盐野七生作品集

（套装33册）

中信出版集团

总　目　录

罗马人的故事（套装共15册）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全集）
马基雅维利语录
盐野七生作品：文艺复兴的故事（全六册）
十字军的故事：全四册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套装共2册）
希腊人的故事（全三册）

罗马人的故事

（15册套装）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总　目　录

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人的故事2
罗马人的故事3
罗马人的故事4
罗马人的故事5
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人的故事7
罗马人的故事8
罗马人的故事9
罗马人的故事10
罗马人的故事11
罗马人的故事12
罗马人的故事13
罗马人的故事14
罗马人的故事15
返回总目录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I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日] 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日本 **商界精英、政要必读书籍**
日产·法国雷诺汽车联盟CEO、索尼集团董事长、
日本钢铁集团总裁 力荐图书

韩国 30名知识分子推荐 教养必读书
50名职业经理人推荐 史上最好的书
100名CEO向青少年推荐 最必要读的书

1

王石　王巍　|作序|
秦朔　吴伯凡　吴晓波　|联袂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日）盐野七生著；计丽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86–3025–0
I. 罗… II. ①盐… ②计… III. 古罗马——历史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2298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Ⅰ: Roma Wa Ichinichi Ni Shite Narazu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2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LUOMA REN DE GUSHI YI: LUOMA BUSHI YITIAN JIANCHENG DE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日] 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金币故事
为什么是罗马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序
第一章 罗马的诞生
第二章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
小结
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公元前527年至前430年，古代希腊城邦国家雅典铸造的货币叫四德拉克马银币。银币正面是头戴皮盔的女神雅典娜头像，背面是雅典娜女

神的守护者猫头鹰。

在实行民主政治、取得波斯战争的胜利以及在伯里克利统治下盛极一时的各个时代，这个图案的银币广为流传，它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繁荣的象征。一想到苏格拉底也曾经使用过它，就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然而，在同时代的罗马，别说是银币，就连铜币也见不到。更多的时候，罗马人是用奥斯提亚海滩制造的盐来支付需要的款项。“工薪族”一词，追根溯源起来，就是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用“盐来付款的人”的意思。

盐野七生

2002年3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发行的金币。这位马其顿年轻的征服者也以其随

风飘逸的长发而闻名。金币的正面是他头戴盔甲、长发及肩的图案，背面是胜利女神尼凯像。铸造年代是在公元前336年至前323年之间，这一期间正是从这位年轻人做马其顿国王开始，经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又东征至印度河，后返回西方，到其33岁时病死于巴比伦结束。

“罗马非一日建成。”处于同时代的罗马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国，还在为统一意大利半岛而战斗。应该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目光投向东方是罗马的幸事。当时的罗马，正忙于扩大其势力范围，并不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别说是金币，甚至连银币他们也不需要。

盐野七生

2003年3月于罗马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

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据说在古罗马有为数极多的神，最多的时候达30万个。这对于来自信奉一神论的国家的人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国家同样信奉众神，所以这种情形不但不会让我感到难以接受，反倒是兴趣盎然。

假如你正坐在古罗马的市中心——古罗马广场遗址倒塌的石柱上，翻看旅游指南或说明书，要是感觉背后有些怪异，那一定是幸存下来的诸神中某个爱捉弄人的神正探着脑袋偷看你的旅游指南呢。他们一定很想知道2000年以后的人们是怎样书写他们的。

“当然，我会认真地书写。”

我不知道爱德华·吉本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爱德华·吉本就是在到访古罗马广场后，才决定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而年轻的阿诺德·汤因比则为了追溯古代罗马，决定骑自行车环游全意大利。

尽管与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相比，我们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到过罗马，不，只要我们寻访过古罗马人的足迹，寻访过他们留在北非、中东以及欧洲的足迹，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

古罗马人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

其智力不及希腊人

其体力不及凯尔特（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其技术不及伊特鲁里亚人

其经济不及迦太基人

但是，就像众多史料所显示的那样，罗马人为自己是罗马人而深感自豪。

但是，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呢？

还有，从单纯的意义上来说，它之所以能够拥有辽阔的疆土，并建立和长期维持大罗马帝国，难道正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缘于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

再者，他们终究未能幸免于衰亡，也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因为统治者很难避免的骄奢造成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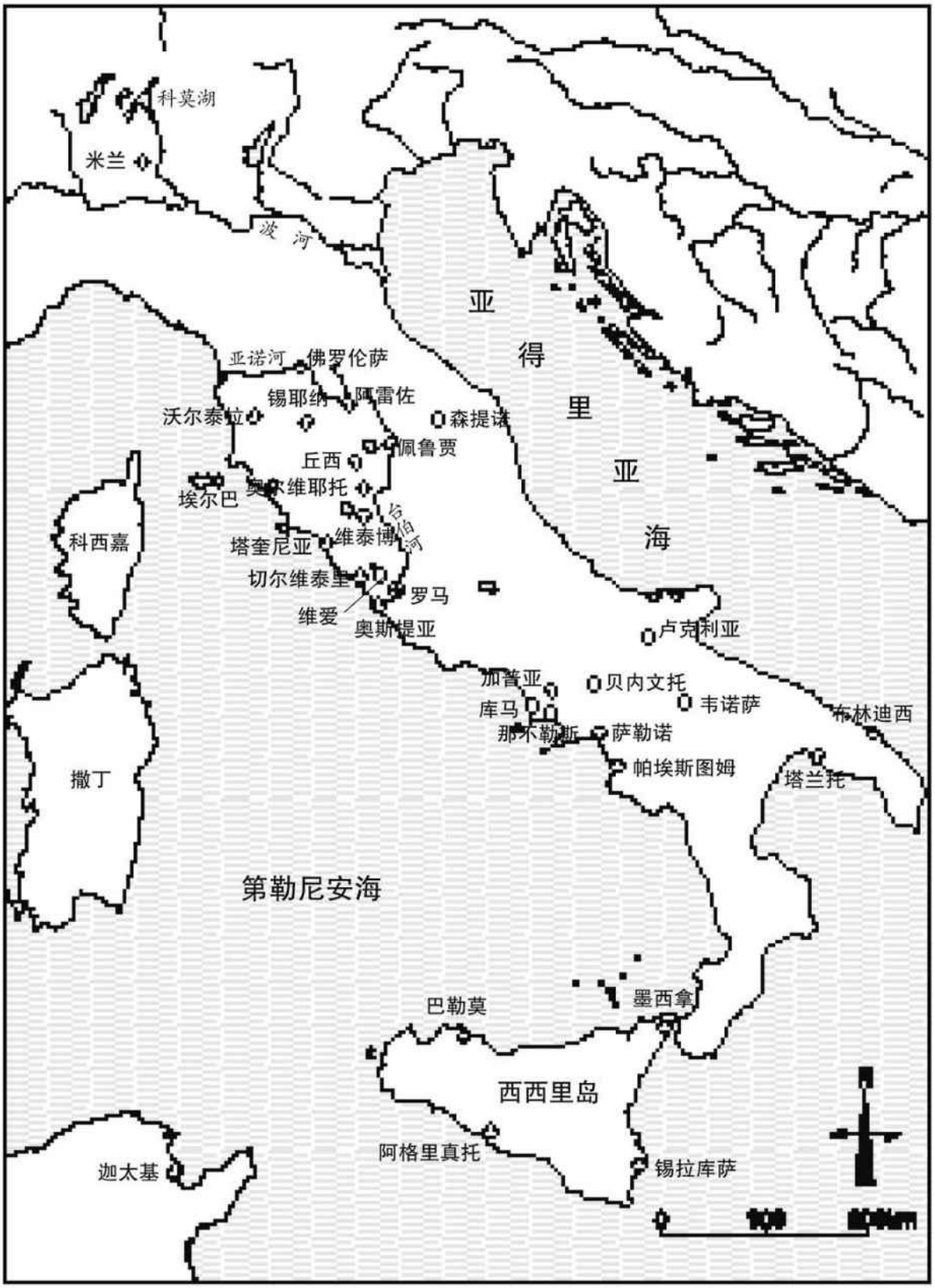
我不想随随便便给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对于人类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构建起来的历史，如果轻易给出答案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也远远没有达到胸有成竹。随着对史实描述的逐步展开，我要思索，希望你也共同思索。

“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大业？”

现在我就要开始写了，你也将开始阅读。在我们的意识里有一个相同的疑问，那就是：古罗马人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

盐野七生

1992年于罗马


科莫湖
米兰
波河
亚
得
里
亚
海
亚诺河
佛罗伦萨
锡耶纳
阿雷佐
沃尔泰拉
森提诺
佩鲁贾
丘西
埃尔巴
奥尔维耶托
台伯河
科西嘉
塔奎尼亚
维泰博
切尔维泰里
罗马
维爱
奥斯提亚
卢克利亚
加普亚
贝内文托
库马
韦诺萨
布林迪西
那不勒斯
萨勒诺
帕埃斯图姆
撒丁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巴勒莫
墨西拿
西西里岛
阿格里真托
迦太基
锡拉库萨

序

公元前167年，有上千人质从正在走向衰亡的希腊被带到了罗马。这些人都是希腊上层社会的人物，36岁的波利比乌斯也在其中。

当时的罗马人非常推崇希腊文化。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些被带到罗马的希腊人质关进监狱，也没有软禁于某个地方，而是安排在罗马共和国境内城镇及村落的有权势人家中。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除了希腊，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行。

在这些人中间，波利比乌斯受到特别的关照，待遇更为优厚。波利比乌斯曾经是坚守希腊独立的最后一个堡垒——阿卡亚同盟中的骑兵军团长，地位仅次于最高司令官。同时，他还是罗马将军之一的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朋友。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后，由于西庇阿的积极争取，住进了西庇阿在罗马的家中。

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是一位武将，他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侄子，同时也是他的养子，曾经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为罗马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西庇阿比波利比乌斯小18岁，所以当时的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但是作为罗马名门望族西庇阿家的男子，他在军事方面已经有过多次令人瞩目的战绩。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是一位非常开明的人，和他的父亲一样，热爱希腊文化。一些素养很高的人经常到他家聚会，参加聚会的这个集体被称做“西庇阿派”，在当时的罗马非常有名。不难想象，出生希腊名门，受过相应的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位高权重、经验丰富的波利比乌斯很自然地受到了“西庇阿派”真诚的欢迎。这时候的波利比乌斯在感慨祖国衰落的同时，悄无声息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似乎还太过年轻。

17年过去了。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亲密关系使这位希腊人质有机会接触到罗马的核心事务，越发加深了波利比乌斯对新兴国家罗马的关心。他去过距离迦太基最近的意大利南部旅行，也随同西庇阿的军队到过西班牙。在又一次随同西庇阿前往非洲的行军归途中，他作了一次长途旅行。沿着汉尼拔走过的路，经过法国南部，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公元前150年，希腊人质获释回归祖国。17年前的1000人此时只剩下300人。

和同胞们一起回国后的波利比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友情依旧。他频频到访罗马，还和已经当选为执政官的西庇阿一起参加了于公元前149年开始的、持续了三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见证了迦太基在经过顽强抵抗后终因不敌对手而于7月7日夜里灭亡。这一年，波利比乌斯57岁。

到82岁去世前的随后20多年里，他写下了长达40章的《历史》。在他之前的历史作品中，大多描写的是以希腊为中心的东地中海世界。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则把着眼点放在了罗马。这是最早一部以真实事件为内容的历史作品。而第一部讲述罗马的真实可信的历史作品就这样由一个非罗马人——希腊人写作而成。

波利比乌斯深知前途渺茫的祖国——希腊所处的混乱局面。同时因为和西庇阿家的亲密关系，他对发展势头正旺的、年轻的罗马也看得很清楚。他发出了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希腊在不断自我瓦解，而罗马却在不断地兴旺发达呢？

这一问让他开始了《历史》一书的写作。波利比乌斯本人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 只要不是太愚蠢，不是太懒惰，大概没有人不希望弄清楚罗马

人为什么在短短的53年时间里，可以成就如此大业，可以处于任何政体之下。

波利比乌斯明确指出了53年的时间，指的大概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因汉尼拔之战失败而告终的公元前202年，到因迦太基灭亡而告终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即公元前146年为止的这段时期。在这50余年间，罗马一跃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此后的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就是罗马的历史。

但是，罗马并非在53年前突然出现的。尽管没有希腊人注意过它，尽管没有哪个外国人打算写它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有一段相当漫长的助跑岁月。起点可以追溯到扎马之战以前500多年的过去，不是五十几年，而是五百几十年。罗马终究非一日建成。

作为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我要讲述的是从罗马建国到第一次、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的500年间的历史。这是一个饱经苦难的漫长岁月里的故事，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它都时常处于进一步退半步的状态，何况有时候甚至后退了十步甚至二十步，要想重回鼎盛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罗马后来之所以能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基本上就是在这500年间萌芽的，就好像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积蓄起来的力量到了三十而立之年才开始了解其真正的价值一样。

第一章

罗马的诞生

逃亡者的传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传承或传说。对于人类来说，想弄清自己的根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愿望。这是一个用科学几乎无法解释清楚的难题，而人们也并不要求科学对此作出解释。人们需要的是一个长篇故事，只要逻辑合理，同时符合他们的感情要求足矣。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故事就是围绕特洛伊沦陷这一件事而展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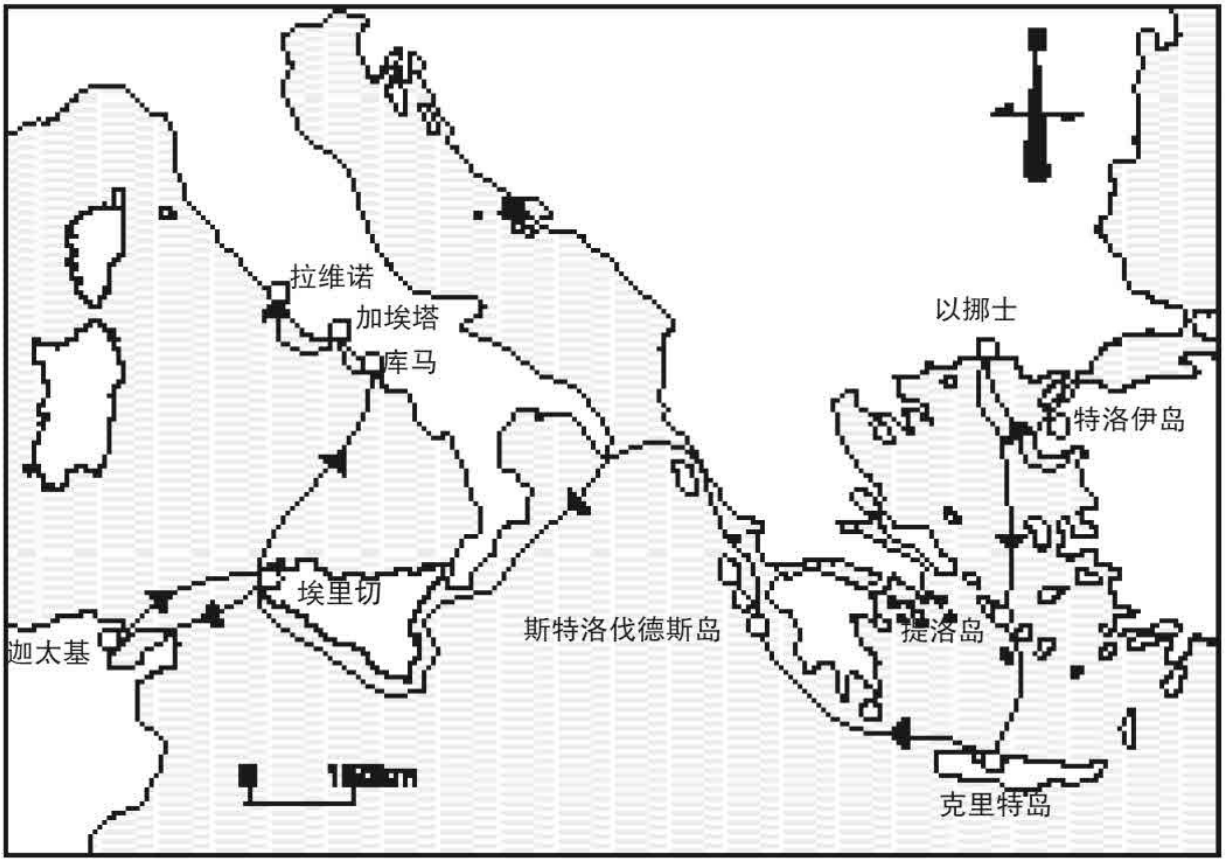
根据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描述，即便在20世纪的今天，这部作品依然不失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之一，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率领希腊军队来到小亚细亚西岸，攻打此地的城市——富饶的特洛伊。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攻防战后，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时刻。希腊武将之一的奥德修斯设计制作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误以为这是希腊人准备放弃战斗，在撤退前给他们留下的礼物，就把它带进了坚守10年之久的城门之中。

就在特洛伊人以为胜利在握而安心沉睡的一个深夜，躲在木马中的希腊士兵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霎时间，特洛伊城陷入一片火海，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宣告沦陷。希腊人不分王族和庶民，对特洛伊人大开杀戒，侥幸活下来的特洛伊人被迫做了奴隶。只有特洛伊王的女婿埃涅阿斯带着年老的父亲和儿子等极少几个人成功逃离沦陷的城市。据说埃涅阿斯是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和凡间男子所生的孩子，他的母亲维纳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希腊士兵兵戎相见。

埃涅阿斯一行人分乘几条船，离开了火海之中的特洛伊城。逃亡者们并未停留在希腊群岛，也没有止步于迦太基，而是在诸神的引导下，沿意大利西岸一路北上，一直到罗马附近的海岸，才终于结束逃亡之旅。此地的王非常欣赏埃涅阿斯，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了妻子。逃

难者终于有了落脚之地。

埃涅阿斯死后，一直跟随父亲和逃亡者一行的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继承了王位。然而，在位30年后的某一天，阿斯卡尼俄斯决定离开此地。他在另一个地方建造了一座名叫阿尔巴隆迦的新城，也就是后来的罗马的前身。



埃涅阿斯的流浪路线

自此，直到罗穆路斯建立罗马王国的漫长岁月里，无数传说中的王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这里我不一一赘述了。不是因为担心罗列一大堆不为人熟知的名字而使读者朋友感到兴味索然，而是因为这里有太多明显是罗马人生搬硬套编造出来的东西。

一直以来，罗马人都坚信是罗穆路斯在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王

国，同时他们还认定罗穆路斯是从特洛伊城逃出来的埃涅阿斯的子孙。然而，在与希腊人开始有了接触之后，他们得知特洛伊城沦陷是公元前13世纪前后的事情。于是其间出现了长达400多年的空白。当然对于罗马人来说，要填补这一时间空白并非难事。在传承传说的世界里，与其追求合理性，远不如荒诞无稽的东西更受人追捧。就这样，在传说中度过了400年后，接下来，传说中的第一位公主登场了。

在王死后，一直觊觎王位的叔叔让阿尔巴隆迦之王的女儿，带着处女之身做了专门服侍神的神子。因为做叔叔的十分清楚自己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王位很脆弱，他害怕一旦公主有了孩子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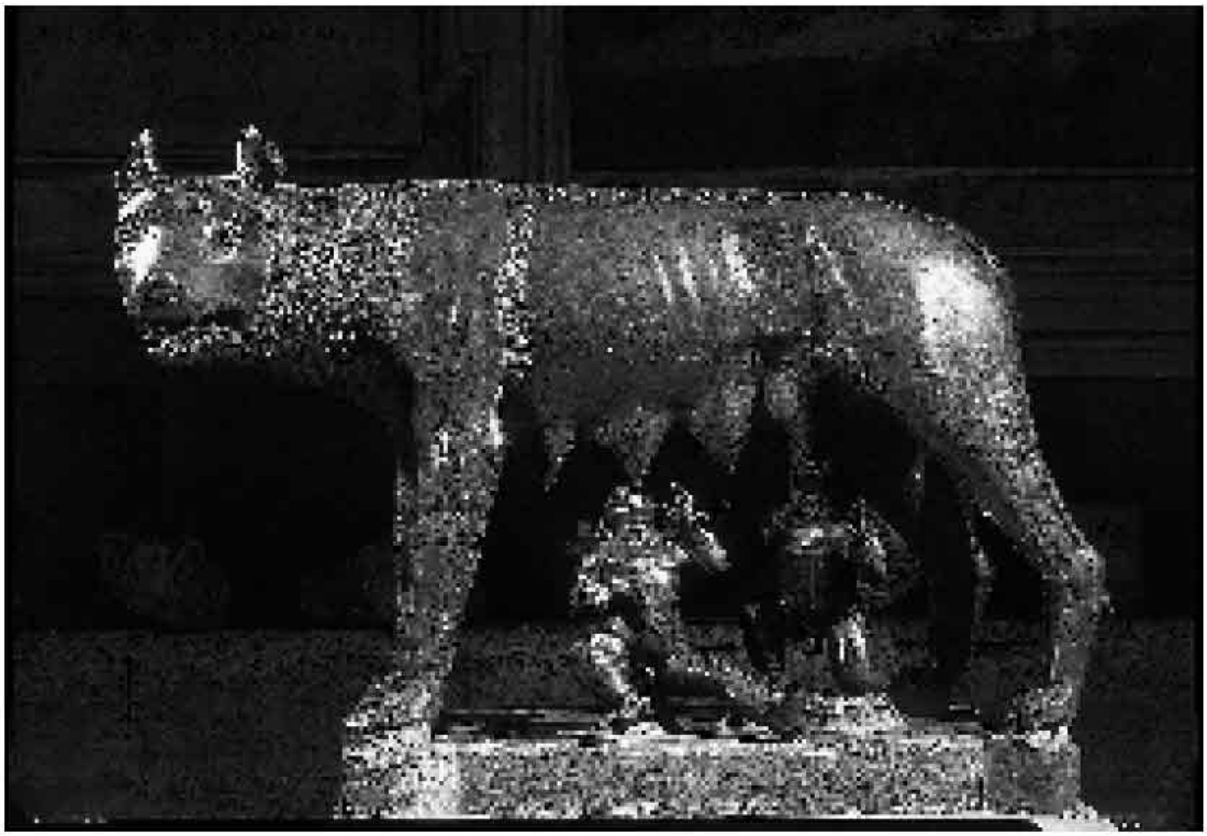
然而事与愿违。有一天，在祭神之余，公主躺在河边睡着了。恰逢此时，战神马尔斯经过她的身边，对她一见钟情。据说从天而降的马尔斯在公主熟睡之际占有了她的身体，而公主始终未醒。大概这就叫神奇吧。随后公主生下双胞胎，分别取名为罗穆路斯和瑞摩斯。

公主的叔叔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他把公主打入牢房，把双胞胎兄弟装进一个桶里投到了台伯河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桶在台伯河上顺流而下，一直漂到河口附近，被河边的草丛挡住了去路。婴儿在桶里大声哭闹，哭声传到了正在附近徘徊的一匹狼的耳朵里。这匹母狼把自己的乳头塞进两个婴儿的嘴里，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

如果由这匹狼来抚养两个孩子，听上去总是不好。所以，随后的情形是狼在喂饱两个幼儿后就离开了，是一个羊倌发现并把他们抱回了家。现在从罗马市区前往莱奥纳多·达· 芬奇机场的路边还经常可以看见一群群的羊，而在2800年前的古代，它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公。

罗穆路斯和瑞摩斯兄弟俩渐渐长大，成了这一地方的羊倌的主人。兄弟俩在与他们不断抗争的同时，扩大着自己的势力圈。随着势力圈的扩大，知道的事情也不断增多。他们因此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

兄弟俩带领属下的羊倌们攻占了阿鲁巴，并杀死了阿鲁巴王。他们的母亲不堪牢狱生活，好像已经不在人世了。兄弟俩没有留在阿鲁巴，也许他们认为坐落在山区的阿鲁巴不够开阔，尽管便于防守，却不宜发展。因为兄弟俩生长的地方位于台伯河的下游，所以他们决定在那里建一座新的城市，此地后来改名罗马。附近的羊倌、农民以及类似身份地位的人纷纷追随战胜阿鲁巴王之后的罗穆路斯和瑞摩斯。



给两个婴儿喂奶的母狼

然而，在扳倒共同的敌人之后，兄弟俩的关系却开始恶化。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双胞胎，难以决定由谁来做王。于是他们只好分而治之，分别在帕拉蒂尼山和阿文庭山上设立各自的地盘。罗穆路斯在帕拉蒂尼山，瑞摩斯在阿文庭山。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两人之间再次起了冲突。起因是瑞摩斯越过了罗穆路斯挖掘的作为势力圈分界线的壕沟。这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以罗马人的想法是绝对不可原谅

的。罗穆路斯杀死了瑞摩斯。

据说以建设者罗穆路斯的名字命名的罗马就这样诞生了，时间是公元前753年4月。此时，在希腊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已举办6届，历史从此开始步入脱离神话传说的时代。

公元前8世纪的意大利

> 意大利半岛位于南国与北国之间。正因为如此，它兼具南北两地的优点。这些优点因两地的相互作用而得以不断地放大，从而决定了位于意大利半岛居中位置的罗马，在地势上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于是智慧堪与神媲美的人类决定在这块地势优越、气候温暖的土地上建立罗马人之都。

这是自罗穆路斯建立罗马王国，经过800年后的帝制初期，建筑师维特鲁威站在城市规划专家的立场上讲述的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罗马的地理位置的确优越。作为适宜国家发展的建都之地，可以说在意大利中部找不出一个地方能够与罗马相抗衡。由此看来，罗穆路斯不仅具备武将的才能，同时还兼备了城市规划的才能。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作为城市建设之地，罗马享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却为什么在罗穆路斯之前没有人在这里建立城市呢？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这里有一些简陋的坟墓和住宅遗迹，经过推算，大约是公元前11世纪前后留下来的。也就是说，在罗马建都之前，这里已经有人生活过。但是看不出可以称之为城市的遗迹。于是人们姑且认为第一个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的人就是罗穆路斯。假如罗穆路斯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他的真实性尚不能确定的话，那么把这第一个人说成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任何人都无妨。

尽管如此，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半岛，至少有两个民族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在地理条件适中的地方轻松建起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市。

他们是正在向意大利中部扩张势力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开始在意大利南部进行殖民的希腊人。对于罗马，这两个民族的态度非常一致——他们都没有看中。尽管伊特鲁里亚人拥有排水开垦的技术，用来开发其时除了七个山丘之外到处都是湿地的罗马并非难事。

在我的想象中，对于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罗马，甚至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许都不是一块足以吸引他们的土地。

希腊是一个通商民族，因此他们又是海洋民族。对他们来说，建设城市的必要条件是有临海的港口。所以，对他们来说，只有沿台伯河才能抵达的罗马，作为城市建设之地并不适宜。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了几个殖民城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如锡拉库萨（又译叙拉古）、塔兰托和那不勒斯都面向大海。

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以产业发展和通商为主的民族。关于城市建设，他们与希腊人的想法不同，他们更喜欢把城市建在微微隆起的小山上。即便是靠近大海的地方，如果不靠山，他们也是不会有兴趣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平原上生活，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小山上、城墙围绕的坚固城堡内。他们的这种性格，只要看佛罗伦萨就能知道。佛罗伦萨的起源虽然始于伊特鲁里亚人，但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菲耶索莱山上。直到罗马人到来并建设之前，亚诺河畔并不存在今天依然完好无损的佛罗伦萨城。

对于伊特鲁里亚人来说，位于罗马的七个小山丘中的任何一个都过于矮小，而且让他们更不能接受的是这七个小山丘的间距又都太近。伊特鲁里亚人最后选择了植根意大利中部，因为这里山岭遍布，山与山之

间的距离适中，而且山顶足够开阔。现在依然完好无损的中等城市锡耶纳、沃尔泰拉、佩鲁贾、丘西、奥尔维耶托等都是始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当你坐火车来到这些城市，出了车站却不能马上踏进市区，至少不能马上进入老城区。你必须乘坐公共汽车，沿山脊线爬到山顶，才能真正走进这些城市的中心。

漫步在这样的城市里，我非常惊讶。他们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建造城市呢？我想，在建设城市方面，除了水、气候等自然因素以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其要求或许都不一样吧。

但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想法不同，终究左右了这三个民族以后的命运：

更愿意选择在防御上万无一失却因此容易阻碍发展的山陵的伊特鲁里亚人。

把城市建在防御不充分却因此可以向外发展的地段的罗马人。

在意大利南部，把城市建在沿海地区，虽然便于通商却忽略了敌人的存在的希腊人。

对于在工学院学习城市工程学专业的人，我强烈建议他们首先要学好哲学和历史等社会学。因为一个城市建在何处也许可以决定这座城市的居民的将来。

伊特鲁里亚人

现在，我们还无法完全解读伊特鲁里亚人的文字。因此，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它是个神秘的民族。我们尚不清楚伊特鲁里亚人是否特指某个固有的民族。即使在古代，伊特鲁里亚人似乎也是对居住在现在的

托斯卡纳、翁布里亚和拉齐奥的人的统称，就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都叫美国人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伊特鲁里亚人来自何方。有历史学家说他们是从小亚细亚横渡大洋而来，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从内陆南下而来。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经掌握了铁器的制造方法。

意大利中部有很多矿山。在此地定居下来的伊特鲁里亚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大自然的恩赐，他们渐渐成长为拥有高超技术的民族。技术力的提高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和同样经济高度发展的希腊人之间的交流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考古学家在伊特鲁里亚人的遗物中，发现了许多出自希腊的壶，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东西竟都出自希腊本土，而非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伊特鲁里亚人除了制造业之外，还开始涉足海上的贸易通商。他们虽然居住在山上，但是通常会有自己的港口，尽管距离可能有些远。所以拥有丰富矿山资源的埃尔巴岛自不必说，他们甚至还到达过科西嘉和撒丁群岛上。环绕群岛的那个海现在仍叫第勒尼安海，而第勒尼安海的意思就是伊特鲁里亚人。

公元前8世纪，他们的势力圈扩张到了北至流经佛罗伦萨的亚诺河，南及流经罗马的台伯河之间的整个区域。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地矗立在这个区域内的城市就像前面所说，都始于伊特鲁里亚，因此它们几乎都在山上。

古代伊特鲁里亚采用联邦制，共有12个城邦国家。在这12个城邦国家中，我们知道的有阿雷佐、沃尔泰拉、丘西、维泰博、奥尔维耶托、塔奎尼亚、切尔韦泰里、维爱和佩鲁贾这9个城市，其中7个城市留存至今。然而，伊特鲁里亚人尽管采用了联邦制，但是各城邦国家的独立倾向非常明显，能做到统一行动的常常只是宗教上的事情，而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要采取统一行动则异常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这12个城邦国家基本上都旗鼓相当，没有一个国家明显比其他国家强大，因此也

没有哪个城邦国家可以占据主导的地位。而正是这一点，后来成了他们的致命之处。

伊特鲁里亚人对死者采用的是遗体埋葬法，所以坟墓建得都很精致，感觉好像是把地面上的房子按比例缩小以后搬到地下一样。一个有权势的人的坟墓内，不仅壁画色彩斑斓，随葬品也极尽奢华。如果单看这些东西，人们一定以为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好战的民族，是一个纯粹靠技术和通商来构建繁荣的平和的民族。尤其是他们的雕像显示出的祥和，甚至可以让看到这些的我们心情变得平静起来。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只是生者为死者的死后生活提供的点缀而已。真实的情况是，伊特鲁里亚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性情并不温和，他们对和平没有偏爱，也不厌烦战争。

围绕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权，他们与迦太基和希腊有过冲突，他们也有用活人做祭品的习俗。让古罗马人痴狂不已、人兽间搏斗的各种角斗项目，原本也是伊特鲁里亚人热衷的竞技形式。如果仅仅根据坟墓内的壁画上极尽享乐的生活场景，就认为这是个耽于享乐而难以自拔的民族，认为这是个好逸恶劳的民族，那无疑是错误的。既然他们拥有值得自豪的一流技术，那么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勤劳的民族，非常具有进取心。伊特鲁里亚人在很多方面对罗马都产生过影响，甚至其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其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不是罗马等国所能企及的。到其鼎盛期，他们的势力范围甚至逼近意大利南部。这一时期，从波河到意大利南部半岛，可分为两大势力：北部属于伊特鲁里亚，南部属于希腊。而罗马就诞生于这两大势力圈的夹缝之间。

希腊殖民势力扩张图

在意大利的希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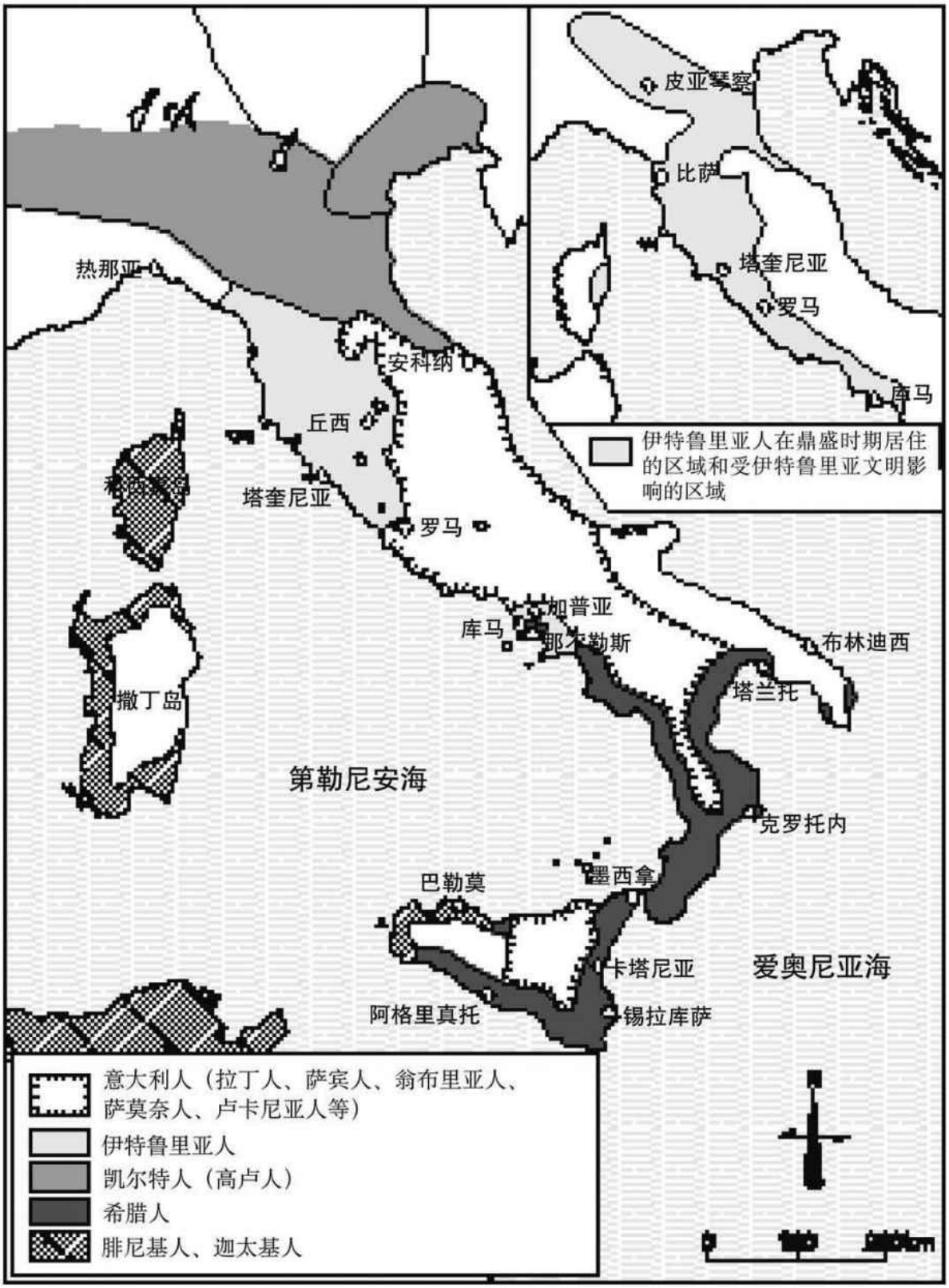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进入了由贵族统治的城邦国家时代（城邦）。与曾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王政时代相比，由于开始从事工业、商业和海运业，经济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人口随之大幅度增加。但是在贵族统治下，政治倾轧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成败之争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多。

在可耕地稀少的希腊，政治失势者和穷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离开祖国，去国外寻找生存之路。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人进行殖民运动的鼎盛时期。而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喜欢冒险的性格加速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希腊人拓展殖民地的规模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东至黑海沿岸，西从法国到西班牙。西班牙的马拉加和法国的马赛都是源自这一时期的希腊殖民城市。

由于意大利距希腊较近的地理条件，这里的殖民城市发展盛况空前，其他地区难以匹敌。一直存在至今的意大利南部诸城市，除极少数源自迦太基外，可以说几乎都源自希腊的殖民城市发展。这些城市包括那不勒斯和塔兰托，以及如今只剩下遗迹的帕埃斯图姆、库马、西西里岛的墨西拿、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等。它们统称为大希腊[德语发音为maga gurekia（Magna Grecia），意大利语发音为mania gureqia（Magna Grecia）]。

之所以叫大希腊，是因为这些城市发展迅速，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繁荣与富强；是因为殖民者是已经具备高度文明的希腊人，所以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尽力做到完美；是因为他们从不为如何与原住民相处而苦恼，就好像这里根本不存在原住民一样；还因为他们是抛弃了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的，一旦失败，他们将没有回头路可走。因此，实现急速发展简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皮亚琴察
比萨
塔奎尼亚
罗马
庞马
伊特鲁里亚人在鼎盛时期居住的区域和受伊特鲁里亚文明影响的区域
热那亚
安科纳
丘西
塔奎尼亚
罗马
加普亚
库马
那不勒斯
布林迪西
塔兰托
撒丁岛
第勒尼安海
克罗托内
墨西拿
巴勒莫
卡塔尼亚
爱奥尼亚海
阿格里真托
锡拉库萨
意大利人（拉丁人、萨宾人、翁布里亚人、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等）
伊特鲁里亚人
凯尔特人（高卢人）
希腊人
腓尼基人、迦太基人

罗马转向共和政体时，意大利半岛上各民族的势力圈

从殖民城市和他们的祖国希腊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了希腊人独立意识很强的个性。

尽管是自己的祖国，但是对于塔兰托人来说，斯巴达是外国；同样，对于锡拉库萨人来说，科林斯也是外国，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密切。希腊人则不然。首先，希腊人是一个更愿意放松心情在海上扬帆航行而不愿意在内陆行走的民族。更何况，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终究还是希腊人，尽管他们拥有一切，却唯独与团结的精神无缘。甚至在大希腊的各城邦之间，也从来不曾出现过共同作战的情形。

刚刚诞生的罗马之所以能在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两大势力之间生存，不是因为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尊重罗马的独立，而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试图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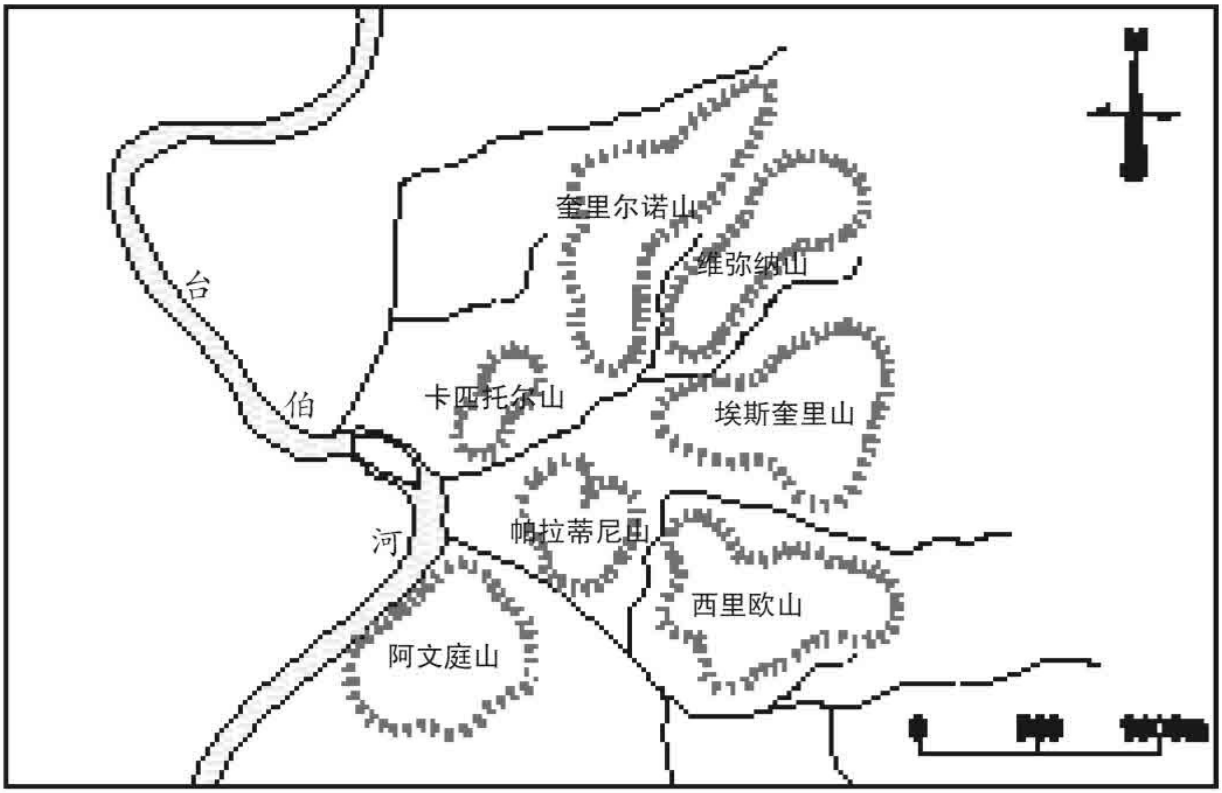
对于既不会制作商品也不会购买商品的人，从一开始就不会引起那些带着商品到处行走的商人的注意。只懂得农业和畜牧业的罗马人，既没有资金购买由雅典工匠精心制作的、漂亮的壶，也没有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伊特鲁里亚生产的、精巧的金属器具。这使得商人们的眼里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存在。再加上罗马所处之地既不靠海又不适合防御，无论对希腊还是对伊特鲁里亚人来说都缺乏扎根于此的吸引力。

由北向南去的伊特鲁里亚人，如果不走海路，就只有走陆路南下。即使中途到了罗马，他们也只是顺着河中毫不起眼的小岛渡过台伯河，然后毫不留恋地继续向希腊人所在的南方前进。对他们来说，罗马不过是途中的一个经由之地而已。既然是经由之地，那么只要不节外生枝就好。就这样，处于发展初期的罗马完全不必担心会有强敌侵扰。还有一点，当时联结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的通商干线主要还是他们从不惧怕的大海。

建国之王罗穆路斯

位于罗马的七个山丘全部集中在台伯河东岸。台伯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全长300多公里。自罗马向前流经约30公里，经过奥斯提亚注入地中海。这条河虽然称不上大河，但是到了罗马附近，水量会大幅度增加。水量丰富的台伯河在罗马附近，首先向西拐一个大弯，接着转而向东，然后又折回向西，最后离开罗马。一旦这里发生洪水，这几个弯道也许很快就会被淹没，水流化做一条粗壮的直线，直奔地中海而去。

罗马的七个山丘尽管位于台伯河附近，却不会受到洪水的侵袭。因为它们都集中在台伯河向东拐了一个大弯的地方。当人口增加到一旦发生洪水，很快就会被水淹没的地带也住上了人的时候，罗马的国体也稳固了，也有了展开大规模治水工程的实力，不必再为洪水灾害而惶恐不安。



王政后期至共和政体前期的罗马

七个山丘从北向南依次是奎里尔诺山、维弥纳山、埃斯奎里山、卡匹托尔山、帕拉蒂尼山、西里欧山和阿文庭山。山丘与山丘之间的平地在当时还是一块又一块的湿地。

这些山丘都很低，连最高的卡匹托尔山海拔也不过50米。相比之下，伊特鲁里亚人建造城市的山，海拔都在300到500米之间。

现在的意大利总统官邸位于奎里尔诺山，负责包括国政选举在内的事务工作的内务部则在维弥纳山。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有关报道的时候，很少听到来自总统官邸的说法，而是说来自奎里尔诺山。同样，报道选举快讯的时候，也听不到来自内务部的说法，而是说这是来自维弥纳山的报道。

让我们重回2800年前。从城市建设的条件来看，如果要说防御，那么这七个山丘中，卡匹托尔山无疑是最适合的。不只是因为它最靠近台伯河，而且还因为此山三面都是陡峭的悬崖。但是，这个山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山顶空地过于窄小。即便是现在，光是罗马市政厅宿舍和两座美术馆加上一座教堂，就已经占据了它几乎全部的空间。于是罗穆路斯最终选择了虽不是最高，但山丘顶部面积有10公顷左右，而且距台伯河又相对较近的帕拉蒂尼山。卡匹托尔山则作为诸神的住处。同样靠近台伯河，而且也有足够的空间供人们居住的阿文庭山，因为处于七个山丘中的最南端，所以远离中心。与罗穆路斯发生冲突而被杀的瑞摩斯曾占据的就是阿文庭山。

瑞摩斯死后，罗穆路斯成了罗马唯一的王。他首先在帕拉蒂尼山周围筑起城墙，意思是要在这里建设城市。他还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仪式，为诸神献上祭品。这一天是公元前753年的4月21日。就这样，作为罗马建国纪念日，这一天在随后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节日。

这一年，罗穆路斯18岁。通过这位年轻人和追随他的3000名拉丁人

的努力，罗马建立了国家。

罗马建国后，作为第一代国王，罗穆路斯并没有独揽大权，他把国政分成三个机构，分别是国王、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并由这三方共同治理罗马。

作为宗教祭祀、军事和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国王由市民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曾经是羊倌和农民领袖的罗穆路斯本人一定认为自己这个王不是自封的，而是经过市民大会选举的。国王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的这种制度，不是君主政体，却是当时的罗马最为自然的选择。

罗穆路斯设立了元老院。他召集100位长老参加元老院。我不清楚为什么元老院的人数是100人。我猜想也许是当时把各门第的长老全部召集起来后，一共就这么多吧。元老院议员不是政府官职，他们的职责是向国王提出忠告和建议，所以不需要通过市民大会的选举。但是这些议员所属的元老院是官方机构。尽管这是个以听取有权势者的意见和建议为目的的机构，但是只要有助于政体确立，那么给他们一个官方的地位或许更有利吧。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就无法明确它的作用和职责。向国王提供意见和建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受国王个人的情绪所左右。

元老院议员又称“父老”，意思是父亲，也就是建国之父。据说这个词后来又衍生出了“贵族”一词。

市民大会由全体罗马市民组成。它的任务是选出以国王为首的各级政府官员。市民大会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但是对国王听取元老院的建议后制定出来的政策有赞成或反对的表决权。此外，在对外关系上，是战是和，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可实施。

这就是罗马建国之初的国家基本形态。它一方面符合当时的罗马国情，同时它也是一种可能适用于将来的、简单而完美的、非常行之有效

的政体。

那么，和罗穆路斯一起参与罗马建国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知道罗穆路斯当上罗马国王之前率领的羊倌和农民都是拉丁人，属于拉丁民族，使用拉丁语。但是，这些说拉丁语的人并不是带着家眷一起移居到台伯河沿岸，共同建设新国家的。事实是，刚刚诞生的罗马的市民中，绝大多数都是单身男人。因为在政体确立以后，罗穆路斯着手进行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掠夺其他民族的女人。

既然罗穆路斯及其属下的男人们不惜向其他民族诉诸武力以期补充女性，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来历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罗穆路斯和他的属下很可能是被他们所属的部族赶出去的。因为正常的部族迁徙应该会带上妻儿家人。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后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的罗马建国者故事就容易流于平庸，从而让他们的子孙感觉兴趣索然。因此，罗马人才编出了埃涅阿斯的游历故事，说他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的孩子，同时又是特洛伊勇士，还生拉硬扯地把他和罗穆路斯联系到了一起。

神话传说的价值并非在于它们的可信度有多高，而是在于有多少人经过多么漫长的岁月依然对其深信不疑。罗马人始终坚信自己是特洛伊勇士的后代，而关于这一点，希腊人曾经也深信不疑。

因此，类似“萨宾女人被掠”之类的故事给后世画家普桑、鲁本斯等人提供了极好的绘画素材。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事情的起始和结局是这样的：

罗穆路斯热情邀请了居住在附近的萨宾人参加罗马的祭祀活动。当时，在祭祀诸神的日子里，一切战斗都是禁止的。萨宾人于是接受罗穆路斯的邀请，全体出动来到了罗马。

就在祭祀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罗穆路斯一声令下，罗马的年轻人向萨宾人的年轻姑娘们发起了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萨宾的男人只能护着自己的妻儿老小逃回自己的部落。

萨宾人自然不甘屈辱，他们不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强烈要求罗马归还被抢的姑娘们。而罗穆路斯对于这一要求自然是一口回绝。他告诉对方说罗马的男人将和这些女孩子正式结婚，娶她们为妻。不仅如此，他还率先举行了婚礼。如此看来，此时的他大概也还是个单身。然而，即便如此，不甘受辱的萨宾人依然无法平息心中的怒气，他们向罗马宣战了。

罗马和萨宾人之间共发生了四次战斗，几乎都是罗马占上风。据说其中的一次战斗是在帕拉蒂尼山和卡匹托尔山之间展开的，所以罗马方面大概也曾陷入过被动吧。事情出现转机是在第四次战斗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被罗马人抢去的萨宾女人突然闯入战场。她们纷纷表示对于丈夫和亲兄弟之间的相互杀戮不能再坐视不管了。这些女人知道，虽然自己是被抢去的，但是她们并没有被逼为奴。她们不仅享有充分的作为妻子的权利，而且从罗马人丈夫那里得到了爱情。

罗马国王罗穆路斯和萨宾国王塔提乌斯一致认为应该听取这些女人的意见。两个部族于是开始了和平共处。

在欧美国家，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习俗，就是男女结婚时，新郎要抱着新娘跨过新居门槛。这是在萨宾女人被掠事件发生后，作为罗马人的习俗沿袭至今的一个例子。

当然，罗穆路斯为后世的罗马人留下的习俗不只是丈夫抱着新娘迈过自家门槛这一桩。

罗穆路斯向萨宾人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不是建议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而是建议两个部族合并起来。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要萨宾

人放弃自己的领地，移居到罗马。而七个山丘之一的奎里尔诺山被提供给他们作为新的居处。

萨宾人接受了这一建议。原因是在四次战斗中萨宾人都输给了罗马人，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和强者合并，肯定利大于弊。再说，两个部族的合并完全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并非罗马人吞并萨宾人。合并后的罗马由萨宾国王塔提乌斯和罗穆路斯共同治理。于是，罗马有了两个王。

两个部族合并后，萨宾全体自由人享有和罗马人完全相同的市民权利。在保证他们有关私有财产的种种权利的同时，他们也享有在市民大会上的投票权。而且，罗穆路斯还为萨宾长老提供了在元老院的席位。

对罗穆路斯来说，这也许是为了增加罗马人口和强化军事力量的一个策略。其结果却使当时的罗马取得了远远大于他们预期的效果。对此，普鲁塔克在《列传》中是这样说的：

> 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的了。

作为建国之王，罗穆路斯成就的另一番事业也很理所当然，那就是依靠战争确保自己的领土。由于萨宾国王塔提乌斯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战死沙场，所以作战指挥权几乎都落在了罗穆路斯一个人的手中。罗穆路斯长达37年的统治期间，有一大半时间都处在一个新生国家不可避免的宿命中，那就是始终都在和邻近部族作战。罗穆路斯制定了以100个士兵为一队的百人队制度。这是罗马军队中的最小单位，是战斗的核心。只要罗马存在一天，百人队制度就会一直存续下去。

接二连三的战斗，出现的阵亡者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罗马的人口和它的战斗力在一点一点地增加。与萨宾人之间的合并，从短期看也是成功的。

公元前715年，罗穆路斯的统治迎来了第39个年头。这一天，罗穆路斯和以往一样正在检阅军队。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骤雨倾泻而至。倾盆大雨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压倒了一切。

等到雨过天晴，人们看到国王的座位空了，哪儿都不见罗穆路斯的身影。于是人们纷纷传言国王被神召到天上去了。

对于罗穆路斯的功绩，所有人都很认同。所以当不幸突然降临时，人们在悲痛欲绝之余，决定认罗穆路斯为罗马国家之父，作为神来祭拜。

继罗穆路斯之后，第二任罗马国王并没有很快产生。其间的过程不太顺利。首先，在罗穆路斯死后，罗马人之间悄悄地在传播一个流言，说国王是被元老院的议员杀死的，原因是他们嫉恨他的权力日渐增大。其次，拉丁人想当然地认为新的国王应该从拉丁人中选出，而萨宾人则希望由萨宾人做国王。元老院受命负责协调此事，却没有能力完成这样一个重任。这时，元老院出现了两个派系：一派为亲罗穆路斯派，另一派则是反罗穆路斯派。也许杀害罗穆路斯的是元老院的某些人这一流言确有其事。

在这种情形下，找第三者做国王是较为现实的做法。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了一个以人格优秀著称的人物身上。

第二代国王努马

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施展其才华的事例，在各民族走向兴盛的历程中比比皆是。在漫长的罗马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就有很多，而努马的即位就是其中一例。

罗穆路斯在位期间，罗马和萨宾合并后，有大量萨宾人移居罗马。

而努马坚持留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他是一个读书型的人，晴天下地劳动，雨天在家学习，农耕之余努力探索知识。其道德之高尚、教养之深厚，罗马人早有所闻。

对拉丁派和萨宾派之间的王位之争束手无策的罗马元老院一致同意推荐努马为罗马国王。长老们来到萨宾的领地，找到努马，向他转达了元老院的决定，请求他继承罗马王位。最初努马拒绝接受这一请求，因为此时的他已年届40岁。在当时，40岁的年龄已经不再适合开启新的人生了。

然而，经不住长老们一次又一次的劝说，努马最终还是答应下来，随他们一起来到了罗马。努马进罗马城的时候，没有穿军装，也没有卫兵手举束棒斧子的国王权杖跟随其后，而是用托加遮住头部的神官形象。

在征得市民大会的同意后，正式继承王位的努马并没有实施神权政治。

罗马国王既不同于集王与神为一体的埃及法老，也不同于带有浓厚神官色彩的、作为神和人之间的纽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当然也不同于给人豪族首领印象的希腊国王。

罗马国王不是神的替身，他是罗马共同体意志的代表，他要率领罗马共同体不断进步。虽然是终身制，却不世袭，还要通过选举产生。罗穆路斯有孩子，但是没有一个罗马人想过请他的孩子来继承第二代王位。所以，与其说是国王，倒不如说是终身制总统更为准确。

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中关于努马的功绩是这样描述的：

> 就任王位后的努马，试图对依靠武力和战争打下建国基础的罗马进行立法和习俗的改革。

这里所谓的立法改革，不是要制定全新的法律，而是要建立秩序，要让当时喜欢逞强好胜的罗马人懂得做人的礼法。在了解自身力量的局限性的同时，让他们懂得要对超越自身极限心存畏惧。

战神雅驽斯同时也是大门及出入口的保护神，努马为他修建了一座神殿。大概是因为雅驽斯表示出和入的意思，他的雕像有两个脑袋，分别面向前后两个方向。在雅驽斯神殿完工后，努马向人们展示了神殿的前后两个门。他说，这两个门要在战时打开，和平时期关闭。在努马统治罗马的43年间，据说这扇大门始终都是关闭的。

但是，在努马死后，这扇大门几乎都是开着的，很少关闭。公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有过短暂的关闭，但是，没多久又被打开。在尤里乌斯·恺撒死后的内乱中，屋大维于公元前31年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联军，终于第三次关上了这扇门。

战神雅驽斯

努马认为除了为防御的需要而战之外，这一时期的罗马不需要战争。他集中力量致力于振兴农业和畜牧业。目的是为了将来在战争取得

胜利后，即使不对失败者进行掠夺也能做到自给自足。

努马还对罗马市民进行了职业分工，让每个人归属于有独立保护神的团体。为此，罗马出现了许多团体，如木工公会、铁匠公会、染色工公会、陶艺工公会等。建立这些职业团体的目的，不仅让人们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还可以防止拉丁人和萨宾人之间的部族对立。当时的罗马，除了这两个部族，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大量涌入。伊特鲁里亚人甚至还成立了自治团体。罗马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摩擦极易发生，如果没有一些预防措施，国家很难有所作为。

努马为了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有序，还进行了历法改革。

罗穆路斯时代的罗马，每年的总天数不固定。为此，努马根据月亮的盈亏，把一年分成了12个月，规定总天数为355天。余下的天数每隔20年作一次调整。努马制定的历法延续了650年，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直到恺撒重新修正历法后，才把一年的总天数定为365天。

努马对一年中每个月的顺序也作了调整。例如，原来的3月是每年的第一个月，努马把它换到了第三个月；原来的11月和12月调到最前面，变成1月和2月。只是，对每个月份的称呼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大概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叫法，担心改动太大会引起混乱吧。但是，9月以后的称呼前后不一。

下面列举的是每个月的称呼，分别用日语、拉丁语和英语表示。虽然英语的母体不是拉丁语，但是我也把它列入了其中。这是因为我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了解英语和罗马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语	日语	拉丁语	英语	
1月	睦月	Ianuarius	January	据说词源是雅努斯神。

2月	如月	Februarius	February	好像出自意为洁净的purificatio一词。宰杀家禽就在这个季节。
3月	弥生	Martius	March	词源是战神马尔斯。
4月	卯月	Aprilis	April	可能出自意为开花的aperio。
5月	皋月	Maius	May	出自旅行和商业之神Mercurius（墨丘利）。
6月	水无月	Iunius	June	词源可能是Iuno女神（朱庇特神之妻），也可能是iuniores，意思是年轻人。
7月	文月	Iulius	July	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这个月，这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当然在恺撒遇刺的公元前44年之前不用这个称呼，而是叫Quintilius，意思是第五个月，即从3月开始数的第五个月。
8月	叶月	Augustus	August	这也是为了纪念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而取的称呼。共和政体时代一直叫Sextilis，意思是从3月开始数的第六个月。
9月	长月	September	September	从3月开始数的第七个月。
10月	神无月	October	October	第八个月的意思。
11月	霜月	November	November	第九个月的意思。

12月	师走	December	December	第十个月的意思。

努马还规定了一年中的节日和休息日。

每个月的第九天和第十五天为集市日。对罗马人来说，这两天就是休息日，他们会从田间劳作中解脱出来，拿着各自的作物前去赶集。除此之外，还有祭祀诸神的祭祀日。据说全年节假日共有45个。在这些节假日里，所有公务一律停止。

但是第二代罗马国王努马的功绩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有关宗教的改革。

在罗穆路斯时代，罗马人就已经有了很多神。努马即位以后，着手对这些神进行了整顿。尽管后来还是和希腊诸神混为一谈，但是，有一些神对罗马和希腊都同样重要。如诸神之王朱庇特神（希腊人叫宙斯，英语叫朱庇特）、其妻朱诺女神（希腊人叫赫拉）、专司美和爱的女神维纳斯（希腊人叫阿弗洛狄忒，英语叫维纳斯）、狩猎女神黛安娜（希腊人叫阿尔忒弥斯，英语叫黛安娜），还有学问和艺术之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战神马尔斯等。此外，雅驽斯等神则是拉丁民族自古就有的神。而先王罗穆路斯是在死后被罗马人神格化，加入罗马诸神行列里的。

努马为诸神设立了等级制度，但是没有规定哪些是罗马之神。目的是要让大家懂得尊重诸神的重要性。

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和以犹太教、基督教为典型的一神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多神教从不祈求诸神来纠正人类的行为道德，而这正是一神教中的神的专利特权。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会发现，多神教中的诸神有着和人类相同的缺点。既然他们的职责不是纠正人类的道德行为，有缺点自然无大碍。但是一神教的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缺点，因为它的

职责是纠正人类的道德行为。

“摩西十诫”是由以下10条构成的：

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3．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4．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5．当孝敬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盗。

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罗马人认为神无处不在，他们甚至把曾经的国王也当成神来供奉，所以第一条戒律对他们是不适用的。罗马人除了神像，还喜欢雕刻祖先像，所以第二条戒律也不适用于他们。至于第三条戒律，因为罗马人开口闭口朱庇特神或赫丘利之名来代替说“糟糕”，因此也不适用。第四条中的安息日，也就是罗马人的休息日，这样的日子里，罗马人除了平时要做的事不做外，什么都可以做，而不只是祷告。

至于第五条至第十条戒律，无疑，罗马人也知道应该遵守。因为这六条戒律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不是信不信宗教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愿意与野兽为伍还是愿意做人的问题。即使摩西不说，相信人们也会遵守吧。

其实，对照“摩西十诫”，从犹太教派生出去的基督教，也只有第一条忠于犹太教。尽管它是一神教，但其实基督教在很多方面都吸纳了多神教的方式。例如，和多神教一样，他们也刻雕像，也会开口闭口叫神或主的名字，他们一边说着“糟糕”，一边高喊“我的上帝”、“基督”！甚至在安息日里，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做运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才会成为世界性宗教吧。

第五条至第十条戒律都是用来规范人类行为和想法的，从宗教的角度看，基督教和犹太教没有区别。善于妥协意味着善于洞悉人类的心理，但是，基督教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一神教。

那么，罗马人既然不祈求诸神纠正自己的道德伦理，他们祈求的又是什么呢？

是保护神。他们祈求的是诸神的保佑。首都罗马的保护神是最高神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战场上，他们有战神马尔斯和雅驽斯神保佑；农业上，他们有谷物女神刻瑞斯保佑；葡萄酒酿造业中，他们有酒神巴克斯保佑；发展经济方面，他们有商业旅行保护神墨丘利保佑；生老病痛，他们有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保佑，而朱诺女神则是幸福婚姻和妇女的保护神。神的数量之多数不胜数。罗马人坚信这些神都在保佑自己。无数神寄宿于罗马，其数量之多就连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希腊人也自叹弗如。之所以罗马会有如此众多的神，原因自然在于罗马人具体而现实的性格。罗马人从不排挤其他民族的神，他们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引进其他民族的神。也许他们认为保护神越多照顾到的地方就越大吧。

不过，在古罗马，保护神并非只是无原则地乐善好施。对于什么都不做的、好逸恶劳的人，任何神都不会给予保佑。罗马人认为在一旁默默支持努力上进的人才是保护神应有的姿态。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维里普拉卡女神，她是调解夫妻矛盾的保护神。

夫妻之间发生争吵，通常起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在任何一

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通常夫妻吵架，双方都认为理在自己这边，所以为了说服对方，声音会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说话会被认为是理亏心虚。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这时如果一方为了不让对方有开口争辩的机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另一方自然会怒从心起，结果甚至可能发展到大打出手。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果，两人决定去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庙。

神庙里只有女神雕像，没有神官或其他什么人。因为在罗马，大到祭祀诸神的神殿，小至神庙，如果所有神堂都配上神官的话，即使动员全罗马所有的人恐怕也不够。但是每个神庙有每个神庙的规矩，信奉诸神的罗马人在没有旁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一定会遵守。维里普拉卡女神庙的规矩就是在女神面前，向女神倾诉的时候一次只限一人。

这样一来，在一方倾诉的时候，另一方就不得不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默默倾听的过程中，渐渐地，他会意识到对方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就在双方一次次交替倾诉和倾听的过程中，原先激烈冲动的声调会慢慢地趋于平和，直至在离开神庙的时候，两人已经和好如初。

细细想来，其实希腊和罗马向神寻求保佑的想法是人性极其自然的一种愿望。与犹太教相比，更具灵活性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更关注这一点。但是，基督教终究是一神教。保护神的职责是保佑圣徒。如果要记录下每个保护神的职能范围，恐怕难以一一说清，因为就连和别人私通的男人都有保护神保佑。基督教不能把神看做保护神，所以就说圣人。现代国家意大利也有圣人，它是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但是，富于协调精神的基督教圣人似乎也管不了夫妻吵架。

努马还整顿了神官组织。神官专门为保护罗马人的诸神服务。神官阶级之长由最高神祇官担任，下设5至10位神祇官。此外还有负责保护圣火的神子，她们要连续工作30年，其间必须保持处女之身。另外，还设了十来位祭司，根据鸟飞的样子和啄食的方式等，来占卜国事的吉凶。

每次作战前，祭司都要占卜。通常我们认为一旦卜到凶签，军队会因此而撤退。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罗马人很少这样做。

首先，罗马人认为，只要不是亲眼所见，那么无论是凶签还是吉签都没有效力。所以即便卜到了凶签，只要祭司在占卜的时候，闭着眼睛做就行了。

其次，判断吉凶是祭司的职责，一个签是好是坏全凭他们的解释。对于祭司来说，让鸟给出军团指挥官希望得到的神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只要士兵相信卜到的是吉签就可以了。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最清醒的。

但是，我们看罗马宗教，可以发现一个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的特点，罗马没有专职神官。罗马不设脱离凡尘俗世而只做神和人的纽带的神官。

罗马的神祇官和祭司不是神谕的代言人，也不是神在地球上的替身。要成为神官或祭司不需要特别的才能，也不需要为培养这种才能而进行特别的训练。除了神子，他们的生活和普通人完全一样。而且，从最高神祇官到祭司，都是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和以执政官为首的政府官员的产生没有任何不同，说起来其实就是国家公务员。但是，如果这样说，他们的神秘感就会减少许多，当然好处也不少。

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所以既不会对其他阶级或官职产生嫉妒，也没有必要为了保全自己所属的阶级而过分执迷于对宗教的尊重。在罗马，宗教和政治之间不会出现明争暗斗或相互利用的情形。自然状态下的政教分离也许是努马最重要的一个功绩。

生活在公元前后交界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厄尼索斯在其著作《古罗马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使罗马强大起来的要因在于他们对宗教的见解之中。

对罗马人来说，宗教不是指导原理，它只是精神寄托。因为有宗教信仰，人性不再受到禁锢。尽管强有力的指导原理有很多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就是拒绝一切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根据狄厄尼索斯的说法，罗马人对宗教表现出来的不是盲目的迷信。罗马人的宗教既不排他也不自闭，与异教徒或邪教的概念相去甚远。虽然罗马人也发动战争，但是他们从来不进行宗教战争。

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不只在于纯粹的神的数量，还在于是否认同他人信奉的神。认可他人的神，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存在。尽管现在距离努马时代已经过去了2700年，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从一神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虽说如此，当愿意纠正人类道德伦理和行为的宗教没有出现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想沦落为与野兽为伍，那么个人也好，国家共同体也好，就必须有一套自我约束的体系。对罗马人来说，这种体系就是家长集权的家庭，以及由罗马人制定、不管你喜不喜欢罗马都不得不遵守的法律。

宗教在不同教派信仰的人之间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法律在没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也能发挥其作用。不！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才需要有法律。罗马人比任何人更早、更强烈地意识到了法律的必要性。考虑到他们的宗教性质，我想这无疑是最自然的一个选择。

和罗马人一样从不向神祈求纠正人类伦理道德的希腊人转而在哲学中探索真理。哲学源自希腊，尤其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思潮正是希腊人思考自身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向宗教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犹太人。

向哲学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希腊人。

向法律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罗马人。

就在这一点上，这三个民族的特点可见一斑。

那么，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努马的改革是如何取得根本性的成功的呢？

刚登上王位时，努马甚至还不是罗马市民，在罗穆路斯时代移居罗马、和拉丁人一样已经成为罗马中坚力量的萨宾人也没有给予他全力的支持。也就是说，努马既没有支持他的势力，也没有血统的优势，只是一个异邦人荣幸地当上了罗马国王而已。他之所以能继承王位，是因为元老院的再三邀请，当然也得到了市民大会的一致通过。但是仅凭这两点，显然基础薄弱。因为，首先，如果元老院对他不满意，完全有可能像对待罗穆路斯那样暗杀他。其次，民众的支持充满变数。再则，就算用语言进行说教，能明白道理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太多。还有，努马不像罗穆路斯在军事上有过辉煌的战绩，而这一点恰恰最难以让民众信服。

他就任王位后，马上解散了由300士兵组成的先王罗穆路斯的护卫队，然后脱去象征王权的紫衣，经常一身白色的神官托加，独自一人跑到森林中去。每当此时，人们纷纷传言，说努马正在森林深处和女神交谈。人们坚信努马在那里通过女神接受诸神的旨意。事实上每次从森林出来，努马都会向市民大会提出新的建议。对他的这些建议，不仅市民大会会无条件地采纳，而且元老院也会一致通过。可见，所谓权力并非只是单纯地依靠武力来行使的，努马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努马在统治罗马43年后，大概是受到了女神们的邀请，安详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第三代国王托里斯·奥斯蒂吕斯

继努马之后，登上王位的是托里斯·奥斯蒂吕斯。他是拉丁系罗马人，和罗穆路斯一样，是个崇尚对外进攻的男人。通过努马的改革和整顿，内部得到充实的罗马，在这个男人的率领下，迎来了向外扩张的时代。

国王托里斯把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放在了阿鲁巴。因为这里被认为是拉丁民族的发祥地，所以也是罗马人的祖先之地。要找一个开战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生活在两国国境线附近的农民之间时有争端。掠夺了对方的财物，阿鲁巴方面拒绝作出赔偿。这就是开战的理由。

但是，与仅有80年历史的罗马相比，阿鲁巴是一个拥有400年历史的独立国家，不是轻易就能打败的对手。托里斯借口强大的伊特鲁里亚就在附近，无谓的流血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他建议双方各派代表，以决斗的形式决定胜负。

两军都有三兄弟同时从军的士兵。他们是荷拉斯家的三个年轻人和居里亚斯家的三个人，分别代表各自的祖国和对方展开决斗。双方约定决斗失败的一方将无条件地接受获胜方的统治。

6个年轻人分别从各自的队伍中出列，站到了两军阵前。听到一声令下，在提心吊胆地观战的两军士兵面前，6个手执刀剑的骑士之间的决斗开始了。

经过激烈的交战，罗马方面有一人首先倒下，接着又有一人死在阿鲁巴骑士的剑下。剩下的唯一一个罗马骑士惊恐万状，他伺机逃离了决斗现场。他边跑边向后看，发现阿鲁巴三个骑士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大。于是，他瞅准时机勒住缰绳，转身打倒了第一个追来的阿鲁巴骑士，接着又成功撂倒第二个对手。这时对方也只剩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比拼的是各自的武力和体力。最后罗马骑士荷拉斯取得了胜利。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阿鲁巴王无法接受一次决斗就决定国家命运的这一结果。他不仅没有遵守承诺，还煽动邻近部族起来反对罗马。为此，罗马不得不应付邻近各部族的挑衅，暂时顾不上要求阿鲁巴王履行诺言了。其间，阿鲁巴王态度暧昧，一味地静观战局的发展，而这一极其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阿鲁巴的灭亡。

战况在罗马占绝对优势的状态下发展。但是亲率军队、战斗在第一线的国王托里斯真正的目标不是眼前这些部族，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是阿鲁巴。打败邻近各部族，成功制伏了他们之后的罗马军，一举向阿鲁巴发起了进攻。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罗马军就占领了阿鲁巴，阿鲁巴王被生擒活捉。

对于阿鲁巴未履行和罗马之间的约定，托里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到了阿鲁巴王的头上。他命人把阿鲁巴王的两只脚分开绑在两匹马上，策马向两个方向拉扯。这是罗马人最早的极刑。

阿鲁巴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居民们被强行移居到罗马。不过，托里斯没有逼他们为奴，而是给了他们罗马市民的身份，和罗马人享有同等的市民权。西里欧山成了这些人的新居所。昆提卢斯、塞尔维乌斯、尤里乌斯等阿鲁巴有权势的门第成了罗马贵族，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得到了元老院的议席。如果这个时候的阿鲁巴人或被灭绝或被逼为奴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了后来出自尤里乌斯这一家族的尤里乌斯·恺撒了。

对罗马人来说，攻打阿鲁巴的意义绝不同于和邻近各部族之间的纯粹的交战。攻占阿鲁巴意味着罗马从此成为拉丁民族的祖国，罗马不再是被各部族赶出去的人聚集在一起建起来的、另立门户的城市，而是拉丁民族的大本营。罗马人继承了罗穆路斯同化战败者的政策，同时也制定了严惩不守承诺者以及叛逆者的规定。

因为萨宾人的加入得以倍增的罗马人口，又因为有了阿鲁巴人的加入而进一步增多。给予被同化者以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他们有同等的义

务。当时市民的首要义务是服兵役，罗马的战斗力因此增强了许多。

托里斯率领这一支军队一次又一次出征，取得了比罗穆路斯更加辉煌的军事战绩。他的统治历时32年。根据历史学家李维的说法，他是死于雷劈。

第四代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

托里斯死后，经过市民大会选举，安库斯·马尔西乌斯成为罗马第四代国王。他是萨宾人，出生于罗马，其母是努马的女儿。外祖父努马去世的那年他才5岁，所以他登基的时候是37岁。也许人们会以为他和努马一样，也是个和平主义者，然而时代不允许安库斯做一个这样的国王。

在先王32年的统治期间，罗马始终在与母国阿鲁巴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交战。因此，安库斯自然无法避免参加与拉丁部族之间的战斗。

不断的战斗表明罗马已经积蓄起力量，并发展成为周边部族不容忽视的强大国家。事实上，随着罗马整体实力大增，它已无法避免与周边部族的武力冲突。

居住在罗马的拉丁人和萨宾人，再怎么说还是拉丁人和萨宾人。罗马人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国家是由那些被赶出原住地的人以及希望移居在此的人共同建起来的。所以，在罗马附近，拉丁人和萨宾人的“母国”依然存在。例如，说阿鲁巴是拉丁人的发源地，它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城邦国家而已。鉴于这样的背景，这些邻近部族和新兴罗马之间的关系，使得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再难关闭。

第三代国王托里斯并没有因自己是拉丁人，就倾全力与萨宾人交战。而第四代国王安库斯也没有因自己是萨宾人，就把作战的目标指向

拉丁人。事实上，托里斯攻占的正是和他本人血脉相连的阿鲁巴。

他们都已经是罗马人了。如果一定要说出他们之间的不同，最多也就是拉丁系罗马人和萨宾系罗马人的区别。而这些“罗马人”并没有通过战争把战败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以及其他民族看做被征服者而让他们臣服于自己，也没有逼他们为奴。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改变“罗马化”的做法。

他们只是强行要求战败者移居罗马，给他们和早期罗马人以同等的市民权，为他们中的有权势者提供元老院议席。但是，这个时期，罗马人对战败方的城市实施了毁灭性的破坏。爱国主义者李维满怀爱国主义情怀解释说，这是为了让被迫移居罗马的人死心塌地地留在罗马的一个策略。不过，战败方的那些村落似乎没有遭到破坏。因为其后，拉丁和萨宾都以独立部族的形态继续存在。也许罗马并不急于对这些村落采取行动。不，应该说，其实他们很希望尽早动手，只是此时的实力还不够强大而已。

尽管如此，罗马的七个山丘正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人的居住地。帕拉蒂尼山上住的是罗穆路斯以来的拉丁系罗马人，萨宾系罗马人把奎里尔诺山作为居住地也为时已久。阿鲁巴人被安排住在西里欧山，阿文庭山上住上了最新的移民们。加上被用做诸神寄宿地的卡匹托尔山，七个山丘中有五个已经住上了人或神。大概是因为这些山丘的高度和开阔度比较适中，所以早早利用上了。剩下的维弥纳山和埃斯奎里山因为顶部平地过于狭窄而且海拔偏低，所以首先需要解决排水问题。

在第四代国王安库斯长达25年的统治期间，除了战争，他还完成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他在台伯河上架起了第一座桥梁。目的是为了把位于西岸的贾尼科洛山丘和集中在东岸的七个山丘联系起来。因为，他把贾尼科洛山用做了要塞。这只是出于防御上的考虑，桥梁是木造的。

第二件，他征服了位于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为此罗马终于得以和地中海直接连通。他还在奥斯提亚周边的海滩上发展制盐业，开始盐田事业，为罗马人提供了不是流通货币的货币。

对于人类来说，盐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从此告别对外依赖，其好处自然很多。而对当时尚处于物物交换时期的罗马来说，其好处就更大了。因为有了盐就意味着有了流通货币。

从罗马向外延伸出去的大路中，有一条叫萨拉里亚的大路，直译就是“盐路”的意思，是罗马最古老的大路之一。这条大路的最大用途就是把产自台伯河河口的盐送往内陆各城市。

罗马就像很多农耕民族一样，缓慢而稳健地扩展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时，他们这种缓慢而稳健的方式非常令人欣赏。不过，外来者的加入有时会导致腾飞的现象，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建国139年的罗马迎来了一次这样的腾飞。

第五代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

安库斯在位期间，有一个外国人带着全家老少和全部财产来到了罗马，光是行李就装了有好几辆牛车。这些人衣着华丽，头发很长，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伊特鲁里亚人。

这个人叫塔克文，是一家之主。他不是血统纯正的伊特鲁里亚人，而是混血儿。他父亲是从希腊科林斯逃到伊特鲁里亚的希腊人，他母亲是伊特鲁里亚一个位高权重人家的女儿。伊特鲁里亚社会非常封闭，如果只是经济上的来往，他们不会过问你的民族。但是如果外族血统的人想进入他们的社会，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塔克文认为，在伊特鲁里亚永远都不可能改变自己异邦人的身份，

也因此无法提升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决定到伊特鲁里亚以外的地方去试试运气。

因为身上流着科林斯人的血，所以去意大利南部科林斯殖民的锡拉库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公元前7世纪末时，锡拉库萨已经相当繁荣，完全不是罗马所能比的。但是塔克文没有选择去锡拉库萨。因为他知道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民族一样，也是个崇尚纯血统论的民族。

混血儿塔克文选择了罗马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地方。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愿意在罗马定居，就可以拥有市民权。而且，像努马和安库斯那样，尽管不是建国者拉丁人，却也坐上了罗马国王的宝座。想必正是这一点，对塔克文很有吸引力吧。于是，他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带着全部家产，投奔罗马而来。

这个外国人并没有找当时在罗马已有的几个伊特鲁里亚人社团，而是努力渗透到拉丁系和萨宾系的区别日趋淡薄的罗马人社会中。由于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庞大的财产，所以以他的财力和他本人的能力，相信进入罗马人社会应该易如反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曾经的外国人被指定担任国王安库斯的遗嘱执行人。

然而塔克文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公证人。在国王死后，他毛遂自荐要竞选罗马国王。大概他是开展选举活动的第一个罗马人。对此，李维曾经这样写道：

> 根据传下来的说法，塔克文为了当选罗马国王，在全罗马进行了巡回演讲，说服市民们把票投给自己。

选举演讲的内容是这样的：

> 虽然我自己从外国移居而来，但是在罗马，外国人登基王位是

有先例的。而且，我是带着妻儿老小和全部家产前来罗马定居的，所以早就打算要终老于罗马。先王对我信任有加，而我的年龄也适合担此重任，我自信在敬畏罗马诸神、尊重法律方面从未落后于他人……

在市民大会上，塔克文以绝对的优势被选为新一任国王，元老院也一致通过。在拉丁人——萨宾人——拉丁人——萨宾人的序列之后，伊特鲁里亚系的人第一次登上了罗马的王位。

成为罗马第五代国王的塔克文显示出了他超强的领导能力。在37年的统治期间，不仅使罗马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而且罗马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市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罗马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罗马城邦。

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增加元老院的人数。自从罗穆路斯设立元老院以来，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人，而塔克文把它增加到了200人，理由是罗马人口大幅度增加了。当然，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在罗马，只有元老院议员由国王指定，而塔克文一定会选择他的忠实支持者。因为如果有反对势力反对罗马新国王塔克文，那一定是固有势力——元老院在从中作梗。尽管塔克文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坐上王位的，但是他很清楚单纯依靠民众的支持是极不牢靠的。在稳固了大后方之后，新国王率领军队离开罗马，开始了征战周边各部族。

因为历任国王的正确指挥和士兵们的勇敢，当时的罗马军已经声名鹊起。但是罗马毕竟还太年轻，敌人即使并不强大，对于当时的罗马士兵来说，也需要经过一番激战才能取得胜利。塔克文和他的前任们不同。战斗结束后，他没有让战败者移居罗马，而是给他们市民权，继而同化他们。胜利者则赶着战车，满载着从战败者那里掠夺来的战利品凯旋。

这一政策的改变，从其后罗马依然欢迎其他民族移居罗马的事实来看，可以认为是国王为了提高个人权威的一个策略。他的这一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那些对罗马周边形成威胁的近邻各部族老实了许多。塔克文利用这段时间，开始了对罗马的大规模开发。

他认为罗马人只住在七个山丘上是对罗马资源的浪费。他把目光投向了山和山之间的湿地。

帕拉蒂尼山北侧的低地沟壑纵横，是一片非常开阔的湿地。如果在那里挖掘下水渠，把低地的水集中起来引到台伯河，就可以解决排水的问题。于是，大规模的下水渠网挖掘工程动工了。现在巨大的排水口遗迹还在台伯河的岸边张着大嘴呢。

通过排水开垦成为平地的这个地方最早被用做市场。与按部族居住的七个山丘比起来，这里是一个中间地带。出于遮盖下水渠顶部的需要，这里还铺上了石板。接着，公共建筑物一点一点地占据了这里的空间。被称为罗马心脏的罗马公共会场、古罗马广场就这样诞生了。

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湿地进行排水开垦后，七个山丘之间变得来去自如。最高的卡匹托尔山丘上建起神殿，专门供奉罗马诸神中的最高神朱庇特神，其他诸神也都各得其所。

在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看来，并不适宜建城的罗马，通过有效利用下水渠的排水开垦事业和位于台伯河河口的港口，一跃成为意大利前所未有的新型城市。一向被认为高度偏低、数量偏多的七个山丘在多民族的罗马既保留了各自的特色，同时又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优势尽显。

塔克文领导下的排水开垦事业不仅增加了可用土地资源，而且也为罗马形成一体、促进各民族团体之间的交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此外从景观方面来看，罗马因为有七个山丘，又有台伯河流经，与单纯

的平原相比，更富于地形变化之美。罗马的这种美就是从此时开始形成的。

这一时期的开发过程中，劳动力就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们。根据李维的说法，国王让士兵参与劳动是“为了让士兵在平时也和战时一样工作”。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此类建设事业交由军队完成的事例很多，这一传统或许就始于这一时期。

有了负责开发规划的人，也有可实现开发的土地，还有可提供劳动力的群体，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则一切无从谈起。当时的罗马人并不具备开展如此大规模开发事业的技术。塔克文于是从生他养他的伊特鲁里亚引进了相关的技术。

这些技术包括排水开垦的技术、下水渠工程所需的技术、道路铺设的技术、建造像神殿那样大规模石造建筑的技术等，所有的技术都从伊特鲁里亚引进。作为技术指导，伊特鲁里亚人也来到了罗马。当时的罗马突然之间多了许多长头发的伊特鲁里亚人。

这一个时期的罗马人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引进伊特鲁里亚人的技术上。他们在伊特鲁里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边劳动边学习。而这后来竟成了世界性的培养工程师的先例。罗马城因塔克文引进的伊特鲁里亚技术而面貌大变。这使原本从事农耕的罗马人意识到了技术的力量。

伊特鲁里亚文明对罗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在技术方面。

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需要可提供材料的人。但是，让当时的罗马人负责这项工作实在过于勉为其难，于是，伊特鲁里亚人又有了用武之地。以前在罗马只限于家庭规模的商业和手工业开始在街头出现。经济活动变得频繁起来。工商业的活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城邦国家，罗马在很多方面开始具备了均衡发展的体系。

有一天，国王塔克文遇见一个伊特鲁里亚少年。此人出身不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奴隶的孩子。但是不知为什么国王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决定把他带回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养育。

少年渐渐长大，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的聪明与勇敢在罗马无人能敌，罗马贵族家的子弟无人敢和他一较高低。塔克文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叫塞尔维乌斯的年轻人。然而，国王对他的厚爱，让觊觎王位已久的、先王安库斯的两个儿子非常不安。如果现任国王塔克文决定死后让自己的女婿继承王位的话，那么他们的希望就会落空。因为此时，已经统治罗马37年的塔克文在市民中的声望依然很高，元老院对他的评价也极好。所以只要有塔克文的推荐，就意味着此人一定能当选国王。安库斯的两个儿子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国王，但是他们就任王位的阴谋没有得逞。

因为从小把塞尔维乌斯带大的塔克文之妻在得知丈夫发生不测后，马上差人叫来塞尔维乌斯，劝说他尽快把王位抢到手中。王后有两个亲生儿子，但是在国王遭到暗杀后，她第一时间叫来的却是女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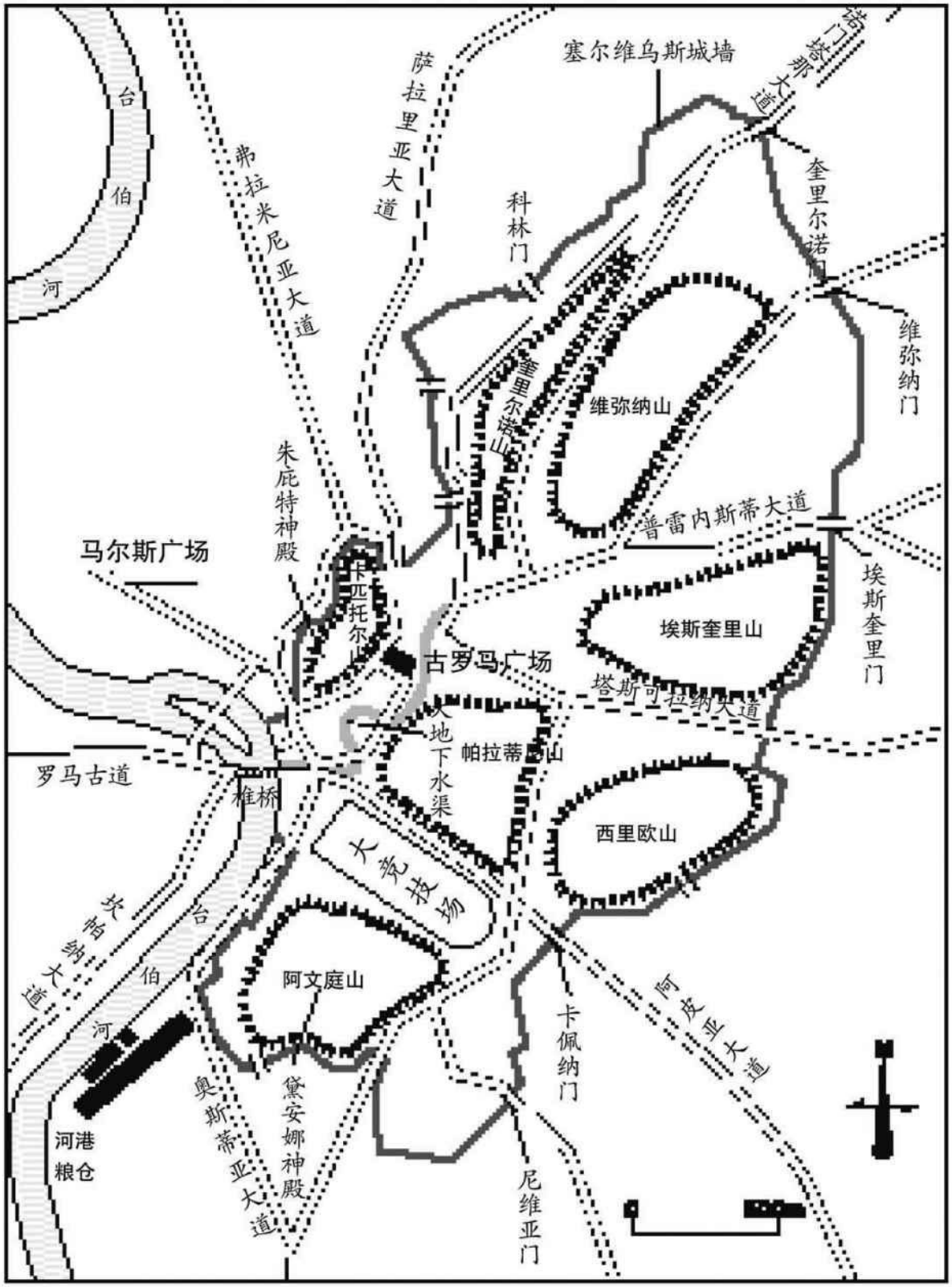
鉴于这一事态，塞尔维乌斯没有经过市民大会的选举，只通过元老院的决议就登上了王位，成为罗马第六代国王。对罗马市民来说，塞尔维乌斯的即位等于向他们承诺罗马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王塔克文的眼光确实过人。

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第六代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作为享有美誉的先王的继承者，首先考虑的是要完成先王塔克文已经开启的事业。当时湿地的排水开垦事业和朱庇特神殿的建造工程已经完成，留给他的当务之急就是保卫全罗马的城墙建设。

这座城墙在经过了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叫“塞尔维乌斯城墙”，在现代罗马，随处可见其断壁残垣。这是一项庞大的建设工程——城墙要把罗马七个山丘和中间的平地全部合拢起来。此时的罗马，通过排水开垦已经成为平地的区域也住上了人，所以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建设城墙必不可少。

有了塞尔维乌斯城墙的保护，再加上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这一时期的罗马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周边部族中的佼佼者。


塞尔维乌斯城墙
萨拉里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台伯河
科林门
奎里尔诺门
奎里尔诺大道
维弥纳门
维弥纳山
奎里尔诺山
朱庇特神殿
普雷内斯蒂大道
马尔斯广场
卡匹托尔山
埃斯奎里山
埃斯奎里门
古罗马广场
塔斯可拉纳大道
大地下水渠
帕拉蒂尼山
罗马古道
椎桥
西里欧山
大竞技场
卡匹托尔大道
台伯河
阿文庭山
阿皮亚大道
卡佩纳门
奥斯蒂亚大道
黛安娜神殿
河港粮仓
尼维亚门

塞尔维乌斯在阿文庭山丘上建了一座神殿，供奉狩猎女神黛安娜。这位女神是以畜牧业为职业的周边部族的保护神。在罗马市内建这样一座气派的神殿用来供奉女神，意味着只要敬畏这位女神，不管是不是罗马市民，都可以来这里祭拜。当然，参拜神殿不能携带武器，这是惯例。

国王塞尔维乌斯一方面建起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城墙，另一方面又建起了神殿，欢迎人们前来祭拜，实在是用心独到。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成就的功绩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队体制的改革。他所进行的这一改革不仅涉及税制改革，而且涉及选举制度的改革。

作为一个国民，他所承担的义务一是缴纳税金，二是保家卫国。在古代，很多国家都以服兵役的形式来抵直接税，罗马如此，希腊也一样。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是独立的市民。作为独立的市民，自然会有相应的权利。市民的权利就是投票权。所以军队体制等于税制，也等于选举制，这一等式成立，并且天衣无缝。

塞尔维乌斯对面向台伯河的开阔湿地也进行了排水开垦，并给这块平地取名“马尔斯广场”，意思是战神马尔斯的广场。冠以战神之名，意味着这个平地是为集结军队所用。当然，它的用途不止这一个，它也用作市民大会的投票场所。在军制=税制=选举制的罗马人看来，这样的组合理所当然。

在开始这一改革前，塞尔维乌斯首先在罗马进行了最早的一次人口普查。他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罗马的战斗力。我们无法从这次人口调查中得知罗马当时的总人口，我们只知道塞尔维乌斯依据调查得出的市民数和各自的财力，制定了新的制度。根据这一新制度，罗马市民不再以贵

族和平民区分，而是依据拥有的财力分为六个阶级。列表如下：

塞尔维乌斯制定的罗马新制度

	财产 （单位：阿斯）	军制 （单位：百人队）	票数
第一阶级	100000以上	骑兵18 步兵80	98
第二阶级	75000—100000	步兵20	20
第三阶级	50000—75000	步兵20	20
第四阶级	25000—50000	步兵20	20
第五阶级	12500—25000	步兵30	30
无产阶级	所谓的财产只有子女	步兵5（预备役） 仅限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其余时候免兵役	5
合计		骑兵18（1800人） 步兵175（17500人）	193

看到这张图表，想必你的心中会产生以下几个疑问：

第一，最富裕阶级的人通常都是少数，仅靠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士兵呢？这个数字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怀疑，怀疑他们用钱雇用无产者。

这个疑问的答案有两个：第一个是罗马直到末期都不曾有过雇佣兵制。因为罗马人不喜欢把保家卫国的重任交给用钱雇来的外人。第二个是罗马有权势的人背后通常都会有后援会，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细述。所以，以税制为依据，提供这个数量的士兵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第二，票数为何如此之少？关于这个疑问，答案在于罗马特有的投票方式。

罗马选举制实行的不是一人一票制，而是按军团的最小单位，每百人队一票。百人队中的100个人首先要在内部进行讨论，形成的统一意见就体现在这一票上。其实，它相当于小的选举区制。希腊雅典的选举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制，而罗马一直坚持百人一票的投票方式。

第三，看到这张图表的人大概都会脱口而出，说仅仅第一阶级，票数就已经过半了。

的确如此。在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人们普遍认同谁承担更多的义务，谁理所当然享有更多的权利。不承担义务的人，也就是免除相当于直接税的军务的人是那些不满16岁的未成年男子和已经完成多年军务的60岁以上的老人、女人、奴隶及无产者，即除了孩子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其中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又死了丈夫，她每年也需要缴纳200阿斯，用做骑兵使用的马匹的饲养费。原因是她没有完成相夫教子的责任，也就是未尽到对社会共同体的义务。

还有，看到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竟然有近2万人的战斗力，相信你也会感到惊讶。事实上，这个数字包括了预备役的人数。对于由25岁至45岁的市民组成的实际战斗力，国王塞尔维乌斯通常按半数来计算。指挥

官没有年龄限制，和国王一样为终身制。

士兵的装备要根据其所属阶级的高低来定。阶级越高装备也越重。重装步兵都是属于第一和第二阶级的人。随着阶级的低下，装备则越来越轻。到了第五阶级的步兵，甚至连军装都可以自由选择，而他们需要准备的武器也变成了棍棒或投石器等弹子球类的东西。这是因为兵役相当于直接税，所以从服装到武器的所有一切都要由个人负担。顺便提一句，本卷中提到的“无产者”很少在战时被征用，500年间只征用过一次，相反，预备役却经常受到征用。

塞尔维乌斯还制定了作战战术。

他把罗马军队分成前锋、主力和后卫三个部分。前锋最早与敌人相接，其任务是扰乱敌人的阵线。紧随其后，作为第二梯队整装待命的军队主力部队、重装步兵冲锋陷阵。一旦出现战局不利，作为第三梯队的后卫立刻前去增援，加入战斗。而骑兵担当机动部队。

在当时，在仓促应战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按照塞尔维乌斯所制定的战术、队列分明地发起攻击的罗马军威力无比，在和周边各部族之间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有理由认为，身世不详的国王塞尔维乌斯，其统治是在极度稳定的状态下结束的。

然而，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免不了有反对者的存在。国王塞尔维乌斯的统治成效卓著，眼看就要进入第44年了。

最后一位国王：“傲慢者塔克文”

先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遭暗杀后，他的女婿塞尔维乌斯取代他的亲生儿子继承了王位。罗马的王位不是世袭的，而且塞尔维乌斯的统治深得人心，功绩颇丰。所以就是有反对者，他们也很难得到市民的支

持。44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这时，他的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认为像他这样的治世方式不是稳重而是胆小。此外，国王塞尔维乌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忙碌，也已经难掩疲惫之态和衰老之势。

塞尔维乌斯有两个女儿，性格截然相反，一个逞强好胜，一个温和老实。先王塔克文的儿子有两个儿子，性格也全然不同，一个是性格暴烈的野心家，一个是性情稳重的人。

国王塞尔维乌斯让这四个人配对结了婚。他把争强好胜的公主嫁给了性情稳重的表兄，让温和老实的公主嫁给了野心勃勃的表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婚姻，中和一下他们的性格。

但是他失败了。争强好胜的公主图利亚非常看不起性情稳重的丈夫。她的口头禅是：有你这种懦夫做丈夫，好运永远不会向我展露笑容。她勾引和自己性格相似的妹夫。不久，性情温和的两个人不知何故先后死去，留下了寡妇图利亚和鳏夫塔克文，他们走到了一起。对于他们的结合，国王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也许性情温和的女儿突然离世给他的打击太大，使他意志消沉了吧。

但他是国王。在罗马，国王是终身的。只要他还活着，王位就是他的。罗马的王位不世袭，即使是国王的女儿也不一定能成为下一任王后。

图利亚开始在她丈夫面前煽风点火。根据李维的说法，她是这样挑唆她丈夫的：

> 如果你真是我心目中的男人，我就把你当丈夫看待，当一个男人来尊重。如果不是，我只有叹我命运不济。你为什么还不下决心？我并没有要求你到科林斯或者塔奎尼亚之类的他国采取行动，你在惧怕什么？如果你还下不了决心，你可以去科林斯，也可以去塔奎尼亚，你也可以重回你的过去。

本来就野心勃勃的塔克文在图利亚的挑唆下，首先收买了居住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他们是他的祖父第五代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请到罗马后在罗马定居下来的人们。接着，他成功地得到了元老院中属于新兴阶级的议员们的支持。他们是一些在罗马开发事业和工商业发展中积聚起了财富的人。

塔克文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元老院进行了演讲。他说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当国王是罗马的耻辱。元老院的议员们并不同意塔克文的这一说法，但是也没有把他赶出去。

这时，国王塞尔维乌斯得到消息后赶了过来。但是，塔克文没有给国王任何反驳的机会。他一把抱起国王，走到外面，把国王扔下了元老院门口的台阶。深受屈辱的国王塞尔维乌斯回到王宫，塔克文的手下已经持剑等在那里。但是他没有死。于是，图利亚赶着马车从她那一息尚存的父亲身上碾了过去。就这样，塔克文当上了罗马国王，图利亚成了王后。

罗马第七代国王塔克文禁止为先王塞尔维乌斯举行葬礼。不仅如此，他还对他认为是先王指派的元老院议员大开杀戒。他继承王位没有经过市民大会的选举，也没有元老院的同意，因此，没有全副武装的卫兵保护，他绝不走出宫门一步。从他登基到被逐出罗马，他从来没有向元老院征求过任何意见或建议，也从来不问市民大会同意与否。市民们在背后称他为“傲慢者塔克文”。

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专制君主“傲慢者塔克文”在军事方面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在与周边各部族的战斗中，罗马几乎是常胜军。塔克文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他的做法确实高明，却也足够阴险。

对国内总是心生不安的统治者通常会努力把对外关系做到最好。塔克文把目标锁定在了邻近的拉丁人以及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

在上百年前的第四代国王安库斯时代，罗马就和邻近的拉丁人建起了同盟关系。因为大家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敬畏同样的诸神，所以加深相互间的关系既自然又容易。

“拉丁同盟”在最初的时候仅限于共庆节日和祭祀日。渐渐地，这种关系发展到共同作战。还有，最初双方的同盟关系完全平等，随着罗马实力的不断增强，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同作战的时候，即使兵力相当，指挥官必定由罗马人担任。不过，战利品的分配始终都是平等的。到了塔克文时代，他改变了这一关系。他邀请实力远比拉丁人强的伊特鲁里亚人加入拉丁同盟。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不是加入，而是被罗马人拉进去的。

事实上，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这个时期，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从第五代国王到第六、第七代国王，罗马已经连续出了三位伊特鲁里亚系的国王。后世的研究者中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时期的罗马处于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之下。

尽管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势力日益强大，但在罗马之外的伊特鲁里亚的势力从这个时期开始走向了衰退。不幸的是，“傲慢者塔克文”恰恰没有看清楚这一事实。他向伊特鲁里亚人示好，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衰败。

急速发展起来的民族，其衰退的速度也很惊人。势力范围一度扩张到那不勒斯附近的伊特鲁里亚人不到100年的时间便开始进入了衰退期。

在一个人强大的时候丑闻不会招惹你，而一旦显出疲态，丑闻将毫不留情地击垮你。即使丑闻和你无关，但是作为有效武器，它的作用不可小视。

国王有一个儿子叫塞克斯图斯。事情的起因是塞克斯图斯看上了亲

戚科拉提努斯的妻子琉克蕾西娅。欲火中烧的年轻人乘琉克蕾西娅的丈夫不在家的一个夜里，来到了爱慕已久的女人家。因为没有随从相伴，又是亲戚关系，所以科拉提努斯的家人包括琉克蕾西娅都热情地招待了他。吃过晚饭后，还安排他到客房休息。

夜深人静，一家人都沉浸在睡梦里的时候，怀揣短剑的塞克斯图斯悄悄溜进了琉克蕾西娅的卧室。他用短剑相威胁，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但是，这个年轻人犯了一个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以犯的错。他匆匆离开了那个房间，留下女人独自在床上哭泣。

当天夜里，琉克蕾西娅就给在罗马的父亲和正在阿尔迪亚出征的丈夫分别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有急事，速带可信之人前来。父亲卢克莱修带着瓦莱里乌斯赶来了。丈夫科拉提努斯也和尤尼乌斯·布鲁特斯一起赶了回来。

坐在床上沉浸在悲愤之中的琉克蕾西娅向匆匆赶来的四个人说完事情的经过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短刀刺向了自己的胸膛。她呼吸艰难地要在场所有男人发誓为她报仇，然后闭上了双眼。

琉克蕾西娅的遗体被送到了罗马，放置在古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面对这一惨状，人们纷纷指责国王和他一家的蛮横和傲慢。布鲁特斯向市民们作了演讲。他说，我们绝不能让贞洁的、行为端正的女人们再次成为这种兽性的牺牲品。他让在场的人们想起了国王塔克文是如何杀害先王夺取王位的。他向市民提议把国王和他的家人统统逐出罗马。

一直以来藏在罗马人心中的对塔克文的不满爆发了。对布鲁特斯的提议，民众大声表示赞同，并积极响应布鲁特斯召集市民参军的号召。

正在阿尔迪亚出征的塔克文得知了这一变故。国王立刻带着部队赶往罗马。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罗马紧紧关闭的城门。他被告知他被放逐了。塔克文于是只好带着追随自己的士兵，前去投奔伊特鲁里亚的

一座城市卡厄瑞。王后图利亚早已逃离罗马。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跟随在亡命的父亲左右。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惹下祸端的塞克斯图斯逃到了另一个城市，被以前受过他欺凌的人杀死了。

“傲慢者塔克文”的统治持续了25年。随着第七代国王塔克文的统治的结束，罗马的王政时代也告结束。时间是公元前509年。从罗穆路斯于公元前753年建国到这一年，罗马已经走过了244年。随后的罗马进入了共和政体，迎来了执政官统治的时代。和从前一样，执政官也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由终身改为短短的一年，还有，原来由一位国王统治改为由两位执政官共同治理。

如果你仅仅因为国王的集权统治而否定王政时代的罗马，我认为你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一个国家共同体，在最初阶段，应该说更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当一个社会组织尚处于幼小期时，如果不加以呵护，难免会中途夭折。所以，在这种时候，由一个人作决策，由一个人坐镇指挥显然有效得多。

罗马七位国王的历史是“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一原则下完成的历史。正是由于国王们的努力，罗马才得以把它粗壮的根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下。这些国王的寿命都很长，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因为每个国王都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并看到它最终转化为现实。此时，即便国王换了，新的国王依然可以在先王的业绩上，创造新的业绩，避免因中断而浪费了新兴罗马的活力。

罗马的王政也许在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吧。琉克蕾西娅事件不过是在已经完成使命的王政体制的脖子上刺了一刀而已。

第二章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

走向共和政体的罗马

罗马摇身一变，进入了共和政体时代。

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第二卷中，对进入共和政体的罗马是这样描述的：

> 随后将要讲述的应该是赢得自由后的罗马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是怎样生活的。罗马将在一年一度选出的官员的治理下，成为以法律取代个人治理的国家。

巧妙利用丑闻推翻王政的最大功臣是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他是随后延续了500年的共和制罗马的创始人。

布鲁特斯把国王逐出罗马后，马上召集市民到古罗马广场。在那里，他要求全体市民起誓，从此以后的罗马，无论是谁都不得登基王位，无论是谁都不得侵犯罗马市民的自由。他创立了新的制度，规定每年由市民大会选举两位执政官为国家最高权力者，取代曾经的国王。第一任当选为执政官的是布鲁特斯和自杀身亡的琉克蕾西娅的丈夫科拉提努斯。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兼具先见之明和行动力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是被逐出罗马的国王塔克文的姐妹，所以他和国王是舅甥关系。“布鲁特斯”这个姓不是他的原姓，而是他的外号，意思是“傻瓜”。据说他在专横跋扈的塔克文时代，一直隐忍着被蔑称为“傻瓜”。结果，这个外号就成了他的姓氏。

但是尽管被称做傻瓜，既然他是国王的外甥，他终究处在权力的近

处，耳目自然少不了，也有机会冷静观察所有的一切。他的这种身份使他能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罗马已经长大，完全可以废除效率很高但却只受国王个人意志左右的王政制度。可见，改革的领导者往往来自旧的势力，而非新兴势力。

出于防止专制的目的，原本由国王一个人负责的事情改成了两位执政官共同负责。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即使再次当选，任期依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因此，为了使这一制度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个既有权威又有权力的稳定机构。布鲁特斯于是进一步强化了王政时代就有的元老院。

罗穆路斯时代只有100位元老院议员，到了第五代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的时候增加了一倍。现在又进一步增加到了300人。新任命的议员多为新兴势力中有权势家族的家长。

元老院集中了罗马有权势家族的家长，议员的任期为终身。事实上，因任期只有一年而不断更换的执政官辈出的机构就是元老院。权威和权力对于元老院来说是永远也不缺少的东西。

还有，只要享有罗马市民权，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市民大会。

支撑罗马社会的国王、元老院、市民大会这三足之中，只有国王换成了执政官，而权力的三足鼎立结构并未改变。

共和政体时期的罗马，在元老院进行演讲时，称呼从原来的“元老院诸位议员”，变成了下面的说法，并渐渐成为惯例。

“PATRES CONSCRIPTI INSIEME.”

直译的意思是：

“各位父老及各位新进。”

这一称呼成为惯用语也始于公元前509年，共和政体元年。因为布鲁图斯的改革，很多新参政者在元老院获得了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按新老分别称呼元老院议员的做法，乍一听似乎是无药可救的旧弊，实际上却是相当高明的一个做法。先道一声“父老”，然后再提新兴势力的称谓不仅给足了旧势力的面子，而且只要坚持提“各位新进”，就使得随时有新人加入成为可能。

实际上，罗马的元老院不是由一群固执己见的老头组成的机构。虽然日语的译法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我在想，每逢演讲，所有议员必以“各位父老及各位新进”作为开始，并慢慢成为习惯的过程中，大家对元老院为新参政者打开其门所持有的抵触情绪是否也随之减弱了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但是，语言的力量终究不能小看。

话虽如此，经过250年的时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国王专制突然转变为共和政体，终究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变革期内，事件会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因为变革带动变革。诞生于公元前509年的罗马共和政体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必然。

罗马有权势人家的年轻人中间，一股不满情绪正在抬头。新制度对他们的父辈是合适的，因为即使还不是元老院的议员，他们也有机会被任命为议员，甚至有可能因此成为执政官。所以他们对新制度是满意的。但是年轻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元老院议员必须是一家之长，而要成为一家之长必须等到父亲去世以后。这和王政时代不一样。在王政时代，只要得到国王的赏识，谁都有可能得到提拔。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认为实行共和制的结果，使自己一显身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对此他们感到极度不满。

这些年轻人悄悄地相约来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他们密谋请回被逐出罗马的国王塔克文。决定王政复辟的他们甚至割破手指，在誓约书上

血书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的谈话被这家的一个奴隶从头到尾偷听到了。此人随即向执政官告了密。

参与阴谋的年轻人无一例外被逮捕了，作为证据的誓约书也遭没收。然而，这次事件对负责审问的两位执政官来说，打击非常沉重。因为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他们熟悉的伙伴，其中提供开会场地的那个人还是执政官科拉提努斯的亲戚。还有，执政官布鲁特斯的两个儿子也在密谋王政复辟的这些年轻人中间。

在随即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宣读了有这些年轻人署名的誓约书。他们被控叛国罪，却无人为自己辩解。民众在默默地看着。有几个人可能猜到了布鲁特斯的心思，建议处以流放。他们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看到了执政官科拉提努斯脸上流下来的眼泪，所以认为这些人判不了死刑。因为两位执政官的意见必须一致，决定才有效，否则就无效。

但是，布鲁特斯没有以执政官的身份而是以家长的身份对此事作出了裁决。在罗马人家中，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拥有生杀大权。

布鲁特斯面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儿子，说：

“提图斯、提贝里乌斯，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父亲重复了三次同样的问题，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布鲁特斯只好对卫兵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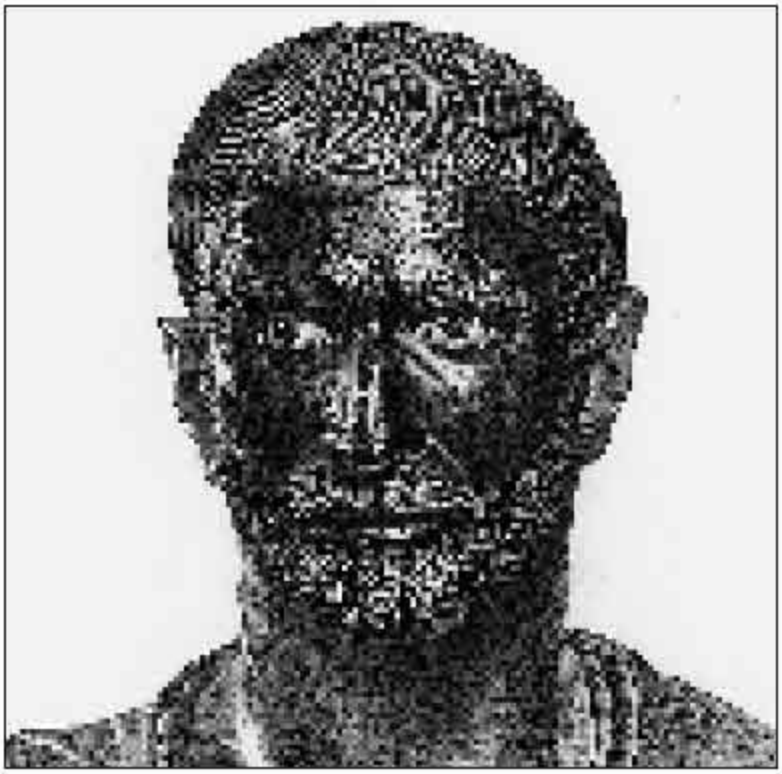
“下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刑罚当场执行。也许因为是主谋，布鲁特斯的两个儿子首当其冲被脱去衣服，双手反绑着接受鞭笞。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正眼看这一残忍的场面，只有布鲁特斯的视线始终盯着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年轻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了地下，被拉起来后，一把斧子砍去了他们的脑袋。直到这时，他们的父亲才离开现场。

对于布鲁特斯的态度，赞许声不绝于耳。但是，另一位执政官科拉提努斯的举止开始令人生疑。市民们甚至对他在审判席上时流下的眼泪也产生了怀疑。科拉提努斯也注意到人们看他的眼神起了变化，他无法接受这种改变，他知道自己当选执政官是因为他是受害者，他的妻子琉克蕾西娅为了贞节而自杀了。于是他主动辞去执政官，并和家人一起逃往了邻国。罗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主动亡命国外的人不追究责任。继他之后，有权势但和先王塔克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瓦莱里乌斯当选执政官，填补了这一空缺。

布鲁特斯有违人性的行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的家长权威。他有一种担心，而他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

先王塔克文没有放弃夺回王位的决心。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亡命地伊特鲁里亚各地，说服伊特鲁里亚各城市把军队借给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伊特鲁里亚的城市中，距离罗马最近的是塔奎尼亚和维爱。正好这两个城市对罗马清除伊特鲁里亚势力怀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答应了被流放的国王借用军队的请求。有了军队的塔克文，其作为武将的才能早在他在位时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

得知罗马名门望族出身的年轻人密谋王政复辟惨遭失败消息的塔克文认为只能依靠武力夺回王位。于是他率军开始南下。迎战他的罗马军由两位执政官指挥，其中布鲁特斯率领骑兵队，瓦莱里乌斯指挥步兵队。

两军在距离罗马城墙尚有一天路程的地点相遇。这里树林遍布，间或会有一些狭窄的空地，视野非常不好。布鲁特斯率领骑兵队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瓦莱里乌斯率领步兵军团随后跟进。

指挥伊特鲁里亚军骑兵队的是塔克文的长子阿隆斯。在确认迎面而来的就是罗马骑兵队后，阿隆斯策马来到队伍最前面，向罗马骑兵队建议，由两军指挥官进行一对一的决斗。这时布鲁特斯也策马来到了队列的最前面。

这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决斗。两人之间从来没有交过手，却满怀愤

怒和绝望。阿隆斯对驱逐自己的罪魁充满了愤怒，布鲁特斯则为公私间的裂痕无法填补而满怀绝望。

在两军士兵的注视下，两位主将之间的激战持续了很久，两人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最后，两人的长矛几乎同时深深地扎进了对方的胸口，他们从马背上滚落下来。

决斗的这一结果激起了两军士兵的斗志。他们顾不上保护主将的遗体，纷纷冲上前去，与敌军短兵相接。激烈的战斗迟迟没有决出胜负，随后赶来的步兵队也加入了战斗。由瓦莱里乌斯指挥的罗马步兵对阵由曾经的国王塔克文指挥的伊特鲁里亚步兵。他们同样势均力敌。

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两军撤回到各自的领地内。当天夜里，两军营地传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流言，说是在白天的战斗中，伊特鲁里亚方面的阵亡者比罗马军的阵亡者只多了一个人，战斗以罗马获胜而告结束。士兵们确信这是神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罗马军再次来到战场，却不见了伊特鲁里亚军的踪影。于是，瓦莱里乌斯带着布鲁特斯的遗体凯旋，回到罗马。

瓦莱里乌斯为布鲁特斯举行了国葬，要求所有罗马女人像父亲去世时一样服丧一年。

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迟早会遭人嫉妒、猜疑和中伤。瓦莱里乌斯也不例外。

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布鲁特斯的壮烈牺牲让罗马人悲痛不已。然而他们的眼泪未干，就开始猜疑起了幸存的执政官瓦莱里乌斯。

首先，他们对瓦莱里乌斯乘坐四匹白马战车的凯旋仪式表示不满。战斗胜利后，举行凯旋仪式是始于罗穆路斯时代的罗马的一项传统。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瓦莱里乌斯第一次把凯旋将军所乘战车的四匹马

全部换成了白马。虽然他这样做是因为富有，但是罗马市民认为他是为了炫耀他的王者风范。

其次，他们对瓦莱里乌斯家非常气派的建筑不满，因为他家建在一眼可见古罗马广场的山丘上，在罗马人眼里更像是国王的居所。

再有，瓦莱里乌斯没有马上召集市民大会选举新的执政官填补布鲁特斯死后出现的空缺。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人们开始谣传他已经不满足于执政官的身份，他在觊觎王位。

注意到这一动向的瓦莱里乌斯马上雇用大量工匠，仅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拆除了自己家的房屋。然后在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的罗马城墙附近，盖了一个非常简朴的房屋。他要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让所有人都可以亲眼目睹他的生活状态。基于这一考虑，他家的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但是，这还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瓦莱里乌斯制定了一项又一项民众评价似乎还不错的法律。

首先，制定了有关国库管理的法律。在王政时代，国库由国王掌管，现在则交由财务官进行管理。作为政治军事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不干预国家财政的这一法律赢得了市民们的喝彩。

其次，制定了有关诉讼的法律。凡是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对法务官作出的判决有权向市民大会提起诉讼。这一法律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它的制定，为后世罗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法的概念。

但是，由于过度在乎舆论的支持，瓦莱里乌斯制定的法律中难免有一些偏离了正确的判断。

最典型的一条法律，直译的意思为："凡是觊觎王位的人，无论是谁，其生命和财产将为诸神所有。"也就是说，即使杀了人，只要有证

据证明被杀的人对王位有所企图，就可以赦免杀人者。对瓦莱里乌斯来说，制定这样一条法律显然过于轻率。虽然前提是有证据证明，但是这种情况下，所谓客观的证据，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是很值得怀疑的。对于纯粹的怀疑，每个人的看法千差万别，自然有被拿来用做证据的危险。但是，这条法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罗马人起到了约束的作用。

在制定了一项又一项的法律之后，瓦莱里乌斯这才召集市民大会，从同僚候选人中选出了执政官。当选的是为了贞节而自杀的琉克蕾西娅的父亲。但是他因为年岁太大，不久就死了。这次，空缺很快就有人补上了。但是对于新当选的执政官荷拉斯来说，他在位的日子实在太短。因为执政官通常是两人同时当选同时改选。尽管因为一些原因，有人在此任执政官的任期内当选，但是其任期结束的日期是不变的。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一年中制定的几个法律，使得立法者瓦莱里乌斯的人气不断攀升。人们为瓦莱里乌斯取了个绰号叫“亲民者”（意思是重视公共利益的人），并开始这样称呼他。公元前508年，在第二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亲民者”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他曾经的合作者荷拉斯无缘连任，另一位当选的执政官是提图斯·卢克莱修。

这个时期，“亲民者”的怀柔政策也许是必要的。因为罗马刚刚实现共和政体，以往在王政时代不曾有过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如果没有罗马人的团结，相信共和政体一定会夭折在萌芽阶段。

曾经的罗马只关心如何提高国力。伊特鲁里亚系的国王连续出了三代，每一位国王都给罗马带来了大规模的开发事业和与此相随的工商业的发展。毫无疑问，为这些国王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的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的地位和势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高。甚至有学者认为，罗马从王政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土著罗马人对独占工商业的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排斥。

把国王塔克文逐出罗马，迫使他投奔伊特鲁里亚的结果，一定使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立场变得非常微妙。而布鲁图斯增补上百个新兴阶级出身的议员进入元老院，可以认为是为了留住这些人的一个策略，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国王被逐出罗马，完全是国王和他的家人咎由自取，是他们的专横暴虐造成的。与生活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无关。但是，这一策略实施的结果，只能说是成败参半。

对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晋升元老院议员的伊特鲁里亚人来说，生活在以伊特鲁里亚各城市为敌不断进行战斗的罗马感觉一定非常不爽。从来都是外国人移居而来的罗马，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向其他国家外流的情况。拥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外流使罗马的国力大大下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罗马再也不见了大规模的建设事业。

国力的低下同时威胁到了罗马在邻近各部族中的威望。

以“拉丁同盟”的名义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加盟者是使用相同的拉丁语、祭祀相同的诸神的邻近各部族。而此时，由于罗马的政体已经改变，再加上国力下滑，他们不再把罗马看做同盟国了。也许早已习惯相互提供军事支持，由罗马国王担任军事指挥的同盟军，难以接受由罗马执政官执掌指挥权吧。毕竟各同盟国的国王是终身制的，要他们服从任期只有一年的执政官的指挥，自然会有抵触，而且已经走上下坡路的罗马也不再是一个人人仰视的国家。

结果，同盟各国也成了新生罗马的敌人。所谓的“拉丁同盟”不过是弱肉强食时代的产物。受罗马国力下降的影响，战斗也很少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罗马不得不处在和邻近各国的交战中。

共和政体诞生后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罗马彻底把伊特鲁里亚变成了敌人。尽管伊特鲁里亚已经进入衰退期，但当时的国力依然很强，不是罗马所能比的。战场上，两军士兵身上的军装军容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对于努力追求华美装束的伊特鲁里亚战士，罗马士兵的军装能用

上铜或皮革已经非常难得了。

除了国力下降，罗马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伊特鲁里亚出师有名。他们要求罗马方面同意塔克文重回王位。暴君只是罗马人的看法，而对伊特鲁里亚等邻国来说，塔克文是值得他们信赖的同盟者。被逐出罗马的塔克文本人也充满了斗志，发誓要夺回王位。

公元前509年至前503年的6年间，“亲民者”瓦莱里乌斯共当选了四届执政官。除了提图斯·卢克莱修当选过两届以外，其余人都只当选过一次，也就是只做过一年的执政官。所以，这期间实施的政策可以认为基本上都出自这位“亲民者”的想法。

过去，奥斯提亚盐田出产的盐是由个人经营的，“亲民者”把这个经营权收了回来，改由政府经营。他试图通过这一改变，来恢复因伊特鲁里亚人外流而日渐下滑的罗马经济。当时的罗马还没有流通货币，盐在交易外国商品时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亲民者”的这一改革，与其说把生活必需品盐变成了国有化，不如说使货币国有化了。不管怎么说，确保国库收入才是首要问题。

但是，如果改革仅此而已，那么只能使用高价盐交易商品的商人对通商的兴趣就会大大减弱，对恢复经济于事无补。于是，“亲民者”降低了向他们征收的间接税，因此还吸引了一些本不从商的人也开始纷纷从商。这样一来，不仅冲抵了减少后的间接税，而且即使不再依赖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也得以避免重回农牧业国家的危机，还开始有了自己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享受到优惠的新兴中产阶级转而支持共和政府也成为了必然。

“亲民者”非常欢迎外国人移居罗马。在罗马邻近部族中，有人说同属拉丁民族的人之间、拥有相同语言和相同诸神的拉丁人之间相互争斗毫无意义。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很有势力的人，“亲民者”于是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在接受邀请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克劳狄乌斯。他带着一家人和

追随者约5000人移居到了罗马。“亲民者”给这些人罗马的市民权，向他们提供居住地，并邀请作为家长的克劳狄乌斯加入了元老院。昨天的移民今天就可以加入罗马领导者阶级的这一事例加速了邻近部族的人们移居罗马的脚步。“亲民者”的这一政策在填补因伊特鲁里亚人的外流而出现的空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削弱邻近拉丁民族力量的效果。

但是，伊特鲁里亚毕竟是强邻。“傲慢者塔克文”为了夺回王位，甚至不惜卑躬屈膝恳求他们的帮助。

塔克文率领伊特鲁里亚的塔奎尼亚和维爱两个城市的援军向罗马发起了反攻。战斗失利后，他逃到了同属伊特鲁里亚联邦的丘西国王身边。丘西国王波塞纳表示要为塔克文夺回王位而战。国王宣称不光要提供援军，他还要亲自率军攻打罗马。

波塞纳的名字在罗马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仅是位名君，同时也是一位才干出众的武将。罗马陷入了一片恐慌。甚至有人提出回归王政也未尝不可。波塞纳的军队一路南下，很快占领了位于台伯河西岸的贾尼科洛要塞。波塞纳把指挥部设在了那里。

最初的战斗围绕架设在台伯河面上的桥进行。伊特鲁里亚方面努力要保住这座桥，而罗马方面不能允许他们的计划得逞。战斗的结果是，罗马方面获胜，桥被烧毁。

波塞纳于是改变战术，改进攻战为包围战。他征集了河面上的所有船只，命令伊特鲁里亚士兵乘船渡过台伯河，在环绕七个山丘的罗马城墙外布下天罗地网。台伯河上的通行自由被伊特鲁里亚方面所控制，从南方水运来的小麦一粒也进不了罗马城内。

执政官“亲民者”决定分散敌人的战斗力。他安排一部分羊倌赶着羊群和牛群，从距离台伯河最远的埃斯奎里山门，假装逃出陷入包围圈的

罗马城。这一消息很快在伊特鲁里亚士兵中传开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去追赶那些轻松就能抢到手的家畜。就连驻扎在台伯河西岸的士兵也纷纷乘船过河，参加掠夺的行列。

得知敌军动态的“亲民者”，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向指挥各部的将领们下达了命令。

部分队伍从东门埃斯奎里山门向外冲，部分队伍从北门科林门出击。执政官卢克莱修令士兵冲出南门尼维亚门，“亲民者”则从东南门卡佩纳门出击。

正忙着追赶家畜的伊特鲁里亚士兵突然背后受敌，顿时乱作一团。他们从追逐者变成了被追逐者。这一天的混乱局面，使波塞纳遭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但是包围还没有解除。罗马城内的小麦库存已经殆尽，军粮告急。当时，有一个叫穆奇乌斯的年轻人认为要拯救罗马，只有杀死波塞纳。但是他担心自己擅自行动，可能会被大家误以为自己做了逃兵。所以他来到元老院，向两位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认可。于是，穆奇乌斯带着匕首，游到了台伯河的西岸。

他成功混进了敌人的阵营，并接近了国王。当时，波塞纳正亲自给士兵们发军饷。穆奇乌斯从来没见过国王，他看着一群人给士兵发钱，却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国王。因为在罗马人看来，除了普通士兵，伊特鲁里亚人的穿着都非常高贵华丽，看上去个个都像国王。罗马的这位年轻人以为正在发钱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波塞纳，于是对准那个人连同匕首一起撞了上去。他成功杀死了那个人，然而他杀死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秘书。

穆奇乌斯被士兵制伏，带到了国王的面前。他无所畏惧地挺起胸膛，对国王说：

“我是罗马市民，我的名字是盖乌斯·穆奇乌斯。我要杀敌却没有成功，我早已作好必死的准备，不怕死也是我们罗马人的性格。

“罗马的年轻人会告诉你我们绝不放弃对你的战斗。我死后，会有人再来。他再不成功，还会再有人跟上。我们会前赴后继，和你一战到底，我奉劝国王，你最好也早作心理准备。”

气急败坏的波塞纳严刑拷打穆奇乌斯，试图从他口中了解他背后的情况。但是年轻人只是大声地告诉他：

“只有胆小鬼才会顾惜自己的肉体！”

说着，年轻人伸出左手一把抓住正在燃烧的火把，把它摁在自己的右手上。顿时，人肉烧焦的气味充塞了周围。波塞纳对年轻人说：

“行了。你已经让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我很欣赏你的勇气。在我的人民中，如果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就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走吧。”

盖乌斯·穆奇乌斯从此落了个“左撇子穆奇乌斯”的外号。因为被火烫过后的右手再也使不上劲了。

罗马时代的孩子是两眼放着光、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那时的他们需要学习的历史还很有限，有充分的时间聆听英雄的故事。与此相比，2000年后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历史知识大大增加，为了了解更多的历史，只能依靠枯燥乏味的死记硬背了。

闲话少说，在这一段插曲过后，波塞纳向罗马提出了讲和。

伊特鲁里亚王提出两个讲和条件，“亲民者”拒绝一个，接受一个。拒绝的是恢复塔克文的王位，接受的是返还前年的战斗中占领的维爱的领土。波塞纳表示满意。讲和谈判结束后，伊特鲁里亚军撤回到台伯河

西岸的营地，并回到丘西。塔克文知道夺回王位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但是，这并不表示罗马和伊特鲁里亚之间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与波塞纳之间的讲和只是暂时休战罢了，但是给了罗马以喘息之机。

公元前503年，罗马改为共和政制已经6年了。这一年，“亲民者”撒手人寰，离世人而去。此时的瓦莱里乌斯家已经散尽万贯家财，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是每个罗马人自发捐款，为“亲民者”举行了葬礼。和布鲁特斯死时一样，罗马女人服丧一年。

罗马共和政体由布鲁特斯播下种子，又在“亲民者”的施政中深深扎下了根。在这两人之后的罗马，再也没有出现过试图复辟王政的人。

出使希腊的考察团

要讲述最早的罗马人故事，只要讲述罗马周边就可以了。即使把范围扩大一些，最多也只要触及伊特鲁里亚各地，而且还是和罗马国境线相接壤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地区就足够了。至于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并早早享受起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群落，对于当时的普通罗马人来说，只能通过偶尔出现在罗马的商人知道一些。因为这个时候的罗马和意大利南部之间，还间杂有一大片辽阔的土地和许多其他民族。

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前半叶的共和政体初期，罗马势力所波及的范围只是从台伯河周边到河口的一个狭长区域，面积只有东京都的1/10左右。

尽管当时的国境线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很难作出正确的比较，但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塔兰托和锡拉库萨坐拥的势力圈是当时罗马的3至5倍，雅典的10倍，大概是迦太基的10倍以上。虽然自罗穆路斯建立国家以来，已经过去了300年，但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其势力

仍然只局限于这个范围。

但是，在比例不够大的地图上，甚至分不清领地的小城邦国家林立的那个时代，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中的先进国家希腊城邦有了第一次接触。不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国家，而是和希腊本土各国，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直接接触。

公元前5世纪中叶，从王政转向共和政体而引发的诸多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无休止的以周边民族为敌的自卫战争也告一段落。罗马人终于开始要制定成文的法律了。

罗马之前的法律可以说是一些不成文规定的集成，熟悉这些规定的只有统治阶级。对此，民众极度不满，他们要求法律条文化。因为只有写成文字，所有人才有可能接触到。很多时候，民众要求权利，都是从要求法律成文开始的。

最初，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极力抵制这一要求。这时的罗马，自从确立贵族政体也就是共和政体以来，还不到半个世纪。他们正意气风发，由他们站在最前线来保卫的共和政体的罗马边境安泰。

但是，罗马民众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那就是他们拒绝服兵役。在雅驽斯神殿的大门始终没有机会关闭的战争年代里，对于年年从春到秋战事不断的罗马来说，市民罢兵役的行为令他们深感头痛。元老院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制定成文法律。为此，元老院决定派遣考察团，到已经实行法治的先进城邦国家希腊学习。考察团成员由元老院三位议员组成，条件是必须担任过政府要职。当然，他们也是罗马有权势家族的男人。

由三个罗马人组成的考察团在希腊逗留的时间达一年之久。从意大利到希腊，以当时的船速用不了一个月。关于他们出发和回国的日期，找不到史料记载，但是我想，他们在希腊的逗留时间应该有一年之久。

至于考察团的所到之处，尽管历史学家李维只记录了雅典，但是，既然他们在并不辽阔的希腊逗留了如此之久，我想，他们一定翻山越岭，跋涉数天，从雅典去了斯巴达。雅典因梭伦改革而闻名，斯巴达则有莱克格斯实施的改革。

《十二表法》就是根据该考察团的报告制定的，以后再细述。编年史式的记述也到这里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第一次接触到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因为要讲罗马的故事，不能不提到希腊。

那么，早于罗马存在的希腊人，在迎来罗马考察团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前，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克里特岛而非希腊本土。因为克里特岛比希腊本土更靠近当时的先进文明之国埃及。新的文明往往出自自身的周边。关于克里特文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样描写的：

> 米诺斯王创建的船队使船只在克里特岛周边海域的航行变得安全。因为米诺斯利用船队征服了克里特岛周围的诸多岛屿，并成功清除了以这些岛屿为根据地的海盗。不必再担心海盗出没的克里特人财富大增，甚至建起了石板房。

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据说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前后。以公元前1350年前后为界，爱琴海的主人克里特文明急速衰退，不清楚是大地震的缘故，还是因为来自希腊本土的进犯。总之，到了公元前1350年前后，首都克诺索斯遭到破坏，优雅而华丽的克里特文明敲响了晚钟。其后的克里特历史一变而成为依附于希腊本土的历史。尽管如此，

在19世纪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的发掘下，克里特昔日的繁华景象今天仍然依稀可见。

曾经的周边变成了中心，在它周围又形成了新的周边。位于希腊本土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一带成了希腊文明新的中坚力量——历史上称为迈锡尼文明。

当时好像还是军人统治的国体。这些军人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为后世的我们所熟知。阿古士王阿伽门农、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帖撒利王阿喀琉斯、伊塔卡王奥德修斯，他们统称为阿卡亚人，于公元前1520年前后崛起，是经历10年攻城战的、远征特洛伊的主人公。诗人荷马指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为了夺回王后。因为斯巴达王后海伦受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诱惑出走到了特洛伊。它既是一部讲述倾城美女海伦故事的文学作品，同时又因为描写了希腊诸神分别向特洛伊派和希腊派提供支持，从而得到了世界文学最高杰作之一的评价。但是，如果想找出最接近的真相，那么史实应该是希腊人依靠武力远征特洛伊的目的在于掠夺财富吧。

不管怎么说，在特洛伊沦陷时奏响凯歌的迈锡尼文明，在仅仅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1200年早早灭亡了。有一位喜欢历史的人说：

> 他们一心想要征服遥远的特洛伊，为此远离家乡，长达10年之久。其间，国内秩序一片混乱，国力大大衰退。因此，被外来民族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我认为这话即使说得不够准确也八九不离十。结束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满载着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回到国内的希腊联军总司令官阿伽门农被王后和她的情人合谋杀死在浴室里。诗人荷马把袭击胜利者的这类悲剧归因于支持特洛伊派的诸神发怒所致。不管怎样，消灭迈锡尼文明的是从北方一路南下来到希腊的多利亚民族。

和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的特洛伊一样，施里曼发掘出了迈锡尼文明的遗迹，证实荷马史诗不是纯粹虚构，而是史实。然而，以公元前1200年为界，迈锡尼文明也消失了。作为迈锡尼文明中坚力量的人或被杀，或被逼为奴，从而被彻底挤出历史舞台。多利亚人带来的破坏非常惊人，在这以后，整个希腊沉寂了整整400年。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长达400年的沉寂时期，在希腊史上称作“希腊的中世”，意思是一切归于沉寂的、夹在以活跃为特点的两个时代中间的时期。

所谓“中世”通常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为医治伤痛而必要的平静时期，后一阶段则是趋向复原的时期。一旦进入恢复期，即使尚未出现萌芽状态，其根系却已经在地下蔓延开来。在希腊历史上，荷马笔下曾经辉煌的英雄们只拥有青铜器，而野蛮的多利亚人却已经有了铁器。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人走出他们的“中世”，进入统称为城邦国家的时代。由多利亚人建起来的斯巴达和因多利亚人入侵而出逃的阿卡亚人建立的国家雅典成为城邦国家的代表。随着城邦国家的诞生，希腊人开始了向海外的殖民运动。这一现象充分表明，此时的希腊已经获得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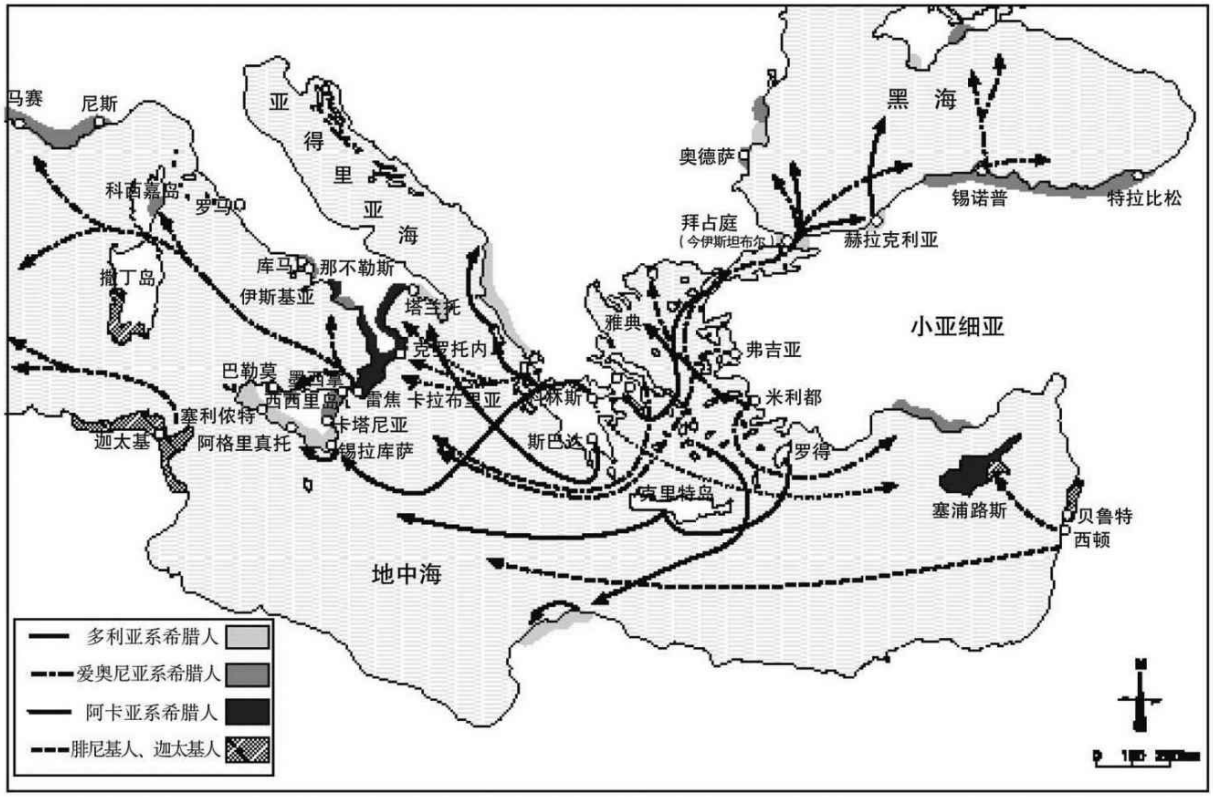
随着人口的增加，希腊本土已经无力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于是就出现了殖民运动。除了帖撒利，希腊没有肥沃的耕地。如果不依赖生产性较高的工商业来取代农耕和畜牧业，希腊完全没有能力为新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然而，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还没有转型成为后来的以工商业为主的民族。而且，这个时期，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国家也刚刚开始形成。城邦的形式意味着诸多小国家各自为政。于是，为了争夺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各城邦之间争端不断。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举行。之后，每隔四年休战一次，大家汇聚在奥林匹克，一起欣赏体育竞技。它意味着除了这一时期，各城邦之间都处在战争的状态。但是，刚刚诞生的各城邦国家实力相当，即使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扩大自己的领地。

对于在本国无法获得足够生活资源的人们来说，对于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人们来说，剩下的就只有去海外发展这一条路了。这个时期的希腊殖民，不仅限于希腊的一个地方，而是以全希腊为规模进行的。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

第一次殖民运动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到前8世纪初，殖民对象主要集中在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的意思是多岛海。在小岛众多的爱琴海，沿着一个又一个的岛屿横渡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建设自己的城市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一个选择。罗得岛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希腊人居住的岛屿的。它意味着爱奥尼亚地区在小亚细亚西岸诞生。一路从克里特、迈锡尼迁徙而来的希腊文明的中心先于雅典，首先在爱奥尼亚地区开了花。哲学鼻祖泰勒斯、历史学先辈希罗多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还有荷马据说都出生于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殖民运动的舞台爱奥尼亚与希腊本土相比更靠近东方，所以才率先积累起了财富。在当时，为了尽快积累起财富，只能依赖通商。所谓通商就是要接触异国文明。通过接触，可以感受到信息带来的刺激。要把这种刺激转化为其他形式，财富无疑是最便利的一种东西。

希腊人进行的第二次殖民运动是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之后，即过去了约半个世纪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后。这一时期的殖民范围不再局限于爱琴海域，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而且，这次殖民运动也没有局限于希腊本土，连第一次殖民运动的舞台爱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城市也加入了此次殖民运动。因此，除了在本国无法生存或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人成为殖民地主人公外，不能不说这是希腊人与生俱来的进取心的一次大爆发。实际上，第二次殖民地选择的是那些或没有土著居民，或土著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因此，这一次殖民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的风险投资。



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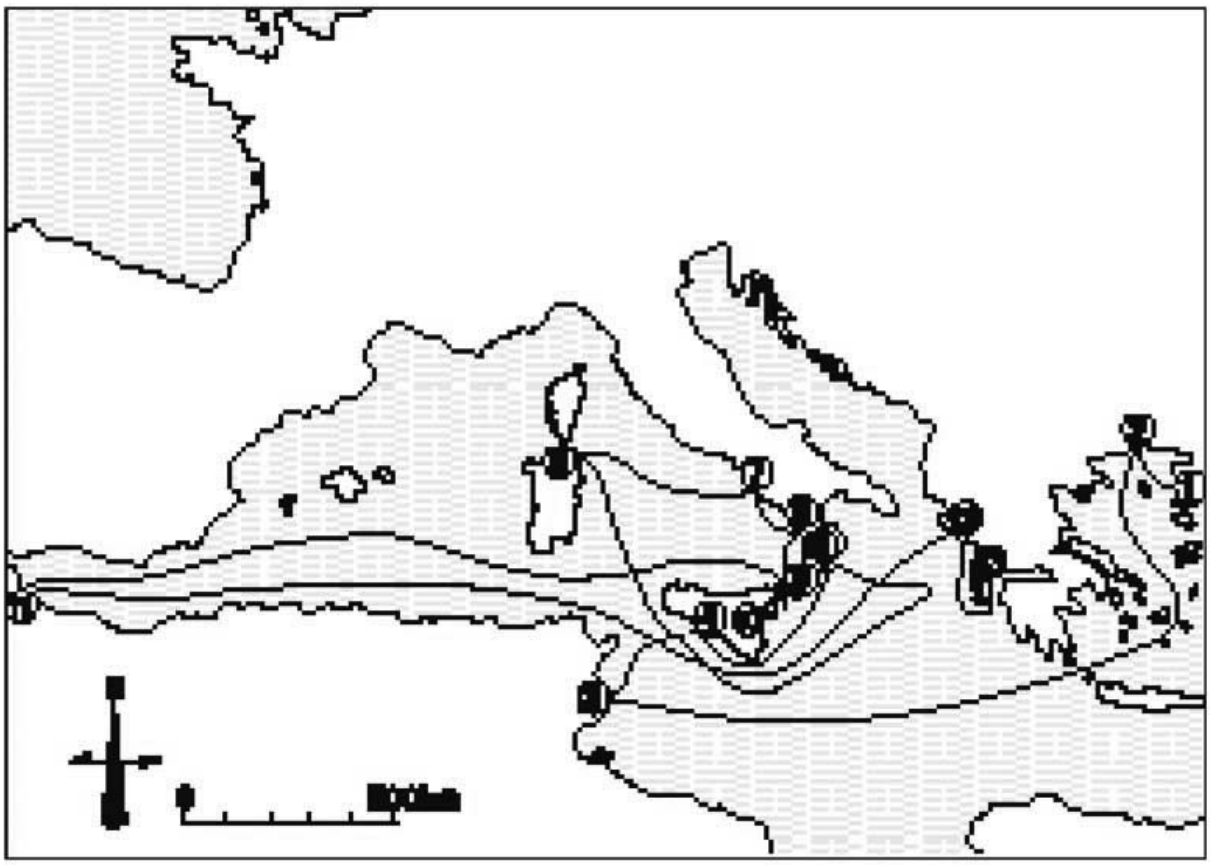
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人数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当然，他们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国南部、西班牙东岸一带也建起了殖民城市。而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大概是相距较近的原因，殖民地网罗了从塞浦路斯岛至黑海的区域。经过第一次殖民运动，爱琴海变成了希腊人的内海，经过第二次殖民运动，希腊人的世界又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在海上可以与他们抗衡的，在当时只有由腓尼基人殖民而建起来的迦太基。

希腊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一次、第二次殖民运动中，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首先是第二次殖民所展现的活动舞台之大。腓尼基人也向外开展了殖民运动，但是建设迦太基的余波只波及西班牙，不像希腊人一直延伸

到了整个地中海。

荷马史诗《奥德赛》是一部讲述用木马把特洛伊战争引向胜利的功臣奥德修斯在其后10年间的漂流故事。奥德修斯从位于地中海东端的特洛伊出发，直到西端的直布罗陀，足迹遍及了整个地中海。而他到过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第二次殖民运动中希腊殖民地的附近。



奥德修斯的流浪路线（根据荷马的《奥德赛》）
1. 特洛伊2. 西科尼3. 吃莲花的人居住的地方4. 独眼巨人居住的地方5. 风神居住的地方6. 食人肉的野蛮人居住的地方7. 美女喀耳克居住的地方8. 美声海妖居住的地方9. 变身海怪的美女岩10. 太阳岛11. 美女卡吕普索居住的地方12. 费阿刻斯人居住的地方13. 伊塔卡岛（奥德修斯的祖国）

荷马的另一部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舞台，经施里曼的发掘工作而证实不完全是诗人空想的产物。至于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述的主人公

奥德修斯到过的地方究竟是哪里现在还在研究之中。据说，《奥德赛》也不完全是杜撰的、荒诞无稽的故事，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其活动的舞台似乎也不是未知的土地。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的目光大概已经扫到了整个地中海。

强大的希腊民族积极向外拓展的性格源自他们具有好奇心、冒险精神和独立心的特点。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才使得他们的宗主国希腊与殖民城市之间的关系完全有别于罗马的情形。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引起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在这里。

例如，那不勒斯和相距不远的、希腊人在意大利的最早殖民地库马一样，最早也是因雅典人的殖民建设而出现的城市。那不勒斯的意思是新城邦，在希腊语中叫NEAPOLIS。但是，在那不勒斯，即便在古代，也看不到任何带有雅典风格的东西，也没有爱奥尼亚风格的东西。这也许是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其宗主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联系的缘故吧。

塔兰托位于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从靴子后跟到脚掌心的位置上。在今天，因为拥有意大利最大的钢铁公司，又因为是面向地中海的军港城市而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同样源自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的殖民建设。同样，在塔兰托，从来也没出现过能让人联想到斯巴达的东西。

今天，位于西西里东部的锡拉库萨因为古迹和每年在这里上演的古典戏剧而闻名。而在古代，作为地中海屈指可数的城市之一，不仅有名，而且还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柏拉图曾经多次到访这里，阿基米德就出生于此地。锡拉库萨同样源自希腊殖民，它的建设者是来自科林斯的殖民者。科林斯在希腊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城邦，其地位仅次于雅典和斯巴达。而锡拉库萨和它的宗主国科林斯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松散。

以这三座城市为首的源自希腊殖民的各个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在那不勒斯城市发展中，找不到任何雅典的影子，塔兰托也选择了和斯巴达完全不同的政体以及生活方式。至于远比宗主国科林斯繁荣的锡拉库萨与雅典之间的关系比与科林斯还要密切。而关系过于密切的结果甚至导致了战争。

以殖民形式向海外发展的希腊人从宗主国带去的只有希腊语和希腊宗教、希腊人的进取心和对独立的执著。母国和殖民城市之间的这种相处方式也是区别希腊和罗马的特点之一。因为罗马就像后面将要讲到的那样，建立的是非常密切又非常有机的联系。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世纪是向海外发展的时期，也是充实国内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最能有效发挥希腊人活力的城邦国家。而希腊人发明的国体——城邦——的代表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

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以雅典为首都，面积2600平方公里，虽然称不上有沃野千里，但是在遍地岩石的希腊，算得上很辽阔了。雅典附近还有一个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是个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由于此地躲过了多利亚人入侵时的劫难，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亚人血统的纯洁性。传说中雅典的创立者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忒修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其他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雅典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改为贵族政体。在该政体下，9位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分管内政、军事和宗教，由其他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辅佐，自由市民组成的市民大会则形同虚设，没有发言权。

进入公元前7世纪，这种贵族政体渐渐地暴露出与雅典的现状不相适应。相对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贵族阶级，依靠工商业强

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一自由市民阶层对于有了经济实力却无法参与国政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更多时候为债务所困的自耕农阶级也加入了反抗贵族的行列。

这些被称为自由市民的市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条文化。贵族阶级因此失去了司法权，无法像在法律不成文的时代里那样随心所欲。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消除“自由市民”的不满。于是，梭伦登场了。公元前594年，梭伦着手开始改革，他迫使原有统治阶级的贵族们承认在实施改革中的强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是出身于重债缠身的自耕农阶级，而是拥有大片土地、在雅典举足轻重的名门贵族之后。他大概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之一。

梭伦首先制定了拯救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为此，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地削减。同时，他还废除了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为奴的旧制度，彻底废除了在古代被认为理所当然地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拒绝了激进派自由市民的提案，也就是没收所有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进行平等分配的提案。对此，梭伦这样写道：

> 我们给了市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们不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利，但也不再新加任何权利。

梭伦改革的最大着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开展了人口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制定了个人权利与其所拥有的不动产成正比的政策。

如此一来，参加国政的权利不再受出身左右了。

王政是一人专政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又叫做帝制。贵族政体是由选出来的若干人共同治理的政治制度，又叫财产政治。这是因为梭伦制定的资产与权利成正比的制度是以人口调查结果为依据的，所以才被安上了“财产权利制”的叫法。在日本有很多学者把它翻译成“财阀政治”，这种翻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用钱买选票的“金权政治”。所以在这里，我把它翻译为“财产权利制”。尽管如此，我想一定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收入与权利挂钩没有道理。

但是，与之前非贵族出身就不得参政的贵族政体相比，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进步的一种政体了。毕竟出身是无法改变的，而要获得财产，可以靠个人的才能和运气。在古代，不，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即使有平等的理念，也只认为是那些理应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把权利与农业收益的多少成正比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工商业积攒起财富的人们投资土地等不动产，以保全已有财富的做法，在今天依然很普遍。

梭伦根据财产也就是资产的多少，将雅典市民分成了四个等级。根据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以及无产者市民构成的第四等级。

首先是各等级的义务。属于第一、第二等级的市民有义务服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和马匹。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也有义务服兵役，并自备军备、军装，在经济上与马匹也必须自备的第一、第二等级相比，负担要轻一些，这个等级的人负责提供重装步兵。估计在人数上也是第三等级最多，因为古代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属于第四等级的市民有义务提供轻装步兵或舰队成员。

其次是与义务相随的各等级的权利。政府要职由第一、第二等级的市民担任，第三等级做行政官僚，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

权。

在地中海世界，率先实行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政制中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就立刻想起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就这样，因为梭伦，雅典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有一种宿命总是与改革相伴相随。因改革而提升了实力的人们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梭伦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一宿命。

首先，雅典在比雷埃夫斯有一个天然良港。其次，雅典人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中大量涌入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因通商而比雅典更早迎来了繁荣。雅典于是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再有，因为梭伦改革，使得那些虽然不是贵族出身却有了资产的人担任国政要职不再是梦想。尽管梭伦改革所重视的财力只限于农业收入，但是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雅典市民对财产的想法发生改变。随着通商的兴起，雅典市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把积攒起来的财富投资土地，他们转向了投资海运和通商业。希腊的土地原本就很贫瘠，所以从投资效益来看，自然不如投向蒸蒸日上的海运和通商业来得快。

开始投资动产的雅典市民，迟早会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心怀不满。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于正面挑战梭伦的个人权威，从而避免了问题的表面化。但是，在梭伦离开政治舞台后不久，人们郁结在心里的不满爆发了。

在无人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为秩序的雅典，等待它的只是权力的空白，也就是无政府状态。

雅典政体的变迁简直就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向我们展示所有政体的这一点上确实非常有用。然而，此时的雅典也有了和希腊其他城邦同样的经历。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暴政，也就是独裁政治。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没有结果的权力斗争的雅典人，开始觉得只要能恢复秩序，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恢复秩序，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

与梭伦一样，庇西特拉图也出身名门贵族。但是，这个名门贵族没有把权力基座放在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上，而是放在民主派的新兴阶级上了。由工商业者构成的这一新兴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原有阶级相比，对经济的发展更加敏感，而且深知要发展经济，政治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实行第一次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赶下了台。15年后的公元前546年，他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凭借武力重返雅典。此后直到他去世的20年间，庇西特拉图一直将雅典置于他的独裁统治之下。

政体的变迁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但是判断一种政体的好坏，有时和教科书不一样。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间，不仅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

考古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在这个时期，制作精美的阿提卡陶器取代了之前占据地中海世界陶器市场的科林斯、萨摩斯、米利都和罗得产的陶器。以红绘和黑绘壶闻名的阿提卡陶器独占地中海高级陶器市场的时代开始了。

独裁者庇西特拉图开展的外交政策也很符合雅典“经济的时代”。

他把雅典军事力量的重心放在海军上。为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他占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岛屿和地区。萨拉米斯和提洛岛重回雅典的统治之下，势力范围扩张到爱琴海上的诸岛屿和爱奥尼亚地区，对于无法置于统治之下的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以及吕底亚王国、波斯帝国，则努力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弥补第二次殖民运动时因不够积极而造成的损

失，他在希里帕附近建造了中转基地，致力于振兴与黑海周边各国之间的通商。在国内则致力于开发矿山事业。

实际上，独裁政权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雅典市民非常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愿意服从他的独裁。但是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却无法忍受作为其继承者的他的儿子们的独裁。公元前510年，雅典的独裁政权被斯巴达援助下的贵族推翻。

推翻独裁政权的贵族们和给他们提供后援的斯巴达都以为推翻独裁政权后的雅典该恢复贵族政制了。但是，带头推翻独裁统治的克利斯梯尼认为，从雅典的现状来看，恢复贵族政体并不适宜。

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中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秩序，提高了经营工商业的雅典市民的经济实力，雅典的经济中心已经明显从土地转向了工商业。在这种状况下，让以土地所有为经济基础的贵族重登政治舞台，过于无视现实。因此，克利斯梯尼没有止步于恢复梭伦的改革上，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将体制改革得更加民主”。

克利斯梯尼首先从行政改革入手。

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地阿提卡一带被分成三大区：首都雅典市和海港比雷埃夫斯一带为第一区，整个沿海地带为第二区，内陆为第三区。每个大区划分20个小区，各小区根据人口密度再分若干“居民区”。据说在整个阿提卡地区，这样的“居民区”有150到170个。这种“居民区”便是城邦国家雅典的行政基础。

这项改革实施后，雅典市民的正式姓名就按名字、姓氏和所在“居民区”名称的顺序构成。例如，苏格拉底就成了阿洛佩凯区索弗罗尼斯科斯的儿子苏格拉底。表示家族和门第的名称彻底消失。这就是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被认为是民主改革的原因。

此外，被认为民主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按照行政区来划分整个雅典的这一改革，从结果上看，分割了贵族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土地，由此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基础。克利斯梯尼的这项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单纯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进行分割的例子。

克利斯梯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梭伦进行的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利制”不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出现的政体叫民主政体，意思是由自由民众治理的政体。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末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首先，市民大会的权力得以强化。20岁以上的所有雅典市民都有权参加市民大会。与罗马不同，在雅典市实行一人一票制。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市民大会，每年召开若干次。从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是否与他国建立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产生，全部由市民大会决定。

克利斯梯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的重点——四个等级的制度，但划分等级的标准有了变化，不再依据梭伦时代的农业收入，而是无行业区别的收入。因此，从事工商业的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克利斯梯尼还设立了类似现在的省厅一样的机构，称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由各区以抽签方式选出的30岁以上的雅典市民组成，所以与出身、财产和才能全无关系。总计500人组成的这个机构处理日常政务。五百人会议每月召开数次，每次会议的议长都以抽签的方式产生。

克利斯梯尼还将梭伦时代由任期一年的9人组成的政府官员增加到10人，重新命名为“内阁”。该词源自“战略”一词，也叫“国家战略官”。就任“国家战略官”的10个人每年由市民大会选出，这就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内阁。

克利斯梯尼进行的最后一项改革是称为“陶片放逐法”的自我净化体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独裁而制定的。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又一种说法是只要够6000块陶片），就有权把市民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市民逐出国外10年。

但是放逐不会损害该市民的名誉，即使遭到陶片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因为他既不会失去市民权，财产也不会充公，只是被逐出雅典，需要在国外的任何地方住上10年而已。过了10年回到雅典，还有可能当选内阁。也就是说，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一个被认为对雅典民主政治可能有威胁的人，使他和他的支持者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大脑。大概雅典人认为头脑要充分冷静下来需要10年时间吧。

不管怎么说，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后世称之为“直接民主政治”。每一个市民都和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雅典，就民主政治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国家中，至今仍然是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例。

当时雅典享有权利的人数，即成年男子的人数是3万到4万。因为距离雅典路途遥远，或者到海外经商办事而无法出席在首都雅典召开的市民大会的人估计不在少数，能经常出席市民大会的人数据说在1万人左右。

但是，1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难想象，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独立意识和擅长辩论的性格，每每使得议事进程十分缓慢。而且1万人是否都具备政治判断力也是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经过了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是个未解的课题，所以深究无益。不过，有关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想法，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名气仅次于民主政治的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吧。

这是在陶片放逐法制定后不到20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雅典政界

大人物阿里斯德岱斯在一个已成惯例的陶片放逐投票现场，被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好像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并不认识阿里斯德岱斯。他递上一枚陶片，说：

“对不起，能帮我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德岱斯问这个男人阿里斯德岱斯做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说：

“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模样，只是满世界听人说阿里斯德岱斯是个大人物，是正义之士什么的，我只是听烦了。”

阿里斯德岱斯二话没说，就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他。那一年，阿里斯德岱斯被雅典驱逐出境。

可是没过3年，他就被召了回来。原因是波斯大军打过来了。不用说，回国后的阿里斯德岱斯协助总司令官特米斯托克利斯，把雅典率先展开的抗击波斯战争引向了胜利。有意思的是，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后来也加入到了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名单中。这个制度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大概雅典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制度存在许多有违国家利益的缺陷吧。

在雅典，无论多么无知，只要是市民，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不具备市民权这一形式的国籍的人则完全没有参政权。住在雅典的所谓非市民通常是指外国人和奴隶。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当时的雅典生活着很多外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说希腊语，信仰希腊宗教，有希腊人的性格，和雅典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雅典以外的城邦，就被和雅典市民区别对待。在雅典，父母必须有一方是雅典市民的人才能享有市民权。后来，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变得更加封闭，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人，才有资格取得市民权。

在希腊，并非只是雅典有这种倾向，说起来，希腊城邦社会的封闭程度确实出人意料。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并将在雅典终老，只要你是外国人，通向市民权的路永远都是封闭的。想想雅典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这种倾向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要给全体市民同等权利，也许就不得不限制市民数量了。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以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则不愿殉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对于雅典市民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是对于出生地不在雅典的亚里士多德来说，他没有义务为雅典的法律牺牲自己。

在这一点上，罗马也选择了与雅典不同的道路。希腊人普鲁塔克是这样写罗马的：

> 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了。

但是，和市民缴纳同样的税金，非但没有被选举权，甚至连选举权也得不到承认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不少见。

希腊与罗马的不同之处在对待奴隶的处置方式上也可见一斑。希腊的奴隶除了极少数例外，注定终身为奴。相反，罗马的奴隶中有解放奴隶。这一制度规定他们或者用攒下的钱赎回自由，或者在经过长年劳役之后，像获得退休金一样被授予自由。解放后获得自由的原奴隶叫解放奴隶，其子孙可以获得与罗马自由市民完全相同的市民权。关于这一问题以后再细述。

城邦国家雅典确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这一政体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那么在这个时期，与雅典并驾齐驱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之一 ——斯巴达实行的又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呢？所谓政治体制不

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斯巴达

绝大多数的希腊城邦国家在雅典之后也步入了民主政体的行列。与此相反，斯巴达却坚守着自己特有的政体。

与面向大海的雅典不同，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是需要翻过一座座山才能到达的内陆之地。它的居民构成从建国之初就与雅典有所不同。

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亚民族挥师南下，征服了土著居民后，建立了城邦国家——斯巴达。征服者多利亚人没有在斯巴达实行同化土著居民的政策。像斯巴达这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界限分明，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城邦国家只此一国。在斯巴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不在实力的有无，而在于民族的不同。

首先是征服者的子孙，构成现有统治阶级的斯巴达人。他们是自由市民及其家人，共约1万人。他们集中居住在市中心。服兵役是这些血统纯正的斯巴达人的唯一工作，参与国政的权利也只有这些人享有。

其次是从事工商业的阶级，叫皮里阿西人。他们既不是多利亚人，也不是斯巴达土著居民，他们大概是追随征服者多利亚民族而来的出生于其他地方的希腊人。

皮里阿西人是自由人，但没有市民权，当然也没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不享有市民权的他们自然没有选举权，但是有义务服兵役。古代国家市民权的概念是只要有服兵役的义务，自然就有参政的权利。但是斯巴达的皮里阿西人在服兵役时只能够作为兵卒，所以在军务方面的权利

可能也有别于专职的斯巴达人享有的权利吧。

城邦国家斯巴达种姓制度的最后一个阶层是农奴，叫希洛人。这些人是多利亚人入侵前的斯巴达原住民。希腊青铜器文明中心的他们被使用铁器的多利亚人征服后，甘居农奴地位，虽然不是奴隶，却相当于奴隶。除了结婚，他们没有参政权、私有财产权和裁判权等市民享有的诸多权利，甚至连市民应尽的义务——服兵役——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斯巴达人的农场里劳作。

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人口比例约为1：7：16。这一人口比例决定了斯巴达的一切。

斯巴达人专事军务而把农业和工商业交给被统治阶级的做法，大概是只占总人口二十四分之一的人口要统治余下人口的一个策略吧。尤其是被统治者中，打上了农奴身份烙印的希洛人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以军事国家著称的斯巴达是从最初出于安定国内的需要而渐渐发展成为军事国家的。

成年后的斯巴达人，服兵役的年限是20岁到60岁，通常有数千人，极少超过1万人。少而精是斯巴达现状的产物。

有市民权的斯巴达人并非一成年便有权出席市民大会，行使自己的一票权。他们必须等到30岁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市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斯巴达人组成。除此之外，还有长老会议。长老会议议员共28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由市民大会选出，任期为终身制。另外加上2位国王，长老会议员的总数是30人。

作为军事和政治的最高权力者，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由两家名门望族世袭。两位国王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同时执政。这就是二头政治，是由世袭的两位国王共同统治。这种政体与君主制的一位国王统治不同，而是两位国王统治的政体，又叫二党制。

即使在全希腊所有城邦国家都受雅典民主政治影响的时代，斯巴达仍然保持了其独特的政体。不仅如此，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来库古进行的改革进一步稳固了这一体制，使得斯巴达的风格更加激进。

与梭伦改革决定了雅典的风格一样，来库古的改革也决定了斯巴达的风格，虽然这两个风格截然不同。

所谓“改革”，实在是一个令人深感恐怖的说法，因为改革失败会置一个民族于死地。即便成功，也会决定一个民族的风格，由此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因此绝不可草率从事。

来库古的改革使斯巴达更加彻底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以军务为至高目的。

孩子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经过检查，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能健康、平安地长大，被认为不够健壮的孩子当即会被抛弃或沦为奴隶。

被认为有希望成为强壮战士的婴儿由父母抚养到6岁，一到7岁，便要离开父母开始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按照以培养合格战士为目的的严密计划接受教育。当然，肉体的训练是主要科目。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想必金牌，不，月桂冠戴到斯巴达人头上的次数一定是最多的。

到了20岁，斯巴达人就开始服兵役，一直到60岁退役。30岁之前有义务过集体生活，即使结了婚，晚上也必须回到兵营。

无论是少年的宿舍还是战士的兵营，都没有相应的建筑物，他们都要生活在帐篷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斯巴达人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在过了30岁才被认为是独立市民的斯巴达人，可以和妻儿一起在有墙有屋顶的室内生活，也只有独立市民才能享有这种权利。

在斯巴达，除了参与国政和服兵役外，男女完全平等。女人和男人一样为了有一个健壮的体格，有义务吃好饭，当然也是为了可以生育健康的后代。为此有严格的体重管理，严禁甜食、酒和美食。和男人一样，女人也必须接受体育教育，并在一次次的运动会上接受检验，成绩优秀的比较容易出嫁。如果在当时女子也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在女子项目上，斯巴达人大概要占绝对优势吧。

和男子一样，无论是训练还是运动会，女子都要以裸体进行。大概来库古认为越是掩饰就越容易产生邪念吧。在斯巴达，性生活不过是以生产身强力壮的战士为目的的一种手段，所以，单身会被人蔑视。丈夫战死后，已经养育了子女的寡妇，国家更是鼓励其再婚。斯巴达女人的义务是尽可能多地生育健康的孩子，同时料理好以纺织为主的家务事。

即便是男子，除了适合少年学习的读物外，绝不欢迎内容曲高和寡的书籍和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至今在意大利仍将沉默寡言的人称为“斯巴达式的”人，城邦国家斯巴达所在的地方叫“斯巴达式的”地方。在古代斯巴达，夸夸其谈会遭到蔑视，在大会上发言也以简明扼要为佳。

作为斯巴达的战士，别说是埋头读书了，就连心存疑问或是浮想联翩都是不被认可的。在广场上逮着一个人就与之辩论，直到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放人走的苏格拉底要是到了斯巴达，一定还没收到一个弟子就被赶出去了。对于斯巴达人来说，美德就是勇敢、服从和有爱国心。

但是，建立了斯巴达体制的来库古深知，改革光靠嘴说是不够的，只有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改革才会成功，才会持久。

他废除了之前在斯巴达流通的金币和银币，决定以铁币作为流通货币。因为使用铁制货币，别国商人就不愿前来通商，于是，一切与艰苦朴素的生活无关的东西也就不会再进入斯巴达境内。而艰苦朴素的生活所需的东西在斯巴达境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从事农业的希洛人每年只要把自己收获的农产品中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就可以了，所以斯巴达人本来就不富裕，又因为使用铁币，他们更是没有了要储存粮食的兴致。但是，无论生活水平多么低下，只要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水平，也就不会产生嫉妒，自然也没有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斯巴达因此以没有窃贼而闻名。斯巴达也没有雅典摆脱不掉的权力斗争，因此得以在政治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

由于斯巴达人一切都服从于军事目的，所以其军事力量之强大令人惊畏。尽管军队数量很少，但是其威名甚至远震波斯。在希腊，一提起精锐部队，指的就是斯巴达的步兵军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战士什么都不产。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建筑和雕刻，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非要说留下了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个词——“斯巴达式的”。

但是，在古代，斯巴达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他们的假想敌雅典实力的不断增强，斯巴达也渐渐对自己固守斯巴达式山地感到了不安。他们开始向外侵略，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都被斯巴达置于其统治之下。

斯巴达联合所有已经处于其统治之下的城邦国家，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加入这一军事同盟的条件之一是当斯巴达发动战争时要提供兵力相助，再就是实行贵族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斯巴达没有要求同盟国每年进贡，因为对斯巴达来说，士兵远比金钱更重要。斯巴达把采用民主政体的城邦国家看做自己的敌人。

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多达150个的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和斯巴达异军突起，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雅典靠的是经济实力，斯巴达倚仗的是军事力量。可是，在这一时期，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两强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如果此时希腊内部发生战争的话，其结果必定两败俱伤，因为大敌从希腊之外袭来。波斯战争开始了。

波斯战争

战争，通过追踪它是如何进行又是如何处理战后事宜，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的风格。人们在讲述历史时，多是在讲述战争。这不是说人类依然未能摆脱战争的恶魔，而是战争是讲述历史也是讲述人类的绝好素材。随后要讲到的波斯战争中，虽然没有一个罗马人参与，却是理解罗马人的“绝好素材”，因为要理解罗马人，不能不首先理解希腊人。在内讧不断的希腊史上，波斯战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希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事例。

进入公元前5世纪前，成功征服了整个东方的波斯帝国，开始将视线转向西方。波斯扩张势力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经济上的理由。当时叫爱奥尼亚地区的小亚细亚西岸和横亘在希腊本土之间的爱琴海一带是经济中心，波斯帝国企图把这一繁华地带据为己有。

其二是宗教上的理由。波斯人坚信以道德之神阿胡拉·玛兹达为最高神的波斯宗教优于只有和人类同等道德的希腊诸神。波斯人认为信仰优等宗教的民族统治信仰劣等宗教的民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波斯国王自称统治权为德高望重的阿胡拉·玛兹达所授，所以他不只是一国之王，而是“众王之王”。从这个众王之王的政体来看，内讧不断的希腊城邦国家，其民主政体低劣至极。波斯人认为救希腊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所以，波斯战争不只是一场出于经济理由的战争，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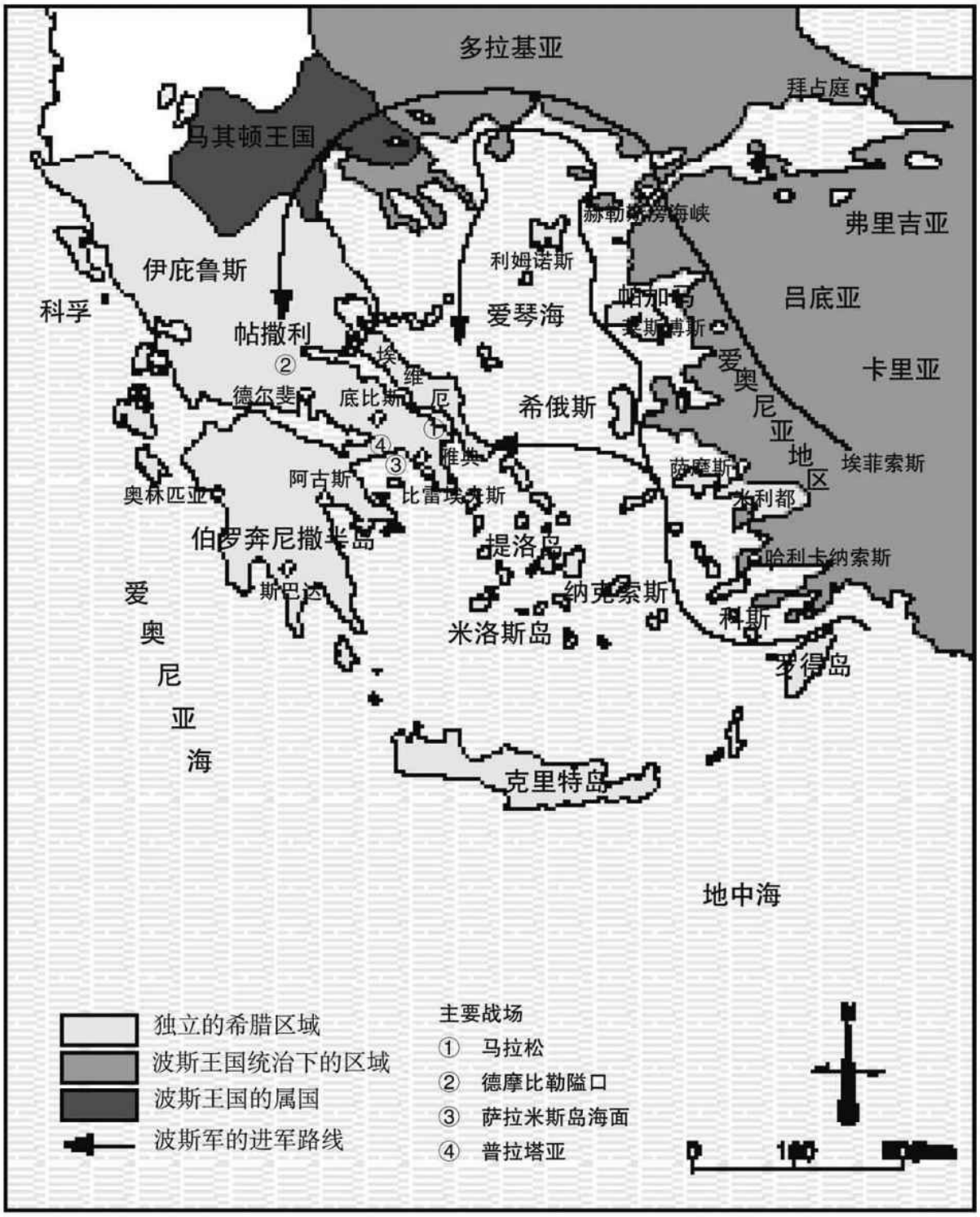
波斯战争首先在距波斯最近的小亚细亚西岸爆发，因为波斯国王强迫位于这一带的城邦改民主政体为君主政体。当时的爱奥尼亚地区，经

济比希腊本土发达，也进行了政体的改革，甚至比希腊更早实行民主政体。对于波斯王的强硬要求，以米利都为代表的爱奥尼亚地区予以了坚决抵制。

米利都人向希腊城邦国家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斯巴达请求支援。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波斯战争的描述，他们是这样请求斯巴达的：

> 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就要沦为奴隶。对于生活在爱奥尼亚的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悲哀，这也是所有希腊人的悲哀，特别是对于你们斯巴达人来说更是如此。你们在希腊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的身上流淌着和你们相同的血液，我们恳请你们把爱奥尼亚同胞从波斯的暴政中解救出来。

当时，正在和阿古斯交战的斯巴达，对民主政体没有好感，所以没有答应爱奥尼亚民众的请求。最后提供援助的是雅典和埃维厄，这两国和爱奥尼亚同是阿卡亚族，所以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共派出了25艘战船和相应的士兵，但是这点力量不足以对抗波斯，仅仅不到4年时间，爱奥尼亚希腊人的抵抗就被打垮了。这一年是公元前494年。



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世界

爱奥尼亚地区的经历使波斯国王认识到了一点——要想攻占希腊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与征服东方各民族不同，只派遣大军是不够的，还需要巧妙的外交策略，离间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波斯国王深信希腊各城邦国家将不会采取共同行动。

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首先向援助过爱奥尼亚的两个国家派出了由陆、海军共计2.5万名士兵组成的大军，明确表示波斯的敌人是埃维厄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国家。埃维厄很快被攻破，家园被破坏，市民被卖身为奴。随后，把战争矛头指向雅典的波斯大军，在位于阿提卡地区东岸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成功。

接到波斯军攻来的消息，雅典举国震惊。他们立即派出使者火速前往斯巴达请求派遣援军。这次斯巴达没有拒绝，但也没有采取行动。雅典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迎战了。

所幸的是，极富决断力的米提亚德此时恰在雅典的10个“国家战略官”之中。

他马上组编并率领1万人的重装步兵团前往马拉松平原，并布置海军从海上保护几乎已成不设防的城市雅典。

波斯军在数量上比雅典军有优势。但是，米提亚德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战术。他明知力量会更薄弱，还是把战线拉得和敌军一样长，而在左右两翼布置精锐部队。

战斗在米提亚德的预想中开始并结束。雅典军尽管中部被攻破，但是左右合围，成功夹击了波斯军。企图从海上强攻雅典的波斯海军也未能如愿。波斯海、陆两军只好撤回东方。

这时，有一个雅典士兵跑步回到雅典，带去了马拉松之战的捷报。这就是现在的奥林匹克马拉松比赛的由来了。

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方面只有192人阵亡，波斯方面的损失要略多一些。波斯军尽管吃了败仗撤回东方，但主力几乎完整无缺。这场战斗的胜负，其意义在于精神。希腊人知道了在东方百战百胜的波斯军也不是所向无敌的常胜军。

但是，没有人认为波斯会就此罢休。对于刚刚战胜波斯军的雅典来说，制定对波斯的战略方针是尤其紧迫的任务。

尽管因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而信心倍增，但是雅典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稳健派和激进派。两派的对立除了具体想法上的不同以外，领导两派的领袖个人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是对立的原因之一。

稳健派的领袖是阿里斯德岱斯，他曾接受过一位无知的家伙的请求，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激进派的领袖则是特米斯托克利斯。

激进派的想法总是比稳健派来得简单明了。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也很简单明了，他主张通过增强军备提高自我防卫能力，强调雅典军事力量的重心应该放在海军上。对此，阿里斯德岱斯并不同意。

特米斯托克利斯为了排挤这个政敌，按照雅典政界的惯例，有效地利用了陶片放逐法。由于收不齐6000块陶片，陶片放逐法无效，所以自然有人要在私底下活动。也就是说，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想要排除政敌，陶片放逐法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阿里斯德岱斯在无知且缺乏判断力的家伙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不写自己的名字，丝毫也不会影响结果。

利用陶片放逐法成功地挤走政敌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必再担心受干扰。他开始把雅典引向自己认定的方向。他把之前从矿山得到的收益由全部分发给市民改为全部上缴国库，以确保增强军备所需的财源。此时雅典的造船业已经发展到一年可造三层桨战船200艘的程度。到了这一时期，雅典完全超越了迦太基，一跃成为地中海世界实力最强的海军大国。

马拉松战役10年后的公元前480年，继承了先王大流士遗志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30万大军和1000艘战船，向希腊杀来。

陆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经过多拉基亚、马其顿，然后南下。海军也与陆军配合行动，沿希腊海岸线，先向西绕了一大圈，然后一路向南。

雅典立刻进入临战状态，被放逐的人一一被召回。三年前遭陶片放逐而生活在国外的阿里斯德岱斯也回到国内，成为曾经的政敌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副将。

波斯以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大举进攻，是为了显示波斯的实力，离间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这次斯巴达并没有犹豫不决。

这是一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决。在国内以服从为美德的斯巴达人也拒绝服从波斯人的统治。有雅典和斯巴达领头，其他城邦国家也纷纷响应。在独立心旺盛而协调性欠缺的希腊，在捍卫希腊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团结。

希腊联军的作战方案是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斯制定的。他认为在帖撒利平原迎战波斯大军不利，所以决定把迎战南下而来的波斯军的第一道防线设在位于希腊中部的德摩比勒狭小且险峻的隘口。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斯巴达士兵和4000名伯罗奔尼撒半岛出身的士兵据守此关。另一方面，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舰队前往埃维厄海峡，在那里设伏等候敌人的舰队，迎战波斯海军。

战术无懈可击，希腊舰队成功阻止了波斯海军继续南下。

但是，从斯巴达赶来的增援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其间，波斯国王为了避免因斯巴达军的顽强抵抗而造成无谓流血，决定放弃从德摩比勒隘口强行突破，改派精锐部队从山上迂回，从背后向斯巴达军发起进攻。

列奥尼达下令让4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士兵撤退。他决定只带300名斯巴达战士死守德摩比勒隘口。为了颂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斯巴达勇士，后人在这里立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一首诗：

异乡的过客啊，

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为祖国献身的勇士们，

长眠在这里。

这是一个斯巴达勇士永远留下威名的悲壮且豪迈的故事。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的牺牲没有白费，因为他们让全希腊知道了连斯巴达人也会为了希腊的自由和独立而殊死战斗，面临危机的统一战线因而不再动摇。

然而，希腊领土的三分之二已经被波斯军征服。边烧杀抢掠边继续南下的波斯军如入无人之境，不见希腊人阻挡。

一路杀向雅典的波斯国王薛西斯进入的是空无一人的雅典城。这里既没有奋起抵抗的士兵，也不见四处乱窜的女人和孩子，只有被气急败坏的波斯兵破坏的帕台农神殿高高扬起的烟尘飘荡在无人的雅典上空。

这正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战术。对他来说，尽管希腊领土的三分之二失去了，但是希腊的重装步兵和舰队还未上阵。他确信对于擅长陆地作战的波斯军，把胜负寄托在海战上，把握会更大。

因此，为了让雅典战士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无后顾之忧，他把雅典所有居民都送到了萨拉米斯岛上避难。然后满载士兵的舰队驶向萨拉米斯的海面上待命。

从船上，雅典士兵看到了熊熊燃烧的雅典城，听到了波斯士兵肆无

忌惮的叫喊声。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这一切都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预料之中。

波斯军队因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雅典城而自鸣得意。他们接到了国王薛西斯的命令，又向海上的雅典军发起了进攻。在胜负决出之前，他们感觉时间很长，而实际上却很短。迎战他们的雅典重装步兵和海军士兵的攻势非常凌厉。波斯国王薛西斯站在海岛上从头到尾目睹了自己军队彻底的失败。

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宣告结束。薛西斯国王一路逃回波斯首都苏塞，爱琴海上从此不见了波斯的舰船。

第二年，波斯军再次挑起战争，以期一雪前耻。雅典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指挥下，再次采用海上作战的战术，雅典城内又一次唱起了空城计。这一次，希腊的其他各国行动也很迅速。波斯军沿着前一年的路线一路南下，总指挥斯巴达王普萨尼亚斯指挥5万希腊联军在底比斯附近的普拉塔亚野外迎战。战斗异常激烈，最后以希腊获胜而结束。波斯军队和前一年一样，渡过赫勒斯滂海峡，逃回亚洲。

同年，希腊转守为攻。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编组而成的希腊联合舰队向东越过爱琴海，攻打小亚细亚。在陆、海战中，希腊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其他地方也是节节胜利。至此，确立了雅典人在海上、斯巴达人在陆地上的绝对霸主地位。

波斯战争于公元前478年结束。米利都、埃菲索斯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故乡哈利卡纳索斯等爱奥尼亚地区诸国回到了希腊人的手中。对希腊人来说，爱琴海再次成为自己的内海。

霸权国家雅典

尽管大敌波斯败退了，但是没有人认为威胁已经解除。对于迟早还会再来犯的波斯军队，希腊城邦各国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的防御体系——“提洛同盟”由此诞生了。

同盟的主导权理所当然由雅典掌握，因为在波斯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雅典的海军。参加提洛同盟的除了希腊本土的城邦，还有爱琴海诸岛和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国家，提洛同盟是一个有200多个城邦参加的联合体。这也充分表明当时在希腊城邦国家的数量之多。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因为这里有供奉希腊民族共同爱戴的阿波罗神的神殿，提洛同盟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参加同盟的各国拥有完全的内政和外交自治权，义务则根据各个城邦的实力不同而有所区别。同盟的主要参加国雅典和莱斯博斯、希俄斯、萨摩斯、纳克索斯诸岛的城邦有义务提供战船和战士，其他城邦只需负担军费。同盟国提供的经费保管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殿内。而同盟的议长权、同盟舰队的最高指挥权和资金的支配权由雅典一手独揽。

就这样，有了大规模常备海军的希腊的制海权不再局限于爱琴海，而是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南岸和塞浦路斯岛。波斯海军被压制在本国沿岸。地中海东半部分成了海上力量本来就强大的希腊人的内海。

但是，提洛同盟未能改变希腊人缺乏协调性的特点。一年前在波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未能保持下去。斯巴达不满雅典独掌主导权而拒绝加入同盟。斯巴达一边藐视因提洛同盟的结成而取得霸权的雅典，一边强化自己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获得波斯战争胜利后的希腊，就这样，在海上雅典越来越强大，在陆地上斯巴达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强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公元前431年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持续了47年的冷战状态。与军事国家斯巴达不同，对于工商业国家雅典来说，这一时期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和平时期。

大敌当前时团结一致打败了敌人之后的希腊，很快分裂成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阵营。同样，在举国一致取得胜利后的雅典，摆脱不掉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这次的主人公还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和阿里斯德岱斯。

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依然十分明了。

敌人是波斯，能够抵御敌人的决定性力量是海军，所以特米斯托克利斯主张有必要今后继续加强海军的力量，而且他还认为今后绝对不能用空城计对付波斯。因为每次敌人一来就逃往海上的话，总有一天这个战术会失去作用。于是他想到了把雅典城区和比雷埃夫斯海港有机地连在一起的办法，那就是为了确保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通行安全，在道路两侧建起高高的城墙。

特米斯托克利斯坚信，对雅典来说，大海才是出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停靠在比雷埃夫斯海港的海军，有必要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完整地连为一体。

要想得到雅典市民的同意并不困难，但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眼光看得更远。他认为敌人不只是波斯，和斯巴达之间的对决不可避免。所以，他还想把雅典已经得到的霸权伸向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暗示斯巴达统治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城邦国家，只要他们建立民主政体，雅典将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以此挑唆他们脱离斯巴达，促使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

特米斯托克利斯还向斯巴达国内的被统治阶级——农奴希洛人——展示民主政体下的自由，鼓动他们起来暴动，试图从内部瓦解斯巴达的力量。

为了推行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特米斯托克利斯需要更大的权力。虽然作为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他的威望很高，但是，仅此一点远远

不够。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特米斯托克利斯许诺要厚待属于雅典第四阶级的市民，试图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尽管没有财产，但是在波斯战争中作为海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这些市民，因为胜利而意气风发，同时对指挥者特米斯托克利斯尊敬有加。只要把他们全部拉拢过来，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权力可以说万无一失了。

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刺激了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雅典的保守派非常担心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和做法会危害到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

于是，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雅典稳健保守派开始指责特米斯托克利斯，说他忘了大敌波斯，而敌视友邦斯巴达。为了将特米斯托克利斯赶下台，他们很自然地利用了陶片放逐法。大概这次不管谁来求阿里斯德岱斯，他也不会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了吧。

大败波斯大军后，仅仅过去7年之后的公元前471年，特米斯托克利斯被逐出了雅典。

即便如此，倔强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依然没有停止告诫人们斯巴达的危险性。但是他所提倡的反斯巴达主义，不仅是雅典，其他城邦也不接受。对他们来说，危险的不是斯巴达，而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危险人物甚至失去了安居之所，特米斯托克利斯最终向波斯请求避难。

波斯国王已经是因特米斯托克利斯而吃尽苦头的薛西斯的儿子。他礼节周全地欢迎前来避难的、曾经的敌帅。在波斯，特米斯托克利斯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无须担心生活。然而在迎来亡命生涯第10年的公元前460年，这种平静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了。

因为波斯国王提出要聘请他担任攻打雅典海军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特米斯托克利斯很难拒绝在绝境中帮助了自己的波斯国王，又不愿

意把矛头指向自己的祖国。时年70岁的他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就这样，早在雅典和斯巴达开战前40年就已经预计到这两国将难以共存的男人的一生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从驱逐特米斯托克利斯，到特米斯托克利斯在波斯服毒自尽为止的10年里，雅典一直处于稳健保守派的统治之下。阿里斯德岱斯正值盛名之时却隐退了，继承其领袖地位的是西门。西门是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者米提亚德的儿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将领。

特米斯托克利斯下台后的雅典，其战略只针对波斯。为了贯彻这一点，还对经济陷入危机的斯巴达提供过援助。

但是，就在特米斯托克利斯自杀的前一年，西门也遭到了陶片驱逐。因为这时的雅典，民众派再次抬头。卷土重来的“自由市民”们并没有想把特米斯托克利斯请回国来，毕竟10年的空白太大了。而且雅典民众派有了新的年轻领袖，年龄只有特米斯托克利斯的一半。从此，历史上著名的伯里克利时代拉开了帷幕。

伯里克利时代

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并不一定是民主主义者。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性格——思想自由。

保守派的西门遭陶片驱逐被赶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伯里克利。那一年是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当时的年纪在35岁左右。西门遭流放或许与他脱不了干系，我们猜测他很可能暗中参与了这一事件，因为在西门被逐出雅典后不久伯里克利就上台了。拥立他的不是他自己所代表的阶层，而是立场相对的阶层。在获得权力以后，伯里克利并没有让权力

只是服务于贵族阶层。

前面已经提到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执行机构由10个“国家战略官”构成。这10个人每年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在雅典，掌握了国家政权意味着此后若干年将连续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有可能出任最高执行机构的议长一职。

伯里克利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呢？

雅典民主政治是通过克利斯梯尼改革实现的。伯里克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贯彻得更加彻底。他规定除了必须拥有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的军队和财政的重要负责人之外，其他所有政府官员、行政和军队的负责人统统在市民大会上通过抽签产生。还规定了所有这些公务员在担任公务期间政府要向他们支付日薪。

在这个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所实行的抽签与日薪相结合的做法，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直接体现民主政体的例子。它的思想十分完美，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理论上，之前的雅典也给了全体市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每天的口粮。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当选了政府官员，也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公职。因为所有公职都是无偿的，而伯里克利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于是，无论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厂工作的工人，还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自耕农，或者是在雅典的海军船上工作的船员，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政权利。由于无产者的参与，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巅峰。

伯里克利免费向市民开放了当时雅典市民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剧场，经费从国库中支出。

他还着手实施宏大的再建工程——要在波斯战争中遭破坏后尚未修复的雅典卫城原址上，建起比以前更漂亮、更壮观的神殿和剧场。市民们对于他把国民的钱花在这类事上很不满，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对此，伯里克利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

“知道了。以后的工程费就从我的私有财产中支出。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要在帕台农神殿的正面刻上我伯里克利的名字，大家没意见吧？”

这样一来，反对伯里克利的人无话可说了。以帕台农神殿为中心的雅典卫城一点一点地展现出了壮丽、堂皇的面貌，令来自外国的游客赞不绝口。外国游客的赞叹声越多，雅典人的自豪感也越强。

伯里克利从进入雅典政界的这一年起，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几乎年年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大部分时间被选为议长。

雅典市民特别容易妒忌别人的成功，更何况雅典政界还有一个排除政敌的特殊方式——陶片放逐法。对于权力者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伯里克利从来没有想过要废除这一方式。令人惊奇的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竟然一次也没有被放逐过。

一个无作为的领袖有可能遭到离弃，却不会下台。但是伯里克利不是一个无作为的领袖。在希腊历史上，在民主政体下，能够连续30年大权在握的人，他是仅有的一个。也许正因为他不是民主主义者，所以他才能更好地利用民主政体吧。

对于自己施行的政策被指责为哗众取宠，伯里克利丝毫不在意。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据说他还花钱买选票。究其原因，都是出于他对权力的热衷。伯里克利就像出色的演奏家渴望拥有称心如意的乐器那样，把强大的权力看做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么在当时的雅典，把只有由一个人拥有的权力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后，伯里克利奏出了怎样的“乐章”呢？

在雅典，作为无人质疑的民众派头目，伯里克利不仅没有废除阿里斯德岱斯、西门等保守派的做法，甚至还沿袭了他们的思路。他利用海军掌握制海权，以确保并扩大雅典市场，从而增强雅典的经济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努力维护与波斯、斯巴达之间的友好关系。

同时，他也继承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提出却未能实现的政策。他也把斯巴达看做与波斯一样的假想敌。出于这一想法，他从不放弃寻找对付斯巴达的方法。他的策略是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和斯巴达之间的较量表面化，同时在这一时期想方设法削弱斯巴达的力量。为此，他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一样，不择手段。

但是，伯里克利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有非凡学识的人。伯里克利野心勃勃，他理所当然要把雅典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希腊第一城邦。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对于外来人，不问职业，只要是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不授予他们市民权，一律以“内需”的名义酬谢他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等纷纷来到雅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因为在雅典获得承认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将来。希腊哲学中心从其诞生地爱奥尼亚转移到雅典就在这个时代。雅典在政治、经济、海军力量以及文化方面成了希腊的代表性城市。后世的我们满怀遐想和敬意提起的“希腊文化”时期就是指伯里克利统治希腊的30年里达到鼎盛的、先后持续不到200年的时期。

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里克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雅典人无须羡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

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

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市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

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

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

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

……

总而言之，我们的城邦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全希腊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典市民所具有的荣誉、经验和德行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具有完整的人格。

这一切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变得强大的现在的雅典证明了这一切。

上面的话虽然有些夸张成分，却是无人能反驳的实情，甚至完全可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历经2500年，人类应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像伯里克利一样作简洁明了又体面的演讲呢？

从遥远的罗马来到希腊，在希腊逗留考察了近一年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社会上公认的“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公元前460年至前430年的30年间。而落后的罗马元老院三位议员为了考察先进国家希腊，在希腊逗留的时间据说是公元前453年到前452年的一年。

伯里克利时代到了最后一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了。这是在公元前431年以后的事情，距离罗马人到访希腊已经过去了近20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认为坚如磐石的伯里克利的权力也蒙上了阴影。罗马人没有看到在反对派射人先射马的策略面前，伯里克利为了爱女不被关进监狱而卑躬屈膝的情形。

也就是说，考察团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是伯里克利在一片拥戴声中执掌政权时期的雅典，看到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雅典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像闪耀着白光的大理石神像似的伯里克利。

通常，我们会以为这三个罗马人一定会被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深深吸引，并成为雅典民主政体的信奉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引进这种政体。因为不需要伯里克利说，眼前看到的外国人的榜样——雅典的生存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雅典繁荣的景象和他们强大的力量，甚至连波斯也自叹弗如。

但是，罗马没有模仿雅典，也没有模仿令强大的雅典时刻不敢放松警惕的斯巴达。

到一个开始进入衰退期的国家，把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当做反面教材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考察一个正处于鼎盛期的国家，却不学习他们的优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考察不是大学生的毕业旅行，来的是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阅历的元老院议员。和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腊的接触，引起这些罗马人思考的不正是有别于模仿的东西吗？

遗憾的是，找不到任何史实可以告诉我们，在希腊逗留的一年时间里，三个罗马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回国后又作了怎样的汇报。甚至对这一时期的罗马作了最详细描述的历史学家李维也只留下这一句话："派遣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抄写著名的梭伦之法，了解希腊各国现状、法律以及产生法律的过程。"关于他们回国后的情况，也是一笔带过，只写了包括回国后的三个人在内的十人委员编写了《十二表法》。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也许这三个人写过些什么，只是后来遗失了。因为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攻下罗马的时候，罗马曾经陷入一片火海，据说很多史料都在这个时候被烧为灰烬。不管怎样，要想找出三个罗马人关于考察希腊的只言片语，实在是难上加难。

但是，我们与学者、研究者不同，他们写历史必须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而我们只是非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有推测和想象的自由。

更何况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模仿不表示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不模仿难道不正表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吗？如果前去考察的是缺乏观察力和洞察力的人，那自然是另当别论。可是，罗马考察团的三个人从他们的先后政绩来看，无疑都是极优秀的人物。

自由和秩序的并存，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秩序，也得不到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两者又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矛盾体。要让这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存，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命

题。雅典和斯巴达虽然方法各不相同，却都解决了这一命题。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两个国家，即使不是罗马人，我想也都会受益匪浅吧。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看到的其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又是怎样呢？

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斯巴达一定让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人感到一种亲近。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质朴和刚毅，而罗马人在200年后依然坚持把质朴和刚毅视做美德之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罗马人生出许多共鸣吧。

但是，斯巴达社会太故步自封了，不只是体现在与别国的关系方面，甚至在国内，各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巴达的这一国情在建国伊始就开始与其他部族互相融合的罗马人眼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军事方面，斯巴达的军事体制是以培养专业士兵为至高目的。相反，罗马士兵的生活和普通人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在罗马，服从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不是斯巴达那样涵盖全部生活的原则。在斯巴达，贪恋私有财产会遭蔑视，但罗马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制定的。

也许罗马人认为，维持秩序无须像斯巴达那样剥夺一切自由，保卫国家不必像斯巴达那样倾全力培养士兵。

我想，他们或许也注意到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很适合防守，却容易阻碍发展。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雅典，虽说有伯里克利本人的引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整个社会所散发出的自由和秩序的并存精神。

当时的罗马虽然处于共和政体时期，但是与曾经的雅典一样，平民阶级正在迅速崛起。而考察团的希腊之行正是因为难以拒绝他们编写成

文法的要求。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与克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极其相似。也就是说，即使实行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也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奇怪。然而，此时的罗马却让那些进步主义的罗马史专家们非常遗憾地写下了“与实现民主政体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

在雅典逗留了整整一年时间的三个罗马人一定有很多机会接触并观察到伯里克利的言行举止。看到了伯里克利卓越的才能，三个罗马人深切地感到人世间像他这样的非凡人才实在太少。然而，我在想，深感这一点的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体系的弱点，那就是，必须有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才能充分发挥体制的优越性。

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他们没有看到20年后的伯里克利之死，也没有看到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逼向灭亡的群愚政治。谁都清楚，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自由和秩序得以并存，完全有赖于伯里克利的力量。

和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留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所作的评价是：

>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修昔底德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时的三个罗马人也不见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过他的眼睛。

罗马因憎恶独裁而推倒王政后，确立共和政体还不到半个世纪。所以，来自那里的人对独裁有些神经质也很自然，即使行使独裁政治的人是一位具有超常平衡能力的人。独裁政治有很多缺陷，首先与行使独裁政治的人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不知为什么，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极少连续出现。其次在于缺少检验机制，即使邪恶也无计可施，这是独裁政治

的最大缺陷。

三个罗马人也许发现了伯里克利时代光芒四射的雅典民主政体其实也有阴影。这或许就是考察了处于鼎盛时期的雅典，却没有把雅典的“法”——也就是政体——照搬过来的理由吧。

了解希腊之后

至此，我非常希望接下来要写的罗马终于确立了自由和秩序并存的先进政体，既不同于重秩序的斯巴达，也不同于重自由的雅典。然而，史实并非如此。其后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在漫长的80年里，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不稳定状态，贵族和平民之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造成这种情形的要因可以列举如下几个：

第一个要因大概要归咎于作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自古以来的保守性格吧。罗马人本能地厌恶改革，即使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进展也很缓慢。一旦改革成功，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们与希腊人相比，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但是一旦开始发展了，又能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即使进入衰退期，大概也会是慢慢衰退的。

第二个要因是罗马贵族抗争的态度非常强硬。和雅典贵族不同，罗马的贵族阶级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和平民阶级一决高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细述。

第三个要因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情形：尽管罗马平民强烈要求少数人统治的政体下的机会均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改变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即寡头政治。尽管他们要求授予自己的代表以统治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让平民阶级的所有人都参与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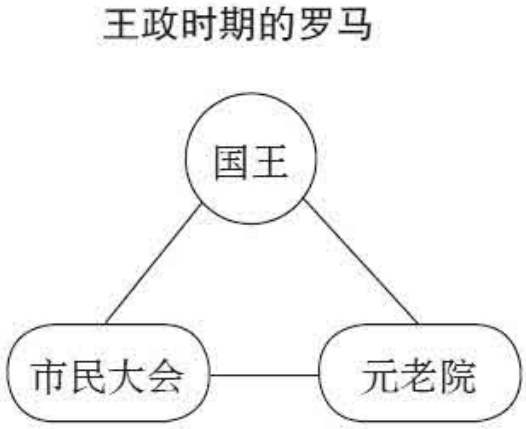
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后的罗马人高调宣布：罗马人自由了，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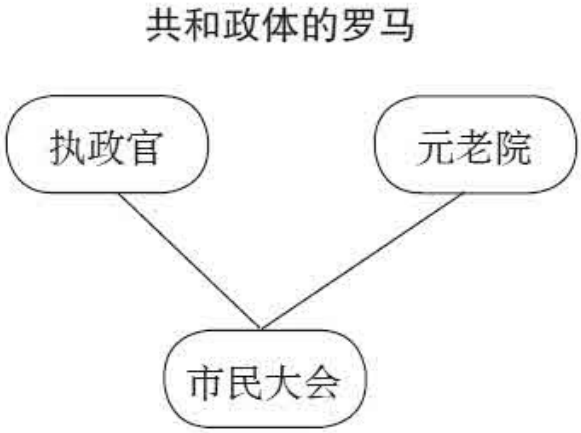
马人绝不会让国王再次骑到自己头上了，由此开始了共和政制的新时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在与支持图谋王政复辟的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的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战争中，在与伺机把刚刚诞生的共和政体罗马连锅端的邻近各部族之间的战争中度过。为了抵御这些外敌，这一时期的国内自然而然地处在了举国一致对外的体制之下。

其间，最后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相继客死在亡命地或战死在战场上，王室没有了后继之人。而邻近各部族也在罗马军的顽强抵抗面前再次收敛起来。罗马暂时成功地渡过了新生期被侵扰的危机。

然而，与此同时，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出现了新的严重矛盾，那就是在以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把罗马社会一分为二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关系。

通常我们认为共和政体要比国王政体先进，可是为什么共和政体下反而会出现国王政体时代没有过的这类阶级矛盾呢？首先，从下面的图解来看一下这两种政体的权力构造有什么不同。





罗马国王是终身制的，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确认同意。一位国王只要在王位上坐上30至40年，势必与元老院的关系变得很松散，权力的独立性也会很高。因为元老院的职责只剩下向国王提建议和

劝告了。与此相反，所有罗马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大会，因为有权对国王行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投票赞成或反对，从而维持了他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

因此，国王政体的权力构造呈三足鼎立。三足鼎立的构造非常稳定，这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三条腿的桌子总是很常见的原因。

但是，进入共和政体后的罗马，权力构造发生了变化。由两个执政官同时执政取代以前的国王。尽管可以多次当选，但每次的任期都是一年。两个人同时执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独裁，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的两位执政官除了祭祀，承担所有以前由国王负责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具备相当强的能力和成熟的思想。而年年选择两位执政官的，就是由各派势力首脑组成的团体——元老院。

于是，执政官和元老院之间的距离自然是逐年缩短，渐渐地，三足中的两足出现重叠，直至合二为一。至于市民大会，虽然他们的权力和以前一样，但是在罗马共和政制的权力构造从三足鼎立变成二足并立后，迟早他们会产生不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也见不到两条腿的桌子。因为这一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罗马国内出现了王政时代没有过的这一结果。

共和政体诞生之初的十几年里，罗马不得不举国一致共同对外。但是与此同时，罗马的平民阶级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意识到，没有他们的参战，无休止的战斗既不能取胜也无法坚持下去。

几乎年年不断的战事使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离开他们工作的农田、牧场、施工现场或商店，直接导致了平民阶级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贵族阶级有大片的农田、牧场做后盾，即使不劳动，经济也不至于很快衰退。所以，经济上的理由就像一个导火索，导致罗马平民阶级起来反抗贵族阶级。

有一天，古罗马广场来了一位平民老人，此人年近60岁，快到服兵役的上限年龄了。只见他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神情极度疲惫。从他被长长的头发和凌乱的胡子遮住的脸上看，他既不像是要饭的，也不像是奴隶。他那穷困潦倒的模样吸引了聚集在古罗马广场的人们。人们关切地问他怎么回事，老人紧闭的双唇终于慢慢地张开了。

他说为了保卫祖国罗马，曾经参加过无数次战斗，还当过百人队队长。于是，人们就有了疑问，说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这样落魄呢？对于这个问题，老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曾经有一些农田，因为那里变成了战场，农田和家毁于一旦，没有烧死的家畜被偷被抢。为了重建家园，他不得不借钱。借款的利息非常高，而收获也不像预期的那样，少得可怜。实在没钱还债，所以根据法律，他就成了债权人的私有物。虽然是罗马市民，却落了个农奴身份，债主使用他比使用奴隶还狠。

说着，老人脱去身上的衣服让大家看他的身体。身上除了刀伤显示他曾经是一名战士外，还有数不清的鞭打后的伤痕。

顿时群情激奋，他们一齐涌向位于古罗马广场一隅的元老院会场。两位执政官力劝大家镇静，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为了商议对策，紧急召集元老院议员开会。但是吓得浑身发抖的议员们躲在家里，不敢前来。由于参加者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临时会议未能举行。

罗马城内充满了革命前夜的气氛。就在这时，传来了外敌来袭的消息。执政官们没有时间细细地思考对策，无奈之下，执政官之一的塞尔维乌斯发布了一则通告，试图和平民们达成妥协。

> 无论是谁，不得用禁闭或锁链阻止罗马市民响应执政官的号召志愿参军。不得在罗马市民执行军事行动期间，出售或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

对此，平民们欣然接受，甚至有更多的平民响应执政官的号召参加军队。战斗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接下来发生的另两次和不同部族之间的战斗也以罗马告捷而结束。

凯旋的罗马士兵想当然地认为塞尔维乌斯发布的通告很快就要变成法制。然而另一位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拒绝同意这则通告的合法化，原因是塞尔维乌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罗马执政官的权限规定任何决策必须两位执政官意见一致才能生效。元老院的大部分人大概已经忘记了被蜂拥而至的群众吓得不敢露面时的恐惧，赞成克劳狄乌斯依法行使否决权。

事态发展至此，使得民愤激昂，再也没有人响应执政官的号召，一致对敌，共同抵抗再次来犯的外敌。他们固守在埃斯奎里山和阿文庭山，拒不出来。这是罗马历史上最早的罢工运动。

元老院被迫认真讨论起对策来。平民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们要实施罢工。对此，贵族一次次地进行了商议，出现了斗争派和协商派。结果，克劳狄乌斯为首的斗争派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元老院作出裁决，最后决定推举独裁官。

推举独裁官意味着事态已经相当严重。虽然独裁官的任期只有短短6个月，但是对于他的决定，即便是执政官也无权提出异议。这是只有共和政体的罗马才有的一种制度。当罗马处于紧急事态时，推举独裁官，把平时两位执政官共享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以此渡过危机。公元前501年，罗马对萨宾人的战斗中曾经有过先例。

但是，这次的事态与公元前501年的那次不同。这一次独裁官的任务不是排除外敌，而是平定国内的动乱。因此，这次任命的独裁官没有从拒绝向平民阶级妥协的斗争派中产生，而推举的是与平民相处极其融洽的瓦莱里乌斯家族的马尼乌斯。他是第一代执政官“亲民者”的弟弟。

要让平民们放弃罢工，这就足够了。在独裁官瓦莱里乌斯的号召下，平民们走下山冈积极响应，很快就完成了10个军团的编组。

罗马人一方面对其他民族很宽容，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共同作战，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并不困难。这次战斗同样取得了胜利。任期结束后的瓦莱里乌斯辞去独裁官的职务。他把权力交还给执政官后，提出了一项提案，禁止剥夺欠债市民的自由。

但是，他的提案遭到了市民大会的否决。因为税制 = 军制 = 选举制的制度规定，在罗马，经济实力越强，有义务提供的士兵数越多，能行使的票数也越多。于是，在这种制度下，贵族阶级要在市民大会上左右一项决议并非难事。

尽管知道根据法律只能接受这一结果，但是，平民阶级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遭到了否决。因此，他们的愤怒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这次他们转移到了比七个山丘远很多的蒙特萨克罗山上拒不出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罢工。

这种状况不能延续下去。以元老院为牙城的贵族们也意识到了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贵族中的协商派和平民阶级中的稳健派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时间并不宽裕，没人知道外敌何时就会来犯。因为罗马国内两个阶级对抗的消息，别说是邻近各部族，甚至已经传到伊特鲁里亚人的耳朵里了。

公元前494年，称为圣山的蒙特萨克罗一带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谈判结果是，决定设立一个专门以保护平民阶级利益和权利为目的的职位。这个职位叫护民官，就任该职位的必须是平民阶级出身，这是绝对条件。护民官不是在贵族阶级操控的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而是另设了平民大会，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最早的护民官人数为两人。

护民官有权对执政官作出的决定行使否决权，同时享有和今天的国会议员相同的人身不可侵犯权。

因为护民官既要维护平民的利益，同时又要向国家统治层反映平民阶级的意见，所以这一位置的设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平民的全胜，但是仔细回味，实在有些微妙。

首先，执政官和元老院避免了与平民阶级面对面的交锋。以后，他们只需要与两位护民官交涉就可以了。想象一下以群体为对象的交涉和以两个人为对象的交涉，它们的区别显而易见。

其次，护民官虽然有否决权，但是有附加条件的，即战时不得行使这一权力。罗马树敌很多，几乎年年都处在战争之中，以至于规定平时必须关闭的雅驽斯神殿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这就表明，护民官享有的最大权力——否决权——的行使机会是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护民官的设立在短时间内还是给罗马带来了国内的安定。乘此时机，罗马元老院开始努力修复和邻近各部族之间因推翻王政而日趋恶化的关系，尽早结束因废除王政导致的与他们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重建相互间宗教、语言和军事一体化的拉丁同盟。

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表明雅驽斯神殿的大门可以关上了。因为在拉丁各国成为盟友之后，还会有其他部族出现，成为新的敌人。从战斗的结果来看，虽然还做不到屡战屡胜，但基本上都是罗马军占优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就出在战斗中的胜利次数过多。

通常，罗马在取得战斗的胜利后，不会把对方部族置于彻底的统治之下。他们更愿意接受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置的方式。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接收战败方的部分“所有地”，把其中的一半作为同盟国赢得的份额分给他们，另一半留做自己的“公有地”用来出租给罗马市民。围绕这一公有地的出租份额比例，再次引起了贵族和平民之间

的对立。

这个问题远比剥夺欠债平民人身自由的问题严重得多。欠债平民的人身自由通过设立护民官这一职权可以得到保护。但是，这个问题却随着战斗的一次次胜利，对立逐步升级。

平民阶级认为公有地的出租分配偏向贵族阶级，而贵族阶级则以尊重私有财产的法律为挡箭牌，抵制平等分配。罗马人本来就是个农牧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财产就是土地。对于视土地为根本的人来说，不是只要能分得土地就可以不在乎土地的好坏。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由于肥沃的土地分配给贵族，自己只能得到贫瘠的土地，平民阶级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土地法所造成的对立，使得罗马像体内长了瘤子一样难以安生。就这样，在对立和摩擦中过了500年，直到尤里乌斯·恺撒的出现，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之所以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究其原因，其中之一竟然在于该时代的罗马人所具有的美德，这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围绕土地法，平民方面始终在坚持不懈地抗争。他们举行过罢工，拒绝应征参军，即使应征参军，也是在战场上消极怠工，拒绝奋力拼杀。他们的种种行为绝对够得上被判死刑。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取得斗争的胜利。原因不在于他们缺少凝聚力，而在于他们名誉至上的美德。

一听到敌人逼近国境线，他们就会冰释前嫌，志愿参军；一得知友军陷入苦战，他们就无法坚持消极怠工或拒绝上前线。最终还是能够赢得战斗。

还有，如果贵族安于现有的权利而回避作出牺牲的话，平民阶级的不满就有了大义的名分。但是，当时的罗马贵族简直就是位高责重的榜

样，处处以身作则。所以这也很不利于平民阶级。

在地里埋头耕作，安静地度过每一天的辛辛纳图斯，一接到独裁官的任命通知，马上扔下锄头，拿起权杖，率领国人，与入侵国境线的来犯外敌作战。取得这一战斗的胜利仅用了不到15天时间。战斗结束后，尽管离6个月的任期还很远，辛辛纳图斯却在第16天就奉还了独裁官的权杖，重新回到自己的地里，开始日常的百姓生活。只留下年幼的后代，带领一家人为保卫国家宁为玉碎的费边也是很好的例证，证明罗马贵族心怀强烈的义务使命感。

这只是一两个有名的事例，而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史实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当战争结束，外敌来犯的担心刚消失，就开始浮出表面的贵族和平民之争始终得不到解决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罗马平民阶级的力量在不断积聚。接下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法律的成文化。

法律只要还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在执行中，就容易偏向握有法律制定权的贵族阶级。因此，要求法律成文合情合理。成文的法律谁都看得到，执行起来就可以做到客观公允。正因为要求合理，所以贵族方面无法对其置之不理。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贵族中的协商派也和平民意见一致。

为此，向希腊派遣了考察团，向希腊学习法律成文方面的经验。公元前5世纪中叶，3个罗马人带着讲述至此的罗马现状向雅典出发了。考察团带着罗马人尤其是平民阶级的满心希望离开了罗马。在考察团回国前的这一年里，平民阶级暂时停止了和贵族之间的抗争。

一年后，为编写成文法成立了“十人委员会”，由包括回国后的3个人在内的10个委员组成。这一机构有相当大的权力，为了编写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可以拒绝任何妨碍该项工作的事情，就好像委员会是无任

期年限的独裁官。但是“十人委员会”的领导者不在从希腊考察回来的3个人之中，而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这位一开始就明确要与平民进行斗争的人物。

公元前449年，《十二表法》出台。一项一项刻在铜板上的《十二表法》出现在古罗马广场的一角。对于它的内容，期待已久的平民自不必说，连协商派的贵族也不禁哑然。

没有一项内容是新的，真不知道他们去希腊都考察了些什么。这一定是大多数罗马人的内心所想。

梭伦改革中，根据不动产的多少分配军役比例的税赋和参加国政的权利这一制度，用不着向梭伦学习，罗马在王政时代就早已确立。在雅典，克利斯梯尼在梭伦之法的基础上，把不动产改成了动产。但是，罗马是农业国，和工商业国家雅典不同。如果把市民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改成动产，不符合罗马的实情。这一点大概平民们也有同感吧。罗马平民所要求的不是把不动产改成动产，而是不动产的公平分配。但是《十二表法》丝毫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平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无法还清欠债时的人身自由问题。虽然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人身自由作为借贷担保而产生的问题，但是在《十二表法》中，对这个问题只是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

借款人如果在约定的时间内无法还清欠债，则被拘留60日。60天后依然不能还清，则或卖身为奴，或用无偿劳动抵扣所借款额。但是，正在执行军务时除外。这几乎就是以前的翻版，不过是把曾经不成文的东西变成成文的而已。

而且，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接受判决后，可以向市民大会提起上诉。如果市民大会否决上述判决，那么该市民将不被处以死刑。这一条

文也不过是对共和政体诞生之初已有的法律进行了追认而已。此外，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联姻依然在禁止之列。

《十二表法》是因为共有12条法律才这样叫的。这是罗马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部成文法，据说今天研究罗马法律的专家也只能理解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我想大概是评价实在太差，不断进行修订的缘故吧。

罗马人在重新制定法律的时候，通常不会采用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的方法。即使现有的法律很不合理，或者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也要全盘保留，而重新制定新的、适用的法律。结果，旧法中与新法不符的部分自动失效。在外行人眼里，法律的这种重新制定方法一定很有吸引力。因为修改旧法，眼光容易盯着过去，而制定新法只要看现在和将来就可以了。

《十二表法》从出台之时就评价不佳。期待落空的平民阶级再次摆出了对抗的态势。效果很快显现。制定《十二表法》的主要领导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两战两败。但是，罗马人通常不会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一位司令官的身上。平民对克劳狄乌斯的不满爆发，不是因为这两次战斗的失利，而是因为他在一件事情上的做法。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但是，他出身于克劳狄乌斯这一罗马的名门望族，姑娘却来自平民阶级。虽然这个女孩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护民官，但平民终究还是平民。《十二表法》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

既然法律规定他们不能结婚，那么要把姑娘占为己有，只能让她做自己的情人或奴隶。因为担心姑娘拒绝做他的情人，阿庇乌斯于是指使自己属下的一个人，让他对外宣称姑娘是自己家的女奴所生的孩子。因为奴隶的孩子仍是奴隶。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物，他们的孩子同样也归奴隶主所有。就这样，阿庇乌斯成功霸占了自己喜欢的姑娘。这一期间，姑娘的父亲，前护民官正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得知这一消息，她的父亲马上赶回罗马。看到被抢的女儿，这个男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若要还你自由之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这样说着，手上的短刀深深地扎进了姑娘的胸口。

这件事情不仅让留守罗马的平民愤慨不已，就连身在战场的平民也竞相表示愤怒。他们全体聚集到蒙特萨克罗山，抗议贵族阿庇乌斯的专横。贵族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逮捕了企图率领属下和平民进行对抗的阿庇乌斯，并择日进行审判。就在判决的前一天夜里，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自尊心极强的阿庇乌斯无法接受被审判的耻辱，选择在狱中自尽。

这件事情之后，因为制定成文法而被授予绝对权限的“十人委员会”瓦解了。贵族阶级答应了平民的要求，规定今后没有平民方面的同意，不再设置任何机构。这也是小意外推动大进步的一个典型事例。

也许到了此时，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终于看似迎来了平民掌握政权。因胜利而意气风发的平民们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出色，与外敌的战斗屡战屡胜。罗马的平民阶级甚至把军事上的战绩也归功于自己。如果这时的罗马平民阶级和波斯战争后的雅典平民一样，宣布由“平民”负责国政，这也许更符合历史潮流。如果这个时候罗马的平民阶级真的这样做了，罗马也会经历民主政体。然而，罗马并没有这样做。

罗马贵族

罗马的贵族阶级和雅典的贵族阶级不同，他们并不软弱，没有因为不断兴起的新生力量而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他们是一股难以撼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单纯地依附于土地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样，他

们的命运迟早会和雅典一样。罗马贵族除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还有别的依托。

古罗马人的语言是拉丁语。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叫clientes，它是意大利语中cliente、英语client的词源。在英日词典和意日词典中，分别是这样翻译的：

> client：（1）（律师等的）委托人；（2）（广告代理店等的）顾客、主顾；（3）（古罗马的）被保护民、（从属于贵族的）随从、家丁。
>
> cliente：（1）主顾、顾客、常客、（律师及医生等的固定的）委托人、患者、熟客、眷顾者；（2）（在古罗马）接受特定贵族保护的平民；（3）给人跑腿的人、手下。

很多学者认为“clientes”与“patron”（保护人）的词源“patronus”之间的关系在罗马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代登基罗马王位的罗穆路斯召集100个家长创设了元老院，这100人就是保护人，是贵族的前身。

这些罗马贵族不是因为国王的青睐而进入贵族行列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流着象征高贵的蓝色的血液。罗马贵族是一门之长和他的家族，其门下是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其他原因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也就是说，罗穆路斯创设的元老院聚集了100个有实力的人。

克劳狄乌斯这一门的首领决定移居罗马时，出现了多达5000人的被保护民一起移居罗马的盛况。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之所以在与平民的对立中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有被认为是当时罗马最大的克劳狄乌斯门下的被保护民们在背后支持。还有，无一例外战死在战场上的费边一家人中，属于贵族费边家的嫡系男丁有306人，其余4000人则是费边门下的被保护民。

因为罗马的直接税是根据不动产收入的多少按比例提供兵力，所以拥有辽阔农牧地的大贵族有义务提供大量的兵源。如果没有被保护民，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因为在罗马没有出钱招募雇佣兵的习惯。

要明确定义贵族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说贵族要对被保护民提供保护。

贵族和被保护民之间相互依存。当贵族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被保护民会助其渡过难关。同样，当被保护民中的某一个人陷入了财政危机，贵族也会出手相助。

被保护民决定开始一项新事业的时候，贵族甚至会求助于关系不错的其他贵族，尽力促成该事业的成功。贵族被海盗抓走需要赎金的时候，被保护民会多方奔走筹集赎金。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被保护民的子女的婚姻问题到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甚至是诉讼问题，保护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提供意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当他们的保护人竞选公职的时候，被保护民会全体赶往马尔斯广场参加投票选举。因为他们是罗马市民，是名副其实的权利人。

对于被保护民，《十二表法》中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保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大概是这一条的评价不错，一直被沿用了下来，而没有在重新制定新法的时候遭到废弃。

作为保护人，贵族家长每天早晨的例行事务就是在简单的早餐之后，马上和等候他的被保护民进行会谈。会谈结束才会见其他贵族或去元老院、官府工作。

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更加隐秘的关系。两者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义（诚信），背叛被认

为是最恶劣的品行。

如果两者中的一方受到审判，不会要求另一方作证。因为在罗马，作伪证也有罪。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关系密切而提供伪证导致被问罪的结果发生。此外，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还是世袭的。

很久以后，渡过卢比孔河后的恺撒与庞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决战。决战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恺撒最信任的副将拉比努斯追随庞培而离开了恺撒。庞培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然而，拉比努斯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抛弃恺撒选择庞培的，只是因为出身于皮切诺的平民拉比努斯是这方土地上的贵族庞培家祖祖辈辈的被保护民。

经历了8年高卢战争、成为恺撒左膀右臂的拉比努斯，因为长期待在恺撒左右，对恺撒作为武将所具备的卓越才能一清二楚。他一定早料到了双雄之争的结果。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保全被保护民信义的生存之道。对于他的“背叛”，恺撒没有一句话的责备，他只是差人把拉比努斯的行李送了过去。因为拉比努斯是罗马人，才选择了离开恺撒，而恺撒也因为是罗马人，才不仅不怪罪，还为他送去了行李。

罗马贵族拥有的实力基础不是土地，而是人，所以，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贵族可以和平民展开面对面的交锋。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单纯地用现有势力和新兴势力的对立这一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应该说，贵族和属于被保护民的平民合二为一的势力与这一关系之外的平民之间的对立才是合理的观点。这一对立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也在于此。

这种关系需要有强烈的同伴意识才能发挥作用。同伴意识通常是在封闭的组织内养成的。但是罗马的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封闭。罗马的保护人非常热衷于扩大被保护民的人数。

奴隶获得自由身后叫解放奴隶，自然，他随后就会成为旧主的被保护民。解放奴隶的子女可以获得罗马市民权，于是，他的旧主人又多了一个有参政权的被保护民。

如此一来，似乎是对公职有野心的贵族为了提高自己一方的得票数的一种策略，但是，把“被保护民网”扩大到没有市民权的人身上，就不能用得票数来解释了。因为即使到了罗马称霸海外的时代，贵族们也想把既非罗马人也不是意大利人，就是说没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吸收为被保护民。

在诸多方面表现极端开放的罗马，乍一看，构成其社会的重要因素似乎在于封闭的被保护民关系中，着实很有意思。但是，也许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归属意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是开放的。

“被保护民”是古代罗马共和政制的一大特点，这一词的翻译，我认为还可以加上“后援会员”或者“支持者”。

贵族与平民的对立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第三个要因是不是可以从罗马是一个重领土国家这一点上去找呢？

罗马和海洋国家雅典不同，是一个以陆地生活为主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它和敌国有国境线相接壤。既然有国境线相接，那么出于防卫的目的，要避免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于罗马人来说，战斗就像家常便饭，比雅典人多出许多。在罗马，除了孩子，一无所有的市民叫无产者，他们不需要缴纳直接税，意味着他们免除了兵役。除了这些无产者，其余人等于都是士兵。

对于指挥官的能力优劣，没有人比士兵更敏感。在无能的指挥官指挥下，士兵会毫无意义地丢掉性命。同时，从成年到60岁结束预备役为止，漫长的战斗经历也告诉他们，没有指挥官，就没有战斗力。罗马人平素就知道，对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说，有能力的指挥者不可或缺。

在一次执政官选举时，平民方面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两位执政官中，要有一位是平民出身的人。对此，贵族方面担心国家最高官职的执政官之一如果让给了平民，他们和平民的力量会变成均等。因此建议执政官由两个人增加到三个人。大概他们考虑即使选了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至少也是二对一。但是，投票的结果，当选的三个人都是贵族。平民们不能不承认平民阶级的人才严重匮乏。

不过，平民中的人才匮乏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十二表法》的制定仅过了4年，一项允许贵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出台了。这一法律的出台，对平民阶层的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在教育制度不健全的那个时代，出身和门第就是接受教育的标志。

尽管如此，公元前449年至前367年的80多年里，罗马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其间，曾经尝试过废除二人的执政官，代之以六人的军事指挥官。这就让人难免想起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十人“国家战略官”。或许是考虑到把两个人行使的权力分散到六个人的手上，就可以淡化寡头政治的倾向吧。

结果却一塌糊涂。每当需要统一指挥系统的时候，不得不一次次地任命独裁官。就像以后将要讲到的卡米路斯，光是他一个人就5次被任命过独裁官。

不久，罗马迎来了这种状况难以为继的时期。在希腊，一度陷入泥沼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有了结果，雅典不敌斯巴达。希腊于公元前404年进入斯巴达称霸的时代。在失去伯里克利，又败于斯巴达后，一直处于迷茫状态之中的雅典于公元前399年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此时的落后国家罗马还处在“探索”过程之中，先进国家希腊也同样一片混乱。

凯尔特人的入侵

在南欧，平原用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商船满载着商品往来于海上的时代，北欧还被大面积的森林所覆盖。这片森林的居民就是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是希腊人取的名字，罗马人叫他们高卢人。今天虽然只剩下爱尔兰，但是在古代，这个民族却占据了欧洲最辽阔的土地。

公元前6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凯尔特人开始了迁徙。他们不是大规模地从居住地涌出，而是像后浪推前浪一样，从北方向东、向南、向西涌去。位于最北边的民族赶走离自己最近的部族，失去家园的这个部族又把距离他们最近的部族赶走，像这样，他们开始了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推进。被赶到南方的凯尔特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今天的米兰到波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

最初，凯尔特人并没有对罗马形成威胁。因为从罗马到那里，不仅有亚平宁山脉横亘其间，而且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范围也还在。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除了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随着罗马废除伊特鲁里亚系的国王，开始共和政体，伊特鲁里亚人转变成了罗马的敌人。罗马敢于与伊特鲁里亚人为敌，表明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开始走下坡路的伊特鲁里亚势力和处于上升期的罗马力量在这一时期应该是交叉的。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的希腊殖民都市群和二分意大利半岛的势力伊特鲁里亚，明显都变成了守势。虽然牢不可破的城堡建在山上，在防御方面无懈可击，但是伊特鲁里亚各城市间的同盟关系没有在军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各路军队汇集到了一起，也往往因为指挥系统的失灵而无法团结一致。相反，罗马人非常清楚指挥系统的重要性，他们宁可牺牲其他部分也要确保指挥系统的正常。

就罗马而言，在有效利用拉丁同盟这一同民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与伊特鲁里亚人的作战方式很相似。在战斗中，罗马人通常担任同盟军的作战主力，左右侧翼交由同盟国负责。战斗胜利后，战利品的分配坚持平等的原则。只有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职位始终由罗马人掌握。在当时，伊特鲁里亚在很多方面都凌驾于罗马之上，但是他们与罗马相比，最缺少的就是和同盟国之间的协调性，他们的指挥系统四分五裂。

但是，各个击破伊特鲁里亚的势力后，罗马却亲手毁坏了阻碍凯尔特人南下的防御线。公元前396年，罗马终于成功攻取了伊特鲁里亚非常强大的城市维爱。这是经过漫漫10年的战争才取得的胜利，为此，罗马举国欢庆。然而，在欢庆的同时，国内的战火再次点燃。

这一时期的罗马形成了只要和外敌作战，就举国一致、共同对敌的体制，因此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战斗一结束，贵族派和平民派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斗争也成了惯例。攻下维爱后，按照这一惯例，两派之争再次展开。此时，平民方面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他们建议在刚刚攻取的维爱建设第二个首都，地位和罗马等同。这一建议的背后，是对维爱雄伟的街道的赞赏以及只要留在罗马就要受贵族压制的思想。

对此，贵族派坚决反对。在贵族派中，作为独裁官，终于给长达10年的维爱攻略战打上休止符的卡米路斯成了反对另立第二个首都提议的急先锋。他说因为有诸神寄居在罗马，由他们在保卫罗马，所以罗马才有了今天。二都并立是对诸神的背叛，对罗马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是，平民派表现得也很执著。他们认为维爱做自己的根据地是再理想不过了。那儿距罗马只有20公里，街上的建筑也非常好，虽然经过了长年的攻防战，但是拥有先进技术的伊特鲁里亚人建起来的这座城市，依然可以拿来就用。

卡米路斯的态度非常坚决。由于卡米路斯是攻取维爱的最大功臣，他的态度的分量自然非同一般。平民方面意识到正面交锋毫无胜算，于是，改变了策略。他们指出，在攻取维爱之后，作为战利品之一的钱去向不明，以此检举卡米路斯。

事实上，卡米路斯为了信守进攻前夜的誓言，把战利品之一的钱献给了位于希腊德尔斐卡米路斯的阿波罗神殿，以此感谢神助罗马取得战斗的胜利。所以用途不明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卡米路斯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擅自作出了决定，所以显得不够光明磊落。

罗马没有陶片放逐法，所以要排除政敌，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检举。在罗马，但凡有势力的人尽管没有六法全书，对法律却了如指掌。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检举，一点也不为过。卡米路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独裁官的任期结束了，卡米路斯成了一个普通市民，失去了不可侵犯的权力。当然，平民在检举的时候也是看准了这一时机。

卡米路斯把被保护民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叫到自己家，商议有关检举的事情。被保护者们对卡米路斯说，如果要罚款，就交给他们来处理，但是，如果是为了在诉讼中取胜而拉票，他们不敢保证。

作为士兵，参加过维爱攻略战的罗马平民们非常尊重司令官卡米路斯，但同时又非常恨他。作为武将，他们承认卡米路斯有杰出的才能，但是，他们无法忘记入冬之前被迫野外宿营的日子。以前，罗马军的惯例是夏季作战。但是，这次为了一举攻下维爱，卡米路斯把首次冬季作战的经历强加给了罗马士兵。当胜利的喜悦渐渐平静下来后，留在人们心里的只剩下不好的印象了。卡米路斯残酷地要求大家战斗到冬季，使得平民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不好。

卡米路斯意识到除了主动亡命国外别无选择。在罗马，有规定对主动亡命国外的市民既往不咎。在被保护民们的护送下，卡米路斯在一个深夜悄悄离开了罗马。罗马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的结果是，罚款金额高达1.5万阿斯。

不用再顾虑他人眼光的平民们一举迁移至维爱。这时的罗马，总司令官的位置出现空缺，军队中有一半人脱离了队伍，不幸就要降临罗马。

公元前390年夏天，凯尔特人翻越过亚平宁山脉后开始南下，他们沿着进军路线一路攻打伊特鲁里亚的城市。

凯尔特士兵的骁勇善战传到了罗马。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剑、矛和贴着皮的木制盾牌，身上披的是铜制盔甲。根据其在军队中的地位，通常盔甲上装饰有不同种类的羽毛。凯尔特军队由骑兵、步兵和战车组成，他们常用的战术是先用战车冲击敌军的阵营，然后，步兵和骑兵再杀进去。他们的军队中还有这样一群人，每当战斗打响，他们就脱去身上的衣服，只戴着金项圈和臂环投入战斗。

凯尔特人有一个习惯，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割下此人的脑袋，挂于自己的马脖子上。战斗结束后，回到家中，把脑袋浸泡在油中，向客人展示敌人的头颅是他们接待贵客的待客之礼。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目标指向了罗马。伊特鲁里亚的城市丘西首先遭到他们的袭击，于是向罗马派去使者请求援军。但是，此时的罗马自顾不暇。

从丘西到罗马相距120公里，中间既没有山脉相阻，也没有河流相隔，而且可以视为缓冲区的维爱也早被罗马灭亡。

罗马陷入了一片恐慌。担负起防御指挥的波比利奥斯·雷纳要求罗

马人鼓起勇气与敌人决一死战。他说：

“尽管我们和拉丁人、萨宾人等战斗，但是战斗结束后，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国。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这样的民族看做敌人。可现在我们面临的敌人残暴至极，如果我们不杀死他们，他们就会把我们杀死。”

可是雷纳能够召集组织起来的罗马军队不仅为数少，而且难免有些仓促。

公元前390年7月18日，罗马军队在台伯河上游迎战来敌，结果很快被打得七零八落，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四散逃命。

凯尔特人开进了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罗马。据说环绕罗马的城墙的城门大开，罗马沦陷。蛮族开始占领罗马，并持续了7个月。

罗马方面认为，即使举国一致共同对抗凯尔特人，要击败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让罗马的年轻人和壮年男子转移到卡匹托尔山上。在罗马的七个山丘中，卡匹托尔山最高，但是山顶很狭窄，所以虽然易于防守，可容纳的人数却非常有限。这座三面陡峭的山丘，对罗马人来说，不仅适合防御，而且还是神圣之地。山上有几个祭祀以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的神殿和它们的附属建筑。他们认为如果这里被敌人占领，罗马也就走到尽头了。

由于卡匹托尔山山顶太过狭窄，可容纳的人数极其有限，因此有相当多的人不能上去。元老院议员、老年人都被留了下来，除了被选中上山守城的士兵家的妻儿，其余妇女儿童也不能上卡匹托尔山，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罗马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凯尔特人在这里极尽残虐之举，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地位高下，杀戮、强暴并掠夺罗马人，还逼迫他们为

奴。他们野蛮地破坏和烧毁神殿、元老院议事厅、房屋及市场。而卡匹托尔山上的男人们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

这是罗马人自建国以来从未尝到过的屈辱。虽然有过被迫退至台伯河西岸的经历，但是集中在东岸的七个山丘和古罗马广场还从来没有被外敌践踏过。公元前390年夏天，凯尔特人的入侵是第一次，而罗马第二次被敌人攻陷则是在800年之后，发生在罗马帝政末期的公元410年的蛮族入侵。

罗马人最看重的品德是名誉，凯尔特人的入侵深深刺伤了罗马人的自尊。这种伤痛不是单靠一次次击退敌人试图攻占卡匹托尔山而发起的强烈攻势所能治愈的。这时，有能力重组军队夺回罗马的卡米路斯已被逐出罗马。就这样过了7个月的被占领生活。

罗马毕竟是幸运的。应该说凯尔特人都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是乡下人，没经历过城里人的生活。他们虽然占领了罗马，却不知道如何在罗马城里生活。

自来水投入了死尸而无法饮用，小麦因为他们过于喜欢火攻而很快烧尽。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尸体未能被及时处理的缘故，瘟疫开始流行。凯尔特士兵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开始厌倦起了城市生活。

固守在卡匹托尔山上的罗马人也陷入了饥荒之中，他们不得不谋求结束僵局。

罗马人派出特使和凯尔特人谈判，他们提出以支付赎金为条件，让凯尔特人离开罗马。对罗马人来说，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现状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凯尔特人拿着300公斤的金块，解除了对罗马7个月之久的占领，离开了。

蛮族离去后，罗马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回卡米路斯。卡米路斯在

流亡之地仍心系祖国的安危，只因为没有接到正式的回国命令，无奈不能擅自回去。此时，卡米路斯在接到回国命令的同时，也接到了独裁官的任命通知。这是他第二次就任独裁官。

利用独裁官的权限，他把迁居到维爱的平民也召集起来，组编了军队。卡米路斯率领罗马军，奋起直追正向北行进在归途中的凯尔特人，报了战败之仇。但是，凯尔特人的入侵使他们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治愈他们的伤痛。

城市遭到严重破坏，重建工作很快开始了。平民们不再要求把首都设到维爱。他们觉得罗马之所以会遭此劫难，是因为保护罗马的诸神利用凯尔特人之手来惩罚试图抛弃他们的罗马。卡米路斯说，抛弃罗马的人不再是罗马人。他的这句话深深印在了经历过凯尔特人入侵后的罗马人的心中。

如果只是重建遭破坏的罗马和恢复罗马市民的团结，那么因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伤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治愈。但是，罗马用了40年的时间才重新站立起来。因为邻近各部族看到罗马面对蛮族入侵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屈服，于是纷纷离它而去。拉丁同盟也夭折了。不仅如此，昨天的同盟国转脸变成了罗马的敌人，他们试图乘机消灭罗马。建国360年，共和政体实行100年之后的罗马，不得不从头来过。

公元前509年确立共和政体的时候，罗马曾经被迫重修王政时代建立的同盟关系。那时，重修同盟关系是为了政体的改变，为了战胜伊特鲁里亚军，实现独立，是新局势的对策，不像公元前390年，是因为战败。

不管怎样，在当时，凯尔特人占领罗马绝对是一大新闻，甚至传到了希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罗马的惨败。公元前390年后的再次兴起比公元前509年无疑要困难得多。

与雅典、斯巴达及迦太基相比，为什么只有罗马能变得如此强大？是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开始执笔书写罗马史。他非常重视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认为这是罗马开始走向强大的第一步。不小心跌入谷底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来。但是跌入谷底并坐以待毙的民族不在少数。尽管罗马人在公元前390年一度跌入了谷底，但是，罗马人终究是罗马人，尽管速度缓慢，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

走向衰亡的希腊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成了罗马人永远的伤痛。不过讲述从此往后的罗马历史，感觉好像是在飘忽不定中追踪了许久之后终于能够不再迷失。

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人迎来了结束对希腊的考察的三个人后，知道了罗马既不能像斯巴达也不能像雅典那样。但是对于如何吸取这两国的精华，去其糟粕，他们肯定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因此，时间依然在贵族和平民的对抗中流逝。

80年的探索岁月看似漫长却又匆匆。其间，罗马几乎不得不年年为自卫而战。

凯尔特人的入侵使罗马人意识到了祖国的脆弱。同时，也教给了他们增强祖国实力的道路。公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也明白了怎样才能走好这条路而不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

使罗马人走出迷茫的直接原因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凯尔特人的入侵不仅使他们在物质上蒙受极大的损失，而且也让他们深感耻辱。但是，同时代的希腊局势的变换告诉罗马人的应该更多。

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最初，战局是向着有利于雅典的方向发展。

公元前429年，瘟疫袭击了战争中的雅典，前一年下台的伯里克利染病而亡。伯里克利死后，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再次兴起，雅典进入了世人所说的群愚政治时代。

说是群愚政治时代，并不是说继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就没有了人才。尼基阿斯、阿尔西比亚德斯、克里提阿斯等，我们随口就能说出几个当时叱咤雅典政坛的人物，他们个个都是资质极高的人，其中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克里提阿斯还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只是，他们缺少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魄力。在长达30年里，伯里克利成功地使民众相信是他们在推动国政，陶片放逐法没有降临到他身上，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同时，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带领雅典前进。我不得不认为，群愚政治不是因为人才的缺乏，而是制度的缺陷浮出表面的结果。

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冲动，非常想写一部题为“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的作品。

阿尔西比亚德斯——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魅力十足的变节者。

克里提阿斯，作为寡头派的领袖，对雅典实施暴政的他，看着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剧中揶揄自己而哈哈大笑。

阿伽松，背弃雅典，前往马其顿的悲剧作家。

色诺芬，只有在波斯才能发挥他的武将才能，在当时的非小说作家中位列第一。

柏拉图，对陷于迷途而难返的雅典心生厌倦，选择了埋头做学问。

他们都是苏格拉底非常欣赏的、从心里到身体都非常健全的青年才

俊。

探寻苏格拉底和他弟子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是刻画辉煌的城邦——雅典——光明与黑暗的极佳题材。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接受审判时所受到的指控是：

“亵渎神灵，腐蚀青年。”

如果仅仅因为“腐蚀”，雅典市民就对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投了赞成票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不像后世的我们对此事所持的看法那么简单了。在他的弟子中，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优秀的作品，也有人活跃于雅典的舞台上，成绩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搀扶起正在下坡路上滚落而下的雅典。不仅如此，他们做的事情甚至还加速了雅典下滑的速度。

这一现象是否要归因于时代？还是与时代无关，是伟人因为伟大而不经意间把毒害播撒到了周围？

当然，这不是苏格拉底个人的责任。不知为什么，仰慕伟人的人中，很多人只对伟人的教诲这一面感受颇深，容易流于强调这一面的生活态度，而忘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忘了真正的生活态度是取自正反两面的平衡。

但是，也许这就是伟人的宿命。如果这样去想的话，对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就只能投反对票了。

也许因为伯里克利比苏格拉底年长25岁，所以虽然把他看做希腊哲学的天才，和他以朋友相交，却似乎没有醉心于他。政治家对民众的理解能力从来不抱幻想，相反，哲学家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提高民众的理解能力上。这也许就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吧。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宣告结束。人所共

知的海上军事强国雅典在海战中极不光彩地输给了陆上军事强国斯巴达，给持续了27年的战争打上休止符。雅典从此再难称雄海上。

进驻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命令战败者雅典放弃民主政体，恢复寡头政治，撤去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道路两侧的城墙。对于那天的情形，色诺芬写道：

> 就像值得庆祝的事情一样，城墙在乐曲声中被推倒，就好像这一天是希腊自由的开始。

但是，“这一天”是希腊失去自由和独立的第一天。

这一天是斯巴达霸权主义时代的开端。这一天对雅典、斯巴达甚至整个希腊来说，是丧失自由和独立的第一天。

继雅典之后的斯巴达霸权并未持续很久。只有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可以是一个强国，却无法成为长久的霸权国家。因为斯巴达人没有让失败者可以接受的生活哲学。除了斯巴达人，没有人能够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人受“斯巴达式”的吸引。由于斯巴达社会很闭塞，士兵数量得不到增加，仅靠1万斯巴达战士去控制不愿接受约束的雅典人是远远不够的。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霸权被底比斯所取代。但是，底比斯的霸权也只维持了短短的10年。其间，雅典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文化之国，雅典称得上很优秀。但是，政治上的持续低迷使它缺乏领导希腊的力量。光荣的城邦历史结束了。

公元前362年，希腊的主宰权落到了王政的非城邦国家马其顿手中。

公元前356年，后来成为皇帝的亚历山大在马其顿降生。

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可以提供希腊局势变化的信息渠道。在当时，信息的传递一是沿商路，二是在希腊的德尔斐神殿。古希腊有德尔斐神谕，据说是地中海世界最灵的神谕。罗马在战局不利的时候，经常派使节前去询问德尔斐神谕。为了祈求神谕，人们不分民族，从四面八方来到德尔斐神殿。因此，当时的德尔斐神殿是最好的信息交流场所。既然希腊人知道凯尔特人占领了罗马，那么，希腊城邦的自然瓦解过程罗马人一定也都知道。

这件事情让罗马人了解到，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只要是城邦，其寿命终究长不了。罗马人是一个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民族，甚至被只看表象的人轻蔑地称做“模仿民族”。

罗马重振

在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尤其是希腊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注意到了罗马人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确定先后顺序的合理性。后来在英国人统治世界的时代里，为培养政治敏感性，甚至要求学者对此加以特别关注。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公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认为必须解决的是下面这些问题，按照罗马人排列的顺序列举如下：

第一，在注重防卫的同时，重建被毁的罗马。

第二，与叛离的旧同盟各部族作战，以此确保边境安全。

第三，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安定和舆论统一。而这必然意味着政治改革。

在接受屈辱的条件，用赎金让凯尔特人离开的7个月后，罗马人终于着手重建被毁的城市。

环绕七个山丘的城墙重建没有按原样进行，全长达8公里的城墙采用了从维爱采石场运来的一边高度在一米以上的石块。在城墙要冲位置建了瞭望塔，上面有哨兵常驻。因为蛮族凯尔特人的行踪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次来犯。

城墙建成之后，下水道的整修工作放在了神殿重建之前完成。这次把以前没有铺的街道也铺上了，还用切割成四方形的石板盖在下水道的上面。接下来才是神殿的重建，当然也不会草率行事。为了不再出现两个都城的问题，罗马有必要强调这里是诸神的原住地。

但是，用国家财政重建公共设施后的罗马，已经很难顾及私人设施的重建工作。于是私人设施的建造问题就一股脑地甩给了市民自己。由于罗马人有非常强烈的重建愿望，结果导致罗马的城市建设毫无规划。见识过当时罗马的希腊人把罗马说得一无是处，指出罗马甚至没有公共设施区与住宅区域之分。这就是急于重建的结果。罗马着手阿皮亚大道及阿皮亚自来水管道那样的建设事业是在“凯尔特冲击”彻底痊愈后的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后。

坚固的城墙建成了，但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时的罗马又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位置上出现了合适的人才。

马克斯·弗瑞耶斯·卡米路斯是一位武将，曾经在公元前396年攻打维爱的战争中立过功。因凯尔特人的入侵，罗马的防御变得不堪一击，他总揽了这项工作。普鲁塔克是这样描述卡米路斯的：

> 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曾经连续担任重要职位，并用他辉煌的战绩为这一职位增添光色。能做到他这样的人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他的经历非常特别，他曾五次担任独裁官，举行过四次凯旋仪式，被誉为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的第二个创建者，却没有一次当选过执政官。

这种状况反映了当时的罗马局势。与元老院展开激烈抗争的罗马平民阶级，不愿意支持两人的执政官，而选择支持六人的军事指挥官。执政官和六人军事指挥官所行使的权限固然相同，但是由于行使权力的人数多了，所以尽管还是寡头政体，多少也会给人民主的印象。

就这样，卡米路斯始终无缘执政官。因为罗马再次实行执政官制度，是在卡米路斯去世的前一年。

但是，由于执政官必须两人意见一致，决议才能生效。所以，即使卡米路斯出生于执政官制度下的时代，从他的性格来看，或许他更适合当独裁官，尽管任期只有执政官的二分之一，却是一个人说了算。

卡米路斯出身于非名门的罗马贵族家庭。他很公正，重信义，对现状有出色的判断能力，更可贵的是有先见之明，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对屈服于罗马武力的战败者也很宽容，性格一点也不张狂。把分崩离析的同盟国成员再次收于罗马羽翼下，不能不说卡米路斯的这种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打败曾经的同盟者后，对待他们就好像从未被他们叛离过一样。尽管通过战斗已经充分显示了罗马的实力，但他依然平和地对待战败者。

但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总是不顾及别人的反应而直言自己的想法。在平民们提出在维爱设第二首都的时候，他坚决反对。遭检举后，不得不主动流亡国外。这件事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固执己见的人容易遭人憎恨。他不是很容易被市民大会选中的人。

但是，无论是卡米路斯还是罗马，值得庆幸的是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即公元前410年至前360年，罗马由六人军事指挥官取代两人执政官治理罗马。因此，每当六人意见不一致，又急于作出决定时，只有任命独裁官来打破僵局。而卡米路斯就是独裁官的最佳人选。

做过五次独裁官的卡米路斯，他的功劳首先是战功，他率领的罗马军几乎是屡战屡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得曾经遭蛮族践踏而失去了自信的罗马人重拾信心，也让背弃罗马的邻近各部族放弃了侵犯罗马边境的想法。

卡米路斯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甚至还借用过凯尔特人的战术。在重视灵活性方面，罗马军的阵型改成了凯尔特方式。以前，军队以大长方形的阵型突击，他改成了小方形，由各路中队分头突击。考虑到长期作战的需要，他还注重建设坚固而舒适的营地。进攻策略也更加灵活，根据敌人的不同随时改变战术取代了以前单一的用力量压制敌人的战术。此外，武器和装备也得到改良。

其结果就是他举行过多达四次的凯旋仪式。一场小小的战斗获胜无权举行凯旋仪式，所以四次凯旋仪式意味着他的战绩很辉煌。对罗马人来说，一次凯旋仪式就是毕生的荣誉。所以，作为人们心目中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第二位建国者，卡米路斯即使在凯旋仪式上驾驶四匹白马拉的车，相信也不会有人提出抗议。

如果是依靠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凯尔特冲击”过后的罗马因为卡米路斯的功劳，得以恢复到“冲击”之前的状态。至于依靠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需要不受传统束缚的判断力，所以只能由比卡米路斯年轻的男人们来解决了。

所谓根本性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者的交替才能做到完善。

政治改革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起来的第一要因在于罗马创造并实施的政治体系。他的理由如下：

> 我们已知的政体有三种，即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如果你问罗马人，他们国家的政体属于其中的哪一种，估计无人能回答。
>
> 如果眼里只有执政官，看上去像王政；如果只注重元老院的作用，大概有人会说是贵族政体；如果只重视市民大会，这人一定果断回答是民主政体。……然而，罗马政体正是这三者的统一体。

有人认为只有这三种政体结合起来，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体系。其中一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为了从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击中走出来，应急措施在经过了20年后暂告一段落。虽然城建杂乱无章，但是，罗马再次成为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市，在打败外敌后，重新变成边境相对安全的地方。尽管是在卡米路斯的领导下，重建罗马也用了20年的时间，可见“凯尔特冲击”带来的创伤有多么巨大，它迫使罗马倒退了10年甚至20年。但是，不管怎样，罗马终究恢复了最初的活力。

但是，问题还在后面。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抗争暂时平息，一旦危机过去，内讧再次出现。战时团结一致，战争一停，国内斗争再起，成了实现共和政体以后的罗马的常态。

面对蛮族来犯束手无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国内不断的内讧。经历了公元前390年厄运的罗马人，已经不能允许这个问题无限期拖延。这一点，罗马人比任何人都有体会。

和80年前制定《十二表法》时的罗马人不同，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已经具备了实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条件：

第一是希腊城邦的衰退。为此，坚持认为必须与平民斗争的顽固派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具有危害性。同时也让一味要求权利的激进派平民阶级了解到雅典模式过于超前所具有的危害性。

第二是平民阶级力量的增强，不是量而是质的增强。

公元前445年“解禁”的贵族和平民间的联姻成果此时开始显现。平民阶级开始人才辈出要归功于卡米路斯。独裁官可以任命骑兵长官一职的副官。卡米路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将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在率领军队和领导国政一视同仁的时代，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自然会转向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就连伯里克利，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当雅典发生战争，他毅然决然地执掌司令官之职参加了战斗。战略也是政略。不！它必须是政略。

公元前367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

在这部法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制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

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差别为目的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埋下了永远的矛盾种子。

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

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在《李锡尼法》实施若干年后，又出台了一部法。

此法规定，凡是担任过重要公职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权取得元老院议席。就连以保护平民阶级权利为己任的护民官，在卸任后也可以成为元老院议员。工会委员长在卸任后也可进入管理层。

但是，经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对“开放元老院”的规定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连护民官在接受洗脑后，也可以被纳入体制这一事例，恰恰证明了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罗马人，与实现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相反，其政治意识低下。

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由那些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出类拔萃的能力、但不需要经过选举的人们组成的机构是共和政体下不可或缺的机构。正因为他们远离选举，所以他们可以从长远的视角去制定一贯的政策。为了维护因选举年年发生变化的执行机构，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

以公元前4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废除了以前的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议员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并非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条路：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

公元前366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执政官选出。

公元前356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诞生。

公元前351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财务官选出。

公元前332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法务官选出。

公元前322年，禁止因无法还清欠债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雅典和罗马在权力的二足结构方面是一样的。

雅典的二足结构采用了交替掌握权力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寡头政权和民主政权看成是两大政党。

因此，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利用陶片放逐法来排除异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没有陶片放逐制度，只要采用政权交替的方式，类似的“流血”事件总是难以避免。

罗马的二足结构没有采用贵族和平民交替执政的方式。原有势力拉拢新兴势力是罗马的惯用手法。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避免政权交替时出现“流血”的情形，而且还可以随时补充新鲜“血液”。可以说，这种体系对于有效利用人才资源非常有利。

当然，它也有缺陷。不管怎样，所谓改革，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让人们看到改革的效果。因此，如何赢得人们不改初衷地支持

改革，是改革者必须牢记的任务。而未废除护民官制度的罗马，在这方面做得也很高明。在平民们看来，护民官的存在意味着自己的想法有可能获得重视。不过，话虽如此，由于护民官在卸任后可以获得终身制的元老院议席，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太过激进。

第二个缺点是，当新兴势力成功进入体制内部后，还会出现新的新兴势力，还需要把他们纳入体制内。也就是说，国家不得不无休止地拉拢新兴势力。直到公元前1世纪前的300年间，这种“拉拢方式”还是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现在的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两大政党主义是上上之策。但是，它果真像我们坚信的那样是上上之策吗？寿命最长的组织——现在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惯用拉拢手段的组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中的“新鲜血液”几乎都是被教皇领导下的教徒们“拉拢”来的。

现在还保存在罗马市内的遗迹古罗马广场曾经是古罗马的中心。从斗兽场的位置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古代的神圣大道前行，可以到达协和神殿。该神殿是为纪念《李锡尼法》的实施而建，位于罗马最好的位置——古罗马广场内，只是现在神殿内已经见不到一根柱子了。

“协和神殿”这一名称，就是一致、协调、和睦、合作之神殿的意思。通过建造神殿，所有人承认了《李锡尼法》，宣誓消除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对立，两者团结一致，相互协调，和睦相处，共同合作，为罗马国家尽心尽力。

建造神殿的目的是为了供奉神，而建造这座神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供奉的是和睦之神——协和女神。可见，罗马人的多神教性格甚至连国内和睦也要神格化。对此我们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正是通过这一做法表达了他们实施《李锡尼法》的坚定决心。

田中美知太郎先生把柏拉图的politeia翻译成了“国家”，而希腊语中，politeia的意思据说是城邦（城邦国家、市民国家）的存在方式、组织、制度。所以“国家”的翻译完全正确。

古代罗马人把politeia翻译成“res publica”（共和国）。它是意大利语中republica、英语中republic的词源。这一拉丁语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公共”，还有采用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的国家的意思。所以“共和国”的翻译也是正确的。

在日本，“res publica”一词被翻译成“共和”或“共和国”，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也采纳“共和”的译法，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协调的感觉。

我认为把“res publica”翻译成“国家”似乎更贴切，当然，如果觉得“国家”的译法不能表达你的心情，还可以翻译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共和”的译法尽管不算错，却难免让人感觉表达的意思不够明确。

“res publica”重视的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这一点上，每个人的想法惊人地一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不是共和就能做到的。这一点历史已经予以证明。不，也许这就是人类的不同表现，即历史本身目标一致，但人类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尽相同。

为什么为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手段会有如此不同呢？所谓的手段，我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是“民意优先”派。有此想法的人们认为主权在民，所以在反映国民意愿的同时，应该实现公共利益。古代希腊和罗马都没有主权在民的说法，但是作为城邦国家，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市民为共同体的主要支柱。如何看待民意的反映是他们的重要课题。

第二是“公共利益优先”派。这部分人认为公共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他们同时认为民意的反映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公共利益。也有人说，属于第一派的人们立足于性善论，而属于第二派的人们则立足于性恶论。

虽然我们不能说美利坚合众国的两大政党现在仍在沿用这个意思，但是仅看称谓，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分别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我想如果把民主党翻译成“民意优先党”，把共和党翻译成“公共利益优先党”，或许会更明白些。

在古代，民意优先派叫平民派，公共利益优先派叫贵族派。贵族只是在最初的阶段表示生来就是贵族的意思，后来普遍沿用“贵族”一词的词源aristocraticos的原意，即比百姓优秀的人，也就是精英的意思。因此，前者认为民主政体是好的政体，而后者我以为选择的政体与其说是贵族政体，倒不如说是寡头政体更加贴切。

如果只是这样的两分法，自然简单，但是由于他们各不相同，所以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区分。

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所以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一员，那么他们不过是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而已。如果想把自己看到并了解的事情付诸行动，需要权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预见到特洛伊将被希腊军队所灭，于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说给特洛伊人听，却没有人理会她。在欧洲，现在还把那些坚信只要劝说就会有人听的人叫做“卡桑德拉”。

因此，获得权力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获得权力，则需要有洞察时代的能力，了解时代的潮流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一潮流是否足够巨大。如果这股大潮是民众，他必须成为平民派的领袖。如果他身处民主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的时代，他必须成为寡头政体的领袖。即使不是因为喜欢平民而成为平民派的，但是只要是同情者，也会有足

够多的人听他吩咐，而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有效利用他的这些手下。权力对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希腊民主政体的瓦解，使时代潮流趋向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人实施寡头政治。即使不是寡头政体，也是马其顿那样的王政统治。但是罗马人不喜欢王政统治，他们认为即使不在王政统治或民主政体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这确实很符合罗马人的做法。

罗马政体

从王政转向共和政体后，有关古代罗马通史的历史书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图示的形式来解释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政治体系。这样自然非常便于理解。但是我没有采用这一方法。因为我认为这一方法不能真正反映罗马当时的情形。

罗马实施共和政体之初，只是把王政时代的三足——国王、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中的国王改成了二人执政官，其余的都没有变动。因为罗马人更喜欢根据需要随时设置官职的做法。

所以，研究人员在解释共和政体初期业已完善的政体状况时，每说到一个官职，无论其是在哪一年设置，哪一年一度废除，还是到哪一年又重新设立，都必须提到公元前509年这一时间。实际情形是，没有任何史料准确记录官职的创设、废除和重新设立的年限。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在公元前509年，罗马刚刚进入共和政体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已经在有效地发挥作用了。但是，事实上，直到公元前367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种种条件并不完善，罗马人却一直在探索中前进。

因此，我接受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看法，认

为罗马共和政体开始全面发挥作用是在经历了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之后更符合历史，解释此后的罗马共和政体下的所有官职更符合实情。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在这里进行说明也是基于这一理由。因为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政体已经完善，可以加以说明了。而且要讲述以后的罗马历史，也可以有明确的起始线了。

与雄辩的希腊人相比，罗马是一个现实主义性格很强的民族。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想结合现实或许会更合适。

首先是支撑政治制度的选举制。进入共和政体以后，罗马人依然继承了王政时代的这一制度。虽然前面已经介绍过，但我还想在这里重复一遍。

就像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也采用了按收入的多少纳税的做法。在没有直接税的时代里，以服兵役的多少来体现，并没有收入和所得的区别，因为当时还没有经费的概念。

百人队是罗马军队的核心。投票以百人队为单位，首先由百人队中的100个士兵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体现在一票上。但是，实际上，有义务提供百人队的人投这一票也很正常。

与雅典的一人一票制相比，这是罗马投票制的最独特的地方。

由于市民大会的总投票数是193票，所以只要有97票就过半数。也就是说，只要第一等级意见一致，就控制了超过半数的票。很显然，这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寡头政体。

执政官（**Consul**）

执政官取代王政时代的国王，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最高官职，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批准后就职。其过程与国王一样，但国王为终身制，而执政官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一年。执政官允许再选，年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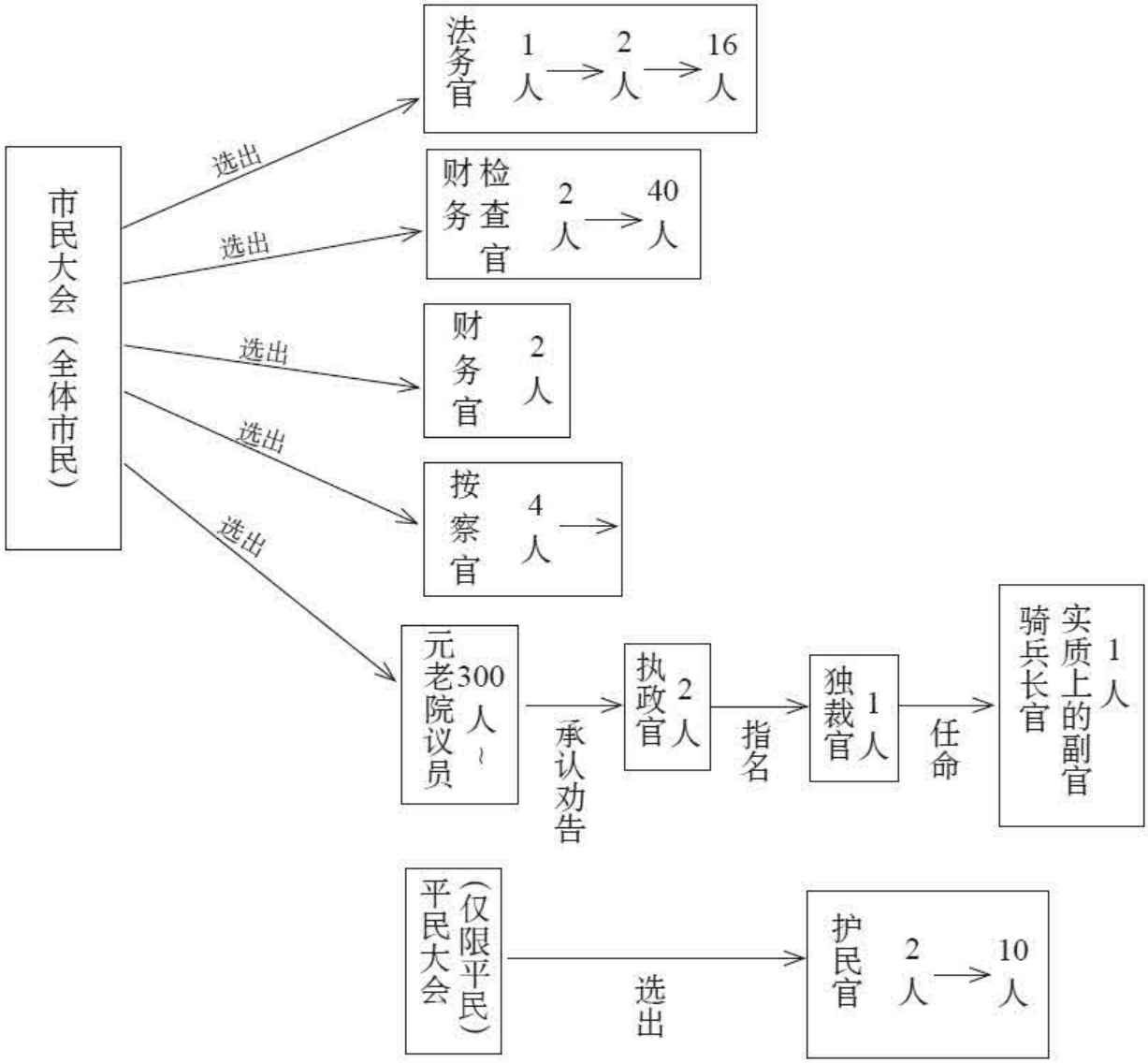
限为40岁。

两位执政官相互有权对对方的想法或做法行使否决权。一项政策，只要两位执政官都不同意，就不能付诸实施。

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是召集市民大会。他们是内政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在战场上担任指挥重任。这一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兼国防大臣兼总参谋长。不，因为需要经常担任实战指挥，所以还要加上前线总指挥。

军务是执政官最重要的工作。罗马的军事力量通常一分为二，由两位执政官分别统领。当敌人很弱小、战斗力不强的时候，一位执政官出征战场，另一位执政官留在罗马保卫首都，同时处理内政。一旦与强敌作战，两位执政官双双率领各自的军团共赴前线。于是，战场上就有了两位指挥官。每当此时，保卫首都的任务就落在了法务官所领导的预备役士兵身上。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政体



尽管战场上有两位指挥官，但是这个时期的罗马并没有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因为，一旦两位执政官各持己见，互不妥协，他们就会任命独裁者，一统指挥权。

但是，战斗并不能够保证在执政官一年的任期内结束。假如在战斗进行之中更换总指挥官，从战术上来说极不可取。

所以，罗马决定必要的时候设置前执政官的官职。这样一来，战斗会在执政官变身的前执政官指挥下继续进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当罗马必须面对三方敌人时，不会出现指挥官空缺的情况。

到了罗马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意大利以外的时代，前执政官指的是被派到各个行省担任总督的人。因为派去的是曾经的执政官，可见罗马对统治行省的重视。远征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是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遣去的，西塞罗作为前执政官被任命前去统治比提尼亚行省。当然，在罗马仍在意大利境内艰苦奋战的时代里，前执政官始终只是在执政官任务过重时才增设的一个官职而已。

刀斧手

由于执政官继承了王政时代由国王掌握的权威和权力，因此保留了王政时代国王的“开路先锋”，执政官也继承了让手执束棒斧子的12个刀斧手做开道先锋的权力。这些刀斧手与其说是近卫士兵，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执政官走到哪里，12个刀斧手就要跟到哪里。所以在路上遇见刀斧手做“开道先锋”的执政官时，大概会有人像波利比乌斯一样，忍不住问道：罗马是王政体制吗？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国家战略官”没有这种习惯。

像这样，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执政官拥有极高的尊严和权力。现在的“领事”一词，词源就出于“执政官”一词，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独裁官（**Dictator**）

与执政官不同，在今天，独裁官是只用于贬义的一个词的词源。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它是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任命的一个官职，意思是临时独裁执政官。与其他官职通过选举产生不同，独裁官由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人指定即可。

独裁官除了无权决定改变政体之外，在任何问题上享有绝对的决定权。对于独裁官作出的决定，任何人无权反对。独裁官的任期很短，为6个月。人数当然只有一人。因为他有权当机立断，决定因实施共和政体而出现滞后的决策，所以领命担任独裁官的人通常具备与执政官不相上下的水平和能力，而且经验丰富。

独裁官有权任命“骑兵长官”，相当于副官。两位执政官在任命独裁官的同时必须接受独裁官的命令。就像副官的名称叫骑兵长官一样，独裁官的任命通常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当然，和平时期任命独裁官的情况也有。例如，因为瘟疫大流行，首都的功能处于瘫痪的时候，或者是必须尽早恢复秩序的时候，等等。

寡头政体也是个指挥者众多的体系，虽然没有民主政体那样多。这

种政体的缺陷是面临紧急事态必须当机立断时，往往缺乏灵活性。独裁官制度恰恰掩盖了这一缺陷。可以说，这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危机的管理体系。马基雅弗利说："如果要保住一种政体，必要时，必须有勇气做出有违这一政体理念的事。"如果不这样，将会招致该政体的瓦解。所以，只有共和政体才会有独裁官这一官职。

既然是危机管理体系，罗马当然不会随便任命独裁官。从共和政体实行之初的公元前509年至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的119年里，据我们所知，只任命过7位独裁官。卡米路斯曾经担任5次独裁官，就像普鲁塔克说的那样，他的经历充分显示了公元前390年前后罗马所处的深刻危机和混乱。

一旦任命了独裁官，本来由两位执政官共同执掌的最高权力，在6个月内就由独裁官一人独占。共和政体下罗马独裁官，允许有24个刀斧手做他的开道先锋，是执政官的开道先锋的两倍。

随着共和政体末期的邻近，独裁官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苏拉和恺撒成了终身独裁官。如此一来，独裁官就变成了独裁者。

法务官（**Praetor**）

法务官的任期为一年，最初由一个人担任，后来成倍增加，最后达到16人。增加人数的不只是法务官，除了执政官，几乎所有官职都有这种倾向。因为随着罗马领地的扩大，官职当然也要相应地增加。

既然翻译成了法务官，负责的自然是司法事务。最初，当执政官上前线时，法务官负责管理后方，后来慢慢变身为司法责任人。这与罗马作为法治国家不断完善的过程一致。

身处该官职的人很多时候也要上战场。要求法务官年龄在40岁以上，也是基于一旦需要就可以代替执政官指挥军队的考虑。此外，执政

官不在时，法务官要担任议长，召集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市民大会。

财务检察官（**Quaestor**）

在日本，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财务官。但是，我把另一个官职翻译成了财务官，所以根据这个官职所从事的工作，我想翻译成财务检察官应该更贴切。

财务检察官的人数最初是2个人，到了共和政体末期增加到了40个人。任期一年，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上。

财务检察官的任务中，有一项是负责前线的财务，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在罗马攻打汉尼拔之前，老加图来到罗马军营地，因提出军费过于浪费而遭到罗马军总司令西庇阿的冷嘲热讽。他当时的官职就是财务检察官。

那一年，加图实际上才30岁，“老”是后来加上去的。时年31岁的西庇阿因为汉尼拔战争的胜利而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当时他这样回答一心要忠实完成任务的财务检察官：

“对于冲锋陷阵的人来说，财务检察官除了会指手画脚，毫无用处。我们为国家所担负的不是金钱责任，而是行为责任。”

可见，这个官职上的人如果不够强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让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不惧权威、能压得住人的年长者担任应该更合适。但是在罗马正好相反。因为对财务检察官的年龄要求是30岁以上，所以作为有志于政治生命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通向政坛的一条捷径。让他们年纪轻轻就学会吹毛求疵，掌握吹毛求疵的方法，这的确很有意思。

财务官（**Censor**）

这一官职最初是为人口调查而设，因此在共和政体的初期，不是每

年，而是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时才会选举。任期一年半以上，这与其他官职通常为一年有所不同。财务官人数是两人，年龄要求不明。考虑到这个官职所拥有的强大权力，即仅次于执政官的权力，想必当选的人一定是超过40岁的、成熟稳重的人。

在罗马进行人口调查，不是调查总人口，而是调查户主们的财政状况。对于未如实申报财政状况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其他什么人，财务官都有权告发。之所以说他们权力很大，原因就在于此。

除此之外，从国有土地的使用到国库的收支，都由他们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他们还有权决定公路及上下水道建设的开支，所以，说他们是国家财政的责任人未尝不可。大概和现在的大藏省（财政部。——译者注）差不多吧。掌握金钱收支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这也许是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现象吧。

按察官（**Aedilis**）

在日本，按察官的译法已经固定下来。但是我不太明白“按察”这一词的意思，查了词典才明白，好像是“监督”的意思。不过，按察官这一官职所负责的领域更多、更广。

在所有官职中，只有这一官职从设立之初就明确了当选者所属的出身阶级——贵族和平民平分秋色，各选两个人，大概是担任这一官职的人需要直接且经常接触市民的缘故。任期一年，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上。按察官和财务检察官一样，是年轻人也有机会担任的官职。

按察官的任务第一是策划组织庆祝和祭祀活动，其中包括举办运动会的工作。

第二是与公安警察相关的工作。

第三是保障粮食的供给。由于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所以按察官负责

的是首都罗马的粮食供给。

第四是负责道路维修、交通整顿和上下水道管理。

第五是对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罚款金额的决定以作为惩戒。

第六是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以保障市场的公平运行。在共和政体临近末期时，还担任向无产者无偿配送小麦的工作。因此，该官职又是担任有名的“面包娱乐”双重事务的官职。

如此看来，该官职似乎是一个权威不高、涉及领域繁多、事务忙碌且报酬微薄的官职。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由于这一官职所负责的领域大多和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就争取民众支持而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位。当时，在那些对政治前途心存野心的人中，自筹经费组织民众所喜爱的活动的人不在少数。

护民官（**Tribunus Plebis**）

关于护民官，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日语中，“护民官”的译法非常漂亮。意如其名，护民官是代表平民阶级的一个官职。因此，非平民阶级出身的人无缘这个官职。因为市民大会除了平民，贵族也有权参加，所以当选该官职的人不在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而是在平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平民大会只有平民阶级出身的人才有权参加。护民官的任期为一年，对年龄没有限制。在古代，16岁就算成人。但是，只有30岁以上的男人才被认为可以独当一面。所以，当选直译为“平民司令官”的护民官的人年龄一定与该官职相符。

护民官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保护平民的权利，因此，他们有权对政府所作出的决定行使否决权。但在战时不得使用这种权力。

因利害冲突，护民官有可能遭到某些行事过激的贵族的暗算。所以，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护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特别权利。这

一权利连执政官都不享受。

因为护民官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官职，所以它的职责并非是领导平民与贵族作斗争，而是促进贵族和平民间的沟通。护民官往往身处权力斗争之中，原因就在于此。护民官任期结束后，通常转为元老院议员，享有元老院的议席。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以后，罗马虽然在形式上选择了一党独裁的方式，而非两大政党交替的方式，但是内部人员则不断进行更替。

护民官的人数最初是2个人，后来不断增加，最后达到10人之多。

元老院（**Senatus**）

今天的罗马，街头巷尾依然可以看到SPQR这四个字母。“此处禁扔垃圾”之类的罗马市政告示用这四个字母开头，井盖上也刻有这四个字母。

SPQR取自Senatus、Populus、Que、Romanus这四个词的词首，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虽然现代罗马不再有元老院，但是，不知是否因为想把罗马市议会看做古罗马元老院的遗存，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过了1500年，这四个字母依然被广泛使用。

既然表示做SPQR，也就意味着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是与这一城邦国家的核心群体——罗马市民——平起平坐的。这样看来，古罗马元老院的地位是无法与现代罗马的市议会相比的。

元老院在古罗马销声匿迹之后，被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继承。即使在普遍采用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现代，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两院中的上院（或参议院。——译者注）都是把拉丁语senatus翻译成本国语言后来称呼的。

日语中，没有把现代的senatus翻译成“元老院”，而是译成了“上

院”。这个翻译非常贴切。因为议会制民主政体下的两院制中的“上院”与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和威尼斯共和国寡头政体中的“元老院”，虽然词源同为拉丁语，但是内涵完全不同。元老院既不同于英国的贵族院，也不同于日本的参议院。

日语中，把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senatus翻译成“元老院”，我有一点困惑。因为元老院的称呼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许多功成名就的老人齐聚一堂，对年轻人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在日本，一说元老院，只会让人浮想起西园寺或山县之类的某个人。在现代，即使勉强去找，充其量只能找到当选过首相的人。

古罗马的元老院与议会制民主政体国家的两院之中的上院有所不同，与由引退后的长老们组成的团体也不同。它是一院政体国家的元老院，机构内的都是现任官员。因为，过了30岁，就可以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了。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最忠实地继承了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元老院。当然有两点除外：

第一个不同点是，除了经济和文化活动，威尼斯出乎意料地闭关自守。这一点与古代雅典很相似。

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议员非威尼斯贵族出身不能参选。行省的贵族也好，本国的平民也好，都无权享有元老院议席。该国的元老院议员构成最真切地反映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纯血统主义倾向。

在这一点上，罗马完全相反。在罗马，元老院的组成是开放的。

其他部族的有势力者带着被保护民（clientes）大举移居罗马后，很快就能够得到元老院的议席。罗马还主动邀请战败国的统治阶级加入罗马元老院。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实施以后，平民出身的人只要

担任过官职，元老院的门也向他敞开。所以，直到昨天还在与元老院针锋相对的平民代表护民官，今天一卸任，就可以在元老院和大家友好地坐在一起。

在元老院举行演讲时，要说："各位元老院议员！"这个称呼是意译，直译则是："建国之父以及各位新加入者！"

威尼斯元老院和罗马元老院的第二点不同是前者要通过选举，后者却不需要。

在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废除了市民大会，事实上的国会由成年后的贵族构成。元老院议员由国会选出，任期一年。

在罗马，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一直存在。除了护民官，以执政官为首的政府要职全部由该"国会"选举产生。

只有元老院议员不需要经过选举，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只要过了30岁就可以自动得到议席。正因为如此，它不是世袭的。只有经过相当严格的甄别，确认其见识、责任心、能力和经验都符合的人才允许进入元老院。当然，出身罗马名门贵族的人，相对多一些优势。但是，就像"新进者"这一演讲使用的称呼语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向新进者开放的机构。

因为不需要经过选举，所以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这不能不使人心生不安，担心元老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倚老卖老或者思想僵化的问题。但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当时，一个人一旦生病，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很快就会死去。同时战事像家常便饭一样，使雅努斯神殿之门总是大敞着。所以，元老院议员的构成经常会有适度的调整。

罗马元老院和威尼斯元老院一样，一直都是寡头政体下的共和体罗

马的心脏。

以执政官及独裁官为首的罗马要人几乎都出自元老院。任期一到，他们都会回到元老院。当时，两位执政官因为战事同时离开罗马几乎是罗马的常态，在此期间，从内政到外政、军事等所有方面，作决策的是元老院，作为领头人，带领罗马前进的也是元老院。当然，元老院没有依法制定政策的权力，他们只有提出建议、忠告、劝告的权力。

制造并向各部分输送血液的心脏要向头部及四肢发出“建议”，所以它是事实上的议决者。就算有人反对，毕竟有前护民官在这一机构中。而且，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元老院从不掉以轻心。一旦反对声强烈，正面冲突有可能对自己不利时，元老院会暂时退让一步。

罗马人的灵活性远远超过生意人威尼斯人。在罗马，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当选财务官，就会做好财务官的工作。没有人会认为曾居高位的人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是丢脸的事。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军队都是如此。

这就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如果说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那么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只是这样的机构只能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寡头政体国家中才能发挥出作用。像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政体国家，像现代众多国家那样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机构几乎难以生存。如果一定要让它存在，那么只有采用表面上为民主政体实质却是寡头政体的方式。

所谓寡头政体，不是主权在民。如果是主权在民，民众就必须有选择的自由权，因此才会有两大政党共存的方式。在少数优秀的人才领导大多数民众的寡头政体下，不可能出现政权的交替。

其实，罗马元老院充分发挥了心脏的作用，现在，它的功绩已经成为西洋史的常识。作为上院的名称，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

愿意留下“senatus”的称谓。就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指出的那样，罗马在健全的元老院开始发挥作用以后，彻底摆脱了迷惘，勇敢地走上了繁荣之路。无疑人人都会对此心生羡慕。

公元前509年，随着罗马进入共和政体，元老院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以后，罗马元老院开始向体制内输送更多的新鲜血液，直到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实施其改革。

恺撒改革是在公元前1世纪。由于形势发生了改变，元老院已经失去了心脏的作用。在元老院议事厅，元老院议员杀死恺撒一事颇具象征意义。发生在许久之后的这一事件，表明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担负着何等重要的使命。

“政治建筑的杰作”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挣脱已有观念的束缚，提高自己，然后再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罗马人的性格。

这不是说失败是好事。失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失败只是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站起来，也就是怎样对待失败。

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给了罗马人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

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分裂是何等的愚蠢。正因为罗马有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才会造成被蛮族凯尔特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直到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后，罗马才成功消除了派系之争。这一政治改革从一开始，贵族就向平民阶级作了巨大的让步，到了公元前300年，国内政坛的所有要职，包括祭祀的职位，全部向平民阶级开放，贵族全面接纳了平民，贵族和平民之间曾经的对立关系消除

了。结果很快显现出来，罗马得以确立新的体制，可以整合全体罗马人所有的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的国力。

希腊人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的第一要素在于罗马确立了它特有的统治体系。对于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他写道：“以此为界，罗马开始了它的兴盛。”

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终究是一次内政改革。对外的政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惨遭凯尔特人入侵的罗马人没有忘记要把从中学到的教训变成现实。

这方面的改革反映出对与他国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2300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政治建筑的杰作”。

在王政时代，罗马已经和邻近各部族建立起同盟关系。尽管部族不同，但是，他们使用同样的拉丁语，信仰同样的宗教，风俗也很接近，所以统称为拉丁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同盟就叫“拉丁同盟”。

初期的拉丁同盟，主要是一起祭祀共同信仰的诸神。他们一年一度汇集在阿尔巴诺山上，在朱庇特神殿举行祭祀活动；模仿希腊奥林匹克举办比赛，组织体育活动几乎是唯一的共同行为。

后来在罗马七个山丘之一的阿文庭山上建起了供奉狩猎女神黛安娜的神殿。黛安娜女神也是拉丁民族共同的神，其重要性仅次于朱庇特神。该神殿的建立加强了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主导色彩。因为在祭祀女神的日子里，拉丁同盟的各加盟部族，都要带着妻儿老小来到罗马，参加祭祀活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行动成为了拉丁同盟的共同行动。

尽管罗马的主导色彩加强了，但是，在当时，由于罗马的力量还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拉丁同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是对等的，同盟

关系并不牢固，同盟国之间也常有战事发生。公元前509年罗马转为共和政体后，这些同盟国纷纷背离罗马，显示了当时的拉丁同盟凝聚力之脆弱。站在同盟各国的立场上来看，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同盟对象不是罗马，而是统治罗马的国王。罗马废除王政意味着解除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有了这一前车之鉴，罗马在稳固了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494年着手重建拉丁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从宗教祭祀变成了军事行动。在同盟协议上，明确规定要建立共同的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同盟军中，罗马军队占一半，其他各同盟国的军队占一半。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罗马一国的领土甚至超过了拉丁同盟各国领土总和的三分之一。同盟军的构成也反映了拉丁民族当时的力量分布状况。

同盟军总指挥由罗马人担任，这也是因为罗马人的军事能力强于其他各部族，胜率较高。对此，同盟各国没有任何异议，他们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除了这一点，拉丁同盟的利益分配完全平等。

每次打了胜仗后，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和俘虏等战利品一分为二，一半给罗马，另一半给其他同盟各国。

加入拉丁同盟的部族之间，市民权、结婚权及通商权完全平等。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移居到其他部族统治的地方，享有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当时，虽然罗马军队没有重大胜利，但是也没有经历大的失败。所以，即使不从长远去看，与罗马建立共同战线，对于其他拉丁人来说，利大于弊。同盟各国一年一度在菲里蒂纳的森林开会商议，对于在此作出的决定，各国必须忠实遵守。

罗马遵守同盟协议是因为罗马有相应的利益在其中。当时的罗马，提供六七千兵力已经倍感艰难。但是，由于同盟国的加入，军队规模得以成倍增加，同盟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当然，这一时期的拉丁同盟也有弱点。一旦主导国罗马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他同盟国就会看不到与罗马统一行动的好处，很容易背离罗马而去。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使这一弱点暴露无遗。

这是一件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希腊人都知道的大事，甚至是连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亚里士多德都要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大事件。这一惨剧严重打击了邻近罗马的同盟各国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罗马命运之上的信心。结果，不只是一个国家背离了罗马，而是像雪崩一样，同盟各国纷纷离罗马而去。他们不仅抛弃罗马，甚至起了乘机瓜分罗马之心。为此罗马不得不用20年的时间来击退他们。尽管有卡米路斯这样的优秀将领，但是要确保边境安全，依然花费了20年的时光。

罗马对此极度失望。于是，在公元前338年，罗马着手进行对外关系的彻底改革。

解除形同虚设的“拉丁同盟”，重建新同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提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过于不自量力。

重建后的同盟体不再叫“拉丁同盟”，应该说，“罗马联盟”的称呼更符合它的性质。

毫无疑问，罗马人是保守的。但是，即便对保守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该改的要改，不需要改的就不改吗？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改变了对外关系形态后的罗马人，没有改变公元前8世纪罗穆路斯以来的罗马人的一个特点，即同化失败者。《列传》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强大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这种性格。但是，它为什么会与汤因比评价的“政治建筑的杰作”相联系呢？

罗马联盟

人类社会中，能早早预见到遥远的未来、据此确立下所谓的百年大计、并把相应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人少之又少。正因为少，我们才称他们为天才。除了天才，普通人只会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但是，因此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人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付诸实施，结果这个计划竟成了百年之计；另一种人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结果也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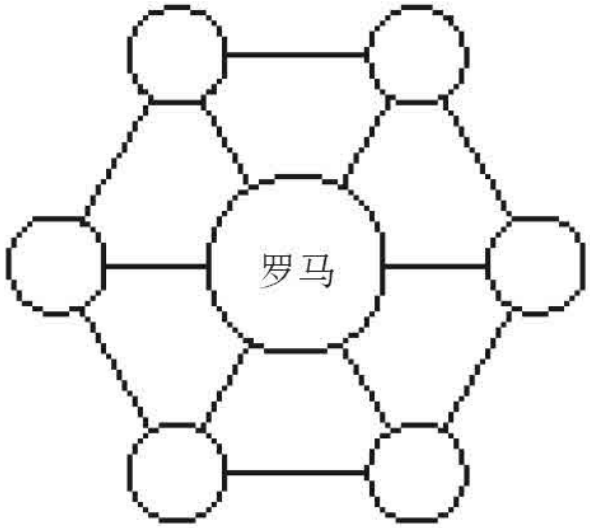
问题看似都是偶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后者的偶然的确是偶然，而前者的偶然却是必然。历史上的偶然成为历史必然都应该归因于人的作为。在后世的我们看来，被认为是历史必然的事件，在当时几乎都是偶然。把这种偶然变为必然，很多时候都在人。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人。

对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罗马人来说，眼前的问题是防止再次出现同盟各国众叛亲离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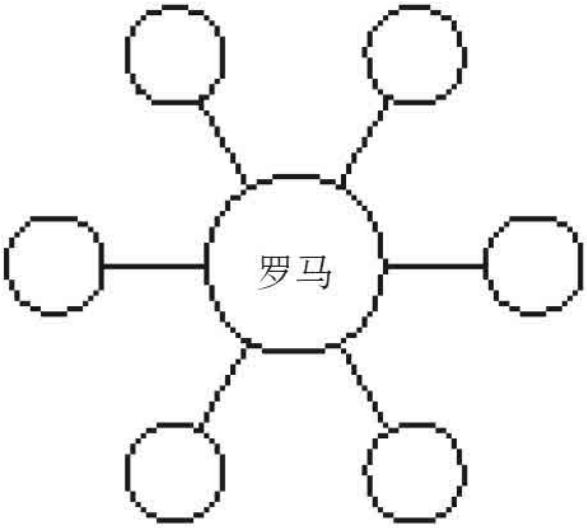
所谓同盟，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采取统一行动的联合体。加盟各国，包括主导国罗马，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样单纯的联合体中，某个加盟国和罗马的关系与该国和其他加盟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当罗马强大时，他们和罗马联盟，一旦罗马出现衰退的迹象，他们就纷纷背离罗马而去。

因此，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的罗马人把同盟国的关系限制在该国和罗马之间。我想，可以用如下图示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拉丁同盟



罗马联盟



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协议中规定，加盟国只许和罗马缔结协议，不许在其他加盟国之间缔结协议。加盟国之间出现问题，也不允许在当事国之间解决，必须由罗马仲裁解决。

罗马之所以可以单方面要求采用这一模式，是因为罗马是胜者，其他国家都是败者。罗马联盟的确把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失败者。但是，对失败者来说，在通行没收财产，逼战败国人民为奴的时代里，说罗马人的这种要求极其宽容一点也不为过。其实罗马人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宽容。不必引用普鲁塔克的话，我们也能想到，罗马人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性格而已。

在拉丁同盟中，同盟成员只有罗马和其他加盟国两类。但是，在罗马联盟中，成员国却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联盟之主罗马。在罗马，只要是自由民，不分贵族和平民，一律享有罗马市民权。因此，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这是享有自由的市民的义务，同时也是直接税的纳税形式。当然，他们同时享有投票

权和罗马公职的被选举权，以及参与国政的权利。

第二类是旧拉丁同盟的加盟各国。他们是公元前390年一度背离罗马、又被重振之后的罗马再度打败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与罗马相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罗马毫不吝啬地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的罗马市民权。

应该说这是吞并，只是这种吞并建立在与胜者罗马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们中甚至有人还当选过罗马执政官。

第三类是拉丁语叫“自治城市”的各国。词源为拉丁语的这一意大利语，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地方自治体或市镇。对于这些国家，罗马给了他们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

所谓“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就是他们不享有罗马国政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此之外，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这些人被要求学习拉丁语，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的人。他们是所谓的准罗马市民军。事实上，只要经过三年，一般都可以得到罗马市民权。

因此，这一类无投票权的市民与罗马市民通婚也是自由的。罗马法律规定的私有财产权也有保证，而且承认国内自治。

第四类是科洛尼亚，我们把它翻译为“殖民地”。科洛尼亚和略早些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不同。罗马人建立殖民地不是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政治上的理由。当然，罗马人也不像希腊人，因本国人满为患，无处容身的人们自作主张去一个地方建起殖民城市，与本土的关系只是通商或文化交流。

只有被认为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地方，罗马市民团才会开展殖民建设。由于他们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所以，有义务承担罗马军务。在

殖民地的罗马人承担军务，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居住的地方。就这样，在每一个战略要地，罗马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建造用作要塞的新城。

除了罗马市民，也有“罗马联盟”其他加盟国的人建设殖民地。前者叫“罗马殖民地”，后者叫“拉丁殖民地”。它们只是殖民者不同，殖民地建设的目的相同。对罗马人来说，建设殖民地就是建“要塞”，所以不太可能交给他们信不过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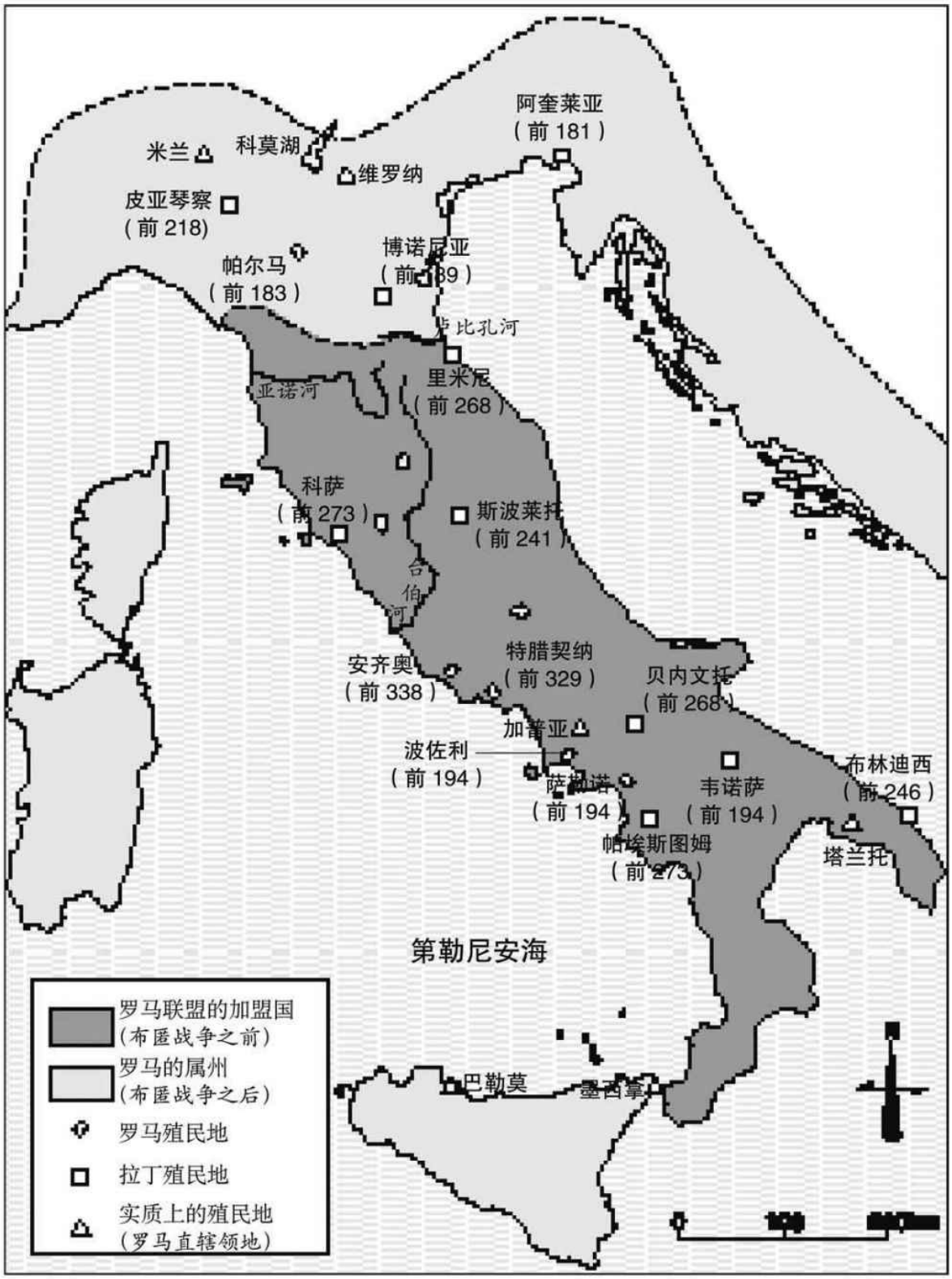
第五类是历史上统称“同盟国”的各个国家。当然，同盟国是后世的人们叫的,在当时，罗马人称他们为“同盟市”。“同盟市”就这样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现在的意思是共同经营者。

同盟市和其他同盟国有所不同。虽然都是罗马的战败国，但是，旧拉丁同盟的加盟国是公元前390年之后的战败者，同盟市则要晚得多，是指公元前350年以后被罗马打败的各国。因此，同盟市和罗马的关系比较浅。

罗马承认同盟市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尤其是使用希腊语的人，更不要求他们学习拉丁语。

因为在当时，与拉丁语相比，希腊语更加完善。罗马人即使在称霸地中海世界后，依然毫不介意地使用双语。

罗马人不要求同盟市（同盟国）以贡金或年贡的形式缴纳税金。罗马对同盟各国的要求只是提供兵力。当然，在士兵自备武装为常识的当时，提供兵力相当于提供维持兵力的费用。


阿奎莱亚
（前 181）
米兰
科莫湖
维罗纳
皮亚琴察
（前 218）
帕尔马
（前 183）
博诺尼亚
（前 189）
卢比孔河
里米尼
（前 268）
亚诺河
科萨
（前 273）
斯波莱托
（前 241）
台伯河
特腊契纳
（前 329）
安齐奥
（前 338）
贝内文托
（前 268）
加普亚
波佐利
（前 194）
萨莱诺
（前 194）
韦诺萨
（前 194）
布林迪西
（前 246）
帕埃斯图姆
（前 273）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罗马联盟的加盟国
（布匿战争之前）
罗马的属州
（布匿战争之后）
罗马殖民地
拉丁殖民地
实质上的殖民地
（罗马直辖领地）
巴勒莫
墨西拿

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前，罗马建立的殖民地和建立年份

不管怎么说，这些原战败国、现为同盟国的同盟市没有被要求提供维持罗马联军所需的费用，但是，作为同盟国居民，有义务提供兵源和罗马士兵一同作战。可以认为这一要求是出于对个人名誉的尊重，而不是为了金钱。自然，同盟各国也这样认为。但是，因为是同盟市，所以他们不享受只有承担完全义务的人才有的罗马市民权。罗马联盟军队的核心始终是罗马市民，来自同盟各国的参战者是协同军。

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时候，这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同盟市的国内自治是得到认可的，所以即使不去遥远的罗马参加投票，不行使对罗马国政的发言权，他们的人权和财产也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得到保护。罗马人为了保证这些非市民的权利，还制定了日语译作《万民法》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外国人法”。

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那不勒斯为首的罗马联盟第五类各国被逐一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其中大部分是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

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确立的罗马联盟的实体。罗马选择了其他国家不存在的政治策略。他们没有把失败者贬为奴隶，而是让失败者成为“共同经营者”。流传后世的有名的“分而治之”的思想就产生于此。

因为罗马以外的四类国家不是以罗马为中心，像树木年轮那样从里到外按自治城市、科洛尼亚、同盟市的顺序依次划分的。这四类同盟国相互混杂在一起。罗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同盟各国将不可能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罗马。特别是散落在战略要地的殖民地，起到了阻碍同盟各国采取共同行动的作用。

这种混杂的方式优点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来自罗马的指令传递迟缓，军队行动不够敏捷。为了解决这一缺陷，这一时期的罗马开始了有计划的道路建设。

道路建设

道路是国家的“动脉”，在今天，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在2300年前的古代，只有罗马人了解这一点。

只要有人聚居，就一定要修通道路。在罗马建国之初的公元前8世纪前半叶，路已经出现了。其中一条路是为了运输盐而铺设的，所以叫盐路（萨拉里亚大道）；还有一条路与罗马人的祖籍拉蒂纳相连，叫拉蒂纳大道，意思是通向拉蒂纳的路。

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道路建设状况为之一变。以公元前312年阿皮亚大道开通之时为界，新建的道路不再是纯粹的行政道路，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也就是政治、军事、行政的综合考虑。

罗马人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新铺设的道路不再使用终点的地名来命名，开始习惯使用道路提议者的名字来命名。按照之前的做法，用道路终点的地名来命名的话，一旦需要延伸这条路，原有的路名就不合适了。但是，如果用提议者的名字命名，如，阿皮亚要求铺设的路就叫阿皮亚大道，弗拉米尼乌斯要求铺设的路就叫弗拉米尼乌斯大道，自然延伸自如。

公元前312年，财务官阿皮亚提议铺设的阿皮亚大道从罗马出发，通向刚刚纳入罗马势力范围的加普亚。随着罗马势力范围的扩张，这条道路不断向外延伸，最后到达意大利最南端的布林迪西，成为罗马的干线道路。

继阿皮亚大道之后，罗马人又铺设了弗拉米尼亚大道、卡萨亚大道、罗马古道等。随着罗马势力范围向四面八方扩张，连接罗马和各地战略要冲的公路网也不断延伸。甚至产生一句熟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横跨欧、亚、非的罗马的道路就发端于这一时期开始的有意识的修建。以这一时期为界，罗马的道路在政治战略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人们称这些为军用道路，但是，我很想用政治道路来称谓它们。

在铺设这类道路之前，这些地方并非没有路。至少行人、马匹通行的路基本上已经有了。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尽最大可能把它们修直，同时拓宽路面、架设桥梁、开挖隧道、改善排水，使其变成坦途，也就是变身为“高速公路”。为了使罗马联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高速公路”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动脉。

帕拉里亚大道（盐路）：罗马→阿斯科利皮切诺（公元前 312 年以前）
拉蒂纳大道：罗马→拉蒂纳地区（公元前 312 年以前）
阿皮亚大道：罗马→加普亚（公元前 312 年）
瓦勒利亚大道：蒂沃利→科菲尼昂（公元前 307 年前后）
阿皮亚大道：加普亚→韦诺萨（公元前 285 年前后）
凯西利亚大道：克勒斯→卡斯特卢姆诺姆
（公元前 283 年前后）
旧罗马古道：罗马→科萨（公元前 241 年前后）
米露琪亚大道：贝内文托→布林迪西（公元前 225 年前后）
艾米利亚大道：里米尼→皮亚琴察（公元前 187 年）
卡萨亚大道：罗马→阿雷佐（公元前 154 年前后）
卡尼亚大道：博诺尼亚→阿奎莱亚（公元前 153 年前后）
波斯图米亚大道：热那亚→经由维罗纳→阿奎莱亚（公元前 148 年）
波比利亚大道：里米尼→亚鲁帝努（公元前 132 年）
阿尼娅大道：加普亚→雷焦卡拉布里亚（公元前 131 年）
新罗马古道：科萨→波普罗尼亚（公元前 119 年前后）
艾米利亚斯考利大道：波普罗尼亚→热那亚（公元前 107 年）

公元前100年前铺设的罗马公路

出身于罗马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的阿庇乌斯修建了阿皮亚大道，铺设了第一条具有罗马式意义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开始了真正的上下水道建设工程。

他考虑通过完善道路和上下水道，使人口一味增长的首都罗马成为宜居的城市。同时代的希腊旅行家写过这样一句话："希腊人热衷于建神殿，罗马人关注于完善公共设施。"

上下水道姑且不论，至于道路，一定是把双刃剑。对于己方来说，方便了相互间的联络和交通，但同时，也给敌方收集情报以及进兵提供了方便。实际上，数十年后的皮洛士、一百年后的汉尼拔就是沿着罗马人铺设的道路一路攻来的。当时的情形着实让罗马人吃惊不小，甚至感觉心跳都要停了。所以，以防御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无论是否具备道路建设的技术，都不会热衷于建造平坦而畅通的道路。古代的伊特鲁里亚民族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沿着笔直的一望无际的阿皮亚大道走去，宛如古代罗马人典型的外向型性格就在眼前。正因为铺设的道路对敌人来说也很方便，所以，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罗马人似乎将会无休止地进行自卫战争。

不过话说回来，从宗教、政治体系、对外关系到道路，罗马人不就是一个真正的开放民族吗？

雅典、斯巴达、伊特鲁里亚和罗马都起源于城邦国家，自由市民是国家的栋梁。但是，雅典、斯巴达和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始终止步于城邦国家，只有罗马，尽管起源于城邦国家，却超越了城邦国家。他们成长的轨迹就体现在他们对市民权独特的构想之中。

市民权

英语中的citizenship源自拉丁语中的civitas，英日词典是这样翻译的：

市民、国民身份、公民权、市民权、国籍。

查意日词典，要查cittadinanza，日文的翻译是：

市民权、国籍、公民地位乃至身份。所以，应该一样。

但是，翻看日语词典，里面对市民权的解释则是：

作为市民的权利、公民权、人权、民权。

作为市民，其行动、思想、财产的自由受政府保护，享有所在国、地方自治体的参政权利。

于是，市民的解释应该是：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城市的居民。在西欧，指享有参政资格和地位的国民、公民。

尽管只是引用词典上的解释，但是，在日本，对市民及市民权的解释还是颇有意思的。

首先，市民权不含国籍的意思。其次，列举了市民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提到义务。也许日本的这种独特现象和宪法第九条不无关系。

要理解古罗马人用授予或不授予市民权来区分的想法，必须在这里明确罗马市民权的含义。为此，除了词典上的解释，根据是否拥有罗马市民权，列举各自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一个方法。

权利

一、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保证一切私有财产。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

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与国政的权利。

三、有依法接受审判的权利。同时，在罗马，被判死刑后，有权向市民大会提出诉讼，也就是上诉权。事实上，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极少被执行死刑。

四、有证据证明是有独立、自由身份的成熟男子。

在罗马，只有拥有市民权，只有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核心——家族一员——才会被承认是成熟的人。

义务

首先，有义务服从军务。17岁至45岁为现役，46岁至60岁为预备役。

这项义务替代了市民另一项义务，即纳税的义务。以间接税为主的古代税制中，直接税用兵役相抵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军务又叫“血税”。

法律并未规定市民不得缴纳税款以逃避军务。只是，对于罗马人来说，这样做太可耻。在罗马，以经济行为纳税的只有不享有市民权因而不承担军务义务的非市民以及经济富裕但没有孩子的女人。

同样，相比较以年贡的形式缴纳直接税，同盟国和行省都认为提供兵力支援更为体面。罗马当然很清楚，如果想要同化征服地，与其希望提供资金援助，不如提供兵力更有利。

从罗马诞生之初，我就一直在讲，“罗马联盟”章节中我也讲过，在

给予外国人本国国民权方面，罗马人是非常大度的。原因在于，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有罗马市民权。因此，雅典及斯巴达的军事力量始终只有以万为单位的兵力，而罗马却可以有以十万为单位的兵力。

在雅典，要取得雅典市民权必须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即使在鼎盛期也是如此。斯巴达也一样。但是，在罗马则不同，只要生活在罗马就可以取得市民权，而且这一情形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在雅典，像亚里士多德，尽管长年生活在雅典，甚至开设学园，为雅典文化的进步尽心尽力，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得到雅典市民权。

对于市民权，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区别也体现在奴隶的处境上。

在希腊，奴隶终身为奴是普遍现象。但是，罗马的奴隶有路可选。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奴隶与家畜作了比较，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 在有用方面，两者几乎没有区别。奴隶和家畜用他们的肉体为我们人类所用，这一方面是一样的。

比亚里士多德早200多年的罗马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说过这样的话，尽管有传言说他本人就是奴隶出身：

> 奴隶和自由民的不同不是先天造成的，而是生来遭遇的命运不同而已。

在罗马，奴隶主为了回报奴隶长年的无偿奉献会还奴隶以自由，或者奴隶能够用自己积攒起来的钱赎回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叫解放奴隶，他们的子孙可以取得罗马市民权。至于有了市民权后，能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看个人的才能和运气了。相反，在雅典，甚至在伯里克

利朝代，由于再婚对象不是雅典人，生下来的儿子就不享有雅典市民权。只有依靠破例才有可能取得雅典的市民权。

对于市民权，罗马人的开放性同时体现在他们承认双重市民权，也就是双重国籍。在那个时期，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中，如果有人希望获得罗马的市民权，这是完全可以的。不仅如此，这个人不必为了罗马市民权而放弃自己所属地的市民权。这种双重的市民权制度是罗马特有的，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制度。

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国的罗穆路斯召集的百人长老会是罗马元老院的开始。这100个人率领的家族被认为是罗马贵族的开始。

500年后，贵族的人数减少到了五分之一。原因或是家族消亡，或是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但是，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增加到了300人。也就是说，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政体的心脏，在其精英中自罗马建国以来的名门望族的比例减少到了十五分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罗马无法避免绵延不断的战争，作为领导阶级的贵族作出比其他人更大的牺牲。

尽管如此，属于罗马统治阶级的男性整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原因是政府要职和元老院议席都向平民开放，所以经常会有新鲜血液进入。毕竟，进入统治阶层的最基本条件是必须享有罗马市民权。

在随后就要讲到的与萨莫奈人长达40年的战争中，在与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国家长达10年的战争中，罗马市民流血不止。这一情形，之后也不曾改变。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坎尼会战中，罗马被汉尼拔打得一败涂地。6000名罗马骑兵只剩下370骑，8万罗马步兵只剩下3000名士兵。尽管如此，罗马还是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罗马人时刻不忘随时补充新鲜血液的结果。

我想，这就是希腊、埃及、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都认识到的罗马人

的“哲学”。

但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除了罗马人，还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补充新鲜血液的好处，并试图积极推广。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罗马对内对外都刚刚确立以重建为目标的体制。所幸的是这个人的视线落在东方而不是罗马所在的西方。对罗马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神助。

“想不到的路”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进攻东方，而是把目标锁定西方，又会怎样呢？

提图斯·李维曾经编写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罗马史》。他根据希腊人留下的史料，介绍了这样的一段历史。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过三次战争，叫布匿战争。这是发生在第二次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扎马战役，即双方决出胜负之后的事情，所以时间应该是刚进入公元前2世纪。扎马战役失利后，逃到东方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战胜他的罗马将军西庇阿偶然在埃菲索斯相遇了。由于二人曾经在扎马战役前夜有过一次会谈，后来作为双方的和谈代表，参与了和谈，所以他们自然互相认识。这二人在战场上互为敌人，但在战场之外，互相很欣赏对方的才能。所以，西庇阿向比自己年长的汉尼拔表示了敬意，言谈也很礼貌。

“您认为当今时代最优秀的将军是哪位？”

汉尼拔当即回答道：

“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不仅以寡敌众，击败波斯大军，而且一直打到遥远的地方，那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地界。只能用伟大来评价他了。”

西庇阿又问：

“那么，第二优秀的将军又是谁呢？”

汉尼拔再次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作为战术家他最优秀，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懂得建宿营地的重要性。”

西庇阿接着问：

“那么，您认为第三优秀的将军是谁？”

迦太基名将这次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西庇阿的问题：

“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因有功于扎马战役的胜利而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的西庇阿对此微笑着说：

“如果您在扎马战役中赢了我的话，又会怎么样？”

汉尼拔的回答好像很理所当然的样子，他说：

“如果是那样，我的排名会在皮洛士之上，也会在亚历山大之前，当之无愧的第一。”

这段对话的趣味性另当别论，发生于公元前3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与其说是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不如说是罗马对汉尼拔的战争更准确。早于汉尼拔60年，位于希腊北部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已经与罗马有过正面交锋，向意大利发动过进攻。汉尼拔列举的当时最优秀的三位将领中，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在战场上与罗马人交过手。

罗马终于摆脱了公元前390年“凯尔特冲击”的阴霾，它在意大利中部确立了其领袖地位的时期与马其顿的伟大统帅在东方纵横捭阖的时期几乎相吻合。

罗马称霸意大利中南部的时间是公元前340年至前326年的14年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远征东方到客死巴比伦的时间是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的11年间。

因此，这个时期，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把他的天才和热情放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话，想象一下，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因为针对其后不断深入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军事力量，当时著名的将领中，未曾与罗马交手的唯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

历史不允许有“如果”，但是这种假设不能不刺激古人的想象力。如果亚历山大的视线瞄准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发展中的罗马发生激烈冲突。其结果会是亚历山大赢吗？抑或是罗马赢呢？

显然，马其顿的风云人物并不是靠抛掷金币来决定目标锁定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攻打东方有其必然性。对于希腊来说，他们的宿敌是波斯。想要维持独立并统一希腊，就必须敲打一下在历史上总是念念不忘染指希腊的波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亚历山大把波斯打得一败涂地后，并没有急于退回西方，而是向更远的东方进军。这对罗马来说，实在是大幸。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与皮洛士和汉尼拔这样的天才将领苦苦鏖战几乎是常事。

在古代，讲述历史同样禁用“如果”，真实发生的事件或者亲耳听到的事情才是历史。“如果”出现在“历史故事”中，这种历史会被认为是野史。因此，古代历史学家没有人会用“如果”来讲述历史，只有李维写下了“想不到的路”：“如果罗马和亚历山大大帝交战的话，罗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李维给出的结论是："即使敌人是亚历山大，最终的胜利想必还是属于罗马。"

历史学家李维生活在公元前后交替时期。在他有生之年，罗马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李维的说法难免会有赞美祖国历史的嫌疑。假如不得不勉强接受他的说法，听听他给出的罗马必胜的理由也很有意思。

李维认为，之所以人们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大帝年纪轻轻，命运尚未出现变化前就已经撒手人寰了。

亚历山大军队的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与此相比，同时代的罗马军中，至少能列出11位优秀指挥官。这是因为罗马指挥官经常变动的关系。

第二，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军规相比，罗马人的军规之严毫不逊色。同样，已经延续了400年的罗马和只用十几年时间建起来的马其顿相比，单从传统出发，士兵的士气也具有不可比拟性。因为士兵的斗志除了有指挥官的激励，他们本身的自信也必不可少。

第三，即使认同亚历山大本人在战略战术上的才能不允许他追随他人，毕竟罗马士兵与大流士士兵、印度士兵不同。因为，罗马人尚未习惯波斯人和印度人那样的奢侈生活。罗马人以质朴刚毅为美德。对手既然如此出色，亚历山大再优秀，也不可能像对付相对弱势民族那样百战百胜。

李维的第四个理由是，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发生战争，将是个人与人才济济的团队之间的对决。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十余年间，最终的胜利终究属于能有效发挥集体作用的团队而非有才能的个人。李维说：

每一个战士有他们各自的命运，或生存或死亡。在罗马，一个

战士的死亡并不会与国家损失直接相连。

李维把第五个理由归结为马其顿军队与罗马步兵军团的性质不同。

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擅长整体进攻和防御。与此相比，作为各中队联合体的罗马重装步兵军团则更富有灵活性，在战术上更善于随机应变。

根据李维的说法，第六个理由是亚历山大是在敌国领土上作战，罗马军却在本国领土内。因此，罗马军显然要比亚历山大军有利得多。尤其是，罗马周围还有加盟罗马联盟的殖民地及同盟国。即便是亚历山大，想必也很难轻易冲破这张紧密相连的同盟大网。

至于李维给出的最后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亚历山大来说，战役的失利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失败。相反，罗马军队的特点是战役的失利与战争的失败毫无关系。

以上是罗马人所列举的罗马的优势。当然，如果罗马真的与亚历山大交手，结果如何大概只有神知道。

不管怎样，亚历山大在美索不达米亚不幸染上热病死了。如果在气候比希腊还暖和的意大利，他完全有可能不会染上热病。如果他选择攻打意大利，说不定亚历山大可以活得更久。

但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把目标指向西方就死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就没有对手了。在亚历山大大帝客死巴比伦的三年前，罗马与统治意大利中南部山岳地带的萨莫奈人之间，已经开始了长达43年的战争。在好不容易征服了这个顽强的山岳民族后，几乎未加休整，又开始与伊庇鲁斯国王——汉尼拔称之为战术上的老师的皮洛士——展开对

决。

与萨莫奈人的战争和与皮洛士的对决，关系到意大利半岛南半部分的霸权。为此，罗马人从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冲击”中再次崛起算起整整用了120年。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所用时间只有10年。这就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不同。罗马人的征服尽管缓慢，却很稳健，虽然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在维持征服地方面却很出色。

山岳民族萨莫奈人

萨莫奈人是一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到南部山岳地带的民族，其都城地址不明。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文明。尽管和阳光普照的那不勒斯处于同一纬度上，但这里很多时候被积雪覆盖，现在依然是意大利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

因为地处山岳地带，所以，萨莫奈人只从事放牧业，与大海基本无缘，他们也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长期以来，罗马与这一山岳民族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但是，当罗马把以加普亚和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坎帕尼亚纳入势力范围以后，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罗马原以为这个对手很容易对付，却出乎意料地费了很大的气力和时间。原因是萨莫奈人的作战方式与罗马人业已习惯的战法截然不同。萨莫奈人善于游击战，但罗马军团的阵势更适合在平原作战。

深知自身优势所在的罗马军试图把敌人引到平原，却屡屡失败，因为萨莫奈人没有打垮罗马的野心。于是，罗马军不得不深入到山岳地带。

战时的萨莫奈人采用的战术最适合山岳地带，他们不编组大队，以小分队为单位神出鬼没。袭扰罗马军就是他们的战术。

因为在山区，所以只有正面作战才能充分发挥优势的罗马骑兵队和重装步兵队威力大减。而且，萨莫奈士兵的斗志与当时公认为意大利第一的罗马士兵相比丝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开始向意大利南部渗透的罗马人绝对不会因为他们是蛰居山区的民族而置之不理。

由于战场就在萨莫奈人的“门前”，所以，他们比罗马人更熟悉战场所在的山岳地带的地形。之所以凭借绝对优势发起进攻的罗马军团在第一战中就遭受重创，原因就在于萨莫奈士兵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一优势。

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战争开始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21年，南下与萨莫奈人作战的罗马军得到一个消息，说萨莫奈全军正在向普利亚集中。率领罗马军团的两位执政官对此确信无疑，他们认为这下可以在平原全歼敌人了，于是下令全军向西挺进。

不料，这是个假情报。萨莫奈军并没有在平原，而是在距平原不远的山区，等待罗马军团自投罗网。

进入山岳地带的罗马军团认为只要到了平原，粮食补给不是难事，所以只带了少量的粮食。通常，罗马军团出征要携带10天的粮食，如果需要携带更多的军粮，就要依赖马车。这次是在山区行军，所以，如果可以轻装上阵，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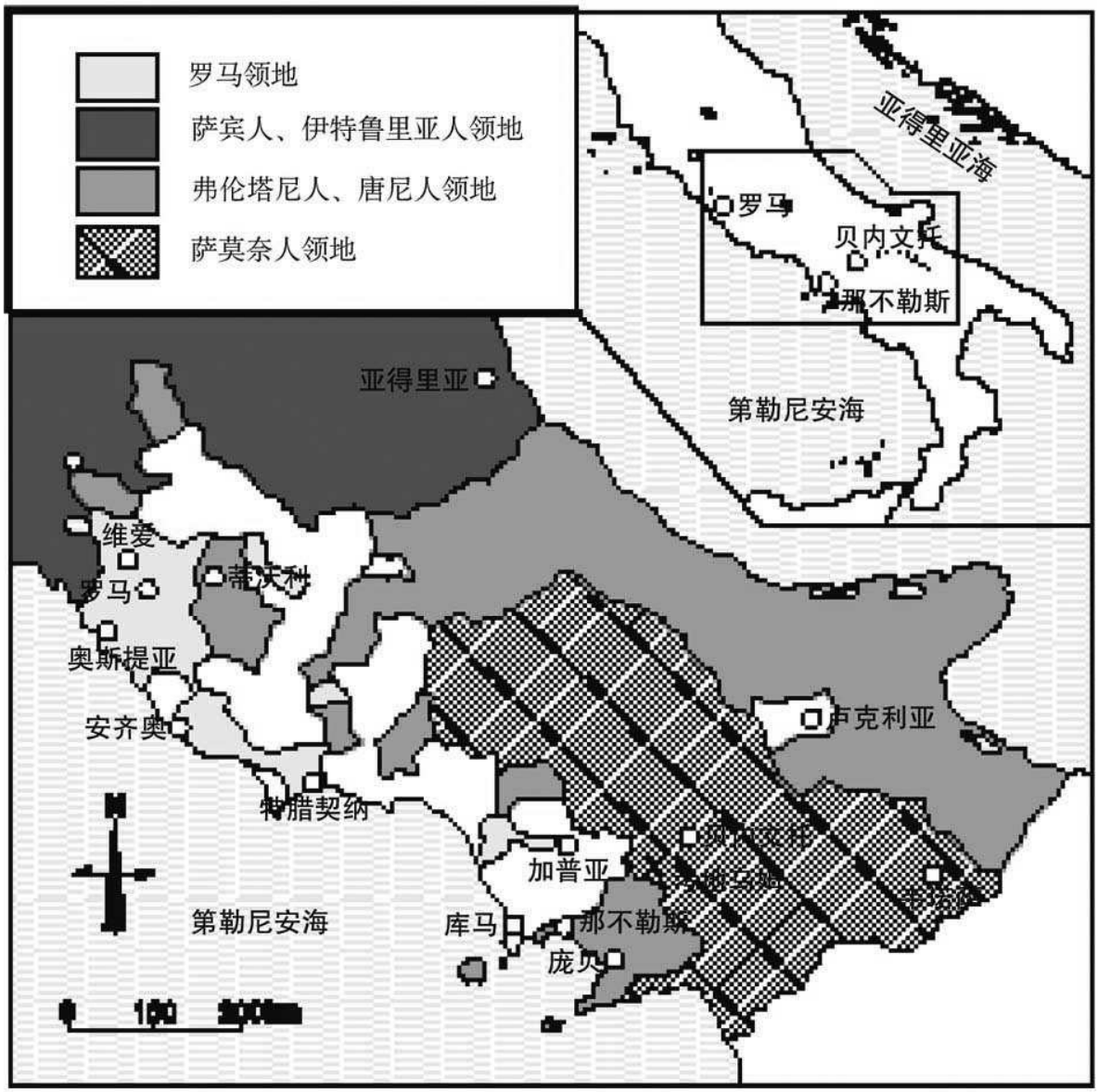
在山与山之间的狭窄小路上，罗马军一路西行，眼看就要通过考地乌姆峡谷了。

过了峡谷前的一段狭窄小路，进入峡谷的罗马军前锋再次踏上狭窄的通道，就在他们准备走出峡谷的时候，横躺在地上的树木挡住了他们

的去路。惊恐不已的罗马士兵连忙转身，试图从入口离开峡谷，然而为时已晚，入口处也已被封死。

峡谷很窄，两侧是岩壁裸露的陡峭、险峻的山岭，从这里往上爬简直比登天还难。峡谷两端被萨莫奈士兵从路障上面射出的箭所阻挡，难以靠近。多达1万人的罗马军团困在了考地乌姆峡谷之中。

无须执政官解释，谁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士兵们无奈之下，没人下命令就开始动手建造宿营地。他们建起了用壕沟和栅栏为防御的罗马式宿营地。但是，这不过是暂时的聊以自慰，因为萨莫奈人没有攻来。



公元前340年的罗马和其他民族

几天过去了，萨莫奈军队还是没有进攻，因为他们深知罗马士兵在肉搏战中的勇猛。罗马士兵一次次地试图突围，都以失败告终。

敌人没有打来，饥饿却开始袭击他们。粮食早已吃光，他们杀马充饥，现在马匹也没有了。虽然峡谷内有水，但在满是石块的河床上寸草

不生。罗马军团终于不战而降。

执政官的副官受命前去向萨莫奈军要求和谈，萨莫奈方面同意签署和谈条约，条件是罗马军撤离那不勒斯一带，放弃殖民地，永远尊重萨莫奈人的领土权力。此外，在实现和平之前，要扣留600名罗马士兵作为人质。这是因为在罗马，即使是国政的最高权力者——执政官的决定，没有得到市民大会的同意也是无效的。

对于败退，罗马士兵早已习惯，但是他们还没有习惯投降。

70年前，凯尔特人入侵罗马是罗马人告诫自己必须牢记的唯一一次投降。对后来的罗马人来说，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的耻辱和发生在公元前321年的这次“考地乌姆耻辱”绝不允许再出现。

全副武装的萨莫奈士兵进入峡谷，他们要求罗马士兵走出宿营地，不许带走矛、剑和盾。作为战士，这是一次羞愧无比的投降。他们的武装被解除，执政官身上表示司令官的大红披风被取下。

作为自由市民，罗马士兵甚至尝到了无地自容的羞辱，他们被要求脱去盔甲、衣服，像奴隶一样，只剩贴身的白色短衣。对罗马的自由民来说，这意味着半裸体。在罗马，着这种装束走在外面的只有奴隶。

萨莫奈士兵对罗马士兵的惩罚不止于此，他们强迫罗马士兵半裸着身体穿过矛林。站在两侧的萨莫奈士兵用侮辱性的语言不断辱骂一个接一个走过他们面前的罗马士兵，有人甚至用矛扎罗马士兵。不少罗马士兵因此或受伤倒地，或当即身亡。侥幸从这种屈辱中死里逃生的罗马人，还被要求以同样的装束回罗马。此外，被扣押的600名人质在得到罗马市民大会的同意，和平条约生效前，被关进了萨莫奈人的监狱中。

终于回到同盟国之地的罗马士兵们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说实话，萨莫奈人如果真的打算和罗马人共存，他们的做法实在不妥。罗马

人最看重的是名誉，萨莫奈人不幸在这一点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罗马人会铭记在心。与胜利相比，他们对失败的记忆更深刻。

被称为“考地乌姆和平”的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和平持续了5年。罗马人吃了败仗后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这一次的失败经历也不例外：

第一，败军之将没有受到惩罚。

现代社会的我们，大概以为这是为了给他一个挽回失地的机会。但是，罗马人不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并非出自这样的想法。

在罗马人的意识中，个人的胜利只有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共同体内，肩负重任却惨遭失败的人，内心会因为羞愧而备受煎熬。既然他已经承受了耻辱带给他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免除他的职务或向他问罪了。对于罗马人来说，名誉是德行之最，失去名誉无异于最严厉的惩罚。

第二，经历了战败后的罗马人会引进新的战术。军团中的中级指挥官不是单纯地执行总司令官，也就是执政官的命令，而是根据需要，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从而提高了灵活机动性。他们还注意到萨莫奈士兵使用的武器——标枪，于是就引进了它。

第三，更加认识到此前的罗马基本政略的有效性，继续扩大和确立罗马联盟。扩大新的同盟者为罗马军输入新的血液的同时，延长了罗马军的补给线，其结果是对萨莫奈人的居住地形成了包围之势。

之前，两位执政官通常各率一个军团，但是，这一时期以后，改成了分别指挥两个军团。罗马的战斗力得到了成倍的增加。这时，5年来一直蛰居在山区的萨莫奈人，得知曾经把罗马军围困在考地乌姆的自己已经被肉眼看不见的包围圈围住了。

公元前316年，罗马认为已经作好了再战萨莫奈的准备。恰恰在这时，对方给了他们开战的口实。

某个同盟国离同盟而去，往往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追随另一个强国对自己更有利。所以，霸权国家有必要时时展示自己的强大。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加普亚倒戈萨莫奈，就是因为罗马在考地乌姆峡谷败给了萨莫奈。

加普亚位于那不勒斯以北，自古被认为比那不勒斯重要得多。因为，是否控制加普亚，关系到是否能控制意大利南部。就是这个加普亚，选择脱离罗马联盟，投奔了萨莫奈人。对此，罗马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罗马军首先成功击退了加普亚的援军萨莫奈军，继而进攻加普亚。攻陷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的加普亚非常容易。加普亚人中的权贵全部被处以死刑。从此，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向汉尼拔倒戈为止的100年间，加普亚一直忠诚于罗马。

即使在当时罗马人对失败者的宽容人人皆知，但是，罗马人并非无一例外地宽容所有失败者。失败者可以期待罗马人的一次宽容，却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宽容。因为罗马人把信义看得和名誉一样重，他们绝不原谅背信弃义的人。

收复了通向意大利南部的要塞加普亚后，罗马于4年后的公元前312年铺设了从罗马到加普亚的道路。这是通过有效利用道路，建立罗马式有机的战略通道的正式开始。

收复加普亚后的罗马没有乘胜追击，一举征服萨莫奈人。但是也没有停止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势力渗透。

在常以四个军团的规模出征的罗马面前，萨莫奈人统治下的地方一

个一个地被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内。此时的罗马依然不忘把失败者纳入罗马联盟，在重要地方建立殖民地，强化罗马联盟。

公元前304年，被一步步逼进深山的萨莫奈人与罗马签订了和谈条约。和考地乌姆时不同，这次和谈是用剑得来的。此时，罗马人依然保持着“缓慢而稳健”的作风，就像学者们在介绍这一时期的罗马时不厌其烦、不断重复的那样。

这次和平只维持了6年。因为居住在罗马以北的各个民族大概以为罗马此时把目光投向南方是个绝好机会，于是纷纷起兵。

在亚平宁山脉以北、波河一带定居已久的凯尔特人就是公元前390年一度占领过罗马的民族。他们蠢蠢欲动，再次觊觎罗马。

被罗马各个击破、不断遭到侵蚀的伊特鲁里亚人与凯尔特人结成了统一阵线。

生活在亚平宁山脉亚得里亚海一侧的翁布里亚人也加入了对罗马的战斗中。

除了这三个民族，被罗马一步步逼进大山深处的萨莫奈人也决定参战。

罗马军团同时受到来自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围攻，不过他们已今非昔比。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公元前297年，罗马元老院宣布罗马进入紧急状态。除了17岁至45岁的市民，60岁以下、通常已经免除兵役的预备役也接到了征兵令。

出现这种状况时，执政官通常会任命独裁官。但是，这一次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胜任独裁官的只有一个人选，此人是名门望族费边家的成员。但是，执政官们不能确信他们的任命是否会得到平

民的赞同。在需要举国团结、一致对外的时候，必须避免贵族和平民之间再次出现对立的状况。

也许罗马的平民阶级会反对费边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却不反对选他当执政官。这一年选出的执政官之一就是这位昆图斯·费边，另一位是年轻的沃卢姆尼乌斯。这是费边第五次就任执政官。

但是丝毫不介意未被任命独裁官的费边对另一位执政官人选提出了异议。他来到市民大会会场，对大家说：

> 我已经是个老年人。对老年人来说，要与年轻人统一意见实在很难。作为执政官，我完全有决心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作为同僚，我希望大家选举德西乌斯。毕竟我与他曾经三次共掌执政官，有过在同一战场上共同作战的经历，而且脾气秉性也相互了解。

独裁官和执政官的最大区别不是六个月和一年的任期区别，而是独裁官完全由一个人作决定，但是，一位执政官如果得不到另一位执政官的同意，就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两位执政官是否合得来决定了执政官能否履行好职责。

听了费边的话，市民大会重新进行了投票。费边和德西乌斯当选执政官。在上一轮投票中，票数仅次于费边的沃卢姆尼乌斯成为前执政官，地位等同于执政官。他受命把敌人牢牢困死在萨莫奈。

在这次当选的两位执政官之中，费边是第五次当选，德西乌斯则是第四次当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费边不同，德西乌斯出身平民阶级。

执政官选举结束后不久，传来了萨莫奈军正在向北行进的消息。费边和德西乌斯率领的罗马军团采用了最大限度发挥灵活机动性的战术。直到后世，这种战术依然不失为罗马军的最大特色。他们把军队改编成

小股部队，开始了对以罗马为敌的四个民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这次坐镇指挥歼灭战并采用游击战法的罗马军团指挥官之一正是当年作为执政官在考地乌姆被迫忍辱投降的森提乌姆斯。

不久，凯尔特、伊特鲁里亚、翁布里亚和萨莫奈的四支军队在亚平宁山脉以东的森提诺集结完毕，罗马军团的主力也在距离敌军6公里处布下了阵。

敌方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四支军队分批对阵罗马。凯尔特和萨莫奈联军首先与罗马军交锋，翁布里亚和伊特鲁里亚军负责垫后。

费边很快得知了敌人的这一战术，是三个伊特鲁里亚人悄悄溜出营地，向费边告密的。费边重重地谢过三个伊特鲁里亚人后马上向发动歼灭战的部队送去了指令，命令部队集中兵力进攻伊特鲁里亚境内。原因是他预感到伊特鲁里亚内部出现了分裂。

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伊特鲁里亚人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入侵的惨状心烦意乱，战斗尚未开始，就匆匆撤离了前线。

战斗没有因为伊特鲁里亚军的退出而停止。敌军兵分两路，右路是凯尔特军，左路是萨莫奈军。罗马方面，费边率领第一、第三军团与萨莫奈军交战，德西乌斯率领第五、第六军团迎战凯尔特军，形成决战态势。第二和第四军团由沃尔姆尼乌斯率领前往南方，目的是阻止萨莫奈各路军队联合起来。

第一次战斗未见胜负，但是，战斗的进程始终有利于罗马军队。

费边知道，萨莫奈士兵与凯尔特士兵一样，第一次战斗时其战斗力非常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战斗力会逐渐减弱。因此，他率领的罗马军团采用的战术是战斗开始时避敌锋芒，待敌人的战斗力减弱后再全面出击。为此，负责给敌人致命一击的骑兵部队作为罗马军团的

右翼保存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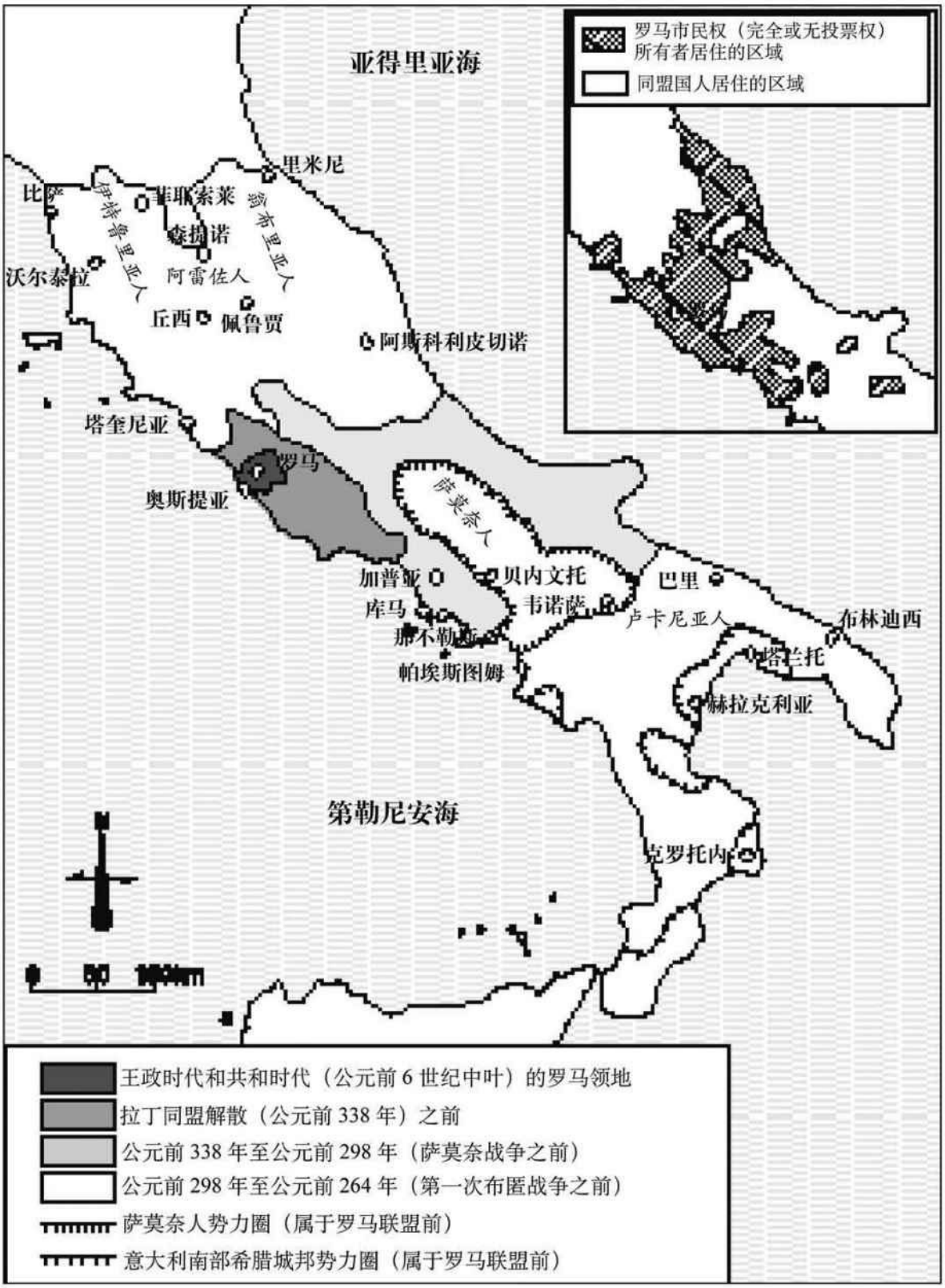
德西乌斯则一开始就摆出决战的架势，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因此，罗马第五、第六军团在战场上与凯尔特军遭遇后，很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看到步兵之间战斗出现胶着状态，德西乌斯把骑兵队也投入了战场。

凯尔特（高卢）骑兵的骁勇善战举世闻名，以至于后来的恺撒只用凯尔特人组编、指挥罗马大军的骑兵部队。而且，发生在公元前297年的这场战斗，战场就在久居意大利的凯尔特人居住地附近。

凯尔特人带着保家卫国的气概投入战斗。面对凯尔特骑兵的猛烈进攻，德西乌斯指挥下的罗马骑兵部队毫无还手之力，军马一匹匹地倒下，骑兵们被纷纷压在马下，连重装步兵也陷入了惶恐之中。

见此情形，德西乌斯大声地向诸神祈求，只要能让罗马赢得胜利，愿意奉上自己的性命。开始败退的罗马士兵听到他的祈求声，羞愧不已。他们重新振作精神，紧随冲在最前头的司令官之后杀向敌人。这时，费边派来的援军到了。形势开始逆转。

费边那边的战场上，整装待命的骑兵队投入了战斗，从敌人步兵团两侧形成围攻之势。乱了阵脚的萨莫奈士兵纷纷逃进友军凯尔特军中间。费边叫住骑兵队，下令向凯尔特军队的背部发起进攻。萨莫奈军总司令官战死，被包围的凯尔特军队试图从狭窄的出入口逃回自己的宿营地，却在围栏前被罗马士兵一一杀死。


罗马市民权（完全或无投票权）所有者居住的区域
同盟国人居住的区域
亚得里亚海
里米尼
比萨
菲耶索莱
伊特鲁里亚人
翁布里亚人
森提诺
沃尔泰拉
阿雷佐人
丘西
佩鲁贾
阿斯科利皮切诺
塔奎尼亚
罗马
奥斯提亚
萨莫奈人
加普亚
贝内文托
巴里
库马
韦诺萨
卢卡尼亚人
布林迪西
那不勒斯
塔兰托
帕埃斯图姆
赫拉克利亚
第勒尼安海
克罗托内
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公元前 6 世纪中叶）的罗马领地
拉丁同盟解散（公元前 338 年）之前
公元前 338 年至公元前 298 年（萨莫奈战争之前）
公元前 298 年至公元前 264 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
萨莫奈人势力圈（属于罗马联盟前）
意大利南部希腊城邦势力圈（属于罗马联盟前）

这天的战斗，敌方损失2.8万名士兵，被俘达8000人。

德西乌斯指挥的部队阵亡7000人，费边指挥的士兵阵亡者也达1700人。

执政官德西乌斯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是被倒地的敌兵压在下面了，战斗结束后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找到他的遗体，直到第二天才找到。费边郑重地埋葬了他的遗体，宣读悼词，盛赞德西乌斯英勇的品格和生前的功绩，吊唁这位长期的亲密战友。

从古至今，历史学家一致认同罗马人有这样一种才能：失败后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胜利后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胜利的成果。公元前297年的胜利就是其中一例。

罗马军团马不停蹄，乘胜追击。凯尔特人被赶到北方，翁布里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同意加入罗马联盟。在年迈的费边引退后，年富力强的将军当选执政官接替了他。

公元前290年，最后一个坚持顽强抵抗的萨莫奈人也投降了罗马军。这次提出和谈的是萨莫奈人方面。

萨莫奈人居住地成为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市。在他们生活的山岳地带中心，建起了由罗马市民团殖民的殖民地，取名韦诺萨。公元前285年，从罗马到加普亚的阿皮亚大道延伸至此。

随着罗马霸权扩张，以阿皮亚大道为代表的罗马大道增加到了6条。这些道路把首都罗马和建在战略要地的殖民地（科洛尼亚，德语叫科隆）联系在了一起。

公元前290年，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中南部的称霸。沿意大利南部

海岸，首次与希腊人引以为傲的繁荣城市直接相接。

与意大利南部希腊的对决

按照时代划分并言简意赅地记录下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下个时代又出现了什么，在战争纪实中几乎不可能。这也是讲述历史时的一个难点。

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部分事件是相互重叠的，原因之二是因为一个事件即使后来有了很大的意义，但是，最初往往始于偶然。因此，历史必然向前是真理，同样，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累积也是真理。

要想做历史的主人公，需要做到的是尽快解决和摆脱不好的偶然，把好的偶然引向必然。我想，与其他民族相比，在很多方面表现迟钝的罗马人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出色，原因不正是他们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才能吗？

意大利半岛形状像长筒靴，塔兰托位于这只长筒靴的鞋跟位置。公元前283年，塔兰托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10艘罗马船。一直都是陆地民族的罗马，自从那不勒斯加入罗马联盟后，开始有了小规模的船队。或许是因为遭遇了暴风雨，这时，船队中有10艘船驶入了塔兰托港。

塔兰托在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邦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在罗马一心对付萨莫奈人的时候，它与罗马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因此，塔兰托人认为10艘罗马船的突然出现违背了协议中的约定，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对这些船动用了武力。

塔兰托是个通商民族，也是个海运国家，海上力量很强，罗马完全不是它的对手。转眼间，5艘船被击沉，船员全部被杀，余下的5艘船勉强逃脱。

罗马向塔兰托提出了赔偿的要求，理由是这次靠港不是出于侵略的目的。但是，塔兰托市民不仅没有接受赔偿的要求，还嘲笑前来谈判的罗马使节说希腊话怪腔怪调，甚至把他们赶了出去。于是，罗马决定向塔兰托开战。

塔兰托是一个天然良港，今天依然是意大利海军的主要军港。塔兰托作为城邦国家，“年龄”与罗马相差无几。罗穆路斯率领3000拉丁民族的弃男，在台伯河岸边建立罗马的时候，来自斯巴达的移民也在这里建起了塔兰托城邦国家。

以塔兰托和西西里的锡拉库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市是那些有城邦国家建设经验的人建起来的，发展非常迅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们把这一带统称为“大希腊”（Magna Grecia）。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在希腊本土，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曾经实力雄厚的城邦国家纷纷衰落，臣服于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希腊又回到了从前的混乱局面。意大利南部归顺希腊的各个城邦统称为“大希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与希腊本土的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进一步就会退半步是罗马的发展模式。在罗马缓慢却稳步发展的公元前五六世纪，事实上统治意大利半岛的是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南方的希腊人。

罗马与伊特鲁里亚毗邻，所以，两者早早就有了接触。但是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罗马始终没有机会与在南方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希腊人直接接触。因为罗马不是通商民族，又位于意大利中部，与散落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所属各城邦国家之间隔着许多其他民族和辽阔的土地。

罗马希望控制这些民族，并把他们一一纳入同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终于使萨莫奈人臣服后，罗马这才与意大利的希腊人有了接触。

前面讲到过，“大希腊”的希腊人与本土的希腊人之间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始于斯巴达人殖民的塔兰托与军事国家斯巴达截然相反，它是作为雅典式的通商国家成长起来的。但是，斯巴达人建起来的塔兰托和科林斯人建起来的锡拉库萨都继承了希腊的风格。

城邦国家诞生后，始终保持着城邦国家的规模。除了作为国家中心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对扩张势力范围几乎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他们认为封闭社会更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虽然叫“大希腊”，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各城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团结合作的时候。除了在波斯战争中之外，它们与本土各城邦国家从来没有采取过一致的行动。

尽管如此，因为有希腊人杰出的智慧，这些城市的经济异常发达。种种迹象表明，罗马人丝毫没有想过要借故向其中最强大的塔兰托宣战。事件发生之初，元老院中息事宁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多数人提出只要塔兰托对击沉的船只和被杀船员作出赔偿就可以了。当时，罗马刚刚结束萨莫奈战争，正处于恢复元气的时期。所以，尽管最后决定向塔兰托宣战，却没有马上派军队南下。

塔兰托非常重视罗马的宣战决定。尽管塔兰托人身上流的是斯巴达人的血，但是出乎意料，他们非常厌恶战争，他们习惯把保卫国家的重任交给其他国家的雇佣兵。既然要雇用其他国家的士兵，自然需要早作准备。对于没有自卫能力的民族，这是他们的宿命。一直以来，塔兰托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做。

塔兰托选中的是希腊北部的王国——国王皮洛士统治的伊庇鲁斯。皮洛士在当时是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武将，可见塔兰托的经济实力非同一般。我们不清楚塔兰托向皮洛士提出“雇佣兵”的具体条件，只知道塔兰托答应皮洛士，会准备35万步兵外加2万骑兵协助其攻打罗马。

在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在东方，一种当时叫“亚历山大综合征”的现象正在蔓延。从亚历山大大帝33岁去世的那年，到现在还不足40年。通过曾经跟随他东征的人们口中，他的丰功伟绩被传得神乎其神。只要是有野心的希腊男人，无不希望自己像他一样。但是，在如此众多的希腊人中，究竟谁可以继承亚历山大的地位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皮洛士。

皮洛士本人当然也有这样的心思。他统治的国家伊庇鲁斯是亚历山大大帝母亲的家乡。自认为有血缘关系的皮洛士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热爱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迎娶埃及公主为妻，也不忘炫耀自己有继承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资格和能力。

据说塔兰托使者来的那一年，皮洛士40岁上下。作为武将，作为一个男人，那都是精力最充沛的年龄。对皮洛士来说，与罗马这个无名国家作战似乎兴趣不高，但是塔兰托答应的37万兵力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列传》作者普鲁塔克介绍了这位有意思的男人的有意思的故事。

当时，国王的亲信齐纳斯问皮洛士：

“罗马人是优秀的战士，有很多部族共同参战。如果我们战胜了罗马人，您有什么打算？”

皮洛士听罢，当即回答说：

“这还用说嘛，齐纳斯，只要我们打败了罗马人，那里的其他民族就不会再有人与我们为敌了。广阔富饶的意大利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

齐纳斯沉默了片刻，又开口问道：

“征服了意大利之后，您有什么打算？”

“西西里靠近意大利。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岛。那里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人口众多。征服它应该轻而易举。阿加托克利斯离开以后，西西里各城市内外兵祸连连，现在依然处于不统一的状态。”

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时代的锡拉库萨僭主阿加托克利斯也是患有“大帝综合征”的人。他不满足于西西里，曾挑战大国迦太基，一时间名震西地中海。他同时又是皮洛士其中一任妻子的父亲。只是，9年前，阿加托克利斯已经病死了。

齐纳斯又问国王：

“也许如您所说，征服西西里很容易。但是，称霸西西里后是不是标志着我们的远征就结束了呢？”

对于这一问题，皮洛士明确地回答说：

“如果众神赐予人类以胜利，那么让胜利成为更大事业的基础是我们人类能做的最起码的答谢。夺取西西里后，利比亚和迦太基已经近在咫尺。阿加托克利斯能做到的事我们当然也可以。等到这些也完成后，该轮到我们的敌人闻风丧胆了。”

“当然，敌人会胆战心惊，”齐纳斯回答说，“等到我们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无疑，马其顿，不，全希腊都会臣服于我们。但是，陛下，在那之后您作何打算？”

听到这里，皮洛士哈哈大笑：

“除了休息还能有什么？到时候，就痛痛快快地歇个够。每天喝喝酒，开开心心地回忆往昔的战斗历程，你觉得怎么样？”

齐纳斯于是小心翼翼问国王：

“喝酒现在不行吗？又没有人禁止，而且令人愉快的战斗经历我们也有。即使我们不再流更多的血，吃更多的苦，冒更大的风险，也完全可以。我们再去加害别人，难免自己也会受伤。”

这个问题让皮洛士感到不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改变决定。

皮洛士命令齐纳斯先带3000名士兵作为前锋横渡塔兰托。主力2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2000名弓箭手和500名投石兵，再加上20头大象，等塔兰托派来的运输船到达后，由皮洛士亲自率领向意大利进发。公元前280年的春天快到了。

天才战术家皮洛士

伊庇鲁斯位于希腊西北部，只要横渡亚得里亚海就可到达意大利。现在的渡轮，深夜从布林迪西出发，日出之前也就到了。不久前，大量阿尔巴尼亚难民乘船进入意大利，着实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一阵慌乱。

到塔兰托必须绕过长筒靴的鞋跟处，所以航程略长一些。即便如此，不出一天也能到达。在2300年前的古代，尽管船速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几天时间也就足够。所以，影响皮洛士西征的不是距离，而是春季有时会在海上出现的暴风雨。皮洛士为此失去了2000名士兵和2头大象。

皮洛士到达后的塔兰托街头，丝毫看不出临战的样子。露天剧场和体育馆挤满了市民，约定的37万士兵不见踪影。失望至极的皮洛士非常生气，下令封锁了剧场和体育馆，却因此引起了雇用他们的塔兰托市民们极度的不满。

此时，适合作战的夏天已经临近。罗马军团南下的消息也传来了。皮洛士决定依靠自己从希腊带来的军队迎战罗马，总共是2.65万名士兵和18头大象。

但是，罗马军团尽管面对的是威震四方的皮洛士，却什么准备也没有。这个时候，罗马还没有认真想过要与塔兰托交战，他们把军队投入到打压伊特鲁里亚上了。在接到皮洛士登陆塔兰托的消息后，可以派去南部的只有执政官拉埃维努斯率领的一半军队。

派往南部的这一半军队是从集中在北方的军队中分出来的。因为和皮洛士一样，罗马人相信了塔兰托所说的准备37万名士兵的话。按照塔兰托的财力，除了西西里，从非洲招募雇佣兵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的轻信。只是因为塔兰托人从来没有靠自己流血牺牲来保卫祖国，所以尽管国家存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但他们早已失去了感知这一危机的能力。

不正常的是塔兰托。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塔兰托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罗马很担心名震天下的武将和37万兵力合二为一。阻止他们的唯一策略就是在他们集结前打败皮洛士。对罗马来说，形势不允许他们等待全部加起来不过四五万的军队一起南下。

罗马和皮洛士的第一战在距离塔兰托不远的赫拉克利亚打响。这里是沿海的一片平地，罗马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地形对自己极为不利。而且，此时的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大象这种庞然大物。

两军的战斗力不相上下。皮洛士有2.65万名士兵和18头大象，执政官拉埃维努斯率领的罗马军中，罗马士兵8000人，同盟国士兵1.6万人，总共2.4万人。步兵与骑兵的比例两军都是9：1。在古代，任何一个民族，战争的主力都是重装步兵。

同样采用密集型方阵作战的重装步兵，希腊叫方阵部队，罗马叫军

团。军团中百人队是核心，作为组织，似乎更加牢固。但是，在当时，名震在地中海世界的是方阵部队。这是利用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成功东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杰作之一。

皮洛士和罗马之间的战斗，在军事上，是固有势力方阵部队和新兴势力军团之间的第一次碰撞。

站在山顶上，视察完罗马军的布阵后，皮洛士回头对站在一旁的齐纳斯说：

“从排兵布阵上看，那些蛮子似乎并不野蛮。结果会怎样，让我们明天拭目以待吧。”

希腊人除了自己，习惯称其他民族为蛮子、野蛮人。

部署在赫拉克利亚郊外的两军阵容反差极大。

罗马军摆出的是纵向阵型，大概他们还不能忘萨莫奈之战的教训。事实上，这种阵型更适合山区而不是平原。皮洛士军摆出的是横向阵型。罗马人原以为18头大象会在最前面，皮洛士却把大象安排在左右两侧。他没有采用由象群攻破中部坚固的罗马重装步兵军团的战术，而是把罗马军团交给方阵部队，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战车——大象攻打部署在敌人两翼的骑兵。

战况按照皮洛士的设想展开。希腊步兵进攻罗马步兵的时候，象群把罗马骑兵队冲得七零八落。乘此时机，皮洛士亲自率领希腊骑兵队成功绕到了罗马军的背后。皮洛士不愧为被后来的汉尼拔称为战术家的那一类武将——既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又是一位沉着冷静的战术家。他能够在身先士卒、勇敢战斗的同时，不忘掌控时刻变化着的战场局势。

罗马军团被团团围住，在战场上留下了7000阵亡者后败退下来。皮

洛士的损失也不小，仅阵亡者就达4000人。由于皮洛士的士兵来自伊庇鲁斯，罗马军的损失可以得到补充，皮洛士的损失却无法得到补充。

罗马军吃了败仗的消息很快在意大利南部传开，因此，被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却心存反意的人纷纷申请加入皮洛士军。皮洛士的队伍在人数上很快得到了补充，挽回了损失。因为初战的胜利和人员的及时补充而心情大好的皮洛士决定乘胜追击，北上攻打首都罗马。他预计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完全有可能背叛他们的盟主罗马。

但是，这次皮洛士失算了。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并没有背叛罗马。那不勒斯、加普亚，甚至连与罗马经历过极其顽强的战斗、最终臣服于罗马的萨莫奈人，也拒绝了皮洛士的劝诱。

这大大打击了已经攻到距离罗马只有60公里的皮洛士的信心。

刚修成不久的阿皮亚大道平坦而笔直，沿着这条路北上，即使带着大象，行军也不会是一件难事。罗马人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保卫首都，甚至把无产者市民也召集了起来，准备共同迎敌。被称为无产者的这些市民，除了孩子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没有纳税的义务，自然，也没有取代直接税的兵役义务。这是罗马建国以来第一次把这批人也召集起来，它意味着罗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重局势。

尽管如此，罗马人似乎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他们有一半军队还没有用上。与从前一样，这时的罗马，没有因为在与皮洛士的第一战中吃了败仗，而对执政官拉埃维努斯兴师问罪，也没有解除他的职位。

罗马担心的事态并没有出现。原因是皮洛士虽然拥有一切，却独独缺少耐心。尽管已经到了距离罗马只有60公里的地方，但是，他借口罗马联盟没有解体，以首都罗马把无产者市民也召集起来为由，沿来时的路返回了。

回到塔兰托后，皮洛士向罗马提议和谈。不是他和罗马之间进行和谈，而是罗马和塔兰托之间进行和谈，由他充当和谈调解人。他派出亲信齐纳斯前往罗马，带去了和谈的条件。

他的条件是：

一、从此罗马尊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宣告其不可侵犯。

二、在希腊系各城市和罗马之间，设置双方均不得染指的中间地带。为此，把位于这一区域的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从罗马联盟中解放出来，宣布他们再次独立。

假如罗马答应了其中的第二个条件，就要撤去因战略需要而建在该区域的卢克利亚和韦诺萨两个殖民地。已经铺到韦诺萨的阿皮亚大道也就失去了政略上的意义。

作为和谈调解人，皮洛士还让齐纳斯带去了昂贵的礼物送给罗马的女人们。他的本意只是送一些礼物，毫无收买罗马女性的意思。但是，罗马女人不习惯这种关照，她们严词拒绝，说不能接受敌人的馈赠。

对于皮洛士提出的和谈，罗马男人似乎认真进行了讨论。本来这次战争就不是为了征服以塔兰托为代表的、富饶的意大利南部希腊系各城市。而且经历了与传闻中的皮洛士的精妙战术和大象部队的交锋后，罗马人觉得非常沮丧。元老院的大多数人开始倾向于接受和谈。

因年事已高而早已引退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阿皮亚大道的铺设，使罗马的道路具备了政治和战略意义。他是罗马道路建设的第一人。在罗马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里，阿庇乌斯的名字是家传的，所以有这个名字的男人很多。为了把建设阿皮亚大道的阿庇乌斯区别于其他同名男人，人们称呼他“财务官阿庇乌斯”或“瞎子阿庇乌斯”。因为年事已高，他的眼睛几近失明。

连走路也需要别人帮助的阿庇乌斯扶着别人的肩膀来到久未露面的元老院，痛斥元老院议员。

他说，和谈的前提是皮洛士必须离开意大利。赖在自家院子的敌人，不能做我们谈判的对象，无论是和谈还是其他。他的话使元老院里的气氛为之一变。

尽管如此，罗马似乎还难以下决心拒绝皮洛士的提议。于是，先派了一位特使，带着赎回俘虏的赎金前去塔兰托见皮洛士。皮洛士对这个特使说：

“我来意大利不是为了做生意。我和你们之间的事情就在战场上解决吧。不过，为了预祝和谈成功，我还罗马俘虏自由。你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这位罗马特使就是第二年当选执政官的法布里齐乌斯。因为皮洛士只是说预祝和谈成功，所以他没有过度地高兴。他提出先带600个俘虏回去，一旦和谈不成，就把他们送回到皮洛士这里。

法布里齐乌斯回来后，罗马元老院又展开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拒绝皮洛士的提议。600名罗马士兵不得不再次离别好不容易见到的家人，回到塔兰托，一个人也不少。

其间，有一个外国人悄悄来到罗马拜访了元老院。据说他是皮洛士的御医派来的秘密使者。他说，御医已经作好了毒死皮洛士的准备，只想问罗马会怎样报答他。元老院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皮洛士。深受感动的皮洛士作为回报把回去的600个罗马俘虏又送了回来。罗马方面也说自己不能无偿接受，于是，送回了罗马军抓来的希腊俘虏。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时候，新的一年到了，适合作战的春天来临了。既然和谈不成，就像皮洛士说的，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这一次罗

马在战场的选择上谨慎了许多。

与皮洛士对决的战场选在奥迪乌斯（此处似有误，应为阿斯库路姆。——译者注）。此地位于卢克利亚和韦诺萨两大殖民地之间，是罗马势力范围的前沿地带，属于山谷地形。皮洛士的骑兵和大象无法驰骋自如。对罗马军来说，这是绝好的选择。

这次战斗，两军力量同样不分上下。两位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总共4万人，皮洛士军因为有志愿兵的加入，也有4万之众。

与第一次战役不同，这里两侧被森林环抱，空间非常狭小。皮洛士根据这一地形改变了战术，使重装步兵团的行动更加灵活。尽管如此，高低起伏的战场地形严重妨碍了战马和大象的行动，第一天的战斗没有分出胜负。

第二天，皮洛士再次改变战术，他把罗马军团引诱到较为平坦的地带。也许因为他的骗术太过巧妙，罗马军团没有察觉到自己被骗。

战场移至有利的地形后，皮洛士的战术开始显出了巨大的威力。战斗的结果与第一次战役一样，罗马军团损失惨重，一位执政官战死，阵亡者达6000人。

皮洛士的损失也不小。战死者3500人，其中大部分是他从伊庇鲁斯带来的希腊士兵。

罗马败退了，但是皮洛士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对一旁的齐纳斯说：

“每胜罗马军一次，我军的战斗力就会大大降低。”

他本人也受了伤，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对皮洛士的忍耐力考验已经足够了。

皮洛士没有乘胜追击。他回到了塔兰托。一位来自西西里岛锡拉库萨的使节前来拜访。他说迦太基正在攻打西西里，希望他助那里的希腊人一臂之力。已经烦透了与罗马人作战的皮洛士甚至没有细问事情的原委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要得到西西里，下一个目标就是迦太基。大概这一想法使他的心情一下子由愁变喜。他对塔兰托市民说，西西里的攻防战用不了很久，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着部下渡过了墨西拿海峡。

但是，得到西西里并非易事。三年里，让身处西西里的皮洛士心烦不已的不是迦太基人，而是他的同胞——西西里的希腊人。

虽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和罗马建国的时间几乎相同，但是他们的繁荣维持了很久。从建国之初，他们的实力就远高于周边。但是，长期的繁荣使人们的心理变得很复杂。与罗马为敌时，皮洛士的骑士精神效果显著。但是，当敌人是在西西里盛极一时的希腊人时，他的骑士精神却丝毫也派不上用场。不管在西西里生活了多久，希腊人始终丢不掉他们所特有的强烈独立意识。虽然都是希腊人，但是显然，西西里人缺少协作精神。

皮洛士被这些人耍得团团转，或是被离间，或是遭背叛，甚至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皮洛士不得已放弃西西里，重回塔兰托。皮洛士的收获就是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和少了一半的部下。

塔兰托市民与他们的西西里同胞的态度完全一样，除了在看皮洛士时多了些白眼，他们不愿意为重建军队提供帮助。

三年的时光让那些来自意大利南方、曾经追随皮洛士的士兵失去了再度尝试的勇气。

但是，罗马没有浪费这三年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巩固罗

马联盟，使得所有加盟国更加坚定地站到罗马一边。

公元前275年夏天，此时的皮洛士刚从西西里回来，他决定把自己的运气再次压在与罗马之间的战斗中。

根据情报，罗马军兵分两路，其中两个军团已在玛鲁文托，另两个军团正行进在南部山区中。

皮洛士决定首先攻打停留在玛鲁文托的罗马军团。等打败这支罗马军团后，再回头攻打另一支罗马军团。这时的皮洛士的兵力与刚踏上意大利土地时相比已只剩下了一半，他只能选择这样的策略。

玛鲁文托位于阿皮亚大道附近，沿大道北上不需要很长时间。对于皮洛士来说，最好能在两支罗马军团会合之前结束战斗，所以行军的时间越短越好。

为了多少弥补以寡敌众的不利条件，皮洛士决定在黎明前向玛鲁文托的罗马军团发起进攻。

但是，进入只铺设到韦诺萨的阿皮亚大道前，在山区中行军比预定计划多用了很多时间。为此，进入阿皮亚大道后一番急行军，北上到达玛鲁文托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

罗马军团对皮洛士的进攻并不感到突然，因为被大象的叫声惊着的沿路居民早就来通风报信了。执政官马尼乌斯没有给皮洛士展开部署的时间就迎了上去。战斗异常激烈。战斗的进行始终有利于罗马。罗马士兵成功捉住了几头大象。

得知皮洛士逼近的消息后，执政官马尼乌斯立刻向行进在较远山区的友军送去了告急信。友军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皮洛士试图阻止罗马全部兵力会合的策略显而易见已经失败——快得就像太阳升起的速度。

皮洛士害怕自己一败涂地，于是命令军队撤退，以来时的速度退回塔兰托。

这年初秋，皮洛士悄悄离开塔兰托，回到了伊庇鲁斯。跟随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西征的2.85万名士兵中，与国王一起回国的幸存者只有8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大象回来几头不清楚。三年后，皮洛士在攻打斯巴达的战斗中阵亡。

把当时地中海最著名的将领皮洛士打回老家的这场战役，使罗马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家。曾经只是拉丁民族一个部落的罗马，从此成为东地中海各国关注的国家。两年后，在地中海世界与迦太基齐名的大国埃及，其特使带着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任务来到了罗马。

但是，进入国际社会并没有让罗马人忘记自己的传统。他们把值得纪念的、战胜皮洛士的战场玛鲁文托改名为“贝内文托”，因为前者的意思是恶风，后者却有和风之意。

公元前272年，罗马开始攻打塔兰托。塔兰托试图得到外援的帮助，希望破灭后被轻易攻陷。

罗马把沦陷后的塔兰托纳入了同盟。只是与罗马联盟的其他同盟国不同，塔兰托不享有完整的自治权。因为罗马打算把这个意大利南部最好的良港用做直辖的海军基地，并且也这样做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意大利曾经从如今依然是军港的塔兰托派出舰队前往中东。

阿皮亚大道很快延长至塔兰托，数年后又从塔兰托延伸至布林迪西。被称为大道皇后的阿皮亚大道终于完成。

公元前367年，罗马开始制造自己的流通货币。在这之前，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总是向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借用货币。有了自己的货币意味着罗马开始有了对外关系。

在后世的我们看来，偶然发生的一次事件成为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历史必然。在公元前270年前后的这一时期，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北自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统一。自公元前753年建国算起，已过去了漫长的500年的悠悠岁月。

站在墨西拿海峡的本土一侧，西西里近在咫尺。就像皮洛士在西西里看迦太基一样，罗马人在西西里看迦太基是在此后不到10年时间的时候。

小结

根据传说，罗马于公元前753年建国。根据史实，罗马于公元前270年完成了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罗马非一日建成》就写了这500年间的故事。为了写这一卷，我自以为应该看的研究文献、历史书籍我都已看过。不用说，我的很多知识首先是来自这些研究者。

虽然我搜集了上述信息，但是仅有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动笔。真正开始写作是在我查阅了这些研究者用做原始史料的古代历史书籍之后。

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代或距其较近时代里所写的史书，学界称为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有关本卷的500年间的原始史料，必须提到以下四部：

一、李维的《罗马史》

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

三、普鲁塔克的《列传》

四、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的《古罗马史》

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死于公元17年，是毋庸置疑的罗马市民。在他的一生中，写了多达142卷的《罗马史》。当然，每一卷都不是很厚。但是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留下来的只有从建国之初到公元前293年间的10卷，公元前218年到前202年，即关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9卷，公元前201年到前167年间的14卷，总计33卷。除此之外，只留下了

一些片段。

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依然高不可估。作为生活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人，为了让同胞们了解祖国伟大的过去，他详尽地写下了《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典型的编年体历史书，他采用即时记录的方式书写下同时代发生的、复杂且众多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对研究者来说，无疑难以找到比这更难能可贵的史料了，局外人是很难看进去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罗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

波利比乌斯生于公元前202年，死于公元前120年，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关于他写《历史》的动机，在本卷开头已经讲过，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希腊早早没落而罗马却不断兴起的疑问让他开始了《历史》的写作。

因《普鲁塔克英雄传》而被日本所熟知的《列传》作者普鲁塔克，大概是四个人中后世唯一的一位畅销书作家。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的他，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是与波利比乌斯一样也是希腊人，他想描述的似乎只是人物而非历史。《列传》就是一部评论性传记，讲述的是希腊和罗马的伟人们。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书中充满了有意思的故事，就认为这只是一部有意思的读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书中随处可见尖锐的批判。对于革命家类型的人物，评论十分辛辣。作为历史学家，我不禁感叹其洞察之深刻。这部传记应该是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作为史料，也非常有价值。

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古罗马史》作者狄俄尼索斯，生于何年卒于何时不清楚。但是，这部书的出版时间非常明确，是公元前7年。所以，他和李维一样，可能是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人。

《古罗马史》共有12卷。从罗马建国开始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公元前264年。但是，保存完整的只有到公元前449年为止的9卷，剩

下的都是一个个片段。

波利比乌斯在亡国后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从而有了观察现实罗马的机会。普鲁塔克尽管留在被罗马占领后的希腊，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罗马。狄俄尼索斯和他们不同。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为了写罗马史而移居罗马的。在写作古代罗马史的同时，靠着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维持生计。

位于小亚细亚西侧的哈利卡纳索斯（现在的博德鲁姆）曾经拥有比雅典更早的文明，但此时已为罗马所占领。作为城市，它当时正在趋于稳定。正因为如此，出生于该城市的狄俄尼索斯有了非常强烈的愿望，他要探究罗马兴盛的根源。

在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过百年左右的研究者们的著作中，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不尽合理之处。于是，就像贴身穿的绢衣一样，很自然地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位希腊人的历史观。

为什么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的历史观让我觉得更合理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想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是这三个人的态度。他们都没有从精神层面去寻找罗马兴盛的原因。一直以来，我本人采取的态度也不是在感性事件中寻找兴衰的要因。这就是说，我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兴盛源自当事者的精神健全，衰退源于他们的精神堕落。

与此相比，我更倾向于兴盛的原因在于当事者建立起来的体系。最容易动摇的是人的内心，你可以努力说服大家改变想法，但是，要所有人都如你所愿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大家觉得非改不可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一致。为此，只有体系是要害之所在。

第二，这三个人都生活在基督教普及之前。他们当然不会是基督教

徒。只要不是基督教徒，就可以摆脱基督教的伦理和价值观。

耶稣说，有信仰才有幸福。我也认为，因信仰得到心灵安宁很重要。但是，我无法不追问这是为什么。虽然我懂耶稣的慈爱，他说穷人要幸福。但是，对伯里克利“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安于贫穷”的说法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我还认为，讲述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古代罗马人，用基督教的价值观一定写不好。

深受中世纪影响的但丁在其《神曲》中说，言行有罪打入地狱的，只是邪恶的基督教徒。异教徒如荷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共和政体的创始者布鲁图斯、恺撒，因为他们“生于基督教之前，未知真正的信仰就死了”，所以，他们在地狱外的阳光下拥有一席之地。可见，连但丁也没有把古人和基督教徒相提并论。

第三，既然这三个人不知道何为真正的信仰，当然，他们也丝毫不会拘泥于法国大革命后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不受理念的束缚，自然而然地正视现实，这样的态度会容易得多。存在理念差异的体制中，即使这样的体制有好的一面，但是因所持理念存在差异，那么就很容易偏执于理念正误，而失去了对现实的正确认识。

尽管如此，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对伯里克利和奥古斯都一视同仁，予以赞美。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英明的领导人治理时期的国家是怎样经营出幸福的。

现在，如果有学生对这二人作同等的评论，想必历史教师会毫不犹豫地给出低分。因为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政体的旗手，奥古斯都却是帝制罗马的创始人。对革新和保守同等看待，这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暂时把“自由”与“平等”这样无疑是高尚的理念搁置一边去思考，又会怎样呢？雅典民主政体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伯里克利领导有方，罗马所建立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也有赖于奥古斯都的力量。只要

有利于民众的幸福，那就是善政，没有所谓的民主政体和帝制政体之分。我想古人大概就是这样认为的吧。

古代的伯里克利被评价为杰出的领袖，被视为民主主义的先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在，却总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现实就越是远离自由、平等、博爱？历史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高唱并热衷追求这一理念的民族没有能够实现它；而选择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尽管并不彻底，却实现了这一理念。我甚至认为，20世纪末的纷乱之象是不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理念的自我毒害状态。

第四，对于2000年前的三个希腊人的想法，我深有同感，原因在于识别问题能力的迫切感。

这三个人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拥有如此高度文明的希腊会衰退，罗马却得以持续发展？由于他们都属于衰落的希腊民族，所以，这个问题自然有了非常迫切的意义。这就好像对于不久前还在不断飞跃发展的日本，欧美人提出了为什么日本会这样的疑问一样。在罗马人李维的著作中，缺少了这种迫切性的态度。其原因，我想，只要想一下日本人写的《日本人论》就可以了解。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有与三个希腊人相同的迫切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关注到为什么只有罗马能成就大业这一问题时，我与他们想法一致。我常常想，在漫长的1000多年里，单凭军事力量，不可能控制住如此众多的民族。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最早给予我启迪的不是现代历史学，而恰恰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这三个希腊人。

关于罗马兴盛的要因，三位希腊人分别是这样认为的：

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认为是宗教影响了罗马人的见解。罗马的宗教与其说是用来约束人类的，不如说是用来保佑人类的。这一宗教没有狂热崇拜的倾向，所以，更容易与其他民族建立起相互包容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承认其他宗教就是承认别的民族。

曾经是政治领袖的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兴盛的要因在于罗马确立了独特的政治体系。像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比较容易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著于政体。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兴盛的要因归结于罗马共和政体所特有的政治体系。那就是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有效利用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优势。由于确立了这一独特的政治体系，罗马消除了国内的对立关系，建立了统一的体制。

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则明确指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

在普鲁塔克的祖国希腊，对其他民族一律称为蛮子。不仅如此，尽管同为希腊人，生于斯巴达的人要取得雅典市民权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相反，在罗马，出生地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有无罗马市民权，而且还有放开的趋势。有一个时期，只要住在罗马，就可以取得罗马市民权。罗马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宽容，不是因为赢不了，而是在赢了以后才让步的。

我认为这三位历史学家说的原因都对。不仅如此，我认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这三点缺一不可。

狄俄尼索斯提出的宗教见解说、波利比乌斯提出的政治体系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同化其他民族的做法说，都反映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特例的罗马人的开放性格。

其智力不及希腊人、体力不及凯尔特（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技术

不及伊特鲁里亚人、经济不及迦太基人的罗马人，之所以超越这些民族，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开放的性格。要说罗马人真正的个性，不就是他们的开放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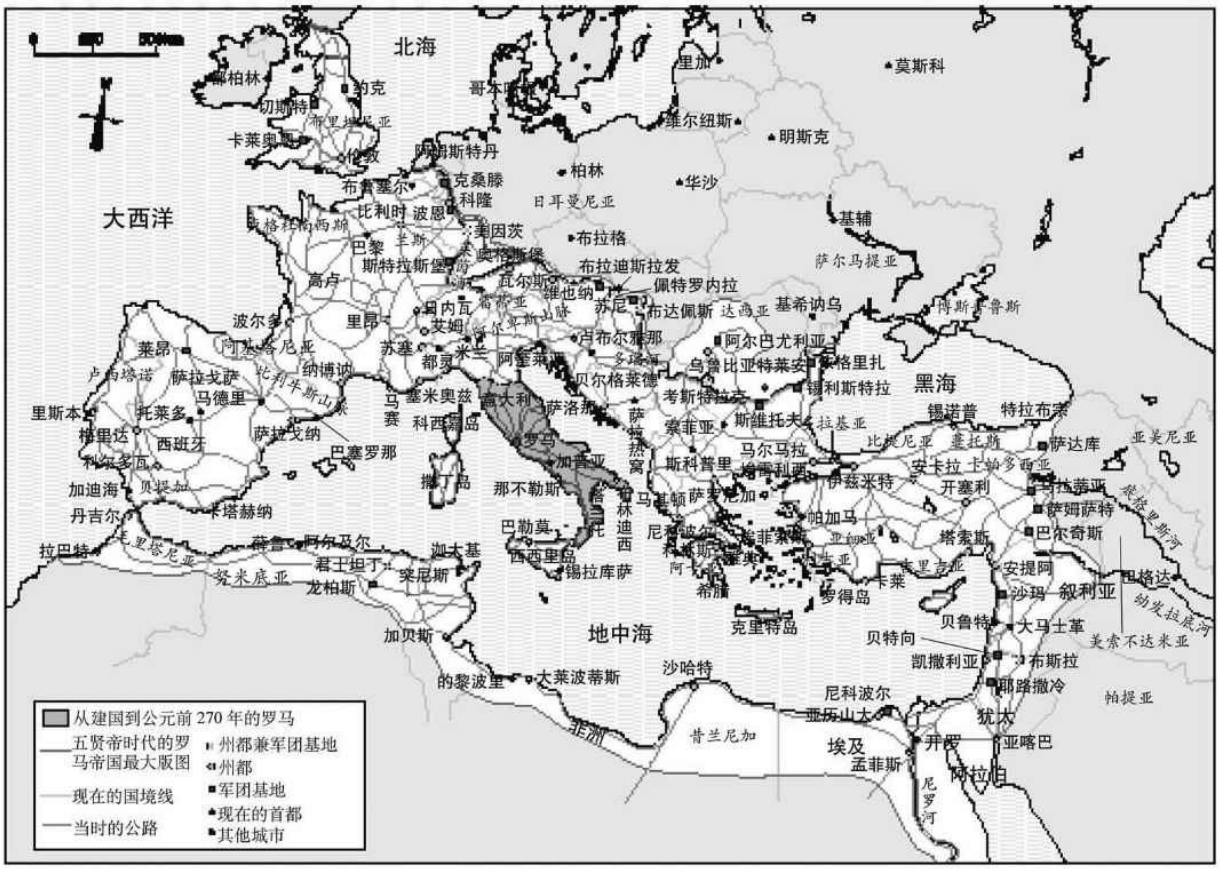
军事和建设方面的成绩是充分展示其性格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在罗马士兵的军靴声早已远去、无数曾经的白色建筑已化做瓦砾之山的今天，人们依然对远古的罗马满怀憧憬和敬意。

古代罗马人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不是辽阔的帝国，也不是经过2000年以后依然挺立的遗迹，而是不论宗教和人种肤色，一律予以同化的开放性。

但是，相距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年，现代的我们却始终不肯放弃宗教上的不宽容，总是拘泥于统治理念甚于统治能力，排斥其他民族和人种。所以，“罗马遥不可及”的说法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伟人从小与众不同”。意大利也有一句意义相近的话叫“玫瑰终会开出玫瑰花”。

本卷涉及的时代里，罗马已经成长。但是按照人类的年龄而论，罗马尚处于30岁之前。三十而立的罗马将面对怎样的考验，又将如何战胜这些考验，这些将在下卷中呈现在你面前。


北海
大西洋
黑海
地中海
柏林
约克
伦敦
布鲁塞尔
科隆
波恩
比利时
巴黎
斯特拉斯堡
高卢
里昂
波尔多
莱昂
里斯本
格里达
科阿多瓦
加迪海
丹吉尔
拉巴特
萨拉戈萨
马德里
托莱多
西班牙
萨拉戈纳
巴塞罗那
纳博讷
米兰
都灵
苏塞
艾姆
日内瓦
苏尼
布拉格
布拉迪斯拉发
佩特罗内拉
布达佩斯
基希讷乌
基辅
萨尔马提亚
华沙
明斯克
维尔纽斯
莫斯科
哥本哈根
里加
罗马
加普亚
那不勒斯
西西里岛
锡拉库萨
撒丁岛
科西嘉岛
高大利
萨洛那
贝尔格莱德
考斯特拉
斯维托夫
马尔马拉
伊兹米特
开塞利
安卡拉
卡塔赫纳
阿尔及尔
君士坦丁
突尼斯
龙柏斯
迦太基
的黎波里
大莱波蒂斯
加贝斯
沙哈特
克里特岛
罗得岛
塞浦路斯
贝鲁特
大马士革
贝特向
凯撒利亚
布斯拉
耶路撒冷
沙玛
叙利亚
安提阿
塔索斯
巴尔奇斯
萨姆萨特
巴格达
萨达库
特拉布宗
锡诺普
锡利斯特拉
格里扎
阿尔巴尤利亚
乌鲁比亚特莱安
尼科波尔
亚历山大
开罗
亚喀巴
埃及
孟菲斯
犹太
阿拉伯
尼罗河
帕提亚
美索不达米亚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亚美尼亚
比提尼亚
卡莱
从建国到公元前270年的罗马
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帝国最大版图
现在的国境线
当时的公路
州都兼军团基地
州都
军团基地
现在的首都
其他城市

2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年表

年代（公元前）	罗马	意大利	希腊	东方	中国	日本
2000		青铜器时代（1800—900）	克里特文明（2000—1400）	埃及新王国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王朝、亚述兴起	殷王朝确立（1400 前后）	绳文时代
1500			迈锡尼文明（1600—1200） 特洛伊战争（1250 前后）	摩西出埃及		
1200			中世纪古希腊（1200—800） 多利亚人南下（1200 前后）		周王朝建立（1120）	
1000		铁器时代（900—）		犹太王国、大卫（1004）、字母表开始普及		
900						
800	根据传承，罗马建国（753） 第二代国王努马（715—673）	伊特鲁里亚文明兴起 希腊殖民城市塔兰托、那不勒斯、锡拉库萨等出现在意大利南部（800—700）	诗人荷马活跃于该时期 殖民运动（800 前后—500 前后） 城邦时代开始（800 前后） 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776）	腓尼基人建立迦太基（810 前后）	春秋时代（771—403） 铁器普及	
700	第三代国王托里斯（673—641） 第四代国王马尔西乌斯（641—616） 第五代国王塔克文（615—579）	伊特鲁里亚全盛期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620 前后）	亚述统一东方（680） 亚述灭亡（612）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意大利	希腊	东方	中国	日本
600	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578—534） 第七代国王“傲慢者塔克文”（534—509）	伊特鲁里亚进入衰退期	雅典梭伦改革（594） 雅典庇西特拉图独裁政治（546—527） 雅典克里斯梯尼的民主政体（508）	新巴比伦繁荣 犹太王国灭亡 巴比伦掳掠俘虏（586） 释迦诞生（565 前后） 波斯统一东方（550—525）	孔子诞生（551 前后）	绳文时代
500	废除王政，建立共和政体（509）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抗开始 设置护民官（494） 着手重建拉丁同盟（494） 与邻近各部族作战；向希腊派遣考察团（453—452） 通过《十二表法》（449）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抗未结束；与邻近各族之间的战斗继续	伊特鲁里亚急剧衰退 意大利南部希腊各城市继续繁荣 伊特鲁里亚急剧衰退	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反波斯之乱（499—494） 第一次波斯战争爆发（492） 马拉松之战，希腊获胜（490） 结成反波斯同盟（481） 第二次波斯战争（480—478） 萨拉米斯海战，波斯败退（480） 结成提洛同盟（477） 雅典确立霸权 雅典国内分裂 特米斯托克利斯遭放逐（471） 稳健保守派掌权（—460） 伯里克利上台（460） 伯里克利时代（460—430） 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哲学、诗歌、剧作、历史、美术、建筑） 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对斯巴达）（431—404） 伯里克利去世（429） 群愚政治时代（429—）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大获成功 雅典投降斯巴达（404）	大流士一世执政（522—486） 波斯国王薛西斯攻打希腊（480） 特米斯托克利斯亡命波斯（471） 特米斯托克利斯自杀（460）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意大利	希腊	东方	中国	日本
400	攻占伊特鲁里亚城邦维爱（396） 凯尔特人侵，占领罗马（390） 通过《李锡尼法》（367） 以此为界，贵族与平民间的对抗趋向平缓； 开始进攻意大利中南部，拉丁同盟解体，罗马联盟成立（338） 与萨莫奈人之间的战争开始（326—290） 铺设阿皮亚大道（312）		斯巴达霸权时代（404—371）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399） 柏拉图创立学园（387） 底比斯称霸时代（371—362） 马其顿影响力出现；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遭暗杀（336） 亚历山大即位马其顿国王（336） 亚里士多德创立吕克昂（335）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并征服波斯（334—332） 称霸印度（330—324）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323）	印度孔雀王朝（317—180 前后） 叙利亚塞琉古王朝（312—63）	进入战国时代（403—221）	绳文时代
300	通过《霍尔腾西亚法》（287）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抗彻底平息 塔兰托之战 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之间的战争（280—275） 称霸意大利南部希腊各城市，完成卢比孔河以南意大利半岛的统一（270）	阿基米德（287—212）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分裂（分裂成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等）（301） 成立阿卡亚同盟（380） 内讧不绝	埃及托勒密王朝（305—30） 科学发展迅速（以埃及亚历山大为中心）		弥生时代

参考文献

学习历史，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史料。史料分为两种，即原始史料（或称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所谓第二手史料，是后世的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历史学家写的史书。之所以称做第二手史料，是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原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写成的。

第一手史料是直接传递当时时代气息的史料，虽然它们统称为原始史料，但是并非都出自当时时代人之手。怎样才能准确地描述几百年前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历史专家也会有的疑问。事实上，以编年体的方式写下罗马史的李维是帝政初期的人，他写的《罗马史》却始于比他生活的时代早700年的古代。

古代罗马有一个官职叫最高神祇官，是在公元前509年实施共和政体时设置的官职，它是宗教祭祀的最高负责人。就像本文中介绍的那样，这是一个普通官职，在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除了宗教祭祀的最高负责人，这个官职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书写每年的日志。他们要详细记录每一天里发生的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情，如有哪些人当选本年度执政官以下的官职，与哪个部族发生了战争，与哪里进行了和谈，等等。在实施共和政体之前的王政时代，最高神祇官由国王兼任，所以，书写日志想必也是国王的工作。因此，留下来的史料不仅少而且很不清楚。但是，自从实施共和政体以后，这种日志式的记录工作得以延续下来。这项工作不是在官邸深处进行的，也不是当即收纳于公文书库中的。在这一年里，记录下来的日志就放在官邸的前面向世人开放。一年过去后，才保存到公文书库中。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因此意味着在古罗马存续期间，这样的记录从未中断。关于这一点，有史实可以证明。虽然历史学家李维指出，古罗马史料因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

被付之一炬，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后的罗马人喜欢记录的习惯。

日志中记录的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尽管详尽，内容却难免枯燥。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老加图在写历史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 我无意于像最高神祇官那样记录每一件事情。我绝不会写诸如食品价格几许，大雾笼罩罗马几日，何时满月，几时月亏，等等。

但是，即便无意于书写日志式的历史，对于希望把历史写得生动有趣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枯燥无味的、流水账式的记录更难能可贵的史料了。没有这种记录，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李维大概写不出《罗马史》；同时代的狄俄尼索斯特意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索斯移居到罗马，想必也是为了便于查阅收藏在罗马公文书库中的这些记录吧。

留存至今的最高神祇官的记录只留下一些残片，数量之少屈指可数。但是，只要读过古代罗马人及希腊人写的东西，就可以了解到这些记录的利用率相当高。正是因为这些记录的存在，即便是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可以写出1000年前的古老的历史。

原始史料

（凡是已有日文版的，在这里只记录日文版出处。）

有关希腊史的主要史料

荷马：《奥德赛》、《伊利亚特》（高津春繁、吴茂一译，筑摩书房，1964）

希罗多德：《历史》（青木严译，新潮社，1968）

修昔底德：《战争史》（久保正彰译，岩波书店，1966—1967）

柏拉图：《全集》（代表作的责任编辑为田中美知太郎，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 6卷》，1966）

亚里士多德：《全集》（代表作的责任编辑也是田中美知太郎，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 8卷》，1972）

阿里斯托芬：《喜剧全集》（《希腊喜剧全集》，田中美知太郎等译，人文书院，1961）

色诺芬：《全集》（只含《回忆苏格拉底》，佐佐木理译，岩波书店，1974）

普鲁塔克：《列传》（《普鲁塔克英雄传》，河野与一译，岩波书店，1952—1956）

有关罗马的主要史料

王政、共和政体时代（前753—前31）

波利比乌斯（Πολβιος，Polybius，前202—前120）：《历史》（Historiae）。希腊人，亡国后被带到罗马，了解了新兴罗马的真实情形。回国后，开始写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各国历史。作为同时代的人，他对布匿战争的描述尤其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布匿战争时期罗马伟大的政治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政敌、罗马保守派重要人物。为了区别于恺撒时代的加图，又称他老加图。他也是有关农业经营和历史的作品De agricultura、Origines和Praecepta ad filium的作者。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7—前27）：《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罗马人记》（Antiquitates，De gente populi Romani）。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最初追随庞培，庞培失败后，投奔恺撒，受命设立国立图书馆。因此项工作，写了很多著作。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全集》。罗马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其友阿提库斯同时从事出版业，所以他的著作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这也是学习拉丁语的欧洲高中生们最憎恨的原因。书信特别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罗马状况，对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大宝库。只是在偏重思想哲学的日本，西塞罗和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一样，只有一小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语。《世界名著· 14卷》，中央公论社，1968年。

尤里乌斯·恺撒（Caius Iulius Caesar，前100—前44）：《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他是历史上罕见的人物，用简洁明了、典雅而独特的文体叙述了自己的事迹。如果他和丘吉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定会早于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写作能力绝非丘吉尔等人所能及，就连西塞罗都不惜溢美之词。《恺撒文集》，国原吉之助译，筑摩书房，1981年。

恺撒麾下的将军们：《亚历山德里亚战记》（Bellum Alexandrinum）、《西班牙战记》（Bellum Hispaniense）。

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前100—前25）：《伟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尽管他的洞察力不及普鲁塔克，但是他作为罗马市民所特有的观点不容忽视。除此之外的著作还有若干。他是当时开始在罗马出现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萨卢斯提乌斯（C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喀提林阴谋》（De Coniuratione Catilinae）、《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和《历史》（Historiae）。在不得已放弃政治生活后，开

始了写作生涯。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人们经常把他和马基雅弗利作比较。他留下了非常出色的著作。体现在文章中的热情和卓越的描写能力也经常被视为能够与马基雅弗利进行比较的缘由。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oidorus Siculus）：《历史图书馆》（Biblioteca）。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人，生卒年份不详。据说该著作完成于公元前30年前后。40卷中现存的只有15卷。著作中介绍了罗马初期的史料，这在有关史料消失后的现在实属难得。

李维（Titus Livius，前59—公元17）：《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32岁那年开始，每10卷出版一次，在总计142卷全部出版后，结束了他的一生。这是由罗马人写的罗马人的历史金字塔。内容从罗马建国开始直到公元前9年。遗憾的是留存至今的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李维的《罗马史》大部分消失在中世纪，对于罗马史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遗憾。

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us）：《古罗马史》（Antichita romane）。生卒年份不详，是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希腊人。为了写罗马史，移居到罗马，写下了从罗马建国到公元前264年为止的历史共20卷。

瓦勒利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嘉言懿行录》（Factorum et Dictorum Memorabilium）。生卒年份不详。因为他曾经把著作献给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所以应该是公元1世纪的人。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学习拉丁语修辞学的罗马学生。因为是轶事集，所以即使不是学生，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而且有用。

普鲁塔克（Plutarchus，46—120）：无须多说，是《列传》的作者。

阿庇安（Appianus）：图拉真皇帝时代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

人。160年前后，写下了由24卷长篇构成的罗马和地中海世界史。如果全部保留下来的话，内容应该是从建国开始直到共和政体结束为止。对两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遗失的部分起到了补充作用。

卡西乌斯·狄奥·科塞安努斯（Cassius Dio Cocceianus）：生活在2世纪至3世纪的人，虽然是希腊人，却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留下了共80卷的《罗马史》。内容从建国开始到公元229年。只是，留存至今的只有36卷至65卷。尽管如此，由于李维也没有共和政体末期的史料，所以他的作品和阿庇安的著作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诗文·剧作

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前259—前184）：深受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民众喜爱的剧作家，对于希望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为了了解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他的喜剧作品是必读的，就像为了了解雅典而必读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一样。

泰伦提乌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前190—前159）：继普劳图斯之后出现的罗马喜剧作家。出身非洲奴隶，但是和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一样，是西庇阿家聚会上的常客。写下了为数众多的喜剧作品。要了解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他的作品也是必读的。

卡图卢斯（Caius Valerius Catullus，前87—前54）：恺撒时代的抒情诗诗人。留下了恋爱诗的杰作Carmi。

碑文

沿着罗马公路，每隔一罗马里就有一块“里程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代，它们无疑都是重要的历史信息来源。此外，墓碑和纪念碑也都是重要的史料。与帝政时代相比，共和政体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少，不超过1300块。把这些碑文收集整理后，出版的是以下两部：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Brlin，1861）、Inscript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Publicae（Roma，1972）。

纸莎草文献

从埃及的沙漠中发现的书写于纸莎草上的希腊语（KOINÈ）史料。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a Cultura Classica（Roma，1975）。

金币•银币•铜币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因为在苏拉以后，它被当时的权力者用做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例如，为纪念战争胜利而制造的货币，等等。这种通用货币，即使看不懂罗马世界的通用语拉丁语或希腊语的人，每天也会拿在手上。这种宣传方法用得最充分的是恺撒，这位伟人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

此外，除了尚存的罗马世界的建筑、遗迹、美术品和艺术品之外，其他所有遗存物作为史料也非常有用。

写于后世、以研究为主要目的的历史书，即第二手史料

T.Mommsen，Romische Geschichte，共六卷，Beilin，1854—

合著，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4卷以后，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69—

合著，Storia di Roma，共25卷，Bologna，1954—

合著，Storia di Roma，共8卷，第4卷之前已出版，Torino，1988—

A.Toynbee，Hannibal’s Legacy: The Hannibalic War’s Effects on Roman Life.I: Rome and Her Neighbours Before Hannibal’s Ent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65，《汉尼拔的遗产》（秀村欣二等译，

河出书房新社，1969）

G.De Sanctis，Storia dei Romani，共8卷，Roma，1979

J.Bayet，La religione romana，Torino，1959

G.Dumezil，La religione romana arcaica，意大利语翻译：Milano，1977

L.Pareti，Storia di Roma，共6卷，Torino，1952

T.Frank，Storia di Roma，意大利语翻译：Roma，1970

J.Vogt，La repubblica romana，意大利语翻译：Bari，1987

M.Grant，Storia di Roma antica，意大利语翻译：Roma，1981

S.I.Kovaliov，Storia di Roma，意大利语翻译：Roma，1982

C.Nicolet，Rome et la conquete du monde mediterraneen，Paris，1978

H.Wagenvoort，Roman dynamism，Oxford，1947

A.. Piganiol，Le conquiste di Roma，意大利语翻译：Milano，1972

Ch.Wirszubski，Il concetto politico di liberta a Roma tra Repubbulica e Impero，意大利语翻译：Bari，1957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井上幸治责任编辑，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28卷》，1972）

这些都是综合描写关于罗马的著作，关于每个事件、现象、人物均刊载于相关卷的末尾。

日本人的著作

村川坚太郎、弓削达、吉村忠典、铃木一州、秀村欣二、吉野悟、青柳正规、长谷川博隆、北原理雄、柴田光藏、石本雅男、佐藤笃士、国原吉之助、大场正史、井上智勇、岛田诚、松本宣郎、船田享二、坂口明、市川雅俊、本村凌二、毛利晶、岛创平、后藤笃子、栗田伸子，以上各位学者的所有著作和研究论文。

作者按：以上各文献中，不只限于王政·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也有一些涉及了帝政时代。第二卷以后的参考文献表中，各卷卷末只刊载未在这里提及的文献。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Ⅱ

汉尼拔战争

[日] 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日本 **商界精英、政要必读书籍**
日产·法国雷诺汽车联盟CEO、索尼集团董事长、
日本钢铁集团总裁 力荐图书

韩国 30名知识分子推荐 教养必读书
50名职业经理人推荐 史上最好的书
100名CEO向青少年推荐 最必要读的书

2

王石 王巍 |作序|
秦朔 吴伯凡 吴晓波 |联袂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记/（日）盐野七生著；计丽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086–3039–7
I. ①罗… II. ①盐… ②计… III. ①古罗马——历史 ②汉尼拔（前247 ～前182）——生平事迹 IV. ①
K126 ②K834.1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364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Ⅱ : Hannibal Senk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3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记
LUOMAREN DE GUSHI ER: HANNIBA ZHANJI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日] 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序
第一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二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
第三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
第四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前期
第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后期
第六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
第七章 布匿战争以后
第八章 马其顿衰亡
第九章 迦太基衰亡
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我曾经手捧迦太基金币感慨万千，当时的情形，时至今日，仍历历

在目，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不住地在想：那个被逼到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不得不起而反抗、并由此引发了与罗马之间战争的国家，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金币的正面是坦尼特女神的侧脸，头上的发饰是麦穗。由此得知，她是一位丰收之神。金币的反面是站立的、体格健壮的马。它是女神的保护神。从金币不含杂质的纯金质地，到其高超的铸造技术，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在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已是地中海世界的强国。与此相比，当时的罗马刚刚开始独立铸造银币。布匿战争的两个当事国——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罗马来说，持久的苦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追寻战争过程的话，那么显然布匿战争向我们揭示了持久战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大国就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现在到了可以向大家介绍罗马货币的时候。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

时，罗马终于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铸造优质银币，并使之广泛流通。搞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货币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此处介绍的银币，它作为罗马货币的代表，尚属在发展初期。也许正因为如此，银币上的图案充分展示了当时罗马人的精神面貌。

银币的正面是罗马女神。喜欢神化任何事物的罗马人把自己的首都罗马也神格化。只是，由于当时罗马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所以尽管耳环显示银币上的头像是女神像，却戴着头盔，身佩宝剑。银币背面是骑士骑着马在战场上勇猛疾驰的图像。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这是二德拉克马银币（Didrachm）。大概因为这种银币在兑换时可

以换两枚小额银币，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名称。德拉克马原本是希腊的流通货币。罗马货币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原因是罗马人对希腊有亲近感。罗马人在打败迦太基后，乘势把希腊纳入其版图之中。在此之后，希腊语的学习在罗马普及开来。罗马人对于使用双语的生活方式竟然相当适应。正因为如此，罗马人也不反对用被征服者希腊的货币名称来命名自己国家铸造出来的货币。也许，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更加务实，因为在地中海的东岸希腊语得到广泛使用，人们更习惯用希腊语来给自己的货币命名，并由此增强货币的认同感。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银币正面是希腊神话中的狄俄斯库里，他是宙斯和勒达的孩子，是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的合称。罗马人喜爱这位年轻的双子神，把他作为罗马货币的图案，合情合理。银币背面是驱赶四马战车的主神宙斯，拉丁语叫朱庇特，与刻在下方的文字“ROMA”一起，显示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人的气概。

盐野七生

2002年4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对于历史所持的态度，除了热衷于研究个案现象的学者，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派：

一派以马基雅弗利为代表。他们通过列举历史上的诸多事例，以期唤起人们的反思。

《君主论》和《政略论》是马基雅弗利的代表作。其中，《政略论》是日文的译名，原名叫《基于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进行论述》（中文译作《李维史论》。——译者注）。通过这部作品，可以了解马基雅弗利在提出自己的论点前，通读了李维、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的作品。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选择了以李维的《罗马史》为核心的历史现象作为例证。像他这样，选择“利用”历史的人中，最近的可以举出《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此外，我认为名著《文明衰亡之时》的作者高坂正尧氏也属于这一派。

对于历史所持的态度，属于另一派的有德国人蒙森和英国人吉本。他们的作品内容仅限于罗马史，并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蒙森的作品内容始于罗马建国，结束于尤里乌斯·恺撒死亡。吉本的作品内容则始于五贤帝时代，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

关于历史，我认为以他们二位为代表的一派只是对历史作了叙述。对他们来说，叙述历史只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这两派孰优孰劣，我只想说他们之间的不同。

那么，这两派的不同表现在哪里呢？说实话，他们的区别就在著作

的分量的不同上。属于第一派的人，他们的著作通常只有一两卷。与此相对，属于另一派的人，他们的著作往往会超过10卷。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分量之差呢？我想这是因为属于第二派的作家认为历史就是过程。

如果只想了解结果，那么看一本打着考生必备符号的历史概要书就已足够。日本高中生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有关罗马史的记述不足10页。但是，如果追溯过程，分量自然轻松超过这一数字的几千倍。分量如此之重，不是因为作者偏好洋洋洒洒的写作，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追溯过程，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我属于第二派之列。

话虽如此，我却不赞成同属一派的巨匠级人物蒙森的看法。

这位生活在启蒙主义时期的德国人似乎把“由历史作出裁定”误解为“由历史学家作出裁定”了。在他盛年之时，他的《罗马史》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写到恺撒死后，他就搁笔不再写了。也就是说，关于帝政以后的罗马，他只字未叙。对此，连当时他的读者也深感遗憾。蒙森始终没有说出自己不再继续写下去的原因。但是，只要读了他写的《罗马史》，这一点便会不言自明。

作为启蒙时代人物的蒙森，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自然会加入自己的评论。他给予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极高的评价。鉴于这样的认识，他自然很难下笔叙写帝政时代的罗马了。

与此相比，我更加欣赏马基雅弗利的观点——人类和人类成果体系都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如果让我对历史进行裁定的话，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我把本系列作品的书名定为《罗马人的故事》，如果把日文的这一书名翻译成拉丁语，我都不希望直接使用表示历史的History和表示故事

的Memory这两个词。所以，选择了意思相同的Gestae一词。“RES GESTAE POPULI ROMANI”直译过来就是“罗马人的种种行为”。我不想裁判任何思想，也不想裁判任何伦理道德，我只想追溯命运无常的人类行为。

如果认为历史在于过程，那么战争就是书写历史的最好素材。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像战争那样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当事国的人民。

第二卷《汉尼拔战争记》讲述的是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33年为止的130年间的故事。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时期。其间，主要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布匿战争，同时也与希腊及叙利亚等国发生了交锋。

在第一卷《罗马非一日建成》中提到的希腊，在本卷中将看到它的终结。第二卷中正式登场的迦太基也走向了灭亡。关于这一结果，生活在2000年后的我们早已了然于心。

尽管希腊人充满智慧，尽管迦太基人不但经济发达而且有绝世名将汉尼拔，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输给了罗马人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一点一点追溯历史进程的同时，如果能引起您的思考，作为作者的我，将深感荣幸。因为在这一卷所讲述的这个时代里，您将有机会了解到在第一卷中讲到的罗马人构筑起来的体系所拥有的真正价值。

关于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史料明显多了许多。只要看同时代的人写的史料，历史人物的面孔就会非常清晰，甚至让我忘记了以汉尼拔和西庇阿为首的本卷出场人物与我们之间竟然相隔2200年的岁月。在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读这段历史，您也有权对这一段历史心怀期待。这不是高中时代的教科书，这里要讲述的是历史的过程，这样的历史比什么都令人期待。

我非常理解学校里老师为什么必须在一年时间内，教完全部的世界历史。我在本卷中所写的全部内容，在日本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中，概括起来，只有下面短短的几行：

> ……罗马在统一意大利半岛之后，继续策划向外扩张，于是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这就是布匿战争。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控制着地中海的制海权和通商权。在消灭迦太基并掌握了西地中海霸权之后，罗马将注意力转向东方，逐一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的各个城邦，攻占了叙利亚王国，把小亚细亚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就这样，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海。……

这样描写的历史只重结果，是一个高中生所必须掌握的，否则只有挂科。但是，为成年人书写的历史与此不同——那应该是过程。因此，不仅令人期待，而且还提供了引导人们进行思考的素材。

盐野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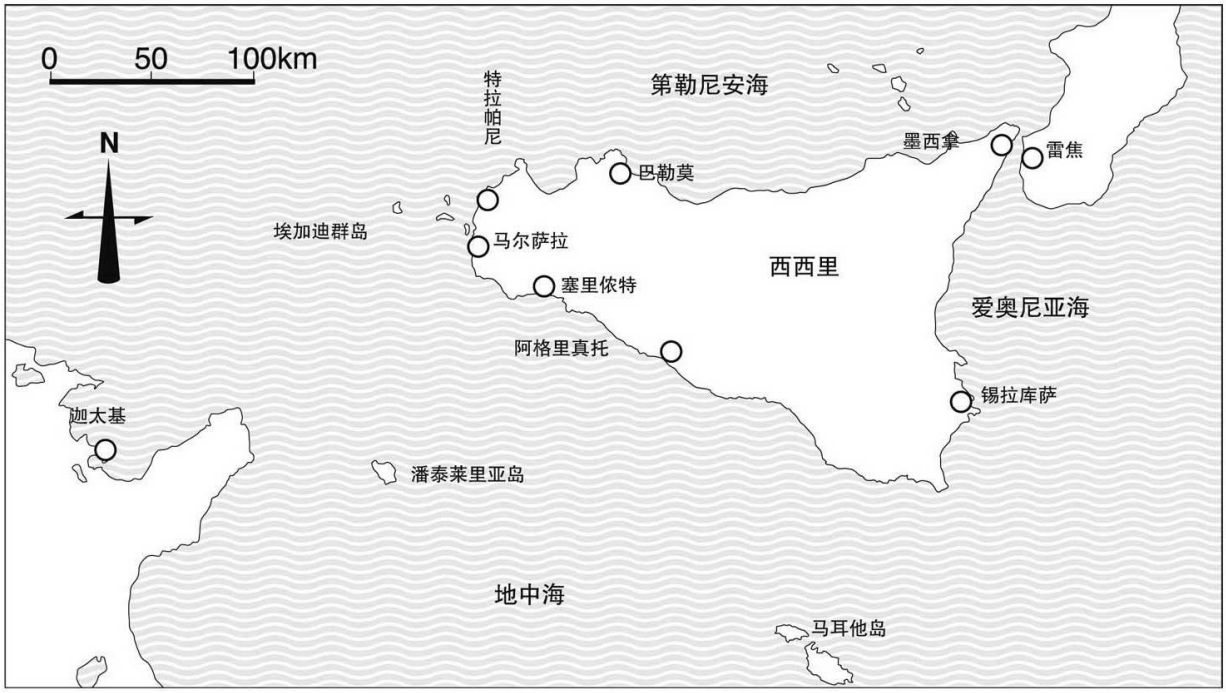
1993年春于罗马

序

西西里位于形状如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上，感觉触手可及。夹在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峡，自古就叫墨西拿海峡。这一名称源自西西里岛最东端的一个叫墨西拿的城市。本土到西西里岛的最短距离只有3公里。从本土的轮渡码头圣乔瓦尼镇到墨西拿港也只有7公里。坐上往返其间的轮渡，要上一杯咖啡，慢慢地品，等这一杯咖啡见底的时候，船也到了。

站在圣乔瓦尼镇，可以看到轮渡离开后不久便到了对岸的墨西拿，又能够看见对岸的人、汽车及列车上了船，轮渡往回开的情景。整个情景犹如近在咫尺。到了现代曾有好几次计划在这一海峡架桥梁。但是和濑户内海不同，墨西拿海峡没有可以用来打桥桩的小岛。如果一定要架桥，只能架吊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吊桥是明石海峡大桥，1998年完工。据说这座大桥的中央支间距离是2公里，技术上可以达到3公里。所以，如果在墨西拿海峡架桥的话，也许日本的技术可以帮助其实现这一愿望。不过目前除了坐轮渡别无他法。

既然只能坐轮渡，那么墨西拿海峡的现状与2200年前的古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当您站在意大利本土，眺望西西里的时候，心里冒出来的想法大概也相同吧。尽管有大海相隔，但是，这种距离和想法，正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战争的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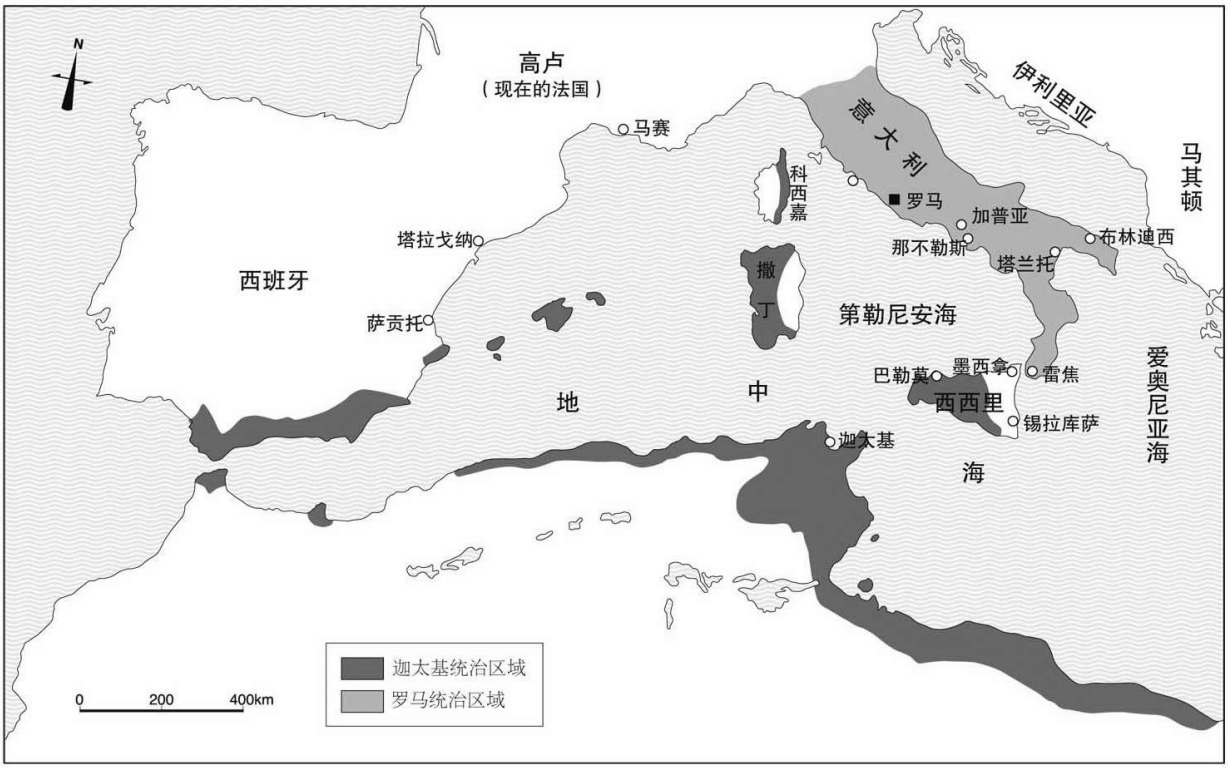

0 50 100km
N
特拉帕尼
第勒尼安海
墨西拿
雷焦
巴勒莫
埃加迪群岛
马尔萨拉
西西里
塞里依特
爱奥尼亚海
阿格里真托
锡拉库萨
迦太基
潘泰莱里亚岛
地中海
马耳他岛

西西里及其周边

第一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

（前264—前241）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的罗马和迦太基

公元前265年，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摆在了罗马元老院的面前，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答复前来寻求救援的墨西拿居民代表。

此时的墨西拿正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因为西西里第一强国锡拉库萨（又译叙拉古）已经把进攻的目标定在这里了。墨西拿人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除这一危机，必须依靠外力的帮助。但是，究竟是向迦太基寻求帮助，还是向罗马寻求救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最后，罗马派占了上风，原因在于近在眼前的雷焦。

雷焦现在是卡拉布里亚地方的首府所在地，位于墨西拿海峡的对岸，与墨西拿隔海相望。雷焦与墨西拿、锡拉库萨一样，都是源自希腊人殖民的城市。自从罗马统一了北自卢比孔河南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后，雷焦也进入罗马的保护伞之下。它是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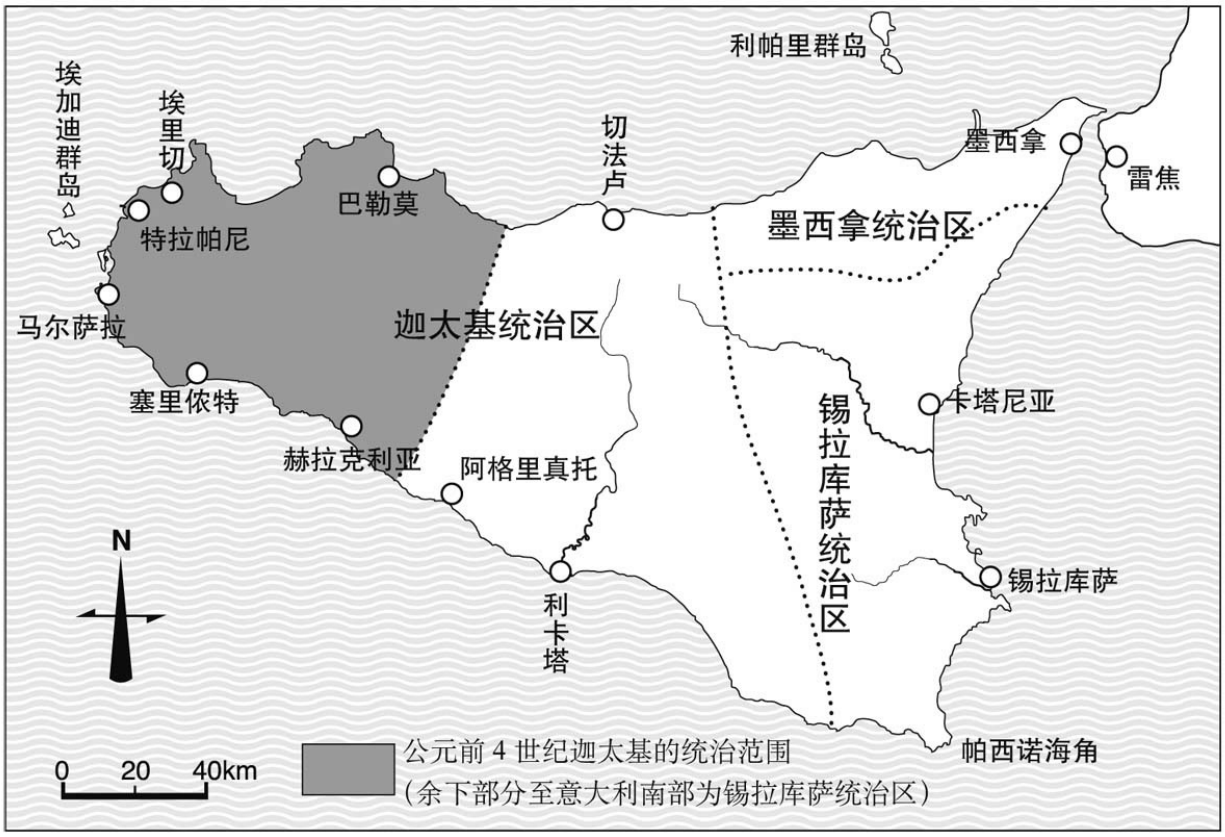
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所以，一抬头就能看到雷焦的墨西拿人选择了放弃迦太基，转而向罗马请求救援。

然而，罗马人却非常犹豫。罗马人尊重法律。如果是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友邦请求救援，他们有义务提供支援。但是罗马和墨西拿没有同盟关系。

更何况，尽管海峡狭窄，但去墨西拿必须横渡大海。罗马军团还未曾有过横渡大海的经历。不要说战船，就是运输船，他们也拿不出来。迄今为止，如果有需要用到船只的地方，港口城市那不勒斯或塔兰托就会作为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代罗马完成使命。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罗马人对于是否要亲自下海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态度。说到底，罗马人终究是一个农牧民族。

但是，如果罗马拒绝墨西拿的请求，无疑，墨西拿会转而向迦太基寻求帮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那个时候，迦太基已经把西西里的西半部分纳入他们的势力之中。此前的西西里历史可以说是希腊殖民城市间冲突不断的历史，迦太基坐收了渔翁之利。位于西西里东半边的锡拉库萨和墨西拿，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冲突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但是，如果迦太基把墨西拿也收入其势力范围的话，情形就会大变，罗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缓冲地。在雅典开始衰落后的这一时期，迦太基是地中海的第一大航海国家。如果迦太基把墨西拿也变成他们的基地的话，不难想象，环绕南意大利的海域的制海权就是迦太基的了。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威胁到以罗马为盟主的罗马联盟各城邦的安全。



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西西里的势力分布图

对于拥有地中海最强大战船力量的迦太基来说，即使罗马人染指墨西拿，墨西拿海峡也不是问题。但是，对罗马人来说，把墨西拿拱手让给迦太基，意味着在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尽管如此，元老院依然难以作出抉择，他们为此破例把这一问题直接交给了罗马的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进行议决。而之前的做法是，元老院首先讨论议定一个政策，再征求市民大会的同意。对于这一次的问题，由享有市民权的人——有义务服兵役的人——所组成的市民大会给出的答案是接受墨西拿的请求。

决定参战的罗马人没有想到，这次交战会引发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正式对决，以至于第一次战争就持续了漫长的23年。

罗马最初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保护连火把都看得清的、近在咫尺的墨西拿，使其不落入强国锡拉库萨或迦太基的手中。只要墨西拿加入罗马联盟，在墨西拿海峡上架“桥”的就是罗马。一旦作出决定后行动迅速的罗马人此时能派往墨西拿的只有一位执政官所统率的两个军团，如果预计到与迦太基之间可能发生激烈对抗，这一军队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第一次布匿战争打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64年，率领罗马军团前去支援墨西拿的执政官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阿庇乌斯是建设阿皮亚大道的倡议人，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这一家族是罗马实施共和政体以来的名门望族，在历史上以主张对平民阶级采取强硬路线而闻名。这一家族的男性都是集傲慢、强硬、不妥协、有先见性、意志坚定、责任感强烈于一身的人，体格也很健壮。在民主政体下，他们绝无可能当选最高权力者。但是，罗马是少数人统治的国家，即寡头政治国家。在市民大会上当选的执政官，如果一人深受民众喜爱，另一个人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受民众喜爱但能力极强的人。事实上，克劳狄乌斯的家族是出现执政官第三多的家族，仅次于同为名门贵族，却深受民众喜爱的科尔奈利乌斯家族和瓦莱里乌斯家族。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到了领军作战的时候就都成了优点。

公元前264年，在执政官任期开始的3月15日，罗马军团在克劳狄乌斯的率领下离开了首都罗马。这是一次急行军，目的地是墨西拿海峡。罗马军团到达雷焦的时候，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友邦城市提供的运输船队已经抛锚等候在雷焦港口。海面上，来自迦太基的舰队正在巡航，他们在监视墨西拿的动态。但是，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下令让一名副官率领一小队士兵，于夜间试验性地渡过海峡。

小部队顺利到达对岸。看到顺利到达的信号——对岸举起的火把后，克劳狄乌斯决定全军浩浩荡荡地于白天横渡海峡。为了避免被急流冲走，容纳了1.7万名士兵的船队挤靠在一起。然而，奇怪的是，迦太

基舰队对此并未加以阻击，而是视而不见。

到达墨西拿后，克劳狄乌斯没有耽搁时间，他马上与前来迎接的市民代表签署了罗马和墨西拿之间的同盟协议。就这样，为了援助墨西拿，罗马军团介入军事行动就出师有名了。

正在进攻墨西拿的锡拉库萨感觉到了来自罗马军团的威胁。同样，驻扎在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也对罗马军团登上西西里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希腊民族国家锡拉库萨和腓尼基民族国家迦太基这两个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中的国家结成同盟军。锡拉库萨军自南，迦太基军自西，分别向罗马军团据守的墨西拿逼近。

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在遭到包围后，没有坐视不理，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他首先向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提出了和谈的要求，遭到了希伦的拒绝。和谈要求遭拒意味着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了。克劳狄乌斯马上指挥罗马军团，向数量上占优势的锡拉库萨军队发起了进攻。

以雇佣兵为主体的锡拉库萨军队完全不是由市民兵组成的罗马军团的对手。城市很快被攻破，僭主希伦率先向南败走。但是，执政官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掉转头，攻打在西边布阵的迦太基军队。向迦太基军开战的理由是他们要攻打自己的同盟国墨西拿。迦太基军队只是为了守卫在西西里的迦太基殖民地而来的，与锡拉库萨军一样，他们一触即溃。

初战胜利后，执政官克劳狄乌斯继续施展他的闪击战。他在墨西拿留下一部分兵力，率领其余兵力向南进军。他的目标是西西里第一强国锡拉库萨的首都。进入锡拉库萨领地后，罗马军团的行军速度不减，一口气逼近了环绕首都的城墙。

这时，冬季来临了。根据当时的习惯，即使在南国西西里，军队也要进入冬季休战期。在罗马，召开市民大会，选举新执政官也在冬季休战的这一时期。公元前263年，当选执政官的是马尼乌斯·瓦莱里乌斯和

奥塔基利乌斯·克拉苏。

马尼乌斯是显赫的贵族，出身于瓦莱里乌斯家族。至于奥塔基利乌斯的名字，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罗马史上。他出身于属于平民阶层的萨莫奈族，所以，之前没见过这个名字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民族曾经是与罗马殊死奋战的对手，从公元前326年至公元前284年，战争持续了整整40年。当然，中间也有过休战期。此时，已经向罗马臣服的萨莫奈人自成为罗马联盟中的一员只过去了短短的20年。好在罗马人是一个热衷于同化战败者的民族，所以他们不仅慷慨地把罗马市民权授予了这个民族的上层阶级，而且在仅仅过去20年后，把曾经的敌人选为自己的最高领导者。对此，我不能不专提一笔，因为罗马人的这一性格，对于走进布匿战争的罗马来说，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

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63年，元老院把瓦莱里乌斯和奥塔基利乌斯都派到了西西里战场。所谓执政官军团，指的是一位执政官指挥的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同时被派去，意味着罗马投入了比前一年多一倍的兵力，也就是四个军团。

一个军团通常由罗马市民兵和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士兵组成。其中，罗马市民兵的数量为步兵4200、骑兵300，来自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兵力与此相等或略少一些。因此，作为战斗单位，“执政官军团”的规模为1.8万到2万人。两位执政官同时出征，意味着罗马军团的战斗人员达到了3.5万至4万人。上一年的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把战场移交给两位继任者后，带着部下的士兵回国了。当时的罗马，每年都要更换总司令官和士兵，因为士兵都是市民，不能让他们长时间地脱离自己市民的生活。

锡拉库萨僭主希伦不是世袭国王。所谓僭主，就是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夺取王位的人。此时的僭主年龄在35岁左右，是一个洞察力很强、又非常现实的人。

希伦不认为地处要冲、防御万无一失的锡拉库萨会轻易被攻陷。他担心的是锡拉库萨在与罗马交战的时候，迦太基会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历史上，希腊民族和腓尼基民族长期交恶，所以，此时的希伦，与墨西拿一样，必须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作出选择。

希伦派出使者来到罗马军阵营要求和谈，罗马两位执政官接受了这一意外收获。和谈条件由罗马方面提出，内容不仅简单而且宽厚至极，让人很难相信对方是因大军逼近城下不战而降的敌人。

第一条：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15年为期，若无异议，则无限期更新。

第二条：罗马尊重锡拉库萨完全的自治权。

第三条：锡拉库萨有义务优先向罗马出售小麦。

第四条：锡拉库萨不承担向罗马联盟军提供士兵的义务。

第五条：作为赔偿金，锡拉库萨向罗马支付100塔兰特。在和平条约生效之时，首先支付25塔兰特，余下部分在15年内分期付清。

锡拉库萨僭主希伦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坚守与罗马之间结成的同盟关系，即使在罗马陷入困境的时候，不仅没有背叛罗马，而且还倾力提供支援。和罗马之间的同盟，对于现实主义者希伦来说，不是被逼，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政治选择。锡拉库萨在以后的50年间，充分享受到了和平与繁荣。

至此，罗马完全可以结束战争了。

首先，墨西拿作为罗马联盟的一员，已无须再担心海峡的狭窄。其次，西西里强国锡拉库萨也成了罗马的同盟国。位于西西里东部的两个主要城市——墨西拿和锡拉库萨——加盟罗马联盟，意味着西西里东部

的海岸线和意大利本土的海岸线一样，因有罗马的友邦国家存在而得到了巩固。罗马意图巩固意大利南部边境的最初目的已经达成。事实上，在与锡拉库萨签订和平条约后，罗马已经撤回了两个军团。留在西西里的只剩下了另两个军团，在西西里的战斗力大为减弱。

与此同时，迦太基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压力。罗马与锡拉库萨建立同盟不只是挫败了迦太基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在西西里势力的企图，他们还担心自己在西西里的既得权利也会受到侵犯。于是，迦太基决定与西西里阵线一战。他们派出了超过4万人的海陆大军，在位于西西里南端的阿格里真托登陆。与迦太基本国隔海相望的阿格里真托成了迦太基进攻罗马的前哨阵地。

至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正面冲突正式揭幕，历史进入了布匿战争时期，“布匿战争”的意思是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争。

在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前，罗马与迦太基并非没有打过交道。

史料表明，两国第一次签订条约是在罗马实施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508年。该条约规定，迦太基允许罗马船只在西西里西部及非洲北岸靠港，不允许在其他港口靠港，即便是为了躲避暴风雨也不行。同时，罗马有权决定是否让迦太基船只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拉齐奥地区的港口靠港，但无权过问迦太基船只在其他地方的港口靠港。

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罗马实施共和政体初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考虑到罗马与已是大国的迦太基之间的力量悬殊，签订这样的条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料还表明，两国之间的第二个条约是在罗马称霸意大利中部时期的公元前348年缔结的。该条约规定，迦太基禁止罗马和罗马联盟的所有加盟国在撒丁及科西嘉以西的西地中海全域进行通商。条约明确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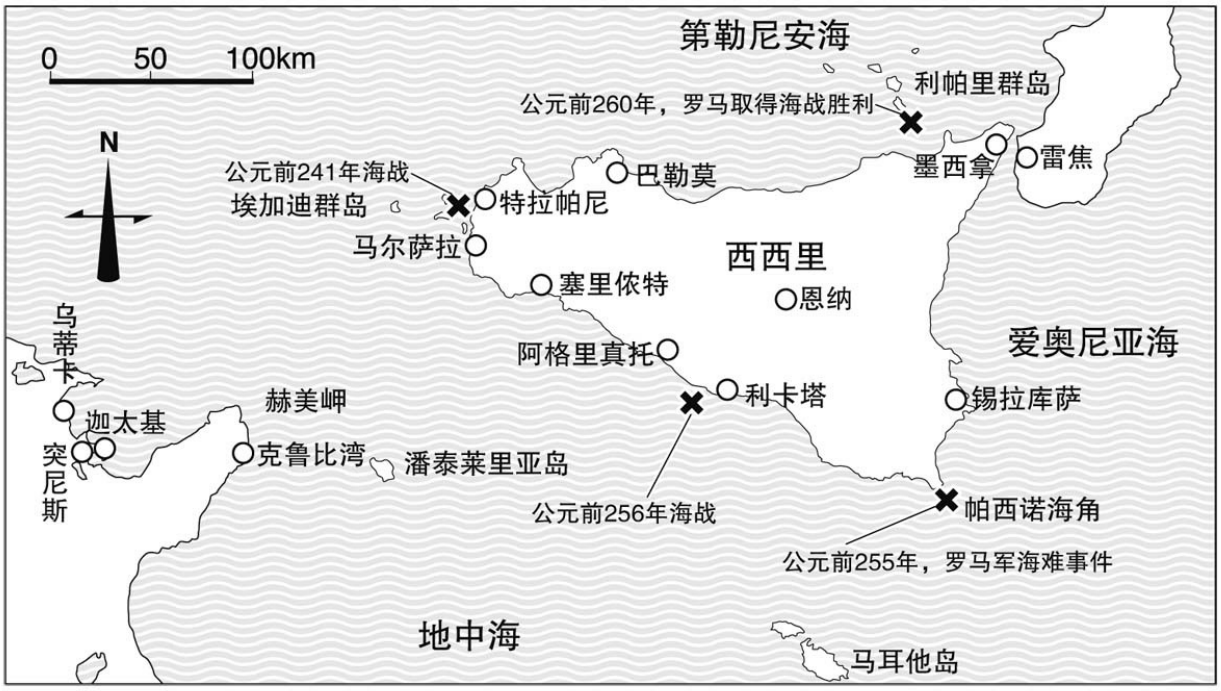
定，迦太基承认罗马在位于这两个岛与意大利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从托斯卡纳到坎帕尼亚地方的港口的主权。但是，迦太基在其他地方的通商权为迦太基的自由行为。

这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据说，当时的迦太基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迦太基的允许，罗马人在海里连手都不能洗。"这反映出了当时两国之间实力悬殊的状况。

话虽如此，作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在当时要处理的陆地上的事情有很多，还无暇顾及海上的事情。事实上，罗马甚至没有可以称之为船的运载工具。

罗马元老院意识到和迦太基之间的对决绝非易事，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到了第三年的公元前262年以后。由于墨西拿和锡拉库萨已经成为自己的同盟，所以元老院以为西西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没料想，就在这个西西里，来自迦太基的4万士兵登陆了。而此时，罗马留在西西里的士兵只有区区1.5万人。

位于西西里西南部的阿格里真托和那不勒斯、塔兰托、锡拉库萨及墨西拿一样，都是公元前8世纪在地中海开展希腊人殖民运动时期建起来的城市。即使是现在，依然以其宏伟的神殿遗迹闻名于世。虽然实力不及锡拉库萨，但是在其鼎盛期早已过去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时，作为城邦国家，那里的人口也达5万之多。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加入迦太基的阵营由来已久。当时的西西里岛分为两大部分：东部有浓重的希腊色彩，西部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阿格里真托属于西半部分，但是，处在靠近分界线的位置上。认为西西里西半部分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迦太基，把前哨阵地设在了阿格里真托。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舞台

当得知迦太基大军登陆阿格里真托的消息后，元老院决定再次派出4个军团前往西西里。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团包围了阿格里真托。但是，随后展开的战况并不乐观，因为两位执政官都是平庸之才。由于不熟悉地形，储藏粮食的地方遭到了敌人偷袭。如果没有希伦的援军从锡拉库萨及时赶来，罗马军团会比困守在阿格里真托的迦太基军队更早断绝军粮供应。

值得庆幸的是，罗马军团的失误却因迦太基军队不善抓住机会而得以弥补。与罗马军队一样，由雇佣兵组成的迦太基军队同样缺少善于用兵的统帅。就这样，战况开始一点点地向有利于罗马方面转变。

这一年的12月，对战局出现厌倦情绪的迦太基士兵乘着夜色逃出阿格里真托，逃回了安全的马尔萨拉。几天后，留下的当地居民打开了阿格里真托的城门。作为胜利者，罗马军队进城后大肆掠夺，多达2.5万人的当地人被逼为奴。锡拉库萨市民以赊账的方式买走了罗马军队出售的大部分奴隶，并让他们回到阿格里真托。罗马军队在阿格里真托的所

作所为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让原本徘徊在投靠罗马还是继续与迦太基站在一起的其他城邦的态度变得坚定起来。出生于阿格里真托的非利努斯正是因为罗马军队的野蛮行径而成为反罗马阵线中的一员。他是记录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人之一。

长期以来，无人质疑阿格里真托是迦太基势力范围中的一个城市。它的陷落使罗马再难回头，只能继续向前。也就是说，罗马必须与从未想过要放弃西西里岛上既得权利的迦太基进行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一定是罗马和迦太基中的一方取得在西西里的全面霸权，否则争战将永无止境。就这样，第一次布匿战争在西西里战场上展开了。

第二年，即公元前261年，罗马和前一年一样，向西西里派去了两位执政官以及统率的四个军团。这一年，罗马军队凭借攻陷阿格里真托的势头所向披靡，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攻占了迦太基领地内的西西里各城市。但是，战果仅限于西西里的内陆地区，始终未能染指沿海城市。即使从内陆向沿海城市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也很难保卫胜利果实。因为这些城市得到了来自迦太基的支援。

罗马很清楚，只要不切断来自迦太基的补给线，就不可能实现称霸西西里的目标。就在这一年，农牧民族罗马人终于领悟到控制海洋的重要意义。

罗马人在陆地某处取得胜利后总是把这个地方作为要塞，建设殖民城市，并通过铺设连接这些城市的公路，建立防御网。既然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很快意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性。

但是，要得到并保证制海权在手，没有海军不行。当时的罗马没有一艘战船，更不用说可以与迦太基战船相抗衡的蓬特型战船了。加盟罗马联盟的海港城市拥有的战船，充其量也只有三层桨战船。因为希腊人的战船即使在雅典最鼎盛的时候，也只是三层桨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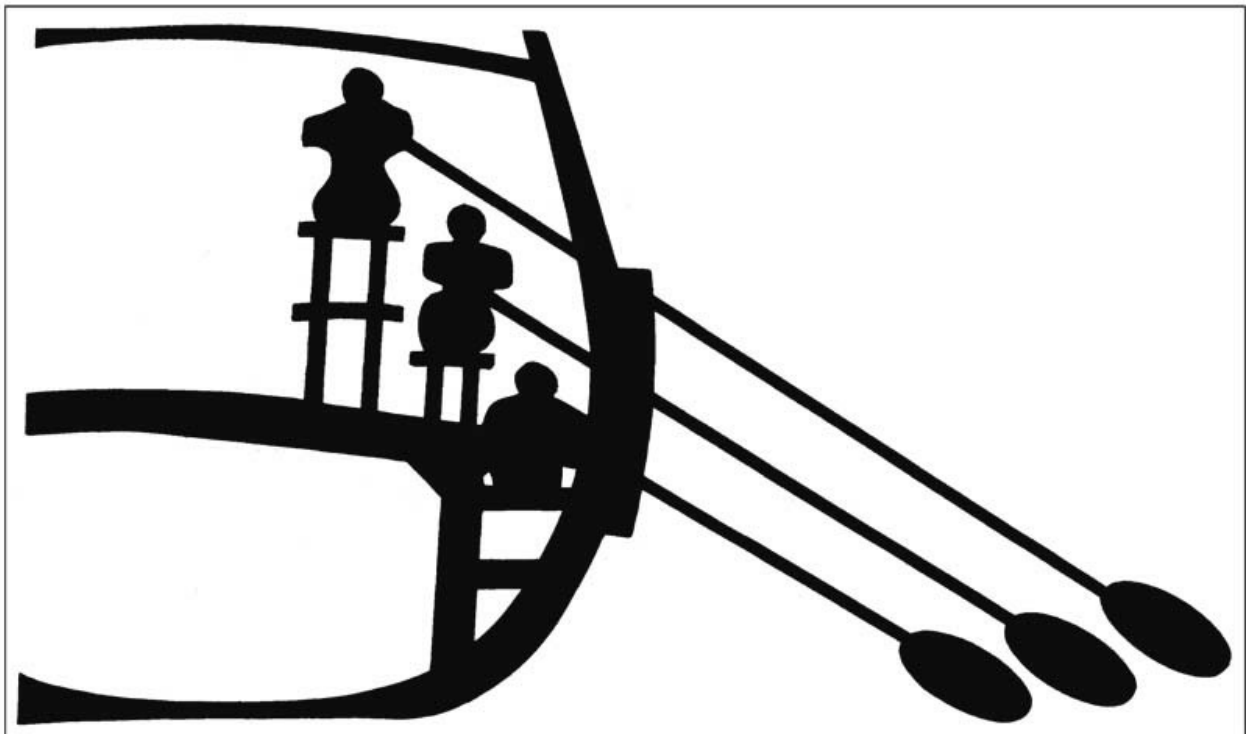
三层桨战船的特点是，划桨手一人持一根桨，并排坐在与船底平行的错落有致的三层台阶上划动船只，所以叫三层桨战船。蓬特型战船却有五层。

古代的战船和中世威尼斯的战船都是大的划桨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古代战船上划桨手一人划一根桨，中世威尼斯的战船上三个划桨手同划一根桨。第二个不同之处是，古代战船的划桨手位于甲板下方，中世威尼斯战船的划桨手并排坐在甲板之上。原因是威尼斯人口稀少，当战斗发展到近身战的时候，划桨手也要放下手中的桨，投入战斗。在威尼斯战船上，士兵的数量一艘最多只有40人。

在古代，划桨手不需要参加战斗，因此，战船上参加战斗的士兵数很多。

在需要100个划桨手的三层桨战船上，士兵数是100人。在长度和高度都要大很多的蓬特型战船上，划桨手达300人，相应的，士兵的数量也达300人。

在特拉法加海战发生以前，尽管都是海战，却常常不得不以近身战来决出胜负。因此，从高处向低处进攻显然更加有利。蓬特型战船与三层桨战船相比，划桨手坐的台阶有五层，所以船身自然要高。而且，三层桨战船的划桨手人数只有100人，与此相比，蓬特型战船的划桨手人数达300人。这就意味着，蓬特型战船的马力相当于三层桨战船的3倍。



三层桨战船的断面图

拥有多达120艘蓬特型战船的迦太基自然而然地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

如果要在海上与迦太基进行较量，罗马必须有自己的蓬特型战船。既然无法依靠罗马联盟中只有三层桨战船的海港城市，那么，罗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自力更生建造蓬特型战船。

没有任何造船经验的罗马决定仿造迦太基的船。他们的手中有迦太基的蓬特型战船，是在第一次横渡墨西拿海峡时缴获的。罗马人拆卸了这些船只，然后再组装起来，开始了通过模仿建造出自己的战船。

就这样，罗马有了自己的战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如何训练海战士兵。罗马市民虽然坐过河船，但从未坐过海船。在那不勒斯等海港城市市民的指导下，罗马市民首先在陆地，用模型叫着号子练习划桨。这和现在的大学划艇俱乐部训练新会员时使用的方法基本相同。我不清楚，罗马市民经过训练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但是，至少罗马

有了自己的划桨手。至于张帆和掌舵，就全靠同盟国中的海港城市提供支援了。

第二年春天，罗马船队迫不及待地下海了。对此，不能不说罗马显得过于急躁。话虽如此，由100艘蓬特型战船和200艘三层桨战船组成的罗马第一支海军就这样诞生了。

担任船队指挥的是后来的名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祖父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在陆地不乏实战经验的他，指挥海军这是第一次。不，应该说，在没有一位海战指挥经验将领的罗马，无论对谁来说，这都是第一次。这一年，罗马把两位执政官都派往了西西里战场，海军就交给执政官之一的西庇阿指挥，另一位执政官杜伊利乌斯统率陆地上的军队。

但是，海运国家不是一日建成的。从陆地一路南下的军队顺利到达了墨西拿。与此相对，从海上南下的海军，船只始终无法统一步调，拖拖踏踏，行进非常缓慢。

执政官西庇阿乘坐的战船行驶在船队的最前面。在等待其他船只的时候，他决定乘机实施一项计划。他带着已经跟上来的17艘战船，前去攻打利帕里岛。他认为只要占领了这个岛，从罗马到西西里的海路将畅通无阻。

利帕里只是一个小岛，所以攻取它易如反掌。但是，西庇阿的这一行动被身在巴勒莫的迦太基海军将领获悉。迦太基不愧为海运大国，他们深知利帕里岛在战略上的意义，马上派出20艘战船前去夺回利帕里岛。

迦太基人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怎样的战术。到达利帕里海面后，迦太基舰队于当天夜里封锁了这里的海港出入口。第一天一早，罗马士兵在停靠的港口船上醒来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只能是二者选其

一：要么不战而降，要么弃船逃跑。一些罗马士兵逃进了山中，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大部分人则被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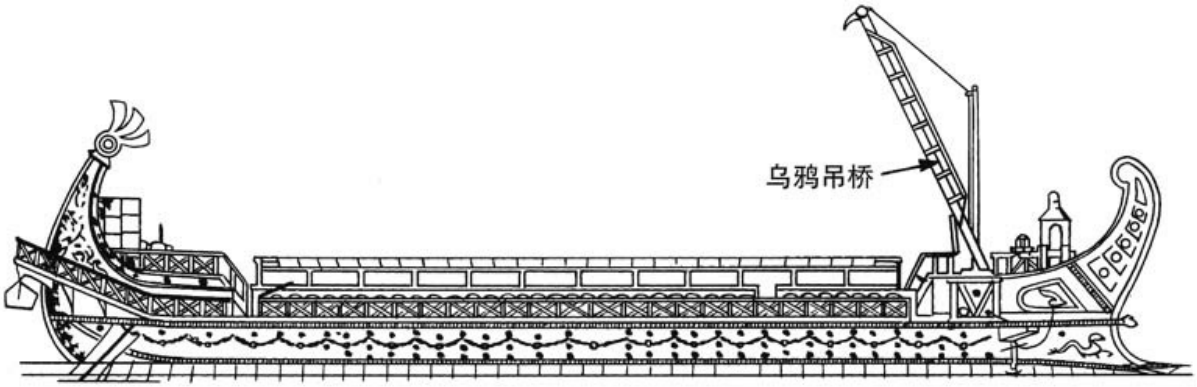
还未开战就成了俘虏的执政官，不久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换俘虏时回到了国内。好在罗马从不惩罚败将，6年后，他再次当选执政官，再次回到西西里前线。

虽然总司令官被捕，但是随后跟进的舰队没有损失一艘，全部顺利进入墨西拿港口。这要归功于迦太基舰队。他们抓到罗马执政官后，认为应该优先把敌人的重要人物护送到巴勒莫，于是放松了对利帕里周边海域的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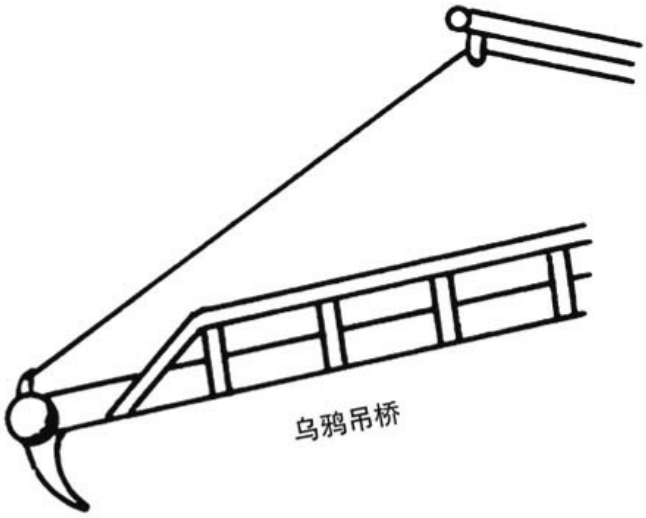
担任陆地指挥的执政官杜伊利乌斯兼任了海军指挥。他与西庇阿一样，对大海一无所知，但是，因为到达西西里的时间较早，他有时间收集前线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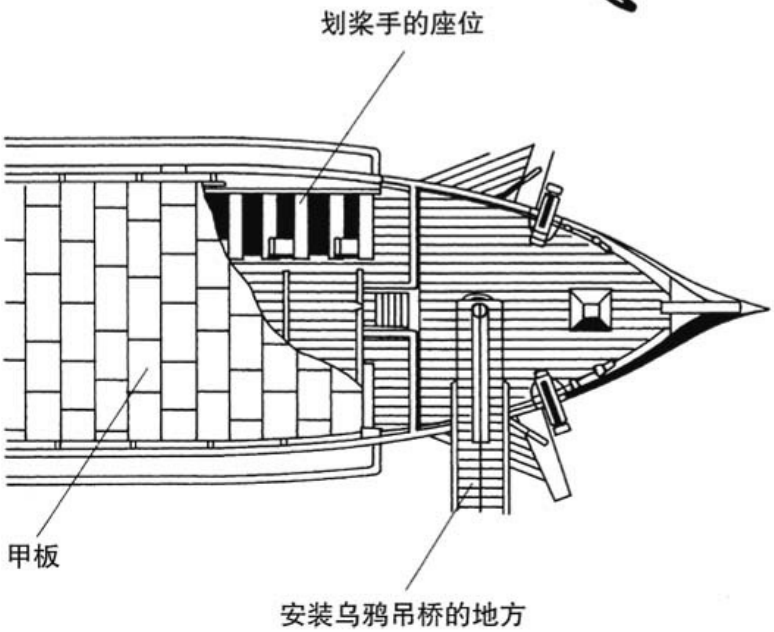
执政官杜伊利乌斯想，虽然自己拥有与迦太基一样的蓬特型战船，但是在海上，罗马肯定不敌迦太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在船上安置一种新式装备，罗马士兵称它为“乌鸦吊桥”。这是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使用过的战场装备。

所谓“乌鸦吊桥”，是用绳索固定在离船头最近一个帆杆上的一种接舷吊桥。待船头靠近敌船时，解开绳索，“乌鸦吊桥”会直接落在敌船的甲板上。吊桥的前端是锋利的铁钉，因下落的惯力，扎进敌船的甲板，从而得以固定。随后，罗马士兵顺着“乌鸦吊桥”，蜂拥进入敌人的舰船。对操纵船只没有信心的罗马人，利用“乌鸦吊桥”，把自己不擅长的海战变成了自己最擅长的陆战。这种“乌鸦吊桥”还可以移动，最大可以转动180度。无论敌船在左侧，还是右侧，只要能成功接近敌船，就可以发挥出它的威力。



罗马军舰





能想出“乌鸦吊桥”这样的装备，是因为罗马人没有海运的传统。因为海运国家的船员，除了在船只操纵方面自信满满，对船只的美观也很看重。当所有帆扬起，帆船呈现出来的美，让这些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大海的男人们备感自豪。对他们来说，“乌鸦吊桥”这样的怪东西安装在帆杆上，是对大海和船只的亵渎。但是，罗马人从来也不是大海之子，他们不会在乎船只是否好看。

在所有船只装备好了“乌鸦吊桥”后，执政官杜伊利乌斯率领全体船队，离开了墨西拿。他们得到消息，说迦太基舰队的100艘蓬特型战船已经离开巴勒莫，正向墨西拿进发。

两支舰队在米拉佐海面相遇。这是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海战。从战船的数量上看，迦太基是罗马海军的1.5倍。从两军对船只的操控能力上来看，两者的差距就连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

罗马海军无论如何也无法使战船排成一条线，引得早早已经排好阵容的迦太基舰队传来阵阵嘲笑声。随着两军船队的越来越近，嘲笑声也越来越高。看到罗马战船的帆杆上像蝉一样的怪物，迦太基士兵忍俊不禁。

但是，好不容易排成一条线，不，实际上依然凌乱不堪的罗马舰队刚开始向迦太基舰队发起进攻，迦太基士兵脸上的笑意顿时跑得无影无踪。

罗马战船完全不顾撞断船头的危险，向迦太基船只猛撞上去。接着，“乌鸦吊桥”纷纷落下，发出一声声巨响。顺着已经嵌入迦太基战船甲板的“乌鸦吊桥”，罗马士兵蜂拥而至。他们是罗马军团的核心力量——重装步兵团。与这样的对手进行肉搏战，迦太基军的雇佣兵们全然不是对手。由于罗马海军把海战变成了陆战，迦太基向来引以为傲的船只操控能力得不到发挥。可见，把“扬我所长，克敌所短”的战术在海上一样可以通用。

战斗在罗马方面占优势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结果，迦太基方面多达15艘战船沉没海底，30艘被捕获，其中包括迦太基海军总司令官乘坐的旗舰。总司令官逃到传令用的快艇上跑了，从而得以逃脱被捕的下场。这次海战中，迦太基方面阵亡3000人，俘虏达7000人。据说罗马方面的损失非常小，甚至不值得一提。就这样，迦太基派往西西里的海军在米拉佐海面与罗马的第一次海战中损失了三分之一。

捷报传到首都罗马，罗马市民欢天喜地。战战兢兢地首次下海的罗马海军与地中海最强大的迦太基海军交锋，并取得了胜利。获胜的将军杜伊利乌斯命令部下用白色大理石制作纪念碑，以纪念这次海战的胜利。他命人在纪念碑圆柱的两侧分别嵌入缴获的迦太基战船的船头，并把它送往了罗马。罗马人把它立在古罗马广场的中心，庆祝海战的胜利。在布匿战争的第五个年头，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

所谓持久战，不是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战斗。持久战同样有冬季的自然休战期。除此之外，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停战的年份。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于公元前260年取得了米拉佐海战的胜利。在此之后的两年间，即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8年，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了。但是，罗马并未就此罢手。此时的西西里已经一分为三。锡拉库萨扎根东南部，罗马占据了东北部和中央地带，迦太基则不断向西部退去。与布匿战争开始前相比，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明显减弱。公元前257年，罗马又迎来了第二次海战的胜利。

这次海战的战场在西西里北部巴勒莫附近的海域，现为西西里首府所在地的巴勒莫，与位于西西里西岸的海港城市特拉帕尼和马尔萨拉一样，都是迦太基控制下在西西里的城市。因为这次海战在对方的城市附近，所以罗马海军的行动范围大了许多。在这次海战中，罗马又赢得了战斗。迦太基方面损失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应该没有米拉佐海战时的损失大。无论如何，这已经让罗马人在海上树立起了足够的信心，罗马决定把战场从西西里延伸到迦太基。攻打非洲，海军不可或缺。也许两次

海战的胜利让罗马认为自己俨然已是一个海上强国了。

这年冬天，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以及那不勒斯、雷焦、墨西拿，造船工人夜以继日地建造战船。他们需要造出是以往两倍数量的战船，迦太基获悉了罗马意图后，其造船厂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迦太基为了捍卫海上强国的荣誉，不能允许有一个罗马士兵踏上非洲的土地。

公元前256年春季来临的时候，罗马新造的230艘战船下水了。迦太基也有250艘战船驶入大海。两支军队新造的所有战船都是蓬特型战船。如此众多的战船投入到一个海域中，这在地中海的海战史上是前所未闻的。

此时的蓬特型战船乘员数是划桨手300人，士兵120人，船员100人，每一艘都超过500人。按230艘战船计算，人数将近12万。而且，这还不包括运输船上的人员。公元前256年，罗马的两位执政官领命共同指挥这支海军。第一次远征非洲，罗马投入了其全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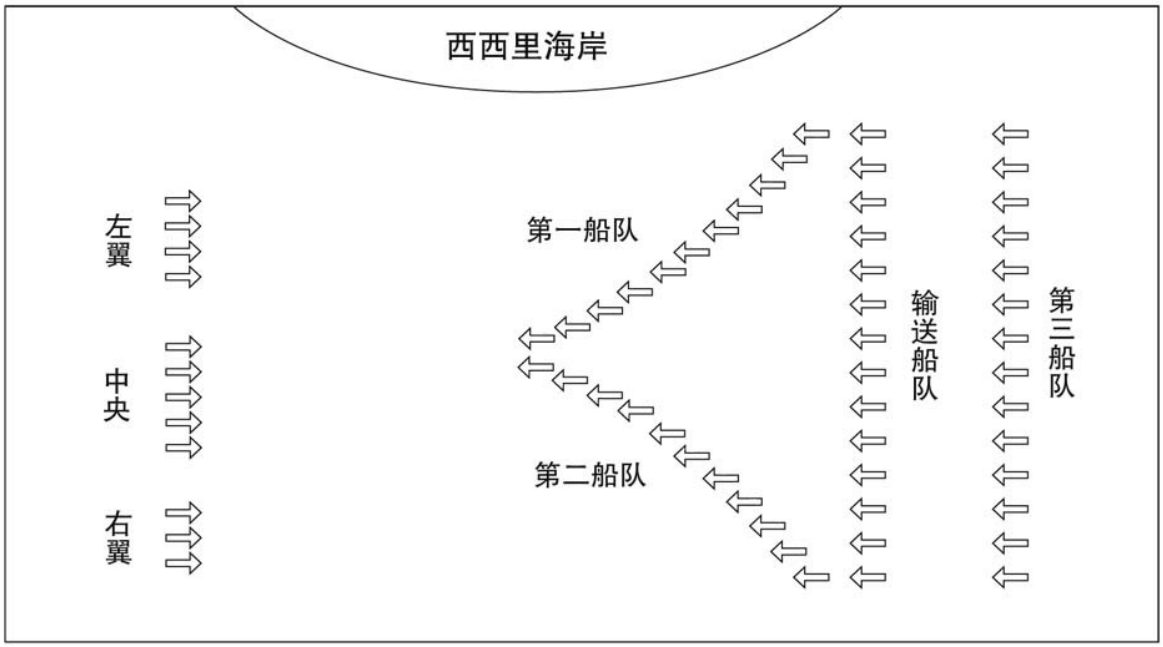
罗马舰队离开墨西拿港时，船上只有划桨手和船员。士兵走陆路，相约绕过西西里南端的帕西诺海角后，在埃克诺穆斯（现在的利卡塔）与船队会合。

为了阻挡罗马的进攻，迦太基舰队此时已经到达马尔萨拉。当接到罗马舰队正向利卡塔进发的消息后，他们离开马尔萨拉，驶向东南方向。迦太基舰队计划赶在罗马士兵登上战船之前，到利卡塔攻击只有船员而未载士兵的罗马舰队。然而，罗马人的行动比他们更快。

待到摆好阵型的迦太基舰队出现时，罗马士兵早已登上战船，正准备沿西南方向向非洲前进。此时，罗马的战船共计230艘，迦太基250艘。在这250艘战船上，迦太基船员充分展示了他们对船只的熟练操控能力，舰队采用了海战中常用的弓形阵型，分左翼、中央、右翼三队，同时向罗马舰队直逼而来。

面对迦太基舰队的进攻，指挥罗马舰队的两位执政官采用了前所未闻的圆锥形阵型迎战。

罗马执政官雷古鲁斯和乌尔索乘坐的两艘旗舰行驶在队伍的最前面。超过全部战船三分之二的160艘蓬特型战船，分两队紧随其后，向左右斜向直线排开，形成圆锥的左右两条边。两艘旗舰是圆锥的尖头，直指敌阵。在相当于圆锥形底边的海面上安排了速度较慢、又没有士兵的运输船队。运输船队的后面是第三船队，负责保护运输船队。相当于后卫的这个船队共由70艘战船组成。



利卡塔海战

在两艘旗舰的带领下，罗马第一和第二船队向敌人的中央发起了进攻。受到罗马舰队的突然袭击，迦太基舰队的中央船队没能支撑多久，很快开始后退。与此同时，迦太基军的左右翼则向罗马舰队发起了进攻。左翼攻打行动滞后的罗马运输船队，右翼直逼罗马的第三船队。对操控船只充满信心、在数量上也占优势的迦太基采用了先隔离罗马舰队的各个船队，再各个击破的战术。就这样，利卡塔海面的这场海战，战

场被分割成了三块。战斗按迦太基方面预想的方案打响。

但是，罗马第一和第二船队攻势之凌厉超出了迦太基的预计。同时遭受两个船队进攻的迦太基的中央船队开始败退，罗马舰队并没有乘胜追击。在赶走敌人的中央船队后，罗马第一船队的80艘战船掉转船头，赶来支援在迦太基左翼的攻势下苦苦支撑的运输船队。同样，第二船队的80艘战船也掉头回到了第三船队正在作战的海域。迦太基军的左右翼都受到了前后夹攻，陷入困境。右翼船队作战的海域较开阔，因此得以逃脱。但是，左翼船队作战的海域靠近陆地，被罗马船队围住后，没有了退路，最后全军覆没。船只或沉入海底，或被对方捕获。

战斗结果，罗马方面有24艘船沉入大海，迦太基方面有30艘沉入海底，63艘被捕获。第三次海战，迦太基又输给了罗马。

迦太基于是摆出了背水一战的架势，从利卡塔海战中逃出来的157艘战船准备在面向迦太基首都的海面上与罗马军队决一死战。但是，罗马方面并不贪恋海战。已经逼近非洲北岸的罗马军队，绕开敌军舰队整装待发的迦太基海湾，在位于迦太基海角东侧的克鲁比湾登陆。罗马军队攻占克鲁比湾后，就把非洲战场的大本营设在了这里。补给来自西西里，由三败迦太基舰队的罗马海军负责。此时，位于西西里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岛屿——马耳他和潘泰莱里亚都已经被罗马军队攻占。

这一年，罗马军队在登陆非洲后，依然所向披靡。短短时间内，罗马军队就降服了克鲁比湾周边的诸多城市，来自迦太基本国的军队也被击退。罗马军把这些战斗的胜利果实——多达2万人的俘虏送到了罗马。

大概是罗马因此对战况非常乐观，刚入秋，罗马元老院就下令执政官中的一人带着一半以上的士兵回国。按规定，现任执政官要主持冬季举行的、选举下一任执政官的市民大会。所以，这次召回一位执政官，应该就是为了此事。罗马军团是由市民兵组成的，因此，一年更换一批

士兵，一定令这些市民兵们异常高兴。就算是第一次海外远征，罗马人依然要按惯例行事。

在非洲越冬的是执政官雷古鲁斯属下的1.5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以及40艘战船和船员们。冬季的驻军地就设在现在的突尼斯附近。之所以把冬季的驻军地从安全的克鲁比湾转移到距离迦太基更近的突尼斯，是因为来年春天攻打首都迦太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友军到来了。

罗马把冬季驻军地安置到了迦太基的首都附近，这让迦太基政府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决定求和，向执政官雷古鲁斯派出了和谈使节。雷古鲁斯接受和谈的请求，提出了如下条件：

第一，迦太基撤出西西里和撒丁两岛；

第二，解散海军，战船交予罗马。

迦太基认为这两个条件过于苛刻，于是拒绝接受。敌人虽然逼近首都，但是迦太基的海军和陆军实力尚存，未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为了备战来年春天必定打响的战斗，迦太基聘用了雇佣兵首领赞提帕斯，他曾经在埃及和叙利亚参加过战斗，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斯巴达人。

迦太基军队有一个惯例，士兵和中下层指挥官由外国的雇佣兵担任，但是，总指挥权掌握在迦太基贵族的手中。尽管他们聘用了声名显赫的雇佣兵首领赞提帕斯，也没有打算改变以往的做法。但是，来到迦太基的斯巴达武将，在视察了迦太基军后，认为和这样一支军队共同作战，等不到拿佣金，自己和自己手下的性命就已经不保了。于是，他向雇主迦太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迦太基败于罗马，不是士兵的原因，而是指挥官的责任。听了这样的评价，因连战连败而信心全无的迦太基贵族伤到了自尊，他们负气地回答说："既然如此，你来指挥好了。"

赞提帕斯也不推辞。翌日，他就开始了对迦太基军队的训练。与此同时，他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战术。为确保大象战队，还雇佣了努米底亚骑兵。新年过后，适合作战的春季一到，这位斯巴达将军就向罗马军发起了挑战。

执政官雷古鲁斯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他没有等友军到来就接受了敌人的挑战。

所谓寡头政体，和议会制、民主政体很相似，不同的只是它不需要通过选举。寡头政体要想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为位居领导层的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在国家政坛的第一线大显身手。

这种体系好处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首先，作为军队总司令官，执政官总是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可以收获战果。只要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就是凯旋将军，回到国内就可以举行凯旋仪式。对罗马人来说，能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如果执政官在任期内，作为军队总司令官虽然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却因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斗发生在下一任执政官任期开始以后，也就是3月15日以后，他就不能享受这一胜利果实。享受这一战果的是下一任执政官。这就使得执政官更愿意速战速决，更容易急功近利。这一缺点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更加暴露无遗。此时，执政官雷古鲁斯想的就是要在下一任执政官到达非洲之前结束战斗，获得战斗的胜利果实。

非洲的春季比意大利来得早。公元前255年，春季刚到，迦太基军队就出征了。步兵1.2万人、骑兵4000人，以及大象100头。军队的规模只能算中等，但是，担任总指挥的是斯巴达人赞提帕斯。接受挑战的罗马军，其战斗力是1万名步兵加500名骑兵。罗马军的核心力量是重装步兵，都是精锐，但是没有大象。

古代大象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战车。大象手骑在象背上指挥大象，三四名士兵在立于象背的高台上坐着进攻。所以，这场战斗，雷古鲁斯

指挥下的罗马军无论多么精锐，多么勇敢，多么顽强，首先在步兵的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骑兵也只有敌人的八分之一。更要命的是，罗马军一辆“战车”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指挥官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或许战况会以另一种形式展开。遗憾的是，雷古鲁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统将领，信奉的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与敌面对面决战。

在距第一次布匿战争第10个年头的初春，罗马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仅仅有2000人成功逃到了有海军守卫的克鲁比，战场上留下了多达8000具的罗马士兵尸体，包括执政官雷古鲁斯在内的500名罗马士兵成了迦太基的俘虏。

两位新任执政官在离开罗马前往非洲途中得知了这一消息，此时他们已经到了锡拉库萨。尽管知道情况有变，他们依然坚持率军向非洲进发，因为他们不能不管还在克鲁比的7000名罗马士兵和40艘战船及船员。

迦太基方面因为陆战的胜利而士气正旺。当得知罗马军队前来的消息，他们决定与对手展开第四次海战。只要能够在这次海战中取得胜利，那么，西西里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制海权就会重回迦太基的手中。

赫美岬（现在的卡本半岛）位于迦太基的东北方向，距离迦太基海湾较远。就在赫美岬海面上，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四次海战打响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者又是罗马人。迦太基共失去了114艘战船，有的沉入海底，有的被烧毁。究其原因，大概是随着海军大国希腊的衰退，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迦太基失去了竞争对手，没有再遇到过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敌人。一支军队如果久疏战阵，自然会缺少实战经验，实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虽然仍是航海国家，却已经不再是海军强国了。

第四次海战的胜利没有让罗马的两位执政官滋生骄气。他们率领罗马舰队进入克鲁比湾港口后，带上在那里的所有罗马人和同盟国士兵，准备扬帆撤回西西里。从前线驻地撤出意味着他们承认非洲作战的失败。

就在他们快要抵达西西里南岸时，狂风暴雨向他们袭来。前方是连绵不绝的海岸线，没有可供船只停靠的港口。在这种情况下，船只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尽可能远离海岸。

罗马舰队的舵手来自罗马联盟加盟国中的海港城市。他们深知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时如何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不幸的是，不了解大海的罗马将军们完全听不进去他们的意见。

在一眼望不到陆地的海面上，船只在暴风雨中颠簸不定。恐惧到极点的罗马人命令船员向海边靠拢。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所有船只一起靠岸，不得分散。船员们自然不服，极力争辩。然而，争辩无效。试图向毫无经验的人作出解释只能是浪费时间。更可悲的是，没有经验的人还位居指挥官之职，是发号施令者。最后，由230艘战船组成的罗马舰队在急风暴雨的咆哮声中从茫茫大海上不顾一切地向海岸靠去。

就这样，地中海史上最大的海难事件发生了。230艘战船不是冲到岸上，就是相互碰撞。最终回到锡拉库萨港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80艘。据说在船只靠岸的海域一带堆满了随波漂来的尸体。这次海难事件使罗马损失了6万人。两位执政官侥幸脱身，因为他们乘坐的是旗舰，船员的技术格外过硬。罗马人尽管赢得了海战的胜利，却未能战胜暴风雨的袭击。他们终究不是一个有航海传统的民族。

获悉这一消息的罗马国人悲痛万分。就在他们为死难者表示哀悼时，迦太基人却欣喜若狂。

这一年，罗马人在悲痛中迎来了冬季，也迎来了来自迦太基的和谈

使节。迦太基认为，对他们来说，此时正是和谈的最佳时机。随和谈使节同来的是被捕的雷古鲁斯。他的任务是帮助迦太基游说罗马元老院，争取让罗马全面放弃西西里。这也是迦太基提出的和谈条件。当然，他们也要求雷古鲁斯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说服元老院都要回到迦太基。

然而，前执政官雷古鲁斯到了罗马后，完全无视在场监督他的迦太基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他说出了与迦太基的希望截然相反的话。他不仅没有游说元老院与迦太基签署和平条约，反而劝说他们不要与迦太基讲和。

因为进攻非洲失利，再加上空前的海难事件，元老院议员们正深感意志消沉。他们听懂了雷古鲁斯的真实想法，明白如果此时答应和谈，那么之前的所有牺牲都将成为徒劳。而且，他们也没有忘记墨西拿海峡对岸的迦太基的威胁，因为他们的气焰又开始变得嚣张起来。

罗马元老院拒绝了迦太基的和谈请求。守约回到迦太基的雷古鲁斯被塞进一个圆形笼子，在大象的脚下像足球一样被踢得滚来滚去，最终惨遭虐杀。

迦太基方面提出和谈要求时自认为可以控制局面，因此提的是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可见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士气也极高涨。他们甚至觉得雇佣兵队长赞提帕斯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解雇了这位斯巴达将军。决心依靠军事力量彻底称霸西西里的迦太基，向西西里送去了曾在与罗马军的战斗中显示出巨大威力的140头大象。

公元前254年春天，罗马军队兵分海、陆两路，在两位执政官和两位前执政官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西西里进发。与此同时，迦太基的象队已经抵达西西里西部的马尔萨拉。

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是西庇阿。在罗马刚刚成立海军的那一年，他在利帕里岛被迦太基抓获，又在两国交换俘虏时回到罗马。两位前执政

官都是发生在西西里南岸的海难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他们拒绝听从船员们的劝告，所以他们难逃其责。罗马启用曾经的被俘者和海难事故的责任人担当指挥，不是为了给他们挽回名誉的机会，而是相信他们会从曾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乍一想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前一年见识到大海威力的这两个人，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再次执掌了海军指挥权。

这一年，罗马像变戏法似的，在短短的3个月里就有多达220艘船下水。而在10年前，这个国家连一艘战船都没有。这200多艘新船和前一年的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80艘战船，在两位前执政官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着西西里北部进发了。

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也从墨西拿出发，开始向西行进。罗马方面的目的是在迎战迦太基海陆军进攻的同时，攻占迦太基军队在西西里的根据地——巴勒莫。

发起攻势的迦太基军士气高涨，但是战绩并不令人鼓舞。原因是他们的海陆军联合战线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与此相反，罗马方面就像二人三足一样，互相配合，气势逼人。他们早早攻占了位于墨西拿和巴勒莫之间的切法卢，保证了来自墨西拿的补给线。同时，来自罗马联盟的同盟国锡拉库萨的另一条补给线，通过位于西西里中部、与罗马结盟的恩纳，也可以发挥作用。

现在的巴勒莫是西西里的首府，在当时，它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根据地。正因为如此，要攻占它并非易事。罗马军最终攻陷巴勒莫，已经是第二年的事了。当时，巴勒莫居民有两派，一派亲罗马，一派亲迦太基。最终，亲罗马派占了上风。罗马军队在这些人的引导下，进入城里，逮捕了亲迦太基派的1.4万名居民，告诉他们，只要拿出赎金，就还他们自由。如果拿不出赎金，就把他们卖身为奴。结果，1.3万人不幸沦落成了奴隶。当然，亲罗马派的2.5万居民仍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生活在巴勒莫。

罗马军队的这一做法，对周边各城邦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西里西部要塞巴勒莫落到罗马之手的消息使他们大为动摇，最终选择了在罗马军攻入之前开门迎接。

西西里岛上，留给迦太基的只剩下位于南岸的小赫拉克利亚和此地以西的塞留斯（现在的塞里侬特）、利利巴厄姆（现在的马尔萨拉）、德雷帕纳姆（现在的特拉帕尼）。它们都是海港城市，位于西西里西部，处于便于接受来自迦太基本国援助的位置。

公元前253年，始于巴勒莫陷落的西西里战事，就这样在罗马军团成功击退迦太基的攻势后离结束已经不远了。罗马方面计划于第二年春季攻打马尔萨拉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在巴勒莫沦陷后，马尔萨拉成了迦太基在西西里的主要根据地。

这时已到冬季。乘着冬季休战期，罗马舰队离开西西里，开始了回国的旅程。然而，就在沿意大利西岸刚刚开始北上的时候，舰队再次遭遇了强暴风雨。指挥官们吸取上次的教训，听从了船员们的劝告。无奈，舰队所在位置却是以地形复杂而闻名的海域，就像荷马在《英雄奥德修斯漂流记》（又译《奥德赛》）中写的那样。在这里，罗马海军再次损失了近150艘战船和不计其数的士兵和船员。

公元前255年和公元前253年连续发生在海上的惨剧让罗马人沮丧不已，没有人愿意再提重整海军的事了。此时的罗马，为维护西西里和非洲北岸之间的制海权，可派遣的战船充其量也只有60艘了。

于是，迦太基方面开始蠢蠢欲动。得知罗马遭遇第二次海难事件后，迦太基认为此时正是夺回巴勒莫的绝好时机。他们以大象队为先锋，从马尔萨拉出发开始向巴勒莫进军。此时，迦太基的大象队已经增加到了150头。

对于大象的威力，罗马人早已领教过。最早把大象带到意大利的是

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双方在第三次战役中，罗马军战胜了对手。但是，那已经是四个半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再次面对大象，罗马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年前雷古鲁斯的惨败。当时，竟有8000罗马士兵被象群践踏而死，更可怕的是，这次的大象数比上一次多了近一倍。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军队已经顾不上攻打马尔萨拉了。

一看到大象，罗马士兵再也无法向前迈出一步。无论将军们怎样激励或者斥责，他们就是不出壕沟，在平原与迦太基军交锋已经没有可能了。海上惧怕暴风雨，陆地上惧怕大象，这一年的罗马军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迦太基军乘势向前挺进，就在他们到达巴勒莫附近时，罗马军终于停下了溃逃的脚步。

一位执政官为了第二年的执政官选举，已经回首都罗马，所以，此时负责保卫巴勒莫的是另一位执政官梅特卢斯。面对罗马军的现状，梅特卢斯认为，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消除士兵们对大象的恐惧心理。

环绕巴勒莫城的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防御敌人入侵。梅特卢斯对这条护城河进行了改造，命令士兵们拓宽加深护城河，并且，越往下越窄，到了最底部，连人都很难行走自如。待护城河改造完毕，他指挥大部分兵力回到城墙内。他的这一做法和以往大不相同。迦太基军知道现在的罗马军只有一位执政官坐镇指挥，因此他们气势汹汹，一路狂追而来。当他们看到巴勒莫城外的布防，越发狂妄，并立刻发起了进攻。

执政官梅特卢斯安排在城墙外侧的是轻装步兵而不是重装步兵，以投枪为主要武器的他们，在等待迦太基军的先头部队大象越过流经巴勒莫街附近的一条小河。就在象群和紧随其后的主力部队越过小河之时，轻装步兵们开始投掷投枪，目标是象群而不是敌兵。投完手中的投枪后，他们一溜烟地逃进了城墙内。

大象这种动物，一旦跑起来，要停下来很难，再加上被罗马士兵的投枪击中身体，象群因伤大怒。它们扬起滚滚尘土，发疯似的向前冲去，几乎震得地动山摇。眼看着大象一头接一头地头朝下落入护城河中，好不容易止住脚步没有落入护城河的大象，也因为伤痛不受骑手的指挥。紧随象队而来的迦太基士兵遭到了怒不可遏的象群的肆意踩踏。

这时，梅特卢斯一声令下，重装步兵开始出击。就在他们对抱头鼠窜的敌人大开杀戒之时，回到城内的轻装步兵团出现在城墙上，对着城墙下面的护城河，向大象开始了又一轮投掷投枪。

巴勒莫攻防战，罗马军取得全胜。迦太基军的大象队，除了10头被捕获，其余的都被罗马军杀死。迦太基方面阵亡人数达2万人，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和指挥官一起逃回马尔萨拉。

指挥这场战斗的迦太基将军被召回国后判处了死刑。自第一次布匿战争打响以来，这是第二位因战败被判死刑的迦太基将军，第一位是在战争第一年因为默许罗马军渡过墨西拿海峡而被处以死刑的指挥官。在这一点上，迦太基和罗马人正相反，因为罗马人从不追究战败者的责任。

获胜将军梅特卢斯命人制造纪念银币，刻上大象的图案。的确，克服士兵们对大象的恐惧比成功守住巴勒莫更值得纪念。

罗马人克服了对大象的恐惧后，也渐渐淡忘了对大海的恐惧。公元前250年，来自意大利各地造船厂的战船又有200艘下水。这一年，罗马把新舰队和四个军团统统投入到攻打马尔萨拉的战斗中了。

迦太基当然不敢松懈，在西西里，迦太基控制下的城市已经仅剩下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两个海港城市了。它们都位于西西里西岸，彼此相距30公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只要其中一个城市被攻陷，那么，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势力就会彻底退出西西里。

迦太基向马尔萨拉派去了1万名雇佣兵，向特拉帕尼派去了庞大的舰队。同时，在迦太基本国，招募10万名雇佣兵的工作也开始了。

因为有了来自迦太基本国大规模军队的加入，所以对罗马军队来说，马尔萨拉实在是一根极其难啃的骨头。

首先，罗马军队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攻打这座要塞化的海港城市。其次，迦太基舰队在特拉帕尼附近的海面游弋，阻碍了罗马海军试图从海上封锁马尔萨拉。迦太基的船只都很轻便，以他们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船只。再有，从特拉帕尼当天往返的迦太基骑兵队也给罗马陆军包围马尔萨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马尔萨拉是海港城市，一时又无法切断来自迦太基的粮食及武器补给。就这样，在马尔萨拉的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冬季休战期到了。

第二年，即公元前249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迎来了第16个年头。罗马方面已经显现出了疲态。这一年，将要上前线的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他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同属一族。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曾经在布匿战争的第一年，以其勇敢果断的进攻使罗马占尽了优势。

两位执政官作了分工，普尔克尔率领220艘战船，负责从海上攻打特拉帕尼，牢牢牵制住在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军队。与此同时，另一位执政官尤尼乌斯向马尔萨拉发起全面进攻。罗马元老院把打破胶着局面的决战任务交给了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的男性，是因为这一家族的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点——以胆大勇猛著称。普尔克尔率领全部罗马战船向30公里以北的特拉帕尼进发了。

但是，保卫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将军面对罗马220艘蓬特型战船发起的进攻，表现得异常镇定。他针对罗马海军在战斗中英勇无比、却对大海心存恐惧的特点，制订了作战计划。

按照传统的打法，迦太基方面应该采用背靠特拉帕尼港迎击敌人。但是，这位将军颠覆了这一战术。接到罗马舰队逼近的消息，他命令所有在特拉帕尼的迦太基战船离开港湾，到特拉帕尼以北的海面上，静候由南而来的罗马舰队。当直扑特拉帕尼的罗马舰队到达港口附近的海域时，迦太基舰队才突然现身。原本打算包围在港口待命的迦太基舰队的罗马舰队，就这样被身后绵延不断的悬崖挡住退路，反被迦太基舰队包围。

指挥迦太基舰队的将军深知罗马士兵打近身战的厉害，同时，他也清楚，只要不靠近罗马舰队作战，战局一定会有利于擅长操控舰船的迦太基方面。

迦太基战船逼着罗马战船向海上撤退，却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罗马战船逃到桨使不上劲的深海时，迦太基方面像渔夫收网一样，一点一点地收紧了对罗马战船的包围圈。

罗马海军遭遇惨败，这是以迦太基为对手的海战中，罗马海军的第一次失败。220艘战船中，93艘被缴获，30艘沉入海底。船上的士兵和船员除了一些人奋力游到岸边，沿陆路逃到正在攻打马尔萨拉的罗马军队营地外，多达2万名的罗马人葬身在茫茫大海之中。身上的盔甲妨碍了他们自救，再加上当时的罗马人不擅长游泳，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局。执政官普尔克尔率领成功突围的余下船只向南败退。

成了败将的执政官普尔克尔被召回首都罗马，受到了1.2万银币的罚款处罚。

这一处罚不是为了追究他使罗马海军遭受第一次失败的责任，而是因为他作为指挥官，做了不该做的举动。

在攻打特拉帕尼之前，执政官普尔克尔按照罗马军的惯例，在出征前也进行了鸡啄食的占卜。

这是用鸡啄食的方式来占卜吉凶的方法。为了罗马军的战略不受鸡的好恶左右，从军的占卜师通常会让鸡饿着肚子。

这天，不知什么原因，饥肠辘辘的鸡就是不去啄食。在士兵们忐忑的守望中，那只鸡四处走了起来，始终不碰食物。争强好胜、性子又急的普尔克尔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只顾散步的鸡，大喝一声："难不成你想喝水！"就把它扔进了海里。看到这一幕的罗马士兵们心里暗自嘀咕："他这样做行吗？"他们非常不安，但还是下海出发了。

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在宗教信仰者众多的共同体中，作为统帅，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个人信条。如果在特拉帕尼海战中，普尔克尔取得了胜利，也许他不会受到处罚。但是，首先是无视宗教，又在随后的战斗中败北，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必须接受惩罚，不为战斗失利而是为他作为统帅太欠考虑的行为。作为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贵族，付过巨额罚款后，据说他连一直生活其间的房屋也无法保全了。

尽管如此，公元前249年对罗马来说，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年。甚至到了第二年，罗马军在西西里依然难有作为。只有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续签了同盟条约，对罗马来说还算是一个好消息。也多亏了他，罗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

罗马每五年要进行一次国势调查。两年后的公元前247年，正是罗马进行国势调查的年份。调查内容包括从17岁到60岁享有罗马市民权的男性人数和财政状况。每次调查，成年男性的人数都会比上一次增加一成以上。但是这一年的调查结果，成年男性人数剧减了17%。就连罗马联盟的加盟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许多。当然，程度没有罗马联盟军的核心——罗马那样严重。与陆战损失相比，海难事件造成的损失影响巨大。除了人员的损失，战船及运输船的损失使得罗马的国库也被掏空了。迎来第一次布匿战争第18个年头的罗马，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迦太基在海战中失败的次数比罗马多，但是，他们没有出现大的海难事件。而且，死于战场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来自外国，对本国的人口没有影响。两者相比，显然罗马方面的损耗远大于迦太基。更加重要的是，公元前247年，迦太基派出了一位富有才能的年轻将军前往西西里战场。

他就是哈米尔卡·巴卡，其姓“巴卡”在腓尼基语中意为“雷光”。这一年30岁刚出头的哈米尔卡正是后来成为罗马人噩梦的汉尼拔的父亲。战争史上被认为最杰出的战术家汉尼拔就是在哈米尔卡领命前往西西里战线的公元前247年呱呱坠地的。

遗憾的是，身处布匿战争的迦太基人很不擅长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好机会。这一年，虽然派出了才能卓著的指挥官，但是本该作为他有力后盾的本国政府出现了分裂。

在掌握经济的人管理国政方面，古代迦太基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很相似。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实行寡头政权。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就是威尼斯作为海上城市耕地少得可怜。因此，他们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与海外的贸易和国内的手工业中。与此相比，迦太基自古兼营农业。

现在的北非，降水量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大片绿色。但是，在古代情形截然不同，首先，迦太基人拥有非常出色的经营农场的能力，而且，他们有可以十二分地发挥这种能力的环境。

同时，迦太基人也继承了腓尼基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善于通商的民族。

由此可见，掌握迦太基国政的人分裂成“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如果两派中有一方生产力下降，他们的发言权自然随之降低，就有可能达成意见的统一。然而，双方都维持了较

高的生产力，因此，调和两派的意见非常困难。

由于没有足够的战斗兵力，哈米尔卡并未在迦太基所控制的西西里的两个海港城市——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设立大本营。他担心自己若把这两个城市中的一处设立为大本营，会遭到罗马军的包围。他讨厌行动受限制，想要确保主导权在自己一方，只要迦太基军守住了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西西里西岸与迦太基之间的制海权就还在迦太基的手中。

哈米尔卡把军队的大本营设在了巴勒莫附近的一座山上。这座山现在叫佩莱格里诺山。

站在山顶上，巴勒莫市区和港口一览无余。只要罗马南下的舰队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出现，这里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山下，沿海岸线偏西的地方，还有一个被悬崖遮挡住的海湾，来自迦太基的船只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这里，即使罗马舰队就在巴勒莫港口也察觉不到。

从这里沿海岸线，虽然无路可绕，但是，把大本营设在山上的哈米尔卡保证了通往特拉帕尼的补给线，那儿有一大块平地直接伸向大海。埃里切的山上是唯一可以监视这块平地的地方。但是，埃里切距离海岸线太远，所以，尽管罗马军占领了埃里切，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迦太基士兵在远处行动自如却束手无策。

哈米尔卡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山上，他频频率军队下山，从背后袭扰正在攻打马尔萨拉的罗马军队，却一次也没有与罗马军队交手。毕竟，双方的战斗力相差太过悬殊。

除了在陆地上，哈米尔卡的游击战还用在了海上。加盟罗马联盟的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及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他们的商船成了哈米尔卡海上游击战的牺牲品。

哈米尔卡采用的战术非常巧妙，也很奏效。公元前247年至公元前

243的4年间，布匿战争完全按照哈米尔卡的预想发展。向佩莱格里诺山发起进攻的罗马军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都在哈米尔卡的预料之中，唯一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始终没有等来罗马的和谈使者。

罗马始终在寻找打开胶着已久的西西里战况的方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切断迦太基对哈米尔卡的补给线。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取得西西里西岸和迦太基之间海域的制海权。迦太基也很清楚，失去这一海域的制海权，意味着迦太基彻底失去了西西里，所以他们一定会派出舰队拼命争夺。由于哈米尔卡的袭扰，罗马始终没有能够攻下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他们于是认为，必须与迦太基舰队在海上一决雌雄。只要取得海战的胜利，就可以使哈米尔卡和马尔萨拉、特拉帕尼同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罗马决定组建自布匿战争开始以来的第四次舰队。这是因为罗马现有战船大多陈旧不堪，所以必须建造新的战船。

既然对手是迦太基，那么舰队的规模必须超过200艘。在迦太基，只有蓬特型船才被认为是战船，所以新造的这200艘船也必须是蓬特型战船。这就意味着公元前242年的罗马，其时的国库就要被掏空。

元老院不认为提高税收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没有人想过一反以往的惯例，要求各同盟城市负担军费开支。于是，元老院议员决定发行战时国债。

条件是战争结束，经济一旦复苏即可赎回。要求购买战时国债的不是全体罗马市民，而是有产阶级和元老院议员以及位居政府要职的这部分人。当财源得到保证后，罗马开始着手造船。200艘蓬特型战船在执政官卡图卢斯的率领下，进军大海。

西西里西岸的战局，并没有因为久未谋面的罗马舰队一经出现就为之彻底改变。因为直到这一年结束，迦太基都没有出动舰队。但是，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罗马舰队从海上发起进攻，马尔萨拉港落到了罗马军队的手中。至此，罗马舰队终于可以利用马尔萨拉这一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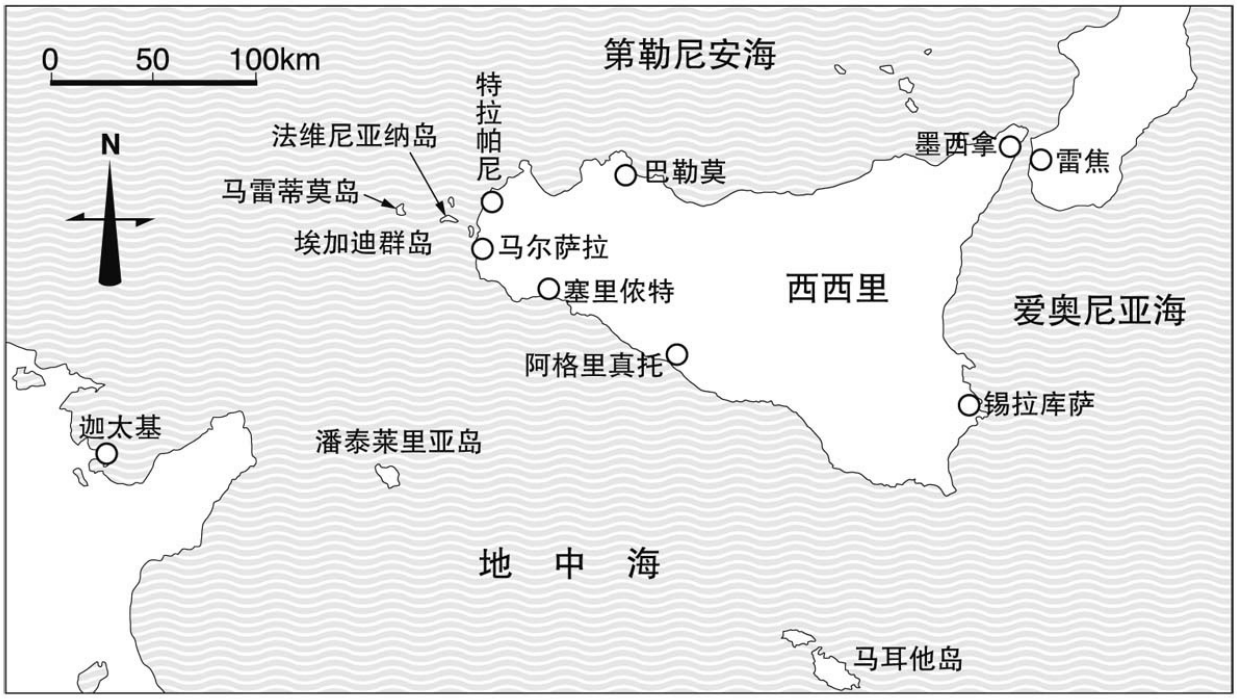
良港了。他们知道，一旦消息传到迦太基，相信迦太基不能不痛下决心。

公元前241年3月，大概是对外贸易派成功说服了国内农业派，迦太基终于派出了舰队。舰队于3月的早春出动，是因为他们要利用罗马军队换防的这一时期。罗马的新执政官任期从3月15日开始，因此，罗马军队到达西西里最早也要等到4月末。迦太基方面就是想乘罗马军队兵力薄弱的这一时期，完成军粮的补给。但是，这次，迦太基失算了。罗马方面非常清楚，战局已经到了紧要的关头，因此，虽然陆军在冬季休战期减了一半，但是海军和执政官卡图卢斯一起全部留在了西西里。

不仅如此，迦太基人还错误地认为，多年前的两次海难事件，再加上8年前的海战失利，罗马海军不会轻易挑起海战。因此，公元前241年春季，提前出动的迦太基舰队与其说是舰队，不如说是运输船队。船上满载着大量武器和充足的粮食，足够在西西里的迦太基军维持半年。

离开首都迦太基后，舰队向东北方向航行，在马雷蒂莫抛锚，伺机向西西里西岸靠拢。

马雷蒂莫是一个小岛，位于埃加迪群岛最西端，就在马尔萨拉和特拉帕尼之间的海域。迦太基舰队打算在特拉帕尼以北的埃里切附近海岸卸下军粮，因为他们担心特拉帕尼海面会有罗马舰队。



西西里周边图

事实上，执政官卡图卢斯没有派舰队监视特拉帕尼港，他接到敌人舰队已经出动的消息后，下令全体舰队北上，集结地是埃加迪群岛中的一个岛，叫法维尼亚纳。马雷蒂莫和法维尼亚纳相距只有10公里，卡图卢斯就在这里等待敌军的下一个行动。

如果说迦太基舰队不知道罗马舰队就在法维尼亚纳，谁也不会相信。因为在那里，3月份已经进入捕鱼期，200艘蓬特型战船不可能躲过渔民的眼睛。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解释。迦太基舰队明知罗马舰队就在10公里开外的附近，却没有改变预定的行动计划。

3月10日早上，刮起了西风，风力很大。埃里切位于马雷蒂莫的正东方向，从马雷蒂莫过去正好顺风。法维尼亚纳在马雷蒂莫偏东南的位置。卡图卢斯坚信，如此难得的风天，敌人一定会有所动作。但是，他很犹豫是否向敌人发起海战。

如果罗马舰队在迦太基舰队前往埃里切的途中进行堵截，就会正面

迎风。这时，迦太基船队处于顺风，罗马船队处于逆风，在风大浪高的情况下，对罗马不利。

思量再三，执政官卡图卢斯决定无视这些不利因素，向迦太基舰队发起海战。与满载军粮的沉重的敌船相比，罗马舰队的优势是灵活轻捷。

卡图卢斯下令所有船只降下船帆，靠划桨手划桨前行。全速向西的罗马舰队要去阻挡正要离开马雷蒂莫的迦太基舰队。当迦太基舰队看到已经进入战斗态势的罗马舰队时，也降下了船帆。海战中，只靠划桨操纵船只是惯例，所以，降帆表示迦太基方面接受了挑战。

强劲的西风依旧。尽管船帆已经落下，却因为船大，惯性大，加上顺风，在大风大浪的推动下，迦太基船只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东面的罗马舰队。船与船猛烈相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冲撞中，船与船卡到了一起，双方士兵纷纷跳到敌船上，一时间，喊杀声震耳欲聋。

战斗异常激烈，胜负很快决出。迦太基方面有50多艘船沉没，70多艘船被缴获，余下的船只乘着风向改变，逃回了迦太基。

取得战斗胜利的罗马舰队损失也很惨重，想要乘胜追击已无可能。所有船只几乎都需要进行大修。关于罗马方面的损失和迦太基方面的死亡人数，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逃回国内的迦太基总司令官被追究战败的责任，处以磔刑。这种刑罚，在迦太基被认为是极刑。至此，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来，因担负战败责任被处以死刑的迦太基司令官达到了3位。

迦太基政权没有等到冬季自然休战期，他们就向哈米尔卡派去了急使，命令哈米尔卡作为使者向罗马提出和谈。执政官卡图卢斯接受了哈米尔卡提出的和谈请求。就这样，在对战争状况有清醒认识的这两位将军之间，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和平谈判开始了。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规定，作为军队总司令官，一旦执政官接受任务，并开始执行后，元老院不得再向他发号施令，也不得对战略战术提任何意见。在任一地点的战略、作战方案等，完全由执政官决定。不追究战败的责任，从一方面讲也是为了执政官可以毫无顾忌地专心于完成自己的使命。此外，无论是提出和谈，还是接受和谈，从和谈条件乃至到谈判结果，全权由执政官处理。这一切正是马基雅弗利不吝溢美之词的方面。

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需要做的只是对执政官已经达成了的和谈内容表决同意或反对，至于执政官同意的和谈条件，只有经过市民大会投票通过才能成立。谈判进行期间为休战期。

卡图卢斯与哈米尔卡之间达成的和平条约内容如下：

一、迦太基撤出西西里，永久放弃对西西里的占有权。

二、迦太基承诺不向罗马的同盟国包括锡拉库萨发动战争。

三、两国同时释放俘虏，互不收取赎金。

四、迦太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10年内向罗马支付2200塔兰特的赔款。

五、罗马尊重迦太基自治和独立的权利。

这份条约在市民大会上遭到了大多数市民的反对。这是一场长达23年的战争，即使不一一细算，罗马方面的实际牺牲也比迦太基方面大得多。罗马市民不能释怀，他们想不通，难道这就是胜利者缔结的和约吗？

在罗马，每当出现这种情形，通常会派遣10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调查团前去调查。调查团抵达西西里后，没过多久，他们就与卡图卢斯取

得了一致意见。

他们对和约内容只作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赔偿金在2200塔兰特的基础上，增加1000塔兰特，变成了3200塔兰特，增加部分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要求在和约生效后，一次性付清。同时，在和约中明确规定，埃加迪群岛、马耳他、潘泰莱里亚等西西里周边岛屿为罗马所有。

关于赔偿金额，对迦太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因为在非洲，光是农场经营，一年的收益就达1.2万塔兰特。还有，在和约中明确马耳他及潘泰莱里亚为罗马所有，也不过是追认既成事实罢了。

罗马签署了一份让迦太基方面很乐于接受的和约。对于这份和约，罗马市民在听取了回国的调查团的报告后也投了赞成票。

公元前264年开始，持续了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41年宣告结束。卡图卢斯在当年6月凯旋罗马。罗马人也沉醉于和平的气氛当中。自从公元前673年以来，一直大敞着的雅努斯神殿之门，在相隔432年之后终于关上了。是应该让战神雅努斯好好休息了。

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战场在西地中海岛屿之一的西西里。所以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大国迦太基和新兴国家罗马之间的这场对决，从投入的兵力来看，已经远远超过了局部战争的规模。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能够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在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除了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再找出第三个。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决定地中海明日的既不是埃及，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马其顿，而是迦太基和罗马中的一个。

就在卡图卢斯在罗马乘坐着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迦太基开始了从西西里的总撤退。军队离开了特拉帕尼和马尔萨拉，雇佣兵紧随其后。甚至在西西里从事殖民地经营的迦太基人也不得不离岛而去。大概是哈米尔卡指挥有方，总撤退井然有序，既没有出现

混乱局面，也没有发生难民骚乱。迦太基撤离西西里，对于占西西里居民一半以上的希腊人来说，不过是从接受迦太基统治变成为接受罗马统治而已。

就这样，迦太基花了400年时间争取来的在西西里的一切权益转眼全部化为乌有，同时失去的还有其地中海的西半部分的海域主权。

第二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

（前241—前219）

战争结束后做什么，怎么做，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胜负已成定局，再纠缠此事于事无补。问题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生活在后世的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到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其间相隔了23年。在本章节中，我要重点讲述的是罗马人在这23年里是怎样度过的，迦太基人在这23年里又是怎样度过的。

对于所有罗马人和绝大部分迦太基人来说，这23年不是休战期。除了极少数迦太基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会再度爆发战争。

罗马与迦太基于公元前241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不过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和约，并非罗马吞并迦太基成为独霸国家的条约。战败后的迦太基，不同于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加普亚及塔兰托，它并未加盟罗马联盟，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也不同于位于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它不是罗马的友邦，不需要每15年更新一次同盟协定。

虽然迦太基因失掉战争不得不放弃在西西里的领土，并向罗马赔款。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作为独立和自治国家的性质。如果一定要说对其“独立和自治”有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反映在和平条约中，因为条约明确规定了迦太基不得向罗马保护下的同盟国家挑起战争。但是，迦太基显然不会受制于这样的条约内容，因为不染指意大利或西西里，迦太基照样可以生存得很好。而且，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的迦太基人，既不希望与罗马再次发生战争，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又一次爆发战争。

哈米尔卡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最后6年，曾经英勇奋战。当迦太基海军在海战中惨遭失败后，他不得不代表迦太基政府向罗马求和。当时还不到40岁的他为此备感屈辱，时刻不忘报仇雪耻。哈米尔卡所属的巴卡家族是以通商为业的对外贸易派的代表，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农家

族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放弃西西里，等于放弃西地中海，而这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情感。所以，哈米尔卡和追随他的迦太基人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与罗马再决雌雄。

但是，与胜利方相比，战败方在战后的压力显然要大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罗马关闭了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心满意足地享受起和平的同时，迦太基国内却被一种极不平静的气氛笼罩着。

在迦太基，看到成群结队的雇佣兵走在大街上，并不稀奇。因为迦太基有委托别国来保卫自己国家的传统。雇佣兵之所以分群结队出行，是因为他们有的来自高卢，有的来自西班牙，有的来自希腊或非洲等地，相互间语言不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结束后雇佣兵纷纷从西西里战场撤回到了迦太基。

战争结束意味着雇佣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必须各自回各自的国家去。他们也知道自己应该回国。但是，在回国前，他们必须首先从迦太基那里拿到雇佣金。

也许因为战争失败，迦太基政府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紧缩财政。他们没有按约定支付雇佣金。因为战争于春末夏初结束，按照从春到秋为一个战斗年度计算，这些雇佣兵参加战斗的时间只有二分之一年度，所以，迦太基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支付一半雇佣费即可。对此，雇佣兵自然不服，而且他们有武器在身。

雇佣兵在科西嘉短暂停留后便出发离开此地，向首都迦太基进军。当2万武装士兵逼近迦太基约20公里处时，迦太基这才答应坐下来谈判。雇佣兵代表最初提出的要求应该还算合理。但是，参与谈判的迦太基高官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他们，于是，条件越提越高。其间，作为迦太基属地的利比亚也开始支持雇佣兵的行动，那里是雇佣兵主要的来源地之一。因为在布匿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课税成倍增加，市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对迦太基的战后政策深感不满的不只是利比亚。与罗马不同，在迦太基，虽然作为被统治者的其他民族和统治者迦太基人同住在迦太基领土上，却备受歧视，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不满使得叛乱的危险在迦太基随时存在。到了仅次于迦太基的第二大城市乌蒂卡也开始表示支持不满者的时候，雇佣兵队伍由最初的2万人增加到了5万人。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0年，迦太基政权已经把他们定性为叛军，决定以武力加以镇压。他们组织了1万士兵，由哈米尔卡任总指挥。对哈米尔卡满怀崇拜的2000名努米底亚骑兵也加入了镇压队伍。

以雇佣兵为核心的叛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他们缺少一个统一的指挥者。面对哈米尔卡的进攻战术，他们全然不是对手，很快就有6000人战死，2000人被捕，余下的纷纷溃逃。在第二年，即公元前239年，哈米尔卡对叛军表示出的一次善意行为却严重受挫。迦太基政府派出一位高官与雇佣兵谈判，不料雇佣兵竟扣押了这位高官，砍去他的四肢，削落他的耳鼻，最后竟将他生生活埋了。

至此，哈米尔卡也转而认为必须全歼这群人。但是，叛军在数量上依然占优势。于是，他避开大规模的正面交战，利用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战斗，逐步削弱敌人，并成功地把他们赶到一座不算很高的山上。接着，他用坚固的栅栏和壕沟团团围住这座山，等待叛军自生自灭。

饥饿难耐的叛军只好虐杀俘虏和奴隶，以人肉充饥，继续负隅顽抗。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终究只有一条，就是投降。哈米尔卡乘机向他们喊话，说只要送10个人下山谈判，保证无生命之虞。

有10个人下了山，却没有一个回到山上。因为他们遭到了杀害。但是，叛军并不知情，只以为这些人背叛了自己，于是他们再次拿起了已经扔掉的武器。

哈米尔卡等的就是这时候。他派出象群从四面八方围攻叛军，迫使他们纷纷掉入凹洼处。在象群无情的践踏下，叛军无一幸存。据说死者超过4万人。已经举起叛旗的乌蒂卡获悉这一消息，马上缴械投诚。公元前238年夏天，在历时3年零4个月之后，反迦太基的叛乱被彻底镇压。

迦太基对参与叛乱的属地和城市分别作出了加收租税的惩罚，增加的幅度各不相同，所依据的不是参与叛乱的程度，而是视其对迦太基来说的重要性如何，例如，乌蒂卡受到的惩罚就非常轻微。

罗马和锡拉库萨并没有趁火打劫，向迦太基发起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还应迦太基的请求，向正遭受属地的叛离、粮食常常供不应求的首都迦太基出口小麦。这也说明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罗马和自古与迦太基交恶的锡拉库萨都无意灭掉迦太基。

当然，罗马并非没有一点偷腥行为。迦太基殖民的撒丁岛上，沿海地区的岛民得知迦太基国内的混乱后，也举旗造反。他们杀了迦太基总督，派使者前往罗马请求援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制海权重要性的罗马自然一口答应。派到撒丁的罗马军队只有一个军团，但是，用以终结迦太基在撒丁的统治已经足够。迦太基政权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由于国内局势的混乱，他们自顾不暇，不得不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撒丁于是归入了罗马的势力版图。

撒丁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后，位于它北面的科西嘉也自动成为了罗马的地盘。就这样，罗马把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统统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确立了它在意大利南部和西部的制海权。而且，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距离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远，这意味着迦太基也将成为罗马的囊中之物。

叛乱镇压了，危机总算过去了。但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迦太基还没有结束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之间的矛盾。

对外贸易派领袖哈米尔卡决定离开国内农业派占上风的迦太基，去西班牙建立根据地。西班牙境内有迦太基的殖民地，但是，势力不大，仅限于以加的斯为中心的西班牙南部海岸地区。他要扩大这一殖民地。此时的哈米尔卡还很年轻，刚过40岁，他带上了已经9岁的长子汉尼拔。决定跟随他前往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为数不少。

很久以后，汉尼拔说：是自己向父亲提出同去的要求。于是，父亲就把他带到了贝尔神庙，要他向神发誓终生以罗马为敌。之后，父亲才答应带他一同前往西班牙。

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曾经被叫做“赫丘利之柱”。渡过这里，移居到西班牙的哈米尔卡发挥出了他优秀的组织才能。他率领追随他的迦太基士兵，攻打西班牙原住民，并把战败的西班牙原住民编入雇佣兵行列。在哈米尔卡精妙的战术指挥下，这支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在与原住民的交战中连战连捷，竟不知失败为何物。

在到手的地域急速扩张后，迦太基人充分发挥了其特有的经营能力，于是，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农场。西班牙众多的山脉也摇身变成了矿藏丰富的矿山，特别是银矿的开采为哈米尔卡成功统治殖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生产效率之高令50年后踏上西班牙土地的罗马人加图惊叹不已。它所创造的高收益成为了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滚滚财源。

哈米尔卡移居西班牙9年后，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西班牙东南部。他们在这里收获的利益远远超过了自足，甚至开始把多出来的资金送往国内，投资国内的农场经营。迦太基得到这一殖民地，足以弥补失掉的西西里。但是，西班牙的迦太基殖民地与迦太基本国没有交集，相互独立。足见巴卡家族的独立王国意识之强烈。

哈米尔卡移居西班牙后的第10年，即公元前228年，取名“迦太基新城”的西班牙东岸城市建设宣告结束。在这里，哈米尔卡建起了巴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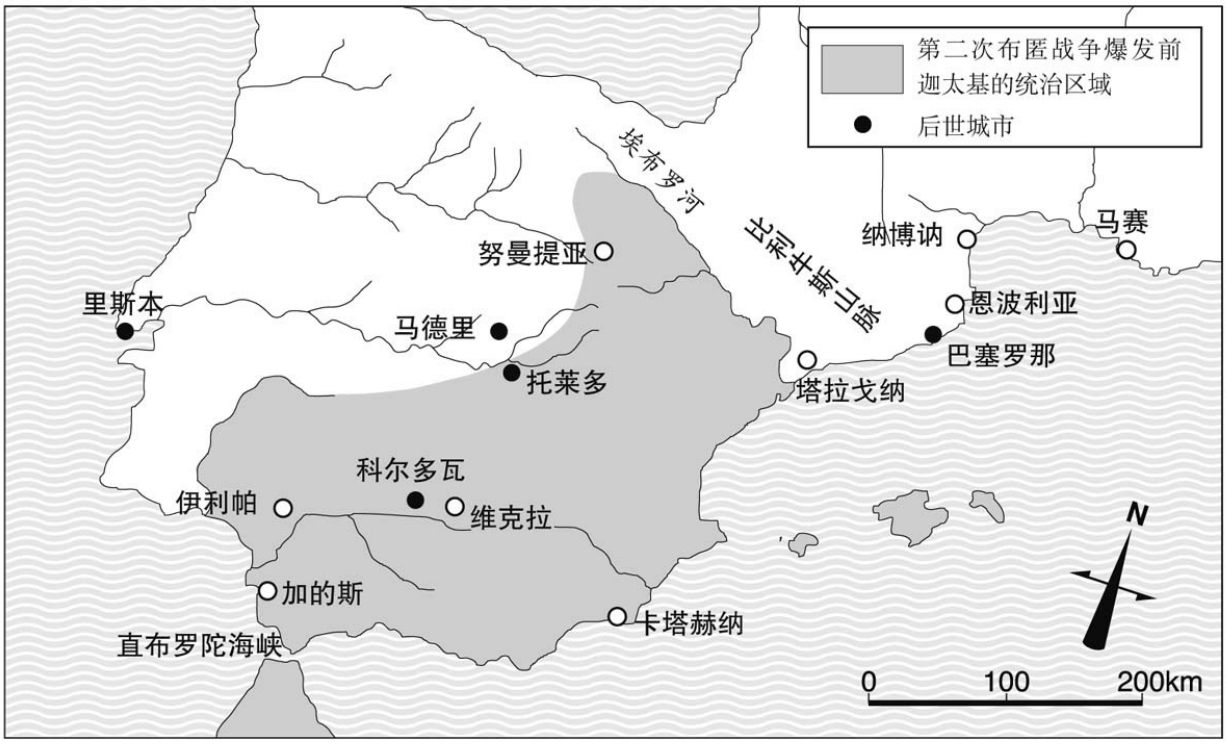
族的城堡，看上去与王宫无异。在这里，汇集了来自西班牙各地的产物。“迦太基新城”（现在的卡塔赫纳）是巴卡家族统治西班牙的大本营，也是一种象征。

哈米尔卡没有看到新城的建成，因为他在一年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继他之后的是跟随哈米尔卡为时已久的副将，也是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鲍尔。当时，哈米尔卡本人的直系继承人汉尼拔只有18岁。

哈斯德鲁鲍尔作为第二代统治者，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岳父的事业得以巩固就是他的功劳。

迦太基在西班牙扩张势力的情况，本该引起罗马的警惕，但是，罗马对此熟视无睹。就像后人所说，一方面是罗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在迦太基本国，看不出一丝一毫要向罗马报仇雪耻的动向。迦太基依然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的方式在统治它的属地，在军事方面也没有改变出钱招募雇佣兵的做法。

到了公元前226年，罗马和哈斯德鲁鲍尔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规定，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不得扩张到自西向东流淌过西班牙北部的埃布罗河以北。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的西班牙

这份条约的订立，表明罗马承认迦太基对埃布罗河以南的西班牙统治。由于埃布罗河流经比利牛斯山脉南侧，所以，事实上，罗马承认了迦太基几乎对全西班牙的统治。

罗马签署这一条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阻止迦太基在西班牙的进一步扩张，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长久以来一直都是罗马友邦的马赛的势力范围。就在这一年，与马赛隔海湾相望的恩波利亚也成了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之一。与马赛一样，恩波利亚起源于希腊人殖民的城邦国家。西地中海的原希腊殖民地纷纷选择了接受罗马人的保护。因为罗马人更喜欢同盟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

那么，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23年间，罗马是怎样度过的呢？

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罗马人执迷上了希腊文化。雅典尚在的时候，锡拉库萨就是希腊文化的一大根据地，其水平之高是

以塔兰托为首的意大利南部希腊所属各城邦难以企及的。现在，锡拉库萨已经是罗马的友邦。罗马的世家子弟为了学习希腊语，纷纷来到意大利南部。在当时，作为一门语言，希腊语的规范程度远远高于拉丁语，而且，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希腊语几乎就是通用语。

当然，热衷于希腊文化的不只是世家子弟。这一时期，拉丁喜剧开始在罗马上演。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喜剧模仿了希腊喜剧。喜剧的作者是李维·安德鲁尼库斯。他的喜剧在罗马上演的这一年，即公元前240年，甚至被认为是拉丁文学史的开启年。为了方便不懂希腊语的普通百姓阅读，安德鲁尼库斯还把荷马的叙事诗翻译成拉丁语出版。

此外，被认为是最早的拉丁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大显身手也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虽然也模仿希腊喜剧，但毕竟有罗马自己的东西。普劳图斯开创了意大利喜剧之先河，他的喜剧作品影响了其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也对18世纪的威尼斯喜剧作家哥尔多尼产生过影响。

在普劳图斯以普通百姓为对象的喜剧中，随处可见希腊语。尽管如此，依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很有可能也懂一些希腊语。一想到这点，我不禁对罗马人的双语功夫深感钦佩。

深受这一时期罗马人喜爱的两位喜剧作家都不是罗马市民。从名字上看，安德鲁尼库斯显然是个希腊人。公元前272年，罗马占领塔兰托后，他被抓到罗马被逼为奴。幸运的是，他的主人李维非常欣赏他的才能，恢复了他自由之身。因为这一经历，他的正式名字也变成了李维·安德鲁尼库斯。

普劳图斯不是奴隶，也不是罗马市民，他出身翁布里亚族，是罗马联盟的加盟国。来到罗马后，他曾从事过许多职业。后来，他当了演员，开始自己动手写剧本，并一举获得成功。为了寻找素材，他剖析了已有的悲喜剧作品，并加以利用。如果当时迦太基也有戏剧作品的话，相信他一定也会拿来利用的。但是，迦太基人只喜欢写实用类的书，如

汉农的《非洲航海志》、马可尼的《农场经营书》等等。普劳图斯在自己作品中，是这样评价迦太基人的：

> 那个男人通晓任何国家的语言。但是，除了本国语言，他要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因为他是迦太基人。

我想，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大概就在于是否乐于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与沟通吧。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出现在罗马的“希腊热”，对于以元老院为牙城的罗马统治阶层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元老院正面临如何管理新得到的西西里的问题。

西西里岛上，绝大多数城市源自希腊殖民，因此，西西里属于希腊语圈。与罗马建立了同盟关系的锡拉库萨，虽然是独立的国家，但是事实上是在罗马的保护之下的。可以说，锡拉库萨也是一个被征服国。更何况，西西里的其他地方都是罗马靠军事力量得来的。鉴于这一情况，如果征服者热衷于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追随被征服者的文化，无疑会让被征服者感到些许的安慰。“希腊热”现象是元老院所希望看到的，他们率先请被征服者之民或担任家庭教师，或聘为秘书，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被征服地留学。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缘于希腊文化足够优秀。

我们看罗马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几乎在所有事情上，他们都不依靠自己亲力亲为，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在任何领域都是第一。例如，被罗马同化后的伊特鲁里亚人依然在土木事业上施展他们的才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被委以通商业的职责；西西里加入罗马的保护圈后，罗马开始全面引进希腊文化。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在艺术、哲学和数学领域，罗马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了希腊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罗马人的开放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且，他们从来不像有的国家，在颁发居留证时，一味地强调“只限具备无可替代的、技能型

的人才”。

话虽如此，统治异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罗马人对现状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之后，确定了适合统治西西里的新体系。

请读者朋友回忆一下《罗马人的故事1》中提到过的罗马联盟中，盟主罗马与加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正像《罗马人的故事1》中所说的那样，成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罗马联盟，不是简单的罗马和其他城邦国家的集合体。盟主罗马和加盟各国的地位并不相同，具体如下：

首先是联盟盟主罗马。

该国居民，只要是自由民，不分贵族平民，一律享有罗马市民权。为此，他们有义务服兵役代替缴纳直接税。当然，作为罗马市民，他们享有投票权，也有参与罗马公职的被选举权。也就是说，他们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只有无产者因为免除了纳税的义务，所以不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尽管如此，人数远远少于有产者市民的无产阶级，依然有权行使选举权，因为他们也是罗马市民。所谓无产阶级，就是他们的财产只有孩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是靠技能吃饭的人。

《罗马人的故事1》在讲述公元前4世纪中叶时，排在罗马之后讲到的是各部族。只是在一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几乎都得到了罗马市民权，与罗马人已无差别。因此，在讲述公元前3世纪时，不再单独列出。总之，他们曾经是始于罗马王政时代的拉丁同盟的加盟国。公元前390年，当罗马因凯尔特人入侵而深受打击之时，他们背叛了罗马。又在罗马重新站起来后，他们作为战败者加盟罗马联盟的。就像普鲁塔克说的那样：一个世纪过去了，多亏了罗马人同化异族甚至不计前嫌同化失败者的性格，才使得那些部族拥有了完全的罗马市民权。

罗马联盟中的第二类城邦是排在第三位的自治城市。

罗马授予这些自治城市的居民以“无选举权的市民权”，表示他们不享有罗马国政方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除此之外的所有事情上，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根据罗马法律，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受到保护。同时，罗马承认他们完全的国内自治。在现代意大利，说到自治城市，依然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

第三类是“科洛尼亚”，现代人把它翻译为“殖民地”。

这些地方通常被认为是战略要地。最多的时候，曾经有6000名罗马男性共同驻守一个殖民地。其中虽然不乏有人带家眷前往，但绝大多数是单身男性。他们和当地女子通婚，生下混血儿，以此进行同化，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无须法律明文规定。

一个殖民地的殖民者如果是完全的罗马市民权所有者，这个地方就叫“罗马殖民地”。如果殖民者是无选举权的市民权所有者或其他人，则叫“拉丁殖民地”。就这样，罗马在每个战略要地都建起了永久性的要塞。但是，从社会性来看，这种“科洛尼亚”无异于建设新城市。顺便提一句，“科洛尼亚”的德语读音就是现在德国的“科隆”。

罗马联盟的第四类加盟国在历史学上是一些城邦国家，叫“同盟城市”或统称为“同盟国”。罗马人则把它们叫做“同盟市”。所谓“同盟市”，在现代意大利语中，是“共同经营者”的意思。

同盟市有一点不同于其他同盟部族及城邦。尽管他们都是罗马的手下败将，但是，曾经加盟旧拉丁同盟的各部族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被罗马打败的，与此相比，同盟市臣服罗马的时间要晚得多。源自希腊人殖民建立的意大利半岛中南部各城市都属于同盟市。

对于这些与自己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历史尚浅的城邦国家，罗马承

认他们完全的国内自治。不仅如此，罗马还奖励这些城邦的统治者申请罗马市民权，却不要求他们同时放弃本国的市民权。也就是说，对于战败者，罗马允许他们拥有双重国籍。

罗马联盟中的自治城市及科洛尼亚、同盟市都没有义务向胜利者罗马缴纳年贡或租税。罗马对它们的要求就是提供兵力资源。在西欧思想起源地的古希腊和罗马，提供兵力支援被认为远比提供资金更为体面。

就这样，罗马与同盟者之间建立起了各不相同的关系。这种视对象来定关系的做法，说到底只是“区别”对待，并不存在“歧视”。主干道阿皮亚大道的修建足以证明这一点。

阿皮亚大道最先从罗马铺设到罗马殖民地特腊契纳，不久延伸至同盟市加普亚，接着又向拉丁殖民地贝内文托伸展，并继续南下，到达同属拉丁殖民地的韦诺萨。在塔兰托进入到罗马势力范围之后，又延伸到了这座同盟市，最后到达拉丁殖民地布林迪西。至此，全线才告完成。

罗马→罗马殖民地→同盟市→拉丁殖民地→拉丁殖民地→同盟市→拉丁殖民地

很显然，罗马人铺设的道路网，就像这条交通动脉——“高速公路”化的阿皮亚大道所示，是以军事为第一目的的。但是，如此完善的系统不可能用途如此单一。因为不收取过路费，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公路出行。装满葡萄酒樽的马车、驮着柴火的驴也可以走在这些大道上。当然，遇到行军途中的军队，必须礼让一旁。正是因为这些道路的存在，甚至连遭遇贼寇及强盗袭击的危险也大大降低。因为贼寇不可能出没于军队频繁往来的道路上。

我想，按现在的话，罗马人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的民族。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提高。同时，生产力的提高，又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当代，这一点已是常识，

几乎无人不晓。

闻名于后世的所谓的“罗马化”，指的不就是包括法律在内的“完善基础设施”吗？值得罗马信赖的合作者，不正是那些通过“罗马化”而了解到在罗马保护之下能够得到好处的被统治民族吗？

但是，从迦太基手中夺取的西西里，对于罗马来说却是全新的事物。

首先，罗马必须考虑如何防止迦太基再次涉足西西里。其次，除了锡拉库萨，西西里处于小城邦国家割据的状态，不适用罗马联盟的方式。西西里小城邦的历史是相互对抗的历史，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秩序，罗马联盟的方式很难奏效。因为，罗马联盟方式的前提是相互间的关系几乎对等。但是，如果在西西里不建立秩序和稳定的话，那么那里随时会有重落迦太基之手的危险。

罗马人考虑再三，决定在西西里建立行省。对罗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但是，罗马并没有在西西里全岛实施行省制，他们依然采用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做法。

首先，锡拉库萨是与罗马建立了同盟关系的国家，罗马尊重其独立和自治。锡拉库萨甚至不承担向罗马提供兵源的义务。相反，得到了罗马的保护，使得锡拉库萨无须再担心敌人来犯，特别是与其长期交恶的敌人迦太基来犯。锡拉库萨僭主希伦所要承担的义务只是每15年更新一次同盟协议以及优先把小麦卖给罗马而已。锡拉库萨并不是行省。

第二个例外是墨西拿。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地就是此地。在这个城邦国家，统治阶级的基础较为薄弱，罗马把它归入了同盟市的行列，与那不勒斯同等待遇。作为罗马联盟的同盟市，在享有国内自治权的同时，有义务向罗马提供海军基地和战船维护设施。

此外，巴勒莫、塞吉斯塔、埃里切等城邦国家也享受到了和墨西拿同样的待遇。这些城邦虽然曾经是迦太基的属地，但是，自从臣服于罗马以后，一直没有二心。罗马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所以，这些城邦也不适用《行省法》。

锡拉库萨的管辖范围占西西里的近四分之一，墨西拿及巴勒莫等自由城邦的领地合计也在四分之一以上。因此，罗马建立行省的区域只剩下西西里的二分之一。尽管如此，建立行省，对罗马来说，意味着采用超出罗马联盟方式的新型统治方式的开始。此外，罗马在撒丁和科西嘉，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了行省统治的方式。

在这里，无论是独立的同盟国还是行省，罗马人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完善基础设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得军队行动更加便捷。

一直以来，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人只有两种类型，即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和无罗马市民权的人。无论有无罗马市民权，只要是罗马同盟国的一员，两者都是以服兵役的形式代替缴纳直接税。但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加上行省的居民就变成了三种类型。

Provincia（行省）是现代法语Provence的词源。那么罗马人是怎样开始最初的行省统治的呢？

罗马向行省派出法务官，他们享有与执政官同等的“统治权”，全权担任在行省的统治。不同的是，执政官有两人，作为行省最高统治者的法务官只有一人。法务官下面的财务检察官等事务官，人数不多，每年从罗马派遣。之所以每年派遣，是因为他们要经过市民大会的选举。被委以统治西西里行省的法务官，驻地设在西西里的马尔萨拉。因为，这里是距迦太基最近的海港城市，地处西西里的强邻迦太基最前沿的位置上，尽管此时的迦太基并非罗马的敌对国。

虽然《行省法》只适用西西里二分之一的区域以及只开发了海岸地区的撒丁和科西嘉，但是，除了接受罗马的直属统治外，行省的最大特点是所有领地为罗马的直属地。居民只能向罗马租借已成为罗马公有地的被没收土地来经营农业，并向土地主罗马支付租地费。

事实上，罗马在打败那些后来成为罗马联盟的加盟国时，同样割占了他们的部分领土。所以，在向罗马政府支付租地费方面，他们与行省的居民一样。两者之间的不同只是反映在遭割占的土地是部分还是全部。

此外，罗马市民要经营农业，同样要向国家租借土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一律平等。而且，罗马不允许一个人想租多少就租多少，即使是元老院议员，租借土地也不能超过500由格尔，相当于125公顷。在罗马，除了间接税，国库的主要收入就来源于这些公有土地的租地费。

行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行省居民有义务缴纳直接税，就好像他们的别称叫“有义务支付租税的人”所示。

作为租税，行省居民必须向罗马要缴纳收入或收益的10%。农牧民似乎是以实物纳税。直接税的别名又叫“什一税”。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缴纳5%的关税。不过，这个税项不是只向他们收取的，罗马市民和同盟国市民也要缴纳。

直接税的税率定为一成，依据有二：一是锡拉库萨僭主征收的租税税率10%；二是迦太基在觊觎向西西里渗透势力的时候，对西西里网开一面，和对手锡拉库萨一样，只按10%的税率征收租税。尽管他们在非洲属地征收的税率非常高，通常为25%，有时甚至高达50%。所以，罗马在确定税率的时候考虑到了锡拉库萨和迦太基的因素。

行省居民有义务缴纳什一税，但是他们没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义务是罗马市民及同盟国市民必须承担的。也就是说，行省居民没有义务支付罗马市民和同盟国市民所必须支付的直接税，即所谓的“血税”。

租地费一般控制在承租人可承受的水平上。如果罗马市民在行省经营农牧业，也必须租借农牧地。尽管在意大利本土不需要缴纳什一税，但是在气候宜人的西西里租借农地，即便付过租地费，缴过什一税后，收益仍然比在意大利本土做相同的事情高得多。

如果没有累进税制，一律按收入的十分之一纳税的话，今天的我也很乐意接受。但是在那时又是租借费，又是所得税的，似乎表明人类已经启动了不好的那部分智慧。当然，如果真的税率统一为十分之一的话，国税局的规模或许可以减半了。

在古代罗马，国税局是民营的，由税吏——直译叫“公务代办人”——承包经营。每年，公务代办人们参照前一年的产量，计算出当年的产量预计，并参加征税权投标。如果公务代办人提出的税额远高于纳税人所能承受的，那么，即使中标，他也有破产的危险。所以，税额通常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公务代办人应得的份额是什一税中的十分之一。此外，他们必须向行省统治官提交有关征税事务的所有文件。

与个人承包征税业务相比，罗马更鼓励由行省的各城市承包这一业务。在西西里，没有一个税吏是外人。尽管只是直接税的1%，罗马还是希望回馈给当地的人。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曾一度把什一税临时增加到了五分之一。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作为税项征收的依然是十分之一，另外十分之一则以收获物的形式缴纳，并由罗马政府买单。

接受了行省统治的西西里渐渐变身为罗马的粮仓。仅仅是作为税收上缴的小麦一项，每年据说也有200万摩第（约合1800万升）。缴完税后，余下的小麦可以自由买卖。当然，买家由迦太基变成了罗马。

与意大利产小麦相比，西西里产的小麦价格便宜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受此冲击，缺少耕地的罗马近郊农业最先失去了竞争力。罗马周边的农地从小麦种植地变成葡萄和橄榄种植地就始于这一时期。

由于行省没有兵役义务，所以保卫行省的任务就落在了罗马——这一强大的国家身上。只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人认为和平时期已经到来，所以在西西里只驻扎了42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既然防御针对迦太基，自然，驻地选在了行省总督法务官所在的马尔萨拉。

行省统治后来也显露出了它的弊端，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尚进行得非常顺利。正像《行省法》规定的那样，居民享有充分的信教自由；如果认为统治方法有失公允，居民有权向罗马元老院提起申诉。就连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统治者罗马人热衷学习的。所以对于成为行省市民的希腊系西西里人来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在西西里建立行省之后，当地各城邦之间原本习以为常的冲突消失了。因适应了罗马人那种“完善基础设施”的统治方式，西西里的生产力不断提高。我想最早满足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居民，大概就是西西里的希腊人。

但是，罗马归根结底是霸权国家。作为霸权国家，罗马认为不仅有义务保护其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安全，而且也有义务保护这些国家居民的利益。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欢庆和平到来的罗马人关闭上了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然而，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为了保护同盟者的利益，罗马再次打开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

意大利半岛东部面向亚得里亚海。如今属于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

亚一带的地区在古代叫做伊利里亚，是伊利里亚人生活的区域。伊利里亚一带有很多复杂的海湾湖汊，在历史上，常常成为海盗的巢穴。伊庇鲁斯王国强盛时期，有充当清剿职责的军队看管这一地区。但是，在伊庇鲁斯衰退后，马其顿王国又无暇顾及此地时，亚得里亚海于是就成了海盗独霸一方的所在。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以通商为立国之本的意大利南部希腊系各城邦。于是，罗马向伊利里亚派去使节，要求他们停止海盗行为。

但是，在希腊达到鼎盛期的时代，依然是未开化民族的伊利里亚人，不仅不接受罗马使节提出的要求，甚至还蛮横地杀害了使节。罗马于是决定向伊利里亚人宣战。

公元前229年，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乘坐200艘战船，离开了布林迪西。这是罗马第一次进军希腊。

在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的攻击下，海盗很快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据点之一阿波罗尼亚陷落后，罗马军队就势把大本营安在了此地。最终，伊利里亚人不得不前来求和。罗马军以割让出阿波罗尼亚及其周边为条件，同意了讲和。就这样，以布林迪西和阿波罗尼亚为两根门柱的亚得里亚海出入口也并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之中。从此以后，与希腊通商的意大利南部各城邦的船只解除了遭遇海盗的危险。

罗马通过打压伊利里亚人，确保了东部边境的安全。南部和西部的边境因得到西西里和撒丁，早已有了安全保证。

从边境安全的角度来看，现在只剩下北边了。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民族是高卢人。早期，按希腊的称呼，这个民族叫凯尔特人，此时这一叫法早已弃用，改叫高卢人。罗马与高卢民族的国境线不直接接壤。但是，罗马的同盟国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与高卢直接接壤。

尚未开化的高卢人不知道可以通过增收方法来养活日渐增多的人

口。当饥荒袭来的时候，他们采用的办法就是由军队做开路先锋，进行全民大迁移。高卢人就像公元前390年攻打罗马时一样，随时都会进行全民大迁移。他们的存在就好比火山随时可能爆发。连马其顿王国也时刻不忘关注北边的土耳其，目的就是为了不给在那儿的凯尔特人以南下的机会。

高卢人并非总是对罗马北部造成威胁。在大丰收之年，粮仓充足时，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再加上高卢民族的内部分为许多部族，各部族之间争斗不断，很多时候无法实施南下的行动。所以，罗马需要警惕的是，高卢人居住的整个地区出现饥荒的时候以及高卢人各部族建立起共同体的年份。公元前238年至公元前227年，尽管其间出现过危险的情况，但都是暂时性的，没有严重到罗马需要向那里派遣执政官并动用军队。

但是，公元前226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隔着阿尔卑斯山，生活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和生活在高卢即现在的法国一侧的高卢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体。为了让饱受饥饿的族人吃上饭，他们只有南下攻打罗马属地。

第二年，即公元前225年，由5万名步兵和2万名骑兵组成的高卢军队横渡波河开始南下。迎战他们的罗马军队决心乘机从根本上解决北方问题。所以把2位执政官及其所率领的4个军团送出了城。罗马市民兵有步兵2.1万人、骑兵1200人，加上来自同盟国的士兵有步兵3万人、骑兵2000人，共计步兵5.1万人、骑兵3200人。这就意味着，罗马投入了这一年可以动员的几乎所有的现役兵力。

率领其中两个军团的执政官帕普斯前往里米尼，率领另两个军团的执政官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前往比萨。两地都处于北部最前线的位置，里米尼在东侧，比萨在西侧。

高卢军队南下途中，极尽抢掠之能事。他们南下的路线正好处于埋

伏在东西两侧的罗马军队之间。罗马军队分别从里米尼和比萨发起进攻，对高卢军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执政官雷古鲁斯阵亡。尽管如此，这场战斗仍然以罗马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高卢军队像以前一样，在战斗初期力量惊人。但是，随着战斗的持续，他们越来越弱。高卢方面阵亡士兵达4万人，被俘上万人，余下的人逃向了波河以北。

一年以后是公元前224年，罗马再次派出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这一年，罗马军越过了卢比孔河。这条河经过里米尼北部，最后流入亚得里亚海。仍未从前一年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的高卢人只能以小规模的战斗抵抗罗马军队的进攻。罗马军队采取的是瓦解高卢人的战术。几个有实力的部族同意与罗马和谈。

公元前223年，率领罗马军团的两位执政官之一是以性格果敢著称的盖乌斯·弗拉米尼。就在这一年，他率军渡过了波河，这充分反映了这位指挥官的性格。眼看罗马军打到家门口，高卢人奋起抵抗。他们召集了5万人的军队迎战罗马军团。一番激战过后，战斗再次以罗马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几个有实力的高卢部族选择了与罗马签署和平条约。

高卢人全都对此深感不安。刚进入下一年，高卢人会合了刚翻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增援的部队，组成共计5万人军队向罗马军团发起了攻势。由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四个罗马军团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一路追到了波河上游，攻占了高卢人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老巢——现在的米兰。

在这次战斗中，高卢方面一个部族的酋长向罗马的两位执政官提出单独决斗的挑战。执政官之一的马尔凯鲁斯接受了挑战。马尔凯鲁斯时年48岁，如果是一名普通士兵，无疑这个年龄已经退入了预备役。由于他非常敬佩高卢民族的个人作战能力，所以他无法不接受挑战，而且，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必定会接受挑战。

在两军士兵的注视下，一对一的决斗开始了。决斗结果，罗马执政官胜出。这是关于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的一段插曲，他在若干年后对汉尼拔的战争中，被誉为“意大利之剑”。

到了公元前220年，平定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人的战斗暂告一段落。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都屈从了罗马，事实上，只是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的部族增加了。罗马决定把防御线从卢比孔河移至波河。公元前218年，罗马在与波河相接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建起了“拉丁殖民地”。并且，铺设从里米尼到皮亚琴察的道路一事也提到了日程上。在弗拉米尼的提议下，从首都罗马到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已于四年前完成。罗马准备在波河以南也实行“罗马化”。然而，汉尼拔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时间。

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相隔的23年里，罗马人除了在西西里实行了行省统治，击退了伊利里亚海盗、打败了高卢人外，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241年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这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王政时期，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推行税制、选举制、军制改革后，相隔300年的又一次改革。

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改革			
	财产 （单位：阿斯）	军队 （单位：百人队）	票数
第一阶级	100000以上	骑兵18，步兵80	98
第二阶级	75000—100000	步兵20	20
第三阶级	50000—75000	步兵20	20
第四阶级	25000—50000	步兵20	20

第五阶级	12500—25000	步兵30	30
无产阶级	所谓的财产只有子女	步兵5 常常免除兵役	5
合计		骑兵18（1800） 步兵175（17500）	193

公元前241年的改革			
	财产 （单位：阿斯）	军队 （单位：百人队）	票数
第一阶级	100000以上	骑兵18，步兵70	88
第二阶级	75000—100000	步兵70	70
第三阶级	50000—75000	步兵70	70
第四阶级	25000—50000	步兵70	70
第五阶级	12500—25000	步兵70	70
无产阶级	所谓的财产只有子女	步兵5 常常免除兵役	5
合计		骑兵18（1800） 步兵355（35500）	373

罗马已经不再是台伯河周边农民和羊倌们聚居的国家，也不再是版图仅限于意大利半岛的国家，它已经把西西里和撒丁等地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很显然，塞尔维乌斯的体系不再适用这一现状，但是，罗马人并未实施大的改革。他们只是对塞尔维乌斯制订的制度作了一些调

整，以适应现状。需要改的就改，不需改的则不作修改。如果拿公元前241年的改革与塞尔维乌斯的改革进行对比，具体的情况就反映在上面的两个表中。其中阶级的划分所依据的是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国情调查”所登记的资产额。

对上述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最大的改变是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在王政时代，第一阶级拥有的票数足以超过市民大会上的一半选票。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如果没有第二、第三阶级的支持，仅靠第一阶级的选票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半数。这也表明，国家的意志体现为更加广泛的市民意志。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标志着这300年间，罗马人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了。

投票权权利的扩大化是与兵役义务的扩大化相关联的。在由拥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所构成的罗马军队中，市民兵的阶层人数变得更加广泛，在军团指挥官的任职上也不再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这对强化罗马举国一致的体制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罗马军团

无论什么事情，罗马人都喜欢做成规范化。他们的这种性格，在罗马军团的编组上表现得最为彻底。为了做到随时能够应对危机，采用规范化的机制是最好的策略。但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状况是：一切以君王的号令为准，来调集军队或根据需要去招募雇佣兵。罗马人的做法显得与众不同。

首先，罗马市民权拥有者分属于35个行政区中的一个。每个行政区，除了无产者，17岁到60岁符合兵役年龄的男性，根据其拥有的资产又分五个阶级。在此基础上，再分现役和预备役。现役年龄是从17岁到45岁，叫Juniors，这是Junior一词的词源。46岁到60岁为预备役，叫

Seniors，这是Senior一词的词源。指挥官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只要不是无可取代的人物，过了60岁通常也要退役。

召开市民大会的时间是在自然休战期的冬季，地点是罗马的马尔斯广场。在这里，首先选出两位担任次年战场的执政官。然后进行其他将领的选举。罗马军的作战单位是一位执政官统率两个军团，所以，两位执政官统率四个军团。四个军团需要24名军官。其中10人必须有10年以上的军旅经验，因此，年龄小于27岁，市民大会不承认其候选人资格。余下的14人至少要有5年军务经验，而且年龄必须在23岁以上，才有资格参选。

选出的24名军官，根据得票数多少，依次分配职位。

前14个人依次为第一军团4人，第二军团3人，第三军团4人，第四军团3人。后10个人的分配不按得票数多少，而是按年龄大小。

根据年龄，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一军团2人，第二军团3人，第三军团2人，第四军团3人。就这样，每个军团的6名上级指挥官分配完毕。从军官的分配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军团中，“领头羊”是第一军团。

执政官被选定，担任执政官辅助工作的军官也被选出并分配完毕后，35个行政区通过抽签，确定下一年度服兵役的区。一个区一个军团。如果这一年的军事行动，只要四个军团就可以解决，那么，八分之七以上的区民当时就可以回家。居住在这些区的居民，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预备役。假如有的区运气太好，从来也没抽中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市民大会会进行适度的调整。罗马人虽然喜欢循规蹈矩，但是，他们的大脑并不僵化。

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军务的行政区后，居住在这些区的所有现役男子，要到卡匹托尔山集合。来这里的人并非个个都要承担军务，因为每个军团的人数是有规定的。

四个行政区分别列队，每个队伍各上前出列四个人，组成四组。要求年龄体格相近，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第一军团的军官首先带走第一组的四个人编入自己的军团。接着，按第二、第三、第四军团的顺序，在军官们的指挥下，每四人一组分别编入各军团。然后，从四个行政区的队伍中再次分别出列四个人，组成新的四组。这次从第二军团开始“分配”，依次是第三、第四、第一军团的顺序。这一轮结束后，接下来的四个组按第三、第四、第一、第二军团的顺序进行分配。随后的一次分配从第四军团开始，按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的顺序进行。像这样，不断循环，直到各军团达到规定的人数为止。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容易造成混乱。但是，做这种事情的是罗马市民，而且其中不乏担任兵役达十数次之多的人。在卡匹托尔并不开阔的山上，已经习以为常的他们总能把分配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用如此复杂的方式分配士兵，目的当然是为了使各军团的士兵水平相当。

在罗马，一个军团的罗马市民兵的人数规定步兵和骑兵合计为4500人上下，即使遇到和强敌对抗的年份，最多也只增加到5000人。所以，四个军团加起来就是1.8万到2万人。因此，从每个行政区队伍中抽选“出列”的工作在达到这个人数后就结束了。余下的人回归预备役，各自回家。

罗马士兵都是普通的市民，因此，罗马非常厌恶无目的的征兵行动。罗马自有一套完整的士兵召集体系，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应对自如。担任这一年兵役的行政区中，作为预备役遣散回家的现役男性首先接受征召，然后是其他区的现役。如果还不够，再召集担任兵役的行政区中的预备役。总之，先后顺序井然有序。只要不发生太严重的事态，不会召集免除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因为这样会剥夺那些无法依赖资产收入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来源。

骑兵由资产最多的第一阶级担任，四个军团共1200骑的数量是固定的。因为数量少，所以在分配给各军团时，按惯例先于步兵进行，每个

军团各300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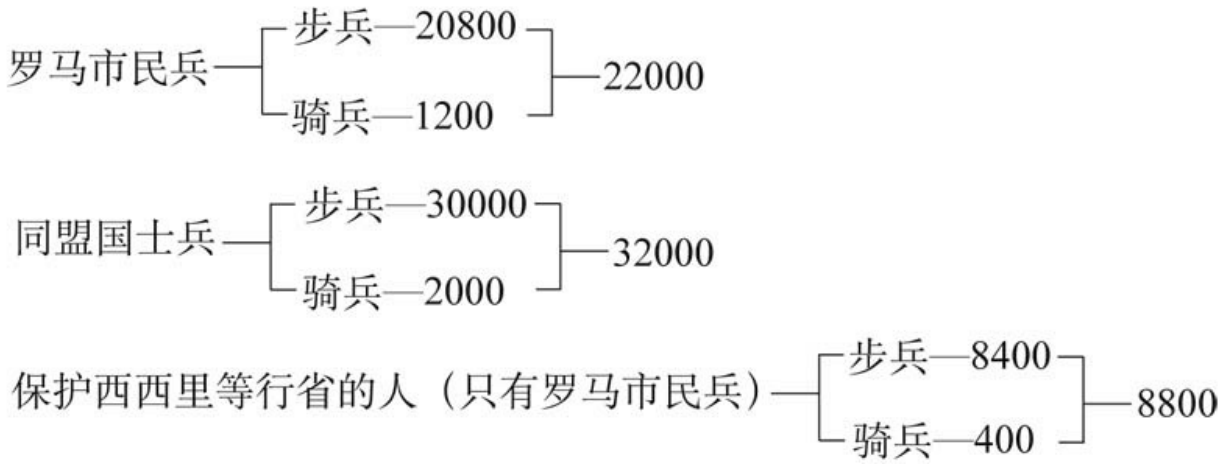
军团编组完成后，全体士兵与执政官及其他军官一起，面对前面的神殿，向诸神发誓。作为自由的市民，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家人，全心全意地完成兵役。

这一仪式结束后，执政官宣布集合的时间和地点。通常集合时间定在3月15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士兵们可以待在自己家里。

罗马市民兵组编结束后，两位执政官这才向罗马联盟的各同盟国要求派遣士兵参加来年春季的军事行动。因为各同盟国享有自治，所以选拔士兵的方式应该各不相同。但是，实际上，许多城邦都采用罗马方式。

根据每个同盟国与罗马签订的条约，各同盟国参加相当于多国联军的罗马联盟军的人数，按一定的比例，取决于各同盟国成年男子的人口。根据历史学家李维的计算，公元前225年，符合罗马市民兵兵役要求的人数是28万。与此相对，各同盟国合计达60万。这两个数字中，罗马市民兵数包括了现役和预备役，同盟国士兵的数量只是现役。

公元前225年，因连续与高卢作战，罗马不得不对正常规模的4个军团进行补充。以这一年为例，战斗力分配情况如下：



罗马市民兵合计：30800

同盟国士兵合计：32000

符合服罗马兵役的人中，现役和预备役的比例如果按2：1粗略计算的话，罗马市民的现役数量约20万人。各同盟国的现役是60万人。每年动员的士兵数基本相等。这就是说，具有盟主地位的罗马，其市民服兵役的次数是同盟国人的3倍。

罗马军团的总指挥权通常由罗马人掌握。但是，这不仅仅因为罗马具有盟主的地位，应该说，罗马承担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牺牲吧。

按照执政官的要求，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集合完毕后，都要向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罗马执政官发誓，在战斗中严守罗马军纪。至此，“罗马联军”正式开始履行职责。

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在集结地集合完毕后，分别由来自本国的指挥官率领。在执政官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这些同盟国的指挥官列席参加。

作为“罗马联军”核心的罗马市民兵，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和纳税义务的多少，又分以下五种（单位为正常时候的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

第一是由600骑组成的骑兵，分若干小队，每小队30骑。第二是轻装步兵，由资产调查中认定属于第四或第五阶级的市民构成，士兵数量为2400名。只需要轻武器的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打前卫，或作为游击队作战。

普遍认为罗马军团等于重装步兵。事实上，罗马军的主力就是重装步兵，由罗马市民中，出身上、中流阶级的人们组成。在资产调查中，第一、第二、第三阶级出身的人全部编入重装步兵。属于第四阶级的人有时候也会被编入重装步兵。

分前后三排横队作战的为常规战术的罗马军重装步兵，又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排横队是最前面的“新兵”，由年龄17岁以上、缺乏战斗经验的年轻市民组成。士兵数为2400人。

第二排是“熟练兵”，他们作为罗马军团的核心而闻名。当前锋线被敌军冲破时，就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所以，阻止溃败是他们的任务。年龄在30岁以上。士兵数也是2400人。

第三排是“老兵”。由40岁上下到45岁的现役中年龄最大的市民构成。虽然他们体力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由他们负责后卫是罗马的常规做法。士兵数为1200人。

组成三排横队的罗马重装步兵中，如果“新兵”、“熟练兵”和“老兵”分别是中队的话，每个中队还会分成20个小队。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军可以在战斗中做到机动灵活的原因。“新兵”和“熟练兵”的小队分别由120人组成，只有“老兵”由60人组成。这就是罗马军团的最小战斗单位“百人队”。率领小队的是以古罗马为题材的电影中必定出现的“百人队队长”。

总司令官、参谋及中队指挥官均是由市民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与名门子弟及名声在外的将领比较容易当选军官不同，百人队队长是由他所属的小队队员投票选举产生的。通常，经过历练有经验的人会当选这些下级士官职务。

但是，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下面要讲述到的理由，把下级士官翻译成“军曹”，感觉上总有些不妥。

第一个理由在于罗马军重装步兵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罗马，他们即便不属于精英之列，至少也属于中流以上的男性。在当时国

家政体最高决策机构的市民大会上，他们掌握着半数以上票数。他们能够充满自豪地说自己作为市民兵，是罗马军队的主力。

第二个理由是两个军团加起来共60人的百人队队长中，按照得票数，前12人可以参加由执政官召集的作战会议。与会者是12名将官和1个骑兵队队长以及列席参加的各同盟国指挥官。

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不是纯粹的下级士官。与上级指挥官相比，作为下级指挥官的他们才是罗马军团的中坚力量。他们才是站在罗马军团最小战斗单位“小队”的前头、率领士兵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

军团最高司令官的能力实际上体现在他可以让百人队队长发挥出多大的作用。罗马的名将，都是那些对百人队队长知人善用、能够有效地指挥他们的帅才，恺撒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来说一说罗马士兵的装备。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士兵的装备都由个人负担。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军出于统一军容的需要，改成国家配发装备。当然，配置装备的费用要从收缴的“经费”中扣除。

轻装步兵的装备是剑、投枪、盾以及简单的头盔、护胸和轻便的军靴。

盾是直径90厘米的希腊式圆形盾。头盔、护胸和鞋是皮制的。头盔上装饰有漂亮的饰物，是为了与日耳曼和高卢人相比个子略矮的罗马人看上能够稍稍高一些。但是，不是冲锋陷阵的重装步兵是不允许戴有饰物的。

投枪细长，越往前越细，长度为1米左右。这种投枪一旦投掷出去，就不能再回收使用。即使到了敌人的手中，敌人也无法使用，因为细细的尖头扎过就断。

重装步兵虽然分前卫、中央和后卫队形，但是他们的装备都一样，都是罗马人想出来的重装备。与中世的重装备相比，轻便许多。

头盔为铁或铜制，上面装饰有50厘米左右长的羽毛。胸甲不光用于护胸，也护背，是用薄铁片或厚重的皮革制成。护腿使用的材料也相同。

这一时期的盾是1.25米× 1.5米大的椭圆形。考虑到可能被敌人砍伤，或立在地上的需要，25厘米宽的外周部分用铁增强坚固度。其余部分成弧形，中间凸起，便于躲避敌人投掷过来的石弹、投枪及直刺而来的剑力。倒扣碗状的中心部分也是为了避开敌人的攻击力而设计的。盾的基本形状是两块木板合在一起，内侧一面贴麻布，外侧贴牛皮。我猜想，这样的盾应该很重。好在罗马人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却足够健壮。

直到公元前250年西庇阿对剑进行改良，在此之前罗马士兵使用的剑一直都是细长的，通常采用砍杀而不是刺杀的方法。公元前250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终于引进了西班牙土著使用的双刃短剑。

投枪可以投掷也可以直刺。波利比乌斯在他的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说：投枪的长度有3米，投程可达25米。年纪较轻的“新兵”和“熟练兵”每人规定携带一粗一细两杆枪，40岁以上的人组成的后卫“老兵”携带一杆即可。但是，一杆的重量也在1公斤以上。

在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团中，骑兵数量较少，战斗力也较低。骑兵的装备由国家的经费负担。不过，骑兵通常都是来自富裕阶层，这自有它的原因。在古代，驾驭马匹本身就是一种技能。一个人从小没有骑过马，或者不习惯骑马，从头学起来会非常困难。

古代没有马鞍，马鞍是中世时代的发明。会骑马并不意味着有战斗力，所以，罗马军团的骑兵很多时候是用来传令或进行侦察的，最多也就是在战场上用来追击溃败的敌人。两个军团加起来不过600骑，也是

缘于骑兵缺乏灵活性，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这个数量已经足够。罗马军团的骑兵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作为名门子弟的“士官学校”。

与步兵的装备不断得到改良有所不同的是，罗马骑兵的装备模仿希腊骑兵的装备，只配备胸甲、头盔、剑、枪和圆形的盾。

不幸的是，罗马军团对骑兵的使用方法后来竟成了被汉尼拔攻击的最大弱点。

在集结地集合完毕的罗马市民兵，已经就地完成了从中队到小队的编组和武器的配发等所有事务。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也完成了编队。他们的编队方法与罗马市民兵略有不同。

首先，由各同盟国推荐有资格的人组成执政官的近卫队，负责执政官身边的一切事务以及警卫任务。后面将要提到的在宿营地，距执政官营帐最近的就是他们。罗马把保卫本国出身的最高司令官的任务交给了虽是同盟国却仍为外国市民的他们，而不是本国市民。由于各同盟国派出担任此任务的都是各国的指挥官预备队，因此，罗马也按士官的待遇给予他们在军团内的待遇。

其次，是从同盟国士兵中挑选三分之一骑兵和五分之一步兵，组成精锐部队。这支同盟国精锐部队相当于罗马军团重装步兵的中坚力量——“熟练兵”。

同盟国士兵中，余下的三分之二骑兵和五分之四步兵再分成两支部队，分别叫左翼和右翼，与罗马市民兵的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叫法不同。最小作战单位是小队，由来自同一城市或同一地方的人组成，小队长也从他们中间产生。

所有这些编队，全部在集结地完成，便于他们随时投入战斗。行军中的顺序，也按单位行进。

走在最前头的是同盟国的精锐部队，随后跟着警卫部队的执政官也在先头部队当中。

第二支队伍是同盟国士兵中的右翼，他们的行李马车紧随其后。

第三支队伍是罗马市民兵中的第一军团和紧随其后装运行李的马车队。

第四支队伍是罗马市民兵中的第二军团和他们装运行李的马车队。

殿后的一支队伍是同盟国士兵中的左翼和他们装运行李的马车队。这是罗马军团常规的行军次序。

按照这样的行军次序，即使中途遭遇敌人，也能迅速排好阵型。因为只要横向散开即可。

骑兵行进在自己所属的军团两侧，或行进在行李马车队的两侧。

如果事先预计到路上可能有敌人从背后突袭，这时，通常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执政官和同盟国的精锐部队转而殿后，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后。其余队伍行军顺序不变。

事实上，在无须担心敌人来袭的时候，行军途中也经常变换顺序。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得到休息，补充水和粮食。

如果行军路线正好在铺就的既平坦又宽阔、易于行进的罗马大道上，或者在宽阔的平野上，队伍会排成三列或四列纵队前进。这种时候，行李马车往往与队伍平行前进。这样，即使出现突发情况，行李马车还可以起到盾牌一样的防御作用。

罗马军团一天的行程通常为25公里。

罗马军团的队形的确非常规范。看到罗马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体现出

井然有序的性格，我感到由衷的钦佩。不过，罗马人的井井有条远未到此结束。一天的行军结束之后，在搭建宿营地的时候，他们的规范性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写过这样一句话：“在希腊，这种事情的处理要随心所欲得多。”

但是，罗马人有他们追求规范的理由。因为从指挥官到士兵每年都要更换，如果没有规范化的规定，很容易出错。所以，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在所有细节上作出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罗马人的确做到了尽善尽美，即使只使用一个晚上的宿营地，他们也忠实地按照规范来搭建宿营地。罗马人把规定订得非常细，即使到了帝政时代，这些规矩依然无须更改。不仅如此，罗马人把搭建宿营地的做法同样用在了建设新城市中。

行军至日落黄昏，值班的一名士官率领一个小队先行，寻找适合当晚宿营的地方。一旦找到防御方面没有问题、附近又有水源、还可以容纳两个军团近2万人的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中心位置竖起一面白色旗子，表示此地是执政官帐幕的位置。以此为中心，向外围搭建宿营地。当然，他们不用卷尺丈量间距，他们是靠步行测量的。一步的距离约30厘米。

就这样，600米× 800米的宿营地就定下来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出入口，从出入口往里是宽阔的通道，相交于中央。为了预防因突变发生混乱，这些主要通路都很宽。接着，他们一边步行测量间距，一边决定搭建帐幕及各方要冲的位置，分别插上旗子。等这些准备工作完成的时候，大部队也到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大家一起完成。宿营地的主要通道旁边，会设一个圣火台。这里是奉上祭品、向诸神祈求保护或用鸟占卜的地方。它的一侧是演讲台。在罗马军团，作为总司令官的执政官向士兵们作演讲，被认为是加强司令官和部属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执政官的帐幕就在圣火台的后面，其帐幕的一侧是财务检察官的帐幕，他们属于军团的经济部门。为方便保护执政官，负责警卫的士兵的帐幕也在旁边。往外是12个将官的帐幕。此外，骑兵和同盟国指挥官的帐幕也在这一区域内。宿营地余下部分位置是军团士兵的帐幕，各军团依次搭建。同盟国士兵也一样。各帐幕之间的距离必须等距，就像用线拉过一样。马棚搭在宿营地的外墙边上。最后，环绕四周，要挖一条壕沟或搭建栅栏。尽管只是一个晚上，但是在安全方面他们绝不掉以轻心。自此，宿营地搭建才告结束。因为规定很具体，所以搭建宿营地所用的时间出乎意料地短。大概士兵们早习以为常了吧。

罗马军队在搭建宿营地方面的用心在其他民族中是名声远扬的。人人都知道，罗马军队到达一个地方后，最先要做的事就是搭建宿营地。后来，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还将计就计，很好地利用了罗马人的这一做法。

帐幕搭建完成后，全体人员参与大扫除。他们在帐幕之间的通道洒上水，用扫帚扫地。

晚饭要在这一切工作都完成以后才开始。按照帐幕，每个人把食材拿到一起，轮流做饭。吃完饭后的打扫和灭火事宜都严格按要求进行。早于其他民族建起了下水设施的罗马人，在宿营地也建有同类设施。随地小便是绝对禁止的。

夜间的警戒，从日落到日出按四等分安排四个班次，轮流值岗。史书中经常出现“轮到第三班值岗的时候悄悄出征”的记载，指的是午夜12点。日落和日出的时间因季节而不同。一个班的放哨时间约3小时，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无一例外，每四天都会轮到一次。

第二天天一亮就吃早饭。可见越是优秀的司令官，越关注士兵的温饱问题。早饭结束后，士兵们不得擅自行动。等到第一声号声响起，全体人员立刻动手拆除帐幕，捆扎行李。等第二次号声响起，行李装上马

车。第三次号声才是离开宿营地开始行军的号令。行军的顺序还是按前面讲到的那样。

在罗马军团的规定中，唯一没有涉及的是罗马军士兵的用餐内容。大概是因为士兵吃的东西和市民没有太大差异，没有必要作特别规定吧。

罗马人不是喜食肉的民族，他们喜欢吃鱼，不喜欢吃陆地动物的肉。甚至有记载说，因为持续的战斗，小麦补给中断，罗马士兵不得不以肉果腹。罗马人的主食是小麦粉做的面包或是以小麦粉为主的粥。他们喜欢吃蔬菜和水果，也喜欢吃奶酪和牛羊奶。这些东西和鱼就是他们的蛋白质来源。

在饮食方面，罗马人和喜欢食肉的高卢人或日耳曼人不同。与高卢人和后来才开始接触到的日耳曼人相比，罗马士兵在体格上处于劣势，他们常常会因此感到自卑。为此，他们应该多吃肉，以期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但是，他们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也许他们认为战斗的胜负不靠体力决定，也许他们离不开海产品、谷物、奶酪、橄榄油加葡萄酒等地中海世界的饮食习惯。罗马士兵在行军途中的餐饮是加牛羊奶煮成的粥、面包、一片奶酪、洋葱和一杯葡萄酒。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征服世界的，这实在令人称奇。现代的欧美人喜欢吃肉，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不是高卢人就是日耳曼人。

罗马军队军规严明，奖惩分明，规定得非常细致。这也是为了在指挥官每年更换的情况下始终能够做到公正。

首先是奖励。对于特别勇敢的士兵，奖以铁制的枪或铁杯。对于在攻城战中，冲在最前面登上城墙的士兵奖以黄金锁。那些救出战友的士兵，将得到被救士兵赠送的、由橡树叶做成的冠。

在所有奖励中，最令人期待的是当选百人队队长。铁杯、黄金锁和

橡树叶冠只代表一个人的战斗经历，它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担任几次百人队队长来得荣耀。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人担任过几次百人队队长。如果担任过第一军团而且是第一小队的百人队队长的话，那种荣耀完全是各类勋章所不能替代的。

其次是惩罚。罗马军队的军规之严比每晚必规规矩矩搭建宿营地还出名。

士兵夜间值岗时打盹，或未及时完成任务等，将面临死刑的处罚。届时，会有两排人站在他的两侧，挥舞棍棒朝他身上打去。这种情形下活下来几乎不可能。此外，偷窃、作伪证、集合迟到三次以上的士兵，也要被处以相应的惩罚。

作战不努力，或过早输于敌人，这些情况属于集体犯罪，军团或分队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最轻的惩罚是其他士兵吃小麦，受罚士兵只能吃大麦。因为大麦是马匹的饲料，所以表示他们的待遇只能与马一样。惩罚稍微重一些的话，是不许他们在宿营地内搭建帐幕，他们的帐幕只能搭在环绕宿营地的栅栏外面。

因为罗马人从不惩罚打了败仗的司令官，所以最重的惩罚不是因为战败。在罗马，被处以最重惩罚的是集体违反军规，也就是不服从总司令官的指挥举旗造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按十分之一的比例，从军团中抽签决定牺牲者。抽中的人要担负起其他人的罪责，在严刑拷打之后被处以斩首。这一刑法通称做“十分之一刑罚”，在罗马军队中被认为是最严厉的酷刑。因为大家虽是同犯，却不得不亲手惩处同伴。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惩罚，而且，没有比这种惩罚更残忍的了。

罗马军队的军规因其严厉而闻名，但是，其公正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执政官处罚亲生儿子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罗马国库的收入来源于国有土地的租地费和间接税以及行省的什一

税。

除了行省市民外，直接税都以“血税”，也就是兵役的形式来抵扣。因此，原则上市民在服兵役期间是没有报酬的。如果还要他们负担服兵役期间的经费，显然税负过重。所以，从战斗持续一个夏季以上的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罗马军队以日薪的形式向士兵发放津贴。

步兵（不分轻重装步兵）：一天4阿斯。

百人队队长：一天8阿斯。

骑兵：一天12阿斯。

重装步兵是拥有5万阿斯以上资产的罗马市民，所以，4阿斯的日薪显然过于低廉。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奴隶，只要聪明一点，一天也能挣到12阿斯。所以，这点钱与其说是收入，倒不如把它看做是象征性的报酬。可见，作为一个自由市民，的确很不容易。来自各同盟国的士兵，他们的日薪好像由各自的国家负担。

另外，虽然军队士兵的粮食由罗马配给，但是，罗马市民在分量上也不占优势。下面是一个月的口粮配给比较：

罗马市民步兵：6摩第小麦

罗马市民骑兵：18摩第小麦，外加马吃的63摩第大麦。

同盟国步兵：6摩第小麦

同盟国骑兵：16摩第小麦，外加马吃的45摩第大麦。

1摩第相当于9升。分配给骑兵的量多于其他士兵，是因为他们有随从。此外，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也有区别。对于来自同盟国的士兵，罗马方面无偿提供粮食，但是对于本国的士兵，要从他们的“工

资”中扣除相应费用。

兵役是享有参与国政权利的自由市民的职责。从经济上考虑，缴纳什一税、免除兵役的行省市民要合适得多。

但是，对于比奴隶的日薪还低的日薪，正在服兵役的无论是罗马市民还是各同盟国市民无一持有异议。

因为他们，罗马与迦太基之战取得了胜利，保证了西部和南部国境的安全；因为他们，伊利里亚的海盗被击溃，东部国境也得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北方安全有了保证，高卢人的骚扰得以暂时平息。

罗马人“完善基础设施”的网络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23年间越铺越大，越铺越密，甚至覆盖了波河以南暂时平定高卢人后的当地人居住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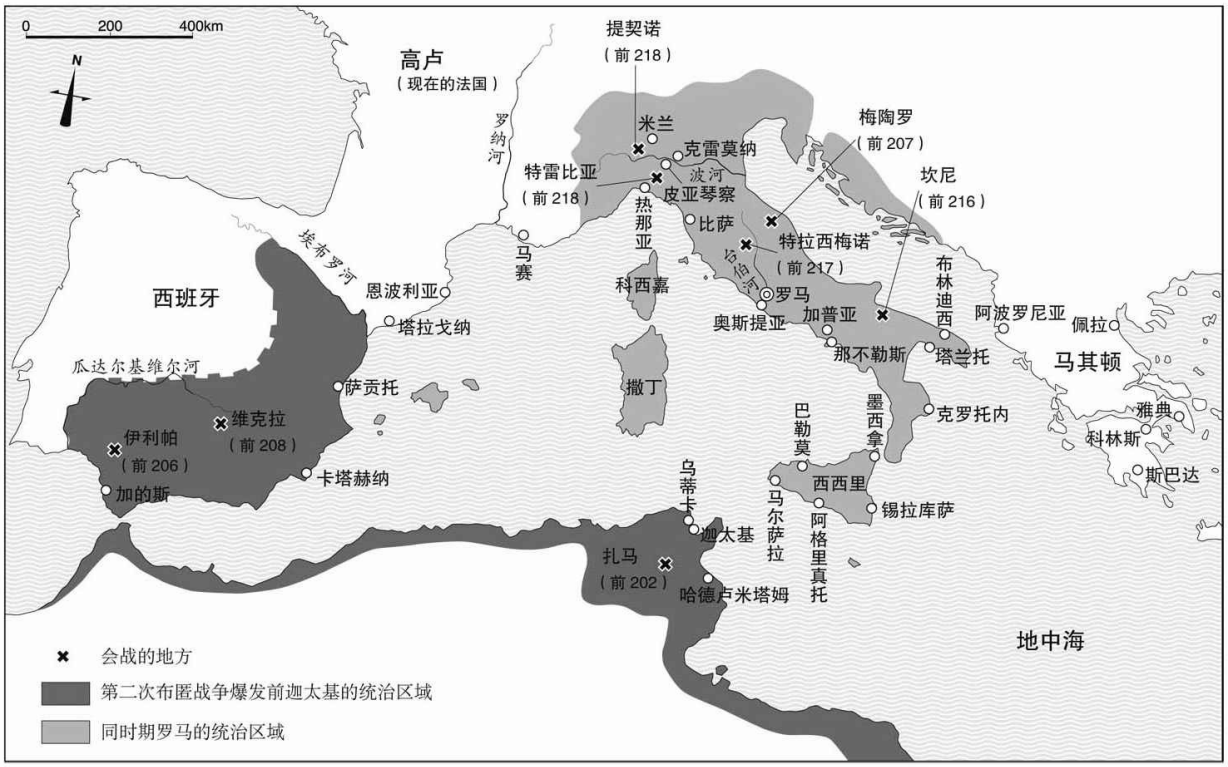
罗马与罗马联盟中的各同盟城邦、同盟民族，不只是军事上的同舟共济，在经济方面也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在这样的罗马，找不到一个主动要与迦太基再战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需要诉诸军事行动的只有生活在波河以北的高卢人。

第三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

（前219—前216）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的地中海

公元前221年，罗马北部的防御体系尚未巩固。就在这一年，总督哈斯德鲁鲍尔在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遇害身亡。据说是他的仆人——一个高卢人——不堪他的侮辱，杀死了他。哈斯德鲁鲍尔是巴卡家的女婿，在巴卡家族的直系继承人汉尼拔长大成人前，他继哈米尔卡之后统治西班牙。这位继承人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年，汉尼拔26岁。

父亲哈米尔卡去世的那一年，汉尼拔只有18岁。8年过去了，已经26岁的他，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成熟起来。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一致推荐他就任总督，宗主国迦太基也同意他担任总督之职。

踌躇满志的汉尼拔上任第二年就计划征服埃布罗河以南的所有地区。西班牙土著居民是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骁勇彪悍远胜高卢人，因此汉尼拔要彻底统一西班牙并非易事。

一年过去了，到了公元前219年，是年28岁的汉尼拔开始要把长期以来的愿望付诸行动。当时，罗马和迦太基本国都未觉察到这位年轻人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

这一年，汉尼拔首先向萨贡托城发起了进攻。萨贡托是港口城市，位于西班牙东岸，与马赛一样，是希腊人殖民后建起来的城市。同样与马赛一样，是罗马的同盟城市。与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的希腊人一样，为了对抗大国迦太基，生活在西地中海的希腊人都与罗马结交，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当受到汉尼拔的进攻后，萨贡托紧急向同盟国罗马派出使者求援。与之有同盟关系的城市遭遇麻烦时，罗马人绝不会袖手旁观。然而，这一年罗马的境况实在是有心无力。

正是在这一年，罗马把北方防线推进到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刚在波河河畔建起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个新殖民城市。但是，通往这两个殖民城市的公路建设尚未动工。在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的道路铺设未完成之前，军队的行动速度受到限制。因此，这两个地方需要长期驻扎军团，以防止生活在波河以北的高卢人侵扰。在这种情形下，罗马无力派援军前往遥远的西班牙。

为此，罗马决定采用外交手段解决萨贡托问题。两位元老院议员，以使节的身份动身前往萨贡托。

罗马的两位使节见到了正在攻打萨贡托的汉尼拔，抗议他攻打自己的同盟城市。但是，这位28岁的年轻人避重就轻，不予正面答复。他甚至扬言：自己没有信心保证两位使节的安全，如果他们一定要继续留在这里，不能够保证他们不被杀得兴起的士兵所害。罗马的两位使节认为话已至此，多说无用，于是，他们决定离开萨贡托，直接去迦太基。然而，汉尼拔的信先于他们送到了迦太基。

罗马方面向迦太基政府正式提出抗议。遗憾的是，在萨贡托的问题上，罗马有难言之隐。

萨贡托位于埃布罗河以南。公元前226年，罗马与哈斯德鲁鲍尔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迦太基不得染指埃布罗河以北。因为当时的罗马与西班牙没有直接接壤，这份协议是为同盟国马赛签署的。

为什么协议中一句也没有提到萨贡托呢？难道是因为公元前226年的时候，萨贡托还没有和罗马缔结同盟？又抑或是罗马认为萨贡托尽管位于埃布罗河以南，但是，既然它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相信迦太基会尊重它的不可侵犯地位？不管怎样，萨贡托的处境非常微妙。

两位使节在迦太基本国同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返回了罗马。元老院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再次向迦太基派出五人使节团，并把决定权交给了他们。这五位使节都是元老院中颇有影响的人，可见此时的罗马非常不希望发生战争。

然而，使节团出行的目的依然没有达到。这时的迦太基统治者因为在西班牙殖民经营的成功已经完成财富积累。他们不仅不打算阻止汉尼拔攻打萨贡托，而且对罗马人提出引渡汉尼拔的要求也只是付之一笑。

只有国内农业派的代表人物汉农有不祥的预感。对于自己的同胞终于为有机会伤害罗马名誉而得意洋洋这一点，他深感担忧，于是呼吁国人认清形势。他说：

> 那个年轻人性情刚烈，又是巴卡家的人，所以才更危险。我有预感，攻打罗马的同盟城市萨贡托会重开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立刻下令，要求汉尼拔马上撤离萨贡托。

但是，几乎没有多少人听得进汉农的话。迦太基政权对罗马的五位使节说，汉尼拔攻打萨贡托完全是萨贡托挑起的。罗马人最憎恨别人睁

着眼睛说瞎话，由此认为事已至此，已经无可挽回。于是，他们要求迦太基政府表明立场：或者从萨贡托撤兵，或者与罗马开战。对此，迦太基政府的回答很明确——“不能从萨贡托撤兵。”

不管是罗马人还是迦太基人，当时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会与第二次布匿战争联系在一起。此时，萨贡托攻城战还在继续。是否加入战争，此事在罗马要由市民大会决定。

五位使节回到了罗马。几乎同时，萨贡托沦陷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公元前219年，时间已经进入秋季。在经历八个月的厮杀之后，萨贡托终于失陷。幸存下来的居民全部沦为奴隶。包括他们在内的战利品售出后，汉尼拔把所得利益分成三份：一份分配给士兵，一份送到迦太基本国，剩下的三分之一留做了军费。接到萨贡托失陷的消息后，罗马市民大会决定向迦太基宣战。

汉尼拔是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战术家，这是罗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位战术家竟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才攻陷了萨贡托。因此，现代史学家中有人评价汉尼拔，说他进行大规模会战时，具备超常的战术才能，却不擅长攻城战。

凡到过萨贡托的人，一定觉得攻打这个城市易如反掌。即使是不善攻城的乃木希典将军，同样可以轻而易举攻下这座城市。我不能不认为，汉尼拔是有意拖延时间。他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延长攻城战的时间，迫使罗马向自己宣战。因为，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辱自己的同盟国。

因为萨贡托位于埃布罗河以南，所以，如果只是攻打这个城市，很难指责他违反了公元前226年签署的协议。但是，如果进攻埃布罗河以北，显然违反了协议。对他来说，只要罗马向他宣战，就无所谓违约了。因为，一旦爆发战争，就意味着协议中的义务自动废除。

萨贡托只是一个小城，小到让罗马想不到应该在协议中特别声明。显然，汉尼拔想要的不是这个小小的城市，他等待的应该是罗马的宣战。他要让当时已经以遵守协议闻名的罗马人首先表态与自己为敌。

卡塔赫纳被称为新迦太基，是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正在这里越冬的汉尼拔终于等来了他翘首以待的罗马宣战的消息。罗马人称做“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战场将在哪里，只有不满30岁的这位年轻人知道。

公元前218年5月，29岁的汉尼拔率领全军，全副武装地离开了卡塔赫纳。

生活在后世的我们知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全过程。但是在当时，只有汉尼拔一个人知道。汉尼拔要率领他的军队一路向北横渡埃布罗河，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现在的法国——当时的高卢，再渡过罗纳河，横穿法国，最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汉尼拔率领大军、带着象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在其后的2200年里广为人知，即使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也有耳闻。

当然，他选择这一冒险的行军路线不是为了博取后人的赞誉。如果只是因为喜欢冒险而冒险，是不可能完成冒险的。既然这样，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为什么他一定要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

我想，答案是，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

虽说是为了继承其父哈米尔卡的遗志，但是，汉尼拔的终极目标是打败罗马。以西西里为战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已经证实，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作战，不可能战胜罗马。要战胜罗马，战场只能在罗马的土地上，在意大利境内进行。

意大利半岛像一只靴子一样伸向地中海中央。南部与迦太基本国相距很近。无疑，从迦太基出发，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最为便利。但是，那里有西西里岛，岛上大多数地方是罗马的行省，而且，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和西西里之间的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海军的手中，因此，从这里进入意大利本土几乎没有可能。

那么，从东边进入又如何呢？首先，航海中的风险与航海距离成正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相距太远。其次，即使顺利通过西西里附近的海域，后面还有意大利南部的海港城市及罗马联盟同盟国的海域。即使成功穿越所有这些海域，进入了亚得里亚海，同样还有危险存在，因为罗马已经把希腊西岸的伊利里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圈，遭遇罗马海军的概率非常高。

此外，从西班牙横渡西地中海也可以到达意大利。但是，从西侧进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都是罗马行省，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罗马海陆军常驻这两个岛上。如果只有五六艘船，或许可以顺利通过。但是，运送大军的船队，无疑会有多达数百艘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可以顺利从罗马海军的眼皮底下通过。

公元前218年的时候，罗马在意大利东、南、西三面的防线几乎像铜墙铁壁一样坚不可摧。

从北方进入意大利是唯一可行的路线。但是，这条进攻路线不仅漫长而且困难重重。需要横穿辽阔的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而且，生活在这一带的原住民高卢人虽然不是罗马人的友邦，却也不是迦太基的友邦。

当然，这条路线也有有利因素。当时，罗马防线虽然已经扩张到了波河，却尚未巩固。而且，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的殖民地建设虽已完成，但是，与旧防线相连的公路尚未铺设。此外，生活在这一带的高卢

人虽然和罗马签署了和平条约，那也只是战败后的权宜之计。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完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罗马化”的恩泽。因为，这里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才刚刚开始。更何况，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被罗马所保护。

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看到了突破罗马防线的可能性。

我想，汉尼拔应该清楚，虽然翻越阿尔卑斯山难关重重，代价很大，但不是不可能，只是当时的罗马人想不到这一点。

后面还会讲到，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汉尼拔之所以拥有出色、超常的判断能力，是因为他知道情报的重要性。可以断定，他早就知道生活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和生活在法国一侧的高卢人，经常赶着家畜往返于阿尔卑斯山两侧。数年前，与罗马军交战的高卢军中，有一部分高卢人就来自罗纳河一带。汉尼拔要做的就是当地高卢人平常在做的事情。只不过他的规模更大——他要率领大军，还要带着大象。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虽然冒险，却是在经过冷静观察和谋划之后实施的一次大胆行动。

现在的我们能够对汉尼拔的这次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得益于当时有记录员随行。或许，这一点他是向亚历山大大帝学的吧。

担任记录员的是汉尼拔的希腊语教师，一个叫西勒诺斯的希腊人。

同一时期，罗马也有一名记录员，他是罗马元老院议员费边·皮克托，与汉尼拔同时代的人。

这两人的记述没有留存至今。但是，古代有人看过他们的记述。汉尼拔46岁那年出生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和200年后的罗马人李维的作品都参考了这两人写的原始史料。根据他们的记载，汉尼拔离开西班牙的根据地卡塔赫纳时，军队的组成是步兵9万人、骑兵1.2万人和大象37

头。

与此同时，汉尼拔派出2万士兵前往迦太基本国，在西班牙留下1.2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以及21头大象。对他来说，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乡，比迦太基本国还要重要。他把守卫西班牙的任务交给了二弟哈斯德鲁鲍尔，让小弟马可尼与自己率领的远征军一起远征。

9万名步兵加1.2万名骑兵的规模应该说非常庞大。骑兵以非洲的努米底亚人为主，步兵是非洲的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军，比例为2：1。除了将官，全体士兵都是雇佣兵。这一点，汉尼拔完全遵循了迦太基军的作战传统。

但是，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把所有人都带到意大利，也没有想过要把所有人都带去。这是一次深入敌后的行军，军粮供应是最大的难题。事实上，过了埃布罗河，汉尼拔已经留下1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守卫比利牛斯山至埃布罗河的地区。同时，他还慷慨允许不愿去遥远意大利的西班牙士兵回家。像这样，汉尼拔在行军途中，同时选拔精锐士兵。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境内时，他的军队还剩步兵5万人、骑兵9000人以及大象37头。

汉尼拔刚过埃布罗河，就有使者紧急向罗马送去了急报。估计是位于埃布罗河以北的沿海城市、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塔拉戈纳及恩波利亚居民发现了汉尼拔的大部队。急报通过那一带实力最强的罗马同盟城市马赛，送到了罗马。

接到急报后，罗马一开始以为汉尼拔发动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称霸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西班牙全境，并认为，为了配合汉尼拔在西班牙起兵，迦太基国内一定也会有所行动，目标当然是西西里。所以，他们预计这次同迦太基之间的战斗，战场将在西西里和西班牙两地。

这一年当选执政官的是贵族出身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

阿和平民出身的提比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二人。为了加速推广“罗马化”的进程，二人最初定下来的任职地都在波河流域。接到“汉尼拔渡过埃布罗河”的消息后，元老院当即变更了二人的任职地，决定派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前往西班牙，派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前往西西里。

通常情况下，罗马每年都要编组四个军团。公元前218年，也只编组了四个军团。因为罗马虽然向迦太基宣战，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接到来自西班牙的急报后，罗马决定在已经编组完成的四个军团的基础上，再增编两个军团。毕竟，意大利半岛也需要有军队来保卫。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组成如下：

罗马市民兵：步兵8000人，骑兵600人。

同盟各国士兵：步兵1.4万人，骑兵1600人。

合计步兵2.2万人，骑兵2200人，共计24200人。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组成如下：

罗马市民兵：步兵8000人，骑兵600人。

同盟各国士兵：步兵1.6万人，骑兵1800人。

合计步兵2.4万人，骑兵2400人，共计26400人。

联盟规定，罗马联军在平时，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各国士兵的比例为5：5。遇到突变事件，增加人口居多的同盟国的士兵数。危机程度进一步提高时，每个军团中的罗马市民兵数从平时的4000人增至5000人。

看得出来，接到“汉尼拔渡过埃布罗河”的消息时，罗马元老院的反

应还只停留在警钟响起的程度。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2.42万名士兵首先到达比萨。在这里，乘坐已等候于此的60艘蓬特型战船，向西班牙进发了。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和他的2.64万名士兵分坐160艘由三层桨战船和蓬特型战船构成的混合船队，与20艘运输船一起，离开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目的地是西西里。

塞姆普罗尼乌斯的战船多于科尔涅利乌斯，而且还配备了运输船，是因为他的任务不是单纯的保卫西西里。在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成功阻截汉尼拔的时候，他要登陆迦太基作战。由此可见，汉尼拔离开西班牙前，向迦太基本国送去2万名士兵保卫迦太基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然而，两位执政官分别向西、南出发后不久，第二份情报送到了罗马，内容是“汉尼拔翻过比利牛斯山”。

罗马猜不透这位29岁的年轻人想要干什么。既然翻过了横亘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可见，汉尼拔的意图显然不是称霸西班牙全境。那么，他率领如此大军，究竟要干什么？难道是要征服以马赛为首的希腊系城邦居多的法国南部吗？不管怎样，从海上一路向西的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第一站就是友邦马赛，所以迟早，他们会知道迦太基年轻人的真实意图。

另一方面，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到达西西里后，经与同盟国僭主希伦商议，进军西西里西部，并在马尔萨拉建起了大本营。他对西西里岛上平静祥和的气氛深感意外，于是亲自率领船队，到迦太基近海视察，却没有看到迦太基本国有任何异常，甚至看不出他们在关注汉尼拔的动向。汉尼拔派来的2万名士兵也在街上游逛，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尽管如此，塞姆普罗尼乌斯依然命令属下海军加强对西西里至意大利南部沿岸的警戒。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和他的军团乘坐的舰队顺利进入了马赛港。然而，等候他们的是敌军已经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消息以及汉尼拔失去行踪的报告。没有人知道汉尼拔和他的5万大军去了哪里。

现在的法国，即当时的高卢，不像现在是一望无际的耕地。当时虽然是一片平原，却遍布森林和沼泽。假如是草原或是耕地，行进途中的一支大军不可能遁迹。因为行军会扬起尘土，即使离得很远，也能被发现。但是，遍地都是茂密的森林会妨碍视线，即使是大队人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其行踪。更何况，法国的腹地很深。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派出300名骑兵，请马赛人当向导，搜索敌人的行踪。在找到汉尼拔军之前，大部队在马赛待命。

搜索极其不易。因为汉尼拔和他的军队不是在马赛附近消失的，而是在翻过比利牛斯山脉后，突然就不见了踪影。当然，“去向不明”也是汉尼拔的行动计划之一。他之所以选择在内陆绕一大圈，故意避开罗马的同盟国马赛以及罗马势力所及的法国南部，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

罗纳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里昂，在马赛附近注入地中海。虽然水流并不湍急，但是其水量丰富，即使在夏季也不见减少（据当地水文特征，夏季水位较低——编者注），用波涛滚滚来形容罗纳河最贴切不过。去阿尔卑斯山必须过这条河，但是，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当时还不知道汉尼拔的真实意图。

汉尼拔尽管年纪轻轻，只有29岁，却要做出前人未曾有过的伟业，他不会鲁莽行事。进入法国后，大多数情况下，他采用的是怀柔政策，用钱笼络部族众多的高卢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武力。他很清楚，一旦罗马发现自己的行踪，一定会派军队阻截自己。汉尼拔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横渡罗纳河，既不会遭遇罗马军，也不会被马赛及其周边的希腊人发现。按惯例，他陆续派出侦察员侦察地形，并结

合被收买的高卢人提供的情报，确定了过河地点。罗纳河的其中一处沙洲很多，水流受到河中沙洲的阻挡，变得很缓慢，非常适合大军和大象过河。这个地点应该是现在的瓦朗斯附近，位于罗纳河上流，距离马赛150公里。因此，遭遇罗马军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这终究是一次达5万人之多的大部队过河。如果按小队依次过河，无论如何也要分几十次，才能全部渡过。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过河，风险太大。因为生活在罗纳河以东的高卢人一定不会坐视他们过河。部队还没有过河，可能已经遭到高卢人的袭击了。实际情况是，汉尼拔的士兵刚刚开始砍树造木筏，河对岸就出现了高卢人的身影，他们带着明显的敌意，注视这边的动静。

汉尼拔于是命令一名部下带着骑兵队，到40公里开外的上游过河。因为是骑兵，过河相对比较容易。骑兵队的任务是，在上游40公里处，渡过罗纳河，袭击并烧毁河对岸所有高卢人的部落。其余人专心制造木筏。

隔着河中沙洲遍布的罗纳河，看到对岸升起的火和烟，汉尼拔知道骑兵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火和烟就是信号。河对岸，怀有敌意的高卢人像潮水退去一样消失了。由于部落住处被烧毁，他们已经无力隔着罗纳河，向汉尼拔军挥舞刀剑。

5万名士兵和马匹、辎重车、大象横渡罗纳河的大规模行动开始了。他们没有利用河中沙洲，他们首先在河中，过河路线的上下筑起两道栅栏，以减缓水流的速度。接着，拉起若干条绳子，两端分别固定在两岸的树上。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和大象，因为害怕，或失足落水，或掌控不住木筏，顺流穿过栅栏，消失在河的下游。

横渡罗纳河的壮举终于结束。但此时的汉尼拔军仅剩下步兵和骑兵合计4.6万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的时候，全军共5.9万人，进入高卢以后，因为横渡罗纳河，损失了1.3万人。好在这一切都在汉尼拔的预料

之中。

横渡罗纳河需要很长时间。为了顺利完成渡河壮举，这位年轻的统帅派出后卫骑兵队到罗纳河下游巡逻。这500人的骑兵队遭遇了前来搜索汉尼拔军的罗马骑兵队。

两支骑兵队战斗的结果，罗马方面损失了300名骑兵中的140名骑兵，迦太基方面损失了200名骑兵。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因此终于掌握了汉尼拔的行踪。

然而，当科尔涅利乌斯紧急赶来时，得到的消息却是，汉尼拔全军已于三天前过河，一刻未停留，向阿尔卑斯山进军了。因为有步兵，三天的距离无论如何也难以追上。即使追上了，没有罗马军的主力——重装步兵也无济于事。

至此，汉尼拔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朗。他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自北攻入意大利。因为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过了罗纳河后，沿峡谷向东北直指现在的格勒诺布尔。从格勒诺布尔再往前，就是阿尔卑斯山。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陷入了两难的选择。首先，他考虑带着自己的军团返回意大利，迎战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的汉尼拔。但是，他身边只有2万兵力。因为在获悉高卢人骑兵的消息后，他向波河周边派出了部分士兵。同时，在离开比萨的时候，又留下了一部分人守卫那里。

其次，他考虑把迎战汉尼拔的任务交给同僚塞姆普罗尼乌斯，自己则按预定计划继续向西班牙进军，捣毁汉尼拔的大本营，摧毁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

问题是，塞姆普罗尼乌斯已经到了西西里。从最南端的西西里到北端的阿尔卑斯，相距太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来。而且，此时的科尔涅利乌斯尚不清楚迦太基的情况，并不知道迦太基完全没有要与意大利

交战的意图。对科尔涅利乌斯来说，从马赛去西班牙并不难。虽然马赛和恩波利亚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海湾，但是只要横渡这个海湾就可以到达罗马的同盟城市恩波利亚。从恩波利亚去西班牙无须翻越比利牛斯山。相反，如果率全军返回比萨，海上的距离就要多走两倍以上。话虽如此，罗马执政官是保卫意大利的最高责任者。如果置正在进军意大利的敌人于不顾，坚持率军去西班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考虑再三，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作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选择。

他把自己的军团交给同行的弟弟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让他率军继续前往西班牙，自己则只带高级指挥官们回意大利，率领在那里已经编组好的另两个军团，迎战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的汉尼拔。因为回意大利的人数不多，只要几艘战船即可，所以，尽管海上的距离在两倍以上，也不成问题。

四年后的战况证实他此时的选择是正确的。罗马元老院在接到科尔涅利乌斯送来的急报后，马上把编组好的两个预备军军团升格为现役军，让他们前往比萨等候执政官从马赛赶来。同时，元老院也向西西里的塞姆普罗尼乌斯送去了指令，要求他紧急北上。很显然，和迦太基军交锋的战场不再是西西里，而是意大利北部了。

尽管已经过去了2200年的岁月，尽管有为数众多的学者在努力探索，但是，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究竟在哪个地点翻越阿尔卑斯山，至今尚未弄清。各派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目前主要有六种说法。在古代，也有两种说法。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地点是现在的圣伯尔纳铎山，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则认为是圣伯尔纳铎山以南的蒙吉内夫罗。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采用了波利比乌斯的说法。但是，自己也经历过

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则认为李维的说法更合理。

如果按波利比乌斯的说法，汉尼拔离开格勒诺布尔后，行军路线应该转向东北，从海拔2110米的圣伯尔纳铎山进入意大利，自北攻入都灵。

相反，如果按李维的说法，汉尼拔离开格勒诺布尔以后，应该向正东方向前进，在海拔1854米的蒙吉内夫罗翻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沿苏萨的峡谷，向东攻入都灵。

拿破仑说过，汉尼拔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遭遇的真正困难是让象群翻过山。历史上，在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的160年之后，尤里乌斯·恺撒也率领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只是，与汉尼拔的方向相反，他的出发地是意大利。

虽然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汉尼拔究竟在哪个地点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对于他如何翻越阿尔卑斯山，可以说，我们了如指掌。原因当然是归功于他的希腊语教师——同行的记录员西勒诺斯,是他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著作都参考了他的记录。

话说回来，这终究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再加上有大象，其难度可想而知。甚至我在想，当时的罗马人认为汉尼拔绝无可能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并非没有道理。

自古以来，山地民族的性格大多封闭，因此多疑。尽管汉尼拔的大军已经到了阿尔卑斯山脚下，但是，影响汉尼拔军士气的不是高高耸立在面前的大山，而是高卢人。因为他们带着明显的敌意。他们手持明晃晃的剑，会从森林中的任一方向向汉尼拔军队袭来。

汉尼拔非常不喜欢无谓的牺牲。在这里，他依然采取了怀柔政策，笼络各部族的首领。他惯常的做法是，赠送金钱等财物，并告诉高卢

人，自己的敌人是罗马人，到这里只是路过。怀柔政策使他成功化解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危机，各部族首领们甚至为他们送来毛皮斗篷，以抵御翻山途中的寒冷。毛皮斗篷自然难得，但是，对汉尼拔来说，他们提供的路线，可以减少牺牲，更是难能可贵。但是，部族众多的高卢人，虽说都是高卢民族，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部族和生活在山中的部族不同。事实上，汉尼拔从心里并不相信高卢人提供的情报。

开始上山了。汉尼拔安排象群走在最前面，目的是要唬住高卢人，让他们不要试图阻止自己的行军队伍。横渡罗纳河时，有一些大象不幸落水，此时尚存30头。紧跟象群后面的是运输军粮的辎重车和步兵军团。后卫由骑兵担任。29岁的年轻统帅走在行军队伍的中间，尽管他是总司令官。有山民不相信他们只是纯粹的路过，认为这是一支入侵的队伍。于是，他们在悬崖上堆起石块，在他们经过时，一块接一块地推落下来。也有人在转角处设下埋伏，等他们走近，射出手中的箭。每当这种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总是总指挥官汉尼拔。

此时还是9月。但是，初雪已经开始在山上纷纷扬扬地飘落起来。不知是否因为第一次看到大象，吓着了，高卢人没有正面袭击汉尼拔军。但是，阿尔卑斯山中的气候对生于南国的大象来说应该很不舒服，象群经常表现出狂躁不安。安抚它们的骑手也是第一次走在雪花纷飞的地方。更可怕的是，山上只有狭窄的小路，往往是一侧峭壁，一侧悬崖，稍不留神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大象凭动物的直觉，遇到危险就停滞不前，全靠步兵从后面推它们前行。这样一来，掉入谷底的危险大大增加。失足的大象、侧翻的辎重车带着士兵，转眼消失在谷底。每次听到下面传来的绝望的叫声，让远远走在后面的骑兵也忍不住心惊胆战。

山上完全没有可以搭建宿营地、让全军歇脚的地方。这种事情连想都不要想。当他们看到山民上山时使用的避难所或要塞，甚至觉得这是神的恩赐。很多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搭建营帐，只好燃起篝火，

用帐幕裹住身体，抵御寒冷和风，但是，这样仍然无济于事。总司令官汉尼拔身先士卒，他和雇佣兵一样吃冻僵的食物，和雇佣兵一样，在峭壁下面小睡片刻。但是，他比雇佣兵辛苦得多，他要考虑雇佣兵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他要根据情况迅速作出判断。

上山后的第九天，全军终于登上了山顶。此时，士兵、马匹和大象都已经疲惫不堪。幸好山顶附近有一块足以让全军休整的平地。汉尼拔下令全军休息两天。

尽管如此，士兵们的情绪依然低落。于是，这位29岁的总司令官集合全体士兵，指着东方给大家鼓气。他指的那个地方，虽然很遥远，但是在蓝天下，依稀可见。

> 那儿就是意大利。只要我们进入意大利，就意味着我们站在了罗马的城门前。接下来，我们走的都是下坡路。下了阿尔卑斯山，我们只需进行一两次战斗，意大利就会投降。我们将是意大利的新主人。

于是，士兵们满脸的疲劳和不满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学过这段史实，2000年后，拿破仑攻打意大利时，也站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对着士兵，讲了同样的一番话。

下坡比上坡还要困难。虽然高卢人终于明白汉尼拔只是路过而不再袭击他们，但此时，阿尔卑斯山中已经完全进入冬季，寒冷一天比一天严酷，凛冽的寒风像针一样直往身上扎。白天下的雪，到了第二天一看，已经冻成冰。在冰路上往下走，别说是大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考验。为了等待开路的士兵敲开冻住的路面，全军不得不常常停下前进的脚步。冻雪上面又落了新雪的地方，更加危险。敲开上面的第一层冰，以为可以走了，但是，往往刚迈出一步，就因下面的冰滑倒在地。一路上还经常遇到雪崩。一旦发生雪崩，前面的道路就会堵住，全军不得不

停下来开通前行的路，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挪不了步。还有些地方，人和马可以通过，但是，辎重车和大象不能通过。这时，就要凿峭壁，拓宽路面。耐不住寒冷和疲劳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失足坠入深渊的人，比上山时还要多。好几头大象遭遇了这些士兵相同的命运。

汉尼拔从开始攀登阿尔卑斯山到走下阿尔卑斯山，据说共用了15天时间。根据汉尼拔自己留下来的记录，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到达意大利一侧的平地上时，他的军队人数是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计2.6万人。

渡过罗纳河的时候，步兵和骑兵合计是4.6万人。这就意味着，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2万人。从走下比利牛斯山脉开始，一路上留下了多达3.3万人的尸骸。虽然他做到了前人未曾尝试的伟业，但是，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

我在想，这部分牺牲或许也在这个29岁的年轻人的预计之中。对他来说，为了把战场设在罗马人的大本营意大利，即使牺牲再大，也必须自北向南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卡塔赫纳出发，到进入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个月。

下了阿尔卑斯山，脚下是一片开阔的峡谷。汉尼拔下令全军休息。这一歇，就是15天。

有学者指出，如果罗马军队早早等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或许轻而易举就能打败精疲力竭外加饥寒交迫的汉尼拔军。我想，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没资格评论历史。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年，罗马好不容易刚刚完成殖民地建设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地，距离汉尼拔下山的地方，向东有250公里之遥。而且，夹在皮亚琴察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还是高卢人的天下。汉尼拔毅然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就是因为他了解这些情况。对罗马军来说，在山脚下设伏全无可

能。

士兵们在山脚下休整期间，汉尼拔却没有闲着，他在笼络周边的高卢人。此时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让他和他的军队顺利通过，而是招募高卢人作为雇佣兵，加入其军队，与罗马人作战。

利用雇佣兵保卫国家是迦太基的传统。一直以来，迦太基的雇佣兵中不乏高卢人。近200年来，生活在意大利北部，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南侧被称为内高卢的高卢人，一直受罗马的压制。他们时常有南下的企图，但是，像公元前390年入侵罗马这样的事情，已经是遥远的幻想。迄今，罗马一直把卢比孔河作为北方国界线，现在这条线已经扩张到波河沿岸。还隔着波河，一南一北在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建起了殖民地。这些举动真实地反映了罗马的意图。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自然不能接受。他们一次次地挑起战斗，但是，每逢重大战斗，胜利者总是罗马。因此，内高卢的高卢人虽然滞缓，却在不断前进的罗马人面前一步步地在后退。

现在，好像神兵从天而降一样，迦太基军来到了他们面前。而且，他们宣称要和高卢人一起，共同对付罗马。很快，几个高卢部族和汉尼拔结成了同盟。

但是，位于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也分很多部族，相互间内讧不断，对外族本能地怀有强烈的猜疑。当汉尼拔不能成功笼络一个部族的时候，他就毫不留情地用武力解决。高卢人的聚居地之一都灵就是在汉尼拔军的进攻下一天内沦陷的。不管怎样，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并未全体响应汉尼拔的号召。通过接触和观察高卢民族，汉尼拔认为，要把他们拉入自己旗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打败罗马军队。于是在攻陷都灵后，汉尼拔转战向东，寻找真正的对手去了。

汉尼拔向意大利发起进攻的公元前218年，被迫迎战的罗马可动员

的兵力是多少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对此，汉尼拔同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皮克托给了我们答案。我在前面提到过，此人的著作，大概是罗马人最早的历史著作，遗憾的是，没有留存至今。但是，波利比乌斯及李维引用了他的著作，因此，我们得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据他们的记载，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所有罗马联盟加盟国中，可动员的兵力人数总计是75万人，其中，罗马联盟盟主罗马的市民超过三分之一。

因为是盟主，所以承担的义务比各同盟城市多。罗马市民中，可动员的兵力共计28万人。其中，除了17岁到45岁的现役，还包括46岁到60岁的预备役。与此相对，同盟各国的可动员的兵力都是现役，他们和罗马市民不同，即使出现紧急情况，也不会召集预备役。

细述起来，非常繁复，所以我在这里不详述了。总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同时代见证人皮克托一一记录下了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各国及地方的可动员兵力。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得知，普鲁塔克和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完全正确。前者说过罗马人甚至会同化战败者，后者则评价罗马联盟是政治建筑的杰作。例如，后世的我们以为，伊特鲁里亚人于公元前4世纪初被罗马打败后，彻底销声匿迹。事实却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这一时期，该民族已经是罗马联盟中强有力的一员，有步兵5万人、骑兵4000人。还有萨莫奈人，虽然其间一度中断，但是，自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曾经与罗马进行了长达40年的艰苦战斗。被罗马打败后，也成了罗马联盟的同盟者，拥有7万步兵和7000骑兵。

对于这些战败者，罗马并没有把他们作为被统治阶层来统治他们，而是吸收他们成为罗马的同盟市。在现代意大利语中，“同盟市”的意思是共同经营者。正因为如此，在建设以罗马大道为代表的“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他们也充分享受了和罗马一样的待遇。这也是罗马在第一次

布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在和汉尼拔较量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是罗马拥有的真正力量。

只从数字上看，汉尼拔以2.6万人的兵力攻打拥有75万人兵力的意大利，难免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有勇无谋。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罗马联军”的士兵，无论其出生地在罗马还是同盟国，都是市民，具备缴纳直接税的经济实力。骑兵和重装步兵是共同体的核心，他们都是拥有中等以上经济实力的人。如果把这些核心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参加军队，共同体将不复存在。事实上，无论是罗马还是同盟各国，市民都是轮流承担兵役义务的，而且尽可能做到平等。因此，进攻意大利的汉尼拔不可能同时与75万人交战。

公元前225年，罗马联盟不得不同时对付东部伊利里亚人和北部高卢人的时候，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是62800人。这个数字还包括西西里及撒丁等行省的驻兵。即使进入战争时期，“罗马联军”的兵力也就这么多。所以，可以认为，自北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必须面对的敌人兵力大约是5万人。

对于只有2.6万人兵力的汉尼拔来说，这个数字也是他的两倍。尽管如此，汉尼拔军的实力却不一般。

汉尼拔军的2.6万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考验后幸存下来的士兵。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在横穿法国时一次次击退高卢人的袭击，渡过了罗纳河，还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用“精兵”一词来形容这支部队最贴切不过。在这个战斗集体中，士兵一个比一个勇猛顽强。

5个月来，他们同吃一锅饭，一起挨过千辛万苦，他们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尽管这个集体中有西班牙人、利比亚人、努米底亚人等，但是，他们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位年轻的天才

领袖。与此相比，罗马联军每年都要更换从总司令官到士兵的所有人。我想，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汉尼拔的兵力只有意大利的二分之一，但是，在实力上毫不逊色。

从军队的构成来看，汉尼拔的2.6万名士兵中，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接近3：1。与此相对，罗马联军向来以重装步兵为主力，所以，根据传统，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不会超过10：1。

通过汉尼拔参加过的战役，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很熟悉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术。这一点，从他有意识地强调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上可见一斑。亚历山大大帝攻打大国波斯时，率领的军队是步兵3.1万人、骑兵5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为6：1。

与马其顿的年轻人率领的3.6万人相比，迦太基的年轻人率领的士兵数是2.6万人。虽然骑兵的战斗力占优势，但是，整体战斗力不如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不过，汉尼拔自有他的优势。亚历山大进入波斯以后，缺少增强战斗力的手段。与此相反，汉尼拔能够招募高卢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位29岁的迦太基将领看似冒险进攻意大利，其实并非鲁莽之举。

决定战斗结果的所谓战术，既是哥伦布的鸡蛋，同时又不是哥伦布的鸡蛋。

所谓哥伦布的鸡蛋，是指用别人不曾想到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同样的方法，用的人不同，结果不一定相同。所以，它又不是哥伦布的鸡蛋。同样的方法，是否有效，要看实际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才能。因为使用的人是亚历山大，所以，他成功了。但是，这不表示任何人都会成功。汉尼拔以亚历山大的先例为参考，加上自己的独创思想，进行了灵活运用。

优秀的指挥官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主要战斗力量来决定战斗的胜利，

懂得要有效利用主要战斗力量，同时也懂得辅助战斗力量不可缺少。2.6万人是汉尼拔的主要战斗力量。他努力笼络居住在意大利一侧的高卢人，就是因为他需要辅助的战斗力量。

高卢人部族多，各部族间纷争不断，所以在战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爆发力特别强，但持久性有所欠缺。组织力的脆弱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他们常常被看做是蛮族、未开化的人。汉尼拔熟知高卢民族的这一特点。他没有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看做是同盟者。虽然结成了同盟，但是，他只是把他们当雇佣兵看待。也就是说，他没有像罗马人信任同盟各国那样信任高卢人。但是，他需要辅助性的战斗力量。高卢人并不清楚汉尼拔的真实意图，但是，出于对罗马的深恶痛绝，他们还是一点一点地赶来加入到汉尼拔的旗下。成功翻过阿尔卑斯山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汇聚到汉尼拔旗下的高卢士兵已经超过1万人。2.6万人变成了3.6万人。更让汉尼拔高兴的是，当时的高卢和非洲的努米底亚一样，是骑兵的产地。

这一期间，罗马方面也作好了准备，迎战从出人意料的方向攻过来的敌人。

从马赛撤回来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等候在比萨的两个军团，一路直奔皮亚琴察。这里已经成为迎战汉尼拔的最前沿阵地。但是，他还没有想好是否仅靠自己手中的两个军团与汉尼拔拉开战斗的序幕。

罗马的指挥官中，只有科尔涅利乌斯对汉尼拔的才能有所耳闻。无论是横渡罗纳河的方法，还是成功翻越了谁都认为不可能翻越的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以及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艰苦行军的方法，这一切都让科尔涅利乌斯有理由认为，汉尼拔绝对不是一个青涩的年轻人。

科尔涅利乌斯听说了高卢人纷纷加入汉尼拔军队。这就是说，汉尼拔军还在不断壮大。所以，从人数上看，两个军团显然处于劣势。此时，同僚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率领两个军团已经离开当初的任职地西

西里正在北上。科尔涅利乌斯决定等待友军的到来。时间已经是11月。在以往，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自然休战期了。

第一次战役：提契诺战役

迄今为止，罗马与其遇到过的敌人，一到冬季，双方就像约好了似的，自动进入休战期。这时，罗马军队会留下少量士兵防守，罗马市民兵回罗马参加市民大会，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也各自回家。然而，这次面对的敌人是汉尼拔，是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带着大象翻过了阿尔卑斯山的人物。面对这个年轻人，一切常规的方式都不再适用。于是，罗马的两个军团全部留在了前线基地皮亚琴察。冬营地皮亚琴察的要塞建设尚不充分，也不知道敌人几时会打来。罗马军就在这种状况下准备越冬。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认为有必要鼓舞一下士兵的士气。他召集起全体士兵，开始讲话：

> 士兵们，如果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带到马赛去的战士们，我无须多说。因为他们知道，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第一次交锋是以罗马方面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的。

事实上，那次交战只是骑兵间的小规模战斗，虽然敌人损失了200名骑兵，但是罗马军也有140名骑兵阵亡。这样的战果实在很难称得上是重大胜利。但是，科尔涅利乌斯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励即将见识汉尼拔的士兵们。

> 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是你们。你们没有看到那场我们取得辉煌战绩的战斗。因此我想，我有必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对大家说几句

话。

各位，我们将要面对的不是新的敌人，他们是23年前被我们大败的敌人余孽。我们战胜过他们，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和撒丁。所以，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不是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败者挑战胜者的再次较量。

他们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他们的士兵忍受了饥寒交迫，浑身污垢，山上的岩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他们的手脚冻裂，肌肉僵硬，兵不像兵，马不像马。他们就像毫无意志、随处飘游的幽灵。

23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迦太基人洗心革面。他们是迦太基人，和那些在埃加迪群岛海域的海战中被我们打败后又被我们成功赶出西西里时的敌人一样。

现在，这些迦太基人公然进入意大利挑战我们。所以，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西西里的统治权，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意大利，保卫我们每一个意大利人的亲人。我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要记住，诸神会保佑我们所有的人！

与此同时，在迦太基军营地，汉尼拔也召集了士兵，鼓舞士气。但是，迦太基的年轻人采用的方法和罗马的名门望族科尔涅利乌斯的方法大不相同。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汉尼拔让全体士兵围成一个大圈，接着，命人把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途中抓获的高卢人带到圆圈中央。一个个高卢人被沉重的锁链铐在一起。由于被捕以后，几乎没进食东西，所有人看上去弱不禁风。几近裸体的他们在严寒的山上一路走来，身上都是冻伤，连站立都非常困难。

汉尼拔命令部下解开他们身上的锁链，通过翻译，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愿意，我允许你们进行决斗。胜出者我会给你武器和马，还给你自由。

可怜的高卢人俘虏都要求加入决斗。惨烈的决斗开始了。随着决斗的进行，决斗中的高卢人和围观的士兵们内心的感受有了共鸣。所有人为胜者鼓掌庆贺，也为失败而亡的高卢人送去更加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终于得以结束残酷的人生。这场决斗结束后，年轻的指挥官对士兵们说：

你们看到了高卢人刚才的表现。如果你们怀着与他们同样的心情去战斗，我可以肯定，胜利将属于我们。刚才，你们看到的不是表演，而是真实地反映你们现状的一面镜子。

我们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大海，这两个大海把我们阻隔在这里，我们没有船可以从这里逃出去。我们的前面是波河，这条河比罗纳河还要大，水流更湍急。我们的背后是高高耸立的阿尔卑斯山，是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刚刚翻越过的山。我想，没有人愿意再次翻越这座山吧。

所以，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面对罗马军队勇往直前。战斗中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而亡。如果战胜了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长生不老的诸神都不敢奢望的酬报。只要战胜罗马，不要说西西里或撒丁，罗马人所有的一切都将属于你们。你们将是罗马人统治的所有土地上的统治者。

我想，大家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很艰苦。但是，与之前我们从西班牙出发，直到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不同，我们的辛苦将会有所回报。

现在，我还不知道敌人的统帅是谁。但是，无论是谁，都无法与生于军帐内、长于军帐中、还有个勇敢的父亲哈米尔卡的我相比。在罗马没有一位将领可以与率领军队完成从西班牙到意大利长途跋涉的我相提并论。

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你们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国家，我将赠与你们当地的土地，无论是在迦太基，在西班牙，还是在意大利。免除一切租税，直到你们的孩子那一代。如果你不要土地只要金钱，我会给你相应的金币。如果你想要迦太基市民权，我会授予你这一权利。

此外，汉尼拔还许诺跟随士兵一起来的奴隶说，如果他们参加战斗就还他们自由。同时承诺，这些奴隶成为自由民后，将为他们的主人各配两个罗马人奴隶照顾他们的生活。总指挥官强烈的自信感染了在场的士兵。在士兵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汉尼拔结束了演讲。

当汉尼拔获知罗马有两个军团就在皮亚琴察时，他马上率领全军离开宿营地，向东行军。目标直指皮亚琴察。

在皮亚琴察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虽然不希望此时立刻开战，但是，他认为在友军到来之前，至少应该视察一下敌情，因此，带着全体骑兵和少量轻装步兵，离开皮亚琴察，向西而来。

从皮亚琴察往西，过了波河上流的提契诺（现在的帕维亚），有一个波河流域最平坦的开阔地带，这里现在是意大利最大的稻谷种植区。罗马骑兵队在波河支流之一的提契诺河上架起桥梁后，继续西行。然而，刚过桥不久，就看见西边远处地平线上尘土飞扬。原来是汉尼拔带着骑兵，也出来视察地形。他们似乎也发现了罗马的骑兵队。

两军的距离渐渐缩短。因为罗马执政官去任何地方都有手持权杖的12名警卫相随，所以，汉尼拔知道罗马的执政官也在敌人的队伍里。罗马人从渐渐临近的迦太基骑兵队的情形中，也知道了汉尼拔就在其中。如此一来，双方别无选择，只有开战。

汉尼拔率领的骑兵兵力是多少，不是很清楚。罗马骑兵队是4000人，据说应该比这个数量还多。罗马方面的轻装步兵在射出第一轮箭

后，慑于敌人骑兵的突击力，很快躲到后面，已毫无战斗力可言。骑兵的这次交战成为了罗马和汉尼拔之间的第一次战役。

汉尼拔一边迎着罗马军队而上，一边迅速部署好阵型。他把骑兵中最优秀的努米底亚骑兵放在两翼，中间是来自迦太基及西班牙的骑兵，由他亲自指挥。与此相反，罗马方面来自最值得信赖的罗马及同盟各国的骑兵组成了主力阵容，前卫由与罗马缔结了和平条约的高卢部族中的高卢骑兵担任。

战斗之初，双方不分上下。但是，负责迦太基军两翼的努米底亚骑兵攻势非常凌厉，最早和他们发生激战的高卢骑兵眼看着一个个成了刀下鬼。努米底亚骑兵突破罗马军的前卫之后，直逼战斗力最强的罗马主力。罗马主力骑兵队担心被敌人包围，自乱阵脚，连执政官也无人护卫，迦太基骑兵乘机将罗马执政官团团围住。幸亏一名首次参加战斗的年轻骑兵从敌方骑兵的包围之中拼命救出了身负重伤的执政官。

罗马骑兵围成一团，护着身负重伤的执政官且战且退。继续留在战场上，显然会被数量和战斗力都占上风的迦太基军队包围，难逃全歼的厄运。骑兵队无暇顾及轻装步兵，他们负责破坏刚刚在提契诺河上架起的桥梁，在骑兵过桥向东逃去后，开始拆桥。他们中有上百人动作不够快，成了迦太基军的俘虏，有一些人逃进了草丛中。汉尼拔抓到的第一批罗马俘虏，成了他极宝贵的情报来源。

这一天，让差一点到手的罗马执政官逃脱，令汉尼拔感到十分惋惜。但是，更加令他惋惜的应该是让那名救出执政官的年轻骑兵逃脱了。这名骑兵正是执政官的儿子，这一年刚满17岁。他和父亲同名，叫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16年后的扎马战役中，他将率领罗马军队与汉尼拔展开激烈的战斗。

逃回皮亚琴察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尽管身负重伤，还是对敌人的兵力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既然弄清了迦太基军的骑兵战斗力高出自己许

多，那么就要考虑尽可能地避免在平原地带宿营。刚刚建成的皮亚琴察防守能力还很薄弱，对自己手下的两个军团和来自西西里的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来说，作为宿营地，既不安全也过于窄小。

第二次战役：特雷比亚战役

特雷比亚河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源头在亚平宁山脉，自南向北，在皮亚琴察附近流入波河。提契诺河也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源头在阿尔卑斯山，自北向南流入波河。但是，特雷比亚河流经的地域，因为靠近亚平宁山脉，所以地势高低起伏，非常不利于骑兵作战。

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选择了这一带最高却很开阔的山丘，在这里构筑起坚固的要塞。因为这个宿营地是为四个军团准备的，所以，称之为城堡似乎更贴切。他考虑在这里越冬。

但是，汉尼拔并不打算无所作为地越冬。根据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他了解到附近的卡斯泰焦村不是单纯的村落，而是罗马军队的军粮储藏地。他当即命令步兵和象队向东进军，自己带着骑兵，突袭了这个村落。就这样，罗马军队的军粮储藏地变成了迦太基军队的军粮储藏地。

有了粮食保障，就不必再掠夺周边高卢人的部落，这使汉尼拔用怀柔政策拉拢高卢人更有效了。再加上骑兵部队在提契诺之战中的胜利，要求加入汉尼拔军的高卢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中，实际上也只是一部分人追随迦太基军而已，大多数高卢部落人仍在观望。因此，汉尼拔希望在新年到来之前，与罗马军再战一次，以增加高卢人对自己的信心，影响他们的去向。为此，他下令全军带上充足的军粮，继续东进。

塞姆普罗尼乌斯率领的两个军团，自南向北纵贯整个意大利，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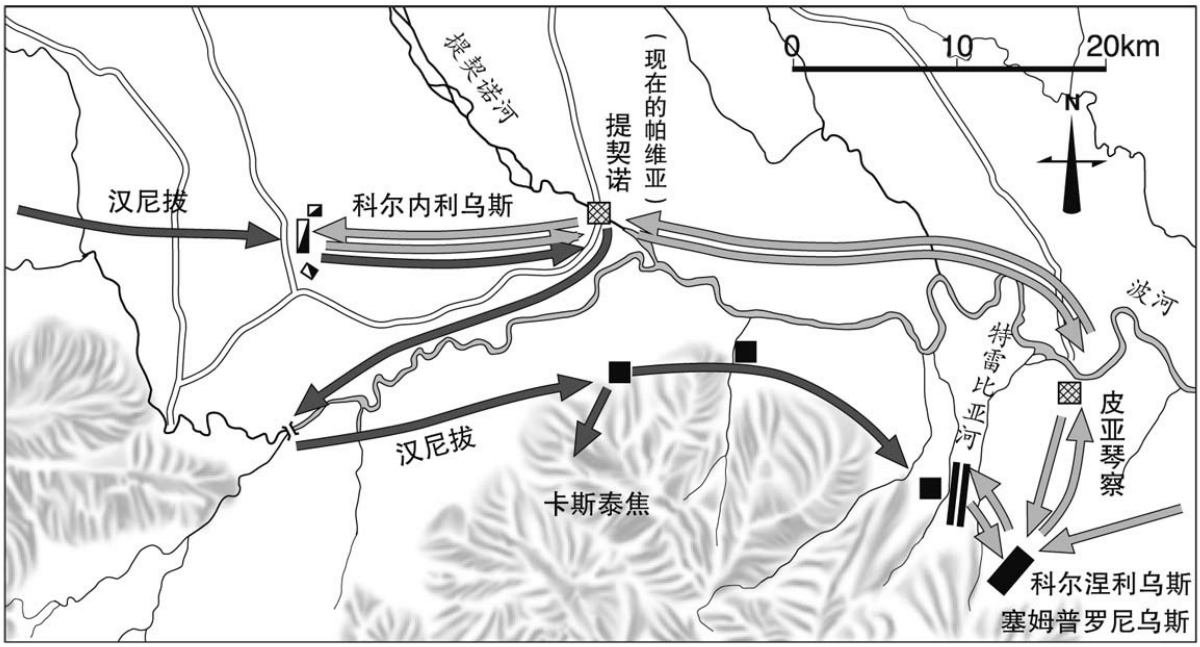
时，终于到达翘首以盼的科尔涅利乌斯建好的宿营地。为了守卫西西里及其周边海域，战船全部留在了那里。所以，未走海路北上的这两个军团只好全程步行。

宿营地在皮亚琴察以南20公里处。士兵们在这里休息恢复体力。其间，两位执政官多次进行了商讨。

科尔涅利乌斯的想法是就此越冬，宿营地建在要冲上，敌人轻易攻不上来。虽然卡斯泰焦落入敌人之手，失去军粮储藏地令人痛惜，但是皮亚琴察以东的高卢人是罗马的同盟者。即使不得不依靠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从里米尼到皮亚琴察只要走平原即可，所以，军粮补给并不困难。而且，尽管时间已经进入冬季最寒冷的12月，但是河道没有因阿尔卑斯山上刮来的寒风而封冻，因为这段河道的水流实在太湍急。

然而，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的想法与他的不同。

提比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出身平民。这个时期，平民出身的罗马执政官中，大多表现得个性张扬。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或是权力欲膨胀而显得个性张扬。在护民官时代，护民官只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但是，执政官是全体罗马市民的代表，其中包括贵族阶级。因此，平民出身的执政官身份意识更加强烈。他们为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也为了继自己之后当选执政官的同一阶级出身的人，必须努力有所作为。其结果是他们显得个性十分张扬。



提契诺、特雷比亚周边图（选自KROMAYER，“Antike Schlachtfelder”）

汉尼拔很重视情报的收集。他因此似乎猜透了塞姆普罗尼乌斯的心思。他想，自己或许可以挑逗一下此人。汉尼拔知道，在罗马的军队中，如果两位执政官在同一战线担任总指挥时，采用的是轮班制，一人一天。但是，如果其中一位执政官身负重伤，那么，在他伤愈之前，另一位执政官将全权担任指挥。此时，科尔涅利乌斯身负重伤，所以，汉尼拔判断他的对手应该只有塞姆普罗尼乌斯一个人。

白天，这位29岁的年轻人率领军队无所顾忌地来到特雷比亚河岸附近，并在此扎营。尽管中间隔着一条河，但是，距离罗马营地只有7.5公里。不仅如此，汉尼拔还故意频频地派出小队人马，袭扰周边地区，尽管此时的他并不需要筹集军粮。罗马营地内，塞姆普罗尼乌斯的话语权一天比一天大，科尔涅利乌斯的说服劝阻失去了效力。

公元前218年12月，临近月底。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冬至前一天，汉尼拔带着他的小弟马可尼一同外出视察周边地形。在详细考察了特雷比亚河西岸之后，他指着一处灌木林对弟弟说：

“那儿就是你的位置。你挑选1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明天天亮前离开宿营地，藏到那片林中。在我发出命令之前，就待在那里。”

回到宿营地后，汉尼拔下令让大家痛痛快快地吃晚饭。接着，命令全体士兵第二天天不亮吃好早饭，在篝火旁烤暖身体后，全身抹上油。

12月22日，寒冷进一步加剧。早上起来，天色阴沉沉的，好像雨就要下下来了。天色未亮，罗马士兵被营地外传来的嘈杂声吵醒。原来是敌人的骑兵杀过来了。

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得知来的只有骑兵，马上命令属下全体骑兵回击。骑兵们穿戴完毕马上出击，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步兵也没有时间吃早饭。他们甚至来不及取出御寒用的毛织外衣，仅来得及在短衣外匆匆套上盔甲，就抓起剑和盾跑出了营地。

步兵们眼前看到的一幕是，在己方骑兵的回击下，敌人不断后退。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和重装步兵没有参加提契诺战役，这是第一次与迦太基军队的骑兵主力努米底亚骑兵交锋。他们听说过努米底亚骑兵的战斗力远在罗马军队的骑兵之上，但是现在，敌人被逼得节节败退。不只是总指挥塞姆普罗尼乌斯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机会，重装步兵也非常振奋。骑兵当然也希望一雪提契诺之耻。以骑兵为先锋的罗马军队等不及情绪高昂的总指挥官发出命令，就向退却中的敌人追去，一蜂窝地过了河。然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迦太基大部队。

虽然特雷比亚河只是一条溪谷，但是雨水使得河水大涨。涉河而过的罗马士兵肚子里没有一点食物，还被河水浸得浑身湿透。相反，汉尼拔的士兵们不仅吃饱喝足，还在烤暖的身体上抹了油，作好了充分准备来抵御寒冷与雨水。罗马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罗马军在匆匆离开总司令官身边的将官们的指挥下，布好了阵型。一看就知道，他们没有吸取提契诺战役的教训。

罗马军队的兵力包括来自罗马和各同盟城市的士兵合计有4万人。其中，骑兵4000人。

汉尼拔军队主力加上高卢士兵，共计3.8万人。由于高卢士兵的加入，骑兵达1万人。

应该说，步兵的战斗势均力敌。但是，骑兵的战斗相差悬殊。

从阵型上来看，罗马方面按常规，依然把军队的主力重装步兵部署在中央，以期突破敌人的中央。相反，汉尼拔把高卢步兵团部署在中央，在两翼，越往外战斗力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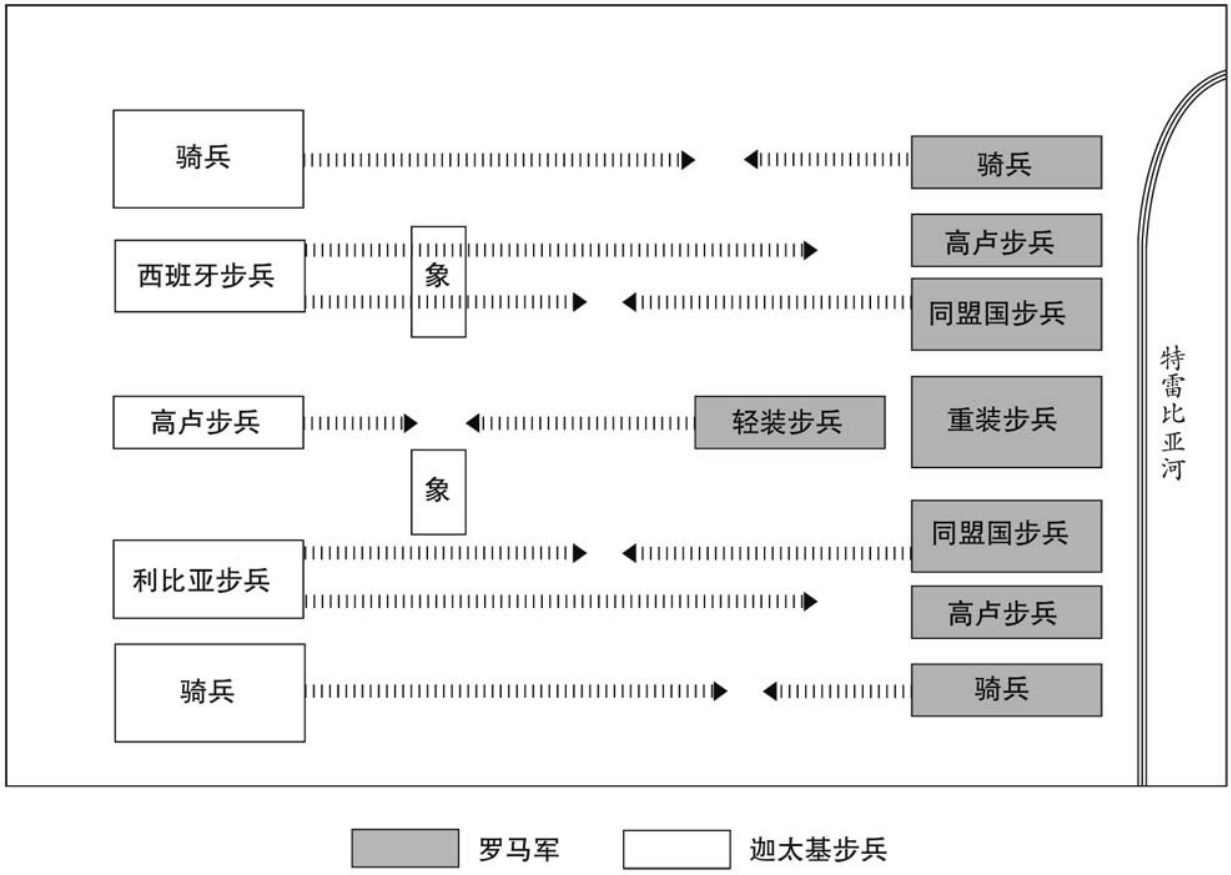
根据汉尼拔军的阵型，他的意图一目了然。他要实施包围战，包围战意味着把敌人的主要战斗力量化解为非战斗力量。这是战术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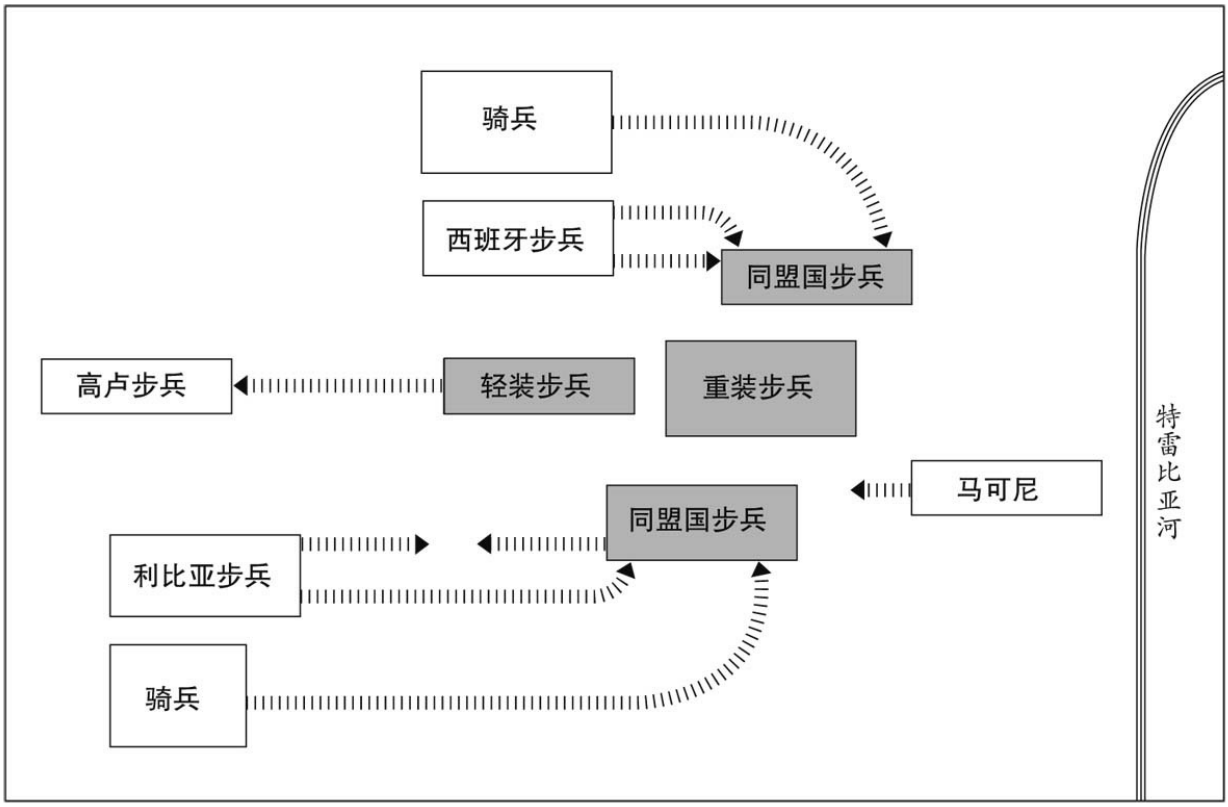
只有辛辛苦苦带来的大象辜负了汉尼拔的期望。生于南国的巨大“战车”虽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但是，它们终究不敌意大利北部的寒冷。那些被罗马轻装步兵射出的箭刺伤而狂躁不已的大象，不仅没有打乱敌人的阵型，还把自己的骑手震落在地，四处乱窜。好在，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汉尼拔的掌控之中。

罗马军队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团尽管腹中空空，浑身湿透，条件险恶，但是他们的攻击力相当惊人。冒着夹雪的雨，他们奋力杀向敌人中央。很快，迦太基军的中央被击破。两侧是来自同盟各国的步兵，他们面对西班牙和利比亚步兵展开英勇的战斗。步兵之间的战斗在罗马军队占上风的情形下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浑身湿透、寒冷等不利因素向英勇奋战的罗马步兵袭来。同时，在两军骑兵的交锋中，罗马方面也渐显下风。

当骑兵被击退后，罗马军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汉尼拔步兵从两翼向他们包抄上来。接着，骑兵队在赶走罗马骑兵后，也从后面逼近。

同时，一直藏在灌木林中的马可尼，带着2000人也出现在罗马军的身后。虽然因为汉尼拔部署在中央的高卢步兵实在太弱，相反罗马重装步兵又过于强大，所以，包围圈没有像画中描绘的那样完美。但是，无疑4万罗马军被包围了。





包围圈一点点地在缩小，罗马士兵挥剑战斗的空间不断地在缩减。迦太基士兵从外侧，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血刃罗马士兵。要避免全歼的结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突破敌人最弱的中央，逃出去。身处军队中心的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一声令下，罗马军队全力向前突围。高卢士兵战斗的爆发力很强，但是持续性极差，击溃他们并非难事。但是，骑兵围住的背后几近铜墙铁壁。成功突破敌人中央，在下游渡过特雷比亚河逃回皮亚琴察的仅剩下区区1万人，2万名士兵身陷重围。向他们发起进攻的迦太基士兵，已经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杀戮。有不少人突破重围逃了出来。但是，在逃回营地的途中，跳入特雷比亚河时，大部分被敌人骑兵追上，遭到杀害。特雷比亚河河面被他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提契诺战役的失败，因为是两军骑兵偶遇发生的战斗，罗马可以不承认自己失败。但是，特雷比亚之战是两军的正式交战，全体步兵和骑兵都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因此罗马不得不承认自己完败。应该说，汉尼

拔在特雷比亚之战中的胜利，不是士兵战斗力的胜利，而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

作为失败方，罗马方面阵亡者达2万人，成功突破中央逃回皮亚琴察的士兵1万人，其中包括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加上留下来守卫营地的士兵，罗马方面的幸存者人数据说超不过1.5万人。余下的人成了汉尼拔的俘虏。

相反，胜利者汉尼拔军的阵亡者中，大多数是高卢人。汉尼拔从西班牙带来的士兵阵亡者人数少之又少，甚至不值一提。只是，大象或是被杀，或是逃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有一头。

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雨夹雪的恶劣天气条件下，长时间的战斗对于胜利者汉尼拔的士兵们来说也是严酷的，汉尼拔不得不放弃继续追击敌人。因伤留在营地的科尔涅利乌斯也得以逃到只有小部分士兵守卫的皮亚琴察。这一次，汉尼拔又让执政官那个17岁的儿子逃脱了。

两位执政官在皮亚琴察重逢后，一致认为不能在皮亚琴察久留。特雷比亚之战的结果，很快在波河两岸的高卢人中传开。之前追随罗马的部族、还在观望犹豫的部族纷纷投奔胜利者的帐下。汉尼拔军很快扩充到了5万人。

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决定撤离，他们汇集残余兵力，离开殖民地皮亚琴察，向里米尼而去。至此，罗马彻底放弃了几个月前正一步步实现称霸的意大利北部。但是，由于第二年开始战场南移，命运多舛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这两个罗马殖民城市，成为周围都是高卢人的两个孤岛城市。从此时开始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的16年间，竟得以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这不能不归咎于高卢人不懂利用好机会的性格缺陷。

远征的第一年，汉尼拔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不过，他不会沉湎在

已有的胜利之中。

面对接踵而至前来称臣、表示顺服的高卢部落首领们，汉尼拔丝毫没有表现出洋洋自得，军队人数的倍增也没有让他得意忘形。因为他始终认为，无论加入自己军队的高卢人有多少，都不足以战胜罗马。

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汉尼拔也有自己的想法。从俘虏口中得到自己所需的情报后，他把俘虏一分为二：一边是罗马市民，另一边是同盟各国市民，并给他们完全不同的待遇。罗马市民兵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还要承受繁重的劳动，境遇非常艰难。相反，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不仅可以吃饱饭，甚至手脚也未被束缚起来，还可以在火堆旁取暖。一段时间后，他杀掉罗马市民俘虏，然后集合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对他们说：

> 我的敌人不是罗马联盟的所有成员，我的敌人只有罗马。现在我还给你们自由，还不要求你们支付赎金。但是，条件是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要把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和我说过的话转告给你们的同胞。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脱离罗马，投奔我，我汉尼拔保证你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安全。

尚不满30岁的年轻人，从未想过仅靠2.6万人攻打可召集兵源达75万人之多的意大利。他要瓦解罗马联盟。他要在铁一样牢固的罗马联盟中插入楔子。罗马联盟的模式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失败的最大原因。只要成功瓦解罗马联盟，双方力量就不再是75万人对2.6万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坚持把战场设在意大利，就是为了要挑动同盟各国背叛罗马。

汉尼拔认为，自己成功争取高卢人的策略同样适用于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因此，他认为光靠释放俘虏远远不够。就像为了证明给高卢人看一样，他还需要挑战罗马军，让罗马的同盟各国看到他的实力。对汉尼

拔来说，下一个战场，也就是充分展示他才能的舞台必须在罗马联盟的领地上，卢比孔河以南。

第三次战役：特拉西梅诺战役

迦太基的惯例是用十字架处死负有战败责任者。相反，罗马人的传统是不处罚败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曾经不惜溢美之词盛赞罗马的这一做法。马基雅弗利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指挥官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可以专心在战场上指挥战斗。这一说法当然对。但是，我认为，原因不仅于此。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没有选择民主制雅典那样排挤贵族阶级、实行以平民为主体的政体。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贵族和平民相辅相成。把两个阶级的力量合二为一，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活力。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政体，就要时刻不忘把贵族和平民之间动辄出现的对立情绪掐断在萌芽之中。以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出台为界，罗马确立了新的方针，所有国家要职向平民开放。为此，作为罗马最高统治者的执政官中，有平民出身的人当选几乎已司空见惯。

在这种情况下，惩戒战败责任者，难免成为内乱的导火索。接受惩罚的是贵族，会引起贵族阶级的不满。相反，如果惩罚的是平民，显然所有平民都会认为受罚的原因是因为他出身平民。要追究责任，却找不到客观的、能让所有人接受的标准。为此，罗马人决定不对任何人追究战败的责任。

如此一来，阵亡者岂不是难以瞑目吗？对个体来说，也许是。但若舍弃小我，为共同体的长远利益着想，则完全可以瞑目。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上下舆论不统一，会很难有效发挥国家的国力。只有国论统一，才能有效发挥国力，就可以减少牺牲。人是具备牺牲精神的，他可

以接受自己牺牲，但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子孙也成为统治阶级无能的牺牲品。

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与迦太基人和希腊人完全不同。也多亏罗马的这种做法，使那些不幸成为败将的人，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罗马人非常通情达理，如果战败的原因在于指挥官能力不足，那么有兵役义务的所有罗马市民不会再选他担任执政官。但是，如果大家都承认总指挥官的能力，那么，即使成为败将，他依然有可能再次当选执政官。

特雷比亚战役期间的罗马军队统帅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任期满后，无缘再次当选执政官。相反，因重伤未能参加战斗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则被任命为前执政官，享有和执政官同等的绝对指挥权，领命率1万士兵开赴西班牙。

前执政官的弟弟格奈乌斯率领两个军团还在西班牙与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交战。在对抗汉尼拔的过程中，罗马元老院所起到的是“总参谋本部”的作用。元老院非常清楚大后方西班牙对汉尼拔的重要性，因此把在西班牙的战事交给了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既然汉尼拔要离间罗马联盟的各成员国，罗马就要彻底铲平汉尼拔的大后方西班牙。

这次从比萨港前往西班牙的前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没有带年已18岁的儿子同行。因为在罗马，贵族子弟的人生轨迹通常是，初次上阵要跟随父亲，以后就要在其他人手下学习了。贵族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成了这位年轻人的第二任指挥官。

公元前217年是汉尼拔远征的第二年，这一年，罗马当选执政官的是贵族塞尔维利乌斯和平民弗拉米尼。

塞尔维利乌斯性格温和谨慎。盖乌斯·弗拉米尼与他正好相反，天性要强又很胆大。因为他力主攻打汉尼拔，因而获得候选资格，并以比同僚多得多的票数当选执政官。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曾经于公元前

232年当选护民官，后来进入元老院，于公元前227年担任行省西西里的总督。公元前223年一度当选执政官，在与高卢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公元前220年当选财务官，并提议铺设弗拉米尼亚大道，即现在的意大利国道三号线。

公元前217年当选执政官，是他第二次就任罗马这一最高官职。从他当选护民官那年开始推算，这一年应该在45岁上下。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这一年龄正是最合适的时候。

作为平民阶级出身的杰出代表，弗拉米尼被认为远比特雷比亚之战的败将塞姆普罗尼乌斯优秀得多。他曾经提出国有土地租用上限规定为125公顷，他制订了法律草案，禁止元老院议员从事通商事业。他制订这些政策，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所以，事实上，受到限制的大多数是贵族。尽管如此，反弗拉米尼的现象并没有表面化。这不是因为他制订的政策没有明确反贵族，而是罗马贵族深知这样做的危害性。当然，弗拉米尼本人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贵族阶级对自己的不满。对他来说，公元前217年出任执政官，应该也是报复他们的绝好机会。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通常被派到最前线。此时，汉尼拔已经到了博诺尼亚附近，要在那里过冬。所有人都猜测第二年春天，他会南下，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会沿哪条路线南下。

平庸的指挥官一定会选择从博诺尼亚穿过平原地带到里米尼，再从里米尼沿始于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翻过阻挡在途中的亚平宁山脉自北南下意大利半岛的路线。弗拉米尼亚大道于三年前刚铺设完成，5万大军同时翻越亚平宁山，走这条路应该最轻松。但是，无人能预测汉尼拔的意图。

既然不知道汉尼拔走哪条路线南下，罗马只有把军队一分为二。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被派往里米尼，防止汉尼拔选择弗拉米尼亚大道。执政官弗拉米尼前往阿雷佐，阻止敌人从亚平宁山脉的某处下来，到达托

斯卡纳。两位执政官各带两个军团。这一年军团增加了兵力，分别为2.5万士兵。两位执政官约好，一旦发现汉尼拔的动向，立刻合兵一处。

公元前217年4月，已经30岁的汉尼拔率领全军离开了冬营地。他没有选择从越冬的博诺尼亚去里米尼，再从那里通过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平坦大道，而是选择了从博诺尼亚直接挑战亚平宁山脉，翻过山直奔佛罗伦萨的路线。这条路线距离短一些，但是难度大为增加。

选择这条路线不是因为害怕与守候在里米尼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之间发生战斗，而是他已经确定了下一个战场——就在伊特鲁里亚人居住的托斯卡纳。

如果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叛离罗马，那么罗马联盟的一个角就会轰然倒塌。而骚扰弗拉米尼亚大道周边，受害的只是生活在那一带的翁布里亚人。在罗马联盟中，伊特鲁里亚的可动员士兵人数有5万人，与此相比，翁布里亚人不过2万人。如果以瓦解罗马联盟为目的，那么选择伊特鲁里亚人集中居住的托斯卡纳作为战场，取得战斗的胜利会给伊特鲁里亚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能够更有效地达到瓦解罗马联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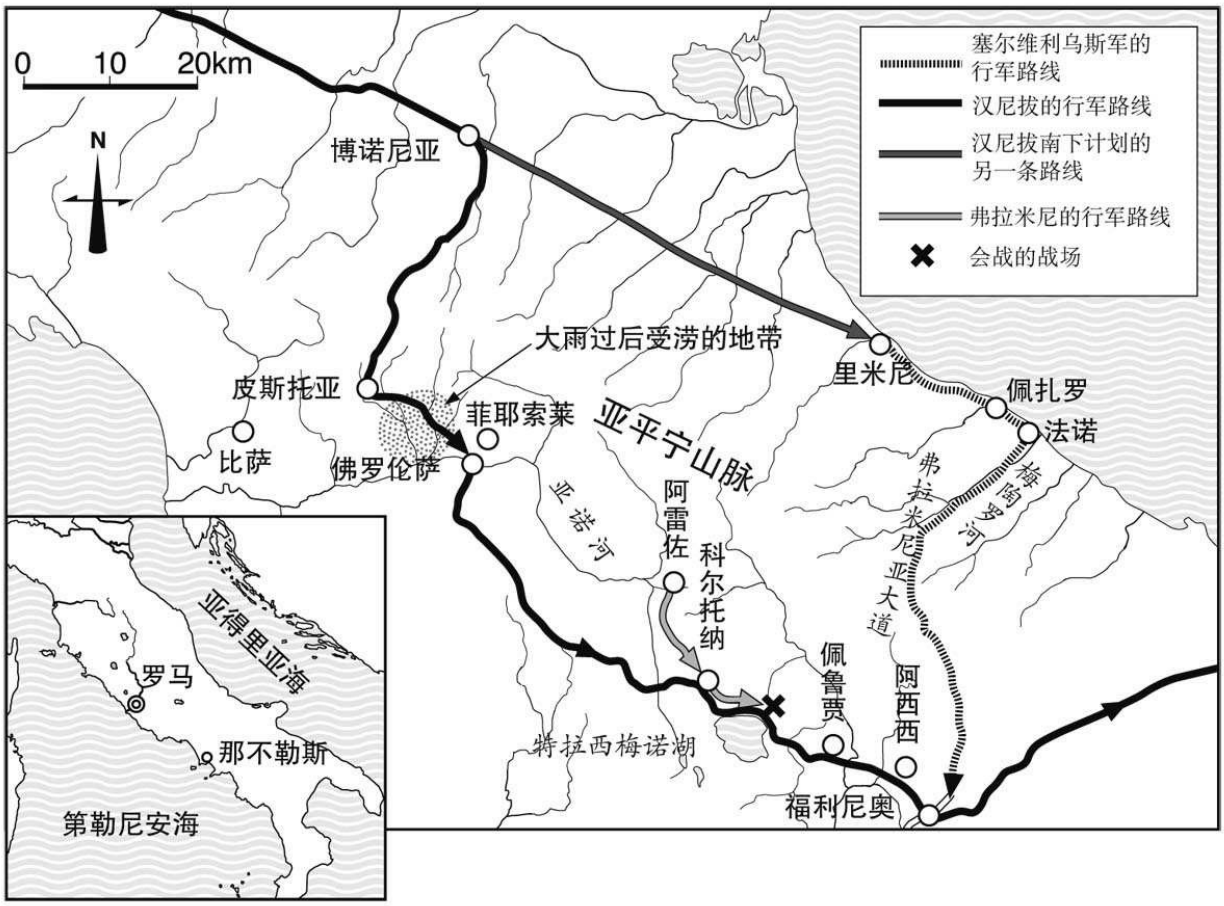
但是，这样的理由只有在事情过后，才能经过分析得出来。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他们完全猜不透汉尼拔的意图。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这位30岁的年轻统帅手中，他曾成功完成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前人未尝试过的壮举，紧接着又两度给罗马以重创。虽然罗马方面在里米尼和阿雷佐部署了军队，但是，在汉尼拔现身以前，没有人可以预知汉尼拔的动向。

翻越亚平宁山脉确实比翻越阿尔卑斯山容易许多。但是，翻过亚平宁山，来到亚诺河流域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不曾预料到的困难。

意大利处于地中海气候带，从冬季到春季，降雨非常集中。公元前217年春季，雨水比往年还要多。源自亚平宁山脉的亚诺河是托斯卡纳当地最大的一条河，流经佛罗伦萨后，汇集多条支流，浩浩荡荡地流向比萨，再从那儿注入第勒尼安海。如果连续下雨，支流流域的平原地区很容易受涝被淹。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刚下亚平宁山，就一脚踏上了已化做一片沼泽的地带。

汉尼拔耗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才走出沼泽地。在沼泽地的行军顺序是利比亚和西班牙步兵团充当前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高卢兵，努米底亚骑兵为后卫。骑兵与其说是后卫，不如说是为了防止牢骚满腹的高卢兵不堪艰难的行军离队逃跑。行军途中几乎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士兵们只能倚在死去的马或辎重车旁小歇片刻。安稳的睡觉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汉尼拔骑在唯一的一头大象背上，此时的他因患眼疾苦不堪言，艰难的行军于他已经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只眼睛完全丧失了视力，绝世战术家从此变成了独眼龙。

全军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休息，是在到达佛罗伦萨以后。就在兵马休整的期间，汉尼拔派出了侦察兵，收集情报。他不仅掌握了弗拉米尼的两个军团就在位于佛罗伦萨东南约100公里的地方——阿雷佐，也了解到了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的性格。在全军得到充分休息，恢复了体力以后，汉尼拔下达了南下的命令。他没有选择直奔阿雷佐的路线，而是选择了阿雷佐西侧的路线。



南下的汉尼拔和追赶汉尼拔的罗马军的动态

行军不再是纯粹的行军，他们边走边烧杀抢掠。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在丘陵众多的托斯卡纳地方非常难得。火着后升起的滚滚浓烟，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阿雷佐是伊特鲁里亚人建的城镇，环绕着低矮的山丘，是罗马的同盟城市。从阿雷佐看过去，大火和浓烟似乎近在眼前。

执政官弗拉米尼确认来者就是敌军后，马上向里米尼派去了紧急使者，向友军通报敌军的动向，同时要求在里米尼的两个军团即刻南下。弗拉米尼考虑让同僚塞尔维利乌斯从里米尼出发，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前来和自己会合，对汉尼拔形成夹攻之势。他想，按这一计划追击汉尼拔，在佩鲁贾附近就可以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友军会合。执政官

弗拉米尼要求在里米尼的塞尔维利乌斯让骑兵先行一步。

如果对手是平庸之辈，这一战术一定可以奏效。但是，身为统帅的年轻对手在收集、分析、选择情报以及利用情报方面有过人之处。不仅如此，其行动之迅速也无人能及。他绝不会轻易让罗马的四个军团会合的。

只能追赶敌军却不能与之交锋，这一定让争强好胜的罗马军队指挥官感觉非常痛苦。作为罗马联盟的盟主，罗马认为有责任保护联盟的加盟者。然而事实上，执政官弗拉米尼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忠实的同盟者伊特鲁里亚人惨遭烧杀抢掠，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弗拉米尼作为罗马联盟最高官职的执政官，有比常人更强的责任感，加之其正当45岁左右的壮年。所以，对他来说，按捺住心中的愤怒实非易事。就像故意挑衅弗拉米尼似的，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牵着罗马军队的鼻子一路南下，并沿途继续做着野蛮杀戮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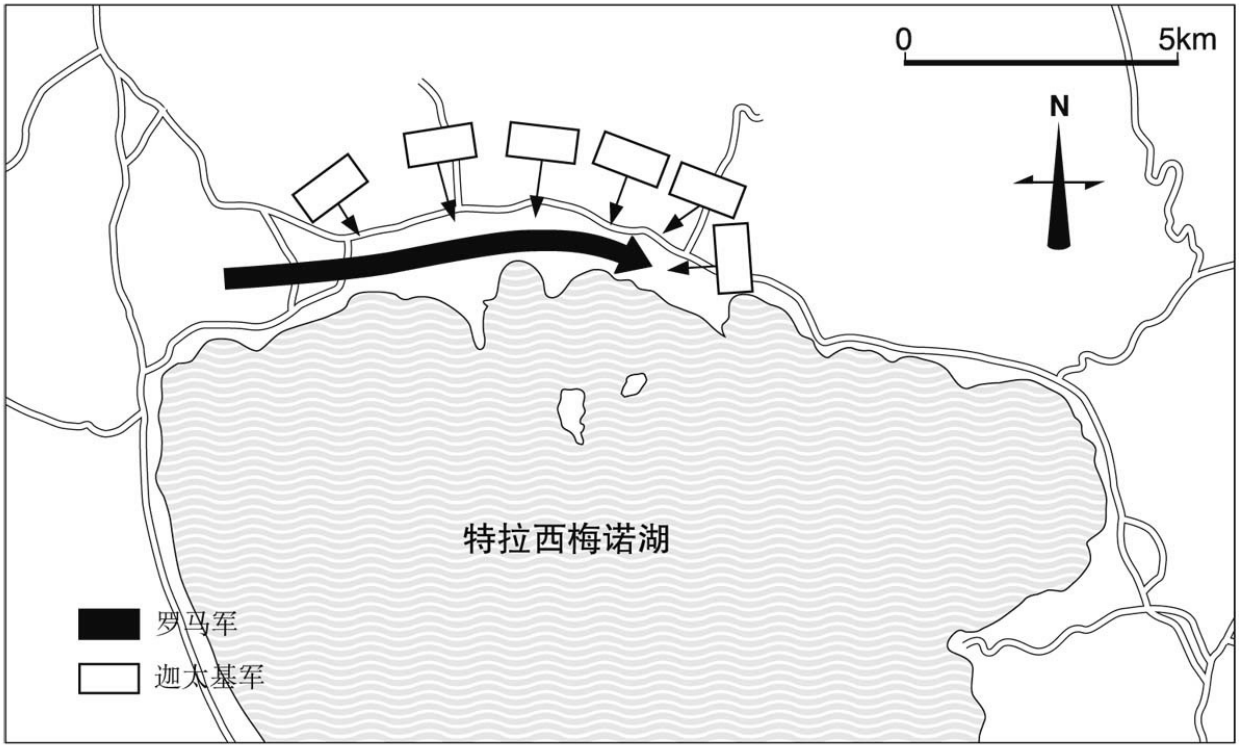
在佛罗伦萨和佩鲁贾中间，有一个湖叫特拉西梅诺湖，视野非常开阔，这是意大利中部最大的一个湖。湖的北面是一块细长的平地，夹在丘陵和湖面中间，自西向东延伸。通过这个平地继续向东，就是弗拉米尼计划和友军会合的地点佩鲁贾。

这天，白天经过一番急行军，汉尼拔军于傍晚时分到达特拉西梅诺湖畔。由于事先已经派侦察兵侦察过周边地形，所以，一到这里，汉尼拔就下达了指令。根据汉尼拔的指示，各大队分别散开，到指定的区域安营扎寨。当天晚上就在这里野营，但是禁止点火。

南下的路被湖阻断后向东拐去。拐角处是一片丘陵，骑兵部队就隐藏在丘陵的脚下。骑兵部队往东是高卢士兵，再往东是利比亚和西班牙的轻装步兵团。所有人都躲在丘陵脚下，等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重装步兵扎营在细长的湖畔尽头，堵住了自西向东的湖畔出口。

从下面的图中，汉尼拔的意图一目了然。他要把敌人引入细长、狭窄的湖畔，待弗拉米尼全军进入湖畔后，骑兵、重装步兵和其他步兵分别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夹击罗马军队。唯一没有部署兵力的南侧是一片湖水。汉尼拔最擅长的全歼敌人的包围战术，就连天然环境也利用上了。

入夜，执政官弗拉米尼和他的两个军团到了湖畔。没有人知道汉尼拔的军队在哪里扎营，弗拉米尼事先也没有派侦察兵侦察。湖畔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篝火。罗马士兵们因此以为汉尼拔军队已经通过特拉西梅诺湖畔，向着佩鲁贾方向去了。夜间行军遭遇敌人埋伏的可能性很大，应尽量避免。于是，弗拉米尼下令全军在湖畔西侧的平地上搭建宿营地。



特拉西梅诺战役

公元前217年4月19日一早，浓浓的晨雾笼罩在特拉西梅诺湖畔上

空。到了春季，这一带经常出现晨雾。雾中含有开阔的湖面上蒸发的大量水分，浓得让人很难相信这是晨雾，雾飘浮在地表上方久久不散。稍早一些时，目力所及不过10米。由此可见，汉尼拔甚至还掌握了此地的气象信息。

罗马军队幻想着今天可以追上敌人，他们早早收起帐幕，没有丝毫犹豫或怀疑，踏进了狭长的湖畔地带。能见度非常低，只能勉强看到行进在各队前头的队标。以为敌人在远处的罗马士兵，在浓雾中全速前进。全军2.5万人用了并不太长的时间全部进入了狭长的湖畔地带。

最早发现异常的是罗马军队的前卫。因为他们走在最前面，最先遭遇到在湖畔东侧张网以待的敌人。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和面前的敌人展开了战斗。然而，因为晨雾浓厚，后续部队即使注意到了前面的异常，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情形。就在他们尚未来得及弄明白的时候，对方的骑兵堵住了湖畔的西端。这时，隐藏在丘陵脚下林中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也开始向被困于狭长湖畔的罗马军队发起攻击。

现代高速公路上常常发生多辆汽车连环追尾的事故，原因就是后面的汽车未注意到前面发生了事故。公元前217年春天，在特拉西梅诺湖畔，类似的情况不幸发生了。

这不是战斗而是杀戮。杀戮圈从西、北、东三个方向不断缩小。就连跳进湖里准备逃跑的罗马士兵也被沿湖追来的敌方骑兵所掷出的投枪击倒，比投向到处乱窜的羊还要准。

面对5万名汉尼拔军队士兵，2.5万名罗马军队士兵陷入了绝境，但是他们没有彻底放弃战斗。这场战斗，准确的应该叫杀戮，持续了3个小时。执政官弗拉米尼已经无法指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一名骑兵的姿态英勇奋战，直至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也未能找到他的尸体。因为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执政官和士兵完全没有了区别。当晨雾散尽时分，特拉西梅诺湖畔的惨状，连迦太基士兵也不忍多看一眼。

2.5万罗马士兵中，有1.7万人战死。6000名前卫士兵冲出敌阵后向东逃去，又被刚刚结束湖畔杀戮的敌军骑兵追上，悉数被捕。游过湖逃到山中，并最终逃回罗马的仅剩2000人。意识到汉尼拔的强大后已经加强了其战斗力的整整两个军团，就这样消失了。

汉尼拔方面的损失只有区区2000人，而且几乎都是高卢兵。汉尼拔从西班牙带来的精锐主力又几乎毫发未伤。

后世的战史家认为，特拉西梅诺之战不能算是一场战役，而是暗算。但是，不管这场战斗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当时的罗马人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且如实告诉了所有市民。

负责召集市民大会的执政官一个阵亡，另一个还在前线，不在罗马。所以，法务官代替执政官召集了市民大会。他面色阴沉，对着集合起来的市民们，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是完败。”

市民大会上，还公布了阵亡者和被捕者人数，以及经过确认后的相关人员姓名。

三天之后，法务官不得不再次召集市民大会，因为前方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在里米尼担任警戒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应弗拉米尼的要求派出4000名骑兵先行出发。他们不知道特拉西梅诺湖畔发生的变故，沿弗拉米尼亚大道来到了福利尼奥附近。在这里，离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西北赶往佩鲁贾，准备和追赶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尼军会合。然而，等候在那里的不是友军，而是努米底亚骑兵。无论数量还是战斗力都处于劣势的罗马骑兵很快被包围，2000人丧身战场，余下的2000人彻底失去了战斗力，逃进附近村落，后来全部被俘。正从里米尼南下的两个军团

由此完全失去了其骑兵的战斗力。由于骑兵补充非常困难，所以对罗马来说，这一重创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计算的。

因为特雷比亚之战的失败，罗马不得不放弃内高卢（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又因为特拉西梅诺之战的失败，罗马把托斯卡纳地区也拱手交到了敌人的手中。

但是，与波河沿岸的意大利北部不同，罗马人绝不会放弃夹在亚诺河和台伯河之间的托斯卡纳地区，罗马也绝对不能轻易放弃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伊特鲁里亚人领教了汉尼拔的本事，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因为罗马在特拉西梅诺之战的惨败而背叛罗马，倒向汉尼拔。以科尔托纳为首的伊特鲁里亚人的所有城市，在汉尼拔到来时，依然紧紧地关住城门。与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不同，居住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罗马化”已经有200年历史了。

汉尼拔的5万大军就在离“高速公路”弗拉米尼亚大道三天行程的地方，他们正因胜利而士气高昂。与此同时，罗马作好了迎战敌人的准备。但是，虽然有保卫首都罗马的两个军团，加上在里米尼失去了骑兵的两个军团，罗马军队的兵力也不过和汉尼拔军相当。所有人都猜测汉尼拔会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指罗马。时间刚刚进入5月。

然而，年轻的迦太基统帅没有像人们猜测的那样做——他没有选择直奔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选择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路。其部下很多士兵对统帅的这一选择心有不解。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去进攻能获得丰厚战利品的首都罗马，而且要离开已经成为自己地盘的托斯卡纳地区，沿亚得里亚海海岸转向意大利南部。汉尼拔的一贯做法是事先从来不向任何人，甚至不向其他将军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将军和士兵所需要做的就只有听命于这位战无不胜的年轻统帅。

我想，汉尼拔的计划大概是先打掉外围，再攻打对方的大本营罗

马。在特拉西梅诺战役之后，对于抓获的俘虏，他依然采用了扣下罗马市民兵、释放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士兵的做法。他在等待罗马联盟解体。托斯卡纳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没有叛离罗马，这让他颇感意外。尽管如此，他认为罗马联盟的解体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将向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罗马同盟者希腊人充分展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虽然在特拉西梅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求成。到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汉尼拔的战略企图已为大多数罗马人知晓。

第一步：他有目的地在罗马联盟加盟各国的领土上烧杀抢掠。

第二步：当罗马军无法容忍他们的行为，主动出击时，他就挑起会战，并取得战役的胜利。

随着一次次会战的胜利，同盟国纷纷叛离罗马。

最后一步：当彻底打掉外围后，进攻并一举征服罗马。

他的这一战略构想非常合乎情理。

除了共和国罗马境内有罗马市民兵，罗马在全意大利的70多个殖民城市均有值得信赖的市民。在汉尼拔攻打首都罗马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汉尼拔军队背后。尽管汉尼拔在两次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现状不允许他虽距罗马仅三日之遥就轻率作出决定向罗马进军。

到了亚得里亚海沿岸，汉尼拔给了全军充分的休整时间。他还让士兵们脱掉早已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从阵亡的罗马兵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这一情况后来一度让罗马军苦恼不已，因为他们分不清谁是敌谁是友。不得已，罗马军全体士兵被要求剃光胡须，因为汉尼拔军队中的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和努米底亚人都有蓄胡须的风俗。

汉尼拔的军队甚至给马也洗了澡，用的还是葡萄酒。在得到充分休整后，汉尼拔军队沿亚得里亚海右海岸，开始向意大利南部进军。途中

所经的罗马同盟城市都饱受烧杀抢掠之苦，无一幸免。据说他们掠夺的物资多得甚至没办法带走。但是，满足5万人的餐饮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虽然烧杀抢掠的目的是诱发各同盟城市背叛罗马，但是，其中也有满足5万人胃口的重要目的。

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极尽恣意妄为之能事后，汉尼拔率领全军改变了行军方向，前往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与托斯卡纳地区一样，这里有很多罗马的同盟城市。除了阿皮亚大道必经的大城市卡普亚，这里还有库马、波佐利、那不勒斯、索伦托等很多罗马的“海港同盟市”。对罗马来说，托斯卡纳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盟者，同样，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其重要程度丝毫不差。

虽然敌军进攻首都的危险性减小，但是罗马依然有必要重建防御体系。为此，罗马决定设立独裁官。自第一次布匿战争拥立独裁官以来，这是相隔32年后再次建立的危机应对机制。费边·马克西姆斯被指定担任独裁官，尽管任期只有6个月，却集大权于一身。这位出身罗马名门望族费边家族的独裁官，是年58岁。他曾经当选过两任执政官，在与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的战斗中有过光荣的胜利记录，战场上的成绩不比任何人差。在这位比30岁的汉尼拔年长一倍的费边脑海里，有与迄今已知的其他罗马统帅完全不同的想法。

虽然费边率领从里米尼赶来的两个军团和新编的两个军团共四个军团在后面追踪汉尼拔，但是他的战略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和汉尼拔正面交锋。

科尔涅利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弗拉米尼，这些已与汉尼拔交过手的执政官都吃了败仗。58岁的费边不认为自己有获胜的机会，他认为如果与汉尼拔交手，自己同样会败。他甚至认为，当时的罗马将军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战胜汉尼拔。

为了不输给汉尼拔，只要不交手就可以。所以，他率领4个军团，

共计5万人马，虽然紧随在普利亚、坎帕尼亚等地极尽疯狂之举的敌军后面，却绝不回应汉尼拔的挑战。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等待敌军自我消耗。

费边因此得到一个外号，叫“持久战主义者”。但是，表示这个意思是后来的事情，最初大家要表达的意思是“拖延者”。

费边采用的战术尽管有效，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很大。罗马联军中，除了罗马市民，还有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市民。由于费边的不作为，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遭受涂炭。就连罗马市民兵，也同样咒骂自己的无能为力。对他们来说，因为未尽到联盟盟主的职责深感懊恼。

反对独裁官费边战术的声音一天高过一天，终于因为中了汉尼拔圈套一事而爆发。

公元前217年之初发生过特拉西梅诺湖战役。此时，这一年的秋天快过去了。在富饶的坎帕尼亚地区，汉尼拔军队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任何阻挠，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而后带着足以越冬的军粮准备回普利亚地区。对汉尼拔来说，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是让5万士兵安全越冬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独裁官费边觉得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从坎帕尼亚到普利亚，必须翻过像脊椎一样纵贯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只是，不需要上下山来翻越山脉，沿山谷即可越过亚平宁山。费边把全军分为三个部分，分别部署在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可能通过的几个地点。一旦敌人进入山谷，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费边所未预料到的是，年纪轻轻的迦太基统帅凭借着其卓越的情报收集能力掌握了罗马军队的动向。当汉尼拔来到山谷前，他命令士兵收集大量枯木。接着，挑选了2000头拉辎重车的牛，把枯木绑在这些牛的

牛角上。

士兵们按照命令完成这一切之后，汉尼拔把他们召集起来，指着远处高山之间的山涧，说：

“我们今晚要通过那里。”

他告诉全体士兵，罗马军队就埋伏在山谷两边的高山一侧。但是，他又说，今晚就要在等候自己到来的敌人面前通过那里。

太阳下山，夜幕降临的时分，传令兵带着总指挥官的命令，与牛群一起来到待命中的士兵面前。当绑在牛角上的枯木点上了火后，在士兵们的驱赶下，牛群一边掉着火星灰，一边向罗马军队埋伏的相反方向跑去。惊恐万状的2000头牛疯狂奔跑，埋伏中的罗马士兵看到黑暗中沿山脊移动的火群，以为是敌人发起了进攻。因为远远看去，就好像无数士兵手举火把一起跑上了山丘。

一向性格沉稳的费边不希望夜间作战。而且，看上去敌军似乎是为了占领一个山丘。失去一个山丘，对于在山谷设伏的战术思想没有任何影响。费边决定天亮前按兵不动。

就在这天夜里，汉尼拔和他的全体士兵，未损失一兵一卒，未丢失一件掠夺品，在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顺利通过了山谷。第二天早上，等费边知道的时候，敌人已经翻越过了亚平宁山。匆忙间派出的骑兵队虽然追上了汉尼拔的后卫部队，却未能啃动著名的努米底亚骑兵。罗马军队虽说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却颜面尽失。

从此，罗马人对于无论受到怎样的阻碍也得以成功的事，改用这样一句习语来表达了：

“不管怎样，汉尼拔过去了。”

独裁官6个月的任期尚未结束，费边就被召回首都罗马，理由是要举行祭祀仪式，实际上就是免职。

当汉尼拔悠然自得地在气候温暖的普利亚过冬时，在罗马，围绕下一年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执政官选举，出现了支持费边主张的拖延战术派和相反的积极战术派。两派对立愈演愈烈。

积极战术派指出，如果采用费边式的拖延战术，那么在敌人消耗殆尽之前会自己先消耗尽了。相反，拖延战术派拿出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先例，指出，把始终未能降伏的哈米尔卡赶出西西里，是因为罗马从迦太基人手中夺取了制海权，切断了迦太基方面的补给线。哈米尔卡是汉尼拔的父亲，他们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无论对父亲还是对儿子都同样有效。

事实上，拖延战术派的软肋不是“牛角事件”中的失败，而是这一年来各同盟城市蒙受的损失。元老院当然希望避免可能导致同盟各国叛离的一切状况出现。

最后的结果是，下一年，即公元前216年，从两派中各选了一位作为前线总指挥官的执政官，他们分别是贵族出生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平民出身的特雷恩蒂乌斯·瓦罗。前者与费边想法一致，后者则是积极战术思想的代表。

尽管选举的结果是两派中各选出了一位执政官，但是市民大会会场现场的气氛却是一边倒地支持积极战术派。

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公元前218年，罗马编组了6个军团，第二年，即公元前217年，增加到11个军团，到了公元前216年，又增加到了13个军团。罗马市民们为了向汉尼拔一雪前耻，尽管要增加自己的兵役义务，依然投了赞成票。对他们来说，翌年春季开始的公元前216年，应该是罗马与汉尼拔之间一决高下的一年。

通过会战决定胜负正是汉尼拔所期待的。

尽管汉尼拔军队在特拉西梅诺湖之战的胜利，以及在普利亚和坎帕尼亚两地汉尼拔军队未受任何阻挠地烧杀抢掠，让人们看到了罗马的软弱；尽管汉尼拔善待同盟城市士兵，无偿释放他们回归故里，但是，罗马联盟的加盟城邦至今尚未有一个背弃罗马，投奔到汉尼拔的帐下。既然汉尼拔认为要让罗马彻底失败只能寄希望于罗马联盟解体，那么，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他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决战。

第四次战役：坎尼会战

好像是1991年的1月，就在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始于空袭的海湾战争，进入地面战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打开电视机，换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CNN）看实况转播。结果，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基地，也不是遭受夜间空袭的伊拉克，而是呈现一派和平景象的麦田。站在麦田中央的记者说，今天早上播出的节目来自意大利。

这位记者说，战争迟早会进入地面战。虽然不知道会始于何时，但是，多国部队已经作好准备。在这里，他将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介绍一场历史上最著名的地面战。这场战役也许对当天即将展开的地面战有所启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意大利南部的坎尼平原，距今2200年前的公元前216年，这里曾是汉尼拔与罗马展开大会战的战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记者指着电视画面上的战况展开图，对汉尼拔用什么战术战胜了数量占优势的罗马军队进行了说明。之后，他又补充道：

“坎尼战役是战争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战役，所以，在军事学院都要学习有关这场战役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和施瓦茨科普夫一样，伊拉克的将军也知道坎尼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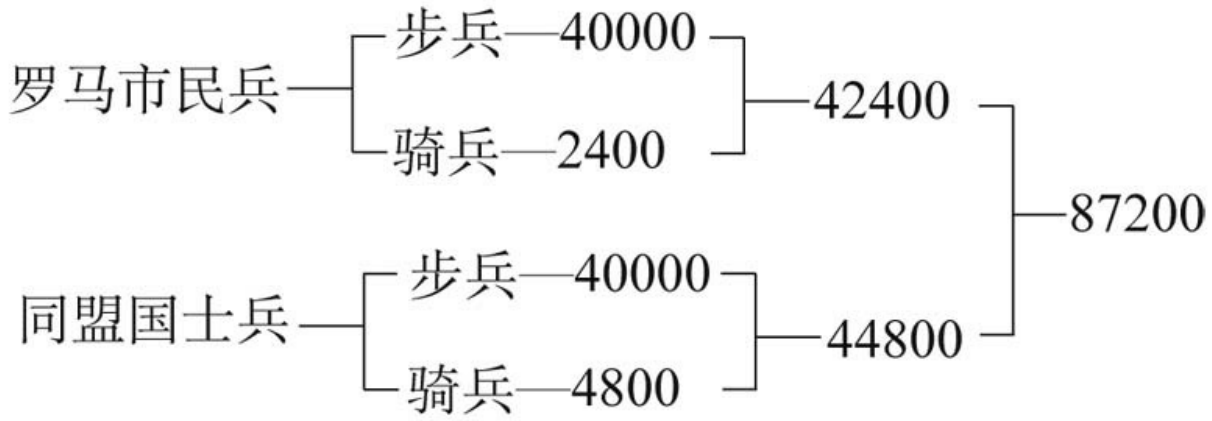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发生在没有战斗机、直升机时代的一场会战，竟然会引起卫星转播时代的记者的关心，实在很有意思。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坎尼会战。我不知道日本的国防大学的情况怎样，但是，欧美的军校一定会学习这部分内容。

公元前216年，罗马市民大会决定加强军队力量，编组军队，准备春季重启战事。

前面已经提到，通常罗马军团由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组成。其中，罗马市民兵为步兵4000人、骑兵3000人，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人数略少于这个数目。每位执政官率领两个军团，就是所谓的“执政官军团”，这是罗马军的作战单位。因为执政官有两位，所以，罗马每年需要编组四个军团。因此，“罗马联军”的兵力通常在3.8万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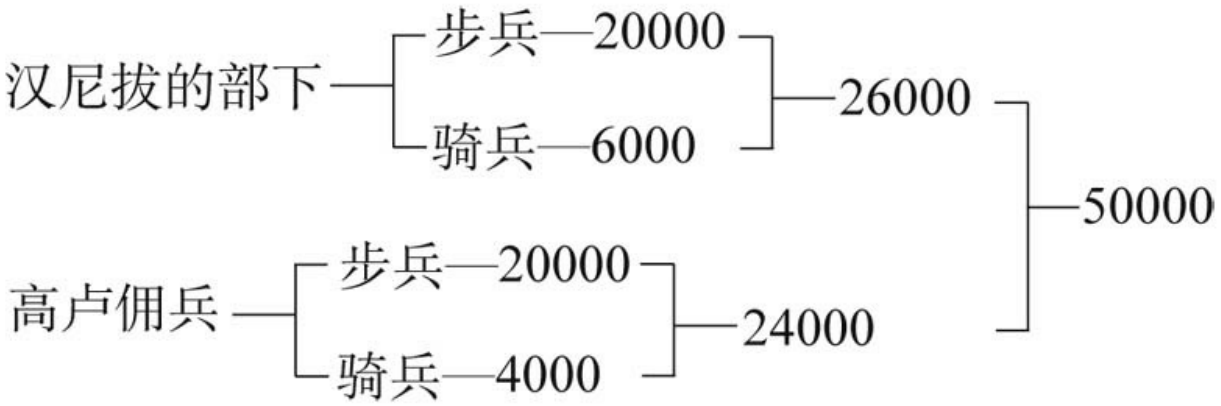
进入战时，根据情况，会相应增加军队力量。兵力最多时曾经达到过5.4万人左右，这是不得不同时面对高卢人和伊利里亚海盗两方面敌人的那一年的事情。当时，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各国士兵的比例是2：3。

公元前216年，尽管敌人只有汉尼拔一个，但是，罗马的兵力增加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只是，增加的不是军团数。因为一位执政官指挥两个军团，两位执政官只能有四个军团，不能超过这个数。因此，与以往的“战时”情况相比，公元前216年的罗马进一步扩大了每个军团的规模。增加的人员主要由罗马联盟盟主、担任总指挥的罗马提供，因此，由两位执政官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的公元前216年度的兵力构成情况如下：



其中步兵8万人、骑兵7200人，所以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是11：1。

在普利亚越冬的汉尼拔军的构成如下：



其中步兵4万人、骑兵1万人，所以步兵和骑兵的比例是4：1。

两军步兵的兵力是8万人比4万人，从数量上看，罗马方面占绝对的优势。但是，再看骑兵战斗力，罗马军是7200人，汉尼拔有1万人，正好相反。前一年在特拉西梅诺之战中失去7000骑兵后，罗马方面尚未补上这个缺口。

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率领8.72万大军决战汉尼拔的两位执政官都没有与汉尼拔交过手。从战绩上看，执政官埃米利乌斯在汉尼拔进入意

大利的前一年，作为执政官，曾率军队与伊利里亚人交战，有过胜利的记录。但是，执政官瓦罗在战斗中只是一名普通士兵，甚至没有担任过百人队队长。他之所以能够当选军队总指挥官的执政官，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通过决战尽早解决战事的主张得到了罗马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两位执政官确切的年龄不详，根据当选执政官必须在40岁以上的这一要求，所以，他们应该比31岁的汉尼拔至少大10岁。不管怎样，公元前216年的罗马，把可能的一切都投入到了与汉尼拔的一战。

和往年一样，于3月15日开始军事行动的罗马军队沿阿皮亚大道开始南下。过了加普亚，快到贝内文托的时候，监视尚在过冬的汉尼拔动向的友军送来一个情报，说汉尼拔已经离开冬营地，没有北上，而是南下了。于是，以两位执政官为先锋，罗马军的8.72万大军追踪着汉尼拔，进入了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

不清楚汉尼拔是如何知道的，也许是在审讯俘虏时了解到的。汉尼拔虽然尚未遭遇罗马军队，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追来的罗马军的规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罗马军队的构成、对两位执政官的性格都了如指掌。他考虑把战场设在平原，以便更好地发挥骑兵的威力。这时，罗马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汉尼拔的意图。但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踏进了有大片平原的普利亚地区。也许因为有两倍于敌人的8万步兵，这给了他们充分的信心吧。因为，罗马重装步兵的勇敢在当时名震天下，几乎无人能敌。

貌似为了躲开追来的罗马军队，汉尼拔的军队继续一路南下，直到位于奥方托河注入亚得里亚海的附近一片开阔平原，才终于停下前行的脚步，随即攻取了位于这条河附近的坎尼村。坎尼是罗马军队在同盟国内的粮食储藏基地之一。看重罗马联盟稳定关系的罗马人，严禁在同盟国内掠夺。

对汉尼拔来说，攻取坎尼村的目的，一是为了刺激罗马军队，二是

为了补充军粮。尽管他们一路上不断掠夺，但是要让5万人吃饱饭终究是个巨大的工程。意大利南部所有的罗马同盟国都很敌视汉尼拔。汉尼拔必须依靠武力，才能迫使他们打开城门。至今，尚未有一个城市主动向他提供军粮补给。而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全年未得到来自迦太基本国的援助。同时，在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率领的罗马军队不断攻打迦太基军队，西班牙方面也没有能力支援在遥远的意大利的汉尼拔军队。此时，汉尼拔军队尽管得到了坎尼，但是，储存在此地的粮食据说只够维持10天。

在坎尼得到粮食补充以后，汉尼拔没有率领军队继续前进，他在坎尼村后面的丘陵上建好了营地，一心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

一路追来的罗马军队在距离汉尼拔10公里左右的地方也停了下来，开始扎营。罗马军队的营地建在野外，四周筑起高高的栅栏，挖好了纵深的壕沟，非常正规。两军隔着10公里的原野，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对峙。

当然，在近两个月的对峙中，双方并非一次也没有动过手。

汉尼拔曾经派出2000人左右挑逗罗马军队，罗马方面派出同样规模的队伍出来应战。在这两个月间，类似这样的小规模战斗，发生频繁。随着小规模战斗的一次次展开，罗马方面的优势渐渐显现。有一次，罗马军队损失了近100人，但是，相比较而言，汉尼拔方面的战死者多达1700人。当然，汉尼拔军队的阵亡者几乎总是高卢兵。尽管如此，还是让罗马阵营中的士气不断高涨，所有人都觉得，照此下去，胜者一定属于自己。

然而，31岁的年轻人就像职业赌徒在台球或扑克游戏中，常常对容易上当的生手施以骗术一样，先让对手小赢几次，然后再让对方赔个精光。

罗马军队已经跃跃欲试，他们甚至把营地移到了奥方托河的左岸，随即汉尼拔也把营地移到了同一岸边。两军相距不足2公里。

两军并没有马上开启战端，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营地内，继续相互对峙。其间，罗马军队渡过奥方托河，在对岸也建了一个小规模的营地。他们认为在河两岸建营地，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量占优势的兵力。对此，汉尼拔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就像特雷比亚和特拉西梅诺战役一样，汉尼拔总是在他希望的地点、希望的时间发起战斗。坎尼之战也一样。他先把敌人引到他所希望的地方。只是在坎尼，汉尼拔与罗马军队相隔2公里，进入对峙状态以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装出因小规模战斗失利而萎靡不振、畏首畏尾的样子。

年轻的汉尼拔早就看穿了罗马指挥官们的心思——他们非常警惕，想方设法避免掉入他的圈套。为了让他们与自己进行会战，汉尼拔首先需要解除他们的戒备心。为此，他故意装出主导权掌握在罗马手中的样子。

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执政官每天轮流担任总指挥的罗马军中，这天的总指挥官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

这天早上，东方刚刚开始泛白，接到总指挥官特雷恩蒂乌斯·瓦罗的命令，士兵们从奥方托河两岸的罗马军队两个大小营地中陆续出来，在河右岸集合。瓦罗选择右岸而不是左岸集合全军，是因为左岸是一片平原，有利于敌人骑兵驰骋纵横，危险度较高。右岸地势高低起伏，对骑兵力量较强的汉尼拔军来说，应该不太有利。

看到罗马军队布好了阵，汉尼拔也亲自率领全军过了河，在罗马军队的正面布下了阵。罗马军队的阵型是横向一条直线，与此相对，汉尼拔部署的阵型呈弓形，中间凸起。

罗马军队的阵型清楚地反映了担任这一天罗马军总司令官的瓦罗的战术。部署在中间的步兵团阵型不是横向的长方形，而是纵向的长方形。目的是由罗马军队的主力重装步兵突破敌人的中央。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了奥方托河右岸、环绕坎尼村后面的丘陵下比较狭窄的地方作为战场。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担任右翼的2400罗马军队骑兵来说，他们不得不在奥方托河与步兵之间的窄小地带，与3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显然非常不利。

此外，瓦罗还留了1万士兵在布满军队的战场后的小营地里待命。他的计划是：当骑兵顶住敌人的进攻，步兵又成功突破敌人中央的时候，再投入这1万兵力，争取一口气取得会战的胜利。

然而，阵型不同于特雷比亚之战的汉尼拔没有上他的当。

会战开始了。两军首先采用了常规的战术，分别与正面的敌人交战。汉尼拔的左翼对罗马的右翼，中央的轻装步兵对中央的轻装步兵，汉尼拔的右翼对罗马的左翼。第一回合是在汉尼拔弓形阵型中的高卢雇佣兵与罗马的轻装步兵之间展开。

会战之初，战斗的展开罗马方面占尽上风。见此情形，瓦罗下令负责步兵部队指挥的前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投入重装步兵团。由高卢雇佣兵组成的汉尼拔军前卫，在罗马全体步兵的凌厉攻势下，突起的弓形变成了凹陷的弓形。汉尼拔部署弓形阵型，目的在于尽可能让罗马步兵团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里。效果非常明显，高卢兵虽然步步后退，却还在抵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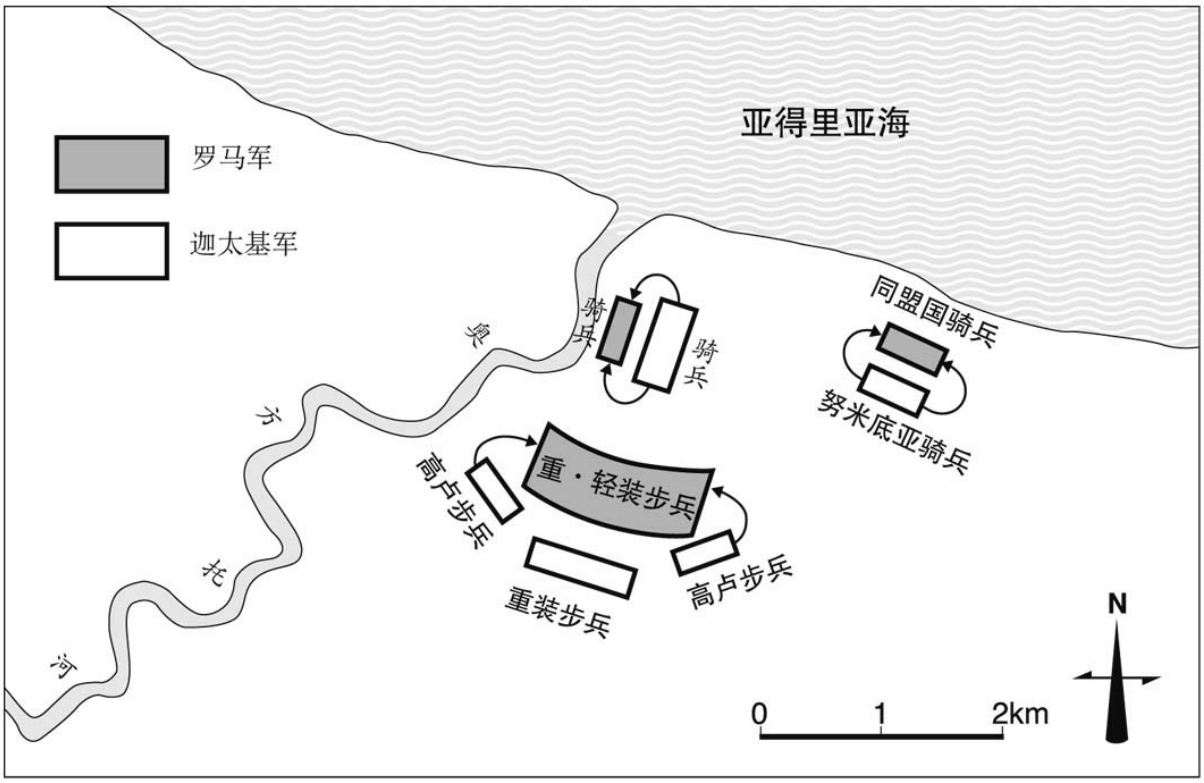
步兵交战开始不久，左右两翼的骑兵也加入了战斗。近3倍于敌人兵力的汉尼拔军左翼对执政官埃米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骑兵队，从一开始就占尽了先机。罗马骑兵一步步地被逼到河边。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顽强奋战。构成罗马右翼的这些骑兵，很多是罗马贵族的子弟，换言之，他们都是候补的士官。

执政官瓦罗率领的是同盟国骑兵组成的左翼，对敌人的努米底亚骑兵。也许因为数量相当，他们奋力作战，战斗之初，没有后退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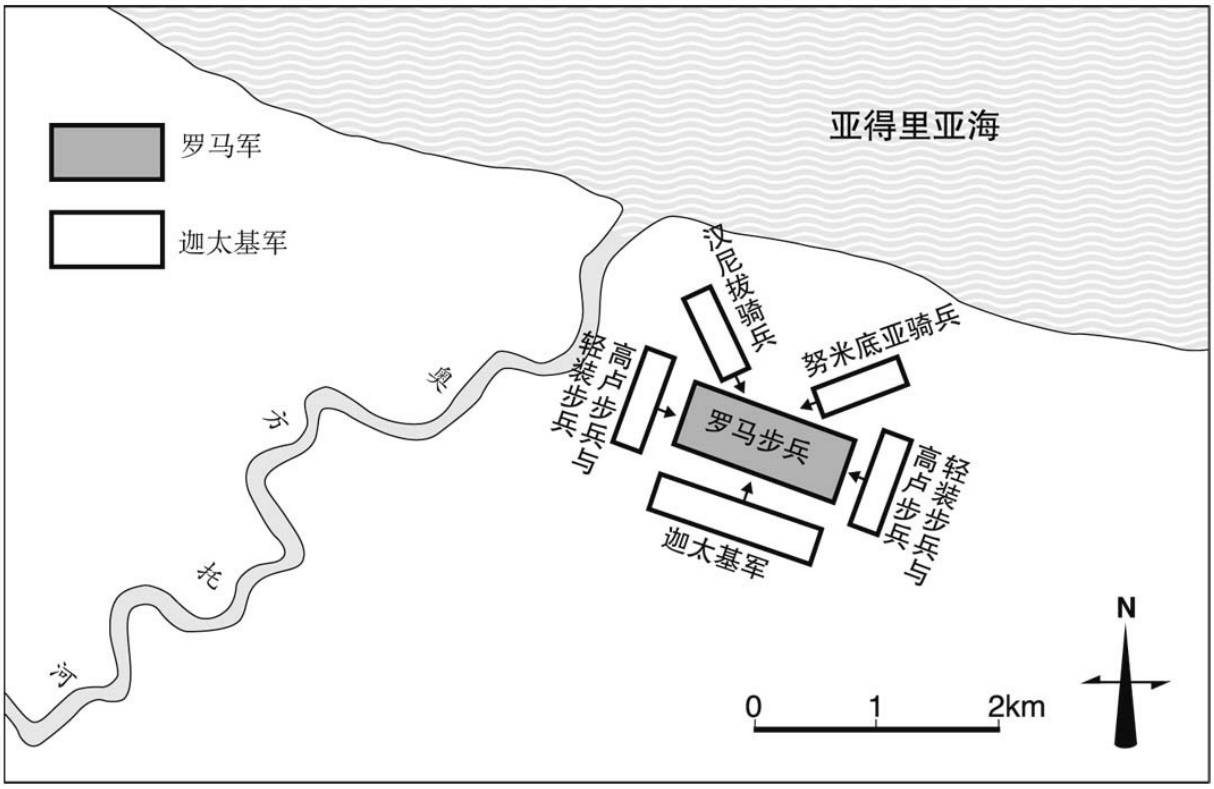
其间，在罗马重装步兵的猛烈进攻下，处于汉尼拔军中央位置的高卢士兵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气势越来越猛的罗马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乘胜追击节节后退的敌人。

亚得里亚海
罗马军
迦太基军
罗马阵营
奥
方
罗马
阵营
塞尔维利乌斯
汉尼拔阵营
北
埃米利乌斯
重装步兵
骑兵
轻装步兵
瓦罗
同盟国骑兵
河
坎
尼
村
西班牙、
高卢骑兵
高卢步兵
汉尼拔阵营
重装步兵
汉尼拔
努米底亚骑兵
N
0
1
2km

坎尼会战（布阵结束时的阵型）



坎尼会战：第二阶段



坎尼会战：最后阶段

这时，一直后退的高卢兵突然向战线两侧散开，汉尼拔的重装步兵出现在罗马重装步兵的面前。不愧是跟随汉尼拔远征而来的精锐部队，2万人抵住了7万罗马士兵的猛烈进攻。

战场中央，重装步兵之间的激战显现了罗马方面处于有利的形势下。但是，骑兵之间的战斗一直处于汉尼拔方面的掌控之中。

执政官埃米利乌斯率领的2400骑兵中的大多数，被敌人的6000骑兵切断退路，被包围在岸边后消灭。只有小部分人跳进河里，逃脱了敌人的追杀。埃米利乌斯的坐骑被杀，又失去可以指挥的骑兵团，于是，他加入了重装步兵团，继续战斗。

执政官瓦罗指挥的4800名骑兵来自同盟各国，会战开始时，抵住了敌人的进攻。然而，终究不敌骑术高超的努米底亚人。左翼没有河相

阻，要摆脱努米底亚骑兵的追击，只有一溜烟地快跑。

在罗马重装步兵和汉尼拔的主力激战的战场中央，汉尼拔的战术开始显出效果。在这里，每名罗马士兵的战斗意志和作战能力已经不起作用。

汉尼拔的精锐部队抵制住罗马重装步兵猛烈进攻的同时，看似已经撤离战线的高卢兵及轻装步兵转移到了罗马军团的两侧。原来在这里的罗马骑兵已经被汉尼拔的骑兵击退。接着，汉尼拔的左翼骑兵在击退罗马军的右翼骑兵后，也绕到了罗马步兵团的背后。最后，努米底亚骑兵赶走执政官瓦罗率领的罗马军骑兵后，也回到了战场。至此，汉尼拔设计的包围圈已经完成。

就像画中画的一样，7万名罗马步兵被汉尼拔的5万士兵团团围住。

罗马市民兵是罗马联盟的核心，尽管遭到敌人的包围，但是，他们绝不轻言放弃，举手投降。对汉尼拔来说，就像之前发生的所有战斗一样，对罗马军实施包围战，意味着实施歼灭战。

上一年度的执政官、指挥重装步兵部队的塞尔维利乌斯阵亡。坐骑被杀后，选择与部下共同战斗的执政官埃米利乌斯战死。独裁官时代担任费边副官的米努基乌斯被杀。加入骑兵队及重装步兵团的80位元老院议员几乎无一幸存，只有极少数人冲破汉尼拔的包围圈，得以逃生。坎尼之战，就像非常完美的包围战一样，这场歼灭战打得非常漂亮。这一次，汉尼拔又一次把敌人的主力，即罗马军团的精锐重装步兵的战斗力给化解了。

未接到总指挥官的命令，一直在营地待命的1万士兵悉数被俘。

担任这一天总指挥官的执政官瓦罗只带着50骑，沿山路向西逃到距离坎尼数十公里开外的罗马殖民城市韦诺萨，侥幸逃脱。4000名步兵和

200名骑兵向南逃到距离坎尼10公里的卡诺莎，已经19岁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也在其中。特雷比亚之战后，他的父亲被派往西班牙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埃米利乌斯。对于年轻的西庇阿来说，接触汉尼拔精妙的战术，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得知执政官及将官逃了出来，坎尼会战的残兵也纷纷聚集到韦诺萨和卡诺莎来了。所有人加起来不到1万人。

坎尼会战中，如果相信古人的记载，罗马方面的牺牲人数多达7万人。胜利者汉尼拔方面的战死者只有5500人，其中三人之二还是高卢兵。

纵观整个历史，罗马军团遭受如此重创，坎尼会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为了扒下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汉尼拔军队第二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也没有完成。汉尼拔派去向迦太基本国通报胜利消息的弟弟马可尼在本国要人面前，据说用从阵亡罗马士兵手指上摘下来的金戒指，堆成了小山。罗马市民手上的金戒指不是结婚戒指，而是他们的印鉴，不仅大还很重。把几万个这样的戒指堆起来，该是多高的山，我难以想象。

罗马平静地接受了完败的消息。以元老院议员为首的全体市民，到城门口迎接、慰问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首都的执政官瓦罗。阵亡者家族服丧的时间从以往的1年缩短至30日。

没有责备特雷恩蒂乌斯·瓦罗一句话，就连最初反对他主张尽早解决问题的提议的人，现在也不再提起。特雷比亚之战、特拉西梅诺之战、坎尼会战，没有一个贵族抱怨惨遭失败的这些战斗的总指挥是平民出身。在其他民族常常发生的类似聚到古罗马广场抗议为政者的事情，在此时的罗马，完全看不到。

祸不单行。坎尼会战失败后，人们的服丧期还没有过去，又传来了在高卢的两个军团被歼的消息。

自从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高卢民族纷纷起兵。这一年，为了镇压起义，罗马向波河流域派去了两个军团，由法务官波斯图米乌斯率领。然而，在追击高卢兵的时候，全军落入了敌人设下的圈套。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了森林之中。

高卢人事先已经把森林中沿路的树木砍倒，又照原样把它们立起来。为了追赶高卢兵，罗马军进入森林，然而立着的树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棵接一棵地砸了下来。两个军团8600人几乎全被树木压倒，动弹不得。躲在一旁的高卢兵乘机把他们杀死。据仅剩的幸存者证实，法务官波斯图米乌斯也和士兵们一起共赴黄泉了。

几天时间，罗马相继失去了合计8万士兵。元老院担心对虔诚信仰宗教的罗马百姓的思想会产生波动，决定派使节去求神谕。派去希腊德尔斐求神谕的是后来记录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史的元老院议员费边·皮克托。这是罗马人对接踵而至的噩耗表现出动摇的唯一证据。

另一方面，在坎尼的汉尼拔营地，完胜之夜，将士们的喜悦之情一展无遗。将官们纷纷向汉尼拔进言，要求立即攻打罗马。他们中有一人扬言，现在攻打罗马，5天后，我们就可以坐在卡匹托尔山上吃晚饭了。

但是，31岁的胜利者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汉尼拔坚信只有罗马联盟分崩离析才能彻底消灭罗马。他说，现在攻打首都为时尚早。于是，指挥官中的一人对他说：

“你知道怎样取得胜利，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胜利。”

汉尼拔年纪尚轻，内心也许有过迷茫。但是，就像后来锡拉库萨及

迦太基的例子所示，攻打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必须作好持续两三年时间的心理准备。此外，一天时间就可以决出胜负的会战自然无关紧要，但是，攻城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高卢兵首先难以信任，汉尼拔可以依靠的只有略多于2.5万人的部下。仅靠这点兵力，强行攻打大城市，无异于自取灭亡。更何况，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并非把所有的国家功能全部集中在首都。这也是汉尼拔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原因。

罗马是由面、点和线构成的国家。坐落于同盟城市之间的殖民城市里，住着罗马市民及享有与罗马市民几乎同等权利的拉丁市民。他们是罗马市民权的拥有者，所以，他们也是士兵。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会带着来自各同盟城市的士兵，袭击正在围攻首都罗马的汉尼拔军。

不管内心想法如何，汉尼拔绝不允许自己改变瓦解罗马联盟这一基本战略。这是在决定攻打意大利之初早已定下的。坎尼会战的重大胜利必须为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服务。

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又把俘虏分成罗马市民兵和同盟国士兵，后者被无偿释放回国。当然，他们走的时候，汉尼拔要他们答应回去后转告他们的同胞，说汉尼拔的敌人只是罗马，不是罗马以外的意大利人。

汉尼拔本人也不浪费时间。他没有攻打首都罗马，也没有追击败兵，而是把自己的军队送往南方。他的目的很明确，他认为，由于罗马在坎尼会战中大败，意大利南部的城市一定会出现动摇。他要攻打这些城市，迫使他们脱离罗马联盟。

卡拉布里亚地区位于状如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脚趾到脚尖的地方。汉尼拔首先在这一带发起了进攻，有一两个城市试图抵抗，但很快被攻占。之后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汉尼拔面前打开了城门。只有那些殖民城市，因为居民是罗马士兵，同时要塞化做得很充分，所以，就像海面上到处露着脑袋的岛屿一样，依然属于罗马。这个地方的同盟国中，唯一

坚持站在罗马一方的是面向墨西拿海峡的雷焦。因为那里相距西西里较近，可以得到西西里岛上亲罗马势力的援助。

罗马联盟在南方最先被削掉一角。

但是，对罗马来说，更沉重的打击是来自加普亚的背叛。

当时，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加普亚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比任何地方都重要，甚至比那不勒斯还要重要。它坐落在始于罗马的拉蒂纳大道与阿皮亚大道交会处，是具有“无投票权的市民权”的城邦国家，市民除了无权参与罗马国政以外，在法律上享有与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同时，又有完全的自主权。加普亚是罗马联盟完全的同盟国，市民有义务参加罗马军队，迄今为止，市民一直与罗马市民兵一起，共同抗击汉尼拔。

然而，罗马在坎尼会战中败于汉尼拔之后，加普亚背弃了罗马。汉尼拔释放来自同盟国俘虏的策略终于结出了巨大的硕果。

加普亚派出市民代表前往汉尼拔营地，提出了讲和条件：

一、达成和谈后，加普亚不承担向汉尼拔军提供士兵的义务。

二、汉尼拔承认加普亚境内的完全自治。

三、汉尼拔向加普亚送去300名罗马市民兵俘虏，换回正在西西里战场服役的300名加普亚市民。

汉尼拔爽快地答应了所有这些条件。就这样，汉尼拔完成了与加普亚之间的和谈。

一个有实力的城邦国家，周边通常会有若干卫星城市。加普亚背离罗马后，又有4个相邻的城市脱离罗马。罗马联盟在意大利中南部也被

插上了楔子。

取得坎尼会战完胜的公元前216年，是汉尼拔和他的士兵们离开西班牙的第三年。这年冬天，他们终于不必睡在营帐内的地上越冬了，他们住进了有房顶有墙的房子里，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了。公元前216年至公元前215年的冬季，汉尼拔率全军在加普亚度过。加普亚是伊特鲁里亚人建设起来的城市。即将告别31岁的汉尼拔在这个大城市里边过冬，边等待罗马联盟的解体。

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如果想了解2300年的古人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最容易找到的著作只有普鲁塔克的《列传》。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只能了解亚历山大的人性的一面，却几乎找不到他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因是，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文化人普鲁塔克不关心这类东西，也没有写这类东西的专业知识。

好在书写亚历山大的古人不止普鲁塔克一个人。在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以后，他成就的远征事业就征服了古代人们的心。在当时，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有不少，有很多历史学家提笔书写这位年轻天才的丰功伟绩。

亚历山大远征时有两位记录员随行。在大帝死后，又有两位历史学家根据这两位记录员的记录，很快完成了传记的写作。

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与亚历山大同行的两位记录员写的记录以及在大帝死后，两位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在罗马时代，以这些作品为原始史料，普鲁塔克写下了《列传》，库尔提乌斯·鲁夫斯及阿里安写下了《亚历山大大帝传》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真容。当然，与生活在大帝去世100年后的汉尼拔相比，从

信息量上来说，前者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有关战略战术的描述。在作品中，描述这类内容，不仅需要对此有兴趣，同时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古代历史学家中，不光是普鲁塔克，绝大多数人都热衷于颂扬大帝的丰功伟业，很少提及大帝是如何成就这些伟业的。虽然历史学家中，有人有这样的资质，如色诺芬有过率领军队作战的经历，修昔底德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波利比乌斯担任过阿卡亚同盟军骑士团团长。但是，除了当过兵的阿里安，没有一个人写亚历山大，实属可惜。

不过，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关心先人的业绩，希望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我想汉尼拔应该是其中之一。很久之后，当西庇阿向汉尼拔提出问题时，他曾经回答说亚历山大大帝是最优秀的军事家。当然，汉尼拔认为自己同样也是优秀的军事家。如果只是道听途说，他不可能如此肯定地回答说是亚历山大位居第一。因为他很清楚，并且对大帝的才能心悦诚服。

汉尼拔在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带了一个希腊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此人始终与汉尼拔同行。他是汉尼拔的亲信，叫西勒诺斯，担任远征意大利的记录员，同时教汉尼拔希腊语。当时，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书籍都是用希腊语写的，也许，西勒诺斯的任务就是把亚历山大的故事读给汉尼拔听吧。当然，重点一定是这位迦太基年轻统帅最关心的大帝用过的战略和战术。

被后人尊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在22岁那年，只带着3.6万名士兵攻入了幅员辽阔的波斯。靠这一支军队，与多达10万至20万名士兵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作战，两次战胜大流士。与波斯方面的战死者多达10万相比，亚历山大的损失只有两三百人。让看到这个数字的人，忍不住以为少写了一个零。尽管古人有夸张的毛病，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完胜。

对此，常人只会感慨其伟大。但是一位将军看到这样的战况，一定

深受刺激，从而产生强烈的探知欲。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尤其是汉尼拔，要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兵力攻打总兵力达75万人的意大利，不难想象，他的探知欲会比别人更强烈。

亚历山大18岁那年，跟随其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率领的军队，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与底比斯·雅典联军作战。当时，他任骑兵团指挥。马其顿军与底比斯·雅典联军，在士兵数量上不相上下。战斗结果是，马其顿获胜。决定这场战斗结果的是马其顿骑兵。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军队主力都是重装步兵，由中、上层市民构成。喀罗尼亚战役中，马其顿军的步兵与骑兵比例也是10：1。

我想，让年轻的亚历山大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源自他亲自指挥骑兵，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结果的这一经历吧。两年后，他准备东征的时候，兵力是步兵3.1万人，骑兵5000人。步兵和骑兵的比例缩小到了6：1。同时，为了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甚至编组了重装骑兵队。

历史书中随处可见对亚历山大的溢美之词。随意地去翻看这些历史书，还以为是位神仙再世呢。但是，如果带着探知欲去读，有时候会看到有关战略战术的记述。如“从敌军侧面进攻”，如“绕到敌人背后”等等。在讲述伊苏斯战役的内容中，面对5倍于己方兵力的敌人，“亚历山大知道，尽管自己的军队主力是重装步兵，但是，随着战局的展开，他确信由骑兵决出胜负的时候到了”。

这位马其顿的年轻统帅认为，重视骑兵的机动性，由步兵和骑兵构成的军队就能够更高效地发挥它的战斗力。并通过有机发挥全军的力量，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以往的战斗中，步兵对阵步兵，骑兵对阵骑兵，这已成作战惯例。骑兵的机动性往往用在追击败退的敌人。在这种情形下，决定胜负

的是“量”。大流士并不是害怕亚历山大，只是因为他坚信只有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才能体现大帝国君主的威力，所以在伊苏斯战役中，才投入了15万的大规模兵力。伊苏斯战役之前，亚历山大参加过的战斗中，只有一次以波斯为对手。与大流士的交锋，伊苏斯战役是第一次。在亚历山大出现以前，所有的作战方式采用的都是加算。因此，波斯方面有理由派出浩浩荡荡的大军。但是，马其顿的年轻统帅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作战方式。

对亚历山大来说，步兵和骑兵都是棋子，要根据战术，相应地在战场棋盘上移动。他让骑兵攻打敌人的步兵，也会让步兵迎战敌人的骑兵。他不在乎贵族出身居多的骑兵的自尊心，他关心的首先是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这也是他在战场上屡屡获胜的原因。

所谓天才，不是善于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新事物的人，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因为他能够意识到别人没有意识到的、已知事物的重要性。

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亚历山大总在思考的是如何有效地发挥出自己军队的每一份战斗力，如何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战场的主导权总是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不是坐等敌人出手。他经常说：“所谓战斗，就是呈现出激烈变化的一种状态。因此，战场上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有变化地进行。”

亚历山大同时熟知战场之外必须谨慎。所以，在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他没有穷追落败而逃的大流士，任凭波斯国王逃到内陆，自己先专心于控制地中海沿岸地区。因为对亚历山大来说，既然在敌国领土上作战，确保来自希腊的补给线是重中之重。后来，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再次战胜大流士以后，他也没有追击大流士，而是转身攻取了巴比伦、苏萨以及波斯波利斯。对大流士实施追击，是在波斯的这些重要城市一一到手以后。

率领仅有的3.6万人远征东方的亚历山大，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

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后，放弃穷追猛打，改为攻占周边，使他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随着不断向东方深入，沿途居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致使希腊的兵力比例逐渐减少。

亚历山大用过的上述所有战略战术，汉尼拔也都用上了。其中最后一项，一定更强烈地吸引了力促罗马联盟解体的汉尼拔的兴趣。问题在于，汉尼拔的对手不是习惯了波斯及其他专制君主制的东方民族，而是与罗马建立了平等的同盟关系、罗马化了的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及希腊人。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他们已与罗马人在经济上连为一体。

汉尼拔无疑从亚历山大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们是两个人。与汉尼拔不同，亚历山大几乎从来没有向敌人发起过突然袭击，也从来没有用计谋置敌人于死地。这不能说是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民族性的差异，只能说是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个人性格的不同。荷马的英雄中，亚历山大最喜欢的是既高贵又勇敢、却对谋略一窍不通的阿喀琉斯。我们不清楚汉尼拔的偏爱，也许他说过喜欢用奸计攻陷了特洛伊的奥德修斯。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战略战术是否能够成功。即使是经过缜密设计的战略战术，如果执行者的性格不适合该战术，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成功。因为，人只会把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公元前4世纪的阿喀琉斯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夜袭，但是，汉尼拔是公元前3世纪的“奥德修斯”。

为了把握时机展开战斗，必须有效利用骑兵。这一点，汉尼拔一定是向亚历山大学的。那么，连续四次大败于汉尼拔的罗马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加强骑兵战斗力呢？难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骑兵拥有的机动性吗？或者是因为不得已，使得罗马人尽管有想法，却始终无法提高骑兵的力量？

事实上，在提契诺战役后，罗马就已经注意到了汉尼拔骑兵战斗力的优势。当时，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骑兵队第一次与汉尼拔的骑

兵队遭遇，就惨遭失败。事后，科尔涅利乌斯向元老院特别提及了这一点。还有，特拉西梅诺之战的败将执政官弗拉米尼，在决定追击正在南下的汉尼拔时，也曾要求同僚塞尔维利乌斯派骑兵队先行一步，从里米尼出发。罗马的指挥们非常清楚汉尼拔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尽管如此，罗马并没有马上着手增加骑兵兵力。

原因有二：

首先在共和政体下罗马军队的构成上。当时，罗马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由承担市民义务的、属于中上层阶级的市民构成。重装步兵体现了共和政体下罗马的灵魂。

蔑视重装步兵就是蔑视罗马的共和政体精神。例如，我们日本提倡的是“和”的精神，如果因为这种精神在国际化时代不通用而放弃它，那么日本就不是日本了。同样，如果只看到骑兵的重要，而把重装步兵改编为骑兵，那么罗马人也就不是罗马人了。

近500年来，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足够优秀。对迄今为止战绩卓著的军队进行改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很难对之前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事情实施变革。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罗马和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即使想扩大骑兵兵力，能够形成战斗力的骑兵也是少之又少。在意大利，马匹的集中产地在亚平宁山脉周边的山岳地带。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培养出骑兵。

古人不知道马镫。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作为工学天才，加上科学创始者希腊人，为什么也没有想到马镫呢？

被认为是医学鼻祖的希波克拉底和集古代医学大成者盖伦，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由于两脚长时间下垂引起淤血所导致的脚疾是骑士的

职业病。

古代骑士和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一样，骑马时马背上只有简单的马鞍，两脚自然下垂，没有马镫的支撑。因为下垂的脚也能踢马肚子，所以，有没有马镫不影响骑马。

但是，在马背上射箭投枪就需要力的支撑点，为此，马镫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因为没有马镫，所以骑兵们只能靠两腿夹紧马肚子，以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的特殊技能，只有从小开始训练才能学会。

如此一来，就限制了骑士队伍的人数。他们或者来自马匹的产地，从小骑着马漫山遍野地跑，或者出生于社会地位高、家境富裕的人家里。按照罗马税制，第一阶级拥有的财产最多。鉴于这一原因，他们要承担罗马骑兵的义务。罗马人知道加强骑兵的战斗力是当务之急。然而，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罗马一时之间难以付诸实施。

与此相对，君主专制国家马其顿和实行雇佣兵制的国家迦太基，在加强骑兵战斗力方面显然有利得多。亚历山大东征之际，从北方的多拉基亚招募了大量骑兵，汉尼拔只要从北非努米底亚雇佣就可以了。作为游牧民族，努米底亚闻名地中海世界。

罗马军队改变了市民兵的性质以后，依然没有改变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方针。因此，如何加强骑兵的力量，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一直遗留下来了。后来，尤里乌斯·恺撒就从地中海另一个游牧民族高卢人中招募骑兵。应该说，作为游牧民族，高卢和努米底亚不相上下。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当时，高卢是罗马的敌人，他们追随汉尼拔。这就意味着，通过学习亚历山大大帝，熟知骑兵战斗力之重要的汉尼拔，把努米底亚和高卢这两个地中海世界屈指可数的游牧民族都收入了自己的帐下。

因此，罗马要加强骑兵的战斗力，可谓困难重重。在坎尼会战完败

之后，罗马人又等待了14年，终于等到亚历山大战略思想继承者的汉尼拔，他的继承者西庇阿出现时，这一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

顺便提一句，马镫普及是在公元11世纪以后。在中世纪，骑士得以进入黄金时代，原因之一就是马镫的出现。

第四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前期

（前215—前211）

每次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实节目，我总是惊讶于英国人对事物极其冷静客观的叙述。即使没有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名字，只要认真倾听纪实的内容，也能知道这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他们的这种态度实在很适合讲述历史。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英国学者的著作最值得信赖。

但是，冷静得让人以为从没流过鲜血的英国人的叙事风格，有时候却会变得激情澎湃。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苦笑着自言自语说：

“又想起了敦刻尔克以后的不列颠之战了吧。”

英国绅士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但下面我要讲到的是令他们也会热血沸腾的、历史上的罗马人故事——是被汉尼拔打得头破血流之后的罗马人故事。然而，罗马没有美国的帮助，而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才得以奋起并继续战斗。

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派往本国通报胜利喜讯的小弟马可尼，用从会战中阵亡的罗马士兵手指上摘下来的金戒指堆成山的时候，据说迦太基元老院会场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汉农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浸在向罗马复仇后的喜悦中。他是经常与汉尼拔所属的对外贸易派意见相左的国内农业派代表人物。汉农向马可尼发出了一问：

“请问，在拉丁民族中有哪个部族投奔了我们？在多达37个拉丁殖民城市中，有多少殖民城市脱离战线，投降了汉尼拔军队？”

略显稚嫩的马可尼面对老谋深算、权势在握的汉农，略显紧张地回答：

“没有，一个也没有。”

汉农接着问：

“也就是说，敌人依然强大。那么，请问，罗马的殖民城市和同盟城市的市民中，有没有背叛罗马的迹象？”

“不清楚。”

“罗马人有没有向汉尼拔提出和谈申请？”

“还没有。”

“又是还没有吗？既然这样，现在的情形与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又有什么不同？坎尼会战胜利后，迦太基和罗马依然处在激烈的战争之中。各位，我提议现在与罗马讲和。”

但是，罗马方面并不希望讲和。

在意大利中南部最大的城市加普亚度过了舒适的冬季后，汉尼拔做了一件迄今尚未做过的事情。按惯例，他首先无偿释放了来自同盟各国的俘虏。然后，去见留下来的罗马市民俘虏。他语气温和地对他们说：

> 我发起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要灭绝罗马人。我是为了名誉和权力而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我父亲向诸位的父亲作了让步，现在由于我的智慧和诸神的恩赐，似乎应该由你们一方作出让步了。
>
> 现在我宣布，各位只要拿出赎金，我就恢复你们的自由。

据说，此时的罗马市民俘虏仅有8000人。因为汉尼拔为了避免成为行军途中的累赘，把之前四次战斗中抓获的罗马人都杀了。所以，坎尼会战后，罗马市民兵俘虏就只有这个数。汉尼拔要求俘虏选10个代表，随自己的一名亲信回罗马。

汉尼拔无偿释放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俘虏，目的是促使同盟各国脱离罗马联盟。但是，罗马市民兵俘虏获释，回到罗马后，显然会再次成

为罗马军队的一员与汉尼拔作战，既然如此，汉尼拔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猜想，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

第一，确保全军的粮食供给，已经让汉尼拔深感力不从心。8000个罗马人，虽说是俘虏，却也有8000张嘴。对汉尼拔来说，能少一张嘴吃饭都是好的。汉尼拔没有要求过高的赎金，接近无特殊技能的奴隶售价。作为赎金，远比正常的要求低。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和迦太基曾经频繁地进行过俘虏交换。如果一方人数不足，只要支付相应人数的赎金即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支付赎金的常常是迦太基方面。

坎尼会战后的情况与那个时代不同。因为，坎尼会战后，罗马没有迦太基俘虏可以与汉尼拔进行交换。因此，罗马若想本国士兵获得释放，只能向汉尼拔支付赎金。也就是说，汉尼拔愿意释放俘虏，不是因为他特别宽容，也不是他要做一件缺乏常识的事情。

第二，这是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第一次释放罗马市民兵俘虏。汉尼拔是要通过释放这些罗马市民权拥有者，试探罗马有无讲和的意向。站在汉尼拔的立场上，他认为，罗马经过四次会战的失败，应该信心尽失。这个时候，如果罗马答应放弃西西里和撒丁两岛，以及加普亚以南的意大利南部，那么，他攻打意大利的目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不仅重新夺回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失去的一切，而且还得到了希腊人聚居的富饶的意大利中南部地区。

回到首都罗马的10个代表请求在元老院发言，很快获得允许。但是，和俘虏代表同去的汉尼拔的那位亲信没有被允许进入环绕罗马的城墙内，只能等候在外面。

在元老院议员面前，10个俘虏代表把汉尼拔说过的话转述了一遍。当然，也说了赎金金额。元老院议员们表情沉重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俘

虏中有他们的亲属，也有坎尼会战中英勇奋战、最终被捕的元老院议员。在俘虏代表离开后，元老院议员们展开了讨论，结论是拒绝支付赎金。俘虏代表们与家人只见了一面，相拥片刻即带着这一答案，再次回到汉尼拔的身边。

罗马人从不认为被捕是可耻的事情。罗马不是不需要这8000名战士，也不是付不起8000名被俘战士的赎金。

8000名市民兵相当于两个军团的兵力。在坎尼会战中遭受重创的公元前216年冬季，罗马太需要这8000名士兵了。这一时期，罗马为了编组新的军团，已经极尽所能。除了无产者，甚至把预备役也召集起来了。尽管如此，缺口还是很大。为此，罗马不得不招募奴隶志愿者，由国家出钱，从奴隶主手中购买奴隶，约定费用于战争结束后支付。此时正在编组奴隶的两个军团。购买8000个奴隶所需的费用与汉尼拔提出的8000名俘虏的赎金几乎相等。按说，既然要编组奴隶军团，不如把全体俘虏赎回来更好。而且，俘虏中不乏经济宽裕的人。事实上，在元老院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自己出赎金，国家只负担无力支付赎金的俘虏的赎金。

但是，罗马拒绝了汉尼拔的提议——他们拒绝的不是赎回俘虏，而是汉尼拔讲和的试探。从俘虏代表的口中得知罗马给出的决定后，汉尼拔把8000名罗马市民兵俘虏全部卖给了希腊人做奴隶。

既然表明了继续战斗的决心，罗马决定全体元老院议员除了不动产，贡献出所有个人财产，并且真的这样实施了。为了确保战争经费，罗马发行了战时国债。除了无产阶级，所有市民必须根据家庭经济实力，购买相应的份额。

其时，各同盟国也开始向罗马提供资金援助。那不勒斯送来了25个装满金币的壶，元老院只接受了其中一个，以示感恩，其余24个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锡拉库萨也送来了大量小麦和一个兵团的士兵。罗马

接受了兵力援助。至于小麦，罗马表示要出钱购买。罗马希望同盟各国提供兵力援助，却不要求资金援助。

公元前215年，罗马的境况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不仅如此，还在继续恶化。

公元前215年春季，罗马最信赖的同盟者锡拉库萨僭主希伦以90岁的高龄去世了，继位的是他15岁的孙子。锡拉库萨拥立少年君主之后不久，开始出现内乱。汉尼拔于是派了很少一些人，进入锡拉库萨策反反对派。武装政变获得成功，少年君主被杀。不久，锡拉库萨撕毁与罗马之间的同盟条约，与汉尼拔结成了同盟。锡拉库萨政变派觉得自己咬到了美味的诱饵。因为汉尼拔答应，只要追随迦太基，就帮助锡拉库萨成为西西里全岛的最高统治者。

包括西西里在内的意大利南部重要城市中，现在有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是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三大城市。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罗马被汉尼拔抢去了加普亚和锡拉库萨。

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汉尼拔没有预料到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主动向汉尼拔提出加入同盟。就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与第一次不同，不再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两国之争，而是正在呈现世界大战的色彩。

是年22岁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与亚历山大大帝同出一宗。因此，对于自己的皇室继承人，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对于马其顿王国的年轻国王来说，他太想再次称霸全希腊了。但是，击退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平定伊利里亚人，并把势力扩张到了希腊西海岸的罗马，让他感到非常不安。马其顿国王知道罗马在坎尼会战中大败后，决定与胜利者汉尼拔站到一条战线上。国王派出使节，在汉尼拔控制下的意大利南端登陆。见到汉尼拔后，要求缔结同盟关系。当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同盟，而是马其顿国王与汉尼拔之间建立共同战线的同盟。内容分三个阶段：

一、马其顿国王率领军队，击退罗马在希腊西北岸伊利里亚地区的势力。

二、之后，马其顿军攻打罗马军位于希腊西北岸的阿波罗尼亚和都拉基乌姆基地，并占领两地。

三、马其顿国王率领军队，登陆意大利，与迦太基军共同作战，直至攻下罗马。

为了答谢马其顿参战，汉尼拔承诺，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结束后，汉尼拔率军登陆希腊，协助马其顿国王称霸全希腊，承认希腊西岸全部为马其顿领土。

汉尼拔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其顿国王的提议。公元前215年初，地中海世界的两大强国——迦太基和马其顿之间结成了同盟。

罗马很快获悉了同盟内容。因为以布林迪西为基地，警戒亚得里亚海的罗马海军抓到了告别汉尼拔后正走在返回马其顿途中的使节。当然，结成同盟的事实并未因此改变。

汉尼拔是否认真考虑过帮助马其顿再次称霸希腊，令人质疑。这是因为他把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如此觊觎的西西里全岛轻松许诺给锡拉库萨所有。对这位32岁的迦太基统帅来说，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攻取罗马。攻取罗马以后，汉尼拔就有了力量。对他来说，锡拉库萨已经不是敌人。同时，他完全可以无视与马其顿国王之间的约定。有时候，一纸空文也有利用的价值。这个时候，锡拉库萨和马其顿的参战迫使罗马不得不加强对锡拉库萨和马其顿的防卫。

公元前215年以后的罗马，东、南、西、北四处受敌。

东边是马其顿，南边是锡拉库萨，西边是西班牙，北边是高卢民族。还有，最难对付的汉尼拔就在意大利境内。

这一时期的罗马元老院实际上行使起战时总参谋部的职责。为了打破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元老院并没有全面铺开战线，他们纵观全局，从最紧迫的战线入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反击。

尽管汉尼拔以迦太基的名义，与马其顿签署了同盟条约，但是因为马其顿使节落入罗马人手中，这使得汉尼拔和马其顿国王之间未能及时了解各自的信息。所以整整这一年，马其顿军没有任何行动。罗马争取到了时间，强化了以布林迪西为基地的海军。布林迪西是始于罗马的阿皮亚大道的终点。罗马把这个便于从罗马调集军队的地方作为基地，努力维持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一措施对于防御必须横渡大海才能到达意大利的马其顿军非常有效。不过，在这条战线上，罗马并不打算依靠军事力量，而是选择了外交攻略。因为，此时的罗马没有能力调集大军前往希腊。

锡拉库萨倒向迦太基后，如果置之不理，会有失去西西里全岛的危险。失去西西里，意味着失去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的制海权。这样一来，南部战线等于拱手让给了敌方。

罗马没有马上攻打锡拉库萨，罗马考虑的是，首先要确保西西里的其他地方不要因为锡拉库萨的背叛而出现动摇。锡拉库萨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迦太基国内向汉尼拔提供援助。为此，罗马必须保证制海权在握。为了确保制海权，无论如何不能交出西西里。

与锡拉库萨对垒的这一战线，尚不需要马上拉开战端。罗马派去的士兵都是坎尼会战的幸存者。这样做使得他们有报仇雪恨的机会。

汉尼拔大本营是西班牙而不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战线，由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负责。他们的战略已经开始奏效。渡过埃布罗河后，越向南进攻，罗马的优势越明显。对于因坎尼会战完败，又遭加普亚和锡拉库萨背叛而难掩低落情绪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让他们心情转好的战线。

北方战线，在罗马的两个军团中了敌人高卢人的圈套，进入森林并遭到全歼以后，罗马军队彻底撤离了卢比孔河以北。此时，罗马必须警惕的是，阻止高卢新组建的军队与留在意大利南部的汉尼拔的军队会合。为此，罗马派出曾遭受坎尼会战失利的指挥官瓦罗，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皮切诺，这里连接里米尼和意大利南部。他领命组织当地居民，编组成一个军团。因为罗马已经派不出多余的市民兵了。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切断汉尼拔来自东、南、西、北所有方向的补给线，把他孤立在意大利境内。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指望持久战取得预期效果。

话虽如此，把汉尼拔孤立起来，等待他自我消耗的战术并不容易。罗马人在坎尼会战中见识了汉尼拔的才能。但是，他们一致同意继续坚持下去。当然，他们也知道，罗马方面有必要改变以往的战略。当罗马人重新认识了持久战的意义后，“拖延者”费边再次得到启用。

坎尼会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5年，元老院推荐费边为执政官候选人，并获得当选。但是，罗马始于这一年的持久战和独裁官时代费边采用的战术虽然同属持久战，内容却全然不同。曾经是两位执政官一同率领主力军团，与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面对面交锋，现在则把主力军团分成了若干队伍。

罗马人已经知道敌方的可怕将领只有汉尼拔一人，所以，只要避免与汉尼拔会战即可。因为一旦与汉尼拔展开会战，必定导致失败。但是，遇到没有汉尼拔指挥的迦太基军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痛击。

罗马在坎尼会战失败以后，这一战略才显示出效果，这一点非常具有讽刺性。汉尼拔在坎尼取得胜利后，又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的南部地区。由他统治的城市和地方多了，反而增加了他的负担。对于神出鬼没的汉尼拔来说，意大利南部实在太大。在这辽阔的地方，一个人要做到神出鬼没，终非易事。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决定采用群鼠戏猫的战术。但是，罗马人毕竟不是鼠，看见猫不会逃。他们一方面极力避免与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又不懈怠加固周边防御。只要有机会，还要咬一口猫尾巴。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最艰难的时候被认为是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1年的四年间，也就是罗马被迫专心打防御战的四年。这期间，有四位前线指挥官在后方元老院支持下，始终坚守在对阵汉尼拔的最前线。一旦有机会，罗马就要让士兵轮换上前线，尽量每年轮换一次。不过，指挥官却没有轮换过。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执政官不能连续当选，但是，给他们冠以前执政官、法务官、前法务官之类的官名，就可以继续指挥军团。一方面因为战线的扩大和分散，需要更多的指挥官，同时还可以避免每年因更换指挥官带来的弊端。毕竟，汉尼拔的优势是担任指挥官的人始终只有他一个人。

费边·马克西姆斯（贵族）——公元前215年，这一年他的年龄是60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外号由“拖延者”变成了对付汉尼拔的“意大利之盾”。

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平民）——公元前215年，这一年他的年龄是55岁。在对待汉尼拔的问题上，他多采用主动出击的战法，为此，被称为“意大利之剑”。

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平民）——公元前215年，42岁。他负责奴隶军团，训练奴隶成为士兵，并率领这个军团与汉尼拔作战。其所承担的任务相当艰巨。

瓦莱里乌斯·拉埃维努斯（贵族）——当时的年龄在50岁上下。虽然出身行伍，他却更擅长外交攻略及行政管理。因此，元老院委任他负责马其顿战线。

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分别注上了“贵族”或“平民”，这是为了表示罗马上下舆论一致。在这四位指挥官下面的军官们，也是贵族和平民出身相互搭配。平民出身的指挥官，其助手通常是出身于贵族家庭。

很多国家在危机来临时，常常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在罗马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正因为如此，在被汉尼拔打得一败涂地之后，罗马依然能够保持真正的强大。

虽然意大利南部大部分罗马联盟成员加入了汉尼拔的旗下，但是，加普亚背叛罗马后，在坎帕尼亚地区，并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加普亚，其他罗马同盟城市及殖民地都没有背叛罗马，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罗马联盟内。这也是罗马依然强大的原因之一。

罗马的几个行省也没有背叛它。撒丁一度受到迦太基的进犯，因为迦太基国内认为夺回撒丁等岛的机会来了。但是，除了来自罗马的支援，当地居民同样奋起协助罗马军队，共同击退了迦太基军队的进攻。在西西里岛上，没有一个城市紧随锡拉库萨背叛罗马。这个时期，罗马在各行省施行的是仁政统治。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也没有增加行省居民的什一税。虽然由于意大利南部倒向汉尼拔，出现了小麦短缺的情况，罗马不得已要求行省提供小麦。但是，超过什一税的部分罗马照价付了钱。

罗马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深感自豪，同时又深得人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盟国及行省众叛亲离。罗马的这一目的完全达到了。只要汉尼拔不用武力强行攻取，罗马无须担心友邦叛离。

这就意味着罗马必须阻止汉尼拔更多地动用武力。所以，罗马一方面要避免大规模与汉尼拔正面交锋的会战，同时，也要防止敌人用武力攻打友邦。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1年，罗马的所有战略，都是围绕这一难题设计的。

另一方面，汉尼拔自身危机重重。首先，他很担心自己被困在意大利境内。他非常需要设施完善的海港，以便来自迦太基的补给船队靠岸。加普亚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却不靠海。塔兰托依然是罗马的友邦。对汉尼拔来说，在坎帕尼亚地区，夺取一个既有丰富的作物产区，又面向大海的海港城市就显得极为迫切。如果能得到那不勒斯、波佐利和库马三个城市中的一个，那么，来自迦太基的补给船队就可以到达这里而不被以西西里为根据地、掌握着制海权的罗马海军发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港口，本来态度就不积极的迦太基国内，就会借口没有可以让船队安全抵达的港口，转而支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无视在意大利的汉尼拔。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在汇报完坎尼会战胜利的消息后，本该随援军返回意大利，本国政府却命令他随援意大利的军队一起改道去了西班牙。因为，从迦太基到西班牙，中间只有一个直布罗陀海峡。所以，公元前215年，汉尼拔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围绕夺取坎帕尼亚地区的海港城市展开。汉尼拔的目标是那不勒斯和波佐利两个良港。这两个良港都有很深的海湾。

为了阻止汉尼拔的行动，罗马向坎帕尼亚派去了三位指挥官，他们分别是费边、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三人。

这三位指挥官对以加普亚为根据地的汉尼拔形成了三方合围的态势。

执政官费边率领两个军团，在西北方向距加普亚20公里处扎营。这里既可以监视拉蒂纳大道，同时又可守卫首都罗马。东南方向距加普亚20公里处由前法务官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控制。同时，执政官格拉古的两个军团扎营在西南方向，这里可以把阿皮亚大道尽收眼底。如果汉尼拔试图进攻加普亚以南的那不勒斯或波佐利，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马上出击，围攻汉尼拔军。对汉尼拔来说，敌人唯一没有设防的只有东北方向，但是，这里有亚平宁山脉相阻。

汉尼拔从加普亚出征，分别向三支军队挑起过会战。但是，没有一

个人响应。这一年，在这种状态下，汉尼拔强行夺取海港城市过于冒险。因为，他把一半军队派去征战意大利南部了，只靠另一半兵力与罗马的六个军团交战实在很冒险。结果，这一年，双方始终以小规模的战斗相接触。冬天临近的时候，汉尼拔率领军队离开加普亚，向意大利南部出发了。

这一年，罗马军队对汉尼拔之战，虽然没有胜利，却也没有失败。对汉尼拔来说，尽管加普亚有坚固的城墙环绕，但是，在这里越冬并不安全。即使顺利度过了冬季，随着春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会被围困其中。而且，舒适的生活难免会让士兵丧失战斗意志。于是，汉尼拔在加普亚只过了一个冬季，其余时候都选择在意大利南部过野营生活。

第二年，即公元前214年，费边和马尔凯鲁斯二人连续当选执政官。这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还没有过先例。尽管公元前215年，他们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但是，市民大会一致支持费边的战略。这一年，罗马编组了20个军团投入到所有战线上，比前一年因坎尼会战的失败不得不减少到14个军团相比，又有所增加。

罗马已经很久没有向卢比孔河以北派遣军队了。为了加强对卢比孔河以北的防御，这次派去了两个军团。基地设在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任务是阻止高卢士兵参加在意大利南部的汉尼拔军队。

既然里米尼是北方最前线，那么为了切断里米尼和意大利南部之间的联系，皮切诺也成了一个重要城市，在这里部署了由瓦罗成功收编组成的一个军团。

两个军团留在罗马拱卫首都的安全。

因为在坎帕尼亚地区最有可能与汉尼拔再次相遇，所以，在这里部署了由费边和马尔凯鲁斯率领的四个军团。

此外，前执政官格拉古率领的两个由奴隶组成的军团被派往现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相当于长筒靴指甲盖和脚趾头的位置。原因是汉尼拔正在彻底占领这个地区的卢卡尼亚和布鲁蒂乌姆。

费边的儿子率领的两个军团被送往长筒靴鞋跟位置上的普利亚地区，因为这里有当地最大的城市塔兰托，要防止它落入敌军之手。

在西西里岛上，以坎尼会战的幸存士兵为核心组成的两个军团正在准备攻打锡拉库萨。

在西班牙战线，由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率领的两个军团还同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展开激战。

若要确保意大利西部海域制海权，撒丁岛必不可少。在完成击退迦太基收复撒丁岛的目标后，罗马方面也在此驻扎了两个军团。

公元前214年，罗马对马其顿的战线开始行动了。拉埃维努斯率领的一个军团一直负责这条战线。

这一年，共编组了20个军团的罗马军队，加上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共多达16万人。如果所有罗马联盟都参加的话，应该可以达到19万。但是，意大利南部有很多同盟城市未能参加罗马联军。总动员兵力为75万的罗马联盟中，倒戈加入到汉尼拔旗下的各地兵力共计15万人。罗马是在少了这15万人的情况下增加的军团数，因此不得不减少每个军团的士兵人数。

春天一到，汉尼拔开始北上。他在这一年的目标依然是夺取位于坎帕尼亚地区的海港。因此，他要求在意大利南部的另一半军队暂时离开那里北上。无论如何，他必须夺取海港。

迦太基的另一半军队在北上与汉尼拔会合途中，遭遇到格拉古率领的奴隶军团。格拉古事先已经向手下所有奴隶许诺，说只要取得这次战

斗的胜利，就给他们自由民的身份。奴隶军团精神抖擞，攻势异常凌厉。战斗结果是，准备和汉尼拔会合的那一半军队失去了一大半有生力量。

汉尼拔不得不改变战略。他很清楚，就算身边的军队留在坎帕尼亚地区，也会与前一年一样，不得不面对费边、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的六个军团。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对峙和小规模的战斗中空耗一年时光。所以，汉尼拔决定暂时放弃坎帕尼亚，率领军队南下前往塔兰托。因为塔兰托也是一个天然良港。士兵已经变成自由民的格拉古奴隶军团在后面紧追汉尼拔。

因汉尼拔南下而腾出手来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向位于加普亚北侧的卡锡里纳城堡发起了进攻。加普亚位于平原地带。汉尼拔在加普亚时很担心遭到包围，所以，他在加普亚附近，不易包围的要冲地卡锡里纳建了一个可容纳整支部队规模的城堡。他考虑既要有效利用在坎帕尼亚地区越冬的优点，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过冬。

在马尔凯鲁斯指挥的两个军团的猛烈攻势下，守在这里的汉尼拔部下没有能够支持很久，卡锡里纳很快被攻陷。就这样，每到冬季，汉尼拔只能回意大利南部越冬了。

汉尼拔希望通过武力攻占塔兰托的尝试未能如愿，遭到了紧追而来的格拉古和在普利亚严阵以待的费边儿子率领的两支部队共计四个军团的阻挠。在这场攻守战中，两军没有展开大规模会战。但是，袭扰战不断。这一年，汉尼拔既没有攻取那不勒斯，也没有得到塔兰托。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迎来了这一年的冬季。

在马其顿战线，军事和外交攻略并举的做法开始奏效。这条战线的指挥官拉埃维努斯只有一个军团。但是，他可以充分利用在布林迪西的50艘战船，战斗效率很高。马其顿国王在攻打罗马军队位于希腊西部的基地阿波罗尼亚时，被罗马军队击退，逃回自己的国家。

其实，拉埃维努斯的真正本事是体现在外交谋略上的。

罗马元老院刚获悉马其顿参战，就向埃及派去特使，与托勒密王朝缔结了同盟。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也答应保持中立。同时，拉埃维努斯按照元老院的指示，煽动与马其顿国境线相接的埃托利亚人揭竿而起，反抗马其顿。

埃托利亚地区位于马其顿南边的中部希腊，长期以来饱受马其顿欺扰。罗马决定利用该地民众的反马其顿情绪，承诺罗马从西边进军，再提供25艘战船，从海上给予支援。就这样，埃托利亚人决定向马其顿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罗马又成功说服帕加马王国从东边攻打马其顿。因为帕加马王国也时常担心马其顿向其扩张势力。

就这样，仅仅只有一个军团的罗马军队，开始了封锁马其顿的战斗。罗马从未想过攻下强大的马其顿王国，只要困住马其顿，使马其顿国王无法动弹就达到目的了。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公元前213年，格拉古和费边的儿子当选执政官。费边的儿子当选是因为其父费边不能连续三次当选执政官，所以，带有代替父亲的意思。这样一来，62岁的费边作为副将，随执政官小费边率领的两个军团出征。这说明，费边的持久战在这一年依然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到了这一年，罗马又比前一年增加了2个军团，投入的全部兵力共22个军团。像是为了响应在东方希腊开始的封锁马其顿似的，南方战线也一下子变为采取积极进攻的战术。罗马军队中以勇敢善战闻名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是年57岁，他被派往西西里，其任务是攻占锡拉库萨，巩固南部防线。

两位执政官率领的四个军团和法务官雷比达率领的两个军团，共计六个军团，联手对付汉尼拔。希望拉长战线的罗马并没有把这六个军团

投入到一个地方。由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神出鬼没，所以，罗马把意大利南部划分成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两个战区，由两位执政官分别负责。雷比达的两个军团前去支援费边父子负责的普利亚战区。

这一年，34岁的汉尼拔已经没有心情与不响应会战要求的六个罗马军团继续周旋，为了配合马其顿军队的登陆，必须攻取塔兰托。如果正面攻打塔兰托，罗马的六个军团势必会从背后发起袭击。通常采用正面强行攻城的方式很难速战速决。既耗不起时间又不愿损失过多战斗力的汉尼拔，决定放弃凭武力攻取塔兰托，而改为积极争取塔兰托。因为他有过先例。在锡拉库萨，他曾乘僭主交替，国内混乱，成功策动政变，让长期备受罗马信赖的友邦锡拉库萨倒向迦太基方面。

塔兰托与加普亚一样，是被罗马战胜后成为罗马联盟一员的同盟市。因此，有义务向罗马联军提供兵力。但是，塔兰托和其他同盟市又有所不同，不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权。塔兰托有意大利南部最好的良港，罗马考虑把它建成堪与布林迪西媲美的军港。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的阿皮亚大道途经塔兰托，为此，罗马每年都要向塔兰托派遣总督，尽管只是军事上的，却由总督实施统治。

这不是塔兰托市民心甘情愿接受的待遇。布林迪西是罗马新建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是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与布林迪西不同，塔兰托是由斯巴达人建起来的殖民城市，与罗马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是意大利南部最重要的城邦。虽说是罗马的战败国，却与新兴城市有同等待遇，这让当地居民难以释怀。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塔兰托迎回了汉尼拔无偿释放的士兵。亲汉尼拔的情绪开始抬头，这种情绪更是在年轻人中间不断蔓延开来。

他们选出几个代表前去意大利南部，拜访正在那里越冬的汉尼拔，同汉尼拔交换了想法。之后，汉尼拔交给他们一个行动计划，送他们返回塔兰托。他们回去后，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汉尼拔身患重病，却不说汉尼拔在哪里卧病。其间，汉尼拔只带着精锐部队，悄悄来到了塔兰

托。

这一战打得非常完美。这天深夜，迦太基士兵在塔兰托青年人的接应下，进入城门，没费多少时间，也几乎没流多少血，就占领了市内几处要冲。由于汉尼拔事先要求在塔兰托市民的家门口标上记号，所以，大部分塔兰托市民直到早晨起床后，才察觉到异样。一夜之间，塔兰托全市落入了汉尼拔的手中。只有罗马总督和500人坚守的要塞，没有被迦太基军攻下。

要塞建在塔兰托港附近凸起的悬崖上，只要它还在罗马军的手中，船就会困在港口内，汉尼拔还是无法利用这里的港口。对于这一情况，汉尼拔考虑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有塔兰托人问什么样的方法，汉尼拔回答说：

“很多事情，看上去没有可能。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没有可能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

塔兰托城周边都是平原。汉尼拔首先把停泊在港口的船送上陆地，把邻近的海湾改造成了港口。然后，又命令塔兰托人对据守要塞的罗马士兵实施断绝军粮的战术。但是，汉尼拔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要塞有来自布林迪西以及雷焦的海上补给。原来，塔兰托居民没有执行汉尼拔的命令，同时在海上对要塞进行封锁。

大城市塔兰托的沦陷，导致周边各卫星城市纷纷倒戈。除了布林迪西、卢克利亚、韦诺萨等罗马殖民城市以外，意大利南部几乎全部纳入了汉尼拔的控制范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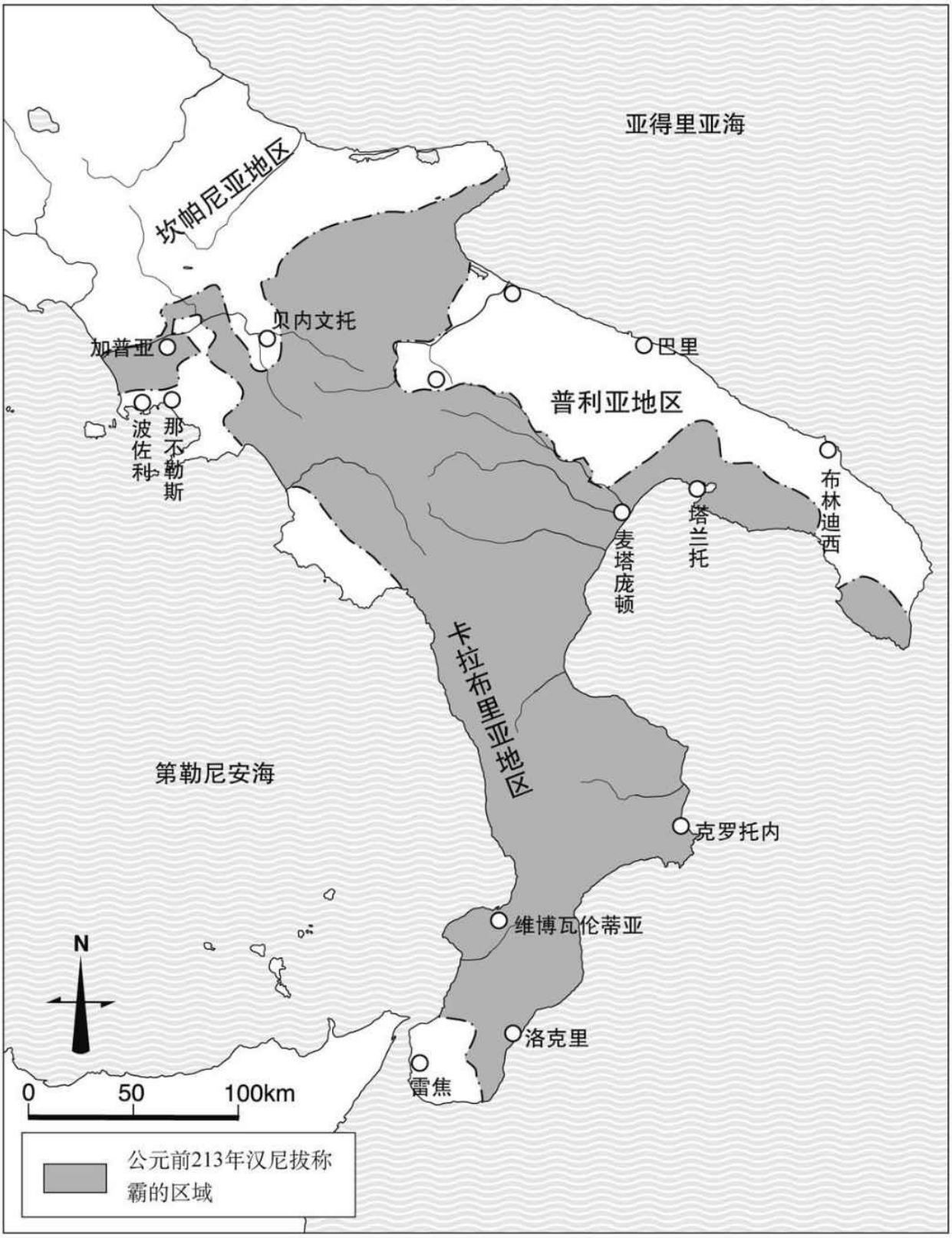
得到塔兰托后，汉尼拔再次开始了频繁的军事行动。但是，罗马军队在执政官格拉古的指挥下坚守阵地。他们依然采用以前的战术——不响应会战。不过，在坚守的同时，又会见缝插针地打上一仗。只要汉尼拔一离开，罗马军队就袭击迦太基军队，每次都能获得胜利。

持久战的缺点是战绩不显著。公元前213年，在很多人眼里，是汉尼拔等待罗马联盟解体的战术最见成效的一年。

意大利南部的三大城市，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已经全部归到汉尼拔的旗下。汉尼拔的军队中开始出现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与此相反，罗马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战果。前去攻打锡拉库萨的“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也遇到了难题，出乎意料地耽搁了很长时间。

然而，认真想来，其实罗马的情况虽然没有好转，却也没有继续恶化。

在意大利的汉尼拔只得到过一次来自迦太基本国的援助。因为，迦太基船队在罗马海军的阻截下，不得不一次次掉转船头，最终不得不放弃尝试。


亚得里亚海
坎帕尼亚地区
贝内文托
加普亚
巴里
普利亚地区
波佐利
那不勒斯
布林迪西
塔兰托
麦塔庞顿
卡拉布里亚地区
第勒尼安海
克罗托内
维博瓦伦蒂亚
N
洛克里
雷焦
0
50
100km
公元前213年汉尼拔称霸的区域

坎尼会战以后罗马与汉尼拔交战的舞台

同样，在西班牙，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始终被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所牵制，无力前往意大利支援他们的兄长。

高卢人加入汉尼拔军队后，曾经因为战胜罗马而意气风发。但是，坎尼会战以后，也被罗马军队阻挡在卢比孔河以北。

此外，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受到来自罗马、埃托利亚、帕加马三方面的进攻，被封锁在马其顿境内动弹不得，更不要说登陆意大利了。

元老院把汉尼拔孤立在意大利境内的战略尽管不显山不露水，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要进入第七个年头。由于已经不能指望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城邦参战，所以市民兵的兵役负担大大增加。他们已经相当疲惫。公元前212年，选举执政官的市民大会上，现场气氛出现异常，有点类似现在的首相辞职。

格拉古没有当选，是因为他是前一年的执政官。有可能当选的老费边、马尔凯鲁斯以及负责马其顿战线的拉埃维努斯也都没有当选。这一年选出的执政官是平民出身的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和贵族出身的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两人。前者是第三次就任罗马这一最高官职，后者是第一次当选。其中，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虽然第三次当选，但是，距离上一次当选执政官已经时隔10年。

但是，尽管感觉像首相辞职，罗马市民并没有对内阁表现出不信任。李维在其著作《罗马史》中，不仅罗列了每年当选的执政官的姓名，同时，也列举了或在执政官之下，或独立率领军团指挥大军的法务官的姓名。根据他的记载，普尔克尔在坎尼会战以后，几乎每年都上了战场。公元前212年，罗马决定编组25个军团，从而成为自第二次布匿

战争开始以来兵力最多的一年。马尔凯鲁斯继续担任攻打锡拉库萨的任务，拉埃维努斯继续坐镇指挥马其顿战线。同样，格拉古的任务也没变，继续对汉尼拔军队采用分片负责的行动模式。

公元前212年的罗马没有改变一贯的战略。只是换了几个抛头露面的人物而已。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罗马来说，勉为其难地投入25个军团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年，罗马的目标是收复加普亚。

所谓城邦国家，通常是先有一座城市，然后根据需要，逐步向周边扩充领地。有实力的城市，周边除了种植粮食的耕地，还会有许多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卫星城市。这些卫星城市，又分别有自己的领地。所以，要攻打城邦国家中的主要城市，往往不能只盯着一个点，而是要对付整个面。加普亚、塔兰托和锡拉库萨的情形左右着其周围一带民众的态度。坐视这三大城市落入汉尼拔之手，是罗马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公元前212年，为了收复加普亚，罗马派遣由两位执政官和一名法务官率领的共六个军团。为此，加普亚感到大难临头，紧急派出使者去塔兰托向汉尼拔求救。然而，当汉尼拔和他的军队摆脱格拉古所率奴隶军团的阻拦，进入坎帕尼亚地区的时候，加普亚已经被罗马的六个军团团团围住。

罗马人就连只睡一个晚上的宿营地都按规矩建得很牢固，所以，为了攻城，形成的包围圈自然密不透风。通常他们会挖一条相当深的壕沟，把高大的木材密密麻麻地排列起来做成栅栏，再抹上泥巴。坚固得连一只蚂蚁也别想进出。这一年，在加普亚筑起来的包围圈同样是密不透风，甚至比以往更加牢固。

就连汉尼拔也无法突破这样一个包围圈。他能做的只是派努米底亚骑兵，冒死进入加普亚，告诉被困其中的加普亚军队，他已经到了。

既然无法突破包围圈，汉尼拔不得不在平原地带布下阵地，向包围加普亚的罗马三支军队一一挑起会战。然而，罗马的三位指挥官完全无视他挑起的正面会战。当然，两军没有单纯地相互对峙。汉尼拔乘罗马的六个军团全部投入到攻打加普亚的机会，尝试向那不勒斯、波佐利和库马等海港城市发起进攻。但是，作为罗马联盟的加盟国，这些城市都抵御住了汉尼拔的进攻。后来，包围加普亚的罗马六个军团中的其中一个赶来增援，致使汉尼拔无功而返。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他只有在那一带烧杀抢掠。

在这些战斗中，罗马方面自然有死伤者出现。同样，汉尼拔的部下也在一点一点地减少。自从塔兰托倒向汉尼拔后，汉尼拔几乎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所有地方。为了守住这些地方，汉尼拔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因为意大利南部的各城市，没有一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对抗罗马军队。

当然，分出兵力，对汉尼拔来说并不难。因为他在自己控制下的各地招募士兵，补充了军队的有生力量。问题是，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这支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军中，除了汉尼拔，找不出第二位有才华的指挥官，这就是现实。只要汉尼拔一离开，迦太基军队就会成为格拉古的奴隶军团口中的肉。所以，汉尼拔看似所向披靡，事实上，不管是留在坎帕尼亚全力支援加普亚，还是试图攻占那不勒斯等海港城市，汉尼拔都处于两难的境地。

公元前212年一整年，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没有交手。与意大利本土情况相反，在西西里战线，局势明显有利于罗马方面。

罗马元老院把马尔凯鲁斯从汉尼拔战线上撤出来，派往西西里是有原因的。马尔凯鲁斯有一个外号，叫“意大利之剑”，这源自他主动出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的任务是在攻打倒向敌方的锡拉库萨时阻击来自迦太基的军事增援。

如果说汉尼拔是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在意大利的战事，那么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真实的。尽管迦太基没有向罗马发动海战以争夺制海权，但是迦太基的确曾多次派出船队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只是除了仅有的一两次，增援行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罗马海军在海上作战能力非常强大。

向锡拉库萨提供援助远比向塔兰托派出船队支援容易得多。毕竟，从迦太基到锡拉库萨的海上距离只有到塔兰托的二分之一。首先，派遣船队不可能只有一艘；其次，船队在海上遭遇罗马海军的概率，与海路的距离成正比；再有，支援锡拉库萨关系到对西西里全岛的控制，因此，在迦太基国内也更容易得到国内农业派的支持。事实上，从坎尼会战后的第二年开始，迦太基就匆匆向倒向迦太基方面的锡拉库萨送去了援助。

受命负责西西里战线的是马尔凯鲁斯所辖、共计四个军团的3万名士兵。其中两个军团是坎尼会战中的幸存者，因此得绰号“坎尼军团”，自坎尼会战失败后，一直驻守在西西里岛上。另两个军团则来自意大利本土。

早在公元前213年春天，罗马军队便南下进攻锡拉库萨。在对其招降失败后，罗马军队开始对锡拉库萨展开攻城战。然而，罗马军队很快遭受到严重挫折。原因并不是锡拉库萨全城动员，誓死抵抗，原因之一是锡拉库萨的中心城市位于天然要冲之地。但是，原因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锡拉库萨有阿基米德，是他让罗马人领教了一个人的智慧有时可以与四个军团相匹敌。

指挥官马尔凯鲁斯的计划是从海陆两路同时对大城市锡拉库萨发起进攻。在锡拉库萨的陆地一侧，他部署了2万名士兵。同时，指挥从巴勒莫赶来的100艘蓬特型战船从海上封锁锡拉库萨靠海的一侧。因此，来自迦太基的支援船队只能无功而返。

完成对锡拉库萨的包围后，海陆双方同时发起了总攻，但遭遇到锡拉库萨方面的军队用各种奇形怪状、用途各异的兵器的顽强抵抗。在陆地一侧发起进攻的罗马士兵，被伸出城墙外、能够发射石弹的新式兵器打得措手不及。这些新兵器不仅射程距离伸缩自如，还能自由改变方向。无论罗马士兵转移到哪个位置，都能准确无误地打过来。城墙上只有探着脑袋，观察并随时报告罗马军队动向的士兵。他们把身体压得很低，只露出两只眼睛，罗马士兵根本无法射中他们。别说爬上环绕锡拉库萨全城的城墙，罗马军队连靠近城墙的机会都没有。

靠海一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马军队没有靠蛮力进攻，而是采取了一些策略。

锡拉库萨靠海一侧的城墙比陆地一侧的城墙略微简单些，只在临海的悬崖上建了一堵并不坚固的薄薄的城墙。在靠海一侧，罗马军的进攻计划是这样的：

首先，每两艘满载士兵的船用绳子拴在一起，在船的左右两侧用橹划向悬崖下。从船尾通过帆杆顶端直达船头的绳子前端绑着攻城用的梯子。船一到悬崖下面，就用滑车卸下梯子，士兵们顺着梯子爬上悬崖，再把梯子搭在城墙上，爬梯子登上城墙。即使敌人从城墙上方投下石块，射来箭抵抗，只要坐在两艘战船上的士兵同时向上放箭，守兵就无法站到城墙上。以量取胜，是罗马人的做法。

然而，罗马战船刚靠近悬崖，出现在城墙上的却不是敌人，而是奇形怪状的装置。这些装置伸出城墙，伸到悬崖上，钩住准备卸下来攻城的梯子扔进海里。这类怪东西不止一件，在靠海一侧的城墙上到处都是。它们把攻城用的梯子和顺着梯子准备爬上悬崖的罗马士兵一一拎起来又扔进了海里。

射程距离伸缩自如又可以随意移动的投石器也用在了靠海一侧。不少船只被石弹射中后，失去平衡，狠狠撞向悬崖而损坏。尽管如此，依

然有士兵躲过阿基米德发明的新式兵器的攻势，攀上了城墙。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反射过来的镜子的反光，让他们一个个头昏眼花，一头栽倒，掉到城墙下面去。

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相持时间越久，人员和物资损失就越大。因为看不见敌人的真面目，罗马士兵完全失去了斗志。看着在船上苦苦奋战的部下，性情豪爽的马尔凯鲁斯还对其周围的部下开玩笑地说：

“阿基米德好像把装满水的杯子扔出去一样，把船从海里捞起来又扔出去。我们的士兵就像是因为桑布卡的演技太差而从宴会上被赶出去的乐师似的。”

因为攻城用的梯子形状像桑布卡，所以就用这种乐器对其命名了。通常，演奏水平不高的乐师所能够得到的报酬就是从宴会上被赶出去。

就这样，阿基米德的名声在罗马军队中传开。马尔凯鲁斯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感慨地说，自己“被一个老朽弄得团团转，这算什么事啊”。

这一年，阿基米德大约75岁上下，是一位数学家。数学虽然与罗马军队无关，却让2200年以后的高中生苦恼不已。

就在马尔凯鲁斯开始感到要想勉为其难地打破胶着的战事是愚蠢行为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因为海上被封锁，迦太基的增援部队无法直接进入锡拉库萨，于是计划让援军在西西里中部的阿格里真托附近登陆。马尔凯鲁斯留下副手继续围困锡拉库萨，自己率领一半的士兵紧急赶往阿格里真托。

迦太基派了2.5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以及12头大象来到阿格里真托附近海面准备登陆。交战的结果是，以罗马军胜利而告终。迦太基派遣的满载士兵的船队不得不放弃登陆计划，返回迦太基。马尔凯鲁斯也回到了锡拉库萨城下。但是，公元前213年的这一年里，终因阿基米

德，马尔凯鲁斯未能成功攻取锡拉库萨。

又一年过去了。公元前212年是罗马在意大利本土发动收复加普亚之战并落下帷幕的一年。这一年，马尔凯鲁斯也感到有必要尽快结束锡拉库萨攻城战。由于阿基米德发明的新武器非常有效，锡拉库萨市民深受鼓舞。他们完全不再畏惧罗马军的进攻。而且，罗马方面不能指望等到锡拉库萨城中弹尽粮绝，因为锡拉库萨这座大城市的粮食储备非常充足。不难想象，继续相持下去的话，迦太基一定还会与前一年一样，派出大规模的部队前来增援。

马尔凯鲁斯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手中的锡拉库萨俘虏。他马上叫人把他们带来审问。俘虏们的回答中有一件事引起了马尔凯鲁斯的注意，那就是阿尔忒弥斯神的祭祀日快到了。对于希腊民族的锡拉库萨人来说，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祭祀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关于这一点，马尔凯鲁斯也知道。就像俘虏们所说，祭祀日这天锡拉库萨人通常要一醉方休。罗马人也喜欢喝葡萄酒，但是，不喝到烂醉不罢休的多是希腊民族。白天，阿基米德的新兵器是防御的主角，夜间，守卫城墙的是锡拉库萨市民。马尔凯鲁斯判断，阿尔忒弥斯神的祭祀日之夜，他们一定经不住葡萄酒的诱惑。

马尔凯鲁斯挑选了1000名精兵，命人把攻城用的大部分梯子事先藏在城墙附近的森林中，还在靠陆地一侧的每个城门附近，部署了1万士兵。所有人只等夜幕的降临。

过了夜半时刻，1000名精兵悄无声息地靠近城墙，把藏在森林中的梯子搭在城墙外，开始攀越城墙。

城墙上的哨兵被悄悄干掉。进入城墙内的罗马士兵杀死烂醉如泥的城门守兵，从里侧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城门。在黑暗中，1万名罗马士兵开进了锡拉库萨城内。天亮时，市区有一半已经落入罗马军的手中。

但是，城邦国家锡拉库萨的中心部分集中在岛上。这个岛面积很大，靠吊桥与本土相连。罗马军占领的只是建有神殿及半圆形剧场的本土部分，还谈不上占领整个锡拉库萨城邦国家。突破靠陆地一侧的城墙，等于夺取了阿基米德的新兵器大显身手的场所，再加上海上的封锁依然严密，所以，中心部位因为涌入许多从本土逃过去的人，一时人满为患，弹尽粮绝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军队对加普亚的包围战中击退了在加普亚的请求下赶来增援的汉尼拔援军，成功坚持到了冬季自然休战期。在这些好消息的鼓舞下，罗马人又拾起了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沮丧消息。

前执政官格拉古负责的是意大利南部的战线。汉尼拔留在这里的迦太基军队有一名军官派出使者向他表示愿意投诚，希望他前去面谈。格拉古信以为真，只带着一小队人马赶往指定地点。结果，格拉古和同去的全体骑兵被前后左右一拥而上的迦太基士兵杀死。格拉古的奴隶军团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他们看到总指挥官的脑袋被扔进营地以后。

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作为指挥官，在坎尼会战后，罗马陷入最困难的时期，率领以奴隶为主的军团，进行了勇敢的作战，完成了艰巨任务。他希望奴隶们成为真正的罗马战士，不过，他没有用鞭子威胁过那些并未表示对罗马效忠的奴隶。在他的奴隶军团内，无论是奴隶还是市民，待遇完全一样。他给奴隶们配备同样的武器，向他们提供同样的伙食，让他们在同样的营帐内睡觉。若在战斗中战胜了迦太基军队，他会平均分配战利品。

虽然这个军团被叫做“奴隶军团”，但此时，他们已经不是奴隶。因为在贝内文托，与迦太基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格拉古如约给了他们自由。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毁约，他们遵守了只要战争没有结束就留在军团的承诺。他们效忠的不是罗马，他们效忠的是年龄在45岁上下的格拉古。

四年来同甘共苦的总指挥官死得那么突然，又那么悲惨，令人难以接受。格拉古的死使这些士兵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只有失去过顶梁柱的人才能理解。四年里，以紧密团结为自豪的奴隶军团，随着总指挥官的被杀顿作鸟兽散。

罗马市民兵和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即罗马联盟的正规军士兵，在战斗结束后一定会归队。因此，罗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正确把握死伤者的人数。对罗马来说，两个军团的士兵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还是第一次。该军团的军官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正规军士兵向罗马通报了格拉古遇害和奴隶军团解体的情况。

就这样，罗马失去了坎尼会战以来坚守在罗马最前线的四位指挥官中的一位。在这四人中间，格拉古的年龄最小。

又是新的一年。公元前211年，随着春天的来临，攻陷锡拉库萨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因为是在南方，所以马尔凯鲁斯没有无所作为地越冬。他没有等敌人弹尽粮绝，就向锡拉库萨的中心所在岛屿发起了攻势，并在冬季结束了战斗。

罗马军队从海陆两路发起总攻，锡拉库萨海陆两面同时受敌，未能坚持很久。由于此时城邦已群龙无首，因此没有人出面主持交涉停战的事宜。直到锡拉库萨方面再也没有人抵抗才告战斗结束。在古代，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劝降，坚持战斗，直至失败，该国家和国民统统归胜利者所有，这是惯例。胜利后的马尔凯鲁斯默许了手下士兵们在城里大肆掠夺，为期三天。

马尔凯鲁斯虽然出身平民，但是他懂希腊语，对希腊文化尊崇有加。在手下士兵大肆掠夺之际，他没有忘记保护那些在掠夺中最易毁损的美术品和工艺品。他把锡拉库萨所有的这些东西集中起来，收归罗马国家所有。作为统帅，在首都罗马举行的至高荣誉的凯旋仪式中，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是第一位用无数美术品装点的罗马将军。

罗马百姓也因此得以亲眼目睹希腊造型文化之美。

来自锡拉库萨的这些战利品，精美至极。在此之前罗马人见识过的、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美术品完全不能与之相媲美。锡拉库萨的500年历史不同于其他城邦国家的500年，是鼎盛时期的雅典、斯巴达和迦太基都不得不自叹弗如的500年。虽然西西里东半部和意大利南部统称“大希腊”，但是，大希腊的中心通常是指锡拉库萨。锡拉库萨也因为柏拉图曾经来访过而闻名。公元前211年，锡拉库萨失去了独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马尔凯鲁斯虽然默许了士兵掠夺锡拉库萨市民的财产，却不允许他们掠夺市民的肉体，即不允许把他们卖身为奴。全体市民保留了自由民的身份。只是，他们所有的土地一律充公，成为罗马的国有土地。从此，锡拉库萨市民只能向罗马租借土地耕作。同时，与西西里其他行省一样，要向罗马缴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租税。十分之一直接税和上缴给锡拉库萨僭主的一样，所增加的是租地费。

锡拉库萨沦陷时，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让罗马军队伤透脑筋的阿基米德，依然埋首研究数学问题，后来在一片混乱中被一名不知其为何人的罗马士兵杀死。马尔凯鲁斯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遗憾。

公元前211年，同前一年一样，罗马投入了25个军团，在所有战线展开全面作战。也同前一年一样，负责加普亚攻城战的6个军团，其中的3名指挥官都没有更换。

尽管一到冬季，汉尼拔只能去意大利南部过冬。但是眼下正逢锡拉库萨沦陷又重新回到罗马手中，因此，守住加普亚显得越发重要。对他而言，无论如何必须把加普亚从罗马军队铜墙铁壁般的包围中解救出来。

汉尼拔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诱

敌人进行会战。他率领尽可能少的兵力，带上尽可能少的粮食，紧急北上前往加普亚，大部队随后跟上。当他突然出现在加普亚附近后，便向罗马军队的包围圈发起了突袭。

然而，他的突袭并未奏效。因为罗马军队对加普亚的包围圈是双向的。既包围了加普亚，同时，还可以抵抗外来的进攻。汉尼拔向包围圈发动进攻，却无法引诱罗马军进行会战，他于是决定不等大部队到来便与罗马军一决胜负。他要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兵力少自有兵力少的好处。汉尼拔带着自己的小部队，在未被对方觉察的情况下成功绕到了罗马军队包围圈的背后。接着，他率部队沿着不可能遇到罗马军的拉蒂纳大道一路北上，直奔首都罗马。在距离罗马城墙四五公里的地方，他命令士兵搭建营帐。自己只带着骑兵，继续沿拉蒂纳大道北上，一直来到可以看得见罗马城墙的地方。在这里，他离开大道，沿着环绕罗马的城墙外，“悠闲”地走过了城墙全长的约三分之一，一直来到科林门外。

自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高卢人）入侵以来的179年间，罗马还没有让敌人如此靠近过。这一公然的大胆举动成了罗马人的噩梦。罗马人挤上城墙，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城墙下面。因为不在箭的射程范围内，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时年36岁的迦太基统帅骑在白马背上旁若无人地溜溜达达。

环绕罗马的城墙非常坚固，仅靠一个军团是根本无法撼动。而且此时，派往普利亚地区的两个军团刚刚组建完成，尚未出发。作为指挥官的执政官加尔巴也在首都。加上保卫首都的两个军团，在坚固的城墙之内，驻扎了四个军团。元老院紧急召开会议，64岁的费边建议，连一个军团也不需要从加普亚的包围圈或其他地方抽调过来。这位拖延战法的倡导者忠告执政官加尔巴要尽量避免与汉尼拔面对面地作战。

加尔巴接受了费边的忠告。他虽然把整支部队带到城墙之外，毫不

示弱地部署好阵地，但那不过是为了向汉尼拔展示一下罗马军队的威势而已。在随后的几天里，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军队之间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也始终仅仅局限在小规模战斗的范围内。

汉尼拔希望引出罗马的守军展开会战，并战而胜之。他料想，一旦罗马失守，在加普亚的罗马军队一定会解除包围，赶回增援首都。这时再与增援部队展开会战，一举打败他们。然而，他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

尽管如此，这一段插曲给罗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直至今日，母亲训斥孩子的时候，还常说："汉尼拔已经到门口了。"

公元前211年的这次"罗马之行"，对于急切希望攻下罗马，并为此心甘情愿承受任何牺牲的汉尼拔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目睹罗马。

汉尼拔没有伤到罗马一根毫毛，不得不离开南下。途中也没有再绕道加普亚去挑衅罗马军队所形成的包围圈，而是直接回到了意大利南部。他的大部队在半路与他相遇后，转而与他们的指挥官一起返回了在地图上位于长筒靴脚趾尖位置的卡拉布里亚。

加普亚得不到汉尼拔的支援，不久，在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中沦陷。罗马军队指挥官之一、前执政官普尔克尔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沦陷后的加普亚失去了国内自治权，从罗马的同盟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市民没有被卖身为奴。这是加普亚第二次背叛罗马。第一次是罗马苦战皮洛士国王的时候。加普亚在100年的时间里，两次背叛罗马，对此，罗马不能原谅。他们对加普亚的处置远比对锡拉库萨严厉得多。掌握加普亚领导权的70个市民被处死刑。

就这样，坎尼会战以后，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个主要城市，

继锡拉库萨之后，加普亚也被收复，只剩下塔兰托了。

收复锡拉库萨确保了西西里的统治权，加普亚的失而复得让罗马不必再担心坎帕尼亚地区。现在，罗马对汉尼拔的战线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也就是说，虽然意大利南部成为汉尼拔的根据地历时已久，但此时，罗马有能力把战线推向这里了。罗马对汉尼拔的真正攻势就要展开了。

公元前211年，传来的似乎都是好消息。然而，夏天刚过，却传来了一个令罗马人意想不到的噩耗。自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以来，罗马不断增加新战线。在所有战线中，唯一不断送来捷报的战线是西班牙战线。然而，正是这个战线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公元前218年，当年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未能阻止汉尼拔横渡罗纳河，于是把自己带到马赛的军队交给同行的弟弟格奈乌斯，并按计划把他们派往西班牙后，自己返回意大利，等候汉尼拔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在汉尼拔与罗马的第一次交锋，即提契诺骑兵战中，科尔涅利乌斯失利并身负重伤。伤愈后，他又被派往西班牙。

科尔涅利乌斯的任务是，在西班牙与弟弟会合，并攻打汉尼拔的大本营西班牙，阻止西班牙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罗马很清楚，既然汉尼拔越过围墙，进了自家的院子，要把他赶出去很不容易。所以，必须切断外部对入侵者的补给，把入侵者彻底孤立在围墙之内。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1年的8年间，继弟弟格奈乌斯之后，哥哥科尔涅利乌斯也来到了西班牙。罗马在特雷比亚战役、特拉西梅诺战役、坎尼战役中接连败于汉尼拔的时候，负责西班牙战线兄弟俩始终踏踏实实地恪守他们的职责。西班牙是汉尼拔9岁起一直生活的地方，是他所属的巴卡一门次优殖民地意识非常强烈的地方。但是，其间西班牙未能给汉尼拔提供任何援助。

在西班牙的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把根据地设在了塔拉戈纳。塔拉戈纳靠近埃布罗河。埃布罗河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前，罗马和迦太基两国相隔的国境线。每年春季一到，战斗重开之时，兄弟俩就率领军队渡过埃布罗河，向南发起进攻。罗马给了他们两个军团，兄弟俩分别带领一个军团作战，在战斗中取得节节胜利，成功地削弱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公元前212年，进入自然休战期后的秋天，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已夺取了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三分之一区域。这是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一直坚持战斗、未回一次国的结果。

迦太基国内非常担忧西班牙的战况，他们把本该送到意大利增援汉尼拔的援军和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送到了西班牙。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意大利海域的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手中。有罗马海军相阻，迦太基的援助无法如愿到达意大利。与此相比，到西班牙只要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即可，危险系数小很多。其次，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西班牙矿藏丰富。对于迦太基国内来说，支援西班牙意味着“继续投资”。所以，国内农业派也表示同意。就这样，迦太基国内提供的援助，包括本该前去增援汉尼拔军的兵力，全部投入到了西班牙。

迦太基是一个以雇佣兵制度为传统的国家。因此，来自迦太基的支援，使西班牙的雇佣兵市场突然火爆起来。

同期的罗马无力增派军队前往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只有依靠现有的两个军团继续作战。虽然连战连捷，但是，连续的战斗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战斗力的减损。罗马军队没有雇佣士兵的习惯，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按罗马的方式来补充自己的军队。他们没有用钱雇佣当地居民，而是与被征服地的土著部族缔结同盟关系。条件是由被征服地提供作战兵源。

但是，西班牙当地住民不同于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后两者加盟罗马联盟为时已久。如果有人把一堆金币放到他们眼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撕毁与罗马之间的同盟条约。到了公元

前212年末，当地士兵的哗变，使一直以来战果辉煌的西班牙战线陷入了困境。

第二年即公元前211年，迦太基军队用金币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他们把全军分成三支军队：一支由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率领，一支由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另一支由迦太基国内派来的吉斯戈率领。罗马军队不得不以两支军队的规模应对敌方的三支军队，当地士兵纷纷临阵脱逃。罗马军队兵力的削弱意味着迦太基军队兵力的增强。

对科尔涅利乌斯兄弟来说，兵力的削弱是绝对需要引起重视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两支军队单独作战的战略。

公元前211年初夏，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军团中，最多一次有7500名西班牙士兵脱逃。得知这一情况后，普布利乌斯不管当时夜已多深，决定立刻把他们追回来。他要在逃走的士兵与迦太基军队会合前，把逃兵的事情处理好。

然而，天色开始转亮的时候，出现在罗马军队面前的是来前来迎接逃兵的努米底亚骑兵团。努米底亚骑兵团是由受雇于迦太基的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率领的。他们的攻势非常凌厉，罗马军疲于应付。这时，马可尼率领的迦太基军队也加入了战斗。刚好在附近的哈斯德鲁鲍尔率领的军队也到了。兵力绝对处于劣势的罗马军队，其退路被切断，最后被一举消灭。指挥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也在一番激战之后阵亡。

迦太基的一支军队在打败了科尔涅利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后，又袭击了正在不远处行军的格奈乌斯的军团。在遭到三倍于自己的敌军进攻后，这支罗马军团与友军一样也被消灭。公元前222年担任过执政官的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同样战死。

罗马两个军团的残兵在高级指挥官全部阵亡的情况下，由一名百人

队队长带领逃到了埃布罗河以北。就这样，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兵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残兵逃回埃布罗河以北的塔拉戈纳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花了整整8年时间，取得的成果转眼间付之东流。

这个消息传到了在意大利境内的汉尼拔耳朵里。对于相继丢失锡拉库萨和加普亚的汉尼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如果说这个消息给汉尼拔带去了希望，那么对罗马来说却是噩耗。迦太基方面借此打开了一条向汉尼拔提供支援的补给线。这是罗马绝不允许的。攻陷加普亚后，罗马终于有了机动人才。元老院马上派出克劳狄乌斯·尼禄带1万名士兵紧急赶往西班牙。

克劳狄乌斯·尼禄出身于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族。前面已经提过，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因为个性张扬而不受民众喜爱。但是，他们个个都很出色。作为将领，他们在战场上大多喜欢速战速决。尤其是尼禄，曾经在勇敢善战的马尔凯鲁斯手下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来到罗马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地盘的西班牙，未加休整就向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挑起了战争，却受骗让哈斯德鲁鲍尔成功溜了。哈斯德鲁鲍尔是汉尼拔的弟弟，在他看来，诈胜也是胜利。所以，当尼禄追击他的时候，他向尼禄提出了讲和。尼禄信以为真，一心一意等待第二天进行和谈。不料，天亮后，哈斯德鲁鲍尔和他的军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让罗马元老院对尼禄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不具备担任西班牙战线总指挥官的能力。元老院甚至没有让克劳狄乌斯·尼禄在西班牙过冬，就把他召回了罗马。四年后，尼禄终于把欺骗过自己的对手打得体无完肤，为自己报仇雪耻。

罗马绝对不能放弃西班牙战线，为此，需要一名统帅担任该战线的总指挥官。但此时，罗马已经向汉尼拔发起了正式攻势。在这种情况

下，罗马没有可以动用的将领派往其他战线。又因为战线远在西班牙，不方便随时更换总指挥官。所以，这个人必须有可能长时间待在西班牙。当然，这位将领还必须具备过人的才能，率领经历过失败的士兵，扭转西班牙战局。把谁派到西班牙战线去呢？元老院为此绞尽了脑汁。

西庇阿登场

一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推开了元老院的大门。在年已64岁的费边和59岁的马尔凯鲁斯眼里，这位24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个未成年人。他叫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他主动请缨，要求担任西班牙战线的总指挥官，代替战死在西班牙的父亲完成任务。

对这位年轻人的话，在场的元老院议员几乎没有人当真。从年轻人的经历来看，他只在一年前担任过按察官，参加过的战斗也只有提契诺战役和两年后的坎尼会战。提契诺战役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那年他17岁，其父是总指挥。坎尼会战时，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加入了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军团。最主要的是，他不是元老院议员，因为，不到30岁没有资格加入元老院。把一个战略单位的两个军团交给这样一个人担任总指挥，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尚未有过先例。更何况，这位年轻人曾经有过的一次做法，已经让费边这样忠实的共和政体主义者心怀疑虑。

那是两年前的冬天，按惯例，是罗马选举的季节。按察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往上，他的哥哥路奇乌斯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路奇乌斯是平庸之人。他们的母亲很担心路奇乌斯不能当选，所以，天天去神殿祭拜诸神保佑。有一天，年轻人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大人，如果我们兄弟二人都当选上按察官，会怎样？”

母亲知道兄弟二人中，有一人资格年龄不到。但她还是笑着回答：

“真要这样，我会喜极而泣。”

选举当天一早，年轻人穿上无任何装饰的纯白托加，乘母亲不注意，悄悄出门了。在罗马，穿着纯白无装饰的托加，站在选举会场马尔斯广场的演讲坛上，意味着此人是候选人。选举没有竞选演说。

与哥哥路奇乌斯并排站在演讲坛上的这位年轻人，赢得了有市民权的人的一片欢呼声。甚至无须按百人一组进行讨论和投票，全场一致同意他当选按察官。他知道，自己和哥哥并排站在演讲坛上会非常醒目，一旦自己当选，哥哥也一定会当选。结果如他所料，本来岌岌可危的路奇乌斯也顺利当上了按察官。年轻的西庇阿并没有特别辉煌的功绩，但他深受市民们的喜爱。

兼任选举委员长的护民官，以未到资格年龄为由，对西庇阿的当选提出了异议。对此，这位当时22岁的年轻人回答道：

“全体市民同意我担任按察官，这就是说，我的年龄足以胜任这一职位。”

共和政体主义者很看重论资排辈，所以对他的这种做法自然是很看不惯。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市民支持他，因此离资格年龄尚差7岁的按察官就这样产生了。

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按察官是级别最低的一个官职，对其的选拔睁一眼闭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需要的是能指挥一个由两个军团共2.5万名到3万名士兵所组成的作战单位的统帅。迄今为止，这类职位都是由执政官或法务官担任的。这两个官职的资格年龄都在40岁以上。一年后，西庇阿出任该官职时，年仅25岁。与当选按察官时相比，这次差的可不是7岁，而是足足15岁。

第二年，即公元前210年，罗马决定在各个战场投入共计21个军

团，需要11位指挥官，已经确定10人（都在40岁以上），只差西班牙战线的指挥官尚未定下来。元老院一时找不到条件符合、年龄又在40岁以上的将领来担当这一重任。

最后元老院决定让西庇阿试试。但是，元老院摆出来的姿态好像是不便拒绝年轻人为战死在西班牙的父亲和叔叔报仇的心愿。因为年轻人的父亲和叔叔是元老院议员们的同僚，所以，他们破例答应了这位年轻人的请求。这其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由他做代表去为战死在遥远西班牙的同胞送行。

就这样，元老院把西班牙战线交给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为此，首先任命他为前法务官，尽管他从未担任过法务官。然后，授予他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尽管如此，元老院并不放心把这一大权完全交给他一个人。所以，又派了一个和他资历相同的监督官一起前往西班牙。此人名叫西勒诺斯，既没有实战经验，年龄也不大。他的任务是，一旦这位年轻的指挥官犯错，马上取代他担任总指挥。

元老院的决定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好评。对于一直苦于与汉尼拔周旋的罗马人来说，西庇阿的年轻、开朗和果断的行动力给了他们希望。

就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舞台上又涌现出一位天才的将领。我想，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最优秀的弟子是汉尼拔的话，那么，汉尼拔最优秀的弟子不正是这位西庇阿吗？亚历山大没有机会见识弟子的才能，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他的幸运。与此相比，汉尼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第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后期

（前210—前206）

罗马人称之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只要看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被派往哪里，就可以知道罗马的主要战场在哪里。“汉尼拔战争”爆发的第九年，也就是坎尼会战罗马军队完败的第六年，即公元前210年，当选该年度执政官的两个人中，马尔凯鲁斯被派往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拉埃维努斯被派往西西里。

普利亚地区是对阵汉尼拔的最前线。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任务是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作战，在此前提下主动出击，以此削弱汉尼拔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收复普利亚地区的要塞塔兰托作准备。马尔凯鲁斯因其习惯采用主动出击的战法被誉为“意大利之剑”，他曾成功收复锡拉库萨。对于任命他负责这一任务，元老院没有任何异议。

拉埃维努斯已经连续四年坚守马其顿战线，他成功地在外交和军事两方面对马其顿实行了封锁。他当选执政官后，被派往西西里，上一年度的执政官加尔巴接替他负责这个战场。因为锡拉库萨已经收复，所以西西里战场看似已经安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西班牙，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于前一年相继败于迦太基军，两位指挥官均阵亡。逃到埃布罗河以北的罗马军队，兵力减少到了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迦太基国内派到西班牙的援军，很有可能转而前往西西里。所以，执政官拉埃维努斯在西西里的任务就是整顿刚刚收复的锡拉库萨统治机构，在锡拉库萨以外的西西里全岛，防止可能出现的迦太基进攻。只要罗马没有彻底控制西西里，就很难孤立汉尼拔。因为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只有狭窄的海峡相隔。罗马必须彻底断绝敌人的补给线。对于强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公元前210年之前的8年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汉尼拔的手中。但是，到了这一年，战争主动权开始明显向罗马方面转移。迦太基的统治者们并不懂得把握时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战争的主动权转让给了罗马。罗马非常担心西西里战场，甚至派去执政官坐镇

指挥。与此相比，迦太基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公元前210年，罗马改用攻势。这时其投入的兵力合计21个军团，与前一年的25个军团相比，减少了4个军团。从理论上来说，由守变攻应该增加军队的规模才对。但是，由于加普亚和锡拉库萨已经收复，在这两地不再需要投入兵力，尤其是曾经需要投入6个军团包围加普亚，但是现在只要驻扎一个军团已经足够，而且好处不仅于此。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虽然没有给各级指挥官们放假，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让市民兵回家休整。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带领市民兵进行长期的战争。

虽然罗马可以要求罗马市民兵一次又一次地服兵役，却不能如此要求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的士兵。这一年，西庇阿申请担任西班牙战线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但是，动身离开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港口的时间，已是夏末。因为征集1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这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虽然这一年罗马对汉尼拔的作战由守变攻，但是，在组编军团的时候，元老院必须考虑各同盟城市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们依然不轻松。

在公元前210年的一年间，西西里战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西班牙战场的形势尚不明朗。这一年里，战斗最激烈的是意大利南部的战场——是汉尼拔与马尔凯鲁斯的交锋。

这个战场的战斗始终是围绕塔兰托展开的。罗马投入了由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率领的两个军团和前执政官凯恩图马卢斯率领的两个军团，共计四个军团。

凯恩图马卢斯的军团首先与汉尼拔交手，可惜不是汉尼拔的对手。罗马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战斗力损失了五分之四，前执政官战死。

但是，年已六旬的“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不会在年仅37岁的迦太基猛将面前服输。

得知友军失利消息后，马尔凯鲁斯一方面派人前往罗马通报战况，同时把凯恩图马卢斯军团的残兵编入自己的军团中，而后率领全军向汉尼拔追去。汉尼拔的军队已经转移。但是，为了不让罗马军队靠近塔兰托，他们没有走出萨莫奈人居住的山岳地带。在奈米斯托罗附近，马尔凯鲁斯终于追上了汉尼拔。

这里有一片开阔地，这在重峦叠嶂的当地非常难得。汉尼拔在开阔地尽头的山丘上布下阵地，马尔凯鲁斯追到这里后，向他挑起了会战。

迄今为止，两人之间已进行了无数次战斗，但是，面对面作战是第一次。对汉尼拔来说，在坎尼会战以后，这也是第一次与罗马军队展开正面作战。

为了不重蹈坎尼会战失败的覆辙，马尔凯鲁斯没有把全军投入到战斗中。他把全军分成两部分，在战斗中交替上阵。汉尼拔又用上了象群，这些象是迦太基避开罗马海军，成功从本国送来的。

然而效果恰得其反。由于大象完全不听指挥，汉尼拔军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其精妙的战术，处于苦苦应战的局面。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日落，很难说哪方获胜。

第二天一早，离开宿营地在开阔地布阵的罗马军队，没有见到迦太基军从宿营地出来。不得已，马尔凯鲁斯只得命令士兵首先火葬了前一天的阵亡者。

没有月色的这天深夜，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已经悄悄离开宿营地。由于营帐前的火把都亮着，所以，罗马军队没有察觉敌军的营地已成空巢。当他们发觉异常时，已是在天亮之后。

马尔凯鲁斯继续追击汉尼拔，在韦诺萨附近再次追上了汉尼拔。对罗马来说，韦诺萨是个重要的殖民地，阿皮亚大道通过此地。这里没有

平地，大规模正面作战绝无可能。但是，两军之间的战斗还是打响了。战斗结果是罗马占了上风。当天夜里，汉尼拔又离开了营地。马尔凯鲁斯依然继续追击。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在首都罗马，迎来了冬季选举第二年要职的市民大会。市民大会必须有至少一位执政官主持。通常，回国的是距离首都较近的执政官。但是这一年，尽管与远在西西里的拉埃维努斯相比，马尔凯鲁斯距离罗马近许多，回国的却是拉埃维努斯。因为，马尔凯鲁斯早就传话过来，说自己无法抽身。

市民大会选出了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度的执政官，他们是老费边和弗拉库斯。马尔凯鲁斯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继续负责对汉尼拔的战场。在组编下一年派往各个战场的军团时，罗马遇到了迄今为止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150多个罗马联盟的同盟城市及同盟殖民地中，有12个地方传来消息说，已无力提供兵源。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已经过去了9年，汉尼拔却仍在意大利境内，而且，公元前210年这一年，罗马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也许各同盟城市的负担已到极限，但是，元老院并未因此草草作出决定。与前一年一样，最终依然组编出了21个军团。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拒绝提供兵源的同盟城市一成不到。

虽然罗马向汉尼拔发起正式攻势后，并非所有方面都顺利，但是至少在西班牙，一位完全不同于其前任的年轻指挥官登场了，并开始施展他的军事才能。

在以前的作品中，我曾经写到过一位成功的领袖，最重要的条件在于能够在其周围营造出轻松的气氛。意大利语叫SERENO，翻译成日语是“晴朗”。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从年轻时候起，就具备这

样的天分。

在讲坛上一站，就能吸引人们不自觉地把票投给他。在后来变成秃头前，西庇阿又是个美男子。还有，他出身在科尔涅利乌斯这一罗马首屈一指的贵族世家。在罗马，科尔涅利乌斯家族超过瓦莱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埃米利乌斯和费边，在担任罗马执政官等重要官职的人数上，排名第一。

这位出身名门、又有能力的美男子，非常清楚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这份自信得益于他天生的亲和力——从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大家都很愿意接纳他。

面对众人时，他魅力四射；面对一个人时，他同样充满魅力。沿海路从奥斯提亚到西班牙东岸恩波利亚的途中，他已经彻底征服了同行的监督官西勒诺斯。

尤里乌斯·西勒诺斯前往西班牙，享有和西庇阿同等的权威和权力。西庇阿太年轻，不足以让元老院信任，所以才派了监督官与他同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妨碍西庇阿作出决策。拿破仑曾经说过，两位优秀的指挥官在一起比不上一个平庸的指挥官。只有西庇阿的父亲和他的叔叔，能够做到相互配合，推进战事。

25岁的西庇阿请求年长他很多的西勒诺斯负责守卫埃布罗河以北的塔拉戈纳营地，自己负责与埃布罗河以南的迦太基军展开战斗。西勒诺斯答应了，不仅如此，他始终坚持对西庇阿的承诺。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当然，年轻的西庇阿以后的种种表现，也无须这位监督官出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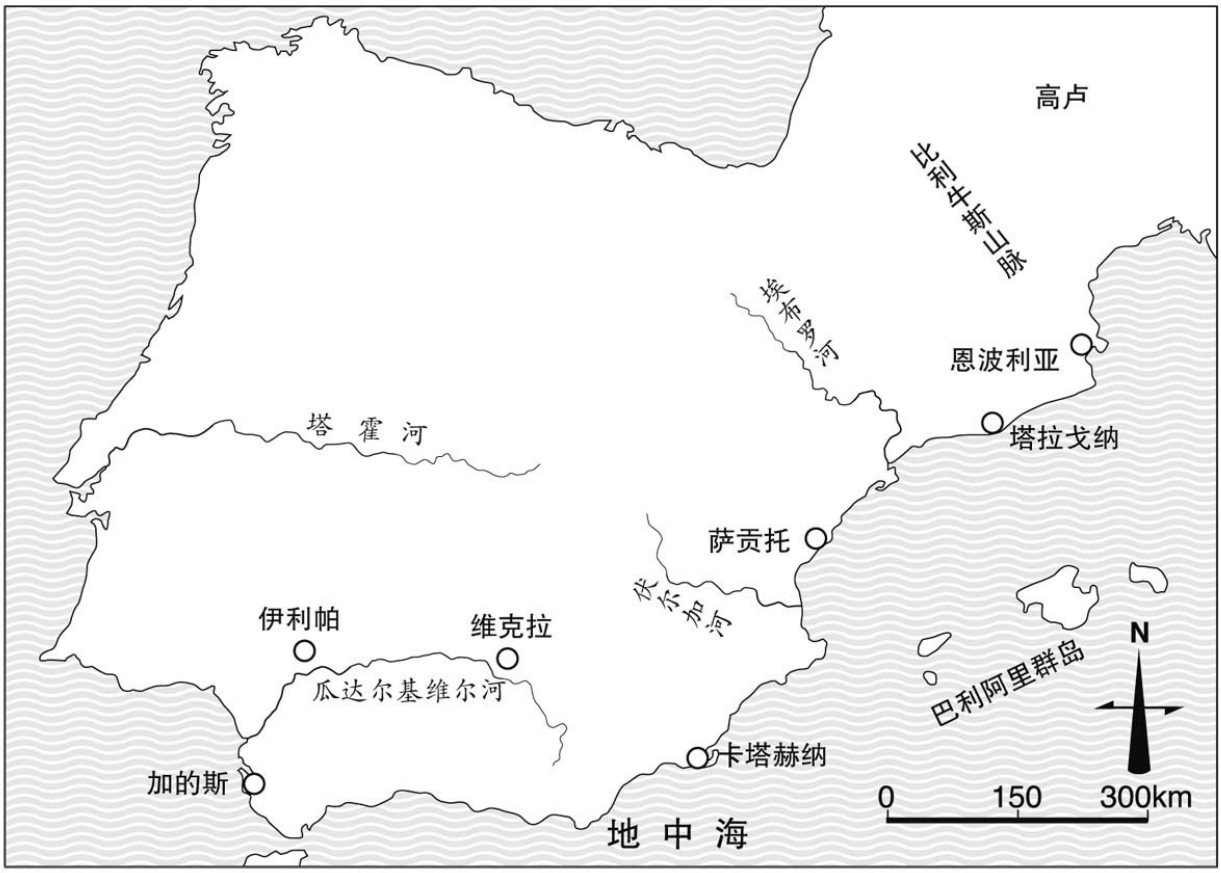
西庇阿在恩波利亚下了船，来到罗马军队在塔拉戈纳的营地。迎接他的是历经了8年的艰苦战斗幸存下来的士兵，他们失去了曾经是他们指挥官的、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

这位25岁的年轻统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消除士兵们的失败阴影。他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一切从明天开始。他还说，虽然自己年龄不大，但是，海神波塞冬在保佑自己。他甚至让大家相信，自己真正的父亲不是战死在西班牙的科尔涅利乌斯，而是海神波塞冬。这不免让人想起亚历山大大帝。当他从埃及神官那里听到，自己的父亲不是马其顿国王，而是长生不老之人，即诸神中的一人时，虽然惊讶却深信不疑。那些军事奇才们，为了笼住部下士兵的心，经常会谎称自己的母亲与诸神中的一个发生了恋情。笃信诸神的罗马士兵，听了这番话以后，开始觉得自己一方一定能获胜。

接着，这位年轻的统帅开始收集包括来自友邦马赛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情报。对他来说，西班牙还是个未知的地方。地形、气候、原住民部族的分布情况、迦太基军队所在的位置、兵力等等，他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多。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9年的冬季自然休战期，西庇阿都在收集和分析情报，并以此为依据，制订了作战计划。

他知道了敌人还是分三支军队行动。这与自己的父亲、叔叔败战时的情形一样，没有变化。其中一支军队由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率领，一支由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另一支则由吉斯戈率领。每支军队的兵力都在2.5万人上下，合计超过7万人。此外，迦太基军队还有象队。

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军队中有他自己从意大利带来的1.1万人和前一年克劳狄乌斯·尼禄被紧急派往西班牙时带来的1万人，加上不成完整建制的7000人，共计2.8万人。若与迦太基的一支军队作战，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是，一旦迦太基方面三支军队合而为一，那么罗马军队一定会寡不敌众。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西班牙

迦太基的三支军队分别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越冬：一支在西班牙中部，距离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卡塔赫纳有10天的行程；一支在西班牙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另一支在现属于葡萄牙的塔沟的河口附近。三支军队彼此之间的距离都需要10天的行程。这就是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大本营的迦太基军队状况。西庇阿接受的任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率领退回埃布罗河以北的罗马军队扭转被动的战局。

公元前209年，西庇阿在西班牙开始了行动。此时尚未到执政官费边和弗尔维乌斯二人始于3月15日的任期日。

西庇阿把防守根据地塔拉戈纳以及周边的任务交给西勒诺斯后，率领全体士兵向南渡过了埃布罗河。他的好友、副将雷利乌斯率领满载士兵的30艘战船同时南下。清楚这次行动目标的只有西庇阿、雷利乌斯和

西勒诺斯三个人。要想欺骗敌人，首先必须瞒过自己人。

从塔拉戈纳到卡塔赫纳通常需要20天时间。但是，经过一番急行军，西庇阿于7天后到达了卡塔赫纳的城墙前。直到此时，士兵们才弄明白了总指挥官的意图。

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早已知道西庇阿到了西班牙，只是他们没有料到西庇阿的行动如此之快，更没有料到他的第一个目标竟是自己的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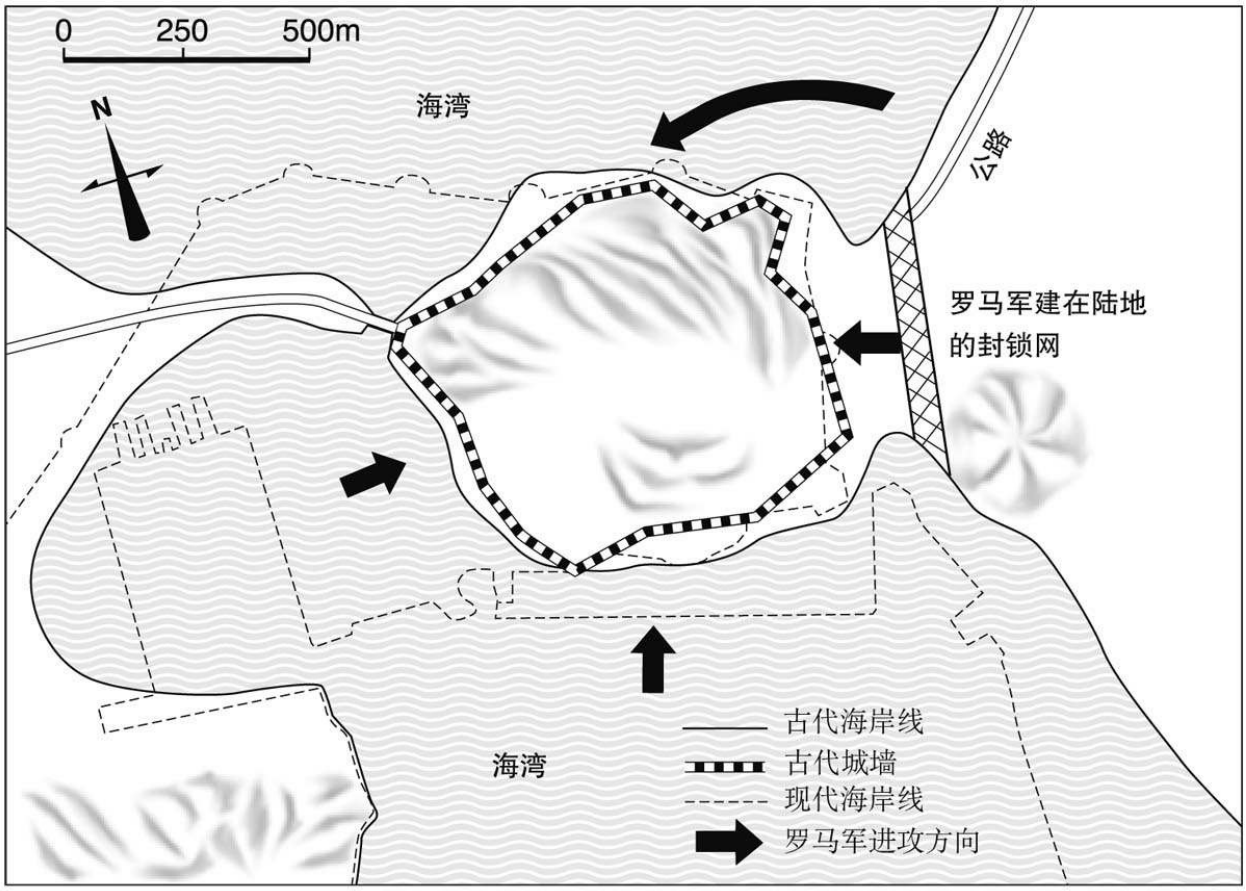
迦太基的一支军队距离卡塔赫纳只有10天的行程。未满26岁的西庇阿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他的战略意图，这取决于他的行动是否足够迅速。

当时的卡塔赫纳被称做“新迦太基”，它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死后由其女婿哈斯德鲁鲍尔，于公元前228年作为迦太基殖民地西班牙的首都建起来的。这座海港城市有效利用了周围达4公里的海角。西南两侧面海，北侧是一个海湾，只有东侧与陆地相连。在西班牙开采的矿产及农耕作物都先集中到卡塔赫纳，而后从海路运往迦太基国内。这里同时也是汉尼拔一家越冬的地方。在城墙环绕的海角一端，有一座极尽奢华的城堡，令其周围其他景象黯然失色。汉尼拔从19岁开始直到进攻意大利，在这座城堡内度过了10年的时光。对汉尼拔一家来说，他们的家就在这里，而不是迦太基国内。卡塔赫纳有4000名士兵防守。只留下4000名士兵防守是因为这里三面临海，曾经在战斗中一直占优势的科尔涅利乌斯兄弟俩都未敢尝试攻打卡塔赫纳。

结束了一天的行军后，按规定，罗马士兵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依照规矩搭建宿营地。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卡塔赫纳守兵看到敌军突然出现在城下，虽然很惊慌，但由于此时已日近黄昏，而略感心安。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军队一定会首先搭建宿营地。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西庇阿一到卡塔赫纳所在的海角入口，未给全军休息的时间，马上

就在海角东面，与城墙平行布下了一个长方形阵地，然后才开始搭建宿营地。此时，率领战船北上的雷利乌斯也已经完成对卡塔赫纳西南两侧的海上封锁。只剩下位于海角北面尚无罗马军队出现。这里是一个海湾，非常开阔。城内的守兵认为自己无法从这里逃走，敌人也不可能从这里攻过来。但是，西庇阿不这样想。



卡塔赫纳（新迦太基）（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第二天一早，在海角的东面，常规的攻防战开始了。防守的迦太基方面认为罗马军队只能从这个方向攻过来。因此，把所有战斗力都投入到了东面的防御阵地上。隔着城墙的攻防战未决出胜负，下午战斗继续进行。

就在卡塔赫纳东侧的战斗展开之际，指挥官西庇阿亲自率领2000名事先挑选出来的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海角的北面。直到海湾出现在眼前，这位年轻的统帅才向士兵们说明了自己的作战意图——通过这个海湾，翻过北面防守薄弱的城墙，进入到卡塔赫纳。

他对士兵们说，昨晚海神波塞冬站在自己的床头，告诉自己如何通

过眼前的海湾。所以，就让我们按神的指示去做吧。实际上，这个战术是他经过周密调查之后制订的。

这位26岁的年轻指挥官从收集到的情报中获悉涨满卡塔赫纳北侧海湾的海水，因所处位置的原因，与潮水涨落无关，但与风向有关。不同的风向，会引起海湾内的海水深度发生变化。风向合适，走过海湾也完全可能。这天下午，海湾内的海水深度极浅，只有20厘米左右。

奇袭获得了成功。防守的迦太基士兵没有料到罗马军队会从海湾方向攻过来，彻底溃败下来。东面城墙也很快被攻破。看到蜂拥而入的罗马军队，困守在山丘上城堡内的守军，忘记了战斗，只好投降。

仅一天时间，西庇阿就攻克了敌人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这座连接迦太基国内的要塞城市。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闪击战，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根本来不及赶回来增援。

通过这场战斗的胜利，这位年轻人使罗马完全恢复了两年前因其父亲和叔叔失败而失去的在西班牙的势力。虽然攻占敌人根据地很难，但是要保持这一成果更是难上加难。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三支军队还在，这位是年26岁的罗马统帅不能有一点点闪失。

来到西班牙，通过收集情报，西庇阿知道了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采用高压手段，就是用金币争取合作。当然，汉尼拔在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过。他是迦太基人，又不是迦太基人。与亚历山大一样，既是希腊人又不是普通的希腊人。但是，包括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在内，其余的迦太基人只是迦太基人。

西庇阿决定一改迦太基人的做法，对原住民采用怀柔政策。这也符合他的性格。

卡塔赫纳沦陷后，根据古代攻城战的惯例，人和财产都归胜利者所

有。西庇阿下令居民交出所有财产，物品分给罗马军队的士兵。这个城市是迦太基军队在西班牙的武器库和金库。以600塔兰特金币为代表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归罗马国有，将来可以用作军费。

西庇阿还把投降的守兵和全体居民集中起来分成三组，分别是男人组、匠人组和妇女儿童组。妇女儿童当即可以回家，无须赎金，也不必为奴。他的这一处置，赢得了人们的感激。

他从男人组中只挑选年龄合适、体格健壮的人，要求他们作为罗马战船的划桨手，服务于罗马军队。同时，他向他们承诺把迦太基军赶出西班牙的那一天，他们就可以回家。老年人当时就可以回家。

匠人组据说有2000人之多。西庇阿要求他们作为罗马军队的工兵，为罗马军服务。当然，在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也将从这项工作中解放出来。作为俘虏，送往罗马的只有城内迦太基人中的有权有势者。

迦太基军队为了确保在当地雇用的西班牙土著部族的忠诚，在卡塔赫纳扣押了约300名人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酋长的儿子或女儿。西庇阿一个个抚摸着这些孩子的脑袋，让他们给自己的父母写信，请求父母和罗马建立同盟关系。他还说，自己一定会送他们回到各自的父母身边。人质中还有不少酋长的母亲，西庇阿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些金银首饰送给她们。

城里有一位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非常引人注目。城里的长老们感谢西庇阿的仁厚，尽管这个姑娘已有婚约，还是要把她送给西庇阿。对此，这位26岁的胜利者微笑着说：

“作为个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礼物了。但是作为战争期间的指挥官，没有比这更令我感到为难的礼物了。”

他让这位姑娘回到了未婚夫的身边，为此，大家感激不尽。如果西

庇阿年已古稀，说这番话另当别论，可他恰逢盛年，只是二十几岁。所以，此事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卡塔赫纳，罗马士兵甚至不带武器，一个人走在街上也绝对安全。

副将雷利乌斯带着捷报，从海上回了罗马，留下西庇阿继续在卡塔赫纳。他不允许士兵在胜利后胡作非为。因为，没有人知道迦太基的三支军队几时会打过来。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迦太基的三支军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迦太基，甚至可以将在战斗中失利的指挥官处以死刑，这让指挥官们做事非常谨慎，甚至时有消极。当然，根据地在一天的时间内沦陷，这对他们的打击大概也不小吧。西庇阿时刻关注着迦太基三支军队的动向，同时，在所占领的城市里，对海陆军士兵进行他特有的训练。

加上缴获的船，罗马海军的战船由最初的30艘战船，增加到了53艘。划桨手中，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各占一半。对他们的训练就在卡塔赫纳海面上进行。西班牙人非常配合。

在陆地，西庇阿根据自己制订的计划表，按部就班地训练陆军。

第一天，陆军士兵全副武装，跑步6公里。罗马军队有规定，行军时要携带10天的粮食。加上武器，每个人负重达10公斤以上。

第二天，清理和保养武器装备。擦洗干净武器上的脏污，顺便把身体也洗干净。

第三天休息。士兵的行动不受限制。

第四天，用皮带包住刀锋后，用剑或枪进行肉搏战训练，并练习使用投枪。

第五天，按计划表从头来过。总之，西庇阿在胜利后，不给士兵们一醉方休的时间。

与此同时，西庇阿热衷于武器的改良。他把工匠们分成若干小组，每30人一小组，用所谓的流水线作业，制造兵器装备。整座卡塔赫纳城似乎成了一个大型兵工厂。

就在这个时期，西庇阿引进了西班牙原住民使用的双刃短剑，取代之前罗马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单刃长剑。很久以后，这种剑还被叫做“西班牙剑”，后来，成了罗马重装步兵的正式用剑。

从西班牙剑中可以看出，西庇阿改良兵器装备，追求的是更加轻便，在混战中更具攻击性。对西庇阿来说，在数量上，敌人的三支军队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要与他们交锋，无论是行军还是在战斗，都有赖于每个个体士兵的快速进攻。

夏季过去了，西庇阿在卡塔赫纳留下守军后，率领全军，带着人质，渡过埃布罗河，回到了塔拉戈纳。他要在这里为第二年必定会发生的、与迦太基三支军队之间的战斗作好准备。

历史学家李维有过担任阿卡亚同盟军骑兵团团长的经历，很清楚军事方面的事情。他是这样评价西庇阿的：

“他对所作所为都有完美的理论总结。”

攻陷卡塔赫纳的消息使全罗马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汉尼拔没有及时获知这一消息，因为这个时期的汉尼拔，正苦于与罗马的三支军队周旋。

罗马的第一支军队由该年度的执政官、攻陷加普亚的功臣弗拉库斯担任指挥。战场是在卡拉布里亚地区，位于长筒靴指甲盖到脚尖一带。这里完全在汉尼拔的控制之下。他的任务是在卡拉布里亚地区袭扰并牵制仅为一支军队的汉尼拔军队。

第二支军队由另一位当选该年度执政官的费边率领。作为年已六旬

的拖延战倡导者，他的任务是见缝插针地攻打塔兰托。坎尼会战后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个主要城邦国家中，罗马已经收复了加普亚和锡拉库萨，并希望在这一年把塔兰托也收回来。从汉尼拔手中夺回塔兰托，关系到把汉尼拔从普利亚全境赶出去。

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率领第三支军队。任务和前一年一样，紧紧缠住汉尼拔，为费边率领的两个军团攻打塔兰托争取时间。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打的是游击战。总指挥官未换，士兵也和前一年是同一批人。因为他们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

公元前209年，随着春天的来临，汉尼拔离开冬营地卡拉布里亚地区，开始北上。他知道这一年罗马军队的目标是攻占塔兰托。接到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离开卡拉布里亚的消息后，弗拉库斯马上率领两个军团攻入卡拉布里亚地区。因为他们知道，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中，可怕的只有汉尼拔一个人。汉尼拔当然担心自己的根据地卡拉布里亚，但是，塔兰托更令他不安。所以他不能回头。汉尼拔要率军前去增援塔兰托。但是，马尔凯鲁斯的两个军团挡住了他的去路。

与前一年的情形如出一辙，汉尼拔和马尔凯鲁斯之间再次开始了你追我赶的战斗。马尔凯鲁斯的营帐外始终飘扬着红色短衣，它标志着战斗开始。这位61岁的“意大利之剑”执著地纠缠着38岁的迦太基对手，执著地向他挑起战斗。

两人之间的战斗结果是，汉尼拔以3：2占上风。但是，汉尼拔始终无法从战斗中摆脱出来。即使罗马方面在战斗中死伤人数达数千人，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马尔凯鲁斯的营帐外红色短衣还在迎风飘扬。见此情形，汉尼拔不禁仰天长叹：

> 啊，上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家伙了。他好像毫不在意胜负的结果，赢了会继续追击，输了就好像没输似的，还会穷追不舍。

难道我永远也摆脱不掉这个罗马军队中唯一有血性的家伙吗？难道我只能和他进行无谓的战斗吗？他输了不服输，赢了更来劲，难道只是为了寻求战斗的刺激，却不在乎胜负吗？

一天早晨，在马尔凯鲁斯的紧逼之下，汉尼拔不得不迎战。他站在全军将士面前讲话，先是列数了迄今为止的一次次胜利，鼓舞士兵们的士气。最后，又加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敌人还在紧追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看到罗马军队已经摆好的阵势，就像我们看到太阳一定会升起来一样准确。要阻止这个麻烦的家伙继续追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他们狠狠的打击，让他们想追也追不了。

也许士兵们与统帅深有同感，这一天，汉尼拔军队的战斗攻势异常凌厉。而马尔凯鲁斯把全军分为两部分交替作战的战术，在这一天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效果。因此，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汉尼拔的士兵乘着罗马军队交替时出现的混乱，向罗马士兵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罗马士兵一时乱了阵脚。大敌当前很少临阵脱逃的罗马士兵，一哄而散。阵亡者中，罗马市民兵达1400人，加上来自同盟城市的士兵1300人，共计有2700人，其中包括2名将官和4名百人队队长。被敌人夺取的队旗达6面。

马尔凯鲁斯站在逃回宿营地的士兵们面前，说道：

让我们向诸神祈祷，在今天的失败之后为我们带来胜利吧！但是，必须指出，今天的失败，责任在你们，你们因为恐惧而溃逃。如果敌人继续追击，你们是不是还打算丢弃这个宿营地而逃走？

你们今天的表现算什么！惊慌失措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敌人就是去年夏天你们一次次追击的敌人。他们并没有变。难道你们忘

了，你们曾经不分昼夜，不停地追击，又在战斗中一次次地打败了他们吗？可是今天，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让你们懂得羞耻，这过分吗？我从去年一直带着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着和去年同样的士兵说这样的话。难道你们身体没变，手中的武器没变，精神上却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吗？

这10年来，被汉尼拔杀死的罗马士兵的尸体足以堆积成山，他为此而自豪。尽管如此，罗马士兵从来没有在他面前仓皇而逃过。然而今天，你们让汉尼拔再次引以为傲，是你们成全了他第一次让罗马军队溃不成军。

士兵们垂头丧气地听着他训话。这时，有人说话了：

前执政官，今天的事情我们无话可说，您就看我们明天的表现吧。

听罢此话，马尔凯鲁斯说：

那么，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明天一早，我就送你们上战场。是当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全看你们了。

接着，马尔凯鲁斯宣布了处罚决定。被敌人夺走队旗的小队不能吃小麦做的饭，只能吃大麦做的饭。大麦是喂马的饲料。这些队的百人队队长，第二天不得携带挂剑的皮带。这意味着在战斗中，他要一直手持出鞘的剑。惩罚的内容只有这些而已。

最后，马尔凯鲁斯说，明天早上大家要吃饱饭，在今天战败的消息传到首都之前，希望明天胜利的消息早一步送到罗马。

在第二天的战斗中，罗马士兵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激烈

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日落时分，战斗结束。汉尼拔军队战死者8000人，与此相对，罗马军的战死者在3000人以内。但是，罗马军队中伤者很多，以至于无力追赶趁着夜色悄悄离开宿营地的汉尼拔。

马尔凯鲁斯的执著和士兵们的牺牲没有白费。就这样，马尔凯鲁斯用牛皮糖战术阻止汉尼拔前进的时候，费边的两个军团成功攻取了塔兰托。当汉尼拔最终甩掉马尔凯鲁斯，赶到塔兰托的时候，那里已经沦陷。

至此，罗马收复了倒向汉尼拔的意大利南部三大城邦国家。由于塔兰托的沦陷，汉尼拔失去了在普利亚地区的立足之地，被赶进了长筒靴的前端。

由于未能及时提供援助，汉尼拔不得不接受塔兰托沦陷。现在，唯一还在他手中的地方就是卡拉布里亚。他去了那里。然而，在那里等候他的却是卡塔赫纳沦陷的消息。那是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根据地，也是汉尼拔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攻陷了卡塔赫纳的是比他小12岁的罗马将军西庇阿，并且仅仅用一天的时间。在此之前，汉尼拔面对的罗马指挥官们都比他年长。没有史料记载汉尼拔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的。

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的收复塔兰托和攻陷卡塔赫纳这两大战果，不是单纯的军事成果。它们对阻止罗马联盟各加盟城市拒绝提供兵源的多米诺效应，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汉尼拔期待罗马联盟解体的战略基本上已经宣告失败。公元前208年，所有战场的情况与前一年一样，罗马又投入了21个军团。

当选这一年执政官的是“意大利之剑”马尔凯鲁斯、克里斯皮努斯，加上法务官克莱米奈斯，三位指挥官指挥共计六个军团将与汉尼拔对阵。目标是在这一年内，把汉尼拔赶出“长筒靴的指甲盖”，逼他到“长筒靴的脚尖”。

当然，作为杰出的战术家，已经39岁的汉尼拔不会坐等罗马军队来驱赶自己。他要给罗马决定性的一击，以挽回被动的局面。不等春季到来，他就开始了行动。

在最前线越冬后刚回到首都不过数日的马尔凯鲁斯，挡在了北上的汉尼拔军队前面。得知自己当选执政官的消息时，他还在冬营地韦诺萨。

马尔凯鲁斯和汉尼拔之间再一次展开了追逐战，重演追追打打的景象。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一年他不能允许毫无结果的状况再现。

整整两年时间，在对付马尔凯鲁斯的追击战中，汉尼拔军伤亡不断。他的兵力明显减少，又得不到来自本国的增援，所以，汉尼拔考虑如何避开与马尔凯鲁斯的正面交战，用其他方法取胜。

与此同时，马尔凯鲁斯也很迷惘，他不知道今后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地追击下去。这位真正的、斗士中的斗士是年已经62岁。按理，年龄的增长与谨慎是成正比的，却并非人人如此。费边的谨慎来自他的性格，相反，马尔凯鲁斯的个性是果敢而不是谨慎。公元前208年，马尔凯鲁斯已经相当不耐烦了。

公元前209年末的市民大会上，马尔凯鲁斯成了饱受市民们争议的对象。作为指挥官，两年来，虽然不断追击汉尼拔，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使他备受质疑。虽然元老院力挺他，但是，这位62岁的斗士性格固执，他无法忍受市民的谴责，特意赶回首都，就是为了在市民大会上向市民解释要速战速决地完成与汉尼拔之间的战斗有多么困难。

市民接受了他的解释——不但接受了解释，而且选他担任下一年的执政官，把下一年，即公元前208年，对汉尼拔作战战场的指挥权也交给了他。虽然与汉尼拔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马尔凯鲁斯也希望尽早结

束战斗，取得胜利。

实际情况未能如两位指挥官的所愿。公元前208年上半年，意大利战场依旧在汉尼拔和马尔凯鲁斯之间僵持着。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各自心中想结束胶着状态的意愿都变得越来越强烈。

执政官马尔凯鲁斯请求另一位指挥官克里斯皮努斯北上会合，共同与汉尼拔决战。此时，克里斯皮努斯正在攻打汉尼拔的根据地卡拉布里亚地区，他率领所属的两个军团赶来了。两位罗马执政官会合后，向汉尼拔发出了决战声明。

然而，原本一直希望进行决战的汉尼拔却没有应战。罗马军队于是向前步步紧逼，继续挑衅汉尼拔。汉尼拔始终不作回应。

两军阵营中间有一座小山丘，周围是一片森林。此时，这座小山还不属于两军中的任何一方，汉尼拔决定利用上这座小山丘。他让300名努米底亚骑兵，乘着夜色靠近小山，在环绕小山的森林中隐蔽起来。

罗马军队也发现了这座小山丘。为了了解占领这座小山丘是否有价值，他们决定派侦察队前去侦察。两位执政官都坚信决战一定会发生，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同时侦察周边整个区域的地形。于是，他们亲自出马，与侦察队的220名骑兵同行。由于是为决战作侦察，所以，同时叫上了同盟城市军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一同前往。

马尔凯鲁斯离开营地前，叫来副将克劳狄乌斯·尼禄，要求他随时作好准备，一旦得到消息，马上出兵占领小山丘。应该说，几乎出动了所有最高指挥官前去进行侦察，且只带了220名骑兵，这样的做法实在过于轻率。

就在他们登上小山丘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努米底亚的300名骑兵把他们团团围住了。罗马方面的220名骑兵中，有一半是伊特鲁里亚骑

兵，他们最先溃败。整个激战并未持续很久。

马尔凯鲁斯被敌人的枪刺透胸部受伤，从马上掉下来后死了，保护执政官的12名警卫全部阵亡。同盟城市的两位指挥官战死。另一位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身负重伤，马尔凯鲁斯的儿子也负了伤，他们两人一起侥幸逃脱。跟随他们的仅剩下20名骑兵。

汉尼拔早就预料到敌人会进入他的圈套，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方的执政官会在其中。并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尔凯鲁斯。汉尼拔难以置信，他叫手下把马尔凯鲁斯的尸体抬了回来。

39岁的迦太基将军久久伫立在62岁的罗马将军尸体前。他从尸体的手指上取下金戒指，上面刻着眼前这个男人的侧脸，还有他的名字——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毫无疑问，他就是马尔凯鲁斯本人，无论自己是退却时还是进攻时，汉尼拔想，他就是始终缠着自己不放的“意大利之剑”。

马尔凯鲁斯身材高挑，全身没有多余的赘肉。他躺在执政官大红的长披风上，身上还带着简陋的装备。过了许久，汉尼拔按照罗马的方式，郑重其事地火葬了这位敌帅。并用黄金小盒子装上骨灰，让部下给马尔凯鲁斯的儿子送去。

途中，对黄金小盒子产生了非分之想的士兵之间发生了争执。结果骨灰盒掉到地上，摔开了盒子盖。骨灰撒了出来，正赶上一阵风，被吹散了。汉尼拔知道后，只说了一句：“不能埋进坟墓也是他的命。”

现在的韦诺萨城里还有马尔凯鲁斯的墓地，墓地略显古色苍然，墓碑上的文字不是古代的拉丁文，而是现代的意大利文。所谓历史遗迹，好像大多如此。

令汉尼拔头痛不已的人终于死了。但是这一年，汉尼拔依然未能取

得更多的战果。因为，克里斯皮努斯虽然身负重伤，却没有忘记履行执政官的职责。

马尔凯鲁斯的死，使他手下的士兵深受打击。他们就好像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一样，所以，克里斯皮努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这些士兵重新振作起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马尔凯鲁斯的副将尼禄。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马尔凯鲁斯的戒指落入了汉尼拔之手，所以他不敢懈怠此事。因为在罗马，戒指就是个人权力的印章。

他以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的名义，紧急通知罗马所有同盟国，直至每个角落。通报马尔凯鲁斯阵亡的同时，提醒大家，以马尔凯鲁斯的名义发的任何命令都是敌人的圈套。因为行动迅速及时，普利亚地方的城市、乡镇及村庄没有一个中汉尼拔的计。事实上，汉尼拔确实送过盖有马尔凯鲁斯“印章”的文书，试图不战而取这些城市。

尽管罗马军队失去了马尔凯鲁斯，但是，他们知道汉尼拔的目标是夺取塔兰托。执政官克里斯皮努斯决定放弃追击汉尼拔，把自己所属的两个军团和失去指挥官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到保卫塔兰托上。这一决定非常英明，它迫使汉尼拔到了塔兰托后，不得不放弃强攻，率军折回卡拉布里亚去了。在塔兰托，克里斯皮努斯最终没有熬过重伤而亡。

这一年，两位执政官都死在与汉尼拔的战斗中。为此，罗马不得不提前进行次年执政官的选举。

也在这一年，西班牙战场险象环生。在这个战场上，西庇阿于前一年攻占了迦太基军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迦太基军队发誓报仇雪耻，罗马军队立志乘胜追击，两军都在磨刀霍霍。

第五次战役：维克拉战役

公元前208年，随着春季的到来，西庇阿开始行动了。他命令全军沿海陆两路离开根据地塔拉戈纳，渡过埃布罗河南下，进入卡塔赫纳。在这里，他遣散了被征用的卡塔赫纳划桨手和做兵器的工匠，早于约定的时间让他们回家，因为西庇阿分不出更多的士兵来守卫卡塔赫纳，他把保卫这座城市的任务交给了当地居民。这些当地居民对罗马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西庇阿认为，用人不疑才会取得最大的效果。

这一年，西庇阿虽然无法把手中的兵力分成两路，但采用了两线作战的策略。毕竟，敌军有三支军队，共7.5万人之多。

副将雷利乌斯从罗马回来后，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继续负责海军方面的军事行动。西庇阿给他的任务是，率领战船绕到伊比利亚半岛南侧，牢牢困住汉尼拔在加的斯附近的小弟马可尼的军队。西庇阿自己则率领全体陆军深入内陆，对手是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

哈斯德鲁鲍尔就在距离卡塔赫纳10日行程的维克拉。他在那里坚守，是因为他打算和弟弟马可尼军会合后，与西庇阿一决雌雄。他所处的位置背靠维克拉城，前面有一条河流过，非常适合与正面之敌交战。营地建在离维克拉城不算太远的一座小山丘上。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打来，这个位置都很有利。他一心一意地等着弟弟马可尼军到来，等来的却是在这一年依然准备采用速战速决战术的西庇阿。

西庇阿到后，只看了一眼建在河对岸坚固的敌方营地，立刻知道自己在地势上非常不利。但是，他必须要在敌人会合前，决出胜负。从兵力上来看，哈斯德鲁鲍尔的军队与他率领的罗马军队不相上下。但是，迦太基军队有一些有利因素是罗马军队所不具备的。除了相当于现代战车的大象，他们还有优秀的骑兵。

尽管所处的地势条件不利，兵力也略显劣势，西庇阿却不能不与对方放手一搏。不清楚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沿用了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也是汉尼拔的战术。这时，他的副将雷利乌斯把困守马可尼军队的任务交

给自己部下后也赶来了。西庇阿若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战术，一个心领神会的搭档必不可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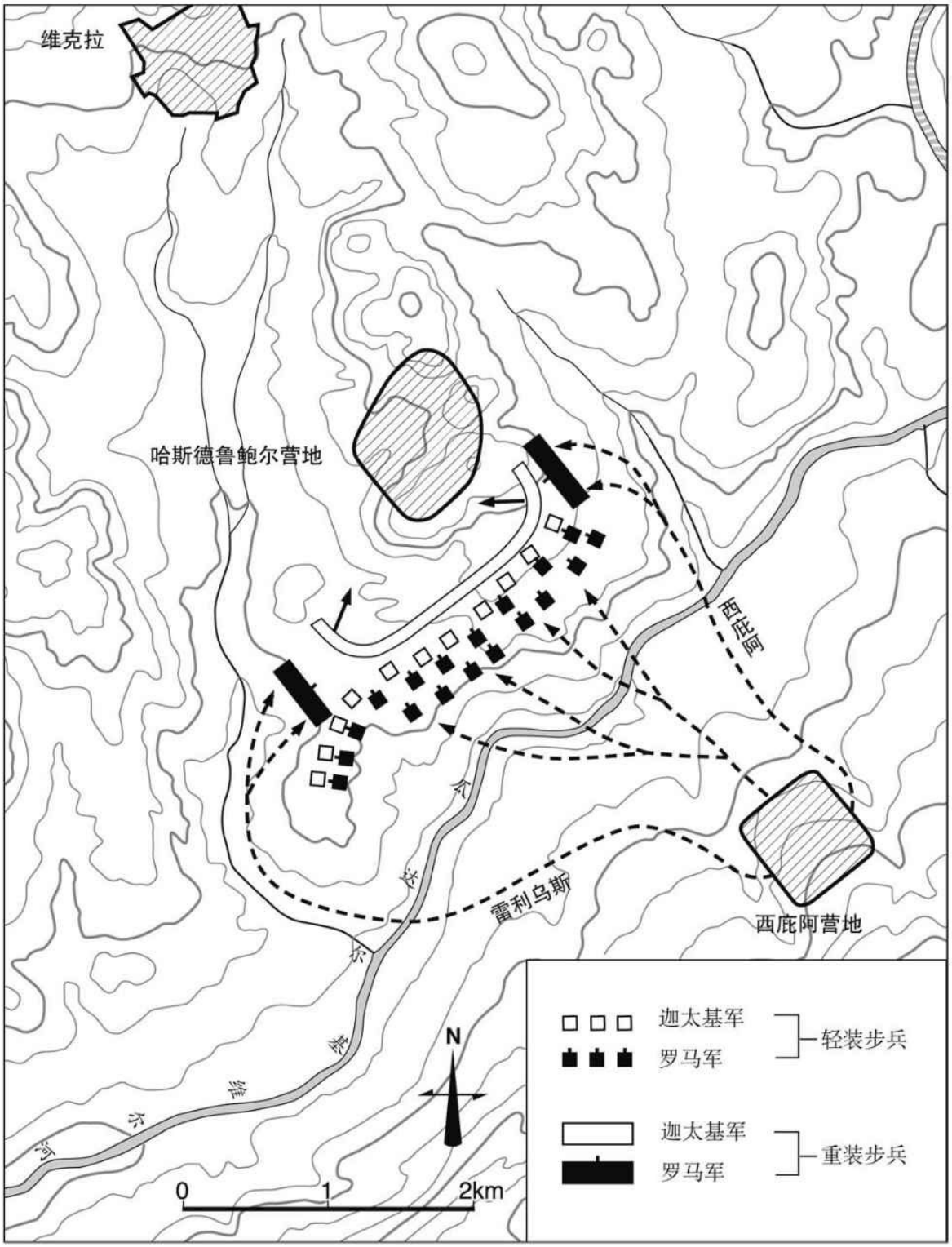
哈斯德鲁鲍尔从未怀疑过马可尼军队的到来，他希望尽可能拖延会战的时间，但是这样一来，他的行动大大地滞后了，西庇阿得到了战役的主动权。

27岁的罗马军队总指挥官命令全体轻装步兵和受感召而自愿加入罗马军队的西班牙部族士兵首先过河，向在开阔地完成布阵的敌军前卫发起进攻。这是诱饵，目的是引诱敌军主力出阵。哈斯德鲁鲍尔上钩了。但是，西庇阿没有给敌军主力在开阔地展开部署的时间。

正在河这边待命的全体重装步兵和骑兵，潮涌似的开始过河。西庇阿指挥右翼，雷利乌斯负责左翼。两支军队绕到了仍在整理阵型的敌军主力侧面。一支军队尚未完成布阵时，指令无法顺利传达。同时受到前方、右侧和左侧三方的进攻，迦太基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彻底崩溃了。背后的营地，在平时起着保护作用。但此时，在一次次发起快攻的罗马军队攻势下，这个营地就像堵在迦太基军后面的一堵墙，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行动。

战斗非常激烈。战斗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西庇阿的手中。作为迦太基军队的象征，象群和优秀的骑兵尚未发挥作用就已经被击垮。西庇阿瓦解敌军的主要战斗力的战术十分奏效。哈斯德鲁鲍尔担心营地被围，导致全军覆没，不得不放弃营地脱离战场，未入维克拉城就逃走了。

这一天的维克拉之战中，迦太基方面战死8000人，被俘1.2万人。西庇阿方面的牺牲微不足道，甚至不值一提。西庇阿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担心途中会遭遇迦太基的另一支军队。他不能犯其父亲和叔叔犯过的同样错误。



维克拉会战（选自LIDDELL HART, “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oileon”）

然而，这成了持不同观点的古今历史学家们或谴责或为西庇阿辩护的由头。

如何处置这1.2万名俘虏？西庇阿面临汉尼拔曾有过的相同问题。首先，西庇阿无偿释放了俘虏中的西班牙人。其次，他把迦太基俘虏送往罗马，在罗马，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被卖身为奴。

俘虏中有一个少年，据说，他出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父母双亡，来西班牙是为了投奔年轻的叔父。一问其叔父的名字，少年回答说是马西尼萨。

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是受雇于迦太基军队的努米底亚骑兵队队长，正是他在三年前伏击西庇阿的父亲，致使他战死沙场。西庇阿问少年想不想回到叔父的身边，少年眼里含着泪，回答说想。

西庇阿让部下给这个少年披上罗马式短衣和带金扣的皮带以及一匹马，又派了一队骑兵，把这个少年送到了他想去的地方。

这位年轻的罗马统帅下的这步棋是其他的罗马指挥官所没有人愿意尝试的。对此，马西尼萨的反应会怎样，此时尚不得而知。

维克拉之战的失败给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带来的打击比上一年更强烈。西庇阿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马可尼和吉斯戈急忙赶到了逃脱的哈斯德鲁鲍尔身边。关于今后的战略，三人展开了讨论。此时，汉尼拔在意大利已经处于守势，那里的情况不容乐观。三个人的讨论结果如下：

哈斯德鲁鲍尔率领3万名精兵，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马可尼军和吉斯戈军合二为一，共同对付西庇阿。

迦太基人一旦作出决定，行动也很迅速。哈斯德鲁鲍尔带领3万名精兵和象队，为了避开西庇阿的追击和在塔拉戈纳的罗马军队的阻拦，

在内陆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后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随后，横穿高卢（现在的法国），翻过阿尔卑斯山，沿汉尼拔走过的同一条路线进入意大利。当然，这一计划已经通知到在意大利的汉尼拔。

哈斯德鲁鲍尔能够成功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这归咎于西庇阿。这成了蒙森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西庇阿的理由。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曾誓死阻止哈斯德鲁鲍尔从西班牙向汉尼拔提供支援，西庇阿却让他得逞了，所以他难辞其咎。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学者中，以战略战术家闻名的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一派则力挺西庇阿。根据这位英国人的说法，如果西庇阿坚持追击哈斯德鲁鲍尔，一定会遭到马可尼和吉斯戈的围攻。所以，放弃追击是不得已的选择。

不管怎样，汉尼拔的二弟就要进入意大利了。得知这一消息，西庇阿马上向罗马派去了急使。接到急报后的元老院，为了迎战胆敢到意大利来的哈斯德鲁鲍尔，决定恢复23个军团。此时，因为罗马军队已经把汉尼拔逼得走投无路，其战斗力早已大为减弱。拖延战的倡导者费边主张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把他困在意大利境内。据说，在他听到“哈斯德鲁鲍尔即将进入意大利”的消息后，不禁怒从心起。这个费边到死都不再信任西庇阿。

话虽如此，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已与汉尼拔进入意大利的公元前218年不同。因为当初通常只有4个军团，所以难免有些惊慌。但是，按照此时的体制，组编23个军团早已不成问题。而且，克劳狄乌斯·尼禄已经当选下一年即公元前207年的执政官，他被认为是马尔凯鲁斯手下最优秀的指挥官，继承了马尔凯鲁斯的主动进攻战术。这一年，作为执政官，尼禄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汉尼拔兄弟会合。

迄今为止，执政官都被送到与汉尼拔作战的最前线，但是公元前207年春天，前方战场由执政官尼禄和法务官弗尔维乌斯负责。另一位执政官李维则被派往里米尼，去阻止哈斯德鲁鲍尔南下。李维只带了两个军团，因为此时元老院还不知道哈斯德鲁鲍尔会走哪条路线前去与他

的哥哥汉尼拔会合。因此，元老院另派了两个军团前往托斯卡纳。南下意大利的另一条路线途经此地。

第六次战役：梅陶罗战役

历史上因为偶然事件使情况发生突变的事例很多。这一年，发生在意大利战场的第一个偶然事件是，哈斯德鲁鲍尔横穿高卢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比预想的要顺利许多。

这一时期生活在现在法国一带的高卢人已经了解汉尼拔兄弟的目标是意大利。既然哈斯德鲁鲍尔对占领自己的地盘没有兴趣，自然他们也不为难迦太基军队通过。甚至还有很多高卢人，作为雇佣兵加入了哈斯德鲁鲍尔所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再加上汉尼拔的名声早已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岳民族中传开。因此，哈斯德鲁鲍尔几乎不必像他的哥哥汉尼拔在11年前那样，不得不面对又不得不解决诸多困难。他唯一的难题只是如何让带着象队的3万名军队越过冬季的阿尔卑斯山。

鉴于上述原因，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的时间远比预计得早很多。这是汉尼拔没有料到的。根据自己的经验，汉尼拔预计弟弟到达意大利的时间还早得很。在与弟弟会合前，为了避免因与罗马军队作战而消耗战斗力，他尽可能地推迟了离开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时间。

当然，推迟出发时间的原因不仅如此。罗马派往意大利南部的军队，加上已在卡拉布里亚的两个军团，共有六个军团。一方面执政官尼禄率领的两个军团，很有可能在路上的某个地方阻截汉尼拔；另一方面，另四个军团完全有可能乘虚而入，在他离开之际攻占卡拉布里亚。汉尼拔没有一个部下可以担负起保卫卡拉布里亚的重任。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要等弟弟来意大利，同时，又担心自己离开后，卡拉布里亚被罗马占领，从而失去最后的根据地。因此，汉尼拔推迟了离开根据地的

时间，也是为使自己尽可能不要远离卡拉布里亚。以后的发展证明，汉尼拔的担心是对的。因为执政官尼禄获悉汉尼拔离开卡拉布里亚后，马上派了两个军团前去攻打。

或许有人会想，既然这样，就在安全的根据地内一心等弟弟来意大利不就行了吗？但是，这样一来，等于帮助罗马军实现阻止兄弟会合的意图。尽管汉尼拔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可是为了尽早与自北南下的弟弟会师，他有必要从意大利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北上。

离开卡拉布里亚后，汉尼拔开始北上。但是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他的身后，尼禄好像阴魂不散的马尔凯鲁斯一样，率领罗马军队一路追踪袭扰。

一母所生的兄弟不一定具备同等的才能。哈斯德鲁鲍尔率领的军队没遇到什么阻碍，顺利进入意大利。整个队伍，加上没有费力就雇到的高卢士兵，共计5万人开始南下。他没有思考如何钻敌人的空当，而是选择了方便行军的平地。

沿着波河周边的原野向里米尼行进的途中，哈斯德鲁鲍尔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哥哥自己的行军路线和预定会合的地点。信交给6名骑兵送去。

这6名迦太基骑兵在寻找汉尼拔的过程中遭遇了一队罗马士兵。罗马士兵把他们抓住后，没收了他们身上的信。信是用希腊语写的，百人队队长看不懂。但是，他的直觉是这封信很重要，否则，哈斯德鲁鲍尔不会派6名骑兵护送。于是，他立刻把信送到了执政官尼禄的手上。

当时，在靠近亚得利亚海海岸的普利亚地区一角，汉尼拔建了一个坚固的营地，准备以静制动。尼禄就在他的营地附近正在建营地。看了紧急翻译过来的信后，尼禄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作为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指挥官，他的这一决定显然是违反规定的。

在罗马，指挥官全权指挥前线的一切行动。按惯例，以执政官为首的每位指挥官，一经选出，便已经决定了各自负责的战区。没有元老院的允许，每位指挥官均不得擅离自己的战区，否则等于擅离职守。

执政官尼禄负责的战区是对阵汉尼拔的战区。他的任务是盯紧汉尼拔，阻止兄弟俩会师。但是，出身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尼禄完全继承了这一家族争强好胜的传统，是速战速决型的将领。此外，他与哈斯德鲁鲍尔之间还有过个人恩怨。

公元前211年，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相继在西班牙战死。为了填补总指挥的空缺，紧急派往西班牙的就是尼禄。哈斯德鲁鲍尔谎称要与尼禄和谈，使尼禄放松了警惕，安全逃脱。因为这件事，尼禄被元老院召回罗马，由年轻的西庇阿接替他去了西班牙。因此，克劳狄乌斯·尼禄认为这是报仇雪耻的好机会，也不难理解。

如果认为尼禄此时擅离职守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这未免冤枉他了。因为从哈斯德鲁鲍尔给他哥哥的信中，尼禄得知哈斯德鲁鲍尔的军队，因高卢兵的加入，已经增加到了5万人。负责迎战哈斯德鲁鲍尔的执政官李维率领的军队只有3万人。所以，尼禄有充分的理由前去支援友军。只不过，他的方式有些不妥，但这是克劳狄乌斯·尼禄的行事风格。

尼禄挑选了年龄合适、体格健壮的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要求他们尽可能轻装上阵，甚至不许带粮食。临出发前，他已经通知行军途中的各同盟城市，准备好一日三餐，在路上等候他们到来。留守营地的部队交给法务官弗尔维乌斯负责。尼禄吩咐他要主动挑起小规模战斗以迷惑汉尼拔，不让他察觉自己不在。为了不引起其他士兵的注意，夜半刚过，他就率领7000名士兵，离开了营地。

这是一次连续的急行军，几乎没有睡眠时间。昼夜行军100公里以上，距离是800公里。通常罗马军队的行军速度是一天20至30公里。尼

禄此次的行军速度纪录直到150年后才被恺撒打破。

从里米尼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约30公里处，有一个始于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出口。通过亚平宁山脉的这条大道到了这一带，感觉变得很开阔。因为，大道南侧有一条河，是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梅陶罗河，该河流域有一片开阔的平原，弗拉米尼亚大道正好通过这片平原。在此出现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着海岸线北上，就可以到达该大道终点里米尼。

被派往里米尼的执政官是李维，他把营地建在梅陶罗河的南岸附近。在这里，无论哈斯德鲁鲍尔沿亚得里亚海南下，还是选择走弗拉米尼亚大道，都在其视线之内可以阻止他。执政官尼禄和7000名士兵到达罗马军队的这一营地时，进入意大利境内的哈斯德鲁鲍尔早已在梅陶罗河北岸建好了宿营地。

假如没看到哈斯德鲁鲍尔写给他哥哥的信，没有人会知道他的意图。但是，尼禄已得知信中的内容。从尼禄的行动中，可以猜想哈斯德鲁鲍尔原打算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由于尼禄率领的7000名士兵的加入，罗马军队一夜之间加强了战斗力。发现这一情况后，哈斯德鲁鲍尔改变了预定的路线，选择走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意大利中部，再从那里直奔意大利南部。这条路线有些绕，却也能到达意大利南部。

哈斯德鲁鲍尔似乎并不知道弗拉米尼亚大道虽然在这一带很平坦，但是进入山区后，一旦遇到敌军，因为带着大象会非常不利。与他的哥哥不同，他似乎并不重视收集情报。

看到敌人的5万大军向弗拉米尼亚大道方向行进，罗马军队马上追了上去，在梅陶罗河口开阔的平原尽头，追上了敌军。哈斯德鲁鲍尔不得不转身应战。尽管罗马军队于一夜之间增加了战斗力，但是，他带领着5万大军，在兵力上依然占优势。

战斗在梅陶罗河以北展开。以与梅陶罗河几乎平行的弗拉米尼亚大

道居中，两边分别是梅陶罗河和靠着大道的山崖。对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这种地形不太有利。

两军分别部署了对决阵型。罗马军队右翼由率领士兵急行军赶来的执政官尼禄指挥，面向河的上游。中央是由里米尼的驻军队长珀尔迪乌斯负责，左翼由执政官李维指挥，全军共4万人。

迦太基军队的阵型是象群在最前面，全军总人数达5.5万人。

战斗在罗马士兵的呐喊声中开始。呐喊声撞击山崖，回声一次比一次大。象群惊慌失措，非但没有冲向敌人阵地，反而转身在自己的军中狂奔乱窜。见此情形，哈斯德鲁鲍尔不得不下令象队撤离战场。骑手们用针扎大象耳朵后面，杀死了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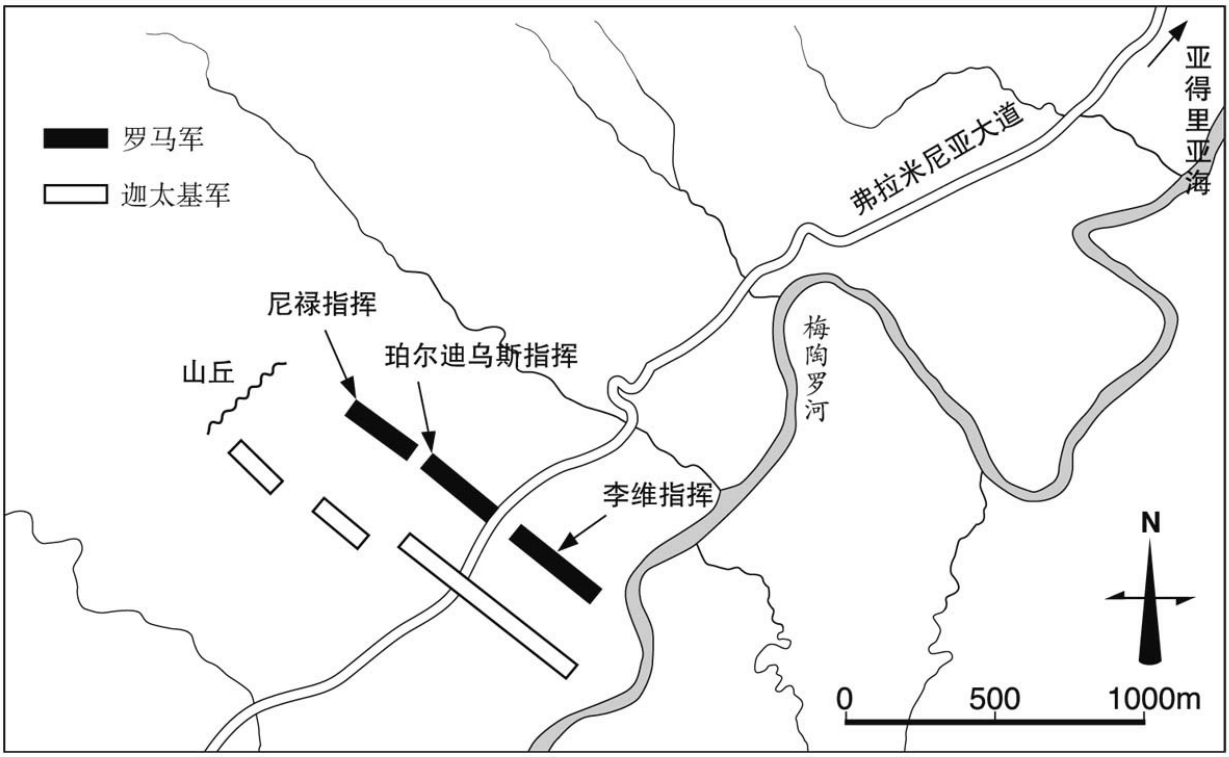
虽然没了大象，但因此卸去重负的迦太基军队开始了总攻。罗马军队右翼因为中间的小山相阻，无法攻打敌人左翼。因此，战斗在罗马军队中央和左翼与迦太基全军之间展开。

如此一来，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罗马军就愈加不利。尼禄认为必须尽快打破这一局面。他当机立断，率领自己指挥的右翼离开战场，从罗马军队的后方，绕到了敌人的右翼。在梅陶罗河岸边，从侧面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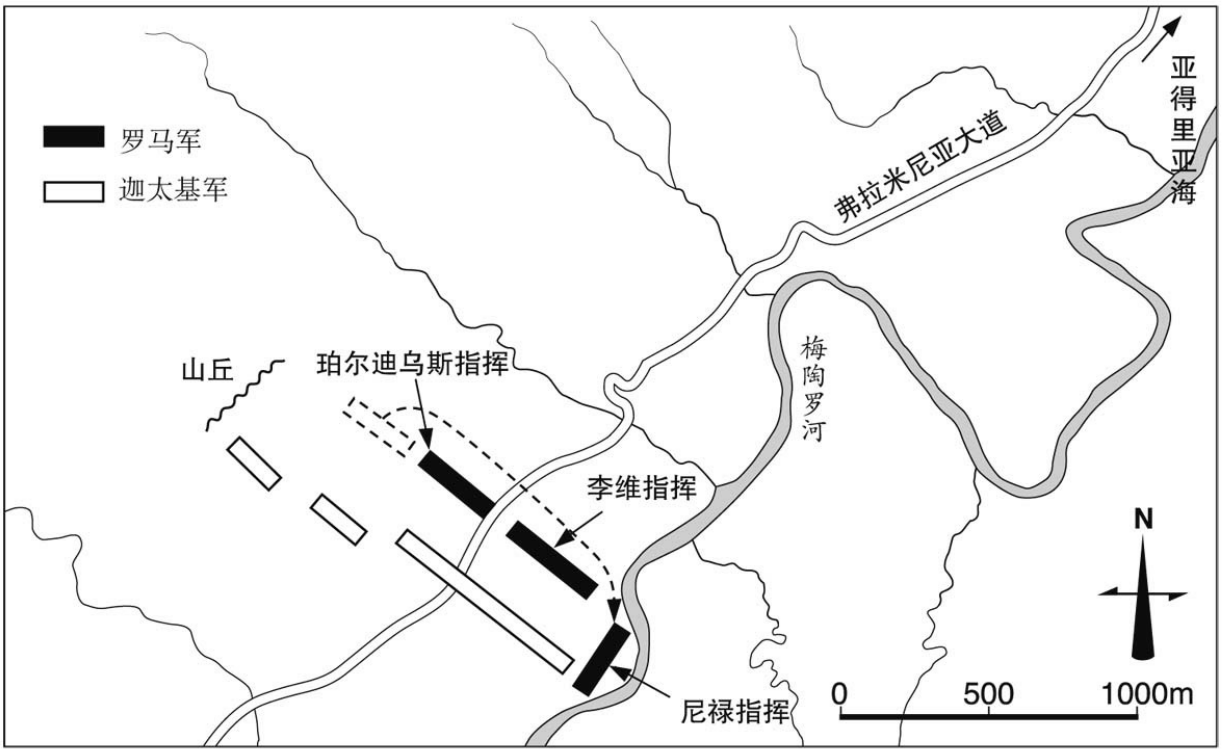
尼禄的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结果。迦太基军队正面和右侧同时受敌，左侧被小山所阻，背后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上坡路。这一处境首先引发了高卢兵的溃逃。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濒临死亡的叫声不绝于耳。哈斯德鲁鲍尔从西班牙带来的3万士兵遭到全歼。在战斗结果已明朗的情况下，哈斯德鲁鲍尔换上迦太基总指挥官的正装，策马闯入敌阵。经过一番激战，最终战死沙场。

历史学家李维这样写道：

作为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鲍尔没有给他们蒙羞。



梅陶罗会战：第一阶段



梅陶罗会战：第二阶段

这一年，汉尼拔40岁。所以他的弟弟哈斯德鲁鲍尔应该只有30多岁。

战役结束后，尼禄把清理战场的事情交给李维，自己带领7000名士兵再次不分昼夜地急行军回到南方。他悄悄离开营地，在梅陶罗河畔与哈斯德鲁鲍尔进行战斗，再急行军回到营地，用去的时间是14天。其间，汉尼拔丝毫也没有察觉他曾经离开过营地。他也不担心弟弟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因为他认为，这个时候，弟弟应该从阿尔卑斯山上往下走了。

汉尼拔是在从环绕营地的栅栏外面扔进来的包裹中，看到哈斯德鲁鲍尔的头颅后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的。这是汉尼拔相隔11年后与弟弟的再相会。

当天夜里，汉尼拔离开营地，回到了卡拉布里亚地区。此时刚刚入夏，所以，这一年的作战期还很长。但是，已经40岁的汉尼拔回到“长筒靴的脚尖”后，再也没有出来。下一年也没有出来。

因梅陶罗之战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罗马，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举行了凯旋仪式。但是，驱赶四匹马拉战车的凯旋将军是执政官李维。因为，战斗是在他负责的战区进行的。执政官尼禄没有因擅离职守被问责，但是，也没有分享到凯旋将军的荣耀。作为右翼指挥官，他只是骑着马跟在四匹马拉的战车后面。罗马市民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凯旋将军，这对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来说已经足够。

第七次战役：伊利帕战役

第二年，即公元前206年，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决定全力反击。

公元前209年，他们的根据地卡塔赫纳被西庇阿攻占。

公元前208年，在维克拉战役中，哈斯德鲁鲍尔败给西庇阿。

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被尼禄打败阵亡。

马可尼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他必须保护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势力。他决定集中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所有力量进行总反攻。为此，他甚至向吉斯戈妥协，把总指挥权让给了他。

总指挥官吉斯戈指挥共计7万名步兵，马可尼指挥总共4000名骑兵中的一半，另一半是努米底亚骑兵，由努米底亚人马西尼萨负责指挥。

这是一支由7.4万名士兵和31头大象组成的大军。他们在西班牙南部的伊利帕（现在的塞维利亚附近）集结，等待敌军的到来。因为兵力

在敌人的两倍以上，所以对迦太基军队来说，战斗更占优势。伊利帕是一片平原，足以让人数众多的大部队、骑兵和大象充分施展身手。

西庇阿对迦太基方面的动向了如指掌。但是，这一年，他并没有急于离开冬营地塔拉戈纳，就好像他故意要给敌人足够的时间，去集合尽可能多的兵力。

西庇阿首先去了卡塔赫纳，在那里稍作停留，然后才进军伊利帕，与严阵以待的敌人交战。西庇阿率领军队离开卡塔赫纳后，先是进入内陆，穿过伊利帕平原。这里有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西庇阿来到上游，沿河南下。选择这样的路线，目的是为了向地处内陆、尚持观望态度的西班牙原住民展示罗马军队的军威。当西班牙原住民意识到获胜的必将是罗马人时，他们纷纷加入罗马的阵营当中。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增加到了拥有4.5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与汉尼拔一样，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主要战斗力，西庇阿同样需要辅助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4.8万人要面对的是7.4万人。除了勇敢战斗，即将迎来29岁的西庇阿还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

西庇阿没有在距离敌人较近的地方建营地。他绕了很大一个圈，绕到南侧后才停止行军，筑建坚固的营地。之所以把营地建在南侧，是因为这里有非常适合建营的小山丘，同时切断了敌人向伊利帕以南的海港城市加的斯逃跑的退路。

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营地分别建在两座小山丘上，它们分别位于伊利帕平原的南端和北侧，中间是开阔的平原。战斗就在这里展开。

迦太基军队迫不及待地进军平原地带，首先排兵布阵。西庇阿也命令全军马上下山布阵。

布阵结束后，迦太基方面却没有发起进攻。西庇阿也未下令进攻。

两军对峙中，太阳开始西斜。好像经过一番激战似的，两军疲惫至极，分别回到各自的营地。

第二天又这样过去了。第三天同样是在对峙中结束。迦太基方面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总指挥官迟迟下不了决心，西庇阿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早已心中有数。

每天在战场上布完阵，等到太阳下山，回到营地。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还在继续。渐渐地，迦太基军队出现在战场上的时间越来越晚。终于，在太阳出来前，战场上再也看不见迦太基士兵的身影。

这天夜里，西庇阿第一次向全军下达命令。他命令所有人明天天亮前吃好早饭，披挂好装备，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迦太基军队看到密密麻麻等候在战场上的罗马军队，大惊失色。在指挥官的催促下，士兵们未吃早餐，匆匆出了营地。因时间太紧，来不及重新布阵，所以，除了象队来不及到最前面，只好部署在两翼外，其余阵型与之前完全一样。但是，罗马军队的阵型变了。

中央稍稍往后是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西班牙士兵，罗马重装步兵作为主要战斗力分列左右两翼，加强两侧的防守来对抗西班牙兵团。

两支军队开始向前，相距800米的时候，双方同时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迦太基方面全线向罗马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但是，罗马军队发起正面进攻的只是中央的西班牙步兵团。分列左右两侧的重装步兵团阵型突然斜向移动，从斜侧面开始攻打敌人的两翼步兵。这就是西庇阿的战术。他让自己最强的战斗力，从既不利于守也不利于攻的斜侧面，攻打敌军最薄弱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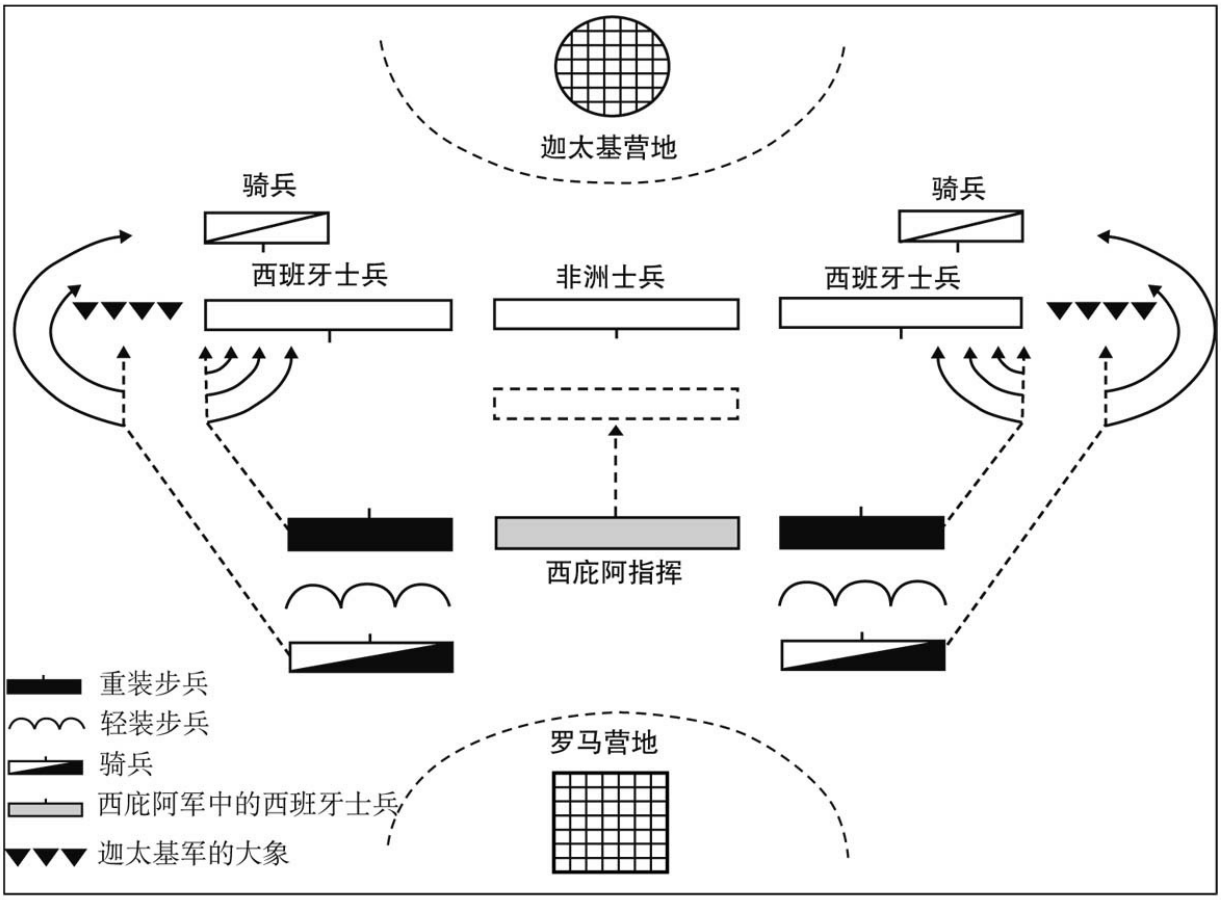
在遭遇罗马军队轻装步兵射出的箭后，迦太基军队的象队不再听骑

手们的指挥。狂怒的象群非但没有冲向敌人，反而在自己的骑兵中间乱窜，妨碍了自己人。

趁着迦太基骑兵因大象乱窜而陷入混乱之际，罗马军队的骑兵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名扬天下的努米底亚骑兵因为诸多的不利因素，无法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威力。一方面，两军在伊利帕战场上的骑兵数量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迦太基骑兵部署在左右两翼步兵团的后面；再加上，这次战斗被罗马军队占了先机。与步兵不同，骑兵只有向敌人发起进攻，才能充分发挥兵马浑然一体的威力。在伊利帕战场，充分发挥了威力的是罗马军队的骑兵。

太阳升高了。站在后方指挥的西庇阿清楚地看到迦太基军队疲态尽显。这时，在罗马军队从外到里，再到中心的连续进攻下，迦太基军队中尚能坚持战斗的只剩下其主力非洲雇佣兵团。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孤军奋战，前方和左右三面还是被敌人包围。这就是成功地瓦解对方主要战斗力的结果。胜败已成定局，但是，没有一个雇佣兵束手就擒。他们开始向唯一没有被围的后方败退。

罗马军队乘胜追击溃败的迦太基军队。但是，很快不得不停止追击。因为突然而至的强雷阵雨阻碍了他们。得以逃进山中的迦太基军队，勉强还剩下6000人。侥幸逃脱的西班牙原住民士兵人数不详。总之，7.4万人就剩下了6000人。



伊利帕会战当天的布阵（西庇阿的战法）（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oileon”）

由于逃亡加的斯的路被切断，总指挥官吉斯戈和汉尼拔的弟弟马可尼向西逃到了遥远的大西洋海岸。只有率领努米底亚骑兵的马西尼萨突破敌方阵营，成功逃到加的斯。除了敌军三名指挥官逃脱，伊利帕战役的结果与坎尼战役的几无二致。虽然死者人数比坎尼战役少一些。因为坎尼战役中，失败方是罗马市民兵居多的罗马军队，是以不向敌人屈服为荣的罗马战士。

战斗胜利后，西庇阿没有离开伊利帕，他只派了哥哥路奇乌斯回罗马送捷报。他并不打算继续追击吉斯戈和马可尼，他有另外的打算。29岁的胜利者派出使者去加的斯找马西尼萨，要求进行会谈。

此时的西庇阿已经到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时的年龄了。他想把战场转移到迦太基在非洲的大本营。

为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强自己的骑兵力量。如果自己的骑兵力量加强了会削弱敌人的骑兵力量，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因此，西庇阿不计前嫌，向昨天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除了向马西尼萨，同时也向努米底亚的另一个国王西法克斯展开了外交攻势。西法克斯和马西尼萨同为努米底亚王室，两人动辄就会出现对立。西法克斯希望直接和西庇阿面谈，所以，西庇阿秘密从西班牙乘船去了相当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领地。西庇阿非常想得到骑兵，而且是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努米底亚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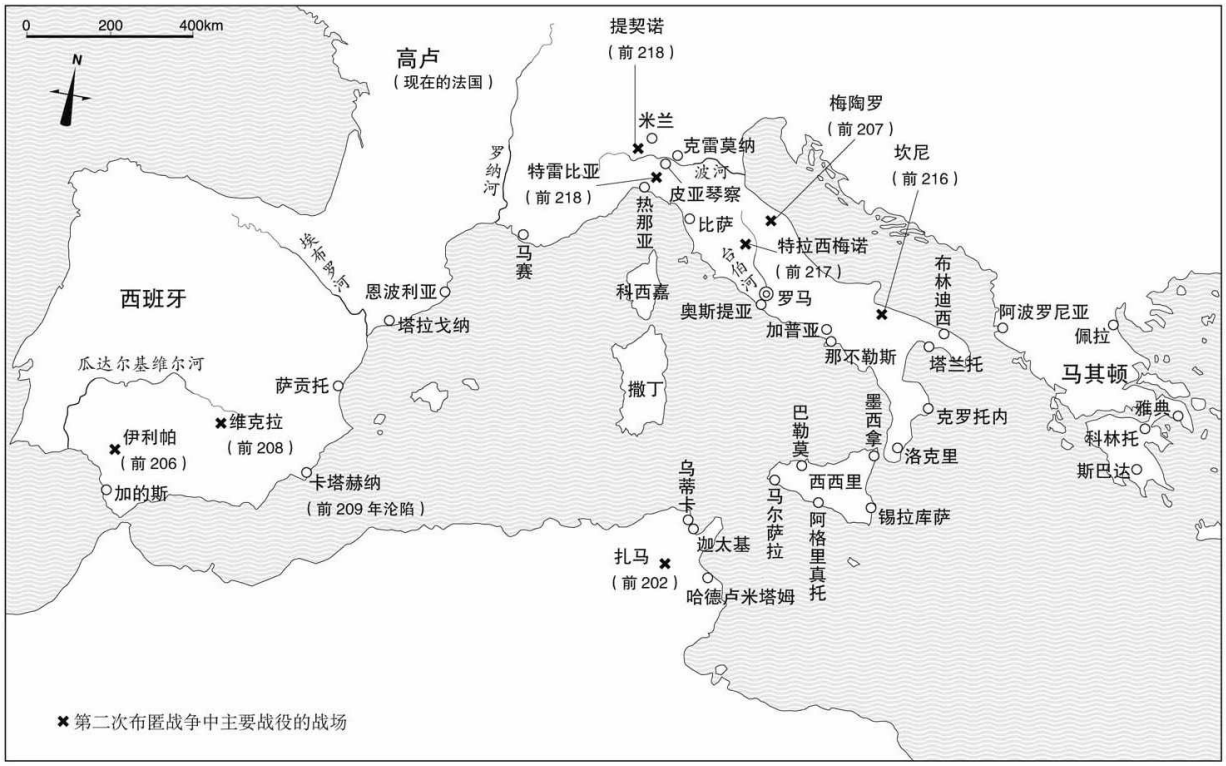
由于一直以来与迦太基的密切关系，努米底亚的两位国王没有马上答复西庇阿。但是，西庇阿建立同盟的牌已经打了出去，接不接这张牌，只能由他们决定。

这一年即公元前206年的冬季，西庇阿在已经到手的西班牙境内留下两个军团守卫，自己带着长期在这里坚持战斗的老兵们，走海路回罗马。他已经四年未回那里了。

第六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

（前205—前201）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地名

罗马是共和政体国家，采用寡头政体，由少数人实施统治。这样的国家既不像君主政体国家，一旦政策定下来就会立刻付诸实施；也不像官僚制度完善的国家，只要事先把相关事情落实好，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付诸实施。共和政体下的罗马有元老院,集中了统治阶层的人。一个人若要让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必须说服元老院同意。为此，在元老院展开辩论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拉丁语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我确信，这是罗马人不得不把辩论当做武器的缘故。战场上擅长运用侧面进攻方式的西庇阿，面对与他一样的罗马精英们，选择的是正面进攻的方法——辩论。他有一个伟大的设想：他要通过汉尼拔战争改变战争策略。

回到罗马后，他首先向元老院申请给予他在元老院汇报战况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西庇阿还不是元老院议员，他距离议员资格年龄30岁还差几个月。获准在元老院汇报战况的西庇阿，在结束西班牙战况的汇报

后，没有要求举行凯旋仪式。

西班牙战场所取得的战果足以让他享受到凯旋将军的荣耀。他的战绩无愧于凯旋将军的称号。但是，罗马是共和政体的罗马。在罗马，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总指挥官资格必须是年龄为40岁以上的执政官、前执政官、法务官或前法务官。西庇阿是破例作为总司令官被派往西班牙的，因为当时他的年龄只有25岁。即使在完成西班牙霸权的现在，他也只有29岁。在这个年龄上要求元老院为他举行凯旋仪式，似乎过于奢望。因为这样，又会成为破例之举。其结果，无疑会极大刺激寡头政体的象征——元老院。因为寡头政体重视论资排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作用。

对罗马将军来说，凯旋仪式是至高荣誉，西庇阿放弃了这一荣誉，取而代之，他要求元老院推荐自己为第二年即公元前205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

执政官的资格年龄是40岁。即使到了第二年，西庇阿也只有30岁，依然差10岁。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因此，他成为元老院议员，罗马元老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推荐他为执政官候选人，元老院表现出非常为难。

但是，元老院会场外面，也就是广场上的情形与此截然相反。虽然没有举行凯旋仪式，但是，全意大利人都知道西庇阿的辉煌战绩。为了在罗马举行的市民大会上投他一票，生活在殖民诸城及同盟各国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纷纷赶到罗马。为此，这一年参加市民大会的人比往年多出许多。罗马的选举方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以组为单位。百人一组，每组一票。市民大会尚未举行，已经有不少“百人组”公开表示，自己这组的票将会投给西庇阿。

元老院很清楚违拗民众的意志不是聪明的做法。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西庇阿的执政官候选人资格。结果，在市民大会上，西庇阿以压倒

多数的票数当选执政官。

但是，在决定新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地时，又出现了波折。西庇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对此，元老院不仅表示为难，甚至明确表示反对。

执政官是共和政体罗马的最高官职，同时也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但是，两位执政官的任地原则上通过抽签决定。但事实上，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所有总司令官，包括两位执政官负责的战场都是由元老院决定的。

原因是战场的选定要根据战略需要，这就要求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市民大会是普通市民参与的大会，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只有元老院具备这种能力。因为这里集中了有从政经验和有过军官经历的人们。

西庇阿请求元老院让自己负责北非战线，这遭到了费边的极力反对。

坎尼会战大败以来，罗马一直采用费边提倡的持久战法。这一年他70岁。从最初被讥讽为“拖延者”，到后来转变为“持久战主义者”，直至最后被尊称为“意大利之盾”的他，在元老院享有不同一般的权威，深受尊敬。罗马元老院有一种制度叫“第一人”制度，意思是有一个人位居其他议员之上，拥有最高发言权。一直以来，费边就是这“第一人”。由于费边的发言，元老院内一场辩论开始了。

广场上，大家都说我反对西庇阿是因为我妒忌这位年轻的将军取得了辉煌战果。我声明，我没有任何理由妒忌比我儿子还要年轻的他。我反对他，完全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

作为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务就应该是赶走长期盘踞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而不是去非洲。尽管他说只要攻打北非，汉尼拔就会撤出意大利。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

费边还举例说明汉尼拔虽然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但是他的危险性丝毫没有减弱。他指出，迦太基国内一次次地尝试向他提供援助，虽然屡遭失败，却始终没有放弃。关于这一点，第二年汉尼拔的小弟马可尼率领增援船队，在罗马的制海权控制之外的热那亚登陆一事可为佐证。可见，老费边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费边接着说：

> 你还年轻，可能不知道。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远征非洲惨遭失败。那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远征非洲的是执政官雷古鲁斯。当时，我们在非洲没有一个同盟国，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观。难道你真的敢说，你不会重蹈雷古鲁斯的覆辙吗？还有，你想过没有，就算如你所愿，汉尼拔离开意大利回到了非洲。到时候他会怎样？在这里，他的所有补给线被我们切断了，还如此顽强。回到他的地盘后，他会得到充分的援助。
>
> 我们抛开年龄大小，让年轻的西庇阿担任执政官，是为了罗马，为了意大利，不是为了帮助他满足他个人的私心。罗马不需要英雄。

事实上，罗马不乏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但是，格拉古和马尔凯鲁斯已经战死沙场，梅陶罗会战的胜利者尼禄没有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留任最前线，已在一年前离开战线，成了一名财务官，虽然有权，却是文官。所以，对元老院来说，同意西庇阿担任执政官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费边说，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他用下面的一句话结束了发言。

> 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恢复意大利的和平。去非洲作战，那是以后的事情。

元老院内，反对西庇阿的气氛本来就很强烈，又因为费边的这一席话就基本定调了。为回应这一情形，西庇阿要求发言。这位年轻人走到议会会场中央，努力控制住激动的声调，斟字酌句、简洁明了地开始阐述自己的意见。

费边·马克西姆斯以及元老院各位议员，首先，我丝毫不相信费边反对我是出于妒忌，而且，我也丝毫没想过要超越他的伟大。

尽管我的年龄还年轻，但是，我参加过的战斗无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迄今为止成功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变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西庇阿说现在正是改变战术的时机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罗马完成了称霸西班牙，西部战场因此得到安定；同时，这一年，罗马和马其顿王国之间也实现了和谈。马其顿直到最后也未能突破罗马实施的封锁战术，非但没有登陆意大利与汉尼拔共同作战，还不得不选择与罗马缔结和约。

与意大利对外战事取得的战果相比，这一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事没有丝毫进展。这样的状况，没办法不受人们的指责。因为元老院把两位执政官都送到了卡拉布里亚地区，却没有啃动汉尼拔一丝一毫。西庇阿继续说：

五年前，就在这里，在元老院，大家都同意我的请求，没有一个人反对派我前往西班牙战场。与那时相比，现在的我又成熟了许多。可是，为什么大家要反对我呢？说实话，那时，我遭遇的困难比现在大多了。父亲和叔叔相继战死沙场，西班牙战线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不仅挽回了颓势，最终还实现了全面称霸西班牙。难道这样的战绩还不能令各位对我充分信任吗？

之前，是迦太基向罗马挑起战端。从今往后，应该由罗马向迦

太基发起进攻。汉尼拔在意大利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罗马人要在非洲统统还给他。攻打敌人大本营的效果如何，汉尼拔已经向我们作出了证明。

如果我们一味等待汉尼拔自我消耗，那么我们究竟要耗到什么时候？要知道他现在只有41岁。

30岁的年轻人又转向70岁的老人，说：

费边·马克西姆斯，正像您曾经忠告过我的一样，早晚我会和汉尼拔交锋。但是，这场交锋，不是在他发动进攻的时候。我要主动出击，引他出击，让他不得不与我展开会战。战场不应该在卡拉布里亚已经毁了一半的城堡，而是在迦太基！

元老院会场内，气氛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呈一边倒的态势。很多议员听了西庇阿的话深有同感，但与费边想法一致的人也依然很多。两种意见人数各占一半。

元老院分裂成两派，不是贵族对平民的两派。因为费边家族和西庇阿所属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都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元老院出现的两派与出身无关，却与年龄相关。上了年纪的人支持费边，年轻的议员们倾向于赞同西庇阿的意见。

上了年纪的人不是因为年岁大才变得固执。如果是普通人，随着生理功能的衰退，或许会出现精神上的动脉硬化现象。但是，曾经有过辉煌业绩的年长者表现出来的固执与此不同。他们之所以变得固执，是因为曾经的辉煌业绩让他们跻身于成功者行列。他们变得固执，不是因为年龄，正是因为成功。因为成功，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当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革的时候，这种自信妨碍了他们选择其他的道路。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革一件事情，只能依靠那些才能出众、且不受曾经的成功羁绊

的人。改革往往由年轻的一代来完成，就是因为他们年纪轻，不会受到已有的成功的羁绊。

在对待汉尼拔的问题上，费边提倡持久战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他是保持罗马不败的最大功臣。正是由于持久的战法，汉尼拔被逼进了“长筒靴的脚尖”。所以，费边反对西庇阿，这完全可以理解。

好在费边和站在他一边的议员们，虽然固执却不缺乏灵活性。他们对现状有充分的认知。就当前的形势而言，他们也感觉有必要设法打破卡拉布里亚地区的胶着状态。最后，双方达成一个折中的意见，既不伤害元老院年长者的体面，又不违背年轻议员们的变革意愿。

西庇阿的任地定在西西里。执政官不宜派往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但是，西西里是罗马的行省，只要不打防御战，作为执政官的任地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西庇阿答应前往西西里的同时，争取到了元老院授予的一个权力——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有必要，第二年可以进军非洲。

只是作为执政官，他必须放弃指挥在首都完成编组的两个军团的指挥权，也就是放弃执政官理应得到的指挥正规军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他有权在西西里招募志愿兵。元老院明确表示：将来西庇阿远征非洲，不是元老院认可的军事行动，一旦远征失败，责任不在元老院，而在他个人。

换做其他人，这样的条件是不会接受的，但是，西庇阿接受了。公元前205年，未等春季来临，这位30岁的执政官就离开罗马，向目的地西西里出发了。同期的执政官李锡尼的任地是卡拉布里亚地区，负责牵制汉尼拔。这一年，罗马投入18个军团的兵力。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2个军团。罗马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投入25个军团。但此时，早已不见往昔的景象。应该说，汉尼拔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的现在，如果决定改变战略，确实是绝好时机。

公元前205年春，这位早早来到任地的年轻执政官，一到西西里，未加休整就开始着手组建军团。

元老院只向他提供招募7000名志愿兵所需的费用。但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取得的战绩、在元老院受到的“冷遇”，都为他招募士兵起到了作用。罗马市民、同盟城邦市民一方面认同他的能力，把打破现状的希望寄托在这位30岁将军的身上，同时对他深表同情。人们纷纷要求加入他的军团。很快，他的身边聚集了6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其中，有不少人是在西班牙一起参加过战斗的回国士兵。

除了志愿兵，很多罗马联盟的加盟城邦提出无偿提供远征非洲所需的物资。以托斯卡纳地区为例，阿雷佐要捐赠小麦和5万杆投枪，沃尔泰拉要提供造船用的木材，塔奎尼亚准备提供全部帆布，皮翁比诺答应提供铁。捐赠物资，可以节省经费，这对西庇阿来说自然求之不得。就这样，西庇阿带着已经招募到的6500名士兵和大量物质，加上30艘战船，来到了西西里。

西西里驻扎着两个军团，士兵的主体是坎尼会战时的幸存者。也许是坎尼会战的失败给他们的惩罚，他们长期驻扎在西西里，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回家。当然，坎尼会战时他们或许曾经是败军，但此时，他们早已不是败军。曾经在马尔凯鲁斯的指挥下，他们参加了攻打锡拉库萨的战斗，不仅一扫失败的沮丧感，而且已经成长为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在被“流放”西西里10年后的这一年，他们迎来了新司令官西庇阿。

西庇阿与他们一样参加了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并从汉尼拔的眼皮底下逃脱了。还有，西庇阿当时新婚妻子的父亲就是坎尼会战时的执政官之一——在会战中英勇捐躯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属于至今仍被叫做“坎尼军团”的这些老战士们，一定怀着别样的心情，迎接年轻的西庇阿的到来。

尽管有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志愿兵，并加上“坎尼军团”的士兵，西庇

阿的兵力依然严重不足。国家不允许他动用国家的经费招募更多的士兵。作为执政官，西庇阿负责西西里战事，兼任西西里行省最高统治者。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这一身份。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除了墨西拿等几个城邦，所有西西里岛上的城邦都成了罗马的行省。锡拉库萨在六年前被马尔凯鲁斯攻陷后，也加入了行省的行列。行省没有自治权，每年要向罗马缴纳收益的十分之一作为租税，为此，不承担提供兵力的义务。但是，由于土地被罗马收归国有后，从事耕作的人们必须支付租地费，向罗马租借耕地。行省的待遇和加盟罗马联盟的同盟城邦不同。

西庇阿把罗马没收的土地还给了西西里行省的居民。不清楚他是把土地还给了所有人，还是只还给了一部分有势力的人。也不清楚他是怎样钻了法律的空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他自作主张对土地进行了处置，但他没有违法。不管怎样，他成功了。他把远比物质利益更大的好处给了西西里人，西西里人不再需要向罗马支付租地费。西西里人为此感激不已。他们自己承担费用，志愿加入军队。就这样，西庇阿招募到了多达2.5万名士兵和1.2万名船员。

但是，他把西西里人的东西归还给西西里人的做法带来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招募到了士兵，不如说是他把西西里全岛变成了自己的后勤补给基地。罗马在非洲没有同盟国，所以要成功实现远征非洲，首先要确保有距离近的补给基地，并要确保该基地与前线之间的补给路线畅通非常重要。

西庇阿没有忘记训练他的军团。由于他的士兵来自意大利各地，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其实就是乌合之众。西庇阿对这样一支新部队组建后展开了训练。与在西班牙曾经实施过的一样，按照日程表，开始了对士兵们的训练。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总司令官西庇阿要求他们都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战士，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30岁的执政官每天和士兵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却没有因此忘记收集有关北非的情报。西西里距离迦太基不远，岛上有不少居民对非洲的情况了解甚多。每天晚上，西庇阿都会向人们了解各种事情。他还让好友同时又是副将的雷利乌斯负责到北非附近直接收集情报。雷利乌斯率领舰队，经常在迦太基以外的北非沿岸游弋。除了收集情报，雷利乌斯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分别与西法克斯和马西尼萨取得联系。因为他们是努米底亚骑兵的主要力量。

西庇阿一心一意作着远征非洲的准备。他是一个善于抓住时机的人，绝不会让机会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这一时期，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同样得到充分发挥。

洛克里是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一个海港城市。迦太基船队曾经钻过罗马海军的空子，偶然有几次在这里靠岸，为汉尼拔提供增援。此时，在内应的策动下，洛克里有可能重新回到罗马一边。西庇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带上3000士兵直奔洛克里。汉尼拔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为时已晚。洛克里相隔10年之后，再次回到了罗马的控制之下。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的汉尼拔的包围圈因此又收紧了许多。

对洛克里进行的闪电战一举成功。但是，西庇阿的行动严重刺激了元老院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罗马，没有元老院的许可，军团指挥官不能擅自把军队带到自己任地以外的地方作战。西庇阿因此受到谴责。元老院非常气愤，甚至准备派遣调查团，对他进行审讯。对此，西庇阿全然不放在心上。另一位执政官李锡尼负责对汉尼拔的战事，他有四个军团，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汉尼拔尽管被逼进了死胡同，但是，迦太基的这只狮子不会给罗马的平庸将军提供任何动手的机会。这让元老院的谴责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第二年即公元前204年春天，西庇阿以前执政官的身份继续行使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他率领全军离开了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尔萨拉。在40艘战船护送下，2.6万名士兵分坐在400艘运输船上，带着足够他们食用

45天的粮食和淡水前往北非。其中前15日的军粮已经做成熟食。

现在，从马尔萨拉到突尼斯，坐船只要8小时即可到达。即使在2200年前的古代，只要遇到顺风，船只航行一昼夜也已足够。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这一海域的制海权一直掌握在罗马手中。但是，风向和制海权无关。西庇阿船队的目标是位于首都迦太基西侧的海角，第二天天亮后，船队已经到了东边突出的海角。也就是说，船队自东向西横越了首都迦太基前面辽阔的海湾，一路平安无事。因为迦太基没有出动舰队试图与他们挑起海战。迦太基人已经很久不曾见过罗马大军，当他们看到罗马大军时，只会表现出惊惶失措。西庇阿和他的军队无视这样的迦太基人，在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附近成功登陆。

但是，来到非洲的西庇阿虽然完成了全军登陆非洲的第一步，但是，等待他的都是些坏消息。

首先，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非但没有接受西庇阿提出的结盟提议，甚至已经投靠迦太基。迦太基通过联姻，成功把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拉到了自己一边。嫁过去的是吉斯戈的女儿。吉斯戈是迦太基武将，在西班牙战场，曾经是西庇阿的手下败将。他的女儿是一位绝世美女，曾经和马西尼萨有婚约。但是，迦太基解除了她与马西尼萨的婚约，让她改嫁西法克斯。

其次，西庇阿对另一位努米底亚人寄予厚望，他就是马西尼萨。但是，马西尼萨在父亲去世后，王位被西法克斯夺走，现在未婚妻也被西法克斯夺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没有王国的国王。

优秀的骑士产地努米底亚分裂出两个王国，实际上却等于一个王国。而且这个王国投靠了迦太基。

马西尼萨只带了200名骑兵出现在西庇阿面前。他看上去依然很精

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沙漠中的一匹狼。他盯着西庇阿的眼睛说：

“两年前，你曾经希望与我缔结同盟。现在我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也许西庇阿在心里感到沮丧，但是脸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与平时一样，他面带微笑，回答说：

“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34岁的努米底亚人和一个31岁的罗马人之间结下了男人的友谊。

西庇阿没有把马西尼萨单纯地看做只是率领200名骑兵的外国人。此后，西庇阿的战略战术都在西庇阿和马西尼萨，加上迄今为止一直与西庇阿并肩作战的雷利乌斯这三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共同战斗中得以实现。这是西庇阿与汉尼拔之间最大的不同，汉尼拔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什么是朋友。

西庇阿曾公开放出豪言：要把汉尼拔在意大利带给意大利人的伤害在非洲还回去。但是，进入非洲后的第一年，与汉尼拔相反，西庇阿战绩平平。攻打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的攻城战也在第40天撤了下来。虽然马西尼萨指挥的骑兵在周边地区极尽烧杀抢掠之举，但是，这些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这一年战绩平平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迦太基，他们几乎没有迎战西庇阿的意愿。除了少部分人，迦太基人并不习惯自己从军。对他们来说，战争只有一次，就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场一个是意大利，还有一个是西班牙。普通的迦太基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因此，对迦太基人来说是幸运的。只是，这样的幸运让迦太基人面临危机时，不能把握实际情况。他们失去了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他们因为罗马军队登陆非洲而大惊失色。为了组建军队迎战西庇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原因也在于此。但是不管怎样，吉斯戈率领的3.3万名雇佣兵组成的迦太基军队和西法克斯率领的6万名努米底亚兵的联军还是组建起来了。当然，时间已经进入到公元前204年秋天将要过去的季节。也就是说，战斗将推迟到下一年进行。

西庇阿在非洲的平平战绩没有过分引起元老院的注意，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事情吸引了元老院的注意力。

迦太基方面认为，由于制海权在罗马手中，受此阻碍向汉尼拔蛰居的意大利南部提供援助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在前一年即公元前205年秋季，迦太基派出援军，在罗马海军监控疏漏的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登陆。这是汉尼拔小弟马可尼率领的一支队伍。有1.4万名士兵以及大象和军粮。公元前204年春天，马可尼开始南下意大利，目的自然是和兄长会合。

元老院获悉这一情况后，与汉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时一样，马上进入临战状态，紧急派遣由一位执政官和两位法务官率领的六个军团北上。但是，公元前204年的这一次和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鲍尔进入意大利的时候不一样了。由于在意大利的迦太基势力已经衰退，高卢人拒绝加入马可尼的军队。马可尼没有如愿加强战斗力，所以，尽管迎战马可尼的罗马三位将领都很平庸，但是他们还是打败了马可尼。这位身负重伤的汉尼拔小弟不得不退回热那亚，从此不再露面。

久居卡拉布里亚地方的汉尼拔也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他没有让罗马军队靠近一步，自己也没有出来一步。

打破双方胶着状态的是非洲战场。

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开启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在公元前218年。这一年，西庇阿17岁。自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0年的8年时间里，战争的

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汉尼拔的手中。公元前210年，西庇阿已经25岁。也就是说，西庇阿和他的副将雷利乌斯这一代人，完全是在汉尼拔的影响下长大的一代。

之前的罗马战士都崇尚公平竞争，他们以公平竞争中取得胜利为自豪。但是，汉尼拔给罗马人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让他们知道了用策略取胜也是胜利，让他们知道了尽管可以坚持公平竞争，但是输了就是输了，说什么也没用。最切身体会到这一点的就是西庇阿这一代罗马人。

罗马军在非洲越冬的营地叫“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源自西庇阿所属家族的名称。与该营地相距10公里的地方，是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冬营地。

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一到，战斗必将如期而至。西庇阿军队有2.6万名士兵，与此相对，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士兵数是9.3万人。已经31岁的罗马新一代指挥官决定好好利用冬季的自然休战期。

西庇阿在称霸西班牙的时候，曾经邀请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和罗马缔结同盟。并且应西法克斯的要求，甚至秘密前往阿尔及利亚与他进行面谈。最后不了了之。现在，西法克斯已经是迦太基方面的人，他就在相距10公里开外的地方。

西庇阿再次与西法克斯取得联系，他暗示说自己希望与迦太基和谈。但是为了顾及名誉，希望努米底亚国王居中协调。

西法克斯上当了。因为新婚妻子的关系，西法克斯投靠了迦太基方面。但是，赶走马西尼萨后，他是全努米底亚的国王。应迦太基要求参加战斗，对现在的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西庇阿邀请他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强国和谈斡旋，让拥有王国和绝世美女妻子的他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西法克斯见过西庇阿派来的使节后，前往相距2公里开外的吉斯戈的冬营地，向他转达了西庇阿的意思。吉斯戈曾经在伊利帕的会战中，与西庇阿交过手，吃了败仗。现在，吉斯戈只是迫于政府的命令，不得不出征。从内心来说，他并不热衷迎战西庇阿。所以，对于西庇阿的提议，他自然乐于接受。于是，西法克斯兴致勃勃地做起了中间人。

努米底亚国王提出了和谈的内容。要求西庇阿撤出非洲，同时，汉尼拔撤离意大利。今后，罗马和迦太基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重建友邦关系。

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不妥。但是，这样的内容对于第一次被罗马军逼近城下的迦太基来说，或许可以接受，却不是罗马能认同的。经过长达15年的战争，罗马一半国土遭到破坏，10万名以上的士兵战死沙场，而且，作为总司令官，执政官级的阵亡者也多达10人。这样的和谈内容，罗马方面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但是，西庇阿没有马上拒绝。他回答西法克斯，说准备派使节进行谈判。

西庇阿派出的使节开始频频往返于努米底亚军的冬营地和科尔涅利乌斯营地之间。西法克斯对西庇阿希望缔结和约的决心深信不疑，对使节全无戒备之心。西庇阿派出的使节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将军，但是，以随从和马倌的身份陪同使节前去的却不是真正的随从和马倌。虽然他们一身奴隶装束，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官就是百人队队长，个个都是历经战场、经验丰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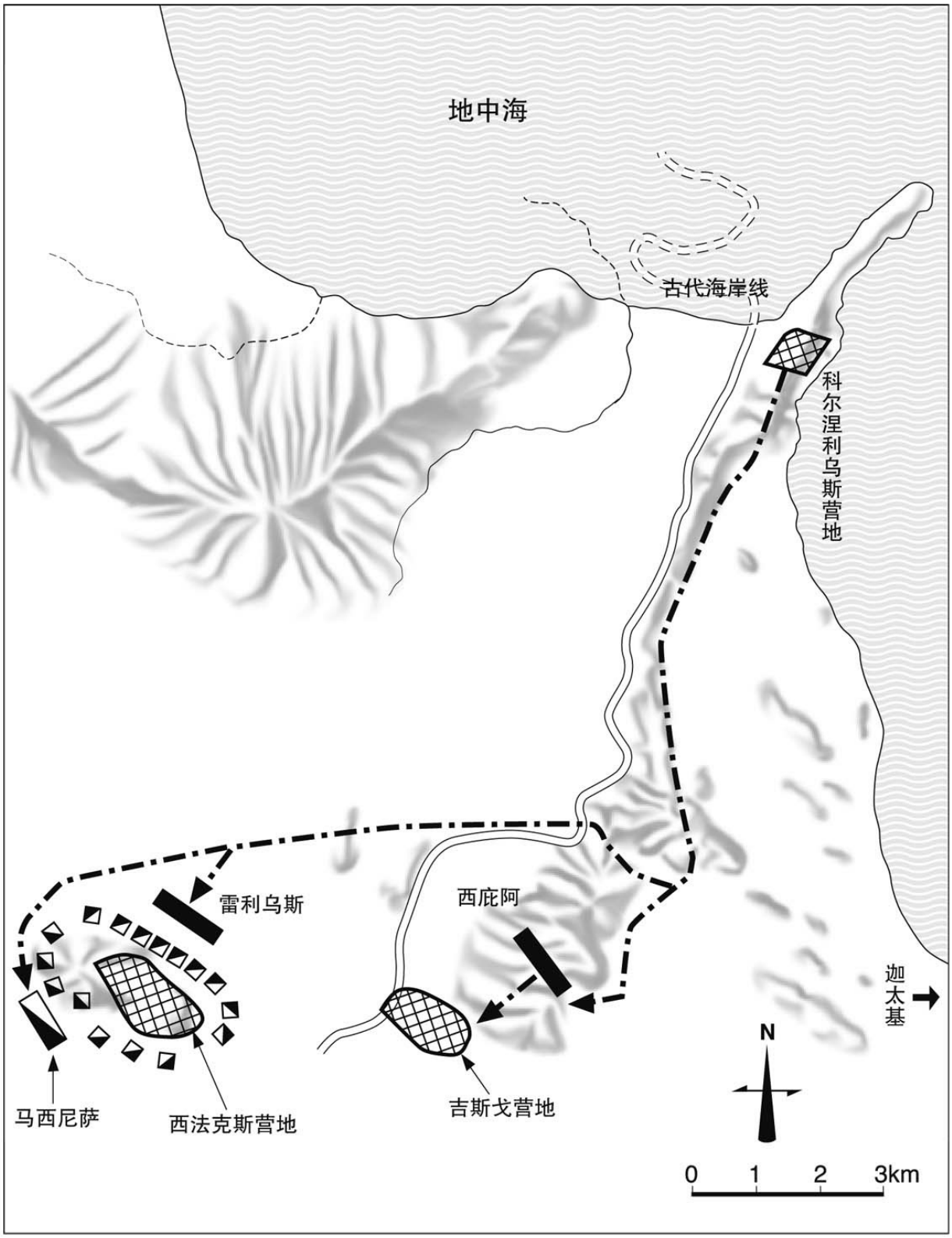
因为西庇阿故意拖延，谈判的过程很长。首先，和谈期间，即使不是自然休战期双方也不能交火。所以，无须担心敌人的进攻。其次，谈判时间越长，使节往返的次数就越多，装扮成随从和马倌的战争经验丰富的战士们对敌人阵地的观察也越准确。在西法克斯的营地，谈判使节一到，直接前往国王的营帐。但是，被认为是奴隶的随从和马倌们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在等待使节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敌人营地内自由行走。

就这样，冬季过去，春季来临的时候，西庇阿已经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派出最后一个使节，带着一封信前去见努米底亚国王。信中写道，自己倾向于同意和谈的内容。但是，由于参加作战会议的大多数将官反对，不得不终止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他在乌蒂卡部署了包围圈，好像与前一年一样，准备再次向乌蒂卡发起进攻。只是，攻打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投入的战斗力只有全部战斗力的三分之一。对此，吉斯戈和西法克斯都没有引起重视。

西庇阿和雷利乌斯加上熟悉地形的马西尼萨三个人共同制订了夜袭计划。除了他们，其他将官接到夜袭通知是在决定实施计划的当天下午。

留在营地守卫的是佯装攻打乌蒂卡的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余兵力分成两支军队：一支由西庇阿亲自率领，夜袭迦太基军营地；另一支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袭击努米底亚营地。

计划是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军队首先发起夜袭的攻击。努米底亚营地使用的材料是木材和芦苇，不是石头或土，非常容易燃烧。双方约定，一旦这边的火点燃，等候在黑夜里的西庇阿军队开始攻打迦太基营地。两个营地之间虽然相距2公里，但是因为是平原，视野非常开阔。



西庇阿突袭（选自LIDDELL HART, “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从日落到第二天日出的夜间，罗马军团把它分成四等分，由四个班的哨兵轮流放哨。哨兵值岗的时间根据季节有所不同，通常是3个小时。所以，夜里的时间不说几点钟，而是说第一岗、第二岗、第三岗和第四岗。实施夜袭的这一天，总司令官西庇阿向参加夜袭的全体指挥官下达命令，要求第一和第二岗换岗之时即夜里9点，在营地外集合好全体士兵。

时间一到，夜袭军就离开了营地。最初，全军一起前进，途中一分为二。经过计算，事先已经知道，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军队抵达努米底亚营地外的时间是第三岗下岗的时间，也就是深夜3点。如期到达敌人营地外的这支军队很快包围了敌营。

带火的箭突然从四面八方落到努米底亚营地，用木材和芦苇建起来的营房眼看着燃烧开来。为了容纳大军，各营房相距很密，几乎没有间隔。如有风助似的，火势很快蔓延开来。努米底亚士兵以为发生了火灾，来不及拿武器就跑出营房，翻过营地的栅栏，纷纷向外逃去，却遭到等候在外面的罗马士兵的迎头痛击。醒悟到敌人来袭的士兵急忙转身回营房，但是，迎接他们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夹在大火和敌人之间的努米底亚士兵，陷入一片混乱，无以形容。相比较死于罗马士兵枪下的人数，被自己人踩踏、挤压致死的人更多。因为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营地里，有6万名士兵。

西庇阿率领的军队看到这边营地的火燃起来的时候，迦太基军营地内的士兵也看到了。他们以为发生了火灾，有人甚至爬上营地的栅栏，向远处眺望。但是很快，带火的箭也落到了这里。

随即，迦太基军营地内出现了和努米底亚军营地几乎相同的情形。因为西庇阿的这次夜袭，迦太基·努米底亚两军加起来共损失了3万人。然而，吉斯戈和西法克斯这两位司令官在部下的掩护下成功逃脱。吉斯

戈逃回了首都迦太基，西法克斯逃回了自己的领地努米底亚。从大火中、从自己人的踩踏中、从罗马士兵的枪下幸运逃脱的士兵四处逃窜。罗马方面没有一个人伤亡。夜袭大获成功。

迦太基在初春时遭遇罗马军队的突然袭击一败涂地，到了春季中期，已经恢复了元气。不仅四散逃窜的残兵回来了，而且，来自西班牙的4000名新雇佣兵也已到达首都的港口，合计兵力达到3万人。他们再次请求努米底亚国王出兵支援。难拒妻子的苦苦哀求，西法克斯再次答应率军加入迦太基方面的战斗。但是，他带的兵力大大减少。

夏初，在靠近努米底亚王国的内陆平原，迦太基军和努米底亚军会合了。两军在努米底亚领地附近会合，是因为西法克斯遭到西庇阿的夜袭，失去众多士兵后，虽然答应参战，却始终拖延出征的时间。再次领命担任迦太基军队指挥的吉斯戈只好用军队迫使他出阵。

获悉敌人会合后，西庇阿没有坐等敌人的进攻。他率领全军，向另一个地方撤去。罗马军队的兵力不及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一半，但是，他决定通过会战一决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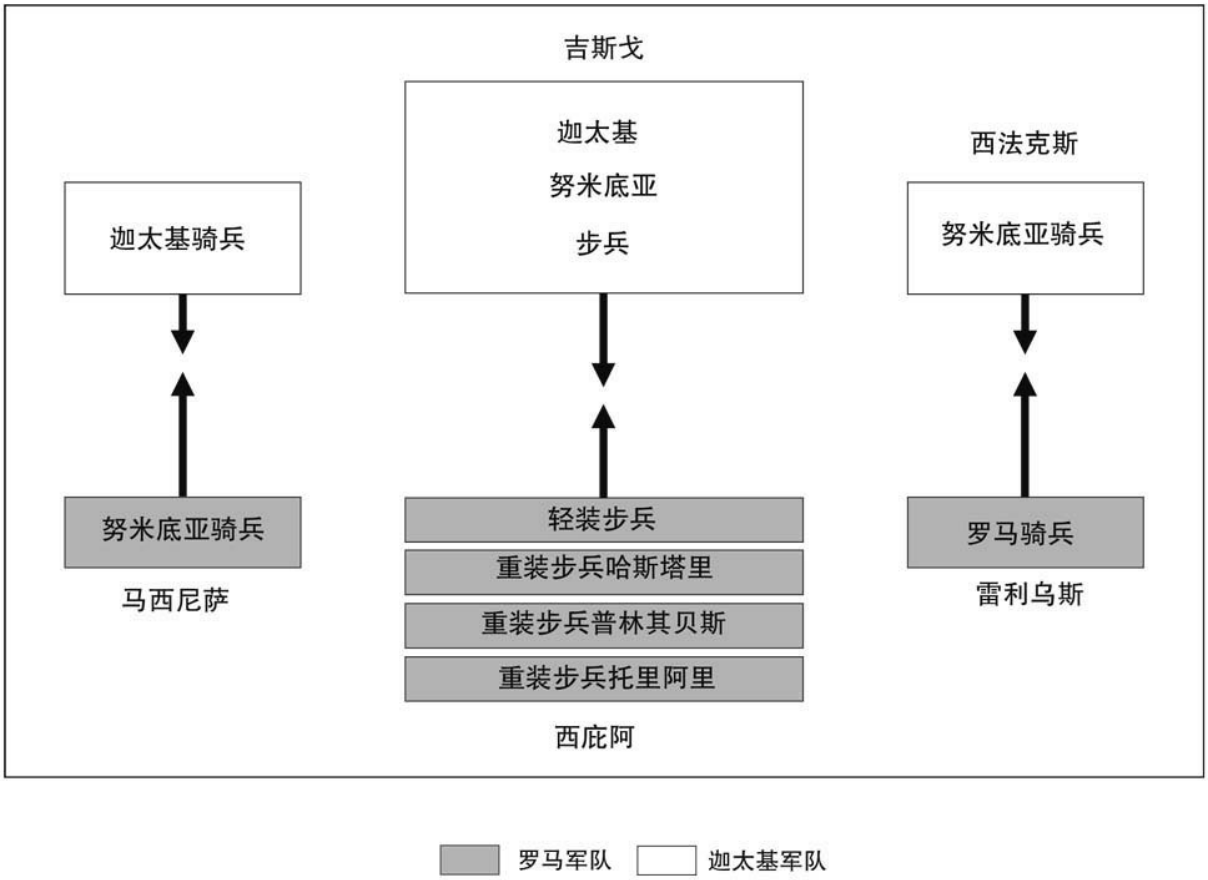
两军布下的阵型看上去都是很常规的阵型。但是，战斗开始后，采用常规战术作战的只有吉斯戈和西法克斯所率的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

根据常规战法，战斗通常始于轻装步兵间展开的激战。但是这一天，是在罗马骑兵的猛烈进攻下开始了战斗。西法克斯率领的努米底亚优秀的骑兵被抢了先机，战斗力大大下降。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却遭到进一步的追击。位于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中央的步兵军团两翼失去了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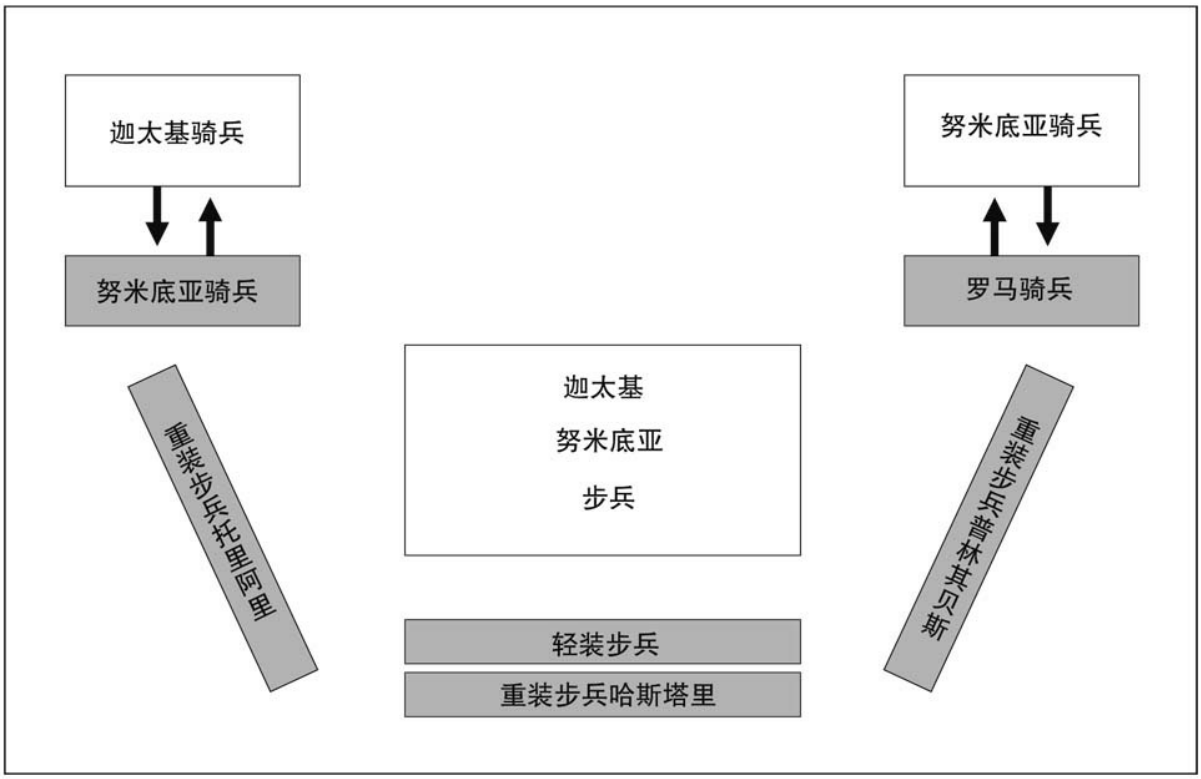
西庇阿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他一声令下，在西西里经过充分训练的步兵们，按照指令，齐刷刷地开始了进攻。

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前卫新兵阻止敌人中央的进攻，与此同时，重装步兵中部的熟练兵绕到敌人步兵右侧，后卫老兵绕到敌人的左侧。敌人步兵三方被围，活动空间不断缩小，难以充分施展拳脚。刚从西班牙来的4000名雇佣兵被全歼。其他步兵中的大多数人战死，战场上堆起了尸山。

但是，迦太基·努米底亚联军的骑兵不愧是优秀的努米底亚骑士。由于骑兵之间始终未能决出胜负，罗马军最终没有实现四面包围的战术。因为有一方未能合围，吉斯戈和西法克斯成功逃出了包围圈。吉斯戈逃回首都迦太基，西法克斯逃回了努米底亚领地内。



会战第一阶段



会战第二阶段

这一天，西庇阿没有停止战斗，他要乘胜追击。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罗马军骑兵追着西法克斯，长驱直入到努米底亚境内，俘虏了努米底亚国王。

根据西庇阿的命令，两人抓住努米底亚国王后，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的脚步。这是实现马西尼萨心愿的一次行动，西庇阿要乘机帮助马西尼萨恢复昔日的努米底亚王国。两人率领骑兵直奔努米底亚王国的首都。看到身带枷锁的西法克斯，首都市民打开了城门。

马西尼萨来到王宫，出现在面前的是西法克斯的王妃——他曾经的未婚妻。马西尼萨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与这位索芙妮丝芭举行了婚礼。他不再是没有王国的国王。

马西尼萨回到营地，西庇阿祝贺他恢复了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不同

意马西尼萨与敌人的妃子结婚。32岁的罗马将军对年长他3岁的努米底亚朋友说：

> 西法克斯没有履行曾经答应我的承诺，投靠了迦太基。因为他的这一罪行，他一定要被送到罗马去。国王成了罗马的战利品，意味着这个国王拥有的一切都是罗马的。我不能答应索芙妮丝芭可以例外，她也必须被送到罗马去。但是，她是你的妻子，你又是我的好友，对她，我实在难以作出这样的处置。

听罢，马西尼萨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西庇阿。他打发一个人带上他写给妻子的信，还有他不离寸步随身携带的毒酒，给他留在努米底亚的新娘送去。信中写道：

> 保护妻子是丈夫的首要责任，但是，这一点我已经无法做到。既然做不到这一点，我只能尽第二项责任，尽量不让妻子落入不幸。为此，我只有利用随信带去的东西。

索芙妮丝芭看完信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接受丈夫给我的结婚礼物，就喝下了毒酒。

为了让沉浸在痛苦中的朋友振作起来，西庇阿在全体士兵面前，宣布马西尼萨已经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国王，今后，努米底亚王国就是罗马的同盟国。他还把执政官的红色帐幕送给了他。这帐幕迄今为止只有他自己使用过。

接到来自西庇阿的报告后，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一致同意西庇阿的意见，庆祝非洲第一个罗马同盟国的诞生。西法克斯被送到罗马后，软禁在意大利的某小城，过起了隐居生活，直至自然死亡。

迦太基在本国境内的第一次会战中吃了败仗，尚不习惯这种事情的

迦太基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制订不出统一的应对策略。

有人主张积极的战术，提出动用舰队攻打罗马战船。

有人主张环绕首都修复城墙，准备守城战。

还有人提出与西庇阿和谈。

此外，把汉尼拔召回国内，与罗马军队一决胜负的呼声也很高。

大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始终不能决定上述几个方案中的一个。结果四种方案同时进行。时间已近秋季。

迦太基派出使节，带着要求立即回国的政府正式文书，紧急前往汉尼拔所在的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和马可尼所在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

与此同时，迦太基向西庇阿也派去使节，表示了和谈的愿望并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西庇阿考虑了一天之后，向使节提了几个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他表示，如果迦太基政府同意，自己会作好和平谈判的准备。西庇阿提出的要求如下：

一、罗马承认迦太基的独立自主和自治权。

二、全体迦太基军队撤离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地区。（意思是汉尼拔兄弟俩都要撤离。）

三、彻底放弃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特权。

四、承认马西尼萨的王国，尊重马西尼萨王国的主权。

五、留下20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

六、和平谈判期间，迦太基负责向在非洲的罗马军队提供军粮。

七、作为赔偿金，向罗马支付5000塔兰特。

从这些条款中可以推断，这个时候的西庇阿应该认真考虑过和迦太基进行和谈的事情。因为他远征非洲的首要目的，就是让汉尼拔离开意大利。战斗，尤其是在平原展开的面对面的会战方式的战斗，无论事先准备得多么周密，战术运用得多么娴熟，说到底还要靠运气。在与汉尼拔的赌局中，没有人愿意下赌。而且，西庇阿不是力主靠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这一点在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证实。他很善于掌握平衡，性格中没有狂信的趋向。

在西庇阿的心中，从来没有复仇的想法。他甚至拉拢杀父仇人马西尼萨成为自己的搭档。另外，他提出的赔偿金5000塔兰特，从购买力上粗略推算，相当于50亿日元。在当时，赔偿金通常以30年或50年为限分期偿还。对于迦太基来说，仅靠本国的农庄经营，一年就有1.2万塔兰特的进账。所以，承担这一金额一定不是难事。问题只有一条，迦太基只能留下20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因为这一条，实质上是要求迦太基解散海军。

我们不清楚迦太基政府对此是如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和、战两手同时进行的迦太基政府接受了所有这些条款。就这样，罗马和迦太基进入了以和谈为前提的休战期。

在意大利的马可尼接到回国命令后，率领全军登船离开热那亚，向迦太基驶去。马可尼在前一年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一直没有治愈。就在南下的船队到达撒丁岛海面的时候，死在了船上。好在失去了总司令官的军队还是顺利进入了迦太基港。

和弟弟一样，汉尼拔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描述他接到命令时内心波动的记录。这一年他已经44岁。自从进入意大利，第

16个年头快要过去了。

因为汉尼拔几乎没有为我们留下他自己的任何逸事，所以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实在无从捕捉他的表情。我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记录，描述这16年里始终不离不弃追随他的士兵们对他的看法。如果一定要说有，也就是在李维的著作中或许可以看到。因为在写到汉尼拔的时候，他参考了与汉尼拔同行的西勒诺斯的记录。它多少让我们有可能想象作为个体的汉尼拔是怎样一个人。把这部分内容直译过来是这样：

> 严寒和酷暑他都默默地承受。餐饮内容和士兵们完全一样，但是，几乎从不按时进食，常常是感觉肚子饿了才想起来吃饭。睡觉也是一样。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堆积如山，总也做不完，为此，他只好牺牲休息时间。对他来说，昼夜毫无意义，睡眠和休息并不意味着柔软的床铺和安静。
>
> 对士兵来说，汉尼拔裹着士兵用的斗篷，在树荫下倒地而卧已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士兵们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地不让武器发出声响。

在离开西班牙之前，汉尼拔与当地一个土著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并生有一子。自从进入意大利以后，他一次也没有碰过女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胜者。不管他愿不愿意，以他这样的身份应该不会缺少女人。

罗马采用切断补给线的战术非常成功。就我们所知，16年里，汉尼拔得到的补给只有两次。那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是怎样解决全军3万人的生存问题的呢？

普利亚地区是富饶的小麦产地，汉尼拔控制这个地方的时候，补给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自从被逼进“长筒靴的脚尖”以后，他又是如何做到让士兵们吃饱饭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迄今尚未有一位历史学

家或学者给出答案。卡拉布里亚地区是个山岳地带，即使在现在，也是意大利土地资源最贫瘠的地方。这个地方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有克罗托内和洛克里等作为贸易港口非常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虽然汉尼拔得到了这些海港城市，由于制海权掌握在罗马海军手中，所以他手中的这些港口毫无军事价值，甚至连出海通商都没有可能。而依靠在这些城市或郊外农村抢掠来长期满足3万人的肚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尽管如此，除了一次有4000名士兵在罗马军队的进攻下投降罗马以外，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人，离开汉尼拔。

他的士兵分别来自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他们语言互不相通。这就是汉尼拔所率领的军队状况。随着罗马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物资严重匮乏时，汉尼拔甚至付不起酬金。作为市民兵，罗马士兵服兵役是尽市民的义务。但是，汉尼拔的士兵与他们不同，都是雇佣兵。司令官付不起工资，雇佣兵离他而去也无可非议。

西庇阿性格开朗，很有亲和力。与他打交道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即使是敌人也不例外。但是，汉尼拔与他不同，一点也不随和，更别说会与士兵们打成一片。

既然如此，在任何时候都不失孤傲的汉尼拔被逼进弹丸之地以后，士兵们依然追随于他，究竟是为什么呢？

也许像马基雅弗利说的那样，一方面可能是慑于他的威严，另一方面，对这位才能卓越却陷于困境的男人，也许有一种谅解的情感。就好像，在他难得的休息时间里，士兵们甚至非常自觉地尽可能不弄出声音，以免打扰到他。

一位领袖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他具备卓越的才能，而是他能让追随者觉得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必不可少。人与人之间能长期维持的关系，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指望会长久。

汉尼拔接到回国命令时就在克罗托内。克罗托内是一个港口城市，向南延伸的一个海角上有一座神殿。这是一座宏伟的神殿，供奉的是这一带希腊族居民信奉的女神赫拉。现在，神殿只剩下一根圆柱，在古代却是一个因漂亮外形而闻名的神殿。以蓝色天空和大海为背景，矗立在海角最前沿的白色神殿，充分展示了这座神殿的建造者——希腊人的审美意识。

接到回国命令后，44岁的迦太基统帅命人在这座神殿祭坛的一面墙上，嵌入一块刻有文字的铜板。

铜板上记录了汉尼拔离开西班牙以后的所有战果。生活在后世的我们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离开西班牙时率领的士兵人数，以及渡过罗纳河时的兵力和成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时候的兵力，得益于50年后来到这里，看到了刻在铜板上的文字的历史学家李维的叙述。罗马人对汉尼拔留下的这些东西一定恨之入骨，但是，直到50年后，这块铜板依然完好无损。这让人不免觉得罗马人很有意思。但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刻在铜板上的文字种类。

根据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铜板分左右两个部分，刻在两边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一边是用迦太基语言文字刻的，即腓尼基语，另一边是用希腊语言文字刻的。所以，对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来说，读懂这些内容没有任何障碍。那么，汉尼拔为什么要用两种文字刻呢？而且，其中的一种文字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

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学者发现，在通称为“罗塞塔石碑”的上面，刻有埃及象形文字、埃及通用文字以及希腊语三种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它为我们解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块非常有名的“罗塞塔石碑”建于公元前196年。汉尼拔用腓尼基语和希腊语刻下自己战果的时间是公元前203年。两者相距只有7年。

分别用象形文字、通用文字和希腊语把文章刻在“罗塞塔石碑”上，

并不是为了帮助后人解读象形文字。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当时的希腊语就相当于现代的英语。

罗马人让自己的子弟把希腊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并不是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被征服的希腊人垄断了文化领域，而是因为罗马人的双语倾向非常强烈。即使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已经完全成为后世欧洲语言的典范，这种倾向也丝毫没有减弱。当时，他们是世界的统治者。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强迫希腊语范围内的被征服民族学习拉丁语，相反，自己很热衷于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希腊语。

让我们再回到汉尼拔的时代。皮克托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曾经写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争史，罗马人称“汉尼拔战争”。由于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称得上是同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罗马人写的最早的历史书。但是，他没有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拉丁语来写，他用的是希腊语，就好像日本学者用英语发表论文一样。

汉尼拔尚未完成打垮罗马的伟大理想，就不得不离开意大利。用腓尼基语和使用范围大得多的希腊语把自己的战绩同时刻在铜板上，难道不是因为他希望为后世留下他从29岁直到44岁之间的经历吗？这样一想，尽管现在这块碑文早已不见踪迹，我们似乎有可能从中推测汉尼拔内心的想法。

汉尼拔决定只带1.5万名士兵回迦太基。他从西班牙带来的士兵是2.6万名。在意大利16年的战斗中，只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是一定要带回去的。另外7000人是意大利南部的士兵，在他手下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1.5万人都是精兵，是汉尼拔信得过的士兵。

余下的士兵担心罗马军队报复，要求同行，遭到汉尼拔的断然拒绝。很多人甚至紧抓着船帮坚持上船。为此，汉尼拔命令船上的士兵们举起手中的箭射向他们。

船队离开克罗托内港，向迦太基驶去。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从船上清楚地看到矗立在海角前端的白色大神殿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没有史料记载快满45岁的汉尼拔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遥望这座神殿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看。

汉尼拔兄弟俩离开意大利的消息分别从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同时送到了首都罗马，整个罗马为此沉浸在异常喜悦的气氛中。所有神殿挤满了前来向诸神表示感谢的人们。元老院议员们纷纷前往费边·马克西姆斯家，共同庆贺。

这位用持久战法支撑罗马度过最艰难时期的老将，在获悉汉尼拔撤离的一个月后，就像蜡烛燃尽了一样离开了人世，享年72岁。

扎马战役——第八次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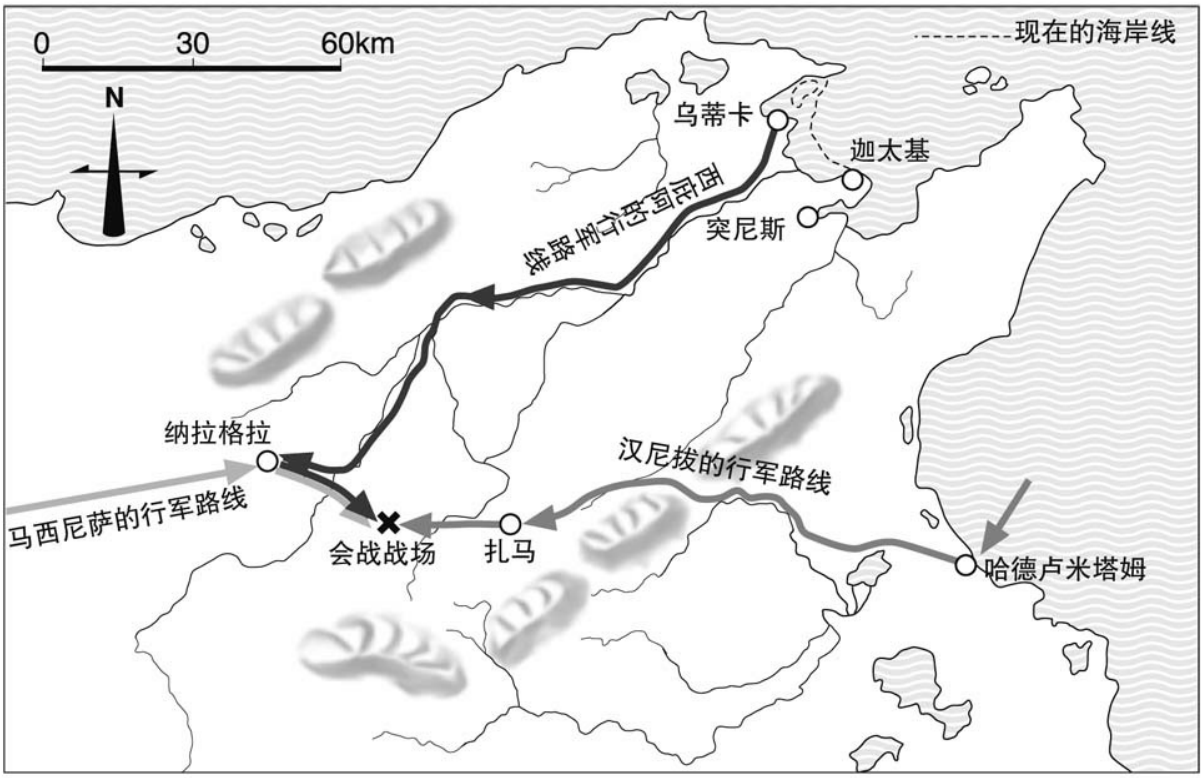
西庇阿提出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和谈内容，在罗马得到了元老院和市民大会的认可，只等迦太基长老会会议同意即可实现。其间，西庇阿遵守和谈期间休战的规定，没有发起军事行动。

但是，休战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罗马一支船队从撒丁岛出发，给西庇阿运送补给的途中，遭遇了暴风雨。为了避难，停靠在距离首都迦太基40公里开外的海岸。迦太基人乘机挟持了这支船队，并把船只拖到首都迦太基的港口内。得知这一消息后，西庇阿马上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归还船队。对于西庇阿的这一要求，迦太基长老会大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就在这时，汉尼拔抵达迦太基的消息传到了长老会大会上。

为了避开罗马军队的阻挠，汉尼拔选择了在南部的哈德卢米塔姆登陆。这里距迦太基很远。同一时期，马可尼的军队回到了首都迦太基港。

这让迦太基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长老会大会决定无视西庇阿的抗议和要求。当然也没有人再提和谈的事情。这样一来，西庇阿只好准备重开战事。

正在哈德卢米塔姆越冬的汉尼拔迎来了来自首都的马可尼军队。冬季过后，第二年即公元前202年春季，聚集在汉尼拔手下的战斗力增加到了步兵4.6万人，骑兵4000人以及80头大象。无疑这是一支大军。正像费边担心的那样，回到国内后的汉尼拔得到了充分的补充。



迦太基周边图（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但是，汉尼拔本人并不满足，因为骑兵战斗力太弱。不仅人数少，质量更是难以令他满意。从前，迦太基的骑兵主要来自努米底亚。现在，统治努米底亚绝大部分领地的是马西尼萨，他早已与罗马结成了同盟。因此，汉尼拔不可能请马西尼萨帮忙。不得已，他只好派人前去努

米底亚，请努米底亚前国王西法克斯的儿子带领全体属下骑兵参战。此时，西法克斯的儿子在马西尼萨的追击下，正疲于逃命，他一口答应带2000名骑兵参战。但是他还没有到。

因为汉尼拔回国以及和谈破裂，西庇阿已经作好了与汉尼拔决一胜负的心理准备。他也派人请马西尼萨参战。马西尼萨在罗马军队的协助下，不仅恢复了父亲的王国——努米底亚王国，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蚕食西法克斯的领地。因此，对于西庇阿的请求，他自然是一口答应。他让来人转告西庇阿，自己将带领6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前去支援。但是，加上这1万人，西庇阿的战斗力也不过4万人。况且，马西尼萨也还没有到。

这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即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和西庇阿所处的境况一样。在迎来春季作战期的同时，都在等待援军的到来。这就可以解释他们的行军路线之所以不合常理的原因了。

笼统地说，西庇阿的大本营科尔涅利乌斯营地和汉尼拔的越冬地哈德卢米塔姆分别处于三角形的两个顶点。如果纯粹为了与敌交战，两军应该相向而行，然后在连接这两点的三角形的这条边上某个位置相遇。然而，西庇阿和汉尼拔没有相向而行，都选择进军三角形的最后一个顶点。当然，从地形上来看，双方都是沿河流向上游而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理由不仅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两人都希望尽可能靠近努米底亚领地。目的当然是尽早与援军会合。

从行军的速度来看，汉尼拔军相对较慢，因为他的军队不仅士兵多，还带着大象。西庇阿军队的行军速度较快，一方面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只有汉尼拔军的一半，另一方面，西庇阿一心要赶在汉尼拔的前面。因为他担心汉尼拔抢先后，会阻止来自努米底亚的马西尼萨。

两军都不是向着目的地一路直行。在行军途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在寻找战机。

迦太基政府一次次地命令汉尼拔，要求他尽快打败西庇阿。对此，汉尼拔回答说：

“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你们决定，但是，靠武力解决的事情，希望全权交给我，由我决定时间、地点和使用的武器。”

关于何时、何地、如何与享有绝世战术家声誉的对手交战的问题，西庇阿大概也在翻来覆去地思考。不管怎样，两人都在不断地思考中一步步向努米底亚靠近。

如果要列举古代5位名将，汉尼拔和西庇阿一定是其中的两位。如果要列举迄今为止历史上的10位优秀将领，他们二人无疑也会位列其中。虽然历史造就了无数优秀的武将，但是，发生在具备同等才能的人之间的会战，却少之又少。这少而又少的事情，就要在扎马战场上演。

汉尼拔到达扎马镇后，得知敌人就在距此向西约百公里的纳拉格拉时，当即派了三名士兵前去侦察。不料这三人被罗马军队抓获，并被带到了罗马军队的营地。他们以为在罗马军营地等待自己的将是死刑或严刑拷问。

西庇阿得知抓获了汉尼拔侦察兵的消息后，下令把他们带上来，和颜悦色地问这三名侦察兵，汉尼拔交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这三人认为反正是死，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侦察敌情。于是，西庇阿叫来一位军官，让他带着这三个人去任何他们希望侦察的地方。

这位军官带着这三个人在营地内四处走动，所有地方都向他们敞开。第二天，他们甚至还看到了马西尼萨带领的努米底亚军在罗马军队士兵的一片欢呼声中到达营地。不仅如此，他们还获知了努米底亚军的人数。

第三天，西庇阿再次叫人带来这三个人，问他们对营地的侦察是否

满意。三个人以为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但还是诚实地回答说如愿看到了一切。不料，西庇阿只说了一句，那就回去向汉尼拔报告这里的一切吧。然后，安排骑兵队把他们护送到回程的途中。

西庇阿

汉尼拔

这三个人回到扎马后，向汉尼拔汇报了这几天的经历。除了有关罗马军队的情况，还报告了西庇阿的言行。汉尼拔默不作声地听完汇报，下令派使节去见西庇阿，要求会谈。

西庇阿答应了会谈，只是要求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由自己决定，定下

来后会派人前去通知。

两军再次出发继续行军。这一次两军是相向而行。当两军的距离缩短到6公里的时候，西庇阿派去使节通知汉尼拔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于是，两军都停止了前进，开始搭建营地。西庇阿的营地建在距离河流较近、便于补充水的地方。与此相对，汉尼拔军的营地建在了远离河流的位置。

第二天，汉尼拔和西庇阿各带一队骑兵离开了各自的营地。西庇阿指定的地点位于两军中间一个低矮的小山上。两支队伍来到半山腰，骑兵们留在这里，只有二将带着翻译继续前行。

具有同等才华的名将交战极为罕见，在交战的前一天，这样的两个人坐在一起会谈，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著作中，参考了与汉尼拔随行的两位记录员写的东西以及与汉尼拔和西庇阿同时代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皮克托写的《战争记》。根据他们的描述，这场历史上罕见的会谈是这样开始并结束的。我几乎全文翻译了波利比乌斯写的这部分内容。因为与李维相比，在波利比乌斯的叙述中，论点条理更清楚。

提出会谈要求的汉尼拔首先发言：

> 最幸福的选择大概是罗马人的手不伸向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迦太基人不走出非洲以外的地方。因为迦太基和罗马之争的起因是西西里，是撒丁岛，是西班牙。
>
>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问题是现在。现在，我们甚至准备赌上自己国家的存亡来决一胜负，这是极其危险的赌局。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停止两国之间的争端。我已经打算这样做了。因为我从自身的经历中，已经学到了命运是怎么回事，它就像对待幼儿一样，可以任意摆弄我们人类。

西庇阿，你还年轻，也许你还不能接受。因为直到今天，在西班牙，在非洲，你还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所以，对你来说，理解起来可能很难。但是，这种事情无须从历史上寻找先例。因为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坎尼会战以后，我曾经是意大利的主人，我甚至逼近过首都罗马。可以说在当时，汉尼拔是决定罗马人生死和罗马国家存亡的法官。但是现在，我回到了非洲，我在与你—— 一个罗马人就救赎迦太基的问题进行会谈。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傲慢的男人。我想说，我们还有将来，虽然将来的事情现在无法预料。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让好事情多一些，坏事情少一些。

面对步步逼近的危险，一个谨慎的人不会选择迎头而上。在你和我的交锋中，即使你赢了，也不会提升你的名气，更不会提高罗马的声誉。相反，如果你输了，不仅西庇阿迄今为止的辉煌战绩一笔勾销，还可能导致你身败名裂。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把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争夺的西西里、撒丁岛及西班牙等所有这些地方都归属罗马，迦太基人发誓绝不再诉诸武力，试图重新夺回这些地方。我相信这样的条件，不仅可以保证迦太基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同时，你和所有罗马人也能享受到极大的荣誉。

汉尼拔说完了，现在轮到比他小12岁的西庇阿开口了：

挑起这场战争的不是罗马人，而是迦太基人。这一事实，汉尼拔，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是诸神在帮助罗马人一步步走向胜利，那一定是诸神知道错在哪方，所以他愿意庇护为保卫自己而奋起的人。

我也知道命运无常。而且，我自以为了解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在罗马进军非洲之前，你主动离开意大利，或者，在我提出的和谈没有破裂之前，你提出这样的建议，也许你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遗憾的是，你离开意大利不是出自你的本意。因为罗马进军非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你不得不撤离意大利。既然这样，和谈条件自然要变。请你不要忘了，在罗马，市民大会已经同意了和谈内容。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迦太基方面的原因，和谈破裂了。

请问，您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做什么？站在我的立场上，请问，您会怎么做？总之，不管您和迦太基政府多么不愿意，都不可能改变我提出的和谈条件。

汉尼拔，您能做的只有好好备战明天的会战。因为迦太基人，尤其是您，实在太不擅长在和平环境中生存了。

两位将领分别从左右两侧下了山。历史上著名的扎马会战将在明天一早开始。

这是一次迦太基对阵罗马的会战，是一次5万大军对阵4万人的会战，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师生之间的第一场交锋。

坎尼会战是战术上的最佳杰作。与坎尼会战不同，那一次罗马人未能通过自己的坚持，决定战役的走向。但是，扎马会战不仅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同时，也将决定地中海世界的未来。

公元前202年，秋日的阳光柔柔地照在扎马和纳拉格拉之间开阔的平原上。两军分别在这里摆下了阵型。

迦太基军队的总指挥是汉尼拔，战斗力为步兵4.6万人，骑兵4000人，合计5万人。此外，还有80头大象。西法克斯的儿子答应带2000名努米底亚骑兵参战，此时，还没有抵达。

罗马军队由西庇阿担任总指挥，雷利乌斯负责左翼，马西尼萨负责右翼。加上马西尼萨带来的努米底亚士兵，战斗力为步兵3.4万人，骑兵6000人，合计4万人。

两军的兵力，总体上来说，迦太基军明显占优势。但是，比较骑兵兵力，罗马有6000人，迦太基只有4000人，罗马占优势。从步兵和骑兵的构成比例来看，迦太基军队为11：1，罗马军队为6：1。罗马军队的这一比例构成，打破了罗马军的常规，这不是罗马的风格，应该说是汉尼拔的风格。相反，扎马战役中的迦太基军队，是罗马军队的常规构成比例，不是汉尼拔风格的构成比例。

已经45岁的绝世战术家汉尼拔不可能不注意这一情况。骑兵战斗力机动灵活，在有效利用全军战斗力方面不可或缺。然而，扎马战役时，迦太基军队的骑兵战斗力不足却是现实。这就意味着，汉尼拔在扎马战役中，很难施展他擅长的迄今为止非常有效的战术。

但是尽管如此，汉尼拔还是部署了一位平庸武将做梦也想不到的阵型，希望借此争取战役的胜利。这种阵型让现代战争史学家们不惜溢美之词，盛赞汉尼拔不愧是古代武将中最杰出的战术家。

80头大象部署在战场的最前列。

第二列部署的是由1.2万名步兵组成的混合雇佣兵。

第三列部署的是少数迦太基市民兵和来自非洲及马其顿的1.9万名步兵雇佣兵。步兵团的两翼各有2000名骑兵固防。

在相距200米的后方，部署了从意大利带来的1.5万名亲兵。

我想，汉尼拔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由80头大象发起突然攻击，扰乱敌人中央的步兵团。接着，

投入第二列和第三列雇佣兵团，在敌人因大象突然袭击而惊惶失措之时发起进攻。汉尼拔预计，在这一阶段，两军投入的战斗力应该是，迦太基军队3.1万人，罗马军队3.4万人。这样，即使罗马军队在战斗中暂时占优势，战斗还是有可能坚持一段时间。等到罗马军队的主力部队——重装步兵团在战斗中开始显出疲态，这时，再投入尚未投入战斗的主力，即1.5万人的亲兵，一举夺取战役的胜利。前提是骑兵团虽然不占优势，但是只要他们不离开步兵两侧就可以。

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很难解释汉尼拔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距离战场200米远的后方。既然在扎马战役中，汉尼拔无法依靠骑兵力量来“确保胜利”，那么这个任务就应该交给主力，也就是他的亲兵。也许汉尼拔的想法是，以部署在第二和第三列的雇佣兵为诱饵，拖垮罗马军队，即使遭到全歼，也在所不惜。

如果对手是他迄今为止的会战中遇到过的罗马武将，也许，这一战术会取得成功。但是，他的对手是西庇阿，一个罗马人却又不像罗马人的西庇阿。他利用了迦太基人曾经对罗马人使用过的战术。而且，一个真正优秀的弟子，不会单纯地模仿老师的所有手法，他一定会根据情况进行创新，举一反三，活学活用。

加上努米底亚士兵，罗马军队的步兵有3.4万人。与以往一样，他把这支步兵军团部署在了中央。只是，在扎马，他采用的战术是迄今为止从未尝试过的战术。

罗马军队重装步兵的常规布阵是从前往后依次为新兵、熟练兵和老兵三支纵队。轻装步兵通常部署在最前列，他们或者是不承担重装步兵役义务的、资产较少的市民，或者是第一年服兵役的人。此外，重装步兵三个纵队还要各自分成小队，每小队由60至120个人组成。轻装步兵相当于游击部队，不分小队作战。但是，在扎马战役中，西庇阿把轻装步兵也分成了小队，安插在重装步兵的小队之间。

在以往，罗马军的战斗队列按小队部署，一目了然。但是，在扎马，这一队列看上去就像一条连贯的横线，小队之间没有间隔。虽然因为插入了轻装步兵的小队，使得重装步兵各小队之间的间距加大。但是，由于插入了轻装步兵的小队，敌人在远处很难分辨。

西庇阿还把6000名骑兵分成两部分，部署在阵型的右翼和左翼，分别由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今天的战术就是他们三个人一起研究出来的。西庇阿担任步兵团的指挥。

为了振作士气，两军布好阵后，两位总司令官分别作了动员。

西庇阿的演讲很简单。他引导士兵们回忆起曾经在西班牙和非洲取得的战斗成果。他说，好运在向我们微笑，并说，今天要与之战斗的是希望和我们讲和的敌人。他还特别对坎尼会战的幸存者、担任重装步兵团主力的士兵们说，今天将是最后一场决战。

汉尼拔让属下将军对雇佣兵进行演讲，自己只对自己从意大利带来的亲兵们作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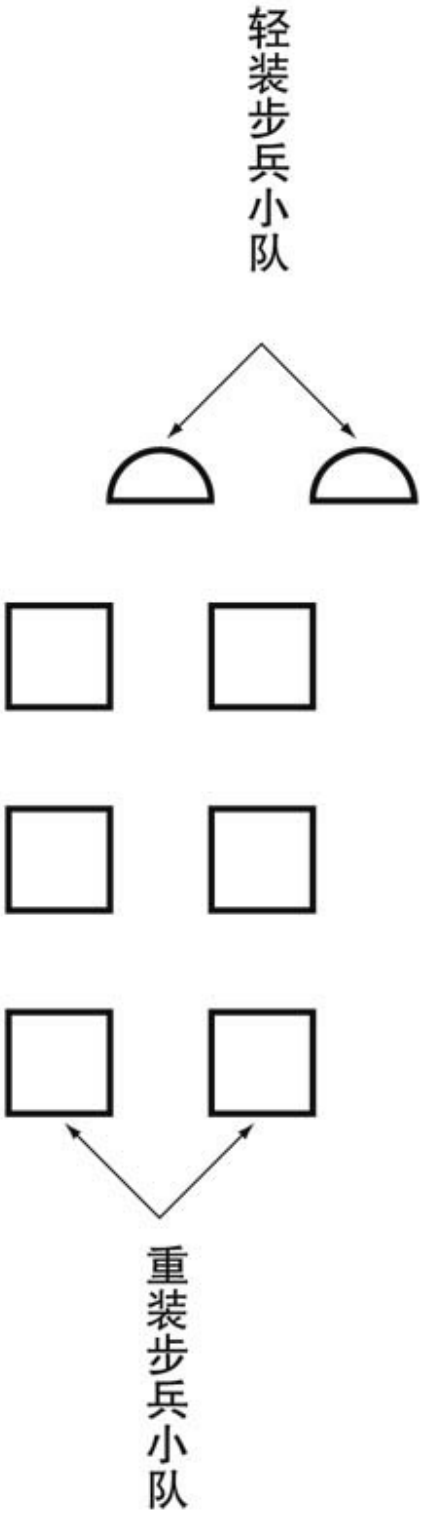
他说，16年漫长的岁月里，在意大利的领土上，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会战的胜利。没有一支罗马军队或一位罗马将军可以战胜我们。今天，指挥敌军的是提契诺和特雷比亚之战的败将之子，是死于坎尼会战的执政官的女婿。今天，为了汉尼拔和汉尼拔的战士们不朽的荣誉，我们要乘胜追击，打他个片甲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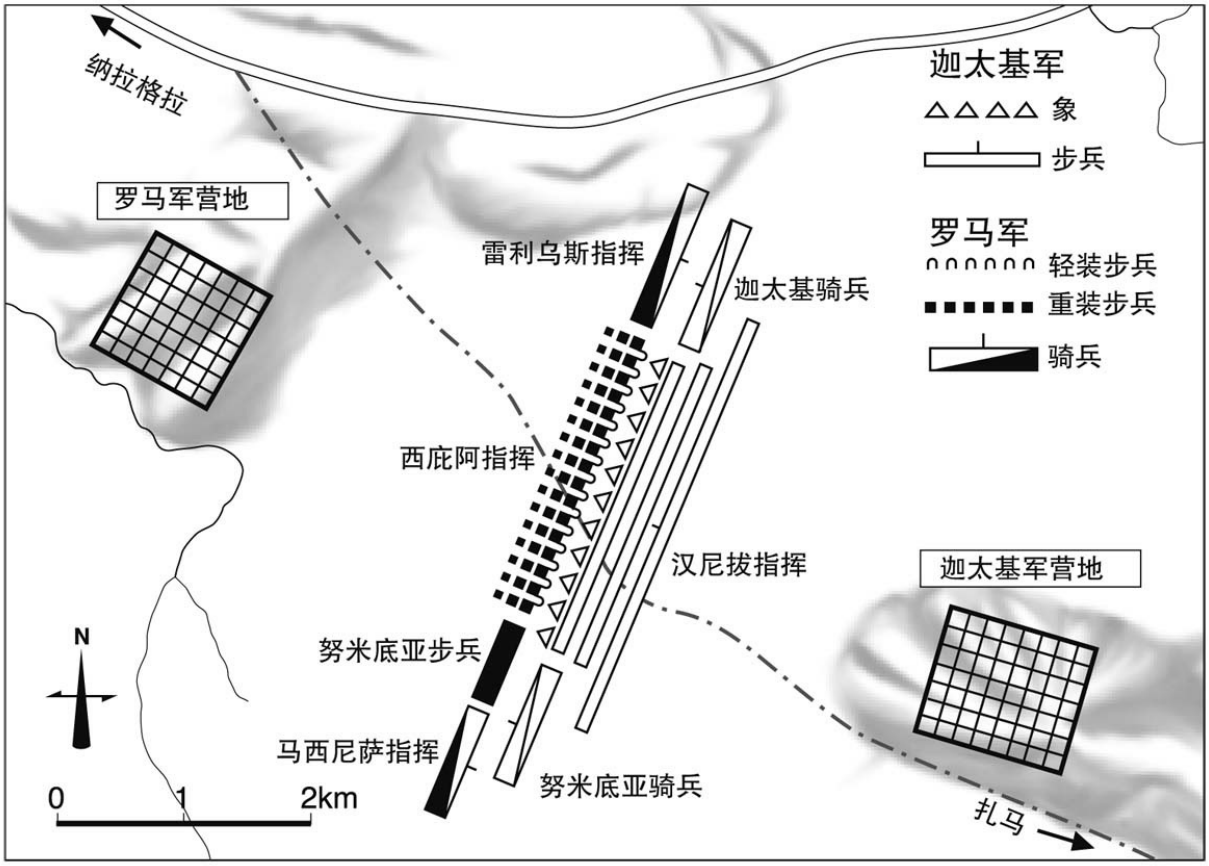
在这1.5万人的精锐部队中，想必汉尼拔的这段话，一定引起了16年来一直与汉尼拔同甘共苦的8000名老兵心中强烈的反响。他们群情振奋，愿为汉尼拔赴汤蹈火。

部署在罗马军队左右两翼的骑兵突然发起进攻，战斗由此开始。汉尼拔立刻下令象队出击。突然冲出来的80头大象卷起滚滚尘土遮天蔽

日，一时间，双方甚至看不清楚敌人的位置。

但是，罗马军队的轻装步兵忠实地执行了西庇阿制订的作战计划。按照指令，随着卷着尘土猛冲而来的大象临近，他们按小队进入了重装步兵的各小队之间。于是，原先像一条横线的罗马军战斗队列，在各小队之间出现了通道。





扎马会战（布阵结束时）（选自LIDDELL HART, “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这条通道为避开大象冲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考虑到大象的因素，在扎马，西庇阿加大了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绝大多数大象只是在罗马轻装步兵轻轻闪开后出现的中间通道上一路通过而已。汉尼拔计划利用大象的袭击，扰乱敌军步兵阵型的战术，被西庇阿轻松破解，未能奏效。

大象有一个缺点，一旦跑起来，轻易不会停下脚步。战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大象通过罗马军队各小队之间的通道后，继续狂奔。当象手们千辛万苦终于成功让大象停下脚步的时候，罗马军队的轻装步兵们吹响喇叭、敲起锣鼓，还纷纷向象群投射出投枪。受此一击，迦太基军的象群有点疯狂，奔跑起来，有的被抓，完全脱离了汉尼拔的控制。

与此同时，战场中央，步兵间的战斗开始了。汉尼拔投入了第一和第二列共3.1万人对阵罗马军由重装步兵2.2万人和努米底亚士兵6000人组成的2.8万人。从士兵数量上看，迦太基方面占优势。但是，相比较战斗力，罗马方面占了优势。

战斗刚开始，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罗马骑兵果断出击。此时，迦太基方面的骑兵已经渐露败相。迦太基军队中央的两翼完全暴露出来。

试图临阵脱逃的

西庇阿没有放过这一绝好时机，他下令重装步兵从正面和两侧三个方向同时向迦太基军队发起攻击。

看到罗马军队主力从三个方向同时攻来，可以说迦太基军队中的乌合之众雇佣兵们彻底慌了神。眼看正面和左右都被包围，无法脱身，只有转身向后。那是唯一没有被包围的方向。然而，汉尼拔的老兵早已持刀等候在那里。汉尼拔有令，试图临阵脱逃的士兵，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逃跑路线被切断，他们只剩下拼死一战了。然而，在战场上，留下无数尸体的依然是他们一方。西庇阿引入的西班牙剑，在战场窄小的混战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有人从罗马军队三方合围的包围圈中逃了出去，西庇阿对他们置之不理，没有追击。因为一路溃败的敌人，队形混乱，早已失去了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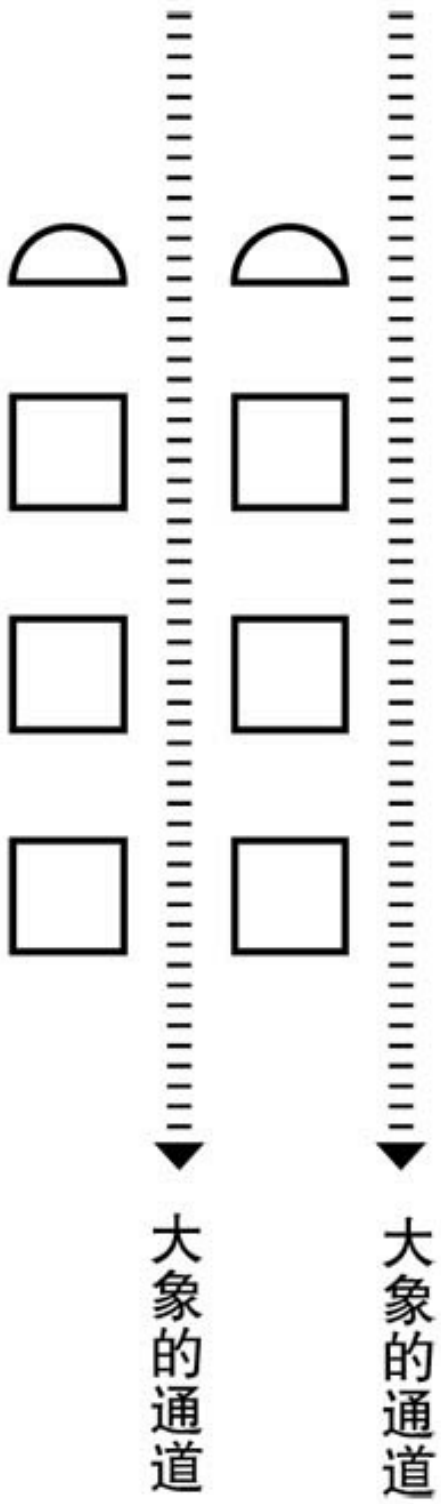
战死的敌人身上流出来的血使草地变得很滑。堆积如山的敌人尸体甚至妨碍了罗马军队前行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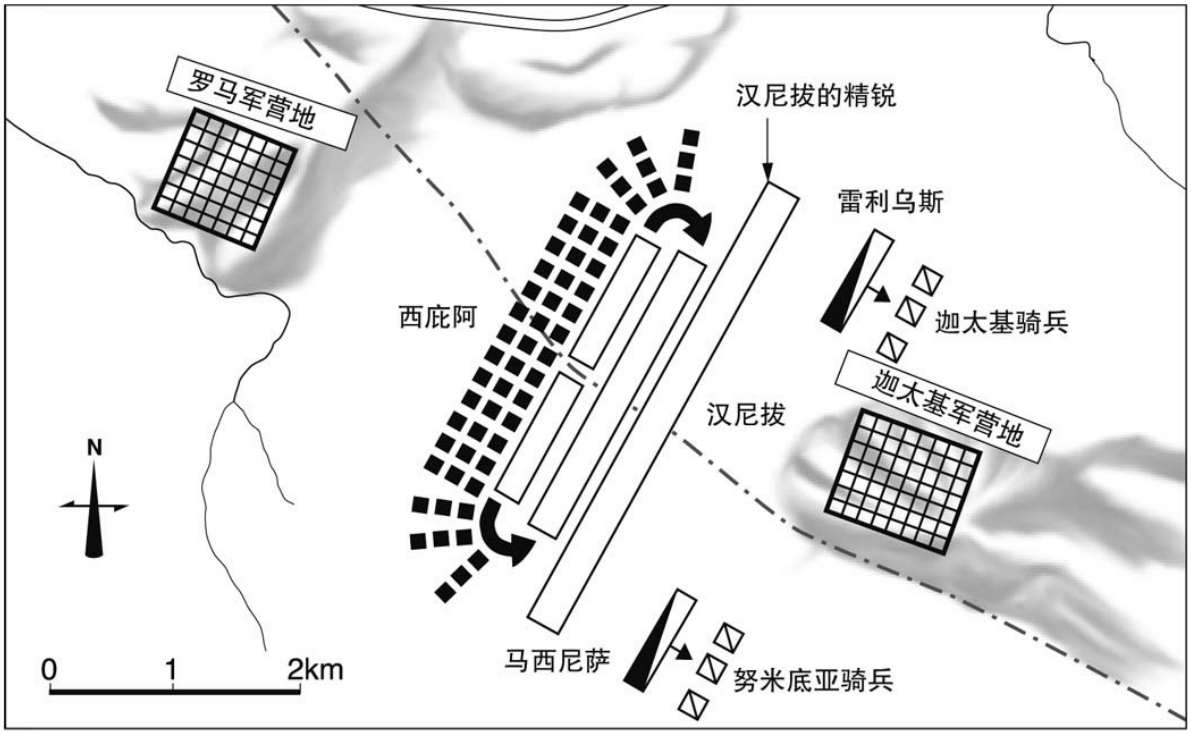
汉尼拔计划在罗马士兵出现疲态时投入自己的主力。此时，时机已

到，他下令正在待命的1.5万名亲兵，编好队形出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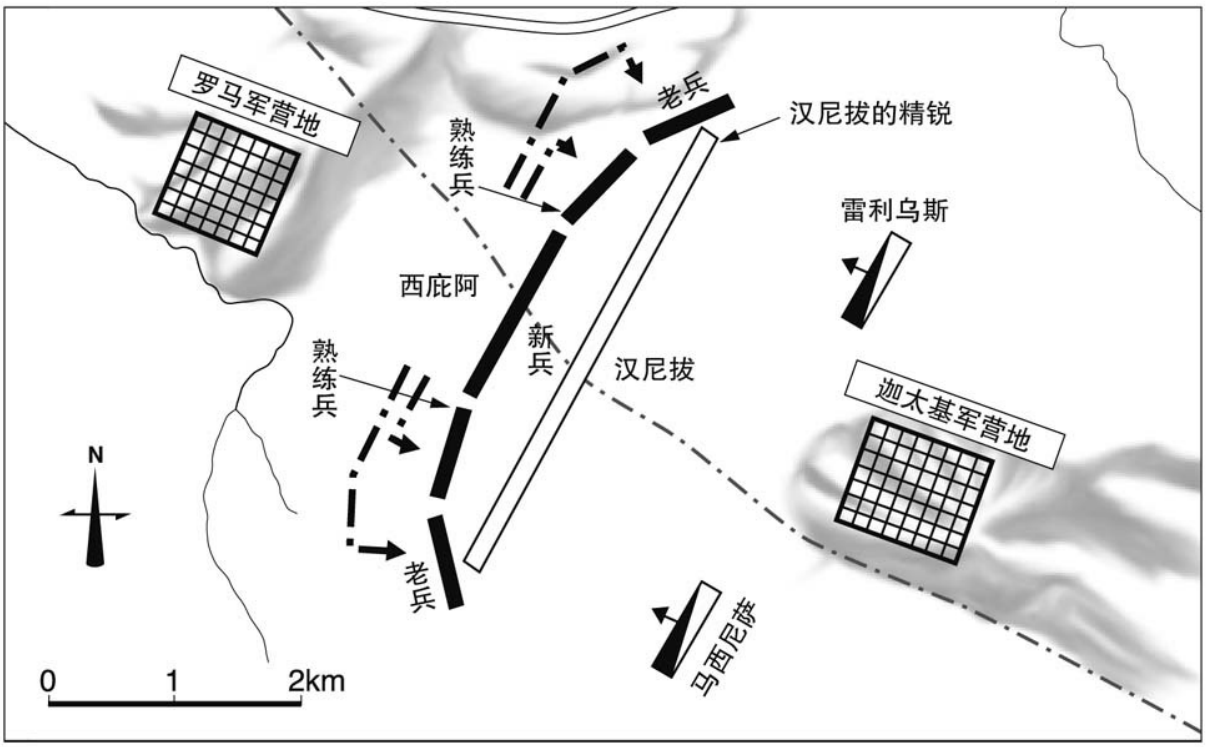
看到迦太基新投入的主力从200米开外的地方逼近，33岁的罗马将军决定出奇制胜，采用其他将军西庇阿做梦都想不到的战术。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他下令全军重整阵型。

按照总司令官的命令，罗马重装步兵们首先把伤者运到后方，轻装步兵及努米底亚步兵把敌人的尸体归拢到一旁。然后，西庇阿把之前按纵队作战的新兵、熟练兵和老兵如上面第二张图所示，布置成横队，呈弓形。对西庇阿来说，虽然士兵们已现疲态，但是，对于刚刚投入战斗的敌人老兵，他要采用新的战术，以便让人数占上风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还可以为正在追击敌人骑兵的自己的骑兵队争取时间回到战场。





扎马会战：第二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扎马会战：最后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轻装步兵和努米底亚步兵回到战场后，全体步兵再次完成了从三个方向包抄敌人的包围圈。这时，雷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率领的骑兵队在击溃敌人骑兵后，也回到了战场。

扎马平原重现了14年前坎尼平原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对象变了。

古代屈指可数的名将，45岁的汉尼拔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兵纷纷被杀，1.5万个战士在扎马遭到全歼。

加上这1.5万人，迦太基方面的战死者远远超过2万人，还有多达2万人被捕。余下的人向着10日行程之外的首都迦太基逃去。汉尼拔只带着数名骑兵，逃到了哈德卢米塔姆。扎马战役中，罗马方面的战死者是1500人。西庇阿完胜。

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我曾经提到过一段插曲，在这里我想再说一说。在这次会战过去几年后，汉尼拔和西庇阿在埃菲索斯偶然相遇，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对于年长12岁的汉尼拔，西庇阿使用了非常礼貌的语言。他说：

“您认为当今时代最优秀的将军是哪位？”

汉尼拔当即回答说：

“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不仅以寡敌众，击败了波斯大军，而且一直打到遥远的地方。那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地界。只能用伟大来评价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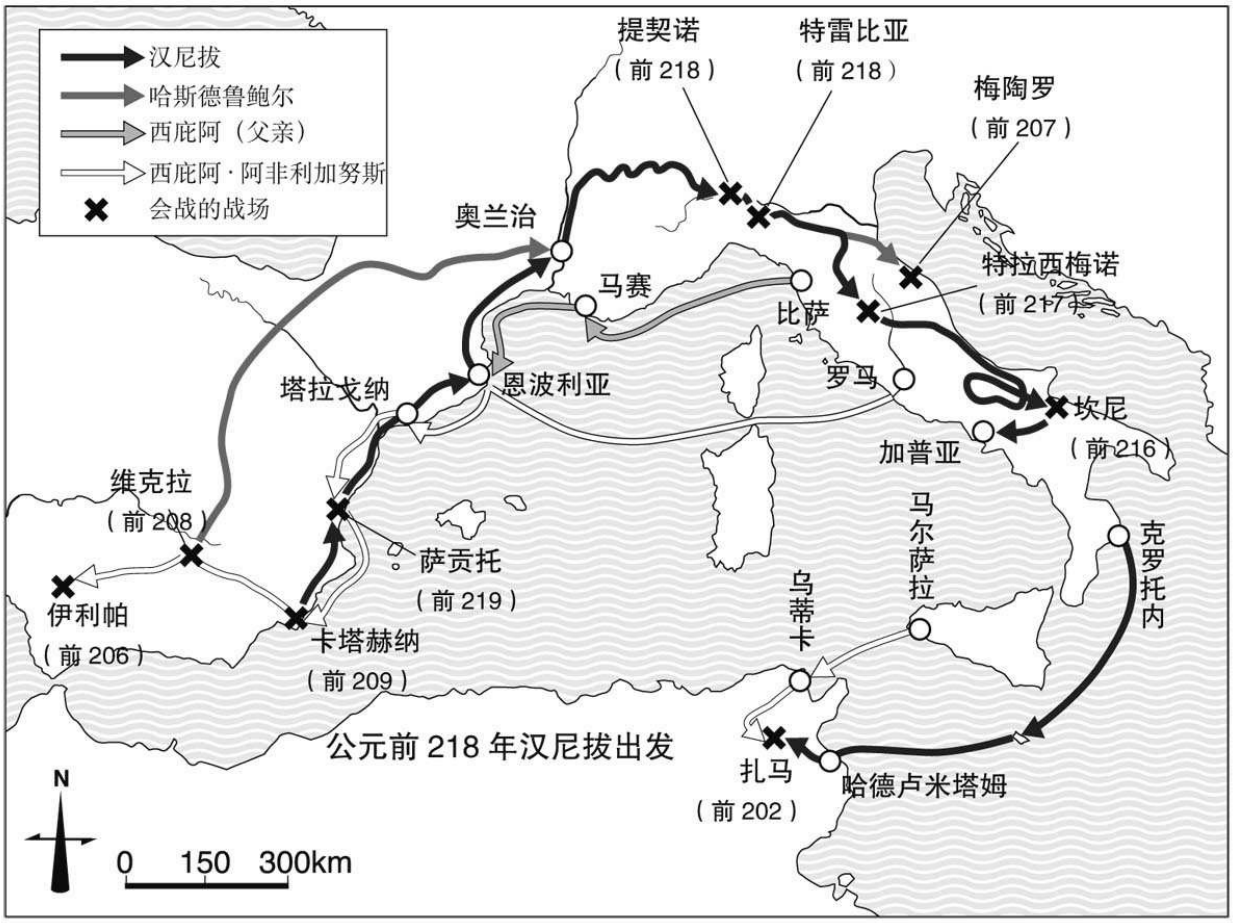
西庇阿又问：

“那么，第二优秀的将军又是谁呢？”

汉尼拔再次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作为战术家他是最杰出的。”

西庇阿接着问：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著名战役的战场和四位将领的行军路线

“那么，您认为第三优秀的将军是谁？”

迦太基名将又是脱口而出，回答了西庇阿的问题：

“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西庇阿听罢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他说：

“如果您在扎马战役中赢了我的话，又会怎么样？”

汉尼拔好像很理所当然地回答说：

“如果是那样，我的排名会在皮洛士之上，也会在亚历山大之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先不论是否可以排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我想汉尼拔对自己的评价是合适的。

在扎马他成了败将。但是，他发明的战术，即有效利用步兵和骑兵、包围并全歼敌人的战术，虽然应用并取得成功的是罗马将军，却是再一次证明了其有效性。不可否认，面对汉尼拔，成功利用了这一战术，是因为西庇阿也是天才。但是不管怎样，发明这一战术的终究是汉尼拔。

在古代罗马，除了卢西亚诺，没有人不认为汉尼拔作为将领，其才能在救国英雄西庇阿之上。汉尼拔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遇到了优秀的弟子。

而且，作为战略家，汉尼拔犯了很大的一个错——他以为罗马联盟很容易解体。在迦太基，社会阶层相对固定，所以作为迦太基人，汉尼拔很难理解罗马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变得非常宽容，甚至可以把失败者吸纳为合作者。

扎马战役失败后，汉尼拔亲身体验到了罗马人的宽厚。因为，作为和平谈判的代表，罗马方面是西庇阿，迦太基方面是汉尼拔。

汉尼拔是迦太基的最后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在扎马会战中吃了败仗，这让迦太基大惊失色。他们以为，罗马军队会乘胜追击，一举逼近城墙之下。就在这时，逃到哈德卢米塔姆的汉尼拔回到了首都。面对长老大会上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的各位议员，这位败军之将说，除了与罗马和谈，别无选择。

扎马会战胜利后，正当西庇阿在回科尔涅利乌斯营地的途中之时，

请求和谈的使者到了。西庇阿接受了和谈请求。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决定是否接受和谈，权力在市民大会。但是，和平谈判的权力掌握在有绝对指挥权的总司令官手中。因此，西庇阿担任了与迦太基和谈的罗马方面的首席代表。迦太基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汉尼拔。曾经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两个人，为了走向和平，这次要相对而坐。

两人经过讨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和平条约达成了如下内容：

一、从今以后，罗马视迦太基为独立的同盟国，尊重迦太基国内的自治权。不在迦太基境内设基地，也不驻扎罗马军队。承认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属于迦太基领地的非洲一带的领属。

二、迦太基全面放弃在西西里、撒丁岛以及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占有权。

三、迦太基正式承认以马西尼萨为国王的努米底亚王国。

四、从今以后，迦太基不再向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及城邦挑起战端。

五、迦太基释放所有罗马俘虏。罗马在和约签订后释放迦太基俘虏。

六、迦太基留下10艘三层桨战船，其余战船和参战用的大象全部交给罗马。

七、在非洲内外，没有罗马的同意，迦太基不得发动战争。

八、和约生效前，罗马军队驻留非洲的费用由迦太基承担。

九、作为赔偿金，迦太基向罗马支付1万塔兰特，以50年为限，分期支付。

十、在确证迦太基遵守了与罗马签署的和约前，作为人质，由西庇阿挑选100名14岁至30岁的迦太基人送往罗马。

比较扎马会战前后西庇阿提出的和谈条件，我们不禁为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而深感震惊。

第一、第二和第三项与会战前西庇阿提出的第一、第三和第四项完全相同。第四项是迄今为止，罗马对所有战败国都会提的条件，不只针对迦太基。

第五项也是与任何国家之间签订的和约中必定会有的一项。

第六项的意思是解散迦太基海军。只是，扎马会战前，迦太基留下20艘，扎马会战后改成留下10艘，其余战船全部交给罗马。

问题应该是第七项。这才是扎马会战失败的真正后果。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即使是自卫，也必须在得到罗马的许可。也就是说，迦太基失去了主动交战的权利。这样一来，迦太基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第八项与扎马会战前的第六项完全相同，也是和约中必定会有的一项。

至于有关赔偿金的第九项，比扎马会战前后翻了一倍，从5000塔兰特增加到了1万塔兰特。但是，因为期限是50年，折合成每一年，迦太基需要支付给罗马的只有200塔兰特。换算成日元相当于一年2亿日元。

第十项是向罗马送100名人质。后来这成了罗马人常用的一个手段。只是，这些所谓的人质除了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随时回国，其余方面和享受奖学金的留学生完全一样。挑选年轻人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罗马人喜欢挑选曾经的敌国的统治阶层的子弟，也就是曾经的敌国的统治阶层预备军，让他们在罗马学习，把他们培养成亲罗马者。说是人质，

与牢狱没有任何关系。罗马人心目中的人质就是把他们安置在合适的人家里，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让他们和这家的孩子一起在家庭教师的教授下学习。

作为日本人，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只有胜者和败者的这一事实，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他们不会认为战争是犯罪。如果对战争犯进行审判的话，汉尼拔当之无愧应该是一号战犯吧。

的确，和约的内容有些苛刻。但是迦太基不像有些加盟罗马联盟的罗马同盟国，不仅部分领土遭到没收，成为罗马的国有土地，必须向罗马支付租地费才能耕种这些土地，而且还要承担为罗马联盟军提供兵力的义务。也不像西西里那样变成罗马的行省。虽然交战权利受到限制，虽然海军事实上被解散，但是，作为自治国，其余的一切都保留下来了。对于迦太基的内政，罗马也不加干涉。而且，从后来罗马与马其顿、叙利亚之间缔结的和约内容来看，很难说，罗马只对迦太基苛刻。

罗马人把第二次布匿战争叫做“汉尼拔战争”，可见，第二次布匿战争是迦太基方面挑起的。尽管首先宣战的是罗马，那也是因为汉尼拔设下的圈套太高明。考虑到16年间，罗马付出的代价、超过10万人的阵亡者、多达10人以上的执政官级武将的死，迦太基作为战败国，补偿的分量实在太轻，轻得让人难以相信。由此可见，罗马人在与失败国缔结和平条约时，从来没有报复的念头。我想，这多少受西庇阿为人的影响吧，因为，和谈条件是他提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罗马人的性格。他们在市民大会上，对这一和谈条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缔结的和平条约或许有些苛刻，但是，它既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正义对非正义作出的惩罚。因为在古代，战争从来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不再是胜者与败者的区分，而是定义为正义与非正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即使战争被定义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并没有因此消失。战争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噩梦。

对于这一和谈内容，迦太基方面有不少有权势的人表示难以接受。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和西庇阿有过两次交锋却都吃了败仗的、未参加扎马会战的吉斯戈。

吉斯戈站在议会厅的讲坛上，准备驳斥和谈内容。这时，汉尼拔腾地从议席上站起来，走近吉斯戈，一把揪住吉斯戈的衣服前襟，把他拖下了讲坛。看到汉尼拔这一野蛮的举动，在场的所有人不禁大吃一惊，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静寂。汉尼拔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头，放开了吉斯戈。他说：

“我在9岁那年离开祖国，到今天已经36年。这36年里，我的人生是在营地和战场上度过的。我不懂城市生活，但是，我很清楚在战场上应该怎么做。”

汉尼拔为什么如此希望与罗马讲和，我们不清楚。因为，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想象。

我想，也许所有亲兵无一幸免地战死沙场，不仅让他深陷绝望之境，而且他也因此成了光杆司令。还有，汉尼拔早已习惯对战场上的情形作出冷静客观的判断。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失去了精锐士兵的迦太基，仅靠雇佣兵这样的乌合之众，绝无可能战胜西庇阿。

汉尼拔没有再动手。但是，他也没有停止继续发言：

“现在，你们能做的事情不是玩弄舆论，而是接受。考虑到我国的现状，你们应该觉得西庇阿的提议并无不妥。”

迦太基有势力的人们只好点头称是。迦太基方面接受了和谈内容。在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也一致通过，没有要求额外追加条件。相隔16年后，两国再次迎来了和平。

看到和约已经签订，西庇阿率领属下全体罗马士兵，离开了迦太

基。走海路，先到西西里，然后，横渡墨西拿海峡，登陆意大利本土。在本土，沿陆路直奔罗马。

年轻的凯旋将军西庇阿骑着白马一路向前。沿途的人们在他经过的时候，纷纷向他献上鲜花，欢呼声此起彼伏。一路上，迎接他的人群络绎不绝，直到他回到首都。与胜利相比，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更是为和平回归而庆贺。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从此被人们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意思是“征服非洲的人”。我想，对于33岁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来说，从战胜汉尼拔的公元前202年到凯旋回罗马的公元前201年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第七章

布匿战争以后

（前200—前183）

现代研究者中，除了那些幸福的人一口断定古代=奴隶制社会=榨取，因此认为古罗马不好以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罗马人不好。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提到，从台伯河畔的7个小山丘到卢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半岛，罗马用了500年的时间才得以统一。与现代意大利版图相比，那不过只是一半领土而已。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不能把他们统一意大利半岛的行为看做是侵略。还有，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来说，对外关系采用的是罗马联盟。无须汤因比的赞誉，罗马和各同盟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因此，罗马才能够在第一次、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研究者中甚至有人把英国和旧殖民地各国之间缔结的英联邦关系等同于此。

在本卷一开头我就提到过，从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地势上来看，把第一次布匿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也有些勉为其难。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方面完全是出于自卫。任何民族都有权抵御入侵本国的敌人而进行自卫。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公元前200年以后的罗马人。对于此后的罗马人，谴责派要开始横加指责了。

谴责派的理由是公元前200年以后，罗马选择了帝国主义路线。“帝国主义”这个词让人感觉很熟悉。日语词典的解释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图谋本国发展的侵略主义。

Imperialism翻译成日语，意思是“帝国主义”。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也就是产业革命以后。古代没有这种说法。甚至遭到罗马“侵略”的民族之一，希腊人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

拉丁语Imperium的意思是“绝对主权”。以此词为词源，造出来的词就是Imperialism。那么，罗马人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开始帝国主义的？还有，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帝国主义”与后来的“帝国主义”是否是风马牛不相及？

扎马会战功臣西庇阿的凯旋仪式的欢庆气氛尚未结束，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来到了罗马。他们访问罗马的公开目的是祝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元老院的议事厅，他们除了向罗马元老院表示祝贺外，更是控诉了马其顿王国的行为，说他们侵略自己，希望依靠罗马的力量阻止他们。

罗马元老院有一种制度，叫“第一人”。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不是议长，而是元老院300名议员中，有权最先或最后发言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在掌握罗马国政的元老院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这个“第一人”。直到公元前203年去世，费边一直占据“第一人”的位置。年龄70岁上下，又是针对汉尼拔的战争，提出了持久战法的首创者，所以，费边占据“第一人”的位置顺理成章。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被选为“第一人”的是34岁的西庇阿。元老院在授予这位救国英雄“阿非利加努斯”的尊称的同时，还把他选做了元老院的“第一人”。当然，如此年轻的“第一人”是个特例。在此后的近15年里，罗马元老院的对外政策几乎都是在这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主导下展开的。

虽然受到战场上胜利的鼓舞，但是罗马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一下子变为霸权主义。西庇阿知道，在他回罗马时，等候在沿途的人们向他投掷鲜花，不只是庆祝罗马的胜利，同时，也是庆祝和平回归的一种表现。因此，希腊城邦的代表们提出军事帮助的要求，让元老院非常为难。

以西庇阿为首的元老院决定先通过对话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16年间，埃及保持了善意的中立。为了向托勒密王朝表示感谢，元老院派遣由四位执政官级的议员组成的使节团正前

往埃及。元老院当即命令其中一人，转而前往马其顿王国首都佩拉，希望通过与菲利普国王直接对话，来阻止马其顿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话没有成功。马其顿军队开始南下，很快逼近雅典。事已至此，罗马必须立刻作出决断。

除了马其顿，在罗马苦战汉尼拔的时候，希腊各城邦都是坚定的同盟者。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曾经向胜利者汉尼拔提出结成统一战线的愿望。在他们缔结同盟后，希腊各城邦国家响应罗马的号召，参与了在第一线封锁马其顿军队的战斗。同盟国有难，前去支援，这是罗马不可更改的法则。而且，此时受敌威胁、陷入困境的是希腊各国，它们是罗马在困难时期给过帮助的国家。罗马肩负着双重的帮助职责。

同时，元老院也认为有必要给马其顿一点教训。曾经，马其顿与汉尼拔结成了统一战线，好在最后没有实现。但是，如果实现了，罗马会是怎样的呢？而且，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后来尽管与罗马缔结了和约，但是，扎马会战时，应迦太基的请求，派去了雇佣兵。只是，罗马既然可以承认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自然不会想过要消灭马其顿。所以，元老院全体议员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有必要给马其顿一点教训。

但是，市民大会反对元老院的这一决定，理由是本国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虽说是为了支援同盟国，他们还是持反对态度，投赞成票的百人组一个都没有。可以看出，第二次布匿战争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罗马人从心底里希望和平。

但是，掌握国政的元老院没有因此退让。当选公元前200年度的执政官加尔巴走上演讲坛，向市民们发出了呼吁。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 如果汉尼拔攻打萨贡托的时候，我们立刻前去支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战场一定不会是意大利而是西班牙。就像我们应墨西拿的请求，立刻赶去支援，使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战场留在了西西里一

样。当我们的同盟城市萨贡托向我们请求支援时，罗马希望通过与汉尼拔对话解决问题，结果贻误了时机，使意大利变成了战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忘掉这漫长而艰难的16年。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现在对雅典的所作所为，与19年前汉尼拔对萨贡托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汉尼拔从成功攻占萨贡托，到入侵意大利，用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坐视马其顿国王攻占雅典，他从科林斯到意大利，在海上的时间只需要5天。问题已经出现，我们要尽早解决。等敌人进入自家的院子，一切都为时已晚。

执政官加尔巴的演讲结束后，市民大会重新进行了投票。这次，市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向马其顿宣战的决议。只是，这一决议有附加条件，就是派往希腊的军团为志愿兵。由此可见，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次军事行动。

马其顿国王得知罗马军事介入的消息后，撤回了已经逼近雅典的军队。当然，他不是要终结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侵略的目标从南部的雅典转移到了东部的帕加马和罗得岛。

对罗马来说，情况没有因此改变。罗马对马其顿实行封锁策略的时候，雅典是罗马的同盟国，同样，帕加马和罗得岛也是罗马的同盟国。

罗马没有理由拒绝军事介入。就这样，罗马开始一点点地向希腊境内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想法单纯的罗马人被工于心计的希腊人利用了。

希腊诸王国

公元前323年，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的一年。这一年，他33岁。他用短短10年的时间，实现了横跨欧亚地区的称霸。在他死后，他

那幅员广阔的帝国被他手下的部将们分割了。

由此诞生了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以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有规模略小的王朝帕加马。此外，在希腊，照例是众多城邦国家分而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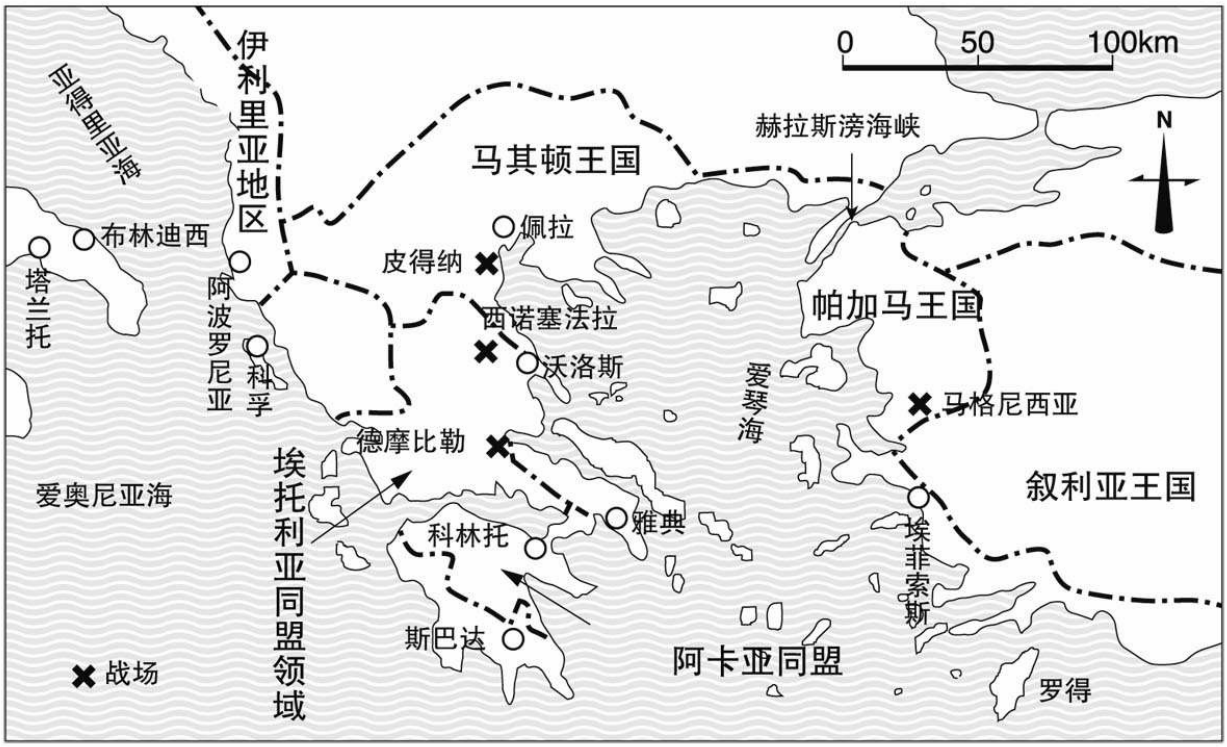
在文化方面，后世的我们知道，以埃及的亚历山大为中心，这一时期，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甚至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希腊时代”。但是，在政治方面，从公元前323年直到被罗马征服的200多年间，这些希腊诸王国是在一次次缔结同盟又一次次对立中度过。首先是刻在纪念币上的诸王侧脸，他们的容貌出奇地相似，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其次是“克娄巴特拉”这一女性的名字。除了埃及，叙利亚和帕加马人中，取这个名字的人也出奇地多。应该说，这是各王国之间频频通婚的结果。

希腊诸王国的统治者终究是希腊人。即使他们超越国境，相互间的交流盛极一时，在国内却始终保持了东方的特点，国民等级依然森严，没有丝毫改变。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希望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希腊世界的主角还是与大帝一样的希腊人时，他的这一宏伟意图没有能够实现。

在希腊人统治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由于被统治的东方民族习惯于接受统治，所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在马其顿王国，被统治者是希腊人，是尚不习惯被统治的民族，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因为，作为被统治者的希腊民族是一个有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意见的民族。

希腊人见证了雅典的衰落，也未能维持斯巴达霸权。在亚历山大大帝父亲的时代，希腊曾经一度屈服于马其顿的军事力量。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这个时期，希腊南部诸城邦结成了阿卡亚同盟，希腊中部各城邦也结成了埃托利亚同盟。他们与统治者马其顿王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同时，由于斯巴达和雅典时而加入

同盟时而退出同盟，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全希腊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马其顿的局面。当然，即使他们团结起来，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足以战胜马其顿。尽管如此，希腊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在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



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希腊世界

于是，希腊人把视线转向了新兴的罗马。他们想，如果罗马帮助他们赶走马其顿，他们就可以恢复自由和独立。只是，罗马人虽然有心教训马其顿，却无意彻底灭亡马其顿。这一出发点的不同，使得始于公元前200年的希腊战争变得错综复杂。

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也导致了罗马在希腊的军事介入变得愈加复杂。西庇阿和弗拉米尼都是罗马人中有名的希腊迷。他们一个在元老院已经拥有无形的势力，一个是第一次希腊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他们来说，正因为抗击马其顿的是雅典，所以，他们甚至有意加入义勇

军，从马其顿的压迫下解放希腊诸城邦。刚过30岁的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好像从心底里相信这一点。

马其顿军队和罗马军队之间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公元前197年，战场是帖撒利地区的西诺塞法拉。罗马军队的总人数是2万人，其中一半士兵来自罗马和罗马联盟，另一半士兵来自希腊各城邦。马其顿军队的人数是2.6万人。此时，距离罗马决定军事介入已经过去了3年，参加战斗的罗马士兵只有区区1万人。由此可见，对于对希腊实施军事介入，罗马的态度是极其消极的。

这是一支混编的军队。但是，总指挥弗拉米尼手下的将领中，有人很好地掌握了西庇阿式战术，即在战斗中，通过有效地发挥部队各组成部分的作用，成功地瓦解敌人的主要战斗力。由马其顿国王亲自率领、在希腊世界享有无敌之名的马其顿重装步兵在罗马人的战术面前一退再退。在西地中海，罗马人在战争中向汉尼拔学习的时候，在东地中海，无人怀疑正面力量冲突的有效性。

战斗结果，马其顿军队阵亡8000人，被俘5000人。与此相比较，罗马方面的战死者不过700人。这一结果震惊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

国王菲利普五世逃回马其顿领地后，提出了休战的请求。一方面是为了埋葬战死者，另一方面他希望进行和谈。最高司令官弗拉米尼接受了他的这一请求。但是，参加罗马军队的埃托利亚同盟诸城邦不满他的决定。他们主张乘胜攻打马其顿领地，彻底消灭马其顿王国。他们还抗议说，罗马人在开战前还能听取希腊人的意见，战斗结束后却要独断专行。对此，弗拉米尼回答说：

“罗马人的传统在于包容失败者。我们对扎马会战的败将汉尼拔的态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彻底消灭失败者不是罗马人的做事风格。对待武装的敌人，我们

要用武装起来的决心对付他们。但是，对于主动解除武装的失败者，我们也应该解除他们心里的武装。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一直遵循的做法。作为我来说，既然被授予了罗马军队指挥权，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承这种做法。

“如果我们消灭了马其顿王国，那么，面对迄今时常威胁希腊北部的凯尔特人和多拉基亚人，谁来保卫希腊？我认为希腊人应该心胸开阔地寻找与马其顿王国共存的道路，以确保马其顿今后不再侵犯希腊。”

这年冬天，罗马与马其顿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如下：

一、彻底恢复希腊人居住的城市完全自治，马其顿国王尊重他们自治。

二、马其顿把自己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之外的领地全部交给罗马，第二年入春前，全部撤离驻扎在这些地方的马其顿军队。

三、马其顿留下5艘战船，其余全部交给罗马。

四、今后，马其顿军队的士兵数不得超过5000人。

五、没有罗马的允许，马其顿不得在本国领土以外的地方作战。

六、作为赔偿金，马其顿向罗马支付1000塔兰特。和约签订之时，支付500塔兰特，余下的分10年付清。

七、不得向罗马同盟国帕加马和罗得岛发动战争。

八、国王的次子迪米特里厄斯作为人质送往罗马。

九、承认雅典对利姆诺斯等岛屿的管辖。

和平回归了。而且，正像大多数希腊人所希望的那样，在阻止马其

顿王国侵略行为的前提下，和平得到了回归。但是，希腊人对此依然半信半疑。罗马是胜利者，打败了亚历山大大帝光环下的马其顿。随后，罗马会怎样对待希腊呢？说是承认希腊自治，但是这会是真的吗？在东地中海，胜利者就是法律。

第二年，即公元前196年，根据惯例，科林斯将举办盛大的体育节。罗马的得胜将军弗拉米尼将出席这一盛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希腊。

科林斯体育节不是纯粹的体育竞技活动，它同时也是一次峰会。希腊诸城邦有势力的人将汇聚一堂，讨论各种问题。现在，弗拉米尼竟然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腊人都认为，负责希腊战事的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来塔兰托不可能只是为了观看比赛。

接下来的内容，我想根据那一年刚满7岁的波利比乌斯后来写的《历史》来进行描述。阿卡迪亚是阿卡亚同盟的加盟城市。波利比乌斯出身在阿卡迪亚一个有势力的人家。所以，即使他没有参加当年的体育节，他也有可能从出席者那里听到许多事情。

> 这一天，科林斯露天体育场挤满了观众。全希腊有权势的人都来了。他们和往年不同，对眼前正在进行的比赛丝毫没有兴趣，只是坐在观众席中，专注于谈话。
>
> 罗马人说过承认希腊人自治。但是，他们应该会驻扎军队吧？如果不让他们在有名的城邦驻扎军队，他们也许不会放弃战略要地吧？年贡的要求会是怎样呢？希腊的独立会是什么样的？希腊人的自由又会是什么样的？
>
> 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些问题，凭臆测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任何结论。
>
> 竞技结束后，弗拉米尼所在的正面观众席里，站起来一个人。他带着司号手，要向在场的所有人传达指令。喇叭声传遍了体育场

的每个角落，他要求全体观众肃静。整个体育场一片寂静，只有这个人的声音在体育场的上空响起。

罗马元老院及总司令官提图斯·昆克蒂乌斯·弗拉米尼在这里向各位宣告如下事宜。

从即日起，希腊人彻底恢复自由。希腊各城邦对罗马不承担缴纳年贡和租税的义务。依据各自的法律，享有完全的自治。不承担向罗马提供军事基地的义务，罗马军队撤出全希腊。

刹那间，体育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遮住了此人的声音。有人坐在体育场的角落，没有听清这番话，有人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们要求此人重复一遍他说过的话。于是，这个人站到体育场中央，重复了弗拉米尼的告示。

这太出乎希腊人的意料，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不敢相信，身为异族的罗马人，为了拯救深陷危机的希腊人的独立和自由，自己出资，流血战斗。最后却无任何要求，撤出全部军队。

以往的体育节上，竞技比赛结束后，人们会涌向赢得比赛的人，向他表示祝贺。这是人们已经见惯了的光景。然而，这一天，没有一个人前去祝贺胜利者。出乎他们意料的告示内容，竟然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老人变成了欢天喜地的少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

人们纷纷涌向弗拉米尼。如果没有罗马士兵牢牢守在他身边，也许他难逃被挤扁的厄运。这一年弗拉米尼34岁，他希腊语讲得很地道。所有人都希望尽可能地靠近他，希望一睹这位罗马统帅的风采，他们甚至希望能碰到他的身体。弗拉米尼被挤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从体育场脱身。

罗马人遵守自己的承诺。两年后，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了希腊。与此同时，弗拉米尼的愿望也得到了实现。这是他拜托希腊人做的唯一一件事。

20年前的坎尼会战中，被汉尼拔俘虏的罗马士兵，因为罗马拒绝支付赎金被悉数卖到希腊为奴。他希望希腊人为罗马找回这些俘虏。希腊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最终找到了1200人。20年前的8000人，在希腊经过20年的奴隶生活，减少到了1200人。此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需要向奴隶主赎买。希腊各城邦为了向罗马和弗拉米尼表示感激之情，承担了这些费用。弗拉米尼凯旋罗马，并带回了坎尼之战的老兵们——他们在20年后重新踏上了祖国领土。

罗马以为希腊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因为罗马已经狠狠地教训了马其顿，希腊各城邦不必再担心马其顿的威胁。

但是，所谓介入，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抑或是军事的还是其他什么，与对方之间的关系都会很深，而且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下去。

根据现代学者们的研究，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院采取的对外方针称得上是稳健的帝国主义，与迦太基和马其顿签署的和约内容充分显示了这一倾向。理由如下：

一、罗马掌握霸权。

二、为此，其他强国的军事力量下降到仅满足自卫的水平。

三、但是，罗马不是军事占领，所以，不设军事基地，也不驻扎军队。

四、承认各国完全的国内自治。

五、同时，希望各国在和平的环境下，保持经济上的繁荣。

这个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所谓强国，除了霸权国家罗马，还有迦太基、马其顿以及叙利亚和埃及。西庇阿提倡的“稳健的帝国主义”，是在

罗马的霸权下，所有独立的国家共存共荣。由此，出现了一个概念叫“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只是，帝国统治始终采用稳健的形式。

美中不足的是，不管什么事情，采用稳健的做法必须双方态度一致。如果一方不同意，稳健就无法实现。各强国对于承认罗马霸权，并遵从罗马霸权的要求，是如何想的呢？迦太基是如何想的？马其顿是如何想的？还有尚未与罗马交过手的叙利亚和埃及又会怎样想？

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失败后，开始恢复国内的经济建设。汉尼拔一马当先。

自古以来，迦太基习惯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源的不足。汉尼拔没有沿用这样的传统。他采用了节流的方式。一方面节约经费，同时调整开支，以此施行经济重建政策。这一做法效果显著，却也为他树立了敌人。汉尼拔虽然只担任过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却是个自信心十足的人。这样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习惯采用强制手段，即使他的做法是正确的。汉尼拔也犯了这样的毛病。迦太基人从来不擅长制造统一国家的舆论，经过6年时间，他们终于不愿意再忍受汉尼拔严厉的做法。

反汉尼拔派向罗马投诉。据说，投诉的理由是汉尼拔与叙利亚国王内外勾结。

罗马决定派考察团前往迦太基，名义是考察非洲现状。汉尼拔不相信这一说法，年已51岁的汉尼拔，于是只身离开了祖国。他趁着夜色，策马来到海边，登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船，目的地是叙利亚。他要投奔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也许流言是真的。不管怎样，汉尼拔离开后的迦太基，再也没有人对祖国置于罗马霸权下心怀不满。

屈服于罗马军事力量的另一个强国马其顿，国王是菲利普五世。这个人物的性格非常有意思。

他出生于公元前237年，比西庇阿年长2岁。在与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交战中落败后，与罗马签订了和约，承认罗马霸权。这是公元前197年的事情，那一年，他40岁，登基王位已经超过20年。在处理复杂的希腊诸国关系问题上，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同时，他又具备对现状敏锐的洞察力。当然，他表现出来的敏锐洞察力和丰富经验只是表象，内心还怀有极高的自豪感。他为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继承人深感自豪。

在与弗拉米尼率领的罗马军队作战中，他一败涂地，不得不与罗马签订和约，承认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当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 独立的市民人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强大，农耕地会修整得更彻底，国家会更加富裕。但是，希腊的现状与此相去甚远。
>
> 我们最好看一看罗马，他们推行自由的社会形态。在那个国家，连奴隶都是社会的一员。一旦需要，可以授予他们市民权。不仅授予他们市民权，还会选举他们担任公职。常常是，我们以为某个人是根红苗正的罗马市民，却不料他的父辈还是奴隶身份。
>
> 因此，我们不得不随时面对新的罗马人，就好像他们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罗马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对于这样的罗马人，又有谁可以战胜他们呢？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在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之后，曾经向胜利者汉尼拔提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罗马。应该说，那是非常失策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菲利普也早已成为希腊君主之首。然而，遇到罗马军队，刚交手就一败涂地。为此，菲利普不得不甘居罗马的霸权之下。这位英明的男人应该很清楚前因后果。甚至在和谈的会场，他对罗马方面的首席代表、坐在对面的弗拉米尼所说的话从不反驳。他很清楚自己只能承认弗拉米尼的话很有道理。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这位不需要翻译，可以直接用希腊语谈判的罗马胜将颇有好感。但是，他依然难以平息心中的恼怒。与马其顿相比，罗马只能算是

一个新兴国家。他恼怒自己作为马其顿的国王，竟不得不向新兴国家罗马作出让步。

菲利普始终不能消除这种扭曲的感情。王子迪米特里厄斯曾作为人质被送往罗马，回到国内时成了彻头彻尾的亲罗马者，他的这种感情终于爆发了。留在马其顿的长子珀尔修斯好像看透了父亲的内心，从不掩饰自己对罗马的反感情绪。好在菲利普在世期间执行的是务实政策，罗马和马其顿总算一直和平相处。

打破罗马霸权下这种稳定局面的，不是屈服于罗马的迦太基或是马其顿，而是罗马恢复了其独立和自由的希腊。这实在很有讽刺意味。

埃托利亚人生活在希腊中部，北方国境线与马其顿王国接壤。公元前197年，罗马和马其顿实现和谈的时候，他们就心存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罗马善待马其顿。他们甚至认为罗马背叛了自己，因为他们加入了罗马军队作战。只是以他们自己的力量，又无力抗衡马其顿。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其他国家帮助是希腊人的传统做法。

埃托利亚人向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请求帮助。安条克看到马其顿王国的实力已经开始衰退，认为此时正是打击长期以来的对手马其顿，向希腊展示自己国家实力的好机会。看到同伴力量衰退，乘机落井下石是希腊诸国惯用的做法。而且此时，叙利亚有汉尼拔。

针对罗马的策略，汉尼拔是这样向叙利亚国王进言的：

首先，主战场应该设在意大利境内。

为此，叙利亚国王向汉尼拔提供100艘战船和1万名步兵以及1000名骑兵。汉尼拔带领这支队伍回迦太基，说服迦太基政府进军意大利。

与此同时，安条克率领余下的军队，攻入希腊，乘着征服希腊的势头，登陆意大利。然后，汉尼拔自南向北，安条克自东向西，同时攻打

罗马。

这一战略构思非常宏大。只是，听起来可行性微乎其微。汉尼拔是否真的这样建议过，没有确凿的证据。不管怎样，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作好了进攻希腊的准备。

最初，罗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事态，并于公元前193年，派遣了以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团长的三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使节团前往叙利亚。三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埃菲索斯见到了叙利亚国王。

交涉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好像也没有一触即发的气氛。因为，罗马方面无意再次进行军事介入，而年已50岁的叙利亚国王刚与一位年轻女子结婚，上战场的心情并不急迫。

据说就是这个时候，汉尼拔和西庇阿之间有了那样一段对话，即西庇阿问汉尼拔谁是最优秀将领的那段对话。如果这段插曲是史实，那么，这一年，汉尼拔应该54岁，西庇阿42岁。距离扎马会战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

当时，54岁的汉尼拔第一次在宫中供职，各方面都不自由，而且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如愿实施，为此他深感绝望。西庇阿比他小12岁，好像身患重病的样子。从年轻时候开始，西庇阿就时常大病缠身，不像汉尼拔身体壮实得像一块铁。以他们两人为主人公的时代帷幕正一点一点地落下。

两年之后的公元前191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终于开始行动了。在希腊诸国中，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拥有最大的领土。这一年，国王率领6万大军开始横渡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准备从亚细亚进入欧洲。

罗马已预计到与叙利亚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早已向市民大

会提出，希望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同意罗马派遣军团实施军事介入。军事介入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埃托利亚人违反了同盟协议，二是为了阻止叙利亚国王对罗马在希腊的同盟诸城邦实施侵略行为。同时，元老院请求各国把军粮卖给罗马。既然要在海外作战，确保军粮供应是重中之重。

埃及答应提供小麦，但是，不通过意大利，准备直接出口到希腊。迦太基也传来消息，答应出口大量小麦和大麦，此外再无偿赠送6400吨小麦和大麦。但是，元老院拒绝接受馈赠，说："罗马市民习惯使用自己付款购买的东西。"结果，这部分粮食所需的费用也付给了迦太基。

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也提出无偿提供军粮。元老院以同样理由拒绝接受，选择了付款购买。但是，作为来自同盟国的参战者，罗马接受了努米底亚国王送来的500骑马和20头大象。

那么，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是怎样对待罗马提出的请求的呢？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与大多数希腊人的预测相反，马其顿国王不仅答应出口军粮，甚至还要求提供经济援助和兵力支援。

对于国王提出的经济援助，罗马元老院拒绝了。理由与对迦太基及努米底亚一样。至于兵力和军粮，罗马接受了，并说如果能直接送到已出征希腊的执政官那里，将不胜感激。

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以50年为限分期向罗马支付的赔偿金，还剩40年尚未付清。迦太基方面提出，这部分钱已经准备好，可以乘此时机一次付清。元老院竟然一口回绝了。这就充分证明，赔偿金分期付清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只要战败方未付清赔偿金，就有希望继续维持和平。

罗马的准备工作可谓周密详尽，却似乎没派上用场。安条克到了希腊，与埃托利亚人会合后，军队的总兵力远远超过罗马军队，却在兵力

处于劣势的罗马军面前，很快溃不成军。两军在德摩比勒隘口交战，没用多久，罗马军队就已经胜出了。希腊诸国相信只要人数占优势，必能在战斗中胜出。但是，在西庇阿之后的罗马年轻一代将领们灵活机动的战术面前，他们的军队只剩下失败之路。当罗马人因为汉尼拔而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在贪图享乐。结果，安条克在仅剩的500名骑兵的保护下，乘船逃回了小亚细亚。

没有人认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安条克虽然打了败仗，却是在本国领土以外的战场上。罗马有必要在亚细亚，也就是安条克的领土内，与安条克展开会战，最终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横渡亚细亚。尽管对手输给了自己，但是毕竟这个对手是叙利亚，是希腊诸国中最大也是最强的国家。为此，罗马决定抛出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第二年，即公元前190年，罗马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派到了叙利亚战场。

安条克为了在亚细亚的土地上一雪前耻，正在集结超过8万人的大军，并借此显示作为塞琉古王朝之主拥有最大片领地的气派。罗马事先得到了这一情报。此时的罗马，无论怎样努力，最多只能派出3万人的军队。万一敌人的总指挥是汉尼拔，对罗马来说，情况将非常不容乐观。因此，他们不得不抛出西庇阿这张王牌。

四年前的公元前194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第二次当选执政官。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认为紧急事态已经解除，于是，恢复了从前的体制。同一个人在10年内，不得两次就任执政官。罗马采用的寡头政体，是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一方面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个人手中，同时，通过最大限度地使用统治层的少数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苦战汉尼拔的年代里，罗马不得不对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幸运的是，那一切已经成为过去。

元老院不能破例推荐西庇阿再次就任执政官，于是，决定采用第二

次布匿战争中，曾经对费边用的方法。费边曾经连任两届执政官，这在罗马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第三年，元老院没有理由让他再次连任，于是推选了费边的儿子就任执政官，费边作为参谋随行。总指挥权事实上由费边掌握。

现在，元老院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既然不能推荐西庇阿，就让他的兄长路奇乌斯就任执政官，西庇阿作为参谋随行好了。但是，路奇乌斯是个非常平庸的人，作为候选人，他几乎没有可能当选执政官。于是，元老院公开宣称，推荐他为候选人是因为要派遣他伟大的弟弟西庇阿随军出征。所以，市民大会同意路奇乌斯担任执政官。该年度的另一位执政官是雷利乌斯，作为西庇阿的左膀右臂，曾经和西庇阿一起，从西班牙一直打到扎马。看得出来，直到这个时期，西庇阿对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依然有影响力。

这一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已经45岁，作为执政官兄长路奇乌斯的参谋，随军队离开了罗马。军队首先沿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目的地是布林迪西，全军将从这里离开意大利。西庇阿离开罗马的时候，士兵数只有步兵1.3万人，外加骑兵500人。计划到达希腊后，与前一年在德摩比勒隘口大败安条克的罗马军会合。但是，得知西庇阿多年后再次出征的消息，曾经的部下早已等候在沿途，志愿加入西庇阿的军队。为此，士兵数增加了2000人，此外还有50艘战船。

后世的我们受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影片的影响，一说到罗马军队，往往以为参加军队的只有罗马人，在战场上作战的也只有罗马人。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像罗马人那样，会吸纳其他民族参加自己的军队共同作战。当然，总指挥权掌握在罗马人手中是事实。还有，罗马市民兵一直都是主力也是事实。但是，大多数时候，罗马军队是一支“多国部队”也是事实。在意大利境内，有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及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参加；在非洲有努米底亚人参加；在希腊，因为敌人是马其顿，所以有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参加等等。

形成“多国部队”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一时期，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罗马市民权拥有者，也就是从17岁到60岁的罗马市民的绝对人数非常少，甚至不足30万人。还要减去无产者的人数。因为在罗马，服兵役等于市民的直接税，无须缴纳直接税的无产阶级不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再加上，17岁到45岁的市民虽然是现役市民兵，但是，罗马不能让所有这些人连续数年都在服兵役。罗马必须有效地利用这有限的兵力。

第二个原因是希望通过抗击共同的敌人，使同盟诸国市民从心底里产生与罗马同命运的一体意识。

此外，罗马人也知道，保障治安，建设公路和殖民城市，“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也是最好的防御。

因此，与行省相比，罗马人更喜欢同盟关系。因为，行省需要缴纳租税却没有提供兵力的义务，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不需要缴纳租税和年贡，却有义务提供兵力参加作战。现代研究者提到的“稳健的帝国主义”，既符合这一方针的推动者西庇阿的性格，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罗马的实际需求。

事实上，如果在附近没有同盟者的话，罗马不可能进军东方，与东方大国叙利亚作战。在远征东方，与叙利亚国王作战的时候，除了来自罗马联盟加盟国的士兵，罗马军还有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和帕加马、罗得岛等同盟者。而且，在希腊，马其顿一手担负起了罗马军远征之际的军粮补给。在横渡到亚细亚以后，这一任务由帕加马接了过去。

横渡到希腊以后，西庇阿没有利用军队的威力一意孤行。在与叙利亚国王决战前，他必须避免兵力遭到损失，为此，他展开了外交攻势。扎马战役胜利者的名声在这个时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对埃托利亚人。埃托利亚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作为希腊民族之一的这个部族，在叙利亚国王于德摩比勒隘口被罗马军战

败逃回亚细亚后在希腊被彻底孤立起来。但是，他们的居住地是希腊中部一带。罗马军前往亚细亚，只要不走海路，这里是必经之地。西庇阿没有动用武力试图强行突破他们，而是决定把他们笼络过来。

只是埃托利亚人的罪孽实在太深重，当着其他同盟国的面，马上与他签订和约不是明智之举。因此，西庇阿和他们签署了6个月的休战协议，理由是为了展开和谈。他要求埃托利亚方面派代表前往罗马进行谈判。对西庇阿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与意大利之间有一条安全的补给线。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协调与马其顿国王之间的关系。

他派去了属下年轻的武将格拉古作为使节。格拉古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奴隶军团勇敢战斗的老格拉古的儿子。西庇阿本人则在马其顿方面提供军粮和武器的“事务层面”达成共识后，为了表示感谢，专程前往马其顿首都佩拉拜访了国王。

菲利普和西庇阿年龄相仿。他们一个是承认罗马霸权的国家的国王，一个是霸权国家鼎鼎大名的统帅。据说，他们超越了这样的关系，在一起度过了亲密友好的时光。尽管已经人到中年，但是，西庇阿依然不失年轻时豁达、平易近人的特点，连性格并不外向的菲利普也能够向他敞开了心扉。就这样，在横渡亚细亚前，西庇阿首先确保了自己队伍的稳定。

因为中间隔着爱琴海，所以，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之间的战争始于海战，目的是确保海路通畅。

这年夏季，罗马舰队与罗得的海军会合后，与叙利亚舰队展开了战斗。指挥叙利亚舰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汉尼拔。这场海战两军都投入了100艘战船。

不知道是因为汉尼拔不擅长海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叙利亚舰队输了这场战斗。后来，双方又发生了一场海战，结果又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二次海战中，指挥叙利亚舰队的不是汉尼拔。但是，由于第二次海战的失败，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失去了迄今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爱琴海的制海权。通向亚细亚的道路在罗马军队面前打开了。

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后，西庇阿和罗马全军就要开始南下。这时，叙利亚国王派来的求和使者到了。原来，安条克向黑海沿岸的比提尼亚国王请求支援，遭到拒绝后，失去了仅靠叙利亚一国与罗马作战的决心。这是西庇阿外交策略的一个成果。因为西庇阿事先已经带信给比提尼亚国王，说服他不要追随叙利亚。

叙利亚国王的使者就和谈问题，提出了叙利亚方面的条件：

一、叙利亚放弃对小亚细亚地区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希腊城邦的领有，撤出军队，就像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从希腊撤军一样。

二、赔偿罗马军战争费用的一半。

罗马军举行了作战会议，执政官路奇乌斯担任议长。会议认为这些条件不够充分，于是提出了罗马方面的条件：

一、无论和罗马是否有同盟关系，叙利亚国王全面放弃爱琴海全域和小亚细亚西岸所有希腊系城邦。

二、为了在希腊系城邦和叙利亚领土之间设立中立地带，叙利亚军撤离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全域。

三、作为战争的挑起者，叙利亚国王全额赔偿战争费用。

对于这些条件，叙利亚国王的使节回答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按

照国王的命令，要求与西庇阿单独会谈。因为，躺在病床上的西庇阿没有出席作战会议。

见到西庇阿后，叙利亚使节转达了国王的意思，并说叙利亚将无偿释放之前的海战中被叙利亚俘虏的西庇阿的儿子。希望利用西庇阿的威望，放宽和谈条件，还答应将献上高额谢礼。

对于送回自己年轻的儿子，西庇阿表示感谢。但是，他没有接受谢礼。他说，作为送回儿子的回礼，也作为朋友，他要送给国王几句忠言。他说，与其在战场上解决问题，不如按照罗马方面提出的条件，订立和约，这样对叙利亚国王更有利。然而，安条克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罗马军队于是再次开始南下。叙利亚军开始北上。从小亚细亚西岸的埃菲索斯镇进入内陆的地方是马格尼西亚平原。这里成了两军遭遇的战场。

原本汉尼拔和西庇阿有可能在马格尼西亚会战中再次相遇，却因为历史上并不少见的阴差阳错，使得这两位名将无缘二度交锋。

西庇阿因病没有参加战斗，汉尼拔被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远远调离了战场，因为安条克没有能力用好汉尼拔，同时因为汉尼拔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指挥。

但是，从规模上来看，罗马军队在东方的第一场大战符合会战的条件。其时，以马其顿雇佣兵为主力的叙利亚军队，加上从叙利亚全国征集来的士兵，组成了一支6万人的大军。此外，这支队伍还有54头大象。

在另一方面，以罗马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除了阿卡亚同盟，还有来自马其顿的希腊士兵，来自帕加马、罗得、努米底亚的骑兵，共3.4万人。此外，还有努米底亚送来的16头大象。

尽管罗马方面的兵力只有叙利亚的二分之一，但是，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罗马。这场会战的两军指挥都是二流战术家，都没有太出彩的战术。罗马军队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将官们的战法灵活机动。罗马将官们熟悉西庇阿的战术，就连只负责指挥2000人的将官也能运用自如，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这种情形与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之间进行会战时的情形一样。当时，因亚历山大大帝而闻名的马其顿重装步兵依然非常强悍，但是，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只有面对正面进攻的敌人时才能发挥出其威力。因为只要他们围成团，就会竖起长长的枪，变成一只巨型的刺猬。从正面进攻，很容易被刺猬刺到。但是，被认为东方最强大的他们，对于来自侧面和背后的进攻就显得软弱无力。以西庇阿为榜样的罗马年轻指挥官们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弱点。巨大的刺猬无法用上他们的刺，很快被击破。

叙利亚军队大败，步兵和骑兵的阵亡人数共计达3.3万人，罗马军队的损失不过324人。

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勉强逃到了内陆的萨迪斯。塞琉古王朝尊称大帝的安条克成了没有士兵的国王，彻底失去了提和谈条件的资本。国王派出使节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这时，西庇阿已经病愈，他对使节说：

> 我们罗马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在完成诸神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已。因此，我们知道，无论诸神交给罗马人的事情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结果好的时候，我们不会狂妄自大，结果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灰心丧气。如果你要了解我们罗马人的性格，最好的证人就是在你们阵营中的汉尼拔。
>
> 罗马军队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细亚的时候，正是罗马军队与叙利亚军队面临战斗冲突的时候，双方都表示了和谈的意愿。遗憾的是，叙利亚国王没有接受和谈的条件，这才导致了会战的发

生。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情形。

双方的关系已经从对等的关系变成了胜者与败者的关系。但是，罗马人依然愿意用之前同样的条件，与叙利亚国王进行和谈。

第一，罗马把叙利亚看成是同盟国，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自治，罗马军全部撤离叙利亚，前提是叙利亚军必须全部撤离欧洲。

第二，在亚细亚，以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为界，叙利亚承诺不侵犯西北部。

第三，作为战争赔偿，向罗马支付1.5万塔兰特。（这里的塔兰特是埃维亚岛的塔兰特，与阿提卡地区的塔兰特相比，只有三分之二的价值。所以，与迦太基的1万塔兰特的赔偿金差不多同等价值。——作者注）

1.5万塔兰特中，500塔兰特在和约签订之时付清，2500塔兰特在和约内容取得罗马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同意，和约开始生效后支付。余下的1.2万塔兰特以12年为限，分期付清。

第四，向帕加马支付400塔兰特的赔偿金。

第五，为了确保两国继续维持和平，作为人质，由罗马方面挑选20个叙利亚人的子弟送到罗马。

第六，对罗马来说，叙利亚国王保护下的汉尼拔是个危险人物。因此，把他和埃托利亚的3位首领引渡到罗马。

说完这些条件后，西庇阿又补充道：一旦和约签订，叙利亚就是罗马的同盟国。今后，罗马将为尊重叙利亚国王和王国的安全负起责任。

叙利亚国王安条克接受了所有条件。只是，汉尼拔尚未被引渡到罗马前已经逃亡，最初的目的地是克里特岛。西庇阿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没有派人追捕。

汉尼拔大概觉得漂浮在地中海的岛屿克里特并不安全，不久又亡命

投奔了位于黑海沿岸的比提尼亚国王。罗马的势力发展到这里已是6年以后的事了。

始于公元前26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和公元前218年至前202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降伏了西地中海强国的迦太基。公元前197年和前190年又分别成功制伏马其顿和叙利亚这两个东地中海世界的强国。埃及在当时盛况不再，在布匿战争期间已经成为罗马的友邦。

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已经完全属于罗马。首都罗马超越了罗马联盟盟主罗马的首都，变成了“世界的首都”。既然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各王国及城邦一旦有问题，就会派代表前来罗马请愿，要求霸主罗马作裁决。

作为战术家，西庇阿或许不如汉尼拔，但是，作为政治家，我认为他要优秀得多。

请读者朋友回顾一下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讲到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那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在罗马社会中根深蒂固。保护与被保护是相互的，保护者有时候也会变成被保护者。这就是罗马人非常现实又极其灵活的人际关系。

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80年前后，西庇阿在元老院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时期，西庇阿推行并实施的对外关系，我想大概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保护者当然是已经成为霸权国家的罗马，被保护者是承认罗马霸权、并在罗马霸权下享受独立和自治的同盟国。罗马的责任是保护这些“被保护者”们。

而且，就像罗马人社会中这一关系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是“信义”一样，罗马和同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样既不是榨取，也不是利用，一定是

信义。因此，后世的研究者们，特别是对统治的概念非常敏感的英国研究者们，把这一时期罗马的对外政策称做是“稳健的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有缺陷，那就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必须想法一致。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下列情形，这种关系就无法成立：

保护者说：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绝对保证秩序和安全。

被保护者反驳：自由，不然，死。

人类从西庇阿时代算起已经过去了2200多年。直到现在，关于这两者想法的对或错尚无定论。

“稳健的帝国主义”在与其想法不同的“被保护者”们发生对立之前，罗马人内部先有了变化。这种变化的表面化的起因是这一方针的首倡者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下台。

审判西庇阿

一个成绩骄人因而位居最高地位的人，很少能避免别人的嫉恨。只是，这种嫉恨不会一开始就以弹劾或中伤的方式表面化。嫉恨往往深藏在心里，等待时机的来临。这种时机往往就在对方暴露出软肋的时候，即便其实质原本无伤大雅。丑闻从来不会侵扰强者。

西庇阿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长年占据元老院“第一人”的位置。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总被人们认为是罗马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他的软肋就是健康状况的恶化。

公元前187年，西庇阿打败叙利亚，回到国内后，遭到了两位护民官的检举。最初，检举的对象不是西庇阿，而是他的兄长路奇乌斯。理由是，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在和约签署当时支付的赔偿金500塔兰特用途不明。因为前面提到过的原因，罗马军队在叙利亚战场的最高司令官，虽然事实上是西庇阿，表面上却是路奇乌斯，西庇阿只是参谋。因此，表面上的责任人路奇乌斯成了被检举的对象。

西庇阿从一开始就知道，被送到被告席上的虽然是兄长路奇乌斯，但是，检举者真正的目标是自己。

对于检举者来说，他们并不在乎500塔兰特的用途如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西庇阿赶下台。以公款用途不明作为检举理由，一方面可以让元老院内的西庇阿派不得不沉默，同时，也最容易引起大众的关心。作为赶走政敌的策略，这确实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战术。

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激起西庇阿的愤怒。本来他就比常人自尊心更强，再加上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使他的忍耐力大大降低。

元老院传讯证人的当天，路奇乌斯拿着军团出纳账簿来到会场，西庇阿和他一起也走进了会场。看到兄长翻着账簿准备解释，西庇阿阻止了他，并在元老院全体议员面前，一把夺过用纸草纸订成的厚厚的账簿，嚓嚓几下就撕了。然后对着坐满元老院会场的人们，开口说：

“现在有人要检举我，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我不认为听信他们起诉的理由是罗马人应有的行为。不要忘记，如果没有西庇阿，检举他的这些人岂止是检举的自由，甚至连肉体之身也许早已不在了。”

战争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评价西庇阿此时的言论和做法，说政治上极不明智，却是人类的本性。

西庇阿作为共和政体罗马的市民，并不要求特别的地位，如王位。因为在征服西班牙的时候，曾经有原住民主动向他献出王位，但是，他拒绝了。他要求的只是希望大家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为祖国作出的贡献，而不是以追究500塔兰特的用途为名，试图赶他下台。

然而，扎马会战已经过去了15年。罗马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性格没变。人们把他的这番话看做是他傲慢的表现。此时的西庇阿，虽然年仅48岁，却因病痛的折磨，难掩老态。

反西庇阿派乘机掉转方向，不再追究路奇乌斯有关赔偿金用途不明的事情，把检举的目标明确指向了西庇阿。会场内，从传讯证人变成了审判。

元老院会场变成了审判西庇阿的地方。第二天，两位护民官开始揭发被告西庇阿。当然，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两位护民官的背后，有人在操纵事态的发展。他就是一直反对西庇阿的反西庇阿派领袖马尔库斯·加图，即历史上的老加图。

两位护民官轮流发言，弹劾西庇阿。他们从公元前205年，即17年前，在西西里越冬的那个时期开始揭发。

当时，西庇阿作为执政官，正在西西里一心一意地准备远征非洲。有一天，西庇阿得到一个消息，说意大利南部城市之一的洛克里可能要揭竿起义，摆脱占领了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汉尼拔的控制。于是，西庇阿立刻率领3000名士兵，紧急赶往洛克里，与洛克里城中的反汉尼拔市民里应外合，成功收复了汉尼拔据点之一的港口城市洛克里。

由于执政官西庇阿的任地在西西里，所以，这次行动是他的一次越权行为。在当时，以费边为首，相当一部分人向他提出了质疑。后来，因为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使人们淡忘了他的这一过错。相反，人们盛赞西庇阿是救国英雄。再加上，洛克里事件虽然属于

越权行为，但是，收复洛克里毕竟是战略上的一次成功。所以，后来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然而，经过了17年以后的现在，检举者却旧事重提。护民官继续说：

> 叙利亚国王无条件释放了西庇阿被俘的儿子，让人很难不认为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交易。请问，真的是无条件吗？
>
> 还有，安条克有事情总要求直接和西庇阿谈判，从不理会其他人。我们知道，在叙利亚战场，西庇阿的职位不过是参谋。然而，他却撇开总司令官路奇乌斯，也不理会罗马的市民大会才是决定战争或战或和的主体，他的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除了独裁又是什么？
>
> 西庇阿自以为是的言行早在西班牙、在高卢、在西西里、在非洲就已经很引人注意了。这次在希腊、在叙利亚，同样表露无遗。
>
> 西庇阿有什么理由参加叙利亚战线？难道不是为了向东方所有王国的国王、所有民众显示，霸权国家罗马的主人就是他，是他一个人在支撑罗马吗？他参加这次战争，不就是为了向其他国家的人们炫耀，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事实上不过是他西庇阿的影子吗？就好像要告诉人们，只要他一开口，罗马元老院就会按他的意思达成决议，只要他一眨眼，罗马市民就要驰骋沙场。

像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检举，与其说是检举，不如说是弹劾。审判的第一天，在两位护民官的轮番揭发中结束。第二天由被告为自己作辩护。

第二天，两位护民官早早来到会场，在座位上等候被告的到来。在前一天的检举中，西庇阿只是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反驳，这让两位护民官底气十足。这一天，元老院会场挤满了人。人们纷纷赶来，准备听一听西庇阿将如何为自己辩护。但是，西庇阿没有作辩护。

这一天，西庇阿迟到了。他带着一大群朋友和被保护者（支持者）

来到会场，挤满会场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他沿着这条通道向护民官走去，在护民官的座位前，西庇阿停下脚步，回头环视了一圈会场。会场内一片寂静,人们在静静地等待他开口。病痛还没有伤及他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洪亮的声音：

> 两位护民官及罗马各位市民，今天，是我在非洲扎马与汉尼拔和迦太基军队作战，有幸取得胜利的第15个纪念日。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建议让我们忘掉一切争执，大家团结一心，向诸神奉上我们的感恩之心。
>
> 现在，我就要出发前往卡匹托尔山，向供奉在那里的、以最高神朱庇特和朱诺女神及密涅瓦女神为代表的诸神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和参加那次战役的所有罗马市民为祖国罗马的自由和安全竭尽全力的机会。
>
> 各位，如果你们愿意，我诚心邀请各位与我同行。希望各位和我一样对诸神心怀感激之情。因为从我17岁开始到已显老迈的现在，是罗马的各位市民给了我打破常规的机遇，让我有机会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说完，没等人们开口回答，西庇阿就离开了会场。他的身后，不只是他的朋友们和被保护者们。因为所有罗马人终于都想起来了。元老院议员站起了身，旁听的市民们离开了会场，连书记员也放下了铁笔，跟随在西庇阿之后。会场里只剩下两位护民官和加图三个人。

以西庇阿为首的罗马市民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遮住了从古罗马广场前往卡匹托尔山的平缓的坡路。

历史学家李维写道：这一天，身着托加的西庇阿已经不见昔日的风采。他脑袋秃顶，身体羸弱。但是，市民们对他的敬爱之情，胜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从非洲凯旋时，人们向三十几岁的年轻胜将发出喝彩声，并送上鲜花。李维还说：

“这一天，成了西庇阿灿烂辉煌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西庇阿离开了罗马。在利特卢诺的别墅里过起了隐居生活。这座别墅是以前就有的，位于前往那不勒斯途中的沿海地区。他没有理会元老院的传唤，去接受审判。

审判当天，兄长路奇乌斯代替西庇阿来到元老院，请求元老院因健康的原因允许西庇阿缺席审判。但是，护民官的态度非常强硬：

> 元老院及各位市民，现在，你们亲眼见识了西庇阿的妄自尊大。在他担任总司令官、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你们一直被他看不起。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他仍然蔑视你们。不接受传唤就是无视元老院和市民。正是这无耻的西庇阿，才是共和政体罗马的耻辱。

护民官要求全体议员决定再次传唤西庇阿。还说，如果他不答应，就强行把他带来。

这时，年轻议员格拉古站了出来。人们以为格拉古会声讨西庇阿。格拉古是坎尼会战以后，在罗马苦战的时期，与费边和马尔凯鲁斯共同战斗过的一位将领的儿子，是曾经率领不服别人统率的奴隶军团，艰苦奋战，直至身亡的前执政官的儿子。罗马人中，有很多人认为，抗击汉尼拔的人应该不只是西庇阿一个人。他们常常因为人们把罗马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看做是西庇阿一个人的功劳而心怀不满。格拉古也是其中一人。

然而，格拉古说出来的话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他试图说服元老院议员，没有必要继续追究西庇阿：

> 在诸神的庇护下，西庇阿为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共和国

罗马，他登上了最高的地位，深受人们的感激和敬爱。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竟然想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竟然想把他押到演讲坛下，强迫他倾听我们对他的弹劾和声讨，甚至想让他接受无心少年的恶骂。

这种事情不仅玷污了他西庇阿的名誉，更是玷污了我们罗马市民的名誉。

格拉古的这一席话打动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心，他们决定停止弹劾西庇阿。

这一年到公元前183年的4年间，西庇阿就在利特卢诺的别墅里度过，没有再走近罗马一步。此后，成功挤走政敌西庇阿的加图把持了罗马。

西庇阿把自己的女儿科尔涅利娅嫁给了公然为他辩护的年轻的格拉古，生下了两个儿子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在我计划的《罗马人的故事3》中，他们将作为主人公正式登场。他们是名将西庇阿的外孙，他们试图从根本上改革罗马社会。

公元前183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在利特卢诺的别墅去世，享年52岁。

巧的是，同一年，汉尼拔也在远离意大利，同时也距离迦太基非常遥远的黑海沿岸国家比提尼亚去世了。原来，罗马军队的一个队长急于立功，向比提尼亚国王提出了引渡汉尼拔的要求。汉尼拔获知这一消息后，喝下了片刻不离身的毒药。就这样，绝世战术家在64岁的那一年走向了死亡。

汉尼拔最好的弟子，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西庇阿，拒绝葬在阿皮亚大道沿线的西庇阿祖祖辈辈的墓地里，原因是墓地在罗马境内。西庇阿留下遗言，直译过来是这样的：

“不知感恩的祖国，你们有何资格拥有我的遗骨。”

就这样，西庇阿和汉尼拔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经历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罗马人，除了身壮如铁，一直活到84岁的加图，已经没有第二个人了。罗马就要进入新的时代。

顺便提一句，西庇阿下台的导火索是用途不明的500塔兰特，直到最后，这些钱的去向也没有弄清楚。好像是兄长路奇乌斯在马格尼西亚会战后，在军团内举行了盛大酒宴，钱就用在此处。但是，证明西庇阿蒙冤，贪污公款的罪名得到平反、西庇阿的冤屈得到澄清是在西庇阿去世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弹劾西庇阿的主谋加图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要赶西庇阿下台呢？

当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作为一个“新人”，是从地方的平民出身成功跻身首都政界的人物。这位年轻人曾经是农民，是当地的大地主、贵族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发现了他，并把他推到中央政界的。这位年轻人学识丰富，而且能言善辩。瓦莱里乌斯想利用他与西庇阿所属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争夺主导权。

加图比西庇阿小1岁，在瓦莱里乌斯家族的支持下，顺利开始了他的事业。

公元前205年，当选财务检察官的加图前往西西里，视察正在为远征非洲作准备的西庇阿的营地，提出西庇阿率领的军团用钱太过随便，于是检举了责任人西庇阿。只是，没过多久，西庇阿就去了非洲，取得了扎马战役的胜利，成了救国英雄。为此，加图的检举不了了之。但是，处女作的重要性是为以后所有作品打基础的。这一原理并非只适用于作家，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政治家加图使出的手法是继续弹劾当时的实权者。

即使战场上的战绩辉煌，也难与西庇阿相提并论。更何况，加图的战场只是元老院的会场，他的“战绩”是靠辩论取得的。

加图的演讲技巧无人能及。他不像西庇阿，演讲的对象是奔赴战场的士兵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而他的演讲对象是元老院议员以及聚集在市民大会上的市民们。他用来吸引人们倾听他演讲的最好的方法有二：

首先是攻击他人，尤其是有势力的人；其次是迎合罗马人的性格，罗马人喜欢意外和幽默。

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制订了一条法律，即禁止奢华法。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取消这一法律的议题提到了日程上。从法律上来说，禁止奢华法这一法律，剥夺的是女人享受的权利。因此，加图反对取消这一法律。他的演讲是这样开始的：

“我不知道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人，上面还有妻子这个霸主。”

会场顿时响起一阵笑声。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元老院议员在人前与妻子亲昵，遭人检举，说他的行为有损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加图赞成这一检举。于是，其他议员问他说：“你和你妻子难道不接吻吗？”对此，加图的回答是这样的：

“当然接吻。但是仅限于打雷的时候，因此我非常喜欢雷鸣。”

场内又是一阵哄笑。不过，话虽如此，结果又是怎样呢？议员们虽然喜欢听加图演讲，因为幽默，很有意思。但是，听归听，投票的时候则另当别论。因为战争已经结束，禁止奢华法的法律最终还是被取消了。因为在人前和妻子亲昵遭到非议的议员，后来还是元老院议员。加图令人捧腹的演说出乎意料地与投票没有关系。不过，只有两件事情上

他没有用他的幽默，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一是成功挤走西庇阿；二是迦太基灭亡成为现实。

西庇阿精通希腊语，有很高的希腊文化教养，非常人所能及。他对希腊的热爱众所周知。但是，加图讨厌希腊，而且，他对希腊的厌恶与西庇阿对希腊的热爱同样出名。

他憎恨希腊文化流入罗马，认为这样有损罗马人原有的质朴刚毅。但是，在古罗马广场建起的第一座希腊式会堂，是他担任财务官时提议的。既然希腊的建筑式样好，当然可以引进。但是，希腊文明的精神再好，也要拒绝。这就是加图的想法。这就好像日本精神与西方文化不能融为一体一样。他极力提倡，罗马人不需要希腊哲学、美术和诗文。移居大国罗马的希腊人，除了希腊语教师，应该禁止其在其他领域渗透。

但是，他的强烈主张只是逆时代潮流而已。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出身非洲的奴隶，曾经有学识的人聚在一起、非常引人注目的西庇阿圈子，对罗马下一代的影响非常大。尽管加图成功赶走了西庇阿，却未能成功逆转时代的潮流。

我认为这个男人是反西庇阿阵营中唯一坚定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是真心担心西庇阿身上表现出来的罗马新思潮。

首先，他坚信以西庇阿为代表的人们倾心于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将来有害。

其次，他相信始于西庇阿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会给罗马共和政体带来害处。

在废除王政，由少数统治者决议的寡头政体下，个人主义抬头会导致王政的抬头，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西庇阿本人没有这种想法，但是，他的存在本身就隐藏着这种危险。对加图来说，本来很可能以一个局外

人的身份终结一生。但是，既然现在有了机会，他自然更看重罗马的共和制度，希望罗马一直维持这种制度。历史上，有很多局外人热衷于维护旧的体制，加图是其中一例。他从心底里相信，罗马共和政体的有效性，因为该政体的基础是元老院不足300人的精英商议的制度，他相信为了维护这一政体，毁灭偶像是神授予自己的天命。

加图反对西庇阿的第三个理由是瓦莱里乌斯家族反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西庇阿影响下的元老院的对外政策，也就是反对西庇阿实施的“稳健的帝国主义”。瓦莱里乌斯家族是加图的后台，他们试图利用他的能言善辩，击败西庇阿家族。

通过与迦太基、马其顿及叙利亚之间的和谈，我们可以看出，“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是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的：

第一，战败国承认罗马霸权，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因此，没有罗马的许可，不得发动对外战争。

第二，战败国的军备力量控制在自卫的水平上。

第三，罗马承认战败国的国内自治，因此，战败国国民不承担向罗马缴纳租税的义务。

根据这些内容，战败国不失为独立的国家，不是罗马的行省。所以，罗马在签订和约的同时，从这些国家撤军。

但是，西庇阿并非对所有战败国都采用“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即使在西庇阿的威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时期，罗马采用这一路线的也只有迦太基以及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和叙利亚而已。

像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因为帮助过汉尼拔，所以，罗马对他们实施的就不是“稳健的帝国主义”。还有在迦太基势力被逐出后的西班牙，罗马也没有采用“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屈服于罗马的武力后，高卢人

和西班牙人都没有得到独立的同盟者的待遇。他们成了罗马的行省，受罗马派遣的总督统治，有义务每年向罗马缴纳相当于一成收益的租税。相应的，罗马负责以铺设公路网为首的“完善基础设施”和防御，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化”。

那么，在地中海西部和东部，罗马人对失败者的待遇为什么会不同呢？

研究者们说，高卢人和西班牙原住民是蛮族，所以，罗马人要对他们不客气。迦太基以及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叙利亚人在当时比罗马人的文明程度高。所以，罗马对这些文明下的众生非常宽容。

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从希腊人占多数的西西里变成行省的过程以及后来的罗马史进程来看，我认为理由不仅于此。

当时，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和西班牙原住民部族众多，始终没有统一起来。同时，作为文明的民族，生活在西西里的希腊人城邦林立，相互间不断抗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状态下，罗马很难确定谈判对象。

没有明确的谈判对象，外交关系就无从建立。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周边，高卢民族没有统一的一个国家。西班牙在殖民者迦太基人离开后，各部族也没有统一。如果罗马打算放弃这些地方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想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我想办法也就一个，那就是行省化，即“严厉的帝国主义”。这才是这个时期，受西庇阿影响的罗马元老院在地中海东部和西部采用不同路线的主要原因。

稳健的帝国主义因为不驻扎军队，所以，只要对方心有不甘，就有失败的危险。可以认为，加图与西庇阿唱反调的真正原因是一旦这一路线失败，罗马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加图没有忘记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与迦太基签署了条件优厚的和约，结果，仅仅过了20年，第二

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攻入意大利的那一年，加图16岁。

同年代的西庇阿，因为迦太基人失去了父亲和叔父，岳父也死在迦太基人的手中。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他沉湎于过去，他只会一往直前。相反，加图总是沉湎于过去，以此来纠正当下自己的行为。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两个人的对立，我认为都是宿命的。

与加图相比，我更喜欢西庇阿。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西庇阿死后仅仅4年，加图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公元前179年，承认罗马霸权，并接受罗马“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死了，继承王位的是他的长子珀尔修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是坚定的反罗马者。

马其顿开始加强军事力量。消息从东方传来，罗马立刻绷紧了神经。令人担心的是，马其顿新国王珀尔修斯不仅自己着手增强军事力量，还开始煽动希腊各城邦举旗反对罗马。战争风云再次遮住了希腊的上空。

第八章

马其顿衰亡

（前179—前167）

假如，不，几乎可以确切地说，从输给罗马的公元前197年到前179年去世的18年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心中，始终纠结于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具备对现实很强的洞察力，因而他认识到，马其顿王国只有在新兴国家罗马的霸权之下才能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抗拒这一现实。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下属分割了帝国，建立各自的王朝，已经过去了120年。但是，在希腊的这些王国的眼中，世界只有自己生活其中的东地中海世界。对他们来说，地中海的西方算不上是世界。虽然，西地中海也有强国迦太基，但是，与西方相比，他们和马其顿、叙利亚、埃及等东方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希腊诸国完全有可能乘机抓住这两个国家激战正酣的有利时机，却没有采取任何举动。当罗马因坎尼会战失利、国家危机四起的时候，只有马其顿向汉尼拔提出了共同作战的要求。那也是因为马其顿在围绕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地区与罗马有直接接触的唯一国家。布匿战争的40年间，是消灭新兴罗马的最佳时机，但是，大国叙利亚和埃及都无条件接受了罗马要求保持中立的请求。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地中海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只是在相互不断联姻或战争中度过了120年。当他们醒悟的时候，罗马已经站在了他们的背后。

120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无论是希腊各城邦还是希腊各国，面对罗马，都没有可能结成统一战线。

公元前197年，马其顿军队败于罗马军队。当时，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和位于希腊诸国中间位置的帕加马加入了罗马军队。叙利亚保持中立。

公元前190年，叙利亚军队败于罗马军队。此时，埃托利亚和斯巴达以外的希腊人以及马其顿王国加入了罗马军队。帕加马和罗得也追随罗马，打击附近的敌人叙利亚。埃及与罗马有同盟关系，苦恼于叙利亚一次次的进犯。因此，在当时，埃及人大概是怀着相当不错的心情坐视叙利亚国王的失败吧。同时代的希腊人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经这样写道：

> 希腊民族不应继续希腊人之间的争斗，我们希腊人应该团结起来，时刻关注发生在地中海西方的战争。
>
>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岂止是局部战争，应该说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是生活在希腊世界的希腊人业已习惯的争斗无法相提并论的。罗马在战争中打败迦太基，一跃成为军事大国，其军队好比高效、精巧的战争机器。可以想象，这个战争机器迟早会进入地中海的东方。
>
> 我们希腊人相互抗争，只是为了得到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权。其结果，希腊民族失去了这一决定权，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一权力。

有权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意味着独立与自主。或许，和波利比乌斯同时代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对现实的认识也基于这一点吧。

40岁的那一年被罗马打败后，他不得不在承认罗马霸权的基础上，与罗马缔结同盟关系。在其后的18年里，他从来没有揭竿而起反对罗马，哪怕连一次也没有。我想这应该归因于他的谨慎吧。因为这样，他可以避免最终失去对事物的决定权。

波利比乌斯和菲利普是同时代的希腊人。但是，波利比乌斯不过是阿卡亚同盟的加盟城邦之一、阿卡迪亚的一个有势力者而已。与他不同，菲利普是希腊世界的强国之一、马其顿王国的国王。身为王者，他一定心怀自豪，因此，不得不根据对现实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他

一定心有不甘。从40岁臣服于罗马的那一年直到去世的18年间，他的内心始终很复杂。这应该就是原因。

菲利普非常喜欢次子迪米特里厄斯的才能和性格，而且，迪米特里厄斯又是正室夫人所生。所以，对于自己死后，是否让妾生的长子珀尔修斯继承王位表现出相当犹豫。

迪米特里厄斯作为人质，曾经在罗马生活很久。因为罗马人心目中的人质实际上相当于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所以在罗马，他住在有势力的人家里，接受教育。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罗马者。看到儿子这个样子，父亲的内心非常复杂。长子珀尔修斯因为是妾生的，所以对自己能否继承王位一直心存不安。于是，他决定利用菲利普的这一矛盾心理。

珀尔修斯在父王的耳边吹风说，迪米特里厄斯准备和罗马秘密订立条约，把马其顿出卖给罗马。国王虽然心存几份疑惑，但还是听信了他的话。年轻的王子被认定是叛国者，被判死刑，饮毒而亡，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不久，迪米特里厄斯的叛国罪得到昭雪，但是，已经于事无补。马其顿国王菲利普非常后悔杀了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身心备受折磨，于58岁那年，离开了人世。

珀尔修斯继承了王位。他从父亲菲利普身上继承了作为马其顿国王的自豪感，但是，没有继承对现实的洞察力。他是典型的希腊式君主，娶了叙利亚国王安条克的女儿为妃，又把妹妹嫁给了比提尼亚国王。在珀尔修斯的统治下，马其顿王国公然着手增强军备力量。对罗马说是为了防止北部的凯尔特人入侵。对此，这虽然引起了罗马的警觉，却选择了静观其变。然而，不到五年的时间，马其顿王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让人很难相信只是单纯为了抵御北方蛮族的入侵。

军备力量增强后，马其顿把矛头直指东方国境线接壤的帕加马王国。帕加马火速派出使者向罗马求援。罗马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事。名为视察团的特使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马其顿与珀尔修斯交涉，就像海浪一波推一波似的。但是，珀尔修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明确的答复。其间，帕加马国王的弟弟为了阻止马其顿的侵略行为，直接到访罗马，请求罗马军事援助。珀尔修斯则开始策动希腊诸城邦的不满分子。

罗马已经看出战争将不可避免，决定对马其顿采取行动。首先向希腊及亚细亚各国派去使节。在希腊，西部的伊利里亚地区、中部的埃托利亚各同盟城邦以及雅典和阿卡亚同盟各加盟城邦都表示站在罗马一边。帕加马王国和罗得，甚至珀尔修斯王妃的娘家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也答应站在罗马的一边。对于在希腊的第二次军事介入，罗马的态度慎而又慎。

珀尔修斯的妹夫比提尼亚国王也表明立场，保持中立。珀尔修斯彻底孤立了。但是，马其顿是一个矿藏丰富、农业发达的国家。作为马其顿军队主力的重装步兵名声在外，再加上从东方全域招募来的雇佣兵，马其顿的战斗力也达到近5万人。

罗马还是采用多国部队的形式。所有战斗力加起来只有3万人出头。不是罗马没有能力输送更多的兵力，而是不想过分大张旗鼓。因为马其顿王国并非直接攻打罗马，而且，公元前171年的这次军事介入与公元前197年的第一次军事介入不同。当时，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马其顿与汉尼拔结成了统一战线，企图从背后捅罗马一刀，所以，罗马有心要给马其顿“扎针”。

不知道是不是罗马人思想的反映，公元前171年，登陆希腊的罗马军在战斗中的表现非常消极，总让人感觉像是在窥视对方的态度。第二年的情形也一样，始终限于对峙和消极的小规模战斗。由于罗马送来的执政官一年一换，这让珀尔修斯认为罗马方面没有展开大规模作战的想

法，因而气焰更加嚣张。在与罗马军队的交战中，珀尔修斯甚至杀死了4000名罗马士兵。

至此，借用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描述，希腊人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 面对绝对优势的擂主，众人一致认为绝无可能取胜的挑战者，竟然出乎人们的意料，勇敢出击。看到这一情形，观众转身开始狂热地支持挑战者，痛骂擂主。

希腊诸城邦开始看好马其顿。波利比乌斯担任过骑士团团长的阿卡亚同盟，事先答应过罗马加入罗马军队参加对珀尔修斯的战斗。然而，看到交战双方力量出现变化，开始消极对待罗马的请求，迟迟不肯出兵。其他希腊人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反对马其顿的，开始冷眼观看罗马军队。

出现这样的情形，罗马知道自己不能再等闲视之。然而，公元前170年和第二年的公元前169年，罗马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

罗马有一个规定，率领两个军团以上的军队指挥官是执政官。在平时，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守。执政官在一年一度举行的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辅佐最高司令官即执政官手下的上级指挥官，在共和政体罗马，同样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一来，很难保证每次都能选出合适的人选。而且这个时期，罗马普通市民的心中，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派遣军队前往希腊。

但是，元老院知道希腊的状况已经非常危险，议员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于是，决定推荐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公元前168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

这一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62岁。迄今为止，他在希腊、叙利

亚、西班牙积累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取得过辉煌的战绩。他是坎尼会战时的执政官、在会战中阵亡的老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儿子。姐姐嫁给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所以，他又是名将西庇阿的妻弟。

埃米利乌斯家族和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都是罗马名门望族，实力不相上下。在爱好希腊文化方面，埃米利乌斯同样不亚于西庇阿。他为两个儿子请的家庭教师，除了希腊语教师，连雕刻家都是希腊人。只是，埃米利乌斯虽然是名门望族，经济却不富裕。所以，为了儿子们的将来，他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别人家做养子。一个在费边家，另一个是名将西庇阿的儿子的养子。

在西庇阿家做养子的这个儿子，是第三次布匿战争中促使迦太基灭亡的罗马军总司令官。这个儿子的名字中，有两个名门望族的姓，叫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在名将西庇阿之后，继承“西庇阿圈子”的也是这位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西庇阿圈子”是罗马希腊文化爱好者的中心沙龙，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经是这里的常客。

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知道自己当选执政官，作为罗马军总司令官将前往对阵珀尔修斯的战场时，在市民大会上提了个要求：

“大家选我一定是因为罗马需要将军对阵珀尔修斯。既然这样，我希望，除了战略战术，请各位把直属军官的人选权也交给我。”

这个要求不合常规，但是，市民大会同意了。于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挑选了能完全领会自己意图的男人们担任副官。其中，有在费边家做养子的大儿子、在西庇阿家做养子的小儿子、女儿的丈夫（加图的儿子）以及名将西庇阿的女婿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对罗马人来说，“士官学校”就是实战的战场。

这位时年62岁的将军受命解决希腊事态，首先从收集详尽的情报开始入手。在离开罗马前，对于希腊全域的地势、气候、希腊诸城邦的动

向、民心变化等等有关希腊的所有情报，他都已经了然于心。

他知道了率领马其顿军队的珀尔修斯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几岁，是典型的希腊美男子。他知道了许多希腊人把他看做亚历山大大帝再世。他也知道了这三年来，由于他在与罗马军队的战斗中英勇善战，希腊人的心正在不断向他倾斜。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认为，必须尽早给这个珀尔修斯以漂亮的一击。因为军事介入的时间拖得越久，对介入一方就越不利。

公元前168年6月，埃米利乌斯率领增补的军团离开布林迪西港，经由科孚岛，在希腊西岸登陆。登陆后的埃米利乌斯，一路横穿希腊中部，直指马其顿。这是一次急行军。对罗马军队来说，这样的急行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罗马军队需要在敌人进入马其顿山岳地带前，截住他们。罗马执政官登陆希腊的消息尚未传到珀尔修斯的耳朵里，埃米利乌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了珀尔修斯正在宿营的皮得纳平原。

对阵的两军兵力分别是马其顿方面4.4万人，罗马方面加上以前派到希腊的军队，仅有3万人。得知自己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珀尔修斯毫不犹豫地决定与罗马军队进行会战。

会战的前夜，发生了月食。埃米利乌斯年轻时担任过占卜官，他对这一现象非常了解。所以，事先告诉全军，傍晚6点左右到夜里9点，月亮会被吃掉，是正常的现象，无须担心。但是，马其顿军队没有这样的人才，看到月亮被吃掉，所有人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凶兆。会战尚未开始，士兵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

第二天一早，会战在皮得纳平原展开。从两军投入的兵力规模来看，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开战仅一个小时，胜负已经决出。原因是：一方面，看到月食的马其顿军队以为凶兆临头，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消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埃米利乌斯有得力的下属军官，他们对统帅的意图心领神会，使埃米利乌斯有机发挥各部队作用的

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包围、粉碎并彻底消灭了正面进攻的马其顿军队。

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对珀尔修斯采用的战术与公元前197年，弗拉米尼对菲利普采用的战术相同，都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战术，同时也是汉尼拔使用过的战术。追根溯源，还是菲利普和珀尔修斯敬仰的伟大的祖先亚历山大大帝始创的战术。

这是希腊诸国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一个例证。他们与其说是输给了敌人，不如说是输给了自己。

皮得纳会战的结果是，投入4.4万兵力的马其顿军队战死者达2.5万人，被俘6000人。相反，罗马军队的战死者人数不足100人。正像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写的那样，汉尼拔以后的罗马军队是高效而精巧的战争武器。

败将珀尔修斯逃回自己国家的首都佩拉城下。看到他回来，居民们关上了城门，无论如何也不肯打开。不得已，马其顿国王逃到了萨莫色雷斯岛。在这里，他同样遭到了背叛，被追踪而至的罗马士兵抓获。马其顿最后的国王被送到罗马，成为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凯旋仪式上的一个点缀，后来与家人一起在意大利的小镇阿鲁巴度过了余生。这是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度过隐居生活的地方。对于希腊三大王国之一的马其顿，罗马终于下了决心要消灭它。罗马的“帝国主义”开始一步步成熟起来。

这个时候，罗马还没有想过把希腊变成直辖统治的行省。为了起到警示的作用，只在支持马其顿军的70多个城镇实施抢掠，逼使部分居民为奴。包括波利比乌斯在内的1000位希腊高官，作为危险人物被送到罗马，安置在罗马有势力的人家里，过起了人质生活。波利比乌斯住进了埃米利乌斯的家里。

马其顿灭亡了。但是灭亡的只是王朝，王国的领土分裂成四个国家，以联邦的形式继续存在。罗马承认他们自治，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卫力量。只是要求他们把从前向国王缴纳的租税中的一半缴给罗马，另一半留做四个自治国的国内经费。来自矿山的收益同样要向罗马缴纳二分之一，马其顿人留下另二分之一。因为马其顿王朝不服罗马的霸权统治，所以罗马消灭了它，但是，尊重马其顿人自治。

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因人而异。罗马对马其顿的处置足够宽容，但是，在马其顿人看来，罗马人给予他们的权利毫无用处。

与其他希腊人不同，马其顿人没有城邦国家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国王统治，却不懂市民自治。

但是，罗马希望尽早结束这次军事介入的行动。在重新确认了马其顿以外的希腊诸城邦的自治权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军撤离了希腊。除了因为关系到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在阿波罗尼亚设立了军事基地以外，没有一个地方设立军事基地。

此后的20年里，希腊社会大体还算稳定。他们承认罗马霸权，享受自由和独立。

罗马在希腊没有铺设罗马式的公路，不是因为希腊已经有了高速公路式的公路，而是罗马认为希腊无须公路，以方便军团的移动。也就是说，罗马在当时没有想过要对希腊再次实施军事介入。

然而，迫使罗马人考虑这个问题的正是希腊人自己，就像波利比乌斯所承认的一样。

第九章

迦太基衰亡

（前149—前146）

有人习惯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样的人常犯的错误是他们认为每个历史现象自始至终都是按部就班向前发展的，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真正的历史现象不是按部就班向前发展的，它是在不断重复错误、因彷徨而停滞，或者是因偶然而改变方向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果，在后世看来，好像是必然。

本来只打算给一个教训，却导致了一个王国灭亡。这一事例已在有关马其顿灭亡的章节中讲过。只是，马其顿王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说到迦太基人，那还真是可怜。因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败给罗马以后的50年间，迦太基人在罗马霸权下，老老实实地过着平和的生活。

只能说，迦太基灭亡是一连串不幸的偶然导致的结果。

罗马人叫做“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没有变成行省，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只是，降到二等国家的行列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只能拥有极少的军事力量，只够对付弱小国家。没有罗马的准许，不能行使与他国的交战权。

失去了西班牙、西西里和撒丁等所有海外领土后，迦太基只能把经济基础放在发展本国非洲的农庄经营上。矿山经营等已是昔日的梦想，发展工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在这一点上，罗马在意大利境内有托斯卡纳地区，意大利之外有西班牙，现在又得到了马其顿的矿山，优势非常明显。

迦太基作为通商国家，昔日的盛况不再。由于农庄收获成了主要的产物，所以，可交易的物资也受到极大限制。而且还有罗马的同盟国，

位于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的希腊人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迦太基人经营农庄的经验非常丰富，农庄生产力极高。甚至还出版了有关农庄经营的书，罗马人把它翻译成了拉丁语。在古代，北非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耕地辽阔肥沃，非常适宜农庄经营。加上迦太基人善于耕作，生产力高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导致迦太基灭亡的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罗马妒忌迦太基的经济实力。

的确，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失败后，经济很快振作起来。但是，如果只比较经济实力，在战后已经过去50年的这个时期，迦太基还谈不上是一个富可敌罗马的经济大国。

加图力主消灭迦太基，其中有一个插曲非常有名。说的是，加图从迦太基带回非常漂亮的迦太基产无花果，拿到元老院展示给大家看，说能生产如此丰饶果实的敌人就在相距三日海路的地方。加图是一个巧舌如簧、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人。他不过提出了最容易说服人们的事实，以此打动人们的视觉。

经济获得重生的迦太基，其经济实力还不至于引起罗马的担心。但是，迦太基毕竟有过引发“汉尼拔战争”的“前科”。

一个国家有了经济实力，招募雇佣兵不是难事。谁又敢断言迦太基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汉尼拔”呢？

在讲述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加图这两个人的时候，已经说过拘泥于过去导致心灵无法自由的人和超越过去的人之间的不同。此时，西庇阿早已离世，加图依然健在，尽管已经80岁高龄。

加图反迦太基的态度异常执著。无论谈论什么事情，最后，他总是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认为迦太基应该被消灭。”

在决定罗马国政的元老院中，不是所有议员都赞同加图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加图才需要反复重申上面的这句话。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下台并去世以后，元老院内依然有不少人认同西庇阿生前推行的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其代表是西庇阿的女婿西庇阿·纳西卡。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政界，他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为了表示反对老加图的论点，在所有发言中，他总是用这样一句话作结尾：

“但是，我认为迦太基应该继续存在。”

然而，打破罗马这一微妙平衡关系的一击竟来自迦太基。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成为罗马的“clients”，即被保护者，却深受同为罗马的“clients”——努米底亚王国势力扩张所扰。

作为同盟国，迦太基和努米底亚的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承认罗马的霸权。按理说，罗马人对这两个国家应该一视同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这也无可非议。因为，努米底亚原国王马西尼萨曾经协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立下过汗马功劳。

还有，在希腊战线和叙利亚战线的罗马军队中，也有努米底亚士兵的身影。迦太基尽管也向罗马提供了支援，却仅限于提供小麦而已。而且，罗马还不接受无偿支援，一定要支付粮款。曾经有一次，迦太基使节在罗马元老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我们迦太基人和你们罗马人一起打败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和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三个国王。”

听了这话，元老院内差一点响起一片嘲笑声，甚至在会场的一角传来了奚落声：

“血都没流一滴，敢在这里胡说！”

所以，尽管都是罗马霸权下的“clients”，努米底亚和迦太基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

当时，努米底亚王国已经一跃成为强国，写过地中海世界历史地理的斯特拉波说：“在国王马西尼萨的统治下，从游牧民族一变成为农耕民族。”因此，迦太基人担心努米底亚，已经不是纯粹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念头，而是现实。

为了抵御努米底亚势力的渗透，迦太基决定招募雇佣兵。很快，6万雇佣兵来到了迦太基。

当然，罗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迦太基的这一动向，马上派出以加图为首的调查团。迦太基向调查团控诉了努米底亚的侵略主义。但是，有加图在，迦太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罗马方面很清楚这一点，于是，第二年向迦太基派去了以西庇阿·纳西卡为首的调查团。

西庇阿·纳西卡成功让努米底亚军队退回到努米底亚境内。于是，很多人相信迦太基的危机已经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就是其中一人，他甚至准备回自己的祖国希腊，并已经走在了前往布林迪西的路上。

迦太基人尽管在经济方面很有才能，在政治上却极为幼稚。他们认为西庇阿·纳西卡采取的妥协策略证明了罗马的软弱。此时，国内有雇佣兵6万。在迦太基政府的授意下，雇佣兵突破努米底亚国境线，直逼王国首都90公里处。

获悉这一消息，罗马元老院被激怒了。汉尼拔战争结束后签署的和约中明文规定，没有罗马的许可，迦太基不得对他国行使交战权。攻打努米底亚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条约的规定。

以加图为首的反迦太基强硬派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以西庇阿·纳西卡为首的稳健派不得不沉默。罗马决定立即编组四个军团派往迦太基。

迦太基政府马上领会了罗马的意图。再加上攻入努米底亚境内的迦太基雇佣兵遭到努米底亚军队的迎头痛击，吃了败仗。因为轻率，无谓地违反条约的规定，迦太基政府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紧急向罗马派出使者，许诺立即遣散雇佣兵，处死指挥官，努力平复罗马元老院的愤怒。元老院相信了他们的话，暂停派遣军团，改派调查团。

调查团的任务是现场监督迦太基是否履行了承诺。然而，迦太基政府再次犯了迷糊。他们没有痛痛快快地履行承诺，而是在罗马调查团到来后，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履行约定。调查团送回的报告使元老院对迦太基产生了信任危机。

首都迦太基没有意识到眼前这种状态的危险性，反而是迦太基第二大城市乌蒂卡为首的迦太基国内其他城市的居民们感觉到了危机。他们向罗马派去代表，声明一旦罗马和迦太基再次发生战争，自己将站在罗马一边。

得到这样的声明，罗马元老院成了反迦太基强硬派一枝独秀的舞台。公元前149年，元老院决定两位执政官的任地都在非洲。这无异于提出宣战。

迦太基大吃一惊，紧急向罗马派去五位特使，极力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罗马元老院只是告诉这五位特使，说执政官已经离开罗马。罗马向迦太基宣战的理由是没有罗马的允许，迦太基擅自对罗马的同盟国努米底亚采取了敌对行为。对此，五位特使拼命解释，说迦太基愿意无条件全面投降，并提出，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将送来300名人质。元老院接受了，马上派人向已经前往非洲的两位执政官带去指令，授予他们全权与迦太基交涉。

五位特使回国后，这次迦太基政府没有再挤牙膏，马上把300名人质送到了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此时，执政官们已经登陆非洲，来到半个世纪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作为攻打迦太基的基地建造的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执政官把这300名人质送到了西西里，然后，向迦太基政府提出了罗马方面的要求，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他们要求迦太基交出所有攻城器械和武器。这意味着彻底解除迦太基的武装。迦太基接受了。2000件石弓器加上20万套盔甲送到了科尔涅利乌斯营地。对此，两位执政官表示满意。他们还向迦太基政府建议，派遣由30个有权势的市民组成代表团前往罗马，听从元老院的发落。迦太基政府照做了。

然而，迦太基的运气实在太差，就在同一个时期，希腊发生了一件大事，让罗马的态度变得非常强硬。

在以马其顿为中心的希腊，先王珀尔修斯有一个庶子，叫菲利普。希腊人心中有反罗马的情结。这一时期，菲利普成了这些希腊人的核心。事实上，珀尔修斯的庶子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自由和独立的意识仍然非常强，但是，他们为实现并维持独立和自由的政治能力早已随伯里克利的去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对政治毫不关心。柏拉图曾经感受过的绝望越来越成为现实。不断向反罗马的菲利普倾斜的希腊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会无所顾忌地说：

“我们欢迎罗马人以朋友的身份到希腊来，而不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希腊。”

这话赢得满堂喝彩，是因为他们听说罗马进军非洲了。在他们看来，现在罗马的注意力放在迦太基，是推翻罗马霸权的绝好机会。希腊人波利比乌斯也这样写道：“希腊人利用了这个机会。”

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弗拉米尼时代相比，罗马人对希腊人的

看法早已不同。在这半个世纪里，对于伯里克利时代盛极一时的希腊文明，罗马依然尊敬有加。但是，对现在即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他们充满了不屑。

和伯里克利时代一样，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一有情况，就会高喊自由和独立。这一点没有变。但是，在实现自由和独立的行动上，此时的希腊人只会仰仗其他国家或利用其他国家的危机。

这就是罗马人蔑视希腊民族的原因。尽管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希腊人创造的美术品和建筑，尽管他们是那么地努力学习希腊文学和历史，尽管他们从不要求希腊人学习拉丁语，宁愿自己学习希腊语。但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早已与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不一样了。他们失去了创造力，再也拿不出超越新时代的、有震撼力的作品。

公元前148年，罗马决定派遣军团对希腊实施第三次军事干预。自从战胜汉尼拔以来，罗马在战场上几乎百战百胜，对于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信心十足。失去了政治头脑的希腊人刺激了罗马。

就在罗马为希腊人的动向焦头烂额的时候，迦太基代表来到了罗马。只能说他们实在太不走运。因为，与此前相比，焦虑的罗马人再也没有精力反对加图执著而强硬的反迦太基路线。

宽厚对待其他民族却常常出现相反的结果。为此，罗马统治者们深受打击，开始考虑应该改变从前的做法。再加上对军事力量充满自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罗马向迦太基提出了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

迦太基代表来到罗马，请求罗马元老院指示。他们表示，只要能避免与罗马之间发生战争，做什么事情都愿意。然而，对于迦太基的这30位代表，罗马元老院却提出了最后通牒。具体要求是：

拆毁首都迦太基，全体居民迁至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约合15公

里）的内陆地区。

代表中有一人表示异议，说：“这无异于置迦太基于死地。”但是，元老院坚持不改初衷。不得已，30名代表只好接受了这一条件。在回国的途中，有几个人选择了逃亡。

事到如今，包括波利比乌斯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第三次布匿战争不会再爆发。波利比乌斯在布林迪西登船准备回希腊。

这时，好朋友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紧急派来的信使赶到了波利比乌斯身边。波利比乌斯下船和信使一起，再一次走在阿皮亚大道上，赶往西庇阿·埃米利乌斯正在作出征准备的奥斯提亚港。

代表们带着罗马苛刻的要求回到国内后，迦太基民众认为这一切都是缘于统治阶层的无能。他们奋起反抗罗马。统治阶层的软弱一次次地激起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带着罗马的要求回到国内的代表遭到民众的唾骂，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狂怒的民众打死。

首都迦太基变成了武器制造厂。为了准备守城，迦太基人一方面从近郊大量调集粮食，同时召回被放逐的反罗马强硬派和他们带领的雇佣兵。女人们剪下头发，用来做石弓器的绳子。贫富差别不见了。以参加首都保卫战为条件，解放了犯人和奴隶。有人预见到船只终将沉没，事先逃了出去，为此，迦太基的人口比往常少了许多。但是，据说还有6万人留在了首都迦太基。其中，将要参加守城战的兵力也有2万人。

就这样，罗马和迦太基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那么，这“最后的时刻”是否真的不可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依然对此心存疑问。尽管罗马元老院给来自迦太基的30位特使下的最后通牒是拆毁首都迦太基，所有居民迁至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的内陆地区。但是，认为最后通牒的要求过于苛刻的只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古代历史学

家们并没有这样认为。

经过中世，李维的《罗马史》中已经不见了有关这个时代的篇章，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评价这最后通牒的。至少《历史》的作者，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提出的最后通牒不是违背道德的行为。还有，有幸参考古代所有史料的狄奥多罗斯和阿庇安对于罗马提出的最后通牒，只评价说强硬，没有说苛刻。也许，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只是囫囵吞枣地理解了迦太基特使中的一人，在接到最后通牒时说的一句话——“这无异于置迦太基于死地。”——吧。

罗马元老院逼迦太基政府二选一：要么让首都迦太基所有居民离开首都，移居到内陆建设新城市；要么战争。元老院没有指定建设新城市的地点，只要求距离海岸线10罗马里的内陆地区。至于在距离海边10罗马里的哪个地方建设新城市，由迦太基人自己决定。

为此，我查阅了当时地中海世界有名城市至海边的距离。

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巴勒莫，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起来的城市卡塔赫纳、加的斯，埃及的亚历山大，小亚细亚的埃菲索斯等，和迦太基一样，都是临海的海港城市。迦太基国的第二大城市乌蒂卡因为海岸线后退，现在成了内陆城市，在古代也是临海的城市。

叙利亚首都安提阿建在内陆，必须沿河流上溯22公里才能抵达。而且，这条河流不大，连当时的大船都无法航行。作为通商产业城市极尽繁荣的雅典也不临海，距离外港比雷埃夫斯有8公里的路程。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没有河道相连，所以，雅典的出产必须先运到比雷埃夫斯才能装船。为此，根据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提议，雅典到比雷埃夫斯建有一条通道，两边有平行的城墙相护。

罗马也不临海，只有一条台伯河。罗马和外港奥斯提亚之间可以利

用台伯河，但是台伯河不适宜大船自由航行。所以，通常利用一条几乎是笔直的公路，距离是22公里。

罗马没有要求迦太基把城市建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正中央，居民移居到那里。不过是要求他们离开海岸线15公里。在古代，北非植被丰富，河流很多。就算不能利用河道，也可以采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办法，用高而坚固的围墙围一条“走廊”，这条“走廊”不过只有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不足两倍而已。此外，不要忘了，罗马元老院还有西庇阿派——坚定地支持迦太基的温和派。还有，以加图为首的反迦太基派都是罗马居民。他们认为，无论沿河而下还是两条腿步行，要看到大海，走22公里理所应当。

只是，迦太基人从来都是一出家门就要坐船。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只有15公里的路程，也“无异于死”。

我想，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不同，才是民族之间纷争和摩擦不断的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迦太基人不能接受罗马提出的要求——在仅相距15公里的内陆地区建设新城市，并迁居那里——就是正面挑战罗马的霸权。

总之，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迦太基人还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也许正因为首都迦太基地处天然要地，所以，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可以迁居到其他地方。也可能作为拥有大国历史的民族，不能为了生存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吧。

迦太基沦陷

迦太基市区建在天然要地的位置，位于突尼斯湾西侧突出的海角前端。整个海角面积很大，三面向海。迦太基市区北侧有山阻隔，东侧有大海相守。从这两个方向进攻几乎没有可能。西侧有高40米、宽10米的

三重城墙防御，从这里突破也不太可能。

唯一有可能攻取这座海港城市迦太基的只有正面门户，也就是港口一侧。全军集中从这里向城内发起进攻，是在公元前147年，西庇阿·埃米利乌斯担任总指挥以后。向迦太基宣战后的两年里，罗马方面一直没有作为，原因是担任总司令官的执政官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人。战争之初，罗马方面的准备也不够充分。不管怎样，对于迦太基这样的大城市实施攻城战，花上几年时间也很正常。只是，希腊的事态发展促使罗马人加快了结束迦太基攻城战的进程。

罗马自从决定对希腊实施第三次军事干预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功镇压了冒充马其顿国王庶子的家伙所率领的叛军。至此，罗马不再尊重马其顿人的独立。分裂成四个自治国的旧马其顿王国领地失去了自治权，降格成为罗马的行省。

对于其他希腊诸城邦，罗马原打算继续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自治。遗憾的是，希腊人没有把罗马的这一姿态看做是当权者的宽容，误以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有自卑感，是软弱的表现。出访希腊城邦之一科林斯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们在科林斯受到了无礼的待遇。这一事件挑战了罗马人宽容的极限。

罗马紧急向科林斯派出军队，彻底摧毁了科林斯。甚至掘地三尺，不留片瓦。美术品遭没收送到罗马，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被卖做奴隶。科林斯的下场给了桀骜不驯的全体希腊人一次严重的警告。

罗马人对三天期限过后，仍然不顾劝降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城市，实施过掠夺，也曾经把这些城市的居民卖做奴隶。

自建国以来，罗马还从来没有过让一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的举动。继雅典、斯巴达之后，一直位居希腊第三重要城市的科林斯的灭亡足以让希腊人的大脑冷静下来。此后的希腊人，虽然没有像旧马其顿那样成

为罗马的行省，但是在罗马的霸权下确实老实了许多。最看重自由和独立的他们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尽管取而代之的是获得了秩序和稳定。

公元前146年，是罗马人从“稳健的帝国主义”路线转变为“严厉的帝国主义”路线的一年。同年，迦太基迎来了最后的时刻，不幸的偶然带来不幸的结果。

因为迦太基人要求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独立，仅仅只是安全。所以，这样的结局更让人觉得可怜。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希腊失去独立，责任在希腊人。但是，他没有认为迦太基灭亡，是迦太基人自己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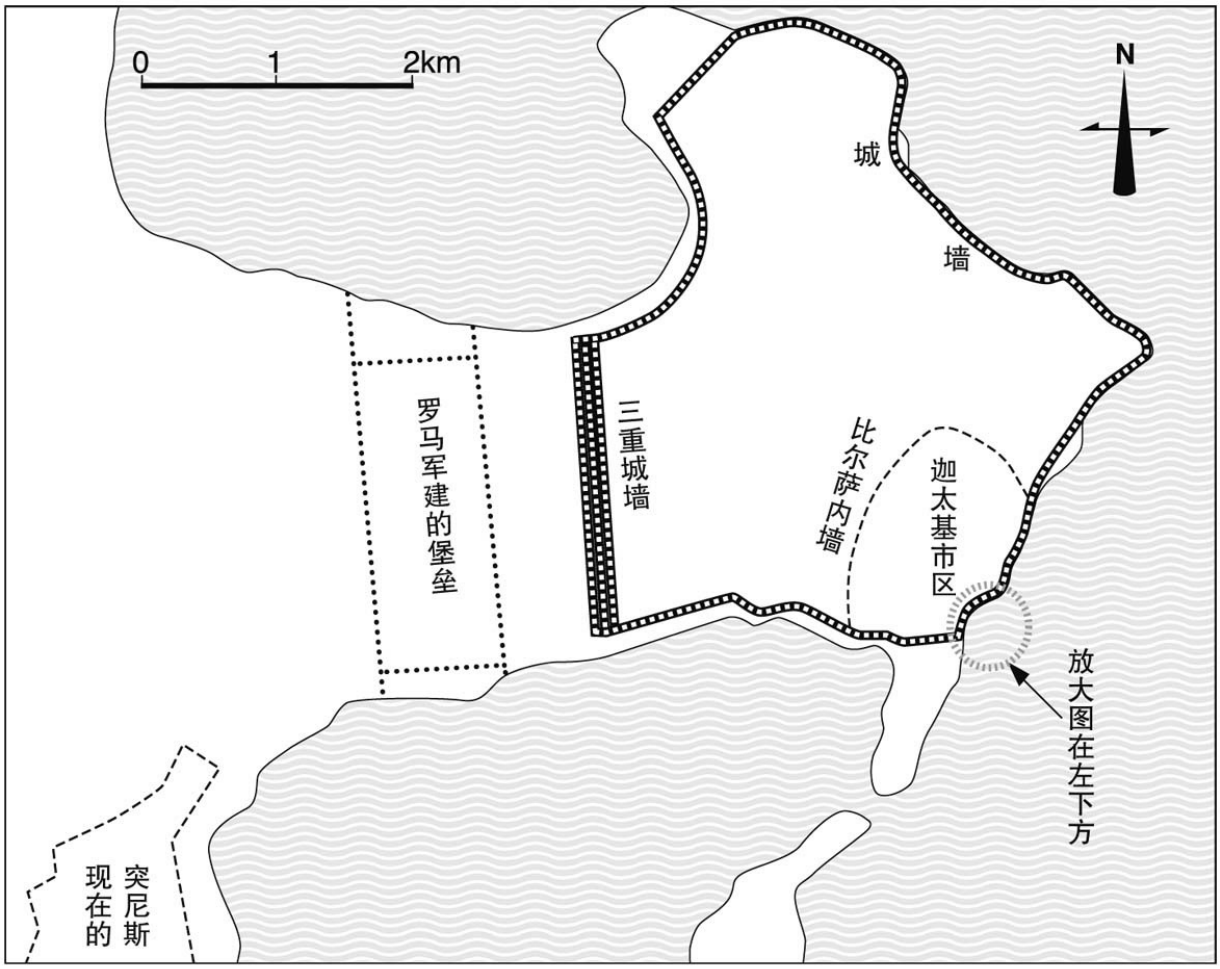
如果一定要说迦太基人有错，大概是他们拒绝罗马的劝降，选择了和自己的城市同存共亡的道路吧。他们让罗马士兵俘虏列队站在城墙上，当着罗马军队的面，一个一个地杀死。如此残忍的举动在当时的战场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敢于这样做，只能认为他们要把自己逼进绝地。迦太基人自己决定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公元前147年到前146年的冬季自然休战期间，罗马军队总司令官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向罗马元老院派去一名使者，请示元老院如何处置迦太基的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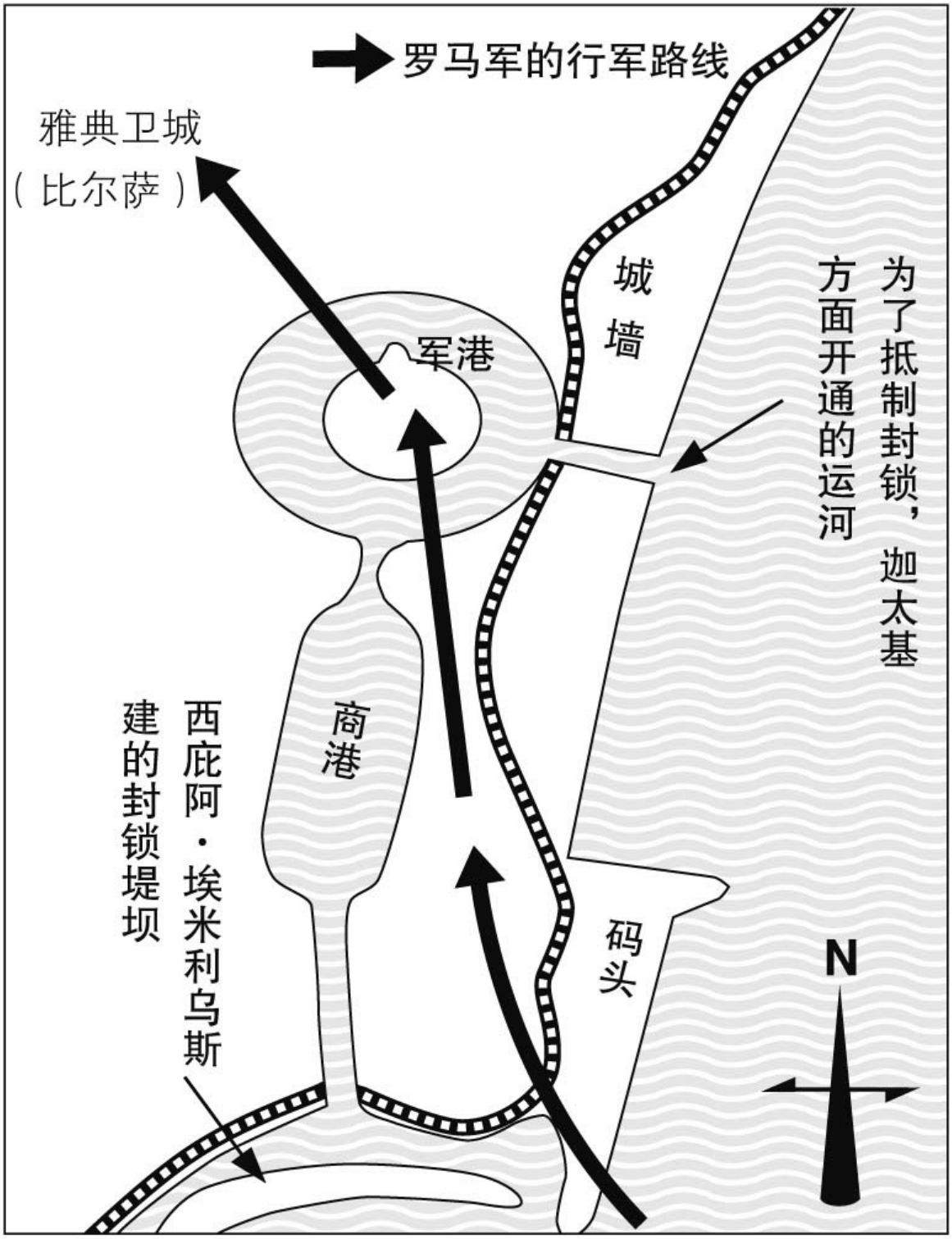
从港口外侧进攻迦太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罗马军队建设了堤防，彻底封锁了连接大海与港口的运河入口。迦太基开通的另一条运河，由于罗马战船在前面的海域频频巡逻，起不了任何作用。靠陆地一侧的城墙多处损毁。在守城战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城里储存的粮食也已经告罄。是给予最后一击还是再次尝试和谈？

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养孙西庇阿·埃米利乌斯这一年38岁。作为最高司令官，他有权决定战场上的一切行动。但是，与养祖父西庇阿和亲生父亲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一样，这位罗马

将军非常大度，对异国文化和异国民族没有偏见。所以，在决定迦太基人命运的时候，他非常犹豫。



迦太基首都


罗马军的行军路线
雅典卫城
（比尔萨）
城墙
为了抵制封锁，迦太基方面开通的运河
军港
商港
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建的封锁堤坝
码头
N

迦太基首都放大图

新的一年即公元前146年春天，元老院的命令到了，内容是：与科林斯一样，彻底毁灭迦太基。

罗马军队开始了来自海上的进攻，防御一方点燃了排列在外港周围的仓库和造船厂，负隅顽抗。在一片火海中，街巷战开始了。罗马军队一座房一座房、一条街一条街地边攻边进，追击敌人。这场街巷战持续了整整六天六夜。

第七天，摧毁迦太基市的行动因神殿林立的比尔萨失火而告结束。纵身跳进神殿周围的火海、宁死不做奴隶的迦太基人不在少数。因为拒绝劝降，坚持战斗的市民在城市沦陷后的命运已成定局。被逼为奴的迦太基市民，算上孩子多达5万人。

因为与总司令官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关系好，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来到了迦太基沦陷的现场。他详尽地描写了沦陷后的迦太基。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经历了中世纪后，他的著作《历史》留存到现在已不足三分之二的内容。但是，让人感到最可惜的是，有关迦太基沦陷的场面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为此，我只好引用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阿庇安的著作，因为他参考了波利比乌斯的著作：

> 很长一段时间，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暴露在自己眼前的迦太基城，眺望着这座自建国以来长达700年的岁月，曾经很长时间极尽繁华的城市沦陷了，化做瓦砾之山。
>
> 在700年的漫长岁月里，迦太基曾经把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岛屿以及大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迦太基拥有大量武器、战船、大象以及财富，丝毫不逊色于迄今人类缔造的任何一个强大帝国。
>
> 在勇气和气概上，迦太基远比这些以往任何一个帝国都优秀。尽管屈从罗马的要求，交出了所有的武器和战船，尽管最终城市沦陷，遭到彻底的破坏，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但是，在长达三年的时

间里，他们拼死抵御过罗马的进攻。

根据流传下来的说法（其实是根据波利比乌斯留下来的说法），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一想到对手所遭遇的这一命运，便会泪流满面。

尽管他是胜利者，但是他忍不住思绪万千。不仅是人类，就连城市、国家、帝国等，一切的一切，命中注定都要灭亡。他不能不感慨万千。特洛伊、亚述、波斯以及20年前还在的马其顿王国，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盛极必衰的事实。不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位罗马的得胜将军吐出一句荷马史诗中的话，据说是特洛伊总司令官赫克托尔的话：

“特洛伊迟早会和国王普里阿摩斯以及追随他的所有战士一起灭亡。”

当时，波利比乌斯就站在他的身后，于是问这位罗马常胜将军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一句话。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回头看着波利比乌斯，拉起这位希腊人、同时又是好朋友的手，回答说：

“波利比乌斯，迦太基曾经享尽荣华，然而现在，我们却站在这一帝国灭亡的伟大瞬间。此刻，充满我内心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是悲哀。我在想，我们罗马或许也会迎来这样的时刻吧。”

沦陷后的迦太基，城墙、神殿、房屋、市场等建筑全部遭到破坏。石头、泥土成堆的地面被犁耕平。根据罗马人的习惯，这个遭到诸神诅咒的地方撒上了盐。

迦太基被定成寸草不生、人类不可居住的不毛之地，人类再次生活于此是在100年之后。尤里乌斯·恺撒下令在这里进行殖民地建设，虽然因为他遭到暗杀而半途而废，到了奥古斯都大帝时代，最终得以完成。因此，留存至今的迦太基遗迹是罗马时代建的，极少迦太基人的东西。

自从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长达600多年的岁月里，罗马从来没有

实施过把失败者从地球上彻底抹去的行为。然而，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和迦太基相继被夷为平地。而且，在迦太基灭亡13年后，西班牙的努曼提亚也遭遇了和迦太基同样的命运。此时的总司令官与迦太基灭亡时是同一人——西庇阿·埃米利乌斯。

大多数现代研究者认为，毁灭这三个城市的行为无疑是野蛮行径。对于他们的这一看法，如果我也能接受，那该多好啊。

如果这只是野蛮行径，结果又会怎样呢？

科林斯的灭亡和科林斯市民奴隶化对刺激希腊人的大脑是有效的。因为这是一个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意见、从来形不成统一意见的民族。其后，雅典和斯巴达作为自治城邦被保留下来，并且，以这两个城邦为首的全希腊在承认罗马霸权的基础上，享受起了有秩序的和平。希腊人从未想过的“完善基础设施”的潮流也波及希腊。在阿皮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隔海相望的希腊，艾格纳提亚公路破土动工。“罗马化”开始在希腊出现。

那么，毁灭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是不是单纯的野蛮行径呢？

对任何人来说，西班牙原住民都是极其不易征服的民族。汉尼拔家族在西班牙建设殖民地的时代，迦太基人也曾经受困于原住民的一次次骚乱。不是因为西班牙人与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相同。他们不顺从的性格缘于险峻的地势。

每当西班牙发生骚乱，罗马就会派出军队前去镇压。罗马人移居西班牙后，致力于开发各项事业，到了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终于彻底平定西班牙。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也不同于高卢（现在的法国）人，他们被认为是被“罗马化”的高一等级民族。

公元前133年，彻底毁灭努曼提亚，毫不留情地把住民卖做奴隶，

暂时为平定西班牙起到作用。而且，对受到制裁的西班牙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也开始了“罗马化”的进程。始于罗马的公路横穿现在的法国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作为“罗马化”象征，罗马式的公路即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这个时期延伸到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马基雅弗利说过，就算必须严厉处置，那也应该在某个时期集中实施。

迦太基灭亡是否与这两例一样，非如此不可吗？

我倒觉得毁灭迦太基是一次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一蛮行实在没有必要。只能说是罗马人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才导致的结果。

罗马消灭迦太基得到的好处只有一点，就是无须再次与汉尼拔这样的人物进行作战。如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不久的当时，这种感情也许会困扰罗马人。但是经过了50年，为什么罗马人还要这样做呢？古代非洲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作为非洲物产的集结地，迦太基又是最合适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主动挑战罗马霸权。导致他们举起反旗的，正是把他们逼到绝境的罗马。

迦太基灭亡后没多久，罗马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他们亲手毁灭了这个本来可以起到遏制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日趋强大作用的国家。

西庇阿·纳西卡始终主张维持迦太基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出于宽容，更是想到了对付努米底亚王国的策略。但是他的这一务实路线输给了加图的强硬路线。非常不幸的是，他的想法未被接受，原因不于在迦太基人，而是同一时期希腊人挑起的事端殃及了迦太基。

假如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加图调换一下：早死的是加图，长寿的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话，如果同一时期，希腊没有出现骚乱的话，历史或许会改写。而且，我坚信历史一定会改写。特别是看到留存至今的、罗马人在100年后重建迦太基时，开展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遗

迹后，想到罗马人为了重建迦太基，在“完善基础设施”上下了如此大的工夫，使重建后的迦太基在罗马存续期间，一直位居非洲数一数二的城市后，我的这一想法变得愈发强烈。

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灭亡，它曾经的领土后来成为常驻乌蒂卡的总督统治下的罗马行省。成为罗马行省后的旧迦太基的名称不再是迦太基，而是“非洲行省”。

“我们的海”

从此，迦太基成为行省，西班牙成为行省，希腊也成为了事实上的行省。还有，帕加马国王由于没有继承人，临死留下遗言，把自己的王国托付给罗马。于是，帕加马所在的小亚细亚西岸一带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就这样，罗马仅靠管辖土地的辽阔幅员就成为地中海世界毋庸置疑的巨无霸国家。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已经是“我们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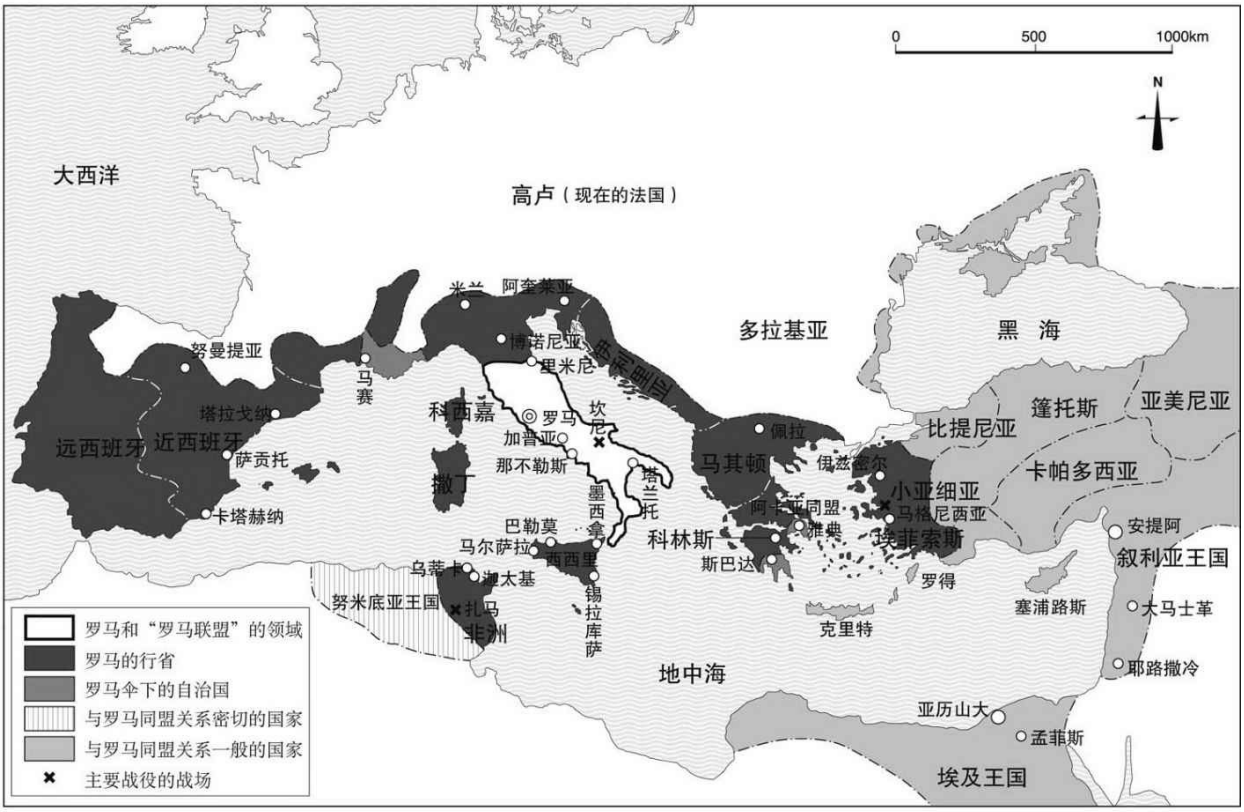
这一切开始于公元前26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但是，如果第一次布匿战争彻底终结了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的话，如果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展开不是罗马人称做“汉尼拔战争”的形式的话，罗马人称霸地中海一定不会在130年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完成。

从战胜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霸主的“汉尼拔战争”结束算起，罗马完成全地中海霸权所用的时间不足70年，就连波利比乌斯都对此惊叹不已。想必在当时，大多数人也有同感吧。

一切都源自汉尼拔。在跨越这130年岁月的本卷中，只用了16年时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占据了本卷三分之二的篇幅。回顾历史学家李维在其著作《罗马史》中用于“汉尼拔战争”的篇幅，不由得让我重新认识了这场战争带给罗马人的影响之大。罗马人称霸地中海，包括灭亡迦太基，都是“汉尼拔战争”的余波。

以消灭罗马为终生夙愿的汉尼拔给了罗马变得比其他任何人、任何国家更加强大的力量。只能认为，正是汉尼拔，让罗马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我们的海”。

但是，成功者在获得成功后，需要付出代价。罗马人也不例外。在《罗马人的故事3》中，我准备描述罗马人成为霸主后的所作所为。



公元前13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

年表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迦太基	希腊·马其顿	东方	中国	日本
	第一次布匿战争（264—241） 与锡拉库萨结成同盟（263）	迦太基军队登陆西西里（263）	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去世（264）	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位（268）		弥生时代
260	米拉佐海战（260） 巴勒莫海战（257） 利卡塔海战（256） 赫美岬海战（255）					
250		哈米尔卡出任司令官（247） 汉尼拔出生（247）		伊朗、帕提亚王国（247）	嬴政（秦始皇）即位（247）	
	埃加迪群岛海战、战争结束、西西里收为属领（241） 税制、选举制、军制改革（241）					
230		哈米尔卡镇压迦太基叛军、移居西班牙（238） 国内农业派和对外贸易派之争（237—230）	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去世（230）	阿育王去世，孔雀王朝分裂（232）		
	攻打伊利里亚（229）	哈米尔卡阵亡，女婿哈斯德鲁鲍尔成为将军（229） 在西班牙建设卡塔赫纳（228）				
	攻打并击退高卢军队（225—222）	汉尼拔就任总督（221）		安条克登基叙利亚国（223）	秦始皇统一天下（221）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迦太基	希腊·马其顿	东方	中国	日本
220	第二次布匿战争（218—201） 提契诺、特雷比亚会战（218） 特拉西梅诺会战（217） 坎尼会战，罗马军大败（216） 汉尼拔攻占意大利南部诸城邦（213） 锡拉库萨成为罗马行省（211）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218） 与锡拉库萨、马其顿结成同盟（215） 几乎全歼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211）	希腊同盟战争（220—217）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迦太基结成同盟（215）	埃及托勒密王朝与罗马结成同盟（214）		弥生时代
210	收复塔兰托（209） 西庇阿攻占卡塔赫纳（209） 维克拉会战（208） 梅陶罗会战（207） 伊利帕会战，西庇阿征服西班牙（206） 西庇阿就任执政官（205） 扎马会战，西庇阿大破汉尼拔（202） 战争结束，罗马掌握西地中海霸权（201）	哈斯德鲁鲍尔（汉尼拔二弟）离开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进入意大利（208） 哈斯德鲁鲍尔战死（207） 马可尼登陆热那亚（205） 汉尼拔回到迦太基（203） 与罗马讲和（202）		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结成同盟（203）	建立汉王朝（202）	
200	与马其顿作战，罗马军胜利（197） 叙利亚战争开始（191）	汉尼拔亡命叙利亚（195）	马其顿开始南下（200） 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宣布希腊诸城邦自由（196）	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开始进攻迦太基（195） 汉尼拔在埃菲索斯与西庇阿会谈（193）		
190	马格尼西亚会战，击败叙利亚军队（190） 西庇阿被送上审判席（187） 西庇阿去世（183） 马其顿战争，马其顿失败，分裂成四个自治国（171—168）	汉尼拔亡命比提尼亚（190） 汉尼拔自杀（183）	菲利普国王去世，珀尔修斯登基国王（179） 马其顿王朝灭亡（168）	叙利亚败于罗马海军，失去制海权（190） 叙利亚败于罗马，求和（190）	吴楚七国之乱（154）	
150	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149） 阿卡亚同盟国中心科林斯灭亡（146） 迦太基灭亡，战争结束（146） 消灭西班牙的努曼兹，占领西班牙全境（133）	迦太基市备战罗马的进攻（149） 迦太基灭亡，成为罗马的行省，称非洲行省（146）	旧马其顿王国领土成为罗马行省（146）	迦太基雇佣兵攻打努米底亚（150）	汉武帝即位（141）	

参考文献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是在小国家或许有可能。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不具备影响力。当然，在言论管制极为严厉的特务国家也有可能。除了这样的一些国家，故意篡改历史通常不太容易做到。

有失偏颇也许不可避免，但是，有失偏颇和无中生有的谎言完全是两回事。

罗马人是胜利者。但是，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在长达1200年的历史中，除了最初时期，罗马人一直作为双语民族生活在各个时代。在罗马时代，胜利者的语言——拉丁语和被征服者的通用语——希腊语，它们的地位完全相等。被征服者希腊人、犹太人、东方的人们都会发表用希腊语写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拥有作为胜利者的罗马人读者。对于大多数罗马家庭的子弟来说，希腊语是必修科目。

叙事诗人荷马，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他们用希腊语写成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出版，在古代已是接近末期以后的事情。这不是因为罗马人不关心这些人的成果，而是因为对他们的作品有兴趣的罗马人都可以读懂希腊语。在古代，翻译的数量和关心的程度不是比例关系。

就像本文讲述的那样，可以认为古代希腊语相当于现代的英语。“罗塞塔石碑”证明了这一点，汉尼拔留下的碑文也显示了这一点。甚至不少罗马人也用希腊语写作。记录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罗马人费边·

皮克托的作品，就没有使用他的母语拉丁语，而是用了希腊语。后来的马可·奥勒留皇帝也选择了用希腊语写作。

扎马会战前夕，汉尼拔与西庇阿有过一次会谈。因为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带了翻译。我想，翻译之间使用的语言大概就是希腊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因为西庇阿精通希腊语，汉尼拔也学过希腊语，所以，不管现场有没有翻译，想必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意思。两人在埃菲索斯的那次交谈，属于私下聊天，没有翻译。这个时候使用的语言应该也是希腊语。可以想象，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之间的私房话应该也是希腊语吧。

叙述历史不能完全按照胜利者的意愿来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有能力确认事件真伪的人很多。

在印刷技术尚未出现的古代，有类似于出版社的机构，只是因为不能印刷，所以采用手书的方式。因为靠人力一字一句地抄写，自然每一卷的价值都很高。到了帝政时代，虽然出现了图书馆，但是，读者的人数依然受到限制，只能拥有有限的读者人数。这也表明了读者都是一些对叙述的内容具备相当程度了解的人，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会了解部分。

叙述历史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首先要收集、整理史料；其次要在此基础上，写成文理通顺的文章，便于读者理解。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胡编乱造的事情上吧。

拉丁语有句格言，叫VERBA VOLANT，SCRIPTA MANENT (说过的话会忘，写下的东西会留下来)。写作这项工作，像历史学家萨卢斯提乌斯说过的那样，是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写作很难）。既然如此辛苦，还有谁会故意书写歪曲事实的历史呢？还有，很难让第三者任意发挥的第三个理由是，写作开始前的调查阶段，历史的叙述已经萌芽。

写于后世的历史研究书可以给我们知识。但是，作为知识的历史容易停留在平面的理解上。若想立体地去了解，只有阅读写于同时代或较近时代的作为原始史料的史料。一旦开始阅读这些史料，历史不仅变得立体，甚至还能感受到丰富的色彩。体会到这种妙处后，任何作者都希望把它传达给读它的人。

一个尝试写历史（故事）的人，知道在整理汇总史料的阶段，已经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同时他也知道过于依赖想象力，会自掘坟墓。只要不是写虚构的东西，历史真相也好，脱离历史也好，都不是明确下结论即可的命题。

我认为，书写历史就是与历史的交锋，甚至可以说是赌上自己所有智慧和一切展开的决战。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不太完全。但是，故意歪曲历史，相应的，ARDUUM，会很难。因为选择用自己的表现去写的人知道，人的性格更多体现在他或她写或说的语言（普鲁塔克）中，而不是容貌。

关于参考史料，在这里不再重复《罗马人的故事1》卷末提到的作品。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Ⅲ

胜者的迷思

[日] 盐野七生◎著　刘锐◎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日本 **商界精英、政要必读书籍**
日产·法国雷诺汽车联盟CEO、索尼集团董事长、
日本钢铁集团总裁 力荐图书

韩国 30名知识分子推荐 教养必读书
50名职业经理人推荐 史上最好的书
100名CEO向青少年推荐 最必要读的书

3

王石 王巍 |作序|
秦朔 吴伯凡 吴晓波 |联袂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日）盐野七生著；刘锐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086 –3194–3
I. 罗… II. ①盐… ②刘… III. 古罗马——历史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928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Ⅲ : Shousha No Konme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4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
LUOMAREN DE GUSHI SAN: SHENGZHE DE MISI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刘锐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

[日] 盐野七生 著
刘锐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序
第一章 格拉古兄弟时代
第二章 马略与苏拉时代
第三章 庞培时代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罗马铸造的第纳尔（denarius）银币，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有信用的货币。即使是能够铸造出这种优质货币的罗马，在共和政体时代，银币表面雕像也很少见到凡人，多是神话诸神的形象。元老院体制这种少

数领导型的政体，喜欢突出个人的现象并不多见。

这里展示的这枚第纳尔银币就是一个例子。银币正面是头戴胜利者标志月桂冠的阿波罗；背面是正在指挥士兵的骑马将领，其下方的文字是铸造此银币那一年的两位执政官中其中一人的姓名（Publius Crepusius）。因为这个记载，区分银币的铸造年代就成为可能。这就是罗马货币被当做一级文献史料的由来。顺便告诉大家，这枚银币铸造于公元前82年。

盐野七生

2002年7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共和政体时代末期，是个人主义明显抬头的时期。

这里介绍的，是为了纪念“前三头政治”的其中一人——庞培的功绩而铸造的第纳尔银币。

银币正面，是仅用了三个月就将横行地中海的海盗扫荡一空、确立了地中海和平的大将庞培；背面是庞培本人因为此次成功，而将其作为自己守护神的海神及跟随海神的两位神祇。

这位海神的希腊文名字叫做波塞冬，拉丁文作Neptunus，传到西方英语就成了Neptune（海王星）。

由于古代人的谦虚性格，将地中海海盗扫荡一空这种人类行为，能够如此之快速而且漂亮地取得成功，他们相信一定是得到了神明的帮助。

盐野七生

2002年7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序

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国泰民安。即使没有来自外敌的威胁，也会出现产生于内部的敌人。

这就如同人体一样，强健的体魄可以抵御外来疾病的入侵，但是内脏器官的疾患，却会制约身体的健康成长，并使人饱受折磨。

——汉尼拔 （引自李维《罗马史》）

从（公元前202年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败降服于罗马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口中，预言似的说出了上面这段话。半个世纪之后，历史走进了公元前147年，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也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一个年轻人从罗马来到迦太基城，出现在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城的前沿阵地上。

这个年轻人经意大利渡海被送到了前线，但他并不是作为主力部队的一员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刚满16周岁，在数月前才举行过步入成人的仪式，完成了从一个只能穿长度及膝盖、被称为“短衣”的少年服装的少年，到一个可以穿长度达踝骨的“托加”的正式服装的成人的转变。尽管如此，在罗马年满17岁以上者才能够服兵役，这个刚满16岁的少年还不能成为军人。实际上这个少年是应罗马军总司令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minor），前185—前129年，通称小西庇阿〕的邀请，作为有交情的特别客人来到前线的。他被安排住在总司令的营帐内，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和周到的招待。

这个年轻人就是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约前169—前133年），也就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

政治家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格拉古兄弟母亲的娘家也是西庇阿家族，他们的姐姐又嫁给了小西庇阿。这样论起来，在迦太基城前线指挥战斗的小西庇阿总司令既是这个年轻人的姐夫，又是他的表兄。在罗马的上流社会中，贵族们常常把家族中即将进入服兵役年龄的男孩送到战场上，让他们像战士一样在营帐内起居，体验战争的种种经历，并把这种体验作为即将到来的人生的第一课。

此刻在这个16岁的年轻人看来，将迦太基城团团围困起来的罗马军队中，并没有即将攻陷一个大国首都前夜的那种紧张气氛。

在迦太基城内，被围困其中的人超过5万。从公元前149年这个城市被包围开始，这些守城者已经顽强地坚守了两年多。但是，身处现场的人们都很清楚，迦太基城的命运，已经清晰可见。

迦太基城三面环海，地处天然要害，但罗马军的包围网也堪称完美无缺。迦太基城的西面是陆地，建有高14米、厚10米的三层城墙作为守城的屏障，但很多地方已被攻破。罗马军从港口方向进攻的准备也已经就绪。城内储藏的粮食，在围城进入第三年时已经见底。罗马方面万事俱备，现在就等转过年来即公元前146年春天，从海陆两面发动强大攻势。然而，总攻的命令却一直没有发出。

在古罗马，最高司令官有权作出战场上的一切决定。此刻迦太基城的命运就取决于小西庇阿的一念之间。然而，从他的养祖父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major），前236—前184年，通称大西庇阿，小西庇阿是大西庇阿的长子的养子〕到他的生父，对于罗马以外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都持一种比较开放、无偏见的态度。38岁的总司令小西庇阿在这一点上，显然与他的养祖父和生父持有相同的立场。他对迦太基人的命运就这样由他决定，似乎有些踌躇。况且他的伯父（养父的哥哥），在罗马元老院中属于对迦太基温和派的长老，与主张让迦太基城毁灭的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一派针锋相对。

利用公元前147—前146年这个冬季的自然休战期，年轻的总司令小西庇阿派出专使到罗马元老院，对于是给予迦太基城最后一击，还是尝试和谈，请求元老院的最终指示。在等待罗马元老院答复的期间，小西庇阿经常与几年后开始写布匿战争历史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ibius）同桌就餐交谈，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虽然年轻，但由于和总司令的特殊关系，他也会时常坐在餐桌的末席共同就餐。也就是说，希腊历史学家与罗马将军之间的餐桌对话，这个16岁的年轻人能够有幸聆听。

公元前146年初春，小西庇阿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最终命令：让迦太基城消失！经过六天六夜悲壮的激战，迦太基城陷落了。尽管迦太基守军拒绝投降而苦斗，但战败的命运还是降临到迦太基头上，被俘虏成为罗马人奴隶的迦太基人，包括孩子，达5万人之多。

对于长期称雄地中海世界的强大国家迦太基的悲惨命运，就连作为胜者的罗马人也颇多感慨。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用他那传神之笔，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战场花絮：

> 小西庇阿久久地凝视着脚下广阔的迦太基城。这个经历了建国以来700年的岁月，其间长期保持了极度繁荣的大都市，一陷入敌手，竟化成了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瓦砾。

在700年的漫长岁月里，迦太基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岛屿，以及属于其支配的海洋。迦太基所具有的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战船、象群以及雄厚的财富，与之前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任何一个强大的帝国相比，都毫不逊色。

而且，无论与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相比，迦太基人的勇气和气概更令人称道。他们在屈从于罗马人的要求、被迫交出全部武器和战船的情况下，还能够坚守三年，抵御罗马军对迦太基城的强大攻势。今天城市陷

落，并遭受了彻底的破坏，迦太基城从地面上消失了。想到对手的这种命运，小西庇阿不禁潸然泪下。

小西庇阿心潮起伏，他此刻的思考已经超乎一个军事胜利者的思维。他想到的是，不仅限于人类，城市也好，国家也好，包括强盛的帝国，谁都逃避不了灭亡的命运，特洛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还有20年前的马其顿王国，无不遵循了历史展示给人们的“胜者必衰”的规律。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位得胜之师的最高首长吟诵起《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的一句名言：

> 归根结底，特洛伊大概也会随着国王普里阿摩斯和追随他的战士们共同死亡吧！

站在他背后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询问他何出此言，小西庇阿回过头来，注视着波利比乌斯这个20年来的亲密朋友，拉着他的手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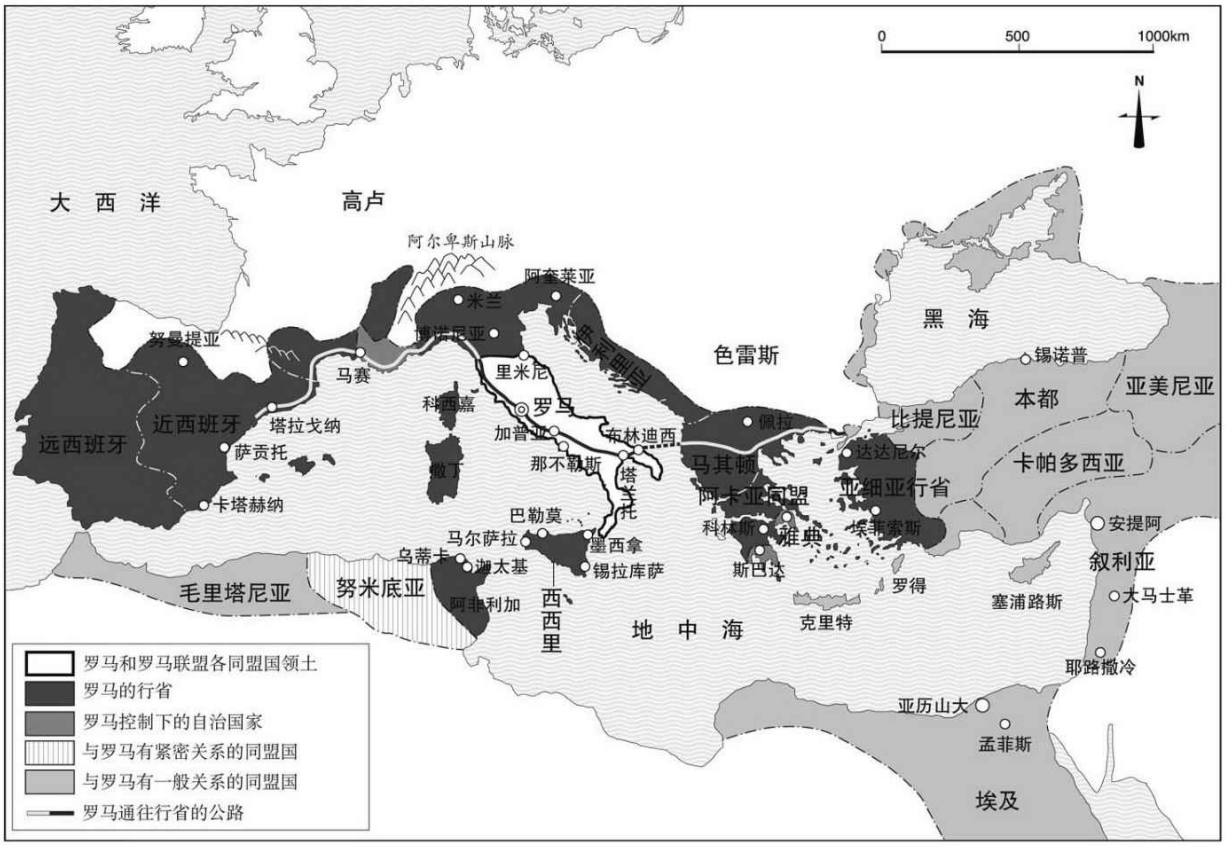
“波利比乌斯，我们刚刚消灭了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赢来了这一‘伟大的瞬间’，但是现在充满我胸间的，却不是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些伤感——我担心我们的罗马，也会在某一时刻遭遇与此相同的命运！”

根据罗马元老院的命令，迦太基城的宗教建筑和城市建筑，不管是城墙、神殿，还是普通房屋、市场建筑物、码头、仓库，全部遭到了摧毁，仅仅剩下石块和土块的地面，被用犁犁平。然后按罗马人的习惯，在地面上撒上盐，让众神来诅咒这个地方。人们骤然见到成为不毛之地的迦太基城，实在无法想象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矗立着地中海地区最繁荣富足的大都市。也只有身在城毁国亡现场之人，方能发出意味深长的感慨，方能体会到“伟大的瞬间”的深刻含义。

16岁的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此刻会有怎样的感慨呢？现存史料上没有记载。可以确信的是，由于他的外祖父就是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会战中大破汉尼拔，为罗马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的著名军事家大西庇阿，纵令西庇阿家族的姓氏不能出现在他的名字里，但他属于西庇阿家族的一员乃是不争的事实。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面对因第三次布匿战争战败而导致的迦太基城的毁灭，他肯定会比普通的罗马人产生更强烈的感触。

那个时候，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年仅16岁。16岁的他，会不会与56岁的波利比乌斯和38岁的小西庇阿一样，怀有“胜者必衰”的伤感？还是有其他一些思考呢？譬如，他会不会在想，罗马绝对不会重蹈特洛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特别是迦太基帝国的覆辙……

迦太基在经历了700年的历史后灭亡了，而这一年，罗马从建国算起，已经度过了600年的岁月。



布匿战争后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

第一章

格拉古兄弟时代

（前133—前120）

在西欧，有“含着银汤匙出生”的说法，特指那些出生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十分优越的家庭的孩子。如果用这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历史上有名的格拉古兄弟〔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和弟弟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约前160—前121年）〕，是再恰当不过了。

两兄弟的外祖父，如前所述，是罗马将军大西庇阿。他们的祖父提比利乌斯也是罗马名将，曾率领奴隶军团，在罗马防卫的最前线对抗不可一世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40来岁时即已成为名满战场的勇将，并以身殉国。两兄弟的父亲提比利乌斯（按照格拉古家族的规矩，家中长子承袭父亲的名字，故本书提到的祖孙三代都以提比利乌斯为名）是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活跃于罗马政坛的知名政治家。在元老院主导下的共和政体下，他们父亲的作为是值得特书一笔的。

格拉古父亲的生年不详，从其生平经历推算，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20年。公元前190年，由于与叙利亚国王的战争，大西庇阿决定率罗马军队第一次踏足东方（地中海东岸地区），根据大西庇阿的命令，父亲接受了出使马其顿的任务，敦促马其顿国王腓力承担起支援前线罗马军队的后勤保障任务。这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格拉古的父亲第一次担任公职。

公元前187年，格拉古父亲被选为护民官（Tribunus）。当年，罗马发生了著名的“西庇阿审判”，即反对派抓住大西庇阿在职务上有500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公款的用途不明为借口，针对大西庇阿发动的审判。以老加图为首的反西庇阿派的真意，并不是要追回这500塔兰特，而是要在政治上使大西庇阿失势，以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由于老加图实力强大，加之这一政治背景，当时无人敢出面为大西庇阿辩护。格拉古父亲时年33岁，不惧权势，勇敢地站出来为大西庇阿进行了辩护。

在辩护中，他是这样说的：

> 在诸神的庇护下，西庇阿为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共和国罗马，他登上了最高的地位，深受人们的感激和敬爱。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竟然想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竟然想把他押到演讲坛下，强迫他倾听我们对他的弹劾和声讨，甚至想让他接受无心少年的恶骂。
>
> 这种事情不仅玷污了他西庇阿的名誉，更是玷污了我们罗马市民的名誉。

反对派试图强行逮捕大西庇阿的提案在元老院被否决了。但是，他们使这位扎马之战的胜利英雄在政治上失势的目的达到了，大西庇阿极度厌恶反对派的阴谋诡计，愤而离开罗马，从公众生活中引退。

尽管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但这位在罗马唯一拥有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战绩的大英雄，是不可能忘记自己处于命运低谷时勇于力排众议、为自己辩护的那位年轻人的。他把自己的女儿科尔涅利娅（Cornelia）许配给格拉古父亲，此后二人结婚，才诞生了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两兄弟。说格拉古兄弟身上流淌着名将西庇阿的血，就是源于这一重关系。

公元前182年，也就是为大西庇阿辩护的5年后，38岁的格拉古父亲被选为罗马的按察官（Aedile）。按察官的职责包括对大型庆典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他亲自组织的体育竞技大会华丽精彩，且规模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引起了元老院的重视。很多自费参加活动的格拉古父亲的政治“后援者”（类似于今天的“拥趸”、“粉丝”，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竞技大会提供了赞助。因此，这次体育竞技大会不仅展现了格拉古父亲的能力和富裕程度，而且显示出他已经成为能够统领众多“后援者”的政治“掌门人”。

格拉古家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家门，本出自平民。就是在第二次布

匿战争时期，他家也还是平民。但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需要贵族、平民团结起来，于是允许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所属的家门成为罗马的统治阶级即贵族阶级。换句话说，就是打开平民精英成为贵族的通道。从公元前3世纪起，只要森普罗尼乌斯一门出了位执政官，家门即可成为贵族。由于这个措施，在公元前2世纪，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了。

当然，历史悠久的贵族豪门还是存在的。如小西庇阿所属的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建造罗马第一条大道——阿皮亚大道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所属的克劳狄乌斯一门，主张用持久战术对抗汉尼拔的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所属的法比乌斯一门，罗马成为共和国时即已是显贵的瓦莱里乌斯一门，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所属的尤里乌斯一门。相对这些名门望族，因不屈汉尼拔威势而享有“意大利之剑”美称的马尔凯鲁斯和格拉古家这些原属平民但后来拥有权势的新豪门，则被称为“平民贵族”，以与原有老贵族相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后世研究者喜欢使用的分类方法。当时的罗马人，似乎并不执拗于这种分类。以当时的通例，每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中必有一位是平民。这样的话，理论上每年都会有一个平民家庭进入贵族的行列，罗马的“贵族阶级”，已不再仅仅是封闭的世袭制。而拥有广阔的土地、统率众多“后援者”的政治“掌门人”成为平民贵族，也不再是什么罕见的事。

担任按察官职务两年后，即公元前180年，格拉古父亲被选为法务官（Praetor）。他的当选，得益于按察官任上以出色的竞技大会主办者为看点的周密的选前宣传，得益于众多“后援者”亲临现场投票，得益于“西庇阿审判”前后他果敢和仗义执言的一贯表现所带来的选民们的敬意。或许，是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当选为法务官，还意味着他具有了指挥两个战略单位（两个军团）的资格。

翌年，41岁的格拉古父亲以前法务官的身份（法务官任职期满后，

通常都会到海外行省任最高长官或统率军队打仗），被派遣到西班牙东部地区，负责当地行省的军政事务。他面对的是原住民不满罗马统治而举行的起义。

在西班牙东部行省任职期间，格拉古父亲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他率领的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指挥这支军队，他从不用皮鞭，而是给士兵们与自由市民同等的待遇。格拉古兄弟的爷爷是在对抗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斗中阵亡的，格拉古父亲拿出爷爷的事迹激励士兵，将士同心，终于平息了这场起义。格拉古父亲还在西班牙建立了原住民能够接受的、符合实际的、公正的统治制度，使过去一直执拗地反对罗马统治的西班牙，获得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为表彰他的功绩，在他返回罗马时，元老院特地为他举行了凯旋式。

两年后，即公元前177年，格拉古父亲被选为罗马政坛上的最高职位——执政官（Consul）。大约两三年后，格拉古父亲与大西庇阿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结婚。从大西庇阿将女儿许配给格拉古父亲到二人完婚，中间经历了12年。由此推算，指定婚约时候的科尔涅利娅，还是个幼女。可见，夫妇二人的年龄差距是很大的。

公元前169年，格拉古父亲获选为监察官（Censor），负责全面监察罗马人的道德行为。这虽不是最高官职，但在罗马共和国时代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监察官的职权中，还包括国家公共财产的管理及与公共事业建设相关合同的处理。格拉古父亲在任监察官职务期间，促使国家通过了关于禁止公共事业建设被少数人垄断的法律。

格拉古父亲自费买下了岳父大西庇阿在罗马广场（Foro Romano）的公馆，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了一座希腊式的长方形会堂（Basilica），被称为“巴西利卡·森普罗尼亚”。后世的恺撒又在同一场所建造了被称为“巴西利卡·尤里乌斯”的会堂。

格拉古父亲在监察官任上值得一书的另一大贡献，即作为法案提案

人，促成了一部重要法律的通过。根据该法律，凡家中已有5岁以上孩子、持有价值3万阿斯以上资产的解放奴隶，有权成为罗马公民。这就使原来的奴隶，获得自由后无须等到第二代就有可能成为罗马公民。解放奴隶中，很多人经营街边小店，或从事手艺人的工作，这部法律使他们可以和从事同样职业的罗马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当时，首都罗马出现了特别多的这类新公民，他们可以根据自己住所的不同，选择在罗马4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公民登记。

6年后，即公元前163年，57岁的格拉古父亲再次被选为执政官。获得投票权的解放奴隶们，几乎全部把选票投给了他。在此前后，他还两次担任视察团的团长，巡视东方（地中海东岸地区），显示罗马对同盟国叙利亚的塞琉古国王的支持。此后，叙利亚王位继承出现纠纷时，由罗马进行裁定。

格拉古父亲大约逝世于公元前153年前后。有一种说法是他和妻子科尔涅利娅共生育了12个孩子，但由于那个年代婴幼儿死亡率很高，成人的只有提比利乌斯、盖乌斯两兄弟和嫁给小西庇阿的女儿。提比利乌斯10岁丧父，弟弟盖乌斯比他小9岁，格拉古父亲给兄弟二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包括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政界和民间享有的良好口碑以及众多的政治“后援者”，但兄弟二人连父亲的面也没见到。

科尔涅利娅年纪轻轻即成为未亡人，对她来说，再婚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相当不错的选择，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风俗，女子再婚，特别是有过生育经历的女子再婚，是很受夫家欢迎的。何况科尔涅利娅还是“伟大的西庇阿”的女儿呢！实际上，求婚者络绎不绝，就连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想迎娶她为王妃。

然而科尔涅利娅拒绝了这一切，她的理由是，她想专心养育这两个儿子。

她把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这两个儿子称为“我的两颗宝石”。为了给

予两个儿子最好的教育和生长环境，科尔涅利娅作了周到的考虑与安排。她深知母亲自身的素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自己就拥有当时罗马的“教养人”资格，并且能够使用希腊语阅读和会话。她还特地从希腊请来学者，做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她认为，绝不能将孩子托付给家庭教师和用人，“孩子不仅从胎儿时期就要在母亲的腹中开始接受教育，母亲还要全面掌管孩子的教育成长，甚至不应放过通过餐桌上的交谈会话对孩子进行教育培养的机会”。科尔涅利娅和恺撒的母亲奥利娅并列，被誉为罗马妇女的偶像。提比利乌斯和盖乌斯二人，就是这样沐浴着母亲的关爱，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了健康成长。

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从迦太基灭亡现场归国后的那几年做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应该是像罗马上层社会的良家子弟一样，居住在当年罗马富人聚集的帕拉蒂尼山上公馆林立的高级住宅区，并曾在军队中服兵役。20岁那年，他被选为祭司。

正像《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所描述的那样，古罗马没有设置专门的“祭司”这个职业，敬奉鬼神的祭祀活动，由从各行各业选举出的“祭司”来主持。由于罗马是个多神教的国家，需要祭司的场合非常多。如军队出征需要祈求众神护佑，军队凯旋又要感谢众神的帮助，军事之外的公众祭祀活动也有很多。为此，即便是年轻的祭司，也有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接触到一些大人物，包括元老院中的重要人物。

在公众场合，提比利乌斯引起了元老院“首席议员”（类似于当代议会中的议长）克劳狄乌斯的注意。有一天，他一进家门就像出了什么急事似的呼喊他的妻子，连声说：“女儿的婚事定下来了！”

女儿的婚姻大事不和母亲商量就决定下来，他的妻子当然不高兴：“女儿的婚姻大事怎能这样草率！除非女婿是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经克劳狄乌斯一解释，妻子自然由嗔转喜。母亲心目中女儿的结婚

对象，古今标准都是差不多的。罗马发生社会革命以前的提比利乌斯，是所有母亲心目中女婿的最佳人选。

公元前137年，26岁的提比利乌斯被选为派遣至西班牙军团的财务检察官（Quaestor），随军去了西班牙。根据其弟盖乌斯的转述，提比利乌斯在去西班牙的路上，中途经过托斯卡纳地区，亲眼看到耕作农田的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伊特鲁里亚人，而是从外国来的奴隶，这种情景使责任感强的年轻精英极为惊愕。在西班牙期间，提比利乌斯一直没有中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财务检察官的职能主要是军中的财务管理，从军队所需的一切必要的物资筹措，到士兵军饷的支付，以及其他除战斗指挥之外军队运营所需的一切杂务，都由其负责。军队回国后，他还要负责写出会计报告。罗马统治者们有意识地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准备提拔为领导者的年轻后备干部，使之掌握军队运营的经验。大概他们认为，即使是肩负战斗指挥任务的总司令官，也只有具备了通过财务进出如实反映军队状况的经验，方能更加得心应手地指挥调动军队。

提比利乌斯随军的军团此次被派遣至西班牙的任务，是对付当地民众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发生的叛乱。

格拉古父亲在西班牙时期，实施的是在充分考虑当地民众诉求基础上制订的统治方式，实践证明很成功，使西班牙半个世纪以来持续保持平稳状态。

时隔多年，这回被派遣到西班牙镇压叛乱的罗马军遭到惨败，狼狈不堪。罗马军先是在战斗中败北，继而在溃败中又遭到敌军围困，交出武器和全部辎重后才得到了一个以停战为名的不光彩的撤退。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罗马官兵的素质，已到了眼不见心不烦的程度。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也成为年轻的提比利乌斯深刻思考的问题。

为这次西班牙战败善后的重任又落到了打赢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将军小西庇阿肩上。实际上，小西庇阿也根本不信任正规编制的罗马军团，他招呼他的“后援者”们出钱，自己征集了一支军队，率领着这支军队开赴西班牙。

对罗马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提比利乌斯归国的公元前135年，罗马史上第一次奴隶起义爆发了。而被派到西西里岛的正规军团，与起义的奴隶们交锋并不占优势，陷于持续苦战的境地。

“好像什么都开始不对劲儿了？”面对这些坏消息，人们自然会这么想。在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罗马于公元前509年选择共和政体以来，一直面临着贵族与平民抗争这样一个难题。后来通过的两部法律，成功地化解了这个难题：一部是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法》，根据这部法律，一切公职都面向平民开放，即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竞选或其他合法程序而成为各级官吏。另一部是公元前287年通过的《霍滕修斯法》，根据这部法律，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成为国家的法令。此外，代表平民利益的护民官，在任期届满后可以进入元老院。尽管这些护民官在元老院中仍属微不足道，是罗马实行的“少数领导制”中的“少少数”，但在防止元老院封闭化、防止出现倡导分裂的国民舆论方面多少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既然平民大会可以议决国家大事，那么公民（包括平民和贵族）大会更没有理由对大事不作决定。像对外国宣战和停战这样的大事，决定权都属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还具有人事决定权，以执政官为首的重要官职，都要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有权利就得有相应的义务，战争需要的资金依据公民资产的多少按比例分担，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这种分担办法还是体现了公平、公正。

这种根据资产按比例分担战争资金的办法，相当于现代的“战争特别国债”，因为资金的募集采取强制的形式，偿还则要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国家有钱时才能偿还。由于资金的偿还期都在20年以上，而且不付利息，实质上又属于临时性征收的直接税。

罗马人民承担的义务不仅是要出钱支持战争，还要出人去打仗。被罗马人称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打了17年，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前后有25人战斗在最前线，其中有8人战死。执政官在战场上是唯一的最高司令官，尚且有这么多人牺牲，身为普通公民当兵上战场而牺牲生命者，就更多得不计其数。正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罗马人上下一心，团结对外，才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使享誉世界战争史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俯首称臣。

听来令人称道的这一切，却从公元前200年，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了改变。

首先，罗马军队开始不断打胜仗，可以夸口“屡战屡胜”了。最高司令官战死沙场的故事再也没有发生。这对罗马当然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负面的东西正在显现出来。前面提到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开始实行允许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的子孙成为贵族阶级的政策，其本意是想防止统治阶级的封闭化，但这个意图并没有实现。

从公元前200年到迦太基灭亡的公元前146年，共经历了54年，按共和制罗马的规定，每年选举产生两位执政官，不考虑有人10年后再次当选的个案，其间共产生了108位执政官。在这“一百单八将”里，家门中从未有人当过执政官的当选者仅有8人，其余百人全部集中于科尔涅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格拉古家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等28个家门。这一时期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不再体现为相互抗争的阶级对立，二者之间的通婚也有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像日常便饭一样不再稀奇。但是，同为罗马公民，属于元老院阶层的和不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两大人群的区分与对立日益明显，且有固定化的趋势。

本来元老院只是一个向国王进言的咨询机构，对几乎所有的国事都没有决定权。所谓的“元老院劝告”，是指将在元老院讨论议决的事项作为来自元老院的“建议”提交给决策者，元老院没有将其建议政策化的权力。罗马的“共和政体”，从理论上说是彻底的“主权在民”。

但这个规矩被“汉尼拔战争”时期的“非常事态”给破坏了。由于汉尼拔统率的迦太基军队大兵压境，为了度过这一罗马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很多重要事项需要随机应变，迅速决策。迫于这种压力，这一时期的“元老院劝告”被原样照搬地成为国家的政策。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决策方法在“非常事态”结束后被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变通做法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人质疑其有效性，但反对意见长时期没有成为主流，而且在这期间，国政大权不断向理应只有“劝告”权力的元老院集中。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罗马的霸权从意大利半岛逐渐延伸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元老院集中权力的过程恰巧与之重叠，致使权力向元老院的转移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元老院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第一是外交权。罗马霸权范围所及的海外行省和同盟国派到罗马的使节，必须是接受元老院的邀请才可成行。也就是说，是元老院而不是执政官在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当海外行省和同盟国出现需要罗马出面解决的问题时，也是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视察团行使处置权，并已成为惯例。

第二是人事权。主要公职人员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但其候选者要由元老院决定。

第三是财政权。海外行省的税制由元老院决定，国库的支付，也是由元老院议员担任的监察官决定。监察官还是每5年对市民作一次资产调查的责任人。对于罗马人民来说，监察官就像国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公共建设事业合同的管理，也是由监察官负责。

第四是司法权。法律认可罗马公民有控告权，行省居民有检举权，但审判机关的最高长官，则是身为元老院议员的法务官。审判时的陪审团成员，全部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军事权实际上也在元老院手上。带兵打仗的执政官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但每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的任职地点，则由元老院决定，而且，执政官任期届满后，通常都要被派去管理行省，具体去哪一个行省，仍由元老院作出决断。

如此程度的权力集中，假如没有和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对于罗马来说还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罗马人的观念与希腊人不同，对于“少数领导制”这一罗马独有的共和政体，罗马人往往只注重体制机能的有无，而很少去操心体制本身正确与否。

下面我们来看两张表。表1是按罗马公民拥有资产数额而作出的等级区分。表2统计的是负有承担兵役义务的罗马公民的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17岁至60岁的男子中，拥有资产达到规定金额以上、能够以服兵役形式支付直接税者。

表1 按公民拥有资产金额划分的六个等级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前241） （货币单位：阿斯）	第三次布匿战争后（前146） （货币单位：阿斯）
第一等级	100000以上	1000000以上
第二等级	75000—100000	300000—1000000
第三等级	50000—75000	100000—300000
第四等级	25000—50000	50000—100000

第五等级	12500—25000	6400—50000 不久资产下限降至4500阿斯，公元前130年时已降至1500阿斯
无产阶级	资产在12500阿斯以下者为免税阶级，免服兵役	资产在不同时期不足6400、4500、1500阿斯者为免税阶级，免服兵役

表2 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应服兵役者人数及其变化

年份 （公元前）	人数	备注
241	260000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
225	291200	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七年前
204	214000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两年后
189	258318	叙利亚战争结束一年后
179	258794	这个时期派遣到西班牙的军队人数可能未统计在内，因此与10年前的数字差别不大，实际上这一时期人口应该是增长的
169	312805	马其顿王国灭亡

159	328316	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147	322000	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
136	317933	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从表1、表2可以看出：第一，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并且第五等级的资产下限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应服兵役的公民（第一至第五等级）数字却在持续减少。这是很多家庭在有人从军后，家庭拥有的资产难以维持生活，达不到第五等级以上的标准，免服兵役的无产阶级不断增多的缘故。第二，罗马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在公元前241年，第一等级与第五等级的差距不足10倍；到了公元前146年，这个差距已超过500倍。与以前平民要求与贵族政治权利平等而发生的抗争不同，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困扰罗马的社会动荡，主要表现为追求社会正义与公正，抗争的双方转为穷人与富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表1显示出，罗马作为地中海世界的胜者，其富裕阶级的财富呈数量级地增长，第一等级的起点已从10万阿斯上升至100万阿斯，但作为罗马共和国中坚的一般公民的数字，却处于减少的状态中。

社会的动荡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萧条，而经济的萧条，又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罗马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农民的特点是勤劳并富于进取性，一种有定论的说法是，罗马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优于国境相邻的高卢人。从事农业，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是个高尚的职业。据说公元前5世纪被推选为罗马独裁官的辛辛纳图斯打仗时放下锄头拿起权杖就去指挥战斗，得胜归来放下权杖又拿起锄头务农。农业生产以家庭规模的自耕农为主要形态，有的家庭即使拥有奴隶也就是一两个。

其后农耕地和奴隶的数目略有增加，但自耕农的主流地位没有改变。这些自耕农，按资产规模属于第四、第五等级，他们以服兵役的形

式向国家缴纳直接税，为罗马成就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士”和“农”的区别不那么明确之外，那个时期的罗马就已经有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

然而，由于意大利中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这些中产阶级受到了直接打击。

在公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西西里成为罗马的一个新的行省，要向罗马纳税。西西里以大量的小麦用于缴纳直接税，大量小麦流入市场对罗马小规模农家的小麦生产造成严重冲击。由于自耕农生产的小麦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农民们转为生产橄榄油、葡萄酒，或从事畜牧业。在小规模自耕农为主要形态的时代，农家及时转型是成功的。因为随着罗马国力不断增强，社会资本充实，城市建设投资规模扩大，带动了包括同盟城市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地区生产水平的提高，对橄榄油、葡萄酒等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强劲。

这一切，在公元前15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

首先公元前187年，罗马政府将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以战争国债形式向人民筹借的款项全部偿还完毕。

继而在公元前167年，上述这种实质上为向罗马公民征收直接税的筹集战争资金的做法被宣布废止。

这是因为，罗马属下的西起西班牙、东至希腊的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各个行省都要向罗马缴纳什一税（直接税）和矿山收益，再加上国有土地租金和港口使用费等等的间接税入账，没有必要再向罗马公民征收直接税。

我把战争国债意译为“直接税”，是由于它是按公民所拥有资产的多少来课征的。这种税全部取消，受益最大的是富裕阶层。此时罗马出现

了资金过剩的“钱多状态”（有点像现在经济学家们常说的“流动性资金过剩”），取消直接税是导致资金过剩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罗马霸权扩大、市场扩大而导致的“骑士阶级”的兴起。

拉丁语中的“equites”被直译为“骑士阶级”，他们负有向罗马军队提供骑士的义务，意味着他们拥有的资产额按表1的划分不低于第一等级，即贵族阶级。但为了和担当国政的贵族阶级以至元老院阶级相区别，他们被称为“骑士阶级”。由于祖上没有人担任过执政官，与名门望族和平民贵族相比，从政对他们来说是个难关，所以他们选择了经商之路。根据法律，元老院阶级的人士被禁止经商，使得骑士们在这个领域得以大显身手，而罗马的不断强大又使他们的市场持续扩大。

骑士们的“业务”门类非常多，最初主要从事的业务是承包代理征收租税，以从中收取手续费作为收入来源。应缴纳租税的人们，往往会为缴税而临时借款，于是贷款又成为骑士们的业务。他们贷款给这些纳税人，以后再催讨欠款本息。罗马元老院对于以恶劣手段从事金融业的人虽没有听之任之，但在共和政体时期也没有对其进行整顿。后来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放贷的利息高达48%，令见多识广的西塞罗也大吃一惊。当时正常的贷款利息，年利率仅为12%。

军需品的采购也成为骑士们的业务。这项生意怎样品味都是个“肥差”，即使现在谁能做这项生意，也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公共事业的建设也由骑士们来承包。与罗马成为富足国家相伴，这个时期发明了用石灰和火山灰混合而成的水泥，促进了建筑的繁荣。从公元前190年到公元前140年期间，以提供用于审判、会谈和市民集会的场所为目的，相继建设了霍里亚会堂、埃米利亚会堂和森普罗尼亚会堂，还重建了8座神庙。公元前179年修建了横跨台伯河的石桥。公元前144年修建了工程规模前所未有的梅西亚水渠。此外还上马了重新铺设

道路和填海造地等建设工程。这些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建设工程，由于投资巨大，骑士们就采用寻找合作伙伴、组织合伙公司的办法来承担。

这些与现代公司相似的经济组织，在罗马以外的地区灵活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他们将总部设在罗马，在行省和同盟国设立分部。分部中，活跃的多是那些原本就具备较强经商能力、希腊血统的意大利人。

这些人能够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与元老院阶级有人暗中支持密不可分。元老院议员经商，在法律层面是被禁止的，但法律常常会有漏洞。很多元老院议员把自家的奴隶恢复自由，成为“解放奴隶”，把资产放在这些“解放奴隶”的名义下加以运用。从弹劾西庇阿事件暴露出，老加图就是通过自家的奴隶投资经商的。总而言之，越是富人就越富。

如果出现了财富超过了自身需要的增长，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考虑投资。而最合适的投资对象是土地，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通例。本来未拥有不动产，放弃从政而选择经商的骑士们，同样把土地作为首选的投资对象。

但是，罗马还有能够用于投资的土地吗？

罗马共和国在称霸意大利半岛的时代，对于败在自己手下的国家，保留其城市和人民，使之成为同盟者，但要从战败国手中没收一部分土地，变为罗马的国有土地。据学者们推算，公元前140年的国有土地总计为50万公顷，相当于罗马全部领土的七分之一。

这些国有土地，租借给公民来耕种，租金根据土地用途划定不同标准，耕作小麦按年收益的十分之一，种植橄榄或葡萄按年收益的五分之一。与租种地主土地支付的地租相比，这个租金标准是相当优惠的了。

而且，国有土地的租借权，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不得向其他人转让。从可继承这一点来说，这种租借来的土地，实质上可以视为私有土

地，只不过从法律上仍是完全的国有土地。

剩余资金陆续流入这些国有土地。如果从事畜牧业或从事橄榄、葡萄的栽培，可以期待数年后获得好的回报，但需要先期投入资金。而且，从规模效益的角度讲，能够使用的土地越多收益率就会越高，先期投资也就越大。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连战连胜，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罗马。奴隶作为劳动力的魅力，不仅在于因供给超过需求而导致奴隶的价格下跌，还在于和身为罗马公民的罗马农民不同，不是罗马公民的奴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可以专心务农。

假如一家中有一个公民服完兵役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家属劳动所得的收获物，在与使用大量奴隶大规模生产同类农作物的农庄的价格竞争中败北，卖不出去只能削价处理。为了渡过难关，只好靠借款维持生计，但这终究还是陷入窘境，难以自拔。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罗马农民的勤劳意愿发生了变化，而是罗马的农业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不管怎么说，罗马的军事力量是建筑在自耕农这类中产阶级之上的。罗马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没有理由对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不闻不问。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那时土地集中现象还不是那么明显），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人租借国有土地的上限为500尤格（约为125公顷）。

但这种规定仍有漏洞。被禁止经商但可以堂堂正正从事农业的元老院议员们，虽然以自己的名义只能租借500尤格，但他们可以用家属和亲戚的名义大量租借国有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法律已是有名无实了。

由于奴隶无须担心服兵役，是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使用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其收益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促进了罗马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但是，片面的经济增长不一定给社会带来好的效果。那些借款耕作

而产品又缺乏价格竞争力的自耕农，由于经营失败，无力偿还贷款，被当做贷款抵押的土地就被债主收走，成为失去土地的失业者。

这些失去土地的原自耕农大量流入财富集中地——首都罗马，据研究者推算，大约占首都罗马人口的7%，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仅靠完善社会保障、充实国民福祉就能够化解的。对于失业者来说，不单单是失去了职业、丧失了生存手段，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整日睡在木桶中仍能保持做人的尊严，这种人物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普通人，是把自己的尊严和从事的职业相联系的，人之作为人，有必要保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自我肯定意识一旦丧失，绝对不是仅靠社会福利就能够恢复的，只有恢复他们的职业才行。

对这些“失业者”来说，失去土地导致他们成为了无产阶级，以往服兵役形式的直接税被免除了，岂不是挺好的事吗？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的心理。这些“失业者”难以舍弃罗马公民的荣誉感，失业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罗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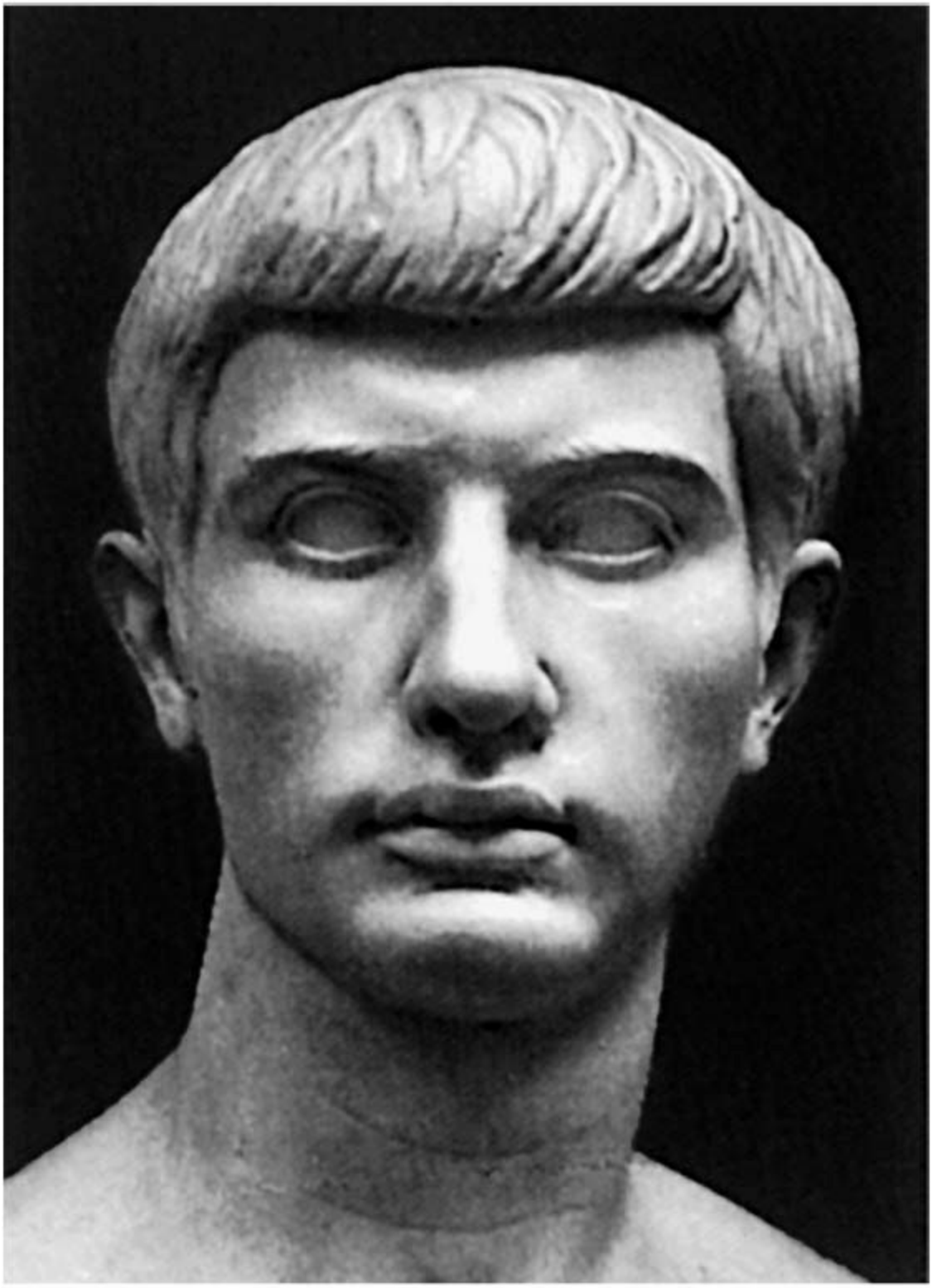
根据罗马的人口调查（表2所示），直到公元前159年，义务服兵役的人数都是持续增加的，以这一年为转折点，人数逐年减少。其实17至60岁男人的人数没有减少，具有服兵役资产资格的公民人数却在持续减少。即使把第五等级的资产下限从12500阿斯降低到6400阿斯，具备服兵役义务的公民人数还是在减少，以致征兵成为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与之相对，免除兵役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在增多。降低资产下限的结果，是把以前不属于服兵役阶层的人驱赶到了战场上。如果说这些士兵在战斗力上不如西班牙原住民和西西里的叛乱奴隶，还不如说他们缺乏责任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战斗中，他们不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而只是为维持罗马的霸权而战。

公元前134年夏，29岁的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当选为护

民官。他的任期是第二年（前133），那时他才刚满30岁。尽管年轻，但他在第一次演讲时，以其关心平民百姓的视角和独特的抑扬顿挫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罗马人的心。

> 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自己的巢穴，劳累之后回到巢中，能够尽情地休养生息。而为国战死的罗马公民，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只能带着妻子和孩子四处流浪。
>
> 在战场上，面对敌兵的袭击，指挥官会用“你们要保卫自己家族和先祖的墓地”这样的话来激励士兵，这不过是虚伪的谎话。为什么是谎话？因为士兵们家中不仅没有可供祭奠的先祖陵墓，甚至连祭祖的祭坛都没有。
>
> 这样说来，士兵们勇敢地战斗，勇敢地牺牲，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守护别人的富裕与幸福。
>
> 罗马人民，现在是胜者，被称为世界的霸主，然而现实中的罗马人民，却连属于自己的土块都没有！

护民官的任期从当年12月10日开始，就好像等得不耐烦了似的，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提出了有关农地改革的法律。



提比利乌斯• 格拉古

他的《农地法》，与现代的农地改革法不同。对于罗马人来说，保护私有财产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不论多么广阔的土地，只要是私有的就不能成为《农地法》调整的对象。提比利乌斯属于森普罗尼乌斯一门，他提出的法案被称之为《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这项法案，只是以国有土地为对象。

《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有如下内容：

1.租借国有土地的上限仍为500尤格（约合125公顷）。如果再以儿子的名义租借国有土地，一个儿子名下不能超过250尤格。但是，全家租借国有土地的总额，不得超过1000尤格。从事畜牧业的家畜总数，以600头为上限。

2.国有土地的租借权可以继承，但不得向其他人让渡。

3.已借用国有土地超过1000尤格者，要将1000尤格以上的土地退还给国家，国家根据退还土地的数量，支付补偿金。国家设立常设的委员会把收回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再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追求平等的改革法案，最多是一部追求公正的改革法案。因为大多数农民租借的土地，只有30尤格（约合7.5公顷）。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提倡的农地改革，不过是把百年前已经法制化而后处于有名无实状态的事物，再度还原到原来的形态。租金的标准也没有变化。向被租借的国有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土地征收的租金，类似现在的固定资产税（物业税）。这个法案的真实意图，是在纠正那些富有者以亲属和“解放奴隶”（即主人给予其自由，使之成为自由人，但并不离开主人家庭的原奴隶）的名义过度占有国有土地的行为。

提比利乌斯的《农地法》提出之际，元老院方面没有公开反对的动向，因为这个法案维护公正的立场非常清楚。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岳父、元老院中最有实力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著名法律专家、当年

度的执政官姆奇乌斯·杰奥拉，对年轻的护民官的做法都是积极的赞成派。那些多占土地的元老院议员，由于法案会侵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从内心是抵制的，但鉴于中产阶级人数减少导致军队质量下降的现实，他们也没有理由唱反调。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思路是清晰的。

救助从农民沦落为无产者的那些人，给予他们土地，使之复归自耕农。由此可健全罗马社会中间阶层的基础，在救济失业者的同时，化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只有中间阶层经济基础牢固，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军队的质量才能提升。他的思路是，借鉴雅典的模式，在不涉及其他阶级的前提下完成改革，尽力避免阶级斗争。在这个阶段，就是那些担心失去既得利益的元老院议员，也无法以图谋分裂国家的舆论为口实对他进行责难。

问题是，仅仅分配农用土地，还是不能把这些失业者培育成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意大利是个山地国家，不具备大平原的优势，更适合种植橄榄、葡萄，或从事畜牧业。罗马最早的农业著述的作者老加图也是这样论述的。不论要从事种植橄榄、葡萄，还是从事畜牧业，都需要一定数额的前期投资，而目前流浪在城市里的无产阶级们显然没有这个财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在他的法案中又追加了一项内容，即除了发给这些人能够回到分配给他们的农地上的救济金之外，还要再资助复耕所需的启动资金，这笔资金由国库支出。

这样一来，本来一直未公开表示反对的那些元老院议员们，现在转为明确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国库资金的支出，不得用于对私人的补助等资助私人的开支。当然，基于《农地法》分配给农民的土地租借权具有可以继承这个特性，将其视为私有土地也没有错。很显然，拿出这个反对理由只是反对派的一种策略，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将他们多占的土地收回，而这个真正的动机又无法拿到桌面上来。

反对派成功地将另一名护民官，以思想保守著称的马尔克斯·奥塔维斯拉拢到自己的阵营。根据法律规定，只要现任四名护民官中有一人反对，他可以行使否决权，使法案不能付诸投票表决。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与马尔克斯·奥塔维斯同年出生，从少年时代起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二人都出身上流社会，年少时按良家子弟的规矩，每天上午都要在家中跟着家庭教师努力学习，下午到城墙之外马尔斯广场的体育场上刻苦锻炼身体。幼时的玩伴现在要对他的提案行使否决权，这对提比利乌斯是一个未曾想到的打击。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进行农地改革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绝不肯暂时妥协后退，重新等待时机。如果采取私下沟通的做法，把马尔克斯·奥塔维斯拉到自己这边来，又不符合提比利乌斯的性格。他选择了与马尔克斯·奥塔维斯公开辩论，试图以堂堂正正的理由光明正大地说服对方。

二人之间连续几天进行了白热化的辩论。尽管论战十分激烈，但双方没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污言秽语，没有抓住对方小辫子不放的奚落羞辱，甚至连高分贝的粗声粗气都没有。尽管分为正方反方，但双方都保持了礼貌与风度。马尔克斯·奥塔维斯在辩论中屡屡落于下风，但躲在后面的反对派在辩论后给他打气助威。

看到马尔克斯·奥塔维斯执意要行使否决权，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决心使出最后手段——解除马尔克斯·奥塔维斯的护民官职务。这是在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处置手段。提比利乌斯判断，只要能够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他的农地改革法案显然能够以多数票得以通过。为了使《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能够成为法律，他只有使用这个手段。“既然护民官忘记了维护平民的权利，平民们没有理由再维护他的护民官位置！”提比利乌斯的这番话，得到了平民们的响应，解除马尔克斯·奥塔维斯护民官职务的动议获得通过。没有了行使否决权的人，《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在公民大会上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

负责将收回不正当占用的国有土地再分配给无产者的“三人委员会”也开始运转。三名委员中，提比利乌斯自任委员之一，其余两名委员分别由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和他的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担任。但是其弟盖乌斯加入了小西庇阿率领的镇压西班牙起义的军队，即将离开罗马，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年老体衰正在患病，提比利乌斯只好孤军奋战。这项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了，好在他只有30岁，还能坚持下来。

《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生效后，希望租借农地的人非常多，那些反对农地改革的人，就不断搞一些如拒绝提供谈判场所之类的小动作来妨碍法案实施，但这些都不能阻挡年轻的护民官推进改革的进程。《农地法》生效后与生效前相比，提比利乌斯对于“身居护民官职位，就要保护民众利益”有了更强的意识。但与此同时，元老院中的稳健派，那些开明且一直支持他的人开始疏远他。

这些人在作出收回多占土地并支付补偿金的决定时，对提比利乌斯是支持的。他们一方面不能容忍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提比利乌斯为了得到解除马尔克斯·奥塔维斯护民官职务而必需的赞成票所表现出来的反富裕阶级的行为，他们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承认农地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们不同意把国家应得的收入变成实施《农地法》所需的资金来源。

当时正值帕加马国王去世，根据国王的遗言，帕加马王国并入罗马，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提比利乌斯提出议案，打算把帕加马上缴的租税作为实施农地改革的资金来源。那些过去支持提比利乌斯改革的元老院人士对此也不赞成。

新近纳入罗马霸权的国家或地区重组为罗马的行省，是一件大事。元老院把持这个权力已有70年的历史。按照程序，先要由10名元老院议员组成视察团对拟成为新行省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基于考察结果形成关于其统治模式的提案，提交元老院审查通过形成最终决策。提比利乌

斯的提案被认为使元老院具有的权限受到了侵害。

为了推进农地改革，提比利乌斯太需要钱了。若想让流民们不再是流民，必须先给予他们生活费，还要给予先期投资资金把他们送到新分配的土地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流民将重新进入“不得不借款→然后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再次失去土地→重新沦为流民”的恶性循环。尽管法律规定土地租借权不得转让，但流民们为了糊口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在使出各种手段的同时，更加意识到确保财源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这笔钱的确很难从国库支出，主管公共财物的监察官也会很棘手。恰在此时，得知没有儿子的帕加马国王愿将王国送给罗马人民的消息，提比利乌斯将此视为众神赐予的希望之舟。

然而，护民官提比利乌斯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公然挑战元老院的权威，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提比利乌斯一步也不退，他说：“帕加马国王的遗嘱，记载的是将王国送给罗马人民，而罗马人民如何处理这笔遗产，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由元老院决定。”提比利乌斯利用了法律的这一漏洞，他的提案不是提交给公民大会，而是提交给平民大会来表决。因为根据《霍滕修斯法》，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无须再经过其他机构认可即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

这样一来，农地改革开始演变为公开反对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的行为。以元老院为大本营的罗马统治阶级，感觉到他们安居了70年的统治制度正在被强烈地撼动，而撼动他们统治的这个人，还是属于自己阶级的一分子——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迄今为止一直对自己的做法给以热心支持的人们，现在渐渐转变立场，对此提比利乌斯不可能没有察觉。但这反而使他意志更为坚定，他要坚决推广实施《农地法》，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半途而废。“只要将农地改革坚持下去并取得成果，就能够夯实共和制罗马的基础，罗马就不会重蹈已经灭亡的那些国家的覆辙。”正是16岁时形成的这种危

机意识，支持着日渐孤立的提比利乌斯·格拉古。

为了使自己主导的改革不致中途停顿，就不能离开护民官的位置，30岁的提比利乌斯决心竞选连任。他的任期从上年12月10日开始，已经过半，护民官的选举在每年7月举行，如果7月份其他人当选，则他的任期还有半年。假如新当选者与他政见不同，他必须在剩下的半年任期内完成改革。提比利乌斯对此非常担心。

“汉尼拔战争”之后，战时的“非常事态”终结，罗马恢复了执政官不得连选连任的制度，其他官职也不再允许连任。但对护民官连选连任没有禁止性的法律，这是因为当初创设护民官制度时，只是将护民官当做平民阶级的代表，或者说是国家一部分利益者的代表，并未将其视为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公元前4世纪已经实施了一项法律，规定有过护民官任职经历者自动享有元老院议席。对于那些虽未出身于名门望族，仍属于平民贵族的从政者来说，护民官任职期满后进入元老院，而后经过法务官的台阶后问鼎执政官的道路，是职业政治家最稳当快捷的“精英之路”。即便护民官连选连任没有什么问题，但相比之下，选择放弃连选连任尽快进入元老院，对仕途更为有利。况且，法律意义上护民官虽不属于公职，但实际上，该职务的诸多特征使人们认为该职务在不能连选连任问题上与其他公职没有区别。

反复权衡之后，提比利乌斯认为，既然法律上没有禁止性规定，他就决心一搏。

那个时候聚集在提比利乌斯周围的，几乎都是和他同样出身于罗马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他们狂热地支持他。为了探讨提比利乌斯连选连任的可能性，他们作了大量选情分析和预测。出乎意料的是，从搜集到的信息分析，得出的竟是很难获胜的结论。

在元老院内，因农地改革而伤害到既得利益的人持反对态度，是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即使赞成改革，同时又维护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的元老院议员们，此时反对农地改革的立场也日趋明显。当然，护民官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既独立于元老院，又独立于公民大会。提比利乌斯在平民大会上能否当选之所以难以把握，是由于平民对他的支持也是勉勉强强。

民主政体采用直接选举方式选举领导人，而直接选举方式的一个缺陷，就是选举结果会更多反映身临投票现场的人的意见。例如在首都罗马召开平民大会，左右大会决议的，不会是住在远离罗马的平民，而是住在罗马的平民。提比利乌斯的不利之处在于，住在罗马的平民，大多从事工商业，以国家给予农耕地、培育健全的自耕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改革，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关注国事、政治意识强的平民，会赞成农地改革，由于平民阶层比富裕阶层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无产者，他们更能感受到失业者增多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罗马的平民有点当家做主的意思，他们有自己的平民大会，可以选举中意的护民官。在这个制度安排下，罗马平民们没有劣等阶级的感觉。代表他们利益的，就是护民官。每年都要选出四名护民官，四人地位、权限不相上下。提比利乌斯断然解除同僚的职务，不说冒天下之大不韪，至少也是没有先例的出位行为。有些平民虽然投了赞成票，但对于代表自己利益的护民官就这样被解除职务，总是心存芥蒂，短时间内难以消化，这些人怎么说也不愿意提比利乌斯连选连任。反提比利乌斯派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提比利乌斯争取连选连任，目的是向自己个人集中权力，反对派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般来说，视野狭隘的普通人在考虑政治取向时，往往把私利私欲掺杂其中，这种社会现象不是今天才有。但罗马是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他们非难提比利乌斯想当独裁者，这一招不容易

捕获民众的心。实际上，确定要对提比利乌斯连选连任投赞成票的平民，以直接受惠于农地改革的城市无产阶级为主。问题是，罗马的选举制度是以投票者资产的多少来确定其票数，虽然无产阶级人数众多，但票数有限。如果在罗马召开平民大会，即使集中了全部有利因素，提比利乌斯所获票数仍不能满足连续当选的要求。

看到选情分析的结果不理想，提比利乌斯并没有灰心，他的思路又转向如何争取有产平民的支持。他发现，有一定资产的平民就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个义务过多就成为负担，而且还有很多有产平民将市场扩展到海外从事经济贸易活动，他们的利益也应该得到保护，应该在这两方面做些工作。

提比利乌斯提出了缩短服兵役的时间和关于司法改革的两个法案。后一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将目前为止陪审团成员全部由元老院议员组成，改为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即富裕平民各占一半。他希望能借此争取到连选连任的选票。这两个法案迅即在平民中广为传播，虽然还未议决，但平民们对提比利乌斯的好感确实再度提升。这样一来，反提比利乌斯派的危机感进一步增强。

很快就到了护民官选举日，平民大会如期在罗马的卡匹托尔山举行。有选举权的平民们很早就挤满了会场。当提比利乌斯来到现场时，人们以狂热的欢呼迎接他的到来。护民官连任之路似乎就在他的脚下。会场上聚集了比往年都要多的准备投赞成票的民众，支持者众多当然是好事，然而这次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卡匹托尔山是罗马城七座山丘中最高的一座，但山顶面积比哪一座山都要狭窄。在这个狭窄的山顶上，以供奉最高神朱庇特的神庙为首，共建有大小五座神庙。平民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朱庇特神庙前的广场上，这个广场也是卡匹托尔山最大的场所，此时已被聚集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距此处大约80米的地方，建有供奉“信义之神”斐迪斯的神庙，被危机感笼罩着的元老院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有选举权的民众超出常规数目聚集在选举现场，致使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选举变得非常困难。除了支持提比利乌斯的民众之外，反对他的民众也聚集到了一起，更加剧了现场的混乱。这些反对提比利乌斯重新当选的民众成群结队地向提比利乌斯站立的神庙正面的台阶上涌来，支持提比利乌斯的民众则试图把他们推回原地。此时，支持提比利乌斯的元老院议员富维斯·弗拉库斯，为了将元老院开会的情况通知给提比利乌斯而迅速赶到这里，但由于人多拥挤不堪，他根本无法接近提比利乌斯。他只好登上附近神庙的台阶，向提比利乌斯打手势。提比利乌斯看到后，让群众让开一条道，二人才得以见面。弗拉库斯告诉提比利乌斯，元老院议员中的强硬派要求执政官使用武力，执政官没有首肯，这些强硬派议员们就声称要把武器发给自己的侍从和奴隶，摆出一副靠自己的力量也要阻止提比利乌斯连选连任的架势来。

得知这一消息后，提比利乌斯的支持者也强硬起来，他们一齐把托加的下摆撩起来，别到腰部，拿起原本指挥疏散用的木棍，也做出一副武力抵抗的架势。远处的民众注意到了这种反常的举动，他们大声地询问提比利乌斯到底出了什么事。提比利乌斯想向他们解释，但他意识到声音根本传不到那么远，为了让群众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就做了一个用手掌指向头部的动作。

看到这个场景，反提比利乌斯的民众迅速跑到元老院开会的斐迪斯神庙，告诉元老院说提比利乌斯要求平民给他戴皇冠。

这个消息使元老院会场顿时哗然，最高神祇官西庇阿·那西卡高喊，为了打倒暴君，把国家从专制者手中解救出来，必须赶快动用武力。他逼迫执政官马上下令。

执政官杰奥拉没有改变平静的态度，他回答说："那些人并没有采取暴力行动，而且不经审判不能对公民执行死刑。假如平民们被提比利乌斯胁迫、非法选举他为护民官，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

听到这里那西卡霍地从自己的座席上站起来说道：

“各位元老院议员，诸位都看到了，我们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已经背叛了祖国，我们不能指望他了。捍卫罗马法的人，跟我走！”

说完这话，那西卡掀起自己托加的前襟蒙上自己的头，这是祭司捧着牺牲祭祀众神的姿势，那西卡拿着这个姿势，背对斐迪斯神庙，向平民大会的会场朱庇特神庙前的广场走去，跟在这位最高神祇官后面的，是那些强硬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他们左手撩起托加前襟，右手举着从椅子上拆下来的铁质椅子腿。

很多平民被以最高神祇官率领的元老院议员的阵势吓住了。原本站在前面阻挡反对派的人们，开始掉头逃跑，由于跑得过急，有人被绊倒，其他人就踩着伙伴的身体继续奔逃。

这样一来，局势变得谁也无法控制，就在祭祀罗马守护神的神庙前，拥护农地改革的民众和反对农地改革的势力发生了正面冲撞。就像两支持不同政见的示威队伍发生肢体冲突那样，双方一刹那好像忘掉了一切，只剩下失去理智的相互憎恨。提比利乌斯这一方，尽管人员年轻且占有地利，但手中只有木棍防身，终归不敌挥舞着铁质椅子腿的元老院一方，败下阵来。就连为保护提比利乌斯而紧紧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逃走了。提比利乌斯只好逃离现场，路上不知被谁抓住了托加，他只好弃掉托加，沿着从卡匹托尔山通往罗马广场的坡道逃跑，但途中又被尸体绊倒。刚想爬起来的提比利乌斯，被追上来的人一袭击中，继而又抡起铁棒再次重击，提比利乌斯当场死亡。当天被杀死的提比利乌斯的支持者达300人之多，无一例是刀剑所伤，全部是被殴打致死。

反对派对提比利乌斯及其支持者的憎恨，并不因将人打死而停止，他们拒绝了死者家属收尸火葬的要求，将包括提比利乌斯在内的300多具尸体，全部被扔进了台伯河。

这一以悲惨结果而告终的事件，令元老院中的开明派惊愕不已，从现场一溜烟逃跑的民众们也后悔莫及。帝王时期的罗马，在王位交替时发生过流血事件，但在共和政体迄今近40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因政治斗争导致流血冲突的事件发生。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为保卫平民权利，为他们争取不可侵犯的切身利益的护民官竟在身居现职时被打死。提比利乌斯的任期被人为中断。按说即使他连选未获成功，他的任期也应该到当年的12月9日。

为平息平民们的愤怒情绪，元老院采取了一些安抚民众的措施。首先是以去行省进行祭祀活动为由，把平民们最为憎恶、成为众矢之的那西卡派到遥远的东方（地中海东岸地区），实际上是放逐了他。其次是决定《农地法》继续有效，承担没收不正当占用国有土地再分配给农户任务的“三人委员会”继续工作。“三人委员会”中，因提比利乌斯死去形成的空缺，选举其弟盖乌斯的岳父里奇尼乌斯·格拉斯担任，其他两个成员仍由从西班牙回来的盖乌斯以及提比利乌斯的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二人继续担任。不久，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因病去世，接替他的仍是提比利乌斯的亲友富维斯·弗拉库斯。元老院通过以上措施向平民们表态：尽管提比利乌斯已死，但农地改革继续进行。

当时很多罗马人把这次动乱当做一场不幸的事故，以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然而，发生在公元前133年的这场悲剧，却不幸地成为其后持续百年的“罗马内乱”的开端。所谓“内乱”，不仅仅指发生在庞培和恺撒之间的故事。希腊历史学家阿庇安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记述了从公元前133年开始，中间经历庞培和恺撒的争斗，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联军为止，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历史。作为一部记载百年史的著作，作者使用了突出多次内乱这一主题的书名，直译为《诸内乱记》。这100年对于罗马人来说，是战争的百年，然而与三次布匿战争时代的百年不同，那100年的敌人是迦太基这样的外敌，而这100年却是自身的内斗。

虽然罗马经历快速扩张迅速成为大国，但这个大国已经罹患了疾病。30岁即已辞世的提比利乌斯，担任护民官实际只有7个月，可就是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将罗马所生的疾患公之于世。要想不重蹈过去那些大国的覆辙，尽快治疗疾患，是摆在罗马人面前最重要的事情。

临死瞬间，提比利乌斯所想的，大概只有英雄无奈的感慨。但至少有一个事实可以让他感到宽慰，那就是——自公元前159年起持续下降的应服兵役的公民数量，也就是构成罗马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的数量，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开始不断增加。罗马共和国的人口调查，显示了如表3所示的结果。

表3 农地改革后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应服兵役者人数及其变化

公元前136年	317933人	当年创下最低纪录
公元前131年	318823人	提比利乌斯改革2年后
公元前125年	394736人	提比利乌斯改革8年后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主导的农地改革，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提比利乌斯死后，从法律意义上农地改革是在继续进行。“三人委员会”也没有解散，然而3名委员中元老院实力派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很快病死，接替提比利乌斯的里奇尼乌斯·格拉斯在东方战死，剩下的盖乌斯·格拉古，此时还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共和制罗马时期，普遍认为毛孩子不好控制，不成熟，所以规定30岁以上者方能担任国家公职。提比利乌斯的《农地法》虽然没有成为作废的法律，但由于欠缺具有坚强意志的领头人鼎力推进，处于不死不活状态是难以避免的。聊以自慰的是，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被杀之后的数年间，罗马倒是过了几年安定、富足的好时光。

被赋予全权带兵镇压西班牙原住民叛乱的小西庇阿，此时已经攻下

了叛军的大本营努曼提亚，并且实施了像迦太基城那样的屠城，至此彻底平息了叛乱。攻陷努曼提亚与提比利乌斯被杀，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第二年，小西庇阿胜利回到了罗马。

发生在西西里的奴隶起义，公元前132年也被完全镇压下去。罗马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奴隶起义，没有发生在意大利半岛，而是西西里岛，这与西西里岛的农业普遍为大规模的农庄经营有关。在家族规模的自耕农经营形态下，主人和奴隶共同劳动，给予奴隶的待遇也容易比较人道。而大规模农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本就疏远，很容易忽视奴隶的权益，往往给予不人道的待遇。

成功镇压奴隶起义后的罗马政府，设立了一些旨在改善奴隶待遇的法律。政府也明白，奴隶起义的导火索，往往是因不满严苛控制的奴隶一时愤怒杀死主人而起。

西班牙恢复平稳，西西里也安定了。由于罗马一直没有在行省常驻军队的习惯，军队需要的人数减少，裁掉了不必要的军团。军队不缺人了，继续推进农地改革的热度自然减退。

提比利乌斯改革初期，元老院中的开明派赞成，固守既得利益的反提比利乌斯派也不能公开反对，就是因为军队质量下降的问题非常突出。现在应服兵役的公民数量逐年增多，加之各行省局势平稳，军队减少编制，对军人的需求自然下降。人就是这样，只要没有火烧眉毛的事，对根本性的问题往往健忘。罗马恢复了和平，制约自身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不突出了，早该解决的事就又被推迟了。

即使没有那么紧迫，但也不能忘记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持这种清醒认识的不止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一人，元老院那些当初支持提比利乌斯改革的开明派，也都认为应该纠正罗马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提比利乌斯在推行改革的半年间没有碰到的障碍，现在让他们碰到了。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农地改革，简单说就是将超出法律规定多借用的国有土地予以没收，再借给失去农地的城市无产阶级化的平民。这个改革，建基于权利公正，因此没有问题，但随着《农地法》的实施推进，另一个问题冒头了。

国有土地的借用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之久，其间土地租借权的广泛转让是可以想象到的。禁止转让，是提比利乌斯《农地法》的关键点之一。

租借权仅在罗马公民之间转让，这个问题好办，如果不正当地多租借土地，遵照《农地法》没收就是了。你既然是罗马公民，就有遵守罗马法律的义务。

然而，土地租借权如果转让给罗马公民以外的人，即转让给了加盟罗马联盟的其他城市国家的公民，怎么处理？当发现这种情况多得出乎意料时，问题就来了。

如同《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中所述，以罗马为盟主的罗马联盟各城邦之间，除了军事同盟关系之外，由于道路等基础设施也是同盟各国共有，各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防卫上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方面也成为命运共同体。不仅在共度布匿战争“国难”时期，就是在罗马的霸权遍及地中海世界期间，军事、经济上的罗马联盟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有越来越紧密的倾向。

然而，罗马公民和同盟城市的公民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要求罗马公民承担罗马公民的义务，但不能要求同盟城市其他国家公民承担这种义务，因为不具备同等权利者，不能要求承担同等的义务。假如要求承担同等的义务，就必须给予同样的权利。向不享有权利者要求承担与权利相伴的义务，就是干涉内政。罗马联盟是以各城市国家互不干涉内政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战略同盟，因此，如果出现了成员国被干涉内政的情形，联盟就会解体。

罗马联盟是一个有效的防卫体系，这已经为“汉尼拔战争”的实践所证明。罗马元老院那些开明的领导者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同盟。在他们看来，罗马联盟相当于“罗马之盾”，坚持这个同盟远比农地改革重要。

公元前146年消灭迦太基，公元前133年摧毁努曼提亚，成功平定西班牙叛乱后胜利归国的小西庇阿，是当时罗马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序中已经介绍过，在扎马会战中战胜汉尼拔、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的军事首领是大西庇阿。小西庇阿是大西庇阿的养孙。为便于区分，人们就将他们分别称之为“大西庇阿”和“小西庇阿”。

作为军事家，小西庇阿自然知道罗马联盟的分量，他在听取了同盟各城邦的“陈情”后，明确表态反对提比利乌斯的农地改革。就在他预定在元老院发表反农地改革演说的那天早上，他被发现已经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有风言风语说他是被提比利乌斯的余党所杀，但其身体上并无外伤，脖子上亦无勒痕。小西庇阿极其肥胖，且人已进入中老年，由此可以断定为心脏病致死。公元前129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功臣小西庇阿去世了，享年57岁。从他表弟提比利乌斯遇害的那一年算起，已经过了4年。

小西庇阿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之外，还具备文明开放的包容心态和良好的教养。他与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都有很深的交往，他喜欢从战败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中聘请具备丰富学识者为其所用。然而，具备一定学识的领导者，他的知识有时反而会妨碍其思想的转变与飞跃。提比利乌斯的改革虽未废止，但屡受挫折，这里起作用的，恐怕不只是富裕阶层太过自私这一个原因。

提比利乌斯怀着英雄无奈的感慨英年早逝那年，弟弟盖乌斯不在罗马，21岁的他从军去了西班牙。第二年回国，在哥哥遗留下来的“三人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的工作。如前所述，“三人委员会”作为农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当时的状态是每况愈下。两兄弟的性格截然相反。哥哥比较内敛，即使在内心充满坚强的斗志和火热的激情的状态下，表面上

仍是平静如水。弟弟盖乌斯则是表里如一的性情中人。但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盖乌斯懂得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等待时机。

其后10年盖乌斯·格拉古重复着罗马共和国领导人后备军都要走的人生轨迹。在罗马，从政者必须有军队工作经历，这意味着盖乌斯还要经历一段军队的生活。公元前126年，盖乌斯随军被派遣至撒丁岛，当了3年的财务检察官。这3年盖乌斯没有虚度光阴，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工作，留下了一些堪称美谈的逸事。

寒冷的冬天来了，军中冬用衣被不足，先是向中央政府申请调拨，无奈中央政府以冬季航海过于危险为由，不肯从罗马向撒丁岛运送，让部队自行筹措。军团司令请来岛上的财主们协助解决，但这些财主们在和司令会谈时，环顾左右而言他，搪塞敷衍，问题一点儿也没解决。前面介绍过，随军财务检察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筹措军队所需的一切军需物资，盖乌斯作为第一责任人，只好承担起“搞掂”这些财主的“艰巨”任务。他是怎么说服这些“不讲政治”的财主们的，我们不得而知。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盖乌斯是成功了——这些不给司令官面子的财主们，不仅痛快地解决了军队所需的冬装，而且还主动送到军营。由于盖乌斯的出色工作，士兵们免去了挨冻之苦。

另外一件轶闻也很有意思。当时士兵们的主食小麦粉快没有了，可撒丁岛不是传统的小麦产区，如果在当地征粮，岛民们只能把自己的口粮交出来。为解决军粮又不至扰民，这回该从罗马调粮了，可罗马的粮食也没有运到。

这可怎么办？军中不可一日无粮！盖乌斯紧急求助于北非的努米底亚国王，从努米底亚运来了大量小麦。年轻的财务检察官再次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努米底亚国王的父亲，老国王马西尼萨与盖乌斯的外祖父大西庇阿是当年共同与汉尼拔作战的战友加朋友，出于这层关系，努米底亚王国成为西庇阿家族坚定的政治“后援者”。老国王马西尼萨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就是大西庇阿的养孙小西庇阿。“掌门人”和“后援者”之间的

关系，应该是基于道义和情理、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的关系。

公元前124年，盖乌斯·格拉古终于年满30岁，如期当选为护民官。他不是以最高票当选，而是排在当选者的最后一位。此时盖乌斯展示给选民的印象是，对国政改革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强的认识，故而支持率不高。但是人们没想到的是，盖乌斯与他哥哥提比利乌斯一样，并不想把护民官这一职务作为其仕途的出发点。

当年12月10日任期刚刚开始，盖乌斯就接二连三地提出法案。仅从其提出法案的数量之多，就可知他绝不是当选护民官后才考虑这些国家政务问题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准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

首先是把他哥哥提比利乌斯·格拉古遗留给世人的《农地法》进行司法程序上的再确认。由于经历了10年坎坷，《农地法》已名存实亡，需要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表决，使它起死回生。实施农地改革的执行机关——“三人委员会”也需要重新运转起来。《农地法》的目的是以给予土地的方式救助那些失去土地成为失业者的原自耕农，由此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健全罗马社会的基础。当然，把这个目标落到实处还需要时间。但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应服兵役者人数在持续增加，前面已经用数字表述过，这是可以看到的成果。盖乌斯认为，不仅要推进自耕农奖励政策，还要考虑福利政策。

《小麦法》就是这样一个产物。该法案提出，由国家收购一定数量的小麦，再将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配售给穷人。当然这不是要实行统治经济，国家收购以外的小麦仍由自由市场交易定价。据后世研究者考证，盖乌斯《小麦法》规定的国家收购价大约为市场价的二分之一。配给对象为居住在罗马的贫民，每一户主每月配给5摩第（1摩第约等于9升，合计为45升左右）小麦，1摩第小麦的配给价是6.3阿斯。

盖乌斯的视野不仅限于失业者。受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应承担兵役义务的罗马公民的资产下限降到1500阿斯，损害了大批本不该承担此

项义务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为减轻这些人的经济负担，他又提出了《军队法》草案，规定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得征调17岁以下的男子当兵。而且，针对目前士兵使用的武器装备等项开支从士兵的军饷中扣除的现象，法案规定军人的一切开支，包括口粮和物资装备，均由国家负担，不得再从士兵军饷中扣除。

随着罗马的农业逐渐农庄化的趋势，自耕农未来的前景不容乐观，有些失业者也不愿意再重新务农。盖乌斯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仅靠自耕农鼓励政策是不够的。他又提出了《公用事业法》草案，试图通过兴建公路、桥梁、上下水道、港口等基础设施，在振兴公用事业的同时，统筹解决失业问题。盖乌斯的《公用事业法》对罗马乃至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例如后来建设的以罗马为中心，联通欧洲、中近东、北非的公路网，再如从首都罗马开始每隔1罗马里（约合1.5公里）修建1座标明此处距罗马距离的圆柱形大理石里程碑，这些设想都是在《公用事业法》中首次明确提出的。

当然，盖乌斯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振兴公用事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他认为，应该利用不断充实的社会资本，建设能够承载活跃经济的有效载体。体现他这一思想的法案，就是《殖民城市法》。

此前罗马建设的殖民城市，主要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每个殖民城市大约要从罗马移民3000人，城市建设的目的是满足军事需要，故而建设的其实是一些军事要塞。当然，修建这些“要塞”和以军事目的修建的道路一样，客观上具有经济意义，产生了殖民城市的派生效果。现代欧洲的很多城市，经研究证实，都是在古罗马殖民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盖乌斯是第一个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建设殖民城市的政治家。他建设的，或者说他想建设的殖民城市，选址都在沿海地区，其中在迦太基城

遗址上建设的“朱诺殖民城市”最能体现他的想法。尽管盖乌斯延续了哥哥提比利乌斯的自耕农奖励政策，但他理想中的罗马，不应是农业国。建设殖民城市，一方面可以让希望拥有土地的人得到土地，继续务农，一旦遇到紧急军情，他们又可以马上成为军人；另一方面，还可以选一些人在殖民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完善城市功能。

前面提到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对罗马社会造成了一些冲击。盖乌斯并不想制止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但他想利用这个变化趋势，顺势而为。既然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在于失业者增多，那就想办法搞活经济，靠经济的发展来吸纳失业人口。

盖乌斯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不能忽视日益兴起的“骑士阶级”，而应该很好地利用他们。

罗马建国以来的名门望族和祖上有人当过执政官的平民贵族，共同形成了以元老院为大本营的统治国家的贵族阶级，如果把他们称之为“血统贵族”，那么向国家提供骑士、经济富足的“骑士阶级”就可以被称之为“财富精英”。盖乌斯打算提高“骑士阶级”的社会地位。

首先是把这些“财富精英”的入门门槛从30万提高至40万阿斯。根据资产划分的罗马六个等级（包括无产阶级，参见表1）中，第二等级的资产额是30万至100万阿斯，只要拥有的资产进入这个等级就可以被称为“骑士”，“骑士”并不一定真的去打仗，只是为了从称谓上与贵族相区别。

盖乌斯还打算提高这些经济上的领导者的政治地位，让他们可以享受到政治精英才能享有的待遇，那就是给予元老院的议席，当然与“士农工商”的排序相适应，给他们的只能是后排的席位。

其次是将其兄曾提出但没能法制化的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盖乌斯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陪审员改革法》。

共和时代罗马的司法体系，是由法务官承担下令搜查和法庭审判的职权，原告方的辩护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被告方的辩护人负责辩护，判决则由陪审团合议后作出。格拉古兄弟改革前，陪审员全部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陪审员改革法》除了要提高经济阶层的政治地位，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在原有法律框架内，执政官本身就是元老院议员，他们任职期满后，往往到海外行省去担任总督。总督们的专横与不公，动辄成为舆论非难的对象。虽然法律赋予了行省公民控告总督的权利，但由于陪审团成员都是元老院议员，总督总是被判无罪。针对这种弊端，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在任时，提出的改革法案是将陪审团成员改为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各占一半组成，盖乌斯的法案则更为激进，陪审员全部由骑士阶级人士担任。

第三是重修《行省法》，根据盖乌斯的法案，以租税征收权为代表的一切经济活动，变得对骑士阶级更为有利。盖乌斯·格拉古用一连串优待经济阶级的政策，彻底颠覆了共和制罗马沿袭多年的“士农工商”排列秩序。

任何改革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管是农地改革，给贫苦人民配给小麦，还是发展公用事业，建设殖民城市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不能确保财源，改革很难取得成功。

30岁的护民官在《行省法》改革方案中，要重新制订行省中较富裕的小亚细亚地区的税收制度：一是计划把从这些地区征收的被称为“什一税”的直接税作为改革的资金来源；二是考虑到直接税这笔财源可能还不足，他又提议将间接税中的“港口使用费”改为关税，港口使用费很大程度上是凭感觉征收，不精确，关税则是按通关的每一物品来征收，更为科学，也能收到更多的税款。

年轻的护民官没有忘记还要改革选举制度。公元前137年，罗马已

经将选举时举手表决改为无记名投票，此举使投票人不必看权贵的眼色行事，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但是王政时期养成的尊卑有序的投票惯例却一直未改，即先由第一等级投票，如果达到过半数就算投票结束，只有达不到半数票时才轮到其他等级的公民投票。大多数情况下，中下等级的公民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盖乌斯的改革方案是，不论是公民大会还是平民大会，从第一等级到无产阶级同时投票。

盖乌斯刚刚当选时，人们对他的支持率很一般，经过他这一段的表现，人们对他给予了全面的支持。盖乌斯则满腔热情地不断向人民宣讲国政改革的必要性。

哥哥提比利乌斯演讲时，站在讲台上基本不动，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平静地说理。弟弟盖乌斯则不同，讲话时慷慨激昂，不停地从讲台的一边走向另一边，不知疲劳地持续演说。他也知道音调过高会冲淡说理的效果，于是常常在讲台的后面安排一个脑筋灵活的“解放奴隶”，当盖乌斯过于激动、音调太高时，这个人就用手中的乐器发出低声，以提醒盖乌斯控制情绪。

没有演讲时的盖乌斯一直忙于工作，连憎恨他的人都不得不叹服他的精力之充沛。他已经提出了很多法案，由于这些法案需要陆续开会表决，年轻的护民官不得不做的工作多如山积。但工作难不倒盖乌斯，凭借优异的组织能力，他都能妥善安排，迅速处理。在他的工作场所，承包商、工程技术人员、外国使节、政府官吏、文臣武将等等，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对这些帮助自己推行新政的合作者和其他来访者，盖乌斯以其出众的才能、良好的家世、完备的教育背景倾倒了来访者。他亲自款待来宾而不失品位，充分尊重来访者具备的各种能力，在该作决断时又绝不拖泥带水。一个能力卓越的领袖形象展示在罗马人面前。

盖乌斯的外祖父大西庇阿，是罗马人中第一个与异族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缔结对等的共同作战关系的领导者，并且凭借这种同盟关系打败了汉尼拔。盖乌斯的父亲的重要贡献则是全力促成了一部重要法律，

使家中已有5岁以上孩子、持有价值3万阿斯以上资产的“解放奴隶”们成为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外祖父和父亲在处理外族和奴隶问题上的平等意识，对盖乌斯有着重要的影响。到他这一代，马西尼萨的儿子、现任的努米底亚国王是他的政治“后援者”，他又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迦太基遗址上建设罗马的殖民城市，把一部分罗马公民移到迦太基去。元老院议员们陈旧思想中的“国界”，在这个男人心目中根本不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了《公民权改革法》。罗马公民权是个敏感的问题，就连像小西庇阿那样的位高权重的元老院开明派即使碰到也会选择回避，盖乌斯此举，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罗马的公民权分为两类：具备从选举权到控告权的公民，为“完整公民权”，未被认可全部权利的，为“不完整公民权”。前者被称为“罗马公民权”，后者被称为“拉丁公民权”。在具有这两种公民权的人民之外，还有加盟罗马联盟的各同盟城市国家的人民，这些人被称为“意大利人”。除这三类人之外，就是罗马下属各行省的人民。罗马公民、拉丁公民、意大利人，都无须向罗马政府缴纳直接税。

本来罗马人对于把自己国家的公民权给予他人，甚为“大气”。只要在罗马境内居住，就能够得到罗马公民权。这个政策实行多年，移民到罗马的人虽然不少，但远未达到让统治者担心的程度。这是因为，那时拥有罗马公民权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而且在罗马联盟军队中，作为盟主，罗马公民的兵役负担更重。罗马公民从军，连军队中的伙食费都要自掏腰包，从应发的军饷中扣掉，而对拉丁公民和意大利人则是免费供应。此外，在七八十年以前，罗马联盟军打了胜仗，战利品是平等分配。因此，那时的罗马公民权吸引力不足。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随着罗马霸权遍及地中海世界，战利品不再平等分配，全部归罗马籍士兵所有。

其次，随着来自行省的税收增加，从公元前168年起，原来对罗马公民征收的兵役之外的直接税（我所说的类似战时国债）全部取消。而拉丁公民、意大利人所在国家的税收没有取消，照常征收。如此一来，就出现了罗马公民与其他公民的差别，罗马公民权的吸引力大为增强。这也从侧面证明，各行省上缴的租税全部进了罗马的国库。不仅如此，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罗马的市场也随之扩大，这对从事经济活动的罗马人更为有利。

对于移民涌入罗马首先提出非议的，不是罗马政府，而是拉丁公民居住的市、镇、村。理由是，那么多拉丁人都跑罗马去了，他们原先居住的地区出现了人口过于稀少的问题，这些市、镇、村就要求罗马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控制。罗马政府应他们的要求首次立法限制移民，规定罗马之外的人民移住罗马不再给予罗马公民权，仅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就两次出台这方面的法律。那时候罗马公民权已经成为“香饽饽”了。而已经享受到罗马公民权好处的罗马公民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再让他们与别人分享这些既得利益，罗马公民们就变得“小气”了。

公民权改革不仅会遭到来自元老院的反对，还会招致普通罗马公民的抵制，盖乌斯对此十分清楚。但他更清楚的是，由于人民之间存在不同公民权的差别，农地改革也好，其他改革也好，都不可能顺利实施，为此必须要启动公民权改革。但公民权改革是触及罗马共和体制深层次问题的根本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许他认为，只有选择阶段性推进才是实现公民权改革的捷径，故而他实际上推出的改革方案，是相当平和的。

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认可拉丁公民具有的选举权和控告权，使之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则取得拉丁公民权。

这个方案不严密的地方在于，既然拉丁公民能够升格为罗马公民，那么意大利人升格到拉丁公民后，终究还是能再升格为罗马公民。于是，不论是不愿意丧失既得利益的罗马公民，还是确信罗马联盟是最优

防御体系的元老院，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

元老院认为，如果照这个方案实施改革，罗马公民权拥有者人数的扩张，会导致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罗马不复存在，罗马联盟随之解体，这是对以元老院为主体的罗马共和政体的挑战。元老院的危机感极其强烈，不管是开明派还是强硬派，一致对外，结成了反盖乌斯的统一战线。但是，盖乌斯·格拉古的威望仍然很高，他提出的法案，除《公民权改革法》外，都已经获得通过成为法律。盖乌斯还提前作出安排，使认可护民官连选连任的法案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从而在公元前123年夏天的护民官选举中，成功获得连任。鉴于此，元老院反盖乌斯运动的手段，集中在如何破坏人民对盖乌斯的支持上，而且这回做得很巧妙，使出了“两面作战”的谋略。但他们对无关百姓痛痒且不能公开的元老院体制危机绝不触及。

“两面作战”之第一面，是对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用过的、什么时候都有效的手段——污蔑中伤。他们鼓噪说盖乌斯的改革完全是为了拉选票、拢人心、向自己集中权力、把权力私有化。现代英国有一个学者曾写过如下的经典名言：

> 所谓无知大众，就是偏激地把一切出于政治目的（即使是很高尚的行为）的行为都视为被私利私欲所驱使的人种。

“偏激”不仅限于无知大众，我联想到，就连70年后罗马史上出现的最高学问的知识分子，按我的想法属于“最高级的媒体工作者”——西塞罗先生，也是这种“偏激人种”中的一员。这种偏激，与教养高低、时代差异、文化差别都没有关系，只要人们不能正确区分目的和手段，把手段目的化，就容易被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格拉古派的做法是有效的。

盖乌斯连选获得成功，人民对他的支持空前稳固，他的对手也明

白，仅靠中伤效果有限。于是使出了“两面作战”的另一面，这是没有对他哥哥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用过的谋略。

盖乌斯也知道，元老院正团结起来，谋划让自己垮台，他的回应是以持续的政绩确保选民的支持。由于连选获胜，盖乌斯赢得了多一年的施政时间，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在迦太基城旧址建设的殖民城市中。

进入第二个任期的盖乌斯·格拉古，充分运用护民官的权力和自己旺盛的精力，使在迦太基城旧址新建的殖民城市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罗马以前建设的殖民城市。

殖民人数首先突破了惯例，达到6000人，而且这6000人还只是户主。被选择的殖民者不仅包括失去农地的城市无产阶级和退役军人，还包括工匠、技术人员、商人等。盖乌斯设计的殖民城市，不是军事基地，而是经济上的“基地”。

其次，过去罗马建设殖民城市，每一户主分配的土地没有超过50尤格，而在迦太基城旧址上建设的“朱诺殖民城市”，给予殖民者的土地增到了200尤格（约合50公顷）。这也证明，盖乌斯实行的并不仅仅是自耕农奖励政策。

然而原迦太基城一带，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之后的25年间，逐渐成为没有人烟的荒地。刚刚灭亡时，尽管城市毁了，耕地还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色，不幸几年后遭遇蝗灾，就只剩下裸露的土地。这次再度恢复人居，土地变绿自是可以期待的了。假如殖民成功，将进一步扩大罗马的市场——建起了城镇，周边的耕地就会得到整备，相隔不远又会出现新的城镇……北非本就是富饶的地方，殖民城市的波及效果将会十分明显。

作出如此殖民规划的盖乌斯，在殖民前先要决定农地的分配和基础设施的用地，他几乎是把办公室迁到了非洲，在罗马的留守时间不足70

天。这段时光元老院那拨人可是没荒废。

与盖乌斯·格拉古同被选为公元前122年度护民官的，有一个叫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此人成为反盖乌斯运动的急先锋，当然后面是元老院那拨人在操纵。

护民官拥有提出政策议案的权力，李维乌斯就利用这个权力，相继提出了一些近乎荒唐的法案。

根据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农地法》，农民得到新分配的土地，要按照以前国有土地租借法的有关规定，向国家缴纳租金（近似于缴纳固定资产税），李维乌斯提出了一个法案，租金全免。这个法案得到了再次获得土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喝彩欢迎。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农地法》禁止将国有土地的租借权转让他人，李维乌斯提出的法案则是允许土地租借权转让。按李维乌斯的政策，不想当农民者只需把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土地租借权转让就可以发财。李维乌斯的法案博得了想卖地者的好评。

根据盖乌斯的《殖民城市法》建设的殖民城市有三个，意大利半岛建两个，迦太基旧址建一个。李维乌斯提出新的法案，仅意大利半岛就建设12个殖民城市，而且被选择的殖民者只限失去农地的城市无产者，土地的租借费全部免除。法案中甚至还加上了国家支付必要的安家费的条款。

盖乌斯的《殖民城市法》规定，殖民者仅限户主，意大利半岛内的殖民城市各3000人，迦太基殖民城市6000人，因此意大利半岛新建殖民城市能够救济6000失业人口。而按照李维乌斯的法案，仅意大利半岛就要安排3.6万人。在那个大多数罗马人不愿意离开意大利半岛到其他地方定居的时代，6000人和3.6万人的政策差异很大，能在半岛内殖民，谁还愿意去迦太基呢？

对于盖乌斯给予拉丁公民罗马公民权的《公民权改革法》，李维乌斯提出比盖乌斯更为宽松的法案，不仅给予罗马公民权，而且对在军中严重违反军纪者应该处以的“棒刑”（乱棍打死，实为死刑）全部废除。

李维乌斯还公开声明拒绝出任“新殖民地建设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职务，以表示自己对“新殖民地建设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盖乌斯的厌烦之情。然而无知大众也好，有教养的文化人也好，都理解为此举表明李维乌斯没有权力欲。虽然不参与殖民地建设工作未必博得民众好感，但护民官李维乌斯获得了“弱势群体的保护人”和“清廉官员”的评价。

看到李维乌斯这些过于讨好民众的荒唐法案相继成为法律，后世的我们不禁要问：隐身其后的元老院不觉得这样会使执政者陷于困境吗？其实，奠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国家理念的罗马人并没有把法律当成是永远不变的东西，他们认为如果某部法律不合适，把它改过来就是了。至于改正的方法，却不是直接修改原来的法律文本，因为要是真想改哪部法律的时候，总会有些犹豫不决，而犹豫不决可能就会贻误改正的最佳时机。

那怎么办？罗马人有他们的高招，那就是不在原来的法律文本上做文章，重新设立一部适应现状的新法律，旧法中与此抵触的部分自然就被覆盖了。如此一来，如果编辑一套集中罗马全部法律的“六法全书”，恐怕要堆成一座山，和非成文法国家不相上下。

如此之多的法律不断产生，每一部法律取什么名是个问题。罗马人有办法，他们的法律不是以《农地法》、《行省法》这种方式命名（因为仅关于农地的法律就有好几个，这样命名难以区分），而是以法案提案人的姓氏来命名。如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法案成为法律，该部法律就以他们家门的姓氏命名为《森普罗尼乌斯法》，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提出的法案成为法律，就命名为《尤里乌斯法》。如果某人提案的法律不止一部，那么就加上个主题词，如《关于国有农地的森普罗尼乌斯法》、《关于行省的森普罗尼乌斯法》，以示区别。

这种命名方法，除了立法者可以留名后世之外，还有明确责任的作用。在现代官僚主导的体制下，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罗马的街道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命名，如阿皮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均是以出资修路人的名字命名。

我们把话题拉回公元前122年，护民官李维乌斯的法案相继成为法律，但操纵他的元老院一点也没有执行这些法律的意思，只要能实现让盖乌斯倒台的目标，李维乌斯这些“搅局”用的法律以后再用新的法律覆盖就是了。

盖乌斯完成在迦太基旧址的工作回到罗马后，发现公民大会的气氛发生了对己严重不利的转变。为挽回危局，他把自己的家从帕拉蒂尼山上的高级住宅区搬到罗马广场附近的庶民居住的街区，以获取平民的好感，此举虽有些成效，但还达不到足以令他第三次当选护民官的支持率。至此元老院还不肯放手，他们担心，盖乌斯赋闲一年后第三次竞选护民官仍有很大可能获胜，而且盖乌斯的任期还有5个月，他们唯恐盖乌斯在这5个月还会有什么作为。元老院决意干扰打击盖乌斯剩余任期的活动。这次，他们打算利用潜伏在罗马人内心深处的迷信心理。

在迦太基旧址测量土地的过程中，测量用的立杆恰巧被强风吹倒。新殖民城市建设之际，用于祭祀神灵的牺牲残余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跑，飘散到新城市边界之外。用来标明城市边界线的立柱也遭到狼的袭击，狼扑断了固定立柱的绳索，致使立柱倒塌。

在罗马人看来，这些全都是不吉利的征兆。盖乌斯的反对者还四处传播流言，说迦太基在灭亡时曾被诅咒过，在罗马人诅咒过的地方建设罗马人居住的城市，罗马人自身也会遭到诅咒。迷信的罗马人动摇了，有人提出了撤销在迦太基旧址建设殖民城市的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表决。公民大会由执政官主持，而当年的执政官是人所共知的强硬保守派人士奥皮米乌斯。

由于第三次竞选护民官失利，盖乌斯的任期到当年的12月9日截止。这令32岁的他很是焦躁，而他的支持者们焦躁情绪更甚。被绝望驱使的人很容易走向偏激，而且聚拢在领袖人物周围的人往往会做出比领袖更为偏激的行动。此刻的盖乌斯正在被大力凛然的支持者们所左右。

盖乌斯的护民官任期结束后，很快就进入了公元前121年，投票决定迦太基殖民城市命运的公民大会如期举行。当天从早上开始，卡匹托尔山就挤满了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民众，按照罗马的传统，公民大会这种正式的公共活动首先要捧着牺牲祭祀神灵，祭祀仪式进行得很顺利，仪式完毕后需要有人收拾祭祀用剩下的动物内脏，那天负责干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叫安迪利乌斯，当他端着盛内脏的盆子穿过人群时，出大事了。

由于会场太过拥挤，安迪利乌斯就用手臂扒拉开支持盖乌斯派的民众往外走，大约是人太多让他比较烦，于是他振臂高呼："坏人们，快给好人让路！"

这小子的下场可想而知，愤怒的人们用在木板上刻字用的那种铁笔将他杀死。

这一下，两派民众紧张地对峙起来，盖乌斯高声呼喊，斥责自己的支持者，这种场合打死人不啻授人以柄。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则煽动民众"以暴力对暴力"。恰在此时下雨了，只好将会议改在第二天继续举行。

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是好天气，执政官奥皮米乌斯首先召开元老院会议，讨论审议法案。会议开始后，有人用担架将昨日被杀的安迪利乌斯的尸体运到元老院门前，从会场出来的元老院议员们见到此情景，连连叹息不已。等他们再度回到会场时，已是茫然失措。元老院决定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于是形成了罗马史上第一次的"元老院最终劝告"，意译为"紧急状态宣言"，授权执政官对于所谓"反国家行为者"可无须审判，格杀勿论。

元老院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声称要镇压“暴徒”，捍卫罗马共和国。

从法律上讲，元老院对国政大事只有“劝告”的权力，无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虽然在布匿战争期间“元老院劝告”具有行政法律效力，但战争结束进入和平时期后就不应再这样做，何况就是在战争期间，也从未使用过“最终”这样宣示最后通牒的字眼。加上这两个字眼后，单纯的“劝告”就变成了戒严令。法律授权元老院自作主张的这个矛盾，一直到罗马共和国消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其实不仅在罗马，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一个国家什么情况下属于“紧急状态”，并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更多的是靠统治者的主观判断。

被元老院认定为“暴徒”的盖乌斯及其追随者们，知悉元老院的决定后群情激愤，他们谁也没有去参加公民大会，盖乌斯的志同道合者中有个骨干叫弗拉库斯的，此人的性格比盖乌斯还要急躁，立场也更为偏激，支持者们就聚拢在弗拉库斯周围。当他们得知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发布命令，让元老院议员和“骑士”们第二天早上全副武装集合的消息后，更是怒不可遏。激愤之余，他们决心在阿文庭山坚守，与元老院誓死一拼。此时的盖乌斯已无力制止这些曾经的支持者。

这些人聚在弗拉库斯的公馆里，举行了盛大的酒席宴。而33岁的盖乌斯却将自己关在家中，满腔的绝望和英雄无奈的感慨，加上几分看透世事的达观，种种思绪混杂在一起，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执政官奥皮米乌斯从克里特和希腊调来的重装步兵集合在罗马广场，盖乌斯的支持者们则聚集在平民阶级时常集会的阿文庭山。只佩带短剑的盖乌斯出现在这里，他找到弗拉库斯商议对策，强调应该尝试与执政官谈判。他们派出的谈判使者，是弗拉库斯的小儿子。

这个尚未成年的少年找到元老院和执政官，流着眼泪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在场的很多人也都倾向于和解。然而执政官开出的条件是：政府

不派谈判代表，盖乌斯们派代表下山来谈，承担造成动乱的罪责，服从政府的处罚。以此作为能否和解的前提条件。

回到阿文庭山的少年传达了执政官的意见，盖乌斯提出自己充当谈判代表，但其他人都不同意，于是这个少年再度成为谈判使者。少年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是执政官奥皮米乌斯根本不给他们相互磋商摸底的时间，并将这个少年当场逮捕并投进牢房。

军队从罗马广场出来，经由帕拉蒂尼山南侧，从大竞技场侧面走过，就到了通往阿文庭山的坡道起点，此处距离阿文庭山只有1.5公里。执政官跟在手持弓弩的克里特士兵和马其顿重装步兵之后，在他后面就是元老院议员的队伍，议员们还都率领着众多自备兵器武装起来的奴隶。

占据阿文庭山抵抗的盖乌斯支持者们，在执意要镇压他们的执政官和正规军面前不堪一击，政府军瞬间即控制了局面。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宣布，谁能将盖乌斯和弗拉库斯的人头拿来，就可获得与人头同等重量的黄金。于是，近乎疯狂的人间杀戮开始了。

弗拉库斯和他的长子躲进了一个熟人家里，很快即被发现，当场被杀并被砍下脑袋献给了执政官。

现场没有人看见盖乌斯·格拉古，他不忍加入罗马人之间的自相残杀，步入建在阿文庭山上的戴安娜神庙中，准备自杀以结束生命，但被追进来的两名友人夺去了他的剑，劝他不要轻生，不如暂避一时以图东山再起。

从阿文庭山北坡下来，有一座跨越台伯河的桥，他们跑到这里时被追兵追上，两名友人抵挡追兵让盖乌斯快逃，盖乌斯只带着自己的一名奴隶逃到了河对岸，但没有遇到愿将马匹借给他们的人，主仆二人只好钻进了河边的小树林。

追兵蜂拥而至，但是只在小树林中发现了两具尸体。最后跟着盖乌斯逃跑的奴隶名叫费罗克拉斯，从名字看是个希腊人，估计是一看无路可逃，奴隶先杀死了盖乌斯，然后自尽。

遵照执政官奥皮米乌斯的命令，盖乌斯和弗拉库斯的人头被摆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尸身和其他被杀者的尸体一起被投进了台伯河。

与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被杀那次不同，公元前121年盖乌斯·格拉古被杀后，对其支持者的追杀并未在当日结束。被视为盖乌斯同党的人们相继被株连，他们被捕后未经审判即被处以死刑，被杀害者数目高达3000人。尚未成年的弗拉库斯的小儿子在牢内被杀。盖乌斯及其支持者的财产被没收拍卖，甚至盖乌斯妻子的陪嫁都被没收。就连遗属们想穿丧服以寄托哀思，竟也被当成“反国家行为”而遭到禁止。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两兄弟死后的境遇不同，还体现在对二人政治遗产的处置。

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被杀后，元老院慑于人民可能的反抗，不敢将提比利乌斯的《农地法》废黜或出台更正性的法律，只能采用不公开的釜底抽薪的手段让法令难以落实。而弟弟盖乌斯被杀后，元老院则是明目张胆地翻案。

首先是废止了预定在迦太基旧址建设“朱诺殖民城市”的计划。盖乌斯生前极力推进的位于马赛西南位置的纳博讷殖民城市虽于3年后（前118）建成，但这个殖民城市能够建成，主要原因是其位于罗马通往西班牙行省的中继位置，军事基地的作用十分突出。元老院这帮人还是不能理解盖乌斯兴建殖民城市对于罗马长治久安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其次是用分步否定的方法，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核心成果《农地法》废掉。第一，认可国有土地租借权可以转让。第二，对超出《农地法》规定上限违规多占用的土地，只要支付租金即可，不必交还国家。

第三，废除了租借国有土地应缴的租金。本来根据反盖乌斯急先锋李维乌斯的提案形成的法律，免除租金只限合法租借国有土地者，盖乌斯被杀后，元老院索性将其改为适用于全部租借国有土地者。

这样一来，自耕农奖励政策彻底夭折，一切回归到原本的自发状态，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已成不可抵挡之势。

但不管怎么说，完全无视民意元老院也将难以生存，因此一部分获得好评的政策法律还是存活了下来。例如对城市无产阶级配给小麦，军人全部支出由国家负担，陪审团成员全部由“骑士阶级”人士担任，提高经济阶层的社会地位等等，都继续有效。随着经济阶层力量的日益壮大，客观上也不容许元老院忽视这股力量。而《公民权改革法》由于开启了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之路，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罗马公民的不满，所以元老院不必担心民意，就将其废除了。

公元前120年时的罗马元老院，仍然沉迷于100年前刚刚战胜汉尼拔时元老院的思维定势，尽管已是百年沧桑，他们还是坚信：

意大利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当然的支配者；

罗马是整个意大利地区当然的主宰者；

元老院是全体罗马人民当然的统治者。

这是一种锁国主义的狭隘意识，取得布匿战争胜利的罗马人，在精神上已经步入锁国主义。

后世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过于超前”。的确，人是关注短期行为的动物，超越大多数人认识水平的改革不容易成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有一句名言：“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他这一思想的例证之一即是格拉古兄弟。实际上，他的观点在70年后被用武力做后盾，即拥有可以强

制国家机器按照自己的意图运作的恺撒所证实。

然而我却不愿意放弃另外一种看法。假如格拉古兄弟不是在护民官的位置，而是在执政官或者监察官的位置上推进改革，结果会是怎样呢？

从格拉古兄弟的祖父和父亲的经历可以看出，以兄弟二人的条件，假以时日，不管是罗马的最高官职执政官，还是有过执政官经历才能担当，权威和权力均不逊于执政官的监察官，都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当选。因此，兄弟二人如不急于改革，熬10年当个执政官，或者执政官期满后隔几年再当上监察官，那时就有更强大的能力推进改革。在执政官或监察官作为政策提案者的情况下，其改革政策更易得到元老院的支持。有了这个背景，所提议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几乎没有问题。

格拉古兄弟的失败，不仅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还因为他们与元老院中的开明派也离心离德。为什么这些有识之士也会与他们分道扬镳呢？

本书后面将要介绍到苏拉，苏拉在他的改革中异常坚决地削减护民官的权力，而且与苏拉同样信奉共和制的西塞罗，对格拉古兄弟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后世对于格拉古兄弟的评价，在共和时期很差，到了帝政时代又好起来。为什么？

护民官是平民阶级的代表，如果其势力过于强大，有识之士就会产生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式共和政体会被摧毁的恐惧。每当贵族与平民的抗争白热化之际，罗马人极度担心会出现两个政府，这种对于国家分裂的恐惧，达到近乎神经质的地步。为此，尽力将开放给平民的职务——护民官的获选者拉进元老院内，就是希望他不要与元老院对抗。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人们，即使赞成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内容，也不赞成兄弟二人推进改革的方式。如果由执政官或监察官提出改革，再怎么着也是寡头政治下的共和政体“体制内”的改革。

帝政时代对格拉古兄弟评价提高，是因为共和政体下人们对体制崩溃的那种担心，与帝政时代的人们无关，而格拉古兄弟为官清廉无私，自然值得赞赏。

由此我又想到的问题是，格拉古兄弟不是作为执政官或监察官，而是以护民官的身份进行的改革，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了么?

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的罗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一点就连体制内的人士也明白。但是，对改革的尝试，在当时元老院的体制框架内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说是因为，僵化的元老院欠缺对现状灵活处置的治理能力。

共和制罗马的兴盛，非一人英雄之力，乃国家体制之功。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形成了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良性机制。这在研究者中是有定论的。既然国家兴盛不靠个人而是靠体制，国家陷入“迷茫”状态，也不是哪个人能力衰竭，显然是国家赖以运行的体制出了问题。由于年龄过于年轻的局限，格拉古兄弟自身也许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唯一超出元老院范围、站在社会的立场上进行的改革。他们留给后人的，是对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的深深质疑。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担任护民官职位只有7个月，盖乌斯·格拉古也不过2年，尽管在位时间短暂，尽管在位期间两兄弟实行的改革措施大都无疾而终，但对于行将结束一路高歌猛进的繁华时代、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罗马来说，格拉古兄弟起到了有转折意味的路标和里程碑的作用。

这就是格拉古兄弟在罗马历史上的存在理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兄弟去世后，罗马人的路途尽管曲折反复，但最终还是沿着两兄弟所立路标指示的道路行进。

不能理解格拉古兄弟改革真正意义的罗马人民，对两兄弟却抱有一

种痛惜与哀怜之情，就在盖乌斯死去的地方，人们自发地建造了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颂扬他们生平事迹的石碑。每到祭祀的季节，人们就像祭奠自己亲人的墓碑一样，来到这里向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石碑敬奉时鲜供品。

由于提比利乌斯的儿子未成年即已夭折，盖乌斯无子，格拉古家的血脉到他们这辈就断绝了。毕竟是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的女儿，元老院没有能够没收格拉古兄弟母亲科尔涅利娅的资产，科尔涅利娅在那不勒斯湾西边的米赛建造了一栋别墅，在这里过着引退的生活。说是“引退”，实际上这样一个人物不可能真正从公众生活中遁出。科尔涅利娅并不孤寂，她那面海的别墅访客不绝。东方和非洲的王侯们访问罗马时，总会拜访她以表示敬意；文人学者们不分国籍，在她这里都会受到欢迎。科尔涅利娅的餐桌，和她抚育两个儿子时没有任何变化，仍是知识的沙龙。

餐桌上的话题难免会涉及她的两个儿子，儿子尸骨未存，连墓碑都被禁止修建，这对母亲何其残忍，但没有人见到过科尔涅利娅落泪。当她听说人们为她的两个儿子修建了颂扬生平事迹的石碑时，她说：“这是最适合我的孩子们的墓碑。”罗马人还为科尔涅利娅建造了塑像，虽然现在只剩下底座，但刻在底座上的“阿非利加努斯的女儿，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涅利娅”的字迹仍清晰可见。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共和制罗马，这是极为罕见的。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两兄弟的肖像，一幅也没有流传下来。他们分别死于30岁和33岁，生前制作肖像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共和罗马时期对兄弟二人毁誉参半，估计他们不属于时常被人们供奉肖像的人物类型吧！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能够遗留下来，由现代各国美术馆所藏的罗马人肖像为数不少，其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肖像。由于这些原因，本书出场的主要人物中，只有格拉古兄弟没有肖像。

有一次我在罗马卡匹托尔美术馆参观的时候，在一尊大理石雕像前驻足，那是一尊刻画年轻人头部的雕像，大约是公元前后一个世纪时的作品，凝望这尊雕像的时候，我开始想象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可能就是这样一副容颜。

我的《罗马人的故事》丛书第一部内文中用的是罗马共和国创始人尤尼乌斯·布鲁特斯的青铜塑像，假如没有拍下这幅青铜塑像的照片，我可能不会把这尊不知名年轻人的雕像插入书中。这尊雕像直截了当地显示出富有坚强意志力的容貌，恰好可以表现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为书名的第一部的内容。

以“汉尼拔战记”为书名的第二部的封面，使用的是青年时期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的侧面像。那张充满朝气且嘴角浮现出几分狡诈的英姿勃勃的面庞，表现的正是那个时代前赴后继地与军事天才汉尼拔斗智斗勇的罗马男人的神态。

以“胜者的迷思”为书名的第三部，虽然这一部出场的马略、苏拉和庞培的肖像现在都有留存且已验明正身，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决定使用在卡匹托尔美术馆发现的那尊不知名年轻人的雕像。这尊雕像既透出坚忍不拔的意志，又体现出良好的教养和气质。其嘴角泛出的性感和淡淡的忧愁，又昭示着这个年轻人完全不是冷血汉子，而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男人。用他来表达第三部的内容最好不过。

我使用这尊不知名年轻人的雕像作为本书第三部的封面，也是想说明罗马从格拉古兄弟开始陷入迷失的原因，正如很多研究者指明的那样——胜者罗马人没有骄奢，没有颓废，他们也有很多的苦恼想诉说。所谓“迷失”，不是来自外敌，完全是源于自身。

第二章

马略与苏拉时代

（前120—前78）

第一章我们描述了出身高贵、家境富裕的格拉古兄弟，为了既不高贵又不富裕的大多数人的权益，令人扼腕地过早凋零。10年之后，一个连先祖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成为罗马政界的中心人物，他就是盖乌斯·马略。

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不在罗马。连接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干线公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海边走的阿皮亚大道，另一条是穿过内陆南下的拉蒂纳大道。从拉蒂纳大道南行，走到一半的地方转入山间小道再往内陆方向行走，就到了阿鲁匹，这就是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这个镇子上的居民在公元前188年，即盖乌斯·马略出生前30年才获得了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

正如希腊思想家、作家普鲁塔克所写的那样，一个不希望过贫乏的生活，而偏偏又出生在充满野性的地方的人，会把军人当做职业首选，因为战场是显示实力的世界。盖乌斯·马略的经历也是从军队开始的。

和一般的罗马人不同，盖乌斯·马略的姓名由两部分组成，“盖乌斯”和“马略”。而身为自由公民的罗马男性，其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

我们以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为例，“提比利乌斯”是他个人的名，“森普罗尼乌斯”是其家门的名，“格拉古”则是其家族的名，也就是姓。再如，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表示的是“属于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姓西庇阿的普布利乌斯”。同样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表示的是“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姓苏拉的路奇乌斯”。英语中读作“尤里乌斯·恺撒”的那位古罗马名人，其姓名在拉丁语中也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假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回家，他妈妈招呼他吃饭时会说“吃饭了，盖乌斯！”

在这三部分之外，有些人姓名中还有第四部分，即表示尊称和敬意

的绰号，这部分甚至还有人继承。如扎马会中战击败汉尼拔、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的大西庇阿，就在姓名中加上了具有征服非洲意思的“阿非利加努斯”，之后人们普遍称呼他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西庇阿的弟弟在姓名中加入“亚细亚迪克斯”，梅特鲁斯在姓名中加上“马其顿尼克斯”等。后面要出场的庞培，在姓名中加上了表示“伟大”意思的“马格努斯”，而且还将之作为自己的姓氏使用，甚至在签署文件时自己就签“庞培·马格努斯”（意译为“伟大的庞培”）。

这个方法用多了，仅靠个人名和家门名来识别一个人就有点儿困难了。因为“后援者”们总爱在自己的姓名中加入他们追随的“掌门人”的家门名，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隶”，也能在自己的姓名中得到原主人的家门名。顺便说一下，罗马“解放奴隶”的姓名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和他在当奴隶时期使用的个人名。

而且，罗马人喜欢用一些响亮的名字作为男人的个人名，像盖乌斯、提比利乌斯、格涅乌斯、阿庇乌斯、路奇乌斯、普布利乌斯、马尔克斯等，这样一来就容易重名。如果妈妈喊一声“盖乌斯，吃饭了”，估计街坊四邻会有好几个叫盖乌斯的小孩子跑过来。话虽如此，具有音乐天赋、创造了很多幻想曲但语言运用力一般的罗马人，自有人家自己的弥补办法。既然创造新的名字比较麻烦，咱就用简单好识别的，比如有五个男孩子，就分别取名为肯托斯、赛克斯托斯、赛迪乌斯、奥克塔乌斯、德西乌斯，就相当于日本男人叫五郎、六郎、七郎、八郎、十郎等。即使家中没有第十个儿子，也要有一个叫德西乌斯的。用久了，这些词就超越了原来的意思，成为独立的个人名字。

给女性取名字更为省事。本来女性没有个人名，把家门名的词尾稍作变化，就成了她们的名字。如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出身于西庇阿家族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科尔涅利娅；科尔涅利娅的母亲、大西庇阿的妻子出身于埃米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埃米利娅；尤里乌斯·恺撒母亲的娘家是奥雷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奥雷利娅。一门有

好几个女儿的情况下，也都这样取名字，于是姊妹们就都用同一个名字。女孩出嫁后，则姓夫家的姓。

在罗马还有少数像马略这样名字只有两部分的人，至于他们的名字为什么比大多数人少了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分析盖乌斯·马略，“盖乌斯”应该是个人名，假如“马略”是家族名，即姓氏，欠缺的就是家门的名，连家门的名都没有，盖乌斯·马略显然出身于平民阶级。盖乌斯·马略也说过自己是出身平民。

按时间顺序排列，格拉古兄弟之后罗马史上的主要人物就是盖乌斯·马略，看来马略是一个生活在各种“后援者”之类政治关系网之外的平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关系的马略要想出人头地，当然会选择到战场上去展现个人能力，搏个前程。这个只有两部分名字、出生于那样一个有野性的小地方的人物开始引人注目，是在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战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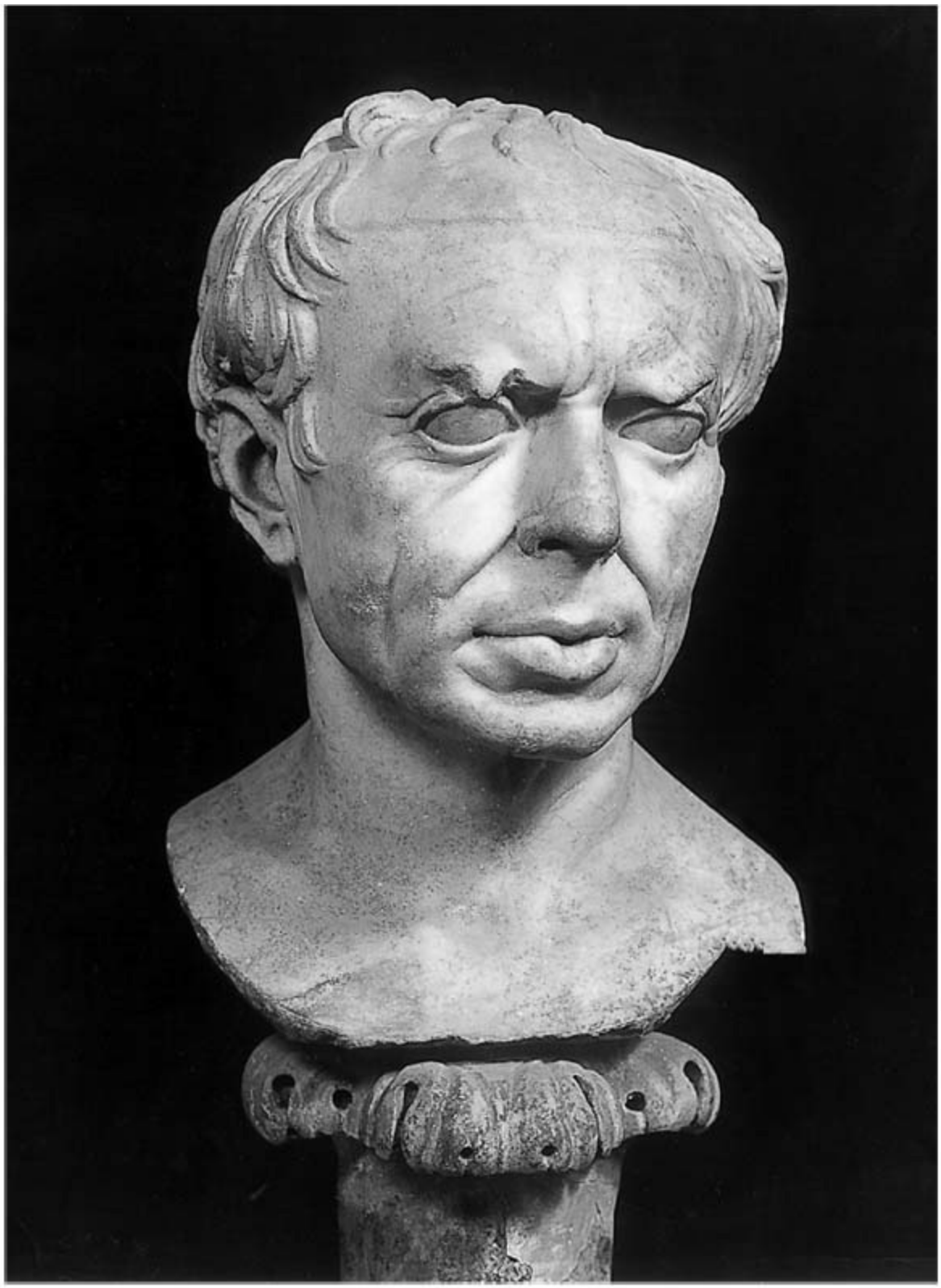
对西班牙原住民的反叛感到十分棘手的罗马，只能再次派遣当时最高等级的武将、灭亡迦太基的主帅、众望所归的小西庇阿为努曼提亚攻防战的最高司令官。有一次，在最高司令官营帐内的宴席上，有人问小西庇阿：“在您之后，谁将是统率罗马军队的将军？”

小西庇阿拍着身边一位年轻将官的肩膀说：“大概就是这个男人吧！”这个男人就是马略，当时他23岁。两年后，即公元前132年，马略跟随小西庇阿凯旋回到罗马。其后13年间，马略的名字没有成为传言的主角，大约他是在各地军团的服役和调防中度过军旅生涯的。

公元前119年，盖乌斯·马略在盖乌斯·格拉古被杀两年后就任护民官。但是，以平民阶级的顶尖人物为目标的盖乌斯·马略很少使用护民官的地位和权力。时年38岁的盖乌斯·马略，可能只是把护民官当做他进入元老院的通行证。

在平庸地度过护民官任期后，盖乌斯·马略竞选按察官，但不幸落选。按察官在罗马政界属于较低级别的官员，连这个职务都没有选上，没有背景的盖乌斯·马略在政界的前途十分黯淡。年过40，盖乌斯·马略才结婚，妻子是恺撒家族尤里乌斯一门的女儿，论辈分相当于此时尚未出生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姑姑。当时恺撒家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在罗马处于二流，由于这次婚姻，马略在元老院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年后，公元前115年，盖乌斯·马略成功当选为法务官。法务官是接近执政官的高级别官员，只有两名，马略能够当选，恺撒家的关系网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年，以前法务官的身份，马略被派到西班牙行省担任总督。不管是在法务官任上，还是在总督任上，马略的业绩都与他在护民官任上相同，属于“无可无不可”一类。



马略

盖乌斯·马略得以发挥作用、大显身手的机会5年后再度来临，这次是从被称为“朱古达战争”的努米底亚战事开始的。已年届48岁的马略，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梅特鲁斯的副将，被派到了非洲。

让罗马元老院很伤脑筋，以致下决心采取军事介入行动的努米底亚问题，要追溯到公元前109年以前。马西尼萨国王当政时的努米底亚与罗马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即已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在抗击汉尼拔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149年，89岁的老国王马西尼萨去世，他把王国交给三个儿子继承。但是王权不可能一分为三，老国王就委托小西庇阿为遗嘱执行人，决定长子米奇普萨继承王位，国政大权由次子古鲁萨和小儿子玛斯塔纳巴鲁继承。和罗马的同盟关系维持不变。依赖与罗马的紧密关系，加之北非大国迦太基的灭亡，努米底亚王国迅速扩张，成为东与埃及接壤、西邻毛里塔尼亚的北非第一强国。

玛斯塔纳巴鲁有个妾生了个儿子，取名朱古达，这个小王子聪明伶俐，招人喜爱。长大后，恰逢西班牙发生原住民反叛，罗马派小西庇阿率军平叛。由于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是同盟关系，有义务为罗马军提供兵力，加之西庇阿与努米底亚王国是“掌门人”与“后援者”的关系，有困难互相援助是一条“铁律”，朱古达的伯父即国王米奇普萨就把朱古达派到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前线，在小西庇阿指挥下参加了努曼提亚攻防战。

年轻的小王子朱古达在西班牙前线的表现引人瞩目，总司令官小西庇阿应该是比较满意，他特意给米奇普萨国王写信，信中表达了对米奇普萨国王的感谢和赞赏。米奇普萨国王认为维护与罗马的良好关系对本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既然朱古达能让罗马人满意，在朱古达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把他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其实国王自己已有两个亲生儿子，只不过当时尚年幼。问题出在14年后，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弟弟先于自己辞世，米奇普萨也行将驾崩。更坏的事情是，以努米底亚王国为“后援者”的小西庇阿已于11年前去世，小西庇阿没有子嗣留下，与其有血缘关系、有资格可以接替小西庇阿充当努米底亚王国追随的“掌门人”的盖

乌斯·格拉古也在3年前死去。米奇普萨处于在罗马“无人可依”的状态。

米奇普萨国王在遗言中请求罗马元老院为保证人，把努米底亚王国的王权分成三份，分别由两个亲儿子和养子朱古达继承。然而，在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国王逝世之际机能健全的“掌门人”与“后援者”关系，由于小西庇阿等联结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关系的“牵线人”相继辞世，在公元前118年已经不复存在。

所谓“后援者”关系，依我看有点像是一种特殊的“会客厅”，在“会客厅”碰头的时候，罗马的“掌门人”要充分体察“后援者”的想法，然后不辞辛苦地到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做工作，说服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出相关决议。不仅如此，“掌门人”还要居间向“后援者”们通报信息和动态，对哪些事情可以怎样做，哪些事情暂且不动为好，向“后援者”发出忠告或建议。现在“掌门人”死了，联结两国友好关系的“牵线人”不在了，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动也是自然的了。

米奇普萨国王死后不到一年，对王权“三分割”不满的两个亲儿子与养子朱古达起了纷争，继承人之间的争斗，转瞬间演变为国家的内乱。刚一交锋，胜负立分，胜者是朱古达。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亲儿子一个战死，另一个叫阿泰鲁巴雷的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跑到罗马去求助。

这回感到为难的是罗马元老院。努米底亚王国是确凿无疑的独立国家，罗马不能干涉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的内政，这是结盟时就定下的铁的原则。而本可以在罗马和同盟国之间充当润滑作用的“后援者”关系，在努米底亚也不存在了。

不得不发挥仲裁作用的元老院，提出了把努米底亚王国一分为二的方案，西部归阿泰鲁巴雷所有，东部归朱古达所有。但这种局面没能持续5年，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信的朱古达攻占了阿泰鲁巴雷的领土。阿泰鲁巴雷被追得走投无路而战死，站在他这边与朱古达作战的人们全部被杀掉，很多以经商为目的常驻努米底亚的意大利人也惨遭杀害。

消息传到罗马，人民群情激愤，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元老院这回也不能再静观不动了，公元前112年，罗马对朱古达宣战。

被罗马超出预期的强硬态度震惊的朱古达，马上向罗马派出使节，想向罗马做说明解释工作："争夺王位，说到底是我们努米底亚的内政；而意大利人被杀，纯属一次意外的不幸事故。"但是，罗马人将使者拒之于城门之外。没有了"后援者"这层关系，失去了联结两国的"牵线人"，给努米底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第二年，即公元前111年，罗马军登陆北非，然而等待大军的不是朱古达率领的努米底亚部队，而是朱古达派来的投降使者。使者表达了朱古达的投降条件，只要罗马认可他的努米底亚国王王位，他就愿意臣服并继续保持在罗马霸权之下的同盟关系。率领罗马军队的是执政官贝斯蒂亚，他认为，所谓认可朱古达的王位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就接受了朱古达的投降申请。作为讲和的条件，要求朱古达本人拜访罗马阵营。投降文件签署之后，贝斯蒂亚就率大军从非洲回国。

然而，朱古达继先前杀害意大利人之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派人在罗马暗杀一个相当于他的堂兄弟的人物，暗杀成功了，凶手却被抓住了。罗马人最讨厌鬼鬼祟祟在背后搞暗杀的行径，于是再度掀起镇压朱古达的舆论。第二年（前110），罗马再次把军队开到了非洲。

这回迎接罗马军队的，是全副武装的努米底亚士兵，因出乎意料而准备不足的罗马军很快即被包围。罗马军陷入两难处境，要么全军战死，要么接受朱古达提出的停战条件——解除武装，10日内退出非洲。罗马军被迫选择了后者，在屈辱的状态下回到了罗马。

这样一来，人民情绪更加激昂，罗马人认为，因失败而缔结和约，绝不是自己的传统，而且这回是交出武器后被轰回来的，更觉耻辱。朱古达又犯了一个侮辱罗马人的错误。

骑虎难下的罗马，这回决意认真对待与死敌朱古达的战争。这回担任罗马军总指挥的，是已选出的公元前109年度的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鲁斯，梅特鲁斯家在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影响力，昆图斯自身充满贵族出身的优越感和高贵的品位，具备武将的才能，又是一个清正廉洁的绅士。元老院可说是打出了手中最好的牌。为司令官梅特鲁斯配的副将，是虽无高贵出身但属久经历练型人才的佼佼者——时年48岁的盖乌斯·马略。

公元前109年夏，从原迦太基领土向西边的努米底亚进军的梅特鲁斯部队，与在努米底亚境内迎敌的朱古达军队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斗。

梅特鲁斯率步兵，副将马略率骑兵投入战斗，这一仗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朱古达混在四处逃窜的己方士兵中得以逃脱。

尽管输了第一仗，朱古达一方还是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详知地形地势，占据地利之便。第二，由于具有以前随罗马军打仗的体验，熟知罗马军的战法及各个方面。朱古达决定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实施游击战术。他甚至还采用时不时提出讲和的伎俩以避开罗马军的锋芒。但是，在最后这一点上梅特鲁斯没有上他的当。

梅特鲁斯并不穷追朱古达，他的谋略是把周边一带的部落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来，以使逃散的朱古达军难以重新集结。为了尽早与朱古达决战，也为了防止朱古达打游击战，梅特鲁斯把军队分为两部分：第一军由自己指挥，第二军由马略指挥。

这个战术大体上是成功的。第二年（前108）开始的会战，朱古达又被打败逃跑了。然而，这个战术的不利之处是不能尽快对朱古达实行决定性的打击。为了避免消耗战斗力，他又想通过外交途径，离间周边部落与朱古达的关系。但由于朱古达在当地威望较高，这一招非一朝一

夕能够奏效。战争有被拖长的迹象。

副将马略劝说上司梅特鲁斯改变战术，但梅特鲁斯听不进去。限于自己不掌握总指挥权，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打仗，又担心拖延下去会使自己和士兵们困在非洲，马略决心自己竞选执政官。

由于门第的差别，梅特鲁斯始终未将马略视为同列，他认为，根据马略的指挥官才能，充其量也就是个副将，现在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他当然很不高兴。为了竞选执政官，马略向梅特鲁斯提出申请要退役，梅特鲁斯答应得极不爽快。非但如此，他还看着站在旁边的20岁的儿子讽刺马略说："想当执政官吗？不要着急。你可能会同这个孩子一起当选，还有的是时间。"在当时的罗马，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即使能当上法务官，但要当选为执政官还是非常难的。到了距选举日还剩12天时，总算批准马略退役了。从罗马军的营地到港口乌迪卡还有很长的路，马略快马加鞭跑了两天两夜，从乌迪卡乘船四天后赶回罗马，终于赶上了公民大会的开会时间。在罗马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马略不仅明确表达了当选执政官志在必得的态度，而且还要和选民订立明确的公约——生擒朱古达，拉回罗马处决，早日终结朱古达战争。

公元前108年末，公民大会的气氛对平民候选人马略十分有利。这五六年罗马军的战绩，苦战已成为常态，就连保持苦战不败都很难做到。

在马其顿，执政官加图率领的军队被从北方入侵的色雷斯人打败。在欧洲，执政官卡尔波涅斯率领军队抗击从北欧入侵的蛮族，首战即负。更不能容忍的是在非洲，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竟打不过对手朱古达，屈辱地缴械讲和才得以逃脱。指挥这些战斗的，无一不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执政官。由于划定公民服兵役义务的资产下线不断下降，兵役义务增加，而战事败绩不断，应服兵役的罗马公民们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

公民大会不仅选举没有任何背景的“新人”马略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而且通过决议由马略负责非洲军事。“由马略负责非洲军事”的决议本不应由公民大会作出，哪位执政官负责哪方面的事务，这历来是由元老院决定，现在公民大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对元老院的双重不信任。元老院方面这回领教了公民大会的实力，对此居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到了50岁才第一次就任执政官的盖乌斯·马略，此前这么多年基本上是在军队度过的。对罗马军队的内情和士兵们的状况，他极为清楚。因此，他痛切地感到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变军队的现状。

当选后，马略向公民们发表了演说。罗马没有竞选演说的习惯，当选后的演说，实际上就是施政方针演说。小地方出生的平民执政官盖乌斯·马略站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向人民说道：

> 公民们，据我所知，大概有那么一些执政官，当选前展示给公民们的，是一副谦虚的公仆的形象，但当选后，马上变为傲慢的懒汉。而我不会那样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的理念是，为国家服务，与就任执政官、法务官这类官职与否毫无关系！
>
>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既然被选为执政官，就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但我深感困难重重。执政官是罗马的最高官职，也是军队的最高责任者。在准备战事的同时，还不能忘记要保证国家财政的健全。在征招士兵的同时，不能忘记士兵也是公民，他们不仅仅是奋不顾身为国家服兵役的人，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而且，我不得不在反对派的质疑声中履行我的职责，我所遇到的困难会超出各位选民的想象。
>
> 那些与我不同出身的人们，他们拥有作出伟大业绩的祖先，拥有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们的有地位的亲朋好友，他们还拥有众多的“后援者”。当他们遭受挫折的时候，这些“后援者”会保护他们。

而我，保护我自己的，只有我的能力和我诚实的品格。但我认为，圆满完成选民们交给我的任务，有这两条已经足够。其他那些——诸如伟大祖先的影响吧，亲朋好友的地位吧，“后援者”们的势力吧——对于真正为国家尽职尽责的人，对于早已习惯于艰苦与危险的人，只不过是无用的装饰！

我就要率领大家去参加镇压朱古达的战争了，可是，贵族们对我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停止。他们的批评有什么根据吗？

他们对于战争的一知半解，是读来的和听来的，而我的战争知识，却是亲眼所见，亲身所为，在战场上学来的。至于军事战术，他们只知道理论，而我却通晓战场上亲历过的实务。

我一直确信，我确信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我更确信，能够为更大的共同体作出贡献的人，才是更高贵的人！

没有久负盛名的祖先，更没有祖先的肖像，出身平民的我进入罗马领导层经历的曲折困难，恍如昨日。但此刻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与那些挥霍、玷污祖先流传下来的名声的行为相比，靠自己的努力来不断构筑自己的良好口碑，更加难能可贵。

他们靠立下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肖像来彰显自己出身高贵，我只能靠自己身体上的刀剑伤疤来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对于我来说，名誉、地位与艰苦、危险相生相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大家，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这一切！

我没有学希腊语，因为我不理解学它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我认为，说希腊语，写希腊语，读希腊语，对培养男人的力量与体魄，基本上没什么用！

不学希腊语，我们可以学习别的知识，可以培养对国家更有用的能力，如杀死敌人的能力、保家卫国的能力、不惧各种各样污言秽语的能力、不惧天寒地冻露营的能力、忍受军伍中劳累与饥饿的能力。

我要告诉各位公民的，就是以上这些。这不是作为最高司令官居高临下的讲话，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倾诉给全体公民的肺腑之

言。

马上就要成为士兵的公民们，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拯救国家，拯救罗马！

不论行军的时候，还是战斗的场合，我都会与诸位在一起，我是你们的指挥官，我又是和诸位平等地分担危险的战友！

我确信，有众神的守护，胜利、名誉、赞赏，全部属于我们！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是什么修辞高手，但盖乌斯·马略的这篇演讲的确十分出色。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所著的《朱古达战记》中记述了这篇演说词，我从中删除了重复的部分，翻译成现在的模样。《朱古达战记》记载的马略演说词中，对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士进行了近乎偏执的反复批判，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显得欠缺涵养。但在任何一个世俗社会，普通大众都喜欢听对权贵富豪的批判。

这一年的马略还创下了罗马史上的一项纪录，他前无古人地征招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3年出生。

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年出生。

盖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出生。

这三位，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既然是同代人，不用说都会与当时罗马的体制发生冲突。

那个时代的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生长于共和制罗马统治阶级中心的格拉古兄弟，能够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从政治的高度，揭示出霸主罗马不能回避的种种问题，并试图破解这些难题。

而生长于共和罗马周边小镇的马略，尽管缺少从政治高度思考问题、研究对策的训练与修养，但他是一位颇为优秀的职业军人，能够从自身的实践中敏感地捕捉到必须正视的罗马军队素质低下的问题。

结果三个人都触及了棘手的失业问题。格拉古兄弟是意图明确地拿出失业对策；马略则是无心插柳地“巧遇”失业对策。格拉古兄弟的构想因他们英年早逝而胎死腹中，马略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充分就业。

执政官拥有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组建过程如本丛书第二部《汉尼拔战记》所述，先在全国35个选区中抽选出当年应出兵役的选区，然后将该选区资产符合兵役条件者中17岁至45岁的男子抽出来组成军团。只有男丁但资产达不到要求者被视为无产阶级，免除兵役。那是个把兵役与直接税同等看待的年代，免除兵役即是免税。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公元前241年修订了这个政策，明确规定只有资产在12500阿斯以下者方能免除兵役。其后百年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兵力需求，这个“免税线”不断下降，先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苦斗”时期降到6400阿斯，其后降到4500阿斯，继而竟然降到1500阿斯。这样一来，本属于无产阶级可免除兵役的公民陆续被驱赶到战场上已成为常态。

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久经历练的马略，对罗马军队总吃败仗的原因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本属于免除兵役的低收入者被陆续驱赶到战场上，才导致了军队质量下降。这些人本不是失业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只是由于被迫服兵役才不得不丢弃了职业。家中多了个当兵的，却少了个挣钱的，剩余资产又不足以养活全家，这些兵上了战场后当然会士气低落。

而且，随着可免除兵役的资产额不断下降，从统计数字看流入城市的无产阶级人数是在减少，但这并没有化解社会不安定的问题，因为此时的城市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免服兵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名副其

实的无产阶级了。

执政官马略在行使自己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时，将历来的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由此罗马的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而成为了一种职业。响应马略召唤来当志愿兵的，大部分是失去了农地的失业者。

以前征兵制体制下国家需要支出的士兵经费全部转为志愿兵的工资。但原来的经费和现在的工资两者之间没有富余，不能再给士兵们涨工资。尽管如此，新政策颇受无产阶级欢迎，他们宁愿放弃作为城市失业者可以享受到的低价配额小麦的福利，也要选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失业问题不是仅靠充实福利就能够化解的。在格拉古兄弟那一章中已经说到过，对失业者来说，失业不仅仅是失去了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存理由。格拉古兄弟想靠给失业者分配农地、建设新殖民地、振兴公共事业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却是两兄弟英年早逝，良好愿望未能实现。马略的招数则是把失业者吸收进军队。

根据马略的志愿兵体制创建的罗马军队，实质上成为职业军人集团，这个集团不可能游离于罗马的其他社会阶层。

第一个理由是，志愿兵不再是失业者，而是成为和农民、商人相提并论的一部分人志愿从事的职业。

第二个理由是，有志于在共和制罗马政界发展的人，必须要有10年以上的军队工作经历。关于这一点我还坚持一个看法，在古罗马，特别是共和制罗马，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没有一个是“低能儿”，这种现象与他们拥有的军队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共和制罗马的领导者们，几乎全部拥有军界、政界的丰富经历。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既是哲学家又是律师还是个以写文章为职业的西塞罗。

不管怎么说，马略进行的军队改革，毕竟是触及罗马体制根基的重大改革，但这项改革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而得以顺利实施。为什么？

第一，当时罗马对外进行的战争，要么是连吃败仗，要么是深陷泥潭、左右为难，老百姓对率军打仗的元老院诸公的指挥能力深感怀疑。就是在元老院内部，认为必须要改变现状的呼声也很强烈。

第二，马略的改革没有涉及农地的重新分配，也就不会招致多占土地的富裕阶层的反对。

第三，免去了被迫服兵役困扰的下层人民，能够安居乐业，重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原失业者”对马略政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

我认为还有第四个理由，格拉古兄弟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是“体制外”的改革，而马略则是已担任执政官后进行的“体制内”改革。

但是，如果罗马元老院认为马略的改革是体制内的改革，可以安心放行，那就太愚蠢了。由于进行了这项改革，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的马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本来由于出身寒微，此前马略一直没有自己的“后援者”队伍，实行志愿兵改革后，那些志愿参加马略率领的军团的无产阶级，自然成为马略的“后援者”，就连那些虽未从军、但受益于改革的下层人民也成为马略坚定的“后援者”。于是，格拉古兄弟时代不曾有的，可以戏称为“民众党”的党派诞生了，而原本不属于政客的马略，却被推举为这个“政党”的头目，真是造化弄人。

马略的军政改革，体现了他“实践派”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时稳步推进，故而并没有一下子完成。托非洲战局的福，改革才得以取得成功。在竞选执政官时，马略曾与公民们订有尽早解决朱古达战争的公约，但他当选后，非洲战局并没有马上改观。

尽管如此，公民大会上并没有非难之声，马略的“后援者”们对他们

的“掌门人”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

虽说非洲战局没有马上改观，但擅长果敢速攻战法的马略总司令的到来还是给罗马军队带来了活力。无产阶级的志愿兵们作战更为勇敢，罗马军相继攻占了朱古达实行游击战的众多基地，当年深秋时节，罗马军已控制了努米底亚的一半国土。

但朱古达还健在，战争还未结束，即将结束的却是马略的执政官任期。于是马略向公民大会提出要求，如果非洲战事要继续进行，就要给予他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公民大会通过了给他的继续授权，第二年，即公元前106年，马略能够继续在非洲指挥军队。这个授权能够获得通过，士兵们从非洲前线写给祖国家属的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志愿兵们在信中不断称颂他们的总司令和士兵们吃同样的伙食，与士兵们一起修筑营帐，战斗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对平民执政官的高度评价，远远领先于战场上的实际战果。

然而日益明确的现实是，要想结束朱古达战争，仅靠战斗的胜利还不够。而马略擅长的果敢速攻战法，也由于朱古达基地太多，东躲西藏而难以奏效。如果不能切断朱古达与其最大同盟者毛里塔尼亚国王的关系，完全孤立朱古达也是不可能的。要想孤立朱古达，外交上的才能比军事上的能力更为重要。马略对外交并不擅长，需要给他配备一个具备外交才能的助手，于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从罗马来到了非洲战争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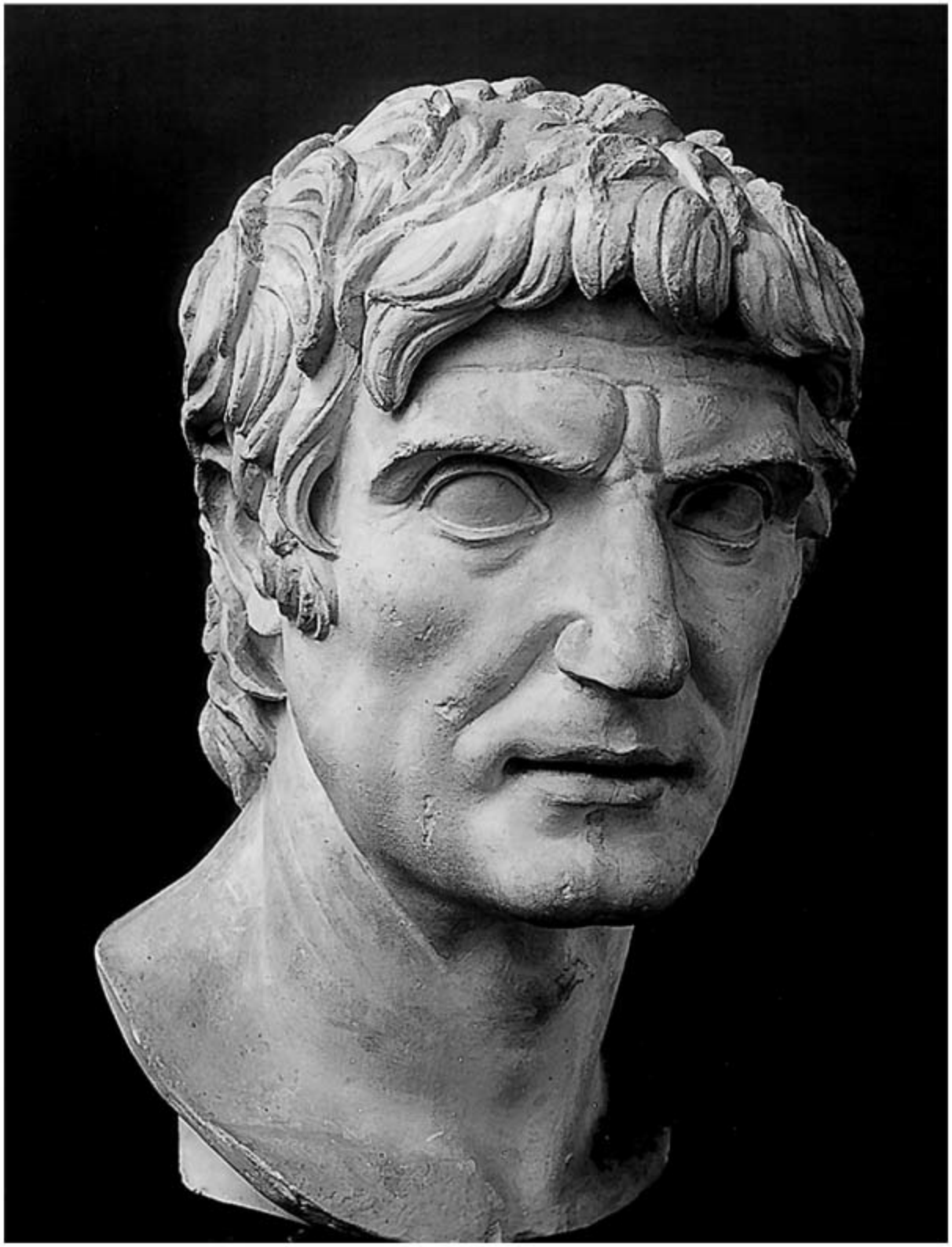
罗马史上另一个主人公登场了。那一年，苏拉年仅32岁。

被派到军团中的财务检察官，如前所述，要负责除指挥军事以外的一切军中杂务。这个职务在罗马政界被视为“登龙门”的起点，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当选财务检察官者以年轻人占压倒性多数。被选为财务检察官后，苏拉没有马上到任，他先去罗马同盟城市国家征集援兵，然后率领征集的骑兵来到了非洲。此时正值朱古达战争十分关键的时刻。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与马略不同，他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这一名门，但由于祖上无人，日渐式微，说是贵族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家族。这一点与平民贵族格拉古家完全不同。

因此，苏拉家较为贫穷。在罗马，把一家一栋的独栋住宅称为“道姆斯”，把租赁用的公寓称为“茵斯拉”，虽说出身贵族，但苏拉家是住在“茵斯拉”的普通住户。苏拉的母语是拉丁语，他不仅拉丁语非常优秀，还能熟练地使用希腊语。他的母亲可能早逝，据说是妓女们供养他完成学业。关于苏拉的这些传闻，我判断应该是真实的。“刻苦学习”这个词用在苏拉身上，可说恰如其分。

由于苏拉在罗马历史上一手制造了独裁时代，留给后人的肖像以非常恐怖的面庞而出名。提起苏拉，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威严冷酷。实际上的苏拉并非如此，特别是年轻时代的苏拉，性格开朗，喜欢与士兵们开开玩笑以润滑关系，能够深入士兵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口碑还是不错的。对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苏拉持礼甚恭而又不卑不亢，该说的话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苏拉脸上的麻子是后来才有的，年轻时是个肤色白皙、身材挺拔的美男子。他举手投足间风流倜傥，从不因自己年少时的经历而自卑。苏拉是个野心家，但他不是个卑鄙猥琐的野心家。



苏拉

32岁的财务检察官到任后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让马略和士兵们觉得离不开他。除了军团的后勤事务外，苏拉还率领骑兵到前线参战，尽管他缺少作战经验，但取得了上乘的战绩，得胜回营。这期间，与朱古达结盟在会战中大败罗马军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向罗马军秘密发出讲和的试探，也是苏拉最先作出反应。

身为总司令的马略并不擅长外交事务，于是就将与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谈判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苏拉。由于布克斯已娶朱古达的女儿为妃，为使媾和谈判不致太露痕迹，布克斯委婉地提出："为了毛里塔尼亚人民与罗马人民的相互利益，请派两名总司令信赖的人来进行商谈。"

苏拉与另一名同僚到达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的营地后，向布克斯陈述讲和的有利之处，但布克斯态度暧昧，导致第一回合的谈判破裂。看到布克斯难以决断，苏拉也没有强求。之后，朱古达和布克斯的联军与罗马军再战，被罗马军打败。于是布克斯再次提出讲和，请罗马军再派代表，马略答应了他的请求。

罗马军与朱古达的战事处于拉锯状态，胜负不明，此时去敌方的营地谈判，是件很危险的差事。苏拉这回是只身前往，见到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后，苏拉要求与布克斯单独密谈，他们二人加翻译在密室里会谈了很久，总算有了结果。苏拉要求布克斯诱捕朱古达，并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第二天，布克斯派人给朱古达送去宴请的邀请，应邀前来赴宴的朱古达被当场拿下，戴着枷锁就交给了苏拉。

常年困扰罗马的朱古达问题，终于获得圆满解决。罗马人把功绩都记在了马略头上，他人还在非洲，公民大会即已选举他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4年度的执政官。此时又传来消息，蛮族从阿尔卑斯山北边逐渐接近。

公元前104年1月在罗马举行了马略的凯旋仪式，披枷戴锁的朱古达

被杀死在罗马广场附近的牢狱内。努米底亚仍和从前一样，作为承认罗马霸权的独立国家继续存在。元老院选定朱古达的内弟（小舅子）担任新的国王。事实上，罗马从来也没有将努米底亚变成行省的打算，朱古达强行采取错误的做法，结果是丢掉了自己的王位和性命。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倾注热情撰写的《朱古达战记》一书指出，朱古达战争的历史价值，仅仅体现于催生了马略的军队体制改革。随着原迦太基领土变为罗马的行省，努米底亚王国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国，毛里塔尼亚王国也成为罗马的同盟国，罗马的霸权已经尽数覆盖了西地中海地区。

朱古达战争还促使搅动罗马历史的另一个人物——苏拉粉墨登场。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又不属于当政的权贵阶层。他和马略，以及后来的恺撒，论出身都与掌握权力和财富的元老院阶级有相当远的距离。论家族历史，格拉古家虽比苏拉和恺撒家更浅一些，两兄弟却是出身于被称为“平民贵族”的家门中，生长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心。而苏拉、恺撒纵使祖上是名门望族，但他们在罗马政界仍属于“新手”。随着这些“新手”的陆续登场，罗马的“迷失”也越来越呈现出“革命的世纪”的模样。

人类在一个地方觉得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总是要向他们想象中更易于生存的地方迁徙，这是古今东西不变的现象。这种民族迁徙，在古代称之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难民潮”。在古代罗马，这种民族迁徙形成了罗马存续过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原生活地区生存难以为继导致的人口迁徙，可能是和平的方式，也可能是暴力的方式。即使是和平方式的迁徙，也不可能不给迁入地现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因此民族的迁徙或多或少也是带有暴力色彩的。

罗马人多次面对这个难题，又不断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难

题。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几乎整个罗马史中随处可见。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高卢人）曾短时间占领首都罗马，有这样一个痛苦经历的罗马人，对蛮族的入侵首先采用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后来随着罗马的富裕与强盛，罗马人开始站在长远的角度上更为从容地对待蛮族入侵问题，并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被动地等待入侵之敌，而是主动杀向蛮族聚集的地区，征服他们。征服之后在当地实行“罗马化”，即修建罗马式的公路网，完备基础设施，建设殖民城市，让这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接受罗马的文明，使之在自己的地盘上自食其力。

高卢人居住的卢比孔河以北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就是这样被“罗马化”的。而且，同属高卢人聚居、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也是这样被“罗马化”的，并被改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普罗旺斯”这个地名，拉丁语发音是“普罗温洽”，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行省”，“普罗旺斯”不过是这个拉丁词的法语发音。

这种罗马式的做法如果放在现代，就会被当做奉行侵略路线的帝国主义而遭到负面的评判。在现代遇到这类问题，总想用人道主义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然而现实却是，越是想用人道主义方法解决就越是解决不了。

朱古达战争总算在公元前104年结束了，但国内还有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可没有前面说的那么“从容”。公民大会把本不是执政官候选人的马略再次选为执政官，也是迫于蛮族从北方步步逼近，寄希望马略能打败蛮族的入侵。实际上，北方未开化民族从现在的丹麦、德国一带南下的8年间，已经和派去试图阻止他们的罗马军发生了5次冲突，5次都是罗马军吃败仗。开始时，罗马按加强行省防卫的层级派遣军队，但由于连吃败仗，且高卢人也与蛮族合流声势浩大，让罗马人越发感到危机来临，于是公元前105年派出了正规军团。假如再被打败，南法行省（今法国南部）被蛮族侵占，那就连被阿尔卑斯山这个天然屏

障护卫着的意大利也危险了。

这些败仗，不过是当时罗马军队质量低下、元老院阶级的军事指挥人才告罄的实例而已。不难想象，此时正是马略展示“新人”实力的绝佳机会。而更幸运的是，众神似乎也格外眷顾马略，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又给了他充足的准备时间——南下的蛮族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南下，向西杀奔西班牙。

盖乌斯·马略于公元前107年实行了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的军制改革。由于当时他必须马上承担起朱古达战争的指挥责任，军制的其他方面改革都没有来得及进行。公元前104年是相对平稳的一年，使他可以操作这些改革。这一年还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与公元前107年一样，马略也是该年度的执政官。

马略改革前的军制与改革后的军制的对比如下图所示。图中的“执政官军团”指罗马军队中由执政官指挥的一个战略作战单位，或者说是执政官直接担任总司令的军团的规模。

马略的改革有这么几项：第一，总司令指挥的军团数目可以伸缩自如了。由下图可以看出，以前“执政官军团”的规模约为2万人，包含两个普通军团，但这是执政官能够掌握的最大兵力；改革后的军团人数降为6000人加骑兵队，但执政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个军团，增强了执政官掌握军队数量的能力。以前的军制是建立在以防卫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罗马的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新军制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

第二，旧军制下，公民从军后从事什么兵种，是按其资产等级划分的。由于不再按资产等级征兵，而是改为不问资产的志愿兵制，原方法不再适用，故而将其废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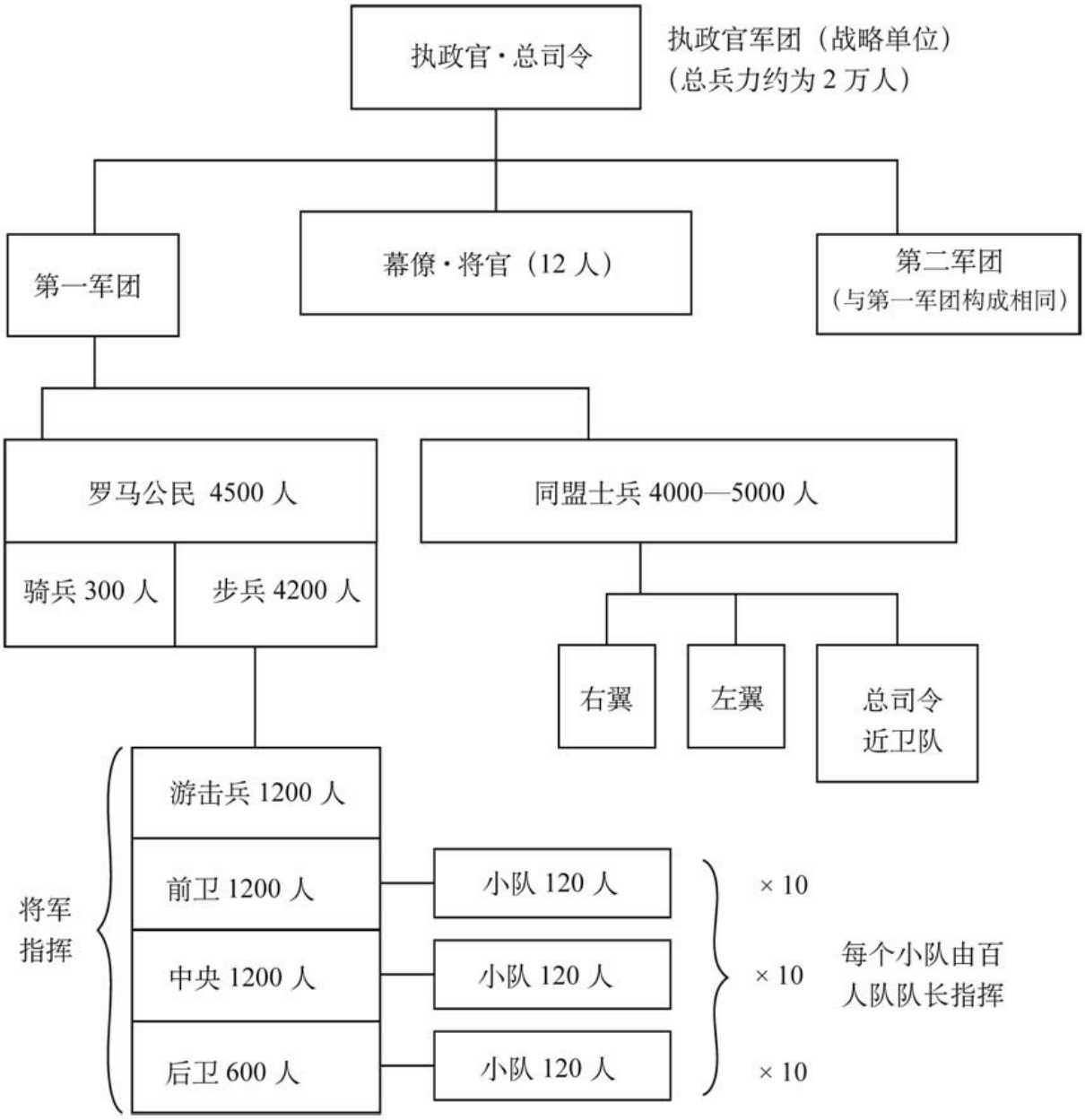
第三，旧军制下，罗马公民兵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士兵分别编

队，改革后的军制取消了分别编队的办法，改为士兵不问国籍，一律统一编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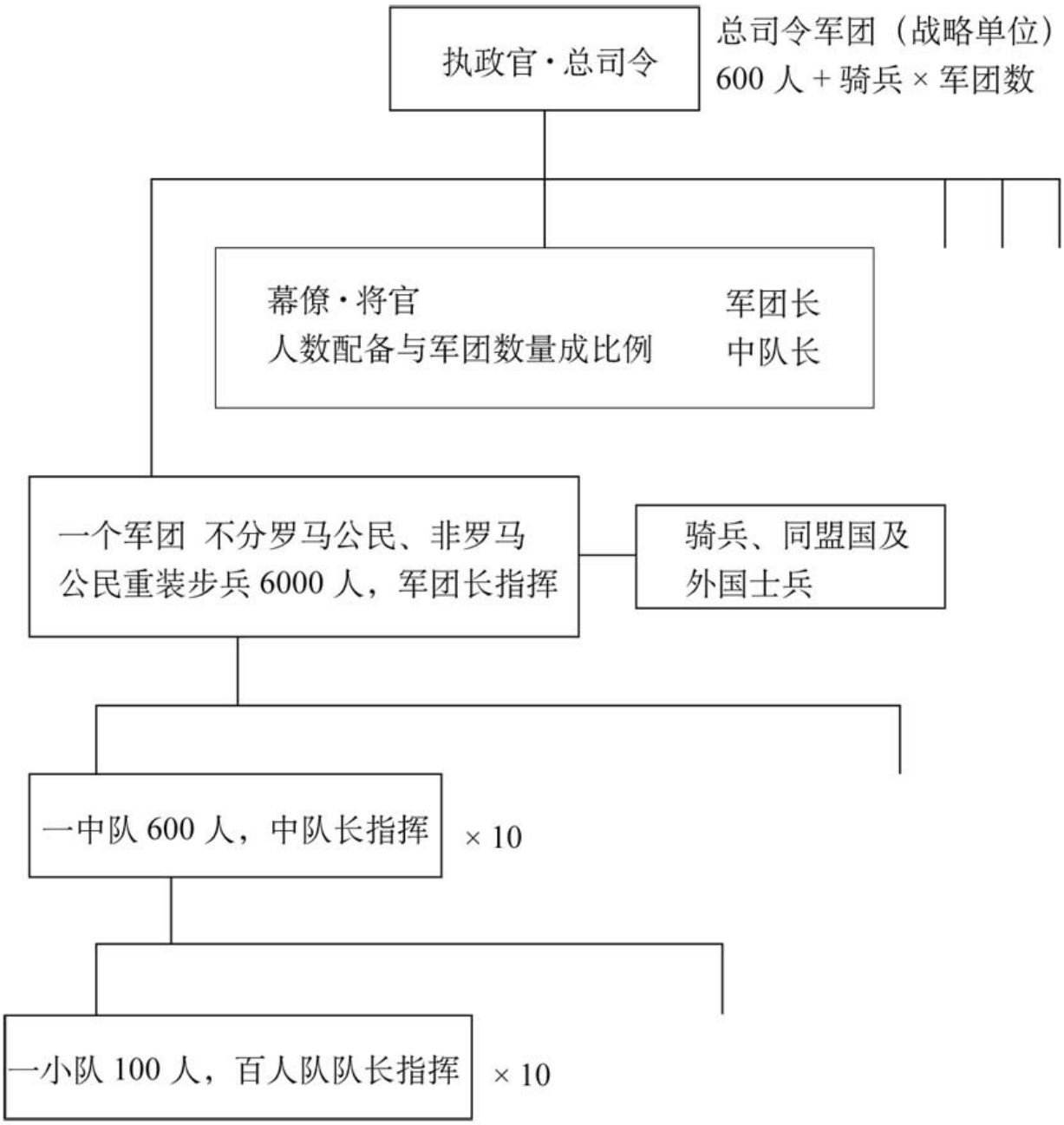
第四，以前军团中的将官和幕僚也要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显然影响军团的指挥效率，因而在马略之前即逐步推进军队首长用人权改革，马略改革中将此加以明确，即将官和幕僚改由总司令任命。从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快速反应机制角度看，这项改革也是必然结果。

马略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军制对比示意图

马略改革前的军制


执政官·总司令
执政官军团（战略单位）
（总兵力约为 2 万人）
第一军团
幕僚·将官（12 人）
第二军团
（与第一军团构成相同）
罗马公民 4500 人
同盟士兵 4000—5000 人
骑兵 300 人
步兵 4200 人
右翼
左翼
总司令
近卫队
将军
指挥
游击兵 1200 人
前卫 1200 人
中央 1200 人
后卫 600 人
小队 120 人
小队 120 人
小队 120 人
× 10
× 10
× 10
每个小队由百
人队队长指挥

马略改革后的军制



第五，实行志愿兵制后取消了步兵各兵种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取消了步兵配备武器的区别。只要是步兵，统一配备投枪、盾和剑。剑是当年大西庇阿选定的双刃短剑，这种短剑有利于近战的优势已为一个世纪的战争史所证明。

第六，废除了原来步兵中按资产等级划分的各兵种各自的队旗，取而代之的是全军团统一的以银质的鹰为标志的队旗。鹰成为罗马的象征就从这时开始。

第七，重装步兵团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骑兵团自然也要变。当时罗马军队中的骑兵已不是上流社会子弟的“士官学校”，就连拥有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可以承担军务、担当骑士、被称为“骑士阶级”的富裕阶层子弟，也仅限于不过问军务、没有政治野心的人才能当骑兵。骑兵中没有特别的志愿者。马略改革后的骑兵团，则是由骑术精湛的来自努米底亚、西班牙、高卢和希腊士兵组成的集群。

第八，总司令卫队组成人员的选拔，由过去只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士兵中选拔改为从包括罗马士兵在内的全军团所有士兵中选拔，近卫队的职能也如其字面意义所示，承担起总司令身边的护卫任务。

以上这些，是马略改革后罗马军队形式上的变化。形式上体现不出的变化，我认为还有如下几点：

1.改为志愿兵制，吸收了失业者，意味着这些士兵可以长期使用。

2.军队中彻底消灭了根据资产划分的等级制度。

3.在军队中稀释了罗马公民与各同盟国家公民的区别。

4.可根据需要增减军团数量以及可任命手下带兵的将官，增大了最高司令官的权力。

5.以最高司令官为顶点的军官阶层与普通士兵的关系更为紧密。

然而，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只有正面作用的体制之类的东西，就是神仙也造不出来。何谓改革？在本来就是坏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动，这不是改革。当初是好的体制，经过一段时间后负面因素逐渐显

现出来，设法改正这些负面因素的举动，才能称为改革。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体制在提升罗马军的机能和战斗力方面成效显著，但即使这样的改革也很快显现出负面的作用——即很多历史学家批评的“军队私人化”。可以说，正是马略的军制改革成为此后苏拉、庞培、恺撒这些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土壤。

但在马略实施改革的时期，就连元老院中那些“铁杆”的“捍卫共和派”都没有反对之声。不仅如此，从公元前104年度开始，马略连续5年被选为执政官，体现了人民和政界对他的信任。大概包括马略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留意到这次改革的政治意义吧！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马略没有进行这项改革，也会有别人出来从事这项改革。换句话说，与其认为马略的军事改革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不如归结为是马略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公元前103年，新生的罗马军队在他们的“父亲”马略率领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南法行省。此时从北欧大举南下的日耳曼人，还没有把目标指向意大利，但是罗马对纳入其霸权下的同盟国和南法行省有防卫义务，而且，如果放任不管，罗马会担心已经被“罗马化”的南法行省“日耳曼化”，于是马略率军一直开到了罗讷河边。

这一年蛮族盘踞在高卢（现法国）中西部地区没有什么动向，军中暂时无战事。为了防止等待战机中的士兵会因无所事事而疲沓软弱，马略就让士兵们去修建运河工程。罗讷河水量充沛，在汉尼拔时代即已知渡河困难，马略让士兵们在河口附近开凿运河。这条运河后世被称为“马略运河”，它对马赛与法国内陆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马略率领的罗马军在等待战机时也不忘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从此以后，确定了驻扎各地的罗马军队无战事时从事土木工程的惯例。

临近年末，马略判断今年怎么也不会有战事了，他临时回了趟罗马，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2年的执政官，这是54岁

的马略第四次被选为执政官。

就在此时，蛮族又开始了移动，得到消息后的马略急速从罗马出发，沿第勒尼安海北上，经过热那亚到达罗讷河畔的军营。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从首都罗马连接同盟国马赛、南法行省，直至西班牙行省的公路网。到达前线后，在严阵以待中进入了公元前102年。

再次开始移动的日耳曼人，仅能够充当作战人员的男子数目，即已达到30万人，再加上女人、儿童、家畜、装行李的马车，堪称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由于整个欧洲也只有意大利生活最为富足，因此庞大的人群开始了以意大利为目的地的移动。

如此庞大的人群，难以全体统一行动，于是日耳曼人把各个部落分开，打算从三个方向侵入意大利——条顿部落沿南法行省的海岸从西边入侵；辛布里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从北边入侵；迪克利尼部落则向东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从东面入侵。

罗马方面迎敌阵容是：马略负责抵挡西面；与马略同为执政官的卡图鲁斯负责对付从北面入侵的辛布里部落；东边的入侵之敌由于要从绕过潘诺尼亚的道路过来，尚需时日，暂且先迎击西、北入侵之敌。

这年夏天，首先现身在严阵以待的罗马人面前的，是从西边来的条顿部落。马略率领不足3万人马守候在罗讷河东岸的营地上，条顿部落仅男人就超过了10万人。敌众我寡，马略没有急于冲出营地与敌交锋，而是采取了暂且让过敌人的战术。日耳曼人见罗马人缩在坚固的营地里没有出战，极为蔑视，连罗马人的营地也没有攻击一下就从营地前扬长而去。

蛮族长长的队列缓缓地移动着，他们还和守卫在营地门前的罗马士兵们开起了玩笑，说我们打到罗马后见到你们的家属，会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小子都挺好。看到己方士兵都很焦躁，马略就劝告士兵们少安毋

躁，“展示我们新生罗马军实力的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蛮族长龙般队伍的队尾即将消失在平原尽头的时候，马略下达了全军出战的命令。一般来说，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人群在行进时，后队必然薄弱，马略以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己方军队在敌人背后发起了猛攻。

以“埃奎亚·塞克斯提亚之战”而闻名的，在马赛以北20公里的地方进行的这场战斗，罗马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超过10万的日耳曼人，或死或被俘，悉数全歼。经此一役，同盟国马赛和南法行省被从日耳曼人的威胁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马略的同事执政官卡图鲁斯为总指挥、苏拉为幕僚之一的北部战线的战况却大不相同。卡图鲁斯与马略不同，他采取了面对面的攻坚战，面对辛布里部落南下的10万多人，以己方2万人正面激战，肯定是非常吃力的。可笑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的，2万罗马士兵被身高体壮的10万日耳曼人吓住了，不战而败走。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卡图鲁斯做出了符合总司令身份的举动。

卡图鲁斯率领卫队全速驱动战马，出现在败走士兵的面前，他的左侧是高举银鹰战旗的骑士，如此一来，稳住了队形，士兵们被恐惧驱赶导致的溃败变成了战术撤退。卡图鲁斯命令将官们整好队形，罗马军一丝不乱，得以安全撤退到波河南岸。意大利北部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那一年那里到处都是日耳曼人。似乎也不必再担心他们南下了。

但是，蛮族的三分之一毕竟已经进入意大利境内。为参加庆祝南法大捷凯旋式回到罗马的马略，在分析敌情后认为，必须趁日耳曼人尚沉浸在可以吃饱喝足的梦境中的时候采取迎击的态势。他决定推迟举办凯旋式，再次率自己的士兵北上。而罗马的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1年度的执政官。马略的军队在波河南岸与卡图鲁斯的队伍会合，待第二年春与日耳曼人决战。即使现任执政官与前执政官两军合一，罗马军的人数也就5万，而日耳曼人则超过10万。

公元前101年春天，不待蛮族开始南下，马略和卡图鲁斯的军队即越过波河，在靠近河北岸的维尔切利等待敌人接近。维尔切利地处图里诺和米拉诺之间，是一块宽阔的平原，117年前，汉尼拔军和罗马军的骑兵战即发生在这里。说不清为什么，尽管时代变了，战争却仍在同一场所进行。

得知罗马军已到，辛布里部落的首领派来使节，要求与罗马军约定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他们的习惯。马略对使节说：

“罗马人在战场上从没有听取敌人要求的习惯。话虽如此说，我还是给你们辛布里部落开个特例，决战的地点就在维尔切利，决战时间定在三天后。”

马略属下的士兵有32000人，卡图鲁斯属下有20300人，两军合起来52300人，战斗却以罗马军完胜而告终。马略改革后的罗马军队，不管是中队还是小队，在战场上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按照指挥官的意图进退有序，指哪儿打哪儿，漂亮精彩。罗马军的胜利，是自己的战斗力得到更有效率发挥的结果。而日耳曼人尽管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战斗没有章法，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战斗是惨烈的，包括不愿投降自杀身亡的妇女在内，共12万日耳曼人死亡，6万人被俘。得知日耳曼人在南法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接连战败，迪克利尼部落放弃了从东面入侵的打算，逃回北欧。马略和卡图鲁斯回师罗马，在首都罗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式，马略和卡图鲁斯二人都享受到了最高待遇，乘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接受人们的迎接与欢呼。

意大利也从蛮族入侵的恐慌中解放出来。

一般来说，一个56岁的男人，身体状况如何姑且不论，大脑思维应该还不到衰退的时候，然而马略却以56岁为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因

久经历练而运筹帷幄，马略主导设计了罗马的军制改革方案并使之得以实现，从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把下层人民从兵役义务中解放出来，让失业的人民有了新的职业。由于他的改革，罗马军的机能得以恢复，战斗力大为提升。新生的罗马军两次大胜日耳曼人，就是马略改革成功的实证。

成功击败日耳曼人后，马略的声望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0年度的执政官，这是马略第六次获选这一职务，其中从公元前104年度开始不间断地五次连任。一个在罗马之外的小地方出生的“新人”，创造了建国以来名门望族们也无人能及的辉煌，获得了极高的名誉和地位。然而从公元前100年开始，马略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一年前极高的支持率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对马略有过一个评价，直译为：“政治教养的欠缺对马略是致命的。”

马略战胜日耳曼人的纪念银币

接下来，蒙森对马略的评价还是很有趣的，如果理解了他所谓的“政治教养”是什么，就会觉得更加有趣。蒙森说：

“马略不具备蔑视常识的必要力量，但他偏要做出不正确和违反常识的举动，令人感到恐怖。”

盖乌斯·马略具备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战术素养，足以令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尽管他有些粗野，但为人正直而朴实，打了胜仗后，战利品都分给部下的士兵，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要。对其他国家国王试图收买他的试探性举动，他从来不为之所动。他军规严格但执法公正，注重和士兵的交流，临敌时具有不可撼动的英勇气概，把握战机的能力也非常出色。

不懂希腊语而成长起来的马略，其自身可说没有什么缺陷。但是，未学希腊语意味着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举世罕有的军事指挥人才，他自己却陷入一种不必要的自卑感而难以自拔，他靠极强的自尊和自负来防止自己坠入被自卑感困扰的“地狱”。不过，过度的自卑感尚不至于影响他对外界状况的判断。

马略得胜凯旋，但他随即发现，他所主导的军制改革虽然成功，却派生出另一个重大问题等待他解决。

由于实行了志愿兵制，罗马军队的士兵成为职业军人，这些士兵跟着马略在非洲、南法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连续取得胜利。但是，正由于战争打胜了，就回复到了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军人，作为职业军人的士兵们就失去了职业。

在共和罗马时代，没有常备军的制度。把服兵役当做公民义务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思维，因此，当国家需要时，就迅速组建新的军队，不需要时就解散军队。跟随马略战斗了7年的士兵们，在凯旋之后就面临被解散的命运。

在过去的征兵制时代，军队解散后士兵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就业，而改为志愿兵制后，军队解散就等同于士兵失业。罗马政府给这些原来的士兵们发放退职金，并帮助他们联系新的职业，在未找到工作之前，国家再发给他们失业补贴。

尽管战争结束，马略还是被选为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除了感谢他击退日耳曼人的功劳之外，也含有依赖马略解决退役士兵去向问题的期望在内。因为士兵们本身也是有选举权的公民。

马略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比其他人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作为一个久经艰苦磨炼才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人”，马略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与他手下的这批士兵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密不可分。由于出身寒微，马略无缘成为与生俱来的“掌门人”，祖上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个能在政治上帮扶他的“后援者”，这7年追随他的士兵们成为他在政界最大的“后援者”，让他们退伍后能够安居乐业，是自己作为“掌门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既然是志愿兵制，那么国家与志愿兵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在共和政体时代，还没有对志愿兵退役后的出路作出任何书面的保证。因此，马略认为责无旁贷的事，并没有法律上的规定，只是一种人情上的责任。

其实不仅限于马略，一直以来，所谓的“后援者关系”对罗马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本身就说明，义理人情在罗马人的内心世界里占有一定的位置。

那么，罗马人创造出来的“法”的概念，难道与所谓“义理人情”没有矛盾吗？我认为，想透了就会发现其实并不矛盾。法律执行得越严格，就越容易与人性发生摩擦，为了防止这种摩擦而能够起到润滑剂作用的，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义理人情”。确立了“法”的概念的罗马人，是能够理解润滑剂的重要作用的。

马略、苏拉，还有庞培和恺撒，都是能够理解“义理人情”的男子汉。近现代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这四位领袖和士兵的关系，简单定义为“军队私人化”，因为这些人是不理解或不太理解“义理人情”重要性的欧美学者。

马略的想法是，在罗马人的社会里对这些士兵进行妥善的照顾安置。但正如普鲁塔克所说，马略“是战时的领袖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只是感觉到有责任和义务安排这些士兵，但不懂得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想法政策化。此时的他开始犯糊涂，竟然把自己的大脑交给护民官萨图纽斯执掌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阿普利乌斯·萨图纽斯是格拉古兄弟的崇拜者。很多事例表明，崇拜者往往比被他崇拜的人物更为偏激。路奇乌斯就是这样一个偏激的人，而且他还利用了广大人民对马略的广泛支持。

路奇乌斯首先成功地修改了关于以补贴型价格向穷人配给小麦的法律。从盖乌斯·格拉古时期以来，小麦的配给价格一直就是1摩第小麦6.3阿斯。路奇乌斯将其降至1摩第小麦仅需0.83阿斯，基本上等于白送。对马略来说，这等于给他的老部下们发放“失业补贴”，所以马略也积极赞同这一法案。

其次，路奇乌斯又提出了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再建设殖民城市的法案。他选定的殖民城市建设用地，除当初盖乌斯·格拉古选定但没有建成的迦太基城遗址之外，又增加了北非地区。在他的方案里，到新殖民城市定居的新移民中，排第一位的就是马略的那些老兵们。这些退役士兵们每人可以领到100尤格（约合25公顷）土地。假如该项法案能获得通过，马略的那些老兵的“养老金”也得到保证了。

但是，得悉这些的元老院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反对的理由是国家财源不足，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这方面，路奇乌斯·萨图纽斯远不如盖乌斯·格拉古，他连如何确保殖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对策都筹划不出来。

然而，路奇乌斯自恃有马略和支持马略的公民做后盾，把来自元老院的抗议当成了耳旁风。不仅如此，他还把原属马略手下的那些退役兵召集到罗马，在这些人占据优势的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与元老院对着

干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今后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元老院必须全部认可，并在法案通过5天之内宣誓遵守该法律，拒绝宣誓者，视同放弃元老院议席。

元老院采取强硬态度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就形成了元老院与护民官的公然对立。罗马共和政体的三根支柱，分别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当护民官与元老院形成对立时，充当仲裁职能的只有执政官。当年的执政官是马略，而马略对这种调解谈判极不擅长。

马略自身也是元老院议员，不等他开始仲裁，路奇乌斯在元老院议员中第一个找到他，要求他率先宣誓遵守该法律，这一招让马略无计可施，其他议员也极不情愿地跟在马略后面进行宣誓。到最后拒绝宣誓的，是朱古达战争中曾担任马略上司的梅特鲁斯。身为贵族的这个男人，不仅离开了元老院，还自我流放，离开了罗马。从此以后，本来因马略是位优秀的武将而敬重他的元老院议员们，与马略疏远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萨图纽斯沉醉于使元老院屈服于自己的胜利之中。由于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支持者队伍，他打算连选连任护民官。但是他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路奇乌斯居然派人暗杀了这名竞选者。元老院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

元老院以“对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作出处置措施”为由，通过了“元老院最终劝告”，也就是宣布国家处于“紧急事态”。这项决议通过后，不惜诉诸武力也要致力于恢复秩序的执行责任，就落到政府最高首长执政官的肩上。护民官路奇乌斯认为马略不应该执行元老院的决定，为了阻止马略，他召集支持者们声势浩大地聚拢在卡匹托尔山上，这一下可把马略逼入绝境。

“元老院最终劝告”，就是“紧急事态宣言”，假如马略承担起执行者的角色，就必须忠实地履行职责，但这无异于给自己挖掘了政治坟墓。这样说是因为，“元老院最终劝告”与法律之间的矛盾，马略自己并没有

搞明白，无法利用这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而站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政治能力，马略也不具备。

茫然失措良久，马略选择了履行执政官职责，站到了镇压“暴徒”军队的前头。镇压并不费事，路奇乌斯和他的同党们投降了。马略既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只是把他们关在了罗马广场附近的一所房子内。但是憎恨路奇乌斯的那派人马，把那所房子的屋顶砸开，向关在里面的人投掷石块和瓦片，把他们活活砸死。这期间马略也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起不法的杀人行为。

此次事件之后，平民们对曾视之为自己的代表并充满信任的马略失望了。马略特地将自己的家搬到市中心，以方便接受人民来访，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但是来拜访他的人锐减。回想一年前，马略还是个人民爱戴的英雄，只要他一走出家门，就会得到人们的欢呼与敬仰。马略对下一年度即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选举，也彻底绝望了。

就像要嘲笑马略似的，元老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把自我流放的梅特鲁斯请回罗马。与梅特鲁斯不合的马略，以战胜日耳曼人之后须向众神还愿为由，离开罗马去了希腊。谁也不相信他这个理由。

就在同一年，马略妻子尤利娅的娘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曾严厉批评马略“欠缺政治教养”的历史学家蒙森，却极为赞赏这个男孩，称赞他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叫做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又是8年过去了，对罗马来说，这是表面上和实际上都算平稳的8年。

外敌没有来威胁罗马，各行省也能确保稳定。蛮族在马略的坚决打击下吃了苦头，没有移动的迹象。马略依然隐居。护民官的势力自路奇乌斯被害以来，持续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连那个才能出众的苏拉，这

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事情。罗马过了平稳的8年。

但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潮涌动。

靠奖励自耕农来巩固社会基础的政策，因农地改革一时受挫而不断拖延。对失去农地、流入城市的无产阶级问题，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解决对策。护民官路奇乌斯虽然被杀，但他力推并已通过的向贫民以象征性价格配给小麦的法律没有被废除。这也是由于元老院除了严防死守自己的既得权力与利益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懒怠，面对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失业问题，他们能够想到的也只是靠福利政策来缓解。

另外，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积极对策即新建殖民城市计划，在把马略的退役兵当做稳定对象优先安置的北非殖民城市建成后，也不再有新的动向。在当时唯一能够迅速吸收失业人口的途径就是军队，但这个时期没有战争，军队也不可能扩充。总之，这个时期罗马人享受到的和平，是把一切社会矛盾都搁置起来的和平。不过，罗马还是有明白人对现实有清醒透彻的认识。

和平进入第九年，即公元前91年，这一年当选的护民官中有一位叫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时年39岁，此公就是30年前破坏盖乌斯·格拉古改革的那位叫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护民官的儿子。他父亲当年接受元老院的旨意，提出很多比盖乌斯·格拉古更为讨好民众、意在“搅局”的法案，最终成功地使盖乌斯·格拉古在政治上垮台。德鲁苏斯家与元老院过从甚密，属于家境富裕的权贵阶层，但这个儿子走了一条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护民官马尔库斯再度提出了以前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但未获通过的给予罗马联盟各同盟城市国家公民罗马公民权的法案。盖乌斯·格拉古的法案是先对拥有拉丁公民权（即无投票权的公民权）的人，给予罗马公民权（有投票权的完全公民权），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公民以外的其他人，给予拉丁公民权，也就是说这是个分步实施的方案。而马

尔库斯的方案则是一步到位，给所有意大利人民罗马公民权。

新护民官尽管年轻但教养深厚，是个与元老院中最出色的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人物。他虽不是元老院议员，但以将来就任元老院即国家的领导者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个时候也只有他能够看透罗马平静下潜伏的危机。

实际上，各同盟城市国家人民的罗马公民权问题，自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盖乌斯·格拉古以来，已经日益成为罗马国政改革的关键。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农地改革也好，经济结构变化应对政策也好，军制改革也好，都不能彻底解决罗马的问题。

罗马人把加盟罗马联盟各同盟城市国家的人民，统称为“意大利人”，这些人与罗马公民的关系，已经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完全不同。

首先，布匿战争结束后以保卫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为目的的防卫战几乎没有了，马略指挥的反击日耳曼人入侵的战争是这么多年来罕有的战例。以共同防卫为目的的罗马联盟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但由于罗马联盟还存续，这对同盟各国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参战义务仍旧存在。

其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争，同盟国家出于同盟者的义务而参加，但战争的结果只是罗马霸权的扩大，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而且，随着罗马霸权扩大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原来罗马公民需要认购的“战时国债”完全废止。继而实施的是由马略主导的军制改革带来的志愿兵制，罗马公民连服兵役的义务都没有了，被称为“血税”的直接税也不用缴了。而各同盟城市国家的公民却照旧要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要持续地缴纳“血税”。

还有，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中，罗马公民的志愿兵和同盟国公民的义务兵完全变成同等待遇了。两种性质的士兵同在一个中队战斗，同在一

个小队侦察。而在布匿战争时期，只有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才是主力部队，“主力”就意味着牺牲的概率更大。

这样的话，在罗马联盟百年后的今天，如果站在同盟国家士兵的角度看，牺牲的义务对大家是均等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均等的，对自己来说兵役是义务，而对于罗马公民就是职业。根据不干涉同盟国内政的原则，罗马实行的义务兵制只限于罗马公民。就算同盟各国学习罗马也实行了志愿兵制，但与罗马霸权扩大相随的市场扩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罗马公民得到的更多。

以上这些只是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实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俘虏有5万人之多，他们都会被当做奴隶卖掉，我们假设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秀、聪明伶俐的少年应该是成立的。

这个少年是幸运的，他被某位元老院议员买去做家奴。在这个人家里，该少年除了干活之外，他可以和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在古罗马以及更早一些的古希腊，人们愿意对外国的小孩子给予一定程度的教育。

这个少年很快成长为年轻人，此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主人让这个年轻的奴隶承担与希腊人通商的工作。由于法律不允许元老院议员经商，现实状况是很多议员以家中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经商。

由于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主人有了不便公开的经商收入，于是这个迦太基出生的奴隶对其主人来说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主人给他自由身，他就应该效忠、报答主人。鉴于法律不允许无偿解放奴隶，于是主人就会给这些奴隶一些报酬。这位迦太基奴隶就可以将自己的工资储

蓄起来，当凑够一定数额时用来支付购买自由的费用。不管怎么说，他都会成为“解放奴隶”，获得自由身。他的姓名也成为“罗马式”的，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他在迦太基时的家族名（姓氏）。姓氏能够体现出身，这是他们与传统罗马人的区别。在当时的罗马，使用希腊、东方、西班牙姓氏的居民相当多。

只要成为“解放奴隶”，就离罗马公民不远了。根据格拉古兄弟的父亲当政时通过的一项法律，只要是拥有3万阿斯财产、5岁以上儿子的解放奴隶，均被允许获得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比迦太基灭亡还要早20年。

这样算来，这个当初10岁的小男孩，此时已经65岁了，他已经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和他相比，当初跟着罗马军参加迦太基城攻坚战的同盟国家士兵们的儿子，却还是同盟国家公民身份，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个假设的例子足以说明，同盟国家公民长期忍受着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不利处境。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不公平的”，意大利人当然会这么想。盖乌斯·格拉古当初提议逐步开放罗马公民权时，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其后30年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拥有罗马公民权成为更为有利的事情，他们对这件事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然而，罗马联盟的盟主说到底还是罗马，意大利人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待遇问题，只要涉及罗马公民权，罗马不同意是做不到的。但每当这个问题在罗马成为提案时，就会导致提案者护民官被杀而引发社会动荡。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一涉及开放罗马公民权，就会遭到来自罗马的无产阶级等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

但是在意大利人心中，由公民权问题引发的不满就像烧到99摄氏度的热水，再有1摄氏度就沸腾，已经有人要动员1万名意大利人到罗马进行游行示威，后由于自己的动摇而停留在口头上。护民官德鲁苏斯与各

同盟城市国家权势者有经常性接触，他对这些情况很了解。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决定提出给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法案。

然而，法案一出，讨论此项法案的公民大会即陷入混乱，护民官德鲁苏斯关于法案说明的演讲屡次被怒吼声打断。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菲利普斯针对德鲁苏斯的法案提出了反对的动议。在进入表决之前，护民官可以行使否决权，以使法案不必诉诸表决。德鲁苏斯是个知识分子，不是那种胆大蛮干之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选择了行使否决权。行使否决权后，他离开会场回家，在护送他的支持者中混进了一个反对派的人，当时谁也没注意到。

正向自己的住宅行走的德鲁苏斯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在他的身边，扔着一把鞋匠用的短刀。德鲁苏斯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候罗马能够多一些像我这样的人……"

按说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应该欢迎社会变革，然而不幸的是，身处贫穷阶层而顽固守旧的所谓"贫穷白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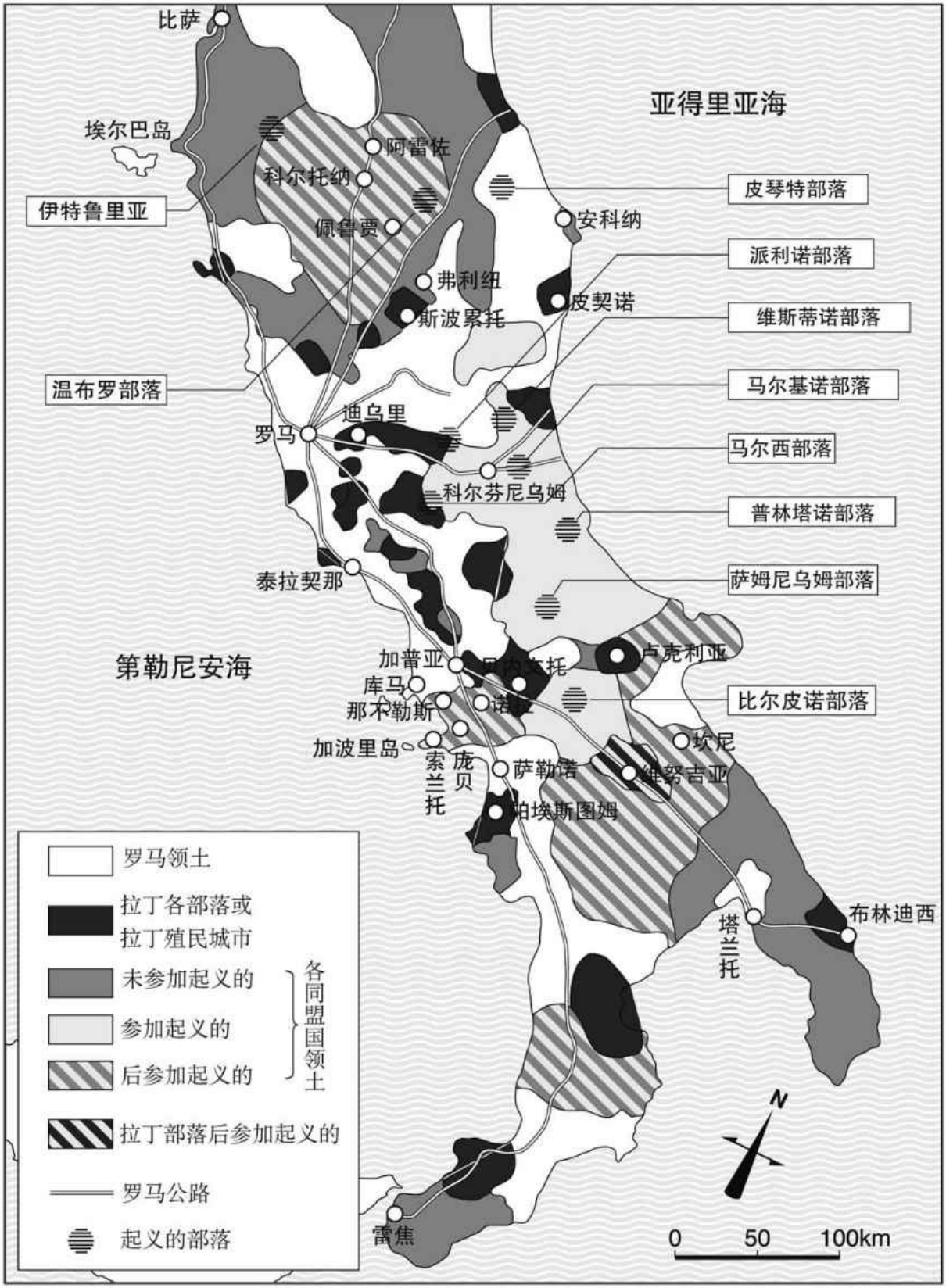
德鲁苏斯的死，恰如最后一把火，给意大利人已经烧到99摄氏度的不满情绪加了最后1摄氏度，不满情绪沸腾了。本来寄希望能以平稳的方式解决罗马公民权问题的"同盟者"们绝望了，各部落开始秘密串联。在罗马这边，由于消灭了德鲁苏斯，公民权问题尚在萌芽状态即被扼杀，罗马人感到安心了。就连统治者元老院也懈怠了，他们对意大利人的动向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没有等到公元前90年，以"同盟战争"而在史上留名的战争爆发了。恰如平原各处同时点燃火舌，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各部落统一行动，同时起义。起义者均为加盟罗马联盟的城市国家，他们在当了罗马250年的同盟者之后，举起了反抗盟主的大旗。

从北向南，意大利半岛临亚得里亚海那一侧居住着皮琴特部落、维

斯蒂诺部落、马尔基诺部落，由此往内陆去，居住着派力诺部落、马尔西部落，再往南的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居住着普林塔诺部落，此外还有山区的萨姆尼乌姆部落、意大利南部的比尔皮诺部落，最早起义的是这8个部落。

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联盟全境中，靠近最北部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还未决定站在哪一边，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和卡拉布里亚地区则是在战争进入第二年后才卷入战争的。


比萨
亚得里亚海
埃尔巴岛
阿雷佐
科尔托纳
伊特鲁里亚
佩鲁贾
皮琴特部落
安科纳
派利诺部落
弗利纽
皮契诺
斯波累托
维斯蒂诺部落
温布罗部落
马尔基诺部落
迪乌里
罗马
马尔西部落
科尔芬尼乌姆
普林塔诺部落
泰拉契那
萨姆尼乌姆部落
卢克利亚
第勒尼安海
加普亚
庞贝
库马
比尔皮诺部落
那不勒斯
诺拉
加波里岛
坎尼
索兰托
萨勒诺
维努吉亚
帕埃斯图姆
布林迪西
塔兰托
雷焦
罗马领土
拉丁各部落或拉丁殖民城市
未参加起义的
参加起义的
后参加起义的
各同盟国领土
拉丁部落后参加起义的
罗马公路
起义的部落
N
0
50
100km

“同盟战争”时的意大利东南部

在罗马作为战略要地修建的殖民城市中，如迁入殖民城市的是罗马公民，当然站在罗马一方。而迁入者是“拉丁公民权”拥有者的殖民城市，即通称为“拉丁殖民城市”中，除唯一的例外维努吉亚，其余的殖民城市都站在罗马一边。这些“拉丁殖民城市”居民和其他拉丁部落一样，已经拥有“无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权”，他们没有理由成为那些因得不到罗马公民权才起义的部落的同盟者。

除上述这些部落外，留在罗马阵营的同盟者，还有在罗马领土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裔居民。这里的人虽不具有罗马公民权，但是，坎帕尼亚地区有富饶的耕地，而且希腊人长于工商业，加之那不勒斯、庞贝、帕埃斯图姆这些富裕的城市也都聚集在那一带。在这里生活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罗马不相上下，而且，城市国家的自治也能够得到保证。他们没有必要非要得到罗马公民权。

简言之，公元前91年末爆发的“同盟战争”，参加起义的基本上都是罗马联盟中较为贫穷地区的居民。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已是晴天霹雳。

在130年之前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联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致汉尼拔曾发出悲壮的誓愿——“让罗马联盟解体。”这一誓愿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130年之后，他的这个誓愿终于实现了。130年前，罗马在特雷比亚之战、特拉西梅诺之战、坎尼之战等与汉尼拔的战争中屡遭败绩的情况下也没有抛弃罗马联盟的那些同盟者，而130年之后那些同盟者们却抛弃了罗马。此举对罗马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打击意义，就是在军事上，罗马在“同盟战争”中只能算是打了个勉勉强强的平手。

东北、东方、东南三个方面同时开始起义行动，北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也没有理由一定站在罗马一边。不仅如此，还有他们

开始集结兵力的情报传来。在西南和南面，起义军控制了第勒尼安海。尽管距离尚远，但起义军不论从哪个方面起兵，利用罗马铺设的公路，十几天即可到达罗马城下。

联合举起反罗马旗帜的8个部落，决定组建为新的国家，国名就叫“意大利”，首都设在亚平宁山麓的科尔芬尼乌姆。国家政体也已经确立，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由500名有资历者组成元老院，每年选举2名执政官、12名法务官，承担军事、政治要务。法定语言是拉丁语，一般通用语言是萨姆尼乌姆语和其他方言。为纪念意大利建国，他们还铸造了纪念币，纪念币上的图案是8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罗马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结合多年的夫妻，而“同盟战争”就像是妻子一方要断绝关系。从双方感情破裂这一点看，很像老夫妻闹离婚；而从同盟各国要求罗马认可他们的公民权、否则就要行使武力这一点来看，又不像老夫妻闹离婚。

成为“意大利国”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与罗马的距离只有120公里，而且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就修建了连接两地的瓦勒利亚大道。

“同盟战争”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罗马遭到不断打击的事件，从此前罗马军队中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数量来推测，此次估计有一半的士兵退出了罗马联盟军而变成了起义军。对罗马的打击不仅限于退出的士兵，在罗马执政官手下担任将官幕僚的士官中很多来自同盟国家，其中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拥有了罗马公民权，这次他们选择站在家乡一边，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共同反对罗马。就在昨天还是共同战斗、同睡一个营帐、同吃一锅饭菜的战友，现在却分成了敌方和我方进行厮杀。

意大利人从将官到士兵，对罗马人的战略战术都是熟知的。他们的起义表明，同盟各国与罗马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罗马陷入了要与过去的同盟者交战的窘境。

罗马人被“同盟战争”惊醒了，他们马上就准确地理解了事件的严重性。可以预料到，四处同时燃起的烽火，无一不指向首都罗马。由于罗马与起义各处都有公路连接，向罗马进攻是很容易的。好在作为战略要地在公路边建设了一些殖民城市，在防止敌人沿公路攻向首都、包围罗马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殖民城市，除阿皮亚大道边的维努吉亚之外，全部都站在罗马一边。起义军要想进攻罗马，必然要先攻打殖民城市。

8个部族的8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象征意大利的女神像

象征罗马的狼，被象征意大利的公牛压倒在地

公元前90年，罗马方面急急忙忙作了迎敌准备。

在坎帕尼亚地区画一条线，分为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当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负责北部战区，另一名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为南部战区总指挥。这位路奇乌斯执政官有个10岁的侄子，就是被历史学家蒙森称赞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在这两位执政官下面，南北战区各配备了5名军团长，军团长指挥的军团安排在预计会与起义军发生激战的地区。习惯上，罗马不采取总司令坐镇后方指挥的作战方式。两位执政官也亲率军团，承担

机动任务，以在必要时迅速赶往有需要的地方投入战斗。把执政官直接指挥的军团称为“游击军团”可能更为贴切。被迫与曾是自己军队中的一半士兵和很多将官为敌，迫使罗马人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作为进行反思。

看一看军团长人选的配备，即可知道为了和自己以前的盟友作战，罗马人已经打出了自己所能打出的最好的牌。

执政官鲁普斯为总指挥的北部战区，战胜日耳曼人的常胜将军、即将年满67岁的马略再披战袍；日后曾主宰罗马政坛的庞培的父亲格涅乌斯·庞培乌斯·斯特拉本站到了最前线。执政官恺撒为总指挥的南部战区，48岁年富力强、风头正劲的苏拉勇为先锋；年仅24岁，日后与庞培、恺撒结为“前三头联盟”的克拉苏也被任命为军团长。

使罗马人目瞪口呆的是，意大利方面排出的阵营与罗马方面完全一样。他们北部战区总指挥是马尔西族出身的昆迪乌斯·侯裴迪乌斯·西罗，南部战区总指挥是萨姆尼乌姆族出身的盖乌斯·帕匹鲁斯·姆迪鲁斯。和罗马方面一样，在他们二人之下，各配备大约5名军团长。使罗马人惊愕的是，这些军团长的个人名字，都是罗马人常用的名字。如此亲密的关系而成为战场上的对手，使人情何以堪！“同盟战争”完全是罗马政治上的失策造成的。

各处展开的战斗相继投入的总兵力，双方都达到了5万人。由于对抗起义军的兵力不足，罗马只能邀请高卢和努米底亚派兵支援。

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战况，前半年是意大利方面占优势，后半年则是罗马方面占优势。按古代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场“连对手身上有多少汗毛孔都熟知”的战争。各地战场激战不断，罗马方面的北部战区总指挥、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战死，南部战区也战死了两名军团长。意大利方面的牺牲也是巨大的。罗马军阵亡将士的遗体连运回罗马举行安葬仪式的余地都没有，只好就地埋葬。

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属苏拉。他采用的果敢速攻战术很奏效，意大利方面居然没有一个能对抗这种战术的指挥官。马略的指挥风格则和以前大不相同，变得保守了，但只要马略一现身，意大利方面的将士联想到过去跟随马略与日耳曼人战斗的情景，就会退缩不前。因此，马略指挥的军团虽未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没吃败仗。

很快进入公元前90年冬天，两军暂且进入休战季节。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因另一位执政官鲁普斯战死，自己必须赶回罗马承担主持公民大会的义务。他这次回去可不仅仅是主持会议，他还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在这项被称为《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法案中，他提议，接受“同盟战争”之前各同盟国提出的要求，给所有同盟国家公民以罗马公民权。

但这项法案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各同盟国结束对罗马的战争。执政官恺撒提案的《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在公民大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历次关于开放罗马公民权的法案都会掀起风波，只有这次很平静，既没有怒吼，更没有暗杀。

以前罗马人在政治上出现失误时，往往采取军事上压服的做法，其结果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这次他们终于选择了用政治上的调整来修复政治上失误的正确做法。当然也可看出，这次开战，“理”本就在意大利人一边。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效果马上即显现出来，一直未决定站在哪一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现在明确站在了罗马一边。在北部战区，原已定为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被罗马军占领后，“意大利国”处于连首都都不知在哪里的尴尬处境。《尤里乌斯公民权法》正式成为法律后，意大利人失去了战争的口实，士气衰落也是必然的。在北部战区被打败的马尔西部落的族长西罗加入了南部地区主力萨姆尼乌姆部落继续顽强战斗，致使南部战区的战争在公元前89年还在继续进行。战争的

名分虽然没有了，但战争中形成的相互仇视与憎恶仍然存在，如果点燃战火的指挥官存有这种仇视与憎恶，战争就会继续。尽管如此，除山区还有部分起义军继续抵抗外，“同盟战争”实质上在公元前89年已经结束。南部战区的英雄苏拉也在这一年末回到了罗马。原以为“同盟战争”会使罗马深陷泥潭的那些东方国家君主们，看到战争超出预期地快速结束，还感到有些失落。

为纪念“同盟战争”制造的银币。银币图案为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握手言欢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是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刚刚破裂时出台的，这个法对结束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我认为该法的重要意义可与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相匹敌，《李锡尼法》实现了贵族与平民在担任国家公职方面的差别，结束了两个阶级的长期抗争，《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则对罗马的国家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持续了200年以上、堪称“钢铁联盟”、从汉尼拔开始很多国家都认可的罗马联盟终于解体了。不管是住在那不勒斯的希腊裔居民、住在托斯卡纳的埃托鲁尼亚人，还是住在可称为意大利半岛脊骨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民，全部都成为了罗马公民。意大利人不存在了。意大利人的再次崛起，要再过1950年之后，作为现代国家的意大利在地球上诞生。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公元前90年罗马联盟的解体，不是以130年前汉尼拔希望的方式被动解体，而是采取了一种可称为“为发展而消亡”的方式主动解体。正是由于支撑城市国家罗马的罗马联盟的解体，使罗马得以超越了“城市国家”这种国家形态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以雅典为代表的所谓“城市国家”，其核心特征是国家以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为中心而运转。由此，市民自治是不言自明之理。不管是民主政体下的雅典，还是王政时代、共和时代的罗马，都把对外宣战、停战这类象征国家主权的最高决策权赋予公民大会，政体尽管不同，但雅典、罗马都属于城市国家。

然而，这种“主权在民”的政体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越尊重公民的权利，就越有可能导致对外的封闭性。这样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国家主人的市民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具有的权利必须平等，而为了维护这种平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排斥“外人”，防止“外人”来分享公民们已有的各种权利。

在实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不是雅典人，孩子就得不到雅典公民权。就连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长期居住在雅典，在雅典

创办了名为“吕凯昂”的学园，致力于提升雅典文化的伟大人物都未能得到雅典公民权。在日本也有反对外国人流入日本的“锁国论者”，同样不能把他们一概斥之为顽固、守旧，因为他们也是信奉国家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狭隘的“主权在民主义”者。

假如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全体成员都把绝对平等作为“金科玉律”，他们就不可能不排斥“外人”。尽管在罗马这个共同体内部，也会存在各种人与人的区别，如名门望族、平民贵族、骑士阶级，普通平民、无产者，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隶”、奴隶，“掌门人”、“后援者”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区别，但想在接纳“外人”问题上形成什么决议，就会遭到各阶层的一致抵抗。这说明，共同体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别”和共同体内部人与“外人”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如果过分关注内部人与“外人”的“差别”，就会忽略共同体内部各阶层间的“区别”，甚至放弃为防止“区别”演变为对立而应该作出的努力。罗马发生的社会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各阶层之间难以流动与融合而导致的阶级对立。

雅典人心目中的“同胞”，是具有共同的血统、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的人。

罗马人心目中的“同胞”，只有一个标准——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至于是原来的奴隶也好，迦太基出生的也罢，完全没有关系。拉丁语说得好不好也没有关系。从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瞬间起，这个人就是“同胞”了。

罗马人对给予“外人”罗马公民权本来是很大方的。本书第一部所叙述的那个时代的罗马公民权，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那时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人民，对取得罗马公民权没有太强的欲望。其实任何国家在处于发展时期时，在接受“外人”方面都是很宽容的，可一旦成为霸权国之后，对“外人”还能持宽容态度的就很少了。

罗马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成为霸权国之后，罗马公民权的吸引力

大为增强，罗马人在给予“外人”罗马公民权问题上就变得非常不宽容，从盖乌斯·格拉古首次提出开放罗马公民权的法案到《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为法律，经历了30多年的蹉跎岁月。

尽管如此，罗马人在经历曲折反复后，总算是迈出了这具有第二个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对于参加“同盟战争”的各部落酋长，在他们降服于罗马后并未受到任何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罗马人并未简单地把这次起义视为反叛。

原加盟罗马联盟的各城市国家及部落的根据地，自此以后成为罗马国家内部的地方自治体，但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性并未因此而消亡。后世有个研究者曾写下过这样的话：

> 罗马留给人类的一个启示是，在保持各地方独立性的同时，可以实现整体的统一，这是可以确立的普遍规律。

随着《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生效，罗马联盟得以实现了“为发展而消亡”。借用本书卷首语引用的汉尼拔的比喻，为了适应骨骼和肉体的生长，内脏器官也要随之生长，“同盟战争”促进了罗马内脏器官的生长，成为罗马从“城市国家”向“世界国家”蜕变的催化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士们的血没有白流。

罗马对意大利半岛之外其霸权所至的地区采取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一种是明确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直接管辖的行省，另一种则是保留其独立国家地位的同盟国。同盟国又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紧密的同盟关系，就像努米底亚王国那样，与罗马保持着类似“掌门人”与“后援者”关系的同盟国。还有一些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国家，如雅典、斯巴达、马赛，虽不是“王国”，但也属于这种同盟关系，实质上是罗马的附属国。这些王国和城市国家不是罗马的行省，因

此无须向罗马缴纳作为行省应该缴纳的税收，其义务是在罗马有战事时，根据其所长（如努米底亚的骑兵，马赛的战船等）派出军队参战。

第二类是和罗马保持普通同盟关系的国家，其中既有被罗马打败后结成同盟的国家，如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也有未和罗马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在罗马刚刚进入“迷失期”即公元前133年这个时点上，这类同盟国有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本都、卡帕多西亚，以及其东邻的亚美尼亚，还有继承亚历山大大帝一部分遗产的埃及王国。这些同盟国都是位居东方、且采取君主政体的国家。也许是受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王室继承的是希腊的血统，统治国家的方式却都是亚洲式的专制主义。

本都即是这种类型的国家之一。当时的国王是米特拉达梯六世，即位于公元前115年。他本应于7年前其父王去世时继承王位，但被其母将王位夺去。米特拉达梯只能在小亚细亚四处流浪，最终于17岁时成功夺回王位。米特拉达梯是个冷酷无情的男人，但又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君主。现存的一枚纪念币上，雕刻着米特拉达梯的侧面头像，那头像似乎在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一头纷乱的鬈发随风飘逸。由此可以看出，米特拉达梯是个潇洒的美男子。这个美男子看到罗马进入了“迷失期”，无暇东顾，决意利用这个间隙创建自己的帝国。

为掩人耳目，本都王国十分慎重地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本都王国的首都是锡诺普，起源于希腊人建在黑海沿岸的殖民城市。受此影响，这个国家财富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贸易，更大的来源则是矿山收入。在专制国家，一切财富都属于王室，米特拉达梯储存了巨额的金银财宝，这些财富不仅储存在首都，他还在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内陆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既可当做军事要塞，又可储藏财富，还能分散风险。在东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佣兵制，只要有钱，随时、随地可以招募士兵，组建军队。在作这些准备的同时，米特拉达梯在耐心等待时机。

刻有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侧面像的纪念币

公元前92年，米特拉达梯40岁的时候，机会来临。

那一年，本都王国的邻国比提尼亚王国的国王去世，王位继承者们开始了争斗，米特拉达梯暗地插手其内部纷争，把自己一派的继承者推上了王位。紧接着，他又在另一个邻国卡帕多西亚王国安排自己的一个儿子登上了王位。被驱逐的两个国家的王室成员跑到罗马去控告米特拉达梯。

强国也有为难的事。由于本都、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都不是罗马的行省而属于各自独立的国家，尽管不能置之不理，但也只能视情况相机处理。于是罗马派遣了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视察团进行仲裁。视察团所作的仲裁暂时是见效了，米特拉达梯收回了自己的做法，把两国的王位还给了两国各自正统的继承人。

然而，此后不足一年，罗马与其意大利半岛上的那些同盟城市国家之间爆发了“同盟战争”。米特拉达梯判断这场战争将使罗马深陷泥潭，再向国外派遣兵力已是没有余地。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多年来创建自己帝国的愿望。

米特拉达梯悍然率军西征。号称30万人的本都铁骑蹂躏了比提尼亚，又侵入了西邻的原帕加马领土，而原帕加马领土早已变成了罗马的行省，米特拉达梯是在与罗马公然叫板。罗马急于结束“同盟战争”，与米特拉达梯的军事入侵也有一定关系。

“同盟战争”未能如米特拉达梯之愿，两年时间就结束了。“同盟战争”结束后，罗马该集中精力对付米特拉达梯了。但是，和15年前日耳曼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大举入侵那次相比，尽管敌人同为30万人，两次危机给罗马人的感觉却并不相同。如果说上次是举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话，这次给人的感觉是罗马人的步调并不一致。

“同盟战争”结束于公元前89年冬季。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的军事指挥能力在“同盟战争”中大放异彩，回到罗马后，他即被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并且如愿获得了东部战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年届50岁的苏拉在开始自己的执政官生涯的同时，着手组建剿灭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他在位于坎帕尼亚的一个城市诺拉开始了志愿兵的招募。

然而，迎来67岁的老将盖乌斯·马略也有出征东方的雄心，他希望是由自己亲率大军征讨米特拉达梯，而且尤其不愿意让苏拉抢到这份功劳。不幸的是，两位声名远播的勇武将军之间的矛盾，因被当年的护民

官利用而变得复杂化了。

公元前88年的护民官是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卢弗斯，他为了使自己拟推行的政策成为法律，需要在政治上得到马略及其庞大的“后援者”队伍的支持，为此他在自己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平民大会上支持马略，二人形成了政治联盟。

罗马共和时期，全国共有35个选区，其中首都罗马有4个。选举制度规定，按公民拥有的资产数额划分选举人拥有的票数，并且以“百人队”为单位进行投票，每个选区票数汇总后形成该选区的选举结果，即每个选区算一票，35个选区选举结果汇总后形成最终选举结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很像现代美国总统选举的计票制度。在这个选举制度下，如何安排各选区的选民成为当时“元老院派”和“平民派”争斗的焦点。

如果把《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称为“老公民”，《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后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公民称为“新公民”，“老公民”与“新公民”的比率约为一比二。假如把“新公民”按居住地划分到就近的选区的话，除了首都罗马的4个选区“老公民”占据压倒性多数外，在其他各个选区“老公民”都成了少数派。也就是说，只要沿袭原来的选举制度，“新公民”将决定罗马的国政大事。

意识到这一点的“老公民”们决意在选区的选民安排上作一些限定，以捍卫他们自诩的“纯种罗马人”的权利。他们举出一个先例来大做文章，即以前罗马的“解放奴隶”在取得罗马公民权后，只能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4个选区投票。既然有这个先例，那么对“新公民”也可以作出类似安排。他们提议，在现有35个选区中指定8个选区，“新公民”只能在这8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或者新设9个选区，“新公民”只能在这9个新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老公民”们希望，把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法律予以通过。“老公民”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尽量压低“新公民”能够反映自己的诉求、进而决定国政大事的比重。

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抢占先机，率先提出了名为《苏尔皮基乌斯法》的法案，提议“新公民”们居住的每个居住区，可选择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选区投票。他认为，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既然都是罗马公民，不应再区分为“老”与“新”。他这样考虑绝对是正确的，但由于因公民权问题而刚刚发生过“同盟战争”，他的想法分步实施可能更为妥当。

尽管时机不妥，《苏尔皮基乌斯法》还是获得了通过，而且在平民大会上还通过了任命马略为东征军总司令的决议。

但是这两项法律没能顺利生效，因为法案通过地是在首都罗马，这里占压到多数的是“老公民”，“老公民”们不愿意，于是拥护和反对《苏尔皮基乌斯法》和“任命马略为东征军总司令”决议的两派民众发生了冲突，并发展为流血事件。出席会议的两位执政官也被卷进了冲突。苏拉躲到马略家才得以逃过一难。让苏拉觉得不能忍受的是，选举制度的改革竟会剥夺他已经执掌的兵权。

苏拉逃离罗马回到诺拉正在组建的军队中，他马上召集将士们集合，告诉他们：“你们的总司令的名誉受到了侮辱，现在我要杀回罗马，用武力来挽回自己名誉上的损失。”将士们大部分都是这两年跟着苏拉在“同盟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热血男儿，也就是被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所诟病的“私家军”，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为挽回“老板”的名誉不惜牺牲一切。军中有一位幕僚认为，正规军杀回首都是一件不妥的事情，他拒绝参加这次行动并离开了军队。除这一个人之外，3.5万名将士都表示听从苏拉的调遣。不仅如此，就连与苏拉同为当年执政官的卢弗斯也逃离罗马，投入到苏拉军中。

诺拉位于维苏威火山的北边，从那里到罗马，首先要穿过加普亚，从那里取道拉蒂纳大道，只需几天行程。但是身在罗马的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一派却毫不在意，他们一是觉得行军距离并不短，二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罗马的执政官会真的统率军队攻打自己国家的首都。

苏拉率军来到没有任何防御准备的首都，只需几个小时小规模的战斗，苏拉军即控制了首都的局面。马略逃往伊特鲁里亚，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被抓获后处死。苏拉还下令，把苏尔皮基乌斯的头颅放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就在首都居民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之间，苏拉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政变。公元前88年的发生的这次事件，成为罗马人用武力夺取罗马的第一个先例。

把罗马控制于自己手中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在罗马广场召集公民开会，向公民们陈述自己不得不动用武力的事情原委。

说实话，苏拉的“陈述”一点也不恳切，他的言行往往还带有“瘆人”的效果，特别是此时，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的人头就在旁边，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苏拉提出了他的法案，提议凡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通过的法案，未经元老院认可不得实施。这个法案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获得通过。本来在公元前287年生效的《霍滕修斯法》中明确规定，即使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议决事项也可以成为国家的政策。《霍滕修斯法》已实行200年之久，现在被苏拉颠覆了。为追求“新公民”和“老公民”平等的《苏尔皮基乌斯法》也因此而成为“废案”。苏拉还胁迫公民大会通过了把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等所谓“平民派”领袖定为“国贼”的法案，凡协助他们者与之同罪。由于这项法律，暂且逃到伊特鲁里亚的马略又被追杀，马略被迫又逃到了非洲。马略的逃亡生涯充满了凄惨与屈辱。

苏拉倒也没有更过分的举动。被选为第二年即公元前87年度执政官的是屋大维和秦纳二人。以法学家知名的屋大维对乱立法规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的现实感到不满，但对苏拉不构成什么威胁。而秦纳40来岁，血气方刚，使苏拉感到有一定危险。恰在此时，传来东方不稳的军情。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判断，即使罗马已经解决了“同盟战争”问题，但仍然没有余力向东方用兵。他在占领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的原帕加马领土现为罗马的行省后，把很多住在当地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

（“同盟战争”结束后已经全部为罗马人）及其家属与奴隶以“血祭”为名全部杀死。如果相信古人的说法，这次被杀的人数达8万之众。

米特拉达梯还打出了“把希腊民族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旗帜，自我标榜为希腊人民的“解放者”。米特拉达梯很聪明，他首先想办法让雅典倒向己方。当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虽不是很强大，但在精神、文化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即便已沦为三等国家，雅典仍是希腊的象征。当时有位哲学家与米特拉达梯会谈后，醉心于米特拉达梯的主张，经这位哲学家一煽动，雅典公民们决定举起反罗马的旗帜。有雅典带头，希腊全境逐渐充满反罗马的气势。

在做出罗马史上第一次强行“进军罗马”的行动后，苏拉来不及完成对罗马政局的全面安排，就不得不率军出征了。他很清楚解决各类政治问题的先后顺序，他是个一旦作出决定就不会左右摇摆的男人。在出征之前，苏拉把即将开始任职的执政官秦纳约到卡匹托尔山，在最高神朱庇特的神庙中，让秦纳宣誓遵守由苏拉提案、公民大会通过并已生效的各项法律。

自己强行发动军事政变，却要求别人宣誓遵守法律，这的确不太公平。在苏拉看来，这也是为了恢复秩序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尽管苏拉会做出违背常理的举动，但他骨子里是个沉着冷静的男人，从本质上说他还是属于较为保守的一类人。

让米特拉达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的年末，苏拉已经率领5个军团加上骑兵共3.5万名罗马军，从布林迪西渡海到了希腊。

苏拉刚去希腊，秦纳即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本来秦纳未被人们视为属于马略和被杀的苏尔皮基乌斯一派，不知为什么他在苏拉走后忽然改变了政治立场，也许他一直是马略、苏尔皮基乌斯隐蔽的支持者。公元前87年，执政官秦纳召集公民大会，通过了为被苏拉定为“国贼”的马略及其一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法案。继而又使《苏尔皮基乌斯法》重

新生效，“新公民”可以在全国35个选区中选择任何一个选区投票。

对秦纳的这些做法，另一位执政官屋大维行使了否决权。罗马还发生了武力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败下阵来的秦纳从罗马逃走。得知罗马形势变化的马略，率领6000士兵回到罗马。

这回用武力把罗马收到囊中的是马略和秦纳一方，但这次武装政变把很多无辜的人牵扯进来。马略难以忘怀逃避追捕时饱尝的凄惨与屈辱，并将之转化为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这位70岁的老将军开始了他那疯狂的复仇之战。

现任执政官屋大维拒绝好心人让他赶快逃亡的劝告，死在了元老院的执政官座位上。秦纳逃离罗马后刚被选为执政官的梅鲁拉，被捕之后竟被切断血管，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公元前102年马略的执政官同事，第二年与他共同成功击退日耳曼人，二人均乘坐4匹马拉的战车凯旋的卡图鲁斯，被捕后被投入密封的牢房中因缺氧致死。公元前91年度的执政官、“同盟战争”第二年的总司令、《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创建人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尽管与马略的妻子还有亲戚关系，也未能幸免于难。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弟弟、“同盟战争”时与马略同为军团长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也被杀害。

若干年后罗马“三头政治”中的“两头”——庞培与克拉苏的父亲也分别在这一年被杀害。刚刚19岁的庞培因不引人注目而得以脱险。27岁的克拉苏则逃至西班牙避难。苏拉的妻子逃到希腊。用来示众的被杀要人的头颅竟然多到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已经放不下的程度。

据说死于马略的残杀中的，有元老院议员50人，属于“骑士阶级”的人士1000人。马略的杀戮持续了5天5夜，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以恢复自由为诱饵，使用了一队奴隶来帮他完成这项“工作”。这队奴隶在完成杀人“工作”后，竟也被为满足怨恨发泄欲望的马略杀死。

看看死难者的名单即可知道，这些人并不全是苏拉的同党。按马略的逻辑，这些人的罪过在于，当苏拉提出将马略定为“国贼”的法案时，他们没有反对，等于是帮助苏拉通过了该项议案。马略疯狂复仇的结果是元老院中的很多优秀人才惨遭杀戮。而在马略疯狂杀人的时候，秦纳既没有帮助马略杀人，也没有出面阻止。

随着马略的仇恨发泄告一段落，罗马也大体平静下来。公民大会选举马略和秦纳为第二年即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这是马略第7次担任执政官职务。当他的这次任期开始后的第13天，也就是公元前86年1月13日，这个卓越的武将与世长辞，终年70岁。

马略死后空出的执政官位置，由秦纳派的弗拉库斯补上，秦纳的独裁统治从这一年开始。

秦纳首先修改了《苏尔皮基乌斯法》，将“新公民”可在全国35个选区的任何一个选区投票改为在居住区域的选区投票。修改后的法案在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由此，过去罗马联盟加盟国的居民，即被称为“意大利人”的“新公民”，已经与“老公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也终于因此而修成正果。“新公民”们自然感激秦纳的恩惠，他们“报恩”的方法，就是支持执政官可以连选连任的体制不变，并持续投秦纳的赞成票，让秦纳可以连续担任执政官，维护秦纳事实上的独裁统治。

取代已死的马略成为“平民派”利益代表者的秦纳，没有忘记救济那些难以偿还债务的下层人民。他促成了一项法律，要求债主必须放弃原有贷款本金的四分之三。这些债主虽然可以照常收取利息，但本金只能收回四分之一。

这种做法显然是过于无视经济理论的表现。债务人因被豁免了四分之三的债务而欢天喜地，而放出贷款的金融业者所从属的“骑士阶级”则开始与秦纳离心离德。

秦纳还利用可以掌握“新公民”和下层公民选票的有利条件，顺利通过了解除苏拉担任的东征军总司令职务的决议。他不仅解除了苏拉的军职，还决定没收苏拉及其同一派系所有人员的财产，并将这些人驱除出境。

由于苏拉受到了解除职务、驱逐出境的处分，他所统率的军队也失去了罗马正规军的名分。按说此举无异于放纵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控制希腊的行为，是置罗马的安全于不顾的荒唐做法。秦纳也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但他更惧怕苏拉的军事实力。他更清楚的是，以苏拉超群的军事才能，仅仅流放是不足以消灭苏拉的。于是，秦纳派另一名执政官弗拉库斯统率罗马正规军远征米特拉达梯。弗拉库斯的正规军于该年年末从布林迪西出发，打算不经希腊直接登陆小亚细亚。苏拉因过于相信秦纳的誓言而深陷敌地，处境艰难，难免感到孤立。这种境遇换了别人恐怕很难坚持下来。但正因为他是苏拉，他的对手才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自公元前87年从意大利渡海到希腊的一年时间里，罗马发生的事情苏拉都很清楚。那时虽不像现代可以做到信息瞬间传递，但一定会被传递到理解其重要性的人手中。苏拉完全知道罗马的局势，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样，苏拉也明白，雅典的动向对控制希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登陆希腊后他首先着手的就是对雅典的攻坚战。尽管他尽知罗马发生的一切，但这并未干扰他攻城的决心。他没有撤出阵地，攻城的力度丝毫未减，就像罗马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苏拉不能指望援军，也不能指望来自后方的军需物资补给，他必须想办法自己解决这一切。

尤其是缺乏海军，成为苏拉心中之痛。雅典有一个距城市8公里的外港——比雷埃夫斯，如果不能控制比雷埃夫斯，雅典就难以攻下。而要想攻打比雷埃夫斯，使用海军更为有利。而且，米特拉达梯买通了西

里西亚的海盗，将其当做自己的海军来使用，掌握了爱琴海的制海权。如果不能夺回爱琴海的制海权，对米特拉达梯的大本营小亚细亚的远征也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登陆希腊的第一年，苏拉即把其一个幕僚卢库鲁斯派出去筹办海军事宜。卢库鲁斯访问了罗得岛和塞浦路斯两个岛国及埃及，邀请他们派遣海军助战。

陆军方面，苏拉也只能充分利用自己手头仅有的兵力。被米特拉达梯赶出来的原罗马行省总督手下的士兵投奔到苏拉门下，但那个时候罗马不在行省派驻军队，总督手下的这些士兵们战斗力极差。本指望这些士兵能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现在看来也指望不上。结果能够使用的兵力还是自己从意大利带出来的5个军团，即3万步兵加上5000名骑兵。

在战争经费的筹措方面，苏拉瞄上了希腊各地有名的神庙中的金银财宝。希腊的厄庇道鲁斯、奥林匹亚、德尔斐等地，都有闻名地中海世界、引来很多信徒朝拜的著名神庙。这些“神的居所”，自然会收到很多贡品，其中有不少是金币、银币，就连海盗也把神庙当做打劫的首选目标。苏拉想好就做，派兵去把这些金银财宝都给没收了。

然而，这些金银财宝都是贡品，贡品的所有者是“神”，希腊的“众神”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希腊众神就是希腊文化。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苏拉的行为难免招致非议。严谨的普鲁塔克就曾哀叹：“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弗拉米尼努斯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这样的罗马人已经消失了。”这三位都是罗马的将军，但又都迷恋希腊文化，他们在征伐希腊时，以绝对不破坏希腊的传统文化而闻名。

其实苏拉对希腊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只不过他的做法与众不同。在没收神庙的贡品时，他并不是二话不说就强行抢夺，而是预先给神庙的神职人员送去一封信，信中说他只是借用这些金银财宝，请神职人员

称一下重量登记入账，以后定当奉还。

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花絮”。有个承担没收工作的部下是希腊人，他进入神庙后，听到从神庙深处放圣经的地方传出一些声响，就问神职人员这是什么声音，神职人员告诉他那是阿波罗神弹奏琉特琴（古代希腊的一种乐器）的声音。这个人慑于神的威力，不敢动用属于“神”的金银财宝，空着手就回来了。他把事情经过向苏拉作了汇报，苏拉听后，压制住怒气对他说：

“你这小子完全误解了神的意志，令我十分失望。神发出声音，不代表不赞成，而是对你取走那些金银财宝表示非常高兴，这才弹奏出悦耳的琴声。你放心取回来便是！”

苏拉的确反应敏捷，也真会嘲弄人。这件事过去不久，又流传如下的“花絮”：

苏拉要求雅典无条件投降，雅典方面派来了谈判具体细节的使臣，这个使臣在苏拉面前长篇大论地演说雅典历史悠久的文化。苏拉是这样回答的：

“贵使臣的确能言善辩，我劝你还是带着你的舌头回去吧！身为罗马公民，我不是派到雅典来学习文化的学生，由于雅典竖起了反罗马的旗帜，我是奉命前来镇压造反者的罗马将军。”

话虽强硬，可对于打开城门无条件向罗马投降的雅典人民，苏拉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说：“为了少数的优秀人才，我们要赦免大多数的人民；为了故去的卓越死者，我们要体恤仍然活着的人民。”尽管是“无条件投降”，但苏拉并没有按照对付投降者的惯例行事，没有把雅典人民当做俘虏，更没有把他们作为奴隶来处理。

而且，后世的我们能够拜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是苏拉之功。当

发现了被尘土掩埋的这位哲学家的著作集后，是苏拉把它们带回罗马保存起来，才得以流传后世。可在另一件事上，他又表现得冷漠无情。为了制作攻城用的器具，苏拉下令把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凯昂”学园周围的森林全部砍倒。毁掉了这片有文化意义的森林，苏拉却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不管雅典在军事上如何软弱无力，攻陷一个城市一般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况且雅典还有比雷埃夫斯这样一个外港，攻城时必须分出一半的兵力对付比雷埃夫斯。派出去筹组海军的卢库鲁斯一直未回，请同盟国派遣海军助战这件事也没有结果。特别是埃及，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可就是不肯发兵。究其原因，还是自公元前133年以后近50年的时间里罗马持续处于“迷失”状态，连一些常年的友好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与罗马的军事同盟关系。在援军不到位的不利情况下，苏拉统率的军队还是完成了对雅典的征服，这与苏拉知己知彼、不失时机地向雅典果断施压密不可分。刚刚拿下雅典，紧急军情传来，号称12万人的本都国军队已经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希腊领土。

由于雅典已重回罗马阵营，时年52岁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不再采用防守待敌的战术，而是挥师北上，在希腊中部地区迎击经过泰萨利亚南下的本都军。面对来势凶猛的本都军，苏拉必须留下5000人镇守雅典，只能率3万人与敌交锋。面对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采取主动出击战术往往比消极防御更为有效。

苏拉还有一重不利因素，他预定的战场是希腊中部的城市国家底比斯，但底比斯出乎意料地早早归顺了米特拉达梯一方，苏拉不得不在敌方的地盘上与4倍于己的敌军战斗。

底比斯西北方向15公里湖边的盖罗涅亚，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公元前86年春，苏拉与米特拉达梯两军在这里相遇。

本都军步兵10万、骑兵1万、战车90辆，在平原上排得满满的。就

像要显示米特拉达梯的军威似的，排出的阵势是手持长枪的希腊式重装步兵和东方式装有巨镰的战车的混合体。军队总指挥是出身于卡帕多西亚的阿尔凯洛斯。与之相比，罗马军只有用短枪和短的双刃剑武装起来的2.5万名重装步兵和5000名骑兵，乍一看，让人感到罗马军胜负难卜。

但是，苏拉最擅长的就是在会战刚刚打响时亲率骑兵团冲入敌阵，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本都军的战车一边转动着巨大的镰刀一边行进，尽管看起来威力巨大，但就像扎马会战中汉尼拔的象群一样，转身不方便，灵活性差，只要对方能够灵巧地躲闪，战车就会疲于奔命而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而且还容易掉队。

本都军的重装步兵阵容严整，长枪的枪尖排成整齐的一条线，目中无人地向前行进。但这个阵容的缺陷是正面强大，两肋和后背依然薄弱，弥补这一缺陷应该是骑兵的职责，但本都的骑兵团只会依赖数量上的优势猛打猛冲。面对苏拉军以中队为战术单位的灵活战术，这些骑兵很容易落入圈套，远离己方的重装步兵，使其主力阵容出现漏洞。

马略实行军制改革后，罗马军按纵三、横十配备中队的传统阵型没有改变，这个阵型的长处是可以根据战况的进展随机应变，可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更有效率的发挥。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军与罗马军之间展开的第一次真正交锋的结果是，本都军方面战死和被俘者达到10万以上，逃掉的不足1万人。而罗马军方面战后点名时缺少了14人，太阳落山后又有2人回到军营，战死者仅有12人。这个战绩，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曾经取得的战果，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次会战后，对于归顺本都方面的城市国家底比斯，苏拉给予了没收其二分之一领土的惩罚，他将这一半没收的领土，分给了厄庇道鲁斯、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作为当初从神庙借走金银财宝的补偿。

东方国家的君主没有亲临战场的习惯，并常常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为指挥官能力欠缺。在专制君主看来，是自己把军队委托给一位总司令来指挥，这位总司令不过是一个臣子而已。盖罗涅亚大败之后，米特拉达梯认为只要换一位更能打仗的总司令，就能够战胜苏拉统率的军队。

数月之内，本都军8万人马再度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而苏拉在盖罗涅亚之战后没有返回雅典，而是率军继续北上。两军第二次对垒的结果，又是苏拉完胜。这次战斗共杀死敌军1.5万人，少于第一次战役，这是因为奉苏拉之命、手下士兵尽可能活捉敌兵的结果。由于苏拉的军费要靠自己筹措，他就把这些俘虏的敌兵当做奴隶卖掉，其收入成为军费的重要来源。在罗马指定的自由港、经济振兴基地得洛斯岛上，有个活跃的奴隶市场，据说自从苏拉在那里大量出卖奴隶后，有很多商人从希腊和亚洲远道而来购买奴隶，致使得洛斯岛的经济非常繁荣。

罗马军在希腊人的眼皮底下连续两次大胜本都军，起到了让希腊人清醒头脑的作用。当时希腊正在进行以修建横断东西的埃涅迪亚大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长于经商的希腊民族已经意识到，当初盲目相信米特拉达梯鼓吹“把希腊人从罗马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蛊惑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利之处。

尽管苏拉已经控制了希腊的局势，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仍然占据着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与希腊隔海相望、可挟制爱琴海的罗马行省。由于海军未到，苏拉无法乘胜追击，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去攻打小亚细亚。就在等待海军的日子里，苏拉得到了消息，秦纳派遣的弗拉库斯指挥的军队已经从小亚细亚的南端登陆。

苏拉在达达尼尔海峡边等待卢库鲁斯率战船归来。这期间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尽管弗拉库斯的罗马“正规军”已经登陆小亚细亚，但总司令弗拉库斯与副将芬布洛斯在战略上意见不合，加之士兵们对弗拉库斯的昏庸无能强烈不满，军中发生了骚乱，弗拉库斯被杀，军队改由芬布洛斯统领。芬布洛斯率罗马军与前来迎战的本都军发生了战斗并取得

了胜利。

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敌兵，这让苏拉很苦恼。不仅苏拉苦恼，米特拉达梯也同样苦恼。米特拉达梯在反复权衡来自两方面的两支罗马军的实力之后，决定与更强大的一方讲和。他派出盖罗涅亚之战的败将阿尔凯洛斯作为谈判代表，来到了苏拉军营。

苏拉提出如下讲和条件：

一、本都国王放弃一切侵略得来的领土，退回本都境内。

二、停战以后，本都再度成为罗马的同盟国。

三、阿尔凯洛斯指挥下的海军战船，全部移交给苏拉军。

四、本都军的俘虏、逃兵、奴隶，全部返还本都方面。

五、本都国王向罗马方面支付2000塔兰特的赔偿金。

阿尔凯洛斯与苏拉军有过战场对决的经历，深知苏拉的厉害。作为谈判代表，他对这些条件没有异议。但国王米特拉达梯并没有下定决心，他判断苏拉急于讲和，又觉得苏拉的条件过于苛刻，所以并不急于答复。在此期间，谈判代表阿尔凯洛斯病了。苏拉周到地安排阿尔凯洛斯在罗马军营中接受治疗。由于在罗马军营中的所见所感，这位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将军为苏拉的人格魅力所倾倒。苏拉也试探性地劝诱阿尔凯洛斯归顺罗马。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拉苦等多时的卢库鲁斯终于率领着他组建的海军船队回来了。埃及最终还是打破了以往总是协助罗马作战的先例，号称保持中立，没有给卢库鲁斯任何帮助。倒是罗德斯向卢库鲁斯提供了战船方面的帮助。

得知苏拉有了自己的海军的消息后，米特拉达梯决心认真对待与苏拉的讲和谈判。但他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又摸

不清苏拉的底牌。于是他准备打出自己手中最硬的一张“牌”，那就是苏拉以被正统的罗马政府驱逐流放之身，没有资格合法地代表罗马政府。米特拉达梯要求与苏拉直接谈判，两人约定于公元前85年春在划分欧亚两大陆的达达尼尔海峡东侧的海港小镇达达尼尔举行会谈。

一般来说，两国首脑会谈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地点的话，通常应该选择在中立地带举行。达达尼尔尽管位于小亚细亚最西端的位置，但毕竟还是属于小亚细亚。虽说希腊在苏拉掌控之下，渡过狭窄的海峡很容易，可当时小亚细亚还是在本都的势力范围。会谈地点定在达达尼尔之后，米特拉达梯想成功地营造一个欢迎苏拉前来求和的“舞台”气氛，加之东方的君主一般都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米特拉达梯率领了2万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一队战车出现在达达尼尔。

苏拉则显得比“演员”米特拉达梯轻松并技高一筹，他只带了24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轻装渡过海峡。一到达达尼尔，苏拉立即命令士兵们快速搭建起罗马式的营帐，坐等米特拉达梯前来。这样就把本都国王迎接前来求和的罗马将军的阵势一下子逆转过来。

米特拉达梯在臣子和骑兵们的簇拥下进入了罗马军营，他身着镶嵌着宝石的豪华礼服，其耀眼的装束的确吸引了罗马士兵的眼球。而站在军营正中迎接米特拉达梯的苏拉却只穿普通的罗马将军军服，披着一件总司令专用的大红色斗篷，连头盔都没带。47岁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牛高马大，以浑身长满健壮的肌肉闻名。53岁的苏拉则属于瘦高身材，有几分儒雅。米特拉达梯下马后，亲热地边伸出右手边走向苏拉。

迎接他的苏拉把他让到椅子上，却没有理睬他伸过来的右手，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按照我提出的条件来讲和的吗？”

没想到苏拉如此无视外交礼节。米特拉达梯在愤怒的同时，更强烈

的感受是出其不意。由于苏拉的突然袭击，把米特拉达梯事先想好的谈判策略全部打乱，他竟然沉默不语。苏拉不给他思考的时间，马上又说："被问话的一方应该回答呀，只有胜者才能无言！"

米特拉达梯试图辩解，他把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神的旨意和罗马派驻行省的统治者身上。但苏拉不给他申辩的时间，马上用犀利的语言封住了他的口：

米特拉达梯六世像

“早就听说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果然名不虚

传，今天已经领教了。然而今天这个场合没有听你演讲的时间，对我已经开出的条件，我只想听你说‘行’还是‘不行’。”

没防备苏拉的再次出其不意，米特拉达梯未假思索脱口而出“Yes”。

苏拉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伸出双手拉住比自己小6岁的米特拉达梯，不仅和他握手，还搂着他的肩膀一同走到签署文件的桌子前。

米特拉达梯精心准备的一手“好牌”被苏拉打飞了，关于谈判的话一句都没能说出来。双方的谈判就这样在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

停战文件签署后，米特拉达梯足不点地地跑回了本都，住在小亚细亚西部罗马行省的本都军全部撤走，被米特拉达梯赶跑的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的国王，也都复归王位。本都军的70艘海军战船全部归属苏拉军，编入了卢库鲁斯指挥下的海军。本来卢库鲁斯征集到的战船很少，虽说自称海军舰队，但其规模小得可怜，现在才真正成为整齐威武的海军之师。这还是得益于苏拉在与米特拉达梯交手时面不改色地坚持自己的条件，终于取得了谈判桌上的胜利。

然而，苏拉手下的士兵们却不情愿按这个条件与米特拉达梯讲和，他们的理由是，米特拉达梯在侵略以原帕加马王国领土为中心的罗马行省时，杀死了8万罗马公民及其奴隶，对这个如此残杀自己同胞的恶魔，就这样放过他过于宽容了。

苏拉把士兵们集中起来对此事作出了说明。他站在全军的角度，循着如何对己方有利的思路，耐心地对士兵们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

“如果我们不能与米特拉达梯缔结和约，米特拉达梯就会与芬布洛斯讲和，假如他们两军联手，我们很难应付，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士兵们听了苏拉的解释后，非常信服，拥护苏拉的做法。

成功征服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后，苏拉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现在手中也有了海军，进军小亚细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率军东渡，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本都军撤走后，小亚细亚的政治格局急需重整，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苏拉首先要对已经陈兵小亚细亚、且首战战胜本都军、由芬布洛斯指挥的罗马“正规军”作出妥善处理。

秦纳派遣的现由芬布洛斯指挥的罗马军有两个军团，加上骑兵，总兵力为1.5万人，苏拉指挥的“非正规军”现在有3.5万人，实力比对手更为强大。但苏拉这个时候还不想两支罗马军在境外打内战。

苏拉率大军沿小亚细亚西岸南下，一直开到严阵以待的芬布洛斯军驻地附近，然后开始安营扎寨。罗马式的军营要在周围挖出战壕、竖起围栏。一般来说，在敌人眼皮底下开挖战壕，十之八九是要开战了。但苏拉的士兵干活时却是优哉游哉的，芬布洛斯的士兵受苏拉士兵的情绪感染，不由得也松懈下来。进而他们换上便衣、不带武器靠近正在干活的苏拉军士兵，苏拉的士兵就邀请他们过来聊天，芬布洛斯的士兵就边聊边帮苏拉的士兵干起活来。苏拉的士兵就请他们一起吃饭，既然饭都吃了，苏拉的士兵又邀请他们过来睡觉。

一来二去，很自然地就形成了芬布洛斯的士兵集体脱逃、加入苏拉军队的现象。等芬布洛斯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是一座空营。这时苏拉的代表来拜会芬布洛斯，称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回罗马的船。芬布洛斯是个性格刚烈的男人，他自知无颜面返回罗马，拒绝了苏拉的“好意”，独自走进帕加马的宙斯神庙，自杀身亡。秦纳为了遏制苏拉而派出的罗马“正规军”，非但未能削弱苏拉的势力，反而被苏拉的“非正规军”悉数吸收，苏拉的队伍更为强大。

但苏拉并未因此而率军回师意大利，去推翻把自己污为“国贼”的政府。苏拉是个善于把握轻重缓急的政治家，他先要在被米特拉达梯侵害过的东方恢复罗马的威严，把罗马的霸权再度覆盖至小亚细亚全部地区。由于米特拉达梯统治了5年之久，原有秩序早已荡然无存，若要彻

底恢复罗马的霸权，就要重新构筑罗马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模式。

苏拉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新架构了对小亚细亚的统治模式：

第一，容易成为小亚细亚纷争根源的，是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三个王权国家，苏拉让他们三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三国各自同罗马重新签订同盟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三国中无论哪一个侵略其他国家，不仅是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被视为与罗马为敌。此举的目的是在与罗马行省相邻的同盟国增大罗马的威慑力，以弥补不在行省派常驻军队的缺欠。

第二，结束被米特拉达梯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恢复以原帕加马领土为中心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一带成为罗马的行省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当地居民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由于此地的居民以希腊人居多，米特拉达梯想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于是把各种租税全部废除。“英明”的米特拉达梯也知道，光靠一句“把希腊民族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口号是笼络不住希腊人的。

由于维持军队的开支很大，必须在当地筹措，苏拉决定恢复征收行省税，而且命令以前5年未缴纳的税款必须一并补足。催缴欠税的做法也是“苏拉式”的。

苏拉不让自己的士兵集中居住在统一的军营内，而是分别住到居民家中，每个家庭要负担一个士兵的食宿和服装，如果摊上一个军官级别的住在自己家中，还要负担其两套服装，一套外出用,一套在家中穿。行省居民都盼着驻军尽快撤走，只好按规定赶快缴税，2万多塔兰特的巨额税款很快就收上来了。

苏拉把原芬布洛斯属下的2个军团并入卢库鲁斯指挥的海军，并决定把这支军队留在小亚细亚。时年54岁的苏拉，最为赏识的是自己幕僚中的武将卢库鲁斯，曾极其信任地把组建海军的任务交给了他，此番又

把维护小亚细亚安定的重任托付给了年仅32岁的卢库鲁斯。

安排好这些事情后，苏拉离开小亚细亚，渡过爱琴海从比雷埃夫斯登陆，进入希腊，不用说跟着他的还有那3.5万名即使去地狱也愿意追随他的将士。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苏拉并未从那里马上向意大利进军，他在雅典待了将近一年，公开的理由是他要在雅典治疗痛风病。就是在雅典居住的这段时期，苏拉发现了被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如果说苏拉变成了学习雅典文化的学生，谁也不会相信，他滞留希腊自有其战略上的考虑。

假如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有什么不稳的动向，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去小亚细亚西海岸，只有三天的海路。苏拉留在雅典，对米特拉达梯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力。而从雅典走陆路向西到希腊西海岸，再走海路去意大利半岛，两天即可到达。只要苏拉持续驻扎在雅典，对于执罗马政府牛耳的秦纳，也构成一种“无言的压力”，使秦纳感到政权不稳。

秦纳不仅感受到了“无言的压力”，还受到了“有言的压力”。罗马元老院收到了来自苏拉的书简，其中有这样的话：

> 考虑到我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功绩，公民大会把我认定为国家之敌并作出将我流放国外、没收财产的处分决定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因同样的借口将很多无辜的人杀害，也是极其无理的。我将与我忠实的部下一道，坚决铲除这些不公现象！

事到如今，一切都明朗了。苏拉根本无视罗马关于出国打仗的将军回国后就要解散军队的法律，他不但不解散军队，还要率这支军队推翻秦纳领导下的正统政府。

把这封书简送到罗马元老院后，苏拉召集将士，告诉他们自己要杀回意大利的决心。他还对将士们说，此行会面临10名以上的将军和20万

以上的军队的迎击。将士们一致表态，誓死跟随苏拉冲锋陷阵。不仅如此，将士们还主动要求拿出自己的积蓄作为军队打仗的经费。将士们都知道，苏拉尽管在筹措资金时措施强硬，但他从不往自己怀里放一个第纳尔（古罗马货币单位，1个第纳尔相当于4阿斯）。苏拉感谢将士们的忠心，他说："兄弟们的情我领了，但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我不能收。我是个幸运者，打仗方面的经费凑合着还够用。"将士们当然对自己统帅的话深信不疑，也就不再坚持。这个时候已经临近公元前84年末。

苏拉是在公元前87年离开意大利的。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秦纳可不会什么都不干地虚度时光。秦纳的全名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说起来与苏拉还同属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在当初马略被个人恩怨驱使疯狂复仇、大开杀戒时，秦纳一直冷眼旁观，马略死后，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但是，秦纳在实施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以元老院为敌的政策时，却是毫不含糊的。他严格地实施了将"新公民"分配到全国35个选区的法律。当然了，核定50万"新公民"的资产，再将"新公民"划分为5个阶层和无产阶级，工作量相当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不管怎样，《尤里乌斯公民权法》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根据公元前85年的户籍调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数量，和以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不考虑"新公民"一次性增加的因素，成年男子是以平均每年5000人左右的幅度在增加。

为贫民阶层配给小麦的政策仍在继续，但由于财政资金紧张，秦纳就削减公共事业开支以保证小麦补贴的资金来源。在秦纳统治时期，罗马没有什么说得出的公共事业建设。这件事以及借款冲销四分之三的政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秦纳的选举政策而已，因之成为反对者非难秦纳的口实。

秦纳靠他能够掌握公民大会的选票来支撑其独裁统治。除上面谈到

的之外，他没有再出台任何激进性的法律。秦纳独裁的三年间，罗马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没有发生流血性的骚乱。秦纳以其政治上的老道，确保了元老院中开明派的支持，以致苏拉刚刚登陆意大利时，元老院并没有马上要抛弃秦纳的迹象。

秦纳把自己刚刚完成“成人式”的女儿嫁给了时年16岁、后世成为大英雄的恺撒。恺撒这个16岁的少年，不仅与马略是姑父与内侄的关系，还是“同盟战争”时期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侄子。现在秦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恺撒，既是增强与“平民英雄”马略的亲缘关系，也是为了表示与元老院中的“开明派”和解的姿态。在那个时代的罗马上流社会中，政治通婚已经很普遍。

在双方蓄势即将爆发激烈冲突的对峙阶段，敌我双方都必须忍受各种压力。有人能够在确信是最好的时机（即错过这次时机将不会有更好的时机出现）作出开始行动的决策；而有人则耐不住压力，在错误的时机发起行动。秦纳自以为是前者，但他实际上是后者。他没有军团总司令的经历，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在战机的把握上不及苏拉。

秦纳开始行使执政官组建军队的正当职权。这一年与秦纳同为执政官的是马略的儿子，二人决定用武力对付“无法者”苏拉。如果事后回过头来看，秦纳应该在意大利以逸待劳，但他被苏拉“有言”、“无言”的压力困扰得不知如何是好，居然采取了离开罗马本土前往希腊挑战苏拉的鲁莽行动。

秦纳军队的集结地设在意大利中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小镇安科纳，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志愿兵们陆续向这里集中。如果要想把这些志愿兵们迅速组建成军团，需要总司令组织一批中级将官开展有效率的编队工作。由于秦纳没有这样做，志愿兵们只好就像无组织的普通群众那样游荡在小镇的各个地方。在这种状态下，秦纳率领着临时组建的军团登上了横渡亚得里亚海的战船。

然而，按照预定安排随后陆续来到安科纳的志愿兵们，却没有跟着秦纳离开安科纳。秦纳只好又率领已经出发的军队返回安科纳。这一来，小镇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像流民一样没有规矩的士兵们混乱不堪，离暴动只有一步之遥。努力想带好这支混乱军队的秦纳，又不具备一现身即可让场面安静下来的人格魅力与能力。如果能融入士兵们中间取得他们的支持还好，但这一点似乎也很难做到。眼看这盘棋是做不活了，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却因很小的一次意外事故而丢掉了性命，终年不足50岁。这是发生在公元前84年末的事。

公元前83年初春，苏拉率军从雅典出发，强行军横穿希腊，渡过亚得里亚海，从意大利南端城市布林迪西登陆。布林迪西的居民们打开城门喜迎被称为“国贼”的苏拉及其统率的军队。对苏拉来说，这意味着好的兆头和全新的开始。从阿皮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到罗马，即使大队人马行军，有半个月时间绰绰有余。而苏拉为了消化一些不利因素，足足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也正如苏拉所预料到的那样，前来迎击他的罗马正规军，数量相当庞大。

从布林迪西上岸后，苏拉首先做的事，是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态度，即自己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罗马的问题，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从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在其后进行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看出，他骨子里是个保守的人。在他看来，意大利半岛是罗马霸权所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在所有意大利居民中，居主导地位的必须是罗马公民，而罗马公民的领导者必须是元老院阶级。对秦纳实行的“罗马公民”和“罗马新公民”同等待遇的政策，他本能地反对。但苏拉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迎击自己的罗马正规军中的很多士兵，正是那些“新公民”，他们是因不愿失去刚刚获得的罗马公民权才参战的。

苏拉从布林迪西发出公告，表态要充分尊重“新公民”们已经得到的权利，然而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这个公告的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缺乏将信息发布到整个意大利的手段；第二是人们不相信被视为保守派的苏拉所做的承诺；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公民”中有很多贫民，他们认为秦纳及其一派是致力于改善贫民待遇的，自己应该报答这份“恩义”。在这个现实面前，苏拉也只好延续他的老做法，即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他过了两年才沿阿皮亚大道北上，原因即在于此。

年满54岁的苏拉，率领着他的3.5万名老兵及在希腊加入其部队的5000名士兵共计4万人，沿阿皮亚大道开始了北伐。为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威慑作用，部队从容不迫地缓慢行进。过去4年间在秦纳统治下忍气吞声、低调生存的一些人物，纷纷投奔苏拉麾下。

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地区驻屯军总司令梅特鲁斯·皮乌斯率领两个军团从意大利北方远道而来与苏拉会合。父兄均被马略杀死后逃到西班牙的克拉苏也从西班牙赶了回来。父亲被马略派杀死的庞培，也从隐居的皮契诺飞速赶来。当时只有23岁的庞培出身于大地主世家，他率领着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来到苏拉身边，苏拉不由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苏拉的军力从公元前88年的5个军团变成了11个军团。新增的6个军团是：在希腊时增加的1个军团，梅特鲁斯·皮乌斯2个军团，庞培3个军团。总兵力为步兵6.5万人，骑兵1万人，总计7.5万人。

得知苏拉从布林迪西发出的布告后，罗马的执政官们紧急从全国各地征召军队，就连村镇都未能幸免。终于组成了总计12万人的罗马正规军。

指挥这支军队的是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诺尔巴努斯和科尔涅利乌斯，还有前执政官西庇阿·那西卡和马略的儿子，以及当过马略副将的塞多留这5个人。面对苏拉军分4路北上，罗马正规军兵分5路，5个人各率一路。

持续了两年的这场战争，激战不断。西庇阿·那西卡对苏拉誓将复仇而自己必死感到恐惧，早早地就投降了。他统率的部队被苏拉的军队吸收。与“同盟战争”中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的战争不同，这次双方都是罗马公民。战争是个邪恶的东西，且邪恶的程度与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成正比。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交战双方士兵中本来不曾有的相互憎恶也会抬头，以致在前线厮杀的战士只是被相互憎恶所驱使，连为何而战都不清楚。内战的最悲惨之处，就在于交战者不知目的何在。

这场殃及意大利全境的战争，在公元前82年11月1日，以罗马城下之战为标志，终于结束了。

诺尔巴努斯逃到了非洲，塞多留逃往西班牙，马略的儿子战死，正规军的指挥员们全线崩溃。苏拉马上命令年轻的庞培奔赴非洲追杀诺尔巴努斯。因不知逃往西班牙的塞多留的具体去向而暂时停止了对他的追捕。但没想到此人后来会给罗马招来后患。

56岁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成了罗马的支配者，他现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于是他开始了横扫政敌的战斗。

与马略因个人恩怨而大开杀戒不同，苏拉的目的则是将反对派全部在物理上消灭，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苏拉首先把因大军兵临罗马城下被迫放弃抵抗的4000名萨姆尼乌姆族士兵集中到竞技场全部杀死。死者临终发出的痛苦的惨叫，连在元老院开会的神庙中都能听到。看到参加会议的元老院议员们面色苍白、心神不定，苏拉冷冷地说：“这是接受正当惩罚者发出的声音，没有听的必要。”苏拉解放了1万名具有强健体魄的奴隶，并允许他们在姓名中使用自己的家门名“科尔涅利乌斯”，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科尔涅利乌斯别动队”，成为苏拉清洗反对派的实际操刀者。他们掘开了马略的墓，将遗骸扔进了台伯河，为马略战胜朱古达和日耳曼人而建立的胜利纪念碑也被毁坏，马略的养孙被虐待而死。

刻有苏拉侧面像的纪念币

对于与马略和秦纳有关联的那些“平民派”人士，苏拉做成了一部名录，将他们登记在册，不管这些人躲到哪里，都很容易被抓获。苏拉还实行了“悬赏密告”，即秘密举报有赏金的办法来抓捕这些人。最厉害的一手是，如果谁杀死了这些人，可以得到被杀者的财产作为奖赏。苏拉的“处罚者名录”上，包括近80名元老院议员、1600名“骑士”，总人数据说高达4700人。这些人被抓后，或不经审判即被处死、财产被没收，或

留下性命、没收财产。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得担任罗马的公职。没收的财产被拿去拍卖，由于拍品众多，拍卖价格很低，有些人就借此低价买进，发了大财，其中就有后世成为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

苏拉对“平民派”的清洗，不仅限于罗马的知名人士，意大利各地也多有涉及。曾参加罗马正规军抵抗苏拉的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南部的萨姆尼乌姆和卢卡尼亚的人们，不仅不能取得《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保证的罗马公民权，而且其中的主导人员还被处以死刑，没收土地。苏拉这样不留情地清洗是想彻底摧毁“平民派”的地盘。

苏拉的“处罚者名录”上还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那就是马略的内侄、秦纳的女婿——恺撒，苏拉认为恺撒是应予清洗的“平民派”的一名出色的干将。

然而苏拉周围的一些人一再为恺撒说情，说他父亲已死，他就是尤里乌斯一门的唯一继承人，而且他只有18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举动，劝苏拉手下留情，放过恺撒。一开始苏拉不为所动，经不住很多人屡次求情，才勉强同意，从“名册”上把恺撒的名字去掉。苏拉还说：

“你们懂什么？100个马略也不及这个年轻人！”

只有天才才能洞悉天才啊！

尽管赦免了恺撒，但苏拉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恺撒和秦纳的女儿离婚，还说这是命令。苏拉这种命令不仅针对恺撒一人。庞培自掏腰包组建3个军团，协助苏拉夺回罗马，并且追到非洲成功消灭“平民派”余党，可说为苏拉立了大功，但因其岳父属于被杀死的“平民派”，也服从苏拉的命令，与其妻子离了婚。离婚后，又按照苏拉的意见，与苏拉妻子娘家的一个女孩再婚。

但恺撒不是庞培，他拒绝与秦纳的女儿离婚，这可激怒了苏拉。18

岁的恺撒赶快离开罗马，跑到意大利中部躲起来，但人在意大利还是很危险，为了避免被继续追杀，他又逃到了遥远的小亚细亚。

和马略复仇后很快就死去不同，时年57岁的苏拉在清洗政敌之后仍然健在，而且他还想做一件大事，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要施展他的抱负，他必须要先取得合法的地位。当时两位合法选出的执政官均已亡故，人们普遍认为，苏拉想占据他们空出的执政官位置。按照罗马的法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国家最高职位的两位执政官均出现空缺时，元老院的首席议员将承担起重新安排内阁选举事宜的职责。我把这个职责意译为“内阁选举管理人”，当年的“内阁选举管理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瓦莱里乌斯，他在公元前100年与马略共同担任过执政官，公元前97年担任过监察官。就在他准备召集公民大会选举新的执政官的时候，收到了苏拉的一封信。信中说道：

> 众所周知，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为了更好地应对目前的状态，必须采用非常时期的对策。如果还是按照平常时期的执政官体制是不够的，必须按非常时期的做法设置独裁官，而且独裁官的任职期限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有6个月，而是要给予其足够解决国家非常状态的充足时间，独裁官的任职应是无期限的。如果能孚众望，我愿担此重任。

根据共和制罗马的制度设计，独裁官是危机管理体制的产物。当共和政体的三大支柱——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不能合作共事、正常履行职责时，就会任命一名被赋予极大权力的独裁官来处理国政事务。由于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的官职，故其任期只有短短的6个月。与执政官等国家官职须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不同，独裁官无须选举，而是由一位执政官任命即可。

但是在公元前81年，具备独裁官任命资格的两位执政官都已战死，按法律程序办事的话，这一年谁也当不了独裁官。

苏拉当然明白这些，但他还是明确表明了要当独裁官而且是无期限的独裁官的意志，虽然这个意志只是通过一封信作出委婉的表达。信不是命令，不过是一种“启发式的点拨”，但苏拉的“点拨”是以近10万大军为后盾的，瓦莱里乌斯也好，元老院也好，只能按苏拉“点拨”的意图去做。

于是，《瓦莱里乌斯法》被提交公民大会表决，由瓦莱里乌斯提出的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选举苏拉为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公民大会通过了这项法案，苏拉被选为独裁官。如此一来，苏拉就不算是无视国法、用武力夺取独裁官位置，而是依照法律民主选举产生的罗马史上第一个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公民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公元前81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不用说都是苏拉一派的人士。

做完这一切后，苏拉才开始举行庆祝两次战胜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凯旋式。凯旋式历时两天，规模宏大，华丽无比。恰巧这一年是希腊第16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年，所有运动员都被邀请到罗马，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这届运动会因此而延期。

苏拉凯旋式纪念金币

在公元前81年1月27日至28日举办的凯旋式结束后，苏拉马上启动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按罗马法律，执政官、监察官、护民官提出的法案，须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但独裁官所提法案则无须公民大会表决，苏拉的想法可以立即成为政策法规。苏拉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关于公民权和选举制度

苏拉认可把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半岛全体居民的《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并表示遵守这项法律的约束。而且，对于由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提案、公民大会通过、后由秦纳推行的《苏尔皮基乌斯法》即“新公民”可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的法规，也予以认可。苏拉想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单纯的保守派。

但是，苏拉废止了秦纳关于“解放奴隶”也可以在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行使投票权的法案，恢复了“解放奴隶”只能在指定的4个选区投票的规定。

而且，苏拉还修改了《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部分内容，明示了“不与罗马为敌者”这个前提条件，即意大利半岛居民中，只有“不与罗马为敌者”方可取得罗马公民权。以这个条款为撒手锏，苏拉剥夺了参加罗马正规军阻挠苏拉向罗马进军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南部很多部落居民的罗马公民权。

二、福祉问题

苏拉废除了40年前由盖乌斯·格拉古开始实行的以低于市场价格向贫民配给小麦，后配给价格不断下降的《小麦法》。在保守派的苏拉看来，和福利政策相比，国家财政的健全化应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而且，根据《小麦法》受益的无产阶级成了“平民派”的地盘，选票都投给了“平民派”，现在废除这个法，也是为了阻断无产阶级对“平民派”的支持。也许苏拉已经意识到，用军队来吸纳失业者会更有效率。

三、失业对策

苏拉重新启动了停顿已久的新殖民城市建设。对苏拉来说，新殖民城市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安排属下的那些“老兵”，其次才是解决失业问题。苏拉主导兴建的8个新殖民城市，安置的几乎都是他的“老兵”。顺便说一句，现在意大利旅游城市佛罗伦萨的起源，就是始于苏拉的新殖民城市。

四、元老院改革

从公元前509年罗马由王政时代进入共和时代开始，元老院议员的编制就是300人，此后一直未变。那时罗马的领土比现在的东京还要小，而此时已大不相同，成为称霸全地中海地区的大国。具有公民大会投票权的公民数量，也已经增加了近10倍。苏拉认为，元老院议员的规模也应适应现状。

5年来，经历了马略和苏拉两次杀戮，应为300人的元老院议员中已经减少了近百人。苏拉首先把缺额补齐，进而把元老院300名议员的编制扩大至600人。根据苏拉安排新得到元老院议员席位的很多人，既不是建国以来的名门望族，也不是因祖上有人当过执政官而进入贵族行列的“平民贵族”，而是属于被称为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经济活动也随之扩大，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的实力大为增强。苏拉有意把这些人拉入政治领域，让他们参与国政，分担社会责任。苏拉认为，若想控制护民官率领的平民势力的冲动行为，强化元老院的力量是最优的政策选择。

五、司法改革

共和时代罗马的司法体系，是由法务官承担下令搜查和主持法庭审判的职权，原告方的辩护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被告方的辩护人负责辩

护，判决则由陪审团合议后作出。由此，陪审员们成为法庭判决裁定的关键因素。陪审团是由元老院议员组成，还是加上经济界人士和平民代表，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

苏拉将其改为陪审员一律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即回复到格拉古兄弟改革以前的状态。苏拉的理由是，元老院议员中已经有了很多“骑士阶级”人士，所以实质上陪审员的组成还是可以做到贵族和“骑士”各占二分之一的比例。总之，强化元老院的作用是苏拉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六、行政改革

苏拉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已成为强大国家，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统治能力。但同时，他又对元老院主导下的寡头统治，即所谓“少数领导制”共和政体的有效性深信不疑，不想破坏这项基本原则。

如此一来，苏拉主导的行政改革的方向就归结为按“年功序列”原则重塑权力架构。既然坚持“少数领导制”，就要建立起一个能让这“少数”人均等地分享“领导”机会的体制，尽量避免出现靠武力夺取权力的特例。苏拉推行的行政改革措施，是严格按照任职程序来安排的：

财务检察官，由8名增至20名，任职年龄为30岁以上。有财务检察官任职经历者，即可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

法务官，由6名增至8名，任职年龄为39岁以上。只有具备法务官任职经历者，方有资格成为执政官候选人。

执政官，仍为2名不变，任职年龄为42岁以上。

按照这个安排，如果30岁被选为财务检察官，一年任期结束后，就可以等待元老院空出的议员席位，由于议员死亡的事情时常发生，经常

会有空出的席位，有空位即可替补为元老院议员。成为元老院议员后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增长经验。经过8年39岁了，可以竞争法务官，当上法务官后干满一届（一年），可以以前法务官的身份被派去行省承担管理职责。有了行省的治理经验且年满42岁之后，就获得了被提名为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如果当选为执政官，一年任期结束后又可以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到行省担任总督。总督任期结束后再回到元老院。由此可以确保元老院是由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的机构。执政官一年任期届满后，若想再度获选为执政官，必须经过10年的间隔，由于这个规定，原国家高级官员将逐步成为元老院的主体。

苏拉还对行省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周密的制度化改革。法务官增至8名后，每年可以有8名卸任法务官和2名卸任执政官，当时罗马属下恰好有10个行省，这10个人可以分别派到各行省任总督一年。由此确保了行省总督后备人选的数量充足。

当时的10个行省是：

（一）西西里岛行省

（二）撒丁岛行省

（三）西班牙东部行省（又称为“近西班牙”）

（四）西班牙西部行省（又称为“远西班牙”，大致是现在的葡萄牙一带）

（五）南法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

（六）马其顿行省（希腊的马其顿地区）

（七）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亚细亚行省”是当时的称

谓）

（八）西里西亚行省（小亚细亚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

（九）阿非利加行省（原迦太基领土的一部分）

（十）北意大利行省（距罗马最近的行省，领土相连，位于卢比孔河以北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

这10个行省，都需要罗马派总督去管理。

七、军事改革

苏拉坚信，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分离，对国家机器健全运行、国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军事改革的重点就是政军分开。

可能有人会问，靠武力得到独裁官位置的苏拉，这样做不是和自己的行为相矛盾吗？其实也正因为苏拉两度率兵强行“进军罗马”，他比任何人都能更深刻地理解政军不分的弊端。

苏拉立下的规矩是：国内有资格统领军队的，只限两名在任的执政官，他们能够统领四个军团，超过四个军团的常备军，一律不得在国内驻扎。超出执政官指挥规模（即四个军团）的军队指挥权，只授予现职担负行省保卫职责的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但他们调动军队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许可。在北至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即罗马领土内，绝对不允许率领军队进入。这些安排都是为了防止有人对首都罗马和元老院滥用武力。即使是最高司令官，在军务结束后也负有立即解散所统率军队的义务。对于与军队具有最短距离的各行省总督，严格限定其一年的任期，防止因总督任期过长容易导致的军队“私有化”现象。

执政官和法务官尽管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但他们任期届满被派到行省时，其具体去哪个行省任职由元老院决定。这本来是个不成文的惯例，苏拉把这个惯例制度化了。总之苏拉在这方面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完善、充实“文官控制”的体制机制，从制度设计上防止用武力“进军罗马”的事情再度发生。

八、地方改革

罗马联盟是实行了多年的一种联邦制的同盟关系，联盟解体后，一切意大利人都成了罗马公民，罗马政府也没有了尊重各同盟城市国家国内自治的义务。过去的同盟城市国家，现在变成了罗马国内的地方自治体。苏拉改革后，中央政府向各地方自治体派遣行政长官，各地方自治体由居民选举产生100名议员组成地方议会，议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的任期均为5年，负责地方自治体的行政事务。由于地方自治体的居民都已拥有罗马公民权，他们也被免除了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只需缴纳间接税。这个时期各地方自治体的财务方面是个什么状况，因史料太少，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和罗马联盟时代相比，向中央政府的集权更为明显。另外，罗马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官方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仍是拉丁语，但与之并行的是，希腊语也被广泛地使用。尤其是作为一种地方特色，希腊语在那不勒斯等城市应用非常普遍，人们普遍将其视之为“希腊人的城市”。

九、关于护民官制度

有关护民官制度的改革措施，其实并没有充分反映苏拉真实的想法。苏拉认为，格拉古兄弟光天化日被杀害以后，罗马进入了“迷失

期”，而“迷失”恰恰是元老院统治能力日渐衰退和护民官权力日益增大造成的。苏拉不认可护民官权力增大是平民对于日益蔓延的社会不公现象不满情绪的喷发口的说法。

在苏拉看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强化元老院的力量是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万全之策。既然要强化元老院的权力，相应的自然要弱化护民官的权力。但是，苏拉具有超强的政治敏感，他深知，在目前状况下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能采取废除护民官制度的激烈举措。权衡之下，他还是保留了护民官制度，但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让护民官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强大的作用。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来，护民官制度首次为平民贵族以及平民出身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罗马政界之门。由于元老院最初是直接面对国王的智囊机构，权贵云集，出身于名门望族者步入元老院比较容易，而那些出身于平民阶级的人士（那个时候其祖先想当执政官也当不上）要想成为元老院议员则要受很多不利因素限制。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这次改革，允许有护民官经历者自动成为元老院议员，消除了对平民阶级出身者进入元老院的不利因素。成为元老院议员对仕途是非常有利的，若想当选执政官、法务官、监察官等共和罗马的重要公职，候选者是元老院议员成为一个不成文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出身于平民或“平民贵族”家庭的执政官，都曾担任过护民官。对进入元老院完全不感兴趣者如格拉古兄弟，绝对是例外中的例外。

为了弱化护民官的作用，苏拉设立了一项有关护民官制度的法律，这项法律保留了有护民官经历者方可进入元老院的制度，但特别限定其不得获选为其他官职。这项法律实施后，对于以政治家为人生目标的年轻人来说，当选护民官对仕途的顺畅多少会带来一些不利，不如去尝试其他的途径，比如去军队当财务检察官也可实现进入元老院的目标，却不受不得转任其他职务的限制，当然对仕途更为有利。这样一来，对那些志存高远、前途有望的优秀年轻人来说，护民官不再是从政的最佳路

径，自然会对竞选护民官失去兴趣，从而使护民官的整体素质降低，护民官率领平民与元老院对抗的能量也就不足了。

对于像格拉古兄弟那样不把护民官职位当做进入政界的跳板、而是一心想为民众做点好事的人，苏拉也设计了相应的对策，独裁官苏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护民官和执政官一样，任职期满后必须相隔10年方可再次竞选同一职位。

以上这些，构成罗马史上第一个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决心推进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苏拉从公元前81年开始操作，到第二年，这些改革措施已全部付诸实施。

从上述改革措施可以看出，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是在努力维护以元老院体制为代表的罗马共和政体。如果把这个体制比喻为一个“皮口袋”，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皮口袋”已经是破旧不堪了。苏拉试图用一些结实的皮革来尽力修补，只要补好的“皮口袋”还能装入新的葡萄酒，苏拉就坚信它还能够正常使用。对此坚信不疑的不仅苏拉一人，连当时有罗马“传媒代表”形象的西塞罗也是属于“皮口袋修缮派”。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人尽管认识到他们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但如果要他们扔掉原来的“皮口袋”，去创造新的体制机制，还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有一人除外。

公元前80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在罗马的中心——罗马广场，按惯例召开了选举下一年度执政官的公民大会。在选出下一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之后，独裁官苏拉登上了讲台，时年58岁的他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向公民们宣布辞去独裁官职务。

对此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人们，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苏拉。苏拉在讲坛上环视了一下听众，又宣告将象征独裁官权威、日夜不离的24名警卫人员解聘。他不仅放弃了独裁官的绝对权力，也放弃了保卫自身安全的警卫，由此，苏拉回归为一个普通的罗马公民。

身材颀长、穿着托加的苏拉走下讲坛，从无言地注视着他的人们中走过，几个朋友陪着他，沿着罗马广场中间的道路边聊天边散步。突然，在场的群众中有一人发出非议苏拉的声音，指责苏拉在独裁官任上的不当行为。听到这些话，苏拉只是缓缓地转过头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瞟了一眼，指责苏拉的人立即闭上了嘴巴。

苏拉的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职位是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正式认可的，在完成各项改革后，只要他愿意，仍然可以继续坐在独裁官的位子上。因此可以判断，他是真心地主动辞去这个职位。就连那些将苏拉的改革斥为“保守、反动”的历史研究者们，大多也都认为苏拉主动辞去独裁官职务，是“不执著于权力的廉洁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这些研究者们相比，我的确更欣赏苏拉，但在他辞去独裁官职务这件事上，我和他们看法不同。

苏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重建立足于“少数领导制”原则下的固有的共和政体。而以元老院为象征的“少数领导制”，不存在认可独裁官这种现象的机能。苏拉出任独裁官，是为了在失去既有秩序的罗马社会中恢复秩序，而他所中意的秩序，就是元老院主导下的秩序。

由于这个原因，苏拉如果长期坐在独裁官位置上，就变成了突出个人能力、反对“少数领导制”的行为，与他所致力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若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完成，苏拉必须辞去独裁官职位。当然了，不眷恋权力的领导者也会得到大众的鼓掌喝彩，由此带来的利益也不少，但这并不是苏拉刻意追求的东西。

在人类世界，真正参透真理的人往往是少数，由此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任何改革若想获得成功，在手段的选择上往往不能随心所欲。

苏拉在58岁时辞去了独裁官职位，并从政界隐退。尽管他还是元老院议员，但他离开了元老院举行会议的城市——罗马，在那不勒斯向西的海滨小城库马过起了隐居生活。库马是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最早建设

的殖民城市，那里处处体现出希腊人的审美趣味——大海、森林、河流和凉爽的西风。

由于积蓄了足够的个人财富，苏拉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他在库马建造的别墅，不算简朴但也绝对称不上奢华。在这栋别墅里，他钓鱼、散步，还撰写回忆录。苏拉的回忆录毁于中世纪而没有流传下来。苏拉在回忆录里，多次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他说自己是“被幸运眷顾的人”（Felix），而且他还将Felix当做自己的尊称放在姓名的姓氏之后，其姓名全称变为“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菲利克斯”。

在这所别墅，苏拉与35岁的年轻妻子瓦莱娅为伴。苏拉的前三次婚姻都是娶不知名的女子为妻，第四次婚姻，娶的是罗马政界有影响的梅特鲁斯家门的姑娘，名叫梅泰拉。梅泰拉在苏拉任独裁官时期亡故，给苏拉留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和女儿。瓦莱娅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关于这个女人与独身的最高权力者之间的邂逅，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如下的浪漫“花絮”：

在举行角斗士比赛的竞技场，苏拉正在观看比赛，瓦莱娅从苏拉座位后经过时，用手触碰了一下苏拉的肩，从他身上穿的托加上抽出一根断丝，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的举动使苏拉大为惊诧，苏拉注视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瓦莱娅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她转过头来面对苏拉说：

“不要觉得我的行动很可笑，我真想像您一样幸运，哪怕是只从您身上得到一点点。”

出身于名门望族瓦莱里乌斯一门的这个女人，成为苏拉的第五任妻子。

谈个题外的趣闻。在以《纽约物语》为题目的一部集锦式电影中，马丁·斯科塞执导的第一部的结尾处，一个年轻女孩在一位名画家作品

展览会门前对这位画家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与普鲁塔克记载的瓦莱娅对苏拉做的事、说的话如出一辙。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估计现代名导马丁·斯科塞也阅读过普鲁塔克先生的书吧！当然了，瓦莱娅的言行是大家闺秀充满自信的得体举止，所以能在苏拉身上奏效。如果换一个除了年轻什么都不具备的女孩子，想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男人的青睐，恐怕难以奏效。

应该指出的是，普鲁塔克是个严谨耿直、有道德家之称的大家，他写出上述花絮绝不是在赞赏苏拉，因为随后他又写道，苏拉的举动是与其身份地位及年龄不符的轻佻之举，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大概普鲁塔克这个人，对于苏拉在公众场合是斯多葛派信徒式的克己禁欲者、在私生活中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的做人方式始终不能理解，站在他的立场，对苏拉进行抨击就是当然的了。

在担任独裁官之前和之后，苏拉并未改变自己将公众生活与私生活截然分开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在公众场合，他总是保持严肃端正的态度，一旦回到家中，他就变成一个喜欢开玩笑甚至喧哗打闹的普通罗马人。假如他餐桌上的常客是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也许会得到普鲁塔克的赞赏。而苏拉餐桌上的常客是喜剧演员、喜剧作家、喜剧诗人等人物，严酷、冷静的政治家的餐桌上，总是哄笑连连。喜剧的主旨是嘲笑伪善，调侃人生，这也许正契合了苏拉的性格吧！

这样的隐居生活过了一年有余，苏拉去世。临终前两天，他大量吐血，但那天他还在撰写回忆录，写完22章后才不得不搁笔。意识到死期将至的苏拉急忙书写遗嘱，他把和第四个妻子梅泰拉所生的双胞胎儿子和妊娠中的瓦莱娅将要分娩的儿子的将来托付给卢库鲁斯。除此之外，继承人是谁、葬礼怎么办这些问题，遗嘱中一概未作交代。苏拉至死也是一个通达事理的罗马共和国的优秀公民。

获知苏拉死讯后，罗马政界在如何为苏拉举行葬礼的问题上分为两派。当年（前78）的执政官是雷必达和卡图鲁斯二人，卡图鲁斯和庞培

等人属于苏拉一派，主张在首都罗马举行国葬。而雷必达则以苏拉已经没有现任职务为由，主张葬礼应是私人式的，不同意举行国葬。但就在这时候，全意大利的老兵开始向库马集中，而且就像参加凯旋式那样，已是全副武装。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罗马元老院决定为苏拉举行国葬。

苏拉的遗体被安置在涂满黄金的灵床上，承载灵床的车由8头牛拉着缓缓前行，从库马沿海岸到泰拉契那后北上，从那里沿阿皮亚大道向罗马行进。走在灵车前为先导的是一队军乐手，灵车后是沉默的老兵们长长的队伍。有些老兵是等在送葬路线的途中加入送丧队伍的，因此越接近罗马，队列就越长。而且这些老兵还不是简单地排队了事，而是按他们当初在苏拉手下时的编队排列，完全就像军团行军打仗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一点——走在队伍前面的，不再是活着的苏拉。

进入罗马城门后，军团旗、大队旗、中队旗全部整齐地举了起来。根据罗马的习俗，对逝者感恩的人们和各市、镇、村以及行省赠送的黄金冠达2000个之多，也加入了送葬队伍。军旗生辉，金冠耀眼，使原本严整肃穆的送葬队伍又增加了华丽的色彩。送葬队伍以最高神祇官为首的祭司们和女祭司为先导，到达罗马广场。全体元老院议员都在那里肃穆等待，两位执政官站在议员们的最前面。

颂扬逝者丰功伟绩的悼词由谁所致，历史学家阿皮亚努斯和普鲁塔克都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一般是由与逝者有最亲密关系的直系亲属来致悼词，但苏拉的儿子尚未成年，大约是其他什么人代为执行这个任务的吧！

致词仪式完成后，元老院议员中的身强力壮者用肩膀扛起苏拉的遗体，送葬队伍离开罗马广场，走出环绕着城市的围墙，向马尔斯广场行进，乐队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吹奏哀乐。

在罗马人供奉战神马尔斯的广场举行的国葬，吸引了很多市民，其

中一部分人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前来送行，其他人则只是好奇。苏拉的骨灰埋葬在安葬历代帝王的马尔斯广场中央墓地。

苏拉临终前，对葬礼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仅仅对下葬的方式提出了要求。在当时的罗马，火葬还是很稀罕的事，科尔涅利乌斯家门的传统是将遗体直接土葬。但苏拉的这个愿望难以满足。元老院诸公难以忘怀马略被掘墓扬尸之事，担心苏拉的遗体不知何时会遭到什么样的亵渎，因此不同意直接土葬。因此，苏拉的遗体是先火化，然后将骨灰下葬。望着苏拉遗体燃烧的火舌，此时不管是仰慕苏拉的人，还是仇视苏拉的人，想法都是一致的——下葬方法是正确的，国葬礼仪是壮观的，前所未有的。苏拉直到死后都是一个幸运的男人。

在苏拉的墓碑上，雕刻着苏拉自己在生前即已定下的碑文：

对朋友来说，没有比苏拉更好的人；对敌人来说，没有比苏拉更恶的人。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苏拉都在调侃世人，真是个玩世不恭的男人！

第三章

庞培时代

（前78—前63）

对于人类来说，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寿终正寝，这就是幸福。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即把自己称为“幸福的人”。但有些人，特别是被宿命安排为公职人员的人，即使生前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又不幸非正常死亡，但他为其所属的共同体指明了将来的方向，起到了铺路者和路标的作用，令人怀念。如果把这样的人定义为“幸福者”的话，那么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显然又属于“不幸的人”。

近现代著名的历史书在记述苏拉之死后，接下来的章节，几乎都是以“苏拉体制的崩溃”为标题，如实描述了苏拉死后的体制变化。苏拉逝世不久，他所努力修复的以元老院为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这个“皮口袋”已经再度“开绽”。在苏拉独裁之下正常运转的这套体制，苏拉去世后并非毁于其反对派，因反对派能量不够，恰恰是属于苏拉本派系的人葬送了“苏拉体制”。

为什么苏拉本派系的人要破坏“苏拉体制”呢？如同很多历史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大概是这个体制牺牲了苏拉手下将领们的个人野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连苏拉本派系的人士都不能坚守的“苏拉体制”，实际上已经无法解决公元前1世纪罗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那么，在苏拉逝世的公元前78年时，两派的班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先看反苏拉阵营。经过苏拉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反苏拉阵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人物。公元前78年度的执政官雷必达是反苏拉阵营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个人在苏拉独裁下能够生存且能当选执政官，是因为他总是打着“亲苏拉派”的幌子。在苏拉将没收的反对派的财产付诸拍卖时，雷必达还趁机低价买进，大赚一笔。就这么一个人物，看到苏拉辞去独裁官职务后，马上发表谴责苏拉的演说，也许后世的研究者因此而将之誉为敢于向苏拉挑战的行为，但在当时的罗马公众看来，是极其

滑稽可笑、令人难以忍受的小丑行为。以这个人的人品，是不可能起到反苏拉派领袖的作用的。

另一个人物是塞多留。他长期在马略手下做军官，在苏拉率军从希腊杀回罗马而引发的内战中败给了苏拉，战败后逃往西班牙，后因不知去向苏拉将其从反对派名单中撤销才得以保住一条命。塞多留出身平民，与马略一样，姓名只有两部分。他也不是一个能成为“小马略”的领军人物。

除这二人之外，当初胆敢批苏拉逆鳞、不肯听从苏拉让其与秦纳女儿离婚的命令、逃命到东方的恺撒倒是具备反苏拉领袖的素质。恺撒是得到苏拉的死讯后才敢回到罗马，此时的恺撒只有22岁，无地位、无金钱、无权力，尚不具备集结起反苏拉派的号召力。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恺撒以勇敢驰名于世，且为人正派，如果再经历一段时间的准备，待时机成熟，“大器晚成”型的恺撒是唯一能挑此重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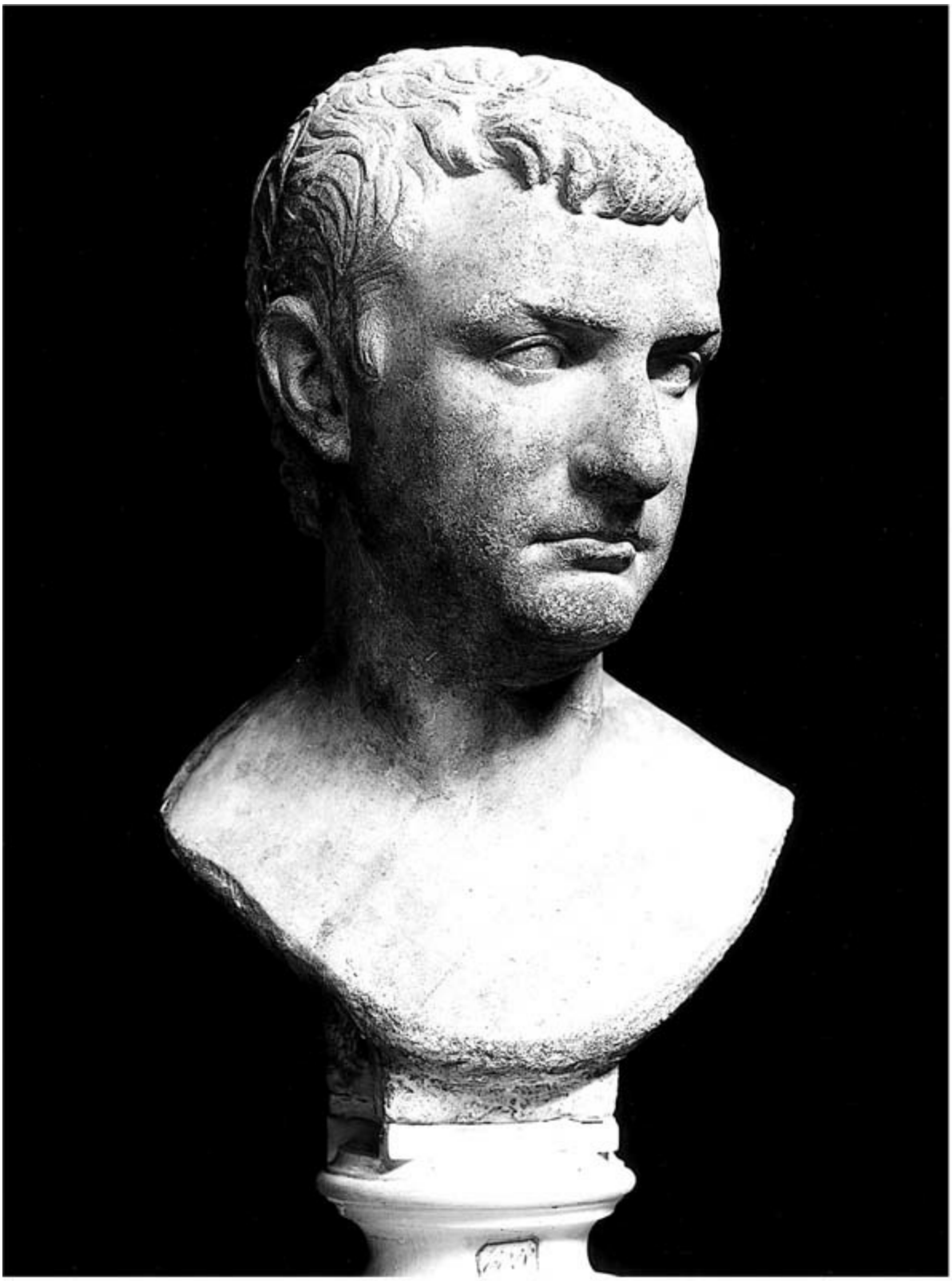
反苏拉阵营的班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靠他们是不可能毁坏“苏拉体制”的。

再说说苏拉体系中的这些人物。这一派的首脑人物，首推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苏拉当初率大军离开小亚细亚的时候，曾委托他管理小亚细亚事务；苏拉临终时他又是手捧苏拉的《回忆录》、被苏拉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最信赖的亲信。卢库鲁斯生年不详，从他的任职经历来推算，苏拉死时他大约38岁。

仅次于卢库鲁斯的，是当年36岁的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秦纳独裁时代他逃往西班牙，得知苏拉杀回意大利，他回到苏拉麾下参战，说起来是苏拉的股肱之臣。相对于军事和政治，克拉苏更擅长赚钱。

苏拉另一个股肱之臣，应该是比克拉苏年轻8岁的格涅乌斯·庞培乌

斯·斯特拉本。苏拉死时庞培年仅28岁，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较早。前面已经说过，苏拉杀回意大利时，年仅23岁的庞培即率领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前来助战，令苏拉大喜过望。3个军团共有步兵1.8万人，骑兵2000人，总兵力达到2万人，如此规模的军队能够自费组建，得益于其家族的财富与势力。庞培家族在意大利中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皮契诺地区有大片的土地、巨额的财富和为数众多的“后援者”。庞培的父亲当过执政官，死于与马略派的抗争。庞培和卢库鲁斯、克拉苏对元老院来说，都不属于“新人”，这是保守的苏拉能够对他们放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青年时代的庞培

庞培具有军事上的天赋，其军事才能早就被同为军事天才的苏拉所洞悉，内战告一段落时，苏拉即派出年轻的庞培去追剿逃到非洲的反苏拉派余党，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时，庞培还不足25岁。苏拉还答应了庞培有些过分的要求，特别批准为他举行了凯旋式。25岁成为凯旋将军，这是大西庇阿当初也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就在那个场合，苏拉半开玩笑地送给这位年轻的凯旋将军一个尊称——“马格努斯”，而此前使用这个尊称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被后世人们意译为“大帝”的那个词，即源于拉丁语的“马格努斯”。苏拉生前，庞培一直未敢使用这个尊称，苏拉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庞培才开始使用“庞培·马格努斯”作为自己的签名。虽说当时苏拉是开庞培的玩笑，但也说明苏拉对庞培还是极为赏识的。

和反苏拉派相比，苏拉体系中的确人才济济，他们要想让“苏拉体制”坚如磐石，在当时也是能够做到的。然而，“苏拉体制”还是走向了崩溃，而崩溃的主要推手，正是苏拉门下的这些英雄才俊。

如同要证明反苏拉派人才不济似的，苏拉死后不到一年，发生了一起反对派对“苏拉体制”的攻击，但就像线香花火一样，刚一点着就销声匿迹了。然而，这次不成功的攻击，却成为“苏拉体制”崩溃的“前哨战”。

公元前77年，卸任执政官的雷必达，被派到“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即南法行省担任总督。在执政官任上，雷必达提出了一项议案但被否决了。他就借当总督的机会，试图靠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被否决的议案有四项内容：

一、将被苏拉整肃的所有牺牲者已被国家没收的土地还给原主人。

二、召回被苏拉流放国外的人士。

三、恢复对贫民阶级的福利政策，让《小麦法》重新生效。

四、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由于苏拉尸骨未寒，而且当年度的另一执政官也发表了强硬的反对其议案的演说，雷必达的议案被公民大会否决。雷必达心中不服，就想靠武力来转变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他在去行省赴任途中，顺便在意大利中部开始组建规模超过行省总督指挥权限的军队。说起来他组建的军队还算是罗马的正规军，现在这支军队站在了反苏拉的立场上，于是，以前因反对苏拉而获罪、被剥夺了土地和罗马公民权的人们纷纷投靠到雷必达麾下。

元老院得悉这一事件后，担心在意大利爆发内战，迅速通过了“关于共和国防卫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因为只有发布了这种形式的“紧急状态宣言”，执政官才能承担起用武力镇压的义务。

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现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发生的两军冲突，简单一战即分出胜负。执政官卡图鲁斯将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庞培，在庞培的果敢速攻战法面前，雷必达的军队不堪一击。被打败的雷必达逃到撒丁岛，并很快病死在那里。雷必达的副将布鲁图被庞培军抓获，依庞培之命被处死。后世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7岁丧父，其父就是这个被庞培处死的布鲁图。雷必达军的残余部分逃到了西班牙，与在当地举起反“苏拉体制”旗帜的塞多留会合。

雷必达的反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镇压下去了。但由此产生了一个副产品。

在共和罗马，一旦确立了军团总司令、向其授予指挥权后，军团在战场上的一切行动都由总司令决定，也就是说，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具有“绝对指挥权”。而有资格统率军团以上规模的军队并获得“绝对指挥权”的，只有执政官和法务官或者是担任过执政官、法务官的人员。而

苏拉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明确了执政官和法务官的最低任职年龄分别为42岁和39岁。

在内战这种非常时期崭露头角的庞培，只有二十几岁，且完全没有在罗马政界的任职经历，就连罗马上流社会“良家子弟”仕途必经之路的财务检察官、按察官这种较低级别官吏的任职经历都没有。但由于当时元老院阶级中尚无军事才能超越庞培的人才，不得不授予庞培实质上的军事指挥权。

这个问题在镇压雷必达叛乱时尚未表面化。因为名义上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执政官卡图鲁斯，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由庞培行使。由于庞培只有29岁，他名义上的职务，只是最高司令官卡图鲁斯的幕僚。根据最高司令官的授权指挥作战，作为一种变通措施，在较短时间能解决问题的战役中使用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战事拖长，就不能再采用这种名实不符的做法了。

雷必达残部跑到西班牙后，与在西班牙行省竖起反罗马旗帜的塞多留会合，使塞多留的实力大为增强。罗马元老院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苏拉在世时，即已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率军去镇压。但是，梅特鲁斯·皮乌斯率领的罗马军被塞多留的“游击战法”搞得无计可施，西班牙战事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元老院认为必须给予实质上的增援才行，但是从现有的39岁以上、担任过法务官职务和42岁以上、担任过执政官职务的人选中很难找出值得信赖、可以授予“绝对指挥权”的武将。

这时毛遂自荐担此重任的，是29岁的庞培。按共和罗马的规定，年满30岁者方可担任财务检察官，庞培连财务检察官都没有干过，当然也不可能是元老院议员了。有资格率领军团的指挥官的最低年龄是39岁的法务官，庞培距这个要求整整差了10岁。自告奋勇要为国效力的庞培对这些规定愤愤不平，因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曾有大西庇阿的先例。但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种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的特例，当时大西庇阿的父亲和伯父相继阵亡，大西庇阿请求兴兵打一场告慰亡灵的复仇之战，

这个请求打动了罗马人重视祖先和家族荣誉的心弦，出于“大义名分”，将这场战事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年仅25岁的大西庇阿。庞培显然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元老院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是严守“苏拉体制”，还是允许改变常例、认可特例？是崇尚“年功序列”，还是尊重实力的价值？

两年前派到西班牙前线的梅特鲁斯·皮乌斯不属于凡庸之将，当初决定把塞多留战事的“绝对指挥权”交给他时，并不存在异议，都相信他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在他取得战果之前，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谁也无法预料。至于罗马在付出的时间与牺牲的代价方面的承受力有多强，元老院议员们也只好问自己了。

事实上，能够权衡考虑的时间是有限的。苏拉生前老老实实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出现不稳的动向。从各方面看，元老院都不能再犹豫不决，必须尽快作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作出决定，授予29岁的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到西班牙与梅特鲁斯·皮乌斯一起，尽快解决塞多留战局。这个决定成为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第一步。由此也暴露出“苏拉体制”的局限性，苏拉本以为靠议员编制“倍增”就可以在质和量两方面加强元老院的力量，没想到还是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发生在西班牙行省、被称为“塞多留战争”的这场战争，并不是西班牙人为民族自治而战。自从公元前133年小西庇阿摧毁努曼提亚之后，西班牙作为罗马的行省，已经平稳地过了半个世纪。让罗马军深陷西班牙8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不过是马略和苏拉的“身后战”转移到了西班牙而已。

在第二章曾经说过，普通罗马人的姓名由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部分组成。盖乌斯·马略的姓名只有两部分，而昆图斯·塞多留的姓名也只有两部分。和马略一样，塞多留也出身于平民，靠自己努力，经过

艰苦磨炼而成长为军队将领。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温布利亚地区，而不是生于罗马，这一点也和马略相似。塞多留作为志愿兵加入马略的部队，在与日耳曼人作战时崭露头角，20岁时即已担任统辖600名士兵的中队指挥官，属于在军队中提拔较快的。公元前83年开始的苏拉与罗马正规军的内战中，塞多留自然会站在“平民派”一边与苏拉为敌。然而，随着苏拉的大获全胜，塞多留的名字也上了苏拉的“黑名单”，不得不从意大利逃走。

塞多留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非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在那里潜伏了一段之后，越过希腊神话中被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西班牙。到西班牙后，塞多留迅速组建了一支4700人的军队，并率领这支军队与西班牙西部行省总督打了一仗，居然取得了胜利。

这场战斗发生在塞多留43岁那年的秋天，他由此而声名大噪。塞多留身上有数不清的刀疤，并且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就有西班牙人开始将其称为“汉尼拔第二”。也由于这场胜仗，到当年年末，跟随他的士兵达到了8000人。

苏拉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去讨伐塞多留。公元前79年，罗马军与塞多留首次交手，塞多留战败。以此次败仗为契机，塞多留改变了战法，开始用游击战术来对付罗马军。

西班牙地形复杂，众多的部落分散居住，游击战术很容易产生效果。对于正规军来说，一场战斗不胜即为负，而对于游击者来说，却是不负即为胜。塞多留反正也没有什么比西班牙更为适合的地方可去，他就打算在这里建设独立国家，甚至开办了元老院和军官的培训学校。西班牙原住民的立场也倾向于塞多留，这使他更加具备与罗马军打游击战的优势。

塞多留的英勇善战，使其对手罗马正规军无计可施，塞多留的名声几乎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其后，唯一能够在地中海世界发挥威慑作

用的苏拉去世，这使本来风平浪静的地中海骤起波澜。

首先是苏拉脚下的意大利出现了前执政官雷必达反“苏拉体制”的叛乱，此事前文中已经述及。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逃到撒丁岛的雷必达追随者又逃到西班牙与塞多留合兵一处，这支队伍由雷必达的一个幕僚佩佩那率领，共有步兵2万人、骑兵1500人。

这21500名经过训练的士兵投到塞多留麾下，使塞多留的兵力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但塞多留并未因此而放弃游击战术，事实也说明他的战术方针是正确的。在庞培未到西班牙之前，罗马军几乎在西班牙全境都受到游击战的骚扰，无法进行决战，战事呈现出陷入泥沼的状况。

风头正劲的塞多留，收到了来自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希望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米特拉达梯被苏拉制伏后，一直在窥伺时机以图东山再起，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方案的主要内容有：米特拉达梯从东边、塞多留从西边进攻罗马；为提高本都王国军队的素质，塞多留派军官帮助本都培训士兵，作为回报，本都为塞多留提供所缺的海军战船。

纵然出生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但已经是罗马公民的塞多留，反对的是“苏拉体制”支配下的罗马政权，并非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让他联合外族来攻打自己的祖国，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他拒绝了米特拉达梯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但派了几名手下的军官去担任本都军队的教官。不管内部怎么争斗不断，罗马人也不愿呼应外族做出危害自己国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罗马民族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完全不同。

在塞多留的势力尚未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时，罗马已经派出庞培来镇压塞多留。但庞培没有急于求成，这位30岁的总司令没有犯不管不顾地急于赶到前线与敌决战的低级错误，他首先做的事情是确保自己的补给

线。

在现代，利用高速公路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达法国南部，必须不停地穿越一个又一个数不清的隧道。古代的“高速公路”也就是罗马修建的公路，是从帝政时代（共和制罗马之后）才开始使用隧道的，而且也仅限于如果不挖掘隧道就无法到达山对面的情况下。现代的高速公路与古代罗马修建的公路相比，有三点不同——隧道众多、有效利用环形线路与收费。

从意大利经过南法行省到达西班牙的公路，已经于公元前188年随着德米狄亚大道的铺设完成而全线开通。然而这条路几乎全程都是俯瞰大海、盘山而行。从热那亚到现在的戛纳，一路上悬崖峭壁不断。庞培在他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重新修建一条“不是汉尼拔当初走过的路，而是一条对罗马更有利的路”。

这条路从上游穿过现在的都灵到苏萨的峡谷，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后继续向西，直到距现在的里昂南边30公里处的罗讷河边。通过这条路，就可以沿罗讷河南下到达马赛湾，与德米狄亚大道会合。从德米狄亚大道西进到纳博讷后，距比利牛斯山脉就只有100余公里了。庞培所说的“对罗马更有利的路”，实际上指的是对军队的移动更为有利。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这段距离，一般来说行军只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庞培却走了一年。他率军开山铺路，在阿尔卑斯山中建设整备基地，监视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塞多留的动向，使塞多留军的士气有所动摇。庞培还把南法地区的居民按照罗马行省的方式进行管理。庞培认识到，由于塞多留成功的游击战术，想在西班牙就地解决军队的补给是不现实的，如果强行在当地征收军需物资，就会逼迫西班牙的民心完全倒向塞多留一方。为避免这一问题，就只能先行建设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军事补给线，使之快捷通畅，并使沿途的高卢地区安全稳定。

由于这些因素，庞培真正介入西班牙战事，实际上是从公元前75年

春天开始的。对于罗马来说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负责塞多留战事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如其名字中的尊称“皮乌斯”所代表的意义一样，是个慈悲宽忍的君子，他和新来的年轻将军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强好胜、固执己见的事情。老将和小将采用分兵合围战术，把塞多留包围起来。尽管已被包围，但使用游击战术的塞多留仍很顽强。

两军对阵，如果是正面相遇的会战，不论结果好坏，总是可以迅速分出胜负。但若是游击战的打法，双方之间没有正面会战的机会，就会长时间胜败不明，且容易把整个战区化为焦土，就会出现生活无着的人群，其中的男人就会加入军队以解决饥饿问题。此时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对抗霸权国罗马的是塞多留，而西班牙原住民对把塞多留驱赶出来的“苏拉体制”并没有什么仇恨与敌意，双方的战争与他们本来毫无关系，但是因塞多留对抗其罗马支配者的战争而成为难民者，很容易就会加入塞多留阵营。尽管罗马方面盼望庞培在进入西班牙的第一年即能果断发起攻势，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但现在看来这个梦想破灭了。

当年冬天，庞培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要求增援的信，这封信的最后四分之一是这样写的：

> 我军和敌军的状态完全相同，罗马军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塞多留军也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这样下去，要么是我们放弃西班牙回国，要么是塞多留舍弃只剩下饥饿的西班牙到意大利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意大利都将被置于拖欠军饷的军队来袭的危险之中。
>
> 为此，我忠告你们，并恳请你们理解，我不能停止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出现不得不放弃西班牙战线的被动局面。由于罗马军和塞多留军的连续战争，整个西班牙东部地区已近荒芜。迄今未遭到敌人毁坏的只有沿海各城市，这些对罗马友好的城市的居民，也难以承受再增加的战争经费的负担。南法的高卢行省，去年已经负担了梅特鲁斯军队的战争经费和军粮，且今年农作物歉收，收获的粮食只够他们勉强维持口粮之用。

为了军团的运行，我不仅花费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并已经借债筹措军费。

现在，我只有向你们请求支援这一条路了。如果元老院否定我的意见，不能作出支援在西班牙的罗马军的决断，那就只有一个后果——战场从西班牙转到意大利！

这封信在第二年年初的元老院会议上被宣读后，由于当时米特拉达梯日渐暴露侵略意图，必须商讨对策，因此对是否支援庞培，元老院内赞成与否定两派意见互不相让，后在苏拉体系的“第一把手”卢库鲁斯的坚持下，元老院接受了庞培的请求，向西班牙增派了两个军团即1.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军费也得到了补充。

即使这样，“塞多留战争”还是又耗费了两年时光方才结束。这场战争，除了证明塞多留的战术才能和在地势复杂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有效性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最后，被罗马军穷追不舍的塞多留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沉湎于嗜酒之中的塞多留被佩佩那暗杀，这才导致了战争的结束。

除了反对苏拉之外，对罗马一直忠诚的塞多留死于50岁。没有了塞多留，他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不是罗马军的对手，一败涂地。公元前72年入冬之前，梅特鲁斯·皮乌斯和庞培两位将军，终于能够向元老院报告战争结束的喜讯了。

元老院得悉“塞多留战争”结束的消息后，与其说是大喜过望，不如说是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就在罗马脚下的意大利半岛内，一年前即公元前7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角斗士起义——斯巴达克斯起义。

出生于后世的我们接触到的希腊、罗马文明，是历经2000多年留下来的壮丽的遗迹，收藏在美术馆中的造型艺术，以及作为文化教养被传

承的哲学、历史、文学等等。一旦接触到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谁都会发出赞叹，赞叹这些伟大、卓越的创造。但在赞叹之余，我们也会产生疑问——创造了如此优雅、高尚的文化文明的希腊、罗马人为什么还要实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耶稣基督说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他并没有说信奉不同“神”的人群之间也是平等的。按历来的历史观，中世纪应该比古代更进步，而从中世纪开始形成的基督教文明也没有全部废除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禁止把基督教徒变成奴隶。因此，将犹太教徒关进强制收容所的做法，从人道的角度说是错误的，而在基督教看来，就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上所写的那样，把“不信仰基督就没有自由”的精神演绎成“用劳动折磨来换取自由”的歪理邪说。

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人类有“人权”这个概念始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从1772年的英国到1888年的巴西，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在这100多年时间里集中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法律上取缔了奴隶制度，但人类心目中让他人隶属于自己的潜意识是不能完全去除的。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古代。首先以公元前5世纪全盛时期的希腊为例，把学者们对雅典人口的推算成果介绍如下：

拥有雅典公民权的雅典市民——4万人（这只是父母双亲都出生在雅典、且本人拥有投票权的自由公民的人数，不包括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和女孩子）。

在店铺或农庄劳动的成年男性奴隶——3.5万人。

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2.5万人。

由奴隶所生，或买来在家庭内做杂务的未成年男女奴隶——1万

人。

在矿山工作的奴隶——2万人。

在希腊的雅典，不认可给予奴隶自由使之变成“解放奴隶”的做法。就连出生于雅典的自由民，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斯巴达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就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这就是在公民权问题上的“雅典方式”。这样一来，即使是获得自由的“解放奴隶”及其后代，想要获得有投票权的雅典公民权，只能是梦想。

在雅典，技能不同的奴隶，买卖价格是不一样的。现把奴隶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

一、掌握熟练专业技术者——医生、技师、制作高级制品的高级工匠，例如在壶上绘画的手艺人。

二、具有一般技能者——如店铺的掌柜、一般工匠、艺人。

三、掌握舞蹈和奏乐技能的女奴隶。

四、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五、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工作的男女奴隶。

六、未成年的奴隶。

上面从一到五的奴隶价格，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可达到40：1。掌握熟练技术的男奴隶的价格，大约是最下层雅典市民年收入的两到三倍。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正处于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时期，自然与雅典有很大的区别。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口，学者们有如下的推算结果：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90万人。

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即罗马本土），包括60岁以上老人和女孩子的自由民总数——600万到700万人。

奴隶——200万到300万人。

以上数字不包括各行省特别是奴隶众多的西西里岛。

这200多万奴隶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劳动的具体数字并不清楚，但奴隶的价格是知道的。现将其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一、教师——即为罗马中上阶层的“良家子弟”教授希腊语和辩论术的家庭教师。这是一个被希腊人垄断的市场。这种奴隶的卖价很高，大约相当于罗马市内独栋住宅或那不勒斯近郊海滨别墅的价格。买者既然花大价钱作了这样的投资，虽说是奴隶，自然也是要厚待他们，奉为上宾。假如有个头疼脑热，也会受到周到的照顾。在罗马教师体罚学生是不能宽恕的，但诸如学生在学习希腊文时如出现句子结构错误，教师偶尔拽拉一下学生的耳朵，家长也不会提出抗议。这些都是为了树立教师奴隶的威信。

二、掌握熟练技术者——医生、建筑师、雕刻师、画师。

罗马人自身就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但他们把建筑和雕刻、绘画、马赛克等造型美术的工作交给掌握相关技术的奴隶去做。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是由自己而不是奴隶来从事这类技术工作。

三、具备一定的高级技能者——指从事交易活动、经营农庄、给主人当秘书等具备一定头脑和知识的奴隶。

承担罗马国政要务的政治精英们开销都很大。一切高级官吏都是由

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肯定需要花钱拉选票。比拉选票更需要花钱的，是那些为了得到当权者的欢心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例如主办一个精彩的运动会，或者修复一条公路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捐赠与支出。但是，对元老院议员又有除经营农庄之外不得从事其他方面经营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于是很多议员就把被禁止经营、但能够赚取利润的贸易及其他经营活动以可信赖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去做。发展到后来，奴隶们不仅仅是把名字“借给”主人，而是也承担经商的具体实务。因此，具备经商才干的人，即便是奴隶，在罗马也是受欢迎的。

奴隶的作用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在其他方面能够成为主人得力助手的奴隶，也是高价交易的。顺便说一下，就连罗马首屈一指的学问家西塞罗著作集的编辑工作，也是由承担西塞罗秘书工作的奴隶完成的。

四、一般手艺人——如店铺的掌柜、工匠、艺人、角斗士。

五、具有舞蹈和演奏乐器技能的女奴隶。

六、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但如果是有名的厨师，则被视为掌握熟练技术者，被以高价进行交易。而且，同属在家庭内从事劳动的奴隶，管家以及担当主人孩子养育工作的乳母和保姆，在奴隶中也是属于地位较高、价格亦较高的。

七、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从事劳动的奴隶。

如果是家庭规模的农庄，农业奴隶往往被当做家庭中的一员来看待，待遇会稍好一些。而在大规模的农庄及矿山劳动的奴隶，就会像希腊的雅典那样，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受到严苛的待遇。由于西西里有很多大庄园，所以两次奴隶起义都发生在那里。而起义的原因，一是对苛刻残酷的待遇感到绝望，二是奴隶们在牧羊时，可以在山野里自由散步，在领略到自由的美好时，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被限制自由的

痛苦。

八、未成年的奴隶。

罗马奴隶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别，可达到100：1，比雅典的40：1又要高出很多，这是由于担任家庭教师的希腊裔奴隶价格高企造成的。另外，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在奴隶的供给增加、购买奴隶更为方便的同时，有很多的人将购买奴隶当做一项投资，很多资金投入到奴隶交易中来，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增加得更快，抬高了奴隶的价格。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在罗马社会，奴隶数量已经达到了自由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如此众多的奴隶，却很少发生奴隶起义，这使我们感到惊异。而导致军队介入镇压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只有公元前135年、公元前104年以及公元前73年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而前两次都发生在大规模庄园较多的西西里岛，只有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罗马国境内。

罗马社会很少发生奴隶起义，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很多罗马人把奴隶当做家庭的一分子，关系较和睦。第二个原因是奴隶之间划分为不同阶层，像那些被主人奉为上宾、享受优厚待遇的家庭教师奴隶，是不可能与牧羊的奴隶结成统一战线的。

第三个原因是罗马能够实现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转换。在罗马社会，奴隶成为“解放奴隶”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如果成为“解放奴隶”，只要再有一定的资产和继承人，就能够取得投票权，成为罗马公民。即使是没有资产的“解放奴隶”，到其儿子那一代也可以成为完全的罗马公民。

与希腊人不同，罗马成年男子总是留短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仪表整洁。而每天为主人剃须就是充当保姆的奴隶的工作。格拉古兄弟

和尤里乌斯·恺撒的事例说明，忠实的奴隶到最后时刻都会和主人共命运。

人与人之间亲属般的关系，在社会上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积极的作用，奴隶之间分为多阶层，获得自由并取得公民权的可能性，主人和奴隶之间重信守义的精神等等，可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罗马社会中特有的奴隶特征。

古代罗马人对奴隶的定义是“不能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按照这个定义，罗马附属各行省的人民，也可以说是半个奴隶。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在服兵役时，和奴隶一样不能志愿参加罗马军。与奴隶不同的是义务，行省公民要缴纳行省税，以纳税的形式承担防卫的义务。而奴隶因为不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自然也没有缴税的义务。

然而在奴隶中，也还是有人宁愿承担缴税的义务，也要争取“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交会处的城市加普亚，以集中了很多角斗士训练营而知名。这些角斗士训练营是私营的，其商业模式是：经营者从奴隶市场买来体格健硕的奴隶，将其训练成角斗士，然后出租这些角斗士参加在罗马及其他城市举办的角斗士比赛以收取租金，赚取利润。角斗士比赛野蛮而激烈，虽然斗败的一方不一定死在角斗过程中，但如果观众认为角斗士的姿势、动作等不够精彩，不够刺激，就会叫嚷着让角斗的胜利者将失败者杀死。角斗士不全都是奴隶，也有自由人选择角斗士为职业。

角斗士出租的准确价格不详，但应该是比较高的。西塞罗的一个好朋友、同样也是当时知名的学问家阿提科斯就在加普亚经营角斗士训练营。阿提科斯是个精明人，他参与的文化活动姑且不论，如果是经济活动，他只染指那些在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由此可见这是个赚钱的生意。

其实经营角斗士训练营与经营其他正规的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西班牙人喜爱斗牛、美国人痴迷拳击一样，罗马人大概是继承了伊特鲁里亚民族的传统，热衷于角斗比赛。

就在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里，有一个按拉丁语发音叫“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他是出生于色雷斯的奴隶。色雷斯南与希腊的马其顿接壤，东临黑海，罗马的霸权那时还未到达那里。马其顿变为罗马的行省后，罗马要承担马其顿北方防卫的义务。在那一带，时常有未开化民族从难以生存的地方向容易生存的地方迁徙的情况，那些民族与试图阻挡他们的罗马军之间屡屡爆发冲突。斯巴达克斯就是在这类武装冲突中战败被俘的。

传说中说斯巴达克斯是色雷斯王子，这不大可能。由于色雷斯地区那时尚未统一，他最多也就是众多部落中某个部落酋长的儿子而已。尽管不是王子，但斯巴达克斯的确是个具有领导素质的男人。

以斯巴达克斯为首的74名角斗士突然从训练营集体脱逃，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斯巴达克斯之乱”。被强迫生存在死亡边缘上的这群奴隶发动的起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段插曲，引起了现代人强烈的兴趣。以斯巴达克斯起义为主题的小说和电影都很有名。《斯巴达克斯》这部电影，主角斯巴达克斯由柯克·道格拉斯饰演，讨伐斯巴达克斯的罗马军队指挥官克拉苏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这部电影不太忠于史实，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并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史实进行诠释。片中的反面角色自然是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克拉苏。这部电影自然能给观众带来愉悦，但历史细节的错误相当多。例如当时仅有27岁、不可能成为元老院议员的尤里乌斯·恺撒却端坐在元老院议员的座位上。更可笑的是由查尔斯·罗顿饰演的每每与克拉苏对立、同情斯巴达克斯的元老院长老议员的名字，居然叫格拉古。

描绘角斗士斗豹子的马赛克

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已辞世，并未留下子嗣。二人去世后，格拉古家即已绝后。现代欧美人在想要把罗马人描绘成对被残害的人如何具有同情心时，特别爱把格拉古这个名字拿出来，格拉古成了古罗马好人的代名词。这确实比较有趣，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遭横死，却能名传后世，与人们的同情心不无关系。

公元前73年，从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集体逃出的斯巴达克斯等74名奴隶，携带着训练营的武器逃进了庞贝城后面的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火山发生毁灭庞贝城的那场大喷发是在150年之后。当时的维苏威火山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秃山，山顶一带林木葱葱，适合隐蔽与防守。

在维苏威火山据守的奴隶角斗士的首领，自然是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相当于副头领的，是高卢人克里克斯和奥诺马乌斯。74人中以日耳曼人居多。

尽管来自不同种族，但都是些经受过长期角斗训练的男子汉，拿起武器，可以以一当百。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下山来，到附近的庄园去掠夺财物。

罗马政府一开始并未对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派出了不足3000人的讨伐队去平定起义，结果是轻而易举地败给了斯巴达克斯。角斗士们战胜罗马正规军的消息，在传到元老院之前已经传至四面八方。维苏威火山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散布着很多大的农庄，在那里劳动的奴隶们扔掉锄头和铁锹，纷纷投奔维苏威火山。

这回罗马政府不能不当真了，派出了执政官率领的两个军团镇压奴隶起义。然而还是败给了斯巴达克斯。好不容易逃回来的几个士兵带回来了两个军团几乎全部被歼灭的惨痛消息。斯巴达克斯们还逼着被俘的罗马士兵像奴隶们那样举行角斗比赛，以作为对罗马人的报复。

两次战胜罗马军的斯巴达克斯在意大利南部名声大噪，投奔起义军的已不再局限于从农庄跑出来的奴隶，还包括很多像奴隶一样日复一日地劳动却得不到温饱的下层农民。起义第二年即公元前72年春，起义军声势浩大，据说已达7万人的规模。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可以兵分两路对付罗马军了。

队伍规模的扩大本来是对起义军有利的好事，但如果指挥系统不能统一，部队规模大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斯巴达克斯并不想对抗罗马、征服意大利，他希望能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归故乡，但克里克斯满足于掠夺富饶的南意大利。两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增多。

而罗马政府方面，却在公元前72年年中痛下决心，要全力剿灭斯巴达克斯起义。

公元前72年的两位执政官，全都投入了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军的行动。两位执政官各率2个军团1.5万人，以4个军团3万人的兵力来对付兵分两路的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

克里克斯率领的起义军，被罗马军成功地逼进了加尔加诺的山中，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起义军败给了罗马军，克里克斯战死。斯巴达克斯则巧妙地避开了罗马军的围攻，率领4万名兄弟沿亚得里亚海海滨从意大利半岛北上。两位执政官率4个军团紧追不舍，在皮契诺附近追上了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的军事才能远在平庸的罗马将军之上。他才不会犯与4个军团同时开战的低级错误。这个色雷斯出身的角斗士，先率部下与其中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战斗，击败对方后，马上挥师袭击另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打了胜仗后，他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卢比孔河附近。途中恰好遭遇南下的北意大利高卢行省总督率领的军队，又把总督的军队打败了。对罗马而言，真是脸面失尽，奇耻大辱。而对于斯巴达克斯来说，则意味着返回故国的道路已经开通。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为何斯巴达克斯又改变了主意。如果他此时想越过阿尔卑斯山北逃的话，已无人再能阻挡，他却突然又掉头率军南下。也许是他不能无视部下兄弟们的意愿——由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均是未开发的贫瘠土地，与其向北回到色雷斯，不如南下去征服富足的西西里岛后在那里定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罗马绝对不肯让他占领西西里岛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斯巴达克斯率领4万起义军又往南方打，终于又杀到了意大利的南端。这一路上，他的队伍不停掠夺路过的村镇。尽管又有一些奴隶和下层农民加入他的队伍，但意大利境内的所有

村镇，没有一个站到斯巴达克斯一边。

斯巴达克斯尽管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南端，他却难以渡过墨西拿海峡。罗马政府派出的由法务官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率领的8个军团5万军队，正沿海峡一带张网以待。

克拉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军事才能，且这一年已42岁了，他深感受委托率领8个军团的庞大兵力镇压起义责任重大。而且，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庞培，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意识，并为此焦躁不安。他已经得知西班牙的“塞多留战争”结束的消息，庞培凯旋只是时间问题。假如庞培凯旋，对斯巴达克斯起义感到棘手的元老院，肯定会让“塞多留战争”的得胜将军取代自己这个没有明显战绩的将领。克拉苏对此深感恐惧。

尽管手上掌握着8个军团5万人马，克拉苏在与斯巴达克斯的第一场战斗中，虽说损失不大，但还是吃了败仗。背靠墨西拿海峡的下一场战斗，对克拉苏的仕途来说生死攸关，意义重大。

克拉苏决定用重典治军。他拿第一次战斗中临敌而败走的一个中队开刀，严惩这个中队以震慑全军。他命令使用以“什一杀”而闻名的最残酷的刑罚，即从这个中队的600人中抽签选中倒霉的60人，并由运气还不算太坏的其余540人用棍棒将这60人击毙。这种残酷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只在出现反叛行为时才加以施用。克拉苏无奈之下滥用严刑，没想到却在全军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居然把想渡过墨西拿海峡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军逼进了山里。

斯巴达克斯军逃进了被称为“险峻之山”的山岳地带。在现代的意大利，这一带因成为拐卖人口犯罪团伙的藏身之处而闻名。这里紧贴大海，地势险要，如果想出动军队进山搜捕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00年之前的克拉苏费尽心机和军力想把斯巴达克斯及其起义部队

从崇山峻岭中赶出来，但无法奏效。好在幸运终于降临到克拉苏头上，斯巴达克斯自信手中有4万雄兵，而且迄今为止屡胜罗马军，估计比较轻视对手，竟然自己率军从山里出来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巴达克斯与西里西亚的海盗达成协议，海盗们为他们备好船队，让他们绕到布林迪西后逃往小亚细亚。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斯巴达克斯是率领起义军下山了，并且与等待已久的罗马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这回斯巴达克斯彻底失败了，4万人几乎全部战死。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没有发现斯巴达克斯的遗体。被俘的6000人被处以罗马社会的极刑，即被绑在十字架上，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历经长时间的痛苦后死去。根据克拉苏的命令，阿皮亚大道沿线竖立的这种十字架，从加普亚一直排到罗马。

从克拉苏接受8个军团重托之日起，6个月后终于实现了剿灭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战果。2个月后，庞培自西班牙凯旋。

任何体制都有正负两面。如果是正面的因素发挥作用时，不论谁负责执行，都能获得一定成果。而如果是负面的因素发挥作用时，就可能出现因得到少量的成果却导致全面失败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况下，整个共同体（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就可能会蒙受过大的实质性损害。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忠实于体制。但在非常时期，则可能会出现即使想忠实于体制但现实情况不允许的事态。因此，只有确立科学而适应性较强的体制，才能避免体制与现实冲突的事情发生。有冲突就会产生“例外”，而第一次的“例外”总是难逃制造下一次“例外”的宿命。

例如，若想维持苏拉努力修复的元老院体制，就不能过于突出某个人的作用，前线的总司令就必须每年更换一次。

这个制度在当年罗马军越过墨西拿海峡，以西西里岛为战场的第一

次布匿战争中不是问题，在以本国为战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不是问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总司令也好，士兵也好，每年都能更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17年间，为对抗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罗马每年平均要投入10名高级将领，这些具有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资格的高级将领须“轮流坐庄”似的行使“绝对指挥权”，坚守在前线，也能够做到让“少数领导制”充分发挥机能，不使某个人的力量过于突出。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后半场后出场的大西庇阿，因其取得了卓越的功绩而使其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但战争结束回复到平常时期后，大西庇阿马上就在政治上垮台了。而且，在汉尼拔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非常时期”结束后，马上恢复了执政官任职期满后再次获选必须间隔10年的做法，并坚持了1个世纪。

然而，此后发生在北非的朱古达战争却使马略在担任一任执政官的情况下获取了北非战争连续3年的最高指挥权。而在日耳曼人大举入侵之际，又不得不让马略连续5年当选为执政官。

此外，因“塞多留战争”而被派到西班牙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在西班牙前线当了8年的最高指挥官，派去支援的庞培也5年未能归国。还有，为了对付苏拉死后再度蠢蠢欲动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而派到小亚细亚的卢库鲁斯，在公元前71年这个时点上连何时回国的日程表都还没有，结果是他在东方连续驻扎了7年。为什么会连续出现违反过去的体制规定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有能力的指挥官可以更有效率地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如果还是拘泥于老的体制，指挥官频繁更换，军队的战斗力得不到有效发挥，就会在实质上损害罗马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罗马的霸权已经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但随着霸权的扩大，想要坚守元老院主导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苏拉体制”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领导阶级层面，就连被领导阶级也遇到同样问题。

总司令如果长期在外，其手下的士兵们也只能长期驻扎在外。因为军团换防走陆路大约需要两个月，如果坚守“苏拉体制”，一年来回就要折腾两次。而且，军队的特点是指挥官一声令下，士兵们应该像指挥官的手足那样协调一致，令行禁止，只有官兵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达成默契，军队才能更有战斗力。

另外，尽管实行了志愿兵制，但由于常年执行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任务，导致士兵们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如果过于强化元老院主导的体制，这些士兵们就容易在公民大会上形成反元老院的势力，而护民官就成为他们话语权的代表。而“苏拉体制”导致了护民官素质降低，自然也会引起中下层人民的不满。

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订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个具备汇集民意、代表民意能力的护民官。结果反而是元老院议员中的开明人士直视现实，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认为有必要解除对护民官任职的这些限制。

现在我们回到公元前75年，当时西班牙的“塞多留战争”尚未见分晓。被选为这年执政官的是盖乌斯·奥利乌斯·科塔。奥利乌斯家门以学者之家著称，家中的女性都懂得希腊语，尤里乌斯·恺撒的母亲奥利娅即出身于奥利乌斯一门。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的学者都由希腊人把持，身为罗马人而能被称为学者的，只有法学家。科塔就是一位颇具学识的法学家。

奥利乌斯一门与格拉古兄弟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一门同属于“平民贵族”。奥利乌斯·科塔也算得上是元老院阶级成员，但其本人一直被视为开明派。苏拉在整肃政敌能够放过科塔，与他的学者地位有很大关系。

这位学者出身的执政官科塔，在说服了元老院议员们之后，相继向

公民大会提出了自己的法案：

第一个法案提出有护民官经历者在经过公民大会选举通过后可以再担任其他官职。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订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由此被颠覆。

第二个法案是规定西西里产小麦出口到罗马，必须要确保一定的数量，并将其作为义务来承担。紧接着，被苏拉定为“废案”的《小麦法》得以重新生效。

奥利乌斯·科塔被认为是个稳健派。他预先设定了因《小麦法》而获得利益的人数上限，即接受补贴的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每个月的配给量是每一户主5摩第（1摩第约合9升，合计为45升左右）小麦，这个数量大体上相当于当时罗马囚犯的口粮。根据科塔的法案，1摩第小麦的配给价是6.3阿斯。这个价格没有回复到苏拉废除《小麦法》前的象征性价格，而是与当初盖乌斯·格拉古时代的价格基本持平，大约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

学者执政官科塔更为稳健的一个政策是，尽力消解社会上因苏拉整肃而聚集不散的怨气与不平。

苏拉在整肃政敌时曾将列入“黑名单”的那些人的财产没收并予以拍卖。按说竞买者支付的拍卖价款应该上缴国库，但苏拉通过设立相关法律的形式免除了竞买者的上缴义务。竞买这些财产的几乎都是苏拉的“解放奴隶”或类似克拉苏这样的属于苏拉派的人士。苏拉就这样把应该进入国库的资金当做了给这些人的“奖金”。随心所欲地做这类荒唐事似乎是苏拉的恶癖。

针对这个问题，执政官科塔提出议案，决定废除苏拉豁免上缴拍卖收入义务的法律，这个议案在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因当初竞买而大发横财的克拉苏等人，只能将购买价款上缴给国库。科塔还在公民大会上

向公众承诺，收上来的这笔资金将专款用于西班牙“塞多留战争”的经费。

尽量消除因被苏拉整肃而成为牺牲品的人们的怨气，避免罗马社会发生分裂，这是奥利乌斯·科塔努力去做的事。他又提出了新的法案，为那些被苏拉定为“国家公敌”的人们恢复名誉。对于已经死去的人，也只能是恢复他们生前的名誉；而对于尚活在世上的人，除恢复名誉之外，还可以担任公职。实际上，这些人在得知苏拉死讯后，已经陆续回到了罗马，现在以科塔家门名命名的这部《奥利乌斯法》生效后，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归社会了。这部法律的受益者中，就包括时年25岁的尤里乌斯·恺撒。

很快，盖乌斯·奥利乌斯·科塔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了。公元前74年，他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赴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担任总督。但是，这位具有良知、学识丰富的学者，在战场上就有点玩不转了。面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攻势，也只能仰仗武夫卢库鲁斯了。

就这样，“苏拉体制”在苏拉去世后不足3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而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最后一次重击，恰恰来自公认的苏拉得意门生——庞培与克拉苏，特别是在苏拉幕僚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庞培，成为葬送“苏拉体制”的最关键人物。

公元前72年“塞多留战争”结束后，罗马的两位带兵将军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温良敦厚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忠实地执行苏拉定下的法律，在率军回到罗马边境的卢比孔河时，将所率领的军队解散。而与梅特鲁斯·皮乌斯同样率领部队回国的庞培，却从西班牙到达“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即南法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从那里越过横断高卢的阿尔卑斯山，与公元前71年夏天到达“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即北意大利行省），从西北向东南到达卢比孔河。但他不仅没有在这里解散军队，反而率军渡过卢比孔河，一直开到罗马郊外宿营。他向元老院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给自己指挥下在西班牙战斗的士兵们分配土地。

二、给自己举办凯旋式。

三、提名自己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候选人。

其实庞培早在公元前81年已经享受过举行凯旋式的荣誉，是经当时具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苏拉批准的特例。那时庞培才25岁，成为罗马史上最年轻的凯旋将军。凯旋式是罗马男人最为看中的最高荣誉，十分难得。就连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救国英雄大西庇阿，也是在扎马会战战胜汉尼拔之后归国时才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殊荣。那时大西庇阿已经34岁了。拉丁语中有一个词“阿德勒琼斯”，有“年轻”、“思春”等意，指从16岁举行成年式后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罗马人看来，这个年龄段的男子尚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男人。

公元前71年时的庞培已经35岁了，仅从年龄上看，他具备了可以举行凯旋式的资格，但问题在于庞培的要求与苏拉进行的改革大相抵触。

根据苏拉改革后的制度，30岁方可获得财务检察官候选人的资格。被选为财务检察官后，有一年的任期，任期结束后31岁，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其后经历8年元老院议员经验，39岁时获得法务官候选人资格，当选法务官后，可获得一个战略单位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一年任期结束后，会去10个行省中的某一个任总督，负责行省的治理与防务。历练两年42岁了，此时才能够获得最高官职——执政官的候选人资格。这些是苏拉费尽心机为修复“元老院体制”而进行改革的核心架构。

与雅典实行的民主政体不同，共和制时期罗马的政体，是被称为“少数领导制”的寡头政体。虽说担任国家公职要经过公民大会选举的“考验”，但这些官职的候选人是由元老院这个未经过选举“考验”的机构提出。苏拉认为，如果将国家比做人体，元老院就是心脏。为了强化元老院的功能，苏拉把元老院议员的数目从300人翻倍至600人。随着议

员队伍的扩大，如果不能严格遵守前述的“年功序列”制度，元老院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个组织的功能。如果庞培于公元前70年就任执政官，他只有36岁，距42岁以上才能担任执政官的资格要求，足足差了6岁。

庞培缺乏的不只是年龄。由于连财务检察官的经历都没有，他连元老院议员都不是，更不用说他也没有法务官的经历。西班牙战事中按视同前法务官的资格授予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统率军队，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作为一个特例得到认可的。

然而这次庞培没有要求为自己再开特例，他说自己已经具备了与举行凯旋式相匹配的辉煌战绩，凭此战绩，他同时也具备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

庞培的逻辑很简单，有实力，就有足够的资格！这下可让元老院为难了。如果承认实力主义，那么靠“年功序列”制才能发挥作用的“元老院体制”就只有崩溃这一条路了。面对庞培以军队相要挟的“无理要求”，元老院最初并没有答应，而是找到刚刚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被认为与庞培同属苏拉一派的头面人物克拉苏，当时克拉苏率领着在意大利境内唯一合法集结的军队，元老院期待手握重兵的克拉苏能够努力说服庞培收回自己的要求。

令元老院没有想到的是，以前对庞培显赫一时、出尽风头一直心怀嫉妒的克拉苏，这回却借着让他游说庞培之机提出了他也想当执政官的要求。而且与庞培一样，克拉苏也把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后本应解散的8个军团带到了首都附近。庞培也好，克拉苏也好，在率兵“进军罗马”这件事上，倒真是苏拉名副其实的徒弟。

克拉苏本身是元老院议员，又有法务官的任职经历，年龄43岁，作为下一年度执政官的候选人，从年龄和资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此人口碑甚差。

克拉苏出身于称得上“平民贵族”之家，属于元老院阶级。既然身为元老院阶级，那么除农庄经营之外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但克拉苏家的经营活动涉猎广泛，不用说都是借用奴隶或“解放奴隶”名义进行的。在克拉苏父亲那一代，他们家就已经被称为“罗马首富”了。到他这一代，在家族本已拥有的巨额财富之外，又增加了大量的位于首都罗马的房地产。被独裁官苏拉列入放逐名单的人们被没收的房产，很多都在拍卖中被克拉苏低价收买，大赚一笔。

在罗马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如果谁家发生了火灾，比消防队来得更快的是克拉苏的马仔。”先行赶到火灾现场的克拉苏家的人，会给后到的消防队一些金钱方面的好处，让他们推迟救火行动。这个期间，克拉苏的手下人会在燃烧着的房子前与这家的主人谈生意，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后，才开始救火行动。

克拉苏在首都罗马有很多房产，他如果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改造为防火、坚固又美观的住宅，也算是为首都的住宅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是具有经济头脑的克拉苏不会那样做。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后，对首都罗马的住宅需求旺盛，但若将破旧房屋改造为结实、美观的住宅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这些房子的租赁价格却达不到能收回投资的水平，因此不划算。由于付得起高额租金的还是少数，需求最多的，是那些低租金的普通住宅。于是，“罗马首富”克拉苏在首都内的房产，大部分都是晃晃悠悠的陋房旧屋。

像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在人民中间享有威望。然而克拉苏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具有罗马第一的财富地位，也应该具有罗马第一的政治地位。而实际上他尽管能当选每年有8个名额的法务官，但要想当选只有2个编制的执政官，即便动员了所有的“后援者”，仍感觉悬悬乎乎。克拉苏太想当执政官了，为此他把长年以来与庞培的对抗之心暂且搁置一边。

在就任执政官问题上同样处于负面评价的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达成了

秘密协议：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克拉苏承诺在元老院内为提名庞培为执政官候选人进行疏通。作为回报，庞培在军队中帮克拉苏拉票，因为庞培在军队中甚至在克拉苏手下的士兵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庞培可动员士兵们投票支持克拉苏。在那个年代，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人，是不能作为志愿兵加入罗马正规军的。因此谁拥有士兵，谁就等同于拥有选票。二人达成协议后，各自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即使没有了军队的压力，元老院的软弱无力状态还是没有改变。对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庞培进行的质询，除了一场闹剧之外什么实质性内容都没有。元老院的长老议员负责询问被质询的庞培：

“阁下可有参战的经验？”

35岁的庞培充满不屑地回答：

“参战的经验？我只有指挥打仗的经验。”

元老院会场当即一片哄笑。

公元前71年年末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庞培和克拉苏的得票数甩开了其他候选人，双双当选为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由此，“苏拉体制”又坍塌了一角。

至此，元老院阶级的唯一指望，是希望身为富裕阶层的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能够为富人的“要塞”元老院阶级谋一些利益。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庞培和克拉苏的确是富人，现在也的确有政治地位。但他们二人想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增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绝不会满足于只做一年的执政官。为了维护以后的权力，他们不能脱离支持他们的阶层。在公元前70年二人任期内他们提出的法案的内容，足以令保守的元老院议员们绝望。这些法案的要点如下：

一、完全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不管是贵族还是无产者，或者是拥有相当于中等阶层市民的财产和5岁以上的男孩子的“解放奴隶”，只要已成为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在执政官手中。执政官因军务不在首都时，由法务官代其行使召集权。但是，选举执政官以下官职的公民大会，则由护民官主持。此外，除世代传承的名门望族外，包括“平民贵族”在内的所有平民都能参加的平民大会，也是由护民官主持。自公元前287年《霍滕修斯法》生效后，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即使没有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也可以作为政策而实施。是苏拉否定了《霍滕修斯法》，改为平民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均不得生效。

庞培和克拉苏的法案，主张废除苏拉所制订的相关法律，公民大会通过了二人的法案，由此《霍滕修斯法》重新生效。

二、改革陪审员制度。

由于司法审判中陪审团成员的构成，能够决定审判的方向与结果，对罗马公民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也由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格拉古兄弟提出改革陪审员制度以来，已经经历了几次反复。

罗马变为共和政体后，陪审团成员长期由元老院议员垄断。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将陪审团成员由全部为元老院议员组成改为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各占二分之一。但是，他死后，这项改革未能形成法律。公元前122年，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新的《陪审员改革法》法案，将陪审团成员改为全部由“骑士阶级”的人士组成。这个法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了通过。到了公元前82年，独裁官苏拉又将其改回为陪审团成员全部为元老院议员组成。

公元前70年，奥利乌斯·科塔的弟弟在得到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积极支持后，提出了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新法案，把陪审团成员的组成改为由元老院议员、“骑士”和平民三大阶级各占三分之一组成。

由这个改革法案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公元前70年庞培与克拉苏已成为各自支持阶层的利益代表，庞培代表的是以士兵为主体的普通平民，克拉苏则代表着日渐兴起的经济界。

关于庞培与克拉苏二人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取向，历史研究者众说纷纭。从这二人日后的行为来看，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始终如一的明确的政治取向。特别是庞培，日后又变成了“元老院体制”的“守护神”，因此他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真的以保护民众利益为目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诽谤庞培。以他的性格，他只做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尽管他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好事，但这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的“善举”。说穿了，做那些他认为“必要的事”，都是为了选举政策，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因为在共和制的罗马，决定任何事情都需要公民手中的“票”。

苏拉是个善恶分明的人，为此他常常招致憎恨，但没有人蔑视他。苏拉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让“元老院体制”具备应有的机能，再度发挥领导作用。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苏拉清楚不能太在意“选票”。他坚信只要再度确立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政治体制，就能够解决罗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苏拉的确有些怀旧情结，但他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如果不能坚持己见，稍有懈怠，顺从所谓的“民意”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改革就会半途而废，共和政体就会坚持不下去，那就只有实行君主政体了。在这一点上，苏拉其实是个罕见的现实主义者。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是“外观是民主政体，实际是由一人支配的国家”。但是，不仅后世的我们，就连古

代的罗马人也知道，“独裁者”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沦为由无知大众推动的政治格局，做出了很多愚蠢可笑而痛苦不堪的荒唐事，以致流传下来“众愚政治”这个专有名词。对当时的雅典政治感到绝望的，不仅是哲学家柏拉图，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甚至说出了“民主政体不适合治理大国”这样的名言。民主政体，并不是绝对的“善政”。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民主政体也有正负两面，听其自然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体。

苏拉是个清醒的政治家，由于他自己实施了独裁统治，他更加致力于构架一个能够在将来排除独裁危险的政治体制。在共和政体的罗马，也只有独裁官能够不受选票的左右自主制订政策。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要求政治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自有其道理。如果统治者想维持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格局，其实行的政策就会左右摇摆，结果是徒增国力的消耗。

但如果把视点转移到被统治者这一方面来又会如何呢？被统治者可能会这样评价——我不管你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得还不错就可以了。

苏拉公元前83年决意登陆意大利，用武力来推翻秦纳执牛耳的政府时，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一定会遵守关于在意大利半岛居住的自由民与罗马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法律。身为保守主义者的苏拉，内心深处肯定不认可这个政策，但在当时需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形势下，没必要因固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实行与全体意大利人为敌的愚蠢政策。苏拉违心作出的声明，当时对苏拉似乎不是个好事。但从结果来看，这个声明对苏拉，对意大利半岛上居住的大多数人，对整个罗马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庞培和克拉苏实行的政策，目的可能是为了拉选票，但带来了好的结果。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可以让“苏拉体制”下离心离德的民众

增强自豪感，看到了希望。而陪审团成员制度的改革，也使行省人民产生了“罗马的司法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公正”的好印象。

根据罗马的法律，在罗马的行省居住的人民，对罗马派来的总督的治理感到不满时，有权控告总督。但实际上，由于陪审团成员均由元老院议员担任，难免袒护总督，控告者大多是败诉。而就在庞培与克拉苏统治时期，即公元前70年，却发生了一起与以往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审判。

公元前70年春，西西里行省总督盖乌斯·威勒斯任期届满回国。他在总督任上的恶行在罗马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西西里行省人民向罗马法庭对盖乌斯·威勒斯提出了控告。

盖乌斯·威勒斯也是元老院议员，很多有影响力的议员都是他的朋友。这场官司，被告方的辩护人由昆图斯·霍滕修斯担任，昆图斯·霍滕修斯是当时罗马最高级的律师，评价很高，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能够当选第二年（前69）的执政官。除昆图斯·霍滕修斯之外，被告方的辩护阵营中，还能看到科尔涅利乌斯、梅特鲁斯等有势力的名门望族的身影。

担任原告方辩护人的，是时年36岁的西塞罗。西塞罗这次辩论的全文，在审判结束后，由他的朋友，经营着类似于现在出版社营生的阿提科斯刊行于世，而且有幸没有毁于中世纪，使现代的我们能够读到。那真是一篇与36岁的少壮派律师相匹配的、洋洋洒洒、充满力度、逻辑清楚、精彩绝伦的辩护文章。我不能不佩服此人具有的传媒业者的才能。

比起在美国法庭上听美国律师的辩护，会觉得西塞罗的辩护更加生动有趣，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仿佛历历在目。在罗马广场的会堂内旁听这场审判的普通百姓，也会从西塞罗的描述中对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如同身临其境。

然而，决定审判结果的，不是旁听者，而是陪审团。假如“苏拉体制”不变，陪审团成员全是元老院议员，让他们对被列为被告的自己人作出不利的判决，恐怕是相当难。但发生在公元前70年的这次审判，坐在陪审员席上的却是元老院议员、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阶级”和平民阶级代表各三分之一。

审判的结果成为传遍罗马所有行省的重大新闻。西西里行省人民最终胜诉，被告盖乌斯·威勒斯被判处将总督任上搜刮的财富全部退还，并且自请流放处分，勉勉强强才免去了牢狱之苦。

这次审判，使既非贵族且祖上没有人当过执政官的“新人”西塞罗名声大振，为野心家西塞罗打开了通往政界之门。

就这样，公元前70年成为“苏拉体制”的落幕之年。苏拉去世仅仅8年，他所精心构筑的体制彻底崩毁。破坏“苏拉体制”的诸多人物，除了奥利乌斯·科塔之外，都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这个体制。应该说，一个不能适应现实要求的体制，必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只不过借用了这些大人物的力量而已。

苏拉具备领袖的全部素质，只是在预见性方面有所欠缺。

破坏了“苏拉体制”才得以当上执政官的庞培，在一年任期将满时并没有表示出“恋栈”的动向。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忠实地执行苏拉制订的制度。执政官任期届满后，作为前执政官要转到行省去担任总督，这也是苏拉制订的制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庞培却不是苏拉制订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了，他拒绝去行省任职。正是由于庞培在这些事情上的举动，他被批评为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

而站在庞培的立场上，也不是不能够理解。在当时的罗马，庞培是公认的最优秀的武将。在公元前69年这个时点上，庞培能够发挥作用的行省，只有小亚细亚。也就是说，当时需要罗马派军队去解决问题的地

方，只有东方。其他行省，不用庞培也能搞定。但是，同属苏拉门下相当于庞培“大师兄”的卢库鲁斯，已经于公元前73年率军去了东方，至今未回。庞培自然不好再去了。

军队的统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始了一场战争，自己有能力将其圆满结束。

第二种类型，由其他统帅开始了一场战争，战争中途接手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后能够将其圆满结束。

第三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始了一场战争，并且作战勇敢、冲锋陷阵，但无力将战争顺利结束，只能够靠其他统帅来结束战争。

苏拉、庞培，还有后来的恺撒，属于第一种类型。

马略可说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朱古达战争前期的指挥官梅特鲁斯、塞多留战争时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只能归为第三种类型。卢库鲁斯虽然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但也只能属于第三种类型。他担纲指挥的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从公元前73年一直到公元前66年，足足打了7年。其间虽然打了一些漂亮的战役，但他只能算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却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出身于有名的平民贵族李锡尼乌斯一门。同属于这一门的克拉苏以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而出名。卢库鲁斯却是一个非常有贵族风度的男子，他可以熟练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文章，并能讲一口漂亮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识教养深厚，并有很强的审美眼光。

卢库鲁斯年轻时即已被苏拉赏识。他的政治履历是从“同盟战争”时

期担任苏拉的幕僚开始的。此后苏拉为了东征米特拉达梯渡海到希腊，他也追随苏拉离开了意大利。苏拉将筹组海军的大任交给了年仅二十几岁的卢库鲁斯，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完成了任务。在率领辛辛苦苦组建的海军船队赶往苏拉身边时，途中经停港口城市以弗所，还出了段小插曲。卢库鲁斯在以弗所遇到了被秦纳派来与苏拉为敌的罗马正规军将领芬布洛斯，芬布洛斯劝诱卢库鲁斯及其船队投靠自己一方，“弃暗投明”。当时苏拉被秦纳主导的政府作为“国贼”指名通缉，处境极其不利。身为罗马公民的卢库鲁斯如果背叛苏拉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是，刚刚进入30岁的卢库鲁斯冷淡地拒绝了芬布洛斯劝诱，离开了以弗所，赶往焦急地等待海军军船归来的苏拉麾下。假如卢库鲁斯的海军船队投靠了芬布洛斯，苏拉的对米特拉达梯之战，绝不可能那么快，并且以那么精彩的方式取得胜利。卢库鲁斯对比自己年长22岁的苏拉一直怀有仰慕之心，忠贞不贰。

苏拉对卢库鲁斯的信任也是坚定不移的。在米特拉达梯问题解决之后，苏拉即将返回意大利与秦纳决一死战，他把留守小亚细亚地区的任务留给了卢库鲁斯。苏拉很清楚，回到意大利后，与秦纳一派发生内战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仅从这一点考虑，让战斗顽强的卢库鲁斯共同返回意大利是有利的。但是，要想在民心上征服意大利，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者形象是苏拉能够打出的最好的“牌”。而为了确保这张“牌”的有效性，他离开后小亚细亚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卢库鲁斯的留守，实际上是肩负了更重的责任。

卢库鲁斯没有辜负苏拉的重托，完成了在小亚细亚“维稳”的任务。等他再度回到罗马，已经是公元前80年，此时正是苏拉独裁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年底，这个构筑“苏拉体制”的独裁者自请辞去独裁官职务。次年，苏拉去世。卢库鲁斯当年38岁，他已经成为元老院中有势力的人，如果他想现实一点，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更大权势，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卢库鲁斯忠实地维护苏拉确立的体制，没有因个人得失而做

出破坏制度的事。直到他年满42岁，达到苏拉规定的执政官任职年龄资格后，才被推举为执政官候选人，公元前74年，卢库鲁斯就任当年度的执政官。

执政官时代的卢库鲁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作为。上一年度的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对“苏拉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卢库鲁斯接任执政官后也没有将被破坏的体制予以修复。看来卢库鲁斯对政治上的事不太在行。

第二年，即公元前73年，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卢库鲁斯赴西里西亚行省任总督。由于米特拉达梯兴兵起事，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爆发，卢库鲁斯这一去足足待了7年才再度返回罗马。如果说，是苏拉承担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责任的话，那么卢库鲁斯则始终活跃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最前线。

公元前73年，看到罗马的军事力量被不同的战事分散，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开始了他的侵略战争。这一年对罗马来说，的确是“多事之年”。

在西班牙进行的塞多留战争中，梅特鲁斯·皮乌斯迟迟不能取胜。又把庞培派过去，还是处于胜负未分的不明朗状态。雪上加霜的是，国内又爆发了斯巴达克斯起义。真是内忧外患。

米特拉达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12万步兵、1.6万名骑兵、100辆4匹马拉的双巨轮战车的庞大阵容，入侵了邻国比提尼亚。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北部，与本都同样面对黑海，比提尼亚国王已留下遗嘱将国家赠送给罗马，此时比提尼亚已经是罗马的行省。米特拉达梯此举已是直接挑战罗马的霸权。当时的比提尼亚总督是当过执政官的奥利乌斯·科塔，科塔指挥的第一场战斗，输给了本都军。

在战争开始的时期陷于苦战，似乎已成为罗马军的宿命。卢库鲁斯

到任后，战况发生了转变。卢库鲁斯只有3万步兵、2500名骑兵，却独自承受了本都大军的全部压力，但卢库鲁斯率领的罗马军取得了胜利。这也能够证明卢库鲁斯是一名优秀的武将。本都败军重新整合后再度发起攻势，结果还是败给了卢库鲁斯。罗马军在与采取游击战术的对手打仗时，常常陷于“苦斗”状态，短期内难以取胜。但对付正面会战之敌时，却是能打善战的强者，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罗马人都占有优势。两次战胜本都军后，卢库鲁斯没有立即去追击本都军，而是选择了治理被米特拉达梯破坏的小亚细亚行省的内政事务，以展示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能力。

罗马负责对各行省征缴税收具体事务的，不是官办机构，而是被称为“普布利加努斯”（可直译为“公务代理人”）的专门从事税收代理事务的私营中介机构，这些人中的成功人士拥有的财富可相当于甚至超过元老院议员的水平。罗马社会把介于元老院阶级与普通平民阶级之间的人士称为“骑士阶级”，意思是可以承担为国家提供骑士义务的有产阶级。骑士阶级经营的一项业务，就是接受罗马政府的委托，代为征收各行省应缴的赋税。他们经营此项业务的收益，是收上来的行省税的十分之一，由于各行省要按收入的十分之一向罗马政府缴纳直接税（也称“什一税”）所以他们的收益是行省收入的百分之一。

普布利加努斯们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相当于代收业务手续费的这百分之一。假如某个地区出现天灾或不幸成为战场致使农作物严重歉收，此时计税依据仍是以上一年的收成为基准。也就是说，歉收之年并不能豁免应缴纳赋税的义务。那么缴不起税的人怎么办呢？可以借款缴税。向谁借呢？这些“公务代理人”或称“税务承包商”可以向纳税义务人提供贷款。贷款成为这些人更赚钱的一项业务。那时候的贷款利率也没有什么基准，假如没有个“为民做主”的好总督来过问这件事的话，贷款利率可就没谱了。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后，苏拉向小亚细亚的行省公民征收的一

次性上缴的租税为2万塔兰特，假定当时全部以借贷支付，10年后，即卢库鲁斯治理行省内政的这一年，本息相加会达到12万塔兰特。卢库鲁斯治理小亚细亚内政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行省人民从高利贷中解救出来。

卢库鲁斯自己也是行省总督，他以自己手中掌握的行省治理上的绝对主权为后盾，果断实行了“金融”方面的改革：

一、规定付给普布利加努斯们的贷款利率为月息1%，即年息12%。

二、不管按贷款者的计算方法应该收取多少贷款本息，借款人最多只支付年收益的四分之一。贷款者对超出部分不得主张权益。

由于卢库鲁斯的这套改革，4年以后，小亚细亚地区罗马各行省人民不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借款人当初用于借贷抵押的资产，大部分也都解除抵押回到了自己手中。行省的民心也因此而回到罗马这边。

然而，卢库鲁斯却因此而与以前在行省大发横财的高利贷者们结成仇敌。这些人开始秘密地向元老院反映情况，告卢库鲁斯的黑状。其结果对卢库鲁斯相当不利——也许是罗马确实没有多余的兵力，反正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期间，卢库鲁斯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母国罗马的任何支援。

卢库鲁斯可以调动的兵力，相当于5个军团，只有步兵3万人、骑兵2500人。其具体构成是：从意大利带出来1个军团；在小亚细亚任行省总督，属下的士兵凑起来大约有2个军团；另外2个军团本来是秦纳派到小亚细亚对付苏拉的，结果归顺了苏拉，他们的指挥官芬布洛斯自杀，苏拉把这2个军团留给卢库鲁斯镇守小亚细亚。原芬布洛斯手下的这2个军团的士兵们，已经15年以上没有回到故国了，这些士兵们的心境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比这些士兵更不幸的是卢库鲁斯。尽管具有武将的才能，也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但卢库鲁斯在得到女人垂青和得到部下拥护这两方面运气欠佳。

卢库鲁斯的家庭生活终生不幸。在没有基督教时代的罗马社会，离婚应该尽量避免，但不算是罪恶。特别是在上层人士之间，因政治策略结成婚姻很普遍，苏拉、庞培、恺撒都曾经历过几次结婚、离婚。但结婚、离婚、再结婚，并不代表他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在婚姻存续期间，他们仍可能会有幸福的男女之爱。经历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即使离婚，也不会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苦涩之情。总之，他们选择配偶，就像政治斗争中选择盟友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即使结婚几年后再离婚，女方仍可以堂堂正正地再婚。

但卢库鲁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真的不幸福。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是真正爱他、与他同心的，以致长年留驻在东方，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卢库鲁斯遇不到好的女人，也没有遇到好的下属，这二者之间似乎是相通的。

人类的幸福不存在客观标准。假如将其限定在精神层面，能够充分地与他人交流沟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所谓交流沟通并不是说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交流沟通的程度就越高，效果就越好。由于标准是主观的，能让对方感觉到交流沟通很充分才能达到效果，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才是交流沟通的高手。

卢库鲁斯很注意与士兵的交往，行军打仗都冲在前头，身先士卒。遇到必须露营的时候，作为总司令的他，与士兵们按同一标准共同在野外就寝。尽管这样，士兵们对他还是不满意。好在卢库鲁斯每战必胜，士兵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跟随着他。

卢库鲁斯不仅能打胜仗，而且常常是用只有对方十分之一的兵力，灵活运用精彩的战术战法，取得令人叫绝的胜利。

两次败给卢库鲁斯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从公元前70年起，采取了和亚美尼亚国王结盟的对策。两国结盟并不仅仅因为亚美尼亚王妃是米特拉达梯的女儿，身为一国之王，亚美尼亚国王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与罗马为敌。他们是因利益而结成盟友的。双方商定，赶走罗马人的势力后，两国瓜分这一带的领土，希腊归本都所有，亚美尼亚则分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败的米特拉达梯逃到亚美尼亚后，卢库鲁斯提出引渡米特拉达梯的要求，却被亚美尼亚国王拒绝。卢库鲁斯又遇到了新的敌人，他只能以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分兵应对两个敌国。

亚美尼亚国王率军迎战前来进攻的罗马军，看到罗马军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布阵，就加以嘲笑：

“罗马派来的如果是求和的谈判使团，人数是多了一些；如果是来打仗的军人，这点人数可就太少了。”

然而，拥有12.5万人的庞大的亚美尼亚军，被只有1.2万名步兵和2500名骑兵的卢库鲁斯军打得狼狈不堪。高效利用手中较少的兵力，灵活突击敌阵，把敌军主力兵团孤立后再对其实施打击，这套战术是自大西庇阿以来罗马将军经常使用的战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亚美尼亚方面死者达10万人以上，而卢库鲁斯指挥的罗马军却只有5人战死，不足百人受伤。卢库鲁斯取得了不逊于其师傅苏拉的骄人战绩。而与师傅相比，卢库鲁斯不止一次以少胜多，更加难能可贵。常胜将军卢库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后继续东征，一直打到了里海。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欧洲人率领军队踏足这个地方，这还是第一次。

不用说，卢库鲁斯也是罗马公职人员到达这里的第一人。

但卢库鲁斯还是未能把给罗马造成“东方之乱”的米特拉达梯彻底消

灭，因为他手下的士兵们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既然不能继续征讨，卢库鲁斯只好率领军队撤回到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首都提格拉诺凯尔塔。由此，命运不再关照卢库鲁斯了。

卢库鲁斯对自己卓越的能力和优秀的素质充满自信，这本不是坏事。问题在于他认为优秀的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士兵们应该也能做到。按理说，当需要士兵们忍受在夏天的沙漠、冬天的雪山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时，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让士兵们能够充分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卢库鲁斯不懂得这种沟通的重要性，以致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细部的内容，他也觉得没必要向士兵们作出说明解释。长此以往，当士兵们感到自己被指挥官日益疏远时，再想沟通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了。优秀的卢库鲁斯对自己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做到完美有着过强的自信，因此他忽略了如何让士兵们与自己同心协力，如何调动士兵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士兵们成为自己战略意图的积极参与者。

卢库鲁斯与士兵们未能形成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战利品的分配令士兵们不满。和西欧相比，那个时候的东方（现中东地区）更为富有，战利品的质量与西班牙和高卢相比，差别相当大。这些战利品包括：受“希腊主义”文明的影响，中东地区各国都能见到的希腊工艺美术制品；东方国家君主们所拥有的奢侈用品；金币、银币等等。

卢库鲁斯将银币分给了部下的士兵们，但艺术品都留给了自己。他觉得身为庶民的普通士兵们不懂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卢库鲁斯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即使懂得这些艺术品价值的卢库鲁斯把他们送到了罗马，这些属于全人类财富的艺术品又有哪一件能够流传后世呢？

作为指挥官，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应该做到尽可能不使士兵们产生不满情绪。例如不要死板地执行罗马军队关于战利品分配的严格规定，时不时让士兵们多得到一些好处等等。

可卢库鲁斯不这么做。不仅如此，他还把应上缴国库之外的金币，

也据为己有，当成总司令应该得到的报酬。当然，多次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取胜对手，肯定离不开指挥者的才能。但是太拘泥于死理，严苛地对待下属，就会导致一个命运共同体内缺乏顺畅的沟通与和谐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过满载艺术品的运往罗马的车队遭到士兵们袭击的事情。

到了这一步，卢库鲁斯仍然对自己抱有自信，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正确性坚信不疑。他简单地认为，自己想做什么，跟士兵们说一下，士兵们就应该明白。于是他把士兵们集合起来，认真地作战前动员，说现在是彻底剿灭米特拉达梯的最好时机，大家要再接再厉等等。然而士兵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总司令如何中饱私囊，坚决不肯再跟着卢库鲁斯继续打仗了。结果是，卢库鲁斯军尽管已经进攻到了里海，但由于担心士兵哗变，只好撤退再撤退。一仗未负却不断退却，卢库鲁斯这也算是创造了罗马军的一项纪录。得知卢库鲁斯军撤退的消息后，米特拉达梯由于儿子叛逆，处于想出击又不敢出击的犹豫不决状态，这等于是救了卢库鲁斯。这一年卢库鲁斯49岁，经历了7年的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就这样未分胜负地结束了。

此时在罗马的庞培39岁了。过了几年安宁而锦衣玉食的生活后，他再度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地中海虽面积广阔，但毕竟是个内海。内海的特点是风向多变，加之周边地形复杂，形成许多海湾，顺风时非常便于航行。在地中海，海不会阻止人类出行，反而更方便通行。货运航行的便利，给那些以袭击抢劫货船为生的海盗也提供了方便条件，致使海盗横行。在地中海，可以说海盗与海水同生共长，自古以来代代不绝。

对不是海洋民族的罗马人来说，海盗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倒不是因为在此期间海盗不存在，而是因为罗马人自己很少有机会出海。自从将环地中海各国收入自己霸权之下后，罗马人出海的次数日渐增多。在公元前1世纪的上半叶，与罗马人出海次数增多相伴的，是本来至少能在本国近海海域对海盗具有威慑力

量的沿地中海各国的国力不断衰退，使海盗日益猖獗。

海盗的大本营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选在那里绝非偶然，因为那里是权力的真空地带。

曾经将西里西亚置于自己霸权之下的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已见不到昔日辉煌的踪影。此时西里西亚已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每年向这里派总督。卢库鲁斯虽担任西里西亚总督，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对付米特拉达梯，腾不出手来清剿海盗。而且海盗们把自己藏身的要塞建在面向大海的狭窄绝壁上，从陆地很难进攻。此外，由于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中东一带纷争不断，战事频发，一败涂地的人们很多都跑去投奔海盗，又给海盗队伍输送了人才。

随着海盗的发展壮大，其组织化的程度也日渐提高，他们具有收集信息的便利条件，能够把握地中海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并利用这些变化兴风作浪。如策划在西班牙从事反罗马战争的塞多留和在意大利境内领导奴隶起义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之间建立反罗马联盟，就是海盗们比较知名的手笔。

海盗们不仅袭击船舶，抢夺物品，还绑架船员、水手、乘客，以收取赎金。能交来赎金的可以恢复自由，付不起赎金或规定时间内未收到赎金的，都被当做奴隶卖掉。

如果仅仅是靠上述“纯粹的”海盗营生赚钱，尚不致达到令罗马政府下决心要将其荡平的程度，关键是海盗们想发展为更大规模的集团并与罗马作对。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是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米特拉达梯扶植海盗的目的，是想让海盗们袭击从罗马向东方运送士兵和武器的船舶，使罗马方面吃点苦头，不再积极向东方用兵，他在东方就可以更加为所欲为。

由于充沛的资金供应，海盗们“鸟枪换炮”，海盗船一律换成了快船

并雇佣了长于航海的专业人士来驾船，这样冬天也可以出海了。海盗装备升级，苦了沿海地区居住的人们，过去冬天海盗来不了，现在冬天也能登岸，一年到头再也不能过踏实日子。除了西里西亚的大本营外，海盗们还在环地中海全部地区设立了众多的根据地，其完整的组织和庞大的规模已经与一个军事集团不相上下。

海盗们不仅袭击罗马船舶，罗马友好国家的船舶也屡遭袭击。由于海盗船靠岸更加方便，他们对意大利半岛也开始无所顾忌，阿皮亚大道离海岸很近，一队行走在阿皮亚大道的行李马车居然也被海盗打劫。离首都罗马只有22公里的外港欧斯迪亚港停泊的船只遭到海盗袭击，众目睽睽之下，海盗公然把船上的货物洗劫一空，乘船的客人全部被劫持而去。引人瞩目的是，就连罗马上流社会人士所乘的船也遭到海盗劫持，支付了赎金后总算把人释放了，这其中就有年轻的恺撒。

由于海盗的猖獗，行省需要的士兵和武器送不到，地中海的物资流通也陷于停滞，就连罗马需要进口的小麦数量都得不到保证。打击海盗已成为令罗马不能忽视的紧迫问题。

公元前67年，在讨论海盗问题的公民大会上，当年度的护民官加皮亚阿斯提出了肃清海盗的提案，提案中提出的清剿海盗构想具体而周密，很有说服力。以一位护民官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很难提出这样有水平的构想，或许这个构想是庞培自己在背后秘密筹划出来的。

护民官加皮亚阿斯提案中列出的作战规模及其他事项如下：

一、投入12万名重装步兵、5000名骑兵，即20个军团的作战部队。

二、配备战船500艘。

三、总司令以下的军官由总司令任命，为总司令配备14名有元老院议员资格的幕僚。

四、总司令的作战实施区域不仅限于海上，还包括从海岸进入陆地80公里纵深的地带。

五、此次作战行动需要支出的资金为1.44亿阿斯。

六、选举庞培为总司令。

七、给予总司令三年的指挥权，直至完成肃清海盗的作战任务。

看来庞培总是要干一些史无前例的大事情。他几次破罗马官场先例的事情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现在庞培的形象又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且这次的破例更是前所未闻。

据学者们的推算，当时罗马的国家预算每年也就是2亿阿斯的程度，现在国家预算的一大半都要拿来用于肃清海盗。罗马人具有尊重决定的品性，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执行，但真要作出这样的重要决策还是要下大决心的。而且，将这样大的权力在三年的时间内授予一人，元老院从维护共和政体的角度出发，也会断然反对的。元老院反对的理由如下：

一、授予一个人如此大的权力，违反了排斥独裁的“元老院体制”，苏拉确定的法律也禁止这样做。

二、这样大的权力只应该授予独裁官，而且三年的任期也过长。

三、即使认可总司令为独裁官，独裁官在国境外（即意大利半岛之外）行使实权也是没有先例的。

四、庞培才39岁，他上次破格当选为执政官已经是创出例外，这次还要制造新的例外，而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例外的。

五、庞培若想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必须再等7年，现在这个清剿海盗

的提案是为满足庞培个人野心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产物，不应该认可。

然而元老院也不是铁板一块，元老院议员中有人就持赞成态度，因“威勒斯审判”获胜而名声大振的西塞罗就赞成这个提案，刚刚步入政界、时年33岁的恺撒也赞成这个提案。而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对罗马政府则抱有一种“看你怎么办”的心态。

护民官加皮亚阿斯的提案，在公民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消息一出，罗马市场上原本高涨的小麦价格立即暴跌。而“苏拉体制”则因此而被彻底埋葬。

由庞培主导的清剿海盗之战，虽未受到后世军事家们的一致好评，但仍称得上可作为军事战略范例的杰作。

庞培首先把地中海全部地区划分为13个作战实施海域，每个海域配备由正副军团长指挥的实战部队。庞培将60艘战船作为自己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在需要时驰往相关海域投入战斗。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前线。

这13个作战实施海域，不用说都是海盗的根据地及其周边海域。整个作战方案分前后两期实施，前期的重点在西地中海地区。先消灭疲弱之敌，这也符合一般军事战略战术的基本要求。

对海盗的打击方式是海上、陆地相结合，先海战后陆战。在海上遇到海盗船即当场痛击，侥幸落荒而逃的海盗逃往根据地时，陆路守候的军队将逃回的海盗连同其根据地连锅端掉。西地中海海盗出没频繁、活动猖獗的区域集中在西班牙近海、利比亚近海、希腊和撒丁岛近海，以及埃尔巴岛附近的第勒尼安海。庞培仅用了40天，就把这一带的海盗全部消灭了。

肃清西地中海海盗的罗马舰队，恰如开始收网的渔夫，把逃遁的海

盗船全部装进了东地中海。紧接着，北至爱琴海，南至埃及，东至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盗根据地全部落入罗马军之手。不断收紧的大网包围了小亚细亚南部的西里西亚。

从战线转移到东地中海开始，到摧毁海盗们的大本营西里西亚，耗时49天。庞培在地中海全部海域实现罗马强权下的和平，一共只用了89天。

在肃清海盗的战斗中，共缴获海盗船400艘，烧毁击沉1300艘，海盗设在根据地的造船厂、要塞全部破坏烧毁，超过1万名海盗被击毙，俘虏了2万多名海盗。被海盗劫持绑架的人们全部恢复了自由。这一年即公元前67年初夏，地中海的航行完全回复了正常的安全状态，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也恢复到原本的数量。

庞培的声誉在罗马急剧上升是可以预料到的。在希腊，被海盗袭击神庙、掠夺城市闹得近乎绝望的希腊人，更是把庞培当做神来称颂。

庞培被授予的“绝对指挥权”有3年的行使期限，而他仅仅用了3个月就出色地完成了肃清海盗的目标。如果他忠实于“元老院体制”，就应该凯旋罗马后，交回“绝对指挥权”。公元前5世纪的辛辛纳图斯曾被任命为6个月期限的独裁官，他在15天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后，立即交回了独裁官的“绝对指挥权”，回到自己原来的“晴耕雨读”的生活中。假如他不那样做，由少数优秀分子组成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就不能坚持下来。

但是，39岁的庞培不那样做，而且时代也不要求他那么做。

可能又是身在西里西亚的庞培的授意，身在罗马的护民官加皮亚阿斯再次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

解除中东、近东战线最高责任者卢库鲁斯的职务，选举庞培接任。

如果庞培接任卢库鲁斯职务被公民大会通过，还要根据战事的需要延长授予庞培的“绝对指挥权”，直至彻底消灭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

这个提案还是遭到了元老院多数议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与当初他们反对肃清海盗提案的理由相同。赞成的元老院议员还是西塞罗和恺撒。而公民大会以35个选区全部投赞成票的结果，通过了加皮亚阿斯的提案。对卢库鲁斯在小亚细亚强制推行的金融改革不满的“骑士阶级”，这次完全站到平民阶级一边，投了赞成票。与上次一样，元老院还是既孤立，又无力阻止。

从西里西亚弃舟登岸，沿小亚细亚向黑海方向北上，途中的内陆地区是卡帕多西亚，卡帕多西亚西邻，有个被称为卡拉迪亚的地方。

在这里，卢库鲁斯和庞培会合，新旧总司令要进行指挥权的移交。年长10岁的卢库鲁斯，还算是同属苏拉门下的庞培的师兄。二人之间的交谈，尽管形式上都是外交辞令，但确实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卢库鲁斯赞扬庞培肃清海盗的高超指挥艺术，庞培则称颂卢库鲁斯作为罗马公职人员第一个率军打到里海的历史功绩。但聊着聊着，二人的自我约束全都失灵，话语变得坦率直白，毫不客气。庞培非难卢库鲁斯的吝啬与贪欲，卢库鲁斯则谴责庞培前来抢夺自己即将收获的胜利果实。不管二人怎样相互指责，有公权力支持的是庞培，二人之间的争斗，从一开始即已清楚地分出胜负。

卸任后，卢库鲁斯准备踏上回国旅途，庞培说卢库鲁斯归国后肯定要举行凯旋式，就以此为由，从接收的原卢库鲁斯手下的士兵中挑选了1600人，允许卢库鲁斯带着这1600名士兵一起回国。卢库鲁斯到港口准备登船时发现，这1600人中除了失去战斗力的老弱士兵，就是重伤在身的伤残之兵，而且都是人所共知的比海盗还要劣质、不服从管理的“兵油子”。年纪轻轻即获得成功，不知失败与挫折痛苦的庞培，在新老交替这样的场合下仍然不顾情面，能够做到坦然与冷酷。

公元前66年，在外7年之久的卢库鲁斯回到罗马，以他所做出的功绩，当然要为他举行凯旋式。在举行凯旋式那天的马尔斯广场上，展览着在与本都国王和亚美尼亚国王战斗中缴获的各种东方华丽的武器和铠甲，仅这些稀罕物就已经让罗马人目不暇给。

凯旋式以10辆从东方君主手中缴获的装有双巨镰的战车为先导，其后是被俘虏的60名本都及亚美尼亚高官，接着是一队牛车拉着的110艘缴获的军船的巨大彩绘模型，再后面是近2米高、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米特拉达梯铜像，作为未能抓到的米特拉达梯的替代品。接下来是数量众多的各种战利品，用20副担架排成一队，其中有国王专用的镶嵌着宝石的盾牌、众多的银壶和33个金杯。再就是8头驴拉的黄金制的轿子，轿子上堆放着56块银锭和270万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的金币。观看凯旋式的市民们看得目瞪口呆。

在这些队伍之后，是一队举着大牌子的士兵，这些牌子上宣示着卢库鲁斯的各项成绩。其中有一块牌子上记载着卢库鲁斯在向庞培移交指挥权后剩余军费的金额。另一块牌子上记载了卢库鲁斯结束远征后从战利品中上缴国库金银币的金额。还有一块牌子上记载着卢库鲁斯给属下士兵每人支付了95德拉克马的奖励金。卢库鲁斯乘坐4匹白马拉着的战车出现后，凯旋式结束。当天晚上，卢库鲁斯自费举办了一个大型宴会，招待市民们。

深受庞培之苦的元老院喜迎卢库鲁斯归国，期待着苏拉门下坐第一把交椅的卢库鲁斯能够为巩固元老院体制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由于担心权力向庞培集中，有些人已经结成了被称为“元老院派”的党派。时年40岁的西塞罗和29岁的加图，都是这个党派的活跃分子。这个加图与当初大西庇阿的政敌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同属一个大家族，历史上为了区分这两个人，就把公元前2世纪的加图称为“老加图”，把公元前1世纪的加图称为“小加图”。老小加图都是狂热的共和政体主义者。

50岁的卢库鲁斯，开始时还打算积极参与“元老院派”的活动，但

是，卢库鲁斯具有认清政治现状的能力，大约他很快就看明白了，西塞罗和小加图尽管有思想、会演说，但要把纲领转化为行动，仅靠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不久，卢库鲁斯就离开了政界。

卢库鲁斯的妻子是小加图的姐姐，过去卢库鲁斯因为妻子是朋友的姐姐一直勉强维持着婚姻，现在他无所顾忌，终于与小加图的姐姐离了婚。从此以后，卢库鲁斯虽然还在元老院有席位，但几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对国政的关心和私人生活的愉悦，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离开政坛后，卢库鲁斯的私生活开始多姿多彩。为了陈列从中东带回来的艺术品，卢库鲁斯在各地修建自己的宅邸，在罗马市内，在那不勒斯近郊的海边，在意大利内陆地区绿树包围的山野，都有他精心建设的漂亮住宅。

和后来的帝政时代相比，共和时代罗马人的住宅还是比较质朴的。帝政时代曾经当过皇帝老师的塞内加曾造访过大西庇阿的别墅，对于这位既富且贵的大英雄居所的简约程度表示吃惊。按塞内加的说法，能与帝政时代的豪宅相媲美的，只有卢库鲁斯的住宅。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卢库鲁斯宅邸的豪华与奢侈。他在海边的别墅，还专门修建了引入海水养鱼的水池。

离开了政治的卢库鲁斯，不再有政治婚姻的必要，他随着季节的变换住在不同地方的私宅中。这个独身的优雅贵族，把自己收集的艺术品和书籍对外人开放，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欣赏的愉悦。卢库鲁斯宅邸内的图书馆，成为热衷文化的罗马人和侨居罗马的希腊人聚会的沙龙。

致使卢库鲁斯留名后世的是他身体力行的饮食文化。至今在西欧，人们还把豪华的美食宴席称为“卢库鲁斯式”宴席。

严谨的普鲁塔克曾对卢库鲁斯的奢侈生活有“暴发户之常态”的恶

评。其实对这类富豪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必要太过在意。卢库鲁斯在美食方面的造诣，令今天的美食家们也难以望其项背。

卢库鲁斯在美食方面的一些做法令人联想到他是当过军队统帅的人。他按所需费用的高低把宴席进行分类，不同级别的宴席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各房间取不同的名字以便于区分。为了保持食材的新鲜和优质，他在自己的农庄里养鱼养鸡，种植蔬菜和水果，还自制奶酪。美食对卢库鲁斯而言，绝不单纯是一个“吃”字，餐厅如何布置，用餐时弹奏什么音乐、朗诵那些诗文，交流怎样的话题，邀请什么类型的客人，这一切的巧妙搭配、和谐完美，才是卢库鲁斯所追求的美食境界。

有一次，卢库鲁斯一个人在家里用餐，用人觉得就他一个人吃饭，于是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饭食。卢库鲁斯得不到美食的满足感，很不高兴，他唤来用人，斥责道：“你怎么连这么点事都弄不明白？今天是卢库鲁斯到卢库鲁斯家来赴宴！”

还有一次，西塞罗和庞培看到了在罗马广场散步的卢库鲁斯。共和时代的罗马人有一个优点，不管在元老院中如何唾沫星子乱飞、大喊大叫地激烈辩论，也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针锋相对，一旦到了私人聚会的场合，都会坦诚相见地交往应酬。西塞罗和庞培自然也不会装着看不见而不理卢库鲁斯。

二人耳语道，卢库鲁斯常邀请客人到他家用餐，他款待客人的豪华宴席都是事先周到地准备好的，卢库鲁斯自己的日常饮食一定不会那么复杂，肯定是非常简朴的，咱们去看看如何。二人商量好以后，就走近卢库鲁斯，寒暄了一阵后说：“今晚去你家好不好？”西塞罗紧接着又说：“不要为我们作什么特殊安排，把你的晚餐拿来我们一起吃就可以了。”

卢库鲁斯刚开始还劝二人另选别的日子，定好时间再来，可这二位就是不同意，非要今晚就去。卢库鲁斯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

当晚招待这两位不请自到又不便拒绝的客人。他对二人说，请允许我告诉跟随我的奴隶咱们今晚在哪个房间吃饭。二人回答说那当然可以。卢库鲁斯就告诉奴隶说："今晚在阿波罗的房间用餐。"西塞罗和庞培哪里知道，按卢库鲁斯的等级划分，以阿波罗神的名字命名的房间的宴席，是最高等级的。据说在"阿波罗的房间"安排的宴席，一次所需费用为5万德拉克马，而那个时候普通人民的年收入只有5000德拉克马左右。

不难想象，庞培和西塞罗二人，当晚一定会被卢库鲁斯的美食水准惊得瞠目结舌。而卢库鲁斯如此破费招待这二人，恰恰是想以此表示对二人的轻蔑。如果再次借用普鲁塔克的话，那就是："在饮食上如此地挥霍和炫耀，就像战争中被俘虏的野蛮民族。"

尽管激烈的政治斗争朝朝暮暮，始终不断，但共和时期罗马人的价值观仍是崇尚质朴刚健，蔑视豪华奢靡的私人生活。卢库鲁斯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只能引起人们的惊讶，不会获得人们的尊敬。

然而，不留恋政界的卢库鲁斯，已经毫不在意别人如何评判。在经历了10年充分享受私人生活的愉悦之后，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是庞培和恺撒的时代了。

卢库鲁斯的葬礼，自始至终没有在市民中掀起特别的感情波澜。据说卢库鲁斯唯一的一个真挚的愿望是希望能安葬在长眠于马尔斯广场的苏拉身边，但因为没有人积极为他争取而未能实现。这个在做副将时期最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男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从卢库鲁斯手中接过东方战线总指挥权后，庞培手中的兵力有10个军团6万余人的陆军和由270艘战船组成的海军，相当于卢库鲁斯能够掌握的兵力的2倍。但这个"2倍"意义重大。

卢库鲁斯用高超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干净利索地战胜了10倍兵力于自己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和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的军队，镇服了

东方的君主们。这个战绩，就连亚历山大大帝都会自叹弗如。当初，亚历山大大帝率3.6万士兵果敢东征，汉尼拔靠2.6万人就敢在意大利横冲直撞。卢库鲁斯与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战略战术，即以较少的兵力压制住大军集结的敌人，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最终大获全胜。但是连续的以少胜多也会令人产生敌方征召军队能力太弱的印象。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军事天才，率领一支战斗力不足的军队总是会有缺失，主要是没有余力去做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努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两军交战，如能给予对方“无形的压力”，可抵得上千军万马。

无论从财政能力，还是从专制君主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东方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征集10万大军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庞培能像在肃清海盗之战时统率20个军团的大军，对这些东方的君主们就会构成“无形的压力”。现在庞培只有肃清海盗时的一半兵力，即10个军团，但还是比卢库鲁斯当时的兵力多了一倍。而且，和卢库鲁斯相比，庞培能够选择的战略幅度也更为宽阔。在能力上，庞培不说远在卢库鲁斯之上，但至少他能够更为自如地驾驭和利用这种“幅度”。

能力超群的人，做事会瞻前顾后，统筹安排，能够让前一阶段所做的事情，成为后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铺垫和出发点。

庞培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肃清了地中海的海盗，这期间俘虏了2万多名海盗。按一般的做法，会把他们押到奴隶市场卖掉。然而庞培没有这样做，他了解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由于东方国家的纷争内乱致使失去家园才投身海盗职业的。

庞培不仅恢复了这些人的自由，还给了他们土地。当时的小亚细亚，不像西班牙、法兰西那样尚未开发，而是已形成村、镇的布局，但由于诸王之间的争斗不断，战火频仍，很多村镇已经无人化。庞培把这些原来的海盗移到这些无人化的村镇落户，但特意关照一点，即一定是

远离大海的内陆地区。因为希腊裔居民已经在沿海地区定居，如果这些原海盗移住附近，会招致希腊裔居民的反对。庞培还把原海盗落户的其中一个小镇，取名为“庞培小镇”。

安排好这些原海盗们的生计之后，马上就到了公元前66年夏，迎来40岁的庞培此刻已没有后顾之忧，他指挥的东方之战正式开始，史称“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为了攻击被卢库鲁斯打跑又回到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庞培率军从小亚细亚北上，向黑海沿岸的本都进军。米特拉达梯没想到庞培这么快就发动攻势，急忙征召了3.3万名士兵出战，被庞培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老奸巨猾的米特拉达梯只好又使出成功对付卢库鲁斯的老办法，即逃往东方的山岳地带，使追讨他的罗马军队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最终总司令顶不住士兵们的压力不得不撤兵回到西方。米特拉达梯期望这一招在对付庞培这个新对手时也能奏效，但庞培不上他的当，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战。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而再、再而三地败给罗马军后仍能东山再起，不是米特拉达梯自身能力有多强，关键在于他与亚美尼亚国王之间的同盟关系。

卢库鲁斯当时也意识到了破坏本都与亚美尼亚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亚美尼亚发生内乱或者亚美尼亚东邻的帕提亚王国（也译成“安息王国”）有什么动向，都可能成为导致本都与亚美尼亚联盟解体的机会。

实际上卢库鲁斯在东征到里海的时候，曾经提出与帕提亚王国结盟的意向。但是，不管卢库鲁斯怎么能打胜仗，毕竟说起来只有3万人马，不足为帕提亚国王所动。如果是现代，遇上这种杀敌10万，己方只牺牲5人的前所未闻的战绩，可以立即把战争全过程的录像送到帕提亚的王宫内一睹为快，可那个时候做不到。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口耳相传

的冲击力、震撼力就差了很多。有鉴于此，在得知米特拉达梯也在争取与帕提亚结盟的消息后，庞培抓紧与帕提亚国王谈判结盟事宜，他把自己的军事实力描述为“两倍于卢库鲁斯的作战能力”。

庞培向帕提亚王国提出的结盟内容，和以前卢库鲁斯的提法相同。主要是以下两条：

一、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承认帕提亚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

二、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划定帕提亚和罗马两国霸权的势力范围。

帕提亚王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也被称为“波斯”。对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不断向罗马挑起事端的做法，帕提亚王国一直不大关心，但当米特拉达梯与帕提亚西部邻国亚美尼亚结成军事同盟后，就不能不关心了。帕提亚对米特拉达梯的举动一直抱有怀疑的眼光。而米特拉达梯却一直想把帕提亚拉入反罗马同盟。

如果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个强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地中海对罗马来说，就不再是“我们的海”了。但是，中东各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局面，并非始于现代。在西欧，“同盟”的含义是团结弱小国家来对抗强国；而在东方，“同盟”的含义则是拉拢强国来欺负弱小国家。

帕提亚王国最终还是抛弃了维持守势的米特拉达梯，选择了处于攻势的罗马结成同盟。但当时谁也没有考虑到的是，两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定势力范围，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隐患。

帕提亚王国倒向罗马一边，动摇了其邻国亚美尼亚与本都继续结盟的决心。具有强烈危机感的一名王子树起了反对父王迪古拉斯的旗帜，

不仅造了父亲的反，他还派出使节到庞培军中来，说要废弃与本都的同盟关系，转而与罗马结盟。

这一下使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陷于窘境。他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结盟的目的，本不是支持米特拉达梯反抗罗马、确保独立和自由，而是为了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本都、亚美尼亚结盟的主要内容即是本都向西、亚美尼亚向南扩张势力范围。现在本国因反对与米特拉达梯结盟而产生内乱，不论从正义，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说，都没有继续维持与米特拉达梯结盟的道理。

于是，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派人给庞培送信，告诉庞培说，为了和平谈判及缔结和约，国王自己想亲自去拜访罗马的将军。不等庞培回信，他就以国王的名义在国内发出布告，悬赏通缉米特拉达梯，如有抓获或杀死米特拉达梯者将给予巨额奖赏。

两次败于庞培后，米特拉达梯还想逃到亚美尼亚境内。以前他逃命的时候，卢库鲁斯曾经向亚美尼亚提出引渡米特拉达梯的要求，那时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被米特拉达梯所迷惑，拒绝了卢库鲁斯的要求。但这回不同了，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均已没有了米特拉达梯容身之地。米特拉达梯以66岁之身，在少数忠臣的守护下，只能逃进高加索山脉中躲避追杀。庞培派来的舰队严密监视着黑海各处，米特拉达梯根本无法在黑海沿岸现身。

庞培靠军事和外交两面作战，完全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帕提亚国王在这场各方较量的“牌局”中只不过是庞培利用的一张“牌”，而亚美尼亚国王对庞培的拜访，则成为庞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标志性事件。

前面提到过，苏拉曾像开玩笑似的送给了庞培“马格努斯”（意为“伟大的”）这个尊称，但因苏拉尚在，庞培有所顾忌，一直未用。经历了平定海盗、征服东方后，庞培已经无所顾忌，他在签署文件时，开始使用“庞培·马格努斯”作为自己的署名。在言、行两方面，庞培都在

模仿之前被人们唯一冠以这个尊称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接待前来拜访的亚美尼亚国王时，他的举止言行与当初亚历山大大帝接见败国之君时一模一样。

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戴着东方君主特有的高高的帽子，上面再加上皇冠，出现在罗马军营前。在军营入口处，他应罗马警卫的要求下马，随身携带的黄金宝剑也被收走。然后他走向站在军营正中、身穿军装、披着大红斗篷的庞培。走到庞培面前时，亚美尼亚国王按照东方国家战败者的习惯，跪倒在罗马将军脚下。而且，他还取下头戴的皇冠，送到庞培手中，以示完全臣服之意。

40岁的庞培满脸洋溢着胜军之将的微笑，拉住还跪在自己脚下的国王的手，让他站起来。然后把皇冠还给了国王，说："我接受你的求和。"

事到如今，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当然会完全接受庞培要求的讲和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亚美尼亚向罗马支付6000塔兰特的赔款。

二、亚美尼亚赠送给庞培手下的士兵每人50第纳尔（罗马货币单位，1第纳尔等于4阿斯）。

三、亚美尼亚将迄今为止侵占的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腓尼基、叙利亚的一部分以及幼发拉底河东岸的索菲地区全部归还给其原来的所有者，放弃对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

四、亚美尼亚与罗马恢复友好同盟国关系。

举起反对父王旗帜、率先与罗马讲和的那位王子，从父亲手中接过赠送给战胜国的礼品，转交给庞培。

庞培把卡帕多西亚的王位，还给了被米特拉达梯、迪古拉斯联军赶跑的卡帕多西亚国王。然后他没有再继续追捕逃到高加索山中的米特拉达梯，大概他认为米特拉达梯已不再是什么心腹之患了。之后，庞培率自己的军队向东、南两个方向开进。

庞培将队伍分兵两处，自己率领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幼发拉底河西岸进军，他率大军到那里是为了向罗马霸权所及的地区宣示主权、展示军威。我这样说的证据，是他遵守与帕提亚王国的协议，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河。庞培的军队在水量充沛的幼发拉底河西岸安营扎寨，在那里度过了公元前66年至65年那个冬天。

庞培手下的另一支部队作为别动队开往南方，进入因被亚美尼亚侵略而一片荒芜的叙利亚，预定在那里等待庞培向帕提亚展示罗马军威后过来会合。当然，这支军队也不能等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是塞琉古王朝统治，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庞培的部队迅速控制了当地的局面，静候庞培。

自从苏拉死后，米特拉达梯一直在耍弄罗马的将军们，现在轮到他被耍弄了。这位67岁的东方君主，在与41岁的庞培的心理较量中，完全处于下风。

米特拉达梯豁出全部家当，将藏在各处的金银财宝全部拿了出来，动员了包括奴隶在内的人民从军，总算又凑起一支3.6万人的队伍。但庞培的视线根本不往北边转移，就像没他这个人似的。米特拉达梯又向庞培提出讲和，条件是承认罗马的霸权，甘居同盟国地位，并支付赔款。庞培的回答是，只要求米特拉达梯自身臣服。这下可伤了一心想做希腊主义式帝国君主、与罗马抗争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米特拉达梯的自尊。他没有再派出回话的使者。

米特拉达梯再次呼吁与帕提亚王国建立同盟关系，却没有得到回应。绝望之余，他离开亡命的高加索山脉，鼓动黑海沿岸的部落一起参

加西征。米特拉达梯游说说，要以手中的3.6万名士兵为主力，率领他们经过色雷斯、马其顿、潘诺尼亚向西方进军，并且雇佣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凯尔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然而事到如今，谁也不再相信这个又老又孤立的男人的幻想。雪上加霜的是，连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尔纳凯斯也对父亲绝望了，公开和米特拉达梯决裂，造父王的反。米特拉达梯此前因怀疑儿子加害于己已经杀死了四个儿子。在高加索山中一直没有什么作为的米特拉达梯，如今到了黑海沿岸已不能再杀人了。而且本都国王的高官们此时也明确表示抛弃国王，站在了王子一边。法尔纳凯斯王子派使者去向庞培表明了本都国王愿臣服罗马、请罗马接纳的请求。

看到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惨状后，庞培没有了后顾之忧，立即率军进入叙利亚。经由安提阿进入大马士革后，未流一滴血就让已徒具虚名的塞琉古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只剩下了另一个继承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从此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罗马派出总督驻在大马士革，行使管理职权。

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后，国王被强制退位，但其国家政体的支持系统并未解体。既然未解体，就需要人员更替，庞培就把国家政体支持系统的主要成员全部换成年轻人。能够让历时250年的塞琉古王朝未流一滴血而灭亡，与庞培这一招有很大关系。

中东地区不是未开发之地，已经有较为发达的城市文明。庞培就以城市为主体来恢复当地的秩序。当时叙利亚的五个主要城市，从南向北依次为安提阿、塞琉古城、《圣经》语言（希伯来语）的发源地比布鲁斯、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庞培设计了以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各中心城市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承担起本城市的治理职责。各城市之上，设置罗马派来的总督。庞培这样安排也是为了避免叙利亚的内乱，因为内部纷争从来是招致外来入侵的最主要原因。

在叙利亚这些城市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中间地带居住着贝都因部

落，庞培率军平定了那里，然后与贝都因人缔结了同盟协议。庞培这样做，是为了在叙利亚行省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地带。

庞培在大马士革忙于重整中东格局，恢复罗马霸权下的秩序。这期间，很多有地位的犹太人前来拜访他。犹太的内乱时有发生，常依赖罗马来进行调停。庞培就命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坚持“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然而这却遭到了虔诚的犹太教徒的强烈反对。于是耶路撒冷成为罗马军的下一个进攻对象。

攻下耶路撒冷城并不费力，但由于该城市内街区密集、建筑物众多，如果防守者占据神庙林立的地区进行抵抗，进攻者需要三个月的巷战。攻下耶路撒冷后，庞培独自一人去了犹太神庙。由于在罗马、希腊等多神教的神庙有不能携带武器进入的规定，庞培就遵守这个规矩，去犹太神庙连武器都没带。由于在希腊、罗马的神庙中，参拜者可以进到神庙深处的“圣所”向神祈祷，庞培以为犹太神庙也如此，就信步走进了神庙深处不对普通参拜者开放的地方。进入后才发现，犹太神庙内的“圣所”内，不像希腊、罗马神庙那样摆有神的雕像，而是什么也没有。庞培对此很诧异，因为诧异，他什么也没有做就赶快出来了。

庞培不知道，犹太神庙内的“圣所”，一年只有一次且只限最高祭司长一人进入。庞培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并无恶意地进入犹太神庙内的“圣所”，在犹太人的眼里，只能是亵渎神灵的行为。这就是多神教的罗马人和单一神教的犹太人之间最早的文化摩擦。从此以后，犹太成为罗马的半行省，由叙利亚总督管理。

耶路撒冷再往南，是以佩特拉为中心扩展势力的纳巴泰部落。纳巴泰人因与印度的贸易而繁荣，他们向庞培提出了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请求。由此，庞培没有再继续南下。到此为止，地中海东南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塞浦路斯岛已全部统合于罗马的霸权之下。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因孤立、绝望，最终选择了自杀。他的儿子法

尔纳凯斯将其遗体送到了庞培军中。

庞培与法尔纳凯斯缔结了和约，把他安排到位于比原本都领土更往东、黑海东岸的地方当国王。庞培打算将原本都领土变为罗马的行省。至此，因米特拉达梯作乱而使罗马人烦恼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小亚细亚地区，终于安定了下来。

被儿子送来的米特拉达梯的遗体，奉庞培之命，葬在锡诺普埋葬历代本都国王的陵墓中。这个顽固执拗地与罗马作对的男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因无望而服毒自尽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给世人留下了一封书信。

米特拉达梯自杀20年后开始写作的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在其著作《历史》中，收录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书信，其中就包括米特拉达梯写给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的这封信。这封信稍长一些，但因其集中反映了当时反对罗马帝国主义路线的代表性观点，我还是想全文介绍给读者。介绍完这封信之后，我想再介绍一下罗马人自己对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这就像法庭调查那样，原告、被告都应有证人出庭才体现公平。

米特拉达梯的信全文如下：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谨向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致以问候。

任何国家的执政者，为了维护和平，都可能会选择与他人结成同盟。但这个同盟是否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将决定同盟的最终结果——是受人尊重，还是贻笑大方。

假如您正处于永久享受和平的状态，没有被邪恶的敌人包围，或者来犯者是虽然邪恶但很容易击败的敌人，那么战胜罗马人，对

您的声誉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向您提出结盟的请求，让您的幸运来填补我的厄运。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看看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吧！他的事例已经说明了现实状况是如何的险恶。我的惨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之间建立同盟，对我们各方都是不可缺欠的。

在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方面，不论您提出您认为合适的任何结盟条件，他都会同意的。在我这方面，命运虽然夺走了我的很多财富，但我具备和罗马人战斗的丰富经验，因此我有能够向您提出有益的建议的自信。事到如今，我的确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但我确信我能够为您和您的国家提供例证和忠告。

实际上，罗马人自古以来就是把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作为唯一目的的民族，他们对别人的财富和领土有着强烈的无穷尽的欲望。

他们最初是以马其顿国王腓力为目标，尽管罗马在迦太基的威胁没有消除之前，与马其顿之间曾结有同盟关系。他们在攻击腓力的时候，为了阻断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向腓力提供的支援，就向安迪欧科斯承诺叙利亚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不可侵犯，成功离间了叙利亚和马其顿的关系。

然而，腓力刚刚败北，安迪欧科斯就成了罗马攻击的目标。安迪欧科斯也被罗马打败，叙利亚在道罗斯山脉以北地区的领土和1万塔兰特被罗马强行夺走。

接下来轮到腓力的儿子珀尔修斯。开始的几次战斗有利于马其顿方面，但最终结局还是败北。在萨摩色雷斯岛尽管缔结了和平协议，但等待珀尔修斯的还是死亡。狡猾、虚伪、欺诈是罗马人的长项，协议条文中保证珀尔修斯的生命，但罗马人让这位马其顿王朝最后的国王，因患失眠症而“自然死亡”。

罗马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大肆宣扬他们与帕加马国王的友好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对待帕加马国王就像当初对待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一样——他们给了安迪欧科斯一片面包，却从安迪欧科斯手

中获得大片领土；他们让帕加马国王担当从叙利亚掠夺来的领土的看守人，而其下场却比奴隶还要悲惨。

他们连无中生有地捏造遗书这种连神灵也惧怕的事情也干得出来，靠这种卑鄙的手段，他们把帕加马王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帕加马国王的儿子刚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就被强行带到了罗马。罗马人就这样将自己的铁蹄踏进了亚洲。

最近还有比提尼亚王国的例子。国王尼科美德死后，留下遗言把国家让渡给罗马，变成罗马的行省。让人生疑的是，尼科美德并非没有后嗣，他尚有一个庶出的王子健在。

那么再说说我吧！我的王国和罗马霸权所及领土并不直接相连，但是，他们知道我有很多的财富，而且对谁也不服从，于是他们就利用尼科美德挑起对我的战争。

我看透了他们狡猾的伎俩，于是我先下手为强，夺取了比提尼亚国王的王位，驱逐了尼科美德，解放了小亚细亚。接着我又把希腊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由于我的臣下阿尔凯洛斯和军队的背叛，我的理想未能实现。

罗马人为了应付国内的内战而与我讲和，但我知道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要和我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我稍事整备后立即再度对其宣战。在陆地上，我战胜了罗马总督奥利乌斯·科塔；在海上，我成功地击溃了罗马海军。但是，我得不到近邻各国的军粮支援，经由黑海运输，又因为恶劣天气而未能如愿。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撤退的军队，又遭遇风暴，船队沉没，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士兵。

其后我并未放弃，而是重整了军队，与入侵的卢库鲁斯展开了几次战斗。但他能够得到来自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军粮补给，而我的国土一片荒芜，军粮得不到补充，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能逃到亚美尼亚。

罗马人并没有追我，他们常用的手法是把军队攻占的地方变成荒地，使我无法再征召部队。现在，就连亚美尼亚国王轻率的举动（与庞培缔结讲和条约），也被他们当做自己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我强烈地请求您，请求您能充分地设想一下我们成为失败者的情形。因为现在您比其他任何国王更具备对抗罗马军的力量，只有您才能终结与罗马人的战争。

毋庸讳言，您拥有众多的士兵、武器和资金，这些对我来说，是接近您、争取与您结盟的理由；而罗马人接近您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您的这一切！

您所不知的是，罗马人早就觊觎着我们的国土，因为他们的西边是大海，阻碍了他们向西方的扩张。罗马人拥有的一切——房子、妻子、耕地等等，都是抢夺周边住民的结果。

罗马人过去也是难民，没有国家，没有家庭，不过是一群流浪者的团伙。他们的国家是构筑于周边人民的牺牲之上的。无论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人间伦理，什么样的神灵，都不会允许抢夺友人和同盟者，并将其毁灭的行为；都不会允许用充满邪恶的眼光歧视其他民族，并将其变成奴隶的行为。

在普通民众中，盼望自由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无知民众更期盼遇到一个公正的主人。我们东方的君主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常常会遇到臣下怀疑的眼光，怀疑我们或是违反国民利益，或是为了复仇，而做出不慎的举动。这个因素也会影响您的决策。

您拥有亚洲第一大城市，而且，因具有无穷财富而闻名于世的波斯也在您的手中。您作为这一切的拥有者，罗马人能不动心吗？他们现在是在哄骗您，是在阻挠您和我们的结盟。当罗马人消灭了我之后，接下来除了战争您还能期待什么呢？

罗马人把他们的剑指向一切民族。但是，哪个民族可供掠夺的财富最多，他们在与这个民族的战斗中也就会最勇猛。他们反复运用战争和欺诈的手段，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帝国。照他们的这种逻辑发展下去，要么是毁灭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一切民族，要么是他们自身的毁灭……

罗马尽管强大，但我们没有必要绝望，我们能够制止他们侵略的步伐。如果您能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兵，我从亚美尼亚出兵，共同

包围罗马军，他们就会陷入没有军粮、也得不到支持的困境，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之前我们没能实现这一目标，一是他们的运气太好，二是我们在持续地犯错误。

假如您能接受我的请求，采取行动去帮助东方的君主们，您将作为消灭罗马侵略者——这些全人类的强盗——的胜利者而令后人景仰。

我恳求您，发自内心地劝您采取行动。如果您选择了让我和其他东方的君主灭亡，也就是选择了您的灭亡的延期到来。您与其这样选择，不如我们联起手来，一致对外，奋力一搏，我们一定会取得战胜罗马人的伟大胜利！

尽管米特拉达梯的信写得很悲壮，但如前所述，他渴望与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结盟的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罗马方面的看法。但绝不是为了与米特拉达梯辩论。我选择的是罗马哲学家、律师、政治家西塞罗去西里西亚行省任总督时，写给他弟弟的信的节录。信中所表达的看法不应视为只是西塞罗的个人见解，因为以西塞罗在当时罗马的地位及影响力，他的见解足以代表罗马方面的主流意见。

西塞罗去西里西亚赴任是在公元前62年，庞培平定东方是在一年前的公元前63年，也就是说，西塞罗是在东方刚刚平定后去西里西亚上任的。

西塞罗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罗马把亚洲（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小亚细亚和近东、中东地区）从无休止的战争和内乱中解救了出来。不应该抱怨说罗马人把亚洲人牺牲的部分财富，当做维持罗马霸权体制的费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亚洲人的这种牺牲，是为

了保持这个地区持久和平所必需的经费支出。

公元前61年元老院在罗马为庞培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过程中也有士兵们高举宣示庞培业绩大牌子的这一幕，若干个大牌子上，记录了庞培自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63年期间为罗马成就霸业所建立的功绩：

一、在从黑海到里海，以至红海的全部地区，确立了罗马的霸主地位。

二、把1200万人口纳入罗马霸权的统治之下。

三、把1538个城市列入罗马的管辖范围。

四、罗马的国库收入和以前相比翻了一番。庞培自己上缴国库的货币形态的战利品高达2亿阿斯。

五、分配给庞培手下的士兵们的报酬总计为2900万阿斯。

六、与埃及、帕提亚、亚美尼亚等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保证与之相邻的罗马行省的边境安全。

以上这些成绩，绝非胜者的夸张之词。43岁的庞培取得的上述成绩，对罗马的确是居功至伟，他所使用的“马格努斯”（意为“伟大的”）这个尊称，不再是徒有其名，这回真的是实至名归。在公元前1世纪60年代，罗马最有名气的人物，也是地中海世界所有民族在内最有名气的人物，非庞培莫属。

庞培自己也在增强“马格努斯”的自我意识。平定东方之后，在返回罗马途中，庞培经停罗得岛，专程去探望了卧病在家的著名哲学家波希多尼。这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举动与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拜访哲学家

第欧根尼十分相仿。

公元前1世纪的“大帝”——庞培，把被地中海波涛涤荡的所有地方，统统变成了罗马的行省或同盟国。在这个时期，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罗马的“内海”。

熟知从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在他的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中，有一卷题为“关于世界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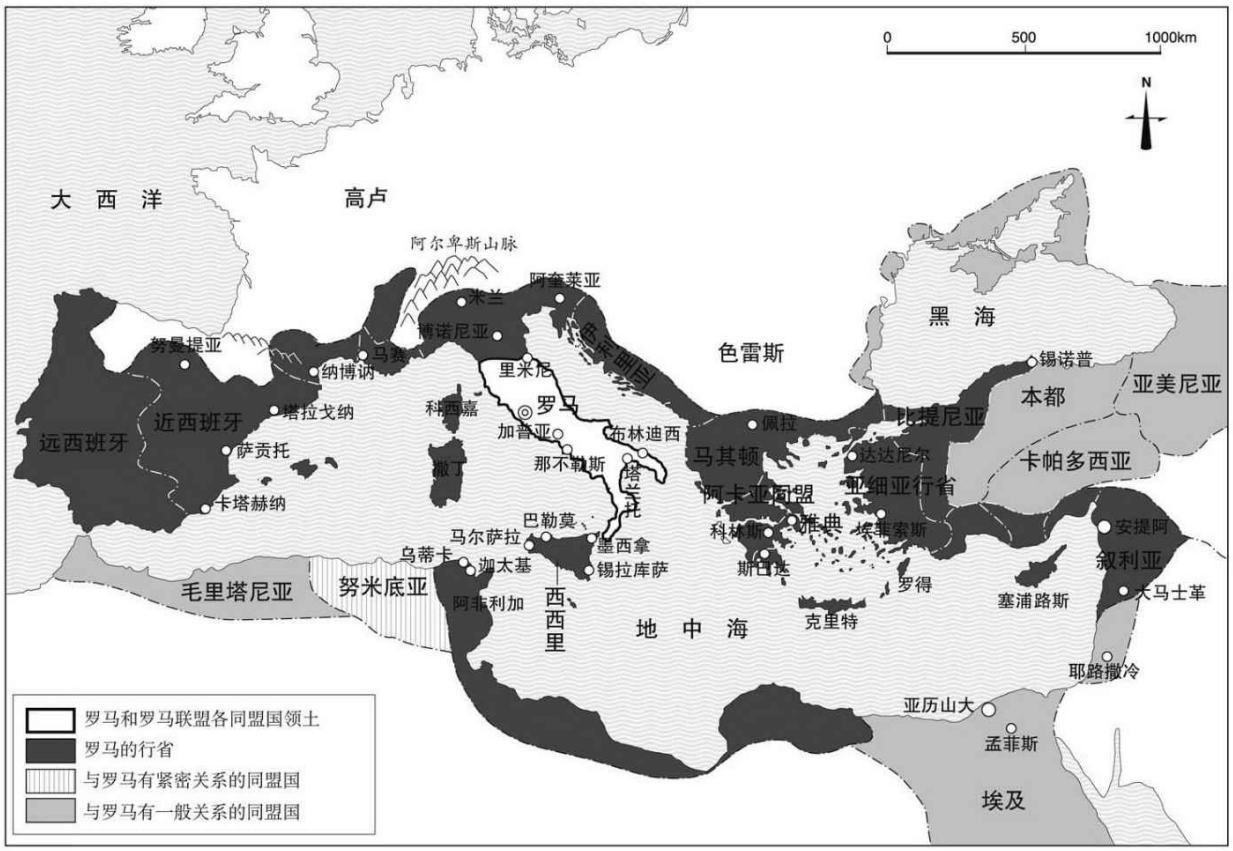
> 历史有时候会突然聚焦到某一个人物身上，并按照这个人物指示的方向行进。普遍与特殊、静止与变动，被集成为这个伟大的个人的人格特征。国家、宗教、文化和社会危机，全部体现于他们的存在。
>
> ……
>
> 危机时期，现存的事物与新生的事物的矛盾与融合，在这些伟大的个人身上达到顶点。这些伟人们的存在，是世界史的一个谜。

公元前63年平定东方后的庞培，年仅43岁，从年龄上看，此后可以对他有更多的期待。

庞培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正值壮年的身体，他具备了应该有的一切——政治能力、军事能力，以及民众对他的支持。如果说，在当时的罗马人当中，找出一个符合布克哈特所定义的“某一个人物”、“伟大的个人”的人，没有谁比庞培更合适，至少在能够看到的人物中，除了庞培没有第二人。而且，当时的罗马尚未从“迷失”状态中走出来，还需要继续变革，克服汉尼拔所形容的“内脏疾患”，以适应身体的正常生长，的确需要伟大的人物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伟大的庞培”（庞培·马格努斯）还是没能成为布克哈

特所定义的“某一个人物”。罗马史上的“伟大的个人”不是庞培，而是其他的人物。



庞培平定东方后（前63）的地中海世界

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近东、中东地区	中国	日本
150	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前 146） 马其亚水渠动工（前 144）		汉武帝即位（前 141）	弥生时代
140	西西里岛第一次奴隶起义（前 135—前 132）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就任护民官，投身农地改革，被反对派杀害（前 133） 小西庇阿镇压西班牙原住民叛乱，摧毁努曼提亚（前 133），占有西班牙全部领土	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七世即位（约前 138）		
130	小西庇阿去世（前 129） 盖乌斯·格拉古就任护民官，继承其兄遗志，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因被反对派追杀而被迫自杀（前 123—前 121）	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八世即位（约前 125）	汉武帝开始攻击匈奴（前 127）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近东、中东地区	中国	日本
120	马略就任护民官（前 119） 在纳尔邦努建设新殖民城市（前 118） 罗马向朱古达宣战（前 112）	努米底亚国王米奇普萨去世，由两个亲儿子和侄子朱古达共同治理国家（前 118） 罗马将努米底亚一分为二，东部由朱古达、西部由阿泰鲁巴雷统治（前 117） 米特拉达梯六世就任本都国王（前 115） 朱古达占领努米底亚西部，杀害阿泰鲁巴雷和意大利商人，朱古达战争爆发（前 112）		弥生时代
110	马略当选执政官，进行军制改革（前 107） 西西里岛第二次奴隶起义（前 104—前 100） 马略出征“普罗温洽”（南法行省）（前 103） 马略指挥“埃奎亚·塞克斯提亚之战”，战胜日耳曼人条顿部落（前 102） 马略指挥“维尔切利之战”，战胜日耳曼人辛布里部落（前 101）	朱古达战争结束（前 105） 朱古达被捕，被押至罗马处死（前 104）		
100	护民官萨图纽斯修改小麦配给法律，提出新殖民城市法，被反对派杀害（前 100） 尤里乌斯·恺撒诞生（前 100） 马略赴小亚细亚（前 99） 护民官德鲁苏斯提出给予所有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法案，被暗杀（前 91） “同盟战争”爆发（前 91）	米特拉达梯六世攻占比提尼亚和原帕加马领土（前 91）	司马迁完成《史记》（前 91 或前 87，有不同说法）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近东、中东地区	中国	日本
90				弥生时代
	罗马同意给予所有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前 89） “同盟战争”实质上结束（前 89） 苏拉当选执政官， 苏拉与马略交恶，罗马陷于内乱状态，马略被迫逃往非洲（前 88） 苏拉远征希腊，马略和执政官秦纳控制罗马，与苏拉的政治斗争激化（前 87） 马略去世，秦纳开始事实上的独裁（前 86） 秦纳意外死亡（前 84） 苏拉与罗马正规军发生内战（前 83—前 82） 苏拉就任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着手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前 81）	米特拉达梯六世占领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罗马行省，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 88—前 84）	汉武帝去世（前 87）	
80	塞尔托利乌斯战争开始（前 80） 苏拉去世，庞培渐得势（前 78） 罗马派遣庞培投入塞尔托利乌斯战争（前 76） 斯巴达克斯起义（前 73—前 71） 塞尔托利乌斯战争结束（前 72） 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前 71）	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 74—前 67） 米特拉达梯六世败于卢库鲁斯，逃往亚美尼亚（前 71）		
70	克拉苏和庞培双双就任执政官（前 70） 庞培肃清海盗，开始征讨米特拉达梯（前 67） 庞培率军进入大马士革（前 65） 庞培控制东方，东征结束，环地中海全部地区纳入罗马霸权之下（前 63）	米特拉达梯六世夺回本都（前 68）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 66—前 63） 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灭于庞培之手（前 64） 米特拉达梯六世自杀，米特拉达梯战争结束（前 63）		

参考文献

可能有读者认为，书中的地名、人名、官职名以及其他没有确切对应日语词语的发音，好像没有统一？所以笔者试着在这里稍作说明。

我想说的是，毕竟作为执笔者的我来说，希望自己完全以不偏向任何一种国家的语言发音来翻译各种人名地名，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情况发生。

第一，有很多地名，古代罗马并不这样叫，确实是用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甚至德语来记录的。

如果古代是重要都市，但现在仅剩遗址的地名，我就将它的古代名称以拉丁语忠实记录，但是这种例子屈指可数。实际上其他很多地名，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城市的功能，保存到现在。

但是，如果将马赛写作马西利亚、那不勒斯写作奈普里斯、不列颠写作布伦第西、米兰写作麦蒂奥拉努姆、伦敦写作伦蒂尼姆、巴黎写作卢坦茨阿、波恩写作波恩那、维也纳写作维多波纳，将古代地名的发音忠实地描述出来，又会怎么样呢？

在今天的罗马，如果你对出租车司机说："我要去弗朗姆·罗马努姆"，即使是教养高深到懂拉丁语的司机，也会把你当外星人看待。你只能将它改为意大利语的"佛罗·罗马诺"（罗马广场）。所以我用拉丁语表述的地名，都是现在仅残留遗迹的荒村野地。

与此相反，人名和官职名，或为希腊语，或为拉丁语，遵循了忠实原语言的方针。但拉丁语的部分仍存在发音问题。就是说，在日语中外

来语中，德语式发音经过一个世纪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用拉丁语发音来记述，确实妥当吗？

在日本出版的拉丁语教材中，并没有针对“为什么德语式拉丁语发音更好”这个问题作出说明。我不是拉丁语专家，略作推测，之所以德语式发音占据主要地位，是因为日本的研究者们从事罗马研究，是从德语开始入门的。另外，也许是由于古代德国地处罗马帝国边境，意外地保留了最纯粹的发音状态。而且，一直以来对古代罗马的研究热情较高的地区，就是古罗马边境的德国和希腊了。

但是，意大利作为古代罗马世界的中心，拉丁语并不用德语式的发音。其中有以下的原因。

因为没有录音机，古代的罗马人对自身的语言——拉丁语，并没有绝对正确的定义。所以意大利的拉丁语学者们只能凭借推测，推测的根据便是残留在建筑、墙壁上的涂鸦。

庞贝遗迹周围残存的这些涂鸦文字，因为是乱写乱画，比起教育水平高的人来说，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留下这些文字的可能性更大。教育水平低的人，在无意中一般会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来写字。而且从这些涂鸦推测发音，意大利语式发音比德语发音更妥当。这就是得出结论的第一理由。

其二，从古罗马时代到现代一直延续的唯一组织是基督教会，教会所使用的拉丁语发音，也非德语式发音而是意大利语式发音。圣歌自不必说，教皇的传教中不使用拉丁语的也只有现任教皇，因为他是归属德语圈的波兰人。

第三个原因，就是语言的发音状况。

如果有人对古罗马人遗留的拉丁语文章使用音读，便会认同这一原

因。

柔美的卡图鲁斯抒情诗，雄大的维吉尔叙事诗，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相声普劳图斯喜剧，满场都是哇啦哇啦的西塞罗的辩论，无与伦比恺撒的文章。

这些如果用德语式拉丁语音读出来，就会变得生涩拗口，失去了语言的流畅和快感。

如果用德语式发音和意大利语式发音匹配起来，就如同以下的样子：

维鲁格里斯——维吉尔

可开罗——西塞罗

卡埃萨鲁——恺撒

马古那·古来可亚——马尼亚·古来齐亚

普罗文可亚——普罗文齐亚

穆尼可比亚——穆尼齐比亚

斯可比奥——西庇阿

中世纪英国《大宪章》中把日本称为麻古那·卡鲁塔，这也是德语式发音，意大利式发音作马尼·亚卡鲁塔。

上面写到的以一个词为例，发音的不同似乎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文章是词汇的连续。这时候，无论是文章的节奏还是连贯性，都不能忽视当时拉丁语的普及程度带来的影响。

即便如此，无法抛弃对拉丁语的德语式发音是否恰当的质疑的我，还是会遵从在日本已经固定下来的拉丁语德语式发音，将人名写作西庇阿、西塞罗、恺撒等。

当时还未产生的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来表述的地名，对于不是写学术论文的我来说，最希望的是尽量让日本人看明白。同样的道理，日本人已经习惯的词语，我会按照德语式发音；而对日本人来说很可能是初次听到的词语，我会按照意大利式或者天主教会式的发音来记述，以后也会如此。

这可能有不统一之嫌，但从文章的节奏和连贯性的重要性来考虑，或者从应该保留最贴切的拉丁语发音的角度来考虑，我想这么做应该更加妥当。

而且，我不是学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让异文化圈的日本人，充分感受、了解西欧文明的一大要素——罗马文明。

参考文献中，《罗马人的故事》第一、第二卷已经刊登的参考文献名称，在第三卷中再次使用时不再重复记载。

后世的历史书籍和研究著作

ADCOCK, F.A.,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Cambridge, 1940.

ASTIN, A.E., *Scipio Aemilianu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7.

AYMARD, A. & AUBOYER, J., *Roma e il suo impero*, Firenze, 1958.

BADIAN, E., *Foreign clientelae 264-70 B.C.*, Oxford, 1958: *From the Gracchi to Sulla*, 《Historia》 11, 1962;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Pretoria, 1967; *Lucius Sulla—The Deadly Reformer*, Sidney, 1970; *Roman Politics and the Italians (133-91 B.C.)*, 《Dial. di Arch.》4-5 (1970-71), Roma, 1972; *Publicans and Sinners.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ervice of Roman Republic*, Blackwell, Oxford, 1972; *Tiberius Gracchu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Revolutio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I-1, pp. 668-731,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72.

BARBAGALLO, C., *Classi, partiti e legge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Pisa, 1974.

BARBIERI, G. & TIBILETTI, G., *Dizionario epigrafico di Antichità Romane.*

BARNARD, S., *Cornelia and the women of her family*, 《Latomus》 49, pp. 383-392, 1990.

BELL, M.J.V., *Tactical Reform in the Roman Republican Army*, 《Historia》 14, 1965.

BENNET, H., *Cinna and His Times*, Menasha, 1923.

BERNSTEIN, A.H., *The Rural Crisis in Italy and the Lex Agrariae of 133 d.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70;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78.

BERVE, H., *Sertorius*, 《Hermes》 64, p. 199, 1929.

BLAZQUEZ, J.M.,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la España Romana*, Madrid, 1975.

BLOCH, G. & CARCOPINO, J., *Des Gracques à Sulla*, Paris, 1929/35; Histoire romaine, Paris, 1935.

BOREN, H.C., *Livius Drusus, t.p. 122 and his Anti-Gracchan Program*, 《Classical Journal》 53, pp. 27-36, 1956; *The Urban Side of the Gracchan Economic Cri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pp. 890-902, 1958; *The Gracchi*, Tuayne, New York, 1968.

BRISCOE, J.,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of Tiberius Gracch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4, pp. 125-135, 1974.

BRISSON, J.P., *Problémes de la guerre à Rome*, Paris, 1969.

BROUGHTON, T.R.S., *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New York, 1951.

BRUNT, P.A., *The Army and the Land in the Rom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2, pp. 69-86, 1962; *Amicitia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Proc. of the Cambr. Phil, Soc.》 11, 1965; *The Equites in the Late Republic*,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 pp. 83-118, (ed. by SEAGER, R.), Heffer, Cambridge, 1969;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1971; *Classi e conflitti sociali nella Roma repubblicana*, Bari, 1972; *Free Labour and Public Works at Rom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0, pp. 81-100, 1980.

BUWAENE, M.V.D., *L'opposition à Scipion Emilien après la mort de Tiberius Gracchus*, 《Phoibos》 5, 1951.

BURDESE, A., *Studi sull'ager publicus*, Torino, 1952.

CALABI, I., *I commentari di Silla come fonte storica*, 《Att. Acc. Linc.》, 1950.

CANTALUPI, P., *La guerra civile Sillana in Italia*, Roma, 1892.

CAPOZZA, M., *Le rivolte servili di Sicilia nel quadro della politica agraria romana*, 《Atti Ist. Ven.》 115, Venezia, 1956-57.

CARANDINI, A., *Schiavi in Italia*, La Nuova Italia Scientifica, Roma, 1988.

CARCOPINO, J., *Autour des Gracques*,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28; *L'Afrique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Rev. H.》 162, p. 88, 1929; *Sylla ou la monarchie manquée*, Paris, 1931; *Points de vue sur l'impérialisme romaine*, Paris, 1934; *Les secrets de la correspondence de Cicéron*, Paris, 1947.

CARDINALI, G., *Il regno di Pergamo*, 《Studi di storia antica》 5, 1906, Roma; *La morte di Attalo III e la rivolta di Aristonico*, 《Saggi di storia antica e di archeologia》, pp. 269-320, Roma, 1910.

CARNEY, T.F., *A Biography of C. Marius*, Chicago, 1970.

CÀSSOLA, F., *I gruppi politici romani nel III sec. a.C.*, Trieste, 1962.

CHAPOT, V., *La province romaine proconsulaire d'Asie*, Paris, 1904; *La frontière de l'Euphrate, de Pompée à la conquéte arabe*, Paris, 1907.

CIACERI, E., *Roma e le guerre servili in Sicilia*, 《Processi politici 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p. 55-, Roma, 1918 .

CICCOTTI, E., *La guerra e la pace nel mondo antico*, Torino, 1901.

CLEMENTE, G., *I Romani nella Gallia meridionale (II-I sec. a.C.)*, Bologna, 1974.

CLERC, M., *La bataille d'Aix: études critiques sur la campagne de Marius en Provence*, Paris, 1906; *Aquae Sextiae. Histoire d'Aix-en-Provence dans l'antiquité*, Aix-en-Provence, 1916; *Massalia: histoire de Marseille dans l'antiquité vol. II*, Marseille, 1929.

COARELLI, F., *I figli dell'Africano*, 《Index》 6, Trieste, 1975; *Public building in Rome between the Second Punic War and Sull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45, pp. 1-23, 1977.

CORRADI, G., *Caio Gracco e le sue leggi*, 《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 pp. 235-297, 1927; 《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 p. 55- & p. 139-, 1928.

CORSETTI, R., *Sul prezzo dei grani nell'antichità classica*, 《Studi di storia antica》 2, p. 63, 1893.

DE FRANCISCI, P.,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vol. I*, Roma, 1926; *vol. II*, parte I, Roma, 1929.

DE MARTINO, F., *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Napoli, 1972-75; *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II*, Jovene, Napoli, 1973;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I*, La Nuova Italia, Firenze, 1979; *Gromatici e questioni graccane*, 《Nuovi studi di economia e diritto romano》, pp. 163-187, Editori Riuniti, Roma, 1988.

DE SANCTIS, G., *Dopoguerra antico*, 《Atene e Roma》 1, pp. 3 & 73, 1920; *Rivoluzione e reazione nell'età dei Gracchi*, 《Atene e Roma》 2, p. 209, 1921; *Quinto Cecilio Metello Numidico*, 《Atti del 2°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udi

Romani》 1, p. 343, Roma, 1931 (Reprinted in *Problemi di storia antica*, p. 215-); *La guerra sociale*, Firenze, 1976.

EARL, D.C., *Tiberius Gracchus: A Study in Politics*, Latomus, Bruxelles, 1963; *Tiberius Gracchus' Last Assembly*, 《Athenaeum》 43, pp. 95-105, 1965.

ENSSLIN, W., *Appian und die Liviustradition zum ersten Bürgerkrieg*, 《Klio》 20, p. 446, 1926.

FERRERO, G., *Grandezza e decadenza di Roma*, Milano, 1902.

FRACCARO, P., *Studi sull'età dei Gracchi*, L'Erma di Bretschneider, Roma, 1967.

FRANK, T.,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Firenze, 1924;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1933; *Storia di Roma*, Firenze, 1974.

FREDERIKSEN, M.W.,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aeology to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Gracchan Period*, 《Dialoghi di Archeologia》, pp. 330-367, 1970-71; *I cambiamenti delle strutture agrarie nella tarda repubblica: la Campania*, 《Società romana e produzione schiavistica》 1, pp. 265-287, Laterza, Roma-Bari, 1981.

FRIEDLAENDER, L., *Studi intorno agli usi e costumi dei Romani*, Milano, 1921.

GABBA, E., *Le origini dell'esercito professionale in Roma: i proletari e la riforma di Mario*, 《Athenaeum》 27, 1949; *Le origini della guerra sociale e la vita politica romana dopo l' 89 a.C.*, 《Athenaeum》 32, 1954; *Appiano e la storia delle guerre civili*, La Nuova Italia, Firenze, 1956; *Mario e Silla*, Berlin, 1972; *Esercito e società nella tarda repubblica romana*, Firenze, 1973; *Considerazioni sulla decadenza della piccola proprietà contadina nell'Italia centromeridionale del II sec. a.C.*, 《Ktema》 2, pp. 269-284, 1977.

GABBA, E. & PASQUINUCCI, M., *Strutture agrarie e allevamento transumante nell'Italia romana (III-I sec. a.C.)*, pp. 64-73, Giardini, Pisa, 1979; *Il tentativo dei Gracchi*, 《Storia di Roma》 2, pp. 671-789, Einaudi, Torino, 1990.

GARDNER, R., *The Siege of Praeneste*, 《J.P.》 35, p. 1, 1919.

GARNSEY, P. & RATHBONE, D., *The background to the grain law of Gaius Gracch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5, pp. 20-25, 1985.

GELZER, M., *Die nobilität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Berlin, 1912; *Pompeius*, München, 1949.

GEYER, F., *Mithridates VI Eupator*, 《Pauly-Wissowa-Real Encyclop.》 15, Stuttgart, 1932; *Tigranes*, 《Pauly-Wissowa-Real Encyclop.》 6, Stuttgart, 1936.

GIANNELLI, G., *La repubblica romana*, Bologna, 1937.

GIUFFRÈ, V., *Aspetti costituziorali del potere dei militari nella tarda res publica*, Napoli, 1973.

GREENIDGE, A.H.J., *Roman Public Life*, London, 1911.

GRUCBER, H.A., *Coins of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vol.), London, 1910.

GRUEN, E.S., *Roman Politics and Criminal Courts 149-78 B.C.*, Cambridge, Mass., 1968;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Los Angeles, 1974.

HALL, U., *Notes on M. Fulvius Flaccus*, 《Athenaeum》 55, pp. 280-286, 1977.

HARMAND, J., *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Paris, 1967.

HARRIS, W.V., *Rome in Etruria and Umbria*,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1.

HARTMAN, L.M. & KROMAYER, G., *Storia romana*, Firenze, 1952.

HATZFELD, J., *Les trafiquants 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 Paris, 1919.

HAWTHORN, J.R., *The Senate after Sulla*, 《Gr. a. Rome》 9, 1962.

HEITLAND, W.E., *Agricola: a study of agriculture and rustic life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abour*, Cambridge, 1921.

HELLEGOUARC'H, J., *Le vocabulaire latin des relations et des part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publique*, Paris, 1963.

HERMON, E., *L'impérialisme romain à l'époque des Gracques*, 《Ktema》 4, pp. 249-258, 1979; *Le programme agraire de Caius Gracchus*, 《Athenaeum》 60, pp. 258-272, 1982.

HILL, H., *The Roman Middle Cla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xford, 1952.

HOLROYD, M., *The Jugurthine War: Was Marius or Metellus the real victo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8, p. 1, 1928.

JONES, A.H.M., *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37.

LAFFI, U., *Sull'organizzazione amministrativa dell'Italia dopo la guerra sociale*, 《Akt, VI Int. Kongr. fuer gr. u. lat. Epigr.》, München, 1973.

LANZANI, C., *Le battaglie di Fidentia e di Placentia nella guerra civile Sillana*,

《Rend. Linc.》 ser. VI, vol. II, p. 7, 1926.

LEVI, M.A., *La costituzione romana dai Gracchi a Giulio Cesare*, Firenze, 1928; *Società e costume: Roma antica*, Torino, 1963.

MAGIE, D.,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Princeton, 1950.

MARINO, R.E., *Aspetti della politica interna di Silla*, Palermo, 1974.

MARROU, H.I., *Storia dell'educazione nell'antichità*, Roma, 1950.

MARSH, F.B.,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from 146 to 30 B.C.* (rev. by H.H. Scullard), London, 1953.

MAZZARINO, S., *Il pensiero storico classico I-III*, Bari, 1966-72.

McCRACKEN, G., *The Villa and Tomb of Lucullus at Tusculum*,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46, 1942.

MEYER, E., *Caesars Monarchie und das Principat des Pompejus*, Stuttgart-Berlin, 1919.

MILLAR, F.,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lassical Roman Republic 200-151 B.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4, pp. 1-19, 1984; *Politics, Persuasion and the People before the Social Wa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6, pp. 1-10, 1986.

NICOLET, C., *L'Inspiration de Tibérius Gracchus*, 《Revue des Etudes Anciennes》 63, pp. 142-159, 1965; *L'ordre équestre à l'époque républicaine I*, De Boccard, Paris, 1966; *Les Gracques*, Julliard, Paris, 1967; *L'ordre équestre à l'époque républicaine II*, De Boccard, Paris, 1974; *Rome et la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I, Les structures de l'Italie romaine 264-27 a.C.*, Paris, PUF, 1977; *Il mestiere di cittadino nell'antica Roma*, Editori Riuniti, Roma, 1980; *Demokratia et aristokratia. A propos de Caius Gracchus: mots grecs et réalités romaine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83.

OLIVER, E.H., *Roman Economic Conditions to the Close of the Republic*, Toronto, 1907.

OOTEGHEM, J.V., *L.L. Lucullus*, Namur, 1959.

ORMEROD, H.A.,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Liverpool, 1924.

PANI, M., *Potere di iudicatio e lavori della commissione agraria graccana dal 129 al 121 a.C.*, 《Ann. Fac. Lett.》 19/20, Bari, 1976-77.

PAOLI, U.E., *Vita romana*, Firenze, 1951.

PARETI, L., *I supposti 'sdoppiamenti' delle guerre servili in Sicilia*, 《Riv. Fil.》 55, p. 44, 1927.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1928.

PASSERINI, A., *Condottieri romani*, Milano, 1935; *Caio Mario*, Milano, 1971.

PEKÁRY, T., *Untersuchungen zu den roemischen Reichsstrassen*, Bonn, 1968.

PERELLI, L., *Il movimento popolare nell'ultimo secolo della Repubblica*, Paravia, Torino, 1982.

PLATNER, S.B.,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revised by Ashby, T.), Oxford, 1929.

RATHBONE, D.W.,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 pp. 10-23, 1981.

REINACH, T., *Mitridate Eupatore*, Milano, 1960.

RICE HOLMES, T.,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Founder of the Empire I*, pp. 138-153 & pp. 369-284, Oxford, 1923;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1923.

RICH, J.W., *The supposed Roman manpower shortage of the later second century B.C.*, 《Historia》 32, pp. 287-331, 1983.

RIZZO, F.P., *Posidonio nei frammenti diodorei sulla I guerra servile di Sicilia*, 《Studi di storia ant. off. dagli alunni a Eugenio Manni》, Roma, 1976.

ROMANELLI, P., *Stor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dell'Africa*, Roma, 1959.

ROSSI, R.F., *Dai Gracchi a Silla*, Cappelli, Bologna, 1980.

ROSTOVZEV,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impero romano*, Firenze, 1933.

ROTONDI, G., *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 Milano, 1912.

SALMON, E.T.,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War*, 《Phoenix》 16, 1962; *Roman Colonization under the Republic*,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69.

SALVIOLI, G., *Il capitalismo antico*, Bari, 1929.

SAUMAGNE, C., *Colonia Iulia Karthago*,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p. 131, 1924.

SCULLARD, H.H., *Roman Politics 220-150 B.C.*, Oxford, 1951.

SEAGER, R.,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1969.

SHERWIN WHITE, A.N., *The Date of the Lex Repetundarum and it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2, pp. 83-99, 1972; *The Lex Repetundarum and*

the Political Ideas of Gaius Gracch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2, pp. 18-31, 1982.

SHOCHAT, Y., *The Lex Agraria of 133 B.C. and the Italian Allies*, 《Athenaeum》 48, pp. 25-45, 1970.

SORDI, M., *La tradizione storiografica su Tiberio Gracco e la propaganda contemporanea*, 《Sesta miscellanea greca e romana》, pp. 299-330, Istituto Italiano Storia Antica, Roma, 1978; *La sacrosanctitas tribunizia e la sovranità popolare in un discorso di Tiberio Gracco*,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 mondo antico》, pp. 124-130, Vita e Pensiero, Milano, 1981.

STERN, C.M., *Lucullus und die mithridatische Offensive in der Propontis*, Lipsia, 1922.

STOCKTON, D., *The Gracchi*,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9.

SYME, R., *La rivoluzione romana*, Torino, 1962.

TAYLOR, L.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Los Angeles, 1949.

TERRUZZI, P., *Studi sulla legislazione agraria di Roma. Enigmi graccani e post-graccani*, 《Archivio giuridico》 97 (quarta serie), 8, p. 3, 1927.

TIBILETTI, G., *Il possesso dell'ager publicus e le norme de modo agrorum sino ai Gracchi*, 《Athenaeum》 26, pp. 173-236, 1948; 《Athenaeum》 27, pp. 3-42, 1949; *Lo sviluppo del latifondo in Italia dall'epoca graccana ai principi dell'Impero*, 《Relaz. X Congr. Intern. Sc. Storiche》 2, pp. 235-292, 1955.

VILLORESI, M., *Lucullo*, Firenze, 1939.

VITUCCI, G., *Il regno di Bitinia*, Roma, 1953.

VOGT, J., *Homo novus: ein Typus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Stuttgart, 1926; *L'uomo e lo schiavo nel mondo antico*, Roma, 1969.

WARDE FOWLER, A., *Social Life at Rome in the Age of Cicero*, London. 1908.

WESTERMANN, W.L., *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Philadelphia, 1955.

WISEMAN, T.P., *New Men in Roman Senate 139 B.C.-A.D. 14*, Oxford, 1971.

WORTHINGTON, I., *The Death of Scipio Aemilianus*, 《Hermes》 117, pp. 253-256, 1989.

ZANCAN, P., *Mitridate Eupatore*, Venezia, 1933.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Ⅳ

恺撒时代（上）

[日] 盐野七生◎著　张伟◎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我不是国王，而是恺撒！”

他征服高卢，踏上英伦，越过卢比孔河
他在社会重重危机中，将个人推向巅峰
他明知遭遇暗杀命运，仍全速推进改革
他开启了罗马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

他注定不朽，却是时代不能理解的孤独者

4

王石王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日）盐野七生著；张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86–3242–1
I. 罗… II. ①盐… ②张… III. 古罗马——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1287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Ⅳ : Julius Caesar Rubicon Izen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5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il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il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
LUOMA REN DE GUSHI SI : KAISA SHIDAI（SHANG）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张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

[日] 盐野七生 著
张伟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序
第一章 幼年期 Infantia
第二章 少年期 Pueritia
第三章 青年前期 Adulescentia
第四章 青年后期 Juventus
第五章 壮年前期 Virilitas
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由于共和政体不喜好突出个体，所以流通的货币上雕刻众神侧脸的时代持续了很久。进入公元前1世纪，个人力量的崛起引人注意。在货币上，苏拉和庞培的面孔出现的时代也已到来，他们既是最高权力者，又是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在罗马，流通货币上刻上自己的面孔的例子极少，即使是这枚苏拉时代铸造的第纳尔银币，正面雕刻的也是带着头盔的罗马女神。背面的图案则首次描绘了独裁官苏拉在举行凯旋仪式时驾驭四匹马拉的战车的情形。根据记载下来的执政官的名字推测，可以得知这枚银币的铸造时间为公元前83年。被居于权力顶峰的苏拉置于死地，是尚未进入青年的恺撒的人生变得波澜万丈的原因。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恺撒的家族名据说是由绰号而来。在迦太基时代展开生死搏斗的布匿战争期间，面对迦太基的大象军团，尤里乌斯家族的某位成员英勇奋战，因而被取了在迦太语中意思为“象”的“恺撒”这个名字。而由原来的绰号转化成为家族名号在罗马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考虑继续利用这一点的，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恺撒。看一看这枚对大象进行描刻、并且在下边刻有CAESAR字样的银币，就会感觉好像是选举用的海报。虽说让罗马向帝政时代迈进是恺撒的最终梦想，但是这个目标的推进却是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进行的。在这样的罗马，要实现自己的想法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力，是拥有公民权的市民们投票表决赋予的。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在流通货币上雕刻众神的头像，在罗马极为常见。恺撒没有如同苏拉和庞培一样的殊荣，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将自己的肖像刻在货币上。高卢败将韦桑热托里克斯的面孔却在罗马货币上出现，这也许是恺撒的深谋远虑吧。想来当时的罗马人使用这枚钱币时，就会想起被恺撒征服成为罗马行省的强大高卢。银币背面刻着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罗马军队的图案：疾驰的战车和立于战车之上罗马士兵的英姿。

不过，这枚银币并没有在高卢战争之后马上发行。它的铸造时间为公元前48年，即一心挫败元老院的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一年。在致力于消除内乱的恺撒看来，宣扬自己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很有必要。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序

我住在佛罗伦萨期间，结识了一位朋友，他曾任佛罗伦萨警署调查科科长。不同于一般意大利人对公众事务的冷漠，他可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公仆。经历过与黑社会及绑匪的无数周旋，调换过若干工作地点，目前他担任北意大利中型城市帕多瓦的警署署长。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他任职佛罗伦萨警署时。他到我家来，看着我的书架说："我突然很想知道一些有关恺撒的事，能不能在此类书中挑一本给我？"于是我选了足有5厘米厚、研究近现代罗马史颇负盛名的杰罗姆·卡尔寇比诺所著的《恺撒传》借给他。

大约一个月后，他归还此书，我请他谈谈读后感想。他没有多言，却对我说：

"要是我能与恺撒生于同一个时代，他就是我最想见到的人。"

"那么如果真的见面的话，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呢？"

"我会拜托他让我在他指挥的军团中担任哪怕是一名百人队队长！"

世人认为恺撒是受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其实这位非凡的人物虽然拥有许多优秀品质，但并非毫无缺点，他甚至有过不道德的行为。

尽管如此，不论率领何种军队，他都会是胜利者；不论生于何种国度，他都将是领导者。

——孟德斯鸠

我并不清楚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史的具体架构，但在《列传》中描写的诸位英雄皆为政治家。当然在作者普鲁塔克眼中，并非从什么是政治家型人才这类的现代思考着眼，他只是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即具有道德意识、精力充沛且勇于行动的人皆可为政治家……

政治既非职业也非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充分展现个人全部的生活经验……

“参与政治”、“漠视政治”等繁杂不清的字眼，对于身处于《列传》时代、有教养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如果能够重新思考这一点，也未尝不是好事。

——小林秀雄

要成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五种特质：智慧、说服力、忍耐力、自控力和坚强的意志。唯有恺撒拥有全部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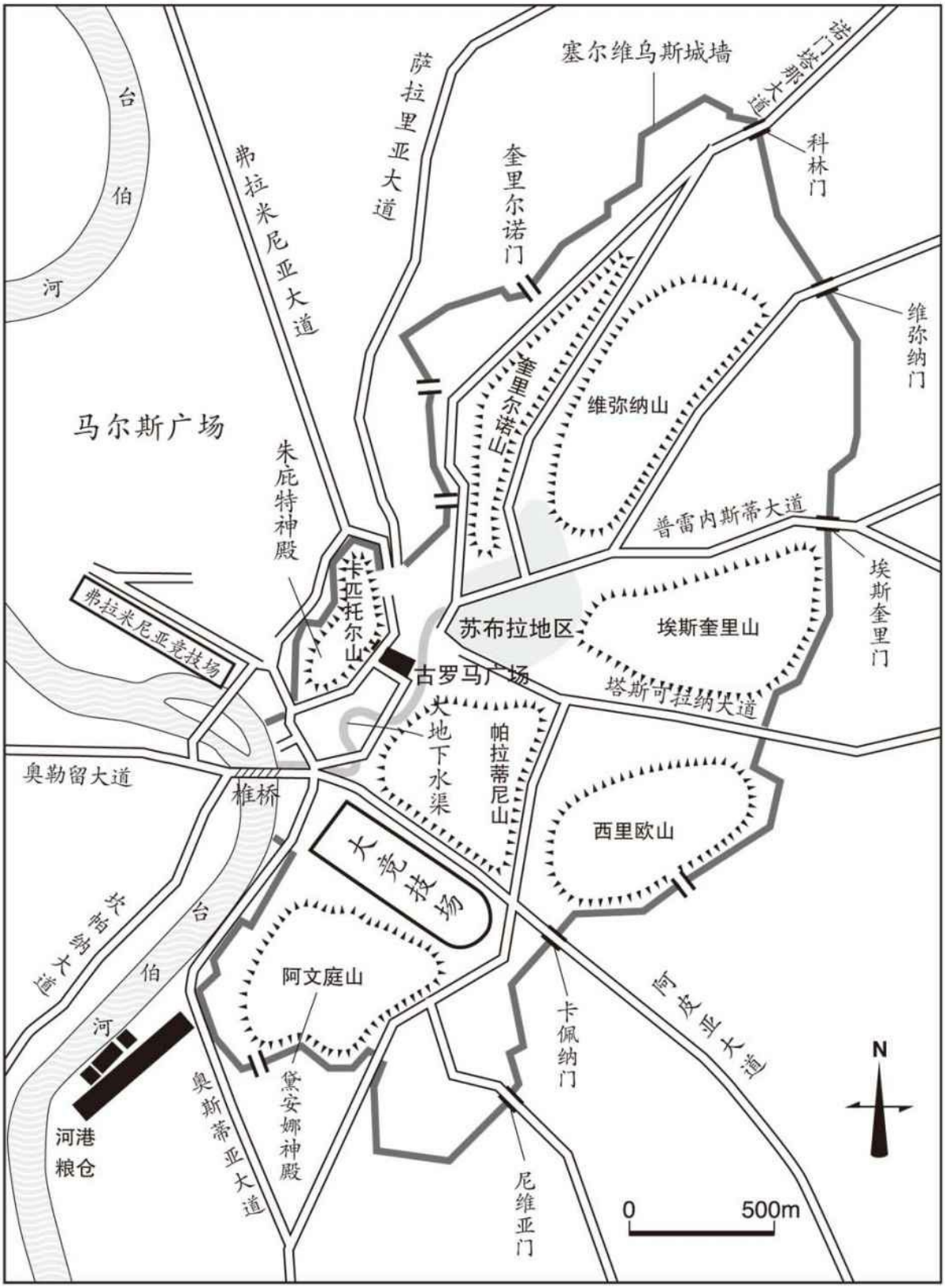
——意大利普通高中使用的教科书

深谙人性弱点的莎士比亚，也无法探知尤里乌斯·恺撒等英雄人物的伟大。《李尔王》虽堪称杰作，《恺撒大帝》却并非佳品。

——萧伯纳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尤里乌斯·恺撒


台
伯
河
马尔斯广场
弗拉米尼亚大道
萨拉里亚大道
塞尔维乌斯城墙
诺门塔纳大道
科林门
奎里尔诺门
维弥纳门
奎里尔诺山
维弥纳山
朱庇特神殿
卡匹托尔山
普雷内斯蒂大道
埃斯奎里门
弗拉米尼亚竞技场
苏布拉地区
埃斯奎里山
古罗马广场
塔斯可拉纳大道
大地下水渠
帕拉蒂尼山
奥勒留大道
椎桥
西里欧山
大竞技场
坎帕纳大道
台
伯
河
阿文庭山
卡佩纳门
阿皮亚大道
奥斯蒂亚大道
黛安娜神殿
河港
粮仓
尼维亚门
N
0
500m

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中心

第一章

幼年期 Infantia

（前100—前94年，恺撒诞生至6岁）

生于何地，长于何地

罗马广场南侧的帕拉蒂尼山，已被建筑物遮盖而无法确切找寻当日的痕迹。2000年后的今天，只能隐约看出最初罗马七座山丘的位置。

以古罗马的心脏罗马广场为中心，西侧是卡匹托尔山，由北向东依次为奎里尔诺山、维弥纳山、埃斯奎里山、西里欧山四个山丘，帕拉蒂尼山隔着大竞技场与阿文庭山遥遥相望，它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罗马七丘”。环绕着七座山丘的城墙，是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在公元前6世纪兴建的，这座塞尔维乌斯城墙在恺撒时代依然矗立。

塞尔维乌斯城墙之内被罗马人视为首都，从面积上来讲，大致和东京大手町、丸之内、霞之关以及永田町合在一起的大小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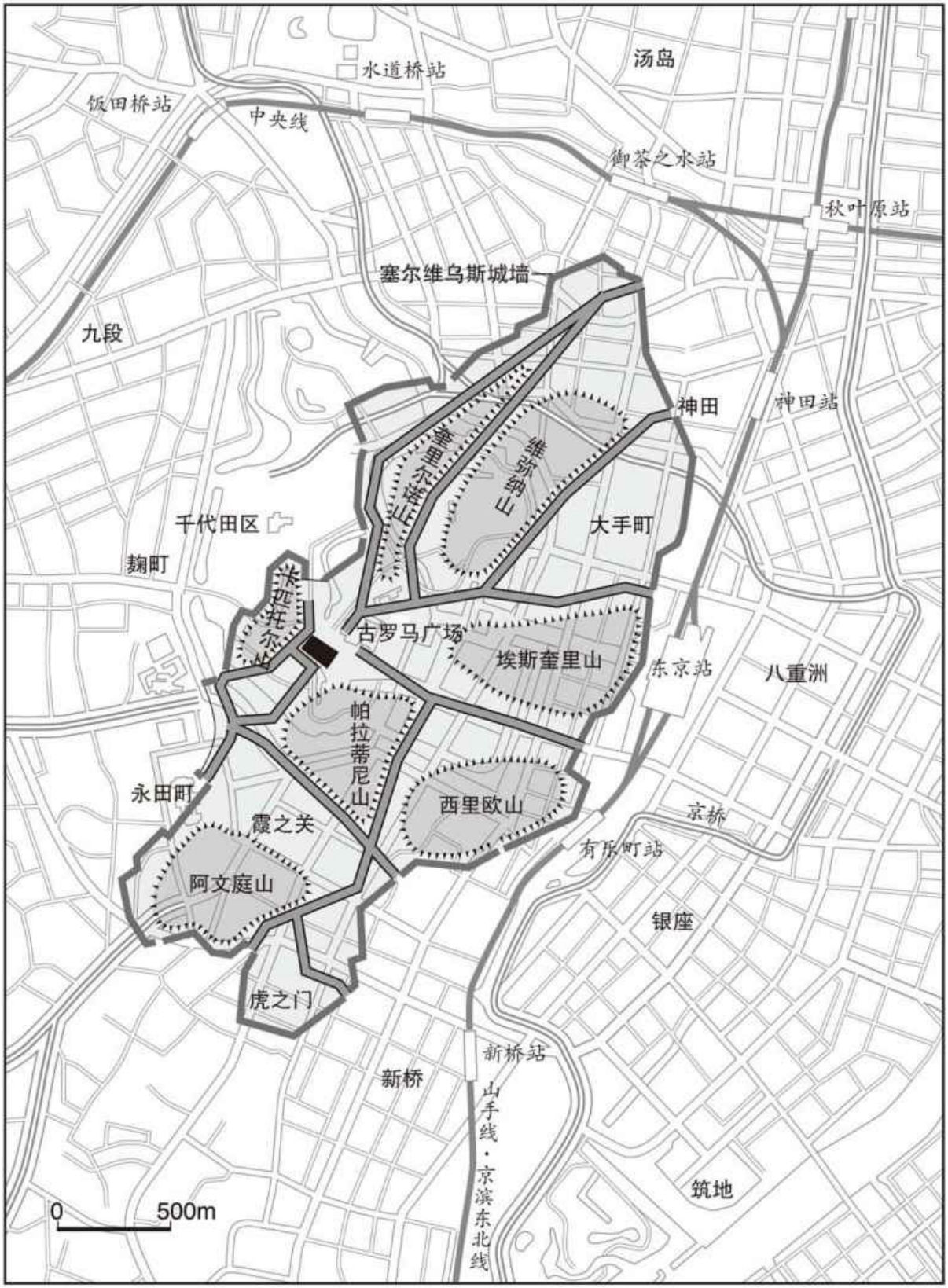
七座山丘中，卡匹托尔山最高，但也不过海拔50米，面积较其他六座小，建国之初它即作为众神居住之所。由于众神的恩惠，人们得以在其余六座山丘上生活。

严格来说，罗马的七座山丘并非各自独立，丘底的山谷也无狭隘险峻之感。低矮的丘陵彼此相连，将地势高处作为住宅用地，中间地带用来排水并建成公共区域，这实际上已成为人们非常自然的选择。台伯河沿岸则得以建造码头及市场，罗马公共会场及其四周的大竞技场也诞生了。罗马人有着多神信仰，拥有为数众多的神殿，卡匹托尔山无法完全容纳这些神殿。希腊人将供奉众神的神殿建于高处，罗马人则喜欢将神殿建于低地，并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公共建筑的一种。山上供奉着众神，人们要登上约20层楼高的阶梯才能进入神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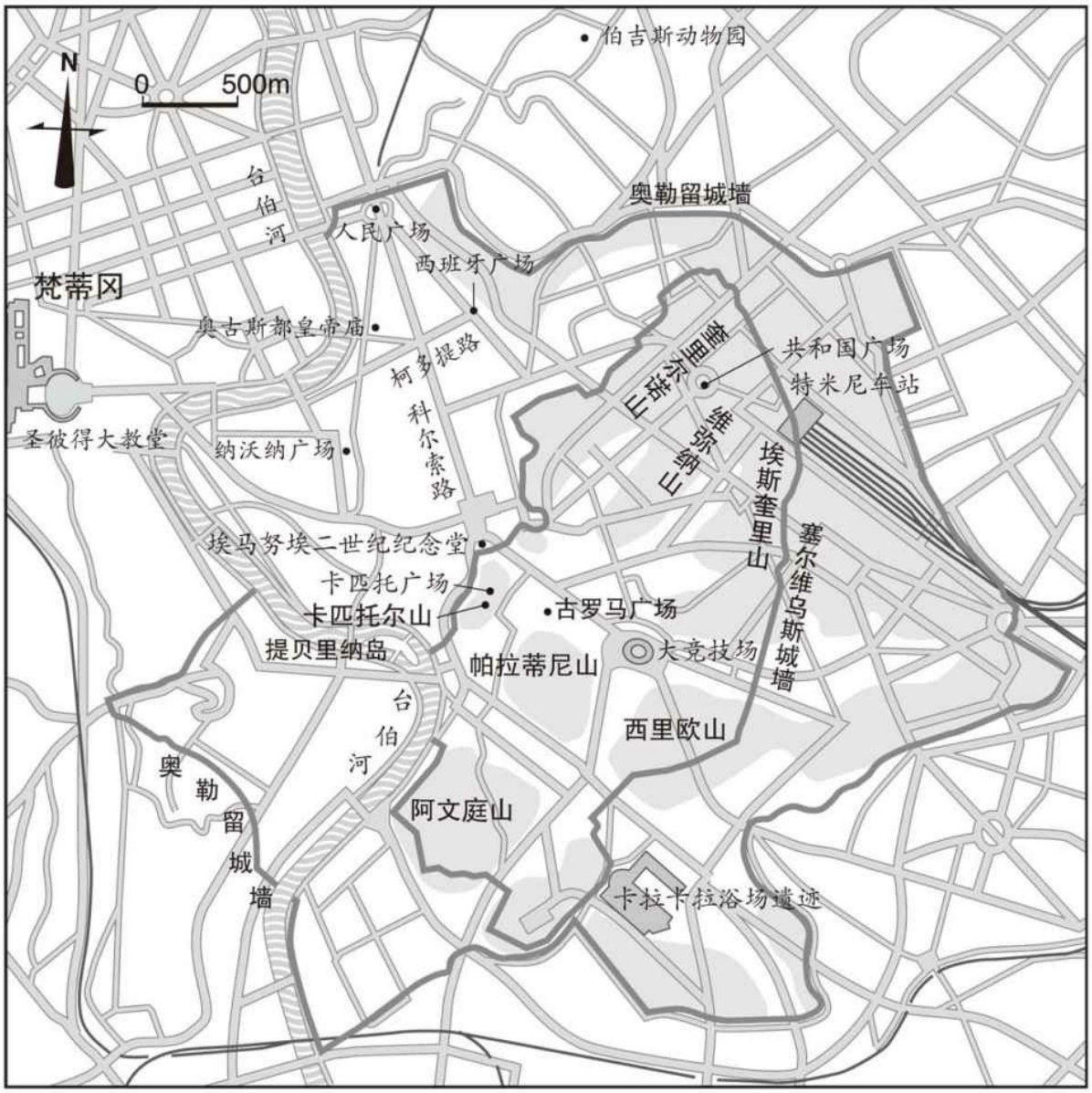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罗马市中心除卡匹托尔山外，地势高处多为私人用地，而地势低处则为公共场所，但在六座山丘当中，地理位置最优的无疑就

是罗马建国者罗穆路斯最初居住的帕拉蒂尼山。

帕拉蒂尼山面积约有10公顷，即使在山顶高处，水源依然丰富。如果前往位于市中心的罗马广场，只需沿着缓坡下行便可到达。由于它是紧邻台伯河的唯一高地，越过台伯河的西风可以抵达这里。在此高处有西风拂面，让人心情十分舒畅。对于夏天比冬天更需要费心选择居住地点的罗马人而言，帕拉蒂尼山可算是无可取代的福地。即使是现代，阳光直射，探访罗马广场的遗迹后登上帕拉蒂尼山，身处罗马，你会惊讶竟有如此清凉的绿意环绕于四周，仿佛是与低洼处的喧嚷迥然不同的另一片天地。如此这般，开国始祖罗穆路斯定居帕拉蒂尼山，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将他的宅邸置于此处，此后历任皇帝也将宫殿兴建于此也就有因可循。但各位皇帝选择在这里兴建宫殿的理由绝不止于此。共和时代，有权有势富裕的罗马人，他们的豪宅也在帕拉蒂尼山上延绵不绝。


汤岛
水道桥站
饭田桥站
中央线
御茶之水站
秋叶原站
塞尔维乌斯城墙
九段
神田
神田站
维弥纳山
埃斯奎里尔山
大手町
千代田区
麹町
米西托尔山
古罗马广场
埃斯奎里山
东京站
八重洲
帕拉蒂尼山
永田町
西里欧山
霞之关
京桥
有乐町站
阿文庭山
银座
虎之门
新桥站
新桥
山手线·京滨东北线
筑地
0
500m

现代东京中心部和古代罗马中心部重合图



现代罗马街道与古罗马城墙重合图

罗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瓦莱里乌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法比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埃米利乌斯等名门望族，无一不是代代将宅邸建于帕拉蒂尼山。格拉古这类平民中的贵族以及罗马首富克拉苏也是帕拉蒂尼居民的一分子。而从外地到罗马发展、以律师身份扬名的哲学家西塞罗，不惜借贷也要在帕拉蒂尼山上购置宅邸。

不只是帕拉蒂尼山，地势高处都为高级住宅区。究其原因，只要想想罗马的气候就会明白。在马尔凯拥有广大领土的庞培，他在罗马的住所位于西里欧山。现在意大利总统的官邸位于奎里尔诺山，总统官邸由中世纪昔日罗马教皇宫殿改建而成，当年意大利统一时由政府一并接管。

没有钱的平民又住在哪里呢？

平民的住所分布于罗马七丘底部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众神居住的卡匹托尔山，山底也充斥着平民的房舍。他们的房舍密集地从山丘下方深入低地，再向另一个山丘下方绵延。此外，也有平民大规模集中居住的地区，这类地区中有一处非常有名，它离市中心最近，几乎与罗马广场相连，被称做“苏布拉”地区。

山顶豪华住宅区的人，在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苏布拉”的平民，则在作坊工匠们日出而作的声响中醒来。贩卖日用品的商户也陆续开门营业。来自山丘上方的豪宅里的奴隶们，为购买日用品而下山，在商店流连。太阳日渐升起，穿梭于狭小街道的人潮随之增多。商店和工匠的作坊临街而设，“苏布拉”大概是罗马噪音最大的地区。在平民的街道上，不论是替人拔牙、理发，还是贩卖气味古怪的东方香料，凡是街头营业的生意人，都无须担心会被有钱人家的用人驱赶，因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做生意。不务正业之徒，在这里也不会担心遭遇他人怪异的目光。“苏布拉”是个奇异却又充满活力的地方。

奥古斯都皇帝下令兴建的广场，如今仅存的残垣断壁处仍依稀可看见高大相连的石壁。“苏布拉”经常发生火灾，石壁是为了防止火势向外蔓延而建。“苏布拉”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平民区，要知道西班牙广场附近餐厅套餐的价格是昔日的“苏布拉”，也就是今天的加富尔大道附近餐厅的3倍。

尤里乌斯·恺撒就诞生于“苏布拉”，在他37岁当选为大祭司移居罗

马广场的官邸之前，一直都住在这里。

环境

罗马共和时代大凡担任国家要职者，几乎都可以从其家族历史中看出究竟。祖父与父亲都担任过执政官的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及格拉古兄弟不必说，克拉苏和庞培的父亲均为执政官。他们出身于世代拥有元老院席位的名门，可归为元老院阶级。无法追溯门第出身者，如出生于地方、因军功而七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略，以及马略的同乡西塞罗，以律师身份扬名打开了新的局面。这类靠自身能力擢升者被称为“新贵”。

说到这类无法追溯门第之人，不得不提苏拉。苏拉并非所谓的“新贵”，他的家族与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等名门颇有关联，不过在他活跃政坛之前，苏拉家族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也许可以算做没落的贵族。

尤里乌斯·恺撒却不属于上述三类出身中的任何一种。

尤里乌斯家族与科尔涅利乌斯、法比乌斯、克劳狄乌斯等家族同属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罗马建国者罗穆路斯的母亲是阿鲁巴国王的女儿，而阿鲁巴的望族之一就是尤里乌斯家族。

公元前753年罗穆路斯建立罗马后，国力日增，一个世纪之后，即公元前650年左右，罗马进攻了孕育过它的阿鲁巴。进攻他国，不过30公里左右的征途，但这段距离相当于当时罗马人活动的半径。

进攻阿鲁巴野营般的征程，由第三任国王图鲁斯·奥斯蒂吕斯率领的罗马军获得成功。阿鲁巴彻底瓦解，阿鲁巴人被迫移居罗马，但并未被逼为奴。罗马人从这时起便开始遵守后来深受普鲁塔克赞许的“同化战败者”的做法。阿鲁巴人虽然被迫移居罗马，但他们与胜利者享有同等的公民权，西里欧山成为这些人的新居所。阿鲁巴权贵昆提利乌斯、

塞尔维乌斯、尤里乌斯等家族也成为罗马贵族，元老院向他们提供席位。与“战败者”混血在罗马完全不是问题，君主政体结束进入共和政体，罗马历代的统治者身上几乎都有“战败者”的血脉。

从共和时代初期，尤里乌斯家族异常活跃，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尤里乌斯家族却相当沉默。尤里乌斯家族的名字在罗马官方记载的《大祭司记录》中开始出现，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代开始。

罗马军团与汉尼拔曾展开过殊死搏斗，尤里乌斯家族成员力战迦太基军，因战功显赫而被人称“恺撒”。“恺撒”这个名字后来竟变成家族名号。在迦太基语中，“恺撒”一词是“象”的意思。由称号变为家族名号在罗马是经常发生的。

此后尤里乌斯家族在历史上再度陷入沉寂。与当时出了十几位执政官的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法比乌斯家族相比，尤里乌斯家族在这个世纪仅出过一位执政官，罗马执政官每年会选出两位。尤里乌斯家族的荣光仅是昙花一现。

公元前1世纪，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终于成为了执政官，但他是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伯父而非父亲，恺撒的父亲只担任过法务官。

法务官在共和时代的罗马，重要性仅次于执政官。每年公民大会选出6位法务官，年满40岁的元老院议员均有机会参选。法务官一年任满后，将奔赴罗马行省担任总督，总督任满后才具有执政官候选人资格。

恺撒的父亲就任总督前死亡，最高职务即为法务官。恺撒并没有显赫的身世，但不同于父母姓名都无迹可查的苏拉，毕竟父亲曾任法务官，而他母亲的家世非同寻常。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为法学者，是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的妹妹。

恺撒家经济状况一般，尤里乌斯家族虽为名门望族，但长久以来不

受当权者的垂青，所以没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机会。凭个人实力脱颖而出的马略，为提高身份迎娶了恺撒的姑姑尤利娅。科塔一族多为学者，自从奥利乌斯·科塔担任执政官后，担任罗马要职的机会就再三降临。出身于此等家庭的女子也绝无下嫁贫穷贵族的道理。就这点而言，我们只能接受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恺撒与苏拉不同，他成长于节俭但非贫困的家庭中，他没有能力在帕拉蒂尼山购置居所。

虽然和平民一样住在“苏布拉”，恺撒也并非与他们住着同样的房舍，过着相同的生活。一般而言，城墙之外的市镇，人们依据不同的经济能力选择不同的地段购置房舍。在古罗马的市中心，历代定居于此的人颇多，经济条件不同的人家比邻而居并不少见。这就好比玄关背后，各家的内部陈设可能完全不同。不过住在帕拉蒂尼与定居“苏布拉”，其间的差别却是十分明显。

公元前1世纪，罗马虽然称霸地中海，但给移居首都的人提供住所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塞尔维乌斯城墙内的面积只和东京大手町、丸之内、霞之关以及永田町合在一起的面积大小相当。要想一下子满足财力不足的群众的需求，只有将房舍向上加盖。提供租用的四五层楼高的密集住宅，罗马人称之为“岛”。直到青年时期，苏拉一直都住在这样的“岛”中。

现存的史料中完全看不到恺撒住这类住宅，所以设定他并不住于此似乎较为恰当。如果是这样，“苏布拉”的居民恺撒，应该住在独栋住宅中。因为对恺撒成长的环境所知不多，所以一切只能想象。我们或许可以将研究者提供的“罗马市内典型的独栋住宅原型图”作为我们想象的起点。

古代罗马与现代罗马房屋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外的开放性。古罗马房屋都是开口朝内，而现代则在外墙上多开窗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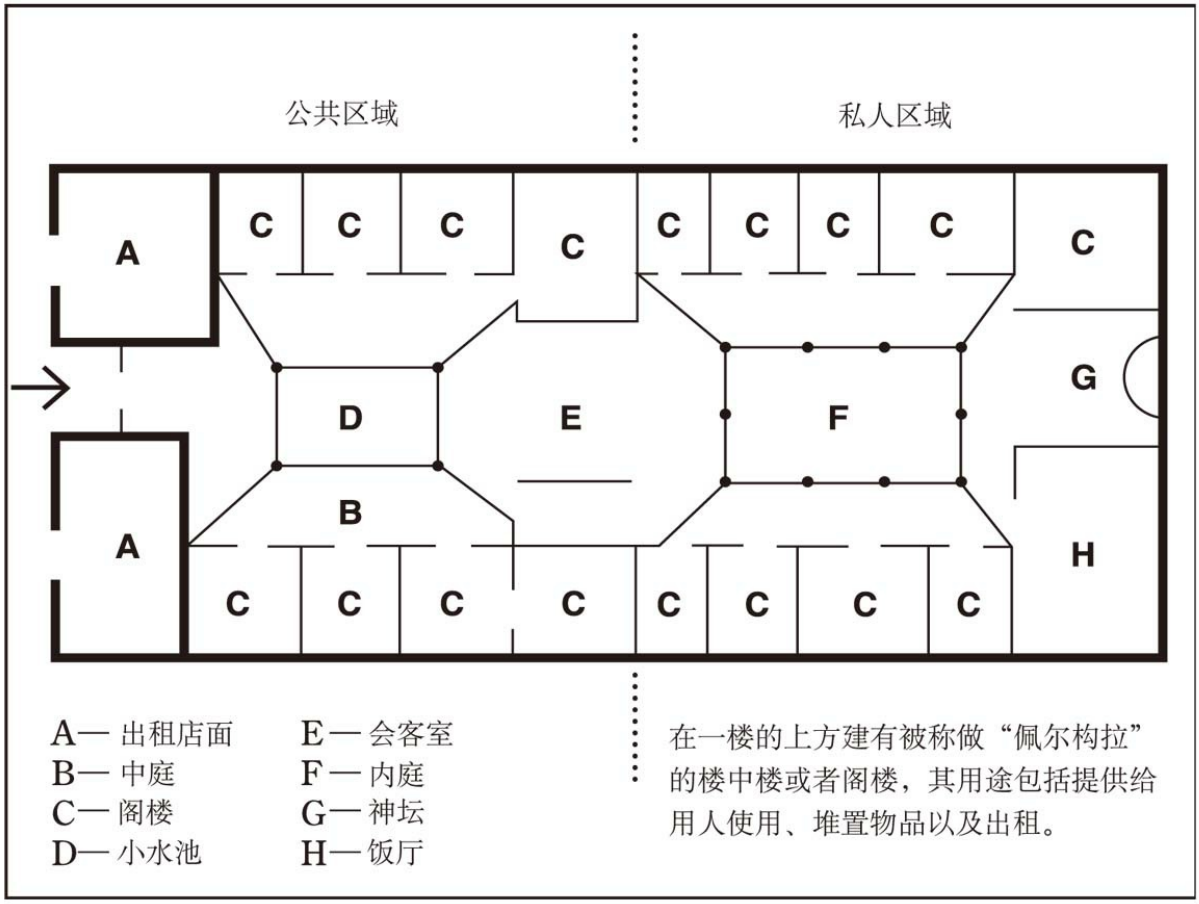
将房屋开口于内侧而外侧封闭有四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在有限的土

地上容纳更多的人，因为即使是独立的房屋，外墙也必须与隔壁的房屋相连；第二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三是因为罗马的气候；最后一个理由是，即使住在热闹的大街上，也能与外界隔绝，以保持家中的宁静。

事实上，文艺复兴之后，便开始有人在房屋内装设窗户，只不过低一点的，如一楼，总加装铁窗。再往上一点的，窗户的高度如果阳光能射入，夏季早晨9点后便得关窗，而且不仅关玻璃窗，连百叶窗也必须关上，直到太阳下山才能再度打开，足见此地阳光强烈的程度。罗马房屋墙壁的厚度至少15厘米，所以能完全隔绝阳光，房屋内部因此出乎意料地凉爽。从这件事便不难理解这种门朝内开的罗马式住宅模式，如今虽然只被保留了一半，但仍能存在到今天的原因。

即使在石造建筑普及之前的砖造建筑时代，古代罗马市内独栋楼房的外墙都相当厚。这些外墙与它所环绕的房屋内部基本上形成对称。左右对称的均衡感，能够与居住于其中者的均衡精神相通。均衡感是古代构成美感价值的首要条件。

作为彻底追求均衡美的表现，古罗马时期经济实力居中上程度的人，他们的住宅当然是左右对称，甚至是出租店铺也以入口为中心左右对称。出租店铺的是房子的主人，在盖店铺之初就打算将店铺出租，所以房东将自身住宅与店铺交界处，用与外墙厚度相同的墙壁加以隔绝。罗马市内的独立住宅的大部分，都是日本称为“木屐式”的住宅。当然，如果是帕拉蒂尼山的豪宅当然就不是这种结构了。庞培住在西里欧山间以豪华著称的宅第，自然不可能将部分出租。但恺撒的家位于“苏布拉”，这里80%都是“木屐住宅”，也就是一楼做店面、二楼以上为住宅的房屋结构。



罗马市内典型的独栋住宅原型图

走进这类“木屐”房屋中间的入口后，可看到被称为“Atrium”的中庭，“Atelier”（画室）就是由这个词演变而来。称它为中庭，实际上并没有庭院，只是天井的中央部分空着，让阳光得以射入屋内罢了。因为四方圆柱支撑的屋顶中央部分空着，所以下雨的话，会造成积水，所幸罗马降雨的日子相当少。在中庭的中央通常都有小池子，这池子与其说是为了在雨天使用，倒不如说是为了美观。池子四周都是回廊，左右两侧的门并列。因为没有窗户，室内的光线只能自天井射入，由于光线强烈，室内光源也已经足够。

与中庭相对的一个房间，被作为外人与屋主进行商谈的会客室。屋主如果是名门望族或有权势者，在罗马通常都会形成一种极为重要的人

际关系，也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或支持者间的关系。因此每天早上都会有被保护者或者支持者造访，在此进行各种商谈，大多数的罗马家庭都有必要设置这样一个空间。自玄关经过中庭到会客室这部分，可说是家中的公共区域。

对一切都持开放态度的罗马人来说，这么做是因为罗马的气候。会客室没有门，在使用会客室时，只在前后用帘子与外界相分隔，不使用时则将帘子拉开。因此，在踏进中庭后，视线经由会客室可直接深入到内部另一个充满花草的中庭。自环绕于会客室上方的横木望去，正如欣赏画框里的绘画一般。

罗马人所建屋内的私人区域与公共区域，大致上都如上述般并未完全隔开。虽然如此，其中还是有所不同。私人区域同样是以柱间无壁、对外开放的结构为中心，四周建有回廊，后方则有房间环绕，而建有小池子的中央部分为庭院，给人一种柔和的感受。中庭四周矗立着许多圆柱，圆柱旁成为适合妇女们工作的地点。被称为“艾色多拉”的部分，设有供奉家中保护神的祭坛，在恺撒家供奉的是代表美的女神维纳斯，旁边则供奉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相对于现代的欧美人，对神坛与佛坛共存于同一屋檐下司空见惯的日本人，对庭院中这样的陈设会有比较少的不协调感。相对于中庭，私人区域中首先与外界接触的是内庭，即使面积再小的庭院也种有花草，庭院的角落甚至还有流水淙淙的雕刻喷泉。

和欧美人相比日本人会有更少的不协调感的另一个地方是古代罗马住宅的内部陈设。一位欧洲研究者曾提到，如果古罗马人看见现代欧洲人将各种家具并置于室内，一定会以为那里是储藏室。古罗马人放置于室内的家具，即使在卧房也只有床、小桌子与椅子。饭厅则是根据希腊、罗马人横卧而食的习惯，中央放置了床形的桌子。

只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放置在身边的罗马人转而装饰墙壁与地板。地板是在尺寸一定的表面铺满光滑的石块，或铺上鲜艳的镶嵌材料。无论是铺上大理石或是使用镶嵌材料，自王政时代乃至共和时代，

镶嵌的色彩也只局限于黑白两色。

墙壁上装饰的绘画，一般都是风景画而并非人物画。即使是画人物，也只是当做风景的一部分。要说这种风景画是什么样的感觉，可到现代罗马市的西班牙广场附近找一家名叫“英国饭店”的酒店，那是一家《你前往何处》的作者显克微支也曾住过的古老酒店。这家饭店的餐厅被命名为“浪漫庭院”，那里并非古罗马式的庭院，只不过是位于地下一楼、四面都是墙壁的角落罢了。四面墙上是绘画，画中有爬满常春藤的石墙与雕像，以及面对山丘类似神殿的建筑物。总之，在“浪漫庭院”吃饭也就仿佛置身于古罗马庭院中用餐时那种气氛。

古罗马室内的壁画都是这种风格的画作，其实以透视画法甚至能画出远及海边的别墅。因此即使身处罗马街道，也能享受与外界相连的乐趣。日本也有类似的传统，如澡堂里浴池的墙壁上绘有富士山和松岛，在家里榻榻米的两头镶边装饰上花纹，在被子面上绘画等。虽然这些风景画并非真实的大自然，但也许正因为罗马式住宅内家具甚少，这类画作才能自然地融入室内而不觉得突兀。

市中心的独栋住家通常都没有二楼，而在现代的意大利，如果高度不及2.5米就不能算是一间屋子。但有类似楼中楼或阁楼的房间，从屋顶到天花板如果有空间，则无论暑寒都较缓和。除了中庭及内庭部分，也就是柱间无壁、对外开放的区域，以及环境四周的屋顶部分外，这类长方形的阁楼间覆盖了整栋房子。这里通常是用人及奴隶的住处，或是用来存放无法放置室内的多余物品，此外也被当做出租的房间。历史学家狄俄尼索斯自希腊初抵罗马时，也住在这类的出租房里。

以上便是罗马街道上独栋住宅的概况。如果是富有人家，中庭及内庭就会更宽广，环绕四周的房间数更多，私人区域后方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庭院，而这些都是位于山丘上方的高级住宅区才能拥有的奢侈享受。但即使是高级住宅，其基本格局也大致相同。就舒适这一点而言，这种房屋格局冬暖夏凉，与外界隔绝而独享清静，很适合罗马的气候和罗马

人的性格。提到居住于北欧的首要条件，罗马人马上考虑到暖气设备，但在南欧的首都罗马就没有这个必要。

在当时的罗马，即使是家境并非特别优越的人，多半也能在距离市中心二三十公里处购置山中别墅，与其说是为了享受绿意盎然的田园生活，倒不如说这是农业国人民的传统与天性使然。因此，山中别墅对于都市的人来说是农业生产地，他们偏爱自制的橄榄油、葡萄酒、奶酪与水果。简朴的恺撒家，似乎也拥有一两栋山中别墅。虽然没有购置的历史记录，但确实曾住宿于此。

公元前100年的7月12日，罗马建国后653年，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诞生于罗马“苏布拉”的家里。他的诞生没有伴随伟人诞生时如星相变化等异常现象出现的传说，如同当时平常的小孩，他受到双亲、年幼的姐姐、亲戚以及奴隶们的祝福。几年后他的妹妹诞生，恺撒成为排行于姐妹间唯一的男孩。

恺撒在母爱中成长，因此他的人格特征之一就是不论身处何种绝境，都绝不会丧失平和的心态。他的乐观来自从不动摇的自信心。是来自母亲所给予的爱，最先使他拥有了身为男人的自负。因为从小在母爱滋润下成长的人，自然从心底里拥有自信，具有均衡发展的人格。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不问过去、展望未来的积极性格。

第二章

少年期 Puerit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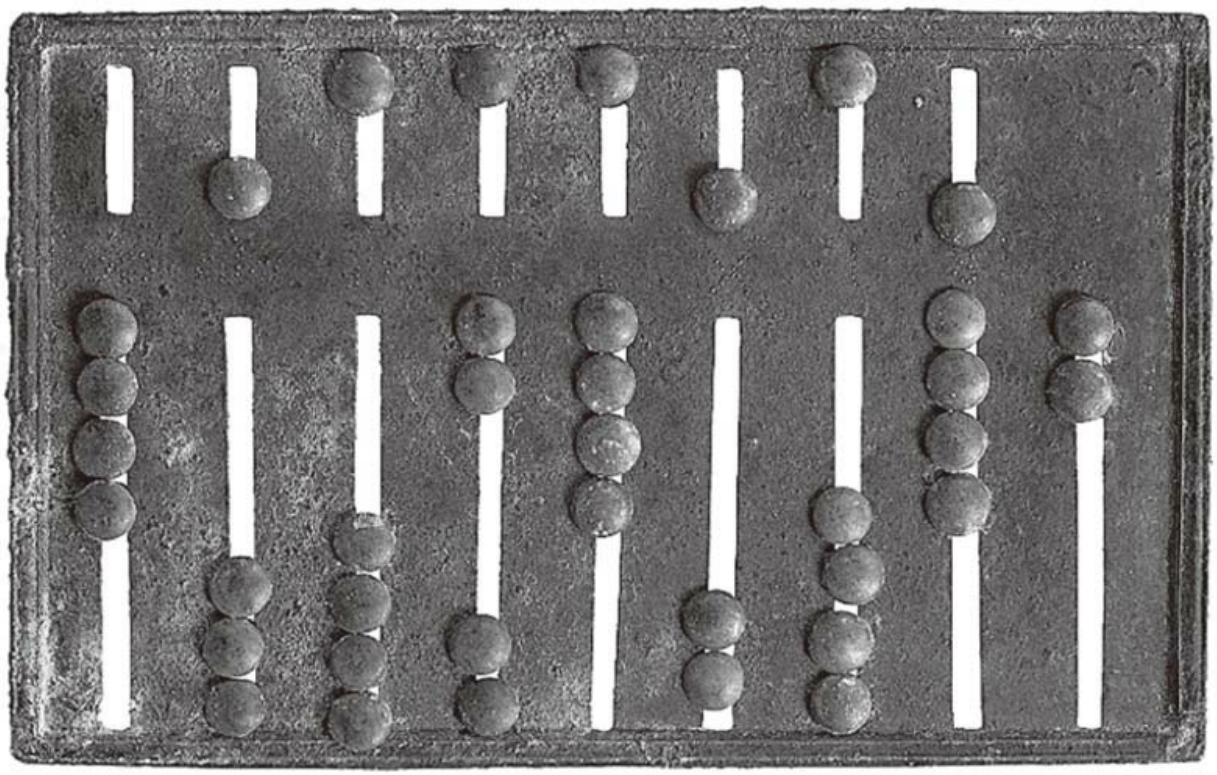
（前93—前84年，恺撒7—16岁）

家庭教师

古罗马时代孩童的教育是从六七岁开始的，没有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在私塾接受教育。如果双亲具备自行教育孩子的文化程度，双亲之一担任家庭教师的现象并不少见。11岁以前所接受的初级教育主要是读、写和算术，因此双亲也能胜任初期的辅导工作。

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是个极具教养的女子，出身于以学者著称的奥利乌斯·科塔家族。恺撒少年时期的初级教育也许就是由母亲负责，与他共同学习的“学友”包括姐姐、妹妹及家中奴隶的子女。不同于在雅典女子不接受教育，罗马自古以来女子就有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此外，越是家世良好，让奴隶的子女与主人的子女一起学习越是被视为理所当然。

出身良好的男子成年后注定要从事公职，因此十分需要如同手足般控制自如的助手。罗马的重要人物直到生命终结一直都会拥有与自己甘苦与共的人，其间以他们的奴隶居多。这也是因为他们从小一起学习、成长，于是拥有终生苦乐与共的情感。所以罗马人是着眼现实的需要而非人道的立场，让奴隶的子女接受同等教育的。



罗马时代随身携带的铜质“算盘”

而到了八九岁时学习便告一段落，家世良好的子女今后的教育依照惯例便托付给家庭教师。

在罗马，重视教育而经济能力也许可的家庭，自乳母开始便雇用希腊人，此后也继续聘用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希腊家庭教师。但是此等花费，只限于格拉古及埃米利乌斯家族这类富裕且重视教育的家庭。如居罗马首富的克拉苏家族，就以高薪聘请了许多希腊籍教师来充门面。当时的家庭教师几乎都是希腊人，其中又以在雅典完成学业的希腊人为“极品”；其次是在以帕加马为中心的小亚细亚西岸或罗得岛受教育的希腊人。格拉古兄弟、克拉苏、庞培的家庭教师当然是由希腊人担任，而家世、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恺撒家自然无法做到。

在恺撒少年时期担任家庭教师的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完成学业的高卢人。之所以选择高卢人，是因为他的母亲奥雷利娅也懂希腊文，而

且凡事讲求实际的结果。让年少的恺撒将母语拉丁文的学习达到完美的境界，同时也能自高卢人身上学习当时国际通用的希腊文。

9岁到16岁之间就是初级教育后期到高等教育初期，学习的科目区分如下：

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法。

修辞学，学习更有效地运用和适当表达词汇的技巧。

辩证学，掌握合乎逻辑的表达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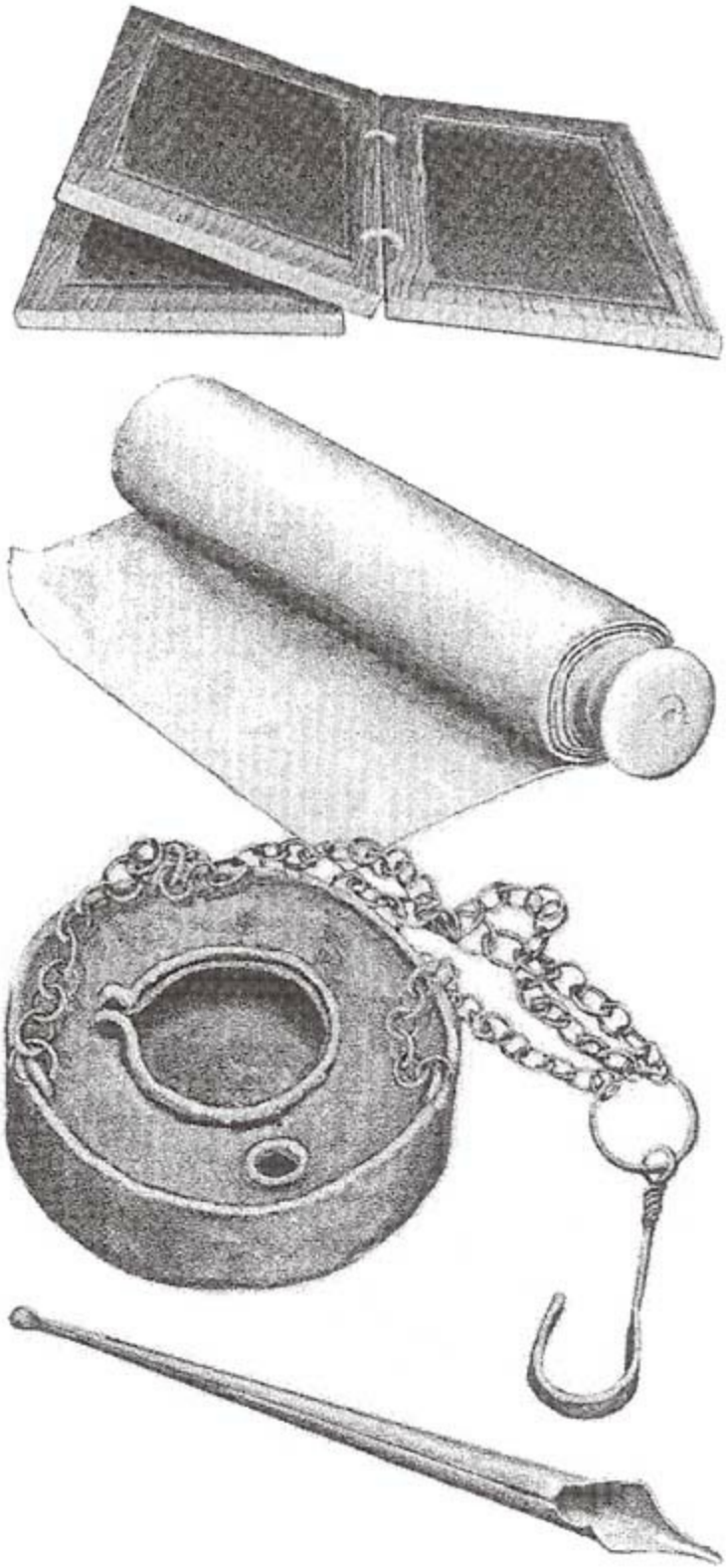
再加上数学、几何学、历史及地理。

以上的这七门学科被称为“阿尔提斯·里贝拉雷斯”，直译的话就是“自由课程”，意译的话是指一个成年人必须学习的人文课程，也就是现代意大利语的“阿尔提·里贝拉雷”，英文的“Liberal Arts”。

这七门课程都由同一位教师讲授，这并非出自经济的考虑，而是由于当时罗马的教育理念。

在初期的学习阶段之后，阅读前人流传下来的文章便成为接下来的教育课程。无论是文法、修辞，还是历史、地理，皆以阅读荷马、修昔底德、柏拉图、大加图的文章为主。总之，教材是前人流传后世的文章，而学生以涂了蜡的木板作为“笔记本”，以铁或者象牙书写于木板上。除了学生以外，大人也以这类木板为“记事本”，因为无论是纸莎草纸还是羊皮纸都十分昂贵。

当时由一位教师来教授所有科目的方式，是非分科综合授课法，这种授课法具有使学生掌握各科间相关性的优点。不过这种方式对教师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不过由家庭教师在罗马社会中所享有的尊贵地位及高额报酬来看，反映了这种需求。



从上往下：笔记本、纸莎草纸、墨水壶以及铁笔 （复原图）

在上述的七门人文课程以外，教师有时也教授天文学、建筑及音乐，这一点其实是深受希腊影响。希腊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与其说是掌握演奏乐器的技巧，不如说是训练和谐的音感。

进大学学习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就是意味着到雅典及帕加马留学。在那里主要学习的课程为更深入地学习修辞、辩证，再加上哲学。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的学习课程中并不包括法学，而实际上，法律已经是罗马人餐桌上的家常话题，是有意担任律师的年轻人充实技能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待在有名的律师身边见习，汲取实际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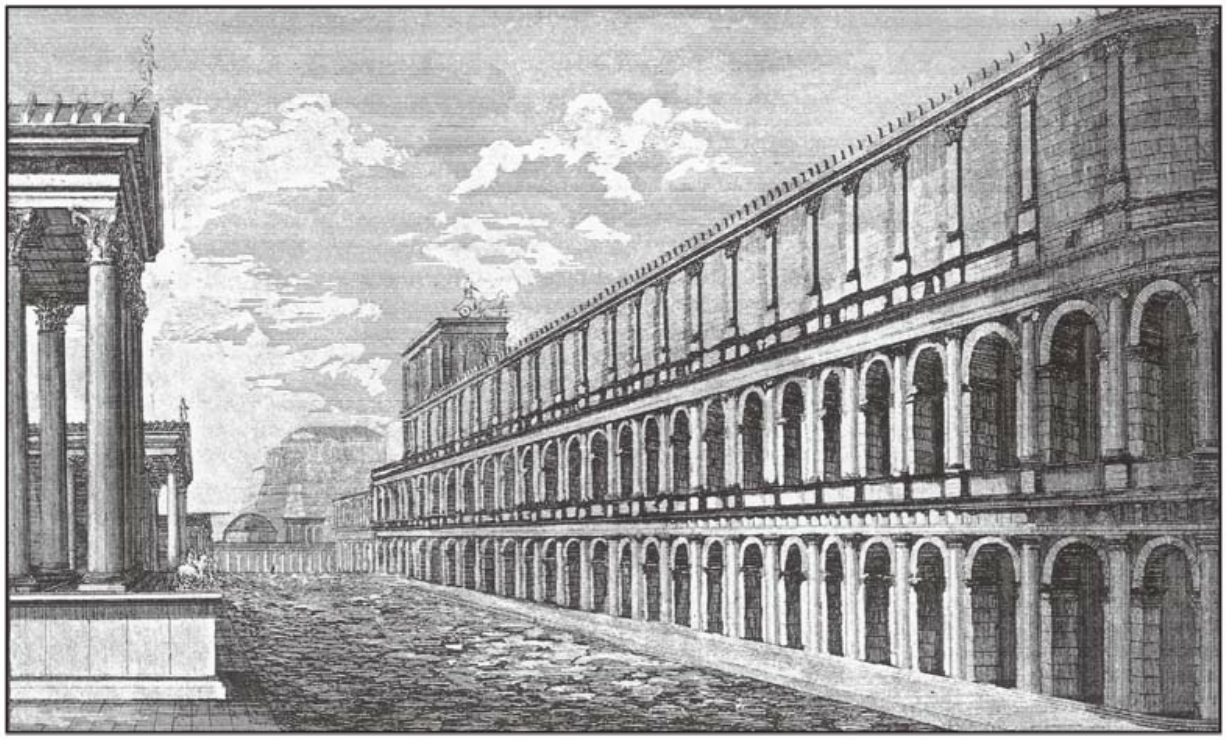
体育

上边讲到的这些人文课程无论是聘用家庭教师或到私塾上课，学习时间都仅限于中午之前，午后则为体育课程的时间。从家庭教师那里获得解放的学生，到各地公营竞技场所附设的健身场所，也就是被称做“吉鲁库斯”或运动场等地锻炼身体。竞技场的观众席下方常作为室内体育馆，而竞技场的竞赛跑道则可以进行赛跑及马术训练。从恺撒家所在的位置来看，位于帕拉蒂尼山对面的大竞技场，以及曾遭汉尼拔突击的弗拉米尼乌斯在城墙外所修建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都是午后锻炼身体以及修习武术的地方。

上午一起读书的“同学”午后也一同前往竞技场，这是因为奴隶的儿子对还只是少年的主人来说，同是担当着同学、伙伴以及仆人的角色。天生体格纤弱的恺撒，无论日后遇到体格多么壮硕的士兵也不认输，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也不屈服，这都得益于他少年时代遵守母亲指示，天天上运动场之赐。

恺撒在少年时代特别擅长御马术。在还没有马镫的年代，能以双手环绕马颈稳健地骑马，只有深刻了解马的脾气的人才能办到。之后在恺

撒面临生死决战时，正是拜此种才能之赐他才能获胜。不过，擅长不使用缰绳骑马的少年，却让母亲心惊胆战，仿佛心跳都将停止。



弗拉米尼亚竞技场（想象复原图）

恺撒并不是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优越环境中成长的，而是平凡地成长于当时罗马家世良好的人家。从9岁那一年起，恺撒开始体验既无家庭教师也无体育训练的生活。因为在从他出生的公元前100年起的9年间，巨大的动乱再度袭向饱受外患内乱之苦的罗马。“同盟战争”爆发了。

实际教育

如果恺撒只是个普通的市井小民的儿子，那么这次的动乱或者父亲的出征，留在年少的他心中的印象，不过是当时的罗马人都必须承受的

一件事罢了。他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出身于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世家。负责平定动乱的罗马军最高司令之一，是恺撒的伯父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恺撒的姑夫马略也是参战的司令官之一。虽然在记载司令官名字的官方记录中，并未发现恺撒的父亲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名字，但他到前线参战的可能性很大。“同盟战争”为曾经与汉尼拔奋战到底的罗马联盟诸国举兵反叛盟主国罗马的战役（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罗马动员了领导阶层外所有的人力投入这场战争。不久，“同盟战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恺撒家餐桌上谈论的焦点。

从9岁到11岁这段时期，从表面上看起来，恺撒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按照罗马的规定，无论战争形势多么恶劣，都不能征召未满17岁的男子服兵役；而45岁以上的预备役将士也只限于保卫首都而不上前线。此外，无论奴隶还是解放奴隶，在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后，也一律免除兵役勤务。“苏布拉”地区如同往常一样喧嚣，恺撒因为母亲奥雷利娅的细心照料，只要踏入家门依然能够平静充实地度日。中午之前的学习课程当然不能荒废，午后到竞技场健身也如往常。对不得不喜欢战争的罗马人来说，即使身处战乱也会极力避免战乱妨碍他们的生活。即使在堪称前所未有的国难“汉尼拔战争”时期，献给众神的祭祀庆典以及随之而来的体育竞赛也一如既往地举行。

幸亏在公元前89年，也就是恺撒11岁那年，“同盟战争”结束了。战争的结束并非军事镇压的结果，而是确保军事上的利益，再加上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叛乱者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公民权，也就是采取政治解决的结果。倡导并促成此项立法者是少年恺撒的伯父，也就是公元前90年担任执政官的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在公元前90年的冬天经全体大会决议成为国法，它不仅是以结束战争为目的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它足以与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相提并论，堪称是奠定罗马未来方向的法律。长久以来，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争斗不断，《李锡尼法》确立平民、贵族

阶级就任国家重要公职的权利平等。相对于《李锡尼法》，《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则赋予北起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所有自由民公民权，具有促使罗马及罗马联盟的盟国立场平等的意义。拥有平等权利后就具有公平竞争的权利，纷争便可得以平息。由于《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通过，罗马人与罗马以外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人人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

“同盟战争”虽然只持续了两年，却是一场有一位执政官战死的激战，为战争的结束付出的代价极大。但凭借《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罗马得以跨出都市形态国家的第一步。同时，胜利的罗马所采取的态度并非凭借军事力量企图控制或压榨战败者，而是把战败的盟国同化，以共存共荣为目标而努力。

我注意到这一点也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差异之一。无论在雅典或斯巴达，凡是希腊人的阶级斗争都必须进行至分出胜负为止，而胜利的一方必定会让失败者屈服其下才肯罢休。斯巴达国内的阶级一向固定不变，即使在雅典，如果平民在与贵族争权时获胜，则施行作为平民独裁的民主政治；如果贵族反击成功，那么平民也只能默默服从贵族的独裁统治。相对于希腊人，罗马人的性格则是短时间争斗，最终仍旧朝共存共荣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罗马人能够创立帝国并且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原因。顺便一提的是，在坚持对立主义的希腊人中，唯一例外的是亚历山大大帝。

从一个人成长的观点来看，如果能够平静地度过不解世事的幼年时代，到了通晓世事的年龄时，又能幸运地获得思索人生的契机，那么即使身处乱世，其实也并非不好。对恺撒来说，必须再度强调的是他的出身，他并非生于一般市井之家。给予年少的他思索方向的，不仅有促成《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立法的伯父，还包括他周遭的人物。

如同曾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所叙述的，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一时之间造成罗马的动荡不安，而在格拉古兄弟死后罗马

维持了约10年短暂的平静。自公元前101年至前78年间，罗马进入堪称以马略与苏拉为主要登场人物的“马略与苏拉时代”。这个时期相当于恺撒出生到他22岁为止，而且这个纷争其中一方的领导人物——马略就是恺撒的姑夫。

马略身为平民而起家于地方，这点对他来说是不利的。但凭借辉煌的战绩，他创造了个人生涯的巅峰，他的风采却是出生于公元前100年的恺撒所无法深刻感受到的。他在北非的朱古达战争中获胜，迎击如怒涛般南下的日耳曼人并大获全胜，这些事都发生于恺撒出生前。在恺撒家的餐桌上提及频率最高的当然是在外的姑夫马略，但是，马略的声势开始走下坡路也是在公元前100年。实际上，在初解人事的少年恺撒眼中，马略是个即将迈入70岁的老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远比现在的势力更令恺撒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在马略麾下初次崭露头角的将领苏拉，则是由于在“同盟战争”中拥有无人能及的辉煌业绩而当选为执政官。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当时50岁的苏拉正朝着人生的巅峰迈进。

但实际上马略在政坛也并非失去了人们的支持。长久以来，罗马军皆以拥有资产者为征兵制的征召对象，马略将不具资产的无产阶级也编入军队，将志愿兵制导入罗马军队中。因为这项改革，罗马军的兵役由公民的义务转变成一种职业，因而稍具资产就须服兵役的小市民得以免除兵役，而失业的人也得以从事军人一职。马略的兵制改革可视为一项社会改革，所以罗马的平民阶级很自然地成为他的支持者。即使在他的声势很明显地走下坡路时，民众对他依然十分支持。马略本人也认为只要掌控军权便能挽回逐渐下滑的声势；另一方面，他对与自己活跃于同一领域，也就是以战绩建立威望、曾身为他部下的苏拉怀有妒意。

但是，苏拉对他以往的上司丝毫不愿意让步。“同盟战争”结束后，罗马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在东方所开展的反罗马阵线。这次远征东方的军事指挥权成为马略与苏拉争夺的开端。

公元前88年，苏拉被公民大会推选为执政官，同时也被任命为征讨米特拉达梯的统帅。但是马略与护民官在平民才可以参加的平民大会中推翻了这项任命。自公元前287年通过《霍滕修斯法》以来，平民大会中所决议的事项也可正式立法予以承认，而丝毫不肯让步的苏拉也不肯就此罢休。护民官苏尔皮修斯十分推崇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但元老院派人士对他偏袒民众的政策感到不安，于是暗中支持苏拉。

苏拉率领着为了远征东方而组编的3.5万名士兵向首都罗马进军。马略及苏尔皮修斯都认为，位居一国之首的执政官苏拉绝对不会率军进攻首都，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防备。短短数小时的冲突后，罗马被苏拉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掌控，马略逃走，苏尔皮修斯被捕身亡。在首都大多数居民还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军事政变便获得成功。以马略为首的平民派其他领导人士，被以“卖国贼”之名处死。苏拉甚至立法规定如果有加以援助者以同罪论处。老马略不能留在意大利，只好逃到遥远的非洲。虽然恺撒一家并非这次政变的直接打击对象，却仍然忧心忡忡地度日。

然而，这个发生于少年恺撒12岁时的事件并没有就此终结。苏拉重获远征东方的统率权后率军前往东方，他将国内的事委托给公元前87年选出的执政官秦纳处理。不想秦纳却露出真面目，他召集公民大会，立法恢复被冠以“卖国贼”的马略以及他同党的声誉。但是，隶属元老院派的另一位执政官屋大维想否决这项立法。马略得知罗马的形势变化后便从非洲回国，6000名支持他的士兵也前来效命。

于是马略与秦纳成功地以武力掌控罗马。但是这次的武装政变，将不相干的人也卷入其中。马略无法忘记自己充满悲惨及屈辱的逃亡生活，于是这位70岁的老将将积压已久的愤恨化为了残酷的报复行动。

老马略大开杀戒，派遣了一队奴隶兵对罗马进行了5天5夜的大杀戮，死者包括元老院议员50人、“骑士阶级”1000人。

作为罗马共和政治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之中，有50位议员遭到杀身之祸。死亡的议员中还包括现任的执政官屋大维。自格拉古兄弟以来，护民官被杀的事件在罗马已是司空见惯，但现任执政官并非死于沙场而是死于罗马人之手倒是首开先例。另外，曾于公元前102年与马略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卡图鲁斯，曾与马略联手，成功击败南下的日耳曼人，并共同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凯旋战车。他也是这次屠杀行动的牺牲者之一。公元前90年担任执政官后成为“同盟战争”的总司令，同时也是《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立法者的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他虽然是马略妻子的亲戚也难逃一死。他的弟弟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也在牺牲者名单上。这些人的“罪状”只不过是没有公开反对苏拉当年提案将马略和他的同党以国家公敌的罪名处死而已。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捕杀，头颅被砍下来后放置于罗马广场的讲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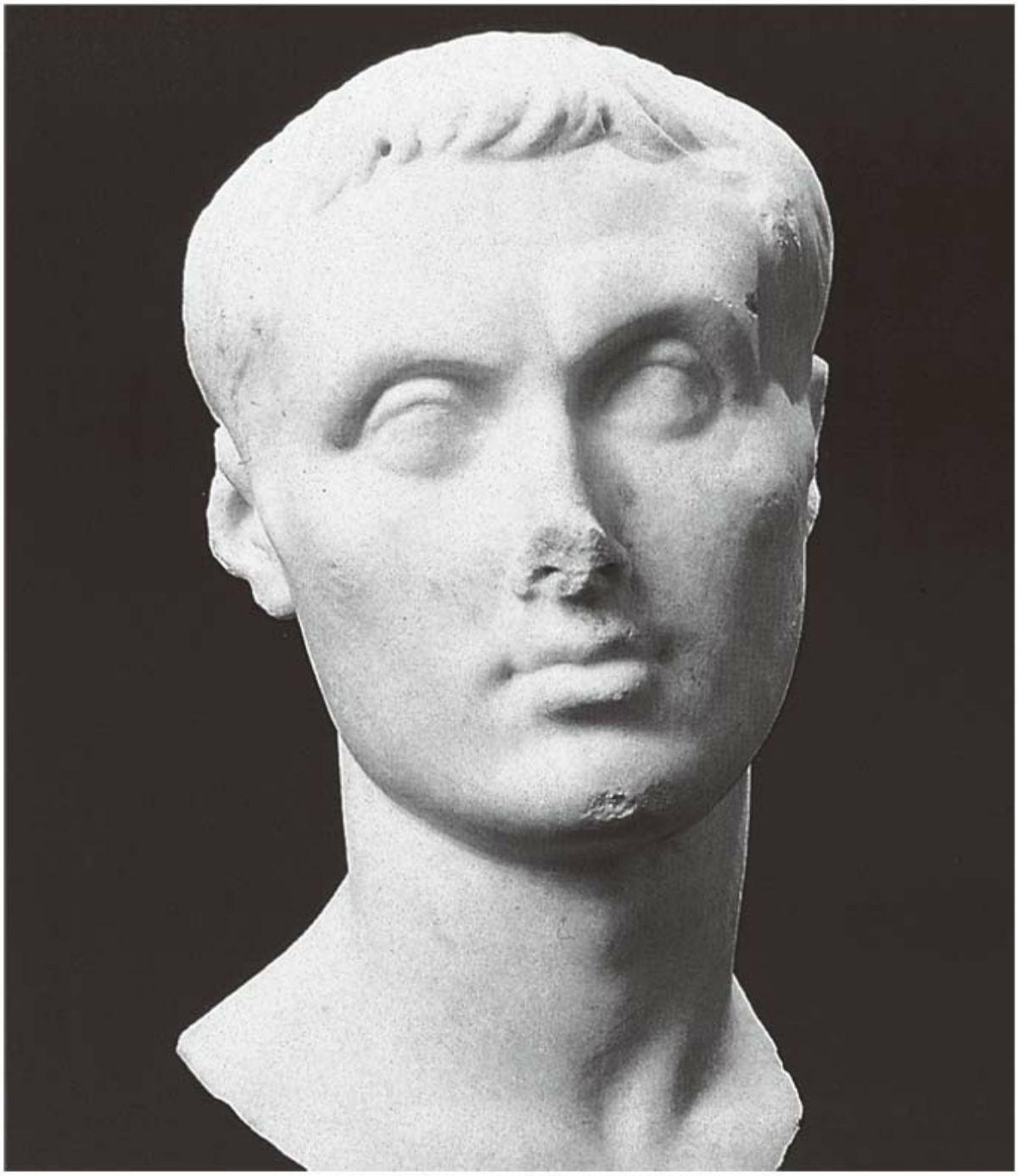
姑夫杀害另两位伯父，这对于恺撒这个13岁的少年来说，可以说是生平第一件令人震撼的事件。“苏布拉”与罗马广场距离很近，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大概也能够感受到腥风血雨的气氛吧。后世某位研究者曾提到，尤里乌斯·恺撒一生都很讨厌血腥的味道，也许正是因为这件在他13岁时发生在他身边的事。

就好像笔者在写到有关马基雅弗利的内容时，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冷静的政治思想家，9岁时目睹的“帕兹事件”后来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的体验对于敏感的人而言，将成为他日后思考模式的根基。不同于完全置身于事外的马基雅弗利，此次事件中双方当事者皆是少年恺撒身边的亲人。

老马略满腹的怨恨发泄完毕之后，罗马才得以恢复表面的平静。公元前86年，公民大会推选马略及秦纳为执政官。对马略而言，这已经是第七度荣获执政官一职，但是就在他就任的第13天，也就是公元前86年1月13日，这位杰出的将领逝世于床榻上，享年70岁。在得知马略进行的大屠杀及他的死讯后，视马略为仇敌的苏拉并无意返回意大利。苏拉

深知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他必须先解决东方的问题。这段时间，秦纳在意大利开始实行独裁统治。

这里说的独裁统治，并非是独裁官一人统治的政治。罗马共和时代的独裁官虽然握有大权，但任期限定为6个月。尽管秦纳恪守这个传统，却因为他连续当选执政官而实行独裁之道。凡是具有罗马公民权者都可以经由公民大会推选担任执政官，拥护平民英雄——马略的平民，成为马略的继任者——秦纳的支持群众。在秦纳实施独裁期间，陆续通过了颇受群众好评的各项法案，元老院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不谙军事的秦纳无法运用军事力量控制政治，元老院的议员们至少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危。



青春期的恺撒

生活于独裁统治下的少年恺撒，得以平静地度过14、15岁，不久16岁也来临了。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过世，死因似乎是自然老死。身前堪称默默无闻的父亲死后，才16岁的恺撒便成为一家之主。根据当时的

罗马风俗，上流社会的女人在生子后如果再婚仍然十分抢手，也不会遭受到任何非议。但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一反世俗，完全不考虑再婚的事，一人承担起持家的责任，以减轻尚且年少的一家之主的负担。她这样做的原因是恺撒在这一年卷入了“平民派”和“元老派”，也就是马略派与苏拉派抗争的风波中。

结婚

在东方的苏拉捷报传来后，被视为马略接班人的秦纳，为了应付迟早会回国的苏拉而伤透了脑筋。通过多项让民众受惠的政策立法，他很自信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但实行源自“Dēmokratia”一语的“多数派的独裁”这三年，不赞成这种统治形态的元老院阶级，自然视秦纳为眼中钉。尤其是6位元老院老议员中的一位因老马略的报复行动而失去性命，当时秦纳虽未从旁协助，却也未曾阻止已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老马略。

当苏拉如预计即将回国之时，为了从容对付苏拉，秦纳设法接近元老院人士。秦纳手中拥有的第一张王牌就是马略死后意大利仍维持着安定的政局，第二张王牌就是让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与自己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结婚。

政局混乱是保守派人士最害怕的。虽说秦纳的统治方式可以说是民众的独裁，但在他执政期间各地均无流血冲突，因此元老院议员当中，也有人基于这一点而对他持有好感。

除此之外，即将与秦纳女儿结婚的恺撒是马略的侄子，也是被马略杀害的前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以及他弟弟的侄子，即使是由保守派人士所支配的元老院当中，有许多人对促成《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立法的这两兄弟怀有敬意，而惋惜他们之死的议员也不在少数。对

这些元老院议员来说，秦纳的女儿与恺撒结婚一事，被视为秦纳暗地里向元老院谢罪的方式。

这个婚姻对秦纳来说堪称一石二鸟。借助这个婚姻，秦纳与支持他的平民，以及死后仍被视为英雄的马略，皆能更进一步地紧密结合。

秦纳没有将女儿嫁给马略的儿子，而选择他的侄子，其用意就在于此。如果将女儿嫁给马略的儿子，民众对他的支持虽然不会改变，但是就博取元老院人士的好感而言，这么做只会造成反效果。由此看来，恺撒第一次的婚姻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其实政治婚姻在当时的罗马上流社会极为普遍。但是，在17岁的成人礼之前结婚，即使在罗马也算出奇地早。这是由于新娘的父亲有不得不急的理由，因为东方已暂时获得平静，苏拉只需渡过亚得里亚海就可回到意大利。

而恺撒作为新郎似乎并不清楚为何如此仓促地结婚。直到40岁步入壮年期后，恺撒仍与母亲商谈政事，所以这次的婚姻恐怕也是他的母亲奥雷利娅在一旁大力促成的结果。

恺撒家族本身就是名门望族，理应归为元老院阶层。《尤里乌斯公民权法》赋予所有居住于意大利的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而正是恺撒家族的成员完成了这个划时代法案的立法，因此可见恺撒家族并不是不会变通的守旧派，而是拥有开明的作风。而他的母亲的娘家奥利乌斯·科塔家族也在此10年间，展现出一种积极稳健的家族风格。另一方面，对罗马平民而言，宛如神话人物般的马略是恺撒的姑夫，因此，恺撒家族的成员在心理上认同平民派自是不难理解。

从恺撒母亲的立场来看的话，这是为生来便注定将要从事公职的独子的前途所作的决定。罗马政坛自格拉古兄弟以后，呈现元老院派及平民派两大政党并立的局面，如果想要立足政坛，就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奥雷利娅为独生子选择了平民派，因为恺撒是马略的侄子，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人视为平民派人士。而他娶秦纳的女儿为妻，更进一步表

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其实早在与秦纳的女儿谈论婚事前，父亲已经替恺撒定了一门亲事，对方为“骑士阶级”，社会地位虽不如恺撒家族，但确实是罗马屈指可数的富有人家，对属名门望族却过着俭朴生活的恺撒家而言，这是个有利的选择。放弃这门婚事而娶秦纳的女儿，如果是在平时倒还说得过去，但在局势动荡时代作出这个决定简直是一场豪赌。由此看来，为恺撒一生增添了几许传奇色彩的赌徒性格，也许正是来自他的母亲奥雷利娅身上。

成人礼

在古罗马，结婚典礼就是在神前发誓及交换戒指，然后邀请亲友参加婚宴，热闹地庆祝一番，最后新郎将新娘抱进家中，这似乎与现代的婚礼并无不同。无论如何，这对少年夫妻如过家家般的婚姻生活，就在堪称为罗马妇女楷模的母亲奥雷利娅稳健的管理下，在“苏布拉”的家中开始了。16岁新郎恺撒的日常生活与婚前相同，中午之前跟着高卢籍的家庭教师用功念书，午后则到竞技场锻炼身体。举行成人礼之前结婚，在他所属的阶级来说其实是不妥的，原本应于17岁举行的成人礼想必也因此提前了一年举办。别的不说，有家室的一家之主仍继续穿着未成年人穿的长仅及膝盖的短衣，实在是有些不恰当。

名字为“托加”（英语为“Toga”）的长袍是古罗马人的正式服装，这种服装非常不易穿着，穿法也与西装大不相同。

这种托加由一块裁成椭圆形的白色毛料做成，质地的厚薄因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元老院的议员，可以在椭圆的圆周部分以深红色的镶边作为装饰。椭圆形的长度依穿衣者的身高来决定。由于穿着托加的过程非常麻烦，穿着时通常都需要奴隶在旁帮忙。总之，将托加整

整齐齐穿在身上，就如同西装一般地笔挺，能够表现出一个人仪容端庄的一面。

在穿托加时，奴仆先将短椭圆对折为不均等的两部分，这是为了在托加裹覆于身时，能将镶边部分完全显露于外侧。接着，自穿着短衣站立的主人左肩，依折线包裹于颈部四周后垂下，托加的下摆长度需到达脚踝，到此完成了托加三分之一的穿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左肩绕于背后，经过右腋下方再绕到左肩，使它像围巾般自然下垂。因为布量很多，自左肩下垂的部分需用左手臂来支撑。

长衣

短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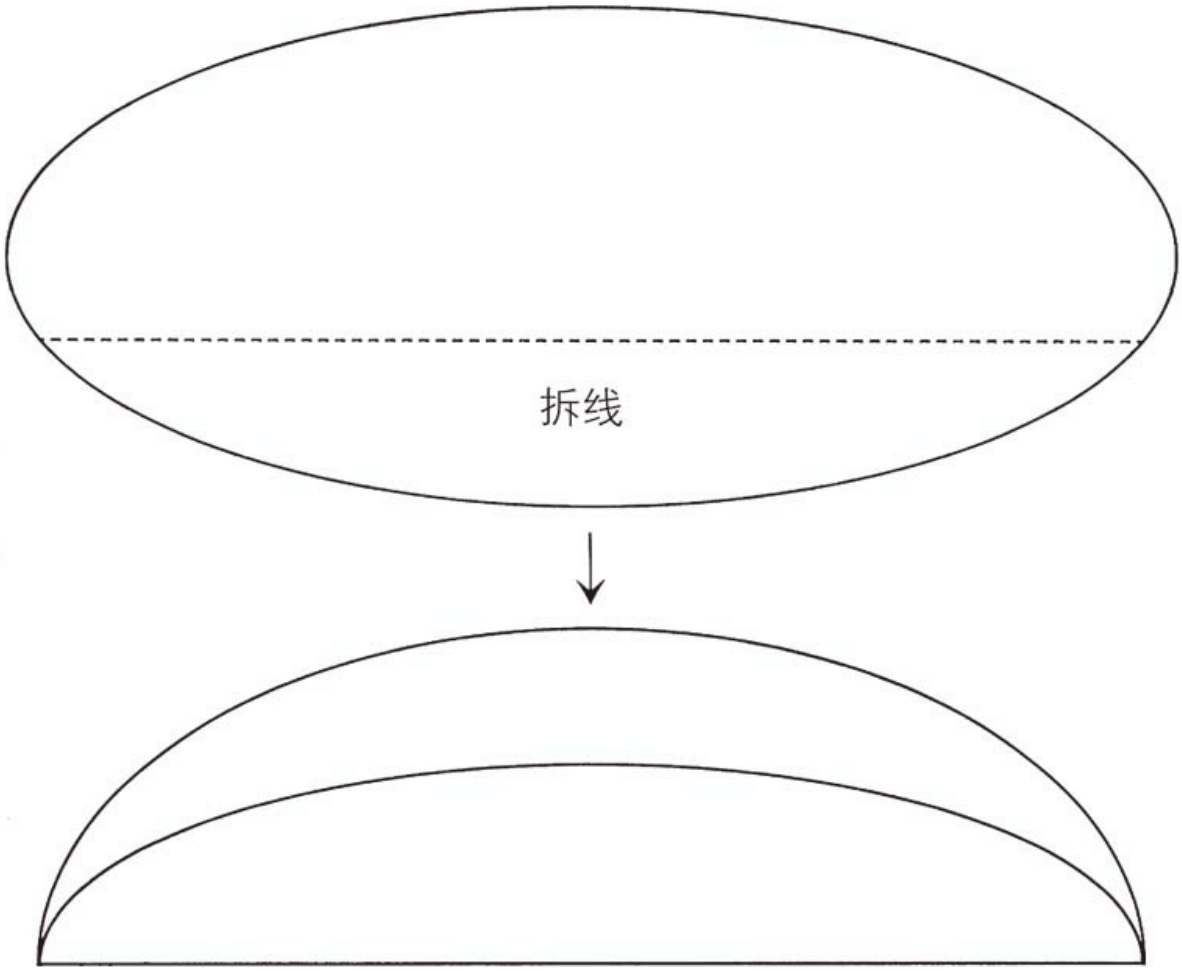
女性的服装

总而言之，要将大约是身高三倍的毛料重复地在身体上围裹，布料上所作的折痕如果不牢固，穿着时就会显得衣冠不整。奴隶们得在前一天就需要将对折及衣褶部分的折线仔细熨烫，这是他们重要的工作之一。那时候当然没有什么电熨斗，但有类似的器具可供使用。

重叠的衣褶在身体的某些部分是较多还是较少，可决定整体装束是整齐清爽还是邋遢不整，因此善于装扮的人在衣褶的处理上煞费苦心。从年轻时代起，恺撒无论对穿着短衣时系腰带的位置或是托加的衣褶均煞费心思，同时他也以善于装扮而闻名。

托加虽然无论在穿衣时还是在穿上之后均十分麻烦，但是它还是受到罗马领导阶层男士的喜爱，因为穿上长而厚的托加后，体格看起来也较健壮，举止也似乎变得稳重，而罗马的男性很偏爱“稳重”这个词。

固然在公开场合应当举止稳重，回到家中人们却想脱下穿着麻烦又行动不便的托加。在家里通常穿着短衣，男用短衣为短袖，两只胳膊裸露在外，长袖的短衣为女性专用。男性即使在冬天也不穿长袖短衣，如果天气寒冷便将短衣重叠穿着或者外罩披风。



托加的折法

在奴隶的协助下16岁的恺撒也努力地练习着托加的穿着，对他而言，穿托加正是从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标志。

然而，过家家般的婚姻生活、学习穿上托加后的言行举止等平静的生活却无法继续，暴风雨远比预期的提前降临了。

公元前84年底，秦纳在全心投入迎击苏拉的准备工作时，因军队编制混乱而被杀身亡。公元前83年春天，率领4万大军的苏拉自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布林迪西登陆。

第三章

青年前期 Adulescentia

（前83—前70年，恺撒17—30岁）

独裁者苏拉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行事都干净利落，令人如沐春风。他性格豪爽，作风明快，给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印象。

苏拉虽然有着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血统——这个家族在名门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其本人却诞生于罗马史上默默无名的家庭中。尽管他始终不知父母为何人，并在贫困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但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都称得上是一个贵族。个子修长的他，极适合穿着托加。他并不是像马略那样平等对待士兵的统帅，但他的僚属对他口服心服——这不仅是因为他总能领导大家打漂亮的胜仗。如果只是完成任务，那并不足以令人折服，使人对他产生信赖感的，是他果敢明快的行事作风。苏拉的长处还在于，他不畏惧任何负面的批评。概而言之，他对世人对他的评价如何毫不在意。

在罗马共和时代，若无元老院的许可，即使是将军也不得率领军团进入北起卢比孔河、南至布林迪西的国境。在国境范围内，将军只有与他的军团立约，在罗马城举行凯旋仪式时才能再度会合。在此期间，军团必须暂时先行解散。在凯旋仪式举行之前，将领哪怕不带一兵一卒，也不得进入罗马城墙内境。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正是忠于罗马法的表现。

在5年前，也就是公元前88年，当原属苏拉的平定东方叛乱的远征军统帅一职为马略所夺时，苏拉率领尚在编成当中的征东军团，在首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武力镇压行动。公元前83年，当东方的战事暂告平息之后，苏拉率领军团自布林迪西登陆。此时他心中所想的并不是凯旋仪式——虽然凯旋仪式对罗马男子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苏拉本身也还

未享受过这份殊荣；同时他在东方优异的战绩，已使他足以拥有举行凯旋仪式的资格。他对这项仪式毫不在意，而是致力于打倒由马略及秦纳所建立的平民派的庞大势力。所以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他并未解散军团。

如果设想恺撒步入壮年后，他的竞争对手不是庞培而是苏拉，那么局势会如何演变？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仅是专业历史学者，也是历史爱好者们所钟爱的问题之一。然而这类问题的答案很难得到。公元前83年，苏拉55岁，恺撒17岁，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自布林迪西登陆后的苏拉没有将军团解散掉，他的用意可说是路人皆知。那些从前为了躲避马略的屠杀而逃亡的人，以及在秦纳的独裁下忍气吞声的人们都火速赶到了苏拉身边。元老院派的重要人物梅特鲁斯·皮乌斯不仅是梅特鲁斯家族的一家之主，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行省的驻军司令，他率领手下2个军团自卢比孔河北方而来。父兄皆被马略所杀、自己也亡命西班牙的31岁的克拉苏也自西班牙返国。父亲亡于马略派人士之手、潜藏于皮契诺地方的庞培也火速前来。23岁的庞培诞生于大地主之家，他带领自费编成的3个军团到来，苏拉欣然接受。

苏拉

至此，苏拉的兵力计有公元前88年起统率的5个军团、来自意大利的1个军团，再加上梅特鲁斯·皮乌斯的2个军团、庞培带来的3个军团，共有11个军团。这是一支拥有步兵6.5万人、骑兵1万人，总计兵力7.5万人的庞大力量。

反观另一方，为对抗苏拉所集结的平民派兵力总计12万，平民派的统帅包括以前执政官身份指挥作战的老马略之子，以及当年的两位执政

官。当然，从罗马国的立场来看，这一方才是政府军。之所以能集结12万人的士兵，一方面是因为平民们仍怀念马略，另一方面秦纳的多项政策也对平民阶层有利，所以他们一致自愿参军。但是平民派这边比较值得惋惜的是，虽然有塞多留这般的指挥官人才，但最核心的统帅实力没法与苏拉相提并论。

纵然如此，耗时两年的内战仍是激战频仍——这实际上是元老院派与平民派之间的阶级斗争；另外，在老马略为发泄满腔的怨恨而对元老院派人士进行血腥屠杀的前车之鉴之下，这也是因害怕苏拉同样的复仇行动而促使平民派人士发起的生死抗争。

内战在意大利半岛全境展开，至公元前82年11月1日，在罗马城墙外的决战终于告一段落。被视为人民公敌的苏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老马略之子战死，其中一名执政官逃往非洲，塞多留也亡命西班牙。无论是领导阶级还是军团士兵，平民派均一蹶不振。在最后决战的次日清晨，苏拉率领军团从首都罗马的城门进入——这里因为没有作为战场而未遭受任何破坏——他随即下令开始消灭反对势力。

当初，马略只是借着大肆杀戮以发泄心中的怨恨而已，而像苏拉这样冷酷的人物，则以杀尽平民派为目标。他们的动机不同，但造成的惨剧却相同。杀戮的动机如果为私人恩怨当然自有限度，如果为政治的动机，那么牺牲者的范围则更广，手段也必须更加系统化。如果借罗马公民之手屠杀罗马公民，恐怕不妥。因此苏拉沿用马略的方法，由奴隶负责进行大屠杀。但由于马略在事成之后杀掉了那些奴隶，所以现在如果只是简单地下达命令，恐怕无法说动这些奴隶执行杀戮。于是，苏拉采取截然不同于马略的方法，他暂时先解散1万名体格健壮的奴隶，将他们的身份提高为“解放奴隶”，使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名号，甚至包括“科尔涅利乌斯”这样的名号，并保证他们不再沦为奴隶之后，再派遣他们去扫荡反对派人士。被称做“科尔涅利乌斯帮”的这批人挖开了马略的坟墓，将他的骨灰投入台伯河，砸坏了为纪念马略战胜朱古达及日耳

曼人而建的纪念碑，杀害了马略的养孙。

56岁的苏拉为了将与马略及秦纳相关的平民派人士赶尽杀绝，甚至编写出一本黑名单；只要名列其中的人，都难逃一死。因为苏拉实行了一种有高额赏金的密告制度，也就是凡密告列于黑名单的人的藏身之处，并且将其杀死的密告者，可接收被害人的财产，并且还可以得到一笔极丰厚的赏金。因为这个制度的施行，消灭平民派的行动更增添几分悲惨。为争取赏金，就连这本黑名单上列名者的儿子、亲戚及奴隶们都加入了这场屠杀行动。然而另一方面，也发生许多感人的插曲。有的奴隶为了保护主人，即使受到威胁或被杀也不肯透露主人的行踪，也有妻子以身为盾掩护丈夫逃亡的。

名列苏拉“死刑黑名单”的据说共有4700人，其中包括近80位元老院议员及1600名“骑士”。他们的下场是未经审判就遭到杀害，然后被没收所有财产。即使有个别人保住了性命，他的财产也只有被没收一条路可走。此外，他们的子孙凡是从事公职者一律革职，那些被没收的财产被公开拍卖，在贱价拍卖中获取暴利的当然是苏拉派人士，其中甚至包括苏拉家的解放奴隶。

消灭平民派的行动并不限于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当权者，还包括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地方。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南部的萨莫奈以及卢卡尼亚，加入罗马正规军队反抗苏拉的居民即使受《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保障，他们也被剥夺了由秦纳所赋予的罗马公民权，他们中的有权势者也被无情地处死或没收土地，因为苏拉想要将所有地区的平民派势力彻底摧毁。

在苏拉的“死刑黑名单”中有一位年轻人，他就是马略的侄子、秦纳的女婿——恺撒。对苏拉而言，年轻资浅的恺撒也是平民派中不该放过的优秀人才。

但苏拉周围的人替恺撒求情的很多，他们认为恺撒家庭的家长已经

去世，而继承者恺撒也不过是个18岁的青年，根本无法从事任何政治性的活动。刚开始，苏拉对这些劝说不予理睬。和罗马的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年满13岁的恺撒也要按照惯例到朱庇特神殿担任少年祭司。在举行祭神仪式时，苏拉曾经常碰见年少的恺撒。但是当罗马极受尊敬的女祭司长也替恺撒求情时，坚定的苏拉也只好勉强答应她的恳求。当恺撒自“死刑黑名单”中被除名时，苏拉说道：

“其实你们都不明白，此后生的才能远超马略百倍啊！”

苏拉虽然答应放过恺撒，但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命令恺撒与秦纳的女儿离婚。庞培自掏腰包编成三个军团协助苏拉作战，等他扫荡完平民派人士自非洲归国后，他的功绩促使苏拉破格允许为年仅24岁的他举行凯旋仪式。然而即使像庞培这样的人物也得服从苏拉的命令，与身为平民派而被杀者的女儿离婚，然后娶苏拉的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为妻。苏拉认为光是将恺撒从“死刑黑名单”上除名，对他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在秦纳已死、平民派也被屠戮殆尽的时刻，与不合时宜的妻子离婚本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为恺撒求情者无不抱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8岁的年轻恺撒必定会服从苏拉的命令。

但从这位尤里乌斯家的年轻人口中反馈回来的回答却是“不”。预期落空的苏拉十分震怒，但他并没有将恺撒重新列入“死刑黑名单”加以处死，而是派遣一队“科尔涅利乌斯帮”人员去逮捕他。18岁的恺撒逃离了罗马城，又快马加鞭地逃到了意大利中部。他逃亡途中曾一度拖着发高烧的身躯躲进山洞避难，但因苏拉持续不断的追捕，使得即使在意大利境内也不再安全。最后，他经由希腊逃往小亚细亚，这才让苏拉的愤怒得以平息。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仅18岁的年轻人敢于对56岁的掌权者说“不”呢？恺撒自己并未留下任何明确的记述，因此自古以来，史学家们便只好反复琢磨此事。纵观恺撒一生，结婚对他来说通常也是政治因素所致。既然与秦纳的女儿结婚是出于政治策略，当不符合形势时就离

婚也不失为一种政治策略，况且服从苏拉的命令而离婚应不会招致太多的非议。

纵然如此，恺撒的回答仍是“不”。

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恺撒自年少起便勇敢过人，一腔英雄侠气。也有史学家认为，想成为平民派领袖的恺撒，理所当然地不能做出这种背叛的行为。另有研究者认为，恺撒是不忍抛弃因父亲惨死而悲伤不已、且有孕在身的年轻妻子。

我认为这些推论似乎都很在理，但自恺撒后来的言行推断，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恺撒认为，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者，也无权介入他人的私生活。因此，当时年仅18岁的他就忠于自己的想法行事。后来，当恺撒也成为绝对权力拥有者时，无论是面对迎娶反对恺撒的强硬派女儿为妻的布鲁图，还是其他的人，他从不曾试图干涉他人的私生活。苏拉是个凡事坚持到底的人，恺撒与他之间虽有年龄、思想上的差距，但就“坚持到底”这一点而言，他们倒是殊途同归。

逃亡

因为说了“不”而被迫逃亡的恺撒，应当是有两三个年龄相仿的平日一起读书、健身的家中奴隶随行的。他们的身份虽为奴隶，但由于自幼和恺撒一起成长，他们此刻便成了值得恺撒信赖的随从。也许正是因为预料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状况吧，罗马的上流家庭往往让子女与奴隶的子女一起成长。

他们渡海至小亚细亚西岸，躲开了苏拉急迫的追击之后，逃亡开始展现出大不相同的一面。不管怎么说，这是恺撒从出生至今首度离开亲人，不能不说有某种愉悦的情绪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也许是在家中用钱不容浪费、母亲奥雷利娅稳健踏实的持家作风，再加上他不愿依靠他

人的帮忙度日等原因吧。恺撒年纪轻轻便遭遇不幸，但似乎又因此见到了生活的曙光。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正面因素大于负面因素的挑战。

逃亡开始的那一年恺撒19岁，苏拉已经57岁。一方面罗马方面在运用他家庭的人脉关系设法使他回国，另一方面他体验着隐身他国所经历的喜与忧，年轻的恺撒除了默默等待以外什么也没有做。当然，恺撒是在等待苏拉的死。但苏拉虽然消瘦，却十分健康，身体硬朗得简直不知疾病为何物。因此，他要在此地等待多少年还是个未知数。说穿了，这仍是一场赌博。

不过好在恺撒有着无法赋闲度日的性格。在潜逃的日子里他有两个选择：其一，进入“大学”充实学问；其二，因为他已达到服兵役下限年龄17岁，可借此机会开始体验军队的生活。

对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来说，留学地指的是雅典及罗得岛两地。苏拉除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及优秀的武将外，也是位颇具教养且不炫耀于外的人。当他在雅典停留期间，有人提供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集给他，当时他便了解这些著作的重要性，并将其带回罗马刊行于世。但如果恺撒在罗马上流社会偏爱的留学地雅典及罗得岛出没，极易引起苏拉注意并因此陷入险境。基于这个原因，年轻的恺撒选择了加入军队这条路。如果能够混入军团中随团四处移防、战斗，不但能累积经验、增长见识，同时也不失为一个藏身的好方法。

于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来到小亚细亚西岸行省总督米努修斯的阵营，志愿加入他的军团。米努修斯是苏拉远征东方时的部属，隶属于苏拉派，但他并非官僚气息浓厚的人，而是个如慈祥长者般的男子。他开导触怒最高当权者而逃亡外地、毫无顾忌地以本名现身、父亲曾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恺撒，并将他迎入当时的参谋总部。年轻的恺撒成为幕僚之一，追随他逃亡的奴隶们也摇身一变，成为这位年轻将领的随从人员。

米努修斯总督统辖的地区是爱琴海诸岛，这里靠近小亚细亚西岸，

无论就其历史还是民族而言，均属于希腊文化圈。其中势力强大的莱斯博斯岛，往往在战事发生时借机向罗马霸权挑战。负责维持罗马霸权下这一区域附近秩序的行省总督，对监控黑海至地中海航路的莱斯博斯岛自是不敢掉以轻心。

米努修斯总督正在进行各项部署，因为他决定对莱斯博斯岛展开军事行动。但莱斯博斯是大海中间的岛屿，经济条件优越的岛上居民早就在位于岛东端的首都四围建造了坚固的城墙。此次在莱斯博斯岛展开的军事行动，须采取从西侧登陆后向首都攻击的陆地战，以及从靠海侧攻击的两面作战方式。这样一来，有正规的海军是必需的。而军舰的调度，需要依赖面对小亚细亚的黑海的比提尼亚王国。比提尼亚与罗马具有同盟关系，罗马与这类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是，罗马保障同盟国的安全，相应的，这些同盟国则各以该国擅长之处协助罗马。它们形式上虽为独立国家，实际上则为罗马的附庸国。所以米努修斯要求比提尼亚王国提供船只支援并不难。

也许正因为这个任务比较简单，总督便将它交给了未满20岁的恺撒。但是，由行省被派遣到比提尼亚王国的使者恺撒，并未被使命感驱使着尽快完成任务，率领船队返航，他反而以等候装备船只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留在比提尼亚皇宫内享受起东方的奢靡生活来了。恺撒受到了比提尼亚王尼科美德的赏识。据说在每晚宫内所举行的宴会里，他也和国王的年轻爱人一起斟酒作乐。恺撒与比提尼亚王为同性恋的传闻因而甚嚣尘上。与希腊人不同的是，同性恋在当时仍不见容于罗马社会，于是这个传闻演变为轰动一时的丑闻。这件事的真实性虽令人质疑，但这个传闻一生都伴随着恺撒。尽管如此，纵观恺撒的一生，对外他是个禁欲主义者，而私下他却奉行享乐主义。虽然他不至于和同性恋扯上关系，但他对东方宫廷内奢靡放纵的生活确实是乐此不疲。即使如此，对外奉行禁欲主义的他并未忘记自己的任务，他率领装备齐全的船队自黑海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马尔马拉海，在总督米努修斯的等候中归来。莱斯博斯岛的攻防战也就此展开。

莱斯博斯岛攻防战是恺撒的首次战争体验。我们虽不知他究竟率领多少部属参战，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非轻松地在参谋本部办公。因为他获得了一顶直译为“市民冠”的“勋章”。“市民冠”是以叶片繁茂的橡树枝编成的头冠，是颁发给不惜牺牲一己生命以解救同伴的战士的勋章。以橡树枝编织而成的“市民冠”由受援助的士兵们亲手制作，是罗马军团中第二高的殊荣。在一般的节庆中即可戴上此冠，也有人以银或其他材质重新打造“市民冠”，以便永久保存。当然，这就得自掏腰包了。

恺撒在征服莱斯博斯岛后便转而担任行政工作，但他不久就向总督米努修斯要求更换工作地点。大约在公元前78年，他转调至小亚细亚南岸的西里西亚地方。另一方面，苏拉在罗马强行重整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他虽已辞任独裁官，却依旧健在。也许是因为一如从前地偏爱前线的工作，22岁的恺撒想去正为应付海盗而大伤脑筋的行省总督塞尔维乌斯的手下工作。总督塞尔维乌斯听说了他在莱斯博斯战役中的事迹后，热烈地欢迎这位拥有“市民冠”荣衔的年轻人。

不过，在他随西里西亚军团移师后不久，罗马有使者火速赶到了军团基地，使者带来的是苏拉的死讯。

恺撒马上向总督要求辞去职务，并获得批准。他急忙向罗马出发，就像一艘起锚的船只一样，在不确定航向时便扬帆起航。在直达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他自小亚细亚至罗马须先经过希腊，横越希腊后经亚得里亚海在布林迪西登陆，之后再沿阿皮亚大道北上。此次行程耗时2个月。当他回到罗马的家中时，苏拉隆重的国葬仪式已经结束，因崇拜苏拉而加入送葬行列的全体老兵们的身影已经不复存在。但在久违4年的首都罗马，这位22岁的年轻人尚无崭露头角的机会。隶属于苏拉派的大将卢库鲁斯、克拉苏及庞培才是活跃于罗马广场的主角。而在位于“苏布拉”的家中，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妻子科尔涅利娅以及首度见面的女儿尤利娅正等待着他。

回国

虽然民众安然无恙，恺撒再次归来时的罗马，平民派却已被铲除殆尽。独裁者苏拉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将名列“死刑黑名单”的平民派人士以及支持平民派者统统赶尽杀绝了。此外，为彻底实行苏拉国政改革，连被平民派视为根基的护民官也无法幸免，这就造成了护民官人才缺乏的局面。关于苏拉推行的国政改革的详细内容，可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的“马略与苏拉时代”。一言以蔽之，苏拉要斩断任何可能让平民派东山再起的根，但他遗漏了一株已经发出的芽。

此后过了3年多，平民派的这株“芽”虽然稍有成长，但恺撒的母亲让他领悟到自己还是仅有两片叶子的幼苗。得知苏拉的死讯后便放下一切急忙回国的恺撒，返国后并未见他有任何建树。

在希腊，女子无论是否接受过教育都不可以参加宴会，唯有高级职业妓女才可以出席。罗马则有所不同，教养良好的罗马女子可以出席宴会，不会遭到冷眼相待。古代的历史学家一致公认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比其他受过教育的女子更具才智。她的独生子在国外求学，她依然能够掌握国内的形势，除了她本身的才智外，也是环境因素使然。

正是马略的缘故，两位家长被杀后恺撒家族沉寂了下来，但奥雷利娅还有娘家奥利乌斯家族可倚靠。在此后3年的公元前75年，她的哥哥奥利乌斯·科塔当选执政官。奥利乌斯家族与恺撒家族同为元老院内的开明派家族，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虽然作风稳健，但他也成为推动改革苏拉复古性体制法案的人物。因为他位居罗马高层，所以他是提供给奥雷利娅正确且实际情报的最佳人选。

恺撒归国后不久，发生了对被称为钢铁般稳固的“苏拉体制”进行的首度反击。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雷必达利用任职行省总督时组成的军团，企图以实力瓦解“苏拉体制”。恺撒身为苏拉屠杀下少数的生还者之

一，对这次的起义不可能毫无感觉，但他并未参与这次行动。事后证明他的抉择十分明智。雷必达的起义轻易地被击败了，他逃到了撒丁岛，并在当地病逝。这次的行动宛如烟火般在瞬间消失。

导致雷必达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人缘不好。他以低价买入苏拉所杀者的资产，拍卖后大赚一笔。这种人即使在苏拉死后以平民派之名起义，且不管他的政策如何，单是他的这种人格就足以使民众裹足不前。二是得苏拉之利而重新掌握大权的元老院果断制定镇压策略，在作为“非常时期宣言”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同时，又附加“为保卫共和国”的但书。为对付雷必达而组成的军团，由年仅30岁的庞培沉稳地指挥，迅速地彻底击败了雷必达军，平民派只好再度沉寂。

开业律师

在回到罗马赋闲的这段期间，23岁的恺撒想通过成为律师这一途径成名。正如《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所叙述，罗马的律师不仅是替人辩护而已，担任控方的机会也相当频繁，性质类似于检察官。如果控告名人胜诉，就可以立即声名大噪，对有意从政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职业。因为罗马主要的官职都是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出身名门的恺撒毕竟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因此开业后并无人委托他担任被告律师。他的第一场官司自然是担任控方律师，至于对手是谁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这一回是以败诉收场。

而第二回，他则瞄准了一个大人物。多拉贝拉以苏拉的亲信著称，曾担任执政官，并且曾以前执政官的身份担任小亚细亚的行省总督。恺撒指控这位元老院内重量级人物的罪名是：在统治行省期间以不正当的手段敛财。

但这一回依然以恺撒败诉结局。23岁的他毕竟还是不够成熟。尽管

被告多拉贝拉在统治行省时期滥用职权，早已达到令元老院内的有识之士不满的程度。但是一来，苏拉已将陪审员的资格恢复为格拉古兄弟之前由元老院议员独占的制度；另一个原因是，控方恺撒的辩证方式，与被视为司法殿堂的罗马法庭的做法格格不入。

罗马时代的律师统称为演说者，他们可能站在为被告辩护的立场上，也可能站在告发被告的立场上。由于下判决的是陪审员，因此具有说服陪审员的辩论技巧极为重要。但正如律师中的佼佼者西塞罗所承认的，实际上，即使是陪审员下判决时，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旁听席上众人的反应的影响。因为对陪审员来说，旁听群众并非无法改变任何决定的第三者，因此律师们的辩论内容也自然地以打动旁听群众为目标之一。

律师这个行业在雅典达到全盛。当时的雅典式辩论正如古希腊的雕刻般可称是去粗取精的类型。之后，随着城邦国家雅典的没落，从小亚细亚西岸的帕加马王国产生的堆砌华丽辞藻的辩论技巧，古罗马人称之为“鬈发”型的辩论技巧，传入罗马。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法庭内充斥着这类辞藻过多的辩论。“亚洲派”的代表人物为霍滕修斯，他有“法庭王子”的美称，甚至他因为他的名气而当选执政官。顺便一提的是，恺撒控告多拉贝拉时的首席辩护律师便是霍滕修斯。

另一方面，正好在这个时期“大学留学”归国的西塞罗创立的被认为是“雅典派”与“亚洲派”的折中方式的辩论技巧开始出现。如果单就文章而言，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把西塞罗及恺撒的辩论翻译后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西塞罗的辩论完全是因应律师这一行的需要。换句话说，除了说服陪审员外也必须打动旁听者，事先铺陈酝酿，而非单刀直入，最后再诉诸听者情感，斟酌当时的情境以获得胜利，这就是西塞罗在法庭内所采取的战略。今日欧美的律师多采取这种方式，西塞罗之所以在2000年后被喻为“律师之父”，也是事出有因的。

相反的，恺撒的天性使他完全无法接受“鬈发”型的说话方式，单刀直入地切中问题所在，也是他文章和演说的特色。依他的性格是绝对无

法接受琢磨情境而作辩论的方式的。这么说来，他的方式应较接近“雅典派”。但即使说理充分，仍然需要努力掌握听众的心理才行。此后，恺撒在掌握听众心理方面也费尽心思。说他的辩论方式并不仅是简单沿袭“雅典派”，理由也就在此。或许当时23岁的恺撒在辩论时所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吧。

不管怎样，恺撒23岁时从事了律师一职，但以失败收场。他不得不放弃如霍滕修斯及西塞罗般，借由律师一职扬名致富而进入政界这条道路。但这两次的败诉并不只是让他放弃以律师这一行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将苏拉派重量级人物告上法庭，在判决败诉后依然余波荡漾。

罗马当权派人士经过调查，回忆起这次告发多拉贝拉的人与四年前违抗苏拉命令的是同一个人。虽然恺撒并未参加雷必达的起义而避免出丑，但这次他感到了尽快平息外界议论的必要性。以平民派的身份受到注目，毕竟还是太过冒险。

事态变得似乎有些严重，只是到距离首都罗马二三十公里的山中别墅暂避风头，恐怕还不够。再者，恺撒并不喜欢隐居乡间无聊度日，又未达到享受田园生活之乐的年纪，因此他再度远走国外。这次他并非因为遭受追捕而逃亡，所以他不再志愿从军而是选择进入“大学”，入学地点在与雅典并称为当时“最高学府”的罗得岛。

远走国外

对出身良好的24岁的恺撒来说，海外留学在当时的罗马是平息众议最自然的选择。一般而言，在共和时代的罗马，从事公职的年龄开始于30岁，所以20岁到30岁之间属于充电期。但假使恺撒是个重视外界评价及在意旁人是否飞黄腾达的人，也许他就无法因尚处充电期便悠闲度日。在他不得不远走国外的同时，仅年长他6岁的庞培被任命为统率罗

马各地正规军的总司令，威风凛凛地出征西班牙，因为马略派的塞多留吸收雷必达的余党后，在西班牙发动了反罗马的起义行动。庞培30岁就担任总司令，为苏拉所制定的公职体系中的特例。这位早熟的军事天才于23岁指挥3个军团、25岁举行凯旋仪式、30岁担任总司令，正一步一步迈向飞黄腾达之路。同样是离开祖国，恺撒与庞培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

不过恺撒生性乐观，他知道自己目前只有等待良机，伺机而起。但是，他没料到在进入“大学”深造之前会遇到海盗。在前往罗得岛的途中，他因所坐的船只遭海盗袭击而被俘虏。

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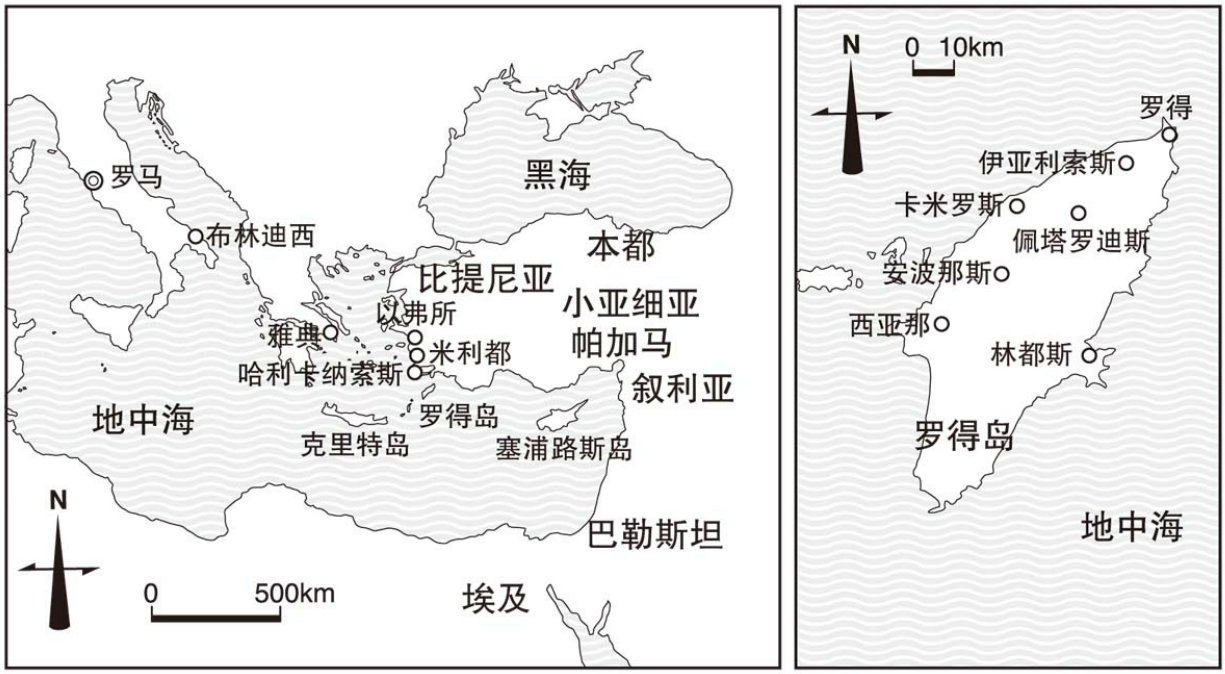
小亚细亚西南部以及与它近旁的爱琴海诸岛，因地处海湾，又位于黑海至叙利亚、埃及的航线上，是素以海盗出没频繁而闻名的海域。海盗的大本营就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提到西里西亚，人们就会直觉地联想到海盗，这里也是罗马政府极为头痛的统辖地区。以残暴闻名的海盗在俘虏船上的乘客后一一订出赎金，他们向恺撒要求20塔兰特的赎金。塔兰特是希腊通用的货币，这里也隶属希腊经济圈，因此赎金便以希腊通用的货币为计算单位，20塔兰特换算之后相当于罗马的30万第纳尔。当时一名士兵的年薪为70第纳尔，20塔兰特是一笔足供募集300名士兵的大数目。

但是，当恺撒听到海盗给自己定的赎金后大笑道：“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所抓的是什么人物。”于是他将赎金提高到50塔兰特，随行人员被送回去想办法筹钱，恺撒自己则与一位好友及两位随从留在海盗身边。

20塔兰特的赎金已是相当可观了，恺撒却自愿将赎金提高到50塔兰

特，关于这件事，史学家李维根据恺撒寄给友人的信件，首次将此事记载于他的著作《罗马史》中。之后记载此事的史学家们，在钦佩恺撒勇气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从年轻时代起即拥有的十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我也深有同感，将20塔兰特的赎金提高到50塔兰特，这个行为背后必定有更深的考虑吧。

首先，以残暴闻名的西里西亚的海盗，往往毫不考虑后果便杀人，落在这种人手里，当务之急便是保住性命。年届25岁的恺撒认为20塔兰特似乎不足以确保性命无虞，但并不表示赎金愈高则愈安全。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回罗马筹钱，只能在位于小亚细亚的行省借高利贷应急，所以金额愈多筹款也愈困难。如果他仔细地在保住性命与可能筹措到的金钱额度间取得平衡后，这个额度大约就是50塔兰特这个数目吧。



恺撒遭遇海盗的西里西亚周边及留学地罗得岛

我会如此推测的原因，是之后被称为“金钱哲学”的恺撒的金钱使用方法，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遵循此道。

如此一来，一向随意杀人的海盗们只要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脸，便仿佛看到一大笔钱。所以恺撒在毫无丧命之忧的情况下，度过了随行人员筹钱而返的38天。

在这段时间里，他非但不是提心吊胆地度日，反而以高傲的态度对待海盗，当他想睡觉而海盗们却吵闹不休时，他便差遣随从前去命令他们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他也参与海盗的武术训练及娱乐活动，他这么做并非为了锻炼身体，只是因为大家年龄相仿觉得有趣罢了。此外，他还命令海盗聆听他写的诗及演讲，当海盗中有人不专心听讲时，他便斥责他们是缺乏知识的野蛮人。这时的恺撒怎么看也不像被海盗们团团围困的人质，反倒像受到保镖簇拥的重要人物。恺撒经常语带威胁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他们抓起来处死，但他们只是相视而笑地把这当做年轻小伙子的玩笑话，他们不时想到的仍是那50塔兰特。

随从带回赎金后，恺撒便获得了自由。海盗释放他之后，他立即前往附近的米利都招募人手及租借船只，然后率队讨伐海盗。他突击了停泊于米利都附近海湾的海盗船，成功地将他们全部俘虏，没收了他们的财物，当然也如愿地拿回了他的50塔兰特。

这下海盗们和恺撒角色互换，海盗成了阶下囚。恺撒将他们关入监狱后，前去向小亚细亚的行省总督报告。但是总督只在意恺撒自海盗手中没收的财物，至于海盗们该如何处置，他认为那是胜利者的权力，任凭恺撒决定。恺撒回去后，将海盗们全数带出监狱处以绞刑，让他们明白从前他说的那些话并非玩笑。此后他平安地到达罗得岛，开始充实他的学生生活。

留学

罗得岛气候优异，即使在气候温和的地中海世界，也有资格位列前

两名之内。这里冬天不冷，盛夏也不超过摄氏25度，终日吹拂的微风缓和了寒气与暑气。“罗得岛”原意为“盛开玫瑰之岛”，不仅拥有优良的气候，也占尽地势之便。岛的北端有天然良港，有两个港口可供利用。这对岛上居民而言十分便利。它距离以弗所、米利都及哈利卡纳索斯等因通商而繁荣的小亚细亚西岸的城市很近，经爱琴海可达雅典，西面为克里特岛，东面则为塞浦路斯岛，它控制这两个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岛屿，而且它位居东经叙利亚至巴勒斯坦、南至埃及的航线上。除了累积财富之外，各地的情报也于此交流，自然形成了罗得岛兴盛的学术风气。罗得岛的全盛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波斯自东地中海撤退后的希腊化时代。

即使是在罗马成为了地中海霸主之后，罗得岛的势力依旧强盛。以通商立国的罗得岛早已洞悉到，如果成为罗马霸权统治下的一员，就可确保自身的安全，于是罗得岛提供海军作为罗马军力的一翼。对海军不振的罗马而言，能提供海军的罗得岛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同盟国。无论拥有多么名满天下的教授的最高学府，如果这个国家无法依赖且难保安全的话，也无法让罗马国未来的领导人——恺撒在此安心求学。

公元前1世纪时，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埃普罗尼厄斯、波塞多尼奥斯等极负盛名的教授，都曾到罗马忠实的盟国罗得岛讲学。波塞多尼奥斯所著的《地中海通史》虽然在中世纪亡佚，无法流传后世，却影响了当时许多的历史学家。选择到雅典留学的西塞罗及后来暗杀恺撒的布鲁图，都继留学雅典后到罗得岛留学。但恺撒与他们两人有所不同，他并非是全心钻研学问的人。无论热爱什么，他都不会沉迷其中。

恺撒的留学生涯虽然偶尔中断，但仍持续了一年时间。由于埃普罗尼厄斯及波塞多尼奥斯所留下的著作只剩下残片，无法从中看出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从留下的断简残编中推测，善于思考的读书人固然受到他们的感召，但他们并非是能够影响独具创意人物的学者。毕竟恺撒来此的目的在于平息众议。

就这样，恺撒25岁后旅居罗得岛，充分享受着这里温暖的气候及美丽的大自然。远至耸立于林都斯岬角的神殿，参观停泊于港口中的罗得岛引以为傲的海军舰队，欣赏岛上艺术家技艺精湛的雕刻，这些或许使他每天都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现在被梵蒂冈美术馆视为至宝的罗得岛《拉奥孔群像》，就是当时罗得人遗留给后人的杰作。

旅居罗得岛的生活也偶尔中断。因为坐小船花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小亚细亚。当那里发生战争时，恺撒会自组军队匆忙前去应战。苏拉曾平定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之乱，在苏拉死后三年，趁着罗马正为塞多留在西班牙的起兵而大伤脑筋时，米特拉达梯伺机而起。一股不安的气氛开始笼罩在小亚细亚一带。

当时恺撒还没有获得罗马政府的认同，因此经过短暂的混乱交战后，他只有先返回罗得岛。公元前74年之后，恺撒就不用再回罗得岛了。因为这一年他的舅舅奥利乌斯·科塔前来小亚细亚就任比提尼亚地方的行省总督。

19岁时，恺撒曾以使节的身份去过比提尼亚王国。这时由于国王尼科美德将比提尼亚王国交托给罗马后过世，罗马决定将连接黑海与爱琴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要地比提尼亚王国纳为行省。以总督身份前去的是公元前75年的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得知舅舅即将到任的消息，恺撒决定离开罗得岛，包括随身的奴隶在内的10位精神抖擞而且毫无畏惧的年轻人，连脑后的头发都没来得及绑好便舍弃“大学”，向北朝小亚细亚西岸的比提尼亚王国前进。

对刚划归行省的地区进行统治，本来就是件困难的任务。王政时代的做法是任命外地人为总督后，于其下再行编制。为了不让习于王政时代的统治者受到异议分子的压制，罗马的做法是尽可能保留王政时代的制度，尤其是敏感的税制问题，就政治立场而言须减税；就经济立场而言，则须确保统治行省所需费用无虞。在这两个立场中取得平衡后制定新税制，是首任总督重要的任务。

奥利乌斯·科塔在公元前75年担任执政官任期内，以政治改革专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为他作风稳健却又能改革苏拉保守的体制，被视为重新建立刚纳入行省的国家统治体系最适当的人选。但是科塔的不幸在于，在他全身心进行政治改革之前，必须先投入军事行动，因为比提尼亚东侧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此时开始入侵刚成为罗马行省的比提尼亚。也许米特拉达梯是担心强敌从旁入侵。

尽管奥利乌斯·科塔以法学学者闻名，且拥有出色的政绩，但他在战场上的成绩截然不同。没多久，他被本都军打败，本是比提尼亚总督的他却落得逃离当地的下场，更糟的是最后他病死在逃亡途中。战争才刚开始即尝败绩的罗马，不得不慎重思考应付米特拉达梯的对策，于是他们决定派遣执政官任期未满的苏拉派大将卢库鲁斯前往平乱。此时原本因为与总司令官有亲戚关系而成为幕僚的恺撒又顿失依靠，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再返回罗得岛。然而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突然从首都传来紧急通知，任命恺撒担任由于奥利乌斯·科塔逝世而空缺出来的祭司一职。

归国

罗马祭司阶级的地位，依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为大祭司——祭司——家族祭司——占卜师，女祭司则属于另一体系。恺撒曾在13岁那年担任过祭司。虽然《李锡尼法》赋予平民在从政界、军界、宗教界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祖父辈即在元老院拥有议员席次的名门望族子弟，仍然具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以强化元老院阶级势力为最终目的的“苏拉改革”，更可明显地看出以元老院议员子弟作为优先考虑对象的倾向。恺撒在舅舅死后递补他的职位，就是前述事实的明证。如此一来，27岁的恺撒成为祭司。这并不表示他的一切行动均与宗教有关。正如《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述，罗马的祭司阶级并非独立于体制外，除了举行祭典仪式者之外，其余的人无异于一般市民。当时的大祭司梅特鲁斯·皮乌斯与庞培在西班牙共同指挥镇压塞多留之役。

但不管怎么说，除了在祭司阶级内地位的提升外，就任祭司一职对27岁的恺撒来说还具有其他意义。久违罗马三年的恺撒穿着纯白的托加，站在召开公民大会的罗马广场的讲坛上，成功地摆脱昔日众人的议论。原意为“纯白”之意的“Candid”，在今日西欧一带成为“候选人”一词的起源。

由于在罗马官场通常起步于30岁，27岁的恺撒虽然说是候选人，但算不上是官职候选人。他符合资格的是军团内的长官——大队长的候选人。大队长手下有6名百人队队长，也就是指挥600名士兵的军中长官，每一军团有10名大队长。

于是恺撒当选了大队长这一职务，今后将不须倚靠亲戚关系就可成为幕僚的一员。不管谁想担任军团的总指挥，均需要从大队长的职位做起。

此时虽说恺撒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只是15名祭司之一，以及被视为战略单位的两个军团的20位大队长之一。目前他的晋升完全未受到关注，即使已经27岁，尤里乌斯·恺撒晋升的速度也只限于此种程度。

恺撒不但在社会上算不上一鸣惊人，即使在他任职的军事体系中也未受重视。同年爆发“斯巴达克斯之乱”时，具备大队长资格的他并未参战，也是这一现象的明证。由出身于色雷斯的奴隶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大规模奴隶、农奴起义，势如破竹地打败执政官亲自指挥的罗马正规军团，起义演变为威胁首都罗马安全的大叛变。公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斯之乱”就这样延续到公元前72年。

另一方面，苏拉的得力干将庞培打破人事惯例前往西班牙参战，这次战役因为塞多留捉摸不定的游击战奏效而未能奏凯，庞培及军团在西班牙动弹不得。为应付再次掀起军事叛乱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罗马又加派了苏拉麾下第一大将卢库鲁斯前往指挥，致使眼前罗马并无人才

足以应付在意大利境内爆发的“斯巴达克斯之乱”。元老院只好将平乱之事全权交给虽然隶属苏拉派、但军事才能根本不受重视的法务官克拉苏。于是克拉苏率领了8个军团前去镇压斯巴达克斯。

8个军团共有80位大队长。总指挥克拉苏当时42岁，是罗马的首富，他也是在此时期开始举债的恺撒的最主要的债权人。克拉苏极欲与庞培一争高下，因此他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成功地平定“斯巴达克斯之乱”。

在28至29岁这段时期，恺撒都没有到过前线，而是滞留首都。直到晚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也许该归功于他身为80位大队长之一却未曾被派往前方战场去的缘故。

罗马市民的生活在公元前71年终于再度恢复平静，6000名叛乱奴隶被钉死在沿着阿皮亚大道并排而立的十字架上，“斯巴达克斯之乱”终于告一段落。西班牙的“塞多留战役”也在耗时7年后终结，总司令官梅特鲁斯·皮乌斯及庞培胜利返回意大利。在卢库鲁斯前去东方之后，罗马军也明显地占上风。在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一解决后，罗马市民便将焦点集中于庞培与克拉苏的势力对抗上。

庞培与克拉苏

自西班牙胜利归国的庞培35岁，因平定“斯巴达克斯之乱”，首度获得军事胜利而备受瞩目的克拉苏时年43岁，两人皆被视为苏拉的得力干将，但他们的关系十分恶劣。庞培对克拉苏不择手段地敛财感到不屑一顾，而克拉苏则嫉妒年纪轻轻便声名赫赫的庞培。以马略、秦纳为代表的平民派被打败后的12年间，一直是由苏拉派，也就是由元老院派掌握大权，因此派系分裂暂时不致构成威胁。但是，苏拉派内部的势力斗争，却导致苏拉辛苦重建的由元老院所主导的共和政体逐渐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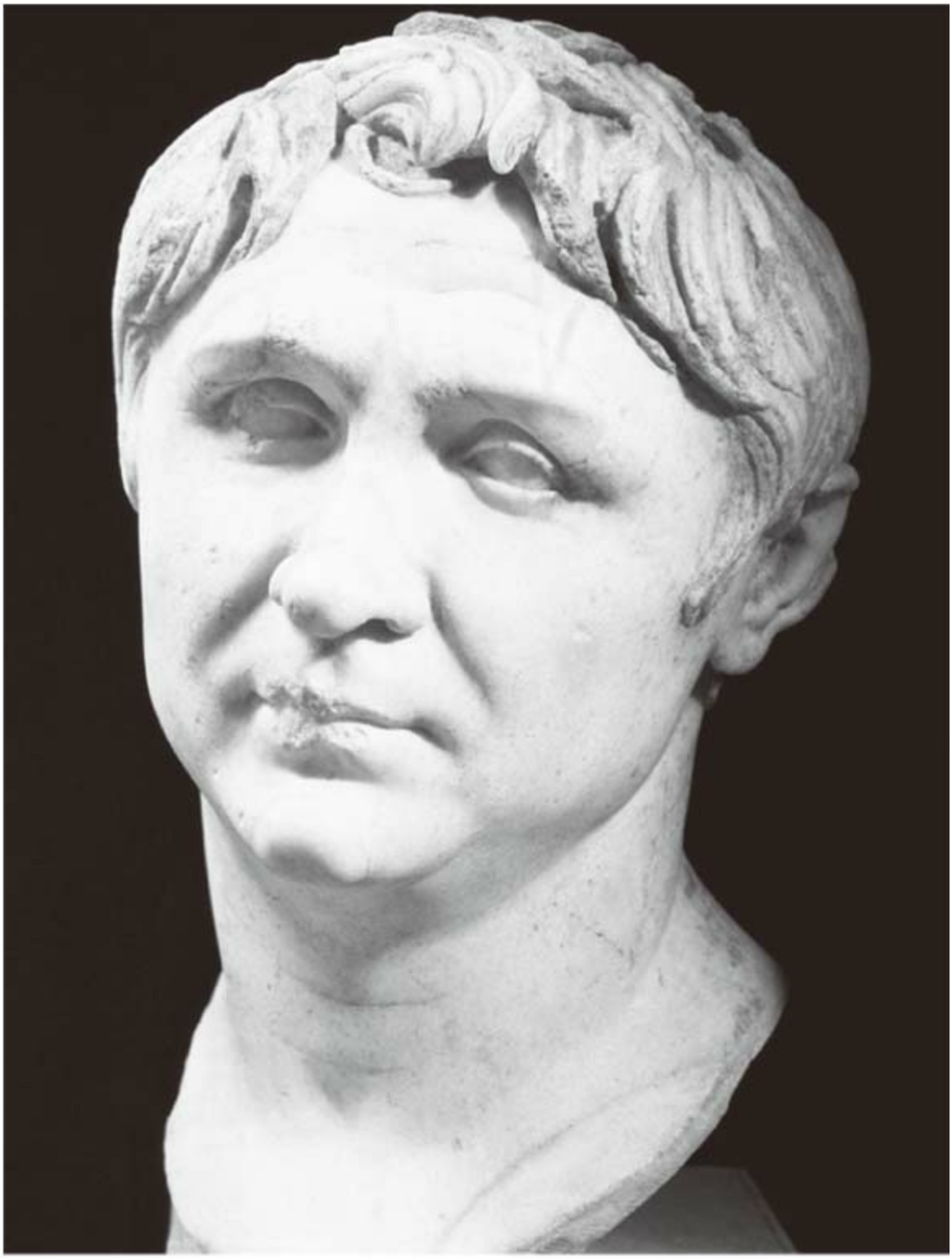
自西班牙回国后，庞培要求元老院提名他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候选人。虽然凡是具有罗马公民权者在公民大会中均有投票权，执政官的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中进行，但推举候选人却是元老院的权力。

最开始，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都一致拒绝庞培的要求，因为如果答应了他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的要求，就是违反“苏拉改革”。正如《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所详述，苏拉为恢复以元老院为主导所建立的共和政体，不惜施行独裁政治，因此必须尽可能给予元老院议员相同的领导权。如果因为某些特定对象势力庞大而另眼相看，上述的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苏拉在政治生涯的每一阶段都审慎地制定年功序列制。

年功序列制是指30岁具有财务检察官候选人的资格，当选后任职满一年为31岁，此时就可在元老院占有议席。此后担任元老院议员8年，在39岁时具备法务官候选人的资格，同时也取得指挥两个军团的战略单位——1.5万名士兵的“绝对指挥权”。法务官一职任满一年后，大致皆可成为罗马10个行省中任一行省的总督，处理行省政治及安全防卫一两年后，才能在42岁时具备罗马最高官职——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此时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倍增至600人，再依每位议员的才能、势力推举执政官候选人，苏拉认为依循这个模式就可以巩固罗马的统治核心。

庞培生于9月，执政官的任期自1月1日起为时一年。换句话说，庞培在公元前70年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一位35岁的执政官，即使不以实岁计算，而是将他的年龄算做36岁，也依然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庞培自22岁突然受到苏拉征召之后便东征西伐，25岁便破格举行凯旋仪式，他并没有财务检察官的经历。虽然战绩辉煌的他，并不需要刻意去担任被视为政治生涯起点的财务检察官，但是他已经35岁却连元老院议员的资格也没有取得。未担任法务官的庞培是以前法务官的身份前往西班牙战地，若非如此，他就无法取得指挥两个以上军团必须具备的“绝对指挥权”。因为当时元老院议员虽有600位，却没有任何人的军事才能凌驾于年仅32岁的庞培之上。这次受到元老院破格任用且不负所

托的庞培返国后，不仅资格、年龄不符，而且在本身不具备元老院议员身份的情况下，再度破格要求元老院推举他为执政官候选人。由于庞培并未解散原先率领的军团，他的军事力量带给元老院以无形的压力。



庞培

苏拉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必须在军事任务结束后解散军团——庞培并未遵守，而克拉苏也同样违反了这项规定。克拉苏并无资格上的问题，而且他也以担任执政官为目标。虽然无法肯定他是否曾担任财务检察官，但他的确曾任法务官，罗马派遣他前去镇压“斯巴达克斯之乱”时，授予了他“绝对指挥权”。因此，克拉苏就任执政官在政治经历或年龄方面均无不妥。而他身为元老院议员，也并未违反公元前509年创立罗马共和政体以来的规定，也就是执政官候选人必须为元老院议员。但克拉苏仍有一个难题，那就是他的声誉不佳。贪得无厌的敛财手段虽然使他成为罗马首富，却也使得他声名狼藉。相反的，庞培以年轻的凯旋将军之姿颇受市民欢迎，但元老院还未针对他的要求给予正面回应。

一向水火不相容的庞培与克拉苏，却决定在此刻携手。他们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克拉苏想办法让元老院同意庞培为执政官候选人，而庞培则将支持自己的选票转移给克拉苏。这么一来，公元前71年初冬，两人顺利当选为下年度的执政官。自公元前75年的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起，元老院已逐渐无法主导执政官的人选，苏拉体制的崩溃在两人当选执政官一事中表露无遗。但一般平民并未考虑这些问题，对他们而言，有趣的不过是关系恶劣且名声响亮的庞培与克拉苏竟会为了选举而合作罢了。

同年或是下一年的公元前69年左右，恺撒当选为财务检察官。在军团内服役或担任行政工作都有薪俸，而担任“始于财务检察官、终于执政官”的国家重要公职则均为无俸制。在罗马从事无报酬的公职被称为“库鲁斯·荷诺鲁姆”，如果意译就是“光荣的职务”。恺撒在31岁时终于站在“光荣的职务”的起跑线上。

罗马每年会选出20位财务检察官，恺撒就是这年选出的20位财务检察官之一，但是任职地并非位于首都或跟随战斗中的军团，而是位于被称为“远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他的上司，也就是统治此地的行

省总督，是在庞培平定塞多留战役之后，被派遣到问题不多的这个行省来的并不知名的人士。

尽管这么说，当时恺撒已不再是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已30岁的他也算是位名人。无论当选为20位军团大队长之一还是当选为财务检察官，由于他是以“光荣的职务”为目标的名门之后，即使他并非特别费心也能够得到外界的支持。但当时30岁的恺撒闻名于世的并非前述事迹，而是以一位年轻的花花公子的名声，因现实世界中奢华的生活而背负起巨额债务。

第四章

青年后期 Juventus

（前69—前61年，恺撒31—39岁）

起跑线

恺撒就任财务检察官之前，据说累积的债务总额高达1300塔兰特之多。这笔钱足够雇用11万以上的士兵服役整整一年，也足够如卢库鲁斯那样极其奢侈而讲究的美食家举行150次宴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初他不顾一切地将海盗给自己定的赎金提高到50塔兰特或许是因为他打从心底根本就不觉得那是笔大数目。

那么恺撒究竟把钱用于何处了？这笔钱是在他进入政界前所借，因此并非用来做诸如为争取民众支持而举办剑术比赛或修建道路等选举经费。由于恺撒家境并不宽裕，所以这笔钱是向他人所借，至于他究竟用在何处，在参阅众多历史资料后得知他大致是用于下列三方面：

第一是花在他自己身上了。

恺撒的读书量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堪称第一，是众人一致公认的，这一点连西塞罗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书籍写于昂贵的纸莎草纸上，自然所费不少，何况他对读书的兴趣并非开始于他经济宽裕时。

另一方面，年轻的恺撒也以注重打扮而出名。根本不知装扮为何的人才会认为托加不过是将白色的布料披覆于身而已。但实际上依白色毛料厚度的不同，在托加最重要的衣褶部分也会相应地改变，而且越薄的布料越昂贵。

正式的服装托加脱下之后，便是任何时候皆可穿着的短衣，虽然短衣式样极为朴素，且都是统一的短袖和长度及膝的设计，却有很多讲究。第一是腰带上的扣环，这个扣环上镶有金子。另外，短衣袖口也可另行装饰。因为穿着短衣外出者只限于未成年的少年、一般平民及奴隶。所以身份地位特殊的成年人则于短衣外罩上披风，而将披风固定于

左肩的别针也是注重打扮者的另一项装饰品。一般的短衣均为白色，可将外罩的彩色披风衬托得更出色。染色的披风价格昂贵，其中最贵的是紫色的披风，染料来自贝类，要1.5万枚贝类才能取得一件披风所需的染料，所以只有凯旋的将军才能穿得起紫色披风。紫色这个得来不易的颜色，在后来的帝政时代成为皇帝专属的色彩。

价格仅次于紫色的便是大红色。只有元老院议员的托加上的镶边，以及总司令官罩于短衣外胸甲上的大件披风才能使用大红色。在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影片中罗马士兵都穿红色的披风，那只是追求色彩上的效果罢了。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尚不知丝为何物，一般将线以原有的颜色织成布料，这种布料价格十分便宜。

护民官和平民的服装

元老院议员的服装

男子的服装在罗马时代虽只分为短衣、托加、军装，但如果是注重打扮者依旧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装扮自己，当然，衣着越讲究则越花钱。

恺撒借钱的第二个理由，根据史学家的说法，是他与朋友交际时的慷慨性格。除了友人之外，还有与名门中分封贵族的交际花费。世世代代为分封贵族者因出身名门，他们都扮演着恺撒的赞助者的角色，妥善经营与这些人的关系不仅是身为名门家长的义务，也是立足政界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三个造成高额借款的原因是恺撒送给情人们的礼物花费。他亲自挑选昂贵的礼物送给情人们，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慷慨。

虽然恺撒出身名门，但家庭并不富裕，而且当时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对他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从古代人的眼光来看，他并非是拥有如女子一样匀称五官的美男子。但是恺撒身材修长、体格匀称，并拥有乌黑灵活的双眼及优雅的举止，使得他即使身处同辈的年轻男子当中也格外地引人注目。再加上他诙谐幽默的谈吐，常令人心情愉快。即使不送昂贵的礼物，他也深受女人垂青。而获他赠礼者莫不欣喜。恺撒并非为了广受众多女子的欢迎而送礼，而只是为了让佳人开心。女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出为讨女人欢心而送礼的男人与只是为让女人开心而赠礼者之间的差别。

总而言之，基于上述各种理由，恺撒负债累累地前往西班牙上任，由于任职的行省并非多事之地，一年的任期也就平平淡淡地很快结束了。恺撒所担任的财务检察官一职主要负责行省经济方面的工作。由于职务的关系，他得以到任职的西班牙南部各地旅行，其中一个旅行地就是古代被称做“赫丘利之柱”的地方，靠近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的加的斯。当他在这里停留时，史学家们记载了如下的一段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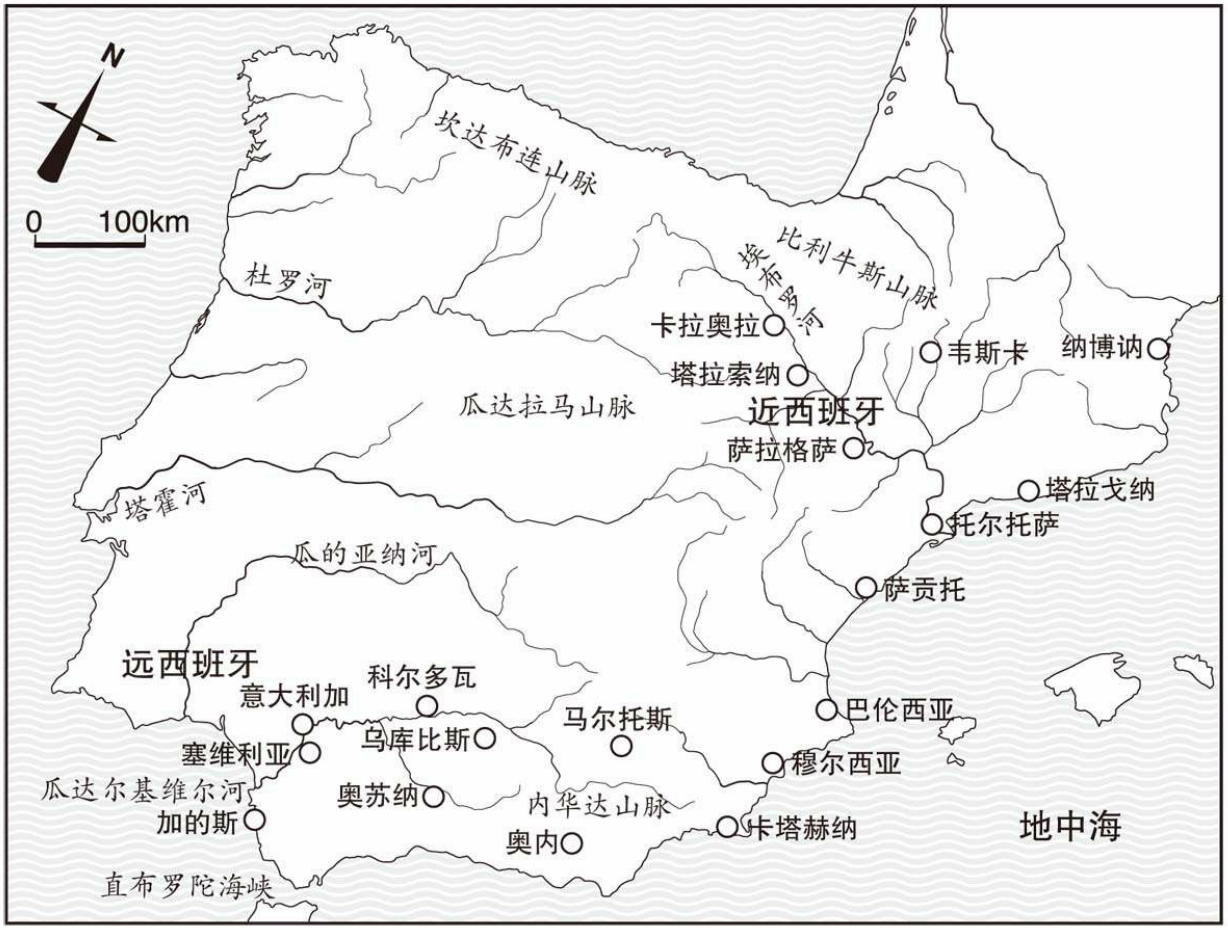
商港加的斯自迦太基统治西班牙开始而繁荣，在这里有座供奉半神半人的赫丘利神殿。相对于赫丘利神，在“出差”途中前往神殿参拜的恺撒，对安置其中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独自在像前说道：

“在我这个年纪时亚历山大已经称霸世界，而我却还一事无成。”

这是恺撒的自我反省，也反映出他身边的人和他的“被保护人”期盼他能反省而有一番作为的苦心。对他们而言，恺撒或许没有必要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比较的对象，但眼见活跃的同时代的庞培与西塞罗，他们很希望恺撒有所警醒。年长恺撒6岁的庞培已任执政官，并已经举行了第二次凯旋仪式。同样长他6岁的西塞罗，也因三年前在罗马广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瓦莱里乌斯官司的胜诉，取代霍滕修斯成为罗马首席律师。

令共和时代末期的罗马史更加多彩多姿的主角几乎悉数登场，而恺撒却不在其中。

恺撒的任期在他自我反省的同时也已终了。表面上看起来，回国后他的生活方式与从前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举债度日、挥金如土，除了获得花花公子的称号外，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反省或振作的行动。如果说有什么改变，就是根据“苏拉的改革”，他在财务检察官任期满后获得元老院的席次，他进入元老院成为身着镶有红色绲边的白色托加的元老院议员。一向注重打扮的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将红色的饰边重叠等琐事。



恺撒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

虽然恺撒的生活方式从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如果仔细琢磨，却有某些踪迹可循。自从步入青年后期开始，他在言行上的改变也更加明显。这种改变的开端，始于他的姑姑尤利娅的葬礼。

宣示

罗马人是多神教的民族，并且很重视家人。当这两种特质合为一体时，很自然地产生了敬畏祖先的心理。罗马社会对葬礼的重视程度远胜于婚礼，尤其是曾担任“光荣的职务”的国家要职者，死后即使不举行国

葬，都要按照惯例，送葬行列自家中出发沿着通往都市中心的道路行进，在罗马广场或马尔斯广场，由近亲代表在遗体前举行颂扬死者的追悼演说。除亲人外，路过的平民也倾听演说而加入吊唁的行列。除了重要人物本身外，其妻子及儿女也适用这项惯例。

恺撒从西班牙卸任回国所作的追悼演说，正是在他姑姑的遗体前。她是恺撒父亲的姐姐，也是平民英雄马略的遗孀。致悼词者通常是死者的直系血亲，但由于马略的儿子在与苏拉进行内战时被捕身亡，而马略并无其他子女，因此由恺撒来代替。

恺撒这次演说的内容，虽然只能从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所记载的要点中略知一二，但在演说中32岁的恺撒实际上有相当大胆的发言。他说姑姑的娘家与王室有渊源，而追溯父亲这一方则与永生的众神有关。换句话说，姑姑的娘家也就是自己所属的尤里乌斯家族，追溯本源则和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有关。在特洛伊沦陷后，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率领众人逃亡至意大利，这批人就是罗马人的祖先。凡出生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者，均被视为自特洛伊逃亡者的后裔，尤里乌斯家族是被视为孕育罗马的阿尔巴隆加的名门望族。对罗马人来说，与女神维纳斯有血缘关系并非无稽之谈，因此恺撒在姑姑尤利娅葬礼中大胆的行为并非说了以上内容，而是另有所指。

罗马人葬礼由于重视祖先及家人，因此在送葬行列中除死者的遗体外，还要有死者的祖先或家人的蜡制面具或雕像随行。恺撒在姑姑尤利娅的送葬行列中也让姑夫马略的蜡像随行。苏拉宣告平民英雄马略为国家公敌后，这项命令一直未解除。尽管马略已身亡，但将国家公敌的蜡像立于遗体旁仍是极其大胆的行为。因为苏拉虽然已死，但罗马仍为苏拉派人士掌控。

在马略死后的18年，当曾经的平民英雄马略的蜡像出现在罗马平民的面前时，他们的内心一阵激动。在苏拉宣布独裁的14年当中，马略这个名字一直是个禁忌。马略的内侄恺撒在演说中也完全不曾提及姑夫，

因为那样做太过冒险了。但是他把马略蜡像展示在了众人面前，实际上，恺撒在暗地里向世人宣示，他要重振被苏拉摧毁的平民派。

就在同一时期，恺撒的妻子科尔涅利娅过世。恺撒为她举行了符合罗马名门女子身份的葬礼，他在追悼演说中并未提及岳父秦纳，送葬行列中也没有秦纳雕像随行。因为秦纳虽是平民派大将，但马略比他更具象征意义。

恺撒的举动宣示了他重振平民派的决心，但居于苏拉派主导地位的元老院毫无反应。因为罗马当权者根本没把这位刚获得元老院席次的年轻花花公子放在眼里。即使是看到马略蜡像而眼眶含泪的民众，对于依靠负债和光鲜的外表勾引女人而负有盛名、装模作样地以一根手指搔头的32岁的恺撒，也不抱任何的希望。无论如何，罗马为苏拉派的天下，苏拉麾下受到各界认可的英才庞培，在他的辉煌战绩的烘托下，在政界无比地活跃。他不但身负元老院的期待，更是平民羡慕的对象。一年后，庞培超越社会各阶层成为国民英雄的机会来了，不仅是罗马人，全地中海世界的人都在扫荡海盗之战中，将目光集中在了这个年仅39岁的庞培身上。

庞培的崛起

罗马人的特性之一是，即使成为了霸主，也不会让本国人民去打理所有的事，其他民族如果有在某方面特别擅长的，便委托给他们处理，因此关于海上的事，他们便交给希腊民族。本来地中海世界的海洋民族是腓尼基人，但腓尼基亡于迦太基后，腓尼基人仅往来于叙利亚与埃及间的海域，成为了地区性的水手。纵横全地中海的仍是希腊民族。

只要是水手，都了解拥有一个随时可供船只停泊的基地的重要性。希腊人的殖民运动自公元前8世纪起就开始了，所以希腊人的海港都市

遍及全地中海，即使后来希腊国力衰败，成为罗马霸权统治下的一分子，他们在通商、航海方面依旧十分活跃。希腊民族认为国家虽然灭亡，但山川依旧存在，如果大自然能使人们言归于好，那么共享河山也无妨。不久，希腊的水手甚至到达印度洋，发现了所谓的“季风现象”。

但是“国家灭亡”对希腊人仍有影响。这样一来，出港后航行于海上的安全就毫无保障，可依靠的公共组织也不存在。如果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尚有应付的自信，但如果遇到海盗，虽也能以航海技术加以抵抗，但程度毕竟有限。

另外，与一般大洋不同，地中海除海域狭小外，风向也不停地改变。因此无论航行技术多么高超，都必须迁就地势，采取沿岸航行的方式。

越接近陆地航行，遭遇海盗袭击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大，因为船体本身的限制，这一点无法改变。一般船只与快速船的速度差别在于船只整体的重量比例。自附近岛屿后方突袭而来的海盗船，因为完全没有装载任何不必要的东西，速度类似比赛用的快艇，即使是以航海技术为傲的希腊水手也无法应付。

霸权国的义务之一便是保障霸权统治下诸民族的安危。罗马人原为农牧民族，在海上一旦遭遇暴风雨就一筹莫展。但地中海海域为他们霸权统治的区域之一，因此他们必须消灭海盗。

早在海盗日益猖獗的15年前，罗马就曾派遣军队至海盗的大本营西里西亚加以讨伐，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当时海盗船甚至出没于意大利近海，肆无忌惮地四处横行。尤其是一直与罗马为敌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援助了海盗后，他们的装备更为精良，连冬季也可畅行于海上。这导致罗马无法运送士兵及武器至各行省。地中海的物资流通迟缓，连输入罗马的主食小麦数量也无法保证。此时，如何对付海盗已成为罗马自身非常迫切的问题。

护民官盖比尼乌斯在公元前67年的公民大会中提出了扫荡海盗的作战方案。此方案原始构想恐怕来自庞培。这不仅是一个提案，更是个从大局到局部都完备的实施方案。由于这个方案十分具体，连一般市民都能轻易判断是否可行，所以极具说服力。护民官盖比尼乌斯所提出的扫荡海盗作战计划如下：

一、在这次作战中投入由12万名重装步兵及5000名骑兵所组成的20个军团。

二、投入战船500艘。

三、由他任命14名元老院议员为总司令官之下的幕僚。

四、总司令官的作战区域除海上外，还要进一步深入海岸内部80公里的陆地范围。

五、财政支出1.44亿塞斯特斯作为此次作战的经费。

六、推举庞培为总司令官。

七、此次作战的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内总司令官对以上各事项均拥有“绝对指挥权”。

对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将大权集中于特定一个人身上。庞培即将拥有的权力对一心只想掌权的元老院来说实在太大，元老院大多数议员反对这个提案。但也有少数议员表示赞成，例如自瓦莱里乌斯官司胜诉以来，对罗马舆论极具影响力的39岁的西塞罗，以及时年33岁的恺撒。

虽然海盗问题才刚波及罗马，尽管元老院也反对护民官盖比尼乌斯的提案，但在社会大众所抱持的危机意识的压力下，此案在公民大会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而通过。一通过这个提案，原先上涨的小麦价格便急

速下滑。由600名元老院议员形成的集体领导制度，被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所摧毁。苏拉一直执著于重建由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但这次的事件充分凸显出这个政体已无法应付公元前1世纪罗马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为了达到通过法案的目的，众人不惜在公民大会中贬损元老院的权威，而庞培也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任务。海盗的巢穴散布于地中海全境，庞培首先扫荡西地中海海域的海盗。最后，东地中海海域的海盗也在大批进驻的罗马舰队的猛攻下被扫平。攻陷海盗的大本营西里西亚地区后，海盗被一举歼灭。这次的胜利乃是罗马毅然投入全力，以缜密的战术展开快攻所致。扫荡海盗之战耗时89天，在短短的89天内，庞培为霸权国罗马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快地，在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7年夏天，人们得以安心地航行于地中海，向意大利输入的小麦也恢复至正常数量。

在罗马，庞培的声望急速跃升自不必说，屡遭海盗侵袭神殿、劫掠都市而陷入绝境的希腊人，甚至将他视为天神崇拜。

虽然在三年的期限内庞培都具有“绝对指挥权”，但他只使用了三个月。

庞培最终完美地完成任务。假如他忠于元老院体制，应该在得胜返回罗马时就交出“绝对指挥权”。公元前5世纪时，辛辛纳图斯被任命为任期6个月的独裁官，大权在握的他却在15天内驱逐外敌后就交出“绝对指挥权”，重新拿起锄头，过起自己的田园生活。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维持以元老院等少数精英分子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治。

但39岁的庞培没有这么做。在另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也不需要他这么做。

成功扫荡海盗后的庞培并未返回首都。如果回到罗马，固然能享有

凯旋仪式的荣耀，但在凯旋仪式后就必须交出“绝对指挥权”，所以庞培先不回首都而在公民大会中提出了如下的提案。提案者正是被视为他代言人的护民官盖比尼乌斯。这一次的提案，他甚至未事先请示元老院。

“撤换中东战线的领导人卢库鲁斯，改由庞培担任。庞培可以在必要时延长他现有的‘绝对指挥权’期限，委派庞培平定引发中东纷争的祸首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

这个提案再次遭到元老院众多议员的反对，他们生怕将权力过度集中于特定一人身上。而将要解职的卢库鲁斯本人及外界都把他看做苏拉麾下的“接班人”，他一向奉行“苏拉改革”。总之，他是位彻头彻尾的元老院派人物。

从公元前73年开始，卢库鲁斯前往东方平定叛乱已过7年，米特拉达梯战争却没有结果。正如《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所叙述，拥有卓越军事才能但具有官僚性格的卢库鲁斯本身也难辞其咎，而战事一旦延长，任谁都会逐渐产生厌倦之意。相较于市民们期望庞培能尽快结束此战，元老院大部分的议员却不希望与自己立场一致的大将卢库鲁斯被撤换。赞成这项提案者依旧是西塞罗与恺撒。之后，在35个选区皆投赞成票的情况下，通过了将卢库鲁斯解职、让庞培继续掌握大权的法案。元老院陷入孤立和无力当中。

就任按察官

解决了海盗的问题，罗马的商业活动恢复了往日的活跃，东方有庞培坐镇，只需要等待捷报传来，公元前65年的罗马充满了活力与祥和。时年35岁的恺撒也在担任“光荣的职务”，也就是政治生涯中到达第二个阶段，他当选了按察官。35岁就任这个官职并非是引人注目的升迁，虽有正面评价，但这只是顺理成章的升迁罢了。不过，恺撒决心妥善运用

这个堪称营建官的职务，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

恺撒就职后，没有顾及其他三位同僚的想法，而是进行了各项大手笔的工程。他首先开始对公元前312年修筑的阿皮亚大道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工程，这条在罗马的地位日益重要的大道有“罗马街道女王”之称。

另一方面，恺撒也没有忘记举办斗剑比赛以争取民众的支持。他雇用320组共640位角斗士，让他们在右手臂戴上在阳光下闪耀动人的纯银铠甲。他热衷于举办斗剑比赛，因为他自己的确也乐在其中，元老院的长老们虽然对此颇有微词，民众却乐此不疲。

不过，在恺撒担任按察官一年期间，他个人的负债已近天文数字。虽然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完全不顾虑巨额的借款会拖垮自己。

正是由于上述各项活动都由恺撒自费进行而导致了债务的增加。罗马政府固然也有公费整修街道、为娱乐民众而举办的斗剑比赛，但必须经过质朴刚毅的元老院长老们批准。除预算金额有限外，还要遵循先提报者优先通过的原则。厌恶这套程序的恺撒干脆自掏腰包。自费投入工程建设是个人的自由，有钱人承担公共工程也是罗马的传统。

利用修建道路、大手笔举办斗剑比赛所累积的民众支持，恺撒在原址重建了16年前遭苏拉毁坏的马略胜利纪念碑。按察官的职责包括修复古建筑物及纪念碑，但重建仍为国家公敌的马略胜利纪念碑，已变成具有政治意味的行为。元老院对此感到不满，但也仅止于此，因为元老院无法在久违的平民英雄纪念碑前落泪的民众面前，再次毁坏这座纪念碑。

因为此事罗马平民也将希望寄托在了恺撒身上。在这种状况下，对恺撒而言第一个重要官职的任期届满。虽然他并无卓著的政绩，但他获得了平民的普遍好感，当然同样他也为此背负了巨额的债务。

37岁真正起步

即便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庞培这类早熟的天才型人物，男人如果到30岁还未起步便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对传记作者来说，40岁才“崛起”的恺撒的确有点让人难以下笔。

另一方面，由于恺撒在“崛起”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掌控整个罗马，这种极为罕见的际遇也成为传记作家难以下笔的另一个原因。

40岁之前的恺撒，实际上在近现代的历史学家笔下的罗马史中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么一来后人便无法撰写他的传记。因此迫使撰写恺撒传记的历史学家，必须先描述这位一崛起世界即以他为发展中心的男子究竟身处何种时代。结果，恺撒“崛起”之前的罗马史便占了传记的前三分之一。

正如这一丛书的大标题“罗马人的故事”所揭示的，我撰写的重点是采取人物与时代交错描述的手法。一般恺撒传记的作者在书中前三分之一所描写的“恺撒身处时代”的部分，我已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交代完毕。这位在崛起时就开始掌控罗马的人物，在他“崛起”之前有何重要性，也未与他人作任何比较。因此，即使内容有所重叠，《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已提及的内容，在本书中则从恺撒这方面加以描述，这类的内容就到此为止。总之，从以下的部分开始才算真正进入《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前三分之一的内容描述格拉古兄弟的事迹，虽然这些事发生于恺撒出生前二三十年，却不能说与他毫无关联。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只因为他能超越时代的藩篱，但天才之所以能超越时代也正是拜当时的时势所赐。我觉得《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与《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之间有前述微妙的关系存在。

自主角“崛起”时开始记载，从撰写通史的立场来看固然没有不妥之

处，但传记必须将人物更真实地呈现，因此“真正开始起步”的时期也是不容忽视的必经过程。对恺撒而言，这个时期始于公元前63年，37岁起他才“真正起步”。那一年，乍看平静的罗马，因社会不安而引发了著名的“喀提林阴谋”事件。

这个事件的爆发，使格拉古兄弟改革导致的罗马社会矛盾浮上台面，也成为此问题60年后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的证明。

大祭司

大祭司梅特鲁斯·皮乌斯于公元前63年去世。这位老将曾于公元前83年赶往强行登陆意大利的苏拉身边参与内战，之后也曾协助庞培在西班牙的“塞多留之役”中奋战到底，堪称苏拉派的元老，被视为元老院派重量级的人物。正如“Pius”（指深具慈悲胸怀者）这个尊称，他是一位具有完美人格的贵族。大祭司为主持宗教仪式的祭司、女祭司、神官之首，在罗马主持各项国家大典的宗教仪式中，大祭司一职一日不可缺。

37岁的恺撒决定角逐大祭司一职，但大祭司这个光荣的职务唯有功勋卓著者才能担任。恺撒的竞争对手均非等闲之辈，其中一位为塞尔维乌斯·伊扫里库斯，曾于公元前79年担任执政官，享有凯旋仪式的荣誉；另一位为鲁塔提乌斯·卡图鲁斯，曾于公元前78年担任执政官，为元老院中堪称“院内总管”的“第一人选”。这两人的年龄均在60岁上下，除此之外，37岁的恺撒尚有其他居于劣势之处。

根据“苏拉改革”，公元前82年后大祭司一职改由诸位祭司以“商谈”的方式决定。苏拉一向对扩张元老院阶级的权力及权威不遗余力，担任祭司者多半出身元老院阶级，大祭司如果由诸位祭司以商谈的方式决定，实际上是为了由元老院阶级独占这个职位。根据罗马法律的规定，自公元前367年制定《李锡尼法》后，平民才得以角逐大祭司一

职。

贯彻“苏拉改革”——就像10年前恺撒也是在经由众祭司商量后才能担任祭司一样——显然不利于恺撒。相对于另两位候选人过去的辉煌事迹，他的经历只限于财务检察官及按察官，此时，年轻反而成为不利的因素。

因此，恺撒请担任护民官的友人拉比埃努斯以再提案的方式，重新提出制定于公元前104年的《图密善法》一案。依据《图密善法》，大祭司的人选由35个选区中抽出17个选区投票决定。对外提出此案的护民官拉比埃努斯在公民大会中向大众说明提案的理由，是为了打破元老院对拥有主持宗教仪式最高权力的大祭司一职的垄断，将权力归于全体公民。公民们自然是毫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个提案。

但是，这个提案依然无法确保恺撒当选。在担任按察官的两年里，他虽然以大手笔举办斗剑比赛而赢得民众的支持，但他并不如两位竞争对手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恺撒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在向来不举办竞选演说的罗马，竞选活动分为以下四类：

一、家庭访谈员——就是做家庭访谈者，助选人员逐门逐户拜托对方赐予一票。

二、沿街拜票员——拥有投票权者只限于具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拜票员在这些男子前往罗马广场工作或到市集时与他们同行，沿路进行拉票活动。

三、沿街拉票员——第二项是在这些符合条件的男子上班或到市集的去程中进行；而第三项则是指他们在回程中进行同样工作的助选人员，他们在市中心等待符合条件的公民，在送他们返家途中拉票。

四、名人劝说员——以对群众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为目标，设法说服

他们赐予一票。

恺撒并非这些竞选活动的首创者。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候选人西塞罗也曾采用过同样的竞选方式。

西塞罗的年龄符合规定，而且以“罗马第一律师”而闻名，但是他并非毫无弱点。在首都扬名但出身市井的他，属于祖先并非元老院议员的“新贵”。以血统为傲的元老院阶级，或多或少会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类“新贵”。而他又不像同乡的马略那样身为一位战功辉煌的凯旋将军，让民众疯狂地崇拜，因此西塞罗采用这样的竞选活动是必然之举。

恺撒出身小康，又在律师这一行受挫，就任官职后却债台高筑，并不如以律师扬名的西塞罗般拥有雇用大批助选人员的经济能力。他的选举经费一如往常，来自与日俱增的借贷款。

选举当天，当穿上候选人的纯白托加后，恺撒在门口对送他出门的母亲奥雷利娅说：

“假如我没有当选大祭司，就请您不用再等我回家。”

恺撒并不是打算一旦落选就自杀。他大胆地与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共同角逐这个罗马最高荣誉的职务，如果落选就无法在首都立足，势必得远赴国外暂避风头，他是希望母亲有这种心理准备。但幸运之神十分眷顾这位大胆的赌徒，那一夜，恺撒以大祭司的身份返家。

恺撒是怎样做到在如此年轻时争取到大祭司一职的？事实上，没有人料到他会成为候选人，元老院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十分震惊。大祭司虽是一个“光荣的职务”，却无法掌握特权，年轻而充满野心的精英分子绝不会不惜借贷以争取此职。尽管如此，担任大祭司仍然具有下列优点：

一、大祭司为宗教界最高领袖。

二、担任罗马公职的人数均为复数，就算是执政官也有两位，大祭司是极少数没有同僚的公职。

三、大祭司可兼任其他公职。

四、罗马公职均有任期的限制，而大祭司是唯一例外的终身制。

五、大祭司是唯一提供官邸的公职。

其实无论做任何事，恺撒的目的都不止一个，他能够很自然地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合二为一，就任大祭司就是例证之一。他认为，如元老院体制般的集体领导方式并无统治国家的能力，解散元老院体制后所建立的政治新秩序必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体。如果采取集体领导方式，那么居领导地位的诸位元老院议员，或许在穿上红色镶边的白色托加后，就足以树立权威，毕竟元老院议员共有600人。但如果居于领导地位者只有一位……我想，毫不迷信而且较常人更具理性精神的恺撒，他认为宗教乃是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

恺撒在就任大祭司的同时移居了官邸，这并非是为了远离平民区“苏布拉”的喧嚣。官邸靠近罗马广场的中心，声音的来源不同但喧嚣依旧。在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不管罗马式的房屋在建造时如何费心地与外界隔绝，外界的声音依然堂而皇之地穿过外墙飘进无墙的中庭。而且官邸并不十分宽敞，根本无法与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相提并论，因为官邸原为王政时代国王的行宫所在地，承袭了罗马国力不振时所建造的规模。

但不管怎么样，恺撒成为了大祭司，在罗马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拥有了官邸。要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常在此聚会的罗马市民的心理，是说不通的。此外，居住在罗马广场，民众也较易与他亲近，政治家的大门必须为群众敞开。在尤里乌斯·恺撒被暗杀前，他一直住在这个官邸中。

反元老院派的第一步

恺撒在就任大祭司那一年，再度通过好友护民官拉比埃努斯告发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罪名是在37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00年），他充当了杀害当时的护民官萨图纽斯及其派系人士的主谋，这事件已详述于《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当时的护民官萨图纽斯强行推动激进的改革，元老院为重选护民官而发表类似紧急事态宣言的“元老院最终劝告”，他却用实力予以瓦解。

但是被告发的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在37年前虽然意气风发地镇压对手，在37年后的公元前63年却已是垂垂老矣，而且此时他已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元老院议员。

没有想到的是，市民们却对这名虽是37年前的事件主角、如今已缺牙秃顶的老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好不容易从“新贵”中脱颖而出的执政官西塞罗早就对此有所洞察。这位想成为平民喉舌的执政官也加入了为这位元老院资深议员辩护的行列。恺撒和拉比埃努斯如果不想败诉就必须改变战略。

诉讼在罗马广场内某个会堂的一角展开，市民如潮水般涌入。突然有人厉声宣告，声称雅尼库鲁姆丘上有一面红旗迎风飞舞。

在王政时代，受到邻国伊特鲁里亚人袭击之后，凡是罗马在遭受外敌侵略时就会在台伯河西岸的雅尼库鲁姆丘上插上红旗以警告市民。当看到红旗飘舞时，人们都会抛下手边的工作回家，专心准备迎战。公元前1世纪，罗马霸权遍及地中海全境，虽有好几百年未曾再起战事，这个习惯却流传下来。因此当聚集在法庭内的市民、律师西塞罗、被告拉比留斯获知这个消息时，无论情报准确与否，都立刻离开法庭各自赶回了家中。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查出此事纯属虚报。但原告在之后开庭

时，却显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诉讼只能草草结束。

后世的学者认为，这是恺撒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以应付眼前不妙的形势。形势在刚开始时的确对他不利，但最后仍以喜剧收场。但如果将这个闹剧视为年轻气盛的恺撒幼稚的作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弹劾一位垂垂老矣的议员，而是另有更深的用意。

在公元前121年，也就是在此之前58年，当时的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古将长久以来不成文的规范制章定律，形成了明确的法律，也就是《森普罗尼乌斯法》。根据此法，罗马所有公民即使是被判死刑，也有到公民大会申诉的权利。

如《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所述，《森普罗尼乌斯法》是因元老院在罗马史上首度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而来。在这个紧急事态宣言中声明，执政官可不经审判而对具有叛国行为者格杀勿论，而首位被视为暴徒的牺牲者就是盖乌斯·格拉古以及他的党羽。

立法者也有成为牺牲者的例子，《森普罗尼乌斯法》后来也无疾而终，而元老院却在之后屡次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恺撒真正的意图就是要彰显“元老院最终劝告”的不合法性。

罗马政体中唯一不经选举就组成的机构便是元老院。在王政时期，这是由一群长老集体向国王进谏，到了共和政体时期成为劝谏机构。但元老院一向不具决定权。之后元老院因在布匿战争中高度发挥出了功能，逐渐拥有了决定权。在护民官之中，格拉古兄弟率先以身试法，频频抵抗元老院的强权，却都铩羽而归，这是元老院握有“元老院最终劝告”这项法宝的缘故。

恺撒指称元老院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后，拉比留斯成为了一名刽子手，因为他不承认护民官萨图纽斯及其下的公民具有控诉权，未经审判就将他们杀害。恺撒在公民面前充分发挥他的胆识，让众人见证

了“元老院最终劝告”的不合法。顺利的话，元老院极可能拱手让出这项法宝。而恺撒必须追究直到自己出生前37年的陈年旧事乃情非得已，因为当年正是针对代表公民的护民官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最后一年。

结果虽然是以闹剧收场，但并不意味着失败。元老院本来应该只有劝谏权而无决定权，却采取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这种强势做法，再度引发一个问题：元老院对罗马公民是否具有不经判决就可以格杀的权力。这事引发了公元前63年造成四分之一罗马公民陷于恐慌的“喀提林阴谋”事件。

“喀提林阴谋”

公元前63年，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正值45岁的壮年时期。出身没落贵族的他年轻时便在苏拉手下崭露头角，不仅具有武将的才干，而且绝对服从命令并毫不徇私，因此苏拉也视他为得力助手。苏拉强行消灭“马略派”时，喀提林便是阵前指挥之一。喀提林虽然颇具将才，却心胸狭窄，在苏拉死后，相对于雄才大略而且富贵加身的同辈人物庞培，他显然逊色许多。

尽管如此，喀提林也称得上是一位创造时代的人才。公元前1世纪，罗马跃居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地位，经济规模甚至超越迦太基。各式的商品，尤其是非日常必需的奢侈品由地中海海域输入罗马。以勇健、俊美著称的罗马男子也躬逢其盛，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再多钱也嫌不够花的时代。在领导阶层的子弟之间，借贷已成为家常便饭。

但是借贷之后该如何偿还的问题，影响波及面很广。喀提林出身没落贵族，手头并不宽裕，为了满足欲望也不得不借贷。但他深信庞大的债务足以毁人一生，因此在心态上较放不开。相比之下，小他8岁的恺撒借贷金额比他更多却不以为然。恺撒在借贷这方面显然比较乐观。

如此一来，才华横溢的喀提林开始憎恨陷他于苦境的社会。他的行事风格与性格也逐渐偏向晦暗孤僻。我个人认为，西塞罗在弹劾喀提林时，用“无赖汉”、“杀人犯”、“通奸者”、“背信者”之类的批评，未必全然可信；西塞罗一向以雄辩的姿态出阵，经常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喀提林则是一丝不苟的人，如果真是无赖汉便罢了，但有3000名同伴愿与他同生死则必非等闲。而罗马史上有名的“喀提林阴谋”也就此展开了。

两年前的公元前65年冬天，选举下年执政官的日子迫在眉睫。虽然资格年龄均不足，43岁的喀提林却跃跃欲试。选举在公民大会举行，决定候选人资格的却是元老院。多数元老院成员对属于激进派的、高举“注销一切借贷”这一反经济原理公约的喀提林均无好感，倾向否决他的候选人资格。当然否决需要理由，理由就是他在任非洲行省总督时被告发的贪污诉讼判决尚未明朗化。之后，判决结果立刻公布，喀提林无罪开释，但已过了候选人登记的期限。显然判决有故意拖延之嫌，不管真相如何，喀提林已耽误了候选的机会。

可是喀提林并未因此死心，第二年他仍然卷土重来。这次元老院找不到借口，喀提林顺利成为公元前63年度的执政官候选人，公约的内容和去年一样，仍是债务一笔勾销。

当年的两名候补对手都是强敌，其中一位是西塞罗，以律师身份提升了知名度，一心要当上地方出身的执政官。祖上并无元老院议员的他，是一名“新贵”，其优势在于出生以来就倚赖的苏拉派原属于元老院派。元老院对稍显激进的喀提林略为反感，可是对与自家缘分不深的西塞罗却没太多意见。

另一位竞争对手是盖乌斯·安东尼，他的才华与为人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可是其父却是西塞罗前一代的大辩论家，也是一位知名的法学家与律师。他父亲的名声对民众而言并不陌生，所以他也深得其利。此外，他也从罗马富豪克拉苏手中获得了充裕的选举基金。

选举的结果是西塞罗和安东尼当选，喀提林居次席。

喀提林依然不甘心。在公元前63年10月20日举行的下年执政官选举中，他再度出马。当时他的对手与去年相较并不足为惧，是尤尼乌斯·希拉努斯和李锡尼乌斯·穆列纳两位。不料投票结果，喀提林仍居次席。但是就在下一年，担任执政官两人之一的穆列纳因为违反选举而被举发。如果穆列纳获判有罪，次席的喀提林就能顺利递补，此事让元老院慌了手脚，一致认为必须避免“借款一笔勾销”这种激进政策的实施，因此授意西塞罗为穆列纳辩护，即使他尚在执政官任期之内。

穆列纳违反选举的罪名似乎确凿，但是罗马首席律师西塞罗想要颠倒黑白的话，根本是易如反掌。穆列纳获判无罪，喀提林递补的美梦也因而破灭。

绝望往往促使一个人走上极端，尤其对爱钻牛角尖的人更是如此。

支持喀提林的不满人士大概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出身良好，与喀提林一样为了维护一定的生活水准，不断举债以致债台高筑，苦不堪言之后为了突破现状只好采取极端的手段的人。尤其经济活动活跃之后，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不是任何人都像克拉苏一样那么有能力见风使舵。

另一种是苏拉部下的一群士兵。他们跟随苏拉南征北战，退伍后被赐予田地，成为自耕农，但有些人在从士兵转换成农民角色中不能适应。如果是分到那不勒斯近郊、平原辽阔的坎帕尼亚一地的算是幸运的。但是如果是分到山丘绵延的托斯卡纳一地的人，放下宝剑，取而代之的是拿锹荷锄，这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苏拉这人，在整合手下士兵的战斗力时不遗余力，在军团解散或同伙结合上却不那么积极。或许正因为他是一名卓越超群、自信满满的武

将，所以除非是大事或是他所关心的事，他都有点疏忽。

在毫无外界协助的情况下，又要面对无法习惯而且困难重重的工作，聚集在托斯卡纳中心佛罗伦萨一地的老兵逐渐变得暴躁，他们与邻近的农民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耳闻。以这块没有感情的土地作抵押来借钱成了家常便饭，还钱必须打拼，可是讨厌农事的他们根本提不起劲。失去土地再加上债台高筑，这种无可救药的绝望，与被债务逼上绝路的贵族们是相同的。

除了以上的这些人，喀提林手下还有一些不满现状的人，但是没有住在都市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也不具备可借钱的身份。为债务所苦的人，虽然有一些是分布在意大利各地的自耕农，可是为数不多，因为他们还拥有土地，只说为了投票，并不会特地来到罗马。

喀提林的“阴谋”当中，也未包含被称为“骑士阶级”的有经济实力的人士，因为他们是被借钱的债主。

由此可见，西塞罗所认为的“喀提林阴谋”并非集结了罗马所有的不满分子。只是，原来拥有罗马公民权而且不乏是有头有脸的苏拉老兵，为了投喀提林一票而聚集在罗马，毕竟这样很引人注目。即使不着军服，由走路方式也可猜出一二。另外，西塞罗身为现任执政官，组织了近卫队，自己也在外衣上套上盔甲，闪闪发光，更提升了喀提林危机四伏的状况。“主谋”喀提林则一如平常地在街道中行走，也出席了元老院会议，更刺激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首都罗马市内暴动四起，托斯卡纳一地组织起来的军队也计划进军首都。此外，像苏拉旧部下、集体移民加普亚一地的老兵们也与斗剑士联手，南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一地的农民起义，北意大利波河以北的农民也蠢蠢欲动。南意和北意的暴乱，似乎是尚未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人为了抗议苏拉而兴起的。

这个“阴谋”其实乍看之下有点空穴来风。主谋者当中具备指挥才能的除了喀提林一人，其他都只能说是起于托斯卡纳一地的骚动而已。暴乱首领除了苏拉老部下蒙利乌斯之外别无他人。事实上，加普亚一地或是南意、北意根本就没有首脑，即使提到造成罗马境内骚动的主谋者成员，也是寥寥可数。

首先是在公元前71年曾担任执政官的雷托鲁斯。他之后的行为似乎有违元老院议员规范，所以被逐出元老院。他一心期待能挽回失地，在公元前63年被选为法务官。其他还有两位前任法务官、一位年轻的元老院议员，年轻的贫穷贵族、骑士阶级各一位。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

暴动决定在苏拉胜利纪念日，也就是10月28日这一天进行，罗马人都在盛大庆祝。本来的计划是在当天先杀掉执政官西塞罗，然后在罗马各地纵火，再在混乱之中收回罗马，同时迎接各地赶来的起义军，可惜计划却事先泄了密。

因为主谋团体位居末座的某个人，认定此次暴动必成功无疑，于是得意洋洋地向他心爱的女人泄露，不料这名女子却偷偷前往西塞罗家中，一五一十地把计划全盘托出。

西塞罗马上召集了元老院成员，向他们当场说明这个传言已久的“喀提林阴谋”全部属实，为展开镇压行动，要求下达“元老院最终劝告”。元老院议员之一的喀提林也列席其中，一部分的议员显得神色仓皇，但大多数的议员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了西塞罗的要求。

在当天的元老院会议中，有一名议员迟到了。他解释说是因为妻子生产才迟到，那天是9月23日，出生的孩子正是屋大维，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起义”在之后的一个月间迫在眉睫，喀提林方面却并无显著行动。

元老院因为没有证据也都按兵不动。但是因为事先泄露了天机，元老院内及罗马市中，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谣传。

在元老院议员之间，少有人肯定喀提林有这种才能，大部分人认为必有黑手在他背后操控。

克拉苏就被视为幕后黑手的第一人。庞培被克拉苏视为眼中钉，他扫荡海盗一举成功，远征东方也成果辉煌。庞培将宿敌米特拉达梯王逼到自戕，近日即将胜利归国。克拉苏与庞培交恶之事，在罗马境内可说是妇孺皆知。面对战绩辉煌且率骁勇军队即将返国的庞培，克拉苏可说忧心忡忡。于是有谣言说他趁宿敌回国前先拿下罗马，暗中操纵喀提林等等。而策划必须要有资金，克拉苏正好是罗马首富。

恺撒则被视为另外一位幕后的黑手。恺撒因债务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窘迫绝对在喀提林之上，连元老院议员都认为他不会不想把欠账一笔勾销。尤其恺撒最近时常有反元老院的言行发生，趁这机会把他拉下来，对元老院派的人而言可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

事实上，元老院派中政客之一且气势汹汹的加图，凭借自己32岁年轻气盛，一直紧咬着恺撒不放。

无论是克拉苏还是恺撒，都苦于无确切证据证明自己清白。但是如果放任不管，也害怕会惹祸上身。然而两人对如何澄清谣言，却有不同的做法。

在10月20日深夜，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来叩西塞罗的房门。西塞罗开门一看，正是元老院很有势力的议员克劳狄乌斯·迈提鲁斯、梅特鲁斯·西庇阿两人和51岁的克拉苏。被邀入内后，克拉苏在西塞罗面前拿出一个小包说：

“这是放在我家门口的一沓信，我拆开收信人是我的那封，上面写

着趁惨事发生前速速离去等字样。没有寄信人姓名，这里还有其他收信人的信，我想应该拿到执政官您这边来。”

10月21日，也就是第二天，西塞罗紧急召集元老院成员。执政官站在议场中央，拿着一沓信，一一唱名，把信交给对方。而拿到信的人，被要求要大声把信朗读出来，克拉苏率先以身作则。信的内容大同小异，而且也都没有寄信人姓名。

在会议进行当中，恺撒一直坐在自己位子上写着信，然后他把信交给一位仆人，又交代他一些事。仆人接过信后从元老院会场后门离开，这事自始至终都被加图看在眼里，为了与《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中出现的加图有所区别，历史学家把这位加图称为“小加图”，因为他是前者的曾孙。

不久恺撒的仆人就回来了，他交给主人一封信，恺撒坐在自己位子上，默默地读着信。

等不及他把信看完，小加图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指着恺撒大声说：

“你们看，各位议员，那就是恺撒和外面的喀提林一党之间秘密联络的证据。”

恺撒镇定地回答道：

“这只是我私人的信件而已。”

但是小加图得理不饶人，坚称那是联络证据。恺撒只好一副很无奈的样子把信交给小加图。小加图浏览了信之后，立刻涨红了脸，他把信丢回给恺撒，大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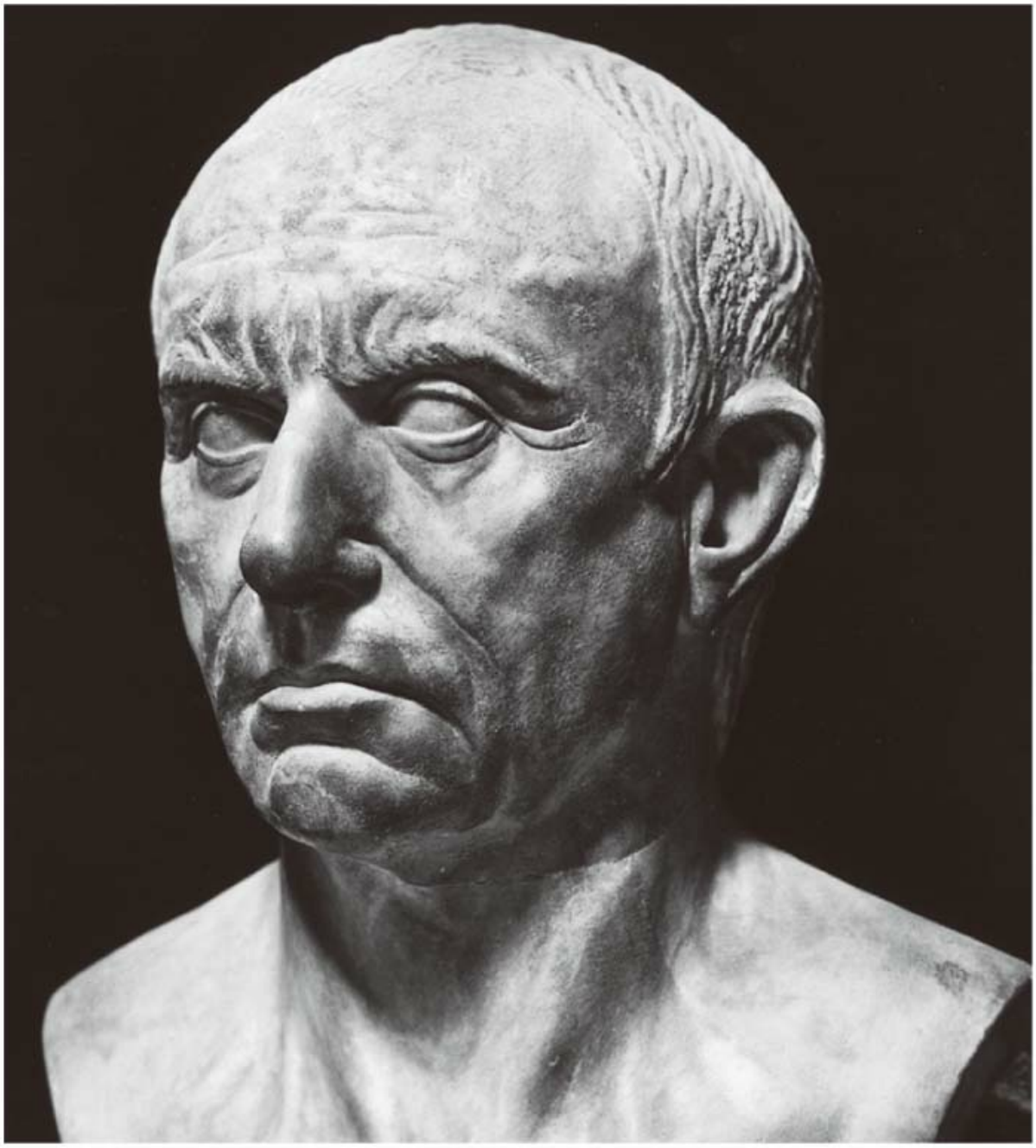
“你这风流鬼！”

并肩而坐的元老院议员们发出一阵爆笑。恺撒是众所周知的花花公子，而大家的笑声则是朝向搞错状况的小加图。那封被误认为有问题的信件，则是塞维利娅回应恺撒的甜言蜜语而写的情书。塞维利娅是小加图的嫂嫂，没有人不知道她也是恺撒的情妇，那时她的儿子布图斯已经22岁了。连严谨的布鲁图也写道："塞维利娅对恺撒如痴如狂。"

但这样一来，原本对恺撒的所有猜疑都烟消云散。德国的作家布莱希特也写了上述的描述。要说到制造绯闻的能力，恺撒真是无人能比。

渐渐地，10月28日，这个喀提林决定的"起义"之日逼近了，托斯卡纳及蒙利乌斯一地的有志之士们逐渐聚集。西塞罗召集元老院议员，向议员们叙述情况危急，强烈要求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可是出席议会的喀提林则大加讨伐，谴责执政官在毫无证据之下先私自行动。不过这次情况不同了，因为各地都在整军备武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元老院最后还是决议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

这样一来，执政官就全权负责处理事态。一时没有确切证据，也不能逮捕喀提林。喀提林在罗马广场上依然自由来去，即使可以谴责他破坏秩序，也没有其他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喀提林为了让其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然来到元老院议员迈提鲁斯家中，请求暂住。在这样僵持的状态下，10月28日那天反而风平浪静。



小加图

喀提林到11月6日开始有了行动。那天夜里，他偷偷潜逃出迈提鲁斯官邸，急急赶赴某人家中。在那里，以法务官雷托鲁斯为首的英雄志士正翘首企盼他的到来。

席间没有明确内容，只决定了要杀掉执政官西塞罗。密谈不久之后，喀提林又若无其事地潜回原来的寄身地迈提鲁斯官邸。

第二天，即11月7日的凌晨，被选为刺客的两人将短剑藏在外礼袍下，到西塞罗家去。因为罗马的重要人物家中，照惯例都有早上接见陈情者的习惯，他们想借此混入其中，谋杀西塞罗。可是进入警戒状态已久的西塞罗，早就暂停了早上的例行公事，因此两名刺客也不得其门而入。连这小事都没事先调查清楚，真是一次鲁莽的行动。然而一个月以来都疑神疑鬼的西塞罗因此证实了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当天就到元老院紧急召开会议。

11月8日，执政官西塞罗召集全体人员来到会堂。这里边当然包括了恺撒、克拉苏、小加图和喀提林等人。

而西塞罗现在倾尽全力救助的已不单单是以往的被告，而是国家罗马。43岁的西塞罗的辩护又升级了。以下有名的辩论词，在现代有时还拿来给高中生作为翻译试题，这就是有名的“喀提林弹劾”第一炮。

喀提林，你究竟要滥用我们的容忍到什么时候？你要掩饰自己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到什么时候？为了实现你肆无忌惮的野心，下一次你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帕拉蒂尼山夜间的守卫根本不在你眼里；罗马市内无所不在的巡警根本不在你眼里；人民的惊恐根本不在你眼里；所有正直的人的忧虑根本不在你眼里；元老院在这一防守坚强的地点（帕拉蒂尼山上）所开的会议根本不在你眼里；现在在座的议员们忧心忡忡，这些种种难道都不能使你惊惧，令你悬崖勒马吗？

你的阴谋不久即将水落石出。你或许现在嘴硬，可是你的想法不久就要昭示天下。昨晚你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共犯是谁？召集了什么人？决定了什么事？这些事实已经不再是你的秘密了。

啊！辉煌的过去呀！光辉的传统呀！以前的元老院、执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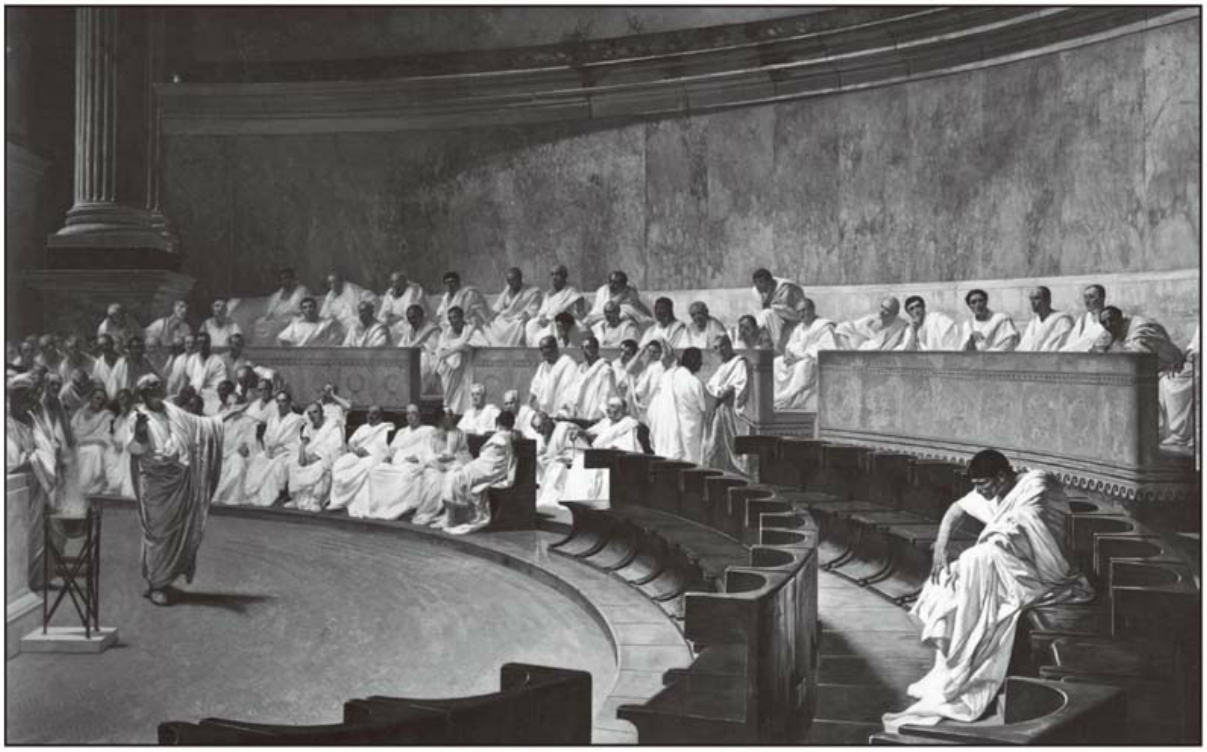
未曾对恢复过往的秩序倦怠过，然而破坏者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正出席元老院，用他杀人犯的眼睛，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心想着要他生或死。而拥有无比权力的我们，为祖国不惜牺牲生命的元老院议员，却要以身试法，接受此人好恶的判决，这又天理何在？

喀提林，早在很久以前，你就应该被执政官逐出国门，而其实在更久以前，你就已经臭名昭彰了。

大祭司那西卡曾经在没有元老院或执政官的命令下，也杀死了只是稍稍动摇了共和政权的克拉苏。然而今天，执政官对一心想用杀人放火的手段使罗马陷于混乱的喀提林，却要坐视不管吗？……我们拥有对付你这种不肖之徒的严峻法律——“元老院最终劝告”，罗马共和国赋予元老院适当的权限行使权力。我说得明白些，如果没有行使这项权力，连我在内的两位执政官，也没有资格和能力位居其职。

我此刻与其是表达对喀提林的憎恨，不如说是站在对他不被接受的怜悯立场上说话。喀提林，你进入会场的时候，在这么多你的亲朋好友在内的元老院议员当中，有谁去向你打过招呼？这种失礼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你究竟在等什么呢？不会是责难吧！其实大家已经在用沉默抗议你了。当你一就座，你邻近的人就接二连三地起身换位，你四周空无一人，这样的耻辱，你如何能够忍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喀提林你想对付我吗？我之前曾提议要把你流放。如果是元老院的决议的话，你说你也除了顺从之外别无他法。不，其实我并没有提过什么特定的提案，为什么呢？因为那有违我的作风。我想说的是你实质上已经被流放了。



被西塞罗（左）弹劾的喀提林（右下）（19世纪想象图）

离开罗马吧，喀提林！让共和国从恐怖中解放吧！我只求你一件事，离开罗马！

你还在等些什么呢？没注意到议员们都沉默以待吗？他们是同意我的。你在等有人开口下达命令？难道你不明白他们的沉默，已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朱庇特神呀！如果依你的预言，是罗穆路斯建造这个城市的话，那我们要向你祈祷。我们求你让这名男子以及他的党羽离开罗马，离开罗马的每一户人家，离开首都四周的城池，离开美丽的葡萄田，离开每一份资产、每一位居民。他是诚实正直的人的公敌，意大利的毁灭者，心狠手辣，不知廉耻，恶党的首脑，人神共愤，带给我们人类无穷的苦恼，请你把他以及他的党羽逐出罗马吧！

喀提林当天夜里便离开了罗马。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罗在元老院议会席上，如同发布胜利的宣言一样，得意洋洋地宣布喀提林离开的消息。但是其“余党”仍残留在罗马境内，而执政官西塞罗并没有逮捕

他们的证据。

风平浪静地过了20天左右，离开罗马的喀提林，藏身在当时叫伊特鲁里亚现在叫托斯卡纳的地方。他到了同党集结的蒙利乌斯家中，但尚未有任何军事行动。罗马的元老院也一样，虽然命令北意驻军准备移动，可是军队对喀提林本人尚未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还没找到任何叛国的具体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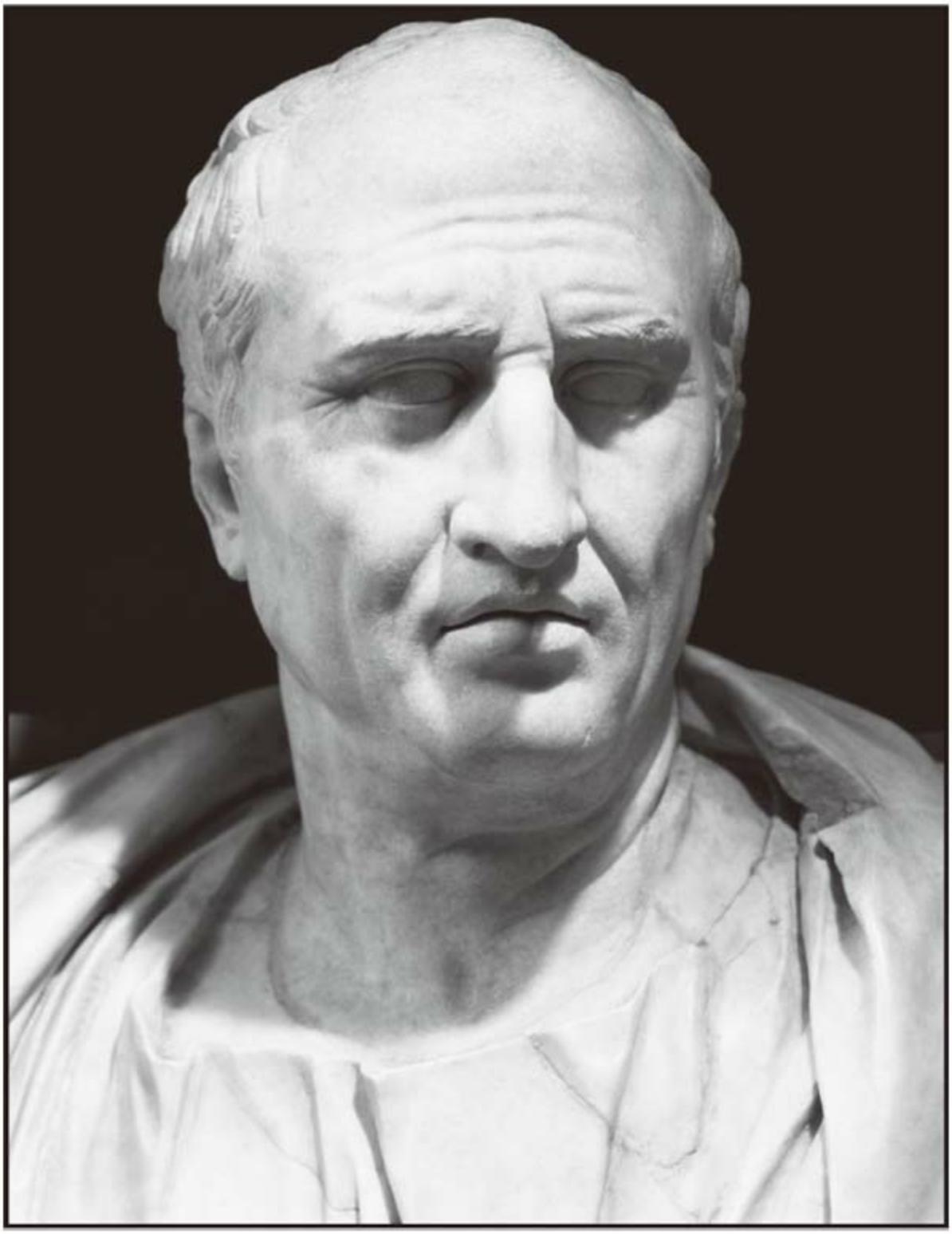
12月某夜，有一群明显不是罗马人装扮的人造访西塞罗府邸。他们是住在阿尔卑斯山对面、南法行省高卢一地某族的代表。他们来向西塞罗陈情，希望能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告诉西塞罗说，本来他们觉得希望渺茫，正要回乡的时候，突然雷托鲁斯和他们接触。雷托鲁斯约定说如果他们帮喀提林起义反抗，成功之后一定给他们罗马公民权，可是他们一想到要加入叛军阵容就毛骨悚然，于是选择了报告西塞罗这条路。

于是，西塞罗开始进行投放诱饵式的调查。他要高卢人回应说，虽然想参加抗战，但是不得不服从部落首领的决定，因此要雷托鲁斯以及其他起事者联合签署誓文。大约12月2日至3日的深夜，西塞罗才把这份具体书面证据弄到手。然后西塞罗立刻逮捕署名的雷托鲁斯、凯提古斯、伽比尼乌斯、斯塔提利乌斯及另外一名共5人。署名之一的卡西乌斯当晚正好离开罗马，逃过一劫。

12月3日，西塞罗召集元老院议员，并向他们揭示联合署名的誓文，并把抓到的5人带进来询问署名是否属实，5人都承认是自己的签名。

西塞罗此时正式公布这是一场阴谋叛乱。罗马城内到处有现职法官或元老院议员被捕，一片骚动不安。在雷托鲁斯家中，仆人们为了救回主人而集结起来准备行动，在赶到的亲戚劝说下才暂时解散。佛罗伦萨附近菲耶索莱一地的喀提林，当然不会见死不救，不知何时就会突击罗马，因此大家均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另外，那5人的罪刑也必须早日

有一个了断。



12月5日，元老院为决定此事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无论是会场上的议员还是聚集的公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处以罪犯死刑。

“元老院最终劝告”作为非常时期的宣言一经发布，它就赋予执政官神圣的使命，在维持国家秩序的前提下，即使是罗马公民不经审判就可以处刑。但西塞罗也是“法律人士”之一，在他心中，或许对“元老院最终劝告”这种不经裁判而且无视控诉权存在就可任意处刑的合法性感到不安。因此开会当天，他要求在场议员讨论，讨论后投票表决。换句话说，“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执行责任，不是执政官，而是交给了元老院。

首先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是担任来年执政官的希拉努斯。根据他的意思，赞成5人立即处死。另一位也是下任执政官的穆列纳也赞成立即处死。第三位发言的是当选来年（公元前62年）法务官的恺撒。这位37岁的下任法务官，推翻了前两位的发言，原文虽稍长，但我在这里全文翻译如下。在留给后世的恺撒言论中，这算是“处女作”。虽然常说处女作对一位作家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日后一切的萌芽，但其实这并不仅限于作家。恺撒从18岁那年毫不犹豫地拒绝当时拥有绝对权力的苏拉起，就是言行一致的男子。

元老院诸位议员：

其实不只是各位，对所有的人而言，在这决定可疑之事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大家都应先摒弃憎恨、友情、愤怒、慈悲等情绪。要认清事实并非易事，尤其对那种一时可以满足某些人，但对整体而言不知是否恰当的抉择就更是艰难。要重理性的话，就要善用你的大脑。然而人往往在感情的控制下，作决定流于感性，而失去了让理性进驻的空间。

我在这里请求各位回顾一下历史。许多君主与人民都因过于愤怒或慈悲而自取灭亡。与此相比，我怀着喜悦和骄傲回想起的是我

们祖先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祖先并未感情泛滥，凡事均以公正为前提。对马其顿战役中佩鲁修斯国王来说是如此，应对繁荣富庶的罗得岛的反抗时也是如此。我们的祖先在战后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自己本身，谁也不能受罚。即使发动过三次布匿战争，我们的祖先也不改其志。迦太基人屡次违反和平条约，但也都未被处以极刑。

各位议员，因此现在的我们也应采取无愧于先祖的决定。对雷托鲁斯及其一帮人鲁莽的行为如何处置，必须基于我们足以自豪的方式而不是憎恨。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适当处罚？就算是他们的罪孽深重超出了想象，我也希望能在既存的法律范围内寻求适当的途径。

在我之前各位先生的发言，除了慎选措辞外，也请说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危险，请描述那些战争残酷的场面、败者的下场、被玷污的处女和少年、父母怀中活生生被抢的婴儿，被盛气凌人的胜者欺凌的妇孺、被抢夺一空的神殿。简单地说，这些都是只有武器及血泪的战争惨况。

我们在此辩论的真正目的究竟何在？是叫人们厌恨阴谋，还是为了不存在的人物，用想象加诸他们的恐惧呢？

不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应自惭形秽才对。

然而，元老院议员诸君，你们没有为人类生而平等、言行自由而讴歌。如果是社会下层的人，你们会原谅他们因一时冲动而做的事情，但身为上流社会的人，却不许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由此可见，越是上流阶层，言行越受限制。换句话说，不能太亲切，也不能太可憎，任何事都不能看不顺眼，一般人的愤怒对有权位者而言，就是傲慢或残虐。

我是这样考量的，各位议员，所有的刑罚都不能比犯人所犯的罪重，不过很多情况是后来才察觉的。人们议论刑罚的同时，往往忘了犯罪事件的本质，而只着眼于判刑轻重与否。对于刚才众所熟知、德高望重的希拉努斯的发言，我相信他是基于爱国情操而生

发，不是被怨恨蒙蔽了眼睛，也相信他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我个人也肯定他大公无私的性格。然而我对他的高见，如果不说它残酷，那么对可怜的弱者而言怎样才称之为残酷呢？就算不说它残酷，也不得不怀疑是否违反了国家法律。

我想下任执政官希拉努斯是对造成国家动荡不安的大事当然有所顾忌，才会不惜要求处以极刑。但在这里，讨论会引起什么恐慌并无多大意义。万一真有什么武装暴动，有现任执政官果断明快的处理，相应的，对策也会很快完成。

我个人的考虑是，对于采用何种刑罚的问题，在泪水与不幸当中死去，是比任何刑罚都更佳的救赎。虽然人类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历过一切死刑犯所尝受的苦难，但是一旦死去，既无喜乐，自然苦痛也没有了。

希拉努斯，为何你不提议先处以鞭刑呢？难道《波路奇乌斯法》不适用于罗马公民吗？如果依其他法律，罗马公民必须将此人流放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可以判他死刑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觉得鞭刑比死刑重吗？

任何一种判刑对犯了重罪的人而言，是要更重、更残酷，还是更轻呢？希拉努斯，你对此的判断，参照罗马国家法律的话，你认为你理直气壮的理由在哪里呢？

希拉努斯，你曾经说过，这是个对叛国者的审判。但是一般的人经常被时代、被命运、被世局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的结局决定了他们生存的价值。可是各位议员，你们却不必这样。因此，你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今天开了先例，往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何恶劣的裁判最初的动机都有可能是基于善意。可是，一旦权力落入不成熟、不公正的人手中，再好的动机也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把罪证不充分的人定罪处刑，很可能会连累更多清白无辜者牺牲。

斯巴达人大胜雅典时，对30名曾压迫雅典的上层人士，强烈要求不经审判就处以这些反体制者死刑。雅典公民觉得他们罪极至此

也就欣然同意了。然而除了这30名压榨者之外，却也连累了其他无辜者，他们也受池鱼之殃被判了刑，于是城内一片风声鹤唳，公民们才惊觉自己的浅薄，以至于今天成为他人的奴隶。

我们生活于或许不至于如此无知的时代，可是当初开始铲除当权派苏拉一派时，不是也有很多罗马公民异口同声地谴责他罪该万死吗？这正是罗马人心开始荒芜的征兆。利欲熏心的一些人，不仅想把豪宅占为己有，连一丝一缕都不放过，于是便密告屋主，使苏拉的“死刑黑名单”更洋洋大观。原本以为事不关己的人，第二天赫然发现自己也在黑名单之列。这种情形是苏拉派的人沉溺于物质享受，以至于咎由自取。

如果这位执政官西塞罗是这无的放矢之人，那我大可放心。然而在大都市里，有许多性格相异的人共处，如果别的执政官在别的案例中，对矫饰的阴谋也信以为真而滥用职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开此先例，其他执政官会以有先例可循为由，动用“元老院最终劝告”这把尚方宝剑，那还有谁可以阻止悲剧发生呢？

各位元老院议员们，我们的祖先英勇善战，但从未失去分寸。他们对于善的事情，从不会因为傲慢而导致不去向他国学习。从萨莫奈人引入攻防武器，从伊特鲁里亚导入官职标章。换句话说，无论是盟友还是仇敌，只要是好的东西，都绝对赶紧地将它引进。与其排斥这些东西，不如采取仿效的措施。

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承袭希腊人的方式，多用鞭刑，死刑也大肆采用。然而随着国家日益富强，人民发言的机会增加，顾虑到这种方式有可能牵涉到无辜者，所以制定了《波路奇乌斯法》，即使是罪犯，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条流亡逃生之道。各位议员，基于这种考量，相对于采取紧急措施我希望提出反论。我们的祖先以智慧及德行把罗马从一个小邦建立成今日的泱泱大国，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手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因此在行使时更加慎重。

结论是，因为担心对后世影响而释放犯人吗？当然不是，如此一来恐怕更会助长喀提林一党的茁壮。因此以下是我的建议：没收那5人的财产，每人分别监禁在不同的地方，不准他们在元老院或公

民大会上发言，如果违背的话，则视为国家公敌，处以适当刑罚。

恺撒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动摇了原本坚持死刑的元老院的决定。下任执政官希拉努斯首先撤回前面的发言。赞成恺撒提议的议员当中，还包括西塞罗的弟弟。连向来以元老院派自居的保守派克拉提斯也建议不妨把判决日期延后。议长西塞罗的改口也似乎箭在弦上，尤其现在是武装政变尚未发生之时。但是此时小加图要求发言，这位咄咄逼人的32岁元老院派的辩士，开始陈述反对恺撒的理由：

元老院诸位议员：

我的想法与恺撒大相径庭。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非比寻常。这一点，可能恺撒与支持他的人还不是很明白。大家都忘了这5人所犯的罪是对国家、对父母、对神殿、对家园发动了战争。我们优先讨论的不应该是如何定罪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类似重罪再度发生。如果是其他的罪行，在犯案之初就应处罚，但本案不同。防止再犯应该为优先考虑，所以即使尚未酿成悲剧也应有所判决。我想提醒已在神前发誓的各位，坦白地说，在你们心中，比起国家利益，你们更重视的是你们的家园、别墅、雕刻和绘画吧！如果你们想要和平快乐地享受这些你们很珍爱的物品，多少也要为国家前途想一想。我不是在说财物或特别税金的事，我想唤起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正在一个天平上……

我认为意图犯罪本身就应受到处罚。……无论怎么说，各位，这里的问题所在，不在于我们的祖国多么伟大，我们的祖先多么英明，而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要继续留在我们自己手中，还是任它落入敌人之手。如果因为某人宽大慈悲的演说而有所动摇，那是我们暂且忘了语言的真义，把挥霍他人财产的行为谓之为自由，企图行恶的意念称之为勇气。如此下去的话，共和国必濒临生死存亡之时。如果把掠夺他人财产的行为赞为自由，把宽容对待横抢税金的人视为我们的传统也就罢了，可是关系到我们性命的事，我绝不姑

息。我不容许释放少数坏人，而牺牲了循规蹈矩的良民。

雄辩的恺撒刚才谈到生死的问题，就个人所知我想要说明的是：重视身后之事，但生前生活在暗无天日、孤独暴力的恐怖世界之中，好人与坏人的命运可谓天壤之别。他提议没收坏人财产、监禁坏人等做法，很明显，他也认为把那群坏人留在罗马，恐怕余党间藕断丝连，甚至会买通下层人士，无法彻底清除吧！恺撒似乎认为只有首都有叛徒，意大利其他地方没有，因为疏于防卫的地方，原本就不易产生叛徒吧。

但是恺撒的想法，从防卫的角度而言却值得商榷。各位，今天你们所审判的人不是雷托鲁斯几人而已，而是喀提林一行党羽。而且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坚持原则，对方便气势减弱；相反的，如果我们有所忌惮，对方反而会乘胜追击，日益强大。

……

我们的祖先蒙利乌斯曾大义灭亲而处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违抗总司令官父亲的命令，强行进攻。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却因自己的愚勇而牺牲生命。

而现在，你们却对比蒙利乌斯之子更低劣的人判刑一事感到踌躇。……在这期间，我们或许已遭受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不自知。喀提林一行人正计谋取我们的首级，其他人也在城内蠢蠢欲动，甚至公然行动。我们不得不早一步寻求对策。

因此我有个提案，叛徒造反使国家濒临危机，而且杀人放火计划、对国家与全体市民施暴，这已是证据确凿的事，谁都认为他们罪该万死。为了忠于祖先信念，我主张他们应被处以极刑！

小加图的慷慨陈词使得元老院议员心中又开始波涛汹涌。多数议员都赞赏小加图的正义凛然。投票表决之前的最终辩论是执政官西塞罗的任务，他的辩论当中明显可见他也有所动摇。针对恺撒搬出《森普罗尼乌斯法》，罗马公民不可在无裁决、无控诉权之下处死的说辞，他提出

连叛国贼都还要视为罗马公民一说有待商榷，可见法律专家西塞罗也改变了初衷。可是促使西塞罗改变的不是野心而是虚荣心。相对于西庇阿、马略、庞培全副武装地抵御外侮，身为上层人士一员的西塞罗，却身着托加虚荣地想要捍卫疆土。他的冗长的最终辩论，现只节译最后一部分：

> 我牺牲个人的一切，只因为一心想保卫疆土。就这样的行为，我对各位只有一个请求，也就是把今天的发言、我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都记在心里。如果你们能铭记在心，在这同时，我也就如同受到铜墙铁壁的保护一样。我想将我的儿子托付给各位，如果你们能记起这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曾置生死于度外救国救民，他本身的安全及前途都有了保障。
>
> 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初，各位都以认真无畏的态度陈述己见。不要忘了问题重心关乎全罗马市民及各位妻小的人身安全，城内、家乡、神殿，也就是所有罗马共和国的命运。你们并不犹豫将你们的决定付诸行动，我身为执政官，有生之日都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结果公元前63年12月5日的元老院会议，以压倒性的票数决定将5人处以死刑。执政官西塞罗也确认了“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实施权限。西塞罗与小加图如得胜归国的将军一般，在步出会场时受到人们的欢呼。但恺撒则不然，走出会场时，被久等的人们丢掷东西和臭骂。如果不是及时赶到的友人带他脱离险境，可能他早被围殴至死。13年后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时，元老院悔恨不已，当初如果置他于死地，就无现在的祸害。

西塞罗当天晚上站在牢内5名罪犯面前，将喀提林同党雷托鲁斯一行人，在没有审判，也没有控诉权之下处死。

西塞罗在执政官任上的最后几天，也就是12月底，被授予“国父”的荣誉。另一方面，恺撒为了避免再被人群掷东西，一直躲在官邸足不出户。

喀提林获知同党被处死却未有进一步行动，西塞罗于是动用了“元老院最终劝告”，将他定为叛国暴徒，由西塞罗的同僚安东尼率领2个军团自南北上，北边由梅特鲁斯率领3个军团南下，合计3万人马镇压。而喀提林仅有1.2万名残兵对抗，并且大多是奴隶、贫民，没有武器。喀提林让他们回乡，最后与喀提林共生死的人不过3000名而已。

没有人知道喀提林率领这3000名部下有何打算，将往何处，因为最后他们都同归于尽，无人可证实。可能是从佛罗伦萨附近沿着亚诺河到皮斯托亚，想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高卢。不管怎样，在前往皮斯托亚的时候，被罗马正规军团团围住。

两军交锋并展开一场激战，但就时间而言，很快就结束了。喀提林在敌阵中壮烈牺牲，其他3000名士兵也全军覆没，无一人被生擒，也没有人背部中刀，全部都是胸部、头部被刺身亡。这是公元前62年1月底的事情，也是“喀提林阴谋”落幕之时。

西塞罗四次弹劾喀提林的言论，由亲友阿提库斯所开的出版社出版刊行。对他而言，也许是当做文官胜武官的一个纪念品，可是西塞罗深知把言论留下来当做记录的必要性，当初熟谙此道的人不多，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位。

“伟大的庞培”

公元前62年，对罗马人而言，应该是苦难结束后和平快乐的一年。事实上，首都罗马和意大利全境的人在表面上也都一如往昔地安居乐业着，可实际上平静的表面下却波涛汹涌。元老院派防患于未然瓦解了“喀提林阴谋”而正沉浸在胜利的欢歌中，现在担心的是已平定东方而即将归国的庞培的动向。此外，当初对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院派强行镇压政策拍手叫好的公民，在看到5人被处死、3000名士兵也无一幸存的

惨剧后，也开始后悔是否真有必要置人于死地。这时年仅24岁的塞勒斯特在两年后所著的历史杰作《喀提林阴谋》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反省。时年38岁就任法务官的恺撒，就充分利用了人心的动向。

从“苏拉改革”事件后法务官增加为8名定员。恺撒身为8人之中的1人，当然知道如何善用人心。不仅如此，连沉醉在胜利当中的西塞罗和元老院派也被操纵在他的股掌之间。

法务官恺撒在公民大会上抨击身为元老院派的长老、久占元老院“第一位”的卡图鲁斯，恺撒认为他位高权重却经常缺席，因此提案以怠慢职务为由建议更换，由庞培取而代之。元老院派对这一提案的态度很强硬。与其说元老院介意换掉卡图鲁斯，不如说是元老院无视庞培所统率的意气风发的军队和市民对他的拍手叫好而拒绝将第一宝座让给他，是件极度危险的事。

虽是这么说，却也不能引起市民运动这种笨拙的做法来达到目的。所以坚持元老院集团指导体制的元老院派，不得不一改以往的作风，以争取民意为政策来制定新法。小加图在公民大会上建言废止《小麦法》。《小麦法》原是把低于市价许多的小麦分配给少数特权分子，现在小加图建议取消人数的限制，如此一来，定能使下层市民雀跃不已。不过一旦此法推行，原本特权分子有3万人左右，一下子跃增为10倍，约30万人，所需费用一年约750万塞斯特斯，势必造成财政赤字。元老院派向来把健康的财政奉为金科玉律，这么一来，可谓腹背受敌，因为与此同时，庞培已平定东方，把地中海沿岸收入罗马版图，俨然如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一般英姿焕发地率领大军得胜归国。

在公元前67年全力扫荡海盗后，庞培以小亚细亚西岸都市以弗所为起点，向东继续征战。为了奖励忠心善战的部下5年来的劳苦，除了薪水外还发给如下的奖金：

士兵一律为6000塞斯特斯，百人队队长为12万塞斯特斯，大队长为

100万塞斯特斯，财务检察官为500万塞斯特斯，军团长为1800万塞斯特斯。

在罗马历史上如此的大手笔可说前所未闻，由此可证明，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东方要比西方富裕许多。罗马的税收也得益于庞培东征，为过去的两倍之多。在一般市民眼中，43岁的庞培当然令人崇拜不已。另外庞培途经莱斯博斯岛时，也列席了诗人座谈会；在罗得岛，他被哲学家们团团围住；在雅典，则慷慨捐助修复露天剧场等，所以他的凯旋可说集各种荣誉于一身。

庞培取得的成就，对罗马而言，当然可喜可贺，可是对元老院派的人来说则是一大隐忧。早熟的天才庞培年仅43岁，已经历过凯旋仪式和执政官，5年来长期握有总司令官大权，东征西讨，击败海盗。这样一位四十几岁的少壮派代表，下一步要追求的是什么呢？这令元老院派忐忑不安。

那么在意大利半岛南端布林迪西登陆后，庞培会忠于“苏拉改革”中所决定的事项解散率领的军队，还是破例被允许违反“苏拉改革”，从此飞黄腾达？是否这次会无视苏拉的法令，如同20年前苏拉排除万难一样，率军进军罗马，建立独裁政权呢？万一庞培心有此意的话，那他一定会在公元前63年进行非法武装政变，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不许一人专政、坚持集团指导制度的元老院派深知此点，所以对庞培的凯旋，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忧心忡忡。

但就在庞培回国之前，一件事情吸引了元老院议员以及全罗马市民的眼光。

丑闻

克劳狄乌斯一族公元前312年出钱出力建设罗马，铺设了阿皮亚大

道，使克劳狄乌斯家族在罗马的名流贵族中地位更为尊贵。如果只限定一个时代，那么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一门或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一门，以及共和时期的瓦莱里乌斯一族、埃米利乌斯一族都名噪一时，然而克劳狄乌斯家族一直都活跃于罗马的历史舞台上。几乎各时代都有家庭成员跻身于罗马政治高层，克劳狄乌斯家族为世人公认的贵族名门，隶属于这一名门的普尔克尔家的家长为33岁的男子普布利乌斯·普尔克尔，他与恺撒在秦纳的女儿科尔涅利娅死后再娶的妻子庞培娅的婚外情引起了轩然大波。

执政官或是法务官等担任国家要职者家中，每年接近12月时，都由家族中的女性开始准备祭祀波娜女神的庆祝活动。12月1日夜里举行的祭典，是膜拜专司生产的女神，只有女性才能参加，即使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也严禁参加。所以举行祭典的家庭，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男子当晚都必须到别的地方做客。

在已经就任法务官的恺撒家中，一切祭祀波娜女神的事都在他母亲奥雷利娅的指导下。他的妻子庞培娅开始召集罗马上流社会诸位贵妇人。当天，克劳狄乌斯乔装成女人混入其中。

在祭典进行时屋内一片昏暗，迷失方向的克劳狄乌斯被恺撒家中恰巧路过的女奴发现，而且她已看出在家中四处徘徊的是一名乔装女性的男子。

得知这个突发事件后奥雷利娅立刻停止祭典，命令女奴将这名可疑分子赶走。奥雷利娅一眼便看穿了他的身份，因此她并未将克劳狄乌斯送交守夜的警卫而将他赶走。奥雷利娅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参加祭典的其他女性都在混乱中从女奴口中得知不速之客的名字，于是便在回家后告诉她们的丈夫。

这件事于是演变成为了丑闻。首先，有男人擅闯严禁男人参与的举行祭典的场所，此举已构成对女神的亵渎。其次，闯入的地点还是高官

的住所。当年恺撒已任职法务官，而且一年前荣获大祭司的职位，这种亵渎女神的行为竟发生在罗马宗教界领袖的官邸当中。反恺撒派人士夸大地指称此事已不只是丑闻，也是大祭司怠忽职守所致。这事件爆发后，等着看好戏的除了身为恺撒同僚的元老院议员外，还包括一般市井小民。因为在此之前一直私通他人之妻的恺撒，首次尝到妻子与他人私通的滋味，所有人都兴致高昂地期待好戏上场。而恺撒则决定与妻子离婚。

由于反恺撒派人士对这事不肯妥协，因此乔装女性的这个名门望族之后被送上法庭。但出庭作证的奥雷利娅却回答当时太暗无法看清闯入者为何人，恺撒家的女奴的证词也和她一模一样。

而轮到恺撒时，他作证答称自己当晚并不在场，所以无法提供任何证词。检察官便追问他为何与妻子庞培娅离婚，恺撒答道：

“恺撒的妻子绝不容许怀疑！”

在场的众人因此哑口无言，之后便无人再请恺撒提供任何证词。

我如果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一边笑一边惊讶于恺撒竟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句话，甚至我可能会对他说：“分明是你自己任性妄为嘛！”但元老院的长老们之所以哑口无言其实也不难理解。在罗马，愈是上流社会的女子愈能拥有财产权等，因此政治婚姻的比例相当高，堪称世界霸主的罗马领导阶层中有许多人为惧内者，汉尼拔时代的大加图在元老院议员前演说时，曾开玩笑道：“堪称世界霸主的诸君之上，还有另一位名为妻子的霸主。”实际上，他们曾经想对妻子说的话却被恺撒抢先说出。无论如何，恺撒似乎因为上述话语而化解了原本可能被免除大祭司一职的危机。看起来，克劳狄乌斯也将因证据不足而获判无罪，但西塞罗一出马情势就再起变化。

被告方的律师以克劳狄乌斯家奴隶的证词为依据辩护，指称当晚被

告身在距罗马100公里外的别墅。但西塞罗指出，当天早上，克劳狄乌斯曾到西塞罗家拜访，在半天之内根本无法来回百里，陪审团必须在奴隶及前执政官的证词中选择一方，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似乎已经开始动摇。此时克拉苏开始行动，经济实力堪称罗马第一的克拉苏暗示将给予陪审员经济利益以收买人心。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项举动是为了解救克劳狄乌斯，但正如其后陈述的理由，我认为其实这次获救的是恺撒。无论如何，判决的结果以有罪的25票对证据不足而无罪的31票，出身名门望族的年轻的克劳狄乌斯被释放。此后，克劳狄乌斯发誓一定要报复西塞罗。

恺撒从丑闻中得以脱身，以前法务官的身份等候统治行省的职务。公元前61年恺撒被任命担任西班牙南部的行省总督一年。当恺撒在财务检察官任期内便曾任职于被称做“远西班牙”的西班牙南部，但这次在他上任时拥有指挥两个以上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他并非庞培那种少年便得志的人物，但已经39岁的尤里乌斯·恺撒，总算也在罗马政坛迈出成功的第一步。有了统治行省的经历，那么举行凯旋仪式或担任执政官都已唾手可得。

本应该尽快前往西班牙的恺撒却无法跨出家门，债权人蜂拥而至，声言除非恺撒还钱否则他们绝不离开。这些债权人的心情不难理解，因为恺撒所积欠的金额已成为天文数字。如果换了是生性认真且苦于借贷的喀提林，恐怕非得发动百回政变吧。好在恺撒还有克拉苏的帮忙。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克拉苏是他最主要的债权人，克拉苏不但将偿还的期限延长，同时还担任其他债务的偿还保证人。有了身为罗马首富克拉苏的保证，债权人终于答应离开。贵为行省总督的恺撒总算能出发前往任职地。

上流妇人的服装

大约从当时起直到今天的2000多年来，历史学家及研究者们拼命探究却无法解开的两个谜团，就是恺撒同金钱及恺撒同女人之间的关系。试着找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件颇有乐趣的事吧。一个人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应该也是衡量他胸襟的办法，而丑闻的产生也经常与金钱及女人有关。

恺撒与女人

如果你去阅读古今史学家及研究者的著作，他们如出一辙地表现出对恺撒的着迷，令人会心一笑。信奉基督教史观的人无法批判恺撒，因为他们是在基督之后才出现的人物；而奉行马克思史观的人面对他不容忽视的生存价值，也无法再说社会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笔下所描绘的恺撒十分生动，我想，如果以那样的笔法描写恺撒的一生，大概根本无法打草稿吧。但是恺撒使他们着迷的理由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因为如果想全盘了解恺撒这个人，须从他的言行仔细地推敲。总之，他不是个容易了解的男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今史学家、研究者、作家绝非对他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信息：恺撒似乎深得女性青睐，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对他心怀怨恨。

在古罗马评判美男子的标准，正如年轻时堪称“秀色可餐”的庞培、众人公认世所罕见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皇帝的娈童安提诺乌斯般，须具备如女子般匀称的五官，这一点恐怕是受到希腊雕刻的影响吧。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恺撒绝对不能算是个美男子，年轻时两颊便有明显的皱纹，45岁以后发际向后移，必须将中间的头发向前覆盖来掩饰他的秃头。另一方面，在40岁掌控罗马之前，他并不富裕而且经常借贷，也尚未拥有足以满足女人虚荣心的权力，但即使如此，纵然是女人中的女人也依然被他所吸引。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笔下的描述，恺撒的身材瘦削高挑、举止优雅，是一位风度型的美男子。但当时罗马有一名美男子古曼，不仅是风度连容貌都很出色。从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学识、讽刺与幽默完美的结合，不难想见他是位言之有物而且风趣的人。但可惜如果能忍受他自吹自擂的癖好，那么即使是西塞罗都称得上是言谈风趣的人。

如果借用某位作家的话，只有恺撒拥有让所有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自愿列队等候他青睐的魅力。如恺撒的第一债权人克拉苏的妻子提多利娅，因为丈夫庞培赴东方指挥作战而独守空闺的慕琪娅，以及身为庞培副将必须同往东方的盖比尼乌斯的妻子罗利娅。光是留下记录及姓名者就已如此可观。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据史学家指出，元老院三分之一的议员之妻皆曾与恺撒私通。他的情人当中除了克娄巴特拉之外，最有名的当属塞维利娅。塞维利娅是后来暗杀恺撒的主谋者布鲁图的母亲，在她改嫁之前一直都是恺撒的情人。

恺撒的情人们都出身于罗马上流社会，换句话说，她们经常会在美容沙龙或高级服饰店相遇，但她们之间并无任何嫉妒或争执，宛如依次排队般柔顺地等待，心甘情愿地做他的情人，如果有什么消息也会即刻互相通知。

但并不是所有女子都能成为恺撒的情人，因为他与当时罗马社交圈中最负盛名的克劳狄娅便无任何瓜葛。

克劳狄娅出身于罗马极负盛名的贵族世家，她也就是举行波娜女神的祭典当晚乔装女性闯入恺撒官邸的克劳狄乌斯的妹妹。身材窈窕又颇富教养的她与卢库鲁斯离婚后，加上诗人卡图鲁斯诗中的女主角及女同性恋者皆以她为创作灵感，使得克劳狄娅备受瞩目。不同于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女性，罗马女性可出席宴会，在宴会中有专职的舞娘表演舞蹈，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通常不在宴会中跳舞。克劳狄娅毫不在乎这项传统而在宴会中翩翩起舞，此举顿时成为罗马社交圈议论的焦点。有一位研究者专门评论公元前1世纪罗马名人，他指出，克劳狄娅特别喜欢有

名的男人，在“喀提林阴谋”事件中声名大噪而奠定地位的西塞罗也是她眉目传情的对象，而西塞罗也欣然接受美人的青睐。她对恺撒这位罗马的“花花公子”并非毫无兴趣，但恺撒只把她当做普通朋友而非情人，也许是因他不喜欢她那种惊世骇俗的生活态度吧。事实上，10年后，克劳狄娅因不满年轻的情人克里乌斯离她而去，控告对方侵占财物及毒杀，在这桩诉讼中担任辩护律师，并在尽情嘲笑她的言行中获得胜诉的就是西塞罗。由此事得知，纵横情场的恺撒对女人并非来者不拒。同时，他之所以能俘获众女子的芳心，主要也是因为他锲而不舍地追求。只要是女人，绝对无法抗拒穷追不舍的男人。而且恺撒面对女人也十分油滑，他对其他女人要求他和妻子离婚然后再结婚深感恐惧，于是他和未婚女子从来没有任何沾染。他所交往的女子，都是有结婚经历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恺撒的确轻易赢得不少女人的芳心，史学家及研究者羡慕他的并不只是因为他深受女人的青睐，如果只是具有女人缘的话，那么角斗士或演员也能办到。他让许多杰出男人羡慕的地方在于他的情人当中没有一个怨恨他。具有女人缘固然是男人的梦想，但男人心底真正的愿望是如何避免喜欢自己的女人怨恨。

这是因为丑闻往往产生于女人愤怒时，而一个成熟的男子并不希望引发丑闻。女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受到伤害，那么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女人会受到伤害呢？

在之前叙述的以克劳狄娅为原告、西塞罗为辩护律师的“克里乌斯官司”中，从西塞罗的辩护词中可以知道，女人之所以会愤怒地不惜引发丑闻，是因为她供养的男人无情地拂袖而去并与她断绝关系。但恺撒与不解女人心态的克里乌斯完全不同。

首先，恺撒常常以赠送昂贵的礼物对他心爱的女人展开追求攻势，这也就是他累积下巨额债务的原因之一。只有身为人妻者会认为，如果赠礼将增加借贷金额的话倒不如不送礼。除此之外，所有的女人都喜欢男人的赠礼，并对此而感到自豪。恺撒曾送给塞维利娅价值600万塞斯

特斯的黑珍珠，一时成为罗马女人谈论的焦点，如果此事属实，这笔钱已足以在帕拉蒂尼山购买两栋豪宅。

其次，恺撒从来就没有对外隐瞒情人存在的事实，他有情人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正因为连她们的丈夫都知情，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秘密。连在东方作战的庞培及盖比尼乌斯都知道妻子有外遇的事实，因此并未酿成丑闻。正因为一切公开，即使成为恺撒的情妇，她们也毫无怨言。

再次，如果单单就史实的记载而言，忠实的恺撒与相继成为他情妇的女人之间从未真正断绝关系。换句话说，他始终没有和她们划清界限。

后来即使恺撒与20年间身为他公开情人的塞维利娅不再是恋人，他依旧尽量满足她的需求。在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投靠庞培与恺撒军对阵之际，恺撒仍在战斗结束后担心布鲁图的安危，在得知他生还后立即通知塞维利娅。另外，在克娄巴特拉正式成为他的情人后，恺撒依然照顾塞维利娅的生活，甚至将国有土地以低价让售给她，这是身为公职人员不该有的行为。至于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对这一切究竟作何感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恺撒也没有真正断绝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例如，因为他与情人们隶属同一阶级，因而照面的机会自然不少。当他与妻子共同出席宴会或其他场合时遇见旧情人，如果是一般男人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为避免尴尬便装做不认识地走过对方身边，但恺撒并非如此。他请妻子稍等，竟然就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方地走向旧情人，温柔地牵起她的手问道："近来可好？"也许因为他明白，对女人而言最大的伤害莫过于被忽略吧。

这种情况如果是情人的话倒还可以忍受，而身为人妻者又作何感想呢？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妻子与情人之间并非光以赠礼与否来区分，一旦成为正室，地位就受到众人的肯定。而且回家之后，恺撒便

告诉妻子，今天在元老院会议中西塞罗夸张的演说有多么滑稽，妻子根本无从发火。虽然这是旧话重提，但对女人来说，最大的伤害莫过于被男人忽略。

就如同意大利某位作家所说的，恺撒“不只是受到众女子青睐，而且具有让这些女人无法怨恨他的罕见本领”。前述论点也是我根据史实推敲而来，女人与大众就这一点而言可说完全相同，因为有时候人类的心态与性别毫无关系。

恺撒与金钱

还有另一个对古今的史学家及研究者来说至今未解之谜。令人不解的与其说是恺撒“为何”欠下巨额的债务，倒不如说是他“如何能够”借到如此巨额的款项。

在进入这个话题的探讨之前必须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不管从任何记录或史书来看，恺撒的借贷金额都像天文数字般庞大，但作为抵押的位于“苏布拉”地区的私人住宅及拉比寇的别墅始终未被债主接收。根据当时罗马上流社会的经济状况看来，即使接收上述不动产依然不足以清偿他的债务，但也只有先把它们当做抵押品收回。也许是受到堪称家庭主妇楷模的母亲奥雷利娅的影响，恺撒在家中过着朴实的生活，同时他坚守着不让债务影响到家庭的原则。但即使在古代，如果想在毫无抵押品的情况下借钱，只有依靠高利贷或特殊的途径。对恺撒而言，有一条“特殊的途径”那就是克拉苏。

为什么恺撒不但深具女人缘，而且她们对他毫无怨言呢？探究这一点的史学家及研究者几乎清一色皆为男性，但除非站在女人的立场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他们终究无法解开这个谜。恺撒在尚未掌权前如何能够借贷巨额款项，关于这一点的探究与前述的问题类似，除非如地方上富

有的知识分子普鲁塔克，或由大学负担研究经费供现代研究者全心地考察，否则根本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总之，有必要先探究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心态。

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是恺撒最主要的债权人，他除了借钱给恺撒外，还向其他债权人担保恺撒必定会清偿债务，甚至可说是恺撒唯一的债权人。比恺撒年长14岁的克拉苏在父亲那一代就已是罗马首富，到他这一代时，财富之多已高达国家预算的一半。至于克拉苏如何累积到如此惊人的财富，正如《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所描述的，他在拍卖没收到如此死刑犯的资产时，将价格压低后竟买入手，或在发生火灾的房屋即将倒塌前以极低价买入。金钱对不择手段增加财富的克拉苏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恺撒似乎能够洞悉克拉苏的心态。借款额不多时债权人就居于强势而债务人居于弱势，但借贷金额十分庞大时则情势完全逆转，恺撒深谙上述微妙的变化。

当借贷金额不多时，一切只是单纯的借贷行为，这对债务人来说没有任何保证；但如果借贷金额增多则情况会变得不同，一旦背负巨额借款便如同获得了“保证”。与其说巨额的借款是债务人烦恼的根源，倒不如说已成为债权人巨大的困扰。一个人之所以能忘却债权人的嘴脸，往往是他的债权人过多的缘故，因而此时要尽全力自保的不是债务人而是债权人。在恺撒即将前往西班牙就任行省总督时，却因债权人欲讨回借款而无法动身，此时出面向其他债权人担保者正是克拉苏。此后，即使原来并非出于本意，但帮助恺撒立足政坛者也是克拉苏。对克拉苏这类债权人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在古罗马时代，如恺撒这种债务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皆如喀提林般生性正直，深信过多的债务将导致自身的毁灭。

有一个观点我敢十分肯定事实并非如此，那就是许多现代的研究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恺撒因为积欠的庞大债务而受制于克拉苏。其实有证据显示恺撒比克拉苏更具有行动的自由。在恺撒所著的《内战记》中载

有如下的一段内容，现在将它直接翻译如下：

> 身处逆境的恺撒向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等将领借钱，用来给全体士兵们发奖金。此计有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可以促使指挥官们两袖清风无法还乡，促使他们努力作战。另一方面，对总司令的善心满怀感激的士兵们也会全情投入，奋勇杀敌。

或许在银行界恺撒是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物，但由前述的内容可知，他将筹借而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众女子的礼物所费不多，他的钱主要还是用在修复街道、举办斗剑比赛以及选举造势活动等，他大费周折借得的钱并非用来累积本身的财富。他不像西塞罗不惜借贷也要在帕拉蒂尼山上购买豪宅，并在意大利各地购置8栋别墅。他对不动产的关注，仅限于以扩大罗马的心脏地带罗马广场为开端的公共事业。即使是建于台伯河西岸的私人庭园，他也在遗言中声明要捐给罗马公民，他甚至毫不在意自己的墓地所在。事实上，他并没有自己的墓地。

反恺撒派人士无法将金钱引发的丑闻和恺撒拉扯上任何关系，因为他并未将钱私吞，因此他的金钱来源也不容旁人有所指责。另一方面，他虽身为借贷者却是“强势的债务人”，能让克拉苏一直以金钱援助的人唯有恺撒。后世的某位研究者指出，尤里乌斯·恺撒是以他人的金钱成功地进行他自己的事业。

于是在并非受制于债权人的情况下，恺撒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标而迅速掌握了大权。

第五章

壮年前期 Virilitas

（前60—前49年1月，恺撒40—50岁）

40岁立足政坛

克劳狄乌斯在波娜女神的祭典当晚轻率地闯入了恺撒家，因等待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又被人催讨债款困在家中，于是恺撒向行省出发的时间大幅地延迟了。这时恺撒即将39岁，而恺撒的南西班牙行省的统治时间，从公元前61年的春天到公元前60年初，只剩不到一年。之所以不到一年就回罗马的原因，是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行省总督要做什么，也很清楚有了这个经历之后，自己要再做些什么。

恺撒就任总督的地点位于当时的“远西班牙”(南西班牙)。恺撒因为当地基本没有居民造反，所以那里大致没有问题。在安定时期统治行省，只需明示政策并加以组织，还有确定执行政策的顾问机关即可。因此即使总督本人不在，也能毫不费力地统治。

恺撒作为行省总督宣告了一种税制改革措施。此改革并非彻底改革税制，而是对依据行省法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人和享有罗马公民待遇、不缴税的殖民城市的人民这两者作个明确的区分。以前的行省总督无视这两者的区别，总以为增税才是有利国库的方法。但如果没有一套公开的税制，就容易产生征税官为所欲为的后果。罗马所课的行省税不是重税，为收入的十分之一，然而让众多行省人民感到税重的原因，是因为不得不依照征税官所要求的付税。再者，行省总督在投票制度中有选举征税官的权力，他们会认为收多少赋税是自己的权力。此行为甚至已经成了历代总督的习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当上行省总督就能累积一笔财富。因此，大家都想去富硕的东方行省，而被分派到西方行省的，则被认为是抽中了“贫穷签”。

而恺撒正是中了“贫穷签”，他虽债台高筑，但并未增收南西班牙行省的税，而是采取减少征税官搜括空间的政策。结果，增收反倒变成了

减收。但政治斗争似乎成了法律论争，对以法立国的罗马人来说，既然开了先例，今后就照办了。得益于公开减税之赐，不再缴纳行省税的居民，在欣喜和感恩之余，纷纷给总督送上礼金。虽然并不清楚礼金究竟有多少，不过倒是对恺撒借款的减少有些帮助。

另外，恺撒为了组建实行这项政策的智囊团，积极录用当地人才。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即是其一。他生活在汉尼拔家族的统治下所开创的繁荣时代，住在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加的斯，并拥有罗马公民权。他们究竟是移民西班牙的罗马人的子孙，还是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迦太基人子孙，研究者们对此的看法不一。但两者都与罗马上流社会无关。不过，并非与文明开化无关。巴尔布斯不仅具备实务能力，也具备甚至能与西塞罗一起谈天说地的教养。恺撒回罗马赴任时也带巴尔布斯同行，之后在他身边如影随形的就是这位西班牙人。服侍在恺撒身旁而成为恺撒好友的巴尔布斯，一直扮演着对外交涉的微妙角色。恺撒遇刺四年之后，他甚至还担任了执政官。

除了积极任用本地人才，率领着军团的恺撒还致力于建立对现在位于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半岛大西洋岸的统治。那一带的居民没有反对罗马的举动，甚至还打算为罗马称霸其他地区时举行凯旋仪式。

通过展示马略派实力和大事主办斗剑比赛，恺撒了解到自己在罗马市民间颇有人缘。但他也知道这样的人缘与支持并不一样。凯旋仪式是用来表扬成功击退罗马敌人或扩张罗马势力所举行的荣誉仪式。对回到任地想参选执政官的恺撒而言，如何将人缘转变为支持就成了不可小觑的问题。因此，他并未彻底实行称霸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一带的计划。因为只要能获得凯旋仪式的举行资格就足够了。同时在这个时期，恺撒也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大西洋。

恺撒在这种情形下预想到了自己应做之事而回国赴任，但罗马迎接他的气氛，与他在西班牙时所预想的大不相同。元老院派对恺撒的希望不屑一顾，而追溯元老院派如此傲慢的原因，始于一年前庞培自意大利

回国。

在平民的喝彩声中，同时也在元老院的忐忑不安下，大约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统率10个军团6万名士兵在布林迪西登陆。自“苏拉改革”之后，便有法令规定从北边回国的罗马军团总司令官，必须在卢比孔河解散军团；而从南边回来就任时，则必须在抵达布林迪西时解散军团。总司令官和士兵们约定在首都罗马的凯旋仪式中再会后，士兵们将暂且先回故乡，而总司令官则只率少数随从向罗马进发。直到凯旋仪式举行为止，总司令官才能进入首都城墙内。元老院派的不安在于，40多岁的庞培在歼灭海盗，甚至完成了称霸东方诸国的伟绩之后，是否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出10个军团呢？20年前，苏拉在布林迪西登陆后，不解散军团而一路攻至首都，歼灭“马略派”后施行独裁政治。有关于苏拉的记忆，至今仍清楚地在多数元老院议员的脑海里存在着。

不过，当初苏拉的政治目标是由元老院主导建立寡头政权。庞培虽然被看做是苏拉门下的得力干将，但他是个军事人才而不是政治人才。现代某位英国研究者甚至这样形容他：“他其实是个虚荣家而不是野心家。”因为野心是想做成某件事的意志，而虚荣则是想博取众人称赞的愿望。

作为年少便成名的军事人才，庞培二十几岁起就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喝彩与赞赏，很自然地也习惯了虚荣。登陆后不久就解散军团的庞培，只带着军团长、大队长等不到50人的随从从布林迪西出发，沿着阿皮亚大道向罗马前进。沿途聚集着前来一睹这位名将风采的人。直到罗马的大街，慕名前来的人随处可见。在接近首都时，庞培身后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随行的人。西塞罗目睹这个景象时曾经说过，就算没有军团的助阵，只要庞培愿意，他也能发动政变。公元前61年1月底，庞培抵达了罗马城外。

不过，元老院派的这步棋走错了。他们因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而消除了自己对庞培的不信任。虽然按照规定滞留在罗马城外，久违罗马

五年的庞培却向元老院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允许举行凯旋仪式。

二、认可庞培为公元前60年执政官的候选人。

三、允许配给属下官兵耕地作为他们的“退休金”。

四、承认庞培称霸后再组织的东方各行省同盟国的编组案。

元老院毫无疑问地同意了第一点。元老院答应庞培需要足够时间准备盛大豪华的凯旋仪式的要求，决定在那年的9月举行凯旋仪式。

但是，元老院对有关第二点的要求感到很为难。公元前60年的执政官，将在公元前61年夏季所召开的公民大会中选出。执政官候选人的登记按规定必须由本人出面才行。候选人登记书要放置于卡匹托尔山，而且只能由国家公文馆收受办理。因此，对必须等到凯旋仪式才可以进入城内的庞培而言，除非牺牲光荣的凯旋仪式，否则事实上他根本无法递出候选人登记书。

元老院派对第三点配给耕地的要求，采取了态度暧昧的战略，这使得总司令官庞培在属下面前颜面扫地。不过由于元老院方面也没有明确理由可以拒绝这个要求，所以庞培和士兵们都还继续抱持着希望。

在第四点的要求中，同样显示元老院派的决定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总司令官虽然有称霸地的编组权，但是须经由元老院承认才可以实行；如果得不到这项承认，对庞培而言，是使自己在所征服地颜面尽失的事情。而元老院派之所以会摆出强势姿态，是因为兵权离手的庞培绝非可怕的人物。

其实元老院派的组成也是大有来头的。罗马的政体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公元前59年转为共和政治。这个由30岁以上才能出众和经验丰富

的数百人组成的元老院，是不经过选举而组成的机构，担任着实际上的统治，属于少数领导制。在这种寡头政治中，必须尽可能公平地给这群少数领导者均衡的领导机会。如果有人独占这个机会，都将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发挥它的机能。而庞培简直是特例中的特例，在年龄还不符合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时，29岁的他就被赋予了“绝对指挥权”。在扫荡海盗时，元老院又破例一口气允诺他三年的任期。如果这项任务也成功了，给予他称霸东方的无限期用兵大权也是可能的。不过，想维持集体领导制的元老院派，觉得有必要稍微抑制这种做法。小加图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代表。

表面上所持的意见相同，但那些赞成小加图的元老院议员，实际上所抱持的看法各自不同。元老院派的有权势人士卢库鲁斯，基于《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所叙述的理由，对庞培憎恨不已。对他来说，只要是能损伤庞培面子的事他都举双手赞成。

在元老院派中其实还有另一位有权势的人士西塞罗，也在一直坚持元老院体制。西塞罗之所以赞成贬损庞培声威，其实出自他在“喀提林阴谋”时吹嘘的“以文官进行压制”的想法。属于知识分子的西塞罗是不统领军团的文官，而他也具有以非军事的言论力量防范未来政变的自负。就他的立场来说，能够挫伤军事领袖庞培的锐气，未尝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大快事。可以说三个人各有各的想法，但相同的是，这三位元老院的有权势议员，都不约而同地挡住了夸耀胜利的庞培的去路。

在罗马，远征归国的将军按照惯例必须在公民大会中发表有关远征的演说。但凯旋仪式还有9个月才举行，而直到凯旋仪式举行庞培才能入城。然而没有理由让这位闪耀着胜利光芒的胜将，在9个月的时间里完全没有与市民接触的机会。市民们也早就期待为带给自己胜利的人物献上掌声与欢呼。

在公元前61年2月，元老院给了庞培与市民们接触的机会。由于顾虑到庞培在参加公民大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凯旋仪式才能进入城内，所以

就将会见场所改在城外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对庞培来说，与市民见面，应是他抗议元老院恩将仇报的绝佳时机。但是，庞培原本就不太善于演说，再加上此时，他正对自己扫荡海盗、称霸东方，对国家有无人能及的贡献而感到万分自豪。过于自满和高傲使他缺少了与人沟通的意愿。根据在一旁聆听的西塞罗所描述的，那是一场无法给贫困者希望也无法让富裕者安心的演讲。平民派对庞培演说中无关痛痒的牢骚毫不欣赏，元老院派对他也采取不信赖的态度。于是，演说就在全体市民反应冷淡的情况下结束了。尽管庞培具有的胜利将军的魅力仍然深植于一般市民心中，但是这场演讲已成了元老院派轻视庞培的决定性因素。

这场演讲后不久恺撒便向任地西班牙出发。但即使恺撒一年后归国时，庞培的境遇也没有好转。元老院让罗马人连续两天沉浸在狂热和豪华的凯旋庆祝中，而对庞培所提的第三点与第四点要求依然束之高阁，这让他颜面尽失。

其实庞培并没有束手无策地度过这一年，他也尝试了几种对策：一是试着和作为元老院派言论先锋的小加图搞好关系。由于妻子慕琪娅与恺撒间出轨之事传到东方，庞培在归国途中就已经和妻子离婚。恢复单身的庞培表示想要娶小加图的妹妹为妻，但被小加图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在地中海一带声名无人可及的45岁凯旋将军，却遭受34岁的元老院议员如此冷淡的对待，此事成为市民们的笑柄。情绪欠佳的庞培索性避居阿尔巴的别墅而在首都失踪了。

公元前60年，恺撒早就回国赴任，内心所决定的事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当选次年的执政官。但是，选举在那年的夏天举行，在选举前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并且完成候选人的登记。由于法律规定候选人登记要由本人申请，所以他必须在这之前举行凯旋仪式以取得入城许可。因此恺撒在回国之后，立刻依据规定自己留在城外，派遣一位代理人进入城内向元老院请求举行凯旋仪式。

但是，粉碎了庞培参加执政官选举意图的元老院派，对恺撒也采用

同样的策略。

虽与反对庞培的理由不同，但恺撒也被元老院派视为危险的人物。恺撒目前的力量还不到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地步，但是从他在历任公职中的言行举止来看，他完全倾向于打倒“元老院体制”。三年前在“喀提林阴谋”时，西塞罗在恺撒的提案与小加图反对这两种意见的争论中，说了下面这段话：

元老院诸位议员：

在尽可能地提出多种提案之后，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检讨何种为最佳的方案。首先，检讨恺撒的提案，他算得上属于平民派；采纳他的提案，显然就会少掉一般市民愤怒和暴力抗议的场面了。

总之，在37岁前后时，恺撒已经被认为是元老院议员中反元老院派的核心人物。因此三年后的元老院派，当然不愿意给恺撒任何机会。

于是恺撒遭遇了和庞培相同的处境。要举行凯旋仪式，就不得不放弃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位置；要想担任执政官，就必须牺牲对罗马男子而言属于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有别于庞培的凯旋仪式是第三次，执政官是第二任，对恺撒来说，凯旋仪式和执政官的机会都是第一次降临。而且，在恺撒还在犹豫时，截止日期已经迫近了。

恺撒终于下定决心，他骑着一匹凯旋将军所骑的白马走在街上，这显示他虽下定了决心，但还是对凯旋仪式有所眷恋。恺撒驱马穿过城门直接前往卡匹托尔山，向国家公文书馆提出了执政官候选人的登记。元老院也不得不认可他的候选人资格，因为恺撒是身为法务官和前法务官的行省总督，而且具有接受凯旋仪式的充分的军事功绩。40岁的恺撒，在名誉与权力之间，舍去名誉，选择了权力。

然而，恺撒即使拥有候选人资格，也不一定就能当选。不得不承认

恺撒候选人资格的元老院派，共同推出了另外两位足以与恺撒抗衡的候选人。属于平民派的恺撒向来仰赖一般市民的支持，但是现阶段平民对他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慕名，而可以将慕名转换为支持的凯旋仪式，如今又已被牺牲掉了。穿着白色托加的恺撒对此心知肚明，站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时，他也想到自己虽然当选了候选人，但并不等于实际当选。

“三头政治”

并没有人知道到底恺撒与庞培是在何时、何处和以何种方式有过接触。两人的年纪仅相差6岁，当然不可能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或许恺撒曾经在阿尔巴的别墅拜访过庞培。虽然两人在知名度上有一段差距，但是庞培有充分的可能对恺撒有好感。7年前，当庞培扫荡海盗、远征东方时，元老院就反对将大权托付给他，而赞成的只有西塞罗和恺撒。在远征途中的庞培，对恺撒和妻子慕琪娅私通之事，认定是慕琪娅不够庄重。因此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两个男人的隔阂。

结果恺撒和庞培缔结了秘密协约：庞培动员了旧部属，帮助恺撒当选；而当上执政官的恺撒，必须给予庞培的旧部属土地及承认庞培组织的东方行省的再编组案。于是，恺撒也因此确定无疑地当选了。

在两者的联合关系中，庞培和恺撒的势力并不均衡，庞培比恺撒的实力要强出许多。因此，恺撒提出了加入克拉苏的三者联合构想。研究学者大多认为邀请克拉苏加入，是因为恺撒无法无视他是自己最大的债权人。我个人认为，身为最大债权人的克拉苏既然无法抛弃恺撒这位不良债务人，就只好选择继续帮助恺撒了。而恺撒想借着克拉苏的加入来平衡自己与庞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邀请克拉苏加入也许是件极为容易的事吧。克拉苏对庞培有敌对的意识，就像如果知道庞培多吃了口羹，他也非得多吃一口否则就会睡不着一样。或许让庞培答应克拉苏的参加

是有点困难，因为庞培常常看不起克拉苏，两人间的交恶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克拉苏是罗马具有经济实力者的龙头。庞培也知道自己能否称霸东方与统治东方和克拉苏这类人的援助有相当的关系。而克拉苏也很清楚，在此处助上一臂之力，就能扩大自己所代表的“骑士阶级”的市场。

于是就这样，公元前60年的春天到夏天这段时期，历史上有名的“三头政治”成立了。年方40的恺撒以压倒性的多票数当选为执政官。元老院派所推派的两位人选中，只有比布鲁斯好不容易挤进第二位。但是，恺撒当选后，元老院派有将近半年的时间还不知道“三头政治”的存在。保守“三头”这个秘密，是因为这和罗马人所熟悉的政体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体制。

提起恺撒的创举，古今的史学家无不一致公认“三头政治”是他的杰作，但是提起对此举的评价就众口不一了。从古至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三个实力者利益相交的同盟关系。就庞培与克拉苏两人的关系而言，我个人赞成这样的看法；而对于恺撒而言，这样的同盟关系很符合他的利益，因此一半是以眼前利益为主，这点我持赞成意见。

但是正如同前文所提到的，恺撒这个男人，做一件事不会只有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恺撒的特点是将私利与他利甚至公利密切结合在一起。因为他认为私利的追求与实现，要借他利乃至公利的运用才有可能完全实现。

其实并非天才的恺撒才想得出来此种观点，我们大多数的人，也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每日这么做着。全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遵照满足私利、进而满足他利和公利的行事模式，是相当符合人类本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也是一位强烈赞同此种观点的人。也就是说，即使身为公仆也应该肯定他追求私利。因为唯有大家共同认可私利的追求，才能为公利的实现提供更健全、更久远的基础。

树立“三头政治”这个新系统，恺撒得以顺利当选执政官。因而面对元老院派的反对势力时，仍能确保他任期内的强势执政这个私利；而就他利方面而言，他也满足了庞培及克拉苏的利益。那么，恺撒所认为的公利是什么呢？

恺撒从以前到现在的各种言行就已经显示他属于反元老院派。他明显地有打倒元老院派所坚持的由元老院主导共和政体的意图。但是，如果认为恺撒是单纯地反体制那可就错了。因为自格拉古兄弟以来，“反体制”的主力都是护民官。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尤里乌斯·恺撒并没有当护民官的资格。护民官这个职位设立于公元前494年，最初是以为保护平民权利为目的而设置，因此贵族无权担任。而如果属于平民出身，但祖先曾担任过执政官的这类平民贵族，他的护民官资格也是受到认可的。格拉古兄弟、塞多留、庞培以及克拉苏，都是属于有资格的平民贵族。

然而，即使有资格担任护民官，恺撒能够以护民官的身份推行“反体制”的运动吗？我想是没办法的。因为恺撒注意到“反体制”是在强势体制下才能成立的。在格拉古兄弟时代，罗马与迦太基间三次战争所取得的功绩仍然在发挥作用，元老院体制依然稳如泰山。当护民官对抗僵硬坚固的体制时相当具有震撼作用。但在那之后的70年，体制已渐渐呈现弱势。一旦出现问题就得靠马略、苏拉以及庞培这些个人力量的支持，这成了元老院体制解决问题的支柱。

其间的原因探究起来可能有两种：一是元老院制度的长时间不变更以及元老院一直由固定的阶级把持；二是与先前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时代相比，罗马的疆域已经更为广大了。从前罗马公民和来自近郊拥有罗马公民权者通过在罗马召开的公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以下的公职，这种方式不但有意义而且具有可行性。然而，随着领土扩张到全意大利半岛，公元前90年前后起，住在那里的自由民全都拿到了罗马公民权。于是通过公民大会进行选举，变得不太具有意义且不太有可行性。而且在

那之后，罗马公民的居住地域也明显扩大了。散居于地中海全域的罗马公民人数也大为增加。这些人之中，究竟有多少人会为了一年一度的执政官及护民官选举，千里迢迢地赶赴首都罗马呢？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几乎只有住在首都以及附近的罗马公民行使了公民权。

因此，制度的长时间不变更一定会造成当事者才能及力量的衰退。元老院体制表面上坚固无比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恺撒认为没有必要从“反体制”一侧攻击元老院。苏拉改革的目的也在于强化这个元老院体制。因此在现实情况中，与其成为“反体制”势力的先锋攻击既有的体制，不如致力于新制度的建立更有意义。

其实我甚至以为，“三头政治”就类似于现代的高峰会议。尽管在联合国里国家不分大小均拥有一票，也基于现实考虑增设了安全理事会，并赋予各成员拉丁文“VETO”所意指的否决权。然而，今日的联合国不要说是统治，连协调能力都无法让人信服。相对之下，如同大国聚会的高峰会议并不采用否决权。恺撒当年提出“三头政治”的想法，主要是为了恢复统治能力，其实今日为了应对冷战后的变化而加强的政治性峰会，大概也是这个模式。“三头政治”和今日的高峰会议都不是正式的机构，而且也和深信结合众人智慧事情才能圆满达成的民主共和式思考背道而驰。附带一提的是，罗马政体中只有执政官与护民官的否决权受到承认，而护民官借由否决权的滥用，往往造成罗马国内政局的不安定。

其实这个由恺撒所主导的改造国家、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并非开始于战胜庞培的公元前48年，也并非开始于越过卢比孔河的公元前49年，而是开始于公元前60年“三头政治”的建立。也有几位现代的研究者清楚地指出：“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因”三头政治“的出现而崩坏。”

然而，当时就注意到这个兆头的人少之又少。恐怕就连庞培和克拉苏也是在不了解“三头”制度的真正意义之下加入的吧。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三头政治”是罗马政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异类，因此有必要

尽可能地保密。“三头”的成立事实上有半年之久未被察觉，甚至连自认为情报非常灵通的西塞罗也没发现。那是因为他始终被恺撒没有表情的脸蒙骗了。而一直对恺撒当上执政官心存不满的元老院派发言人西塞罗，其实早就名列为恺撒打点的对象了。恺撒曾派心腹巴尔布斯拜访西塞罗。以下摘述的是西塞罗写给密友阿提库斯的一段话：

> 根据巴尔布斯所说，恺撒需要我的协助。恺撒本人曾对他这么说过：“我一切都听从西塞罗和庞培的判断，并且打算致力于改善庞培和克拉苏的关系。”如此说来，我们元老院派如果能与庞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与恺撒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非梦想。这么一来，仇敌化解为战友，民众也能平静度日，我也可以有个安稳的后半辈子了。

巴尔布斯的拜访，逐渐解除了西塞罗的戒心，他又写道：

“喂了庞培后，恺撒就更容易喂养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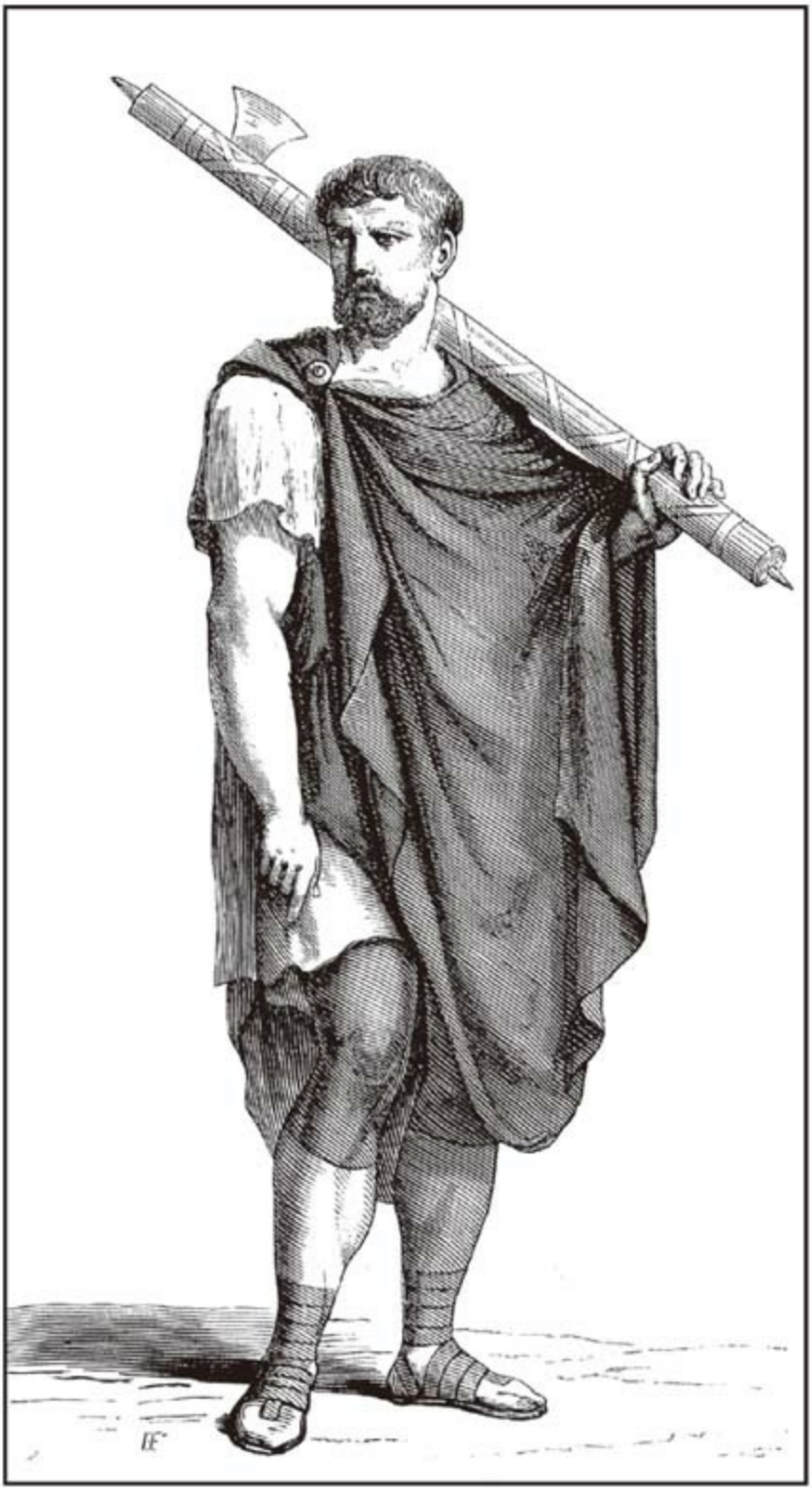
然而，公元前59年1月1日，就任执政官的恺撒就显现出不惯于被人“喂养”的气度。

就任执政官

一位统治者的气度就在于他的一时之计是否能成为百年之计。步入40岁的恺撒，在公元前59年，除了借钱和骗女人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也让一般罗马市民印象深刻。

在尤里乌斯·恺撒初任执政官时，不仅仅是元老院派，就连稳重的市民当中，也有人担心他是复辟的激进派。恺撒第一步就是着手平息众人的疑虑。为了强调自己并非是罗马传说的破坏者，他恢复了共和初期

的传统惯例，也就是不分得票高低，两位执政官每日轮流执掌军团总指挥权。若是同在首都时，政务也是一月交接一次，而且在不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当月，跟随在执政官身旁的12名侍卫不得手执代表公权的权杖。



持权杖侍卫的服装

恺撒树立起自己不是破坏罗马传统者的形象后，下一步却是没有人料想得到的实现所谓的“执政官通告”。当时称为“阿库塔·迪乌鲁那”或“阿库塔·塞那托斯”，直译的话，可译为《每日纪闻》或《元老院纪事》。元老院会议中所进行的议事、讨论和决议等，将在会议第二天全部张贴在罗马广场的墙上。在口述笔记广为使用的罗马社会中，由于速记技术的普及，只要有心的话，施行起来是相当容易的。后世的学者们称此为新闻传播的开始。不过，从现在的角度去理解，应该说是CNN式的电台被搬到元老院会议场去了，这样比喻恐怕更为贴切。

以往的元老院会议其实说起来类似会员制，元老院所进行的讨论和决议都是关起门来举行的，一般市民要想知道其中的内容，只有从打开门走出来的议员们在公民大会中的发言才能得知。而恺撒将此公开化。有权者握有给予情报的权力，谁都没有理由反对执政官的决议，元老院只有默许了。

恺撒施行的“阿库塔·迪乌鲁那”制度对元老院而言是一种打击，而这打击对西塞罗而言更甚。西塞罗的写作习惯是反复推敲，例如他在议会的发言就是反复推敲准备好了的。由友人经营的出版社所出的手抄本《辩论集》，也是经过他一番深思熟虑地修改后才刊发的。这里有个著名的例子，有个人曾找西塞罗辩护，最终却败诉亡命马赛。在读西塞罗那本《辩论集》时，看到了西塞罗所写的当时为自己辩护的辩护词，他感慨地指出，西塞罗如果当初能这般辩护，他就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方每天吃鱼了。就像经过CNN式的电视台逐一报道后，以往那些专做推敲、着墨工作的编辑和传播新闻的人士生意大受影响一样，由恺撒导入的《每日纪闻》制度，也使得元老院所把持的特权之一崩溃了。

恺撒即使轮休，就是在不是内政最高司令官的月份也没闲着。他利用和自己同派的护民官巴第纽斯，以护民官立法的形式提出法案。因为元老院的反对而悬而未决的庞培当初征服东方诸国的再编组案，也是经由这种方式而政策化。即使元老院拒绝承认这项政策，只要由护民官担

任议长，举行平民大会表决依然可以通过。因为依据《霍滕修斯法》，可将平民大会中通过的提案政策化。庞培也因此在长达三年后恢复名声。这项表面上仅仅是对庞培和克拉苏有益的法案，事实上促使了行省经济活动的活跃。行省经济的活跃同时也带来了首都以及全体罗马世界的经济活跃。

在自己负责政务的那个月份，恺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法。其中之一，直译的话就是《尤里乌斯判例法》，如果是意译，则可称为《尤里乌斯国家公务员法》。大抵而言，是一种有110多项条目、针对罗马全域内的公职人员如何对待职务的律法。

600年后查士丁尼一世集罗马法律之大成编成罗马法大全——《查士丁尼法典》，也收录了这部法律。可见这是在罗马国存续期间一直具有效力的法令。

解读这个法令就可得知对所有的事不抱持单一目的的恺撒是多么地有深谋远虑了。

首先，任何就任公职者不得收受1万塞斯特斯以上的赠物，1万塞斯特斯等于一名士兵35年的薪资。可见这法案的目的，与其说是净化中、低级公务员的公共道德，不如说是为了要断绝长期以来一直被元老院议员所独占、以行省总督为首的高级公职人员的贪污行为。再说，如果规定凡是赠礼，即使金额少也一概不可收受，岂不是对人性过于无知吗？恺撒企图削弱元老院权力的做法还有：违反法令者，除了会被处以受贿罪之外，还必须撤除元老院的议席。从这项法令同样收录在《罗马法大全》中来看，当然是条长命的法令。

另外，即使公务员道德得以净化，也不保证统治就能得心应手。被管理者的想法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被管理者的想法是受什么左右呢？无论古今，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是取决于税金了。在恺撒就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时，便曾将改革税制列为统治的重要事项。在他于罗马称霸担任最

高职位的执政官时再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尤里乌斯国家公务员法》中的一项，显示了他是多么重视税制的公正与否，这是即使到现代也不可忽视的问题。

依照这个条例，担任行省勤务的国家公务员有公开纳税者名簿的义务。纳税者一览表张贴在各行省主要都市的两处，以及首都罗马的三个地方。因此每个人都能够一目了然地得知信息。借着公布从行省总督到一般公务员及行省居民的纳税金额，排除了贿赂以及其他不法行为。因为只有公开才能减少当地官员贪污，也就可以避免职权滥用的情形发生。此外，以往有些人专门借钱给无法缴纳税款的人，靠放高利贷发财。例如，连西塞罗也对布鲁图高达48%的高利贷惊讶不已。而恺撒的这项法令明确将超过认可的年利12%的高利贷以外的高利率贷款加以废除。

而违反者的结局就是等着被剥夺元老院的议席。

元老院派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也并非毫无抵抗。他们的代表卢库鲁斯，将自己所持的反对意见，通过《每日纪闻》呈现在全市民的眼前。他反对恺撒订立的法律，因为其明显轻视元老院。执政官恺撒的应对之道是，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曾经介绍过的在卢库鲁斯有名的宴席上，一边装做若无其事，一边又小声谈论他手中握有卢库鲁斯在任职小亚细亚行省总督时的不法证据。于是，这名57岁的曾是苏拉门下第一勇将的卢库鲁斯，在接下来的元老院会议上再也没有吭声。

而对付元老院派的没有行省总督经验的36岁青年小加图，就不能用这种威胁的手段了。这个小加图仗着年轻力壮、以长时间演说来阻挠议事的进行。然而，执政官还是畅行无阻地完成了议事任务，因为命令守卫带走妨碍者是被认同的合法行为。恺撒命令守卫将喋喋不休的小加图带出会场并关进牢里，而等小加图获释放时议事已经结束了。

《农地法》

公元前59年3月，恺撒的执政官任期进入第三个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提出了法案，那就是自格拉古兄弟以来的《农地法》。

对政治家来说也有棘手而不敢触碰的政策。在罗马，有关公民权和农地改革的法令就属于这类政策。由于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和此法案成立后将导致新获益者出现，还包括从何处以及如何获取利益等问题，实在是件难以掌握的事。因此即使得到支持，也只不过是不太彻底的支持，这成了这类法案的共同点。因此，每当这类法案被提出来时，罗马境内便会发生流血事件，甚至提案者被杀从而导致更大的混乱。

《公民权法》是在公元前90年的“同盟战争”中，不顾众人是否赞成强行通过的。剩下来的难题，是自从公元前133年格拉古兄弟以来，就频频与流血动乱有密切关联的《农地法》。况且，自从公元前100年的护民官萨图纽斯遭杀害以来，41年之中，再没有人有勇气提出新的方案，而尤里乌斯·恺撒准备再提出的正是涉及《农地法》的法令。

在共和政体下，罗马有两种途径可以订立法令：一是公元前59年以来所采行的方法，也就是经元老院表决通过，而且也经公民大会通过的方法；二是即使元老院反对，只要公民大会通过，就有可能政策化。这是根据公元前287年《霍滕修斯法》所采行的办法。在第二种情形中出现的，表示“公民大会决议”意思的拉丁语，就是现代意大利语里所沿用的“国民投票”。因此，从前的元老院决议与现代的国会决议是不同的，现代的国会是由当选的议员组成的，而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是由没有经过选举的人组成的。

自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以来，《农地法》常导致争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二是这项法令的通过经常诉诸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护民官率先挺身，斥退元老院的反对声

音，然后再诉诸公民大会决议，这是相当明显的“反体制”做法。

为了实现通过《农地法》的宿愿，恺撒首先试着借由第一种方法进行。因为恺撒与格拉古兄弟以及萨图纽斯这样在元老院里没有议席的护民官不一样，他是担任着元老院会议中议长的执政官。

恺撒向元老院所提出的《尤里乌斯农地法》，在70年前曾逼死了格拉古兄弟，它近似于《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的修正案。虽然是以农地改革为最终目的法令，但是非常忠于罗马法中保障私有财产权为基本权利的精神，无论农地改革的范围有多大，一概不涉及私有土地。重新分配的对象始终只限于国有土地。因此即使因《农地法》而取得土地，也等于是借用国家的土地。

国有土地的借用上限，户长为500尤格（约合125公顷），其他以儿子名义借用的，每个儿子可借用250尤格。但是，一户人家的全数借地，不许超过1000尤格。

目前借用1000尤格以上的人，必须将多余的部分归还国家，国家则依照归还土地的面积支付赔偿金。

另外，设立常设委员会负责有关市民借用农地的分配事宜。

一直到上述部分，几乎与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并无不同。恺撒所作的修正，在下面各项中：

一、关于国有土地的借地权，承认继承的权利，但是对他人的让渡权，20年以内不予承认。

农民的固定化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格拉古兄弟完全不承认让渡权，恺撒则认为20年之后可获得承认，也许是他认为这样比较符合现实状况吧。

二、能够申请国有土地的借用者，包括曾经追随庞培拥有五年军旅生涯者，以及生育有三个小孩的无产者。

付给庞培的旧部属们“退休金”，是当时“三头政治”成立的条件，所以这也还是在满足庞培的利益。然而，恺撒一方面满足庞培的要求，一方面也没忘记在《农地法》中，帮助流入都市的原属于旧自耕农的无产者重新建立家园。由小加图提出非常受欢迎的政策《小麦法》曾使30万之多的人受益，可见失业是罗马社会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为应付民众将超过1000尤格以上的不法借用地归还国家时所需支付的补偿金，以及重新分配土地需先行投资的款项，决定动用庞培当时从东方回国时纳入国库的2亿塞斯特斯铜币作为相应的财源。

因此，每次一提到《农地法》就以将造成财源紧张为由而反对的元老院派，这下无话可说了。

四、将发放不法借用地归还的补偿金的额度，划为财务官的权限。

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也提到，财务官除了负责人口调查外，也负责国库的收支。打比方说的话就像大藏省（财政厅），补偿金的基本额度就掌握在他们手上，这件事说来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恺撒另有计划。财务官的任用一般是选自元老院中有执政官经验的杰出人士，“给予财务官权限”这一点，可说是恺撒对元老院的怀柔政策之一。

五、设置处理有关借用农地重新分配案的常设委员会，由20位委员组成，提案者不得为委员会的成员。

在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中，委员会由三位委员组成，他们兄弟都是委员，这显示这项农地改革是由护民官所主导的“反体制”运动。相反的，恺撒自己不参加委员会，而且委员人数增至20人，其中一人明显的是属于元老院派的西塞罗。恺撒选择了突出非党派的方式来进行农地

改革。

此外，恺撒将坎帕尼亚一带排除于国有土地重新分配的对象之外。这个地方以那不勒斯和庞贝为中心，土质肥沃堪称意大利第一。而这一带早被元老院有权势人士借走了，已经事实上被他们当成私有土地使用了。

恺撒的《农地法》小心地顾及着不刺激元老院。但元老院内反对的依然占大多数。死守由元老院所主导的共和政体的元老院派，认为《农地法》实在是一个“反体制”运动。西塞罗也持反对的态度。至于小加图，又再度像以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企图妨碍议事。第一天，恺撒让小加图发表长篇大论，等他的演说结束时，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元老院会议也就散会了。

第二天，执政官恺撒在小加图又开始滔滔不绝时，呼叫守卫将小加图带出会场外。恺撒向坐在位子上的元老院议员说：

> 元老院各位议员：我请求各位担任《农地法》的裁判官和审判者，因为这项法令对国家而言是无比的重要。我希望在元老院彻底讨论后的决议能够在公民大会上公布。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这项行动的意愿，就表示没有能力处理这事，恐怕最后也只有交由市民们决定了。

恺撒决定突破现状，而保密至今的“三头政治”也在此时公开化了。

根据也是现场证人的西塞罗的书简，我试着重新描绘当日公民大会的情形：

> 即使是3月，南国罗马的阳光依然肆无忌惮地洒落，从罗马广场中央稍微偏北的地方，有一座长24米、宽10米的演讲坛。它的前方

有一片露天的集会场。那天，庞培所动员的老兵一大早就集合在那里了。此事关系着往后的生活，所以即使没有庞培的动员，他们也会参加吧。围绕着露天集会场的神殿以及会堂的柱廊和石阶，满是身着短衣的贫穷公民。在3米高的演讲坛前方及左右两侧是身穿镶着红边托加的人，这些一看就知道是元老院议员——罗马的支配阶级。

那天由执政官恺撒担任此次公民大会的议长，这也是因为他特意挑选了轮到自己负责国政的3月份才召开这次公民大会。当然，反对农地改革的“元老院派执政官”比布鲁斯也出席了。70年来，每次只要触及这个尖锐问题，势必以流血事件收场。《农地法》是否能成功在那日就可见分晓了。赞成派与反对派也相互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执政官平时所着服装与元老院议员并无二致。恺撒身穿镶着红边的白色托加，一站上3米高的讲坛，高度正好和聚集在神殿柱廊的人群差不多。而在露天广场里的人，可就要以仰望的角度看他了。就恺撒所处的位置看来，他是最能主导这个场合的人，他首先要小加图上台发言。

小加图一上讲坛就想以冗长的演说来妨碍议事。但这次不需恺撒出马，众人马上明白这是阻止法案通过的陈词滥调，立刻涌到台前进行威胁；有一些人甚至冲上讲坛将演说中的小加图拉扯下台。最后幸好有强壮的元老院议员护着，让小加图退出场外，他才没落得血溅当场。

这样恺撒什么也不必做就成功地把小加图排除了。他指名同为执政官的比布鲁斯为下一位发言人。自1月1日就任执政官以来，就一直被恺撒操纵的比布鲁斯，内心虽然对恺撒不满，但是眼前公民们对小加图的敌意使他十分害怕。于是他轻声细语地表示，依据占卜今日并不适合决定这个法案。话一说完还来不及接下句，就招来市民们的嘘声，于是他自觉地走下了讲坛。

接着恺撒指名克拉苏为下一位发言人。同为“三头政治”一角的克拉

苏，以简短的演说叙述自己的赞成意见后就步下讲坛。市民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克拉苏赞成的事情，正是“骑士阶级”所赞成的。

紧接着恺撒指名第四位发言人庞培上台。这时恺撒采取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他并非要庞培进行表示赞成的演说，而是对着这位“三头政治”中的一头，逐条朗读出《尤里乌斯农地法》的项目，并以回答赞成与否的方式，逐一询问庞培的意见。对不擅演说的庞培而言，恺撒的这种做法，令他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体谅与照顾。

每当恺撒朗读一条法令并询问庞培是否赞成时，庞培的“赞成”总会得到众人如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全部法令都朗读、对答完毕，恺撒还不让庞培走开，恺撒转头对庞培说：

“仅仅有法案的成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负起监督实施的责任，希望您能接受这个任务。”

还没等庞培的回答，恺撒就转身对市民们说：

“如此的重责大任，我们怎能不恳请伟大的庞培担任呢？你们说是不是啊！各位！”

市民们“哇……哇……！”地大声呼喊着。

庞培是位虚荣家，一旦欢呼集于一身时就情绪高亢。他竟忘了自己不擅演说而开始发言起来。他说，如此受到执政官与公民的托付实在是光荣之至。除此之外，他也表示了《农地法》成立的必要性。演说的尾声，庞培用这句话做结语：

“如果有人执剑刺向这个法案，我庞培定会化为盾牌加以阻挡！”

听见这句话，市民中又响起“哇……哇……！”的欢呼声。

于是形势急剧变化，元老院派顿生强烈的危机感。于是便强行派出执政官比布鲁斯再次发言，表示他作为执政官拥有否决权。恺撒以盖过比布鲁斯说话的声音说道：

“各位市民，如果没有执政官比布鲁斯的同意，就算各位有多么强烈的企盼，这个法案依然无法实行。”

群众已经失控。比布鲁斯看见向讲坛蜂拥而至的群众，马上放弃动用否决权，一路落荒而逃。古代的一位史学家就曾对这件以这种局面收场的事，说了一句非常讽刺的幽默话：

“到此，这次竞赛就在敌方全部退场的情况下结束了。”

《农地法》是经由恺撒深思熟虑而成立的，因此不会那么容易就放过元老院派。诉诸公民大会强行突破的恺撒，还让原案中没有的修正案也通过了。其一是，元老院议员有尊重公民大会决议的义务；其二是，原案中未提及的坎帕尼亚地方，也列为不法借用归还地。恺撒接二连三的法案使元老院派不得不屈服，这可激起了小加图反对恺撒的怒火。他声称即使被流放也不愿承诺这些义务。不过，最后他还是在西塞罗的游说下屈服了。其他的元老院议员尽管心中有许多不情愿，也全数许下了尊重公民大会与公民大会议决事项的誓言。如此一来，《尤里乌斯农地法》与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截然不同，它并不是反体制运动的成果，而是所谓“与在野党协力”的政策，也是一个未经流血而订立的政策。

西塞罗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打算，他觉得待在罗马似乎无事可做了，就想到别的村庄走走，专心从事笔耕生活。而屡遭挫败后受到惊吓的比布鲁斯，即使还处于执政官的任期也一直在宅邸里闭门不出。

罗马自建国以来，纪年的方法就没有称说几年的方式，而是以谁与

谁当执政官作为纪年。公民们认为这一年（公元前59年）并非恺撒和比布鲁斯为执政官，而笑称是“尤里乌斯与恺撒”当执政官的年份。公元前59年4月，《农地法》中由20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展开活动。由于比布鲁斯的退场，自公元前59年4月起至任期结束的12月为止，为期9个月，恺撒实际上是一人在掌管国政。

高卢行省总督

事实上，公元前59年前后，独自担任执政官的恺撒并没有浪费时光。因为还没有满足克拉苏的利益。恺撒提出了《行省法》中有关行省税征收业者法的修正案。罗马的行省税征收称为“包税人”，是由私营业者施行的投票制度，得票的“包税人”，有义务将征税的三分之一，先支付给国家作为预缴税款。属于“包税人”的“骑士阶级”中，以克拉苏为代表，很早以前就希望能废止预缴税款，但是因元老院反对而无法实现。恺撒想实现这个计划，不过，元老院认为“如果废止行省税征收业者预缴三分之一税款，就太让他们占便宜了”，恺撒必须提出自己站得住脚的理由才行。

于是恺撒提出了下边两点理由：

一、以往的“包税人”皆以预期的预缴税款来报价，因此自然造成行省税本身的增额；然而，没有理由向行省居民征收超过义务范围的税收。因此如果能废止预缴税款，才能实现行省税的公正。

二、行省废止预缴税款后的剩余，将转为公共事业投资。克拉苏本人也表达了愿意担当的意愿。如果这项计划能够实际达成，将可促进经济的活跃。

最终行省税征收业者法的修正案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克拉苏在“骑士阶级”面前做足了面子。

接下来该是庞培登场了。庞培称霸东方世界的重新编组案已经通过；付给老兵土地之事，也已经因《农地法》的确立而解决了，所以这对庞培而言，是第三次利益得到满足。然而，对于这件事，恺撒是既考虑了庞培的私利又考虑了罗马的国家利益。

将临地中海的东方世界收纳为罗马霸权之下，是庞培所完成的大事业，但在这些国家之中，庞培唯独没对埃及下手。原因是尽管埃及与罗马相距甚远，却是罗马的友好邻邦。可是，当时埃及的托勒密十二世，被首都亚历山大城的居民逐出国境时，罗马对埃及的不干涉主义也就无法持续下去了。因为对罗马的安全保障而言，埃及是很重要的一环。于是恺撒决定让这个亡命意大利的国王，在罗马军队的保护下收复埃及王位。被元老院喻为“罗马的友好同盟”的国王，就在庞培旧幕僚中的一人领兵之下，恢复了王位。因此庞培让埃及成了自己的保护地，他成了“patronus”(保护者)。埃及王为了表达谢意，承诺将给予庞培3000塔兰特，恺撒3000塔兰特。恺撒将这3000塔兰特的半数，归还给克拉苏抵消债务，剩下来的另一半，让埃及王当成是欠着自己的债务不用支付。

在执政官恺撒的努力下，除了埃及王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异邦领导人也得到“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谓，那就是日耳曼民族的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为了让罗马能承认日耳曼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并定居于河西侧这个既成事实，他与罗马结下了友人同盟。

此事的实现要归功于恺撒，但在第二年开始的高卢战役中，恺撒初逢的真正敌手，就是这位阿利欧维斯图斯。

终于，轮到恺撒顾及私利的时候了。然而，在做这件事之前，他已经先由稳固自己的根基做起了。

恺撒和第一任妻子科尔涅利娅生有一个女儿叫尤利娅，现在她已经订婚了。但是恺撒废除了这件婚约而将尤利娅嫁给了庞培。这桩婚姻成了罗马人口中最热门的话题，不过并非是因为22岁的新娘与47岁的新郎

间的年龄差距。其实年轻女子与中年男子结婚在罗马并非稀奇的事，之所以引人议论纷纷，在于原本造成庞培单身的正是恺撒。庞培因为得知妻子和恺撒发生的事情，才和妻子离婚的。因此人们在谈论这事，与其说是传播丑闻，不如说是乐观其成。恺撒这位男子，具有不会招惹情人怨恨与愤怒的特异才能，即使丑闻曝光，也能以令人欣慰而不惹人厌的结果收场，这非得要相当特异的才能不可。

三年前发生的庆祝波娜女神祭典当晚所发生的入侵事件，至今在街头巷尾仍被议论。说“恺撒之妻绝不容许怀疑”而与妻子离婚的恺撒，当上执政官后仍然独身。此时他想要结婚的对象，是元老院中的有权势议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的女儿卡尔普妮娅。她的实际年龄不详，不过和恺撒的婚姻算是初婚，所以或许卡尔普妮娅和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年龄相仿。当上岳父的皮索，虽然不是什么有突出才能的人，但也多亏他有学者般温厚的性格，因此甚少有冲突。当然，这对恺撒来说又是桩政治婚姻。但如果说政治婚姻会导致不幸的婚姻，那可就下结论过早了，庞培和尤利娅的婚姻就很幸福；而具有遇到困难也不失耐性、勇于承担责任的恺撒，对妻子而言，是位难得的好丈夫也不一定。但是，恺撒和只守着一个妻子的庞培是不同的，从这点来说，他还真是个极为不忠的丈夫。

恺撒借此巩固根基，借忠实的护民官巴第纽斯之手，提出了《有关恺撒行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

我已经叙述过在恺撒还是执政官候选人时，元老院派就对他有敌意。但即使元老院派最后承认了恺撒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也并不意味着元老院派就没有了坏心。当时的罗马，在执政官选出以前，已经由元老院决定了执政官任期结束后就任的行省。这是“元老院体制”中的一项特权，目的是为了防范执政官就任后滥用选择的权力，因此才在执政官尚未就任的阶段就由元老院来决定。而由元老院决定的恺撒任职地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森林与街道”，也就是负责意大利境内的森林与街道管

理。因为是属于建设部门与农林部门管辖的事宜，所以不用使用军团。元老院派之所以想出这个闻所未闻的任务，主要是已经考虑到，即使无法阻止恺撒当上执政官，也不能让他手里握有军团。恺撒最初对此并未抗议，因为能当上执政官才是自己施展手脚的前提。然而，一过了公元前59年的下半年，六个月后的就任地就成了现实的问题。提出《巴第纽斯法》的目的，就是涉及任职地变更的事宜。而那时，恺撒也明确地向“元老院体制”递出挑战书，以当时他所处的有利条件来说，他已经预见了此法的通过。《有关恺撒行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是要将担任执政官以后的恺撒任务，由负责森林与街道，变更为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行省，也就是北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行省，就是现在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埃西亚两行省。此外，任期为五年，并且可以拥有三个军团的军力。

当然元老院派是持反对意见，但也有议员受到恺撒岳父皮索的劝说而犹豫未决，在是否投赞成票上举棋不定。以小加图为代表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则是坚决反对。小加图甚至在会场，面对面地指责恺撒的行为是利用女人的卑鄙伎俩。

“三头政治”便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作用来了。庞培和克拉苏作出了赞成的决定，不过依然无法抗衡整个元老院反对的力量。结果，恺撒又是采用强行突破的方式，召开了公民大会。庞培和克拉苏的赞成意见被真实地传达了出来，《巴第纽斯法》终于获得通过。由于公民大会具有将通过法案政策化的效力，所以即使元老院反对，也无法排挤《霍滕修斯法》了。

随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也就是现在南法行省的总督梅特鲁斯突然死去。恺撒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有关恺撒行省统治权的巴第纽斯法》中，提出附加了南法行省的修正案。已经承认原案的元老院，自无反对的理由。于是，恺撒就成了三个行省的最高责任者。依据《巴第纽斯法》，42岁的恺撒拥有了以下权力：

一、担任北意高卢、伊利里亚与南法高卢三行省的总督，保障其安

全。

二、任期为五年。

三、可以支配的军力包括三个军团加上驻扎南法行省的一个军团，总计为四个军团。

四、总司令官恺撒拥有全部幕僚的任命权。

元老院派对此毫无办法，连喜好过问政治的西塞罗，也在随后的三个月在自己的别墅中专心从事笔耕生活。而此时的恺撒事务缠身，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

确保心腹

其实对于恺撒来说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人在高卢仍能掌控罗马政界。行省总督只有留在任地才拥有军团指挥权，因此即使知道首都有不利自己的举动，但是只要越过罗马和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就会失去行省总督的地位和军团指挥权。因此如果不能远远地掌控罗马，恺撒将成为第二个庞培。他也可能遭遇和庞培一样的待遇，即使东征西战五年，回国后也不过是丢尽脸面，落到连许诺给部属们的“退休金”都无法兑现的下场。不过与恺撒不同的是，庞培有个致力于强化元老院体制的恩师——苏拉，所以元老院派对他还没有到敌视的地步。而元老院派完全视恺撒为敌人。因此，对恺撒来说，比庞培更需要遥控罗马。

在“三头”的会议中，还决定了次年也就是公元前58年谁来参选执政官。一位是与恺撒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他的岳父（虽说是岳父，年龄上却差不多）；另外一位是被称为庞培右臂的盖比尼乌斯。商量出来的办法是用庞培的旧部属和支持恺撒的平民派选票来左右公民大会。商谈的结果，在公民大会当中得到实现。两人当选，而由元老院派推选出来对

抗的候选人惨败而归。

虽然次年的执政官职位都已稳落自己人之手，恺撒还是认为不够。皮索和盖比尼乌斯的忠诚没有问题，但他们两人的执政能力让人怀疑。再说，要说到执政能力，占“三头”中一头的克拉苏也不能完全放心。而庞培则沉迷于和年轻妻子过日子，在阿尔巴别墅的时间比在首都罗马的时间要多得多。要达到掌控罗马的目的，物色一位与元老院派的急先锋小加图年龄相仿的人物势在必行。而且这个人物还需要有行动能力从而能够与西塞罗相抗衡。恺撒什么时候注意上这位男子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的确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这位男子正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三年前，在波娜女神的祭祀之夜，男扮女装潜入恺撒家，引起大骚动。后来恺撒被要求作证时，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恺撒的态度使他感到万分感激。而他对质疑他“不在场证明”的西塞罗，却是憎恶万分，以至于曾誓言要报仇。这位来自罗马名门望族克的劳狄乌斯一门的年轻人，天生极具才华，但缺乏目标意识，不假思索地滥用自己的才华。在禁止男子进入的祭祀中扮女装潜入，也是这种行为之一吧。他已经步入30岁的后半阶段了，依然是不成熟的男子。而他的下一个愿望又成为史无前例的丑闻，他要抛弃贵族地位成为平民的养子，参选护民官的选举。

说是“丑闻”，是元老院派站在自认为元老院阶级才是罗马领导阶级的立场。对他们来说，名门望族是构成元老院阶级的最纯粹要素，而抛弃这个地位成为平民，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而且忌惮的唐突之举。而不管是平民要成为名门望族的养子，还是贵族想成为平民的养子，在罗马必须先得到大祭司的认可。而恺撒三年前已就任终身制的大祭司。元老院派认为即使是恺撒，也不会应许这事，但大错特错了，恺撒允许了这件事。接着，公民大会这个下一个需要翻越的障碍克劳狄乌斯也成功翻越了。于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的名字改为颇有平民风范的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如果以这个名字参选登记护民官选举，并得到“三

头”的支援，一定可以当选。同时，恺撒也确保在自己担任执政官时，一直为自己左右手的巴第纽斯任期届满后，当上受自己意志支配的护民官。然而，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护民官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原本就出身于平民的巴第纽斯不同，得注意如何掌控。恺撒使用克劳狄乌斯对付元老院派，乃是用了以毒攻毒的策略。

恺撒一人活跃的公元前59年，也就是如同众人所说的“尤里乌斯与恺撒执政年”也即将过去。然而，人们头脑中经常都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十分牢固。后来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哪怕身处恺撒一人掌控的公元前59年罗马的“三头政治”之下，也还一直认为背后主谋是庞培。年轻时即已有所作为，与恺撒年龄上的差距仅有6岁的庞培，在当时所累积的声誉评价，恺撒是远不能及的。因此元老院派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暗杀的对象，不是恺撒却是庞培。

在三年前“喀提林阴谋”发生的时候，一位为西塞罗当密探的男子，在巴第纽斯即将任期届满之时，向他密告了暗杀庞培的阴谋，巴第纽斯很快地向执政官恺撒报告。恺撒看了密告者罗列的图谋者名单，发现在几位年轻能干的元老院议员名字后面，还写着现任执政官比布鲁斯、元老院派重臣卢库鲁斯，最后连西塞罗的名字都在上面了。恺撒笑着问护民官巴第纽斯：“就只有这些吗？”护民官答道：“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是27岁的布鲁图。护民官之所以隐藏了布鲁图的名字，是因为恺撒和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间的非常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此顾虑才没写出他的名字。

最终执政官恺撒没有惊动元老院就解决了此事。密告者不但没有领到赏金，还被关进了牢里。然而，这样的处罚不过是一种示众的办法，当然也是在向参加这项暗杀计划的人暗示：你们的计划已经走漏风声了，暗杀行动无法实施。如果知道自己原来是受到母亲情人的恩惠，布鲁图心中作何感想呢？这个另当别论，至少依他那老实的性格，必会将此视为一种缘分而愉快地接受下来。

《高卢战记》

要叙述从公元前58年到前51年为止这8年的战役，而不需要参考战役中主人公恺撒亲笔写的《高卢战记》的人，恐怕古今中外也找不到吧。无论参考各种基本史料，都少不了《高卢战记》。在书写由恺撒担当总指挥的高卢战役前先介绍一下恺撒所写的《高卢战记》，未必不是件有趣的事。有句话叫“人如其文”，然而我认为恺撒的文章很难在叙述战役时加以引用。在这里我想先介绍别人的评论。2000年来，历史学家们对恺撒的功绩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对恺撒的写作能力却发出一致的赞叹。恺撒的作品即使在2000年后，依然有文库本（“文库本”在日本指一种廉价且外形便于携带、以普及为目的的小开本书籍。——译者注）重复印刷、再版，继续替他实现着写作梦想。也正因为如此，有关此书的评价如沙粒般难以计数。在我著的此书中，无法一一列举，仅从古今中各挑选出一位评论者，他们就是西塞罗和小林秀雄，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西塞罗——公元前51年所写：

> 这几卷作品，在毫无修饰当中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好像人脱光身上的衣服，纯粹以裸体示人。
>
> 也许正是为了给写历史的人提供史料，恺撒写下了这本书。于是有人将其间的事件东拼西凑作为写作历史的材料，真正得到好处的可能也只有以这种方式写历史的笨蛋吧。对于深思熟虑的贤明之士，这本书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写作历史的欲望。

小林秀雄——1942年所写：

> 我知道尤里乌斯·恺撒写下了《高卢战记》这本书，但是不久前近山金次先生将它翻译出版后，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拜读这本有名

的战记。刚看了一些便立即忘掉了其余诸事，一口气地把这本如此有趣的书读完了。然而，说得更贴切点，是由于罗马军一直没让读者有在中途停息的时候。当然，在读完后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读后感浮现，我感到彻头彻尾地满意。这是我近来所进行的少有的较理想的文学鉴赏……

我没有忘记应该写些有关《高卢战记》的内容，然而这部对我而言虽然说是文学作品的战记，却如同古代美术品般地让我震惊。于是我在恍惚之间，文风也就变得如此迂回曲折了。我们已经从学者的勘察结果印证了恺撒在记述上的正确性。我读《高卢战记》的过程，也就如同那些学者在勘察古迹，当从地下挖掘起罗马胜利纪念碑的碎片时，发出感叹之声。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它那粗糙的石面，刚健有力的雕刻纹路。如果把此书放在现代文学之中来看，你就会明白文学本非是我们头脑中所设想的那样具有文学性。很早以前，语言是被刻在石头或者瓦砾上，或是用笔抄写下来，就如同一种器物般，谨慎地处理，文字这个东西可想而知具有多么重的分量。这实在是值得生活在如今的我们好好想一想，因为得益于铅字与滚轮印刷之赐，现在语言完全失去了实质性而化作了观念的符号穿梭于人们想象之间。现在的文学再这样下去，就将纠结于读者的解释和批判，最终气闷而绝。而像《高卢战记》这样不考虑读者的喜好，只是自我满足式地呈现力与美的形式，这种现象在文学里愈来愈少见了。

其实《高卢战记》不过是在兵马征战的紧要之间，恺撒迅速写给元老院的实地报告书。我为什么想要读这叙事诗般的杰作呢？译文虽然相当不通畅，不过这确无关紧要。这部作品就像刚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表面上锈迹斑斑的雕刻品，我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原文的风格。对那些为政治而作战服役的将士来讲，战争本身即是某种巨大的创作。而高卢战役就是恺撒的创作最熟悉的材料吧，他正是以自己熟知的材料，不加入任何伤感和空想而挥笔写作。《高卢战记》创作外的题外话能如诗般打动我，这绝非不可思议之事。我仿佛听到军靴声，感受到时光飞逝。

虽然是生于迦太基的奴隶，但后来被公认为有文才而扬名于罗马的喜剧作家德伦西，他的作品曾经是恺撒在宴席间助兴的材料。好像是在接句子，西塞罗第一个开口后，恺撒又接着说道：

> 在堪称首席文人的人物当中，德伦西与梅南多洛斯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并光彩闪耀。因为他们是爱好精练、清新文体的人。

“Puri sermonis amator”（爱好精练、清新文体的人）这句话，才真正应该拿来赞美恺撒。我想恺撒的文体，可以概括成下面三个词：

简洁、明晰、洗练的优雅。

莎士比亚、布莱希特以及美国剧作家索托·怀尔德之所以书写其他时期的恺撒，却不写高卢战役时代的恺撒，也许就是不愿成为西塞罗口中的“笨蛋”吧。莎士比亚或许是因为只读过普鲁塔克的作品，但是现代作家中的布莱希特或是怀尔德，则是肯定读过《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当在他们面对恺撒那简洁、明晰与精练的优雅的文章时，可能也会觉得没有必要再添笔墨了吧。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正是尝试着叙述高卢战役，难免会成为西塞罗所看不起的“将事件东拼西凑作为写作历史材料的笨蛋”。然而由于恺撒是写给那些了解当时情况的同一时代的人看的，而2000年后的人自然无法拥有与他们一样的理解程度。此外，有着与罗马不同文明形态的东方人，能与孕育自罗马文明的西方人有相同的理解程度，这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各种事件是东拼西凑的，我还是试着尽量去接近恺撒执笔叙述的方式，甚至于接近他的声音。我要呈现的是恺撒整个人，而恺撒的声音其实也在他的文章里存在着。

《高卢战记》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导言，一开始就是下边的开场白：

全高卢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比利时人住的地方；第二是阿奎塔尼亚人住的地方；第三是高卢人住的地方。他们称为凯尔特人，我们称为高卢人。

这个开头足以挫败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因为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不写前言和导言而直接进入主题，是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梦想。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李维、塞勒斯特、普鲁塔克等，他们总是会把写作目的置于文章的开头或是文中的某处。作家们应该知道读者对自己作品的了解程度因人而异。然而尽管早有这样的认知，还是无法很干脆地完全不设计写书的目的。读者显然不一定非得沿着作者铺好的轨道前进，但是如果没人告诉读者轨道在何处，他们也不会陷入不安。而从作者这一方面来讲，一旦明示了写作目的，就能安心地继续写下去。这也就是前言和导言等的存在意义，是不为读者而是为作者存在的。

但是恺撒没有做对作家而言如此重要的事情。无论在开始部分还是在文章中间部分均没有提及。其实这种情况还不只是在《高卢战记》存在，在稍后恺撒所写的《内战记》也没有前言或导言部分，也是直接进入主题。可见恺撒这种写作方式一直没有改变。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否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说，恺撒“的确拥有贵族般精神”的缘故？

还是如西塞罗所说，因为恺撒喜好“纯粹以裸体示人的文体”？

还是如小林秀雄所说，因为恺撒是个“不考虑读者的喜好，只是自我满足式地呈现力与美”的人？

若要是依据“文如其人”这个观点来看，以上三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虽然我也赞同，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恺撒并非不写前言

或导言部分，而是“不会写”的缘故。他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作家，所以并非在技巧上无法办到，而是碍于其他的理由而无法写。如果能通盘考虑他为何希望在北意、南法和伊利里亚三行省有五年的总督任期，或许更能进一步了解这一点。

在《高卢战记》开篇的段落中，恺撒说明了高卢问题并非开始于他担任总督的公元前58年，而是在三年前就已经有征兆。

恺撒所称的高卢就是莱茵河流域以西的地方，以现在的地理概念来看，也就是除南法以外的法国全境、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的南部、德国的西部以及瑞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西欧。

我们现代人是很难想象在恺撒时代这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的。森林、沼泽、河川占有比耕地要多得多的面积。但依据学者的推算，由于水源充足且气候不那么严寒，大约能生产足够供给1200万人的农产品及家畜。虽然恺撒将这个地方大致一分为三，但其实即使是未开发地上，也因为土壤丰沃而有人口聚落。高卢全境有10个以上势力较强的部族，如果加上小部族，就有近百个部族存在，离统一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这是公元前1世纪高卢的现状。

南方的罗马行省，希腊人居住的城市马赛并非是高卢的威胁。住在中部和北部的高卢人，因为不同于被罗马化而剪着罗马风格短发的南部高卢人，被罗马人称做“长发高卢”。他们所受的威胁却来自东方，那就是居住在莱茵河东侧的森林深处的日耳曼人。与莱茵河西方不同，两岸虽同为森林与沼泽，但在莱茵河东侧的气候更为恶劣。为了供给1万人口的生活所需，只靠筹借粮食的方法是不够的。对没有东西可吃的人来说，涌向有食物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于是每逢粮食筹措困难时，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的“蛮族入侵”，就成了例行的举动。

恺撒笔下所记录的属于比利时人居住地的东北部高卢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已经被渡过莱茵河来此定居的日耳曼人所占

据；因此莱茵河下游处的民族迁移相当频繁，而在莱茵河的中游及上游，由东至西，渡河而来的日耳曼人有增无减。

高卢全图

想到日耳曼民族对西欧的威胁2000年都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我不禁感慨不已。日耳曼人的侵略攻击比较容易成功的原因，或多或少是基于高卢人不团结统一的倾向。居住在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人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请求罗马元老院赐予“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而能够获得这相当受承认的权力，也是部族间争执不休的高卢人曾向日耳曼人求助的缘故。日耳曼人利用高卢人自己彼此间的争斗，仿佛是滴落在纸上的墨汁般扩散开来，开始逐渐向莱茵河的西方浸透。

对此难以接受的是居住在列曼湖东边的赫尔维西亚人。“赫尔维西亚”这种称呼至今仍被使用，就是指瑞士人。他们是败给日耳曼人的人，因此时常感到有股来自东边的压力推挤着他们，于是赫尔维西亚人

决定逃向更西边、更濒临大西洋的高卢最西部的不列塔尼亚地方。

整个部族的迁移从小女孩到邻近的小部族全部包括了进来，总共约36.8万人，其中的9.2万人是身负战斗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迁移的准备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储备了两个月的粮食，并且他们毫不眷恋地烧掉了12个镇和多达400个村落。现在的问题是从哪条路线向西走。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由集结地杰内瓦（现在的日内瓦）直接通往西边的道路；另一条是在杰内瓦的一条沿着罗讷河向南边的道路，可进入边境的罗马行省。接着，再穿过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的罗马南法行省的北边，由奥弗涅人领地再度进入高卢，沿加龙河北上到达目的地不列塔尼亚。

第一条直接前往西边的道路优势是路程短，但必须穿过埃杜伊人等强悍部族居住的地带。而部族迁移越境这样的举动通常会惹来战争。如果选择第二条道路，虽然要绕往南方，迂回而行，颇费周折，但如果能得到罗马行省的准许，就能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从而避免人员的伤亡。

赫尔维西亚人的首领将开始迁移的时间定在公元前58年的4月，他向罗马的行省总督请求批准通过行省。恺撒对这项请求明确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可公开说明的理由；二是不可公开说明的理由。

第一，30万的人、行李车和家畜，不可能不生枝节地安全通行而过。站在保障行省人民的安全与行省防卫的立场上，只有拒绝了。

第二，其实恺撒一开始就反对这项迁移活动。因为不列塔尼亚这个赫尔维西亚人所决定的目的地并非荒芜之地，那里长年居住着皮克顿人和萨恩托尼人，而这两个部族也没发出任何邀请赫尔维西亚人的信息。因此，即使途中能担保没有战事，却能预见到达目的地之后会发生的战争。如果这根导火线使战乱扩及多部族分立的整个高卢，将会产生大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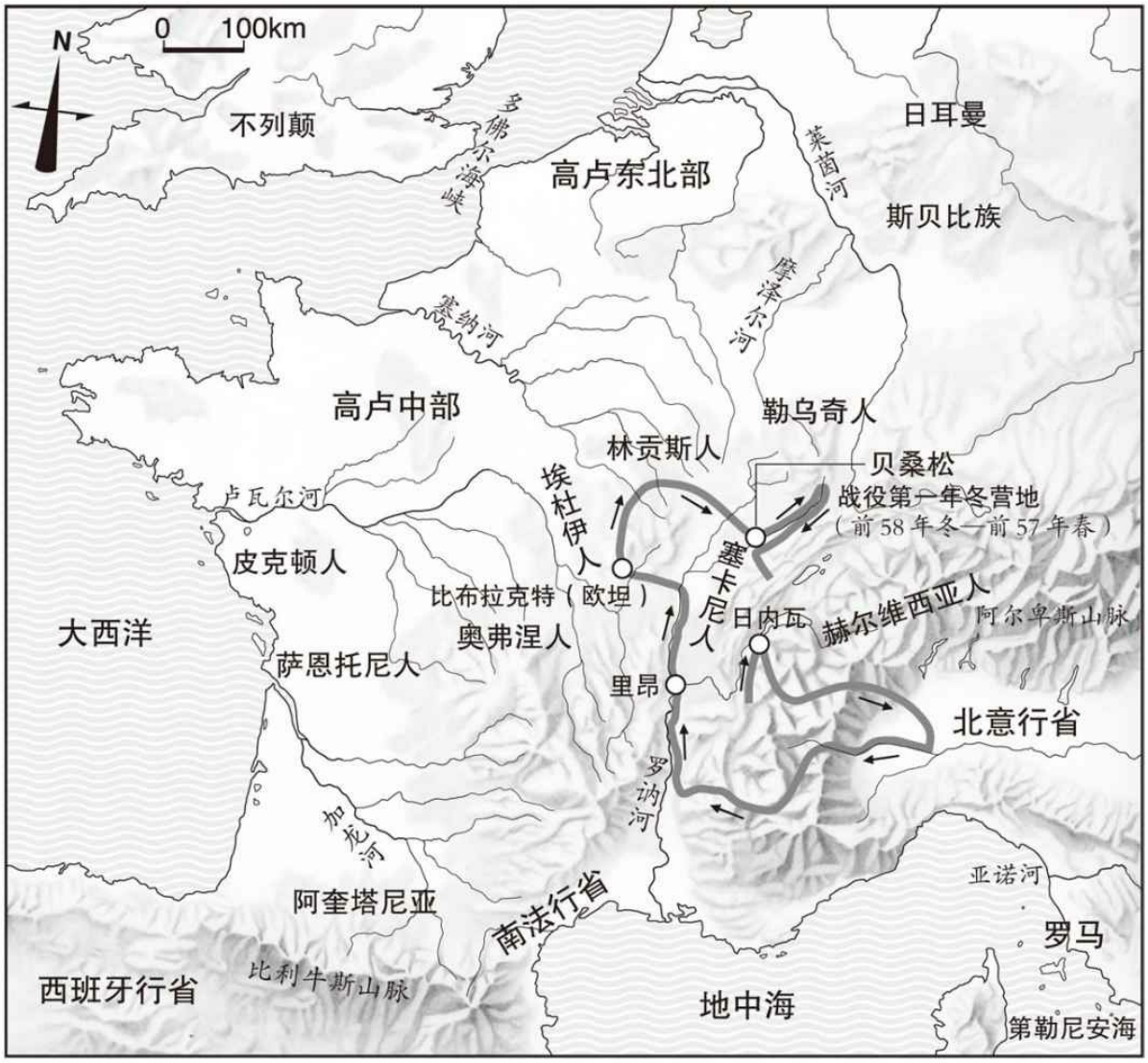
的难民，而难民一定会向没被卷入战乱的南方迁移。负责位于南方行省事务的恺撒，自然没有给予通行许可的理由。

只不过此时恺撒心中一定有些感慨吧。那就是在自己还是执政官的一年前，接受日耳曼人领袖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请求，给予他“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结果事实证明这样做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承认阿利欧维斯图斯是罗马的同盟，本是想将他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可这个日耳曼人就以为对高卢人可以不太在意，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遭受日耳曼威胁的赫尔维西亚人，不得不舍弃先祖传下来的土地。

赫尔维西亚人并没有因为被恺撒拒绝而打消迁移的想法，他们不得已采用了第一个方案直接西行。但是正式迁移还未开始，就早已与住在迁移方向的其他高卢部族之间发生冲突。于是赫尔维西亚人的迁移计划再度改为南行。恺撒此时还在罗马，接到这份报告时还没前往任地。

高卢战役第一年（前58年，恺撒42岁）

按照惯例，在罗马前执政官即将赴行省任总督时，罗马境内会举办连日的欢庆宴，然后再由前执政官的家族、亲戚及众多“client”(被保护人)欢送，风风光光地出发。行省总督被赋予罗马国的军事责任，如果能为防卫国家建功立业，对同门的男子或“client”而言，可就有被提拔的希望了。此外，罗马男子喜爱“庄重”这个词，所以在出发就任行省总督这件事上，也必须庄重。恺撒将有长达5年的时间无法回罗马，因此举办一场既庄重又盛大的欢送仪式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将近42岁的恺撒离开罗马时，除了对自己很亲近也很牵挂的母亲奥雷利娅频频叮嘱，以及对留在罗马的亲信明确指示接下来的任务以外，并没有再花时间准备其他的事情。他的出发既不隆重也不盛大，甚至没有引起市井罗马人的注意，简单朴素地就结束了。实际上恺撒在拒绝赫尔维西亚人的请求之后，立刻带领着数名骑兵急忙向北奔驰而去。



家境良好的罗马家庭有将儿子托付给他人以训练成为武将的习惯，这数名骑兵中除了恺撒亲自任命的副将拉比埃努斯外，其余的就是托付给恺撒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三头政治”中克拉苏的长子、与恺撒有亲缘关系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恺撒的侄子昆图斯·佩提乌斯，都是25至30岁之间的青年。只要是贵族出身就享有将官的待遇，但是对刚来接受武将训练的人似乎无法赋予重任，因此，恺撒让平民出身的拉比埃努斯担任将官们的领导。从公元前63年开始，也就是恺撒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前5年，与恺撒同岁的拉比埃努斯就和恺撒齐心协力地合作。在元老院派

的眼里，拉比埃努斯是个只会惹麻烦的同僚，因为那一年他是护民官。

公元前58年春，到达任地后的恺撒紧急召集统辖下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4个军团。但只有第十军团距离较近，其他3个军团位于今天意大利的东北部，屯驻于古代的重要基地阿奎莱亚。而且即便4个军团合起来，也不过只有2.4万人的兵力。恺撒在这个时候已经命令再编组第十一与第十二两个军团。但军团的新编成必须经由元老院的许可，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进行。于是恺撒没等从阿奎莱亚出发的3个军团到达，也没等另2个军团的编成，他就下令让晚到的军团与新编成的军团尽快追上他。恺撒只率领第十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然后在罗讷河岸边停了下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并未越过罗马行省和高卢的疆界，而只是现身在边界之地。

可即使这样已经让赫尔维西亚人感到惊慌失措了。3月底，他们派出使节要求恺撒准许他们通行于罗马行省内。当时恺撒并未给予使节答复，只是委婉地告诉对方，由于需要时间考虑，请他们过半个月后再来。而实际上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恺撒为了防止他们从中部高卢向南边行省入侵，就在罗讷河南岸围起长达28公里、高4.8米的防卫栅栏，防卫栅栏前方还挖掘了一条壕沟。这项工程由第十军团的士兵担任。栅栏筑好之后，在4月15日那天才明确地拒绝了赫尔维西亚人使节的要求。

于是赫尔维西亚人又再度陷入混乱。他们明白如此一来，只剩下西行一途了。他们请求住在西方的埃杜伊人去说服住在那条路线上的塞卡尼人。埃杜伊人是中部高卢中最强大的部族，而且也与罗马拥有友好国的关系。部族的有权势人士中，甚至有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埃杜伊人的首领了解赫尔维西亚人的困境，便成功说服了塞卡尼人让他们通行。然而，30万人的移动要不生任何枝节倒也是件难事。不得已借道而行的一方与无可奈何让其通行的一方，两者间所起的小摩擦一下子就扩大开了，混乱甚至波及埃杜伊人的领地。埃杜伊人后悔自己游

说却为时已晚。那段时间，恺撒与他的军团丝毫没有放松对南法的监视。因为在文官控制的元老院体制之下，罗马军在国境尚未遭受侵略的情况下，不可以随意出动，只能专心致力于防守保卫的工作。

然而，由于赫尔维西亚人的通行所造成的混乱，有从混乱演变成战乱的趋势。乱了阵脚的埃杜伊人向有同盟关系、约定相互防卫的罗马求援，当然也就是向距离高卢最近的罗马总督请求派遣援军。

行省总督恺撒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遵照元老院的指示。但是那时，他判断没有再等下去的时间了。公元前58年5月，恺撒与他的军团越过南法行省边界，进入高卢之后立刻在鲁古都努（现在的里昂）与埃杜伊人的代表会面。于是罗马与埃杜伊人在高卢结成了共同的战线。不过与高卢人的共同战斗关系是恺撒不太放心的信赖关系，毕竟高卢人存在着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在政治上，有时即使对敌方也不得不信赖。于是在高卢的恺撒从政治和战争两方面同时展开了攻势。

塞卡尼人与埃杜伊人的领土境内，有一条阿拉乌河（现在的索恩河），它是由北方流入罗讷河的支流之一。由于水流和缓，可以用小船渡河。根据恺撒派出的侦察兵带回来的报告，赫尔维西亚人正群聚在那条河边，而且有四分之三的人已经渡河，剩下四分之一的人还留在原来的岸边。得知情报的恺撒率领3个军团半夜便奔向敌军营地。

遭遇恺撒的突袭并且是在一分为二的情况下，赫尔维西亚人自然不是罗马军团的对手。在岸边的没有渡河的赫尔维西亚人，除了逃掉的均被杀死。已经渡到对岸的同族人则束手无策，于是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恺撒并没有休息便要求军团造一座桥，军团兵摇身一变为工兵，一天的工夫就造好了一座桥。

罗马人工程技术水平着实让赫尔维西亚人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派遣使节向恺撒要求讲和，并表示愿意迁移至恺撒所指定的地方居住。恺

撒以提供人质作为担保及赔偿埃杜伊人的损失为条件，答应了这项求和。然而使节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他表示自己部族只有接受他方人质的习惯，并无提供人质的习惯，说完后竟扬长而去，于是和谈破裂。恺撒派出了6个军团追踪往北方前进的赫尔维西亚人。这半个月来的追踪，双方一直保持不超过80公里的距离。在这期间，恺撒遇到一个新的难题，就是有共同战斗关系的埃杜伊人常常耽搁军粮的供给，恺撒对这件事当然还是以信赖的态度来掩饰他的不信任。不管怎样，埃杜伊人为恺撒带来了4000名骑兵，这对原本在骑兵战斗力薄弱的罗马军而言，是不可小看的军力提升。因为赫尔维西亚人向来以骑马民族闻名，埃杜伊人骑兵的加入，对恺撒而言帮助不少。

军粮的确保对在敌方阵地战斗的总司令官而言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甚至与战斗指挥有同等的重要性。战争是为了寻求生存而非毁灭。如果战争开始演变成自我毁灭的行为时，人就会丧失原本理性，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能明白战争是为了寻求生存，那么也就能维持组织的健全性。而其中连一个士兵都最清楚明白的要事就是粮食的确保。它的重要性恺撒一生都谨记在心。

罗马军团决定每15天就发放一次以一天1000克为分量的主食小麦及其他配给，细目为850克的小麦、150克的油、20克的乳酪再加上少许的醋。领到配给的士兵们，分成10人左右的小班，各自烧煮就餐。如果发放粮食比预定日期迟了，即使是普通士兵也知道是军粮不足了。追随在赫尔维西亚人之后的恺撒，有时即使遇到大好进攻机会，也不得不停止，因为配给要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两天，可能是无法确保有充分的军粮。

在恺撒军团东北方18罗马里（约合27公里）处，坐落着埃杜伊人的首都比布拉克特（靠近现在的欧坦）。为了确保军粮，恺撒便率军团往东北行进。然而一个参加罗马军的高卢骑兵暗自给赫尔维西亚人告知了恺撒的动向，于是赫尔维西亚人便掉头回来。或许是因为罗马军一直没

有利用良好战机而让赫尔维西亚人看轻了他们，或是赫尔维西亚人想切断罗马军的军粮补给，他们首先挑起对罗马军团的战争。在后背遭受攻击的恺撒，立刻迎战。

在步兵军团都登上附近山丘的同时，恺撒派出骑兵团迎敌。这样在骑兵与敌军交战的时间里，在整个山丘上罗马军团作了以下的部署：由老练士兵们所组成的4个军团，已依照罗马军传统的三列阵型在山腰布阵妥当；在他们后方则部署了新编成的2个军团以及由罗马公民兵以外的士兵所组成的机动兵力；而装载帐篷等物品的运输车队，则远远地摆在山丘的顶端，以免干扰士兵的战斗。

罗马军各有指挥官分别镇守各自的中队、大队和军团。而高卢人则采用希腊式的密集阵型，从山丘下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迎敌的罗马军一方则是依照恺撒的命令摆出背水一战的阵型。因为布阵于山丘坡地，逃走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情况不妙，只有骑兵可以策马奔逃。明白这一道理的恺撒却跳下马来，加入到步兵的行列。在《高卢战记》中恺撒写道："这是为了和士兵同生共死，并且断绝他们逃亡的念想。"

这样一来就非战斗不可了。好在步兵主要武器之一的投枪，从山丘斜坡射向敌方那支大型密集队伍的命中率相当高。这支大型密集队伍也因此而四散开来了，于是排在前边的罗马士兵开始拔刀追击溃散的敌军。

还有一个对由攻势转变为守势的高卢兵不利的因素，那就是罗马军的投枪前端已被改良成弯曲的式样，在穿透敌人的盾牌时会挂在上面，很难被拔出。在这场与赫尔维西亚人的战斗中，这样做的目的充分达到了。中了2米长枪的盾牌，简直毫无用武之地。高卢人只好丢弃盾牌，在没有盾牌防卫的情况下战斗。

于是，兵力占优势，比恺撒3万名士兵多出3倍的赫尔维西亚人开始向后撤退，他们的目的地是前方1.5公里的山丘。罗马军紧随其后，但此时遭受到了从他们未持盾牌的右手方向过来的士兵的攻击，这些士兵是与赫尔维西亚人共同行动的高卢部族。见到这个形势的赫尔维西亚人，也从原本的落荒而逃转为下山再战，于是一下子罗马军变得腹背迎敌。然而此时罗马军的三列阵型得以发挥作用。第一和第二列迎战赫尔维西亚人，第三列则迎战突袭之敌。于是双方开始第二场战斗。

日落时分胜负才得以见分晓。高卢人也算是英勇无畏，从第7时（下午1点）开始至战斗尾声的日落时分，没有一个人逃走。生还的高卢人取道东北方向逃跑了。

恺撒没有办法追击他们。他写道，为了照顾伤兵及埋葬死者，罗马士兵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之久。然而，也没有理由因为牺牲人数众多就让军队停滞不前。第四天，全军再度展开追击。也许那三天是为了要让历经五小时激战的士兵得以休整恢复呢。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并非恺撒亲手选拔的军团，而是从前任指挥官手中接过来的；第十一、第十二军团虽然是新编成的，但也未经恺撒挑选过。而借由此战，这些军团成了恺撒亲近的部属。恺撒不是个会选拔属下的领导者，而是个能灵活调动属下的领导者。而要能灵活调动属下，就必须在恰当的时机给予属下需要的东西。

或许是恺撒思考过即便休整三天也无所谓吧。在比布拉克特的战斗中，赫尔维西亚人遭受了重创而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他们中生还的士兵打算投奔林贡斯人。而恺撒派遣的使者早就传达了帮助逃亡者视同逃亡者一样皆为罗马敌人的旨意。经过三天的休整后，罗马军再度展开追击，此时赫尔维西亚人已陷入无法南行、无法西行，东北边也无处可去、无食粮供应的境地，他们只好向恺撒请求谅解。

现在	罗马时代
6 时 （午前）	黎明
7 时	第 1 时
8 时	第 2 时
9 时	第 3 时
10 时	第 4 时
11 时	第 5 时
12 时	第 6 时
13 时 （午后 1 时）	第 7 时
14 时	第 8 时
15 时	第 9 时
16 时	第 10 时
17 时	第 11 时
18 时	日落
19 时	第一夜警时 以 第一步哨时
20 时	
21 时	
22 时	第二夜警时 以 第二步哨时
23 时	
24 时	
1 时	第三夜警时 以 第三步哨时
2 时	
3 时	
4 时	第四夜警时 以 第四步哨时
5 时	
6 时	黎明

罗马人的一天（计时器——水时计、沙时计、日时计）

讲和在赫尔维西亚人交出人质与武器的情况下成功了。恺撒命令他们重新返回舍弃了的土地。不过，那片祖先遗留之地上的家园和田地都被他们毫不留恋地烧毁了，回去也只有被饿死。恺撒下令给予他们一些粮食援助，但在这批粮食吃完以前，要将烧掉的城镇和村落重建起来。恺撒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赫尔维西亚人的土地闲置的话，将有被渡过莱茵河前来定居的日耳曼人占领的危险。

赫尔维西亚人最初迁移时有36.8万人，再次回到故土时仅剩下了11万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瑞士人又继续住在瑞士了。如果不是这样，法国的某处可能会被称做瑞士也不一定。也有可能瑞士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日耳曼问题

解决完赫尔维西亚人问题后归营的恺撒收到了高卢诸部族首领们的祝贺。得到恺撒的许可后，于比布拉克特召开了高卢部族首领会议。会中所讨论的议题是赫尔维西亚人的迁移所产生的混乱结束后高卢该何去何从。恺撒没有出席这场会议，不过，会议的议长是埃杜伊人的首领迪比奇阿库斯，他是出了名的亲罗马派，因此恺撒在暗中操纵的可能性很高。高卢部族首领会议结束后，代表们拜访恺撒并向他通报会议的结果，希望恺撒能实现会议决议之事。

他们的决议就是要求恺撒代替高卢同日耳曼人谈判。由于莱茵河以东生活环境严酷，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从刚开始的1.5万人剧增为现在的12万人，并且侵入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人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的力量非常强大，他欺压邻近的高卢人，甚至于高卢民族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人也需向他交出人质及每年都有的贡金。日耳曼的问题对高卢人而

言很复杂，因为同为高卢民族的埃杜伊人和奥弗涅人相互之间一直在较劲，而奥弗涅人和住在高卢东部的塞卡尼人串通，邀约日耳曼人来高卢和他们结为同盟共同战斗。于是以与罗马有友好关系的埃杜伊人为首，拜托恺撒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日耳曼问题。埃杜伊人的首领迪比奇阿库斯请求恺撒说：

> 如果恺撒和罗马不给予任何协助，高卢全族将只能和赫尔维西亚人一样，开始向更远的地方迁移了。
>
> 然而，基于前些日子的大胜与罗马之名，我们充满着对您和您手下军团的信任和希望。相信您一定能够阻止更多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相信您能够解放全高卢，洗刷阿利欧维斯图斯带给我们的屈辱！

在场的其他部族的首领也同声附和埃杜伊人的首领，要求恺撒接受这项任务。面对此请求，恺撒首先说了些激励他们的话，接下来所说的，如果直译的话就是“约定将妥善处理”。恺撒这里的“妥善处理”，所指的是“执行”的意思。

回答“妥善处理”的理由，恺撒依照自己惯用的条例方式条列如下：

一、埃杜伊人虽为罗马友人，也不得不如同被奴役般向日耳曼人提供人质。这对罗马是相当有损名誉的。

二、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大举涌入高卢，这对罗马甚为危险。因为，如果比高卢人更未开化且好战的日耳曼人称霸高卢的话，不只会令人想起金布利人和铁脱尼人的前例，还可能眼见他们入侵意大利。因为与日耳曼人交情很深的塞卡尼人居住的地带与罗马南法行省边界只隔着一条河。

三、阿利欧维斯图斯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其他部族所能忍耐的极限。

但恺撒还是选择了以谈判的方式来作为解决日耳曼问题的首选策略。没想到阿利欧维斯图斯对要求派出使节参与会谈，却作了如下的答复：

> 如果是我认为有必要谈判，理所当然是我去拜访恺撒。不过现在是恺撒认为有会谈的必要，所以应该是他过来拜访我才对。军队的移动并非易事，要是我要去有恺撒驻军的高卢我又必须带着军队前往。

然后，日耳曼人的首领还相当出人意料地添了一句：

> 身为罗马将军的恺撒，为什么要对我们日耳曼人历经战斗所得的高卢显示出关注之态呢？真是让人费解。

恺撒再度派出使节回复阿利欧维斯图斯。这次使节将之前会谈的决议带了过去。

一、不再让已经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居住在高卢。

二、日耳曼人应该释放埃杜伊人的人质。

三、日耳曼人不再发动针对埃杜伊人以及同盟部族的战争。

如果能遵照以上要求执行，阿利欧维斯图斯及其日耳曼人下属，就能享有与恺撒以及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如果不行，按照罗马法，身为南法行省总督的恺撒，绝对会不遗余力地保护罗马与同盟友邦的利益。恺撒一定会对欺侮埃杜伊人的人给予处罚。

阿利欧维斯图斯的答复很快就送回了：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战争铁定法则。罗马国也常以自以为是的方式来统治手下的败将。我不曾向罗马进言该如何对待战败者，也因此，我也没想请罗马人教我如何处置战败者。

埃杜伊人正是因为战败才被课以年贡金。但恺撒的到来造成我莫大的损失，因为他来到高卢之后缴纳给我们的年贡金减少了。我没有归还埃杜伊人人质的意愿，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缴纳年贡金，我自然不会对他们开战。但是，如果他们寻找理由不缴纳年贡金，即使他们和罗马是同盟友邦也毫无作用。而恺撒在断然宣称会惩罚违背他的意愿的人时，也应该想到到目前为止与我敌对之人，还没有一个不衰败灭亡的。

如果恺撒有进攻的意思，那么尽管进攻吧。连恺撒都不忘日日习武练兵，这不正表明了他承认14年来不曾因定居而有所松懈的日耳曼人是多么英勇。

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这个回答无疑是最后通牒。也许是由于日耳曼首领表现出了强硬态度，局势有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恺撒很快就收到之前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开始蠢蠢欲动、即将发动袭击的报告，接着，又收到日耳曼人中最强悍的斯贝比人正大举集结准备渡河的报告。但因为书信的往返浪费了很多时间，恺撒没能阻止已经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新来的日耳曼人相会。恺撒向全军下达了向阿利欧维斯图斯所在之处出兵的命令。这次行军采用的是第二种行军速度。

如同在《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中叙述过的，罗马人做什么都喜欢手册化，因此就连军团的行军速度也分成三种记载于册。但因为是多达上万人的行军，所以不是以时速而是以日速，也就是依照每天的行走距离，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通常行军——5小时走25公里。

二、强行军——7小时走30至35公里。

三、最强行军——日夜兼程，尽可能快地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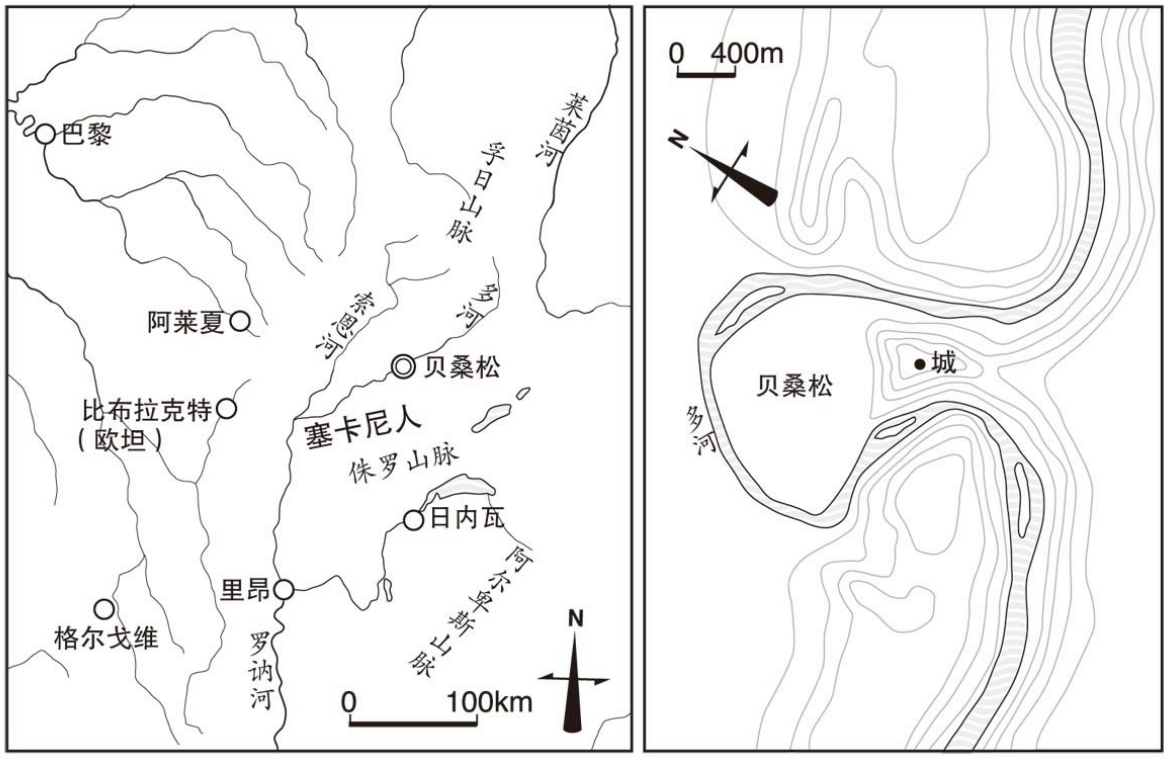
虽然士兵们身上通常都背负着将近40公斤的武器及粮食，而尤其是作为罗马军主力的重装步兵，在身高上不如高卢人及日耳曼人，但他们都强健敏捷，能够按照要求行军前进。

往东边追踪日耳曼人的恺撒军团，出发当初是采取的第二种强行军，而在三天后被迫更改。因为阿利欧维斯图斯开始进军并正朝贝佐提欧（现在的贝桑松）移动的情报传了过来。贝桑松是塞卡尼人的根据地，食粮和武器的贮藏丰富。河川如同用圆规画出的圆般包围着位于山丘上的城镇。这个地区如果落入敌手，那么恺撒军队的军粮补给就得仰赖百里之远的埃杜伊人了。将行军速度提升至第三种的恺撒军队，不久就到了贝桑松，之后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个地方。塞卡尼人一方面出席高卢族长会议，一方面又和日耳曼人走得很近。而恺撒的闪电作战快得让他们无法想象。也许这也就是恺撒采用最强行军的理由吧。

在贝桑松数天的准备与休息期间，有些与日耳曼人在生意上有来往的高卢商人，向恺撒的士兵报告了有关日耳曼人的信息。比如日耳曼男子体格魁梧高大，他们能够灵活运用武器并且勇猛无比。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他们雄健的体格与锐利的眼光，会令敌人感到无法动弹。罗马兵直接与日耳曼人对决的历史，须追溯到40年前的马略时代。罗马男子的个子原本就比较矮，连高卢人也对此嘲笑不已。这些消息传开后，恐慌在罗马军团很快蔓延开来。发生在这之后的事，我想直译《高卢战记》中的一段描写来代替，恺撒那讽刺和幽默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实属绝品：

> 恐慌先是发生在随恺撒参加此次战役但缺乏战场经验的年轻将官身上。他们当中有些人向恺撒提出有急事不得不离开的休假请求；有些人害怕被嘲笑为懦夫虽然留了下来，却无法装出朝气蓬勃的样子，不是坐在帐篷里独自流泪，就是和同伴们在一起感叹命运

不济。宿营地满是在遗书上盖封印的声音。



贝桑松位置图

这样的恐慌甚至渐渐地渗透到原本已习惯沙场征战的熟练士兵、百人队队长以及骑兵团团长身上。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已陷入恐慌的人说道："日耳曼人其实并不可怕，行军在日耳曼人所在之处的艰险路程及深邃森林才最可怕呢！"有的人则说："在那样的路上运送军粮，真是令人担心呀！"还有人甚至向恺撒发出紧急报告："如果总司令官恺撒下达继续出发的命令，士兵们拒绝举军旗前进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已至此，恺撒召集包括百人队队长在内的全体将领召开作战会议。

通常的作战会议，列席的有军团长和大队长，百人队队长中只允许指挥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的首席百人队队长出席。而那天的作战会议中，连平常没有出席资格的300名百人队队长也被召集。平常的作战会议约

是130人，那天有430人出席。这显示了恺撒意图在当天的作战会议中，传达所有的作战信息。接着译文如下：

恺撒在作战会议上，首先痛斥大家对战略抱持批判和质疑态度。然后又说道：

“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阿利欧维斯图斯积极争取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而现在为什么毫无理由地破坏原有的关系呢？我自己深信，他如果非常理解我的要求，并且了解这项措施的公正性，就不会认为我和罗马公民违反了对他的承诺。但即使他被疯狂所驱使而挑起战争，你们又何须惊恐？为什么非得要对你们自己的勇敢和我的判断怀疑呢？

“在我们的父辈一代，罗马就曾经和日耳曼民族开战。那是在马略毁灭金布利人与铁脱尼人的时候，后来还有奴隶战役（日耳曼人很多）。他们之所以能与罗马军对战，也多是从罗马人处学得的战术及军规。由这些例子看来，只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明显的才是在战争中制胜的武器。事实上，长久以来罗马人无缘无故地害怕日耳曼人，我们完全可以在对决时打败日耳曼人。虽说是日耳曼人，不是连赫尔维西亚人有时也战胜他们了吗？两者是同样的民族，而那个赫尔维西亚不正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

“将内心的恐怖推到行军路途艰险和担心欠缺军粮的人，只能说是冒昧而且放肆。因为这些人，如果不是不信任总司令官所拥有的责任心，就是擅自说些并未征求总司令官意见的事。身为总司令官的我不但已经考虑过这些事情，也在这方面作了若干部署。军粮之事，由塞卡尼人、雷乌契人与林贡斯人提供，而且现在正值农作物收获季节。而有关行军路程到底怎么样，等行军开始了你们再自己确认吧。

“此外，还有人在背地里窃窃私语，说什么即使我下达出师的命令，士兵们也不会举着军旗服从。我对这样的谣言并不介意，因为带不了兵的将军，不是因为战略错误而招致幸运远离，就是因为被贪念所驱使，做出不正当的行为。我的公正与无私，已经印证在

我的前半生中。我的幸运也在对赫尔维西亚人的胜利中显示出来了。

“现在，我将本想再过一段时候才告知大家的事情公布出来。明天晚上，一进入第四步哨时，我就将离开宿营地，这也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是心中的荣誉感和义务感得胜，还是恐惧和疑虑得胜。即使没有其余跟随前来的人，我就只率领第十军团出发。第十军团的忠诚度是不容置疑的，而在那之后，第十军团将成为我的近卫军团。”

这就是恺撒说话时能抓住人心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我想对方即使是女人也必定会被他说动。

当晚恺撒的演说立刻在宿营地四处传播，将士们都士气振作起来。第十军团的士兵向恺撒宣誓了自己的忠诚与义务，并且宣告已经完成了出征的准备。其他的军团派出指挥官向恺撒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批判总司令官的战略。恺撒接受了他们的致歉，承认他们仍为原来的部下。

士气高涨时就得好好利用，经与埃杜伊人首领迪比奇阿库斯商量，恺撒决定选择较为平坦的一条行军路线，相比险峻之路须绕道75公里左右。于是罗马军依照作战会议中宣布的日期与时刻出发，经过7天的强行军后，得到侦察兵带回来的情报，阿利欧维斯图斯就在前方距离36公里之处。

知道恺撒正逐渐接近的日耳曼首领，派使节告诉恺撒可到自己的领地举行会谈，恺撒答应了这个要求。于是会谈地点定在两军之间的宽广高地上，日期定在五天后。阿利欧维斯图斯提出两位首领都不带步兵而只带骑兵的要求，恺撒也答应了。因为日耳曼人的军队主力不是步兵而是骑兵，因而对有名的罗马重装步兵深怀恐惧。但是，恺撒军的骑兵团是由以埃杜伊人为首的高卢骑兵组成的。在高卢人的保护下与敌方将领会谈，令恺撒感到不安。于是他换下高卢骑兵，而指派第十军团的重装

步兵成为追随自己参加会谈的骑兵队。第十军团的士兵笑着说："恺撒虽然约好要将我们升格为近卫队，但是现在就将我们升格为了骑兵队，这是更好的待遇啊！"罗马人其实还是很喜欢开玩笑的。

会谈当日，在登上高地的300米前，恺撒命令骑兵团等待，阿利欧维斯图斯也同样这么做。按照日耳曼方面的要求，之后恺撒只率领10名骑兵前进。这其实又是接受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要求，以骑在马上的姿态展开会谈。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高卢语吧。阿利欧维斯图斯在高卢生活了14年，已经通晓高卢语了，恺撒这边则由与恺撒有私人情谊的高卢人担任整个秘书工作。

会谈首先由恺撒发言，发言的要旨和已经交换的书简里的内容大致相同。发言快完时恺撒这样总结道：

> 罗马的传统就是不会看着与自己有着友好同盟关系的民族衰败而不管，罗马期望他们能够走上更繁荣和光明的道路。因此任何一位罗马人，都无法对有同盟关系的埃杜伊人被夺走之物熟视无睹。我再重复一次，曾托付你的使节所带回去的要求，请勿再对我的同盟部族埃杜伊人发起挑衅，请将他们的人质和俘虏送还。我不要求将已经迁居至高卢的日耳曼人遣返，但是，你们需要发誓不再渡过莱茵河。

阿利欧维斯图斯也重复了在书简中所提及的立场并对恺撒的意见提出反对。不过他认为日耳曼人并非擅自越过莱茵河，而是被高卢人邀请才渡河而来的。他甚至要恺撒别出手管罗马南部行省以外的高卢，如果多管闲事就会引来战争。他自己并不认同恺撒所说的发生战争就会破坏了他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因为假使恺撒战死，罗马的许多贵族反倒会感到高兴。如此一来要得到他们的好感就更容易了。这是日耳曼人的说辞，甚至连元老院派与恺撒势不两立之事也在他们的掌握中，真是消息灵通。

在恺撒开始继续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跟随阿利欧维斯图斯前来的日耳曼骑兵开始接近恺撒带来的骑兵并投掷石块，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危险。恺撒中止了发言，返回到自己的骑兵处，命令他们立刻离开。虽说第十军团的步兵可谓所向无敌，但敌方可是纯粹的骑兵。将培养出来的士兵作无谓的牺牲，这种事只有重视面子的指挥官才做得出来。

恐怕在举行会谈之前，恺撒就已经料想到这个结果了。他是要借这个会谈，让将士以及在远方的罗马接纳这场虽全力避免但依然发生的战斗吧。不久，如同他所预测的，两军互相逼近，进入战争状态。

其实阿利欧维斯图斯并不急着在自己的领地内开战。他先派出占优势的骑兵去切断恺撒军的军粮补给路线。恺撒并未上当，他在敌阵附近筑起营地，准备挑起会战。虽已迫近敌阵，但是敌方并未出营。恺撒再筑第二个营地，继续加以挑衅。敌方虽然派出少许兵力，并且可见出营应战的样子，但是还没有到全军出战的地步。

恺撒无法理解究竟怎么回事，询问俘虏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日耳曼民族有请当母亲的女人抽签占卜何时为最佳出战时机的习惯。据说这一次所抽到的签表明，在几乎看不到月亮的新月期间打仗的话，日耳曼人不会有获胜的希望。恺撒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利用了这一点，决定在第二天清晨展开决战。

恺撒并未告诉我们日耳曼人的军力究竟如何，但是之前他曾提到过12万人。在“相对于敌军的庞大数量，我军显得人数稀少”这句恺撒所写的话中，可见两方的兵力悬殊。特别在骑兵方面，恺撒方面只有高卢的4000名骑兵，而敌方的6000名骑兵则处于绝对的优势。还有一点就是日耳曼民族的战斗方式也不同于罗马人，通常他们会把女孩一起带到战场，期待由女孩子的激励和哀求，让男子们奋勇战斗。面对恺撒的挑战而不得不出迎的阿利欧维斯图斯，也让载着女孩子的马车随行，并用这些马车阻断了士兵们的退路，可以说也是一种背水之阵。

比起背水之阵，另一方的恺撒的阵营则有较多的空间了。首先，指挥工作由恺撒担任，6个军团的军团长无须做指挥官的工作，他们只需负责监督每个士兵的作战状况。于是，每一个士兵都确信只要自己敢于拼杀，自己的英勇矫健一定会传到恺撒的耳朵中去。他们正是带着这份自信与自觉走到战场上去的。

在这次高卢战役的第二场战斗中，恺撒虽未布下背水之阵，却正确地掌握了敌情。见敌阵的右翼较为薄弱，就由那里先展开攻击。日耳曼人原本薄弱的地方，又遭受对方的先发攻击，简直是连投枪还击的时间都没有就溃散窜逃了。再者，日耳曼人和高卢人很类似，即在战争开始突击力很强烈，却有随着战斗的进行而力竭气衰的缺点，恺撒也未忘记针对这个弱点加以痛击。而恺撒之所以能够运用如此灵活的战术，是因为罗马军的构成统一为中队、大队、军团的顺序。即使战术有所变更，各队依然能够相互配合而独自行动。恺撒对这种罗马军的构成传统，并未加以改变，而是更有效地利用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一样，惯用以希腊式的大型密集队形展开战斗。这种队形，即使前方的攻击力很强，两侧却不成气候；再说，日耳曼的骑兵每个人单独的力量虽然很强，但是日耳曼人的指挥官并不懂得如何有效利用整个骑兵团的机动力量。

尽管如此，敌方人数众多的兵力似乎占了优势。罗马军的右翼正遭受比自己多出两倍以上的敌人攻击而陷于劣势。而扭转这种危机、解救右翼军的是小克拉苏。他是“三头”之一克拉苏的长子，这位青年将领被委任以指挥骑兵团的任务，当他发觉到第三军列的士兵们并未被灵活用到，于是就率领他们去支援右翼，而这正是胜败的关键。

敌军终于转身而逃。日耳曼人开始逃向距离战场7.5公里的莱茵河，恺撒亲自率领罗马骑兵团展开追击。骑兵的后面则紧跟着队伍整齐的步兵军团。能寻得皮筏或小船渡河的日耳曼人很少。阿利欧维斯图斯的两个妻子和一个女儿被杀，另一个女儿被俘。被他们捉去的高卢人，全都恢复了自由身。

这场战争的结果一传开来，原本想渡过莱茵河正向河岸附近集结的斯贝比人，便放弃了迁居高卢的打算而返回自己原来的土地。阿利欧维斯图斯虽然逃至莱茵河以东，但是也在一年后寂寞地死去了。

恺撒在高卢战役之初就连打了两场胜仗。他提早在9月中旬就让全军以冬季扎营的形式长时间休息。罗马军在高卢的初冬营地，决定设在塞卡尼人的根据地贝桑松。由那个位置，可以清楚地从高卢监视莱茵河对岸的动静。冬营地的最高责任委托给副将拉比埃努斯，恺撒自己则朝阿尔卑斯山的南方进发。他负责管辖三个行省，因此拥有自南法经北意至现在的斯洛伐克的广大地域。一方面恺撒打算巡视那里，另一方面准备执行行省总督另一项任务，也就是内政和司法等工作。

在公元前58年的战役中很多事项成了影响后世的发端。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称为雷努斯河的莱茵河，在恺撒的部署下首度明确地划为罗马国的基本防卫线。此外，河川和大海比山脉是更佳防卫线这样的概念，成了罗马人战略的最初起点。

那段时期的罗马

把事情托付给别人的人根据做事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详细交代所托付之事的人；二是将任务交给别人却不交代细节的人。这与对别人是否信赖几乎无关。前者是自己本身得到细节指示后，才觉得办事容易的人；而后者则是相反。恺撒完全是属于后者。但是，采用后者这种情况便多少有些赌博的意味，不顺利的时候也很多，这时交代事情的人就得自己处理善后。只不过，“不顺利”除了可能全部不行，也有可能是某方面行但某方面不行。因此，在作善后处理时，究竟是该立刻处理，还是可以再拖一阵子，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判断。出身名门望族却自愿成为平民的养子、立志担任向来只限平民或是格拉古兄弟之流的平民贵族才能出任的护民官、并且处处与元老院作对的克劳狄乌斯，在曾经助他一臂之力的恺撒眼里，也是属于后者。

克劳狄乌斯被前往高卢的恺撒要求盯住元老院派，然而，这位护民官做了超过盯住元老院派以外的事。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西塞罗。

克劳狄乌斯以西塞罗为敌有以下两个理由：

一、在波娜女神祭祀那晚，以男扮女装侵入恺撒住宅案的裁判中，西塞罗粉碎了克劳狄乌斯不在场的证据，险些让克劳狄乌斯被判有罪，他因而怀恨在心。

二、西塞罗出身于地方，本属于祖先中无出任执政官的非元老院阶级，但现在他非但成为了罗马人所说的“新贵”，还俨然摆出一副元老院派代表的样子，并且还买了坐落于罗马最高级住宅地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克拉苏的豪宅，西塞罗因此得意万分。出身名门的克劳狄乌斯对这种一步登天的人，产生了轻蔑。

然而，这些都属于心里的想法，如果暴露了心里的想法，目的恐怕很难达成。恺撒托付克劳狄乌斯盯好元老院派，同时也给了他武器，也就是给了他做事的方法，那就是恺撒自己在“喀提林阴谋”时所提出却并未受认可的——罗马公民应有控诉权，这意味着未经公民裁判所判决的死刑是违法的。克劳狄乌斯正是想依据这点来找西塞罗麻烦。

在克劳狄乌斯和平民建立认养关系后，西塞罗有了不良的预感。那个时候恺撒还在罗马，西塞罗便将自己的不安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该如何做才好。西塞罗与恺撒两人虽在政治思想上对立，但就学问教养方面，却是比谁都投缘，十分谈得来。明知恺撒是提携克劳狄乌斯的人，西塞罗还对他说自己的心事，我只能感叹西塞罗是个好人。

接受西塞罗商量的恺撒，向西塞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西塞罗加入到他的幕僚人员中去，到高卢避开世人的议论。在这之前，对于元老院派的很爱唠叨的小加图，恺撒已计划分派他负责埃及王放手的塞浦路斯罗马行省化的任务，这样便可以将他从罗马隔离。如果能将西塞

罗也从罗马隔离，就能达成盯住元老院派的目的。小加图依靠的是清廉的名声以及惊人的体力，他一开始演说就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而西塞罗所依靠的，则是能够赢得大众喝彩的演说能力。如果能除去这两个人，元老院派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削弱了。然而西塞罗只把恺撒的建议当做是一种好心而拒绝了。因为他相信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庞培会为他解决。

公元前58年3月，护民官克劳狄乌斯提出了将未经裁判即处死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判以驱逐罪的法律，其中并未提及西塞罗的名字。然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是，5年前的“喀提林阴谋”中，正是那年的执政官西塞罗未经裁判便将喀提林的5人处以了死刑。克劳狄乌斯的目标是西塞罗再明显不过了。48岁的西塞罗为了在克劳狄乌斯的攻势中保全自己，便想拜托同年纪的庞培为他开脱。然而庞培并不想和前来阿尔巴别墅拜访的西塞罗见面，而“三头政治”的另一头克拉苏也是闪烁其词。因此实际上两人都在西塞罗的面前闭上了门窗，而元老院也只是以同情的态度看待此事。绝望的西塞罗心想市民会站在自己一边，于是他披头散发、穿着丧服向罗马广场走去，并且叫住经过的市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委屈。但5年前那些曾经为他喝彩、称他为救国英雄的市民，竟然都在避开他之后改道而去。

罗马预定在3月20日，将举行克劳狄乌斯所提出的这条法律的投票。西塞罗在前天夜里就离开了罗马。不过，他还心存一丝幻想。他心想虽说小加图不在，但是元老院派也没有理由就这样通过克劳狄乌斯的法案，于是便在距离罗马不远处等待。不过，结果却更为残酷，得知西塞罗逃跑的克劳狄乌斯，又追加了以下获得通过的法律条目，就是西塞罗的资产不但被破坏和没收，还有如果他进入国境750公里以内，就会立即被逮捕。因此西塞罗连逃到北意大利或是西西里岛都变得不可能了。他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后，只好从布林迪西渡海到希腊去了。在他逃亡的这段时间，护民官克劳狄乌斯一声令下，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便化成了灰。在克劳狄乌斯的提议下，决定在那块土地上盖一

座自由之神的神殿。西塞罗所拥有的另两栋别墅，也被没收和拍卖。

被称为“写信之神”的西塞罗，在被驱逐的境遇中，写了很多信寄送出去，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罗马的庞培，就连在高卢打仗的恺撒也成了他写信的对象。所有信件的共同内容都是感叹自己遭受的流放之苦，希望收信人能早日帮助他回到罗马。“爱哭虫西塞罗”这个绰号的由来，正是源自这时期的信件。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文人，也是醉心于西塞罗的哲学论者。他从僧院的书库中发现了西塞罗的《书简集》，他也承认当他看到这些书简，尤其是西塞罗流放国外时期的书简时，他对西塞罗的评价的确也大为动摇。就连对西塞罗极具好感的《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也批评他不擅长忍受逆境。然而换个视角来看，其实这不也是“有人性”的评价吗？

高卢战役第二年（前57年，恺撒43岁）

塞纳河东北

后世的很多殖民帝国，一般都无视当地居民的不同生活样式，仅仅以直线来划分区域。而恺撒将整个高卢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是把语言、风俗、居民的差异，甚至连自然环境的差异都进行了权衡：

其一，是现在法国的西南部，是由注入大西洋的加龙河南侧至比利牛斯山脉，是阿奎塔尼亚人居住地。这个地方距离已是罗马行省的南法很近。和北边的高卢相比，这一地区与隔着比利牛斯山的西班牙为邻，且两者关系密切。

其二，就是包括法国一半以上、德国西侧部分以及瑞士地带。北边以塞纳河与加龙河为界，东方以摩泽尔河为界，南法行省和阿奎塔尼亚地方则为南边的边界，属于中部高卢，是说希腊语的凯尔特人和说拉丁

语的高卢人的聚集地。住在这片广袤之地的人，在古代即与希腊和罗马有所交流，因而多少和文明有所接触。南法的马赛是与罗马几乎在同一时期建国的希腊人殖民都市国家。马赛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擅长经商的希腊人与居住在内陆高卢人通商的缘故。后来，随着罗马的强大，罗马人与隔着阿尔卑斯山居住于北意大利的高卢人关系也日渐密切。比如埃杜伊人不但与罗马有同盟关系，部族中的有权势者甚至还享有罗马公民权。高卢战役的第一年，战场就在中部高卢东侧一带的地方。

其三，就是从法国东北部经比利时到荷兰南部一带的地方。是以塞纳河、加龙河、摩泽尔河为南界；西北至东北处以多佛尔海峡、波罗的海、莱茵河为界。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已经在这一带定居很久。相对于高卢人而言，恺撒将此地归类为具有日耳曼民族血缘的地带。包括被罗马人称为比利时人在内的生活于此的居民，是高卢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恺撒的理由是“比利时人的居住地距较为人性化的南部罗马行省相当遥远，并且商人也不到那里，因此他们罕有接触文明世界的机会”。“人性化”这个词是采用直译的方式，现代的译者会译成“文明

化”。而认为比利时人最具战斗力的第二个理由，恺撒认为他们与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相互争斗已是家常便饭。即使原本出自同一民族，但是对移居较久、并且定居生活下来的人而言，新到者就是敌人吧。而这些比利时人正是恺撒第二年高卢战役时的对手。

公元前58年到前57年的冬营期，恺撒正忙于南法与北意两行省的统治管理时，有关比利时人不大稳定的情报越来越多。由在贝桑松冬营中的副将拉比埃努斯发出的报告中，恺撒证实了这些情报的可靠性。恺撒决定编组两个新的军团。新编组军团士兵的募集工作在恺撒管辖下的北意行省完成。由于这次编组也是未征求元老院许可而进行的，因此没有召集来自卢比孔河以南意大利的志愿兵。与去年新编成的两个军团一样，这次又是恺撒自费维持所需开支。另外恺撒还招募了努米底亚骑兵及克里特的士兵等具特殊技能的外国雇佣兵，他们以支援部队的名义加入恺撒的军团。恺撒也积极吸纳具备罗马军传统，同时能成为忠实伙伴的当地兵。这些当地兵是以埃杜伊人为首的高卢地方亲罗马派部族。恺撒军的总数有8个军团4.8万人，加上外国雇佣兵5000人，再加上高卢当地的4000名骑兵，总计5.7万人。而在另一方，比利时人拥有将近40万人的庞大兵力。

没等这两个新军团的编组完成，恺撒就派幕僚佩里阿斯担负起率领已编成军团赶赴当地的任务。他自己在安排好军粮的准备与补给方法后，也赶快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了副将拉比埃努斯驻守的贝桑松冬营地后，恺撒首先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地搜集当地的各种情报。

而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分析，至今与罗马人罕有接触的比利时人开始蠢蠢欲动，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他们认为只要罗马入主高卢中部后，下个目标就将是他们在高卢东北部的领土。

高卢部族图

二、既然不允许日耳曼人入侵，当然也就不能允许罗马人入侵。

三、他们所在地方通用的理论是弱肉强食，长期以来他们都是以强压弱，并且使弱小的部族屈服，从属于他们。他们认为如果罗马的势力进入后这个办法将不再管用，这让他们感到害怕。

有了这些一致想法的比利时人相当团结。他们以苏威西翁内斯人的首领盖尔巴为大将，首先侵入高卢中部，开始了对罗马先发制人的攻击。

恺撒知道此事后，判断如果反应迟缓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立刻离开宿营地，带着军队走了15天的强行军，到达了比利时人的领土边境。

恺撒军团如此神速的抵达令住在距边境最近的雷米人立刻动摇了。

雷米人马上派遣使节表示恭顺，而且他们愿意给罗马军提供军粮。不战而胜乃为兵法的根本。恺撒相当感激雷米人的归顺，因为他们与苏威西翁内斯人是有友邦关系的。因此他们所送来的人质，也就是部落中有权势人士的儿子，也得到了到罗马留学的厚待，从此之后雷米人就成了恺撒的同盟者了，并且，由雷米人这方所得到的情报也较为正确。恺撒因此知道了比利时人的战斗力，除去雷米人之后，总数为29.6万人；也知道他们和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有共同战斗的约定。其中对恺撒较为有利的信息是比利时大军是由12个部族组成的联军。虽然这样，这30万大军还是全部联合起来集体出动了。

没等对方进攻，恺撒就率领全军越过流经诺维欧杜努（现在的苏瓦松）的索恩河，准备先攻打敌方的前阵，再进军敌方领地。恺撒军团在渡河后马上开始修筑阵营地。

至于为何在敌人领地内要把阵营地修筑于河川附近的高地上，恺撒是这样解释的：

> 阵营地要占据地势上的有利点。背靠河川，所以在正面迎敌时，背后很好防守，雷米人及其他支持者的军粮补给就不会受到威胁。但由于在河川之上架设桥梁，所以能渡桥而来的对岸就成了要塞，恺撒派给慕僚萨比努斯6个大队在那里警备。再者，阵营地的前方低处，在左右两边各筑起3.5米高的防栅并且挖掘了5.4米宽的战壕。

这明显是不想让敌人包围修筑于高地的阵营地所制定的对策。而巧的是在阵营地前面刚好有一片平原般的宽广湿地，也有减弱敌军攻势的作用。就在这样的阵营地里，恺撒军团等待着比自己多出5倍的敌人。

从北过来的比利时军队的行军路线上有雷米人的城镇，这里距离恺撒的阵营地还有12公里的距离。比利时军队首先袭击了这个要塞。

恺撒写道，比利时人与高卢人的作战方法很相似。整个军队一起冲过来，向防栅上的卫兵投掷石头，趁防卫兵们躲避石块之际，以盾牌护头接近防栅，然后点火烧防栅并越过。就拥有庞大兵力的军队而言，此战法颇有效果。当然他们在攻击雷米人时也使用了这个战法。很快恺撒就接到了守卫雷米人城镇一方送来的援助请求。

恺撒当然不会不理睬。因为既不能助长敌人声势，对于刚结成友邦的雷米人，也有必要让他们尝到投靠罗马的好处。恺撒立刻派出努米底亚与克里特的弓箭手和出生于马罗卡诸岛的投石兵前往支援。他们既能增强防卫，又能削弱对方攻击的力量。比利时军果然放弃攻击雷米人城镇，于是他们便以恺撒阵营为目的地南下而来。由罗马军阵营地望去，12公里的开阔平原上，净是比利时军队的帐篷与焚火升起的烟。

恺撒最开始是想避开会战的。因为此时敌方人数众多，并非是进行会战的适合时机。恺撒因此只派出骑兵反复进行一些零星迎战以观察形势。结果这招成果很好，就连步兵们的士气也振作起来，恺撒这才决意进行会战。但恺撒并非仅靠将士们的士气，他安排修筑在阵营地左右的防栅与壕沟，起到了防止战场扩大的作用。同时比利时军为了攻打过来，也必须绕道宽广湿地的两侧，进入被隔开和划分了的战场。狭小的战场对拥有众多兵力的一方反而不利。会战正如恺撒预想般地展开了。

恺撒让新编成的2个军团守卫宿营地，同时派遣6个军团，约3.6万人奔赴战场，而对面的敌方则一下投入了30万人的兵力。

结果比利时军蒙受重大损失，主要还不是罗马军的砍杀，而是士兵被自己的同胞在混乱中压死或踩死。他们于是放弃正面攻击，兵分左右进军恺撒阵营地后边的河川，打算渡河先攻下用桥联结的阵营要塞，再从背后进攻大本营。恺撒立刻将6个军团调回阵营地。同时，他自己则率领努米底亚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全员率先到对岸去。这样过桥到对岸的恺撒军，面对的就是想要渡河攻来的敌方。而敌方是不可能全员一起渡过河川的，所以敌人自然也只能投入少许兵力。对恺撒而言，制伏他们

轻而易举。

正面攻击与背后突击都告失败，比利时军还残留着一条后路，就是咬着牙重复地从正面和背后再攻击。当然他们采取这个行动的可能性，也在恺撒的预想之中。

罗马军在会战之前就考虑了军粮的确保与补给路线，而高卢、比利时和日耳曼人都只考虑到在当地筹措战时的补给。此时的比利时人，各部族都是从自己的领地出发来远方参加战斗。此时由于罗马人的阻碍，战胜其余部族从而分获军粮成了不可能的梦想，何况此时小麦尚未成熟。于是为数众多的士兵之间，也就有了内讧的情形。恺撒之前布好的一着棋这时也开始产生效果。他命令友邦埃杜伊人破坏比利时人中实力最强的贝洛巴契人的领地。于是比利时人面对着会战无进展和军粮不足的境况，再加上各个部族牵挂自己领地的安危，因此同意先暂回自己领地，以后再联络继续战斗。

比利时人虽然达成了共识，但是选在半夜出发并不可行。恺撒抓住了这个机会，确认敌方即将撤兵的第二天早晨，恺撒发出了追击命令，要佩提乌斯和科塔率领骑兵团先行，再由副将拉比埃努斯率领的三个军团跟进。被罗马军追上的比利时军的后卫倒也很勇敢地应战了，反倒是走在前边的主力军队惊慌失措，队伍逐渐变得七零八落，士兵纷纷向四面八方逃跑。而早已部署在两侧的罗马兵，仿佛是收网一般将他们一一歼灭。罗马军没有任何损失地结束了这场战斗，依恺撒命令在日落前归营。

罗马最高司令官的服装

罗马士兵的服装

A. 百人队队长　B. 重装步兵　C. 骑兵　D. 轻装步兵

恺撒期盼已久的各个击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而这个策略必须在敌人尚未忘记撤退时被追击的恐惧时执行。第二天一早，恺撒就开始迁徙营地，目的地是诺维欧杜努，也就是比利时军大将盖尔巴的出身部族苏威西翁内斯人的根据地。恺撒命令军团以第二种速度行军。

恺撒想尽早攻陷这个城镇，然而之前败退的比利时士兵早已进入这个城镇。恺撒明白只有打攻城战了。但是恺撒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展开攻防战，于是罗马军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就发挥出作用了。

“移动回廊”是一种长4米、宽2.5米、高2米，带有轮子的移动战车。顶部盖着潮湿的兽皮或布，即使被带火的弓箭射中也不会燃烧。车内部可以容纳很多士兵，他们移动脚步来决定战车是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危险地接近敌人。许多个“移动回廊”一起移动的样子，就像成群的虫子集合前行。另外恺撒还准备了称为“移动塔”的攻城器物，如同名字一样，是移动式的和对方的城墙差不多高的塔。

这些攻城器械，对住在现在法国东北部的高卢人而言，都是第一次见到。它们规模庞大，令人生畏。再加上看到罗马人这么快就制造了为数众多的器械，技术能力实在让他们震惊。而不久前被罗马兵追击时的恐怖感仍旧清楚地残存着。最终，当表示投降的使者到恺撒那里谈和时，实际上罗马军的攻城器械还没有准备完毕。

恺撒装出是受了雷米人大力劝说才接受他们降服的，并要求族长盖尔巴的两个儿子和其他有权势人士的儿子作为人质，并且交出武器才完成讲和。这样各个击破的第一个目标便达成了。恺撒马不停蹄地又将矛头指向比利时人中最强悍的贝洛巴契人，他们的领地在现在巴黎北方100公里的地带。

到距目的地还有5罗马里（约7.5公里）处时，贝洛巴契人的所有长

老都在路边等待着恺撒，他们将两手往前伸出，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长老们向恺撒表明自己原本没有与罗马为敌的意思。罗马军在城镇附近安营扎寨后，连女人和小孩也都将双手伸在前面向他们乞求和平。同行的埃杜伊人族长迪比奇阿库斯也来向恺撒说情，他说贝洛巴契人与埃杜伊人是有友好关系的，但正是因为受到反埃杜伊人者的挑唆才有反罗马的举动。迪比奇阿库斯也指出，不愿屈服于恺撒曾加入比利时联军的强硬派已经逃往不列颠，留下来的都是稳健之人，因此希望恺撒能接受他们的讲和要求。

其实恺撒内心是急着完成讲和的，但他表面上还是摆出了一副完全是给居中协调人面子的架势，和贝洛巴契人以讲和收场了。由于贝洛巴契人是较强大的部族，所以要求多交出600名人质。在他们誓言武器与领地内的要塞都归罗马军后，恺撒才进军下一个目标。不久恺撒又得到了安比阿尼人的恭顺归附。现在剩下的就是素有高卢东北部最强部族的涅尔维人了。在多以骑兵为主要战斗力的高卢人中，涅尔维人是比较独特的以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部族。

高卢战士

根据所得到的情报来看，平常他们不准许商人出入、禁止葡萄酒及奢侈品输入、男子从小就进行武术训练，简直就是像过去的斯巴达人。他们的军队主力就有5万人。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要和恺撒讲和。

这次恺撒所率领的军队变为向东北方去。现在正越过法国国境进入比利时人领地内。这里是商人和罗马人都没有来过的地方，夏季常弥漫着从晦暗的森林与沼泽深处飘来的雾霭。根据雷米人所提供的情报，有多达7.5万名的敌人正在里边某处等待着他们。

进入涅尔维人领地行军三天后，恺撒从原居民处得知，对方的全部军队都在距罗马军不到15公里的河川对面。敌人是以涅尔维人为主，加上邻近中小部族所集结成的联合军队。而部族中的女人、小孩和老人都已经迁移到罗马兵无法侵入的沼泽地避难了。由此可见涅尔维人已经为战斗作好了准备。

恺撒派由侦察兵和百人队队长所组成的一队人马先行，调查适合扎营的地点。他带领剩下的全军尾随在后。然而，投降后加入恺撒军的比利时人或者高卢人中，有人给涅尔维人密报了罗马军的行军方式。密报者说恺撒是按照罗马军惯用的行军顺序前进的，军团与军团之间一定是军用货物的运输车队，所以只要向其发动攻击就可成功。

涅尔维人相信了密报的内容。他们的军队由步兵构成，居住地位于分布着森林与沼泽的高卢东北部，同时他们为防止以骑兵为主力的日耳曼人的侵略有自己的战斗方法和计策。阻挡骑兵的方式是每年砍下小树的顶端，从而让下方的树枝能长得更茂盛并横向生长，同时在树下移栽蔷薇，这样便做成了天然防栅。这座天然的“城墙”，时间越久越茂密。这座“城墙”不仅能阻止骑兵，还能让对方看不清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人，是完美的防卫墙。而在罗马军一方，第一军团、第一军团的运输车队，第二军团、第二军团的运输车队，依照这个惯用的罗马式行军顺序，实际上也是罗马军为了能够有效防卫自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所采取

的适当安排。

但恺撒认为，与其沿用不需担心敌人来袭时的行军法则，不如考虑敌人来袭时的行军方法。于是他命令8个军团中的6个军团的士兵，把通常行军时所背负的近40公斤物品，全部搬上了运输车，这样士兵们变得轻松多了。然后恺撒只让军团先行，而运输车队尾随在后，运输车队之后跟着新编成的2个军团，他们肩负起运输车队的护卫与行军后卫的责任。如此一来，即使遭遇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士兵便可无须顾虑运输车队，立即就可以应战。而恺撒并非事先知道有密报者才做出行军顺序上的变更的，是后来才得知此事。

侦察兵与百人队队长设置的阵营地地点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并未察觉在不到1米深的河对面，被灌木丛掩盖的丘陵中有敌兵隐藏。走在步兵军团之前先到达预定阵营地的骑兵团不久便发现了河对岸的骑兵，他们便立刻渡河攻击。只是，他们并没想到在敌人的骑兵背后紧跟着大队的步兵。因为通常军队都让骑兵先行，因此很容易认为碰到的骑兵与自己这边一样都属于先行军。

这样罗马军便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突袭。随后抵达的6个军团眼睁睁地看着双方骑兵在激战，但当务之急是赶紧完成设营工作。当他们忙着在河这岸扎营的同时，运输车队也陆续抵达。而敌人一见运输车队的影子，就立即从隐藏的地方全部现身。超过7万名士兵以怒涛之势奔向河边。在河边草原的恺撒骑兵抵挡不住便四散奔逃。大队的敌军继续向正在建设营地的罗马兵压过来，势头极其迅速凶猛，很快罗马兵的前侧与右侧都被敌人包围了。

恺撒一时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甚至到了一次要做几样事情的地步。比如举起红色战旗，这意味着要士兵们跑至置放武器的场所、将武器带在身上；吹响集合喇叭，意味着要正在设营的士兵停止工作。除此之外，还必须吹响整队用的喇叭，而鼓舞士兵们的演说也属必要。然后，还得吹响告知战斗开始的喇叭。但即使动作再利索，当遭遇敌方突袭的

时候，同时做这些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恺撒并没有专注于一定要做到所有的这些事情，幸运的是由两个因素缓解了这种危险的状态：一是受过训练与实际战争锻炼的士兵们拥有战斗知识和经验，他们不需任何命令便知道在此情况下该如何行动；二是在设营中离开了手下士兵的军团指挥官们的准确判断，他们即使没有总司令官恺撒的命令，也能及时察觉战况并自动加入军事行动。

于是恺撒只需要判断形势然后发布紧急命令即可。下过重要命令后，他便骑马追上了已在最前线的第十军团。寥寥数语鼓励完士兵们之后，便向与敌兵仅有投枪射程之距的第十军团下达了战斗开始的命令。其他军团同时也配合地进入战斗状态。

和在最前线战斗的士兵一样，恺撒一直留守在最前线。鼓励完第十军团后，他马上骑马赶到旁边的第九军团。没有准备的时间再加上敌人猛烈的突袭，罗马士兵连举队旗、穿盔甲和拿盾牌的时间都没有。待他们各自取剑之后，发现所见的队旗并非自己大队之旗，但是他们仍往战旗周围聚集并加入战斗。他们一边寻找自己所属的部队，一边担心会失去良好的战机。

“我方阵营如此分布，并非学校所授战术。阵营是随当时的地势与危急的程度而有所变化。各军团因为必须要对抗眼前之敌人而各自分离，前面提及的天然城墙也阻碍了他们寻找队友，同时也无法适时地将军团送往必要的战线。也就是说，连指挥系统的统一都无法维持。就这样，在这场于我方非常不利的状况下展开的战斗中，关系着胜败的因素也以各种形式出现。”

战斗刚开始，恺撒军的骑兵和轻装步兵有一部分人四处逃散。罗马兵逃走的消息，并未影响后来的局势变化，消息只传到高卢东北部一带。

尽管恺撒无法对全军发布统一的指令，但能骑马纵横战场、调配指

挥，分开战斗的军团到达合适的场所。在最前线战斗的士兵，因为只见到眼前的敌兵，即使没有天然城墙的妨碍，也不会注意到友军的动态。而观察大局并适时地调动士兵以最大化发挥自己军队的效率，则是总司令官需要仔细考虑的。比如根据实际状况，如果认为圆形阵比通常的方形阵更好时，就要迅速下达指令。并且，恺撒还担当起了首席百人队队长的职责。在苦战中的军团里，只见恺撒抢过了一个后卫士兵的盾牌，然后冲到最前线，逐一呼喊百人队队长的名字，并激励大家往前冲。而之所以夺士兵的盾牌是因为他一直连盾牌也没拿地骑马。总司令官如此的英姿，令士兵们感动万分鼓舞。他们变得果断勇敢，局势才转为对罗马军有利。而这一有利形势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护卫运输车队的两个军团终于抵达，以及成功攻陷敌人阵营地的副将拉比埃努斯给第十军团送来了支援。

由于得到了两方面的援助，原来感到被重重围困的士兵顿时心境大变，连原本受伤倒地的士兵，也重新举起盾牌接着战斗。溃退的骑兵、轻装步兵和随军的奴隶也加入了战斗。但是，涅尔维人果然也不负其最勇猛之名，继续勇敢地战斗着，即使众多同伴倒下，他们依然能站在同伴的尸体上继续战斗。

然而即使高卢人的突击力再厉害，在耐力上恐怕还是罗马兵占优。战争进入后半阶段，罗马军更是势不可挡。在双方的激战中，即使其他的部族逃走了，涅尔维人还是继续留在战场上，于是战争就在涅尔维人男子的尸体如山般堆积下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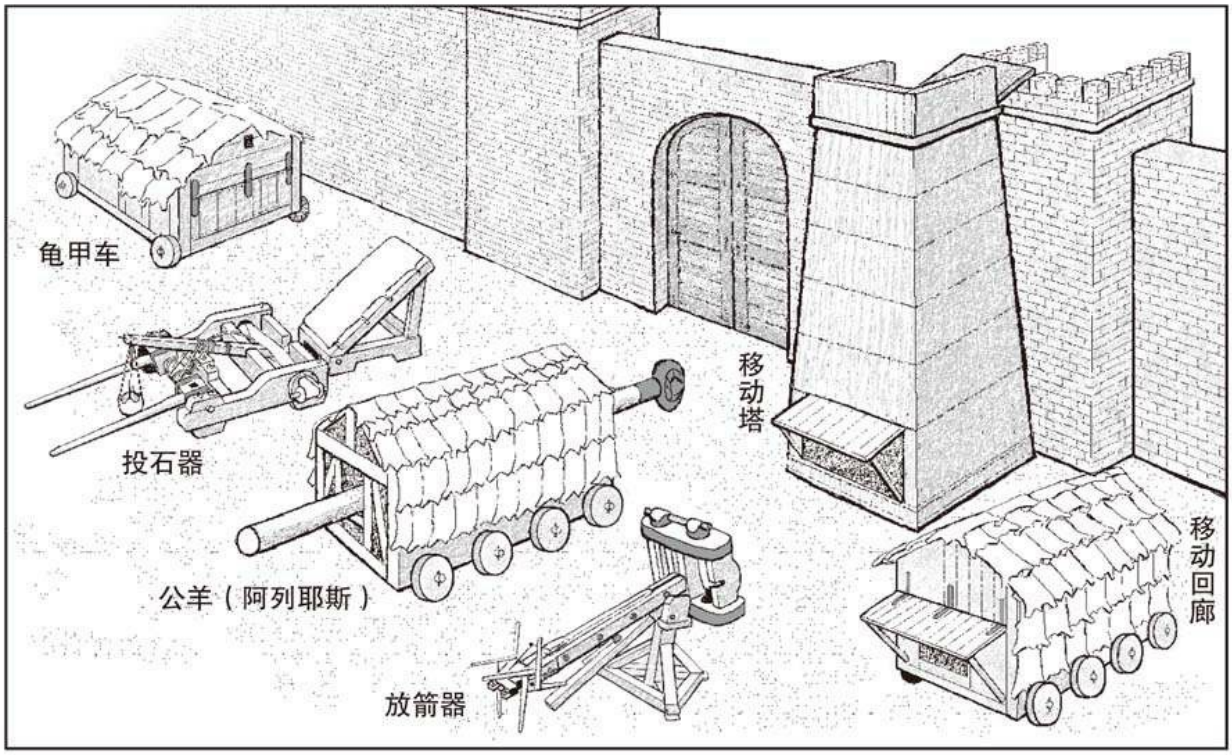
涅尔维人的成年男子在这场激战中几乎被彻底根除。到沼泽地带避难的涅尔维人老人、女人和小孩派使节向恺撒投降。据使节所说，部落600位有权势人士中，存活者仅有3人；6万名士兵，存活者仅500人。

恺撒并没有要求他们提供人质便同意了这项讲和，并且允许他们回归原住地，而且，恺撒还命令附近的诸部落不准侮辱或攻击涅尔维人。也许恺撒认为发起战争本身并非有罪。

尽管彻底打败了涅尔维人，但在战斗中有其他部族先逃走了，因此恺撒并未在他所分类的高卢东北部称霸。埋葬了战死者、治疗负伤者后，恺撒又率领残余的军队向东北进军。原本响应涅尔维人而参战的1.5万名阿都阿提奇人士兵，逃回了自己的领地。根据雷米人送来的情报，他们的兵力应该有2万人，并且，他们所居住的要塞，素以拥有天然防卫与戒备森严闻名。周围绝壁围绕，只有一处300米宽的斜坡可以作为城塞的出入口。敌人便躲在这个险要之地不出来。恺撒认为要打破现状，只有利用罗马军的技术能力了。于是军团兵摇身一变成为工兵，开始制作庞大的攻城兵器。他们制作了“移动回廊”、“移动塔”，还做了被称为“公羊”的破城槌，从城塞上方远眺罗马人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大声地嘲笑：

“罗马人啊！这样的庞然大物，你们打算如何用你们的小小身躯移动它呢？”

罗马人常常被高卢人嘲笑个子矮，但高卢人的嘲笑声，却在眼见攻城器械向他们的城墙接近时消失了。还不只是消失，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庞大兵器，他们的脸色也变得苍白。



攻城兵器

结果有的攻城器械还没有被运用上，攻城就结束了，因为阿都阿提奇人派来了请求讲和的使者。他们之所以讲和是认为罗马人得了神的护佑。因为他们不但能够制造如此庞大的兵器，还能移动它。传说恺撒会善待主动投降者，阿都阿提奇人期待这一点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不解除武装，理由是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恺撒这样回答他们：

“我之所以宽恕敌人，并非是敌人有被宽恕的资格，那只是我的做法而已。如果在‘公羊’还没叩城门以前，你们就投降的话，我或许可以接受你们不解除武装投降的请求。但现在事实并非如此，讲和之事就得等解除武装之后才能谈，这和涅尔维人是一样的。你们可以告诉其他部族：攻打和罗马讲和的部族，就等于是反抗罗马。”

使者带着这个回答返回后，从敌方城塞扔出了大量的武器。但后来

才知道还有三分之一藏于城内。不过，恺撒遵守约定，与阿都阿提奇人的讲和当天便达成了。

当天过半夜的时候，也就是夜里的第三步哨时，拿着隐藏武器的男人，从城塞出来，袭击了在阵营地睡觉的罗马士兵。经过一夜的战斗，4000名阿都阿提奇人被杀，剩下的也被赶进了城塞。

第二天清晨，罗马军从已无人防守的城门进入了城塞内，把剩下的士兵和居民都当成奴隶卖了。根据恺撒所收到的报告，被卖为奴隶的人数多达5.3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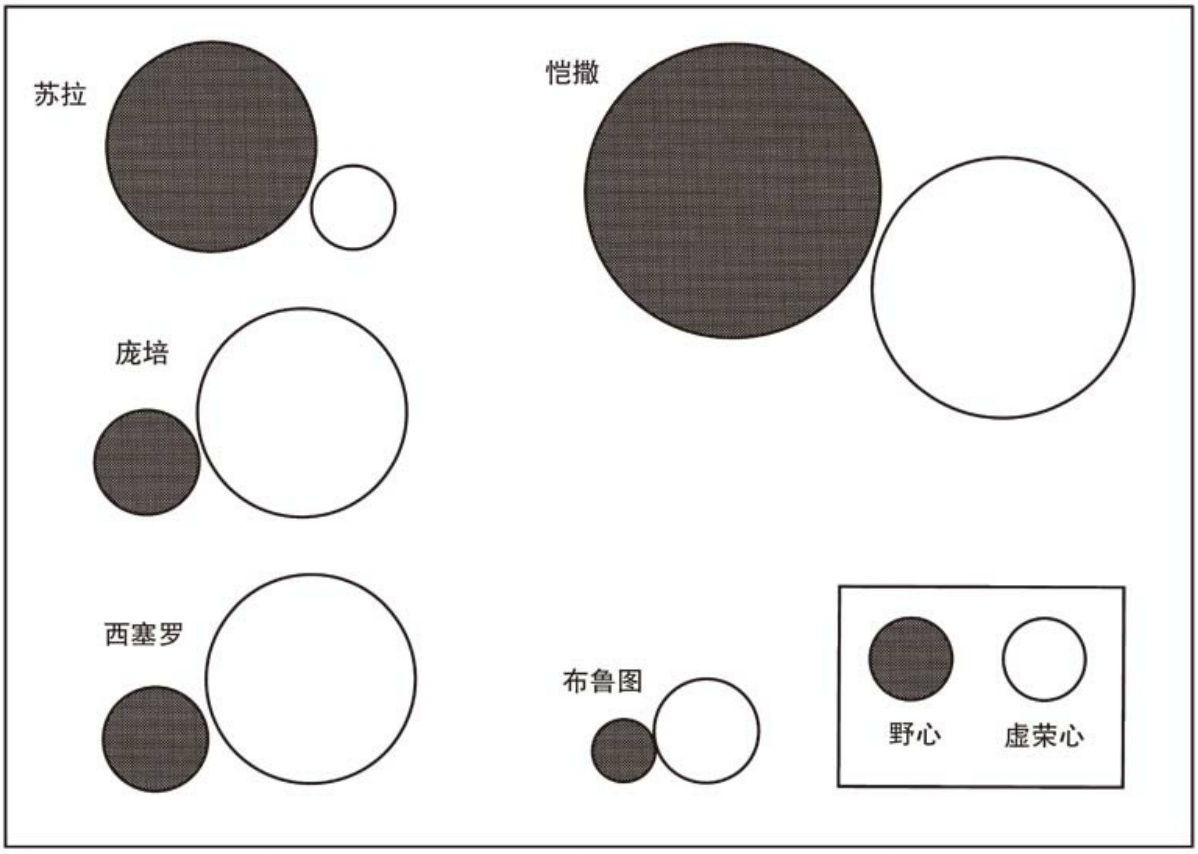
罗马人，特别是强烈意识到自己是罗马人的恺撒，非常重视誓约。罗马人属多神教，没有与神的契约，他们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誓约。即使是对不同的人种，也承认为同等之人，因此要相信所交换的誓言。相对于习惯信奉单一神教契约的欧美人以及秉承“武士绝不食言”精神的日本人，应该对罗马人所提倡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这一点有很好的理解吧。

恺撒并不认为发动战争本身是有罪的。但是一旦破坏了交换的誓约并攻打对方，很明显就构成了罪。他认为背弃誓言者应该遭受到做奴隶的命运。

得到完成高卢东北部一带称霸的恺撒的允许，年轻的克拉苏率领一个军团至大西洋岸一带，成功地获得了维奈特人等七个部族的恭顺。这七个部族提供人质并誓言承认罗马的霸权。

这样一来，恺撒所说的“和平”就在全高卢实现了。恺撒的战果也传到了莱茵河东岸，那边也有部族交出人质并派遣使节表示愿意归顺罗马。由于恺撒觉得有必要进行行省的管理统治，想尽早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告诉他们的使节明年春天再来谈归顺之事。

那年军团的冬营地，恺撒决定选在加努特斯人和托洛尼人住的高卢中西部。确认已经筹措了足够最前线冬营士兵过冬的军粮，恺撒便向南出发了。



罗马元老院收到恺撒送来的公元前57年战斗报告书后，决定举行15天对神明的感谢祭。恺撒在《高卢战记》第二卷的结束部分曾这样写道：“这是迄今为止谁都没有得到过的。”当年庞培打败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时，元老院为褒赏他的战绩所举行的感谢祭为12天。当然，恺撒言辞简练，并没有说出从前最多为12天、而自己却得到15天等有失水准的话。只是写道15天的感谢祭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但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了那种得意的虚荣心。所谓虚荣心，就是想到被别人认为优秀而感到欢喜的心情。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庞培与其说是野心家，不如说是虚荣家。另一方面，恺撒与其说是虚荣家不如说是野心家。但是他的虚荣心可不比庞培要来得小。即使是小，也和庞培差不多。不，或许应该说比庞培大。但是，恺撒的野心比起他超乎常人的虚荣心更为巨大。我随意绘制了张图，希望各位思考，期望他人赞赏与即使得不到他人赞赏也执著于达成目标的想法这两者间的关系。不要仅把眼光放在野心和虚荣心的负面，而是去注意它的积极面。

那段时期的罗马

公元前58年，也就是恺撒高卢战役的第一年，是“三头政治”顺利发挥作用的一年。担任执政官的两人都是与“三头”密切相关的人物，同时派护民官克劳狄乌斯紧盯元老院派。派小加图至塞浦路斯赴任、驱逐西塞罗，则成功地排除了这两位元老院派的论客。但是，高卢战役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年，局势有所转变，元老院派开始反击。元老院派能这么做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庞培的消极性

那年的庞培年才49岁。实际年龄虽是49岁，可是精神年龄仿佛是到了退役年龄——60岁，甚至有60多岁的倾向。他认为与相亲相爱的年轻妻子尤利娅在一起的生活，已经相当满足了。可那不过是他自己骗自己，庞培实际上有了隐居的心态。他很少去罗马，也很少去妻子尤利娅的父亲那里。在他的脑子里，一直存有在“三头政治”中获利最多的是恺撒这样的想法。因此，在公元前57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并没有积极的动作。这年当选的两位执政官之一是元老院派推出的雷托鲁斯，他既是庞培的敌人又是西塞罗的亲友。另一位当选者是梅特鲁斯，这个人是属于恺撒派的。

二、护民官克劳狄乌斯的狂妄

克劳狄乌斯驱逐了西塞罗报了一箭之仇后，做了比恺撒指示更多的事。他以盯住元老院为由，逐条成立了无视元老院的过激政策。如根据社会福利政策的《小麦法》，克劳狄乌斯将对贫民阶级的小麦低价格配给改为免费给付。此外，为了保持退任护民官后自己的势力，甚至自费雇用、组织了个人警团。并且，将原本存在于罗马的职能之别的组织化为政治组织。因为如果能借由组织来操控团体的行动，就可容易地左右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的动向。

这样的决定虽然受到大众热烈的欢迎，但是10年后，这三项都被独裁官恺撒废止了。连属于平民派的恺撒都要废止，可以想见元老院派的态度。其实这三项法条在成立之初，不只是元老院派，连西塞罗口中“深思熟虑的人”也对此给予了非常不好的评价。克劳狄乌斯的狂妄使庞培皱起了眉头，同时也使稳健和有良心的人疏远了他，于是最后造成了对元老院派有利的形势。

三、小加图的归任与解除对西塞罗的驱逐令

小加图即使回到任职地，也未必能让元老院派东山再起。小加图的曾祖父大加图，曾经弹劾击败汉尼拔的英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有“大”字加在名字前边的这个加图，是个口齿伶俐的论客，但是由于他颇为幽默的说话方式，还是具有吸引听众的魅力。相反的，小加图说话犀利但完全无幽默感。虽然他和大加图同样是清廉的政治家，但是由于无幽默感，他并不得人气。他虽自恃38岁年轻力壮，可以发表长篇大论，但其实只会令听众感到厌倦而已。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相比，更有幽默感。

而西塞罗的演说则与小加图有所不同，他具有随时可以幽默一下的才能。他还在合适的时机安抚泪水夺眶而出的听众；此外，西塞罗说话时还擅长引经据典，着实令人佩服。而西塞罗的演说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他内心那股燃烧着的忧国热情。至于他用何种方法将这股忧国热情付诸行动，多数人就并不大关心了。似乎不管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对是

错，只要他有忧国之心就够了。也许对西塞罗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

49岁的西塞罗被驱逐9个月后，驱逐令终于得到解除。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驱逐他的克劳狄乌斯，大家对他的评价一落千丈。其次是西塞罗前来拜访时拒绝与其见面的庞培，他在半年过后就后悔了。而公元前57年担任执政官的雷托鲁斯，为他亲友西塞罗积极地活动。在高卢的恺撒也寄来了同意解除驱逐令的信件。原本恺撒的意图是，只要这位“媒体代表”离开罗马就行了，因此他甚至还邀请西塞罗来当自己的幕僚。但实际上即使西塞罗答应了，他在战场上恐怕也会成为累赘，因此可能会被委任以留守行省的工作吧。拒绝这个邀请的西塞罗，结局落得个被驱逐，在希腊唉声叹气。而身为友人的恺撒也曾考虑过西塞罗就这样结局是否得当。总之，反对解除西塞罗驱逐令的，只有因暴力行动而遭众人谴责的克劳狄乌斯一人。因此，这件事的实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公元前57年8月初，公民大会通过了执政官两人的共同提案，解除了对西塞罗的驱逐令。9个月前，由压倒性多数人所决议的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是在公民大会的会场，也是被压倒性的多数人推翻。西塞罗从朋友那里得知通过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早就到意大利附近来等待了。驱逐令一解除他便马上就归国。8月5日，西塞罗就在布林迪西登陆，可以料想他是多么的归国心切。他几乎是沿着阿皮亚大道一路奔驰北上。阔别9个月，终于回到首都的西塞罗，当天即被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声所包围，宛若凯旋的将军。

既然成员都到齐了，对“三头政治”的反击就开始了。元老院派努力不重犯公元前60年让庞培陷于尴尬，却给了恺撒喘息机会从而使其借由“三头政治”逆转得胜的过失。另外他们也设法不让因西塞罗归国决议所赢得的民意离元老院而去，因而他们不准备修正克劳狄乌斯所成立的三法，因为民众对这三项法令有着高度的支持。此外，公元前57年，元老院派还作了另一点巧妙的安排，不是反击“三头”，而是离间“三头”。“三头”中的克拉苏，不管他也无所谓，因此离间策略的主要对象

是庞培与恺撒。

元老院派认为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治才是罗马的政体，应该保持下去。恺撒则一向反对统治的僵化。至于庞培的政治理念虽然从未明确过，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一心想重建由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的苏拉手下发迹的。因此相对于恺撒，庞培与元老院派的关系更亲近些。而且恺撒是个危险人物，相比较之下，庞培就没那么具有威胁性。正好恺撒此时又身陷高卢战役中，这对元老院派来说，实在是实施自己计划的大好时机。

西塞罗的提案首先在元老院中提出，得到元老院的赞同后，再于公民大会中提出。这就是由庞培负责确保今后五年首都罗马及意大利所需粮食的法案。罗马于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战胜迦太基，夺得西西里岛成为其行省之后，就舍去了主食小麦的自给自足。这么说来，庞培不就等于是“粮食厅”的最高长官了吗？如果这么想可就错了。罗马的小麦必须经海上从行省及同盟国输入。因此，确保粮食的最高责任者，实际上就是掌握罗马海军的最高责任者。必要时甚至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征用商船的权限。

但罗马以前并没有如此重大的职位存在，确保粮食的工作不过是由按察官等年轻的公职人员来担任。所以之所以加上海军总司令官职恐怕是为了吸引庞培上钩吧。拥有两个军团以上战略单位的指挥权，当然就意味着有“绝对指挥权”。10年前与海盗作战，拥有丰功伟绩的庞培，这次表面上是确保粮食安全，却令人自然地觉得是当海军统帅。

罗马不是以海运立国，自然也不属于海军国家，因此基本上没有组建过海军。如有需要，则向同盟国或行省要求派遣海军进行支援。如果西塞罗所提出的法案通过，庞培就成了罗马人中唯一能够组建海军的人了。这件事让年近50岁的庞培的自尊心膨胀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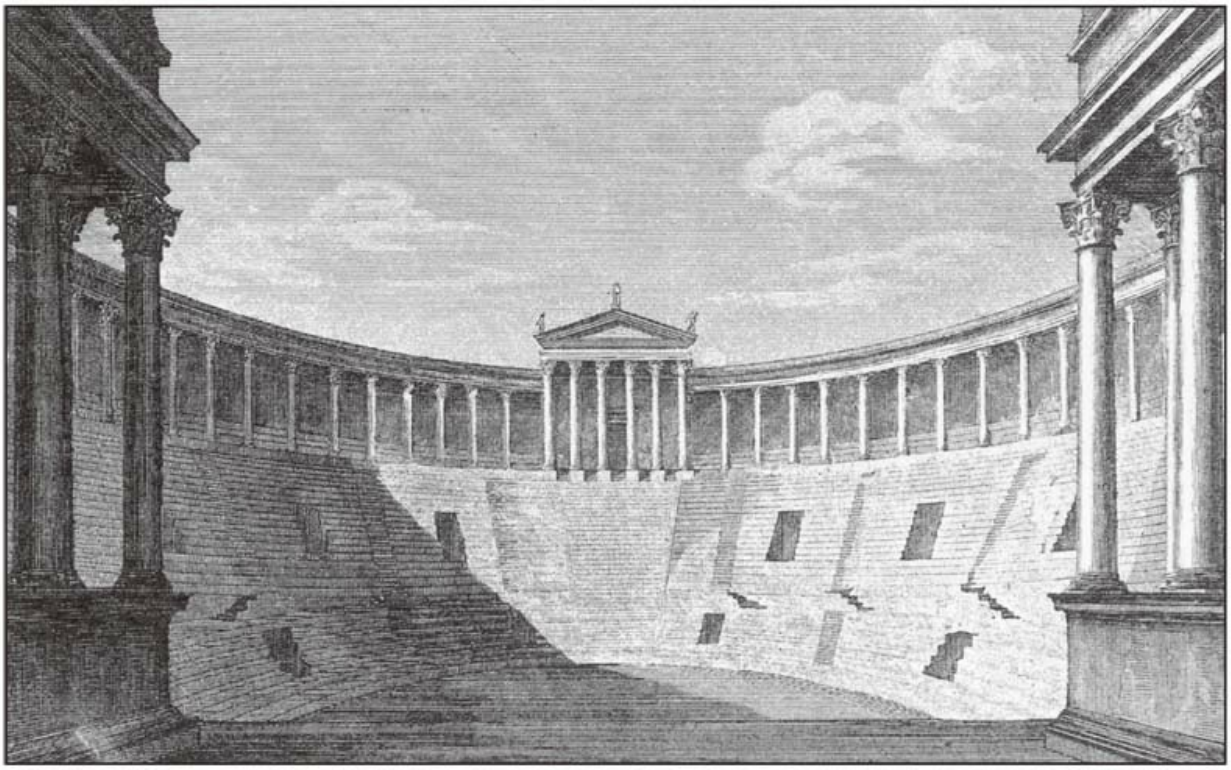
接着西塞罗提出的法案成立了。庞培面露感动地表示将努力做好这

件重责大任的事，接受了这个罗马史上首次出现的重要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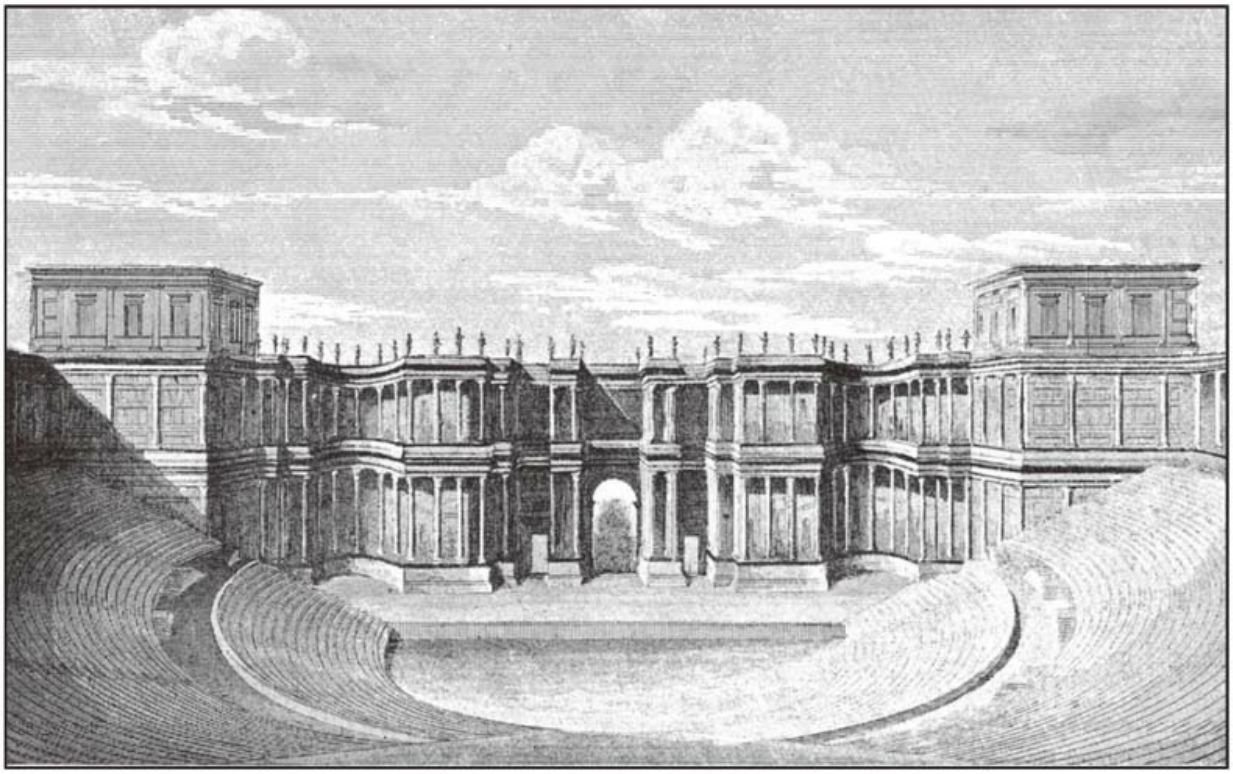
元老院派的反击并没有表现出反“三头政治”的样子，这样反而更有效果。因为如果使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稳固关系动摇，原本就不适合做政治人物的庞培就更可能走向非政治化。事实上，那年夏天所举行的下届执政官选举中，元老院派推派的候选人以最高票当选，“三头政治”派好不容易仅有菲利普斯一人入围，但危险的是两名执政官的位子都被属于元老院派的人占领了。

“三头政治”派在法务官选举中，八人中也仅当选两人。在执政官选举中，仅以微小的差距屈居次席的耶诺巴尔布斯，甚至宣布在自己当上执政官时，要解除恺撒高卢行省总督的职位。

在这种形势下，西塞罗被克劳狄乌斯驱逐后遭到没收的资产得到了归还，被烧掉的帕拉蒂尼山的用地也还了回来，新居的建筑费用也决定由国家赔偿。西塞罗以其他两栋别墅也蒙受其害为由，要求补偿修缮费，也得到了允许。西塞罗再度成为活跃于首都罗马的权势人物。



庞培剧场想象复原图：由舞台眺望观众席



庞培剧场想象复原图：由观众席俯视舞台

也许是恢复了元气吧，庞培开始实现他远征东方时就有的梦想——建设罗马最初的常设剧场。但由于罗马人很难接受希腊戏剧中常有的性别反串，因此他们向来蔑视希腊戏剧，在罗马也只有每当上演时才搭建的木造剧场。罗马人常积极于其他公共建筑物的建设，但是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的这个时代，还没有常设的剧场。因此庞培在希腊看到壮观的石造半圆形剧场后，决定也在罗马建造类似的剧场。只不过为了不会招致非难，他要求在大剧场正面观众席的最上部，加盖一座献给维纳斯女神的小神殿。如此一来，由庞培建造的罗马最初的常设剧场，也就能够借着神之名落成了。这座称为“庞培剧场”的大型建筑建造在罗马城外宽广的马尔斯广场上。

公元前57年，一切都如元老院派所设想的在顺利进行，但我认为唯独在一个地方他们犯了错，那就是出于对抗克劳狄乌斯所组织的个人警团，而容许米罗这个浅薄的男子组织了他的暴力团体。

两个暴力组织在一起而不起冲突是不可能的。打着平民派与元老院派的招牌而进行暴力活动，比单纯的暴力团体冲突的情况更糟。在罗马市中心，暴力和争吵几乎已成家常便饭，而这给了在外边应付战事却对首都情报了如指掌的恺撒反击元老院的理由。因为无须再举证，元老院体制连首都的治安都无法维持，正显示其缺乏统治能力。

“卢卡会谈”

当时被称做“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的行省就是现在的北意大利。担任此地统治与防卫的行省总督的官邸在拉文纳，位于距罗马国与行省边境的卢比孔河35公里以北的地方。自公元前56年后，巡视行省的恺撒就常落脚拉文纳，毫不怠慢地关注着罗马政治形势的变化。

公元前56年3月，在拉文纳恺撒聘请了“三头”之一的克拉苏。据研

究者所说，由于此时期的恺撒自己负担了四个军团的编成，因此不要说归还以前积欠克拉苏的债务，他甚至还需向他再借钱。不过在债务人叫债权人过来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便相当特殊了。而受罗马式教育的恺撒相当尊重年长者，43岁的他写给57岁的克拉苏一封诚恳的聘任函，克拉苏也答应了，然后顺着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北上拉文纳。接近月底时，两人便一起离开拉文纳。首先，经艾米利亚大道向西北行，再由罗马军基地摩德纳镇越过亚平宁山，而越过南侧山头所到达的城镇就是卢卡。

即使在现代依然保留有罗马式的教堂、呈现美丽静谧风貌的小镇卢卡，位于由佛罗伦萨通过比萨注入第勒尼安海的亚诺河稍偏北处。在以亚得里亚海侧的卢比孔河、第勒尼安海侧的亚诺河与行省为界的罗马国，卢卡属于行省这边。对越过卢比孔河界线就会丧失行省总督权的恺撒而言，这是他和自罗马而来的庞培的最佳会面地点了。

不管会谈地点决定在卢卡，还是会谈的时间决定在4月初，都是考虑到了双方的时间。已成为“粮食厅长官”的庞培，有到罗马小麦输入来源地的撒丁岛视察的计划。他的行期定在4月，计划从比萨出港。而从比萨到卢卡只需沿着平地向北走20公里。于是从罗马沿奥勒留大道一路北上的庞培，让船在比萨港等着，自己如约奔赴卢卡。

历史上称做“卢卡会谈”的这场“三头会谈”，并没有如同四年前，即公元前60年的“三头会谈”一样秘密进行。据说当时小镇卢卡，仅跟在罗马要人身边手执权杖的侍卫便达到120人。可见除了“三头”之外还有许多要人出席，其中光是元老院的议员就来了200人，简直就像盛大的高峰会议。恺撒此次对元老院的反击，可是在光天化日下堂堂正正地施行。不过参与会谈的只有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三人，会后也未召开“记者会”。所以会中达成的共识，只能从后来罗马政治形势的变化来推断。

会谈结束后“三头”分别前往不同的地方。克拉苏往南回罗马，庞培

则往西去撒丁岛，而要回高卢战场的恺撒则往北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从后来的政治局势来看，“卢卡会谈”决定了以下几个事项。根据内容来推测，可能完全是由43岁的恺撒提出方案，再经由49岁的庞培与57岁的克拉苏同意而共同决定的吧。研究者们对于这一点持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一、在公元前56年所举行的推选次年执政官的选举中，庞培与克拉苏两人同为候选人。以前的旧部下再加上罗马一般公民的投票，庞培可以说铁定当选。同时恺撒为了保证代表有经济实力者、却无名望的克拉苏当选，让士兵们休假回罗马参加投票。但选出执政官的公民大会通常在夏季召开，而夏季是战斗的季节，自然无法让士兵放假。于是使这年的选举延期至冬季便成为庞培和克拉苏的任务。

庞培和克拉苏出任执政官的经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年，因此并不违反苏拉改革中至少需间隔10年才能再度竞选执政官的严格规定，自然元老院派也无话可说。显然恺撒是打算以执政官这个罗马最高的官职与元老院派抗衡。不过“卢卡会谈”的本意是下述第二项：

二、执政官结束一年的任期后，第二年即以前执政官之名赴任行省总督。但罗马的行省简而言之，就是指现在仍未开发的西方与富裕的东方。几乎所有的前执政官，都希望尽可能地到富饶的行省去就任。其中也不乏有人在执政官的任期内就利用强权制定有利于自己来年赴任地的政策制度。为避免此行为的发生，盖乌斯·格拉古的《森普罗尼乌斯法》规定执政官下年赴任的地方，应该在执政官被选出前就决定。因此无论谁当上执政官，那个人下年的任地，如果是马其顿行省，那也是先前决定好的。决定方式由元老院制订草案，再由公民大会承认。

但是“三头”在“卢卡会谈”中作出了自己的决议。将在公元前54年成为前执政官的庞培，他所赴任的行省是“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两行省，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全境。克拉苏所担任的行省是叙利亚，也就是

现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此外，两人的任期也没有依照惯例，一开始就定了5年的时间。当然，恺撒的高卢行省总督任期也顺理成章地延长了4年直到两人任期结束的公元前50年底。

会谈还决定了“三头”可使用的兵力各为10个军团。恺撒当初分配到的是4个军团，加上他自费负担的4个军团共编成了8个军团。如果能得到元老院许可，4个自费军团就能如正规的军团一样得到国家经费的支持。这才是恺撒的用意，同时他还多争取了2个军团的编制。

于是三人都在公元前50年底任期结束前，拥有了10个军团的强大军力。比起公元前60年当时的“三头政治”中，庞培的兵力、克拉苏的经济实力和恺撒的民众支持这样的组合，公元前56年的组合中，三人皆拥有兵力，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同盟色彩。恺撒其实是有他的理由的：

首先，在北的恺撒、在西的庞培和在东的克拉苏，各自统领10个军团，这对首都罗马是无形的压力。元老院派对此也无法掉以轻心。

其次，庞培掌管着两西班牙，这不仅意味着这个地区被和平地掌控于罗马之下，还意味着罗马通过控制伊比利亚半岛从而控制了北非。而克拉苏负责的叙利亚行省，则压制邻近大国帕提亚，确立了幼发拉底河为防卫线。而恺撒亲自负责的则是莱茵河以北的防卫线。

“卢卡会谈”进一步强化了的“三头政治”。见解肤浅的人可能只认为那是三强为实现私人利益所组成的同盟。当然三个人在实力上各有超越元老院体制的实力并有强化个人利益的企图。但是，三人的作为也同时与确立罗马国防卫线的公共利益相关。5年的任期和10个军团的强大战斗力是实施此事的必要保证。正因为是三强共同确保防卫线，所以必须平等分权。

第三件在“卢卡会谈”中决定的事项为“媒体对策”。庞培答应要对西塞罗进行游说，但是恺撒认为这样还不够。

被驱逐后归来的西塞罗，常常拜托恺撒让他的友人在高卢任职。出身于地方却扬名于首都的西塞罗那里常有一些有野心的年轻人前来投奔，因此他便将这些有为的年轻人托付给恺撒。在前线的恺撒曾给他寄来开玩笑的信件：

> 只要是您培养的人送谁来都行。如果他们希望的话，甚至可以当高卢的王，再送上雷普塔耶（此为何意并不清楚。——作者注）也行。如果你认为他们在我身边能够得到好运的话，就别客气地送过来吧！

一方面从事战争，一方面必须负责行省统治工作的恺撒，非常需要事务官僚的协助，同时西塞罗能够利用这样的关系，对这位来自地方的佼佼者而言，也是颇有脸面之事。

而且，恺撒对付西塞罗采用的最极端的对策，那就是任用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为幕僚之一，并且让他担任军团长的大任。这个弟弟与好友阿提库斯的妹妹结婚，但夫妻关系并不好，在政界和律师界也毫不出众，和西塞罗堪比愚弟贤兄。尽管如此，重手足之情的西塞罗还是想替弟弟做些事情。于是，这位四十好几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的昆图斯·西塞罗，就成了恺撒所任命的最前线指挥官之一。

即使是强烈反恺撒的元老院面对高卢战役的胜利，也决定举行史无前例的15天谢神祭。罗马青年的心中燃烧着胜利的消息，许多上流社会的子弟更是渴望在恺撒手下参战。参加高卢战役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现象。

而恺撒从这个时期开始，就承担着把以前情人们的孩子培养成为武将的任务。恺撒属下担任军团长或大队长等将官职位的年轻人，他们的母亲多半是在恺撒的情人名册上。在写给元老院的报告书以及在《高卢战记》中，恺撒都清楚地记载部下的功绩。从前的情人将儿子托付给自

己，而自己也让他们有所成就，恺撒会因此而感到愉悦。也许正因为恺撒没有亲生的儿子，才能让他像父亲一样照顾他们。

虽说如此，集结罗马良家子弟、冬营期邀请高卢人演出希腊悲剧娱乐士兵、让西塞罗弟弟加入幕僚等，终究还是恺撒冷静思考的结果。与其说是要借厚待弟弟博取哥哥西塞罗的欢心，不如说是将他弟弟作为人质。有了人质就好控制在首都的西塞罗的言论，这也是恺撒的目的。

在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丝毫不见怀疑他弟弟被当成人质的迹象。西塞罗发自内心地感谢恺撒，尤其见到恺撒所记载的有关弟弟立功之事，更是欣喜万分。这再次证明恺撒这个男人做一件事情不会只有一个目的。不过，这种做法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基于实行的人确信自己的目的可以达到。恺撒实际上是以西塞罗的弟弟为人质，以应对西塞罗。但西塞罗弟弟出乎意料地骁勇善战，既让西塞罗也让恺撒感到惊讶与欢喜。如若不是这样，即使情感强烈依然能保持头脑清醒的西塞罗，怎会被恺撒如此轻易地瞒过呢？

“卢卡会谈”所通过的事项付诸实践之前，也就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会谈的成果便开始显现。这类似高峰会议的堂而皇之的会谈本身就产生了积极效果。元老院议员中的立场不鲜明的人士有了向“三头”靠拢的倾向。即使因为恺撒军团处于冬营期已经延迟过一次的原定于12月举行的执政官选举，必须再延迟到下年的1月中旬，也很少有人反对。公元前55年1月，如同在卢卡所定的协定，庞培和克拉苏两人当选了执政官。元老院派的候选人以大幅差距落选了。

庞培与克拉苏虽然当选的时间晚了，但并没有浪费执行“卢卡会谈”决议的时间。

恺撒派的护民官特雷波尼乌斯在3月提出了《特雷波尼乌斯法》，此法被认可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4年，庞培与克拉苏分别赴任西班牙与叙利亚行省，并有5年的任期和10个军团的编成权。这个提案很轻易地

就得到元老院会议的许可，而持反对意见的小加图的演说在元老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不久，执政官庞培与克拉苏共同提出了《庞培——李锡尼法》。这个法案中将恺撒高卢行省总督的任期延长至公元前50年底，并且承认他有10个军团的编成权。同样的，表决时反对者仅有小加图，因此甚至没举手表决提案就通过了。

“三头政治”很完美地掌控着国家的政局。执政官2人、法务官8人、护民官10人中的8人，全都为“三头”派所占。而“媒体”也保持沉默。“卢卡会谈”以后，有关首都罗马的政治形势，西塞罗曾向前一年的执政官、已赴任行省的好友雷托鲁斯发牢骚道：

“凭着军事力量和金钱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能控制罗马人的思想，与其说是靠他们的力量，不如说是他们的敌人不够果断且能力低下。那伙人甚至已经预料在元老院内能毫无阻力地通过自己的法案。但如果是在公民大会的场合，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就是恺撒想办法延长任期或竞选连任，以干净利落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原因。”

西塞罗也是元老院议员，因此他也不够果断且能力低下，然而他对此只字未提。西塞罗这个人，虽然是罗马史上最富学识的人，同时又是辩论家和作家，可是2000年来就像定论一般，他是位不善于自我批评的男人。

公元前56年和前55年的两年间，也许是“卢卡会谈”在罗马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吧，一切都在平稳中度过。庞培所建造的送给罗马市民的大剧场也完工了。为了庆祝首座石造剧场的落成，罗马连日举行了马戏团表演，民众感到十分满足。恺撒也因此无须操心首都的局势变化而能够专注于高卢战役。但就在此时，在战场的恺撒收到了母亲奥雷利娅的死讯。

高卢战役第三年（前56年，恺撒44岁）

笔者曾在1970年代末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意大利滑雪，越接近分隔意大利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原本在特里诺之后的宽敞道路也渐渐收窄，让人感受到不可思议的不方便。我想也许是已经登上了阿尔卑斯山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则是为了防备他国的侵略。如果答案是后者，现在都已经是航空时代了，这样的想法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导弹命中目标后再派陆军进攻，就能征服了。进入1980年代后，同一条道路变得宽敞和便利多了，修筑得与国内的道路一般。我也在此时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建立欧洲共同体这样的愿望是可以达成的。

尤里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的第二卷就对公元前57年的战役，以“高卢转为和平”作出了总结。从之后的局势来看他是出言过于草率了。可能恺撒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未交战的部族交出了人质表示恭顺吧。在《高卢战记》的第三卷，也就是关于公元前56年的战役的叙述，是由进入冬营期前，恺撒命令幕僚盖尔巴镇压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岳部族之处开始。派盖尔巴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确保阿尔卑斯山一侧的意大利与高卢之间自由与安全地通商。因为这些山岳部族抢夺商品并且索要高额的通行税。

率领第十二军团骑兵的盖尔巴奉命镇压的地方，位于由现在的特里诺北上至奥斯塔，再由那里越过阿尔卑斯山而行的路段。另一方面，恺撒每年春天越过的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已经成了当时的主干道。我每年为了滑雪都要行经由特里诺向西攀登至苏萨山谷的道路。我想恺撒是打算分别从南边的热那亚、特里诺的西边和特里诺的北边，开发三条联结意大利与高卢之间的道路。而通往热那亚以外的另两条道路，古时起便被推测为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最有可能的两条路线。

所以罗马军向高卢移动的路线已经有了两条。确保这两条北通路线的意图，恺撒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明言是保护通商的自由与安全。但经济的进出多少也会伴随着文明的进出，而接受文明输入的一方往往会有神经质的反应。但经由此事可看出，恺撒摆脱了罗马人向来以阿尔卑斯山为北边防卫线的惯有观念。在恺撒的眼中，阿尔卑斯山脉已经不是疆界了。

这样的尝试在短期来看却是失败的。完成镇压任务的盖尔巴率领罗

马的一个军团进入当地的冬营地时，遭到3万名山岳部落民的袭击。虽然盖尔巴为了不使士兵有太大的牺牲，于是选择了撤退，但所幸这并不是一件足以在军事上构成挑战的事件。对因“卢卡会谈”而比平时推迟进入战地的恺撒而言，眼前有更需要他优先解决的事等着他。

大西洋

在发誓恭顺并已提交人质的诸部族所居住的高卢西部，恺撒命令普布利乌斯·克拉苏设置了冬营地。他是“三头”之一克拉苏的长子。和只知赚钱的父亲相比，普布利乌斯·克拉苏被罗马人喻为神鹰所产的罗马之子，身体与心灵都展现出熠熠的光彩。之所以重用他，恺撒并非是为了完成他父亲的托付，也不是报答作为恺撒情人之一他的母亲，而是看重青年克拉苏的才能。《高卢战记》中每当提及这位青年将领时，光从书写“青年克拉苏”、“年轻的克拉苏”的字里行间，就可看出恺撒流露出的对这位年轻部下的爱护之情。而年轻的克拉苏也没有辜负恺撒的信赖。他总是能将许多正确的情报及时地送到在远方的总司令官处。

身处意大利的恺撒之所以能够得知大西洋沿岸一带的高卢诸部族蠢蠢欲动，正是得到了青年克拉苏提供的准确情报。但恺撒选择了先巩固“三头政治”。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使曾消极不已的庞培离开罗马从而发挥他的作用。所以，直到“卢卡会谈”结束恺撒才奔赴高卢，而到达青年克拉苏所防守的冬营地时，已经到恺撒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冬营中最困难的事莫过于粮食补给。要确保驻扎在刚被征服的高卢土地上的士兵的粮食补给异常艰难，因为这里距南法行省太远了。虽然当初设想是向发誓恭顺的高卢西部诸部族购买小麦，但实际上并不够。与第七军团同在冬营地的青年克拉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要队长们到周边的部族处购买粮食。

但前往维奈特人的两人出人意料地遭到了逮捕。维奈特人是住在现

在法国不列塔尼亚地方的部族，常驾船在大西洋一带横行，并与不列颠（现在的英国）保持联络，是这一带的强大部族，而且正因为强大所以很是嚣张。在克拉苏尚未作出反应之前，高卢西部一带就知道这件事了。正如恺撒评价的“高卢人是做什么事都很冲动的”，其他部族也逮捕了前来购买小麦的罗马士兵。因为维奈特人派遣使者游说这些部族对罗马军采取同样步调。然后，他们再向青年克拉苏派出使节，要求以团体交涉的方式交换人质。

恺撒在意大利时已经收到所有最新的报告。但因为要参加“卢卡会谈”，他便命令青年克拉苏，在维奈特人领地内流注大西洋的卢瓦尔河河口，建造数艘船只。同时在南法行省征集舵手和船员。而关于人质交换之事在恺撒本人抵达之前就让它处于冻结状态。

恺撒到达当地时，他的指令都已切实地被付诸实施了。而以维奈特人为首的高卢西部诸部族也一致决定要与罗马军战斗。恺撒如实地记下了他们的想法：“与其沦为罗马人的奴仆，不如承继祖先留下来的自由。”高卢西部诸部族决定战斗的理由并非是不切实际，可能是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一、光是逮捕前来购买小麦的罗马士兵并不能轻易地吓退罗马军。

二、当地河川多与湿地多这样的地势对打仗是很有利的。

三、罗马人不是航海民族。

四、在不易确保军粮的地方长期战斗应该不可能，因此罗马军迟早必然离去。

五、他们预料在维奈特人的号召下，不只是大西洋沿岸的诸部族，住在高卢北部及西北地方的摩利尼人、梅那庇人，以及多佛尔海峡彼岸的不列颠也会有援军到来。

然而比起他们向罗马军挑战的决心，恺撒接受挑战的决心也丝毫不弱。恺撒表示即使很困难也要开战，五点理由如下：

一、无法饶恕无故拘留罗马人的行为。

二、违背恭顺的誓约举反旗之罪。

三、交出了人质却仍旧不顺从。

四、煽动集结诸多部族的危险性。

五、如果不重视此事，恐怕对高卢的其他地方也会造成恶劣影响。

恺撒所计划的战略将在之后叙述。恺撒可使用10个军团的兵力是庞培与克拉苏认可的。不过由于是两年后的事，现在的兵力只有8个军团，不足5万人。于是将士们分五条战线展开行动了：

一、副将拉比埃努斯带领骑兵团前往东北高卢。目的地是位于莱茵与摩泽尔两河一带的特雷维利人的领土，同时在途中确认罗马同盟部族雷米人的忠诚之后，让他们阻止趁机想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

二、青年克拉苏率领12个大队的步兵7000余人和恺撒手边全部的骑兵，前往南边的阿奎塔尼亚地方。任务是阻止从这个地方沿大西洋岸北上去帮助维奈特人的援军。

三、幕僚萨比努斯则带领3个军团往北进发，镇压居住于现诺曼底地方的维内利人。

四、与青年克拉苏一样获得恺撒垂青的“年轻布鲁图”，则率领造船完毕的军团，承担起自海路攻打维奈特人的任务。（此布鲁图与那位马库斯·布鲁图并非同一人。）

五、恺撒则自己率领剩下的兵力向西行，由陆路攻打维奈特人。

由此战略部署便可得知恺撒的头脑里正确地印着高卢全境的地图。拥有基于正确情报的战略，达成此战略有足够兵力，并且统帅允许各负责人自主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些都是这场战役的特点。因此即使没有恺撒出马，各军团也能运作自如。其中首度被赋予战役责任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年仅28岁。

在五条战线中与敌方战事最少的是恺撒所率领的步兵军团。到达当地后他们调查发现，经由陆路逼近满是敌军的城塞相当困难，于是只好等待海军到达。维奈特人所筑的城塞，多在伸向水中的尖形陆地上，满潮时当然无法通行，退潮时，船又有搁浅的危险。这样海陆攻城战皆行不通。为了突破这个现状，罗马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试图接近他们的城塞。但敌人将武器、食粮和士兵等载入大船，向附近位于同样地势的城塞转移，这样罗马军所建造的工程便毫无作用了。很快夏天就过去了。而罗马的海军之所以迟来，一方面因为气候恶劣被困在港口，另一方面即使出了港也是巨浪滔天。加上大西洋中港口稀少，难度可想而知。到夏末，恺撒已经放弃利用土木工程接近城塞，等待罗马海军的到来。而得知此事的维奈特人，集中了220艘船从港口后侧准备突击罗马军。

在山崖上观战的恺撒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觉得自己的船比高卢船更不适于在大洋中航行呢？打个比方来说，将圆西瓜从正中剖开，再挖掉里面的瓤，这就是高卢船；而横宽跟甜瓜类似的就是罗马船。恺撒虽然命令制造大量船只，但所造之船都是适宜于地中海航行的单甲板平底帆船。这种船可以打海战但并不宜在大海中航行。只用风帆而且船身又高又坚固的维奈特人船只，即使撞上罗马船依旧安然无恙。但罗马船附带有一种称为“桨”的马达，而高卢船却以帆布为命脉。28岁的年轻指挥官看到了这点。请大家回想一下，第一次布匿战争时代对抗海军国迦太基时，罗马人所想出的“乌鸦吊桥”的铁钩（参见《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非海洋民族的罗马人对船并无约定俗成的概念。正因如此，即使在船上加些奇怪的装备，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列塔尼亚地方的海洋民族维奈特人自不必说，前来支援的摩利尼人、梅那庇人和不列颠的援军，他们皆在制造适应北方海域的坚固高船上技术精良，同时还掌握着在狂风怒涛中的驾船技术。海战的前半段，只见敌方自在地驾驶大船，灵巧地躲闪高空落下的箭。而自己一方却要时时提防和敌船相撞，一直不敢靠近与敌方对决。恺撒和他的罗马兵从山崖上看到这样的情景肯定很是担忧。但是，抱着决一死战之心的罗马船渐渐接近敌方，投掷出新兵器，战况于是有了改变。虽说并非是出于新构想的新兵器，但也是罗马人善于应用巧思的结果。

这种新兵器是一端系有长而坚韧的绳索、攻城时使用的投掷式镰刀。因为此种镰刀只需要钩挂在石壁或防栅上，因此没有必要磨尖、磨亮。不过在公元前56年的那场海战中，镰刀被磨得相当锐利，以达到钩挂后同时可切断的目的。在接近敌船时投出此钩，当钩挂住敌船桅杆上的绳索时，便全速向远处驶去，如此就可切断桅杆的绳索。高卢船仅能靠帆布移动，而一旦用于打开帆的桅杆的绳索被切断，帆布就落在甲板上无法再用。而高卢船在帆布没办法使用时，也不能靠划桨前进，因为船身过高了。

帆布无法使用只能待在原地的高卢大船，很快就被罗马的数艘中型单甲板平底帆船包围了。只要上了敌人的船，就如同在地面战斗了。如同恺撒所写的："每个士兵的战斗能力决定了胜负。"罗马士兵的勇猛是出类拔萃的。

眼见形势发生变化，未被切断桅杆绳索的高卢船便想乘风逃走。但不巧当时风平浪静，自然轻易地被以"桨"全速前进的细身平底帆船追上。于是大帆船面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罗马船只节节败退。罗马最初在大西洋上的海战，自上午10点开始至日落时分仍然继续着，最后在敌方仅有数艘船只脱逃的情况下，罗马方大获全胜。自此之后，青年布鲁图便被视为海战专家。

这场海战除消灭了维奈特人投入的兵力，也削弱了派遣援兵的其他

沿岸诸部族的力量。他们不只失去了士兵，还失去了船。传达投降意愿的使节来到恺撒面前，沿大西洋至北海一带的部族于是臣服在了罗马的霸权之下。

恺撒决定对这次战争中的主力维奈特人从严处置。他的理由是："要让野蛮人尝到不尊重外交关系的滋味。"对恺撒而言，不当拘留和背弃誓约都是违反了不同民族接触时必不可少的规矩。在书写高卢人的宗教及风俗时，恺撒从来没有与罗马相比较来指出其落后，而是将它们视为当地居民的文化而加以尊重。

四年后，恺撒从高卢敌手那里尝到了唯一一次失败的滋味，他在那时失去了自己的剑。高卢人便将那把剑当成胜利的纪念，祭祀在自己的神祠中。下年再度征服这里时，身边的人都建议恺撒将这耻辱的标志取下。但是，恺撒却说："既然它已经成为信仰的对象，那就放着吧！"文化是个人的东西，要怎么想是个人的自由。然而，文明却是人种、肤色和风俗习惯不同的人全体互相接触时的必要规矩，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喜好去做。简单来说，其实"文明"就是生存必须遵守的礼节。在这方面，恺撒的做法一向干脆利落。他身上完全见不到现代人常出现的优柔寡断。恺撒明确地把他们归为"野蛮人"，判处维奈特人长老死刑，并将族人全数卖为奴隶。

而在那段时间，恺撒派遣至东、北、南三方的军团也无须恺撒亲自出马就可完成任务。但也许恺撒毫不担心的只有派至东方莱茵河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一人。恺撒相当信赖这位平民出身的同年龄将领。虽说如此，派遣至北边诺曼底地方的萨比努斯和至南边阿奎塔尼亚地方的青年克拉苏，他们的行事风格依自己的个性而不同，但都出色地完成了所托付的任务。萨比努斯故意夸大罗马军的苦境，放出风声好让敌人安心，然后周全地准备迎接想趁机袭击的敌军，以费时但慎重的战法获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年轻的克拉苏则采取一鼓作气的积极战法，在占高卢面积三分之一的阿奎塔尼亚地方，逐一镇压在此地割据的诸部族。

他们和恺撒一样并不铲除战败部族，而是交出人质后接受投降并缔结和约。以青少年为人质是罗马常采取的办法，这些青少年到意大利各地的有权势人家里接受招待与教育，他们在被教育成亲罗马者的同时也学习了文明为何物。他们回国后也多活跃于本国的各个领域中。

部下作用的充分发挥使得夏末就解决了与维奈特人的纷争。恺撒决定在进入冬营前将事情作个了结。他派遣援军至维奈特人领地，决定镇压居住于现在比利时至荷兰南部的摩利尼人与梅那庇人。在全高卢境内，唯独他们还未派使节向恺撒表达恭顺之意，而时节已迈入秋季。虽然恺撒将此视为轻而易举之事，然而事实上进攻高卢最东北部并不像预期那般容易。因为敌军知道不能与罗马军正面对抗后采取了其他的战略。

现在的莱茵河下游一带，在比利时与荷兰这些发达国家的开发下呈现现代化的风貌。但在公元前1世纪时还是一块只有森林、沼泽与湿地的地方。得知罗马军接近的日耳曼系高卢人，将自己的物品及居民都隐藏在森林深处。因此，罗马军抵达后前方并未出现敌人的踪影。而罗马军刚开始建设营地时，敌军就袭来了，恺撒立即命令将近旁树木从前排依照顺序砍倒。

砍倒的树立刻被用来建造围栅，作为危险时的庇护所。接着又继续砍倒前方的树，再做成围栅，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着。而这样持续做了几天之后，围栅保护下的通道已经能够达到森林里了。

顺着这条保护通道前进到森林里的罗马军，找到了敌人藏匿的粮食与家畜，而敌军则逃到了森林的更深处。这个地方原本天气就不好，此时正值频繁刮风下雨的季节，士兵们在皮制的帐篷中根本无法入睡。要继续在森林砍树前行非常艰难，恺撒于是决定撤退。但是此次行动，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类似于实地调查的远征。我想恺撒一定知道莱茵河以西高卢安定的根本是解决日耳曼问题。这当然是下一年的战役了。

高卢战役第四年（前55年，恺撒45岁）

如同“卢卡会谈”所协商的，公元前55年庞培与克拉苏担任了执政官。每年冬天照例南越阿尔卑斯山，在行省度过冬天的恺撒，因为“三头政治”充分发挥了作用，比平常更早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了高卢。之后恺撒获知日耳曼人中较弱小的两部族正渡莱茵河往西方移动。因此正在高卢冬营的军团有必要早日会合。恺撒虽用“日耳曼人”一词统一指称他们，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诸部族的共同体。

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的部族是分布于莱茵河中游东部的斯贝比人，全部族可分为上百个共同体，每年每个共同体都要征集1000名战斗员，总兵力便达到了10万人。这10万人都是侵略攻击外部族的主力。留在族内的人，要供养自己的家族和外出征战者的家族。第二年外出战斗的人和留在族内的人再交换。通过这项制度，生活与战斗彼此独立。斯贝比人的共同体中并不承认私有土地，并且不允许在同一土地上定居一年以上，因此流浪成了他们的习惯。主食为牛奶和肉，因此男人的主要工作是狩猎而不是耕作。

大概是因为以肉为主食吧，他们长得又高又壮。日常的武术训练也很有成效，每个人都显得非常勇猛。不过他们的生活并不如从前的斯巴达人那般规律正常。他们不在乎居住于寒地，身上的衣服也仅有毛皮。而且由于毛皮并不充足，不足以缠裹全身，有许多部位会露出来，就罗马人的眼光看来，那是要洗浴或是下水时的半裸装束。

他们不限制商人的活动，但是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东西，而是抢夺来的东西。他们认为过量饮用葡萄酒会让人软弱，因此被列为禁止输入品。他们喜欢本地饲养的小型健壮马而不是高头大马。他们能熟练驾驭马匹，必要时也可随时下马战斗。

斯贝比人如果战胜其他部族并使其屈服，不会像罗马人那样就地进

行融合并建设殖民地，他们会清楚地划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他们常放任自己领地的周围成为荒地，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荒地正是自己强势的证明。恺撒曾听说那片不许其他部族进入的无人荒地，范围广达900公里。

而居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中，虽非最强但属最大的部族则是乌比人。乌比人的居住地较斯贝比人更靠近上游。由于这个部族住在莱茵河附近一带，与高卢人的交流频繁，较为文明。斯贝比人曾多次向乌比人开战，但终因对方的人口多得无法驱赶，只好改为要求每年缴纳贡金。斯贝比人的侵略转而集中在莱茵河下游，因为他们已经放弃征服乌比人的念头了。成为斯贝比人侵略目标的乌西佩提人与帖恩库贴利人，而他们为了躲避被奴役的命运，就渡过莱茵河向高卢涌了过来。

恺撒对整个情况了如指掌，认为公元前55年只部署对付日耳曼人的战线。不过，目的并非在于征服莱茵河以东，而是要让善变的高卢人不再轻易有变。恺撒曾说过，高卢人是流言的奴隶，他们总是相信添加了自己期望的流言。但恺撒从未向高卢人流露这种看法。他考虑到日耳曼人拥有精良的骑兵，要高卢人派出骑兵协助。同时恺撒也认为要在事态未扩大之前采取行动，于是率兵向东前进。自诺曼底的冬营地出发，越过塞纳河后向东北前进，然后穿过比利时，横切过荷兰南部，再由德国

西北部抵达莱茵河，这就是他所计划的行军路线。很明显，日耳曼是他的目的地。

得知恺撒越来越近，乌西佩提人与帖恩库贴利人急忙派遣使者前往恺撒处。他们说："我们被斯贝比人驱赶而被迫迁移，别无他法只有到莱茵河以西居住了。"但哀求的口气中带有如有万一将不惜与罗马一战的决心。恺撒回答道："我并不认可守不住自己领地的日耳曼人迁居莱茵河以西，如果没地方可住，可以去说服乌比人，请他们让出土地。"而正为斯贝比人的专横困扰不已的乌比人使节，正好在此时造访恺撒。他答应将带回恺撒的建议与部族人商量，之后恺撒再度与使节进行了商谈。这期间，恺撒将行军的速度减至每天几公里，但并没有停止前进，只是命令先行的骑兵团不要发动战事，因为恺撒希望在交涉时休战。

但是，当正在讲和的双方处于微妙的状态时，竟发生了日耳曼骑兵攻击罗马骑兵的事件，遭到突击的罗马军损失了75名骑兵。恺撒放弃和谈并召集军团长，他告诉大家别白费时间。那天与敌人的距离还有12公里。

而第二天一大早，日耳曼两部族长老就为了昨天的事前来向恺撒澄清并谢罪。恺撒命令拘留这些长老，并且下令属下全部出动。在出发的行军顺序上，以前些日子战斗受挫的骑兵团担任后卫。离开营地行军时，已经摆出罗马军特有的三列阵型。

即使不是战斗，平时也以每小时5公里速度行军的罗马部队，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便到达了日耳曼两部族的宿营地，日耳曼人遭到突然出现的罗马军的攻击。由于作为指挥者的长老们不在，宿营地中净是女人、孩子的哭叫声。之前失去同胞的罗马兵愤怒地涌进来。不同于以壕、栅等四面围住的坚固的罗马人阵营地，日耳曼人的宿营地，只以运货马车围住，内部则只搭建帐篷。即使他们有勇敢的抵抗者，也因为同伴们的混乱无法发挥战斗力，能做的只有放下武器与军旗向四面八方逃

走。逃走的人大部分朝莱茵河方向跑去，恺撒便派前些日子怨恨在心的骑兵去追击。许多日耳曼人就在河边被杀。罗马军除了少数人负伤外，没有人员战死。

恺撒并没有记载那天有多少日耳曼人被捕。总数43万的日耳曼两部族是被杀了，还是逃脱了呢？恺撒用“杀戮”而不是“战斗”这个词来书写与日耳曼两部族的对决。如果是未与大多数的敌军交战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真是场大成功。

但保障外交使节的安全应是文明人所遵守的事，这次的做法与恺撒从前所秉持的方针是不是有所矛盾呢？实际上，得知这场由杀戮得来的胜利后，罗马元老院的小加图认为在交涉中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是违反规则的，提议将恺撒交给日耳曼人。但那年的执政官庞培并未同意，他认为在讲和交涉中，自己一方也遭敌方杀害而损失了75名骑兵。恺撒对当时长老们的谢罪访问记录如下：“对我方来说是幸事。”可见终究还是一次没有宣告交涉破裂便发动的攻击。

但姑且不论是否违反文明人的礼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种问题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不易选择之事。遭到意外突袭被杀的75名罗马骑兵，实际上并非是罗马公民，而是认同罗马霸权参与同盟的高卢部族人。但只要属于恺撒指挥下的罗马军，就应该被视为罗马士兵。因此，一方面面对75名骑兵下属被杀，一方面面对不知结果的交涉，总司令官恺撒只有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了。此外，恺撒如果不顾参与同盟的高卢部族在日耳曼被杀之事而继续协商，也一定会影响到与其他提供士兵的高卢诸部族的关系。恺撒眼中见到的并不只是与自己交战的日耳曼人，而是一边作战，一边也将背后的高卢人纳入视野之中。

在公元前58年，紧接着是公元前55年，恺撒两度大胜日耳曼人。由于高卢人经常是日耳曼人的手下败将，罗马人所获得的两大胜利对他们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而恺撒在此事后，对舆论的重要性比谁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原因当然就是：“人是流言的奴隶，他们总是相信添加了

自己期望的流言。”

结束了对日耳曼人的杀戮而回到营地的恺撒，下令释放被拘留的长老们。但得知所发生之事的长老们害怕即使被释放了，从前被他们抢夺过的高卢人会乘机报复，而要求留在恺撒这里。恺撒答应了他们。接着恺撒开始没有中断地实施渡过莱茵河的计划，这对罗马军和罗马人来说都是头一次。

有意思的是，恺撒写道：以小船或筏子渡河，对恺撒本人以及对罗马而言是不安全同时也“不名誉”的方法。这是因为不愿学当年迦太基人汉尼拔渡罗讷河时所用的方法，还是因为日耳曼人渡莱茵河侵略高卢时就常使用小舟与筏？实在不知道恺撒是怎么想的。结果恺撒利用莱茵河作了一次宣传，宣传对象既是日耳曼人也是高卢人。只有煽起人们的好奇心才能有好效果。而对未开化之民，最能引发他们好奇的莫过于罗马人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了。

渡过莱茵河

恺撒所想的是在河宽水急的这条大河上建造一座桥，然后渡桥进攻日耳曼，这个想法可说是前所未有。恺撒在他的笔下，如同现场指挥般，生动详细地呈现了这个“名誉的”渡河方法中桥的构造与建造方法。根据这个记述，后世也造了许多模型。莱茵河最初的建桥地点，在现在德国的波恩与科隆之间。

> 桥的建造依照下列的顺序进行：将两根45厘米粗、长度超过河深的木桩前端削尖，削尖一端分开60厘米而把另一端相互固定绑紧。将这两根绑好为一组的木桩，用滑车沉下河去，再使用打桩机将其固定在河底；但是并非采取平常所用的垂直打入法，而是为了削弱水的阻力，采用类似屋顶斜坡的打入方式。与这组两根木桩平行，于12米开外，也以同样的方法再打入另一组两根的木桩。这两组木桩之间，架设粗60厘米的桥桁，前端各由活栓锁固定在两根木

桩之间。这样做出来的桥墩，一来使用的材料是木材，越含水越坚固；二来建造方法很牢靠，也能充分耐水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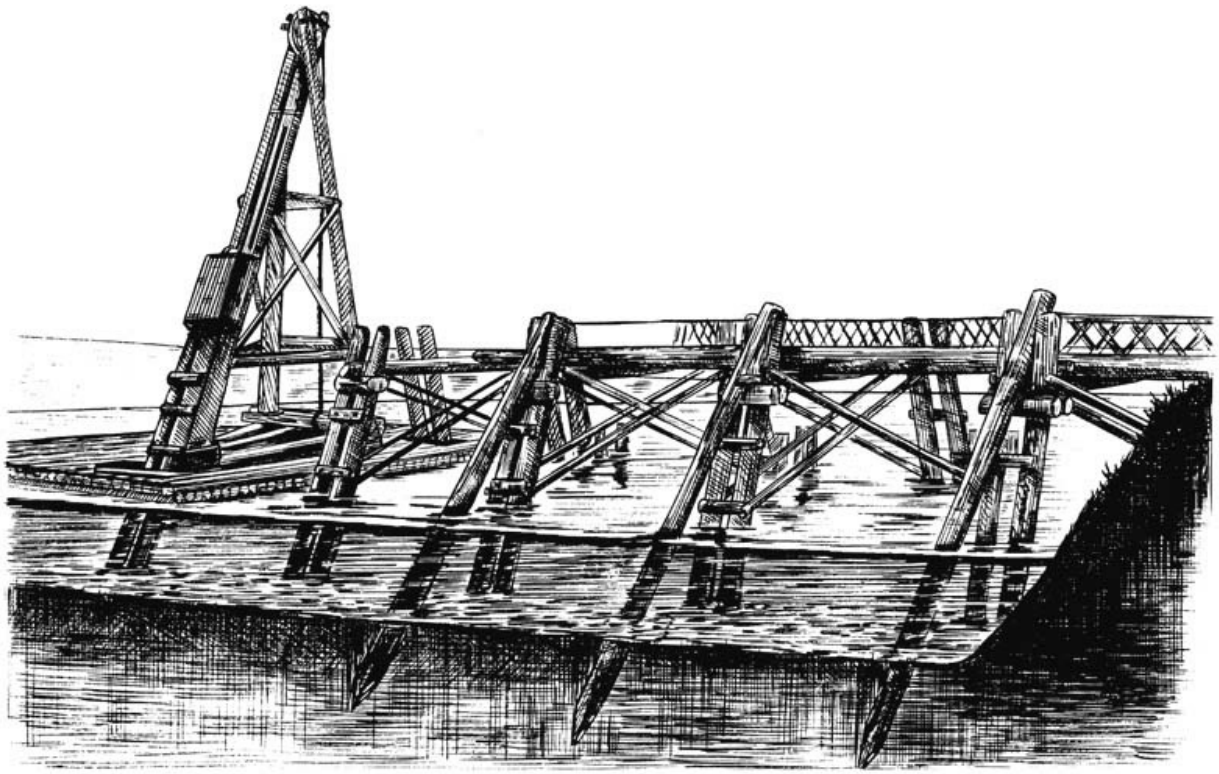
桥墩被一一地打入，上面再跨上横木，然后堆积木柴重叠铺开成桥面。此外，在桥墩的侧边也打入木桩，这不仅可以舒缓水流的压力，在遇敌方想驾船破坏桥时还具备防卫效果。

建桥材料运达的10天后，莱茵河上最初的桥就建造完成了。恺撒在桥的两岸设置充足的警备队后，便率军渡过了莱茵河。

为什么恺撒在这里设桥呢？这样的疑问会自然地浮现出来。关于这点他并没记载，所以只有凭推测了。我猜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

一、此处距离曾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后遭恺撒杀戮的日耳曼两部族很近，适合乘胜追击其余部族。

二、源自阿尔卑斯山的莱茵河在这一带流经平地，因此能够远眺对岸的日耳曼人，遭遇敌方渡河突袭的危险性也就较小了。



恺撒建造的莱茵河桥（建设中的想象图）

三、此地距日耳曼两部族的生还者所逃窜之地的西卡恩布利人很近。

这一带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军事基地在一个世纪后的帝政时代，已到了绵延不绝如同串珠的程度。这正表明了恺撒所制定的莱茵河才是罗马防卫线的政策，后来的统治者也认可。德国的波恩以及科隆等城市其实名字上都还保留着当年拉丁语的色彩。讲些题外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的首都设于波恩的原因，或许是希望与希特勒决绝的战后德国人心中，有着想归属莱茵河西方的愿望吧。丘吉尔在谴责希特勒统领的德国人时，就常用当年以莱茵河为防卫线的古罗马人也没有的口吻，称呼他们为莱茵河对岸的非文明人。

再回到2000多年前的事情。两年后，恺撒决定再次渡过莱茵河。那时的渡河地点还是在波恩与科隆之间，比第一次稍靠上游，距离波恩较

近。很明显，这也是充分了解了这一带的地势后才选择的渡河地点。

不管怎样，运用罗马军的技术力量在莱茵河上架设日耳曼人没见过的桥，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日耳曼人甚至在罗马军建设桥梁期间也没有妨害的举动，只是逃入森林不露面。向莱茵河以东前进的罗马军，首先进攻西卡恩布利人居住地。此时，许多日耳曼部族已经派遣使者向恺撒求和，但恺撒要求以提供人质作为先决条件。在逃走的西卡恩布利人之地待几天后，恺撒将这里夷为平地。之后，恺撒也对乌比人的长老承诺，如果斯贝比人前来攻击，罗马军将给予协助。此举很明显是恺撒意图离间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

根据乌比人传来的情报，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的斯贝比人，得知恺撒渡过莱茵河之事，已撤退到黑森林深处。恺撒达成渡河目的后便决定回高卢，而之前所架设的桥在渡过之后被就毁掉了。

多佛尔海峡

罗马军架桥进攻日耳曼的影响颇大，而就在那年接近夏末时，恺撒又决定再尝试一次惹人好奇的进攻——率军越过多佛尔海峡，进攻不列颠。

进攻不列颠的理由是在高卢战争中常有不列颠人的支援，恺撒认为有必要切断这个支援。但恺撒并不将隔多佛尔海峡而居的不列颠人，看成与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一样。罗马军渡莱茵河是对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威慑，而渡多佛尔海峡进攻不列颠则考虑将其纳入罗马霸权之下。恺撒如此书写这年后半年的决定：

> 真正的登陆上岛（恺撒已经知道英国是个岛了）光考虑季节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当地居民的性格、地势和港口等。调查这些高卢人也不知道的事项，才更有助于进攻。

恺撒利用商人为情报来源。然而提到不列颠，连哪里有生意可做就往哪里去的商人，也只知道是与高卢相望的坎提乌姆（现在的肯特）的地方而已，不列颠全岛的面积、居民的性格以及人口数、他们的战斗方式、统治方式、大船可以靠岸的地理位置等一概不知。公元前1世纪的英国，是即使商人也无法通行的遥远土地，因此恺撒只好靠自己实地调查了。

但与以日耳曼为对象的两次渡过莱茵河的大胜仗不同，恺撒与不列颠人并无直接交战的经验，因此无法期待以之前的胜利威慑敌方。而为了避免不明情况的冒险，恺撒派出一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部下波尔歇努斯前往侦察。恺撒则利用等待侦察结果的时间，进军现位于法国最北部地区的摩利尼人之地，因为由此地越过海峡登陆不列颠距离最近。恺撒所穿越的这个海峡后来被称为多佛尔海峡。如果当时的罗马人有建造海底隧道的技术，就恺撒的意图来看，他会毫不犹豫地挖掘海底隧道。因为恺撒进攻不列颠与渡莱茵河不同，并不是示威宣传。前去侦察的波尔歇努斯从船上观察不列颠岛，尽力搜集有用的情报，五天后就返回了。于是恺撒开始集合登陆作战时的必备船只。

在准备进攻不列颠船队的期间，不列塔尼亚诸部族派遣使节前来，并愿意提供人质来表示承认罗马霸权。恺撒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在使节带着这个答复归返不列塔尼亚时，恺撒让两年前他所信赖的、曾经是部族首领的高卢人寇米乌斯与他们同行。寇米乌斯的任务是告知大家恺撒即将发动对不列颠岛的进攻，希望诸部族能站在罗马这边。而非常幸运的是，住在不列塔尼亚出港地的摩利尼人都誓言服从恺撒。于是恺撒在渡多佛尔海峡时也就能毫无后顾之忧了。

恺撒第一次远征不列颠，准备了下列规模的军团：随行的有第七、第十二军团，再加上骑兵。运输考虑首先由80艘运输船负责运送2个军团，从高卢战役开始就在恺撒指挥下战斗的这2个军团老兵，才1万人。依照恺撒所说，他并非真的要远征而是要作调查。8个军团中有6个留在

高卢，有必要将他们留下是为了防止渡过海峡之后无法返回。6个军团都被派往重要地点。军团长鲁弗斯率领半数军团防守出港地的周边。军团长萨比努斯与同僚科塔率领剩下的半数军团，负责镇压住在现在比利时的一部分摩利尼人与梅那庇人，目的是要熟悉海洋生活的他们，断绝妨害罗马军渡过多佛尔海峡的念头。

恺撒自己也没有写明他们是从何处出发的，也许是由摩利尼人使用的港口，高卢语为内侧港之意的伊提乌斯港吧。古代是这样推测的，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既不在现在法国的布洛涅，当然也不是敦刻尔克，也不是距离最近的加来。罗马人并非基于地势的考虑而选择出港地，他们只是利用高卢人所使用过的现成港口而已。

在此港口等到顺风后，恺撒在半夜命令军团出港，同时命令运输骑兵团的船队随后过来。第二天上午10点，最初的罗马船队便抵达了不列颠的海岸。丘吉尔认为大英帝国的历史就是从此时，也就是公元前55年8月26日开始的。不过以此为大英帝国历史的开始似乎有失尊严。

在向北航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恺撒的船队抵达了类似预定靠岸地点的海岸。极窄海岸边耸立着笔直的山崖，而上边全副武装的不列颠人正等待着他们。他们从山崖上用投枪和箭射向站在岸边的人。由于恺撒并未提及是在何处靠岸，我只能推测他们曾抵达了有名的多佛白色山崖下吧。发觉此地并不适宜作为登陆地点后，恺撒放弃登陆，一直到下午3点都在海上等待后续船队的到达。等待的时候，他召集军团长及大队长和有调查经验的波尔歇努斯参加作战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比预料中更汹涌和易变的潮流。而总司令官恺撒所担心的是，一旦陆地或海上有状况，他所发布的所有命令如何能被正确和迅速地实行。

下午接近3点的时候，潮流变得适于航行。罗马军团包括后续船队一起再次出发。航行了约11公里后发现有连接平原的海岸，于是决定就在平原前方的海岸抛锚。而这里却有另一种不同于山崖海岸的考验等待着他们。

恺撒这样记载，蛮族，也是丘吉尔祖先的不列颠人，一定从陆上追踪着罗马军的行踪，因此当罗马军正要登陆时，从平原处有骑兵与双驾战车迎来。罗马军面临以下考验：

一、吃水很深的运输船只能在距海岸相当远的海上停泊。

二、在指挥官和士兵都不了解地形的陆地上作战会很不利。

三、士兵在搬运沉重武器、双手无法灵活使用的情况下，还得跳入海中游向岸边。

四、见到这个情况的不列颠士兵，则采取了海陆并用的积极战法来妨碍罗马军登陆。

在这个完全不同的战场，曾在陆地上所向披靡的恺撒军团兵，根本无法发挥往常的勇猛敏锐，只是惊恐万分无法动弹。而此时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恺撒计上心来。

办法就是将抛锚的军船也投入战斗。军船不同于帆船与运输船，能靠桨活动，比较灵活。此外，其船底浅可以接近岸边。恺撒命令在这些单甲板平底船上，装载投石器和石弓器，并让船和海岸线保持平行，然后士兵们便从船上攻击敌人。这个办法果然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不列颠人第一次见到单甲板平底船以及所装载的兵器，惊慌不已地向后撤退。

而罗马士兵即使这样依然犹豫不决地没有跳海前进。见此状况的第十军团旗手便站在船头，举起双手向神祈求护佑军团后，对士兵们大声喊道：

“如果不愿将这面银鹫旗交给敌人，战友们，就跳下去吧！至少我们要对国家与总司令官尽责。”

说完后旗手便立刻跳入海中，举着军团旗游了起来。于是同船的士兵也立即跳下船，见此情况的他船士兵也纷纷跳入海中向海岸前进。

于是沿着海岸线的激战开始了。罗马士兵在无法组队、无法在自己旗帜下战斗，甚至无法确保立足之地的状态下，英勇应战。他们往距离自己最近的队旗集中，以距离自己最近的船为盾进行战斗。但由于不列颠人熟知地形，他们总能精确地追逐和攻击对地形全然不知的罗马兵。见到士兵们陷入困境，恺撒又心生一计。原来装载兵器的单甲板平底船，全部改乘士兵。于是，用这种可以划到浅滩的船将士兵送至海岸后，士兵才跳下来，这当然也就是现代的登陆作战方式。只要脚能着陆，战斗就是罗马士兵的看家本领了。他们立刻组队，指挥明确地展开战斗，不列颠人只好逃跑了。但这个好机会无法被利用，因为负责追击任务的骑兵团所搭乘的船队还没有到达。

而暂时逃走的不列颠人却派出使者来向恺撒讲和，表示愿意交出人质和服从命令。与使者同行的，还有恺撒之前派去做事前准备工作的高卢族长寇米乌斯，他在不列颠还没进行交涉就被抓起来了。

如此简单就得到不列颠人的臣服，恺撒也就轻易地接受了讲和的要求，并未考虑到有慎重处置的必要。而他接受讲和的理由是：眼看就要抵达不列颠的海岸了，搭载骑兵的16艘船只却遭到暴风雨，并且顺流被冲到西南边，最后又回到了大陆。恺撒只得带领无骑兵的2个军团1万人留在不列颠。而这是发生在登陆后第四天的事了。

然而，厄运还没有到此结束。当晚为满月，在大西洋的满月之夜，是潮水涨落差距最大的时候，而罗马人对此毫不知情。恺撒命令停泊在岸边的单甲板平底船，受到急剧涨潮的海水冲击。在海面抛下锚的运输船队，也遭到强风猛浪的侵袭。结果许多船遭到破坏，还有些船只因为控制锚的装置被破坏，无法航行。

因为没有回家的船了，连维修的工具也被冲入了海里，士兵们显得

意志消沉。而且由于打算短时间内回高卢，军粮贮备得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补给方法；再加上他们身处精于骑马和战车攻击的不列颠人之地却无骑兵可用。而得知罗马军的现状后，不列颠各族很快就想反悔讲和誓约，再次集结起来，准备全力击退罗马军。

为了应对这个危机，恺撒认为与其自大陆（高卢）呼叫支援部队过来，不如采取自救。对处在孤立之中的人而言，什么也不做而只是等待反倒更痛苦。同时他也传令大陆方面用快船运来修复船只的必要工具。

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防守。罗马人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一晚的宿营也习惯搭建方形的坚固阵营地。喜好成式化的罗马人，也能将阵营地的防守成式化。阵营地四角形的每边各一个门，战时则各有一个大队（600名士兵）在门边负责守卫。由此看来可以说在防卫方面不需要担心。

另一个问题则是粮食的确保。通常罗马军会携带一个月左右的粮食，因此不会一下子陷入缺粮的窘境。但只要时间与人力充足，恺撒一定会派遣士兵筹集粮食。因为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人心才能稳定。

另外，不管工具是否运达都得着手修理船只。破损相当严重的船只只有抛弃，而把精力用在还可使用船只的修复上。这样，80艘船仅抛弃了12艘，还有68艘船可回航时使用。

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不列颠人就向罗马军发动了攻击。他们没有攻击阵营地，却袭击了负责军粮调配的第七军团。得知此消息的恺撒，命令阵营地的各个大门只以半个大队的兵力防守，也就是留2个大队在阵营地，他自己则率领4个大队立刻出发。刚到达罗马士兵收割小麦的地方，只见第七军团的士兵集中在中央，而周围则被不列颠的骑兵与战车包围着。

不列颠人的战车兵法与东方以及希腊不同。首先，驾双驾战车疾

驰，并以激烈嘈杂的车轮声加上投掷石头，使被攻击的一方陷于混乱。然后战车再冲入敌兵行列，战士下战车像步兵一样战斗，驾车者则将车子驾回后方等待。因此即使遇到战斗不利时，战士也能立刻逃走。这个战法极其巧妙，能同时发挥骑兵的机动力与步兵的持久力。

但不列颠人的战车也无法与迅速抵达的恺撒以及他所率领的英勇的第十军团抗衡。最终不列颠的士兵乘着战车逃走了，而没带骑兵团的恺撒无法追击。此外，因为阵营地只有2个大队1000人守卫，他便率全军折返。

鉴于敌军完全可能再度袭击，恺撒向高卢族长寇米乌斯借了他到不列颠时所带来的30位高卢骑兵。加上恺撒与下属的马，组成了不到60人的骑兵队，至少可以在下回派上用场。

果然不列颠人再度发动了攻击，而这次的目标是罗马军的阵营地。恺撒投入了两个军团在阵营前迎击。此次的战斗一开始就向对罗马军有利的形势发展。敌人最终逃跑，罗马士兵尽力追击杀敌，并烧毁了他们的谷仓。

战斗后不列颠人再度派遣使者要求讲和，恺撒命令他们提供较上次加倍的人质，并且人质必须送到高卢。这也给了恺撒离开不列颠的机会与理由，因为他其实并不想在气候恶劣的冬季渡过多佛尔海峡。

根据记载，恺撒是在风向与潮流都适宜的半夜出航，我想这是基于此时不会受到不列颠人干扰所选定的时间吧。总之，回程一路顺利，除了两艘船稍微偏南进入了别的港口以外，全部船只都完好无损地返回了伊提乌斯港。

此时的高卢在军团长们的充分镇守下，各部族维持着稳定的状态。恺撒选择了返回到比利时人居住的地方，即塞纳河以北的亚眠地区，并把这里作为公元前55年到前54年的冬季营地。在这里，一方面可监视冬

天的高卢全境，另一方面则可准备来年和不列颠的交锋。因此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向行省出发之前，他还不忘叮咛镇守冬营地的各军团团长尽量建造新船和修复在不列颠远征时破损的船只。

其实第一次的不列颠远征，虽然征服不列颠失败了，但实地调查的目的达到了。恺撒自己也诚实地写道："遵守约定送人质到高卢来的结果只有两个部族。"但是，越过莱茵河进攻日耳曼人领地——远征罗马人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不列颠，恺撒那年所取得的功绩，对远在罗马的人而言，是既诧异又兴奋。为了表达民众的欣喜，元老院决定举行史无前例的20天谢神祭。

但在公元前55年的战季结束时，恺撒也不得不放手让一位有能力的武将离开，他就是恺撒所垂青的青年克拉苏。因为是富家子弟当上恺撒的幕僚，他的能力往往容易被人们忘记。而这位青年克拉苏就要跟随就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父亲前往东方去了。克拉苏为了准备与大国帕提亚的战争前往东方，作为克拉苏长子的他也必须从军。对年届60岁才首次迎接正式远征的克拉苏而言，在高卢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儿子，是无人可取代的坚强后盾。

恺撒从自己的骑兵中分出了1000名赠与这位已步入35岁的年轻武将。恺撒其实经常面临骑兵兵力的不足，因而一直在大力培养高卢骑兵。他所拥有的骑兵数总计5000人左右，却将其中的1000名骑兵分给了这位武将，这份厚礼真是意义非凡。让这1000名骑兵随青年克拉苏到远东，不仅表现了恺撒以此为赠礼之意，同时也是对"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的一项回礼，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者规定要他提供1000名骑兵。从此之后，恺撒与和他一起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青年克拉苏，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然恺撒再也没见面的人还有母亲奥雷利娅。大概是在从不列颠归来时，恺撒收到了母亲的死讯。尽管是独子，但在接到通知时恺撒身为行省总督，是无法越过卢比孔河而回到罗马的。没再婚专心养育儿子的

奥雷利娅，将儿子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母亲让他无后顾之忧地成长，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她还经常为从政时的恺撒出谋划策。比起罗马的许多母子，恺撒与他母亲可说是非常亲密。

恺撒40岁赴任南西班牙行省总督时，某一天夜晚曾梦见与母亲交媾。这对持理性主义观点的恺撒来说是相当令人惊讶之事，于是他便请占卜师解梦。而依占卜师所言，这是恺撒征服世界之意，他听后才放下了心。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没有提及母亲的死，但这正显示了恺撒与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西塞罗个性不同，他并不太轻易流露私人情感。

改造首都的第一步

身兼南法、北意、伊利里亚（现在的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一带）三行省总督的恺撒，在秋末至春初的冬营期，自然不可能常待在一个地方。其实他即使一年内有多数时间不在，行省统治依然如故，这得归功于恺撒的组织能力。恺撒在行省积极任用当地人，并对还未成为行省的中高卢、北高卢中已经与他缔结同盟协约、表达恭顺誓约的部族内政，也一概不干涉。同样在首都罗马，当选择替代自己的人时，恺撒也毫不犹豫地录用行省出身的人才。采用行省出身者担任首都代理人的理由是，这些人虽拥有罗马公民权但因为是行省出身，进出政界会受到限制，因此可以将他们视为私人秘书使用。这种私人秘书团的代表是巴尔布斯与奥庇斯两人。公元前54年，恺撒能在拉文纳的冬营地安顿下来，也是得力于与这两人的频繁往来。

此时的恺撒或许是受到庞培建造罗马最早的常设剧场以及附属大回廊的刺激，也开始从事扩大罗马广场的都市改造计划。恺撒的行省总督任期，为了与庞培及克拉苏的任期配合而延长，因此往后五年都不会回首都。人不在首都却要推动这项大计划，那得要有高效率的秘书团，设置奥庇斯到拉文纳的职位正是为了这项计划。

在位于罗马政治中心的罗马广场，神殿和会堂随着时代的前进改建

得美轮美奂。罗马广场本身的规模，与500年前将此地定为罗马中心的第五代王塔奎尼乌斯的时代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因此逐渐成为“世界首都”的罗马，显得既破旧又无法充分发挥功能。因为南有帕拉蒂尼山横卧，西有卡匹托尔山耸立，在此地势下，恺撒考虑将首都向北方扩张。至于这时还没有建竞技场的东边，由于既是迎接凯旋将军的入城路，又位于罗马广场重要性较弱的东半部延长线上，对于只有延伸重要区域才有意义的这次扩建来说并不适当。

但在当时恺撒中意的广场北侧并不是空地而满是商店与住家。这是由于“苏布拉”这个恺撒曾生活的平民地区，到现在已经扩张到罗马广场旁边了。

恺撒打算在罗马广场扩建的地方建造神殿以及附属回廊。除了被当成众神住所的卡匹托尔山上的神殿外，在罗马的其余神殿虽为神殿，但完全没有肃穆静谧的氛围，通常都是和商业街比邻相接。虽然恺撒的目的是罗马广场的延伸，但也是以神殿为中心的商业街的建设，围住神殿对面的三条回廊的是密密麻麻的商店。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也给人同样的感觉。但是“苏布拉”地区一向是往南扩张，这对首都的改造事业来说实在不适合，于是便产生了用地买卖的问题。有关此事，西塞罗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如此说道：

> 保卢斯几乎完成了罗马广场内会堂的修改工程。（这个会堂是公元前2世纪，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所建造的，他的子孙所作的修改工程费用是恺撒贷款得来的。）恺撒如果完成了自己随意计划的大规模工程，必可得到荣誉和市民们的惊叹。但居住在罗马广场至自由回廊的土地上的人们并不接受低廉的出价。你也许会大笑出来吧，因此恺撒的朋友，特别是奥庇斯，用6000万塞斯特斯这笔巨额浪费于买卖用地上。

在帕拉蒂尼山上的一等地上，由罗马最有钱的克拉苏买入的豪宅的

价格是350万塞斯特斯。就连骄傲或是犯傻的西塞罗，也不可能收购用地就花了6000万塞斯特斯，这只能说是浪费吧。这封信再读下去，可以发现恺撒在这时已经有将另一公共事业“恺撒·尤利娅”选举会场使用的大回廊建在城外马尔斯广场的构想。公元前2世纪中期自布匿战争胜利以来，罗马的公共事业即快速发展。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罗马此风再起，而这方面的主角是庞培与恺撒两人。

庞培原本就生于富裕之家，再加上又是远东富裕之地的征服者，因而拥有支持大规模公共事业的财源，这是任谁都能想象到的事。而恺撒的钱从何处来呢？

对恺撒而言最大的债权者是克拉苏。恺撒在执政官任期尚未终了的公元前55年秋天，由布林迪西走海路出发至叙利亚。从克拉苏得来的借款尚未还清，已经没办法再向他借更多了。克拉苏碍于庞培与恺撒显赫的名声与辉煌的战果，身为“三头”之一的他也急于有所建树。远征东方对60岁的克拉苏而言是最后的机会了，因而他甚至变卖了私产备战。对恺撒而言，这时的克拉苏已经不能依靠了，也就是自己的巨额借款通道已被关闭了。因为从前都是克拉苏借款给他，或是以克拉苏为担保借款的。

或者恺撒可以如同苏拉或卢库鲁斯那样，从被征服地民众那里掠夺财物。但恺撒所称霸的高卢并非苏拉或卢库鲁斯所称霸的希腊与中近东。此地并没有丰富的财宝，是没有神存在的较落后欠开发地带。虽然部族的有权势人士拥有黄金制品，但居民大多数的富裕程度无法与东方相比。高卢战役终了后，恺撒在高卢全境所收的税金一年为4000万塞斯特斯，这只是罗马广场扩建工程用地收购费的三分之二而已。这证明当时的高卢即使榨干也所得有限。再说向战败者征收他们所无法负担的重税，对想将此地纳入罗马国的恺撒而言，也算是愚蠢的办法吧。

要从高卢征收重税不易，总可以将战俘卖为奴隶换钱吧。但实际上被恺撒当成奴隶卖掉的战败者，只有违背誓约后再度挑起战事的人。普

鲁塔克写道：“高卢战役后有100万人沦为奴隶。”不过研究者一致认为这并非实际的数目。战役中期终了是在公元前55年，10万应是较为贴切的数目。如果将奴隶平均每位以200塞斯特斯卖出，得卖出30万人才够用地收购费。因此，以卖奴隶为财源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那恺撒是不是另有财源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出发至高卢前债务累累的恺撒，随着高卢战役的进行，不知何故手头也似乎逐渐宽裕。即使掠夺和高额征税也有个界限，而卖奴隶的费用也是不够的。仅以高卢为基地的恺撒如何明显地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呢？

也许这个有些俗气的问题不适合在学术上讨论吧，因此研究者们不大涉及此问题，只能从古罗马时代的书籍中寻找蛛丝马迹作为推理的基础。我想他是将在高卢的专利权商业化了。其实这并非是我一人之见，以“通俗歌剧”闻名的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他的《尤里乌斯·恺撒的经营》(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中也提到此假设。

罗马化对罗马国而言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因此恺撒打算将向西扩张以莱茵河为界的高卢全境全都罗马化。套用恺撒自己的话，就是“文明化”。然而恺撒了解民族的文明化，不是去读西塞罗精湛的散文及卡图鲁斯充满情感的韵文，而是可以由经济来完成。因此，恺撒积极奖励与高卢通商。

商人对新市场的开拓相当感兴趣，这是古今中外都一样的。恺撒把他军事称霸下的高卢开放给了罗马商人。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商人大多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南意希腊人，他们便大举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进入高卢。恺撒将自己征战换来的称霸高卢的通商权利卖给了他们，这或许是有期限的契约关系，因此恺撒便有了稳定的固定收入，他的经济状况在实行这项方案后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就很高了。

一旦放任特权者使用特权，就有纵容他们为所欲为的危险。恺撒没有忘记控制这种情况是作为统治者的责任。无论是否完全征服了高卢，

恺撒已经制定出详细的统治政策，其中就包括税制，这样便可以控制追求利润者的为所欲为。

我是根据以下列两点作出推论的：

一、一年后克拉苏死去，而恺撒的经济状况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因为有固定收入而改善了。所谓的“改善”就是一向只知借钱的恺撒，这回有钱可以借给别人了。

二、在五年后的内乱中，南法的马赛站在庞培那一方与恺撒作对，原因就是传统上马赛商人独占着与中北部高卢的通商特权，而罗马商人利用高卢战役的机会，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样的变化令他们心生怨恨。

总之，恺撒找到了一条不掠夺也不征收重税就可赚钱的途径。因此，在布莱希特以史料调查为基础写成的《尤里乌斯·恺撒的经营》一书中，以公元前60年恺撒被选为执政官作结。不知布莱希特之前是否有提笔写高卢战役那段期间恺撒的念头。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且是富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但在写《尤里乌斯·恺撒的经营》的当年就过世了。布莱希特通过从最初以债权人身份与恺撒交往、后来成为恺撒秘书的故事主角口中，将恺撒与金钱的关系表现了出来，请看以下这段话：

> 每当见到他如何应对为钱的问题而来访的人时，我的内心就满怀敬意，我想这是因为他对金钱所抱有的绝对的优越感。
>
> 他对金钱并不渴求，他并没有打算要将他人的钱据为己有，而只是单纯地没有区分他人与自己的金钱罢了。他的举动是以每个人都是为了帮助自己的观点为前提而行动的。他对金钱的超然态度往往也能够感染债权人，从而使债权人没有任何不安与担心。他的泰然自若令我惊叹，他就是那个有名的恺撒。

高卢战役第五年（前54年，恺撒46岁）

公元前54年春，恺撒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军团的冬营地。他前一年所下的命令，麾下的士兵在过冬期间全都照办了，恺撒觉得十分满意。考虑到登陆作战及气象变化，他命令士兵将远征不列颠用的运输船只高度造得很低，士兵们也十分完美地达到了这个要求。运输船总共有600艘，另外还加上28艘可用桨划动而行动较自由的单甲板平底船。总司令官恺撒于是召集士兵对他们大加表扬，因为他们虽然在物资困乏之地却将各种物资调度得十分好，士兵们的士气因此也更加高昂。恺撒下令将准备好的船只集中于和上次出航地点相同的伊提乌斯港。他的计算是从伊提乌斯港航行约30罗马里（约45公里）就可抵达不列颠。从现在来看，这个计算也是正确的。以当时的船只，航行所需的时间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

但在前往港口之前，恺撒有必须解决的问题等着他。莱茵河附近住着的特雷维利人没有出席每年一次的全高卢族长会议，因此没有宣誓效忠罗马。罗马方面还接到消息，他们正号召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和他们共同战斗。为了避免事态演变成为罗马军渡过海峡之后遭人从背后攻击的窘境，在出发之前有必要镇压特雷维利人。

而特雷维利人的骑兵战斗力号称高卢最强是众所皆知，同时他们的步兵战斗力也不容小看。恺撒军团与他们一次也没有交战过。这个部族虽属于高卢人，但也分成许多小部族，而联合这些小部族的重要人物就是契恩杰托利库斯与茵多提欧马鲁斯两人。知道恺撒军的接近后，契恩杰托利库斯联合他所支配的小部族先向恺撒表达了恭顺之意。茵多提欧马鲁斯知道此事之后担心自己被孤立，虽然身为反对罗马的强硬派，但也宣誓了恭顺。

虽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的誓言，但阻止特雷维利人的动向乃是恺撒当前的目标。他接受了他们的讲和，但要求特雷维利人提供较其他部族高

出许多的200名人质作为保证。在对方提出人质、完成讲和之后，恺撒对特雷维利人的镇压便告一段落。他于是率领4个军团以及800名骑兵向伊提乌斯港出发。除了被风吹散而来不及集合的50艘船之外，伊提乌斯港内集结了550艘运输船和28艘单甲板平底船。

和之前2个军团并且没有骑兵的状况相比，在第二次不列颠远征时，恺撒决定带5个军团和2000名骑兵随行。2000名骑兵大部分都是由高卢各部族所提供。除了骑兵不可或缺这个理由之外，带着这些高卢统治阶级的成员到不列颠，实际上也是以他们作为人质。远征不列颠时，

高卢的安定对恺撒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但埃杜伊人的重要人物杜姆诺利库斯却认为此次远征规模过于庞大了。他以害怕大海和宗教上的禁忌为由，请求恺撒让他留在高卢。恺撒给了他否定的回答。绝望的杜姆诺利库斯召集了其他部族的骑兵队长，煽动他们说恺撒带他们去不列颠是打算置他们于死地。恺撒得知此事之后，考虑到埃杜伊人在高卢的重要性，于是尝试说服杜姆诺利库斯。而当时正好风向是西北风，船只都不宜出港航行。恺撒就利用这段期间来说服他们，而高卢的骑兵队队长似乎也接受了恺撒的观点。

在等了25天之后，适宜出航的西南风刮了起来，恺撒下令全军上船出航。但杜姆诺利库斯趁着登船时的匆忙骚动，带着自己部族的骑兵逃脱了。恺撒接到消息之后立刻下令中止上船并追捕逃脱者。他告诉前往追捕的罗马骑兵，如果对方拒绝回来，只需杀死杜姆诺利库斯就好。而这位埃杜伊人的骑兵队队长在临死之时，还呼喊着自己是自由的人类。其他的高卢骑兵则全体返回营地。恺撒见问题已经解决，便让士兵再度登船。

恺撒将3个军团与2000名骑兵交由副将拉比埃努斯指挥，并交代他完成下列的任务：

一、守护出航地周围地区的安全。

二、监视高卢全境。如果有事情发生，他有权采取相应的行动。

三、确保向不列颠征战军团提供补给。

恺撒自己则率领了包括前次远征的第七、第十军团等5个军团，以及2000名骑兵，于傍晚时出航。此时风向是稳定的西南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的骑兵和步兵并没有分开而是混合搭乘在同一条船上。士兵搭乘的船只有578艘，后面还有200艘以上的私人船只尾随出港，坐在这

些私人船只上的都是商人。

这次远征，不仅制造了为方便登陆作战以及易于拉上海滩的很低的运输船。这些船只不仅能用帆行进，还可使用桨来使船前进，也就像是地中海型帆船的改良型。

傍晚时出港的远征军顺利地航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半夜风却停了。恺撒的军团因此无法驶上预定的航线，所有的船只都随潮流而行进着。在黎明时分，他们所抵达的海域可以由左舷望见不列颠的土地。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那正好是前一年夏天所认为的适宜登陆的地点，于是桨便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士兵们拼命地划着桨，笨重的运输船只得以与轻巧的单甲板平底船相同的速度靠岸。接近正午时，所有的船只都已靠岸。这次的登陆地点大约是在第一次登陆地点的南边。

登陆之后完全不见敌人踪影。后来恺撒从抓到的俘虏口中才得知，不列颠人看到与前一年完全不同且数量众多的船只，全都躲藏到内陆去了。

第二次远征不列颠

恺撒刚登上不列颠的陆地时，制定的战略本是深入内陆，在那里建造正式的阵营作为据点来攻击不列颠人，但这个战略马上就被迫改变了。远征不列颠的真正敌人与其说是不列颠人，不如说是与地中海大为不同的北方海洋及气候。

毫无受阻地登陆之后，恺撒下令将船以绳索固定在稍有斜度的海滩上，并安排10个大队6000名步兵加上300名骑兵来守卫。之后，他便率领其余的将士分别进入内陆。

恺撒大军前进了约18公里后，在后面有森林的河边遇到了严阵以待的敌方大军。恺撒的士兵勇敢地迎战前来攻击的敌军。恺撒采取了以经

验丰富的第七军团为前锋的积极战术来与不列颠人战斗，结果成功击退了敌人。没有士兵阵亡，负伤者也很少，但恺撒不让士兵追击下去。在情况不明的敌方土地上，乘势深入追击是很危险的。

第二天一早恺撒军发动了进攻。但就在见到敌军行踪时，负责守卫船只的阿托利乌斯所派遣的急使追上了恺撒军，他带来了如下消息：前一夜受到猛烈暴风雨的袭击，船只受损严重。恺撒立即下令撤兵。而回到海边的恺撒见到的惨状超乎想象，想必他也被惊呆了。

地中海夏天暴风雨如此频繁地袭击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降雨极其猛烈，雨量非常之大，加上北海波涛汹涌，潮流湍急。这些都是地中海无可比拟的。

负责船只安全的阿托利乌斯认为，拉上岸边而停在沙滩上的船只，不需要以粗大的木桩来支撑，只要下锚固定住就可以了。在气候稳定的地中海，也许这么做就已经很安全，但这系船方式无法抵挡北海猛烈的风雨。更糟糕的是，经过暴风雨之后，船只停泊的斜坡都消失无踪了。

恺撒查看后判断有40艘船完全无法使用，其余的船虽然受损严重，但是只要经过充分地修理应该可以起航。而我看来，在一个冬天里就能建造好600艘船，可见这些船不一定能达到足以应对北海恶劣环境的坚固程度。即使没有偷工减料，也一定是以航行地中海船只的标准来建造的。在北海建造船只的首要条件，不是速度也非操纵的灵活性，而是坚固耐用。

修复船只为最优先任务，恺撒让军团中善于修船的士兵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同时，他派遣急使通知留在大陆的副将拉比埃努斯，命令他建造新船并派遣工兵过来。另外，为了能安全地展开船只的修复工作，同时保障其他船只的安全，恺撒下令建造能完全围绕沙滩上所有船只的庞大阵营地。考虑到跟随而来的商人船只的安全，营地需要足以容纳合计700艘以上的船只。对凭借技术和物资作战而压倒对方的恺撒来说，此

时正是发挥他本领的时候。罗马人凭他们的技术能力不分昼夜地突击施工，不到10天就建造完成了这个巨大的四方形营地。

完成营地建造后，除了修复船只的成员之外，恺撒留下一个军团以及300名骑兵作为守卫，便率领其余将士再度进攻内陆。罗马军在得知船只破损之前所在的地点，就是离海岸18公里首次遭遇敌军之处。而朝这个地点前进的罗马军，遇到了和上次截然不同的敌方大军。因为高卢各地于冬天时大量兴建船只，不列颠恐怕也预料到罗马军的再度进攻。于是与前一年不同，各部族共同组成了战斗联盟，总指挥是一名叫卡西贝拉努斯的男子，此人在部族间的战斗中以英勇闻名。

但按照《高卢战记》的叙述顺序，在这里先要叙述一下不列颠人的风俗习惯。虽然一般的将领只会记述地势及敌军规模，但恺撒的习惯是在写完上述事项之后，把看似毫无关系的民族性格、宗教和风俗习惯等也会仔细地记录下来，这有点令人分不清他到底写的是战记还是游记。无论高卢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一例外。但罗马人对高卢人之前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而因为曾进攻过日耳曼人，对他们也不是全然无知。但在恺撒的记录之前，不列颠人对罗马人来说完全是个谜。

恺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一方面是因为恺撒自己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在他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果只是进攻敌人然后烧杀抢掠一番后就离去，那么对方的生活习惯等就毫不重要；而恺撒的思考则完全不同，如他能写出相遇敌军最高指挥者的名字；用干净利落的词句描写两军交锋，令读者屏气凝神；还有就是将敌人的风俗习惯都写进书来。以上的这种写作方法即使是专业作家看来也称得上是十分高明。因为有能令人屏气凝神的情节，连一般的读者也会对战争发生兴趣而继续阅读。为了向这位少见的作家致意，这一部分以直译的形式呈现：

如果传言可信的话，在不列颠的内陆居住着土著；相反的，在

海岸边则有从高卢东北部移来、以战斗和掠取为目的的比利时人居住。他们多是用地名来做名字，这就显示了他们的出生地。

由于人口众多，房屋建造得很密集，有许多的家畜，和高卢很类似。

货币方面用的是金币以及用秤计重的铁棒。内陆产锡而海岸地带出产少量的铁。没有铜所以只能靠输入。除了山毛榉和枞树之外，森林里的树木种类与高卢相同。食用兔子、鸡和鹅是有罪的，他们好像是为了乐趣也饲养这些动物。（大概也是为了吃它们的蛋吧。）气候比高卢稳定温和，不如高卢寒冷。（我想恺撒恐怕是和高卢东北部比较才如此叙述的。）

整个不列颠岛呈三角形。（接下来，恺撒凭自己的地理感觉，在关于不列颠和高卢、希斯帕尼亚的位置关系上的描述相当奇怪，所以省略。不过他已经知道在现在的英国与爱尔兰间有曼岛的存在了。）

根据某本书的记载，据说在不列颠的北方，冬季的黑夜可持续30天之久。就我方搜集的情报无法判断这点是否正确。但是以我方所使用的水钟来实验，结果只能得知黑夜较大陆短暂。

不列颠的居民中最像人类的（最文明的意思）是居住在坎提乌姆地方（现在的肯特，也就是多佛尔海峡沿岸）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高卢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住在内陆的大部分居民连种植小麦的习惯都没有，主要食用肉类与奶；而所谓的衣服只是将毛皮裹在身上而已。而且所有的不列颠人都以青色染料涂染身体。因此在战场上，令人感到格外恐怖（即使是绅士，2000年前也和印第安人差不多）。留长发很普遍，除了头部和唇上的毛发之外，他们习惯剃除其余所有的毛发。男人共同拥有10到12名妻妾，叔伯、父子、兄弟之间共同拥有妻妾是普遍的情况。在女性为处女时首次与她交媾的男子，就算是生下来的孩子的父亲。

接下来就是保留到现在才叙述的令人屏气凝神的战斗部分了。不列

颠人并没有按照恺撒所希望的方式来战斗。也就是说，这些战役并不是以平原为战场正式布阵的会战，而是以游击战来展开的。未开化民族与文明民族间的战争，常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不列颠人是多种部族的集合体，加上当时不列颠完全被森林、沼泽和河川所覆盖，这些是文明的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所以游击战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罗马军不时地会在建设营地时遭到袭击，要不就是在寻找粮草时被攻击。他们十分恼怒于这些突然从森林中突袭而来的敌人。另外，相对于以青色染料涂抹身体、半裸而动作轻盈的不列颠兵，罗马兵身负沉重武器装备，常为自己行动的迟缓而苦恼。但罗马军优秀的总司令官能搜集情报并作出适当判断，因此罗马军也可以适应当地环境。敌军即使有一个总指挥卡西贝拉努斯，但总归也不过是诸部族的集合体罢了。恺撒便由此看出了突破点。

恺撒一改一直以骑兵团为前锋的行军方式，而是尽量将步兵和骑兵编组在同一团。这种战术能有效应对游击战术中必然有的小部队波状攻击。在遭遇敌军袭击时，这种战术的确屡次击退敌人。但恺撒军也并不是毫无伤亡，恺撒明文记载了牺牲者，包括大队长拉比留斯和其他数人。恺撒的进攻并没有因为埋葬战死者或治疗负伤者而中断，由此看来，罗马方面的牺牲人数应该不多。不列颠方面的牺牲者应该数量颇多，这也成了之后多部族集合体解体的原因。一切都证实了恺撒的预测是正确的。

敌军从森林中突然现身袭击的次数在变少，剧烈程度也在变小，可看出敌方部族已经开始叛离。接着，当不列颠最有把握的战车部队被恺撒的步兵和骑兵彻底击败时，诸部族的叛离就成了定局。恺撒没有让这个大好时机白白溜走，他开始朝着不列颠总指挥卡西贝拉努斯在塔梅西斯河（现在的泰晤士河）以北的领土进攻。

即使在古代也无法确认罗马军是在哪里渡过泰晤士河的，恺撒也只说要渡过此河只有一个可能的地点。卡西贝拉努斯的领土因为位于现在

的白金汉郡一带，所以渡河地点有可能是伦敦。无论如何，在局外人看来既然是唯一可能渡河的地点，那么对当地的人而言，一定也是很容易渡河之地。而事实上，罗马军抵达泰晤士河畔时，看见对岸聚集了大批敌军，同时阻止渡河的栅栏也已经修建好了。

所谓的栅栏是由许多前端削尖的木桩打入河里所筑而成。除了看得见的，在水面以下的木桩数量也不少，这是恺撒从俘虏处得知的信息。但因为敌方本身也有渡河的需要，所以桩子不可能打得太密。恺撒下令骑兵首先渡河，步兵紧接其后。这不是分成一批批少量人的渡过，而是全部一起渡河。虽然连头都没入水中，但步兵和骑兵都顺利渡过了河。如此一来，严阵以待的敌军也无法抵抗速度敏捷而且人数众多的罗马军队，只有放弃战斗逃跑了。

卡西贝拉努斯在此战役中重视防御胜过攻击。他只留下4000名士兵，而让其余士兵隐藏在森林中等待。也就是又用游击战术来困住罗马军，但最终也无法抵挡罗马军勇猛的攻击。最后卡西贝拉努斯不得不撤退至自己的根据地。

虽说是根据地，却不是如同高卢人那样以城墙围绕且筑于山上的要塞。不列颠人所认为的要塞就是以栅栏和深沟围住的整座森林。他们往外地人所不知的森林深处运入家畜和粮食，然后躲藏起来等待敌人。贴切点来说，就像是罗宾汉的领地。

但即使是这样的要塞，也抵挡不了罗马人特有的顽强。恺撒命令士兵从两个方面发起攻击。许多不列颠士兵被杀，幸免的则逃出森林向四面八方散去。而就在同时，卡西贝拉努斯命令肯特地方族长攻击了罗马军在海岸的大阵营地。但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防守严密，不列颠士兵根本没有机会得手。最终卡西贝拉努斯本人逃跑了，彻底打垮了不列颠人的战斗意志。

首先向恺撒阵营提出和谈要求的部族，恺撒只要求他们提供人质及

军粮就接受讲和。而已被其他部族抛弃的败将卡西贝拉努斯，也通过高卢族长寇米乌斯，向恺撒派来了降服的使节。

恺撒认为现在该是结束不列颠远征的时候了。他要求不列颠的总将领卡西贝拉努斯答应要求就可讲和，也就是交出表示恭顺的人质，订出年贡金额和禁止侵略其他部族。如此大规模的远征仅此种程度的条件就接受讲和，恺撒的理由是：

一、监视高卢的动向非常有必要，不考虑冬季在不列颠扎营。

二、适合战斗的季节即将结束，不能再持续远征下去了。

罗马军因为带着人质及俘虏而人数大增，不得不分两次渡过多佛尔海峡。恺撒本人则是在第二批船队运送下才回高卢的。因为必须等待到达高卢再回来的船队，当不列颠在恺撒身后时已近秋分了。回高卢途中，士兵、船只均平安无事。

在传统上对研究古罗马颇感兴趣的英国，关于恺撒远征不列颠的意义，很早开始就是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但某些英国研究者的言论也指出了此次远征和恺撒渡过莱茵河相似。看到这一点，身处局外的我禁不住要笑了。

如果像丘吉尔一般说大英帝国的历史是自恺撒登上不列颠开始的，那么德国人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历史是自恺撒渡过莱茵河开始的呢？如此言论，虽十分孩子气，但并非笑话。为什么呢？渡过莱茵河的难度和横越多佛尔海峡的难度是不可比拟的，况且恺撒是在不列颠人没有侵略高卢时决定远征不列颠的，且有众多的商人随行。渡过莱茵河是夸示罗马的军事力量，横越多佛尔海峡则不是为了夸耀。与其说恺撒的目的在于完全征服不列颠，使它成为罗马的行省并派遣罗马人前去，不如说是为了要令后世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和理解它的价值，有朝一日再由某人将它征服而成为罗马的行省。

而渡过莱茵河的目的在于阻止居住于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侵略高卢。恺撒判断要攻进连白昼也昏暗无光的森林深处是不可能的，而且要将日耳曼民族罗马化也不现实。与此相反，虽隔了一道海峡，南部肯特地方的不列颠人与西北方的高卢人是有交流往来的。虽然要高卢人与罗马军队一道远征会使高卢人不情愿，但是只要高卢人臣属于罗马，这两个民族的交流就能转换为文明的交流。从这点出发，恺撒见到了将不列颠罗马化的可能性。

恺撒所指明的事情，在一世纪之后由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继承并加以实现了。也因为如此，英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德国时，抱持着令人无法想象的优越感，丘吉尔甚至还说德国人是河对岸的野蛮人。在我看来，虽然英国成为了罗马世界的一员，但也只有边境的一小部分划属罗马，实在用不着因此而高傲。实际上，德国国土有四分之一位于莱茵河西侧，也是属于古代文明世界的范围。事实虽是如此，但在此问题上知识分子们是出人意料的孩子气。不过也正因为还保留了孩子般的纯真，他们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持续研究下去。

虽然远征不列颠成功并平安归来，但在那一年高卢出事了，这使得恺撒无法直接穿越阿尔卑斯山返回罗马。问题不是出在高卢人群起反抗，而是源于当年高卢的小麦收成不佳。

15个大队的毁灭

恺撒从高卢战役以来，不变的方针就是命令军队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驻扎过冬。罗马军队在刚征服的地方建设起坚固而规模庞大的营地。冬营地的最高指挥官虽然逐年更替，但是全军在同一地点过冬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因为有8个军团4.5万人以上的兵力，胆敢发动攻击的高卢人或日耳曼人基本没有。但公元前54年至前53年的冬天，高卢全境的小麦收成不佳，要让如此众多的士兵填饱肚子，只靠一个地方供应是不可能的。因此罗马大军不得不分散。恺撒决定将冬营地分为8处，每处

驻扎一个军团过冬。军团虽然分散了，但是恺撒仍将各个营地集中到塞纳河北方比利时人所居住的高卢东北部，也就是现代的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南部以及德国西部领土一带。扎营于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项冬营方针其实仍然没变，并且，各个冬营地相距都在150公里以内，这样的距离，即使在冬季，几天之内也能相互往来支援。

在摩利尼人的居住地上扎营过冬的是法比乌斯所率领的一个军团。

驻守在涅尔维人的土地上的是昆图斯·西塞罗（西塞罗的弟弟）所率领的军团。

在耶斯比人的土地上的是洛西欧率领的军团。

而驻守在雷米人居住地上的则是副将拉比埃努斯。不过因最近才向恺撒宣誓忠诚的特雷维利人的领地，位于冬营阵地的视野之内。冬营地虽设在一直对罗马十分忠诚的雷米人居地，但是最受恺撒信赖的拉比埃努斯所肩负的真正任务，乃是监视特雷维利人的动向。

接替跟随父亲前往东方的克拉苏长子职务的，是克拉苏的次子，虽然他还是个财务检察官，但也承担了率领一个军团的任务。接着，随着军团长普兰库斯、特雷波尼乌斯各就各位，分散于三处的冬营指挥官也任命完毕。

一个军团6000名士兵，再加上另外5个大队3000名士兵，总计9000名士兵。冬营地决定驻扎在最靠近莱茵河的伊布洛斯人的土地上。由于兵员众多加上位于最前线，所以这个冬营地的指挥官由具备军团长资格的萨比努斯以及科塔两人共同担任。恺撒一直待在前一年的冬营地亚眠，等待全军各自到达冬营地，完成营地建设，以及从当地调度军粮完毕。等这些报告全都送达以后，恺撒就计划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南方行省进行统治。

我推测此时恺撒应该已经接到女儿尤利娅的死讯。尤利娅嫁给庞培已经五年了，虽是政治婚姻，但夫妇俩的感情十分融洽。她可能是因前一年流产而身体衰弱，难以负担第二次的怀孕及生产。母亲的性命没有保住，生下来的孩子没过几天也死了。

如以前一样恺撒没有流露出任何个人感情，不但完全没有在《高卢战记》中提及，连字里行间也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寻。后世的人是从这一年10月西塞罗所写的信中才得知这件事的。在写给由他推荐、经恺撒准许而被任用的青年托勒巴提斯的信中，西塞罗写着：对恺撒的重大不幸，我自己虽然写信告知了亲信巴尔布斯，但是没有勇气直接写吊唁函给恺撒。

这是继去年母亲去世后恺撒失去的第二位亲人。庞培对爱妻的死亡也悲痛欲绝，准备将她葬在充满两人回忆的阿尔巴别墅里。并且，罗马的一般市民也对关联两大权势人士的尤利娅之死叹息不已。他们均能体谅因职务而无法回罗马的父亲恺撒的心情，决定将她埋葬在马尔斯广场的历代伟人墓地中，这算是特殊的礼遇了。

恺撒在亚眠的大本营中，陆续接到各个军团冬营地准备完毕的报告。虽随时可以往南方进发，他却将出发时间延后了。高卢东北部的局势变化和迁移原已决定好位置的特雷波尼乌斯冬营地是延迟出发的原因，而此时恺撒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消息。

萨比努斯和科塔率领15个大队的9000名兵士，抵达了目的地伊布洛斯人的领地。前往迎接他们的两名族长承诺提供军粮。之后营地建设完成，军粮也送到了营地。但15天之后，友好的伊布洛斯人突然反叛了。原来之前受到恺撒攻击并宣誓效忠的特雷维利人长老唆使伊布洛斯人叛变，理由是现在罗马军队的冬营地分散，正是逐个歼灭的大好时机。

在罗马军的守卫之下，攻击萨比努斯和科塔营地的伊布洛斯人没有得逞，只好节节败退。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撤退而是派人来到营地之

外，表示想与罗马军队会晤并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

接着伊布洛斯的族长告诉罗马营地派出的两名使者，说是因为自己曾受到恺撒诸多恩惠，所以要将所知的机密全部说出。他说出了以下的信息：

> 特地告知以下的信息，完全是想报答恺撒长久以来对他们的厚待。伊布洛斯人攻击罗马营地完全是受到挑唆的结果，并非出于本意。自己这样的弱小部族根本没指望能击败罗马军队。而高卢已请了许多日耳曼人雇佣兵打算越过莱茵河，他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会抵达此处。所以在那之前，如果罗马军队撤除营地，行军到西塞罗之弟营地或拉比埃努斯营地并与他们会合，应该是万全之策。而如果他们要通过伊布洛斯人领土，自己以及族人会保障罗马军队的安全。

罗马的两名使者于是回营报告了上述消息，听后萨比努斯与科塔两位指挥官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之中。他们正在对弱小的伊布洛斯人为何会攻击罗马营地感到费解，此时又刚好被告知日耳曼人即将到来，于是就将此事认定为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但在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意见却产生了分歧。

作为冬营第二指挥官，但因平民出身而谦让贵族萨比努斯一步的科塔，坚持反对因日耳曼军来攻就舍弃营地、拆营离去。他的理由之一是：阵营地有9000名士兵的防卫，军粮也很充足，要撑到己方援军的到来绝对轻而易举；第二个理由是：在没有恺撒的命令下撤离冬营地是不被允许的。科塔的这两项意见，得到大队长以及大部分首席百人队队长的赞同。

但首席冬营指挥官萨比努斯强烈主张撤出冬营地，理由是害怕等待下去会耽误时机以致难以挽回。恺撒已经出发回属地，而各部族又开始

出现形势不稳定的动向。他认为在日耳曼人来袭之前，如果自己不先下手为强，就只有等待饿死或被杀了。会议上，萨比努斯因为得不到列席作战会议将官的支持，把附近的士兵都叫了过来为自己壮声势，结果士兵们也动摇了。担心内部意见分歧会造成不团结的人则居中调解。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半夜，最后科塔成为退让的一方，会议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撤营出发。

指挥官意见的不统一在准备撤营时表露无遗。由于无法下定决心舍弃一切，结果士兵们要带走的行李就非常多，但也没有人针对此问题给予适当的指示。而且，由于是突然之间的决定，为了准备撤退士兵们直到天亮都没有睡觉。

到底是前往75公里外的西塞罗之弟冬营地，还是到稍远一些的拉比埃努斯冬营地，也有一些争议。最终罗马军相信了伊布洛斯族长所说的，如果他们要通过伊布洛斯人领土，族人会保障罗马军队的安全。所以萨比努斯就选择朝西塞罗之弟冬营地出发。这也是导致不幸的原因之一。

离开冬营地后走了约3公里，道路就进入了深谷之中。罗马军既要拖拉装载沉重行李的车辆，又要在峡谷间的道路上行走，队伍自然形成了长长的一列。正要出峡谷之时，先行部队察觉到有敌军埋伏。几乎与此同时，后卫部队也受到敌军的袭击。萨比努斯为了集合自己的人马而大声呼喊。相反的，科塔则逐一喊着大队长及百人队队长的名字，下令组成圆形队伍。他打算将行李车辆置于外围，而士兵们则进入其中防守。但拉得很长的队伍在此兵荒马乱之际要变为圆形十分困难。另外，科塔也决定要抛弃前面与后面的行李车辆，但士兵们并没有执行。结果到行李车拿行李的罗马士兵和已经杀到的敌方士兵混杂在一起，大大延迟了圆形队伍的组成。

以好不容易才组成的圆形车队作为盾牌，罗马军先派一大队出外作战，疲惫之后换下面一队，如此开始了波状攻击。但是埋伏在两边高处

的敌军不断向下投掷石块，使得回到圆阵之内的士兵人数越来越少。激烈的战斗从早晨毫无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首席百人队队长有两人被投枪刺穿身体，军团长科塔被石块击中脸部身负重伤。

动摇的萨比努斯派出使者求见敌方的族长，要求对方放过罗马军队。敌军首领发誓保障罗马士兵的人身安全，同意会谈。萨比努斯于是去找科塔，说服他与自己一起出席与敌军的会谈，但是血流满面的科塔拒绝与战斗中的敌人商谈。

萨比努斯只好招呼在附近的几名大队长及首席百人队队长，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前往。迎接他们的伊布洛斯人首领安比奥里吉斯要求罗马的将官在会谈之前先解除武装。萨比努斯答应了这项要求，并命令随从人员照办。在交涉休战事宜之中，不知何时罗马人被包围了，而等待着他们的则是屠杀。一结束这项杀戮行动，敌军就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并继续袭击守在圆阵中的罗马军队。之后科塔战死，罗马士兵的鲜血染红了寒冷坚硬的土壤。残存者虽然逃回冬营地，但是仅剩下的少数兵力根本无法防卫。军团旗手在无人接手银鹫旗的情况之下，将军旗投向敌军而阵亡。只有几名士兵穿越森林艰难地得以逃生，挣扎着走到了拉比埃努斯守卫的冬营地。

这可以说是恺撒自高卢战役以来首度受到的沉重打击。三年前编组成的第十四军团的10个大队，以及为了增强各军团而征集来的5个大队，全军覆没。根据研究者得出的数字，在此之前的牺牲者加上这次失去的9000名士兵，恺撒前后共失去了1.44万名士兵，等于丢掉整整2个军团。对于以士兵牺牲少而自豪的恺撒而言，这无疑是强烈的打击。

另一边，将9000名罗马士兵赶尽杀绝的伊布洛斯族长，在战胜之后也没有浪费时间，他率兵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近旁的阿都阿提奇人之地，告诉对方他们打败了罗马军队，并煽动对方反叛罗马。第二天又火速来到了涅尔维人的领土，告诉对方他们杀了罗马的两名军团长并毁坏了冬营地，要求对方与自己联合起来，一起攻打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于

是，比利时人之中最强大的涅尔维人，也忘掉了遭受恺撒攻打之后所结的誓约，决定起兵攻击罗马军队。总计6万名士兵的大军一起朝西塞罗之弟所在的、由不到6000名士兵的一个军团所防守的冬营地进发。

而此刻西塞罗之弟完全不知情，最先得知惨祸发生的拉比埃努斯派来的使者，恐怕是在往西塞罗之弟冬营地的途中，连营地都没能靠近就被比利时人抓住杀死了。而西塞罗之弟之所以能知道敌军来袭，是因为在外调度木材的骑兵碰见了敌人，火速回营报告。

西塞罗之弟立刻派遣急使通知身处亚眠的恺撒。但他不知道这个急使在途中也被敌人俘虏，还以为急报已经抵达恺撒的手中。自高卢战役以来，西塞罗之弟的健康状况欠佳，但冬营指挥官的责任感使他的心中燃起了火苗。他命令士兵利用整个夜晚建造120座防卫塔，这项任务刚一结束，敌军就发动了攻击。罗马军队白天防卫，夜晚则修复受敌军攻打而破损之处，连伤病士兵都没有休息。同时因为敌方用投石器将点着火的木桩掷入营地内，所以也需要有人进行消防工作。

比利时军本以为轻松可以拿下营地，却意外遭遇了罗马军的强烈抵抗。于是他们决定要试试对萨比努斯行得通的手段，他们派出涅尔维人中与西塞罗之弟相熟的重要人士进行停战的会谈。在交涉中这位人士告知罗马军队下列事项：

一、整个高卢东北部已经相继对罗马出兵了。

二、日耳曼人也将大举渡过莱茵河。

三、恺撒以及他麾下军团长的冬营地正被包围和攻打。

四、萨比努斯和科塔均已阵亡。

他因此劝罗马军队最好撤离冬营地，向自己的领地行军，他们可以保障途中的安全。他还补充说，罗马军队冬营地的设置没有照往年的惯

例，自己就曾十分担心出事。

西塞罗之弟对此回答如下：

一、罗马人不会听从有武装的敌人从口中说出的话，更不会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

二、如果对方要停战及解除武装，可派遣使者至恺撒处讲和。恺撒对此会公正地判断，也许会接受比利时人的请求。

欺骗阴谋没有得逞的比利时人也只有再次展开攻击了。他们学习罗马人开始建造攻城网，也就是在营地周围筑起高3米的栅栏和掘出宽4.5米的壕沟。但他们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所以只能用剑来削和用手来挖，并且用上衣来运送土壤。即使如此，因为人数众多，经过3天的劳动之后，22.5公里长的围绕着罗马军冬营地的包围网就建造完成了。接着几天，比利时人把时间花在了制作高的瞭望楼以及移动式龟甲车上，而这也是从罗马军处学来的攻城方式。冬营地之内的罗马士兵这时所面对的，不仅是10倍于自己的敌人，还有他们从自己身上学到的颇具效率的攻城方法和工具。

西塞罗之弟冬营地被围后的第七天，强风袭来。比利时人认为作战时机已到，便发动了总攻。而已经知道只有战斗一条路的罗马士兵们，毫不犹豫地拼命守卫，他们甚至从容得可以彼此开玩笑。身在最前线的率领中队的百人队队长们更是惊人地英勇善战。激战持续了一整天，罗马士兵始终紧守着冬营地。

但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续几天的。罗马军虽然送出求援者，但援军始终没有到来。至此罗马军才意识到使者是在途中被俘虏了，于是大家采纳了逃到罗马阵营中的一名涅尔维人的建言，也就是派他的奴隶送信给恺撒，因为奴隶是高卢人，只要混进附近的农民之中就不会被认出来。承诺给予这名奴隶送信成功之后的报酬，则是解除他的奴隶身份。

求援在采取这个办法后终于成功了。恺撒直到此时才得知萨比努斯和科塔所率领的15个大队已被歼灭和西塞罗之弟镇守的冬营地正遭受袭击。此时冬天即将来临，恺撒与拉比埃努斯和西塞罗之弟间还隔着250公里的距离。

收到告急信函之时，正值太阳即将落山的下午5点左右。恺撒立刻派人传令给与自己相距22.5公里的冬营地的财务检察官克拉苏，命令他立刻率领军团火速赶过来。同时，他传令给驻守于摩利尼人土地上的军团长法比乌斯，命他率领军团急行军到阿托雷巴提人的领地去。恺撒打算在前往西塞罗之弟的营地途中与他们会合。接着，他发出了第三道急令给副将拉比埃努斯，内容是如果眼前没有危险，就率军团急行军到涅尔维人的领土去。而对于其他三个冬营地，恺撒就没有发出命令了。因为他们距离太远不便赶来，而且封锁高卢东北部其他部族的动向也非常重要。恺撒本人原本打算在南方行省过冬，所以身边连一个军团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9点，恺撒接到报告得知克拉苏军团已接近自己所在的位置，便只带了400名骑兵离开了亚眠，走了不久便成功与克拉苏会合了。恺撒命令这位年方30岁的财务检察官克拉苏直接到亚眠，防卫这个罗马军在高卢的重要大本营。正在此时，带着副将拉比埃努斯回信的急使也到达了。拉比埃努斯向恺撒报告萨比努斯与科塔军团的惨事，还有来势汹汹的特雷维利人已迫近自己阵营地四五公里处，他认为自己及所属士兵守在冬季营地不离开才是上策。恺撒赞成他的意见，但这样一来，原定救援西塞罗之弟营地的三个军团现在便只剩下两个军团了。此时只有以快速的行动来决定大势走向了。

率领一个军团和400名骑兵的恺撒，于急行军途中与法比乌斯所率领的一个军团会师。然后这两个军团的重装步兵以及400名骑兵继续急行军。到达涅尔维人领土之后，恺撒从因独自行动而被罗马军虏获的涅尔维人士兵口中，打听西塞罗之弟冬营地的战斗现况。恺撒还从随行的

高卢骑兵中派出一人，承诺给他高额的报酬，要他将写有恺撒已出发前来援助的信交给西塞罗之弟。如果情况不允许他进入冬营地，则将信绑在标枪上投进营地之内。信是以高卢人无法读懂的希腊文写成的。

果然这名高卢骑兵无法进入遭敌人团团围住的营地。他按照恺撒所说的方法将信绑在标枪上投入了阵营地。围绕冬营地防栅的各个重要之处都建有高塔，投过去的标枪刚好扎在其中一座塔上。有整整两天的时间都没有人注意到标枪，第三天一名士兵终于发现了标枪上的信。西塞罗之弟于是在全军面前将信朗读了出来。罗马士兵们明白苦痛即将过去，于是心情放松了下来，以全新的状态继续对抗敌军。

而这时包围营地的以涅尔维人为主力的比利时军，也从自己派出的侦察兵口中得知了恺撒的到来，于是他们撤除营地的包围而朝恺撒所在地进发。在城内的这一方知道敌军营地已经撤除后，西塞罗之弟利用上一次成功的方法，也就是派遣高卢人奴隶带信，将敌军撤退正前往恺撒方向之事，火速通知了恺撒。

恺撒相信只有敏捷的行动才能突破现状，因而手下士兵们也各自只带了数天的食粮及帐篷，身负搬运各种行李责任的运输车队也没有带来。因此总司令官恺撒和士兵们都是野营过夜。近半夜时，身上带有西塞罗之弟信函的高卢人奴隶被带到正在小睡中的恺撒跟前。知道敌方大军正在靠近的恺撒马上召集大队长及百人队队长，在作战会议上他告诉大家明天即将开战。

恺撒与两个军团第二天清晨便向敌军进发。走了6公里之后，在有小河穿过的山谷中央，罗马军发现敌兵正群聚在河流的对岸。恺撒已经由西塞罗之弟的报告中得知敌人有6万大军。虽然罗马军一个军团的定员是6000名士兵，但恺撒的两个军团人数大幅削减，总计只有7000名士兵。此时的恺撒并不急于与人数10倍于己的敌人对阵，因为探索有利于战斗的地点以及可设营之地是当前要务。

只有7000名士兵，再加上没有运输车队，罗马军的阵营地规模很小，而恺撒正利用了这不利之处。帐篷与帐篷间通道的宽度比一般应有的要狭窄不少。之所以采取小规模阵营地，是为了诱使敌人来到对自己战斗有利的地方。

第一天，因为敌人也正等待全体军队的抵达，双方仅有骑兵之间的零星冲突。恺撒同时执行着诱敌战术，比如命令骑兵快速撤回阵营地内，或者士兵在阵营内东逃西窜。总之让敌方感觉到罗马军因为众多敌人临近而军心大乱。

涅尔维人与伊布洛斯人共计6万人的大军完全中了恺撒的计。第二天一早，他们连队形也没有组成就大举渡河而来。渡河之后到罗马军阵地的地势是上升的缓坡。渡河之后的高卢人虽组队前进，但没有士兵从罗马军阵地中出来迎战，高卢士兵于是再往前推进。恺撒这边还是没有发出开战的信号，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士兵不要从阵营地的防栅上露脸。

至此，高卢人已经完全瞧不起罗马士兵了。无论是投枪还是射箭进去，阵营地内都毫无反应。高卢人认定对方已经因为过度害怕不敢有任何行动，便靠近了阵营地边上招降。他们大声告诉罗马士兵，如果在三个小时内投降就可饶他们一命。

直到此时恺撒才下令吹响开战的号角，打开阵营地的四个大门。罗马兵从坡上顺势而下冲向敌军。遭受意外突击的敌人立即失去了战斗能力，朝四面八方逃散。浑身裹了毛皮的北方高卢士兵在罗马士兵眼中也许不像人而更像羊吧。整个场面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更像在追赶羊群。最后大量的敌兵被杀死，渡河打算逃走的敌人则被包围在外的骑兵与追赶而来的步兵夹击，只好扔下武器投降。罗马方面连一个士兵也没有牺牲。

在森林与沼泽遍布之地深入追击十分危险，再加上敌军已经丧失了

大部分兵力，恺撒便不让士兵追击。而这时最优先要做的事，乃是赶往西塞罗之弟的冬营地。

罗马军当天就到达了目的地。敌人撤离时留下的攻城武器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令恺撒惊讶不已。不过最令他惊叹的是，列队迎接他的守城士兵，完好无伤的在十人之中找不到一人。

恺撒首先赞扬冬营地负责人西塞罗之弟，接下来，便逐一叫出每个士兵的名字，褒奖他们的卓越功勋。令士兵们感动的事其实还不止于此。站在他们的面前的一向十分注重仪表的恺撒，现在却罕见地留着没刮的胡子，头发也非常蓬乱。

高卢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恺撒胜利的消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传遍了高卢全境。正朝副将拉比埃努斯冬营地行进中的特雷维利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便返回了。罗马的同盟者雷米人一知道此事，也来到拉比埃努斯的阵营地表达祝贺之意。

恺撒决定留在高卢度过这个冬天。这还是他自高卢战役以来首度留在高卢过冬，因为高卢东北部的形势还不容乐观。分散各地的冬营地设置方针虽然没变，但于大本营所在的亚眠周边则配备了三个军团。恺撒留在高卢，作好了随时都能赶到任何一处冬营地去救援的准备。

然而15个大队9000名士兵以及2名军团长的损失实在非同小可，无疑大幅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对恺撒来说，这比任何事都来得严重，而且这个损失必须想办法弥补。

首要的问题是安抚失去9000名战友的士兵。对于能召集到面前来的士兵，恺撒就亲自与他们交谈。而无法召集到面前的士兵，则由各指挥官告知：“这次的不幸乃是因军团长萨比努斯个人的肤浅判断而起，所

以我们要忍耐这件不幸之事而不失去平常心。并且，正因为天神的帮助以及各位的勇气，我军才能立刻复仇成功。”士兵们领会了恺撒的意思。最高司令官不问过去的性格，连一兵一卒都受到感染。

在那个冬天，唯一还没有放弃反抗的特雷维利人被副将拉比埃努斯追击，最后以族长茵多提欧马鲁斯自杀身亡收场。高卢东北地方一带，就在罗马军队与高卢士兵互相观望对方动向的状态下度过。然而身处亚眠的恺撒，已在脑中拟好了第二年的战略，那就是罗马军一定得将高卢最具战斗力的诸部族完全镇压收服。

那段时期的罗马

恺撒在公元前54年前半年远征不列颠，后半年则为镇压高卢东北部的叛变而奔走。这一年，首都罗马的形势也并非平静无波。公元前55年，执政官的位子由庞培及克拉苏“二头”占着，罗马的政治形势由“三头政治”主导。而在公元前54年，元老院派推出的一人成功地当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接着在公元前53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元老院派的两名候选人都当选了，“三头”所推出的候选人则全部落选，“三头”因此转为在野党。庞培的不积极是“三头”失败的原因，这时候的他因为拥有过去的光荣和享有首位罗马常设剧场建设者的名声而心满意足。即使如此，作为当代最伟大武将的庞培，对一般市民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与其说反“三头”不如说是反恺撒的元老院派策划使庞培疏远恺撒。他们以前虽然也尝试过，但恺撒在“卢卡会谈”中成功地将庞培拉了回去。这一次，庞培的妻子尤利娅的死被他们看做是好机会。但这次于公元前54年冬天再度进行的“二头”离间计失败了。庞培对爱妻之死是出自真心的悲伤。而且以他身为武将的矜持，也不容许他在联系双方的人刚死去之时就背叛恺撒。此外，“三头”之一的克拉苏，也正在东方准备与大国帕提亚开战。因此，自公元前54年直到公元前53年的秋天为止，首都罗马的政治形势一直处于“三头”与元老院派互相瞪视的状态之下。

但在两派之中，哪一派更具有政治能力倒不是个问题。在这一年半中，无论是“三头”派的庞培或是元老院派的首脑，都将他们毫无理政能力的一面表露无遗，特别是身为执政党、占了两名执政官位子的元老院派毫无统治能力。那个时候的罗马，有克劳狄乌斯及米罗擅自组织的“院外团”四处闹事。克劳狄乌斯以平民派自居，庞培如果有意的话一定能控制他们，但他无心这么做。米罗自称是元老院派，但是连元老院派的巨头西塞罗也只是感伤时局。他因为害怕再度遭到克劳狄乌斯报复，所以对米罗也置之不理。即使于非选举期间，在罗马市中心也充斥着暴力，并再三地以流血事件收场。稳健而有良心的元老院议员，虽然忧心于罗马的未来，但他们既无突破现状的计策，也没有实行计策所需的坚强意志。这群具备充足学识的人，尤其是有资格代表他们的西塞罗，能做的事也只是追忆过去，感叹以前的时代才是理想的罗马时代罢了。因为在当时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之下，领导阶级与一般民众都齐心协力地与迦太基作战。所谓“当时”，是指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与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完全为了国家立下了战功，而非为了自己。

行省总督有权在其他行省受到攻击时给予援助，这是属于他负责防卫的范围。但如果要进攻他国则需得到元老院的认可，而恺撒却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便进攻高卢的中北部，又越过莱茵河，甚至渡过多佛尔海峡远征不列颠等，光是这些事情就令元老院难以忍受。但恺撒手下的士兵也没有拒绝从军，元老院也不能像卢库鲁斯那时候一样解任恺撒，并且，罗马的一般民众对恺撒的功绩都十分赞赏，如果想将恺撒解职，必定会犯众怒。再加上根据超越元老院的公民大会的决议，恺撒与庞培、克拉苏一样，行省总督的任期是到公元前50年底为止。因此在法律上，恺撒完全不担心自己会被剥夺权力，这一点恺撒自己比谁都清楚。也正因如此，恺撒才在公元前53年时将战线拉到了离首都罗马最远的高卢东北部。对前一年冬天失去的兵力的补充，恺撒也没有征询元老院的许可。无论罗马的情况如何，高卢战役还是非得进行下去不可。

高卢战役第六年(前53年，恺撒47岁）

恺撒就任高卢三行省总督时，国家交给他4个军团，即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但是，在与赫尔维提（瑞士）人战斗前，他又重新招募组编了两个军团，被命名为第十一、第十二军团。因为这两个军团并未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所以费用是自行负担的。战役的第一年，恺撒就以这6个军团3.6万人的兵力进行战斗的。

战役的第二年（公元前57年），恺撒又新组了2个军团。同样因为不被认可而由他自行负担费用。这2个军团就是第十三、第十四军团，这样合计共8个军团。公认的4个军团，可以在罗马国内，也就是北自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上，从事招募志愿军的活动；而非公认的4个军团，只能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北意行省进行募集。但是，罗马的军团兵规定必须是罗马公民。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北意行省是“罗马公民化的高卢人”，因此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也比其他行省更多。只要恺撒能够解决费用问题，募集志愿兵并不是个难题。

公元前56年春，“三头”在卢卡举行了会谈。会谈决定了恺撒、庞培、克拉苏三人，各有5年行省总督的任期与10个军团的兵力。不过该年，恺撒无法将名下的军团增至10个。第二年，公元前55年，“二头”担任执政官，“卢卡会谈”中的密约经公民大会正式生效。

公元前54年，恺撒又延长5年任期，并且与庞培和克拉苏一样拥有了统率10个军团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急着扩军，而是依然维持8个军团的战斗力，只是争取将4个私自组建的非公认军团国家化，这样一来

就无须自行负担军费开支。恺撒不扩军，大概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高卢承认罗马霸权的同盟关系，即便是有“长发高卢”之称的中、北部高卢的埃杜伊人及雷米人也与罗马维持友好关系（“长发高卢”是与惯常留短发的罗马男子相较而言，意指尚未罗马化），并向罗马提供由埃杜伊人及其他部族士兵组成的军队。再者，士兵的数目也并非越多越好，恺撒并不认为在战争中兵力比敌军少就一定会处于劣势。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士兵的数目少，那军粮的保障就不会太成问题。

但是，在公元前54年，恺撒在战斗中损失了第十四军团加上5个大队，2名军团长加上9000名士兵全军覆没。到战役第五年，恺撒总计损失了包括2个军团、2个大队，将近1.5万人的兵力。恺撒手头的兵力仅剩6个军团。到了冬季，身在亚眠的恺撒派遣军团长一行三人至北意行省编组2个新的军团。同时恺撒写信给庞培，恳请他借给自己编组一个军团的权力——因为庞培没有前往西班牙任职，而是继续待在罗马近郊，在那里就任西班牙的两行省总督。行省总督拥有军团的编组权。

庞培答应了恺撒的要求，送给恺撒一个以自己名义编组的军团。而这个军团加上以恺撒之名新编的两个军团，需要人率领进入高卢，也就是要三位军团长才行。

为什么恺撒不行使自己编组10个军团的权力，而大费周章地要庞培借给他一个以庞培之名编组的军团呢？这是恺撒对想离间“二头”的元老院派所投出的牵制球。

在冬末时，3个军团到达了亚眠向久等的恺撒报到，恺撒将这3个新加入的军团，命名为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军团。恺撒毫无芥蒂地再度用全军覆没的军团名命名，那些被命名的军团也并不在意是否吉利。

其实，除去全军覆没的第十四军团，恺撒其他军团战死的士兵加起来仍有12个大队，合计近7000名士兵，换言之，各军团的兵力平均减少了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的其他武将一般会为各军团补充新

兵，但是，恺撒并未这么做，他只将新兵另外组合成独立的军团，因为他重视军团单位的统一性、同质性。因此恺撒的士兵对自己所属的军团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并且引以为豪。事实上，只要报出是恺撒名下第几军团的士兵，这对他国国王或部族族长而言，都如同很体面的“名片”一样，可以通用。

就这样，高卢战役进入到第六年时，恺撒首度拥有了10个军团。新编成的3个军团合计1.8万人，其他7个军团共有3万多人，合计有5.3万多人的步兵兵力，军粮调配由臣服地区配合解决。恺撒的骑兵号称有4000骑，但实际兵力是否如此尚且存疑，因为罗马骑兵的战斗力相当依赖高卢诸部族。

恺撒个人的字典里，没有“复仇”这个词。然而对士兵们而言，要为死去的9000名同伴复仇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运用这种情感的人，在扮演点火角色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感情一旦越过理性的界限，就会转变成狂暴。公元前53年的战役，对士兵们而言是复仇之战。因为，撒谎将罗马军诱出阵营地的罪魁祸首——伊布洛斯人的族长安比奥里吉斯还活着。但这对恺撒而言，是一次完全称霸高卢东北部以及重创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的机会。在高卢地区过冬的意义是，可以提早进入该年的战期。

恺撒没等10个军团到齐，就召集了在亚眠附近冬营的4个军团。仅率领这4个军团的2万人，在冬季尚未结束时就展开了攻击。目标是前年使西塞罗之弟冬营地陷于窘境的涅尔维人。当时拥有5万兵力的涅尔维人，在遭到突然的袭击后丢盔弃甲，光顾着逃跑。恺撒将捕获的家畜分与士兵作为报偿。之后，他们在涅尔维人的领地继续烧杀掠夺，直至涅尔维人不得不交出人质，接受讲和。套句恺撒自己的话：“解决人质问题方可休战。”随后，他让4个军团回冬营地休息，而自己则出面召集全高卢各部族族长开会，并担任了议长。和高卢战役初期，恺撒的姿态与做法有了明显的转变，早期他将召集族长会议的任务交给和罗马友好的

部族族长，而自己不参加。借助这一转变，恺撒透露的政治信息是将高卢中、北部划为罗马行省。

这个会议中，全高卢各部的族长大多出席了，不过也有缺席的部族——中部高卢的歇诺内斯人与加努特斯人，以及住在莱茵河附近、与对岸日耳曼人相呼应、蠢蠢欲动的特雷维利人。恺撒将他们的缺席视为不认可罗马霸权的表现。于是，他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将会议场地移至接近歇诺内斯人的路特提亚。——路特提亚是帕里西人的根据地，就是后来的巴黎。意大利语至今仍将巴黎发音为“帕里吉”。

族长会议移至巴黎的第二天，恺撒很快地就向歇诺内斯人的领地进军。兵临城下，歇诺内斯人只好在埃杜伊人的居中调停下，向恺撒为缺席之事谢罪，并誓约恭顺。恺撒以100个人质为条件，接受此誓约。百名人质皆寄在埃杜伊人处。此外，加努特斯人也通过雷米人向恺撒提出人质条件，要求讲和。恺撒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至此，全高卢的族长会议才告闭幕。恺撒之所以将族长们留到现在，是因为希望他们亲眼目睹自己杀一儆百的做法，并将此信息传递给各部族的人。如此一来，高卢各部族就不敢轻举妄动。恺撒便可以将主目标放在追讨特雷维利人，以及士兵们誓言复仇的伊布洛斯人族长安比奥里吉斯身上，往东方前进。

恺撒采取了两面作战的方式。把2个军团和所有的运输车队皆派往靠近雷米人领地——副将拉比埃努斯那里。恺撒自己没有运输车队，只率领5个军团，采取强行军的方式向安比奥里吉斯可能藏身的梅那庇人领地进发。如果运气好的话，预计压制梅那庇人就可以俘虏安比奥里吉斯，之后再与拉比埃努斯的军队会合。而派往副将拉比埃努斯处的2个军团和运输车队，从现在的法国向东北前进，通过比利时，迂回德国西部，路程较远也只有马不停蹄地强行军。总之，在特雷维利人与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会合前，恺撒与拉比埃努斯必须抢先会合。

恺撒将自己所率领的5个军团分为3队，自己率领一队，另外军团长

法比乌斯与布鲁图各率领一队，各队皆早已铺设好桥梁，三方面同时向梅那庇人之地发动进攻。他们放火焚烧，破坏村落，逮捕居民，掠夺家畜，梅那庇人只好向恺撒求和。恺撒要他们提交作为保证的人质，缔结讲和。如果他们援助伊布洛斯人的安比奥里吉斯，就会再度被视为敌人。之后，恺撒再度指挥5个军团，以特雷维利人为目的地向东南进军。但与此同时，特雷维利人也开始向副将拉比埃努斯的军队展开攻击。

起初，特雷维利人只想攻击拉比埃努斯的那个军团，在距离拉比埃努斯的冬营地还有3天的行程时，他们得知恺撒所派遣的2个军团正在途中。以他们的兵力，与3个军团的罗马军交战必然会吃亏，因此特雷维利人放弃了攻击，并且筑营等待日耳曼人的援军到达。然而，深受恺撒信赖的副将拉比埃努斯，早已察觉敌人的意图，他率领旗下的1个军团出冬营地，前去与恺撒统率的2个军团及运输车队会合。3个军团共30个大队，拉比埃努斯将其中的5个大队当做运输车队的护卫，率领25个大队向敌人的阵营地前进。

拉比埃努斯率军行进至距离敌方1.5公里处便停步不前。拉比埃努斯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特雷维利人所在的阵营地比想象的还要易守难攻。决心在日耳曼人渡河前一决胜负的拉比埃努斯，必须将敌人从那个有利的地点引出来。

特雷维利人也察觉到距营地1.5公里处有罗马军，根据侦察兵带回来的情报，在河对面的罗马军还不满3个军团。特雷维利人因此就放开胆子，率军离开营地向罗马军迎去。拉比埃努斯见敌人已经上当，就作势要逃跑，不断往后撤退；特雷维利人不明就里，以为胜利在望便渡河追击。拉比埃努斯再往后退，特雷维利人步步紧追。拉比埃努斯一直把敌军引诱到运输车队所在地时，那里的地势很利于罗马军。天时地利皆已具足，3个军团加运输车队的5个大队蓄势待发，只等拉比埃努斯一声令下。

在战斗开始前，副将拉比埃努斯激励士兵们：

“战友们，我们所盼望的战机来临了，处于不利地势的敌人，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囊中物了。你们一直在总司令官的面前表现得相当英勇，现在也请将那股勇猛呈现在我的面前吧！虽然总司令官现在不在这里，但我相信他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

特雷维利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追击败兵，没想到罗马军突然发动进攻，特雷维利人还来不及重整旗鼓就全部向森林逃窜。拉比埃斯命令骑兵队展开追击，许多特雷维利人士兵被杀或被俘虏。几天后，特雷维利人派求和的使节拜访拉比埃努斯。正准备渡河前来的日耳曼人，得知罗马军的胜利后便掉头返回了。这样特雷维利人走投无路，只好投降。

再渡莱茵河

与拉比埃努斯的3个军团会合之后，恺撒带着8个军团决定再渡莱茵河，理由有两点：

一、必须对受特雷维利人之邀想渡莱茵河攻入高卢的日耳曼人有所处置。

二、追讨逃至河对岸的伊布洛斯人族长安比奥里吉斯。

日耳曼人一般以小舟或筏渡河，但恺撒命令士兵建桥，以此来展示和炫耀罗马人的技术。此次的渡河地点，是在较两年前第一次渡河稍靠上游的地方，也就是在现在德国波恩与科隆之间，略靠近波恩。更动渡河地点，也是为了给日耳曼人来个措手不及。

桥的制作及建设方式，都在上次试验过了。军团兵摇身变为工兵，渡河攻入日耳曼的计划令他们兴奋不已，设营的工程也比上次更快，只花了几天的工夫就完成了。

根据恺撒的记载，在高卢这方以及在桥的警备上留有相当充足的兵力。因此我推测恺撒所率领的渡过莱茵河的兵力，大概是5个军团。而且由于对方是骑兵兵力强大的日耳曼人，所以恺撒把所有的骑兵全部带在身边。

莱茵河东岸住着乌比人，他们与罗马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也很快就出迎了。恺撒请乌比人派侦察兵至斯贝比人之地进行调查。除此之外，还委托乌比人张罗在日耳曼之地的军粮补给，乌比人均予以承诺。

另外，恺撒得知，与特雷维利人里应外合、想渡莱茵河进攻高卢的日耳曼人正是斯贝比人。数天之后，情报很快就送来了。日耳曼人中最强的斯贝比人，得知罗马军渡莱茵河后，连人带家畜全都退至领地的最东端。此处地形背靠贝切尼斯大森林，这里就如同自然造就的城堡一般。罗马人所称的贝切尼斯森林地带，其地势正如现代的图林根森林。

恺撒的《高卢战记》写到此处，并没有如读者期待的那般，大谈接下来与日耳曼民人发生的激斗，而是突然话锋一转，大谈起日耳曼与高卢的民族比较论。也许在恺撒看来，让罗马人了解处于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以及邻侧日耳曼的民族性格很有必要。

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

“行文至此，叙述高卢与日耳曼这两个民族性格的不同，我想这并非不适宜之举。”恺撒以此语展开了两民族的比较论。首先，由高卢开始。

> 高卢境内的城镇或村落就连家庭内可能也存在着某些派系。这些派系由长老带领，派系内的事情皆由此人一手承担，而派系中的下级人民，在接受保护的同时，必须做到服从。
>
> 这是高卢所有部族共同的倾向，在恺撒未上任之前，高卢两个

有力的部族是埃杜伊人与塞卡尼人。由于塞卡尼人处于强势，而且背后有日耳曼人撑腰，所以一时之间连埃杜伊人也臣服于塞卡尼人的统治。后来，恺撒击退了阿利欧维斯图斯所率领的日耳曼人，并将他们逼退至莱茵河东岸。此后，靠阿利欧维斯图支持的塞卡尼人便日渐衰弱，高卢部族间的势力关系也重新洗牌。雷米人取代塞卡尼人的位置，和埃杜伊人成为最强势的两个部落，而且这两个部族都承认罗马的霸权。

在高卢有两个支配阶级：

其一为称做杜鲁伊得斯的祭司，他们把持的范围不仅限于宗教，还包括教育、司法。祭司的权力相当大，只要他们喜欢，甚至可将人驱逐出境。教育方面，他们不重理解，而较重视背记。语言方面，他们不讲希腊语，但是用希腊文的表记字母。

另一个支配阶级是骑士，他们当然都受过军事训练。至于是不是骑士阶级，一生下来就决定了。

平民阶级地位几乎与奴隶等同，任何事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连出席集会的权利都没有，还必须缴交重税。

高卢尚存有以活人祭供的制度，通常是以罪犯为牺牲品，在罪犯不够的情况下，就无可避免地要牺牲无辜的人。民众信仰的神祇首推墨丘利，下为阿波罗、马尔斯、朱庇特等。高卢人的历法通常由夜晚开始，日、月、年，皆由夜晚开始计算。妻子的地位取决于陪嫁金，所以经济上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生死之权则与子女一样归属于丈夫。相信灵魂不灭的他们，丧礼与高卢人的文明程度不相称地非常讲究。早前还有将死者身边物品，甚至连身边的仆役或奴隶一起火葬的习惯。

在高卢治安良好的地方一般都是法纪严明。比如，探听得知某事时不可随意散播，必须告知统治者。统治者再决定是否要告知部族民，统治者认可之后才可公开。关于部族全体之事，只允许在会议里说。

另一方面，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在他们中并不

存在高卢人里像杜鲁伊得斯那般独揽大权的祭司阶级；此外，也并不像高卢人那样祭祀牺牲。关于所信仰的神，也只限于眼睛所看得到、实际蒙受益处的事物，如太阳、火山、月亮等，除此以外的信仰对象并无名称。

日耳曼男人的一生多花费在狩猎与战斗上，他们自年幼开始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其中守童贞最久者最受尊敬，因为他们相信不与女子交媾，能使身体壮硕、精神强韧。20岁前就知道女人为何物的男人，在同性之间绝非名誉之事。但是，日耳曼人对性也并不忌讳，他们在河里混浴，身体也仅以皮毛遮掩关键部位。

日耳曼人对农耕并不在行，他们的日常食品大多是乳类、奶酪、肉。因为各地区的首长，每年会移动至不同的地方狩猎，所以并不存在土地私有权。而且日耳曼人认为如果认可私有土地，就会产生贫富的差距，衣食温饱的富家就会造成浪费。而且，贫富之差所产生的最大弊害是促使人们追求金钱，继而酿成社会的不安。因此如果不认同私有土地，反能避免平民阶级的不满而得以平稳度日。

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基础并不在家族，而在于亲族的共同体以及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他们最大的骄傲是，自领地的周围为广大的荒废地所环绕。理由一是可以排斥周边其他部族，显示他不想与他们往来的意愿；理由二为出自避开突然袭击、保障安全的考量。战时，推选有权决定全员生死的指挥员，并且听从他们的指示；相反的，平时日耳曼人并不设置统一的统治机关。因此，根据每个共同体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裁决与应对之道。

窃盗行为如果是发生在共同体之外，就不算犯罪，有的地方甚至将此视为不让年轻人怠慢的训练。如果决定掠夺，那么全员有遵从的义务。不参加者则被视为逃兵、背叛者，今后再也没有人会相信和任用他。

无论是从哪里、因何而来的人，只要对方是访客，就要打开门迎接，准备食物，这是他们的做法，如有违背者，就被视为破坏规矩者。

从前是高卢人渡莱茵河攻入日耳曼之地。因为耕地少、粮食缺乏，吃不饱的人民为了确保居住地，还特地从南法殖民到黑林山大森林地带（由现在的斯特拉斯堡向东方扩展的广大地带）。

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和从前一样贫穷，过着接受食物与居住地方的朴素生活，而高卢民族的生活水准却提升了。因为利用靠近罗马行省与近海之利而进行通商，他们的生活与用品都变得丰富且舒适。惯于舒适生活的他们，成了与日耳曼民族战斗时战败的一方。他们的自卑感很难解脱，至今他们仍不愿拿自己与日耳曼人相比较。

黑林山大森林南北的宽度为9天行程。至于长度，由于日耳曼人不懂得距离的测量法，所以正确的距离并不清楚。由赫尔维人居住之地，沿达努毕乌斯河（多瑙河）向东延伸，进入达奇亚人居住之地后，再离河向北扩张。据我们罗马人所知，日耳曼人也不知道这片大森林的尽头在哪里，而且也没有人到过那里。有人走了60天，结果还是无法到达尽头。

叙述完这段话之后，恺撒还列记了栖息在这片大森林地带的珍贵动物：大鹿、野牛以及非常珍贵的独角兽。总之，恺撒想尽量将自己所知关于高卢人及日耳曼人的事情记录下来，传达给同胞。

不过，到底恺撒是只想传达客观的信息，还是想表明自己的意图呢？取代《高卢战记》前面一直出现关于雷努斯河（莱茵河）这个部分的叙述，首度出现了达努毕乌斯河，而故意以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的现状叙述作结论。由此看来，恺撒的思路十分清晰：

一、如果这么放任下去，传统上各部族有分裂倾向的高卢，迟早会被日耳曼化。

二、若是如此，将对罗马的安全保障构成重大威胁。

三、为了不让此事发生，高卢的罗马化是最佳对策。属定居型、以

农牧为主的高卢人，和非定居型、狩猎民族的日耳曼人不同，他们罗马化的可能性比较高。

四、以莱茵河为东防卫线时，如果加以延长就是多瑙河，再延长，就到幼发拉底河。

恺撒是否意图向罗马同胞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呢？

如果下一年的公元前52年没发生大事，高卢全域能保持稳定，那么恺撒在剩下两年的任期内，也许会沿多瑙河向东进攻。他担任总督的地区，正是现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埃西亚的伊利里亚行省。如果能够平定多瑙河以南，伊利里亚行省与北方民族之间也就有了依靠，比较安全。此外，如果再东进多瑙河，那里已经是马其顿行省总督的管辖区域。假设以多瑙河为防卫线的防卫战略被接受，无论谁当上总督都会承认这个战略。接着，确立以幼发拉底河为最东端防卫线的，是“三头”之一的克拉苏，他正执行这项任务。

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收入视野后，恺撒心中的欧洲开始形成了。小林秀雄也写道：“政治、作战皆参与，连一个兵卒的任务也身兼了，对如此精于战争的老手而言，战争本身就是巨大的创作。”尤里乌斯·恺撒想要创作欧洲，而且他创作了。但是，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首都知识分子，却只将这视为恺撒追求私欲的举动。看来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与知识及教养无关的。

读者一定还在关心恺撒与日耳曼人的决战，在恺撒插入了冗长的高卢与日耳曼的比较论之后，也没进入战斗的叙述。因为恺撒与日耳曼人决战并未发生——恺撒放弃了追击逃至大森林地带的斯贝比人。恺撒认为由于当地是非农耕地带，军粮的调配（罗马兵的主食为小麦）有所困难，因此放弃了往莱茵河东岸深追的念头。为了引发日耳曼人对罗马军将发动下一波进攻的恐慌与疑惧，以达到吓阻他们渡莱茵河的目的，恺撒在全军返回莱茵河西岸时，命令士兵破坏桥东侧达60米，在半毁的桥

上近高卢侧，建设近四层高的监视塔，并且派12个大队6000多名士兵驻守此塔。他们也建筑坚固的阵营地。事情完成时已进入了秋季。恺撒率全军北上。他以追讨安比奥里吉斯之名，完全压制了高卢东北部，不给日耳曼人有歇脚的机会。

此举显示了恺撒并没有考虑将日耳曼民族罗马化。渡莱茵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征服日耳曼民族，而是警告他们别再侵入高卢，这是罗马军绝对不允许的。

而罗马军对安比奥里吉斯的追讨结果并不成功。莱茵河口附近有广大的浅滩、森林，以及即使是白天也令人毛骨悚然的沼泽，这对熟知当地环境的安比奥里吉斯来说是件幸事，他在地形的掩护下又逃过一劫。不过，以安比奥里吉斯为首的部族全被灭掉后，原本与罗马关系不太明确的其他部族，也首度向恺撒提出恭顺的誓约。公元前53年后半年，恺撒早晚不断地袭击高卢最好战、与对岸日耳曼人联系最频繁的部族，他们招架不住，也只有向恺撒全面投降的份了。安比奥里吉斯虽然逃走了，但是恺撒压制了作为他势力基础的日耳曼人，彻底地整肃了高卢东北部的诸部族，已经彻底扼杀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与军团一起返回雷米人根据地兰斯的恺撒，在那里召集了全高卢的部族长。在席间，恺撒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担任了议长。当年春天，审判了举反旗后被压制的歇诺内斯人与加努特斯人的主谋者。其中，主谋者亚克，在部族长会议中被宣告死刑。恺撒诉之于罗马的古式刑罚。那种刑罚在罗马历经数百年，而且已经愈来愈少见了。首先将受刑人绑在木桩上，在头部插入熊掌般的器具，接下来，再接受行刑者鞭打近死，最后，斩落首级。这样的处刑，恐怕是在部族长面前做的吧。至于逃亡的人，将处以永远的流放边境。

部族会议解散后，恺撒决定了公元前53年至前52年的冬营地。2个军团在特雷维利人之地，也就是近莱茵河的现在德国西部过冬。其他的都在现在的法国过冬。2个军团在林贡斯人之地，也就是现在第戎的附

近。剩下的6个军团的冬营地，就决定在刚被压制的歇诺内斯人根据地桑斯。再度让8个军团冬营在高卢中部的理由，恺撒并未写到，一切只能靠想象了。在公元前53年的彻底压制下，东北部只要屯驻2个军团就行了。那年春天，8个军团是不是也置于发起暴动的两部族所居住的中部高卢呢？现在成为法国中央部的这一带，自恺撒开始发动高卢战役以来，就没有举过反旗，而5年后发生了这次初举反旗的暴乱。所以酷刑以及屯驻8个军团，都是给予中部高卢的警告。总之，恺撒这样的军团配置，在公元前52年救了罗马军。

恺撒决定各军团冬营地后，向南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这年冬天能够返回行省了。也许就是在秋末时节，首都罗马得知了震惊的惨事。这件事发生在那年夏天，秋天时才传报至罗马——克拉苏所率领的罗马军全军覆没了。

克拉苏

“三头政治”的一头——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在公元前56年春，对于中部意大利的城镇——卢卡举行的“高峰会议”中所决定的事项，都忠实地付诸了行动。先是在公元前55年与庞培共同担任执政官，第二年出发至有五年任期的行省总督任地——叙利亚时，是他的行省总督任期还未开始的公元前55年秋末。渐渐步入60岁的克拉苏很焦虑，作为罗马首富的他所欠缺的，是庞培已拥有的、恺撒也在逐渐壮大的军事上的名声。他是叙利亚的行省总督，任期五年，行省总督必须负起行省防卫的任务。在叙利亚的东边紧临着大国帕提亚，帕提亚尚未承认幼发拉底河为罗马势力的界线。但如果远征帕提亚成功，并使其承认这点，就能够保证罗马行省的安全。这也就是克拉苏肩负的任务。此外，不同于贫穷未开化的高卢，光是以有高度文明的丰沃的远东为任地一事，对经济宽裕的克拉苏而言，就充满了魅力。不等执政官任期届满，克拉苏就前往意大利，可以想象急于远征帕提亚的心情。

而罗马公民与克拉苏的想法相反，公民们反对这趟远征。他们并非惧怕帕提亚，而是因为不相信克拉苏的军事才能。

克拉苏任总司令官时所经历过的战斗，只有18年前的“斯巴达克斯之乱”而已。那是以聚集到角斗士斯巴达克斯旗下的奴隶、农奴为对手的战争。对方为数虽多，但都未受过军事训练。因此，那时他的部下都没有以表示“胜利将军”之意的“Imperator”称号称呼他，也没有举行凯旋仪式。克拉苏虽然在苏拉手下累积了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经验，但是军团长与总司令官是不同的。军团长只是依循总司令官所立的战略来执行任务。

总司令官必须具备的不只是战略上的思考，还需要具备让士兵一路跟随、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的魅力与声望，而克拉苏完全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无论看透此点的公民是如何不赞成远征帕提亚，即使“三头”中的其他“二头”——庞培与恺撒明知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却仍委以克拉苏大任。这两人皆熟知军事，如果是明知而委托，那可说是罪名深重。但实际上，庞培与恺撒并非落井下石，而是倾力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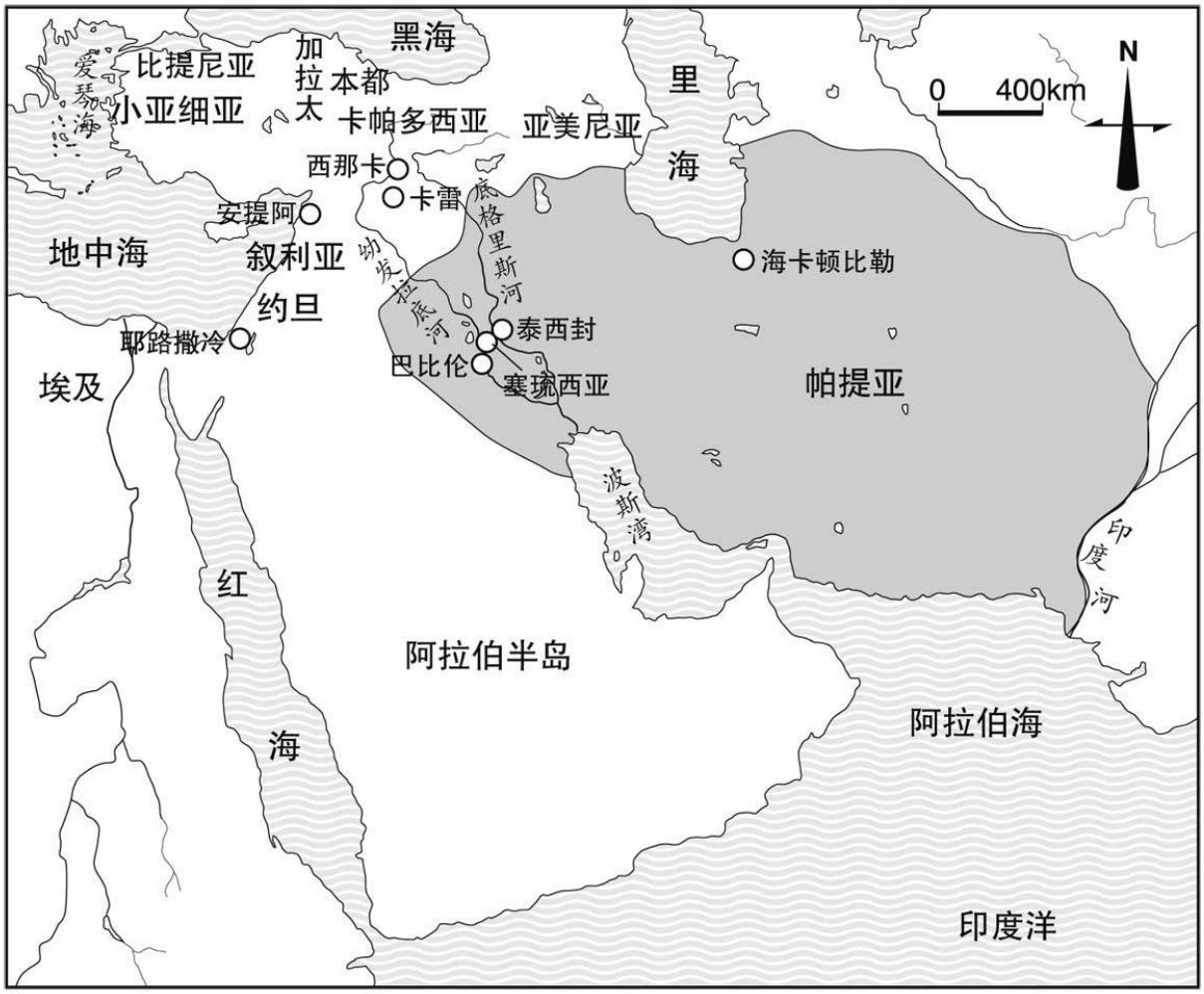
恺撒派克拉苏长子——能力出众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与他父亲同行，并且从人数不多的5000名骑兵中，拨出1000名给他，这1000名是骑兵民族高卢中的精锐骑兵。虽然仅有1000名，却都属于实力派战斗力。而以这1000名骑兵为主力的骑兵团指挥任务，传统上是由副将担任，而这次却交给了35岁的青年克拉苏，他虽然年轻，但已具备辅助父亲的副将才能。

庞培也没忘记提供支援，他派出自己的旧部下、军事老手欧古塔乌斯以军团长的资格与克拉苏同行。还派了年龄大约只有30岁、只能任财务检察官的卡西乌斯同行。这个卡西乌斯后来与马库斯·布鲁图成了暗杀恺撒的主谋。而与布鲁图不同的是，他拥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另外在

支持这三位幕僚的指挥官班底中，也配有战场经验丰富的人手。总之，庞培与恺撒都送出了即使克拉苏不能行使主导权也能独当一面的幕僚班底。

远征帕提亚

公元前55年11月底，克拉苏由布林迪西走海路穿过希腊进入小亚细亚，再东进。不待第二年春，克拉苏即到达叙利亚。他带领了从前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盖比尼乌斯那里承继下来的2个军团以及自己编组的6个军团，合计为8个军团。但是，通常是以10个大队构成一个军团，而克拉苏的一个军团只有8个大队。按规定人数算为4.8万的步兵兵力，而实际只有3.84万人，这是由于国家军费不足所致。行省总督的主要职责是守卫行省，这样的兵力如果只是防卫，还勉强可以应付，但是一旦主动出击他国，行省的后方防卫就会唱空城计，十分危险。



帕提亚周边图

这种情况下，克拉苏还可以自行招募军队，只要肯掏钱承担费用就行。虽然克拉苏是罗马首富，但往往是越有钱越吝啬。克拉苏虽然掏出了钱，但掏得也不干脆。他原本想编组10个军团，最后也以军事资金不足为由放弃了。

克拉苏甚至还想把自己掏出来的部分收回。对有钱人而言，看着自己的财产减少，想必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到达叙利亚时，克拉苏最热心的事情是掠夺以耶路撒冷的神殿为首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神殿宝物。因为如此费心于此事，便疏于了军事上的训练。此外，总司令官

的行为，自然地感染到士兵。克拉苏的军团成员没有成为坚忍卓绝的战士，而是热衷于掠夺敛财。

公元前54年，此时克拉苏尚未到叙利亚上任，他曾举兵进攻帕提亚，但非常轻易地取得了胜利。这让克拉苏及其军队大感意外，并助长了上自总司令官、下至兵卒对帕提亚人的轻视和骄慢。但他们并未认识到，之所以能轻易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帕提亚人还未准备好，另一方面克拉苏的军队未深入敌阵。

克拉苏在军事上是外行，他原本就不了解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出于轻敌情绪，就更怠于搜集唾手可得的情报。克拉苏没有像恺撒那样的好奇心，他不了解帕提亚的现状，更无暇研究当地的风俗人情。他对帕提亚的了解还停留在三年前国王被杀、王室内乱、自顾不暇——这也是让克拉苏确信远征帕提亚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庞培与恺撒寄希望于自己部署的幕僚能够帮助克拉苏作出正确的抉择和判断，但实际上在叙利亚的克拉苏充分行使了自己作为总司令官的主导权，而身为军团长的欧古塔乌斯以及克拉苏的儿子普布利乌斯也只有听命行事。

克拉苏在上任的第二年——公元前53年，就正式远征帕提亚，而当时军队的军事训练还不充分。克拉苏手下的8个军团中，有多达6个军团的新兵，如果未经坚忍且充分的军事训练，是无法成为有效战斗力的。如果是恺撒会先让运输车队做护卫，保护新兵，让他们慢慢习惯战争，而不会一开始就把他们投入战场。

克拉苏的任期尚有四年，而且帕提亚的军队也不会主动出击。但是，急不可耐的克拉苏还是决意强行远征。史料中并未提及克拉苏的幕僚们在对待远征的态度上，是否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但是对远征时取何道而行，克拉苏所认可的道路行径，却引起了幕僚的激烈反对，这点在史料中是可见的。

因为克拉苏的进攻目标是帕提亚的重要都市塞琉西亚，从叙利亚到塞琉西亚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由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后，直接往东取道，到达幼发拉底河。沿此河，向与底格里斯河之西的塞琉西亚同纬度的东南方进军。取此路可以让运输车队乘船运输过去，这是一大优点。随后离开幼发拉底河，向东朝底格里斯河方向进发，横穿10余公里的沙漠之后，到达塞琉西亚。这条路径也是由东方向地中海沿岸的通商之路。

另一条路径是在近幼发拉底河处就离开此河，向东南行，横越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到达底格里斯河之后，再沿此河至塞琉西亚。

克拉苏听信一个负责军队行军向导的阿拉伯贵族进言，决定采行第二条道路。考虑到亚美尼亚王曾承诺会亲自率军参战，由北而来与罗马军会合，这条道路的确很便利。

而幕僚们却反对此事，反对的理由是还得穿越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但是激辩之后，总司令官的意见压制了他人。

克拉苏在叙利亚行省的防卫上留了1个军团，其他士兵均参加远征，包括7个军团共计2.96万名的重装步兵，以及使用投石或弓的轻装步兵4000人、骑兵4000人，再加上克拉苏任前执政官时所带的众多侍从与役使奴隶，合计近4万人。

以下将对克拉苏所未知的国度——帕提亚王国的现状作一叙述：

在东方贸易中致富的帕提亚王国，已成为靠近佩鲁西亚帝国、拥有广大土地的大国。西边的边界虽为幼发拉底河，但是由于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的东岸地带横亘着叙利亚的沙漠，因此边界并没有划分得很清楚。这是帕提亚之所以和西方的大国罗马常发生纠纷的原因。北边的三分之一和亚美尼亚王国接壤。亚美尼亚往哪边靠呢？这成了问题点，不

过经过罗马方面卢库鲁斯、庞培的攻势后，公元前1世纪中期，亚美尼亚已经成了罗马的同盟国。另外三分之一与里海相接；而北方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与居于里海东侧的高原民族相接。南方是波斯湾，东方边境是现代的阿富汗。说起来，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结果是融入了希腊文明圈，而之后由塞琉古王朝的失政所带来的空白状态中，征服北方高原民族的是帕提亚王国，就是现代的伊朗与伊拉克。与希腊文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他们当然较近于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的波斯文明的后继者。制度也像波斯，是绝对君主制。

帕提亚王国的经济基础为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周边的农业与工商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水准很高。然而，工商界皆和罗马的“骑士阶级”相当。国家是由国王与贵族阶级同执牛耳，没有希腊、罗马所存在的公民概念。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当然最后会连军事力量也为支配阶级所独占。骑士当然是以重装骑兵为主战斗力，他们的主要武器是长矛，拥有高原骑马民族的御马技术，各个重装骑兵的战斗力皆很厉害。在还未使用马镫的时代，非骑马民族的骑兵攻击力只能用肩与腕的力量。而惯于将两脚夹住马腹的骑士，就可以用肩、腕的力量，加上马本身的突击力为总攻击力。此外，帕提亚也利用了波斯以来的战斗马车。

但是，由于支配阶级独占政治、经济、军事，因此征集平民所组成的步兵、轻装骑兵（弓兵），并不被重视，因此也不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亚历山大大帝正是以此为突破点而成功征服波斯。如今，亚历山大大帝的敌手波斯消失了，帕提亚取而代之，但是以重装骑兵为主的战法还是没变。

而这样的专制国家自然免不了后继者之争。公元前57年，佛拉帖斯三世遭暗杀，两个儿子间便起了争执。胜利继承王位的是欧洛得斯，弟弟米特拉达梯王子亡命罗马行省。（如果克拉苏能利用这个机会就好了。任期长达五年，实在不必着急进攻。）

和所有称霸广大领土的国家一样，帕提亚王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

被统治的人种当中，有波斯人，也有亚历山大殖民政策时迁至王国西半部的希腊人。因此除了亡命的王子之外，克拉苏其实还可以利用这一批人。住在帕提亚的希腊人与东地中海一带受罗马统治的同胞，向来因为通商而关系密切，对于是接受帕提亚统治还是罗马统治，其实没有特别的好恶。忘了利用这群人数虽少、但在帕提亚王国拥有发言权的希腊人的力量，是克拉苏的一大失策。

来自西方霸主罗马，而且为罗马三大实力者之一的克拉苏亲自率军攻打过来了。这时帕提亚方面站出来加以迎击的是一位青年贵族。虽然远东的贵公子皆以住奢华的皇宫、穿着华美的衣服、聚集美女、虐待被支配者为追求，而在帕提亚宫廷内只有这位男子不为传统束缚、不流于偏见，并且有冷静的头脑。在历史上，只知道在希腊语里他的名字为苏雷纳斯，生于帕提亚最高位的豪门，担任为国王加冕的职务。据说欧洛得斯之所以能排除他的弟弟登基，也得助于苏雷纳斯之力。这位年方30岁的青年贵族，在罗马与帕提亚首度交战之时，即担负起迎击的重任。

首先，欧洛得斯王率领几近帕提亚的全军，攻入北方邻国亚美尼亚。目的在于牵制曾答应要率军助罗马参战的亚美尼亚王。克拉苏则与苏雷纳斯对决。但是，苏雷纳斯所率领的兵力为骑兵1万人。面对步兵3.4万人、骑兵4000人的克拉苏，他究竟打算如何用这区区1万人的骑兵与之相斗呢？

苏雷纳斯将国内传统主战斗力的重装骑兵交给进攻亚美尼亚的国王，他所有的兵力只有贵族权力下的私兵而已。除去少数的重装骑兵，几为以弓箭为武器的轻装骑兵。东方诸国不重视轻骑兵战斗力的原因是，箭袋中的箭一旦射完之后，实无战斗力可言，敌人只需等到弓箭射完就行了，箭一射完、手上又没拿长矛的轻骑兵，充其量不过是坐在马上的普通兵而已。

而苏雷纳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1000头骆驼背负着堆积如山的箭同行，如果箭袋的箭射尽时，可至骆驼处拿取别的箭袋，再返回战场，

如此就能防止以往的轻装骑兵很快就无战斗力的情况。

帕提亚的轻骑兵

轻装骑兵另一个未受重视的理由是，在马上使用弓箭，比固定后使用的石弓，力道自然来得弱，因此射程距离有限且穿刺力也弱。射到罗马兵常用的椭圆形坚固盾牌上毫无攻击力。这位帕提亚的贵公子也改善了这个缺点。改良后的弓大小、重量并没有不同，但是攻击力大大增强，与由石弓放射出的箭相近。改良的方法很简单，只需在箭上附加铁

片，将弓型由一变成二，增加弓弦的强度。这个改良，将帕提亚轻装骑兵放箭的射程距离提升了三倍。与重装骑兵相较，轻骑兵的社会地位低，但是对苏雷纳斯而言，这也成为一大优点，因为他们便于统率和驾驭。于是他率领着这1万名士兵，等待着克拉苏的到来。

克拉苏所率领的罗马军，在渡幼发拉底河时就遇上了障碍。先是传来亚美尼亚王没法参战的消息，接着是原本担任行军向导的阿拉伯贵族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得知亚美尼亚不参战，令他感到不安吧。另一说法为这个阿拉伯人原本就是间谍，将罗马军诱至沙漠地带正是他的任务。总之，一开始这场进攻战就存在了诸多不安的要素。

斜穿过横亘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沙漠地带实非良策。在与亚美尼亚军会合无望时，克拉苏的军队也无法取道第一条路径，只能稍稍后退，向距幼发拉底河不远的东南方路线前进。但是，总司令官克拉苏急于早日穿越沙漠地带，于是行军如同追日。中东的5月不同于地中海的5月，况且克拉苏在抵达幼发拉底河时，也没给士兵几天的休息。在烈阳炎炎的沙漠中，罗马兵的行军背负着40公斤的物品前进。而军事训练不充分的士兵，素质尚有欠缺，尤其在沙漠中炎热口渴时，更是容易感到绝望。而敌人的踪影很快就在沙丘上出现了，这时距克拉苏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才几天而已。克拉苏军队的位置在今天的叙利亚国内，还没进入伊拉克。因此以过于深入敌方来为行军受阻作辩解是不成立的。

克拉苏立刻布阵迎战帕提亚的军队。左翼由财务检察官卡西乌斯率3000名骑兵，中央为军团长欧古塔乌斯率全体步兵，右翼为克拉苏的儿子率领以1000名高卢骑兵为主力的2000名骑兵。但是，中央步兵团的横向广而纵向薄，这点引起了总指挥克拉苏的注意。克拉苏担心如此一来会遭敌人重装骑兵（他还不知敌方为轻骑兵）的突破，于是就将长方形阵变为较耐侧面攻击的正方形阵。但是沙漠这战场并不是平坦的，而有沙丘起伏，正方形的优点则无法被利用。而且在地势起伏不平的地方布

阵，要花不少时间，因此敌人来袭时，布阵还未完成。

帕提亚的军队借助沙漠地形，让马匹奔驰造成尘土飞扬，让罗马军队以为敌军人数比实际的多很多。此外，沙漠的强光之下，敌方骑兵所持圆形小盾牌上的金属面会反射阳光，这也影响了罗马军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帕提亚士兵敲击着小鼓，让罗马士兵人心惶惶。

苏雷纳斯见到罗马军的布阵，知道很难通过攻击摧毁罗马军团的方形布阵，于是他命令轻骑兵发动攻击，以扰乱敌阵，使罗马军自行崩溃。

罗马军内的弓兵属轻装步兵，并非主战斗力，箭的射程为50米。而帕提亚骑兵使用由苏雷纳斯改良的弓，所射出的箭射程距离是罗马弓兵的3倍。罗马兵的弓箭触及不到敌军，敌兵的箭却精确地射了过来。罗马军队本来认为再忍耐一阵子，敌方的箭就会射尽。但是箭源源不断，像雨一样落下来。一股莫名的不安，使罗马军坚固的方形阵，向四方溃散。

如此一来，苏雷纳斯掌握了战斗主导权，罗马军队完全成了帕提亚的囊中物。帕提亚轻骑兵驰骋于沙漠中，向频频退守的罗马兵放箭，如同狼驰骋于羊群周围，然后将之逐一猎杀。经由苏雷纳斯改良后的箭，攻击力很强，甚至能贯穿罗马兵的盾，胸甲等更派不上用场，在混乱之中，平时的训练不足更使得罗马军队的形势雪上加霜。

面对苏雷纳斯的战法，罗马骑兵的机动力虽然比步兵更优良，但此时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的武器是矛和剑，如果不接近敌人是无法发挥威力的。但是敌人的箭雨使他们无法逼近。罗马的4000名骑兵和防战方面的步兵一样，陷入苦战。

这次并非罗马军第一次与远东军对决。即使不提亚历山大大帝，苏拉也曾两度大胜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苏拉门下的卢库鲁斯曾大胜亚美

尼亚的军队，虽然敌方拥有10倍于己的兵力。而亚美尼亚人的战法与帕提亚军队非常类似。在战争中面临不测的事态时，胜负的关键在于最高司令官的临机应变之道，而克拉苏应战经验的匮乏也让罗马军队很难扭转战局。

克拉苏命令守右翼的儿子普布利乌斯率2000名骑兵发动攻击。要突破此时的现状只有靠攻势了，因此这个攻击命令下得并不坏。但是，他同时也向卡西乌斯率领的2000名骑兵下了攻击命令。这种情况下，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骑兵应该去扰乱帕提亚轻骑兵的攻击，好给罗马军队有喘息之机，但万万不能深追下去。比如恺撒带兵时就相当忌讳骑兵深入追击时而导致被孤立。但是克拉苏的儿子还太年轻，他正因为被帕提亚军队戏弄而怒火中烧，失去了身为将领的自制力和判断力。

苏雷纳斯见普布利乌斯率2000名骑兵展开了攻势，于是命令自己的骑兵全部后退。等到深入追击后的青年克拉苏察觉时，已经被帕提亚的1万名骑兵团团围住。箭突如其来地如雨般落下，高卢骑兵纷纷中箭。普布利乌斯带着残存的士兵，至沙丘下避难。此时已经没有突围逃生的希望了，为了避免被帕提亚的士兵生擒活捉，普布利乌斯选择了自杀，他部下的将官纷纷效仿。而剩下的士兵也很快地就被俘虏了。

帕提亚骑兵完全撤退后，松了一口气的罗马军，趁机治疗伤患，整理阵型。但随后帕提亚骑兵再次出现，并投下了克拉苏儿子普布利乌斯的首级。罗马军顿时为恐怖与绝望所笼罩，此时克拉苏才觉悟到彰显罗马伟大之处的正是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于是总司令官下马，奔走在士兵之间，大声诉说自己虽然蒙受丧子之痛，但是仍然决心为罗马的名誉与光荣而战，鼓舞大家应该坚守信念。不过这演讲为时已晚，而且克拉苏并没有恺撒那般的人格魅力。换成恺撒，即使他不发一言，只要他显示坚定不移、自信满满的态度，就能鼓舞士气。但克拉苏的演讲没能让大部分士兵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虽有不少念着罗马名誉与光荣的将领与士兵向敌迎去，但孤军奋斗，敌众我寡，无法打开局面。随着战争的持

续，罗马军方面的死亡人数一直增加。

随着黑夜的降临，一边倒的杀戮终于结束了，远东的士兵绝对不在夜间袭击，帕提亚的骑兵团也朝沙丘的彼端扬长而去。罗马军终于有时间来考虑善后对策了。

但是，最高司令官克拉苏只是待在幕中为儿子的阵亡与自己的不幸频频叹气。欧古塔乌斯与卡西乌斯两人安慰他，并且提出必须采取对策的谏言，但是并无效果。外头百人队队长频频呼叫自己士兵的姓名，大队长们围住从最高司令官帐幕出来的两位幕僚，希望他们发布指令。如果能在此时对离此不远的敌人野营地展开夜袭，即使在军事上效果不大，但在心理上能够重振士气。但这等大胆的决策，还得看最高司令官的意志是否坚强。结果，欧古塔乌斯与卡西乌斯得到克拉苏的默许，下达了连夜撤退的命令。

于是，罗马军争先恐后开始撤退。既没有埋葬战死者，4000名伤者也被置之不理。他们的目标地是距此地稍偏北的卡雷，那是希腊人长久以来在帕提亚居住的城镇。克拉苏在此留下了小规模的罗马守备队。

这场无秩序的败走，在太阳升起后也没结束，因此在逃至卡雷之前，又有帕提亚的骑兵追击而来。而逃至卡雷避难的士兵超过1万人。1万多人的兵力相当于2个军团，但是，住在卡雷的希腊人在提供军粮上很不积极，成王败寇，这些在异乡生活的希腊人有此转变，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罗马军只好继续往50公里以北的西那卡移动，他们判断此城镇较大，做围城较合适。

欧古塔乌斯率5000人出发了。克拉苏也率剩下的士兵尾随在后，但是对此感到厌恶的卡西乌斯私自带着500名骑兵往西边的安提阿逃走。欧古塔乌斯的5000人进入了西那卡，而克拉苏一行人还未抵达。卡西乌斯的逃脱甚至传染至其他士兵，于是跟随克拉苏的士兵一路递减。然而与跟随卡西乌斯脱逃的500名骑兵不同，脱逃的步兵毫无战斗力，不是

被杀就是被俘虏了。

公元前53年6月12日，克拉苏与苏雷纳斯交锋的第三天，宿命之日到来了。欧古塔乌斯和5000名士兵在西那卡等待，总司令官克拉苏和已经减至3000的残军，终于接近了西那卡。但是，苏雷纳斯率领帕提亚的军队也追击至此。为了躲避敌人的1万名骑兵，克拉苏便逃到了附近的山丘中。但是，苏雷纳斯并未马上发动攻击，这位帕提亚的贵公子，已经预见到与罗马军这一仗的胜利了，为了给这场战役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打算活捉罗马最高司令官献给国王。于是，帕提亚的骑兵围住了克拉苏藏身的山丘。

因为投鼠忌器，帕提亚的骑兵无法展开箭雨攻势。而被围困的罗马军得到欧古塔乌斯援军的帮助，首度反攻成功，帕提亚骑兵的攻势也首度受挫。

而苏雷纳斯并不着急，他告诉几名俘虏来的罗马兵，自己的目标是罗马总司令官，如果能交出他的话，罗马兵皆能获得自由。他释放这些俘虏，就是要他们传达这个信息。士兵衡量情况后，禀报克拉苏说帕提亚的贵公子要直接举行与罗马最高司令官的会谈，以商量讲和条件。

谁都明白这个建议的真正意图，克拉苏也不是傻子，他并不想接受。但是，周围的士兵都要求他参加会谈。克拉苏留话给幕僚们：如果我死了，那是由于敌人的欺骗，并不是遭我方人的背叛，然后离开军队一人前往敌阵。欧古塔乌斯不放心他一人前去，就率将官追随前往。这样的一行，与前罗马执政官的派头还是挺般配的。

苏雷纳斯很恭敬地迎接克拉苏，并以颇有格调的希腊语，首先对自己以马上之姿迎接徒步前来的最高司令官之事道歉，接着表示讲和会谈在此场所不便举行，已经在河川附近另外预备好了场所，希望能骑马一同去那里，还让马夫牵马过来。但是竟然只有一匹马，这可叫欧古塔乌斯相当惶恐，他拔出腰间的剑刺杀了马夫。双方的士兵起了小冲突，连

罗马将官内部也产生了冲突。结果混乱之中，克拉苏和欧古塔乌斯都当场被刺死。克拉苏并非被帕提亚士兵的剑或箭所刺，而是被古拉迪乌斯剑——短的双刃剑所刺致死，这恐怕是欧古塔乌斯或是哪位幕僚，为了防止罗马最高司令官成为俘虏而痛下毒手吧。指挥官们被杀后，除了少数的罗马军逃走外，全员成了俘虏。

“三头政治”之一、罗马首富、罗马“经济界”的代表——克拉苏，在61岁时迎来了死亡。他的头与右腕被砍下来，当做献品送给了国王。他们还选了类似克拉苏体格的肥胖俘虏，将他扮成女装，让他在帕提亚人的嘲笑声中穿梭街市。

近4万人的克拉苏远征军中，与卡西乌斯一起脱逃的500名骑兵，加上以其他方法逃走的人，总数尚不足1万。成为俘虏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的罗马兵，虽然逃过了被杀的命运，但是全员被送到帕提亚王国最东北的防卫基地——梅尔布，在此地服终身兵役。梅尔布并非属现在的伊朗，而是在原苏联的土库曼斯坦。剩下的约2万人都战死了。在帕提亚战役几天的时间内，罗马就失去了7个军团，以及总司令官、军团长、大队长、百人队队长以及银鹫旗。而这样惨痛的败北，在罗马700年的共和政治历史中总共只有3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90年，一时被凯尔特人（罗马人称为高卢人）占领了首都的痛苦经验。

第二次是公元前321年的“考地乌姆之耻”。被萨莫奈人所打败的罗马军，遭受被解除武装的休战此等不光荣的败北经验。

而第三次是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受到汉尼拔彻底的毁灭。罗马军损失了7万名士兵。

但是，罗马之后对高卢人采取了一波波的攻势，可令罗马忘却当时的屈辱。带来“考地乌姆”这一不名誉代名词的萨莫奈人，结果被罗马吸

收了。坎尼的败北，也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战胜汉尼拔的扎马会战中雪耻了。“卡雷败北”这样的耻辱对罗马人而言也是非报复不可，但是公元前53年秋，得知此事的罗马并没有打算复仇雪耻，因为罗马的两个大人物——庞培和恺撒，他们都在首都罗马和高卢间忙得不可开交。

雪耻之事不只是心理上的问题。帕提亚战胜罗马之事，给远东全体部族带来了影响。实际上，原本是亲罗马的亚美尼亚王国，也渐成帕提亚的垫脚鞍。气焰高涨的帕提亚军又对罗马行省叙利亚发动攻击。在卡西乌斯召集可用之兵努力防卫之后，阻止了帕提亚军继续进攻叙利亚。不过这与其说是卡西乌斯率罗马军残党的奋斗结果，不如说是因为帕提亚方面少了苏雷纳斯所致。

这位得胜回到塞琉西亚、得意透顶的帕提亚贵公子，正沉醉在祝捷宴、方未清醒之际就被杀害了。害怕苏雷纳斯的名声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国王欧洛得斯故意制造意外事件杀了他。这位年轻的武将，30岁便死去了。随着苏雷纳斯的死，帕提亚人也忘却了这项将骆驼与轻装骑兵组合的具独创效果的战术。设计者死去，此人的设计也被淡忘——这正是东方的缺点。如果是在西方，即便是人死去了，他所成就的事也可存续下去。

首都的混乱

得知克拉苏的死讯，首都罗马元老院的关心焦点，不是雪败北之耻，而是在意克拉苏去世之后，“三头政治”将何去何从。虽然大家都知道克拉苏并非有才能而占有“三头”的一头，但是因为有克拉苏，“三头体制”才成立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认为剩下的“二头”今后仍能持续同盟关系的人很少，因为恺撒呈一人独大之势。元老院派深信唯有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才能继续守护罗马，克拉苏之死对元老院而言不失为大好时机，因为这是离间庞培与恺撒的契机。

庞培也认为“三头政治”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恺撒，自己不过是帮他

忙罢了。再说，他所迎娶的恺撒女儿尤利娅也死了，两人缘分已尽。这也并非庞培的政治理念和元老院派相近，只不过他不像恺撒那般确信长久以来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政体是毫无机能的。就本质而言，庞培这样的男人，并不适合从政。“三头政治”的概念也非先出于他口。在恺撒的想法中，庞培的加入，不过是因为公元前60年时，他屡屡因为元老院而颜面尽失罢了。对庞培而言，克拉苏死后，他更没有理由持续这个实力者联盟。

但是53岁的庞培，当年一扫海盗的果断不知消失于何处了。他迟迟优柔不决，对元老院派的相邀也是态度不明。然而，他的名声依旧在罗马政界一枝独秀。看准此点的元老院派想拉他加入阵营，而这位实力者的暧昧态度，造成了首都秩序混乱，并且也放纵了院外的暴力介入。

高唱“平民派”之名的克劳狄乌斯一派，与打着“元老院派”之名的米罗一派之争，愈演愈烈。原定于公元前53年夏举行的下年度执政官选举，也是一再延期。原本为选出执政官的公民大会，成了暴力团体抗争连连的场所，连会都开不成了。元老院派想收买庞培，而身在高卢的恺撒也希望首都的政情能早日安定，两方的利益暂时达成一致。于是，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终于敲定为庞培一人了。但是元老院派想守住寡头政治，对他们来说，独裁是一场噩梦。对独裁官过敏的元老院，把执政官由两人破例变为一人之后，便不再以独裁官称呼，新设了“一人执政官”的名称以掩人耳目。

因为克劳狄乌斯被米罗一派所杀，混乱的形势暂时得以平息。克劳狄乌斯因主张免费配给小麦救济贫民，而在平民间相当受欢迎，他突如其来的死，引爆了平民们的愤怒。平民在罗马广场集会为克劳狄乌斯举行葬礼，差点演变成为一场暴动。而让平民感到可以接受、元老院派和恺撒也认可的人物，在这个节骨眼上，只有庞培了。

对于克劳狄乌斯被杀之事，罗马平民的愤怒到达何种程度了呢？出于和元老院派之缘为米罗辩护的西塞罗主张无罪，他声称米罗杀人之行

并非蓄意，只是偶然相逢互相争吵而酿成的意外，这样的辩护并未得到陪审员的采纳，可见民心所向。后来，米罗自愿亡命马赛，逃过了刑责。

克拉苏的死、克劳狄乌斯的死、庞培就任一人执政官，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公元前53年至前52年间的罗马，绝对不缺头版新闻。不过恺撒似乎没办法凑上一脚，因为驻守冬营地的军团长，带来了高卢中部有异常情况的消息。在确认庞培就任执政官之后，恺撒总算能向阿尔卑斯山动身了。

其实等罗马政治形势稳定后才关注北意局势，前往有异动的高卢，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等异动呈现表面化，明确得知暴动目的、参加部族与统帅者后，要确立相应战略也就容易多了。况且，虽说迟了但也还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季节。虽然暴动的那方行动很快，而恺撒的行动其实也不算迟。

高卢战役第七年（前52年，恺撒48岁）

公元前52年的起义，是历史上公认的高卢民族首次反抗罗马的运动。然而，这并非计划周密、准备周详的全民反抗恺撒的运动。不善于团结、力量薄弱的高卢人，竟然在一次偶然的契机中，神奇地团结起来，反抗的力量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高卢人的起义没有明确计划，其他人根本无从预测。因此冬季在高卢中部两处冬营地的罗马军团长们，根本无法把握全局，更无法预测动乱将如何发展。不过正因为恺撒军队出兵“迟缓”，才清楚地掌握了高卢人集结后发展的趋势。

起义的导火索来自加努特斯人。因无法忘记首领亚克被处极刑的惨状，隆冬时节，他们游说周边各部族族长，让各族长相信亚克的命运就是各部族未来的命运。在加努特斯人的煽动下，惴惴不安的各部族族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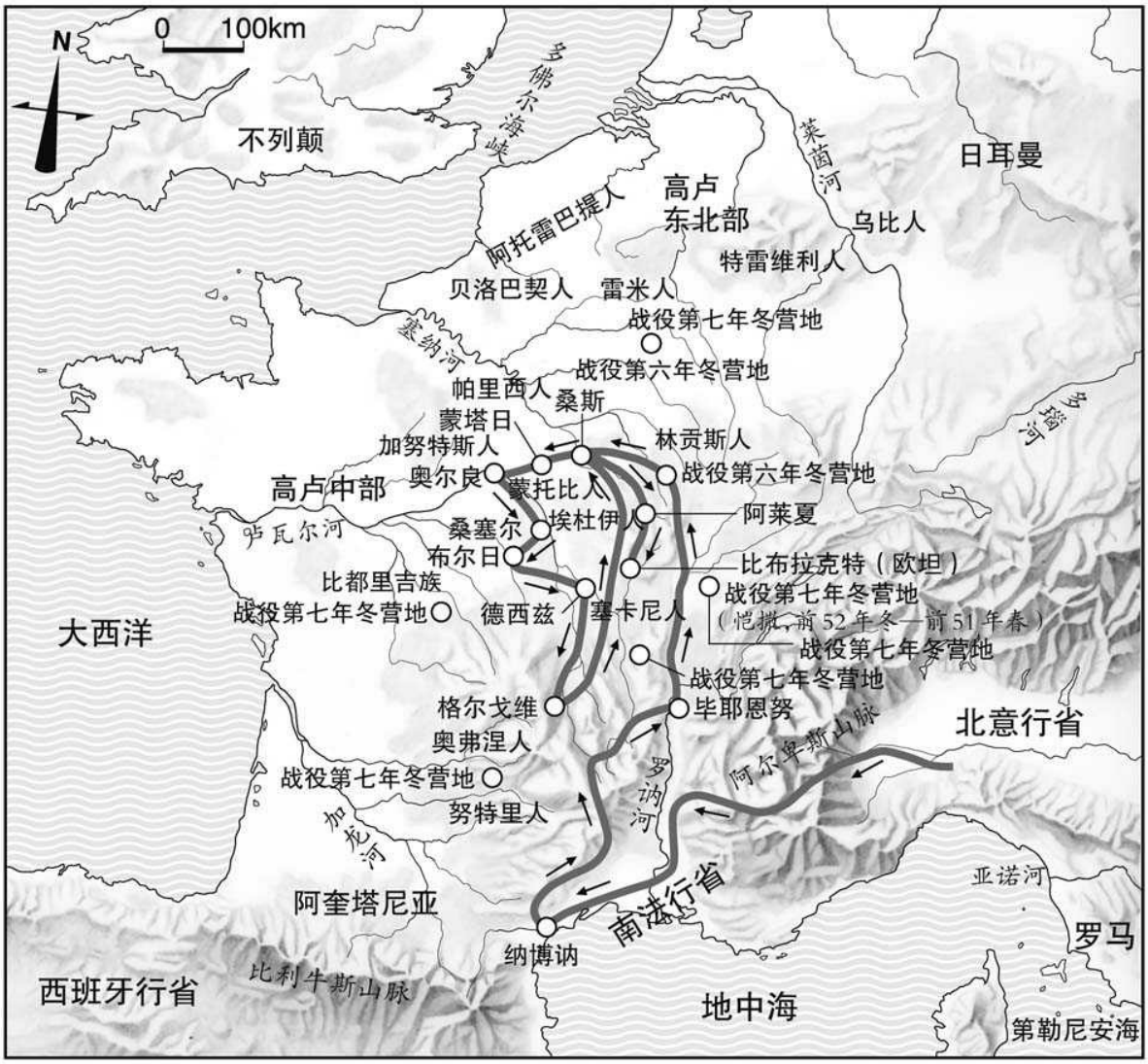
纷纷加入起义，他们选择这个时机反对恺撒，出于如下考虑：

第一，罗马军只有在恺撒的带领下才会胜利，如果能阻止在高卢冬营的10个罗马军团与恺撒会合，就有获胜的机会。

第二，首都罗马的政情不稳，恺撒回到高卢不易。

第三，恺撒需要对付被他逼至莱茵河方向的日耳曼人，无暇抽身，正是反抗恺撒的大好时机。

日耳曼人一直是中部高卢人最大的威胁。因为恺撒对日耳曼人的牵制，高卢中部维持着安定局面。但是，日耳曼人的威胁一旦消除，高卢人对生活在罗马霸权下的不满就一一浮现出来。如果只要求自由与独立，在恺撒两三年前致力远征高卢东北部或不列颠时，起义反抗才对。如果煽动就可令加努特斯人起义，其他部族是否采取同一步调，这是一个疑问。即便其他部族保证与加努特斯人步调一致，加努特斯人未必能安下心来，他们无路可退，面临的是背水一战的绝境。



加努特斯人的根据地，按照拉丁文发音是契那布姆，即现在的奥尔良。在那里，因为恺撒在高卢通常采取一些奖励贸易的政策，因此住着很多来此经商的罗马人。其中也有前来购买小麦补充军用的恺撒的亲信。加努特斯人对这些罗马人肆意屠杀，他们明知罗马，尤其在恺撒治下，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但仍然冒死而行。这件事在高卢口口相传，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整个高卢。这件清晨日出时发生在奥尔良的事件，晚上9点以前，240公里外的奥弗涅人也已知道此事。

韦桑热托里克斯

居住于山岳地带、与罗马南法行省接壤的“长发高卢”中，奥弗涅人力量最为强大，却从未反抗过恺撒。奥弗涅人内部分为亲罗马与反罗马两派，两派争斗中，亲罗马派胜利，处死了反对派的首领。亲罗马派首领的胞弟为当时奥弗涅人的族长，在他领导下，奥弗涅非常安定。

被处死的反罗马派首领有个儿子，名叫韦桑热托里克斯，他也是族长的侄子。得知奥尔良事件后，他认为目前是反罗马最好的时机，于是奔往广场发表演说。亲罗马派一致认为韦桑热托里克斯的行动极度危险，因此将他从奥弗涅的首都格尔戈维放逐。韦桑热托里克斯虽遭放逐，但仍旧召集亲朋，策划反罗马的行动。他抓住时机，集中人力，发动政变，反而将作为族长的叔父放逐，成为奥弗涅人新一任的族长。

他以奥弗涅人族长之名，派遣使者出使高卢各部族，煽动各部族反罗马发动起义。就这样，以加努特斯人为首的反罗马组织纷纷成立。中部高卢没有响应起义的部族，最后只剩下埃杜伊人了。

35岁的韦桑热托里克斯正值壮年，拥有高卢民族少见的强大领导能力，因此很快便被推选为高卢起义军的总司令。他认定高卢民族的团结是此次战役胜利的关键，他亲自制订的措施，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第一，他命令各部族必须提交人质以保证履行盟约。

第二，他命令各部族迅速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兵力。武器的生产和供应各部族也承担相应的部分。

第三，韦桑热托里克斯对增强军队的骑兵兵力作出了特别的强调，他想用高卢的传统主战兵力骑兵，与罗马的主战兵力重装步兵一决胜负。

这位年轻的大将为促成目标的实现，施行了严酷的惩罚制度，对执行不力未完成任务的部族人员，处以火烤、割耳和挖眼等酷刑。用如此的酷刑对付并不是战败一方的部族，在高卢历史上也前所未有。不过正因为如此，一团散沙的高卢部族才得以团结。

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即将挥师进入高卢的恺撒，早已对高卢状况了如指掌。如何与置身高卢的罗马军团会师，他却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是否要将分散三地的所有冬营军团聚集至南方的罗马行省？

这种军团大规模的移动，很有可能遭到韦桑热托里克斯军队的袭击。

由恺撒率军往军团的冬营地会合又会怎样？恺撒率领的不过是紧急编成的一个临时军团，草率率领这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进入反罗马气势高涨的中部高卢，是无谋之举。

最寻常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是由特里诺开始向西方的苏萨山谷迈进，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到达南法行省东边的罗讷河。恺撒并没有下定决心走这条路线。对他而言，经由未参加反抗的塞纳河以北或加龙河以南的阿奎塔尼亚地区，是唯一可以一试的路线。

理应为如何集合部队而无暇旁顾的恺撒，竟然在翻越阿尔卑斯山间隙，撰写了一部名为《类推论》的论著。本书开始引用的一句恺撒名言，就是摘自这部著作。脱稿后，他立即派人将书稿送回罗马，献给与自己观念相左、文风明畅的元老院派领袖西塞罗。

恺撒以静制动的闲暇之时，韦桑热托里克斯给了他行动的机会。纳入了韦桑热托里克斯指挥的中部高卢人，对罗马的南法行省展开了猛烈攻击。韦桑热托里克斯强攻南法行省，企图使恺撒疲于奔命，延缓与军团会合的时间。这一战略可谓攻其不意，但要知道他的对手是恺撒。

得知敌军向南法行省逼近的恺撒，挥军直指纳博讷，在那里建立起完备的防卫体系，整合行省内各部族的兵力，并将从北意大利带来的军团重新配置，防守和攻势很快无懈可击。

恺撒军团如此快速的反应，令受命于韦桑热托里克斯攻击南法行省的鲁库帖利乌斯始料未及。他兵力分散，很快心生退意，放弃了对南法行省的攻击，回到北方的根据地。

眼见敌人退去，恺撒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率领骑兵，翻越积雪的山脉，亲自领军展开反击。法国中部地区与南法之间的重重山脉，似乎为保护南方行省免受北风侵袭而生，就连商人也不会想要在春天前越过这个地区。恺撒做到了，他带领骑兵前行。从2米深的积雪中，开道行进。事实证明，艰苦卓绝的行军是极有价值的。奥弗涅人的居民，刚得知西方攻击失败的消息，怎么也不曾料到，敌人会闪电般出现在东方。一路辛苦行军的恺撒骑兵团受令：可在周边城镇尽情杀掠。

原计划攻击中部地区罗马军团的韦桑热托里克斯，突然见到前来救援的奥弗涅特使。韦桑热托里克斯无法对来自母国的哀求无动于衷，他中止了对罗马冬营地的攻击计划，率军南下参与救援。形势逆转，恺撒渐渐掌握了全局。

如同我在前文描述《高卢战记》开篇记述高卢地理时所打的比方一样，尤里乌斯·恺撒的脑子里印着准确的高卢全境地图。在中部高卢的棋盘里，恺撒对对手的棋步洞若观火，最高效地发挥了自己的效能。相反的，韦桑热托里克斯虽然有高卢民族首领罕有的领袖素质，但似乎对战局没有整体的理解，以致无法得知恺撒的下一步棋。

当然，恺撒绝对不坐等敌军的到来。他搅乱敌人阵脚的第二天，就把在当地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幕僚——德奇姆斯·布鲁图。恺撒严禁年轻的布鲁图在阵地三天行程以上的地区掠夺，并要求他在敌军主力到达前撤离，并追上恺撒的部队。

当时的形势是，韦桑热托里克斯从西边率领大军南下，恺撒从东部率领少数骑兵北上迎敌。对恺撒带领的轻骑兵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的部队很快进入毕耶恩努。毕耶恩努是罗讷河畔的小镇，南距离里昂30公里，在特里诺去往阿尔卑斯山的要道上，可谓高卢的门户，与特里诺的距离只有300公里。

这个位于南法行省最北端的小镇，恺撒于前年冬天，雇用了400名日耳曼人驻守此处。这里成了恺撒下步行动的起点。

与奥弗涅人同为中部高卢强大部族的埃杜伊人，虽然至此都不曾响应韦桑热托里克斯的号令，恺撒却也不敢大意。从毕耶恩努到罗马两个军团驻扎的林贡斯人地区，埃杜伊人的领地是必经之地。即便埃杜伊人表示了友好，恺撒依旧谨慎，在埃杜伊人的领地不分昼夜地急行军。

谨慎行事和出奇制胜是恺撒制胜的两大法宝。急行军之后，恺撒终于和驻扎在林贡斯人地区的2个军团会合，很快，他便传令莱茵河西岸特雷维利人的2个军团到桑斯集结。同时，恺撒亲自率领刚刚会合的4个军团，前往6个军团所在地的桑斯。当韦桑热托里克斯知道罗马的10个军团又悉数接受恺撒的指挥时，集结已经完成。

高卢全面叛乱

叛乱的高卢人不让恺撒与其他军团会合的算盘落空了。率领大军南下却又无功而返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只得再度北上。不过，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下一步棋。

如果能让中部高卢所有部族一起加入反抗罗马的阵营，兵力将是恺撒军团的10倍，恺撒军团的粮草也唾手可得。因此，韦桑热托里克斯不急于与恺撒对决，反而转攻与恺撒交好的埃杜伊人所保护的波伊人根据地格尔戈维。韦桑热托里克斯认定恺撒不会前往救援，因为将大军带出粮草不愁的冬营地，介入寒冬时的野战完全是个冒险。见不到罗马兵团

援助的埃杜伊人，会认为遭到背弃。这样，波伊人连同埃杜伊人，都会弃恺撒而去，转而站在自己这一方了。

战争中能够持续掌握主导权的一方才能胜出，洞悉韦桑热托里克斯心思的恺撒，决定主动出击。恺撒放下疑虑，将军粮补给的重任委托给埃杜伊人，并派遣使者告知波伊人坚持防守，不放弃希望，罗马人会第一时间前往营救。恺撒留下2个军团及所有的运输车队，率领8个军团的战斗部队，离开了营地。

恺撒并未立刻前往被攻击地，他深知奥弗涅人的年轻领导者的意图。因此，为了彻底击垮对方，展示罗马的强大兵力是必要的。行军一天，恺撒大军到达蒙塔日，两天的攻城准备后，该地居民心生畏惧而投降。随后，恺撒到达加努特斯人的大本营奥尔良，为当地被杀的罗马商人一雪前耻。此举不仅是向敌人宣战，也大大提升了罗马军队的士气。奥尔良被毁，当地居民被俘，战利品悉数赐给士兵。此后，恺撒军队才开始向南开拔，朝着比利时人的要塞——桑斯前进。闻此前其他城镇的遭遇，桑斯不战而降。

不过，恺撒军在这之后才第一次与韦桑热托里克斯的骑兵队交锋。知道了恺撒军的到来，中止攻打林贡斯的奥弗涅人年轻武将们，摩拳擦掌地欲迎击恺撒。在为恺撒军团效力的日耳曼骑兵的奋战下，双方骑兵的交手胜负立见分晓。这对自从高卢人举起反旗、已无高卢骑兵可依靠的恺撒而言，实在是可喜的消息。恺撒于是继续向敌方进军，他的下个目标为比利时人的根据地布尔日——高卢地区的心脏。

高卢军队在连续失去了蒙塔日、奥尔良、桑斯三地之后，终于聚集各部族族长，研议今后的战略。韦桑热托里克斯提出焦土化作战的构想，即让高卢中部化成焦土，迫使罗马大军无法调取粮草。一旦粮草调度有问题，势必从更远的地方派遣押粮部队。如此一来，攻击便容易得多。最后粮草无法补给的罗马军，只得乖乖从南法行省撤离。

韦桑热托里克斯所说的焦土化作战，并非只是将田地烧光，而是彻底地破坏能被罗马军利用的所有避难场所，比如城镇和要塞等。他抛出了是以牺牲换取自由还是成为罗马人的奴隶，这种关乎生死的选择，说服了出席作战会议的全部族长。

这项开始严格实施的作战计划，没过多久便不能进行。焦土化地区之一的布尔日，居民百般恳求，竟然使韦桑热托里克斯动念放弃。而恺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正是布尔日。

古称阿瓦利库斯的布尔日城，自古以来就由居民自己防守，坚不可摧。他们向韦桑热托里克斯保证城镇不会被罗马军攻下，因此没有必要破坏自己的城镇。事实上，该地可谓天然要塞。城镇周围护城河围绕，河的两岸沼泽密布，进出只有一条小路，此地易守难攻。

意在攻下此地的恺撒，面临的敌人并非只在布尔日城内。韦桑热托里克斯在距离布尔日24公里的森林泽地搭建了阵地，并在恺撒军队粮草补给的必经之地设下重重埋伏，又派兵随时由后面来包抄搅乱罗马驻军。

恺撒的军粮只得依靠外援。然而，受恺撒委托承担军粮补给的埃杜伊人与波伊人并未尽到同盟的义务。波伊人为小族，提供不了充足的粮草补给罗马部队，埃杜伊人则不同，埃杜伊人的态度暴露了他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的企图。

罗马士兵一般行军只带7天的粮草，远征则带15天的粮草。恺撒出征前，将所有的运输车队留在桑斯，应当是带够了15天的粮草。在攻下了蒙塔日、奥尔良、桑斯之后，粮草得到了充足的补给。准备进攻布尔日的这段日子，粮草在不断消耗。刚到春天，距离收获的日子尚远。即使恺撒打算借着掠夺冬季储藏的粮食来补充军需，但因为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战略，邻近的乡镇村庄皆被烧毁殆尽。如果走远借粮，很有可能遭受韦桑热托里克斯骑兵的袭击。小麦所剩无几，只能吃好不容易到手的

肉食应付。对于热爱肉食的日耳曼骑兵来说也算享受，但以小麦为生的罗马兵却倒尽胃口。况且连用作马匹饲料的大麦都很难弄到。如此境况，攻城的准备却没有丝毫懈怠。布尔日特殊的地形，想要构筑包围全城的攻城栅栏绝无可能，只能在唯一可通行的地点建造带有两座高塔的攻城栅栏。

激发士兵士气，可能是大多数指挥官此时的当务之急。而恺撒则让手下将领，向士兵们传达自己体会战士辛苦，打算放弃攻城的想法。令人称奇的是，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他们的想法：

“我们已经跟随恺撒征战多年，历经磨难，却从来没有半途放弃。如今若是放弃退却，只会影响我们的声誉。我们宁愿承受眼前之苦，也必须为被高卢人杀害的同胞报仇。”

将士的士气非常高昂，但认为士气可以决定一切的领导者，只是位普通的领导者。攻城准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恺撒从俘虏处得知一个可靠消息：韦桑热托里克斯率领骑兵前往罗马军队粮草补给的必经之处伏击，而不在阵地。恺撒在夜色中偷偷出发，第二天凌晨就到达敌方阵地前。由于已经达到双方士兵的行动都能看得真切的距离，恺撒对士兵下达了进入备战状态的命令。士兵的士气高涨，几度恳求恺撒下达进攻命令，不过恺撒并没有答应士兵的请求，他告诉士兵：

“处不利之势想要取得胜利，必须付出超出寻常的代价。目前我们正处在不利的位置。”

他继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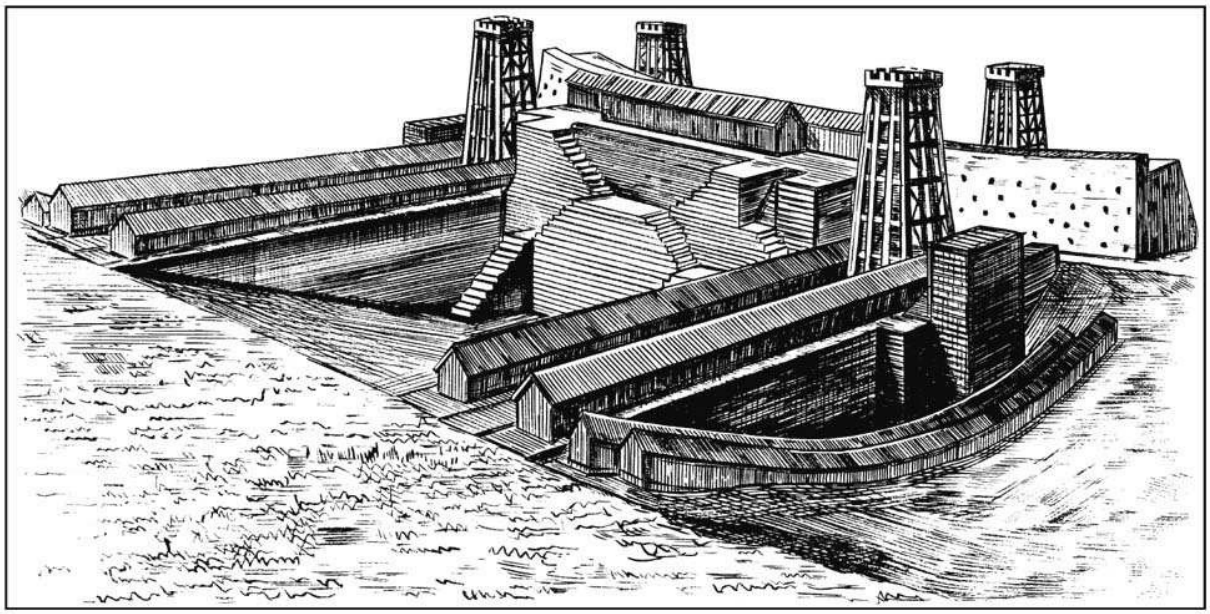
“我很清楚大家士气高昂，愿意为了我的荣耀作出任何牺牲。但若是我将自己的荣誉看得比大家的生命更重要，那我就不配做指挥官。”

说完，恺撒命令士兵退回自己的营地。士兵跟随恺撒撤退的同时，

对这位指挥官的敬慕又增加了几分。

虽然未经任何交战，恺撒就已退去，韦桑热托里克斯仍难逃部族首领关于让罗马军兵临城下的问责。将主力部队全数带离阵地，未曾指认代理的指挥官……对韦桑热托里克斯各种批评指责纷至沓来，甚至有人讥讽他想做高卢王。尽管韦桑热托里克斯一再强调将罗马军逐出高卢，只需断绝他们的粮草即可。然而，对韦桑热托里克斯而言，如何使缺乏统一性的高卢各部族团结这一大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高卢唯一有着战略思考能力的韦桑热托里克斯，虽然想要救援布尔日，但其决策的执行时常被延期。他也许明白，布尔日和自己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罗马军完成攻城准备后，绝望的布尔日守军首先出击，开始了这场攻防战。恺撒命令，两个军团的罗马军负责戒备外围的突袭，攻城的士兵因此并无后顾之忧。战斗在深夜拉开帷幕，高卢士兵倾城而出，果敢出击，罗马军也勇猛无比。激战至次日清晨，战局也日益明朗。城外堆积如山的尽是守城者的尸体，这种惨状令守在城内的士兵绝望。韦桑热托里克斯传来消息：劝布尔日人弃城与自己会合。要想弃城突围，只有壮年男子在夜色掩盖下行动才有可能成功。妇女们哀求男人们不要抛弃她们，城内哭声震天，城外的罗马兵听得清清楚楚，偷逃计划也就此暴露。



恺撒建的布尔日攻城设备（想象复原图）

第二天一大早，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攻击的准备已全线完成。恺撒断言如此的天气正是总攻城池最好的时机。这位最高司令官对全体士兵说：

“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今天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

恺撒许诺最先攻下布尔日城的士兵会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随后，下达了全面攻城的命令。士兵们一直压抑着的斗志完全爆发出来，全线士兵没有一人后退，争先恐后朝城墙涌去。

因为大雨，守城的布尔日人稍稍放松了警惕。守城士兵得知罗马发动总攻的消息慌张赶往城墙防守时，罗马士兵已经稳稳地站在城墙上了。在恺撒的指示下，他们并没有立刻在城内展开攻击。罗马士兵立于城墙之上，将布尔日居民围得水泄不通。绝望的布尔日人甚至丢弃了武器，在城中四处逃窜，争相躲到没有罗马士兵防守的角落，竟有多人被推挤至死。

恺撒随后才下达进攻命令，城内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得到饶恕。罗

马士兵认为他们和高卢士兵一样都是杀人者。罗马士兵毫无掠夺之意，有的只是长时间挨饿的记忆以及同胞在奥尔良被杀的愤怒。住在布尔日的4万名居民，只有在总攻击开始时逃出的800人得以幸存。这些人虽是逃往24公里外韦桑热托里克斯的营地，但听说允许进入营地的只是深夜抵达的少数人。连韦桑热托里克斯也害怕，布尔日失守的消息会令旗下部族族长动摇而叛离。

恺撒让士兵在刚攻下的布尔日待了几天，以便他们能有充足的休息。在食粮丰足和有屋顶的房屋内休息，能为下次的进攻补充足够的体力。另外，恺撒等待着韦桑热托里克斯阵营里的动摇。恺撒攻陷了高卢人认为不可攻破的城池布尔日，这足以令高卢人军心动摇，质疑韦桑热托里克斯的领导能力，甚至让高卢统一战线解体。恺撒之所以让士兵忍受各种磨难而执著地进攻布尔日，就是希望布尔日攻陷后，对方阵营的形势能有所变化。然而，高卢阵营并没有发生如恺撒预期的变化，而且非但没有变化，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第一，韦桑热托里克斯并没有逃避问题；第二，他让族长们回忆起是布尔日人而非他宣称布尔日是不破之城的；第三，他认为罗马军的胜利既有勇敢也有技术力量在起作用。如果高卢人照搬还是有胜算的可能，这些让族长们再次燃起希望。韦桑热托里克斯让各部族族长相信，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没有永不败退的道理。这位奥弗涅年轻的指挥官强调，以罗马为对手的战争，胜负完全取决于高卢民族是否团结。

这番谈话也深深地打动了高卢各族长。他们看到战败的韦桑热托里克斯毫不屈服，有着自己不可企及的勇气、洞察力及领导力。对远在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们而言，韦桑热托里克斯只是蛮族长发高卢的一个普通人而已。但身在前线的恺撒并不是这样，他所著的《高卢战记》中，记录着他对敌将的欣赏并承认自己误判的一段文字：

对大多数指挥官而言，战败将失去部属的信赖；但对他来说，

愈是失败，下属对他的信任却越发牢固。高卢人相信在韦桑热托里克斯的领导下，能促使其他尚未决定去留的部族加盟反对罗马的大军，这么一来，赶走罗马军的目标就可实现。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部族加入反对罗马的阵营，情况与恺撒的预期完全相反。在此情况下，为求突破，恺撒只得另作打算。

高卢战役第七年刚开始，和恺撒对弈的另一方已清楚出现，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棋子。但无论是跳棋还是象棋，游戏与战争根本不同。游戏时的棋子只是任人摆布的木块，战争的棋子却是血肉丰满感情充沛的人。所以如果在制定战略时没有把这些看不见的要素考虑进去的话，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游戏”的。

恺撒或许在攻陷布尔日后，才日渐理解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意图，也就是这位年轻将领的策略——不惜与罗马玉石俱焚。恺撒无法补充兵源，他要做的是尽量保全自己后再攻击对方。这是一场需要有高超技艺的博弈。

恺撒注意到，棋盘一方即使再怎么强的对手，目标只有一个人，征服高卢这样部族群立的地区，这种状况反而有利。从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这一点看，和文明之国作战就比对付蛮人容易些。了解这一点的恺撒，走出了下一步棋，他要做的就是“将军”。恺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母国奥弗涅人的首都——格尔戈维。

恺撒撤退

面对素以速攻闻名的恺撒，韦桑热托里克斯的反应丝毫不慢。

然而，恺撒遇到了一个让他裹足不前的障碍，就是中部高卢最大部族，也就是罗马同盟者埃杜伊人的问题。真正展开战斗的季节4月即将来临。对于目标明确的恺撒而言，此时遇到埃杜伊人的问题很不妙。但

这个问题如果由韦桑热托里克斯来解决，可能会出更大的乱子。于是，恺撒由布尔日向格尔戈维南下行进时，暂时取道东南，到达了埃杜伊人长老的聚集地德西兹。

埃杜伊人的问题是，新族长的选举导致整个部族一分为二，两派互不相让。恺撒强制未经合法程序选出的当权者放弃权力，以此暂时解决内斗，并要求全体埃杜伊人冰释前嫌，协助罗马投入眼前的战事。埃杜伊人需要给罗马军队提供粮草补给，提供步兵、骑兵共1万人以补充兵力。这并不能解决埃杜伊人的内讧，但如此处理却是恺撒的当务之急。

恺撒在此作了一个近现代研究者都认为是错误的决断，他将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他让副将拉比埃努斯率领留在桑斯的2个军团，另加2个军团共4个军团，前往压制北边的歇诺内斯人与帕里西人。恺撒亲自率领6个军团，南下向奥弗涅人住地进发。这样的分兵是否正确？对恺撒而言，在敌人战场上战斗，背后的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就这样，6个军团3万重装步兵加上2000名骑兵以及1万名埃杜伊人士兵，直捣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根据地。时间就这样迈入了5月。

奥弗涅人的年轻领导者，已经准备妥当迎击恺撒。在恺撒从布尔日出发，取道德西兹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洞悉了恺撒的意图。海拔700米高的格尔戈维城镇周围，已围绕了城墙，外侧高地与平野相接之处，垒起2米高的石壁。他发布工程命令的同时，亲自领兵追踪离开德西兹的恺撒部队。虽是追击，他仿佛故意让沿阿列河东岸南下的恺撒看见，沿西岸行军。在河的对岸进行如此紧密地追击，是为了不给恺撒架桥的时间。阿列河虽然算不上一条急流，但在春天水流激增时，若不设桥人也无法通行。

就在韦桑热托里克斯在对岸紧盯不放时，恺撒心生一计。他让4个军团伪装成全部军团般声势浩荡地先行，自己则和2个军团静候在森林里。等瞒过欧维人年轻将领后，2个军团摇身一变，成为架桥的工兵。架桥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没有敌人干扰，在远比莱茵河狭窄的阿列

河上架桥，可说是小菜一碟。恺撒的2个军团先行过河，确保对岸安全后，他叫回4个军团，再行渡河。罗马的6个军团全部平安无事抵达西岸。韦桑热托里克斯不愿在无万全准备的态势下会战，让军队急行至格尔戈维。渡河5天后，恺撒到达了可以望见奥弗涅人首都的地方。

研究者指出，格尔戈维位于现在克莱蒙费朗以南6公里处，恺撒一望地形，即知攻战困难。虽然仅是一座矮山丘，但建造于高处的城镇周围已加上城墙，而下方又建造了防卫用的城墙。上下两重城墙中间的山脊地带，全是敌军的帐篷。要攻进去，几乎全无可能。如果要采取包围战，军粮补给的问题，又因为无法尽信埃杜伊人，不敢贸然行事。

困于格尔戈维的韦桑热托里克斯，致力于整合旗下各部族。他不给族长考虑的闲暇，每日召集他们给予指令，士兵更是没有考虑的时间。

恺撒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他在可看见格尔戈维的正面高地上，为6个军团建了坚固的营地，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营地与格尔戈维连线上的一座小山丘。那里虽然已被敌方占据，但恺撒夜袭山丘占为己有，配置了2个军团在那里筑起小阵营地。接着，为了便于士兵在大本营以及山丘上的这个小营地之间移动，恺撒命令士兵挖掘了两条宽3.6米的壕沟，由此可见他长期作战的决心。

奥弗涅人与埃杜伊人之地，以阿列河为界。东北部属于埃杜伊人，西南部属奥弗涅人。对于正围攻奥弗涅的首都的恺撒而言，若能得到东北部埃杜伊人的补给，长期包围战也就有了可能。但是，两个部族在地理位置上相临，如果埃杜伊人向奥弗涅人靠近，军粮补给困难后就会导致大问题。然而这一切正渐渐变为事实。

埃杜伊人内部分裂，最初不过是势力之争，后来竟发展为以高卢民族意识为出发点的抗争。亲罗马派，以恺撒及罗马往日的厚待为由，主张继续恭顺罗马；反罗马派指出，韦桑热托里克斯麾下的高卢部族，之所以在反罗马抗争中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同为高卢民族的埃杜伊人没

有参加，如此一来埃杜伊人岂不成了背叛者？亲罗马派立刻向恺撒报告此事。恺撒并未回应，因为他害怕谴责反罗马派只会让埃杜伊人倒向敌方。恺撒的态度助长了反罗马派的气焰，他们杀害滞留于埃杜伊人领地的罗马商人，没收其行李与货物，与加努特斯人当初的手段如出一辙。无路可退之人，只能做得比最初的选择更加极端。此时的恺撒深知，靠埃杜伊人提供兵力、军粮补给完全不可能。如此看来，格尔戈维一战，只有撤退一途。但是，不战而退，只能对敌方有利。

恺撒并不打算放弃苦心经营7年的高卢，扬长而去。恺撒虽然放弃了攻打格尔戈维城，却在同时坚定了向北撤退与拉比埃努斯的军团会合后，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对当时的恺撒而言，如何不让对方看出自己撤退的意图，这是个问题。他寻找着可能的机会。

韦桑热托里克斯建造完用石头垒砌的城墙后，认为这样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他还在城墙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布下大军严阵以待。

注意到这一点的恺撒，在半夜时分派遣数队骑兵在这座山丘附近来回行走。天亮前，又让运输粮草的马和驴也在同一地点徘徊。不久，敌方将主力部队移师此地。同时，为了不让处于高地的敌人察觉其真实意图，恺撒隐藏军旗，将部队通过壕沟向山丘的小营地移动。他召集各军团团长，说明对于作为将领的他们，控制自己的战斗意志格外重要，随后，下令全军发动攻击。

罗马军团的士兵作出速攻，由小营地奔向敌方防壁，并迅速越过了高约2米的防壁。大部分的敌兵扑向恺撒所设的诱导处，作出防卫的抵抗，即使罗马军进入有敌军帐篷的山脊地带，能阻挡罗马军团速攻的敌军也微乎其微。就在罗马士兵摧毁敌军帐篷、杀死守备士兵、进攻兴起之时，恺撒下令鸣号撤退。指挥官忠实地执行恺撒下达的命令，大声呼喊自己的士兵撤离，然而，轻易突击至城墙处的罗马士兵并未听见撤退的命令。倾巢而出的高卢士兵却听见了罗马士兵的喊杀声及因突如其来的攻击而惊慌起来的城镇骚动声，他们迅速返回，战况便为之一变。

高卢兵由山脊的高处攻来，罗马军只能在低处反击。另外，支援恺撒的1万名埃杜伊人士兵也行动迟缓。与开战时的情形完全相反，罗马军开始受制于人。危急时刻，发挥救援功能的是恺撒附近的第十军团。威名远播的第十军团和防卫小阵营的塞斯提乌斯立刻派出数个大队救援，这个恰逢其时的举动，使原本开始逃跑的士兵又回到了队伍中。韦桑热托里克斯见到在平原布阵的罗马军，不愿引发会战，呼喊自己的同伴退回自己的防壁内。

恺撒方面仅给对方一击就撤退了，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罗马军团牺牲了近700名士兵，其中包括46名百人队队长。第二天，恺撒集合全军，叱责士兵自以为是的进攻和无视百人队队长下达撤退命令的傲慢。趁势而为，已经超出了一个士兵权限的范围。况且在不利的地势战斗势必付出相当的牺牲。恺撒举在布尔日的例子，指出不让士兵作无谓牺牲正是总司令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味地斥责很容易挫伤士兵的锐气，因此恺撒即使认定他们无谋也不忘赞赏他们的勇敢。但同时指出：士兵们不应该有自以为较最高司令官更正确、更透彻预见战况进展及战斗结果的傲慢。然后，他以下列这句话结束了这次训话：

“我期望你们大家在拥有勇气与骄傲的同时，也能谦虚和自律。”

原准备找时机撤退的恺撒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马上撤退是不行了。虽然恺撒撤退的决心没有改变，却连日在平原布军挑衅，想挑起与敌人的会战。不过，厌恶会战的韦桑热托里克斯，依旧没有派兵走出防壁的打算。此时双方骑兵偶有冲突，多数时候罗马军获胜，恺撒以此让士兵认定：自己处于优势，士兵们的士气也因而恢复，恺撒这才发出撤退的命令。撤退之前，先将战死者埋葬，处理好伤者。

我这样的文人往往会嘲笑军人执著于组队训练以及按规则行进的做法，但其实这并非可笑之事。如果队伍散乱，行军、布阵中指令都无法

下达。作最少的牺牲，才可能会有最大的收获。从这一点出发，就不得不了解军队的机能构成。首先必须了解指挥系统。由指挥系统传达的指令，通过中队、大队、军团等井然有序的组织串联，才能充分传达到每个角落。恺撒军自格尔戈维的撤退，是退离而非败逃。罗马各军团都井然有序地撤离，高卢军并未展开追击，因为要追击有组织撤退的罗马军并非易事。撤退后第三天，恺撒军再次架桥，到了阿列河的东岸，全程没有遇到过韦桑热托里克斯部队的任何干扰与妨碍。

就韦桑热托里克斯而言，无须操之过急，目前为止，他已经是个胜利者。恺撒的神勇和不败战绩根本就是个神话。他毫发无损地撤退，对韦桑热托里克斯来说已是十足的胜利。与恺撒交手，韦桑热托里克斯仍能守住老巢，恺撒“将军”这步棋，算是失败了。

恺撒撤退的消息立刻传遍高卢全境。在罗马问题上难以抉择的部族，也清楚地作出反对罗马的决定。在埃杜伊人内部，民族派势力占据了上风。恺撒当初分成三块的高卢，也就是塞纳河及马恩河两河以北的比利时人的东北高卢，加龙河以南的阿奎塔尼亚人的地盘，塞纳河与加龙河之间辽阔的中部高卢，现在全部都开始反抗罗马。留在罗马阵营的部族，只有自愿选择了罗马的雷米人与林贡斯人，以及恐惧日耳曼人入侵而不得不臣服于罗马的特雷维利人。四分五裂的高卢民族，终于做出团结一致的姿态。四面楚歌的恺撒和6个军团继续急行军，与前往集合地的副将拉比埃努斯所率领的4个军团，在桑斯成功会合。

恺撒再度拥有10个军团的指挥权，但形势并无转机。首先，与骑兵强悍的高卢人战斗，恺撒的骑兵战斗力显得极为低下。以往埃杜伊人是恺撒军队骑兵的主力。这时恺撒只有当年雇用的400名日耳曼骑兵，以及少数因崇拜而追随他的高卢骑兵。恺撒派遣急使到莱茵河东岸，向同盟的乌比人请求补充骑兵。在骑兵到达之前，恺撒一直动弹不得。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对恺撒而言，这是一段一筹莫展的艰难时期。而此时，存放有大部分罗马军务公文书的苏瓦松也落入敌手。在韦

桑热托里克斯的指挥之下，高卢全族团结一致反抗罗马。如果让奥弗涅人的年轻领导者的战略全部实行，恺撒和10个军团岌岌可危。事实上，在得知恺撒撤离格尔戈维消息之后，首都罗马的元老院派开始得势。此外，原本丧妻（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单身的庞培，与元老院派重臣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女儿再婚，立场突变，成为亲元老院派。困于桑斯的恺撒，此时向首都要求援军，或许也没办法获得支援。

如果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战略完全付诸实施，因焦土化无法顺利获得补给的恺撒军队，迟早得踏上离开南法行省之旅。再者，离可提供补给的部族颇有些距离，调拨粮食须有远行的打算。与韦桑热托里克斯集结的30万兵力正面冲突，牺牲会有所增加。还有，即使能平安返回首都，进行了耗时7年的战役和牺牲诸多将士却仍然称霸失败，这等于断送了恺撒的政治生命。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如果”并未发生。

高卢一侧，这次并不是因为有部族反对焦土化作战，原因出在奥弗涅的这位年轻领导者身上。

此时高卢有9万名步兵、1.6万名骑兵，加上其他可能召集过来的士兵近30万人。而恺撒只有10个军团不足5万人的兵力，另外恺撒只有一些产自日耳曼的贫弱马匹，他将马匹分给将官，建立骑兵，但也只能拥有不足1000人的日耳曼骑兵团。即使是这样，恺撒依旧不愿意只是防守。他离开桑斯，率军向东南进发。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如此行动对救援南法行省更为有利。尽管此时韦桑热托里克斯布局良久，煽动南法行省高卢族脱离罗马统治的行动已经失败。可能恺撒的心中，暂时撤退到南法是一项选择吧。而最后把他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的，居然是他的敌人。

得知恺撒军行军路线的韦桑热托里克斯一阵狂喜。因为不用将高卢中部地区全部变为焦土，罗马军已经向南方移动。这位年轻将领立刻召集部族长会议，动情地说服大家：如果任由罗马军向南撤离，坐视不理，他们必会养精蓄锐后再度杀来。要想彻底打倒他们，必须全力追

击。一直避免与战术家恺撒会战的韦桑热托里克斯，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和恺撒的正面交锋。

在极度考验战术和军事素养的会战中，这位奥弗涅人的年轻人完全不是恺撒的对手。高卢优良的骑兵全部投入战斗，恺撒的军队四面被围，三方遭遇强攻，竟也能从容应对，大获全胜。日耳曼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远超出了预期。韦桑热托里克斯甚至没让自己面前队列整齐的步兵军团参与战斗，就主动率领全军撤离，进入了位于阿莱夏高地的城镇。

阿莱夏攻防战

长久以来，韦桑热托里克斯对罗马军的消耗战一直是成功的，为何他决心豪赌一场进行决战呢？另外，阿莱夏是蒙托比人居住的城镇，却一直未归附于周围任何一个部族，高卢人将此地视为圣地。韦桑热托里克斯推崇合理精神，把这场同罗马人的战争视为圣战。为什么这位唯一比一般罗马将领更具领导才能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守阿莱夏城呢？《高卢战记》记述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在此时期的言行，很可能是在战争结束后，恺撒从被俘的高卢部族族长处获悉的。韦桑热托里克斯一系列的战略变动，可能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与恺撒首次对决失败，韦桑热托里克斯内心受到极大震动。

在那场会战中，高卢投入了占压倒性优势的骑兵。为了发挥骑兵的灵活机动性，骑兵先行出动，分左、右、前三路攻击行军中的罗马军，韦桑热托里克斯则率领8万人的步兵团在后方阻断罗马军的后路。这是韦桑热托里克斯认为的最完美的包围。然而，恺撒的骑兵团，许多都是长年在恺撒指挥下作战经验丰富的老手。虽然高卢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灵活的恺撒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落荒而逃。恺撒之所以没有大胜高卢军队，与其说是韦桑热托里克斯及时撤离，不如说是恺撒不想追赶逃兵，他不愿意随敌深入，给自己部队造成伤亡。那些曾在格

尔戈维被恺撒斥责过的士兵，这次也遵守指令，及早刹车。

通过此次对阵，这位奥弗涅人领导者看到，战场上指挥官的素质比士兵个人素质重要得多。

第二，如果不进行会战的话，只有继续之前的消耗战。但已经能成功应对消耗战的恺撒退到南法行省后，必定再度回高卢。敢于在冬季雪山行军的恺撒，重返高卢中部应该不会有任何畏惧。届时，高卢方面是否还能以现在的态势迎敌呢？

韦桑热托里克斯是高卢人，对同胞的特性了解深刻。在部族林立的高卢，要使其他部族信服，必须自身足够强大。奥弗涅人是中部高卢的强族，但是身为部族族长的他，被推举为联军统帅，并非在与其他部族的争斗中胜出，而是各族长认可他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胆量。然而，这并不能对他联军统帅的位置提供百分之百的保障。实际上，同为中部高卢强族埃杜伊人，曾以自己是大族、提供的兵力较多为由，要求高卢联军总司令官的位置。韦桑热托里克斯因其他各部族长的力挺，地位不曾动摇，但是谁也不敢肯定埃杜伊人会永远臣服于自己之下。在多族士兵联合的军队中，只有一国的国力压倒他国时，指挥系统的命令才能统一，系统功能才能充分得到发挥。奥弗涅人并没有足以压倒埃杜伊人的力量。

高卢联军面临卷土重来的恺撒，极有可能先行溃散。原本淡然的韦桑热托里克斯，也开始为此焦虑。

第三，焦虑的人很容易想到再次创造自己以前成功的例子。韦桑热托里克斯最先想到的，正是格尔戈维防卫战的成功。他一定在想，虽然结果不是那么完美，但能达到那个程度已经不错了。

第四，韦桑热托里克斯选择了以阿莱夏为最终决战的场所，阿莱夏是全体高卢人的圣地。占据此地，很自然能点燃高卢人的民族意识，发

动全体高卢人做自己的后援。

但他并不愿以手边仅有的8万名步兵和1万名的骑兵，迎击恺撒。早在恺撒完成对阿莱夏高地包围之前，韦桑热托里克斯就向大部分的骑兵下达指令：返回故乡征兵征粮。

韦桑热托里克斯命令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征集有战斗能力的男子；另外，他告诉骑兵，阿莱夏所贮藏的军粮仅有30天，如果缺乏救援，自己将会落入敌手，8万名高卢兵将与他休戚与共。受令的骑兵，在晚上9点的夜幕中出发。粮食只够维持30天，韦桑热托里克斯希望后援能够尽早抵达，而这些高卢骑兵，多为上层阶级子弟，在高卢各部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派遣这样的人当使者应该是有利的。

那么，相对于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想法，恺撒对战场移至阿莱夏又作何感想呢？他虽对此没有作出任何的叙述，但根据《高卢战记》这个部分对于恺撒言行的描述来推测，我确信他看见敌人退居阿莱夏后，是相信自己一定能胜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后恺撒给部下交代了许多构想，看不出有任何犹豫，而且这些构想也非常有效。大小决定全都建立在他一贯的战略基础上，任务只交给他信任之人和能成事之人。那么，为什么恺撒在还未开始战斗前，就认为可以获胜呢？

一来，阿莱夏地势与格尔戈维相似却不全然相同。格尔戈维背倚山峦，三面都是向平原展开的高地，因而建立低达山脚的包围网绝无可能。阿莱夏也属高地，周围城墙环绕，这点很类似，但是高地的背后不是高山而是河流。未临河的一方，有4.5公里长的宽广平原。这样的地势对于建立跨河的包围圈是可行的。即完全可以采用包围战术。

另外，恺撒经常询问当地居民和俘虏，很好地掌握了阿莱夏城的现状及敌人的动态。他得知敌方几乎没有骑兵，而高卢军对罗马骑兵颇为

忌惮。恺撒兵团的战斗经验与高卢步兵相比，简直可以以一敌十。因此，即使罗马军建设包围圈时，不断遭到敌方的干扰，但罗马一方很快就能消除干扰。

第三，外部援军的到来，早就在恺撒当初的预料之中。即使城中军队同后援军一起夹击恺撒军队，恺撒也想好了破解之策。他非常确定地相信自己握有能够“将军”的棋。

恺撒在此后的《高卢战记》中以工程师一般的口吻，事无巨细地描述包围网的规模以及建筑工势。在《高卢战记》或《内战记》中，每每看到这样的描述，我这没有理工背景的人，实在吃不消。有意思的是，耐着性子读下去，却发现这类文字有些同后文的战役相关，有些和战役无关但能唤起读者的思考。我个人就觉得罗马军团，尤其恺撒麾下的军团，真的称得上是具备日常生活智慧与技能的团体。

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是从罗马军的基地开始发源的，这一点从现今的城市名称的拉丁语发音便可知一二。即使科隆、维也纳这类大城市不在此列，中小型的城市的名字也大抵如此，当年许多罗马军团的士兵退役后，在作为退休金的土地上直接定居，他们便给这些地方取了名字。

经过在兵团的磨砺，他们学会观察地势，根据地势判断可以建成怎样的城镇以及如何做防护才是最为有利的。此外，他们学习建筑技术，更为有幸的是，他们在恺撒这样能规划出既实用又能有所创新的工程总司令麾下服役。他们中出现优秀的城市规划者、建筑师、技术工人等，当然都不会让人意外。

多年后，恺撒让退役的旧属以服役所属的军团为单位进行殖民。过硬的技术，共同体内部一流的指挥系统，使得新城市的建成得以进行。他们所建的城镇，在2000年后依然存在，或许要归功于他们在兵役中所学的工程学知识以及作战时的实地训练。在当地殖民的士兵娶当地女子为妻，在罗马时代非常常见，这也算“罗马化”的一部分吧。

阿莱夏包围圈的建设显示了恺撒工程学素养的一面，根据800年后在拿破仑三世主持的考古发掘中，印证了《高卢战记》中所述的包围网的建设，所言属实。

公元前52年的夏末秋初，如果不是成为了恺撒与高卢联合军决战之地，阿莱夏这个勃艮第的小城市，在历史上一定无人知晓。阿莱夏位于第戎与奥尔良的联结线上，处于靠近第戎的丘陵地带。这里的丘陵大概多为150米高，远处看去像波浪般起伏绵延。而阿莱夏被尊为圣地是有理由的。虽然它所在的山丘与其他山丘高度差不多，但阿莱夏却是孤立的，因为其前边有广阔的平原，能够极为清楚地看到四周的情况。

阿莱夏原本有城墙环绕，驻守那里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借鉴在格尔戈维的成功经验，除了临川断崖处，都围上了防护用的栅栏，他认定这是一场包围战。而打算拿自己做“饵”的恺撒，却深知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包围战。恺撒所建的包围网并非为韦桑热托里克斯和救援的高卢军准备的，他要将罗马军置于包围网内。

根据恺撒的意图，横跨河川，将阿莱夏高地四面围住的包围网，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内侧防卫网全长11罗马里（约合16.5公里）；外侧防卫网利用了可作为战略视点的周边高地的山脊线，长度为14罗马里（约合21公里）。

两侧为防壁的中间地带宽120米，罗马军就封闭在这条带状的地带。之所以要120米的宽幅，恺撒举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与配置的士兵相比，防护线较长，无法在防护线全线配置足够兵力。但搭盖足够的帐篷和让机动士兵能无阻碍地移动，这个宽度是必要的。第二，即使受阿莱夏方面的干扰，在120米箭的射程之外的士兵们，仍能安全地从事作业。这个120米的安全地带两侧所建设的封锁网，是依照以下顺序建造推进的：

一、在最外侧挖掘了宽6米的“U”形壕沟。通常罗马式的壕沟

为“V”形，将“V”形改为“U”形，是基于非倾斜的垂直角度，敌人在攀爬上较困难的考虑。

二、在防护网的最内侧，挖掘两条宽与深都为4.5米的平行壕沟，靠里的一条壕沟在所有的工程完毕后，用河水注满。

三、防壁的建设。在土垒上方加做防栅构成防壁。在3.6米高的防壁上，补造胸墙（这也为后来中世纪的城墙所沿用）。再者，土垒与防栅的接缝外侧部分，为了防止敌兵的攀爬，将木头的前端做成鹿角状，削尖埋在里边。在修筑好的防壁全线，建有视线极好的具有防备功能的监视塔。塔间距离平均为24米。

到此为止防卫设施已经相当可观，但恺撒仍在考虑强化防护。因为一部分士兵用在了调度建设工程的材料及军粮上，对付偶尔在工程当中发动攻击的阿莱夏高卢兵就只能用剩下的士兵了。恺撒把即使士兵数目少防守也是可能的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制定出了一系列强化措施。

四、他收集木桩或坚硬的粗枝，削尖前端，沿壕沟外侧，挖掘1.5米深的穴，把削尖的前端朝上埋好。为了不让这些尖桩轻易被拔走，他让士兵将木桩及粗枝相互连接后才掩埋，全线都被这种防护用的木桩包围，足足围了五列。如果敌人踏进防护圈，一定会被尖锐的木桩刺到。这种木桩被称为“墓碑”，对于敌军而言，这里确实是他们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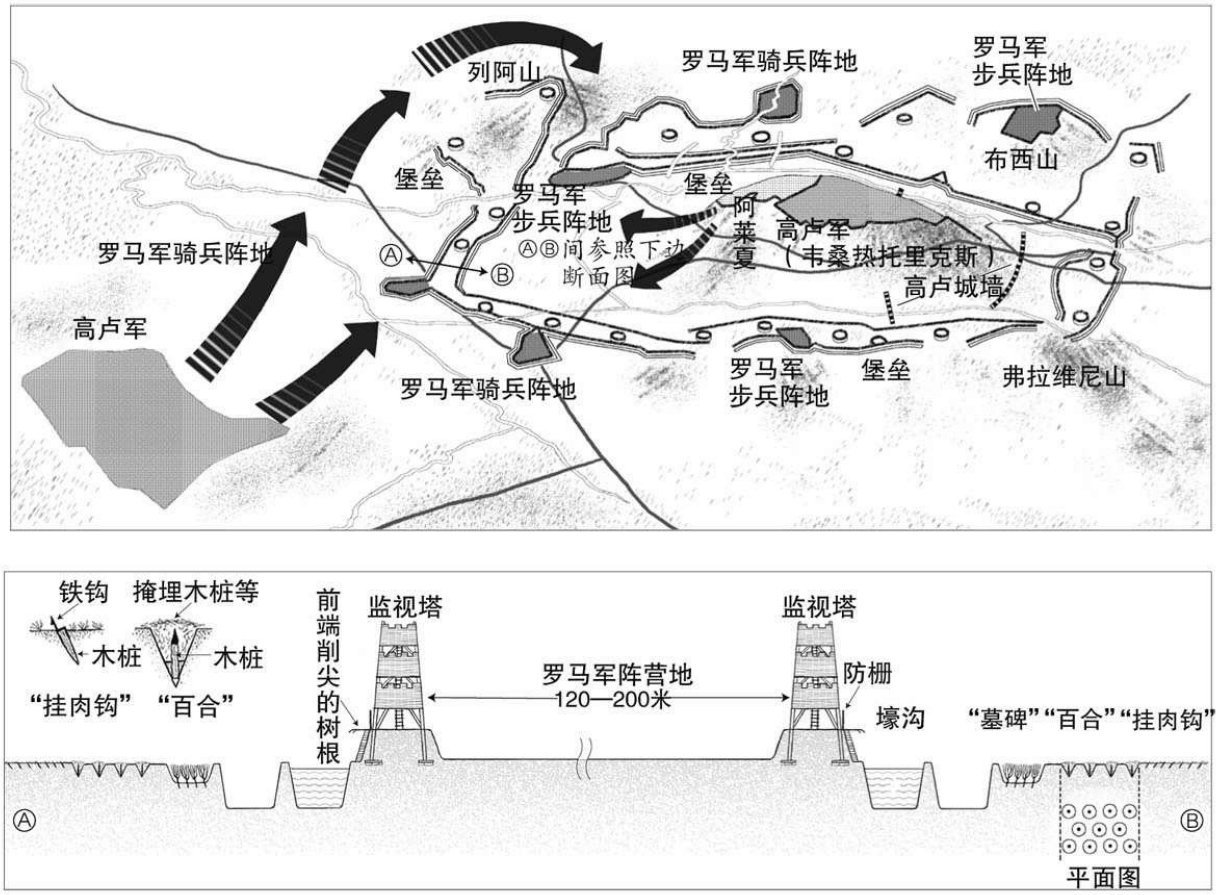
五、恺撒还命令在防护网的外围挖掘了许多深90厘米的洞穴，跟捕狼用的洞穴类似，越是靠近底部越狭窄。洞穴里同样埋有前端削尖烧硬的木桩，穴深三分之一处以土掩埋加固。这些陷阱式的洞穴上方以树枝或柴草掩盖。

洞穴的配置与骰子（罗马时代已存在了）五点的形状相同，各点的间隔为90厘米，八列“五点骰子”式样的洞穴散布于全线，士兵们因为形状相似，把这些洞穴称之为“百合”。

六、为了起到防护的效能，恺撒在防护网外侧又加了一层，埋有长30厘米、前端有铁钩的木桩，地面上满布铁钩。铁钩与卖肉用的挂钩类似，士兵将它们称为“挂肉钩”，这也是对铁钩挂上敌人的肉的期待。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马将士们，一边是时不时呵斥下属、自信满满地发布命令的大将，一边则是边给长官取绰号、边从事工程的士兵们。那年恺撒48岁，士兵们的年龄多是介于24岁至32岁之间。

与内侧相同的七层防卫工程，也以同样的顺序在外侧施行。（首先建设的宽6米的“U”形壕沟未在插图上显示，总共的防御设施有七层。——译者注）这个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包围网到完成为止，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些工程后才允许士兵休息的恺撒，预料一个月之内，战争胜负便知分晓。他命令全军贮备30天的食粮与马用饲料。他与士兵一样，等待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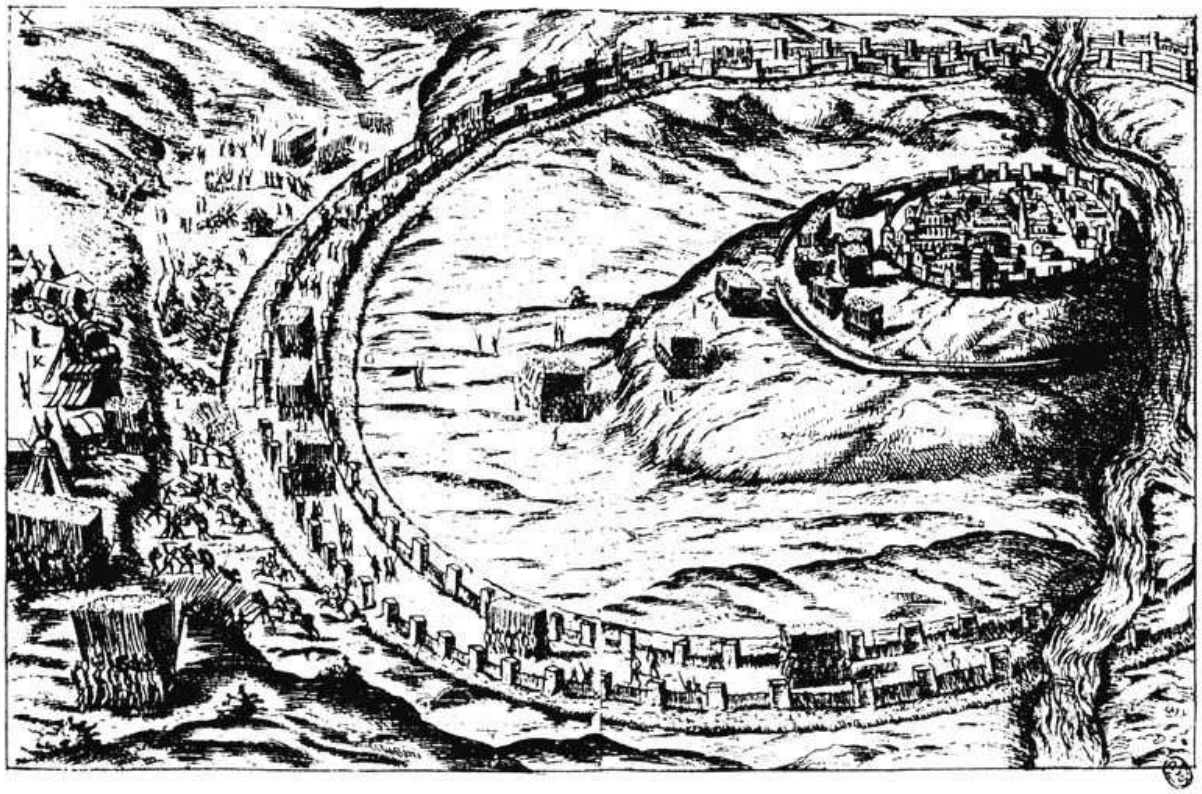
阿莱夏包围模式图（上）和罗马军阵地周边的断面图

在阿莱夏固守的士兵依照韦桑热托里克斯的配给制发放食粮，不久，粮仓开始见底。而恺撒的严密封锁，使他根本无法突出重围获得粮食。8万名士兵加上阿莱夏居民，一张张嘴都要吃饭，但是仍然不见援军的影子。在阿莱夏被围的韦桑热托里克斯，甚至无法派出侦察兵，他因而对外围的境况一无所知。援军是否已经完成组建，韦桑热托里克斯不得而知。此时再派骑兵求援，也是个轻率的决定。突破封锁网，搜集情报，并非简单的骑兵能够完成的。为防备被罗马人抓捕，骑兵必须分几批送出。韦桑热托里克斯在其他方面是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才能，但是他似乎从未考虑过这种情报来源被切断的情形。

实际上，对外部毫无所知的不安，与储养不断减少的危机，一天天

在城内蔓延。韦桑热托里克斯召集的作战会议中，出现了投降和冒死出击两种意见。经商议决定，必须忍耐至后援到达。但是食粮在不断减少，韦桑热托里克斯打算将阿莱夏的全部居民赶出城去。或许他指望被赶出去的这批超过1万人的男女，能够在成为罗马军的奴隶后，得到救命的粮食。但是同处决战时刻的恺撒，也并无余粮，他命令士兵断然拒绝阿莱夏居民的请求。被拒绝的居民只有渡河走入山野，当时为夏季，难民们或许还不至于穷途末路。

困在城里的韦桑热托里克斯，还不知道援军的组编正在进行。韦桑热托里克斯希望召集所有能投入战斗的高卢人。而根据各族长作出的判断，他的愿望并未能实现。要知道，兵力越多，军粮筹集也就越发不易。实际上，打算参加救援的部族总数接近50个，各部族所提供的兵力数为：步兵25万人，骑兵8000人。除了阿奎塔尼亚，几乎高卢全境都起来对抗恺撒。连高卢战役初年败给恺撒的赫尔维西亚人（瑞士人）也提供了8000人。另外，三年前第一次远征不列颠，深受恺撒信任并被派遣为外交使节，同时因此功无须负担提供罗马军军粮义务的寇米乌斯，这次也举起反旗。奥弗涅人指挥官的基本策略——鼓舞高卢人的民族意识，终于有效地得以实现。



由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家安德烈· 帕拉迪欧绘的《高卢战记》插图中的阿莱夏攻防战图

25万名步兵及8000名骑兵的指挥工作，交由4位司令官担任。提供最多兵力——3.5万人的埃杜伊人，派出毕利多马罗斯与耶波利杰尼库斯两位首领。同样提供3.5万人的奥弗涅人，派出韦桑热托里克斯的表兄弟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上阵，再加上寇米乌斯共4人。仅提供4000名士兵的小部族——阿托雷巴提人首领寇米乌斯，如何能成为4位司令官之一呢？一定是他熟知恺撒的缘故。在埃杜伊人之地集结的救援全军，在这4位将领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位于法国中部群山之间的阿莱夏出发。

公元前52年9月20日，因为用的是恺撒改制之前使用的历法，实际上还是夏季，高卢后援大军抵达了阿莱夏的前方。指挥官构筑阵地的高地与阿莱夏要塞同高，因此，困于阿莱夏的部队很快觉察到援军已经到来。韦桑热托里克斯与8万名被围之兵欣喜万分：一个多月坐困围城的

日子终要结束，很快就可以内、外夹击，发动总攻。

恺撒将以不足5万人的微薄兵力，与内外相加近34万人的敌军战斗。

我认为战斗如同管弦乐演奏会，成功与否有七分已在登上舞台前决定，而剩下三分，由登上舞台后的发挥决定。普通的指挥者，在登上舞台前如果没有十分把握便无法安心。战争跟音乐会类似，漫长的准备而结果将在数小时内决定。历时30多天精心准备的阿莱夏攻防战，胜负仅在三天的战斗中就决定了。

救援的高卢大军，将大本营置于离罗马军所设包围网不到1.5公里的高地上。在高地通往平原的山脊，配置了所有的步兵，辅以弓箭手的骑兵也全部被派到了平原。恺撒也同时派出了骑兵。为应付突发状况，恺撒的步兵早已配置在包围网的各处。于是恺撒与高卢的第一战就由骑兵开始。

在两军步兵的注视之下，骑兵之战由正午持续到日落时分。高卢骑兵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为维护自己荣誉而英勇善战。但无惧于敌众我寡的不利，恺撒的日耳曼骑兵也敢于拼杀。战斗在继续，高卢一方属于步兵的弓箭手遭围杀。失去防护的骑兵为保命，只好逃回自己的营地。而阿莱夏方面来势汹汹的步兵团，完全无法靠近恺撒的包围网，靠近者会被防壁上射出的箭射到。得知骑兵退却的消息后，他们也只得撤回阿莱夏。第一场交锋以罗马胜利而告终。

第二天，高卢人并未在白天发动攻击，他们制造梯子及抛钩等攻城器具的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工程完成的后半夜，他们从平原向罗马军的包围网发起攻击，他们大声呐喊，鼓舞自己的同时，也让困于阿莱夏的同胞们得知交战又已开始。韦桑热托里克斯也派遣步兵团越过城墙作战。但是恺撒并没有被这场夜半的突袭弄得惊慌失措。他的所有战士都在待命状态，坚守岗位。他们依靠早已配备好的投石器，将石、铅

球、木桩等向敌方掷去。

由于防壁外侧围了好几层障碍物，高卢军一直无法靠近，在无障碍的安全地带，他们也被对方多如降雨般的箭所阻碍。这是一场在黑暗中的战斗，罗马人无法确定敌人的状况，只有拼命苦战。恺撒写道：相对于可见的危险，不可见的威胁更扰乱人心。不过，在恺撒身边磨砺良久、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团长们，即使没有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也能自主地将兵力配置到急需支援的地方。即使是夜袭，30岁的马克·安东尼也都能将后备兵力准确无误地进行兵力配备。

高卢兵于内外都无法突破恺撒的防护网。黎明时分，战死者被留下，高卢士兵和负伤者一起回营。与罗马人的损失相比，高卢方面显得尤为惨重。韦桑热托里克斯同样不得不撤退。恺撒再度使内外同时攻击的高卢人无功而返。

位于外侧的高卢军已遭到两次失败，军队首脑召开作战会议寻找别的对策。他们发现看似天衣无缝的罗马包围网有一处并不完全，那就是位于流经阿莱夏北面的河流对岸，阿莱夏背后的一座山丘。因为如果连那里也构筑起包围网，战线未免太长，恺撒不得已在战略上不利的此山丘的山腰地带筑塞防守。高卢方面则针对恺撒这个防卫上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其唯一弱点。——译者注），决定展开第三次攻击。

恺撒也深知此地最难防守。因此，2个军团计1万人的兵力，也就是他五分之一的兵力，都配置在此地。敌方决定在此投注6万人的兵力。指挥官是韦桑热托里克斯的表兄弟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他决定同时在之前的战场——东、南部平原的地带，派遣剩余部队，全面发动攻击。阿莱夏也派遣了8万人展开攻势。高卢军期待第二天正午，三面对恺撒同时展开攻击。

贝尔卡西贝拉努斯带领6万人的精锐部队，在晚上9点，秘密出营。

为了不让罗马军察觉，从北方绕了一圈，到达预定地点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他要士兵们休息，等待正午的到来。

阿莱夏攻防战最大一次激战，正午时分在三个地方同时展开。

早已察觉异常的恺撒，登上了能同时将三方纳入视野的监视塔进行总指挥。和以往作战一样，恺撒穿着大红披风。这样虽有引起敌人注意的危险，但如此情况之下，能够让自己的士兵随时随地看到司令官至关重要。当恺撒披起那件大红披风，他的部下们就已经明白，决战就要开始了。

如果能将战场收入视野，也就能很快对战争状况了然于心。内外两侧的高卢部队，都指望能突破恺撒的包围网，罗马军却一步也不退让。胜败在于双方谁先达到目标。恺撒将机动部队一一部署至急需支援的地点。机动部队以大队为单位（一个大队500人以内）组成，由军团长克拉苏的将官们率领前往相应地点。

北面山丘的战斗最为激烈，交战之初就已知道。高卢军由丘陵高处攻下来，罗马军则在低处设防、构筑壕沟。6万人的高卢精锐部队一起将石头投至罗马兵躲藏的地方，再将盾牌连成龟甲队形进攻。此地的高卢6万名兵力并非一时全部投入，而是保持战斗力，不断重复发动波状进攻。军力不足1万人的罗马军，应付得非常吃力。士兵坚守阵地，防战到底，箭和矛几乎已经投尽。

恺撒在此最大的激战地点，派给副将拉比埃努斯6个大队，并严命拉比埃努斯严守，适当的时候可以让士兵们出塞、出堑壕反击。登高了解战况后的恺撒走下高塔，开始骑马四处激励拼死防守的士兵。最高司令官告诉大家，经年累月的战斗，今日就是最后的决战时刻。

由韦桑热托里克斯指挥的发自阿莱夏的攻击，也在当天达到极为猛烈的程度。捕狼式的陷阱已经布置停当，外侧高卢军的攻击也较上次更

为激烈。这次是在夏天太阳下的战斗。蜂拥而至的敌军突破了恺撒布下的好几层障碍网，有几处防栅被他们的掷钩拉倒。恺撒所想出来的这七层包围网，防卫的罗马兵数量有限，将士们可谓耐力惊人。恺撒逐一将援军送到苦战的地点。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数个大队、军团长奔驰援助，法比乌斯带数个大队前往支援地，恺撒自己也率领手下赶去支援。可派遣的军团长及大队用尽之后，临时部队也被派遣上阵，苦战中的罗马士兵也恢复了元气。在原本危险重重的地方，罗马军开始呈现反击的态势。

见此情境，恺撒作出决定，亲自前往拉比埃努斯驻守的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决定在这个地方重新投入全部战略力量的恺撒，命令驻守在附近的四个大队跟着自己。同时他也将骑兵一分为二，一半自己率领，迎向北方战线，另一半则出包围网外，从敌人的背后发动攻击。但就在朝北行进的途中，传来副将拉比埃努斯无法坚守已经命令士兵出包围网迎敌的消息。对拉比埃努斯的支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在看见那件大红披风的同时，6万名高卢兵和他们的指挥官贝尔卡西贝拉努斯立刻知晓了恺撒的到来。恺撒的到达使战争趋于激烈化。双方喊声震天，转过头反击的罗马士兵舍去长矛以剑近身相搏。追随恺撒而来的四个大队，也立刻投入战斗。肉搏正酣，恺撒派遣的由背后突击的罗马骑兵团，出现在了敌人背后的山丘上。

6万名高卢军都在一起往后看。而从那里，罗马骑兵团冲了过来。前后皆受敌的高卢6万人的大军威力顿失。副将阵亡，主将贝尔卡西贝拉努斯也在逃走的时候被生擒。6万名高卢军全部崩溃了，只有极少数的士兵能够逃回大本营。

阿莱夏的8万名士兵眼见同胞溃败，极度受挫，不等韦桑热托里克斯命令，便弃甲回城。正激战于南方平原、想突破罗马军包围网的高卢军主力，得知北方溃败的消息，很多人甚至忘记回营便四下逃散。一向书写冷静的恺撒笔下也难得出现以下激动的话语：

若非连日反复激战导致我方士兵疲惫不堪，我们或可将敌军完全消灭！

不过，夜半，恺撒还是派出骑兵团展开了追击。罗马骑兵追击败走的敌军，许多高卢士兵死了，有些成了俘虏。幸免于难的高卢士兵，各自逃向故国。

恺撒以不足5万人的兵力，击破内侧8万、外侧26万的敌人，仅数字而言，较亚历山大大帝之神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迎击内外两侧敌人而获胜，在战争史上实属首例。对这次战争最有体会的，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部队溃逃而自己勉强脱身的韦桑热托里克斯。战斗结束第二天，他召开作战会议。

席间，韦桑热托里克斯作了如此表述：劝诱全高卢与恺撒对决，并非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是为高卢人的自由而战。不过在无法对抗的命运面前，他愿意被处以死刑或交由恺撒处置，以此来换取同胞的性命。恺撒从使节那里知道了韦桑热托里克斯的意愿，他以交出武器及部族族长为条件，接受了投降。

身穿高卢最高武将服饰的韦桑热托里克斯驱马出现，与在包围网前帅将之椅上端坐的恺撒首度会面。在《高卢战记》中极度认可这位年轻将领才能的恺撒，仅以以下一行文字记述这个场面：

“是韦桑热托里克斯自己送上门来的。”

傲慢的高卢人舍弃武器，臣服在了罗马的胜利者面前。

据西塞罗所言，恺撒爱护与自己年轻时性格相似的年轻人。奥弗涅人的这位年轻人，恐怕是恺撒想揽为军团长的人才吧。但是，历史上那样的人才，往往都只在敌方阵营中出现。

参加阿莱夏攻防战的高卢有权势人士中，沦为阶下囚的只有韦桑热托里克斯一人。恺撒尊重这位牺牲自己来解救同胞的年轻人的决定。

被护送至首都罗马的韦桑热托里克斯，被关入了罗马广场的牢里。他在参加因内乱而不得不延期至公元前46年的恺撒凯旋仪式后被杀。他能力超群，让他活着过于危险。关于他的肖像，残存在一枚货币的浮雕上。这是纪念恺撒凯旋仪式所发行的银币，雕有一个高卢男子的侧脸。这张面容，因6年的牢笼生活而憔悴不堪，或许这正是被恺撒认为是高卢唯一的人才——奥弗涅人的年轻领导者6年后的样子吧。

《高卢战记》刊行

阿莱夏之战大胜后，恺撒却异常平静。他将俘虏分给士兵们当战利品，高卢最大的两个部族埃杜伊人与奥弗涅人，基于政治的考虑，被另行处理。战利品的分配是：士兵每人分配俘虏一人，因此近半数的俘虏被释放，这也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离开阿莱夏的恺撒军，首先前往埃杜伊人之地。埃杜伊人闻讯投降。被俘虏的埃杜伊人有势力者及士兵，因为埃杜伊人的投降而被遣返。奥弗涅人也派遣使节前来求降，恺撒同样接受投降，遣返俘虏。以俘虏身份获释之人，光这两个部族就达2万人。

尚处秋季，但恺撒已经有所考虑，早早就决定了各军团的冬营地。

副将拉比埃努斯带着两个军团和骑兵，至高卢东部的塞卡尼人之地扎营。军团长法比乌斯与巴基尔斯两人率两个军团，进驻高卢东北部的雷米人之地。雷米人的忠诚于阿莱夏之战已经印证，但是附近仍然有不断反罗马的贝洛巴契人。

军团长安提乌斯，带着一个军团前往高卢的比都里吉人之地。

军团长寇米乌斯，也带领一个军团至南部高卢的托洛尼人之地。

军团长西塞罗之弟苏尔皮修斯，担任在埃杜伊人的军粮调度任务。

恺撒自己则带领剩下的士兵，在埃杜伊人的首都设置冬营。既未回北意大利也不回南法行省，这是为了彻底巩固阿莱夏之战的战果。

恺撒自己所写的《高卢战记》，在记录完公元前52年事件后的第七卷戛然而止。《高卢战记》以如下一句话作为终结：

> 得知此年的战果，首都罗马决定举行20天的谢神祭。

生于后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恺撒式的淡淡结尾。但是，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再没有比公元前52年结束的波澜壮阔的高卢战役更重要的事情了。“三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4万名罗马军，在帕提亚大败，不过是一年前的事情。想到被杀害的2万名同胞，以及在边境受终身兵役之苦的1万名同胞的命运，罗马人便意志消沉。许多元老院议员早已明确地表示反恺撒，但因为高卢战役的胜利，元老院也作出决议，举行20天的谢神祭。因此恺撒在《高卢战记》结尾的那句话，有着隐隐的讽刺。

据研究者所言，恺撒在这一年结束时，刊行了《高卢战记》全七卷。但这又是件忤逆元老院的事。

向元老院报告任期中的诸多战役及事务是行省总督的义务，恺撒每年向元老院呈送一份报告。庞培从一扫海盗到称霸远东的这五年，每年年终也一定将报告书呈给元老院，但是庞培并未以报告为题材成书，而恺撒却这么做了。恺撒与庞培等同时代人不同，因为比起元老院，他较重视公民的支持。

公元前59年，恺撒最初就任执政官的那年，就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施政内容。名叫“阿库塔·迪乌鲁那”——也就是元老院的审议内容的每日记事，每日都张贴于罗马广场的大墙上。我曾写道，这就好比将以往于

密室内，由元老院参与的议题，作了CNN式的报道。恺撒认为只给元老院报告书的做法并不充分，才有了将作品独立呈世的想法。恺撒善用“媒体”。这个“媒体”可与利用罗马广场的讲坛的反恺撒派西塞罗及小加图相对抗。身处高卢战役中的他，无法利用讲坛，于是便以反恺撒派人士也不得不叹服的精彩文字进行对抗。

《高卢战记》虽已出版，但在当时只是手抄本，部数有限。但要知道能前往罗马广场听演说的人，在当时的罗马，也是少数。恺撒的手抄本，读过的人口耳相传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但是恺撒并非以取悦大众为前提而着手写作《高卢战记》的。

第一，他期望能客观记录。直接明白地记下自己犯下的错误，也公正地记述对方的作为。恺撒认为客观记述才是让别人充分理解自己思想的最佳手段。任何有意识的虚构，会让读者丧失对作品所有内容的信任。因而，不用第一人称换用第三人称写法，也是恺撒想让读者感受到叙述客观性的考虑。

第二，即使他为了寻求一般公民的支持，也不改自己的文风。如果以大众为对象，哗众取宠的、夸张的、有笑有泪的西塞罗式论法应该更受欢迎。2000多年后的今天，在陪审员制度的法庭上，还是有许多律师的辩论方式是西塞罗式的，这就是西塞罗式语言方式受欢迎的最好证明。

但是恺撒的记录，并没有哗众取宠。恺撒始终是恺撒，依照自己的性格行事往往是最好的。

《高卢战记》常因记录客观被人提起，但恺撒如此，绝非因为“保持客观叙述”这个新闻从业者的座右铭，而是自尊使然。不是职业道德，而是当事者的气概所致。恺撒有争取支持者的诉求，但是他拒绝自甘堕落的举动。

出于恺撒之笔的《高卢战记》，在战争第七年的叙述中结束。但是战争进行了八年，第八年的战争是由恺撒的秘书官希尔提乌斯执笔。每年一卷的《高卢战记》全八卷最终得以完成。希尔提乌斯不得不写的原因是恺撒没有时间写。从罗马内乱开始到完全终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恺撒就被暗杀了。但恺撒还是让缺了最后一年的七卷本《高卢战记》刊行，这是他认为有必要与反对自己的势力对抗。阅读此书时，我并不觉得七卷本是未完成版本，也许恺撒自己也没这么想过吧。一切都在阿莱夏攻防战中决定，第八年只是战后处理。当然，在行军中只要有闲暇，恺撒就会将时间花在写作上。也许在他结束一切必须处理的事情后，会再度执笔，记录高卢战役第八年。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高卢战役第八年（前51年，恺撒49岁）

《高卢战记》最后一卷的写作素材，是从恺撒身边的亲信巴尔布斯处得来的。希尔提乌斯的序文是这一卷的开始，现在将这部分的全文译出：

> 巴尔布斯，我真被您的热心劝告说服。我的每次拒绝，都会被认为是畏惧困难或懒惰。但我终于还是决定接受这项极为困难的任务。我需要书写的，一是补充恺撒的《高卢战记》进入《内战记》叙述中的欠缺部分，二是补充《内战记》中未写到的阿莱夏战役后至今尚存的内乱，以及内乱中恺撒的死。也许只有少数人会读这些内容，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了解，接受这项任务的我并不舒坦。如果能理解我的心情，您就不会认为我愚蠢，也会以宽容之心看待我在恺撒之后狗尾续貂。
>
> 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的洗练程度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与之比肩。它们为书写伟业的史家提供了史料，仿佛它们正是为此而存在。各领域超越国籍的人的赞誉，使后来的历史家们失去了提笔的勇气。

我们这些在恺撒身边的人，感慨要比其他人更为深刻。旁人仅是读过文字，就禁不住对恺撒那洗练的文字赞不绝口。而我们，更是知道，如此精妙的文字是如何轻易又迅速地被恺撒口述。

恺撒不只有他人罕有的写作才华，还有将自己的意图明确传达给他人的能力。我自己并未参加阿莱夏战役或非洲战役，战役都由恺撒口述而为我所知。尽管如此，抱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享受和恺撒的对谈，和一边听一边想着记录的心情是不同的。尽管我一再声明：别拿我和恺撒比较，但或许还是会有人这样做。既然这是件令人骄傲的事，那么我就尝试着去做一下吧。

战后处理的第一阶段

希尔提乌斯所执笔的《高卢战记》第八卷，由叙述阿莱夏攻防战后恺撒所作的战后处理开始。但是，高卢境内数以百计的部族林立，与大流士缔造的波斯帝国不同。高卢没有专门的指挥系统，因此无法采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后的处理方式。高卢的四大部族——埃杜伊人、奥弗涅人、林贡斯人、塞卡尼人，在阿莱夏攻防战败北后，很快就派遣使者至恺撒处。恺撒也很能体恤各部族的求稳的心态，于是再度缔结盟约。但高卢中等部族，原本对大部族存有敌意，再加上参与阿莱夏攻防战投入不多，此战对他们没有太大伤害。更何况，他们也知道恺撒的任期就要结束。解决这些部族的问题，便成了战后第一阶段需要处理的工作。

给了疲于阿莱夏攻防战的士兵必要的两个月休息后，恺撒开始战后第一阶段的处理。公元前52年的12月，压制行动开始。10个军团并未全部行动，3个军团投入此事。阿莱夏激战后，士兵进行了充分休息，养精蓄锐，但是恺撒自己并没休息。

压制行动以奥尔良为中心，向高卢各地呈放射状展开。这次武力镇压的对象，是参加阿莱夏之战、违背以前与恺撒所订誓约、反抗一直不断的部族。恺撒急切希望能在任期结束前，完全解决高卢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压制行动，格外残酷。他们烧杀掳掠甚至连路边迷失的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对于继续集结反抗的部族处置则更为严酷，投降士兵的手腕都被砍断。恺撒要让人们铭记，反抗恺撒者的结局。

阿莱夏战后处理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51年夏天完成。而恺撒就在视察从未去过的阿奎塔尼亚度过夏末。加龙河与比利牛斯山脉间广大的阿奎塔尼亚地带，自从5年前归顺恺撒，从未举过反旗。巡视此地后，恺撒前往纳博讷，南法行省也是他的任地之一。行省总督公开向南法行省民众表示感谢。持久的高卢之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很重要的原因是南法人对罗马不变的忠诚。随后，恺撒即刻返回北高卢，进行第二阶段战后处理，为此他牺牲了返回北意过冬的机会。

战后处理的第二阶段

罗马所谓的“前执政官”，是指在罗马指挥两个军团以上的兵力，负责行省防卫，因此又是行省总督乃至最高司令官的别名。前执政官有采取军事行动称霸地方，并有在罗马霸权下提出再编组案的义务。这项再编组案，须经由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承认便成为国家政策。在以后的罗马内乱中，恺撒所提出来的高卢再编组案，无法获得元老院的承认与公民大会的议决。但是，当他成为内乱的胜利者时，将这项再编组案立法化，到了帝政时代仍在延续。

以下仅记述这项再编组的要点：

一、除了南法外，高卢全域的边界为：西南为比利牛斯山脉，西为大西洋，北为多佛尔海峡，东为莱茵河。

二、埃杜伊、奥弗涅、赛克亚尼、林贡斯这四大部族为罗马的同盟者，缔结盟约。高卢以这四大部族为中心进行整合。

三、包括中小部族在内的高卢全部族的内政自治皆受承认。

四、保留高卢的社会制度，分为祭司阶级、骑士阶级、平民、奴隶四个等级。

与采取以都市为中心向周围扩张的希腊、罗马不同，高卢的差异之处主要在于社会制度。即使保存高卢原来的制度，与日耳曼相比，高卢罗马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原因有三：

一、高卢人有尊重私有财产的传统。

二、高卢的神与希腊、罗马类似，神人格化，容易和罗马诸神融合。

三、高卢人有追求舒适生活的天性。

相反，日耳曼人不认可土地私有化；崇拜太阳、月亮、火；对舒适的生活没有太多追求；明确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不喜欢两者融合。

如此一来，高卢各部族在保有主体性之余，又受罗马的编组支配。除了几处特例外，罗马在高卢内几乎未重设任何罗马式都市。各部族的首都和根据地，在罗马霸权之下保留原貌。作为罗马征服象征的罗马式街道，也与这些城镇联结交织，铺成网状。

我在叙述高卢战役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城镇名用现代法语标记了出来，因为这些城镇现在仍然存在。城镇存续，部族的固有文化也就能存续下去。高卢人依希腊式的称法为凯尔特人，在现在的法国和比利时仍然留存。并非只有逃至现在爱尔兰的高卢人才得以存活下去。一边享受罗马文明，同时保有自己特质的高卢人，缔造了后来的法国文明。

恺撒实行的高卢罗马化，具体来说有下列几点：

一、部族领导者的子弟作为人质，被送往罗马或南法行省接受学习。恺撒在成为独裁官之后，甚至还给予高卢部族有权势者元老院的议席。甚至有人以尤里乌斯的名头，在外招摇。结果，高卢有权势的家庭，多以尤里乌斯为第二个名字。

二、以往的高卢战役中，尽管祭司（杜鲁伊得斯）常是反抗罗马的导火索，罗马也并无这种专门祭司阶级存在，但是恺撒对高卢的祭司并不管束。维持祭司阶级的原因，是恺撒希望高卢人负起宗教教育与一般教育的责任。

三、奖励通商，促进矿山的开发，振兴经济。恺撒将国内5%的流通税和物品税，也就是物品流通所缴纳的间接税，在高卢降到2.5%。

四、最后是影响人们对统治者评价的直接税改革。

罗马人的直接税是为了安全保障所缴的费用。帝政时代的塞内加说道："没有尽力的防卫保障不了安全，而防卫要花金钱，因此税是必要的。"

拥有罗马公民权者可以以服兵役替代直接税，但是有服兵役资格的是罗马公民。因此，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要免除兵役，就有缴纳直接税——行省税的义务。而行省税的征收方法，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长年以来包给称为"包税人"（Publicanus）的私营征税人。由于直接税占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也叫"什一税"，是以该年的收益为基准所作的计算。这个税制看似非常合理，能够考虑缴税者遇干旱积雨作物歉收的状况。收成减少，税金也会有所减少。但是，此税制仍有问题，就是往往易为"包税人"的"处理分寸"所左右。这些征税人有权决定税额，"包税人"的手续费占税额的一成，因此税额高低决定征税人的利益。

早在10年前担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时，恺撒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税制公开、透明，排除"包税人"的干预，才可能公平征税。他决定在高卢，不以收益量化什一税，而以4000万塞斯特斯总额作为高卢需缴税款。因此，"包税人"的工作，只是征收这个已经决定了的税金。如果"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还活着，这个制度不会那么容易实现。克拉苏在罗马是"骑士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形成罗马"经济界"的基石正是"包税人"。不过克拉苏因帕提亚之战而死。

但是，诚实纳税之人，一定会有如下的疑问：不依照收入的多寡缴纳税款，这不是无视收入变动的恶性税收吗？不能征收手续费后的"包税人"，工作热情消失，不是会大大降低征税效率吗？

恺撒似乎也有此疑虑。他采取压低税额的做法将这两个问题一并解决。与其征收重税、在税务上日趋增加人手与费用，不如拟定适当的税额。他给出了纳税者在缴税时，丝毫不感到是负担的税额。一年4000万塞斯特斯是恺撒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的。

那么，4000万塞斯特斯是多大一笔金额呢？要将历史上的货币换算为现代币值，不可能精准。因此，我以罗马的流通货币塞斯特斯为单位，给大家作如下说明：

一、据学者估算，公元前67年，罗马的国家预算总额为2亿塞斯特斯。

二、同年，庞培为最高司令官主持的扫荡海贼作战中，支出货币总额1.44亿塞斯特斯。

三、公元前63年，庞培称霸远东，进入罗马国库的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行省间接税，总计约2亿塞斯特斯。

四、公元前61年，举行凯旋仪式的庞培，赠与士兵的奖金总额为2900万塞斯特斯。

五、罗马首富克拉苏的资产总额为1.004亿塞斯特斯。

六、就任财务检察官那年，恺撒政治生涯开始时，32岁的他所有的借款总额为3120万塞斯特斯。

七、因律师身份名声大噪的西塞罗，购买位于罗马最高级住宅区——帕拉蒂尼山上的克拉苏豪宅时，即使是朋友的价格，金额为350万塞斯特斯。

八、公元前58年的驱逐流放中，被克劳狄乌斯弄得倾家荡产的西塞罗，第二年解除驱逐令返回首都，从国家得到的赔偿金额是200万塞斯特斯。西塞罗感叹比购入费低，遭破坏的两个地方的别墅的赔偿金分别为50万塞斯特斯与250万塞斯特斯，这让西塞罗感叹国家的吝啬。

九、公元前54年，扩建罗马广场的恺撒，光是收购民众的工程用地，就花了6000万塞斯特斯。

十、同时期，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修补120年前祖先所建的埃米利亚会堂时，恺撒以2.5%（通常为6%到12%）的年利，融到的资金为3600万塞斯特斯。

根据研究者的估算，高卢战役时，高卢全境人口为1200万人左右。高卢的气候、地质适宜发展农业，也因为土地肥美，日耳曼人才屡次尝试入侵。如果相信普鲁塔克的记述，恺撒指挥的8年的高卢战役中，有100万人被杀、100万人成为奴隶。对高卢课以4000万塞斯特斯的直接税，税收是轻是重，大家就自己判断吧。总而言之，高卢在被恺撒征服以后，完全面貌一新。

高卢虽然有军团驻守，却没有军事压制。恺撒军团在内乱频发的公元前49年后，也就是恺撒离开高卢后约一年的时间，离开了高卢。高卢境内完全没有了罗马部队。恺撒忙于与庞培内战，正是推翻罗马的最佳时机。况且，诸部族的实力派，除两三位过世外，其他的都活着。以往扮演煽风点火角色的祭司阶级仍然存在，高卢也不缺乏再度燃起民族独立之火、率兵造反的领导者。令人称奇的是，高卢人并无反意。恺撒攻击马赛时，他们甚至答应恺撒的要求，提供攻城必需的军粮。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军对阵，运送军粮的也是高卢人。

为什么罗马在高卢唱空城计时，并且与庞培的暗中期待相反，高卢人始终愿意继续留在恺撒名下？只有唯一的一次例外，那就是最有战斗力的贝洛巴契人在公元前46年发动叛乱，不过罗马没有出兵，周边部族自行解决了。从此以后，高卢人再没有举过反旗。在罗马帝政时代，高卢一直是接受“罗马化”的优等生。

一本比利时人所著、在法国出版的名为《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的漫画，其成功之处在于对作为罗马化优等生的祖先，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这本书称恺撒称霸高卢的说法实际上是个谎言，还有一个小村落并未臣服于恺撒。这是“阿斯泰利克斯丛书”的基本故事线索。这个小村庄为什么没有臣服呢？因为该村的祭司用药草调成了“力久酒”，只要喝下

去，就会像吃了菠菜的波比一样充满力气，罗马军团被击得溃不成军。也由于这个缘故，给恺撒的高卢称霸留下了小小的遗憾。

这本漫画深受成年人的喜欢，它在细节处描摹得极为细致。一是若是早调制出这种神奇有效的“力久酒”，可以让高卢全族饮用，高卢可能就推翻了罗马的统治。可惜喝“力久酒”的只有一个部族。二是漫画中变成像波比般的高卢人，屡屡挫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团。然而书中所写的罗马军团指挥官并非是恺撒，如果在这方面也没有忠于史实，这本漫画就更具备讽刺效果了。

尽管有爱国思想的流露，法国人也是理性的民族，法国人喜爱的《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全然不见被支配民族的愤懑，也毫无被害者意识带来的阴沉面。漫画中对恺撒形象的刻画，也是在熟读《高卢战记》、充分了解历史之后。恺撒是漫画者嘲讽的对象，却也是他们尊崇的角色。恺撒被描绘成令人无法感到憎恶的征服者。正是因为恺撒，法国人才免于被他们憎恶的日耳曼人同化。

那么，高卢战役后的高卢人，又是如何看待“罗马化”的呢？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高卢特质？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看点。阿斯泰利克斯率领喝下祭司特制的“力久酒”的高卢人，击溃了无敌的恺撒军团，从来不曾屈服于罗马的武力之下，也不曾臣服于罗马文明。他们拒绝跟罗马相关的一切，继续保持高卢人特有的习性。

在书中，不同于短发、剃须的罗马人，如同罗马人所称呼的“长发高卢”，他们的发长几可编成小辫，胡须也不剃。此外，不同于短衣加披风的罗马式装扮，继续穿着长裤，被罗马称为“长裤高卢”。此外，罗马人的主食——以小麦粉为主熬制的浓汤，在高卢人看来难以下咽，他们依旧大口吃自己热衷的烤野全猪。尽管森林被砍伐、沼泽被填埋，高卢开始了都市计划，这些不曾屈服的高卢人依然像从前一样，住在木材和泥土建造的房子中，走在不曾铺设路面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他们对享

受水利工程的便利、水源直达广场和家庭的高卢人嗤之以鼻，与往常一样只用河川之水。在他们看来排水工程对比邻森林的村落而言并非必需。

摘自《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歌西尼作（A. 乌德佐绘）

如果有读者认为，快乐的阿斯泰利克斯与伙伴的对谈，表现出被支配的高卢人对支配者罗马的反抗，作者首先会反对吧。喜爱这一系列漫画的法国人大概也会大笑不止。一个自认为卑屈压抑的民族，产生不了《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这类作品。日本虽然引入了此套漫画作品，但发行并不成功。罗马史的知识在日本并未普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恺撒“介绍”给大家的大国就是今天的英法两国。法国在2000年后产生了此类讽刺作品，为何在英国却没有出现呢？我认为，最先将英国介绍给文明世界的虽然是恺撒，但促使不列颠正式罗马化是在帝政时代以后。这一时期应该没有足以和写出《高卢战记》的恺撒相媲美的人物吧。相反，法国则将自己的“罗马化”写成易懂且巧妙的文学作品遗留给后世。而结果创造了不是对征服者恺撒的抵抗式文学，而是成了讽刺象征的文学。丘吉尔所说“大英帝国的历史，开始于恺撒渡多佛尔海峡”时如此地坦然。而高卢也就是法国无法对这段历史毫不在乎。恺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与对高卢的战后处理，就高卢人来说是“犯罪”之举。

恺撒在公元前58年就任行省总督之后，拒绝赫尔维西亚人通行时，是不是就没有想到过这势必无法平稳收场呢。我想不是这样的，也许在罗马皆知赫尔维西亚人准备移动的公元前59年，恺撒已经预测到这个部族的迁移将在高卢全域卷起风波了吧。正因如此，他才期望到此风波必至之地就任，而且一开始就期望有五年的任期。一向只阅读《高卢战记》的小林秀雄对此曾尖锐地指出，野心家恺撒所等待的，想必是创作高卢战役的机会吧。但这是个给予罗马国未来指针的“创作”，也许这正是《高卢战记》无法书写前言的理由。如果写了的话，恺撒的野心会被众人一览无余，也一定会受到元老院派的猛烈攻击。其实最重要的是，恺撒的前瞻性是无法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当然也有研究者是了解恺撒的，现在英国的一位研究者写道：

阿莱夏攻防战，决定了不列颠、由比利牛斯山脉至莱茵河之地以后的历史。

历经8年的高卢战争，战后处理告终后，恺撒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意行省进发。时间已经进入公元前50年的夏天。这是适宜战斗的季节，恺撒的离开，标志了高卢事宜基本上处理完毕。法比乌斯率4个军团在高卢中部驻守，特雷波尼乌斯率领4个军团前往高卢东北部。公元前52年至前51年的冬天、公元前51年至前50年的冬天，在非战季节两度于高卢过冬，以彻底解决高卢问题为考量的恺撒，对于首都的反恺撒行动也不会草率放过。北意行省总督的大本营在拉文纳，恺撒终于返回拉文纳，致力于解决因高卢问题而搁置的首都罗马的对策，对付元老院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朝北意行省前进途中，恺撒收到的情报之一是元老院派企图拉拢拉比埃努斯。而恺撒毫不犹豫地将屯驻北意行省军团的指挥权，托付给

了这位在8年的高卢战役中与自己同心协力走过来的副将。

理由之一是这样做纯粹出于对拉比埃努斯的慰劳。恺撒在北意过冬的那年，而拉比埃努斯一直留在高卢。恺撒的考虑是想让他待在被称为“罗马化的高卢”，也就是最罗马化的已无敌意的北意行省好好休养。第二个理由主要是意在参选第二次执政官的恺撒基于选举的考虑。北意行省说来算是他的选举地盘，因为在此地编组而成、且在恺撒指挥下战斗的军团兵都是拥有投票权者。对恺撒而言，将拉比埃努斯送往北意行省，正是送最信任的人统治选区的做法。

据说庞培曾多次派人与拉比埃努斯接触。恺撒身边的希尔提乌斯在《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中记录了得此消息后恺撒的反应：

“对这件事，恺撒置若罔闻。”

高卢战役结束后，没有片刻喘息的恺撒开始了下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与高卢战争不同，它以法律与言论为武器。

渡过卢比孔河之前

两年前，即公元前52年，元老院派的米罗与平民派的克劳狄乌斯两派武力冲突不断，并且在米罗杀害克劳狄乌斯时达到了最高潮。随着“一人执政官”庞培的就任，他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他过去的声望，以及那些他曾经的部下在领取土地之后对平民形成的无言的压力，对平息由平民代言人克劳狄乌斯的被杀所引起的民众狂怒，是有相当助益的。恺撒也同意这是解决现状的良方，由于高卢的韦桑热托里克斯集结诸部族对抗罗马军，恺撒就安心地离开了北意行省前去高卢。但是，当恺撒展开与对手韦桑热托里克斯在高卢的战役时，在首都罗马，元老院派和庞培也开始越走越近了。

首先是将特例的“一人执政官”的现状，提早改回常设的两人执政官

制度。深信只有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型寡头政治才能守护罗马政体的元老院派，认为只有一人的执政官，有导致独裁的危险。苏拉所实行的强力独裁政权，虽然强化了元老院政体，但是他成为最高权力者这件事，就足以使元老院派深感是做了场噩梦。西塞罗、小加图、马尔凯鲁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等元老院派，都对“一人执政官”心有余悸。无政治野心的庞培也明白元老院派的心思，同意再选任另一位执政官。第二位执政官由庞培再婚妻子的父亲——梅特鲁斯·西庇阿就任。梅特鲁斯·西庇阿本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元老院议员，因此对元老院派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但是，这件事对“恺撒派”而言，反映出“三头政治”中的盟友庞培，开始转向元老院派了。

以打倒“三头联盟”为目标的元老院派，现在图谋离间恺撒与庞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策略。而他们想争取的，不是恺撒而是庞培，这也是相当明智的选择。因为实现“三头联盟”想法的恺撒，想改革由元老院所主导的寡头政体的意图甚为明确。

但是，庞培也曾不止一次地赞同“三头联盟”。只不过在庞培光辉战绩的背后，他同时也被誉为罗马最骁勇的武士，因而早在他年轻时，他的虚荣心就已习惯于被拥戴为“第一人”了。如果能延揽这样的庞培进来，对崇尚共和主义的元老院派而言，是不用担心他会变成独裁者的。

元老院派之所以执著于拉拢庞培，原因之一是希望能够孤立恺撒，原因之二为利用庞培的声望，在元老院派中，缺少令一般市民热衷的魅力型领导者。西塞罗虽然是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但是他评论家式的言行并未得到平民的认同，以至于他在公元前63年没能当选为执政官。而小加图清廉的生活起居众所周知，但是他那悲观式的辩论令民众非常反感，在两名执政官选举中，他落选了。其他的人也是即使当选了执政官，成为政治家、武将，也无法成为使民众欢呼拥戴的魅力型领导者。因此，对元老院派而言，借助庞培来得到市民的支持是必要的，而且，不具政治野心的庞培，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

诚如我在之前所述的，虚荣心是一种希望得到别人赞赏的心态，而野心却是实现某个目标的意志。希望别人称赞自己并非绝对需要权力，而想要达成某事的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权力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即使有虚荣心但无野心的人，人们也会视他为无欲之人，因而元老院派不认为庞培是个危险人物，所以受重用的往往是庞培这种“不危险的人”。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并且也并不想在国家社会中达成某事，这种人实质上是过着隐居、不危害人类社会的人生而已。古代称此生活方式为“伊壁鸠鲁派”。而相反的，选择积极与人类社会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则称为“斯多葛派”。庞培的不幸，在于当他称霸东方归国后，44岁的他由积极的斯多葛派变为不彻底的斯多葛派。他如果能像前辈卢库鲁斯、西塞罗的亲友阿提库斯那般处事，他也许就能彻底地以伊壁鸠鲁派的生活方式，平稳、优雅地度过他的后半生吧。但希望成为国家秩序守护者的虚荣心，使得年届50岁的庞培，成了元老院派拉拢的对象。

西塞罗是元老院派中试图拉拢庞培的一个代表，他在此时期开始执笔《论国家》。第二年，《论国家》立刻被刊行，这部著作提倡理想的国家，应是由超越党派、忠于国法、超然其上的客观调停者来治理。这明显是在暗指庞培，这是在替庞培以及推荐他的元老院派提供理论上的根据。

得到庞培为助力的元老院派，先是策划在公元前51年的两位执政官选举，希望皆为己方所独占。但是此事只成功了一半。马尔凯鲁斯当选了，但小加图落选了。而恺撒派则无一人当选，次于马尔凯鲁斯当选的是中间派的法学家鲁弗斯。因此，元老院派的反恺撒攻势明显增强了。

我想在此先对元老院派和恺撒两者的真正目的作一下梳理，这对理清往后法律抗争的复杂性相当有效。因为无论怎么说被称为“法的子民”的罗马人，即使是在政治抗争中，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一只手拿着《六法全书》在斗争一样。

首先简明扼要叙述如下：

元老院派——坚持由元老院主导少数领导的罗马共和政体。因此对于决意想打倒现行体制、树立新秩序的恺撒，无论用何种手段也要将他赶走，而目前所面临的任务正是阻止恺撒再任执政官。他们只要想起公元前59年当时执政官恺撒的统治方法，就认为恺撒哪怕是身为二人执政官其中之一也是相当危险的。

恺撒——深感公元前6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着的罗马型寡头共和政体，并不适合公元前1世纪中已成为超级大国的罗马现状，必须确立取而代之的秩序。所以，他以在高卢战役中所获得的声望为依托，在执政官这个现行体制内寻求改革之道。而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代替恺撒叙述高卢战役最后一年的希尔提乌斯也记述如下："尽管以依法的妥当方法进行改革的希望很渺茫，恺撒还是在可牺牲的范围内牺牲，希望能依法进行。"

恺撒首度就任执政官是在公元前59年。如果是在公元前48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也就是相隔10年再当选执政官，也还未违反在当时依然有效的"苏拉法"。公元前55年担任过执政官的庞培，在公元前52年又当上了执政官，当时的一人就任，是以平息事态为目的的特例处置的。恺撒依照常例，期望参选合法期间内所设置的执政官选举。公元前49年的那场选举他也很有希望当选，但是那需要在公元前50年的夏季选举中集中火力出击，如此一来，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处理战后事宜了。

但是，即使是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也是在前一年的夏天举行，况且依照惯例，候选登记必须由候选人本人到罗马市内卡匹托尔山上的国家公文书馆提交候选登记书。如果想遵守这个规定，恺撒就需要在公元前49年的夏季以前，就要为高卢战绩举行一场凯旋仪式，因为凯旋仪式是为拥有军团最高指挥权的前执政官举行的，在身为前执政官、行省总督时，如果没有举行凯旋仪式，就无法进入首都城内，这是罗马的法规。如果他在凯旋仪式结束后，自己一人返回罗马城内提交候选人登记

书，就不会违反罗马法规与惯例。

如此一来，恺撒就百分之百地中了元老院派所设下的圈套了。因为恺撒的行省总督任期，照例是在公元前50年底结束。因为照例所计算的实际任期是在后继者到达接任时才结束。军务上的任期更是经常会有所延长，而依此习惯，任期的结束通常是在下一年的初春。

但是，决定后继者人选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又唯元老院派马首是瞻。这样的话，提早决定后继者的可能性颇高。恺撒的任期较可能在公元前50年底结束。但是在那样的情况，通常要暂时解散手下的军团，相约于凯旋仪式时再会。恺撒如果想参选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他的旧部属们或许会一举投下支持他的票而使他当选。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当上6个月的“光杆司令”。而看准恺撒将恢复为“光杆司令”的元老院派，必定会展开一场法律斗争。因为在罗马有禁止告发公职人员的规定，也因此有很多公职人员在卸下行省总督职位回首都时，遭到被告发的命运。

反恺撒派的人握有将恺撒告到法庭的“罪行”吗？如果依照罗马法律是有的。

一、行省总督的身份应是专司防卫，而恺撒越过任区的行省边境远征，渡过莱茵河攻击日耳曼人的领地、越过多佛尔海峡远征不列颠。行省总督在越过任区边界进军的情况，习惯上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才可以行动，但是恺撒并未得到认可，也未请求得到认可就擅自行动了。

二、除了被给予的4个军团以外，他自己负责编组的4个军团并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公元前56年春的卢卡“三头”会谈决定，至公元前54年的三年间，恺撒第一年拥有6个军团，第二年拥有8个军团，当然这项决定也未向元老院请求核准过。

三、在征服高卢之后，恺撒将自己家族的姓氏“尤里乌斯”赐给当地

的权贵，擅自建立属于他自己的“client网”。

四、在恺撒长期以来的债权人克拉苏死后，经济方面变得好转的恺撒资金来源很值得追究。以振兴高卢经济为名，向去高卢开拓新市场的罗马商人收取回扣，这完全可被视为受贿罪。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这位连战连胜、击败汉尼拔、将罗马从布匿战争的泥沼中救出来的人物，也曾因被追究500塔兰特(合1200万塞斯特斯)的用途不明，而被逼得狼狈万分。恺撒的情况是将钱用在扩建罗马广场的工程上了，因为是用在公共事业，还不至于用途不明，而是出处来源不明。扯恺撒这位救国英雄后腿的告发者，是承继大加图血统的小加图，他执著地希望打倒恺撒。

因此，失去公职这个盾牌的恺撒，必定会被告发的炮火集中猛烈地攻击。而在审判结果尚未明朗以前，元老院大可以此为借口，不接受他的候选登记。诸如此类的先例，包括喀提林的情况在罗马的历史上颇多。

当然，恺撒在这方面也作了某些应对。恺撒派将多数护民官的提案立法化，对恺撒特别通过了允许他不在罗马也能提交候选登记书的法律，也就是本人无须至罗马提出登记，由代理人提出就可以了。在北非与努米底亚王朱古达战斗、无法归国的马略，也有非本人所提出的候选登记受承认的先例。恺撒自然也可以用高卢战役正在进行为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在高卢战役结束、行省总督任期将满的公元前49年以后，是否能继续得到承认就很难保证了。然而事实上，鉴于恺撒功在国家而给予他特例，已开始向不被认同的方向发展了。

先是公元前52年，庞培努力完成了以立案形式提出的《行政官法》。这项法律中再次要求候选人有亲自至首都登记的义务。此法是庞培在获悉格尔戈维的恺撒军撤退时所提出来的。突击敌人，利用敌人势弱时加以阻击是正确的，不过，这似乎也太早了。三个月后，阿莱夏的

罗马军反败为胜的消息传来。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致评价阿莱夏攻防战才是决定不列颠与高卢历史的战争，当时的罗马一般市民，也同样正确掌握了这次胜仗的意义，他们觉悟到长期的高卢战役就要结束了。在狂热的民众面前，元老院决议为了向神表达谢意，举行20天的谢神祭，以报偿恺撒的功绩。《行政官法》也不得不针对恺撒外加一条修正条款，将他列为特例，修正条款的提案人为庞培。

恺撒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将自己的任期延至公元前49年底。理由是战后处理工作需要充分的时间，而真正的用意则是他认为自己所受的特别待遇可能会被取消。如果能将任期延至公元前49年底，在公元前49年夏季的执政官选举中，就不会面临“光杆司令”的危险了。

元老院派认为拒绝恺撒延长任期的要求，是违逆市民情感的举动，因此没有立刻对恺撒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反恺撒的第二支箭——《庞培行省总督法》，在公元前51年被推出了，此法虽然已于前一年年底由元老院通过了，但公元前51年，能够获得较多选票的庞培以提案的形式在公民大会中提出来了。

在《庞培行省总督法》中，规定即使拥有成为行省总督权力的前执政官与前法务官，也必须在担任执政官或法务官五年后才能实际赴任。此法一成立，使得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验、但无行省职务经验的人，被排除于行省总督之外。不想担任行省职务的西塞罗，也于公元前51年夏出发至任地西里西亚。对不擅军务的西塞罗来说幸运的是，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行省，那时还算是平稳之地。也正因为是没有问题的地方，才会派遣知识分子去吧。但是如果提起内政，西塞罗实际上是凭良心工作的总督。

这个《庞培行省总督法》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是以恺撒为目标。但是，元老院中集合的“法律子民”——罗马人中法律知识超群的人，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

行省的赴任是在获得权力五年以后。公元前52年担任执政官的庞培，在公元前51年时，不得不退任两西班牙的行省总督。与任职高卢三行省总督的恺撒相比，庞培的卸任当然呈现了军事力量关系的不平等。因为恺撒保持了他的军事力量，而庞培却无军事力量。

因此元老院派议决了将庞培的两西班牙行省总督任期再延长5年，这种做法也相当巧妙。庞培的任期并非由公元前50年底开始5年的延长期，而是由公元前52年底开始。为什么由公元前52年底开始呢？因为庞培在前半是担任“一人执政官”，所以才选在公元前52年。如果由公元前52年底为任期开始的时间，庞培的任期终了就是公元前47年底。如此一来，即使迫于市民对恺撒的爱戴，不得不接受恺撒将任期延至公元前49年年底时，庞培的任期也还比恺撒晚两年才结束。

因此，两人间的实力关系一变而对恺撒较为不利。不能忘记的是，罗马中拥有绝对指挥权、率军权限的是行省总督。因此，行省总督的任期结束，就意味着军事力量的解除。一心希望打倒恺撒的元老院派，期望在军事力量等各方面都优于恺撒。因此拉拢庞培至元老院派是有效果的，而这对惯于无敌手、当龙头的庞培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多少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但是，元老院派有点过于见风使舵了。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公然地反对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那就是在高卢战役结束后，要求解任恺撒最高司令官之职，并召还回本国。

这在元老院议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终于决定要早一点解任、召还这位被回报以20天谢神祭之功的当事人。的确，就战略的观点来看，高卢战役是在阿莱夏的攻防战中结束了。恺撒自己写到《高卢战记》的第七卷，希尔提乌斯所执笔的是第八卷，记录了阿莱夏之战以后完全称霸高卢之事。也就是如同第八卷所叙述的，此时期的恺撒正逐渐纵横高卢全域、完成称霸高卢。并且，《高卢战记》至第七卷的抄写本也开始到处流传。

执政官鲁弗斯首先是站在反对这一提案的立场上，虽然他并非恺撒派。元老院议员分为强硬的元老院派与稳健的元老院派，鲁弗斯是法学者，属于稳健的元老院派。执政官鲁弗斯反对的理由是：以恺撒充分执行了最高司令官之职为前提，应将他的职位留至任期截止较为妥当。17年前曾有将在前线战斗进行中的最高司令官卢库鲁斯召还回本国的例子。但是，当时不得不解任、召还正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作战的卢库鲁斯，并将他的指挥权交给后继的庞培，是因为即使他攻至里海的军事功绩充分地获得认同，但之后士兵拒绝从军，也就是因为士兵罢战之事无法解决，以致卢库鲁斯沾上了身为最高司令官却不懂明辨的污点。而恺撒的士兵并无此种状况。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提案过于明白地显示出对恺撒的憎恶，终究无法得到元老院议员的赞同而无疾而终。

强硬的元老院派也无法忽视的是，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这项提案，令庞培感到不快。庞培也担任着两西班牙行省的总督，然而他派遣心腹至行省统治，自己则留在罗马，在行省总督任期内不得入首都城内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他。因此，他从罗马南方的阿尔巴别墅传达出不快之意。庞培的不快，我想纯粹是出于身为军人的不快。惯于首都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无人知晓率领5万大军，进行长期战役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最高司令官的地位宛如投球那般简单。而在军事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庞培当然隐忍不了，庞培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却是个正直的男子。

庞培表达反对意见之后，强硬的元老院派不得不改变战术，采取不露骨的反恺撒的迂回战术。下一年，公元前50年的执政官选举，两名执政官皆为元老院派所独占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由于恺撒还在高卢继续完成称霸工作，元老院派独占两名执政官的行动算是成功了。因为在战斗进行中，恺撒无法为了帮助己派的候选人当选而让手下的士兵们休假，或让他们回首都投票。当选的盖乌斯·马尔凯鲁斯与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都是元老院派的。前者与前一年度以执

政官身份强硬地反恺撒的马库斯·马尔凯鲁斯有堂兄弟关系。两人反恺撒的论调也是一样的。当恺撒对先前所建的埃米利亚会堂进行修复时，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借给恺撒修复工程所需的资金，因此他并非在感情上反恺撒。只是，这位名门望族是个诚实的人，他不希望成为恺撒在首都的利益代言人。

就在这样东忙西忙后，恺撒完成了在全高卢的称霸。连续两年在高卢过冬、优先处理此事的恺撒，在公元前51年的冬天，开始着手内政方面的战后善后事宜。

如前所述，这些都是攸关将来罗马根本方向的大事，再继续做下去，就能有重新应对首都局势的对策。套用一句西塞罗的说法，“恺撒的长手”再度开始伸向首都罗马。

不仅如此，恺撒搜集情报的能力，以及利用情报为基础设立驻外机关的才能，也令人惊讶。即使在战斗中，埋首于距巴黎150公里北侧的阿拉斯战后处理时，恺撒也能对首都形势的变化了如指掌。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南法与北意的行省统治也能继续充分发挥影响，真可说是组织能力超群的人。

但是，他的统治形式是完全的中央集权。负责驻外机关的人员皆和恺撒直接联系，情报完全集中于恺撒处，基本的指示也全由恺撒下达。接到指示的驻外机关负责人同时也是经济方面的负责人，仿佛恺撒的手足般，彻底地实施他的指示。

这个系统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时刻的非常规系统。也许，在恺撒看来，平时的法律斗争和非常时刻的典型事件——战争无异吧。

尚在高卢处理战后事宜的恺撒，借由此法，清楚地掌握了庞培的动态与元老院派的策略。因此，他大概也早已察觉到要将己方人士送上执政官的位子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任凭反恺撒的罗马领导阶级日益壮

大，等于就是自寻灭亡。因此，恺撒必须寻找一个即使面对着身边的元老院和执政官，依然能胜任其“手”的人物。有趣的是，恺撒所注意到的符合此项要求的人，却是按照普通的想法会极力避免的人选——　一位现职的护民官，35岁左右的青年。

“恺撒的长手”

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古里奥，他的父亲是强硬的反恺撒派，因此他也被视为元老院派。青年古里奥的条理式思考表现以及充分的辩才，使他成为西塞罗等元老院派不吝赞赏与期待的对象。然而这位古里奥却成了“恺撒的长手”。

为什么恺撒会注意到这位分明属于敌方阵营的古里奥呢？

第一，青年古里奥担任护民官的职位。在罗马政体中，除执政官两人外，只有护民官握有行使拒绝权的权力。

但是这里剩下的疑问是：护民官之职有10个人担任，也犯不着特地选敌方阵营的人吧。

也许恺撒知道青年古里奥了解以往对恺撒的攻击论法，因而对他的能力予以肯定。总之，古里奥能与和他的父亲年龄相仿的元老院派议员以及执政官为敌，一步也不退让地守着恺撒的利益，那是因为恺撒收买了青年古里奥的才能。

我们或许可以想到，这个处于整个家族都是反恺撒派环境中的青年，替恺撒派做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恺撒是否已经从古里奥以往的演说以及其他情报，察觉到他是一位对任何想做的事都有强烈意志的人？对这种性格的青年，只要明示远大的理想，并说明成果共享等等，要说服他并非没有可能。而恺撒又正是写这种信的高手。

再者，青年古里奥有喜好奢华贵族生活的倾向，导致他一直到处负

债。总额高达6000万塞斯特斯，就借钱的才能而论，他比年轻时的恺撒更豪奢。恺撒替他偿还了那笔债，因为什么都不付出就拜托他有些失礼。根据西塞罗所述，恺撒很喜欢那个与自己年轻时候类似的青年。对50岁的恺撒而言，古里奥那笔庞大的借款，真是个负面的却又令人愉快的资料吧。

我猜想，直接与古里奥接触的，应该是首都的“恺撒事务所”主任巴尔布斯。由于必须采取隐秘作战，因此打探等微妙的接触，常是由间谍出身、跟在恺撒身边的人担任。

年轻护民官的立场的转变，一时之间也没有人发觉。连向来喜欢接触情报、到西里西亚行省任地也不忘和首都交换情报的西塞罗，直到公元前50年中期才发觉此事。因为护民官古里奥遵守恺撒的指示，尽量以低调的方式行使职权。

当古里奥行使了否决权，这个“变节”的举动立即引起了罗马政界的骚动。元老院派所期待的人才被敌人收买了，元老院内皆大叹此为丑闻。强硬的元老院派责难古里奥不该被恺撒的金钱收买，有良心的元老院老议员，则纷纷感叹此时年轻人的道德伦理低落。

但是，认为任何人皆是可为金钱所买动的人，本身也可能为金钱所买动。从非难这件事来看，较之受非难的一方，反倒更映现出非难这方的样子。青年古里奥自此成为恺撒忠实而热情的青年同志。

那么，在公元前50年的12月9日截止的护民官任期中，古里奥是如何守住在北意行省无法接近首都的恺撒的利益的呢？

恺撒将任期延长至公元前49年年底的要求，还未交元老院讨论决议就告终了。因为元老院派意图决议要恺撒卸任且返回本国，但是由于元老院内的稳健派和庞培的反对，而未达成此决议，这件事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被迫转换战术的元老院派，行动的第一步是期望独占执政官。

这个计划在公元前5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获得成功，该年夏天所举行的下年度执政官选举相当天衣无缝。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都是强硬的反恺撒派——马尔凯鲁斯与雷托鲁斯两人。这三年来马尔凯鲁斯家门的当选，与特别厌恶强硬的恺撒的克劳狄乌斯一族举族助选有关。再者，现在属于元老院派的庞培也有某种效果的聚票力，庞培的聚票力，比起住在罗马市内的游离票，反倒是多来自罗马附近那不勒斯周边的殖民，那里到首都方便而且又是他老部下的势力地盘。

下年度的执政官皆为己派所独占之事成功后，元老院派的第二个计划是，早日决定恺撒的继任人选。如果连继任者都决定好、并且早日赴任地，那么恺撒就无法一直在行省安稳地待到公元前50年年底的任期终了之后。不是行省总督，就不得不对军事权放手了。而“变节”后的护民官古里奥的任务就是打听、预测可能继任高卢行省总督的人选。

但是高卢行省总督的继任人选问题，在公元前51年，已经列为元老院的议题了。提案者是执政官马尔凯鲁斯，那时就连元老院也对长期以来的高卢战役终了后就决定继任者之事大感犹豫，因此列为下年的议题未被采决。但是就任公元前50年执政官的盖乌斯·马尔凯鲁斯，将这个问题视为自己任期内的最重要议题，这早在1月1日他就任的第一天就已经表明了。

怎样做才能事先得到情报呢？古里奥当初替恺撒派做事时还没有人发现，在他被认为是元老院派的时候反倒有利于为恺撒获取情报。

首先，积极促成经由元老院派和庞培同意所提出的议案：克拉苏远征失败后，叙利亚行省的防卫变弱，从握有军事权力的恺撒、庞培手中各拨出一个军团，派遣至叙利亚。庞培指出，自己早在公元前53年，已经借给恺撒一个军团了。因此从庞培那里借来的一个军团，加上恺撒原本义务所需提供的一个军团，恺撒有两个军团的兵力遭削减。这项提案的目的，很明显是要削减恺撒的军事力量，虽然有帕提亚的威胁，但是自从苏雷纳斯死后就没什么影响了，自然也还不至于要紧急派遣援军。

恺撒遵从元老院的决议，送返屯驻北意行省的第十五军团，取而代之的是由高卢来的第十三军团。而他自己所义务提供的军团由在高卢的第十四军团递补，并且还告诉他们，就要离开高卢回罗马了，然后称赞这两个即将离开的军团士兵这些日子来的英勇战斗，付完薪俸后才将他们送回故国。

不过这下子恺撒手里的军团就减至8个了，而被送返的2个军团也正如恺撒的预料，他们没有被送往叙利亚，而是被置留在庞培的老兵所集中的南意加普亚。

面对这种情况，恺撒并未提出抗议，但是虽未抗议，此时他已经未经元老院许可，擅自到南法行省征募志愿兵了。志愿者非罗马公民，而是高卢人，因此不以正规罗马军第某某军团命名。因此，组成的总计22个大队，实际上相当于2个军团的新编组兵力，并被命名为“云雀军团”。这是因南法行省有许多云雀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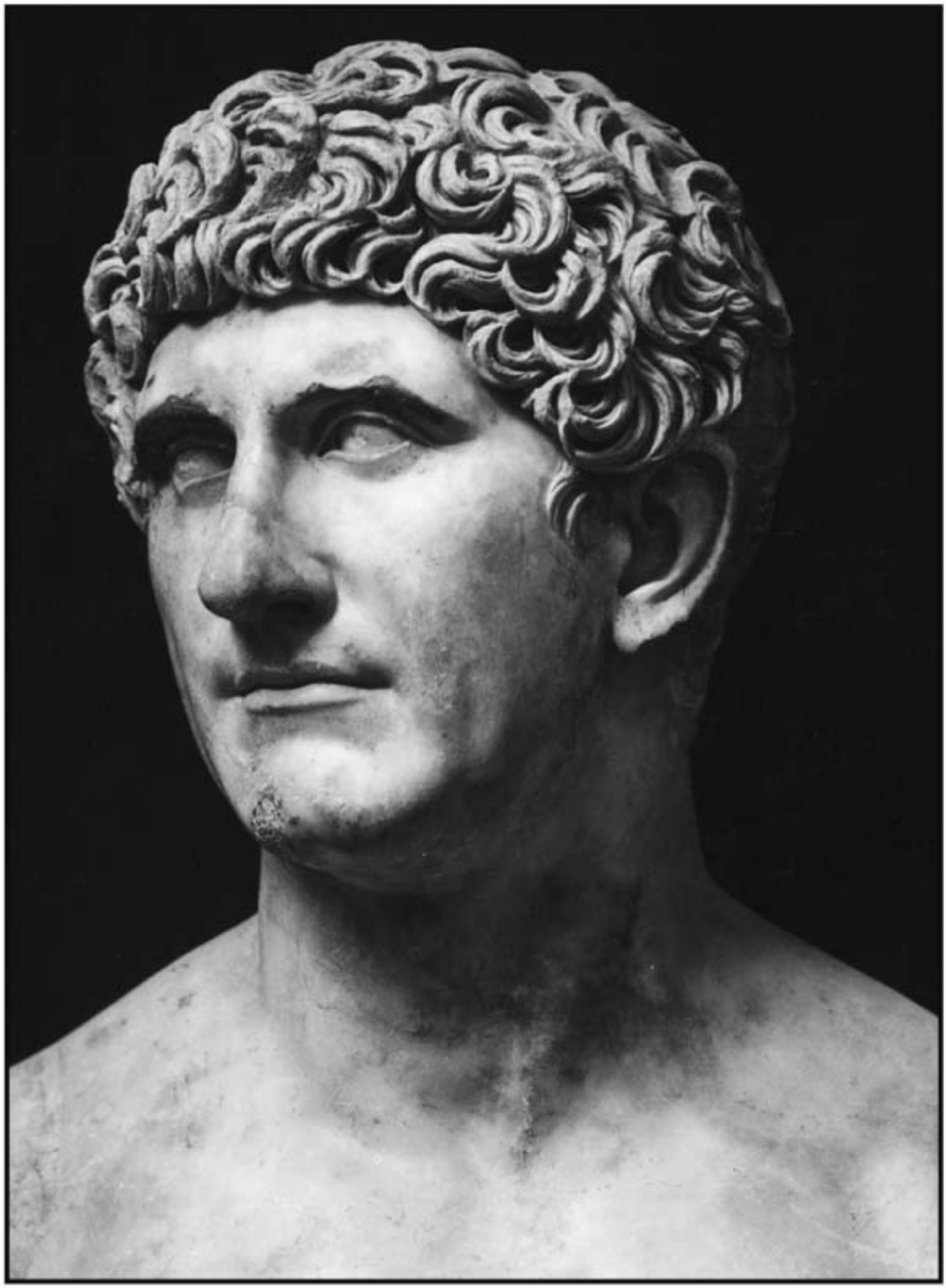
总之，恺撒表面上显示出顺从元老院决议的态度，但是思想上，他依然认为只要庞培有10个军团，他自己就也要握有10个军团。护民官古里奥一面假装成元老院派，一面着手延迟高卢总督继任者的计划，于是搬出“法”的法律论争展开了。如果以法律论争也无法左右元老院的议决时，他就行使护民官投否决票的权力。尽管世人也会因此知道古里奥和恺撒走得很近，但是否决权的行使是护民官的正当权力。元老院派就只剩咬牙切齿了，而且一面咬牙切齿，一面等待古里奥的任期截止——至公元前50年的12月9日，但是此时恺撒用来粉碎他们计划的对策已经准备好了。

护民官安东尼

护民官的任期是从12月10日至下年的12月9日，选举通常与执政官选举同期举行。与在执政官和其他公职选举中，只要拥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投票权的公民大会不同，护民官的选出，是由只有平民才有投票权的

平民大会来决定。在平民大会中，元老院派的影响较小，因此被视为是平民派领导人恺撒的地盘。在平民大会中，恺撒所推派的候选人要当选护民官是很容易的。当时的安东尼刚满32岁，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中的主角，虽然他有在恺撒之下担任军团团长的军务经验，但是说到政治，这还是头一遭。不过，恺撒在此时已返回北意行省，北意行省的总督驻地在拉文纳，距离罗马约三天的行程。如果派遣紧急使者，可以更节省时间。比起在高卢时，送达指示自然是容易多了。安东尼当选护民官，恺撒利用护民官对抗元老院的策略也就能够继续施行了。

尽管护民官古里奥面临任期即将结束，但古里奥的活跃，令在拉文纳的恺撒感到相当满意。学者也未必只会写些正经八百的话，有时也会有些通俗的表达，那是因为通俗的表达能适当地反映出现实。而罗马史的世界权威学者之一，也写了下面这句话："古里奥是高价位但却值得收买的人。"



马克· 安东尼

但是鉴于庞培的反对，古里奥也不可能将恺撒的任期延长一年至公元前49年年底。也是由于庞培的反对，恺撒的卸任与召返回国也就没能实现。结果，古里奥所利用的武器是否决权，使得元老院下不了决定。

但是由于恺撒身在拉文纳，所以他将战术作了些许调整。他以就任执政官，并且在罗马的现行体制下对国家进行改造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在此之前恺撒决定留在行省，一直到公元前49年夏他被选为执政官。他的不在场候选人权利，受到《护民官法》的承认，即使元老院派因此继续努力奔走，还是没达成废除此案的目的。执政官在公元前49年夏被选出，就任日期是在公元前48年1月1日。但是元老院的讨论必须事先征求下任执政官的意见，因此可视同为有官职。这和退任行省总督的个人完全不同。因此，按照不可告发有官职者的规定，恺撒避免了遭受敌人诉讼炮火轰击的危险。恺撒之所以有可能留居行省总督，是因为他的继任者尚未确定，一旦决定好继任人选后，元老院又会以使用否决权的常用手法，使之回复到原点。

但是这两派的敌对状态，使得首都罗马人心不安，年长的人回忆起马略与苏拉时代的内乱，并且害怕再次发生内乱。西塞罗所疼爱的年轻人卡埃里乌斯等人，正宛若局外人，热衷于观看庞培与恺撒两人谁胜谁负。恺撒认为行使否决权，造成元老院继续瘫痪的状态，对自己也是不利的。护民官不仅可行使否决权，也有政策立案权，恺撒正是注意到了这点。

公元前50年12月1日，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按照惯例又在元老院中发表批评恺撒的演说，批评恺撒破坏现行体制，想称霸成为独裁者。演说结束后，马尔凯鲁斯要求元老院议员采纳下述的提案：

一、有无必要决定恺撒的继任者？

——根据元老院议员的投票结果，认为有必要的占了大多数。

二、是否应取消庞培的最高指挥权？

——多数议员投了反对票。

“根据公元前55年制定的《庞培——李锡尼法》，高卢行省总督恺撒与两西班牙行省总督庞培，任期皆于公元前50年年底终止，且皆自行省总督退任，解散军团。”

这是由恺撒所提出的妥协提案，实为一个巧妙的提案。庞培当然没有理由反对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如果庞培不反对，元老院派自然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

再说，不只是提案内容，就连恺撒提出提案的方式也颇为巧妙。因为如果古里奥的提案议决通过，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提案一和提案二皆自动无效。而古里奥也以前述的一、二提案皆采用即席表决为由，要求他的提案也能得到立即表决。

投票结果是：370票赞成、22票反对。如此一来，想剥夺恺撒的军事力量却不动庞培的方案流产了。

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恼怒了，宣告散会，然后向元老院议员丢下一句话：“恺撒将成为诸位的主人。”说完随即离开会场。

在元老院会场外等待古里奥的，是担心万分的市民的鼓掌与大声欢呼，西塞罗也赶忙如同回避内战似的没有吭声。

但是，就在第二天，12月2日，元老院议员接到来自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紧急召集，马尔凯鲁斯向到元老院会场的议员宣告：

“我接到情报，恺撒的10个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正向罗马南下。”

护民官古里奥不等发言结束，就自席间站起来叫道：

“这个情报是假的！”

由于元老院仅给有财务检察官或护民官经验者议席，所以议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是体验过马略与苏拉内战的一代。动摇的他们也没法再作深思，而顺应了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的要求，再次对古里奥的提案重新表决。结果竟推翻了前一天的决定，以否决定案。

古里奥立刻将此事报告在拉文纳的恺撒，恺撒也马上派秘书官希尔提乌斯赶到罗马。12月6日太阳下山后，进入首都的希尔提乌斯与正等待接应的古里奥及保卢斯会面，确认状况。然后，在第二天清早就与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会面，提出了恺撒的第二个妥协提案：保持北意与伊利里亚两行省总督拥有两个军团的权力，承认不在场候选人的候选资格，如此一来也就可启动南法行省的总督继任者的人事任命。但是恺撒所交代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和庞培会面、伺机转告恺撒之意。而希尔提乌斯按照目前的形势判断，了解此举已无用处，因为握有目前元老院改变决议结果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等不及地就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任两西班牙行省总督的庞培，依法不得进入首都，马尔凯鲁斯带着元老院派的议员来到庞培在阿尔巴的别墅，亲手把剑交给庞培，并说道：

“元老院要求您当国家的盾，并请您向恺撒进军。为完成此大义之举，我们给您在意大利的军队编组权，当然包括屯驻加普亚这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必要的一切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权，现在皆在您的手中。”

庞培前一阵子还在因病疗养，但是这位56岁的罗马名将接受了剑，答道：“如果没有其他的良策，我就将执政官的要求当成是命令接受下来吧！”

由现场证人梅特鲁斯·西庇阿口中直接得知此事的希尔提乌斯，在

罗马只停留了24小时，于12月7日夜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赶往拉文纳。或许在3天之后，恺撒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事已至此，恺撒只好命令在高卢的8个军团中的第八与第十二两个军团，离开冬营地向北意移动，因为和他一起在拉文纳的只有第十三军团。

因为预料恺撒与庞培将有正面冲突，而陷入恐惧、混乱和骚动的罗马，正逢护民官古里奥任期届满，新护民官安东尼12月10日的任期开始。有了安东尼接手后，古里奥便出发前往拉文纳，和恺撒会面，并向恺撒汇报所有的事情，并听候下一步的作战指示。护民官的卸任者，自动被给予元老院的议席，几乎已成了规定，因此古里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成为元老院议员。虽然无否决权可用，但是也可通过论争来左右决议。

元老院派除了戏剧性的亲手向庞培递交了剑以外，也将授予庞培的大权合法化。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在古里奥至拉文纳不在首都期间，冠以梅特鲁斯·西庇阿之名的提案在元老院被提出了，提案未提及庞培，唯独命令恺撒解散军团，如果恺撒不服从，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提案者梅特鲁斯·西庇阿完全不理会恺撒送过来的第二个提案，在会场甚至没提及此事，只是要求元老院采纳他的提案。

恺撒军南下的传闻在罗马境内引起骚动。而庞培离开阿尔巴别墅，在首都城外等待元老院的议决结果，大大地激起了议员们的不安。护民官安东尼偕同恺撒派的护民官进入会场，扬言如果梅特鲁斯·西庇阿的提案通过，那么他们将不惜动用护民官的否决权。这句话奏效了，当日的议决被延期。

但是庞培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当晚，庞培召集元老院的重臣到他城外的宅邸，告诉他们一再地延期迟迟不下决定，对议员本身和对国家皆非良策，并且还说他自己已经有再度挥剑的觉悟了。元老院中非反恺撒的议员，提出派遣代表到拉文纳说服恺撒的方案，但是仅得到少数人的

支持。因为在护民官安东尼所召集的平民大会中，他激情的演说，激发了元老院议员的危机意识。在12月21日所召开的平民大会上，安东尼批评元老院与执政官不顾恺撒征服高卢对罗马的莫大贡献，竟然要做出忘恩负义的行为。而现在护民官打算行使否决权，如果此举也遭漠视，就等同于平民的权利也受到漠视。而平民大会全会一致支持安东尼等护民官。

元老院面对这种强硬的态度，也不理会庞培的表态，无法踏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在僵持当中，已近公元前50年年底了，恺撒的任期即将结束，而继任者的人选尚未决定。因为元老院如果强行决定，护民官一定会动用否决权，元老院畏惧与恺撒和平民阶级同时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去往拉文纳的古里奥返回了罗马。接着，公元前49年1月1日，马尔凯鲁斯（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弟弟）与雷托鲁斯新任执政官任期的第一天来到了，两人皆为强硬的反恺撒派。

在元老院议场举行的新任执政官就任仪式结束时，元老院议员古里奥要求发言。他想宣读恺撒交托给他的书简。执政官马尔凯鲁斯认为此事应当搁置，先行进入议题。但是以护民官身份进场的安东尼要求立刻宣读恺撒的书简。这是关键人物恺撒写给元老院的书简，许多人要求宣读出来，执政官也就只有应允了。

恺撒亲手写的书简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客观叙述了自己从以前到现在的诸项战绩。二是有关唯独自己的权利受剥夺，庞培却允许维持原有的权利，这样做有失公正，因此第三度提出议案。也就是他有辞去高卢行省总督的准备，不过两西班牙行省总督庞培，也必须同样辞去职位。最后，恺撒要求元老院对这项提案进行表决，应在充分讨论后以不记名方式投票。

身为议长的执政官，完全无视恺撒书简中的第三项，采取了未经讨论的举手表决方式。结果赞成恺撒提案的，只有古里奥与西塞罗的爱徒

卡西乌斯两人而已，近400人的元老院议员，几乎都拒绝了恺撒的提案。与其说是反对提案中的内容，不如说是因为觉得这是最后通牒而引起反感所致。就内容而言，连属于稳健元老院派的西塞罗，大概也评论这是很现实的解决方法。

护民官安东尼果然如预料般地行使了否决权，因此结果悬而未决，只好隔天再行表决。元老院派否决恺撒的提案，马上护民官安东尼又动用否决权。第二天再举行一次表决，结果还是一样，护民官安东尼依然动用了否决权。

在双方反复抗衡的同时，庞培的旧部属涌至元老院的议场外等待，进行施压。于是护民官们连日来面临被杀害的威胁。接着，1月7日来临了。

“元老院最终劝告”

公元前49年1月7日，担任议长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不理会护民官一向拥有行使否决权的权力，要求在1月1日元老院议会的表决中，对恺撒提案的否决之议再行确认。几乎所有的元老院议员已经投了好几次否决票，当然那天安东尼与另一位护民官又马上行使了否决权。但是，那天两位执政官的态度都很强硬，无视护民官的否决权，要求大家以举手的方式表决。

一、高卢的行省总督恺撒，应服从元老院的归国命令。

二、继任者为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有立刻在意大利境内征集4000名志愿兵的权力。一旦编组完成即可前往北意行省任地。

三、恺撒返回首都亲自递交执政官候选人登记书。

护民官安东尼也在决定强行突破的反恺撒派面前，重复行使否决权

加以阻挠，但是当天的反恺撒派一步也不退让。

“元老院最终劝告”最终被提了出来，而一旦发布这一非常事态宣言，护民官也就无法行使否决权了。再者，两位执政官要求表决承认授予元老院与庞培无限大权之法。于是，不服从元老院与庞培决定之事的人，就成了国家的敌人，被视为国贼，要遭受无须审判的死刑。在投票表决之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告诉包括安东尼在内的两位护民官，如果不想成为“元老院最终劝告”的箭靶，就快退场吧。于是护民官们一边叫嚷着自己的权力遭到侵害而退场。元老院议员古里奥也只好退场以示抗议。

当天夜里，已经预料到这个局势的安东尼与另一位护民官以及元老院议员古里奥三人装扮成奴隶逃离了首都，目的地当然是在拉文纳的恺撒处。但是，巴尔布斯所遣送的急使比这三个人更快，已经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了。事先在决定之地更换马匹、派遣急使的方法，是恺撒常用的。因此恺撒在他三人到达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被视为国家公敌了。

以恺撒为目标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就这样成了既成事实。出席的西塞罗讽刺地批评道：“这是一项给甲方或者乙方哪一方权力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同样出席的小加图所评价的“把统治结构作为赌注的斗争”更为准确。当天所决定的非常事态宣言，成了元老院派和庞培攻击恺撒的武器。

元老院派认为如此一来，恺撒就无计可施了。因为在搬出“元老院最终劝告”这个元老院的传家法宝后，许多反体制运动也因此而结束了。

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因“元老院最终劝告”之名，被当成国贼杀了，兄弟俩所进行的国政改革也告中断。

公元前100年，利用马略的声望，实行下层市民优惠待遇政策的护民官萨图纽斯，也在“元老院最终劝告”的发布之下成了国贼，最终血染罗马广场而死。

另外元老院议员无人能忘的公元前63年，企图政变而遭弹劾的喀提林，也在面对“元老院最终劝告”发布后派出的罗马正规军面前玉碎而终。而这不过是13年前的事情而已。

而这次，公元前49年的“元老院最终劝告”正是向恺撒发出的。“元老院最终劝告”这个向来所向无敌的有力武器，这次以恺撒为目标了。

就如同恺撒在“喀提林阴谋”发生之际发表于元老院的演说中所表示的一样，他始终不承认“元老院最终劝告”具有合法性。恺撒认为这个借“元老院最终劝告”之名的非常事态宣言，是元老院的越权行为，因为元老院不过是对法律提出建议、劝告的机构。而借用此名，无视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所认可的裁判权与控诉权，立即判处死刑，这是违反罗马国法的。恺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现在他自己也被迫面临此事。敌方也看准恺撒始终不服“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态度，预备如果他不从，就将他视为叛国贼，跟随叛国贼的军团也就成了叛军，再由庞培率罗马的正规军加以袭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元老院派的如意算盘。

不过，打着“元老院最终劝告”旗帜的罗马正规军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时间。庞培所拥有军团的军事力量，仅有恺撒送回的两个军团。而被选出来当恺撒后继者的阿赫诺巴尔布斯，尚在征募志愿兵，还没有军事力量。但是元老院派还是乐观地认为时间的缩减是可能的。

第一，他们也知道恺撒手中只有一个军团。

第二，时令才刚进入冬季，以尤里乌斯历法计算，虽为1月上旬，实际上是12月上旬。在此时期，即使是南国的意大利也还是河水增涨、气候寒冷，并不适宜战斗。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型气候中，冬天属于雨

期。加以恺撒军团几乎皆在高卢冬营中，即使恺撒下达了出师命令，要在冬季横穿高卢、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这也并非易事。我想元老院派是预测恺撒至少要等到春天才能够行动吧。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使得元老院派预测恺撒将延迟行动。那就是迄今为止恺撒对法律的态度。恺撒虽然无视元老院的权限，擅自进攻高卢并编组军团，但是从来没有触犯过国法。而因为卢比孔河为本国与行省的边界，越过卢比孔河，攻至罗马本国，此举就完全触犯了国法。曾经犯过此法的是率兵登陆南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再攻向罗马的苏拉。因此苏拉有攻入自己国家首都的“前科”，而恺撒并没有。

于是从目前的局势庞培判断即使发生了战斗，也是罗马正规军进攻卢比孔河之北。庞培与元老院派都认为必须得耗费整个冬天作战前准备，这也正可以说明为何他们在军事准备上流于缓慢。总而言之，反恺撒派的人一面向恺撒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是在准备行动上又过于松懈。

但正是出乎庞培与元老院的预料，恺撒没有耐心再思考了。

卢比孔河就在眼前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与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虽有38岁的年龄差距，但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一、两人皆属罗马的名门望族，不过，苏拉和恺撒都可算是以往几乎没出现在罗马史上的旁系身份。

二、就经济上的理由看来，他们虽然并非出自请得起希腊人为家庭教师的优越家境，但是称得上是当代知识分子中一流的有教养人士。

三、两人都是高瘦体型，举止动作颇有气质，无论何时何地皆为受人瞩目的焦点。

四、两人皆非早熟的天才型人物，活动的全盛期从迈入40岁后才开始。

五、尽管知道金钱的重要，但是对于囤积私财的事情毫不关心。

六、两人皆具有能使人明辨目的的性格，因此在得到部属士兵爱戴的同时，也能得到他们的敬重。

七、两人皆洞察出元老院已无统治能力。但是苏拉认为统治能力的再兴可借由元老院这个机构的改革而获成功，而恺撒与苏拉较保守的看法不同，认为那样的改革根本是行不通的，而是要通过革新。

八、不被惯有的想法所束缚，行动也相当大胆，这点两人颇为类似。但苏拉并未流露出任何不安与迷惘，而恺撒就不是这样了。

登陆布林迪西后，并未解散军团的苏拉，在违逆国法攻陷罗马时，一点也没有疑虑或犹豫的样子。而当恺撒面对着卢比孔河时，却感到很迷惘。因为姑且不论触犯国法的行为正确与否，一旦决意触犯国法，所衍生的结果乃至余波都是值得深思的。

因为恺撒必须考虑到，如果决意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导致内战。苏拉并不在意与同是罗马人的同胞发生内战。而恺撒青少年时代的体验，却让他不能轻易地作出这样的决定。

恺撒13岁时，他的姑夫马略一声令下，仅5天5夜的时间，以当时执政官为首的元老院议员50人，以及属于“骑士阶级”的1000人都被杀了。遭杀害的人当中有恺撒父亲的兄弟，因此对这个少年而言，他有两位伯父卷入此事件中，并被姑夫杀害了。被杀重要人物的首级，就放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多得数不清。而从恺撒少年时所住的“苏布拉”到罗马广场，所需的时间不到五分钟，所以恺撒曾亲眼见过当时的头颅铺满讲坛的情景。

接着，图谋对马略所领导的平民派施以武力反击的苏拉，在登陆布林迪西两年后，在内战中获得胜利，终于有机会一扫平民派。苏拉制作了一本“死刑黑名单”，其中包括了80位元老院议员、1600名“骑士”，共4700人。他们几乎皆是在没有经过裁判的情况下被杀害，全部财产也遭没收。即使侥幸没被杀的人，也免不了资产被没收。而且他们本人，甚至连子孙都遭受到剥夺公职的处分。被杀的重要人物首级从罗马广场的讲坛掉落下来的情景，就如同5年前一样。18岁的恺撒目睹此景，而且他自己的名字也在“黑名单”上，说起来终究也是牺牲者。他虽然得救了，但是这个18岁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忍耐着度过4年的亡命生涯。

但是内战中真正悲惨的并不是被杀害的人，而是随着杀戮所衍生出的不易消失的抱怨、仇恨和憎恶。这对共同体而言，非常不利。因此必须尽量避免这种事态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在“喀提林阴谋”时，37岁的恺撒在演说中就已经表达了这种看法。

况且，内战屡屡造成亲子、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分裂。恺撒的明快作风与直接的表达方式，加以在高卢的辉煌战绩，虏获了首都罗马众多年轻人的心。结果，不顾当元老院议员的父亲担心，而公开表示加入恺撒麾下的罗马有权势人士子弟的数量增加了。西塞罗年仅15岁的儿子与外甥，都成了忠诚的恺撒派。如果仅仅造成家庭内的骚动，还算是喜剧。不过，如果恺撒渡过卢比孔河，这喜剧就会变成悲剧。

然而恺撒是一位一生忠于自己想法并且身体力行的男子。他期望改造罗马的国体，树立罗马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恺撒不渡过卢比孔河，屈服于“元老院最终劝告”，放手军团的兵权，或许可以避免内战，但是树立新秩序就成了一场梦。那么，这对活了50年的恺撒来说，还真不知这50年来为什么而活。况且他的骄傲，也绝不允许他就这样去过无意义的人生。而现在自己的名誉已遭玷污了。仿佛高卢战役从没发生过似的，如果自己不服从“元老院最终劝告”，就将被宣告成国家的敌人，成为叛国贼，恺撒的名誉已经彻底地遭到了玷污。

不过，对于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卢比孔河——曾经经历过如此思念祖国的日子的恺撒，他心中还有一个牵挂，那就是副将拉比埃努斯的去留问题。

两个男人的演出

除了恺撒，还有一位为是否渡卢比孔河而烦恼的男子。

恺撒烦恼的理由，有诸多可作为推测的立足点。首先是恺撒自己所写的《内战记》。接着，要了解当时元老院的动态，以及反恺撒派的主张，可参阅西塞罗和友人们往来频繁的许多书简。此外，尽管相隔数百年，还有普鲁塔克、阿庇亚努斯、卡西乌斯、迪奥等人的史书。公元前1世纪中叶这一罗马史上最大的危机时期的第一男主角是恺撒，因此拉比埃努斯说起来应该是个配角。由于他是配角，与恺撒相较之下，即使根据史实能够推测他心境的必要立足点的资料，显得相当地少。不仅《内战记》中提到的不多，西塞罗对他仅止于表面评价，就连帝政时期所写的一些史料，提到他时也是以最先背叛“神君恺撒”的人物而一笔带过。但是，如果想贴近面临一生决定性瞬间的恺撒当时的心境，审视当时同样处于这决定性瞬间的另一人物，绝非是无用的。

因为面对超越了憎恶、仇恨、复仇等心态的恺撒的，是一个内心愤怒未消的拉比埃努斯。如前所说，在《内战记》中提到拉比埃努斯之处很少，况且恺撒本着一贯记录事实的态度。但是为什么我一定得插入这段话呢？因为不得不让继续顽固地反抗恺撒的拉比埃努斯登场了。再说，这么一来，总会可有些收尾的感觉在字里行间飘荡。

《内战记》与《高卢战记》不同，全篇所流露的主旋律是恺撒对敌人的轻蔑。如果认为自己比对方优秀，就可超越憎恶、仇恨、复仇之心，也就是憎恶、仇恨、复仇之心会让位给轻蔑。而恺撒唯一想轻蔑却无法轻蔑的对象，就是拉比埃努斯。那么，为什么唯独无法轻蔑拉比埃努斯呢？还有，拉比埃努斯如何看待恺撒呢？

据说，与恺撒同年的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出生于意大利半岛、亚得里亚海边的安科那港镇附近的小村珍古里。在一般拥有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这三种名字的罗马人中，马略与萨图纽斯都只有个人名与家族名。而与前两人相同的拉比埃努斯大概也是平民出身。但是，他所出生的地方，是大地主庞培家的私有土地。也许是这个原因，拉比埃努斯与庞培有好几代直接的“client”关系。“client”关系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已经说明过了，之后也陆续出现过，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共和政治下的罗马，实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通过由“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的互助关系，或许更能正确反映“保护者”的后援会组织。

拉比埃努斯17岁那年，比他年长6岁的庞培加入了登陆布林迪西的苏拉自费组编的3个军团。这3个军团共有1.8万名士兵。在罗马，17岁就是开始服兵役的年龄。虽然从史实中还无法确定，不过拉比埃努斯的初次上阵，很有可能是在庞培的指挥之下。因为年轻的庞培曾组编3个军团，是由身为大地主的他手下的“client”所组成的，这在史实中出现过。

虽然拉比埃努斯之后的军事经验，并无证据显示是累积于跟从庞培之时，但是至少在公元前63年，庞培所领导的军队称霸东地中海一带时，他并没有参战，这点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公元前63年的拉比埃努斯在首都罗马担任护民官。

他与恺撒的关系明显地出现于史实中，也是由这时开始的。

公元前63年，因喀提林事件而出现大骚乱的首都罗马，发生了37岁的恺撒与拉比埃努斯以反元老院为目的所实施的行动。护民官拉比埃努斯成了原告，告发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控诉的罪名是，37年前（公元前100年），拉比留斯杀害当年的护民官萨图纽斯以及他那一派人。但是，重提37年前的旧事，并非是要判现已年迈的元老院议员拉比留斯有罪，而是要借此凸显并且攻击“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非法性。察觉到恺撒

真正意图的西塞罗，不顾其为现任的执政官，站出来为被告辩护。因为替当时的被告辩护，等于是为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辩护。这个事件，如前所述如滑稽剧般收场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恺撒与拉比埃努斯之间出现了裂痕。

接着，公元前60年，“三头政治”开始了。结果有了公元前59年的恺撒就任执政官，以及自公元前58年开始的高卢战役。而恺撒就任行省总督时，拉比埃努斯也追随恺撒离开了罗马。恺撒一开始并没有挑选部下，然后视战场表现才选择真正的部下，他唯一亲自选出的部下就是拉比埃努斯。

拉比埃努斯也圆满地回应了恺撒的期待。当时出身于罗马良家子弟的众多幕僚及军团长中，不需要恺撒派军支援的，只有拉比埃努斯指挥的战线。将兵力一分为二的时候，恺撒也一定将其一交由拉比埃努斯负责。在恺撒越过莱茵河及多佛尔海峡远征时，在背后留守的也是拉比埃努斯。在恺撒返回行省过冬的那年，拉比埃努斯也还继续留在高卢。或许，拉比埃努斯是一位拥有恺撒全部信赖的部属将领。

再说，恺撒是那种有福同享的人，他也将机会给了副将拉比埃努斯。拉比埃努斯因此存了些积蓄，并且投资于故乡村落的整修。这个出身平民的男人，带给了故乡荣耀。恺撒在高卢战役结束时，任命拉比埃努斯为北意行省的军团指挥官，这纯粹是出于慰劳之意，以及自己当上执政官之后，拉比埃努斯就是可以托付的对象，前文也提到了这点。总之，对拉比埃努斯而言，自己与庞培的关系是先天的，而与恺撒的关系则是后天的。

而庞培拉拢了拉比埃努斯。

庞培方面接触拉比埃努斯的风闻，已经在公元前50年的夏天被恺撒知晓。根据《高卢战记》第八卷的作者，也就是恺撒的秘书官——希尔提乌斯的叙述，恺撒并不愿听到别人提及此事。拉比埃努斯返回北意以

后，庞培方面一定也更积极地与他接触了。而恺撒也在公元前50年秋天时进入北意。因此，这两个人或许曾在同一场所——拉文纳的北意行省总督公邸一带，一起度过了“渡过卢比孔河以前”的三个月紧张时期。13年的岁月，也就是从37岁至50岁的这13年间，这两人同甘共苦。是他们无法作好沟通的缘故呢，还是这两位同龄的男人之间，不曾相互吐露胸中的心事？

就恺撒的性格看来，我想他是不会开口去过问的。如果是拉比埃努斯开口说的话，这又另当别论了。而拉比埃努斯是否明确地与恺撒沟通过了呢？

就拉比埃努斯的言行来看，这位军人对恺撒与元老院派抗争的理由等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平民出身的护民官，面对守卫平民阶级的权利，乃至元老院阶级的统治能力衰退等问题，这都是超乎他教养以外的政治斗争问题。对他而言，即使站在庞培一方，也是基于重视与庞培的“client”关系，而并非是为了要帮助元老院派。

再者，即使他留在恺撒一方，也并非出于理解恺撒所认为的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守护与恺撒间的友情。因此，拉比埃努斯的烦恼是，究竟要选择先天的关系，还是重视后天的因缘呢？即使本想吐露心事与恺撒作番详谈，但这是个即使这样做了也不会改变答案的行为。

我认为这两人之间或许并没有插入什么商谈。某位史学家评论这是“两个男人的戏剧”，他们并未触及此事而一起度过了紧张的三个月。这真是两位壮年男子的沉默对手戏。

庞培这边挥舞着“client”关系的旗帜，执拗地劝诱拉比埃努斯。13年前已经解散自己的军队、部属也都当了农民的庞培，他所想要的是可靠的实战型大将。拉比埃努斯作为武将的能力，光是阅读《高卢战记》，就让自身也是优秀武将的庞培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此外，如果能够成

功地拉拢有恺撒右腕之喻的拉比埃努斯，明显的，这对恺撒而言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庞培想借着拉拢拉比埃努斯而达成一石二鸟之计。

在这场“喜剧”的背后，还有恺撒与元老院以法律为武器所进行的斗争。恺撒这边所提出的第一、第二、第三妥协案均遭否决。1月7日终于来临了。恺撒如果不遵从“元老院最终劝告”，就成了叛国贼。而庞培握有两个军团，恺撒手边却仅有一个军团。但是如果等己方准备好时，对方也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恺撒命令士兵们集合。

第十三军团对恺撒而言并非是特别的军团，并不像第十军团那般获得他的信赖，也就是说，第十三军团并非恺撒的第一精锐部队。不过，他们都是从公元前57年编组开始，就与恺撒一起经历七年高卢战役的士兵。于是对着这些部下们，最高司令官开始说话了。

他对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士兵，要求他们与同是罗马公民的士兵战斗。如果是普通的政治家，一定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宣讲正义属于己方，因此现在将起的内战，并非为守私利，而是为了达成公益等等。但是，恺撒的做法完全相反。

首先，他控诉反恺撒派者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对他不公的贬损，为此还把庞培牵扯进来，使人不禁要叹道反恺撒派是多么没品格。第二，批评元老院侵害了护民官行使否决权的权力，连苏拉也没侵犯过身为平民代表的护民官所拥有的权力。恺撒指出，类似格拉古兄弟及萨图纽斯的牺牲，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也有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现在的罗马，与那个时代依然没什么两样。最后，他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这位自高卢战役的九年当中，有诸多胜战记录、称霸高卢、成功压制日耳曼和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最高司令官，要求他的部属为他守护名誉与尊严。第十三军团的士兵在听到这句话后，一齐叫道：“为了洗刷最高司令官与护民官所受的侮辱，我们已经准备好无论是天涯海角也要追随恺撒！”恺撒命令士兵在夜晚集合。我想也许从下面百人队队长的

话，可以显示当时追随恺撒越过卢比孔河、认为自己也成了叛国贼的士兵心境。

“这场内战如果结束的话，恺撒的名誉得以恢复，我们也可以恢复自由了。”

恢复自由，意味着士兵每个人自允诺恺撒的誓约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也就是从军队中退役。也正因为确信如此，恺撒才能仅以一个军团的军力展开决定性的行动。庞培与元老院原本预测，在厌恶被视为国家公敌的情况下，恺撒阵营将出现离反的风潮，但是这样的预测被证实是错误的。离反者只有一人，而且是出于别的理由。

“孤注一掷！”

恺撒是如何越过卢比孔河的呢？他自己也没说。《内战记》当中在记述士兵们高呼誓死追随恺撒之后，就只换行写道：“知道他们的心情后，就和军团一起向里米尼出发了。”虽然我尊重恺撒面临戏剧性场面，不喜用戏剧性表现手法的风格，但是，在此也不可免俗地要以其他被认为较接近事实的史料作为补充，试图重现真实。

从拉文纳到里米尼，有50公里的距离，这是条一边眺望左侧的亚得里亚海，一边南下的平坦的道路。从拉文纳前行35公里，就到了卢比孔河。2000年后的今天，卢比孔河分为三个支流，我们无从知晓到底哪一个支流是历史上的卢比孔河。但是，今天的这三个支流差不多都是涉水可渡的河流，这与公元前1世纪时的情况也许是相同的。虽说卢比孔河是罗马与北意大利行省的分界线，却也只是象征性的国境。恺撒军团是在半夜出发的，所以早晨7点时，一定已经到达卢比孔河。因为罗马军团的行军时速为5公里。

站在卢比孔河岸边的恺撒，并没有立即下达渡河的命令。他只是在岸边沉默地站了好一阵子，追随他的第十三军团，也沉默地凝视着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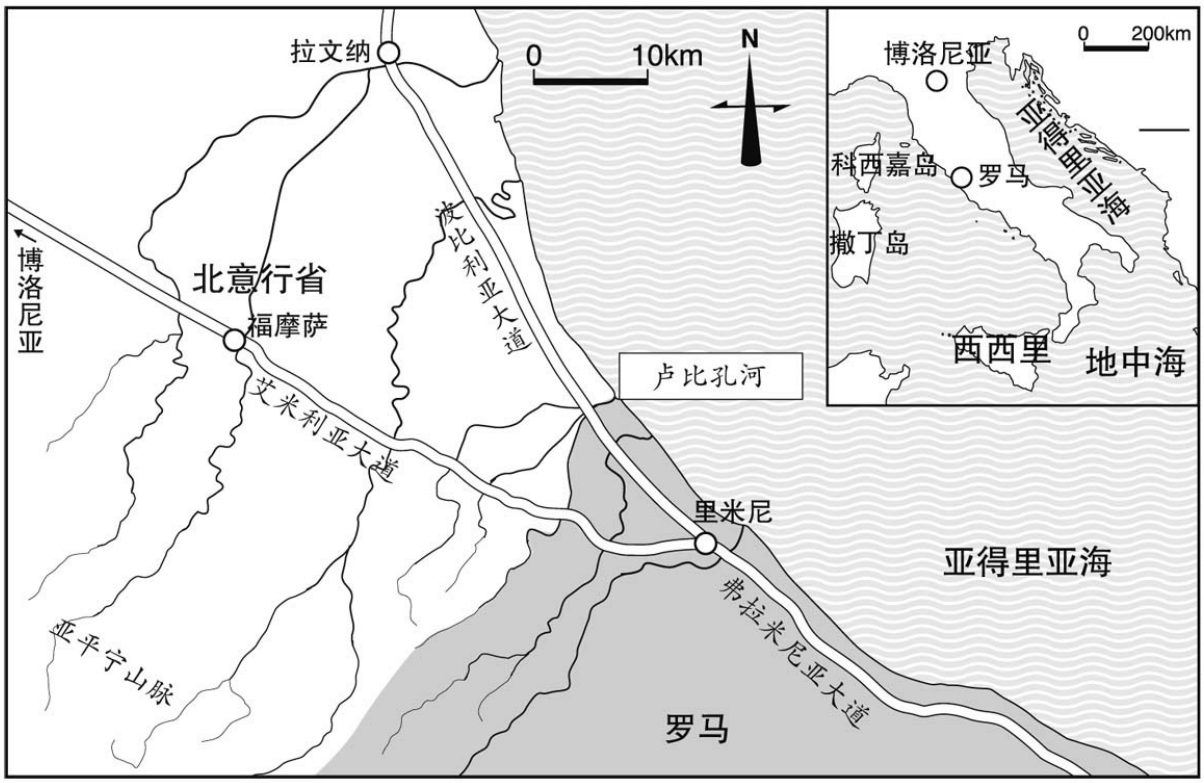
司令官的背影。终于，恺撒转过身来，对身旁的幕僚们说：

“越过此河，将是悲惨的人间世界。但若不越过，吾将毁灭。”

然后，他立刻向望着自己的士兵，斩钉截铁地喊道：

“前进吧，到诸神等待的地方，到侮辱我们的敌人所在之处，孤注一掷！”

士兵们也以雄壮的应和声作为回答。于是，在队伍前驰马领头的恺撒，带着一行人渡过了卢比孔河。那是公元前49年1月12日，恺撒时年50岁又6个月的早晨。



五天之后，另外一位男子也渡过了他所认为的卢比孔河。曾经是恺撒副将的他，避免与恺撒的行进路程相会，从第勒尼安海一侧越过国境。也许，他是要借阿皮亚大道南下，到此时应该已经在罗马的庞培那

里了吧。

所以结局是拉比埃努斯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追随恺撒。但是，他一直等到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才渡过他的“卢比孔河”。另外，他也辜负了庞培与元老院的期待，全然没有离间恺撒手下的士兵，只带着儿子与追随他的奴隶离开了恺撒。他的行李全部留在了营地，他几乎是只带走了自己的身躯而已。这是没有政治才能的武人拉比埃努斯唯一会做的事。得知副将的反叛后，恺撒命令将拉比埃努斯所留置的全部行李，全部送还给他。这是恺撒面对追随他13年的部下反叛时，唯一所做的事。

就这样，两个男人渡过了各自的“卢比孔河”，都已经无法回头。骰子，已经掷出了。不是靠言论，也非靠法律，而是以武力分胜负的时刻来临了。

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前）	100	91（9）（括号内为恺撒年龄）	90（10）	89（11）	88（12）	87（13）	86（14）	85（15）
恺撒	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于7月12日出生于罗马「苏布拉」地区。父亲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母亲为奥雷利娅（出身于奥利乌斯·科塔家族）							
国家罗马	护民官萨图纽斯修订《小麦法》、提出新殖民地城市法、向元老院宣誓公民大会的优先决议权后，遭反对派暗杀	护民官德鲁苏斯提出将罗马公民权给予全体自由人的法案，遭反对派暗杀	「同盟战争」开始时任执政官，恺撒伯父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成立《尤里乌斯公民权法》	《公民权法》成立，「同盟战争」实际上结束，罗马迈入世界性大国	时任执政官、恺撒姑夫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斗争拉开帷幕。苏拉通过军事政变迫使马略流亡，杀死护民官苏尔皮修斯。苏拉开始进军东方	执政官马略和秦纳控制罗马，报复苏拉派。恺撒伯父尤里乌斯被杀	马略死后，秦纳独裁	
地中海世界		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侵占比提尼亚、帕加马			米特拉达梯攻占罗马小亚细亚西岸行省，挑起雅典反抗。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开始（～前84）		苏拉攻占雅典，并于喀罗尼亚战役中大破本都军队，获得两次压倒性胜利	苏拉、米特拉达梯于达达尼尔和谈。苏拉转战小亚细亚，开始再度构筑其统治体系
中国		司马迁完成《史记》				汉武帝崩，汉昭帝即位（～前74）霍光摄政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84（16）	83（17）	82（18）	81（19）	80（20）	78（22）	77（23）	76（24）	75（25）	74（26）	73（27）
恺撒	恺撒父亲去世，在秦纳授意下，恺撒与秦纳之女科尔涅利娅成婚		苏拉命恺撒离婚，恺撒拒绝并逃往小亚细亚，加入行省总督米努修斯部队，任幕僚（～前81）		恺撒参与米努修斯的莱斯博斯岛战役	恺撒回国	恺撒筹备入律师界失败	恺撒为留学前往罗得岛，途中遭遇海盗			恺撒回国，出任祭司及大队长
国家罗马	秦纳被部下所杀	苏拉远征归国，联合梅特鲁斯·皮乌斯、克拉苏、庞培大胜正规军，扫除平民派。萨图纽斯逃往西班牙（～前82）		苏拉就任无任期独裁官，重建共和政体，进行国政改革	苏拉辞任独裁官	苏拉卒	雷必达起兵反抗苏拉体制，被庞培镇压				加普亚发生「斯巴达克斯之乱」
地中海世界					行省西班牙的塞多留战役开始（～前72）				庞培担任塞多留战役指挥		米特拉达梯再度进攻比提尼亚。卢库鲁斯出任奇里乞亚总督后，大败本都军队。开始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役（～前67）
中国										汉宣帝即位（～前49）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72（28）	70（30）	69（31）	68（32）	67（33）	66（34）	65（35）	63（37）	62（38）	61（39）
恺撒		恺撒出任财务检察官（或者是前69年），赴远西班牙。回国后任元老院议员		恺撒于姑姑——马略之妻的葬礼上发表大胆的追悼演说。妻子科尔涅利娅卒			恺撒出任监察官。自费修补阿皮亚大道工事，自费开展华丽的角斗比赛	恺撒在好友护民官拉比埃努斯的帮助下，成功出任大祭司。移居古罗马广场官邸。并与拉比埃努斯一起挑战元老院体制的强权	恺撒出任法务官。因第二任妻子庞培娅和克劳狄乌斯的暧昧关系，恺撒与妻离婚	恺撒赴远西班牙任行省总督，并任用当地人巴尔布斯征服大西洋岸
国家罗马	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斯之乱」。庞培自西班牙凯旋	克拉苏和庞培出任执政官			庞培名气急升			西塞罗出任执政官。「喀提林阴谋」时西塞罗、恺撒、小加图进行论战。阴谋失败后，3000人被杀	屋大维出生。庞培回国，元老院派感受到危机	庞培举行凯旋仪式
地中海世界	萨图纽斯被副将拉比留斯刺杀，战争终结	本都和亚美尼亚同盟成立。卢库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军队后，进入里海，后撤退	埃及托勒密十二世次女克娄巴特拉出生		庞培肃清地中海海域海盗，确立地中海全境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开始征讨米特拉达梯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役开始。庞培大破本都军队，与帕提亚、亚美尼亚建立同盟，进入幼发拉底河西岸。军事称霸叙利亚（～前63）	庞培入主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城	米特拉达梯六世自杀，战争结束。塞琉古王朝灭亡。叙利亚成为罗马行省。庞培征服东方诸城邦，将地中海全域纳入罗马霸权下		
中国	汉朝与乌孙夹击匈奴，大胜			霍光卒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60（40）	59（41）	58（42）	57（43）	56（44）
恺撒	恺撒回国，为次年执政官候补人选。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三头同盟」。开始改造国家的第一步	恺撒出任执政官。恢复执政官轮流执政制度，开始元老院日报制度，实施庞培提出的整编东方诸城邦提案，实行《尤里乌斯判例法》（《国家公务员法》）在元老院大会通过《尤里乌斯农地法》，打击了元老院派。调整负责行省税征收从业人员法案。帮助流亡意大利的埃及托勒密十二世（克娄巴特拉之父）复位。日耳曼人首领的成为「罗马的友好同盟」。将女儿尤利娅嫁与庞培。迎娶元老院议员皮索之女卡尔普尼娅为妻。强行通过《瓦提尼乌斯法》，出任北高卢、伊利里亚、南部高卢的总督。赴任途中安排小舅子皮索和庞培的左右手盖比尼乌斯出任次年执政官、克劳狄乌斯为护民官	高卢战役第一年。出任高卢总督，副将为拉比埃努斯。高卢的赫尔维西亚人被日耳曼驱逐，36.8 万人从瑞士列曼湖东侧转移到布列塔尼亚地区。12 万日耳曼人度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恺撒反对将赫尔维西亚人并入罗马行省。越过边境进入高卢。与埃杜伊人结盟。恺撒突袭索恩河岸的赫尔维西亚人，后获得比布拉克特战役大捷，与赫尔维西亚议和。赫尔维西亚 10 万人返回瑞士。应高卢人要求与阿利欧维斯图斯和谈但后来决裂。与阿利欧维斯图斯再度于贝桑松谈判决裂，展开战役，大败日耳曼人。将冬营地设在贝桑松，表明莱茵河成为罗马的基本国界防卫线	高卢战役第二年。进军高卢东北部，与雷米人结成同盟。对阵比利时的 29.6 万人大军、总指挥是苏威西翁内斯人的盖尔巴。恺撒越过埃纳河，在敌地构筑阵营并击溃比利时军队。进入现在的比利时境内，击败内尔维人。接着大破阿都阿提奇人，并俘虏 5.3 万人为奴隶。压制高卢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部族皆归顺恺撒，获得整个高卢地区的「和平」。将冬营地设在奥尔良	
国家罗马			小加图往塞浦路斯赴任。西塞罗遭到护民官克劳狄乌斯报复逃往希腊	由于庞培的消极、护民官克劳狄乌斯的过激、小加图归国、西塞罗被解除流放等，元老院派开始反击「三头政治」。庞培被任命掌管五年内的粮食。克劳狄乌斯的私警团开始对抗米罗的暴力组织	
地中海世界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55（45）	54（46）	53（47）
恺撒	高卢战役第四年。恺撒从德国西北部进军，直指莱茵河，击败日耳曼民族中的乌西佩提人和帖恩库贴利人。并于现在的波恩和科隆之间架设桥梁渡过莱茵河。征服西卡恩布利人和乌比人，分裂日耳曼人。恺撒军西移。第一次远征不列颠。横渡多佛尔海峡后，于不列颠（今英国）登陆。为随父出征赴叙利亚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配置1000名骑兵。将冬营地设置在亚眠。恺撒母亲奥雷利娅卒	高卢战役第五年。征服特雷维利人，第二次远征不列颠，以游击战击败不列颠军队。渡过泰晤士河，击败卡西贝拉努斯指挥的不列颠军队。接受不列颠议和后退回高卢。因高卢小麦歉收，冬营地分为8个分散各地。因伊布洛斯人的奸计，失去9000名士兵。涅尔维人联合阿都阿提奇人，及6万人比利时军队围困昆图斯·西塞罗冬营地。恺撒前往救援，击败敌军。恺撒首次在高卢过冬	高卢战役第六年。恺撒征服涅尔维人后，在巴黎召开高卢全体部落族长会议，迫使加努特斯人和歇诺内斯人臣服，从此确立了背后的安全保障。征服梅那庇人后，副将拉比埃努斯也征服了特雷维利人，军队合流再次渡过莱茵河。在莱茵河西岸构筑营地，屯兵6000人。北上莱茵河口，平定高卢东北部诸部落。在兰斯召开高卢全体部落族长会议，处死加努特斯人反对势力的首脑亚克。在现今德国西部和第戎边境和桑斯设置冬营地
国家罗马	「卢卡会谈」后，庞培和克拉苏就任执政官。《特雷波尼乌斯法》和《庞培—李锡尼法》。根据前者，庞培和克拉苏分赴西班牙和叙利亚行省，有权拥有10个军团的兵力，且任期为5年。根据后者，恺撒的任期可延长至公元前50年，也有权拥有10个军团。马尔斯广场的庞培剧场建设完成。克拉苏出发前往任职地叙利亚	恺撒女儿，庞培之妻尤利娅卒。恺撒命亲信布鲁图和奥比乌斯着手扩建古罗马广场。元老院派反击，第二年独占执政官两席。元老院派和「三头」派互相争斗，情势混乱	克劳狄乌斯派和米罗派的暴力斗争越发激化，克劳狄乌斯被杀，米罗逃往马赛。次年执政官由庞培一人担任
地中海世界		克拉苏远征帕提亚	克拉苏开始真正远征帕提亚。帕提亚王进攻亚美尼亚以牵制罗马军队，在沙漠大破罗马军队。青年克拉苏自杀身亡，克拉苏本人也在后来被杀。4万人远征军生还者不到1万人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52（48）	51（49）	50（50）	49（51）
恺撒	高卢战役第七年。加努特斯人杀害奥尔良的罗马人，举起反叛大旗。奥弗涅人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发出反对罗马的呼声，高卢中部各部落纷纷响应。恺撒从法国南部行省急行军前往高卢中部，于桑斯集合全部军队，压制叛乱。恺撒攻打格尔戈维未果，撤退。高卢中部的部落，集结反罗马，挑战恺撒军队失败，6万大军退守阿雷佐。恺撒构筑阿雷佐包围网，同时高卢援军20万到达。阿雷佐展开攻防战。韦桑热托里克斯被俘。恺撒在8个地方设置冬营地。恺撒在毕布拉克特营地越冬。恺撒发行《高卢战记》全七卷（第八卷由恺撒亲信希尔提乌斯执笔）	高卢战役第八年。作为阿雷佐战役的战后处理，恺撒征服诸部落，并前往阿奎塔尼亚视察。开始着手「将高卢罗马化」。将行省税从「什一税」改为「定额税」。恺撒在高卢北部的阿拉斯设置冬营地	高卢战役第九年。作为阿雷佐战役的战后处理，恺撒征服诸部落，并前往阿奎塔尼亚视察。开始着手「将高卢罗马化」。将行省税从「什一税」改为「定额税」。围绕着解散恺撒军团的命令，恺撒派的新护民官安东尼和元老院派持续进行政治抗争	恺撒于夏天返回北意大利行省。元老院派试图拉拢恺撒左右手拉比埃努斯。执政官由元老院派的盖乌斯·马尔凯鲁斯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斯出任。次年由马克弟弟和雷托鲁斯出任。恺撒则以时任护民官、年轻的库里奥对抗元老院派。11月，假传「恺撒10个军团正朝罗马南下」，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授权庞培为总司令迎击恺撒。
国家罗马	庞培一人就任执政官。元老院要求在增加一位执政官，梅特鲁斯·西庇阿当选。庞培迎娶西庇阿之女为妻。庞培成为元老院派，次年通过《行政官法》、《庞培行省总督法》、《庞培的西班牙行省总督任期延长案》的强化反恺撒体制	西塞罗发表《论国家》		
地中海世界		克娄巴特拉和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埃及		8月11日，库里奥率领罗马军队在北非行省登陆。20日于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一战，2万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库里奥战死。为夺取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小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也于达尔马特亚完败于庞培将领黎波之手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48（52）	47（53）	46（54）	45（55）	44（55）
恺撒				1月安东尼出任另一个执政官席位。恺撒正式宣布未来两年征服帕提亚计划。2月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通过决议，任命恺撒为终身执政官。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会议场所庞培回廊被马库斯·布鲁图、卡西乌斯等暗杀。3月16日恺撒遗嘱被公开，屋大维（当时年仅18岁，是恺撒甥孙）成为恺撒第一指定继承人及养子，并继承恺撒家族姓氏。克娄巴特拉及其与恺撒之子「小恺撒」离开罗马返回埃及。3月17日安东尼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并未追究暗杀者们的刑事责任，人事安排及政治路线仍按照恺撒遗愿进行。3月18日恺撒火葬。民众群情激奋。暗杀集团成员布鲁图、卡西乌斯、西塞罗等于19日早逃离罗马	庞培儿子格涅乌斯、塞克斯图斯及拉比埃努斯、瓦罗等反恺撒派于西班牙行省再度发起动乱。恺撒出击西班牙，3月17日开始的孟达会战，在经过激烈战役后大破庞培余党。拉比埃努斯战死，格涅乌斯被杀。恺撒确立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开始着手巩固民生，走向帝制的全面改革。•北意大利行省按照计划获得罗马公民权，授予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行省居民们拉丁公民权。•将元老院议席增加到900人，削弱公民大会和护民官的实权。•固定金银的兑换率、设定利息的上限。•增加法务官、财务检察官、监察官的席位，将同位执政官变为辅助职能。•修正地方议会的被选举权，允许解放奴隶们获得公职。•重新整理行省、承认行省议会、设置公家的征税机关。•规定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三位为罗马的主神。•重新启用《森普罗尼乌斯法》废除元老院终极决议，调整陪审员资格。•将获得低价配给小麦的人口减至15万，并设置两名财务检察官。•将失业人口和退伍老兵分散到各个行省，重兴迦太基和科林斯。•授予教师和医生罗马公民权。•重建首都。修建恺撒神坛、翻新古罗马广场、拆掉塞尔维乌斯城墙等。•进行将街道设备延长等公共事业	1月恺撒在北非行省东岸登陆并构筑营地。4月6日恺撒在塔普苏斯会战中大败西庇阿军，紧接着追击努米底亚国王尤巴。尤巴自尽，西庇阿和亚弗拉尼乌斯被杀。小加图自杀（4月21日）。4月13日恺撒入乌蒂卡城。恺撒视察撒丁岛和科西嘉岛。7月25日返回罗马。8月5日开始举行为期四天的凯旋仪式。恺撒开始着手改革。规定太阳历并与次年公元前45年1月1日执行。成立国家造币机构，从元老院手中夺取了造币权。出任任期为10年的独裁官	2月末多米提乌斯率援军抵达亚历山大港，恺撒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役中取得胜利，托勒密十三世战死。3月27日恺撒入亚历山大港城。克娄巴特拉和最小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开始共同统治埃及。恺撒完成《内战记》的前三卷。6月恺撒自亚历山大港出发，支援在小亚细亚败于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之手的多米提乌斯。途中重新构筑了对犹太、叙利亚和奇里乞亚的统治。6月末恺撒在小亚细亚登陆，于卡帕多西亚地区的泽拉击败法尔纳凯斯（我来，我见，我征服），恺撒掌握了希腊。9月末恺撒回到布林迪西。再度与西塞罗相见，并宽容地对待他。恺撒凯旋，并出任以五年为任期的独裁官，纠正安东尼代理统治期间的失政。12月为压制北非行省的庞培余党19日进入突尼斯的马尔萨拉，27日从该地出发	1月4日，恺撒自布林迪西出海，翌日于希腊西岸登陆。恺撒军与庞培军于都拉斯南部对峙。3月27日安东尼率领第二梯队从宁法姆登陆。4月3日与恺撒会合。都拉斯包围战从4月15日起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恺撒军败。恺撒退到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庞培率军追击。7月29日恺撒达到法萨卢斯平原，准备迎击与西庇阿会合的庞培大军。8月9日法萨卢斯会战开始。庞培军完败，庞培逃往爱琴海，试图在埃及东山再起。恺撒一边狙击庞培一面任命安东尼为独裁官协理——「骑士团长」——处理国内事务。9月28日庞培及同行的雷托鲁斯在亚历山大港被罗马士兵所杀。10月4日恺撒登陆亚历山大港。10月7日裁定内乱中的埃及由克娄巴特拉和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10月中旬托勒密十三世率军攻击恺撒军队，亚历山大港战役拉开帷幕。12月多米提乌斯被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击败逃往叙利亚
国家罗马					
地中海世界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44（55）	43	42	41		40
国家	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屋大维	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罗马	安东尼立刻安排亲信补任恺撒生前的职务，任雷必达为大祭司，多拉贝拉与自己一道成为执政官。4月中旬屋大维自希腊的阿波罗尼亚回国。7月屋大维主办纪念恺撒的盛大竞技会。8月在安东尼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安东尼安排了以下几行省的总督人选：安东尼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多拉贝拉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库斯·布鲁图、卡西乌斯在公元前44年末前分别就任马其顿、叙利亚行省总督。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前往任地就职，实际上是以公开的名义逃往国外。9月西塞罗开始了著名的弹劾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之辩》。10月，军队大部分势力均表示支持屋大维，为了掌握更多的兵力，安东尼攻击掌管北意大利行省军权的德奇姆斯·布鲁图	支撑屋大维的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出任执政官。3月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一同讨伐正在北意大利行省摩德纳与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安东尼，安东尼撤退。两位执政官战死，德奇姆斯·布鲁图被杀。8月屋大维被选为执政官（另一位执政官是恺撒的外甥佩提乌斯）。屋大维正式成为恺撒养子，改名「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提出《佩提乌斯法》正式追捕刺杀恺撒者。安东尼在法国南部行省与高卢、西班牙行省总督结成共同战线。10月屋大维进军北意大利行省。11月，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在博洛尼亚城结成「后三头政治」。27日公民大会对该同盟及其五年期限予以通过。寡头政治至此完全解体。11月28日，以西塞罗为首的「黑名单」正式形成，罗马掀起了肃清的暴风雨。12月7日西塞罗被杀	一月一日元老院通过将恺撒升为「神」的决议。屋大维将恺撒著作销毁，仅留《高卢战记》、《内战记》。夏—秋，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合军出兵希腊，于腓立比大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联军。布鲁图与卡西乌斯自裁。腓立比战役后，屋大维和安东尼以东西为界分别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屋大维转向罗马世界的西半部，安东尼回到东半部	秋天，安东尼的弟弟路奇乌斯与妻子富尔维娅于意大利中部贝鲁吉亚举兵。屋大维和「左膀右臂」阿格里帕为镇压动乱艰苦作战	东部诸侯归顺后，安东尼继续行军，与行省奇里乞亚的首付塔鲁苏斯传召埃及女王。秋天，安东尼受邀造访亚历山大港，与克娄巴特拉确立情人关系	2月末贝鲁吉亚战事结束。富尔维娅和路奇乌斯逃往希腊。安东尼将动乱的责任全部转嫁给富尔维娅。屋大维启用梅塞纳斯负责外交。	安东尼回到意大利，克娄巴特拉产下两人孩子（双胞胎）	屋大维迎娶塞克斯图斯表妹司克里波尼娅（不久离异），生下屋大维唯一骨血（女儿）尤利娅。
地中海世界	克娄巴特拉回到埃及，杀掉托勒密十四世，与小恺撒共同统治埃及			布鲁图在马其顿、卡西乌斯在叙利亚集结了10万兵力准备战斗。卡西乌斯将前往叙利亚赴任的多拉贝拉杀死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签订《布林迪西协定》，将罗马的西部、东部、非洲划定给各自的势力范围。安东尼与屋大维姐姐屋大维娅再婚。秋，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在西班牙行省再度崛起，并扩大到西西里岛。屋大维、安东尼和塞克斯图斯三人在那不勒斯湾的墨西拿海峡签订《墨西拿协定》。根据协定，塞克斯图斯停止敌对活动，屋大维允许塞克斯图斯党成员恢复公职，将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三岛的统治权让渡给塞克斯图斯。

年代（公元前）	38	37		36	34	33	32		31	30
地中海世界	1月，屋大维与克劳狄乌斯·尼禄之妻莉薇娅再婚，并将尼禄与莉薇娅之子提比略（后为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杜路苏斯收为养子。继续与塞克斯图斯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将塞克斯图斯毙于莱斯博斯岛	屋大维		屋大维与阿格里帕共同一心压制伊利里亚地区动乱	屋大维召集元老院会议，会上通过后「三头政治」同盟解体，及安东尼的亚历山大港宣言无效的决议。	秋，屋大维为纪念伊利里亚战役凯旋修建尤利娅水道，建设屋大维回廊，修补公共建筑。安东尼遗嘱公开，指定自己死后葬于亚历山大港。屋大维开始其宣传战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秋，屋大维被整个意大利推举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总司令」，开始在意大利进行备战。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以弗所以及希腊备战	3月，屋大维率大军渡河抵达希腊。夏，安东尼·克娄巴特拉军队的将士相继叛逃。9月2日大决战「亚克兴角海战」拉开帷幕。战败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相继逃往亚历山大港。屋大维追击的同时再度构筑罗马对沿途的统治	7月31日，正与屋大维军战斗的安东尼军队将士叛离。安东尼自裁，次日死亡。8月1日，屋大维入主亚历山大港城，杀小恺撒。克娄巴特拉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屋大维凯旋，返回罗马。罗马进入帝国时代
国家罗马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安东尼率领11万大军出征帕提亚。8月帕提亚和中东联合军用游击战术消耗安东尼军队力量。11月安东尼大军撤退安提阿	春，安东尼远征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与之议和。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举行凯旋仪式，并宣布小恺撒为埃及国王，自己与克娄巴特拉所出三子拥有对东方诸城邦的统治权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留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				
中国			秋，安东尼出发远征帕提亚，与克娄巴特拉于叙利亚的安提阿再聚。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正式成婚，并认可双胞胎			汉成帝即位（~前7）				
日本	弥生时代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V

恺撒时代（下）

[日] 盐野七生◎著　谢茜◎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我不是国王，而是恺撒！”

他征服高卢，踏上英伦，越过卢比孔河
他在社会重重危机中，将个人推向巅峰
他明知遭遇暗杀命运，仍全速推进改革
他开启了罗马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

他注定不朽，却是时代不能理解的孤独者

5

王　石　王　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日）盐野七生著；谢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86–3245–2
I. 罗… II. ①盐… ②谢… III. 古罗马——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1675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Ⅴ : Julius Caesar Rubicon Igo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6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
LUOMA REN DE GUSHI WU : KAISA SHIDAI（XIA）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谢茜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

[日] 盐野七生 著
谢茜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铜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序
第一章 壮年后期 Virilitas
第二章 “3·15事件”Idus Martiae
第三章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结盟对付屋大维
结语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得到这枚银币花了我整整10年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印有恺撒侧脸的硬币数量非常之少。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到被暗杀，其间一共经历了6年时间。公元前46年恺撒举行了同时庆祝内战和高卢战役胜利的凯旋仪式。在此前内战的4年时间里，恺撒并不是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而在他将绝对权力握于手中之后，不到两年就被暗杀了。因此，与奥古斯都执政40年可以享受到的权利相比起来，恺撒能够制造银币的时间并不多。

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在2000年后的现代，恺撒的崇拜者也多不胜数。银币只要一拿出来拍卖，立即就被抢购一空。而且买到银币的人绝对不会轻易脱手，这就令得到这枚银币变得非常艰难。也正因为如此，这枚印有头戴帝王桂冠的恺撒货币，虽然是银制的，价格却比印有奥古斯都模样的金币还要贵上3倍。即使这样，最后我竟然也有幸得到了一

枚，也就是在这里介绍的这枚。它的正面印着罗马帝国实际上的创始人——相貌堂堂的恺撒，背面印着尤里乌斯一族的守护女神维纳斯。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虽然雕刻着“BRUTUS”字样，但银币上的肖像并不是暗杀恺撒的布鲁图。因为公元前1世纪时的罗马精英们都流行剃光胡须，所以即使刻有“BRUTUS”字样，这个也不会是因暗杀恺撒而闻名历史的公元前1世纪那个布鲁图。他倒有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确立罗马共和制的，笔者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介绍的那位路奇乌斯·布鲁图。虽然两者并无血缘关系，但500年后的布鲁图还是把这位前辈作为真正思想意义上的祖先。在暗杀恺撒成功后，他特地在发行的纪念银币上刻着路奇乌斯·布鲁图，而不是自己的肖像。公元前6世纪确立的共和政体，虽然在公元前1世纪得到再兴，但仅仅两年就失败了。因为他们虽然消灭了恺撒的肉体，却无法清除恺撒的精神。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铜币故事

有一类人，自身也许并无独创的见地，却能将前人的构想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扬。在笔者看来，这也不失为一种能力。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正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里介绍的铜币是屋大维发扬恺撒统治思想——“货币是统治的最好宣传”——的产物，也是证明屋大维拥有上述能力的典型例子。货币正面刻有恺撒和屋大维两人的侧面头像。恺撒头像一侧刻有代表“神君”之意的单词“DIVI”，屋大维头像另一侧则刻有代表神君之子意思的单词——“F·DIVI”。货币背面刻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海战中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联合军队时所乘船只的画像。正面的恺撒之子，表明屋大维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背面的船只则表明自己拥有统治的实力，即有“名”有“实”之意。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借由这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货币向民众加深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印象。

盐野七生

2004年6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序

我住在佛罗伦萨期间，结识了一位朋友，他曾任佛罗伦萨警署调查科科长。不同于一般意大利人对公众事务的冷漠，他可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公仆。经历过与黑社会及绑匪的无数周旋，调换过若干工作地点，目前他担任北意大利中型城市帕多瓦的警署署长。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他任职佛罗伦萨警署时。他到我家来，看着我的书架说："我突然很想知道一些有关恺撒的事，能不能在此类书中挑一本给我？"于是我选了足有5厘米厚、研究近现代罗马史颇负盛名的杰罗姆·卡尔寇比诺所著的《恺撒传》借给他。

大约一个月后，他归还此书，我请他谈谈读后感想。他没有多言，却对我说：

"要是我能与恺撒生于同一个时代，他就是我最想见到的人。"

"那么如果真的见面的话，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呢？"

"我会拜托他让我在他指挥的军团中担任哪怕是一名百人队队长！"

世人认为恺撒是受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其实这位非凡的人物虽然拥有许多优秀品质，但并非毫无缺点，他甚至有过不道德的行为。

尽管如此，不论率领何种军队，他都会是胜利者；不论生于何种国度，他都将是领导者。

——孟德斯鸠

我并不清楚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史的具体架构，但在《列传》中描写的诸位英雄皆为政治家。当然在作者普鲁塔克眼中，并非从什么是政治家型人才这类的现代思考着眼，他只是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即具有道德意识、精力充沛且勇于行动的人皆可为政治家……

政治既非职业也非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充分展现个人全部的生活经验……

“参与政治”、“漠视政治”等繁杂不清的字眼，对于身处于《列传》时代、有教养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如果能够重新思考这一点，也未尝不是好事。

——小林秀雄

要成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五种特质：智慧、说服力、忍耐力、自控力和坚强的意志。唯有恺撒拥有全部的特质。

——意大利普通高中使用的教科书

深谙人性弱点的莎士比亚，也无法探知尤里乌斯·恺撒等英雄人物的伟大。《李尔王》虽堪称杰作，《恺撒大帝》却并非佳品。

——萧伯纳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尤里乌斯·恺撒

第一章

壮年后期 Virilitas

（前49年1月——前44年3月，恺撒50—55岁）

越过卢比孔河后

从卢比孔河到国境边的小城里米尼，直线距离不过15公里，以罗马军团5公里时速的行军速度，大约早上10点就能到达。本为意大利北部行省的里米尼虽说是意大利与罗马本土的分界点，却早在150年前就已经罗马化，因此罗马中央政府在此只布置了一支不到600人的警备队。当恺撒率领第十三军团到达时，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入城了。身为护民官不能出国境的安东尼与另一位护民官卡西乌斯正在城中等待恺撒军队，而与安东尼一起逃离首都的库里奥，凭借元老院议员可自由出入国境的特权，很快就与恺撒在拉文纳会合，并跟随恺撒一道渡过了卢比孔河。

尽管恺撒近乎零损耗地入了城，但此时他手上只有第十三军团中的10个大队，由于无法补充兵员，原本6000人规模的大队，实际不过只有4500人左右。庞培和元老院派没想到恺撒如此果断敢为，竟然以如此疲弱的兵力，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冒着严冬率兵穿越卢比孔河。（罗马法律规定，任何指挥官皆不可带着军队渡过卢比孔河，否则就是背叛罗马。——译者注）恺撒完全出乎了对手的预料，当机立断、义无反顾地迅猛出击。

恺撒将5个大队的兵力——相当于其一半兵力——交给安东尼，命令他率兵越过亚平宁山脉，进攻阿雷佐。将3个大队交给刚归来的库里奥，命他率兵进攻分布在亚得里亚海南部周围的佩扎罗、法诺和安科纳。自己则率领剩下的2个大队驻守里米尼。这个安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占领阿雷佐意味着控制了首都罗马以北的主线路卡萨亚大道街道，占领佩扎罗、法诺和安科纳意味着罗马以南的主线路阿皮亚大道尽在掌握之中，而驻守里米尼则是控制了另一条前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弗拉米尼亚大道。

33岁的安东尼和年龄相仿的库里奥都没有辜负恺撒的信任。在渡过卢比孔河、进驻里米尼的当晚，也就是1月12日，恺撒就收到捷报：库里奥率领的3个大队已攻占30公里以南的佩扎罗。第二天接着传来占领法诺的消息。第三天拿下了百公里外的安科纳。第四天，安东尼率领的5个大队也顺利地攻下阿雷佐。恺撒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庞培的事先毫无防备和事后的迟缓应对。而被攻占城中的民众，对早已在高卢战争中声名显赫的恺撒表现出了无比狂热的拥护，不仅不抵抗，反而热烈欢迎恺撒军的到来。恺撒迅速地掌握了卡萨亚、弗拉米尼亚以及罗马南面的交通要道，由此，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发，恺撒军都能在三天内直达首都罗马。

《内战记》中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前后内容的推测，大约在1月15日前后，恺撒正在里米尼等待安东尼和库里奥战报时，迎来了传达元老院决定的两位罗马公使。元老院的决议大意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才来，是因为你的每一步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个决定出台时，恺撒尚未发动进攻，对于庞培和元老院贵族们而言，这或许是通过正式程序警告恺撒的好时机。然而恺撒的迅速出击，使得这个带恐吓性质的决议成为了一个笑话，原本应当在卢比孔河以南的拉文纳（国境外）提出的控告，现在出现在了卢比孔河以北的里米尼（国境内）。

两位公使一位是现任罗马法务官罗西乌斯，另一位是恺撒年轻的堂弟但归顺了庞培的路奇乌斯·恺撒，这两人带给恺撒的是1月7日元老院会议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内容是：命令恺撒解散军队立刻回国，如果恺撒不服从命令，那么即刻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恺撒为国家的公敌，并将其手中权力移交给庞培。阿赫诺巴尔布斯接替恺撒成为高卢总督。除了元老院的公开决议，堂弟路奇乌斯还带给恺撒一封庞培的亲笔密信，大意是：

自己已经决定接受恺撒的军事指挥权，但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和恺撒的私人恩怨，而是出于对公众的责任。本人一向是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私人关系之上的，希望恺撒也能够顾及目前的地位和尊严，从公众的角度考虑，为了国家摒弃个人的嫌怨，免得满腔怒火伤害敌人时也伤害到国家。

位居独裁官之尊的庞培写下的这封密信，其口吻完全是在以一个资历深厚的长者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但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办法。针对庞培来信，恺撒写了一封回信，大意为：以庞培为榜样抛开私人恩怨，怀着公共责任的崇高理想，把罗马从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嘱托罗西乌斯和路奇乌斯转交。按照恺撒的写作习惯，他在信中将自己“拯救罗马”的建议进行了分项列举：

第一，庞培必须前往就职地西班牙。

第二，庞培和恺撒都解散各自的军队，意大利实现非军事化。罗马恢复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即不以武力威胁公民，公民可以自由地参加公民大会，一切政治活动恢复正常。（而一旦政治体制回到正常程序，庞培和元老院就必须认可恺撒的候补执政官职位。）

第三，如果庞培对以上建议感兴趣，双方可以进一步磋商实施细节，并以合同形式立约。因此，庞培有必要前往恺撒所在地，或者恺撒前往庞培所在地进行会谈。

第三条提议被称为“卢卡会谈”。这个重新以首脑会谈形式解决冲突的提案，印证了10年前的“三头政治”体制并不是恺撒的一时兴起，也成为恺撒的反对派们最为诟病的一点。

带着这封回信，两位公使从里米尼出发迅速地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赶回罗马，然而等他们到达首都之后，并没法把信交给任何人了，因为庞培和当任两位执政官以及多数元老院贵族们早已逃离了罗马。

庞培放弃首都

就在庞培派两位公使前往恺撒所在营地后，罗马剧变骤临，种种意外纷至沓来。

先是传来恺撒率领军团渡过卢比孔河进驻里米尼的消息，接着又收到恺撒军团陆续占领佩扎罗、法诺、安科纳、阿雷佐的战报。罗马向来有非战时不设防的传统，所以当恺撒大军进攻消息传到罗马，在罗马的庞培及两位执政官手中却无兵无将，而另一位元老院推选的恺撒继任者——阿赫诺巴尔布斯则远在南意大利招募军队。

庞培之前认定恺撒不敢违反法律渡河，悠哉地在罗马等待恺撒的回信。而当恺撒军队突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庞培只能舍弃罗马，逃往有两个军团兵力驻守的加普亚。正当庞培的两位公使带着恺撒的回信一路快马加鞭地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时，1月17日，庞培放弃了首都罗马。

被恺撒强势渡河及其后续雷霆攻势吓得望风而逃的，绝非庞培一人。两位彻底的恺撒反对派——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在“靠山”庞培撤离之后的第二天，也赶紧逃离了罗马。此外，在庞培“继续留在罗马将视作亲恺撒派予以惩罚”的威胁下，许多元老院的议员也随庞培撤离。这些放弃罗马的人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30年前苏拉进攻罗马的情形：贵族们都在动员家眷、驱赶奴隶，为撤离作准备，家里情形混乱不堪；为了装载大量的行李物品到处搜集拖车，又使整个罗马混乱不堪。这些逃亡的人，名义上是难民，实际上全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0
100
200km
N
阿奎莱亚
维罗纳
帕多瓦
波河
艾米利亚大道
皮亚琴察
博洛尼亚
拉文纳（1月12日）
卢比孔河
里米尼（1月12日）
佩扎罗（1月12日）
法诺（1月13日）
安科纳（1月14日）
奥西莫（2月3日）
费尔莫（2月5日）
阿斯科利皮切诺（2月15日）
佛罗伦萨
比萨
亚诺河
阿雷佐
（1月15日）
古比奥
（1月20日）
卡萨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波普罗尼亚
奥勒留大道
台伯河
瓦勒利亚大道
亚得里亚海
科菲尼昂（2月15日—2月21日）
罗马
（1月17日）
拉蒂纳大道
阿皮亚大道
卢克利亚
坎尼
福尔米亚
加普亚
（1月22日）
那不勒斯
恺撒
（3月9日—19日）
布林迪西
塔兰托
庞培
（2月25日—3月17日）
第勒尼安海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卡拉布里亚
西西里岛
地中海
恺撒的进攻路线
庞培的撤退路线

越过卢比孔河后恺撒的进攻路线和庞培的撤退路线

执政官也只想着运送自己的财产，等想到国库中还有大批物资需要运送出城时，整个罗马已经没有可以用的拖车了，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把车捐献出来。两位执政官也丝毫没有为国库物资的运送问题减慢自己出逃的速度。他们匆匆而去，留给守城者的只有一道“设法将物资运出城”的命令。

阿皮亚大道往南的路上，出逃的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们拖家带口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首都罗马早被他们抛在身后。公元前49年1月18日，在恺撒大军渡河后的第六天，在恺撒攻下卡萨亚大道、弗拉米尼亚大道、瓦勒利亚大道，控制了从北到西进入罗马的交通要道后第三天，在庞培弃城后仅仅一天，罗马“沦陷”了。而由于找不到可以运送物资的办法，以及原本负责运送物资的官员们集体出逃，国库物资仍完好无损地留在了罗马。

高级官员的集体出逃行为，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误，不如说是政治决策上的错误。

首先，作为比恺撒职务高级的执政官们，不仅没有留守都城尽全力抵御，反而主动放弃了抵抗和指挥权，这无异于主动放弃了正统政府的地位。

其次，罗马的公民，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的投票主体，都认为庞培和支持他的元老院贵族放弃了他们，这无异于失去了民心。

两位公使回到罗马，发现执政要员们都走光了，也赶紧沿路去追赶庞培。当他们沿着阿皮亚大道在加普亚追上庞培和两位执政官时，已经是1月23日了。除他们两位外，恺撒以前的副将拉比埃努斯也到达加普亚投靠庞培。这位恺撒的“左膀右臂”的投诚，让庞培喜出望外。有一个

人却让庞培备感头疼，那就是西塞罗。西塞罗虽然跟庞培一起逃离罗马，但他对庞培的态度很是模糊，沿着阿皮亚大道行走两天后，就停留在途中的福尔米亚城别墅。西塞罗和庞培都是56岁，因此以年龄为理由拒绝逃徙大概是行不通的。但西塞罗不愧是西塞罗，在半路他想出了这样一个“中途下车”的办法。

而恺撒这一方，在回信提出解决建议后，军事行动速度却丝毫未见减慢。1月20日，库里奥率领3个大队攻下安科纳之后，杀入内陆直奔古比奥城。从里米尼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到达法诺，就进入了直达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而古比奥城是这个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的军事要地。掌握了古比奥城，意味着不论是从弗拉米尼亚大道还是卡萨亚大道，恺撒大军到达罗马都只需两天时间。

但恺撒并没有挥师入都，他早就接到线报，知道庞培和执政官们已经逃离都城。于是，恺撒又一次抢先行动。

恺撒从一直坐镇的后方司令部里米尼出发，由于不准备前往罗马，所以没有取道库里奥控制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在命令库里奥前往与安东尼会合后，自己亲率军队经由库里奥控制的佩扎罗、法诺、安科纳向亚得里亚海的南部进发。在安科纳，恺撒收到了庞培的回信。

庞培的回信，与其说是庞培的个人意愿，倒不如说是他身边保守的执政官及元老院派的集体意志。信的内容大致是：

一、恺撒军队即刻从所占城池撤退，率军退回卢比孔河以北，在那里解散部队，交出兵权。

二、在上述事项完成前，庞培及元老院派会继续增强军事力量。

三、但上述事项完成后，恺撒会当选为候补执政官，并在首都为其举行凯旋仪式。

四、一切完成之后，庞培离开首都，前往任职地西班牙。

虽然是匆忙逃离，但庞培团体在信中依然语气强硬，对元老院派仍是现行体制的中坚力量以及“元老院最终劝告”仍然是现行体制的尚方宝剑，这两点深信不疑。但对恺撒而言，信中所言事项是他无法接受的。

首先，在恺撒看来，之前在信中提出的两方会谈提案完全被庞培派无视了。其次，元老院派坚持只让恺撒一方解除兵权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再次，虽然规定庞培要离开首都，前往西班牙，但是没有规定出发的具体时间。这说明庞培仍然可以保持现有兵力继续住在国内。如果接受这些条款，那么冒险渡过卢比孔河对恺撒而言就是做了一次无用功，在庞培和元老院派眼里，这也只是一个狗急跳墙的行为。因此，这封信的到来，反而更加坚定了恺撒继续攻打的决心。

2月3日，恺撒率军亲征。他从安科纳出发，进入南面10公里外的奥西莫。奥西莫往南，是庞培的行省，也是“宗主”庞培的“藩属”家族聚集地。恺撒亲率军队南下的目的，除了想抢在前头拦截庞培外，也想借机摧毁庞培赖以招募人员补给的地盘。

庞培确实也打算回到自己的地盘。在给恺撒回信后，庞培舍弃了路程短且较为安全的阿皮亚大道，取道亚得里亚海附近的卢克利亚。但是恺撒的快速攻势，完全打乱了庞培的原定计划。

自傲的恺撒，认定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足可以一抵百，因此早就将手中的5个大队和另3个大队分别派给了安东尼与库里奥，而身边只留下了2个大队。由于安东尼和库里奥都没有追上，因此进入庞培根据地时，恺撒身边只有大约900人兵力。

从庞培落后的准备看来，恺撒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如果庞培自1月17日逃离首都时，就派人在行省开始重新招兵买马

的话，恺撒的进攻或许就不能如此轻松，但庞培没有这么做。他的迟缓行动，不仅在后来没法组织起兵力，也让一直支持他的“藩属”感到被抛弃的绝望。

接下来，庞培启用了他一手调教出来的两位大将拱卫根据地的大门奥西莫城。这两位大将，一位是担任过非洲行省总督的特雷特易乌斯·瓦尔洛，一位是原百人队首席队长，曾追随庞培参与东方战役的路奇乌斯·普比。在庞培未下令之前，两位大将就意识到了事态紧急，已经开始自发地招募士兵。但那时正值隆冬，两人都没预料到恺撒敢在冬天跨过卢比孔河。

当恺撒突然出现在奥西莫，不仅两位大将，连城中的百姓都大吃一惊。百姓们认为从形势上看，庞培是靠不住了，因此选出代表前去与两位守城大将交涉。百姓们主要认为：庞培和恺撒之间的争斗孰是孰非自己判断不了，但是不能将在高卢战役中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恺撒拒于城门之外。

瓦尔洛和普比是明白民心向背的，于是他们带了刚刚招募的士兵就匆匆离城了。恺撒自然不会任由他们逃走，两位将军手下的士兵们只有少数稍作抵抗，随后便被全部俘虏。

恺撒让被俘的他们自由选择去向，大多数士兵是临时加入军队的，因此最后都选择了解甲归田，而也有部分人愿留在恺撒军中效力。后来恺撒并没有记录这次留用的具体人数，或许是因为这个数目并不多吧。恺撒也给予了瓦尔洛和普比自由选择权，两位由庞培一手调教的守城将军，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庞培的身边。

为什么恺撒这次处理俘虏的方式和高卢战役中完全不同呢？或许是因为这次对着的是自己的同胞。恺撒兵不血刃入城后，立刻召集了奥西莫城的百姓，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离奥西莫不远，有个叫钦库利的村庄，是恺撒原“左膀右臂”拉比埃努斯的故乡。平民出生的拉比埃努斯在出仕后，总是带着一份“衣锦还乡”的情怀，将自己的财物捐给村里。钦库利的百姓听说了恺撒宽厚对待奥西莫之后，也派了代表与恺撒商谈。钦库利的代表转达了归顺恺撒的意愿，恺撒则希望钦库利能够为自己提供兵力援助。其实恺撒也知道，钦库利只是一个小村庄，并不能提供太多士兵，他这么做，不过是对背叛者拉比埃努斯的一次报复。所以恺撒没忘记写下这么一句话：

“他们信守诺言，把士兵送来了。”

两天后，也就是2月5日，恺撒率军进入了奥西莫南面40公里外的费尔莫城。离庞培的地盘越来越近了。

此时，格里亚冬营地的第十二军团——恺撒在过卢比孔河之前招募的两个军团其中之一——经过长途跋涉已与他会合了。于是恺撒率领着一直跟随他的第十三军团和刚到的第十二军团向阿斯科利皮切诺进发。有10个大队拱卫的阿斯科利皮切诺是庞培行省的中心城，也是庞培派的雷托鲁斯——公元前57年的罗马执政官——所驻守的要地。恺撒为了攻打这个地方，才舍弃沿海平坦的道路，改走内陆路线。

然后事情却出奇地顺利。雷托鲁斯收到恺撒逼近的消息，赶紧逃走了。他原本想带着驻城的10个大队离开，但大多数的士兵不愿意逃离，最后只带走了几十个人。逃跑途中，他遇上了庞培派来支援的维布里乌斯·鲁弗斯。鲁弗斯将雷托鲁斯身边的士兵收编到自己麾下，却任由雷托鲁斯逃走了。

被恺撒逼近的消息吓走的，不只是雷托鲁斯一个。6个大队里的士兵、刚招募到的士兵，乃至去招兵的官员，都有人逃走。面对军队建制混乱，鲁弗斯只好把13个大队重新收编，带着他们前往科菲尼昂。此时，接替恺撒成为高卢总督的阿赫诺巴尔布斯早已率领20个大队，按照原计划到达了科菲尼昂。庞培派终于要在离罗马不到两天路程的瓦勒利

亚山脉中的小城科菲尼昂，对恺撒进行大规模的还击。

庞培这边有33个大队，规模相当于他手中3个军团中的一个军团。而正向科菲尼昂逼近的恺撒的兵力也不差，有自卢比孔河时期就跟随他的第十三军团，有从高卢赶过来的第十二军团，加上在之前各战役中的降兵以及招募的新兵（具体数目是多少，恐怕连恺撒自己都不清楚）。总之，等恺撒率领着训练有素的2个军团和不确定数量的新兵赶到科菲尼昂时，已经是2月15日了。此时已经进入真正的寒冬时节。不过，对于冬天曾在北方高卢打过仗的恺撒部将来说，意大利南方的冬天并不怎么可怕。所以一进入科菲尼昂，恺撒的官兵就开始为构筑工事忙碌起来。

“科菲尼昂”开城投降

正在城中等待与恺撒军团决一死战的阿赫诺巴尔布斯，内心忐忑不安。他对自己能否以33个大队阻挡恺撒进攻没有信心。而此时，接到恺撒命令、从高卢北部跋山涉水而来的第八军团，已经进入了意大利境内。一旦他们会合，恺撒手中的兵力就将达到3个军团，将近30个大队。攻守双方的兵力将旗鼓相当。

担忧的阿赫诺巴尔布斯急忙向庞培要求增派援军，此时庞培正在科菲尼昂南面120公里外的卢克利亚。庞培手中有两个从恺撒手中收编过来的军团，加上新招士兵，大约有30个大队。原本阿赫诺巴尔布斯认为自己的30个大队，加上庞培的30个大队，如果分进合击、左右夹攻恺撒，那就胜券在握了。

但是，庞培在得知恺撒逼近科菲尼昂后，准备将北上支援的行军路线改成南下，开往科菲尼昂南面60公里的坎尼。被蒙在鼓里的阿赫诺巴尔布斯正精神振奋地在城中积极备战。他不仅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还对

士兵们许下诺言，战争胜利后，每个人都可以从他在南意大利的行省分得约15公顷的土地。

恺撒的军队从2月25日抵达后，积极进行进攻准备，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个插曲。科菲尼昂10公里外的斯尔摩那居民，被庞培7个大队兵力驻守无法投奔恺撒。他听说这个消息，立刻派了安东尼带5个大队前往。斯尔摩那的居民听到恺撒的部队来了，即刻开城欢迎。最后连庞培安排的7个守城大队的士兵也加入了欢迎队伍，他们的指挥官成了安东尼的俘虏。两位俘虏当天被安东尼带回了恺撒营地，随后被恺撒释放。恺撒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斯尔摩那城，还收编了庞培留在城中的7个大队。

恺撒军队依然积极准备攻打科菲尼昂，准备工作包括构筑围攻线和筹集军粮。自发动内战以来，恺撒一直禁止掠夺等扰民行为，因此军粮的筹集也是出资向百姓购买。

就在准备工作进行时，继第八军团后，法国南部行省的高卢人组成的“云雀军团”的22个大队也到达科菲尼昂。恺撒于是下令构筑一个新的军事阵营，不仅解决部队收容上的问题，也解决了战略指挥上的问题。这个第二阵营的负责人是库里奥，这里也可以看出，比起安东尼，恺撒还是更加器重库里奥。

跟恺撒的顺利相反，阿赫诺巴尔布斯处处遭到打击。首先是军队被恺撒倍增的战斗力吓倒，接着传来了更大的打击消息——庞培的回信。庞培在信中说，在科菲尼昂迎敌根本不是自己的计划，而是阿赫诺巴尔布斯擅自作出的主张，因而他不仅绝不会派兵增援，而且还命令防卫军团全军撤退，前往与自己的其余部队会合。

此时，恺撒构筑的包围网只差一步就合拢了。在这种情况下，带领33个大队近2万名士兵撤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而面对强敌恺撒，在无援兵的情况下，阿赫诺巴尔布斯也毫无胜利的把握。最后，阿赫诺巴

尔布斯决定和城中政要们带着家眷偷偷溜出城。阿赫诺巴尔布斯跟几个重要的指挥官诉说了面临的窘境，但没有在城中公布庞培的来信。流言开始像水波一样在城中迅速扩撒，而阿赫诺巴尔布斯暧昧不明的态度似乎更成为了流言的佐证。军队里人心浮动，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既然司令阿赫诺巴尔布斯都作好准备要自己逃命了，那么我们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于是在某一个场合，士兵们蜂拥而上，围困并逮捕了阿赫诺巴尔布斯，派代表前往恺撒军营，阐明他们的决定。他们愿意打开科菲尼昂城门，服从恺撒的命令，交出阿赫诺巴尔布斯。

能够不花代价地达成目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对于必须赶着南下的恺撒而言，更是喜出望外。但是，恺撒现在对这些深夜来访的敌方士兵并不信任。不过他仍装做无比相信的样子，对他们的决定表示赞赏。同时他还说因为怕深夜率军入城会引起混乱，所以要求这些士兵仍旧驻守城中等待天明。

前往恺撒驻地投诚的，不仅是士兵代表，城中政要们也派了使节前来。而这位政要代表，正是不久前在兵不血刃的阿斯科利皮切诺战役中逃跑的指挥官——雷托鲁斯。这位雷托鲁斯逃出后，本想赶往庞培所在地，途中在科菲尼昂歇脚，不料又碰上了与恺撒的对决，这次可真是无处可逃了。雷托鲁斯在恺撒面前作了冗长的辩解，解释自己此行是受科菲尼昂城中政要及他们的家族所托，前来讨饶的。但同样也没有得到恺撒的答复，被连夜遣回城了。

第二天，2月21日一大早，恺撒首先命城中的政要们及其家族来自己的营地。为了防止城中的士兵对这些人动粗导致暴动，恺撒不得不命自己的士兵前去迎接他们。这些政要包括：元老院议员、雷托鲁斯、鲁弗斯、财务检察官、包括阿赫诺巴尔布斯在内的罗马贵族青年，还有被称为“骑士”的商人和将领。恺撒只简短地跟他们说了几句，就将他们全部释放了。而士兵们则宣誓愿意留在恺撒麾下，因而也把他们编入了军

队。所有事情完成后，当天午时刚过，恺撒再度拔营，挥军南下。

在之前的叙述中也提到过，从战争开始，恺撒总是将庞培方的俘将如数释放。而到科菲尼昂，连他最强大的敌人——被称为恺撒接班人的——驻守科菲尼昂的阿赫诺巴尔布斯，也释放了。这些事情在百姓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知道这件事之后，西塞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多么不同，对敌人宽厚的恺撒和抛弃自己人的庞培！”

大概是跟亲友们感慨完意犹未尽，西塞罗又给恺撒写了封赞扬信。在行军途中的恺撒，收到信后也即刻写了回信：

致西塞罗：

从您信中所言，可知您对我知之甚深。我的行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无残暴可言。这些话从您口中说出，足以令人信服。我对自己所行之事，均足以自谓满意。如今更承蒙您称赞，令我不胜欣喜。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无后悔可言。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庞培放弃罗马本土

尽管没想到科菲尼昂会以那样的方式被占领，但是从拒绝增派援军那一刻起，庞培从逃跑开始一直都没想明白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或许没料到科菲尼昂会这么快就落入敌手，但接到消息后，庞培、两位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并没有停下逃跑的步伐。2月25日，也就是科菲尼昂

投降的四天后，他们到达了通往希腊的主港口布林迪西。而预计到庞培计划的恺撒，在接受了科菲尼昂后马上挥师南下，希望在国土范围内与庞培一决高下。

恺撒双管齐下，在调动军队的同时，不忘使用外交手段。恺撒军中有位庞培派的投降将领，在恺撒给予自由选择权时，他选择追随恺撒。于是恺撒令这位投诚将领给庞培送去一份亲笔信，内容如下：

> 到目前为止，我和您都没有过面对面的商谈。现在我也正往布林迪西赶去，我认为，不管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也好，还是为了你我二人的将来也好，我们有必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与其远距离依靠使节传达意思，不如见面对话，这样对彼此的意思才能了解得更透彻。

恺撒在用外交手段进行交涉时，军事行动上也丝毫没有迟缓。训练有素的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军团、“云雀军团”及收编的庞培派降兵，此刻直逼布林迪西的恺撒军实力已达到了6个军团，即60个大队之众。反观庞培军，从开战起足足有9个大队投降了恺撒，现在军中所剩兵力仅仅只有50个大队。在庞培派里，无论是谁，脑海中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逃离意大利。

3月4日，到达布林迪西仅仅一周，庞培和元老院派已经从逃离首都走到了逃离祖国这一步。但彼时搜集的船只数量，并不足以运送3万将士渡海。庞培显然已经没有时间去等待搜集足够的船只，于是只有分两次将兵力运送出国。两位执政官率领30个大队横穿亚得里亚海的第一梯队，而庞培则率领剩下的20个大队留在布林迪西。庞培等待第一梯队的船到达希腊西海岸后，再折返回来接他们。

等待中的庞培给恺撒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明确地拒绝了恺撒提出的双方会谈的建议。庞培的理由是：“如果我这么做，对那些追随我到今

天的人而言是一种背叛。因此绝无可能！”

在庞培的第一梯队渡海5天后，也就是3月9日，恺撒也赶到了布林迪西。恺撒再次派了使节，向近港口驻扎的庞培发出首脑会谈的邀请，再次被拒绝。但这次庞培拒绝的理由是：“没有和两位执政官商量，因此无法决定。”

或许庞培是在担心，如果两人商谈，结果会不会像曾经的“卢卡会谈”那样，最终顺应恺撒的意志行事？又或许庞培是在担心，恺撒要求的首脑会谈方式，会打破罗马现行的、一直由元老院主导的少数人指导制？又或许庞培是在反省，正如西塞罗、小加图等共和政论者说的那样，10年前的“三头政治”也好，6年前的“卢卡会谈”也好，都只是一时的政策决策，无法永远解决问题？不管庞培内心作何考虑，事实总是：恺撒反复地发出邀请，而庞培不断地在拒绝。

虽然恺撒一直在使用外交手段和庞培交涉，但事实上，他在到达布林迪西的第一天就下令构筑营地。之后，他又下令修建封锁港口的工事。不过由于船只几乎都被庞培征用了，恺撒所谓的港口封锁实际上也只能是阻止出港，而管不了海上。在有船的情况下，恺撒军只需在海港出入口沉上几艘船，就可以达到封港的目的。但现在，只能在港边埋一些石头、木头、栅栏之类的，还常受到庞培军队的阻挠。就在恺撒的封港行动进行时，运送第一梯队的船回港了。此时，庞培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出港。

3月17日，庞培剩下的20个大队在日落之后全部登上了出港船，当天半夜，所有的船只一起出港。恺撒军构筑的封锁工事虽然努力阻挡，但也无法阻止大型船只。手中无船的恺撒，无法出海追击。迅速结束内战的愿望，像梦一样在天亮后破灭了。

望着船尾渐行渐远的灯火，恺撒意识到，和30年前苏拉与马里乌斯在意大利半岛内的战争不同，这将会是场旷日持久、波及深广的内战。

庞培已经远走，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两天后，恺撒离开布林迪西，沿着阿皮亚大道朝罗马疾驰。恺撒和庞培，这两位当代头号将领的正面对决就此拉开了帷幕。

大战略

霸权统治下的罗马世界可谓疆域宏阔：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沿莱茵河直抵北海，南到撒哈拉沙漠。从称谓上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一版图中对罗马人最为重要的就是地中海。他们将地中海视做内海，称之为“我们的海”。无论是由布林迪西逃走的庞培，还是阻止未遂的恺撒，都以这样的地理认知作为其雄伟战略的依据。在地理认知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确立庞大战略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藩属”——或者用更贴近当时罗马人的词语，叫做“clientes”。

在翻译过程中，源于拉丁语的现代词是最让我头疼的。现代英语的意思和古代同源拉丁语，即使形式上一样，意思却可能大相径庭，上文提到的“clientes”和“consul”这两个词就是典型的例子。“consul”在现代英语中指“领事”，而它的拉丁语同源词，放在古罗马则是指“执政官”。“clientes”在现代英语里有“client”（客人）、广告代理的赞助商、律师的委托人等意思，而在古罗马则有别的含义。不同于“执政官”在历史上已经有明确的统一译法，“clientes”这个词更加复杂，我不能按照字典的意思，把它简单地直译成“被保护者”，把“patronus”直译成“保护者”。因为根据古罗马的历史，这二者不是简单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而是从罗马建国到本书记述阶段以来的700多年间，代表人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重要用语。

罗马人对外征服时，并不是风卷残云般袭击、杀戮，再风卷残云般消失的风格，他们把每一个被征服地都纳入自己的世界。一方面，他们和附属国结成同盟，派出总督对其实行直接统治；另一方面，就像一神

教民族重视对神的誓言一样，多神教的罗马人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这种生存方式，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过布匿战争击败迦太基后的罗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但其政治体制跟不上国力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比国与国之间的约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容易发展。所以也就出现了，当国家关系出现问题时，用人与人之间的私交来弥补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可以用“patronus”和“clientes”来形容人际关系和国家关系。这样的形式和罗马人“一言九鼎”的民族性格，弥补了体制的不足，支撑了共和罗马时期的高速发展。

虽然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关系完全是旧社会的糟粕，可以一脚踢开。但以那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种关系可是非常必要的。

自从庞培肃清地中海一带的海盗，使沿海重归和平之后，庞培就成为了地中海沿岸各城邦的“patronus”。这样他的“clientes”就扩大到了两块：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和东方战役后的东方诸城邦。

而恺撒则在称霸高卢后，与高卢诸城邦建立了“宗藩”关系。

对“宗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责保护“藩属”，使他们的权益不被罗马中央政府侵害。这两者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保护”，倒不如说是“保障安全”更加贴切。庞培也好，恺撒也罢，都十分用心地维持行省的秩序和经济发展。

那么，“藩属”又有哪些义务呢？

最主要的就是为“宗主”提供其所需的支援。我虽然把两者翻译成“宗主”和“藩属”，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仍然使用原文的“patronus”和“clientes”，原因就在此。因为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相扶助的。在遇到困难

时，“patronus”和“clientes”是福祸与共的。因此两者不是风卷残云般地杀戮与被杀戮、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自然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而“藩属”向罗马缴纳的“行省税”，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罗马公民皆有服兵役的义务，而行省居民不需要服兵役，所以行省居民要缴纳“行省税”用来支付服兵役人士的军费开支。从本质上看，“行省税”其实更接近于“安全保障费”。

随着罗马国力的高速发展，原来的政治体制已经不再适应国家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罗马共和国时期，“patronus”与“clientes”的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上升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比如，原本以独立国家姿态与罗马结盟的埃及，其王室在庞培帮助下成功复位之后，埃及就成为了罗马的“clientes”。

我们再来看庞培和恺撒的对决大战略。

庞培一路逃跑，并不是因为害怕打仗。恺撒渡河及随后的一系列快速进攻确实是庞培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完全没有作好迎敌准备。庞培认为，与其如此匆忙地应战，不如一边撤退一边动员自己的clientes筹备战事，等到条件成熟后再与恺撒正面对决。而恺撒显然也是看透了庞培的想法，于是才想办法试图阻止庞培。因为只要离开意大利半岛进入地中海海域，庞培就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军事力量的强弱，不能仅从作战兵力的多少进行判断，还要对兵力的维持能力、补充能力、对战局有决定作用的其他因素等进行综合考虑。

恺撒的clientes是曾经支持了他在高卢8年作战的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行省。他们能够为恺撒提供金额为4000万塞斯特斯（塞斯特斯，即sesterce，古罗马青铜铸币，1塞斯特斯等于4阿

斯。——译者注）的行省税。

而庞培拥有比恺撒更多的clientes，他们缴纳的行省税金额高达2亿塞斯特斯。这其中包括：富裕的小亚细亚、叙利亚、经济强大的希腊、巴勒斯坦、埃及、西班牙及非洲行省。虽然庞培还没去西班牙赴任，但是他手下有3名大将率领7个军团驻守在那，等于统治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另外，历届非洲行省的总督都是由庞培派亲信担任的，因此非洲行省也可以看成是庞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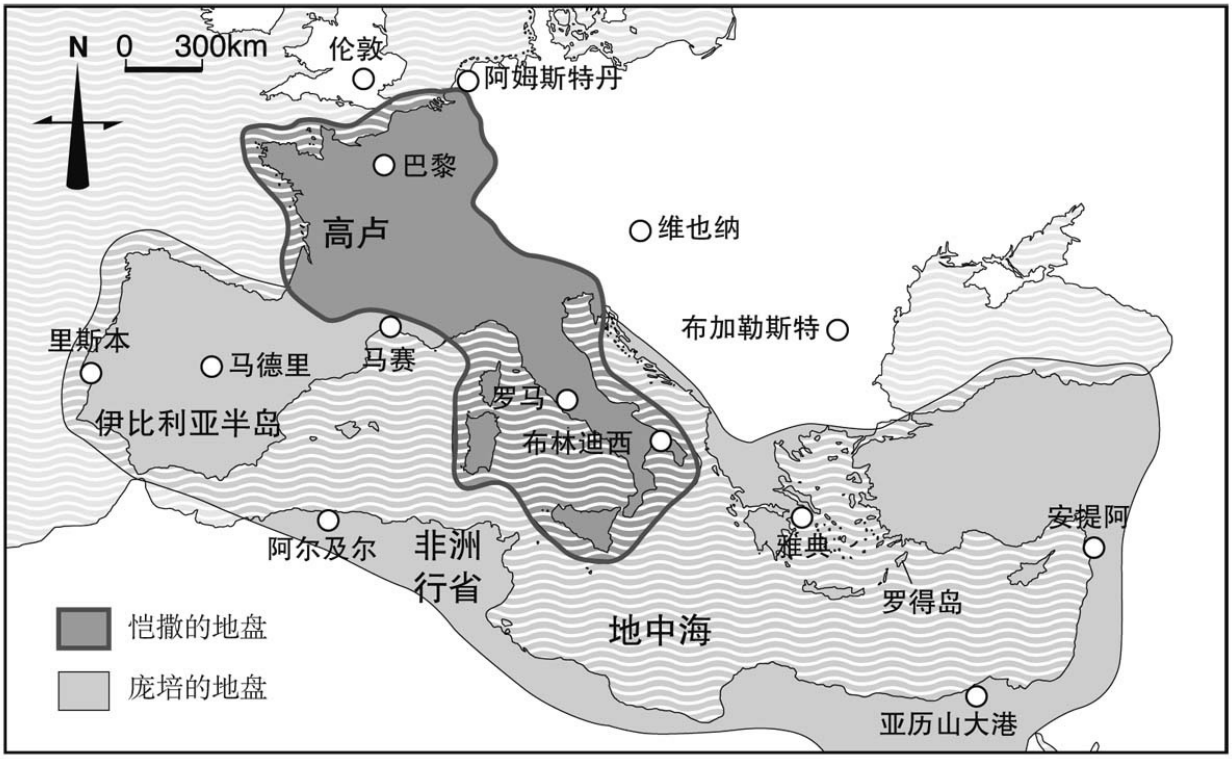
除以上列举，自肃清海盗战役后，地中海沿岸的马赛等港口城市也成为了庞培的clientes。他们能够为庞培提供出海的船只和港口基地。

尽管付出了放弃本国的代价，但一个更宏大的战略计划已经在庞培脑海中酝酿。那就是用东方行省、西班牙、非洲行省的力量，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意大利和高卢地区的恺撒军队进行包围战。在海上也拥有绝对优势的庞培有能力实现这个战略计划。

但是，政治也好，军事也罢，只要包含人为因素的事，都不可能像数学那样永恒不变。有时候1加1并不一定等于2，有可能是3，有可能是4，也有可能只有0.5。相对于庞培的辽阔领土，恺撒手中只有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罗马本土。表面上看是完全没胜算的，然而正因为罗马是本土，所以也拥有其特殊的有利因素。这一点，无论是庞培，还是以后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或者是打败布鲁图的安东尼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即使有电脑也无法估量的——重要的无形的优势，只有恺撒和后来的屋大维看到了。仅从这一点看，屋大维就是当之无愧的“恺撒接班人”。

上文我们提到，从遥望庞培远去的灯火，到率军奔向罗马前，恺撒在布林迪西逗留了两天。这两天里，他为以后的战争完成了可以作的一切准备。

首先是准备渡海船只。附近的船只都被庞培征用完了，恺撒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从高卢远调船只到布林迪西，或者建造新的船只。在这样的形势下，还剩唯一一个有利因素，那就是布林迪西的民众们都是恺撒的支持者，因此恺撒命令他们在半年内建造足以运输10个军团的渡海船。恺撒知道，是否拥有船队，是能否打败庞培这个海上霸主、保卫罗马的重要条件。



公元前49年时双雄各自的地盘

其次是筹备粮食。需要筹备的不仅仅是军粮，还有普通百姓的口粮。虽然罗马本国的范围，涵盖了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但从200年前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起，罗马本土的粮食就满足不了本国需要了。罗马人的主食——小麦——大多是依赖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北非三个行省提供。这些地方都与罗马隔海（地中海）相望，而此时，整个地中海的制海权都在庞培手里。

从越过卢比孔河以来，恺撒不费一兵一卒在两个月内就掌握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然而，恺撒知道，是否真正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安全，二是粮食。

第一个“安全”问题。恺撒公开宣布“我不是苏拉”，并下令严禁虐待留在罗马的庞培派们，以及严禁士兵们掠夺等暴力行为。只要士兵们严格遵守命令，“安全”问题就算解决了。

第二个“粮食”问题。这个问题越晚解决的话，越有利于敌方。因为早在公元前57年，庞培担任“粮食局长”后，派出自己的亲信前往西西里岛、撒丁岛及北非三个行省进行统治。这个决策在当时只是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并非针对恺撒，而现在却成了威胁恺撒的一把利器。

为解决粮食问题，恺撒先派兵控制撒丁岛。而西西里岛上的守将小加图是坚定的反恺撒派，于是恺撒派亲信库里奥前往西西里岛，但随库里奥出发的士兵，都是两个月来收编的庞培降兵。恺撒自己则亲率老部下去执行更为重要的任务。

在庞培远走后的两天里，恺撒下令进行全方位的备战准备。随后恺撒率领主力军团沿着阿皮亚大道，朝罗马奔去。公元前49年3月19日，内战的第二阶段拉开了帷幕。

从布林迪西到罗马——其距离大约等于半个意大利的直线距离——恺撒率领部将只用了12天时间。

恺撒3月25日达到贝内文托，26日到达加普亚。马不停蹄赶往罗马的同时，恺撒心中已经对内战有了全盘的计划。综合考虑到所有因素，包括庞培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他认为，最好的计划就是——西进。

加普亚是首都罗马南面的两条主大道——拉蒂纳大道和阿皮亚大道——的交会城池。恺撒进入加普亚后，向元老院议员发出召集令，将于

4月1日在罗马召开大会。之后，在阿皮亚大道上疾驰的恺撒，途中只休息了一次，就急忙赶往罗马。

西塞罗的对策

古罗马出色的雄辩家西塞罗，同时也是位热心于哲学和政治学的人。从个人感情来说，相比与庞培，西塞罗更加欣赏恺撒，并且还称恺撒是自己文学上的知音。但是，作为古罗马最有见地的知识分子，西塞罗和恺撒的政治立场则完全不同。西塞罗认为，元老院指导的少数制——传统的寡头政治——是较为符合罗马国体的。但虽然立场不同，西塞罗并不是坚持“元老院政体”的顽固派。作为知识分子，西塞罗认为罗马应当恢复布匿战争前的政体，即由无私的、一心为国的优秀人才领导国家。此时的西塞罗，最希望看到的是罗马的两强——庞培和恺撒能够携手合作，共治罗马。

然而，对恺撒满腹牢骚的元老院派却发出了“最终劝告”，意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备感委屈的恺撒拒绝接受劝告，并率兵跨越卢比孔河。西塞罗的理想如梦般破灭了。元老院给恺撒发出“最终劝告”时，西塞罗也投了赞成票，因此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西塞罗只能跟随庞培出走。

但是在逃离罗马的途中，只跟随庞培走了一小段路——不到阿皮亚大道十分之一——西塞罗就与庞培分道扬镳了。后来从他留下的许多手稿中看得出，西塞罗认为，国家与社会绝不能将庞培当成大树来依靠。他倒不是认为庞培不值得信赖，相反，他认为这个世上没人比庞培更诚实，连他本人也非常尊敬庞培。那么庞培的问题在哪里呢？西塞罗认为，是“力量”。自东方战役胜利后，西塞罗反而对庞培的力量越来越没有信心。尽管西塞罗意识到了庞培的问题所在，但是从政治立场上看，他也没法接纳恺撒。为此苦恼不已的西塞罗，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躲进了福尔米亚的别墅。然而以西塞罗的性格，不可能真的隐居起来，不问

世事。与其说，住在临海别墅里的西塞罗在等待朋友们传来外界信息，倒不如说是他主动频繁地写信，向朋友们询问外界的消息，因此有关恺撒和庞培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漏掉。就在这个时候，西塞罗收到了恺撒的来信。

致西塞罗：

我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弗尔尼乌斯（恺撒的秘书）见面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虽然很想了解您的近况，却总没有时间向他打听。

总是收到您的来信，我目前虽亲率大军在急行的途中，但总想着能有时间给您回信。在此，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我现在正快马加鞭赶回罗马，也很期盼能在罗马与您相见。我迫切地盼望着能得到您的指点，借助您的权威，在各方面得到您的帮助。匆匆数语，请见谅。容见面后再详叙。信中未尽之意，已请弗尔尼乌斯代为转达。

接到信后，西塞罗大吃一惊。在庞培逃往希腊后，恺撒已经是意大利的武力主宰者了。而自己虽偏居鄙乡，却也听说了他将于4月1日在罗马召开元老院大会。那么恺撒在信中说“期盼罗马相见”，不就是“请务必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意思？如果前去罗马，庞培肯定会认为自己已经投靠了恺撒；如果不去，又得罪了掌握着意大利军事大权的恺撒。西塞罗可谓是进退两难。慌乱中的西塞罗只好写信向恺撒的好友马提乌斯请教解决办法。恺撒信中提到了“信中未尽之意”，这封“未尽”的信显然是恺撒将拜访西塞罗的预先知会，表明他将就信中未能言尽的内容与西塞罗进行面对面的详谈。为解燃眉之急，西塞罗随后又立刻给自己的好友阿提库斯写信求救：

致阿提库斯：

今天，3月27日，我一边给您写信，一边在等托尔帕提乌斯（西

塞罗年轻的老乡，之前因西塞罗推荐成为恺撒的秘书），我打算听听他的建议，再综合马提乌斯的回信，想想怎么对付恺撒的要求。现在我真是度日如年啊！恺撒肯定是不惜动用武力也要逼我去罗马。4月1日在罗马召开元老院大会的公告已经发到福尔米亚了。我该怎么办才好，拒绝吗？拒绝的话，后果又将如何？无论什么状况，我都会再跟您逐一叙述详情的。早知如此，还不如离开这里回阿尔比尼姆去。太多烦心的事，我已经受不了了。

福尔米亚面朝大海、背靠阿皮亚大道，是个稀缺的别墅宝地，在这里进行别墅房产投资，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是现在，西塞罗被这个极具经济价值的投资给害苦了。阿尔比尼姆是西塞罗的出生地，位于拉蒂纳大道往内陆腹地的一处山脉中。现在，无论眼前的海景多么美丽，西塞罗也已无心欣赏了。

恺撒拜访西塞罗的预想，三天后成为了现实。可两人见面时，一路急行军的恺撒没来得及换掉军装，而西塞罗也穿着象征元老院议员身份的红色镶边托加。因为这一次的会面不是文学上的切磋，所以两人在穿着和谈话内容上都不敢随意。56岁的西塞罗和50岁的恺撒，素来亲厚，所以西塞罗担心的武力威胁情形并没有出现在这次会面中。而这次交谈的内容，我们可以从随后西塞罗写给阿提库斯的信中分析出来。

致阿提库斯：

充分听取您的忠告后，我和他进行了会谈。我不去罗马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但是您还记得吗？在恺撒上位之初，我们曾经认为，在驯服庞培之后，也能轻易地驯服恺撒。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当初这个预测是错误的。

他跟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如果您不去罗马，不仅意味着不同意我的行为，还会对元老院其他议员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辩解道：“我有我不去的理由，其他的同僚们如果不同意，

也自有他们的理由。”

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争论一番之后，他最后说：

“那么，以和平之名，重邀您到罗马任职，如何？”

“那么，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吗？”

“难道恺撒还需要担任西塞罗的词语老师？”

“既然这样，恕我直言。元老院不会同意，恺撒派兵攻打身在西班牙的庞培三将领。同样的，元老院也不会同意，恺撒向庞培逃往的希腊进攻。至于我个人，则对庞培将来的命运深感悲哀。”

“哦，不，我一点也不想听到您这么说。”

“我猜也是。所以我才不会去罗马。以我的立场，我一定会这么说，而且会说出让您无法沉默的内容。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我还是不去的好。”

恺撒站起来对我说：“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他言及于此，老朋友，我真的无法拒绝。他对我的态度肯定是不满意的，之后他就出发了。但是我已经给自己打了高分，这种满意的感觉，很久都没有感受到了……

而那些恺撒年轻的追随者们却令我无比地感慨。这些豪门望族出身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跟随恺撒，把手中长矛指向庞培阵营里的父母亲人。恺撒的威望已经根植于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根植于军队的每个角落，但是对向来决策大胆的恺撒，我并不觉得会有好结果在等着他。或者真的像您说的那样，我该隐退了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越来越超出想象的时代。

读完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会觉得西塞罗真不愧是罗马的第一雄辩家，即使面对恺撒也不遑多让，而且考虑得更为周详。就连西塞罗自己也对此甚为得意，认为自己赢了。他多次在信中写道：“我不去罗马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满意”。

通过这件事，看得出，恺撒始终是言行一致的。这个时期的西塞罗，在支持元老院主导共和政体这点上，也算是言行一致的。但如果西塞罗的信念真是如此坚定的话，如此坚定地想避免兵刃相见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出现在罗马元老院会议上，堂堂正正地论述反对恺撒的理由。因为对恺撒来说，最坏的情形，就是遭到罗马舆论权威——西塞罗——的公开反对。

虽然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意大利半岛，但永远直面现实的恺撒清醒地知道，他与庞培的正式对决才刚开始。他也知道，与庞培政治信念相似的西塞罗不可能立刻改变主意。恺撒拜访西塞罗时，虽然口口声声希望西塞罗去罗马出席会议，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希望西塞罗参加元老院会议。

事实上，恺撒根本就是虚晃一枪，而罗马最优秀的雄辩家西塞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对恺撒来说，如果西塞罗能够在元老院替自己说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西塞罗仍然为庞培说话，那么对恺撒而言就是最糟糕的。所以，干脆让西塞罗保持中立，也就是到另一个远离主大道的地方待着，闭口不言，这样反而对自己最有利。

表面上看，西塞罗始终掌握了会谈的主动权，直把恺撒说得哑口无言、失望而归。实际上却完全相反。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让西塞罗得到了心理满足的恺撒，无论是心理战还是演技战上都更胜一筹。

首都罗马

照公告的原定计划，公元前49年4月1日，元老院大会正式召开。根据古罗马法律，手握重兵的前执政官是不能进入罗马市内的。虽然已经宣布了阿赫诺巴尔布斯为高卢总督，但并未举行交接仪式，因而此时的恺撒依然是高卢的总督。为了让手握兵权、身任高卢总督的前执政官恺

撒能参加会议，此次的元老院会议改在城外神庙的回廊一侧召开。顺带解释一下，那时的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地，只要是祭司进行过祝圣仪式的地方，都可以开会。

恺撒并不想步苏拉恐怖政治的后尘，因此他既遵守法纪不入城，又把军队置于罗马城外，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会场。而他这么做，得到的结果显然和苏拉不同。

自去高卢任职后，9年没回过首都的恺撒，在元老院议员面前先进行了一番自我辩解。他首先解释了自己不得不跨越卢比孔河的理由，接着阐明自己在渡河后为与庞培进行会谈所进行的努力。最后他申辩，自己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特权，而是作为一个为国尽忠的罗马市民，拿回自己应得的权益。辩解后，他提出要求，即参与罗马共和国的国政。不过，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拒绝这个要求，我也不会推卸这个重任的，那么国家就由我一个人来治理。”

恺撒说完之后，就要求议员们进行当场表决，并以寻求和平的名义派使节向庞培通报表决结果。对于恺撒参与国政的表决，元老院全票通过，但接下来，在派出使节的问题上议员们出现了很大分歧。在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当下，成为使节，也就意味着要被庞培派当成敌人。没有跟庞培撤离的元老们，也并不是就愿意支持恺撒。这些元老们既不愿被庞培当成恺撒派，也不愿意跟随庞培逃离首都，对于这些人，我是挺同情的。这样的人，现在也有很多。

而且元老们的精神支柱——西塞罗——都没有出席会议，这样要作出一个决定就更加艰难。最终这次元老院会议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议而不决的会议，恺撒为此付出了三天时间。

会议期间，海上传来捷报。恺撒的部队又兵不血刃地赶走了庞培派守将，占领了撒丁岛；接着，西西里岛又传来了守将小加图未待开战就逃往希腊的消息。这样，恺撒手中就控制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两大小

麦产地，不用再担心本国的粮食问题了。现在粮食输入地只剩下北非行省了。恺撒命令成功拿下西西里岛的库里奥，整顿军队后即刻率军前往北非。

现在只剩下安全问题了。前面说过，由于两位执政官和庞培都逃走了，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安全和秩序的维持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像粮食问题上有库里奥这个帮手一样，在安全问题上，恺撒也找到了得力助手，那就是为效忠恺撒不惜与父为敌的议员世子们。得不到元老院帮助的恺撒，开始实行他“一个人治国”的策略。

不过，恺撒还是启用了一个人担任国家大法务官这个国内最重要的职务。这个负责管理国家内政的年轻人就是雷必达。这个雷必达就是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雷必达之子，一直以来都是恺撒的忠实支持者。雷必达的父亲曾在苏拉死后，拉起平民派大旗起义，最后失败。而雷必达自己则是后来与屋大维、安东尼齐名的“后三头”政治家之一。

恺撒认为，依靠军事威慑力对罗马市民进行统治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决定不在国内设置军队。也正因为此，他给雷必达的任务就是既不依靠军事力量又维持好国内的秩序。

负责对外防御的是护民官安东尼，此人也是“后三头”中的一位。

和安东尼负责本土防御对应，恺撒任命了两人负责夺取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一个是安东尼的弟弟，另一个则是名门之后，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连女婿都愿意为恺撒效力，这也是上文中西塞罗感慨无限的原因之一。

恺撒给二人少量的船队和20个大队。他们的任务是夺取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同时确保恺撒前往希腊时的海上安全，以及阻止庞培从海上夺回意大利半岛。

虽然恺撒运筹帷幄、力求面面俱到，但难免会有不如意之处。庞培虽然放弃了意大利本土，但凭借地中海各clientes给予的海军支援，在本土之外的地方拥有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代表现行体制的庞培，身边聚集的是一批和他同龄的保守派，这些经验丰富、正当壮年的将领构成了庞培军队的中坚力量。而以改革派自居的恺撒，麾下将领几乎都是年轻人。安东尼、库里奥、多拉贝拉都是30多岁的军官，跟庞培军相比，虽在体力和精力上有优势，但毕竟临阵经验不足。于是恺撒不得不事事亲临，彼时他对高卢战役中的“左右手”拉比埃努斯投敌，感到头疼不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但是，世上的事总是福祸相依的。虽然恺撒在战事上不得不事必躬亲，但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和他的士兵们总是一起共同接受战争的考验。而庞培和他手下，除拉比埃努斯外，仗着自己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反而已经有15年没有亲临战场了。

人生中这样的窘境时有发生：身边没有可给予全副信赖的人，却又不得不将完全的信任加诸其身，此时唯有孤注一掷。在没能阻止庞培出海后，恺撒面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既已行动，唯有全力以赴。彼时，意大利从气候上看已进入4月，但实际上才刚到3月。原本要再过半年，才到适合打仗的季节，但恺撒已经迫不及待要进行“西进”了。他命令驻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高卢地区的6个军团南下，朝西班牙进发。

在全面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恺撒，那就是资金。财务官巴尔布斯向恺撒报告说，金库已经空了。不过同时他又向恺撒报告了另一个消息，萨托鲁努斯神殿下的罗马国库还完好无损。恺撒本以为，罗马金库早就被两位逃跑的执政官搬空了，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出望外。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恺撒自撰《内战记》中并没有记载，我们从普鲁塔克的《列传》中找到一些内容。《列传》中虽有丰富的史料，但是这件事记述的真实与否，到现在也没弄清。因为事情发生地——萨托鲁

努斯神殿位于罗马市内，而有着前执政官官身份的恺撒，按照法令，是不能进入罗马市内的。他进入罗马的条件只能是卸任高卢总督并担任独裁官，然而根据历史记载，恺撒到年底才出任独裁官。但是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虽然当时存在客观条件限制，但是依据恺撒的性格，这件事又确实可能发生，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介绍。这件事是这样的：

恺撒进入罗马集会广场后，在市民的注视下走向神殿。在神殿前遭到了护民官梅特鲁斯的阻挡，护民官抗议说，除了执政官以外，任何人不得动用国库，这是罗马国法的规定。对此，恺撒回答道：

“依靠武力的时代，不同于依靠法律的时代。如果你对我的行为感到不满，那你也要闭上嘴。在战争年代，不是对什么都有言论自由的。等到我和庞培都放下武器和解时，对我的所作所为你无论说什么都可以。”

而此时，有部下跟恺撒汇报说，神殿中找不到打开国库的钥匙。可能庞培逃走时，谁把钥匙带走了。于是恺撒叫来铁匠，准备强行开库。护民官梅特鲁斯再度抗议，周围有不少百姓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

恺撒第一次表现得怒不可遏，他厉声对护民官说，如果不停止抗议，杀无赦。之后他又压低了声音说：“年轻人，你应该知道，对我来说，要你的命比说话还简单。”一句话已足够，年轻的护民官吓得面如纸色，噤声不语。

这次的强取，恺撒总共获得了1.5万根金条，3万根银条和大约29吨、价值3000万塞斯特斯的铜币，这下解决了军费问题。

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纸币，所以不仅是苏拉、恺撒，古代人都很热衷于获得金银。发军饷、筹军粮、修道路，乃至中央和地方公务员的薪水，全部都是用金、银打造的货币支付。

3月17日深夜，庞培从布林迪西出海。

3月31日傍晚，恺撒抵达罗马。

4月7日早上，恺撒从罗马出发。

在率军前往西班牙前，在恺撒的影响下，元老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即，对卢比孔河以北的北意大利行省，也就是罗马人口中的高卢人（指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人），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利的法案。由于这个法案是由大法务官罗西乌斯提呈的，所以后来也称其为《罗西乌斯法》。实际上，这是恺撒报答那些在高卢战役中，全心全意支持过他的北意大利行省人民的一项法案，也是恺撒笼络民心的一个手段。通过这项法案，除西西里和撒丁两岛外，罗马本国的版图和现代的意大利领土几乎重合，卢比孔河也不再是中、北意大利的界河了。

西进

前面说过，恺撒手中没有足够的船只，地中海的制海权掌握在庞培手中，因此恺撒不得不率军队从陆路奔袭西班牙。西地中海大战是整个内战的第二阶段。恺撒出动了一路跟随自己过卢比孔河、称霸意大利的3个老军团，另外命令在高卢中北部过冬的6个军团全部出发。他拿出高卢战争中的老底子，试图一举肃清庞培的势力。而驻守西班牙的三位庞培方大将，则率领着7个军团及当地民兵共9万人，严阵以待。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恺撒自4月7日离开罗马以来，沿着奥勒留大道一路北上，经过热那亚，到达了法国南部行省后，向西进发。军队一路高歌，到达马赛时已经是4月19日了。迦太基灭亡后，马赛成了地中海西部的第一大港口，在这里，恺撒遇到了行军以来的第一个障碍——马赛人紧闭城门，他被拒之门外了。

古代被称为马西利亚的马赛港，是个起源于希腊殖民的海港城市，拥有比罗马更悠久的历史。以叙事诗、哲学和悲剧著称的希腊民族，在商业和海运上也有卓越的才能。希腊统治下的马赛，虽在文化上没有太高的成就，却也是个繁荣的商业都市。作为商人，马赛人对时代的变化自然很敏感，早在罗马与迦太基竞争的时代，马赛就投靠罗马。罗马击败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霸主后，虽然把马赛置于自己的军事范围内，但仍允许其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存在。此外，法国南部的罗马行省，也承认马赛的独立地位。由于庞培曾肃清海盗，实现地中海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以贸易立国的马赛也深受其益，因此马赛也是庞培clientes大网中的一分子。

不过这并不是马赛拒绝为恺撒开城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还因为他们是不为感情所动的商人。早在高卢战役结束、恺撒统治高卢中、北部后，他就一直致力于积极发展当地经济。而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是那些住在意大利的有希腊血统的罗马公民。这些既继承了希腊经济才能又享有罗马公民特权的人，成为了马赛人在高卢中、北部的最大商业竞争对手。马赛人认为是恺撒打破了他们对商业的垄断，因而一直对恺撒没有好感。庞培和恺撒间的战争，就在这里开始了。在马赛人看来，前者和后者的战争，就是帮助他们扫清海盗的英雄和破坏他们商业收益的坏人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马赛人站在了庞培这边，让恺撒吃了闭门羹。而庞培显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援马赛，因为当clientes遇到危机时，patronus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帮助。马赛人心中仍然保留着庞培当年扫荡海盗时果敢勇猛的雄姿。

这是恺撒未料到的情形，但他也不能放弃有如此重要战略意义的城池。恺撒的“西进”计划，不仅要打击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还要拿下西地中海，为自己讨伐庞培所在的希腊时解决后顾之忧。而从马赛出发，横跨海湾就能直达西班牙，如此重要的城池恺撒势在必得。

马赛地处海港，恺撒考虑用海陆夹击的办法进行攻击。不过处于半

岛尖端的马赛，本就占了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加上丰厚的经济实力，不管是海上还是陆路都是一座坚固的要塞。按照常理，应当以持久战的战略攻城，不过，恺撒已经等不及了。

马赛战役

以罗马军队的技术，构筑陆地封锁线需要两周时间。这期间，恺撒在马赛附近的阿尔勒城建造了用于海上封锁的12艘船。5月4日，恺撒军的陆地攻坚准备就绪之后，马赛战役拉开了帷幕。

对战争早有预见的马赛人已经提前储备好了武器粮草，又从外部补足了精兵强将。与恺撒预计的快速战相反，战争逐渐向持久战的方向发展。庞培也履行了他作为patronus的义务，派阿赫诺巴尔布斯前来出任防卫总指挥。这位总指挥与恺撒有过交战经验，曾经在科菲尼昂战役中被恺撒擒获后又被释放。此次随他前来的还有16艘战船的援军。

庞培本人并未在前线出现，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早已谋划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规划。

马赛战役相持了大约一个月，恺撒认识到再这么耗下去，自己将无力前往西班牙与庞培军队进行大决战了。法比乌斯带领着三个从高卢过来的军团已经先一步抵达了西班牙，恺撒知道，如果继续这么让他们单独滞留在敌方阵地的话，情势就很危险了。

于是，恺撒命令由托雷波尼乌斯带领3个军团留下来，负责继续从陆上进攻。海上的攻坚，由军团长德奇姆斯·布鲁图担任。此人在高卢战役中战胜大西洋沿岸的维奈特人以后，俨然已成为一名海战专家。

恺撒自己率领了从意大利开始便跟随他的3个军团和900名骑兵，从马赛城背部向西挺进。途经纳博讷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达巴塞罗那以西

130公里的莱里达时，已经是6月22日了。在这里，恺撒和法比乌斯的3个军团成功会合。

庞培派来驻守莱里达的将领，也是曾在科尔布尼奥战役中为恺撒所先擒后纵的鲁布斯。鲁布斯将庞培原来分散为两股的5个军团合而为一，形成了与法比乌斯3个军团对峙的局面。正在此时，恺撒到了。若无马赛城的顽强阻挠，恺撒本打算用9个军团速战速决的。此时他麾下仅有6个军团，从军团数量上看，仅比敌方多出一个军团。但是敌方的一个军团定员是6000人，与此相对，恺撒的一个军团，自8年前的高卢战役后，最多也就4500人。此外，敌方还有西班牙原居民组成的80个大队，共4.8万人。内战第二阶段中最重要的西班牙战役，双方兵力情况如下：

——庞培方——

5个军团3万名重装步兵加上4.8万名当地兵，共计7.8万名步兵。5000名骑兵，由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两将代替总司令庞培行使指挥权。此外，另有瓦罗将军率领2个军团在西班牙南部待命。

——恺撒方——

6个军团共计2.7万名重装步兵，3000名骑兵。没有本地兵，因为本地兵们的家乡——西班牙全境都归属于敌方庞培所有。

恺撒在此役中喊出了“攻打无将之师”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豪言壮语也是无济于事的。这里，再次引用在《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曾引用过的《内战记》中的一段话：

> 身处逆境的恺撒向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等将领借钱，用来给全体士兵们发奖金。此计有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可以促使指挥官们两袖清风无法还乡，促使他们努力作战；另一方面，对总司令的

善心满怀感激的士兵们也会全情投入，奋勇杀敌。

然而恺撒的金库里是否真的空空如也，这一点很值得怀疑。他强行取走了罗马国库中大部分财富，又怎么可能在半年内就消散于无形呢。除此之外，这里再援引一下《内战记》当中的叙述：小麦价格上涨了50倍的时候，恺撒虽然也唉声叹气，却仍然有财力购买。他不是谎称没钱，还从将领们那里借钱度日了吗？之所以如此行事，无非是为了达到上文中所说的“一石二鸟”的目的。

意大利的教育制度，文科的普通高中五年，是袭仿吕凯昂（Lykeion）学园的普通高中设置的——该学园为亚里士多德所创。学生们在进入大学接受专门教育前，一定要学习一些教养课程，其中的两大重要科目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恺撒的文风简洁易读，堪称拉丁语散文中的典范，因此是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般而言，老师会在二年级时要求学生们进行翻译。然而，其文章字句固然简易好懂，但是对15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要透彻理解文章背后的内容恐怕不容易。《高卢战记》还算简单，若以《内战记》为例，学生们就不是仅看他的文章就能理解的。无论如何，像恺撒这样的一代枭雄，纵使不会写下谎言，也不会将事实完完全全地和盘托出。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当恺撒面对着眼前三倍于己的敌军，他就一边说着“攻打无将之师”这样的豪言壮语，另外一边却在做着借钱发奖金这样的事。

此时的恺撒，就连骑兵的战斗力也处于以3000应对敌方5000的绝对劣势。不过他对此倒是并不担心。这3000名骑兵是恺撒亲自从高卢骑兵中一手挑选出来的，经历了高卢战争最高潮的阿雷佐攻坚战，是由在恺撒的指挥下浴血奋战的日耳曼骑兵组成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虽然民族各异，但是同样忘记了自己是被征服者。他们跟随恺撒出生入死，比起由罗马人组成的军团，他们的忠诚和勇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恺撒

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忠诚。内战结束后，不单只是高卢骑兵，连日耳曼骑兵一起，他都赐予了罗马公民权，还给予了他们可以加以统治的封地。

比恺撒先进入西班牙一个月的法比乌斯，拥有3个军团和2100名骑兵的兵力，大约1.5万人。在面临9万名近在咫尺的敌军时，他们所做的事也只是“等待恺撒”。此外，他们利用“等待恺撒”的这段时间，一面巩固营地，一面在阵前的赛格力河上架起两座长达6公里的渡桥。

西班牙战役

隶属于西班牙卡塔罗尼亚地区的莱里达，地处发源于比利牛斯山脉的赛格力河和埃布罗河的交汇点以北40公里处。该城地势既高且峻，赛格力河从其东侧湍急流过，河上架有罗马式的坚固石桥。这座桥将其与罗马的基地塔拉戈纳连通，也使其与马赛及法国南部诸行省相连。庞培选择在比利牛斯山附近，也就是西班牙入口处对志在夺取西班牙的恺撒进行迎头抗击，自有其道理。此外，庞培还将原本分为三股的军事力量整合为两股，制订好击溃恺撒的战略，早早地严阵以待。

负责指挥作战的两位将领，都是正当壮年的战争老手。亚弗拉尼乌斯是公元前60年便有执政官经验的人，6年之前便代表庞培成为西班牙半岛的总统治者。他比庞培还要年长一两岁。担任副将的佩托雷乌斯的年龄也差之不多。他不属元老院阶级，而是出身于行伍基层。

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合流的两位将军外，在西班牙南部还有瓦罗率领的2个军团。此人时年67岁，比起两位武将的声名来，他的文名要更高。在庞培方的上层将领里，壮年和老年者占了大部分，这位就是一例。

在莱里达准备迎击恺撒的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两位将军，统率将近9万人的战斗力，并没有在城中空自等待，而是在莱里达城以南1

公里处的高地上修筑工事。与此相应，同样静候着恺撒的法比乌斯则在莱里达以北修筑营地。为了应对城郊敌人所筑的渡桥，他还在赛格力河的上游建造了木桥，一共两座。

但是，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春天又连绵多雨。赛格力河的水流量只下了一天雨便大涨。两座木桥已经有一座被冲走了，另外一座通过士兵们的拼命抢修，也算是勉强恢复。此时，恺撒率着3个军团浩荡而来，时间是公元前49年的6月22日。

在马赛浪费了一个月时间的恺撒，已经没有充分的时间休整军队。他一边命令建桥以保证可以打通从高卢运送军粮补给的道路，一边率领除了修桥和守营地的6个大队之外的所有人，早早地着手军事行动。恺撒早已知悉庞培军队的军粮补给完全依靠莱里达城，于是率军绕过莱里达城前，在城南1公里外高地处的敌方阵地出现，试图挑起战斗。

但是，早已布阵于有利地势的亚弗拉尼乌斯并没有理会。恺撒虽极尽挑衅之能事，但其实他也压根儿不打算进行于己方不利的以低打高的进攻。恺撒的本意，是在难以轻易攻陷莱里达城的情况下，首先将其和亚弗拉尼乌斯阵地间的联系切断。

恺撒麾下的军团士兵们，和高卢战役时如出一辙，迅速地又变成了工兵。为了切断敌方的补给路线，他们开始挖掘深达4.5米的壕沟工事。

这个任务在第二天便已完成。不料赛格力河又开始涨水，裹挟着泥沙的急流把恺撒这边所架的两座桥也给冲垮了。泥沙浊流并没有冲毁敌方所属的莱里达近郊的石桥，这使他们在军队补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实际上，恺撒从高卢送补给来的运输车队在渡过石桥时遭到敌兵的迎头痛击，甚至于根本无法靠近石桥。尽管恺撒的军队仍然在敌人阵前努力坚持着，但是他们意识到，照这样下去所有人迟早都要陷入饥馑而死的绝境。

若不尽早解决这个状况，比起肠胃空空来，士气的衰竭将成为更可怕的灾难。面对浊流湍急的赛格力河，骑兵勉强还可以通过，步兵则完全没有办法。而在这期间，大雨全无停歇地一直下着。

在获悉了恺撒军队困境的敌营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两位将领向首都罗马和身在希腊的庞培各发了一封急报，内容为："恺撒已临无路可走之绝境，我们几乎已等同于胜利。"

在希腊的庞培派大概是一片欢腾；在首都罗马，多数一直伪装中立的元老院议员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表态了，西塞罗便是其中之一。

听到该消息的第一时间，西塞罗就决定动身前往庞培身边。他意识到在恺撒士兵的监视下从布林迪西出海是不可能的，于是不得不走一条行程多6倍的道路。他从福尔米亚的别墅出发，首先通过陆路到达库马，然后再南下，从那里坐船通过墨西拿海峡进入爱奥尼亚海，再从那里北上到希腊的西海岸上岸。这对优柔寡断的西塞罗来说，可是人生第一次的重大决断。但是在西塞罗的脚即将踏上希腊土地之前，事情发生了大逆转。

自越过卢比孔河以来的最大困难，此时正摆在恺撒的面前。他现在的状态之差，连自己的51岁大寿都无心庆祝。此时此刻，士兵们尽将最高指挥官的低落神色看在眼里。恺撒麾下的6个军团全部都是高卢战役浴血过来的老底子。高卢战役中不管多少次，恺撒都能在他们眼皮底下从逆境中崛地而起，反败为胜。但是，恺撒今天走进的是死胡同，绝非仅靠一次计谋就能够全身而退。

首先，恺撒军队被困于45公里之外的赛格力河两条支流所形成的三角洲。这两条支流都因浊流湍急而无法泅渡。当然，从高卢运送来的补给车队也被困在对岸，一筹莫展。恺撒想就地筹粮，可是粮食也一点不剩地全部被亚弗拉尼乌斯征用了。

既然没有小麦果腹，弄点肉类来维持也不失为一个选择。然而预感到战祸的居民们早已带着家禽逃进山林了。此外，天气实在太恶劣了，暴风雨持续不断，完全不见好转。在食物储备丰富而充足的庞培军中，将军和士兵们都在悠然地准备打持久消耗战了。反观恺撒阵营里，从将军恺撒到每一个无名步兵，都一律平等地分配着仅有的粮食，一边无望地等待着天气转晴。

当然，恺撒不可能只是袖手而立地巴望天气好转。即使水流再如何湍急，他的军队也毫不停歇地在尝试着架桥通堑。然后，他借鉴自己在布列塔尼之战中的经验，在上游30公里处用小船连缀架起了一座浮桥。这座桥虽然无法渡运骑兵，身负重荷的6个军团的重装步兵也无法全部通过，但是足以帮他摆脱现在这种完全孤立的状态，和法国南部再度取得联络。此后的6月18日，从法国南部传来了消息，阿赫诺巴尔布斯率领的庞培与马赛的联合船队，与德奇姆斯·布鲁图率领的恺撒船队展开了一场海战，恺撒方大获全胜。恺撒的阵营里为此欢声雷动，长久不息。

从浮桥上送来的有限粮食供应和友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令士兵们士气高涨。恺撒感到反击的时机成熟了。但是仅靠军事实力还无法左右战局，决定胜负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将领的想象力。

逆转

虽说实际上已是7月天气，但按照日历来算还在6月上旬。即使如此，夏季还是到了。按往年规律推算，雪山融水和地中海雨季所形成的河流汛期，自冬而夏至此打住，将进入干旱季。河流水位大幅降低的地中海之夏已经来临。但是今年一反常态，连绵的雨水下个不停，河中水量不减反增。虽说恺撒面对的只是一条支流，但是河中的急流裹挟着泥沙，伸脚入水都令人感到有些害怕。

眺望着连日卷挟着浊流的大河，恺撒一筹莫展。他转念一想，与其

旷日持久地架桥与自然艰苦抗争，还不如顺应和利用大自然的神威猛力。于是，在最高司令官振臂一呼之下，士气高涨的士兵们开始着手修建新的土木工事。

那就是——挖掘运河。他们挖出来的运河多达数条，每条都宽达9米左右。将恺撒阵营深陷其中的赛格力河的一条支流叫做修里斯支流，改变它的流向是第一工程目标。第二目标是要让修里斯河的河水变得浅缓，好让步兵们容易渡河，骑兵的行动也将不受阻滞。在恺撒日夜不停的现场监督下，即使是滂沱的大雨也没有阻挡工事的进度，在不分昼夜的努力中进展神速。

早在工事没有完成前，庞培方的两位将领就对此事有所耳闻。他们立刻醒悟到事态的严重性。原本打算将恺撒赶入死胡同，没想到最终受困的反而是自己。根据恺撒的运河网工事，他们的补给线将被切断。一旦补给线被切断，他们将陷入绝境之中无法自拔。因为恺撒军只有3万人，他们却有9万人等着吃饭。粮食储备此时此刻还不足为虑。但是人性总是如此，在逆境还未真正到来之前，人们就会因为预见它的来临而变得动摇不安。首先动摇的是那些参军的原居民兵，他们像流血一样止不住地崩散。接着，如果没有本地兵的助力，亚弗拉尼乌斯也没有信心与只有5个军团3万人的恺撒对抗。

庞培方的两位将领决定南撤。庞培的名望在西班牙境内隆盛稳固，只要能够摆脱孤立状态，军队就必定可以获得支援。此外，在西班牙的南部，还有瓦罗率领的2个军团。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的战略是，朝着有充分军事力量和充分补给力量的南西班牙战线转移，在那里和恺撒一直耗到冬天，再寻求战机。

自7月25日始，庞培军连续6天趁着夜色悄然从阵地撤退。根据情报人员的线报，恺撒很快就侦获了这一敌情。他本应即刻予以追击，但是此时深河虽已经变成浅滩，但是水流量依然很大，而且非常湍急。骑兵倒是无妨，重装步兵却将被淹到胸部以上。如若强行渡河，恐怕要牺牲

很多士兵的性命。

但是，在得知恺撒决定不予追击的消息之后，士兵们主动向指挥官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劳累和牺牲无足考虑，全体人员已作好了和骑兵一道渡河的准备。我们将沿着骑兵渡河的路线泅渡来确保安全。"

听闻此言的恺撒才下定决心对庞培军进行穷追猛打。与此同时，他也突然想到了一条渡河妙计。他将骑兵在河流中排成两行，让步兵们从骑兵队列的中间通过，以保证他们安全渡河。步兵上游的骑兵们起到了阻挡水流的作用，下游的骑兵则如同防护栅栏一般，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倒的步兵就不会被冲走。此外，他还为此行动选择了一批身强体壮的士兵，让身体不够强壮的士兵留守营地。就这样，没有一个士兵因渡河而牺牲，他们剩下的就只是奋勇追敌了。

西班牙战争打响已过了月余，这期间，战争主导权并不在恺撒手中。他除了与庞培军偶尔发生些小战役之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和自然天气作斗争。但是托运河工事的福，战争的主导权终于掌握到了他手中，于是他开始施展自己惯用的快速作战法。

他的目标是阻止庞培军渡过埃布罗河。这条河自西而东流经西班牙北部，注入地中海，与北部连绵的比利牛斯山脉并排而列，挡住了恺撒自北向南的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进攻。敌人如果渡过了这条河，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向持久战方向发展了。恺撒军队日夜不停地继续行军，想要追上敌人。因为他们企图在莱里达城内到埃布罗河的40公里范围内和敌人一决胜负。

日夜不停的急行军终于奏效，他们在抵达埃布罗河前追上了敌人。两名近乎绝望的庞培方将领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掀开战事。但是，此时的恺撒并没有积极应战，因为经过了持续长途奔袭的士兵们有必要加以休整。两位将领见状又开始继续撤退。恺撒又开始了毫不放松的追击。不过这次的追击并非为了和敌人进行战斗，而是以妨碍敌人撤退行军为

目的，所以他只派出了骑兵。此计收效堪称完美。两位将领被逼中止了行军，就地筑营。恺撒也在他们的营地不远处筑营扎寨。

两位将领打算继续舍弃营地，在夜色掩映中撤退。但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恺撒从庞培军中俘获的俘虏口中获得了这个消息。他命令士兵们在营地里大声欢呼，制造出剧烈的声响。两位将领以为恺撒要进行夜袭，即刻又令士兵们迅速回营。

第二天，佩托雷乌斯亲自率侦察兵出去勘察地形。恺撒这边也对地形进行了勘测。于是，两边得到的地形报告如出一辙：距此地7.5公里内尽是平原，但是再继续往前走就是一片崇山峻岭；越过崇山之后，可以看到流淌着的埃布罗河。掌握这一情况之后，任谁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谁最早到达山岭，谁就掌握了翻越山岭的主导权。如果引用恺撒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事情已经演变成了行军速度的较量。"

首先到达决胜点的，是恺撒及其部队。他们一抵达此处，这场战事便已一锤定音。

从这里开始，恺撒军对庞培军的战争已经变成了猫追老鼠的游戏，即：等待机会，咬定追击，等老鼠再次逃跑时再度追击。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率领的庞培一方，士气已经完全颓败下来了。

庞培军的士兵中间开始起了各种诸如怀疑将领能力等愤愤不平的流言，但是恺撒一点也不急于剿敌，他留了足足一个军团镇守营地。此时他所拥有的所有兵力是5个军团外加3000名骑兵，共2.5万人。虽说被恺撒追得团团转，但是敌人终究是一支拥有8万人战斗力的庞大军队。一旦正式开战，恺撒或许可以侥幸得胜，但是肯定也要有不少的牺牲。他手下的将士们都以为这是剿灭敌军的最好时机，一致要求总司令下令开战。但是恺撒对此置若罔闻。他将自己如此行事的理由记录下来了。和之前的举例一样，他在此处写到自己时，用的也是单数第三人称。

恺撒认为：这个战役也可以不用开战、不用流血就可以获得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已经完全成功地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

既然这样就能获得胜利，为什么要让手中的士兵们作出无谓的牺牲呢？又有什么必要让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士兵们受刀兵之苦呢？难道不能试试不动刀兵只用计谋和思想取胜的总司令的能力吗？不试试怎知运气如何呢？

此外，在恺撒的心中，对虽为敌人但也同是罗马公民的对手也怀着无限的同情。如果一旦战争开始，恺撒知道，他们的血也会不可避免地挥洒流淌。因此，如果能够避免会战的话，也就没有流血的必要了。

尽管如此，恺撒的想法却得不到士兵们的赞同。他们旗帜鲜明地公开宣称，如果此役不打，那么他们也不会为恺撒以后所下的命令而战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是连这样好的时机都不知道掌握的司令，他们也没有什么义务和必要跟随。

恺撒不仅无视士兵们求战的声音，还禁止士兵们擅自脱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先稳住敌方，防止他们作困兽之斗。另一方面，好不容易喘了口气的两位庞培将领，此时向南撤退的道路已经被堵截住。从安全第一的角度出发，他们唯有选择折返位于莱里达的南面1公里的军营。既然南撤行动可以说完全是白费力气，他们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从开始撤退到最终决定撤退地，他们用了3天时间。而在相应的时间内，恺撒面对着回撤莱里达南面阵营的敌人，已经在安全防卫距离之内将自己的阵地尽可能地靠近对方。这样对庞培军形成了完美的包围圈。

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两位将领为了确保士兵的饮用水，亲自到营后通往河边的道路上监督防御工事的修筑。此时，他们的一些将领和士兵们悄自脱营，进入恺撒军的阵地附近，呼唤着恺撒军中熟人的名字。

恺撒军中的士兵们也积极进行回应。他们从阵地里走出来，和庞培方的士兵们不分彼此地握手言欢，共叙情谊。

老实说，他们的脱逃是情有可原的。恺撒方的士兵们，是怀着为了洗刷恺撒不公名誉的决心而战。而西班牙庞培军的士兵们，都是西班牙本地的自愿服役的居民。虽然自己的总司令庞培是行省的总督，但是他们服役并非为了与恺撒军开战。从百人队队长到普通的兵士，皆作此想。

但是他们心中清楚，自己已经到了无路可逃的状态。庞培军的士兵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恺撒抢先到达埃布罗河和此前的崇山峻岭的时候，他们就已为绝望所困了。但是能够至今仍不开战，真是令人喜出望外。他们来寻访恺撒手下的士兵，想打听他们的司令是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士兵们回答说，自己的老大是个一言九鼎的人。庞培的士兵表示，如果果真如此，他们就拜请恺撒士兵代为转告恺撒，他们全体人员愿意投降，条件是保住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的命。如果能够遵守这样的约定，他们就正式派代表前来投降。士兵们迅速地向恺撒报告了。恺撒等的就是这一刻，于是他马上对他们作出了承诺。

庞培军的士兵们自不必说，连恺撒军中的士兵们也欢呼不已。应庞培方的士兵们邀请，恺撒方的士兵们得以到敌营里去进餐。相应的，庞培方的士兵也开始出现在恺撒的阵营中就餐，两个阵营简直就有亲如一家的感觉了。连亚弗拉尼乌斯的儿子都成了其中一员，请求恺撒饶过自己父亲一命。

在工地监督确保饮用水工程的亚弗拉尼乌斯听说了这一消息，绝望地停止了工事，回到了营地。老实说，他对这种情形的发生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佩托雷乌斯并没有放弃希望。和原执政官亚弗拉尼乌斯不同，佩托雷乌斯是庞培指挥下成长起来的武将，对庞培有极高的忠诚度。虽然和亚弗拉尼乌斯是一同回到营地的，但是佩托雷乌斯迅速将精兵强将们聚拢帐下，主张继续以战争的方式与恺撒抗争。在作战会议席

上，他要求全体出席者集体宣誓，并命令他们对恺撒军只要见之则格杀勿论。但是接到这一命令的士兵们不为所动，还是将营中俘获的恺撒士兵们悄然释放了。

尽管如此，司令坚决的态度依然在一些士兵们心中又燃起了战斗的火花。这些人原本就对投降后的命运颇有担忧。而在恺撒方，恺撒一边刺探着敌方阵营内的变化，一边宽厚容忍地将军中的敌方俘虏送还。对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等将官俘虏，恺撒则根据他们本人意愿，任其选择是否留在恺撒麾下。回到自己的阵营的士兵们，像止不住的流血一样逃走了。

投降

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的营地目前来讲安全度尚高，但是没有粮食，水也只剩一点，所以他们不得不舍弃这个阵地。于是，恺撒的追击行动再度开始。然而虽说是追击，恺撒也不想让对方的士兵牺牲，只是在对他们行军不利的地点进行阻击。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开战，对恺撒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但是他不愿让双方士兵伤亡的初衷一直不变。在逃亡了很多人之后，对方的军队仍然有7万人之多。而恺撒手中兵将仅有2.5万人。这是以活生生的人拼命的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在棋盘上落子的输赢游戏。恺撒的追击虽慢，但是一直持续着，从未中断。而庞培军中的士兵们，已经有少数牺牲了。

庞培的军队已经逐渐逐渐、一点点被逼入了绝境。他们已经连饮用水都快没有了。即使这样，恺撒仍在等待。在诉诸战争和等待处于无水可饮的艰苦状态下的敌人投降之间，恺撒选择了后者。

绝望中的敌人终于发起了挑战。恺撒虽然也布下了相应的应战队形，但尚未把标志着开战的红旗升起在阵前。这令亚弗拉尼乌斯这方也

难以下定决心。到日落时，两方军队又各自鸣金收兵了。

翌日凌晨，恺撒命日耳曼军团迂回到敌人阵营的背部。这样的战术令敌方在三天无粮无水的状态下，又陷入了腹背受困的境地。紧接着，亚弗拉尼乌斯委派议降使者前来拜见恺撒。他提出了希望会谈不得公开化的要求。然而恺撒虽然接受投降，但主张要进行公开化的会谈。于是两军的最高首脑在全体士兵面前开始了谈判。亚弗拉尼乌斯是公元前60年的罗马执政官，恺撒是明年即将上任的罗马执政官，这两个有罗马国家最高官职经验的人的会谈，首先是由亚弗拉尼乌斯开口陈述的。因为是公开的会谈，所以他不仅是对恺撒，而是对着两军的全体士兵说了下面的一席话。

庞培的军队为庞培尽忠奋战到今天，罪不在他们自身。为什么这么说？这些人只是单纯地为了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和义务而必须如此。事到如今，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地艰辛抵抗过了。但是在无水、无粮、无退路的绝境下，他们对肉体上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屈辱已经到了无法再承受的地步。因此，他们不得不投降。在这段话的最后，亚弗拉尼乌斯还表明了一点，希望恺撒考虑不要在同胞身上行使胜者的权利。也就是，希望能够饶他们一条生路。

恺撒为此对亚弗拉尼乌斯，同时也对着投降方所有的官兵们作出了以下回答：

>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为着各自的义务尽忠，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差别。恺撒即使是托了对战局有利情况的福，但还是相信有不流血的和平存在的可能。不仅是我，我方军队的士兵们也是如此。即使有人背叛了我们的好意，我们依然抑制住了寻仇的机会。另外，亚弗拉尼乌斯手下的士兵们，在和平的契机到来时，也表示出了他们的欢迎之心。反而是将军们自己由于双眼被仇恨和傲慢所蒙蔽，让自己无视这样的现实。因此，很多没有必要丧命的士兵们丧失了性命。

对我个人而言，此情此景，我也绝不会行使所谓的理所当然的胜者权利。亚弗拉尼乌斯麾下的全部军队，都可以按退役处理。你们若只是为了保卫西班牙，并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的兵力。在西班牙有家有眷者可以留下来。其他的人，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交界处之后就可以解散，自由还乡。

接着，恺撒又为自己与罗马士兵们进行情非得已的战斗而进行了辩解。亚弗拉尼乌斯手下的士兵们，自庞培就任两西班牙的行省总督那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服兵役了。他们都是些离开故土长达6年之久的罗马好男儿。对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他们仅知道从庞培方传来的情报，都以为恺撒穿越卢比孔河就是破坏了共和国法律。他们本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如果他们怀着对恺撒的憎恶之情退役回乡，也是足以令恺撒困扰的事。

在接着谴责自己遭到庞培和元老院的迫害、不得不越过卢比孔河后，恺撒用以下的话结束了演讲：

我方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出了西班牙行省之后解散武装。只要这个目标实现了，谁的性命都不会受到伤害。

不论对哪个士兵来说，退役都是一件令人不胜欣喜的事。现在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不用被编入恺撒军中，而是可以回到故乡。士兵得知此讯之后，竞相大声欢呼。接着，同样如此轻松地保全了性命的将领们内心的忐忑也烟消云散了。

亚弗拉尼乌斯麾下五个军团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和西班牙女子结婚等原因，选择了留下。士兵们如约行至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交界处解散。恺撒许诺，在他们到达边境前都一直为其供应粮食。当然，西班牙原地的士兵们则就地遣散回家。至于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

以及其他庞培派的将领们，恺撒让他们自由决定去留。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向庞培所在的希腊进发。

这一天是公元前49年8月2日。从大军抵达莱里达到战争结束的一个月又一个星期里，恺撒掌握战争主导权的时间仅有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成功地将西班牙的庞培军队解散了。庞培军只剩下称霸埃布罗河以南的瓦罗率领的两个军团。在至关重要的战斗中获胜，意味着可以在其他的战斗中获得更多决定力。在此之后，恺撒于9月17日抵达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9月25日从那里走海路沿北方进入塔拉戈纳。而收服西班牙全境，却花了恺撒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后面的这段时间，与其说恺撒是在战争中进攻，倒不如说是战后处理更加贴切。

但是这个战后处理必须要更加小心谨慎。西班牙是庞培的clientes，也就是庞培的地盘。如果恺撒行使胜者的权利，就会强化民众对庞培的依赖。恺撒想让西班牙人觉得他们有必要站在自己这一边。照此行事的话，即使他朝着庞培所在的希腊奔杀过去，也不必为自己身后门户大开的西班牙而感到担心，可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与庞培的战斗中去。战后处理所花的时间是正式战争的两倍，原因正在于此。

统率着两个军团镇守西班牙南部的瓦罗，在恺撒接近之后就投降了。恺撒也依然允许他自由决定去留。瓦罗也和亚弗拉尼乌斯、佩托雷乌斯一样，选择了奔赴希腊回到庞培身边。对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们，恺撒采取了对之前投降的友军一样的政策，有亲友在西班牙的就留下，其余的到法国南部指定地点就地解散。

如此一来，庞培在西班牙的七个军团就全部瓦解了。这件事意味着，本打算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恺撒的庞培的“大战略”，早早地在西面就露出了破绽。

《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这两部作品，虽然都是出自恺撒的手笔，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评价的话，后人一致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成

功。《高卢战记》中恺撒描写自己的文章令人感到他英姿飒爽的风范。《内战记》中的恺撒虽然英姿依旧，却显得没有之前那么飒爽。在《内战记》中，恺撒的形象显得有些生涩。

《高卢战记》中恺撒的敌人是高卢人、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人。恺撒和这些外邦民族战斗的原因，在他心中为之战斗的既定目标是国家利益，他要使莱茵河成为国家事实上的防卫线。

而《内战记》中的恺撒不得不与之为敌的，是同为罗马人的同胞。这场战争虽然也有既定目标，那就是为罗马共和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将成为罗马向新未来前进的指针。但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恺撒可能要选择一条最困难的路，采用令同胞血流成河的方法。在莱里达，这场战争虽说是战争，但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仗也没打过。在战争最后一个星期里，恺撒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实行包围歼灭的作战方法，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一直忍耐，直到对方自行解体。因为他想尽可能地避免同胞在内战中血流成河。

上文中曾经提到过，恺撒给西塞罗的信中曾这么写道：

> 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拥立庞培的那些坚持现有体制的顽固派们，不得不将试图打破现有体制的恺撒视为敌人。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过，不应当灭杀那些持不同立场的人。从这点上来看，这正是恺撒和苏拉的不同之处。虽然他们都因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而令祖国陷入内战之中。

苏拉的做法是，但凡是反对他的人，不论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个苏拉，内心一点也不苦涩。他痛快无比地灭杀敌人，不会为此有丝毫烦恼。

与他相反的是，恺撒极力避免随意发动战争，即使是对可以随意杀掉的俘虏，他也不行使胜者的权利，而是将其全部释放。恺撒一边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可能再度成为他的敌人，一边还是会释放他们。

>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无后悔可言。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这个实际上等同于“人权宣言”了。尊重个人的人权这件事，并不是1800年以后的18世纪才兴起的启蒙思想家们的特权。

但是，要在尊重他人人权的同时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极为艰难的事。如果上述恺撒的名言被苏拉听见的话，他肯定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但正是由于苏拉会对此付之一笑，才会死在了床上。

恺撒完成了对西班牙的讨伐，回到马赛的时候10月已经过半。马赛战役的胜利如同熟透了的果实，只差掉入袋中了。在7月31日进行的第二次海战中，德奇姆斯·布鲁图大获全胜。失败的庞培方将领阿赫诺巴尔布斯逃走以后，攻陷马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10月25日，马赛被攻下。从战斗开始的5月4日算起，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零20天的时间。与迦太基历经3年方能攻下马赛相比，这是在以3个军团1.5万人攻打地中海最强大的海港城市，这样的战斗在攻城战中已经是很快的了。这样的胜利全拜充分的战略准备所赐。

对攻陷下来的马赛城中的居民们，恺撒也没有使用战胜者权利。他没有让居民们变成奴隶，也禁止士兵在市内掠夺。此外，因为马赛光辉的历史，他还允许其继续以独立城邦的身份存在。但是在首都马赛城外所拥有的所有领土，恺撒都予以没收，将其编入了法国南部行省。这样，马赛和雅典、斯巴达一样，都成为了内政自治的自治城邦了。

如此这般的战后处理完成后，恺撒开始向意大利进发。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军团、攻陷马赛的军团全部成为了开往北意大利的先头部队。在首都罗马，恺撒还有些不得不解决的事情在等待着他。虽然他已经完成了对西班牙和马赛的控制，西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其他战线上委任的都是些年轻将领们，他们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不得不想出对策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又一个出乎意料的难事出现在了恺撒面前。那就是他手下的士兵们拒绝从军。这种事儿，恺撒还是第一次遇到。

罢战

拒绝从军就是罢战，而不是起义，也不是叛乱。但是，如果应对不当，它也有演变成起义和叛乱的危险。恺撒接到第九军团军心不稳的报告之后，立刻改变了准备沿着奥勒留大道一路南下到达首都的计划，匆匆赶往士兵们休息的皮亚琴察。这样的情形不容小觑，恺撒一定要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此，我们有一点不能忘记，那就是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士兵都不是社会的最底层人民。在当时的罗马，每一个市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拥有资产的罗马市民们以对共同体负责的方式以服兵役代替直接税。因此，奴隶是不需要服兵役的。罗马长久以来就有征兵制度，自马略实行军制改革以来，服兵役就成了自愿的事情。但是，服兵役的人必须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个人，这个大前提并没有改变。其他民族参军的士兵，不管数量有多少，都被称为“辅助兵”，而不能被称为“军团兵”。拥有重装步兵的军团兵一直是罗马军的主力，也一直是罗马的传统。这一政策也是重视市民阶层思想的反映。

在恺撒进行改革之后，士兵的薪水获得了成倍的增长。他们一年拥

有约124第纳尔（denarius，古罗马的银币，1第纳尔等于4阿斯。——译者注），接近一般市民的年收入。恺撒之所以成倍地增加士兵的薪水，是因为他要依靠他们与庞培军作战。这样一来，诸如以往战争中的掠夺也好，俘虏也好，奴隶贩卖也好，这样的一些战时收入都将不复存在。为了代替这部分收入，恺撒才给他们增加军饷。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士兵们还将在退役后被赐予一些土地。这种“退休工资”制度，在其他职业里是没有的。此外，参加凯旋式的士兵们，还将获得凯旋将军给予的额外奖金。这种奖金制度，也是其他职业所没有的特权。即使从经济收入方面看，士兵们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而非底层。

正因为如此，士兵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也自视甚高。除了汉尼拔和苏拉外，几乎没有总司令没遭遇过部下拒绝从军的突发状况。即使尊贵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大西庇阿，也有过士兵罢战的经验。对总司令而言，士兵罢战并非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的问题。

恺撒本打算回到意大利之后向南直行，现在他不得不改道往北方出发。如果他知道拒绝从军的是第九军团的士兵们的话，心里是不是能够接受呢？

第九军团，是高卢战役第一年开始就跟随恺撒战斗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四大军团中的一个。与第十军团一样，他们是恺撒像培养孩子一样亲手培养出来的，是他最值得信任的军团。所以我才想，他如果知道了这一情况，心里是不是能够接受？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也好，唯一一次决定性地击败汉尼拔的大西庇阿也好，他们手中拒绝从军的也都是最深得他们信赖的部下。

回到恺撒这边，这次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再一次发生了罢战事件，那时参加罢战的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军团都更得到恺撒的信任的第十军团。阵前指挥的司令和他麾下与之并肩战斗的精锐之间的关系，是在一起挨的苦日子越多，信赖度和亲密度就越高的。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什么都是有界限的。亲密的界限一旦突破，“恃宠”者的态度也就变了。“恃宠而骄”如果再往前推进一点点的话，就会变成人们所说的“得意忘形”。正因此，司令官对罢战事件的处理，正是隐含着从单纯的罢战变成叛乱的危险。

突入意大利北部城市皮亚琴察城的第九军团士兵们要求即时退役。当然，他们也知道恺撒控制了西方之后正要面对庞培，他这个时候是不会让一个士兵退役的。所以虽说是提出即时退役，但实际上本意是想增加军饷。

恺撒到达皮亚琴察之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和之前一样单刀直入地对他们说：

诸位战友：

我想成为得到诸君爱戴的司令。像我这样为着诸君的安全着想、不忘让你们得到丰厚的经济收益、不忘提高诸位作为战士的名誉的人，再也没有了。但是，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允许诸君如此为所欲为。

这世上有两种人：指挥者和被指挥者。指挥者对被指挥者有责任，被指挥者对指挥者也有义务。就像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船长和船员一样。不论如何，我们只有各自完成好各自的任务，才能期待得到好的结果。

和庞培之间的抗争，你们要相信，公正是在我们这一方的。正因如此，诸位才会跟随我。然而虽则占据了公正的立场，如果却在实施阶段忘记了公正的话，又将何去何从呢？难道不是会令我们失去指责庞培方不公正的资格吗？诸位都是罗马市民。而正因为你们是罗马市民，我才不允许你们忘记自己所持的公正。

接下来，恺撒像投石击水一般面对着沉默以对的士兵们，斩钉截铁

地说："我拒绝接受你们的要求。"恺撒不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甚至还说要将他们处以"什一杀"——这一罗马军中最严重的惩罚。

所谓"什一杀"，就是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十分之一的人，而剩下的十分之九的人，则用棒子将那十分之一的人殴打致死。即便是在军规森严的罗马军中，也是仅有极重的罪过才会处以这种刑罚。沉重不堪的沉默笼罩着全军。恺撒对这样的气氛好像视而不见。他命人拿出士兵们的名单，准备抽签决定被施以死刑的人。

事情至此，与"剧本"中预先设置的完全一样，幕僚们出场了。幕僚们劝说恺撒道，这些都是长年跟随他身边出生入死的人，还希望他能原谅他们一时犯浑云云。但是恺撒丝毫不为所动，幕僚们唯有叹气而返。军团长、大队长们也开始再三向绷着一张脸的恺撒求情。第九军团的士兵们顿时失去了之前的气势，面色凝重地看着恺撒。刚刚三十而立的他们和已进入50岁的恺撒之间，毕竟有着15甚至20岁的差距。

最后，总司令终于开口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取消施行"什一杀"，而只是说："刑罚延期执行，在下一个集结地布林迪西能不能再看到诸君，就要看诸君的表现了。"

言毕，他就向首都进发了。所有在北意大利行省休息的恺撒军官兵，向着南意大利的港口布林迪西进发了。到达布林迪西时，第九军团的士兵们一个也没有少。说也不用说，"什一杀"就这样中止了。

以最少的牺牲就掌握了罗马世界西半部分的恺撒，这个时候第一次蒙受了真正的巨大损失。这场大损失发端于南方，即北非的行省战线。

北非战线

库里奥曾频繁而活跃地与庞培派的先头部队元老院和两位执政官针

锋相对。这个30岁的青年贵族，如果在恺撒身边有参加高卢战役的经验的话，大概能培养成为军团长层级的优秀人才吧。然而库里奥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那样的经验，却被任命为一线战场的总指挥。此时身为总司令的恺撒，跟高卢战役在一个地方打仗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他不得不将整个罗马全域都当成战场。因此为了坐镇指挥所有分散的战线，他不得不任命战场经验尚浅的人担任指挥官。恺撒给他的命令中第一目标是称霸西西里，库里奥没怎么战斗就做到了。恺撒的命令中第二个目标是拿下北非行省，这个年轻人也以为可以手到擒来。

为了拿下被称为罗马粮仓的西西里，恺撒配给库里奥4个军团。在攻下西西里岛后，恺撒命令他趁热打铁，率领这支部队进攻庞培以大将为总督坐镇的北非行省（现在的突尼斯）。

年轻的库里奥奉命前往。但是他没有像高卢战役时恺撒手下的军团长们所学到的那样，也没有学到要逐步执行恺撒命令的指挥方法。库里奥是加上自己的臆断来执行命令的。他认为，只需2个军团的重装步兵和500名骑兵，就足以对北非发起进攻。他决定将剩下的2个军团以保卫西西里为目的按兵不动，结果他的军队形成了西西里和北非分置了的两股力量。而在西西里和北非之间横卧着的，并不是简单的架一座桥就能渡过的河，而是地中海。虽然只用两天时间也有充足的航线准备，虽然罗马人称之为“我们的海”，但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海，不是一个适合把兵力分成两股的好地方。

而且配给库里奥的4个军团，并不是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老底子，而是在科菲尼昂之役中投诚的原庞培的士兵。他是率领着这些兵向庞培派驻守的北非行省进攻。攻破科菲尼昂之后，恺撒允许其自由选择时放走的几个将领也已在北非行省会合。正是出于对这种特殊情况的考虑，恺撒才认为有必要用4个军团进攻由2个军团驻守的北非行省。

不仅如此，库里奥还有另外一个失误，那就是他对原迦太基领地内北非行省以西的邻居努米底亚王国的动向缺乏深刻观察。

努米底亚王国，从布匿战争时代就协助罗马与迦太基开战，从那时起就是与罗马有着同盟关系的独立国家。在庞培扫清海盗称霸东地中海之后，它成为庞培的clientes已经很久了。仅凭这一点，也不能不将其纳入庞培方势力。另外，一年前库里奥还是护民官时，曾经向元老院提过一个议案，要求向已经名副其实是罗马属国的努米底亚王国课行省税。虽然这个议案由于庞培派的反对最终没有被采用，但消息早已传到努米底亚国王的耳中。因此，当努米底亚的国王尤巴听闻库里奥大举来犯，而北非行省总督又请求援助时，他认为这是消灭库里奥的绝好时机，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请求。库里奥即使是以4个军团全力进犯，面对这种种复杂的状况，战斗力恐怕也并不算多。

公元前49年8月11日，库里奥率领2个军团和500名骑兵在北非登陆。登陆本身顺顺当当，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此外，登陆后库里奥军队攻击了敌方的补给部队，并夺走了全部物品。狂热的士兵们称赞库里奥为“大将军”。因此，库里奥自认为这些士兵们也尽在自己掌握了。在登陆后的第二天，他就大胆地在乌蒂卡城前摆下阵势。乌蒂卡是迦太基灭亡后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罗马的行省总督的驻地。总督的2个军团也在乌蒂卡驻守。在最开始的战斗中，库里奥初尝胜果。

正当此际，乌蒂卡阵营前的库里奥士兵中间，开始流行一种奇怪的疫病。接着就传来了携战斗象群的努米底亚王军正在逼近的消息。库里奥这时才决定调集驻守西西里的另外2个军团过来。但是在他们抵达之前，驻守乌蒂卡的总督军队已经再次展开了攻击。

库里奥拼命说服已经动摇的士兵。有几个士兵逃走了，但是绝大多数士兵仍然重整旗鼓，准备在总督军和努米底亚王军会合之前出击。然而库里奥在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就开始坐等西西里过来的2个军团。紧接着，为了等待援军和防止士兵背逃，他从乌蒂卡的前沿阵地撤走，搬到位于该城东面的科尔涅利乌斯营地。

科尔涅利乌斯营地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大西庇阿安营扎寨的地方，

位于狭长半岛的最前端。只要制海权不被敌方掌握，这里就是一个颇为安全的基地。这时从西西里过来的2个军团抵达了。库里奥手中的兵力倍增，总兵力为4个军团加800名骑兵。

这个时候，库里奥接到了从努米底亚逼近过来的军队掉头回国的消息。该消息其实是一个计谋，但是库里奥误以为敌军大半已经真的撤退，他决定率军袭击剩下的努米底亚敌军。从西西里赶来的援军和恺撒已经成功称霸西班牙的消息，刺激着年轻的库里奥追求功名的心。

他命5个大队驻守科尔涅利乌斯营地，率其余的全部军队离开了营地，向巴古拉达河进发。那里应该有努米底亚尚未撤离的剩余部队。事实上，敌人确实在那里。但是在离此大约9公里的地方，国王亲率大军也正在张网以待。

库里奥率军从科尔涅利乌斯营地前行了才9公里，就与折回的先锋骑兵团会合了。骑兵团是偷袭努米底亚兵营后带着俘虏凯旋的。在审问完俘虏后，库里奥对士兵们训话说：

> 士兵们，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些俘虏的语气，不是和逃兵的语气一模一样吗？他们的王距此十万八千里，敌人已是不堪一击了。敌军被我们的骑兵追赶得七零八落，就是最好的证明。名誉和金钱在等待我们，出征的时候到了！

但是，经过了夜袭的骑兵团已经很累了，他们落在了梦想着金钱和荣誉而强行急行军的步兵团后面。

夜袭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努米底亚王那里。于是尤巴率领着60头大象、2000名骑兵以及1万名步兵不退反进。库里奥还以为敌人正在忙于逃散，他刚刚收起会战阵型，却正好遭遇到迎面而来的敌人。

库里奥除了守在营地的5个大队外，手上应该只带了2万名重装步

兵，后面的骑兵也还没有到达，而且，他对敌人的突袭全无防备。努米底亚的2000名骑兵从两翼对他进行了包抄。

两翼被敌人骑兵包抄，正面有象群踩踏，逃无可逃，甚至连伤员都没法运出去。士兵们陷入一片混乱中。即使后来己方的骑兵赶到助阵，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匆匆赶来的骑兵队长劝库里奥撤回科尔涅利乌斯营地，身为司令的库里奥正骑在马上，骑兵队长告诉他说，如果只以骑兵突围的话，就可以逃出生还。但是年轻的指挥官掷地有声地回答道：

“如果失去了恺撒交给我的军团，我哪有脸回去面见恺撒！”

库里奥一边这样说，一面舍弃盾牌，手执长矛，杀入敌军阵中。经常被庞培方恶意中伤说被恺撒用金钱收买了的库里奥，就这样失去了他刚刚30多岁的生命。在8月20日的这场战斗中，库里奥麾下的3个半军团共2万名士兵，一个也没有活下来。

负责镇守科尔涅利乌斯营地的5个大队3000名士兵们，从逃回的骑兵的报告中知道了这一惨况，也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内战记》中如此描述：“一旦陷入混乱，库里奥军中的每个人都变得只考虑自己。”停留在岸边的运输船也顾不上同胞了，纷纷带上抢先登船的人驾船掉头逃往大海，而赶到岸边的士兵们也为了登船而一片混乱。终于，剩下的士兵们望着运输船团消失在水平线，只能向行省总督派使者纳表投降。

这些士兵在科菲尼昂投降前都是庞培手下的士兵。总督虽然想帮助他们，但是努米底亚的国王毫不动摇地主张行使胜者的权利。投降的士兵们除了部分被国王选中带回努米底亚外，剩下的全都被杀了。此后，努米底亚王尤巴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乌蒂卡。在国王的身后亦步亦趋的，是逃到非洲行省的庞培派的元老院议员们。其中还出现了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苏尔皮切乌斯·鲁弗斯的面孔。

8月11日登陆后仅过了10天，库里奥率领的恺撒军队在北非的攻城战就以完败告终。对恺撒来说，自己军队第一次遭遇惨败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将北非——也就是从南面对意大利的攻击地点——让给庞培方先进攻。但是，恺撒从不对部下进行指责，或将责任转嫁到部属将领的身上。他对库里奥也是如此。《内战记》中，他只是平静地记述了自己军队的失败，他是这么写的：

> 他的年轻，他的勇气，他在历次战斗中的胜利，以及他相较于执行任务更加看重战斗结果的责任感，以及他从恺撒这里接受军令的强烈的自觉，使他过早地作出了判断。

然而在返回久别了8个月的罗马的途中，恺撒收到的不仅仅只有库里奥失败的消息。

在制伏了西面后，恺撒打算一门心思对付庞培所在的东方。为此，从其手中夺取横亘于意大利半岛和希腊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是决战前不可或缺的一项准备。在前往西班牙之前，恺撒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下文称为小安东尼。——译者注）和多拉贝拉二人。小安东尼那年正值29岁，多拉贝拉则刚好30岁。两人都属于名门科尔涅利乌斯一脉，两人都是以放荡闻名的美男子，又都才华横溢，因此很得恺撒的欣赏。多拉贝拉还是西塞罗的爱女图利娅的丈夫。如果抛开多拉贝拉放荡不羁、挥霍妻子的嫁妆引起西塞罗憎恶这一点的话，西塞罗和这个年轻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备受西塞罗疼爱又有着美好前途的年轻人们，从库里奥开始，到这个多拉贝拉，再到卡埃里乌斯，乃至他的亲侄子、儿子都悄悄地追随恺撒走了。他们是促使西塞罗这个57岁的老头如此悲观厌世的一大根由。因为就连还没有到服兵役年龄的侄子和儿子，也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罗马。

恺撒给予了多拉贝拉和小安东尼两人20个大队共1.2万名士兵，委以夺取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重大任务。当然，恺撒也从本已不多的船团中给他们划拨了必需的40艘船。这相当于2个军团的20个大队和1.2万兵马，应该是恺撒在法国南部行省编组成的“云雀军团”中的士兵。这个军团中的精英指挥官之一，就是后来历史传记《喀提林阴谋》的作者——撒路斯提乌斯。那时已经37岁的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西塞罗所说的“恺撒帮罗马青年激进派”中的一员。

根据恺撒的命令，两位正当而立之年的将领率领的1.2万兵马开始分成两股行动。小安东尼领兵朝希腊北部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特亚（现在的库洛特亚）出发，欲往此处建造基地，多拉贝拉率船队在海上予以协助作战。

为了对付这两个人，不让恺撒方渡过亚得里亚海，庞培方派出了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海将黎波是个50多岁、战场经验丰富的老手，从肃清海岸对海盗作战时期就跟随庞培。他审时度势，对两员小将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法。

黎波的首要目标就是海上的多拉贝拉。多拉贝拉的船队被黎波的船队穷追猛打，只好逃往达尔马特亚的海岸。但是亚得里亚海靠近意大利的方向都是连续的沙滩，连接着原南斯拉夫的东岸却是被山峦挤压后延伸入江的山崖和海湾。这里地形蜿蜒繁复，船队只要进去了就很难找到出口。多拉贝拉的40艘船被追杀得无路可逃，终于败北。逃出来的多拉贝拉和几艘船想去和小安东尼的部队会合，但在那之前，黎波早就改变了攻击的目标，将矛头转向了小安东尼。小安东尼的部队也被赶到了一个小岛上，除了小安东尼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几个大队抛弃船只，仅带着军粮成功逃脱之外，全军皆被俘。

海将黎波告知被俘的15个大队9000人，只要站到庞培这边向恺撒宣战就能保全性命。大多数的士兵都接受了这个选择，也有少数几位百人队队长因拒绝而被杀。虽然此后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但在此时，这样

的事对恺撒而言还是头一遭。为了表示对恺撒的忠诚而宁愿选择死的这些人，不是罗马市民，而是高卢人。

对恺撒来说，这次失败损失的不仅是9000兵马和40艘战船，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在此情况下要攻打在亚得里亚海对岸等待着的、正在养精蓄锐的庞培，形势确实非常不利。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人会努力收拾残局，挽回由于失败带来的不利形势；另一种人会将既有情况就置之不理，转而另觅蹊径继续努力，最后一举成功地挽回败局。恺撒就是第二种人的典型代表。

恺撒出任执政官

从高卢战役开始，恺撒就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即使在行军过程中，他也照样要接受各地的情况汇报，发布军事指令。他在各地配备的“恺撒事务所”，是一个能够帮助完美执行送情报的人和忠实地施行指令的组织。因此，恺撒能够在到达一个地方的同时，马上就能着手处理事务。12月2日，恺撒也是和往常一样，一回到首都马上便发布指令。托那些同心协力贯彻执行指令的机关人员的福，他在10天之内就完成了所有需要处理的事项。

首要的一个指令，就是将恺撒提名为独裁官。

相对独裁官而言，他内心其实更希望被选为执政官。但是问题是，只有现任执政官才拥有公民大会的召集权，选出下一任执政官。公元前49年选出来的两位当任执政官早已随着庞培一起逃往了希腊。因此，恺撒四处活动，想授予大法务官雷必达以大会召集权，却因遭到了元老院的反对而功败垂成。恺撒授意雷必达，令其提出任命恺撒为独裁官的法案。这是苏拉用过的老法子，因此恺撒一点也不喜欢用。但是他没工夫

跟元老院那帮推诿搪塞、消极抵抗的人耗着了。该法案经公民大会通过后，恺撒正式就任独裁官一职。

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一职，是一种负责国家危机管理对策的职位，因此拥有广义上的收拾残局的任务。执政官二人因某种原因不在首都的情况下，独裁官有权召集公民大会，选出下一任的执政官。因为罗马人心里把避免政治空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恺撒行使了这个权利，以选举执政官为目的召开了公民大会。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候补人员有几人，不得而知也无须考虑。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会议召集人，同时也是会议主席的恺撒也必定是候选人之一。就这样，恺撒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公民大会中的最高选票，第二次担任了罗马的执政官。另外一位当选者是温和厚道的恺撒派元老院议员伊扫里库斯。至此，恺撒终于达到了当选独裁官的目的。身为独裁官，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和执政官不同的是，护民官就算对独裁官有所异议，也不能行使否决权。尽管如此，手中握有独裁权力的恺撒所行之事，和苏拉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大开杀戒。

他做的事情包括：

一、废除了由苏拉定下的国法中，反苏拉派人的子孙们永远不得担任公职这一条。

二、允许流放国外的人回国，但这一条并非对任何人都有效，必须获得大法务官或者护民官认可，并通过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才行。

三、为罗马各行省任命总督。任命如下：雷必达继续担任近西班牙的总督；卡西乌斯继续留任远西班牙总督；德奇姆斯·布鲁图出任法国南部的行省总督；亚里埃努斯担任西西里总督、佩多凯乌斯担任撒丁总督。当然毋庸赘言，所有的人都是恺撒的人。这也是确保将西地中海区

域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人事安排。

四、恺撒认为要继续掌握本国罗马，除了一定要解决政治上的空白和社会的无序这一问题，他更加了然于心的是，经济混乱会导致人心的不稳，只有保证了经济的安定和繁荣，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公民才会成为最好的伙伴。

内战爆发以后，罗马人对未来普遍感到不安。每个人成了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因此经济也变得衰弱无力。欠债的不还钱，放债的如果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那么他也不会再放贷。金钱如果不流通的话，经济就唯有停滞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放任不管的话，下层人民会比富裕阶层的人先忍受不了，不满情绪将有爆发的危险。

因此，恺撒行使了不论谁反对都无法禁止他使用的独裁官的特权，强制性地将以下政策贯彻实施：

首先，债务人有义务委托第三方介入，按照内战爆发前的标准，评估自己所拥有资产的价值。这一评估完成后，除去已付的利息，剩下的所有债务，债务人应当以这个评估为基点，以现金或者资产的方式偿还债务。

之所以按照内战爆发前的标准评估现有资产价值，是因为战乱的不安因素，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了四分之一。因此恺撒的这个政策，主要是在抑制通货膨胀。

根据恺撒实施的这个政策，债权人实际上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债权。但是，由于减去了四分之一的债务，让债务人还债还得少一些了，结果债权人索回四分之三的债务也相应地变得更容易。从经济上来看，将债权的评估价值冻结到内战爆发前的水平，看来是一条颇为高明的可行之道。

五、这个政策还禁止拥有6万第纳尔以上的现金。换句话说，就是禁止拥有超过这个额度的现金存放。

六、除此之外，恺撒还全面废除了告密制度。他禁止了在苏拉独裁统治时期一度泛滥的告密行为。被钱蒙住了双眼的人们曾经极为热衷于此。这样一来，恺撒在结束了人们内心恐惧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让资金的流通更有活力。

七、为了让资金更好地流通，以及扩大军用资金来源，恺撒发行了新的货币。由于在准备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强行夺取了国库中的大部分资金，因此仅用国库中的金银是无法保证新货币的铸造的。于是又到了适用独裁官强权的时刻了。恺撒下令取出罗马城中供奉神殿的供品，将之铸成了金币。

这枚新货币的正面是“慈祥”的恺撒头像，背面刻有恺撒的名字和“inperator”的字样。针对那些既不喜欢听演讲又不喜欢看书的人，将媒介活用到每天都必须接触的货币进行宣传，恺撒是最早想到这一方法的罗马人。

与11个月之前相比，恺撒的身份已经大不一样了。跨过卢比孔河之时，恺撒因不服从类似戒严令的“元老院最终劝告”而被视为国贼，追随他的士兵也被称为叛军或贼军。然而现在，恺撒身居罗马执政官这一国家最高职位，拥有正统的法定地位。跟随这样一位由法律认可的领袖的士兵们，也即刻被认为是伟大的正规军。

9个月之前，恺撒没能阻止庞培出海，令庞培和他的军队成功逃往希腊。这样一来，恺撒想尽早解决内战之争的梦想便化为泡影。当时正是因为自己已成为了国贼，所以他坚持要尽早解决战事。然而当迅速解决的希望变得淡薄，就有必要对法律加以改善，使之与自己的立场相一致。前面反复提到过的，罗马人非常重视法律。恺撒要获得罗马人的接受，必须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就任执政官之后的恺撒，依法获

得了正统的执政者地位，有了统领军队的正当权力和立场，因此可以冠冕堂皇地对庞培及其军队予以追击。他这场形势大逆转之战，堪称“一举挽狂澜”的恺撒式胜利的典范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恺撒才成功地控制住了国内形势，令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恺撒知道这种手腕的效力，并将之完美地运用起来。相比较而言，只知在军事上求“实”耕耘，却抛弃了本国资源的庞培，在这种“虚”招的应用上无疑是失败的。

不过即便如此，仅在法律上加以诠释还是不够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赢得民心。由于恺撒实施了以上利民政策，普通市民们确实都倾向于支持恺撒派。对这些人来说，内战不过是庞培和恺撒之间的权力斗争。虽说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也还是要将法律上的胜利和实际上的胜利一起展示给他们看，才能成其为明确无疑的“胜利”。用武力说话的时代还没有结束。在恺撒的命令下，12个军团的重装步兵和1400名骑兵在布林迪西集结。

如果以赛马为喻的话，庞培从比赛开始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而恺撒则在最初仅与其他的马匹并驾齐驱，逐渐地脱离马群取得领先，直到即将进入最后的直线圈时，他才从外圈切入内道，首次占据领先位置。现在，这个直线圈才是两雄相争的胜负关键。

战斗力的比较

恺撒在《内战记》中记述如下：

> 庞培既没有非打不可的战斗，也没有在其他方面受到敌人的阻碍。他几乎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

舍弃了意大利之后的庞培，对马赛和西班牙的支援也很消极，在希腊地盘上迎战恺撒的准备工作却毫不懈怠地不断进行着。

首先，他从意大利带走了5个军团共3万名重装步兵。如果是恺撒，当兵团人数不足时，只要军团建制还在，他就不会急于补充人员，也不会将两个军团合并为一个。而庞培在这方面非常“务实”。他手下的一个军团，必定要有6000名士兵的定额。

此外，他还集结了由罗马市民兵组成的四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是驻守奇里乞亚的老兵，是由两个残缺不全的军团合成的一个军团。这个军团庞培称之为“双胞胎”军团。另一个军团是从罗马行省克里特岛和马其顿两个地方集结的士兵编成的。剩下的两个军团，是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雷托鲁斯以现任执政官的身份在意大利编成的军团。根据庞培的规则，他将以亚得里亚海上俘虏的恺撒方的9000名高卢兵为基础的非罗马市民兵，以及东地中海全境范围内招募的士兵，也都混编入罗马市民兵当中，以凑满军团规定的编制。

这样，一共就有了9个军团5.4万名士兵，还有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率领的在叙利亚编成的2个军团。如果加上这个的话，仅重装步兵一项，庞培军就达到了11个军团6.6万人。

军团里除了军团兵之外，还有由于职能不同另行编制的轻装步兵。庞培军的轻装步兵队，克里特、斯巴达、本都，以及从叙利亚来的3000名弓箭兵和1200名投石兵，一起编进了部队，共计4200人。

此外还有7000名骑兵。在东方，骑兵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才能服的兵役。庞培手中的骑兵团，出现了从格拉提亚的领主到庞培在东方的clientes家族总动员的盛况。领主们即使自己不参加，也会让儿子们参战。

从陆上的实力对比来看，恺撒这边绝对处于不利地位。

首先，虽然率领了10个军团参加此次的决战，但是他从没有在《内战记》中写出准确的数字。因此我们只有根据他记述的内容来推测了。不管怎样算，他一个军团的人数都没有庞培方的6000人多，平均算起来，大概只有2500人。人员锐减至此的原因，恺撒也在书中记述了。

八年高卢战役和马赛、西班牙两次战役减员，以及在各大战役的往返中途损耗，加上意大利南部布林迪西地区秋季的气候反常，都是军团兵大量减员的原因。但是减员的总数和战死、病死的人数并不相符。因为伤员和病人等已经不能继续服役的人，恺撒已经命令他们或者返乡，或者留在本国待命了。另外，从12月22日抵达布林迪西，到1月4日率军出港，这期间恺撒为了决战而进行了士兵筛选。正如上文所说，他选拔出来的精兵强将，一个兵团平均只剩2500人了。

这些事情完成后，恺撒手下的重装步兵有10个军团共2.5万人。轻装步兵数量不明，应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兵力。此外，恺撒视若子犊的1300名骑兵，是从高卢和日耳曼出身的人当中选出来、由恺撒亲自加以训练的。军团兵这边，几乎全部战斗力的二分之一，都是高卢战役时开始就在恺撒指挥下战斗的老底子。

恺撒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认同“精锐论”。他维持手中的西地中海海域的各行省，至少需要10个军团以上的兵力。因此，他主张“精锐论”，很大程度上是想确保军粮供应，令自己不用为此劳力费心。这是一个有利点。对要在庞培的地盘上进行这场希腊战争的恺撒来说，这个有利点是不容忽视、必须要考虑到的。

接着，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双方的陆战指挥班底。

庞培方的总司令当然是57岁的庞培自己。这个人的组织能力和战略才能，到目前为止都是被评为第一名的。当然，他手下的副将是梅特鲁斯·西庇阿，这个人既是庞培的岳父，也在公元前52年和女婿庞培一道出任过执政官，虽然是副将，但是从他受到的待遇来看，简直就是和庞

培并列的总司令。庞培是以这样的礼数对待他的，他自己本人也是这样行事的。

在这两人之下的是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两个从西班牙战线打了败仗回来的人。他们在被恺撒释放后，跑到希腊和庞培会合了。另外，科菲尼昂战役里被恺撒打败的阿赫诺巴尔布斯也是“战败被俘——释放——会合”俱乐部里的一员。因为在科菲尼昂战役之后，他根据庞培的指示又出任了马赛保卫战的总指挥，但仍然在两次海战中再一次败给恺撒的下属将领德奇姆斯·布鲁图。此后他对马赛的命运不再抱幻想，返回希腊和庞培会合。

从根本上来看，在庞培派中事实上担任副将的，是在八年高卢战役期间担任恺撒副将的拉比埃努斯。他熟知恺撒的战略战术，而且一直以来都战斗在指挥最前线。这两点加深了庞培对他的倚赖。

此外，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雷托鲁斯，以及小加图等反恺撒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在将领的名单中。跟随庞培舍弃意大利的元老院议员有200多人，都可以在希腊召开元老院大会了。但是，几经犹豫之后又追随庞培来到希腊的，包括西塞罗在内的这些人，在军事上并不能得到庞培的重视，他们也自知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但是作为社会地位崇高的人士，他们也不愿放弃作战会议的出席权。这也就是一群只会嘴上吵吵的人。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自愿奔赴前线参战的36岁的马库斯·布鲁图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此人以后会相当有名。布鲁图8岁那年，父亲就被庞培杀害了。父亲之死使他恨庞培恨了很久。但是此时他决定来到希腊，是为了反对恺撒打倒“元老院体制”。因为他相信，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也就是现在的政体，是罗马国家应当遵循的政体。这个布鲁图虽然在庞培的阵营里待着，但是从不与庞培说话。庞培也对这个毫无军事经验、整日阴沉着脸的男子置若罔闻。

在恺撒从首都出发前，布鲁图的母亲就拜托恺撒保护跟随庞培走掉的儿子。布鲁图的母亲是恺撒以前的情人，所以恺撒不会不理的。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是恺撒一生挚爱的女子。这个女子的委托，恺撒从内心绝不会辜负。可能布鲁图以为跟着庞培走了，就能摆脱自己是恺撒情人儿子的不光彩命运。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要回到原点面对这个现实。

终于可以看到和庞培决战的恺撒方的指挥官的面孔了。除了总司令是恺撒外，和星光熠熠的庞培方比起来，这边的阵容显得非常寒酸。除了公元前53年的执政官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一人和恺撒是同时代的将领外，其他的将领，从33岁的安东尼开始，大多都是些经验不足的年轻将领，这就是现实。高卢战役时期的军团长库拉斯因为被选出担任大法务官，和托雷波尼乌斯一起留在罗马统治本土，德奇姆斯·布鲁图出任行省总督到法国南部赴任去了，不能一同前往希腊。因为库里奥战死北非，恺撒也不放心将一方军队只交给多拉贝拉一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恺撒任命多米提乌斯为第一副将，小安东尼为第二副将。这两人都是骁勇善战之辈。当然，这个骁勇善战，也是有忠实地执行恺撒思想战略的成分在内的。世上的事经常有正和反两面，相比于思考的“头”和出主意的“口”都很多的庞培方，恺撒这边所有的思考和意见都集中在恺撒一人手中。

虽然可以成为幕僚的人寥寥可数，但是恺撒任命以百人队队长为代表的将领担任中间指挥层，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压倒庞培方。从很久以前开始，罗马军团的主力就是百人队，将这个传统活用到巅峰的正是恺撒。从名字来推测，这些人都是出生于平民的阶层。恺撒相信他们的实力，给了他们莫大的自信。他们被升任为原本仅由贵族和元老院阶级出身才能担当的军团长和大队长，也同时萌生了担负起军团支柱的自觉心和责任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百人队队长们对恺撒的忠诚之心，是连一丝乌云也看不到的。和这些百人队队长同寝同食的普通士兵们，跟自己的队长也是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虽然有

些迫不得已，但这正是恺撒采用精兵模式与庞培战斗的自信来源。

话虽如此，战争并不是只是依靠意志和气概的战斗。战争的决定要素中，首屈一指的，无论如何都是士兵的数量和素质。如果说数量的话，那么庞培方肯定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如果从质量上看，两方的情况正好颠倒了。因此，两个在数量和质量上各擅胜场的综合体的战斗力比较，是没办法简单给出答案的。

恺撒这边的10个军团2.5万名重装步兵中，现役的老兵占到了一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5个军团，都是从高卢战役第一年开始就追随恺撒的。对恺撒而言，他是率领着嫡系部队亲临决战。

庞培方的老兵也不少。但问题是，老兵也有两种：一种是自始至终都在战场上的现役兵；另一种是年龄上虽然已是老兵，但是战斗经验已经撂下了好多年的所谓老手。

庞培方的老兵，只有从意大利带来的两个军团属于前一种，这两个军团是以出兵叙利亚为名，从恺撒手中收走的两个军团。从公元前53年到公元前50年的四年期间，这些老兵跟随在恺撒身边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除这两个军团以外的庞培军中的老兵们，都是些东地中海海域各行省的防卫兵。他们因为庞培称霸了东方后过上了和平的日子。简言之，自从庞培称霸东方以后，从公元前63年开始的15年间都没有一个真正战斗过的老兵。越是新经过战火洗礼的战士，就越是强悍。庞培也知道这一点。在恺撒取得西地中海海域期间，庞培率领他的士兵们前往希腊中部的色萨利进行了军事训练。然而不管怎么说，除了这两个军团以外，他的兵力也还都是从各地凑合而成的。没有面面俱到的训练，就无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提到海上战斗力，我们会发现将双方实力拿到一起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庞培从东地中海全域搜集了600艘船。和他相比，恺撒连保证运送

2.5万名步兵和1300名骑兵的船只都没有，他为此不得不分两批运送。这样算来，他应该充其量只有100艘船。在无可奈何地目送庞培出港远遁之后，恺撒在9个月前就下令建造船队。但是受命造出来的船里头，有40艘已经在小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夺取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时损失掉了。不过，庞培军队也不会为了阻止恺撒军渡过亚得里亚海而动用全部的600艘船。另外，港口也仅能容下150艘船。

即使夺取地中海制海权犹如梦一般遥远，恺撒除了考虑如何渡过亚得里亚海之外，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此时庞培则认为，只需150艘船就足够阻止恺撒渡海了。

战争因而转移到了经济问题上。在双方战争费用的比较方面，庞培仍然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不能忘记的是，公元前49年这一年的两位现任执政官正是庞培的人，而且他还拥有足够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元老院议员。但是，根据发布“元老院最终劝告”的戒严命令，庞培还被赋予了以军事力量全权收拾事情残局的权力。这一年的正统政府，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希腊。无论是向罗马行省征税还是向同盟国提出兵力支援的要求，权力都掌握在庞培手上。庞培并不是单纯地收拾残局。他通过成功肃清海盗，使得地中海的全部海港城市都成为了他的clientes，此后又继续称霸了东方。那些成为了罗马行省的地方自不用说，还有一些承认罗马霸权后的同盟国都与庞培建立起了clientes的关系。而且这些东地中海行省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西地中海领域。如果从地域来说的话，它相当于高卢、小亚细亚、叙利亚三者相加之总和。从那些地方收取的行省税，恺撒只有区区4000万第纳尔，庞培则有2亿。舍弃意大利之后的庞培，将东地中海全部的行省税都握在了自己手中。因为有正统政府之名，所以他这样做在法律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庞培慌忙从首都逃遁时，也许在神殿内国库的大部分都没来得及带出——也有可能一点都没有拿走。但是由于政府的正统性以及庞培个人的权威，庞培方的战争经费仍然非常充裕。就连那

个小气的西塞罗，去投靠阵营时都带去了100万第纳尔，可见光是各方捐献数目就已经相当惊人了。

庞培用这笔钱在希腊买了大量的粮食储藏起来。无论是购买兵器、添置装备，还是支付军饷，他都完全不觉得有负担。从一开始，庞培和众元老院议员的生活水准，就和在首都时不相上下。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将妻子和未满服兵役年纪的儿子都放在了莱斯博斯岛避难，因此处于分居两地的境地。

另外，庞培方资金的充裕是与负责收税的税吏分不开的。在庞培和恺撒的斗争中，税吏都站在庞培一边，保证了资金的流入。税吏和放贷者这类罗马社会的金融人员，对恺撒在高卢和西班牙全境实行的税制改革产生了危机感。税制改革一旦实施，就不能随意地进行操作了，他们的甜头就会减少。此外，恺撒还规定了利息的上限。从金融方面来看，庞培所代表的体制是自由经济派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派。

恺撒将出任公元前48年执政官，他所代表的政府即将成为正统政府。但是，这仅是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而已。如果他无法从事实上得到，那么他还是得不到。另外，他手中的地域都是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虽然西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经济力量较强，但如果对那里的居民实行重税的话，恐怕就连他们都有追随庞培的危险。

如果资金不足，又无法从敌人现居地区获得军粮补给的话，形势就对恺撒越来越不利了。正是因为无法对战争经费不足视而不见，他才一面召集了12个军团，一面最后只带了10个军团出征。

两雄相争之前，如果将两方所有条件总结成一个总览表的话，应该就是如下表所示。因为总司令的年龄分别是58岁和52岁，因此这一点上就将两者视为条件等同，不再列入表中。此外，总览表的满分是10分。

双方条件	庞培	恺撒

陆上力量（数量）	10	3
士兵的老练程度（平均值）	2	8
高级指挥官	8	2
中、下层指挥官	2	10
海上战斗力	10	2
资金支援	10	2
总司令的能力（或是对上述各条件的利用程度）	？	？

我想标注“？”的地方如何评价，还是根据两强相争的阶段结果，由读者来填写比较好。无论如何，军事上的组织所指的是，为达到实现用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好的效果的目的而应该调动全部能力的组织。因此，战争开始以前还不明了的地方，我用“？”来表示。

进军希腊

取得执政官之位的恺撒到达布林迪西的时候，是公元前49年的12月22日。按照往常来说，此时应该是进入到冬营期，而非适宜军事行动的季节。但是，想尽快结束内战，进行历法改革的恺撒，对日历上的季节和实际上的季节差别的感受，比普通人敏感了一倍。虽然确有差别，其实也并没有差到两个月这么久。11月的南意大利已经进入了冬季。冬天里，即使是平静的地中海也会变得波涛汹涌。此外，恺撒还未能准备好足够数目的船只来完成全军一次性渡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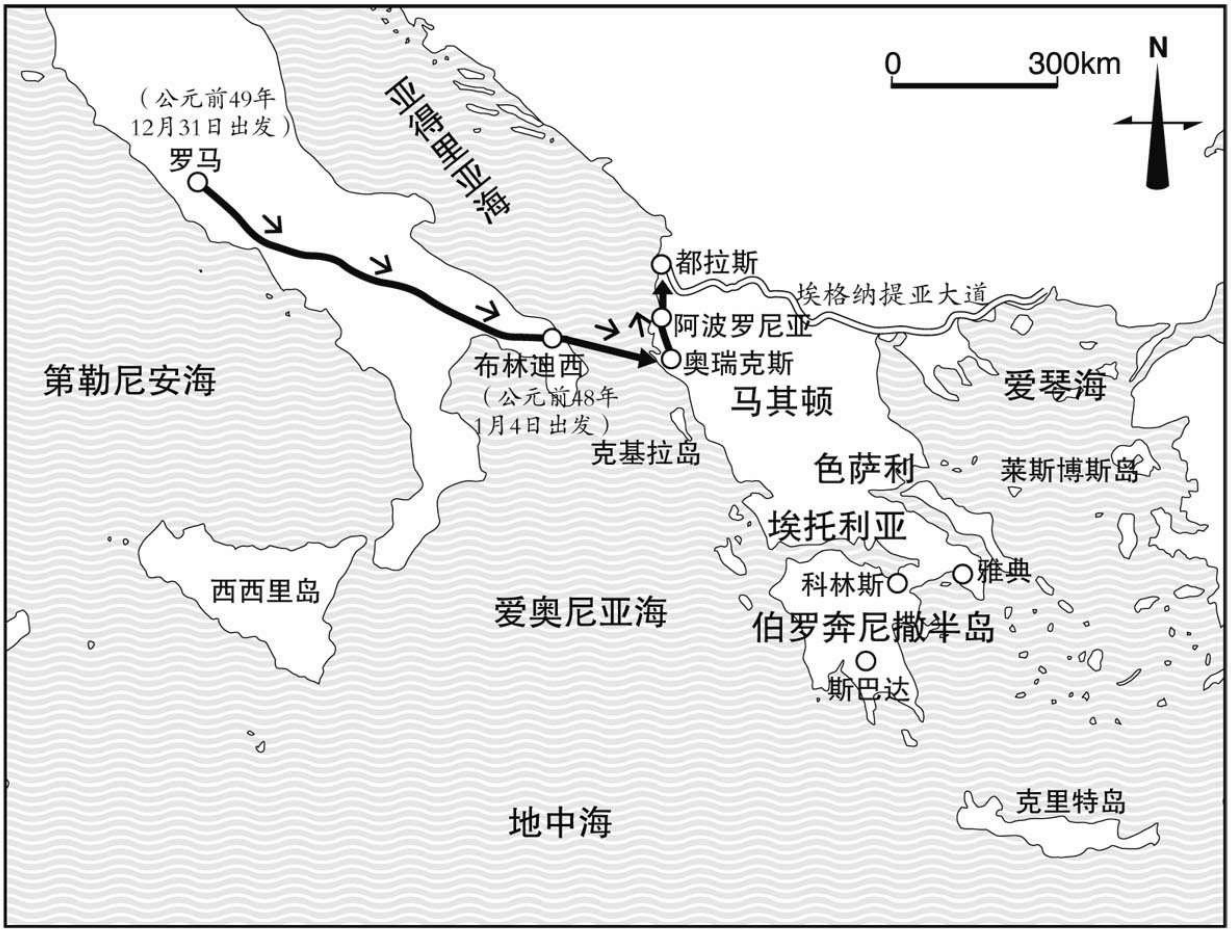
虽然如此，恺撒也没想过要延期渡海奔向希腊。我推测，他是不想浪费公元前48年这一年期间——也就是他就任执政官这段时间——的一

分一秒，想将这一年的效用最大化。为什么这么说？到了来年，也就是如果到了公元前47年的话，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恺撒就会变成前执政官，他就要离开罗马到地方赴任。这和现在拥有前执政官身份的庞培，资格就变得一样了。

年份刚刚变成公元前48年那年的1月4日，他就率领着第一批人马，1.5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从布林迪西出海了。他渡海抵达布林迪西这一通向希腊的主要港口，不过用了13天时间。

除了必不可少的装备以外，军团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布林迪西就出海了。恺撒自己在书中也提到，这是为了尽可能地多装士兵渡海。按照预定计划，剩下的物品，船在送先锋部队渡海之后再返回，由渡海的第二拨士兵运送。第二拨渡海的有1万名步兵和800名骑兵，由副将安东尼率领。

恺撒一直担心的，庞培海军会在海上对其进行阻击的情况没有出现。敌方根本没有想到恺撒会在冬季渡海。而由于海面上也很平静，敌军又没有造成阻碍，在出海第二天的一大早，恺撒就顺利地从希腊西岸登陆了。由于忌惮庞培方的监视和哨所，恺撒最初就没打算从海港登陆。但是除了海港以外，也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够登陆的。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海湾形势复杂，太接近的话就有很大可能会触礁。在登陆的地点上，恺撒选择了礁石夹击的沙滩。这好像就是现代称之为帕拉萨海岸的地方。这里处于距离庞培大本营扎营的地方——现在称之为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以南直线距离130公里的位置。都拉斯的拉丁语名是Dyrrhachium。恺撒在布林迪西放弃阿皮亚大道，坐船横穿亚得里亚海，从都拉斯上岸了。这是从罗马前往东地中海区域的主干道。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就已经从都拉斯横穿亚得里亚海向东方，建设了埃格纳提亚大道。避开了有庞培下属驻守的其他港口，恺撒的人马从都拉斯登陆后，船队立刻朝布林迪西返航，以便尽早运送第二拨人渡海。



公元前48年恺撒的进攻路线

上岸之后，他们甚至连坐在沙滩上将被海水泡湿的衣物弄干的时间都没有。从登陆地点往北不到10公里的地方，就是奥瑞克斯港。庞培在那里留了18艘战船守护。此外，在南面80公里海上的克基拉岛上，是受命担任亚得里亚海域海军总指挥的比布鲁斯和他率领的110艘战船。

不巧的是，不管是当监察官、大法务官，还是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比布鲁斯都和恺撒是同任。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斗不过恺撒。内战开始以后，他进入庞培手下管理海军，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积极活跃。恺撒的希腊登陆，必须在比布鲁斯闻讯而动之前，尽快尽早地确立位置。

公元前48年1月5日，恺撒成功地从希腊西岸登陆，首先从陆上对奥瑞克斯港实行背后攻击。他亲自率领陆上进攻，手下剩余的12艘军船从海上进行进攻配合，对奥瑞克斯港实行双面夹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下了该港。遭到突然袭击的奥瑞克斯港向克基拉请求支援。但是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比布鲁斯的110艘船都还没来得及出港，奥瑞克斯就被攻陷了。

奥克瑞斯成功攻陷后，恺撒马上将参与战役的12艘战船遣返回布林迪西。对深入敌营的恺撒来说，安东尼率领的第二拨1.5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的战斗力才是重头戏，等待他们的到来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带着恺撒希望的这12艘返回布林迪西的船在途中遭到了从克基拉赶来的比布鲁斯船队的追击。12艘船被包围后遭到攻击和焚烧，船上的船员们全部牺牲。

比布鲁斯就此断定恺撒必有援军，下定决心要阻止恺撒的第二拨士兵渡海。他开始实行海上封锁。比布鲁斯作为总指挥连睡觉都在海上，时刻都处于临战的状态。他想包围和孤立登陆成功的恺撒，将恺撒友军运送军粮的补给路线掐断。

恺撒还不知道自己12艘军船遭到袭击的悲惨命运。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只蒙头大睡等着第二拨军队到来的人，他已经开始准备进攻奥瑞克斯以北50公里的港口阿波罗尼亚了。

由于现代海岸线持续前推，现在的阿波罗尼亚是个已经看不到过去影子的内陆小村庄。而2000年前的阿波罗尼亚则是希腊西岸重要的罗马基地，是和埃格纳提亚大道的始发地都拉斯相提并论的。当然，庞培也在那里设下了港口守备军。

但是，知道恺撒军队正在靠近的当地居民，拒绝协助庞培手下的守备军们进行防卫。守备军队长既得不到居民们的协助，又认定与恺撒为

敌是自取灭亡，便带着守备军们逃走了。当地居民派代表前往恺撒营中，传达了友好投降的意愿。恺撒也保证会保障居民们的安全，并为他们提供防卫保护。这样，在攻陷奥瑞克斯后的第二天，恺撒又兵不血刃地从庞培手中夺得了阿波罗尼亚。这一天是1月7日，所有的障碍都已清除，部队开始向纵深挺进。但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天——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其后几天之内——恺撒知道了自己的船队被比布鲁斯围剿的悲惨命运。恺撒马上就想到了比布鲁斯的行动意图。即使如此，他也毫不怀疑自己的第二拨军队会尽早抵达。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布林迪西处于长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位置。从那里到希腊西海岸，坐船只需要一天的距离。

但是，知道恺撒登陆的庞培中止了在色萨利的军事训练，率全部军队北上，沿埃格纳提亚大道向都拉斯靠近。

隶属罗马的埃格纳提亚大道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高速公路”。恺撒才收到庞培“接近中”的报告不久，“到达”的报告就迅速地传来了。恺撒在阿波罗尼亚，庞培在都拉斯，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70公里。但是在阿波罗尼亚前面的海上，还有比布鲁斯率领庞培海军时常在进行日夜不停的“海上封锁”。为了避免受到海上和陆上两面夹击的威胁，恺撒决定打一打运动战。

在梅特鲁斯·西庇阿的2个军团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庞培麾下的军队就应该已经有9个军团5.4万名重装步兵和6000名左右的骑兵。而另一方面，恺撒只有1.5万名的重装步兵和500名骑兵。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走为上策。但是恺撒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庞培将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地都拉斯当做补给基地，用于储存军粮和武器。另外，他还以保护钱粮基地为理由，将庞培派中不适合上战场的西塞罗、小加图之流的元老院议员们送到了都拉斯。手握5万余重兵，没有理由死守城中按兵不动。再说，庞培也没有进行围城作战的想法。从色萨利跟随总司令而来的全体官兵都在都拉斯南面30公里处，注

入亚得里亚海的阿普斯河北岸安营扎寨。当然，这都是得知恺撒驻扎于阿波罗尼亚后所进行的布置。但是恺撒不但没有逃撤，反而迎敌北进，在阿普斯河以南筑起了营地。面对6万名庞培士兵，在兵力只及对方实力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如此行事，堪称十分大胆的举措。比起坐等下一拨援军的到来，或者在优势敌人逼近的情况下逃跑而言，恺撒知道不如主动进攻才能更加激起士兵们的士气。但是，恺撒在这一形势下的前进策略，也不能不说失之鲁莽，给了庞培一个绝好的机会。

然而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庞培不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举全军之力进攻呢？他是否因为考虑到资历相当的梅特鲁斯·西庇阿的感受，想等他到位之后再发动总攻呢？是不是因为庞培派的元老院议员们的脑袋和嘴巴都太多，他听了太多的忠告、劝谏意见，被蒙住了双眼，失去了对行动的判断力呢？还是因为知道恺撒登陆后己方昼夜兼程急行军，强度太大，希腊人居多的士兵们纷纷逃走，军心动摇了呢？又或者是从不知战败滋味，也不曾尝过在敌人面前撤退，只知前进和常胜的庞培自信地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和恺撒正面对阵都能打赢呢？若非如此，难道是在57岁的庞培内心最深处，为避免与同胞的战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在决断上进行着激烈的自我辩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庞培在这样绝好的机会下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行动着的是恺撒。他知道以手边现有的兵力，根本无法与庞培进行战斗。因此，他又用到了外交战争。

对恺撒的这一行为，后世有两种理解：有学者们认为，恺撒在这个时候拿出外交手段，完全就是在拖延时间；而另一些学者们则认为，恺撒是真心希望用对话的方式解决纷争。如果我来看待这个问题，恺撒可能以上两种考虑都有。

在恺撒营中有一位名为维布里乌斯·鲁弗斯的人，他原为庞培的参谋，在科菲尼昂战役、西班牙战役中，都是庞培派去和阿赫诺巴尔布斯、亚弗拉尼乌斯并肩作战的将领。作为庞培身边的高官之一，他在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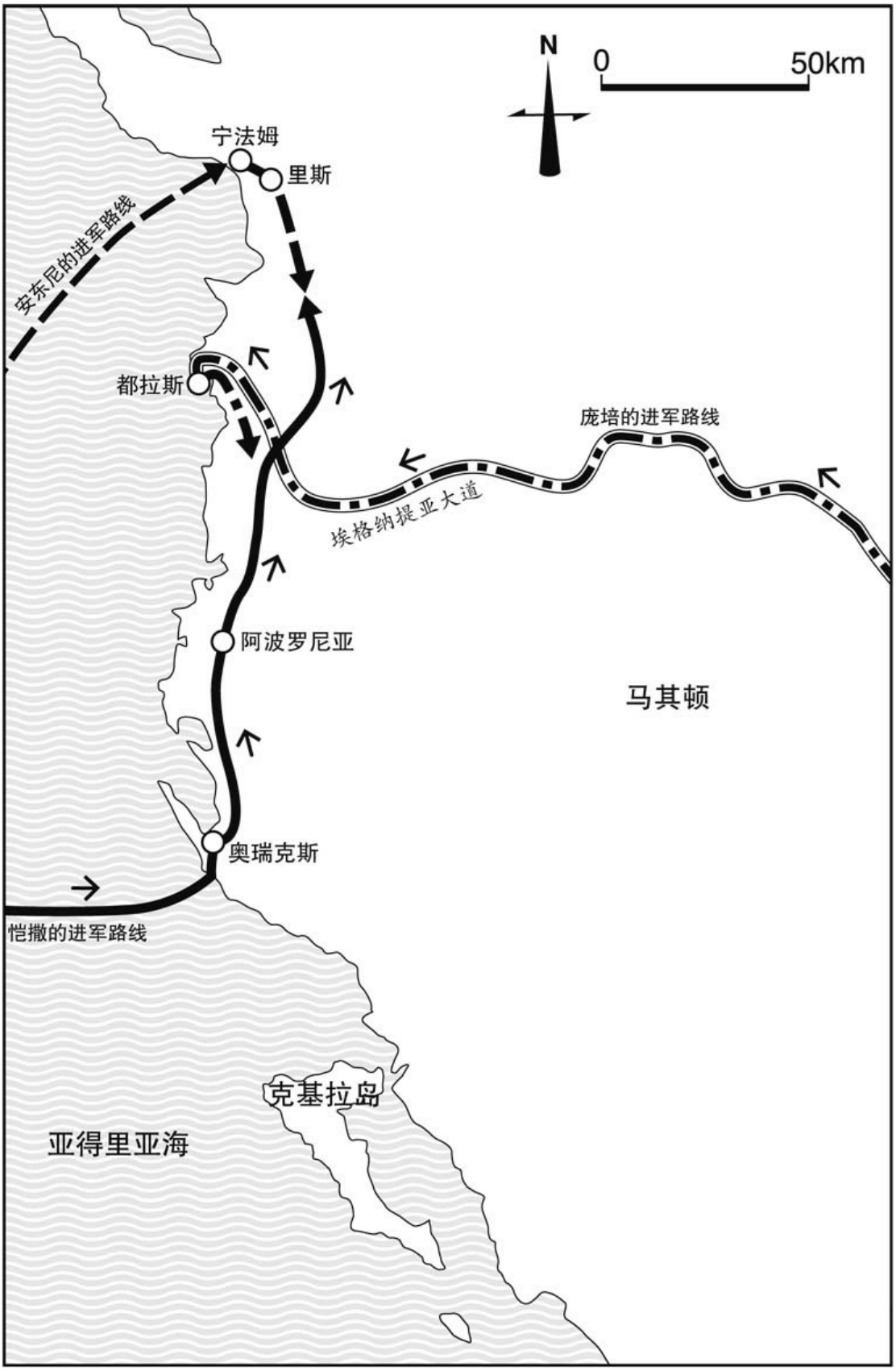
菲尼昂和西班牙战役中两次被恺撒俘虏，两次都被恺撒给予去留选择的自由。但是，和阿赫诺巴尔布斯、亚弗拉尼乌斯不同，他在第一次科菲尼昂战役后回到了庞培身边，却在西班牙战役后，不知何故，留在了恺撒阵营。恺撒选择了这个人作为前去与庞培和谈的使臣。根据恺撒自己的记录，他让鲁弗斯带去的书信中的要点如下：

> 庞培与恺撒消除彼此间的敌对关系。放下武器、停止以后的敌对行动。两人都要从重大的损害中吸取教训，避免再受其害。
>
> 庞培被逐出意大利，失去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及西班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他失掉了130个大队（计7.8万人）的罗马市民兵。恺撒则深深为库里奥的早逝感到悲伤，为北非的挫败叹息不已，为亚得里亚海中失去小安东尼及其手下的兵士感到难过。这些都是强有力的例证，来证明我们两人在战争中会有怎样的命运。因此，为了我们两人、为了国家，你难道不想避免再出现上述悲剧吗？
>
> 因此，现在正是以谈判方式和谈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么说？你我二人的自负之心和对各自军队的信心堪称并驾齐驱。如果有一方的优越感稍微多一点的话，谈判就将进行不下去。为什么这么说？比起按照能力获得相应的满足，优越感更强的一方总是会考虑全部包揽。
>
> 和谈的条件，我有以下几个建议：以各自大军全体士兵为证，你我二人交换誓约。随后三天内，各自解散军队。但是，由于对庞培心存顾虑，恺撒将从城中（即都拉斯）离开后，到平原地区再解散军队。

鲁弗斯带着这封恺撒的亲笔信出发，将信交给庞培的时候，已经是1月中旬了。得知恺撒登陆的庞培一直在急速行军积极备战；与之相反的是，恺撒这边则处于日渐浓郁的被孤立的不安之中。

或许，如果庞培是独自一人品读恺撒的亲笔信，独自一人对之进行

判断的话，或许真有可能达到和平。但是，庞培是一个为憎恶恺撒的人——这些强硬的反恺撒派聚集于希腊，但并不只是在希腊——所拥戴的司令。因此，他认为自己不能在不和这些人商讨的情况下直接与恺撒进行谈判。结果，庞培没有给恺撒写回信。


N
0
50km
宁法姆
里斯
安东尼的进军路线
都拉斯
庞培的进军路线
埃格纳提亚大道
阿波罗尼亚
马其顿
奥瑞克斯
恺撒的进军路线
克基拉岛
亚得里亚海

希腊西部地图

庞培依然按兵不动，恺撒也没有行动——尽管两者的理由大不相同。由于被河流隔着，他们形成了两军对峙的胶着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对恺撒而言绝对是不利的。因为无论是军粮或者无论其他什么，恺撒军都极为缺少。恺撒把辛苦筹集来的军粮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官兵无一人口出抱怨之言。在皮亚琴察以退役为名要求加饷并发起罢战的第九军团士兵们，更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成为了军中榜样。

即使这样对峙，两军将士也是同胞。特别是庞培方的两个军团，在高卢战役后面四年里他们是恺撒手下的兵。虽由于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使他们成为了敌人，但是对他们而言，河对岸摆下阵势的恺撒军仍然是他们并肩作战了四年的战友。两方的士兵一点点靠近河堤，开始隔着河对话。恺撒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决定再度尝试和谈。但是，这次派将领瓦提尼乌斯送去的亲笔信，和第一次的尝试遭遇了同样杳无回音的命运。庞培的近参们对此的反应是，对隔河交谈的士兵们加以训斥，并严令他们返营。拉比埃努斯的言论就是这种反应的象征。曾经是恺撒“左膀右臂”的拉比埃努斯训斥着庞培方的士兵，同时对恺撒方的士兵大声叫道：

“什么讲和！什么同意！禁止再交谈这样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取下恺撒的首级那一刻，就是和平之日。”

庞培方的战略已经很明确了，而这边除了等待第二拨出海援军的到来之外，恺撒别无他法。恺撒的第二拨人马，1万名重装步兵和800名骑兵数次尝试出海。然而他们要面对的是隆冬呼啸的大海，以及庞培海军封锁这两大敌人。敌军没有出现的时候，海上风暴的袭击就够他们喝一壶的。在布林迪西港，他们几乎处于被钉子钉死的状态。

风水轮流转，安东尼的幸运时刻来了。春天即将来临。与此同时，

因憎恨恺撒而在海上不知疲倦地来回巡逻的比布鲁斯突然去世了。即使这样，当安东尼率第二拨士兵把意大利甩在身后时，已经是3月下旬了——虽然天气实际上才到2月中旬的季节，但日历上此时已是3月下旬。在对安东尼坚持不懈的催促下，恺撒长达2个月零20天的艰苦时期才终于结束了。

第二拨军队终于来了

即使普遍被认为是记录激烈战争场面的战记文章，读者也会看到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有趣场面。安东尼率领恺撒第二拨军队争渡希腊，就是这样的一场进军。

与海洋性季风不同，地中海的海风是一直都在变化的。不过各个季节还是有其被称为“主风”的主流风向。亚得里亚海冬天主要是吹北风或者西北风。恺撒指示安东尼在阿波罗尼亚登陆。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可以借助这一风向驱船航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开庞培军监视下的都拉斯和克基拉周围。无论如何，运输船大多都是以帆布装备的帆船，而且是罗马时代的四角帆。随后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船才是三角形的帆，三角形的帆船可以弯曲，因此即使是逆风也可以前进。四角帆，如果不是顺风的话就无法前进，在逆风的场合，它将被吹往与目标完全相反的方向。

此时庞培方的海将比布鲁斯已经亡故，这样来自敌人人为的阻碍虽然减少，但是时机不凑巧，老天一直不吹西北风。安东尼和组成第二拨援军的1万名步兵800名骑兵都开始焦急起来。从第一拨士兵出海已经过去2个月零22天了。在这期间，原本预定的军粮补给的船一艘也没有送出去。要保持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只有靠速度较快的传令船穿过庞培海军在海上形成的封锁网。

哪怕是在冬季，海上也一直刮着南风。安东尼和他的士兵们都认为，再不能这样空自等待下去了。即使是冒着逆风突袭，他们也要出海。

3月26日，由安东尼率领的恺撒第二拨军队作别布林迪西。他们希望出海后风向会发生变化，但是风向始终如一，没有丝毫改变。他们原本计划从布林迪西南行一段之后就在阿波罗尼亚登陆的，结果却一直被风吹向了北方。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接近了亚得里亚海的希腊海岸。出现在他们右前方的，不是阿波罗尼亚，而是都拉斯。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还被庞培方的海上巡逻队发现了，受到敌人船队的追击，也无法和恺撒取得联系。

强劲的南风拯救了安东尼，而且时年已34岁的安东尼，有恺撒这个纪律严明的上司。他遵守恺撒不惜一切代价登陆希腊的命令，完全不考虑在海上降帆迎敌，而是挂直风帆，趁南风毫不停歇地撤退。恺撒从陆上看到了这一切，在北方迅速布阵的庞培也看到了。

向北撤退的安东尼的船队，以及对其实施追击的罗得岛庞培方船队先后在陆上双方军队的瞩目下驶过。

在撤退的过程中，安东尼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登陆”。此时，宁法姆的港口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知道这个小港在刮西南风的时候是个不错的避风港，但是刮南风时则不那么安全。安东尼考虑与其被敌人追击，倒不如冒着被吹向山崖的危险靠岸。这个决定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安东尼的船队成功进入港口，此前一成不变的南风突然转成了西南风。

安东尼的船队在强劲的西南风下安全地进入避风港。与此相反的是，追击者在港外受到了强烈的南风侵袭，不仅船只之间互有碰撞，还有的船只被吹向了山崖，破损严重，士兵们纷纷跌落海中，被恺撒方士兵救起。这些获救的罗得岛居民被恺撒遣返故乡。

又一次蒙神眷顾的安东尼在宁法姆港登陆后，头脑一直很清醒，分秒不误地占据了往内陆四五公里处的里斯城。同时他立刻传消息给恺撒，报告了自己的位置所在。

安东尼的实际登陆地点在距恺撒指定登陆点以北，两地直线距离在130公里以上。如果在阿波罗尼亚登陆的话，安东尼只要再往北50公里就能和恺撒会合了。但是现在安东尼不是在南面的阿波罗尼亚，而是在北方130公里外的宁法姆港登陆，这样他和恺撒之间的距离，隔着庞培方的补给基地都拉斯。除此之外更要命的是，中间还有阿普斯河北岸庞培的6万名士兵严阵以待。

在1月5日恺撒登陆和3月27日安东尼登陆之间的2个月零20天里，庞培的大军形同虚设。不过他也在试图活用自己的战斗力，不让恺撒和安东尼会合。这对横插大军于恺撒和安东尼之间的庞培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用一半大军封锁恺撒1.5万人的行动，再用剩下的一半粉碎仅1万名步兵和800名骑兵的安东尼的进攻。由于他手上有6万大军，因此拿出其中的一半也足足有3万人，绝对是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此外，庞培还拥有一个地理优势——与过不了阿普斯河就无法北进的恺撒相反，他无须渡河就能北伐安东尼。

恺撒也在为阻止敌人会合而行动。但是他无法将自己的大军一分为二。

会师

安东尼的里斯城与阿普斯河以南的恺撒之间，即使算直线距离也有50公里，而且在这个中间，还有阿普斯河和庞培的6万大军阻挡。显而易见，如果他不向东走个大迂回，就无法和恺撒会合。恺撒命令安东尼

迂回南下，自己也从阿普斯河南岸拔营，从东面迂回北上。

与此同时，庞培也从阿普斯河北岸的营地出发了。但是在大军中的两大要素中，无论是在启动时间还是在行军速度上，恺撒这边都更快一步。因为比起敌人试图掩盖行踪而放慢行军速度来说，恺撒更看重缩短他和安东尼之间的距离，因此在大白天就下令拔营行军。和恺撒相反，庞培发出的指令是要大军在恺撒毫无察觉的状态下在黑夜中行军。此外，庞培将6万大军全部投入到阻止恺撒和安东尼会合的战斗中，行动难免迟缓。

北方的安东尼从东南方向迂回南下的同时，南方的恺撒从东北方向迂回北上。两人都为了尽早会师而拼命提高速度。因此，他们赶在庞培大军干扰前就成功会合了。此时是公元前48年4月3日，恺撒的两拨军队在第二拨登陆后一周成功会师。

恺撒已经和两地相隔了三个月没见的部下会合了，这不是出于幸运之神的眷顾，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创见，而是来自敌人的赐予。

庞培得知敌人已成功会师之后，非但没有发起挑战，反而下令全军撤退。于是在两天后，他又重新构筑了新的阵营等待恺撒。这次的位置在阿普斯河稍北的地方，距离补给基地都拉斯更近的基努斯河河口附近。这里是海陆的交通要道，既可以通过埃格纳提亚大道，也可以从海上联络都拉斯，是个适合“等待”的绝好地方。庞培在这里静待从叙利亚过来的梅特鲁斯·西庇阿的两个军团。

会师后，恺撒这边的状态也并没有得到突然扭转。军粮补给要从布林迪西送来的话，需要一天的航程，而且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放弃这一希望。因为放手让恺撒的第二拨士兵也登陆的庞培，正在集中力量破坏恺撒的军粮补给。

首先，停靠在奥瑞克斯港的恺撒的剩余船只，被庞培的长子格涅乌

斯率领来自埃及的50艘战船前往击破了。接着，依然是在他的指挥下，船队击毁了在宁法姆港停泊的安东尼和第二拨士兵们乘坐的船。由于春天到了，庞培的船队可以连续出动，外加海上的风暴干扰，恺撒和意大利之间的补给线被全面切断。

事已至此，唯有在当地筹集粮食了。不仅要大力发动士兵筹粮，连恺撒自己也不得不出动了。在这种万事皆不足的状况下，恺撒与舞台不断扩大的庞培在希腊对决，拉开了第二阶段的帷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达三个月的战争，史称“都拉斯战役”。

都拉斯战役

允许恺撒军队会合的时候，庞培已经有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恺撒也是如此。持久战对恺撒颇为不利。他曾下令在西西里和法国南部建造的船队，也没有靠近亚得里亚海的报告传来。他简直就处于无一船可用的状况。从意大利来的补给也没法期待了。反观庞培这边，他不仅储备了充足的粮草，还牢牢掌握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与“等待”的庞培相反，恺撒决定发动“进攻”。两军会师后，恺撒立刻掉头追击原本在身后追击自己、后来转为撤退的庞培。两天后，他追上了庞培，并对其提出了战争的挑衅。在总司令的帷幕上挂起红色的短上衣，就意味着宣告挑战。但是，形势有利于打持久战的庞培并没有应战。如此一来，恺撒也唯有改变战略，考虑进行持久战。

在会师之后，他将手中的10个军团和1300名骑兵分成两股，其中每一股又分成三队。命令三队人马集中攻击希腊东、中部地区。

第一副总指挥多米提乌斯率领2个军团和500名骑兵，前往马其顿。

隆基努斯率领1个军团和200名骑兵前往色萨利。

撒比努斯率领5个大队，也就是二分之一个军团和少数的骑兵，前往埃托利亚。

这样算起来，总共三个半军团与700名骑兵，承担的任务一是获取军粮，二是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三是确认接近中的梅特鲁斯·西庇阿的两个军团已到达何处，并对其实施阻拦。

第一个任务，换句话来说，就是“减少吃饭的人数”。虽然两军会师喜不自禁，但是军粮所需增加了一倍。

第二个，获得当地居民支持的任务相当成功。庞培和恺撒的战争不管是谁获得胜利，对希腊人来说，在罗马统治下生活是不会变的。此外，希腊和小亚细亚、帕鲁斯提那不一样，这里并不是庞培的clientes。希腊被当成罗马人的战场不堪重负，庞培的征税人员对他们课税又更胜往年，于是有人内心逐渐有反对庞培的想法。因为庞培大军驻扎，所以这种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来。而获得这个希腊本地人支持的恺撒，在确保军粮方面虽然有点好转，以小队形式行进的部队，也不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虽然收效良好，但恺撒也不能完全安心。越是弱小的第三方，越是会探索如何倚赖强者的生存之道。希腊的各城邦都密切关注着两雄相争的结果，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例外。

派出这些队伍之后，恺撒身边仅余6个半军团和600名骑兵的战斗力，仅依靠这些兵力，他进行了切断庞培军营和军粮补给地都拉斯之间联络的作战。

首先，他在基努斯河附近的庞培营地和都拉斯之间安营扎寨。与之针锋相对的庞培也将军营往自己的补给基地靠近。在大海之滨，一块被称为佩特拉高地的地方，有一个小海湾。不论风向如何，补给船只都能在此安全登陆。此处离补给基地都拉斯的海上直线距离仅7公里，陆上

直线距离也不过10公里。但是在这10公里即将到头的时候，会发现处于海湾岬角顶端的都拉斯，落潮之后四周呈现沼泽地貌，宽广的海湾横贯其间。这里地形蜿蜒复杂，若想从陆上行进抵达，必须往北进行大迂回才行。

鉴于情况特殊，加上佩特拉的海湾规模较小，恺撒想出的战略是，包围在佩特拉呈“守”势的庞培。虽说希望战争尽早结束的愿望已经基本破灭，但是“进攻”，也就是必须掌握战争主导权的决定并没有动摇。与以往一样，恺撒将以包围网围困庞培军的理由逐条罗列了出来：

一、敌方拥有大规模军队，从都拉斯运送补给必然很频繁，而且必须从外部调来军粮，那么切断其补给线必然是首要的任务。

二、敌方的骑兵数量颇多，围攻可以有效削弱其骑兵的机动力，是第二个目的。

三、让世人目睹庞培被恺撒围攻，而庞培却不敢应对。这样可以令在别国眼里形象崇高的庞培自然声名扫地。这是第三个目的。

一和二是军事上要达到的目的。没有海军的恺撒是不可能从海上进行封锁的，但是他可以从陆上进行封锁，让庞培仅能从海路获得补给，无法像之前那样高枕无忧。

三则是恺撒惯用的宣传攻势，达到心里狙击作战的效果。想想就知道了，庞培是个“实”的人，恺撒是个“虚”的人。

包围网

4月15日，恺撒从渡海登陆希腊后的3个月零10天，也就是与安东尼会合的12天之后，他开始构筑包围网的工事。一直贯彻“进攻”战略的恺

撒，哪怕已年届52岁，进攻姿态仍然不输当年。

庞培的大本营放在临海的高地佩特拉的陆地这边，高而陡峭的山丘一直向南绵延。恺撒在这些陡丘上修建了碉堡，让这些陡丘渐次形成包围圈。他们作业的地方距敌方大本营仅3公里。敌人若对其出击，他们也只能仓促应战。但是，庞培一直决心“死守”。即使这样也经常会有小规模的袭击，使得恺撒的士兵们无法在弓箭射程范围内继续构筑工事。为了防止中箭，他们在身上缠了很多东西，作为盔甲保护不到之处的补充。

虽然受到庞培军干扰，恺撒士兵们还是一点一点地修筑出了包围网的形态。庞培得知之后，也决定在自己这方修筑防卫线。这样一来，以海岸线为中心构筑了一个半月形的由栅栏、壕沟和碉堡相连组成的双重围网。围网里面是庞培，外面是恺撒。

坐拥6万兵力的庞培这方当然想尽可能地扩大宽阔地带的防卫网。恺撒这边则尽最大努力将防卫网所占地带缩小。在这个地带的战斗，就此围绕着“谁能占到更多山丘”而展开。

庞培这边的防卫网抢先完成了。因为他们修筑工事的士兵们数量更多，而且内半月形的修筑距离也更短。话是如此，但是这个更短的防卫网全长有22.5公里，依丘而建的碉堡数量达24座。反观恺撒方的包围网，全长达到25.5公里，碉堡有16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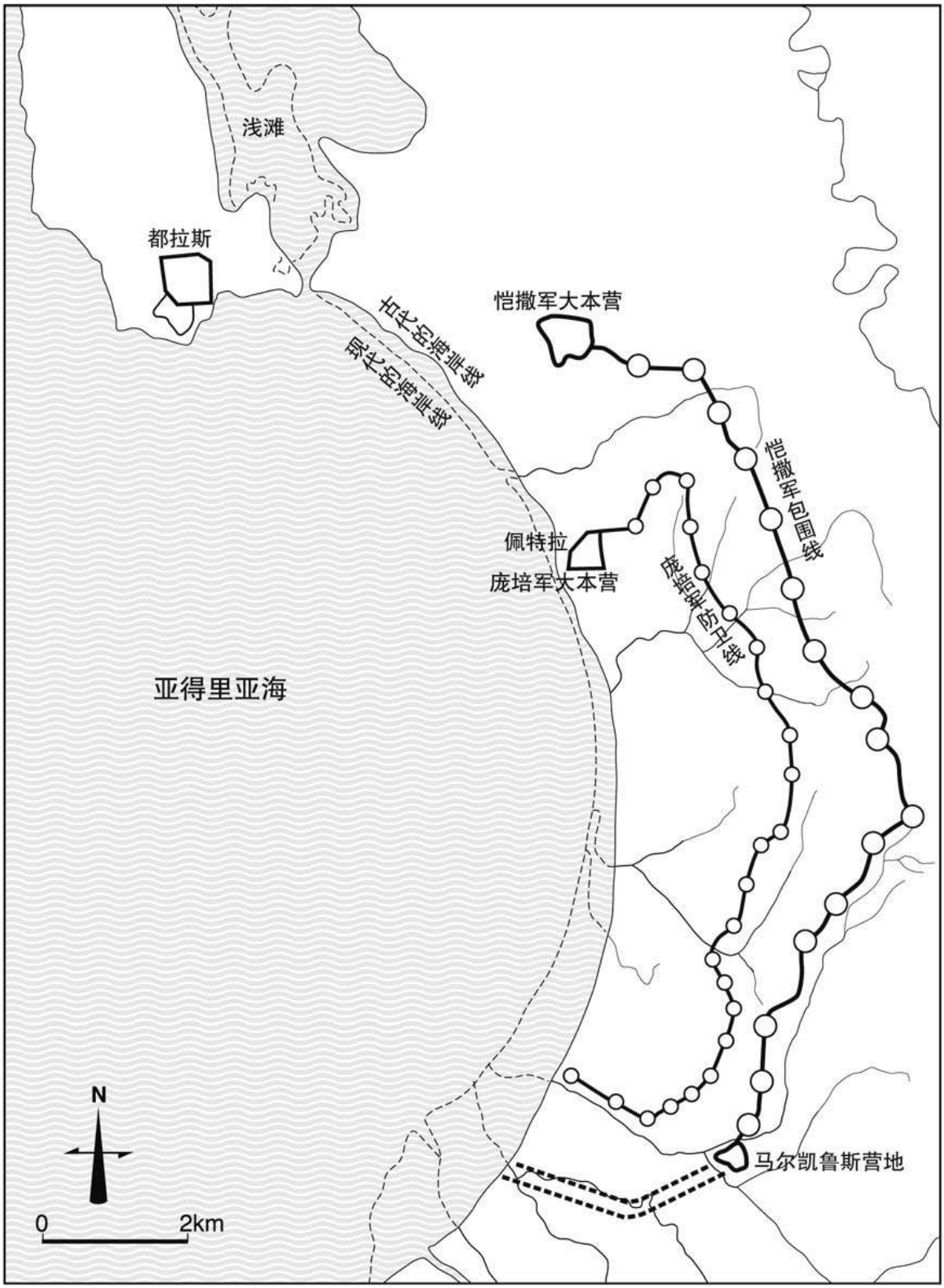
对身处此境的庞培军队来说，他们在距离敌人的包围网一两公里的防卫网之内，还可以放马煮饭，即使彻底地“守”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6万人的饮食确实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大事，现在就连水都需要依赖海上补给从都拉斯运来了。因为流往庞培这边的河水，已被恺撒下令全部截流了。

即使如此，不利于恺撒的地方还有更多。首先，包围网战线太长

了，依山而建的碉堡又太少，而且25.5公里长的包围网沿线充分配备的兵力的士兵数都很少。除了碉堡必须要的士兵外，包围网上可以使用的士兵，100米才有一个人。此外，切断对方军粮的目的也没有很好地达成。从都拉斯以及其他港口过来的补给船还是每天不断地进港。

军粮不足的情况反而是恺撒这边先出现。这些平时以小麦为主食的罗马人，现在变得连作为马饲料的大麦也吃，甚至以野菜和肉为主食。这种情况似曾相识。这些跟随恺撒参与过高卢战役、西班牙战役都忍受过饥饿的士兵们，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也没有一个抱怨和叹气，他们甚至还想出制造新品种的面包的办法。

那是在当地被称为“卡夫”的一种植物球根，干燥之后磨成粉，加上羊乳一起烧成面包。这种球根随处可见，因此也成为了恺撒军中2.5万名士兵和500名骑兵的主食。庞培方的士兵们纷纷嘲笑恺撒方的士兵吃不饱。恺撒的士兵们就把这种面包扔到敌人的防卫网内作为回应。如此这般，4月份过去了。


浅滩
都拉斯
恺撒军大本营
古代岛堤遗迹
现代岛堤遗迹
恺撒军包围线
佩特拉
庞培军大本营
庞培军防卫线
亚得里亚海
N
0
2km
马尔凯鲁斯营地

都拉斯包围图（摘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的“The Roman Republic”）

以卡夫为原料的食物被庞培看在眼里。他认为以这样的东西充饥，士气必然会衰落。而事实和他的判断完全相反。小麦成熟的季节越接近，恺撒的士兵们就越充满希望，相信自己能熬过饥馑时期。

庞培方却随着小麦收获季节的到来而越发慌张起来。梅特鲁斯·西庇阿的两个军团被恺撒所派的多米提乌斯的两个军团缠住了，无法顺利前进。此外，从都拉斯和各地运来的补给中，虽然士兵的食粮不用担心，但是单靠海上补给无法满足马对饲料的需求。和恺撒相比，庞培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多数的骑兵，这是令他自豪的部队。但如果马生病甚至死掉的话，这个优势也就消失殆尽了。由于马饲料不足，原本打算“死守”的庞培，也决心要“出击”了。从恺撒构筑包围网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时间；从两军互相在栅栏、战壕两侧对峙到进入战斗状态，也过了一个多月了。

据我推测，恺撒写的《高卢战记》，庞培有很大的可能性也读了。此书发行后立刻在当时成为畅销书。如果他读过的话就应该知道，在高卢战役中，恺撒军队的战绩实际上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恺撒个人。因此庞培在决定“进攻”的时候，首先实行的战术就是将恺撒从包围网引开。

于是庞培广播谣言，说在都拉斯城内有叛徒正打算帮助恺撒方进入。恺撒相信了这个谣言，向都拉斯奔去。恺撒离开期间，庞培同时出兵进攻恺撒包围网中的3座碉堡。为了让恺撒尽可能长时间地远离包围网，他从海边调兵驰援都拉斯的同时，展开了对恺撒方向3座碉堡的攻势。那一天是6月25日，庞培军同时对6座碉堡展开了如火喷一般的攻势。

到目前为止，在长达2个月零10天的攻坚战中，恺撒将全长25.5公里的包围网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北面由自己负责，南面是安东尼负

责。他误信谣言后想要夺回都拉斯，因此实际上北面的指挥权他委任给了苏拉。这个普布利乌斯·孔奈琉斯·苏拉是前独裁者苏拉的侄子。原本一心想强化“元老院体制”的独裁者苏拉的侄子，似乎也应该是元老院派的人。但是他也是越过卢比孔河之后跟随在恺撒身边的“罗马青年激进派”中的一员。就像在恺撒的家族中，像路奇乌斯·恺撒这样隶属庞培派的也大有人在。内战造成了诸多亲人、家族的分裂。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内战对决，也是体制坚持派和体制改革派之间的战斗，战争中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

恺撒率军向北迂回绕过大海湾，奔都拉斯而去时，庞培投入25.5公里防卫线的全线兵力，分别对恺撒封锁线的3座碉堡发动袭击。庞培手握充分的兵力，对每座碉堡都投入了相当的兵力。仅为了攻下由一个大队共250人防守的恺撒方碉堡，庞培就投入了4个军团2.4万人兵力。

恺撒方的250名士兵面对数量超百倍的敌人的攻击，顶住了4个小时。4个小时后，苏拉率领的2个军团共5000人到了，帮助他们成功地击退了庞培的进攻。恺撒方的士兵们认为此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加以追击。但是，苏拉制止了这种想法，并把已追出的士兵也召回。士兵们对此感到不服气，异口同声地对指挥官说，如果现在追击的话，今日之内就能解决战斗。但是，苏拉仍然没有改变初衷，关于此事，恺撒的记述如下：

> 他所作出的决定，我认为并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军团长和总司令的任务是不同的。前者的任务是根据指示实施战术；而后者的任务在于考虑整体战略，对其实施的所有必要事项进行全盘考虑，最后给执行人下达实施指令。
>
> 受恺撒之命负责守卫大本营的苏拉，确保完成总司令授予的任务，挽救了士兵们的生命，却得到了作战不积极的评价。也许他确实让获胜的机会溜走了，但是他的选择是为了不侵犯总司令的职权。

6月25日是庞培回到15年前将战术才能一举发挥到顶峰的一天。只是为了分散为数不多的恺撒方的战斗力的目的，庞培对都拉斯附近的3座碉堡和包围网上的3个地方，一共6个地方同时实施进攻。如果在包围网上的其他两个地方也是持续激战到日落之后的话，那么它们和苏拉及其两个军团赶到的战场情况应该类似。在第二个激战的地点，恺撒方的3个大队共750人对抗着庞培方1个军团共6000人的袭击。在第三个激战的地点，面对云朵般聚集的敌人，恺撒方的日耳曼骑兵们毫不迟疑地就进行了战斗。不管是哪个地点，恺撒的士兵们最终都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恺撒包围网和庞培防卫网之间宽度大约1公里的中间地带，满是被掩埋的尸体和丢弃的武器。那天战斗的损失情况如下：

庞培方的士兵战死约2000人，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百人队队长，例如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这样出身名门的高级将领。从恺撒方夺取的军旗共6面。

恺撒方的损失，全战线战死者不到20人。但是受伤者极多。在最严重的激战地第一激战地，没有一个人不负伤的。4名百人队队长各失去了一只眼睛。仅一个敌方就向恺撒方放箭达到3万支。百人队队长谢霸的盾牌上留下了120个箭眼。恺撒，将军团中的8位百人队队长升为首席百人队队长，赏给他们20万第纳尔。以250人抵抗了2.4万人的进攻4个小时的战绩，与这些百人队队长的奋战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恺撒传令这天参与战斗的全体士兵们，此后的军饷翻倍。从这时开始，罗马军团士兵们的军饷隔了150年终于有所提高了。虽说是在几乎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年代，可是军饷150年都没有变过，也难怪士兵们会提出拒绝从军、罢战的要求。但是，恺撒这样的男人，仍然认为罢战这样的要求是绝症，是绝对不允许开头的。虽然如此，他也会相应地给予辛苦战斗的士兵们以大方的奖赏。

恺撒其人喜怒不形于色，几乎看不到他有担忧和操心的表情。即使这样，这次他也罕见地爆发性地表现出喜色。但是，庞培方也没有因为

这次进攻受挫而垂头丧气。2000人的损失，在梅特鲁斯·西庇阿到达后就达到11个军团6.5万人和7000名骑兵的兵力面前，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损失。但是，由于马粮不足，庞培想再次采取“守势”是不可能的了。一直自负地认为是地中海世界名望第一人的庞培，寻找着机会再次实施“进攻”。就在此时，也就是庞培进攻被击退几天之后，两个高卢兄弟给庞培带来了最佳情报，好机会出现了。

激战

这两兄弟是高卢人，出身于法国南部高卢的骑士阶级，自高卢战役时就跟随在恺撒身边当骑兵，历经多次战斗。内战爆发后，他们理所当然地加入了骑兵团。恺撒也认可他俩的能力，也给予了如赐予土地等诸多礼遇。但是两人对恺撒的温情并不领情，对同僚们则十分傲慢无礼。简单地说，他们在军饷上一贯揩油，分战利品时也常常私吞。同僚的高卢士兵们多次集体拜会恺撒，对他俩的不端行为予以报告。

恺撒认为现在不是考虑赏罚问题的时候，所以他也只是倾听了士兵们的抱怨而已，然后让他们回去了。但是他私下秘密地传召了两个高卢骑兵，只是对他们予以叱责，并没有给予责罚。两个高卢骑兵却认为这事还没了结，于是决定逃走。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希腊，逃走的生存之路只有投奔敌军。

庞培手中当地兵很多，所以对他来说，有逃兵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恺撒军中竟然有了投奔敌方的逃兵，这可是第一遭。不仅如此，投诚过来的竟然是比罗马市民组成的重装兵更有价值的、在军中属于高级阶层的两个骑兵。喜不自禁的庞培让这两个骑兵在全体官兵前骑马经过，作为连骑兵都抛弃了恺撒的证据。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个高卢骑兵带去了让庞培更加欣喜的消息。这对平时就不太积极于搜集情报的庞培来说，简直如同天上掉馅饼一样。

这两个高卢逃兵对庞培说，恺撒方的包围网并不像庞培方想的那样完美，它还有未能完成的地方。这个部分在25公里包围网最南端到海边的4公里处，是第九军团防守的地带，由生病的年轻指挥官马尔凯鲁斯指挥。在这一段建设包围网时，恺撒担心庞培方从海上登陆作战，因此这里用的防护栅栏比其他地方更为坚固。恺撒最初的构想是：在靠近深四五米的壕沟附近，竖起高度为3米的防护栅栏。栅栏的土垒宽度也在3米。此外，在距离防护栏180米外，再造一条同样结构的但是规模小一些的平行防护线，这样来形成双重防护。

但是，这个构想尚未完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庞培方的干扰，另一方面是25公里长的包围网建设使得人手明显不足。此外，比起南部的壕沟和栅栏建设来，在都拉斯战役开始之后的2个月零10天里，两方军队的冲突全部集中在包围网的北部。因此恺撒认为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需要优先解决的事情上。恺撒通常会将大本营置于最重要的地方，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都拉斯战役中，最重要的地点在北半部——不是庞培大本营所在，那个可与都拉斯城便捷地从海上进行联络的佩特拉，而是建于佩特拉和都拉斯之间的恺撒大本营。离此最为遥远的南面建筑工事没加紧完成，之所以会搁置，是因为当初恺撒担心庞培会从海上登陆作战，可是庞培一次都没有试过。不管怎么说，2个月零10天的时间里，庞培的视线第一次投向了双方都没有关注过的南部战线的最南端。

此外，两个高卢逃兵不仅仅告诉了庞培有关恺撒包围网的缺陷所在，他们更将整条战线上负责的指挥官的姓名和守卫军团、瞭望塔之间的间隔、哨兵的数量及轮岗时间、百人队队长们的性格和指挥风格等等对庞培和盘托出。

对准备再度寻找出击机会的庞培来说，两个逃兵带来的情报实在是恰逢其时。他丝毫没有浪费时间，在恺撒发现逃兵而采取相应措施之前，他就开始了行动。

在对包围网的第二次突围行动中，庞培将手上兵力的三分之二，共60个大队的轻装步兵全部投入战斗。60个大队也就是6个军团，但是恺撒在书中并没有写6个军团。因此这大概是庞培从9个军团中抽出人员所组成的特别军。无论如何，60个大队共3.6万名重装步兵再加上轻装步兵的大军，朝恺撒第九军团2500人驻守的长4公里的包围线扑去。

此时，庞培第一次使用了海陆联合攻击的战略，一面从陆上进攻，一面将原本运送补给物资进港的船全部装上士兵，同时从海上实行登陆作战。完全处于劣势的恺撒守军遭到敌人海陆两面夹击，战局摇摇欲坠。庞培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时间是7月6日，距离第一次突击包围网的战斗不过11天。庞培如同回到了19年前肃清海盗时代一样积极进攻。7月6日，他趁着夜色悄悄将所有的兵力从南面突击。

恺撒的岗哨在天刚亮时才注意到海边有黑色浮影攒动，此时已经迟了。庞培军陆上和海上的攻击同时发动。第九军团的士兵们完全陷入了被夹击的状态。马尔凯鲁斯率着几个大队从附近的营地驰援完全陷入泥潭的第九军团，但结果是他们一起陷入混乱的战斗中。在混乱中，连掌管军团旗帜银鹫旗的旗手也身负重伤。为了不让军旗被敌方夺去，他将军旗交给身旁的骑兵，并说：

“多年来我以守护爱情般的忠诚守护这面银鹫旗。今天临死之前，请将此旗和我永恒不变的忠诚之心一起转交恺撒。恺撒军旗从未有落入敌手的命运。为了不让恺撒军的名誉在我们手中受到侵犯，请一定将此旗平安交给恺撒。”

银鹫旗保住了，但是军团旗手以及第九军团第一大队下辖的6名百人队队长共有5人战死，仅1人得以幸存。

直到负责包围网南半部分指挥的安东尼率领12个大队赶到，第九军团的士兵们的心里才逐渐镇定下来。数小时之后，恺撒也到了。恺撒守军从被袭地点逐个堡垒传递狼烟，终于将消息传给了远在包围网北端的

恺撒。他从20公里之外紧急奔袭而来。

这一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庞培方手里。恺撒军暂时逼退了敌军，忙于挖掘战壕，建筑防御工事。庞培对此置若罔闻，立刻在别的战线上展开攻势。他利用优势兵力，军队活动灵活多变，在多个地点同时展开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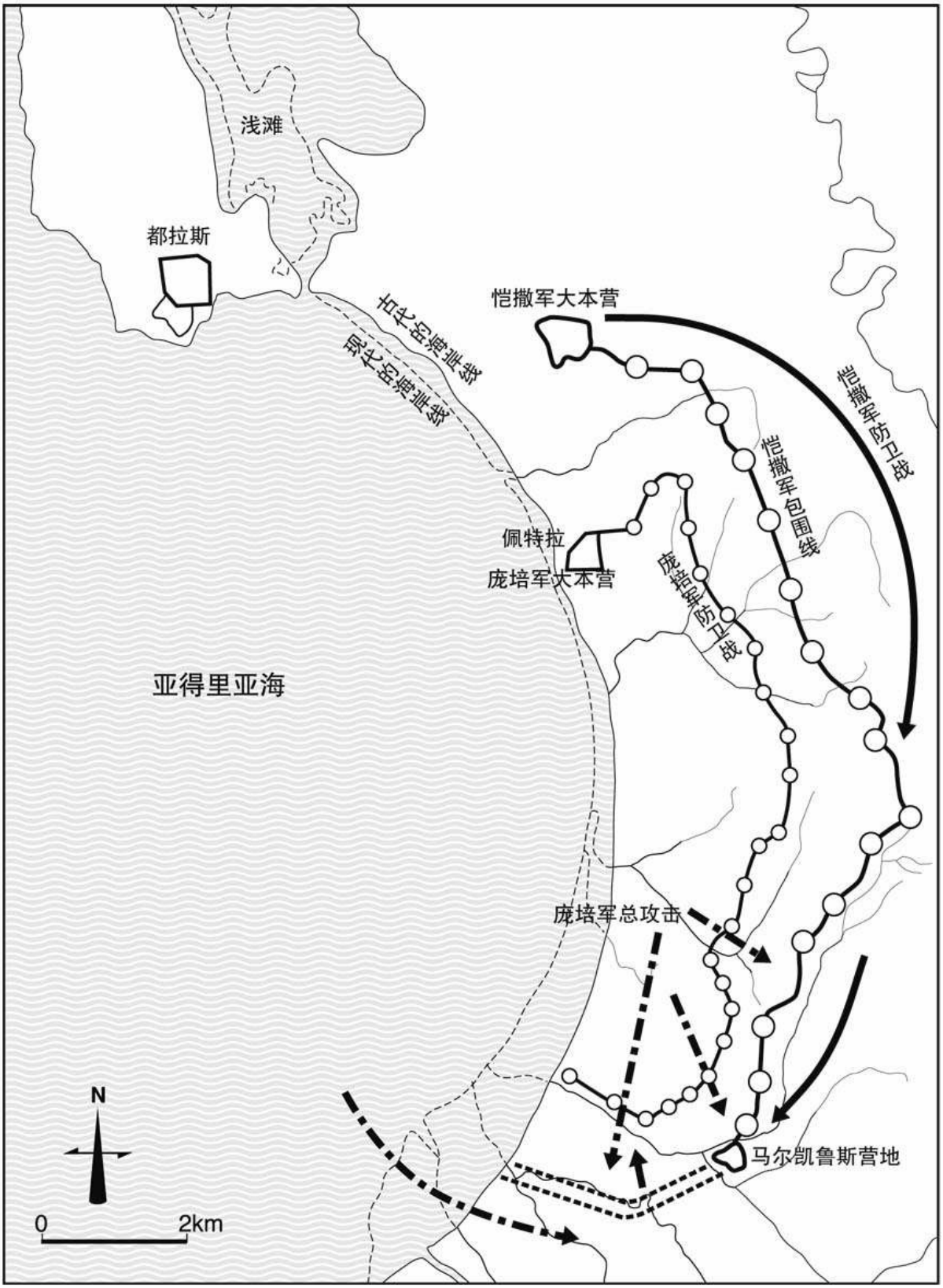
恺撒军队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连骑兵也逃得只剩背影。恺撒不顾自己的总司令身份，从溃逃的旗手手中夺下银鹫旗，大声地呼喝以图稳住士兵阵脚。但是，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的。中队旗手也好，大队旗手也好，都在溃逃过程中将碍事的军旗弃之不顾。很多士兵跌落3米深的壕沟内，被压致死的数不胜数。

在这种状态下恺撒军也没有全军覆没，原因有两个：一是当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时，庞培怀疑敌军的败走是个圈套，因此没有乘势追击；第二，恺撒方的包围网对庞培的骑兵团的行动自由起到了有效的阻碍作用。这样，恺撒军团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在这一天总共两次的战斗中，恺撒失去了960名重装步兵和200名骑兵，以及5位大队长和32位百人队队长。这其中，很多人不是死在敌人的手中，而是跌落战壕中，被败走的自己人挤压和踩踏致死。此外，他还失去了33面队旗。

这1197人并非全部战死，其中除了跌落战壕被踩踏致死的人外，还有不少被庞培俘虏了。

拉比埃努斯请求庞培将这些俘虏交给自己。听到这个请求的庞培，认为拉比埃努斯一定是想说服他们和他一样抛弃恺撒投降自己，立刻应允了。俘虏们和拉比埃努斯曾经一起经过八年高卢战役，是恺撒的副将与恺撒的士兵，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浅滩
都拉斯
古代岛屿轮廓
现代岛屿轮廓
恺撒军大本营
恺撒军防卫战
恺撒军包围线
佩特拉
庞培军大本营
庞培军防卫战
亚得里亚海
庞培军总攻击
马尔凯鲁斯营地
N
0
2km

都拉斯战役
（公元前48年7月6日，笔者根据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的“The Roman Republic”图改编而成）

拉比埃努斯在庞培士兵的列队面前请出这些老部下，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诸位老战友”。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可不是说降。

他出乎意料地问他们：“你们今天这个惨相，也配称是恺撒的精锐战斗作风吗？”他接着又问道：“恺撒的精锐，是像你们这样一味只知逃跑的吗？”如此这般地羞辱了一番之后，他在庞培军全体士兵们面前，将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部刺死了。

关于这个插曲，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认为是显示了拉比埃努斯对恺撒的怨恨。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从庞培实际上的副将拉比埃努斯这边来看，他是想让自己的士兵们知道，恺撒的精锐实际上是不足为惧的。这是军事上的理由。

但是，理由真的就只是这样吗？恺撒和拉比埃努斯之间是总司令和颇受信赖的首席副将的关系。这种关系从15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3年的“三头政治”同盟开始，到公元前58年为止长达8年。此后拉比埃努斯将这样的深厚信赖关系弃之不顾，却优先考虑世袭clientes的传统投靠了庞培。这样看起来，拉比埃努斯应该没有怨恨恺撒的理由。如果非要说怨恨的话，那么也应该是恺撒对背叛了自己这15年来信赖的拉比埃努斯的怨恨。

但是，恺撒这样的男人是拒绝对他人怀有怨恨感情的。因为怨恨是对与自己实力相当的，或是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才会有的感情。恺撒对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有着充分的自负，当然要拒绝“怨恨”——这种所谓下等人才有的情感。

即使如此，仅仅是对拉比埃努斯，恺撒特有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绝

对优越感和自负也有少许阴影。他的文字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从字里行间看来，恺撒对15年来的同事，而且是同年同辈的同事之背叛，还是有一口气如鲠在喉的。

同样，咽不下这口气的还有拉比埃努斯。在庞培军中，没有谁比他更强硬地反对恺撒，更残忍地杀害恺撒方的俘虏。拉比埃努斯似乎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明反恺撒的坚定态度。要清算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并不是在桌前翻阅史书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撤退

公元前48年7月6日，在都拉斯战役中最大也是最激烈的战斗中，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地当属庞培。恺撒对庞培施行包围作战的办法，很明显是功败垂成了。后来拿破仑评价他面对数量远胜于自己的敌人，还实行包围战法，是战略上的失误。

回想当年的杰尔高维亚撤退，武将恺撒并不像武将庞培那样失败而不自知，他败了就是败了。而且正如杰尔高维亚撤退后又在阿雷佐雪耻一样，他很快就挽回了败局。

在都拉斯，恺撒虽然痛失了1200名士兵，但也只占了全部兵力的5%不到。但是，改变战略是必需的了。恺撒命令士兵们尽早从包围网上全部撤下，竭尽全力躲开庞培军的追击。

逃跑计划暂时成功了。如前所述，也是拜庞培方追击太迟所赐。到了安全地点之后，恺撒将全军整队集中起来，对他们发表演讲。

首先，他表示要冷静地接受今天发生的事，没必要对此事顾虑过多，或将这种顾虑上升到恐惧的程度。今天的损失，在此前浩如烟海的胜仗面前，不过是场无足轻重的轻伤。接着他说：

我们必须感谢神之手助和命运的优待。在意大利，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胜利。在西班牙，我们面对能力高强的将领所率领的敌军，也只用很少的代价，就让他们弃甲投降。我们有供给小麦的希腊、马其顿、色萨利、埃托利亚等各城市为后盾。我们在敌人船队大举巡逻的港口，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成功地渡过了亚得里亚海。因此，既然命运没有将我们所有的希望全部赐之实现，那么我们就必须以自己的双手之力，实现属于我们的胜利。

恺撒对战败的士兵们的抚慰初见成效。身为总司令的他话锋一转，又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今天遭遇的不幸，责任可以归结为很多原因，但是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我。我给诸位选择了有利的战斗地形，修建了诸多碉堡，为思考战斗方法而殚精竭虑，千方百计让战斗对我们有利。就是这样，诸位，还是因为你们的混乱、错误的认识和对待偶发事件的错误态度，让近在眼前的胜利逃走了。但是，如果全军全力以赴的话，我们是极有可能反转局势的。如果全军同仇敌忾的话，我们会和杰尔高维亚撤退时一样，自绝地翻身成为胜利者。因此各位，不要因为被恐怖驱使而缺乏战斗的勇气，请拿出自己在战场上的英雄气概。

如果是普通的司令，一定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而不会向部下问责。在都拉斯保卫战中，先不管拿破仑的评论如何，恺撒的思考战略真的没有失误吗？如果他能同时将自己的战略失误堂堂正正地向士兵们承认的话，后世也就不会因为其转嫁责任而对他进行指责了，恺撒也就能保全自己作为德行高尚者的名誉了。

但是，此时最重要的是重整战败后的军队，而不是顾及恺撒个人的名誉。人在士气低落的时候，如果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虽说他心里的一块石头会落地，但是这样的话，他也就会认为这确实不是自

己的责任。如此一来，要他从自己内心萌发出重新振作的能量，就会变得颇不容易了。他只会一再地消极沉溺于依赖指导者的判断。我认为，恺撒正是为了避免这样才转嫁责任的。他对士兵们明说“这是你们的责任”，是为了诱导士兵们重新激发自己的战斗活力。

实际上，在总司令的训话结束之后，士兵们心中存在的最多的念头就是“耻辱”。全体官兵都流下了泪水，并深以自己为耻。特别是率先败走的第九军团的士兵们，这个想法更加强烈。他们正是8个月前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拒绝从军进行罢战的诸位。那时候恺撒的一番演说让他们自己觉得羞愧之后，恺撒又说要实行“什一杀”，也就是抽签选出十分之一的士兵，被剩下的士兵们殴打致死这一罗马军队中最严酷的刑罚。但是，这个场面在之前也提到，最终是恺撒决定在对庞培战役结束后延期执行。第九军团剩余的士兵们认为，相比其他人而言，自己应该为败走负更大的责任。

恺撒对此明确地回答“不”。这个否定的回答，让第九军团的士兵们的羞耻感更加强烈。他们都一起高喊：“希望至少也要对旗手们处以死刑，军规里旗手是绝不能舍弃战场的。”

但是，对此恺撒也明确回答“不”。士兵们已经开始泣不成声，他们一边哭泣一边向恺撒请愿，让自己重回敌人所在地，竭尽全力与敌血战。但是，恺撒听完之后也只是说：“我自有主张。”

那天恺撒给士兵们的惩罚，仅仅只是将弃战场而逃的旗手们降级。

诱敌战

从恺撒设下的包围圈到阿波罗尼亚，要向南行军50公里。无论是都拉斯还是阿波罗尼亚，我都写成希腊城邦，因为它们在古时确实属于希腊。现如今它们则在阿尔巴尼亚境内。恺撒军到达阿波罗尼亚时已是吃

了败仗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9日了。为了阿波罗尼亚和奥瑞克斯的防卫，恺撒留下8个大队共2000人和100名骑兵。一个目的是为了保住这个和意大利的联络点，另一目的则是将不能行军的伤员们留在那里治疗。

恺撒在希腊的全部军队由10个军团2.5万多名重装步兵和1300名骑兵组成。恺撒给了第一副将多米提乌斯2个军团和500名骑兵，用于对抗数量相当的梅特鲁斯·西庇阿军队。之后，剩下的8个军团共2万人和800名骑兵则跟随恺撒，和总兵力达到6万人的庞培大军打都拉斯战役。恺撒在该战役失败后，损失了1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现在剩余的兵力，大概是1.9万名步兵和600名骑兵。此外，他留下了2000名步兵和100名骑兵在海港作为防卫力量。这样算下来，恺撒手中现有兵力是1.7万名重装步兵，骑兵只剩500名。恺撒此时绝对需要和多米提乌斯的军队会合。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希腊西岸，前往希腊中部。如此一来，他就会离本在都拉斯的庞培军越来越远。不过恺撒并不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情的人。

必须前往希腊中部的理由，除了与多米提乌斯的两个军团会合之外，恺撒还想借此机会把庞培从他必不可少的补给基地都拉斯调开，进行诱敌作战。有三大因素显示，实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很高。

第一，尽管在都拉斯占据了绝对优势，庞培却对恺撒的挑战不加理会。或许是在和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会合之前，庞培压根儿没打算积极进攻。

第二，一旦知道恺撒前往希腊中部的消息，庞培肯定也会觉察到恺撒是想去与多米提乌斯会合。这样一来，他必定会担心会合后的恺撒会全军向梅特鲁斯·西庇阿的两个军团发起进攻。

第三，都拉斯战役胜利后，庞培方的士气必定高涨，因此对与恺撒会战的要求必然也会和士气一样高涨。

在平原地区布阵进行正面对阵的战争，对希望一次决胜负的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它可以决定此人在其他方面的所有命运。用这样的战争来一把豪赌，对此时的恺撒是必要的。因为物资不足的状况持续太久的话，就对物资充足的敌人更加有利。另外，都拉斯的失败已经传遍了整个希腊，在希腊人全部倒向庞培之前，他也必须进行一场大决战。

恺撒在阿波罗尼亚仅仅待了三天就率军出发了，行军的方向是东南，目的地是希腊中部的色萨利。恺撒命令多米提乌斯解除阻挡梅特鲁斯·西庇阿军队西进的阵型，赶往色萨利与恺撒会合。

希腊境内岩石山峦众多。罗马时代的旅行家们经常开玩笑说，希腊众多的神庙只不过是改变了岩石的位置而已。越往希腊腹地深入，恺撒军眼前就出现越多矗立的岩石山脉。越过一个又一个石山的行军并无欢乐可言。恺撒军不停地翻山越岭，每天只有50公里的行军速度。200公里的路程竟花去了他们12天的时间。幸好时值夏季，士兵们只用翻山，不用面临饮水不足的情况。7月24日，收到恺撒命令南下的多米提乌斯的军队在色萨利北部的阿吉尼乌姆与恺撒会合了。

庞培也在向希腊中部挺进。果然如恺撒所料，他在担心梅特鲁斯·西庇阿两个军团的命运。但是，庞培选择从都拉斯出来，沿着东面向希腊北部行军，首先进入埃格纳提亚大道，之后才选择南下的平坦的道路。相对于恺撒军翻山越岭的奇兵突进，中规中矩的庞培军在行动上就慢了一步。或者说不是庞培行军动作慢了，而是恺撒军行军速度更快一步。与多米提乌斯会合后，恺撒一步也没有停留。将庞培从补给基地都拉斯引出来之后，他还想把他从希腊西岸引开，引到海军优势无法施展的地方。这就是恺撒自己所记载的“在同等条件下战斗”的战略。

因此，与多米提乌斯会合后，恺撒的行军方向仍然不变。他没有向北迎击庞培的军队，而是越发向东南方向逃走。但是，毕竟总目标还是把庞培引出来进行会战，所以他逃撤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而是一点一点和敌人缩短距离。为了达到第一目的，他任由庞培和梅特鲁斯·西庇阿

会合。

和多米提乌斯会合后，恺撒的总兵力达到了步兵2.2万多人，骑兵1000多人，到达了阿吉尼乌姆东南50公里的地方——宫福易斯。宫福易斯是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交界处的一个小城。几个月前这里刚刚对恺撒表达了归顺之意，并表示愿意为其提供军粮。

但是，都拉斯战役的结果也传到了这里。城中的百姓们也不敢再支持恺撒了，怕如果再支持下去，会受到庞培的恐怖威胁。他们紧闭城门，召集青壮年男子死守不开，同时给庞培和西庇阿发求援信号。对恺撒来说，是不允许这样沉默地经过的。如果他就这样放任宫福易斯抵抗自己的话，那么显然全希腊人都会起来抵抗自己。

收到宫福易斯来的急件之后，西庇阿和他的两个军团正在小城东北90公里以外的地方，色萨利地区的大城拉里萨。而庞培及其9个军团还没到达色萨利地区。

从安插敌营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后，恺撒决定进行闪电战。一雪前耻的信念在士兵们心中熊熊燃烧。他们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作战准备。

7月26日下午3点，恺撒军发起火焰般的猛攻，在当天日落之前就完成了战斗。恺撒这次允许士兵们在城中进行掠夺，但是时间很短。当天夜里，他们就拔营前行了，向下一个目的地美托罗珀里斯挺进。第二天一大早，军队就到达位于东南方向20公里处的美托罗珀里斯。

美托罗珀里斯也是曾经和恺撒立过誓约的城，但这里也和宫福易斯一样，打算对恺撒紧闭城门。然而眼见着恺撒阵前押着的宫福易斯居民们的样子，美托罗珀里斯居民们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觉得与其抵抗然后被恺撒掠夺和俘虏，倒不如赶紧开门为妙。

恺撒对待美托罗珀里斯的态度和宫福易斯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是为了让色萨利其余地方的城市能够信守当年与自己的誓言而实施的举措。他的目的达到了。当然，西庇阿军队所在的拉里萨除外。

在这里，恺撒第一次改变了行军的方向，不再往东南，而是朝正东方向行进。东面50公里外的地方，正是绝好的适合会战的平原。首先，那里已经进入小麦的收获季节，有着充足的粮食补给。此外，那里也是迎战庞培的最佳地点。

恺撒到达这个法萨卢斯平原的时候已经是7月29日了，离都拉斯撤退已经整整过去了23天。

庞培一直向希腊中部追击恺撒。他和西庇阿在拉里萨会合是在8月1日。两雄决战的大舞台已经就绪。

时间是在庞培58岁生日之前一个半月，在恺撒52岁生日之后的一个月。

大决战开始

同为恺撒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在表现手法上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战略层面上。《高卢战记》中恺撒为什么考虑使用某个战略，都会用语言表述出来。而在《内战记》中他只是记述自己考虑过的战略，而尽量避免对其思考的过程进行直接表述。

究其原因，因为《高卢战记》是以高卢人、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为对手的战记，这些人是书的读者罗马人的反对对象。而《内战记》中记述的是和同胞手足相残的战事，它的读者和恺撒的对手同为罗马人。

因此，恺撒尽量避免使用诱敌作战、诱饵、陷阱等语言。

恺撒的这两本书，特别是《内战记》，并不像西塞罗所评价的那样是“想给写历史书的人提供史料而书写的”。当然，如果从结果来看，这两本书确实可称为是提供史料的好书。这是因为恺撒所特有的透彻的视角，以及简洁、明晰、客观的表现手法所致。恺撒的本意，特别是《内战记》中的本意，是希望同时代的罗马人理解他的行为。他写出此书给同胞看，为的是获得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恺撒给自己立下的最重要的课题，是建立罗马的新秩序。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诉诸战争，而且必须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在以胜利的姿态结束战争之后，他还要为了建立新秩序而获得更多的帮助者和支持者。

正因为如此，写《内战记》时恺撒在语言的选择上就相当地慎重。对庞培所犯下的错误，他并没有用语言明确地表述出来。自己对庞培所设置的陷阱之类，他也绝对不写。所有可能触犯同胞罗马人反感神经的语言表达，他都慎重地加以避免。

建立新秩序实际上就是政治。有志于政治的人自然知道，没有中间派和反对派的话，也就不会被称之为政治了。恺撒正是要通过《内战记》来说服自己的反对者和中间派。

虽然恺撒在遣词造句上慎之又慎，但是在如实记述这一点上，《内战记》与《高卢战记》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说，行文风格反映写书人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读《内战记》时，越往后读就越能了解恺撒的战略和他对庞培的评价。如果虚心地读下去的话，也会知道法萨卢斯平原上声势浩大的两雄决战，基本上是从一个月前的都拉斯包围网撤退时就已经拉开帷幕了。同时我们也会了解到，恺撒何以在撤退过程中没有在阿波罗尼亚久待，仅三天之后就迅速向色萨利撤退的理由。

为什么在众多的选择中，恺撒独独青睐色萨利呢？因为在那里，多米提乌斯的军队正在和梅特鲁斯·西庇阿的两个军团进行一对一的对峙。恺撒进入色萨利后，一旦下令多米提乌斯解除对峙状态，和自己指挥下的军队会合，庞培是不会舍弃梅特鲁斯·西庇阿和他的两个军团的。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离开对打持久战十分有利的都拉斯。

N
0
50km
里斯
都拉斯
（7月6日战役）
马其顿地区
腓立比
阿姆菲波利斯
塞萨洛尼基
埃格纳提亚大道
阿波罗尼亚
（7月9日—12日）
色萨利地区
奥林匹斯山
2917米
奥瑞克斯
爱琴海
克基拉岛
拉里萨（8月1日）
伊庇鲁斯地区
宫福易斯
（7月26日）
法萨卢斯
美托罗珀里斯
法萨卢斯决战
（8月9日）
恺撒
（7月29日返回）
德尔斐
亚该亚行省
雅典
科林斯
爱奥尼亚海
伯罗奔尼撒半岛
斯巴达
恺撒撤退路线
庞培追击路线

都拉斯战役后战场的移动

在包围战中失利的恺撒记述此事为“战略性的根本变更”。后来有一位史学家将恺撒前往色萨利的撤退方式评价为“撤退作战之妙招”。如果用恺撒极力回避的直接表述来讲，就是对庞培设下了陷阱。吃掉梅特鲁斯·西庇阿和其两个军团的计划，实际上是吃掉庞培的计划。西庇阿只是这个计划的诱饵而已。

庞培派2万多兵力驻守自己最大的军粮基地都拉斯西岸，自己率领剩下的兵力进入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地区和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军队成功会合。此时他可指挥作战的兵力有4.7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

庞培的阵营里已充斥着胜利在握的欢乐气氛。

总司令庞培也显得从容而悠然。对身兼岳父、叙利亚行省总督、前执政官多重身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梅特鲁斯·西庇阿，庞培并没有将其当做副将来对待，而是给予和自己并列的总司令待遇。比起严格统一的指挥系统，他更喜欢被人评价为一个“谦虚的人”。他甚至还给梅特鲁斯·西庇阿分配了军号手，该职位的士兵是总司令用来传达指令的。自然，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帐帷也和庞培的一样，用了只有总司令才可以使用的红色。士兵中间胜利的气氛更是与日俱增，这也是原因之一。

19个月前跟随庞培从罗马逃出来，一直追随他到希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有着已经要胜利返回首都的气氛，他们七嘴八舌地众口相传：

“庞培是个对什么事都过分慎重的人。以他的性格来看，只有这次表现出如此的悠闲和胜券在握。看来这次会战应该一天内就能决出胜负。”

“庞培在慎重处事的同时，肯定也在感受着像命令奴隶一样命令我们这些有着执政官、大法务官经验的人的快感吧。”

大多数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们认为，在罗马霸权下的地方，比起当地的王侯们，他们应该受到更加高级的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决战还没有真正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为回到意大利之后如何进行公职分配而争吵不休了，而且这一切讨论，是发生在决战前探讨战略战术的作战会议上。

首先他们一致认为，应当没收追随恺撒的元老院议员们的财产，并对之进行瓜分。其次，西里乌斯的友人建议，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7年的大法务官应当由西里乌斯担任。西里乌斯因被庞培指派保卫叙利亚而不在会议现场，为了避免他因缺席而捞不到好处，他的朋友们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其他的人有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全体人员都很辛苦，因此不能给某个人特殊的待遇。

这种气氛，也传染给了地位更高的人。阿赫诺巴尔布斯、梅特鲁斯·西庇阿和雷托鲁斯三人为谁来取代恺撒担任大祭司一职而争论了起来。大祭司是终身职位，因此当他们对决战中庞培的胜利深信不疑时，早早就开始争当这个职位的后任继承者。阿赫诺巴尔布斯表示自己在首都人望颇高。梅特鲁斯·西庇阿则认为自己和庞培关系密切。雷托鲁斯觉得这两人年事已高，自己才是大祭司的最适合人选。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梅特鲁斯·西庇阿是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雷托鲁斯是公元前57年的执政官，三人在年龄、职位经验上看都有取代恺撒任职的资格。

虽说是作战会议，会上争论的却是这样跟作战毫无关系的事情。还有人置迫在眉睫的决战于不顾，拿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讨论。鲁弗斯向庞培控诉，西班牙的投降是因为亚弗拉尼乌斯的兵力背叛所致，阿赫诺巴尔布斯则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所有人都关心的提案，内容如下：

但凡跟随庞培的元老院议员，每人可拥有三票表决权。他们有权以此对留在罗马或其他地方但是没有支持庞培的元老院议员们进行逐一裁决。三票中一票用以表决无罪，一票用于表决死刑，三票都投表示要进

行金钱惩罚。

一言以蔽之，庞培的这场作战会议，与其说是在讨论如何获胜，倒不如说是在集中讨论如何瓜分胜利战果。

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氛围下，没有被感染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庞培。

庞培虽然是作战会议的主持者，但是他没有制止别人高声对以上内容进行讨论，而且自己也没有加入到这样的讨论中。这位58岁的武将一直沉默，可能是真的在思考迫在眉睫的与恺撒的决战该如何进行吧。也许，庞培已经知道自己掉入了恺撒的圈套。不，或许，是决定从安全的都拉斯出来时，就已经知道了。

即使是没有担任战场总司令经验的后人，也可以凭史料推理出当时的情形。这个战场经验比谁都丰富的庞培，在得知了恺撒向色萨利撤退时，当然也会觉察到这是个陷阱。

庞培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却还是自投罗网。但他肯定是考虑到即使如此自己也能获胜，才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庞培在都拉斯附近安置了2万名步兵作为守卫，只带着骑兵跟随着大军出发。与梅特鲁斯·西庇阿会合之后，庞培方的骑兵增加到了7000名。而对方恺撒只有1000名骑兵。已经58岁的庞培以罗马第一名将自诩，他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忙于思索之故。之后的几天里，庞培全军从色萨利拔营而起，向恺撒所在的法萨卢斯出发。从拉里萨到法萨卢斯平原，只需要向正南方向行进40公里。

法萨卢斯大决战

在涵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法萨卢斯平原与其说是在其中

部，还不如说是处于北希腊的南端更为确切。如果这里不是庞培和恺撒决战的舞台，那它就不过和色萨利地区多见的山间平原一样平常，甚至只是一块小麦地而已。周围由500米高不到的丘陵围绕，中间的开阔平原东西长20公里，南北长17公里。在平原北部边缘附近，有条没有桥也可以照渡不误的小河，向东缓缓流淌。

首先，对士兵数量相对少的恺撒来说，这个宽广度的平原是十分不利的。尤其是恺撒手中机动力强的骑兵数量少，更加不利于这样的平原作战。从西边率先抵达法萨卢斯平原的恺撒，肯定对构筑军营的地点进行了一番精心选择。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在对防守有利的高地扎营，而是在平原的正中央构筑阵地。就是在宽阔的平原，即使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恺撒也想由自己来划定战场，进而彻底地采取“进攻”的策略。从北部抵达的庞培，虽然也在平原的中央构筑营地，但是他选择了在地势更高的地方。

《内战记》中对两军的战斗力的记述，后世的研究者们都认为是准确可信的。根据这个记述，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如下：

——庞培军——

110个大队的重装步兵共4.5万人

庞培过去的部下2000人

骑兵7000人

共计5.4万人投入大决战

守卫营地的人员共有4000人

——恺撒军——

80个大队的重装步兵共2.2万人

骑兵1000人

共计2.3万人参战

其中500名步兵留守营地

但是，恺撒几乎在决战开始的同时，就已经倾巢出动，投入了全部的兵力。至此法萨卢斯平原上出现了步兵4.7万对2.2万，骑兵7000对1000的大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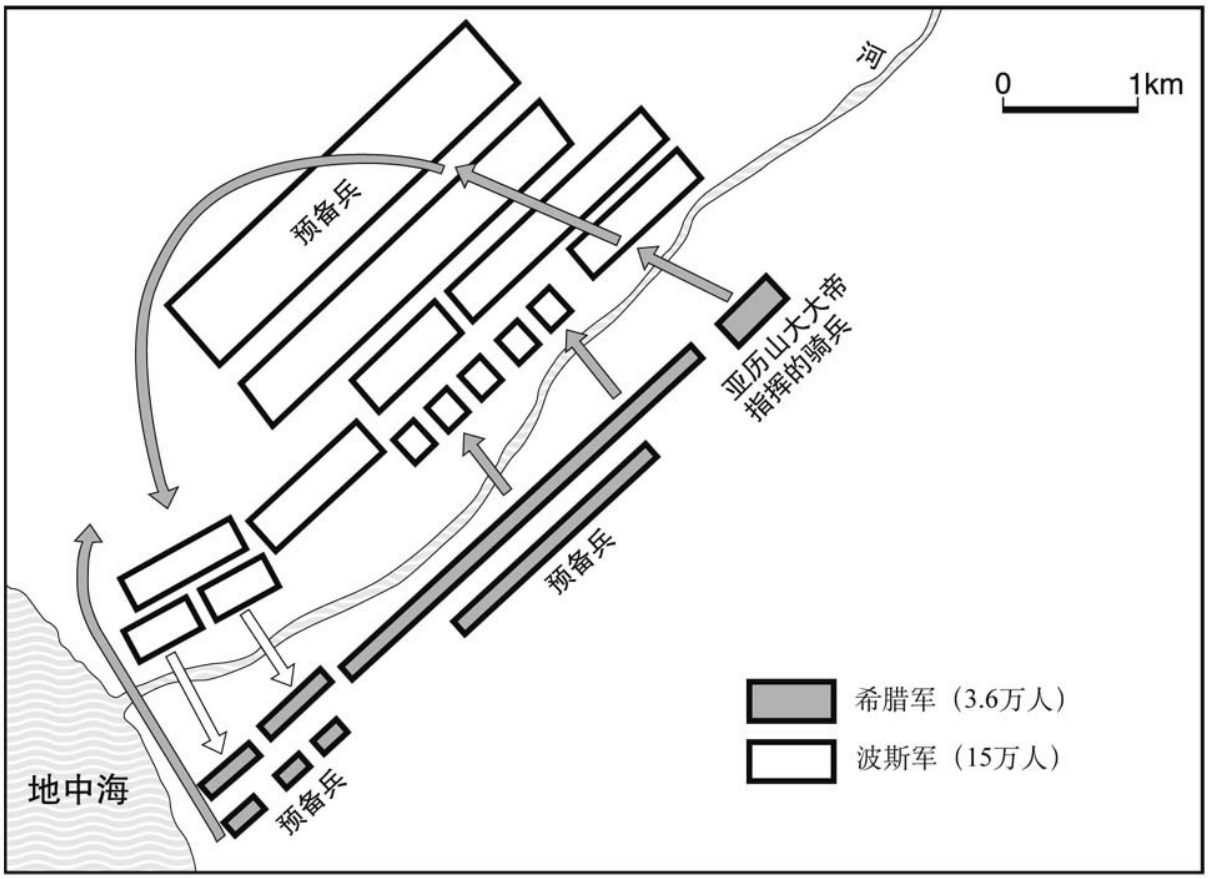
恺撒不是以军团为单位，而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战术单位的计数。因为他喜欢少而精的精锐部队，这就是他的战术单位。但是，同样都是大队，庞培的大队和恺撒的大队在士兵数量构成上是有差别的。

庞培将过去的2000名老部下分散到各个大队去，因而庞培方总共有110个大队，共计4.7万人。每个大队的士兵数量有430人。而另一方，恺撒这边的每个大队平均下来只有275人。从这个对比上看，恺撒在人数上处于不利的局面。但是恺撒认为，人数上的不利算不上什么不利。

在法萨卢斯平原上筑营的当天夜里，庞培就召开了作战会议。在会上他阐明了自己的战术思想。在庞培的战术形成之前，他的脑海里大概回想过以往众多的战役案例。在介绍庞培的战术思想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此前历史上那些时常会被想起的著名战役。这并不是扯闲篇浪费时间，因为庞培的脑海里应该也无可避免地回想过这些内容。

从伊苏斯平原向西，能够眺望到地中海东北方的海。公元前333年，在这里发生了希腊和波斯的战争。被后世称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亚历山大曾在此统领以马其顿为主力的希腊联军，拥有重装步兵3.1万人加上骑兵5000人共计3.6万人的兵力。大流士王亲率波斯军队1万以上的骑兵和15万人的大军与之对阵。那一年，这位时年23岁的马其顿年轻国

王，率领骑兵5000人作为大军右翼的先头部队，首先击破敌人左翼的防守骑兵，接着马上攻入大流士王坐镇的敌军中央指挥部，摧毁了敌人的大本营。他马不停蹄地又绕到敌人的右翼背后，以积极的战术获得完胜。



伊苏斯会战略图

“战斗是令人激动的，因此战场上必须要用调动所有令人激动的因素。”亚历山大如是说。这好像就是在他眼前出现一样的战术。这个战术的数据结果是，己方牺牲200名士兵，敌方死伤5万人。

在这里要注意的第一点是马其顿的阵型。这个阵型的左边是大海，所有的骑兵都布置在右边，以保证其行动不会受到海的限制。亚历山大的这个安排，也和他的思想一样是“令人激动的”。一般而言，骑兵团会

分布在军队的两翼。而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把所有的骑兵都集中在军队的右侧。接着率领他们冲乱敌人的左翼，直入中央，接着马上绕到敌人的右翼，从三个方向展开了围歼战。

亚历山大独创的第二个战术，是针对数量占绝对多数的波斯重装骑兵施行的战略。他的战略使得这些社会地位很高的骑兵空自骑在马上，发挥不了骑兵的作用。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着眼于以发挥骑兵的机动性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将骑兵机动作战上升为战术上的一大要素。

他的第三个独创性，是活用了马其顿重装步兵团方阵。这严格来说是继承了他的父王菲利普斯的军事思想。马其顿重装步兵团是由手持5米长矛的步兵组成。他们第一排平行而立，从第二排往后的每一排逐渐增大长矛竖立的角度，到最后一排就变成了垂直而立的一个像巨大刺猬形状的集团方阵。以这样的方阵在战场上行进，不管在数量上有多大优势的波斯兵如何进攻都是徒劳的。在这个方阵的两翼和背后，他还配以骑兵进行对敌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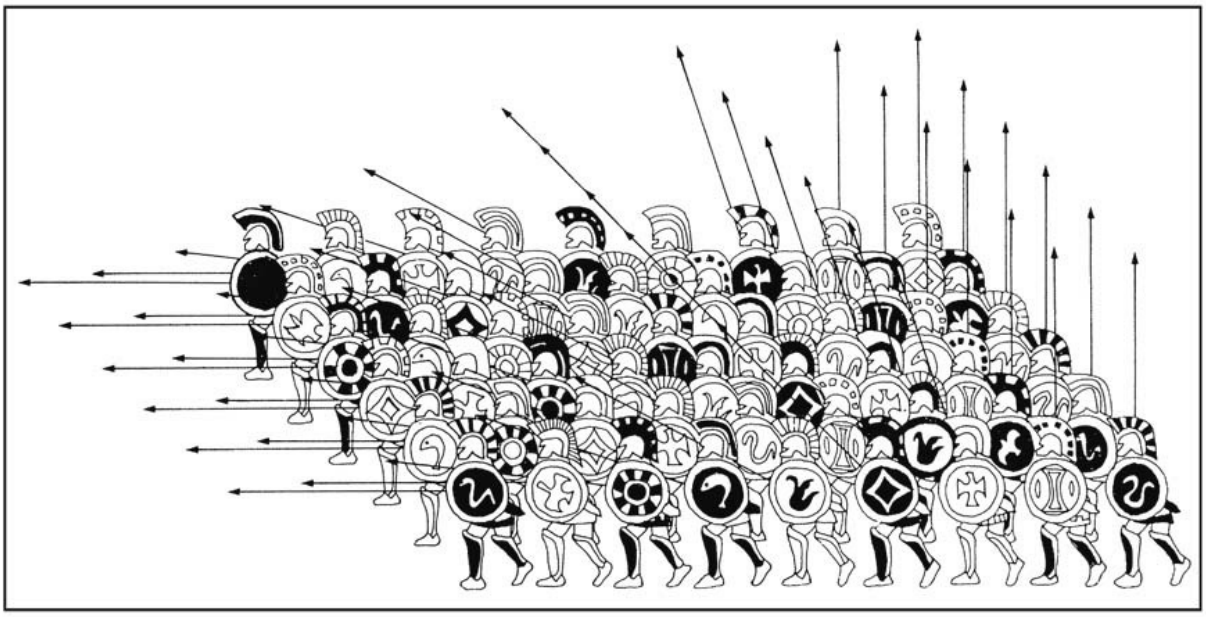
巨大的刺猬阵和灵活运用机动力强大的骑兵，造就了亚历山大成为一代大帝。

为了学习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术，汉尼拔甚至学了希腊语。在公元前216年，意大利南部的坎尼平原，他与当时也被称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武力的罗马军队发生激战，结果也是完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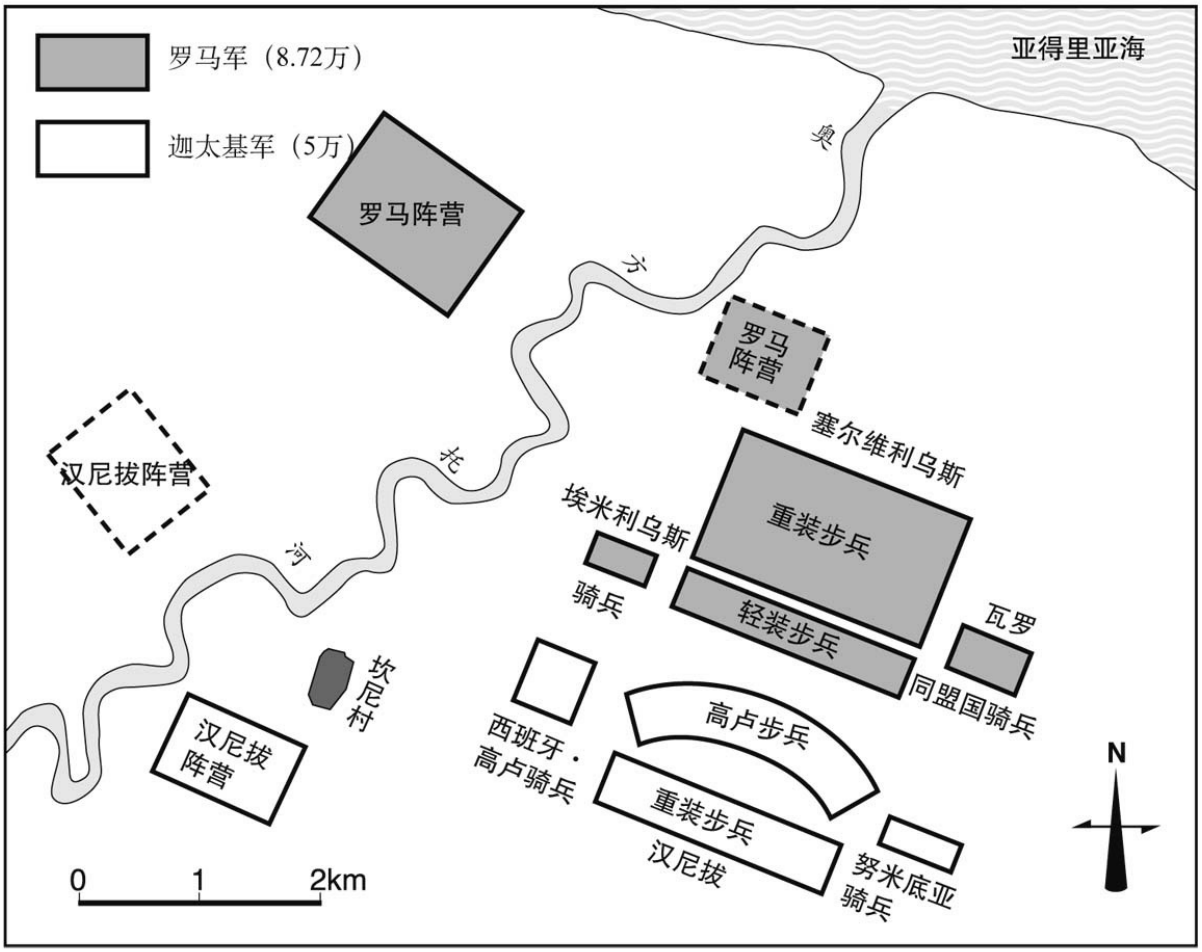
那时汉尼拔的战斗力是步兵4万名加上骑兵1万人共5万人，而对手罗马军团有8万名步兵和7200名骑兵，共计8.72万人。

关于在坎尼和扎马开展的两场战役，在《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中有详细的叙述，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坎尼战役中的汉尼拔，将在实力上占尽优势的骑兵安排在左右两翼。为了抵挡敌人大本营队伍的正面猛攻，他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安排在队伍的最中央。这支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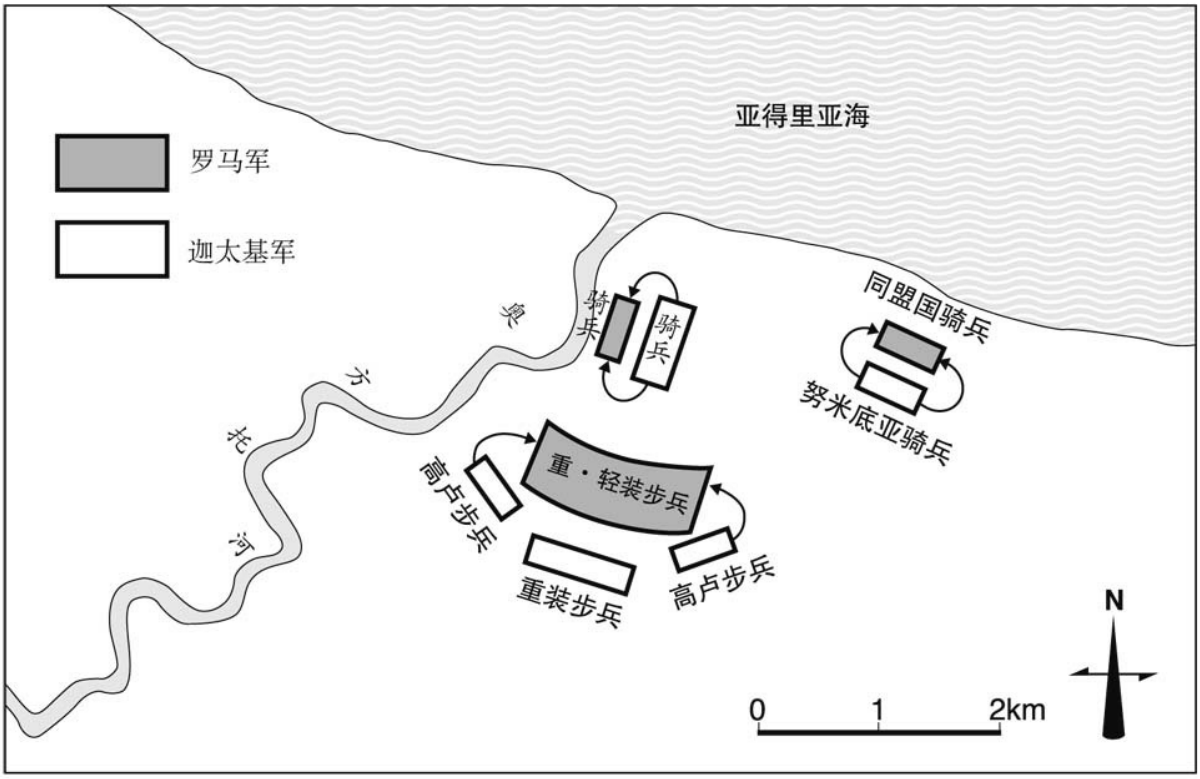
曾跟随自己一起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汉尼拔对他们视若子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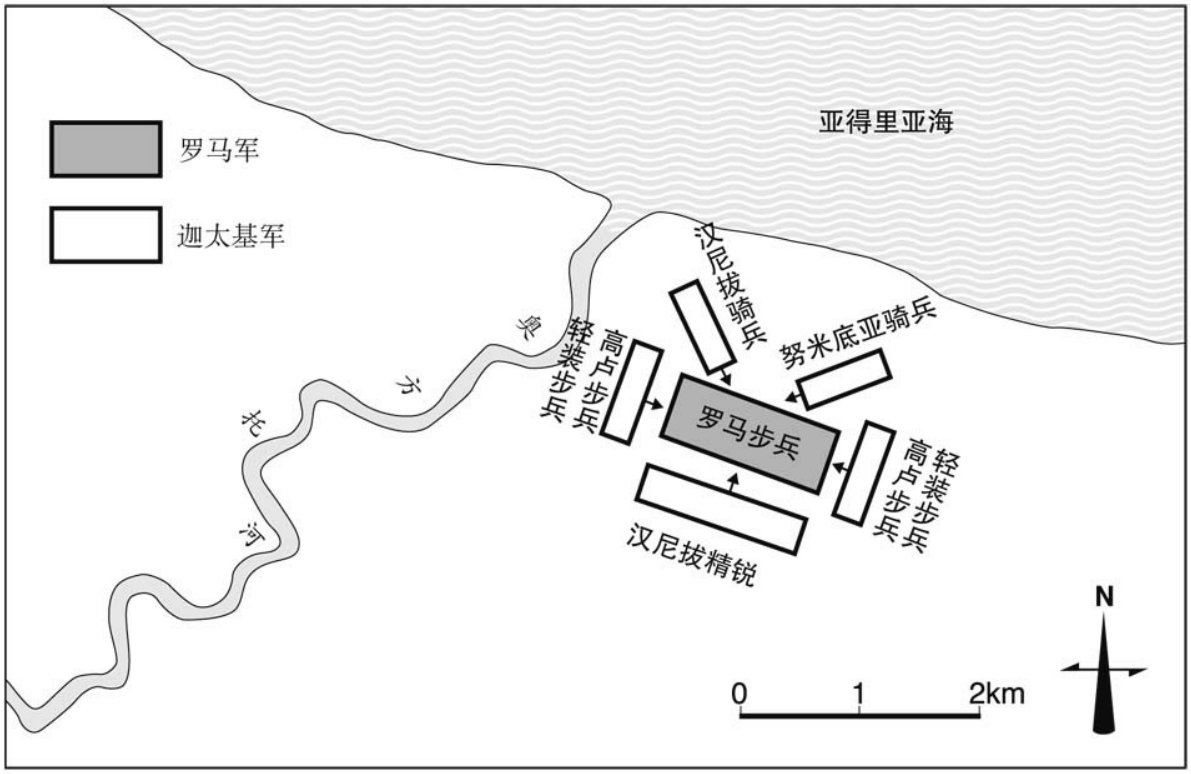
马其顿式重装步兵团（摘自意大利中学世界史教材）


罗马军（8.72万）
迦太基军（5万）
亚得里亚海
罗马阵营
奥
方
罗马
阵营
塞尔维利乌斯
汉尼拔阵营
托
埃米利乌斯
重装步兵
河
骑兵
轻装步兵
瓦罗
坎
尼
村
同盟国骑兵
西班牙·
高卢骑兵
高卢步兵
汉尼拔
阵营
重装步兵
汉尼拔
努米底亚
骑兵
N
0
1
2km

坎尼会战（布阵后的阵型）


亚得里亚海
罗马军
迦太基军
骑兵
骑兵
同盟国骑兵
努米底亚骑兵
重·轻装步兵
高卢步兵
重装步兵
高卢步兵
N
0
1
2km

坎尼会战（第二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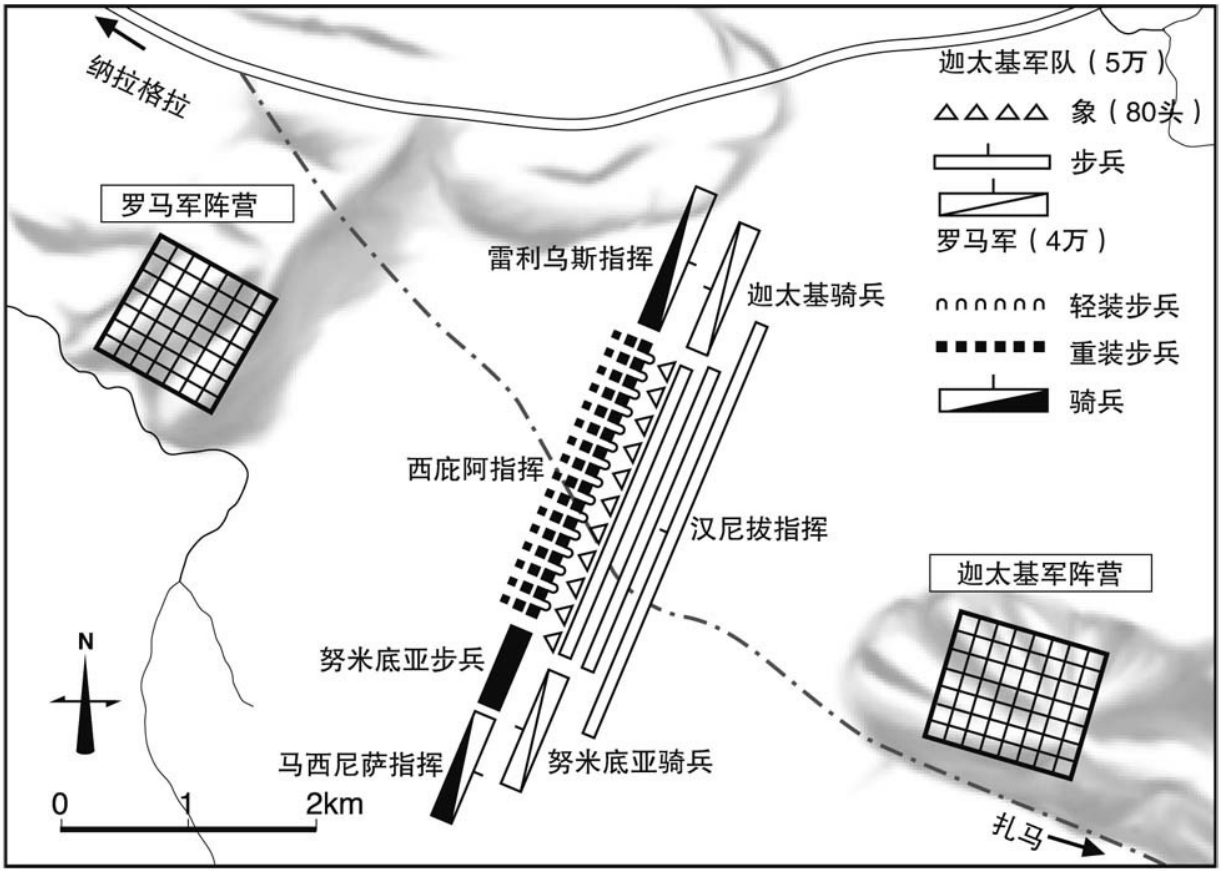

亚得里亚海
罗马军
迦太基军
汉尼拔骑兵
努米底亚骑兵
轻装步兵
高卢步兵
罗马步兵
轻装步兵
高卢步兵
汉尼拔精锐
N
0
1
2km

坎尼会战（最后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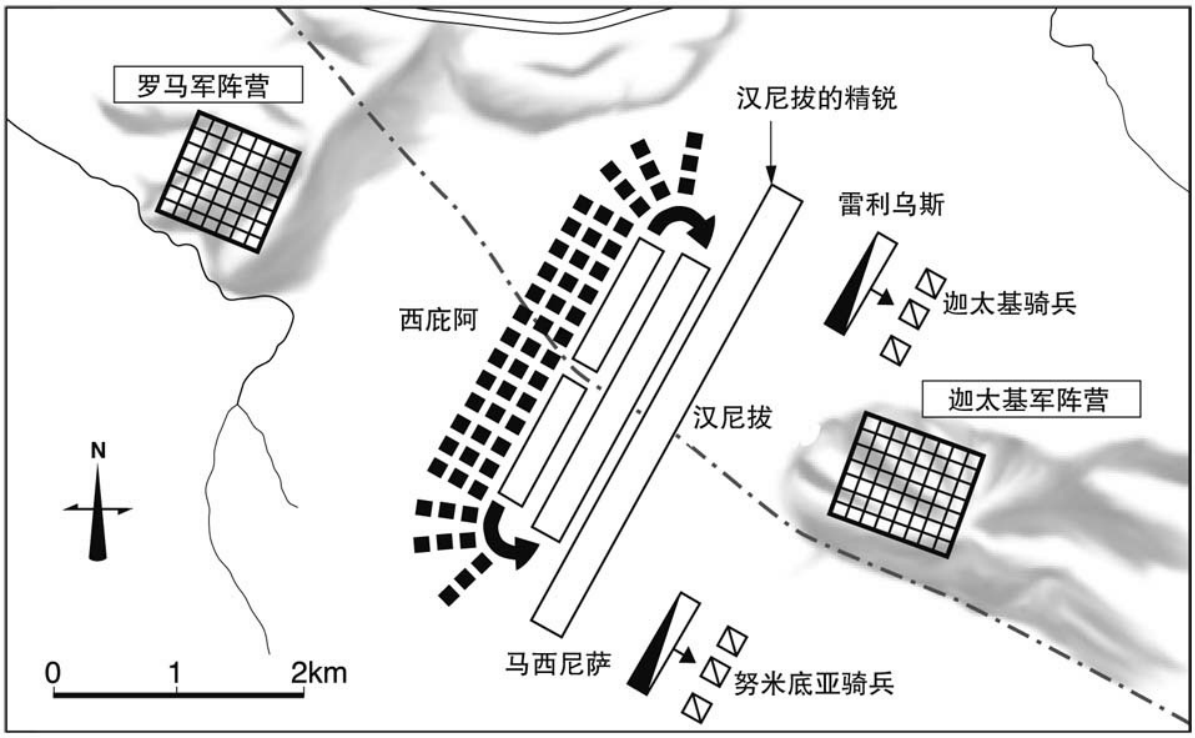
重装步兵动作迟缓，但是耐力持久，骑兵拥有无可比拟的机动力优势。两支部队相结合的战术为亚历山大大帝所首创，被汉尼拔再度加以完美演绎。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和步兵骑兵都比敌人数量少的亚历山大大帝相比，汉尼拔的军队虽然步兵数量少，但是骑兵数量占了优势。他将骑兵势力分在左右两侧，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从两翼进行合围进攻的话，比绕到敌人背后需要耗费的时间更少。

坎尼战役的结果是，汉尼拔只牺牲了5500名士兵，而罗马军队战死者达到6万人，被俘8000人。此外，被称为“汉尼拔精锐”的士兵们战死的非常之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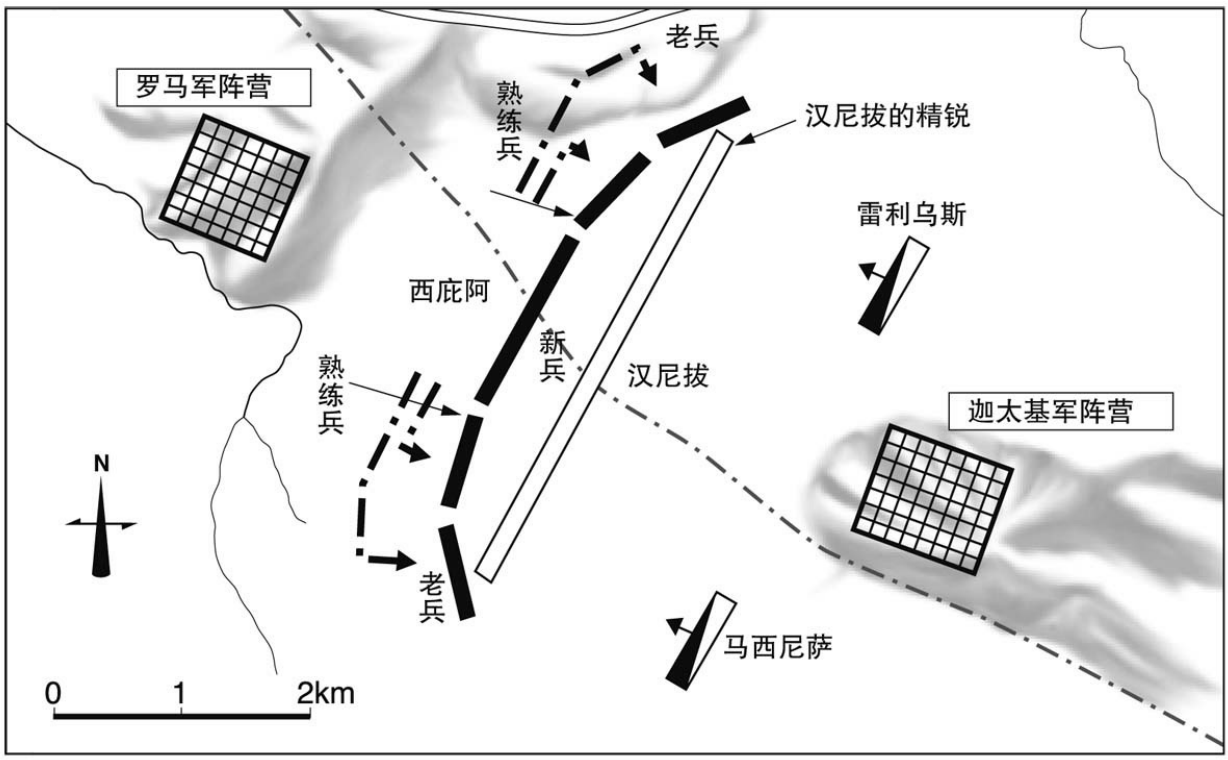
后来，汉尼拔在公元前202年为罗马年轻的武将西庇阿所挑战，双方展开大规模会战的地点在现在位于突尼斯中部的扎马平原。



扎马会战（布阵后的阵型）（选自LIDDELL HART, “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扎马会战（第二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扎马会战（最后阶段）（选自LIDDELL HART，“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那次会战中汉尼拔的兵力有步兵4.6万人、骑兵4000人，共计5万人，另外还有80头大象助阵。而西庇阿这边有步兵3.4万人、骑兵6000人，共计4万人。罗马军步兵数量虽少，但是在骑兵数量上占了优势。汉尼拔知道己方机动能力处于劣势，于是派象群扰乱敌方阵营，而他的精锐部队则打算到最后再投入到战斗中。但是西庇阿首先打乱了象群的攻势，接着对汉尼拔使用了和他在坎尼战役中同样的战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结果大败汉尼拔。

这次会战中，常胜不败的汉尼拔终告败北。迦太基军战死的士兵在2万人以上，俘虏也有2万人，而罗马方战死的只有1500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完胜而归。此后，罗马军的战术全部都沿用了西庇阿式战法。

以上是公元前古罗马最有名的三次会战。法萨卢斯会战也是堪与上述三大会战匹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战。在开始讲述这个会战之前，参战者应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了。因为这一战决定了罗马政权是维护现有体制，还是建立恺撒所主张的新秩序。

在法萨卢斯之战中，庞培的兵力有步兵4.7万人，骑兵7000人，共计5.4万人，而恺撒这边则有步兵2.2万人，骑兵1000人，共计2.3万人。

和之前的三大战役相比来看，恺撒的步兵和骑兵都处于劣势，他的状况或许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情况类似。而坎尼之战的汉尼拔和扎马之战的西庇阿，都是在步兵处于劣势而骑兵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取得大胜的。

即使如此，恺撒还是无法照搬当年马其顿年轻领袖的战术。亚历山大大帝当年面对的，是还没有意识到骑兵机动战斗力的波斯骑兵。相反，恺撒即将面对的是扎马战役后150年来罗马军队固定成型的骑兵战

术——机动性充分活用的罗马骑兵，而且，这支骑兵的数量还是自己的7倍之多。庞培对这样一支决定胜败的骑兵战斗力十分重视，将其指挥权交给了一个对恺撒的军事手段了如指掌的武将。

步兵2倍于敌，骑兵7倍于敌，在这样的战斗力对比下，百战不殆、从未尝过败绩滋味的常胜将军庞培，在参加作战会议的地位高的众人面前断言：

“在全面战斗开始之前，我们就能摧毁恺撒军队。”

面对着眼前吃惊不已的人群，庞培继续说道：

“也许你们认为我说的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但是请听听我的战术想法。听过之后，你们大概就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战斗了。

“我将命骑兵团在战斗刚刚打响时猛攻恺撒的右翼。在我主力部队投石之前（即在主力部队加入战斗前），右翼进攻必须要把他们逼入崩溃的境地。之后，骑兵团绕到敌军背后，抢在他们之先到达河边，完成对敌包围。这样一来，会战将在我军主力重装步兵陷入危险之前就结束战斗，最终达到基本没有牺牲的状况。

“考虑到我方的骑兵兵力优势，这个战术实施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

庞培的阵型布局如下：

两军的营地大约相距7公里，如果把法萨卢斯平原从东西一分为二的话，庞培的营地就在东半部分，恺撒的营地在西半部分，因此，这个从营地中将敌人引出来的布阵，有一条河位于庞培方的右边，恺撒方的左边。

离河较近的是庞培军的右翼。庞培派亚弗拉尼乌斯指挥来自奇里乞

亚和西班牙的士兵。西班牙士兵都是雇佣兵，庞培认为他们的战斗力冠绝全军，因此将他们安排在没有骑兵守卫的右翼。

大军的中央由梅特鲁斯·西庇阿指挥，庞培配给他从叙利亚过来的两个军团。

位于大军左翼的是两年前借出兵帕提亚（安息）为由从恺撒手中夺来的两个军团。

除上述兵力以外，其他的步兵，包括庞培手中的2000名老兵，都平等地分配给左、中、右三个部分。综上所述，罗马将官和被称为“主力部队”的重装步兵，已经有4.7万人。

这些重装步兵团的左边是全军的最左翼，庞培将7000名骑兵全部放在那里。而这个掌握了全局状况关键的骑兵团，庞培任命拉比埃努斯担任指挥。庞培自任总指挥，扎营于大军左翼背后的矮山丘上。

在对战场地势和行军布阵进行了一番观察之后，恺撒清楚地知悉了庞培的战略意图。从都拉斯包围战中那两个逃跑的高卢骑兵口中，庞培知道了恺撒手中的骑兵总数，也知道按照普通战术，恺撒是没有多余的兵力在左右两翼都配备骑兵的。但是他自己的做法也是违反常规的。他将全部的骑兵都放在大军左翼，这和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战役中将左右两翼骑兵进行不同设置的战术如出一辙。伊苏斯战役中，重要的骑兵团是由亚历山大大帝亲自指挥的。庞培则任命比谁都更了解恺撒打仗手法的拉比埃努斯担任骑兵团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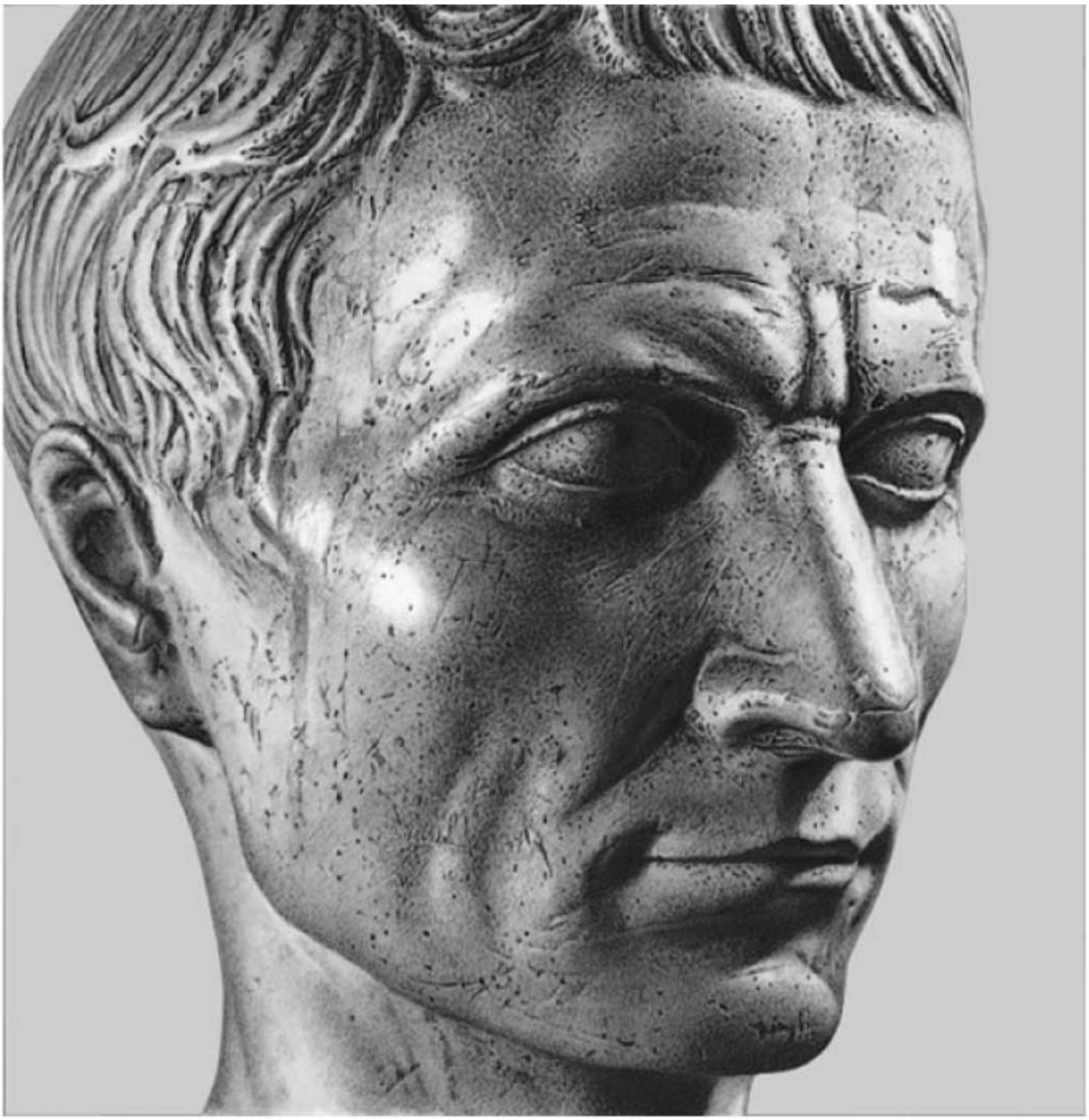
在作战会议上听庞培明确战术后，拉比埃努斯接受任务时表态说：“不获全胜，誓不还营！”

其他将领们也纷纷宣誓奋战。首先起誓的是庞培，接着是其他的全部将领。作战会议在“我军必胜”的自信气氛中散会了。庞培和拉比埃努

斯这样身经百战的武将所发出来的自信满满的话语，浸透到了每一个士兵的心田。不战则已，一战必胜。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人心存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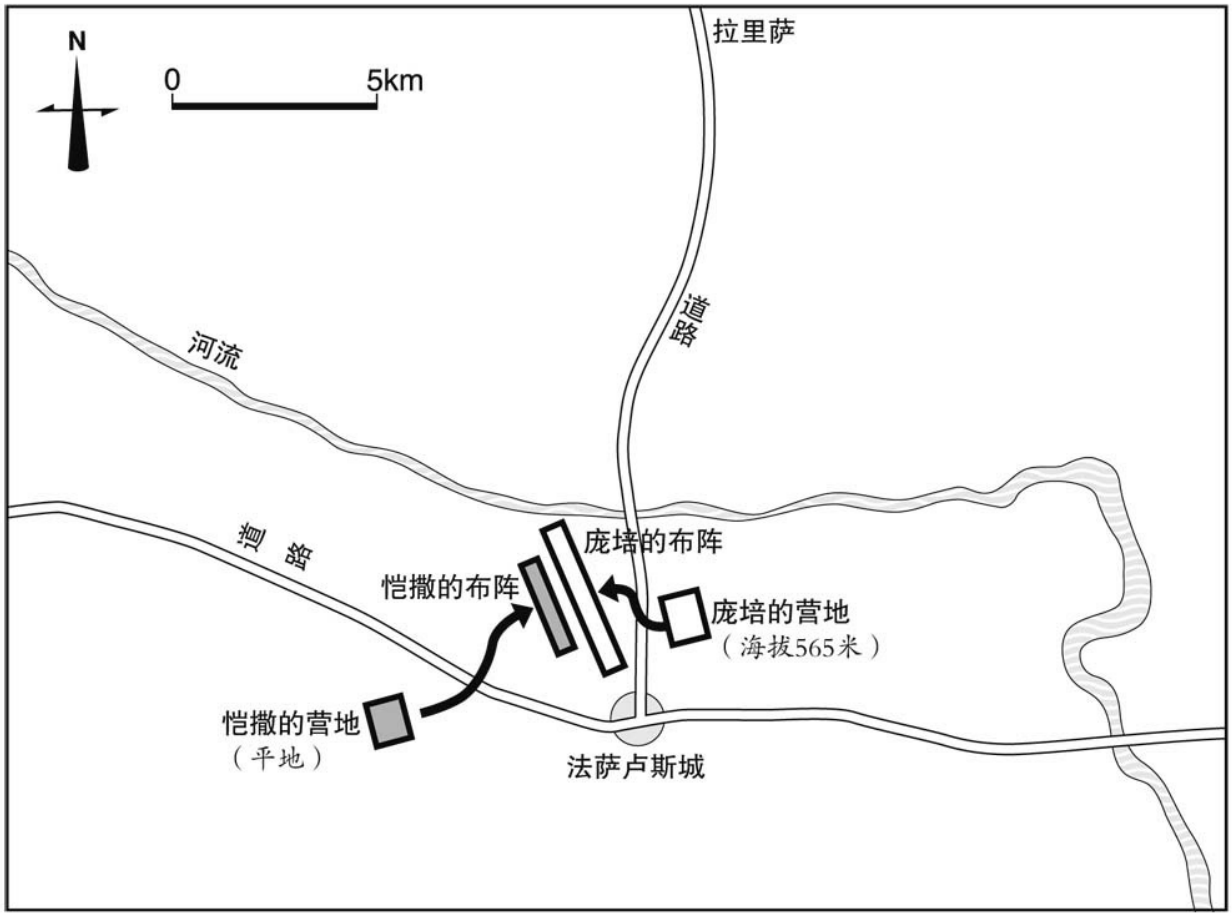
在电影中常出现一种情节，战争中两方军队在刚刚接近时，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样的场景当然是因为放映时间有限，所以必须将画面的时间缩短。现实中的战争岂有如此简单。仅仅是布阵这一项，通常都要两三个小时。而且布阵之后，两军可能会处于长久对峙的状态。

按照惯例，罗马军在夜里会回营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再回到战场，日夜如此往复。这样，是因为总司令在寻求战机，同时总司令也可以读到敌方的信息，得到机会。



恺撒

庞培



法萨卢斯平原略图

为了一扫在都拉斯包围战中吃了败仗的低落气氛，庞培军在法萨卢斯平原安营扎寨的第二天，恺撒就让自己的军队在阵前摆开战斗阵势。在第一天，他们在离敌军5公里的地方布阵；第二天，阵地比第一天稍微往前移动了一点，最后移动到庞培军的阵营所在高地的正下方。这样一来，军中的士兵们在近距离见到敌兵时，就会对敌人习惯。同时，这样也方便自己观察敌人的阵型。

如此这般，恺撒读懂了庞培心中所想。恺撒曾在《高卢战记》中写道："只知根据教科书的办法来作战的人，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他大概是指在这场战役中，庞培就是根据教科书来作出的部署。在步兵未动之前由骑兵从背后包抄，然后全歼敌人的战法，说起来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 3"的做法。但是，使用这个战术，必须要拥有绝

对优势的骑兵。与恺撒的1000名骑兵比较起来，庞培有7000名骑兵可用，因此这个战法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恺撒手中的骑兵兵力只有对方的七分之一，他是不能像庞培一样完全按照“教科书”来部署的。这就意味着，恺撒必须做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以及西庇阿没有做过的事，想出新的战术。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获胜。

然而恺撒也不是处于完全劣势。虽然步兵在数量上远远不如，但是恺撒的步兵贵在“质量”值得信赖。庞培有4.7万名步兵，恺撒的步兵数量只有他的一半。但是，恺撒这2.2万名的步兵主力，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团，他们是在恺撒的指挥下经受过高卢战役洗礼的，都是个顶个的战场老手。恺撒打算将这支作为主力的重装步兵打造得更具机动性。也就是说，当敌人的骑兵按照“教科书”绕到其背后进行攻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他们能够一直支撑着威胁敌人两侧和正面的步兵，并且从三个方向进攻，进行包围战。由于不能使用骑兵进行包围的战术，因此恺撒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因为虽为步兵，那些士兵们也有丰富的运动战经验，足以承担这样的任务。

剩下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敌人都拥有7倍于己的骑兵攻击力，而且他们还是平原作战，骑兵的机动性可以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何与之对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7000对1000，如果从正面对抗的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恺撒认为，仅凭1000名骑兵的实力，想实现三位前辈所示范的绕到敌人背后进行扰乱的战法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首先放弃了这个想法。这1000名骑兵只能作为与敌人7000名骑兵周旋的手段。如果正面对抗的话，是必输无疑的。于是恺撒考虑将自己手上的马匹作为“秘密武器”使用。这是一场没办法补充骑兵兵员的战斗，恺撒唯有在手头现有的资源上打主意。他花费了几天时间反复布阵，对这个“秘密武器”也进行了战

斗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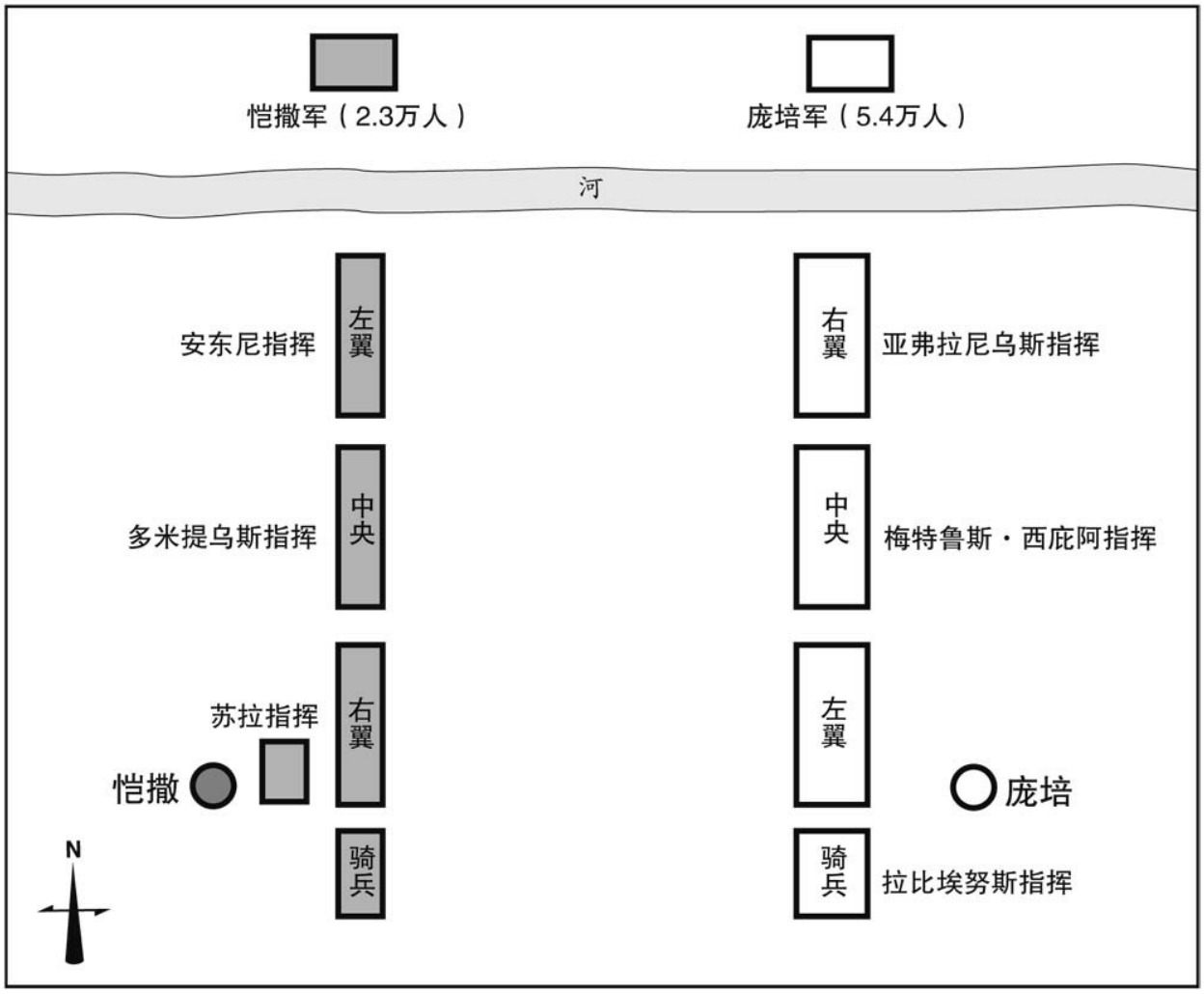
河流在恺撒军阵型的左手边，具体兵力部署如下：

左翼——第八、第九军团担当主力，由安东尼指挥。

中央——第十一军团担当主力，由多米提乌斯指挥。

右翼——第十军团、第十二军团担当主力，由苏拉指挥。

最右翼——骑兵。



两军阵型略图

总指挥是恺撒，他的位置和庞培遥相呼应，坐镇于右翼的背后。但是恺撒不是扎营在高地上，而是骑在马上。

在反复演练布阵的同时，恺撒也在注意不让敌人察觉到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的第一目的是谋杀敌人骑兵的机动性，因此，有以下两件事必须完成：

第一个秘密武器是骑兵。恺撒将平时的守护队旗的轻装步兵共400人从日常任务中调离，这些身手矫健的士兵被添加进1000名骑兵之中，组成步骑混合队。他们都是年轻人，又都是轻武装，因此行动迅捷，既可以在骑兵身后和骑兵共乘一匹马，也可以突然从马上跃下。通常状态下，他们和骑兵一起行动；在战斗时他们跃身下马，以其敏捷的身手和惊人的体力所展示出来的战斗力也颇为惊人。当然，也这是在反复布阵时不断演习积累经验才迸发出来的战法。

第二个秘密武器，恺撒不想让敌方预先知道，因此没有进行预先演习，希望直到最后真正的战役中才拿出来。之所以觉得这样可行，是因为这个和“秘密武器一”不同，执行“秘密武器二”任务的，都是军中百里挑一的精英。

重装步兵的军队布阵，恺撒是忠实于罗马军传统的，以左翼、中央、右翼组成三列的横队组成。从前列开始分别是“哈斯塔里”、“普林奇佩丝”和“陀利亚里”。所谓的哈斯塔里就是年轻人，普林奇佩丝是中坚力量，而陀利亚里则是老兵队列。这样的阵型属于寻常配备。不过，罗马军的服役时间是从17岁到45岁。一般老兵也就是40岁出头。法萨卢斯平原上的恺撒军中的“老兵”，指的则是从公元前58年高卢战役第一年就跟随他、在他的指挥下战斗了10年之久的士兵。

恺撒把军中左翼、中央、右翼全部的从陀利亚里中挑出来的精兵聚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特别军团。

选出这个精兵军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既是步兵，所以在敌人的7000名骑兵猛攻时，这些步兵要张开双臂站在他们面前担任阻挡的任务。他们必须在骑兵的面前一动不动，没有极大的勇气是无法做到的。年轻士兵们虽然有勇气也有斗志，但说到战斗经验和临敌勇气胆魄的话，在这样的战斗面前他们是否能做到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由于那些士兵是老手，所以他们也不需要进行特别演习，只需要恺撒一声令下就足够了。恺撒不想让敌人觉察到这个特别军团配备了2000名精兵，于是将他们安置在右翼的背后，也就是自己的近前。

这两个“秘密武器”，能达成灭掉敌人7000名骑兵的机动性这个目标吗？恺撒对此毫不怀疑。

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一个小插曲，恺撒在少年时期，曾经以两手放在头后交叉的姿势骑乘裸马。之后的恺撒，曾经骑马和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努米底亚骑兵或日耳曼骑兵拔刀交战，这一点士兵们都是有口皆碑的。这足以证明恺撒对马这种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

如果熟悉马的习性的话，应该知道马这样的动物，就算有只兔子挡在面前它也会停步站立的。换言之，马是那种本能地讨厌用脚踢东西的动物。正是因为连兔子站在面前也会立刻停步站立的习性，使得像我这样没注意到这一点的笨拙骑手，总因为马匹突然止步而一个跟斗落马。因此，要求骑手有一定的骑术，马是那种如果不给予一定助跑距离的话，就没办法跳过障碍物的动物。总之，要战马发挥出机动性和冲击力，一定程度的距离或者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只要将这个距离控制在敌人骑兵无法施展的范围之内，那么消灭敌人骑兵的机动性的突击力就不再是梦了。一旦此举得手，那么庞培方的7000名骑兵反而成了对恺撒有利的武器。

如果有7000名骑兵，他们全体都需要一定的助跑距离或者空间，那

么这就需要相当广阔的地带。恺撒要做的，只是不给他们制造这个广阔的空间就可以了。面对敌人7000名骑兵的猛攻，他首先让一个由10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组成的团假装抵抗同时闪开，让7000名骑兵认为由此可以轻易地绕行到恺撒军的背后。然而就在此刻，恺撒突然安排2000名精兵站立挡住骑兵的攻势。与此同时，恺撒的10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也到达了骑兵的身后。这样，就将敌人的7000名骑兵迫入了“栅栏”中。简言之，也就是把庞培的7000名骑兵赶入恺撒1000名骑兵和长枪在手的2400名步兵所构筑成的“栅栏”中。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7000名骑兵面前展臂站立的2000名老兵，无论事态如何，不管可能遭受怎样的践踏，他们都不能后退一步。恺撒在发出了作战指示后对他们说：“成败在此一举，你们的勇气将决定此役的胜负！”

只要能将敌人的核心战斗力瓦解，就能战无不胜。法萨卢斯会战中的恺撒，正在尝试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都没有用过的战术。但是，率领敌人主力部队的正是熟知他战术手段的拉比埃努斯。因此，他必须运用连拉比埃努斯都想象不到的战术，才能成功将庞培的核心战斗力瓦解。

庞培军的营地构筑在一个较高的山丘上。从他的营地到下面的平原之间，是一片开阔而不太陡峭的坡路。恺撒在反复操练布阵的同时，庞培也将自己的军队拉到小坡度的开阔山脊上，而不是平原上进行布阵。这样的局势令恺撒不能开战。这样由低处向高处进攻，己方将损失惨重。到目前为止，庞培方还是高枕无忧的，而且战争越往持久化方向发展，形势就将越不利于恺撒。在完成了战斗准备之后，恺撒却一直找不到有利的战机。

于是，他再度尝试诱敌作战。拔营出发的军号吹响后，恺撒军有意识地让满载物资的运输车队横穿平原，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路过。

另一方面，庞培的阵营内也早已充满了打决战的气氛。庞培对己方的胜利是毫不怀疑的。拉比埃努斯也说，恺撒的老兵们在漫长的高卢战役中精英尽失，活着的人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为惧。他以这样的说辞鼓励着自己的士兵。此外，在恺撒军的诱敌刺激下，洋溢着胜利气氛的庞培军开始从营地中出来活动。他们的布阵位置也已经比前几天更远离了营地的栅栏。这一切都被恺撒看在眼里。终于，恺撒在知道己方已离开不利的战斗地形后，立刻命令军队停止行动，将所有非战斗物品统统都放下，所有士兵全副武装整队集合。他对士兵们说："诱敌活动已经结束了，现在你们的心里应该只想着战斗。我们所有人期盼已久、等待已久的胜利，就在眼前了。我军的准备是无懈可击的！今日之战机稍纵即逝，再也不会有第二次！"

紧接着，他下令展开战斗阵型。

从士兵们进入战斗的态势和他们的行动表现，可以衡量出他们的士气。恺撒见到自己士兵的士气已经达到了顶峰。在布阵结束后，他骑马趋至全军阵前，简明扼要地完成了罗马军队永恒不变的战前演说。在简短的演说中，他只强调了一点，那就是：

自己始终在为避免没必要的流血而不懈努力，也数度尝试过和庞培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对此努力，全体将士有目共睹，可作明证。

演讲结束之后，恺撒命人高高举起了象征战斗开始的红色旗帜。在返回总司令位置的途中，他走过作为右翼主力军的第十军团的附近，听到百人队队长库拉斯提努斯在激励所属的士兵们："是我指挥下的部队里的士兵的话，只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足够了。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为总司令所宣的誓言。今日一战，是决定一切的一战。此战胜出，恺撒的荣誉将获得恢复，我们也可以荣归故里。"

知道恺撒拉住马正在听，百人队队长又面朝总司令大声高叫道："将军，请你亲睹我们今日之表现。不论是生是死，相信您都一定

会对我们心存感激。”

如此这般的一番话后，库拉斯提努斯率先跨出队列冲向敌军。他率领下的120名士兵也立即紧跟在他身后冲锋而出。法萨卢斯会战中恺撒方的战火首先燃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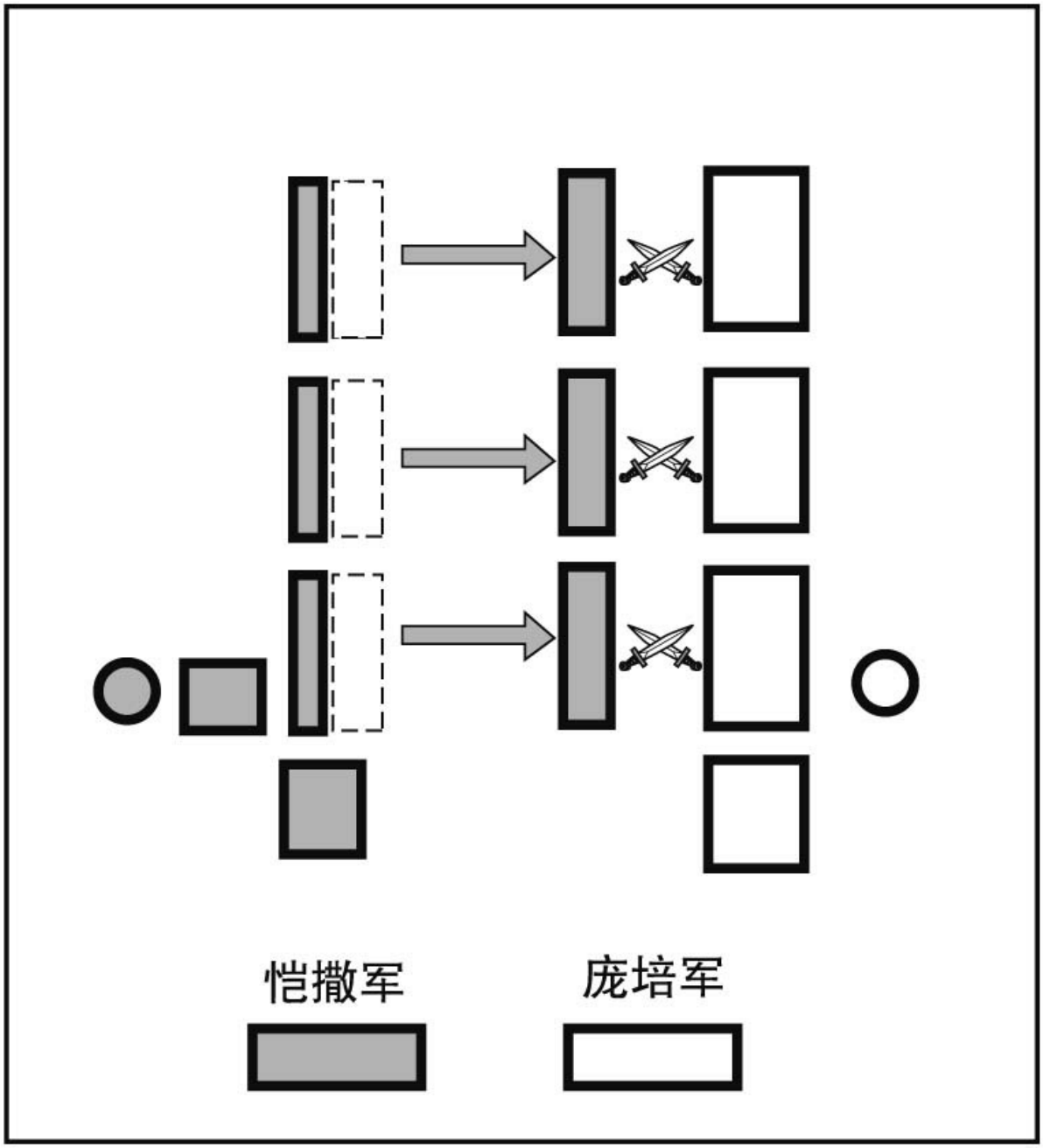
公元前48年8月9日

两军之间，还隔着一段足够双方军队奔走激战的距离。此时发起攻势的只有恺撒的军队，而庞培禁止己方军队有所行动。庞培考虑让恺撒方的步兵持械奔袭两倍的距离，等他们到了庞培军面前时，应该会有些疲劳和困乏。那时再进行迎击，应该是对己方最有利的。不过，这个战略对早已身经百战的恺撒精英们来说并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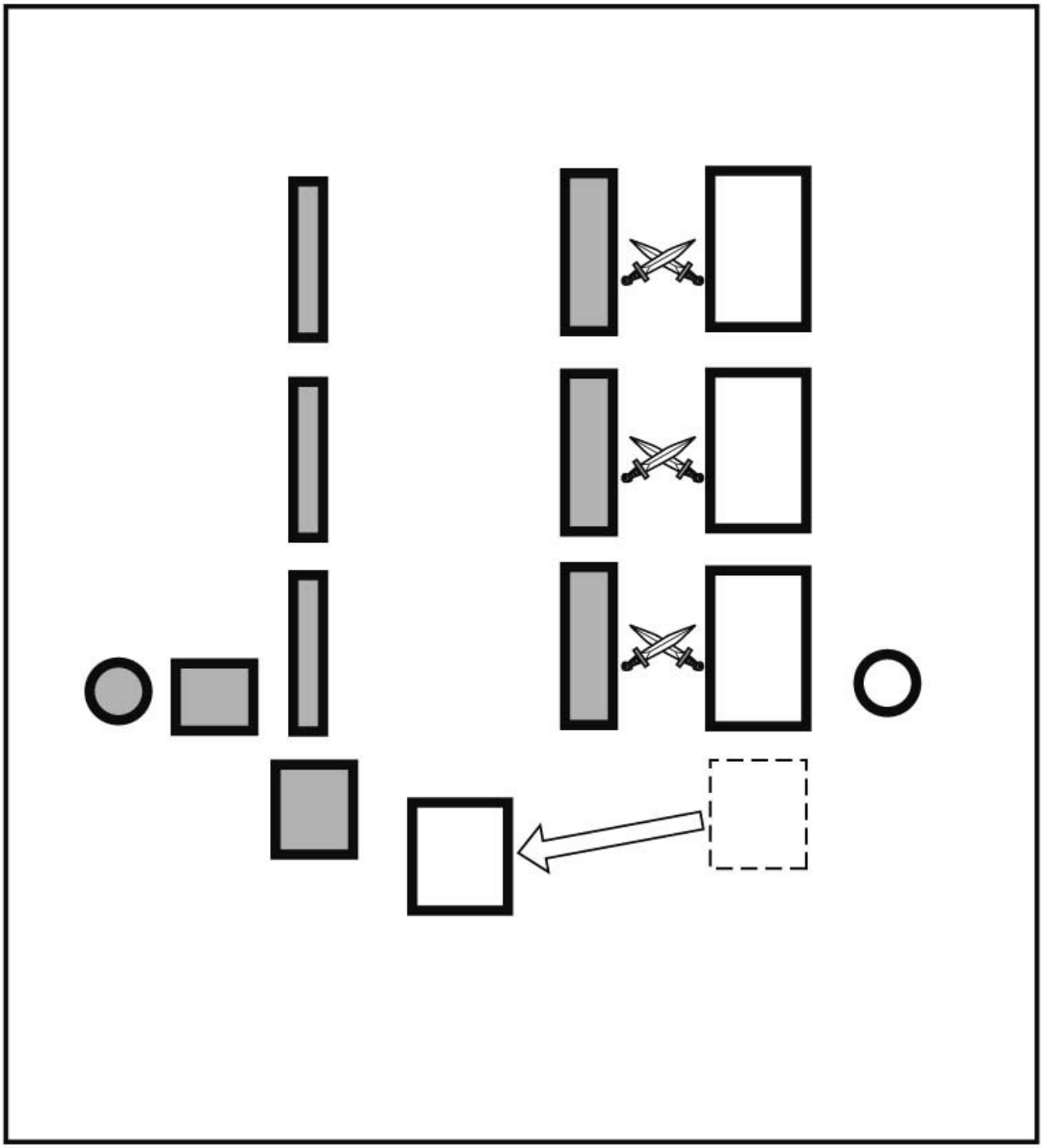
恺撒在《内战记》中也记录了这个场面：

> 根据我的推测，庞培应该是没有考虑到将士们自然高涨的战斗欲望和情感冲动，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战术。身为指挥官是不应该压制这种冲动的；相反，他应该进行鼓励。一旦战争开始，军号齐鸣，全战线充斥着雄壮高昂的呐喊声，这个自古就有的习惯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在震慑敌人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士兵充满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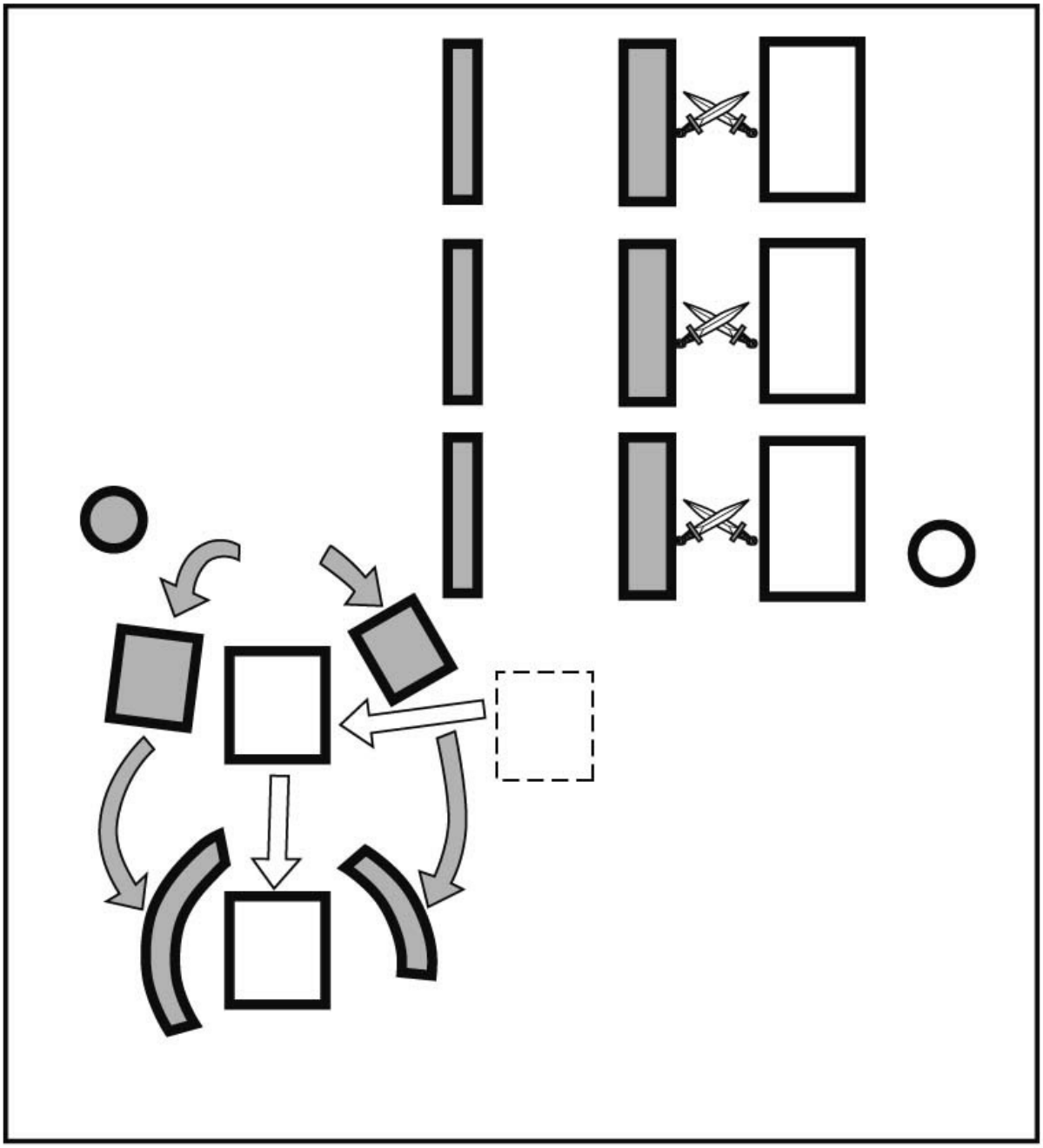
庞培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计算好了，敌兵因为长距离奔袭而疲劳的时候，本来排成一线的阵型一定会溃散。那时己方士兵再以整齐的阵型，迎击阵型已经溃散的恺撒军队，击败他们便变得轻而易举。但是，这次的对手是恺撒的士兵，他这招失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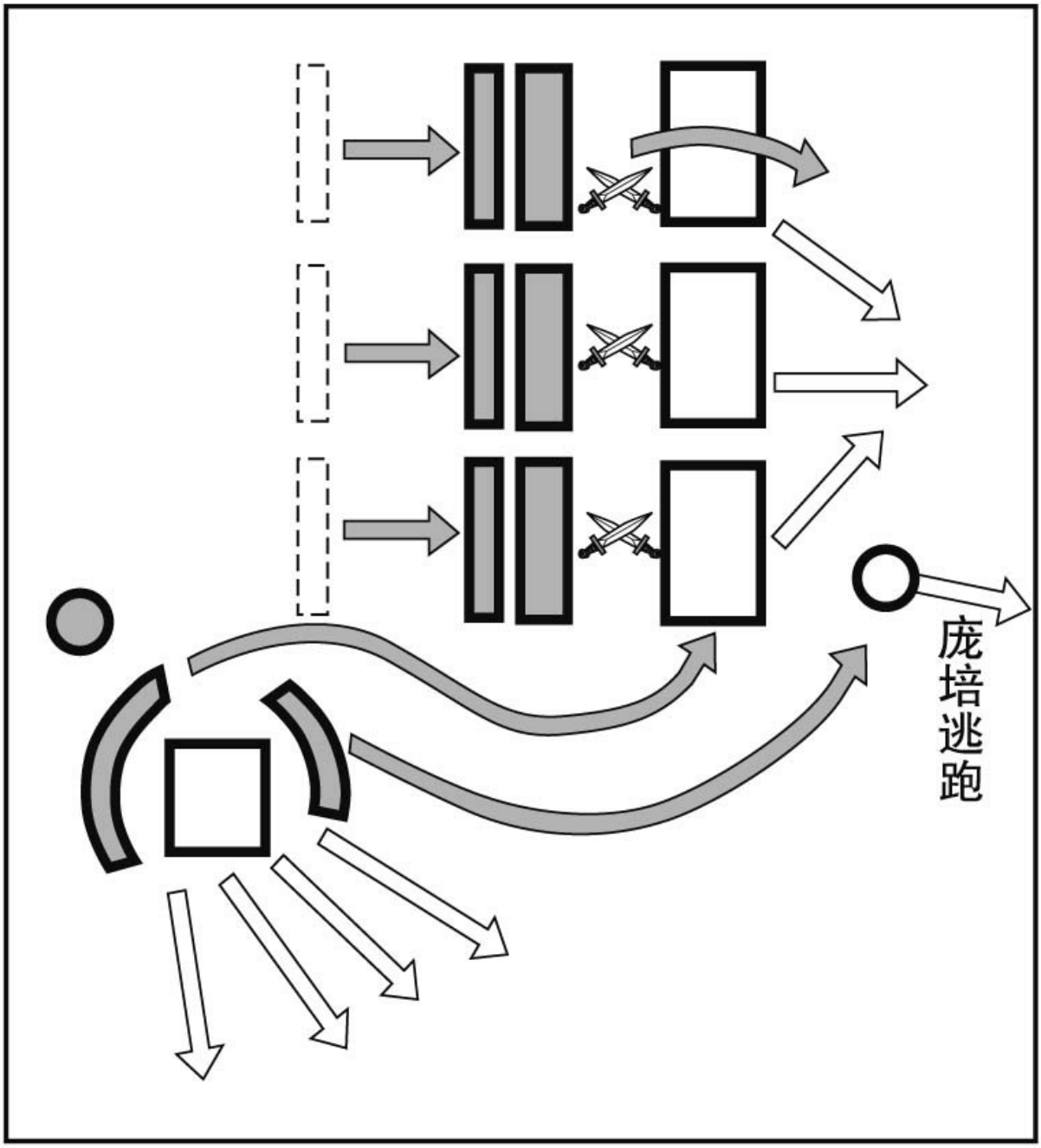
会战的第一阶段（恺撒军3/4突袭）



会战的第二阶段（庞培命令骑兵出击）



会战的第三阶段（恺撒的“秘密武器”出动）



会战的最后阶段

战斗之初，左右翼及中央的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军团的精英作为先头部队出征。飞奔到两军相隔距离的一半时，他们警醒地注意到庞培军队依旧岿然未动。凭借多年征战的经验，他们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突然停止了。他们停下奔跑的脚步，调整呼吸，整

理队列，之后再持枪，再开始突击。因此当他们到达敌人面前的时候，气息不乱、阵型不乱，重新成为了一条直线。不论是左翼、中央，还是右翼，都以整齐的阵型对敌军实行了突击。

虽然如此，庞培军还是抵挡住了这次进攻。毕竟仅从人数上来看，他拥有3倍于敌的兵力。数量庞大的庞培军阵型也没有溃散，他们全线压上应战。见此情形，庞培命令最左翼的7000名骑兵发动总攻。攻击开始的同时，轻装步兵们开始漫天射箭，以掩护骑兵的攻势。

恺撒军的1000名骑兵看到拉比埃努斯率领的7000名骑兵迎面而来，装出惊恐的样子迅速避退。这样使敌军7000名骑兵的气焰更加嚣张。恺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时，他才给一直处于隐藏状态的2000名精英发出行动指令。同时，那些装做害怕逃走的10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组成的特殊大队从背后杀到。把庞培骑兵赶入蓄谋已久的“栅栏”的战斗开始了。

负责掩护骑兵的庞培方箭手们首先被击退。接着，庞培的7000名骑兵当中没有任何一骑可以轻易地从恺撒精英组成的“栅栏”中突围。恺撒的“栅栏”兵手持长枪，逐渐缩小包围圈。

但是这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栅栏”。最终，这10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还是没有将庞培的7000名骑兵全部围困住。由于战场所处的地带所限，再往南走就是开阔的平原地带了，从“栅栏”中逃脱的骑兵们三三两两地朝平原逃去，恺撒士兵也无法进行追击。

即使这样，恺撒也避免了被7000名骑兵绕到背后、使全军陷入包围的困境。此外，即使骑兵的机动性是卓然超群的，但是如果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进攻，也是无法发挥战斗力的。恺撒在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就已经成功地将敌人的核心战斗力瓦解。

战况很快就传入庞培耳中，他即刻勒马飞奔回营地。

另一方，恺撒早已命令成功瓦解对方骑兵的1000名骑兵和400名年轻的步兵，以及2000名精英将士开始从侧面进攻敌人的左翼。

敌人的左翼此时和己方军队的右翼厮杀正酣。因此，这次进攻和庞培军左翼的正面攻击相加，让庞培军队陷入了正面、左面和背后三面受敌的困境。即使是庞培军中在恺撒身边战斗了四年之久的那两个军团，也抵挡不了这样的进攻。

还好，庞培军的中央和右翼仍然保持了不溃散的队形坚持战斗。他们认为恺撒再无实力绕到背后进行夹击，但实际上恺撒仍然具有这个实力。

恺撒忠实于罗马军队的传统，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哈斯塔里、普林奇佩丝和陀利亚里三梯队阵型。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恺撒将前面两梯队的士兵全都投入战斗，而第三梯队的陀利亚里还没有出动。

这些老兵们直到现在才接到出击的命令。迎击数量3倍于己之敌的前两个梯队，此时被命令后退，换下来进行休息和整顿。取而代之的第三梯队士兵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以疲劳度为零的状态投入了战斗。

庞培军的士兵们已经非常疲惫了，而正当他们疲累交加之时，恺撒的老兵们气势汹汹地杀到。他们手持的铁枪映着太阳，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不仅如此，刚刚调整好气息、擦干了剑上血迹的恺撒第一、第二梯队的士兵们，已经等不及恺撒的命令，燃烧着士气从两侧和背后再度杀到。

庞培军的左、中、右三军全盘崩溃，再无一人能保持战斗的姿态。

希腊仲夏的太阳，无情地照在战场内堆得山高的尸体上。

完败的士兵根本连守卫大本营都忘记了，大多数人朝着河边的高地逃去——那里是和大本营相反的方向。

恺撒虽然知道部下们已经很疲惫了，但是这个时候必须下定决心追击到底。他们开始向敌军的大本营发起进攻。

恺撒军喊杀的声音之大，连身处总司令帷幕中的庞培都听到了。这位昨天还在夸下海口的将军，此时已经到了必须舍弃营地的地步了。他快马加鞭、一路不停地逃往拉里萨，仅有几名骑兵跟随。

恺撒进入主帅逃走后的敌方阵营，他眼里所看到的，都是为了迎接胜利的人所准备的各种最好的帷帐，地位高的人的帷帐以常青藤的叶子作为装饰，在地上铺以绿草，在餐桌上排列好银制的器皿。这些东西除了展示庞培方的物资丰富之外，还表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今天会如此惨败。

恺撒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战争还没有结束，禁止士兵们劫掠敌人逃走时放弃的物品。紧接着，他命人紧追从营地后面脱身北逃的庞培。

但是，根据追击队传回的消息，庞培并没有在拉里萨停留，而是向东直奔50公里远的海边而去。跟随庞培从拉里萨逃遁的30人中，有梅特鲁斯·西庇阿，也有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

在收到这个报告之前，恺撒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敌人的残留兵力了。逃走的敌兵大多渡过河后朝最近的高地逃去。如果不尽早采取对策，他们就有逃到防守坚固的拉里萨的可能。这样一来恺撒就有点危险了。

恺撒将自己的军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驻守自己的大本营，另一部分驻守已经攻克的庞培大本营，他亲自率领最后一部分共四个军团渡河向敌人逃走的高地方向追击。

士兵们从早上激战至今，已经十分疲惫了。尽管黑夜即将降临，恺

撒仍然命令士兵们在高地和河流之间挖掘壕沟，让逃窜在高地之上的敌军欲靠近河流而不可得。壕沟完成之后，他又寸步不离地在一边激励士兵们。他用以激励士兵的说法是，之所以要将水源切断，就是为了不必流血就降服敌军。

工事完成之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清晨的初日将周围的一切罩入白光之中。马上，敌兵们因为水源被切断而陷入绝望，从高地上派下使节，表示愿意投降。

面对着在自己面前并排而立的庞培的残兵败将，恺撒首先命他们放下武器。俘虏的总数是2.4万人。其中有人痛哭着伏于恺撒脚边，乞求恺撒饶其一命。

恺撒让这些人站起身来。为了消除俘虏们的恐惧，他针对自己的战争行为和宽容的精神作了一番小小的演说。接着，他给予了所有人去留自由的权利。他不仅告诉众人，他将给予他们自由，还命令己方士兵不得对降兵施以危害，也不可掠夺这些人所带的物品。接着，他命令彻夜挖壕沟的四个军团的士兵回到阵地休息，而自己则率领原本守卫大本营的、已得到充分休息的四个军团前去追击庞培。然而庞培已经乘上运输小麦的船，出海往东方逃去了。无奈的恺撒只好暂时返回法萨卢斯平原。他必须确立战后的善后政策，并给予士兵们相应的指示。

“法萨卢斯会战”是历史上有名的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对决，其结果是战败的庞培方战死人数达到6000人，俘虏人数达到2.4万人。在被释放的俘虏中，有恺撒的情人塞维利娅强烈拜托他照顾的儿子，37岁的马库斯·布鲁图。恺撒下令所有的士兵不得杀害布鲁图，并让他们在俘虏中找到他之后，马上向恺撒报告。马库斯·布鲁图和其他俘虏一起被释放了。虽然恺撒没有强求，但他还是和那些没有跟随庞培的高级官员一起逃走的其他士兵一样，作出了向恺撒表示效忠的选择。

恺撒这边的伤亡状况，阵亡者为200人，其中有30人是百人队队

长。这30人，就是开战前对恺撒说“不管是生还是死，一定要打一场让恺撒不得不感谢自己的战斗”的精锐老兵，库拉斯提努斯也身在其中。这名百人队队长，是被敌人在面门上用剑直击致死的。

摆在恺撒面前的，是庞培军队的9面军团旗，加上大队旗和中队旗，总共有180面旗。庞培军队总共有11个军团，11个军团旗中已经有9面落在了恺撒的手中。作为罗马人，仅仅只凭这个数据，就已经能计算出恺撒此番的战果了。

失败的庞培方的重要人物中，只有阿赫诺巴尔布斯在逃跑过程中被恺撒方的士兵杀死。

其他的重要人士，庞培和梅特鲁斯·西庇阿，以及上年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四个人，都躲在强征来的小麦运输船中逃走了。

西塞罗和小加图，因为被命令留守都拉斯，并没有参加法萨卢斯会战。

在亚得里亚海指挥海军的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也没有参加法萨卢斯会战。

指挥右翼的亚弗拉尼乌斯，以及跟随他的在西班牙与恺撒交手有败阵经历的佩托雷乌斯和瓦罗，还有比任何人在军事能力上都更得到庞培认可的因此在庞培军中担任作为主战斗力的7000名骑兵指挥的拉比埃努斯。以上4个人，在那场大溃败中成功地逃到了都拉斯。身为指挥官的他们，都是骑马逃离战场的。

但是，逃到都拉斯的这4个人，以及留守的西塞罗、小加图和其他庞培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一致认为，虽然都拉斯位于海峡的尖端，防卫也很坚固，但是毕竟还有一端和大陆相连，在这里不容易继续抵抗下去，于是，全体人又舍弃了都拉斯，转移到没有海军的恺撒不容易攻击的克

基拉。

在克基拉岛上，除了逃往东方的庞培等人外，这些重要人士加上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一起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的结果是，大家又一致认为克基拉不够安全。因为从意大利南部到岛上只需要两天的海路时间，乘着法萨卢斯会战胜利的势头，恺撒军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意大利组建船队，渡海前来。

于是，趁着现在庞培方还拥有强大的海军，大家决定逃往有利于海军作战的北非。北非的行省拥有消灭恺撒派将领库里奥4个军团的硕硕战果。他们决定在那里等待庞培，集齐士兵卷土重来。

但是，也有不赞成这个方案的人说，法萨卢斯会战失败不仅仅是战争上的失败，而是完全地败给了恺撒。因此，他以后想从政治生活中引退。

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强硬的反恺撒派马库斯·马尔凯鲁斯说，他决定前往希腊的一个小岛，在那里度过余生，从此告别罗马的政治舞台。

作为庞培的军团长之一，瓦罗在西班牙战争中和恺撒对决，被俘虏后又被恺撒释放，在那之后选择回到庞培身边。这一次他彻底地放弃庞培了。这个与其说来是个武将，更像个文人的人，决定回到意大利重新开始过他的学者研究生活。

众人之中，西塞罗也决定不去北非，他也说想回到意大利，专心从事文学生活，于是出现了他被格涅乌斯·庞培痛骂是背叛者的一幕。瓦罗和西塞罗不像马尔凯鲁斯那样要亡命异乡，而是决定回到罗马，也是因为他们俩跟恺撒还有学术和文艺上亲近而互相欣赏这一层关系。两个人认为恺撒应该不会计较自己跟随庞培这件事。实际上，恺撒也根据瓦

罗自己的意愿，任命他担任了罗马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和伊苏斯会战、坎尼会战、扎马会战相比，法萨卢斯会战战败方的死亡人数非常少。不仅是绝对数量上的人数少，而且这也是唯一一次俘虏的人数大于战死人数的战役。而且，和总数为4.7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共计5.4万的总人数相比，这场战争除去战死6000人以及俘虏2.4万人以外，还有2.4万人逃走。这个逃兵的人数，也是四大会战中最高的。那么这样是否说明作为武将，恺撒的能力比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及西庇阿他们更差呢？

首先，这2.4万人的逃兵，虽说是庞培的军队，但实际上仅仅是和庞培有着clientes关系而已，从东方诸城邦前来的援兵也加在里面。这些士兵中有的是君侯亲自指挥，有的是君侯属下率领的。在法萨卢斯会战大崩溃之后，他们既没有跟随庞培逃走，也没有跟随那些逃回都拉斯庞培派的罗马人一起，而是都尽可能地各自向各自的祖国逃去。对恺撒来说，这些也是罗马世界构成要素的诸盟国的士兵，既没有必要对之赶尽杀绝，也没有下令追击。因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人都是现场目击者。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后，必会广为传播法萨卢斯会战的结果。此外，如果对他们进行追击，这些人回到国内后，说不定会与从前一样，继续站在庞培的clientes的立场上。

此外，法萨卢斯会战，俘虏人数超过战死人数的4倍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不言自明。之前三次著名战役的三位名将，都是和国家的敌人进行战斗；而恺撒这次，却是以同胞为对手进行战斗。正因如此，他才给予全体2.4万名俘虏以自由，也没有强迫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

恺撒和同胞进行的内战，并不是只要战胜就万事大吉。如果只是求得战争胜利，那么恺撒就和苏拉无异了。恺撒并不愿意重蹈苏拉的覆辙，而且他不仅不愿意那样做，更加相信那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但是，这个法萨卢斯会战并不像伊苏斯会战、坎尼会战或者扎马会

战那样，成为传颂至今的陆军大学教材中包围歼灭战的典型案例。它没有获得这样的荣誉——也许现在仍有教师在讲授这次战役，但是并没有成为固定的讲授内容。

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三次的著名会战，都是开创了固定的战争“模式”，通过特有的模式获得战争胜利。而恺撒的这次战役，不过是因为“巧合”而获得了胜利。

“模式”必须是指不管是谁都可以沿袭，并且都能取得相似效果的。而由于指挥者的才能的影响，在特定的场合才可能适用的战例，是不能成为教材范例的。

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都已经在西点军校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果是恺撒，也许会说：“首先让我看看敌人和战场，在那之后我才能考虑能赢的战术。”

伴随这样的胜利，肯定能获得非凡的愉悦。但是这样创造不出可以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稳妥获胜“模式”。

恺撒从本质上就和之前的三位名将不一样。比起军事来，他更多思考的是“政治”。对他来说，军事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事实上，研究战争史的专家们一直为如何从战史上对他评价而头痛不已。

顺带说说，由亚历山大大帝创立的、由汉尼拔加以拓展的、由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加以证明其有效性的、通过发挥骑兵的机动性进行包围歼灭的战术，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持续展示着它的有效性。骑兵后来虽然为战车所代替，但是这个战术的普遍有效性仍然在延续。在最近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将过去的骑兵的位置和责任改由战车来执行，以及后来用直升机部队来继承，都是与这个战术一脉相承的。

无论是被称为巧合还是奇谋，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虽然释放了全体的俘虏，但仍然让庞培派大多数重要人士逃走了，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恺撒心中担心的，只有这个武将庞培一人而已吗？可以知道，即使只算是在士兵们面前喊的口号，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些话。

在前往西班牙对阵由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率领的7个军团之际，他说过“攻打无将之师”，后来终于到了和庞培对决前向希腊进发的时候，他也高声说：“攻打无将之师。”

这个庞培最终还是逃走了。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获胜后并没有回到罗马，而是决定亲自率军追击庞培。

“为了防止逃跑的庞培在逃亡地再编组兵力，从而阻止让内战延续的事态。”他自己在书里是这么写的。但是，恺撒一边亲自率兵出击，一边必须把战场善后的对策仔细交代给部下。对恺撒而言，他和庞培的对决还没有结束。

法萨卢斯会战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48年8月9日，根据恺撒改革后的历法，也就是从实际上的季节来看，应该是6月29日。因此，此时正是最适合进行追击的时间，因为时间很充分。根据现行的日历来决定执政官的任期的话，作为执政官的恺撒的任期，再不到5个月就要结束了。在追击庞培需要多少时间还无法预测的状态下，必须先确立下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7年的对策。这样恺撒才是安全的。

但是，作为公元前48年度执政官的恺撒，如果按照苏拉所改定的法律，那么下一次再出任执政官就需要等上10年，也就无法出任公元前47年的执政官。因此，他必须要对已经有效实行了20多年的“苏拉法”进行改革。但是，恺撒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出新的法律。

这样的话，像公元前52年的庞培那样，当“没有同仁的执政官”，即

只有一个人出任执政官的模式，这条路行得通吗？公元前55年担任执政官职务的庞培，没有经过10年，而仅仅在第二年后又再度出任执政官，是因为当时有处理紧急事态的任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直接出任由国家法律认可的独裁官。但是此不受约束的独裁官体制受到了元老院的反对，所以最后庞培成为了“没有同仁的执政官”。

以打倒元老院主导的现体制为目标的恺撒，并没有必要顾虑元老院的限制或者喜好。此外，因为是同样的紧急事态的对策，他从公元前47年就已经开始出任独裁官了。既然是独裁官的话，只要由两位执政官当中的一位任命就行了。恺撒向留在首都的另一位执政官同仁伊扫里库斯送去一封信，要求在公元前48年12月末任命自己为独裁官。

此外，独裁官还有权任命“副手”，也就是任命骑兵团团长的权力。因此恺撒任命34岁的小安东尼为副手，全权委托他代替因为追击庞培而不在首都的恺撒，有权处理从治理本国到处理回国士兵以及其余事务。这样，恺撒避免政治空白的对策终于实现了。在战场上展示了相当才华的安东尼，今后要展示他的政治才能了。

把恺撒的行动顺序反过来看的话，在法萨卢斯会战结束后，从战后处理到确立第二年的政治对策，直到给了很多指令结束后，准备再开始对庞培进行追击为止，真正也不过就过了几天时间。虽然好像是大战之后的休息期，但是恺撒从没有真正休息过。果然，他还是对庞培放心不下，于是率领了第六军团前往追击。

法萨卢斯会战中的主力，勇猛善战的第八军团、第九军团、第十军团、第十一军团、第十二军团这些精英军团，恺撒命令他们回到意大利休整，养精蓄锐。这些军团的士兵是从公元前58年的高卢战役的第一年就开始跟随他的。与之相比，第六军团是公元前53年才编成的军团，军团士兵的年龄构成基本要年轻5岁左右。虽说是第六军团，但也都是在恺撒的指挥下拥有6年战斗经验的老手了，所以恺撒才决定率领这支可信赖又年轻的士兵进行前途未卜的追击。

追击

恺撒的追击行程走的是陆路，不仅是因为没有船，也是因为恺撒在追击庞培的同时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将庞培在东方诸城邦的clientes收编到自己的麾下。

庞培战败后首先逃到拉里萨，再从那里日夜不停地快马加鞭赶到海岸边，从那里乘坐运送小麦的轮船逃往爱琴海。他对这种普通的船还是不放心，所以暂时在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海港阿姆菲波利斯登陆，那是在8月12日。接着，他在阿姆菲波利斯征用了一艘五层高的大型帆船继续逃亡。但是，虽然离法萨卢斯已经很远，庞培还是得知了恺撒正在接近的消息。于是他再度向海上出发。这次的目的地是先去妻子科尔涅利娅以及小儿子塞克斯图斯避难地莱斯博斯岛。但是，到此为止一直同行的公元前49的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两人则前往罗得岛。他们二人的任务是在罗得岛中心重建庞培的军队。庞培这方在莱斯博斯岛接到妻子后，也决定前往罗得岛。经过罗得岛绕过小亚细亚的罗马行省经过塞浦路斯岛重新开往叙利亚，庞培期待以这样的途径东山再起。但是，比起庞培的前进速度，法萨卢斯会战的结果更早就在这些地方传播开了。

恺撒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在得知了庞培向海上逃走的消息后，他也没有立刻组织船队追击，而是仍旧经由陆路向东进发，到达希腊和小亚细亚中间的达达尼尔海峡。

卡西乌斯是五年前远征帕提亚失败后克拉苏军中唯一幸存的指挥官。他接到庞培命令守卫近海，后来一直在叙利亚行省驻守。但是，庞培派的卡西乌斯也听说了法萨卢斯会战的结果。卡西乌斯带着从庞培那里预支的10艘军用船及士兵，连尝试抵抗都没有尝试，就向恺撒投降了。

当然，恺撒依旧宽恕了所有的人。但是，这个卡西乌斯诱导法萨卢斯会战中同样被宽恕的马库斯·布鲁图，成为了四年后“暗杀恺撒”事件的主谋。

恺撒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地域，继续向南朝小亚细亚西岸行军。此时，以庆祝法萨卢斯会战胜利为由，原本向庞培提供资金、兵员和战船的诸城邦连续不断地派慰劳使节前来对他进行慰问。

恺撒没有因为这些城邦曾经站在庞培那边而对他们进行责罚或者责难，反而将从这些地方征收的间接税减少了一半。庞培曾经对这些地区课以重税。当然，从庞培派们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有政治考量在内的。

被庞培认为是自己地盘的东地中海诸城邦，此时也转变了立场，开始替恺撒鞍前马后地忙碌起来。如此一来，奔向罗得岛的两位执政官甚至连港口都无法靠近。庞培在莱斯博斯岛滞留数日后，向南逃去。他在奇里乞亚和塞浦路斯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曾经是他争霸时行省的一些地方，他也吃了闭门羹，没得到照应。此时，clientes的道义对败者为寇的人来说是一文不值了。

看到这些现状，庞培本来打算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气概顿时烟消云散。

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都无路可逃的庞培，最后还剩下两个选择：

第一是前往北非，与法萨卢斯会战后逃往那里的庞培派重要人士会合。第二就是依靠埃及。这两个选择，不管哪个都是有利有弊。

如果前往北非的话，他的长子格涅乌斯也在那里，亚弗拉尼乌斯、佩托雷乌斯以及拉比埃努斯和小加图都在那里。但是，前往北非的弊端就是，无法忽视和北非行省接壤的努米底亚王国。他能够歼灭库里奥及

其军队，与其说是北非的庞培派的功绩，倒不如说是努米底亚国王的功绩。表面上是同盟国、实际上是附属国的努米底亚，显然凭这一件事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对这个一辈子都被当成罗马第一武将、拥有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尊敬称谓、被称为“伟大的庞培”的庞培，虽说是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败仗，但是要他逃往附属国，看附属国国王的脸色，那是他的自尊所不能允许的。

逃往埃及的话，有利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埃及是由姐弟俩共同统治的，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埃及的先王，是在庞培的鼎力帮助下从一度被驱逐的废王重新复位的。为了稳固王位，庞培给手下的将领盖比尼乌斯配备了一个军团镇守亚历山大港。也就是说，现在统治埃及的王朝，是庞培的“藩属”（被保护者）。其实，早在和恺撒对决前，庞培就对东方诸城邦要求派出援军。为了响应这个要求，埃及两个统治者之一的姐姐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弟弟提供了50艘军船作为援助。响应patronus的要求，是clientes应尽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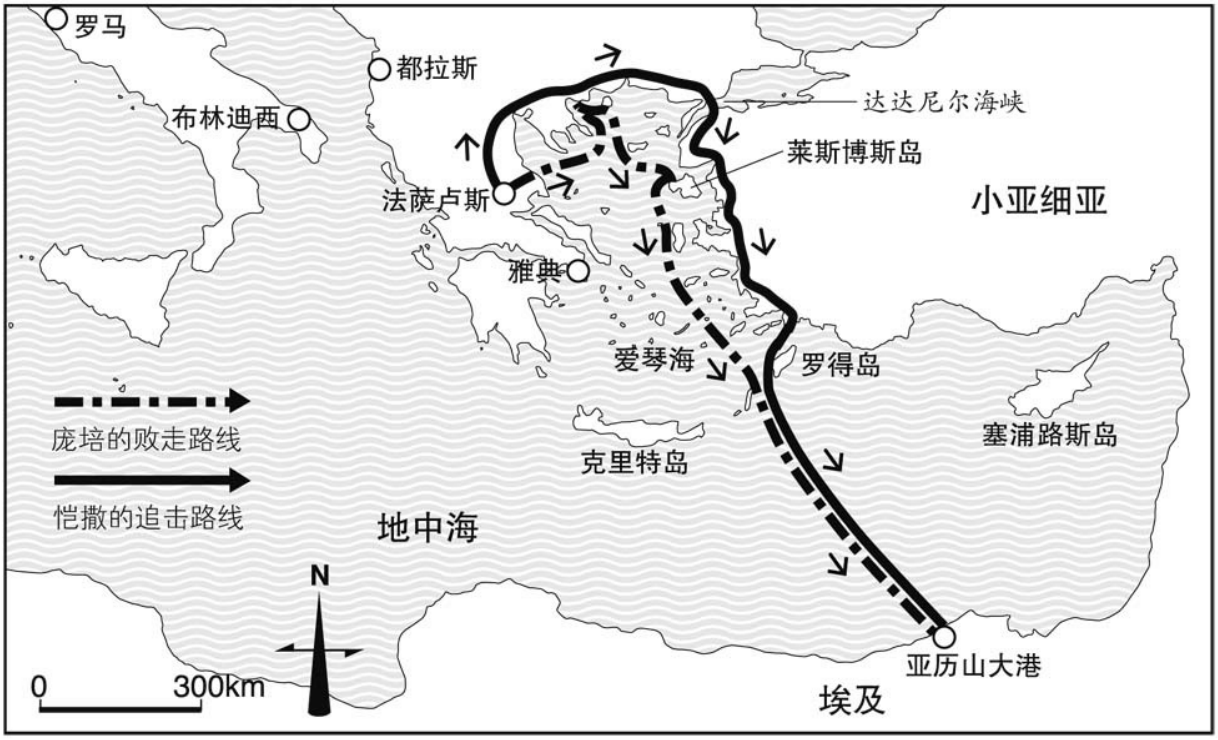
这样的相互扶持关系，应该是父子相传，这是罗马人一直深信不疑的。但是，这种罗马独特的人际关系，如果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也受到尊重的话，那也更多是因为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根本不习惯失败而又因为处处吃闭门羹而意志消沉的庞培，已经失去了直面这种人生现实的勇气。或许，他是在从不知挫折为何物的人生里，变得不知如何面对这世态炎凉吧。如果是恺撒，应该对这种状况了然于心，就像他在书中写的那样：“苦境，可以将朋友变为敌人。”

此外，再加上此时的埃及王朝实在不合适作为流亡地。原本共同统治的姐弟俩，现在变成了敌对的状态。被夺去王位的姐姐克娄巴特拉正在谋划召集士兵们进行夺回王位的计划。埃及处于内战的状态。庞培的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和两位前任执政官全力劝诫庞培逃往北非，但是，庞培最后还是决定前往埃及。

经过爱琴海后，船一直向南航行。数天之后到达小亚细亚南岸的恺

撒也得知庞培走海路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消息。这一次，恺撒也乘船进行追击。他运送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必需的10艘船由本是庞培clientes的罗得岛提供。他们除了是向胜利者示好之外，也是感谢恺撒。在都拉斯包围战开始之前，败给安东尼后被俘虏的罗得岛士兵曾被恺撒释放回国。

目标向南，航行一路顺利。庞培委托快船给埃及的少年国王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要求接受他们一行人作为客人入境。快船带回消息，埃及王室欢迎庞培一行入境。庞培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因而安心下来。无论如何，埃及现在的国王能顺利登上王位，也是有庞培一份功劳的。在埃及两个统治者处于敌对状况时，以庞培作为罗马无出其右的武将之名，在这里的市场应该价值不菲。



庞培失败逃走路线和恺撒的追击路线

这位意志消沉的58岁武将，开始稍微恢复了些元气，开始准备面见

埃及王时候的演说稿了。

但是，虽然在接受庞培入境的亲笔信中很客气地回答说欢迎他的到来，但是这都是辅佐（或者说是实际操纵）少年埃及王的那些亲信的想法。他们言行并不一致。站在他们的立场，这也不难理解。庞培在大决战中失败后，已经在所有东方诸盟国吃了闭门羹。这样一个败逃的人物到了埃及投靠他们，没有比这个更麻烦的事了。

此外还要再提及一点，即庞培以往派来埃及、此后一直定居于此的罗马士兵的心情。他们已经完全被埃及化了。在姐弟的王位争夺战中，他们站在弟弟这边，积极地加入了这场家庭战争之中。这种错误行为在罗马是不会被原谅的。这些罗马人已经不再想回到庞培手下了，当然他们也无意追随新的领袖恺撒。

这两种想法融合在一起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杀之”。但是，当这个策略落实到手段上时，就反映出主谋者们低劣、卑下的品格。

庞培之死

亚历山大港既是埃及的首都，也是东地中海最大的海港城市，拥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完善设施。庞培所乘坐的五层楼高的帆船，原本可以在著名的灯塔后宽阔的内港下锚停靠，但是，由国王的家庭教师和宦官们组成的亲信以15岁埃及王的名义，传达欲出港迎接，所以请庞培在港外等待的意思。他们对毫不怀疑地等待着的庞培说，会有迎接船靠近庞培。

来迎接的船虽有不少船员在划桨，但实际是连“舟”都称不上的小型船。此外，被称为希腊人伦理学教师的阿基拉斯和罗马士兵的塞普提米乌斯也乘船而来。庞培看到在扫荡海盗作战中曾是自己属下百人队队长的塞普提米乌斯，心里安定下来了，也相信了阿基拉斯说的埃及王先在

港内等待、只先请庞培上岸的一番说辞。他也相信他说的，其余的人将有别的船前来迎接。

在阿基拉斯的劝说下，上了小型迎接船的只有庞培、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雷托鲁斯以及少数士兵。

庞培乘着小船，在妻儿和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的注视下，远离了五层楼高的大船。小船在箭支射程的距离外停下来——肯定要离岸边百米以上。但是，这个距离在毫无遮挡的海上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庞培的被控制，塞普提米乌斯的动作，以及庞培被压在小船边被抓住右腕无法行动的样子，都历历映入众人眼中。他的亲族们亲眼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在一片哀号和绝望声中，庞培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跟随庞培上船的几个士兵也被当场杀死，雷托鲁斯被关进了大牢，后来也在那里被杀。载着庞培的小船起锚疾走，在人们的悲鸣声中远去。

这是公元前48年9月28日，距离法萨卢斯会战仅仅过了1个月零20天。4天后，恺撒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亚历山大港。

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的首级，以及象征着他信印的金戒指被送到恺撒的面前。根据后来的史学家们，也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记载，恺撒见此情景，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12年前的公元前60年，当时46岁的庞培和40岁的恺撒两人还是结成“三头政治”的盟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为妻。公元前58年，受身在首都罗马的庞培之托，恺撒出发前往高卢平乱。在出发前，恺撒曾写下遗书，这个遗书的继承人就是成为了他女婿的庞培。

这个庞培，在7年后从恺撒的盟友变成了最强硬的反恺撒派。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盟友变成了敌对双方。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庞培逃离意大利，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后逃到埃及送了性命。这就是年龄只有6岁之差的罗马双雄在最后两年里的命运。冷峻而不冷酷的恺撒，面对曾经的好友因为立场的改变而有了这样的结果，为之伤心流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恺撒对这件事只在书中写下了一行文字：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

这一行字，如小林秀雄所言，是比刻在大理石上的文章更美的古代艺术品。我也与他持同样看法。

但是，恺撒的《内战记》是面向同时代罗马人的作品。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即便是艺术品，那也不是过去的艺术品。读到这一行文字的人，如果是恺撒派的话，自然要高唱凯歌；如果是庞培派的人，则难免要流下伤心的泪水。所以这一行字，在感情上是符合双方的感情需要的。

为庞培最后的结局而惋惜落泪的人，也无法对恺撒恶言相向。为什么这么说？恺撒不仅没有对庞培进行批判，连得知他死讯瞬间的心中感想也一句都没有写下。他所留下的一行文字，既是恺撒自身性格的反映，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如果从既要有所制约，又要能充分表现文章力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如同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一般，是能够传递语言重量感的绝佳例子。

同样是得知庞培死讯后所写的文章，西塞罗的文字就完全不一样。他在给好友阿提库斯写的私人信件中不需要考虑政治上的东西，也是通过文章正面反映了文人的气质：

庞培有那样的最后结果，我其实已经充分地预想过了。法萨卢斯会战后，他处于一个危险的立场之中。这一点在罗马世界里，上

至王侯下至民众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他逃到哪里，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

虽说忍不住要为他的命运感到悲哀，但我所认识的庞培，真是一个不懂得规避、只知道直面世界的男人。

两千年后有位英国学者则是这样评价的：

庞培如若在战场上，是恺撒值得作为对手的唯一一位将领。但是，与都拉斯失败时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恺撒相反，法萨卢斯会战中的庞培是最先一个舍弃战场的战士。

此外，对天才和人才的区别方法是智慧和热情是否能合二为一，而庞培在这一点上尚有欠缺。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这么简短的一行字，是在当时能引起正反两方读后感想的一行字，也是能经得起后世反复诵读的一行字。

有学者认为，不污染自己的双手就除掉了宿敌，对恺撒来说正是最盼望的结局。同意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真实的恺撒是这样想的吗？

如果恺撒能够成功地生擒庞培又当如何呢？他连普通士兵都可以给予自由加以释放，对庞培肯定也会给予自由的。但是得到自由之后的庞培，又要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呢？从这15年来他的生活方式推测，他会不会选择回到阿鲁巴的别墅，带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偶尔招待前来探访的部下，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呢？

这样的话，恺撒就会很麻烦了。庞培不是那种因为有着鲜明的政治信仰，所以决定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体制的元老院派或者“庞培

派”领袖。他是被那些人推举为领袖的。他自己非常渴望过上平静的隐居生活。但是只要拥戴他的人存在，他就有可能经常被推举。对恺撒来说，这样的庞培就会变成永恒不变的危险人物。

那么，恺撒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想以恺撒的一贯作风，可能会向庞培提出“两头政治”的解决方案吧。回想起来，越过卢比孔河后，恺撒这边多次试图与庞培和解，而且恺撒唯一坚持的条件，就是他要通过和庞培进行两人之间的直接会谈来解决。对恺撒来说，自从“三头政治”建立起以来，特别是在经过“卢卡会谈”的“商讨”之后，只要能够和庞培进行商谈，最终的结果都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下去的。恺撒一直都拥有这种自信。在法萨卢斯会战胜利之后这样做就更容易了。恺撒拥有极为强大的自信心，可以将表面上的“两头政治”实际上变成“一头政治”。

而且，让战败者加盟并同化他们，这是罗马人对待失败者的传统做法。很多的事例已经表明，恺撒也是个懂得协调的、现实的罗马人。

此外，如果协调成功了的话，首先喝彩的人一定是西塞罗——即使“两头政治”中有一人只不过是名誉会长，或者说是权力被架空的会长。

这个西塞罗对活着的庞培的评价没有一句好话，即使是在毫无顾虑地写给密友的信中，也是如下的语调：

缺乏智慧。零说服力。体力也已是今非昔比。因沉溺于年轻娇妻而疏于政务。没有自我控制能力。至于意志力，则自始至终都没有过。等等。

西塞罗竟然追随了一个在自己口中形容得如此之糟糕的人，读者对此一定会感到目瞪口呆。但这就是西塞罗对在世时的庞培的评价。

在得知庞培的死讯后，西塞罗立刻停止了这样的评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往往可以让人们忘记对他生前的种种批判，而只会回忆起那人好的一面。这不也正是很多人共同的现实人性吗？

但是一旦庞培担任被架空了权力的会长，而由恺撒担任运营总监的“两头政治”真的实现的话，事态会有所变化吗？

首先最为明确的一点是：逃到北非的强硬反恺撒派们和庞培派人士，想继续反对恺撒就将师出无名。

但是庞培被杀了。庞培的死反而让反恺撒派们更加有了支撑的支柱。此刻的庞培再不是那个生前有着诸多缺点的人，而是成为了死后被人们回忆起更多优点的、偶像化的人物，被尊称为“伟大的庞培”。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对于恺撒写下的这一行文字，我是这么看的：对恺撒来说，这非但不是最后的可以为之安心的终结，反而在为背后更深远的东西而担忧。

不管知道庞培死讯之后的恺撒真正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庞培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个既成的事实面前，恺撒在想到上述所说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想到了两个有利影响：

第一，对恺撒而言，武将当中唯一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以后恺撒真的只需要“攻打无将之师”。在这之后，他长时间地在埃及滞留，既是因为卷入了埃及王室的内部争斗，也是因为那时已经进入到了刮西北风的季节而无法出港，同时也因为被克娄巴特拉的魅力所吸引——抑或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可以看出来，一直处于绷弦般紧张情绪的恺撒，此时顿时得到了缓解。

有利点之二是，事实证明，在庞培死后，残留下来的反恺撒派们也不可能再推戴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出来了。能够代替“伟大的庞培”的人，

元老院派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的两个儿子，仅仅是继承了庞培的血脉而已。小加图虽然是个有威慑力的人物，却缺乏声望。而西塞罗虽说堪称罗马的“媒体代表”，却也无法成为反恺撒派的引导车。

所谓内战，是国内两种势力相互对抗而产生的斗争。以我的观点，恺撒认为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到庞培之死，这场内战就算走到尽头。《内战记》是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记录，却并不是以法萨卢斯会战，而是以庞培之死作为终结的。此后的和庞培派的斗争虽然也在持续，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内战了。这难道不是恺撒的“宣告”吗？这已经不再是互相抵抗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抗争了，仅仅是解决动乱分子的抵抗而已。《内战记》在这之后没有继续写下去，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恺撒没有充裕的时间写，而是他认为再没有写下去的必要了。

事实上，在这之后继续进行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都是由恺撒的幕僚和中坚将领们执笔的。尤其要提的是《亚历山大战记》的作者希尔提乌斯，这个人是代替恺撒写《高卢战记》最后一卷的人，但是他没有参与亚历山大港战役。没有从军参加战役也没有去过亚历山大港的希尔提乌斯，只根据恺撒的口述来写作。恺撒只是口述，没有参与成书写作。因此，《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都是交给属下完成的。对于只通过口述笔记就能写成出色散文看来，恺撒这样的人并不是不能写，而是没有写作的意向——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吧。

克娄巴特拉

恺撒“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之后，埃及王室宫廷的人们总以为，杀死庞培实在是卖给了恺撒一个天大的人情。

献上庞培的首级和金戒指之后，由家庭教师和宦官组成的宫廷派，给恺撒——当前罗马第一实权派，同时又是罗马霸权的现任执政官——传递了消息，说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得手，请早早离开。恺撒虽然从不被个人情感左右，却认为事情演变成这样已经是国家之间的问题了。埃及虽说是独立国家，但是也是认可罗马霸权并与罗马结为同盟的国家。罗马认可埃及的独立地位，埃及才能成为独立国家。于是，恺撒这位贵为罗马最高统治者地位的现任执政官，决定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没有经过民主讨论来决定事物习惯的话，即使努力给他移植这种习惯也是徒劳。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至今，埃及的统治者虽然几经变更，但是始终是神政一体绝对王权政治的国家。希腊人在埃及确立的王政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所确立。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后，他手下的一位将军成为了托勒密王朝的开国君王，建立托勒密王朝。

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们则借由神谕的形式告知希腊人，马其顿年轻的王亚历山大并不是人类之子，而是神的孩子。因为，埃及是一直处于天神之子支配下的国度，如果受人类之子支配的话，就会很不好。简言之，对埃及人来说，没有不死之身的人，就不配拥有正统的统治者地位。同样是以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军作为开国先祖，马其顿认为他们的王是人类当中的第一人，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则认可能够在神和人类之间建立关系的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是以天神之子来统治人间的王，他们之间有微妙的不一样。而正是这点不同，使得罗马打败迦太基、统治东地中海之后，把马其顿和叙利亚都列为了行省，却单单把埃及列为独立国家。另一个原因，就是自罗马以迦太基为对手展开生死搏斗的时代起，埃及王朝就已经站在罗马这边了，此后，他们也不像马其顿和叙利亚那样曾经犯过对罗马宣战的“错误”。

早在公元前63年庞培执政时期，罗马就废除了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将之变为罗马的行省。那时如果他想的话，也可以把埃及变成行

省。因为以埃及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能与罗马为敌。

但是，罗马的对外基本方针并不是莽撞地直接统治。虽然成为了行省，但是罗马仍然尽量采取使内部的诸多势力不要与罗马敌对的温和政策，这是罗马人的统治方式。宗教、语言以及生活习惯，罗马人并不会强制要求对方和自己保持一致。罗马人本身就是多神教的民族，并不像一神教那样要求将自己信奉的神作为唯一的真神，所以他们对认可其他民族的神也没有抗拒感。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具有统治地位，希腊系的托勒密王朝支配下的埃及则信奉奥西里斯和伊希斯。虽是这样，受希腊系王朝统治的埃及，仍然属于希腊语系。

罗马对同盟国的要求之一是不与罗马为敌。罗马人一直以来都在保障罗马霸权下诸城邦之间的国际关系安全，以及充实罗马式的街道网扩张需要的资本。罗马式的基本设施整顿是为了重视统治和军事的效率，也理所当然地提高了“罗马版图居民”的生活水平。

由罗马直接统治的行省，对罗马有着对外关系和安全保障上的依赖。它们和实际上是属国、形式上以独立国家存在的同盟各国一起组成了“罗马世界”。但是，罗马尽量避免将其行省化的原因，是为了安全保障费。因为如果对行省是直接统治，罗马这边就有了对他们内外都必须保障安全的义务。他们缴了行省税之后，行省居民就没有管这方面的义务了。如果是以独立国家形式存在的同盟国，罗马人就对他们没有保障国内安全的义务。虽然没有行省税的收入，但是安全保障费用却大大增加。因为有同盟关系，罗马对外战争时，也可以以相互保障安全的理由向他们要求派兵增援。从同盟国派兵过来的费用，也由该国家自行支付。罗马将这样的国家称为“罗马的友好同盟”，这样对罗马而言收益比付出更多。

即使这样，罗马还是有很多行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以西班牙和高卢为代表，拥有很多的部族，部族林立，不

可能通过与某个部族交涉而将其统一化支配。

第二种，可以确立统一的支配体系，比如马其顿和叙利亚，以及过去的迦太基，曾经数度与罗马为敌的诸多城邦。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吃了诸多苦头，但是罗马最终也没有把迦太基变成行省。马其顿和叙利亚也是，虽然最初的战争是胜利的，罗马也没有将其变为行省。但是后来由于他们数度与罗马敌对，罗马人没有更好的方案，只好将这两地设为行省。一次都没有和罗马敌对过的、一直是“罗马的友好同盟”的像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这样的比马其顿和叙利亚实力弱小一些的国家，也是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存在。本身也算大国的埃及，也是“罗马的友好同盟”之一，它也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安然地存在着。特别是埃及，由于和由人类之子统治的“罗马公民”的民情不一样，情况更加特殊一点。

即使如此，不与“罗马公民”为敌仍然是罗马的条件。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由家庭教师和宦官们组成的埃及“宫廷派”似乎欠缺了辨别时势的政治敏感。曾经也有大国时常犯这样的“错误”。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的埃及，曾经有着被看成大国的双重条件——3000年足以自傲的埃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以来300年光辉闪耀的希腊文明。“克娄巴特拉”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马其顿王室的女子常见的名字。

恺撒将他们浸在香油中送来的庞培首级进行火葬，并送至庞培妻子处。庞培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将之安葬在庞培生前最喜欢的阿鲁巴别墅的庭院中。那里的庞培墓现在依然存在。

恺撒在亚历山大港上岸，是公元前48年的10月4日，距离庞培被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6天。恺撒以霸权国家罗马最高统治者现任执政官的身份登陆，他带了12个侍卫，与其地位相称。迄今为止一直与罗马风平浪静相处的埃及的首都居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件事刺激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尤其是在希腊王朝统治下的很多

希腊居民。到此为止，他们都没有亲眼见证过如此直接的罗马权力形式，道路两旁挤满了人。在他们看来，朝着王宫行进的恺撒及其军团，是罗马人对于希腊系的埃及王朝的羞辱。恺撒也感受到了这种危险的气氛，认为必须严肃地加以处理。他派出使节，下令由庞培的剩余士兵所编成、驻守在小亚细亚的军团前来埃及。但是，恺撒马上对自己在亚历山大港要做什么心知肚明，而且也没有因为受阻而动摇决心。

当同盟国内部发生内乱时，罗马有责任担任仲裁，收拾事态，这是到此为止的罗马的常规。虽然罗马尊重同盟国的内政自由，但是只有同盟国内部国情安定，他们才有理由维持与罗马的同盟关系。恺撒认为，保证埃及国内政治稳定是身为罗马执政官的他的任务。因此，登陆之后，他立刻决定于三日后，也就是10月7日，在王宫召集埃及内乱的两位肇事者，姐姐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弟弟托勒密。这一举动又深深刺激到了埃及的宫廷。

恺撒在《内战记》中这样记述道："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的人不仅只有埃及王室的宫廷人，长久以来一直住在埃及的——特别是在首都亚历山大港，在希腊系王朝统治下的很多希腊商人也是如此。因此，恺撒登陆后最先着手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派援军前往小亚细亚，第二件事就是召集王室姐弟二人。在召集王室的当天，在姐弟俩还没到达之前，他做的事情是宣布在亚历山大港内有自由通商权。具体来说，就是把亚历山大港经济圈内希腊人和犹太人原本不平等的现状进行完全的权利平等化。这项政策的内容决定了恺撒将得到犹太人的敬慕。而认为被侵害了自身既得利益的希腊系亚历山大港市民们则对恺撒更加反感。

在此期间的10月7日，恺撒担任仲裁人，与埃及国王家族内讧的两位当事人进行了会谈。

姐弟俩的父王，也就是埃及的先王托勒密十二世，先是在埃及王室常有的内斗中被赶下了台。在罗马的援助下复位后，他统治的埃及成为了“罗马的友好同盟”，这全拜庞培当年积极活动所赐。在那一年，恺撒也正在担任公元前59年的罗马执政官职务，因此也曾在元老院认可下召开公民大会，为通过该项政策而尽心尽力。实际上托勒密十二世恢复王位，是庞培派手下的将领盖比尼乌斯和一个军团前往，在公元前55年才实现的。因此，罗马出面解决埃及王室的内部争斗也是有先例可援的。恺撒当年虽说是接受了庞培的授意，但实际上也为了将事情法案化而尽心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现在的恺撒而言，埃及的政治稳定是在庞培过世后，自己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身为“罗马的友好同盟”的托勒密十二世死于公元前51年。他留下的子女是以当时刚刚18岁的克娄巴特拉为首的两位公主和另外两位王子。托勒密十二世的遗诏中最重要的是这么两项：

一、埃及由长公主和大王子共同统治。

二、埃及王室今后要继续作为“罗马的友好同盟”。

当时的埃及，也许只有这位65岁死去的先王，才看到了不想看到的现实。

先王遗诏的第一项确实得到了忠实的实施。从公元前51年开始的埃及，是由克娄巴特拉七世和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

这次埃及再次发生的王室内乱，究竟是由少年王身边的近侍们排斥克娄巴特拉而发起的，还是聪明、好胜又野心勃勃的克娄巴特拉因为对与资质平庸的弟弟共同治理国家感到厌恶而发起的，目前尚不明确。不管原因为何，公元前48年秋天恺撒到达埃及时，少年王已经得到了盖比尼乌斯的余党罗马士兵的支持，比21岁的姐姐更有优势。与少年王在首都相反的是，克娄巴特拉被驱逐出了首都亚历山大港，正在集结兵力为

夺回王位作准备。

如果从顺势而动的现实主义角度看，这时候恺撒只要对军事上已经占优势的弟弟进行兵力上的支持，埃及的政治应该就可以得到预期的安稳。但是，在10月7日举行的恺撒和姐弟俩的会谈中，恺撒作出的裁定是姐弟俩和解并且再度联手统治。

这个恺撒的裁定，一看就知道是对克娄巴特拉有利，引起古今中外对此事有了众多的臆测。以普鲁塔克为首的史学家们所写的小插曲，使得后来的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那就是在恺撒作出裁定的头一天夜里，克娄巴特拉巧妙地藏在了被褥里，由侍者带着成功地混进王宫。在那里，她用自己的魅力成功地俘虏了第一次见面的恺撒，结果就有了这样一个有利于她的裁决。帕斯卡等历史学家甚至说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再低一点的话，说不定历史就要改写了。

我也不打算否定这个小插曲的真实性。以克娄巴特拉的性格来看，这确实像她能做出来的事。而且，这位在事业上成功的恺撒，在私生活上也不是个不解风情的呆子。虽说恺撒并非是个见醴不食的人，但是也不会是个轻易被迷惑的男人。而在这个常年于紧张岁月中度过的已经52岁的胜利者面前站着的，是为了打赢人生中最大一场豪赌而精心准备的浑身魅力四射的21岁绝艳女子。如果她的鼻子稍微低一点，对这样的事情不在意的话，对恺撒来说应该是充满了魅力的吧。此外，这位年轻的女王，还非常富有幽默感。如果只是有身体交流而不能对话的话，这个女子是不可能长久地成为恺撒的情人的。而同样具有赌徒性格的这两个人之间，一旦有了苗头，进入到情人关系就会水到渠成了。问题是，恺撒的裁定是否真的是被克娄巴特拉的魅力所俘虏的结果呢？

作为“罗马公民”的代表，现任执政官恺撒从法律上说作为代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用这个身份来对同盟国埃及的王室内斗做仲裁人的话，对恺撒而言最重要的是，保证埃及和先王时代一样继续做“罗马的友好同盟”。因此，只要继位者明言继承这个传统，继续按照先王的遗诏实施，对罗马来说就已经是达到了最期望的目的了。但遗诏中还记载了由长公主和大王子共同统治这件事，恺撒的裁定也是忠实地遵照先王遗诏。

此外，还有其他事情让恺撒无法只考虑军事上的优势，而在埃及内乱中作出支持弟弟的决定。

虽然直接动手杀死庞培的是身为罗马公民的塞普提米乌斯，背后指使的却是托勒密十三世身边的近侍。罗马人是不会饶恕杀死同胞的异国人的。此外，庞培还拥有前执政官这样的官职，从履历上说还是罗马的公职人员。而且，对作为clientes的埃及王室来说，庞培还是他们的patronus，两者本身应当是相互扶持的关系，而现在被保护者竟然杀害了保护者。这对重视clientes关系的罗马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如果只是城门紧闭吃了闭门羹，人们只会慨叹失败者的悲惨命运；但是杀人，这在罗马人眼里就是另当别论了。

恺撒在登上亚历山大港之初，就没打算放任杀害庞培的主谋。对他来说，如果支持女王弟弟登基，那么就如同放弃围在女王弟弟身边的那些人。用恺撒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谋杀犯”，无法将他们问罪而且绳之以法了。这样一来，罗马本国人必会感到不满，这正是他十分担心的事情。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罗马人，还是作为罗马的统治者，恺撒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让女王弟弟一个人就任王位。

此外，两人有了交欢之后，恺撒也了解了克娄巴特拉的资质。这个头脑聪明、意志坚定的女人，难道不是比性格软弱、易受身边人影响的

弟弟更加适合出任共同统治者中的一个吗？

总之，对恺撒来说，即使和克娄巴特拉没有进展到情人关系，他也还有很多理由必须挽回克娄巴特拉在军事上的劣势。情爱关系的存在并不足以左右国际关系局势。此外，恺撒本人也不是会沉溺于情爱而被他人左右的性格。

克娄巴特拉认为这些是因为自己的魅力，这样想也并非毫无道理。比起相信事实道理来，女人是那种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凭借魅力获得成功的物种。要让女人有这样的错觉，对恺撒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克娄巴特拉对此事的误解一直持续到恺撒的遗书公布之后。而那时候她感受到的屈辱感，我认为是了解她后半生的一个关键因素。

恺撒在公元前48年作出的这个裁决，对军事上占优势的托勒密十三世，特别是他身边的近侍们来说，是远远不能够满意的。在裁定作出的一个月之后，他们对恺撒发起了军事行动。“亚历山大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亚历山大战役

在普通人的眼里，只想看见自己想看见的现实的人，一旦堕入疯狂的执著之中，是非常可怕的。家庭教师阿基拉斯和宦官波提乌斯将托勒密十三世的全部军队都召集到了首都亚历山大港。

这支埃及的军队由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组成，其中有7年前受庞培派遣、随盖比尼乌斯到来的剩余部队。这些士兵们在埃及娶妻生子，已经全部忘记了罗马军队的军规，被全盘埃及化了。他们剩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不断有王室争斗的埃及生活的7年里，已经习惯了战斗。此外还有一个军团，与其说是士兵，倒不如说是强盗更为贴切。他们原本是叙利亚和奇里乞亚等地区的海盗，被告知如果参军打仗就能免

除死刑。此外还有些拿起武器的罪犯、流放者和很多逃亡的奴隶。这些人共同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战斗获得，而是从参与掠夺、杀人、放火和打架中得来。

而恺撒只有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以及10艘船。而对方有72艘船，其中的主力还是应庞培的要求提供给法萨卢斯会战所用、后来逃跑回来的大型船。

面对这样的情况，恺撒只有彻底的防守。但是这个防守不得不在城内进行巷战。因为前面所讲过的原因，亚历山大港的希腊系居民对恺撒非常反感，所以恺撒也得不到市民们的支持。

所有的情况都对阿基拉斯和波提乌斯有利，他们的进攻气势很强；相反，恺撒只有进行防守战。由于害怕敌人切断通往大海的出口，恺撒的攻击主要集中于打击敌人的海军。恺撒的士兵们放火烧了敌人的船队。火势蔓延，连古希腊的文化发源地、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40万卷藏书都灰飞烟灭。火烧起来后，恺撒立刻尝试占据灯塔所在的半岛。一旦成功占领这个被称为法罗斯的著名半岛，恺撒就占据了这个半岛所在的1.4公里长堤。这个堤坝所连接的就是亚历山大港，所以这也是占领全港的第一步。

在此期间，恺撒首先杀掉了宦官波提乌斯，但是另一位公主阿尔西诺伊和少年国王站到了阿基拉斯这边，而克娄巴特拉一直坚定地站在恺撒这边，形成了这样的战斗格局。不久之后，根据阿尔西诺伊公主的命令，阿基拉斯也被杀了。这样，根据父王的遗诏拥有继承权的克娄巴特拉和完全没有继承权的妹妹阿尔西诺伊之间，展开了对王位的军事争夺战。恺撒也卷入了这场无聊的家庭斗争中。在接到命令的援军赶到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可以改变这一状况。

在希尔提乌斯执笔撰写的《亚历山大战记》中，实际上对于亚历山大战役中攻防战的叙述部分，只有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因为从罗马人

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意义并不大。话虽这么说，这个亚历山大战役却是在从高卢战役开始到法萨卢斯会战之后，所有恺撒负责的战斗中最具电影效果的。

这场战争简直是一部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大场面电影，豪华的场景连续不断。侍从带来的被褥打开后，面前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王。为守护这位女王而进行战斗的，是罗马的第一勇士。在海港内用绳索连接在一起的50艘大型船只在熊熊火焰中燃烧。火焰蔓延，烧毁了古希腊的文明之花——亚历山大图书馆。接着是围绕着因为技术水准高超而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鼎鼎有名的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而进行的海战。在千钧一发之际，恺撒从船上跳到海里逃脱了。

的确，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合适。以豪华的埃及王朝作为背景，展示了家族争斗、英雄美女情爱、杀戮、战斗、火灾等一系列元素，感觉就是一部什么都不缺的电影。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战争。

身处此境的恺撒现在只能一边全面防守，一边等待援军到来。但是他是一位已经习惯了在前线战斗的总司令了。在亚历山大战役中的恺撒，甚至在千钧一发的险境之中感受到了愉悦的心情。话虽如此，为了保证干净饮用水供应，他对为此修筑的工事技术也颇为用心。

原本负责小亚细亚地区防卫的多米提乌斯接到命令后率援军赶到时，大概已经是公元前47年的2月底了，从去年10月开始的战争已经足足过去了4个月。到达埃及的援军并不是只有随多米提乌斯前来的2个军团，还有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自愿来到恺撒身边参战的战士——他们非常兴奋。这其中还有拥有本都王族血脉的勇将米特拉达梯。

也就是说在到达的援军里，既有从海路来的，也有从陆路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来的。他们分布在亚历山大港周围，就像网状分布的尼罗河的支流。一直以王宫为依托进行战斗的恺撒，认为有必要和到来的援

军会合。此时恺撒手中已经掌握了制海权，于是决定乘船在海上进行会合。而另一面，托勒密十三世这边正准备加以阻止。这样一来，战斗就从亚历山大港城内转移到了尼罗河的入海口。在尼罗河的入海口有几条支流分别注入地中海。这个地带又被称做三角洲，因为其地形酷似希腊语中的字母“Δ”。

恺撒从麻烦的巷战中解放出来之后，又和援军会合了。他终于可以施展他的独特战术了。在尼罗河三角洲展开的战斗，不到一个月就分出了胜负。托勒密十三世卷入失败的亚历山大港军队后战死，作为指挥的宦官盖尼莫德斯战死。公主阿尔西诺伊成为了俘虏。恺撒站在日耳曼骑兵团前面，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亚历山大港城内。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些士兵都像影子一样忠实地跟随着他。这是公元前47年3月27日。

亚历山大港的居民们想利用王室内部的斗争巩固希腊系的势力，将罗马的势力从埃及赶出去，结果功败垂成。他们被这个结果震动了。在胜利者恺撒的面前，他们要放下武器自不必说，甚至还说出希望恺撒能成为埃及的王这样的话，只求能有一条生路。按照常例规定，失败者的命运不是被杀死就是被卖做奴隶。

但是，恺撒的想法在经过五个多月的战斗后也没有改变，那就是忠实地执行埃及先王的遗诏，埃及的王位由克娄巴特拉和另一位还活着的二王子共同治理。这样既符合了埃及的民情，此外也是对罗马而言最适合的政策。新的共同统治者克娄巴特拉七世和托勒密十四世与恺撒签订了新的同盟条约。

因为托勒密十四世还是个孩子，埃及的王实际上由年仅22岁的克娄巴特拉担任。此后，克娄巴特拉自然是和她的父王一样，继续成为“罗马的友好同盟”。那些与恺撒兵戎相见的亚历山大港居民们既没有被处死，也没有被当做奴隶售卖，甚至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毕竟他们都是“罗马的友好同盟”的臣民，而罗马人一向不喜欢干涉同盟国处理自己子民的内政。

杀害庞培的主谋们则全部被处死。罗马公民被杀的仇是不会就这么放任不报的。只剩下内乱的主谋——克娄巴特拉的妹妹阿尔西诺伊，恺撒认为她如果继续留在埃及的话，说不定又会成为内乱的源头。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发生，他将她遣送到了罗马。

这样，恺撒终于做完了他在埃及应该要做的所有的事。此时也到了春季，船队不再碍于西北风而不能出行，恺撒可以从亚历山大港出发回到处于西北方位的罗马了。但是恺撒决定休息不走，原因有两个：一是让士兵们休息；另外一个，则是要探寻尼罗河的源头。根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行的正式公文，第一个关心探索尼罗河源头的人就是恺撒。但是据我们所知，发现尼罗河源头——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维多利亚湖的地方——的是2000年以后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也就是说，恺撒所说的探寻水源，实际上应该是在尼罗河周边游玩。而这个旅伴，不用说也知道一定是克娄巴特拉。从幕僚所写的《亚历山大战记》中完全看不到恺撒这次坐船游玩的影子，这说明了无论是恺撒还是他的部下，都把这次出游当做是私人之行而加以保密。

这次的休假历时两个多月。虽然恺撒在打败庞培后已是罗马“第一人”，但是庞培的余党们正在现在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两地打磨着反对恺撒的利刃，这两个地方与埃及从陆上相连。在这两个月里，恺撒一边欣赏着尼罗河的风光，一边和情人过着悠然自得的愉悦生活。

即使在当时，也有人认为他是沉溺于克娄巴特拉的魅力之中不能自拔。还有一些人认为，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是十足的“恺撒作风”使然，因为再没有谁能做出比恺撒更大胆的行为了。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两类，而我则想再加上一个看法。

我认为这时候的恺撒，是想在身心上好好休养一番。从阿雷佐战役开始到法萨卢斯会战这五年的时间里，恺撒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当中，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放松。现在他最大的对手庞培也已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天才也需要有解压的时候。在进入新的政治活动之前，进行一些消

除疲劳的活动是必要的——这一点对谁来说都一样，对恺撒也是如此。所谓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是一个人对紧张自我的调整能力。

而且，此时的舞台是在南国。温柔的山风追逐在晶莹剔透的尼罗河上，还有无数充满异国情调的金字塔和神庙，同行的则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处处流露出机敏可人的女王克娄巴特拉。如果这样美好的闲暇时光都不懂得去享受，那对快乐主义者恺撒而言，就等于是有御膳摆在眼前而不尝一样了。

他们探寻水源的结果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休息期间，恺撒完成了《内战记》全部三卷的写作倒是事实。

结束了休息后回到亚历山大港，等待着恺撒的是被任命为小亚细亚防卫官的多米提乌斯传来的急报。多米提乌斯率领三个军团负责小亚细亚方面的防卫。在接到恺撒要求派遣援军的命令后，他从中抽了两个军团支援恺撒，手中只剩下一个军团，已经几乎不能抵抗对手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于是，这就成为了恺撒在回到罗马前必须处理的政事。

为了保卫埃及王室的安全，恺撒留下了两个军团，只带走了法萨卢斯会战后随他追击庞培的第六军团和日耳曼的800名骑兵。与克娄巴特拉告别后，他出发时已是公元前47年的6月——按照实际季节则是4月中旬，即将进入适合打仗的季节。这也是恺撒重新开始行动的最好季节。

但是，恺撒并没有直接前往战争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因为在途中，他还有些不得不处理的事情。

已是罗马世界“第一人”的恺撒虽然急于驰援，但是他在途中也没有浪费有利于战争的机会。他经过数月休整之后，身心都为之焕然一新。再次行动时已经53岁的他，在这之后的三个月里和以前一样思虑周详，甚至行动更加迅速。

“我来，我见，我征服”

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托勒密·阿克（现在的以色列的阿卡），恺撒选择了走海路。因为不论是犹太还是恺撒的下一个目的地叙利亚，都是庞培称霸东方以后的罗马行省及同盟国，并且它们都处于地中海东岸沿线。这是恺撒担任罗马权力领袖后首次——也是他个人生涯中的首次——造访。

犹太的诸侯和祭司们早已在阿卡恭候恺撒。早在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就已经赋予了犹太人与希腊人拥有同等的通商权。到达阿卡之后，恺撒又对犹太人许下了一系列承诺。他根据犹太民族政教不分的特点，承认大祭司为犹太的最高统治者，允许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同意归还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后夺取的犹太重要港口雅法（现在的特拉维夫），免除犹太向罗马军冬营提供粮食的义务，此外同意暂时免除犹太的行省税。恺撒向犹太人许诺，待他回到罗马，以上政策经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通过后便立即实施。在地中海世界里，犹太人一直被看成二等民族，因此犹太人把这个改善他们待遇的恺撒，当成救世主狂热地拥戴着。

但是，恺撒这么做的本意并非是为了优待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宗教林立、文化多元的地区的统治者，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接下来，这个手段在安提阿也被反复使用。从阿卡经由陆路北上就到了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城市安提阿，恺撒在那里召集了叙利亚行省及周围所有的诸侯，连沙漠游牧民族贝都因也包含在内。

这些诸侯都是庞培时期的“罗马的友好同盟”，在法萨卢斯会战期间大多站在庞培一边。世易时移，如今的胜者变成了恺撒，曾经支持庞培的诸侯们又重新向恺撒发誓效忠罗马。恺撒以他个人和国家的名义，与各诸侯交换了“罗马的友好同盟”誓约，并要求他们与罗马共同维持地中海东岸地域的安全。恺撒留下族人塞克斯提·恺撒担任维护双方关系的

驻地大使后，乘坐由阿卡送来的船，往小亚细亚南岸的奇里乞亚驶去。因为如果走陆路，恺撒必须要从北方绕经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战争的遗迹伊苏斯才能到达，而走海路的话，只需不到两天的时间。

奇里乞亚也是罗马的行省，首都是大数。恺撒在这里，仍采取了同样的安抚手段。罗马作为宗主国，有责任和义务调解被统治民族间的纠纷；当行省和领土外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也有责任和义务保卫行省各民族的安全。只有履行了上述义务，罗马的霸权统治才能受到行省人民的认可，才能继续一统“罗马的友好同盟”。

除了“友好同盟”各民族之间的问题，各宗教间的关系也需要罗马调停、裁决。恺撒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不仅认可犹太教，也在神殿再次认可自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东方各宗教。

罗马霸权统治下的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罗马世界，古人也称之为罗马帝国。因此，在进入正式由帝王统治的200年前，即从打败迦太基开始，罗马便冠以“帝国”、“共和国”的称谓载入史册。“帝国”两字代表的仅是罗马的霸权地位，因此跟国体无论是帝王制还是共和制都不与之矛盾。《罗马法》是这个帝国共同的行为规范，希腊语和拉丁语是通用的官方语言。因为罗马时代，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属于希腊语系，那时的公告和碑文都是以希腊文写成的。

古人所指的帝国，我认为，比后人所说的殖民帝国更接近于古罗马本来的政治形态。就像恺撒试图指引罗马人看到的那样，古罗马帝国的前景，不会仅局限于城邦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广阔世界版图的国家。从这一点上看，恺撒是亚历山大大帝真正的接班人，也是帝国主义的推崇者。因此，在对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军事暴动的处置上，恺撒没有用对决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调停的手段。现实世界里，“和平”的达成与国力的盛衰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于弱国和强国间的商谈，“和平”往往是由强国作为主导，凭借强盛的国力强行进行所谓调停、裁决而达成的。“和平的罗马世界”及“和平的大英帝国”，这些称谓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我们且看一个例证。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是通过出卖其父王而夺得王位的。其父王米特拉达梯是曾与苏拉、卢库鲁斯等罗马名将数度交手不落下风的名将。他在后来与庞培作战时被逼入绝境，加上被儿子出卖，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自杀。时年30岁的法尔纳凯斯，甚至将父王的遗骸也上交给了庞培，反而是庞培郑重地将其厚葬于王室陵寝。庞培也借此缩小了本都的领地，交给法尔纳凯斯一个比他父王更小的王国。

15年后，当庞培和恺撒在希腊战场进行对决时，趁着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希腊战场上，法尔纳凯斯以“光复王国领土”为借口举起了暴动的大旗。然而法尔纳凯斯父亲所拥有的更大范围的领土也是通过侵略周边诸国得来的，因此，这场暴动其实是与罗马帝国的利益为敌，自然不可能得到罗马的认同。法尔纳凯斯首先攻下了黑海南岸最大的城市锡诺普，然后趁势又占领了卡帕多西亚。被攻占的地方都是“罗马的友好同盟”的领土，同时法尔纳凯斯本身也是同盟者的一员，这场暴动就成了罗马世界的内乱。作为统治者的罗马，自然必须担负起平息统治区内各城邦国纷争的责任。

因此，法萨卢斯会战获胜后，恺撒虽然亲率士兵去追击庞培，但仍因法尔纳凯斯事件事关重大，而派第一副将多米提乌斯率领三个军团去解决这场内乱，第二副将安东尼则驻守罗马本土处理内政。

不得不说多米提乌斯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经过法萨卢斯一役后，恺撒的嫡系部队都回到意大利本土进行休整，因此派给他的三个军团都只是曾经跟随庞培的志愿兵，不是恺撒的精锐。此外，恺撒卷入埃及王室的内讧后，又命多米提乌斯分出两个军团增援自己。把恺撒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重的多米提乌斯，毫不犹豫地执行恺撒的增援命令，结果自己手上只剩下一个军团。多米提乌斯并不是战术天才，加上手上兵力不足，因此与法尔纳凯斯对阵以失败告终，于公元前48年12月逃往叙利亚等待援兵。那时的恺撒正陷入与埃及军队的激烈鏖战中，虽然接到多米提乌斯的求援信，恺撒却分身乏术。而与埃及军队的战争结束后，恺

撒又在尼罗河给自己放了长达两个月的大假。因此，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末，多米提乌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度过了漫长的焦虑时期。

6月，恺撒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安提阿。而等恺撒处理完维持“和平的罗马世界”所必须解决的种种事项后到达小亚细亚时，6月已接近尾声了。在过去的6个月里，法尔纳凯斯几乎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一半领土。恺撒带来的是他的精锐第六军团、800名日耳曼骑兵，加上多米提乌斯手中的一个军团，以及痛恨法尔纳凯斯侵略的诸侯们的援兵。虽然第六军团因为伤病员的原因，人数锐减到1000人，但是加上其他力量，恺撒手中的兵力也超过2万人。其实，仅仅是恺撒亲自前来这个消息，就已经逼得法尔纳凯斯不得不选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恺撒也同意这个要求，但此时的法尔纳凯斯犯了一个错误，故意拖拖拉拉不派遣使节，以便延长谈判时间。恺撒见此，当即决定终止谈判，加速朝小亚细亚进军。到卡帕多西亚地区，也就是黑海附近的泽拉，双方展开对决。面对数量虽少却绝非浪得虚名的第六军团的猛攻，东方的士兵们显然难以抵御其锋芒。战争过后，恺撒送给罗马元老院的战报里，只写下了三个词：“我来，我见，我征服。”

从这句话及后来的“胜败在此一举”、“布鲁图，你也在啊”等名句来看，恺撒简直有做广告文案的才华。持相同观点的不只我一人。“我来，我见，我征服”这句话的拉丁语原文实际上是非常简洁的三个词，在美国买一盒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出品的万宝路，就可以看到香烟外盒正反面的纹理中，都印有“VENI，VIDI，VICI”字样，如同标榜典型的美国男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万宝路似的。“我来，我见，我征服”成为了恺撒军队的风格。

而“被来，被见，被征服”的法尔纳凯斯，虽然在这场战役中逃脱，但4年后仍孤寂地死了。本都王朝的王位，恺撒授予了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作为援军先锋奋战过的本都王族米特拉达梯。这样，恺撒成功地平息了小亚细亚“友好同盟”们的纷争，让各民族回到各自的领地上生活。

在世纪大决战法萨卢斯会战中获胜后，恺撒仍然清醒地保持着他一贯的问题意识。虽然在埃及卷入了意外的战争，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处理，但是恺撒依然把该解决的事情一件不落地解决好了。在此后的行军过程中，他争分夺秒地处理好了犹太、叙利亚、小亚细亚的诸多事端。因此回到罗马之前，在恺撒眼中只剩下一个麻烦了，那就是希腊。

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在内战时期都是庞培的“地盘”，用罗马人的观点看，也就是庞培的clientes。因此，庞培才有信心放弃罗马本土，而希望在希腊反败为胜。也正是如此，恺撒“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把庞培的这些地域都变成自己的地盘。当然，恺撒是以罗马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来进行这一切的。除了在埃及和法尔纳凯斯不得已的兵戎相见，恺撒还是希望以政治手段而非军事压迫来达成这个目标。恺撒麾下只带了第六军团的1000名士兵和骑兵团的800人，这是连小小领主都能轻易募集到的人数。恺撒没有用武力胁迫，而是凭借战胜庞培的声望以及调停、裁决过程中的公正，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这一年中，恺撒只在亚历山大战役和“我来，我见，我征服”这两次动用过武力，即使是面对曾经作为和庞培决战的战场、曾经全力支持过庞培的希腊，恺撒也从未改变过这个方针。

如果横穿希腊北部沿埃格纳提亚大道到达都拉斯，然后在都拉斯坐船渡海的话，恺撒在打败法尔纳凯斯后两周内就能回到意大利。然而恺撒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解决沿途各地问题。此时，受命监理罗马内政的安东尼传来急报，称罗马发生了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情。接到急报后的恺撒此刻仍决定先处理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麻烦——希腊。远离回罗马的主大道，恺撒进入希腊的中部，并在雅典召开了希腊城邦代表大会。在希腊，恺撒同样没有对那些曾经的庞培派问罪，不论是罗马行省，还是像雅典、斯巴达这样的独立城邦，一切待遇都如前，并且还废除了庞培为了决战所征收的特别税。但是，面对这些一直支持庞培的雅典市民，恺撒还是情不自禁地讽刺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因反复自蹈死罪而为众人所知，又因为蒙祖先庇佑逃脱罪罚而闻名于世。”

恺撒将希腊也烙上自己的印迹后，从都拉斯渡海回到意大利。当然，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也早已掌握在了恺撒手中。当第六军团和日耳曼骑兵团跟随恺撒在布林迪西登陆后，公元前47年的9月已经接近尾声了。为了和庞培决战离开布林迪西后，时隔1年零8个月，恺撒回到了本国。距法萨卢斯会战结束正好一年。

在庆祝完全称霸埃及和首次控制本都王朝的巨大喜悦中，罗马公民大会任命实现这一霸业的恺撒出任独裁官，任期5年。

恺撒和西塞罗

同样是一年的时间，但对西塞罗来说，这是和恺撒截然不同的一年。法萨卢斯会战失败后，西塞罗没有和其余的庞培派那样逃往北非，而是选择回到意大利。然而等待着他的，确实完全出乎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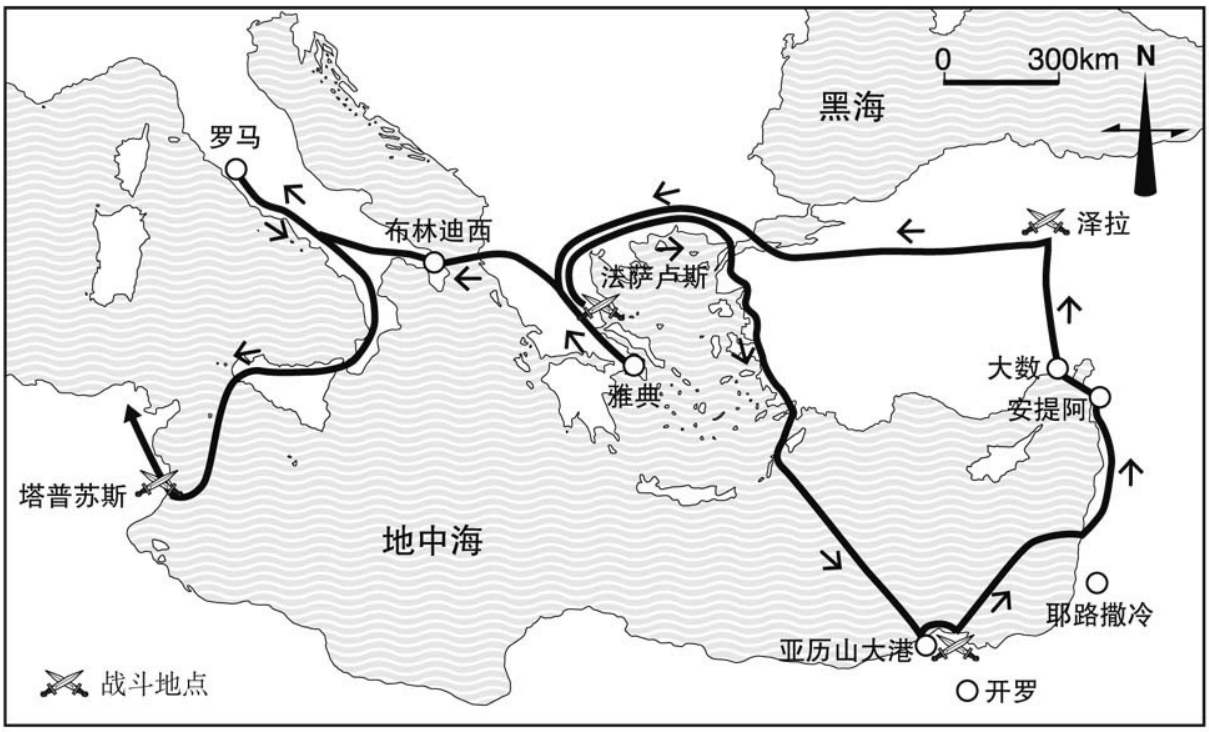
如果祖上未曾出过元老院议员，自己也不是在罗马出生却成为了执政官，这样的外地人有一个特定的称谓——“新贵”。出生于外地的西塞罗，不仅出任过元老院议员，还担任过执政官，此外还是罗马第一律师，著作等身，可谓是“新贵”中的佼佼者。除了社会事务上的成就，西塞罗还具有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他热衷于投资不动产，除在首都最高级的住宅区帕拉蒂尼山上拥有常用住所外，温泉、海边、山林等地也拥有别墅，合计有8处之多。法萨卢斯会战后，西塞罗原本打算离开庞培，一边专心著书立说，一边隐居于自己的数幢别墅享受生活，以此度过余生。于是，他仗着和恺撒的过往私交，满怀着不会为恺撒所罚的信心回到国内。

然而当西塞罗在布林迪西登陆时，他却意外地收到了要求“待命”的通知。安东尼特地写信给西塞罗，告诉他自己只是受恺撒之命暂时监理政务，但没有权力处理西塞罗这样的情况。34岁的安东尼对58岁的西塞

罗言辞之间恭敬有加。安东尼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还因为他的爷爷是苏拉时期一名著名律师。西塞罗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介绍过这位“货真价实的贵族”。安东尼在信中，还一同附上恺撒写给自己的信。恺撒在信中提到：“到处都在传小加图和路奇乌斯·马尔凯鲁斯即将回到意大利再次进行政治活动的消息。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内乱的根源永远无法铲除。因此是否允许他二人回国定居，待我自己考虑后再作决定。”这封信里并没有提及西塞罗，但安东尼也没有胆量在未得到恺撒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西塞罗的去留。同时安东尼也很同情被困在布林迪西的西塞罗，因此安东尼又问西塞罗，是否需要给正在亚历山大港战斗的恺撒送去急信，就这个情况予以请示。此提议遭到了西塞罗的拒绝。这倒不是因为他公正廉洁，而是他害怕这样做会引起北非庞培派的憎恨。这就是虽则知识丰富，却毫无决断力和先见之明的西塞罗，在如此的节骨眼上，居然首先担心的是因为态度鲜明而遭到敌视。

话虽如此，困在布林迪西的每一天对西塞罗而言，还是充满了绝望和不安。与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不同，西塞罗可并不是个“愈挫愈勇”的人，他知道自己必须要等待恺撒回国，而这个等待何时结束却未为可知。起先的消息说恺撒在亚历山大港战斗。等战斗结束消息传来，西塞罗以为恺撒很快就回国，可接下来的两个月却毫无动静。然后又传来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相伴游玩的消息；好不容易等游乐完毕，又说恺撒前往犹太、叙利亚、小亚细亚巡视去了。

假如能够知晓恺撒回国的确切时间，西塞罗的日子还是很好打发的。因为在布林迪西的周围，到处都有他感兴趣的希腊文明。从布林迪西坐船，不出三天时间，就能到达充满了希腊文化的西西里岛，西塞罗一度以特使的身份在那里任过职。可惜，恺撒是出了名的神出鬼没，常常会比通报行程的使节先一步出现在当地。西塞罗总是担心，他去意大利南部参观希腊神殿时，恺撒会突然回国，这样他就失去了向恺撒请求的机会。因此，西塞罗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布林迪西等候恺撒回国。



法萨卢斯会战后恺撒的行动路线

西塞罗又一次向好友阿提库斯倾诉自己的绝望和不安：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样痛苦、严重到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动力，驱使着我作出了那样的选择（指追随庞培）。现在回想起来，那肯定不是理性的抉择，而是一时的冲动。如果不责怪自己，那可真是连信都不好意思写了。那个决定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你从（法萨卢斯会战）结果大概也能猜想到吧。我现在的状况不用说你应该也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拜托你什么了。唉，只要能把我从现在悲惨的境地解救出去，能做什么就请放手去做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我连写回信的精神都没有了。麻烦你代我给巴基鲁斯（恺撒的部下）和伊扫里库斯（公元前48年和恺撒一同出任执政官）回信吧。

因为害怕恺撒手下会有所行动，我每天连家门都不敢出。我已经给巴尔布斯和奥比乌斯（都是恺撒的亲信）写信了，我期待着恺

撤回国时影响我心情的是个好消息。

即使这样，我仍对过往难以释怀。我总是忍不住一边回想过去，一边思考怎么到今天这般田地。

往往“新贵”们都是现有体制的忠实维护者，大概是因为对这个给予自己出人头地机会的体制，他们始终有着无法割舍的留恋吧。让西塞罗失去预见力的，也许正是这种留恋。他作为坚定的元老院派，一直主张罗马应当坚持元老院领导下的共和体制。而当初让他犹豫是否要追随庞培的根源，只不过是对庞培个人领导能力的怀疑。因此，他在跟随庞培撤出罗马的途中，躲进福尔米亚的别墅。

恺撒没能阻止庞培逃离意大利后，在返回罗马的途中，曾前往福尔米亚劝说西塞罗。促膝深谈到最后，恺撒也仅得到西塞罗答应保持中立的承诺，这个结果在当时对恺撒而言也足够了。但恺撒在西班牙陷入苦战的消息传来，西塞罗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强行拉上弟弟昆图斯以及原本支持恺撒的儿子和侄子坐上投奔庞培的船只。但是还没等他们到达庞培身边，恺撒就已经在西班牙战争中反败为胜了，接下来的过程，就是恺撒与庞培决战，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获胜，以及庞培被杀。

西塞罗是庞培派中唯一一个受到恺撒亲自登门劝说的人。即使这样，这个被恺撒另眼相看的西塞罗还是背弃了中立的承诺，匆忙投奔了庞培。现在作为胜者的恺撒，会怎么处理他呢？

在决定与逃往北非的庞培派分道扬镳时，西塞罗曾一度认为恺撒会对他格外宽容，而被困在布林迪西后，强烈的不安袭上他的心头。每当想起是自己违背了诺言，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就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在这一年里，西塞罗给好友阿提库斯一共写过22封长信，他的忧虑可见一斑。不过比起同情西塞罗来，我倒是更佩服阿提库斯可以忍受好友这么久的牢骚。此外，在这一年里，西塞罗的家庭生活也非常不如意，西塞罗的状况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首先是弟弟昆图斯指责西塞罗引自己上了贼船，声称要弃暗投明，投奔恺撒，并在法萨卢斯会战后留在了希腊。接着是儿子和侄子不满西塞罗强拉自己加入庞培派的做法，法萨卢斯会战后也都投奔了恺撒。更惨的是，当西塞罗回到意大利以后，连妻子都不愿意见他了。而接到最疼爱的女儿重病卧床的消息，他却又不得不留在布林迪西等候恺撒，无法前往探望。此外，西塞罗曾经最看好的家乡青年卡埃里乌斯，现在是恺撒的得力手下。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也是恺撒的亲信。父亲跟随庞培，儿子追随恺撒，父子兵戎相见，这是内战时的特色。西塞罗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今的西塞罗除了面对家族指责外，还被曾经同事过的庞培派唾弃。以小加图和庞培长子格涅乌斯为首，庞培派公开斥责他是临阵脱逃的叛徒。被不安、绝望、悔恨的情绪笼罩，西塞罗内心痛苦不堪。

从西塞罗写给好友的22封长信中可以看出，这位58岁的知识分子内心正一天比一天更脆弱。熬到后来，他甚至开始埋怨好友，责怪他明明只要经过阿皮亚大道就能来布林迪西探望，却对困境缠身的自己置若罔闻。

这里提到的阿提库斯也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于公元前109年出身于罗马望族，那正是罗马动荡不安的时代。他本名提图斯·庞培尼乌斯，后因仰慕希腊文化而改名为阿提库斯（阿提卡人）。他比西塞罗大3岁，年长恺撒9岁。在雅典留学时与西塞罗结识，成为一生挚友。但和热衷于政治的西塞罗不同，他一生都不愿涉足政事。他依仗丰厚的祖业以及巧妙的投资，在金融业、训练角斗士以及出版业都享有盛誉。对于热衷积攒财富的西塞罗来说，他既是好友也是自己的投资顾问。但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商人是很难和战乱彻底绝缘的。为了不卷入内战，阿提库斯尽了最大努力，各方面都作了精心的打点。

他通过经营着的行业，与各政治派别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庞培还是恺撒，都与他交好。即使是在听老友西塞罗抱怨的这一年里，

他仍与暂代恺撒管理意大利的安东尼保持着亲密往来。政治家们经常要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头疼，与金融家阿提库斯交好，对他们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身为西塞罗的好友，即使心底深处同情元老院派，但无论是对庞培，还是对后来的布鲁图，阿提库斯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只以贷款的形式为政治派别提供资金支持，以此保护自己远离反对派敌视。

依靠这样的原则，哪怕在恺撒被杀，西塞罗被安东尼处死，安东尼和屋大维争霸的时代变换中，阿提库斯都得以逃过浩劫，并且还替西塞罗出版了著作。不过在《西塞罗书信集》出版时，在16卷书信中阿提库斯将自己的回信全部删掉了，只保留了西塞罗的原信。这也导致我们仅能以恺撒著作和西塞罗著作为最好史料，从中寻找到罗马从共和时期过渡到帝国时期的种种。而中立的阿提库斯对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的原信中推测出大概。不过，猜测终究只是猜测。在《西塞罗书信集》刊行的年代，人们大概没有任何可以指责阿提库斯的理由吧。即使在现代，只要拜读过间接描述阿提库斯的三卷本《书信集》的人，都会对这个乱世中的清醒男子心生敬佩。

素养一流的阿提库斯自己也写过几部著作。公元前47年，在倾听老朋友西塞罗发牢骚的同时，他创作了《年代记事》。这本书记录了到公元前54年为止罗马所有出任公务职位人的姓名。此外他还为罗马的各名门望族，如尤里乌斯、法比乌斯、马尔凯鲁斯、埃米利乌斯等记录了家谱，以及以出色的希腊文写成的《西塞罗论丛》。虽然只是简单的记事著作，也足以让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相形见绌。

77岁那年阿提库斯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这位传奇人物采取了绝食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足见这位为避开战祸而殚精竭虑、事事周详的男子，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和西塞罗的友情，在西塞罗死后都一点没有改变。在我看来，虽然他和西塞罗有着共同爱好，但性格截然相反。

在西塞罗被画地为牢时，阿提库斯虽然没有亲自前往阿皮亚大道的另一端进行探望，但也派人给西塞罗送去了必需品和现金作为帮助。我猜想，他这么做的理由，或许是他当时认为自己待在首都更有利于解救西塞罗。在恺撒成为了赢家，同时也成为了罗马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的情况下，和西塞罗一样，阿提库斯也无法准确猜测到恺撒的想法。如果贸然行动，反而会引起恺撒的猜忌，因此阿提库斯干脆采取了不闻不问的策略。

这是个头脑多么清醒的家伙！西塞罗也接受了阿提库斯的想法，认为他留在罗马对自己更有利，在信中西塞罗这么写道："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建议通常都是对的。所以，不要对我的情绪有所顾虑，请畅所欲言。"从这封信中也看得出，西塞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可是，每当想起像西塞罗、阿提库斯这样高素质的人都无法理解恺撒时，我真的都很无语。人为什么会变得愤怒、试图报复，那是因为人总是把对手想得和自己一样。恺撒一辈子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不是因为他的伦理道德观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成与众不同。他拥有超然的优越感。一个绝对优秀的人怎么会自降身价，和普通人一样被愤怒和报复的念头驱使呢？恺撒和苏拉相似之处很多，但在这一点上，两人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称恺撒的这种观念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博学多识但又缺乏"真正贵族精神"的西塞罗和阿提库斯揣摩，自然是无法揣摩到恺撒心中境界的。

接下来要叙述的一段小插曲引自普鲁塔克的著作。不知道是因为羞于启齿，还是因为马上就能与好友面谈，西塞罗在信中特地隐去了这件事。但这件事的发生像风一样吹散了西塞罗的不安以及阿提库斯的深谋远虑。事情是这样的：

在布林迪西等待恺撒回国的西塞罗，一听到恺撒上岸的消息，就急切地前往与之会面。走在路上的西塞罗，心中尚怀着一线希

望，期盼着恺撒也许能宽恕自己。但同时西塞罗又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请求眼前的大赢家恺撒放过自己，显得太没有格调了。他的内心委实纠结无比。

其实，西塞罗真的没必要腹诽恺撒之人格，也没必要轻率地揣测恺撒的立场。因为当恺撒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看到情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西塞罗时，他特地下马朝他迎面走去。他不仅当街拥抱了西塞罗，还与西塞罗亲热交谈着走完了数百米的欢迎夹道。

这真是个反映出人类气度差别的绝妙故事。

在这之后，西塞罗立刻修书一封，从布林迪西发给在韦诺萨的妻子。信中他告知了回家的时间，以及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入浴，并嘱咐妻子充分准备，以便让他回家后就能过上顺意舒心的好日子。

西塞罗的不安烟消云散了，而恺撒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政治家安东尼

对将领而言，战败后处理士兵很难，战胜后安置士兵也并非易事。因为给予士兵休养时间是必要的，而这个休养的时间又不能太长。为了避免士兵们在冬天以及休战期过于闲散，恺撒制订了一项政策，命令士兵们负责修筑贯通“罗马世界”的主要道路。

法萨卢斯会战获胜后，恺撒决定亲自率兵追击庞培，不过他并没有带上在都拉斯和法萨卢斯作战的主力精锐，而是命令他们回到意大利休整。恺撒把安置精锐的任务交给了留在国内的安东尼。自恺撒于元前47年出任独裁官后，曾经的骑兵团团长安东尼成了罗马世界的第二号人物，代替恺撒执掌国内政务。那一年安东尼虽只有34岁，但拥有多次跟随恺撒征战的丰富阅历，从资历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安东尼行使“代理”职权的这一年，正好是“老大”恺撒缺席的一年。并且治理国家和治理军团可不一样，当团长时只要服从恺撒的命令就行了，而现在的安东尼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情况。

一、因为古罗马独裁官的权力不仅限于军事，还延伸到政治等国家管理的各方面。与此相对，作为“代理”统治者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二、安东尼要处理的不仅是战争事务，和平时期的国家管理也是他的职责。

三、恺撒曾严禁对庞培派进行处罚，不得流放，不得没收他们的财产。因而要求安东尼必须既温和地应付反对派的挑衅，同时又维护国内稳定，这给安东尼出了个大难题。

四、恺撒交给安东尼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防止恺撒派获胜后飞扬跋扈。那些支持恺撒的年轻人——用西塞罗的话说就是“罗马的青年激进派”——或许在胜利后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来到了，从而对反对派肆意妄为。因为拥趸们反客为主，比倡导者本身更为激进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身为“激进派”一员的安东尼，接到的任务就是控制好他的这些伙伴。

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团都是从高卢战役开始就跟随恺撒南征北战的精锐部队。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一直作为恺撒军主力征战不休。恺撒希望他们这次能好好休整，以迎接他回国之后即将开展的另一次重大战役。安东尼的另一个重担是，负责这些部队休整的准备工作。

从处理西塞罗的例子上可以看得出，34岁的安东尼为完成这些任务拼尽了全力。但从西塞罗在布林迪西滞留一年这个结果也可以看出，无论安东尼怎么努力，他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很多事情最终仍不得不依赖恺撒决断。

不过，在恺撒缺席的这一年里，罗马本土倒也没有发生庞培派被杀、被流放的事件，只是有不少庞培派的财产被没收了。因此恺撒回国的第一件事是命安东尼将没收的财产归还。而安东尼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处理好精锐部队的安置任务。战场上管理军队游刃有余的安东尼，一到和平时期反而手足无措了。这摊子事也不得不等恺撒归国后加以处理。

解决完西塞罗的事情后，恺撒沿着阿皮亚大道奔向首都的期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安东尼从罗马发来的急报。罢战又发生了，精锐军团中的部分士兵，集体要求退役。而且此次的主谋第十军团的士兵们已经手持武器，齐聚城外的马尔斯广场。大法务官撒路斯提乌斯（后来的历史学家）带着奖赏方案前去交涉，结果被士兵们赶了回来。

说起这个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第十军团，在地中海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英雄团如今举起了罢战的大旗，这事非同小可。况且，对恺撒而言，现在正是需要他们前往北非肃清庞培余党的关键时刻。

从阿皮亚大道进入首都的正南方向，正好与马尔斯广场所在方位相对。恺撒对近侍们的劝阻置若罔闻，连日耳曼骑兵担任的侍卫们都没带，策马横穿罗马城，单骑出现在闹事的士兵们眼前。时隔一年，再次与第十军团士兵们相见的恺撒，没有任何寒暄，而是突然开口道："说！想要什么？"士兵们纷纷叫嚷着要求退役。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在即将开始的北非战场上恺撒是非常需要自己的。因此这个退役的要求不过是希望恺撒能答应增加军饷提高奖励而已，原本他们就没想过要真正退役，还是希望能跟随恺撒继续征战。然而恺撒只说了一句话："我准了。"

闹事的士兵们没料到恺撒会这样回答，挥舞剑的手顿时停在空中，叫嚷声也瞬间停止了，广场上陷入一片沉寂。面对哑然的士兵，恺撒接着说："乡亲们，我恺撒一言九鼎，在我及我的士兵们得胜凯旋之后，各位的饷银及其余奖赏定会如数给付。在此之前，请乡亲们到安全的地

方静候。”

恺撒的这一声“乡亲们”，在以精锐自居的第十军团士兵们听来，无异于晴空霹雳。这下他们真是成为了退伍士兵，成为了和恺撒无情无缘的普通老百姓。多少年来，一直被恺撒热切对待的“战友们”，现如今却成了“乡亲们”。这种被恺撒当成陌生人的感觉，让第十军团的士兵们深受打击，再没心情要求罢战、要求加军饷。士兵们一边流泪一边高喊道：

“我们要重回军队！”

“我们要追随恺撒继续战斗！”

不过对于这一切，恺撒不再应答。曾经意气风发的第十军团此刻显得无比消沉。在随后北非战役的备战过程中，恺撒下令麾下军队在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集合，却独独没有通知第十军团。被冷落的第十军团像只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默默跟在前往西西里岛集结的大部队后面。等他们再度接到恺撒的参战命令时，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这一次恺撒又赢了，既没有发奖金也没有提高薪水就收拾了第十军团，而且最后还让他们乖乖地主动要求作战。后来有位学者这么评价：“恺撒简直是个演技一流的幽默剧大师。”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在介绍这一幕时，异口同声地称赞恺撒“仅出一言，便已扭转乾坤”。

这一幕里的恺撒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语言才能，正如他所说：“文章好坏，取决于言辞。”

不过在这一点上，在希腊留学的高学历安东尼和恺撒相比则相形见绌。

接连处理完西塞罗、第十军团罢战以及补救安东尼政策失误之后，

离再度出征为数不多的时间里，恺撒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一直被恺撒看做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的——经济问题。

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年代，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很无力。借钱的人怀着不还别人也拿自己没办法的心理，欠债不还，有钱的人则把钱都藏匿起来。社会的走向和恺撒搞活经济的预期完全相反。而在处理对策上，安东尼又犯了错误。

以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和他的爱徒卡埃里乌斯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派”们，认为这是胜利之后为所欲为的时代。因此分任大法务官和护民官的两人无视经济规律，提出一项将庞培时期的欠款全部归零的议案。而安东尼以在恺撒回国前，暂缓确立一切新法案为理由冻结了该项提案。但是这项法案给罗马公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欠款清零这项政策有可能会实现，这样谁还愿意去还债呢？因而罗马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无法循环的困境。

为了打开局面，恺撒回国后尝试着推行了两项法案：

一、罗马地区年租金在500第纳尔以内，意大利地区年租金在125第纳尔以内的居住租房，免除翌年租金。

二、免除翌年所有利息。这项法案没有限定适用范围，但规定除该年外，其余所有利息应当以恺撒两年前制定的法律为标准进行支付。内战爆发后出现通货膨胀，恺撒的这项法案其实就是刨去了通货膨胀的部分，而以内战爆发前的价值标准进行还款和支付利息。此外，恺撒也调整了年利率，此前的年利率一直是12%，这次利率调整得更低。这样，债权人虽然损失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收益，但可以收回本金以及利息。

恺撒应该是想通过第一项法案刺激消费，第二项法案刺激投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恺撒的政治并不只是为了扶助贫民。他深知社会福利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福利和搞活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因而不顾长久以来

树立的“平民政治家”形象，转而经营经济。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接班人。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剩余的庞培派。这倒与安东尼执政失误无关，因为这件事只有恺撒才能解决。

与对待西塞罗一样，恺撒也让他们自由选择去留，哪怕是前往北非参加正在集结的“庞培军”，也绝不阻拦。对于愿意留下的人，也像对待西塞罗和瓦罗一样，允许他们在罗马居住，既不没收财产也不剥夺公职，仍给予他们言论自由。此外对那些仍希望从政的人，恺撒给予他们公平竞争职务的机会，不过在此之前要求他们必须归顺自己。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都在归顺之列。恺撒严守“我和苏拉不同”的诺言，并没有设置什么臭名远扬的“处罚黑名单”，也没有设置“待察黑名单”。恺撒从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阶级”和百人队队长中选出优秀人才填补因议员辞世而产生的元老院空缺。而那些身居北非的庞培派议员们，如梅特鲁斯·西庇阿、小加图、亚弗拉尼乌斯、佩托雷乌斯、拉比埃努斯等，恺撒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元老院议员身份。

恺撒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处理完上述事情。此外为了避免自己前往北非期间，国内政治出现无人领导的真空期，恺撒还提前选好了下一届的执政官。他以独裁官兼执政官的身份，任命与自己同为执政官的雷必达掌管公元前46年的国内事务。而由于对安东尼执政能力的失望，恺撒既没有让他连任，也没有让他出任执政官。不过对马克·安东尼来说，因为自己和恺撒相差18岁而且母亲和恺撒同属尤里乌斯家族，不论从年龄还是血缘关系上都认为自己是恺撒接班人的最佳候选人。因此，安东尼认为恺撒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不过是暂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恺撒已经知道了安东尼的统治能力。然而我想，安东尼自己是不是一辈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这也是恺撒死后，作为罗马世界主人之一的安东尼能力有限的佐证。

北非战役

在我看来，这世上的将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等全军整装完备后再展开决定性行动；另一类则是自己先动，等追随的士兵到齐后马上进入决战。庞培属于前者，恺撒则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在我这个军事门外汉眼里，法萨卢斯会战已经过去一年了，难道还有急切进行战斗的必要吗？不过，或许在恺撒眼里，战争本就该通过反复施行小规模的试探——哪怕是错误的试探——获得战机，然后一鼓作气进行最终对决。因此，在这位永远先行的最高司令官身后，总是跟着一群追赶他脚步的士兵。

像海湾战争那样，即使在20世纪交通发达、运输便利的现代，要集结50万大军完成战争准备也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2000年前的恺撒，尽管所需集结的军队规模只有海湾战争的十分之一，行军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地中海周围，但作好战斗准备肯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高卢战役时，恺撒每年冬天都慎重选择冬营地的目的，除了方便监视辖区外，也考虑到有利于以后军事行动的开展和集结军队的速度。但是，高卢战役的战场仅仅包含了高卢、不列颠部分地区、莱茵河以东部分，对应现代地名，也就是包含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的部分以及德国的西部。而内战时期的战争，则涵盖了地中海周边。恺撒的行军范围包括了现代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以及突尼斯，因此无法根据翌年的战斗而选择冬营地。此外，恺撒在内战期间还经常要利用休整时间回到首都处理各项政务，为此军队营地设置在意大利本土，从那里开往下一个战斗地点较为方便。这一年的战场是庞培派残余分子聚集的北非行省（现在的突尼斯）。恺撒部队在西西里岛西面的港口马尔萨拉集结，计划从那里沿海路到达北非。向来身先士卒的恺撒这一次又是比大部队先进入了北非。

恺撒执笔的《内战记》只写到庞培之死，后来描写埃及战役以及“我来，我见，我征服”法尔纳凯斯战役的《亚历山大战记》均由秘书

希尔提乌斯代笔。而之后的《阿非利加战记》究竟是希尔提乌斯所写，还是恺撒帐下某位幕僚所著，一直是个谜。《阿非利加战记》的文笔比《高卢战记》、《内战记》差了一大截，在选词的简洁明了、洗练达意上不仅远不及恺撒，甚至连恺撒的模仿者希尔提乌斯都比不上。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其毫无价值。首先，通过该书可以了解非洲战役的全过程，如同亲临现场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史料参考价值。其次，正因为该书不是恺撒亲笔撰写，反而更能看出在士兵心目中恺撒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简而言之，虽然不能通过该书得到语言上的阅读快感，但能从中体会出恺撒和部下之间深厚的人情味。我们来看一段《阿非利加战记》的原文：

> 恺撒以骑兵正常的速度行军，但是中途一刻也没有停留，于（公元前47年）12月19日抵达马尔萨拉，随后立即登船待发。跟随恺撒一道抵达马尔萨拉的只有600名骑兵，步兵连一个军团都没到。在等待步兵军团期间，恺撒也没有在市内停留，而是在将彰示总司令身份的红色帐营驻扎在港口最前沿，海浪甚至都能拍击到帷幕。这是为了告诉追赶来的步兵们，别想在西西里休息，前往北非的征途随时都可能开始。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在逆风的日子里，恺撒也命令后续到达的士兵们和水手们全体登船待命，时刻等候风向的改变准备出海。这样，那些以为全军集结后可以休息一阵子的士兵们，也不得不紧张备战了。

在这样持续备战的日子里，终于迎来了全部参战军团。此次军团大部分由新兵组成，精锐老底子算起来只有第五军团的士兵。第五军团是恺撒为了应对内战而在法国南部行省编成的军团，所有士兵都是高卢人。在编成初期，他们既没有罗马公民权，也不能算做正规军，因此又被称为“云雀军团”。但内战结束后，为了表彰他们在战役中的忠诚和勇猛，恺撒不仅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还将之升级成正规军并授予“第五军团”番号。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方的情况。根据恺撒在马尔萨拉搜集的情报，身处突尼斯地域的庞培余党兵力正在增加。庞培余党通过从地中海各个地区雇用兵力，已经拥有10个军团共3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的战斗力。此外，努米底亚王麾下还有以罗马方式训练出来的4个军团，计2.5万名重装步兵，以及鼎鼎大名的6000名努米底亚骑兵和120头大象。这样加起来庞培派共有6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在将领方面，拥有海上指挥权的非洲行省总督也站在庞培余党一侧，这样他们在海上的战斗力上也占有优势。

而恺撒不过只率领了10个步兵军团和4000名骑兵，其中还包括了5个新兵军团。其余5个精锐军团由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等从高卢战役头年或者第二年开始就跟随恺撒征战的老底子，以及刚刚晋级的第五军团组成。和往日的战争一样，这一次恺撒军在人数上仍然处于劣势。面对敌方的6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的强大战斗力，恺撒手中只有3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威力相当于现代坦克的大象则一头也没有。此外，恺撒是客场作战，连军粮补给都得从西西里远道运送过来。

士兵们也非常清楚现在的情况，不过他们关心的是将军的打算。根据《阿非利加战记》记载，这位53岁的总司令“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个对己不利的局势，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自信和希望”。而且在抵达马尔萨拉后仅仅一周，甚至连1.8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都没有集结完毕，就于12月27日下令出发。同时留给西西里总督亚里埃努斯负责军粮补给和安排后达军团出海两项指令。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登陆地点了。一般人在没有到过非洲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从补给基地西西里岛出发，顺风一天就能达到的突尼斯海湾登陆。因为该海湾不仅离西西里岛最近，而且海岸线绵延百余公里，在该地登陆，最不容易被敌军守卫发现。如果在该地登陆，由于距北非行省首都、庞培余党盘踞的乌蒂卡最近，既有利于迅速展开攻击，而且还可以利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设立的科尔涅利乌斯营地。

早在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9年，受恺撒之命远征非洲的库里奥就是在该地登陆的。

不过选择该地登陆也有不利因素。

首先，登陆地点距敌方大本营很近，虽然可以尽快对其大本营进行突袭，但同时也意味着要在补给不充分的情况与敌人展开正面对决。

其次，敌人在大本营周围的防卫自然是相当严密的，进攻难度显然加大了。

再次，庞培余党盘踞的北非行省西面紧邻努米底亚王国。该国国王尤巴就是曾在北非战役中全歼库里奥大军的头号人物。而以梅特鲁斯·西庇阿为首的庞培余党们已和尤巴结成了战争联盟。努米底亚王国的领土囊括了现今阿尔及利亚的整个东部，因此，如果战斗在突尼斯北部打响的话，尤巴马上就能率军到达并展开战斗。

因此恺撒最终没有在突尼斯北部登陆，而是选择了突尼斯的东部。这样对他来说，有三个好处：

一、对双方都是远距离作战。虽然恺撒的补给从马尔萨拉港出发需要4天才能到达，但是敌方也并不轻松，战斗地点距他们补给基地乌蒂卡城也有200公里。

二、而敌方的盟友努米底亚王，更是需要跋涉近300公里才能与庞培余党会合。

三、对客场作战的恺撒来说，军粮是致命的问题。在不能完全依靠海对岸送来军粮补给的情况下，当地征集粮食的多少关系到军队的存亡。而突尼斯的城市大多集中在北部，非洲总督的影响力在东部相对要弱，因此在东部登陆相对而言较为有利。

恺撒并不是个永不失手的人，但他绝不会在同一条河流里跌倒两次。都拉斯战役中由于过于接近敌军补给基地而惨败，这一次他大概不想重蹈覆辙。都拉斯战役后他改变战略，引庞培军离开都拉斯到法萨卢斯进行对决，由此获得了大决战的成功。而这次远征北非，他仍套用了彼时的战略，将诱敌远离大本营乌蒂卡作为首要战术。

恺撒登陆的突尼斯东部，虽不似北部繁荣，但也有诸如哈卓美特姆、大莱普提斯、塔普苏斯等的沿海城市，并非一片荒山野岭。因此无论在哪里上岸，都很有可能遇上敌军。不过距离恺撒的最终目标乌蒂卡城，依然还有200公里的路程。恺撒并没有在哈卓美特姆北面绵延百余公里的沙滩上登陆，而是选择了从城池诸多的南面上岸。因为只有对守军进行攻击，才能引诱真正的敌人从乌蒂卡城赶来，才能达到调动敌人远离安全的、物资丰富的大本营的最终目的。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需要集结大军，而是首先要让敌人知道恺撒已经来了。在敌人急行200公里奔赴南部时，恺撒也有了足够的时间让大军陆续抵达。等待援军、寻求战机、一击即中，这才是恺撒的战略。在面临客场作战、敌众我寡等诸多不利因素时，像恺撒这样采取诱敌远离大本营的策略，实在是军队将领战略的不二之选。

不过普通士兵自然无法理解大将的胸中丘壑，而恺撒也并不是一个会向部下说明战略的司令。加上此次出征的第一拨多半是新兵，并不像老兵那样和恺撒心意相通、绝对信任。因而恺撒的战略遭到了年轻新兵们的不满。这种情绪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只集结1.8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就出发前往拥有6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及120头大象的敌营，这样的司令在他们眼里就是轻率和鲁莽的代名词。对于这一点，士兵们私下议论纷纷。

二、士兵们不满的另一点是，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寒冬里最冷的时候打仗。新兵们显然还没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恺撒军出征是从不分酷暑与严寒的。

除了士兵外，庞培余党也没想到恺撒会在12月末渡海作战。从日历上看，恺撒离开马尔萨拉港的时间是12月27日。但是，按照此后一年内开始实行的儒略历所显示的实际季节来看，那时仍是10月。此时的地中海并不是适航季节。早在实施历法改革之前，恺撒头脑中历法改革的想法就已形成。而其他人还活在陈旧历法观念里，毫不怀疑地按照比实际季节提前两个月的旧历法生活。

从马尔萨拉出海后的第四天接近突尼斯东岸时，新兵们的不满情绪越发强烈。因为海上航行不同于陆上行军，满载士兵的近百艘战船在海上航行，只有依靠彼此相望来判断下一步的行动。如果看不到战友的船只，他们就会迷失方向。然而恺撒没有对任何一位船长说过具体的登录地点。因此当其余船只看不见恺撒所乘坐的主船时，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该在哪里登陆。

正常情况下，像登陆作战这样的秘密战略安排一般会以密信形式下发给各船长，这样各船一出海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恺撒并没有这么做，以至于不少船只迷失了方向，也遭到士兵们“轻率、鲁莽”的抱怨。《阿非利加战记》作者在书中为恺撒进行了辩护：因为突尼斯东部敌人防守力量都很薄弱，只要上岸后能集合，那么军队在哪里登陆效果都差不多，故而恺撒没有给出具体登陆指令，而让各船自由选择地点登陆。事实上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上岸后集合时，由于各船长根据当时情况自主选择适合的登陆地点，军队反而毫发无损。这一结果也堵住了不断抱怨的众口。

士兵们虽然嘴上不再抱怨，但心里仍惴惴不安。因为突尼斯东部的三个主要城市，除了大莱普提斯向恺撒大开城门外，哈卓美特姆和塔普苏斯仍旧被庞培余党把持。他们非但不理会恺撒的劝降，反而向乌蒂卡报告了恺撒的行踪。恺撒的新兵们大概想到北方的地平线上即将冒出6万名敌人的身影而忐忑不安吧。加上总司令在军营修筑完毕后带着部分军队到周边视察，此时并不在军中；从西西里开来的后援军团又尚未到

达，此时军中气氛并不高涨。《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是这么描述这期间士兵们的心态的：

> 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都没人知道最高指挥官在想些什么。在担心与不安的驱使下，每个人都努力猜测恺撒的意图。毕竟这样小规模的兵力与敌人的强大兵力相比，好像陷入敌人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更不用说敌人还拥有恐怖的骑兵阵势。士兵们不安的情绪，连他们的直接首领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都没有办法安抚。因为他们和士兵们拥有同样的心境。不过恺撒快乐的表情和不知疲倦的行动，恢复了士兵们的自信。事实上，士兵们每次看到恺撒，都能感受到他伟大的精神和无比的自信，内心也渐渐地安定下来，勇气也日益恢复。因为恺撒给予了他们希望和信心：只要凭借恺撒的智慧及力量，那么任何事情最终都能获得好结果。

士兵们原本认为恺撒是轻率、鲁莽的观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彻底转变了。这些新兵们后来也成为地中海世界里“恺撒战士”的代名词。

转眼到了公元前46年1月底，经过千锤百炼后的“恺撒战士”后援团终于到了。这批后援包括了随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第十三、第十四两个精锐军团，以及恺撒亲自培养的高卢800名骑兵和负责投石、弓箭的1000名士兵。随着第二拨精锐的到来，恺撒军的战斗力增加到了2.5万名重装步兵，2800名骑兵以及包括投石手、弓箭手在内的1150名轻装步兵。不过这些兵力还不到敌军的一半，骑兵更是连对方五分之一都不到，因此恺撒并未改变最初构想的战略。

恺撒首先命令营地的中心修筑一条长长的防护栅栏，以应对敌方压倒性优势的骑兵。接着他亲自出马远近征集军粮，以确保正常供应。亲自出马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保证控制士兵们不以暴力掠夺的方式征粮，另一方面可以争取周围城池的支持以增加己方力量。在敌人的地盘

上作战不能少的，是尽量获得当地的支持。而在当地必定有对北非行省统治不满的部落。争取他们支持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保证军粮的供应，更可以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不至于在大战之际腹背受敌。

此外，身在突尼斯东部的恺撒，已经把战略眼光投放到了整个北非。努米底亚西边与毛里塔尼亚接壤，这两个国家都是承认罗马霸权统治的罗马盟国。但和努米底亚支持庞培不同，毛里塔尼亚并不热衷于参与派别争斗，内战时期也并没和努米底亚政见一致。不过毛里塔尼亚并不是一开始就支持恺撒的。因此恺撒拉拢了毛里塔尼亚国王的军师，罗马人西提乌斯，希望其说服毛里塔尼亚国王派军进攻努米底亚以达到牵制尤巴的目的。

同时恺撒也注意到了努米底亚南面撒哈拉沙漠中的部落。他们以向努米底亚提供兵源为代价换取部落的延续。恺撒注意到这点后，知道庞培余党的军队事实上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因此他决定从内部分化他们。恺撒的这个策略，随后被验证为正确的，持续地获得了成功。

知道恺撒登陆的庞培余党们是否觉察到了恺撒引蛇出洞的战略呢？这一点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如果经历了都拉斯战役和法萨卢斯会战，还没能领悟到恺撒的惯用战略的话，那这些人还真是愧对“将领”这个称号。庞培死后成为军队首脑的梅特鲁斯·西庇阿、小加图、亚弗拉尼乌斯、佩托雷乌斯以及拉比埃努斯，还有在北非准备应战恺撒的全体庞培派指挥官，全都在希腊与恺撒有过对阵经验。因此，我相信他们对恺撒的战略是有所察觉的。或许正是因为有所觉察，他们才没有在得知恺撒登陆后马上行动，而是慎重考虑奔赴200公里外的后果。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出动了。拉比埃努斯指挥骑兵作为先头部队，虽然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但并没有打败恺撒，反而被恺撒构筑的防护栅所伤，每次攻击后回营的骑兵数量都在减少。在骑兵较量期间，恺撒的第二拨精锐已经到位。并且恺撒在突尼斯东部的各项策略开始有了一定影响力。这一切使远在乌蒂卡城的诸位感到不安。梅特鲁斯·西庇阿终于

决定出动大军。恺撒终于等到这一天，战场真正从突尼斯北部转移到东部。

两军在相隔数公里的地方正面对峙，却并没有即刻开战。双方都各有考量。

庞培余党不开战是因为他们的盟友努米底亚王尤巴在支援途中接到国内被毛里塔尼亚进攻的消息而匆匆回国防御。失去了尤巴军队的支持，西庇阿也失去了与恺撒正面对决的勇气。

恺撒则是因为本应从西西里前来支援的第三批军队迟迟不见踪迹。第三批援军由精英中的精英，第九、第十两个军团组成。第十军团因去年发起罢战而被恺撒责令最后出发。恺撒本只想以示惩戒，却不料第十军团出发时碰上海上大风暴，只能留在马尔萨拉港内，现在恺撒内心大概是后悔不已吧。虽然恺撒为平息罢战事件故意把第九、第十军团士兵称为“乡亲们”，但实际上恺撒真正最信赖的还是他们。《阿非利加战记》中对恺撒此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描述：“内心与双眼都在不分昼夜地遥望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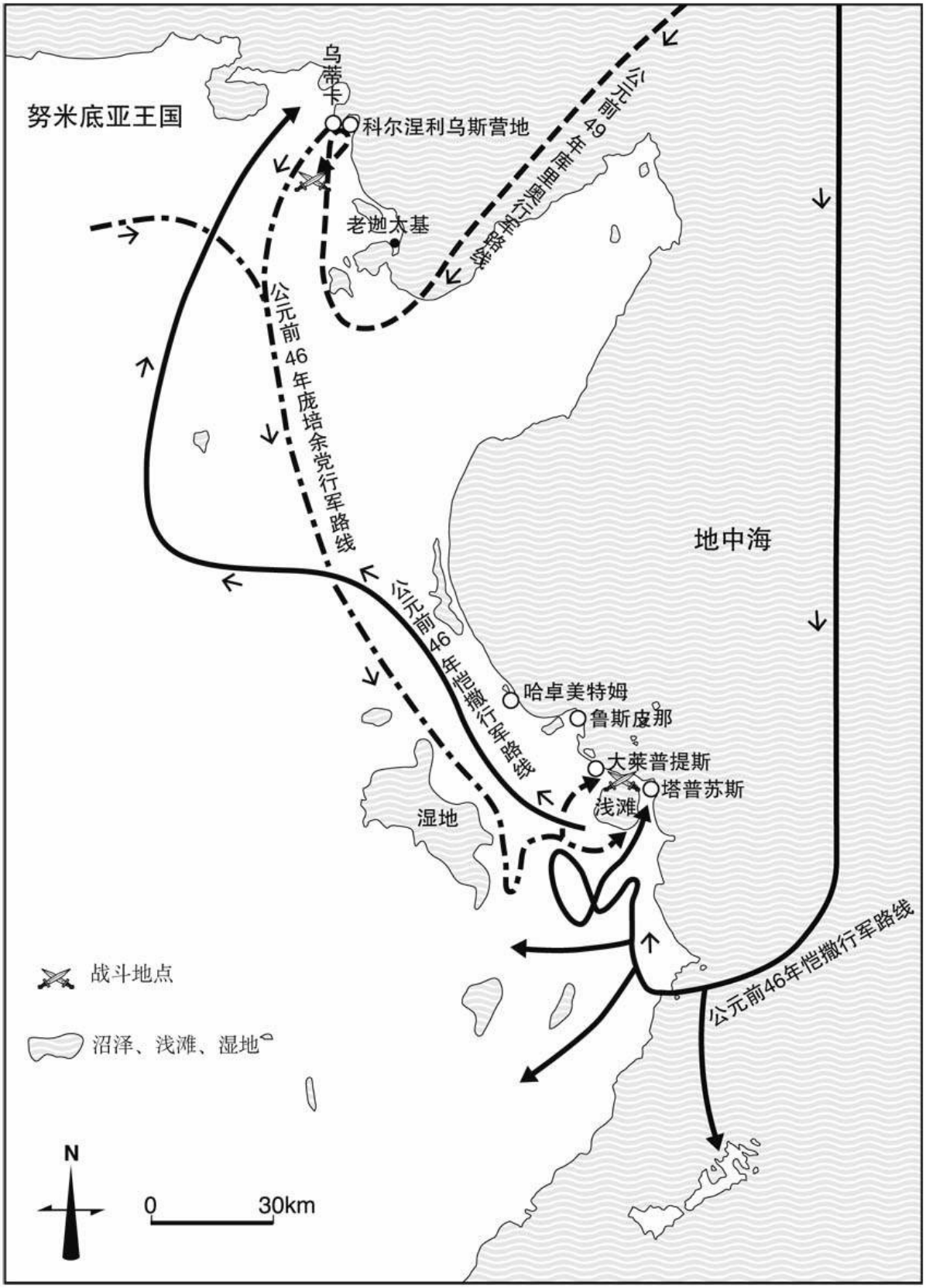
尽管“已不像平时的恺撒，连进攻都不再积极”，恺撒倒也不是无谓地消磨时光。等待期间，他亲自传授作战方法给那些年轻缺乏经验的新兵。《阿非利加战记》中也有相关记载：

> 与多民族组成的北非大军对阵前，恺撒开始训练新兵。不过这不像是实战经验丰富、战绩辉煌的精兵对新兵的训练，也不像是总司令对新兵的训练，倒像是剑道高手在教刚入门的弟子。
>
> 与敌人应当保持多远的距离，突袭敌人时应当到什么限度，什么样的姿势既可以保护自己又能击倒敌人，进攻的方法，后退的窍门，以及有效投石的技巧，这些都是恺撒教授的范围。

对于精锐士兵们，恺撒也没让他们闲着。这些老兵虽然有着与高卢人、布里塔尼亚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和东方诸城邦人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是他们从不曾和大象战斗过。

因此恺撒特地找来了大象，在活生生的“教科书”前恺撒一面让士兵们真实地触摸大象，一面详细地向士兵们讲解。士兵们逐渐了解了大象这种动物有什么样的习性，攻击力如何，以及其作为武器的缺陷有哪些，大象的哪一部分最容易攻击，如何朝大象投石最有效，长矛刺在大象哪个部位最有效等等。除士兵外恺撒把战马也拉到大象面前，让它们日夜与大象相处直到习以为常。最后恺撒让士兵们亲自实践，以弓箭和石头攻击大象直到庞然大物倒下。经过反复训练，士兵及战马都增强了信心，不再害怕象群。

在训练的过程中，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第三批士兵，接着第四批士兵也到了。第三批士兵由第九、第十军团组成，第四批士兵则是由那些因生病或其他事务耽搁最晚出发的人组成，包括4000名重装步兵、400名骑兵及弓箭手、投石兵等1000名轻装步兵。这样恺撒大军最终形成，共有3万名重装步兵、3200名骑兵、2150名轻装步兵。不过即使这样，规模还是远远不及对手。


努米底亚王国
乌蒂卡
科尔涅利乌斯营地
老迦太基
公元前49年恺撒行军路线
公元前46年庞培余党行军路线
公元前46年恺撒行军路线
地中海
哈卓美特姆
鲁斯皮那
大莱普提斯
塔普苏斯
浅滩
湿地
公元前46年恺撒行军路线
战斗地点
沼泽、浅滩、湿地
N
0
30km

北非战役展开图

几乎在恺撒完成战斗准备的同时，敌方也调整好了战斗状态。努米底亚王把国内的防卫工作交给了下属，又亲自率军匆匆南下赶往恺撒所在地。到此为止，恺撒认为开展积极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己方军队集结完毕为进攻提供了可能，在敌方领地待的时间不能过长则促使恺撒不得不进攻。此时已进入4月。

只是敌方好像并不急着进行决战，面对恺撒多次发起的挑战，他们只在小范围内应战而并没有大战的态势。仿佛又回到了法萨卢斯会战之初和庞培决战时的情景。于是恺撒决定跟对付庞培一样，这次也采用引蛇出洞的战略：攻打敌方战略要地，迫使敌人不得不正面迎击。恺撒一面指挥军队挑衅，一面寻找战机，此时大莱普提斯以南15公里的塔普苏斯进入了恺撒的视野。由庞培旧部镇守的塔普苏斯是战地周围屈指可数的战略要地之一。

其实战地周围最有战略意义的要塞，并不是塔普苏斯而是哈卓美特姆，只不过后者一直就紧闭城门。为什么恺撒不进攻哈卓美特姆而选择塔普苏斯作为切入点呢？这就关系到恺撒独特的军事眼光和塔普苏斯的地形了。塔普苏斯（现在的拉斯丹纳斯）位于半岛前端，陆地一侧紧邻宽阔的咸水湖。该咸水湖由北到南为2公里长的陆地所围绕，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内陆的一部分。又由于该咸水湖里积蓄的都是海水，因此一直作为盐田在使用。恺撒预计如果攻打塔普苏斯，敌人必定会采取封锁南北部陆地的战术，将兵力分成两股从海上和陆上对恺撒军形成夹击。一旦他们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敌军原本数量上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据此，恺撒决定以进攻塔普苏斯为诱饵，引敌分化作战。

公元前46年4月4日一大早，恺撒率领彻夜行军的部队出现在塔普苏斯。到达目的地后，恺撒立即开始构筑罗马四方形的典型营地，并在营

地完成后佯装快速“攻城”。攻城不过是个诱饵，恺撒并没有全力进攻。为了让士兵们尽快恢复体力，他命令士兵们轮流作息：一半在营内休息一半攻城。敌人果然追来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5日傍晚，敌军到达了半岛入口。不出恺撒所料，敌军果然采取了兵分两路的夹击战略。

梅特鲁斯·西庇阿率领着象群及一半兵力封锁北部陆地，努米底亚王则率领另一半兵力封锁南部。梅特鲁斯到达后也即刻令士兵们修筑营地，不过他的士兵比起“恺撒战士”，不仅在战斗能力上有差距，连修建营地的速度都要慢一拍。恺撒早料到他会这么做，也早就估计到了两军建营速度上的差异。

塔普苏斯会战

公元前46年4月6日天刚亮，恺撒就展开了行动。他留下2个军团在塔普苏斯应对敌人从背后的突袭，自己率其余全部力量绕到了军营后方。他大概是要根据敌人阵型再确定己方的具体阵法，因此行动开始时士兵们仍以原有军团为单位。不过看到敌人阵型后，恺撒却作出了一系列有悖常理的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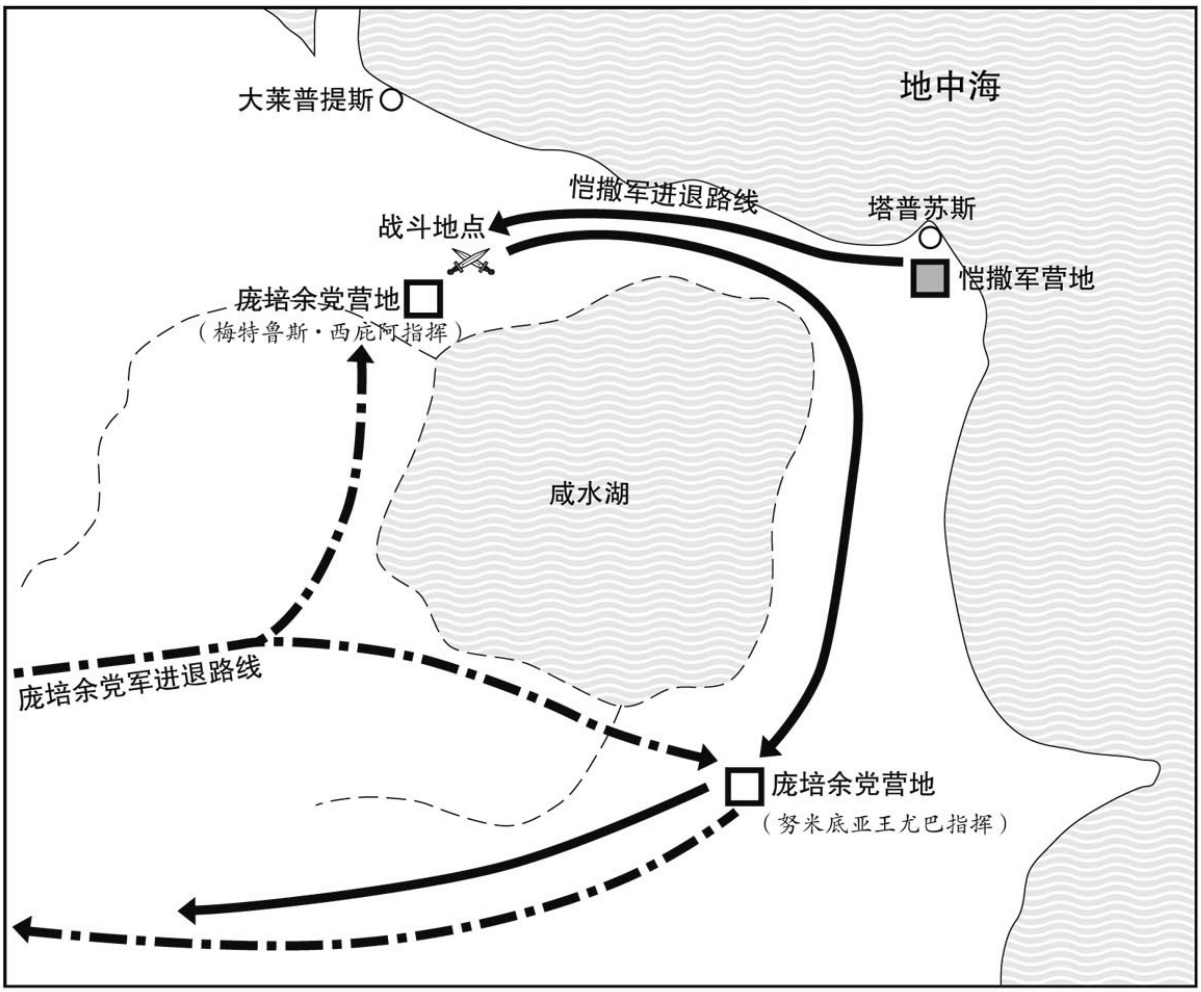
在普通的阵型中，骑兵总是会被安排在左右两翼中的一边以发挥其机动力，在法萨卢斯会战中恺撒骑兵就集中于右翼。但这一次恺撒把骑兵全部放在阵地的正中间。此外，靠近咸水湖的左翼由第十三、第十四军团精锐组成，临海的右翼由第九、第十军团组成。恺撒把第五军团分成两部分混入左右两翼中，他们只负责攻击敌军的左右各60头大象的象群，利用投石、投枪等手段各自负责赶跑它们。剩下3个军团的新兵，恺撒把他们安排在全军的正中央，骑兵身后。

另一方面，营地还没构筑完就慌忙应战的梅特鲁斯·西庇阿，匆忙之间只能用传统的阵法进行抵挡：左右两翼各有象群及骑兵，中央是重

装步兵。

尽管我是个军事门外汉，但是叙述战争的过程中，似乎也明白了：不论用什么方法，战术最重要的是能实现成功地包围敌人。而这个包围战术的最根本目的是快速瓦解敌人的主战斗力。

选择塔普苏斯作为第一战场意味着，恺撒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解决西庇阿军队，因此必须赶在西庇阿与南面努米底亚军会合前与之决战。速战速决是唯一制胜之道。恺撒打破常规，把骑兵安排在军阵的最中央。这样做是想以骑兵快速解决敌方军阵最中央的步兵，之后骑兵再分成两股，绕到敌军背后分别袭击左右两翼。负责从正面攻击敌人左右翼的是身经百战的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军团。第五军团如前所述负责解决象群。此战术如果运用得当，便能将敌军全部围歼，而且还是在海、陆两方分成两股围歼。这不仅使得歼灭战斗更易实施，而且更使战斗时间大大缩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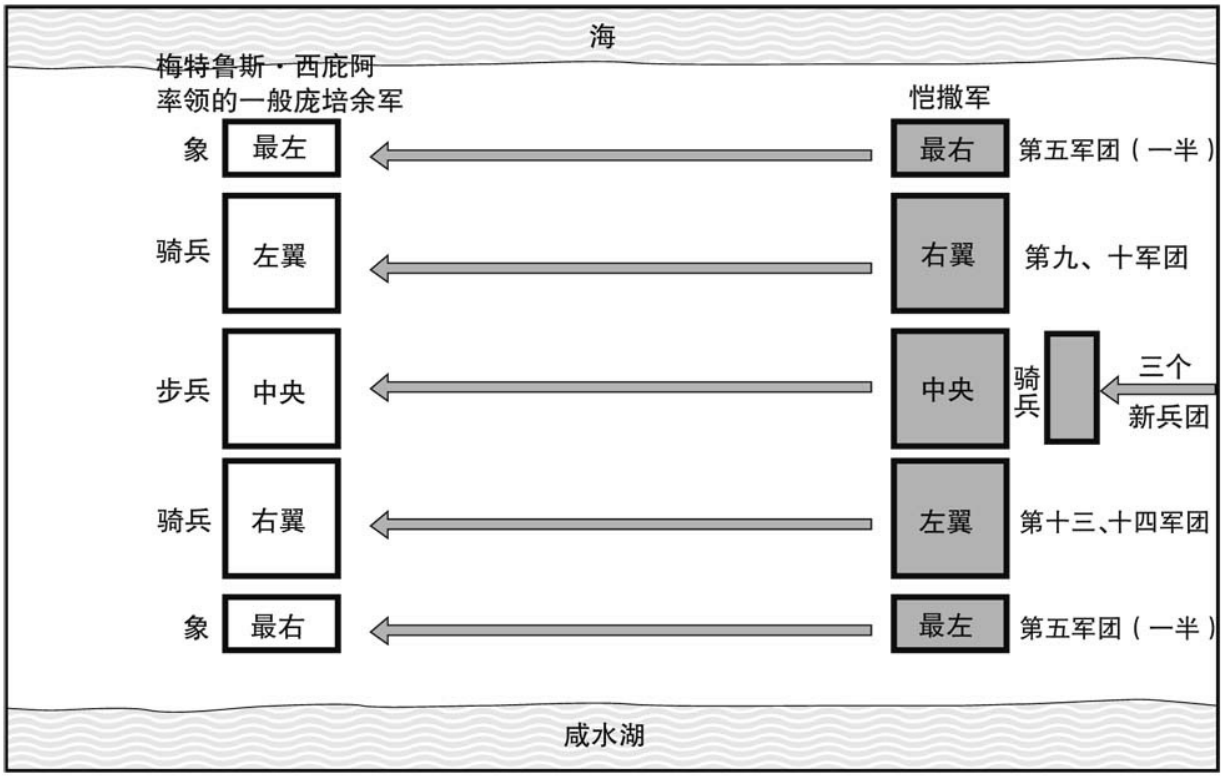


塔普苏斯附近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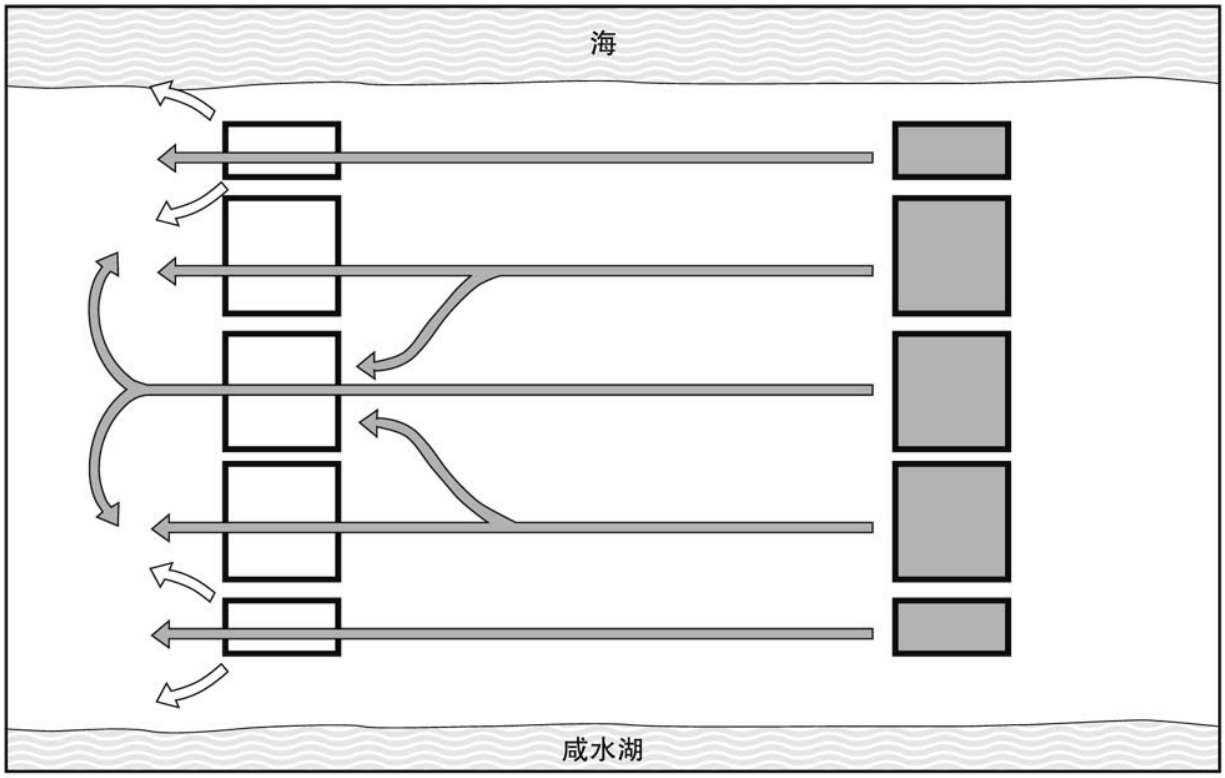
包围歼灭是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战术，经过汉尼拔拓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战术。甚至连汉尼拔的对手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也曾用该战术打赢过汉尼拔本人。法萨卢斯会战中，恺撒因骑兵战斗力弱小而使用过“秘密武器”，但总体上其“秘密武器”仍然是对前辈们包围全歼战术的沿袭。塔普苏斯会战中恺撒把骑兵安置在正中央的策略，实际上是把过去的一个包围圈拓展成了两个。只是这样做就要求他必须在努米底亚王军到来之前尽快地解决战斗，防止他们互相接应。

完成布阵后，恺撒军开始向敌军挺进。恺撒徒步穿行在即将与敌殊

死拼杀的士兵中间，来回挨个进行激励。象征着最高指挥官的红色披风在风中猎猎翻飞。恺撒准确地叫出每一位老兵的姓名，鼓励他们说："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战斗不辱盛名，不是吗？"对新兵，恺撒则鼓励他们要鼓足勇气，不要输给那些曾给恺撒军团带来无限声誉的前辈们。



塔普苏斯会战略图前半场



塔普苏斯会战略图后半场

但是在即将看到敌军全阵时，出乎恺撒意料的事发生了。曾发起罢战事件的第十军团将士们以为恺撒尚未完全原谅自己，为了将功补过，该军团的吹号手在没接到恺撒命令时就吹响了进攻号角。

恺撒原本计划距敌人更近一些再发起进攻。不过就像他自己在《高卢战记》中所写的那样："当将士们的战斗热情一旦迸发，与其打压控制，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在战斗欲望的引导下奋勇前行。"恺撒趁机发出全线压进突击的命令，自己翻身上马带头冲向了敌营。早就按捺不住的右翼第十军团和稳健的左翼军团见状，怒吼着"跟着司令一起上啊"，也冲入了战阵。恺撒全军众志一心，直插敌营。

战斗的过程一如恺撒所料，遭到第五军团攻击受伤的敌军象群狂躁地乱闯，不但没有起到制敌之效，反而掉头冲向己方的阵营，最后早早逃离了战场。拉比埃努斯指挥的骑兵团，前方被己方步兵挡住前进的脚

步，后方被恺撒骑兵包抄围堵，除了首领和几名骑兵逃逸之外，全部被歼灭。梅特鲁斯·西庇阿率领的3万名步兵中，战死士兵超过1万人，其余的也都四下逃散了。反观恺撒军中的伤亡人数不到50人，其中有些还是被杀红了眼的自己人错当成敌军而丧了性命。

整个战斗不到半天就结束了。恺撒命第九和第十军团追击逃窜敌军，自己则率领大部队掉转头如利刃一般狂奔。不是回军营，不是回攻塔普苏斯城，而是直指努米底亚王尤巴的阵营。

从梅特鲁斯·西庇阿营地到尤巴营中间隔着一个南北走向的宽阔的咸水湖，当恺撒绕湖赶到时，梅特鲁斯溃败的消息早已传到尤巴军营。谁都没有勇气与恺撒对决，纷纷临阵脱逃，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军营。见此情形恺撒兵分两路，一路追击散兵游勇，自己则率一半兵马直奔尤巴逃往的扎马平原。150年前汉尼拔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决战的扎马平原，如今再一次成为了逐鹿之地。

不过左右150年后大局的战役，早在塔普苏斯就已上演。尤巴并没能在扎马堂堂正正地与恺撒对决，因为扎马的居民们把自己的国王关在了城门外。塔普苏斯会战的结果早已传遍了努米底亚的大街小巷，努米底亚国内掀起了一股投靠恺撒的热潮。无望的尤巴与庞培余党佩托雷乌斯最终以互刺的方式结束了生命。150年前因协助阿非利加努斯对抗迦太基而获得独立的努米底亚王朝，在这儿走到了尽头。率领毛里塔尼亚军队从背后袭击努米底亚的罗马人西提乌斯是恺撒获胜的功臣。恺撒于是任命其统治原来的努米底亚王国。之后恺撒率军北上，直奔乌蒂卡。

途中恺撒不断收到关于庞培余党的消息。首先是总司令梅特鲁斯乘船逃跑被俘，士兵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将其杀死。接着是法乌斯托斯·苏拉。此人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毫无功绩可言，仅仅因为是苏拉的儿子而被人们熟知。他也在逃跑途中被杀。最后一个消息是关于亚弗拉尼乌斯的。西班牙战役投降后，他因恺撒的宽恕而回到庞培身边，在法萨卢斯会战、塔普苏斯会战又接连遭遇失败。因为有过被恺撒

释放的经历，他怀着这次也能被释放的期待，带着一家老小和全部家产从城中逃出准备投降恺撒。但是他时运不济，在投降途中被强盗盯上了。那些对散兵游勇而言犹如秃鹫的强盗们，把这位曾经的罗马执政官、庞培派的元老以及整个家族掳得一干二净，并将除了奴隶以外的人全部杀死了。

小加图

由于海岸线改变，如今的乌蒂卡已经成为一个内陆城市，再难找到昔日的荣光。迦太基时代繁华的港口乌蒂卡是仅次于首都的第二大城市，迦太基覆灭、首都被毁后，乌蒂卡更是一跃成为了当地第一大城市。在罗马接收迦太基领地后，乌蒂卡曾作为北非行省首都存在了百年之久。打算在北非应战恺撒的庞培余党自然会把这样一个地方当做大本营，并且在乌蒂卡储藏了大量从周边征集来的军粮。

自迦太基时代起，港口城市乌蒂卡业已拥有完备的防卫设备。在此镇守的小加图收到塔普苏斯会战结果后，并没有像之前的将领一样逃走，而是打算凭借乌蒂卡充分的防御措施彻底抵抗。他以塔普苏斯逃回的1500名骑兵为主力，加上部分被赦奴隶，组成了防卫军。但乌蒂卡的居民们并不赞同，他们也知道塔普苏斯的结局因而拒绝协助防卫。没有居民的支持，负隅顽抗不过是一场梦。

小加图知道庞培的长子和次子在得知恺撒登陆北非时，为防不测早早逃往了加那利群岛。此外小加图也知道塔普苏斯会战后庞培余党将领中瓦罗和拉比埃努斯两人逃往西班牙。此时小加图若想脱身也是完全能逃走的。但是这个小加图无论是在以前希腊还是现在北非，都从未萌生过在恺撒阵前脱逃的念头，也从未想过投降。比恺撒年轻5岁的小加图，不仅在政见上与恺撒相左，是个狂热的元老院派，而且在个人感情上也非常厌恶恺撒。

在小加图看来，人格的高洁清廉比什么都重要，容不下任何委曲求全。他认定恺撒是个行为处事不够磊落而且野心强大的人，明明其财富来自不劳而获，仅靠政治手段和战争赢得支持，却偏偏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这样的男人被小加图所不齿。他和恺撒是完全不同的人，即使没有政治因素，两人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小加图之前从都拉斯逃走是因为庞培仍健在，而现在庞培本人已死，手下的将领不是战死就是归顺了恺撒，就连他一直当做儿子抚育的外甥布鲁图也在法萨卢斯会战后归降了恺撒。这个天下已经是恺撒的囊中之物了。听到恺撒逼近乌蒂卡的消息，水手们都望风而逃，现在小加图即使萌生逃意也无船可用了。

小加图将城中要员及家族的安全托付给了恺撒的同族人——庞培派的路奇乌斯·恺撒。这其中包括，庞培的女儿后来嫁给独裁官苏拉的儿子法乌斯托斯为妻的庞培娅及其儿子们，小加图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鲍基娅。鲍基娅嫁给公元前59年与恺撒同任执政官、内战爆发后领导庞培海军的比布鲁斯，在丈夫阵亡后一直跟随父亲寡居。

小加图并没有让路奇乌斯·恺撒带着这些人逃离，反而劝他们前往恺撒营地。因为他确信，恺撒定会无条件地将他们送回国内。但他自己从未想过要获得恺撒的宽恕，因为他既不想让恺撒享有宽恕敌人的特权，也不想看到恺撒宽恕敌人时的愉悦。

塔普苏斯会战后的第六天，即4月12日，小加图举办了一场晚宴招待乌蒂卡的要员们。罗马人的晚宴，在柏拉图《会饮篇》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所有人横卧在床形大椅上，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针对既定的话题进行会谈。这种觥筹交错中的论谈，罗马人称之为专题座谈会（源于希腊语，由罗马人按拉丁语发音而成），而座谈会的讨论专题是由晚宴的主办人兼主持人拟定的。在小加图的主持下，是夜的会谈并不以塔普苏斯会战为主题，而是讨论哲学命题——自由为何物。小加图援引苏格拉底的例子，强调堂堂正正的清白人，即便死后也一定会作为自由人而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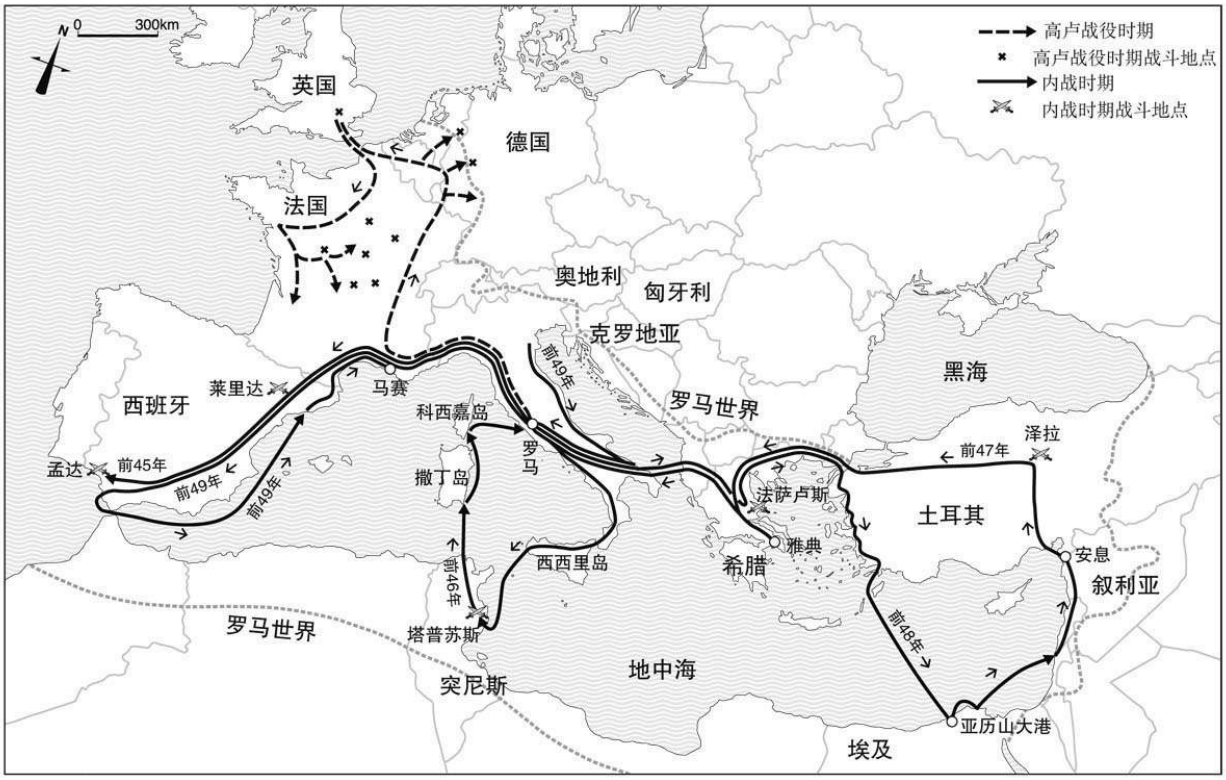
在。待会谈结束客人们四散，小加图便回到卧室。他没有立刻就寝，而是在灯下阅读柏拉图的名作《斐多篇》。《斐多篇》是一本记述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们论生与死问题的哲学书。短暂的阅读后，小加图以短剑刺入自己腹中，喷射的鲜血溅在打开的《斐多篇》上。但是利刃没有刺中要害，小加图并没当场身亡。对他在宴会上的言行有不祥预感的儿子和奴仆们正在外间密切留意他。听到喘息声后，他们立刻冲进房间，传来医生。医生上前要将其伤口缝合，但小加图激烈挣扎，推开医生，拉出自己的内脏，顷刻气绝。时年49岁。

无论是少数领导制还是共和制时期，在鼓吹公民一律平等原则的罗马，宽恕他人都是一种狂妄、违规的行为。身为国家统治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们尤其注重这一点。小加图认为宽恕行为就是承认个人特权，这完全违反了罗马共和制的精神。这个观点从理论上看是无懈可击的。在罗马人看来，即使是饶恕性命、不没收财产、不流放这样的善行，也是违反了法的精神。公民没有决定其他公民生死的权利，这是罗马人心中铁的原则。从这一点上说，现代也有不少人称赞小加图之死是自由对权力的抗议。如果他能言行始终如一地将此理论用在下一代身上的话，那么他的理念算得上是知行合一。但是小加图并没有做到，他把子女以及庞培的儿孙最终都托付给了恺撒。这一举动最终变成了对他信念的一种讽刺。

小加图这种“意志之死”的自杀，在罗马人看来是异常壮烈的，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冲击。因此生前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的小加图，在死后却成为了抗击绝对权力的自由精神的化身。这种人对敌人而言，就是死后比生前更危险的典型代表。

西塞罗知道小加图的死讯后，不知是出于惭愧，还是已经忘记了自己要靠恺撒的宽恕才获得自由这一事实，发表了赞美小加图的《论加图》一文。恺撒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反加图论》。这两篇文章均未保存下来，我们无法得知文中具体所指。不过根据情景，其中的内容也不

难想象。西塞罗的文章大概是会赞美小加图的高洁人格以及其宁死不屈的信念吧。恺撒的《反加图论》大约会从批判小加图的狭隘视角入手，指明这个世上除了人格高洁、信念执著外，还需要寻求更重要的问题。这段插曲或许可以很好地诠释一点，即不仅是政治思想，人的任何思想都是对其生活方式的反映。



恺撒战争简图

小加图死后第二天，恺撒以胜者的身份进入乌蒂卡城。未等路奇乌斯求情，恺撒就允诺保证小加图儿女及庞培儿孙的安全，也没有处置任何一位城中的庞培余党，更没有将小加图的首级挂在乌蒂卡城中广场示众。小加图不惜以死来谴责恺撒这种“反共和制、自由精神”的“宽容”，而恺撒仍然用这种“宽容”精神来对待他所有的敌人。

恺撒任命后来以历史学家著称的撒路斯提乌斯为北非的新总督，之后乘船离开了乌蒂卡。从入城到离开，恺撒不过用了两天时间。

穿军装的恺撒

恺撒用三个月时间争霸北非后启程返回。换做别人此时定会从乌蒂卡经海路到西西里后改陆路迅速回到罗马。肃清庞培余党后，恺撒天下在握。他从跨过卢比孔河时期就萌生的重建罗马新秩序的理想，在公元前46年已见到希望。但恺撒只命令军队整装回国，自己则带了几名侍卫前往撒丁岛。并不是撒丁岛上还有庞培残余势力，恺撒此行纯为视察，因为他从未去过撒丁及科西嘉岛。回想一下恺撒经历，在整个横跨多佛尔海峡到尼罗河的罗马领土中，确实只有撒丁和科西嘉岛是恺撒从未涉足过的。而这两岛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小麦为主食却又不能自给自足的罗马而言，它们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从战略地形上看，它们所处的地中海中央位置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虽说此行意义颇大，但恺撒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由于两岛地处海中央，因此无论是波涛汹涌还是平静无波时都无法航行，毕竟恺撒时代的帆船只能依赖风前行。恺撒4月中旬从乌蒂卡出发，视察完成归国时已经是7月25日了，所以后来有本专门研究恺撒的著作评论他是“行踪不定的恺撒”。不过恺撒手下有一帮能人干将，在他不现身的情况下，仅凭指令也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凯旋仪式的准备就是很好的例子。庞培当年的凯旋仪式持续了两天时间，为了那两天的豪华场面，庞培一行人回国后足足准备了9个月；恺撒的凯旋仪式分四个阶段举行，规模远胜庞培，但只

用了10天时间准备。正是因为他将所有不可预测的事情都思虑周详，执著地追求效率才变得更有实际意义。

凯旋仪式

举行罗马人心目中最高荣誉——凯旋仪式，对已经54岁的恺撒来说也是首次。在此之前不是因为他功绩不足，而是由于时间不够，没能举行过凯旋仪式。整个凯旋仪式共持续了10天，分四个阶段进行，比庞培当年的两天豪华许多。如此盛大的仪式，是因为恺撒足足击败了四个国家。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庆祝征服高卢；第二阶段庆祝战胜埃及托勒密十三世和埃及公主阿尔西诺伊；第三阶段庆祝击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第四阶段庆祝战胜努米底亚王尤巴。法萨卢斯会战中击败庞培的功绩并没有以凯旋仪式进行庆祝，除了认定那是属于罗马内部的斗争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恺撒从来都走怀柔路线——不但不打压败将反而给予他们和胜利者享有同等权利的机会——如果此时刺激庞培余党脆弱的神经那是非常愚蠢的；二是恺撒自己大概也不想庆祝战胜庞培的胜利，恺撒这个人虽然冷静，却并不冷酷。

不过凯旋仪式中在庆祝战胜努米底亚王尤巴的同时也有庆祝塔普苏斯战役胜利的内容。虽然塔普苏斯的对手也是罗马将领，但是在恺撒眼里他们和庞培是不同的。如果说恺撒把庞培看成“三头政治同盟”中的盟友，那么在庞培死后仍负隅顽抗的那些罗马人，在恺撒心中已与敌人无异。此外恺撒虽一贯善待俘虏，保全他们的性命、财产，不予流放，但对于努米底亚王恺撒并未留情。于私，因努米底亚王尤巴曾全歼了库里奥军队，杀尤巴对恺撒而言是为库里奥报仇；于公，打败努米底亚是对那些心口不一的罗马同盟国的严重警告。因此恺撒和罗马人完全有理由大事庆祝对尤巴战争的胜利。

不论恺撒点子多么多，这一次的凯旋仪式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传

统规矩进行。

首先，参加游行的人员全部在罗马城外的马尔斯广场集合，并排成竖列。那天的马尔斯广场远远望去，尽是像蛇一般蜿蜒的队列。凯旋仪式举行时全国放假，因此无论是游行队伍经过街道沿途还是首发地马尔斯广场都是人山人海。游行队伍集结完毕后，独裁官恺撒在24名警卫的簇拥下出场。全体将士在军团长的号令下，统一高举右手整齐地向恺撒敬礼。这种“罗马式敬礼”如今在关于纳粹的纪录片中仍能见到，最初出现在墨索里尼军营中，接着希特勒也沿用了这种形式。虽然纳粹党只是在敬礼形式效仿了古罗马，但人们也认为种族主义的纳粹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资格沿用主张民族共荣的罗马传统。不过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敬礼方式确实比英美式看起来更加气派。此外墨索里尼还在其他方面都效仿了古罗马：他倡导的“法西斯主义”就来源于古罗马侍卫手捧的象征权威的束棒；他将军队称谓从师团改成军团并引入了古罗马的敬礼仪式；将手中最精锐的军团更名为“第十军团”以强化意大利军团。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如诸位所知，他并未如愿。人们常说，形式虽重要但实质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墨索里尼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来，我见，我征服”
（恺撒铸造的硬币是不是这样的呢？带着想象，16世纪的意大利人安东尼• 盖维诺制作了这种硬币。不过我们仍然期待能发掘出真正的恺撒铸硬币）

主角恺撒到场，庆祝凯旋的游行正式开始。队伍最前面的是元老院议员及政府高官们，按照古罗马的习惯，文官在前武将随后。乐队紧随其后。之后是满载战利品的马车队列。为了让围观群众大开眼界并为胜利成果震撼，战利品并不是简单地在马车上堆成一堆，而是以精心的形式展示。马车过后是描述战争情景的展示牌队列：在庆祝高卢战役时，

展示牌上描绘着代表罗马军队的银鹫旗在高卢地图上飘扬，莱茵河上架设的桥梁，及阿雷佐战役后败将维森盖托里克斯跪在恺撒脚下的情形；在庆祝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时，展示牌上记载了恺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在庆祝击败努米底亚王尤巴时，展示牌上描绘尤巴与庞培余党佩托雷乌斯互刺，以及小加图掏出自己内脏的情形。这些展示牌将凯旋仪式装点得更实至名归。罗马和希腊不同，更加注重对普通市民的宣传策略，因此在当时绘图、文字形式的展示牌非常盛行。

通过展示牌让围观者了解战役大致经过后，接着就是让他们亲眼见证“战果”了。展示牌队列之后是彰显胜利“事实”的队列，载着俘虏的马车开始登场。马车上的俘虏代表有：高卢战争时期的维森盖托里克斯、埃及的公主阿尔西诺伊、本都的法尔纳凯斯之子以及努米底亚王尤巴5岁的儿子。这里要顺带提一下，通常这些战败俘虏在凯旋仪式后都会被扣留在意大利，但性命无虞。不过这次有了两个特例：一是尤巴幼子成年后远赴毛里塔尼亚继任王位，因为该王族已无后人；二是维森盖托里克斯在仪式结束后被杀于狱中，因为在恺撒心中他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俘虏车后紧接着是祭祀仪式中作为祭品的白牛。祭司紧随其后。罗马并没有设置神职等级，祭司不过是选出来执行祭祀任务的人，而履行大祭司职务的实际上是恺撒本人。因此和往常凯旋仪式不同，这次祭司队伍并没有所谓大祭司领头。

每一位游行队伍成员都穿着象征威仪的礼服，马车和马也都装饰得美轮美奂，就连装俘虏的囚车也全部用罗马人喜爱的常青藤装饰，看起来马车好像镶嵌了绿边框。罗马人特别喜欢将平整的大理石铺在地上并在周围种上树。虽说绿色植物与白色大理石互相映衬非常美，但是这个方法也有缺点，植物的根常会使石板变得松动。节日里罗马人喜欢将搓好的常青藤挂在墙上，用这种方法，把光秃秃的墙壁变得生动起来。

继象征“政治”的政府官员和象征“宗教”的祭司队伍之后，轮到“军事”队列出场——我们的主角恺撒出场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凯旋仪式

上，将军都是自己驾着四匹白马拉着的马车登场，这个形式到公元前1世纪有所改变，将军只是站在马车上向群众示意并接受群众抛来的鲜花。在这个大喜日子里，凯旋将军也会穿着特制的服装。上身在白色短衣外面罩着一件纯黄金打造的有着精致图案的胸甲；脚上穿着为典礼特制的同样有精美图案的短靴；身披象征至高地位的紫色披风，宽大的披风一侧在右肩固定，一侧披在左肩上；左手持日常战斗中握于右手的黄金象牙指挥棒；头戴绿色月桂冠，而不是战斗中的头盔。此外，当天将军的脸上要被涂成红色，这是效仿伊特鲁里亚的风俗将胜者的脸涂成红色可以驱魔辟邪。

恺撒身后紧随的是他的幕僚们，之后是骑兵团，他们都骑着马。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团给凯旋仪式添加了一道异国风情，身形高大健硕、金发碧眼、面无表情的他们走在个头相对矮小、褐发褐眼、表情丰富的罗马人中间，立刻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威风凛凛的日耳曼军团身后是久负盛名的恺撒军团。各军团高举着银鹫旗，按照军团长、大队长、百人队队长带领各自的军团、大队、中队的顺序前进，并且全体将士都身着军装保持持枪持剑的姿势。不过将士们虽着装严肃，每个人脸上却带着轻松的表情，军团整体气氛与其说是威仪严肃，倒不如说是有些流氓气。那天的凯旋仪式上，他们反复齐声高喊着一句话："快藏好娇妻呀，罗马市民们，我们领来了秃瓢的淫棍。"虽然恺撒认为这样太过分，但12年来风餐露宿的士兵们这回并没把总司令的意见放在心上。因为决定凯旋仪式上齐唱的内容历来都是士兵们的特权，而这么做据说是为了让诸神不对威风的凯旋将军产生嫉妒之情。这也是罗马的传统之一。恺撒此时提出抗议也不过就是惯常幽默性格的表现吧。不过秃头这个问题确实是恺撒的一块心病，发际线不断地后退大概是唯一能令他想哭的烦恼。元老院曾经授予恺撒一项荣誉，在担任独裁官期间恺撒在凯旋仪式后也可以使用月桂冠。这项荣誉让恺撒大喜过望，因为月桂冠正好可以遮住他越来越少的头发。

士兵们唱的不着调内容，让罗马市民们在威严的凯旋仪式上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这个玩笑到卡匹托尔山就戛然而止了，士兵们都换上了严肃的神情。游行从马尔斯广场出发到古罗马广场结束。仪式的亚洲部分是通过广场中央南北走向的圣道，登上卡匹托尔山向诸神会报战绩并举行祭天仪式。现在我们一般都从北面进入卡匹托尔山，这得益于16世纪上半叶米开朗基罗对山丘的重新设计，在那之前要登山只能从南面出发。卡匹托尔山是罗马七丘中最高的峰，供奉着古罗马开国以来的众神，从地位最高的朱庇特开始，众多神殿并立。这是古罗马唯一的只供神不住人的地方。凯旋仪式的最后一项就是登上神殿感谢诸位永生之神，是他们的怜惜和帮助才使原本要死于战场的人能活着回来。只有凯旋将军才有资格进入供奉朱庇特的神殿。一向理性的恺撒此时大概也是真心地拜谢诸神吧，毕竟经过了如此长的艰苦岁月才等到了今天。

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根据想象的复原图）

凯旋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招待酒宴，围观的群众也在被宴请之列。恺

撒向来喜欢奢华，这次的酒宴场面肯定也是相当壮观。

随后，他给恺撒军团的将士们派发了数目可观的奖金：普通士兵各5000第纳尔、百人队队长1万第纳尔、大队长2万第纳尔。此外他还打破常规，给战死士兵的家属以及伤残士兵们发放了部分奖金。从布匿战争起罗马士兵们的军饷就一直是每年70第纳尔，直到内战爆发恺撒才将罗马军团的军饷提高到140第纳尔，这意味着凯旋仪式后发的奖金等于士兵们35年的军饷总和。

不仅士兵们拿到奖赏，连见证凯旋仪式的群众（女人、17岁以下孩子、奴隶除外）都领到了恺撒大手笔赠送的“礼物”——87.5升小麦和3.27公斤橄榄油及100第纳尔。并且恺撒发的都不是常用货币，而是专门打造的25第纳尔面值的纪念银币。该银币不仅具有纪念价值，也能作为正常货币进行流通。

持续了4天的凯旋仪式，仅招待宴席就达2.2万桌。在凉风习习的夏夜里，参与豪饮的宾客们更是达到了6万人。很多不在邀请之列的贫民们也蹭了不少酒席吃。因为宴请都是在野外举行——不是在古罗马广场就是在台伯河中的小岛上——不可能仔细核查宾客身份，且恺撒本身也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喜欢被人群拥簇着进餐。晚宴结束后，在人们的目送中恺撒踏上回家的路。然而和平时侍卫开道不同，凯旋仪式期间为他开路的是背上绑着火把的象群。这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迦太基语里“大象”发音就是“恺撒”。

除了宴席，在4天的凯旋仪式里恺撒还安排了精彩的娱乐活动，如戏剧表演、将台伯河水引入竞技场模拟海战演出、角斗士竞技、狩猎400头雄狮等，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免费观看的。在庆祝北非战役胜利阶段展示了非洲的贺礼长颈鹿。虽说地中海南岸均已归顺罗马，罗马市民也见过不少非洲的珍奇动物，但他们还是首次见到长颈鹿。为了纪念早夭的女儿尤利娅，恺撒将戏剧安排在庞培剧场演出——年幼的尤利娅曾嫁于庞培为妻。

罗马有一项必须遵守的传统，有能力的人要自费建造公共场所，并将之赠给国家。按照罗马的逻辑，一个人若能强大到举办凯旋仪式，那么此人必定也有能力建造公共场所。古罗马广场西北面的埃米利亚会堂由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公元前179年击败马其顿王珀尔修斯后出资修建；埃米利亚会堂对面的森普罗尼乌斯会堂由格拉古兄弟之父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70年修建。此外独裁官苏拉于公元前80年在古罗马广场对面的卡匹托尔山上建造了塔布拉里姆典籍库，后来成为古罗马政府的办公大楼。该楼南面还有一些自中世纪起沿用至今的罗马市政厅部分遗迹。一度称霸整个东地中海的庞培没有一味模仿前人，他于公元前55年在罗马城墙外建了罗马首个石砌剧场和大回廊赠与国家。

恺撒自是不甘人后的，在高卢战役时就已经命人着手修建神殿和回廊，为以后扩大古罗马广场工事作准备。此后也公开宣称修缮森普罗尼乌斯会堂作为凯旋的纪念。但该会堂因破旧已无法修缮，恺撒于是又下令在原址上重建，这就是后来的“尤里乌斯会堂”。不仅如此，恺撒对罗马的城市规划也很有兴趣，他的眼光已不局限于建造赠与国家和纪念凯旋的场所，因为他想让罗马从内在的政治秩序到外在的城市建设都焕然一新。

迦太基历经700年后衰亡，而罗马700年后正焕发着生机。恺撒重建首都的理想昭示着一个新的罗马即将诞生。

> 历史有时似乎都凝结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整个世界都跟随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些伟人将人格上的特性与共性、静止和运动集于一身。国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的危机都体现在他们身上……
>
> 危急时刻，传统和创新在这个伟人身上融合并达到顶峰。这些伟人的存在，至今仍是世界历史的奇迹。
>
> ——布鲁克哈《对世界历史的考察》

改造国家

自塔普苏斯会战成功扫清庞培余党后，恺撒于公元前46年4月离开了北非。至此，在恺撒心中，从公元前49年1月12日渡过卢比孔河以来的内战终于画上休止符。鉴于恺撒和庞培之间实际上是“反元老院体制”与“元老院体制”之间的抗争，因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

格拉古兄弟首先指出罗马的内乱是由于元老院体制机能丧失，因此古历史学家阿庇安所著的《罗马史》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记述的。可见这也是古罗马人的共识。恺撒虽有超常的思维方式，他这一次也赞同格拉古兄弟的看法。因为在担任执政官的头一年，他作出的最重要的政策改革就是将格拉古兄弟提案发起的，但由于他们过早去世而停止的《农地法》延续下去。

不过继格拉古兄弟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罗马的问题已严重到不是单靠一两项政策就能改变的地步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已经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苏拉、西塞罗和恺撒都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

罗马独特的共和体制是这样的：每年有两位执政官共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由未经选举的所谓“精英”组成的元老院辅助执政官，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们构成公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因为元老院议员大多由行政官员担任，因此罗马政体也被称为“寡头政治”。

布匿战争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赞扬罗马采用的是理想政体。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分别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优点的象征，因此罗马共和政体可谓集三种政体优势于一体。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们均由选举产生。凡公民都有参选可能，不分阶级，人人平等，由能力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大小。

罗马人从不认可民主政体。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体，也不过是依赖伯里克利这样卓群的政治人物领导才显得优越。伯里克利过世后，雅典因种种愚笨政策而日渐衰退。在正处于上升期的罗马眼中，雅典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希腊人热衷于巩固城邦制，罗马人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同化被征服地域，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越来越多。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国家决策并不依赖于选民自身知识和判断力，而依赖在事情发生时参与决策的选民数量。但雅典实行的并非真正民主，而是“封闭的民主”，例如双亲中有一方并不生于雅典城邦，那么这个人就不具备公民选举权。

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描述的时代里确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到《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中该政体已经在元老院主导下显现出优势，一如波利比乌斯所赞。天才将领西庇阿能击败迦太基也得益于元老院上下一心。可以说，对迦太基的胜利就是罗马组织能力的胜利。那时候元老院阶级始终战斗在前线，阵亡比例也是最高的。不过政体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击败迦太基称霸地中海之后，罗马陷入了政治困局。原因有两个：一是任何政治体系都避免不了的僵化现象；二是成为战胜国后，所面临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那之前一直发挥正面作用的政治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显现出弊端来。然而若要人去改变已经习惯的并有正面作用的制度，甚至比让他们从零开始都艰难得多。因为改变制度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特别是那些一贯对自己能力极有信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否定自己更难。但是如果不否定旧的自己，就无法树立适应新时代的新制度。自格拉古兄弟以来罗马精英们所头疼的问题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无论是苏拉、西塞罗还是恺撒，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必须恢复罗马强大的统治能力，并且他们也一致认为，现阶段的元老院并不适合肩负此项重任。虽说此三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出发点都一样，都是为罗马国家的未来着想。那么他们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苏拉的办法，简单说就是用强力手段实行内部改革。凭借独裁官的特权，苏拉组起了一个危机管理内阁，实行高压政策。采取杀伐、流放、没收财产等方式对付反对派，以期加强元老院引导制，恢复元老院对罗马的统治能力。像《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记述的那样，苏拉一方面严格执行按资排辈，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加强元老院议员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项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以期提高元老院阶级的总体素质。但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见的人构成，对反对者苏拉设立了详细的“黑名单”彻底肃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优化罗马政体的任务必须由对共和政体绝对忠诚的人来担任。

比苏拉年轻30岁的西塞罗，又有什么良策拯救罗马呢？

西塞罗对苏拉的独断专行、肃清反对者以强化统治阶级的做法并不认同。“喀提林阴谋”时期任执政官的西塞罗深深担忧苏拉的恐怖政治会导致人心涣散，但是西塞罗也同意同辈的恺撒所提出的制度改革的办法。作为非罗马市出生的成功人士，西塞罗和普通“外地人”一样对接纳自己的体制抱有好感，因此热衷于维护现有体制。不过西塞罗还是比别人更加担心国家的现状，他所想到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公职人员生活的净化”。在他看来，如果“净化”能实现的话，那么罗马的未来就是稳定的。西塞罗相信舆论的力量能够保证“净化”的实现，于是他发表的论著乃至辩护文书中，都以提高罗马公职人员道德为目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改善普通人的道德观。

在人生最得志的时候，西塞罗曾为以下词语进行了定义：

Consul sine armis —— 不用武力的执政官。

Dux et imperator togae —— 宽容的司令。

Cedant arma togae —— 以文制武。

刻有“宽容”（clementia）字样的恺撒凯旋仪式纪念银币正面

刻有“宽容”（clementia）字样的恺撒凯旋仪式纪念银币反面

但罗马的现状证明了，就像苏拉独行的内部改革并不适应时代一样，西塞罗提倡的提高公职人员道德结果也并不如意。

那么恺撒又将为改变现状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公元前46年以后，恺撒和当年的苏拉一样当上了独裁官，这意味着恺撒握有绝对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阻挠按照自己的意图实行改革。

已经54岁的恺撒，在树立新秩序之初首先把“宽容”作为改革的宗

旨。在凯旋仪式上派发的纪念银币上就刻着拉丁文的“宽容”字样，这表明恺撒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和苏拉的不同。他没有制作针对反对派的“黑名单”，允许流亡者回国。对那些因安东尼政策失误而被没收的财产，他要么返还，要么征得持有人同意再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割下庞培余党的首级并摆上古罗马广场的祭坛。对于流亡者表示想回国并恢复公职的愿望，恺撒全部应允。就连当初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并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他也没有为难。恺撒希望不要再区分什么“敌”“我”，所有人为重建罗马而再次团结起来。不过这样做比苏拉铲除异己实行改革的办法要困难得多。苏拉的做法与其个性相符，恺撒的做法也表现了他的气度。

恺撒的做法，让众多反对他的罗马人都放下了心中大石。同胞之间的流血争斗，已经使大多数罗马人精疲力尽了。像小加图那样认为宽容精神是亵渎共和政体精神的罗马人虽然已经不多了，但罗马人传统思想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改变的，反对宽容的人依然存在。小加图虽已在乌蒂卡自杀身亡，但仍有人帮助庞培的两个儿子逃走并准备在西班牙集中反击。

西塞罗虽然在《论加图》中对小加图以死明志的精神大加赞赏，但他同时也认可恺撒所实行的“宽容路线”。此时的西塞罗积极致力于修补昔日同事与恺撒的关系，以团结两派为己任。

西塞罗的热心源于他的政治理念，他期望罗马在手握大权的恺撒领导下，重建少数精英主导的自由共和制国家。但这也正说明了西塞罗和恺撒的思想并不在一处。因为恺撒认为国家建设并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而是实干，能否让国家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最初其实并未理解的某个理念。而随着该理念的实施，他会生出被出卖的感觉。在战场上从不孤独的恺撒，这一回在政坛上尝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不过孤独是恺撒这类人一生都逃脱不掉的宿命，这或许也是拥有天赋才能的代价吧。沉溺于孤独中是无法完成所行之事的。恺撒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慨自己的孤独，他把西塞罗的评论晾在一边，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推行历法改革，这是他作为实干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历法改革

罗马使用的日历是公元前7世纪由第二代罗马统治者努马制定的阴历。该历法根据月亮盈亏将一年分为12个月，共355天，每隔数年再增加一个月来平衡多出来的天数。这种方法随着年份增加误差也加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日历上的季节已经和实际的季节间产生了近3个月的误差。

恺撒下定决心改革历法，并不只是为了纠正前人的历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认为在罗马统治范围内统一推广准确的历法的话，那么罗马所辖臣民就有了一致的生活节奏。要真正实现罗马世界的大一统，除了军事上的霸权外，还应当在允许不同文化共存的同时有共同的文明。统一每日生活所必需的时间计算标准，是实现共同文明的第一步。

恺撒命在埃及认识的埃及天文学家及希腊数学家们担纲新历法的制定工作。这些被邀请到罗马的科学家们算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是365天零6小时。因此将365天分为12个月作为一年，再将每年多出的6小时误差加在每隔4年的2月末，这样就有了闰年的2月29号。如果说努马制定的是阴历，那么这个就是阳历了。根据创始人的姓名，该历法被称为朱利安历法（亦称儒略历）。

接下来就是清算之前历法积攒的时间误差了，于是在公元前46年的11月和12月之间，添加了3个月份。这样公元前46年的月份就变成了：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加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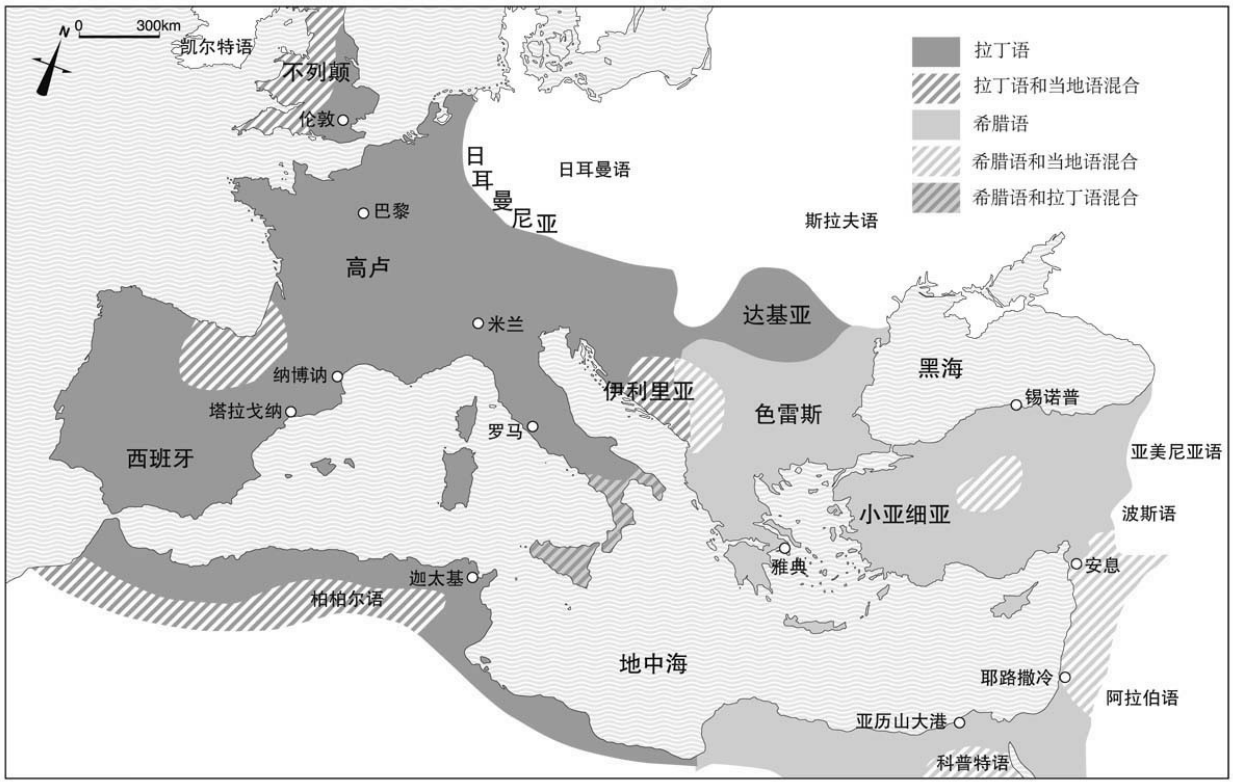
月、加2月、加3月、12月。那一年罗马人就“多了”70天时间。新历法在次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1月1日正式启用。

到公元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了修订为止，此前的1627年里，儒略历广泛地应用于地中海世界、欧洲和中东、近东。随着16世纪后半期天文学的急速发展，科学家们发现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并不是365天零6小时，而是365天零5小时48分46秒，因此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决定对历法进行修订。由此产生的格列高利历取代了儒略历并沿用至今。11分14秒的误差竟然需要1627年才发现，足见儒略历在当时准确的惊人程度。后来的格列高利历虽然修正了儒略历的11分14秒误差，但其在历法上的意义远不及儒略历重大。

不过恺撒并没强行令其他名族改用儒略历，因为他打算制定一部“国际历法”。各民族仍照习惯使用旧历法，像高卢人就一直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仍沿用他们自己的历法。不过他们对新的儒略历也并不抗拒，因此同时使用阴历和阳历成了罗马统治下的非罗马公民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地方沿袭这种办法。

货币改革

恺撒认为共同文明和特色同时存在是件好事，这在继历法改革后的货币改革中充分反映出来。在货币改革中虽说允许多种货币同时出现，不过前提条件必须是以罗马货币为主。这样确立起来的新货币制度，成为推动罗马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



罗马时期的语系图（摘自意大利的大学课本）

恺撒首先从元老院手中取得造币权并设立了国家造币机构，将金、银、铜币的铸造业务制度化、系统化。恺撒从凯旋仪式上的纪念币到常用货币都刻上了自己的侧脸，这开创了罗马货币上雕刻人像的先河。不过那些拥有造币权的行省乃至像雅典这样的独立城邦，恺撒都允许他们继续使用自己铸造的货币。当然这也带来了兑换市场的繁荣。

当时历史学家中有不少希腊人，因此他们的史书中常常提到希腊货币单位。这让研究该段历史的现代学者们头疼不已，他们肯定与我一样，常备着各国货币的换算表和计算器。不得不说这是恺撒的并存主义留下的后遗症。

与货币一样，恺撒的并存主义也适用于语言使用上。不过如同儒略历因其正确性被广泛接纳一样，在当时也有两种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因其体系成熟而被普遍使用。在西塞罗和恺撒这两位大文豪的影响

下，拉丁语于公元前1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足与希腊语并立，几欲成为罗马世界的通用语。罗马人自古就有使用双语的习惯，这在恺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下令罗马第一座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必须同时保存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个版本。同时他下令任何发往希腊语文化圈内的政府公告，都必须使用希腊语。

除了这两大语系外，各地区也在很长时期里保留了当地的语言。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些地方语言和拉丁语混杂，衍生出了现代的各国语言。

尽管恺撒在很多领域都认同权力分立，但涉及政治体制、法律、军事、城市排水建设、港口设备等社会资本领域，他又强调坚持罗马特有的方式，也就是中央集权。他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权力分立和权力集中合理并存的社会。

恺撒原本致力于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大国。不过这番宏图因为面临了新问题不得不中断。反对派们在西班牙重新拥立庞培的两个儿子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孟达会战

庞培长子格涅乌斯和次子塞克斯图斯以及塔普苏斯战役逃走的拉比埃努斯、瓦罗等人，逃到西班牙得到原居民的支持后又再度发起动乱。

西班牙原本就不甘心被罗马统治，说得好听点是不甘心向强权屈服。因为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权力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每次有人反抗罗马，西班牙总是会跟随其举起反罗马的大旗。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是个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的民族。公元前75年左右庞培出马解决的塞多留之乱就是典型例子。谁会想到当年庞培是镇压动乱的领袖，而如今他的儿子却成为了发起动乱的首领。西

班牙并不属于庞培派，如果这次政府的首领不是恺撒而是庞培的话，他们应该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抗。对付这样的民族，除了武力征服外别无他法。恺撒命军团长佩提乌斯和法比乌斯两人率军在事态扩大前控制住局势。

这两位将军自高卢战役起就担任恺撒的幕僚，是十分称职的军团长。不过这次战役总指挥的任务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结果非但没遏制住形势，反而让格涅乌斯·庞培在西班牙南部势力得到拓展。鉴于此时在西班牙南部的重要城池中支持恺撒的只剩科尔多瓦，且庞培余党兵力增加到了8万，恺撒决定亲自出征。在公元前45年3月7日进行的孟达会战中，庞培派最后的反抗力量也被打垮了。恺撒以北非毛里塔尼亚士兵为主的兵力达到4.8万人，其中包括一直跟随他的高卢第五军团、法萨卢斯会战后随他出征埃及的第六军团以及非大战中不加启用的第十军团。敌方有8万兵力，由庞培长子格涅乌斯及塔普苏斯战后逃到西班牙的拉比埃努斯指挥。激战过后，恺撒军中有1000名士兵战死，而敌方则战死3.3万人，其中包括拉比埃努斯。格涅乌斯负伤逃走途中被杀，塞克斯图斯远远地逃到大西洋沿岸的山林中才躲过一死。

内战中恺撒军抓获俘虏的数量总是远远超过杀戮人数，因为恺撒曾严禁大肆杀害同胞士兵。但这次的孟达会战例外，激战中恺撒士兵们大开杀戒。这从侧面说明了反抗恺撒的罗马人业已不多。庞培派最后的抵抗势力中，除了司令和指挥官是罗马人，大部分战斗的士兵都是西班牙的原居民。

这次会战拉比埃努斯战死，他与恺撒对抗也随之结束。阔别四年再度碰面，面对这具神情仍旧刚毅的老战友、背叛自己的旧部下的遗体，恺撒是什么心情？《西班牙战记》对此并没有任何描述，只有一句：“拉比埃努斯也战死被埋葬了。”

到此为止，恺撒从未因战胜庞培派举办过凯旋仪式。但孟达会战后恺撒立即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以感谢神佑，与民同庆。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恺撒终于撕掉了面具的表现。但恺撒认为，孟达会战是自己以正统罗马政府的身份镇压反抗的行动，因此孟达会战和之前的战役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此次在凯旋仪式上亮相的将军也不止恺撒一人，尽管最后是恺撒亲征才获得了胜利，但佩提乌斯和法比乌斯也一起出现在凯旋将军的马车上。恺撒授予两人对各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这意味着两人此后拥有了公职地位，可以直接派兵镇压动乱。恺撒邀请两位部下一同参与凯旋仪式，也是为表明此次举办仪式的合理性和自己立场的正确性。

一年前经由元老院任命，恺撒成为任期10年的独裁官，并且他还兼任公元前46年及公元前45年的执政官。公元前46年与恺撒同为执政官的是雷必达，公元前45年的是法比乌斯。法比乌斯在执政官任上病逝后，虽然离12月底的任期结束没多少时间，恺撒仍提议由特雷波尼乌斯补缺。经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任命，恺撒任独裁官的任期从5年延长到了10年。这表明恺撒已经开始有意将独裁官这个原本的临时政体变成长期政体，但罗马人对君主制（王政）是极度过敏的。

遗嘱

到此为止恺撒终于可以一门心思扑在政坛上了，这种想法体现在他此时立下的遗嘱中。在女儿尤利娅嫁给庞培后高卢战役前期间，也就是公元前58年左右，恺撒写下人生第一份遗嘱。在该遗嘱中庞培是恺撒继承人。尤利娅死后，恺撒和庞培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直到庞培也去世后，第一份遗嘱自动作废。当时立遗嘱是很常见的行为，继承财产也不算出奇的事。当时恺撒的全部资产除了“苏布拉”的两座私宅外，只剩下一两所固定的山庄，还有大量外债。

但公元前45年所立遗嘱与之前的有很大不同。上一次是在出征高卢前匆忙所立，这一次则是得胜回国后立下的。此时的恺撒虽然私有财产

并未显著增多，但起码已经没有外债了。而且这次的是政治遗嘱，也就是以遗嘱形式确定政治继承人。

恺撒这次立遗嘱并不是因为自己年届54岁年老体衰，也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事实上在罗马连普通的士兵也要到45岁才退役，倘若遇上紧急情况，60岁以下的人都要应征入伍。根据罗马的标准，中老年的分界线是60岁，也根本没有针对司令阶层的年龄限制。这里也对恺撒的健康进行说明，之前有过恺撒患癫痫的谣传，但翻阅当时的史料，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内容，只是150年甚至200年后以普鲁塔克为首的希腊历史学家们零星记载过类似说法。像癫痫这种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发作的病症，如果发生在恺撒这样经常面对大众的人身上的话，肯定是瞒不住的。此外西塞罗号称是当时的情报专家，如果恺撒真的有病，那么以西塞罗反对恺撒的立场，肯定会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提及。但我们翻阅西塞罗的书信及论著也没有发现相关记录。该说法大概和恺撒是剖腹所产一样，都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吧。因为在近现代历史学家们遗留的学术著作中，从未有过类似的记载。

关于恺撒遗嘱的具体内容，我们到后面再详细叙述。指定的继承人在恺撒立遗嘱时不满18岁，这意味着恺撒原本是打算再过十二三年才退位。因为恺撒开始进入政坛是30岁，按照遗嘱时间再过12年，恺撒指定的继承人接手政务也正好30岁。或许55岁的恺撒是想将自己一手开创的新罗马扶植到成熟后再交给继承人吧。但历史并不如他所愿，在新罗马根基未稳时历史就已开辟了另一条航道。

走向“帝制”

自公元前202年汉尼拔起到公元前50年征服高卢，罗马进入了高速成长时期。不过借用汉尼拔所言，此时的罗马仍处于骨骼已成熟但内在机体尚不发达的状态。

罗马的内在机体，也就是以政治体制为代表的制度体系只能适应击败迦太基之前的领土范围。而那时的罗马不过是个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国家。击败迦太基后，罗马迅速扩张将原本的国界——地中海——变成了“我们的海”和“内海”。在此期间，内在机体却没有随之成长，仍沿用了意大利半岛时期的统治体制。矛盾油然而生。格拉古兄弟首先注意到这个矛盾，在他们之后，罗马陷入了胜利者的迷茫和痛苦中。

恺撒所做的，就是帮助罗马内在机体成熟以适应其强大的外在。换句话说，就是让罗马从高度成长期过渡到稳定成长期。

罗马把整个地中海纳入腹中，防御范围囊括了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幼发拉底河。南边以原迦太基领地现在的北非行省为中心，控制了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两个盟国。西边则是意大利半岛的天然屏障——大西洋。北边则以与不列颠、高卢相接的北海为界。恺撒最后想真正发起的战役就是远征帕提亚。远征不是为了征服帕提亚，而是为了给罗马赢得幼发拉底河作为防御边线。此外在计划远征帕提亚时，他也打算在回国途中顺便确立罗马的多瑙河南岸的霸权。完成这两件事后，恺撒就不再打算扩大罗马领土了。事实上从地图上看，也没有办法再扩大了。

如果说扩大防御边线是外在的话，那么扩充国力就是与之相适应的内在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首先保证在罗马霸权统治各地区各民族有和平的秩序。简言之，就是首先要保证“Pax Roman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和平秩序的前提下，罗马作为生活大国的目标才可能实现。要将罗马改造为生活大国，不是光靠喊喊口号就行的，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的改革。

恺撒认为帝制比元老院主导的共和制更加适应现阶段的罗马。民主政治随着罗马领域的扩大而越来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样的，寡头政治也与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统治范围越来越广，体制的效率性是保证国家统治有效的首要因素。现有体制中仅元老

院就有600名议员，这样的机构不仅意见难以统一，政策的出台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随着国力增强，既有的政治体制必然也会随之改变。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为了提高统治能力，也将200人的元老院改革成17人的“十人委员会”。

恺撒决定把罗马的行政体制从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改成1人做主的帝制。与14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比起来，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统治领域要广阔得多。因此将共和制改成帝制，才是恺撒真正要跨越的“卢比孔河”。

对于扩大城市街道网的建设，罗马人能充分理解其重要性，因为该工程的利益是目力可见的。但是恺撒要做的是改造人们看不见的国家机体，让内在机体符合外在发展的需要。

那么恺撒会怎样具体实现这个理想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与恺撒有着同样政治理念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在实现了国家高速成长后突然辞世。

公民权问题

上文已经叙述过历法和货币改革，也阐述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边境拓展问题。接下来要论述的是与罗马未来的帝制息息相关的公民权问题。

恺撒宣布从卢比孔河到阿尔卑斯山的北意大利行省全体自由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据此，阿尔卑斯山南部居住的高卢人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恺撒称这是报答北意大利行省人民在高卢战役中对自己的支持。但

实际上北意大利和卢比孔河以南地区都已经罗马化了，罗马式的街道在那里也随处可见。

行省的全体自由居民成为罗马公民而不再是属民，这个决策有重大意义。原本只是高卢人聚居的梅狄奥拉努斯（现在的米兰）、塔里诺鲁姆（现在的都灵）都开始像罗马一样规划城市建设。从此卢比孔河及流经佛罗伦萨的亚诺河不再是罗马本国和行省的分界线。

根据罗马法律，罗马本土不允许常驻军队，行省则不受此限制。如果到阿尔卑斯山为止都不设置军队的话，罗马人不会感到安全。因此虽然居民都享有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但在行政体制上仍旧将北意大利作为行省，仍旧直接派遣总督管理北意大利。不过北意大利居民从此可以免缴行省税。

恺撒也考虑过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西西里岛居民，但西西里岛居民从未支援过恺撒出征，因此这回可没有像“报答”这样直接的借口了。此外与北意大利高卢人说拉丁语不同，西西里岛属于希腊语系，他们同时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考虑到上述因素，恺撒最后授予西西里岛居民“拉丁公民权”。所谓“拉丁公民权”就是剔除了政治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也可以看做是罗马公民权的预备军。

除了西西里岛，恺撒还将拉丁公民权授予了法国南部行省，这也是为了报答他们当年对自己的支持。虽然北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行省居住的都是高卢人，但是由于罗马化程度不同，享有的权利待遇上也产生了差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罗马政治的特色。

既然公民权有“有无”之分，那么拥有罗马公民权定是有优势的。

自马略的军政改革后，原本罗马公民必须履行的兵役成了自愿制度，没人可以强迫罗马公民参军。行省居民虽然也没有必须服役的义务，但是他们必须缴纳行省税。罗马公民连像行省税这样的直接税都不

必缴纳。不过要说明的是，当时像行省税这样的直接税并不高，仅占个人所有收入的一成。

除经济上的好处，罗马公民权也是个人安全的保护伞。如果罗马公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到其他国家侵害，罗马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此外拥有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拥有法律体系作为后盾。根据罗马的法律，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权都应该得到保护。从这一点上看，罗马公民永不会陷入被强夺财产、被执行私刑的恐惧中。

雅典的公民权只授予有血缘关系的人，而罗马的公民权并没有此类限制。不过在恺撒之前，罗马公民权也仅对意大利半岛居民开放。恺撒改革后，连士兵退役后的去处、罗马行省以及高卢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如此在行省居住的罗马公民数量大大增加。

对恺撒而言，国家防御边界线的概念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界线。

政治改革

元老院

在罗马开国者罗穆路斯时期，元老院共有300个席位；700年后的苏拉时期，增加到600席；苏拉辞世35年后恺撒当政时，席位猛增到900个。

同是为元老院注入新鲜血液，苏拉和恺撒的做法不尽相同。苏拉将扩展范围仅限于在罗马本土居住的公民，但恺撒增加的新席位大多给了他的军团长和百人队队长们。根据恺撒的殖民政策，他的旧部中以百人队队长们为代表大多居住在行省，因此元老院新增席位中大多是行省居民。关于这个殖民政策，文中稍后会提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连刚被

征服的高卢中北部地区族长们也进入元老院，这让有同化败者传统的罗马人也惊诧不已。试想，如果大英帝国的国会中增加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议席的话，那英国人该多么意外？恺撒做的就是这样一项改革。

罗马本土居民对此大加讽刺：

“我们有不认识去元老院会场路的议员呦。”

“我们有不会说拉丁文的元老院议员呦。”

“我们有不脱掉外裤穿托加的议员呦。”

高卢人向来有穿长裤的传统，这一点在前文论述过。

虽然平民们把这当成笑料乐在其中，但那些坐在元老院会场的罗马本土议员们肯定笑不起来。现代意大利大学的教材中认为那些对恺撒的开国政策不满的议员们是“守旧”的，西塞罗、布鲁图、卡西乌斯是典型代表。

此外，同是为元老院注入新鲜血液，苏拉和恺撒的目的也完全相反。苏拉的改革是为了强化元老院体制，恺撒增加席位的改革则是为了弱化元老院的功能。恺撒认为元老院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机构存在，绝不能拥有像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戒严令这样大的权力。元老院只是国家领袖的储备机构，是为独裁官提供政治辅佐的国家机构。

厌恶“伪善”的恺撒从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守旧”派也完全能理解恺撒的用意。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

公民大会

即便如此，恺撒也没办法完全架空元老院。议员们仍旧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即便形式上要听从恺撒安排，但是任命行省总督的权力仍在

元老院手中。此外国家行政机构中的要员几乎是元老院议员。

而且恺撒还决定将原本国家最高机构——公民大会——改为追认机构。

因为当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即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已过百万。直接民主政治无法满足百万选民的需求。百万选民不是集中在意大利半岛，而是分布在罗马统治下的整个地中海区域，并且这种分散趋势还在逐渐增强。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公元前91年，随着意大利半岛全体居民被授予公民权，在罗马集中所有公民召开的公民大会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恺撒现在所做的，无非是将这个公开的秘密挑明了而已。但因为公民大会毕竟是共和政体存在的象征，恺撒最终并没有废除已形同虚设的公民大会，只是将这个“象征”改造成了独裁官决议的追认机构。独裁官恺撒决定政府要职人员名单后交由公民大会，经过大会公开选举后正式生效。这样一来公民大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追认机构。

护民官

护民官是另一个被恺撒改革架空的职位。

恺撒此项改革并不是因为曾经保护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权益的护民官制度已不再适用，也不是像苏拉那样因护民官经常带头举行反体制的活动而对他们的权力进行打压。以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解释的话，恺撒这么做是因为他不希望出现两党制。

取代元老院站上权力顶峰的恺撒，在成为“元首”后仍认为保护被统治阶级的权力是自己的重要职责。出身名门望族的恺撒按照法令并不能担任护民官，但他的继任者——平民出身的屋大维在成为“元首”，即罗马帝国首任帝王后，同时兼任了“元首”和“护民官”两个职务。

恺撒并非想将代表体制的“元老院”和代表“反体制”的“护民官”分成两派，而是想将他们合为一体，从而生成罗马“新秩序”。兼任帝王和护民官双职的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完全继承了恺撒的这个思想。

终身独裁官

为什么恺撒会成为罗马史无前例的“终身独裁官”而不是“皇帝”呢？

罗马公民对王政十分反感，他们认为“皇帝”只相当于军中的总司令，“元首”也无权干涉元老院的决策。

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律，只有独裁官是唯一一个不必与别人共同执政的职位，而且护民官的“否决权”对独裁官也不适用。罗马法律规定了只有独裁官能不受“否决权”限制推行政策。不过一直以来独裁官都只作为非常时期的危急管理职位，而恺撒打算将这个“特殊”职位固定化成为了“常设”职务。这样一来，集权就不再仅限于某个时间段而是长期持续性的了。

从有“独裁官”起，这就是个将遵循体制的执政官和反体制的护民官职务集于一身的职务。恺撒认为这项制度起码有利于以下两点：

一、消除国内的阶级斗争；

二、提高版图扩大后罗马统治的效率。

因此恺撒打算将独裁官制度作为日常体制中的一部分固定下来。

苏拉曾经在担任两年独裁官后卸任，恺撒对此评价道：“苏拉还没有真正了解政治。”结合恺撒上述观点，他会这么评价也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对“政治”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苏拉执政的目的是强化元老院恢复传统体制的统治能力；恺撒执政则是以建立新秩序来恢复罗马的统治能力。

公元前44年2月根据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任命”，恺撒出任“终身独裁官”，开启了罗马走向帝制的第一步。

金融改革

如前文所述，恺撒设立了国家造币机构，并将铸造货币系统化。此外恺撒认为罗马铸币必须成为罗马帝国所有货币的基准，并固定了金银货币的兑换率。一枚金币兑换12枚银币成为固定的兑换汇率。此前罗马一直没有固定的兑换率，基准货币和固定兑换率的出台，罗马各行省的地方货币和罗马货币统一，都有利于促进罗马经济的发展。他还专门设立了“造币三人委员会”，负责国家造币机构的运营，以及监督铸币中金、银的含量。

或许是有过借债的亲身经历，恺撒认为借贷并不是件坏事，反而是盘活经济的重要因素。根据恺撒的观点，借贷应当公正地做到以下两点：一、公正地评估担保物的价值；二、借贷利率不能随意浮动。针对第一点恺撒规定，由于内战导致通货膨胀，因此评估时应以内战爆发前的价值为准。实际上就是在估值中减去了通货膨胀带来的25个百分点。针对第二点，恺撒规定借贷的年利率上限为12%，然后再根据情况逐渐往下调整直到6%。他率先垂范，将自己的物品以6%的利率借贷。但是罗马有着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传统，因此只要不超过利率上限，其他的都只能由公民的经济道德来具体决定了。

行政改革

恺撒并没有改变执政官制度，这个罗马最高的行政职务依旧是每年选出两人同时出任。不过由于恺撒本身既是执政官又是独裁官，他并不受任何约束。因为执政官权力遭到“否决”时，他仍能以独裁官的身份坚

持执行。这样一来和他同时出任执政官的同僚，事实上变成了他的下属。至此恺撒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要把罗马改造成表面上维持共和体制的君主制帝国。顺带提一下，公元前45年也就是恺撒开始改革时，与他一道出任执政官的是法比乌斯。法比乌斯辞世后，该职位由特雷波尼乌斯接替。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由恺撒和安东尼共同出任。法比乌斯、特雷波尼乌斯和安东尼皆为恺撒军中旧部下，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恺撒的“同事”，倒不如说是恺撒的助手更为贴切。除大祭司外所有职位都由两人出任以防止一人专权的罗马共和政体，至此走到了尽头。

恺撒对行政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法务官职位也进行了改革，将苏拉时期的8个席位增加到16席，任期仍维持一年不变。

为了更好地培养帝国统治人才，除了负责国家安全而无法具体限定任期的行省总督外，其余所有官职都保留了共和制时的任期。根据共和制时期的规定，可以无限期任职的职位只有两个：大祭司和独裁官。这两个职位都已由恺撒出任。

将法务官席位从8个增加到16个，是因为与苏拉时期相比，恺撒统治下的行省数量也增加了。按照法律，法务官在完成一年任期后将以“前法务官”的身份被授予“绝对指挥权”，率领2个军团驻守行省以维护罗马统治。作为保障罗马国家安全的前锋，增加人数因而是必要的。

每个军团都要派驻一名财务检察官，在恺撒的改革中财务检察官的席位也增加到40个。财务检察官的职责说起来类似于军团总务，负责军团的各项收支账目。虽说财务检察官必须由30岁以上的人出任，但是这个职位意义重大，相当于通往罗马政坛的“龙门”。照惯例，担任过财务检察官的人几乎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元老院议员。

首都罗马的按察官也从4人增加到6人。恺撒打算从硬件、软件同时着手将罗马打造成为远超其他城市的“世界首都”。

在行政改革方面，还有罗马国内的“地方自治体”。与罗马帝国是罗马本土和行省以及盟国的联合体一样，国内的“地方自治体”也承认各行省的内政自治权。自治体中的地方首席官员由中央派遣，但是他们也必须和地方上的议会一起共同管理地方行政。地方议会的议员们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关于选举权，恺撒依照苏拉当年的规定未作更改。与决定国家事务的公民大会一样，从可以服兵役的17岁起，行省公民就能执行选举权决定行省事务。但恺撒对被选举权，即当选议员的年龄进行了规定：

一、未服兵役者——30岁以上；

二、有步兵服役经验者——23岁以上；

三、有骑兵或百人队队长兵役经验者——20岁以上。

此外，恺撒还明确规定：罪犯、伪证者、逃兵、角斗士、戏子、卖淫者都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

值得一提的是，恺撒向““解放奴隶””们开放了地方议会议员和地方自治体的行政职位，之后又向他们开放了行省行政人员和行省总督的职位。总而言之，“解放奴隶”们大量地进入行政体系中。

录用“解放奴隶”

前文提过，恺撒为了让罗马铸币成为罗马统治内的基准货币，特地设置了国家造币机构，由“造币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该委员会首任成员都是以前恺撒的家奴，因极具经济才能被任用。考虑到奴隶身份不适合出任该职位，恺撒在他们就任之时宣布给予他们自由，因此实际上他们就是“解放奴隶”。

早在124年前格拉古兄弟的父亲任执政官时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年龄超过5岁、资产在3万塞斯特斯铜币以上的人，即拥有相当于普通公民的资产的人，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为曾经的奴隶进入行政体制和地方自治体提供了基础，而恺撒则将该政策明晰化。

恺撒的这项政策并未招致反对。原本罗马家庭中奴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很小的农民家庭或者商店，都有一两个奴隶和主人一同生活起居。元老院议员阶层的家庭中，有掌管家里大小事务的主管奴隶，还有服从主管奴隶的各式奴隶。还有不少家庭教师也是奴隶，曾被西塞罗称赞为“少了你，我就少了写作的左右手”的秘书也是一名奴隶。专为克拉苏演说撰稿的希腊奴隶秘书，曾是元老院议员们竞相高价购买的对象。

虽然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恺撒家奴因崇拜恺撒而终身不想改变身份，但除了他们，大多数奴隶还是渴望获得自由的。西塞罗的秘书就因西塞罗曾许诺会给予他自由而尽心尽力工作。根据恺撒的改革，奴隶只要获得解放就能够参与公共行政。为此恺撒还特地发布公告，不得以“被解放者”称呼那些履行公共行政的原奴隶。以提高罗马帝国的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新鲜血液”，从此大量涌入。

行省统治

罗马本土所在的意大利半岛、众多行省及众多盟国共同构筑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人种、多语言的集合体。因此除了对本土国体、本土地方自治体的改革外，恺撒对行省的行政改革也值得一提。

首先，如前文所述，小亚细亚的本都、加拉提亚及其东方的亚美尼亚、被称为加利亚王国的犹太地区、埃及、毛里塔尼亚等都是恺撒认可

的罗马同盟国，都被授予“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都是承认罗马霸权统治的独立国家。

上述同盟国和罗马之间签订了相互保障安全条约，他们有义务在罗马面临战争时提供兵力支援，因此不需要向罗马纳税。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罗马曾帮助同盟国修建诸如街道等“基础设施”，因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商品往来，而同盟国大概向罗马缴纳过物品流通一类的税。

接着，作为罗马帝国重要组成部分，恺撒对统治行省的方式进行了改革。他将行省分为18个行政地域。苏拉统治时期罗马只有10个行省，后来随着庞培和恺撒的扩张，罗马又增加了8个行省。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恺撒重新划分了行省区域。例如，希腊就被分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两部分。罗马帝国的防卫需求和各行省的经济能力是这次重新划分区域的依据。因此领土是希腊三倍的高卢在这次划分中仍然只占一个行省的份额。

从罗马本土所在的意大利开始，按照顺时针顺序，重新划分的行省如下：

一、西西里岛；

二、撒丁岛和科西嘉岛；

三、远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西部）；

四、近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东部）；

五、纳博讷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即纳尔波高卢；

六、长发高卢（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德国西部、瑞士）即山北高卢；

七、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即山南高卢；

八、伊利里亚（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九、马其顿（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希腊中北部）；

十、亚该亚（现在的希腊中南部）；

十一、亚细亚（小亚细亚的中西部，即土耳其中西部）；

十二、比提尼亚（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现在的土耳其北部，当时是称霸黑海的重要战略地）；

十三、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岛（小亚细亚的东南一带，现在的土耳其的东南部，以及当下希腊和土耳其交界的争议地区的塞浦路斯）；

十四、克里特岛——200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可作为“东地中海不沉的航空母舰”，是英军和德军争夺的地方。而在当时因为可以将其作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航空母舰”，恺撒也意欲将其提升为独立的行省；

十五、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的西北部、黎巴嫩及巴勒斯坦地区，同盟国加利亚的领土除外）；

十六、昔兰尼加（现在的利比亚北部）；

十七、非洲（原迦太基的领地，现在的突尼斯）；

十八、新非洲（原努米底亚王国，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中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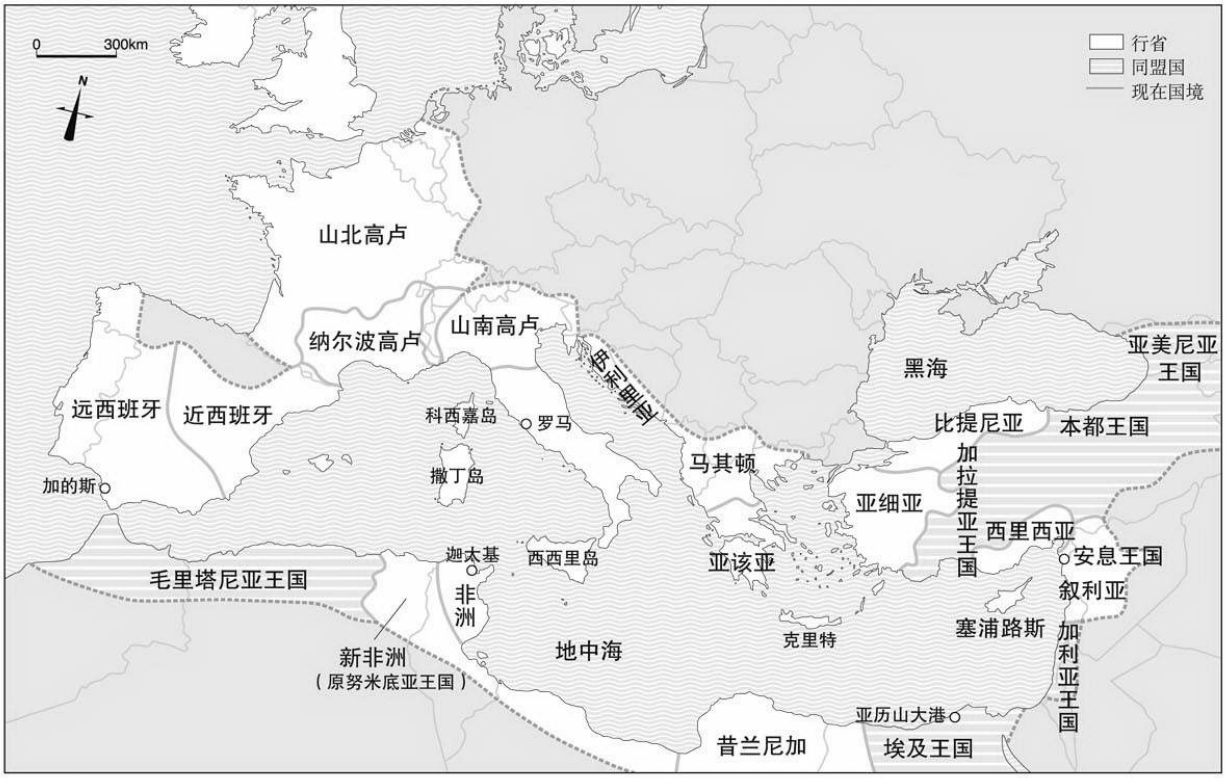
罗马能否有效统一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集合体，首先取决于能否有效地统一罗马行省。恺撒认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平衡地共用是帝国统治的关键所在。因此他没有把罗马本土和行省

的关系看成简单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把行省当成任意榨取的对象。

按照他的想法，重新对行省进行区域划分只是出于行政管理上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限制各行省间的流通。已划定区域的行省并非只有该行省的居民可以定居。恺撒比任何人都更积极致力于推动罗马公民移居行省，同时也计划将所有行省的街道都仿照罗马进行改造。

在现代意大利语中，表示行省的词“provinicia”还是保留了拉丁语的发音。该词有两个义项：一是指“省”，例如“Provincia de Milano”指的就是米兰省；二是指“与中央相对的地方”，例如“provincia”出生者，指的就是出身于地方的人。从词义上看，古代和现代只有些微差别，这不正说明了古罗马人在情感上并不蔑视行省吗？若非如此，不管该词和法语发音如何接近，法国南部的人也不会到现在还称呼自己的住地是“行省”了。正是恺撒的政策，引导罗马人正确看待行省的地位。

但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和罗马本土内的地方自治体还是有差别的。地方自治体的最高责任人是类似市长的地方官，而行省的最高责任人是行省总督。总督肩负着行省的防卫任务以及向行省居民征收安全保障税的任务。因此即使在有军团司令驻守的情况下，行省总督仍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权力。虽然行省议会要经过恺撒的认可才能成立，但是行省议会的议员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由各部落族长担任，这就根据当地情况由总督决定了。例如，和罗马人同样经历过城邦国家历史的希腊人当然会采取选举制，但是对高卢人和西班牙人来说选举是不现实的。恺撒认为连帝国统治都是采取分权和集权并用的手段，那么管理行省的内部事宜也理应如此。



恺撒重编行省和同盟国图

除了考量分权的限度，对税收和宗教问题的对策也是统治好行省的关键。

首先来看税收问题。恺撒废除了一直使用的被称为“包税人”（Publicanus）私人征税制度，以国家征税机构取而代之。因为在他看来，以投标的方式决定税收事务是弊大于利的。为示公正，他一方面公布纳税人名单，另一方面尽可能缩小收税人可随意做手脚的范围。

作为直接税的行省税，恺撒规定其税率仍旧保持在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变。正确掌握纳税人的真实收入，对现代税收制度而言尚且是个难题，在古罗马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现代税收制度一般会从比较容易掌握收入的人入手。

罗马帝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也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对此恺撒并不只是简单地承认各种信仰自由，他考虑也采取集权和分权并用的手

段解决这一问题。

在罗马人看来规定人们生活方式的是法律而不是神，神会保佑并帮助那些依法自律努力生活的人，因此罗马人无论去哪儿都会把他们的神一起带上。随着统治政策、军事行动以及商业活动的进行，出入各行省的罗马人越来越多。同时由于恺撒的殖民政策，在行省定居的罗马人也越来越多。故而恺撒认为有必要明确确立起罗马的宗教。他规定朱庇特、朱庇特之妻朱诺以及密涅瓦三神是罗马的主神，在罗马帝国境内三神的祭祀日是法定假日。

这个规定在希腊文化圈推行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三神原本就源自希腊祭神，在希腊语中他们分别对应宙斯、赫拉和雅典娜。由于恺撒在征服高卢时仍保留了当地的祭司，同意希腊、罗马宗教的信徒们并没有必须参拜以上三神的义务，因此朱庇特的祭祀日对于高卢的本土宗教信徒而言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公休日。但是恺撒的宗教改革在犹太民族中引发了抗议热潮。一神教的犹太人以为罗马和自己一样，将自己的宗教当成唯一的信仰，因此害怕罗马人会强逼自己加入罗马宗教。或许知晓恺撒被暗杀后，真正暗叹的就是犹太民族吧。

最高神朱庇特

天后朱诺

诺密涅瓦

司法改革

上诉权和陪审团制度是罗马司法改革中的两项重头戏。

根据格拉古兄弟中的盖乌斯·格拉古提议的《森普罗尼乌斯法》，

犯罪不分类别必须经由审判定罪，在上诉前不得用刑。该法案自提交起即成罗马国法，不过按照规律凡由代表“反体制”的护民官提出的法案，必定招致体制维护者元老院派的反击。作为紧急事态宣言的“元老院最终劝告”是对该法案的反击。“最终劝告”一旦发出，被通告的对象就已判定为反国家罪，既不需经过审判也不给予上诉机会可直接被判死刑。元老院凭借此最强有力武器，首次处死了《森普罗尼乌斯法》的提案人盖乌斯·格拉古。此后“元老院最终劝告”多次出现，而《森普罗尼乌斯法》则消声于历史舞台。

从37岁起恺撒就一直坚持认为元老院只是劝告及提议机关而并非决策机关，因此并没有权力发布所谓紧急事态宣言。登上罗马权力顶峰后，恺撒重新恢复《森普罗尼乌斯法》，剥夺元老院手中最强有力武器——“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此一来，所有罗马公民在未经审判和进行上诉前都可以远离死刑的威胁。

原本为保证裁决公正设置的陪审团制度，在格拉古兄弟以后，为争夺陪审员构成比例的斗争屡屡发生。为什么该制度会引发阶级斗争呢？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历史。

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开始实行共和政体以来，陪审团席位全部被元老院阶级占据。到公元前123年，盖乌斯·格拉古设立法案，规定陪审团席位由代表政界的元老院议员、代表“经济界”的骑士阶级和普通平民三个阶级平等分配。接着到公元前81年，苏拉为强化元老院体制重新规定陪审团席位由元老院阶级独占。陪审团席位的问题至此成为了阶级斗争问题。公元前70年，由平民支持上位的庞培和代表“经济界”利益的克拉苏出任执政官，同年两人决定恢复盖乌斯·格拉古关于陪审团构成比例的法案。此后陪审员由元老院议员、骑士、平民三个阶级平分席位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恺撒任独裁官时。

恺撒上位后，宣布废除之前所有的陪审团构成法案，重新规定了个人资产在40万塞斯特斯的罗马公民（按照罗马当时的经济实力，即相当

于中产阶级）都有资格出任陪审员。这意味着陪审员不再与阶级身份相关，甚至被“解放奴隶”也有资格出任。如此关于陪审团议席构成比例的阶级斗争终于在恺撒执政期间画上了休止符。

之前受理公民上诉的机关是罗马公民大会，但恺撒在新秩序的改革中，已将公民大会改为追认机关，因此公民上诉此后由恺撒本人即独裁官受理。

此外，政治犯的最高刑罚从死刑改成了流放，且罪不及族人。

恺撒还打算编纂成文法典。

尽管罗马人很热衷推动设立法律，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将法律成文，因此大多数的法律随着常年不使用逐渐被淡忘。立志于让被淡忘的法律重见天日的恺撒，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将法律整理成形以便于公民参阅。

而且罗马法典对维护罗马帝国的统治也大有裨益。

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 犹太人以宗教约束行为，
>
> 希腊人以哲学匡正行为，
>
> 罗马人以法律规范行为，
>
> 由此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民族特性。

宗教不可能成为非信徒的“行动原则”。同样的，哲学也不可能对门外汉有任何影响力。无论苏格拉底的哲学如何深邃，他也无法成为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劳工们的“道德规范”。雅典公民大力赞成对苏格拉底处以

死刑的事实，证明了哲学在“道德规范”影响力上的界限。

但是法律不一样。即使非宗教信徒、哲学门外汉，也不得不承认法律是他们社会生存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法律的精神，就是不管赞不赞同都必须要遵守的生存规则。因此对恺撒而言，在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背景下，法律与街道、货币、日历等并立，都是建设“罗马世界”的共同原则。

可惜罗马法典尚未开始编纂，恺撒就被暗杀了。恺撒的梦想直到600年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编成罗马法大全——《查士丁尼法典》——后才得到实现。不过恺撒时期的“罗马精神”彼时也不复存在了。

社会改革

福利改革

恺撒当权后，并非只是一味地维护他的最初支持者——平民派——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件事。

格拉古兄弟中的盖乌斯·格拉古设立《小麦法》，规定将小麦低价配给给贫民。随着历史的波澜，该法案也一直在变动，到苏拉当政时被废除，后又被恺撒母亲奥雷利娅·科塔恢复。该法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笼络平民派的工具，到恺撒当政时依然如此。首先是元老院派的小加图为获得贫民阶层的支持，废除了低价配给数量的限制；而他的政敌，护民官克劳狄乌斯则将低价配给改为无偿配给，以拉拢那些贫民出身的当权者。因此到恺撒统治时，免费领取小麦的人口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这给国库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恺撒认为，社会福利不是无限制施予，而是在人们有保证生活的收

入来源前暂时性的援助。因此恺撒将配给人口从32万锐减到15万，并规定15万为援助人数的上限，严禁因任何理由拔高该标准。他设置两名地方官专门负责小麦援助事务，令其严格调查受援家庭的收入情况和人数，公正地判定是否有必要对申请者进行援助。只有公正的调查和判断，才能让《小麦法》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成为社会福利政策。

虽然恺撒将援助人口锐减到15万人，但并未引起贫民阶层的不满，足见之前的当权者，为政治斗争需要，将援助范围扩大到了没有实际需求的人。

失业对策、殖民政策

失业不仅让人失去谋生手段，也让人失去了自尊心。对普通人而言，从事某份工作可以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解决失业问题不应该依靠社会福利，而是要创造就业机会。如果误读了解决之道，一则导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二则无论社会福利政策是否彻底，都会成为社会动荡滋生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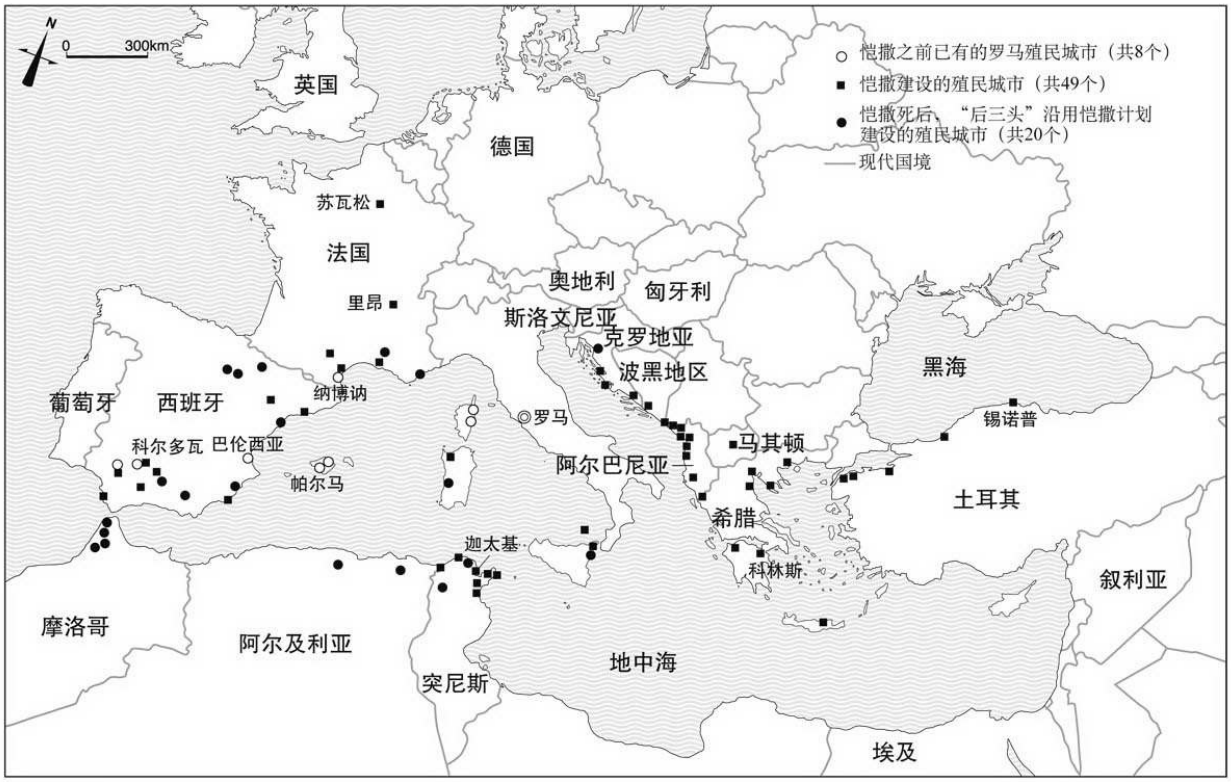
因此无论是格拉古兄弟设立的《农地法》，还是马略的“自愿兵制”，都是将失业的预备军——普通农家除长子外的儿子——吸纳进了部队。70多年后，恺撒在公元前59年担任执政官时，将既是土地改革又是解决失业的政策——格拉古兄弟的《农地法》——再度恢复。同时继续推动罗马军团吸纳失业预备军的功能。

根据《农地法》，失业者可以借国家土地进行耕种，而罗马本土土地总是有限的。不过对恺撒来说，罗马本土和罗马行省之间并不存在国境线。

恺撒大力推广殖民政策，将给失业者和退役兵的土地分散到各行省。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避免了重蹈苏拉从意大利居民手上夺取土地再分配给军中部下的覆辙。

二、将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们分散到各行省推广殖民活动，使得罗马帝国全境范围内都拥有了发展的根基。



恺撒的殖民政策

恺撒的殖民政策完全不是针对弃民的，他将自己的军中精锐，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的殖民地以军团为单位，分散到法国南部各行省。此外，恺撒复兴了地处北非的迦太基领土和希腊的科林斯。它们都是得益于优越地理位置而有过700年以上繁荣历史的一国首都，之前都因被罗马灭国而成为不毛之地。从不墨守成规的恺撒认为，像迦太基和科林斯这样完全可以把土地利用起来，没有必要作为胜利成果展示而闲置。因此与公元前146年灭亡的迦太基和科林斯时隔百年又重新兴盛起来。

以前从意大利半岛去爱琴海要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了缩短路途同时兴盛科林斯，恺撒决定开凿人工海峡。不过恺撒的这一理想和他另外那些工程设想一样，直到近代才真正实现。

在恺撒的政策推动下到各行省实行殖民的罗马公民，仅以各家族族长计算，就已到达8万人。随着殖民政策的推进，恺撒理想中的“罗马世界”、“罗马帝国”正一步步形成。

委员会政策

自古以来罗马就存在许多职能各异的“委员会”，负责行业内的互扶互助。在多神教的罗马，这些以行业职能为目的的委员会也免不了染上宗教组织的色彩，例如石头工匠委员会信奉保护他们的石工守护神等。只要不掺杂外国人、不因狂热的宗教信仰引发社会动乱，通常情况下这些组织的存在都是合法的。因此这种委员作为构成罗马社会的重要因素而延续下来。

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护民官克劳狄乌斯注意到这些组织的政治作用。在高卢战役时期，克劳狄乌斯受恺撒之命设法牵制元老院，他注意到由于委员会各劳动行业组织，所以委员会成员大半都来自平民阶层。他于是着眼于开发这些委员会的政治功用以冲击元老院主导的体制，结果起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故而元老院不得不默认米罗组织的暴力组织——院外团——的存在，以对抗克劳狄乌斯的“委员会”。

不过，曾为恺撒上位付出努力的“委员会”，却因其反体制的特殊职能，成为了恺撒建立新秩序的大障碍。因此，继废除由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平民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后，恺撒接着又遣散了这个平民阶级权力的温床——已政治化的委员会，重建了一个只含行业互助功能的委员会，并给予新组建的委员会以信奉各自行业守护神的自由。

治安政策

学者们推测，恺撒时期首都罗马的人口，包括女人、孩子、奴隶、外国人在内，规模大约已达到百万人。可以说首都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的罗马帝国的缩影。

不过当时的罗马并没有类似警察这样的机构，恺撒打算设立一个治安机关。如果政府本身不管理治安的话，富裕家庭肯定会自己雇用私家护卫，如此首都治安将面临重大隐患。克劳狄乌斯和米罗的暴力组织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如果治安上没有优越性的话，罗马也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首都”。

但是想着构筑首都治安的恺撒，自己外出时却极讨厌带侍卫，这也反映了他的独特性格。

交通疏堵对策

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罗马，自然更是热闹非凡，当然也免不了随之而来的拥挤、杂乱等问题。在市中心罗马广场及开设市场的台伯河沿岸一带，人和马车交杂在一起，导致交通堵塞。恺撒对此也进行了整顿。他规定，白天只准已婚妇女和女祭司乘车上街，货车等一律在夜晚通行，以日出为界。作为领袖，他自己也是步行上街。

由于货车一律在夜间通行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代，住在马路两侧的人们常被夜里马车碾过铺路石板的声音搅得彻夜难眠。对此的补救措施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因为当时还没有橡胶，只好从房子结构上想办法，所以当时罗马市中心的房子都改成了没有窗户的内部敞开式结构。百年后塞内加从西班牙“上京”时曾借住于罗马一户人家，当时尚无名气的他每天夜里枕着货车的噪音，写下那篇既幽默又悲伤的名作。

不过不要忘了，罗马人自古以来就有都市和田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的罗马人在乡间都拥有“第二家园”。受街上的噪音的困

扰是住在城市享受便利生活的代价吧。

城市清洁问题

治安和清洁问题，是检测居民素质的最简单的衡量工具。

恺撒没有忽视罗马的清洁。他规定地方官负责管辖区域内公共场所的清洁，而公共场所之外地方的清洁，则由当地居民负责。各人负责清理各家的房前屋后。我敢肯定，那时的罗马绝对比现在还要整洁。

禁止奢侈法案

恺撒并非想把罗马人变成清苦的斯巴达人。俗话说过犹不及，恺撒担心过度节制的话政策不能持久，但恺撒又担心若放任自流容易滋生社会攀比风气。故而恺撒决定有限度地禁止奢侈，例如，他规定除渔民和渔贩外，不可养鱼。因为罗马人喜鱼恶肉，故而罗马富人中特别流行在池塘或者大渔篓中养鱼。

西塞罗曾撰文讽刺该禁令："最近老是拉肚子。既然不能养鱼，我只好以青菜度日。"

恺撒自己倒是完全没有口腹之欲，他早已习惯和士兵们风餐露宿。他也不怎么喝酒，从未喝醉过。连小加图都说："推翻共和政体的那些人中，只有恺撒是清醒的。"即使成为了最高领袖，他也从未特别定制过菜肴。他从不因饮食味道不好而抱怨。倘若有同食者嫌弃味道不好，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就不吃吧。

建设新罗马

人文地理学的先驱斯特拉波，公元前64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本都，

和恺撒是同代人。这位希腊人在他的名著《地理志》中曾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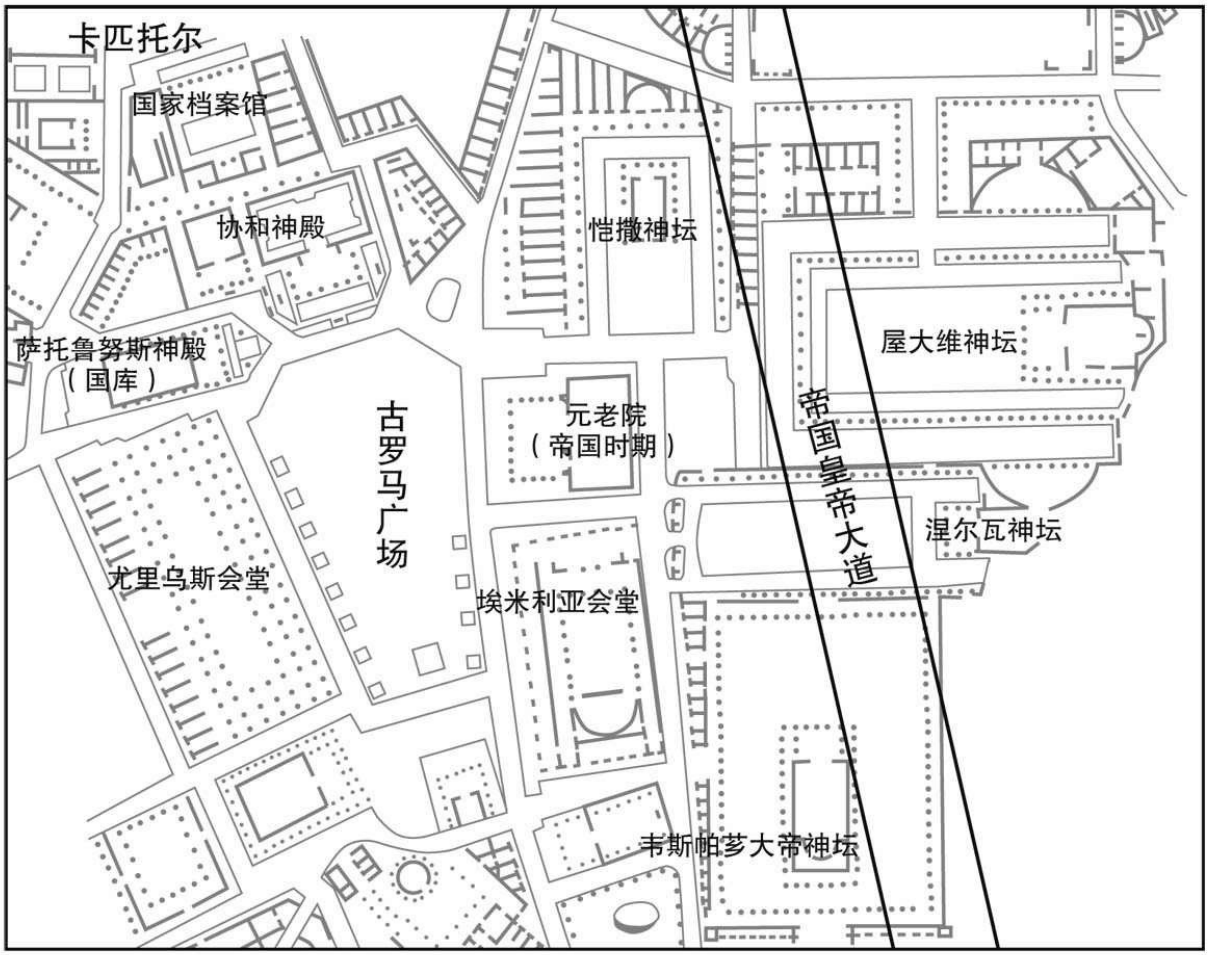
> 美丽、安全，有一个能够进出货物的港口，这样的城市就足以打动希腊人了。
>
> 但如果要吸引罗马人，还需要加上基础的城市设施，如铺饰过的街道、完备的下水道和上水道系统。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城市里的下水道建设，在罗马街面下呈网状分布，由弧形石头打造，排出的水统一流入台伯河。罗马街面上是马路，街面下是下水道。
>
> 不仅罗马市内的街道，整个罗马领土内所有的城市街道都经过铺饰。
>
> 罗马在铺设街道前都会铲平小丘，将高低不平的地势修理平整。铺设后的街道非常平坦，满载货物的搬运车也可以顺利通过。
>
> 上水道的设置也非常完美，饮用水可直接连接到每家每户。许多家庭装有蓄水池，有的甚至可以维持家用小喷泉工作一整天。

罗马人的城市兼具功能性和舒适性，甚至2000年后的学者们都称赞恺撒是“体现了罗马体力和智力兼备的现实主义者”。他主持下的首都翻新工程，自然也体现了他这一特点。

墨索里尼为了向希特勒夸耀独一无二的阅兵用司令台装置，用一条宽阔的马路无情地将恺撒主持下新建的罗马一分为二。该情景一直延续至今。当时建筑家鲁·克鲁比杰曾提议架设桥梁代替把马路截断，不过桥梁虽有利于保存古罗马的风貌，却不适合现代阅兵。因此有了这么一条从威尼斯广场到罗马斗兽场的马路。这真是个行为没有文化却全然不知羞耻的领袖之典范。

帝国广场大道（Via Dei Fori Imperiali），如果按照意大利语发音直译就是“帝国皇帝大道”。因为在道路的南侧，矗立着恺撒及后来沿袭他想法建设新罗马的众多皇帝的铜像，如奥古斯都、涅尔瓦、提图斯等。

无智的法西斯政权倒台后，取而代之的民主主义政权已经存续了近50年。不知是因为他们也无智呢，还是因为财政困难，一半以上的皇帝神坛仍长眠于柏油马路下。



罗马帝国时代的古罗马广场和墨索里尼时期的帝国皇帝大道
（摘自“Roma Antiqua, Forum, Colisee, Palatin”。但帝国皇帝大道图由作者添加，大道两旁是置有长凳的旅游步行通道）

罗马成为“世界的首都”后，祭祀用的卡匹托尔山、古罗马广场和帝国皇帝大道以及图拉真开发的新地块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

站在历史被隔断的现代回头看古罗马，如果没有超凡的想象力，仅凭地图也无法在脑海里再现那时的全貌。

说个题外话，每逢重大节日，帝国皇帝大道上通常都是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知高高在上的皇帝们眺望这一切时，心中又作何感想呢？

恺撒神坛

意大利语中FORO，拉丁语中FORUM都是指古代罗马人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域，那是集政治、行政、司法、宗教和经济于一体的公共场所。“集众多功能于一体”是古罗马人建造城市的特征，市民们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恺撒的改造理念，将这种“浑然一体”实施得更为彻底。在恺撒之前，无论是古罗马广场还是街道旁的神殿，都是彼此独立的，都沿袭了卡匹托尔山上仿希腊神殿的样式。但自公元前55年开始建造至公元前46年完工的恺撒神坛，开创了新的风格。首先该神坛体现了宗教、经济“合一”的理念。神坛正殿供奉着恺撒家族守护神——美神维纳斯，正殿左右两侧都围绕着长长的回廊。由罗马柱支撑的回廊中间，开设了许多商铺。不过这些商铺可不是买卖日用品的，而是专为骑士阶级建造的办公场所。此外神坛还有文化及教育功能。

恺撒神坛进深165米，宽75米，两侧回廊（165 × 2=330米）开设了许多商铺。除办公场所外，神坛一角计划建成罗马首个国家图书馆。虽然恺撒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但是他选定的图书馆馆长——原庞培派瓦罗，仍尽心尽力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图书收集在此。神坛另一角用于建造私塾形式的学校，直到今天仍残存着学生们的涂鸦。

一言以蔽之，恺撒心中的“神坛”实际是古罗马广场的缩影。

古罗马广场（拉丁语称古罗马神坛）中，建有作为国库使用的萨托鲁努斯神殿及其余神殿，也有被称为Basilica的长方形会堂。其中包括了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修建的埃米利亚会堂、恺撒在格拉古兄弟之父修建的基础上扩建的尤里乌斯会堂。

会堂的外观最初模仿希腊建筑，后来又转化成基督教堂的样子。不过虽然外观类似，其内部结构与基督教堂相比有所改动：基督教堂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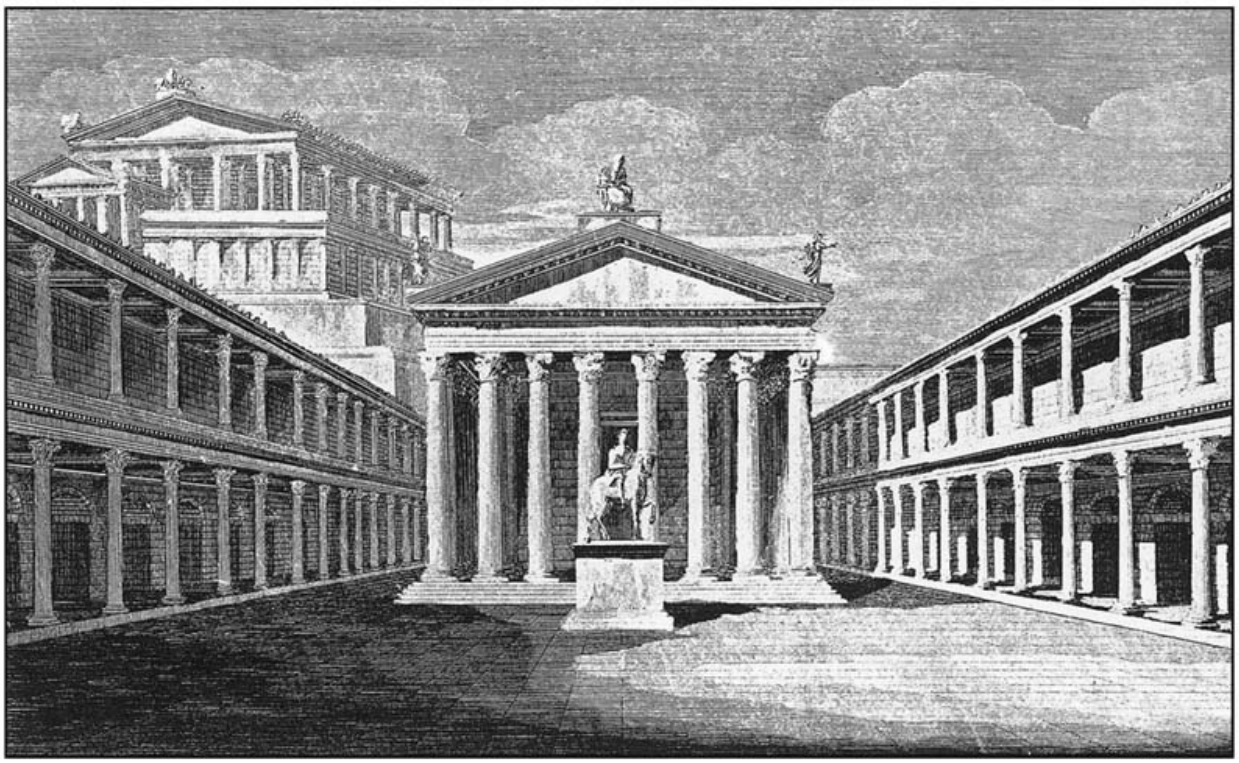
空间是封闭的，罗马时代的会堂却是四面敞开的，为保证中间宽敞，在周围并立了许多罗马柱。埃米利亚会堂长70米、宽29米，尤里乌斯会堂的规模是其2倍。罗马人为会堂建造了屋顶，这样既可以避雨又有充足的光照。因此罗马人几乎在会堂里进行审判、商议、交换情报等所有事务。

恺撒神坛中既设有办公长廊，也设有会堂，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的古罗马广场。同时恺撒神坛的建筑风格也独树一帜，将罗马人的建筑观从古希腊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开创了罗马独特的风格。不过，或许恺撒真正希望的是这个正中矗立着自己骑马塑像的神坛，成为对全体罗马人开放的公共场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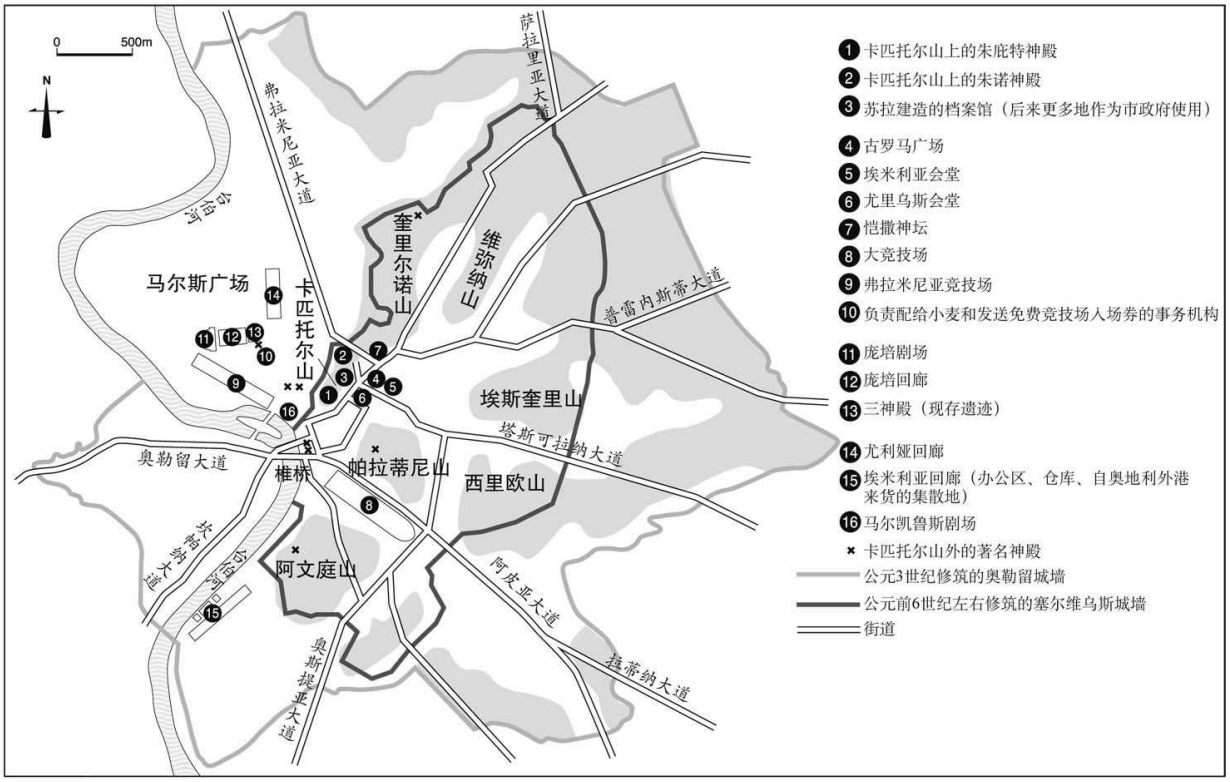
建造了尤里乌斯会堂后，恺撒打算在传统基础上全面修整古罗马广场。不过，他并没有修缮自己的居所大祭司官邸，而是改造了公民大会堂及其毗邻的讲坛，将它们移到更靠近广场中央的地方。其实这些地方并没有破损到需要重新修葺的地步。恺撒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罗马的城市规划更加整洁。或许恺撒就是喜欢“浑然一体”的风格，讨厌无秩序的混杂吧。

恺撒的改造计划中还包括城墙外宽阔的马尔斯广场。

得名于战神马尔斯（Mars）的广场是一块开阔平地，由台伯河像条大蛇一样环绕着。恰如其名，该广场本就是军队的集结地和校场。随着罗马的强盛，城内无法安放的一些公用建筑也逐渐建造于此。



恺撒神坛（想象复原图）



恺撒时代（罗马共和末期）的首都罗马

大约最早设在这里的建筑物，是被称为“公共别墅”的小麦储藏仓库，一个专门负责向贫民们配给小麦的场所。从现在能见到的遗迹来判断，该仓库西边紧邻的是三座神殿。沿着台伯河，有一个足可与罗马共和国时期“大竞技场”媲美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公元前221年，平民家庭出身的执政官弗拉米尼（后为汉尼拔所杀）反对贵族独占“大竞技场”。为了让平民有锻炼身体的地方，他修建了“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其实后者并非只有平民能使用，而大竞技场名义上也并非只限贵族使用。但由于后者有“平民俱乐部”的特质，护民官还是经常把那里当做平民集会的场所。

弗拉米尼还令人修建了一条从古罗马广场出发直通台伯河的大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弗拉米尼亚大道，文艺复兴时期称该道路为克鲁苏大道，现在是意大利第三国道。这条长达5500米的笔直大道可谓是古

罗马时期街道特征的典型代表。

随着公共建筑物的逐渐增多，马尔斯广场也不再被当成“城外”了。这一转变的真正实现是在庞培时期。公元前55年，庞培援赠给国家的罗马第一座石砌半圆形剧场建造完成，该剧场可同时容纳1.2万人。接着庞培又建了一个长180米、宽135米的回廊。该回廊一端作为元老院会场，另一段设置了办公区域。

在政治、军事上皆视庞培为对手的恺撒，在公共建设领域自然不甘其后。恺撒在庞培建筑的北面，开始兴建纪念尤利娅的工程——尤利娅回廊。该工程不仅作为公民大会投票场所，也开放给普通市民供他们休息。该工程长达300米，宽120米，四周以巨大的罗马柱并列支撑，造型既美丽又雄伟。

此外，恺撒还打算在台伯河附近建造半圆形石质剧场。不过该计划直到他的后任奥古斯都才变成现实。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了纪念他的侄子，该剧场以其侄子名命名，被称为“马尔凯鲁斯剧场”。该剧场的主体部分到现在还被改造成集中住宅区。

无论是恺撒神坛、剧场、回廊、会场，还是竞技场，其中作为支撑的罗马柱，以及被称为“艾萨多拉”的半圆形广场和广场中央都以大理石和铜等作为表面装饰。正是有了这种“内在需求”，罗马迎来了特有艺术样式的全盛时期。

罗马的当权者们，无论是出于虚荣心、不甘人后的好胜心，还是回馈社会的心理，都对公共建设非常热衷。由此罗马作为“世界首都”在迅速扩大和完备的同时，城市的功能和舒适程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过“天生的政治家”恺撒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同，他不仅在建设，也在破坏。他总是在已有公共建设的附近重建新工程。他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建设而破坏，只是为了破坏而破坏。

公元前6世纪罗马第六代王塞尔维乌斯建造了一座长达8公里、环绕罗马七丘山、拥有14个城门的“塞尔维乌斯城墙”。该城墙坚固异常，连汉尼拔都对之无计可施。但是到现在这座牢不可破的城墙只在车站尽头的卡匹托尔山和埃斯奎里山上留有少量的遗迹。若只历经2000多年的自然风化，该城墙也不只剩这么点；而且通阅典籍也找不到在那之后有与之相关的建筑痕迹。因此有可能该城墙是恺撒下令毁掉的。现在罗马市周边环绕的“奥勒留城墙”是公元3世纪的建筑，那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为了防御不得不修筑的城墙。

即使在1700年后的现代看来，奥勒留城墙仍旧保存完好。除了古罗马的建筑技术优秀外，行使皇帝职能的历代罗马教皇们也功不可没，教皇们时常注意对该城墙的修缮。大概是因为即使身为基督教尘世王国之首，他们也认为没法在毫无防御的状态下实现和平吧。

另一方面，有300年之久，古罗马在无城墙防御状态下和平度过。或者这可以看成是恺撒给奥古斯都及其后任者们的启示：虽然奥古斯都完成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但只有在首都不需要城墙防卫的状态下，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因为城墙在起到防御作用的同时，也阻碍了内外之间的交流。拆掉城墙的行为表明，恺撒在扩大罗马城市规模的同时，也希望在没有壁垒的情况下维持和平。笔者最初对共和时期城墙遗迹的贫瘠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通过有关学者的论文论述，再加上实际的调查研究，却为恺撒的这一行为感动不已。眼见恺撒之后的历史中，统治者们总是构筑起有形或无形的“墙”，我总是禁不住怀疑人类历史是否行走在倒退之路上。

以上是恺撒对新建首都的构想。如果说类似拆城墙的举措是恺撒的“硬计划”的话，那么接下来要叙述的提高教育、医疗水平则属于“软计划”了。

教师和医师

恺撒曾下令，所有在罗马的教师和医生只要继续留在罗马从事本来职业，那么不分人种、肤色、宗教、民族，全部享有罗马公民权。拥有罗马公民权意味着可以免缴像行省税那样的直接税，并且个人安全还能得到罗马法律的庇护。

不过恺撒也知道，有志于从事教育和医学的人并不是能轻易被直接利益所打动的一群人。因此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扩充医疗设备，改善医疗条件以留住医生。后来罗马帝国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恺撒重医的思想，帝国时期军团医院规模甚大，医院的规模和设备让2000年后的现代人都赞叹不已。另一面则为教师们提供进修的机会和场所。恺撒神坛内的国立图书馆本身也是研究机构，同时馆内一角还建有私塾。

恺撒的方法不仅仅有助于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还促进了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索斯到罗马的狄俄尼索斯就是在当教师期间，写下了《古罗马史》。无论是苏拉建设的档案馆中的资料，还是罗马公共事务年鉴《大祭司记录》，恺撒都无偿向有志于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者们公开，并且命人抄录并出版。

因此笔者认为，教师和医师这两种职业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被公开承认，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恺撒。此后不久，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效仿恺撒授予教师和医师罗马公民权。接着，连罗马人移居的殖民城市以及军团基地也开始尊师尊医。最后，整个庞大的罗马帝国统治范围内都开始兴起这股风气。

其他公共事业改革

一、沿亚得里亚海海岸，铺设从拉文纳到布林迪西的道路。贯通意

大利半岛南北的新铺设道路全部以罗马样式为统一标准。不过这个类似今天高速公路的新道路也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全部完成。

二、将罗马以东的瓦勒利亚大道延长至亚得里亚海。该工程也是帝国时期才实现。

三、填湖造田。把沿着瓦勒利亚大道的费奇诺湖及周围区域变成耕地。帝国时期完成填湖工作，然而耕地化直至19世纪才实现。

四、改善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的港湾设施。该项由克劳狄和图拉真完成。

五、将阿皮亚大道沿线宽阔的湿地区域改造成耕地。此项至20世纪墨索里尼时期才得以实现。

六、恺撒计划将蜿蜒的台伯河改道，分为原来的河道和流经梵蒂冈背后的两条河道。这样既可以在台伯河东岸（马尔斯广场）防洪，同时也可以将台伯河西岸（梵蒂冈）并入罗马市内。

不过后来的奥古斯都认为第六项是个不切实际的大工程，因此并未实施，而只在台伯河东岸加筑堤坝工事作为防洪手段。

然而奥古斯都的做法却与恺撒的真正动机背道而驰。因为堤坝的加筑工程必定要加高河岸，如此一来，恺撒的罗马一体化理想被加高的河岸硬生生地隔断了。中世纪时佛罗伦萨通过在亚诺河上下游设置堤坝以控制水流量的方式，成功地将河流两岸地区一体化。但鉴于台伯河水量要大得多，因此佛罗伦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罗马。

在恺撒的计划中，还有一项因评价不高而不得不中止的改革：装订书籍。

古代书籍是以笔写在纸莎草制成的纸上，再做成长卷。书中不分章

节，只标有总共的卷数。为了使用方便，恺撒打算将长长的书卷切开，以一页页的方式装订成册。这样阅读者就能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看的章节部分。然而，恺撒这个合理的想法并不符合罗马人的喜好。因为比起一页页翻阅，罗马人认为手握长卷更显得庄重。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男性更喜欢这种阅读方式显出的派头。恺撒的书籍改造计划在同时代人的无视中无疾而终。

但到了中世纪，古罗马的统治地位已被基督教代替，从事抄写古代遗书的修道院也注意到了恺撒的装订方法。因当时已经用羊皮纸代替纸莎草作为书写材料，而羊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再适应以卷轴方式保存。故而修道院的僧侣们将羊皮纸切断，再以皮质硬壳作为外套，压平折皱。或许他们正是看到古罗马书中记载的恺撒构想，从中受到启发才这么做的。后来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尽管纸张质地轻薄到完全可以卷起来的地步，然而恺撒创造的订书方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恺撒的特权

从公元前45年到公元前44年，恺撒被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的荣誉、权威和特权具体如下：

一、在罗马共和国450年历史中，独裁官任期不超过6个月。恺撒打破了这个纪录，被授予无任期限制的、权力不变的“终身独裁官”。

二、“终身独裁官”恺撒可以在任何时期兼任当年的执政官。

三、按照古罗马传统，士兵们只能在打胜仗后欢呼时称呼将军为“伟大总指挥”。恺撒无论战时、平时都享有该称号。

四、恺撒被尊为“国父”。罗马市民们认为罗穆路斯创立了罗马，恺撒则给予了罗马新生。

五、恺撒有权在平时穿着紫色披风。这种服饰原本只能在凯旋仪式上由凯旋的将军穿戴。

六、恺撒可将月桂冠作为日常配饰。

七、恺撒可终身单独出任“纠风官”。该职位原本只有财务官和元老院议员共同出任，负责纠正社会风气。

八、在元老院会议上，恺撒座次要高于执政官。

九、剧场及竞技场中，恺撒在观众席中享有特殊席位。

十、在卡匹托尔山供奉着罗马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入口处，并立着历代罗马帝王雕像。恺撒有权将自己的全身立像置于其中。

十一、恺撒拥有元老院会议上的首席发言权。

十二、恺撒拥有对公职人员的任免权，其任免决定公民大会不能否决。这意味着从公元前509年开始的公民大会从此形同虚设，公民的选举权事实上不复存在。

十三、由于恺撒出身名门，按照罗马规定，他无法出任只能由平民担任的护民官一职。因而恺撒又给自己谋取了两项只有护民官才能有的权力，那就是否决权及身体不受侵犯权。

十四、除纪念币外，恺撒有权在普通货币上加刻自己的肖像。

十五、按照罗马第二位国王努马的历法，3月是一年的开始，7月实际上是现代一年中的第五个月。为了纪念恺撒的诞生，恺撒将7月的名称从原来的“昆提利乌斯”改为“尤里乌斯”（Julius，即英文的July）。

十六、神化恺撒政治的基本精神——“宽容”，建造以“恺撒的宽容”为名的神坛。

以上事实表明，恺撒已事实上成了帝王——罗马走进了帝制。

就连对恺撒没有好感的布鲁图，也不得不承认恺撒为此进行的不懈努力。

恺撒对多民族综合国家帝制的理解，超越了同时代绝大多数人。那时人群中常常有人称呼恺撒为“皇帝陛下”，但恺撒对此应声道：“我不是皇帝，我只是恺撒。”然而反对者们则认为，恺撒不过是因为称帝时机尚未成熟而说出的虚伪辞令。恺撒自己却深知统治一个民族的“王”和统治多个民族的“皇帝”之间的区别。因此实际上后来所称的“恺撒大帝”，也仅仅是单一民族意义上的皇帝。

恺撒一面“宽容”地对待反对者，一面坚定地按照自己的主张推行政治改革。直面艰难处境，也许是他不得不担负的宿命。但是反对者们自负地认为，自己和恺撒是站在同等的立场上承担国政之责。

不满的人们

西塞罗曾给某位友人写信抱怨道：

> 虽然以前我并不是出于个人喜好而监督国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我们仍旧是坐在船尾掌舵的。而如今的我尽管也在船上，却只是坐在船底。如果我在那不勒斯，说不定可以随时听到元老院变化决策的消息。
>
> 如今元老院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共识的某位朋友的后院了。如果那个人认为妥当的话，法案的起草者可以随意地署上我的名字。据说对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政策的起草人就是西塞罗，不过我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
> 你别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说真的，这事眼下正在发生。

某天我收到远方国家的王们所写的感谢信，声称因为我起草的法案，使得他们的王位得以存续，特向我表示感谢。可悲的是，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听说此事，甚至我连这个世上有他们这样的人都不知道。

在西塞罗与好友的通信中，他更是将不满情绪表露无遗：

你一直力主元老院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可如今的元老院早已不再是政治的中心了，在这样的地方待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阿提库斯啊，西塞罗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能很久以前就已经没必要了，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这个事实。我和国家的缘分已尽，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到别墅孤独地度过残年吧。

阿提库斯哪，我们写信交换意见也快没有意义了，都是千篇一律的、充满了忧郁的内容。我即将要成为失业者了。

特别是此刻，想到罗马共和国的未来，潸然泪下。

过去的政治由老练者执事，现在成了某人发号施令和另一些听其号令的年轻人的世界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腔老去的热情或许只能用在园艺上了。

元老院曾经是罗马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中地，如今这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们要和高卢人、西班牙、希腊人比邻而坐。因此大文豪西塞罗表示不堪忍受那些人以蹩脚的拉丁语陈述意见，他说："从高卢来的这些人，给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罗马光荣传统蒙上了阴影。"

尽管"有秩序的融合"是西塞罗政治思想的根基，但他所主张的"融合"是指他现在所属的元老院阶级与他出身的骑士阶级之间的融合，而并非恺撒所指的罗马人和行省人民的融合。"我不是恺撒行政执行机构中的成员，无法了解他执政的方式。不过，或许恺撒自己也并不清楚

吧。”

恺撒心中当然是有数的，只不过他看得到的东西，西塞罗不一定能明白而已。

即便如此，西塞罗仍无法对政治死心。但如今恺撒一人独揽国政大权，因此西塞罗和朋友商量着以写信的方式向恺撒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他打算就罗马的未来向恺撒写封意见书：

> 审慎考虑后决定中止写意见书，但表达政见的欲望并未停止。我计划以书信的形式创作《政治备忘录》，但不知从何着手。我手上现有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彭波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两本著作，但不知能否以之为参照。毕竟这两位本身都德高望重，并且所写内容深得亚历山大大帝赞许啊。
>
> 阿提库斯哪，你帮我参谋参谋我和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吧。到底有还是没有，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纠结许久，西塞罗最终还是没有写下他的意见书。因为：首先他不确定写了意见书之后是否能增加声望；其次他担心意见书代表了自己已经认可恺撒现在的地位；再次他对该意见书能否被恺撒接受也没有信心。

西塞罗为赞美小加图以死拒绝恺撒的宽容精神而专门发表过《论加图》。对此恺撒以《反加图论》为题发表与西塞罗相反的观点，以制造自己的舆论阵营。恺撒没有禁西塞罗的《论加图》，而是选择自己站出来进行反驳。公元前44年恺撒出任终身独裁官时，也有人匿名趁夜在古罗马广场建筑物墙上张贴斥责恺撒的文章，对此恺撒也没有追究。假设西塞罗真的发表《政治备忘录》，以重申对元老院主导的少数指导体制的坚持，相信恺撒也不会一味打压该言论，而会选择自己亲笔进行辩驳。因此西塞罗最终罢笔，肯定不是被恺撒打压所迫，而是自行选择放

弃的。

西塞罗把恺撒的秘书希尔提乌斯送来的《反加图论》一气读完，并写下读后感寄给好友阿提库斯：

> 我在读完希尔提乌斯送来的恺撒反论之后，终于知道恺撒在读完《论加图》之后的感想了。在恺撒的反论里，他对小加图的缺点进行了列举式的批判。但是，对我的行文水平他还是认可的。因此我已经将《反加图论》给了姆斯卡斯抄写，以便能尽早让更多人读到。

西塞罗已年过六旬，却仍改不了自卖自夸的习惯。只要听到赞美之词，不管是谁，基于什么事发出的，西塞罗都会觉得飘飘然。在恺撒的独裁统治下，言论自由仍得到极大的鼓励，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是，尽管大权在握的领袖有接受批评的气度，他曾经的同僚现在的友人们却没有署名批评他的勇气。西塞罗作为这种人的代表，自己选择了放弃劝诫。

自我限制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不论从产生该行为的心理背景，还是从该行为产生的心理影响来看，都是很有意思的。

在苏拉时代，他大概不会让西塞罗或是其他反对自己的人有机会为要不要写意见书而烦恼，而是直接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杀掉就是了。此外，像小加图那样认为罗马人无权宽恕其他人的，以及受小加图思想影响，但又因接受了恺撒宽恕而苦恼不已的布鲁图等人，苏拉也大可直接处死他们。只要祭出“处死”利器，他们就会自我限制，不会在受了恩惠之后又自我烦恼了。

但恺撒并没有制作“黑名单”。无论是对庞培余党还是对坚持元老院体制的共和主义者，恺撒都给予了宽大处理，既允许他们回国恢复原来

生活，也保留了他们原本在元老院的席位。像布鲁图就被恺撒任命为公元前46年的北意大利行省总督——尽管也因为他是恺撒情人之子。苏拉曾强命恺撒与政敌秦纳的女儿离婚。然而恺撒和苏拉不同，他在知晓布鲁图娶小加图女儿为妻后也并没有强令其离婚或者流露出一丝不快。

从第三者的角度看，恺撒的方式显然要比苏拉好很多。但是当事人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在高压统治下失去言论自由，那么当事人尽可以将不满归咎于高压政策上。但如果没有高压政策的压迫，是自己主动放弃言论讨伐的话，那么这份不满可就无处发泄了。同时曾被自己以剑相对的人，不仅饶恕了自己的性命，还许以高官厚禄，这样一来即使心中有情绪又怎能再向他发泄呢？

在苏拉的高压政策下，上述烦恼、厌恶等种种情绪早被扼杀在摇篮里。而恺撒的宽容反而让这些情绪有了滋长的空间。苏拉生前总是对周遭种种产生不安；讨厌被不安情绪包围的恺撒却不知不觉间被平静表面下暗生的怨恨情绪包围了。

西塞罗、布鲁图以及曾为庞培派后归顺恺撒并任高职的卡西乌斯三人，于公元前45年至公元前44年间频繁地通信。信件在首都的布鲁图、卡西乌斯和别墅里百无聊赖的西塞罗之间来回传递。不过年过六旬的西塞罗和40多岁的布鲁图、卡西乌斯之间还是有代沟的。西塞罗反而与55岁的恺撒有更多的共同经历、共同教养以及相近的拉丁语写作水准。可惜此二人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对，此外两人在性格、两性关系和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也有着天壤之别。不过从个人立场上看，西塞罗对恺撒的评价之高，远超他对庞培的评价；那些与西塞罗持相同政见的人也对恺撒评价很高，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从个人的立场上来讲是很喜欢恺撒的。因此西塞罗即使抱怨自己要成无业人员在罗马已无立足之地之后，仍这么写道：

恺撒有着杰出的平衡能力，他虽怀着宽容的心但并不滥用。对于那些才堪大任的人，一律不分国别、不问出身委以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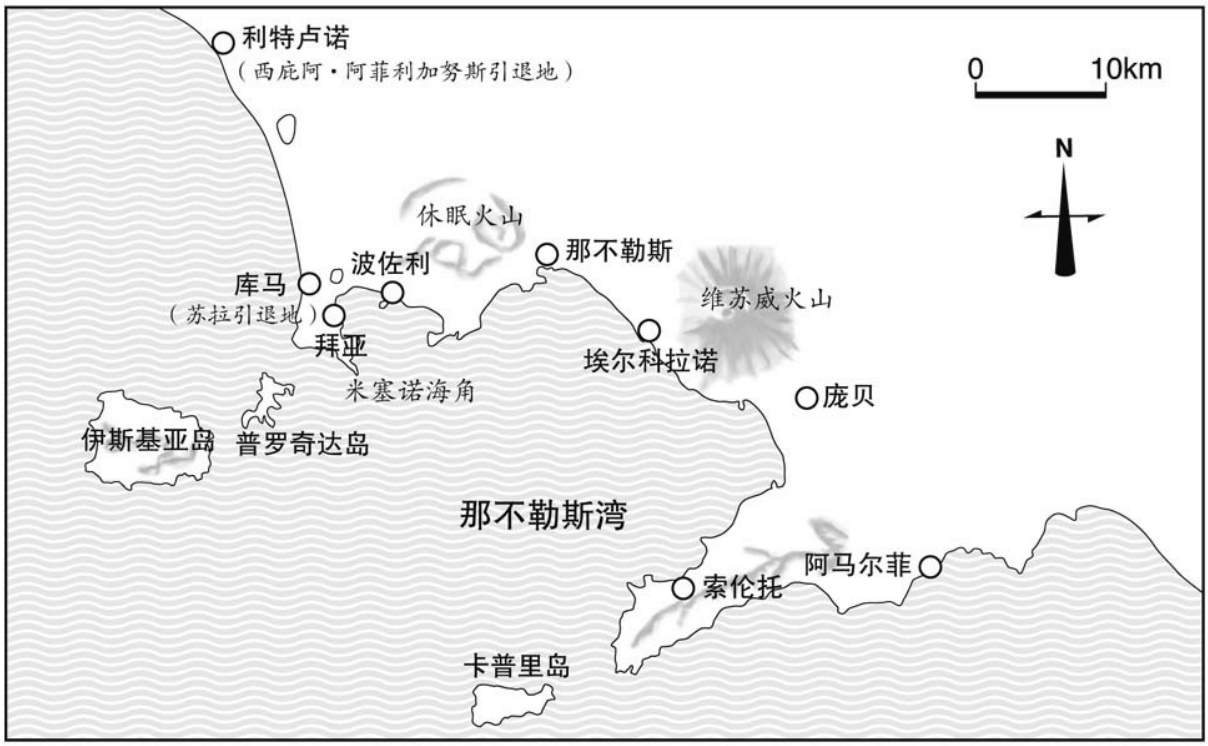
对恺撒认真、公正的态度和贤明的行为，我从不吝啬赞美之词，即使庞培在谈到恺撒时，言语中也充满了敬意。

在庞培出资建造的庞培剧场附属大回廊上矗立着的庞培立像雕塑，曾在法萨卢斯会战后被恺撒推倒。但不久后恺撒又在原地重塑了一座规模相等的大理石庞培塑像。即便是对死者，恺撒依然如此宽容，对此西塞罗是很能理解的。作为罗马首屈一指的评论家，西塞罗曾说："恺撒的文章，无论是口述还是笔著，都秉承了其一贯的特征：品格高尚，灿烂光明，壮丽高贵，充满理性。"

但是西塞罗无法将文艺评论当成自己的主业，也无法像瓦罗那样在庞培派失败后从政治世界中退隐，受恺撒之命专心创立罗马首座国家图书馆，整日与书为伍。在数度与好友阿提库斯通信中，西塞罗犹豫的心态一览无余。最后他终于决定前往拜访恺撒，他估计恺撒还是会念昔日友情的。

恺撒自出任独裁官以来，整日埋首政务，身边围绕着众多智囊和秘书们。仅在新建首都这项改革上，身边就有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等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建筑家团队。如果西塞罗拜访当天负责接待的人是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或者奥皮乌斯的话，那他们根据西塞罗和恺撒的交情，必定会对其特别优待。不过恰巧西塞罗遇上的是恺撒的新秘书，因此他被安排在接待室，和别的访客一样等待恺撒的传召。西塞罗在等候期间的心情可想而知。从曾经的地位相当沦落到需要等待传召，西塞罗一定全身心都备感屈辱。不过幸好这种屈辱感并没有维持太久。因处理某事偶然走出办公室的恺撒，一看到西塞罗等候的身影，即刻大声地训斥随从秘书："无怪众人会对我不满，传言非虚。现在居然连马库斯·西塞罗都不能自由出入而要搞什么等候了。"

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公元前45年12月，恺撒写信给西塞罗，称想利用12月17日开始的神农节闲暇到那不勒斯附近转转，顺便造访西塞罗所在的别墅。



那不勒斯附近地形略图

喜欢古代风情的现代观光客们大多喜欢游览那不勒斯东面的维苏威火山和庞贝遗址。古罗马的达官贵人们则喜欢那不勒斯西面的库马、米塞诺海角、拜亚的海湾等地，到罗马帝国时期，流行在作为军港的波佐利一带购置别墅。自认是达官贵人阶层的西塞罗就在波佐利拥有一幢别墅，那是他的8幢别墅之一。那不勒斯海湾一带冬天有着温暖的气候和温泉，恺撒喜欢在此休假，但苦于自己在该地并无别墅，因此只能借住在附近的达官别墅里。

恺撒的到来，让西塞罗很是紧张。据说恺撒一行近2000人，而且最高领袖的要求定是不能回绝的，于是西塞罗为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以迎接那一天。第二天恺撒走后，身在波佐利的西塞罗立刻给阿提库斯写

信，叙述“恺撒成为西塞罗别墅的座上宾”的种种。笔者将该信翻成现代文以飨读者。先要说明的是，西塞罗提到恺撒一行近2000人，大概是中世纪抄写人的笔误，参照其余史书，恺撒一行的真实人数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即200人左右。

这位麻烦的客人终于离开了。不过说实话，这也是无比愉快的一天。农神节第二天傍晚恺撒一行抵达菲利普斯（公元前56年的执政官，屋大维的继父）的别墅。恺撒一行人挥汗成雨，塞满了整栋别墅，只剩存放餐桌的房间是空的。毕竟，随行的达2000人之多呢。我正在为第二天该怎么接待这么多人犯难时，幸得巴尔巴·卡西乌斯伸出援手。他派来了警卫员协助保卫恺撒留宿期间的安全，并把这些警卫安置在露天的帐篷里。

在菲利普斯别墅的第二天，恺撒早早起床，独自一人待到下午1点。其间他只传召巴尔巴密谈了一会儿，大概是询问账目问题。随后，他在海边散步许久。散步后他来到我的别墅，洗浴、按摩，面无表情地听亲信马穆拉的报告。接着，他开始用晚餐。因为使用催吐剂，不必担心消化，所以他开始畅吃畅饮。

晚宴按照鄙家一贯的特色，既豪华又充满趣味。并且在用餐期间，进行了高水平的愉悦闲谈。真是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谈话内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以后说给你听。总之，这是场自始至终既不乏亲切又合乎礼仪的晚宴。（大概是指没有一人醉倒，大家都保持了礼仪。——作者注）

随行人员和位居要职的“解放奴隶”，都安置在另外三间屋子里，也给他们提供了丰盛的晚餐和完善的服务。而那些身居要职的“解放奴隶”们自然享有更加特别的优待。

总之对主宾双方而言，这都是一场符合各自身份的盛宴。

按照常理，在宾客离开时应该客气地邀请下次再来。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的盛宴，一次就足够了。

晚宴之后，我们并没有谈及政治，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文学展

开。恺撒兴致盎然，好像文学才是他的本职。他说打算在波佐利再待一天，之后再前往拜亚一天。

这就是恺撒在鄙庄的全过程。虽然我原本并不乐意，但这确实是非常愉快的一天。我打算再待几天，之后移居图斯库罗姆的别墅。

恺撒到达多拉贝拉（恺撒亲信之一，西塞罗的女婿）别墅时，别墅大门两侧有士兵整齐列队欢迎骑马抵达的恺撒。但是好像恺撒流露出不太喜欢的样子，类似的仪式就再没出现。

公元前44年恺撒公开宣布远征帕提亚，实际上他从去年秋天就开始准备了。公元前44年3月18日，远征军正式出发。

远征帕提亚是恺撒有生之年非达成不可的理想——报仇雪耻。

9年前克拉苏在帕提亚惨败，有1万名罗马士兵被俘，全部被赶至帕提亚王国东北边境的梅尔夫终身服役，即流放。9年后恺撒虽然并不清楚当年被俘的罗马士兵还有多少能活着，但以罗马人的传统，恺撒必须解救他们，一雪前耻。罗马人绝不允许遭遇失败而无所作为。

征服帕提亚王国并不在恺撒的远征目的之列，两年的时间毕竟太短了。恺撒远征的首要目的是，借打胜仗的契机，向东方诸国再一次展示罗马的实力，将幼发拉底河确立为罗马的防线；同时将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再次编入罗马领地。远征的第二目的是，在回程时征服多瑙河沿岸地区，并将多瑙河确立为罗马防线。如果以上目的都成功实现的话，恺撒就确立起一个以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幼发拉底河为天然防线的罗马大帝国。罗马帝国防线得到巩固，恺撒也就能放心地把罗马交给他的接班人了。

因为恺撒预计远征需要两年时间，故而他早已确定了两年内本国及各行省的行政、军事负责人选。新的防卫线并不是和当地首领坐下来谈

谈就能确定，对那些并不愿恭顺的地区，必须诉诸战争以武力征服。因此恺撒必须经希腊到达东方诸城邦，征服帕提亚后前往黑海，征服多瑙河流域后再回到意大利。即使对恺撒而言，这整个过程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是“我来，我见，我征服”这么简单。

对年近六旬的恺撒而言，这次远征是给他的光辉人生锦上添花的一大壮举。

正如某位史学家说的：“恺撒可能会欺骗别人，但他一次也不会欺骗自己。”恺撒这次远征，并不是为了显示罗马最高领袖的权威，而是在冷静思考判断后做出的必要举动。

“为人身安全整日忧心忡忡，不算真正地活着”，因此恺撒要求全体元老院议员集体宣誓，视恺撒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宣誓后西塞罗、布鲁图、卡西乌斯等都在誓约上签名。恺撒得到元老院全体议员的保证，立刻解散了由西班牙和日耳曼人组成的护卫队。

不过，自恺撒公布远征帕提亚后，关于恺撒想称帝的谣言甚嚣尘上。因为在罗马人信奉的女巫师的寓言里，只有帝王才能征服帕提亚。同时恺撒属下安东尼也犯下思虑不慎的轻率举动。这一切都加快了谣言的散播。

每年2月，罗马都要举行牧神节的盛大祭祀。体育竞技是祭祀的传统活动之一。恺撒在大竞技场观看比赛的当天，年轻的执政官安东尼向观众席中央的恺撒献上了王冠。虽然当时也有拍手称赞者，但大多数人还是为此倒吸了一口冷气，毕竟罗马人对帝制异常敏感。

恺撒立刻意识到安东尼献上王冠事件的严重性，他即刻命人在古罗马广场一角矗立的大理石柱上刻下这么一句话：“执政官马克·安东尼希望终身独裁官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接受王者权威，被恺撒拒绝。”希望

以此终结自己想称帝的谣言。

一个月后的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会场被暗杀。

暗杀集团成员之一的西塞罗，3月15日并没有出席元老院会议。不过，在得知恺撒被刺杀后，他立刻写信给暗杀成员之一的巴基鲁斯，落款日期也是3月15日。西塞罗写道：“得知消息，分外欣喜。我感谢你。我爱你。你也需回应我的爱。你和集团其余成员今后有何打算呢，请逐一告知。”然而正是这个西塞罗，在恺撒饶恕庞培余党、并准许他们行动自由后，曾写信给恺撒对他大加赞扬。

恺撒给西塞罗的回信写道：

> 从您信中所言，可知您对我知之甚深。我的行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无残暴可言。这些话从您口中说出，足以令人信服。我对自己所行之事，均足以自谓满意。如今更承蒙您称赞，令我不胜欣喜。
>
>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无后悔可言。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
> 如果您和其他人都能到罗马，协助我完成心中所愿的事业，我将不胜欣喜。建议也好，忠告也好，或者发挥您和诸位所长也好，我总是认为，只要是实用的，那么不管是谁的提案我都能接受。诸位丰富的知识定能让我受益无穷。

被暗杀时，恺撒距离他的56岁生日只剩4个月。

第二章

“3·15事件”Idus Martiae

（前44年3月15日——前42年10月）

书写历史之笔握于胜利者之手，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但笔者对此持有异议。这里即将叙述的就是我持反对意见的最好例证。本章全部都是从失败一方——即全部以反恺撒派——遗留下来的史料为基准进行叙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反恺撒派的西塞罗留下来的。因此，本章将要叙述的所有事情都来源于西塞罗和接下来要登场的人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就是“目击证人证词”。数百年后，普鲁塔克所著《列传》以及后来阿匹亚努斯所著史书和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等等后世人的叙述，援引的都是这些信件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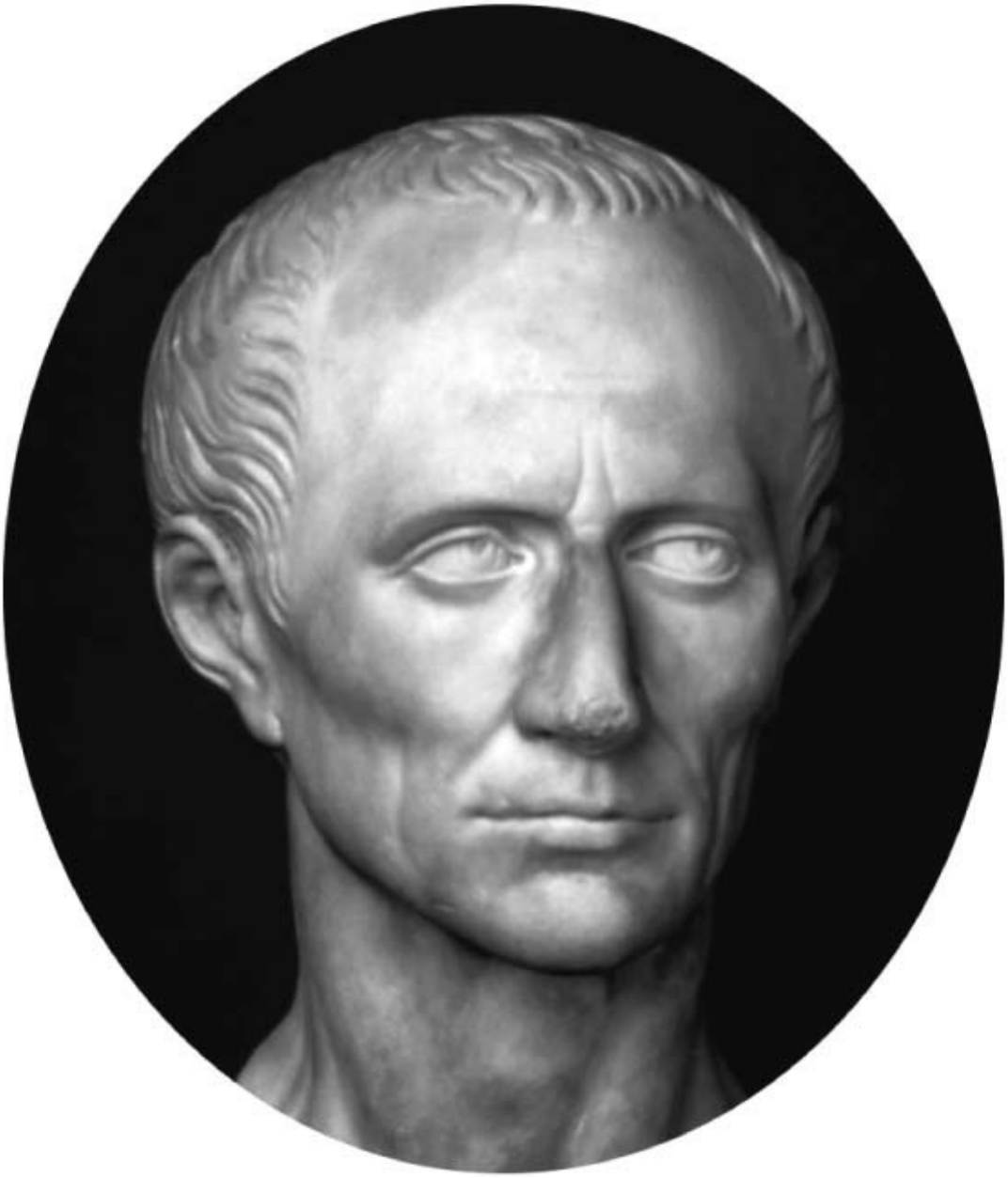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西塞罗的《书信集》可以有资格成为“目击证人证词”呢？盖因恺撒死后，西塞罗认为自己重新掌舵的机会又来临了，因此积极地活跃于恺撒派和反恺撒派之间，进行居中调停。但是，又由于他自己属于反恺撒阵营，故而即使调停也是围绕着暗杀恺撒的反恺撒派的利益进行的。以62岁的高龄阅历以及他作为罗马第一智者的声望，西塞罗手中集中了反恺撒派和恺撒派双方的信件，也集中了双方人士希望拜见西塞罗，并请他替己方说话的请求。

对罗马人而言，恺撒被暗杀犹如晴空霹雳、电闪雷鸣一般。被杀的一方和杀人的一方，即恺撒派和反恺撒派都同时突然失去了行动的方向。此时，西塞罗对两派而言都堪称是雷雨中唯一的灯塔。因为对反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见解；对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并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恺撒。

然而西塞罗并非这些写信求助者的指路明灯，因为他本人也要写信求助。他在写给密友阿提库斯的信中，常常有许多无法向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说出的话。西塞罗并非先知，他只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具有了优于常人的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此外他也有一流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将他的观察和认知充分传达给他人。因此西塞罗的《书信集》成为了值得信赖的“目击证人证词”。此外，和百年后普鲁塔克及他之后的古代史学家的作品不同，西塞罗的《书信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改变，一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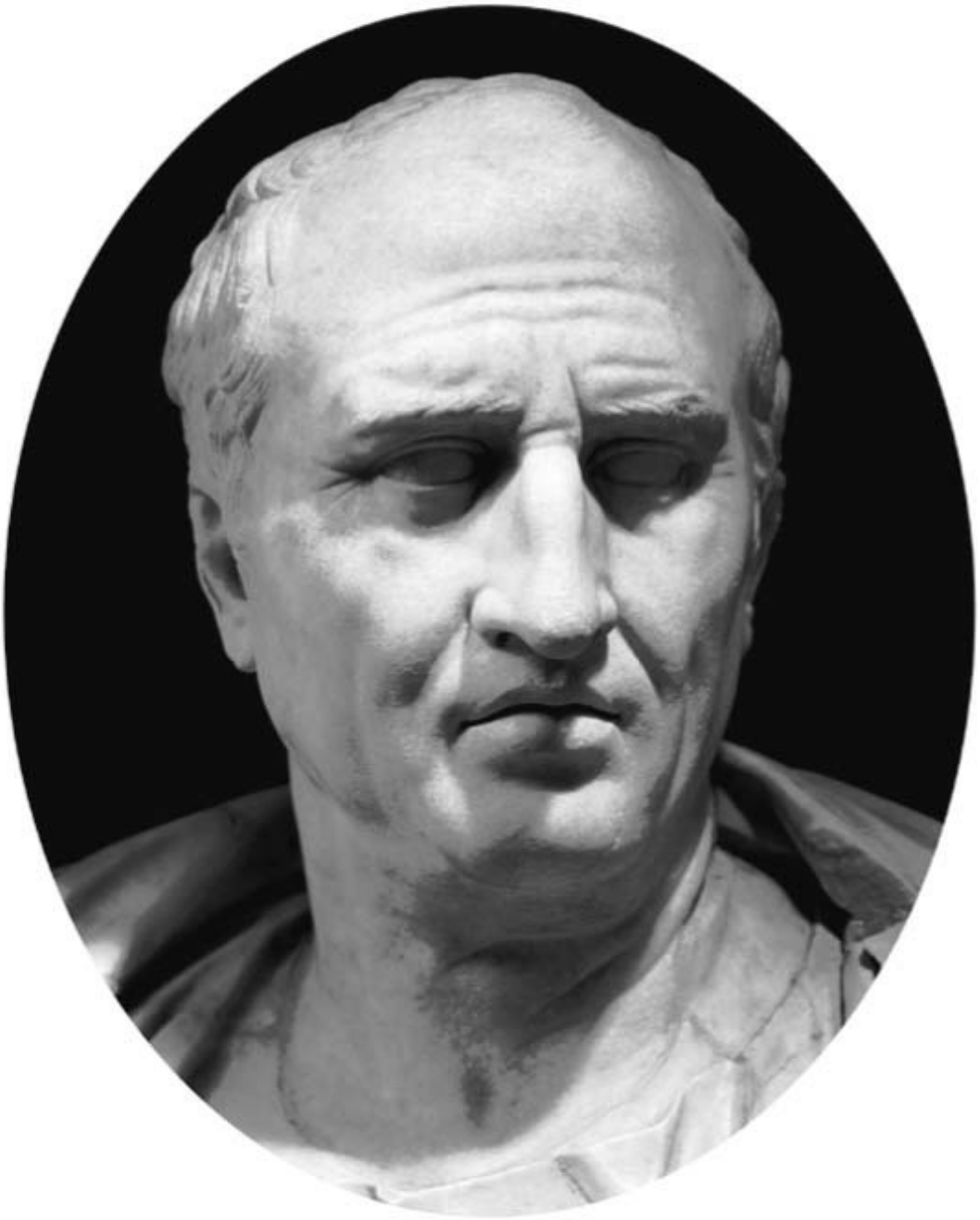
变地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是日常的书信，才更能反映现实。因此，2000年后的我们托西塞罗的福，可以得出布鲁图、安东尼以及屋大维的真实面貌，以及即使被杀也屹立不倒的恺撒的真实面貌。

马克·安东尼



尤里乌斯·恺撒

马库斯·布鲁图



西塞罗

屋大维

3月15日

长久以来，罗马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甚至连罗马最高国家机关——公民大会——也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到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会议场所才被固定在由恺撒建造的地方。至此才有了既能容纳数百人济济一堂、又能和其余人群隔离开、还是处于罗马市中心的会议场所。此后元老院会议既在神殿中央召开，也经常在回廊的一角召开。但在此之前，由于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因此每次元老院开会召集议员、公布开会时间和开会场所都必须明确记录并昭告意大利全部领域。恺撒就任终身执政官时，当时恺撒神坛有部分细节并未完工，因此当时元老院会议经常在庞培剧场东侧的大回廊一角召开。因为那里够宽敞，足足

有180米× 135米，这样与庞培剧场并立的庞培大回廊，只要在当天禁止普通人出入，就有足够的空间供元老院召开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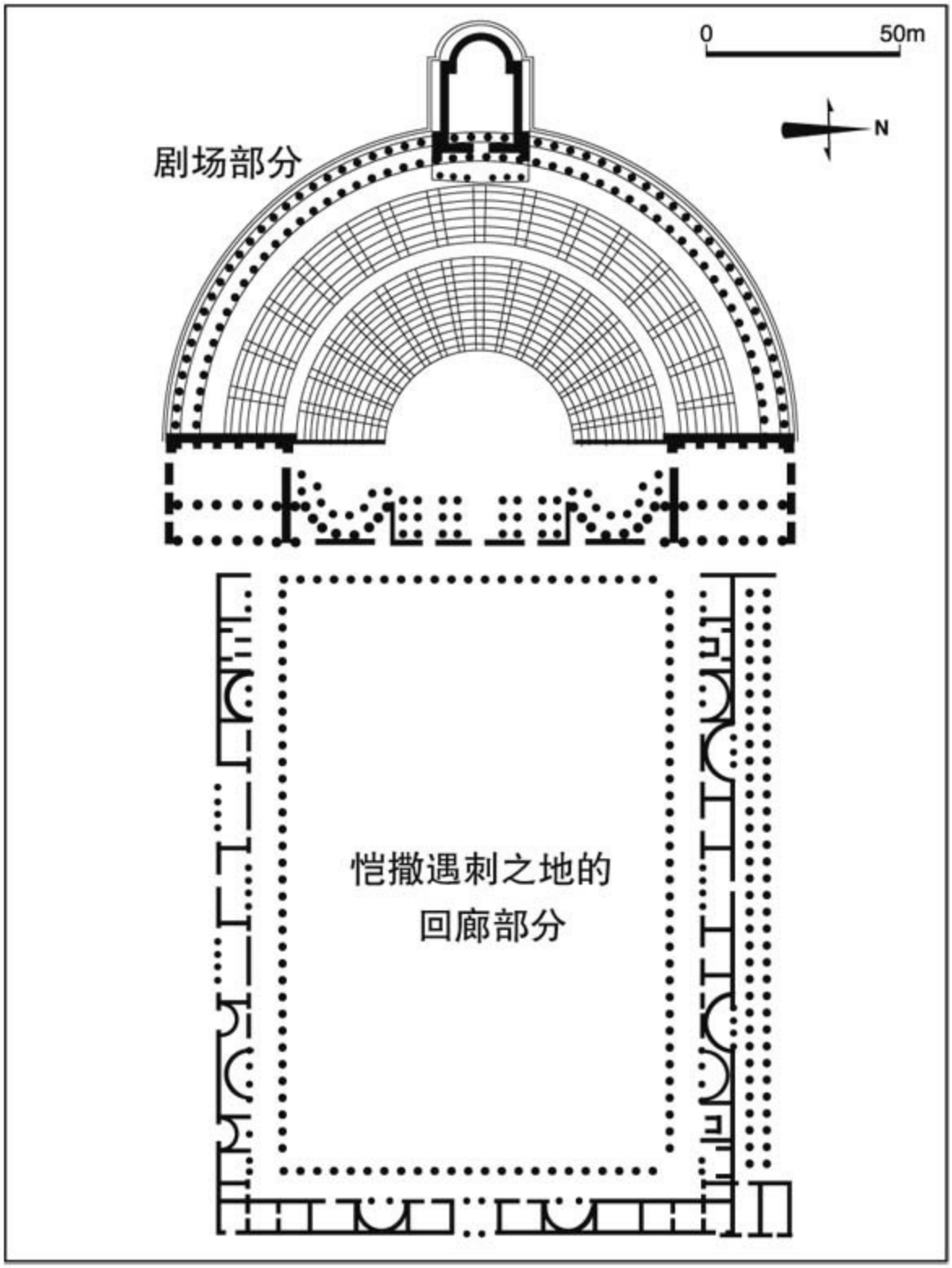
不过，如果没有恺撒的“建设新罗马”计划，元老院也不能在庞培大回廊召开会议。因为那里位于城墙外宽阔的马尔斯广场中央。虽然无论哪里都足够作为会议场地，但是当时只有军队最高司令出席时，才会在城外开会。因为根据罗马共和国制度，军队最高司令是不能进入城内的。

根据恺撒的改造计划，拆除首都罗马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壁垒“城墙”是有必要的，也是其一大特色。因此原本是在城墙外的马尔斯广场，经恺撒之手，再也没有“墙外”的区别，而成为了罗马市中心。在那里召开元老院会议就再也没有什么不合规矩了。

此外，恺撒本人对在由庞培建造的庞培大回廊召开元老院会议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如果恺撒有一点反对的意愿，他就可以选择其他地方作为会场。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恺撒就下令将其改至可以看得见庞培立像的角落里召开。

恺撒所住之处，为古罗马广场内大祭司的官邸。他从住处前往现在已不见踪迹的庞培大回廊，只能够步行前往。因为依据恺撒所制定的法律，白日在市内，唯已婚妇女可使用马车，紧急情况下的使者才能乘骑马匹。此外，从恺撒住所到会场的距离虽然从直线距离来看不足一公里，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罗马的城市模型复原图来看，两者的距离约为直线距离的两倍。

按照罗马当时的习惯，身居高位的人在“上班”时，会有地位较低的人到家中迎接，并陪同他一起前往会场。那天陪同恺撒从官邸前往会场的人是德奇姆斯·布鲁图。



庞培剧场和大回廊的平面图

恺撒所走的那条道路，沿途必定会有一些人竞相与其打招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早起是很常见的事。更不用说罗马人通常在中午之前便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般人的工作也好，元老院的会议也罢，通常都在正午之前举行。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与往常一样在上午10点左右召开。

无论是拉丁语中的“Idus Martiae”、英语中的“The ides of March”，还是意大利语中的“Idi di marzo”，对西欧人而言，只要提到“3月15日”，都知道是恺撒遇刺的日子，这是无须多言的常识。因为在西方历史上，这是首屈一指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天。

而且，这一天的经过所衍生的各种版本，历时逾久，反而变得比事实本身流传更广。譬如，恺撒之妻卡尔普尼娅的噩梦、占卜师“留意3月15日”的预言、从3月14日到3月15日彻夜不停地肆虐罗马的暴风雨、古罗马广场突然聚集的大规模鸟群等。

古代史学家们的想象力，从一本正经地理性论述恺撒当中解放出来，对种种不祥之兆的描述，发挥出超人的想象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依据普鲁塔克的《列传》所衍生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

不过，3月的罗马气候总是变化无常。恺撒的行动是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更不必说是梦境、预言、鸟群等这些所谓的“征兆”。他并不是完全无视这些东西的存在。如果对国家的统治或者提高士兵士气有所裨益，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而且，他本人也担任了罗马宗教界的最高职位——大祭司一职。

不论是古代历史学家还是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大家都一致认为恺撒是个一流的合理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理性的人。

对这件事情有所叙述的古人遗作当中——除了西塞罗之外——全部

都是希腊人的作品。

希腊人虽以追随理性和追求真实闻名，认为理性是这世上独一无二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一旦他们从这种理解中解放开来，就很容易转向这种思想的反面——即变得感性起来。而罗马人——特别是恺撒——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感性。正因如此，他们认定两者的均衡至关重要。人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能够如此直指现实人心的，不止恺撒一人。西塞罗虽然在政治上与恺撒立场相异，但是他在这一观点上与恺撒并无二致。无论是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还是那些给西塞罗写信的所谓“目击证人”们，没有一言一处提到过那些超现实的前兆和预言。

3月15日那天的事，并非是那些看见、听见或知晓种种不祥前兆的预言的人所屏息守候的一起事件，3月15日只是无数寻常日子中的一天。除了阴谋者之外，没有人预料到这起突发性的惨案。所谓戏剧性，就是原本应该朝着非戏剧性的方向行进时，忽然形势急转直下，这样才形成了事情的戏剧性。

对18日即将远征帕提亚的恺撒而言，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非比寻常。他不可能因为要陪伴无法成眠的妻子而缺席。因为这是他公布自己远征两年期间里留守本土与各行省防卫和统治负责人名单的最后时机。对阴谋刺杀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

3月15日的元老院大会是恺撒出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密谋刺杀者们担心元老院议员们会以推举恺撒称王的方式来预祝他远征胜利，而且即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仍感到不安。因为恺撒是战无不胜的，只要恺撒出马，征服帕提亚只是时间的问题。罗马人一致认为此次出征必能一雪克拉苏败北的耻辱，并能解救那些被流放到边境的罗马士兵，也能在回国途中征服多瑙河地域。对于恺撒的功成凯旋，罗马人深信不

疑。密谋刺杀者们担心，一旦恺撒得胜回国，那么就再也无法阻止他称帝了。因此他们认为在恺撒出征之前的3月15日元老院会议是除去恺撒的最后机会。

元老院会议禁止携带武器进入，因此无论是恺撒或者恺撒派的议员们都会毫无防备地出席，加上会场守卫也不会安排武装士兵。此外，恺撒在议员们全体宣誓后，解散了由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护卫队。此时的恺撒身边只有一个24人组成的近卫队，他们手中仅仅捧着象征礼仪和地位的束棒斧子，并且近卫队通常在会场中与恺撒保持较远的距离。对刺杀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刺杀者们将短剑藏于托加内的褶皱里带进了会场。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恺撒身旁的安东尼。前文提过西塞罗曾称赞安东尼武力过人堪比角斗士。卡西乌斯主张干脆连安东尼一起杀掉，但布鲁图认为“我们打不过他”，主张只解决恺撒一人。因此最后他们决定派人与安东尼搭话，将其引开。这个任务交给了托雷波尼乌斯，因为他曾任恺撒军团长与安东尼相熟，前去搭话也不会引起怀疑。

现在只剩下刺杀的时机问题。开会时会场大约有几百名议员，显然刺杀者们不打算当着他们的面行刺，这样成功率相当低。因此他们决定在会议召开之前，议员们尚未到齐时采取行动。

有一种说法称刺杀集团包括了60名元老院议员，但目前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已经证实的是参与刺杀过程的共有14人。不过这14人面临如此大事情时显然不够冷静，其中有人将原该刺向恺撒的短剑刺到了自己人身上。

在这狂乱的14人围攻下，恺撒最终不敌，共受23处剑伤，其中胸前一剑是致命的。恺撒不愿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于是用披风裹住全身，最后倒在了庞培立像脚下。

其他的议员们一时间呆若木鸡。惨案就这么瞬间发生了。

接下来依次介绍行刺者的生平。

1.马库斯·布鲁图。其父属于马略派，在苏拉死后与雷必达一起为树立平民派政权而战斗，后被庞培镇压并处以死刑。8岁丧父的布鲁图由母亲塞维利娅抚养长大。塞维利娅虽是一位称职的好母亲，她给布鲁图请来希腊家庭教师并让他去希腊留学，不过此时少年儿子并不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她心里第一位的人是恺撒，在夫婿亡故后不久，她就成了恺撒公开的情人。在当时的罗马，遗孀再嫁是很常见的，不再婚反而引人议论。然而塞维利娅不顾恺撒出于政治目的已结婚多次，并公开拥有众多情妇，仍一心一意地爱着他。这份情感即使布鲁图成年后也无法理解。

少年时期的布鲁图一心向学，先后在雅典、帕加马、罗得岛等当时的最高学府留学。相当于今天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再到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获得学位一样。青年时期的布鲁图并不像同阶级的年轻人那样关心政治和军事，他只一门心思钻研哲学。因此后来他既没有军务经验，也没有担任过相当于进入政界踏脚石的财务检察官或者候补按察官。他本出身于平民贵族，按照法令可以出任护民官等职务，不过对此他并未显露出丝毫兴趣。在少年及青年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年长10岁的叔父小加图，而这位叔父正是反恺撒的急先锋。

由于布鲁图并非出身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因此要维持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就必须找到出路。布鲁图厌恶进入政界，故而他虽学哲学，却不愿进入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律师业。大约30岁时布鲁图就进入了金融界，他在小亚细亚以48%的年利率进行高额放贷。不过这个过高的利率招致了时任当地总督的西塞罗的批评。

年纪相差不大的恺撒和布鲁图两人，一个热衷于四处借款，即使债台高筑仍面不改色，一个则一生不愿伸手借钱。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

心。恺撒和布鲁图两人大概对此都深有体会，但是两人对待恒产的态度大不一样。恺撒认为借来的钱只要数目够大，也可以成为恒产的一部分，不过该想法在布鲁图这儿可站不住脚。

自恺撒率兵强渡卢比孔河，罗马爆发内战后，36岁的布鲁图马上退出了金融界进入政坛。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叔父小加图一起加入了庞培派。虽然庞培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布鲁图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情仇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高举元老院体制大旗的庞培军营中。

法萨卢斯会战后，由于母亲塞维利娅的恳求，恺撒下令全军不得伤害布鲁图。逃走后的布鲁图也给恺撒写信，庆祝其胜利并告知自己所在位置。放下心中大石的恺撒就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派一队人马前往布鲁图所在地护送他回到母亲塞维利娅身边。此后，或许是接受了母亲的劝慰，布鲁图并没有回到期待东山再起的小加图身边，而是留在罗马一心一意研究学问。

庞培死后，恺撒解决了埃及内乱，平定了小亚细亚，成功实现“我来，我见，我征服”。凯旋的恺撒收到来自塞维利娅的请求，请求他给予自己儿子一个美好将来。恺撒不是铁石心肠，他无法拒绝用尽一生爱自己的情人的请求。

公元前46年，39岁的布鲁图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而此前他并没有任何政务经验。这当然是得益于恺撒对他的特殊照顾。之后即使亲叔父小加图与恺撒在北非对阵，他仍老老实实地留在行省任职。由于当时北意大利行省的居民都被破格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布鲁图任职地区并未出现什么动乱。

不过任满回国后布鲁图立即离婚再娶，再婚的对象是叔父小加图的女儿鲍基娅。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证。大概他是想向已故的叔父表示歉意吧。不过这位新娘鲍基娅却对恺撒有着滔天大恨。因为她不仅是坚定反恺撒派小加图的孤女，还是恺撒的旧同僚但

总被恺撒压制的比布鲁斯的遗孀。不过对于布鲁图的做法，恺撒没有任何不满，仍然继续不断地提拔他。公元前44年，也就是刺杀恺撒同年，他还升任了大法务官。

布鲁图有着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教养，连西塞罗和阿提库斯都甚为赞赏。如果他专心研究学问的话，定能有一番大成就。可惜知识和教养并不能等于大智慧，布鲁图总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最初他并不是刺杀恺撒的主谋，他只不过是被推出来的。真正的主谋是他的妹夫卡西乌斯。只是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主谋而参与刺杀的，因此表面上他好像就成了首领。顺带说明一下，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建立罗马共和制的人也叫布鲁图。虽然这两人并无事实上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家族名一样，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有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前人布鲁图了。因为人们在作某重大决定时，总是要借助一些名分。

布鲁图曾拜托西塞罗润色演说稿，那时西塞罗对布鲁图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西塞罗对无话不谈的好友阿提库斯是这么评价的："文章结构缜密有序，但是缺乏热情。没有传达自己想法的技巧和说服别人的信念。"恺撒生前听完布鲁图的演说后，也说："只知道那位年轻人有着强烈追求某一事物的欲望，但不知道他到底想追求什么。"

即便是笔者受到这样讽刺的评价，大概都会夜不能寐，何况布鲁图。恺撒虽看在情人面子上为布鲁图进入政界大开绿灯，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布鲁图的才能。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恺撒临终前说的那句"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应该不是这位马库斯·布鲁图，而是之前陪他去元老院会场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笔者对此亦持认同态度。恺撒遇刺之时，马库斯·布鲁图大约40岁或者41岁。

2. 卡西乌斯·罗基努斯。"3·15事件"的真正主谋，年龄与布鲁图相仿，经历却完全相反。

公元前54年，时年30岁的卡西乌斯以财务检察官的身份随克拉苏远征帕提亚。在次年的战斗中，以前财务检察官的资格指挥克拉苏军左翼。在与帕提亚军对阵的卡雷战役中，克拉苏军战败，31岁就平步青云的卡西乌斯率500名骑兵抛弃总司令克拉苏逃命。

此后，卡西乌斯专门负责叙利亚行省的防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才能。内战爆发时，他投靠了地盘在东方的庞培，负责爱琴海的制海权防卫。但是，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后，恺撒获胜并对庞培加以追击。当恺撒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小亚细亚时，本属庞培派的卡西乌斯却率领他的全体战舰不战而降。恺撒照例对卡西乌斯宽大处理，给予他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卡西乌斯既没有前往埃及追随庞培，也没有前往北非追赶他的同僚。他也没有像布鲁图那样过着谨言慎行的生活，而是积极地为恺撒效力。在前文中提到的以“我来，我见，我征服”而闻名的法尔纳凯斯会战中，卡西乌斯还曾担任恺撒军的军团长一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军事才能突出，另一方面，当时没有任何人怀疑卡西乌斯对恺撒的忠诚。同时，他还迎娶了同为恺撒忠实信徒的布鲁图之妹作为妻子。在接下来的公元前44年，他和布鲁图同时被恺撒任命为法务官。41岁的卡西乌斯顺利地登上高位。

但是，卡西乌斯对此并不满意。虽说同为法务官，布鲁图是首都的法务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务官。而与布鲁图同龄、但是资历超过他的卡西乌斯，却只能负责在罗马居住的外籍人事务。已经与庞培余党分道扬镳、一心一意忠于恺撒的卡西乌斯，对此安排满腹怨气。

卡西乌斯一直怀疑恺撒对自己的好意，这一次的安排令他对此怀疑更加确定了。这样一来，随着恺撒的权力愈加强大，自己的未来就将越来越渺茫。

那么，恺撒是否真的对卡西乌斯没有好感呢？虽然恺撒对卡西乌斯同样发扬了“宽容”的精神，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也许真的无法原谅带着500名骑兵弃克拉苏而逃的卡西乌斯。

500名骑兵，在当时堪称很强的战斗力。如果卡西乌斯没有带着他们逃走的话，战斗情况也许截然不同。即使战争结局无法逆转，最起码克拉苏和他指挥下的罗马军队也不至于如此悲惨收场。对将士兵的生命与战争取胜看得一样重要的恺撒来说，且不说即使是个人临阵脱逃都无法原谅，卡西乌斯可是置远征军全军覆没于不顾，率领500名骑兵背师而逃。有如此不堪前科的卡西乌斯，以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恺撒都不会从内心加以饶恕的。

卡西乌斯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本质。如果他的智慧能及于此的话，也就不会在开始时率军脱逃了。

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恺撒手下，他并非旗手之才。如果因为谋害恺撒是出于不满于徘徊低位的一己之私的话，是无法说服他人一起动手的。所以他决定以布鲁图为旗手。布鲁图能够身居要职，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而是因为他和恺撒的关系。这一点在元老院议员当中人尽皆知。因此，以他为旗手的话，就能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为了罗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恺撒给予他的私人利益的，一个品质高尚洁白、无欲无求、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从而加以追随。

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固然是没有过人之能，但是如果由能力出众者担当旗手之位的话，其他人就会对他加以防备而不予追随了。所以，卡西乌斯选布鲁图为刺杀恺撒旗手，算是选对人了。

除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之外，还有利盖里乌斯、阿奎拉、鲁布里乌斯、那佐、盖乌斯·卡斯卡、普布利乌斯·卡斯卡，再加上强硬的反恺撒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儿子。上述9人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为恺撒所原谅的庞培余党”。此外，暗杀恺撒的人还包括恺撒派。

3.托利乌斯·金布罗。职位不详，在恺撒的推荐之下成为元老院议员。换句话来说，他也是“恺撒拥趸”之一。

4.盖乌斯·托雷波尼乌斯。刺杀事件发生时他四十五六岁。公元前60年任财务检察官，五年后任护民官。从公元前54年开始，他就在恺撒麾下任军团长，出征高卢。内战爆发时，他负责马赛攻防战中的陆上攻击。公元前47年，他被恺撒任命为西班牙总督。但是他又让庞培的两个儿子成功地集结叛军，逼得恺撒亲自出兵平叛。在恺撒的军团长中，他的才能属于中等。

5.德奇姆斯·布鲁图。高卢战役时就跟随恺撒的幕僚之中，他和另一位在远征帕提亚中战死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是最有军事才能的两人。这两人不仅背景相似，都出身良好，且都在20岁出头时追随恺撒左右。恺撒常常用“青年克拉苏”、“青年布鲁图”称呼两人，从中可以看出恺撒对这两位年轻人的喜爱之情。

然而这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青年克拉苏”在随父远征帕提亚中壮烈牺牲；“青年布鲁图”则从高卢战役到内战中一路追随恺撒，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恺撒非常欣赏这位青年将军的才华，在恺撒的遗书中，曾指明其为第一继承人后的顺位继承人。不过“3·15事件”发生时，40岁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对此并不知情。而当恺撒遗书公布之后，他顿时面色异常，沉默无言。因此，后来大多数人认为恺撒临终前说“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人就是他，而不是他的堂兄弟马库斯·布鲁图。事实上，罗马市民也大多将刺杀恺撒事件的一腔怒火集中发泄在他身上。

6.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此人也是从高卢时期就追随恺撒的军团长。不过他在军事上并无突出才能。恺撒对他的任用，更多的是在高卢战役之后与元老院的斗争当中。他于公元前54年出任大法务官，在公元前49年成为恺撒派推举的执政官候选人，但最终败在了庞培和元老院派选派的两位候选人之手。内战时期，他虽仍为恺撒军团长，但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

7.米奴丘斯·巴基尔斯。此人自公元前55年起以军团长身份参加高卢战役，内战时期也是恺撒手下一员。但史料中对此人的军事才能并没有具体的记述。唯一可知的是，他既是恺撒派，又以西塞罗的弟子自居。

上述5人中，以恺撒派高级将领托雷波尼乌斯、加尔巴、巴基尔斯以及德奇姆斯·布鲁图4人为甚，一直到内战时期都对恺撒忠心耿耿。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暗杀恺撒的一员呢？

由于他们在“3·15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都相继死于非命，且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或遗言，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只能通过想象推测他们行刺恺撒的因由。目前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他们觉得被恺撒欺骗了。他们认为自己为恺撒战斗，是为了恢复罗马的秩序，而不是为了让恺撒称帝。后来研究者们将这5个人称为“担忧的恺撒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幕僚和亲信都反对恺撒。在他手下的将领和文官中，大约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萌生了反意。话虽如此，我们仍然禁不住想，这些可都是被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人啊，为什么当中仍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会萌生杀害恺撒的想法呢？

在最初受到君主重用之后，又遭受冷落陷入绝望，继而萌生反意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日本历史上的明智光秀（刺杀主公织田信长。——译者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上述4人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远征帕提亚的准备工作中，恺撒打算任命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出任行省总督，这一职位已属留守国内人事安排中的要职。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并不是因为即将面临仕途上的困境而刺杀恺撒。

此外，虽然恺撒始终拒绝登位称帝，但他对罗马将来应当成为君主制（一人独裁）的看法毫不掩饰。对此，他身边的希尔提乌斯、巴尔布

斯、安东尼等人都能充分领会，与他们同属恺撒亲信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及其余三人为什么就不能领会到这一点呢？

如果他们领会但并不认可恺撒的理念，完全可以改投庞培门下。如果他们不同意君主制，而坚持寡头政治的话，也大可以在“3·15事件”发生前表明态度。毕竟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在法尔萨拉战役前一直持续了两年，他们完全有机会重新选择。

因此，对于他们刺杀恺撒的理由，我想用恺撒自己的一句话来解释最为恰当：

>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如此说来，再追究这些刺杀恺撒的直接刺客们的动机，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他们每个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14个人组成的刺杀团伙的最终动机，仍是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阻止罗马走向帝制。

不过他们并未理解，恺撒所考虑的“帝制”和他们“不想看见的”、罗马建国初期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君主制“王政”并不相同。因此这14人一致认为，如果恺撒的最终目的是走向“王政”的话，那么必须在该目标实现前摧毁它。

恺撒生前曾说：“无论结局如何恶劣，一切的源初仍是善意。”如此，一味追寻刺杀的动机还不如研究他们的“善意”来得更有意义。因此我们不如以一个善意的人——西塞罗——的证言为基础，来探究他们的“善意”。这样一来，莎士比亚以普鲁塔克的《列传》为基础写成的《恺撒大帝》，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的可能。

在身中23剑的恺撒遗体面前，所有人——包括安东尼——都在瞬间

逃散，连句哀悼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安东尼和其余恺撒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以及那些中立派的议员们，在得知恺撒被刺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逃出了会场。手握滴血短剑、身穿浴血托加的布鲁图及其同伙们陷入了癫狂状态，甚至一度刺伤了同伴的手腕。当他们重返会场时，发现庞培大回廊里空无一人，连守卫都无影无踪。

以布鲁图为首，刺杀者们相继奔出会场，沿途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等口号。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沿途百姓早已在抢先逃跑的议员们“恺撒被刺杀了”的高喊声中得知了事变的发生。所有人都回家躲匿起来，紧闭大门，静观事态发展。原本熙熙攘攘的罗马市中心，瞬间成为了无人街。

刺杀者们原以为自己会获得热爱自由的罗马市民的欢呼和拥戴，但眼前空无一人的景象让他们感受到了和刺杀恺撒时一样的恐惧。恐惧和慌乱再次袭上他们心头。迷失了自我的刺杀者们再也没有勇气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再次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按照当初的计划，布鲁图要给罗马市民们作鼓动演说，然而此时的古罗马广场连一个鬼影都见不到。于是刺杀者们只好登上了卡匹托尔山。他们倒不是为了向众神报告已行之大事，也不是感谢诸神庇佑。作为罗马诸神的供奉地，卡匹托尔山一直被当做罗马的圣地。躲在这里，刺杀者们才能感到自己的安全有所保障。西塞罗在知道事变发生后，马上赶到了他们藏匿的地方。

西塞罗首先对仍握着滴血短剑的刺杀者们表达了敬佩之意，接着他建议他们应当迅速召开元老院会议，以恢复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按照罗马法律，法务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而刺杀者中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都时任法务官，且布鲁图还专门负责首都事务。西塞罗认为，布鲁图应当立刻行使召集会议的权力。

然而罗马法律还有另一项规定，即只有当两位执政官都因故无法召集会议时，大法务官才能行使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而当时两位执政官中，虽恺撒已死，但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仍在罗马。布鲁图如果罔顾

这一事实而强行召开会议，那实际上是违法的行为。

虽然布鲁图有胆量背弃誓死保卫恺撒的誓言，但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违背法律的约束。最终，他以执政官安东尼才有权召集会议为由，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共和政体复辟的希望瞬间破灭。与恺撒一起跨越“卢比孔河”的布鲁图，却在渡河后裹足不前。

在此期间，恺撒的遗体仍然躺在庞培大回廊的角落里。当遇刺的消息传到恺撒宅邸，他的妻子卡尔普尼娅当场晕厥，奴隶们也手足无措。当日下午，三位忠心耿耿的奴隶自发潜入庞培大回廊偷运出主人的遗体，没有运往罗马市内的官邸，而是安放于“苏布拉”的别墅中。经医生诊断，恺撒的23处剑伤中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在卡匹托尔山的神殿内，刺杀集团与西塞罗会面时提出将恺撒遗体与格拉古兄弟当年一样进行处理——扔进台伯河中。在他们依然为此争论不休时，勇敢的奴隶们已经将恺撒遗体偷运出城了。

3月15日的夜晚很快来临。入夜后，亢奋的刺杀者们平静了些许。根据西塞罗奴隶们四处调查的结果，位居安东尼之下的恺撒派们都紧闭家门；马尔斯广场周围驻扎的恺撒精锐们也因事出突然而茫然无措。之所以奴隶能调查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独立于主人们的情报网。得知事态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刺杀者们约定先各自回家，翌日早上再于古罗马广场相聚。

西塞罗却不敢返回位于罗马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的宅邸，而是转而投宿在恺撒的好友、金融家马提乌斯的家里。一则马提乌斯的宅邸位于远离市中心的阿皮亚大道旁；二则他预想恺撒的精锐部队也不至于会攻击恺撒生前好友的住宅。

恺撒并未打算带着高卢战役以来就追随他的精锐军团远征帕提亚，而是给他们在各殖民地分派了土地。也有一些士兵宁愿一无所取，坚定

地只求追随恺撒左右。这部分士兵后来被恺撒安置在马尔斯广场周围待命。这些人大多数是恺撒军中的百人队队长，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在实战中，都是恺撒的得力助手。与四个背叛恺撒的高级将领不同，恺撒军中大凡中层以下的士兵们都对恺撒绝对忠心。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军团长更能理解恺撒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们对恺撒有着与生俱来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盲从。或许有时候，信任就是一种盲从吧，就像塞维利娅对恺撒的爱。将士们对恺撒的爱或许并不逊色于男女之爱。这批人的存在正是让刺杀者们最为惊惧的。

3月16日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市民们重新出现在街头巷尾。不过街市商铺既无开店买卖，会堂、回廊、古罗马广场周围的学校也见不到上课的师生。所有的人听说布鲁图要公开演讲，都聚集到了古罗马广场。恺撒的精锐士兵们也满满当当地挤在讲坛周围的群众中。

布鲁图的演讲首先阐述了刺杀恺撒的原因，不是出于对恺撒的憎恨，而是出于对国家之爱远胜恺撒。因为如果任恺撒继续推行改革，那么全罗马人都会成为恺撒一人之奴隶。为了捍卫全罗马人的自由，他们不得已才行刺杀之举。

在布鲁图的演讲过程中，听众们皆寂静无声，既无反对的口号，也无赞同的声音。在布鲁图演讲完毕之后，秦纳登上讲坛。此人并非刺杀集团中的一员，却曾在得知事变后第一时间赶往卡匹托尔山对暗杀者们表示支持。而当秦纳攻击恺撒的演说一开始，沉默的听众们瞬间爆发。他在演说中称不允许为恺撒举行葬礼，恺撒遗体只能投入台伯河中。这一言论激起了群众的怒号，愤怒的群众像潮水一般朝秦纳和布鲁图所在的讲坛涌去。

刺杀集团成员们在自家奴隶的护卫下，从古罗马广场后面的暗道逃出，再度逃往头一天藏身的卡匹托尔山神庙。

公开遗嘱

此时，安东尼来到恺撒的别墅。4年前庞培死后，安东尼曾没收了他在西里欧山上的住宅。恺撒回国得知后勃然大怒，命其按照市价付给庞培遗孀相应的购置费。此后安东尼终于成为该住宅的正式持有人。从那里去往恺撒“苏布拉”的别墅，无须经过古罗马广场。

在恺撒被害的4小时后，同为执政官的安东尼第一次面对曾经同事的遗体。在恺撒的“苏布拉”别墅，还有恺撒的遗孀卡尔普尼娅及其父亲——元老院的资深议员皮索。正是这位皮索告诉安东尼，恺撒留有遗嘱。此前，遗嘱一直由女祭司保存，而安东尼对此一无所知。

当卡尔普尼娅、皮索、恺撒的亲信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以及恺撒死后成为罗马最高权力者的安东尼等人在能望见恺撒遗体的回廊内齐集后，恺撒的遗嘱首度公之于世。遗嘱写于6个月前，记录日期是公元前45年9月15日。

一、恺撒所有资产的四分之三，由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与阿提娅之子屋大维继承。

二、剩下的四分之一由路奇乌斯·皮纳利乌斯和昆图斯·佩提乌斯平均继承。

三、如第一继承人屋大维主动放弃继承权，其权利由德奇姆斯·布鲁图继承。

四、如第一继承人实行继承，则德奇姆斯·布鲁图与马克·安东尼两

人为遗嘱执行监督人。同时若卡尔普尼娅生下恺撒遗腹子，上述两人同为遗腹子监护人。

五、第一继承人屋大维继承资产的同时，自动成为恺撒的养子，并改用恺撒的家族姓氏。

六、赠与所有住在首都的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并将台伯河西岸恺撒名下的花园捐给市民作为公共场所。该项由第一继承人实行。

恺撒遇害时，屋大维正值18岁零6个月。其父屋大维乌斯是出身于“骑士阶级”的元老院议员，也属于阿皮亚大道旁韦莱特里城的权力阶层。其母是恺撒的外甥女阿提娅。“屋大维”一词的原意是指小屋大维乌斯。这位年轻人是恺撒的甥孙。

皮纳利乌斯和佩提乌斯两人，都是恺撒姐姐的儿子，也就是恺撒的外甥。

德奇姆斯·布鲁图与他们相比，是唯一一个与恺撒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马克·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也是尤里乌斯家族一员。因此论起来，安东尼也是恺撒的亲戚。

然而恺撒的遗嘱却无关血缘，也无关财产分配，而完全是一份政治遗嘱。他将财产赠送给全体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却指定了屋大维作为养子，并给予他尤里乌斯·恺撒之家族名，等于向全世界公布屋大维是自己的继承人。

遗嘱公开后，最失望的莫过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两人了。

“3·15事件”发生时，克娄巴特拉与传闻中她和恺撒的私生子恺撒利昂也正在罗马。

恺撒并不隐瞒他与克娄巴特拉之间的情人关系，他将克娄巴特拉母子安置在台伯河西岸花园的别墅中，自己与正妻则居于官邸。

不过对于他与克娄巴特拉的孩子，遗书中却只字未提。像他这样的伟岸男子，自然不会不承认私生子。或许他认为跟自己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反而是对克娄巴特拉母子最好的保护吧。然而克娄巴特拉没法理解恺撒行为背后的深意。女王带着孩子秘密地乘船经台伯河到达奥斯提亚港口，并在那里转乘大船驶向埃及，远离了伤心之地罗马。她这么做，一是出于对恺撒遗嘱的失望，二是因为“3·15事件”后的罗马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险地。

比之克娄巴特拉，38岁的安东尼的失望感可能更为强烈。作为恺撒左右手的他，对自己将成为恺撒继承人这一点始终深信不疑。身为终身独裁官兼执政官的恺撒还曾任命他出任与自己地位同等的执政官，并且打算在自己远征拍提亚期间委任他留在罗马任代首领。

虽然在法尔萨拉战役后恺撒前往追击庞培的一年里，安东尼作为代首领在统治期间出过乱子，也没能制止第十军团兵变，让恺撒有一阵颇为不悦，然而在恺撒回国后的一年里，两人的关系又逐渐恢复，安东尼又继续成为了恺撒的左右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恺撒要选择连指挥一个大队的经验都没有的、体弱多病的、年仅18岁的、又不是亲生子的屋大维作为继承人？不仅是安东尼，其他人对这一点也无法理解。

从表面上看，让一个当时未满18岁的孩子担任罗马帝国的首脑，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实际上恺撒订立遗嘱时，本以为还要再过十二三年才能用上呢。那时罗马早已完成了从共和政体走向王政的准备阶段，而那时将罗马交给屋大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再过13年，恺撒引退时，屋大维已年届30岁，正是罗马人在政界崭露头角的年纪。

然而即便虑及于此，那时的屋大维也只不过年届30岁，才到罗马人概念中的青年期，离社会认可的成熟男人还有一段距离。而同样的13年

后，安东尼正好50岁。罗马人向来认为作为国家首领，沉稳胜过年少，50岁好过30岁。恺撒的意外遇刺，让罗马诞生了一位年仅18岁的首脑，这一点从安东尼的立场来看，是无法理解，甚至是失望透顶的。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一样，都无法看到恺撒行为背后的真意。

在法尔萨拉战役后的一年里，安东尼在政治统治上的失误，并不只是让恺撒一时感到不快。恺撒从中看到了安东尼的能力并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在军事上，安东尼是军团长中的翘楚。在罗马军常见的左、右、中翼的布阵中，安东尼可以轻松胜任任何一翼的指挥。然而他却不具备非战时的统治能力。恺撒原定远征帕提亚期间，不再任用安东尼为长期的代首领。在第二年、第三年的规划中，恺撒并没有将安东尼列入执政官人选，而是打算将他调到希腊北部的马其顿行省担任总督。这样当恺撒从帕提亚归来时，可以乘势收服多瑙河南岸。毕竟，安东尼在战场上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是屋大维担任帝国事业的继承人呢？当恺撒遗嘱公之于世时，大多数的罗马人心头都萦绕着一个疑问："谁是屋大维？"无论在国内、国外，年轻的屋大维都籍籍无名。为什么恺撒要选这样一个人呢？或许恺撒正是看到了屋大维与安东尼截然相反的才能吧。

恺撒自己是不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能军事、政治一把抓的天才，而安东尼只是军事天才。恺撒看出屋大维有着和平时期的统治天赋，但缺乏军事才能。恺撒认为，和平时期也需要防卫。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缺乏军事才能是行不通的。因此恺撒为了弥补屋大维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特地挑选了一个出生卑微、品性诚实、军事能力卓越的年轻人辅佐屋大维。这个人叫阿格里帕，与屋大维同龄。

恺撒立下遗嘱后，即刻开始了行动。首先他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送到希腊西岸的阿波罗尼亚。两位年轻人在那里的远征军营中见了面。对

于18岁的屋大维而言，出征帕提亚是人生中第一次参战。也正因此，恺撒被刺杀时，屋大维并不在国内。

得知恺撒遗嘱内容后失望异常的安东尼，萌生了趁继承人不在国内取而代之的野心。

首先，他凭借遗嘱执行监督人的身份，以保护恺撒的财产安全为由，将恺撒的金库搬到了自己家。金库中储备了恺撒远征帕提亚所需的约1亿塞斯特斯巨款。在控制了巨款后，他马上开始与刺杀者们接头。接头的任务交给了恺撒的秘书希尔提乌斯。安东尼于3月16日中午左右得知恺撒遗嘱内容，他当晚就命希尔提乌斯秘密造访了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宅邸。德奇姆斯·布鲁图迅速将这一情况以书信的方式通报给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并抄送了一份给西塞罗：

近况通报。

昨夜希尔提乌斯来访，将安东尼最恶劣、最无诚信的计划告知于我。

据其所言，我们之中无一人在罗马可得保全。民众和恺撒的精兵们怒火中烧，都叫嚣着要复仇。此言之真伪，我无法判断，或许你们那里还能判断事态发展之真实境况。

当前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由希尔提乌斯之口说出的安东尼计划。安东尼不赞成我们中任何一人以任何职位留在意大利境内——无论那职位多么卑微。他认为自己无法在愤怒的市民和士兵中保证我们的安全。

于是我向希尔提乌斯建议，我们全都是元老院议员出境制度（元老院议员无论因公、因私出境，都可以在罗马各行省和同盟国享有等同国内职务的待遇）的适用对象，可否依制度让我们离开意大利。

希尔提乌斯答应会尽力说服安东尼。不过依我看，安东尼应该

不会同意我们所有人都按照该制度出境。毕竟我们现在是被恺撒派赶进了死胡同。即使安东尼现在答应我们的请求，将来也有可能反悔。他说不定还会宣布我们是国家公敌，并加以驱逐。

或许你们会询问我之意见。依我看来，还是暂时屈服于厄运，首先远离意大利——去罗得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总之趋远避祸，是为上策。待时来运转之时，便可重整回国；若厄运依旧，则继续天涯亡命；若遇雪上加霜，那就只好各安天命了。

对以上我的计划，不知两位意下如何，期待告知。希尔提乌斯也曾表示期待两位的意见，他嘱咐我一接到两位的回信，即刻向他转达。他将于明早10时向安东尼汇报我们的答复。盼两位即刻回复！

3月17日晨，于罗马

以上就是在恺撒喋血后的48小时内，刺杀集团一边人员的动向。

妥协

同日，即3月17日下午，由于愤怒的民众在古罗马广场聚集不散，安东尼在远离该处的西里欧山神庙里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刺杀集团全员出席，位居安东尼之下的恺撒派也人头攒动。只西塞罗被排除在外。此次元老院会议，实际上不过是两派互探虚实、试图找出折中解决方案的会议。

许多参会人士，特别是刺杀集团成员，在得知恺撒生前对此后两年的人事安排后，都对反恺撒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位列名单之中。敌方的动摇，给安东尼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恺撒遇刺两天后，元老院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对违背誓言刺杀恺撒的原恺撒派刺杀成员，皆不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刺杀集团也认可恺撒政治模式的继续推广，即按照恺撒生前人事计划进行职位安排。

到此时，以布鲁图为首的刺杀集团所关心的已经不是重建共和政体了，而是在愤怒的民众和恺撒精锐士兵威胁下的自身生命安全。出任政府要职无疑是当时最能保全性命的办法。

由恺撒生前准备妥当、死后由元老院追认通过的人事安排如下：

（名字前带“*”印记的，是刺杀集团成员，或没有直接参与刺杀行动但参与策划者。）

公元前43年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

公元前42年执政官——普兰库斯、*德奇姆斯•布鲁图。

公元前44年起，在恺撒远征帕提亚期间的各行省总督：

近西班牙行省——雷必达。

远西班牙行省——帕里奥。

法国南部及整个高卢行省——普兰库斯任职至公元前43年末；自普兰库斯任公元前42年度执政官起该地由近西班牙行省的总督帕里奥兼任。

北意大利行省——*德奇姆斯•布鲁图任职至公元前43年末；布鲁图出任公元前42年度执政官后，该地总督人选再议。

北意大利行省一直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该地居民早已被恺撒全部授予了罗马公民权，但仍保留了行省的行政地位。根据罗马法

律，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罗马本土境内不允许驻扎军队，而当时罗马称霸高卢不足6年，无论是对高卢境内的高卢民族，还是对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意大利半岛的北部防线都不可以松懈。因此，北意大利只有采取行省行政制度，才能保留军队驻防。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西西里岛虽然只享有低于罗马公民的拉丁公民权，但是由于该地属防卫安全地域，因此早已撤掉行省，划归罗马本土境内。从本土防御的角度来看，北意大利的重要性显然高于西西里岛。

北意大利行省的总督同时也担任该地最高军事长官，担负着卢比孔河与本土国境交界地的安全防卫。因此该地总督一职理应会由最可信赖的人出任。公元前46年，恺撒就将北意大利行省总督的位置交给了马库斯·布鲁图。彼时离他在恺撒与庞培的对决中投降恺撒还不足一年时间。接着恺撒又决定在远征帕提亚期间，将这个重要的位置交给德奇姆斯·布鲁图。后来罗马人中流传着这两人恩将仇报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接上继续公布名单：

马其顿行省——安东尼执政官任期终止时赴任。

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地区西南部）——*托雷波尼乌斯。

比提尼亚行省（小亚细亚地区西北部）——*金布罗。

叙利亚行省——多拉贝拉。

原非洲行省——*科尔尼非切斯。

新非洲行省——塞斯提乌斯。

此外，任期自公元前44年12月10起的护民官一职由*卡斯卡出任，而此人正是行刺过程中第一个扑向恺撒的。

护民官——*卡斯卡。

值得一提的是，名单中没有卡西乌斯。按照罗马法律，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卡西乌斯可以在第二年升任行省总督，但恺撒的安排中非但没有让他负责重要的北意大利，甚至也没打算让他出任其他行省总督，反而委任没有总督经验的卡西乌斯妻子的哥哥马库斯·布鲁图为北意大利总督。考虑到行省总督即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这个事实，恺撒这么安排的原因，大概是他的内心仍然无法原谅卡西乌斯当年背叛首领的行为吧。而卡西乌斯也对疑心重重的恺撒怀恨在心。

恺撒被刺两天后的元老院会议上，恺撒派和刺杀集团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却是仍旧按照恺撒生前的人事安排进行职务调配。恺撒虽死，但其思想仍在影响着他们。

没有亲临会议的西塞罗知道结果后，对此向阿提库斯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喟叹：

“早知如此，当初何必杀恺撒！”

此外元老院会议还决定，除了人事安排外，其余各方面仍沿用恺撒的政治构想：一是同意高卢和西班牙两个行省的代表进驻元老院，虽然保守派们对此曾异常反感；二是继续维持给予非本土出生的人罗马公民权的政策。

安东尼也向刺杀集团作出了让步，不过，只限于一件事，那就是废除终身独裁官制度。安东尼也知道，自恺撒后，任何人再试图坐上这个位置都必然招致全体公民的嘲笑。此外，远征帕提亚一事，在会议上再无一人提及。

会上恺撒派提出3月18日在古罗马广场为恺撒举办国葬。那些因恺撒遗嘱而受惠的刺杀成员们，对此亦无异议。

会后德奇姆斯·布鲁图便匆匆离开罗马，以期能尽快到达自己能公开拥有兵权的北意大利行省赴任。他早已感觉到了罗马公民和恺撒精锐士兵们的腾腾怒气。托雷波尼乌斯和金布罗也急忙赶往各自的任地。

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两位刺杀主谋，却怀着对会上所达成妥协的信任安心在罗马待了下来。元老院会议结束后，他们分别到两位恺撒派重要人物家中赴宴。雷必达招待布鲁图，安东尼招待卡西乌斯。两场宴会都在一片表面的和平中结束。

翌日，恺撒葬礼。

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写道，恺撒的葬礼由马库斯·布鲁图的演说作为开场，接着安东尼进行了他那举世闻名的杰出演讲。然而，我们在“目击证人的证词”中并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刺杀发生当天的3月15日，刺杀者们原打算公开进行演讲，但后来不得不逃到卡匹托尔山上神殿中躲避。刺杀后第二天的3月16日，马库斯·布鲁图虽发表了演说，但最后也和前一天一样逃进了卡匹托尔山。如此两次，到国葬日的3月18日，德奇姆斯·布鲁图和马库斯·布鲁图自然再无胆量现身于众，因为民众和恺撒精锐们的愤怒丝毫未减。因此在国葬上，只有安东尼一人出现并发凭吊词。

在所有历史学家的论述中，无一人真正知道安东尼的凭吊内容，然而历史学家们都公认安东尼确实是发表了凭吊演说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按照古罗马惯例，凭吊演说一般是由死者最亲近的人进行的。意欲取屋大维而代之的安东尼，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展示机会。至于演说内容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恺撒大帝》中安东尼那精彩绝伦的凭吊词实际上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而已。鉴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有必要用那样的演说对历经“3·15事

件”的罗马公众进行煽动呢？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煽动，罗马民众难道就会对布鲁图等刺杀者们拍手赞扬，赞同他们的行为吗？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煽动，罗马民众就不会对刺杀者们加以痛恨，对刺杀行为进行谴责吗？

有位古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如下事实：

> 安东尼站在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面对恺撒的遗体，宣读了恺撒遗嘱。表示会依照遗嘱赠与每位罗马公民300塞斯特斯，及将台伯河西岸的庭院捐赠给国家作为公共场所。同时他也谴责了违背誓死效忠恺撒誓言的刺杀者们。之后他对恺撒的功绩进行了一番颂扬。追悼会结束。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足以充分煽动民众情绪了，根本无须什么锦上添花的精彩演说。

火葬恺撒

史书记载的葬礼情况与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的描写大体相同。看到恺撒遗体的群众禁不住号啕大哭，怒火中烧。包围恺撒遗体的熊熊大火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恺撒的葬礼已经不再是单纯寄托哀思的场所，更多地成为引燃愤怒和讨伐心的地方。

群众用燃烧恺撒遗体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杀向了刺杀者们的宅邸。而以布鲁图为首的全体刺杀集团成员们早已躲进了友人的家中避祸，他们当中并没有谁在那天受到实质性的攻击。反而是一个与刺杀者金布罗同名的恺撒派诗人被愤怒的群众误杀了。

几乎在恺撒遗体被火焰吞噬的瞬间，天降瓢泼大雨，恺撒的骨灰被

雨水冲刷殆尽。后来屋大维在平定内乱后曾建造了一座帝陵，而本应首位葬入帝陵的恺撒却因骨灰尽失而无法得葬。

恺撒之墓无处可寻。或许恺撒骨灰早已被雨水冲进了罗马的地下，随着他亲手督造的完备下水道系统流进了台伯河，流进了地中海。不平凡的无墓之葬，或许更适合不凡的恺撒吧。

逃跑

葬礼后次日，也就是3月19日夜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天不亮就逃离了罗马。身为首都法务官的布鲁图本应留在国内尽忠职守，但惧于群情激奋，也匆匆逃往阿皮亚大道30公里以南的别墅。古罗马将建在郊外的独栋别墅统称为“围拉”（villa），通常由大而坚的石头高墙围绕，其防卫能力远胜于罗马市内住宅，而内部设置从居室、马厩到奴隶住所一应俱全。因此这两位刺杀恺撒的主谋躲进安全所，等待安东尼履行承诺的“特赦”再返回罗马。

然而安东尼面临的情况比他之前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因此尽管有西塞罗的热心周旋，尽管此前安东尼本人也有过亲口承诺，但现在他想要重新考虑之前承诺刺杀者的“特赦”了。因为如果实行“特赦”，他担心愤怒的罗马民众会将怒火转嫁到自己身上。

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之后，立刻要求元老院全体议员起誓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恺撒在接受誓言后，立刻解散了长久以来由日耳曼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警卫队。然而如前所述，所有的刺杀成员都是元老院议员。

可能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如此相信誓言似乎显得轻率，而对古罗马而言，誓言有着极重的分量。

一神教的犹太人信奉人与神之间的约定，而多神教的罗马人则不同，他们认为神的作用是保护及帮助人类，而非裁定人类行为方式的判官，人类行为的正确与否，最终有待人类自身来裁决。正因如此，古罗马人才开创了法律精神，并相信无信义则无人伦。古罗马人惯于彼此交换誓言，通常他们的誓言分为以下几类：

一、与败者相约——在扣押人质的基础上缔结盟约。

二、与债务人相约——在有担保的基础上建立融资关系。

三、具公共效力的君子协定——在无人质、无担保的情况下，口头盟誓。

恺撒要求全体元老院议员所做的就是第三种协定。换言之，包括刺杀者在内的元老院议员们和终身独裁官恺撒之间的正是“君子协定”。

如果无此约定，那么刺杀恺撒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场单纯的谋杀，仅构成罗马法律上的刑事犯罪。依据恺撒修订过的罗马法典，刑事罪犯只要选择自行流亡他国就不再被追究责任。然而刺杀者们参加过这典型的罗马式“君子协定”，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罪这么简单了。国家统治上层人士背信弃义——违背当初无须人质、无须担保但拥有最广泛公共效力的誓言，如同“驷马难追”的君子、“一言九鼎”的社会名流违背了社会公义。君子恺撒相信君子协定，解散了警卫队，而对方的“君子们”则偷偷携带武器前往禁械的场所行刺。一则违背誓言，二则违背法典，这样的人，怎能继续做名流，称君子？

当刺杀者们从亢奋中冷静后，西塞罗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积极斡旋，以期刺杀者们能获得“特赦”，恢复名誉。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塞罗所想的“特赦”和今天我们说的“特赦”并不相同，不是获得宽恕释放而更接近自行流放。

此外，刺杀者们也在恢复理智后意识到了刺杀恺撒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次日元老院会议上也默认了恺撒生前遗嘱的人事安排。毕竟对国家公职，特别是国家要职人员而言，道义总是居于律法之下的。在西塞罗的积极斡旋下，安东尼答应进行“特赦”。“特赦”一旦实现，刺杀者们便可恢复“君子”声望。刺杀集团的成员均属元老院议员集团，均以自身纯罗马血统而自豪，在重视和严守誓言上皆不甘人后。因此他们对恺撒当年允许行省地区的优秀人物进入元老院始终无法释怀。

上述观点在纯罗马血统的“君子”们之间颇为盛行，但普通百姓对此无法理解。那么恺撒之死在普通民众间激起千层浪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恺撒大帝》中安东尼那精彩绝伦的演说煽动？是因为被恺撒赠与每位公民300塞斯特斯遗嘱所感动？还是因为对最高统治者突然遇刺的同情？

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曾称恺撒为“国父”。“喀提林阴谋”时期，西塞罗也曾被人如此称呼，不同的是，恺撒获得的是全国性的正式称谓。和罗马建国之父罗穆路斯相比，恺撒可以算得上是第二位开创者，所谓的“中兴鼻祖”。

“国父”即国民之父。无论是对元老院议员还是普通百姓而言，恺撒都有着父亲一般的神圣光环。同时恺撒还将财产分赠给了每一位罗马公民，这是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对罗马而言，继承恺撒分赠的遗产，类似于儿子接受父亲的遗产。而在罗马，弑父是最重的罪行。

普通百姓可能无法了解所谓“君子协定”，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是谁谋害了他们的“父亲”。因此他们并不以“刺杀者”来称呼谋害恺撒之人，而是冠以“弑父者”之名，以表达他们心中对布鲁图等人的无比憎恨和愤怒之情。

安东尼马上察觉到了民心向背。在恺撒遗嘱公布之后，他立刻决心取代屋大维成为事实上恺撒的继任。因此，他也并没有让逃离罗马的刺

杀者们返回的意思。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西塞罗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安东尼的态度让他惴惴不安。即便自己并未亲手参与到谋杀行动中，西塞罗还是危机四伏，他不敢留在罗马的宅邸，也不敢留在郊外朋友家。即使西塞罗身负和以安东尼为首的恺撒派进行交涉，保证从公元前43年就无职务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安全重任，此刻他也不敢逗留，匆匆地逃往罗马市外的别墅。

然而即使身处离罗马20公里之外的别墅里，西塞罗仍惶恐不安。彼时关于恺撒精锐将亮出复仇之剑的传言满天飞，他虽认为自己不会是复仇靶子，却为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等人的安全担忧。他试图说服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前往自己在拉努比奥的别墅，并称自己将在那里和他们会合。拉努比奥别墅在布鲁图现居地以南约30公里，是个远离各条主大道的濒海之地。西塞罗曾为投资不动产不惜举债，如今看来，投资倒也派上了用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刻的安东尼正在毁掉自己成为恺撒继任者的大好机会。他非但没有立刻实施恺撒给每位公民分赠财产的遗嘱，反而将这部分钱挪用到巩固自己军队上。显然他并不懂“好钢使在刀刃上”这个道理。

安东尼忘了遵循恺撒的分赠遗嘱，但没忘了安排自己的亲信上位。他安排恺撒的首席副将雷必达补上恺撒兼任的大祭司一职，多拉贝拉补上恺撒兼任的执政官一职。这两人均为恺撒派要员，且与安东尼同为38岁。

在西塞罗惴惴不安的心态下，安东尼的势力日渐壮大。在他正为成为恺撒继承人努力之时，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出现了。公元前44年4月，18岁的屋大维自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登陆回国。此时离恺撒遇刺约一个月。

屋大维

屋大维受恺撒之命，于公元前45年秋天前往希腊西岸的阿波罗尼亚。当恺撒遇刺和恺撒遗嘱公布的消息传到时，他正在为远征帕提亚集结军队。当时不少军团长力劝这位年轻的恺撒指定继承人不要返回罗马，在仍旧以“恺撒士兵”为荣的军队中静观其变。然而18岁的屋大维决意早日回到罗马，以继承恺撒遗志，完成恺撒遗愿。

此前，屋大维对恺撒会指定自己为继承人一事毫不知情。恺撒自己也没料到与世长辞会如此之快，因此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遗嘱内容的一星半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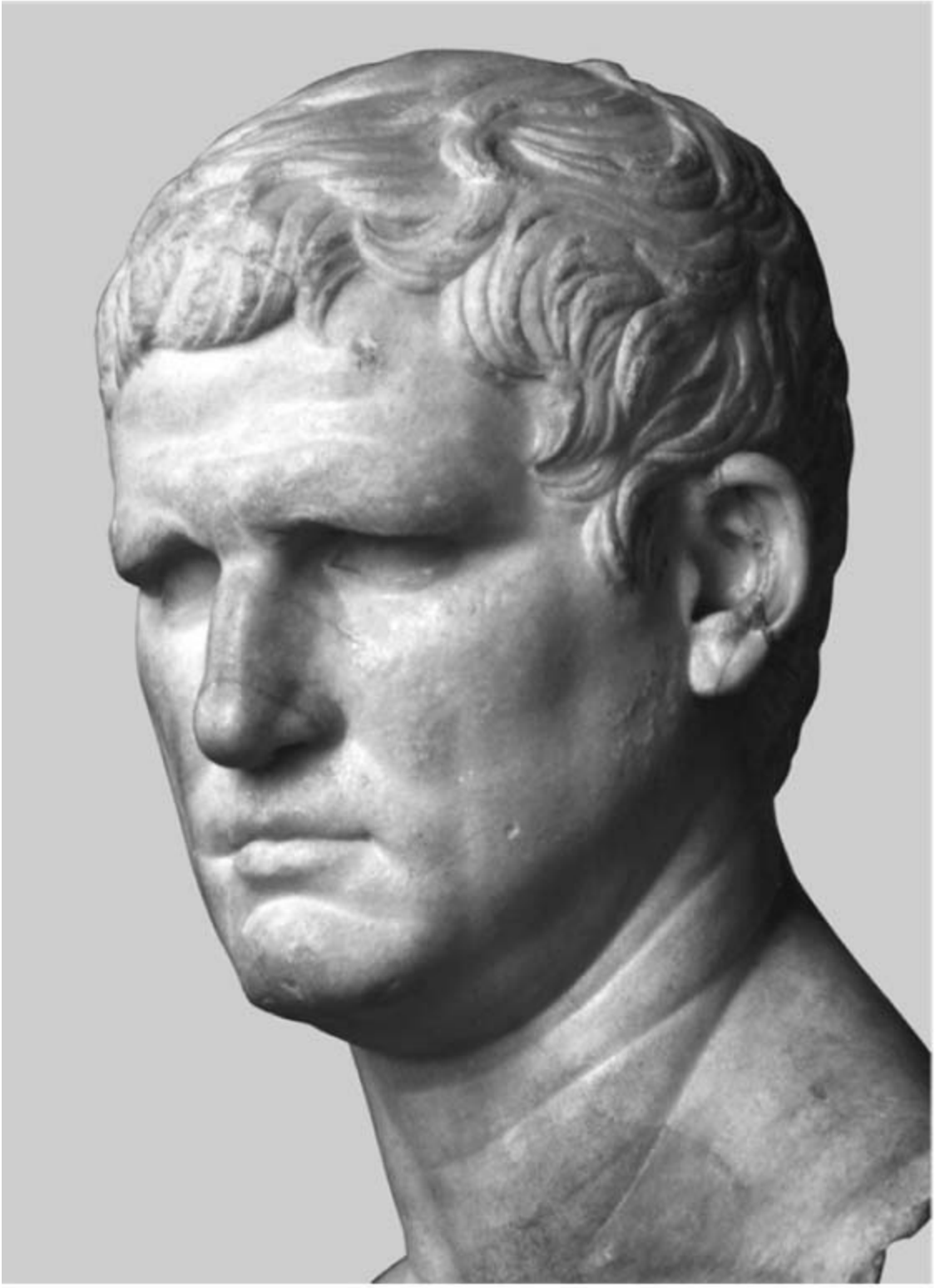
公元前46年末到公元前45年中期，恺撒曾出兵西班牙击败庞培余党，史称孟达会战。当时17岁的屋大维执意从军，因而恺撒也将其带在身边出征。得胜回国后恺撒给刚满18岁的屋大维配备了一员良将——阿格里帕，并令其护卫屋大维前往阿波罗尼亚。

屋大维

恺撒对屋大维的做法在古罗马上层阶级中并不罕见。仅凭这两件事，谁也不会想到恺撒打算立屋大维为继任。而屋大维在罗马百姓中并无特殊声望，因此当恺撒遗嘱公布后，大多数的罗马百姓都产生一个疑问——“谁是屋大维？”同样的，大部分的元老院阶级人士也在疑惑——“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出生于地方小城韦莱特里，父亲是原元老院议员。屋大维幼年丧父，母亲阿提娅不久改嫁。按照罗马惯例，女子改嫁通常不带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因此年幼的屋大维和姐姐一同由祖母尤利娅抚养。尤利娅是恺撒一母同胞的妹妹，其夫早亡，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不知道她们是住在“苏布拉”的别墅，还是罗马市内大祭司的官邸，但可以肯定的是，少年屋大维是在恺撒家中成长的。

当时恺撒正忙于高卢战事，应该没有太多时间与少年屋大维一起生活。恺撒的高卢战役捷报频传，在年轻人当中掀起了一阵狂潮。阿雷佐战役那年，屋大维11岁，两年后恺撒就率军强渡卢比孔河。内战爆发后，罗马的上流社会分为两派，年轻人都支持恺撒，年长的都忠心于庞培。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内部也爆发了矛盾，西塞罗家是典型代表。西塞罗看好的年轻人，库里奥、卡埃里乌斯及女婿多拉贝拉相继成为恺撒派，连年仅10多岁的儿子和侄子也都追随恺撒，这让西塞罗头疼不已。他曾试图将儿子和侄子送到希腊，以远离那些狂热的罗马青年。屋大维从13岁到17岁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他来说，恺撒既是心中的偶像，也是自己的舅公。虽然恺撒回国时间很少，但只要他一回来，不论是官邸还是别墅或者拉比可的庄园，屋大维总是粘着恺撒。



阿格里帕

年少的屋大维知道舅公对自己的爱护，知道自己军事能力不够突出，便精心挑选了良将阿格里帕随侍。因此远征帕提亚前，屋大维对舅公派自己先行前往阿波罗尼亚集结军队的命令毫无异议。

恺撒的遇刺是许多人的噩梦，对屋大维而言更是晴天霹雳。得知噩耗，屋大维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而当恺撒遗嘱内容公布后，这位年轻人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遗嘱中恺撒不仅指定屋大维为继任者，同时还指明收他为养子并继承恺撒家族姓氏。屋大维的生父虽是元老院议员，但从其姓名“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中便可一眼看出，其出生并不高贵。小屋大维随其父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继承了其父出身不高贵的事实。恺撒自然明白，仅让屋大维以养子身份继承自己的事业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恺撒才费尽苦心地指定屋大维继承名门望族的姓氏，以抬高他的出身。恺撒的这份心意，屋大维比谁都更清楚。因为恺撒的遗嘱让这默默无名的地方官之子一跃而起，成为了全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之后。

此外，即便恺撒订立遗嘱时打算再过十几年才移交事业，他也在当时就已经决定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帝国交托给当时年仅18岁的孩子，虽然这个孩子还没有任何功绩可言。仅凭这一点信任，就足以令屋大维感动终生。18岁时的这份感激，成为了支撑屋大维今后意志的源泉。屋大维心中的这份情，莫说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连安东尼和西塞罗都没有注意到。

4月中旬，罗马和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人们都在不安中度过，此时距恺撒遇刺还不到一个月。

安东尼在罗马日复一日地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积极筹备。刺杀集团中被派赴行省任总督的成员们都早早地离开了罗马，遗嘱中没有被委任职务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逐渐地往远离罗马的南方行去。无论西塞罗如何激动，如何鼓励，布鲁图都终日只谈论哲学，不再过问政事。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屋大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回国了。此前人们都认为他会躲在阿波罗尼亚。他遵照国家法律规定，并未带军队回国，但他也不是单枪匹马而来，阿格里帕等几人贴身随侍左右。他从布林迪西登陆后，沿阿皮亚大道北上，根据阿提库斯写给西塞罗的书信所言，他于4月16日到达其继父——前执政官——菲利普斯在那不勒斯的别墅。听说了这一消息的恺撒派成员纷纷从罗马赶赴那不勒斯，聚集在屋大维周围。

无论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还是奥比乌斯，都和其他人一样，对屋大维作为继承人感到意外。但这些恺撒的亲信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质疑恺撒的决定，他们选择遵从恺撒遗愿，坚定地拥护恺撒的选择。

在那不勒斯逗留期间，18岁的屋大维向恺撒派们表明心迹，明确自己将继承亡“父”遗志的决心。接着为表明对亡父亲近之人的尊敬，他很快就拜访了住在附近别墅的西塞罗。虚荣的西塞罗看到这位年轻人充满敬意的举动，心中自是满足不已。

西塞罗在信中多次称屋大维为“孩子”。可能对于62岁的西塞罗来说，18岁的屋大维确实只是个孩子。不过这个称谓对屋大维来说却相当刺耳。

虽然如此，屋大维还拥有恺撒所没有的特质——伪善。

屋大维在亡父恺撒亲信们的拥簇下从那不勒斯出发，沿着阿皮亚大道北上，于4月末抵达罗马，受到了安东尼异常冷淡地迎接。

38岁的安东尼和西塞罗一样，都只把18岁的屋大维当成一个“孩子”。有着年龄和履历双重优势的安东尼相当傲慢。虽然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恺撒养子并有资格继承恺撒家族姓氏，但这一切都尚未正式实现。按照罗马规定，继承望族之名，首先要得到大祭司的认可，接着要获得公民大会的通过。现在的情况是，接替恺撒任大祭司的雷必达

性格温顺，早在安东尼掌握之中；同时安东尼自任执政官，手握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因此安东尼早已决定要暗中使坏，阻止屋大维正式成为恺撒“养子”。

回罗马后，屋大维立刻以尊长之礼拜访安东尼。他首先提出自己将继承恺撒遗志的决心，接着他要求安东尼归还私吞的恺撒金库。

按照罗马传统，社会名流去世后，其子必须举行诸如戏剧、体育竞技等系列的纪念活动。举办活动自然需要经费，此外恺撒遗嘱中也声明将给每位公民分赠300塞斯特斯。虽然屋大维生父远比恺撒富裕，但也不像克拉苏和庞培那样富可敌国。如果安东尼不归还恺撒金库，屋大维也没有能力举办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作为恺撒养子却无法履行义务，如此屋大维便无法向公众交代。

安东尼自是推三阻四找理由不肯归还金库。如果屋大维无法尽身为养子的义务，失望的公民们自会认为他没有继承恺撒家族的资格，这正中安东尼下怀。

最初年仅18岁的屋大维也一筹莫展。不过这位意志力坚定的“孩子”很快想到了办法，他打算拜访恺撒生前财力雄厚的好友，请他们提供资金支援。马提乌斯是拜访对象之一。恺撒遇刺后西塞罗就曾前往马提乌斯位于阿皮亚大道旁的别墅躲避风头。马提乌斯是属于“骑士阶级”的有经济实力的人，一贯以不关心政治的金融家自居。他修养极高，曾将荷马著作《伊利亚特》译成拉丁语。恺撒的朋友们尽管出身阶级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良好的修为。

这一次他又受到了阻挠——暗中使坏的人不是安东尼，而是西塞罗。虽然出发点和安东尼完全不同，但西塞罗也不愿看到屋大维成为恺撒的接班人。如果屋大维继承了恺撒的政治遗愿，那么费尽心力刺杀恺撒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故而西塞罗给素来亲厚的马提乌斯修书一封，谴责他在恺撒遇刺后仍与恺撒派藕断丝连，并希望他不要接受屋大维的请

求。现存的史料中还能找到马提乌斯的回信，全文翻译如下：

> 您的来信令我不胜欣喜，且无论内容为何，字里行间都满含着您对我的关心和亲厚。但我也不得不说信的内容让我陷入了苦恼。我竟不知自己所行之事（指经济援助屋大维）会伤害到您那高贵的精神。
>
> 尽管我对您的尊敬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我仍决意将我所行之事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尽的义务——即使这会成为对您意见的反驳。
>
> 恺撒去世后，我受到多方面的指责。我为痛失挚友而悲伤，我为自己敬仰的伟人死于非命而悲愤不已，却不知这样也会遭受到众人的横加指责。
>
> 他们指责我重私情而轻国益。明明是为国家利益扫清了障碍的高兴事，我却因为逝去的是自己的好友而流泪。恕我直言，我对那样的“高尚”言论毫无兴趣，我也没有那样的高尚贤明的智慧。
>
> 在恺撒与元老院的斗争中，我并没有和他站在一边；在恺撒强渡卢比孔河时，我也并不认可他的行为，但我无法对好友身陷囹圄而坐视不理。内战爆发后，为促成恺撒和庞培和谈，我曾多次秘密斡旋。（马提乌斯确曾在内战某一段时期，为双方间调停而积极奔走，终因庞培无意与恺撒一对一和谈而作罢。）
>
> 即使最后内战是以好友胜利告终，我也未曾因此而谋私利，反而因后来的金融改革蒙受了巨大损失。（恺撒为保证债务人能及时还清债务，人为剔除战后因通货膨胀产生的25%的价值，要求各债权人仍以战前的担保价值追债。这实际上造成了金融大鳄的不小损失。）
>
> 我既无法释怀恺撒为了盘活经济而让我们金融界人士蒙受损失，也无法忘记他让反对派继续住在罗马过着和以前一样公职生活的宽容精神。而正是这种宽容精神，让反对派们有机会在3月15日将剑刺向他。

我如何能像这帮忘恩负义之徒一样憎恨恺撒，为恺撒之死而欢欣鼓舞呢？或许他们会说：“今天我们不杀他，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死在他的手上。”

这是何等傲慢的言行！不仅不为犯下的杀人罪行而后悔，还不允许人们为死者悲伤流泪！连奴隶都有起码的喜怒哀乐自由啊！这些以终结暴君统治的解救者自居的人，是不是还想继续支配人民的情感自由？

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我都不会退缩。无论何种威胁——哪怕是死亡——都不能夺取我的人性及对好友尽义务的责任心。恺撒之死让我深深地明白，带着对自己的自豪死去也是一种荣光。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此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希望因恺撒之死能让所有人都感到痛苦。

但我不会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因此我也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情感，让我能为最敬爱最伟大的朋友回归西天而尽情悲伤流泪。

西塞罗啊，您大概是因为听说我将为恺撒举行纪念竞技会提供资金援助而写信的吧。我坦白说，我只将其视为私事，并不带有政治目的。是我自己怀着敬意，为纪念伟大的朋友而作出的捐赠。说实话，我无法拒绝那位年轻人真诚的请求，同时我也为恺撒选了这样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感到无上欣喜。

诚如您所言，我常常拜访安东尼府上，不过那纯粹是礼节性的。如果您现在也造访安东尼宅邸，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那里如今已是水泄不通，希望借当权者之手获利的人如过江之鲫充斥门庭。当中有不少就是斥责我不顾国家公义为恺撒悲痛的人。

以前恺撒从不干涉我拜访何人，也不干涉我接受谁的造访。即使我与他的政敌往来，他也从未流露过半分不快。与之相反的是，现在竟然有人不允许我为挚友遇害而悲伤，禁止我表达个人情感！这样践踏人性的独裁制度，断不能长期存续。若其不幸实现，我将退至远离罗马的罗得岛，远离独裁和干扰，怀着对恺撒的思念聊度

余生。

面对马提乌斯义正词严的斥责，西塞罗似乎也无颜继续阻挠。屋大维决定将恺撒纪念大会定于恺撒诞生的7月进行，此时大体已经准备妥当。资金方面除了马提乌斯外，屋大维还争取到了另一位经济大鳄的支援，可以说基本上屋大维已经拥有整个罗马经济界作为后盾了。在此形势下，安东尼即使想使绊也无处着手。罗马民众对这位18岁的“孩子”有了很大改观。重视家族的罗马人认为力排阻挠为父尽孝，是值得称颂的美德。年仅18岁的屋大维，无须借助武力，漂亮地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刺杀者

随着罗马再度成为恺撒派的天下，刺杀者方面的情形却每况愈下。即使住在布鲁图离罗马南面60公里的拉努比奥别墅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仍然心怀不安，打算阖家迁至更南边的那不勒斯。布鲁图甚至产生主动流放的想法，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一旦主动流放就意味着认罪，而且无论他们逃到哪里，都没有信心能逃离恺撒精英部队的怒火。

惶恐中，大家聚集到布鲁图的拉努比奥别墅商议对策。到场的有布鲁图、西斯阿罗、布鲁图母亲塞维利娅、妻子鲍基娅及妹妹特尔图拉（即卡西乌斯之妻）。

西塞罗向布鲁图说过他在途中想到的解决办法，即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两人主动提出前往西西里购置小麦。西塞罗认为若以此为由，安东尼定无拒绝之理。

西塞罗力劝眉头紧锁的布鲁图，身为共和政体的旗手，他的个人安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卡西乌斯到场后，西塞罗又不厌其烦地

重复了一遍观点。

布鲁图依旧沉默，卡西乌斯听后却火冒三丈。他愤怒道：“宁死不去西西里！委曲求全，还要强颜答谢，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西塞罗大感无奈，问卡西乌斯有什么打算，卡西乌斯表示可以前往亚卡伊亚（希腊中部）。西塞罗接着又问布鲁图有何打算，此时布鲁图终于开口了。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返回罗马。”

“绝无可能！回到罗马就是以身犯险。”

“如果绝无危险，是否您就同意呢？”

“自然。”西塞罗答道，然后接着说，“您现在所任的大法务官一职任期到今年年中为止，比起让您到行省去，我本意自然是希望您能留在罗马。然而对于之后无官无职的您来说，留在罗马确实是个危险之举。您我都心知肚明。”

之后，西塞罗又逐一分析了首都的危险因素。他的分析燃起了刺杀者们心中的不满。本来是商量善后对策的会场，立刻出现了争相声讨自己同志的场面。最激动的要数卡西乌斯。他慨叹失去了大好机会的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谴责其他同志。被声讨的最厉害的，是已赴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的德奇姆斯·布鲁图。

刺杀者中，德奇姆斯·布鲁图与恺撒的关系最为密切。原本在刺杀成功后，面对茫然无措的罗马公民们，德奇姆斯·布鲁图可以迅速掌握形势，但他什么也没做。对此，不仅是卡西乌斯，就连马库斯·布鲁图都口出怨言。

西塞罗也没有保持沉默。这位62岁的罗马共和主义者也在激烈地抱

怨三件事：一是为什么没有连安东尼一并杀掉；二是为什么不在刺杀成功后马上召集元老院会议，尽早恢复共和制政体；三是为什么刺杀成功后不立刻召集茫然的民众们，乘机恢复被恺撒推倒的元老院共和体制，最后棋差一着。

此时，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突然插话，用激烈的语调大声说："我从未听到谁说这样的话！"

塞维利娅所言极是，此前从未有人就刺杀成功后的局面提出任何计划，毫无考虑就刺杀了恺撒。

马库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是恺撒一生的红颜知己，丈夫死后，她不仅没有再婚，反而对拥有多次政治婚姻且情人不断的恺撒一往情深。对她来说，亲生儿子亲手杀死了自己一生的挚爱这是何其悲惨的命运，连古希腊悲剧戏文也不过如此吧。这样的一个女人当时在想什么，史料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仅仅留下了上述的那一句话。从上述的唯一一句话推测，大概此前将情人看得高于一切的塞维利娅，在情人死后又回归了母亲的天职吧。她不仅出席了这样的一场会议，后来也去求安东尼和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等恺撒派，在不伤及名誉的情况下放儿子布鲁图离开意大利。大概是出于和恺撒的特殊关系，她与上述人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此后塞维利娅再没和儿子一起行动过。一方面由于儿子已入不惑之年，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儿媳——小加图之女鲍基娅——对恺撒恨之入骨。这也不足为奇：一位是把儿子托付给恺撒的母亲，一位是策动丈夫离开恺撒的妻子。这对婆媳之间的交恶，可谓史无前例。在下定刺杀恺撒的决心前，布鲁图肯定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团团转。

会后，塞维利娅动身前往恺撒生前赠与她的那不勒斯近郊别墅。尽管是刺杀恺撒主谋者的母亲，安东尼、屋大维以及恺撒生前亲信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奥比乌斯等对挚爱恺撒一生的塞维利娅是很尊重的，且此态度并未因恺撒亡故而改变。因此在那不勒斯别墅中安享晚年的塞

维利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身安全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只是她晚年未允许儿子涉足别墅半步。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声讨会议。被塞维利娅斥责考虑不周的刺杀者们，被斥责后越发消沉，根本无法冷静地思索对策。最后会议在绝望的叹气和互相指责里结束。西塞罗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详尽地记述了会议当天的情形，并在信末感慨道：

> 我眼前似乎出现了陌生人同舟渡河的情形。没有人指得出明确的目的地，没有人能冷静判断出今后何为。自刺杀恺撒后就一直陷入混乱的他们，如今更是被绝望的情绪笼罩。每个人心里都恨不得插翅远飞，直至再听不见“刺杀”这个词为止。

西塞罗信中的日期落款为“公元前44年6月8日”，离“3月15日”已经过去了快3个月。同时西塞罗还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写道：

> 3月15日后继续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想法，如今看来不过是可笑的幻想。他们只有成为英雄的热情，却缺少成为英雄的头脑，甚至连孩子都比不上。大树虽倒下，树根仍深植。

不过笔者认为，西塞罗似乎并没有资格指责以布鲁图为首的“英雄”们的幼稚。因为在西塞罗同一时间的另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 在我看来，屋大维是个智勇双全的小伙子。他对我们的英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并不（像安东尼那样）恨入骨髓，或许我们还有和解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太过年轻，我担心他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如何让他与安东尼决裂，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旦成功，这位曾呼我为“仲父”的孩子很有可能为我们所用，到时我们的英雄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事实上，对这位18岁的“伪善”者来说，称西塞罗一声“仲父”比吃一顿早餐难不了多少。因此他一方面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满足这位罗马绅士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7月中旬的大型纪念运动会。纪念恺撒的运动会为期7天，全罗马公民包括女性、孩子都可以参加。4个月前56岁的恺撒遇刺的记忆重新在全体罗马公民的脑中翻腾，对刺杀者们的憎恨及复仇的决心也再度燃起。自然屋大维也不忘适时地执行“亡父”遗嘱，给每位公民分赠300塞斯特斯。

屋大维铸造的恺撒纪念银币（刻有运动会最后一夜天空中划过的闪耀彗星）

大会的最后一夜，一颗大且闪亮的彗星出现在罗马湛蓝的夜空。人们纷纷传言那是恺撒升天的异象。

在此顺便解释一下，后来的天文学研究表明，那正是“哈雷彗星”。

屋大维成功举办恺撒纪念运动会，与其说对隐居远在那不勒斯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造成巨大震撼，不如说给近在罗马的安东尼心头投下一片阴影。

为了对抗声望渐涨的屋大维，安东尼再度和布鲁图、卡西乌斯接洽。对于希望在无损声誉情况下逃往海外的刺杀者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自3月17日元老院会议后，这是安东尼和布鲁图之间的第二次相互妥协。

逃往国外

屋大维成功地在“7月”举办了恺撒纪念运动会，这不仅让罗马人自此用Julius（尤里乌斯）称呼“7月”，更是成功地塑造了“屋大维”在全体罗马人——首都的、意大利半岛的、商业殖民或者应兵役要求到国外的——心中的声望。现在再也不会有人问“谁是屋大维？”了。对此安东尼焦虑不已。

他一方面命继任大祭司的雷必达停止为屋大维办理养子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再度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来往。鉴于西塞罗的《书信集》中并无相关内容，大概可以推测出他并没有参与此事。然而从布鲁图并未对安东尼授意下的元老院决策感到惊异这一表现，我们推测应该是在此之前他与安东尼就已有来往。或许促成来往的中间人，正是与恺撒派过从甚密的塞维利娅。

Julius月的次月，即8月初，元老院会议以大多数赞同票迅速地通过

了执政官安东尼的议案。该项议案表面上是关于现任执政官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于次年，即公元前43年，完成执政官任期后的任职地，实际上其核心是该议案的附带内容——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处置办法。

一、执政官安东尼在完成任期后，将于公元前43年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任期5年。多拉贝拉同样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任期5年。

二、安东尼任执政官期间，马其顿行省的总督一职由马库斯·布鲁图出任，任期至公元前44年末。恺撒为远征帕提亚在希腊阿波罗尼亚集结的军队将不日召回，不归布鲁图管辖。同时身为马其顿总督的布鲁图不能自主召集军队。恺撒生前指派的叙利亚总督多拉贝拉已任执政官，因此该职位由卡西乌斯补任。

尽管屋大维声望如日中天，但18岁的他仍无法在元老院占一席之地。恺撒遇害后，身任执政官的安东尼因握有元老院会议召集权成为了元老院执牛耳者。尽管之前他声称继承恺撒政治遗愿，此番议案却明确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倒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即使屋大维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大概也不会对安东尼的议案提出任何反驳。因为他是个懂得绕道而行的人，在该伪装的场合他会毫不犹豫。

在恺撒遇害后的第五个月，元老院通过的安东尼议案中包括了以下两项内容：

一、与差两个月才满19岁的屋大维相比，年届38岁的安东尼首次公开表明要成为恺撒继承人的态度。

如前所述，由于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意大利北部行省全体公民，都被恺撒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该地实际上已与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本土融为一体了。继续保持其行省性质，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北部敌人，另一方面是用该地驻兵保卫罗马本土。

然而恺撒遇刺后，高卢和日耳曼都遣来使节吊唁，北意大利行省存在的第一个理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但第二个理由依然很充分。安东尼打算卸任执政官后，从较易渡过的卢比孔河以北，以军事控制罗马本土。这才是他接任德奇姆斯·布鲁图出任总督并任期5年的真正用意，以达到在近处以武力胁迫罗马本土的目的。至此安东尼的目的不言而明。

二、安东尼议案中另一项内容，是关于“特赦”的。

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任期到公元前44年末为止，那么从该项任命起始日算起也不过只能持续4个月时间。但是他两人便可据此名正言顺出境，而免于被流放的命运。让两人以公职人员身份因公出境，正是该议案的目的。不同于杀人犯的获罪流放，而让两人保全了梦寐以求的“在不伤及名誉的情况下逃往国外”的愿望。对安东尼来说，此刻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刺杀后一心逃往国外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而是留在罗马的屋大维。因此给这两人“特赦”正好可以获得以西塞罗为首的刺杀派的选票，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

布鲁图、卡西乌斯、西塞罗都察觉到了安东尼的用意。如果协助安东尼，意味着这些原本为恢复共和政体不惜刺杀专制君主的人们，现在要成为另一位君主上位的帮凶。然而诚如西塞罗所言：“保证共和制旗手马库斯·布鲁图的人身安全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已顾不了这么多，甚至打算抛弃另一位同志德奇姆斯·布鲁图。

据恺撒遇害后召开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决议，德奇姆斯·布鲁图将于次年的公元前43年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但安东尼议案不仅剥夺了正前往任地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的任职资格，甚至也没有为他安排其他职位。这无异于将其置于危险境地。原为军团长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常年在恺撒麾下效力，颇受恺撒赏识。恺撒生前所立遗嘱指定他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备受恺撒青睐的人，首先举剑刺向了恺撒。正因如此，恺撒军中精锐和普通百姓对他的憎恨来得更为强烈。此时若失去拥有军队指挥权的行省总督一职，又没有其余公职在身的话，

德奇姆斯·布鲁图就再无抵御公众愤怒和复仇的盾牌了。西塞罗、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明知如此，却也对安东尼的议案毫无异议。西塞罗更是在元老院会议中给该议案投了赞同票，这明显是打算见死不救了。

安东尼的计划相当完美。首先按照元老院会议之前通过的决议，多拉贝拉在执政官期满后将于公元前44年末起，出任叙利亚总督。而在多拉贝拉仍为执政官的这个空当，即当下至公元前44年末，则提议由卡西乌斯出任叙利亚总督。另一方面提议马库斯·布鲁图出任马其顿总督至公元前44年末，却没有安排他的继任者。这样即可以让布鲁图以正当理由走出国门，又给元老院中以西塞罗为首的布鲁图支持者们留有希望。因为他们本以为能保全布鲁图的性命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自己还有继续参政的可能。安东尼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给反恺撒派以希望，从而控制他们。

8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分别前往马其顿、叙利亚赴任。身负公职的他们，终于可以在白天堂堂正正地出发了。那些在“3月15日”高举白刃、刺杀暴君、高喊自由的人们，或许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海外逃亡吧。

尽管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西塞罗一再斥责此“以为杀掉专制君主就是打到专制政治”的两个人“幼稚至极”，但他不得不将再度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临别前，这位62岁智者的一番慷慨激昂，让共和主义者们无不闻之动容：“过去共和政治的精神在罗马，从今日起共和政治的精神在你们到达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西塞罗对自身的影响力充满自信。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平安地送走后，更是增添了他的勇气。西塞罗此刻坚信，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离开罗马后，历史的重任就只能落在他一人肩头——以舆论为器，再兴共和。

弹劾安东尼

从公元前44年9月起，西塞罗陆续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反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philippic）之辩》，共计14次。西塞罗将演讲标题解释为“弹劾菲利普”，从标题看，西塞罗的目的不言而喻。

相传希腊步入衰退期时，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曾试图一统希腊城邦。德摩斯梯尼为此特别以“腓力比克”为题，发表著名的反菲利普演说。他向雅典市民呼吁，自由才是公民应当守护的最高价值。因此罗马人只要一听到“腓力比克”这个标题，大略就明白西塞罗演讲的内容所指。这也正是西塞罗的高明之处。

然而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攻击性演说，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西塞罗本以为，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听完演说后，“西塞罗所言极是”、“罗马绝不允许个人独裁”、“恢复共和，流放安东尼”、“迎接布鲁图”的呼声会此起彼伏；元老院也将顺应民情重新制定政策。然而在他的演说结束后，想象中的情景终未出现。不过他也并非一无所获。自“3月15日”后目睹安东尼专横的元老院议员们——即西塞罗口中的“保守派”——开始远离安东尼。所谓“保守派”，大都是拥立屋大维的原恺撒派。

为什么西塞罗只针对安东尼，而没有连带上恺撒的指定继承人屋大维？是否在他眼中屋大维不是再兴共和的障碍？西塞罗在演讲中极尽能事攻击安东尼的品行：指责安东尼虽孔武有力，却只有匹夫之勇；揭露安东尼沉溺酒色，除嗓门高之外一无是处；是个角斗士一样的普通男人。这种对品行不端的攻击正是西塞罗的特长。只是他将所有的指责都集中在安东尼一人；他不仅不攻击屋大维，反而大加赞扬。他的目的是想让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嫌隙更深一层。待屋大维看穿安东尼的真面目，不再期待与之进行谈判时，便会转而投入到“仲父”阵营中——这才是西塞罗希望看到的。

屋大维在回国后的4个月里，着实巩固了自己的基础。他周围除了忠心的旧恺撒派外，还聚拢了不少原恺撒军中的精锐士兵。西塞罗以为只要拉拢了屋大维，那么布鲁图回国就指日可待。

这位62岁的罗马智者，仍然保留着对屋大维的最初印象，以为仍是当年那个“孩子”。他认为这位近19岁的“孩子”所希望的，不过是继承尤里乌斯·恺撒家族的遗产，并非恺撒的政治抱负，因此无须太过高看他。

进入10月，“3月15日”以来一直胶着的局势终于发生了改变。恺撒生前为远征帕提亚集结的军队从希腊回国了。为了尽早将这支军队收为己用，安东尼率先赶到了军队登陆的布林迪西港口。

当初安东尼没有把恺撒金库交给屋大维，为的就是这一天。他希望用金钱收买这支部队。然而军队中过半的士兵们都拒绝接受安东尼指挥，表示愿坚定地跟随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对安东尼来说，这个打击远比西塞罗的弹劾演说要巨大得多。慌张的安东尼心生一计，以执政官身份命北意大利总督德奇姆斯·布鲁图立即卸任，以便亲自掌控北意大利的军队和屋大维对抗。

德奇姆斯·布鲁图深知自己是恺撒派复仇的对象，如果没有军队的话就意味着任人宰割，因此他拒不服从安东尼的命令。奈何北意大利军队对安东尼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安东尼决定不惜以武力夺取北意大利。他没有返回首都，而是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向北意大利急行，途中他以高额赏金征集了不少军队。然而到了北意大利与罗马交界的卢比孔河，之前征集的士兵们大多改换门庭，直奔屋大维而去。

仅尤里乌斯·恺撒之名，就已远胜1亿塞斯特斯的效力。深知这一点的恺撒固然值得敬佩，年仅18岁的屋大维能理解恺撒的深意更不简单。大概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薪火传承吧。

对于急转直下的局势，西塞罗比谁都更为关注。且不论之前的见死不救，现在西塞罗认为救德奇姆斯·布鲁图的绝佳机会来了。安东尼围攻摩德纳城中德奇姆斯·布鲁图的战斗已经打响，救布鲁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2月20日，西塞罗在当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第三次《腓力比克之辩》，其内容如下：

一、赞扬屋大维从安东尼的暴政中解救了首都罗马。

二、指出支援被安东尼围攻的德奇姆斯·布鲁图乃当务之急。

三、强调安东尼才应该是罗马军队的攻击目标。

公元前44年，刺杀者们历经了成功刺杀恺撒的激动时刻、刺杀后的消极直至绝望逃亡阶段，到公元前43年，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扭转命运的曙光。

西塞罗演讲结束的20天后，公元前43年1月1日，执政官依律进行换届。按照恺撒生前指定，由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人出任当年执政官。这两人都曾是恺撒的亲信，一直忠心耿耿，在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斗争中显然也都支持屋大维。西塞罗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他与身处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身在叙利亚的卡西乌斯之间的通信猛增，同时他也不忘给在北意大利与安东尼对决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写鼓励信。

当原本与自己亲厚的两人出任执政官后，西塞罗似乎有些激动得忘形了。他接连恳请元老院通过以下两个议案：

一、授予屋大维正式地位。

二、对安东尼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并宣布其为国家公敌。

尽管众人对安东尼专横行事感到不满，但上述两件都并非小事，元老院最终没有通过西塞罗的议案。一方面毕竟屋大维只有19岁，正式执政太过年轻；另一方面，非常态的“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非法性一直被恺撒所诟病，因此也不是轻易就能启用的。元老院最终决定派使者前往安东尼处，表达完希望其回头的意愿就散会了。此时屋大维认为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募集资金，组建军队。

公元前43年3月，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离开罗马，前往安东尼与德奇姆斯·布鲁图交战的摩德纳。摩德纳是北意大利行省的主大道艾米利亚大道沿线的重要城市，可直达里米尼和皮亚琴察。此行的目的是以武力逼迫安东尼屈服，与两位执政官同行的正是屋大维。这一次屋大维并非以个人身份随军，而是正式率领军队参战。此次行动除了两位执政官同意，连西塞罗也极为赞成。因为西塞罗非常希望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三人可以击退围困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安东尼，将德奇姆斯救回。

4月，腹背受敌的安东尼不得不解除对德奇姆斯的包围，之后他在与两位执政官及屋大维的联合阵线对阵中败北，迅速向西撤退。此番战斗中，两位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皆战死沙场。他们手下的士兵们拒绝接受曾经杀害恺撒的德奇姆斯指挥，纷纷投到屋大维帐下。

绝望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打算投奔远在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然而在途中被沿途的高卢居民抓获。安东尼得知此消息，毫不犹豫地下令斩杀德奇姆斯。

在此之前，前往叙利亚的多拉贝拉也杀掉了托雷波尼乌斯。恺撒亲信的四位军团长中，有两位提剑刺向了恺撒，而最后却死在另两位的剑下。血债血偿拉开了帷幕。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的首级被送到罗马，置于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

复仇以恺撒生前最不愿看到的方式正式开始。

复仇

首次握有兵力并独立指挥战争的屋大维，并没有听从西塞罗乘胜追击的建议，而是率领军队返回罗马。

面对军权在握的屋大维，元老院并无能力与之抗衡。于是在两位执政官皆战死的情况下，很快元老院就同意屋大维出任候补执政官。

西塞罗对19岁担任执政官这等前无古人之事感到为难，但他仍认为自己能操控住这个“孩子”，因此也并没有强烈反对。

8月，屋大维获得公民大会压倒性的投票优势正式出任执政官。同时由恺撒的外甥佩提乌斯补上另一执政官之空缺。此时屋大维距法定任职年龄——21岁——还差两年。

就任后19岁的屋大维做的第一件事，是履行成为恺撒养子的公证程序——因为在此之前该程序一直遭到安东尼的阻挠。在公民大会毫无异义地全票通过后，屋大维开始正式启用“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这个名称。民众及元老院众议员也开始以“恺撒”代称屋大维。

19岁的“恺撒”做的第二件事，是促成另一位执政官佩提乌斯提出《佩提乌斯法》的出台。这个法案给了远在别墅的西塞罗当头一棒。

依据该法案，那些背弃誓言杀害恺撒的人全被判定有罪，并被处以流放。正式成为恺撒之子的屋大维，好像向恺撒派全员吹响了进攻号角，告诉他们“复仇的时机到了！”

接着，屋大维以执政官身份率领着实力已大增的11个军团，奔赴北

意大利行省。

此时此刻，19岁的屋大维仍“情真意切”地给西塞罗写信并不倦地向这位63岁的智者讨教，而西塞罗仍对年轻的执政官抱有一丝希望。真不知是该叹息西塞罗的愚善，还是该佩服屋大维的伪善。西塞罗仍希望北去的屋大维能够和安东尼决一雌雄并战胜而归。毕竟和安东尼的狙杀政策相比，《佩提乌斯法》规定的流放处罚还是要好得多。

虽然屋大维为了吹响复仇号角已苦苦等待了一年多，但他并没有与安东尼对决的打算，毕竟此刻自身实力还远逊于安东尼。

就在屋大维进行成为恺撒养子的公正程序并努力谋求执政官职位时，从摩德纳战败的安东尼正在筹划与高卢、西班牙行省总督组成联合阵线。此时雷必达、普兰库斯、帕里奥等已升为行省总督的原恺撒军团长们，率领着各自部下前往北意大利与屋大维会合。

公元前43年11月，恺撒派们再度于北意大利行省内的博洛尼亚城聚首。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三人结成同盟，史称“后三头政治”（或“后三头同盟”）。孤注一掷信任屋大维的西塞罗，此刻彻底绝望了。

“后三头”率领部队，从博洛尼亚返回罗马。11月27日，公民大会承认“后三头同盟”为国家危机管理体制，以5年为限。

“后三头政治”

历史上由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组成的“前三头政治”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公认体制，而“后三头政治”却作为正式的同盟形态得到了公开承认。西塞罗的毕生理想，布鲁图等刺杀者强行守护的元老院共和政体——罗马特色的寡头政治——到此灰飞烟灭。

此外，“后三头政治”的形成，也让39岁的安东尼不得不隐藏起想成为恺撒接班人的野心。

不知道安东尼还记不记得，“前三头政治”同盟时“三头”里力量最弱小的恺撒后来居上，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而此刻在“后三头政治”同盟里，尽管19岁年轻人手中的势力已极大加强，让人无法轻视，但无论年龄还是履历，屋大维的情况都和当年的恺撒颇为相似——年轻且无政绩。“后三头”中安东尼在年龄和政绩上都居首位。雷必达性格温厚颇似当年“前三头”里的克拉苏，事实上他也是因为曾任恺撒左右手才成为“三头”中一员的。安东尼是否考虑过这些特性？还是像恺撒生前的名言一样，他属于“只想看见自己想看的现实”那一类人呢？“后三头政治”同盟成立后，安东尼有句话常不离口：“屋大维有实力？那不过是蒙恺撒庇佑而已。”

“后三头政治”同盟成立后，首先作出如下决定：

一、制定“黑名单”，消灭反对势力。

二、安东尼与屋大维合力，共同对付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同时，雷必达留守本国，守护大本营。

或许恺撒对敌宽容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抛诸脑后，然而安东尼和屋大维，毕竟不是恺撒，他们只代表自己。恺撒生前曾极力反对的、臭名远扬的苏拉式恐怖政治复活了。制作名单时，屋大维比任何人都更冷酷无情。“复仇”取代了“宽容”。

名单中牵涉了300名元老院议员和2000名左右的“骑士阶级”人士。其中，有130人被定为国家公敌，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处死。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庞培支持者，后来在恺撒的宽容下继续保持元老院议席的议员。这130人中，直接参与刺杀行动的确有其人，但更多人与刺杀毫无关系，刺杀发生后也并未秘密支援刺杀者。因此“后三头同盟”实际

上是效仿苏拉，在对反对势力斩草除根上如出一辙。

“后三头”制作黑名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筹措资金，因此黑名单中的2000名有经济实力的人士，被没收全部财产。西塞罗的好友，著名的富翁阿提库斯就因曾支援过布鲁图而位列黑名单中，差点被处罚。因他长年担任安东尼之妻富尔维娅的经济顾问，后来安东尼看妻子的面子，将他除名。

此外，西塞罗因曾大肆发表弹劾安东尼的演说而位列黑名单榜首。口口声声称“仲父”、经常写信求教于他的屋大维此时也表现得异常冷漠，非但没有试图救他，而且对安东尼的提议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西塞罗的罪名是“刺杀恺撒行动的思想指导”。如果翻阅刺杀恺撒时期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之间的频繁通信，这个罪名也不是毫无理由的。然而对思想的处罚并不属于刑法的问题。但实际上“后三头”提出黑名单，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强力扫除反对势力。因此西塞罗的问题并不属于刑事范围，而属政治斗争范畴。

公元前43年冬，整肃风暴席卷了罗马及整个意大利半岛。苏拉当年采用的给予告密者奖赏的制度重新被启用，意大利陷入了血雨腥风中，宛如40年前苏拉的白色政治再现。一旦被列入名单，就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即使名单人员家族中的妇女、儿童也会被严刑拷打，要求供出其夫或者其父隐姓埋名的地点。那被定为死刑的130人，一旦落网首级即刻被割下然后送往罗马，连押运的过程和麻烦都省了。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摆满了首级，与苏拉时代并无二致。

“后三头”对黑名单上的人物一律从严处理，甚至到了“大义灭亲”的程度。“三头”中雷必达的亲弟弟巴鲁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安东尼的亲舅舅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都被定为死刑且行刑过程严苛。

自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罗马内战爆发以来，罗马人分成了两派——恺撒派与庞培派。大多数家族内部也因支持不同的领袖而发生了分裂。

毕竟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并不仅是一家一族的冲突，而是关系到国家整体的政治斗争。一家一族之内的骨肉亲人间自然也会因各自不同的政见而爆发冲突。内战结束后，家族内部血亲也因政治阵营分为胜者和败者。

恺撒对失败阵营人士采取了宽容政策，一方面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处理好败方心中的怨愤，对整个国家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因为他宽容的性格，他根本不愿看到这样互相怨恨的悲惨局面出现。或许恺撒心中的理想罗马，应该是个既无成王也无败寇的世界。

然而恺撒的继任者们，却因亲历了恺撒遇害事件，而对“宽容”不放心。他们认为如果不将败方们斩草除根，便永无宁日。不过也有一些旧庞培派，因被恺撒生前委以重任，而免于受苦。大文豪特伦提乌斯·瓦罗便是其中一位。恺撒敬重其文学造诣，任命他为罗马首任国家图书馆的选书人。而且这位瓦罗和西塞罗不同，他在得到恺撒赦免后就远离了政坛。

西塞罗之死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后三头”首次公布黑名单。不过这份名单上并没有详细列出2300人的姓名，而是公布了16位要犯。这16人包括了直接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等14人和西塞罗两兄弟，并且西塞罗之名赫然列在榜首。

当时西塞罗已经对安东尼和屋大维联手的罗马政治不再抱希望，离开首都，在名下的8处别墅中轮住。同时他还念念不忘远在希腊的布鲁图等人的安危，不断打听他们的行踪。黑名单公布时，西塞罗还待在三面临海的阿斯托拉别墅中。知道自己名列名单之首后，西塞罗最初打算乘船逃往希腊。彼时彼刻，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或许还能逃离意大利，然而西塞罗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西塞罗优柔

寡断的性格造成的悲剧，笔者对此倒不赞同。无法抛弃亲弟弟昆图斯而独自逃生是西塞罗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昆图斯一直和兄长西塞罗生活在西塞罗的别墅中，不久前因取必需品而回到罗马近旁的图斯库罗姆别墅。曾经在恺撒麾下参与高卢战役的昆图斯，此番被列入黑名单的死刑部分中，只因其兄长西塞罗是头号要犯。因此西塞罗肯定不能抛下弟弟独自逃走。

另一个原因，是西塞罗也无意求生。曾经无比热爱写作的西塞罗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再也没有拿起笔。大概他觉得生无可恋甘愿听天由命，再也不愿在波涛中逃避了吧。

得知搜查队逼近后，西塞罗从容应对死亡。他并未作出任何反抗，面对奴隶们自发成立的保护组织，他也只说：“勿行无用之事。”

搜查队奉安东尼之命，不仅割下西塞罗首级，还砍下他的右手一并带回罗马广场示众。显然安东尼对于西塞罗曾经撰写《腓力比克之辩》一事无法释怀。

从无比欢欣地看着恺撒遇害，到西塞罗自己举身赴黄泉，不过1年零9个月。公元前43年12月7日，西塞罗被杀，享年63岁。

50年后，帕拉蒂尼山的皇宫内，皇孙们正聚在一起阅读西塞罗的名著时，年迈的帝王步入殿内。孩子们知道皇祖父与西塞罗被杀的过程，都因害怕遭受训斥而紧张不已。

然而青春不再的帝王屋大维拿过孙儿们手中读物，伫立默读片刻后返还给孙儿们说：“西塞罗是位智者，学识渊博且深爱国家。”

此时的屋大维是不是回忆起那段被称为“孩子”而不愤的岁月呢？已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此时看到的大概是西塞罗的这篇著作：

人世诸爱种种，至高至喜之爱当属爱国。世人皆知爱父母，世人亦知爱子女、兄弟、友人、爱人。然诸爱种种都包含在爱国之内。若国有难，若国有需，诸民定当赴汤蹈火，为国捐躯。

——《论义务》

《论义务》是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充满了爱国之情、忧国之意，深深地打动着读者。这篇文章的论调其实和恺撒的主张是一致的，如果作者换成恺撒或许也不会有人发觉。那西塞罗为何还要继续反对恺撒呢？

或许这是因为二者对“祖国”的概念理解各异吧。

西塞罗心中的理想国是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那是一个由本国出生的罗马精英——元老院阶级——主导并统治的国家。当时北部的卢比孔河、南部的墨西拿海峡是罗马本土与行省的分界，本土版图内才是西塞罗认可的“祖国”。

而恺撒心中之“祖国”是无边界之国。他并不赞成由罗马本土出生的元老院阶级担任国家专政的统治者。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改革，选用被征服民族的代表进入元老院议席，引起纯正血统论者西塞罗和布鲁图的反对。他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希腊人都可任用。恺撒的“祖国”是罗马文明统治下的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帝国。

有人说，公元前1世纪的顶级智者分别是西塞罗和恺撒，笔者深表赞同。然而这两位生于同时代的亲密友人之间却无法相互理解。

或者应该这么说，恺撒是理解西塞罗的。尽管对“国家”的观点不同，恺撒仍能体会并尊重西塞罗深切的“爱国心”。每当西塞罗陷入危机，恺撒总是尽力出手救助，并不断地希望西塞罗能理解并支持自己的

大业。然而西塞罗却无法理解恺撒。

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并不待见实力日渐增强的安东尼，他曾数度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批评安东尼的处事：“若是恺撒，一定能处理得更好。”西塞罗这么评价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理解恺撒，而是因为他对安东尼的态度不满。恺撒在世时总是受到尊重的西塞罗，到安东尼手上却经常被无视。西塞罗文笔卓越，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其文仍旧是拉丁语的范文和标杆。然而这位文采斐然、洞悉世事的西塞罗，却缺乏先见之明。他对“祖国”概念的理解，就充分反映出他的缺陷。

“神君恺撒”（Divus Caesar）

西塞罗死后，公元前42年罗马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

古罗马的1月1日，既不是祭祀日，也不是公休日，而是一年工作的开端。那一年的1月1日，元老院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称为“神”。恺撒正式成为神族一员。

这个决议造就了后世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此前后世的研究者们对恺撒的评价一直相当高，然而多数人受到基督教一神教的教义束缚，在如何继续评价恺撒这个问题上显得很无措。甚至写下了“明君恺撒怎么能成为神呢？”这样的疑惑。和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学者们不同，笔者自小就生在一个信奉八百万众神明的国度，对此问题也持不同态度。在日本，出于尊崇或出于敬畏，菅原道真、明治天皇或其他历史人物，都被奉为神明，因此日本是一个有八百万神明的国家。当时的罗马人虽然没有供奉八百万神明这么多，但也盛行敬拜多神。比如，征服叙利亚后，叙利亚的诸位神明就在罗马人中间站稳了脚跟；恺撒带克娄巴特拉回国后，埃及诸神的信徒也开始出现在罗马。

事实上，除开国君王罗穆路斯外，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被尊为

神的帝王。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获埃及神官告知，其父乃天神并非凡人，因此且惊且喜的亚历山大大帝才在远征印度时表现得更为英勇无惧。这就是古代多神教的世界。虚荣心胜过常人的恺撒如果知道自己被封神，大概一点不会不快吧。或许他会开颜畅怀地与众人玩笑说："与我爱恋过的女子以后可以说她们曾和神恋爱过了。"

但是恺撒被神化，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才能非凡的屋大维没有具备恺撒的幽默感，因此为了捍卫恺撒神一般的形象，他只保留了恺撒的巅峰作品《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而将其余作品全部付之一炬。恺撒年轻时创作的诗歌、戏剧、大多数的书信以及情书等永远消失在历史烟尘中。

从希腊神话里可以看出，多神教的众神其实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缺点，譬如爱恋，譬如偷情，均毫不掩饰。话虽如此，但如果一位上神留下众多情书，这让后世情何以堪。或许是考虑到这点，除《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以外的恺撒著作，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等人的转引中找到蛛丝马迹。显然，要成为上神，麻烦总是和荣誉一起到来。

与屋大维的反应相对，普通罗马人倒是大方地接受恺撒封神一事。对"称帝"异常反感的罗马人对"封神"却不反对，足见罗马是个多神教的国家。在老百姓看来，既然开国者罗穆路斯能够成神，那么恺撒作为罗马盛世之主，被封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在罗马，神作为守护众生的无上力量，自是多多益善。

随着恺撒被封神，其继子屋大维自然成为了"神之子"，罗马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曾经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号称是"神之子"。

在公元前42年这个时间节点，提出将恺撒神格化的议案，是屋大维等人精心筹划的重要政治部署。20岁的屋大维已经决定借此在公元前42年内完成复仇大计，一举歼灭正在希腊整兵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屋大维深知目前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该目标，必须要得到武将出身的安东

尼的配合。然而彼时安东尼正全身心谋划扩大自己实力，实际上并无为恺撒复仇之意。因此只有找到大义凛然的理由，才能逼迫安东尼出战。将恺撒神格化，就是最合适的理由。

杀害已经成为罗马人守护神的恺撒，犯了罗马人的大忌。刺杀者自然成为了罗马人的公敌。恺撒升格为神，为神复仇的理由使得安东尼和屋大维结成了最坚实的统一战线。该年夏天，两人率19个军团齐动，渡过亚得里亚海。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战场，效仿当年恺撒与庞培的对决，选定在希腊某个地方。

出发前，20岁的年轻首领宣誓将在斩杀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后建立神庙，用于供奉“复仇之神”。而当年恺撒战后建立的，却是“宽容之神”神庙。

布鲁图之死

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没有白白浪费两年时光，他们作好了迎接复仇的准备。首先他们在各自的行省——布鲁图在希腊、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加强军备。卡西乌斯甚至杀掉安东尼议案中指派的叙利亚总督多拉贝拉以血祭旗。同时他们加强各自行省的赋税，从希腊到东方的罗马行省居民都负担了沉重的课税。

某地域的统治者在增强军备的同时，通常不会不顾一切地搜刮民脂民膏，怕引发众怒揭竿而起。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此时不得不为之，以备迎战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复仇联盟。在一系列准备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共集结了含2万骑兵在内的10万大军。安东尼和屋大维联盟则率领了含1.3万骑兵在内的12万大军汹汹进攻。攻守双方的兵力是当年恺撒和庞培在法萨卢斯会战时的2倍多。战斗在希腊北部的腓立比进行。该城位于横贯希腊东西的交通要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沿路的广阔平原上。这座

由亚历山大大帝父亲菲利普斯建立的城池，因此次战役名垂青史。

马库斯·布鲁图的侧脸（刺杀恺撒不久逃往希腊后铸造，约前43—前42年）

秋天在腓立比平原上进行的战争，尽管参战人数达到20万之众，却在战略、战术上毫无建树。其原因如下：

首要原因是没有统一战略。一山不容二虎，无论是安东尼还是屋大维都不甘心屈居军中副手，都各自率领军队积极进攻。同时守方的布鲁

图和卡西乌斯也各自为政。因此战争初期，出现了安东尼对阵卡西乌斯、屋大维对阵布鲁图的局面。

其次，四位主帅中最具武将才能的安东尼和卡西乌斯也不过尔尔。这两位都只是军中军团长级别的人物，并不具备总司令的能力，因此在腓立比会战中表现平平。

与当年恺撒和庞培的法萨卢斯会战相比，两次战役的总司令水平并不在一个等级上。尽管腓立比会战拥有大量骑兵——1.3万对阵2万——然而却没有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战斗力。因此，腓立比会战仅仅只是“量”的战斗。

再次，尽管敌对双方的领袖——屋大维和布鲁图——都没有担任总司令的经验，然而由于屋大维抱病在床，其军队在布鲁图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位总司令天生消化器官娇弱，后来常出现腹痛到无法下床的情形。这也是他被安东尼蔑视的原因之一。不过恺撒在指定他为继承人时肯定知道这点，因为当年屋大维随恺撒出征西班牙的孟达会战时，也经常“抱恙”。腓立比战役对屋大维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在关键时刻病倒确实不走运。并且恺撒亲自为屋大维挑选的武将阿格里帕尽管尽心尽力，却也因临战经验不足未能发挥充分。

综上因素，腓立比战役前期屋大维被布鲁图击退，安东尼击败卡西乌斯。因失败而绝望的卡西乌斯不久自裁，终年43岁。

战争后期的前20天里，布鲁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将老战友卡西乌斯遗体焚化后，便一步也没有离开卡西乌斯营帐。屋大维借此机会重整大军，安东尼也进一步扩大了兵力。

笔者推测，或许布鲁图在迎击屋大维和安东尼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欲望，甚至已经丧失了生存意志。因为那段时间噩耗充斥着他的脑海。

布鲁图发行的《刺杀恺撒》纪念银币 （前43—前42年左右）

首先是托雷波尼乌斯被处决，接着是德奇姆斯·布鲁图。屋大维和安东尼结成同盟后，绝望的妻子波西娅吞火炭而亡。直至西塞罗被处决，宣告布鲁图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再也得不到支援。此时最后一位朋友卡西乌斯也自杀身亡。

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描述布鲁图此刻眼前出现了恺撒魂灵。或许他真正看见的不是恺撒，而是他自己心中的苦闷吧。因为在莎翁笔下另一部戏剧《哈姆雷特》中，当已故国王魂灵显现时，除王子外，其余近卫也看得一清二楚。而此刻只有布鲁图一人看见了恺撒魂灵，不得不说是他内心作祟。此外，以恺撒生前宽容的性格，即便死后也不可能化身怨气的鬼魂出现。不论被恶灵缠身是真是假，布鲁图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显然早已自暴自弃。

腓立比战役后期，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合军队获得最终胜利，布鲁图则拒绝部下逃命的建议选择了自杀，终年43岁。

两位敌将（屋大维和安东尼）按照罗马传统火葬了布鲁图，并将骨灰送至其母塞维利娅处。顺带介绍一下，塞维利娅并没卷进“后三头”掀起的整肃运动，而是在恺撒赠与的那不勒色近郊别墅中安度了晚年。屋大维和安东尼对恺撒一生挚爱还是非常尊重的，即便那人是他们头号政敌的母亲。最后布鲁图葬于何处，至今再无人知晓。

这里想介绍布鲁图写给西塞罗的一封亲笔信，因为这是目前在布鲁图遗物中，最能展示他真性情的物件。

相较于恺撒动辄两三行，最长也不过半页的写信习惯，布鲁图倒非常善于写长信。即将介绍的这封信就长达6页。不过信中布鲁图多次重复同一内容，若照信全译虽有助于理解他的性格，但无论译者还是读者大概都会不胜其烦。因此信中雷同内容笔者在此均用“……”代替。

该信写成于公元前43年5月，彼时正值西塞罗自以为能操控屋大维，因此要求屋大维饶恕布鲁图并允许其回国。正在希腊的马其顿加强军备的布鲁图，得知消息后立刻写信给罗马的西塞罗表示抗议。

致西塞罗：

从阿提库斯送来的手抄信副本中，我也得知了您写给屋大维的建议。对于您的帮助和关心，我不胜感激。本国来的信中都充满了身处国内的您每时每刻对我的关心、担忧，我也知道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然而您给屋大维的建议，却让我无比为难。我明白，您为了换得我的安全不惜向那个年轻人卑躬屈膝，但我能做到不顾共和国之名向他表示感激吗？我也明白，您将我的安全托付给了他，但我认为若如此苟延残喘，毋宁死。难道我们刺杀恺撒不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度，而是为了让另一个人登上君王宝座吗？

您对他说话的言辞，极像臣子对君王的语气。同为争取自由的人，为什么要为了达成某些愿望而这样低声下气？为守护自由而手染鲜血的我们，生命却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倘若那个年轻人无维护的意愿，那我们就已失去存活的权利了吗？我向往活着，但若如此活着，倒真是生不如死。我们曾对着朱庇特神宣誓，我们曾将世界人民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因此我也坚信我们应当受到罗马人民的感激，而大可不必为了活命卑躬屈膝。……

西塞罗，据悉您如今是屋大维最信赖的顾问，而您最关心的则是我的人身安全。那么我是否也该将自身安全寄望于那个“孩子”的温情呢？

若如此，为什么不寄望于安东尼？反正都是忍辱偷生，反正都是寄希望于“温情”，为什么只能选择屋大维而不选择安东尼呢？在专制独裁问题上，他们并无二致啊。

是的，就是这个专制。正是因为向往专制，恺撒才会有登王位称帝的野心。正是因为向往专制，安东尼才一心一意想成为恺撒的继承人。而如今的罗马，正将那个年龄上尚不足以成为“男人”的“孩子”推上君主专制的宝座。

遗憾的是，这拥立中还有您的一份“功劳”。出于对安东尼的

憎恨，您大力扶助屋大维。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憎恨专制的人，而拥立专制君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既如此，杀死恺撒就已毫无意义可言。……恺撒在世时我们是他的奴隶，难道恺撒死后我们还要继续做他的奴隶吗？我们能反对恺撒所行之事，却不能反对恺撒继任者所行之事吗？……

在我看来，恺撒生前的西塞罗远比现在更忠于自己。倘若继续抱着对人类奴性和卑劣性的厌恶，无论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也不会为流亡的命运感到悲哀。正因如此，若必须对使人产生奴性的专制主义者屈服才能回到罗马，我宁愿选择继续流亡。……因为凡得自由之地，皆是我心中之罗马。……

曾正义凛然弹劾安东尼（《腓力比克之辩》）的西塞罗，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守护人。如今屈从于一个专制主义者的西塞罗，到此已功过相抵。不但已失去了死后的荣光，也伤害了他引以自傲的尊严。

西塞罗啊，没有人能比您更爱罗马，也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罗马的根基——自由——的守护者。因此我恳求您，不要再为我向屋大维屈服。与其让您为此努力，我更希望能看到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西塞罗。我也祈祷：总有一天，那座城市（罗马）可以成为您对祖国贡献的证人，恢复它以自由为傲的荣光；总有一天，市民们会团结一致反对专制主义者，众志成城。

写下这封信的四个月后，马库斯·布鲁图兵败，自刎于腓立比草原。

尽管刺杀恺撒的真正首犯是卡西乌斯而非布鲁图，但刺杀集团是在布鲁图领导下才正式发挥作用。尽管也有人批评布鲁图走错了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图身上仍具有高洁的品格。

然而和西塞罗虽智慧却缺乏预见能力类似，布鲁图的高洁精神也未能给罗马人指出正确的前进道路。在意大利现行的大学历史教材中也是

这么评价的：“‘3·15事件’是怀旧主义者们自我陶醉式的、弊大于利的悲剧。”

“3月15日”不仅是恺撒的悲剧，也是布鲁图的悲剧。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高尚精神不为时代所容，而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

罗马帝国崩溃的1500年后，当意大利人重建城市国家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给予了布鲁图很高的评价。《恺撒大帝》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出自英国人莎士比亚之手。

第三章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结盟对付屋大维

（前42—前30年）

罗马内战以布鲁图之死为分界线。此前的内战属于政治思想斗争，围绕罗马采用何种政体——是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此后的内战变成权力斗争——前期政治斗争胜利的君主专制派内部为争夺帝王宝座展开的斗争。

不过安东尼和屋大维随后十几年的争斗，也不完全是露骨的争权夺利。他们争夺的焦点，除了权力之外，更多的是围绕着是否能继承恺撒生前对罗马世界构想而进行的。后者才是政治斗争持续进行的关键。原本无意涉足政治的安东尼突然参与斗争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对恺撒政治的不理解；二是因为克娄巴特拉的政治野心。

若恺撒没有遇害，那么到公元前30年间的这13年的混乱性、破坏性和无序性的杀戮定能得到避免。因此“3·15事件”谋杀的不仅是最高权力者，正如此后变得怯弱的西塞罗所言，这是一场“无果的悲剧”。对谋杀者是如此，对被杀者是如此，对广大的生活在罗马世界的普通人而言也是如此。

拔得头筹的安东尼

在彻底扫清黑名单、赢得腓立比会战的胜利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人在实现为恺撒复仇的同时，也成功地摧毁了共和主义者的根基。腓立比战役结束后，两人立刻将帝国版图一分为二，各掌东西一侧。表面上是因为自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两年的混乱期，因此两人必须分担重建罗马的任务。此时“后三头同盟”虽未解除，但雷必达有名无实。安东尼和屋大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想起雷必达，大多数时候都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安东尼将罗马世界的东半边版图划归自己管理，将西半边丢给屋大维。因为腓立比战役实际上是安东尼的胜利。此时安东尼的野心——成

为恺撒事实上的继承人——再度燃起。对面黄体弱、常卧床不起、年仅21岁的屋大维，安东尼已经不再将他放在眼里。

安东尼选择东半边版图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那边方便远征帕提亚。如果自己能完成恺撒未尽之事业，那么屋大维即使是恺撒养子，也将失去威信。那时整个罗马自然成为自己囊中之物。

将西半边交给屋大维，安东尼自然也有算计。在恺撒遇刺到腓立比会战的两年时间里，孟达会战逃生的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正在西班牙重新组织反对势力。由于庞培当年肃清海盗的影响，沿海的海港城市不仅仍与罗马保持着“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同时也买当年庞培的面子，帮助“庞培二世”建立起了海军。负责整理西半边版图的屋大维自然要与这位敌人正面相逢，安东尼正是要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屋大维。在安东尼看来，对“仅继承恺撒之名”的屋大维而言，要恢复西半边的秩序绝非易事，他打算以此来消耗屋大维的势力。

此外，安东尼选择东半边版图的原因之二，是因为那里雄厚的经济支撑，仅行省税一项，西半边就只能望其项背了。

不过，这个身体羸弱的21岁年轻人，也不是完全被赶到西半边去的。如果有得选的话，或许他还会主动选择西边呢。

公元前1世纪时，虽然罗马西部的经济实力远逊于东部，然而它却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首先，罗马本土就属于西部。这一绝对的优势，安东尼竟然没有注意到。

其次，西部方便集结兵力。因为罗马军团必须由罗马公民组成，故罗马本土所在的意大利半岛，以及被恺撒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行省和法国南部行省等都集中于西部。东部虽然拥有更多行省和同盟国，但

西部拥有更多的罗马公民。

或许安东尼以为只要有钱，招兵就不是问题。因为东部长久以来就有着雇佣兵的传统制度。士兵只为出价更高的人效力已是东部的惯例。

罗马兵制虽已改为自愿制，然而作为军队主力的重装步兵仍必须是罗马公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军队的质量。若东部和西部真正开战，实际上就会成为西部的“质”和东部的“量”之间的对决。这一点安东尼也没有注意到。

不过自腓立比会战胜利后，安东尼俨然成为了众人眼中罗马世界的头号人物。克娄巴特拉和全罗马的人都这么认为。

此时安东尼的年龄也正好处于男性的鼎盛期——40岁，西塞罗曾评价他有着角斗士一般的坚强体魄。他把棘手的西部丢给屋大维，自己则在享受东部富足的同时，等待着屋大维被西部耗尽力量。为了进一步铲除屋大维势力，他开始积极密谋。

当布鲁图的遗体随火焰消失在腓立比平原后，围绕恺撒继承人的斗争才真正拉开了帷幕。安东尼对此志在必得。而对屋大维来说，这是继实现复仇目的后，对他个人能力的第二次试炼。

克娄巴特拉

东部罗马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或国家对安东尼构成障碍。依附得胜者是经济雄厚但军事力量不敌罗马军团的东方诸侯们常用的自保手段。法萨卢斯会战后全部归顺恺撒的东方诸国，在腓立比会战后又都转投到安东尼账下。因此安东尼东进的路途上未遇到丝毫阻碍，顺利到达位于小亚细亚东南的西里西亚行省。安东尼在行省首府塔鲁苏斯休息，并于该地传召了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

对安东尼而言，确保罗马与结盟的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与各国王见面拉近距离是恢复东部罗马秩序的必要手段。长久以来埃及都是罗马的坚实同盟，而此次传召克娄巴特拉却不仅仅是普通的同盟维护。因为克娄巴特拉曾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提供过军事援助，故而安东尼此番传召不仅是为了巩固同盟关系，更打算对克娄巴特拉进行斥责。

克娄巴特拉曾在恺撒生前获邀造访过罗马，彼时与安东尼有过数面之缘。当时克娄巴特拉的身份复杂，不仅是罗马盟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安东尼顶头上司恺撒的情人。如今两人关系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安东尼成为了罗马世界最高权力者，克娄巴特拉则成为了下属。这种改变无疑极大地满足了安东尼的虚荣心。不过从后来的历史看，克娄巴特拉技高一筹，成为了此次见面的真正受益人。

克娄巴特拉在安东尼眼前的亮相，展示了她高超的智慧和手腕。

犹记当年她为了捕获恺撒所使的手段：21岁的妙龄少女藏在裹好的被褥中来到恺撒房内，美女随被褥打开突现眼前。对出身名门的真正贵族恺撒而言，用智慧营造的愉快氛围比财富堆积在眼前更让他终生难忘。

安东尼全名马克·安东尼，从名字上看就知道他出身于平民阶层。不过和克拉苏、庞培一样，安东尼虽出身平民但也很早就成为了元老院阶级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寒门出身的贵族。因此安东尼身上那暴发户似的习性，与其说是其出身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个人兴趣导致的。西塞罗在弹劾演说中，就批评安东尼“贪婪、下流、好女色，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与角斗士并无二致”。安东尼的军事才能足以令其在军队中拥有超高人气，但他不属于能凭借卓尔不群的非凡气质征服大众的类型。

针对安东尼种种特性，27岁的克娄巴特拉的亮相只能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土耳其的地方小城塔鲁苏斯在古代是小亚细亚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位置比现代更靠近海，有河流经市内汇入大海。埃及女王乘坐着象征东方富庶的大舫沿着该河驶入市内。

女王的御用画舫可谓是东方富庶的结晶。该舫周身贴满金色，象征高贵的紫色布制成的大风帆随风鼓胀，闪亮的金色船舷与船夫手中银制的船桨柄交相辉映，合着音乐的节拍轻快地分开河水前行。

画舫中央以纯金丝制成的刺绣帷帐隔开视线。当帷帐左右拉起时，打扮成爱神维纳斯的女王陛下端坐在御座之上，丘比特装扮的女奴们执扇送风，带起女王飘飘衣袂。以那喀索斯及美神装扮的歌伎们，身着如蝉翼般薄衣，萦绕着女王翩翩起舞。一切宛如画中。画舫上飘出若有若无的淡淡香气，直引得围观者凝神驻足。美轮美奂的场景让围观者叹为观止，纷纷传言这是阿芙洛狄忒（维纳斯）来见狄奥尼索斯。不得不称赞，克娄巴特拉为了美好未来赌的这一把，堪称完美。

如果阿波罗代表理性的话，那么狄奥尼索斯代表的则是感性。被比做感性之神狄奥尼索斯的安东尼立刻邀请“女神”共进午餐。“女神”并未回绝反而邀安东尼上船小聚。从安东尼踏上“女神”画舫那一刻起，胜负已分。

克娄巴特拉对安东尼的品性和能力早已了若指掌，同时她也将安东尼和恺撒作过对比。女人一生中总要面对的问题，此刻摆在她的面前。一流的男人绝不会仍由女人摆布，女人能驾驭的只能是二流男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直接决定着女人的生活方式。在才情卓越和任由自己支配之间，克娄巴特拉选择了后者。这也决定了她往后的人生。

最终克娄巴特拉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为了巩固胜利，她邀请安东尼以私人身份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港再聚。安东尼也如约以个人名义而非罗马前执政官的头衔接受了邀请。这一年——公元前41年早秋——41岁的武将投入了28岁女王的怀抱。

待客之道以宾至如归为上，但若一味如此，反让客人失了兴致。若辅以意外之喜，则能事半功倍。

深谙待客之道的克娄巴特拉早已将安东尼的习性和之前的恺撒进行了细致对比。

恺撒即使度假也有独特的方式。在埃及休息期间，他坚持写《内战记》、研究尼罗河水源、关注埃及的国情，同时以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思考历法改革。一言以蔽之，恺撒是个善于自主安排时间和休息方式的客人。他对食物是否华美并不在意，也对东方式的豪华生活兴趣乏乏。在恺撒度假期间，克娄巴特拉唯一能做的是凭借自身的年轻貌美陪伴恺撒身侧，同时提供泛游尼罗河上的舒适游船。

与恺撒相比，安东尼是个等待被照顾周到的客人。因此克娄巴特拉能够提供的就更多了。

首先，克娄巴特拉为安东尼营造了豪华的王者宫殿生活氛围。为了满足客人任何口味上的要求，命令厨师按照大型宴会的规格精心准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山珍海味。无论数量、质量，还是种类，都足以令客人叹为观止。同时有乐师、舞伎、魔术师等为宴会助兴，日日欢舞，夜夜笙歌。

克娄巴特拉自然也知道珍馐虽美、佳酿虽醇，终有厌倦的一天。于是她安排罗马将军和自己一同泛舟尼罗河上垂钓，以美景相伴度过愉快的时光。开始因毫无收获而心中不快的安东尼悄悄令奴隶潜至水底将鱼挂到自己的钩上以提升“战绩”，最后满载而归。察觉到“猫腻”的克娄巴特拉并未揭穿安东尼的小把戏，反而附和称颂。第二天，克娄巴特拉的“杰作”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与幽默。她同样命奴隶潜到水底给安东尼鱼钩上挂鱼，不过这一次她命奴隶放的可是一条鱼干。可以想象当安东尼得意洋洋拉起鱼竿看到上钩的是一条鱼干时，如何能笑得起来。而克娄巴特拉和周围侍从却哈哈大笑，化解了冰冻的气氛。接着女王言笑盈

盈，对安东尼说：“我无上伟大的将军，小小鱼儿岂能入您法眼。您之所钓必为王国大陆和城市啊。”

这个看似让安东尼颜面扫地的举动，却在克娄巴特拉的机智下成为让安东尼无比愉悦的行为。安东尼早已被克娄巴特拉的聪明伎俩逗弄得心醉神迷。

或许克娄巴特拉早已深刻总结了在恺撒身上的失败，苦心经营后全身心投入到捕获安东尼上。这固然让女王成功征服了安东尼，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她的吹捧让二流的人，误以为自己真的能够掌握世界而飘飘然。

正当安东尼沉醉于埃及的奢华宫殿和女王的机智奉迎时，公元前41年秋到公元前40年春，屋大维正在恶战中度日如年。由于安东尼指使弟弟路奇乌斯和妻子富尔维娅在意大利中部的贝鲁吉亚举兵动摇屋大维的根基，使得原本不擅长领兵的屋大维不得不为镇压国内的动乱用尽全力。

这里要提到的安东尼之妻富尔维娅，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开女性自信和自负先河的传奇人物。由于她每一次的婚姻对象都是罗马政坛的风云人物，因此她也被熏陶出热衷插足政事的风格。

她的第一位丈夫，是罗马护民官克劳狄乌斯。按照罗马当时法令，护民官必须出身平民阶层。生于罗马名门世家的克劳狄乌斯为任护民官一职，不惜舍弃身份做了一户平民的养子。在恺撒远赴高卢作战期间，他一直作为恺撒的代表留在罗马与元老院对抗。克劳狄乌斯被元老院的米罗杀害后，富尔维娅改嫁另一位护民官库里奥。库里奥是恺撒在高卢战役末期最看好的人才之一，后来成为恺撒军团中与元老院斗争的头号人物。内战爆发后，库里奥死于非洲战场，富尔维娅再度改嫁。这次的结婚对象仍是恺撒部属，名将安东尼。在基督教的处女信仰未普及的罗马时期，像富尔维娅这样有过多次婚史的人并不罕见。

年仅22岁的屋大维自身并不擅长军事。同时恺撒指派给他的阿格里帕同样也只有22岁，临战经验不足，并且阿格里帕也不像亚历山大大帝、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恺撒或者早期的庞培那样属于军事天才。当年是因踏实的品性被恺撒看中，被命辅佐同样踏实的屋大维，担任他的左右手。因此屋大维一度被安东尼派的动乱逼入困境。

勤能补拙是良训。踏实的两人经过数度苦战，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逐渐赢得了局面。公元前40年2月底，两个22岁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胜利，成功镇压动乱并将路奇乌斯和富尔维娅赶到希腊。贝鲁吉亚战役结束。

如此重要的消息，不重视情报工作的安东尼却压根儿不知道。他原本打算等弟弟和妻子举兵消耗屋大维力量后，自己最后出马收拾局面。因此当他按照原定计划从埃及返回意大利、到达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港口时，才得知兵败事宜。在布林迪西等待他的，不是想象中意志消沉的22岁小年青，而是意气风发坐拥强大兵力足以揭穿他小阴谋的屋大维。

此情此景，安东尼立刻改变了态度。他将贝鲁吉亚动乱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富尔维娅，声称是富尔维娅煽动弟弟路奇乌斯进行动乱，而自己毫不知情。远逃在希腊的富尔维娅听到消息后，怒极身亡。

22岁的屋大维自然不会相信安东尼的连篇鬼话。然而当时屋大维在贝鲁吉亚战役中损耗很大，同时又要面临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日渐壮大直逼西里西亚的势力，因此不得不装做深信不疑。

《布林迪西协定》

当年恺撒在遗嘱中指定只有17岁的屋大维为继承人，并给他配备了阿格里帕。屋大维从这个安排中学到一条重要经验：自身才学有限，然

无碍建业，若能知人善任，则可转败为胜。恺撒生前是否明确地传授过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屋大维仅从恺撒的人事安排上悟出道理，说明良匠需遇美玉方能两相生辉。教育的成功不能仅靠教师单方面的努力。

恺撒一生中从未遇到过不能战胜的对手，因此在他的词典里从未有“妥协”二字。然而对22岁的屋大维而言，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委曲求全。因此年轻的屋大维学会了一整套外交手法，并重用与自己同龄的年轻人。

首位出场的年轻人是梅塞纳斯——2000年后日本著名的“企业梅塞纳活动”的创始人即因他命名。“梅塞纳”一词源于拉丁语中梅塞纳斯的法语发音。

担任屋大维“外交大臣”的梅塞纳斯是伊特鲁里亚人；担任“国防大臣”的阿格里帕出身于被罗马吞并的意大利南部民族；连屋大维自己也并不是正统的“罗马人”。而正是这三个外族年轻人引领着罗马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布林迪西，梅塞纳斯成功地在各有算计的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人间穿梭平衡，最终促成了《布林迪西协定》。

《布林迪西协定》因协商地点布林迪西命名，这是“后三头”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根据协议，罗马世界分成了三大块：安东尼占据东部，屋大维盘踞西部，雷必达控制南部及非洲行省。

然而此番三分天下与腓立比战役后的三分协议意义截然不同。两年前的三分协议，是在消除布鲁图及卡西乌斯等共和政派最后抵抗的前提下，“后三头”为恢复罗马正常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划分。公元前40年在布林迪西的三分，则是“三头”各自划分统治领域、互不侵犯的协议。因此前一次是共同治理恺撒留下的罗马，而这一次则是真正的“三分天下”。对此时的屋大维而言，解决掉安东尼带来的障碍，是完成父亲恺撒遗志统一罗马的先决条件。

为了确保《布林迪西协定》正常执行，屋大维和安东尼进行了政治联姻。

富尔维娅死后成为鳏夫的安东尼随后迎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屋大维则与安东尼前妻富尔维娅和首任丈夫克劳狄乌斯之女克劳狄娅定下婚约。此时传来克娄巴特拉产下双胞胎的消息，安东尼并未动摇，仍与屋大维娅如期行礼。

而屋大维与克劳狄娅的联姻并未走向婚礼阶段。这倒不是因为嫌弃克劳狄娅，而是屋大维想以婚姻为筹码换得更多的赌注。对23岁的屋大维来说，婚姻是当时能改变自己处境的唯一机会。8个月后，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墨西拿海峡位于那不勒斯湾西部顶端，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在那里发起签订了历史上的《墨西拿协定》。该协定由屋大维、安东尼和塞克斯图斯三人共同协商签订。而此次选址墨西拿海峡为协商地点，是为了方便塞克斯图斯乘船出行。

根据《墨西拿协定》条款，庞培余党将彻底结束反对屋大维的各种活动。同时作为条件，屋大维重新恢复孟达会战被恺撒击败流亡的塞克斯图斯等人的罗马公共职务，并且将西西里、撒丁及科西嘉等三岛的统治权授予塞克斯图斯。对于无法一击即胜的对手，妥协和让步是必需的，这一点屋大维自始至终都牢记在心。

安东尼作为屋大维和塞克斯图斯的中间公证人，也出席了谈判。这说明安东尼彼时力量远在谈判的两人之上。

安东尼在继女克劳狄娅的婚事上也显得相当大度。他不仅同意屋大维退婚的请求，还见证了屋大维与塞克斯图斯表妹司克里波尼娅签订婚约。司克里波尼娅比23岁的屋大维年长。屋大维在此次婚姻中拥有了一生中唯一的亲生骨肉——女儿尤利娅。

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结婚后，恢复了罗马男儿的日常生活。在蜜月地雅典，安东尼远离了夜宴、舞伎、夜夜笙歌等克娄巴特拉式奢靡生活，转而过起了朴实的柏拉图式哲学清淡生活，并喜获女儿安东尼娅。安东尼的转变让其下属惊喜异常。安东尼此番转变自是为了拜托克娄巴特拉的影响，或许在他心里一直认为罗马式的清淡生活能为以后远征帕提亚积蓄能量。此时在安东尼心中没有什么比远征帕提亚更重要的了。部下们看见他的转变也日渐安心。白驹过隙，两年时光弹指即逝。

屋大维的爱恋

43岁的安东尼努力忘情弃爱之际，24岁的屋大维正处于春心跃动之时。

屋大维爱上一个年小自己5岁的已婚女子——莉薇娅。莉薇娅早已嫁给克劳狄乌斯·尼禄，育有一个3岁孩子提比略，并且腹中正在孕育着第二个孩子。

莎士比亚笔下的屋大维是既冷酷又冷静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屋大维坚定不移地继承恺撒意志就表明他还是个意志坚定并热心热情的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哪怕心上人已罗敷有夫且身怀六甲，也无法阻止他的热切爱恋。

并且此时的屋大维业已独身。随着他和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的关系不断恶化，他已经和政治联姻的妻子司克里波尼娅离婚。24岁的屋大维为了得到心上人，与情敌进行了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同为罗马贵族的克劳狄乌斯·尼禄宣布退让，将妻子拱手送予屋大维。公元前38年1月，屋大维与莉薇娅举行婚礼，有别于传统习俗，婚礼上的伴娘由男性——新娘的前夫克劳狄乌斯担任。三个月后莉薇娅产下次子，取名杜路苏斯——这也是克劳狄乌斯·尼禄家族

的常见名。

屋大维此次婚姻，除了婚礼上的别出心裁，婚后生活也打破了罗马一直以来的传统。罗马上流社会里，女子改嫁通常为净身入户，并不携带与前夫所育子女。然而屋大维不仅接受莉薇娅，也接受了她与克劳狄乌斯所生的两子。或许童年时期远离母亲在祖母抚养下长大的痛苦记忆，使得他对两个孩子产生出温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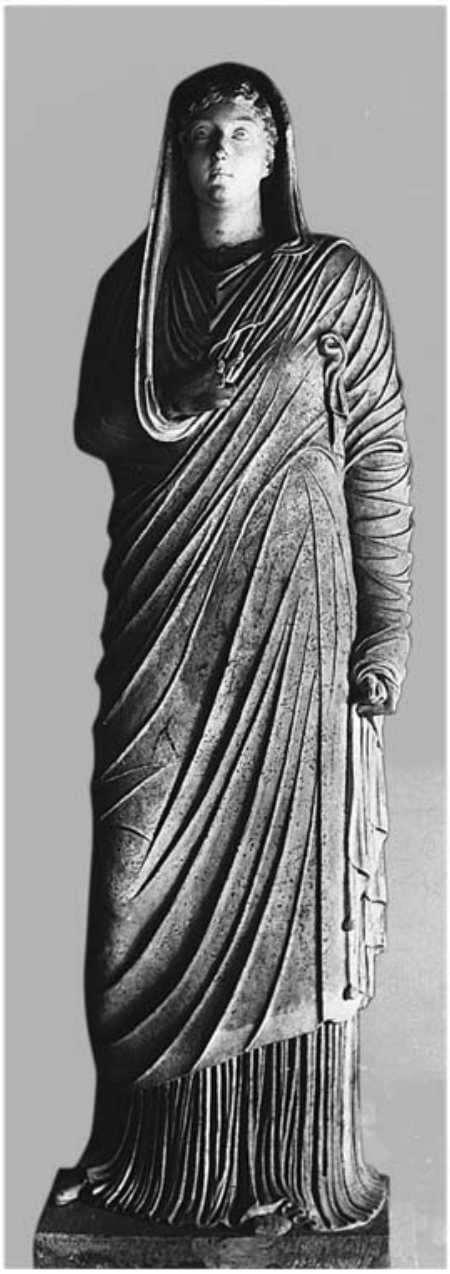
24岁夫君和19岁妻子最终携手共白头，这是整个罗马政坛婚史上的奇葩。此外被尊称为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后来选定莉薇娅再婚带来的孩子提比略为自己的接班人，担任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二位皇帝。

从屋大维可以选择心爱之人结为连理而不必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联姻，看得出屋大维的实力已今非昔比。此时为了扩大势力称霸西部，屋大维也在积极地进行军事行动。他在等待时机，与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一决胜负。屋大维自知军事指挥能力有限，因此不得不等待正在外地作战的阿格里帕回来。

最终屋大维成功在战争中击败了罗马西部最强的对手塞克斯图斯·庞培。然而屋大维毕竟不同于恺撒，他用“复仇”代替了恺撒的“宽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相继死去的结局才让他的“复仇”大计落下帷幕。在他看来，只有死人最保险。因此逃到莱斯博斯岛的塞克斯图斯最后也没能幸免。

屋大维势力的日渐扩大让安东尼坐立难安。与屋大维在西部的轰轰烈烈相比，年届45岁的安东尼在东部平静无波，日渐淡出民众的视野，且可以作为震慑东部罗马筹码的远征帕提亚此时也并未践行。但是若远征帕提亚能成功，实现伟大恺撒未竟的事业，也许能盖过屋大维日渐壮大的声望。安东尼终于开始重整旗鼓了。

古代史学家认为克娄巴特拉的来信是促使安东尼行动的原因，然而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因为在两人分别的四年里，克娄巴特拉不只给安东尼写过一封信，同时安东尼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对埃及女王的迷恋。安东尼现任妻子屋大维娅是罗马贤淑女性的典范，从未对此流露过一丝不满。不过贤淑不等于魅力。



莉薇娅

远征帕提亚终于提上了日程。出发前安东尼嘱咐临盆在即的妻子在罗马好好地等待自己回来。屋大维娅丝毫没有嗅到来自克娄巴特拉的危险，乖乖地遵照丈夫的指示。她拖着笨重的身躯回到罗马后，并未返回娘家，而是继续留在夫家一面待产一面照顾安东尼和前妻的孩子们。

公元前37年秋，安东尼向东出发。出发前他给克娄巴特拉送去密信，期待再聚。收到信的克娄巴特拉立刻从亚历山大港出发。她不仅为安东尼准备了远征帕提亚所需的充足物资和资金，还带去了那一双出生后就未见过父亲的双胞胎。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联姻

四年之后再度相会，安东尼又立刻身陷克娄巴特拉的情网不能自拔。

这次克娄巴特拉明确地表示再不愿做地下情人，正式向安东尼提出结婚。两人在征途中举行了希腊式的婚礼。安东尼正式承认克娄巴特拉所生双胞胎为自己所出，并给两个孩子命名。男孩名为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女孩名为克娄巴特拉·塞勒涅。在希腊神话中，赫利俄斯是太阳神，塞勒涅为月亮神。此外，安东尼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被埃及人称做“恺撒二世”的恺撒与克娄巴特拉之子——托勒密·恺撒——的监护人。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按照希腊的传统，发行了刻有两人侧面的纪念银币。在希腊发行的货币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分别饰以狄奥尼索斯和阿芙洛狄忒（雅典娜）的造型。在埃及发行的货币上，两人则又分别以欧西里斯和伊希斯女神的造型出现。

安东尼将东方诸城邦的统治权当做新婚礼物送给克娄巴特拉。这其中大多是罗马行省及其被看做罗马同盟国的诸侯领地。但是克娄巴特拉一心想要的是希律王的领地犹太地区，安东尼却始终没有答应。通过这次婚姻，克娄巴特拉以新婚礼物为名实际上恢复了埃及王室200年前的领地范围。

刻有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侧面像的银币（前34—前33年左右，埃及铸造）

罗马人得知这一切后，震惊失语。重婚本身就违反了罗马法律。将罗马霸权统治下的如此多的地域赠与一个小小的同盟国埃及，更是有悖常理。罗马民众愤怒到了极点，反而无言以对。面对这种反应，安东尼却显得淡定自若。他认为只要远征帕提亚成功，这些都不再会是问题，罗马人一定能够接受。

克娄巴特拉并非倾国倾城之姿，却机敏过人。然而她的机敏是否等同于拥有眼光长远的智慧？

首先，她未能洞悉政局。早在公元前63年庞培称霸东方时，罗马就已将叙利亚塞琉古王朝收为行省。若当时罗马有意，以同样的手法处理埃及也并不是难事。罗马最终没有这么做，并不是惧于埃及强盛的国力，而是另有打算。

在军事上采取霸权统治的同时，罗马在外交上则以同盟国战略为基本方针。对于那些国内政治稳定的国家，罗马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与他们结成同盟。因为一旦将独立国变成罗马的行省，虽然能增加行省税的收入，但同时罗马也要向行省派遣总督并有责

任维护行省的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但若成为同盟国，在双方都对彼此有安全责任的情况下，罗马既可以获益，又不需要承担维护同盟国国内稳定和防卫的费用。

正因如此，埃及是罗马长期以来的最理想同盟国。因为与马其顿、叙利亚等希腊文化国不同，埃及国内政治非常稳定。埃及托勒密王朝凭借着两重力量巧妙地牢牢地控制着国民：一是借助神仙下凡的身份威慑埃及国民；另一是凭借亚历山大大帝后裔的马其顿血统之名牢牢控制住执埃及经济之牛耳的亚历山大港多数希腊后裔。“克娄巴特拉”并非埃及名字，而常见于马其顿王室中。克娄巴特拉除了主持埃及传统祭祀时以短发装扮亮相外，平时总爱以希腊发型搭配西欧着装风格打扮自己。事实上克娄巴特拉遗留下的画像里，埃及的短发造型仅有一例，其余全是希腊风格。至于克娄巴特拉存于人们心中的短发形象，也不过是从莎士比亚起为了追求舞台上的异域风情而营造的效果。因此《奥赛罗》的主人公在舞台上装扮成一个黑人，其实也并不符合历史上真实的样貌。或许是因为地理位置相对较北的英国观众认为，如果没有女王的埃及装扮和奥赛罗的黑人特征，就没有浓厚的异国情绪吧。

总而言之，对罗马统治者而言，充分利用埃及特色和希腊特征进行统治的托勒密王朝，只要国内政治稳定就已经足够了。当年克娄巴特拉的父王由于内乱流亡之际，罗马的两大巨头——庞培和恺撒——都一致给予其军事援助并助其复国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就埃及的统治者必须是神的化身这一点而言，埃及的王位只能由埃及人出任。因此对罗马人而言，与其自己亲自统治，还不如就让埃及人自己统治，更有利于埃及政治的稳定。

恺撒的埃及政策是这一传统观点的完美继承。对罗马统治者而言，谁继承王位都无所谓，只要能保证埃及的稳定都行。因此恺撒在拥有埃及王位继承权的两位王子和两位公主中，选择克娄巴特拉，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只有她与庞培之死无关。罗马人——无论妇孺——都绝不

会看到一个杀害自己同胞的人坐上王位而置之不理的。

对此，克娄巴特拉却以为自己是凭借个人魅力登上王位的。正是这种自负让她的智慧开始蒙上阴影，也正是这种自负开启了她今后的蒙昧道路。然而恺撒不是身陷美色无法自拔的角色，因此在恺撒时期，克娄巴特拉尽管有壮志雄心却没有行差踏错的机会。

恺撒死后，在公布的他生前订立的遗嘱中，他对“小恺撒”只字未提。（不过这个孩子也是恺撒死后才得到公开承认的。）这也让“小恺撒”的母亲克娄巴特拉感到既愤怒又委屈。

克娄巴特拉彼时或许真的没有理解恺撒的用心吧。恺撒一直与她保持着情人关系，也不公开承认两人所生孩子，其实是为了维护她王位的稳定。毕竟埃及王室存亡的关键一直都系于罗马之手，只要罗马愿意随时都能以武力制伏埃及。正是因此，恺撒才极力避免刺激到罗马人的神经。恺撒给予的保护和爱，克娄巴特拉完全没有体会到。

怀着对故去恺撒的强烈报复心，她与安东尼正式结为夫妻，也让她的孩子得到公开的承认。此时克娄巴特拉迈出了自我毁灭的决定性一步。

同为女性，笔者本不想用“浅薄”等词语形容女人。然而当踏出决定性一步时，克娄巴特拉已32岁，笔者也无法以“年少轻狂”这样的理由为她辩解。

当时在地中海，大概没有哪个女子能比克娄巴特拉拥有更多的财富；在罗马，大概也没有哪座建筑能比她在亚历山大港的王宫更奢华。此外整个地中海也找不出来像亚历山大港如此设施完备的港口，因此恺撒在参观了亚历山大港之后，特地将埃及的工匠和技师请到罗马打造奥斯提亚港。埃及首都亚历山大港当时聚集了大批希腊裔的埃及富翁，可谓东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繁荣城市。当地的市场商品琳琅满目，商贾云

集。

然而表象并不等于国力。国力不仅指表面上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更重要的是能像地下水一样充沛富足，随取随有。这些不知克娄巴特拉是否真的理解。

克娄巴特拉是否以为凭借埃及的富有和安东尼的领军才能就能击败一心继承恺撒遗志、率领罗马朝恺撒生前理想国前进的屋大维呢？

此外，埃及女王的“浅薄”还导致安东尼在远征帕提亚时的狂妄自大。

远征帕提亚

对罗马人而言，远征帕提亚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能为曾经失败的克拉苏军团一雪前耻；第二，征服帕提亚即能确立起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国家防卫线，可树立起罗马世界东部地域的安全保障。因此远征帕提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征服及占有。然而克娄巴特拉占有帕提亚地区的野心最终影响了安东尼的判断，改变了罗马自古以来对帕提亚的政略——从战胜退兵改为胜后统治。政略的改变必然导致远征手法的变更。安东尼并未对部下挑明这一切。因为他心知肚明，罗马人组成的兵团，只会为确立国家的防卫线厮杀，绝不会为了异国女王的野心卖命。因此公元前36年春，远征帕提亚的罗马军一开始就被蒙在了鼓里。

安东尼为远征准备的军队规模是克拉苏时期的3倍。

仅16个重装步兵团人数已达6万，全部由罗马人组成。

从高卢和西班牙征集骑兵，人数达1万。

此外，与罗马有盟国关系的东方诸城邦各王侯均派兵支援，人数超过4万。

综上，安东尼远征大军仅士兵数量就已超过11万，可谓是一次拥有大量攻城利器的浩浩荡荡的远征行动。

另一方面，帕提亚的军队规模骑兵和步兵加起来总共只有4万人，由归顺帕提亚的希腊人莫内斯指挥。仅从兵力上比较，罗马军毫无疑问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总指挥安东尼对获胜信心十足，连克娄巴特拉也对获胜毫不怀疑，她已从行军途中撤走回到亚历山大港等候捷报。

同时帕提亚国内也并不乐观。一方面长久以来的王位纷争并未结束，另一方面击败克拉苏的苏雷纳斯那样的天才将领也未横空出世。然而，当他们引以为傲的重装骑兵团败于安东尼的先锋部队后，他们也从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在安东尼准备远征的四年时间里，帕提亚的主力军已经从持长矛的重装骑兵改装为以弓箭为武器的轻骑兵。这也是他们17年前击败克拉苏兵团的法宝，而安东尼的军队布阵和克拉苏当年毫无变化。可惜，从不注重搜集敌情的安东尼，并不知道这个变化。

另外，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目的已经从确立幼发拉底河防线变成了占领帕提亚。这一点虽然他并未对部下言明，但那些随征的东方诸城邦王侯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俱不愿为了埃及女王私欲协助罗马军队，转而投向帕提亚。原因显而易见。倘若远征是为了巩固罗马的防卫，那么远征成功自然能保各自城邦安泰。但若远征是为了占领，那么帕提亚之后，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

根据罗马的传统，征战时除了罗马自身军团作为主力参战外，也会召集远征地域周边的诸侯国及各部落派出支持力量。即便强大如恺撒，也不敢轻视罗马与同盟部族建立的共同体制。安东尼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在战斗前反而没有进行必需的政治外交联合。倒不是因为时间仓促，而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政治外交的重要性。此外，克娄巴特拉对此

等事关成败的基础也一无所知。

结果形势急转直下，中东联盟反倒站在帕提亚一边，联合对抗罗马。

安东尼毕竟只拥有军团长的才能。在忠实地执行总司令的指令方面，安东尼确实是个人才，然而在远征帕提亚中能否担任总司令，却不由经验决定，天生才能和气度才是关键。此外，曾经婉言笑语“小小鱼儿岂能入您法眼，您之所钓必为王国大陆和城市”的克娄巴特拉真如传言一般智慧吗？克娄巴特拉的确精通希腊文与拉丁文，并能将埃及本土语言运用自如，但语言天分是否能与智慧画上等号？

接下来笔者将用简短的语言大致描述安东尼自公元前36年3月至同年10月末的远征过程。之所以简略，是因其并不值得长篇大论。

平安抵达幼发拉底河西侧的安东尼大军，自渡河后，连遭不测。

帕提亚军队没有直接对罗马大军发起攻击，转而攻向了罗马的运粮队，并全歼了押运粮草的两个军团，夺取军需，烧毁攻城器具。随后又集中兵力截断了罗马军的补给供应道路。

安东尼只好下令现地筹粮。于敌地筹粮显然要付出代价。许多东方诸城邦的士兵在外出筹粮后再没能回到营地。

8月，酷热的天气加上水粮不足，迫使安东尼不得不考虑撤退。然而自尊又不允许他下令退兵。在作战大会上，他最终力排众议，以总司令的身份压下大多数人撤退的主张，下令进攻。

帕提亚勉强应战，未能击退罗马重装步兵，反而自损80名骑兵。帕提亚此后再不应战，改为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消耗罗马军的耐心和实力。

10月，帕提亚所在的中东沙漠地域进入了昼夜温差大的季节。安东

尼终于决定撤退。撤退之行异常艰苦。安东尼凭借自身武将才能，虽没有重蹈当年克拉苏军团的覆辙，但在向北迂回途中，受到帕提亚军队的轮番袭击，损失8000名士兵。

11月，逃回安息城的罗马大军，主力军团士兵只剩下三分之二。这次远征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战役，也没有用上之前精心准备的攻城武器。安顿后，安东尼急忙派特使传消息邀克娄巴特拉前来。这个绝望的46岁男人，此时大概只能在心爱女子怀中才能求得安慰吧。

远征帕提亚失败的消息，不到一个月就传遍了罗马。屋大维彼时和阿格里帕正集中全力收服亚得里亚海东部沿岸的伊利里亚地区。由于关系到对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控制，这场收服显得异常重要，因此他并无余力其实也并不愿意援助安东尼。但安东尼的妻子屋大维娅听到消息后，立刻购入大量支援物资，准备必要的军用资金，并亲自率领雇用来的2000名士兵前往与安东尼会合。屋大维娅认为自己是安东尼的正室，帮助身陷困境的丈夫，是妻子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当她到达希腊的雅典时，收到了安东尼的亲笔信。信中言明物资和资金留下，而命屋大维娅返程。此时的屋大维娅仍唯夫命是从，顺从地回到罗马。

得知此事，屋大维怒极。他亲自修书给姐姐，告诉她从此大可不必为安东尼尽妻子义务，也不必为安东尼守护家宅，更没有必要抚养安东尼与前妻所生孩子。弟弟的愤怒和忠告，都无法改变屋大维娅的心意。

屋大维娅视夫君为天，对她而言，丈夫是此生的唯一。可惜她为丈夫所做的一切，却事与愿违，反而让安东尼的声望日薄西山。原本对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暗斗并不关心的罗马民众，看到人妻典范屋大维娅遭安东尼如此对待，纷纷为其大鸣不平。安东尼为了一个外国女子而让罗马淑女受委屈，这种委屈罗马民众仿佛感同身受。

正忙于收服伊利里亚地区已完成对罗马西部称霸的年仅28岁的屋大维，将罗马民众感情的变化尽收眼底。他当然会考虑在恰当的时机好好借用这股不满情绪。

异国的凯旋仪式

笔者开篇引用了萧伯纳的一段话：

> 深谙人性弱点的莎士比亚，也无法探知尤里乌斯·恺撒等英雄人物的伟大。《李尔王》虽堪称杰作，《恺撒大帝》却并非佳品。

顺着萧伯纳的逻辑，莎士比亚的另一部作品《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自然能归入优秀之列。

克娄巴特拉千里奔赴被远征失败击溃了自信的安东尼身旁，同时还带来了对败军而言至关重要的资金与物资。屋大维娅率物资前来时，被安东尼命令留下物资独自返回罗马，克娄巴特拉面对的可不是这个结局。对安东尼而言，克娄巴特拉就是必需品。此外，如果安东尼一蹶不振的话，克娄巴特拉也就等于一只脚踏上了不归路。

因此34岁的克娄巴特拉极力激励47岁的安东尼，忘记失败、重振旗鼓、再度远征。安东尼和他的部下们都已失去了再度征战帕提亚的自信和欲望，因此再度出兵的目标已转向了比帕提亚实力稍逊的亚美尼亚王国。远征时间定于次年，即公元前34年春。送安东尼出征后，克娄巴特拉又先行返回了埃及，在亚历山大港为安东尼准备凯旋仪式。

说是远征亚美尼亚，实际上不过是远行而已。彼时亚美尼亚国内正处于王位纷争的混乱中，安东尼趁着亚美尼亚军队尚未整编成形之际，未进行一次正式战役，就轻轻松松地收服了亚美尼亚。随后安东尼急忙

与亚美尼亚王缔结和约并正式退兵。此时的安东尼已无法忍受与克娄巴特拉长期分离了。

议和的结果是亚美尼亚王国和安东尼所代表的罗马结成同盟关系，这对罗马民众而言本非坏事。但安东尼为了巩固两国关系而促成的另一件事——安东尼为自己和克娄巴特拉的儿子与亚美亚尼王国的公主定下婚约——却在罗马人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罗马人看来，安东尼所率领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属国家公共财产，并不能为一己私欲滥用，因此安东尼在国内的声望一落千丈。同时克娄巴特拉的浅薄也将安东尼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虽名不副实，克娄巴特拉仍决定为安东尼远征亚美尼亚举办所谓的“凯旋”仪式，并且将仪式地点定在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港，这显然又点燃了罗马人的怒火。

克娄巴特拉究竟有没有理解凯旋仪式在罗马人心中的意义呢？

凯旋仪式对罗马人而言并不只是市民欢迎远征归来的将士，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而进行的仪式。凯旋将士们列队登上卡匹托尔山感谢众神才是仪式的核心。人们互相庆祝，并感谢众神才是罗马凯旋仪式真正的意义所在。因此并非任何地方都能举行凯旋仪式。如果不是在守护罗马的众神休憩地，也就是首都罗马举行的话，凯旋仪式就失去了意义。多神教的罗马人，虽也接纳埃及人信奉的欧西里斯和伊希斯，但仍以守护自己的朱庇特（宙斯）、朱诺（赫拉）、密涅瓦（雅典娜）、马尔斯为尊。克娄巴特拉是为了向罗马传统文化挑战而特地在亚历山大港举办凯旋仪式的话，这愚蠢之举不得不让人怀疑她的智慧。此外，为了满足爱人心愿而弃罗马传统于不顾、同意在埃及举办凯旋仪式的安东尼，也诚如西塞罗的评论“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与角斗士并无二致”。因为真正的智者，即使无法将其他文化吸收为自己的一部分，也会尊重它。

凯旋将军驾着罗马式的四匹高大白马拉的战车，在埃及民众和希腊

裔埃及居民的围观下，穿过亚历山大港，停在王宫前。克娄巴特拉扮成伊希斯女神，坐在高高的黄金御座上，在那里等待着他。年届48岁的安东尼，从未享受过象征罗马男子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这次在异国的凯旋仪式，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克娄巴特拉御座旁，摆着同样由纯金打造的宝座，空候着从战车上下来的凯旋将军。两人手边，并排安置着四个略小一号的宝座，是13岁的恺撒二世（小恺撒）、6岁的龙凤胎以及2岁幺子的座位。龙凤胎和2岁的幺子为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所出。

罗马凯旋将军，对民众发表宣言，包含如下内容：

一、因克娄巴特拉曾与恺撒有过正式婚约，他们的孩子——13岁的托勒密·恺撒——确为恺撒嫡子。

二、克娄巴特拉为女王，同时托勒密·恺撒为国王。

三、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亚美尼亚王国、梅迪亚王国及帕提亚王国赐予6岁的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将昔兰尼加和利比亚两国赐予克娄巴特拉·塞勒涅。此外将叙利亚和奇里乞亚，即幼发拉底河至达达尼尔海峡（今）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赐予2岁的托勒密·菲拉迪鲁法奥斯。

四、包含以上全部领土的埃及帝国由克娄巴特拉和托勒密·恺撒共同统治。

以上消息传到罗马人耳中无异于掀起了惊涛骇浪。据历史学家记载，克娄巴特拉可谓一时风头无二。仅仅是罗马将军的安东尼，为了满足心爱的女人，居然敢将罗马霸权统治下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分，以及罗马行省和同盟国相赠。克娄巴特拉此时并不仅仅是安东尼的爱人，还是一国之君。但她索求并坦然接受这一切的行为，却完全不像君主所为，不知是否已被极度的自负蒙蔽了双眼。

安东尼公布上述决定的同时，往罗马送去两封信：一封给屋大维娅，要求离婚；一封给屋大维，要求正式将罗马世界东西两部分分而治之。

当大多数罗马人都被安东尼的行为震惊到无语时，屋大维依旧保持了冷静。这位已经30岁的领袖，既没有正面回答安东尼任何要求，也没有拒绝与斥责。他利用现任执政官的地位，立刻召开元老院会议，会上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元前43年结成的五年为期的“后三头政治”，到公元前38年已经续约，同样仍以五年为期。此后不再进行第三次续约。

二、安东尼在埃及作出的所有决定，均未通过元老院会议审议，因此无效。

三、将罗马世界一分为二的提议与恺撒遗愿背道而驰，故不列入会议议题。

在处理完安东尼的要求后，屋大维立刻回到了伊利里亚战场。屋大维深知与安东尼的较量早晚会爆发，因此制伏伊利里亚地区极为必要。之后在与安东尼的初步较量中，舆论宣传战比真刀真枪的战争更为有效。恺撒的年轻继承人，深知伺机而动的道理，也懂得不可仅仅坐待良机。宣传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策动整个罗马世界反对安东尼，反对克娄巴特拉。虽然此前通过元老院会议结束“三头政治”，成功地剥夺了安东尼的正式地位，但这还不够。煽动起民众反安东尼、反克娄巴特拉的情绪，烘托他们的对手——屋大维——立场的正确性，是非常必要的。

走向大决战

年仅18岁就成为了恺撒继承人，从那时起一直身挑重任的屋大维到公元前33年秋已进而立之年。尽管军事方面他一直没有突出表现——正如恺撒当年预见的一样——但强烈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意志是他被恺撒选为继承人的重要因素。此外，当年恺撒为弥补他的军事能力缺陷指派给他的辅臣阿格里帕，现今业已年满30岁。17岁开始培养的能力如今正值收获季节。象征着完全掌握罗马西部世界的伊利里亚战役的成功，就是两人天衣无缝配合的最好证明。

伊利里亚地区包括了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等地。控制了这块地域，等于掌握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意味着保障了意大利半岛——即罗马本土——的安全。成功收服伊利里亚地区的屋大维和阿格里帕，自然受到了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的拥戴。人们纷纷认为，与年届50岁被外国女子魅惑的安东尼相比，30岁的屋大维更为罗马的利益着想。屋大维在伊利里亚战争中身负两伤，这更加深了他在罗马人心目的好印象。人们认为这才是能为自己战斗的有强烈责任感的领袖。

此外伊利里亚战争后，屋大维在首都举行的凯旋仪式无一不遵照罗马的传统。相比之下，躲在异国首都、向异国诸神报告战绩的安东尼显得不可理喻。而且安东尼感谢神灵时所拜的对象是扮成埃及伊希斯女神的克娄巴特拉，或许对于把王当做神的化身的埃及人而言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对罗马人来说，该行为等同于蔑视祖国、反对国家。

按照罗马传统，为了将自己的功绩传颂后世，同时也为了感谢和自己创造这一切的同僚们，凯旋将军通常会建设公共场所赠与国家。苏拉建造了相当于市政街的塔布拉里乌姆；庞培建造了罗马首个石制剧场；恺撒留下了如古罗马广场扩建等诸多的公共建筑。屋大维也循例为之，同时也鼓励部下阿格里帕和麦克纳斯参与其中。此外，除了新造建筑外，他还进行了重要且实在的工作——修缮了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建筑。

他在建设首都供水系统尤利娅水道的同时，修复了已有的马尔奇亚水道。在建造屋大维回廊的同时，不忘修缮庞培剧场。在继承恺撒遗志继续进行罗马再开发计划时，采取了麦克纳斯的建议，在埃斯奎里山建造了一座公园赠与市民。

重视修缮既有公共建筑，并非屋大维首创。事实上罗马是一个非常重视公共设施的民族。他们既热衷建设，也热衷维护。他们认真思索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的方法，从上下水道到街道乃至神殿，他们都适时地进行维护，并形成了一套高超的技艺。正因深知修缮的重要性，罗马建筑物的石碑上，不仅刻有建造者姓名，大多也都铭刻着修缮者之名。

屋大维忠实地履行着罗马人这一传统，这比起建造新建筑给罗马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让民众感到他更适合作为领袖。而他的对手安东尼，不仅没有建设任何公共建筑赠与国家，更没有行任何修缮工程。

屋大维恢复了自恺撒遇害以来中断长达11年的罗马市内建设。同时屋大维密谋另一个打击对手的行动——一项恺撒做不出来的阴谋。但屋大维毕竟不是恺撒。他在元老院会议上公布了安东尼预留在女祭司处的遗嘱。

得知安东尼遗嘱内容后，罗马人的神经再度受到冲击。

第一，安东尼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和克娄巴特拉所生孩子，完全无视和富尔维娅、屋大维娅所生的孩子。这表明安东尼否认与富尔维娅、屋大维娅等两位罗马上流社会女性的婚姻关系。这深深伤害了罗马人的感情，同时激起他们的愤慨。

第二，安东尼指定自己死后葬于亚历山大港。

古罗马人和现代日本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喜爱温泉；喜爱简素的室内装饰；赞同火葬；认同魂归故里，落叶归根。死于埃及的庞培，遗

体被运回意大利下葬；自杀于非洲的小加图，骨灰被运回祖国；自杀于希腊的布鲁图，遗体被运回母亲身旁。像恺撒那样生前就会对自己墓所毫不关心的人毕竟是特例，大多数罗马人还是将葬身之所看得无比重要。因此在普通罗马人看来，想葬身异国的安东尼已经不能再算得上是罗马人了。出生于罗马的安东尼，不愿在众神守护的罗马长眠而选择异国的亚历山大港，这无疑是对罗马众神的侮辱。同时也让罗马人认为，一旦他获胜，连首都罗马都有搬迁到亚历山大港的可能性。

安东尼选择长眠于亚历山大港，无非是一个陷入热恋的男子真情的流露。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介平民，与他愿意死同穴的女人也并非埃及小民。如同恺撒遗嘱的政治意义一样，安东尼的遗愿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遗嘱内容公布后，激起了罗马庶民心中对他的轻蔑、对克娄巴特拉的憎恨。屋大维的宣传战确实起到了不俗战果。此时罗马将军安东尼正在小亚细亚西岸的华丽都市以弗所与克娄巴特拉形影不离地过着东方君主的幸福生活，丝毫不在意西部日渐兴起的反对之声。克娄巴特拉对反对声也仅是报以嘲讽。

这两人的乐观也并非毫无依据。

因为克娄巴特拉不仅对埃及人来说是神的化身，对住在埃及首都众多的希腊人和散布在东方世界的希腊人而言，她也是马其顿王家血脉的继承人。城邦国家衰退后希腊人的境地，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的热那亚人有相似之处。凭借卓越的航海技术和商业才华，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根发芽。然而他们又不完全一样，至少希腊人是曾经创造并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民族才能让他们在罗马霸权统治下毫无障碍地生活，民族自尊却让他们对成为二等民族心有不甘。克娄巴特拉可以借由安东尼之手将地中海世界东半部分从罗马统治中独立，对希腊人而言这也是恢复独立主导权的绝佳时机。

然而如果克娄巴特拉希望获得希腊人的信赖和帮助，那么只能说她并不懂得历史。那些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凭借自身能力生存的民族，通常

并没有维护所属共同体的意愿。此外，那些经历了长期衰退的民族，在历史上也没有重振旗鼓的先例。如果东山再起，必须对国家构造、民族自身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曾有如此理想的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也没能看到改造的结果，之后希腊人更加丧失了活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即便他们赞成与罗马为敌，也不会有人为此走向战场。

克娄巴特拉以为凭借埃及的富庶、希腊人的援助、安东尼的军事才能，就能战胜尚未进入衰退期的、有充分维持共同体意愿的、百战不殆的罗马人。这不正犯了恺撒所言“只看见自己想看的现实”的错误吗？尽管身为恺撒情人，大概她还是没从恺撒身上学到太多。

大决战准备

公元前32年，31岁的屋大维感受到了最后决战的气息。正如其字面意义，这不是单纯地决定局部胜负，而且决定整个罗马世界主宰者的“大决战”。

正如上文所述，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而是围绕着权力鹿死谁手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不容易。常常要以高薪等条件招募士兵，而这样往往难以保证军队质量。

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恺撒继承人，巧妙地将个人间的争斗转换成国家间的战争。

让罗马民众相信，他们的敌人不仅是安东尼，还包括将这位罗马将军变成自己近卫队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屋大维散播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操作起来倒不困难。最后大决战并不是东方诸城邦全力抵抗罗马霸权的战争，这也大大超乎克娄巴特拉和罗马民众意料。

东地中海世界并没有权力挑战罗马，罗马世界东半部分的诸位王侯们没有一人亲自参加迎击屋大维的安东尼军队。他们虽然应安东尼的强烈要求而出兵，但是这些世故的王侯们深知这场大决战是由克娄巴特拉的野心、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引起的。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所犯下的错误，屋大维全部都将之变成了自己的利好因素。屋大维深信，只要宣传能够持之以恒，必能奏效。所以他不仅在首都进行弹劾安东尼的演说，同时在地方自治城邦也如法炮制。他将在罗马进行的演说记录原封不动地张贴在庞贝、那不勒斯、比萨、佛罗伦萨等地的中央广场。

同年秋天，罗马本土的所有地方自治城邦推举屋大维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全军总司令”。

这样一来，原本是以争夺恺撒的继承权为目的的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正式转化为罗马和埃及之间的国家战争。

为此，此前一直跟随在安东尼麾下的幕僚，也是曾在恺撒麾下一同战斗过的同僚帕里奥和普兰库斯等人，在知道了事情真相之后，全都离开了安东尼。同时，也开始有部分罗马士兵弃安东尼而去。

安东尼是一个性格很好、懂得合理分配报酬、又与士兵关系融洽的司令官。因此，在士兵们中间，他还是一位非常有人望的将军。因此，尽管知道即将要和祖国的正规军进行战斗，仍有大批的士兵愿意追随安东尼。同时，他们也深知这次战争的问题所在。他们派代表劝说安东尼让埃及女王回到埃及去，不要参加大决战。安东尼没有当场给予答复，最终也没有听取他们的忠告，因为这不是克娄巴特拉想看到的结果。她对于即将到来的与罗马的战争感到异常兴奋，同时她也确信，安东尼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正当安东尼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筹备兵力的时候，屋大维也在

意大利一心一意地筹备应战。此时的屋大维迸发了当初为恺撒所看好的才能。安东尼通过在埃及筹集的资金和在东地中海诸国征得的行省税，雇用士兵组成船队。屋大维则在向罗马市民征收临时税的同时，还获得了市民的额外支持。这两个原本相互矛盾的事物，在屋大维手上却成功地统一起来。

屋大维向全体市民征收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向“解放奴隶”征收年收入的八分之一，作为特别临时税。同时免除罗马市民和“解放奴隶”的所得税。这样实际上就是临时增加了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的高额直接税。这给税民增加了很重的负担，也引得不少地方自治体陷入濒临暴动的边缘。

不过，屋大维也对此早有准备。他免除了愿意服役的市民和“解放奴隶”的临时税，同时也对他们的间接税不予增加；行省税方面的条款没有更改。这样一来，达到了如下的效果：

一、罗马本国的市民，无论是以缴纳临时税的形式，还是以服兵役的形式，全都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参与到消灭祖国敌人的战争中，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二、不变动间接税，表明这只是战争时期特别设置的临时税，消除了市民们的不满情绪。

三、不变动行省税，获得了行省人民对战争的支持。这样在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战争期间，各行省情况可以保持稳定。

这样一来，以地中海为“内海”的罗马世界西半部分就固如磐石。另一方面，安东尼从大本营所在的以弗所逐渐向西面的萨摩斯岛和雅典移动。在安东尼的营地内，克娄巴特拉为了刺激安东尼，让其不再消沉而是重新振作起来，特地安排了日以继夜的各种奢华宴会。50岁的安东尼日日宴饮笙歌。

而在罗马的卡匹托尔山神殿内，屋大维正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行传统的出征祈神仪式。这是祈求诸神庇佑罗马、祈求罗马军队获胜、正式向敌人宣战的仪式。在整个过程中，罗马人安东尼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屋大维口中的敌人始终只有异国埃及的女王克娄巴特拉一人。

安东尼的海军集结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屋大维的海军集结于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在双方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公元前32年过去了，一决雌雄的时刻就快到了。恺撒的义子屋大维，以及恺撒的副将安东尼，此时分别迈入31岁和50岁。

亚克兴角海战

公元前48年，当恺撒准备攻打盘踞希腊的庞培时，他辞去了独裁官的职位，重新出任执政官，并以这一身份出征。公元前31年，屋大维准备攻打盘踞于希腊的安东尼时，特地坚持要求再度出任执政官，并以此身份出征。根据罗马的法律，执政官任期满后的一年内不得再度出任同一职位。屋大维如此行事，是因为在当时的共和政体下，执政官依然是罗马所有公职中的最高职位。而独裁官不过是一个特别职位。到此为止，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所组成的“后三头政治”于公于私都正式失去了效力。安东尼此时在罗马人眼中只剩私人立场而已。这样一来，战争就正式定性为罗马执政官攻打背弃同盟国关系的埃及女王的战争。

尽管沉浸在酒池肉林之中，安东尼依然是一名武将，因此集结军队这样的事，他没有让克娄巴特拉插手。

陆军方面，安东尼手持重装步兵6.5万人，弓箭手、投石兵等轻装步兵2万人，同时还有1.2万名骑兵。

海军方面有一支由8个分队组成的、总计拥有520艘船的特大海军船队。每支分队由60艘大船和5艘快速联络船组成。克娄巴特拉所乘坐的

旗舰“安东尼号”是一艘高达十层的大船。船上的一支船桨都需十人方能划动。安东尼和将士们所乘坐的船全部都是五层高的大船。船队之气势恢宏令人瞩目。划桨手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加上作为战斗主力的重装步兵，520艘船的船队总共装载了15万人。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在地中海领域史无前例。此战的陆海两军绝大部分费用都来自埃及。克娄巴特拉几乎是破釜沉舟，要决一死战了。

罗马方面，陆上的战斗力与安东尼不相上下，但是海上的力量明显处于劣势。陆军共有8万名重装步兵和1.2万名骑兵，海上总共有400艘战船。

在这些战船当中，只有屋大维乘坐的旗舰和阿格里帕等乘坐的不到五艘战船达到五层，其余以三人划动一支桨的三层战船为主。笔者形象一点来描述的话，需要十人划动一桨的船等于十马力，三人划动一桨的船等于三马力。

虽说罗马的战船在马力上处于劣势，但是与埃及相比，他们仍有两个优点：

一、全体船只皆备有阿格里帕设计的被称为“汉巴克斯”的火器。将其点燃之后扔向敌船，可以达到令敌船起火的目的。

二、船头经过改良，变得比以前更为坚固和锐利，增强了对敌船的突击力。

此外，大型船只在速度和防御力上虽然都占优势，但是在战场上的机动性显然有缺。小型船只反而更为机动灵活。担任作战总指挥的阿格里帕尽管收到了希腊传来的敌方超大型船队的情报，也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船队朝超大型船队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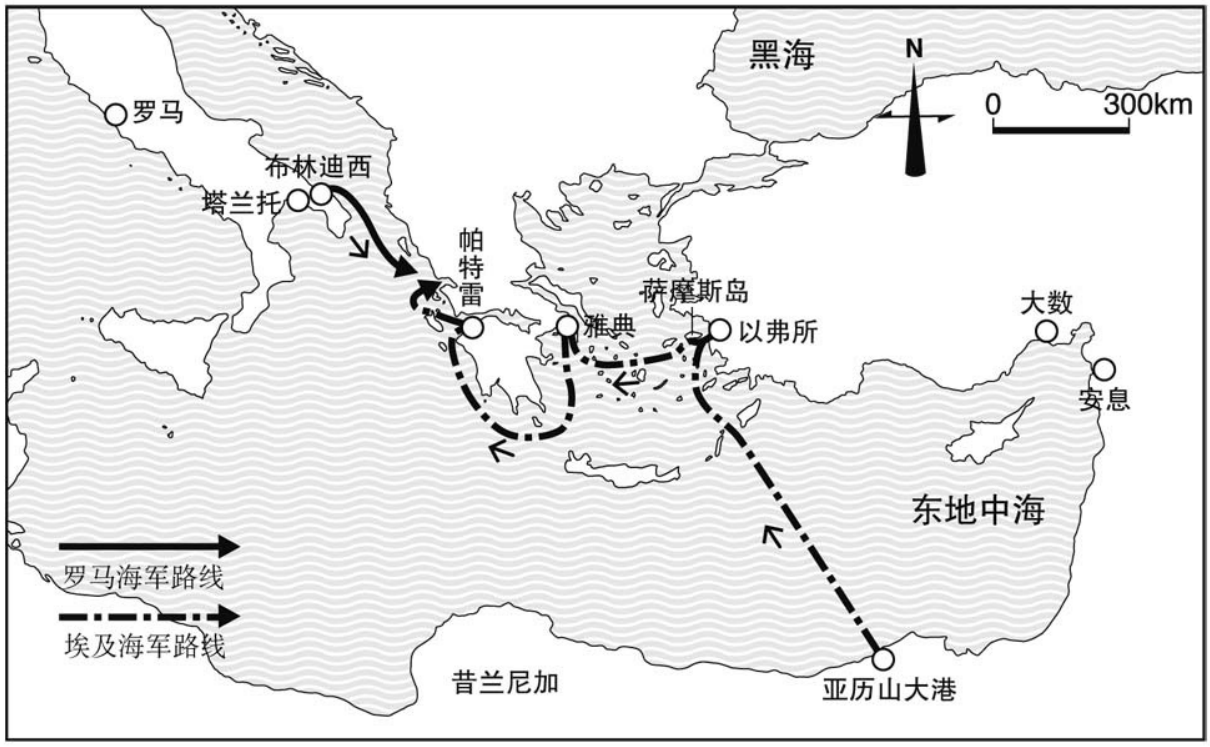
公元前31年3月，屋大维率领全部的兵力渡海去希腊，安东尼从前

一年的冬天开始就将大本营安置在希腊的帕特雷，在那里与克娄巴特拉一起相守过冬。同时，他把船队安顿在帕特雷西北部直线距离130公里处的普雷韦扎湾，以便当罗马军队从希腊东北部登陆时，能够随时保持作战状态。

安东尼的问题出在战略上。强渡希腊的决策已经表明，罗马打算在意大利半岛之外一决胜负。安东尼方的所有人也都预测战场将会在希腊的西北部。然而在安东尼的作战会议上，关于陆战和海战谁为主导的问题，意见分成两派。

安东尼手下的罗马将士们一致主张应先进行陆上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作为总指挥的安东尼擅长陆战。此外，一旦陆战获得胜利，安置于普雷韦扎待命的船队可立即装载陆军登陆意大利南部，可北上一口气拿下首都罗马。

然而经常出席作战会议的克娄巴特拉却有别的考虑，她主张应当先进行海战。理由很简单，因为海上力量占优。对于这位名义上是总司令的埃及女王，将士们毫不留情地加以反驳。



东地中海略图

他们认为，船队仅是待命于敌人无法攻击的普雷韦扎湾内，就已是极大的优势，无须舍弃这一优势而挑起海战。但是克娄巴特拉无意收回成见。最终的决定由事实上的总司令安东尼来决策。安东尼经过短暂的考虑，最终采用了克娄巴特拉的主张。

这倒并非出于他与克娄巴特拉的私情，而是出于他自己对局势的判断。

安东尼最为忌惮的是屋大维军队的脊梁——百人队队长。此次战役，原恺撒麾下的百人队队长们大多是自愿参加的。安东尼在恺撒麾下从军团长一直做到恺撒副将，他对百人队队长令人恐怖的出名的勇猛心知肚明。如果是进行海战的话，他们的威力将被大大削弱。

克娄巴特拉的主张不止上述一条，她甚至还要求海战失败之后第二次战役的决定权。作战会议决定，如果海战失利，陆海军将一同撤往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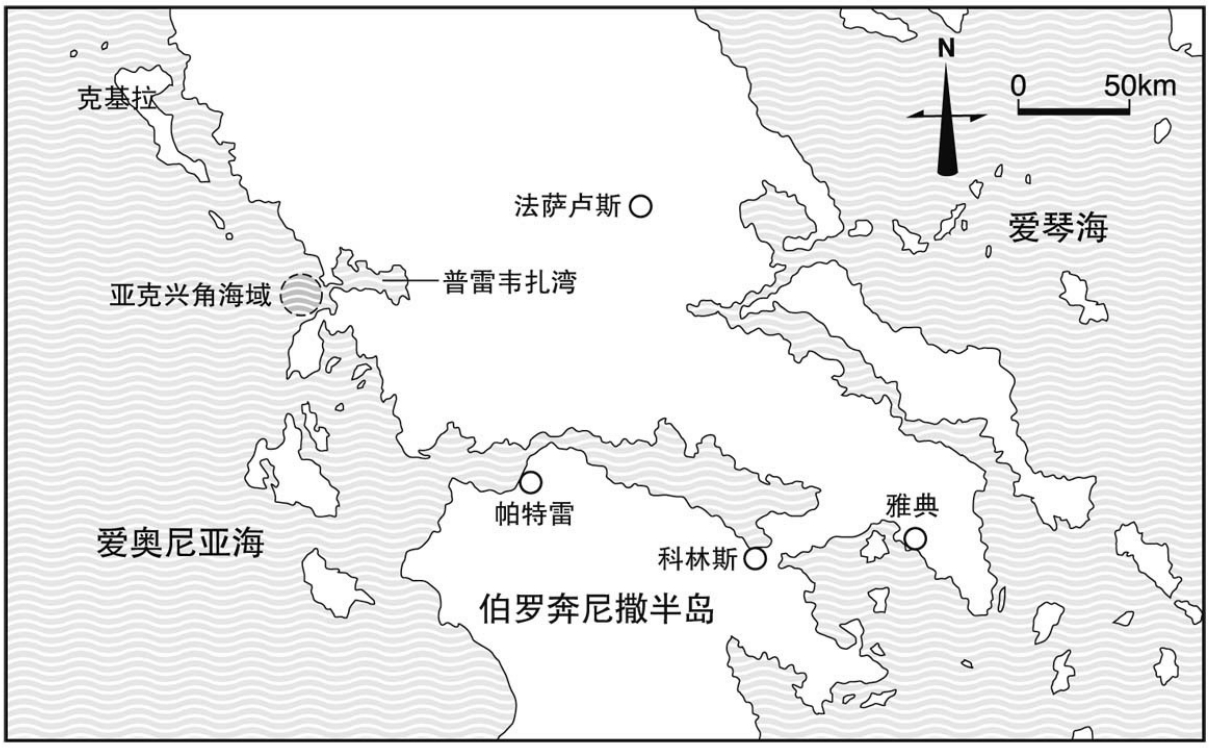
及，在那里迎战罗马军队。

身为总司令，必须要表明一决胜负的强大意志，才能率领将士们征战沙场。即使心中考虑过关于败北之后的对策，也只能深藏于心中，而不应将其公之于作战会议之上。因此，此事不仅是克娄巴特拉越俎代庖的结果，也是安东尼不具备全军总司令才能的证明。

此外，克娄巴特拉列席作战会议的次数日益增多，也令安东尼麾下将领们逐渐陷入绝望。他们认为自己仅是宣誓效忠罗马，而并非效忠于埃及女王的丈夫。因此，屋大维在希腊登陆之后，他们纷纷决定弃安东尼而去。

士官的背叛，势必导致其麾下士兵的背叛。拂晓未至，安东尼阵营里已是空帐累累。在作战会议现场，将领的席位也像掉了齿的梳子一样，出现很多空缺。狂怒的安东尼下令，处死每一名被擒返的逃兵。但这样的行事方法只能使脱阵逃走的齿轮越转越急。

进入夏季之后，原本应在安东尼麾下效力的东方诸侯们已经有很多投奔了屋大维，其中的急先锋当属统治犹太的希律王。原本犹太人就对恺撒怀有感恩之心，因为正是由于恺撒当年的政策，犹太商人才能够拥有和希腊商人同等的地位。恺撒被杀之后，他们自然对恺撒的义子屋大维带有天生好感。此外，对犹太人而言，克娄巴特拉的获胜，意味着他们在经济上的对手希腊人将再度取得优势。



希腊西岸地域图

与此同时，希腊人此刻也开始对克娄巴特拉的野心感到忧惧。安东尼军营中的逃兵在他们眼中是情况恶化的先兆。斯巴达首先向屋大维遣使表示恭顺。之后，犹太人、希腊人及东方诸城邦的使节也都齐聚于屋大维的帐下了。

在此之前，安东尼并不急于进行决战，他原打算凭借己方丰富的军资、充足的军粮拖延屋大维军队，消耗其原本就不充足的军资，然后再进行决战。然而急转直下的形势令安东尼不得不速战速决。

相反，屋大维此刻倒是悠闲起来了。那些背叛安东尼的士官们给屋大维带来了很多情报，敌方的内部情况已被屋大维尽握手中。这位年仅32岁的年轻领袖也用非常巧妙的方式来对待投诚士兵。这些士官们对屋大维说，他们虽然离开了安东尼，但是也无法与其兵戎相见。屋大维因此给予他们自由之身，允许他们自由回国。消息传到安东尼这边，更多的士兵从阵营里逃走了。事已至此，海战已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无关

安东尼的意愿。

此外，那些至今仍然愿意誓死效忠于安东尼的罗马士兵们来到普雷韦扎湾内，准备登船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战舰的桅杆下面，竟然放置着随时都能扬起的风帆。

如前所述，一流的司令官会考虑战场上的退路，但是不会将其心思轻易表露于人前。唯有表现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士兵们才会奋不顾身地殊死战斗。在海战中对风帆的运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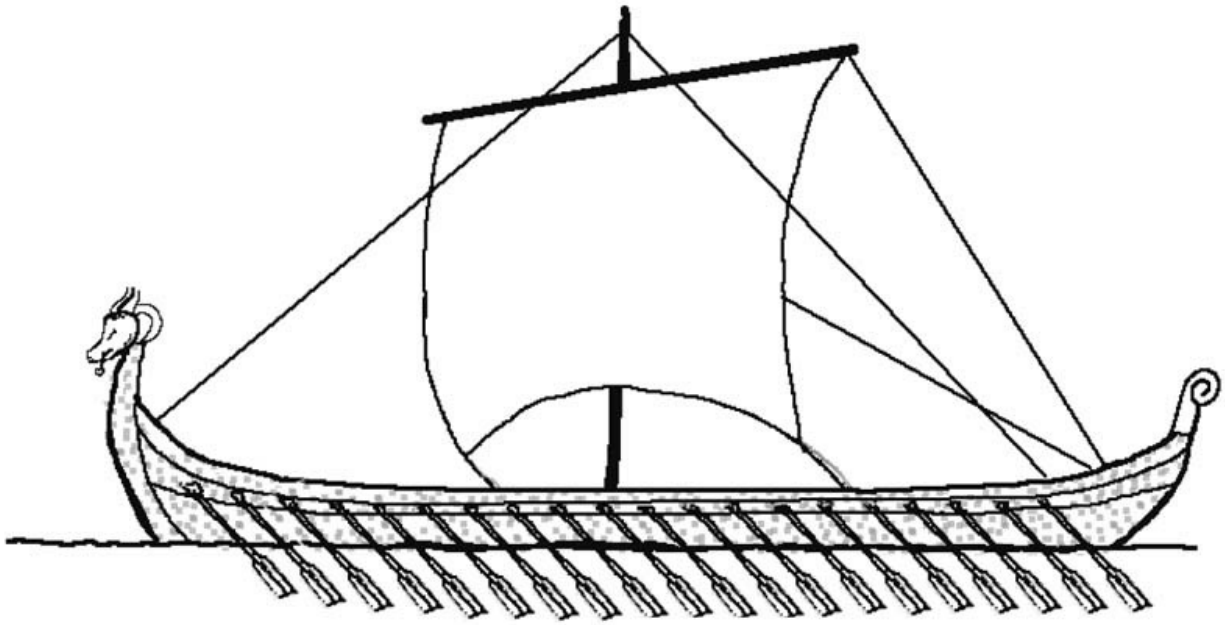
在地中海，尽管风帆的形状从四角变成了三角，但是用纯风帆而不配备桨的帆船，一直都只作为商船使用。不同于印度洋和大西洋，地中海上的风向随时会发生变化，因此，以船桨作为马达之用的单层帆船，是最适用于地中海海域的。不过，船桨终究只能作为马达使用，所以船上都附有风帆。配有船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顺风时可以扬帆航行，让桨手休息。在无风、逆风或者进出港口时，桨手的作用就充分发挥出来。

在海战中，对船只的控制程度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直到纳尔逊时代，大炮才被应用于海战。在此之前，海战其实都是两船相接的白刃战。因此在当时，海战的主力始终是船桨，即使是顺风时也不会使用风帆，因为风向随时都会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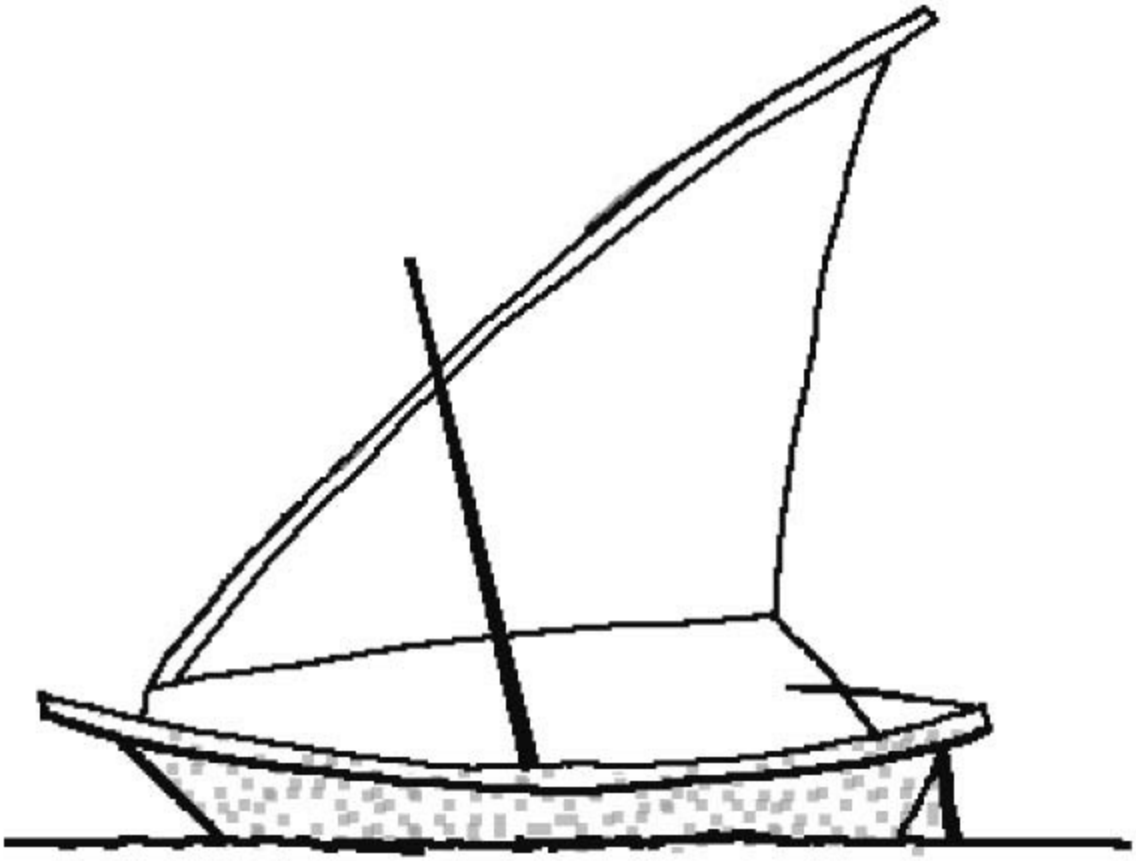
在纳尔逊时代，海洋已登上历史的舞台。那时的战舰都竖着高高的桅杆，帆架固定于其上，与桅杆呈90度交叉，船帆就折叠于其中。但是在地中海时代，情况并不一样。地中海时代的帆是拴在帆架上的，在需要扬帆时通过固定在桅杆上的滑轮升起。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帆架和帆都没有固定。因为在风向变幻莫测的地中海，要做到随时可以扬帆，就必须有360度的扬帆角度。

因此，在进行海战时，只有船桨有用武之地，帆则成了无用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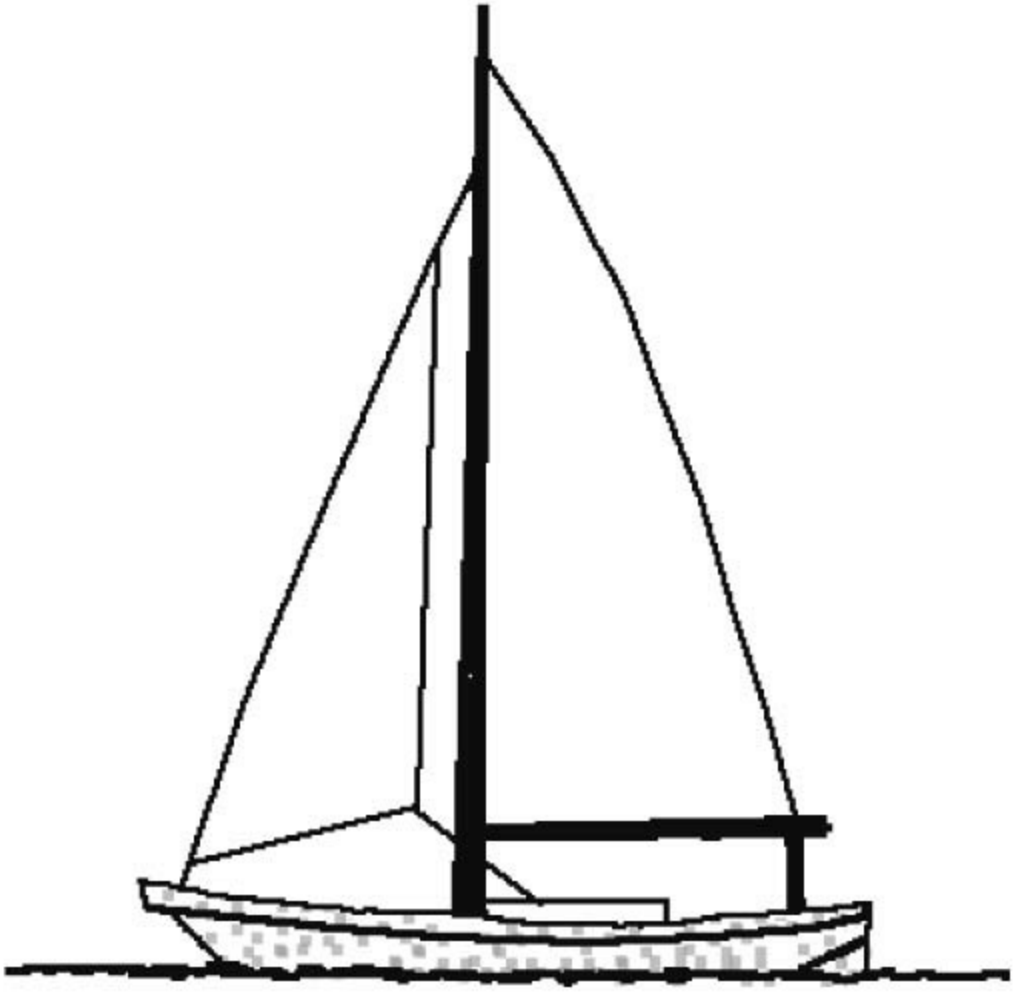
有些司令官甚至会把拴帆的帆架安置于海战战场之外待命的物资输送船上，以表明背水一战的决心。这和参加比赛的高速小帆船上不会放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是一个道理。另外，即使船上放着风帆，也不会将绳子穿到升帆的滑轮上，因为那就等于告诉别人，随时都准备升帆逃走。安东尼的士兵们在登船时之所以感到惊愕，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战船上放置着随时都能够升起的帆。



古代的四角帆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三角帆 （又称拉丁帆）



现代游艇所使用的百慕大帆

就在那一天夜里，有十几艘大船趁着黑暗逃走了。到8月末，当安东尼乘上大船，以及拥有大批随侍奴隶的克娄巴特拉登上旗舰时，已有60艘以上约一个分队的大船消失了。

公元前31年9月2日清晨，大决战拉开了帷幕。根据海战发生的地点，历史上称此次海战为“亚克兴角海战”。

是日天气晴好，东风与便。安东尼军队披着日晖顺风而行，驶出了普雷韦扎湾。一切皆如安东尼所愿。

凭借着自身船只数量及马力、吨位上的优势，安东尼决定采用包围战的战术。而屋大维的前阵总指挥阿格里帕所使用的战术也是包围战。他认为在普雷韦扎湾的狭窄入口处对敌人进行围攻，可以弥补自己在船只数量和马力上的劣势。

从布阵阶段开始，事事都按安东尼的意愿顺利进行。考虑到从普雷韦扎湾出发的顺序，负责守护克娄巴特拉旗舰的全体埃及船只都排列在位于中央位置的第二梯队，安东尼所乘坐的船只位于右翼。按照包围战术，他所指挥的是先头部队的右翼。

屋大维的军队在宽阔的海面上排成弧形，严阵以待。屋大维坐镇中央，军事总指挥阿格里帕的船只位于左翼，正对安东尼的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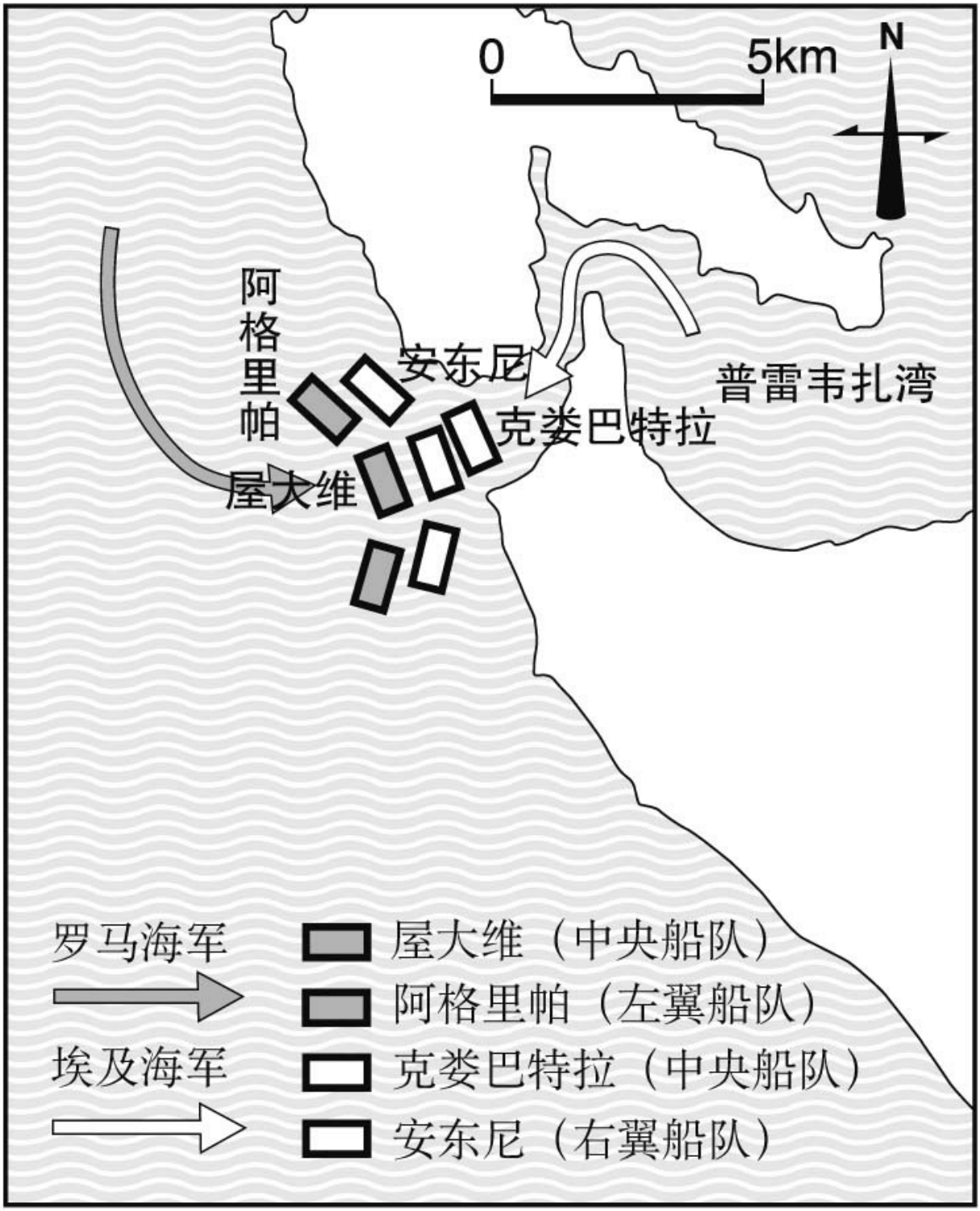
海战的前半阶段尚在安东尼意料之中。利用风向和马力优势，安东尼的战船迅速迫近敌军。由于战线的扩大，克娄巴特拉位居后方中央的旗舰也投入战阵之中。海战进入到第二阶段，海面上充斥着船只冲撞声和士兵们的呐喊搏杀声。450艘船只与400艘船只的激烈对撞，全战线陷入一片地狱般的光景。

此时，风向突然从东风转为北风。38岁的克娄巴特拉不甘只当观战角色，而是加入了指挥的行列。眼前地狱般的光景使得她从堂堂埃及女王跌落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没有下令突击，而是下令扬帆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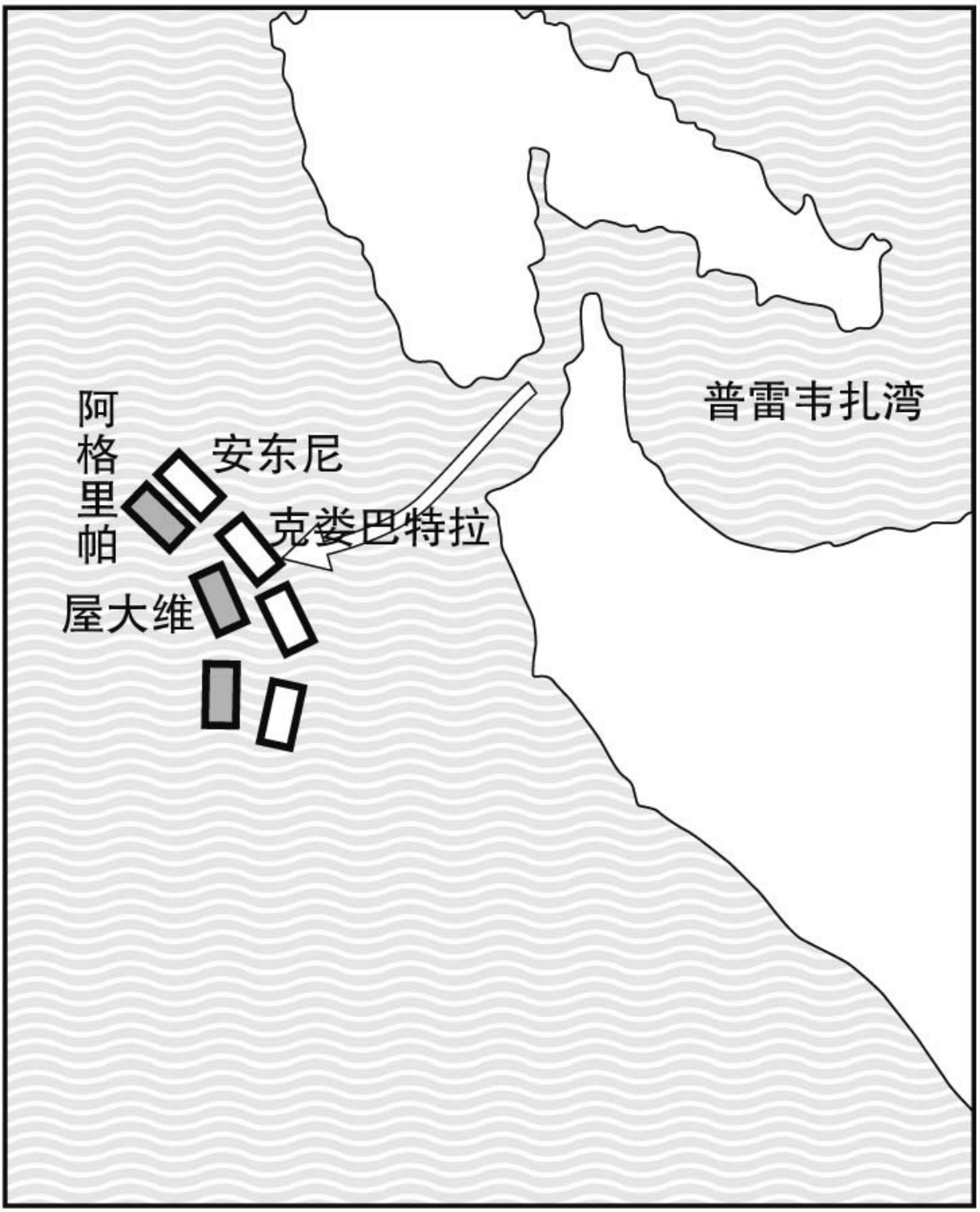
巨大的紫色风帆瞬间鼓胀起来，桨手们也全力划桨。守护旗舰的60艘战船也全部逆风起帆，追随着南逃的旗舰而去。

见此光景，右翼指挥安东尼瞬间忘记了武将身份，下意识地也扬帆追随克娄巴特拉而去。在他逃离战场回望之际，他弃之不顾的船队已被阿格里帕团团包围，处在普雷韦扎湾狭窄入口处来不及逃脱的船队全部高举船桨投降。见此情景，安东尼伏在船尾，动弹不得。此时他的脑中也想不起要前往待命于帕特雷的陆上部队了。古代的史学家曾毫不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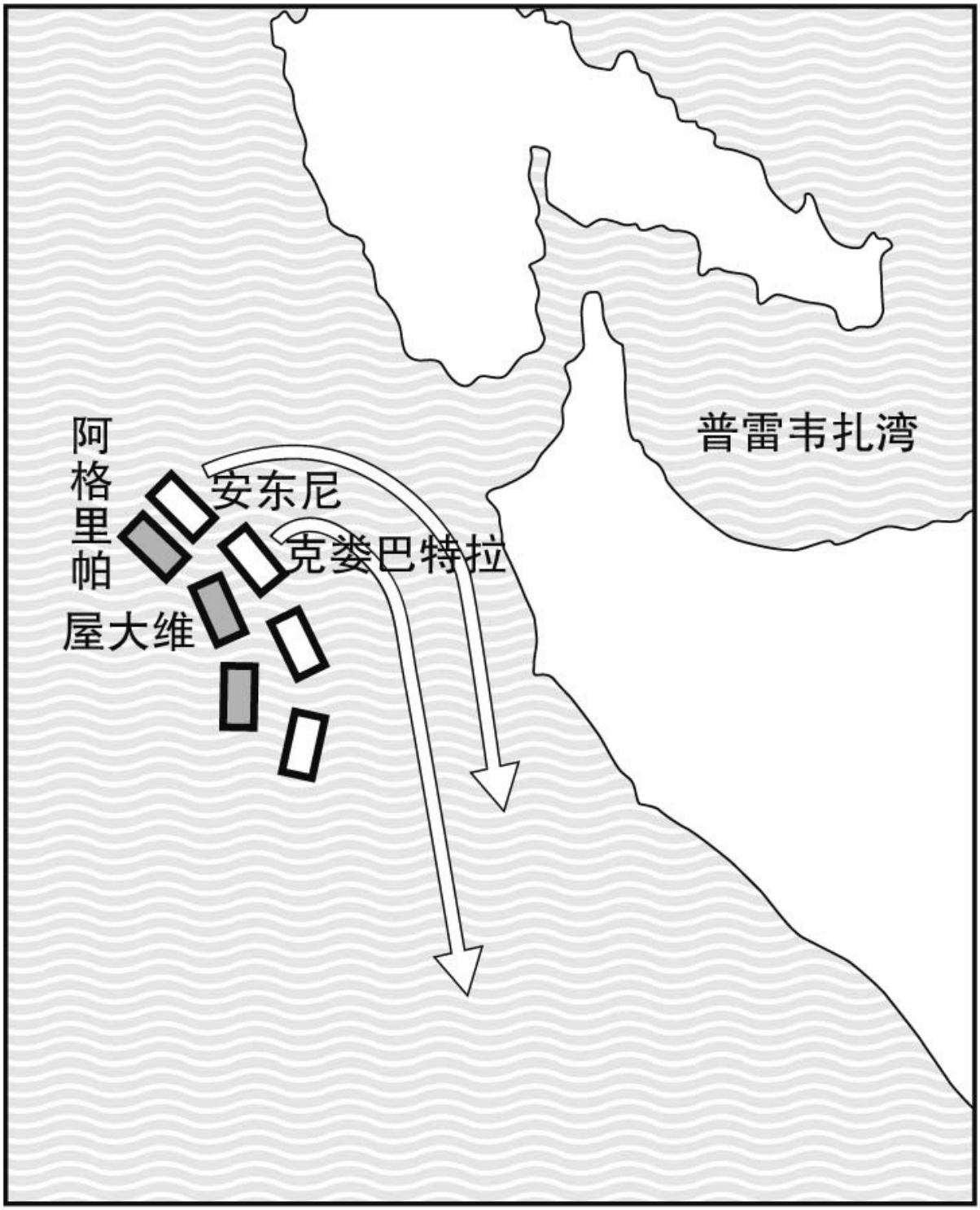
地评价道：“作为男人，他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已然终结。”


0
5km
N
阿格里帕
安东尼
普雷韦扎湾
克娄巴特拉
屋大维
罗马海军
屋大维（中央船队）
阿格里帕（左翼船队）
埃及海军
克娄巴特拉（中央船队）
安东尼（右翼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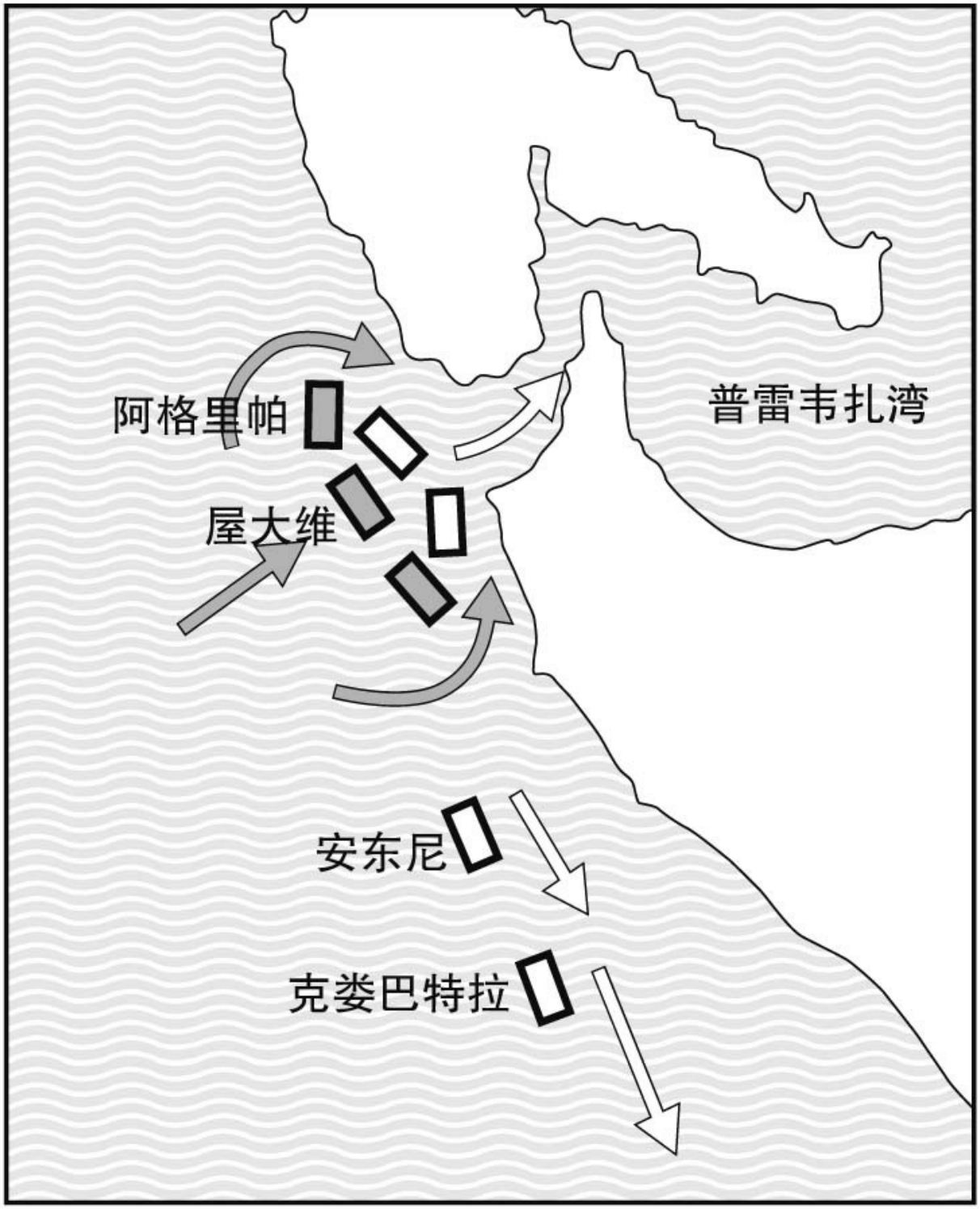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最终阶段

罗马军队俘虏了逾300艘战船。屋大维饶了所有士兵的性命，却将所有埃及战船的船首切断，将船身全部焚毁。

安东尼的陆上部队在帕特雷足足待命了8天。没有收到安东尼任何消息的士兵们终于在第九天向屋大维投降了，此前屋大维曾允诺饶恕他们性命。

克娄巴特拉本身大概也没有打算逃走，或许她是在执行作战会议上的那个决议，也就是在海战作战失败之后逃回埃及，待机再战。

然而她在错误的时间执行了这一决定，并且事先也没有和安东尼有任何商量，就随意地做出了行动。战场不是庆典会场。如果仅仅因为听到惨叫就变得惊慌失措，她就应该守在亚历山大的皇宫，而不应跑到战场上来。

倘若安东尼能够脚踏实地地认真对待此战的话，亚克兴角海战是否会出现不同的局面呢？毕竟若论武将之才的话，安东尼与阿格里帕不相上下。还是说这一战和其他的战役一样，胜败早已注定？

不管怎么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是在有获胜可能的情况下中途放弃的。

安东尼没有追随心爱女人的脚步前往埃及。他的战船没有驶往东南方向的亚历山大港，而是在南面的现利比亚所在地昔兰尼加登陆。总司令在海战中途扬起风帆逃窜时，有许多右翼的船只跟随他左右——大概有10多艘战船。所以此时他手上总共约有6000名士兵，但51岁的安东尼已经心灰意冷，再无斗志可言。他躲在海边的家中终日眺望海面，并在给克娄巴特拉的信中表示，他希望克娄巴特拉能放任他一人安静地度过余生。

克娄巴特拉无法对安东尼置之不理，或者说，如果她离开安东尼的

话，自身也会陷入危机当中。她数度给安东尼写信，恳求他前往亚历山大港。最终，安东尼还是无法对克娄巴特拉的恳求视若无睹。

在埃及皇宫里，克娄巴特拉得以再度与安东尼相会。她曾数度鼓励意志消沉的安东尼，令其东山再起，然而这次的情况不同往昔。今时今日，就是那些对安东尼个人心存好感的士兵们，也陆续背弃他投奔了屋大维。即使是克娄巴特拉以高薪诱惑，也只有极少数安东尼的死忠部属愿意留下，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素质低劣如同强盗的兵痞。

作为一名武将，安东尼深知在值得信赖的幕僚尽数散去之后，想要东山再起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一次无论克娄巴特拉如何哀求，安东尼也再无重整军队再战屋大维的斗志了。

亚克兴角海战后，屋大维没有返回罗马述职，而是和阿格里帕一道缓慢地以追击为名义行经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这一路不仅与发誓效忠罗马的诸王侯重续同盟之约，同时还要整顿在安东尼的放任统治下已混乱不堪的各行省统治机构——这是两件刻不容缓的事。亚克兴角海战意味着原本属于安东尼势力的罗马世界东半部分，现已成为了屋大维囊中之物。诸位王侯再也没有谁站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一方了。

大决战终幕

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30年的春天。安东尼给已抵达叙利亚的屋大维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以自己之死来换取屋大维对克娄巴特拉的帮助。

屋大维并未回信给安东尼，却给克娄巴特拉写了一封回信。此前，克娄巴特拉曾写信给他，表示自己愿意退位，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埃及王位。屋大维的回信要求克娄巴特拉首先解除武装。本来克娄巴特拉对此尚抱着一线希望，然而熟知屋大维性格的安东尼明白，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克娄巴特拉首度萌生了放弃安东尼的念头。她早知此战最终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将之扩大为埃及和罗马之战的，却正是她自己。她大概认为屋大维的目的只是想用这场扩大了的战争来打倒安东尼而已。当年，无论是在庞培的东方称霸时期，还是恺撒时代，埃及王国都以独立的形式存在。这一次，克娄巴特拉大概也想在屋大维手下将政权延续下去吧。如果不是出于此种考虑的话，也就无法理解她为何突然躲入灵庙了。著名的“托勒密财富”就藏在灵庙当中。她是否想以此财富来作为与屋大维进行交换的条件，以换得埃及王国的存续呢？罗马流传着一句名言，克娄巴特拉或许并不知晓。

“拥有战士，就可以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却不一定能够创造战士。”

此时安东尼内心又在思考些什么呢？我们完全不得而知。然而当他获悉罗马军队正在逼近时，他还是率领最后的残余骑兵迎战了。

7月31日，安东尼率领的骑兵与屋大维的先头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就在安东尼看似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安东尼麾下的骑兵统统投奔了屋大维。此时，来自埃及的使者抵达，向他宣布了女王的死讯。此次报讯乃是奉克娄巴特拉之命行事。

比起部下的背叛，爱人不在人世的消息更令安东尼感到绝望。这位51岁的武将与其奴隶曾有过约定，他对他的奴隶说：“履行约定的时刻已经到了。”忠诚的奴隶没有按约定将剑刺向主人，而是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在死去的奴隶面前，安东尼对于自己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感到无比羞愧，他拔出奴隶胸口的剑，刺向了自己。

但是他没有马上死去。正当他忍受着重伤痛楚的时候，又有使者前来向他传达了女王并未死去的消息。原来在谎报了自己的死讯后，克娄

巴特拉立刻后悔了，所以马上又派使者向安东尼报告真相。失血过多的安东尼用最后一口气对身边的数名部下说，希望能够将他抬到女王身边。

灵庙的入口已按照克娄巴特拉的命令严密封死，因此将士们只能将安东尼从高处的空窗塞进去。

克娄巴特拉含泪抱住了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的安东尼。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死在了克娄巴特拉的怀中。终生不渝地倾心于一个女人，也是男人的生命方式之一。

安东尼死的那天是8月1日，同日屋大维进入了亚历山大港。埃及首都没有一人试图抵抗这位胜利者。军队直指王宫，屋大维才得知安东尼的死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命令将女王活着带到面前。

克娄巴特拉自然是殊死反抗。她封锁了灵庙的入口，在谁也无法进入灵庙的情况下，向屋大维提出交涉要求，希望以灵庙财宝作为条件，换得她与恺撒之子继承王位。屋大维未予答复。就在克娄巴特拉还在灵庙内负隅顽抗时，屋大维的部下从灵庙上部成功攻入。

侵入灵庙的士兵们将克娄巴特拉带到灵庙之外，“托勒密财富”也尽入屋大维之手。财富之巨虽然无法估量，但是屋大维将其运回罗马之后，这些财富不仅为屋大维提供了全部士兵的薪水以及退役士兵购买土地的资金，还有余款用于建设公共事业。此外，这笔财富还令罗马的年利率从12%骤降为4%。由此也可看出，在东方专制国家，财富几乎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

被带到王宫之后，克娄巴特拉才知道屋大维如何处置她的子女。

他下令将年仅17岁的恺撒二世处死。

10岁的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克娄巴特拉·塞勒涅这对龙凤胎被送至

罗马，交给安东尼的原配妻子屋大维娅抚养，6岁的男孩托勒密·菲拉迪鲁法奥斯与他的兄长和姐姐一道，也被送至罗马抚养。克娄巴特拉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继承王位的努力成为了泡影。

直到此时，克娄巴特拉是否才真正开始理解恺撒所为的真意呢？——他不承认自己的亲生骨肉，对儿子、对克娄巴特拉都有好处。所以他既不承认，也没有在遗嘱中正式提及自己有这么一个儿子，正是他对克娄巴特拉的爱意之所在。

克娄巴特拉的所有子女当中，屋大维只杀了她和恺撒之子。她和安东尼所生的三个子女都平安无事。因为对屋大维而言，恺撒之子——即尤里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

据说在王宫内，39岁的女王和33岁的胜利者进行了谈判。谈判内容如何，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不得而知。有几位古代的历史学家写道，克娄巴特拉对屋大维使出了曾经奏效于恺撒和安东尼的手段，但是屋大维不为所动。是不是在年届40岁之际，连闻名遐迩的“克娄巴特拉魅力”也失去效力了呢？

笔者个人并不认同这个判断，而是认为克娄巴特拉并未作出此等尝试。女人就像猫一样，能够敏锐地分辨出会宠爱自己的人。一个男人是否能为自己魅力所动，在四目相接的瞬间就能够被判断出来。

从时年33岁的美少年屋大维那冷酷的眼神里，克娄巴特拉第一时间已经意识到这种战术是注定徒劳的。自负为一流冒险家的克娄巴特拉，不会做出此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或许早在第一次见到屋大维时，克娄巴特拉就已完全地断了念想，清楚地认识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由于看不清现实而一直在犯错的克娄巴特拉，在最后时刻终于认清了现实。自己将被送到罗马，在屋大维的凯旋仪式上被作为最好的战利品示众，然后步自己的妹妹阿尔

西诺伊的后尘，在意大利的某处靠年金过活。如果执著地苟活人世的话，她40岁以后的人生将是如此。因为按照罗马的传统，战败国的国王不会在凯旋仪式之后被处死。

克娄巴特拉决心一死以谢天下。与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苟活人世，还不如带着一代女王的尊严死去。事实上，这也正是屋大维所期盼的。不管是作为女王还是别的什么，她的永久消失对他而言都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说屋大维打算将克娄巴特拉活着押送到罗马的话，那么当时对她的监视未免过于宽松了。

被深困于王宫之内的克娄巴特拉，虽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排场相比，但是依旧有奴隶役使，仆人们也可以自由进出王宫。她命人将毒蛇藏在装有无花果的篮子里，带进了王宫。

克娄巴特拉对屋大维说，她想为安东尼敬上一杯酒，因此请求他允许自己前往灵庙。屋大维答应了她的请求。看守克娄巴特拉的士兵护送她到灵庙前，并按照屋大维的命令在外守候，放克娄巴特拉和两名女仆进入了灵庙。

毒蛇之液结束了为野心所驱使的女王的一生。据说，在死去之时，克娄巴特拉穿上了女王的盛装。不过这盛装是埃及女王的服饰，抑或是代表希腊血统的托勒密王朝女王的服饰，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前者，那么正好迎合了莎士比亚时代以后欧洲人对异国情调的审美趣味；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会使罗马人受到很强的冲击。与埃及3000年的文明相比，当时的罗马人更关心3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是后者，屋大维就是将罗马人所尊敬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逼上了绝路。克娄巴特拉死后，两位希腊后裔的女仆也以同样的方式追随主人，自杀身亡。

屋大维发行的征服埃及纪念银币正面：屋大维

屋大维发行的征服埃及纪念银币反面：埃及的象征鳄鱼

克娄巴特拉给屋大维留了最后一封信，要求屋大维允许将自己葬在安东尼旁边。对于克娄巴特拉所有的要求，年轻的胜利者仅仅应允了她这一个。

自公元前333年开始，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战胜波斯、统治埃及，到公元前30年，持续了300年的希腊系托勒密王朝，以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死画上句号。

公布了女王的死讯后，屋大维布告天下，宣告了对埃及王国的领有权。埃及并不作为罗马的行省，而是作为他个人的私有领地。因为在埃及，统治者必须是神的后裔，因此不能接受“罗马公民及元老院”（S.P.Q.R.）的统治。而屋大维自己是已经升格为神的恺撒之子，以“神之子”的身份来统治。此种形式，亚历山大大帝早有先例在前。

这样一来，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众多将军们所创立的众王朝中硕果仅存的托勒密王朝覆灭了。倘若可以像其他的诸王国一样，认可罗马霸权，并以同盟国的形式存在，托勒密王朝必不至于遭受灭亡的命运。

结语

胜利回国的屋大维在首都举行了历时三天的狂热而壮丽的凯旋仪式。然而市民们对这名33岁胜利者的狂热并不仅仅因为他所取得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对终于结束的内战的欣喜。屋大维也深知这一点。他下令关闭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自罗马第二任国王努马开始，供奉着战神雅努斯的神殿之门开着时，就表明罗马处于战争状态。

但是，关闭战神雅努斯神殿大门的机会，本来无须等到公元前30年。公元前45年，拥立庞培遗子的庞培派们兴起的最后抵抗，被恺撒镇压，史称“孟达会战”。战役结束之后，恺撒回国之日本应是大门关闭之时，然而半年之后，布鲁图等人暗杀恺撒，使得这一好机会迟来了14年之久。这14年以后，也还是恺撒所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取得了胜利。真是不知为什么要暗杀，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14年。对作为国家的罗马来说，唯一的收获就是征服了埃及，可是它最终也还是成为了屋大维的私人领地。不管结果如何，罗马人同室操戈、不断扩大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公元前44年春，曾经谁也没有料到会成为恺撒指定继承人而突然闯入历史舞台的18岁少年，如今已年届33岁。再也没人会问“谁是屋大维？”这样的问题了。当时的“孩子”经过14年，已经坐实了恺撒所指定的继承人地位。不是安东尼，也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这个当时还是“未知数”的18岁的屋大维成为恺撒继承人，这正是慧眼识才的恺撒高瞻远瞩的胜利。

战神雅努斯

公元前46年，恺撒在北非的塔普苏斯击败庞培派回国后，其施政的基本方针是“宽容”。公元前30年，击败安东尼回国成为和恺撒一样的罗马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施政的基本方针是“和平”。至此，罗马实现了“Pax Romana”，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然而和平并非只靠希望和口号来实现的。从33岁开始，屋大维将创建一个由恺撒曾经构想并着手开始构建、后来又不得不终止的新罗马的

大任负于肩上。

恺撒的肉体死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然而恺撒真正死去是在公元前30年。从这一年开始，罗马进入了屋大维时代。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奥古斯都时代”。因为奥古斯都取代了恺撒所推翻的罗马共和制度，建立了罗马帝国制度，成为了首位开国皇帝。

德国杰出的古典史学家蒙森（Mommsen）在评价共和时代的罗马历史时，将恺撒称为“罗马诞生的唯一的创造性天才”。然而这位天才在主张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的崇古主义者甚众的时代，只能凭一己之力来进行所有的改革。屋大维虽然不是创造性的天才，但是他具备了恺撒时代所没有的两大有利条件：

第一，崇古主义者们在公元前49年到公元前30年的内战中都死绝了。

第二，有阿格里帕和麦克纳斯等同辈人的大力支持。阿格里帕是恺撒亲选的屋大维的帮手，麦克纳斯是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自己发掘的助手。这三位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了“Pax Romana”的构建。这个年轻的力量团体，正与罗马朝着新生时期迸发的需要相符的。

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前）	100	91（9）（括号内为恺撒年龄）	90（10）	89（11）	88（12）	87（13）	86（14）	85（15）
恺撒	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于7月12日出生于罗马「苏布拉」地区。父亲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母亲为奥雷利娅（出身于奥利乌斯·科塔家族）							
国家罗马	护民官萨图纽斯修订《小麦法》、提出新殖民地城市法、向元老院宣誓公民大会的优先决议权后，遭反对派暗杀	护民官德鲁苏斯提出将罗马公民权给予全体自由人的法案，遭反对派暗杀	「同盟战争」开始时任执政官，恺撒伯父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成立《尤里乌斯公民权法》	《公民权法》成立，「同盟战争」实际上结束，罗马迈入世界性大国	时任执政官、恺撒姑夫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斗争拉开帷幕。苏拉通过军事政变迫使马略流亡，杀死护民官苏尔皮修斯。苏拉开始进军东方	执政官马略和秦纳控制罗马，报复苏拉派。恺撒伯父尤里乌斯被杀	马略死后，秦纳独裁	
地中海世界		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侵占比提尼亚、帕加马			米特拉达梯攻占罗马小亚细亚西岸行省，挑起雅典反抗。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开始（~前84）		苏拉攻占雅典，并于喀罗尼亚战役中大破本都军队，获得两次压倒性胜利	苏拉、米特拉达梯于达达尼尔和谈。苏拉转战小亚细亚，开始再度构筑其统治体系
中国		司马迁完成《史记》				汉武帝崩，汉昭帝即位（~前74）霍光摄政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84（16）	83（17）	82（18）	81（19）	80（20）	78（22）	77（23）	76（24）	75（25）	74（26）	73（27）
恺撒	恺撒父亲去世，在秦纳授意下，恺撒与秦纳之女科尔涅利娅成婚		苏拉命恺撒离婚，恺撒拒绝并逃往小亚细亚，加入行省总督米努修斯部队，任幕僚（～前81）		恺撒参与米努修斯的莱斯博斯岛战役	恺撒回国	恺撒筹备入律师界失败	恺撒为留学前往罗得岛，途中遭遇海盗			恺撒回国，出任祭司及大队长
国家罗马	秦纳被部下所杀	苏拉远征归国，联合梅特鲁斯·皮乌斯、克拉苏、庞培大胜正规军，扫除平民派。萨图纽斯逃往西班牙（～前82）		苏拉就任无任期独裁官，重建共和政体，进行国政改革	苏拉辞任独裁官	苏拉卒	雷必达起兵反抗苏拉体制，被庞培镇压				加普亚发生「斯巴达克斯之乱」
地中海世界					行省西班牙的塞多留战役开始（～前72）				庞培担任塞多留战役指挥		米特拉达梯再度进攻比提尼亚。卢库鲁斯出任奇里乞亚总督后，大败本都军队。开始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役（～前67）
中国										汉宣帝即位（～前49）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72（28）	70（30）	69（31）	68（32）	67（33）	66（34）	65（35）	63（37）	62（38）	61（39）
恺撒		恺撒出任财务检察官（或者是前69年），赴远西班牙。回国后任元老院议员		恺撒于姑姑——马略之妻的葬礼上发表大胆的追悼演说。妻子科尔涅利娅卒			恺撒出任监察官。自费修补阿皮亚大道工事，自费开展华丽的角斗比赛	恺撒在好友护民官拉比埃努斯的帮助下，成功出任大祭司。移居古罗马广场官邸。并与拉比埃努斯一起挑战元老院体制的强权	恺撒出任法务官。因第二任妻子庞培娅和克劳狄乌斯的暧昧关系，恺撒与妻离婚	恺撒赴远西班牙任行省总督，并任用当地人巴尔布斯征服大西洋岸
国家罗马	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斯之乱」。庞培自西班牙凯旋	克拉苏和庞培出任执政官			庞培名气急升			西塞罗出任执政官。「喀提林阴谋」时西塞罗、恺撒、小加图进行论战。阴谋失败后，3000人被杀	屋大维出生。庞培回国，元老院派感受到危机	庞培举行凯旋仪式
地中海世界	萨图纽斯被副将拉比留斯刺杀，战争终结	本都和亚美尼亚同盟成立。卢库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军队后，进入里海，后撤退	埃及托勒密十二世次女克娄巴特拉出生		庞培肃清地中海海域海盗，确立地中海全境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开始征讨米特拉达梯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役开始。庞培大破本都军队，与帕提亚、亚美尼亚建立同盟，进入幼发拉底河西岸。军事称霸叙利亚（～前63）	庞培入主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城	米特拉达梯六世自杀，战争结束。塞琉古王朝灭亡。叙利亚成为罗马行省。庞培征服东方诸城邦，将地中海全域纳入罗马霸权下		
中国	汉朝与乌孙夹击匈奴，大胜			霍光卒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60（40）	59（41）	58（42）	57（43）	56（44）
恺撒	恺撒回国，为次年执政官候补人选。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三头同盟」。开始改造国家的第一步	恺撒出任执政官。恢复执政官轮流执政制度，开始元老院日报制度，实施庞培提出的整编东方诸城邦提案，实行《尤里乌斯判例法》（《国家公务员法》）在元老院大会通过《尤里乌斯农地法》，打击了元老院派。调整负责行省税征收从业人员法案。帮助流亡意大利的埃及托勒密十二世（克娄巴特拉之父）复位。日耳曼人首领的成为「罗马的友好同盟」。将女儿尤利娅嫁与庞培。迎娶元老院议员皮索之女卡尔普尼娅为妻。强行通过《瓦提尼乌斯法》，出任北高卢、伊利里亚、南部高卢的总督。赴任途中安排小舅子皮索和庞培的左右手盖比尼乌斯出任次年执政官、克劳狄乌斯为护民官	高卢战役第一年。出任高卢总督，副将为拉比埃努斯。高卢的赫尔维西亚人被日耳曼驱逐，36.8 万人从瑞士列曼湖东侧转移到布列塔尼亚地区。12 万日耳曼人度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恺撒反对将赫尔维西亚人并入罗马行省。越过边境进入高卢。与埃杜伊人结盟。恺撒突袭索恩河岸的赫尔维西亚人，后获得比布拉克特战役大捷，与赫尔维西亚议和。赫尔维西亚 10 万人返回瑞士。应高卢人要求与阿利欧维斯图斯和谈但后来决裂。与阿利欧维斯图斯再度于贝桑松谈判决裂，展开战役，大败日耳曼人。将冬营地设在贝桑松，表明莱茵河成为罗马的基本国界防卫线	高卢战役第二年。进军高卢东北部，与雷米人结成同盟。对阵比利时的 29.6 万人大军、总指挥是苏威西翁内斯人的盖尔巴。恺撒越过埃纳河，在敌地构筑阵营并击溃比利时军队。进入现在的比利时境内，击败内尔维人。接着大破阿都阿提奇人，并俘虏 5.3 万人为奴隶。压制高卢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部族皆归顺恺撒，获得整个高卢地区的「和平」。将冬营地设在奥尔良	高卢战役第三年。恺撒、庞培、克拉苏进行「卢卡会谈」。维内利人接受高卢西部诸部族的挑战，开始进攻不列颠地区。青年布鲁图指挥恺撒军队在海战中击溃维内利人。拉比埃努斯在莱茵河流域、萨比努斯在诺曼底、青年克拉苏在阿奎塔尼亚分别取得了胜利。为征服摩利尼人和梅那庇人，恺撒下令在深秋时节撤退到诺曼底，在那设置冬营地
国家罗马			小加图往塞浦路斯赴任。西塞罗遭到护民官克劳狄乌斯报复逃往希腊	由于庞培的消极、护民官克劳狄乌斯的过激、小加图归国、西塞罗被解除流放等，元老院派开始反击「三头政治」。庞培被任命掌管五年内的粮食。克劳狄乌斯的私警团开始对抗米罗的暴力组织	
地中海世界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55 (45)	54 (46)	53 (47)
恺撒	高卢战役第四年。恺撒从德国西北部进军，直指莱茵河，击败日耳曼民族中的乌西佩提人和帖恩库贴利人。并于现在的波恩和科隆之间架设桥梁渡过莱茵河。征服西卡恩布利人和乌比人，分裂日耳曼人。恺撒军西移。第一次远征不列颠。横渡多佛尔海峡后，于不列颠（今英国）登陆。为随父出征赴叙利亚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配置1000名骑兵。将冬营地设置在亚眠。恺撒母亲奥雷利娅卒	高卢战役第五年。征服特雷维利人，第二次远征不列颠，以游击战击败不列颠军队。渡过泰晤士河，击败卡西贝拉努斯指挥的不列颠军队。接受不列颠议和后退回高卢。因高卢小麦歉收，冬营地分为8个分散各地。因伊布洛斯人的奸计，失去9000名士兵。涅尔维人联合阿都阿提奇人，及6万人比利时军队围困昆图斯·西塞罗冬营地。恺撒前往救援，击败敌军。恺撒首次在高卢过冬	高卢战役第六年。恺撒征服涅尔维人后，在巴黎召开高卢全体部落族长会议，迫使加努特斯人和歇诺内斯人臣服，从此确立了背后的安全保障。征服梅那庇人后，副将拉比埃努斯也征服了特雷维利人，军队合流再次渡过莱茵河。在莱茵河西岸构筑营地，屯兵6000人。北上莱茵河口，平定高卢东北部诸部落。在兰斯召开高卢全体部落族长会议，处死加努特斯人反对势力的首脑亚克。在现今德国西部和第戎边境和桑斯设置冬营地
国家罗马	「卢卡会谈」后，庞培和克拉苏就任执政官。《特雷波尼乌斯法》和《庞培—李锡尼法》。根据前者，庞培和克拉苏分赴西班牙和叙利亚行省，有权拥有10个军团的兵力，且任期为5年。根据后者，恺撒的任期可延长至公元前50年，也有权拥有10个军团。马尔斯广场的庞培剧场建设完成。克拉苏出发前往任职地叙利亚	恺撒女儿，庞培之妻尤利娅卒。恺撒命亲信布鲁图和奥比乌斯着手扩建古罗马广场。元老院派反击，第二年独占执政官两席。元老院派和「三头」派互相争斗，情势混乱	克劳狄乌斯派和米罗派的暴力斗争越发激化，克劳狄乌斯被杀，米罗逃往马赛。次年执政官由庞培一人担任
地中海世界		克拉苏远征帕提亚	克拉苏开始真正远征帕提亚。帕提亚王进攻亚美尼亚以牵制罗马军队，在沙漠大破罗马军队。青年克拉苏自杀身亡，克拉苏本人也在后来被杀。4万人远征军生还者不到1万人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52（48）	51（49）	50（50）	49（51）
恺撒	高卢战役第七年。加努特斯人杀害奥尔良的罗马人，举起反叛大旗。奥弗涅人的韦桑热托里克斯发出反对罗马的呼声，高卢中部各部落纷纷响应。恺撒从法国南部行省急行军前往高卢中部，于桑斯集合全部军队，压制叛乱。恺撒攻打格尔戈维未果，撤退。高卢中部的部落，集结反罗马，挑战恺撒军队失败，6万大军退守阿雷佐。恺撒构筑阿雷佐包围网，同时高卢援军20万到达。阿雷佐展开攻防战。韦桑热托里克斯被俘。恺撒在8个地方设置冬营地。恺撒在毕布拉克特营地越冬。恺撒发行《高卢战记》全七卷（第八卷由恺撒亲信希尔提乌斯执笔）	高卢战役第八年。作为阿雷佐战役的战后处理，恺撒征服诸部落，并前往阿奎塔尼亚视察。开始着手「将高卢罗马化」。将行省税从「什一税」改为「定额税」。恺撒在高卢北部的阿拉斯设置冬营地	高卢战役第八年。作为阿雷佐战役的战后处理，恺撒征服诸部落，并前往阿奎塔尼亚视察。开始着手「将高卢罗马化」。将行省税从「什一税」改为「定额税」。围绕着解散恺撒军团的命令，恺撒派的新护民官安东尼和元老院派持续进行政治抗争	恺撒于夏天返回北意大利行省。元老院派试图拉拢恺撒左右手拉比埃努斯。执政官由元老院派的盖乌斯·马尔凯鲁斯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斯出任。次年由马克弟弟和雷托鲁斯出任。恺撒则以时任护民官、年轻的库里奥对抗元老院派。11月，假传「恺撒10个军团正朝罗马南下」，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授权庞培为总司令迎击恺撒。	1月7日，元老院发出「最终劝告」，并通过法案授予庞培无限制大权。1月12日，恺撒率领一个军团离开拉文纳，渡过卢比孔河，进入里米尼。护民官安东尼和卡西乌斯与恺撒会合后，控制安科纳和阿雷佐等。1月17日，庞培逃离罗马。西塞罗逃离罗马。之后执政官马尔凯鲁斯和雷托鲁斯也逃离。罗马陷入大混乱。和恺撒分道扬镳的拉比埃努斯在加普亚加入庞培阵营。恺撒沿亚得里亚海南进，2月21日兵不血刃地进入阿赫诺巴尔布斯守卫的科菲尼昂城。2月25日，庞培逃往布林迪西。3月9日，恺撒也到达布林迪西。3月17日庞培强行突破封锁逃向希腊。恺撒事实上争霸整个意大利半岛。10月9日恺撒回到罗马。3月30日，恺撒在急行往罗马的途中，造访福尔米亚的西塞罗别墅，两人进行了会谈。4月1日恺撒出席了罗马城外的元老院会议，将撒丁岛和西西里纳入罗马。恺撒任命库里奥攻占北非行省（今突尼斯）、雷必达为大法务官主内政，安东尼负责对外防卫，小安东尼和西塞罗女婿多拉贝拉夺取亚得里亚海制海权。4月7日恺撒进攻庞培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行省。4月19日恺撒到达独立国家马赛。长时期的马赛攻坚战从5月4日吹响了号角。6月22日恺撒到达西班牙行省的路利达，以路利达攻坚战揭开了整个西班牙战役的序幕。8月2日亚弗拉尼乌斯和佩托雷乌斯率领的庞培军队解体。9月恺撒称霸加的斯、塔拉戈纳及西班牙全境，瓦罗率领的庞培军队解体。10月中旬，恺撒返回马赛，25日攻陷马赛，返回意大利。12月2日，恺撒回到罗马任独裁官。废除苏拉订立的永久禁止反苏拉者子孙后代入主公职的规定。任命恺撒派成员为行省总督，开始实施发行新货币等经济改革。当选为次年公元前48年度的执政官。12月13日恺撒离开罗马狙击庞培
国家罗马	庞培一人就任执政官。元老院要求在增加一位执政官，梅特鲁斯·西庇阿当选。庞培迎娶西庇阿之女为妻。庞培成为元老院派，次年通过《行政官法》、《庞培行省总督法》、《庞培的西班牙行省总督任期延长案》的强化反恺撒体制	西塞罗发表《论国家》		
地中海世界		克娄巴特拉和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埃及		8月11日，库里奥率领罗马军队在北非行省登陆。20日于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一战，2万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库里奥战死。为夺取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小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也于达尔马特亚完败于庞培将领黎波之手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48（52）	47（53）	46（54）	45（55）	44（55）
恺撒					1月安东尼出任另一个执政官席位。恺撒正式宣布未来两年征服帕提亚计划。2月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通过决议，任命恺撒为终身执政官。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会议场所庞培回廊被马库斯·布鲁图、卡西乌斯等暗杀。3月16日恺撒遗嘱被公开，屋大维（当时年仅18岁，是恺撒甥孙）成为恺撒第一指定继承人及养子，并继承恺撒家族姓氏。克娄巴特拉及其与恺撒之子「小恺撒」离开罗马返回埃及。3月17日安东尼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并未追究暗杀者们的刑事责任，人事安排及政治路线仍按照恺撒遗愿进行。3月18日恺撒火葬。民众群情激奋。暗杀集团成员布鲁图、卡西乌斯、西塞罗等于19日早逃离罗马
国家罗马	庞培儿子格涅乌斯、塞克斯图斯及拉比埃努斯、瓦罗等反恺撒派于西班牙行省再度发起动乱。恺撒出击西班牙，3月17日开始的孟达会战，在经过激烈战役后大破庞培余党。拉比埃努斯战死，格涅乌斯被杀。恺撒确立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开始着手巩固民生、走向帝制的全面改革。•北意大利行省按照计划获得罗马公民权，授予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行省居民们拉丁公民权。•将元老院议席增加到900人，削弱公民大会和护民官的实权。•固定金银的兑换率，设定利息的上限。•增加法务官、财务检察官、监察官的席位，将同位执政官变为辅助职能。•修正地方议会的被选举权，允许解放奴隶们获得公职。•重新整理行省、承认行省议会、设置公家的征税机关。•规定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三位为罗马的主神。•重新启用《森普罗尼乌斯法》废除元老院终极决议，调整陪审员资格。•将获得低价配给小麦的人口减至15万，并设置两名财务检察官。•将失业人口和退伍老兵分散到各个行省，重兴迦太基和科林斯。•授予教师和医生罗马公民权。•重建首都。修建恺撒神坛、翻新古罗马广场、拆掉塞尔维乌斯城墙等。•进行将街道设备延长等公共事业		2月末多米提乌斯率援军抵达亚历山大港，恺撒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役中取得胜利，托勒密十三世战死。3月27日恺撒入亚历山大港城。克娄巴特拉和最小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开始共同统治埃及。恺撒完成《内战记》的前三卷。6月恺撒自亚历山大港出发，支援在小亚细亚败于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之手的多米提乌斯。途中重新构筑了对犹太、叙利亚和奇里乞亚的统治。6月末恺撒在小亚细亚登陆，于卡帕多西亚地区的泽拉击败法尔纳凯斯（我来，我见，我征服），恺撒掌握了希腊。9月末恺撒回到布林迪西。再度与西塞罗相见，并宽容地对待他。恺撒凯旋，并出任以五年为任期的独裁官，纠正安东尼代理统治期间的失政。12月为压制北非行省的庞培余党19日进入突尼斯的马尔萨拉，27日从该地出发	1月恺撒在北非行省东岸登陆并构筑营地。4月6日恺撒在塔普苏斯会战中大败西庇阿军，紧接着追击努米底亚国王尤巴。尤巴自尽、西庇阿和亚弗拉尼乌斯被杀。小加图自杀（4月21日）。4月13日恺撒入乌蒂卡城。恺撒视察撒丁岛和科西嘉岛。7月25日返回罗马。8月5日开始举行为期四天的凯旋仪式。恺撒开始着手改革。规定太阳历并与次年公元前45年1月1日执行。成立国家造币机构，从元老院手中夺取了造币权。出任任期为10年的独裁官	1月4日，恺撒自布林迪西出海，翌日于希腊西岸登陆。恺撒军与庞培军于都拉斯南部对峙。3月27日安东尼率领第二梯队从宁法姆登陆。4月3日与恺撒会合。都拉斯包围战从4月15日起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恺撒军败。恺撒退到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庞培率军追击。7月29日恺撒达到法萨卢斯平原，准备迎击与西庇阿会合的庞培大军。8月9日法萨卢斯会战开始。庞培军完败，庞培逃往爱琴海，试图在埃及东山再起。恺撒一边狙击庞培一面任命安东尼为独裁官协理——「骑士团长」——处理国内事务。9月28日庞培及同行的雷托鲁斯在亚历山大港被罗马士兵所杀。10月4日恺撒登陆亚历山大港。10月7日裁定内乱中的埃及由克娄巴特拉和托勒密十三世共同统治。10月中旬托勒密十三世率军攻击恺撒军队，亚历山大港战役拉开帷幕。12月多米提乌斯被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击败逃往叙利亚		
地中海世界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44（55）	43	42	41		40
罗马国家	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屋大维	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罗马国家	安东尼立刻安排亲信补任恺撒生前的职务，任雷必达为大祭司，多拉贝拉与自己一道成为执政官。4月中旬屋大维自希腊的阿波罗尼亚回国。7月屋大维主办纪念恺撒的盛大竞技会。8月在安东尼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安东尼安排了以下几行省的总督人选：安东尼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多拉贝拉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库斯·布鲁图、卡西乌斯在公元前44年末前分别就任马其顿、叙利亚行省总督。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前往任地就职，实际上是以公开的名义逃往国外。9月西塞罗开始了著名的弹劾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之辩》。10月，军队大部分势力均表示支持屋大维，为了掌握更多的兵力，安东尼攻击掌管北意大利行省军权的德奇姆斯·布鲁图	安东尼立刻安排亲信补任恺撒生前的职务，任雷必达为大祭司，多拉贝拉与自己一道成为执政官。4月中旬屋大维自希腊的阿波罗尼亚回国。7月屋大维主办纪念恺撒的盛大竞技会。8月在安东尼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安东尼安排了以下几行省的总督人选：安东尼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多拉贝拉执政官期满后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库斯·布鲁图、卡西乌斯在公元前44年末前分别就任马其顿、叙利亚行省总督。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前往任地就职，实际上是以公开的名义逃往国外。9月西塞罗开始了著名的弹劾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之辩》。10月，军队大部分势力均表示支持屋大维，为了掌握更多的兵力，安东尼攻击掌管北意大利行省军权的德奇姆斯·布鲁图	支撑屋大维的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出任执政官。3月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一同讨伐正在北意大利行省摩德纳与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安东尼，安东尼撤退。两位执政官战死，德奇姆斯·布鲁图被杀。8月屋大维被选为执政官（另一位执政官是恺撒的外甥佩提乌斯）。屋大维正式成为恺撒养子，改名「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提出《佩提乌斯法》正式追捕刺杀恺撒者。安东尼在法国南部行省与高卢、西班牙行省总督结成共同战线。10月屋大维进军北意大利行省。11月，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在博洛尼亚城结成「后三头政治」。27日公民大会对该同盟及其五年期限予以通过。寡头政治至此完全解体。11月28日，以西塞罗为首的「黑名单」正式形成，罗马掀起了肃清的暴风雨。12月7日西塞罗被杀	1月1日元老院通过将恺撒升为「神」的决议。屋大维将恺撒著作销毁，仅留《高卢战记》、《内战记》。夏—秋，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合军出兵希腊，于腓立比大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联军。布鲁图与卡西乌斯自裁。腓立比战役后，屋大维和安东尼以东西为界分别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屋大维转向罗马世界的西半部，安东尼回到东半部	秋天，安东尼的弟弟路奇乌斯与妻子富尔维娅于意大利中部贝鲁吉亚举兵。屋大维和「左膀右臂」阿格里帕为镇压动乱艰苦作战	东部诸侯归顺后，安东尼继续行军，与行省奇里乞亚的首付塔鲁苏斯传召埃及女王。秋天，安东尼受邀造访亚历山大港，与克娄巴特拉确立情人关系	2月末贝鲁吉亚战事结束。富尔维娅和路奇乌斯逃往希腊。安东尼将动乱的责任全部转嫁给富尔维娅。屋大维启用梅塞纳斯负责外交。	安东尼回到意大利，克娄巴特拉产下两人孩子（双胞胎）	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签订《布林迪西协定》，将罗马的西部、东部、非洲划定给各自的势力范围。安东尼与屋大维姐姐屋大维娅再婚。秋，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在西班牙行省再度崛起，并扩大到西西里岛。屋大维，安东尼和塞克斯图斯三人在那不勒斯湾的墨西拿海峡签订《墨西拿协定》。根据协定，塞克斯图斯停止敌对活动，屋大维允许塞克斯图斯党成员恢复公职，将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三岛的统治权让渡给塞克斯图斯。屋大维迎娶塞克斯图斯表妹司克里波尼娅（不久离异），生下屋大维唯一骨血（女儿）尤利娅。
地中海世界	克娄巴特拉回到埃及，杀掉托勒密十四世，与小恺撒共同统治埃及	布鲁图在马其顿、卡西乌斯在叙利亚集结了10万兵力准备战斗。卡西乌斯将前往叙利亚赴任的多拉贝拉杀死				
中国						
日本	弥生时代					

年代（公元前）	38	37		36	34	33	32	31	30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1月，屋大维与克劳狄乌斯·尼禄之妻莉薇娅再婚，并将尼禄与莉薇娅之子提比略（后为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杜路苏斯收为养子。继续与塞克斯图斯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将塞克斯图斯毙于莱斯博斯岛	屋大维		屋大维与阿格里帕共同一心压制伊利里亚地区动乱	屋大维召集元老院会议，会上通过后「三头政治」同盟解体，及安东尼的亚历山大港宣言无效的决议。	秋，屋大维为纪念伊利里亚战役凯旋修建尤利娅水道，建设屋大维回廊，修补公共建筑。安东尼遗嘱公开，指定自己死后葬于亚历山大港。屋大维开始其宣传战	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秋，屋大维被整个意大利推举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总司令」，开始在意大利进行备战。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以弗所以及希腊备战	3月，屋大维率大军渡河抵达希腊。夏，安东尼·克娄巴特拉军队的将士相继叛逃。9月2日大决战「亚克兴角海战」拉开帷幕。战败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相继逃往亚历山大港。屋大维追击的同时再度构筑罗马对沿途的统治	7月31日，正与屋大维军战斗的安东尼军队将士叛离。安东尼自裁，次日死亡。8月1日，屋大维入主亚历山大港城，杀小恺撒。克娄巴特拉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屋大维凯旋，返回罗马。罗马进入帝国时代
国家罗马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秋，安东尼出发远征帕提亚，与克娄巴特拉于叙利亚的安提阿再聚。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正式成婚，并认可双胞胎	安东尼率领二万大军出征帕提亚。8月帕提亚和中东联合军用游击战术消耗安东尼军队力量。二月安东尼大军撤退安提阿	春，安东尼远征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与之议和。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举行凯旋仪式，并宣布小恺撒为埃及国王，自己与克娄巴特拉所出三子拥有对东方诸城邦的统治权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留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			
地中海世界									
中国						汉成帝即位（~前7）			
日本	弥生时代								

参考文献

如果《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和《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在叙述上比起其他已刊印卷本来说更为生动的话，那绝非我的功劳，而是托西塞罗和恺撒之福，他们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史料。他们两人所生活的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准确的史料。放眼整个世界史，再也没有能留下如此丰富史料的时代了。

首先，这两人都有着卓越的洞察力和文字表现力，而这两人又是相互关联的。拥有能敏锐而深刻地将洞察表现出来的才能，必能使得阅读者也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因为将头脑中已有的思想形成文章所带来的冲击力，作者比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更多。

第二，作为最优质史料提供者的西塞罗和恺撒二人，都是该时代的主角。作为当事人，他们入手的情报当然比别人更为有力。相较于同在罗马时代的秘书、军团长等配角，甚至是与百年之后的罗马历史学家所谓的“旁观者”作品相比，洞察力和表现力兼备的主角们的叙述，当然更具史料价值。

第三，西塞罗和恺撒在政治立场上针锋相对。西塞罗是元老院体制的坚定维护者。而恺撒则以打倒元老院体制、建立新秩序为奋斗目标。就如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们有丘吉尔的作品可作参考，但是堪与丘吉尔匹敌的所谓反派主角的著作，我们却一本都没有。

第四，这两个人还是好朋友。尽管政见不一，但是两人私交甚笃。这一点使得他们卓越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并不孤立存在，而是有着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情报交流上，二人亦敌亦友。我认为，这也正

是他们所遗存下来的史料在质量上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多数史料有所不同的主要原因。

第五，流传下来的质、量俱佳的史料的时代，正是罗马长达100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时代和关键节点，这是历史爱好者之幸。如果按照历史时期区分的话，该时期正是共和体制向帝制过渡的时期。迦太基历史在存续700年后灭亡；雅典、斯巴达、马赛虽未灭亡，却也无法遏制衰退的命运；与它们不同的是，罗马在经历了700年后却仍能再度到达鼎盛。恺撒创造了这一鼎盛的基础，即创造了国家改造所必需的基石。从古至今所有关于罗马历史的研究当中，有四分之一的研究作品是集中于那三四十年之间。从中可以看出公元前1世纪这段时间在罗马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得以凭之窥探到这一时代全貌的、得以留存的历史资料，竟然是出自在罗马历史上具有无人可比的洞察力和表现力的西塞罗和恺撒之笔，难道不是一大幸事吗？

然而，不管叙述者如何妙笔生花，如果读者不能够感受其叙述之生动，这种单方的努力恐怕也最终难以为继。

福田恒存生前曾教诲我这么一个道理：语言的表现力不仅在于传达意义，还能够传达声音。换句话说，意义传达出精神，而包含了语感的声音则令其更加生动传神。福田先生说，翻译也必须有这样一种概念。

我在写作文艺复兴时代之初，就以当时的一手史料为优先考虑，希望能够忠实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声音。然而在传达给读者之前，如果我自己都听不到那个声音的话，所谓生动传神也就无从谈起了。作者都无法感知，又如何传达给读者呢？

结果，我为了写作这两卷书所作的学习考证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用于逐字逐句地阅读、思考和体验西塞罗和恺撒所遗留下来的断简残编之中。同时我也参考了其他古代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以补足这两人所未提及的历史事件和另外的史家观点；又在后世研究者的著作中，纠正我

误读的部分、弥补有所或缺的专业知识。

以前已提及的原始史料和后世研究论著，请允许我在下列参考文献中予以省略。

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皇帝传》（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

维里乌斯·帕特库拉斯（Velleius Paterculus）——古罗马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的部下。文风简明，所著为简略《罗马史》。

《卢坎》（Lucan）——描写恺撒和庞培斗争的长篇史诗《内战记》（又名《法沙利亚》）的作者，诗人，公元39年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忠实的庞培派。

斯特拉波（Strabon）——《地理志》（又名《希腊——罗马世界地理志》，饭尾都人译，龙溪书社），早期地理学者。公元前62年左右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本都。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希腊游记》（又名《希腊记》，饭尾都人译，龙溪书社；《希腊导览》，马场惠二译，岩波文库），2世纪人，早期游记作者。

后世的历史书籍和研究著作

ADCOCK, F.E., *Caesar as Man of Letters*, Cambridge, 1956.

BACKMUND, J., *Catilina und die Parteikämpfe im Jahre 63*, Würzburg, 1870.

BALDACCI, A., *Considerazioni intorno allo sbarco di M. Antonio a Ninfeo e al suo congiungimento con Giulio Cesare*, 《Rivista Dalmatica》, 1934.

BALSDON, J.P.V.D., *Julius Caesar and Rome*, London, 1967.

BAUR, E., *Zur Chronologie der catilinarischen Verschwörung*, Strassburg, 1875.

BECKMANN, F., *Geographie und Ethnographie in Caesars Bellum Gallicum*, Dortmund, 1930.

BEESLY, E.S., *Catiline, Clodius and Tiberius*, London, 1878.

BELOCH, J., *Die Bevölkerung Galliens zur Zeit Caesar*, 《Rh. Mus.》 54, 1899.

BERSANETTI, G.M., *Quando fu conchiusa l'alleanza tra Cesare, Pompeo e Crasso?* Palermo, 1924.

BERTRIN, G., *Num legitime prudenterque se gesserit M. Tullius Cicero consul in puniendis conjurationis Catilinariae sociis*, Paris, 1900.

BETTI, E., *Le origini giuridiche e lo svolgimento politico del conflitto tra Giulio Cesare e il senato romano sino allo scoppio della guerra civile*, Città di Castello, 1915.

BLOCH, G., *Note sur un passage de Diodore de Sicile à propos de la première Catilinaire*, Mélanges Boissier, Paris, 1903; *La république romaine. Confli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Paris, 1913.

et sociaux, Paris, 1913.

BOAK, A.E.R., *The Extraordinary Commands from 81 to 48 B.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4, 1918-19.

BOISSIER, G., *Cicéron et ses Amis*, Paris, 1865; *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 Paris, 1905.

BORT, T., *Römische Charakterköpfe*, Leipzig, 1913.

BOTSFORD, G.W., *The Roman Assemblies*, New York, 1909.

BOUCHÉ-LECLERCQ, A., *La question d'Orient au temps de Cicéron*, 《Revue historique》 79, 1902; *Histoire des Séleucides*, Paris, 1913-14.

BRANDES, G., *G. Julius Caesar*, Copenhagen, 1918.

BRECHT, B., *Die Geschä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 Berlin, 1957.

BROUGHTON, T.R.S., *The Romanization of Africa Proconsularis*, Baltimore-Oxford, 1929.

BUCHAN, J., *Julius Caesar*, London, 1932.

CANALI, L., *Personalità e stile di Cesare*, Roma, 1963.

CANAVESI, M,. *La politica estera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42.

CARCOPINO, J., *Le secret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Cicéron*, Paris, 1947; *Profils de conquérants*, Paris, 1961; *Jules César*, Paris, 1968; *Passion et politique chez les Césars*, Paris, 1970; *Alésia et les ruses de César*, Paris, 1970.

CARY, M., *The Land Legislation of Julius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 《Journal of Philology》 35, 1920; *The municipal legislation of Julius Caesa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 27, 1937.

CHAPOT, V., *La frontière de l'Euphrate de Pompée à la conquête Arabe*, Paris, 1907.

CIACERI, E., *Processi Politici 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Roma, 1918; *Cicerone e i suoi tempi*, Milano-Roma-Napoli, 1926.

CLERC, M., *Massalia: Histoire de Marseille dans l'antiquité*, Marseilles, 1929.

COLLINS, J.H., *Propaganda, 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assumptions in Caesar's writings*, Frankfurt, 1952.

COLOMB, G., *L'Énigme d'Alésia*, Paris, 1922.

CONSTANS, L.A., *Les débuts de la lutte entre César et Vercingétorix*, 《Rev. Belge》 27, 1923; *Guide illustré des campagnes de César en Gaule*, Paris, 1929.

CONWAY, E.S., *Makers of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COSTA, G., *La concezione religiosa di Cesare*, 《Convivium》 7, 1935.

COWELL, F.R., *Cicero and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48; *The Revolutions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962.

DEGRASSI, A., *Inscriptiones Italiae vol. XIII: Fasti et Elogia*, Roma, 1946.

DE RUGGIERO, E., *Il Foro Romano*, Roma, 1913.

DOTTIN, G., *Manuel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Antiquité celtique*, Paris, 1915.

DRUMANN, W. & GROEBE, P., *Geschichte Roms in seinem Übergange von der republicanischen zur monarchischen Verfassung*, Berlin, 1899.

EBERT, M., *Reallexicon der Vorgeschichte*, Berlin, 1924-29.

EGGER, E., *Examen critique des historiens anciens de la vie et du règne d'Auguste*, Paris, 1844.

FERRABINO, A., *Curione in Africa: 49 a.C.*, 《Atti Acc. Torino》, 1912; *L'Italia romana*, Milano, 1934; *Cesare*, Torino, 1941; *La fortuna della creazione politica di Cesare*, Roma, 1956.

FRANK, T., *Roman Imperialism*, New York, 1914; *The Date of the Vatinian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41, 1920.

FULLER, J.F.C., *Julius Caesar. Man, soldier and tyrant*, London, 1965.

GAUTIER, F., *Vercingétorix*, Paris, 1935.

GELZER, M., *Caesar und Augustus. Meister der Politik*, 1922; *Die Lex Vatinia de imperio Caesaris*, 《Hermes》 63, 1928; *Pompeius*, München, 1959; *Caesar. Der Politiker und Staatsmann*, Wiesbaden, 1960.

GESCHE, H., *Caesar*, Darmstadt, 1976.

GIANNELLI, G., *La repubblica romana*, Milano, 1937.

GRAINDOR, P., *La guerre d'Alexandrie*, Cairo, 1931.

GRANT, M., *Julius Caesar*, London, 1959; *Kleopatra*, London, 1972.

GREENIDGE, A.H.J., *The Legal Procedure of Cicero's Time*, Oxford, 1901.

GROEBE, P., *Die Obstruktion im römischen Senat*, 《Klio》 5, 1905.

GROSSI, O., *The Forum of Julius Caesar and the Temple of Venus Genetrix*,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3, 1936.

GRUEBER, H., *Coinage of the Triumvirs Antony, Lepidus and Octavian,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Numismatic Chronicle》 11, 1911.

GSELL, S.,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vol. VIII: Jules César et l'Afrique. Fin des Royaumes indigènes*, Paris, 1928.

GURLITT, L., *Lex Clodia de Exilio Ciceronis*, 《Philologus》 59, 1900.

HAGEN, E., *Untersuchungen über römische Geschichte I: Catilina*, Königsberg, 1854.

HANKEL, W., *Caesar. Goldne Zeiten führt'ich ein*, München-Berlin, 1978.

HARDY, E.G., *The Table of Heraclea and the Lex Julia Municipalis*, 《JRS》 4, 1914; *Some problems in Roman History*, Oxford, 1924; *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 Oxford, 1924.

HARMAND, J., *Une campagne césarienne: Alésia*, Paris, 1967.

HAVERFIELD, F., *Portus Itius*, 《Classical Review (CR)》 27, 1913.

HOWORTH, H.H., *The Germans of Caesa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3, 1908.

HUSBAND, R.W., *The expulsion of foreigners from Rome*, 《Classical Philology》 11, 1916.

ISENBURG, I., *Iulius Caesar*, London, 1964.

JOHN, C.,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catilinarischen Verschwörung*, 《Jahrb》, 1876; *Sallustius über Catilina's Candidatur im Jahre 688*, 1876.

JONSON, B., *Catilina, his conspiracy*, Oxford, 1921.

JULLIAN, C., *Vercingétorix*, Paris, 1911; *Histoire de la Gaule*, Paris, 1921; *Notes Gallo-Romaines*, 《Revue d'Etudes Anciennes》.

KASTEN, H., *Cicero, Atticus-Briefe. Lateinisch-deutsch.* München, 1976.

KENDRICK, *T.D., The Druids*, London, 1927.

KLASS, J., *Cicero und Caesar*, Berlin, 1939.

KLOTZ, R., *Caesarstudien*, Leipzig, 1910.

KORNEMANN, E., *Die cäsarische Kolonie Karthago und die Einführung röm. Gemeindeordnung in Afrika*, 《Philologus》 70, 1911; *Römis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1939.

KROLL, W., *Die Privatwirtschaft in der Zeit Ciceros*, 《N.J.f.Wiss.》 5, 1929.

KROMAYER, J. & Veith, G., *Schlachten-Atlas zur antiken Kriegsgeschichte*, Leipzig, 1929.

KROYMANN, J., *Caesar und das Corpus Caesarianum*, 1973.

LANG, E., *Das Strafverfahren gegen die Catilinarier*, Heilbronn, 1884.

LARROUY, M., *Antoine et Cléopatre*, Paris, 1934.

LEVI, M.A., *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41, 1924; *La "tribunicia potestas" di C. Giulio Cesare*, 《Atti del I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udi Romani》, 1928; *La costituzione romana dai Gracchi a Giulio*

Cesare, Firenze, 1928; *La battaglia d'Azio,* 《Athenaeum》, 1932.

LUCAS, F.L., *The Battlefield of Pharsalos,*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24, 1919-21.

LUGLI, G., *Roma antica. Il centro monumentable,* Roma, 1946.

MACBAIN, A., *Celtic Mythology and Religion,* Stirling, 1917.

MARSH, F.B., *The Chronology of Caesar's Consulship,* 《Classical Journal (CJ)》 22, 1926-27; *The Policy of Clodius,* 《Classical Quarterly (CQ)》 22, 1927;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7.

MARTHA, J., *Comment Cicéron est arrivé aux honneurs,* Mélanges Boissier, Paris, 1903.

McDONALD, W.F., *Clodius and the Lex Aelia Fufia,* 《JRS》 19, 1929.

McFAYDEN, D., *The History of the title Imperator under the Roman Empire,* Chicago, 1920.

MENEGETTI, N., *Quel che Cesare non dice nel suo capolavoro,* Milano, 1931.

MÉRIMÉE, P., *Études sur l'histoire romaine II: Conjuration de Catilina,* Paris, 1844.

MEYER, E., *Parthia, Persi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ondon, 1911; *Blüte und Niedergang des Hellenismus in Asien,* Berlin, 1925.

MISPOULET, J.B., *La Vie Parlementaire à Rome sous la République,* Paris, 1899.

MOMMSEN, TH.,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886.

MOTZO, R.B., *Antonio, Ottaviano e il tesoro di Cesare,* 《Atti III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udi Romani》, 1935; *Le contiones di M. Antonio e di Bruto dopo la morte di Cesare in Studii offerti a E. Ciaceri,* Genova, 1940.

MÜNZER, F., *Labienus,* P.W.

NAPOLÉON I, *Préces des guerres de Julius César,* Paris, 1836.

NAPOLÉON III, *Vie de César,* Paris, 1865; *Histoire de Jules César I-III,* Paris, 1865-87.

NICCOLINI, G., *Il triumvirato di Lepido, Antonio e Ottaviano e il principato di Augusto,* 《Atti Società Scienze e Lettere di Genova》, 1939.

NUTTING, H.C., *The Attempt to murder Cicero at his Hous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35, 1904; *The Conspiracy at Rome in 66-5 B.C.,* Berkeley, 1910.

OMAN, Ch., *Seven Roman Statesmen,* London, 1902.

PAIS, E., *L'Aspirazione di Cesare al regno e l'opposizione tribunicia durante gli anni 45-44 a.C.,* 《Atti r. Accad. arch. lett. e belle arti》, 1913; *Fasti triumphales*

Populi Romani, Roma, 1920.

PALADINI, V., *Sallustio*, Milano, 1948.

PARATORE, E., *Il Bellum Civile di Cesare*, Roma, 1965.

PARETI, L., *Cesare e la Gallia*, 《Studi Romani (SR)》 3, 1955; *L'essenza della concezione politica di C. Giulio Cesare*, 《SR》 4, 1956.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1928.

PEAKS, M.P., *Caesar's Movements Jan. 21 to Feb. 14, 49 B.C.*, 《CR》 18, 1904.

PETERSSON, T., *Cicero*, Berkeley, 1920.

PIGHI, J.B., *De ludes saecularibus Populi Romani Quiritium*, Milano, 1941.

PLATNER, S.B. & ASHBY, Th.,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29.

PLAUMANN, G., *Das sogenannte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 《Klio》 13, 1913.

POCOCK, L.G., *P. Clodius and the Acts of Caesar*, 《CQ》 19, 1924.

POSTGATE, J.P., *The site of the battle of Pharsalia*, 《JRS》 12, 1922.

RABE, A., *Die Senatssitzung am 8 November des Jahres 63 v. Chr.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rsten catilinarischen Rede Ciceros*, 《Klio》 23, 1930.

RADIN, M.,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Gallic campaigns*, 《CJ》 12, 1916-17.

RAWLINSON, G., *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 London, 1873.

REID, J.S., *Roman Ideas of Deity*, 《JRS》 6, 1916.

REINACH, S., *Ephémérides d'Alesia: histoire, fouilles, controverses*, Paris, 1925.

RICE HOLMES T., *Ancient Britain and the invasions of Julius Caesar*, Oxford, 1907; *Caesar's Conquest of Gaul*, Oxford, 1911;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1923.

ROSTOWZEW, M.,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II: Rome*, London, 1927.

RUSHFORTH, G.M., *Lati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Empire*, Oxford, 1930.

RUSSELL, A., *Julius Caesar*, London, 1915.

SCHMIDT, O.E., *Flugschriften aus der Zeit des ersten Triumvirats*, 《N.J.Kl.Alt.》 7, 1901.

SEEL, O., *Sallust von den Briefen ad Caesarem zur Coniuratio Catilinae*, Leipzig-Berlin, 1930; *Hirtius.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pseudocäsarischen Bella*, Leipzig, 1935.

SEMI, F., *Il sentimento di Cesare*, Padova, 1966.

SIHLER, E.G., *Annals of Caesar*, New York, 1911.

SPECK, A., *Katilina im Drama der Weltliteratur*, Leipzig, 1906.

STRACHAN-DAVIDSON, J.L., *Problems of the Roman Criminal Law*, Oxford, 1912.

SYKES, P.M.,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1921.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TARN, W.W., *Hellenistic military and naval developments*, Cambridge, 1930; *The Battle of Actium*, 《JRS》, 1931.

TÄUBLER, E., *Imperium Romanum*, Leipzig-Berlin, 1913.

TAYLOR, H., *Cicero: A Sketch of His Life and Works*, London, 1916.

TAYLOR, L.R., *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wn, Conn., U.S.A., 1931.

THIAUCOURT, C., *Études sur 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 Paris, 1887.

TOYNBEE, J.M.C., *Portraits of Julius Caesar, Greece and Rome*, Oxford, 1957.

UGOLINI, L., *Note di topografia illirica*, 《Boll. Com.》, 1933.

ULLMANN, R., *Senatsmotet 5te december 63*, 《Nordisk Tidskrift for Filologi》 4, 1917.

VEITH, G.,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C. Julius Caesar*, Wien, 1906; *Der Feldzug von Dyrrhachium zwischen Caesar und Pompejus*, Wien, 1920; *Cäsar*, Leipzig, 1922; *Sezione sull'esercito di Cesare, Heerwesen und Kriegführung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Müllers Handbuch*, München, 1928; *La campagna di Durazzo tra Cesare e Pompeo* (伊訳), Roma, 1942.

VOLKMANN, H., *Kleopatra. Politik und Propaganda*, München, 1953.

VON PÖHLMANN R., *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in der antiken Welt*, München, 1901.

VON STERN, E., *Catilina und die Parteikämpfe in Rom der Jahre 66-3*, Dorpat, 1883.

WARDE FOWLER, W., *Julius Caesar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man Imperial System*, New York-London, 1904; *An unnoticed trait in the character of Julius Caesar*, 《CR》 30, 1916; *Roman Ideas of Deity in the Last Century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London, 1914.

WILCKEN, U., *Octavian after the Fall of Alexandria*, 《JRS》, 1937.

WILDER, T., *The Ides of March*, New York, 1948.

WIRTZ, R., *Beiträge zur catilinarischen Verschwörung*, Aachen, 1910.

WIRZ, H., *Catilina's und Cicero's Bewerbung um den Consulat für das Jahr 63*, Zürich, 1863.

ZENO, R., *La crisi della repubblica e il fondatore dell' Impero Romano*, Catania, 1934.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VI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日] 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他不像恺撒那样大放异彩
他33岁退出沙场，让罗马人从战争中解放
他统治罗马40年，让罗马帝国走向巅峰
他是罗马人心中的神，他是奥古斯都
他是继承恺撒伟业的“非天才人物”
他会如何完成连天才都达不到的目标

王石 王巍 |作序|

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日）盐野七生著；徐越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86–3357–2
I. 罗… II. ①盐… ②徐… III. 古罗马——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48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Ⅵ : Pax Romana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7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LUOMA REN DE GUSHI LIU : LUOMA TONGZHI XIA DE HEPING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徐越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日] 盐野七生 著
徐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铜币故事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第一章 奥古斯都统治前期
第二章 奥古斯都统治中期
第三章 奥古斯都统治后期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人们日常使用的货币上印刻国家最高统治者侧面头像的习惯，是由终身独裁官尤里乌斯·恺撒开启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提升领导者的知名度。不过，即使是恺撒，也没有将自己的头像刻铸在金币上。其理由就像日本纸币上的那些人选一样，必须是不会引发任何争议的人士。在罗马共和时代，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是诸位天神。因此，恺撒的侧面头像仅出现在银币上。

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改变了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金币的正面变成了皇帝的头像。天神们并没有就此退场，只不过换到了背面。这种变化既不是因为国家体制由共和转向帝政，也不是皇帝的强行之举，而是由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提倡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盐野七生

2004年8月于罗马

铜币故事

罗马进入帝政时代之后，金币、银币的铸造权移交到了皇帝的手里。唯有铜币的铸造权仍依照以往的惯例，归属元老院。尽管元老院的势力有所削弱，但是铜币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它是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的货币。如果把1塞斯特斯（Sestertius）铜币比做1美元的话，那么1第纳尔（Denarius）银币就是100美元。和百元美钞上的富兰克林相比，人们见到印在1美元纸钞上华盛顿的机会要多得多。

铜币的背面刻着代表元老院的字母S和C，铜币直径长3厘米，它比直径不足2厘米的银币可以刻铸更为复杂的图案，因此皇帝的各种丰功伟业常出现在铜币的正面，通过流通，传达给帝国全境的人民。

这枚铜币正面的头像是被称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没有他忠心耿耿、竭尽一生地辅佐奥古斯都，罗马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帝政的。

盐野七生

2004年8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恺撒是一个很懂得自我宣传的人，但他的后继者、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技艺更胜一筹。尽管恺撒备受争议，有一点却毋庸置疑，他不是一个伪君子，而他的养子却能够毫无愧色地欺世盗名。奥古斯都的矫言伪行，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他“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目的。对个人而言，没有比自身的利益能和共同体（国家）的利益相符来得更幸福的事情。

这位幸福的男人活到77岁，但他留给世人的却是一个30岁的面孔。他要为走向帝政的新生罗马树立一个朝气蓬勃的形象，又不忘彰显他特殊的身份。在古罗马，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化身为神，奥古斯都不错过任何机会，宣扬自己是神君恺撒之子。

奥古斯都的确是一个精明狡猾的人物，也正因为他这高超的政治手

腕，Pax（“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毕竟，和平不是轻松地唱着歌就能降临的。

盐野七生

2004年8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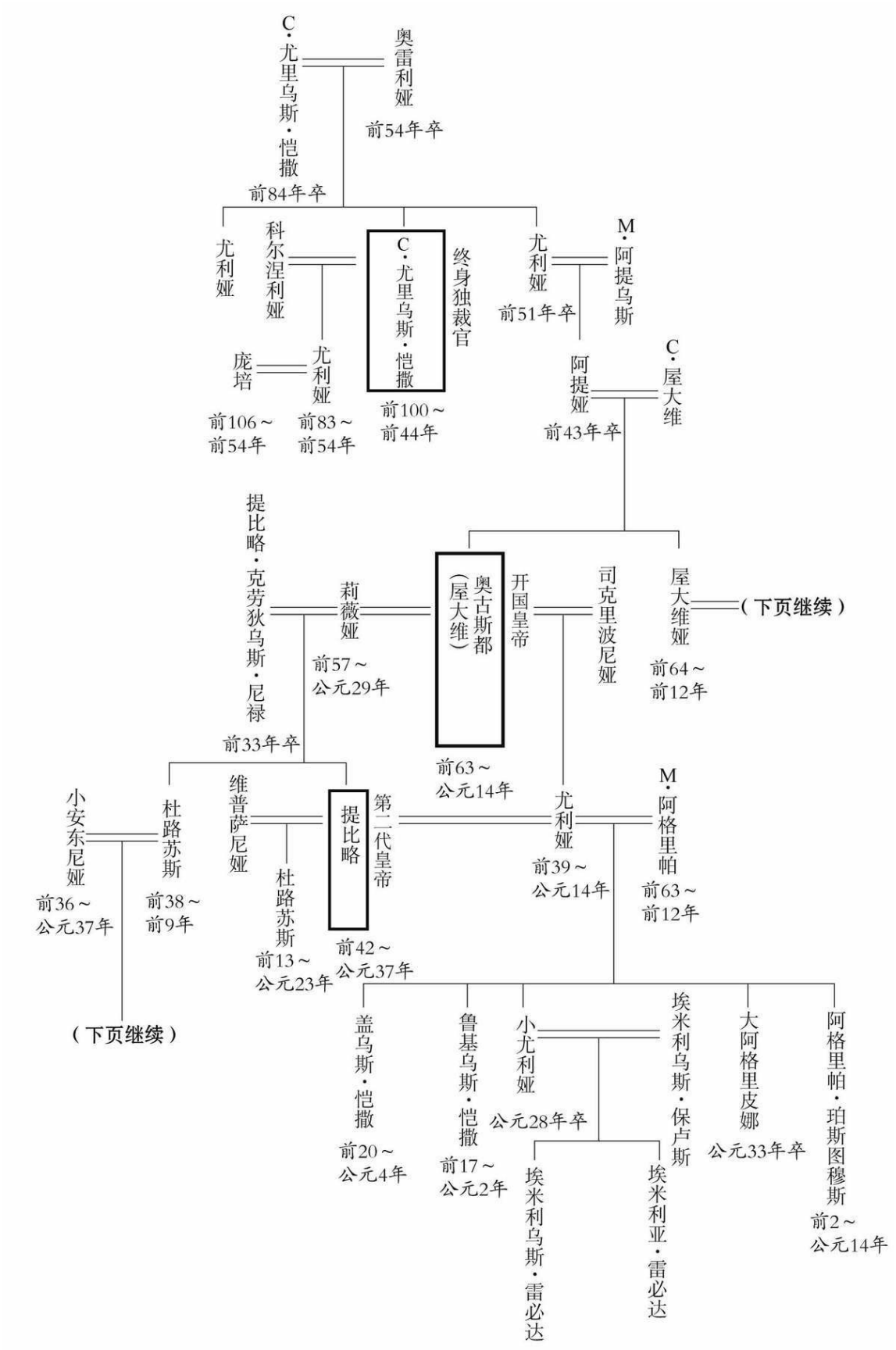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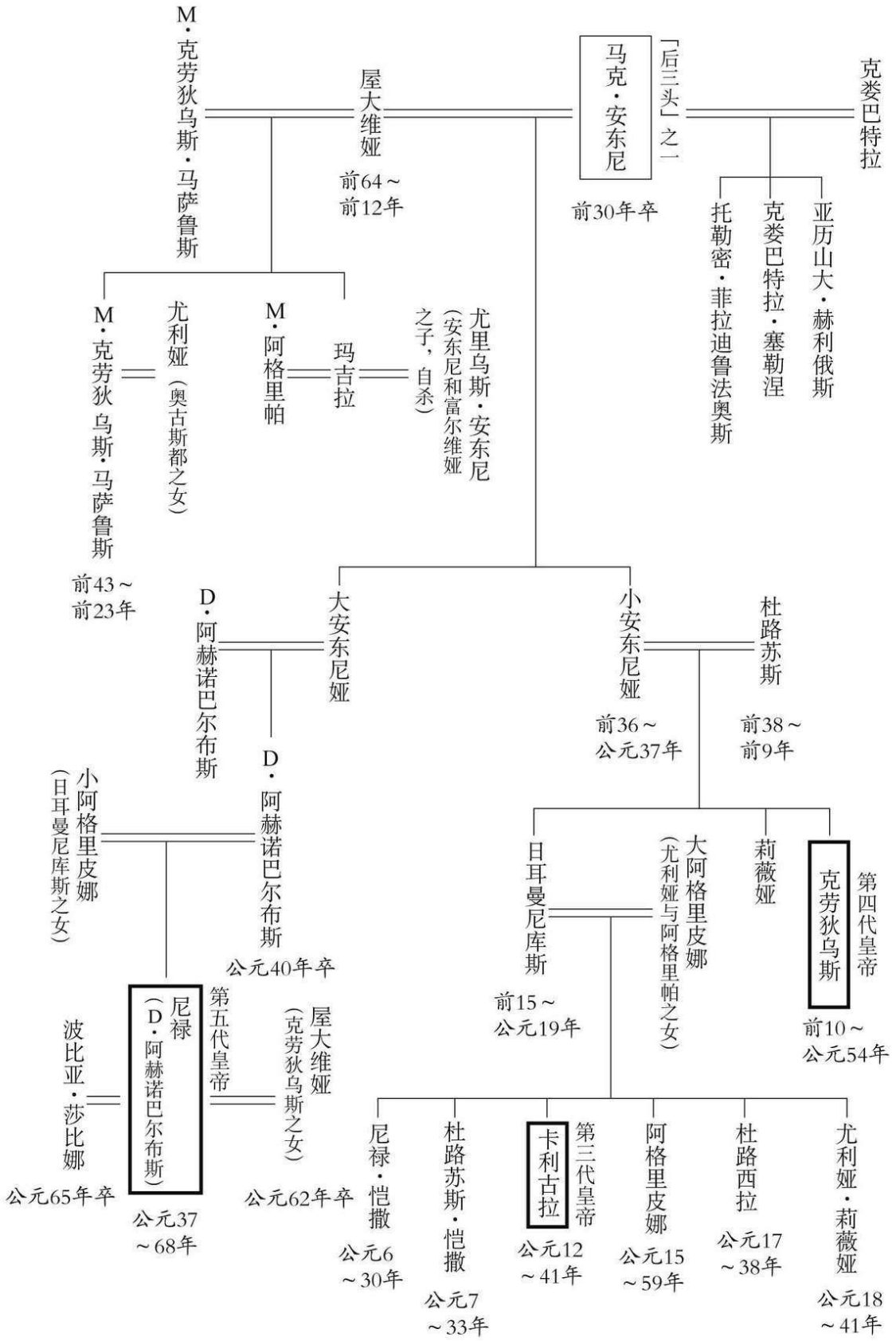
盐野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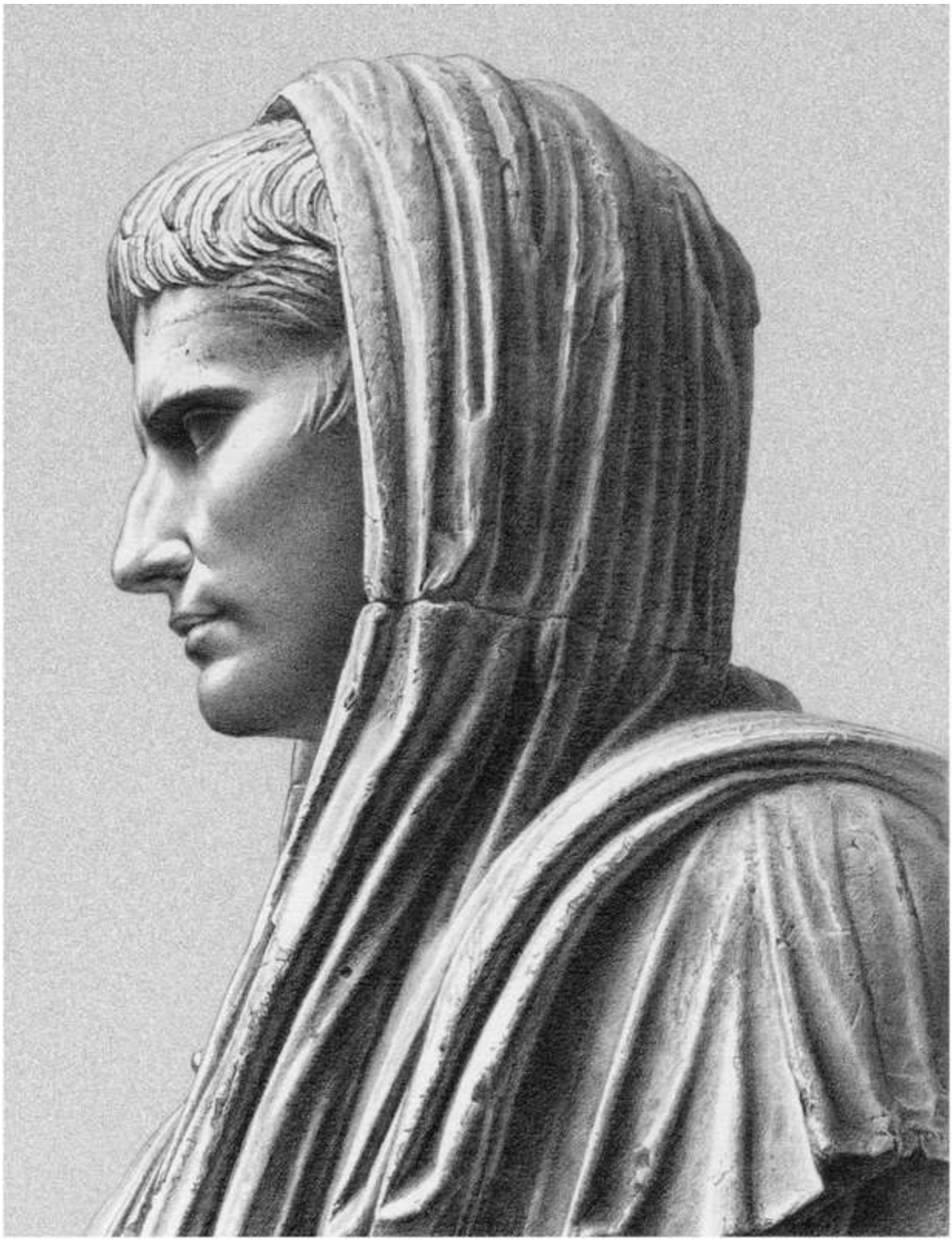
2011年夏于罗马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族系图（1）


C·尤里乌斯·恺撒
前84年卒
奥雷利娅
前54年卒
尤利娅
科尔涅利娅
C·尤里乌斯·恺撒
终身独裁官
尤利娅
M·阿提乌斯
前51年卒
庞培
尤利娅
前106～前54年
前83～前54年
前100～前44年
阿提娅
C·屋大维
前43年卒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
前33年卒
莉薇娅
前57～公元29年
奥古斯都（屋大维）
开国皇帝
前63～公元14年
司克里波尼娅
屋大维娅
（下页继续）
前64～前12年
小安东尼娅
前36～公元37年
杜路苏斯
前38～前9年
维普萨尼娅
杜路苏斯
前13～公元23年
提比略
第二代皇帝
前42～公元37年
尤利娅
前39～公元14年
M·阿格里帕
前63～前12年
（下页继续）
盖乌斯·恺撒
前20～公元4年
鲁基乌斯·恺撒
前17～公元2年
小尤利娅
公元28年卒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埃米利亚·雷必达
大阿格里皮娜
公元33年卒
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
前2～公元14年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族系图（2）


M·克劳狄乌斯·马萨鲁斯
屋大维娅
前64～前12年
马克·安东尼
前30年卒
「后三头」之一
克娄巴特拉
托勒密·菲拉迪鲁法奥斯
克娄巴特拉·塞勒涅
亚历山大·赫利俄斯
M·克劳狄乌斯·马萨鲁斯
前43～前23年
尤利娅（奥古斯都之女）
M·阿格里帕
玛吉拉
尤里乌斯·安东尼（安东尼和富尔维娅之子，自杀）
大安东尼娅
小安东尼娅
前36～公元37年
杜路苏斯
前38～前9年
D·阿赫诺巴尔布斯
D·阿赫诺巴尔布斯
公元40年卒
小阿格里皮娜（日耳曼尼库斯之女）
尼禄（D·阿赫诺巴尔布斯）
第五代皇帝
公元37～68年
屋大维娅（克劳狄乌斯之女）
公元62年卒
波比亚·莎比娜
公元65年卒
日耳曼尼库斯
前15～公元19年
大阿格里皮娜（尤利娅与阿格里帕之女）
莉薇娅
克劳狄乌斯
第四代皇帝
前10～公元54年
尼禄·恺撒
公元6～30年
杜路苏斯·恺撒
公元7～33年
卡利古拉
第三代皇帝
公元12～41年
阿格里皮娜
公元15～59年
杜路西拉
公元17～38年
尤利娅·莉薇娅
公元18～41年



头披托加的大祭司奥古斯都

致读者

本卷的主人公奥古斯都（屋大维）既不像《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中登场的苏拉（Sulla）那样神采飞扬，酣畅淋漓，也没有《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和《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中的主人公恺撒（Caesar）的豪迈不羁，具有不可一世的非凡气势。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后半部所述，战场上的奥古斯都屡战屡败。后来，他不再亲自指挥，全权下放，只做一位挂名的总司令。因此，本卷既不会出现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也没有反败为胜的意外惊喜。如果说战争和政治的决策及其执行，最能够反映最高统治者性格的话，那么我不得不承认，奥古斯都很缺乏恺撒式的鲜明个性。

然而，在探究奥古斯都的生涯和功绩的过程中，我从未感到过无聊。从33岁退出沙场，到77岁去世，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奥古斯都始终在另一个战场作不懈的奋斗。

我非常喜欢尤里乌斯·恺撒的一句话："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话虽如此，恺撒还是尝试着让他那些有才华的领导成员，去面对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在《内战记》里，恺撒对他的对手没有一句损害人格的恶言恶语，这反而让读者备感元老院的衰败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恺撒指定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和恺撒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手段和恺撒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这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奥古斯都天生小心谨慎。

第二，奥古斯都从恺撒被杀的事件中得到教训：只有活着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三，奥古斯都自知，无论是演讲还是著书，他的感染力都无法与恺撒相提并论。

奥古斯都选择了让人们去看他们愿意看到的现实，而他自己却始终面对真正的现实，向目标迈进。

我想，这就是奥古斯都终其一生的战争。

天才之后的凡人继承者，如何完成了天才没有实现的目标，这就是下面我想讲的故事。

第一章

奥古斯都统治前期

（前29—前19年，34—44岁）

年轻的最高统治者

公元前31年9月，在希腊西岸发生的亚克兴角海战中，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败北于屋大维军团。逃往埃及的两位战败者，在第二年，即公元前30年8月，一位伏剑自刎，一位毒蛇噬身自尽。

公元前29年，为欢迎屋大维胜利归来，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仪式持续了三天，整个罗马为之疯狂。人们感谢天神保佑，击败了外敌埃及，而同样身为罗马人的安东尼的名字，此刻已无人再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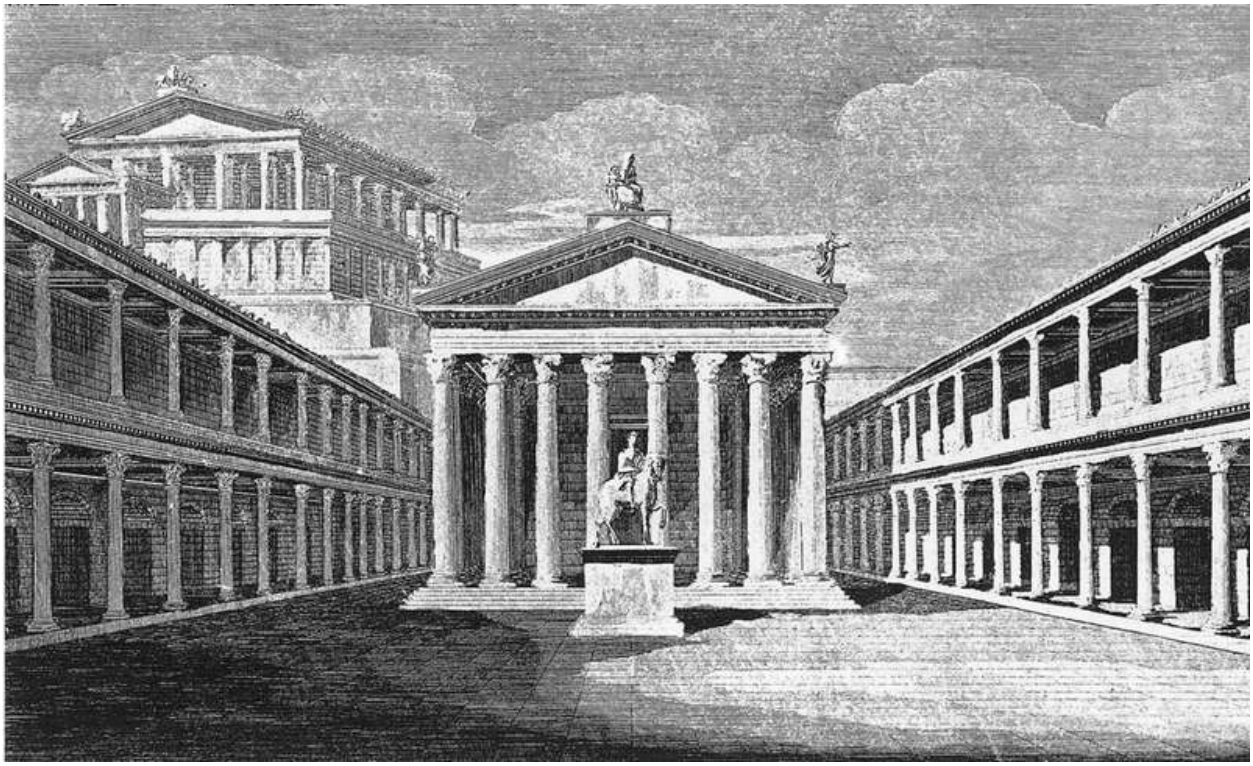
每一位罗马人甚至孩子都明白，这次的凯旋仪式宣告了长年内战的结束，战争期间始终敞开的供奉战神雅努斯的神殿大门，终于关闭了。以维吉尔、贺拉斯等为首，对时代的潮流变迁格外敏感的诗人们，也为罗马重返和平讴歌吟唱，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这时的屋大维即将迎来34岁的生日。

凯旋仪式结束后的同年9月，屋大维宣布，将在古罗马广场为养父“神君恺撒”建立一座神殿；同时，元老院会场也将依照恺撒生前的计划，紧邻恺撒广场而建。（现在看到的会场遗址，因后人改建，位置稍有偏离。）此外，屋大维还决定，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一座阿波罗神殿。除了上述的计划，以复仇之神马尔斯神殿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当时已在建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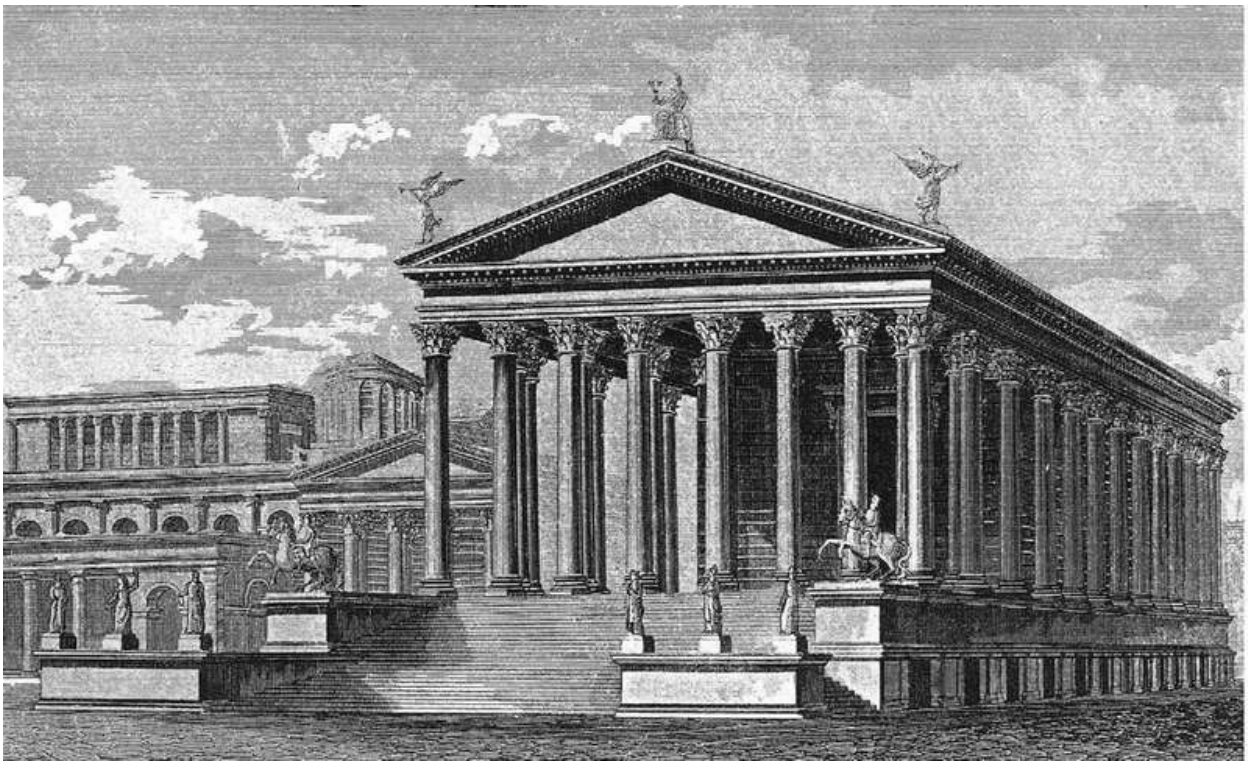
建造马尔斯神殿，是因为在公元前42年，与布鲁图对决的腓立比会战的前夜，屋大维曾发誓，如果打赢此仗，将建造一座神殿献给马尔斯神。而阿波罗神殿的建造，则是在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亚克兴角海战时，他对阿波罗神许下的诺言。

虽然阿波罗神殿坐落在高级住宅区的帕拉蒂尼山上，一般平民鲜有光顾，它之所以没有沦落成一处冷清孤高的圣地，是因为与诗神阿波罗形象非常吻合的国立图书馆恰好在神殿的边上。图书馆内藏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当时的罗马共有两座国立图书馆，另一所建在恺撒广场。

罗马人重视公共事业，对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更不会敷衍了事。顺便提一下，英文的infra原本是拉丁文，“之下”“之中”的意思。相对英文的structure，拉丁文有structura（构造）这个词。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



恺撒广场（复原图，左后方是位于帕拉蒂尼山的朱庇特神殿）



尤里乌斯元老院会场（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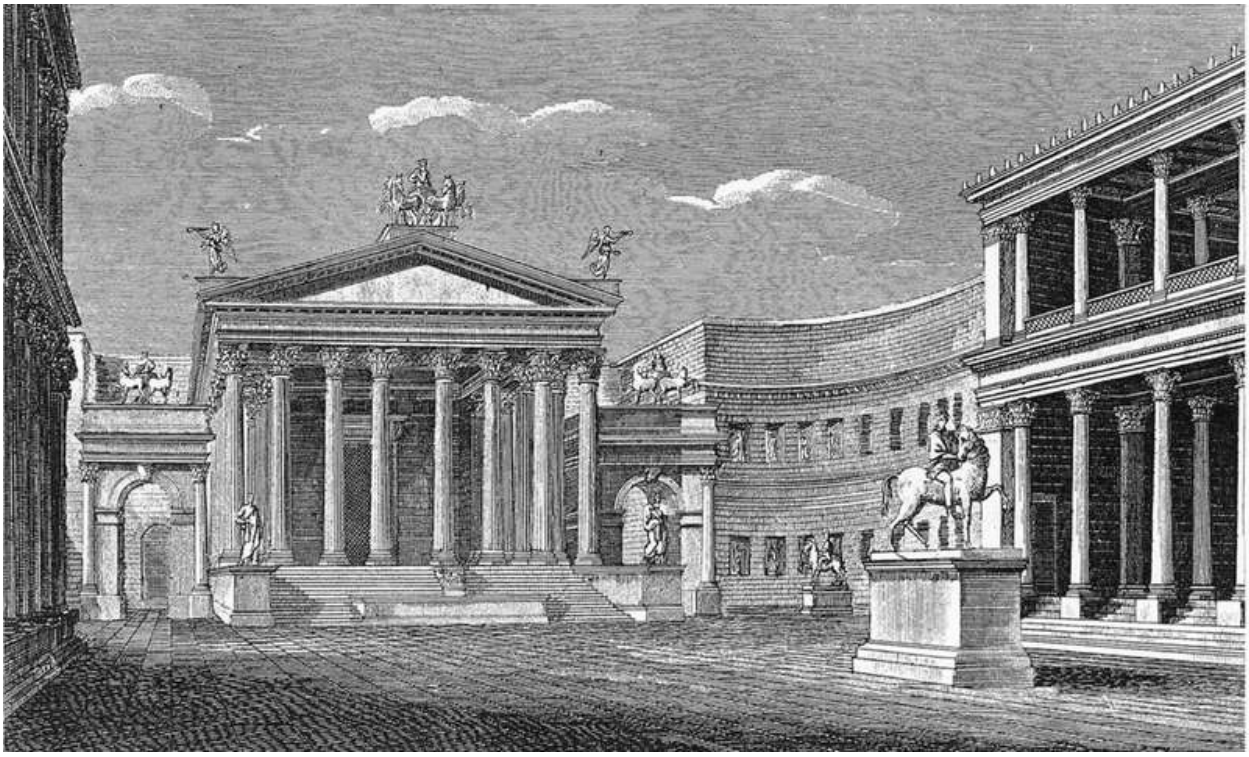
罗马人深知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同样也非常了解维护整修的重要。屋大维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立刻展开了基础建设的维修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程，是全面改建了罗马以北的两条主干道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他个人承担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全部费用。

向诸神表达感激之情；以胜利之名行公共事业回馈于民，作为盛大凯旋仪式的享誉者，凯旋将军有义务和责任执行上述这些传统的罗马公共事业。

不过，公元前29年，当时的屋大维不仅仅是一位凯旋将军，而且正如公元前82年的苏拉、公元前46年的恺撒一样，他也是位独一无二的绝对统治者。

正如当年苏拉手中握有败北的马略（Gaius Marius）派党羽的黑名单，恺撒在击败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后，获取了庞培在罗

马的余党及其同情者的来往书信；同样，屋大维也掌握着安东尼一方所有人的情报。不过，三个人处理的方式迥然不同。



奥古斯都广场（复原图）

苏拉凭借手中的证据，对反对派进行了彻底的肃清，4700名罗马上流人士遭到杀害，财产被没收，其子孙后代不得担任公职。

而恺撒却只字未读便将这些书信付之一炬。无论是庞培的公开支持者，还是那些暗中的同情者，全体予以豁免，公职得以恢复。

作为众所公认的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也承袭了他的宽容。即便是那些支持安东尼的死硬派，也都重返元老院，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据传，所有的证物都被烧毁，但没有人目睹此事。那些让安东尼的余党们惶恐不安的秘密情报，34岁的最高统治者屋大维选择了束之高阁。

削减军备

正当罗马上下为国家重返“和谐”（拉丁文concordia）欢欣不已之时，屋大维又宣布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政策：削减军备。这项政策如果不是得到了军队的总指挥阿格里帕的同意和协助，根本无法实施。

公元前29年的当时，唯一胜利者的屋大维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他本人的记录，兵力超过了50万人。人数之所以如此众多，主要是因为安东尼军队的加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尚未打到陆战就已经败北，军队投降时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当时战败的官兵们只要向胜利的一方俯首称臣、宣誓效忠，就能逃脱做俘虏的命运。

年轻的最高统治者决定对多达50万人的兵力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同时，又不能怠慢了这些罗马军队的战士，需要为他们安排退役后的工作，以及所需的生活费用，即退伍金。退伍军人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将会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问题是钱从何而来？屋大维变卖了克娄巴特拉留下的“托勒密财宝”，投入其全部所得，仍然无法支撑庞大的开支，最后，他不得不拿出私人财产来填补缺口。

志愿兵大多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者是略有薄产的家中的次子或三子。这些人退伍后，无论是返回故乡，还是决定留在行省内的殖民城市，他们的迁移地及其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由屋大维来决定，因为殖民地的开发规划，也是国家的政策之一。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消减军备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屋大维最终还是加速了进程，只要一想到50万人兵力的巨额开支，裁军的计划就一刻也不能耽搁。虽然史料里没有明确记载裁军完成的时间，50万人的军队最终缩减到了16.8万人。

削减军备并不是和平形势下单纯的政策调整。虽然军队不像普通行业，有所谓的个人生产效率的管理，但是，提高军队的经济效益，进行军事改革，才是屋大维的真正目的所在。有关屋大维的令人惊叹的大规模“裁员”的军事改革，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尽管治理国家的手段不同，屋大维和恺撒的目标则完全一致。两人都认识到罗马已经从领土扩张的年代，进入了领土巩固的年代。只不过，恺撒要到50岁之后才开始着手改变国策，而屋大维起步时，很幸运地比恺撒年轻了20岁。消化器官虚弱的屋大维，健康状况似乎劣于恺撒，但是50岁和30岁的人，在时间的运用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屋大维凡事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人口普查

屋大维凯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8年，他和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决定，组织开展人口普查（census）。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还是在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中间相隔了42年。作为重返和平的象征之一，罗马人欣然接受了人口普查。不过这次的普查方式与往年不同。

如今已成为许多国家“人口普查”词源的census，意指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调查。以往罗马的人口普查对象仅限于个人资产以及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服兵役的人数，调查对象仅限于居住在国内、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屋大维在世期间共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公元前28年、公元前8年、公元14年），普查对象包括了女性、儿童甚至奴隶。不过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只记录了最重要的一项：拥有罗马公民权的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口数量。

屋大维自己记录的数字如下：

公元前28年：406.3万人。

公元前8年：420.3万人。

公元14年：490.7万人。

公民人口的调查，让屋大维再度认识到罗马共和体制的极限。这个问题恺撒一早就预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极限”一说呢？因为罗马共和体制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召集全体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公民人数如此不断地增加，能够来首都罗马参加大会、行使权利的人数势必减少。这样的话，所谓的人民的意见，不过是少部分人的心声而已。更何况在公元前1世纪，除了本国的公民，罗马的统治者还需要管理人口数量超过罗马10倍的行省居民。

公元前70年普查登记的人口为90万人，42年后，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恺撒授予了北意大利行省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所以这次普查把他们也归入了本国人口；其次，从激增的人口数量可以判断，这次普查的范围涉及了所有的行省。事实上，之后行省的税赋都是依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来征收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准确把握现状是首要的工作。

最早公布普查结果的是意大利本土，以及行省中那些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殖民城市。一来是因为罗马人习惯了这种形式的调查；再者，组织调查的机构以地方自治体为中心。至于其他的行省，因无法达到本土的效率，调查结果的出炉需要等待几年的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弗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曾说过：“新政策在需要立即实施的情况下，不能给人

们思考以及批评的时间，必须接二连三迅速果断地去执行。”1500年前的屋大维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公元前28年，在进行大规模裁军的同时，展开了遍及行省的人口普查，同一年，屋大维又开始为自己及家族建造陵墓。

建造陵墓

古罗马的统治者们，既不像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们那样执著于身后之事，也没有东方国家那些专制的皇帝们建造宏伟的陵园以显权威的习惯。不过，从如今仍林立在阿皮亚大道（Via Appia）两旁的墓地可以看出，古罗马人对墓地也并非完全不用心思。有些陵墓甚至还模仿埃及的金字塔，不过和本尊相比，那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狗屋。

古罗马人的墓地规模总体不大，陪葬品大多是身前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可见，古罗马人对身后事看得比较平淡，对他们而言，墓地不过是一块死后的栖身之处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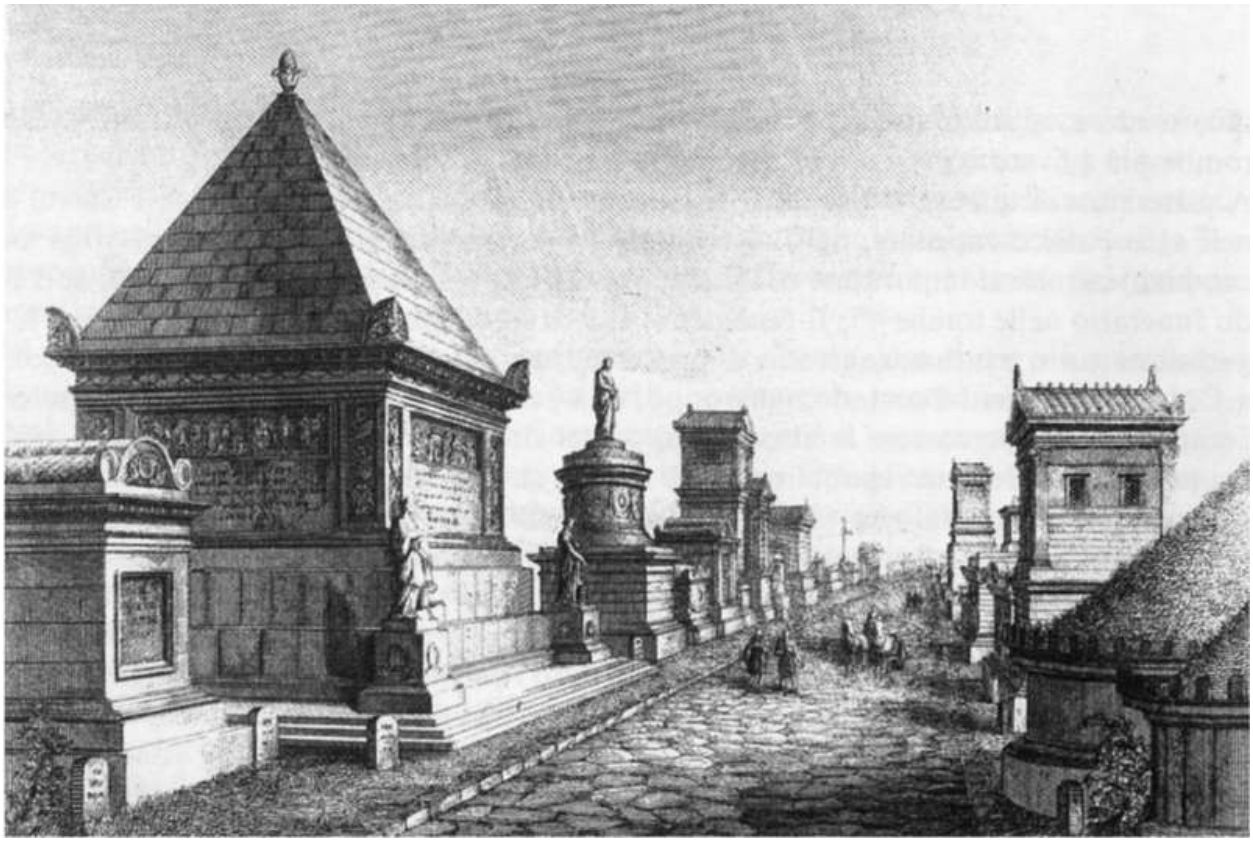
被后人称为“奥古斯都陵”（Mausoleum of Augustus）的屋大维的陵墓，建在自古以来叫做马尔斯广场的北面，往北直通弗拉米尼亚大道，与缓缓向南流淌的台伯河毗邻。现在这一带河岸整修完善，宽敞的道路可以通车，而当时陵墓的位置应该更靠近河边，四周被蜿蜒的台伯河包围。

虽然塞尔维乌斯城墙（Mura Serviana）已遭恺撒破坏，不过从轮廓上还是能看出，城墙内就是当年罗马共和国的市中心。屋大维的陵墓建在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外侧，所以也不算违反罗马城内不许建造墓地的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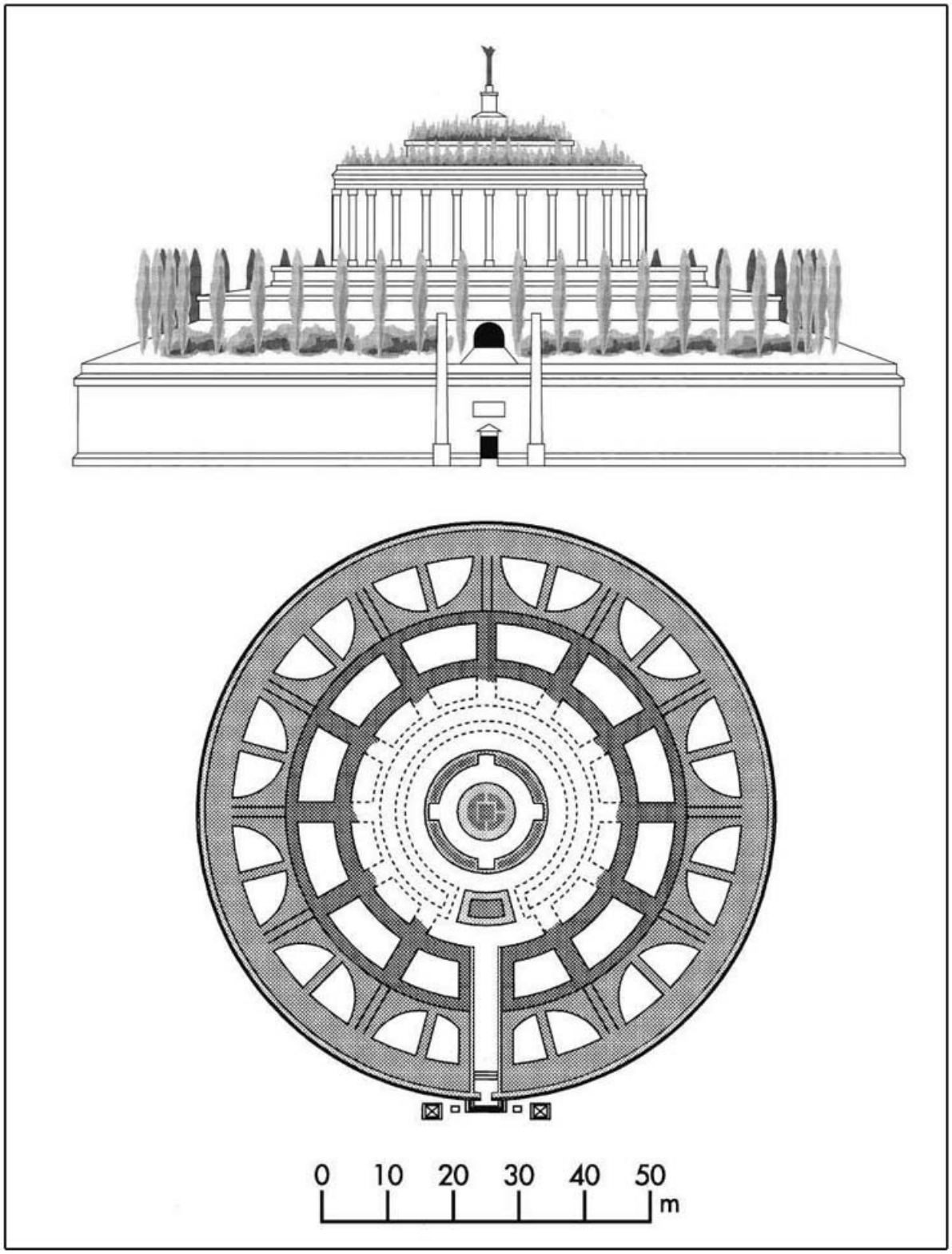
陵墓呈圆柱形，高3层，底座直径长达90米，如此巨大的建筑要想避人耳目，还真是困难。

陵墓的表面贴着白色的大理石，每一层都种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外侧用大理石围成一圈墙垣，陵墓的顶部竖立着屋大维本人的铜像，高度远远超过了种在最上层的松柏树。入口朝南，正对着罗马市民经常集会的马尔斯广场。

奥古斯都陵距离我的住处步行不超过2分钟，说来这里也不过是我的日常通道，但每次经过，总让我有种百思不解的感觉。



位于首都附近的阿皮亚大道两旁林立的墓地（复原图）



奥古斯都陵（上：复原图；下：平面图）

35岁的男人会考虑墓地的事情吗？虽然体质虚弱，但当时的屋大维并没有什么大病缠身。在他之前，罗马没有人会想到要建造一座壮观的陵墓。尽管200年后哈德良（Hadrianus）皇帝也在台伯河对岸建造了被后人称做“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 Angelo）的陵园，但这之前的200年，屋大维的奥古斯都陵始终都是古罗马城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屋大维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住宅相当素朴，为何陵墓偏偏造得如此豪华？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来看，也不像是一个对死后世界执著的人。

恺撒生前对身后的墓地漠不关心，作为恺撒的养子又是继承人的屋大维，为什么这么急着建造陵墓呢？罗马人对王朝复辟有着本能的排斥，难道他不担心建造陵墓会引发人们的质疑吗？

事实上，奥古斯都陵的建造纯粹基于政治的理由，这位35岁的陵墓主人没有忘记使用怀柔手段来安抚对这类事情神经异常敏感的元老院。

信息公开

罗马的法律，从公元前59年，恺撒初任执政官时制定以来，到奥古斯都执政的公元前28年，30年来内容没有变动过。

恺撒时代，元老院讨论的议题以及决议等所有的事项，都写成《每日纪闻》（Acta Diurna）或者《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在会议的第二天，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供人民阅览。这种规定也可以叫“信息公开法”。之前的元老院一直都是闭门开会，普通市民只有从元老院议员的公开发言，或者召开市民大会时，才有机会了解会议的内容。恺撒改变了元老院的运作，要求会议内容从审议阶段开始，就向人民公开。虽然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心怀不满，但也不敢投反对票否决人民知情权的法案。

如果站在元老院议员的立场，就能理解他们的不满。因为掌握国家的秘密，是强化手中权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恺撒制定“信息公开法”的目的，除了要大家认识到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之外，也是为了打破元老院长年以来享受的既得利益。

屋大维作为恺撒的养子、众所公认的继承人，竟然修改了这项法律。法律修改后的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就从罗马广场的墙壁上消失了。这让元老院的议员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和一心想打破元老院体制的恺撒不同，恺撒的养子似乎有意认同元老院的权威。

但是，屋大维并没有将这个持续了30年、广受好评的法律彻底废除，而是根据内容，将《每日纪闻》和《元老院纪事》分开。

《元老院纪事》依旧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会议的内容，记录存放在档案馆（Tabularium），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自由阅览。这样，既维护了信息公开的理念，又不像以前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强迫人民接受信息。让愿意了解的人通过自由阅读来获取资讯，才是最实际的信息公开。

元老院的议员们对此也非常欢迎，他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发言第二天就成为民众饭后茶余的话题。

至于《每日纪闻》，屋大维认为从字义上理解（Acta Diurna），它更接近官方消息，因此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记录国家政策、元老院决议事项以及公职选举的结果等内容为主，通过《每日纪闻》向本土内的地方自治体以及行省内的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发布官方消息。到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时期，《每日纪闻》又增添了元老院的会议摘要，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因此，有不少现代研究者认为《每日纪闻》就是现代报纸的鼻祖。《每日纪闻》独立发行百余年后，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著作中有以下的陈述：

《每日纪闻》不仅在罗马人居多的罗马军事基地和殖民城市流传，在各个行省内也有很高的传阅度。

《每日纪闻》、《元老院纪事》以及持续了500年以上作为罗马国家官方记录的《大祭司记录》，是了解罗马的正式资料。罗马人深知正确掌握信息的重要性，只要罗马帝国还存在，这三份记录就不会中断。

元老院的“裁员”

废除了“墙报”赢得元老院好感的屋大维，又马不停蹄地着手进行元老院再整编的工作。

对元老院的议员们而言，改革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屋大维采用了让他们不会反对的巧妙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公元前28年，元老院已陷入混乱无章的状态，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势在必行。

公元前45年，恺撒击败了以庞培为首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将元老院议员的人数从苏拉改革以来的600人增加到了900人。恺撒通过增加议员的人数，实施了元老院的改革。改革后的元老院，新成员中除了行省的罗马公民之外，还有不少刚被恺撒征服的中北部高卢的部落首领。习惯了异族同化的罗马人也对恺撒的这种激进的做法感到吃惊，特别是以西塞罗、布鲁图等为首的一向以高贵血统为荣的议员们，不满情绪尤其强烈。

恺撒遭到暗杀之后，安东尼阴谋篡权夺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提出了再度增员的要求。安东尼自知影响力不够，佯称这是恺撒生前决定的人事，硬行闯关通过。对那些新任议员，就连一般的平民都嘲笑他们是“冥界派来的议员”。

屋大维掌权之后，他不仅赦免了对手安东尼派的所有议员，而且准许他们全体复职。内战结束、恢复和平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已多到议会大厅容不下的程度，据说超过了1000人。屋大维决心将议员人数减至600人。

首先，屋大维亲自出马，劝说一部分议员主动提出辞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猜想这些人大概都是被恺撒降伏的高卢人。毕竟，比起纯正的罗马人，他们属于弱势的异族。再者，一直都有传闻说恺撒的被杀和这些高卢人有关，对这些传闻，屋大维是不会掉以轻心、坐视不管的。

元老院议员在现代就相当于国会议员。无论古今都算是国家精英。自屋大维赶走高卢人之后，行省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元老院，成为国家精英。一直要到90年后，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禁令才得以解除。这件事也成为了后世研究者评断屋大维比恺撒保守的论据之一。

屋大维通过“谈心”活动，成功地减去了70人。因为形式上这些议员们是主动辞职，所以屋大维也没有忘记投桃报李。但凡有国家主办的体育竞技活动或者剧场演出时，都为他们保留了和现职议员同等的席位。

接下来的140位议员，屋大维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剥夺了他们在元老院的议席。这些人是在恺撒遭暗杀后的混乱时期进入元老院的，甚至有些奴隶身份的人，靠着巴结依附权贵也当上了议员。驱除身份不符的人，正合了那些世代元老院阶层的心意，他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被强行剥夺了议席的人是没有任何回馈的。

至此，屋大维已成功地减去了210人，但距离600人的目标，还多了200余人。于是他通过以下的方式，作最后的努力。

首先，他和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挑选30人，再让这30个人选出其他的30人；被选中的30个人，另外再选30人，直到人数达到600人为

止。

罗马自建国以来，元老院的议员人数一直定在300人。苏拉实施改革时，将人数增加到了600人。之后的恺撒更胜一筹，达到900人。两人不同的是，苏拉意在强化元老院体制，而恺撒则是为了打破元老院体制。屋大维将元老院的议员人数恢复到600人，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元老院的好感度，甚至连共和派的人士都认为，屋大维的此项举动证明了他对元老院的尊重。没料到，在第二年，年轻的统治者又做了一件令共和派们欣喜若狂的事情。

恢复共和宣言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屋大维发表了恢复共和的宣言。

屋大维不擅长即兴演讲，特别是重要的场合，都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表演说。这一天想必亦是如此。

屋大维死后才公开的《奥古斯都功德碑》亦称《功业录》（Res Gestae）中，有一段相关的记事：

> 平息内战后，经国民一致同意，我掌控了所有的事物。在我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时（公元前27年），我将我的所有权力转交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手里。

在其他史料中，对那天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铲平了布鲁图、打败了安东尼的屋大维，此刻像一位战场归来的战士，放下武器，卸下盔甲，站在元老院议员们的面前，发表了演讲：

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全部还给你们。我宣布，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的这个宣言，意味着军事、政治、外交的决定权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元老院会场一瞬间像冰冻般悄然无声，即刻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突如其来的事态，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议员们像孩子一般欢呼雀跃。

回归共和体制，意味着少数人领导制的复活，也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国家政策由元老院提出，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所以也称做“元老院体制”。当年恺撒孤注一掷，甘冒国法，跨过卢比孔（Rubicon）河，不惜挑起内战，决心打倒而且最终推翻了元老院体制，他的养子兼接班人竟然又让它复活了。元老院议员们不遗余力的掌声，不仅是献给屋大维的，也是庆祝他们自己又可以成为罗马这条大船的掌舵人。

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罗马法律规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必须由两人担任。不过，一人独揽大权的特例曾有过三次，他们分别是苏拉、恺撒，以及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的屋大维。

苏拉对反对派进行了大肃清之后，自任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实施了强化元老院体制的改革。他在目标达成之后辞去了独裁官。独裁官是非常时期，作为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一环而制定的特别制度。苏拉的辞任，表明了他坚持共和体制的决心。不过，由于苏拉之前清除反对派的手段过于残酷，即便是那些元老院坚持派，也都感到失而复得的权力似乎充满了血腥味。

恺撒得到政权之后，赦免了所有的反对派成员，并且恢复了他们的公职。虽然避免了一场肃杀风暴，但是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的举动，彻底打碎了西塞罗、布鲁图等共和主义者期待元老院复活的美梦。

屋大维继位后，也没有对反对派采取报复行动，曾经的对手们都予以恢复公职。现在，他又宣言回归共和体制，将内战时期他享有的一切特权全部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当然是欣喜若狂，百分之百地接受。

屋大维放弃了集于一身的特权，得到了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民的赞赏。我们来看一下，屋大维之前拥有的所谓的特权，具体是指哪些权力：

（一）“三头同盟”（Triumvirate）

（二）意大利誓约

（三）世界的支持

特权（一）的“三头同盟”，是指公元前43年末，由安东尼、雷必达（Lepidus）、屋大维三位实力派共同组成的政治联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不同于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私自结成的“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经过公民大会予以正式批准，可以说是合法的“危机管理体系”。

这个同盟因雷必达的引退，以及公元前30年安东尼因战败自杀，已名存实亡。而且，“后三头同盟”在罗马人心目中，有一个血腥恐怖的印象。因为在同盟结成的第二年，“三头”罗列了反对派人员的黑名单，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清洗，受牵连的罗马人有2300人之多。

名列反对派黑名单之首的西塞罗在肃清运动中惨遭杀害，他是那些受害者中名望最高、最受尊敬的人物。为了摆脱负面印象，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海战中战胜了安东尼之后，特地派西塞罗的儿子去元老院报告胜

利消息，希望借安东尼的战败，将血腥镇压反对派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安东尼一个人的身上。总而言之，作为特权之一的“后三头同盟”还是放弃为好。

特权（二）的“意大利誓约”，是公元前32年，屋大维准备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决一死战之际，向本土的意大利半岛的人民要求的誓约。作为回应，意大利所有的地方自治体推举屋大维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全军总司令”，并向他宣誓效忠。这项特权也是在国家发生危机时，作为危机管理的一环而制定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死后，如果仍继续保留，不免会招来共同体私有化的误解。

特权（三）我不得不直译为“世界的支持”。其内容是罗马以外的所有行省赋予屋大维相当于“意大利誓约”的特权。由于当时罗马国家的东半部属于安东尼，所以所谓的“世界的”其实只有屋大维拥有的西半部而已。简单地说，就是行省的人们也都一致支持屋大维。

“意大利誓约”不只是口头誓约，还包括了人民承认屋大维拥有士兵的招募权，并且愿意负担临时税。而“世界的支持”没有这两项制约，甚至行省税都没有增加，屋大维只希望他在东征期间，后方能够维持稳定，直至战事结束。

总而言之，这三项特权都是非常时期特别设立的临时权力，尤其是第二项特权包括了临时课税权，如果再继续持有，会引发民众的公愤。

尽管屋大维的决定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不过，这些特权事实上也的确有违于罗马共和体制，所以，屋大维交还权力的宣言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政治谎言。

屋大维放弃特权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的权力，将自己的地位降至与元老院议员同级。那么，他没放弃的权力有哪些呢？

首先，他没有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公元前43年，年仅19岁的屋大维首度当选为执政官；之后，从公元前32年起连续任职，到公元前27年，宣布回归共和时，他正第七次担任着执政官。从那以后他仍然每年当选，直至公元前23年为止。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职位，屋大维宁愿冒着违反国法之险，也要保住这个权力。

如果能觉察到屋大维的用心，或许人民的感受就会不同，不会发自内心地为他的“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宣誓而欢呼雀跃。不过话说回来，执政官毕竟是国家的常设官职，即便是连任，也不能彻底否定他放弃特权这个事实。

屋大维第二项没有放弃的权力，是“凯旋将军”（Imperator）称号的经常使用权。“凯旋将军”原本是战争胜利时，罗马士兵对统帅的敬称，和平时期，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称号是一个特殊的荣誉和权力。恺撒生前曾经拥有这个权力，他的确也很符合“凯旋将军”的形象。屋大维却不同。众所周知，战场上带领士兵打赢胜仗的是阿格里帕将军。屋大维之所以坚持要使用这个称号，和恺撒一样，他也深知这个称号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屋大维以恺撒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的称号，拥有经常使用的权力。凡是由屋大维兴建的建筑物上，他名字的前面必定刻有“凯旋将军”略称的“IMP”。不过，生性谨慎的他还是尽量避免使用这个称号，以免招来“军事武力”的嫌疑。比如说他写的《功业录》里，就不曾用过这个称号。

“凯旋将军”的称号以世袭的方式相传可谓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军队指挥权的代代延续，即实质上的“君主制”。公元前27年，当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不知道有多少罗马人觉察到，这个“凯旋将军”即将成为皇帝。

屋大维保留的第三项权力是“第一公民”的称号。Princeps原本是指罗马共和时期国家公民“第一人”，之后被引申用做称呼领导人。公元前

29年，元老院授予34岁的屋大维“第一公民”的称号，以表彰他战胜安东尼、结束长期内战的功绩。相比带有军事色彩的“凯旋将军”，“第一公民”的称号对屋大维来说无疑是一件很便利的隐身外套。

同样，对坚持共和体制者而言，“凯旋将军”的称号多少隐含着些挑衅之意，而“第一公民”就完全没有了忌讳。当年，元老院也曾授予打败汉尼拔（Hannibal Barca）、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胜利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这个称号。

屋大维将“第一公民”的称号发扬光大用到极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称呼即将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时，要么用“恺撒”（他是恺撒的养子，继承了恺撒的姓氏），要么就用“第一公民”。在他自己撰写的《功业录》中，也曾三度自称“第一公民”。一些现代研究者将屋大维执政时期的罗马国家体制叫做“元首制”而不是“君主制”，或许也和这个称号有关。看来35岁的屋大维不仅骗过了当年的罗马人，也骗过了不少后世的研究者们。

以上是公元前27年，年轻的统治者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放弃和继续保留的权力。那么，他从中又得到了哪些利益呢？

“奥古斯都”

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制之后刚过三天，即公元前27年的1月16日，元老院通过决议一致同意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

屋大维在《功业录》中对此作了以下的记述：

> 为了答谢，我宣告恢复共和，元老院授予我“奥古斯都”的称号，并给予我以下荣誉：

> 我居所的两侧门柱以月桂树装饰，大门上放置“公民冠”。还有一面黄金盾牌置放于元老院会场内，盾牌上的铭文可以证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因为我的英勇、宽容、公正、仁慈而将它赠与我。
>
> 从今以后，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

这段内容写得非常平实，既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夸大其词，除了最后一段隐瞒了事实。对屋大维来说，这是最好的写法。他正在出演一场政治权谋的大型剧，即便是想象力过人的恺撒也会为他养子这精湛的演技赞叹不已。

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称号的过程可以用“绝妙”两字来形容。

绝妙之处有三：首先，从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到元老院决议授予封号，之间只隔了3天。其次，提议给“奥古斯都”称号的人选。再次，为何是“奥古斯都”而不是其他的称号。

3天，足够元老院议员们为共和回归而兴奋喜悦，却来不及去深思这突如其来的宣言的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动机。3天的时间可谓不长也不短。

接下来是提案的人选。之所以用“人选”这个词，是因为整个过程是按照事先经过周密计划、安排好的剧本来演绎的，称号的提案人不是偶然出现的。

依照惯例，元老院会议每隔9天举行一次，那一次不知为何只隔了3天。会议上，提议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的是备受同僚尊敬的议员帕里奥（Asinius Pollio）。

帕里奥是一位很有学识、教养的武将，出生于公元前76年，公元前27年时他刚满48岁。帕里奥的父亲只是一位乡绅，他能走上“晋升之

路”，位居高职（即所谓的“光荣的公职人员”），全靠恺撒的提拔。公元前49年1月，26岁的帕里奥决定跟随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西塞罗口中的“年轻的罗马激进派”的一分子。

恺撒在《内战记》中没有提及渡过卢比孔河一事，后人是根据帕里奥遗留下来的文稿才有机会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同年4月，帕里奥作为库里奥的副官，和35岁的库里奥一起，遵照恺撒的指示，在征服了西西里之后，将战场往北非延续。同年8月，库里奥因战败引咎自杀，年仅27岁的帕里奥带领残余部队退回到西西里。

不久，恺撒提升帕里奥为军团长。从此以后，帕里奥跟随恺撒，参与了和庞培对决的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今都拉斯）战役、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和在北非彻底击败庞培军团的塔普苏斯之战，以及在西班牙战胜了庞培之子的孟达（Munda）会战。

公元前44年，恺撒出兵帕提亚（Parthia）之际，任命32岁的帕里奥，在他东征期间，担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恺撒遭暗杀之后，他生前决定的人事任命并没有变更，因此帕里奥离开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罗马，按原定的计划，出发去西班牙赴任。

恺撒遗言公开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出现了相互牵制的微妙关系。或许是因为曾经一起跟随恺撒打仗，有所谓的同袍之谊，帕里奥的态度很明显地偏向安东尼一方。当年安东尼、屋大维联手，对阵布鲁图和卡西乌斯（Cassius）的军队的那场腓立比战役，帕里奥参加的就是安东尼的部队。

安东尼日后逐渐受到克娄巴特拉的影响，最终发展到要同屋大维率领的罗马军队开战一决的局面。这种形势下，帕里奥不得不放弃了安东尼。屋大维理解帕里奥无法面对安东尼拉弓引箭的心情，尊重了他的立场，没有勉强邀他一同出战。亚克兴角海战的战势以及次年安东尼自杀

的消息，帕里奥都是在意大利本土获悉的。

正如之前所述，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的余党，准许他们恢复公职。对帕里奥而言，他同样也可以重新开始一度被中断的公职，那时他才46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然而，帕里奥只保留了恺撒授予他的元老院的议席，辞去了其他所有的公职，选择了另一种优雅知性的人生。帕里奥的所为，为他赢得了不趋炎附势的清白名声。

挑选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屋大维这独到的政治眼光，让人难以相信他只有35岁。试想，屋大维如果选自己的同党，势必会引起元老院的怀疑，但要让那些心底里仍然尊敬布鲁图的共和派人士来提议，又不知会等到何年何月。想要称号顺理成章地提出，又能迅速无碍地通过，帕里奥是唯一不二的人选。

当然，对于有着异常的政治灵敏度的屋大维而言，最重要的还是选择“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相信这一定是他经过了反复推演、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

罗马人是一个爱用外号的民族。比如说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阿提库斯”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深爱希腊的阿提卡（Attica），所以为自己取了一个意为“阿提卡人”，即“阿提库斯”的外号。这种爱好到了重要人物身上就变成了称号。

打败汉尼拔、征服了北非迦太基人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 Scipio）被称做“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意为“非洲的征服者”。科尔涅利乌斯家族是古罗马煊赫的世家，其中，西庇阿一门人才辈出，称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也是为了和其他的西庇阿区分开来。

同样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苏拉，曾立下征服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等赫赫战功，照例也应该被授予称号，

因为他后来掌权之后血腥镇压对手马略（Gaius Marius）一派，没有罗马人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虽然苏拉并没有强烈的虚荣心，但对此事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幸运者”（Felix）的称号。

苏拉死后，这位令人畏惧、害怕与他为敌的统治者的称号就再也无人提及。苏拉他自己可能是一位幸运者，可是对那些因他的肃清运动而惨遭杀害、没收财产、子孙后代被剥夺了公职权的人们来说，就太不幸了。

庞培也有称号，叫“马格努斯”（Magnus），“伟大”的意思。庞培作为苏拉的得力大将，在很年轻时就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尤其是一举歼灭海盗、成功占领东地中海海域的战绩，更让他声名显赫，成为了罗马著名的战将。拉丁语的Magnus相当于英语的“The Great”，与亚历山大大帝同称。

恺撒生前既没有外号也没有称号。或许对于这位战胜了“伟大的”庞培的人物，人们实在想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配的称号。他死后被神化，“神君恺撒”就成了他的称号。

从罗马人的习惯来看，授予国家功臣以称号算不上什么特殊的待遇，问题是用怎样的称号。屋大维的确有平定内乱的功绩，但实际指挥战事的是阿格里帕，因此他不适合骁勇善战的称号，何况屋大维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前人相类似的称号。

在古罗马时代，“奥古斯都”（Augustus）纯粹是指神圣的、崇敬的事物或场所，没有武力或是权力的暗喻。即便有神圣之意，那也是宗教上的含义，没有唯我独尊那种强烈的语意。要知道，就算是街边的小寺庙也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场所。

35岁的屋大维为自己选择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且挑选了声誉良好的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在恢复共和宣言发表后的第3天，趁元老院还

沉浸在恢复共和的兴奋中尚未清醒之际，以被动授予而不是主动要求的形式得到了称号。公元前27年1月16日的那次元老院会议上，几乎没有人会将“奥古斯都”和权力联想到一起。

除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元老院还授予了屋大维其他的荣誉。像在住宅的门柱上装饰月桂树、大门上镶嵌“公民冠”以及将他的事迹刻在黄金盾牌上并存放于在元老院会场。其中“公民冠”和“盾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首先，盾意味着防守并非攻击。而用橡树枝编织而成的公民冠，在罗马军队里是作为勋章，奖给那些成功地拯救了自家部队的官兵。它和月桂冠不同，后者是用月桂树枝制成，象征胜利的桂冠。罗马军人以得到公民冠勋章为荣，他们认为这是比做冲锋陷阵的英雄来得更高的荣誉。奥古斯都也喜欢公民冠，他不善武事的形象和象征战争英雄的月桂冠相差甚远，倒是公民冠更能彰显他平息内乱、救罗马于崩溃边缘的功绩。事实上，流传下来为数众多的奥古斯都的肖像中，他几乎都佩戴公民冠，极少看到佩戴月桂冠的肖像，他的喜好可见一斑。

然而，元老院全体一致通过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和权力无缘。

表面上“奥古斯都”的称号给屋大维带来的只是权威不是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历经了14年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他的任何发言都是一言九鼎，其分量之重无人可比。何况，他放弃的都是那些对他有害无利的权力，而最高军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有关这点，我们以后会再叙述。

这样一位人物，如果再添以权威，会变成怎样的情形？无论是在会议上的发言还是决定政策，奥古斯都的意见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言，势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在他的书中所写的“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的说法，理论上或许

成立，而事实并非如此。

和奥古斯都长期共同担任执政官的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忠实得力的左右手，但他并不拥有屋大维变成“奥古斯都”之后的那份威信，因为他没有象征权力（arctorita）的称号，所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根本就超过了他的同僚。

有一位研究者对这个时期的奥古斯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奥古斯都卓越的政治手腕，在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奥古斯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共和体制下的法律规定，而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最终将演变成违反共和制法律的帝制。这就是他的“卓越”之处。

对大多数的罗马人而言，公元前27年是庆祝恢复共和的一年，而同样是这一年，在后人眼里（半个世纪之后），正是帝制正式的开始。

这一年，奥古斯都正式的名称叫“凯旋将军·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一个宣布恢复共和的人有这样的名称很有些讽刺意味。

我认为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个名称背后的实质意义。这位35岁年轻的统治者有着令人敬畏的冷静的头脑，他统治下的新生罗马将以怎样一个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事先都作好了周全的设计。

形象作战

奥古斯都是位美男子。当年17岁被恺撒选定为继承人，长相粗犷的安东尼曾尖刻地说：“恺撒喜欢美少年。”奥古斯都从17岁被推上政治舞

台，到30岁的14年中，陆续打败了劲敌布鲁图、安东尼，英俊的容貌里更添了一份自信的神采，越发地英姿焕发、气宇轩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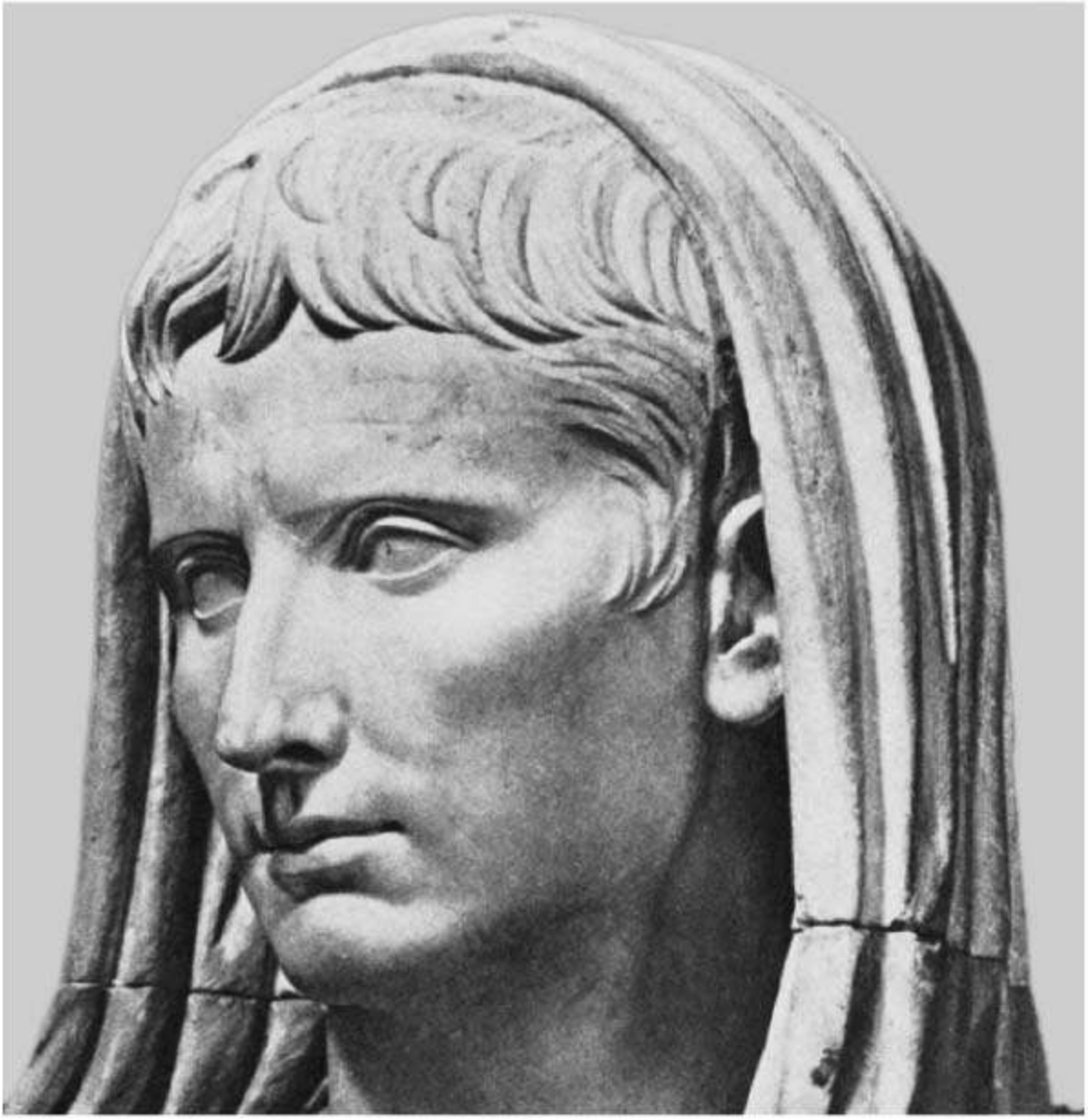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的美不仅在外貌，当他说话或者聆听时，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静谧和清朗的气息，比他端正的脸更有魅力。

古罗马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曾描述过奥古斯都是“难得的美男子，但不爱打扮”。或许正因为天生俊美，他不用花心思装扮自己。不过，35岁就站在人生顶峰的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份美貌的功效。

尽管古罗马的雕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或破损，后来又遭到基督教徒的破坏，还是有可观的数量遗留至今，其中最多的就是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罗马帝国的全境都发现了他的雕像，可见当时制造的数量之多，而且派发到了全国各地。

留存下来的奥古斯都的雕像，除了有一尊怀疑可能是他晚年时期的之外，其余都是他40岁前的形象。奥古斯都长寿，活到了77岁。且不论晚年，就是在他45岁通常被古罗马人认为壮年期的雕像竟然也没有被发现。何况，壮年期的奥古斯都，无论在公务还是私生活上，都是一帆风顺。将自己成熟时期的形象保存下来应该更加合情合理。苏维托尼乌斯曾说过：奥古斯都的魅力到老都没有衰退。

我想，奥古斯都是有意将自己的公众形象限定在30岁的青年期。他的责任在于实现恺撒生前描绘的蓝图。恺撒很晚才开始“光荣的公职”生涯（他只有50多岁的雕像），相对于恺撒非凡的个人魅力，彰显自己的年轻，是奥古斯都呈现自己存在感的最有效的手法。而且，奥古斯都想要为他的新生罗马，树立一个和平、开朗、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形象，充满活力的30岁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奥古斯都头像

刻铸在奥里斯金币上的奥古斯都侧面像 （公元前2年——公元1年左右）

击败安东尼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奥古斯都，正在使用他手中的权力，建立一个罗马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特性，在看似与之无关的雕像、货币中都有显示。

作家眼中的奥古斯都

罗马历史上，奥古斯都的重要性仅次于恺撒，准确地说是不相上下。由20世纪一批顶尖的专业研究者的论文编辑而成的《罗马通史》中，有关奥古斯都的篇幅可以与恺撒的匹敌。可见，奥古斯都的一生既有写成详细传记的价值，且内容也不乏魅力。

事实上，有关奥古斯都传记的数量非常少，大概不足恺撒的十分之一。这些传记图书基本上都是由研究者们所著，作家几乎没有写过奥古斯都，至少著名的作家没有相关的作品。这其中必有理由，我推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奥古斯都不是能引发作者写作冲动的人物。我再次强调，他不是一个乏善可陈的男人，他有足够的魅力，但不是那种会令人热血沸腾的魅力，他沉稳的特性反而会使人越发清醒。前一种魅力叫人感动，而后者令人敬佩。这大概就是打下江山和稳住江山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吧。

所有的文字工作者都知道，笔下人物的魅力是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因素，只有心灵被深深地打动，作者才有可能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日本的出版界有一个定律：有关织田信长的书一定畅销。这虽然和喜欢织田信长的读者居多有关，不过我认为，日本的历史人物中，织田信长的个人魅力特别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这种热情驱使作家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对喜爱信长的读者而言，有新佳作诞生，当然是愿意一睹为快。

第二，和恺撒相比，奥古斯都的生平事迹比较难以叙述。奥古斯都在政权地位稳定之后的晚年，曾经提笔写过回忆录，结果中途放弃。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他不愿意被人拿来与恺撒的好文笔作比较，我倒是觉得，这是因为奥古斯都无法准确地概述自己的一生，索性把手稿扔进了垃圾桶里。

那么，奥古斯都的传记究竟难写在哪里？这主要是因为奥古斯都不是一个按部就班行事的人。我以作画为例来说明吧。

恺撒在宽阔的墙壁上，用他特有的“快攻”方式画上湿壁画（Fresco），完成之后即刻又转到另一面墙，在旁观者的感叹声中一气呵成，放眼望去，宽大客厅的四壁上布满了鲜艳夺目的壁画。

不同于恺撒，奥古斯都有充裕的时间，他可以画油画。宽敞的客厅里摆上大小不一的各种画架，奥古斯都没有选择画完一张再画第二张的方式，他在这些画布上先画上素描，然后放在那里。偶尔他也会有一气呵成的作品，那是当他判断尽早完成对他有利时，他会迅速地将作品完整地呈献给观众。换言之，就是尽快造成既定事实。恢复共和的宣言，以及促成元老院向自己赠与“奥古斯都”称号的演出，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余的一些作品则用相当长的时间，慢慢去完成。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走到画架前添上几笔，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让旁观者失去了耐心，注意力渐渐被转移，而此刻对奥古斯都而言，正是绝佳的时机，他在大家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油画。

和恺撒时期相比，奥古斯都年代的史料严重不足，这是鲜有奥古斯都传记的第三个原因。

首先主人公自己没留下什么著作。虽然有一本《奥古斯都功德碑》，内容却过于单薄，类似目录。奥古斯都把他希望传达给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事迹列举成35项，其内容虽然没有虚构，但也没有写出全部的事实。

即便是这样一本内容简单的《功业录》，奥古斯都对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经过等都没有作明确的叙述，鉴于政治上的理由他不得不含糊不清。

除了奥古斯都自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

以第三者的立场曾经写过一本《罗马史》，可是在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时期，作品被毁于一旦，因为基督教对罗马的兴盛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根本没有深究的兴趣。

恺撒时期，其手下秘书官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萨卢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等为他的所为留下了证言，而奥古斯都时期，既没有这类为他证言的手下，也没有出现像西塞罗那样热衷于政治、喜爱写信、收集各类情报的人物。

研究奥古斯都的时代，只有靠后人撰写的历史书以及从碑文、纸莎草（papyrus）文书和货币等史迹中一点点挖掘，再像拼接一块块马赛克那样，拼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如果奥古斯都是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人，可以写出一本完整的编年史，正因为他的作风不是如此，所以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就很难条理清晰地去叙述。

那么，研究者们又是如何去处理这位作为罗马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奥古斯都的呢？

简单地说，是将奥古斯都实施的各种政策分门别类，单项阐述。例如：政治改革、行政改革、货币改革、社会改革、军队改革等等。即便如此，研究者们还是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因为仅军队改革这一项，奥古斯都就用了28年的时间。

阅读这种分类式的记述文，虽然可以了解奥古斯都创下的伟业功绩，却无法感受他个人的特质。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平安地活到77岁，源于他深谋远虑的个性，有关个人特质方面的信息很难从文章中体会到。

换句话说，这种记述法，根本无法让人近距离地看清奥古斯都。这些内容作学术研究或许足够了，但我不是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此。我关心的并不是他作出了哪些成就，而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当然，我也没发现什么新的史料，写作时也面临与研究者们同样的困惑，我只有尽可能地按照编年史的方式进行论述，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的业绩作一个总结归纳。所以，有些事情，还处于素描阶段的时候，我先作一个简短的介绍，等油画完成之后，我会再次详细论述。

既然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有三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们在公元前27年时肯定已经画好了素描。这三件事情是：（一）中央政府的行政改革；（二）确定行省统治的基本方针；（三）军队改革。这三项在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中都没有记载，只字未提的原因想来是他权衡之下作出的判断。作为一个宣布恢复共和的人，提及这三件事情只会暴露他的言行不一。

建立“内阁”

奥古斯都实施元老院的重建，将议员人数减至600人之后不久，立刻又着手创建了类似于现今称做“内阁”的机构。这个叫“Concilium Princepium”（直译为“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的机构，以奥古斯都（“第一公民”）为中心，由两位执政官加上从各个机关抽出的法务官（Praetor）、财务检察官（Quaestor）、监察官（Cēnsor）、按察官（Aedilie）各一名，以及从元老院中选出的15位议员所组成。Concilium之后成为英语council（议会）的词源。它具有和“元老院最终劝告”（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同等的效力。而“元老院最终劝告”原本是维护元老院体制最有力的武器。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民主改革。国家政策不再是由“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独断，而是由包括了15位元老院议员在内的多数成员共同商定。内阁有着合议制的外表，再加上有15位从元老院抽选出的议员参与，所以，即便是内阁的决议和元老院的决议效力相等，元老院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内阁建立时，“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还兼任着执政官的职位，另一位执政官是阿格里帕，再加上4位事务官，内阁成员中，奥古斯都派共占有6票。元老院的15名议员因为是以抽选方式选出，“第一公民”难以暗中操作，直观上是15票对6票，形势有利于元老院。

没过多久，大家就清楚地认识到，权力的抗衡实际上并非数值显示的那么单纯。虽然“第一公民”、“奥古斯都”的称号只是权威的象征，没有实际的权力，作为掌握实权的执政官却拥有否决权。内阁建立时，奥古斯都正好担任着执政官，如果元老院的15位议员提出与他意见相悖的决议，他可以使用否决权推翻决议。尽管否决权由2位执政官共同拥有，但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可以说是奥古斯都亲信中的亲信，根本不用担心他会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内阁所作的决议就是奥古斯都的决议。

不过，内阁决议的效力并没有超过元老院的决议，只是与其相当，否则会引发元老院的反对。奥古斯都用了以下的方法解决了二者实力均衡的难题：

他减少了元老院的例会，改为每月两次，分别在每月的1日和15日举行。此外，每年还有两个月的休会期。而内阁则是全年无休会期，必要时随时可以召开内阁会议。如此一来，两个决策机构的重要性即刻分出了上下，名义上同等价值的决议，实质上并非如此。

行省统治的基本方针

派遣总督的行省统治权，长久以来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当年苏拉进行国政改革时规定，派往行省的总督必须要有担任过执政官或者法务官的经历。在只有议员才能担任执政官和法务官的前提下，结果就是唯元老院的人才能成为行省总督。除此之外，罗马共和体制规定，军事指挥

权只授予总督，元老院独占行省总督的委任权就意味着独占军权。

打破这个独占制度的是恺撒。他接受了行省总督必须是元老院议员的条件，毕竟元老院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废除了元老院的行省总督任命权。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发表了回归共和的宣言，行省总督的委任权按理也应该归还给元老院。所谓的罗马共和体制，不是君主独裁制，而是由600位元老院议员共同执政的少数人领导制（寡头政治）。可是，为感谢年轻的最高统治者回归共和的决定，元老院不仅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还赋予了他担任行省军事指挥的权力直至和平稳定。

坚决反对恺撒的西塞罗、小加图（Cato）、布鲁图都已经不在人世，元老院也从亲身经历共和体制的世代转移到只有在理论上了解共和体制的世代。对这代人而言，与其待在生活不便又时常要面对蛮族的军营，当然不如留在气候温和、生活舒适的本土，或者是生活条件较好的行省。元老院出身的人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过上安逸的生活。读到这里，请大家不要匆忙地下结论，认为罗马的上流社会已经开始堕落，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喜欢安逸的人。何况那时候的罗马，正如诗人咏颂的一般，还沉浸在内乱结束、和平到来的兴奋之中。

奥古斯都正是相机而行地利用了这个和平气氛，在给足了元老院面子的情况下，得到了行省的军事权。

罗马国家分为四大区域：

一、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墨西拿海峡（Stretto di Messina）的意大利本土。

二、元老院任命的总督统治的行省，史称“元老院行省”。

三、奥古斯都直接统治的行省，史称“皇帝行省”。

四、由于特殊国情，属于征服者奥古斯都私人领地的埃及。

除以上区域，加上那些承认罗马霸权、外交及军事追随罗马的“同盟国”，构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

那么上述的二和三区域是如何分割的呢？

如果是一位平庸无能的统治者，他一定会选择经济发达、容易管理的地区。然而，35岁的奥古斯都却反其道而行之。

那些归属罗马年代久远、已经罗马化（罗马人称之文明化）的行省，以及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无须驻兵的地方，划为元老院行省。它们包括：

1.西西里岛（Sicilia）。

2.撒丁岛（Sardegna）和科西嘉岛（Corsica）。

3.西班牙境内伊比利亚（Iberia）半岛的贝提卡（Baetica）地区。

4.领土从南法延至瑞士的高卢（Gallia Narbonensis）行省。

5.靠近希腊北部的马其顿（Macedonia）行省。

6.希腊南部的亚该亚（Achaia）行省。

7.小亚细亚（Asia Minor）西部的亚细亚行省。

8.小亚细亚北部的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

9.克里特（Crete）。

10.塞浦路斯（Cyprus）两岛。

11.东邻埃及的昔兰尼加（Cirenaica）。

12.原属旧迦太基（Carthage）领土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

13.原属旧努米底亚（Numidia）的努米底亚行省。

以上这些地区亦称文官统治区，依旧按照惯例由元老院派遣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的人员担任行省总督，任期一年。对元老院议员而言，除了法务官等公职之外，有了行省总督的经历，才算真正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精英”，何况赴任之处又是麻烦不大的太平之地，所以，对奥古斯都的决定举双手赞成。

作为“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精英”的义务，行省总督是没有薪水报酬的，不过所需的经费可以从当地向本土缴纳的行省税中扣除。

而奥古斯都所管辖的帝政之后被称为“皇帝行省”的区域是：

一、伊比利亚半岛（Ibérian Peninsula）西部的卢西塔尼亚（Lusitania）行省。

二、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Hispania Tarraconensis）。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北部还未完全被罗马占领。

三、南法以外的高卢（Gallia）全境。之后此处被划分为三个行省。

大概不需要我特别说明，大家也了解，这个区域是既属于莱茵河防卫线的前沿，也是后方之地。

四、伊利里亚（Illyricum）、达尔马提亚（Dalmazia）地区。

多瑙河的防线的建立，因恺撒遭暗杀而终止，因此这个地区就成为了保卫多瑙河的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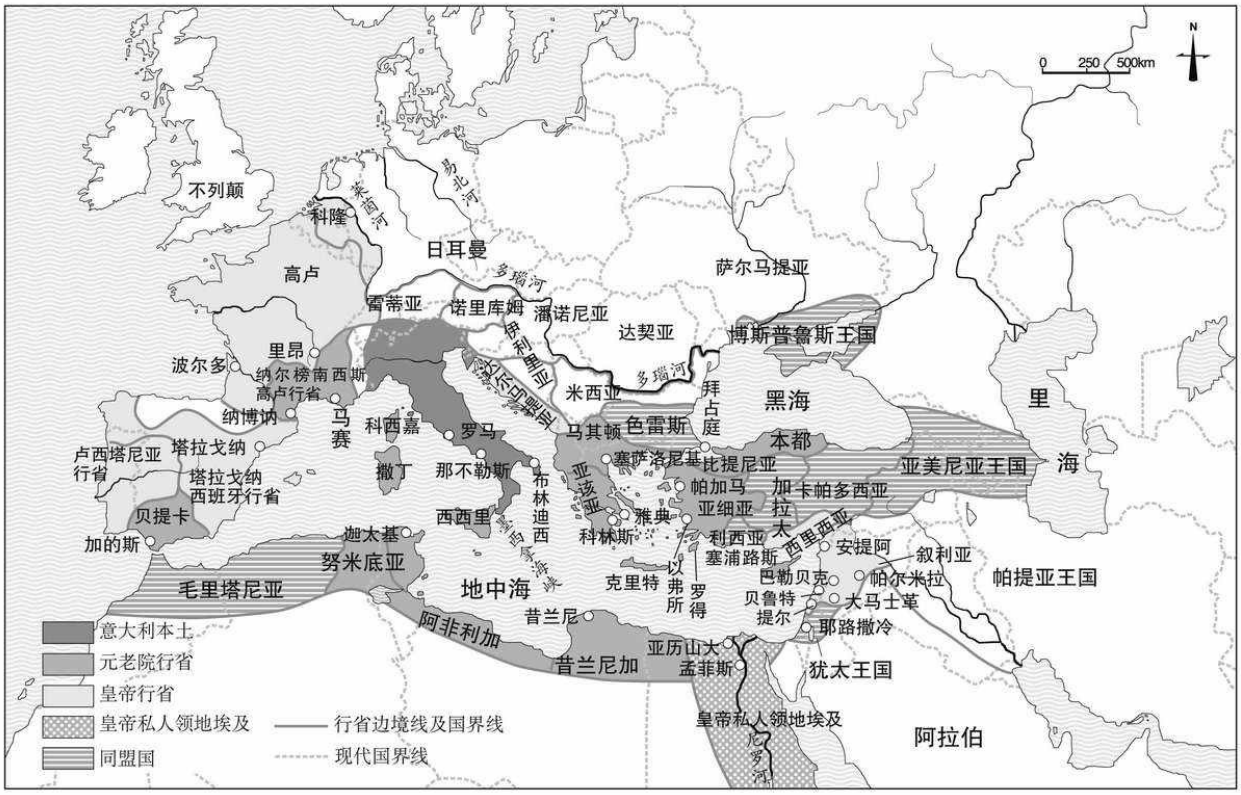
五、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

六、叙利亚（Syria）行省。

以上（五）和（六）行省是以帕提亚（Parthia）王国作为头号假想敌而构成的前沿地区。

这些“皇帝”的直辖行省由奥古斯都任命的将军统治管理。因为这些行省基本属于边境地区，保卫边防是最主要的任务，所以行省总督都是由可以兼任军队指挥官的武将担任。总督们作为公职人员领取俸饷，任期长短由奥古斯都视情况而定。

既然赋予武官们军事指挥权，从法律上讲，奥古斯都必须拥有可以指挥武官们的更高一等的权力，否则整个帝国的防卫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鉴于这个理由，奥古斯都获得了公认的“全军最高司令权”。元老院就这样连军事权也一并交给了奥古斯都。



公元前27年时的罗马全境地图

如果不想承担责任，自然不会强调主张权利。不过奥古斯都并非是为了获得军权才实施了行省管辖二分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需。

“安全保障”

古罗马时代就有了防卫以及安全保障的概念。英文的“安全”（security）就是源自拉丁文的securitas。大家如果认为罗马共和时代施行的是非扩张主义，而帝国时代是扩张主义，那就完全错了。事实上，罗马共和时代正是霸权扩张的年代，而帝国时代则是进入了防御守卫的时期。最先改变政策的是恺撒，他认为无止境的领土扩张对罗马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作为恺撒继承人的奥古斯都对此有着共识。

国家的政策由攻击转向防御，确立防卫线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恺撒征服高卢的军事行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奥古斯都时代，也并非与战争完全无缘，不过这些战争中，除一场之外，其余的都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样是因为安全保障的需要，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史上常备军的创始者。

作为最低限度的防卫，罗马共和时代设有四个军团，从未有超过这个规模以上的常备军的兵力。因为如果有需要，可以征兵随时组成军队。人口普查就是为了方便征兵而调查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数才应运而生的。即使后来征兵制改为自愿兵制，仍旧维持着临时征兵的方式。罗马军队在遭遇外敌袭击时经常反应迟缓，正是没有常备军的缘故。

共和时代末期，恺撒的军团就是实质上的常备军，但军队和恺撒之间的誓约也只是到战争结束为止。这种誓约关系，与其说是国家和军队之间的，不如说是总司令和士兵之间的誓约。

在共和时代的霸权扩张期，随机组军的方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是出兵攻击对方，事先一定会设立一个目标。等目标明确了再建立军队，经过充分的训练之后再出兵也为时不迟。何况，仅是罗马在训练军队的消息，就已经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胁，军队一旦开拔，敌方往往不战而降，所以，临时征兵还是有其长处的。

但是，一旦国家目标转为安全防卫时，之前的做法就变得不合时宜。要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必须建立一支常备军予以防备。奥古斯都认为要达到防卫国家的目的，常备军万不可缺，因此他将之付诸行动。

这项军事改革是和缩小军备一起实行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是常备军，就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用最少的经费达到最大的效果，否则国家经济将不能承受。如果国家不能负担军费，迟早会用提高行省税的方式来填补开支，这势必会引发行省人民的不满，到时候不要说预防外敌了，就连帝国内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我想，以上这些都是在公元前27年秋天前，35岁的奥古斯都计划的国家政策。他的责任在于完成恺撒规划的国家蓝图。但是如果一上任就立即付诸行动，不免会招来独裁的质疑。因此，在这个时期，他大概只考虑基盘的建立。当然，造楼房最重要的就是打好地基，换言之，就是要选准基石的位置。不过，奥古斯都在砌堆石头之前，间隔了一段时间，他先去做了一些引人注目并且获得好评的，即可以记入《功业录》的事情。他利用这个时间完全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

重整西方领地

公元前27年的秋天，刚满36岁的奥古斯都离开罗马，经由罗马古道（Via Aurelia）进入南法，同行的除了与他年纪相当的得力大将阿格里帕，还有两位少年——16岁的马萨鲁斯（Marcellus）和15岁的提比略

（Tiberius）。马萨鲁斯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则是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与前夫所生之子，即奥古斯都的继子。奥古斯都带上这两个少年是为了让他们初试一下战场的经历。奥古斯都和莉薇娅结婚已经10余年，两人却没有生子。

这一年的冬天，奥古斯都是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行省的首府纳博讷（Narbonne）度过的。所谓的度过并不是游山玩水、休养生息，正如恺撒做一件事绝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奥古斯都同样也是深谋远虑。虽然表面上此次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实际上重整罗马帝国的西半部才是奥古斯都的真正目的。

征服现今属于西班牙北部的高山民族，因为是军事行动，奥古斯都全权委任阿格里帕负责，不过作为总司令，奥古斯都不能远离战场滞留南法。于是他在第二年的春天前往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塔拉戈纳在巴塞罗那以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面临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从西班牙东部的行省以“希斯帕尼亚·塔拉戈南西斯”（Hispania Tarrakonenshisu）命名来看，在古代塔拉戈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巴塞罗那，行省的省会也设在此地。

虽然奥古斯都到了塔拉戈纳，但是距离实际战场还有400公里。一方面是因为奥古斯都对阿格里帕大将的指挥能力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即使战役名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实际规模并没有大到需要总司令亲临前线的程度。

当阿格里帕全力以赴指挥海陆两路进攻之时，奥古斯都一直留在塔拉戈纳。经过两次战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马军队就彻底征服了西班牙高山民族。奥古斯都一直到公元前23年才胜利返回罗马。这三年半的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首先是早在公元前27年的冬天已经着手处理的高卢问题。

除了南法，整个高卢地区一直属于罗马的行省，尽管在罗马14年的内战时期，高卢人随时有机会脱离罗马的统治。高卢没有像希腊那样成为战场，集中了罗马的兵力。和其他长久归属罗马的行省不同，高卢刚被恺撒征服不久，作为罗马的行省的历史还很短。从恺撒遭暗杀之后的14年，加上平息内乱后，奥古斯都因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高卢问题，直到公元前27年的总共17年中，高卢地区几乎见不到罗马士兵的影子。即使如此，罗马并不担心高卢人的反叛，这是因为当年战争之后，恺撒对高卢用了巧妙的招安政策。他到底用了些什么政策呢？

恺撒认为，被征服的民族会奋起反抗，并不是出于人民的民族自主性，而是由统治阶级的煽动引发。而统治阶级的不满，又是缘于异族的侵略导致他们失去了威信和权力。

恺撒对高卢全境所有的族群都很温和，没有任何赶尽杀绝的行为。所谓的温和，是指保留了族群的根据地、族群首领的地位，族群的宗教、语言以及生活习惯都和罗马入侵前一样维持不变。

但是仅靠这些并不能消除高卢内部的不安局势。近百个族群之间的抗争不断，处于劣势的族群会向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讨救兵援助。于是，恺撒挑选了四个最主要的族群，赋予他们领导管理所有高卢族群的权力。这四个族群分别是：埃杜维人（Aedui）、奥沃涅人（Auvergne）、塞卡尼人（Sequani）、林贡斯人（Lingones）。这四个族群的首领承担管理各自族群下那些中小部落的责任。甚至连曾经一度将恺撒逼入绝境的起义军领袖韦桑热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所属的阿尔维尼（Arverni）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可见，恺撒非常务实，而且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感觉。

此外，恺撒还要求这四个族群的首领必须一年一度召开全地区部族长会议，这是为了防止四个部族独自为政、竞相称霸所采取的策略。

就这样恺撒成功地掌控了高卢的统治阶层。他承认族群领袖一贯以

来的权力和威信，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一些可靠得力的族长甚至被授予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恺撒还很慷慨地将他的家族名“尤里乌斯”（Julius）赠给高卢人，高卢子弟作为“交换留学生”去罗马留学。从史料上可以发现，在恺撒遭暗杀之后，应该说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还是不断出现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虽然有点滑稽，不过在古罗马，被授予家族姓氏意味着一种被保护的关系（clientes），这和日本的店家允许别人使用其店名的行为有些类似。

恺撒的怀柔政策不仅仅如此。因为即使民众不会自发性地组织反抗运动，但不满情绪的爆发是发自内心的。而最容易引发人民不满的导火线就是经济问题。

罗马共和时期，按规定行省人必须缴纳叫做“什一税”的直接税，即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给罗马，有点类似缴付保护费。行省人没有服兵役的义务，罗马军团兵仅限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由于收入会有上下波动，所以恺撒将行省的什一税改为固定金额，整个高卢地区，一年上缴的行省税为4000万塞斯特斯（sestertius）。这个金额在当时到底有多大，我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中曾经有过叙述，总之这不是一笔高额的费用。

罗马共和时期的行省课税体制有一个特色，税款并非由国家来征收，而是由一个叫做“包税人”（Publicanus，由竞标方式决定征税人）的私营机关负责。恺撒废除了这项制度，高卢的税款从此和“包税人”没有关系。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是由谁来负责征收高卢的税款，按照恺撒的作风，我推测他应该是把职权交给族长们了。各部族长负责征收税款，经过由四大族群掌控的族长会议集中，然后交给恺撒。恺撒不是一个会将国家财产中饱私囊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分得不很清楚。他这一点，从严格的公私分明主义者眼光来看，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高卢的行省税，很有可能在之后的恺撒对庞培的战争中花掉了。

姑且不论税款的去向，站在高卢人的角度，被恺撒征服后的高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首先，各部族间的纷争已成为过去。来自日耳曼人的侵略，也因为恺撒两次渡过莱茵河对其的攻击，不再有忧患。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曾在书中记述，高卢被恺撒征服之后，从狩猎民族变成了农耕民族，由此可见，高卢人的生活日渐安定。

即使不再需要担心外敌的侵略，可以专心于农耕，各个部落族群的内部结构还是和以往一样没有变化。从内政的自治到税赋的征收，部族首领的威信和权力是众所公认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税金很低，就连本土意大利都要征收的5%的关税，在高卢只有2.5%。当时的高卢属于经济落后地区，所以恺撒有意降低了税率。

这些就是为何在恺撒遭暗杀、罗马因此陷入长期内战之后，高卢地区可以始终保持安定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缘于高卢人对恺撒的崇拜，我不这样认为，17年的地区稳定，不是单凭对个人的崇拜就能维持的。

但是在罗马平息内乱、恢复安定的公元前30年之后，高卢地区反而弥漫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氛。引发不安定的肇事者是奥古斯都派遣去高卢的一个解放奴隶（解放奴隶，指曾经是奴隶，后获得自由身份。——译者注）。

这位曾经是奥古斯都心腹的解放奴隶主张，高卢也应该和其他行省一样缴纳什一税。这引发了高卢族群首领们的不满。奥古斯都知道这件事必须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公元前27年到公元前26年间他待在纳博讷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可能是奥古斯都给族长们看了公元前28年罗马人口普查的报告结果，族长们也不得不承认一年4000万塞斯特斯的税金的确过低，最终，

高卢的行省税也改成和其他地区一样的什一税。

奥古斯都清楚，增税和减税的政策一并实施，会比较容易得到贯彻落实。因此他将高卢原本的2.5%的关税再减到1.5%。至于征收权，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想是和以往一样交由部族首领们负责。因为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个时期已经恢复了罗马共和时代的“包税人”制度，而类似于地方税务局的机关，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公元前15年前后才设立。所以，我才这样推测。“慎重”是贯穿奥古斯都一生始终如一的性格。

税制修正之后，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对高卢全境进行重整。

高卢全境分为五大区域：北面是多佛尔海峡（trait of Dover）和北海，西临大西洋，南靠比利牛斯（Pyrenaei）山脉和地中海，东边被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所包围。

一、南法行省（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的省会是纳博讷。行省的主要城市有：托洛萨（现图卢兹，Toulouse）、马赛利亚（现马赛，Marseille），以及由恺撒建设为军港、位于现在戛纳（Cannes）与圣特罗佩（Saint-Tropez）之间的法姆·尤里（现弗雷瑞斯，Fréjus）；往北有克拉罗（现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以及罗讷河（Rhone）沿岸的瓦伦提亚（现在的瓦朗斯，Valence）。这个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已有200年的历史，已经被罗马同化，整个高卢只有这里属于元老院管辖的行省。行省税为收入的10%，关税和罗马本土一样是5%。

恺撒征服的是除这里之外的高卢地区，奥古斯都又把这些地区分划成四个板块。

二、阿奎塔尼亚（Aquitania）行省：原来恺撒把比利牛斯山脉到加龙河（Garonne）之间的地域定为阿奎塔尼亚，奥古斯都又往北扩大至卢瓦尔河（Loire）指定为阿奎塔尼亚（现阿基坦，Aquitaine）。奥古斯

都扩大行省地域的理由大概有几点：当年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对峙相持不下的时期，阿奎塔尼亚地区曾经发生过小小的暴动，虽然暴动很快被阿格里帕镇压了下去，但为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奥古斯都希望通过地区的扩大，让该地区的族群同加龙河以北的奥弗涅人、比都里吉人等强大族群融合在一起。行省的省会布迪格拉（现波尔多，Bordeaux），位于加龙河的河口，是从大西洋一侧掌控高卢的绝好位置。

阿奎塔尼亚行省的主要城市，除了省会的波尔多之外，还有莱莫农（现普瓦捷，Poitiers）、阿瓦利肯（现布尔日，Bourges）、奥古斯都里通（现利摩日，Limoges）等。

三、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位于高卢的中间地带。从卢瓦尔河到塞纳河，以及南部索恩河（Saone）和罗讷河交汇处的里昂都属于这个行省。省会卢格登（现里昂，Lyon）。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也有里昂行省的意思。其他主要城市有：恺撒奥顿（现图尔，Tours）、温迪农（现勒芒，Le Mans）、罗托马古斯（现鲁昂，Rouen）、鲁特西亚（现巴黎，Paris）、阿吉丁古（现桑斯，Sense）、奥古斯托杜努姆（现欧坦，Autun）等。

行省边界线
现代国界线
北海
不列颠
日耳曼
多佛尔海峡
莱茵河
科隆
日耳曼行省
亚眠
特里尔
鲁昂
苏瓦松
兰斯
马恩河
摩泽尔河
塞纳河
巴黎
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
比尔吉亚行省
桑斯
勒芒
卢瓦尔河
图尔
第戎
贝桑松
布尔日
欧坦
普瓦捷
索恩河
日内瓦
阿奎塔尼亚行省
比斯开湾
利摩日
里昂
格勒诺布尔
波尔多
瓦朗斯
意大利本土
加龙河
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
图卢兹
纳博讷
弗雷瑞斯
罗讷河
马赛
N
0
100km
西班牙
比利牛斯山脉
地中海

奥古斯都重整后的高卢行省

这些城市中，里昂因其有利的地势受到罗马人重点开发，它不仅成为行省的省会，而且逐渐发展成整个高卢地区的要塞城市。这个地区的主要部落埃杜伊人是传统的亲罗马派，尽管因阿莱夏攻防战，关系曾一度疏远，不过之后依然和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四、比尔吉亚行省（Belgica）：恺撒的《高卢战记》开头描述的渡过莱茵河移居到高卢的人，即比利时人所居住的地方，是指从塞纳河、马恩河（River Marne）两河往北的广阔地带。奥古斯都将这个地区及其南面的林贡斯人、塞卡尼人和特雷维利人（Treveri）的居住地合并为“比尔吉亚行省”，即“比利时行省”。

行省省会是位于摩泽尔河（Moselle）河畔的奥古斯都·特来弗里（现特里尔，Trier）。如今这里属于德国的最西端，西面紧邻卢森堡。

主要的城市有：萨马罗布里瓦（现亚眠，Amiens）、诺维奥杜努姆（现苏瓦松，Soissons）、杜罗科托努姆（现兰斯，Reims）以及再度整编规划之前的第比欧（现第戎，Dijon）、韦松蒂奥（现贝桑松，Besançon）、杰那瓦（现日内瓦，Geneva）。这个地区的主要部落是雷米人，自从被恺撒征服之后，一直都是亲罗马派。

五、最后是日耳曼行省：虽然叫日耳曼行省，其实仅指莱茵河西岸一带。这里是防止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入侵高卢的最前沿，所以省会就设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内西姆。罗马人将这里起名为科隆尼亚（意为罗马人的殖民都市），如今是德国的重要城市之一的科隆，在罗马时代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省会科隆的地理位置和其作用非常明显，行省整编完全出于军事目的。整个行省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是罗马军团的军事基地，这些城市全部

位于莱茵河沿线，也就是说都处于最前线。

莱茵河防卫线是由恺撒设计、奥古斯都开始实施、经过历代皇帝百年的不断努力而建成。防卫线建造的最大目的在于持续，所以在建设军事基地时，在地政上作了考虑，2000年后的今天，这些地方作为城市仍然可以发挥其功效。

奥古斯都重整高卢全境的计划，不少方面都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是各行省边境线的划分；其次是各行省省会的位置；最后是军队的驻守地。

除了南法之外，奥古斯都并没有将高卢全境机械地划分为四块，虽然这样做比较容易管理。他仿效了恺撒的做法，将高卢全境内的十余个族群分配到四大部族的管辖之下，除了作为军事行省的日耳曼行省，其他三省由当地的主要部族负责管理。阿奎塔尼亚行省由奥弗涅人负责，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交给埃杜伊人，比尔吉亚行省则归雷米人。当然行省的最高长官都是由奥古斯都任命从罗马派来的。不过，为了行省的治理顺利运行，类似于“法人代表”的管理职务似乎都是由当地的有力之士来担任。高卢作为奥古斯都的直辖行省，每个行省照理都应该有罗马驻军，而实际上，除了日耳曼行省之外，其他的三省没有罗马军队，派驻高卢的五个罗马军团全部集中在莱茵河防卫线的日耳曼行省，而在高卢的其他地区根本见不到罗马士兵的影子。这一点足以证明奥古斯都对高卢采取了自治化的管理。

各行省省会的选址也很有意思。通常征服者会把战败者的老巢作为“行省总督府”，这样做比较简单。但是奥古斯都对省会的选址，只考虑地理位置是否有利。像波尔多、里昂以及特里尔，都位于交通要道上，或许应该说这些地方都会成为交通要道，因为治理整顿高卢境内的交通网络是由罗马人负责的。

那些主要族群的根据地，像雷米人聚居的兰斯、埃杜伊人集中的欧

坦，都没有成为高卢的统治中心。不过这些都市的交通网并没有被忽略，不但没有被忽略，而且罗马人将基础建设覆盖了整个高卢，甚至那些原住民居住的村镇都相互联结。尽管罗马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对占领地的建设并没有弃之不理。就像阿皮亚大道，这条当年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霸主的时代所铺设的道路，联结了所有罗马统治之下的部落的根据地，罗马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命运共同体。

高卢和西班牙一样，境内既有皇帝行省，也有元老院行省。当阿格里帕全力以赴投入征服西班牙西北部的军事行动时，奥古斯都先是坐镇南法的纳博讷，后移往西班牙的塔拉戈纳，专注于这两个地方的管理体系的建立。由于高卢和西班牙都是两种行省并存之地，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管理体系，将成为罗马统治下的所有地方的规范模式。

奥古斯都意识到，统一和分离、中央和地方、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些矛盾的概念是否并立，是否能构成共存的管理体系，是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共融，维系罗马帝国持续统治的关键所在。那些看似全权交给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也没有完全继续按照共和时期的管理方式来运行。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由元老院指定，必须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的经历，任期一年。

罗马共和时期的行省只有元老院行省一种，所以行省总督负责包括军事、司法、行政以及征收行省税等的所有事务。不过行省税实际是由一个叫“包税人”的私营机构代为征收，总督只是发号施令而已。

奥古斯都口头上宣扬回归共和，实际上却是背道而驰，他一心希望统一与分离能够并立。所谓的元老院行省交由元老院全权负责，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权而已。

前文中我已经说明过，元老院管辖的行省大多是被罗马同化了的地区，无须驻军，行省的总督人选虽然归元老院负责，但军事权交给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非常清楚，军事权的分离才是关键的问题。

此外，奥古斯都将司法权也半集权化。虽然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拥有上诉权，行省的居民也可以向行省总督提告，但是最终需要由在罗马的“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作出裁决。我们不妨把行省总督想象成地方法院的裁判长，而奥古斯都则是最高法院的裁判长。

在征税方面，不仅是行省税，包括关税等在内的间接税的征税权，都从行省总督的职权中分离了出来。奥古斯都决定设立专门负责税收的部门，无论是皇帝行省，还是元老院行省，有关税收的事务都由这个部门派遣的专职官员负责处理。

“国税局”的创立

“皇帝税务官”官职的设立，可以说是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改革。税务官由奥古斯都亲自任命，他们来自骑士阶级（equester）。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我通常将这个阶级的人意译为“经济界人士”，就是通晓经济的人。这些人在共和时期就是私营的“包税人”，负责代理征收税赋，奥古斯都通过由他任命的方式，让他们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尽管国家需要向税务官支付薪水，但省下了之前付给“包税人”的所征税金的10%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税收公职化十分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奥古斯都设立税务官官职的目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行省税收的公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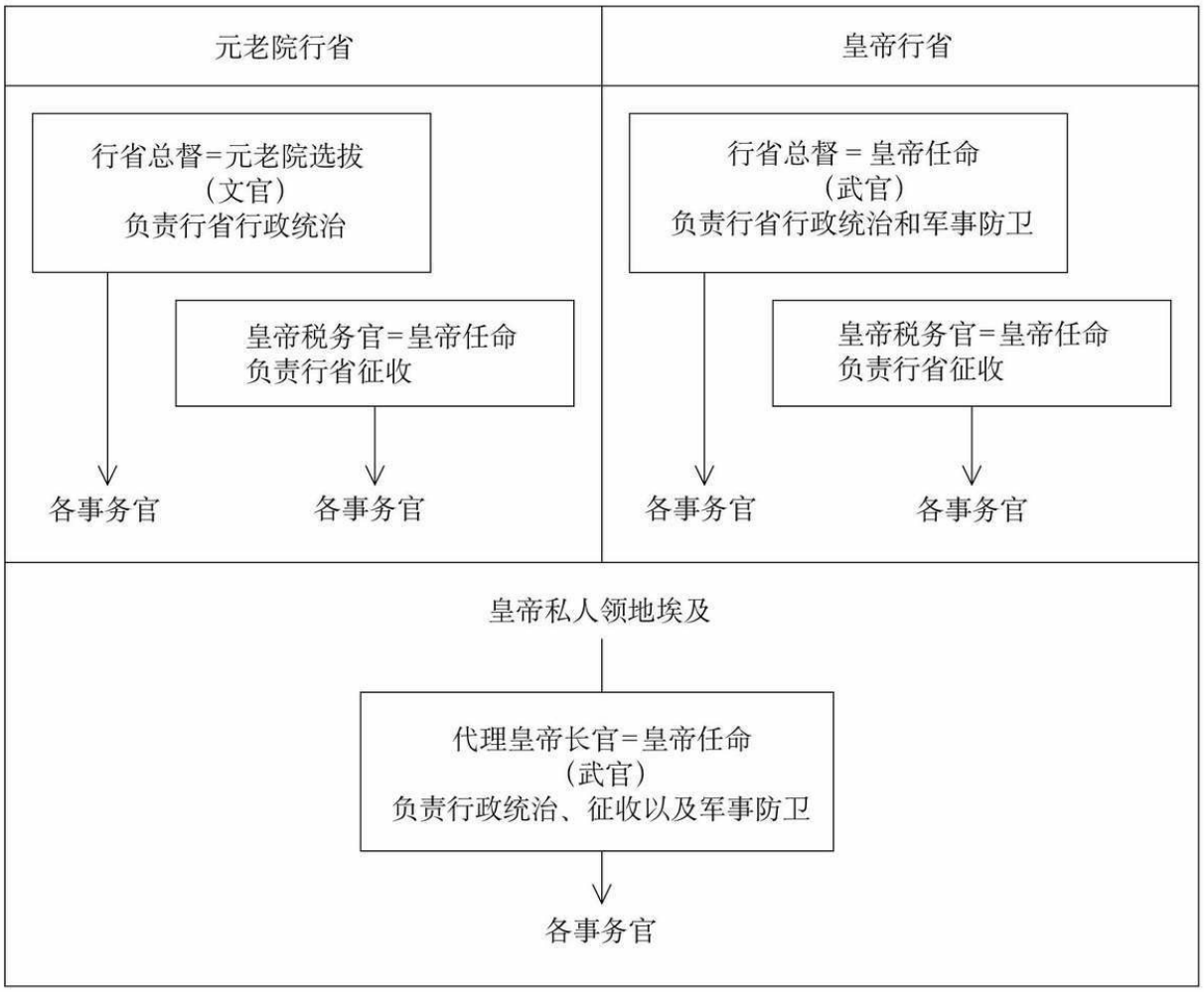
共和时期，由元老院派遣的行省总督具有税金的征收和预算两方面

的权力，因此总督在任职期间中饱私囊的问题，像一个恶瘤严重危害了共和时期的行省统治。要除掉这个恶瘤，就必须将权力分离。

税务官制度建立之后，征税由专职人员负责，总督只需要负责税金的用途。

第二，可以根据帝国统治的版图来合理地安排使用税金。

行省税是按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纳，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因此各行省的税收也有差异。国防经费是税收最大的用途，可是除了叙利亚行省之外，其他需要军费的行省，都属于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税收根本无法独立承担其国防开支。如果不用先进地区的税收来贴补落后地区的话，帝国整体的防卫系统就难以维系。



奥古斯都建立的行省统治体系

奥古斯都想通过建立税务官制度达到税制统一，因而解决各地税收不均衡的问题。

第三，保证治理的连续性。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只有一年，在统治管理上缺乏持续性。为改善这个问题，皇帝税务官的任期由奥古斯都决定，连续担任10年以上也不足为奇。

税务官征收来的税金，扣除行省所需经费，全额上缴罗马国库。不

过国家的支出还是很大，首先是国防军费，再者是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土的基础建设费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是行省的道路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仅是里昂，就铺设了四条道路：一条是从里昂往西通往阿奎塔尼亚行省；另一条是往西北方通向大西洋沿岸；第三条向莱茵河东北面延伸；第四条沿着罗讷河通到马赛。除了高卢，西班牙行省内同样也是大兴土木。这些公路的建设项目由阿格里帕负责。

由于罗马军团担任了公路的建设，因此军费开支和社会公共开支很难清楚地划分。不过拉丁文的securitas是“安全保障”的意思，所以两者也未必需要分割得很清楚。

罗马道路的建设证实了一个真理：一项好政策完美的落实，必定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以军事为目的而建设的道路网，因追求彻底的效率性，从而带动了民间经济的振兴。举一个例子说，为了方便沉重的攻击性武器的搬运，罗马的街道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铺设得平坦和直顺。即使地势不利，也会通过打通隧道、填平沼泽地以及开山的方式来改变地形。道路状况改善之后，货车的装载量得以提升，物资的交流随之变得频繁，频繁的物资交流又会带动人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意味着思想和知识的交流，作为罗马文明支柱的一大文明圈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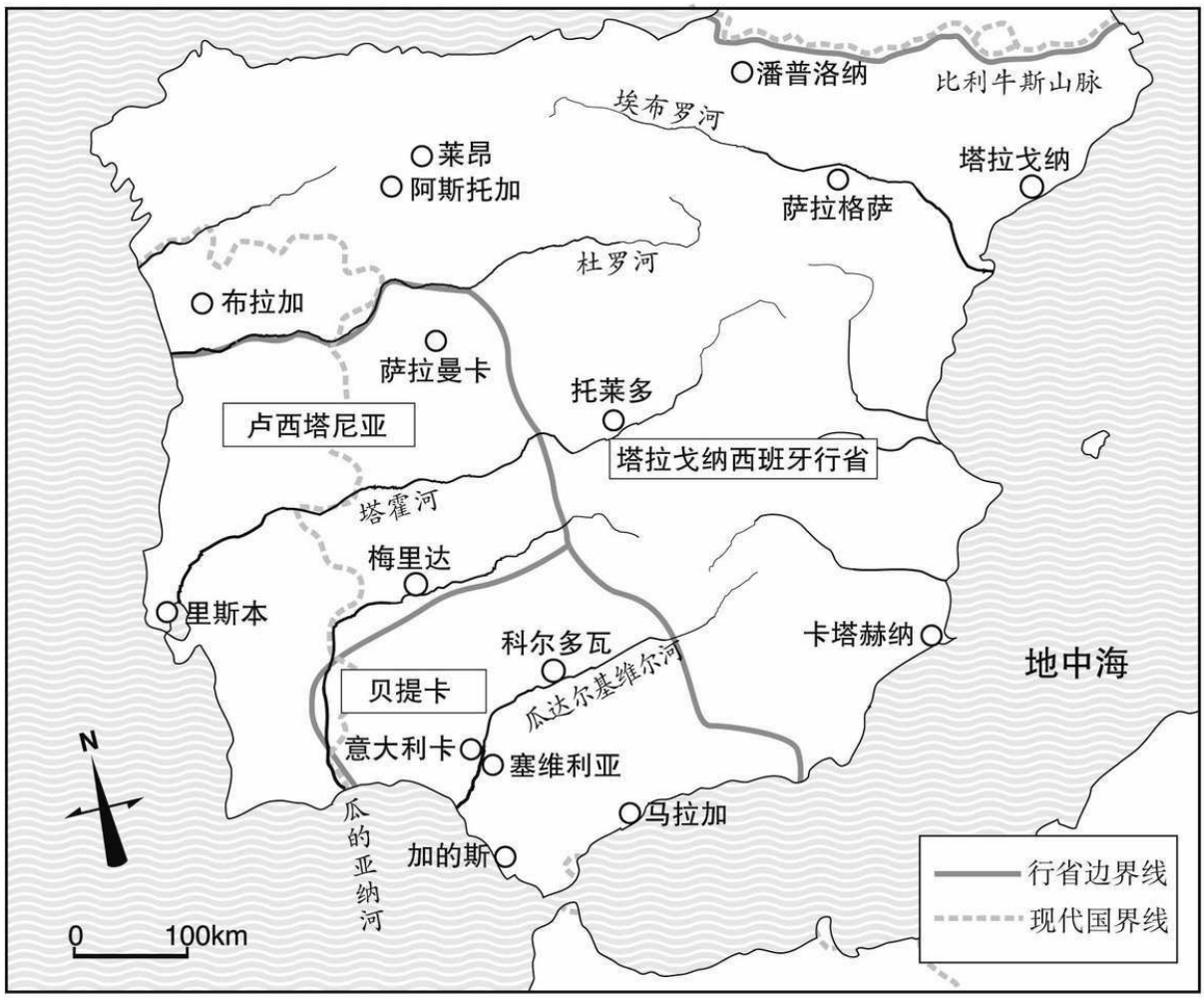
和高卢一样，奥古斯都对恺撒规划的西班牙行省也进行了再整治。伊比利亚半岛原本分东西两部，东部为近西班牙行省，西部为远西班牙行省。奥古斯都将它们重新划分为三块：南部的贝提卡行省、西部的卢西塔尼亚行省，以及东部的塔拉戈纳行省。这个地区还包括刚被征服西班牙的西北部，领土占伊比利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塔拉戈纳行省。

如我前文所述，贝提卡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被罗马同化的历史悠久，无须驻扎兵力。塔拉戈纳行省尽管也有相当长的同化历史，因为需要监视刚占领的西北部地区，因此和卢西塔尼亚行省一样，属于奥古斯

都直辖管理的皇帝行省。驻守西班牙的四个军团，正是以包围西北部的方式，部署在两个皇帝行省。

奥古斯都为这三个行省选定的省会和主要城市如下：

塔拉戈纳行省的省会是塔拉戈（现塔拉戈纳），主要的城市南面有卡塔戈诺瓦（现卡塔赫纳，Cartagena）；北面有托莱图姆（现托莱多，Toledo），以及恺撒建立的恺撒·奥古斯塔（现萨拉格萨，Zaragoza）和庞培建立的庞培洛（现潘普洛纳，Pamplona）；西北部有阿斯图里卡·奥古斯塔（现阿斯托加，Astorga）和莱吉欧（现莱昂，Leon）；大西洋沿岸有布拉卡拉·奥古斯塔（现葡萄牙的布拉加，Braga）。



奥古斯都重整后的西班牙行省

卢西塔尼亚行省的省会是艾梅里达·奥古斯塔（现梅里达，Mérida），主要的城市北面有萨卢曼迪卡（现萨拉曼卡，Salamanca），西面有奥里斯波（现里斯本，Lisbon）等。

贝提卡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省会是科杜巴（现科尔多瓦，Cordoba）。主要的城市南面有马拉卡（现马拉加，Malaga）以及布匿战争之后就成为罗马殖民城市的意大利卡，从意大利卡南下就是西斯帕里斯（现塞维利亚，Sevilla），还有就是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加的尔（现加的斯，Cadiz）。

为建设殖民城市，奥古斯都安排了很多老兵入驻萨拉格萨和梅里达。不同于高卢地区，西班牙的原住民中不存在有特别影响力的族群，“见机行事”是罗马人的传统，住在殖民城市中的罗马人，没有单独的社区，他们和原住民混居一地。罗马军人在服役期间不得结婚，大约在40岁退伍。移居殖民城市的老兵们退伍之后，大都会和当地的女子结婚生子、落户扎根，这就是罗马人的殖民方式。由恺撒发起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一直延续到了奥古斯都帝国时代。

“幸运的阿拉伯”

高卢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整规划，从公元前26年开始，到公元前24年基本完成。这段期间，奥古斯都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是唯一的一场不是为了防御的战争。这场战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次远征，远至阿拉伯半岛。

远征的前哨战是衣索比亚之战，目的是确保皇帝行省埃及的南部防御战。驻守埃及的罗马军团沿着尼罗河南下，一直攻到现在苏丹的纳帕达，最终与衣索比亚人达成和解，确保了埃及南部的安全。

这个时期，奥古斯都又尝试着进攻被叫做“幸运的阿拉伯”的也门。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他只派了两个军团的兵力，这对于对外必先稳固防卫线的奥古斯都来说是少有的例子。

“幸运的阿拉伯”并不是当地的阿拉伯人自己叫的，好像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或者罗马人这样称呼他们。因为这些阿拉伯人通过销售香料、没药、珍珠宝石以及经过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绢丝等，幸运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奥古斯都为什么会看中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一端的“幸运的阿拉伯”呢？因为他一生都在寻找除却重税以外，能够确保国家财源的方

式。奥古斯都认为，只要控制住红海的入口，就能独占与东方贸易的利益。他在《功业录》中曾提及，他在纳博讷时，曾接待过来自远方印度国王的使节。

“幸运的阿拉伯”的远征，并不像奥古斯都《功业录》中所描述的“杀了抵抗者，赢得了战争，占领了很多城镇”那么成功。罗马军渡过红海登陆阿拉伯半岛开始的这一段，还算顺利，之后向萨巴族大本营马里卜进军的过程中，罗马军团遇到了极度的困难，穿越300公里的沙漠他们竟然用了6个月的时间。当军队到达目的地马里卜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攻击之力，只得撤兵返回。这次远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罗马还是成功地占领了红海以北三分之一的地区，并且在阿拉伯的雷乌凯克美、埃及的贝仑尼塞以及尼罗河岸的科普特设立了海关，相对于意大利本土的5%的关税，以及落后地区高卢的1.5%的关税，这里征收的来自东方的高级消费品的关税高达25%。

奥古斯都在高卢的时候，肯定没有忽视不列颠（Britannia）。不过他既没有明确表示要继承父亲恺撒征服不列颠的遗志，也没有对此作出否定。当时高卢的情况非常平稳，并没有发生不满分子逃到不列颠，煽动当地族群发起挑衅罗马的行为，居住在多佛尔海峡附近的肯特地区的不列颠的两个部族，也都派了使节向奥古斯都宣誓效忠。这样的状况大概让奥古斯都觉得征服不列颠并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奥古斯都一向是要等到最后的关头，世间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的政治家。

尽管奥古斯都一手掌握军权，但是除了那些必须靠武力征服的地区之外，他愿意与外国结成同盟关系。比如说，对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王国就是如此。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的西北部，隔着古称“赫丘利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的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遥遥相对。

这种同盟关系并非是奥古斯都的独创，苏拉、庞培、恺撒，这些罗

马的统治者们都遵循这种罗马传统的外交政策。

奥古斯都为中断了王位的毛里塔尼亚王国找来了继承人。他是在塔普苏斯之战中因败给恺撒而自杀身亡的努米底亚王的遗子。这位以尤巴二世之称继位的王子，5岁那年被带到罗马，以败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恺撒的凯旋仪式。之后，他作为人质一直留在恺撒的私宅里，恺撒死后又转移到奥古斯都的家里居住。他接受了和罗马上流社会的子弟同等的教育。后来，奥古斯都又把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埃及公主克娄巴特拉·塞勒涅许配给了他。塞勒涅在她父母双双自杀后，由屋大维的姐姐，也是安东尼的前妻屋大维娅收养，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她也是在罗马长大的。

尤巴二世和塞勒涅的婚姻，以及毛里塔尼亚王国的振兴都很成功。年轻的王子王妃都是有很好教养的人，既擅长内政，又懂得外交，毛里塔尼亚王国成为了罗马可信任的同盟国。特别是王妃塞勒涅，没有她母亲那般的野心，却继承了她的聪明智慧，在她的周边形成了一个类似文化沙龙的圈子，甚至从罗马来的人都必须前去拜会，以示敬意。西北非就这样完美地担当起奥古斯都“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个宏伟大业的一端使命。

公元前24年，完成了罗马西部疆土再整编的奥古斯都回到了罗马。那年，他40岁。

“第一公民”阔别三年返回罗马，虽然只打了一场胜仗，毕竟是征服了整个西班牙，首都人民相信他必定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与只关心战事结果的平民不同，元老院议员们非常了解再整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很快地告知奥古斯都，他获得了举行凯旋仪式的权力。

奥古斯都却没有接受这个权力。至于拒绝的理由，他一如既往地不作解释。也许是期待将来人们读他的《功业录》时，会赞叹：“多么谦虚的人啊！”也许是觉得胜仗是阿格里帕打的，而他本人在离开战场400

公里之外的地方专于外政，所以战争凯旋仪式那种四匹白马开道、浩浩荡荡的华丽场面并不适宜。不过仪式也不能完全没有，因为平民百姓们都期待着凯旋将军分发的礼物。

奥古斯都决定不举行凯旋仪式，礼物还是照样分发。每户人家可以获得400塞斯特斯。这个金额和以前恺撒发放的相同，这又为他赢得了好声誉。在民众的心目中，奥古斯都不仅谦虚而且还是一位大方的君主。只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位谦虚的人还是一位卓越的谋略家。

护民官特权

公元前23年，40岁的奥古斯都又发布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而且很快就付之于行动。

他宣布，他将和阿格里帕一起辞去长期以来担任的执政官的职务，以后的执政官将按照共和时期的惯例，通过每年举行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连任执政官在罗马历史上并非罕例。自马略之后，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尽管如此，一年任期的执政官毕竟是共和体制的象征，奥古斯都的这个决定让那些共和派们再次感激涕零。这些满怀感激之情的人们，不经思考地就给奥古斯都提出的另一项“谦虚”的申请投下了赞成票。

奥古斯都提出的申请是给予他一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Toribunicia Potestas）。所谓的护民官特权是指护民官享有的诸种权力。这些权力主要是：（一）人身的不可侵犯；（二）作为平民的代表，具有维护平民权利的地位；（三）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四）政策立案权；（五）否决权（veto）。

护民官的否决权除了对危机管理体制中的独裁官无效之外，对其余的政府机关以及政府的政策都具有效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元老院的决

议还是执政官的决定，只要护民官投了否决权，一切都形同白纸。

因为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养子，属于贵族阶级，所以不能出任只有平民出身才能担任的护民官，因此他要求获得护民官的特权，而非护民官的职位。

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举制度的重新启用，让元老院的议员对回归共和的真实性确信无疑，对奥古斯都心存感激，同时又为自己可能有机会担任执政官暗中窃喜，所以都同意护民官特权按以往惯例为期一年。不过奥古斯都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期满之后，如果没有异议将自动更新。试想一下，谁会对最高统治者的更新申请提出反对呢？这个特权实际上就是终身制。

可以享有护民官特权的人数曾经有10人，在恺撒担任终身独裁官时，将之减为一人。恺撒的目的在于防止否决权的滥用，保证国家政策顺利执行。奥古斯都秉承了恺撒的理念，从公元前23年开始，一人独占了罗马国家的否决权，恺撒体制又得以复活。

不过，奥古斯都并没有效仿恺撒，出任违反共和体制的终身独裁官，他是实质意义上的独裁官。先交出一些已经没有意义和效力的权力赢得好评，然后再换取一些表面上看似既没意义也没有效力，但在日后一定会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权益，这是奥古斯都一贯的政治手段。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就演变成违反罗马共和体制的帝制。

这里，我们将奥古斯都至此的一系列举动作一个小结。

“恺撒”——这是屋大维（奥古斯都）17岁时被恺撒收做养子，并被指定为继承人而承袭的姓氏。随着帝制的进一步深化，又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2000年后，德国人名的“恺撒”和俄罗斯人名的“查理”都有这个意思。

“第一公民”——当初元老院赠与屋大维（奥古斯都）这个称号时，只代表了罗马公民“第一人”的意思，对于隐藏帝王之心的奥古斯都而言，这个称号实在是一个漂亮的幌子。这一点从他爱用“第一公民”来自称就足以证明。

“奥古斯都”——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权力象征的尊称，因而也意味着超越了权力相争的立场。恺撒生前一边打倒现有的体制，一边又察觉到靠打倒现有体制而获得的“反体制”的权力的空洞性，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对继承了恺撒理念的奥古斯都而言，超越了“体制·反体制”立场的“奥古斯都”称号，自然是一个既方便又有效的尊号。

“凯旋将军”——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原本也属于恺撒。元老院之所以会批准奥古斯都继承使用权的申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称号不过是士兵们对凯旋将军的一个敬称而已。但是如果把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和他拥有的罗马军“最高司令权”连在一起，“凯旋将军”就变成了罗马军终身总司令。

奥古斯都将“全军最高司令权”扩大到了传统上不设兵力的首都罗马，从而获得了在首都行使军事权的法律权限。然而奥古斯都是一个有百分之百自制力的人，他在世期间，只有在将领们举行凯旋仪式时，首都街头才看得到部队行军的场面。

护民官特权——护民官是罗马共和体制中最民主、最自由的公职。它的权责在于保护那些非贵族出身、地位处于劣势的平民百姓的社会权利。为了防止遭到贵族的迫害，护民官被赋予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力。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权力，导致护民官受伤或死亡，将会以叛国罪受到裁决。当初刺杀了恺撒的布鲁图等人被认定为触犯了国法，就是因为恺撒拥有护民官特权。

奥古斯都每次出席元老院会议，他那些孔武有力的同党们会紧紧地围在他身边。在安全方面，奥古斯都是不会因为拥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

力就掉以轻心的。

当然，奥古斯都获取护民官特权的真正目的，还是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和政策立案权，更主要的是否决权。

有了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如果奥古斯都想要推行什么政策，他可以通过召开平民大会，使提案得到通过。即使元老院提出反对，也可以采取平民立法的形式来抗拒。平民立法是在公元前278年通过的《霍滕修斯法》（Hortensius）所承认的形式，它和执政官召集的公民大会的决议具有同等的价值，何况，奥古斯都还有可以让任何元老院或执政官的提案变成一张废纸的否决权。

为什么护民官特权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轻易地落入奥古斯都一个人的手里呢？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元老院被奥古斯都丢出的终止执政官连任的诱饵，引得欣喜不已，结果落进了圈套里。

第二，护民官制度从公元前494年开始实施，已经存在了500年，是一个罗马人耳熟能详的制度。也许是太习以为常，谁都没想到这个制度还会有什么新的用途。其实最早想到这个制度的新用途的是恺撒，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使用就遭到了暗杀。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获得护民官特权之事，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只字未提。因为护民官特权中的否决权的行使，正是罗马向帝制转型的关键所在。

奥古斯都获得的护民官特权，对他一手创立的“内阁”的运作也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罗马的内阁直译为“第一公民的辅助机关”，由“第一公民”本人奥古斯都和两位执政官，以及重要官署的代表，再加上元老院抽选出的15位

议员所组成。除了“第一公民”，其他人都是一年的任期。

内阁设立的当初，奥古斯都不仅是“第一公民”，还和阿格里帕一起担任着执政官。根据罗马法律，执政官具有否决权，因此奥古斯都并不担心他推行的政策会受到阻挠。然而，在公元前23年，他辞去了执政官职务以后，内阁的决议就会出现因执政官否决而导致夭折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护民官特权就发挥作用了。

虽然罗马法律规定，执政官和护民官两者的否决权具有相同的效力，可是奥古斯都并不只是共和时期10位护民官中的一分子而已，他是护民官特权唯一的享有者，也是罗马的“第一公民”，更何况，他还是超越了这些职位、高高在上的尊贵的“奥古斯都”。事实上，内阁完全操控在奥古斯都一个人的手里。

讲到这里，大家都会对《功业录》中奥古斯都所言及的“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苦笑不已吧。

那个时候，内阁中的元老院成员已从15人增加到了20人，不过元老院对于国政的影响力已经不是人数多寡的问题。即便如此，元老院对于能有20位议员抽选入阁还是十分满意。

奥古斯都通过获得护民官特权，确立了作为领导者，应该说作为皇帝的公认的地位。有关公认这一点，从他之后的各代皇帝的公式名称都叫“奥古斯都”可以证明。

罗马皇帝的公称是：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护民官·特权（Imperator Caesar Augustis Tribunicia Potestas），融名字与特权为一体。

走到了这一步，如果是一位平庸的皇帝，势必会做出一些比如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之类的放纵的事情。然而，40岁的奥古斯都真可

谓是恺撒名副其实的继承人，他和恺撒一样，对聚敛私财完全没有兴趣。他仍然住在位于高级住宅区却十分素朴的房子里，为提高帝国整体的经济实力，正着手进行货币制度的彻底改革。货币制度看似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与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也息息相关。

货币改革

长久以来，罗马的通用货币只有银币和铜币两种。虽然也有金币，但是作为凯旋仪式或其他重要时刻特别打造的纪念币，一般的人很难有机会得到，在实际流通中很少使用。或许这也反映了罗马共和时期的经济实力。不管怎么说，金币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纯金，有总比没有来得好，只不过它不是广泛流通的一般意义上的货币。

将金币定为通用货币的是恺撒。这是预计到国家经济实力将呈上升趋势而制定的政策。在经济方面，恺撒同样也有着高度的前瞻性。

恺撒规定，1枚金币兑换12枚银币，金币、银币的铸造权归终身独裁官本人所有，铜币的铸造权则依然归属元老院。

恺撒的货币政策因他遭暗杀而中断，奥古斯都重新开启了对货币制度的改革。奥古斯都在权力和时间上都比恺撒来得充裕，因此他的改革全面而且彻底。尽管之后随着帝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货币的含金量不断地有所调整，奥古斯都制定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了300年，直到公元4世纪。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末期，即罗马帝国的初期，大力推进货币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建立坚挺而且可信赖的流通货币，活跃帝国全境的经济。

奥古斯都制定的货币制度，就是我这种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也看

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1阿斯金币 = 25第纳尔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金、银、铜三种货币之间有着简单明了的交换关系。

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复杂，所以制度的基础部分越单纯越好。

第二，当我研究这个从恺撒开始、奥古斯都贯彻落实的罗马货币改革时，我曾经的一个想法似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经济学家可以不懂政治，而政治家必须了解经济。

奥古斯都的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关键部分，在于货币的面额与制作材料的价值的等同性。如果不能维持两者的一致性，罗马的货币就不能成为长期的基础货币。

奥古斯都清楚，货币是不受罗马皇帝或者罗马军队左右、只忠实于经济规律的“动物”。为了不让这只动物胡作非为，在纸币还没有产生的那个时代，只有保持它的面额与其原材料价值的一致性。

第三，由奥古斯都发行、随后延续了300年不变的这些货币，只是罗马帝国的基础货币，并非是帝国全境的共通货币。我们从百年后的希腊历史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一点，罗马时代的希腊人的作品中所出现的货币，都还是德拉克马（Didrachm）、塔兰特（talentum）等传统的希腊货币。这些货币既然出现在书籍里，也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并且被使用。

奥古斯都实行的货币改革制度（自公元前23年起）

金属	金	银	铜	
实物大小	 奥里斯金币	 第纳尔银币	 塞斯特斯铜币	 阿斯铜币
名称	奥里斯（金币） 奎利纳里斯（金币）	第纳尔（银币） 奎利纳里斯（银币）	塞斯特斯（铜币） 都庞地亚（铜币）	阿斯（铜币） 夸德伦（铜币）
交换价值	25第纳尔银币 1/2奥里斯金币	1/25奥里斯金币 1/2第纳尔银币	1/4第纳尔银币 2阿斯	1/4塞斯特斯铜币 1/4阿斯
重量（克）	7.80 3.89	3.90 1.95	27 13.65	10.90 3.24
重量（磅）	1/42	1/84	1 1/2	1/4 1/16
含金量	金100% 金100%	银100% 银100%	黄铜（铜＋锌）	铜100% 铜100%

说明：*磅（ 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1磅 = 327. 456克。
1. 1奥里斯金币 = 25第纳尔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
2. 塞斯特斯原本是银币单位，奥古斯都改革之后，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铜币。
3. 铜和锌合成的黄铜呈金黄色，具有易加工、耐腐蚀的特点，因此被作为流通最广的铜币原材料。其材质的本身价值高于纯铜。为了保持货币的材质和货币面额价值的一致，奥古斯都提高了两种纯铜货币的重量。因此，原本重量为7克的1阿斯铜币，变成了10. 9克；原本重量为1.7克的夸德伦铜币，变成了3.24克。

尽管罗马完全有力量将罗马货币定为帝国版图下所有地区的统一货币，却没有这样强行去实施。从自治都市到自由都市，各地都有铸造货币的自主权。地区的自治也包含了货币的自治。因为货币除了经济上的

意义之外，还代表着文化的独特性。试想一下，在日本，如果日元被美元取而代之，会是怎样一个情形？单从对外经济的角度考虑，或许会比较便利，可是，经济的活性化，如果只考虑经济面，就过于片面了。

第四，奥古斯都承袭了恺撒的做法，在纪念币和普通货币上都铸上自己的头像以及和自己有关的业绩。而且不仅是铸造权归他所有的金币、银币，连元老院所属的铜币上都有他的头像。也就是说，罗马的基本货币上充斥着奥古斯都的脸。现代一些国家的货币上也都印着国家元首的头像，不过材料是纸质的而已。

罗马的货币没有使用期限，一直用到破损才会重新铸造。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之后，作为国家公敌的布鲁图当年铸造的银币也因为含银量100%，仍然在继续使用。罗马的皇帝们从来没有因为货币上铸有先代皇帝的头像就回笼重新铸造的习惯。

在那个没有纸币的时代，罗马货币的面额价值和材料价值的变化，正好反映了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上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确存在过，而且是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的。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作为一位政治家，奥古斯都比恺撒来得更彻底而且更有政治家的资质。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论述的那样，奥古斯都在成为唯一胜者之后，“悄悄地耐心地把所有的权力一个接一个地弄到了手”。而恺撒正相反，成为唯一胜者之后立刻就任终身独裁官，大张旗鼓地强行推动革命运动。

我认为他们二人的差异，首先是因为性格不同，其二是年龄上的差距。恺撒到54岁才有机会着手诸项改革，而奥古斯都却从33岁时就已经开始。其三是奥古斯都从恺撒被杀的事情中获取了教训，他绝对要保全性命。

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差异不妨也可以考虑进去，那就是日本人常说

的“好人家”和平民家庭出身的不同。

恺撒的家族起源于王政时代，有着700年的悠久历史，是罗马名门中的名门。奥古斯都虽然也出生于罗马，家族居住在韦莱特里（Velletri）小镇，经济上可能比恺撒要富裕，但社会地位远远不如恺撒家族。他祖父那一代从事的职业不详，到他父亲那代才有机会进入元老院。奥古斯都的父亲在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不久便去世了，所以从来没有在元老院中担任过要职。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的娘家在罗马也是属于无名之辈。相对于贵族出身的恺撒，奥古斯都只是属于罗马社会第二阶层的“骑士阶级”。虽然奥古斯都是恺撒的甥孙，两人之间有一点血缘关系，不过关系那么远，说出来免不了被人笑话。

王政时期罗马的名门曾有300家族之多，到了共和时代的末期减少到只有14家。尽管名门数量大幅度减少，元老院里来自贵族家庭的人依然比比皆是，像瓦莱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等等家族。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也是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

正因为以上所述的理由，恺撒在指定当时还叫屋大维的奥古斯都作为继承人时，为弥补他出身上的不足，特地将他收为养子，纳入了恺撒家族。不过，在那些尽管日趋凋零，但仍然位居罗马社会顶端的贵族们的眼里，养子和亲生儿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一般民众对贵族又有着崇拜的心理，无论恺撒做什么都会盲目地给以支持，奥古斯都行事却不得不小心谨慎。

奥古斯都继位之后，努力彰显自己的存在，我认为他并非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目的在于促进罗马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煞费苦心，还是挺令我感动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是墓地。和恺撒无心身后事不同，奥古斯都在马尔斯广场的北边，为自己及家族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壮观的陵墓。再者是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规模上的差异。前者是罗马广场扩建计划中最早的一个建设

项目，后者是为纪念战胜恺撒的暗杀者们所建。

恺撒广场只有两尊重要的雕像：一尊是作为恺撒·尤里乌斯家族守护神的维纳斯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建在神殿中堂；另一尊是建在神殿前广场中央的骑着战马的恺撒的青铜像。

奥古斯都广场和恺撒广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仅是主要雕像的数目就十分惊人。

首先是位于广场中心的驾驭着四驾马车的奥古斯都的青铜像，当初建造广场的名目是献给战神兼复仇之神的马尔斯神，所以铜像还算是有其象征意义。广场神殿内的中央也有一尊复仇之神马尔斯神像，在它的左边是维纳斯女神像，右边则是神格化了的恺撒雕像。我们从建造广场目的可以理解竖立这几座神像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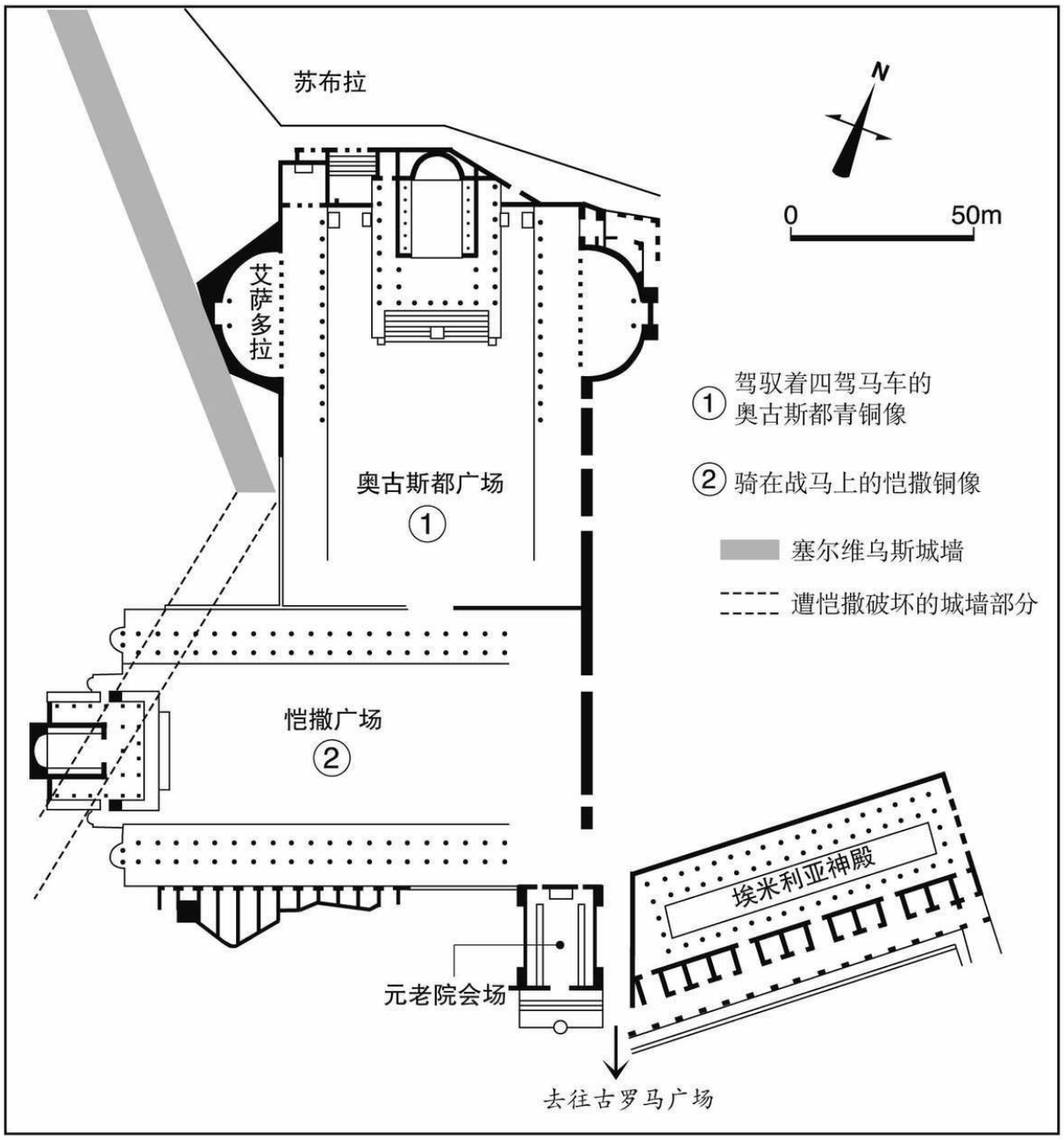
主要的雕像不止以上几尊，从尤里乌斯家族的始祖，维纳斯女神之子的埃涅阿斯、孙子苏比沃斯及其亲属，到尤里乌斯家族起源地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的国王们，再加上罗马共和时期的历代伟人，浩浩荡荡地排列在一起。奥古斯都大概是想要这些历史伟人替他做后盾吧。为了满足奥古斯都的愿望，广场两侧特地加建了半圆形空间，来容纳目前可以考证的这16座雕像，我对罗马建筑师们的才华深表敬意。

不同于恺撒广场的素朴，奥古斯都广场充满了威严之势，这反而产生了一个副作用，罗马时代的恋人们，对这里都敬而远之。

半圆形的部分是宽阔的广场中最舒适的空间，但那里也立满了建国以来诸位伟人的雕像。其中最不适宜的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的像。阿庇乌斯是罗马式道路系统的创立者，著名的阿皮亚大道就是由他主持铺设的。这位人物老年时虽然视力衰退，但精神不减。当年元老院因败北欲同敌方求和时，他曾大声呵斥：“罗马只有赢才讲和，不会因为输而讲和！”

在这样一位人物的注视下，情侣们怎么亲热得起来呢？老先生的怒吼似乎随时会从天而降，所以罗马情侣们约会，都会去隔壁的恺撒广场。

恺撒广场有爱神维纳斯和情场高手恺撒的雕像，正好用来做情人们的守护神。帝国时代的诗人，不知是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is）还是尤维纳利斯（Juvenalis）曾写过一段诗，幽默地描述了一位在罗马广场的法庭上滔滔雄辩的律师，约心仪的女孩去恺撒广场相见，走到了恺撒的骑马雕像下，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骑在马上的恺撒看到这个情景，一定会大笑着对他说："小伙子，加油啊！"



被情侣们嫌弃的奥古斯都广场也并非完全没有人气。它经常被当时罗马盛行的私塾性质的中小学校作为户外教室使用。广场上竖立的那些伟人的雕像，正好就地取材拿来做课本，是上课教学的好地方。

当年还是恺撒·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在同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联军

的亚克兴角海战的前夕，曾向阿波罗神祈祷保佑胜利。战争胜利、凯旋之后，他立刻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了阿波罗神殿。在此之前，阿波罗神并不是罗马人传统上敬奉的主要天神。此外，在有天神圣地之称的卡匹托尔的山上，建有男神朱庇特（希腊的宙斯）、其妻子朱诺（希腊的赫拉）和智慧女神密涅瓦（希腊的雅典娜）三位主神的神殿。

这些天神很早就自希腊流传到罗马，和罗马传统的天神融合，形成了罗马宗教的主神群。另外还有一位战神马尔斯（希腊的阿瑞斯）也是主神之一。唯独在希腊作为主神被信奉的阿波罗神没有受到罗马人的重视，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主掌的事物是光与诗，对罗马人来说过于抽象才被忽略了。长久以来，阿波罗的神殿都是建在距离城中心很远的位置。

奥古斯都反其道而行，把阿波罗神殿建在离他住所以及城中心都很近的帕拉蒂尼山上。阿波罗神成为罗马最高当权者的守护神之后，在罗马的地位显著地得到了提升。奥古斯都不像恺撒，拥有家族传统的守护神，阿波罗神也许是他的苦心之选。

将短处化为长处，是创造者必须具备的才能。阿波罗神通常以年轻俊美的形象面世，而奥古斯都又坚持雕像必须是他40岁之前的相貌，年轻的阿波罗神守护着年轻的统治者，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

选举改革

形式先行并非坏事，不好的是只有形式没有具体内容。公元前23年，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取重新开启，罗马市民们（有选举权者）的政治意识再次活跃起来，对奥古斯都而言，这正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好时机。

凡事小心谨慎、尽量避人耳目的奥古斯都，大张旗鼓地举行选举，做的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

即便是以强硬的手段取得政权的恺撒也了解，行使自由选举权，是一件可以给人民带来很多满足的事情。人民心满意足了，才会顺从；人民顺从了，统治者才能成就大业。拉丁语中的cōnsentiō以及英文中的consensus的意思，与其说是目的上的共识，不如解释是手段上的共识来得更加合适。

由恺撒筹建、奥古斯都完成的尤利娅选举会场（Saeputa Julia），东邻著名的万神殿（Pantheon），是一个120米× 300米的巨大的回廊，回廊内分割成不同的选区。选举的方式和共和时代相同，是否当选不是以全体公民的投票数来计算，而是以每个选区为一个团体，每个团体先选出一位候选人，最终再对几位候选人进行投票决定。罗马这种独特的选举方式自公元前509年前就开始启用。

奥古斯都的选举改革之所以叫改革，是因为他推动了罗马史上，从古到今第一次首都之外地区的投票选举。选民们在当地的自治区投票，然后选票送到首都集中，这在现代是习以为常的选举方式，但是在古代的城邦国家历史上，选举理所当然的是在首都举行。奥古斯都的改革，意味着异地投票的选举方式得到承认。

当时罗马国家有选举权的人数超过了400万，如果再继续沿用只有在首都罗马才能行使选举权的制度的话，那么连形式上的最高官职的执政官的选举也是形同虚设。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居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也能异地投票，不过，因为大多数有选举权的人都居住在意大利本土，所以异地投票的实施，的确保障了行使选举权的平等性。顺便提一下，即使在2000多年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居住在海外的公民能够进行异地投票的国家也不是很多。

选举活动活跃的同时，违法行为也会随之增加。为此，奥古斯都制定了以下的处罚条例：

首先，候选人事先必须缴纳一笔保证金。如果发生违法行为，保证

金将被没收充公。按罗马的惯例，向候选人提供选举经费是合法的，奥古斯都本人也有赞助同派系候选人的习惯，赞助金额为每个候选人1000塞斯特斯。那个时候，一个士兵一年的俸禄是900塞斯特斯。其他的赞助人捐助的金额想来是不好意思超过最高统治者的。

第二，参选无薪“光荣的公职人员”的候选人，必须拥有不低于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这个金额和元老院议员的财产要求相同。如果不具备这个经济能力，既不能被提名，也没有做元老院议员的资格。不过，如果有人除了经济以外，其他条件都符合参选的话，奥古斯都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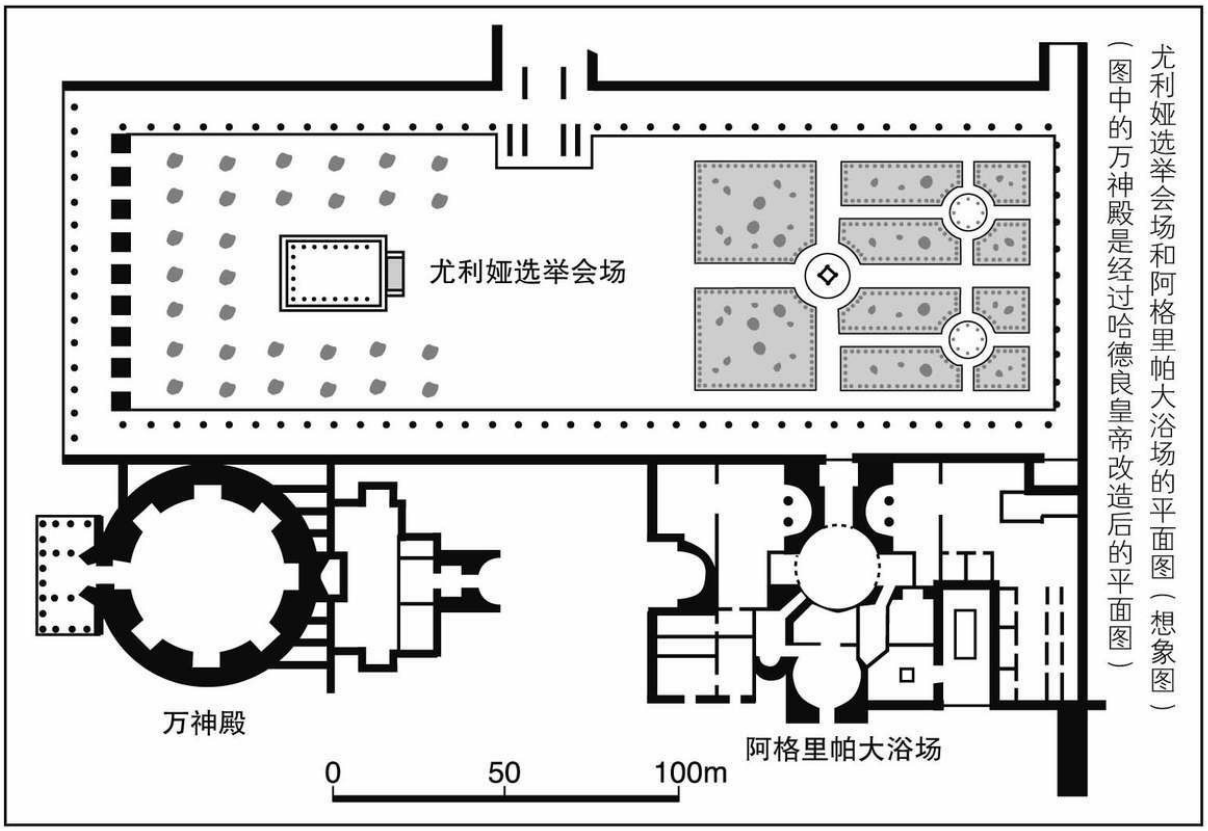
仅凭以上这些约束，就能杜绝选举中的违法行为吗？事实上的确得到有效的控制。同买选票行为横行的恺撒时代相比，奥古斯都时代选举的透明度的确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这并非是因为奥古斯都执政的40年间，罗马人的伦理观大有提升，也不是因为候选人在乎保证金，真正的理由是，纵使候选人花钱买选票得到了公职，也不会因此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以往罗马仕途之路，首先当选为财务检察官，期满之后可以得到元老院议席，然后参选法务官，接着是执政官，最终目的是行省总督。可是，奥古斯都免除了原本属于行省总督的征税权，交由专门的皇帝监察官负责管理，这样，行省总督再也没有像共和时期那样的机会，在任期内中饱私囊、囤积私财。所以说，选举透明度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失去了因权力而生的经济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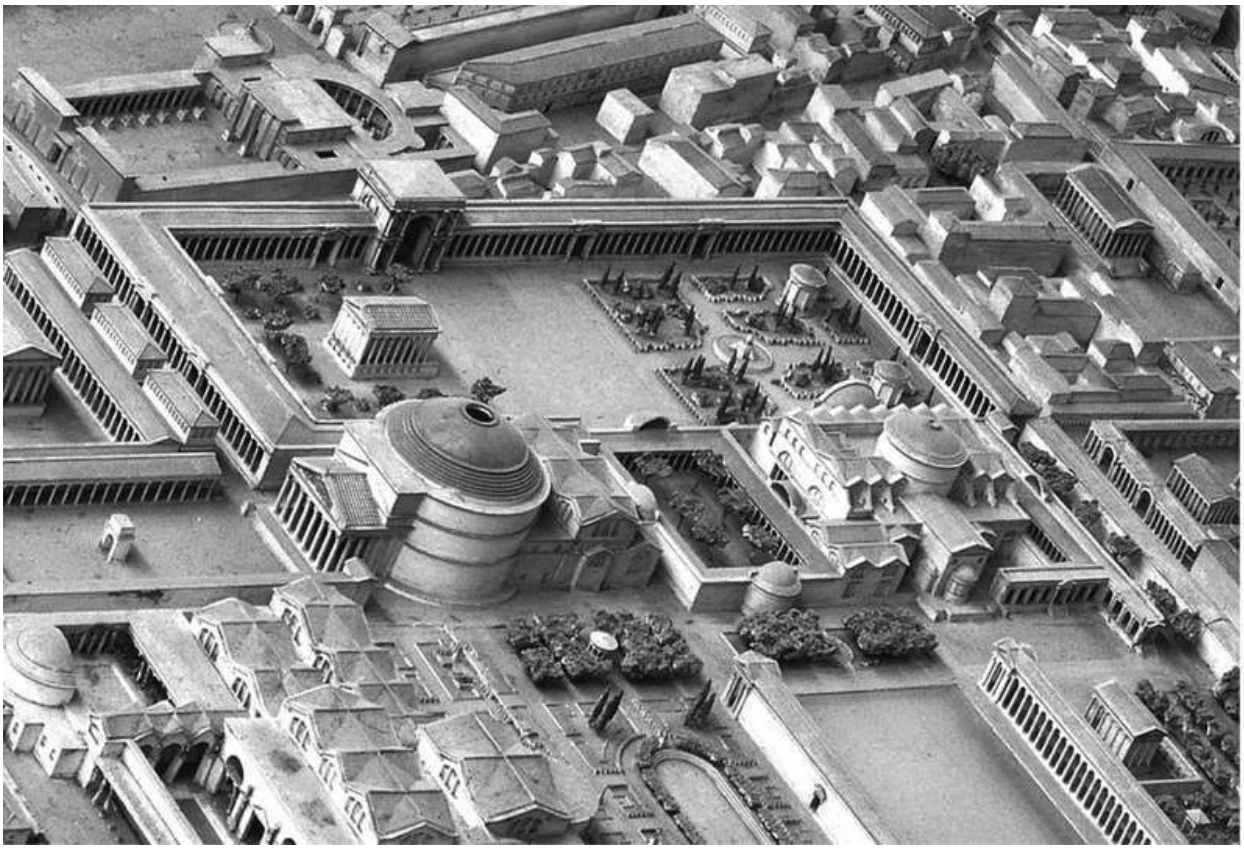
不过，罗马传统上的“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理念仍然健在。相比于积累财产，还是有很多人更愿意为国家作出无私的奉献。人总是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何况还有虚荣心作祟。一般的民众也把一年一度的选举当成节日，选举的几天里，尤利娅选举会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奥古斯都的选举改革政策中，依然保留了恺撒时期设定的执政官2

人、法务官16人的人数。不过，恺撒设定的40人的财务检察官则改回了之前苏拉所定的20人。这也是奥古斯都对元老院采取的怀柔政策之一。尽管苏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极力推行强化元老院的政策，让元老院将他视做恩人。



尤利娅选举会场和阿格里帕大浴场的平面图（想象图）
（图中的万神殿是经过哈德良皇帝改造后的平面图）



尤利娅选举会场、阿格里帕大浴场、万神殿的模型复原图

虽然财务检察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但作为“光荣的公职人员”入门官职的财务检察官的年龄限制也由原来的30岁降到了25岁。这并非是出于政府官员年轻化的考虑，而是为了拉大财务检察官和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的差距。因为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如果财务检察官也定在30岁的话，退职之后就可以自动进入元老院。如果是25岁的话，财务检察官从任期届满到进入元老院还需要等待4年。这4年的时间，可以让奥古斯都慢慢考核此人是否适合进入元老院。

即使在共和时代，官僚任职期满之后也不是就能自动当选元老院议员的，必须经过监察官的讨论决定。唯一例外是护民官，可以在任职期满后无条件地成为元老院的议员。这也是笼络平民的一种手段。

元老院是国家精英的聚集地，因此掌握元老院议员审定资格的监察

官，在共和时代有着很大的权力。要成为监察官，不仅要做过执政官，甚至还要有行省总督的经历。通常都是由元老院中的实力派人士担任。这种由元老院负责审查、决定罗马国家精英后备军的制度，自然不会逃过始终倡导“打倒元老院”的恺撒的法眼。他废除了这项制度，审定的权限归他本人终身独裁官所有。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权力，行事方式却不同。恺撒对那些年龄不低于31岁、任职期满的政务官，会立即作出是否有资格进入元老院的审定，并且马上宣告结果。奥古斯都却将审定的时间拖延至4年，相比于恺撒一锤定人终身的做法，奥古斯都这种时间差的处理方式，缓和了人们的观感，淡化了世人对他独揽大权的印象，这正是他深谋远虑的地方。

总而言之，罗马的选举，要选出执政官2名，法务官16名，财务检察官20名，合计38名的国家要员，候选人超过名额数倍以上，选战声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罗马时代的“通报侍从”

罗马自古以来，权贵们出门时都有带上叫做“通报侍从”（nomenclator）的奴隶的习惯。nome意为名字，clator是照顾的意思。

因为地位显赫，就算随便在罗马广场转一圈，也会有很多人上前致意。大人物们哪记得住所有人的名字。这个时候，通报侍从就会在主人耳边悄悄地提醒，主人便可以不失礼貌地寒暄几句：“哦，是普布利乌斯·瓦提尼奥斯啊，最近怎么样？”

如果是在选举期间，通报侍从的工作就不仅仅是记住人名那么简单。首先，候选人如果等着对方上来打招呼，肯定没机会当选。再者，

罗马有形形色色的选民。其中包括了没有资产靠劳动维生的无产者，以及曾经是奴隶身份、后来获得了自由的解放奴隶。解放奴隶只要拥有少许的家产和孩子，就有资格获得罗马的公民权。所以就算候选人的父辈是元老院议员，过了25岁的成年人，还只是个势利眼，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陪伴左右的通报侍从必须像电脑一般快速地将信息反馈给主人。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你好！最近在东方的生意顺利吗？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哦，对了，你大概也看到候选人名单了，我这次要竞选财务检察官，请多多关照了。”

“这不是昆图斯·塔基图斯吗？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了你。在南法行省勤务的时候，多亏了你亲戚们的照顾，非常感谢。我这次要竞选财务检察官，拜托了。”

如果是参选执政官，态度上除了平易近人，更需要保持有礼有节的风度。

“是你呀，提图斯·普鲁塔克。听说贵公子留学去雅典了，你准备让他在那儿学多久啊？哦，要待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能在担任执政官之后，去亚该亚行省做行省总督（雅典属于该省管辖），到时候或许能帮上贵公子一些忙。”

作为罗马统治阶级必不可缺的情报专员，通报侍从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安排宴席的席次顺序。罗马人喜欢躺在类似床的卧榻上吃饭，想要接近权贵的人，通常都会塞些小费给通报侍从，请他帮忙安排个好座位。

现代语言中也有“通报侍从”（nomenclator）这个词语，只是字尾稍有改变，变成了nomenclatura，意指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权阶级。

罗马的选举，除了候选人之间的竞选活动之外，还有最高统治者推荐的形式。最擅长使用这种方式的，是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帝政制度的推行者，只不过他们的手法迥异。

恺撒经常会发推荐信，大致内容是："独裁官恺撒致A选区的各位选民们：我希望通过你们的投票，候选人B和C能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官职。"

推荐信适合于全选区使用，只要换个选区和候选人的名字就可以。这也就是合理主义者的恺撒会采用的方式。

奥古斯都不写推荐信。选举的时候，宽阔的尤利娅选举会场，用幕帘将各个选区隔开。奥古斯都会在同党派的候选人的陪同下，访问每一个选区，拜托大家投票给他推荐的候选人。这种拜票的做法在公元前8年以后停止了，不知是因为那时的他已经71岁体力不支，还是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扮演一个"谦虚的人"了，真正的理由无人知晓。公元前8年以后的奥古斯都采用了和恺撒同样的写推荐信的方式。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定会亲自去投票现场，投下自己的一票。罗马的选举可以说是帝政制度下的选举。

奥古斯都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正驱使着罗马国家朝着帝政统治一步步地迈进。由于他的行动始终是暗中操作，所以，大家对表面上的共和体制不过是有点不置可否的感觉。正如恺撒所言："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正因为人们愿意相信罗马处在共和体制之下，所以奥古斯都在元老院时，经常需要忍受议员们肆无忌惮的言行举止。

如果是苏拉的话，绝对不会允许这种场面出现。元老院会场势必会像死水一般地沉寂，没有人会有勇气尝试着向他提出质疑。谁要是被苏拉冰冷的眼光扫到，就意味着这个人上了"黑名单"，断送的不只是政治生涯，肉体可能都会被彻底消灭。

换成是恺撒，想必会场里一定是畅所欲言，气氛活跃。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宽容的恺撒”。不过，如果有人想要挑衅的话，他必须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机智的恺撒三言两语就能让他在大家的嘲笑声中哑口无言。小加图等人就屡次有过这种屈辱的经历。

奥古斯都可能没有以上两位令人折服的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和身体条件也有关系。奥古斯都身高1.7米，在当时的罗马男人中属于不高也不矮的中等身材。而苏拉和恺撒，有很多史料已证明，他们都是1.8米以上的高个子。和他们相比，奥古斯都少了一些俯视一切的威严气势。

有一次，奥古斯都在元老院为法案作说明的时候，有一位议员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完全意思不清！”

这对本来就不擅辩解的奥古斯都来说，正打在了他的痛处。这种无礼的行为并没有立刻停止，又有其他的议员站出来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

“如果允许我发言的话，我会一条一条地来反驳你。”

即便是奥古斯都，对这种场面也是忍无可忍，拂袖而去。在他身后有人大声地叫道：“国家大事应该由元老院的议员们讨论决定！”

在外面的奥古斯都，大概会狠狠地踢颗小石子，把火气给压下去。

尽管如此，既没有人遭到惩罚，也没有人被降职。因此元老院开会时，议员们发言踊跃，各种批评声不断，经常会出现对“第一公民”不敬的场面。

自幼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带过来的孩子提比略，年轻气盛，为继父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为此，奥古斯都专门给

提比略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提比略，你还年轻，难免按捺不住火气。但是，纵使有人对我口出恶言也不能表示愤怒。他们不对我们剑拔弩张，我们就应该感到很满足了。”

我只能说，奥古斯都的忍耐力同样也是出类拔萃的。

对血缘的执著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首次遭遇了家庭的不幸。

他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马萨鲁斯突然病故，对40岁的奥古斯都来说，同时失去了外甥、女婿以及继承人。奥古斯都把女儿嫁给马萨鲁斯，是希望将他培养成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可惜马萨鲁斯年仅20岁，英年早逝，也没留下一男半女。葬礼上，奥古斯都亲自念诵了悼词。马萨鲁斯被安葬在奥古斯都陵，他是奥古斯都家族中第一个进入陵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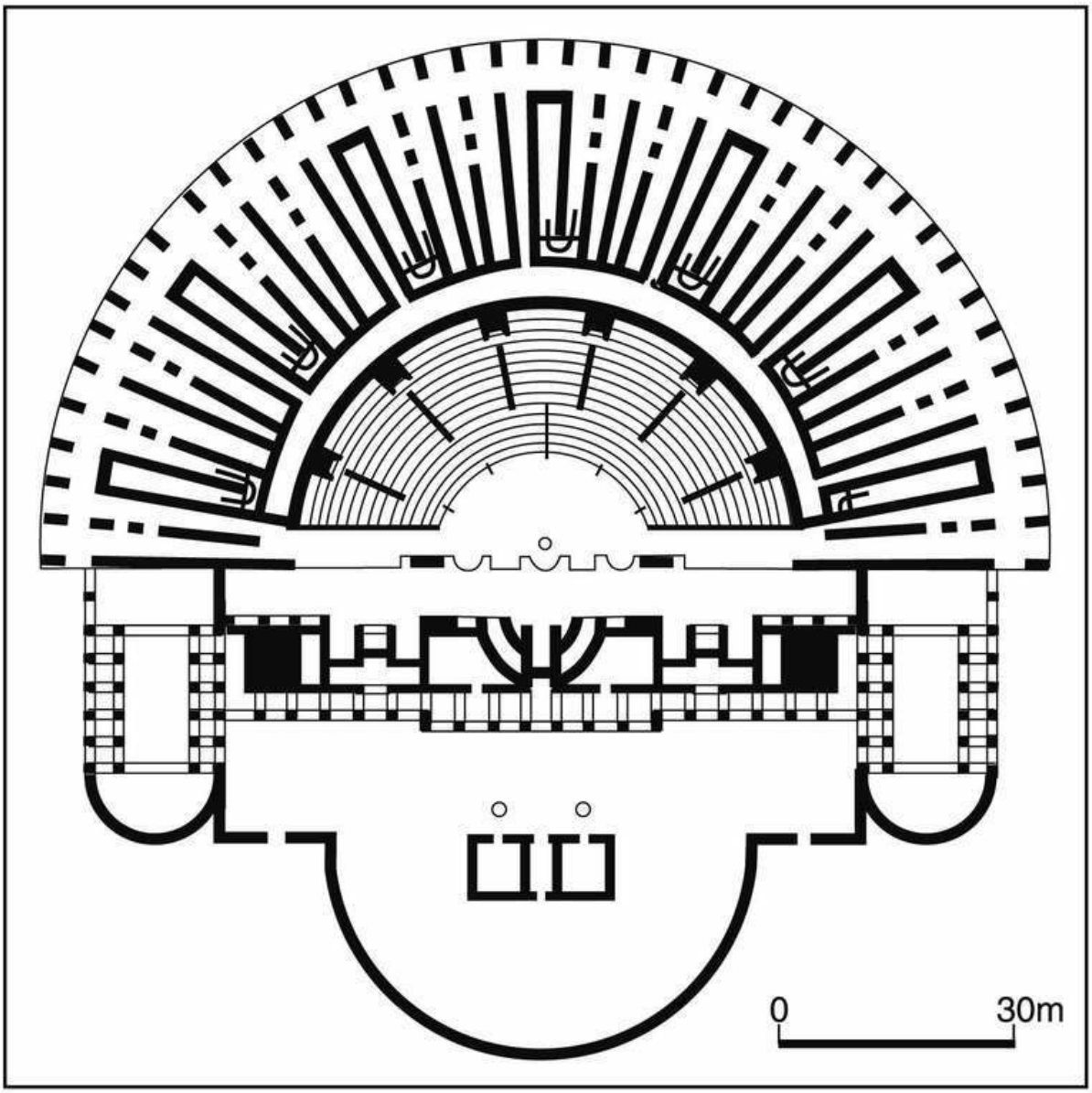
后人从陵墓中挖掘出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马萨鲁斯和他母亲屋大维娅的名字。我推测这是屋大维娅在安葬儿子的同时，也建好了自己的墓。20岁的儿子先自己而去，任何一位母亲都会悲痛欲绝，丧失生活的勇气。作为舅舅又是岳父的奥古斯都也没有轻易地忘记这份悲伤，10年以后，他将建成的新剧场，命名为马萨鲁斯剧场（Theatre of Marcell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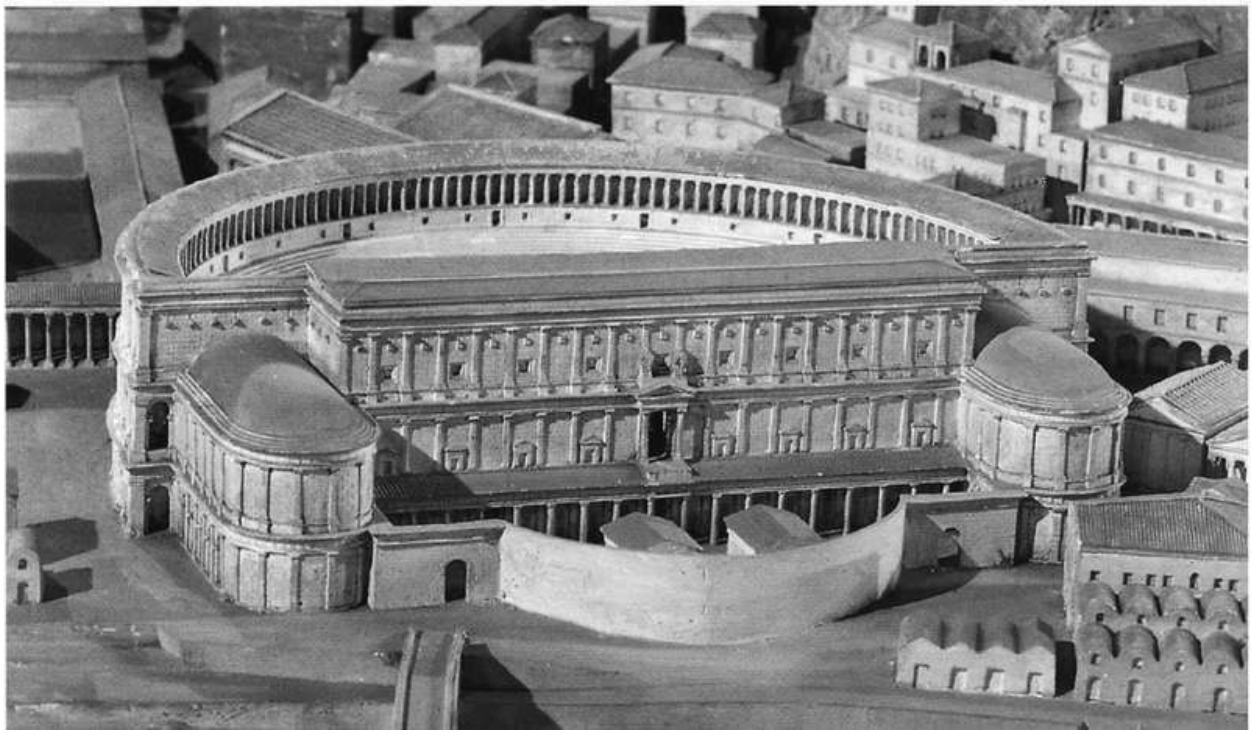
马萨鲁斯剧场是继庞培剧场之后，罗马建造的第二座石结构的剧场。它是由恺撒兴建、在奥古斯都时期完成的。本来它应该和恺撒着手建造的另外几座建筑，像尤利娅选举会场、尤利娅元老院会场（Curia Julia）、尤利娅水道（Aqua Julia）一样，叫尤利娅剧场，奥古斯都却违反了建筑物冠以建造者之名的传统习惯，命名为马萨鲁斯剧场。

不同于恺撒，奥古斯都相当执著于血缘关系。

马萨鲁斯的丧礼刚结束不久，16岁的未亡人尤利娅就立刻再婚，对象是奥古斯都17岁时恺撒派给他的助手，之后始终是奥古斯都忠实伙伴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同年，40岁再次做了新郎。当时的阿格里帕其实已经和屋大维娅的女儿玛吉拉（Claudia Marcella Majora）结婚，两人之间有一个女儿。奥古斯都命令阿格里帕离婚，和自己的女儿结婚，而离了婚的玛吉拉则被安排嫁给了安东尼的一个儿子。

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婚姻，的确成功地延续了血脉。两人在结婚后的第二年，产下一子，三年之后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奥古斯都在43岁当上了外祖父。


0
30m



马萨鲁斯剧场的平面图和模型复原图

即便是执著于家族血统，奥古斯都一刻也没有忘记国家大事。当年恺撒选中这位17岁的少年，恐怕就是看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身负国家大任之后，支撑他日以继夜的政治生涯的，也正是这份强烈的使命感。

当首都发生粮食危机之时，奥古斯都不仅应对得迅速果断，而且建立了未来的预防措施。那个曾经因家庭不幸深受打击的奥古斯都，像随着女婿的遗体一同在火焰中消失。

粮食储备

罗马国家自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的200年里，彻底放弃了对粮食的自给自足的想法。通过布匿战争，罗马从迦太基人手中获得了西西里岛的领土权，西西里岛盛产小麦，价格上又有竞争优势，所以意大利本土就不再种植小麦，改为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本土在农业转型之

后，橄榄油和葡萄酒在产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还可以出口。可是作为主食的小麦就不得不依赖进口了。保证小麦的需求量，不仅对总人口超过百万的首都罗马极为重要，对整个意大利本土而言，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粮食储备在罗马共和时期，由按察官负责。如果发生粮食严重不足，年轻的按察官无法应对严峻的事态，就会临时任命一位有威信和地位的政界人物来负责解决问题。比如说，公元前57年，庞培就负责过处理粮食危机。

后来，恺撒修改了制度，将按察官的人数从4人增加到6人，其中2人授予“粮食管理按察官”的官职，专门负责粮食问题。这2位按察官的主要职责首先是确保小麦的进口数量，其次是负责向贫民无偿发放粮食。和其他政务官一样，粮食管理按察官的任期也是一年。粮食问题需要长远的对策并付诸实施，作为负责人，只有一年的任期其实不是很合适。

奥古斯都考虑将任期长久化。按照他的性格，凡事都得循序渐进，所以在公元前23年，发生粮食危机时，他并没有立即出手，最初的时候，反而是在一旁静观两位执政官的表现。当时的两位按察官，依然按照共和时期的惯例，每年选举一次。

如果完全忠实于共和时期的规定，执政官要动用国库临时支出时，必须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元老院的600位议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久议未决。因粮食短缺而陷入恐慌的市民，不断发出希望奥古斯都担任独裁官、一举解决问题的呼声。独裁官是罗马国家发生危机时启动的一个机制，它不受制于元老院，可以完全独立地实施国家事务的决策。不过，奥古斯都并没有接受民众的邀请，他实际上掌握的权力已等同于独裁官，只不过他巧于掩饰，大多数人没有觉察而已。奥古斯都对独裁官的拒绝，让共和派们松了一口气。

当然也不能让这种恐慌状态持续和蔓延，最终，奥古斯都动用了私财，紧急派人去海外采购了大量的小麦。这样的事迹是他最乐意写在《功业录》里的："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将首都人民从危机和恐慌中解救了出来。"

市民们对奥古斯都自然是感激不尽，在感激之余经过不断的讨论，大家终于感觉到罗马的共和体制已经到了极限的状态。

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利用这种气氛趁机做些什么事情。粮食危机过去之后，粮食管理按察官的任期依旧维持一年，这又让奥古斯都再次得到了共和派人士的赞叹。对这些元老院议员而言，掌握"食"权如同掌握军权，意义极其重大。

不过，奥古斯都这次没有等到28年后再度发生粮食危机时才采取行动，他设立了一个"粮食局局长"的官职。为了突显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行政官职，而非政治职务，奥古斯都从骑士阶级中挑选了人选。这个职位和其他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僚一样，有相当长的任期。罗马国家终于建立起了粮食储备的安全保障体制。这个体制的建立还意味着"食"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元老院又失去了一个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

我并不打算在论述粮食储备的同时，展开水资源的话题。上、下水道的建设和道路建设并立为罗马国家基础建设的两大支柱，为此我会另作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是稍稍提一下。

同道路建设一样，水道的建设，奥古斯都也是完全交由阿格里帕负责。阿格里帕也是万神殿的最初的建造者。为了各类建筑、街道以及水道的建设，阿格里帕特地组织了一支技术专家队伍，这些人全部是奴隶。

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2年去世前，将其所有的财产留给了奥古斯都，其中也包括了这些公共工程的专家。奥古斯都不仅给予了他们自由的身

份，还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到了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并且建立了以这些专家为中心的“公共事业部”。

在公共事业部的各部署中，水道局尤其重要。帝政时代的中期，首都罗马已经拥有了10条以上的供水水道，其中有2条是阿格里帕负责修建的。虽然是武将，阿格里帕也非常清楚确保水资源的重要性。如今遗留在法国南部尼姆（Nîmes）的嘉德水道桥（Pont du Gard）就是2000年前阿格里帕建造的。

在对公共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方面，奥古斯都完全不劣于阿格里帕。他要求水道局局长的人选必须是有过执政官经验的元老院议员。奥古斯都把粮食的掌管权控制在自己和继承人的手中，水资源的管辖则交给了元老院，这也是基于罗马的传统，公共工程的建设一般都是由高位阶层负责管理。

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41岁。他曾经进行的国政改革，到这个时候已经有4年的空窗期。进一步推动改革之前，他有别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重整罗马帝国东半部，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帕提亚问题。选择搁置国政改革，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枯燥乏味的国政改革，民众也更喜欢轰轰烈烈的战事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出马重整帝国东部的各方面的机会都已经成熟。

重整东方领地

在古代被称做加拉太（Galatia）的地方，是指以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为中心的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在罗马共和时代，这里是罗马的同盟国，用罗马人的话说，是“罗马的友好同盟”。加拉太王族的最后一人在公元前24年死去。加拉太的东部是同为罗马同盟国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从卡帕多西亚的东部一直到里海的广大地区是亚美尼

亚王国。亚美尼亚也是罗马的同盟国。罗马利用叙利亚行省和这些同盟国，采取了以半圆形的方式从西边包围住头号假想敌帕提亚。虽然加拉太和帕提亚没有领土邻接，但是对罗马而言，加拉太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罗马的防御战略，如果加拉太摆脱了罗马的控制，罗马在东方的防御措施将崩溃瓦解。

接到加拉太王死讯的时候，奥古斯都还在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忙于西方领地的重整。征服西班牙的战役一结束，他立即派阿格里帕前往东方，并授予阿格里帕仅次于他本人的地位。也就是说阿格里帕是集权威权力于一身的特派大使。奥古斯都希望通过非武力行动将加拉太收为罗马属下的行省。

前往东方的阿格里帕并没有带军队，也没有直接进入加拉太，而是逗留在靠近小亚细亚西岸的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上，进行和平交涉。

提起阿格里帕，就连罗马的孩子都知道，他向来是代替不擅作战的奥古斯都冲锋陷阵。这次出征竟然不带军队，去的又是因女诗人萨福的诗歌而出名的风光明媚的爱琴海小岛莱斯博斯，这不禁引起众人的猜疑，是不是由于奥古斯都过于偏爱女婿马萨鲁斯，引发了阿格里帕的不满，索性跑到小岛上隐居了。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现在百分之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那段时间，阿格里帕不光是待在莱斯博斯岛上，他还视察了东方的各个行省，甚至涉足尤地亚（Judaea）。因此阿格里帕的此次东方之行，是为奥古斯都的东征打基础，作事前准备。以阿格里帕之名在东方世界兴建的公共建设，数量之多举不胜举。如果是一个心情苦闷、躲在小岛上的人，是不会有这番心思的。正因为是位于最高统治者之下的“次席”，才有可能会为即将登场的“主席”去作这些事业上的铺垫。也因为有阿格里帕在东方的把持，奥古斯都才得以完成了西方领地的重整，返回首都，获得了护民官的特权，向他的皇帝之路更走近了一步。当年由恺撒指派、从17岁开始一直在奥古斯都身边、与他同甘共

苦的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始终如一的朋友、同志和协助者。

失去爱婿马萨鲁斯的奥古斯都，选择阿格里帕作为女儿的再婚对象，或许是出于深情厚谊，希望自己和好朋友的血缘联结融合在一起。阿格里帕成为奥古斯都女婿之后，奥古斯都将他的地位提升到与自己同级，成为共同的统治者，他不在罗马的期间，由阿格里帕代为掌管内阁。内阁除了“第一公民”、2位执政官、各官署的代表以及20位元老院议员这些原本的成员之外，奥古斯都又加上了和他“第一公民”本人共同的统治者阿格里帕。大概是奥古斯都考虑，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罗马帝国可以托付给阿格里帕。两人虽然同龄，但是阿格里帕身强体壮、少有疾患，健康状况胜过奥古斯都。

因为东方有阿格里帕在帮忙打点，所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从西班牙返回首都之后，不需要急于启程直抵东方，他出行的第一站是西西里岛。住在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也满怀期待地等候迎接这位恺撒之子、“第一公民”的到访。

恺撒不仅授予了卢比孔河以北的北意行省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也给了居住在西西里岛的所有自由人拉丁公民权。拉丁公民权除了没有参政权，即投票权之外，其他权利和罗马公民相同，因此拉丁公民权可以说是取得罗马公民权之前的一个准备程序。同样得到恺撒授予拉丁公民权的还有南法行省。

北意行省的罗马公民权在公元前49年已得到正式的通过，而授予西西里岛和南法的拉丁公民权的政策，是恺撒在公元前44年才决定的。3个月之后恺撒就遭暗杀，罗马随即陷入长期的内战，直到公元前30年才得以安定。这段时间，有关拉丁公民权的问题一直被搁置。奥古斯都认为没有明文化的政策形同白纸，和南法一样，他也没打算对西西里授予拉丁公民权。

西西里人也知道，奥古斯都在南法期间，并没有给予当地居民拉丁

公民权，仍旧维持着行省居民的身份。但在西西里人看来，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和西西里行省不同，他们这里作为罗马行省的历史要长久多了，而且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之间仅相隔一条最窄处只有3公里的墨西拿海峡，从地理上讲，将西西里算做本土也无可非议。何况，西西里还是罗马的粮仓。

奥古斯都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西西里是外国，使用的语言也是希腊语。当时高卢和西班牙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拉丁语因此得到普及，但是由于希腊语是完整的语言，再加上罗马推行双语政策，所以就算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人们日常用语还是希腊语。在西西里，似乎希腊语是国语，而拉丁语则是第一外语。直到现代，西西里当地的方言里还夹杂着不少的希腊语，每次听到这些奇妙的语言，总让我不禁莞尔。

奥古斯都对公民权的想法，对西西里人很不利。

我把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有关公民权的看法，作以下归纳：

—— 恺撒——

（一）即便是异族，只要从事对罗马有所贡献的工作，就可以给予公民权。比如说，对那些忠诚的士兵，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日耳曼人，恺撒一律授予了他们罗马公民权。

（二）给那些有助于罗马国家未来安全稳定的人授予公民权，像罗马统治下的部族的首领，以及巴尔博那样有才能的行省人。恺撒在授予外国人公民权的问题上，态度始终是开放的、积极的。

—— 奥古斯都——

对于以上（一）的条件，奥古斯都承袭了恺撒的做法。（后文将会论述。）他在实施军事改革的时候，授予了那些行省出身的包括退伍兵

在内的全体志愿兵罗马公民权的资格。

而对于（二），奥古斯都的态度与其说是慎重不如说是消极。首先应该是他不想引起元老院的反感；其次，奥古斯都认为，必须优先振兴本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信念。

在公民权问题上也反映了“父”与“子”性格上的迥异。研究者评价两人，通常会认为恺撒是一个追求革新的人，而奥古斯都则相对保守。不过，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反而是奥古斯都得到的正面评价更多一些。话说回来，传统上热衷于研究罗马史的国家，大多是曾经拥有过殖民地的先进国家，如果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他们的论点可能就会不同。因为帝国对这些旧殖民地“从事对本土有所贡献工作”的人民，从来都不肯给予本土的国籍。

总而言之，西西里没有得到公民权，依旧维持着原来的行省地位。如果说保守主义的主张是维持原状的话，奥古斯都的确是保守的，这同时也代表了罗马传统的做法。不过，奥古斯都对提高这个罗马粮仓的生产能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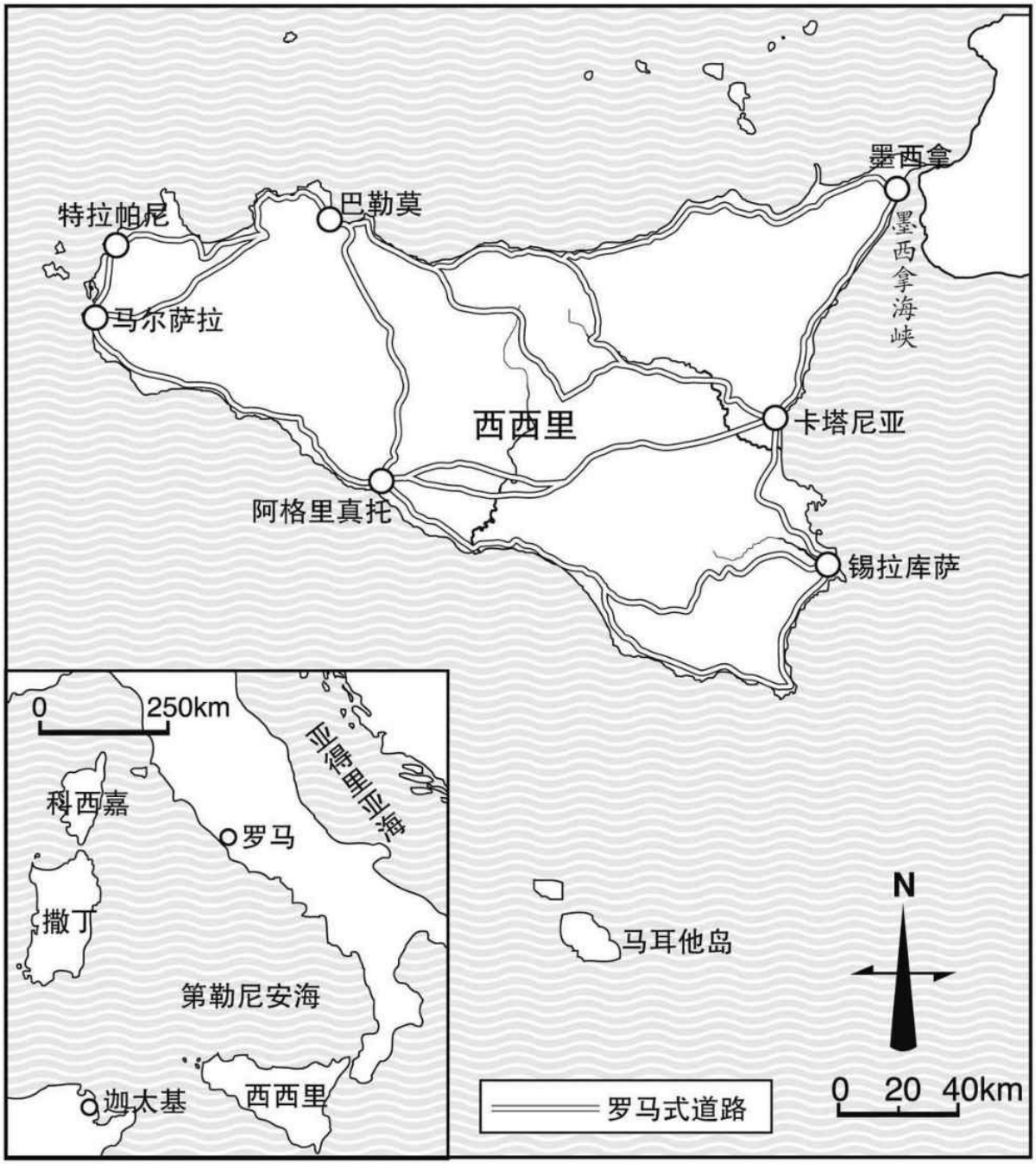
西西里和罗马一样拥有700年的历史，是希腊人的移居地。主要有：锡拉库萨（Siracusa）、卡塔尼亚（Catania）、墨西拿（Messina）、巴勒莫（Palermo）、特拉帕尼（Trapani）、马尔萨拉（Marsala）以及阿格里真托（Agrigento）。这7个城市由从事海运和通商的希腊人以及迦太基人所建，所以都是海港城市。

奥古斯都决定扩建这7个城市。首先是建造环绕海岸线的道路，由此形成7个城市的交通网络；其次是建设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内陆道路。希腊人对内陆向来关注甚少，奥古斯都希望通过公路建设繁荣内陆的经济。

除了上述的计划，奥古斯都沿用了恺撒生前的策略，向各战略要地

输入退伍的罗马军人，在这些地区总共建立了7个殖民城市。殖民城市建在哪里，哪里势必成为地区的军事防卫和振兴经济的核心，而各个核心地之间，都会建立起相互联结的交通网络。

通过以上道路和城市的建设，农产品从内陆到港口的输送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多半不是因为产量递减，而是由于产地的运输功能低下。物流系统有效地运作，不仅可以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主食小麦依赖进口的意大利本土的人民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



西西里行省

奥古斯都在西西里逗留期间，还计划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两岛的公路网的建设，这项计划和西西里扩建一样，迅速地得到实施。

在奥古斯都的行省治理政策中，与撒丁岛以及科西嘉岛相比，西西里受惠更多。西西里靠近非洲，坐船去迦太基，只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当年恺撒制定了迦太基的重建计划，后来由奥古斯都完成。恢复了昔日繁荣的迦太基，再度成为北非物资的集散地。西西里的居民大多是希腊人，希腊人又是以商才出名，所以，西西里在作为农业产地的同时，又被开发成为物资的中转枢纽地。

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人，看到从迦太基运来的新鲜无花果都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生产如此美味水果的敌人竟然离罗马只有3天航行的距离。150年之后，在奥古斯都推进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政策下，罗马人的这种心理畏惧变成了物质上的充实。西西里由于地处地中海正中，长久以来是大国间的相争之地，这个不利的条件，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实现，转变成正面、有利的因素。

另外，奥古斯都的行省治理制度，也促使了西西里地区进一步安定。

西西里属于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议员出任行省总督。根据奥古斯都的行省制度，行省总督没有征税权，税赋的事务由奥古斯都直接任命的税务官负责。因此，行省总督失去了利用职权贪污税金的机会。罗马共和时代，让西塞罗一举成名的，就是他起诉了劣迹累累的西西里总督威尔维斯。奥古斯都的“税务官”制度下，不会再出现类似威尔维斯这样的人物。

西西里因为继续维持行省的地位，所以居民必须缴纳什一税。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即使缴了税，还是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

西西里行省以及撒丁岛、科西嘉岛，由于社会安定，所以没有驻扎任何罗马军队。

第二年，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离开西西里动身前往希腊。

当年恺撒和庞培的对决、之后的安东尼——屋大维联合军和布鲁图——卡西乌斯联合军的战争，以及屋大维与安东尼——克娄巴特拉联合军的决战，罗马内乱时所有主要的战役，都发生在希腊领土上。希腊历经不幸长达20年。

陷入长期衰退的希腊经济，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不堪一击的地步。耕地荒芜，仅靠着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维系。人们选择畜牧业，也是出于万一发生战争，可以有个逃生之地的理由。希腊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再抱有希望，最终导致了人口大量外流，与其说人口外流，不如说“头脑”外流更贴切。人口外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希腊民族生存能力很强，去哪儿都能适应。

首先，希腊语是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再加上罗马人作为提升教养课目的哲学、伦理学、修辞学、历史、数学、地理、天文学，都起源于希腊。恺撒规定，能够教授这些学科的人，不问民族，一律给予罗马公民权。因此，利用这个特惠的希腊人日益增多，因为除了可以谋得一职之外，有了罗马公民权，就不必再缴纳行省税。何况，不用到罗马，只要在附近的罗得岛开设讲座，就会有留学生从罗马蜂拥而至。

除了教学，希腊人在建筑和美术造型上也有着独特的造诣。罗马人有市场需求，希腊人有能力提供，两者间的供求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行医是希腊人自古以来另一个传统的职业。拜恺撒所赐，这个行业和教师一样，只要在罗马开设诊所，或者是在罗马公民聚集的殖民城市、军事基地的医院任职，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免缴行省税。

若是擅长生意的希腊人，那么地中海世界的所有海港城市，都是他们活跃的舞台。希腊人还善于航海，不仅是地中海，从红海到印度洋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天文学上的季风现象，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一位希腊人发现的。

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古代的希腊人比他们的后代更有勇气和自信，即使离开祖国，他们也有足够的生活能力立足异邦。

不管怎么说，希腊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空洞化不容忽视。希腊的不振，对一向尊重希腊文化的罗马统治阶层而言，是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问题。如果希腊能够恢复以往土地丰饶、人丁兴旺、人才济济的景况，对罗马的战略防御也十分有利。罗马一直希望建立起多瑙河防卫线，希腊的北部正好可以作为后方基地。

当初，恺撒将希腊分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两个行省。奥古斯都将它们都划为元老院行省。统治权理应属于元老院，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地区没有奥古斯都插手的余地。可是，奥古斯都凭借巧妙的政治手腕，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大家都认为虽然统治权归元老院，但是重整领地、制订行省治理方针应该交给奥古斯都。

希腊行省及周边图

奥古斯都在希腊期间，不管是亚该亚的省会科林斯（Corinth），还是马其顿的省会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他都从未涉足。他好像

一直留在雅典，奥古斯都不像恺撒，喜欢轻车简从、四处巡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恺撒生前规划的打通科林斯地峡、联结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和爱琴海的计划完全没有兴趣。如果他去了科林斯，一定会去现场视察考证工程实施的必要性。恺撒生前计划过多种建设项目，像科林斯地峡那样，要等到19世纪才得以实现的工程，为数并不多。

史料上没有奥古斯都在雅典召集研究者、增加学识的记载。他18岁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想来是很少会有充裕的时间去静心学习、提升教养。如今到了42岁，又有堆积如山的国家大事等着他去处理，估计他不会有聚集文人墨客谈天说地的闲情逸致。

奥古斯都重建希腊的构想，包括建设自治城市、殖民城市，以及联结这些城市的道路网。

自治城市基本上就像一个城邦国家，拥有独立的货币铸造权，当然也不征收行省税。在希腊，有雅典、斯巴达、奥古斯都建设的尼科波里斯（Nikopolis）等，总共不到10个特别自治区。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能享受这个特殊的待遇，是因为历代的罗马统治者都非常尊重这两座希腊最著名的城市的历史。

殖民城市是罗马退伍军人移居的城市，因为是罗马公民居住地，自然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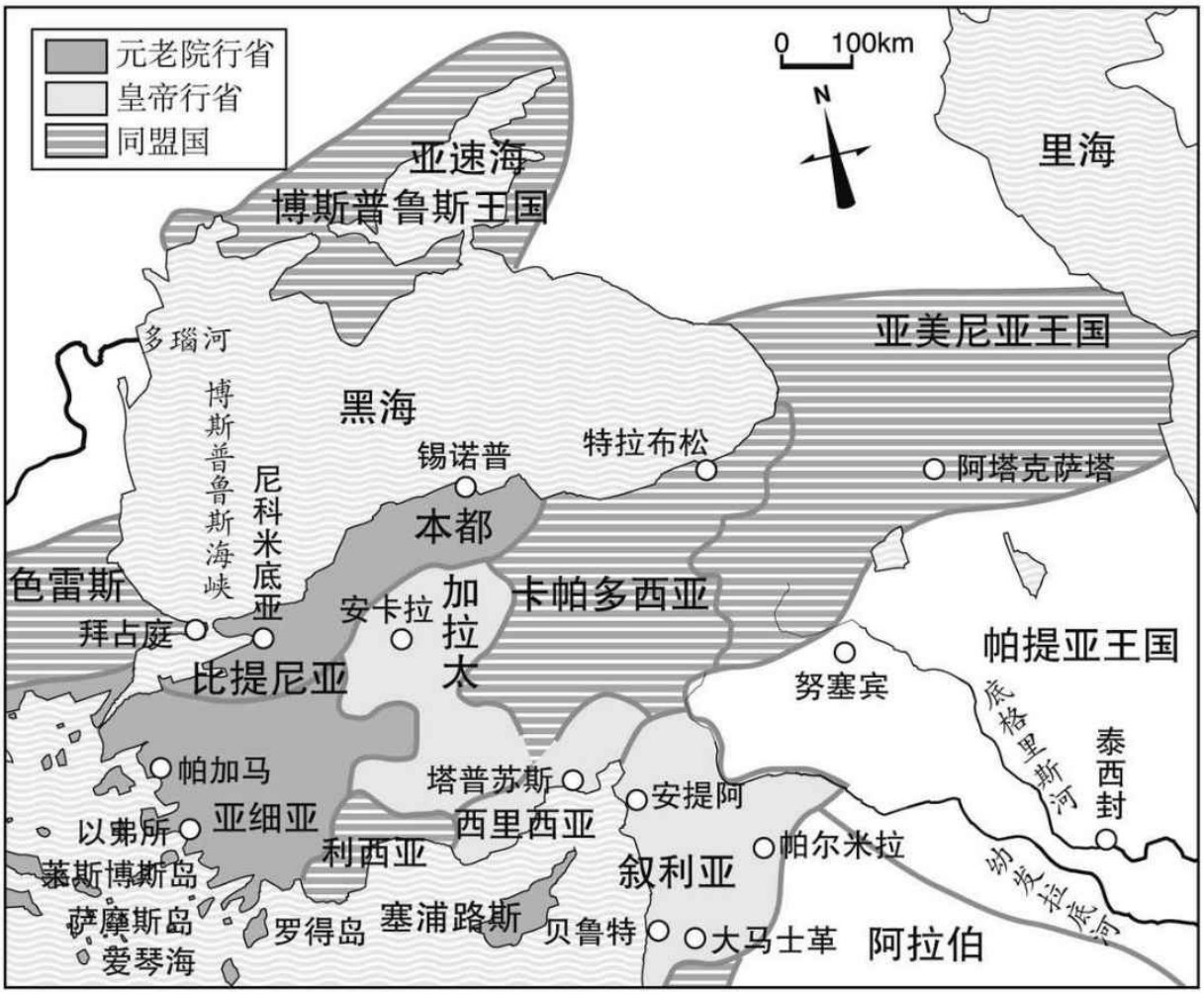
希腊的公路修建，是将原本只有一条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向纵深扩展，形成一个联结所有自治城市和殖民城市的交通网络。这种罗马式的道路形同现代的高速公路。

奥古斯都坚信，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复兴希腊。他在雅典市区的北面，建造了一座圆柱环绕的市场，赠送给雅典市民。作为回赠，雅典在卫城（Acropolis）上建立了一座神殿，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神殿中，

矗立着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

非常有趣，罗马人赠送的礼物是“贸易中心”，而希腊人的回礼则是神殿和雕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地中海地区这两大文明古国不同的民族性。

从神殿里并立的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可以推测，那一年，阿格里帕可能来到雅典和奥古斯都会合，就东方重整计划的有关任务进行了交接。奥古斯都之后从雅典前往东方的时候，阿格里帕并没有同行，他在雅典交了接力棒后，直接返回了首都罗马。陪伴奥古斯都东行的是年轻的提比略。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信的奥古斯都唯一的健康法，就是不勉强行事，能让人代劳的事尽量交给别人。



小亚细亚及其周边图

雅典冬冷夏热，公元前21年的冬天，奥古斯都是在气候温暖的萨摩斯岛上度过的。萨摩斯岛是邻近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岛屿，对奥古斯都而言，逗留此地，为下一年（公元前20年）即将展开的东方重整计划作准备，比待在希腊本土来得更加方便。

从飞机上俯瞰古代称做“亚细亚”的现今的小亚细亚，满目是连绵不断的荒丘野岭。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曾有过你争我夺的历史，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旦改坐汽车，行驶在陆地上，感观就大不同了。这里虽然没有广阔的平原，但是农田散布，水源丰沛，山丘以外的地区气候温

和，是一个素朴而富饶的地方，尤其是希腊人开发的黑海沿岸、面临爱琴海的爱奥尼亚（Ionia），以及位于面向叙利亚和埃及的小亚细亚南部，经济水平都不低于叙利亚和埃及。

小亚细亚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到200年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里的民族构成像其历史一样，也是相当错综复杂。原住民的亚洲人务农，由来已久的希腊移民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同样是移民的波斯人，以及作为雇佣兵而来、之后定居在此的凯尔特人（Celt），再加上小亚细亚东北一带的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可谓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恰似罗马帝国的一个缩影。

如何对这样一个既复杂又潜藏能量、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进行治理，对罗马来说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罗马最优秀的将军们，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庞培到苏拉、恺撒，都曾经举兵小亚细亚，可见这个地区的重要性。

共和时代的罗马在对小亚细亚的政策上，一贯保持与各王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在死前将国家托付给罗马，这里才成为了罗马的行省。尽管罗马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一直希望尽可能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将小亚细亚整个地区收为罗马的行省。

小亚细亚的王国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君主体制和东方人的特性交汇在一起，就容易发生王位继承的纠纷。罗马人之间的纠纷，罗马人自己可以解决；而在东方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情况普遍，因此一个国家的内部纠纷常会引来他国的介入，从而扩大了战事。为了维持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安定，罗马也不得不改变策略，增加了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西里西亚（Cilicia）三个罗马行省。这项政策是由庞培规划、恺撒实施完成的。

奥古斯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与这三个行省相邻的加拉太王国的国王死亡，王位无人继承。如果放任这个状况不理，附近的大国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势必会伺机而入，奥古斯都决定将加拉太纳入直辖行省，为了不刺激紧邻的诸国，他希望通过非武力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获得奥古斯都授予“次席”地位、被任命为全权特派大使的阿格里帕，和加拉太王国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阿格里帕给予对方的条件是：

一、延长债务偿还期限。通常情况下，加拉太人是借款一方，而贷款一方则是罗马人。这想必是奥古斯都对罗马金融业施加了压力而促成的协议。

二、承诺行省税的公平征收。行省税是收入的十分之一，金额已经低于加拉太人民之前缴给国王的税金，因此所谓公平征收，应该是指税率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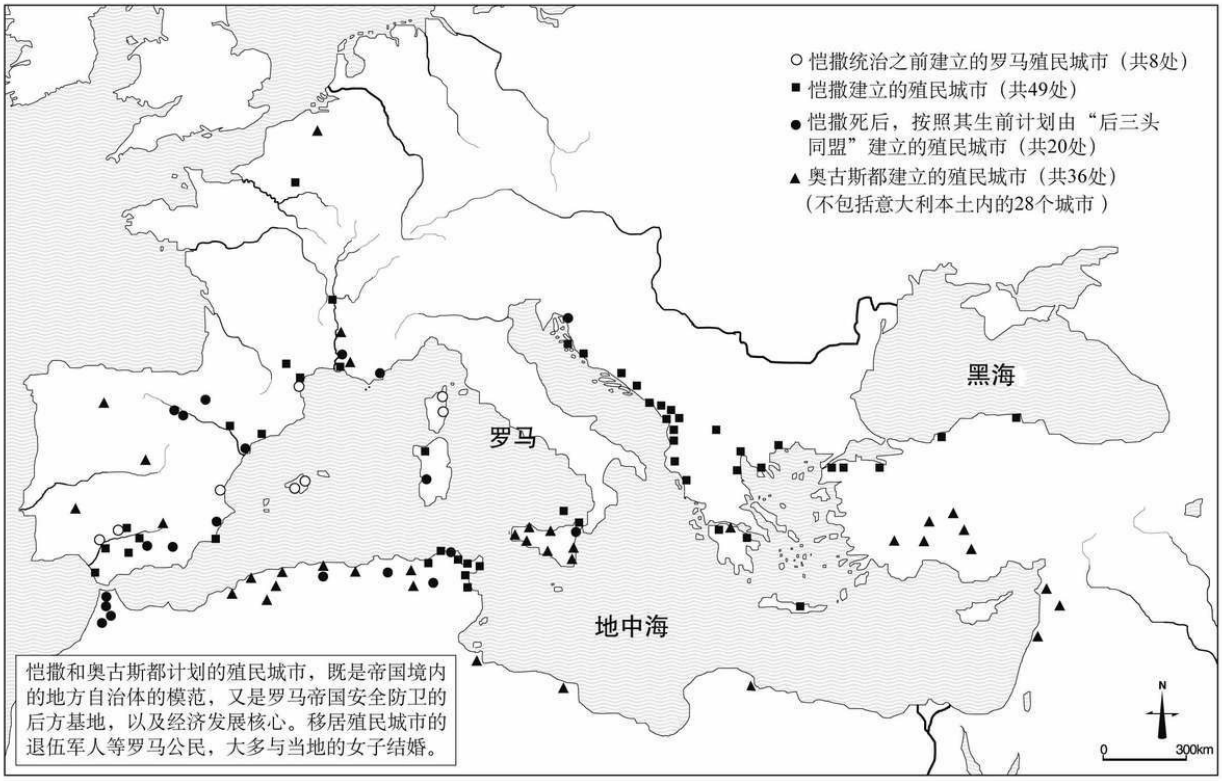
三、明确行省总督的统治地区。在罗马的行省中有不少希腊型的通商城市，这些城市从共和时代开始，一直作为“自治城市”被罗马认可。奥古斯都继承了这种治理方式，与其说是尊重地方的自由，不如说是让它们成为当地经济的核心。这些自治城市只要没有反罗马的行为，就不会派驻罗马军队，行省总督的权限不涉及这些地区。

既然是自治城市，按理说可以决定各自的税率，但是实际上这些城市的税率都没有超过行省税的十分之一，因此还是采取了统一的标准。如果自治城市的税率高过了周边的地区，就算是自治城市，也避免不了人口外流的问题。

四、不派军队驻守，但建立罗马退伍军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小亚细亚的另外两行省亚细亚和比提尼亚属于元老院行省，所以没有罗马军队，但是对于刚成为行省的加拉太，因属于奥古斯都直辖的皇帝行省，

按理说应该派兵驻守。不过，奥古斯都认为正规军只要驻守在叙利亚就够了，这和莱茵河沿岸有大批的罗马军队防守，附近其他的地区没有驻兵是同一个道理。

为防止利益上的冲突，殖民城市的地点选择了远离原住民希腊人的地区，六个殖民城市都建在加拉太的内陆地区。这些罗马退伍兵居住的土地，不作强行占用，而是由奥古斯都自费购买。殖民城市之所以选在内陆，除了避免民族间的矛盾，也是考虑到希腊人擅长经商，罗马人擅长农牧，要保证经济振兴的持续性，人力、资源的分配必须均衡合理。不同于希腊人偏重沿海城市，罗马人对内陆的开发也非常热衷。加拉太行省的省会定在安卡拉（Ankara）。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到，这里也进行了罗马式的基础建设，筑起桥梁和道路，形成了联结核心地段的交通网。位于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太，就这样和平地被收为罗马的行省。



恺撒及其后继者奥古斯都的殖民政策

当时，以莱斯博斯岛为据点的阿格里帕，东奔西跑十分活跃，而原本安心逗留在萨摩斯岛的奥古斯都，也逐渐地扩大了他的视察范围，似乎只有在冬天才回萨摩斯岛。那时他们两人都是40岁出头，共同肩负着巩固帝国疆土的大业。

罗马时代的叙利亚行省的版图很大，包括了现在的土耳其东南部，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居住着希腊人、腓尼基人（Phoenicia）以及闪米特人（Semite）等，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当年由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在这里建立的塞琉古（Seleucus）王朝，因发生内乱而灭亡，庞培将这块地区收为罗马行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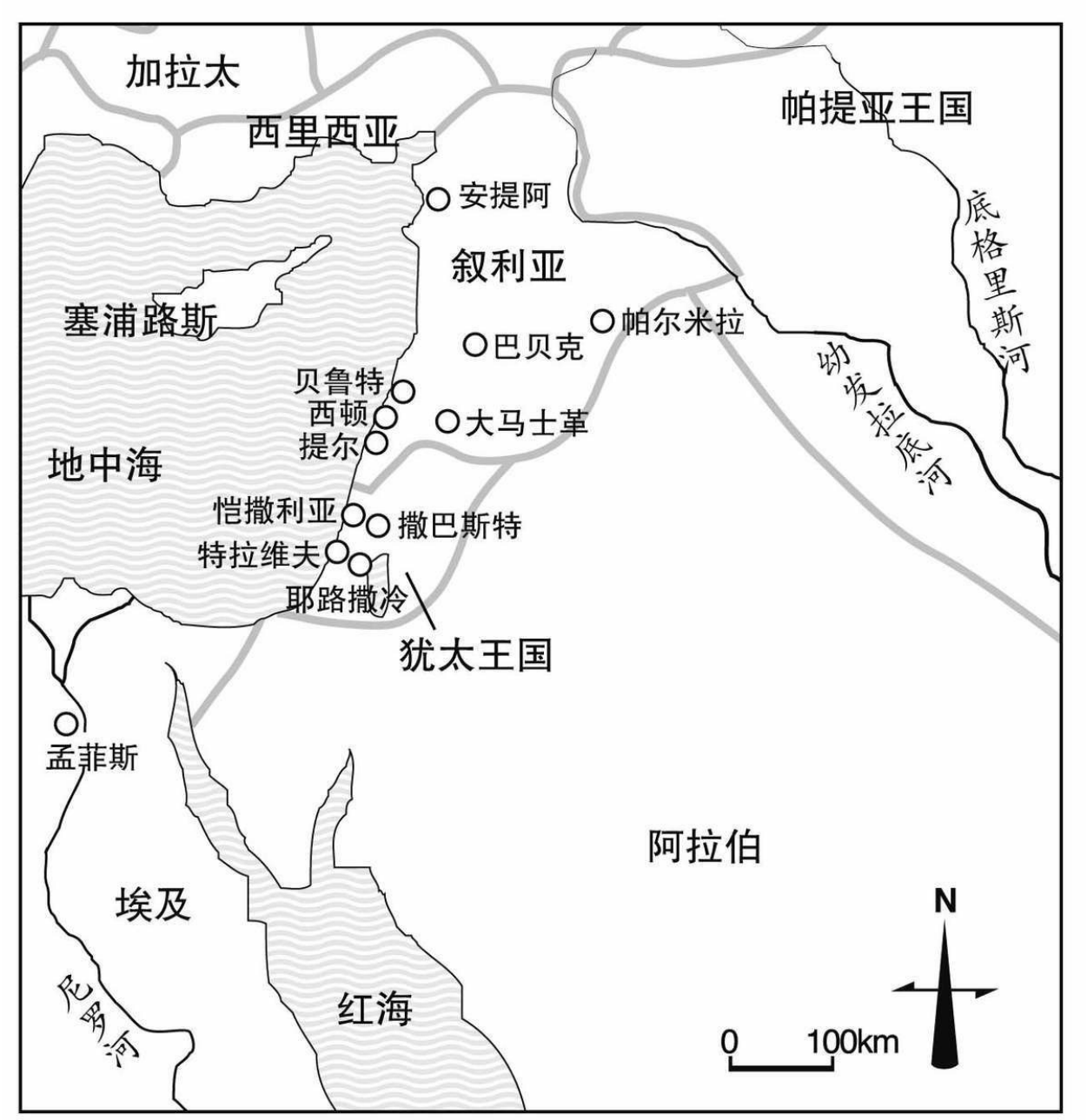
由于这里和大国帕提亚相邻，所以有罗马军队驻守。奥古斯都将这里划为皇帝行省，即使在平常，驻军也达到了四个军团的兵力。

叙利亚行省的省会设立在塞琉古王朝时代的首都安提阿（Antioch）。当年恺撒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他深知安提阿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当奥古斯都来到安提阿，面对林立的剧场、水道、浴场、会堂等各式各样的建筑和设施，他知道，对这里只需要保证其维持现状，而他真正需要做的，是那些恺撒没来得及整顿的重要地区。

叙利亚行省的最大特征是，一面与邻国帕提亚为敌，一面又和它保持着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因此，即使面对强敌，也不能筑起铜墙铁壁，隔绝来往，否则就等于切断了叙利亚的经济命脉。因此，在部署军队驻地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的开发。如果这些城市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那些商队都会改走其他的路径。

奥古斯都在赫里奥波利斯（现巴贝克，Baalbek）建立了军事基地，为了让驻守边境的士兵们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下令在基地内建设了各种公共设施。就这样，罗马文明渗透进了黎巴嫩的山区，不过它并不能渗入当地人民的心灵。当地人和以往一样，信奉巴尔神

（Baal），这里的地名从希腊语的“赫里奥波利斯”改为“巴贝克”，也足以证明巴尔神始终是当地人民信奉的神灵。



叙利亚行省及其周边地区图

对于商队行径通路的沿线各个城市的开发，在奥古斯都时代，首先集中在大马士革和帕尔米拉（Palmyra）。这块沙漠地带，散布着五个小王国，罗马和他们都结成了同盟关系。罗马希望这些小国能在罗马叙利亚行省和帕提亚王国之间，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其中大马士革和帕尔

米拉，无论是作为缓冲的核心，还是作为通商路径发挥其功效，都处于最好的位置。

罗马人一定在安提阿——帕尔米拉之间、帕尔米拉——大马士革之间、大马士革——贝利图斯（现贝鲁特）之间，以及贝利图斯——安提阿之间，铺设了道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奥古斯都的行省政策，除了继承了传统的罗马统治方式，或者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地区的开发，他也对一些既定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距离贝利图斯不到50公里的地中海沿岸，有着两座腓尼基时代就存在的古老城市，西顿（Sidon）和提尔（Tyre），无论是最初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纳入罗马行省的庞培，还是之后确立了罗马在这个地区统治地位的恺撒，都指定西顿和提尔为“自治城市”，同意它们的自治。但是在恺撒遭到暗杀、罗马陷入混乱的期间，这两个地方曾经兴起过反罗马的风潮，发生过杀害罗马商人的事件。奥古斯都剥夺了这两座城市作为“自治城市”的资格，降格为叙利亚行省内的一市。这就是日后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的统治方针——可以给予自由，但不能背叛罗马。

犹太问题

叙利亚行省的南边是犹太王国。如今，要想从这里轻易地通过边境简直就是做梦。在古代，贝利图斯和约帕（现特拉维夫）之间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或许在贝利图斯的街道上会有“距离特拉维夫200公里”的标志。不过在古代，也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国界线。

叙利亚行省属于希腊文化，而犹太王国则属于犹太文化。前者是多神教社会，后者是一神教社会。在罗马人看来，既然首都罗马的犹太人集中的居住区有犹太礼拜堂，那么犹太地区也应该为多神教人民设立神

殿，而犹太人是绝对不允许在王国内设立祭拜其他神的殿堂。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对罗马来说，治理这个地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管是40年前（公元前60年）征服了耶路撒冷的庞培，还是公元前48年树立了罗马统治地位的恺撒，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将犹太王国收为罗马的行省，只要犹太王国承认罗马的霸权地位、和罗马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就足矣。在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希腊裔商人曾经一直享有特殊的待遇，犹太商人始终屈居第二。是恺撒授予犹太人和希腊人同等的地位，他也因此受到了犹太人狂热的支持。

事实上，相比于希腊人统治的时代，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在罗马统治时代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不过，承认这点的只限于一些明理的犹太人，何况，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贫富差距，毕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行商的。

不过，在处理犹太王国问题上，奥古斯都手里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被犹太王国的人民称做大王的希律（Herod）国王。

希律王生于公元前73年，年长奥古斯都10岁。王族间的权力之争，在东方的君主国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希律王的前半生也是在和亲族们的相互厮杀中度过的。公元前40年，帕提亚入侵犹太王国，逮捕了国王，逼他将王位交给了亲帕提亚的弟弟。当时身为国王近臣的希律逃往罗马。罗马那个时候正值安东尼和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共同统治的时期，他们当然不会承认和帕提亚交好的新任的国王，反而是头脑清晰、务实、有着坚强意志的希律，得到了罗马统治阶层的赞赏和信任。最重要的是，智力和体力正值盛年的33岁的希律，正确地判断了罗马的力量。

不久，希律带着安东尼和屋大维授予的“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返回祖国，成功地夺取王位，成为了犹太国王。

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曾经非常希望得到犹太王国，对她言听计从的安东尼，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不肯点头同意，可见罗马对希律王的重视。安东尼死后，希律王的犹太王国和奥古斯都的罗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一个人对两国的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是生于大马士革的希腊人，他学识渊博、性格温和、著书颇丰，曾经担任过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后来又成为了希律王的顾问。

希律王和尼古拉斯这两位，一个犹太人，一个希腊人，在一件事情上有着共识：犹太王国最佳的选择就是在作为罗马的被保护者（clientes）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

罗马时代的被保护者，不单指受到保护，还意味着成为保护者的后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安全保护者（patoronesu）的罗马有责任保护犹太王国免于外敌的侵略，而被保护国的犹太王国，也要为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罗马而言，犹太王国就是抵御东方的帕提亚、南方的阿拉伯的防卫线之一。作为交换条件，罗马承认犹太王国的独立地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神殿。

希律王的亲罗马政策也贯彻得相当彻底。在犹太王国内，建有信奉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为感谢奥古斯都，将撒玛利亚城（Samaria）改为沙巴斯提（Sabaste）；还建了一个名为恺撒利亚（Caesaria）的海港，意为“恺撒之都”；同时在恺撒利亚又建了一座神殿，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即使在耶路撒冷城内，也允许并正在建设以奥古斯都和其妻莉薇娅，以及已经成为奥古斯都女婿的阿格里帕之名捐赠的公共建筑。

但是，犹太民族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民族都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不少人对在自己国土上建造那

些与劣等民族罗马有关的建筑，觉得忍无可忍，即便这些建筑是为公众所建。同时，他们对国王亲罗马的政策也十分不满。而希律王独断专行的强硬手段更是火上加油，一神教的宗教信仰加上民族主义情结，究竟会爆发出怎样的火焰，对信仰和思想都完全相反的罗马人而言，是无法轻易地预测和应对的。

不管怎么样，50多岁的希律王目前还稳坐王位，而比希律王年轻10岁的奥古斯都，又是个不会自找麻烦的人，奥古斯都的这种性格，从他这次东方之行最主要的目的，即解决帕提亚的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帕提亚问题

罗马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之后，仍然没有忽视在那遥远的东方，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据点的帕提亚王国的存在。不解决帕提亚的问题，罗马帝国的东部防卫线就无法建立。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敌人大多是小国或者是蛮族，真正需要罗马动用正规军的对手，在征服了克娄巴特拉的埃及之后，就只剩下帕提亚了。

可是，迄今为止，罗马从来没有赢过帕提亚的战绩。虽然卢库鲁斯（Lucullus）和庞培都曾经攻打到幼发拉底河附近，却没有和帕提亚作正面的交战。公元前53年，当时“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率军，首次和帕提亚正面对决。结果4万多人的罗马军团，能成功逃离的人不到1万人；1万多人被帕提亚俘虏，其余的2万多人战死沙场，几乎是全军覆没。幸存的指挥官，除了总司令克拉苏之外，只有后来成为暗杀恺撒主谋的卡西乌斯一人。甚至罗马军团的军旗银鹫旗也落入了敌人的手里，这对罗马而言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众所周知，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到暗杀的恺撒，原本正准备出发远征帕提亚的。不解决帕提亚问题，罗马帝国的东部防卫线就无法建

立，何况，罗马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帕提亚的问题，因恺撒之死以及随之爆发的长期内战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公元前36年，安东尼率领包括同盟国军队在内的总共11万人的兵力讨伐帕提亚，经过长达8个月的远征，结果损失了2万多人的兵力。尽管没有输得一败涂地，但这次的战败，对野心勃勃、有意接替恺撒大位的安东尼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的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罗马人民在庆祝内战结束的同时，也期盼着奥古斯都能够征服帕提亚，一雪前耻。事实上，亚克兴角海战胜利之后，奥古斯都曾经追击安东尼到过东方。当时如果从那里率兵去帕提亚，大概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位英国的研究者就此作过以下的论述：

> 如果亚克兴角海战的胜者是恺撒的话，他会立刻远征帕提亚。因为帕提亚的问题不及时解决，东方地区不安定的局势会越发地对罗马不利。所以如果是恺撒，他一定希望尽快地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而且会在第一时间，修复罗马帝国在以亚美尼亚为首的各同盟国中的威信。可惜，奥古斯都的性格与恺撒迥然不同。

奥古斯都非常清楚，制伏帕提亚是东方和平的关键。可是，罗马不仅从来没有战胜过帕提亚，甚至还有克拉苏、安东尼两次败北的惨痛教训，绝对不能再有第三次的失败。否则，罗马帝国的东方疆土将彻底地分崩瓦解。因为东方国家，从国王到百姓，从来都是跟着强者走的。

奥古斯都虽然具有总司令的品格，却没有指挥战斗的能力；阿格里帕虽然是勇将，却不是天才型的司令官，军队靠他指挥，未必就能战胜帕提亚。除了和恺撒性格不同，公元前30年的当时，的确还存在着不少令奥古斯都不得不谨慎处理帕提亚问题的实际原因。那个时候的帕提亚，并没有什么威胁罗马行省的举动，结果，奥古斯都在10年之后才开

始处理帕提亚问题。

说到开始，按照奥古斯都的行事风格，他的开始就是作好万全的事前准备。

帕提亚王国也是一个王族之间经常发生权力之争、纠纷不断的国家。国王弗拉特斯四世的年高体衰又成了内斗的一条导火线。国王的弟弟提里达特斯试图篡位，逮捕了王位继承人的王子，将他送去了罗马。提里达特斯相信，憎恨帕提亚的罗马一定会杀了王子。可是，奥古斯都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非常厚待王子。

不久，老国王弗拉特斯四世的近臣成功反击，失败的提里达特斯逃往叙利亚行省，向行省总督求救。罗马方面对提里达特斯也给予了温厚的待遇。这样，在帕提亚问题上，罗马就有了两张牌可以利用

帕提亚方面以老国王的名义，向罗马提出了和谈的建议。他们的条件是要求归还两位人质。大家都清楚，这两位人质如果返回帕提亚，一位是继位，一位是上断头台。

奥古斯都接受了帕提亚提出的条件，作为交换，罗马要求归还因两次战败失去的银鹫旗和1万多名被俘的罗马官兵。帕提亚同样也接受了罗马的条件。

奥古斯都将王子交给了帕提亚派来的和谈特使，但没有交出提里达特斯。奥古斯都拒绝的理由是：出卖一个信任并且投靠罗马的人，有违罗马人的信义精神。

帕提亚王子回到祖国不久，就登上了王位。但不知为何，他没有乘此机会和罗马讲和。按理说，新国王的这种做法，很不给奥古斯都面子，不过，此刻在前往东方、重整帝国疆土的奥古斯都的心中，又有了另一张牌，他要利用亚美尼亚来解决帕提亚。

当时的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尔塔克西亚斯（Artaxes），是被安东尼逼迫退位的前国王的儿子。前国王被逼退的原因是过于亲近帕提亚。罗马两次败给帕提亚的阴影，给亚美尼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国王就算换成了儿子，亚美尼亚的亲帕提亚的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亲帕提亚就意味着反罗马，在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经常受到冷遇，甚至有人遭到杀害。奥古斯都决定把亚美尼亚对策，和处理帕提亚问题并联在一起，希望一次性解决两个国家的问题。

公元前21年，从雅典前往萨摩斯岛的奥古斯都，命令同行的提比略，率领驻守叙利亚行省的四个军团进攻亚美尼亚。一向轻看罗马的亚美尼亚宫廷，被这个突然的举动吓得惊慌失措，他们杀了阿尔塔克西亚斯王，急派使者前往罗马表达效忠之心。

提比略奉奥古斯都之命，让被杀的阿尔塔克西亚斯国王的弟弟提格拉涅斯（Tigranes）继位，在交替了政权、重新确立了同盟国关系之后，撤兵离开亚美尼亚。新任的国王曾经作为人质，在奥古斯都的私宅度过了很长一段“交换留学生”的生涯。

自从奥古斯都亲赴东方，帕提亚国中始终处于警戒状态。特别是北面的亚美尼亚，如今倒戈相向，撤出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只要改道向南，立刻就可以进入帕提亚的境内。在这种形势之下，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五世，不得不将搁置已久的和谈再次放上桌面，全面接受了罗马的条件，缔结了同盟关系。

公元前21年的5月11日，罗马和帕提亚的和平缔约仪式，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舞台味十足的小岛上举行。罗马方面的代表是21岁的提比略，帕提亚方面的代表，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想来应该是身居高位的王室成员。仪式结束之后，提比略和他的随行人员一同参加了帕提亚方面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为他们举行的招待宴会；第二天，罗马方面在幼发拉底河西岸设宴款待帕提亚的代表团，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暂时告一段落。

帕提亚归还了33年前克拉苏败北，以及15年安东尼战败时，夺走的罗马军队的银鹫旗，但是，33年前被俘的士兵没有能够返回罗马，这并非是帕提亚违约，是因为已经没有存活者。作为补偿，帕提亚归还了当初从阵亡的罗马士兵身上摘下、作为战利品保存的盔甲和武器。

公元前54年克拉苏远征时，参战的士兵的平均年龄，假定在32、33岁左右，33年后，都已经超过了60岁。被帕提亚俘虏的士兵没有成为奴隶，而是在帕提亚边境的要塞马雷（Mary）服终身兵役。马雷不在现今的伊朗境内，而是在原苏联的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马雷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在这里服役其实就是流放。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赢得压倒性胜利的汉尼拔，将俘虏的8000多名罗马士兵卖给希腊当奴隶。20年后的公元前196年，希腊为感谢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从希腊撤兵，接受了他的请求：在希腊全境寻找当年被卖身为奴的罗马士兵，送他们返回罗马，结果找到了1200人。

从以上汉尼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把分散在各地难以寻找的不利因素算进去，忍受了20年奴役生涯，能够存活下来的，8000多人中还有1200人。而在帕提亚的所有的俘虏都集中在一地，30年后竟然会没有一位幸存者。如果能找到幸存者带回罗马，哪怕只有一个人，奥古斯都一定会在他的《功业录》中记上一笔。因为他非常希望彰显自己解决了帕提亚问题的功绩。事实上，他在《功业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可见他带罗马士兵返回祖国的愿望没有实现。

如果恺撒没有遭到暗杀，在公元前44年就解决了帕提亚的问题，那么，那些俘虏们的流放生活10年就能结束。10年的话，1万多名士兵或许都能活着返回罗马。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就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问题的解决，作了以下的论述：

阿尔塔克西亚斯国王被杀之后，是可以将亚美尼亚收为罗马的行省的。不过，我遵循了祖先的传统，派遣继子提比略，扶助提格拉涅斯继承了王位。

我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了三次战役中（除了克拉苏和安东尼的败北之外，中间还有一次小型的败仗。——作者注）被夺去的银鹫旗和战利品，还促成了帕提亚主动向罗马人民提出保持友好的请求。

奥古斯都对不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帕提亚问题的事迹作了大肆的宣传。幼发拉底河缔结和平条约的5月12日，成为每年庆祝的节日。奥古斯都命人为他打造了英勇武姿的全身像，胸前的铠甲上雕满了他平息帕提亚的画面。元老院也按照他的意思，决定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恺撒神殿边上，建立一座凯旋门，以纪念帕提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对罗马人民和元老院而言，失去银鹫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到洗雪，他们的喜悦心情完全可以想象。现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对这件事大多都评价是“奥古斯都的外交杰作”。

如果所有的纷争，靠谈判交涉就能解决，那么人类的理性会多么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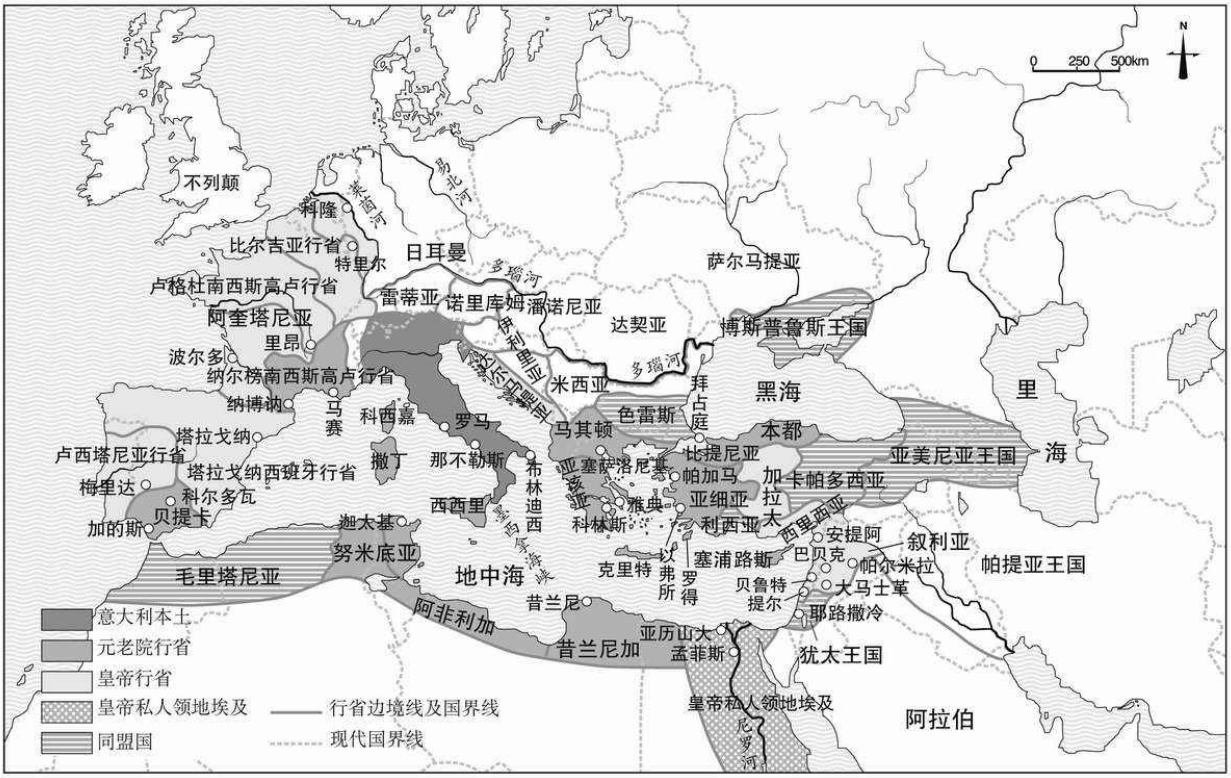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记述的“我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了被夺去的银鹫旗和战利品，还促成了帕提亚主动向罗马人民提出保持友好的请求”这段内容，是写给罗马人民看的。他清楚地知道，人民希望他能洗雪前耻，所以用了非常巧妙的字句，告诉人民国仇已报。真可谓用心良苦。如果不这样写，罗马人民是不肯接受的。

然而，同样的事情，帕提亚方面又会怎么论述呢？虽然没有史料可以引用，我想应该是完全和奥古斯都相反的内容吧。或许会是这样：“罗马放弃了使用武力，选择了通过谈判来改善两国关系，在幼发拉底河上签署了和平条约，帕提亚应罗马的请求，归还了罗马的军旗和

奥古斯都戎装像

战死的罗马官兵们的武器和装备。”如果这是帕提亚的观点的话，想来它的邻国亚美尼亚等国家也抱有类似的看法。

奥古斯都的所作所为，是以主宰西方世界的罗马人的价值观为基准。然而，价值观不是万民共同的。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东方有东方的价值观，犹太人又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多半立足于现实，相反，东方的价值观，容易被权势所左右。这里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而已。



公元前21年罗马全境略图

东方民族并不是因为和亚历山大大帝有着共同的信念，为创建超越人种、民族、语言的理想国家，才会屈膝于他的脚下。他们之所以俯首称臣，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击败了帕提亚前身的波斯王国的皇帝大流士，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

虽然恺撒远征帕提亚的计划因遭暗杀而未能实现，但他的目的并非是要征服帕提亚民族，而是希望通过攻破帕提亚，建立起幼发拉底河防卫线。

奥古斯都以外交的方式解决帕提亚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理性的策略。从他使用的棋子就可以看出，他选择了最现实、危险性最小的方法。必须承认，他这招用得非常巧妙。

不过，帕提亚的问题并没有结束，不仅是帕提亚，就连和亚美尼亚也没有成功地建立起稳固的良好关系。在东方，罗马能够成功地统治的

地方，只限于希腊人管理的地区，因为这两个民族拥有相同的价值观。

只要价值观相同，就比较容易妥协。如果认清了妥协的必要性，那么就不会产生距离等障碍。位于黑海的北端，顿河流域环绕亚速海（Sea of Azov）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虽然王族是波斯人，但是统治阶层的位置被在这里生活了700年以上的希腊人所占据，所以罗马才得以和他们结为同盟。罗马之所以要和这个北端的小国结盟，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罗马如果不能称霸黑海，那么就无法保障黑海以南的小亚细亚行省的安全，特别是小亚细亚北部的锡诺普（Sinop）、特拉布松（Trabzon）等主要城市，等于站在黑海的风口浪尖上。另外，如果没有控制住黑海出海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就断了叙利亚行省和亚细亚行省之间的通路。

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王国，也是个内部纷争不断的东方君主国。经过阿格里帕派遣的小部队的武装调停，奠定了以女王为首的政权基础，局势得到安定。通过和博斯普鲁斯王国结为同盟，罗马成功地在黑海一侧牵制住了亚美尼亚王国。

埃及

在被征服的国家中，罗马能够顺利进行统治的是托勒密王朝（Ptolemies）灭亡之后的埃及。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的“克娄巴特拉”一节中所叙述的那样，只有埃及是属于奥古斯都私人的领地。不过，这只是为了埃及人能够接受所采用的一个形式。事实上，无论是奥古斯都本人，还是当时的罗马人民，都认为埃及是属于罗马国家的。

即便是形式上为个人所有，但毕竟是国家正式的规定。加上罗马人又是一个就事论事的民族，所以，对于奥古斯都任命骑士阶级出身

的“长官”作为埃及的实际管理人一事，元老院的共和派们并没有作出抗议。出于对埃及特殊情况的考虑，元老院成员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不允许进入埃及。对罗马人而言，只要有利于国家管理，即使价值观中有不同的部分，也可以容忍。而埃及长久以来被神化了的法老所统治，在他们看来，与其被一个人民共和体的国家所支配，还不如由已经神格化了的恺撒的儿子、“神之子”奥古斯都来统治，更能减少摩擦。话说回来，“神之子”奥古斯都对埃及的统治政策一点不神化，完全是人类理智的管理。

埃及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的300年间，它的统治阶层始终是当初和征服者一同进入埃及的希腊人。罗马人并没有把这些希腊裔当做被征服的民族打压，反而着眼于他们和罗马人在价值观上的共同之处，有效地加以利用。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埃及经济的活性化。

埃及的整体经济结构，也是农工商并存。商业主要是希腊人主导，他们原本就擅长此道。根据罗马新的关税政策规定，从东方运来的高价物品需要征收25%的税，即使在高税率的情况之下，埃及的商业贸易依然兴盛不衰。因为从这里直接通往罗马帝国这么一个广大的市场，物品的数量有增无减。

由于罗马本土公共建设正处于高潮，因而也带动了埃及的工业。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埃及出口的非洲产的彩色大理石和意大利产的白色大理石同样得到了大量的使用。

不过，埃及的经济基础还是因尼罗河而受惠的农业。从法老时代开始，埃及就以富裕而闻名。这主要在于它有高产量的农业。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君主们也都非常热心于农业的振兴。只不过，一旦王族陷入争权夺利的泥沼之中，就无人再去关注这类基础政策。农业政策需要持续性的执行方能见效，托勒密王朝到了衰败的末期，尼罗河的灌溉工程等荒废殆尽，无人问津。

奥古斯都早在追击安东尼进入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埃及的灌溉系统需要作彻底的改善。10年之后，他手握大权终于可以实施当年的计划。为了水资源达到最有效的利用，按照奥古斯都的命令，埃及开始了水道治理工事。工事初期，动用了驻守埃及的3个军团，总共1.8万人的士兵，但是仅靠这些罗马军人，工程无法达到罗马化的完备和彻底。于是又追加了辅助兵团的9000名埃及士兵，结果人手还是不足，最终只好召集埃及当地的平民共同参与。正如法老时代建造金字塔一样，奥古斯都的水道治理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灌溉工程和金字塔工程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它不是为死人而建，而是为了许许多多活在今世的人；其次，水利工程完成之后，还需要定期的维护，因此始终有劳动力的需求。

奥古斯都在埃及建设的灌溉工程的成效到底如何，地理学的创始人斯特拉波目睹了刚完成的工程后，曾经作过以下的论述：

> 在托勒密王朝末期，尼罗河水位如果不上升到14腕尺（Cubit，约合6.3米），就无法灌溉农田，如果水位只有3.6米高的话，农作物就会歉收。进入罗马时代之后，5.4米的水位就能获得丰收；即使水位只有3.6米高，也不会出现农作物收获不足的现象。

尼罗河上涨的河水，通过水路网络，引入农田，滋润了土地。农作物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阳光，才能茁壮地成长，因此，水路网络不单单是建设，还需要不断地维护和整修。罗马人素有重视公共建设的传统，这也让他们深知维修的重要性。埃及农业的复兴之路，就这样在帝国时代初期已经打好基础。

要振兴农业，单靠硬件的建设是不够的，奥古斯都又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引进了埃及。

埃及原本没有土地私有化的概念，土地理所当然地属于法老和君王。另外，神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农民们是从君王处借地耕作的，因此，埃及所有的农民都是佃农，没有一个自耕农。

降伏了克娄巴特拉，成为了埃及之王的奥古斯都，拥有属于神庙之外的所有埃及的土地。他拿出自己的所有地进行拍卖，推行奖励自耕农的政策。奥古斯都的这个政策，和现代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有些相似。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一来是拥有资金的希腊裔居民，看中的是兴盛的商业和工业，对农业完全没有投资的兴趣；二来则是因为几千年以来未曾拥有土地的埃及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根本无所适从。这要是换成了罗马人，哪怕是借了钱也要赶紧去把土地买下来。这就是两个国家的国民的不同之处。罗马人拥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并且罗马法的基本理念正是保护私有财产，而这些在埃及是不曾有过的。

尽管私有化进程开展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奥古斯都仍然坚持只有耕地私有化，土地才能成为资本的基础。他原本也可以让那些拥有足够资金的元老院议员们购买土地，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奥古斯都不希望在刚成为罗马领地的埃及，出现太多飞扬跋扈的罗马人。罗马人出入于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国际都市，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出现在尼罗河流域的农耕区，就会显得格外刺眼。元老院议员不经奥古斯都的允许，不能进入埃及的规定，正是出于对埃及人观感的考虑。奥古斯都希望，在一段时间内，除了罗马军队和担当税务官等的事务官之外，不要有更多的罗马人进入埃及。

然而，耕地不私有化，就不能期待提高农业的效率。为了宣传和推动政策，需要找一些人来作示范。奥古斯都要求近臣阿格里帕、梅塞纳斯（Maecenas）以及一些不属于元老院的友人购买土地，结果，这些人都成为了埃及的大地主。据说，奥古斯都甚至让他家里的那些解放奴隶也去买地，可见那时的他真是无计可施了。

埃及的农业，通过水利工程、道路网的建设，以及土地私有化制度的逐渐展开，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针对耕地所征收的地租税规定：如果种植小麦，可以全部用小麦来抵扣税金。2000平方米的耕地，根据土地的优劣，征收30到60升的小麦。因为没有确切的小麦收获量，所以无法断定这个税率的高低。无论如何，运往亚历山大港，单是作为税金所缴纳的小麦的数量，就可以保证首都罗马三分之一的小麦供给。土地私有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劳资双方对自己的投资，都有利可图。

除了上述的基础建设和耕地私有化之外，奥古斯都引进埃及的另一个理念是政教分离。

和没有独立的祭司阶级的罗马不同，埃及不仅有独立的祭司阶级，而且他们还以神庙之名，占据了大批的土地。如果他们仅仅是精神上的统治者，可以像高卢的祭司阶级那样，允许保留其独立性。然而，埃及的神职人员，不仅占据了人民的心灵，而且还支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各个神庙可以自己决定地税，还经常干涉国政。他们在拥有威信的同时也掌握着实权，是引发埃及局势不安的主要原因。

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多神教的信仰者，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废除埃及的宗教。但如果宗教影响国家安定的话，就必须纳入控制范围之内。

奥古斯都没收了神庙的土地。由于托勒密王朝历代帝皇们的竞相供奉，神庙拥有庞大的土地。因为没收的土地数量过大，反而导致了土地私有化的奖励政策来不及跟上，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雇农向国家借用土地成为了通常的形式。

罗马的祭司是无薪的“光荣的公职人员”，他们的生活无须受到照顾。而埃及的祭司则属于独立的一个阶层，在没收了土地的情况下，必须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奥古斯都规定，由埃及政府向祭司们发放俸饷，这样更有益于掌控。

除了土地之外，神庙的独立经营权也被取消，全部交由在亚历山大的大祭司管理，所有的祭司必须听命于大祭司。对罗马而言，控制一个人比管理多数人要来得容易。

各个神庙有一年一次向大祭司提交报告的义务，报告内容包括神庙的经济状况以及祭司的人数等详细事项。另外，神庙祭司的人数也受到了限制，如果超过了规定的人数，虽然不会遭受处罚，但不能享有免税的待遇。

由奥古斯都制定、罗马历代统治者持续实施的埃及政教分离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宗教，只是让它脱离于政治。事实上，埃及的宗教非但没有被排除，神庙的修复和建设都成为了罗马皇帝们的工作之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使没有耶稣基督的教诲，罗马人也谙晓其道并予以实践。

返回首都

以上就是公元前23年到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在视察东方期间推行并实施的各项政策及措施。

经由希腊返回罗马的途中，奥古斯都去拜见了人在雅典的诗人维吉尔。维吉尔年长奥古斯都7岁，是受到梅塞纳斯资助的文化人之一。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知己，也是现代“梅塞纳活动”（法语mécénat，指企业赞助文化艺术的活动）的鼻祖。因为梅塞纳斯的关系，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很早就相识，算是旧交。奥古斯都这位罗马皇帝带着患病的诗人维吉尔，离开希腊由海路返回意大利。当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港登陆时，诗人的病情恶化，无法再一同前往罗马。公元前19年9月21日，被称为罗马国民诗人的维吉尔，在布林迪西去世。当时他所撰写的《埃涅阿斯纪》还在修改之中，尚未完成。临终前他嘱咐

友人将诗稿焚毁，幸好被奥古斯都拦阻了下来。同年的10月21日，奥古斯都回到了罗马。他44岁的生日，是在从阿皮亚大道前往首都的途中度过的。

奥古斯都对他阔别三年返回祖国，作了以下的描述：

> 根据元老院的命令，一部分议员以及大法务官和平民护民官随同执政官昆图斯·鲁克雷提乌斯前往坎帕尼亚（中心是那不勒斯）迎接我。在我之前，从未有人接受过这样的荣耀。
>
> 为纪念我的归来，元老院在卡佩纳门（从阿皮亚大道进入首都的大门）附近的荣誉与美德神庙前，建立了一座祭坛，奉献给凯旋将军和一路相助的命运女神。以后每年祭司和维斯太贞女们（Vestalis）都会在这里举行一次献祭仪式，纪念我在昆图斯·鲁克雷提乌斯和马库斯·维尼基乌斯任执政官的这年（公元前19年）归国，并用我的名字将献祭仪式命名为奥古斯塔利亚。

关键的大事从来不作记述的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留下这样的文字，真让人忍俊不禁。话说回来，奥古斯都还真是非常幸运的皇帝，既没有征战，也没有扩大疆土，回国之后还能够受到众多人的欢迎。就在半个世纪之前，罗马还要根据歼敌的数量来决定是否举行凯旋仪式，真可谓是今非昔比。这也体现了由恺撒设想、奥古斯都逐一实现的国家罗马稳定成长的路线，已经开始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奥古斯都东方之行带回的成果，让元老院那些顽固的共和主义者们都不得不表示赞赏。乘此机会，他打算推出一项必定会受到元老院阶级，即国家统治阶级反对的法律。这是让我们了解首都出身，但始终保持地方主义精神的奥古斯都的一个很好的事例。或者说，这个事例显示了一位坚忍不拔的男人对帝国统治的思想。

第二章

奥古斯都统治中期

（前18—前6年，45—57岁）

不知谁说过：“鱼是从头开始腐烂的。”

公元前80年，担任独裁官的苏拉强硬地推行了巩固元老院的政策。出身于罗马名门科尔涅利乌斯一族的苏拉，心狠手辣，如果是反对派，哪怕出身名门贵族，轻者开除公职，重者人头落地。苏拉主张，要巩固罗马的统治阶级，首先元老院的成员必须是健全的共和分子。恺撒虽然是贵族，但他是反对派，所以就不属于健全分子。如果奥古斯都早出生30年，那么像他这种地方出身的骑士阶级，根本不会被苏拉放在眼里。

公元前45年，终身独裁官恺撒实施了强化领导层的政策。同为名门出身，恺撒与苏拉却大不相同。他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不论出生地，不问阶级和民族，在罗马帝国全境内广征人才。他指定地方中产阶级出身的17岁少年做继承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还有一个例子是巴尔布斯，他经恺撒提拔，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于西班牙行省的执政官。

接下来轮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公元前18年的奥古斯都。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罗马“第一公民”，却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同时，作为值得尊敬的人——“奥古斯都”又拥有超越一切的威信。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言，他在不刺激反对派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将权力揽入手中。奥古斯都在完成了对西方以及东方领地的再整编之后，也开始考虑强化“领导班子”的问题。这是一项作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工作。

奥古斯都有幸出生得晚，他有苏拉、恺撒的前车之鉴可以参考。

他既没有杀害反对派，也没有开除他们的公职；但他也没有仿效恺撒，在罗马全境内召集人才。除了北意大利之外，所有行省的人民都被排除在外。奥古斯都的人才策略是强化全体罗马公民权。

奥古斯都不会忘记，恺撒正是因为将元老院的议席分给了行省人，

引起元老院贵族阶级的反对，才招来了杀身之祸。话说回来，奥古斯都倒不是因为怕死就彻底否定了恺撒的开国路线，他还不至于如此懦弱。其实，他并不反对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境的人才征召，不过在此之前，首先需要考虑本土的人民。换言之，优化罗马公民是第一步。他深信，罗马公民应该成为帝国的核心，提高罗马公民的数量和质量，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少子化对策”

在公元前1世纪末期，罗马本土意大利半岛的居民，在人种和民族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居民的结构有所变化。奴隶获得自由的方式日益增多，他们获得解放之后，只要有孩子和最低3万塞斯特斯的资产，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且，恺撒制定的解放奴隶的政策，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他们可以在地方自治体担任公职。

如果上层阶级的人口，能像平民的数量一样增长，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然而，公元前1世纪末的罗马，少子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罗马的上层阶级中，像格拉古（Gracchus）兄弟的母亲科尔涅利娅那样生10个孩子的人比比皆是。就算是恺撒时代，每个家庭平均也有2到3个孩子；可是，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民并不是因为生活贫困、对未来不抱希望才放弃生育。理由恰恰相反，因为除了养育孩子，还有其他舒适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

贵族即使单身，也不会有生活上的障碍。家务有奴隶代劳，日常生活的一切由管家奴隶负责打理。如果是内乱时期，或许需要通过婚姻来

保护、强大自己的势力，战乱终结之后，也就没了这个必要了。再说，就算是靠着丈人的势力当上了行省总督，在奥古斯都的政策下，任期仅仅一年，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享受的权力。做总督谋取利益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

尽管社会不太能够接受未婚的女性，但是，如果是丧夫或者离了婚，恢复单身，社会里依然有她们的容身之地。罗马是一个“家父长权”（相当于家长制）的社会，对已婚妇女而言，来自父亲的约束力，多半大于丈夫，而大多数的父亲都疼惜女儿。和雅典不同，在罗马，已婚女性允许与男性同时出席宴会。

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提出了两项法案的提议。虽然法案遭到了元老院激烈反对，45岁的最高统治者一步也不肯退让，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成功地通过了法案。

这两项法案是：《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

罗马的法律，和街道以及公共建筑一样，有冠以提案者姓氏的传统。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法律，同时也有彰显提案者的意思。奥古斯都成为恺撒养子之后，归属尤里乌斯家族，因此这两项法案称做“尤里乌斯二法”。

我们先谈一下“通奸罪”。按照罗马传统观点，这类事情属于与国家无关的私人问题。如果妻子通奸，丈夫和她离婚便是。若实在是忍无可忍，杀妻泄愤也是一种办法。若是强势的父权家族，父亲可以迫使女儿离婚，如觉得有辱家门，甚至可以处死。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大多是以离婚来解决问题。一些娘家势力比较强大的妻子，可以继续维持她们的婚姻关系。

《尤里乌斯通奸罪法》颁布之后，通奸成为了法定的犯罪行为。如

果妻子通奸，不仅是她的丈夫或者父亲，任何一位市民都有告发她的权力，而且这项法律不仅规定了通奸的妻子和她的情夫有罪，对知情不报，或者说知情后没采取任何措施的丈夫、女方的父亲，将以“协助卖淫”治罪。而《婚外关系罪法》则规定，男子被禁止与妻子以外的女性（不包括女奴和娼妇）发生性关系。

奥古斯都的这个策略，让人联想到先断其粮草、再攻其城池的兵法。他推出的另一项《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可以说正是攻城之法。

《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约束的对象仅限于罗马上、中层阶级，即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也就是说，这是针对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的罗马公民所制定的法律。目的是希望通过奖惩并施的方法，推动正式的婚姻。

根据这项法律，担负着罗马国家的“大脑”、“心脏”、“神经”之功能的精英阶层，男性在25岁到60岁、女性在20岁到50岁之间，如果不结婚，必须承受因独身所带来的不利待遇。没有孩子的寡妇，如果一年之内不再婚，也视做独身。

《婚姻法》中还明确记述了以下两种不予鼓励的婚姻：

第一，法定年龄之外的婚姻。老年男性和年轻女子结婚被视做“不予鼓励”的婚姻，可见这项法律是针对少子化问题。

第二，与不正当职业者的通婚。这应该是出于血统的考虑，罗马帝国未来主人公的母亲总不能是叙利亚舞女或者非洲出身的女招待吧。这类婚姻，虽不被禁止，但不受法律保护，仍当做独身处理。

同样，法定年龄之外的婚姻，只是不予鼓励，并不违反法律，但在税金上非常不利。法律明确规定，如果夫妻的年龄不在法定期限之内，或者配偶中有一方的年龄违规，丈夫死后，妻子无权继承遗产，财产将

被没收充公。

除上述规定之外，法律对女性独身者也作出了征收类似独身税的不利规定。没有孩子的独身女性，50岁之后不再享有任何的继承权。如果拥有5万塞斯特斯以上的资产，50岁之后必须转让给他人，不允许继续持有。没有生育的女性等于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即没有尽到公民的义务，因此也没有资格享受罗马的基本法之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

对独身女性不利的规定不仅如此。相对于一直享有免缴直接税的男性公民，罗马的女性公民，如果财产超过2万塞斯特斯的，即使不到50岁，只要没有结婚，都必须每年向国家缴纳财产收益的1%。

这项针对独身女性的税赋，并不是在女性结婚后就能够立刻免除。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可以先提交恢复免税权的申请，要等生完第三胎，缴纳1%税的义务才算正式解除。

另一方，罗马男性公民如果没有孩子，虽然不用像女性那样，需要缴纳直接税，但在经济上还是会受到一些制裁。男性无论资产多寡，必须在第一个孩子诞生之后，才能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继承者，非法定继承者才有资格继承财产。

现代人一般都是将近亲指定为法定继承人，或许不会觉得这项规定有什么不妥，而在古罗马，通常都会将好友、知己加进财产继承人之列，因此这项法律就涉及了很多人的利益。比如说，罗马法律规定，替人辩护不能收取钱财，西塞罗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的当事人们都指定他作为自己的财产继承人。

《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颁布之后，对独身者和无子嗣者，除了有上述的在社会以及经济上的不利之外，政治前途也有所影响。法律上对有孩子的公职人员，有以下明确的优惠待遇：

一、由公民大会投票选举的公职人员，在得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将按多子女者、有子女者、已婚者、独身者的优先顺序当选。

二、由奥古斯都实际操控的元老院议员的人选，如果候选人的资格、能力在同等水平，也按以上的顺序决定。

三、元老院决定的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人选，同样遵守上述的条件。

四、属于“光荣的公职人员”，在任期届满、出任下一个公职之前，必须要有一段休职期。《婚姻法》则规定，有一个孩子，休职期可以缩短一年。这意味着孩子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尽早地获得要职。

奥古斯都在厚待多子的父亲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多产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允许脱离娘家“家父长权”的束缚，不仅可以自由地指定财产继承人，也可以接受任何人的馈赠，等于在经济上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在男性社会的希腊——罗马社会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改革。

奥古斯都针对解放奴隶，也实施了多子化的奖励政策。有正式婚姻并且有一个以上孩子的解放奴隶，可以和其原主人脱离雇佣关系。无论是主人的善心还是靠自己赚钱买来的自由，解放奴隶获得身份之后，通常还是会为原主人工作，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长期的束缚关系。根据奥古斯都的法令，只要是多子的父亲，即便原来是奴隶，也可以独立创业、设立公司，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在促成人民结婚、生子的事情上煞费苦心的奥古斯都，自然不会放任离婚一事。对离婚者的处理，和独身一样，虽然法律上不禁止，但出台的各类规定使离婚变得非常困难。

首先，原本不需要禀报的离婚，改为有公开申报的义务。而且，申报时必须要有7位罗马公民做证人才得以受理。如果违反规定，将处以罚金。其次，过去离婚，只需要当事人夫妻双方以及妻子的父亲认可就

可以解决。而新法律则规定，离婚必须经过以元老院议员为首的委员会裁定。这个委员会的功能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民事裁判庭。奥古斯都利用了人们“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让家庭问题公开化以达到降低离婚率的目的，不得不说他用了一条妙计。

奥古斯都认为，只有保护和培养健全的家庭，才能有健全的国家。他对婚外情也采取了重罚的措施。根据《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如果是有夫之妇发生婚外情，三分之一财产将被没收，当事人将被终生流放，并且不得再与自由民出身的罗马公民结婚。

如果有婚外情的是丈夫一方，又怎样处置呢？事实上好像是不追究责任的。但是如果对方是有夫之妇的话，就等于陷爱人于不义。作为肇事者，他应该无法摆脱羞耻感和罪恶感。话说回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妻子出轨比丈夫出轨更容易造成家庭的破裂，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对丈夫的出轨也不是放任自流。罗马的娼妇有向政府注册登记的义务，按察官掌握着所有娼妇的名册，并且每年都作修订。如果丈夫出轨的对象的名字不在名册上，就意味着她是娼妇以外的女性，那么男人将会以“强奸罪”治罪，原本拈花惹草的风流事就变成了生命攸关的大事。这要是让偷情老手的恺撒知道，他一定会在天堂捧腹大笑吧。

热心于“伦理政策”的奥古斯都，他自己就没有把柄被人抓到吗？我们来看一封安东尼写给他的信，那时候奥古斯都35岁左右。

> 你凭什么这样指责我？就因为我和女王（克娄巴特拉）上床吗？我现在可是和妻子同床共寝。这可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睡在一起已经9年。那么你呢？枕边人难道只有莉薇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就是（罗马）唯一一位过着健全生活的人。当你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身边躺着的是哪一位？图尔朵拉？还是特莉缇娅？不然就是鲁菲娅，也可能是莎维娅·提提塞尼亚？这名单太长了，

恕我无法一一列举。因为只要是个女人，都能燃烧起你的热情。

45岁的奥古斯都是否纠正了他的女性关系，我们姑且不提。《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实施的时间，决定在法律通过的三年之后开始。与其说是这两项法律不受欢迎，不如说是给人们一个清理身边问题的准备时间。不过，法律正式启用，实际上又往后延续了三年，可见这项法律的确不得人心。就拿生孩子来说，这可不是想生就一定能生的事情。像奥古斯都本人，再怎么翘首以待，妻子莉薇娅也没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

这两项法律在27年后的公元9年作出了修正，修正案名为《帕尔乌斯——波配乌斯法》。提案者的帕尔乌斯和波配乌斯是当时的执政官，碰巧两位都是独身，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奥古斯都原本可以使用他的护民官特权否定修正案，不过他没有那样做，想来他也承认法律有修改的必要。

因为《帕尔乌斯——波配乌斯法》是修正案，所以从它的修改内容中，可以看出之前“尤里乌斯二法”的不妥之处。修正条款有以下三项：

一、《尤里乌斯法》规定，没有孩子的夫妻，男女双方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没有继承配偶财产的权利。《帕尔乌斯——波配乌斯法》则以后天血缘为理由，承认了继承权。不过继承的金额比有孩子的情况下减半。

二、《尤里乌斯法》规定，独身女性不享有赠与遗产以及被赠与的权利。《帕尔乌斯——波配乌斯法》则作了只要再婚就能立刻恢复权利的改定。

三、《尤里乌斯法》规定，一年内不再婚的寡妇形同独身，将承受不利的待遇。即便是再婚有了孩子，也不能立刻免除缴纳财产1%的直接税，必须要等生下第三个孩子才予以终止。《帕尔乌斯——波配乌斯

法》则改定为，寡妇只要再婚，就可以恢复继承权，1%的税在生下第一胎之后即可免除。

《尤里乌斯法》颁布之后，曾经遭到激进的女性分子的反对。那个场面想来应该是蛮有趣的。不过奥古斯都意志坚定，甚至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竭尽全力要启蒙人民。

《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刚通过不久，一位老年公民受到奥古斯都的邀请来到首都罗马。受到邀请的除了老人本人，还有他的8个儿子和35个孙子以及18个曾孙。皇帝陛下像迎接凯旋将军般，欢迎这位平民和他的子子孙孙。奥古斯都亲自带领他们到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参拜，赞扬老人是罗马人民的典范。

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并非摈弃了恺撒倡导的不问人种、民族、阶级，人才尽用的路线，而是将恺撒的开放思想和优先充实罗马公民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两种路线取长补短，逐渐成为了罗马帝国人才选用的基本理念。

公元前18年颁布的“尤里乌斯二法”，受到了历代罗马皇帝们的重视。奥古斯都之后的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以及西班牙出生的哈德良，甚至是北非出生的塞维鲁，都将此法案作为为帝国统治的基本政策。直到基督教胜利之后，独身才被提升为最高的价值。

从尊重个人权利、接受过启蒙主义思想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奥古斯都的这二法应该是很不适宜的。有趣的是事实正好相反。作出正面评价的研究者都来自先进国家，或许他们对少子化问题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我个人觉得，依靠减税和家庭补贴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我对二法又有种莫名的认可。生孩子的动机无论是出于税金上的考虑还是为了仕途，生下来的孩子总是可爱的，结婚亦是如此。如果不结婚就要面临不平的待遇，或许找对象时，就会改变那种挑三拣四的

傲慢的态度。进步主义者认为向上帝宣誓过的婚姻不得解除的基督教的戒律是一条恶法，我倒不这么看。如果对神灵有所敬畏，那么在考虑离婚时，应该要比百无禁忌的人更加小心谨慎、深思熟虑，或许在思考期间会发现不离婚也能解决问题的途径。

对于离婚，基督教思想认为因为行为违背了上帝，必须禁止。而罗马人则是虽不禁止，但必须甘受不平等待遇。这里的不同之处很有意思。所谓的“法制精神”其实就是寻求一种平衡。接下来我要论述的奥古斯都推行的政策，正体现了他优秀的平衡感。

所谓的平衡感，就是在相互矛盾的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中间点。为找到最适合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有时也会偏向某一端，保持平衡就是一种始终在移动中的行为。

自由和秩序是两个矛盾的概念。过分尊重自由就会破坏秩序，过分强调秩序又会失去自由。然而，这两个思想又必须共存共立。没有自由，社会不会进步；少了秩序，不仅没有进步，甚至会危及生命。

这种思考方式和狂热的信仰无关。对发明了哲学的希腊人以及发明了法律的罗马人而言，这是一种极其平常、自然的观念。罗马人作为法律的创始者，曾留下这样的格言：法律因期待公平而立，但过分使用会导致不公的出现。

不少研究者认为，与革新派的恺撒相比，奥古斯都的思想比较保守。这是对照二人立下的功业而言，用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作出结论。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就算恺撒没遭到暗杀，平安无事地活下来，他的那些政策也是行不通的。”

我接下来要论述的奥古斯都倡导的罗马的宗教复古路线，或许正是揭示他保守性的一个好范例。不过，当年37岁，尚未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之前，想要参选与政治无缘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的人，却是被大家认做改革派的恺撒。

宗教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7年复古宗教路线时，还不是大祭司。恺撒死后继承其位的雷必达还健在，而大祭司又是罗马唯一的终身公职。“后三头同盟”之一的雷必达，虽然不像另外“一头”的安东尼输得那么惨烈，终究也是在权力斗争中输给了奥古斯都，自动引退后的雷必达几乎连首都都很少光顾。雷必达死于公元前12年，同年，奥古斯都竞选成功，接任了罗马大祭司。

尽管公元前17年的奥古斯都还不是大祭司，但他掌握着管理宗教的大权。他是祭司的一员，又是“伦理改革”的负责人。在他的《功业录》中有一段相关的记叙：

> 在马库斯·维尼基乌斯和昆图斯·鲁克雷提乌斯任执政官的年间（公元前19年）以及普布利乌斯·兰图卢斯和格奈乌斯·兰图卢斯任执政官的年间（公元前18年），还有帕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和昆图斯·图贝罗努斯任执政官时（公元前11年），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一致推选我为唯一拥有最高权限的伦理改革负责人。

百年一度举行的“百年节”（Secular Games）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仪式。但是仪式的日期不定，意义也不明。奥古斯都将这个传统定期化并且赋予了实质的意义。他首先是把仪式程序化，并将程序刻在大理石板上嵌入罗马广场的墙上，昭示天下。参祭者没有限制，不是罗马人也允许自由参加。“百年节”定在5月31日开始，总共三天三夜。

祭礼的几天之前，国家开始接受一般市民的捐赠，捐赠物品大多是

祭祀所需的小麦、大麦和蚕豆。同时，国家向每个家庭发硫黄和焦油。因为在参加祭祀之前，参祭者需要用硫黄和焦油燃烧出的烟雾来净身，这种净身方式可真够刺激的。

5月31日日落之后，祭奠正式开始。主会场是塔仁杜姆，它位于马尔斯广场靠近台伯河一带。

祭祀主办者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两人，身着祭司服装，率领着15名祭司进入会场。所谓的祭司服，也没有什么讲究，不过是用平时穿的托加的一角盖住头部而已。佛教和尚穿的法衣或者是基督教神甫做弥撒时的服装，都非常华丽和特别。这些宗教具有独立性，神职人员的服装也是彰显他们特殊地位的一种表现。而罗马的祭司只是公职的一种，按照法律，罗马公民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竞选祭司的职位，所以着装上也就没什么讲究。

我们说回祭祀。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身着白色的托加，在火炬的照耀下，将9只绵羊和9只山羊放上祭坛，献给命运女神。在宰杀、烧烤祭品的同时，大家吟诵祷文，祈求命运女神赐予罗马人民健康和智慧，保证罗马胜利、独立和永久和平。

献祭仪式结束后，希腊、罗马特有的体育竞技比赛正式开始。竞技目的不在于比出胜负，而是献给天神，所以比赛在架高的舞台上进行。奥古斯都以下的全体人员，按照自古以来的传统，站立着观赏比赛。

只允许男性参加的祭祀以及比赛结束之后，轮到女性登场。110位已婚妇女将在祭祀当日、太阳未落山前烹饪供品，奉献给朱诺和戴安娜女神。这个仪式称为“神圣的晚餐”，祭礼之后，参加者可以共同享有供品。

6月1日的上午，祭祀的中心转移到卡匹托尔山。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依然是托加包头的姿态，带着15名祭司，出现在众多的参拜者面前。

他们二人手里各牵着一头雄牛，这天是祭拜天神朱庇特，所以献祭动物是雄牛。

献祭仪式和前夜一样，祭坛上的雄牛被宰杀和烧烤时，人们向朱庇特天神祈祷，请求天神保佑罗马人民和罗马国家。同一个时间，体育比赛在马尔斯广场的塔仁杜姆继续进行。

6月1日晚。日落之后，祭祀的舞台重新回到马尔斯广场。这一晚的仪式是奉献给多产女神，所以，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都不出席。献给女神的祭品分别是用小麦、大麦和蚕豆三种材料制成的面包，总共27个。这种面包类似于比萨饼的饼坯，意大利人叫它佛卡夏（Focaccia）。仪式的程序和前一日相同，在奉献供品时祈祷祝福。

6月2日的上午，卡匹托尔山再一次变为主会场。这天，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各牵着一头母牛，献给天神朱庇特的妻子朱诺女神。因为是祭奉女神，所以允许女性参加。110位已婚妇女加入了祈祷的人群。妇女们背对着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两位主办人，跪地祈祷，而此刻，马尔斯广场的体育竞技也进入了第三天。

日落之后，祭祀的队伍回到台伯河沿岸的塔仁杜姆，仪式还是由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主持，二人也没有改换祭司服。当晚祭祀的对象是掌管妊娠的大地女神，祭品换成了母猪。同样因为是女神的献祭，所以和白天一样，110位已婚妇女参加了献祭仪式。仪式结束后，烤猪分给参加者们享用。

祭祀的最后一天，6月3日的早晨，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主持的献祭仪式在帕拉蒂尼山上的阿波罗神殿举行。三种材料做成的27个面包作为祭品，献给男神阿波罗和女神戴安娜。祭祀并没有就此结束，献祭仪式之后，大家回到卡匹托尔山，开始了“百年节”的压轴戏。

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仍然穿着白色的托加，跟随在后的是一群身穿

纯白短袍、头戴花冠的少男少女。少年组总共54人，男女各半。这一次既不牺牲动物，也不供奉任何其他的祭品。在参祭者的注视下，少男少女们合唱《百年节赞歌》，歌词是奥古斯都委托诗人贺拉斯（Flaccus）所作，诗歌流传至今。我很愿意译出全文，可是诗歌有300多页之长，这里就容我省略了。歌词的主题就是祝福罗马永恒美丽和健全。我觉得祭礼的场景里，如果再加上一群飞向天空的白鸽，就是奥林匹克的开幕式了。

言归正传，“百年节”的最后一夜，台伯河上晚风徐徐吹来，天空中飘浮着一层青蓝色的雾霭，炎炎圣火照亮了罗马之城。我想，此刻，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沉醉在璀璨、神圣的气氛里。接着，黑夜过去，天空渐渐泛白，在初夏清朗的晨光下，白色大理石的神殿和白色的托加融为一体，人们庄严地向诸神祈祷；头戴花冠、身着纯白短袍的少男少女们齐声合唱。淳朴、健美、壮丽的祭祀仪式代表着罗马人的理想，那一刻，罗马人的心中必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百年节”这种典型的祭祀活动毕竟是由国家主办，奥古斯都认为更重要的是再次提升民间的信仰。

罗马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供奉家族保护神和祖先灵位的地方。这一点同日本人的家里灵位牌和佛坛放在一起有些相似。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享有“家庭信仰”的条件。尤其是像罗马这样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狭窄的楼房里根本没有供奉神灵的空间。何况，孑然一身来到首都、租屋而居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多。为这些人找到精神寄托，是奥古斯都推行民间信仰改革运动的出发点。

都市内的道路网罗密布，产生了很多十字路口和交叉点。奥古斯都下令在每个交叉路口，根据地况，建造相应规模的寺庙和祭坛，供奉“当地守护神”和“奥古斯都之灵”。寺庙和祭坛的管理由当地的行政人员（像日本在区役所工作的地方公务员）负责。这样，那些非罗马本地出生的外来者或者奴隶也都有了信仰的对象。

现代人对宗教认识几乎都是一神教。对于古罗马人祭拜“当地守护神”或许能够理解，但对祭拜还健在的“奥古斯都之灵”，可能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对除了犹太人之外，都是多神教信仰者的古人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灵”不单指死者的灵魂，还有守护神的含义，同时还包括了能力、资质、精神、真髓的意思。所以，人们祭拜“奥古斯都之灵”，也是希望能拥有像他那般的天赋。这是一份与祭拜对象的生死没有关系的感情，因此，祭拜的对象无论是在世还是死去，都无关紧要。

起源于拉丁文的意大利语里的“电影明星”，男性叫“迪瓦”（divo），女性叫“迪娃”（diva），是神的意思，词意和电影明星的“星”倒也不是毫无关联，因为古代罗马人相信，拥有神般天分的人死后都会变成星星。

不用等研究者们站出来指责，奥古斯都本人也极度厌恶活人神格化。不过，正是这个对“奥古斯都之灵”的信仰，开启了之后对皇帝崇拜的风潮。我再次强调，古罗马人的信仰在一神教者的规范思想内，是无法想象的。不过，请大家想一下日本供奉的各路神灵，从天照大御神到明治神宫，还有供奉狐狸的稻荷神社，或许就能对古罗马人的宗教信仰有所理解。

之后取代了罗马多神教的一神教基督教，虽然不像古罗马人那样见神就拜，但也继承了在交叉路口设立教堂的形式。教徒们从教堂前走过，大多都会稍作停留，对着耶稣基督或者圣母马利亚，在胸前划十字。所以说，展示宗教心是人类特有的行为，与信仰一神教还是多神教完全没有关系。

话说回来，被人崇拜和赞美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健全和美丽的罗马”也不像少男少女唱的赞美诗那样会直到永远，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所幸，即将47岁的奥古斯都被人敬仰的“特质”中，最好的一项就是清醒

的现实感。

阿尔卑斯

从阿尔卑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去高卢，主要的路径有以下四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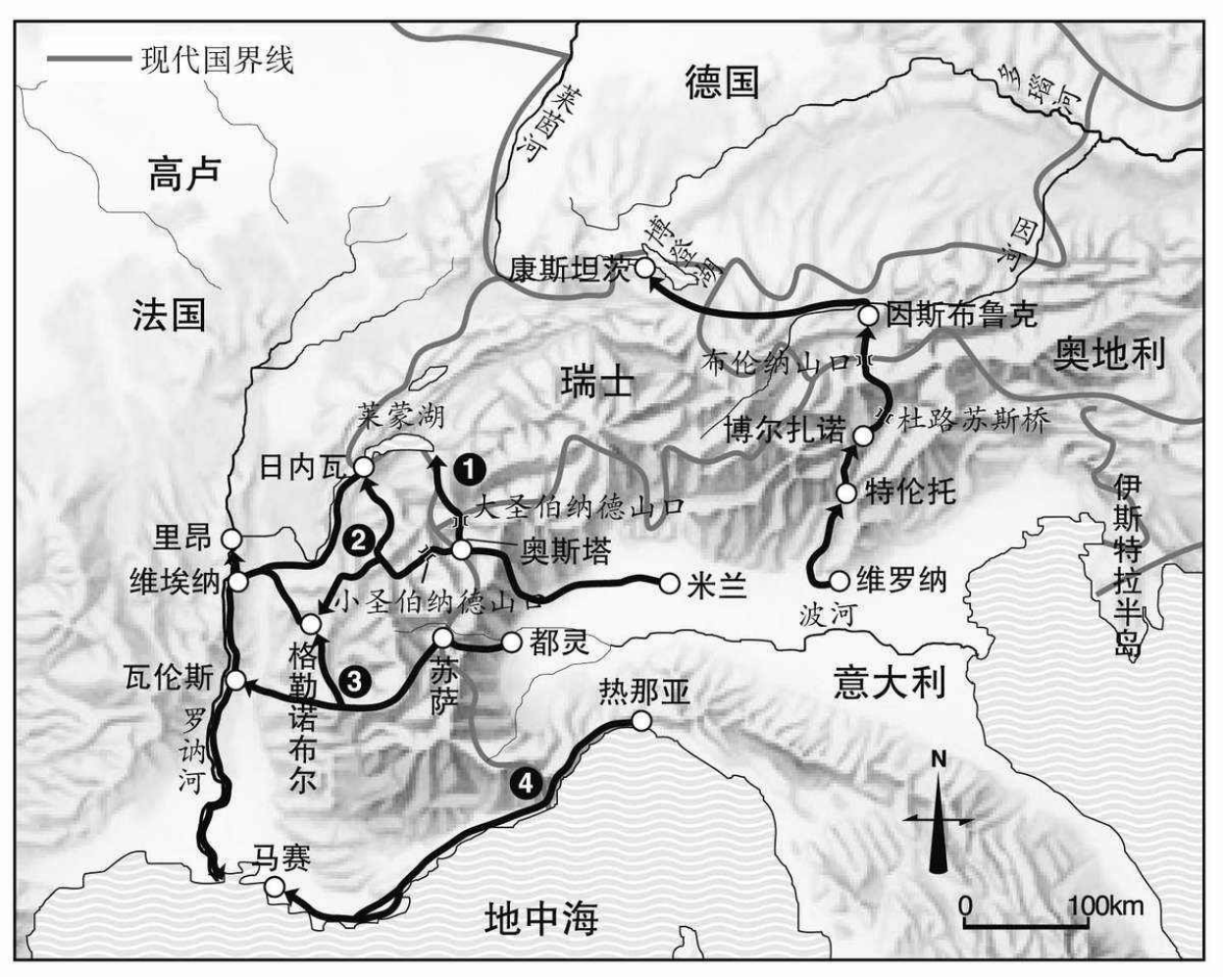
第一，从奥斯塔（Aosta）往北，到达阿尔卑斯山，翻过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t.Bernard Pass），抵达现在瑞士的莱蒙湖（Leman）。

第二，从奥斯塔往西行进，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小圣伯纳德山口（Petit Saint Bernard），经由日内瓦或格勒诺布尔（Grenoble），抵达现在法国的里昂。

第三，从都灵（Torino）向西，攀过苏萨（Susa）山谷的山道，到达阿尔卑斯山。翻过山之后就进入了现在的法国境内。由此往北，经由维埃纳（Vienne）抵达里昂。如果向南的话，经过瓦伦斯（Valence），沿着罗讷河顺流而下，便可到达地中海的出口。这条路径，罗马人根据当地部落的部族名，称之为“柯提亚阿尔卑斯行省”（Alpes Cottiae）。

第四，从热那亚（Genova）沿着地中海行进至马赛，罗马人称这条路径为“海边的阿尔卑斯”。这条道路因为通往南法和西班牙行省，所以道路的整修早于其他几条线路。由此可见，罗马式的道路，早在150年之前就已经建成。

公元前16年的当时，罗马已经有了以上四条可通行的路线，奥古斯都不必再亲自出马打理。不过，四条路线中的第三条柯提亚阿尔卑斯行省处于独立的部落族长的势力范围之下。这里的高山族部落族长，当年从恺撒那里得到了罗马公民权和尤里乌斯的家族名，与罗马结成了同盟关系。因此，自称为王的族长，有一个意大利式的名字：马库斯·尤里乌斯·柯提斯。



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主要四条路径，以及公元前16—前15年杜路苏斯军团的行军路线

由于和罗马的同盟关系，柯提斯在阿尔卑斯山一带的高山部落群中势力强大。虽然联结意大利和高卢的四条线路不全是由他支配，但他的影响力实际上涉及了整个地区。奥古斯都任命尤里乌斯·柯提斯为阿尔卑斯地区的“长官”，将他放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合并。就此，经由阿尔卑斯山的线路全部归属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的手段比恺撒更胜一筹。

既然柯提亚阿尔卑斯行省成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范畴，奥古斯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修建罗马式的道路，即建设高速公路。顺便提一下，从意大利翻过阿尔卑斯山去高卢，走第三条路径的话，从都灵到瓦伦斯的距

离是365公里，徒步需要10天的时间。

从整顿阿尔卑斯路线的问题上可以看出，看似着重于国内治理的奥古斯都，其实有着超越国境的眼光，整顿了西方，也绝不会忘了东方。而每一次整顿的好机会，总是敌人带来的。

正好是这个时候，驻扎伊利里亚行省的罗马军团受到了原本是同盟的北方部落的袭击。于是，阿格里帕率兵向北挺进。

多瑙河

卢比孔河以北的北意大利地区，因为得到了恺撒授予的罗马公民权，所以拥有和罗马本土相等的地位。由西向东蜿蜒的阿尔卑斯山脉是这个地区的防卫线。按照现代地理的划分，应该是法国·阿尔卑斯、瑞士·阿尔卑斯、奥地利·阿尔卑斯的三国边境交界处，同在斯洛伐克的边境隔着一条山脉。

高山峻岭作为防卫线，看似理想，实际却是事与愿违。因为腹背受敌的情形，通常会给人带来比实际状况严重的恐惧感，所以防御基地只好建在高山的前方。但是，无论基地再怎么高大、坚固，其功效还是会受到地形的限制。何况，由高往下攻击的力，总是胜过在低处抵抗，那么把基地建在山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作为监视点，山顶的确是最好的位置，但是要抵御外敌的攻击，就根本不行了。因为有气候等各种不利的因素，无法驻扎大规模的防御部队。

恺撒是罗马第一个发现高山防卫线弊端的人。他征服高卢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国家的防卫线，从阿尔卑斯山脉转移到莱茵河。防卫线以河川取代山脉，成为了恺撒之后罗马国家的军事战略。防卫线设在河边，比较容易看见对岸，有助于了解敌情。战争中，最忌讳的就是暴露军队，看不见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岸

边可以驻扎大部队。

在罗马的河岸防卫线的版图上，恺撒已经建立了莱茵河线；奥古斯都用外交的方式确立幼发拉底河沿线至黑海沿线，南面是罗马行省，东面有坚固的同盟国，与北面的博斯普鲁斯王国也签订了同盟协议，至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目标已达成了一半，剩下的只有多瑙河了。当年恺撒远征帕提亚的归途中，企图控制多瑙河南岸未果，把问题留了下来。这个地区如果按照现今欧洲的版图划分，从西到东分别是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现塞尔维亚），直到保加利亚境内。这是一片辽阔的疆土，所以不是轻易就能征服的。然而，如果不解决了这个地区的问题，包括黑海西岸在内的罗马帝国东北部的防卫线就难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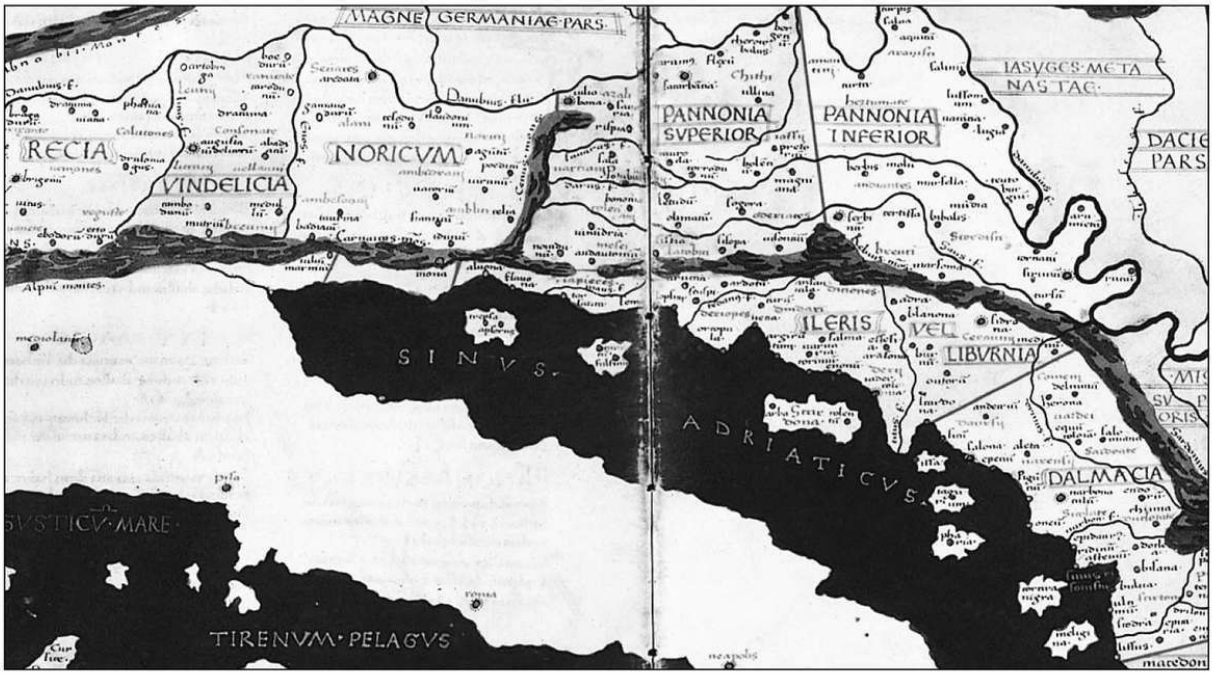
任何事情想要做得圆满，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掌握正确的情报。恺撒时代，已经有了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的地图，街道、桥梁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罗马人的视野不仅仅是本土，他们还制作了从非洲到英国以至印度的地图，据说这种地图最早是在阿格里帕主持下制作的。

阿格里帕将大地图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板镶嵌在由他兴建的诸多公共建筑中的某一处的墙上，任何人都有机会浏览。当然，奥古斯都也有他自己专用的地图，据说地图有两种：一种是根据不同地区，用彩色的大理石镶嵌在墙上的地图；一种是画在纸莎草纸上的地图。

这些地图没有留存下来，它们的精确性无从考察，估计可以接近公元2世纪时居住在埃及的希腊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制作的世界地图的水平。当年恺撒下令制作的意大利本土的地图也是出自希腊人之手。尽管都追求地图的精确性，然而希腊人纯粹是因为求知欲，而罗马人则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多瑙河迟早会引起奥古斯都的注意。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曾说过：“除非敌人攻击，我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阿尔卑斯东北部的高山部落袭击驻守伊利里亚行

省的罗马军团，对奥古斯都而言，正是解决多瑙河问题的大好时机。向北方挺进的罗马军团，轻松地击退了高山民族，乘势展开大规模的扩张行动。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多瑙河以南）

公元前16年进行的大规模的北方军事行动，由阿格里帕担任总指挥，26岁的提比略和他22岁的弟弟杜路苏斯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奥古斯都和莉薇娅结婚时，提比略3岁，杜路苏斯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如今两人都已经成长为年轻的将军。两兄弟都有过在西班牙与高山民族作战的经验，这次的敌人是居住在现今蒂罗尔（Tyrol）一带的雷蒂亚（Raetia）族群。

根据阿格里帕的战略，杜路苏斯率军从维罗纳（Verona）北上，提比略的部队则渡过莱茵河向东南进攻。两支队伍在现今的博登湖附近的康斯坦茨（Konstanz）会合，从那里再向南发起进攻。这样，从现在的瑞士全境到南奥地利·阿尔卑斯的地带，就像网中之鱼，牢牢地掌控在罗马军团的手里。

从维罗纳的前线军营出发的杜路苏斯部队，在当年的秋天就征服了塔兰托（Trento）一带，在当地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之后，杜路苏斯率军继续向北，抵达博尔扎诺（Bolzano），在那里迎来了冬天。这一带已经是奥地利·阿尔卑斯的山里。

20岁刚出头的年轻将军，并没有带着他的部队返回温暖的维罗纳过冬。罗马军队真正的强大之处，并不是在刀光剑影、短兵相接之时，而是严格地遵守战略计划，事前准备做到尽善尽美。在公元前16年的冬天到公元前15年入春之前的休战期间，罗马军队的全体士兵担当起了工兵的职责，在各个要塞深挖战壕，高固城堡，修筑联结各个要塞的道路、桥梁，为赶上开春后北征的计划，即使是大雪纷飞作业也不中断。原本只通到维罗纳的道路，即当时的高速公路，因此延伸到了塔兰托。

第二年，公元前15年的春天，北征行动再度展开。杜路苏斯的军队一面架设杜路苏斯桥一面往北进军。军队越过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抵达因斯布鲁克。之后，沿着因河（Inn）继续征战，行军路线逐渐远离阿尔卑斯山区，改道西行向康斯坦茨前进。

另一边，从高卢渡过莱茵河向东南进攻的提比略的军队，战事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夏天来临之际，兄弟俩终于会合在博登湖畔。康斯坦茨距离多瑙河50公里左右，从那里向南挺进的罗马军队可谓是一马平川，没有哪个部落胆敢站出来挑衅。罗马从公元前16年到公元前15年，大约两年的时间，建立起了意大利本土北方的安全保卫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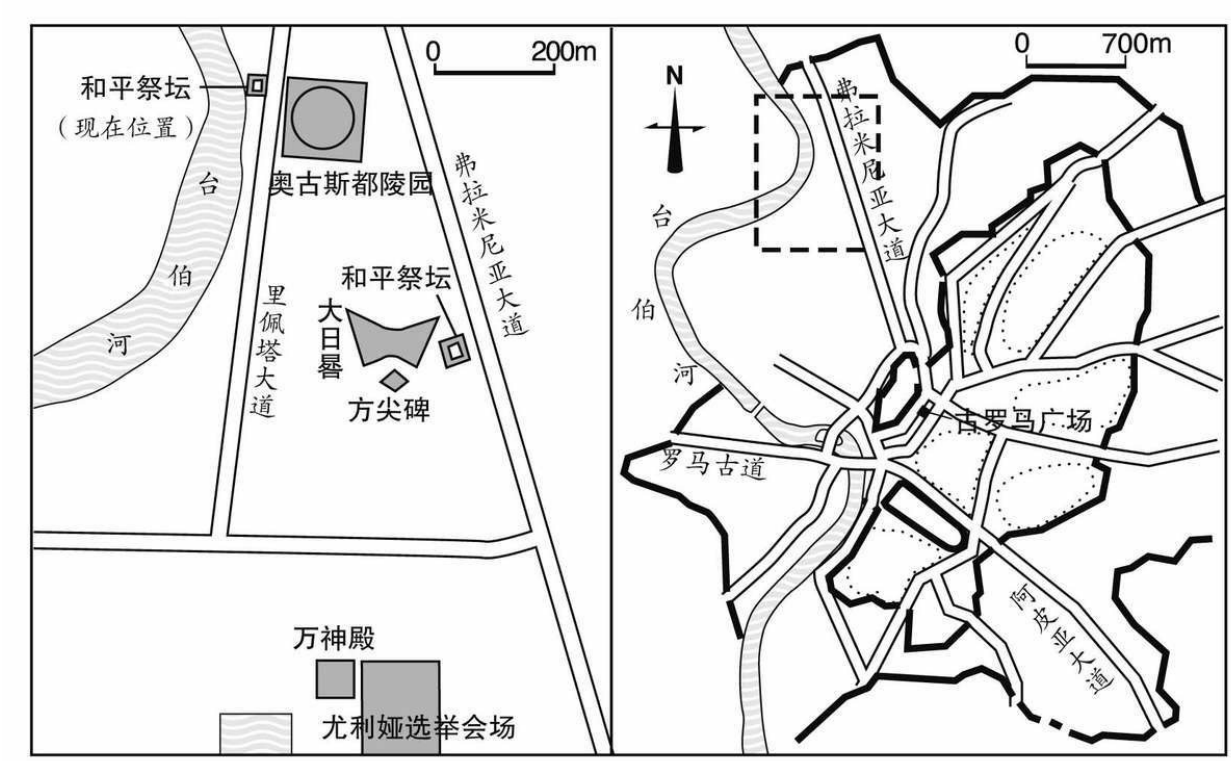
首都的人民很清楚这件事情对于罗马的重要意义。或许，阿格里帕制作的大地图，对于提高一般市民的地理知识起到了作用。诗人贺拉斯非常激动，专门写了诗歌颂扬两位年轻将军的壮举，称赞他们不愧是荣耀的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名门之后。

和平祭坛

希腊人喜欢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建造圣所，而罗马人则认为在人来人往热闹的地方建圣所更好。公元前13年，为迎接重整西方归来的奥古斯都，元老院决定建立的祭坛，就位于从罗马前往北方的主干道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台伯河方向的途中。祭坛的正式名字叫“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通称“和平祭坛”，以纪念奥古斯都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象征罗马人民祈求永远和平的心愿。

当初建造和平祭坛的计划，不知是出自元老院由衷的愿望，还是滞留在高卢和西班牙两年以上、致力于稳定罗马帝国统治的奥古斯都，用他特有的“斡旋”方式，暗地指使。不过，谁是始作俑者无关紧要，因为祭坛是为纪念和平而建，而希望永远和平又是从元老院到全体罗马人的心愿，用现在的话讲，是国民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建造祭坛虽然是由元老院批准，可如何建造还得听从奥古斯都的意见。从公元前13年开始到公元前9年1月完工的和平祭坛，无论从它的名字，还是整体白色大理石的简约设计以及雕刻在祭坛上的那些浮雕的意象，都比奥古斯都兴建的其他公共建筑，更能体现他健全、踏实的人格。



和平祭坛位置图

祭坛正面对着利用方尖碑（Oblisk）为指针的大日晷。大日晷由奥古斯都所建，矗立在现在的国会广场。祭坛的规模为12米× 11米，基本上呈正方形，在古罗马的建筑中，属于小型建筑。祭坛的正后方通向弗拉米尼亚大道之处，也有一个出入口。祭坛没有天花板，呈开放型，构造上也没有居高临下的、睥睨一切的气势。登上石阶，首先到达围绕祭坛四周的圆柱回廊，里面是高度不足5米的开放型祭坛。这里无论是对来大日晷看时间的人，还是经过弗拉米尼亚大道的旅人，都是一个稍作歇息的好地方。从边上穿过并列的石柱，坐在回廊前，出现在眼前的就是奥古斯都和他的家族以及元老院的议员们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祈祷的浮雕。

如果这些浮雕刻板、无趣，人们一定会转移视线。所幸，它们雕刻得多姿多彩，特别是那些儿童群像，让人看了不禁微笑，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既肃穆又充满人情味的祈愿和平的祭祀场景。

除了设立在中央、通往正殿的入口及其反方向的出口之外，祭坛的四周都有浮雕装饰。

浮雕分为两段，下段统一雕刻了小鸟、小虫散落在莨苕叶子上的模样。农牧民族的罗马人喜爱用大自然的景象点缀城市。鸟类图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天鹅，天鹅和阿波罗神的渊源深远，而阿波罗神又是奥古斯都的守护神。

上段雕刻的则是诸神和人的群像。进入祭坛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右边的壁画。壁画上逃出一片火海的特洛伊城、经过持续不断的亡命旅程、最终登陆意大利的埃涅阿斯，在罗马传统的家神珀那忒斯（Penates）神面前发誓："这里将是我的终焉之地。"特洛伊人和美神维纳斯所生的埃涅阿斯因为是希腊人，所以雕像上的他是下巴蓄须的希腊人的容貌。罗马人正好相反，没有蓄须的习惯，因此两位代表珀那忒斯神的年轻男神就没有胡子。

在埃涅阿斯和珀那忒斯神之间，还有埃涅阿斯儿子的雕像，但如今浮雕已经破损，模糊不清。这个人才是尤里乌斯一族的创始人，雕像正是为了彰显身为恺撒养子的奥古斯都的尊贵、正统和拥有悠久历史的出身。

祭坛左则壁画的浮雕，除了小部分之外，都已不知去向。根据残留部分而复原的壁画看，浮雕呈现的场景是：给幼小的罗穆路斯和瑞摩斯喂奶的母狼和发现了这两兄弟并抚养他们长大的羊倌，以及看见孩子被羊倌收留而感到安心的两兄弟的父亲马尔斯天神。

埃涅阿斯以及罗穆路斯、瑞摩斯和狼的故事，是有关罗马建国的各种传说中最著名的一则，它绝对有资格雕刻在祭坛正面的左右两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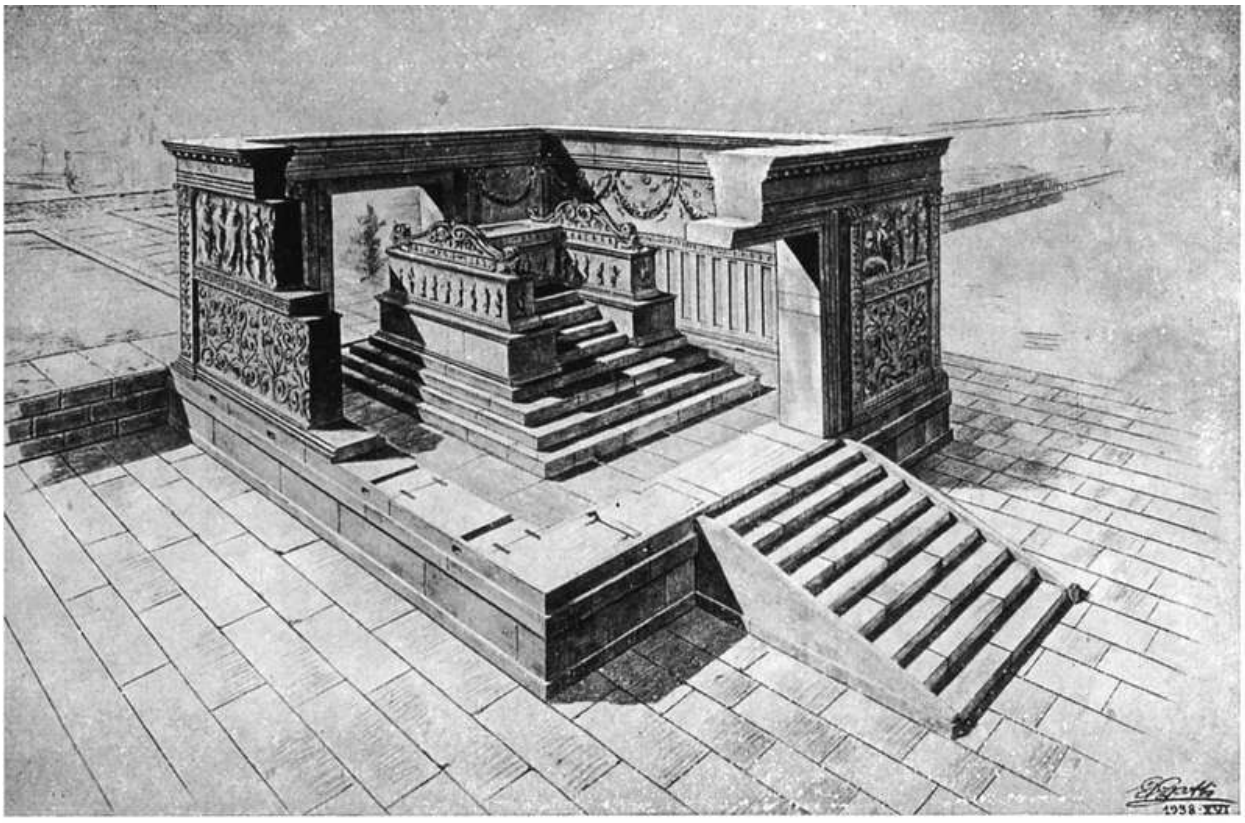
在叙述人群雕像之前，我先把诸神像一一述清。正面墙的背面也是天神的雕像，不过这两面墙都是女神。

从正面绕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壁雕是坐在中间、两手各抱一个幼儿的大地女神特勒斯，她的两边分别坐着掌管风和水的女神。怀抱两个幼儿的女神象征多产，三位女神的脚下是一片麦田以及散落其间的牛羊，这无疑是表达大地赐予人类的恩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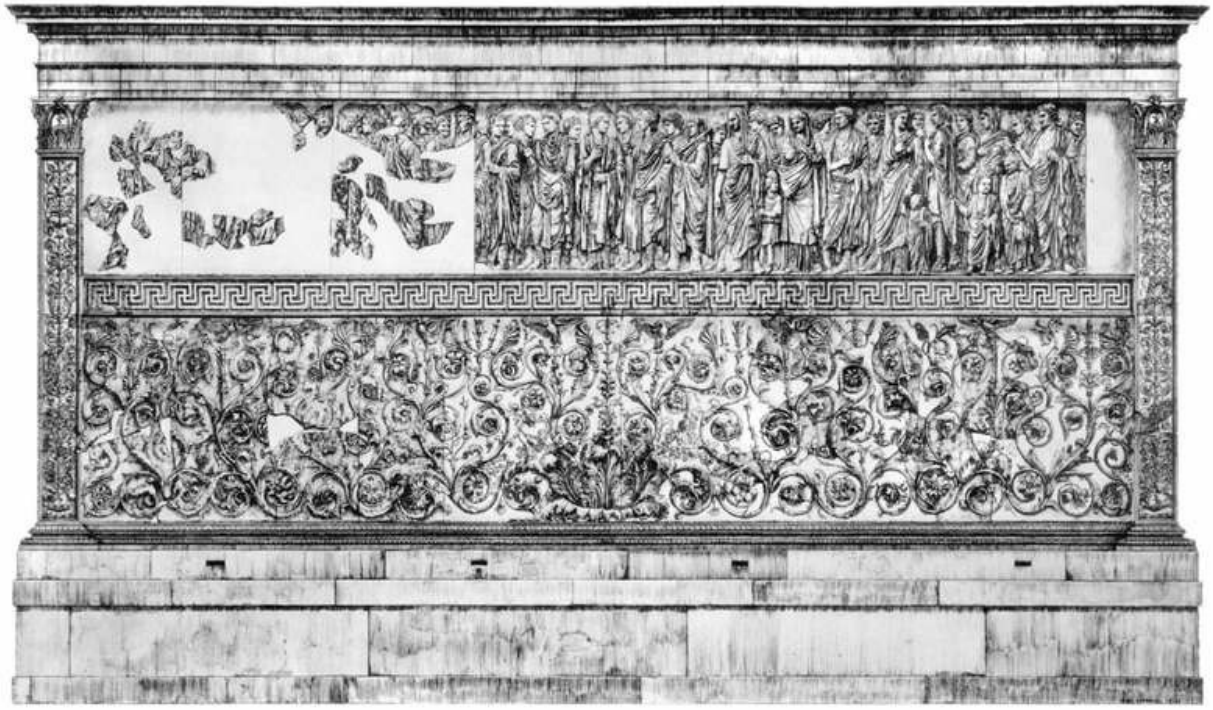
以正殿的出口为中心的两边墙壁上也有雕像。如今，右墙上的浮雕几乎消失殆尽。考古学家根据仅存的一些石片分析，判断浮雕应该是模仿希腊神话亚马孙（Amazones）部落女战士的代表国家的女神罗马。共和时代的货币上罗马就以女神的形象出现过，不过，建造奉献给女神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神殿则是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后才开始的。那个时代，连行省也建立了不少这样的神殿。以女性作为国家的象征，是因为对那些出生在罗马、长大后离开祖国、直到死后才魂归故里的男人们而言，国家就是母亲。

人类的浮雕像则刻在左右两侧，离诸神不远也不近。这种安排绝妙地体现了罗马多神教的精神。古罗马人崇尚写实主义，因此2000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逼真的奥古斯都的“家族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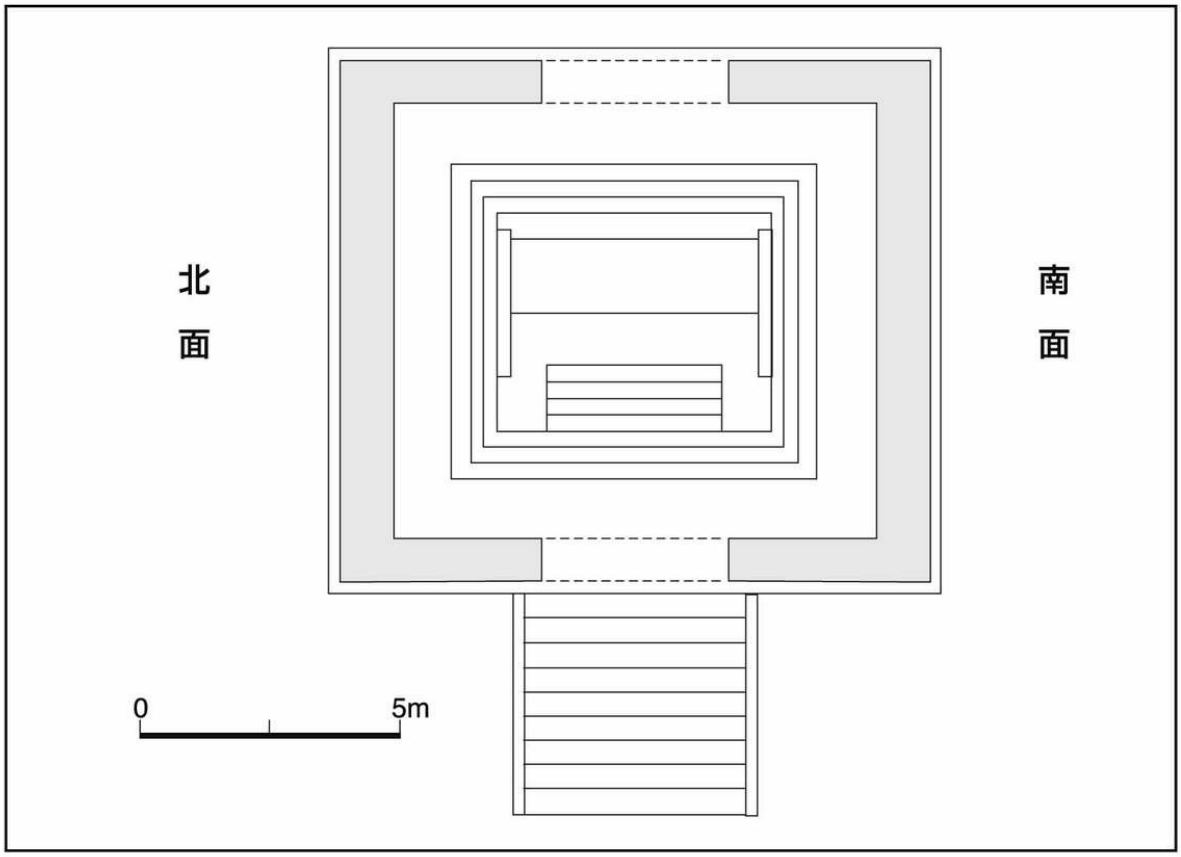
正面的右侧，即祭坛的南面的壁墙上雕刻的是参加和平祈祷的队伍。最初的四分之一的浮雕已经损坏得非常厉害，站在侍卫（Lictor）后面的人只剩下了脸部和左半身的一部分，但那肯定是奥古斯都。在和平祭坛建造期间，他就任了大祭司，因此，51岁之后的奥古斯都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国家祭祀活动的主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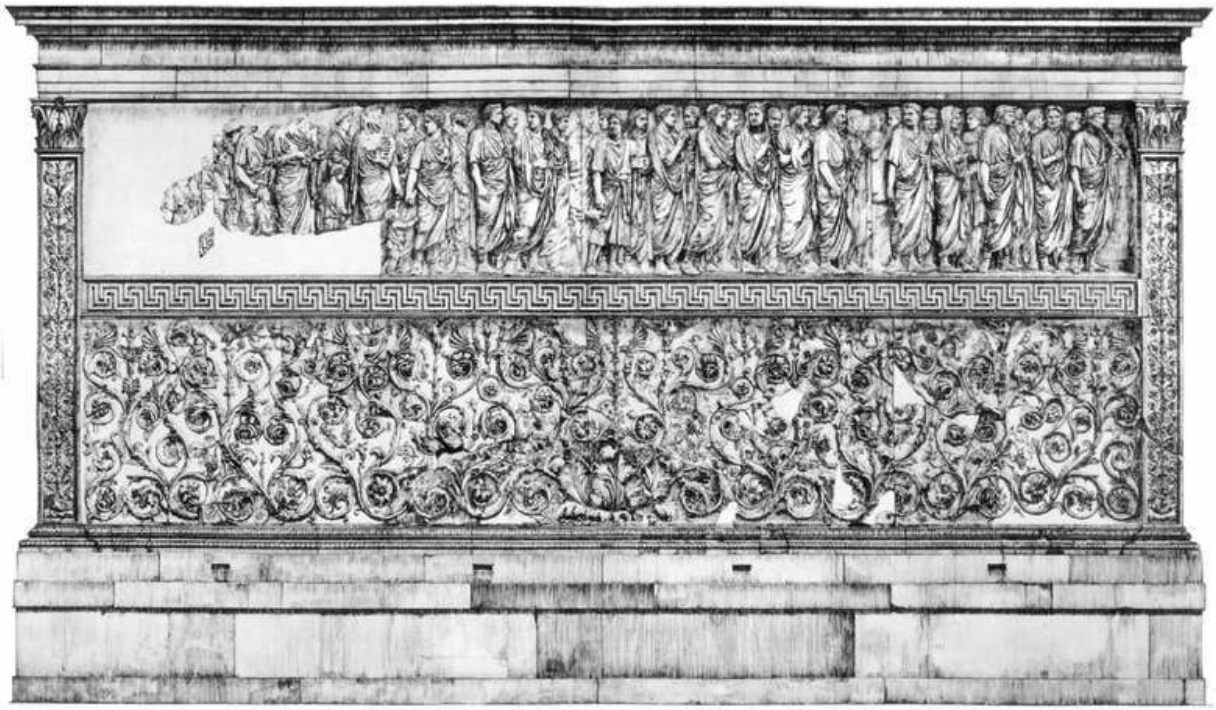
和平祭坛（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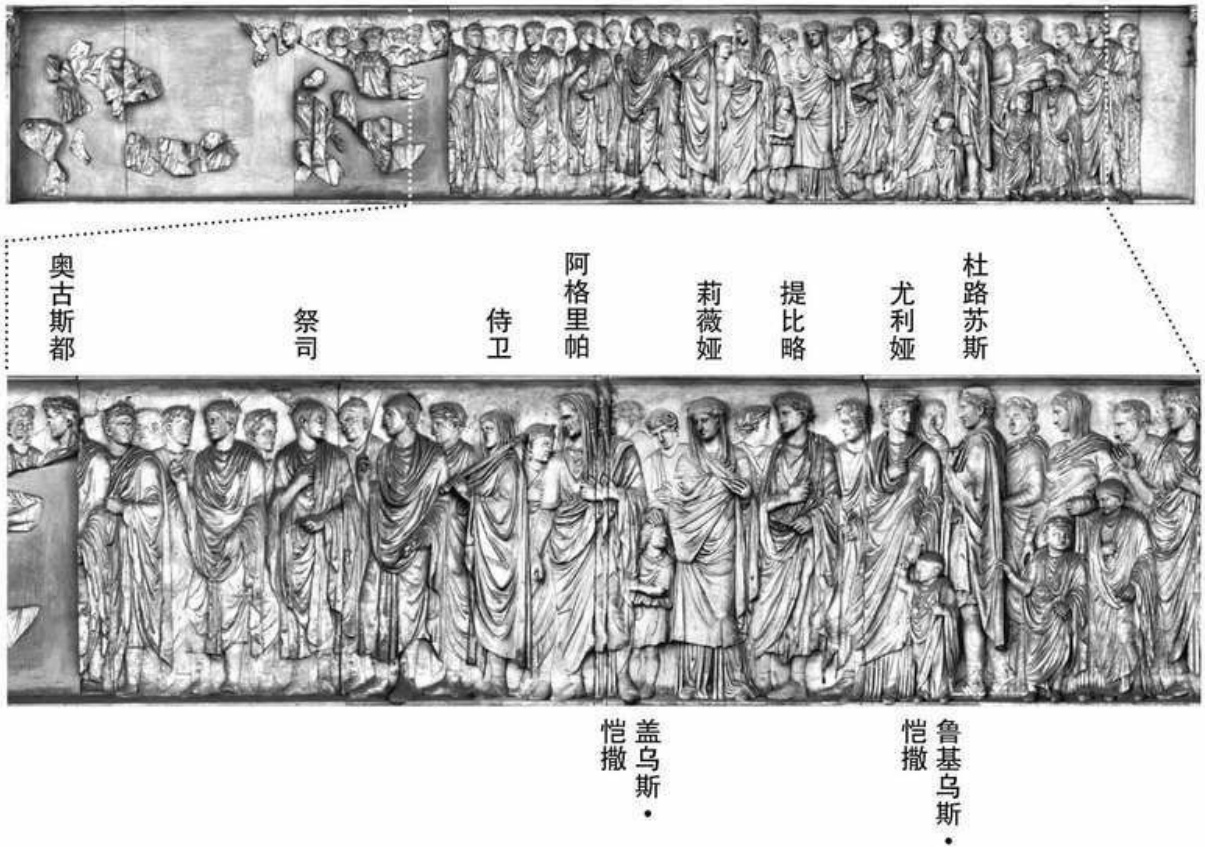
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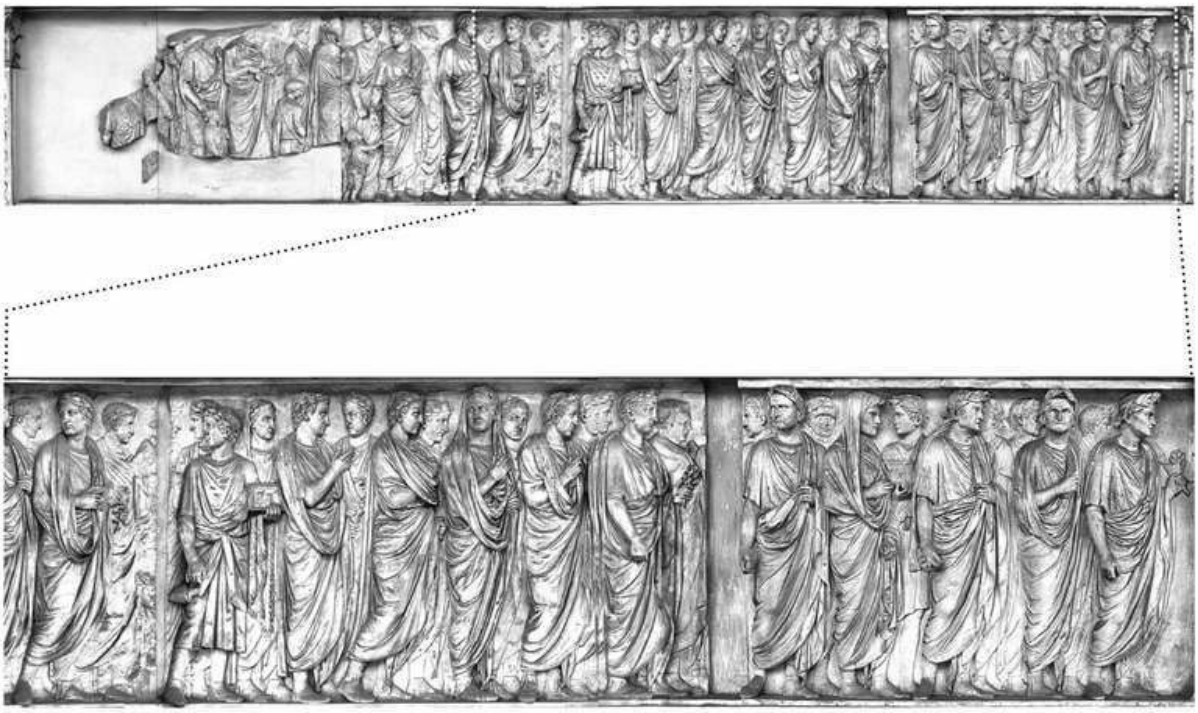
和平祭坛平面图



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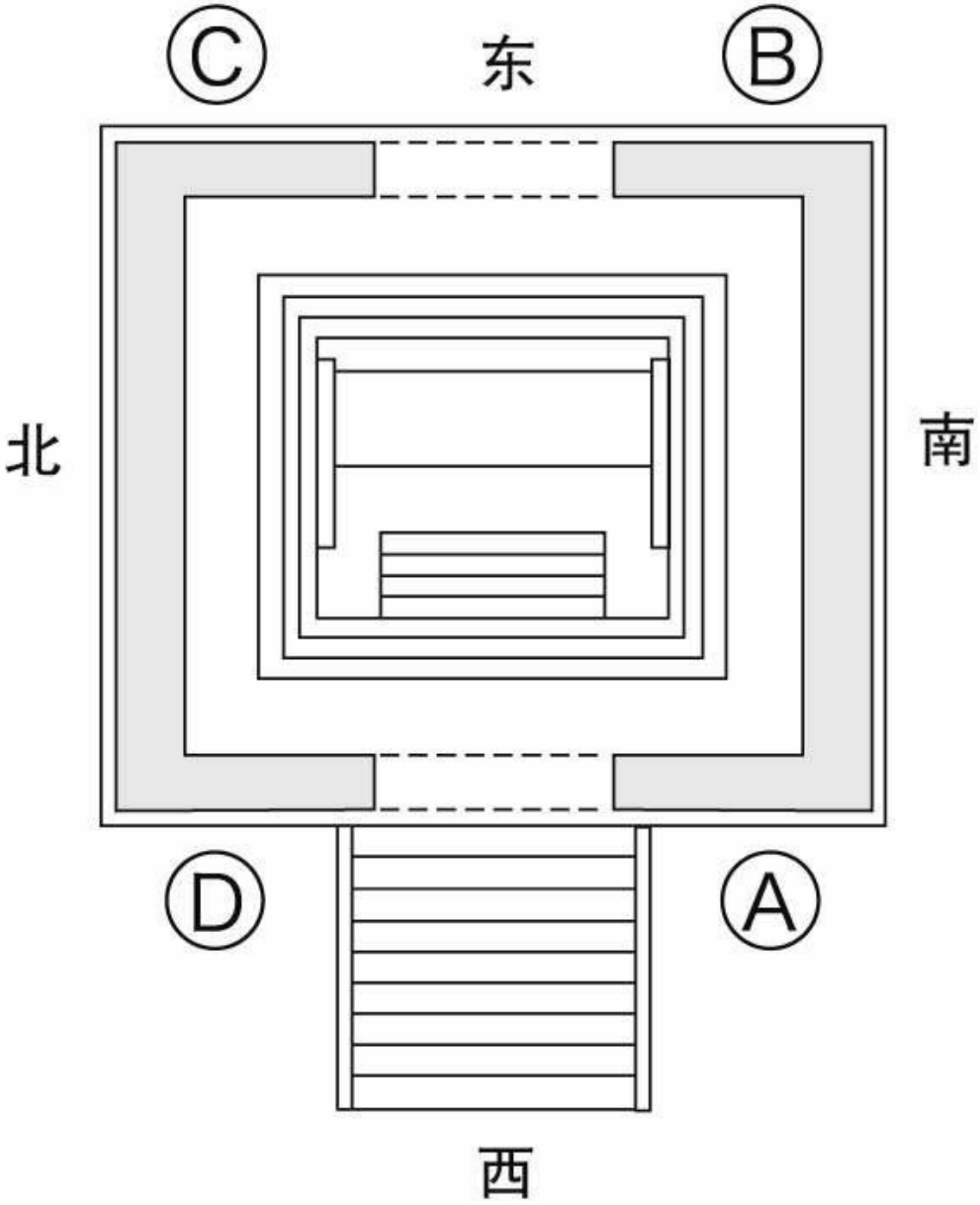


和平祭坛南面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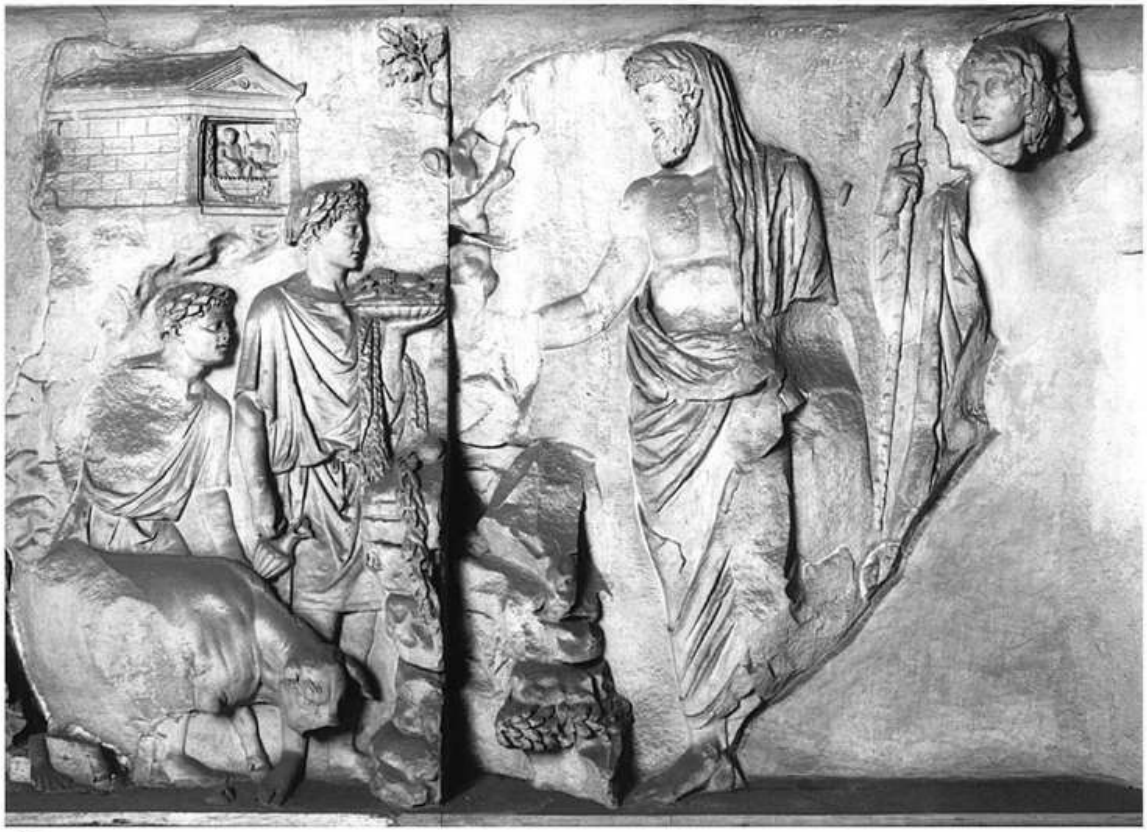


和平祭坛北面浮雕

和平祭坛下段浮雕


C
东
B
北
南
D
A
西

小鸟、小虫散落在莨苕叶子上的浮雕放大图



Ⓐ

和平祭坛西南侧浮雕：埃涅阿斯向珀那忒斯神奉献牺牲

Ⓑ

和平祭坛东南侧浮雕：怀抱两个幼儿的大地女神特勒斯

Ⓒ

和平祭坛东北侧浮雕：模仿希腊神话亚马孙部落女战士的女神罗马

Ⓓ

和平祭坛西北侧浮雕：给罗马的建国者罗穆路斯和瑞摩斯喂奶的母狼和发现并抚养他们长大的羊倌以及他们的父亲马尔斯天神

尽管浮雕已经模糊不清，不过我相信，奥古斯都用托加包住的头上应该带着月桂冠。不过看他脸上的线条和垂散在额头上的头发，让人很难相信那是过了50岁的男人。站在奥古斯都的后方、中间隔着几位祭司的阿格里帕就是50岁的男人的形象。和他年轻时候的像相比，不由得让人发出岁月流逝的感慨。而和阿格里帕同年的奥古斯都的容貌却依然停留在30多岁。如果和平祭坛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的话，就可以断定我对奥古斯都存心保留年轻时的容貌是一种形象作战的论述是否正确。

束棒斧是古罗马公权力的象征。肩扛着束棒斧的侍卫的后面，是奥古斯都指名的共同统治者，也是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儿尤莉亚再婚对象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17岁时由恺撒提拔，从此成为了不善战斗的奥古斯都的左膀右臂。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今天的奥古斯都。然而，和平祭坛上阿格里帕的雕像显得异常苍老，和他年轻时体格强壮、生气勃勃的形象判若两人。决定建造和平祭坛的那一年，阿格里帕还健

在，但在三年后的完工大典时，他已经不在人世。浮雕上阿格里帕栩栩如生的形象反映了奥古斯都对这位生死之交的深切怀念。

阿格里帕和他身旁拉着他托加一角的孩子的画面非常可爱。那孩子是阿格里帕和尤莉亚所生的盖乌斯·恺撒。他是奥古斯都的长（外）孙，对血缘承继异常偏执的奥古斯都，在盖乌斯1岁的时候将他收为了养子。和平祭坛开建时他才7岁，跟着奥古斯都坐在祭祀典礼的上位，由此可见，当时的奥古斯都是打算让这个外孙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紧接着少年的是一位美丽的妇人，按照顺序排列，应该是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莉薇娅的后面有一位身着托加的年轻人，他是莉薇娅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两个儿子中的兄长、祭坛开工时年纪29岁的提比略。提比略没有用托加遮住头部，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祭司，祭祀典礼上，普通市民是不需要遮掩头部的。

隔开一个人之后的妇人据说是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当时是阿格里帕妻子的尤利娅。她手牵着的幼童，应该就是她和阿格里帕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鲁基乌斯·恺撒。鲁基乌斯一出生就被奥古斯都收为了养子，建祭坛时他年仅4岁。

跟在4岁幼童后面的是典礼行列里唯一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据说是莉薇娅带过来的小儿子杜路苏斯。他之所以戎装打扮，是因为在祭坛建设的时候他正担任着远征日耳曼军队的总司令。莉薇娅的两个儿子，代替年过50岁的阿格里帕，成为了奥古斯都的左右手。

杜路苏斯的边上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拉着他军袍的一角，排在他们后面的那些人到底是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既然都是一些妇女和孩子，想来应该是奥古斯都的家族成员。当时奥古斯都的家族成员中，还包括了提比略的妻子维普萨尼娅（Vipsania）、杜路苏斯的妻子小安东尼娅、与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结婚的大安东尼娅，以及她们的孩子。

姐妹俩因为同名，为了区分，姐姐称做大安东尼娅，妹妹则叫小安东尼娅。她们是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孩子。尽管奥古斯都置安东尼于死地，但对他的孩子仍然视为家人，并且替两位外甥女安排了合适的婚姻。这对姐妹的婚姻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罗马帝国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以及第五代皇帝尼禄（Nero）都和奥古斯都的手下败将安东尼有着血缘关系。

与南面奥古斯都家族肖像相对的北墙壁雕，则是参加祭祀的元老院的权势者以及政府的高官们。他们全体都穿着托加，其中也有人带着孩子。和对面的皇帝一家的肖像一样，这边的场景也很轻松，有的人看着边上，有的人热衷于谈话。就连奥古斯都家的孩子们也不顾禁忌，跑到这边来找同伴玩耍。和诸天神不同，这里的主角是人类，是充满人性的罗马人。虽然祈求天神赐予和平，但要达到目标还是要靠人类的努力。这也正是奥古斯都建立祭坛的真正用意。

和平祭坛正殿雕刻的祭祀场景

正殿的四周也被浮雕包围，浮雕上的天神和人物都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尽管正殿也是层层堆砌，但是建筑本身还是非常简朴，登上台阶之后，只有一个大理石的祭坛。或许是因为祭坛上要烧烤供奉的动物，为了散去烟灰，才没有设计天花板。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元老院不仅决定建造“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还“决定每年在祭坛举行献祭仪式”。所谓每年

的献祭仪式是向天神祈求和平的一种罗马式的称呼。因此，和平祭坛既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象征，又实际用于祈求和平。

罗马时代的和平祭坛，建造在从古罗马广场步行不到15分钟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边上。从行省来首都的人们，如果从北方经过弗拉米尼亚大道或者卡萨亚大道（Via Cassia），途中就能望见祭坛。如果是从罗马古道过来，要稍微绕一点路；而经过阿皮亚大道从南方来的人，只要从古罗马广场走几步路就能看到祭坛了。这些行省的人民看到祭坛，或许也能和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奥古斯都致力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决心。

所谓的统治，必须给予被统治者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否则，仅靠武力镇压、灭绝反对派，统治绝对是不可能持久的。

和平祭坛现在也能看到，不过位置已经不在原地。遗址上已经建有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罗马城市，即使挖掘到祭坛的遗石，也不可能拆除建在原址上正在使用的建筑，所以无法在原来的地点重建。1936年，根据当时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决定，利用重新开发奥古斯都陵园周边地区之际，在位于陵园和台伯河之间的地带，用考古挖掘出的材料复原了祭坛。

从此，以奥古斯都陵以及和平祭坛为中心的广场，改名为“奥古斯都皇帝广场”（Piazza Augusto Imperatore）。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政府以反法西斯为首要国策，所以，极其厌恶法西斯时代的产物。法西斯年代的建筑，在设计上虽然缺乏美感，却都造得非常之坚固，要拆毁奥古斯都皇帝广场周围的建筑成本太高，因此这一带被原样地保留了下来。由于罗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是左翼掌权，所以对这里的设施既不作保养维修，也没有任何开发、利用的规划，这里成了一块冷清之地。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个安静的好地方，但喜欢热闹的罗马人避而远之。

此外，现代的博物馆、美术馆的主办者们大都对美术史的兴趣胜于历史。如果是真迹的话，哪怕是一个水壶的碎片都会大张旗鼓地拿出来展示，但对古迹的复原作业就不怎么关心。因此，和平祭坛一向少有游客光顾。不过，这里倒是很适合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好地方。因为几乎在与和平祭坛开工的同时，奥古斯都正在展开一场军事改革，从罗马传统意义上来说，这场改革是革命性的。

军事改革

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公民的定义是：无论是隶属于国家还是地方自治体，在拥有参与“共同体”（Res publica）自治的权利的同时，还有着保卫共同体的义务。军队在人数上劣于东方专制的君主国家的军队，但是在质量上占有相当的优势，经常打赢战争。这主要是因为东方国家通常是从他国招募雇佣兵，而希腊、罗马的军队则有着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

为了提升这些城邦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以及经济上的地位，由中坚市民组成的重装步军团，代替了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骑军团，成为了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个变化促成了一场军事制度的改革。顺便提一下，到了中世纪，骑军团又恢复为军队的主力，步兵再次成为主力军一直要到近代之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就是提倡将主力军恢复到由本国国民组成的步兵队伍。

古罗马也是秉承了这种“公民”思想的国家。希腊人对公民制度的使用只限于自己所属的城邦国家境内，罗马人则把它发展到希腊无法比拟的整个罗马帝国的辽阔疆土。可以说，近代再次复兴的“公民”概念，最早是由罗马人确立的。

保卫共同体的义务也意味着维持共同体。所以，服兵役的义务和缴

税的义务，理所当然地就合为一体。既然税金根据收入不同有所区别，那么就不应该强迫所有的人统一服兵役。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曾经叙述过，罗马从王政时代起，就采用服兵役代替缴直接税的方式，尽量去保证公正性。那些没有财产来源、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公民，不需要通过服兵役来代替直接税。这个阶层拉丁语称之为“proletari”（无产阶级），现代语中的“proletariat”就是其衍生词。

不过，这种征兵制度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当时罗马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还不大。军队在春天集结出兵征战，不到深秋士兵们就能返回家乡。通常服兵役的年限为一年，如果战争持续一年以上，即使司令官需要留任，士兵还是到期就作交替。否则的话，无法要求人民履行当兵的义务。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敌人变成了迦太基、西班牙以及希腊，罗马的军事行动不断地向外扩展，士兵们从战场返回家乡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往那种军队每年解散的、重新组编的形式已变得不可行，只有延长服役时间，这样，人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而且，随着罗马的霸权扩张，罗马人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服兵役成为了不受人民欢迎的义务。高度增长的经济又带来了分配上的不均，无产阶级不仅是要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一部分人甚至连劳动的机会都没有。失业者大批流进首都罗马，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靠免税能够解决了。

如《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所述，公元前107年，当时的执政官盖乌斯·马略对延续了500年的罗马军事制度实行了改革，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罗马士兵也从公民的义务变成了一种职业。公元前160年前后，由于直接税的废止，缴纳直接税等于服兵役的方式也变得有名无实，因此募兵制度的推行完全没有受到障碍，更主要的是募兵制解决了失业问题。

好在罗马军队最终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的堆积场，这要归功于为政者确立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得到了代表普通大众的公民大会的支持。

第一，虽然失业者属于无产阶级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使罗马公民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再次的确认。这有助于因免除兵役而不被看做是罗马公民的无产阶级恢复信心，他们可以抬头挺胸地说："因为我是罗马公民，所以我有保卫罗马的义务。"恺撒常对他的士兵训示说："别忘了各位是罗马公民。"士兵们只有对自己所承担的职责怀有自豪感，同时又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有可能奋不顾身地去完成任务。

第二，收入保障。士兵的酬劳并不高，一个士兵一年的薪水是70第纳尔银币，按照公元前1世纪的生活水平，这个金额连购买主食小麦都有点困难。不过，服役期间，士兵的衣食都是无偿供给，所以这只是一个底薪。另外还可以期待战利品的分发以及凯旋仪式的赏金等临时收入。

罗马军队的素质没有因改为募兵制而下降的第三个理由，主要是规定了那些目标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的人必须具备从军的经历。要保证罗马军队的质量，首先必须保证指挥官们的素质。士兵们对于带领自己的将军的能力非常之敏感，因为跟随无能的将军就意味着要付出无谓的牺牲。而且，军队如果不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就等于失去了军事能力。这种组织和运用的能力，也完全适用于政界。

不过，马略的军制改革并没有触及罗马传统的兵役期限，服役年限仍然是一年，如果需要延长再作更新。

无论是出国远征3年的苏拉军队，还是在庞培麾下打了5年仗的士兵，或者是跟随恺撒征战高卢8年之后，渡过卢比孔河继续战斗长达13年的战士们，他们在战时的春季入伍，到了秋季如果提出返乡的申请，即便是司令官也无权强迫他们继续服役。士兵们之所以愿意留在军队，是因为这些将军们有着极其强大的领导力。苏拉和庞培的军队条件还算

不错，因为对手是东方国家或是海盗，至少有机会得到丰厚的战利品。恺撒的士兵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场是落后的高卢，能掠夺的财产少之又少，之后又是和罗马同胞相战，总司令严令禁止抢劫掠夺。虽然恺撒将士兵的薪水从70第纳尔银币提高了一倍到140第纳尔银币，但对这些跟随恺撒纵横转战地中海的士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那些心甘情愿跟随恺撒的士兵不是为了薪水，为钱而战的不能叫做士兵。

恺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深知自己没有“父亲”般的指挥能力。不要说是和恺撒相比，就是苏拉的个人魅力，以及庞培的军事头脑，也都是他无法比拟的。他指挥的战役屡战屡败，之后的战事长期依靠阿格里帕，现在又将作战指挥权交给提比略和杜路苏斯两兄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恺撒和他手下的将士们说话时，经常叫他们“战友们”，而奥古斯都对他们只称呼“战士们”，他不愿意去做名不副实的事情。不过，他也禁止阿格里帕和提比略、杜路苏斯兄弟使用“战友们”，尽管他们完全有这个资格。结果，前线的指挥官们只能称呼士兵们为“战士们”。奥古斯并非是因为他和军队的官兵们没有密切的关系，出于嫉妒才下此禁令，而是他认为军队必须是一个不管由谁指挥都能够发挥功效的组织。而且，更应该是一个面对落后民族（历史上称蛮族），在无法期待战利品等各种不利、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完成任务的军事集团。将这个军事集团制度化就是奥古斯都面临的课题。

奥古斯都在进行军事改革时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列举如下：

1.军事目的不是征服，而是防御。

2.除了帕提亚是独立国家之外，其余的敌人都是落后、没有组织的蛮族。

3.正因为军事行动以防御为目的，所以必须设立常备军。

4.提高和保证对担任防御任务的人，即士兵们的劳动条件。

5.确立安全保障（拉丁文securitas）所必需的综合战略。

6.确保这些防御系统运作所需的财源。

在军事行动以征服外族为主的时代，军队是可以按照传统方法在决定远征之后再进行组编。不过，罗马也因此经常会在敌方突然进攻时措手不及。一旦军事目的成为了防御，就不能容许同样的失败，因此，必须建立长期的防卫军。

屡战屡胜的恺撒曾经指示，在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以及撒哈拉沙漠建立军事防卫线，而对这些地区以外的地方的进攻，他则认为反而对罗马不利。这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判断。继承了恺撒的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0年时，一手拥有了天下无敌的罗马军队。如果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形势下大都会失去冷静，对外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罗马的民意一定会为这种展现罗马威势的行为鼓掌、叫好，予以支持。然而，奥古斯都不仅继承了恺撒的思想，而且将他拥有强大的兵力缩减了三分之二。为了有效地实现以防卫为目的战略，他违背了罗马700年的传统，设立了常备军，这是实现和平战略最有效、最现实的一个手段，奥古斯都就是这样确立起了决定帝国未来的军事方针。

不过，一旦军事目的变成了防御，敌人就由不得自己选。打赢了可能获得丰厚收入的唯一的对手帕提亚已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了问题，剩下的都是没有战利品可期待的蛮族，而且与蛮族打仗，就意味着要将军队派遣到经济落后、生活不便、气候和地形都相当恶劣的地区去。所以，提高士兵的服役待遇就成为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在改革之初，奥古斯都将士兵的服役年限定在16年，服役的年龄资格为17岁。所以士兵们兵役期满也只有33岁。罗马自从战役时间拉长之后，规定军人服役期间必须独身。所以服役期定在16年，是考虑到他们

在退伍后还来得及组织家庭，重新开始正常的人生。

但是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时代的末期，兵役期由16年延长到20年。这样，17岁入伍的军人退役时都已37岁。尽管法律规定服役期间必须独身，不过如果有军人结婚生子也不属于违反军规，虽然晋级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不会受到军法处分。通常这类情况，大多是在退伍后正式结婚。

奥古斯都在制定了军人服役期限的同时，还创立了在古代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人退伍金制度。

其实，在罗马共和时代的末期，退伍金制度也已经存在。国家向退伍军人提供田地，并且发放凯旋仪式赏金以作为土地收获前的前期资金。但退伍军人是否能得到这些福利，完全受制于他们从军时跟随的司令官。如果是败将手下的士兵，不要说退伍金，就连正规的薪水都岌岌可危。

奥古斯都将退伍金制度化，目的是为了让军人们安心服役，并且退伍金还有田地或者现金两种方式供选择。

实际上，军人在退伍之后，除了选择返回故乡，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迁居新型殖民城市。因为恺撒修改了选举法，地方自治体的议员或公务员的参选条件比较有利于有军人背景的人。那些选择返回故乡的人大多数都应该会选择现金作为退伍金。

在其他职业没有工作年限的那个时代，奥古斯都不但规定了军人的服役年限，而且定为20年，实在是相当具有前瞻性。驻扎边境的军人的背景大抵相似，视野、见识因此会受到限制。当然这也是形势所迫，军队如果不聚集专业人才，其功效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作为军人无法摆脱的命运。如果士兵的服役年限不是20年而是更长，那么他们只好度过一生的军旅生活。即使不是一生，想转到其他行业也有相当的难

度，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军人阶级。如果没有其他热衷的事情可以作为，人通常都会更依存于现有的状态。

无论国家体制是共和还是帝政，罗马始终是一个军事国家。它之所以可以长期地避免形成固定阶层的弊病，是因为军人生涯和文职生涯（平民生涯）的划分通常都不会很清晰。一般人都有机会同时经历两种生活，社会对此也给予正面的评价。军队的指挥官退役后通常都能够转入政界，所以，为那些人生第一阶段在军营度过的下等士兵们提供向第二阶段的平民生活转化的资源，就是统治者的责任。罗马时代发放的退伍金，并非是让退伍军人无须劳作、游手好闲，而是一笔重新开始人生的准备金。退伍金有限，士兵们36岁退役后想靠它悠然度过余生根本是不可能的。

奥古斯都的军制改革政策规定，一般士兵的年俸是225第纳尔银币，比恺撒的140第纳尔增加了不少。这并非是30年来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奥古斯都认为，那些坚守边境地区、即使打赢也不会收获战利品的士兵们的苦劳，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保障他们的生活。

士兵225第纳尔的年俸，在罗马社会仍然属于低下阶层的收入。不过，在军中，衣食住是免费的，还有就是像退伍金这样的特别待遇。另外，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罗马军团经常会被征用去进行公共设施的整修，士兵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些土木工程的技术。不管怎么说，参军是人生的第一阶段。

公元6年的时候，退伍金的金额规定为3000第纳尔，相当于13年的年俸。如果士兵在服役期间用完了所有的薪水，那么靠这笔退伍金不够在罗马生活1年。不过，如果移居到生活费用比较低的行省，大概可以啥都不干过上10年。

即使士兵在军队期间十分节俭，将所有薪水都积攒下来，再加上退伍金，之后的生活仍然无法过得轻松自在。我们假设有这样节俭的士

兵，那么退伍时他手中有7500第纳尔。兑换成日常使用的货币塞斯特斯铜币，大约是3万，如果居住在意大利本土的某个地方自治区，那么这笔费用最多能够过上3年。如果人民不是把服兵役当做公民应尽的义务、把退伍金理解为开始新生活的准备金，恐怕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军人退伍后在社会上会得到优待，但是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是以他们将从事其他工作为前提。话说回来，对军人来说杯水车薪的收入，对作为提供方的国家而言，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作为帝国全域的防卫力量，军队的数量最初在28个军团，公元9年以后，改为25个军团。我们从军团数量稳定在25个军团的阶段来论述。这25个军团由罗马公民所组成，每个军团有6000名官兵，25个军团总共有官兵15万人。被称为军团兵（legionaries）的这15万兵力，在罗马进入帝政时代之后，仍然是国家主要的防卫力量。以上讲述的对军人的经济保障，就是针对这些军团兵的。仅是支付包括将军官阶在内的15万军人的每年的薪水就超过了1.5亿塞斯特斯铜币。

仅凭15万人的兵力，是不可能守住罗马那漫长的防卫线的。但是如果再增加兵力，又面临以下两个难题：

第一，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17岁以上的男子）总人数为500万，能够服兵役的人数（17岁到45岁）约占其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因此每年确保有15万人的兵力已经是极限。准确地说，如果不守住这个底线，罗马会沦为一个单纯的武力国家。

第二，军费维持相当困难。罗马并非只挑选富裕地区作为行省，还有不少地方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理由。奥古斯都划分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的条件，除了是否需要驻军之外，还根据经济能力来区别。元老院行省都属于经济实力较高的富裕地区，而皇帝行省除了因特殊理由归属皇帝私人领地的埃及以及为牵制帕提亚的叙利亚之外，其余的行省都属于落后地区，因此，也无法期待行省税的收益。然而，这些落后地区又必须集中驻扎军队，因为罗马人叫做“Limes”的帝国最重要的安全防卫

线，正贯穿于这些地方。

归属元老院的元老院行省和皇帝管辖的皇帝行省，同是行省，但是行省税的名称不同，税金的流向也不同。

元老院行省的行省税依然沿用共和时代的名称，叫“艾拉留姆”（Aerarium），“国库”的意思。行省税所得按照传统，上缴国库。

而皇帝行省所征收的行省税称“费斯库斯”（Fiscus），缴入皇帝的金库。不过，它并不属于皇帝个人所有。奥古斯都对公款和私财一向分得很清楚，“费斯库斯”既然是税金，当然属于公款。

但是，经济实力低下的落后地区的行省税数目原本就不大，即使加上另外的间接税，仍然无法支撑军用开支。如果不挪动相当金额的元老院行省税“艾拉留姆”，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体系，仅在经济层面上就无法正常运作。研究者们一直苦于无法准确地掌握古罗马的收支状况，“艾拉留姆”和“费斯库斯”的流向不清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这样的实际问题存在，要清楚地划分两种税金的用途的确很困难。

尽管是为了帝国整体的安全，但也不是元老院行省的税金全转到皇帝行省就能解决问题。虽然理智地去思考，人民之所以能免受蛮族的威胁过着和平的生活，是因为有军队的保护。但是如果眼前就有必须架设的桥梁，却被告知工程暂且需要缓一缓，钱得拿去支付边防的开支，这时候作为纳税人大概都会失去理性，怨声载道。如果放任这种不满情绪在行省内蔓延，那么，那些原本不需驻兵的行省也不得不派兵镇守。罗马人构思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了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满足所有人的生活。奥古斯都将军团兵人数上限定在15万人，势必是出于这个理由。

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成为了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将原来50万人的兵力缩减到20万人左右。裁军之后的军团数为28个，士兵人数约在17万。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提到有

30万人以上的士兵退役，的确没有夸大其词。

然而，如果将奥古斯都的这次裁军理解为和平局势下的调整，不免太简单了。只要分析一下当时各种状况我们就可以明白，保卫帝国的兵力从28个军团减到25个，人数从17万降到15万，其实是一个迫于现实的决定。持之以恒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勉强行事。

当时罗马士兵的素质的确非常优秀，但是奥古斯都很清楚靠15万人的兵力是无法守住国家防卫线的。他打算打破罗马军队的传统，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写恺撒的时候，让我深有感触的是这个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只为一个单纯的目的。写到奥古斯都，再次让我生发同样的感想。想到这里，我脑海中浮现了1500年之后（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之后）马基雅弗利的一段话：

> 无论做什么，如果不能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感到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事情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那也是短暂的。

马基雅弗利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达成一个妥协。妥协就是一种让步，是让大家各退一步从而找到一个共同点，简单地说，就是降低一些要求。这种做法容易引发一部分人的不满，导致事情半途而废。所谓妥协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和社会现实相碰撞后无奈接受的东西。很少有人会像马基雅弗利那样如此憎恶这种没有建设性的妥协。

大概没有人会把强行渡过卢比孔河的恺撒和“妥协”一词联系在一起。同样，奥古斯都看似一个容易妥协的人，骨子里绝非如此。奥古斯都的行为不是妥协而是欺瞒。对于那些满脑子想着共和体制的人们，他就摆出投其所好的姿态，让他们继续沉浸在假想世界里。如果要用一句

话来形容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政治手腕，那就是“一石二鸟”。不过，可不是简单地用一块石头打下两只鸟，而是打下多只小鸟。而且一定是用石头击准目标，而不是那些线圈、纸团之类无用的工具。问题是，所有的参与者是否能够相信这种“一石二鸟”式的思路会为自身带来利益呢？

尽管罗马军队规定军人必须是罗马公民，不过军队里也不是完全没有非公民。除了以同盟国军的方式参战之外，非公民也经常出现在罗马的正规军中，只不过没有形成制度而已。非公民的参战方式主要根据军队总司令的战术而定。像苏拉就是将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部署在战场的前沿，而非公民的军队则作为后援；庞培则是直接让非公民加入正规军以壮大军队的声势。恺撒使用非公民军队最拿手的就是尽其所长。由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恺撒骑军团勇猛骁战，赫赫声名威震整个地中海地区。可是无论多么能征善战，这些非公民士兵仍然不属于罗马正规军。

奥古斯都将这些非公民士兵提升为正规军，但不属于军团兵编制。作为罗马军队主力军的军团兵依然维持罗马的传统，由罗马公民组成。另外，非公民军队的旧名称“辅助兵”也继续使用。即使非公民士兵升格为组织的一员，还是要突显罗马的主力军是军团兵。

虽然叫辅助兵，但他们仍然是肩负保卫帝国安全的罗马正规军的一员。奥古斯都在提高了罗马军团兵的服役待遇的同时，也准备给予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相应的保障。要申明一下，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精神，而是来自他“一石二鸟”的政治观点。

和军团兵一样，辅助兵也有服役期限，规定为25年，比军团兵长了5年。这似乎有些不公，其实并非如此。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兵不仅要负责保卫帝国全域的安全，而且有义务服从换防、调离驻扎地的命令。军团会从莱茵河换到尼罗河，也可能从西班牙转移到中东地区。然而，辅助兵服役的地区通常都在家乡的附近，大多数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他的军旅生涯。如果驻扎地离家乡不远的话，那么军人在退伍之后，能

够比较迅速地适应新生活，因此，兵役年限20年和25年的差异不能算不公，应该把他们视为同等待遇。

辅助兵的薪水当然也是有保障的。担任防卫任务，没有额外的战利品可以收获，唯有保证他们的收入，才能确保他们的战斗力。和军团兵不同，有关辅助兵薪酬的史料一直没有被发现，金额应该低于军团兵，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有退伍金。我想即使有，也是一笔很小的数目吧。军人的退伍金制度的设立，在古代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对金额就不能再有过多的苛求。辅助兵的衣食住在还未成为正规军时代已经有所保障，升格至正规军之后，当然会水涨船高地变得更好。随着帝政时代的推进，对于受伤士兵的医疗保障也有所提高，另外，为了慰劳坚守边疆的战士们而建的剧场、浴场，辅助兵同样可以享受。

辅助兵都来自行省。经历了军事基地的生活的士兵们，自然而然地会对罗马产生敬意和憧憬。像似读懂了他们的心思，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制度中，有一项规定就是给予退役的辅助兵罗马公民权。这项规定和奥古斯都制定的其他政策一样，延续了300年，这项优惠说不定就是辅助兵的退伍金。

罗马的公民权不单是一个荣誉勋章。首先，它有免除了行省税的实际利益；再者，公民权是世袭的，退伍之后得到公民权的辅助兵的下一代，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去申请加入军团兵。

在授予罗马公民权的问题上，奥古斯都不如恺撒来得开放，他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措施。

他废除了行省的部族首领进入元老院的制度，取消了给予西西里以及南法两行省与罗马本土同等待遇的资格。另外，对那些想通过关系取得公民权的要求也是一律拒绝，即便是妻子莉薇娅来说情也没得商量。恺撒的积极使用行省人才的政策，一直要到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才得以恢复。

行省人民长时间不得重用的始作俑者就是奥古斯都。

不过，对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教师和医生，奥古斯都还是延续了恺撒的政策，不问人种、民族，一律给予公民权。除了表示对这两种职业的重视之外，这也显示了奥古斯都精英化的治国路线，在这一点上，他和恺撒不谋而合。如今，奥古斯都又将授予辅助兵罗马公民权制度化，尽管选择参加辅助兵的行省人，未必都来自知性的上层阶级，但是拥有公民权意味着地位平等，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拥有相同的国籍。雅典人将公民权看做另一种血缘关系，如果父母不是雅典人，子女就不能成为雅典的公民。而罗马人则把公民权看做一种思想、行为上的认同，对于那些认同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人，应该给予“共同的权利”。

对罗马而言，没有比辅助兵参与帝国的安全防御更值得感谢的事了。恺撒曾经非常大方地授予了日耳曼和高卢出身的军人们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则将它制度化。这项制度和另一项限制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政策，在奥古斯都看来，两者毫不矛盾。

奥古斯都规定辅助兵军团的人数和军团兵一样为15万人。如果单纯地以这个数字计算，每25年就增加15万人的罗马公民。另外，军团兵不少会与驻扎地的女子结婚，而那些派往殖民城市参与建设的退伍罗马军人，通常也会和当地人通婚，因此，即便是对公民权采取保守政策的奥古斯都时代，也不会产生什么“锁国”思想。

通过奥古斯都的改革，行省人出身的辅助兵成为了罗马军队常态的成员。这项改革带来以下的益处。准确地说，是奥古斯都事先考虑到以下的这些有利的因素，才推行了改革，这就是他的“一石二鸟”政策。

第一，节约了防卫费用。和平不是免费的，需要用钱买。当然也不能无止境，否则就会造成国家财政的赤字。在没有销售国债概念的古罗马时代，只有从国库和皇帝金库中拿出钱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如果这

样还不能解决，那就会产生重税政策。重税政策，从统治学，即政治心理学上讲，是一种最愚蠢的解决方式。根据研究者的研究统计，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全境的人口，大概在5000万人。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的防御兵力，包括辅助兵在内大约是30万人，这个数量与现代拥有同样人口的国家相比，只限于陆军人数，而且不考虑科技化程度，它们分别是：法国24万，韩国52万。之所以提及这两个国家，除了因为人口和当时的罗马帝国相近之外，它们和古罗马同样有着与他国接壤的地理环境。顺便提一下，岛国日本目前的人口数量是古罗马的2倍以上，日本自卫队的人数是15万。限定在这个数量上，与其说是出于违不违宪之类的敏感理由，倒不如说是和没有陆地邻接的实际地理状况有关。同为岛国的英国的陆军兵力比日本还少，只有12万多人。

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现代任何一个国家的防卫线，都无法和罗马帝国时代相比。古罗马的防卫线不仅漫长，而且军队必须能够适应在条件迥异的防卫线上作战。既有寒冷的日耳曼，也有炎热的撒哈拉沙漠。30万人的兵力能够严守罗马帝国边境300年，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军事力量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和使用了成本较低的辅助兵有极大的关联。

第二，辅助兵军队的正规化，有益于提高行省人民自己保卫国土的意识。在罗马霸权下生活的行省人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保卫国土安全是霸主方罗马的责任。作为交换条件，行省人民必须缴纳行省税。收入的十分之一的行省税，可以说是换取安全的费用。但是，付钱让别人来保护自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都被视为一种堕落的行为。奥古斯都以辅助兵的方式要求行省人民参加国土防卫，也是希望借此提高行省人民的思想意识。辅助兵和军团兵一样是募兵制的，为保卫自己的故乡和家园自愿加入军队，这是最能体现人民健全性的方式，也是最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辅助兵从军的地点才限定于士兵的家乡附近。

第三，这一点对研究政治和心理学问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

例。当年马略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的目的，概括地说，就是解决失业问题。以往的征兵条件要求入伍者必须要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资格参军。而志愿兵制则将这个阶层的人民吸收为军队的成员。如果失业问题任其发展，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原因，和人的心理也有关联。通常，人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培养出自尊心。兵役是一个基本的公民义务，被剥夺了义务的人，大多会丧失信心，加之对生活的不满，很容易形成负面的心理。相反，即使缺乏财产仍然能够平等地去尽公民义务，至少可以保证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健康。行省也是如此，每个行省都存在着下层阶级，他们甚至连行省税都缴不起。如果放任这个人群不管，在本土也许就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而在行省则会滋生出暴动、叛乱的土壤。

当初，奥古斯都在除了南法之外的高卢全省部署了6个军团的兵力，他认为这些兵力足够维持高卢的安全。这3.6万人的军团兵全部驻扎在莱茵河一带，其他地区则没有任何的军队。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消除了不安定的因素，这种和平的行省统治政策根本无法贯彻、落实。

第四，军团兵以及辅助兵的设立，意味着罗马人和行省人并肩作战，通过军事基地这个媒介，行省的罗马化，罗马人称之为文明化，得到了不断推进。这种罗马同化的过程不是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分离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经过民族之间的融合形成了罗马文化的基础。就像军团兵的战士会娶驻地的女子为妻，辅助兵的儿子也有资格参加军团兵那样，它是一种自然的同化过程。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号召住在西岸、已经成为罗马行省居民的日耳曼人，联手共同打败罗马军队。他们昔日的同胞是这样回答的：“驻扎在我地的罗马士兵，不少人都和我们结成了亲戚。有的军人娶了这里的女子，一些军团兵的母亲是我们的姐妹。他们都把这里当成故乡罗马，我们无法答应你们这种无理的要求。你们想想看，谁会去杀死自己的父亲、兄弟呢？”

这也是罗马帝国的一种安全保障。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才真正称得上是“综合安全保障”。

话说回来，无论同化异族如何成功，仅仅靠军团兵加辅助兵不足30万人的兵力来防守长达1万多公里的防卫线，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正因为有各种因素决定了不超过30万人的兵力上限，所以才不得不追求防御能力的高效性，促使罗马军队将实力发挥到极致。奥古斯都推行的军事改革的第五项内容就是建立了安全保障必不可缺的综合战略。

综合战略

罗马人见机行事（case by case）的应变能力，早在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年代，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才能之所以没有分散在个体之中而是得到了整体地运用，主要是因为国家基本政策的始终如一。这些基本方针单纯、明朗，针对各种状况所采取的对应方式无论怎样的不同，它们都不会偏离基本的路线。既坚持一贯的方针，又懂得见机行事，这两种矛盾的概念要做到求同存异，并且在实际中能得到充分地利用，制定的基本路线必须简要清通。除此之外，还需懂得平衡，罗马人的平衡感同样也是出类拔萃的。

如果没有构成全体的每一个个体、乃至核心的确立，综合战略就无法成立。基于这个道理，奥古斯都重新整编了“军团兵”和“辅助兵”。不过，罗马军队的一些传统的名称，即使已经不能再反映现状，名称依旧保留了下来。例如编制已经不是100人的“百人队”（centuria，参照下页图表）。

武器配备：

军团兵
- 攻击武器——投枪（pilum）、短剑（gladius）
- 防御武器——方盾（scutum）

辅助兵
- 攻击武器——弓箭、石弓、长剑，骑兵为长枪
- 防御武器——圆形小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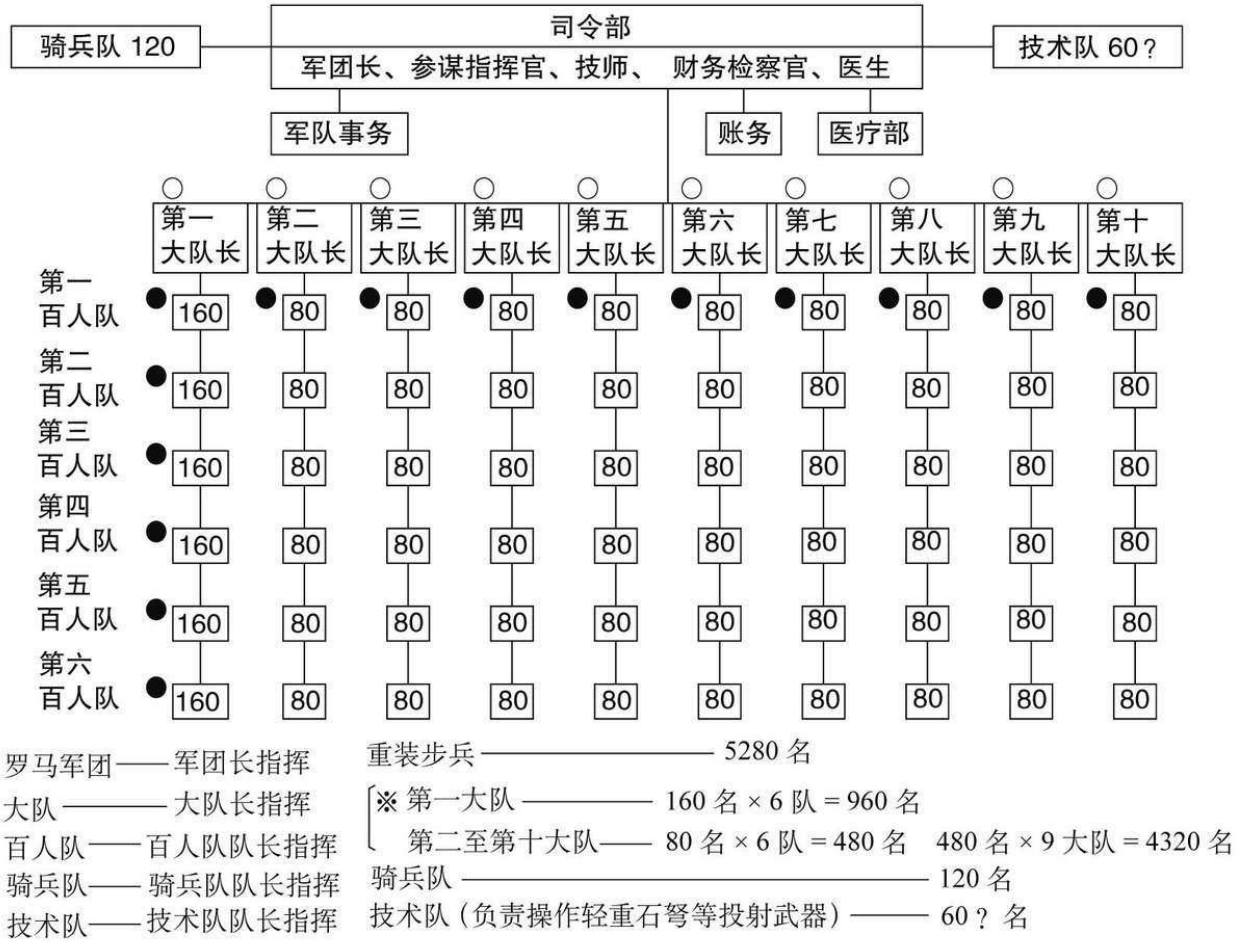
从以上的武器装备可以看出，圆桌骑士以及十字军时代的中世纪的士兵们，不是军团兵而是辅助兵的延续。我想其原因可能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战场上不再有罗马公民存在，因此战术也有所改变。

确立了个体之后，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去制订操纵、驱使个体的综合战略。虽然有着高超的技术，但没有建万里长城的罗马人是用以下的方法完成的。不过我先得声明一下，罗马的防卫线是经过历代皇帝不断的改善才得以最终完成。奥古斯都建立的只是一个基本战略，因此，第169页图只是一个基本的图解，没有涉及各个防卫线的特殊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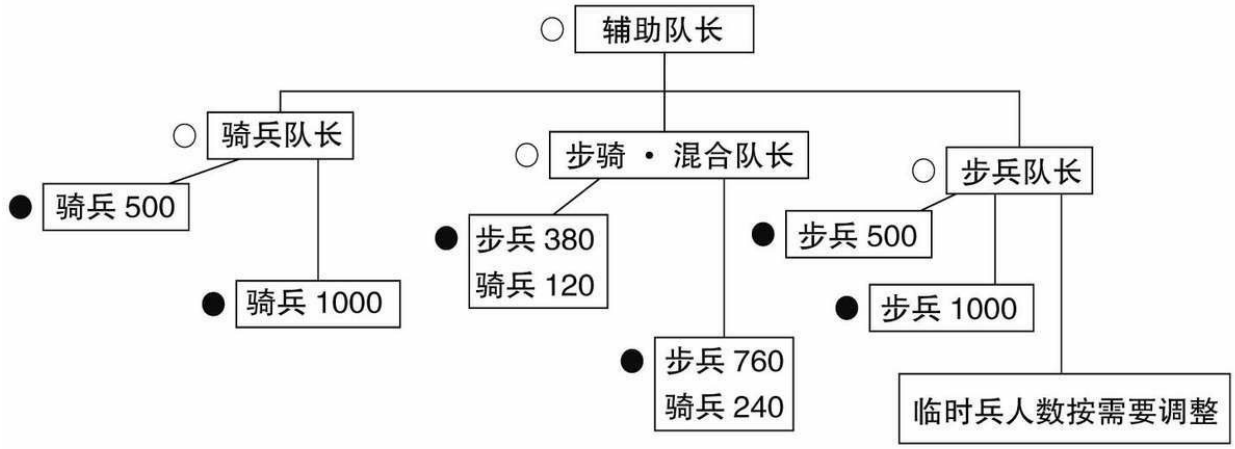
研究罗马历史的研究者们对各个行省防卫线都作了详细的图解，却没有提供基本的战略图。

研究者们撰写的著作针对的基本上是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读者，而像我这种外行，要完全理解就相对困难了。为了便于理解，我自己画了一张图，图虽然拙陋，大致可以呈现出一个基本的概念——当驻守要塞的士兵发现敌人来袭时，他们或升起狼烟发出警报，或驰马传信，向附近的营地通报消息。营地在派出援军的同时，将战情上报军团基地，接到消息的军团也立即出征。由于罗马的道路四通八达，所以军队可以快速地移动。

罗马军团（罗马公民兵，约6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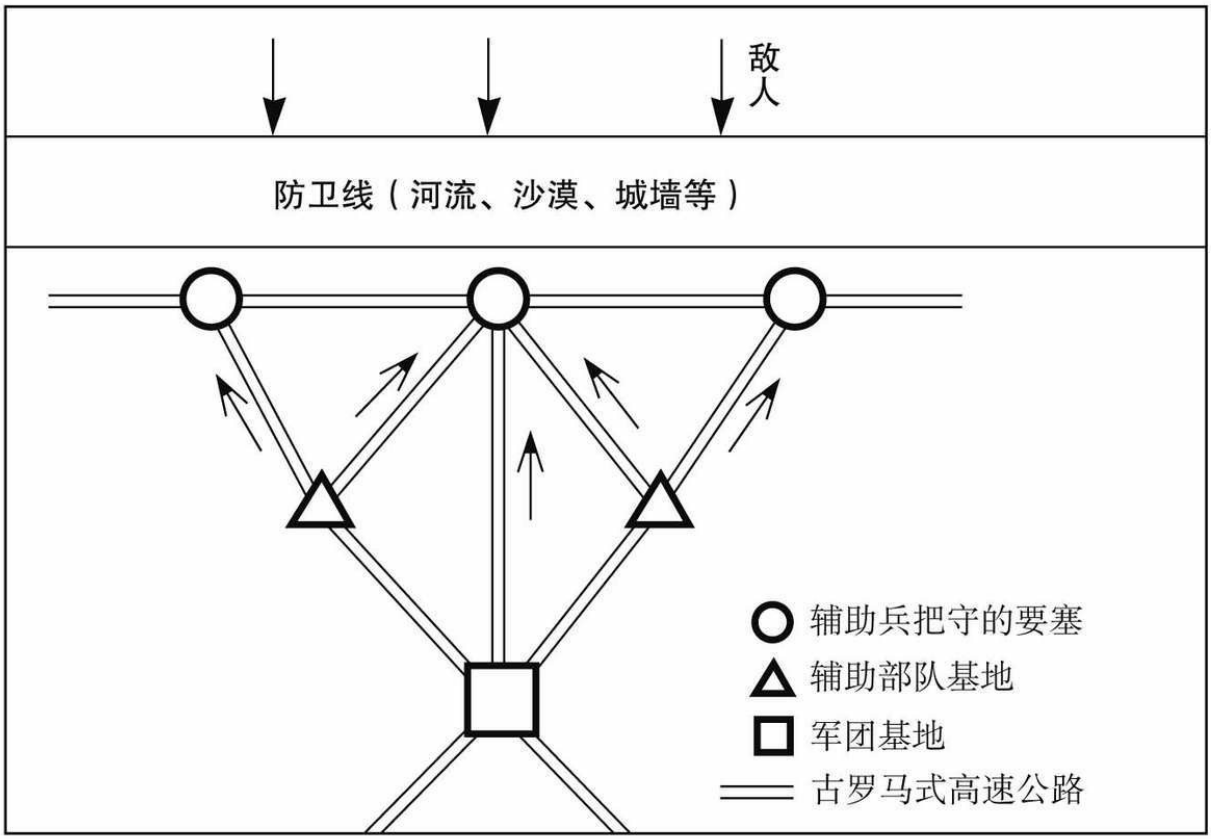


辅助部队（行省兵，4500—6000人）



说明：1. 指挥官级别的将领来自部落酋长的子弟，他们也是行省人，但是多半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2. 财务、医疗由军团相关部门的指挥官协助辅助部队。
○印——有资格参加司令部的作战会议者。
●印——有1个人可以参加作战会议的大队。
（参考Edward N. Luttwak，“6: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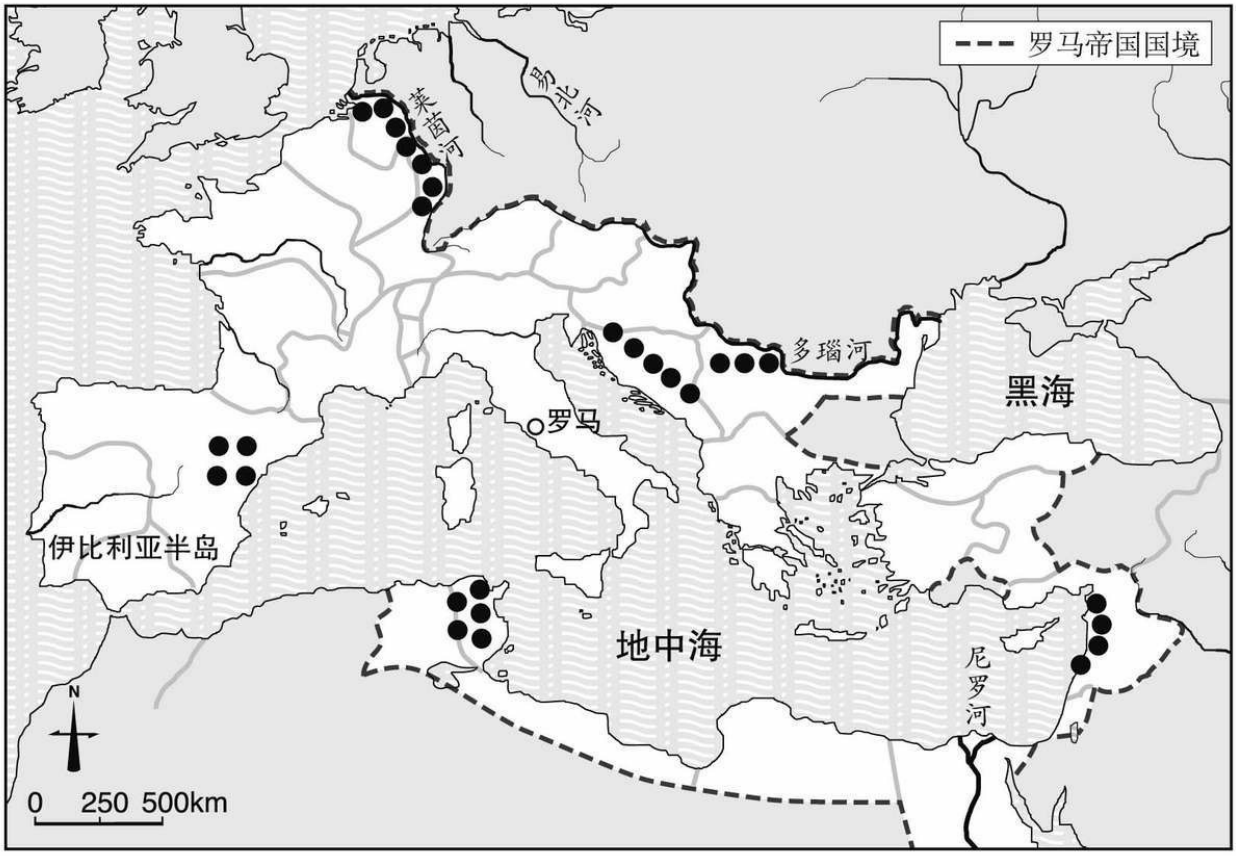


防卫线的基本战略图

步兵的行军速度平均大约是1小时5公里。如果是骑兵的话，一天大概可以飞奔80公里。运载重兵器的马车每小时只能行走1.5公里，因此，凡是有大规模驻扎部队的基地，都备有武器装备，辅助兵也不例外。

以防卫为目的的罗马的军事战略，概括地讲，就是当敌人来袭时，辅助兵作为先头部队予以抵抗，等援军军团兵到达之后，再进行全面的还击。如果敌方的规模很大，周边的军事基地可以派兵支援。

罗马的道路如果全部连接在一起，据说可以绕地球两圈。建设道路网就是为了军事目的。罗马帝国全境内的道路，力求做到尽量平坦、尽量呈直线形。如果遇到河流就架桥，碰到山麓就开山或挖隧道，所有的主干线的道路都铺设良好，排水系统近乎完美，形成了一个两车道宽的道路网。意大利本土的道路建设，尽管建路的初衷是为了用有限的兵力获得最大的军事效果，却同时也带动了人以及物资的交流，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以提高。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境同样也享受到了罗马式道路所带来的收益。



公元9年之前的罗马军团分布图

负责保卫帝国安全的主力军团，一直到公元9年为止，都维持在28个军团。军团的具体部署见下：

除了南部之外的伊比利亚半岛全境——4个军团。

莱茵河下游沿岸——5个军团。

莱茵河上游沿岸——2个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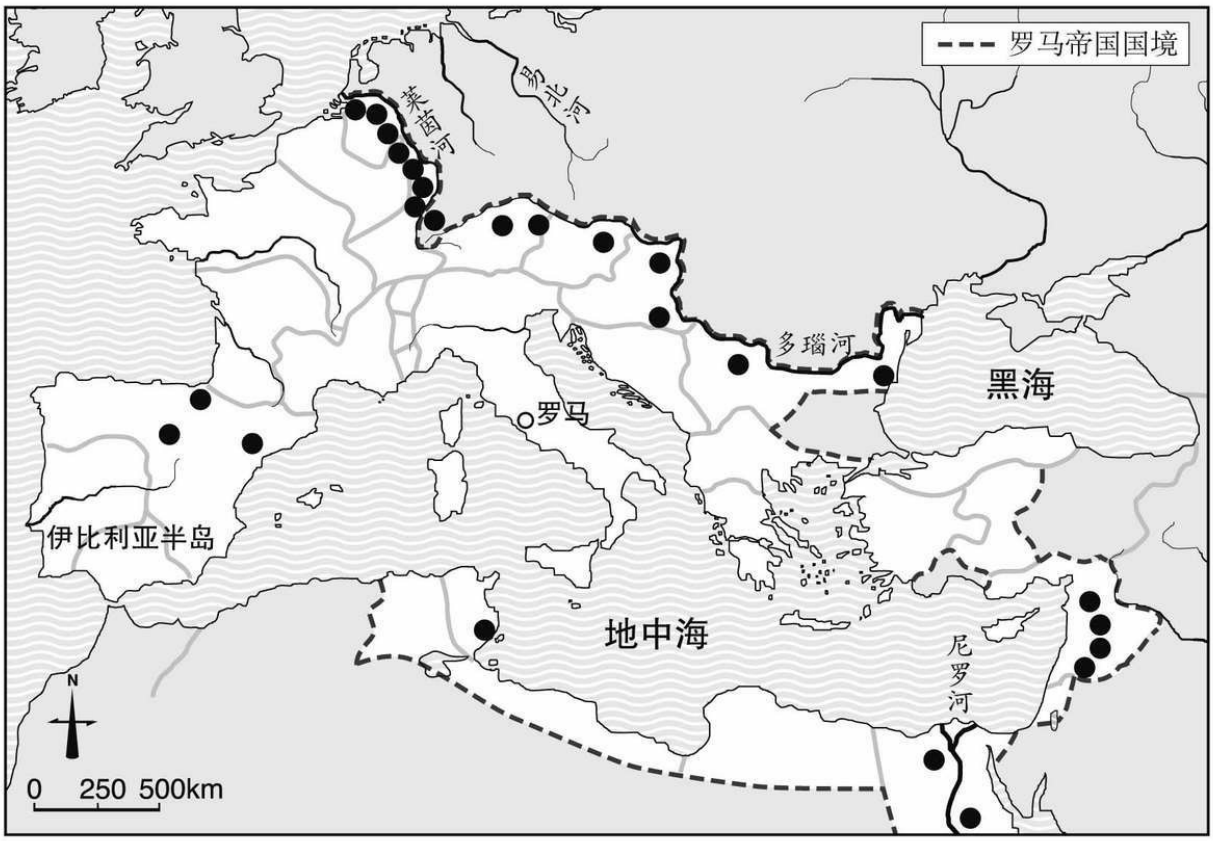
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今属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5个军团。

多瑙河南岸米西亚（Moesia）一带（今属塞尔维亚）——3个军团。

叙利亚行省（今属叙利亚和黎巴嫩）——4个军团。

北非全境——5个军团。

公元9年之后，罗马的常备军团减少至25个军团，军团的部署也随之作出了以下的改变：



公元9年之后的罗马军团分布图

伊比利亚半岛——3个军团。

莱茵河西岸——8个军团。

多瑙河南岸——7个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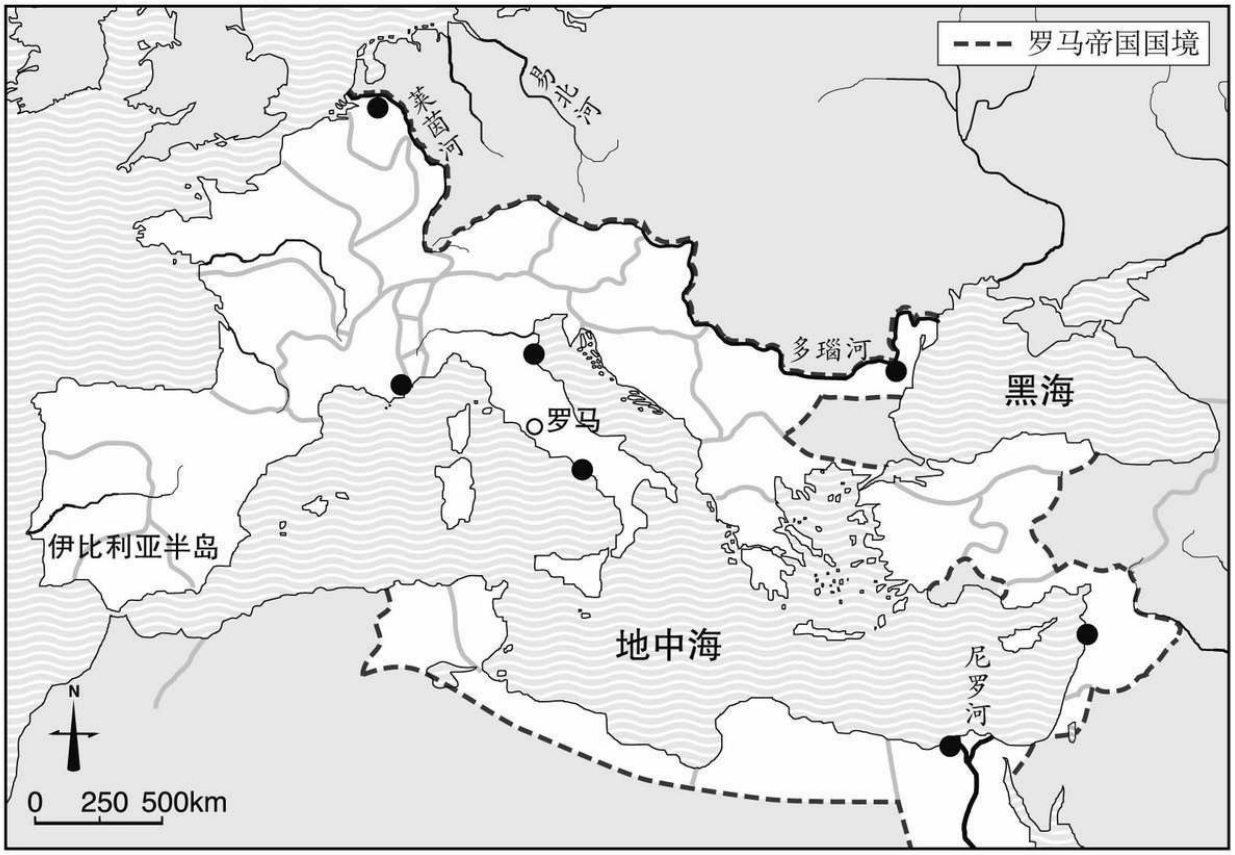
叙利亚行省——4个军团。

埃及——2个军团。

北非（除埃及以及同盟国毛里塔尼亚）——1个军团。

以上就是志愿参军的罗马公民驻守的地区，这也是罗马军团的基本分布状况。当然，军团的配置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每

个地区都会在当地雇用辅助兵。辅助兵的人数与驻守的军团兵基本相同或略少于军团兵。由于是就地录用，所以辅助兵的人种也是各种各样。叙利亚军事基地的辅助兵大多来自闪米特人（Semite），莱茵河基地的辅助兵主要是高卢人以及日耳曼人。我再次强调，这些属于被支配方的辅助兵，在服役期满、退伍之后，都可以成为支配者一方的罗马公民。



罗马海军基地分布图

既然讲了罗马陆地的防卫，就不得不提及海上的军事。军事大国罗马的海军，与其强大的陆军相比，实在是非常弱小。

罗马海军的弱势不能归咎于罗马人农耕民族的本性。罗马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之后，海军的军船大多被当做运输船使用，除此之外，也就是抓获一些偷鸡摸狗的小型海盗船等类似于海上警察的工作。由于地中海地区的陆地部分都在罗马支配之下，所以海上实现“罗马统治下的

和平”比陆地来得更早、更简单一些。

为国家安全的需要设立了陆军常备军的奥古斯都，出于同样的理念，再次反罗马传统建立起了海军常备军。

奥古斯都时代，设有两处罗马海军基地：一处在拉文纳，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另一处则建在位于那不勒斯湾北端的米塞努姆（Misenum，现称米塞诺，Miseno）。除了这两处主要的基地之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以及叙利亚的安提阿的东地中海地区也设有海军基地。而在西地中海海域，南法的法姆·尤里（现弗雷瑞斯，Fréjus）在恺撒时代曾经建成海军基地，因此继续作为军港使用。当然，罗马的军船也可以停泊在法姆·尤里以外的其他港口。在奥古斯都时代，只有拉文纳和米塞努姆两处港口，大型船只能够自由出入，因为运河开凿到了湖泊附近。其他一些小型的海军基地则设在黑海沿岸。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大河沿岸建立海军基地，是在公元之后。

不过，罗马的防御系统始终是以陆地为主、海上为辅。究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罗马人心目中的海上防卫，是将沿海的陆地置于掌控之下。这个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第二，和去一趟临近的城镇都要行舟扬帆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畏惧海洋，就像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正常的罗马人都怕海。”这是他们特有的民族性。

第三，海上航运的时间过长，士兵的健康状况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个时代没有冰箱之类电子产品。

第四，罗马人喜爱计划。如果是陆地行军，以时速5公里计算，一天的行军距离大约在25公里到30公里。只要知道目的地的距离，就可以

计算出行军所需的时间。比如说，从罗马出发去莱茵河防线最大的军事基地科隆，以正常的行军速度计算，65天左右可以到达。罗马的道路堪比现代的高速公路，每隔1罗马里（milliarium，相当于148米）就设有一处距离标志，沿途配备了提供军队住宿以及供应兵粮、更换马匹的各种设施。最重要的是，无论刮风还是下雪，都无须担心行军路线会偏离。

然而，海上行军无法制定出缜密的计划。肆意的暴风雨随时将至，完全不受人控制。海洋考古学之所以在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在古代沉船事故屡屡发生。此外，地中海的风向变化多端。但是古代的船帆制作成了适合于顺风时的四角形，遇到逆风或无风的天气，就完全束手无策。而相当于马达的船桨也存在各种问题。首先，船桨必须靠人工24小时不停地划动，迟早会有“歇火”的时候。其次，如果利用船帆，船速平均每小时可达6海里（knot），但如果只靠人工划桨的话，无论如何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帆、桨并用的加列船（Galley，单层甲板大帆船）之所以能成为地中海的主要船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顺便提一下，中世纪的民族中最热爱而且擅长计划的威尼斯人，也经常使用加列船，不过，他们将船帆改成了三角形。三角帆在逆风中会呈“Z”字形推船前行。

其实，海路其实还是有它的长处的，那就是节约时间。

比如说，军队从罗马去和假想敌帕提亚接壤的叙利亚行省，如果走陆路，首先经由阿皮亚大道抵达布林迪西，再从那里坐一天的船到达迪拉基乌姆；然后从迪拉基乌姆沿着埃格纳提亚大道横穿过希腊，渡过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现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进入小亚细亚；穿过国界，最终到达叙利亚行省的省会安提阿。走完这段行程需要包括陆地124天以及海上2天，总共126天，即4个多月的时间。

另一方，如果从罗马走陆路到米塞诺，然后乘船经昔兰尼加（Cyrenaica，现利比亚）的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以及埃及的亚历山

大港，到达目的地安提阿的外港塞琉西亚（Seleukeia），正常情况下55天可以到达。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的话，大概只需要15天。

以下是乘船去罗马帝国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城市的时间，供给大家参考：

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Ostia）到南法的马赛，最快3天，正常航行时间为10天左右。

从奥斯提亚到西班牙的塔拉戈纳，最少需要5天。

从奥斯提亚到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途中不靠港的话需要7天。

从米塞诺军港到由恺撒、奥古斯都重建的迦太基，最少2天的时间。

从米塞诺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途中经由西西里的墨西拿、昔兰尼加的阿波罗尼亚，通常需要41天，如果顺风，9天即可到达。

从黑海出口的拜占庭（现伊斯坦布尔）到顿河，大约是10天的时间。

以上都是研究者们从古代的各种文献中找到的数据。很明显，海运大大地节省了时间成本，再怎么“正常的罗马人都怕海”，罗马人还是充分地利用了地中海这条海上运输线。他们称地中海叫“内海”，或者是“我们的海”。

不过，在时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罗马人还是会首选陆地。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骑军团从罗马去马赛，如果坐船，只需要10天的时间，若顺风，3天即可到达。而且从距离上讲，走海路是直线，相当于三角形的一边，而走陆地则是三角形的两边相加，等于多出了1倍的距离。

然而，恺撒宁愿选择策马扬鞭在陆地上奔驰，他最终用了12天的时间到达马赛。奥古斯都是罗马人中少数喜欢乘船的人，对他来说，没有比长时间地在马背上颠簸更痛苦的事情了。

在亚克兴角海战之后，运输成为了罗马海军的主要任务。对于海军士兵的要求不像陆军那样严格，除了指挥官必须是罗马公民之外，其余的船员、划桨手等成员不问出身、民族。不过，像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带着枷锁的奴隶在划船的场景，应该属于特例。因为海军的服役时间规定在28年，尽管有关他们的薪酬以及退役后的待遇等，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如果雇用奴隶是罗马海军的常规，就没有必要定什么服役年限了。相对于军团兵的20年以及辅助兵25年的兵役，海军28年的兵役显示了他们的任务比较轻松，社会地位也比前者来得低一些。将海军的地位提升到与陆军的辅助兵同级的，是征服了大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公元50年时，海军的服役年限改为22年，退役之后也有了获得罗马公民权的资格。

海军的提督似乎是从政务官中选出，而非武官出身。像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Mt.Vesuvius）爆发淹没了整个庞贝城的时候，隔着那不勒斯海峡和庞贝城遥遥相对的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就是著名的科学家老普林尼（Pliny，The Elder）。老普林尼在担任海军提督之前，曾担任过高卢、北非以及西班牙行省的监察官，主要负责行省税的征收，相当于国税局所属的地方税务局局长的职位。

禁卫军团

奥古斯都口头上宣布回归共和，暗地里却在为帝政统治精心布局。在他实施的军事改革中，帝政色彩最浓的就是建立了禁卫军团（Praetorian，亦译近卫军）。禁卫军团不同于由奥古斯都奠定、经过历代皇帝不断地完善所建立起的罗马帝国的军队，即作为防御的军事力

量，它表面上是为了保卫没有军队驻守的本土的安全，实际上是维持国内的社会秩序，换言之，是用来抑制反皇派。

禁卫军团有9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1000人，包括了步兵和骑兵。毫无疑问，禁卫军团的9000名士兵都是罗马公民。因为考虑士兵的素质，所以不拘泥于其出身阶级，即便是乡下农民的儿子，也有资格成为禁卫军。

禁卫军的年薪为675第纳尔，是军团兵的3倍。服役年限也比军团兵少了4年，为16年。服役期满后获得的退伍金是5000第纳尔，而军团兵只有3000第纳尔。禁卫军负责担当皇帝在首都的警卫，皇帝出行前往行省时也会带一部分禁卫军随行，因此禁卫军的军服非常华丽，可谓是罗马军之“花”。

如果能当上禁卫军的指挥官，之后的仕途就等于得到了保证。退役之后，可以稳稳地坐上元老院行省的监察官或者皇帝行省的长官（praefectus，亦译执法长官）的位子。因此，加入禁卫军是那些地方出身、社会底层人们的梦想。禁卫军团的总指挥是阿格里帕，另外还有两位担任实际指挥的长官，他们来自骑士阶级。奥古斯都挑选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担任指挥官，其意图很明显是为了抗衡元老院。元老院中至今还有不少共和体制的支持者。两位长官之下，每一个大队还有一个大队长（tribunes），到了大队长官阶就没有了任何的阶级限制。罗马军队改革的实际执行人阿格里帕来自地方低层阶级，因此，罗马军彻底奉行了能力主义。

禁卫军团创建于公元前27年，那时奥古斯都刚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他的此项提案立刻得到了元老院的批准。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奥古斯都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对于会让人联想到帝政、引起元老院猜疑的事情，他一向是慎重小心。禁卫军的9个大队中，驻守首都的只有3个大队，没有专门的军营。其余的大队则分散在本土的各地。到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时代，整个禁卫军团全部驻守首都，并且建造了

大规模的军营。经过了奥古斯都40年的统治，元老院对于帝制的过敏症日渐消退，准确地说是他们放弃了坚持。

禁卫军军营（Castra Praetoria）的旧址，现在也是军营，名称也叫Castra Praetoria。古代的军营通常会有很多的雕塑，如果加以发掘，在考古学上一定颇有收获，意大利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物尽其用让它们继续发挥原本的功能。军营的附近是罗马大学，罗马大学在古代就接收了很多来自各个行省、学习罗马史的留学生，如今，仍然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学习。我曾经和一位考古学系的学生谈及挖掘遗址的问题，他对我说："这样的话，整个罗马都得翻起来挖一遍。"的确如此，现代的罗马正是建立在古罗马的遗址之上，所以也很难建地下停车场。因为它的地下一层，就是古罗马的地上一层。

税制改革

无论什么事业，如果不能确保财源就无法持续。奥古斯都在建立了常备军的同时，又设立了常用的军事防御经费。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新设目的税，从而推行了税制的改革。

奥古斯都实施的改革，持续了300年，成为了罗马帝国既定的税收制度。

奥古斯都实行的税制改革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行省人民）
直接税	没有直接的收入税 解放奴隶税5% 遗产税5%	地租税或行省税 税率为收入的10% （服兵役的行省人民免直接税）

间接税	关税1.5%—5%（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征收25%关税） 营业税1%

行省居民缴纳的地租税，其实就是资产税，在那个时代人民的资产就是土地。按照现代的理念，征收土地税相当于征收生产力税，即人力税。在古罗马，地租税称为“sutipendiumu”，直译的话就是“薪酬”，是没有参军义务的行省居民支付给担负国家保卫任务的罗马公民的薪水，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安全保障费”。因此，对那些参加辅助兵的行省居民，是不征收地租税的。

“解放奴隶税”是针对罗马公民的一项税赋，它在罗马还没有拥有行省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在现代人看来，向赎身的奴隶征税非常之不人道，然而站在古罗马人的角度，从不需要纳税、参军的奴隶，成为负有从军、纳税义务的自由公民的标准，就是需要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维持日常的生活。如果任意解放没有经济能力的奴隶，将会给社会增加大批的无产阶级。因此脱离奴隶身份成为自由人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缴纳相对于“解放奴隶”市场价的5%的税。相对于免费赠送，人对自己花钱所得的东西，往往会更加珍惜。

在“百分比”只有概念没有专门词语表达的那个年代，这个税的正式名称叫“解放奴隶二十分之一税”（vicesima libertatis），即有自立的生活能力、能支付市场价5%税金的奴隶，有资格获得自由。有3万塞斯特斯铜币的资产（相对于军团兵退伍金的2.5倍）、并且有孩子的解放奴隶，还可以成为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解放奴隶的税金实际上大多是由奴隶主代付，以感谢他们长年忠诚的侍奉。赎身后的奴隶如果之后有了经济能力再还给主人。因此，“解放奴隶税”可以说是向奴隶主征收的税金。

我们曾经介绍过间接税在奥古斯都实施改革之前就存在。这个叫做“portoria”的税，我只能译为“关税”，或者按照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港

湾税”，指的是设立在河岸、海港的海关，对经过此地的货物征收的税金。考虑到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帝国全境并没有实施统一的税率。经济不发达的高卢地区为1.5%，属于罗马本土的意大利半岛是5%。另外，对于那些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和宝石等奢侈品，则征收25%的关税。

为了逃避罗马的关税，利用霍尔木兹（Hormuz）海峡进入阿拉伯湾，通过陆地前往地中海地区的走私贸易日益活跃。季风现象发现之后，又多了一条走私的途径——利用季风，从印度往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由此前往非洲，再一路北上抵达地中海地区。请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奥古斯都引以为自豪的关税制度会因此名存实亡。事实上，伴随着奢侈品需求的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经济体。而在罗马军队保护圈之外的走私贸易，除了有遭遇沙漠强盗袭击的危险之外，还不得不向一些不在罗马掌控之下的小部落支付类似于买路钱的额外的费用。因此，它没有机会发展到可以威胁正规贸易的规模，它不过是在罗马帝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之下，实际存在的一种贸易形式。

四处设置海关、征收关税，是否会妨碍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经济体的发展呢？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研究者们的考证，帝国全境内设有10处海关。在罗马尚未拥有行省、各部落割据一方的时代，他们巧立名目索取的各种通行费的金额，要远远高于海关所征收的税金。罗马统治之后，收取税金的次数反而减少，而且税率也是有一定规定的。

第二，罗马中央政府大兴土木，建设了道路、港湾等公共设施，带动了通商量的增加。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了便于重型武器的搬运，罗马的道路都尽量铺设得又平又直，货车的载运量因此也得到了提高。大家想象一下，卡车在田间小道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的不同状况，就能够理解道路对于运输的影响。另外，“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仅减轻了人民对于外敌侵袭的忧患，而且消除了国内山贼、海盗的威胁。

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安全上的保证。

第三，随着大罗马经济圈的形成，也带动了那些原本无法满足自给的落后地区的经济。这些地区可以生产其他地方所需的产品，然后通过出口来换取自身所需的物资。这就是统一经济圈的好处。物流量增大，意味着做大了分享的饼，5%关税的负担相对就变轻了。

除了奢侈品之外，将税率的上限定在5%，这意味着罗马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在欧盟诞生2000年之前，罗马人就建立起了一个从欧洲到北非以至中东的经济体，而且是以信用良好的罗马货币作为经济体的基本货币。

和关税一样，“营业税”也是罗马人和行省居民都必须缴纳的间接税之一。为了准确地翻译这项税种，我曾经向一位日本的税务专家咨询过有关的问题，他告诉我其实就是消费税。不过将“百分之一税”（centesima）翻译成消费税感觉似乎太现代了，商议的结果，我们认为还是译成“营业税”比较妥当。“百分之一税”税如其名，无论什么物资，税率统一定为1%。“唉，只有1%！”我在惊叹之余，向这位日本专家问及他对古罗马税制的感受，这位就任于财政厅、只关注于财政赤字多少的官员无言以对。顺便提一下，现在的意大利，这类税的税率是19%，因此意大利人逃税的热情不亚于他们对足球的热情。

营业税的征收究竟是起源于共和时期，还是由奥古斯都新设立，目前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将之固定为目的税的是奥古斯都。其目的是为了贴补国防费用，因此，也不妨将它意译为“安全保障费”。

从不分罗马人或是行省人统一课征的这项“百分之一税”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都对国防军费的定义。作为帝国全境的防御费用，哪怕税率只有1%，身处统治一方的罗马人也必须和行省人民共同承担这个义务。要达到社会的公平，当然应该如此。奥古斯都的理念又促成了遗产税（亦译继承税）这个在古代绝无仅有的新税种的创立。

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就是奥古斯都时代之前的200年间，一直享受着免收类似于收入税的直接税的待遇。公元前2世纪，正是罗马征服了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霸权势力向整个地中海地区扩张的时期。征服者负有保卫被征服者安全的义务。当时罗马的兵役制度是建国以来一直保持的征兵制。兵役期通常为1年，现役军人年龄规定在17岁以上到45岁之间。危急情况下，60岁以下的男子也要作为预备役军人。因此，罗马公民一生当中，一定会轮到一次兵役。随着罗马霸权的日益扩张，罗马公民从军的必要性在逐渐地增加。财政上因为有行省税收入，不再需要另外征税，所以，罗马公民一直是以服兵役的形式来取代纳税的义务。

公元前2世纪末期，马略施行了军事改革，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由于免税是鉴于财政上的理由，因此即使军制有所变化，罗马公民享受免缴直接税的待遇并没有改变。

到了奥古斯都时代，虽然保卫国家的主要责任还是由罗马公民承担，但是行省居民也被允许以加入辅助兵的方式来负起保卫国家的职责。这种形势下，那些不从军的罗马公民还可以继续免税，就有欠公平了。因为营业税是作为军事防御费的开支，向罗马本土以及行省一并征收的，所以为了修正税制上的不公，新设立的直接税只限于罗马公民。

不过，行省居民缴纳的地租税就不能再向罗马公民征收。尽管征兵制改为了志愿兵制，保卫国家安全的主力军仍然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兵。何况，要作为统治者一方的罗马人和被他们征服的行省人缴纳同等的税金，势必会有抵触情绪。毕竟罗马人享受了200年的免税特权。其实，不服兵役就应该尽纳税的义务，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不过，这世上能够理智思考的人永远是少数。鉴于以上的理由，奥古斯都煞费苦心地创立了一个在古代前所未有的新概念——遗产税。遗产税的特点如下：

第一，它前所未有，没有可对比性。

第二，不是固定每年都需要支付。

第三，它是在人们接受遗产时才支付，所以获得遗产的喜悦可以稀释对缴税的不满情绪。

第四，它专用于安置退伍军人，纳税人难以反对。

第五，它的税率正如其正式名称“二十分之一遗产税”（vicesima hereditatum）所示的是5%，低于行省居民的10％的税率，保全了霸权者罗马市民的面子。

第六，如果继承人是死者六等亲以内的亲属，则免税。古罗马人向来有将财产留给血亲以外的人的习惯，像是知心好友或者是尊敬的人等。因此，免税范围扩大到六等亲，也不会有无税可收的担忧。

奥古斯都本人也接受了他的生死之交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以及其他人的遗产。

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的丈夫，因此，奥古斯都接受阿格里帕的遗产无须缴税。而梅塞纳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按规定，奥古斯都需要支付5%的税金。梅塞纳斯一生从未担任过公职，始终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奥古斯都，死后他又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

尽管经过反复推敲，奥古斯都在正式推出“二十分之一遗产税”时，还是小心翼翼。无论古今中外，推出新税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他在《功业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 公元前30年以及公元前14年，为了给退伍军人购买土地，我向意大利境内的各个地方自治体支付了6亿塞斯特斯的土地费。为了那些居住在行省的退伍军人，我在行省购买土地的费用是2.6亿塞斯特斯。

从上文可见，退伍军人的退伍金，一直到公元前14年为止都是以发放土地方式支付的。退伍金改用现金支付，是在公元前14年之后。有关这个变化，《功业录》里也有所记录：

> 公元前7年、前6年、前4年、前3年以及前2年，服役期满返回各自希望的居住地的军人的“退伍金”（拉丁文是赐予忠诚、尽职者的赏金之意）是用现金支付的。金额达到4亿塞斯特斯。

无论是购买土地的费用还是现金，退伍军人的安置费应该是从奥古斯都所属的皇帝行省的行省税以及其他间接税中支出。皇帝行省属于需要军队驻守的边防地区，同时又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税收低于经济发达的元老院行省，可是军费开支又远高于元老院行省。奥古斯都一贯主张保卫帝国的安全是全民的义务。他在《功业录》中有过这样一句叙述：“我曾经4次用我个人的资金支援国库，其金额为1亿塞斯特斯。”

皇帝行省的国库，经常出现财政赤字。每次发生问题，奥古斯都就自掏腰包来填补缺口。接着上文，《功业录》的下文是：

> 公元6年，根据我的提案，建立了军用资金制度。从那以后，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就从这笔资金中支出。这笔资金中也包括了我捐献的1.7亿塞斯特斯。

所谓的军用资金，就是指公元6年设立的遗产税。自此，退伍军人开始第二人生的财产来源，既不需要挪用皇帝行省的国库，也不需要依靠皇帝的私财相救，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的方式得以常规化。

在制度推进的过程中，奥古斯都采用的手法耐人寻味。当国库空虚时，他首先拿出个人的资金来填补不足。待遗产税设立确保了财源之后，他再捐赠1.7亿塞斯特斯的巨款，压下了那些反对的声音。为了确

立退伍金的财源，奥古斯都用了整整24年的时间，而且他还贡献了巨额的私人财产。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奥古斯都是一位深谋远虑的统治者。不过，在那个胜者为王可以占有一切，而败者甚至连人身自由都会失去的时代，奥古斯都的这个要求胜利者保护失败者的新税制度，在实施中遭遇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不知是不是税率是用分数显示的缘故，分数计算是古罗马小学的重要学习科目。与奥古斯都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曾经写过一段有趣的文字：

> 罗马的小学生连十二进制这么复杂的计算都能掌握。有一位老师问学生："阿尔卑努斯的儿子，十二分之五减去十二分之一是多少？你回答我。"
>
> "是三分之一。"
>
> "回答得真棒！你长大了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资产运用者。那么，十二分之五加十二分之一又是多少呢？"
>
> "二分之一。"

和国家的规模相比，罗马帝国的税务人员的人数非常之少。这不知是源于儿童时期良好的基础教育，还是因为税制本身单纯明了，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人力，而且也没有设立专门对付逃税漏税的部门。罗马帝国所有的税率都定在1%到10%之间，这在后世看来是一个相当低的税率。我个人认为，当直接税上升到10%、间接税至5%的时候，纳税人才会开始热衷于避税、节税。

古罗马税制的特征是以总收入来计算，而不是扣除所需开支后的净收入。这种方法直到不久之前仍被普遍使用，可见它是税赋制度的基础。因此我不称它为"所得税"（日本人的所得税，指扣除开支后的净收入。——译者注），而是称它收入税或收益税。不计算净收入，单纯按

照总收入课税，是罗马税制简单明了、防止税务部门肥大化的主要手段。相反，现代的税收制度，则是钱用得越多，税反而缴得越少。这真的很合理吗？如果多花钱能少缴税，人们都会热衷于消费，结果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何况，不是任何的产出都能当做成本的。比如说去美术馆观赏奥古斯都的雕像，如果要计算成本的话，可能就是一张门票的价钱，而因观赏历史文物所产生的各种联想是无法计算的。

公元前12年，建设了一年的和平祭坛正在制作各种浮雕。奥古斯都生平最高杰作“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进程也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年，51岁的奥古斯都失去了他生涯中最亲密的朋友、伙伴阿格里帕。

阿格里帕

这里，我们重新回顾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的一生。

阿格里帕出生于公元前63年，死于公元前12年。他是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最重要、最忠心的协助者。阿格里帕17岁时被恺撒选中，派到屋大维（奥古斯都）身边。那时，恺撒已经秘密地将屋大维指定为他的接班人，恺撒希望通过阿格里帕来弥补屋大维欠缺的军事才能。事实上，奥古斯都战场上所有的胜利，都是靠阿格里帕获得的。

阿格里帕出身于意大利地方上一个普通的家庭。对他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罗马军团，因此也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阿格里帕并没有为此感到自卑，他有着十分健全的精神状态，而且将这份健全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没有阿格里帕的战略眼光以及他领导下的罗马军团，联结前线辅助部队基地与主力部队大本营以及各条道路的罗马防卫网是不可能达成的。古代称做“克劳狄娅·阿格里皮娜”（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的现代德国的大都市科隆的兴起，正是源于阿格里帕

曾在那里建立过军事基地。

由古罗马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现代都市科隆

阿格里帕建立的罗马防卫网不仅在西方，甚至延伸到了东方。鉴于

东方世界高度发展的文明，阿格里帕的东方战略中，也包括了修复雅典神殿以及重建耶路撒冷的犹太神殿。由恺撒设想、奥古斯都实施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一个包容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多元化社会。阿格里帕即使没有理解希腊语的学识，还是完全能够领会两位指导者的意图。对于古罗马人而言，希腊语是衡量一个人出身、教养的标准，据说奥古斯都也不擅长希腊语。不过，在向东方各领地发布罗马中央政府公告时，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都没有强行使用母语拉丁语，而是让人将公告翻译成东方世界的通用语言——希腊语。

为了帮助实现奥古斯都的理想，阿格里帕奉献了他一生的精力。两人不仅在军事上取长补短，在建筑上的合作也是完美无缺。

罗马市中心的古罗马广场是由恺撒规划、奥古斯都接手建设而成的。阿格里帕负责了位于广场北部马尔斯广场的修建。广场的西面是蜿蜒流淌的台伯河，广场内建有庞培剧场和环绕剧场的大回廊，以及向贫民配给小麦、被称做“公共馆”（Villa Publica）等各类公共建筑。这里起初是士兵的操练场，到了共和时代末期，逐渐发展为罗马市中心的一部分。马尔斯广场位于罗马共和时代的护城墙塞尔维乌斯城墙（Mura Serviana）的西北面，最初修建马尔斯广场时，在距离围墙以南三分之一处停了下来。之后，恺撒将广场再往城墙以北扩大了三分之一，以这一带为中心，建造了尤利娅选举会场。会场由巨大的圆柱组成，高300米、宽120米。我个人认为，城市计划不应该由某个领导者独断专行、按照个人的想法来规划。政府负责兴建主要的场所，周边则交给民间自行开发，这样的城市才会更合理、更人性化。

奥古都斯时代的马尔斯广场内的公共建筑

马尔斯广场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南面的核心建筑是庞培兴建的庞培剧场以及围绕剧场的巨型回廊。北面则是奥古斯都所建的大日晷以及元老院决定建设的和平祭坛。阿格里帕负责的是广场中心的部分。阿格里帕首先完成了因恺撒之死而中止的尤利娅选举会场的建设。工程完成之后，按照恺撒的遗愿，将这里定为公职选举的会场。选举以外的时间，则是市民休闲的场所。

阿格里帕在尤利娅选举会场的西面建造了神殿。神殿奉献给所有的天神，因此命名为“万神殿”（Pantheon）。万神殿在哈德良皇帝时代曾经经过改造，它是目前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下来的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在万神殿的南面，阿格里帕建造了历史上最初的罗马公共浴场——阿格里帕大浴场（Thermae Agrippae）。浴场内不仅有浴室、按摩等设施，还建有体育场、读书房以及象棋室。阿格里帕邀请了希腊的艺术家，为浴场画上美丽的壁画、塑造了壮观的雕像。为了浴场的供水需要，专门建设了一条少女水道（Aqua Virgo）。少女水道的上水道如今是以特雷维喷泉（Fontana Di Trevi）为首罗马城中各种喷泉的水源，它是古罗马供水系统的10条水道中，经过修复后，唯一一条现在仍在使用的水道。罗马街头有很多饮水口供市民使用，有的饮水口上还饰以雕塑，从那里24小时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水，也是来自这条少女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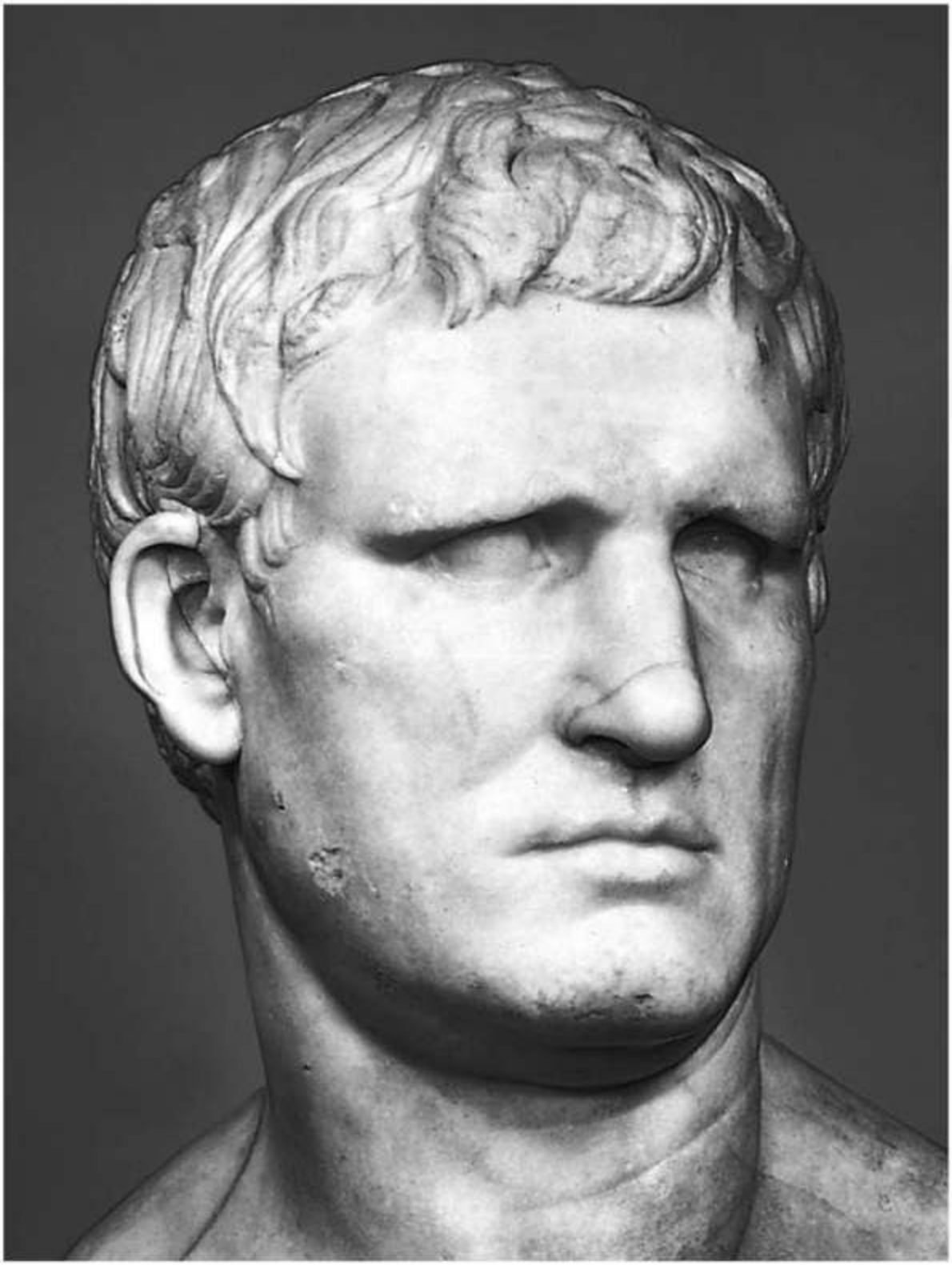
在大浴场的西面，建有阿格里帕人工湖，湖边绿树丛林，这一带的石建筑群很多，因为有绿树的柔和，整个环境显得非常温暖、宁静。

阿格里帕在万神殿的东北部建了一条维普萨尼娅回廊（Portico Vipsania），回廊的墙壁上镶嵌着阿格里帕制作的“世界大地图”。地图的制作显示了罗马人“汝欲得之，必先知之”的理念。

阿格里帕留下了很多的公共建筑，但从来没有发现他的私人建筑。他的私宅、别墅的所在地至今无从考查。也许他对敛财聚宝完全不感兴趣。

阿格里帕建造的公共建筑，不仅在罗马以及意大利境内，甚至遍布了帝国全境。如果要将它们一一列出的话，得写上好几页，我这里就以一例做代表。在现在法国南部尼姆有一座嘉德古桥，全长370米，高48米，它是为尼姆居民提供水源而建的饮水桥，桥上铺设有人行道。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的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这是古罗马人留下的遗迹，他们深信这样的桥绝非人类所为，是恶魔之作，因此嘉德古桥也常被叫做“恶魔桥”。当然，它不是什么恶魔的作品，它是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9年建造的。

阿格里帕肯定没有读过斯多葛派（Stoa，或称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书籍。但是他一生为公共事业所作的贡献，正体现了斯多葛哲学提倡的“公共服务精神”。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或许他是希望在死后仍然能够为公共事业添砖加瓦。



阿格里帕

在我看来，阿格里帕之所以热心于建造公共建筑，并非是来自奥古斯都的指示，也不是他与生俱来就有着斯多葛学派所谓的公共服务精神，他是真心喜欢建筑。出身卑微却能有机会主管建造国家公物，这让他感到荣幸和幸福，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召集建筑人才，甚至连奴隶都没有遗漏，组织起了一支优秀的技术团队。奥古斯都在阿格里帕死后接收了这支团队，解放了其中的奴隶，将他们的地位提升至骑士阶级，并且以他们为中心成员创立了“公共事业部”。

阿格里帕对奥古斯都的忠心，不仅在公事上，私事上也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当年奥古斯都的外甥兼女婿的马萨鲁斯突然去世，身后没有留下孩子。为了延续血缘，奥古斯都令阿格里帕离婚，与他的独生女尤利娅再婚，阿格里帕唯命是从，他和尤利娅生下了三男二女（其中有一个是在他死后出生的遗腹子）。欣喜万分的奥古斯都为两个外孙分别取名为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鲁基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收为养子。奥古斯都希望外孙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因此让他们继承了本家恺撒的姓氏。阿格里帕去世时，盖乌斯8岁，鲁基乌斯才5岁。

然而，公元前12年51岁的奥古斯都和他的一个8岁、一个5岁的继承人之间的年龄相差甚远。自外孙出生之后，奥古斯都似乎就在考虑在孩子成人之前，先让这位既是忠实的助手又是女婿的阿格里帕做他的继承人。当时，奥古斯都向元老院提出申请，希望赋予阿格里帕和他本人同样的两项特权。特权之一是军队的“绝对指挥权”（Imperium），之二是包括了拥有政策立案权以及人身不可侵犯权的“护民官特权”。此外，奥古斯都还要求元老院准许阿格里帕和“第一公民”也即他本人同时出席“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元老院批准了奥古斯都的这些申请。

奥古斯都认为要让继承人顺利继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地广而告之，让大家清楚地知道谁将成为未来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将阿格里帕的地位从他的助手提升到共同统治者，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尽管两人同龄，不过奥古斯都天生体质虚弱，40岁时曾经患上严重的疾病，意大利全国的人民为此向天神祈祷保佑他的平安，当时连奥古斯都自己都觉得难逃此劫。没料到，一向身体强健不知病痛为何物的阿格里帕竟然会先自己而去。奥古斯都一直以为阿格里帕会比自己长寿，会接替自己的位子，然后再把皇位传给来自他们两人血缘的盖乌斯或者鲁基乌斯。就像坚信阿格里帕的友情和忠诚那样，奥古斯都从来没有怀疑过阿格里帕的健康状况。

阿格里帕是在那不勒斯去世的。奥古斯都在罗马闻讯阿格里帕病危时，平时不爱骑马的他快马扬鞭赶往当地，结果还是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信赖无间的朋友就这样突然之间离自己而去，从此，奥古斯都失去了从17岁开始，30多年来始终在他身边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亲密伙伴。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体质虚弱的奥古斯都会比阿格里帕长寿？

统治国家的工作，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一个繁重的劳动。特别是奥古斯都一面冠冕堂皇地打着共和体制的招牌，一面又暗中筹谋实现帝制，这其中的精神压力不是常人所能承受，而且他天生就有消化系统的毛病。

虽然体质不佳，奥古斯都对自己的健康却不怎么在意。尽管他非常厚待那位治愈了他重疾的希腊医生，不过他并没有专门的随从医生。他吃东西不讲究，感觉饿了就吃，常常是吃了一堆的零食、点心，到了正餐的时间，反而什么也不吃了。他在招待晚宴上也经常这样，完全无视礼仪。

根据史料记载，奥古斯都的口味非常平民化，喜爱简单质优的食物。家中用餐，只要有烤面包、奶酪、水果和蔬菜，就心满意足。奥古斯都平时在哪儿用餐，又吃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一些信件中，窥见一斑：

“我在车里吃了点面包和一些枣椰子。”

“从大会堂（basilica）返家的途中，在轿子里吃了面包和葡萄。”

奥古斯都似乎是不饿不吃。

“亲爱的提比略，我今天比安息日的犹太人吃得还要少。我胃里只有两片面包，那是在黄昏入浴前，按摩完身体后吃的。”

他经常是吃一片经水泡过的面包、一块西瓜和几片生菜叶就对付过去。他从来没有豪饮葡萄酒的习惯，这倒不是出于健康上的考虑，而是他的胃难以负荷。

古罗马人没有午睡的习惯，奥古斯都却经常会穿着衣服和鞋子，随便找个东西或者直接用手遮住眼睛，躺下小憩一会儿。和他吃东西一样，感觉疲劳了，不管何时何地立刻躺下休息。奥古斯都不爱骑马，喜欢坐轿子。因为躲在帘子后面睡觉不怕被人看见。

奥古斯都的睡眠时间很不规则，犯困了就躲进轿子里打个瞌睡；晚上睡不着就改白天睡，即使旭日高升也照睡不误，完全违反了罗马人日出而作的传统习惯。

奥古斯都似乎很不擅长早起。国家经常会举行献祭仪式，这种时候必须早起。作为大祭司的奥古斯都完全是靠着一份责任感，勉强地从床上挣扎起来。说不定他有低血压的毛病。

奥古斯都既怕热又畏寒。只要北风一起，他就披上厚厚的托加，里面穿4件短袍，袍子里面是毛质的衬衣，衬衣里面再穿一件棉质的内衣。托加盖不到的小腿裹上绑腿来御寒。既然这么怕冷，干吗不像高卢人那样穿裤子呢？在那个时代，裤子是北方蛮族才穿的服装，文明的罗马人穿了有失面子。恺撒在和北方蛮族打仗的时候，始终穿着露出手臂和腿的罗马军服。这一点，奥古斯都又和恺撒不一样。

到了夏天，他不是打开卧室的房门睡觉，就是把床搬到庭院里。结果不是因为风吹多了着了凉，就是被太阳晒得头痛不止。不过他没像女士那样撑一把伞来遮阳挡风，在古罗马人心目中，美丽的伞是他们蔑视的东方君主用的玩意儿。

不管奥古斯都的生活规律如何无常，他终究还是比阿格里帕多活了26年。这大概就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吧。

讲到健康的问题，不禁让我联想到奥古斯都在战场上无能的表现，这会不会和他身体虚弱有关呢？

在战场上，看到敌人射过来的箭，他可能会认为这全是冲自己来的，看到剑，就感觉都是刺向他的。有了这种恐惧，还怎么调兵遣将、冲锋陷阵呢？人的恐惧心理是一种无法用常理来分析、解释的问题。不过，恺撒和阿格里帕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奥古斯都对暗杀的防范可以说是做到了密不透风。每次去元老院，总有10位牛高马大的同派议员将他紧紧地围住，不允许他人走近。如果死了，所有的事业都将随着生命而中止，这是他从恺撒被暗杀中得到的教训。除了作为政治家担心事业毁于一旦，奥古斯都害怕暗杀也有着身体上本能的反应，一想到短剑刺进自己身体里的感觉，那种生理上的恐惧和厌恶挥之不去。

恺撒还真有眼光，竟然选了一个和自己如此不同的人作为接班人。不过，当年同庞培的儿子决战的时候，17岁的奥古斯都咬紧牙关跟着部队翻过了险峻的西班牙山岭。恺撒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份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意志力。也正因为如此，恺撒才会将阿格里帕派到他的身边来弥补他不善战事的一面。

除了打仗，恺撒拥有的才能中，还有一项也是奥古斯都有所欠缺的。这方面的不足，他依靠了另一个人的帮助。奥古斯都在失去阿格里

帕4年之后，又失去了这位朋友。

在《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的卷首中，除了记载了后世对恺撒的评价，我还引用了意大利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里的一段文字：

> 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五种特质：智慧、说服力、忍耐力、自控力和坚强的意志。唯有恺撒拥有全部的特质。

那么，奥古斯都又怎么样呢？

首先，在“坚强的意志”方面，毫无疑问他可以得100分。

其次，“自控力”，如果称之为克制力，那么奥古斯都可以拿满分。

至于“忍耐力”，尽管先天不足，奥古斯都平安地活到了70多岁，如果把耐力折算成寿命，那么奥古斯都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统治者必备的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项：“智慧”。

智慧不是指拥有多少学识或者多高的教养，它是一种洞悉力。它可以看清大多数人不愿去面对的那些现实问题，而且在看清之后，懂得如何去尽善解决。换言之，缺乏创造性的辨别力，不能称做智慧。

即使是共和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赞扬恺撒有着神一般的智慧。近代的史学家蒙森（Mommsen）则称恺撒是罗马历史上唯一一位创造性的天才。奥古斯都在完成目标这点上可算做天才，树立起明确目标的却是恺撒。如果说创造力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么给奥古斯都打80分比较妥当。

奥古斯都的问题在“说服力”上。所谓的说服力是指说话者通过著文或者演讲去说服受众的能力。换言之，它是一种以语言为武器、化敌为

友的能力。要做到让对方心服口服，取决于表达的内容及其方式。这方面，奥古斯都能得多少分呢？

我简称为《功业录》的《奥古斯都功德碑》是奥古斯都亲自撰写的唯一一部大事记。作为罗马帝国开国皇帝的遗文，《功业录》可算做最珍贵的历史资料。然而，据我所知，有关罗马史的学术著作中，没有一本介绍过《功业录》的全文。最早对《功业录》作学术性介绍的是蒙森，研究罗马史的人大概都读过他的著作。然而普通人不太可能去接触那么厚重的学术作品。不少欧洲的研究者都写过非常优秀的传记，在这些针对一般大众的作品中也没有见到过《功业录》的全文介绍。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岩波文库出版社出版的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皇帝传》（中译本为《罗马十二帝王传》。——译者注）在有关奥古斯都的文章后面附上了《功业录》的全文。不过原文中并没有这个附录，是翻译者国原吉之助添加上去的。

为什么研究者们对如此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作详细介绍呢？

其理由之一，《功业录》记叙的并非是奥古斯都实际的成就，仅是一些奥古斯都希望传达给后人的事迹，而像有关帝国建设这样极其重要的功绩，他避而不谈。所以《功业录》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才会如此之低。我对奥古斯都不谈的理由非常好奇，这种好奇心大概是作家特有的，非研究者所需。

理由之二，文章写得相当糟糕。奥古斯都的业绩写成目录式的条文状，即便如此，我觉得至少也该润色一下文字。除了充实内容，文章也需要写得让人读得下去。谈话亦是如此，说出来的话得让人愿意聆听。无论是著文还是演说，奥古斯都无法使人乐见或喜闻。这和表述的内容无关，他就是缺乏引人入胜的感染力。除了能力上的欠缺，奥古斯都也并不打算明确地传达自己的意图。要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把共和体制拉向帝制当然不能观点清晰。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以及希望人们予以理解的愿望，是写不出精彩文章的。

同时代的人们，特别是罗马的有识之士们，喜欢比较“父”与“子”。这也是奥古斯都让人同情的地方。他“父亲”恺撒实在太有表达能力了，甚至连政治上的对手对此也是赞不绝口。恺撒对手之一的西塞罗在他有关演讲的著作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恺撒那样演讲、著书。他能够用喜剧的方式来讲述悲剧，用幽默的语言来解除人们消沉的情绪。人并不缺乏对重要事物的理解能力，但是要让理解能力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力，则取决于是否能调动起读者、听众情绪的叙述能力。

这是一门艺术，很显然奥古斯都缺乏这门艺术（拉丁语Ars，意大利语Arte，英语Arts）。然而政治宣传（propaganda）又是重建罗马大业必不可缺的工作。奥古斯都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在这方面很有造诣的人。负责这项工作就是现代“梅塞纳活动”的鼻祖梅塞纳斯。

梅塞纳斯

如果说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右臂的话，那么梅塞纳斯就是奥古斯都的左膀。梅塞纳斯和阿格里帕一样，也不是来自首都罗马的上流社会。他出身于伊特鲁里亚，现在属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家族，社会地位属于元老院阶级之下的骑士阶级。梅塞纳斯比奥古斯都年长一两岁，加上阿格里帕，三人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和阿格里帕不同，奥古斯都与梅塞纳斯的相识并不是通过恺撒，据研究者考证，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腓立比战役。那个时候，还叫做屋大维的奥古斯都的年纪21岁左右。

虽然初次见面是在战场上，而且两人都还很年轻，但那时的奥古斯

都已经有了敏锐的眼光，而梅塞纳斯也落落大方地接受奥古斯都对他的赏识。之后，奥古斯都将战场交给阿格里帕，而外交上的交涉则由梅塞纳斯负责。

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依照法律，所有的公职都必须各司其职。要想游走于各派系之间，传达、落实统治者的意志，担任着公职会有诸多不便。因此，梅塞纳斯放弃了所有的公职和升迁的机会。这在现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对古罗马人而言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对他们来说，经历过各种公职才是一个男人最高的生活价值，名字可以刻在罗马广场的墙壁上、载入罗马国家官方的《大祭司记录》，所以才有“光荣的公职人员”这样的称号。

梅塞纳斯放弃了进入元老院成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决心站在奥古斯都的背后，默默地奉献一生。梅塞纳斯的这个决意可谓是可歌可泣。何况，当时的奥古斯都只是恺撒的养子，他的未来，包括是否会成为恺撒的接班人，都是一个未知数。

从公元前42年的腓立比战役击败布鲁图，到公元前32年亚克兴角海战歼灭安东尼，在这10年里，梅塞纳斯作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表现得相当活跃，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帮助能力尚不足以独霸一方的奥古斯都，梅塞纳斯首先改善了和安东尼的关系；其次，为了牵制住安东尼，又和庞培的儿子达成了私下的协议。在这10年里，奥古斯都打倒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最终消灭了安东尼。奥古斯都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作为秘密外交员的梅塞纳斯可谓是功不可没。

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凭借着实力继承了恺撒的统治地位，成为了罗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在他登上权力最高峰的这一路上，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协助。

然而，公元前30年以后，阿格里帕在奥古斯都的提拔下担任了执政官，从此走上成为国家精英之路，而梅塞纳斯既没有得到任何的官职，

也没有被派遣到国外去担任公使，这主要的原因是时代改变了。罗马在内乱结束后，无论是与同盟国以及行省，还是类似帕提亚的假想敌国，外交活动都改为在台面上进行。

这种形势下，奥古斯都认为正式的外交以及对外政策，由阿格里帕来担任比较合适。在外国人眼中，“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像一个皇帝（事实上的确如此），阿格里帕作为武将，战果辉煌，相反梅塞纳斯既没有地位又没有战绩。其实，对奥古斯都而言，提拔梅塞纳斯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只不过他不想这么做，他希望梅塞纳斯作为谋臣留在自己的身边，如果让梅塞纳斯担任了公职，他的愿望就会落空。而梅塞纳斯欣然接受了奥古斯都这个看似不公平的要求，一生没有担任公职，因此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雕像。

奥古斯都身体欠佳的时候，经常会以休养的名义，去位于埃斯奎里山（Esquilino）的梅塞纳斯大宅小住。喜欢谈论风流韵事的苏维托尼乌斯等人说，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的妻子有染，我觉得不太可能。人总有比情欲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何况是自制力强于常人的奥古斯都。我想他是利用这段相对比较清闲的时间，和梅塞纳斯作一些深度的交流，无论是教养、学识，还是判断事物的准确性，以及实际操作中的手法，梅塞纳斯都是最好的谈话对象。

秘密外交工作停止之后，奥古斯都又将一项非常适合梅塞纳斯的任务交给了他——担任文化·宣传工作。现代将文化赞助活动叫做“梅塞纳活动”（Maecenas）就是由此而来的。

原本就出身于富裕家庭，之后，应奥古斯都的要求购买了埃及大批的土地成为了大富翁的梅塞纳斯，对文化的赞助十分慷慨，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很多的诗人。这些人里面最著名的是被誉为最伟大的拉丁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顺便提一下，崇拜维吉尔的但丁，在《神曲》中把他写成是地狱和天国的引路人。

我个人认为，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散文是以西塞罗和恺撒为代表的公元前1世纪，诗歌则是史上称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公元1世纪前后。和始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西塞罗、恺撒不同，维吉尔和贺拉斯一生都是以作诗为业。他们没有参与政治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散文和诗歌的不同，还是由于身处作业分工明确的奥古斯都时代呢？

两位诗人的出生地很有意思，维吉尔出生在曼图亚（Mantuva），他出生时，包括曼图亚在内的卢比孔河以北的北意大利一带还是罗马的行省，在他20岁时，恺撒将这一带纳入了本土领域。在此之前，不清楚他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维吉尔并不是罗马人的姓氏，或许他的祖先是居住在北意大利的高卢的某一部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罗马国民诗人身体里流着的就不是罗马人的血液。不过，这对罗马人来说无关紧要，200年前会写漂亮文章的迦太基的奴隶同样受到了罗马人的欢迎。维吉尔出生于公元前70年，比梅塞纳斯年长五六岁。

比维吉尔年轻5岁的贺拉斯出生在阿皮亚大道沿线的殖民城市维诺萨。这位诗人也不是罗马公民，而且直到他父亲那一代都是奴隶。

贺拉斯父亲成为解放奴隶之后，为了儿子的教育，离开了乡村小镇的维诺萨，来到了首都罗马。贺拉斯父亲在罗马从事何种职业无从查考，但是他让贺拉斯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并且送他到当时最高学府的雅典去留学，看来是一位非常热心于教育的爸爸。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是在未成年前就离开了故乡来到罗马的，可见在当时，人们想接受良好的教育首先就是去罗马。

在雅典的贺拉斯没有专心于学业，精力全用在了政治上。那个时期的雅典即将成为恺撒派和反恺撒派对决的战场，形势一触即发。人们谈论的话题全集中在了究竟是安东尼——屋大维的恺撒派会赢，还是反恺撒派的布鲁图——卡西乌斯能够获得胜利这件事情上。

贺拉斯天生有诗人的激情，又值年轻气盛的23岁，完全被当时的气

氛所感染，投笔从戎，参加了志愿兵。他加入的是杀了“暴君”恺撒的布鲁图的军队。他在军队中担任大队长，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参战军人。

然而，腓立比战役恺撒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布鲁图自杀身亡。成了败兵的贺拉斯一路逃亡，颠沛流离，终于回到了祖国。

个人的境遇，再加上罗马当时的混乱状况，让多愁善感的诗人深感悲观、绝望。内战并没有在腓立比山岭上结束，紧接着的是庞培之子和屋大维的战斗，这边刚决出胜负，那边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斗争又开始了，罗马人不断地在自相残杀。那个时期的贺拉斯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诗：

> 永无止境的内战，下一代也卷入其中。罗马正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敌人不再是马农西人或者伊特鲁里亚人；也不是强大的加普亚和勇敢的斯巴达；既不是阴险狡诈的高卢人，也不是凶横彪悍的蓝眼睛的日耳曼人，更不是令人憎恨的汉尼拔，罗马人现在的敌人就是罗马人自己。终有一日，罗马会回到野草丛生的时代。
>
> 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最好的忠告是什么？没错，就是舍弃你的祖国。舍弃祖国，远走他乡。就像从前（公元前540年）的费契亚人那样，不堪波斯的统治绝望地集体出逃。

然而，不到4年的时间，贺拉斯的心境便逐渐趋于平静，他结识了梅塞纳斯，两人成了知己。又过了8年，诗人对国家的前途从不安变成了希望。公元前30年，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尽管获得胜利的是腓立比战场的对手，事到如今这已无关紧要。战争太令人憎恶了，不管谁赢，能够恢复和平就要感谢天神保佑了。

我们不能指责贺拉斯的这种改变是共和主义者的变节行为。他代表了那个时期大多数罗马人的心情。而这正是奥古斯都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奥古斯都本人比任何人都清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必要性，因此

他的政治生涯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巧妙地、充分地利用了这张王牌。

奥古斯都成为唯一赢家之后，即刻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军，士兵的人数减至一半。向罗马人民表达了走向和平的决心。此刻的贺拉斯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不知道是不是梅塞纳斯向他讲述了奥古斯都建立“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艰辛，以及将之贯彻到底的决心，结识了梅塞纳斯之后的贺拉斯，对奥古斯都的态度由敌视转为赞赏。

作为资助人的梅塞纳斯打算替解放奴隶之子、两袖清风的贺拉斯在奥古斯都的手下谋个一官半职，贺拉斯给他的回答是：“讨厌做官。”于是梅塞纳斯改送了一座有24间房子的庄园给他。古罗马的庄园本身就是一个农业生产基地，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赠送庄园，不仅是提供了居所和得以安心劳作的场所，更意味着保证了生活的来源。

至于梅塞纳斯是用什么形式赞助维吉尔的，目前无史可查。可以确定的是以维吉尔、贺拉斯为首的梅塞纳斯文艺沙龙的文化人，成为了奥古斯都施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政策的宣传员。他们怀着喜悦和自豪的心情为日渐走向和平的新生罗马讴歌颂扬，维吉尔的诗歌高贵而刚健，而贺拉斯的作品则充满了活力和清新，这正象征了奥古斯都心目中罗马帝国的形象。

我不赞成将这些诗人说成是御用文人的讲法。如果只是为了回馈物质上的援助，是写不出优秀作品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2000年经久不衰，正因为是发自内心。梅塞纳斯慧眼识珠很善于选择资助的对象。梅塞纳斯死后，贺拉斯表示将来要葬在梅塞纳斯的身边，后来果真如实履行。贺拉斯仿效梅塞纳斯，死后将梅塞纳斯送给他的庄园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花朵再度盛开。那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位

和梅塞纳斯相似的人物，他就是来自佛罗伦萨望族、美第奇（Medici）家族的主人科西莫。科西莫曾经向雕塑家多纳泰罗（Donatello）赠送了一座位于托斯卡纳的庄园。心存感激的雕塑家去世前留下遗言，要求死后葬在科西莫墓地的附近。如今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之一的雕塑家，就长眠于圣罗伦佐教堂（San Lorenzo）地下的美第奇家族的墓室中。

以上两例是最典型的古代文化赞助的形式。

长寿意味着身边的人会一个个地离去。尤其是看到同年代人的离去，更会让人生发岁月无情、生命流逝的感叹，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死。然而，失去了阿格里帕之后又失去了梅塞纳斯的奥古斯都并没有动摇自己坚强的意志，他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地实现，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此时此刻的重要性。

就在这个时候，奥古斯都第一次违背了恺撒的路线，决定将罗马帝国的防卫线由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这个行动意味着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辽阔的日耳曼地区（Germania，现今大部分属于德国）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征服居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民族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a，英文geopolitics）是希腊语的“大地”（geo）和“政治”（politika）二词组合而成、由20世纪的人创造的词语。

在古罗马时代，虽然没有这样专门的词语，但并不表示人们没有这个概念。或许是因为道理太显而易见，反而不需要专门再为它去造一个词语。罗马人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这一点他们和擅长抽象概念的希腊人不同。虽然语言上输给希腊人，但罗马人部署的帝国防卫线正是不

折不扣的“地缘政治学”。

恺撒在划定莱茵河防卫线之前，曾经两次亲自率军渡过莱茵河，和日耳曼人战斗。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的确亲身踏上了日耳曼的土地，目睹了日耳曼民族。

据史料记载，奥古斯都在决定把防卫线从莱茵河移转到易北河之前，在视察行省的途中，曾经顺道前往过奥古斯都·特来弗里（现德国的特里尔，Trier），不过，没有他到过莱茵河边的史实。奥古斯都视察行省通常会在一个地方滞留很久，他不太喜欢东奔西跑作实地考察，基本上属于习惯于坐在书桌前工作的人。

奥古斯都的手中有两份地图：一份是根据恺撒的指示、他死后安东尼负责完成的意大利本土的地图。地图上不仅显示了意大利境内的山峦、河川，整个罗马本土的交通网络都作出了明确的标示。另一份地图是由阿格里帕负责制作的帝国全境地图。这份大理石版的地图，几乎有一面墙之大，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宝石标示出帝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地图镶嵌在维普萨尼娅回廊的墙上，供一般市民阅览。据说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的官邸里也有一份同样类型的地图。

那么，奥古斯都为什么要把防卫线从莱茵河移往易北河呢？

从地图上看，如果连接易北河和多瑙河之间的防卫线能够成功地建立的话，整个防卫线的距离的确比原来莱茵河——多瑙河的防卫线缩短了500公里，是不是出于这个理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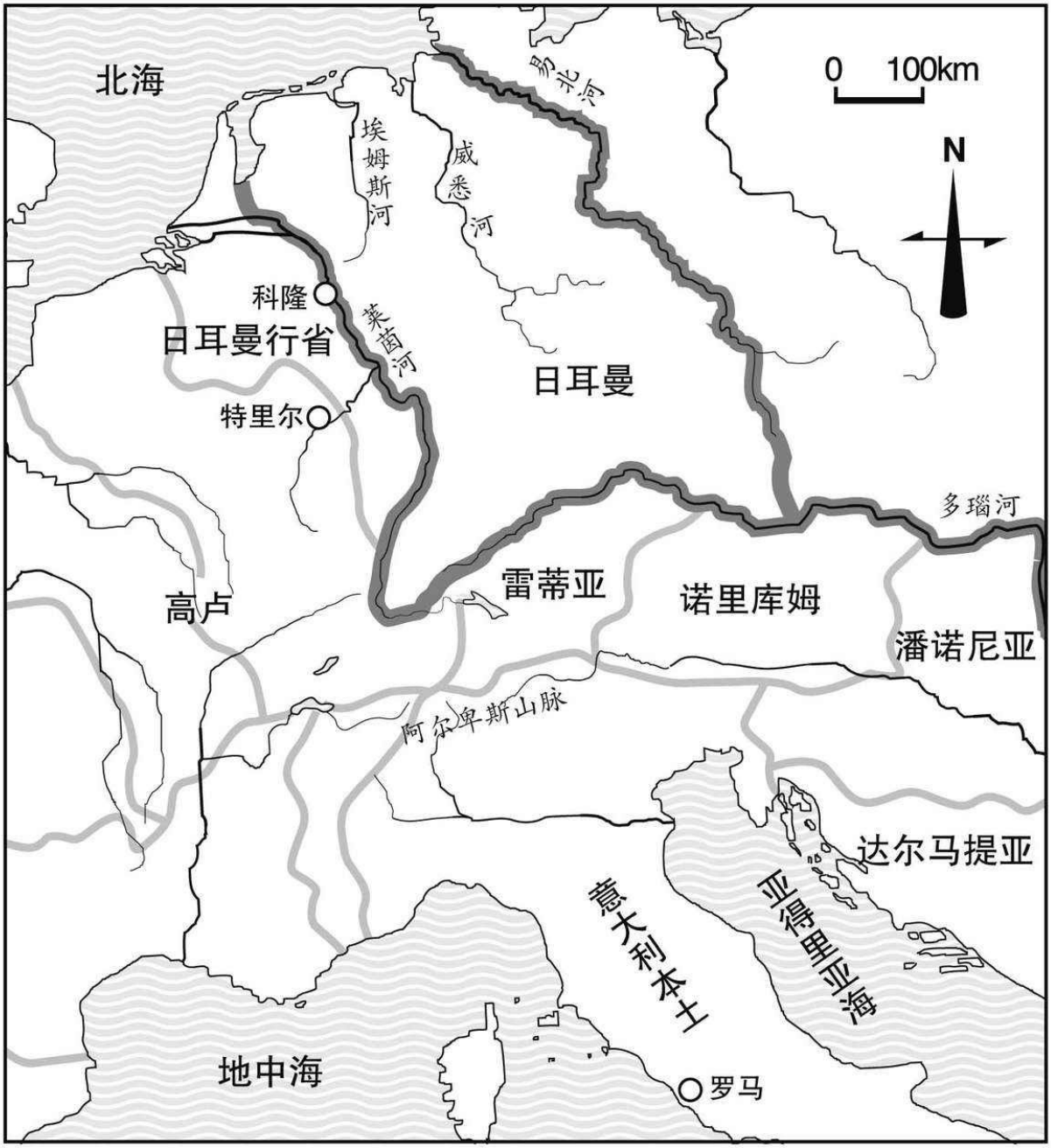
或者是他考虑到降伏日耳曼民族，让这个茹毛饮血、勇猛顽强的民族走向文明，会为罗马帝国的国境带来安定。

总之，罗马军从公元前12年开始了进攻日耳曼的战役，中间历经数次的休战，延续至公元9年，最终到公元16年才算真正结束。即便是将

战争结束的时间算做公元9年，其间也有20年的时间和日耳曼人相持不下。

与之相反，恺撒在公元前58年发起了对高卢的军事行动，8年之后几乎占领了整个高卢地区。进攻日耳曼和征服高卢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后方参谋部制定的战略，而后者则是由前线指挥部所部署。换言之，这是几乎没有亲临战场指挥过的奥古斯都和调兵遣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恺撒之间的区别。还有一点，就是攻打日耳曼的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了。即使不能同恺撒相比，阿格里帕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他的去世给奥古斯都的军事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阿里里帕去世后，取代他成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是奥古斯都的两个继子提比略和杜路苏斯。他们的母亲莉薇娅和奥古斯都再婚时，哥哥3岁，弟弟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公元前12年时，两兄弟已长大成人，提比略30岁，杜路苏斯26岁。奥古斯都非常疼爱这两位继子，但执著于家族血缘的他，并没有将两人收为“养子”。“养子”是继承人的象征，奥古斯都选择了他的独生女儿尤利娅和阿格里帕所生的两个儿子——当时8岁的盖乌斯和5岁的鲁基乌斯——作为自己的养子。不过在和平祭坛南墙的皇帝家族的雕像中有提比略和杜路苏斯的形象，可见奥古斯都还是视他们为家人。两兄弟出现在雕像上，不单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妻子，阿格里帕还在世时，两人已经显露了能够成为阿格里帕后继者的才华，奥古斯都对他们的厚待，可以说是兄弟俩靠实力争取来的。



防卫线从莱茵河——多瑙河改为易北河——多瑙河之后的地形图

提比略的妻子是阿提库斯（Atticus）的外孙女维普萨尼娅。阿提库斯以西塞罗的挚友和笔友而著名，他的女儿是阿格里帕的第一位妻子，阿格里帕就是维普萨尼娅的父亲。提比略和维普萨尼娅的婚姻十分美满，公元前12年的提比略有一个1岁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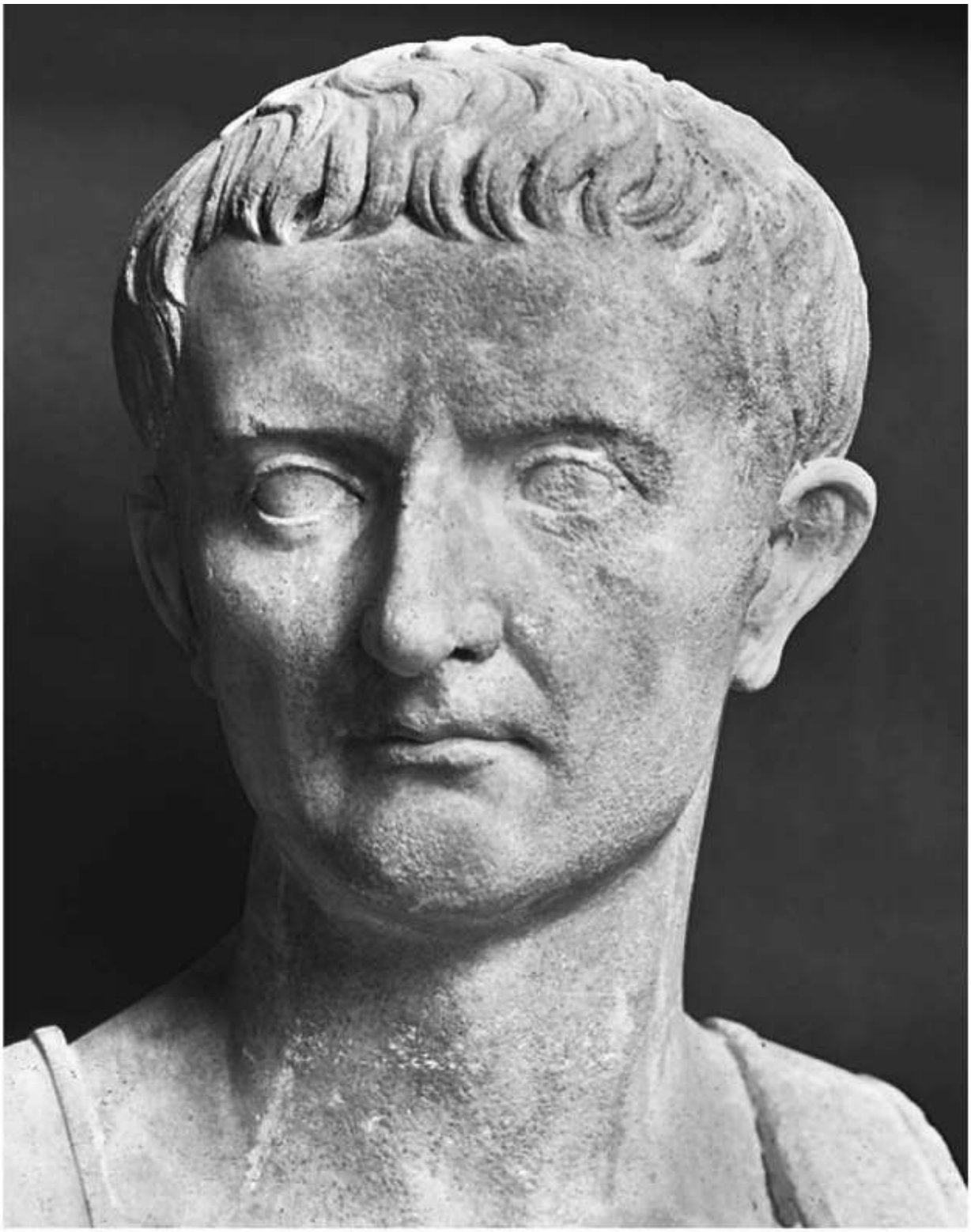
弟弟杜路苏斯的妻子，是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小安东尼娅，他们的婚姻也非常稳定，两人育有两男一女。奥古斯都之所以让杜路苏斯娶死对头安东尼的女儿为妻，是因为小安东尼娅另一半的血缘来自自己的姐姐。这就是奥古斯都的血统观。

正因为这个血统观，奥古斯都在替二度成为未亡人的女儿尤利娅挑选第三任丈夫时，没有选已经娶了自己外甥女的杜路苏斯，而是挑了至今和他没有接上血缘关系的提比略。尽管提比略的妻子是他的好朋友阿格里帕的女儿，尽管两人的婚姻幸福美满而且还有孩子，但这一切对于追求血脉相承的奥古斯都而言，都无足轻重。他想到的是30岁的提比略和27岁的尤利娅结婚，还有机会生很多孩子。奥古斯都的愿望就是多生产一些有着他的血统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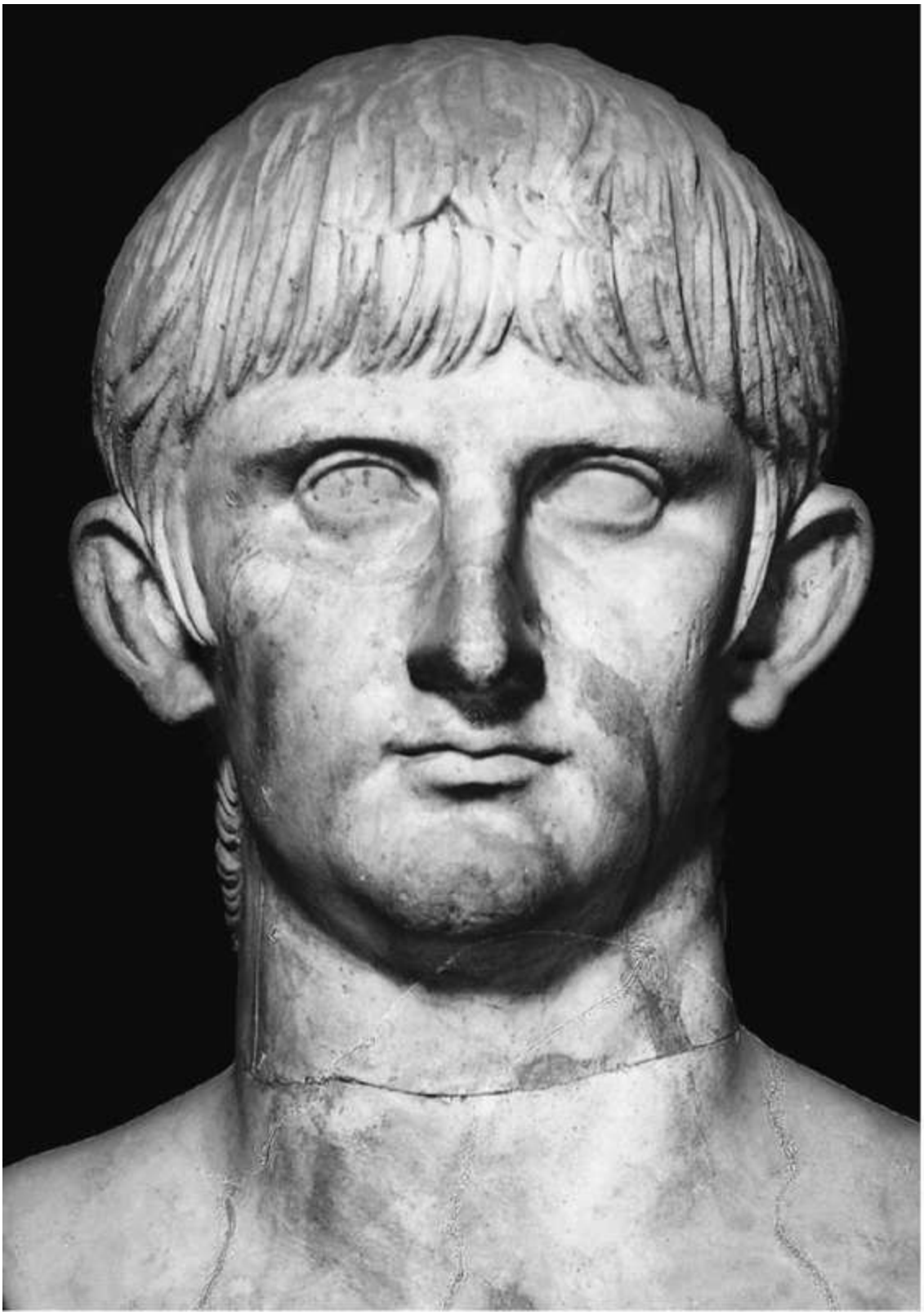
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以及母亲的劝说，让提比略无法违抗，最终他和爱妻维普萨尼娅离婚，娶尤利娅为妻。离婚之后的提比略有一次在街上，看见维普萨尼娅的背影，他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前妻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人群里。据说，从那以后提比略再也没见过维普萨尼娅，她始终回避和他相遇的可能性。

恺撒从不介入他人的生活，这一点又和奥古斯都完全不同。两人间的这个差异，用英文说来就是style（生活方式）不同。

尽管奥古斯都对血统非常偏执，但他并不会在公事中掺入私人的感情，这是他的杰出之处。他对手下的将军、政务官们的评判都非常客观，部下们对此也深信不疑。有了信任的基础就会努力工作，取代阿格里帕成为了奥古斯都左右手的提比略、杜路苏斯兄弟俩也全力以赴地奔赴各自的战场。提比略负责建立多瑙河的防卫线，杜路苏斯则担当了将防卫线从莱茵河移往易北河的任务。所有的人都预见到，征服未开化民族将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提比略



杜路苏斯

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越容易被征服，而文明程度越低则越困难。这话咋听像是说反了，其实没有，千真万确。特别是像罗马人这种共存共荣的征服方式，这个特征尤其明显。

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容易理解罗马人所谓的“文明化”的益处。例如罗马式公路等的基础建设、在各地都得到承认的“自由都市”以及以“殖民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等等。况且，在罗马统治之下，国内的纷争得以解决，罗马军负责抵御外敌的侵略；对于原有的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甚至货币，统治方的罗马也不强制去要求改变。尤为重要的是罗马人不会剥夺被征服者的生存空间，罗马统治之下的各个民族，都拥有他们各自发挥专长的机会和舞台。这是古罗马人所具备的最高品德。

相反，要让文明程度低下的民族了解并接受文明化带来的好处，就困难重重。这就是未开化部落不容易被征服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蛮族所在地没有都市化，因此无法采用攻下一方占为要塞的战术。而且，这些部落都很独立，很少有团结一致对抗罗马的大型战斗，结果就变成了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游击战，罗马军团最拿手的平原布阵的会战方式，几乎没有发挥的余地。

第三个原因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什么征服蛮族的实战经验。意大利半岛统一之后，作战的对手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迦太基、希腊、叙利亚、埃及这样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

对于进入帝政之后的罗马人而言，唯一可以参考的实例，就是恺撒征服高卢，即便是天才恺撒，打赢这场战争都花费了8年的时间。当时高卢战役时，身为统帅的恺撒除了拥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之外，他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这是以日耳曼人为对手的奥古斯都不曾有的。

恺撒手中的王牌就是高卢人非常惧怕日耳曼人。恺撒曾经把高卢的

部落头领叫到面前，对他们说，如果高卢继续由你们高卢人统治，迟早要被日耳曼吞并。无论心中如何作想，首领们对恺撒所言不得不点头同意。

《高卢战记》中曾经提及，住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拒绝征服民和被征服民之间的交流，两者的居住地之间隔着一片荒野，除了每年缴纳贡赋之外，从来不接触，而且他们不喜欢定居一处。

高卢人在面临不得不选择外来统治者的形势下，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尽管这是在罗马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作出的选择。

然而，对付日耳曼却没有这种王牌可用。对于当时的日耳曼人来说，没有什么民族可以对他们产生威胁，除了在西面和南面，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河岸边拿着长剑虎视眈眈对着他们的罗马人。

奥古斯都在决定进攻日耳曼的当初，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王牌的重要性。而且，战争的初期捷报频传，不仅罗马人为此疯狂，就连奥古斯都本人都认为失去阿格里帕的这个军事缺口完全被补上了。

东边是致力于建立多瑙河防卫线的提比略及军团，负责进攻日耳曼的弟弟杜路苏斯则率5个军团前往北方战线。

提比略的军队以现在的维也纳、布达佩斯为中心建立了军事基地，以基地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张，这种看似沉闷的作战方式却带来实际的效果，罗马军队牢牢地控制了多瑙河以南的地区。相反，杜路苏斯的攻势十分猛烈，从北海向南一路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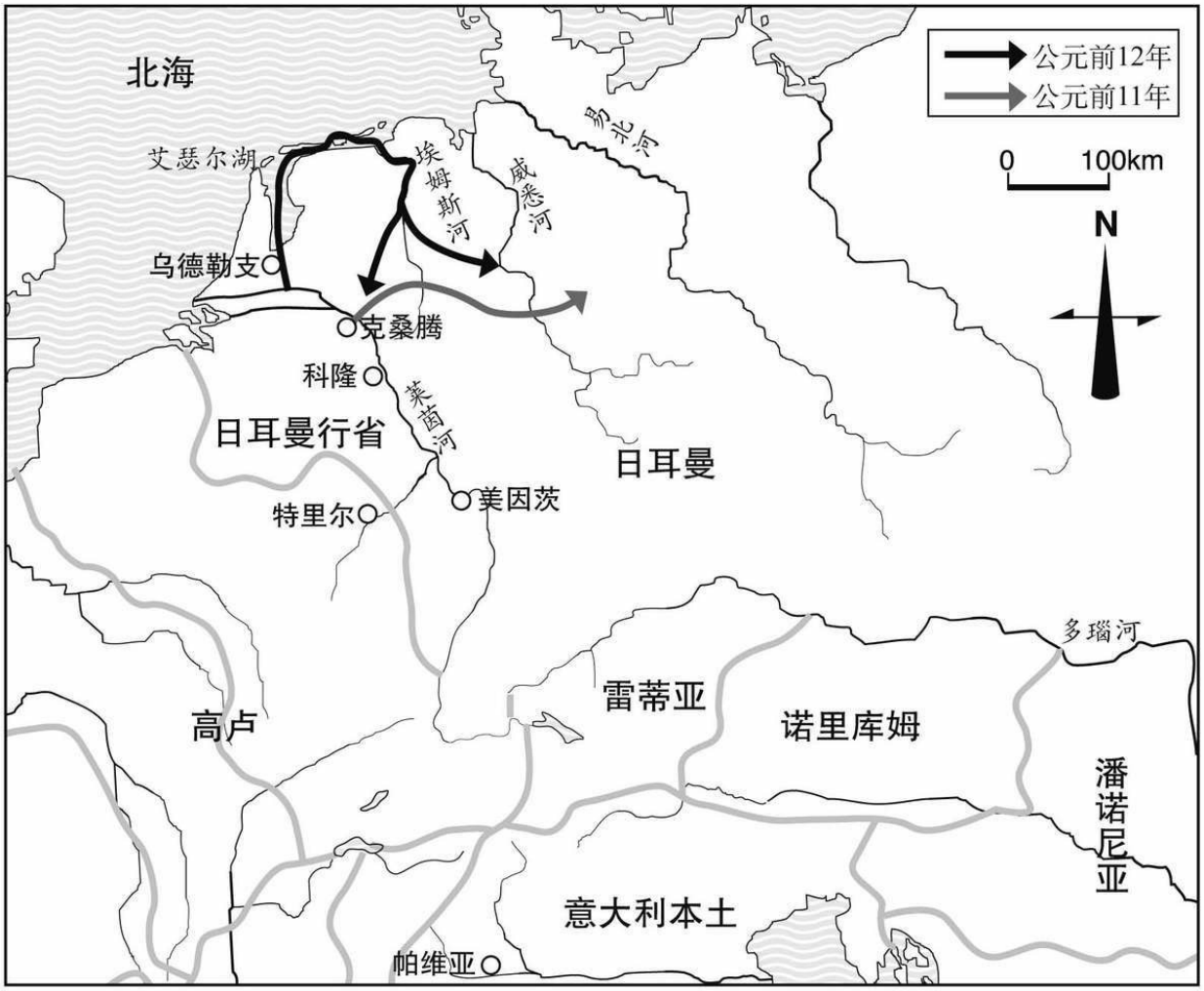
杜路苏斯的军队，首先在古代称为“莱茵河渡口”（Trajectum ad Rhenum，现荷兰的乌德勒支，Utrecht）的附近开通了运河，连接起莱茵河与艾瑟尔湖（Ijssel）之间的水路。军队从莱茵河上船首先进入北

海，由此向东沿海岸航行，从另一条也是汇入北海的埃姆斯河（Ems）的河口逆流而上，直捣日耳曼的心脏。这种作战方式放在现在，就是用飞机把士兵运载到敌方上空的空降部队。如果在“空降”的同时，能派兵从西向莱茵河东进，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战果，不过，多瑙河南岸的战争也在进行之中，想来是没有更多可以调遣的兵力了。

公元前12年杜路苏斯军队的进攻，最终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埃姆斯河中游成功登陆的杜路苏斯军团，由此继续向东行进，沿途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日耳曼部落，直抵威悉河（Weser）流域。和地中海相比，北海在夏季也是波涛汹涌，所以，连日耳曼人也没有料到南方民族的罗马人会采用这种战略。从现代地理来说，埃姆斯河靠近荷兰的国境，而威悉河则完全位于德国的中央。这也难怪罗马人听到捷报后，兴高采烈地认为继高卢之后，日耳曼也将成为他们的领地。

第二年，即公元前11年，年轻的杜路苏斯将军，改变了进攻日耳曼的路线。军队从莱茵河沿岸的克桑腾（Xanten）基地越过莱茵河，从东面进攻，抵达日耳曼的心脏地带。军队从威悉河中游地带返回莱茵河西岸的基地过冬时，选择了向北迂回的路线，和出发时的路线不同。罗马人的军事行动，不仅是战场上的正面交锋，还包括了在各个要塞开路、造桥的工兵作业。这些作业需要穿过大片的森林，森林地带即使在白天能见度也相当低。在蛮荒地区打仗的确是举步维艰。

公元前10年，杜路苏斯决定向最终的目标易北河流域发起进攻。他计划用2年的时间占领易北河，为了节省时间，军队冬天不返回莱茵河，原地留在日耳曼的中心部。那一年，28岁的杜路苏斯首次当选为执政官，奥古斯都和罗马人民都对这位年轻的将军充满了期望。



公元前12年和前11年杜路苏斯军团的行军路线

当32岁的提比略和28岁的杜路苏斯从前线接连不断地向首都传送捷报时，53岁的奥古斯都也正准备将本土的行政组织规划作一个彻底的完结。

奥古斯都从来不会一次性提交议案，他总是先提出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再作一些修正，反反复复，直至他心目中的计划完整成形。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面对已经既成的事实除了赞成无计可施。他们之所以不提出反对意见也是因为找不到漏洞。在改革重建方面，奥古斯都绝对是一位天才。

行政改革

奥古斯都改革的基本方针，不是要求达到整体的提升，而是建立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核心”，余下的部分，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交给民间管理。

这个方针并非来自奥古斯都与生俱来的理念，而是因应形势所需。罗马公民以成年男子人数计算是500万人，相对于罗马帝国全境5000万的人口，作为统治方只有掌握核心，才可能长久维持。

这个方针也不是奥古斯都独创，罗马的建国之父罗穆路斯建立的国家政策中已经体现了这种思想。经过不断的延续，成为了一种非常实用的罗马人的“哲学”。

奥古斯都之后100多年的希腊人普鲁塔克在他的《列传》中明确地指出，罗马兴盛的根本原因就是同化战败者。在“败者为奴”的古代，罗马人的这种同化具有何等的意义，对于经过了18世纪《人权宣言》洗礼的现代人而言，或许有些茫然，但是即便像雅典这样高度文明的地区也从未对“败者为奴”的观点产生过质疑，可见罗马人的生存方式有多么的特别。罗马人将这种生存方式传播至帝国全境，使之由特殊变成了一个普世的价值。奥古斯都所做的就是将这种传统的罗马人的生活哲学制度化，并且运用在帝国的各个领域。

奥古斯都将北至阿尔卑斯山、南到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即罗马帝国的本土，规划成11个大区。这种划分不是拿着标尺单纯地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而是根据居民所在的部落、传统、风俗等的不同，分门别类。大家不妨拿它和2000年后今天的意大利各大区来作个比较。意大利语的“大区”（Regione）的词源来自拉丁语Regio。如今的意大利发展到18个大区（实际为20个。——译者注），这是由于2000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奥古斯都规划的意大利本土的11个大区具体如下：

第一大区（拉丁姆·坎帕尼亚，Latium Campania）——现拉齐奥（Lazio）、坎帕尼亚（Campania）两大区。

第二大区（阿普利亚，Apulia）——现普利亚（Puglia）大区。

第三大区（卢卡尼亚·布鲁蒂姆，Lucania Bruttium）——现巴斯利卡塔（Basilicata）、卡拉布里亚（Calabria）两大区。

第四大区（塞尼阿姆，Samnium）——现阿布鲁佐（Abruzzo）、莫利塞（Molise）两大区。

第五大区（皮切诺，Piceno）——现马尔凯（Marche）大区。

第六大区（翁布里亚，Umbria）——现翁布里亚（Umbria）大区。

第七大区（伊特鲁里亚，Etruria）——现托斯卡纳（Toscana）大区。

第八大区（艾米利亚，Emilia）——现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大区。

第九大区（利古利亚，Liguria）——现利古利亚（Liguria）大区。

第十大区（威尼斯，Venezia）——现威尼托（Veneto）、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特伦蒂诺-阿尔托·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Trentino-Südtirol）三大区。（顺便提一下：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的Giulia来自尤里乌斯·恺撒的Jul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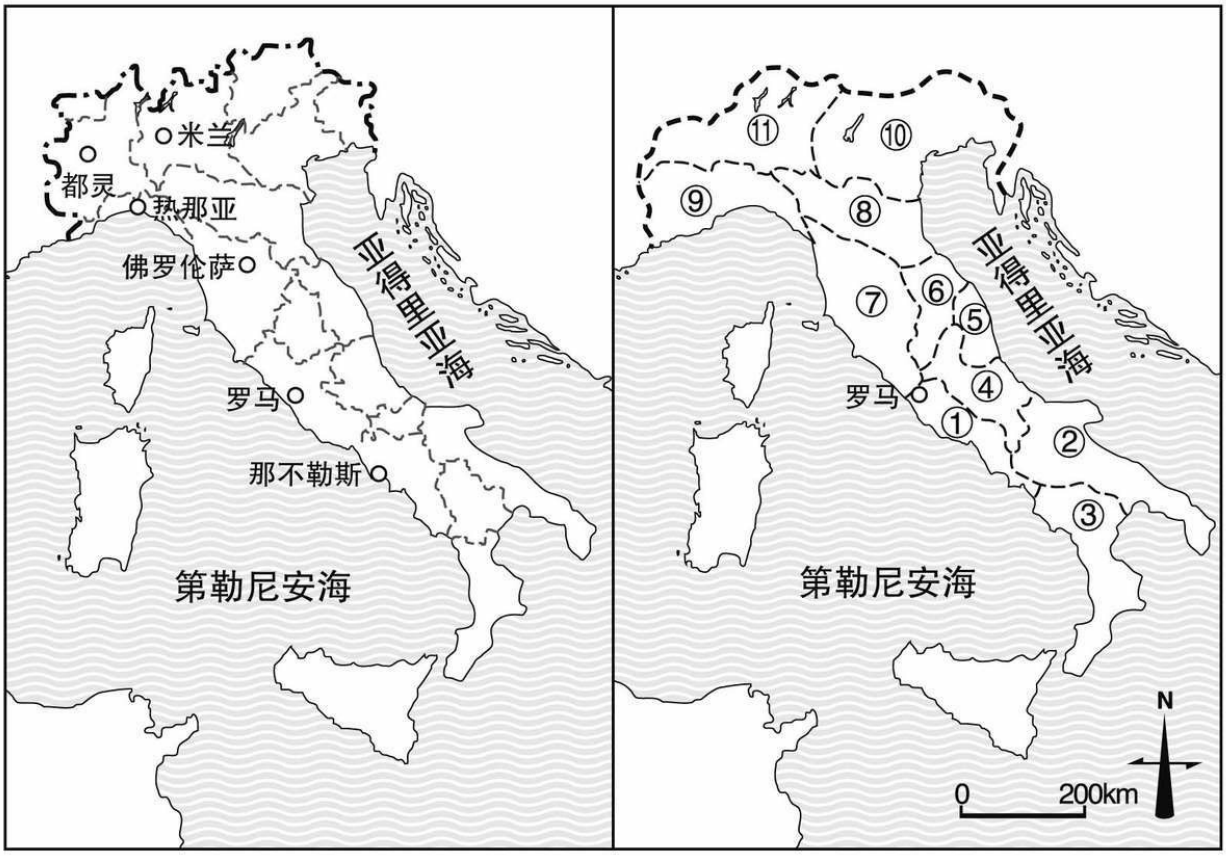
第十一大区（坦斯帕达纳，Transpadana）——现伦巴第（Lombardia）、皮埃蒙特（Piemonte）、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三大区。

当初恺撒将卢比孔河以北的地区从行省纳入本土，形成了现在北意

大利地区。北意的大区数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2000年后这里的实力远超过了卢比孔河以南的地区。

奥古斯都划分大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效地发挥中央集权的职能，同时也希望建立起地方分权的制度。这是罗马人擅长平衡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了追求效率性，集权和分权的制度可以同时存在。

虽然奥古斯都建立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代表共和体制的元老院以及公民大会，逐渐转向皇帝主导的“内阁”。然而，古罗马公民一向拥有投票权，即参与政治的权利。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参政的愿望，不满情绪迟早会伺机爆发。为了消除隐患，奥古斯都建立了大区制度，大区内的事务交给在那里居住的公民，让他们自己负责管理。



左：现今的18大区 右：奥古斯都制定的11大区

奥古斯都不仅赋予了地方公民地方自治体（大区或市镇）的自治权，如前文所述，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国家政务官的选举，最终结果也包括了各大区的表决。这样就可以满足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挖掘出来的庞贝遗址的壁墙上，留有不少当年的竞选海报，可见当时像庞贝那样中等规模的地方城市，选举气氛也十分热烈。分割成11个大区的意大利本土实际上就是各自拥有自治权的联合体，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是定论。如果作过大胆比较的话，古罗马帝国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倒是比较接近于现代的美利坚合众国。

满足公民参政的愿望，怎么能忽视了首都罗马的公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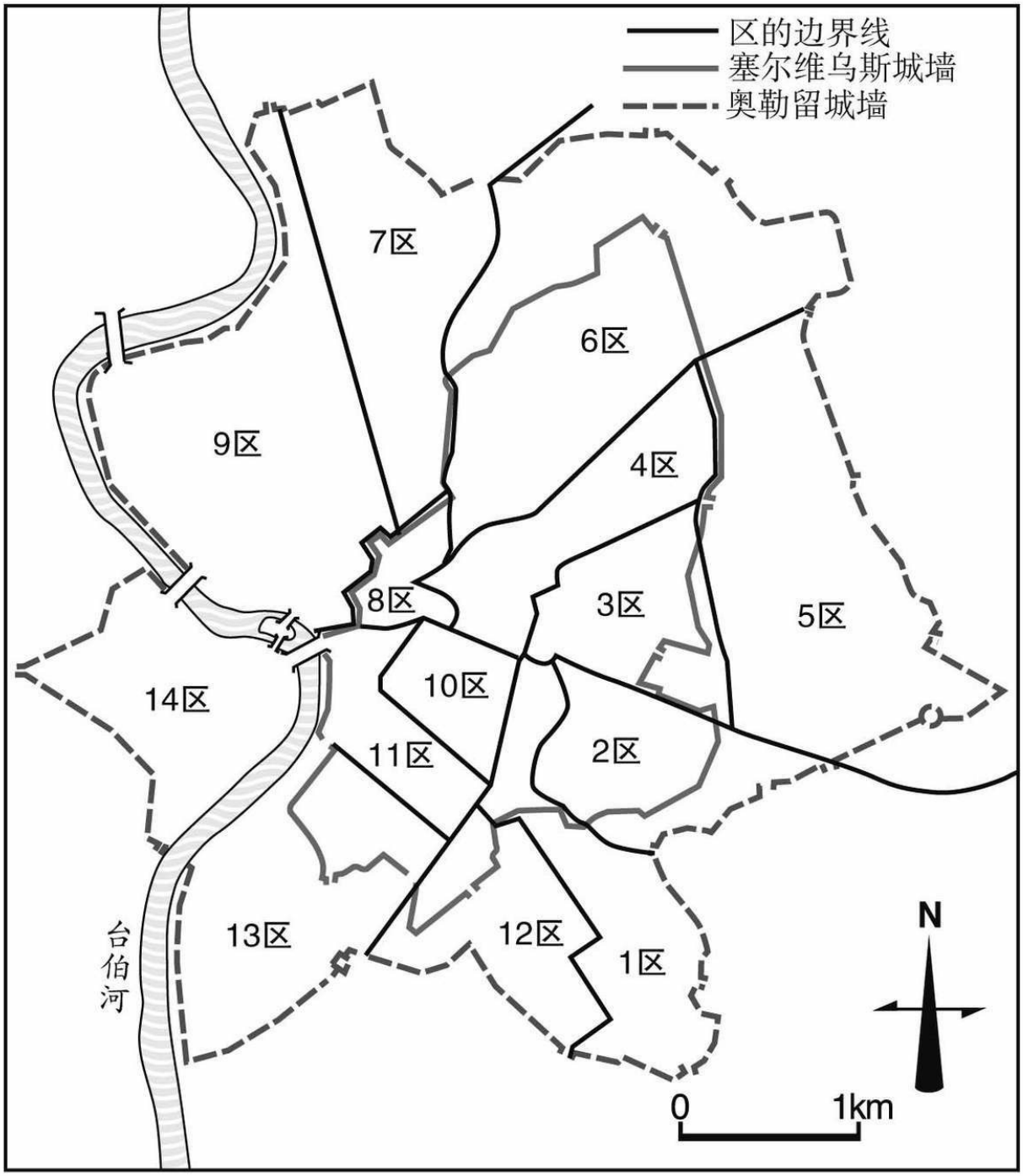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将首都划分为14个居民区，居民区和大区一样，也叫“Regio”，这点比较有趣。顺便提一下，罗马军团叫Legio，在R、L不分的日语里，“区”和“军团”听上去是一样的。

尽管奥古斯都用同样的“Regio”来表示首都的居民区和意大利本土内的11个大区。作为后人，为了避免产生误会，我们不得不用“居民区”和“大区”来区分。至于奥古斯都为何要用同样一个词来代表，其中的理由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因为“居民区”和“大区”一样，也是选举区。古罗马人的选举方法基本上和美国的总统大选相似。先有一个预选，从各个选区（居民区或大区）中选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然后各个候选人再进行最终的选举。在共和时期，首都罗马的选区总共只有4个，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已经增加到了14个，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居民区由市中心逐渐发展到周边的地区。14个区的大小不一，它应该是根据各居住地的选民的人口数量来划分的。

在我看到首都罗马分区地图的时候，另外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奥古斯都在规划居民区时，完全没有受到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影响，可以说完全忽略了城墙的存在。

我想这是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理念。恺撒认为建立“和平”才是罗马的新生之路，因此，像护城墙这样的战争产物，不应该继续存在。在首都居民分区图上，我也顺便标上了“奥勒留城墙”（亦称奥勒利安城墙，Aurelianu）。这座城墙建于公元3世纪末期，当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分崩离析，首都处于不得不修筑城墙来抵御外敌的形势之下，在至此之前的300年间，罗马一直都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奥古斯都制定的首都罗马的14个居民区

塞尔维乌斯城墙至今还留有少许遗迹，在奥古斯都时代，它应该保存得更好。不过，保存祖上留下的东西，还是无视，完全是两回事。帝

国时代的罗马在对首都的定义上已经超越了共和时代。最好的例证就是第14个居民区跨过了台伯河的西岸。原本作为军事防卫线的台伯河从此成为了一条流淌在市内的普通的河流。

奥古斯都之所以能无视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存在，将首都划分为14个居民区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在居民区下面又规划了265个市镇（vicus）。如果只有14个居民区的话，有些区可能会被城墙隔成两半而产生诸多不便，但如果是比居民区规模小的市镇，那么，墙的两边各有一个市镇，就不存在什么问题。由于附图是略图，所以居民区的分割简单地呈直线状，实际上应该是错落有致、弯弯曲曲的。

根据规定，各大区、市镇的区长、市长由选举产生。奥古斯都延续了恺撒的人才录用的路线，这些地方的公务员中，有不少是解放奴隶。这意味着元老院议员，甚至是皇帝本人所居住的地区的政务官可能出身于奴隶。奥古斯都之所以允许这些人担任公职，不单纯仅是因为“英雄不问出身”，区长、市长完全属于行政职务，他们的工作包括了区内道路的整备、清扫，以及街角的祭坛、寺庙的管理等。市镇的规模一般在300人左右，作为当地长官，其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正确统计出辖区内的失业者人数，即有资格接受免费小麦配给的贫民的数量。所以，这些地方首长还同时兼任了“社会福利局”局长的职责。

奥古斯都本人几乎没有亲赴战场带兵打仗的经验，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称呼士兵“战友们”，也禁止阿格里帕、提比略、杜路苏斯用这个称呼，而统一称为“战士们”。然而，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要激励人们勤奋地工作，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就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奥古斯都的政策激发了首都人民积极参政、自主管理的欲望，准确地说，他们的反应比其他地方更强烈。向饥民发放粮食是国家的职责，但是到底是哪些人最需要粮食，则由人民自己来判断。

地方呈报上来的饥民的人数超过了20万。尽管这个数字超过了“父亲”恺撒制定的15万人的上限，奥古斯都还是接受了申请。不过，他规

定每年对接受社会福利的市民进行一次人口审查，根据审查结果调整标准。然而，有一些问题不是能够由人民自主决定的，或者说交给国家处理会比较妥当。

正如前文所述，为了确保首都人民的粮食供应，奥古斯都设立了一个“粮食局局长”的职位，指派专人负责管理。和粮食管理同样，对于水资源，也相应设立了一个“水道局局长”的位子。除了以上两个职位之外，第二代皇帝提比略，针对台伯河泛滥的问题，又增设了一个“台伯河治水长官”的职位。另外还有一个负责首都公共建筑维修的“公共建筑·神殿修复官”。担任这些官职的人选必须是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的元老院议员，由此可见，它们都是重要而且是“光荣的公职”。

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如说“条条大路来自罗马”。奥古斯都设立了一个“道路事务官”，专门负责道路的维修、保养。这个职位之前就存在，奥古斯都只是将它常规化。我认为判断一个民族实力的基本标准，在于对维护公共财产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以及是否有将之付诸实现的能力。奥古斯都设立专门机构，也向后世的罗马人传达了保护公共财产的重要性。

保护人民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责之一。这里安全保护不是指抵御外敌的侵略，而是指维持国家内部的安定，所以，建立警察制度就成为了一个必需的课题。

作为“世界之都”（拉丁语Caput Mundi），罗马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如果不集中管理治安问题，就会变得人人自危，其结果就是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为自己买到安全，而且这种由个人出资的私警方式，容易产生以暴制暴的社会风气，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了罗马帝国的“和平”（Pax），奥古斯都建立了常备军，现在他又考虑建立一支警察队伍来保卫首都人民的Pax。

罗马共和时代，也没有忽视了公共安全保护的问题，它属于执政官

的重要职责之一。两位执政官都必须在离开罗马的情况下，才能指定“代理”来负责这项工作。这一方面，恺撒从来没有懈怠过，而奥古斯都多半是指定梅塞纳斯作为他的代理。但这毕竟是一个临时的职位，没有长久性。奥古斯都把很多临时的职务改定为长期化，警察也是其中的一项。

警察总监（Prefectus Urbi，亦译首都长官）一职由元老院中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担任，可见其重要性。

总监下面设有三个警察大队，每个大队约有1000人警力，因此有3000名的警察负责维护首都罗马的治安。

在建立警察队伍的同时，奥古斯都还建立消防局（Prefectures）。消防局设有7个大队，每个大队也是由1000人组成，每一个大队负责首都两个居民区的消防工作。消防员录用了很多解放奴隶，队长大多是曾经担任过罗马军团百人队队长的退伍军人，消防局局长一般由元老院议员担任。这也证明了为政者对消防的重视。因为及时地建立了消防安全体系，所以罗马这个百万人口的都市鲜有火灾发生。

以上这些官职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经皇帝主导的“内阁”推举，由元老院审核决定，即任命制。任期大多在1年以上，属于常务官职。任职期间有薪酬可领，相当于官僚。罗马帝政时代的政治职务（政治家）和行政职务（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属于无薪的领导阶层（有可使用的经费），而后者则是有薪的事务性官职。

杜路苏斯之死

公元前9年新年刚过，开工四年的和平祭坛终于竣工。南国晴天之下，1月的寒气并没有让人感到凛冽肃杀，反而神清气爽。在这晴朗的日子里，奥古斯都带着他的家人以及元老院的全体议员参加了祭坛的竣

工典礼。人员排列的顺序如实地雕刻在祭坛两侧的墙上。参加献祭仪式的人们，从罗马广场出发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行进，来到和平祭坛，举行了宰杀献祭动物的仪式。民众通过没有墙壁的列柱回廊，可以看到烧烤献祭动物的烟火从祭坛飘上天空，同时也能亲眼看到站在祭坛边的那些达官显要。聚集在祭坛附近的民众们不光是来看热闹的，Pax——“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全罗马人的心愿。他们和统治者们一起，虔诚地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祈祷。

和平祭坛南侧的墙面上雕刻的皇帝家族群像中，有两位没有能够出席竣工典礼，一位是3年前去世的阿格里帕。对于奥古斯都的忠臣、一生奉献给公共事业的阿格里帕来说，祭坛是他的墓碑。另一位是因远征日耳曼而缺席的杜路苏斯。负责多瑙河南岸战事的提比略，利用冬季休战期，回到罗马参加了典礼，而杜路苏斯因为准备开春后立即攻打易北河地区，所以就在日耳曼的中心部位安营扎寨，准备越冬。或许是雕刻家事先考虑到了战事，所以雕像上的提比略穿着平日的托加，而杜路苏斯的形象则被刻画成戎装之姿。

可是，竣工不到一年的和平祭坛又成了皇帝家族群像中那位缺席典礼的年轻人的墓碑。这是即将迎来54岁的奥古斯都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日耳曼战争捷报频传，而指挥战争的将军杜路苏斯年仅29岁。

古罗马人的生死观既不宗教也不哲学，甚至觉得“生死观”这样的字眼都是夸大之词。他们非常之豁达，对死毫无忌讳，谈论到“人”甚至会用“必死者”来形容。古罗马人不会专门建陵园，把所有亡者集中在一起，与世隔绝。虽然有些人会将庭院的一角作为死者的墓地，不过他们更喜欢把墓地建在路边，即使拥有大花园的富裕人家也是如此。无论是阿皮亚大道还是弗拉米尼亚大道，只要一出城，就可以看到道路两旁林林总总的坟墓，它们的造型不同，墓地主人来自的阶级也不同。道路是人来人往最频繁的地方，古罗马人希望在死后也能尽量地接近活人的世界。

尤其是喧闹的市区，走在路上就如同穿梭于坟墓之间。坟墓的造型千奇百怪，像设计比赛，刻在墓碑上的碑文也是五花八门，对旅行者而言，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场所。碑文中有不少有趣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古罗马人健康的生死观。我这里抄录几段供大家一乐：

“喂，那个过路人，你不坐下来歇歇脚？摇头。什么，不想歇？别忘了你早晚得来这儿歇着。”

“幸运女神对所有人都作了承诺，可是她从来没遵守过诺言。所以，在那个没有永远的世界，好好地过每一天、每一小时。”

“敬告读碑文者：健康、爱人，在你进来之前的每一天。”

奥古斯都也是罗马人，虽然天生体质虚弱但也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一切都顺其自然。他非常清楚，雕刻在和平祭坛上包括自己在内的家族成员，总有一天都会成为墓碑。因此，他并没有把去世的阿格里帕排除在外，仍然当他还健在，放进了家族群像中。然而，功成名就的51岁的死，和一切才刚刚开始的29岁的死毕竟不一样，杜路苏斯的噩耗比上一次阿格里帕的死讯，让奥古斯都更为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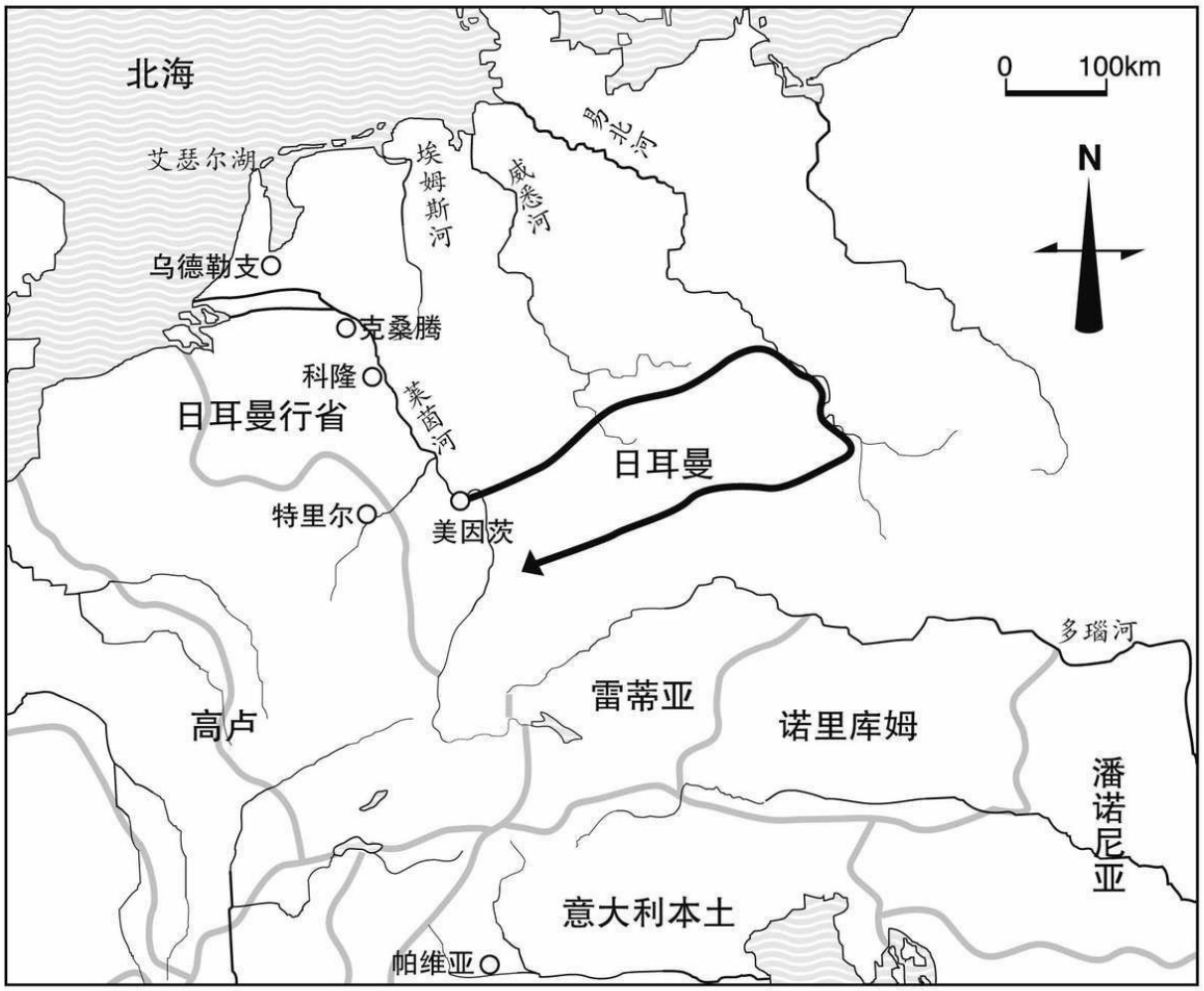
公元前9年从春到夏再转秋，一年中大半的时间，罗马接连不断地收到从前线传来的捷报。特别是在夏天，奥古斯都收到了他殷切期盼的“罗马军到达易北河”的好消息。这个消息令人感到日耳曼人已被罗马军队消灭得片甲不留，军事防卫线成功地转移到了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奥古斯都不仅为战绩而高兴，同时也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奥古斯都曾做过一些违反“父亲”恺撒遗愿的事情。比如说，为解决台伯河洪水泛滥，在梵蒂冈的后面打通了运河；抽干阿皮亚大道边上的泥沼地带改为耕地等等。但这些事情和改变莱茵河军事防卫线相比，都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对于不善战的奥古斯都而言，征服日耳曼民族等于是对战争强人恺撒的一个背叛。因此他对日耳曼的战况，比迄今为止的

任何一场战役都要放心不下，就算手握国家最高权力，但是罗马的统治阶层里，有很多人了解生前的恺撒，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拿他同其“父亲”作比较。

年轻的杜路苏斯在军事方面的才华，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他在四年中发起了三次进攻，每一次都采用了不同的战术，而且每次都从不同的地点展开攻势。他最后一次远征，选择了从莱茵河沿岸的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现德国美因茨，Mainz）出发，其目的在于避开日耳曼人正面的进攻，声东击西，打乱敌方的部署。日耳曼人被杜路苏斯搞得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该在哪儿设置据点阻击。



公元前10—前9年杜路苏斯军团行军图

到达了易北河的杜路苏斯的军队，原本预定从别的路径返回美因茨。来去选择不同的路线是因为罗马军队不单纯只是行军、打仗，还要在沿途的战略要地架桥、筑路建立起军事要塞。因此，罗马军经过的地区，“社会基础”（公共建设）就会得到改善。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规模，但已经为今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正因为边走边建的这种行军方式，杜路苏斯的军队从易北河回到莱茵河附近时，北国的日耳曼已经进入冬季。

不幸发生在雪中行军途中。率领着军团凯旋的杜路苏斯不知何故，

突然落马，而且受了重伤。据说，如果当时随军的医生在判断了伤情之后立即采取大胆的治疗措施，切断因骨折而恶化的腿，至少可以保住他的性命。但不知是杜路苏斯拒绝了截肢手术，还是医生没有这个勇气，杜路苏斯的病情日益恶化。根据他的命令，首先通知了在多瑙河战场的哥哥提比略。

所幸，当时的提比略那边已休战，进入了冬营地。兄弟俩一向手足情深，闻讯后，哥哥只带了一队骑兵，冰天雪地里翻越了重重的山岭，到达了弟弟的营地。从来没有背对过敌人的年轻英勇的将军，在大他4岁的哥哥怀里闭上了眼睛。

敬仰杜路苏斯的将士们，希望能像其他阵亡的战友一样，将总司令安葬在日耳曼人的大地上。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成为罗马的领地指日可待。但是提比略决心将弟弟的遗体带回罗马。提比略也是位出色的将军，而且他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战场，因此，并不像奥古斯都和其他的将士们那样乐观，他对于日耳曼的罗马化，多少有些心存疑虑。

尽管出发点不同，奥古斯都也同意了将杜路苏斯的遗体运回罗马。官兵们轮流扛着棺木向南行进，提比略一路徒步始终相伴在弟弟的左右。同时，皇帝亲自前往北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迎接。运载棺木的马车在前，奥古斯都的座驾在后，一行人从帕维亚前往罗马。

提比略并没有随弟弟的棺木一起去罗马，他从帕维亚返回了莱茵河沿岸。这到底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命令还是他本人的意愿，不得而知。杜路苏斯的死讯一定已经传到了日耳曼人那里。虽然冬天无法开仗，入春后他们势必会发起攻击。目前还算平静的多瑙河战场暂且搁置一边，莱茵河防线的坚守万不可掉以轻心。

和平祭坛在建成的那一刻，就成为了两位有功之臣的纪念碑。

提比略的引退

对妻子莉薇娅的两个儿子，奥古斯都比较偏爱弟弟杜路苏斯——这是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英年早逝的人容易博得更多的同情和好感，这属于人之常情。不过，这种传言，对于几经波折继承了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第二代皇帝的提比略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即使这是不了解内情的外人的猜测，其中多少包含了一些事实，何况，从奥古斯都的表现来看，这个传言的真实度的确不低。

恺撒是一个开朗的人，无论是苦或乐，他总是笑声不绝，他的乐观也感染了周围的人。相反，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容易敞开心怀的人，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肃然之气，让人却步，只能远远地注视着他。恺撒让人感动，奥古斯都则令人折服。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奥古斯都是一个封闭的人。我想，拥有阿格里帕、梅塞纳斯这两位可以畅所欲言的挚友，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奥古斯都的内向，是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非厌恶与人交往。

话说回来，不轻易流露感情终究是来自天生的性格，而人通常又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交往，所以，内敛的奥古斯都喜欢性格开朗的杜路苏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是人本能的反应。一般来说，小儿子性格都比较开朗，杜路苏斯的确非常让人喜爱。

然而，奥古斯都是一个不会让私情左右公事的人。如果杜路苏斯是一个无能之辈，奥古斯都既不会疼爱更不会予以重用。所幸，杜路苏斯非常有才华。他不仅在战场上有勇有谋，奥古斯都重整高卢之后，把它交给杜路苏斯治理，杜路苏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对于杜路苏斯的英年早逝，不仅是奥古斯都和罗马人民，就是处于被统治一方的高卢人民也从心底感到深深的惋惜。

说到才能，提比略也很有才能。但是，对奥古斯都而言，杜路苏斯

不仅是他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另一个对皇帝来说事关紧要的问题上，也是积极的协助者。杜路苏斯在血统延续上的贡献，不逊于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绩。29岁去世的杜路苏斯生前和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之间生有两男一女，最大的男孩当时6岁。顺便说一下，当时才1岁的小儿子克劳狄乌斯，50年之后成为了罗马的皇帝。

提比略在传宗接代上对奥古斯都丝毫没有帮助。奥古斯都令他和阿格里帕的女儿离婚，与自己的独生女儿尤利娅再婚，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继承他血脉的孩子。在那个儿童死亡率极高的年代，仅仅有阿格里帕和尤莉亚生下的三男二女，并不能让他感到安心。讲到这里，我不禁又要感叹：阿格里帕在这种事情上也为奥古斯都作出了十二分的贡献。

被迫和爱妻离婚、和皇帝之女再婚的提比略，一开始似乎也曾努力地去经营这段婚姻，后来不知何故，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据史料记载，尤利娅的行为不检，我想，重视品行的提比略终究无法忍受妻子放荡的行径。夫妻没有感情，大可假装恩爱维持下去，可惜提比略是一个连表面功夫都不肯做的男人。两人之间曾经生下一子，但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夫妻分室而眠。这件事情从家奴的口中流传开来，大家都纷纷议论，说是因为提比略长年在前线打仗，导致了夫妻感情不和。

特地将女儿嫁给提比略的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这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深感不满。

奥古斯都在政治心理学上可称是天才，但在个人的感情问题上完全没有智慧。按照古代的审美标准，他绝对是一个胜过恺撒的美男子。但是说到异性缘，我认为他肯定不如恺撒讨女人欢喜。千万别小看了女人的感性，女人不是那么简单就会被男人的权力和容貌骗过的。

奥古斯都一面承认提比略的才华，一面对他又心存芥蒂。两人之间产生隔阂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过这完全是奥古斯都方面的问题

虽然奥古斯都是恺撒外甥女的儿子，但是他出身于地方乡绅家庭，在罗马社会中地位处于元老院阶级之下的骑士阶级。当年他17岁时被恺撒指定为继承人，并且授予了他尤里乌斯·恺撒的姓氏。恺撒非常清楚，尽管奥古斯都拥有领导人的资质，但他的出身会对他不利，所以，才会留下遗言，将罗马名门贵族尤里乌斯一族当家人的名字送给了奥古斯都。

如果奥古斯都也能像恺撒那样，不论血统只凭实力的话，就不会那么纠结。而他既论实力又重视血统，因此才会在挑选继承人这件事上万分苦恼。如果说有谁能看透奥古斯都的这个矛盾心理，那就是提比略。

提比略出身于克劳狄乌斯一族，在家族历史的悠久性上，可能稍逊于尤里乌斯家族，但论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尤里乌斯家族。史上最初的一条罗马大道，即阿皮亚大道，就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提比略的先祖阿庇乌斯兴建。后来提比略的言行举止证明，他对于来自高贵的克劳狄乌斯家族有着强烈的意识。

尽管杜路苏斯也是克劳狄乌斯的后人，但次子对于家门的荣光通常不如长子那么在意，因此，奥古斯都更能够接受杜路苏斯。

苦恼的不只是奥古斯都，提比略也有他自己的困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多地认同继父的政治观。如果奥古斯都不纠结在他那一介地方乡绅的血统上，尊重实力毫不偏颇，自幼在奥古斯都身边长大的提比略，会由衷地敬爱这位继父。然而这位拥有非凡统治能力的继父，为了延续他那条并不高贵、罗马人称之为“新贵”的血缘，费尽心思，而提比略本人就是其中的牺牲者之一。提比略和尤利娅的关系恶化，在奥古斯都看来，是提比略公开向他表示不满，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从那时起日渐疏远。奥古斯都从未想过杜路苏斯的去世给提比略带来的打击，他是一个不懂得去关怀、体谅他人心境的人。而在这类事情上，最能够向奥古斯都进善言的梅塞纳斯，也在公元前8年离他而去。

从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8年的4年间，阿格里帕、杜路苏斯、梅塞纳斯相继离去，对于54岁的奥古斯都而言，可以信赖的人只剩下提比略一个人了。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孩子，奥古斯都的外孙盖乌斯和鲁基乌斯分别才12岁和9岁。能够率军打仗保卫帝国安全的，身边的一群人里似乎只有提比略。

其实这是缺乏前线战斗经验的奥古斯都的一个错觉。不论是元老院议员之子，还是来自骑士阶级，或者像阿格里帕那样的平民，优秀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只要给他们多提供一些机会，通过锻炼，这些人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可惜，不带兵打仗的奥古斯都不理解什么是机会。奥古斯都把建立帝国北方防卫线，这个帝国全境最困难的重任，放在了提比略一个人的身上。

提比略不负众望，不仅征服了多瑙河以南一带，战后对这个地区进行了罗马化。而日耳曼人的反击，也没有预想中的因杜路苏斯的突然病逝而变得猛烈，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判断，防卫线北移易北河的战略获得了成功。

然而，这只是一个战争初期暂时的成功，征服未开化民族绝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哪怕是恺撒这样的军事天才，平定高卢也花了8年的时间。仅仅4年的时间，不论是哪一位司令官，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和择地而居的高卢人不同，日耳曼人居所不定。杜路苏斯军团在日耳曼中部铺设的道路，不像在莱茵河以西那样，铲平后在路面铺上石头，整修得十分完备，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大片的荒野中，开出的不过是一条可以行走的小道而已。如果不继续修缮，不用多久，这里又会变回一片荒野。战争也同样如此，如果战事中途停止，形势不会是维持现状，而是又回到战前的状态。这些问题都是缺乏战争经验的奥古斯都无法理解的。

对战争看法的迥异，加剧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矛盾。奥古斯都认为已经完全占领了日耳曼，而提比略则认为并非如此。公元前7年，奥

古斯都推举利用冬季休战期返回罗马的提比略出任执政官，提比略如期当选。然而，提比略并没有留在罗马履行执政官的职责，开春之后他又重返日耳曼战场。继执政官之后，第二年的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再次向元老院提出申请，授予提比略5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元老院对此也予以批准。

“护民官特权”同时具有政策立案权和否决权两大特权。它的所有者，除了奥古斯都本人，就只有和尤利娅结婚之后、成为奥古斯都女婿的阿格里帕一人。对自己的健康不乐观的奥古斯都，考虑到他死的时候，如果两个外孙盖乌斯和鲁基乌斯还未达到继位的法定年龄（罗马的法定年龄是30岁），可以让阿格里帕先做一个临时递补。公元前6年时，奥古斯都57岁、长（外）孙盖乌斯·恺撒14岁、次孙鲁基乌斯·恺撒11岁，而提比略36岁。

尽管“护民官特权”是一个原本除了奥古斯都无人可以共享的极其荣誉的权力，然而作为共享人，阿格里帕和提比略的态度却不同。

如果不是遇到恺撒，而是在一个平庸的指挥官手下打仗，阿格里帕一生的成就充其量也就是做一个百人队队长。尽管百人队是罗马军团的精英部队，但队长的军阶只是一个下士官。阿格里帕对他得到恺撒的提拔、成为奥古斯都左右手的人生深感幸运，心怀感激。不管是首都罗马的都市建设，还是和尤利娅结婚、担任种马般的角色，对阿格里帕而言，这些都是为了支持奥古斯都。哪怕是一个临时皇帝，反正接下来继位的也是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对获得“护民官特权”除了喜悦别无他想。

然而提比略就不一样了，他并没有像阿格里帕那样从17岁开始就和奥古斯都同甘共苦的经历，况且他有着来自名门贵族的骄傲。要他做一个递补，而且还是为了没有感情的妻子尤利娅的儿子，他的苦涩心情可想而知。虽然奥古斯都给予了提比略“护民官特权”，但并没有收他为养子。养子意味着继任人，奥古斯都指定的养子是他14岁和11岁的外孙。

提比略的地位显然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统治者而已。

奥古斯都认为，提比略应该为得到与阿格里帕同样的殊荣而感动高兴，然而提比略并没有过多的表示，他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项权力。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之间有关日耳曼战争的分歧依然没有消失。奥古斯都认为，不需要对日耳曼再作什么决定性的攻击，因此没有为提比略提供更多的兵力。正好那个时候，东方的亚美尼亚王国的局势再次发生动荡，奥古斯都便下令提比略转往东方。奥古斯都的这个命令，让失去了弟弟、深感孤独无助的提比略，作了一个有生以来最大的决定。

36岁的提比略拒绝了57岁的奥古斯都的命令，并且请求解除他所有的公职。

提比略出人意料的反抗，让奥古斯都勃然大怒，他宣布不准提比略放弃公职。然而，提比略这次没有妥协，即使母亲的苦苦相劝，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提比略像逃跑似的离开了罗马，躲到罗得岛上，自动引退。当然，他是一个人去罗得岛的，和妻子尤利娅实质上等于离婚。

那些喜欢讲小道消息的史学家认为，进入壮年期的提比略突然引退，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嫉妒奥古斯都偏爱两个外孙。

二、和尤利娅的不和。

对此，我有些怀疑。像提比略这样36岁的成年人，难道真会去嫉妒14岁和11岁的孩子？他和尤利娅的不和，不是才发生的事情，早在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不至于那么久之后才爆发，成为了他引退的决定性原因。当然这属于私人的感情问题，我们无法作出准确的评判。提比略对此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的言论。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共同的卓越之处，就是他们都是“直面真正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两人之间的纠葛不应该是儿女情长这类的事情。正因为两人都有着非凡的才华，才会产生观点上的分歧。如果阿格里帕、梅塞纳斯以及杜路苏斯都还健在的话，五位罗马政界的实力派，可以坐在一起好商好量地解决问题。不幸的是，当时只剩下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两个人。

提比略在罗得岛上过着读书、学习的悠闲生活。莉薇娅对变成了一介平民的儿子忧心忡忡，恳求奥古斯都给他一个“特使”（拉丁文legatu，亦译代理）的资格。想来莉薇娅是千辛万苦才为儿子争取到这份权力。因为奥古斯都打心底里不能原谅提比略，在责任感极强的他看来，提比略的引退行为等于是临阵脱逃。事实上提比略的确是做了逃兵。57岁的奥古斯都不得不一个人去治理庞大的罗马帝国。

第三章

奥古斯都统治后期

（前5—公元14年，58—77岁）

祖父奥古斯都

公元前5年，58岁的奥古斯都似乎真的有些着急了。这一年，他的长（外）孙盖乌斯·恺撒15岁，已经到了行成年礼的年龄。

没了“中继接班人”（提比略）的奥古斯都，明目张胆地向元老院提出申请，要求给予盖乌斯“预备执政官”的职位，确保他在5年后就任执政官一职。

对元老院而言，“预备执政官”这种头衔前所未闻，共和时代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官职。即使是独断专行、最终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也没有给予他的继承人、当时17岁的奥古斯都一官半职，更不会把一个17岁的少年，安插进30岁以上才有资格加入的元老院。相比之下，奥古斯都为了15岁的外孙盖乌斯，不仅新设了预备执政官的职位、提供元老院议员的席位，甚至还任命他为辅助大祭司的祭司。

此时此刻，奥古斯都世袭制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

在公元前后交替的这个时期，帝政并不等于世袭。由于元老院的大多数人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部分现实，所以他们始终愿意相信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恢复共和的宣言。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少部分人看清了真正的现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奥古斯都嘴巴上讲共和，但他的大脑和手实际上都在为走向帝政而运作。但是，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恺撒接班人的奥古斯都的确是一个有能之士，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将罗马带入了帝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奥古斯都可以完全不论能力，推行世袭制。何况，15岁的盖乌斯资质平平，说白了就是一位平庸的少年。

无视于元老院的惊愕，奥古斯都的心思全放在了和自己流着相同血

液的外孙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的身上，除了他俩没考虑过让其他人继位。特别是在他心目中的中继接班人提比略开溜之后，更有必要尽早地确立两人的地位。奥古斯都为鲁基乌斯也作了安排，他在年满15岁之后，也将和其兄长一样，拥有预备执政官、元老院议员以及祭司的职位。除了赋予具有权力性的公职之外，还有必要提高两位少年在一般大众中的认知度。奥古斯都考虑建立一支少年团，让两个外孙子担任“总裁”。不过，即使出于私心，奥古斯都也会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将事情制度化。

提到“少年团”（Juventus）首先会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的足球队尤文图斯（Juventus）队。尤文图斯的名字的确来源于古罗马拉丁语中的“Juventus”（青春、少年的意思。——译者注），不过，奥古斯都建立的“Juventus”，不是足球队，而是一个由9岁到17岁的少年组成、以强壮身体以及学习团队精神为目的的组织团体。

“少年团”也并非是奥古斯都首创，类似的团体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以及罗马共和时期就已经存在。奥古斯都用他一贯的手法，扩大了组织的规模并且使之常规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9—13岁和14—17岁两个组。包括首都罗马在内，本土的各个地方自治体都设立了这个组织。少年团的团员必须是罗马公民，拥有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的孩子也有机会加入。

每个少年团都有一到两名教官和一名财务检察官，负责指导和管理。少年团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组长从小组成员中选出。

古罗马时代的孩子，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去私塾，都是在上午读书，午餐之后，孩子们便去所属的少年团队的体育馆或竞技场锻炼身体以及学习、培养团队精神。

有意思的是，这些少年团不是官方组织，是由私人赞助，奥古斯都

本人就是首都罗马某一少年团的赞助人。赞助人需要提供所有的体育设备，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而，奥古斯都始终坚持少年团的私营化制度。赞助少年团，用古罗马人的说法，是对公共事业的一种荣誉的奉献，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回馈于社会。少年团的名称大多冠以所在地的地名，但也有一部分团体用的是赞助人的名字。

少年团每年举行一次全国规模的体育节，各地的少年团都会来参加比赛，还带着各自的拉拉队，场面非常之热闹。偶尔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出现双方的拉拉队、竞技对手打成一团的混乱场面。这一点倒是很像现代的足球比赛。

奥古斯都建立的少年团，和他创立的其他很多制度一样，延续了整个帝国时代，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最初建立在本土的少年团，很快就扩展至罗马公民居住的殖民都市，最终在行省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加入少年团的资格限制也顺势消失。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曾经模仿古罗马建立了青年团，之后，很多事情都拜墨索里尼为师的希特勒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不仅是右派，就是左派的某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组织。不管是左还是右，现代人不懂得去学习古罗马人“败者同化”的精髓，只晓得学一些敬礼、迈步等形式化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希特勒能够吸收犹太裔的德国青年加入组织，日后就不会有纳粹抬头的机会。

奥古斯都为提高两个外孙子的知名度而设立的少年团，自创办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盖乌斯17岁，鲁基乌斯14岁。两人分别担任着少年团的总裁和副总裁，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过失。倒是少年团在帝国境内的不断普及，再次显示了奥古斯都的卓越的组织能力。

更庆幸的是，自从提比略躲到罗得岛之后，日耳曼人也偃旗息鼓，没有发动新的战事，多瑙河边防线也处于平稳的状态。和这两处相比，

麻烦甚少的各个行省，通过奥古斯都在多项制度上的改革、整顿，自然而然地趋向罗马化，没有任何叛乱行动发生。

然而，为帝国全境带来和平形势的奥古斯都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其实奥古斯都没有一刻放松对它们的监督。治理国家和修建公路类似，必须具有对其长期维护的认知能力和不厌其烦、随时修正的行动能力，以及将之变成现实的经济能力。这三种能力缺少了一项，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

奥古斯都这个时候已经60岁，挚友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早已不在人世，继子之一的杜路苏斯英年早逝，而另一个继子提比略又躲在罗得岛上专心学问不问世事。在这期间，奥古斯都始终一个人肩负着所有的国家重任，让人不得不对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坚强的意志深表敬意。他是一位绝不言弃的人。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应该是可以拥有一个安泰的晚年，可惜，命运女神喜欢作弄人，60岁的奥古斯都又添了新的烦恼，而且给他带来烦恼的还是他的亲人。不过要追根究底，这是奥古斯都的自作自受。

女儿的丑闻

即便是父女，也是他人。如果不去干涉他人的私生活，就不会平添无端的烦恼。恺撒虽然把女儿尤利娅的婚姻当做一张政治牌，但并没有逼着她去生儿育女为自己延续血脉。然而，同为尤里乌斯一族，名字也叫尤利娅的奥古斯都的女儿命运却迥然不同，为了延续她父亲的血脉，一生都像商品似的被转手交易。

尤利娅出生于公元前39年，是当时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和他第一任妻子司克里波尼娅的孩子。司克里波尼娅是庞培的儿子的表妹，屋大维这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与庞培的关系。

这场政治婚姻在尤利娅出生之前已经破裂，由于对方先毁约，屋大维正好顺水推舟地解除了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奥古斯都的第二次婚姻非常幸福，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幼小的女儿的存在，尤利娅的童年是跟着母亲一起过的。奥古斯都相信他和妻子莉薇娅之间一定会有孩子诞生，因为夫妻各自都曾有过生育孩子的经历。奥古斯都想起女儿尤利娅，是在他知道妻子莉薇娅不能再生育的时候。

尤利娅14岁时，奥古斯都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儿子马萨鲁斯。他促成这场婚姻，与其说是希望外甥马萨鲁斯做继承人，不如说是期待尤利娅产下有他血统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夫妻双方年纪都太小，小孩过家家般的婚姻才2年，还来不及等到孩子出生，马萨鲁斯就突然病逝，他的死给舅舅奥古斯都和母亲屋大维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奥古斯都悲痛万分的同时，没有忘记他的目的，2年之后，18岁的未亡人尤利娅嫁给了从东方完成任务归来的、其父亲的忠实助手阿格里帕。这一次是48岁和18岁的婚姻。

虽然和丈夫的年龄相差甚远，但这次婚姻给尤利娅带来了幸福。尤利娅之前的生活可谓是夹缝里求生存，一边是深受父亲疼爱和敬重的美丽又高傲的继母莉薇娅，另一边是性格温柔但因家事繁杂无暇顾及侄女的姑妈屋大维娅，其间的苦劳可想而知。结婚之后的尤利娅在成熟的阿格里帕的体贴、关怀之下，度过了9年的平静生活，并且生下三男两女。这让奥古斯都欣喜若狂。

不幸，这场婚姻终究也因阿格里帕的突然死亡而告终。而奥古斯都仍不满足于目前已经有的三个外孙子和两个外孙女，他希望尤利娅能生下更多的孩子。尤利娅第三次婚姻的对象，是她继母的儿子提比略。

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大多数认为，促成这场婚姻的是莉薇娅，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所以强烈地要求奥古斯都把尤利娅嫁给提比略。不过，在我看来，这是奥古斯都自身经过冷静地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即便他非常爱惜和尊重妻子，但他绝不是一个会对妻子言听计从的

男人。挑选提比略，除了延续血脉的理由之外，他相信提比略的能力，万一发生不测，提比略有条件胜任“中继接班人”的角色。

尽管年龄相近，31岁的提比略和28岁的尤利娅的婚姻却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提比略深爱着他的前妻维普萨尼娅，始终不能忘记。如果丈夫能做些表面功夫，妻子一般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维持下去。可是，提比略完全不懂这套，出身贵族的他，对品行欠佳的尤利娅的种种行为，似乎也是忍无可忍，但又没有任何言语或行动上的表示，只是冷冰冰地将妻子晾在一旁，无视她的存在。

夫妻分房而眠的事情，很快就在罗马传开，身为继母又是婆婆的莉薇娅，对尤利娅的态度因此变得更加冷漠。虽然促使提比略出走罗得岛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奥古斯都在军事战略上的意见不合，但在一般不了解内情的外人看来，提比略的出走是因为不爱尤利娅，尤利娅成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而且，提比略并没有提出离婚，只是用分居的形式抛弃了妻子。

在对提比略放弃公职的原因上，婆婆莉薇娅的观点似乎和市井小民相近，将尤利娅视做祸根。莉薇娅不是一个精通政治的人，这一点史料已有所证明，当然，这对奥古斯都来说是件好事。总之，莉薇娅对尤利娅的态度从一贯的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尤利娅而言，唯一一位可以倾吐心事的人、姑妈屋大维娅，也和阿格里帕在同一年去世了。作为弃妇，尤利娅生活在一种极其压抑的环境里，就算是在她掌管的家中，也无法避开大家好奇的眼光。如果尤利娅能专心于养儿育女，或许状况会有所改变，可惜，她不是一个懂得自我调整、控制的人。

不清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皇帝的独生女儿的私情成了街头巷尾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到了公元前2年，37岁的尤利娅的行为，发展到了奥古斯都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的严重程度。

如果当时的尤利娅离了婚，最终结果不过是落下一个放荡的坏名

声，这种女人在罗马上流社会并不少见。可是她在法律上还是提比略的妻子，即使他们夫妻想离婚，奥古斯都也不会同意。为了确保罗马上层阶级拥有健全的婚姻生活，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6年，推出了《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如前文所述，这个法律鼓励正式婚姻，离婚虽不违法，但属于影响社会风气的不良行为。《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正如其名，是由奥古斯都提出并积极推行的法律，所以，奥古斯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女儿离婚。

与《婚姻法》同时，奥古斯都还推出了《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顾名思义，这是处罚通奸行为的法律。尤利娅的所作所为，正触犯了这条法规。

《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规定，凡是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恋情，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将被没收，本人将终身流放，并且不能再和自由民的罗马公民再婚。除了当事人本人，知情不报或者无所作为的当事人的丈夫以及父亲也将以“协助卖淫罪”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治国家讲求公正多于平等，唯有在执行法律这一点上，贯彻的是人人平等的方针。罗马人正是法治国家的创立者，而身为罗马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对自己女儿的违法行为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

虽然，父亲没有将女儿送上审判庭，但严格地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所有的处罚。奥古斯都并不是根据国法，而是行使了“家父长权”的权力，用实际行动履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定律。

最终，尤利娅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被充公，继承父亲奥古斯都遗产的权利被剥夺，终身流放至距离那不勒斯以西70公里的海上小岛潘达特里亚岛（Pandateria）。

对那些与尤利娅通奸案有关的责任人，奥古斯都依照国法，行使了最终裁判权予以处置。除了尤里乌斯·安东尼（Julius Antonius）之外，

其余的人全都处以流放之刑。奥古斯都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尤里乌斯的身上。尤里乌斯是安东尼和富尔维娅（Fulvia）之子，在富尔维娅死后，由与安东尼再婚的屋大维娅抚养成人，按照家族关系，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尽管是死对头安东尼之子，奥古斯都仍将他视为亲外甥予以厚待。

尤里乌斯在公元前13年当选为法务官，公元前10年就任执政官，公元前7年到前6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步步高升，仕途一帆风顺。公元前21年时，尤里乌斯娶玛吉拉为妻，玛吉拉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即尤里乌斯的继母屋大维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的确是将安东尼的儿子当做家人，体现了他宽容的一面。所以，外甥尤里乌斯和女儿偷情，对奥古斯都来说，就像被自家养的狗给咬了，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我感觉尤利娅和尤里乌斯并不是单纯的男女偷情的关系。首先，两人的年纪都不小了，尤利娅37岁，尤里乌斯·安东尼已经过了50岁。其次，两人都是被奥古斯都打败的敌人的后人，即使身份变成了胜利者奥古斯都的家庭一员，对他们而言，和安东尼以及庞培的渊源，超过了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两人会不会是因为同病相怜而产生了爱情？也许是我太过于想象了吧。

潘达特里亚岛是一个面积不足1.3平方公里的荒芜的小岛，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以渔业为主。或许是因为没有耕地，岛上的面貌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潘达特里亚岛属于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在帝政年代一直作为皇帝家族的流放地使用。可能是因为无人关注，岛上的古建筑也没有被后人拆除作为材料使用，一些地方至今维持着旧时的风貌，一些散留在海边的遗迹，不难看出它们曾经是非常典雅的房子。我是在夏天去的潘达特里亚岛，我甚至认为在这里专心写作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潘达特里亚岛现在叫文托特内岛，强风的意思。从地名可以想象冬季凛冽的北风会有多么可怕。真不知道皇帝的女儿是如何在寒风肆虐的岛上度过的。作为对纵欲女人的惩处，奥古斯都禁止尤利娅与任何男人接触，甚至男奴。岛上除了自愿和女儿同住的母亲司克里波尼娅之外，只有几名负责打点日常生活的女仆。想来没多少学识教养的尤利娅，大概很难找到能让她专心致志、忘却时光的事情。

若干年后（具体时间不详），尤利娅的流放地转移到雷焦（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e Calabria）。雷焦在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的鞋尖，是一个由希腊移民兴建而起的古老的城镇。严格执法的奥古斯都并没有允许女儿在城里生活，而是将她幽禁在远离市区的山庄中。

经历了潘达特里亚、雷焦两地总共16年的流放生活，公元14年，尤利娅在她父亲奥古斯都去世的几个月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

“国父”

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在处理完女儿的问题、向元老院提交了相关的书面报告之后，便从众人的面前消失了。女儿伤风败俗的行为，让他羞于见人。

大家很清楚奥古斯都支撑着并不健康的身体，在没有任何得力助手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担负起国家大任。他因家丑而深居简出，反而在全国引发了一片同情之声。

元老院迫于人民的呼声，请求奥古斯都出席元老院会议。皇帝接受了这个请求，来到了久违的元老院，议员瓦莱利乌斯·麦萨拉（Valerius Messala）代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奥古斯都致词：

恺撒·奥古斯都，谨代表我们全体献上最深切的祝福，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你们的平安、健康才能保证国家和首都罗马的和平。经过国民的合意，元老院决定授予您“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

瓦莱利乌斯的发言结束之后，元老院议员全体起立，合唱“国父恺撒·奥古斯都”赞歌，61岁的奥古斯都忍不住当众落泪，向元老院致答谢词：

元老院议员诸君，在我所有的愿望都即将达成的此时此刻，除了祈求各位和罗马人民在我有生之年继续给予我支持之外，我对永生的天神们已别无他求。

“国父”的称号是恺撒曾经获得的荣誉中奥古斯都至今没有到手的唯一的一项，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奥古斯都答谢词中的“我所有的愿望”耐人寻味。所谓的“所有的愿望”到底是哪些愿望，他并没有言及，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诠释。共和派将之解读为是他在35岁时宣告恢复共和，帝政派认为他指的是巧妙地将国家转型为帝制，而那些无所谓国家体制的人，则为奥古斯都达成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心愿而高兴。

恺撒曾经说过，文章的好坏取决于所选择的词语。不善撰文的奥古斯都即使因感动而哽咽，也并没有忘记“所选择的词语”。用词不当而失言，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不能被原谅的愚蠢行为。

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如人们所愿，从他的家庭不幸中解脱出来。精神上的执著一定是要付出实际的代价。

小林秀雄（日本著名的批评家。——译者注）曾经说过：“政治既

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门技术，它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生活。”政治家纵使不都是像奥古斯都那样有天生消化系统的毛病，长年累月的压力也会损耗健康的身体。要在这种严酷的状态下保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认为必须具备以下这些特质：

第一，了解自己的能力界限之所在，看清现实本质的透彻的认知力。

第二，坚持勤奋是成功之本的信念，不厌其烦、不辞辛劳的持续力。

第三，抱有适度的乐观精神。

第四，不走极端，始终保持平衡。

过了60岁的奥古斯都，这些作为政治家的优秀特质依然不衰。可惜他身边没有一个能贯彻执行他意志的协助者，偏偏又在这个时候，平静了20余年的东方，也开始风云突变。

东方问题

公元前4年，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维持了国内长期稳定的犹太王希律去世。希律王死后国内陷入两派对立的局面，纷争再次涌起。反对希律王和其三位继承人的一派主张脱离罗马，完全独立，而另一派则认为，只有成为罗马的行省，才能保证犹太王国的延续。

罗马的东方外交政策似一张大网，通过与各同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牵制各方的势力。这些同盟国家由于独裁或暴政，经常引发人民的不满，引发反罗马的风潮。犹太王国位于叙利亚行省的南面，不仅是保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安全的关键，也是牵制住东边的帕提亚的关键

所在。对罗马而言，犹太王国的内乱，必须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彻底解决。

同一个时期，另一张牵制帕提亚的王牌——亚美尼亚王国也陷入了局势不稳的状况，亲罗马派的国王在与蛮族的战斗中阵亡，东方君主国惯有的为继承王位亲族之间相互厮杀的剧情再次上演，帕提亚乘机介入了局势。罗马同亚美尼亚结成同盟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帕提亚，如果此时亚美尼亚投入帕提亚的怀抱，罗马的东方政策将濒临危机。

平息东方局势，是一个光靠军事力量或者单纯外交交涉都无法解决的、困难且微妙的问题。奥古斯都把任务交给了已年满19岁的外孙子兼养子的盖乌斯。除了身边没有合适人选的现实情况之外，奥古斯都似乎也不能摆脱外祖父的身份，对外孙寄予了过高的期待。不过他还是委派了经验丰富、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马库斯·罗利乌斯（Marcus Lorius）作为顾问与盖乌斯同行。于是在公元前1年，19岁的年轻人盖乌斯作为皇帝代理，带领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东征。

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各行省、自由都市以及同盟国，为这位年轻的未来皇帝，连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招待晚宴，19岁的盖乌斯完全沉醉于这种气氛中，忘记了肩负着重大的外交任务，反倒像查尔斯王子的视察之旅。一行人途中经过萨摩斯岛，隐居在罗得岛的提比略专程前往萨摩斯岛迎接盖乌斯，这在罗马敬长尊老的传统中，算是特例。提比略的这一举动让年轻的盖乌斯气焰越发高涨，其实这对于贵族出身的提比略而言，不过是尊礼行事而已。

之后，年轻的皇子不知为何原因，没有直接前往目的地，而是绕道埃及。或许是因为埃及属于皇帝私人领地，他想亲自去视察一下自家的土地。盖乌斯在埃及同样也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夜夜笙歌，乐不思蜀。等到他到达此次目的地之一的叙利亚行省时，已经耗去了两年的时间。

幸好，奥古斯都派给外孙做顾问的罗利乌斯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

他似乎没有忘记职责。对于犹太王国的内乱，罗马没有直接插手介入，而是选择了静而观之的态度。同时对于帕提亚干涉罗马同盟国内政的问题，也决定采用外交手段解决。

公元2年，罗马和帕提亚在位于两国势力圈交界处的幼发拉底河的小岛上，签署了友好条约。帕提亚派出王子做代表，罗马方面也是由“王子”盖乌斯担任签字仪式的主席。有关仪式的情形，根据当日在现场的帕提科斯的证言，幼发拉底河两岸，东岸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帕提亚的军队，西岸则是罗马军团声势浩大的队伍，场面十分之壮观。

与帕提亚的签字仪式结束之后，盖乌斯前往最终目的地亚美尼亚。

在首都接到通报的奥古斯都应该是如释重负。盖乌斯首战告捷，为他在年满21岁时担任执政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以编年史的方式讲述历史的话，在进一步之前，我们必须暂时停顿一下，先回溯一件事情。

根据传说，耶稣的父亲约瑟夫和母亲马利亚为了参加奥古斯都皇帝举行的人口普查，在赶回原籍地罗马的途中生下了耶稣。可是，世纪交替的这个时期，罗马并没有实施人口普查。

奥古斯都深知正确掌握现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在位期间，总共举行了三次含括帝国全境的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当时的犹太王国属于罗马的同盟国，难道是人口普查涉及同盟国了？根据奥古斯都在《功业录》的记载，三次人口普查的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他和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28年。

第二次，盖乌斯·肯索里努斯（Gaius Censorin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Gaius Asinius）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8年。

第三次，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Sextus Pompeius）和塞克斯图斯·奥勒利乌斯（Sextus Aurelius）担任执政官的公元14年。

顺便提一下，古罗马对年份的称呼，通常不会用建国几年，而是用谁和谁担当执政官的某某年。至于“公元年”的讲法，是在基督教兴盛后才开始的。

话说回来，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是公元的开始，而在耶稣诞生的前后，罗马并没有实施人口普查。距离耶稣出生最近一年的罗马人口普查是在公元前8年，就算同盟国犹太王国距离本土甚远，普查的时间有所差异，也不至于有8年之久。难道是犹太王国独自实施了人口普查吗？可当时的犹太王国正因大希律王的死亡而陷入内乱，绝对不是可以进行人口普查的形势。

非常遗憾，对于我这个单纯的疑问，至今还没有一位研究者可以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还有一点也颇令人费解。耶稣真的是出生在公元前后吗？如果确切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是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出生、成长和死亡。那么基督教为何要等到300年后才在罗马普及呢？

话题再回到耶稣诞生、正值63岁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里。耶稣诞生之后的一年，即公元2年，对奥古斯都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一年。

首先是从马赛传来了外孙鲁基乌斯的死讯。18岁的鲁基乌斯和其兄长盖乌斯一样，也被奥古斯都收为了养子，拥有第二继承人的地位。前一年，为了经历军队的生活，当时17岁的鲁基乌斯被派往西班牙，途中在马赛作了长期的逗留，结果染病不治，年仅18岁就离开了人世。鲁基乌斯的死亡，对于即将64岁的奥古斯都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当盖乌斯和帕提亚缔结了互不干涉的条约，才会让奥古斯都精神

振奋，重新找回了希望。他至少还有一位继承人，而且到目前为止盖乌斯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

同年，隐居在罗得岛的提比略写信给奥古斯都请求让他返回罗马。理由是列席参加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的成年礼。将提比略视为逃兵的奥古斯都，态度十分冷淡，虽然批准了提比略的请求，但要求他必须严守一介自由民的身份，不得进入元老院。提比略在离开7年之后得以重返罗马。

刚进入公元3年，奥古斯都收到了唯一继承人盖乌斯送来的报告，这又让他烦恼不安。

事情发生在前一年的年底。当时帕提亚方面有人告发担任盖乌斯顾问的罗利乌斯因为接受了帕提亚有关方面的钱财，才作出了有利于帕提亚的决策。盖乌斯完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帕提亚的阴谋，对此确信无疑。更糟糕的是，接到报告的奥古斯都在这件事情上态度模糊，被指认犯了受贿罪的罗利乌斯不堪忍受被召回罗马，送上审判庭，最终选择了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身边少了罗利乌斯的盖乌斯完全失去了方向，朝令夕改、言行不一，军队不受其控制。公元3年远征亚美尼亚之前，每个人都掩饰不住不安的情绪。亚美尼亚正在力求同邻国帕提亚改善关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让一个22岁的少年出面进行外交谈判，这份责任的确是过于沉重了。

所幸，盖乌斯一行平安地到达了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王国的一城塞，开始了首轮的谈判。可是，盖乌斯傲慢的言行很快地就激怒了当地人，引发了暴乱，形势愈演愈烈，甚至威胁到了亲罗马派的王公贵族。最终，暴动被盖乌斯带去的罗马军团镇压，但这让“保护者罗马”在亚美尼亚的信誉荡然无存。原本作为牵制帕提亚的一张王牌，渐渐离开了罗马的掌心，朝着帕提亚越走越近。远在首都罗马的奥古斯

都，也回天乏术，只能静观其变。

尽管罗马因此失去了对亚美尼亚的影响力，但是和苏拉、恺撒先武力再谈和的强硬手段相比，奥古斯都以外交方式求和的做法还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话说回来，这些中、近东国家的人民崇尚强势，和亚美尼亚谈判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盖乌斯的无能。

亚美尼亚的挫败给了年轻的皇子沉重的打击，加上镇压暴乱时负了伤，盖乌斯的精神状态日益低落，萎靡不振。

放弃了军队总指挥职责的盖乌斯写信给外祖父，要求引退做回自由人。奥古斯都回信给盖乌斯，苦口婆心地劝他打消引退的念头。那个时刻的奥古斯都不再是一个严厉的长官，而是一个宠爱外孙的慈祥的外祖父。

逃出亚美尼亚的盖乌斯，漫无目的地游荡于小亚细亚各地。公元4年2月20日，盖乌斯在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叙利亚病逝。据说死因是由于刀伤引起，去世时盖乌斯不满23岁。

不难想象，接连失去了两个外孙子又是继承人的奥古斯都，会是多么绝望。在公文中从不掺入私人感情的他，也忍不住在《功业录》中记下了一笔：

> 风华正茂时就被命运女神夺去生命的我的两个养子盖乌斯·恺撒和鲁基乌斯·恺撒，在他们15岁时，由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对我的敬意，被选派为预备执政官，他们将在5年后就任该职。而且从两人正式被介绍给人民的那一天起，元老院就同意他们可以参与国是讨论。

奥古斯都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公元14年，亲笔撰写了《功业录》。那时距离他两个外孙子的死亡已经过去了10余年，然而从字里行间可以

看出垂垂老矣的奥古斯都心中的伤口并没有愈合。奥古斯都在66岁时，失去了所有和他血脉相连的继承人。

提比略的回归

公元4年，在安葬了盖乌斯·恺撒之后不久，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为了养子。在正式公布之前，66岁的奥古斯都和45岁的提比略展开过怎样的谈话，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可以想象这是两位看清现实的本质、具有高度洞察力的政治家，通过彻底的交谈，最终达成了共识。尽管这是一场不夹杂着个人感情的政治选择，然而看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奥古斯都在失去了继承人之后，无奈之下作出的一个决定。

世人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无凭无据，因为奥古斯都在将提比略收为养子的同时，也将女儿尤利娅所生、唯一还在世的外孙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指定为养子。可见，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血统论。

元老院欣然接受了提比略升格为奥古斯都养子的决定。奥古斯都在正式发表他与提比略结成父子关系的同时，又向元老院提出了给予提比略10年任期并且允许延长的“护民官特权”的申请。提比略和尤利娅再婚的当初，曾经得到过5年任期的“护民官特权”，由于之后他的引退，这个特权被自动解除了。

提比略在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之后，即刻获得了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无人拥有的“护民官特权”，虽然他已不再是事实上的奥古斯都的女婿，也没有为奥古斯都带来血脉相承的孩子，但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再是障碍，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继承人。

奥古斯都还任命提比略和他一起担任“内阁”（“第一公民的辅助机关”）的常任委员，之前只有阿格里帕拥有这个职位。“内阁”的成员包

括了“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和现任的两名执政官以及法务官、按察官等，用现今的讲法就是各个部委派出的代表，加上任期6个月的元老院的20名议员。除了奥古斯都本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属于短时期的临时委员。奥古斯都任命提比略为常任委员，就是为了不测之时，国家统治的实务和实权可以顺利地移交到继承人手中。

对奥古斯都的这些举动，作为共和政体最后堡垒的元老院并没有提出异议。我想其中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提比略虽然在罗得岛闲散了7年，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无人可比。元老院也非常清楚，要建立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小事，尤其是担当边境地带的安全保卫任务，除了要有相应的地位，还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能力。年轻的盖乌斯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第二，提比略出身于罗马名门克劳狄乌斯家族，与奥古斯都以及他的外孙子不同，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在那些掌握元老院大权的人看来，提比略是他们自己的人。

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别名“贵族政治”，是历史上被称为“寡头政治”的由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并非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民主政治。元老院成员大多来自地位显赫、出身不凡的罗马上层社会，500年来以他们为代表的元老院掌握了罗马国家的大权。最早一个挑战元老院、欲推翻现有体制的是恺撒，他的接班人奥古斯都不仅继承了他的遗志并且予以实现。

提比略的亲生父亲，年轻时曾经作为恺撒手下的士官，参加过最后几年的高卢战役。恺撒强行渡过卢比孔河之后，他离开了恺撒，转投庞培麾下。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等于向全天下人宣布了他打倒元老院的决心，提比略的父亲离开恺撒、效忠于庞培，可见他心属元老院。在恺撒打败了庞培之后，提比略的父亲依然不离不弃地跟随着庞培之子，所以他是一个坚决的“元老院体制”的支持者。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主谋的暗杀恺撒的行动。

作为反恺撒派的一分子，他的名字上了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肃清反对

派黑名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流放生活。提比略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是奥古斯都的敌人之一。不久，《米塞诺协定》订立，父亲终于回到了罗马，可是，母亲莉薇娅又成为了奥古斯都的妻子。虽然提比略和弟弟杜路苏斯自幼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然而，对于念念不忘“元老院体制”的贵族们来说，提比略始终是高贵的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一员。这些人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就连奥古斯都也都无法忘记提比略的出身。无论是品行、举止，还是流利的希腊语，提比略的身上具备了所有的贵族特质，这也使得他永远无法融合到奥古斯都、阿格里帕这些人的平民世界里。

不过，提比略本人并非是顽固的阶级论者。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前妻维普萨尼娅是平民出身的阿格里帕的女儿，即使追溯到她的祖父阿提库斯那一代，也找不着半滴的贵族血液。所以，那些只认血统的人是不能够了解提比略真正的想法，唯一看懂他的只有奥古斯都，虽然奥古斯都这个醒悟来得晚了一点。

我认为66岁的奥古斯都是完全放心地把位子留给了提比略。因为如果他对提比略还心存疑念，就不会同时授予他“护民官特权”和“内阁”常务委员的权力，而是会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他这次的决定明确、果断，不给人留下任何想象、臆测的余地。

一生执著于血脉相承的奥古斯都，最终选定的继承人竟然和他毫无血缘关系，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其实，对于奥古斯都不计前嫌、以公事为重的决断，我很想由衷地表示赞赏，可惜，这个赞赏只能给出一半，因为奥古斯都在指定提比略做继承人的同时，还指定了提比略之后的继承人。

提比略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的同时，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养父，奥古斯都要求他认其胞弟杜路苏斯的儿子、即将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小安东尼娅，所以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的儿

子。奥古斯都在失去了两个外孙之后，依旧没有放弃任何可以联系血缘的机会。提比略自己也有一个16岁的儿子，但对奥古斯都而言，那是个跟他毫无关系的孩子。

不管是否内有蹊跷，对于提比略的复职，从元老院到平民百姓都表示了欢迎。提比略不负众望，即刻奔赴战场。日耳曼战线吃紧，需要一位能够带兵打仗的指挥官。

元老院议员们的日常生活，通常是居住在安全、舒适的首都，在剧院或竞技场保有前14排的座位，有时候也会去生活水平稍低但无须驻兵防守的元老院行省，平安无事地担任一年的总督。与之相反，前线的士兵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绷紧神经，提高警惕以防敌人随时而来的袭击。对于提比略的回归战场，最高兴的就是前线的战士们。

当年24岁、担任骑兵队总指挥的维勒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20年后在他的《罗马史》中描述了提比略回到前线时的场景：

> 我很清楚以我拙劣的文笔，不在场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不过，我还是相信总有一些人能理解。
>
> 当提比略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士兵们喜极而泣。他们完全忘记了队形整齐，奔向他的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表达喜悦之情，有人甚至忍不住去抚摸他，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
>
> “这不是做梦吧，总司令？我们又能在您的指挥下战斗了。”
>
> “我曾经跟随您在亚美尼亚打过仗，总司令。”
>
> “我是在雷蒂安。”
>
> “在多瑙河战役时，您曾经亲手给我颁发过勋章。”
>
> “我也得到过您的嘉奖，在潘诺尼亚。”

“我跟着您去过日耳曼。”

提比略已经10年没有见到他的战士。45岁重返战场的他，将会在日耳曼战场上如何去发挥他成熟、机智的实力。

奥古斯都指定的提比略的继承人、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也跟着提比略来到了前线。日耳曼尼库斯本名叫尤里乌斯·恺撒。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过于伟大，通常大家都叫他“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意思是打倒了日耳曼的人，原本是杜路苏斯死后，大家为了纪念他在日耳曼战争中的功绩而赠与的称号，之后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称号。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这是第一次跟随伯父兼养父的提比略出征前线。

提比略起初并没有让日耳曼尼库斯担任重要的任务，他让这个18岁年轻小伙子，在参谋部做了2年的勤务。将来要做帝王的人，必须从基层开始学习。这也可以说是罗马人的一种帝王培养教育。

率领第二军团、协助提比略的副将是当年的执政官萨杜尔尼努斯（Saturninus）。日耳曼战争实际上已经中断了10年，不得不回到起点莱茵河重新开始新的征战。这次战争的最终目标，就是完成奥古斯都的征服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同时将罗马的防卫线从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的既定方针。这是奥古斯都始终如一的战略方针。恺撒征服了高卢，使罗马摆脱了威胁，奥古斯都也要消除罗马的另一个威胁——日耳曼，让它和高卢一样走向罗马化。然而，在实现政治上的同化之前，必须使用军事武力降伏日耳曼人。杜路苏斯曾经肩负这个重任，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了提比略。

日耳曼尼库斯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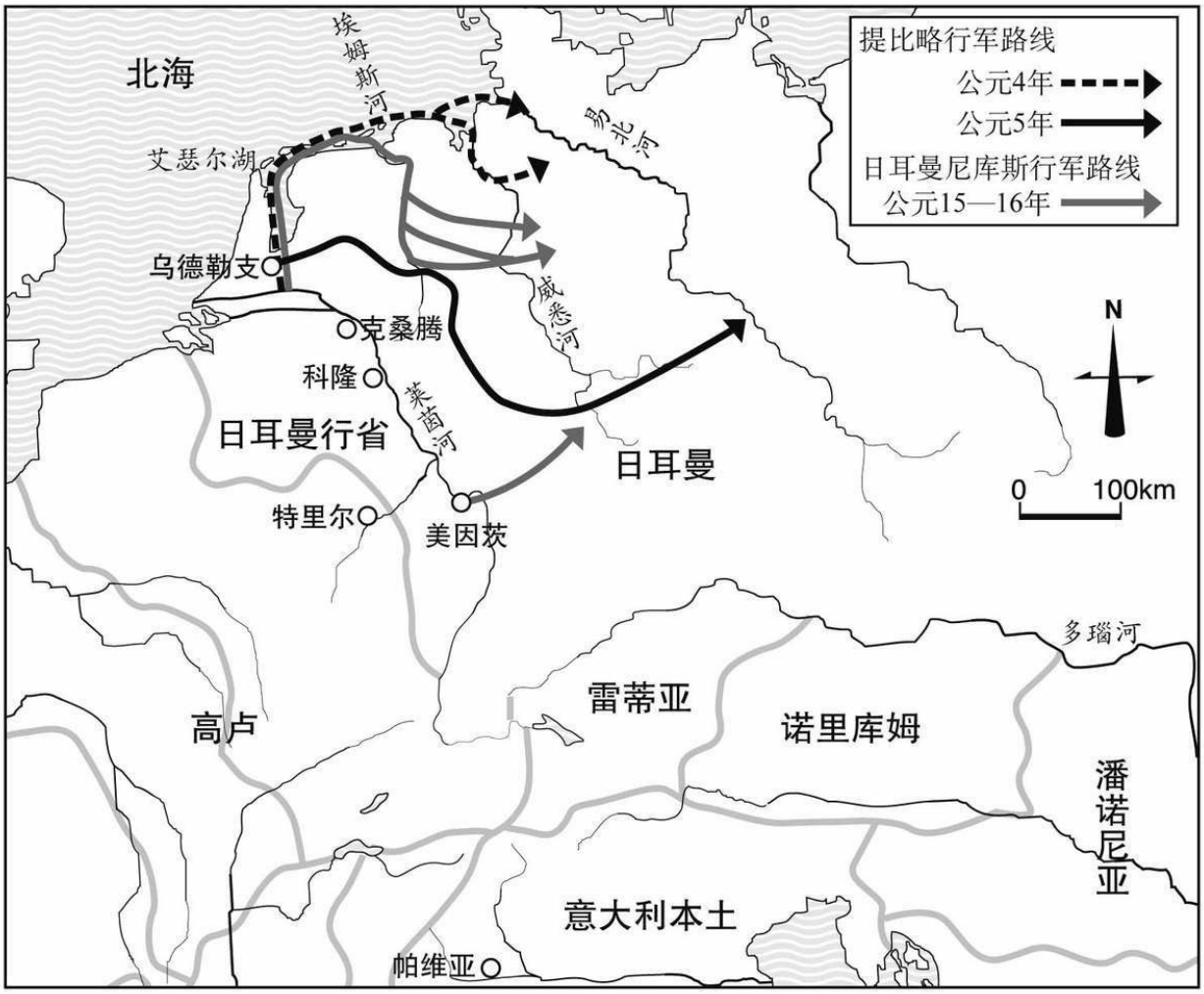
日耳曼有四条通往北海的大河，由西向东分别是莱茵河、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

日耳曼战役重新开始的第一年，即公元4年，提比略将军队兵分两路：年过60岁、非常懂得士兵心理的副司令萨杜尔尼努斯率领的部队从莱茵河的上游过河向东方进攻，占领四条大河的上游地区。他本人率领的第一军团，从下游渡过莱茵河，向北迂回，一路往东攻击。

提比略的战略是，同时占领四大河的上、下游，保证由北海逆流而上的海军航线的安全，利用陆海军联合作战，南北夹击，占领日耳曼全境。提比略打算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计划。

莱茵河上游森林密布，大多数的部落都选择在河的下游区域生活，因此，提比略的第一军团的行程远比萨杜尔尼努斯率领的第二军团要来得艰难。

公元4年的战役，虽然一直持续到年底，但终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除了易北河之外，日耳曼境内所有的重要河流，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军的手中。提比略带着捷报返回了罗马，他并没有在罗马作长久的停留，为了开春后新一轮战役的准备，他向奥古斯都作完汇报后，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到了莱茵河附近的冬营地。



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的行军路线

提比略军团在日耳曼第二年（公元5年）的战役，获得了比前一年更加辉煌的战果，历经14年，罗马军终于到达了易北河。有关战事的情况，允许我再次借用帕特库鲁斯的笔来作描述：

> 罗马军团的足迹遍布日耳曼所有的土地。曾经只听说过名字的许多部落，真真切切地降伏在罗马军的枪下……无以计数的日耳曼人向我们投降，这些金发的年轻人都有着高大壮硕的完美的体格，罗马战士包围着他们，手中的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所有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站在中央的总司令的身

上。

投降的日耳曼部落中甚至包括了从未同罗马军交过手的、居住在易北河东部的“长须族”（long beard）。罗马军团的银鹫旗插遍了莱茵河以东400罗马里（约合600公里）包括易北河在内的整个日耳曼地区。

根据提比略的战略，沿易北河顺流而上的罗马海军与由西向东的陆军联合作战，获得了预期的战果，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

然而，日耳曼人并没有全线投降，其中也有些部落在战败后，另谋出路，东山再起。马尔柯曼尼人（Marcomanni）的首领马罗波达斯（Moraboduas），曾经作为人质，在奥古斯都的亲戚家度过少年时代，他是少数了解罗马的日耳曼人之一。获得自由、回到故乡的马罗波达斯，为了部落的生存，放弃了对抗罗马，带领部落远走他乡。马尔柯曼尼人迁移到位于多瑙河南面的波希米亚地区时，正是公元前9年，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率领军队到达易北河之际，等到公元5年，提比略再次占领易北河时，马尔柯曼尼人已经在波希米亚生活了14年。

马罗波达斯在这14年间，秣马厉兵，建立了7万人的步军团和4000人的骑兵队，以罗马军团的方式，组织和训练军队。拥有强大兵力的马罗波达斯，不仅自封为王，而且与罗马中央政府缔结了外交关系。

尽管有军队做后盾，马罗波达斯仍然力求避免与罗马的正面冲突，但是他统治的地区免不了成为那些不满罗马武力镇压的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首领的避难所。无论马罗波达斯是否有意抗衡罗马，在罗马人眼中，他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地区就像恺撒当年在高卢会战时所见到的不列颠，迟早会察觉到它威胁性的存在，波希米亚南部的边境距离意大利仅350公里，这个路程步兵用12天、骑兵只需要4天就可以抵达。

公元6年，奥古斯都认为征服日耳曼的目标已经达成，决定出兵攻打马尔柯曼尼人。负责此次战役的提比略，为了能在入春后立即发起进攻，在多瑙河附近建立了冬营地。为了对付这个唯一没有投降的日耳曼部族，提比略采取了两路夹击的进攻方式。由他率领的部队从南向北、萨杜尔尼努斯的部队由西向东，将马尔柯曼尼人包围起来一举歼灭。两军抵达前线的行军时间预计在5天左右，罗马军团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只等积雪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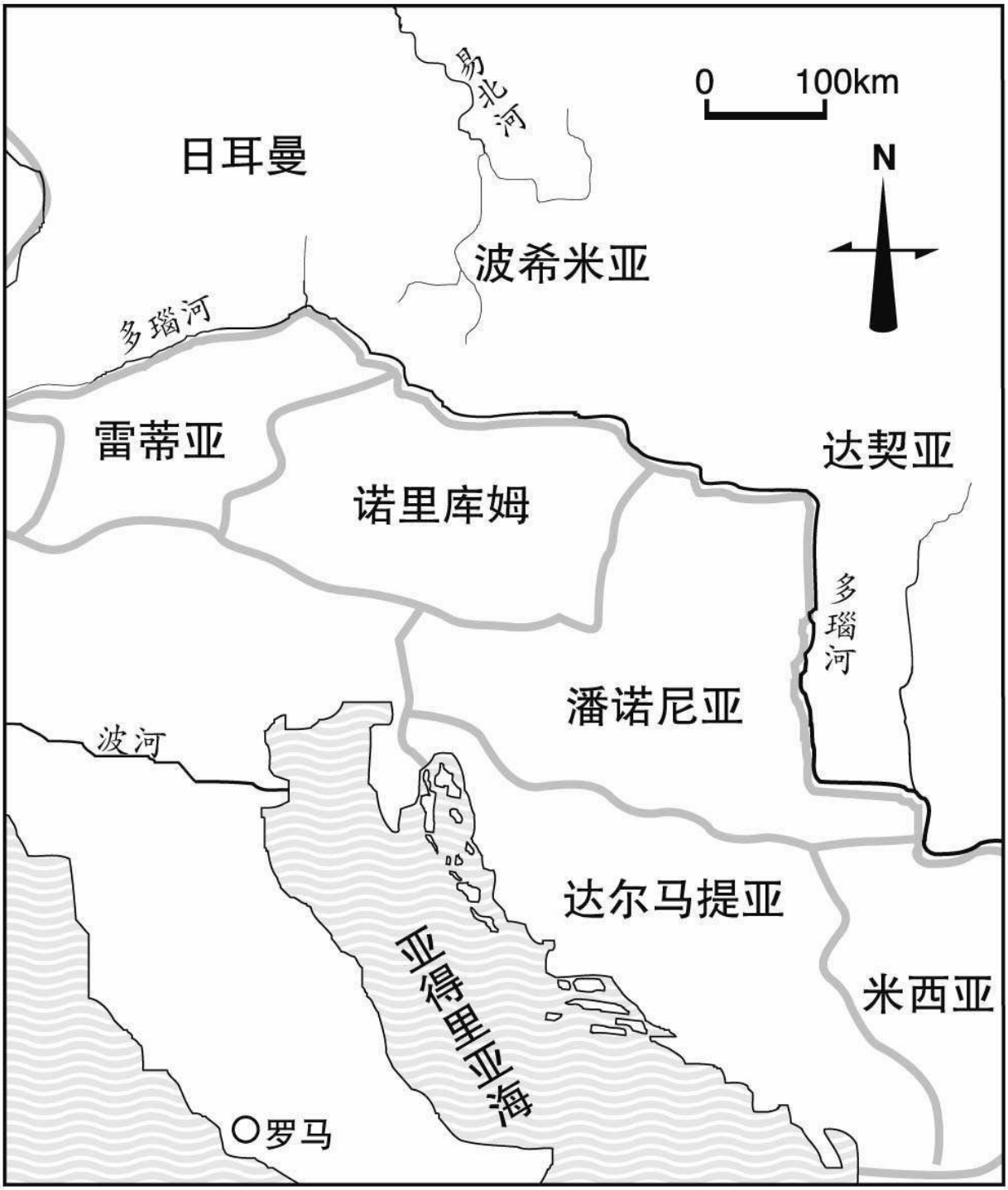
然而，事态的发展正如帕特库鲁斯所言："命运之神有时候会将人类的计划破坏殆尽。"公元6年，正当提比略等待春天向北发起进攻的时候，没料到背后受敌，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内乱。

叛乱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提比略引退罗得岛之前占领下的地区，与意大利隔着亚得里亚海遥遥相望。罗马统治之后，在这里修建了道路，在要塞建立了由罗马退伍兵移居的殖民都市，并且成为了带动当地经济的中心地区。罗马人对这个与意大利一海之隔的地区的罗马化，表现得非常之积极。

这里以地形复杂而著称，从未经历过文明化。在它南面居住的希腊人是航海和通商的民族，对于海洋的兴趣远远大于陆地。而且由于希腊的高度文明，希腊人非常了解罗马基础建设之好处，并且懂得充分加以利用。那些掌握了希腊本土以及小亚细亚的经济命脉的希腊人之所以愿意服从罗马统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倒不如说他们清楚罗马化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益。这好比是知道汽车速度快的人，才能了解高速公路的好处，而对于那些长年累月在山野中过着马背上生活的人而言，要他们搞清楚什么是高速公路，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如前文所述，奥古斯都推行了军事改革之后，主力军除了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之外，也新加入了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其规模基本与罗马军团相同。建立辅助兵，意味着让昔日的敌人重新拿起武器，因此始终存在着危机。加入辅助兵，虽然从军期间衣食住有所保障，退伍后还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然而这些待遇对当地人而言，是否就有特别的吸引力呢？说得极端一点，原本做山贼的人，需要这些东西吗？所谓的文明，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多瑙河中游流域图

尽管存在着各种弊端，罗马人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方针，始终坚持先

用武力征服，再通过基础建设等方式进行罗马化的改造，用罗马人的话讲，是推进文明进程。这种对占领地的政策，在罗马的军事威慑力尚未退去的期间，是可以平稳地推行的，然而当地人的叛乱，通常不会发生在被征服的初期，而是在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露出端倪。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在发生叛乱之前，已经维持了12年的安定。这两个地区的反罗马军的领袖认为，他们可以联合居住在多瑙河以北、波希米亚地区强大的马尔柯曼尼人，共同对抗罗马。或许是以前他们就和马尔柯曼尼人有过接触，所以对此深信不疑。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个地区的叛军人数加起来超过了80万，其中拥有武器、可以战斗的步兵有20万人、骑兵有9000人。这些士兵大部分都在罗马军队中服过役，指挥官多半也曾担任过辅助兵部队的队长。奥古斯都在军事改革中，执行了辅助兵部队自行管理的政策，因此辅助兵部队的指挥官是由当地人担任的，一般都是由部落首领指挥自己的一族。

奥古斯都指定的帝国防御体系，是以罗马军团和辅助兵部队紧密配合为前提，因此两军的指挥官接触频繁，当地人的指挥官甚至可以出席由罗马军团的军团长主持的军事会议。由于十余年之久的交往，当地人都学会了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

叛军的行动通常是先屠杀居住在当地的罗马人，然后袭击罗马军驻地，正式掀开战争的序幕。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的叛军的首领，模仿了罗马式战术，兵分三路：第一军坚守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阵地；第二军向南进攻马其顿；第三军入境意大利东北部，用扩大战线的方式来分散罗马军的兵力。

这次叛乱让凡事处乱不惊的奥古斯都，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安。68岁的老皇帝匆匆地赶到元老院召开会议，向大家宣布叛军距离首都只有10天的（行军）距离，要求立即采取紧急对策。元老院非常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一旦当地被叛军全面占领，一海之隔的意大利半岛难免

直接受敌，尤其是在这风平浪静的夏季，渡过亚得里亚海，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罗马人在遇到外敌侵袭、危机当头时，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全权交由他们公认的实力派负责。元老院通过了紧急招募士兵以及筹款的决议，并且要求奥古斯都任命提比略担任这次镇压叛军行动的罗马军最高指挥官。

提比略在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之后，获得了“护民官特权”，同时也是“内阁”常务委员，但他还没有机会得到罗马军的最高指挥权。这个权力属于奥古斯都一人，军队总司令的人选只有奥古斯都可以决定。这一次奥古斯都同意了元老院的特别要求。

叛乱爆发初始的公元6年，由于驻扎在军事基地的罗马军的反击，叛军没有能够入侵意大利的东北地区，达尔马提亚的海岸一带仍在罗马的掌控之中。罗马军准备在第二年（公元7年）的春季展开的大规模的反攻行动，还是由提比略担任总指挥。这里又不得不提到马基雅弗利对罗马人的赞赏：“一旦权力交给了前线总指挥，本土的中央政府绝不插手。”所谓将在外不受君命，罗马军队的前线总司令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48岁的提比略充分地利用了他手中的“绝对指挥权”。他派密使去和马尔柯曼尼人的大王马罗波达斯和谈（也有一种说法是提比略亲自参与了和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缔结了友好关系。由于和平解决了北面的马尔柯曼尼人的威胁，提比略的军队得以全力以赴地去对付南方的叛军。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叛军联手马尔柯曼尼人的计划，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提比略和马罗波达斯年龄相仿，少年时代作为人质寄宿于奥古斯都亲戚家的马罗波达斯，说不定和提比略还曾经做过同桌。尽管是战败者，但是能够作为人质的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因此人质通

常都会寄宿在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罗马人家庭中，而且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们接受同等的教育。所以我才会经常将人质比喻为“交换留学生”。马罗波达斯决定休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出于他与提比略的同桌友情，而是他了解罗马。对于提比略的和谈要求，他没有提出任何的附加条件。

解除了北方危机的提比略，将手中的5个军团都投入了镇压叛军的战斗。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强大的援军。居住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色雷斯人（Thrace）的大王，亲自率领骑兵队加入了提比略的军队。色雷斯人的骑兵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声名赫赫，对于骑兵力量一向虚弱的罗马军团来说，色雷斯人的支援，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古代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大多位于现代的原南斯拉夫的境内。原南斯拉夫的地形极其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之所以能抵御住德军的进攻，就是凭借了地形优势。在现代，这个地区的纷争难以平息的原因，也是和其复杂的地势有关。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对此提比略也不敢掉以轻心。

公元7年，为了因应敌军的规模和所在的位置，提比略同时使用两种战术：一种是一举歼灭的速决战，另一种则是以消耗敌军实力为目的的持久战。

由于地势的缘故，战场不能集中在一处，无法展开罗马军最擅长的平原布阵、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提比略不得不化整为零，打一个个的局部战。

古罗马人并不认为发动战争是罪恶，因此对于战败者相对比较宽容，而且尽可能地去同化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归属了罗马之后中途毁约、揭竿起义的人，绝不手下留情。叛军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将官们知道，如果被捕，唯有死路一条。

罗马军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各地，受到了叛军的顽强抵抗，战

斗进行得非常惨烈，双方的官兵都很清楚，一旦做了俘虏，就会招致虐杀。

根据奥古斯都的要求，紧急招募的援军陆续到达了前线，军队的大本营附近集聚了成千上万的罗马军人。根据当时在现场的帕特库鲁斯的记录，有10个军团的罗马兵和70个大队以上的辅助兵军团、14支骑兵队、重新归队的退伍军人1万人，以及各同盟国派来的援军和新兵队伍，总人数达到了15万人左右，与兵力超过了20万人的叛军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然而，这在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提比略看来，并非是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

真正的战地指挥官都清楚，一旦兵力超过了5万人，军令就难以贯彻得彻底。也就是说，如果总司令手下没有一批优秀的军官从中协调，他的指令就无法得到全面的执行。这样的一个军官组织通常是要经过长年的合作，才能够逐渐完善，并非一日就能成立。

除了前线的调配，后勤的“兵站”（logistic）也是一个大问题。兵站在后方主要负责军需品补给、运输以及保证线路畅通的任务。罗马军的兵站是一支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强大的后勤部队，一些现代的军事专家甚至认为，罗马军的胜利是靠兵站赢来的。然而，再优秀的兵站，要满足15万人兵力的供给仍然是难以维系。

事实上15万的人数并非是真正的军力。首先那些新兵不受训练根本无法打仗，可是，在激烈战斗持续不断的状态下，又没有条件进行训练。就算那些曾经有过战场经验的退伍军人，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才能恢复状态。而那些由行省人组成的辅助兵都是在家乡附近服兵役，在远离家乡的环境，多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能力。

总而言之，兵力增加的同时，麻烦也随之增加。如果无视这些问题，将所有的人都送到第一线，那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罗马人重视后勤，代表着他们不提倡无谓的牺牲，如何让阵亡的人数降到最低，是评

判一位将军指挥能力的首要标准。

提比略遣回了一大半的援军，他一向讨厌华而不实，他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浩浩荡荡的场面。为了消除志愿兵们路途的疲劳，提比略令他们休息数日，然后派骑兵队一路护送，保证他们安全地返回祖国的边境。尽管安全地遣返援兵任务艰巨，但是不能保证后勤补给的兵力是更大的累赘。

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提比略最终留下了10个军团和骑兵队，人数在6万人左右。虽然数量上只有敌军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是一支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精锐部队。

士兵们因地形所限，战斗力受到阻碍，面对的又是孤注一掷、决一死战的强敌，条件十分之艰苦。所幸，提比略非常地厚待他的士兵。

提比略命令，绝对不能弃阵亡者的遗体于不顾，无论官阶高低，一律为他们举行罗马式的葬礼。伤员由专门的医务团队照顾，医务团队的负责人是总司令的专属医生。提比略的马车和轿子用做运送伤员，他自己始终是骑在马上，放弃了坐轿子歇息的机会。

提比略不仅将他的浴室提供给伤病员，连他的专用厨子也借了出去。罗马军队规定士兵必须自己负责料理一日三餐，那些重伤员的饮食需要有人帮忙打理。

因负伤而乘坐了提比略轿子的帕特库鲁斯曾经说过，前线除了家和家人，什么都不缺。他描述提比略用餐："即使是和手下的指挥官一起吃饭，他也是坐在椅子上。"

古罗马人习惯于半躺在床上用餐，所以帕特库鲁斯说提比略坐在椅子上，就相当于我们站着吃饭的感觉。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场上的提比略，作为总司令身先士卒，抛弃了罗马人所有舒适的生活习惯。

严于律己的人，通常对他人要求严格。不过根据帕特库鲁斯的描述，战场上的提比略并非如此。即使是对那些违反了军规的士兵，只要行为没有危及其他人，大多是给予口头警告，并不实施处罚。而那些侥幸逃过处罚的士兵们因为感激总司令的宽容，很少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提比略的手下，无论是大队长、百人队长还是士兵，从来没有人因为打输了而受到惩罚。

公元7年开始的镇压叛军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年，即公元8年，战场蔓延至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全境，6万名罗马军对20万人叛军的激烈战斗也逐渐进入了尾声，很明显，战争持续得越久，后勤部队的能力就成为了胜负的关键。

远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已经不再需要为战事忧心忡忡，现在困扰他的又是他的家务事。

家门不幸

即将70岁的奥古斯都，膝下还剩下一个男孙，是他独生女儿尤利娅所生的第三个儿子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奥古斯都在指定提比略为养子的同时，也将这个外孙子收为养子。奥古斯都的意图非常明显，希望外孙子能够成为继承人之一。以收养的公元4年时间点计算，继位人的顺序及年龄如下：

第一继承人：提比略45岁。

第二继承人：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15岁。

第三继承人：日耳曼尼库斯18岁。

尽管日耳曼尼库斯的年龄名列第二，继承顺位却排在第三，因为他

是提比略的养子兼继承人，而珀斯图穆斯则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和继承人，所以继位的顺序排在第二。

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通过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改革之后，不论社会地位，上至执政官的儿子，下到无产阶级的孩子，凡是年纪未满17岁，都没有资格服兵役。纵使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也不能剥夺未来主人公接受教育的机会。当年罗马被汉尼拔围困16年，也没有征召任何17岁以下的少年去当兵。

过了17岁之后，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谁都可以去体验军旅生活。尤其是出身上层社会的豪门子弟，为了担任国家要职、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从军是必不可缺的人生经验。

提比略的首战是在阿格里帕的指挥下打西班牙战役，而日耳曼尼库斯则是跟随着养父提比略在日耳曼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到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时，21岁的他已经作为将官，独当一面指挥战斗了。

镇压叛军的行动开始的公元7年，已年满18岁的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本应该随军参加这场战役。无论是从这场战争对罗马的重要性，还是他本人的特殊地位都应该如此。作为外祖父的奥古斯都也认为这是让外孙子初试沙场的绝好机会。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送他的外孙子上战场，准确地说，是没能够送上战场。

那个时候的皇孙，凶暴的行迹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奥古斯都送外孙子去的地方不是潘诺尼亚战场，而是普拉尼西亚岛。普拉尼西亚岛距离拿破仑流放的厄尔巴岛（Elba Island）以南14公里，现称皮亚诺萨（Pianosa）岛。

皮亚诺萨岛没有珀斯图穆斯的母亲尤利娅流放的潘达特里亚岛那么荒凉，岛屿面积约11平方公里，地下水源丰富，可以种植葡萄和橄榄

树。20世纪初期，意大利政府曾经在这里设立过国营结核病隔离疗养院，现在疗养院已经废止，但是岛上还有一些农民和渔民居住的村落。尽管皮亚诺萨岛的环境不错，但不能和“世界之都”的罗马同日而语，对于习惯了奢华生活的珀斯图穆斯来说，这里就是荒蛮的流放之地。他不仅不能回到本土，连厄尔巴岛也被禁足。

然而，家门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奥古斯都继公元7年，流放了外孙子珀斯图穆斯之后，第二年的公元8年，他又不得不将外孙女小尤利娅送上流放岛。小尤利娅和她的母亲尤利娅犯了同样的罪——通奸罪。有关小尤利娅的通奸对象以及她的流放地，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不过，提倡建立健全家庭、将男女偷情行为定为犯罪的奥古斯都对于自家人的违法行为，应该是会作出严厉的处置。接二连三的家庭丑闻，让这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皇帝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奥古斯都对外孙子和外孙女的惩处，没有行使公权力即法律，而是以外祖父以及养父的身份，动用了罗马自古以来的“家父长权”的私刑。

当时未满30岁的小尤利娅已经结婚，丈夫是贵族出身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Macedonicus），并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果不是70岁的老皇帝对小尤利娅的行为忍无可忍，不会残忍到强迫母亲离开孩子。一生执著于血脉传承、对家人爱护有加的奥古斯都，这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背叛竟然来自他的血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嘲讽和悲哀。

永不言弃的奥古斯都，将他唯一一位没有发生问题的外孙女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Minor）嫁给了他外甥女的儿子，即成为了提比略养子的日耳曼尼库斯。这对表兄妹（他们双方的母亲是表姐妹关系）结婚之后，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一人是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而卡利古拉的妹妹则是第五代皇帝尼禄的母亲。

坚定不移的意志原本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品质，然而奥古斯都在血缘问题上的偏执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执迷不悟往往是悲剧的开始。

古代人认为，狂妄地想要自己操控命运的人，会遭到天谴。

诗人奥维德

公元8年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小尤利娅的流放，导致了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流放，这成为了拉丁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

诗人奥维德突然收到奥古斯都的命令，因他写了《爱经》（Ars Amatoria，亦译《爱的艺术》），将被流放到位于多瑙河通向黑海入口的小镇陶米斯（Tomis，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ta）。这对于50岁的奥维德简直是无妄之灾。这部三卷本的诗集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为何事到如今才来兴师问罪。罗马没有言论的限制，奥古斯都的父亲恺撒的政敌西塞罗的作品不仅可以公开发表，作品集里甚至还附有他和暗杀恺撒的布鲁图的来往书信。奥维德是罗马第一个遭到流放的文人。

诗人没有透露过他被流放的理由，但在他的诗中有这样的文字：

> 因为我看到了？是我的眼睛让我成为了罪人？我的无心就是罪？
>
> 阿克托安不经意地一瞥，正好看到赤裸身体的狩猎女神戴安娜而最终被猎狗咬死。
>
> 是的，对众神而言，凡侵害了其圣洁之人，即使无意之为，也必须付出代价，无可饶恕。

拉丁文学的研究者们根据奥维德的诗句，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认为诗人涉及了小尤利娅的风流韵事。奥古斯都惩罚他并非是因为他的《爱经》，而是他是知情者。由于两位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又没有可

以查证的确切史料，有关事情的真相永远是一个谜。

恺撒要是知道他的继承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提升罗马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一定会笑得乐不可支。不过，对奥古斯都而言，《爱经》三卷本诗集简直是不堪入目的东西。

奥维德在《爱经》的第一、第二卷中，向男性宣讲如何追求女性的技巧，在第三卷中则是教导女性如何去获得男性的欢心。作品中列举了大量的实证佐以说明。

《爱经》并不是一本黄色书籍。古典的“教战手册”通常带有对人性深刻敏锐的观察，充满了机智和黑色幽默，《爱经》是这一类作品中的杰作，让人读了心领神会，忍俊不禁。

性爱，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观念里，就是裸体。奥维德咏颂的正是这种毫不遮掩、没有多余东西牵绊的纯粹的情爱。曾经有研究者将奥维德与1500年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相提并论，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君主论》无论是从书名还是其表述的内容，就是一本“政治的技术”。马基雅弗利冷静、透彻地点出了人类的本性，认为这正是统治者巧妙掌控的利器。奥维德则认为，要获得情爱上的愉悦，就应该运用技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原始的欲望。马基雅弗利被谴责缺乏道德观，奥维德也是因同样的理由遭人诟病。

人常常会十分恼火不愿提及的事情被他人挑起。奥古斯都是一个克制力极强的人，如果不是频频发生的家族丑事让他怒不可遏，他是不会因为奥维德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刻画了人之本性的《爱经》就将其流放。事实上，自发行之后始终畅销不断的《爱经》并没有因为作者遭流放而被禁止，从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来看，只能说奥维德成了奥古斯都这位老卫道士泄愤的牺牲品。一生谨慎从事的奥古斯都这次真的是恼羞成怒，何况人老了脾气本来就容易变得急躁。

和阴魂不散的奥古斯都家族丑闻相反，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战役，在进入公元9年前，胜负已经决出定局。

罗马军之强果然强在它的兵站，充足的供给和安全无误的输送路线，完全弥补了兵力上人数的不足。直白地说，罗马军是靠脑子取得了胜利。根据当时在前线的帕特库鲁斯记述，从公元8年的年末到公元9年的年初这个阶段，罗马军在战场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到了公元9年的夏天，潘诺尼亚的全境被罗马军占领。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叛军在他们两位首领的带领下向罗马军投降，死守在达尔马提亚的剩余叛军最终在同年的冬天缴械求和。

一度曾经征服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10多年后再次发生令罗马胆战心惊的叛乱，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两位罗马皇位的继承人经过了3年的苦战，终于重新收回失地，罗马帝国的霸权再度得到巩固，一般人对罗马帝国防卫线的多瑙河的认知和了解，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胜利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首都，罗马为再度恢复和平而欢欣鼓舞，两位继承人不凡的战果让71岁的奥古斯都感到万分欣慰，缠绕着他的家族烦恼也因此阴云散去。然而，这只是日耳曼战线传来噩耗前的短暂的晴日。

“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

人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和在潘诺尼亚冬营地的提比略同时收到了日耳曼战场传来的噩耗。接到消息的提比略紧急赶往首都，商讨对策。

日耳曼的情况的确非常糟糕。昆提里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率领的部队，包括3个精锐的军团、3个骑兵队以及6个辅助兵大队在内的3万人的兵力，再加上随从、后勤人员，总共3.5万人的罗马军，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全军覆没。

自克拉苏败北帕提亚之后，罗马军60年来第一次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这对于修改了恺撒的莱茵河防卫线、将军队送往日耳曼战场的71岁的奥古斯都而言，几乎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守在莱茵河沿线的部队如今只剩下2个军团，无论如何要在冬季休战期间，部署好迎战的策略。奥古斯都能够托付的人也只有提比略。于是，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的提比略，不得不翻过冰寒料峭的阿尔卑斯山，十万火急地赶往莱茵河。

当初，在公元6年提比略占领了易北河之后，奥古斯都认为武装军事行动就此结束，接下来是政治力介入的罗马化统治的开始。因此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富有行省统治经验的昆提里乌斯·瓦鲁斯。

瓦鲁斯出身于罗马贵族，生于公元前50年前后，公元前13年时担任过执政官，之后历任非洲、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是一位政坛老手。

我认为造成这次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之前的武力打击，而是瓦鲁斯的战后处理。如果将他的做法和恺撒平定高卢后所作出的政策对比，其中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恺撒在征服了高卢之后，对所有的高卢部族都采取了温和的手段，而且选择了让高卢人来负责管理他们自己的地区而不是罗马人由上至下的高压统治。高卢各个部落的首领们一如既往地掌管着自己的部落，有关整个高卢地区的政策，依然按照传统的习惯由部落首长会议来作出决定。

个体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从来不会影响到整个政局，只有当不满的个体中出现了领导人物，才会凝聚成具有破坏性的爆发力。在未开化的蛮族中能够成为领导者的就是部落首领。对于被征服者而言，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权力，因此，只有让原本的统治阶层继续保有他们的权力，才可能长久地维持占领地的和平。

恺撒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行省统治政策，他甚至连行省税的征收都交给部落首领，最终再汇总到他那里。罗马共和时期是以竞标的方式决定负责代收税金的“包税人”，在整个高卢地区，能够实施同样制度的唯有自古以来就是罗马行省的南法地区。恺撒征服的中部和北部地区，都是用部落族长代替“包税人”，为罗马征收行省税。尽量减少对占领地内部事务的干涉，仅仅这一点就体现了恺撒卓越的政治远见。高卢战役之后，罗马本土内乱不断，高卢地区在完全没有设置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仍保持了长期的安定。这足以证明恺撒的治理方针深得人心，特别是对高卢那些上层阶级而言，他们没有与罗马抗争的理由和需要。

由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改革，高卢地区自公元前26年起，实行了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治理方式。那个时候，距离恺撒从高卢渡过卢比孔河已经过去了24年。这意味着24年来，高卢作为罗马的行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治。随着时间的迁移，高卢当地的领导层也进行了世代的交替，权力转移到了在罗马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手里，他们对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政策完全没有感到不适或者反感，新制度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执行。

那么，日耳曼的战后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正如以上所述，军事武装行动进行到公元6年时，奥古斯都认为已经大功告成，将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对日耳曼进行罗马式改造，交给了曾经担任过非洲以及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瓦鲁斯。然而，瓦鲁斯并没有像恺撒那样，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给占领地的人民一段适应期。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立刻施行了奥古斯都针对一般行省的管理制度。对于他的做法，连武将出身、不擅长政治的提比略都发出质疑：“瓦鲁斯不像是一位派遣到未开发地区的军团司令官，他的表现更像是去文明城市赴任的官派长官。”

我们来看一下瓦鲁斯曾经担任过总督的两个行省的情况。被罗马人称为“阿非利加行省”的非洲，原本是大国迦太基的领地，它成为罗马行

省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叙利亚行省”则是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一的塞琉古王国，王国灭亡之后，由庞培将那里纳入罗马的领地，成为罗马行省也已经70年。这两个行省有着古老的历史，文明发达程度不亚于罗马，叙利亚首都安提阿以及由恺撒重建的北非行省的首都迦太基，在被罗马统治之前一直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大都市。因此，他们能够了解罗马人积极进行的基础建设会促进繁荣，对强行实施的税制所带来的公平性也有所认知。

叙利亚行省因为与大国帕提亚相邻，所以有4个正规军团的驻军，而非洲行省则是由当地人组成的“辅助兵部队”负责抵御沙漠游民的袭击。因此，瓦鲁斯虽然担任过两地的总督，但他的经验仅限于太平无事的行省。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他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个人的才华、性格姑且不论，事实上，他赴任之地上并没有什么需要他做出随机应变的事情。

征服日耳曼使之罗马化是奥古斯都的夙愿。将防卫线从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的理由，除了有缩短疆界距离的益处，奥古斯都希望借此将日耳曼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彻底消除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的威胁。

包括休战期在内，罗马征服日耳曼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要保证这个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成果得以继续维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有关日耳曼的治理政策，不会是瓦鲁斯一个人全权决定，他有可能只是执行了奥古斯都的命令，或者说，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瓦鲁斯是不会擅自采用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方法去管理日耳曼的。那么，奥古斯都难道没有发现恺撒在高卢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有20年特别治理的缓冲期吗？

首先，奥古斯都本人几乎没有前线指挥打仗的经验，前有阿格里帕后有提比略代替他担任军队的实际指挥官。这或许不是致命的弱点，但在某些方面总是有所局限。他对战场的认识仅限于地图，没有切身的体会。其次是纸上谈兵。书桌上制定出的战略，并非最适合于实际战场，

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战事结束后去日耳曼视察，像奥古斯都这样智慧的人，一定会根据当地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战后措施。可惜，他坐在首都把任务派给了一个官僚型的人。

在罗马共和时代，有关占领地的战后处理事宜，多半是由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指挥官负责。比如说，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中、近东地区是庞培负责，高卢则是由恺撒负责管理。首先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奥古斯都在施行行省改革时，对庞培整顿后的东方领地，几乎没有作过什么政策上的调整，可见原本制度在方向上的正确性；而高卢能够成为罗马化最成功的地区的原因，完全要归功于恺撒制定的一系列的战后处理措施。

未开化民族之所以未开化，是因为他们只屈服于刀枪之下直接的武力，对于征服了他们的人多少心存畏惧和敬意。然而瓦鲁斯从公元7年开始担任日耳曼总督的三年间，没有立下任何显赫的战功。瓦鲁斯执行的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方针，对于日耳曼的各部落族长而言，他们在忍受败北的精神上的屈辱的同时，还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实际利益。要他们屈服于一个在战场上毫无建树的官僚，就等于是在积累心中的怨恨和愤怒。碰巧就在这个时候，点燃众人胸中怒火的人出现了。

阿尔米纽斯（Arminius）出生于公元前16年，是日耳曼齐鲁斯基人酋长的儿子。公元9年时他大约25岁。齐鲁斯基人在公元4年时，被提比略的军队所降伏。当时20岁的阿尔米纽斯也像其他投降的部落首领一样，参加了罗马军的“辅助兵部队”。年轻的阿尔米纽斯很快就显示了他优秀的才华，崭露头角，晋升为骑兵队队长。按照罗马的法律，退伍后的“辅助兵部队”的战士，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权，将官级别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就能享受这个权益。因此，阿尔米纽斯一早就成为了罗马公民，并且迅速地提升到骑士阶级。罗马的阶级地位从上至下分别是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解放奴隶、奴隶，在奥古斯都时代，由于他的保守做法，行省出身的人很难有机会像恺撒时代那样能够进入元老院或者

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阿尔米纽斯能够得到奥古斯都的许可，可见他创下了不凡的功绩。

瓦鲁斯自公元7年担任日耳曼总督之后，对这位年轻人非常器重，这有点像外派海外公司的总经理，在当地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副总经理。曾经也有人向瓦鲁斯提出忠告，要他提防阿尔米纽斯从背后下手，他一概不予理会。

公元9年的初冬，瓦鲁斯率领着军队，结束了日耳曼中部的巡查任务，向西准备返回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越冬。同行的队伍中除了有3个正规军团、6个辅助兵大队以及3个骑兵中队之外，还包括了妇女和小孩。有妇孺同行，证明了罗马已经完全控制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局势平稳地进入了和平维持的阶段，否则军队是不会带着这些影响战斗力的人一起行动的。阿尔米纽斯也在队伍中，他向瓦鲁斯建议队伍改道，回避在附近一带蠢蠢欲动的加蒂人。瓦鲁斯和他手下的将官们大概也因为战事平息之后失去了警惕性，听信了阿尔米纽斯的谗言，放弃了原本安全的路线，进入了森林地带。

“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这是日耳曼人最爱说的豪言壮语。看现代德国，很难想象在2000年前，茂密的森林曾经覆盖了整个日耳曼大地。这里和高卢的森林不同，即使在白天也是幽幽暗暗、深不见底。瓦鲁斯带着3.5万名士兵，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走了进去，他们万万也没有料到，阿尔米纽斯部署的军队正在森林深处等着他们。

对于习惯了打常规战的军队而言，最可怕的对手就是看不见踪影的游击队。罗马军拼死抵抗了3天，最终能够逃出丛林回到莱茵河基地的只有几十个人，其余的全都死在了森林中。瓦鲁斯和他的将官们知道天数已到，最终选择了集体自杀。阿尔米纽斯不留活口，不仅杀了所有投降的罗马兵，就连辅助兵部队的士兵也以协助罗马的罪名一并处决。他对那些和他相识的高级将领更加残暴，先施以虐刑然后处死。

这场惨剧据说是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以北的条顿堡森林（The Teutoburger Wald），古今的研究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那个时代有一批对于失败耿耿于怀、不肯忘记的人物，他们知道惨剧发生在哪里。惨剧发生之后的第6年，即公元15年，当时转战日耳曼各地的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着军队，去凭吊这个古战场，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当时悲惨的场面，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

> 那个场景足以唤醒所有人心中埋藏已久的不堪的记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栏栅围起的营地，营地的简陋足以证明当时仓促的情形。现场还留着包括总司令瓦鲁斯用过的帐篷的遗迹，数量非常之少，甚至容不下3个军团的士兵。走过营地，再往前可以看到一部分破坏的栏栅和浅的壕沟，很明显，在遭受敌人袭击、伤亡惨重之后，知道营地不保的士兵们试图在这里作最后抵抗。两个营地之间四处散落着已经化成白骨的尸体，有些地方尸骨累累重叠在一起，令人想到当时绝望的士兵们，有人试图逃走，有人则聚集在一起负隅抵抗。白骨的边上遗落着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大量的树干上钉着骷髅，看得出他们是被活活地钉死在那里的。森林中还留有不少祭坛，根据同行的瓦鲁斯军团的幸存者的证言，日耳曼人在这些祭坛上，将大队长以及百人队队长作为祭品活活地烧死。特地挑选所属第一大队的百人队长作为祭品，可见是非常熟悉罗马军团组织的人的所作所为。
>
> 生还的士兵们告诉那些初次到访的同胞们，军团长在这里战死，军团银鹫旗在那里被夺走；瓦鲁斯最初在哪里受了伤，最后又是在哪里把军刀刺向了自己的胸膛；阿尔米纽斯在哪里发表了胜利的演说，为了杀死罗马军俘虏设立了多少个行刑台，银鹫旗又是如何遭到了不可一世的阿尔米纽斯的侮辱。
>
> 败北6年之后重返伤心之地的罗马士兵们开始埋葬尸骨，哪些是罗马兵，哪些又是辅助兵早已分辨不清，他们都被安放在了一起，此时此刻，在那些罗马士兵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分别，不管哪一具遗

体都是和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同胞，他们胸中充满了对残忍的敌人的无比仇恨。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在成堆的遗骨上撒下了第一把泥土，士兵们紧随而上，从此死者的悲哀和生者的痛苦联结了在一起。

我们再回到6年之前。当罗马得知瓦鲁斯率领的3.5万人全军覆没后，考虑到日耳曼人会借着阿尔米纽斯胜利之气焰，大举压进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军事基地，十万火急地派遣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争的提比略赶到莱茵河畔。然而，预想之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其中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响应阿尔米纽斯的号召，受其煽动的只有少数几个部落。阿尔米纽斯将瓦鲁斯的首级送给了马尔柯曼尼人的大王马罗波达斯，希望能和他一起联手对抗罗马。然而马罗波达斯信守了与提比略的誓约，派人将瓦鲁斯的首级交给了仍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不仅为这位败将举行了罗马式的葬礼，还将这位与自己有远房关系的亲戚，安葬在了属于家族的陵园之中。罗马的传统是从不惩罚败将，而是把他们视为祖国的殉职者。

第二，阿尔米纽斯提出的全日耳曼民族联合起来结成反罗马同盟的阵线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阿尔米纽斯是一个勇敢胆大又狡猾奸诈的人物，但他缺乏作为领导人所必需的一些特质。与之相比，被恺撒打败的高卢人韦桑热托里克斯更具有领袖的风范。阿尔米纽斯这位年轻的日耳曼人，既缺乏周密的战略思想，又没有集合大众的凝聚力。

对罗马而言，损失了瓦鲁斯3个罗马军团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日耳曼的状况还不至于绝望到无可挽回。只要罗马下定决心霸占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区，完全是有这个能力走出条顿堡森林的阴影达到目的的。凭着当时罗马的实力，再补充3个军团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奥古斯都并没有那样做。

罗马军队并不是没有尝过失败的苦果。罗马军团之所以称为“天下无敌”，是因为他们有挽回失败的能力。在高卢战役中，损失了1.5个军团总共9000人兵力的恺撒，在向庞培讨救兵时，曾经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 我要让高卢人从今往后永远地记住，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是罗马不仅有补偿损失的能力，而且会用更加强大的兵力来扭转局势。

收到信后的庞培给恺撒派去了2个军团的援兵，在这一点上，想必他和恺撒是不谋而合的。

高卢战役是公元前53年的事情，当时有资格参军的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的人数不到百万。60年之后的罗马，公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重新整编3个军团是绝对办得到的事情。那为什么防守边疆的罗马军队从28个军团减至25个军团之后，始终保持着这个数量，不再另外补充3个军团呢？

据称，在夜深人静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里，曾经有人听到过71岁的老皇帝撕心裂肺的呐喊：“瓦鲁斯，你还我3个军团！”

经过了20年的苦战，事到如今是放弃日耳曼重新退回到莱茵河，还是再增加3个甚至5个军团，以10个军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日耳曼？奥古斯都似乎表现得优柔寡断。这其中的理由没有史料可据，以下完全是我的想象：

奥古斯都的优柔寡断取决于他在军事才能上的欠缺。如果阿格里帕那个时候还在世，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一定会直言不讳地给他一些建议和忠告。可惜，军事才华超越了阿格里帕的提比略，

由于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摩擦和隔阂，他无法像阿格里帕那样对奥古斯都坦言相告。而且，奥古斯都是拥有罗马军“最高指挥权”的唯一之人，整个战略是由他制定而不是提比略。

虽然奥古斯都在战略上犹豫不决，但是对于一人肩负日耳曼战场艰巨任务的提比略，还是体现出了充分的体恤之情。要把一个因失败而沮丧不振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让士兵们再次面对曾经屠杀过他们同胞的强敌，的确不易。从当时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中，可以发现奥古斯都的心境有所改变，年老之后的他终于愿意向提比略敞开心扉，由衷地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流露出了对提比略的疼爱之心。

以前的奥古斯都并不喜欢和自己性格相似而又内向的提比略，仅仅认可他的才能。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还在世的时候，奥古斯都明显地偏向性格开朗、亲切和善的杜路苏斯。性格相似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互亲近。

不过在这个时期，让73岁的奥古斯都和53岁的提比略紧密相连的，是肩负重担、身居高位者的责任感。我想，奥古斯都喜欢提比略的理由正在于此。我们来看看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

> 我亲爱的提比略，为了我也为了战士们，请继续胜利。每当我听到人们称赞你是最勇敢的士兵、最有才华的司令官，我的激动和喜悦之情可能远远地超过了你本人。
>
> 亲爱的提比略，我对你夏季战役的指挥赞叹不已。我很清楚，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要重整士气不振的军队，让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没人能比你更明智果断。所有和你共过事的人都对你赞不绝口。那句“此人凭其辛劳，独力回天，为我们重新办好了事情”的名言，似乎是为了你而存在。

这句名言是诗人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诗中的一句话，用来赞

美罗马抗战汉尼拔时的指挥官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 我最亲爱的提比略：当我遇到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当我提出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的时候，我向天神们发誓，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够在我的身边。我想起荷马的那句诗："只要他跟我同行，即使四面火焰如海，我们也能闯出来，双双返回，因为他有无人可比的丰富的智慧、无尽的主意。"

这是荷马史史诗《伊利亚特》中，攻入特洛伊阵营的狄俄墨得斯称赞奥德修斯的一句话。

> 每当我闻讯或者从报告中读到你因为日夜操劳而消瘦了的消息时，我就担心你好像要生病。也许我说得有些夸张，但那种不安使我全身战栗。我恳请你务必保重，如果听到你患病倒下的消息，我和你的母亲会像接到死讯般遭受沉重的打击。更主要的是，对于全罗马人民而言，这意味国家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
> 只有你能保持健康，顺利地完成任务，我是否安康无关紧要。
>
> 我衷心向诸神祈祷，保佑并赐予你健康的身体，无论是现还是将来。假若天神不希望罗马灭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乞求。

奥古斯都一边不惜美誉地向提比略表示感谢，一边对日耳曼的问题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罗马军最高总司令官奥古斯都的踌躇不决，让前线的提比略举步维艰，无法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从公元10年到12年，提比略一直守在前线，这几年时间里，前线部队除了修整莱茵河沿岸的防卫设施之外，对日耳曼的进攻只是反复作些"示威游行"般的恐吓而已。

公元13年，奥古斯都授予了提比略“最高指挥权”，自此，54岁的提比略名副其实地和奥古斯都成为了共同统治者。然而，日耳曼的问题并未因此而打破僵局。

从公元13年起，27岁的日耳曼尼库斯代替返回罗马的提比略，成为了日耳曼战场的总指挥。他在日耳曼总共执行了4年的任务，就是在这期间，他带着部队去凭吊瓦鲁斯军团惨剧的战场。在他担任总指挥的4年里，仍然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到公元16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去世2年之后，已经继承了皇位的提比略下令从日耳曼地区全面撤兵，不过这项决定并未公开发表。作为罗马军总司令的提比略皇帝，将日耳曼战线的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调往东方，用这种掩人耳目的方式，从日耳曼战场悄悄地撤回了军队。对罗马而言，从进攻的战场撤回兵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名誉的事情。

无论如何，提比略的决定使得罗马的防卫线，从易北河——多瑙河重新回到了莱茵河——多瑙河地区，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以现代城市为例，易北河——多瑙河一线就是沿着汉堡——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而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则是鹿特丹——科隆——法兰克福——维也纳。某位英国研究者曾经刻薄地说过，罗马从易北河的撤退，让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终究还是“帝国之外的野蛮民族”。而我这个亚洲人比较有兴趣的则是，如果罗马帝国扩张到易北河的话，会不会还有瓦格纳的音乐诞生呢？

如果说奥古斯都一生犯过什么大错的话，那么企图将帝国的疆界扩张到易北河几乎是他唯一的失策。以我的观点，他还有另一项失误，不过它是下一卷的主题，详情留待以后论述。我们还是回到日耳曼的问题，现代军事专家对于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意见：

> 作为国界线，莱茵河比易北河在地势上更为清晰、明确，边防的保卫相对简单。如果古罗马帝国的疆界成功地扩张到易北河，反

而会增加之后在防卫上的困难度，军费会随之提高，而且对后方高卢地区的控制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有所削弱。

如果专家所言正确，那么从日耳曼撤兵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最终作出决定的是提比略而不是奥古斯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需要，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喜欢做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人。他的“父亲”恺撒曾经征服了罗马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两大强敌之一的凯尔特（罗马人称为高卢），他企图征服另一强敌日耳曼，是否是出于与先父抗衡的虚荣心？恺撒让罗马摆脱了高卢的威胁，奥古斯都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将罗马人民从日耳曼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和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奥古斯都肯定读过恺撒撰写的《高卢战记》。不过，无论作者的论述如何精确，对于内容的理解，最终还是取决于读者本人的智慧。

战争经验贫乏的奥古斯都是不是对《高卢战记》中一些话不甚理解，不能明白恺撒将边防线设在莱茵河的用意，所以才自作主张地将边防线扩张到易北河一带？

《高卢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他们日耳曼民族，既没有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军队组织，也没有建立要塞进行防守的概念。人们散处在四面八方。他们散落之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都市或者村镇。不论是一个隐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或者险阻的沼泽，凡认为有一线保障或逃生的希望，他们就躲藏进去。那些地方是他们熟悉的，但对我们说来，就需要特别留神。倒不是整个部队需要战战兢兢，惊骇四散的人从来不会危害到集中在一起的大军，然而小部队行动时就要特别注意，个别士兵的安全会牵涉到大军的安全。

因为劫掠的欲望会让士兵脱离大部队，即使没有这样的动机，

密林中隐蔽的难以辨识的道路也很难让大队人马维持整齐的队列前行。

要想歼灭这个蛮族，就必将人马分散，四面八方去搜捕。如果按照罗马军队的传统军团旗在前、大批人马整齐排列在后的阵型，那么当地的地形本身就会成为蛮族的保障。同时他们中个别的人，也不乏勇气打些秘密埋伏，对我军分散的队伍来一个突然围攻。

鉴于这些特殊困难，凡事必须谨慎，做到周密考虑。虽然大家心中都燃烧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但恺撒（恺撒通常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认为，放过许多可以给敌人造成损害的机会，比让士兵遭遇死亡更为妥善。

用现代方式来诠释恺撒的战略，那就是要征服日耳曼，除了实行彻底的“地毯式搜索”别无他法。恺撒熟知当地的情况，始终和军队在一起，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放弃了扩大日耳曼战争的计划。与之相反，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的构想，则是一个文官照着书桌上的地图拟想出来的东西。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人类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一旦输了，彼此之间互相推卸责任，四分五裂；如果赢了，又会因为嫉妒而反目成仇。所以胜负不在一时，能够凝聚力量、没有无谓消耗的一方注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断公元9年瓦鲁斯军团惨剧之后的罗马和日耳曼，赢的是罗马，输的则是日耳曼。

历来对皇帝的批评不留情面的元老院，对奥古斯都将瓦鲁斯安葬在家族陵园的举动没有发出任何的非难，全罗马人为此服了一整年的丧。

而赢了战斗的日耳曼，由于阿尔米纽斯缺乏组织能力，错失了反攻罗马的大好时机。部落之间的争斗再度燃起，阿尔米纽斯提出的联合作战的请求遭到了马罗波达斯的拒绝，连他的亲弟弟也背叛了他投奔了罗马。

虽然与罗马人的战斗已经结束，然而，日耳曼部落间你争我夺、互相残杀的纷争并未停止，撤出了日耳曼的罗马人则守在莱茵河畔静观其变。

公元17年，马罗波达斯因在战斗中输给了阿尔米纽斯，向已经是罗马皇帝的提比略求救。那个时候，罗马军撤出日耳曼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无法在军事上给予实际的支援。提比略为了回报这位始终信守诺言的日耳曼族长，保证其在拉文纳的居住安全，并且保证他们余生的生活无忧。拉文纳位于意大利北部，不属于边陲地区，是罗马共和时期北意大利行省的省会，在帝国初期，和南意的米塞诺并列为罗马的两大海军基地。马罗波达斯于公元35年在米塞诺去世，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的亡命生涯。

阿尔米纽斯同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以及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经过了惊心动魄的8年的争斗，公元21年时，在与某一部落的战争中因受伤不治而身亡，年仅37岁。他死前闻讯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被罗马收容，母子俩和马罗波达斯一样，生活在米塞诺。但他不知道在他死后，他到了学龄期的儿子离开母亲，独自前往罗马读书，就寄宿在罗马皇帝的亲戚家中。阿尔米纽斯在后来的19世纪，被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国人奉为民族英雄。

对于曾经战胜过自己或者始终与己为敌的对手，古罗马人不会刻意去丑化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后人之所以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正是因为古罗马人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似乎像他们独创的逼真的人像雕刻艺术那样，展现了彻底的写实主义精神。阿尔米纽斯虽然不能与汉尼拔以及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相提并论，但他也享受了被书写在罗马历史记录里的荣誉。尤其是像塔西佗那种时常站在批评者的立场评论国事的知识精英，从他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读出赞誉阿尔米纽斯的意思。顺便提一下，阿尔米纽斯（Arminius）是拉丁文的读法，日耳曼语叫“赫尔

曼”（Herrman），“战士”的意思。

罗马人可以心平气和地书写敌人的历史，但不能忍受象征罗马军事力量的银鹫旗落入敌手。当初阿尔米纽斯从瓦鲁斯军队那里夺走的三面军旗中的两面，在公元15年，由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成功地夺回。剩下的一面一直要等到27年后的公元42年，才回到了罗马人的手里。奥古斯都曾经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地赢回了克拉苏败北时落入帕提亚人手中的银鹫旗，但在他去世时，还有另外三面军旗仍在敌人的手中，这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等于是带着耻辱而死。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和共同统治者提比略一起，举行了帝国全境范围的人口普查，这是在他统治期间的第3次人口普查。根据这年普查的结果，罗马公民人口（即成年男子人数）达到493.7万人，与42年前的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87.4万人；比22年前第二次的普查增加了70.4万人。尽管在德国的森林中损失了2万余人，但是奥古斯都设想的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前提，从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即从高度成长期转向安定期的目标，正一步步地趋向现实。

奥古斯都的离世

那一年的夏天，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坐着轿子，沿着阿皮亚大道缓缓向南而行。他要去那不勒斯出席体育竞技大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海边休息一段时间，和即将77岁的老皇帝同行的还有他68岁的妻子莉薇娅。奥古斯都去那不勒斯没有全程选择陆路，前面的三分之一路程，走阿皮亚大道，从阿斯托拉（Astra）海港开始，改走海路。进入了那不勒斯湾之后，船沿途靠港，他中途还上岸在卡普里岛（Isola di Capri）作了短暂的停留，尽情地享受着海上之旅。

在这期间，奥古斯都虚弱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不过，他还

是全程出席观看了少年竞技比赛，从未中途离场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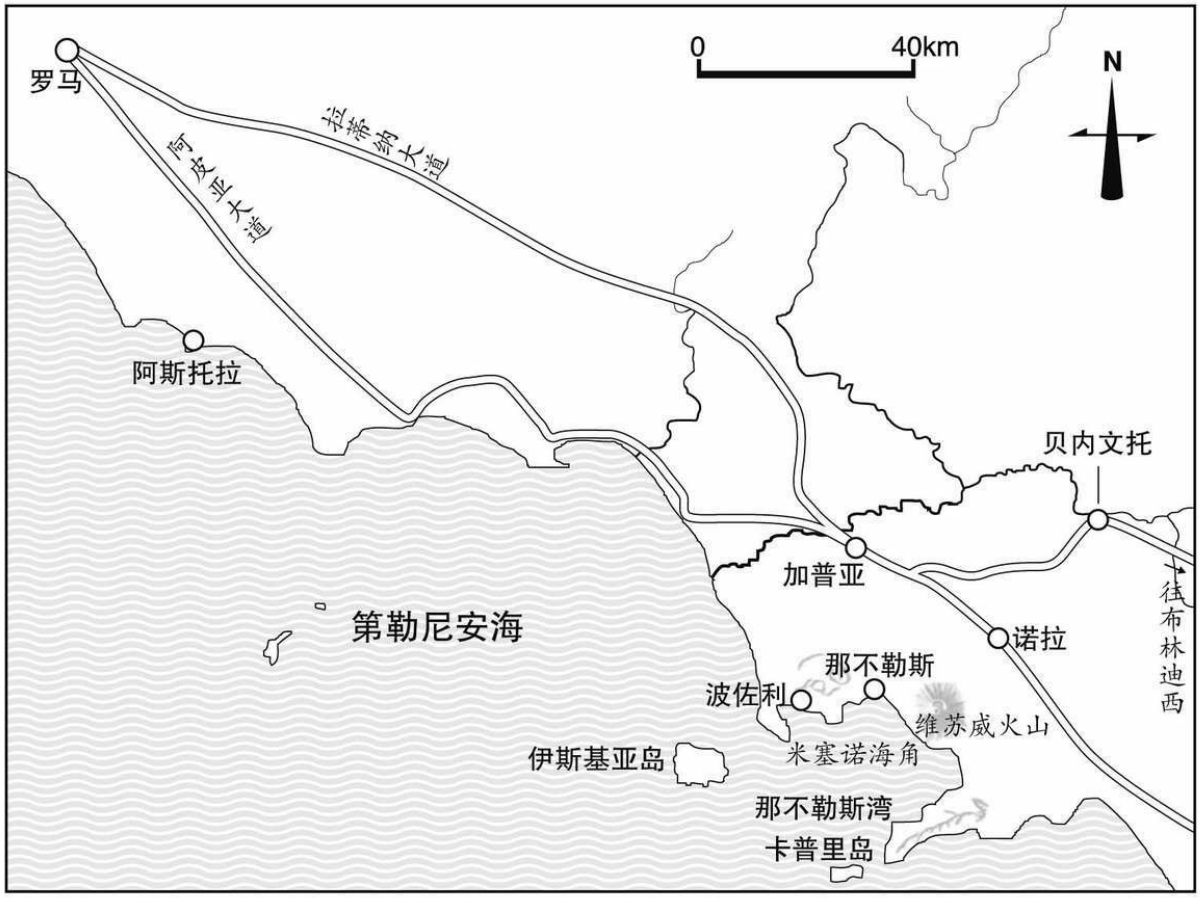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是一位好观众，无论内容是否有趣，他总是从头至尾看完演出或者比赛。这一点，恺撒和他不同，恺撒不是在写信就是在听取报告，很少有专注于表演的时候。

奥古斯都一如既往地认真看完体育比赛，离开那不勒斯，前往阿皮亚大道沿线的一个城镇贝内文托（Benevento）为提比略送行。提比略将经过这里前往布林迪西，进行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重整任务。

和提比略分别之后，奥古斯都再次出发返回那不勒斯继续休假，时值8月，暑假尚未结束。不料，途中在诺拉（Nola），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正由阿皮亚大道南下的提比略被紧急召回。

只有提比略一个人获准进入房间探视奥古斯都，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其实在一年前，奥古斯都就预感到了自己死期将近。刚进入公元14年，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功业录》，将他愿意告知后人的事情记录下来；并且将自己拥有的一切特权都授予了提比略，完成了皇位交替的准备事宜。他写好了遗书，内容包括了继承人的姓名，以及对自己葬礼的详细的指示等。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作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奥古斯都最后之旅

和提比略谈话之后不出几天，奥古斯都在妻子莉薇娅的怀中闭上了眼睛，正如他一生所愿，以平静、安详的方式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公元14年8月19日，离他77岁的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提比略护送着奥古斯都的遗体，沿着阿皮亚大道北上返回罗马。由于天气炎热，只好选择走夜路，白天就将遗体安放在沿途经过的各城镇的会堂里。

骑士阶级的人们，在距离首都20公里左右之处等候迎接提比略一行，大家轮流抬着奥古斯都金碧辉煌的灵柩前往罗马。

抵达首都之后，遗体先送回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第二天，运往古罗马广场的恺撒神殿，灵柩安放在神殿的台阶上，提比略发表了赞颂故人丰功伟绩的演讲。之后，灵柩移往广场西面，放置于公民大会的讲坛上，在那里提比略26岁的儿子杜路苏斯宣读了颂词。当时2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正在日耳曼前线，原本应该是由他担任这个职责的。

杜路苏斯演讲完毕后，由元老院成员抬着奥古斯都的灵柩经过马尔斯广场，在奥古斯都陵的广场前举行了遗体火化的仪式，骨灰即刻放入了陵墓。按照奥古斯都生前的遗嘱，整个仪式既没有威武的士兵队列，也没有来自同盟国以及行省的赠品，在朴素、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葬礼。

数日之后，维斯太贞女在元老院会场，当众启封并宣读了事前保存在她那里的奥古斯都的遗言，他要求将他写的《功业录》刻在铜板上，并镶嵌在陵墓的正面墙上。

奥古斯都的遗言里对帝国的现状也作了详细的记载。内容包括了现有兵力的总数、军团驻军地一览、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各自的税金总额，以及尚未收缴的各类间接税的金额等等。他甚至还列出了能够提供详情的解放奴隶和奴隶的名单，真不愧是一位严谨的人物。

奥古斯都指定提比略和莉薇娅为他的财产主要继承人，提比略得三分之二财产，莉薇娅获三分之一。第二继承人是提比略的儿子杜路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三个儿子。奥古斯都和恺撒一样，所谓的继承人主要继承的是地位和权力，财产则退而为次。

恺撒曾经将他的一部分遗产分发给首都的全体人民。和恺撒同为“国父”的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他的义务，他不仅留给了首都罗马人民4000万塞斯特斯铜币，而且另外赠与了350万塞斯特斯给他所属的两个选区。奥古斯都因为同时继承了他生父屋大维和养父恺撒的选区，因此

拥有两个选区。

此外，他还给禁卫军士兵每人1000塞斯特斯、首都的警察官每人500塞斯特斯以及15万人的军团士兵每人300塞斯特斯。在遗嘱中奥古斯都指示提比略立刻用现金支付，因为他一早就把这笔钱准备好了。

他还把另外的遗产赠给了军团长们，每个人获得的金额多少有些不同，总数约2万塞斯特斯。这笔钱无法立即支付，需要推迟一年，对此奥古斯都也写下了理由说是因为财产不多请大家见谅。

奥古斯都申明，他的继承人所能获得的财产不会超过1.5亿塞斯特斯。虽然在最后的20年间他从朋友们的遗嘱中得到了14亿塞斯特斯的馈赠，但是连同他两位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全都用于国家建设了。

奥古斯都的遗嘱内容不像一位皇帝所写，更似一份会计报告，嫁给这样的人做妻子，大概是要被逼着每天去记流水账，想想也是蛮辛苦的。然而，对帝国而言，如果没有清楚的财政收支，国家统治难以长久地维持。这位性格严谨、讲究细节的罗马帝国的初代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有权高位重的人身先士卒做出表率，才能够严格要求下面的人遵纪守法。

在遗书的最后，奥古斯都表示他不允许流放中的女儿和外孙女死后葬在奥古斯都陵。

奥古斯都和半个世纪前的恺撒得到了同样待遇。元老院以及公民大会决定，将奥古斯都神格化，称之为“神君奥古斯都”。只要罗马帝国还存在，这个称号就不会改变。

从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欧美研究者们对于古罗马的评价，概括来说，就是赞赏共和时代，而认

为帝政时代则是堕落的开始。虽然现代的研究者们逐渐推翻了这种观点，但是在那些提供给历史爱好者阅读的作品中仍然充斥着这样的气氛。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甚至认为，奥古斯都所做的功绩，不过是延迟了帝国的衰亡而已。

盛者必衰是历史永恒不变的道理。纵然奥古斯都的所为只是推延了衰败，也足够予以赞扬的，那毕竟晚来了数百年。难道那些欧美的历史学家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经历荣枯盛衰的轮回。

这些贬低罗马帝国的研究者们主要论点是罗马进入帝制之后，失去了自由，即决定国家政策的自由。

那么，罗马在共和时代，真享受过这类的自由吗？罗马共和时代的政体，并非是雅典般的直接民主制，虽然有一个公民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元老院掌握了国家的权力，罗马共和体制是一个历史上称为“寡头政治”的少数人领导的制度。

最初的元老院只有300人，后来经过苏拉改革之后增加到了600人，也就是说，只有这数百名的元老院成员拥有享受决定国家政策的自由。国家制度转为帝制之后，失去了这个自由的是这600人，而罗马帝国的总人口是他们的10万倍。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遗愿，不惜使用各种欺骗的手段建立帝制，在我看来是一个保证了超级大国高效运转的体制。就连共和派的塔西佗都不得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行省人民更乐于帝政时代的生活。相比于元老院600人的不满，这个制度获得了6000万人的正面评价。正因为如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才得到了长久的维持。

希腊的思想家普鲁塔克曾经说过，罗马的兴盛在于对败者的同化。

这一点在进入帝政之后，虽然由于各代皇帝不同性格以及时代的变迁，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但这种精神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延续下来，应用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为了顺应时代，政治形态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古罗马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

当国家发展到需要维持和平局势、保证国家体系高效运转的阶段，600人决定国家政策的制度是否有继续维持下去的价值呢？人类常常被迫作出选择，因为这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善或恶，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从中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而已。

恺撒作出了选择，奥古斯都也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的结果是废弃共和、建立帝政。

世界著名的罗马历史学权威F. E.阿德科克（F. E. Adocock）教授在他的《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曾经说过："一个人统治国家的形态，是当时的罗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他对确立了这种国家形态的当事人作出了这样的评判："奥古斯都没有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那般过人的智慧，然而，那个时代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物。"

奥古斯都去世前坐船畅游那不勒斯时，曾经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当他的船经过波佐利（Pozzuoli）港时，一艘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商船刚好抵达，船上乘客及船员都认出了附近船上正在休息的老皇帝，所有的人向着他齐声合唱般地叫道：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安全之旅。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自由，享受和平。

突如其来的赞美，让老迈的奥古斯都感到无比喜悦，他下令赐予每个人40个金币，要求大家发誓保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埃及的货物，然后再将购买的货物销售到其他地方去。奥古斯都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仍然是一个清醒、现实的人。只有物品的自由流通，才能提升帝国整体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切必须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才能得以实现。

大事年表

年代（公元前）	罗马	中国	日本
44 年	3 月 15 日，恺撒遭暗杀。翌日恺撒的遗嘱公开。遗嘱指定屋大维（当时 18 岁，恺撒的甥孙）为第一继承人、养子以及袭名恺撒。 4 月中旬，屋大维自希腊西海岸归国。 10 月，大部分军队表示支持屋大维，安东尼向德奇姆斯·布鲁图发起了攻击。	西汉时期	弥生时代
43 年	3 月，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联手攻打正在与布鲁图交战的安东尼。最终，安东尼撤退，两位执政官战死，布鲁图被杀。 8 月，屋大维当选为执政官。他的养子身份得到正式的承认，更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 11 月，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结成“后三头同盟”。		
42 年	从夏至秋，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合军出兵希腊，在腓立比击败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联合军。腓立比战役之后，权力重新分配，屋大维掌管西方，东方则属于安东尼。		
41 年	秋天，安东尼胞弟鲁基乌斯和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在佩鲁贾起兵反抗屋大维，屋大维与其助手阿格里帕拼死镇压，陷入苦战。第二年 2 月，败北的鲁基乌斯和富尔维娅逃亡希腊，不久，富尔维娅死亡。 秋天，安东尼应克娄巴特拉的邀请造访亚历山大港。		
40 年	屋大维启用梅塞纳斯担任外交工作。 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缔结《布林迪西协定》。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再婚。 秋天，庞培次子塞克斯图斯受邀前往那不勒斯的米塞诺，在那里与屋大维和安东尼签订了《米塞诺协定》。 屋大维与塞克斯图斯的表妹司克里波尼娅结婚，生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骨血（女儿）尤利娅，不久离婚。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中国	日本
38 年	1 月，屋大维和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前妻莉薇娅再婚，同时收养了她和尼禄的儿子提比略（之后成为罗马第二代皇帝）和杜路苏斯。		弥生时代
37 年	秋天，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结婚。		
36 年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全力投入伊利里亚战役。		
34 年	春天，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举行远征亚美尼亚的凯旋仪式。 元老院决议，宣布“后三头同盟”终结以及“亚历山大宣言”无效。		
33 年	屋大维为庆祝伊利里亚战役的胜利，修建了尤利娅水道和屋大维回廊。	汉成帝即位（～前 7 年）	
32 年	屋大维当选为进攻埃及的“军队总司令”。		
31 年	9 月 1 日，亚克兴角海战。败北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逃往亚历山大港。		
30 年	7 月 31 日，安东尼自刃（翌日死亡）。 8 月 1 日，屋大维进入亚历山大港，克娄巴特拉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		
29 年	8 月，罗马为屋大维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人民为之疯狂。 9 月，屋大维宣布在古罗马广场为“神君恺撒”建立恺撒神殿。 屋大维实施大幅度裁军。		
28 年	进行中断了 42 年的人口普查。 屋大维开始建造奥古斯都陵。修改了由恺撒制定的持续了 30 年的情报公开制度。元老院的人数从 1000 名重新恢复到 600 名。		
27 年	1 月 13 日，屋大维发表恢复共和政体宣言。 1 月 16 日，元老院决定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称。 奥古斯都（屋大维）设立“内阁”（“第一公民的辅助机关”）。 秋天，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前往南法纳博讷，处理高卢问题。		
26 年	春天，奥古斯都前往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战役开始。		
24 年	年末，完成了罗马世界西半部的重整工作，奥古斯都回到了阔别 3 年半的罗马。		
23 年	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同时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宣布以后每年以公民大会自由选举的方式选出执政官。元老院批准了他拥有“护民官特权”的申请。 年末，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儿尤利娅的丈夫马萨鲁斯病逝，不久，尤利娅与阿格里帕再婚。		
22 年	因小麦不足，首都罗马陷入粮食危机，奥古斯都捐出私款相救。 奥古斯都启程前往东方进行重整工作，首站是西西里。		

（续）

年代（公元前）	罗马	中国	日本
21 年	奥古斯都逗留于希腊。冬天在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度过。 5 月 12 日，举行罗马—帕提亚缔结和平协议仪式。		弥生时代
19 年	9 月 21 日，罗马国民诗人维吉尔逝世。 10 月 21 日，奥古斯都回到首都罗马。		
18 年	奥古斯都制定《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		
17 年	奥古斯都决定将“百年节”的活动定期化。		
16 年	阿格里帕率军救援受到北方蛮族袭击的伊利里亚军营。提比略、杜路苏斯兄弟出发北征。		
13 年	和平祭坛的建设开始。 雷必达去世，奥古斯都继任大祭司。		
12 年	阿格里帕去世。 罗马军开始进攻日耳曼的战役。杜路苏斯的军队到达威悉河流域。		
11 年	杜路苏斯的军队越过了莱茵河。		
10 年	杜路苏斯的军队攻向易北河流域。 奥古斯都将意大利本土划分为 11 个大区，又将首都划分为 14 个居民区，授予各个区域自治的权力。		
9 年	和平祭坛完工。 易北河—多瑙河的防卫线建成。 杜路苏斯因落马受伤不治死亡。		
8 年	梅塞纳斯去世。		
6 年	提比略引退罗得岛。		
5 年	奥古斯都为 15 岁的外孙子盖乌斯·恺撒新设了“预备执政官”的官职。（盖乌斯胞弟鲁基乌斯有同样资格。） “少年团”定为长期化组织，奥古斯都的两个外孙子分别担任正、副总裁。		
4 年	亲罗马的犹太王去世。		
2 年	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因“通奸罪”被处以终生流放。		
1 年	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国父”的称号。 这个时期，犹太王国陷入内战，亚美尼亚王国也局势不稳。为平息战乱，盖乌斯作为皇帝代理前往东方。		

（续）

年代（公元）	罗马	中国	日本
2 年	派往西班牙的鲁基乌斯，途中在马赛病逝。 盖乌斯与帕提亚签订了《互不干涉协定》。	佛教传入中国	弥生时代
3 年	盖乌斯与亚美尼亚的外交交涉失败，逃离亚美尼亚。		
4 年	盖乌斯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叙利亚病逝。 奥古斯都决定提比略为自己的继承人，指定日耳曼尼库斯（杜路苏斯的遗子）为提比略的继承人，同时将外孙子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收为养子。 提比略重返日耳曼战场，夺回了易北河的主要流域。		
5 年	罗马军 14 年之后再度到达易北河流域。		
6 年	罗马军进攻马尔柯曼尼人。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爆发叛乱，提比略与马尔柯曼尼人停战和谈后，急速赶往叛乱地区。		
7 年	奥古斯都处以外孙子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流放之刑。		
8 年	奥古斯都处以外孙女小尤利娅流放之刑，遭此牵连的诗人奥维德也被流放。	王莽灭汉，改国号为“新”（～13 年灭亡）	
9 年	夏，降伏潘诺尼亚。冬，达尔马提亚向罗马求和。 瓦鲁斯率领的 3.5 万人的部队，在日耳曼中部的条顿堡森林遭受阿尔米纽斯带领的日耳曼军的袭击，全军覆没。		
13 年	奥古斯都授予在日耳曼前线指挥了 3 年战斗的提比略“最高指挥权”。之后，日耳曼战场的指挥权移交给日耳曼尼库斯。		
14 年	奥古斯都和共同统治者提比略联名进行了人口普查。 奥古斯都完成《功业录》，8 月 19 日在其逗留的那不勒斯辞世。		

参考文献

一、第一手史料——古人所著的史书、文学作品等

有下列人士作品与本书相关：

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阿庇安（Appianus）、斯特拉波（Strabo）、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塞内加（Seneca）、塔西佗（Tacitus）、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前二者已在《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予以介绍；斯特拉博之后的三位也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的参考文献中出现过；而塞内加、塔西佗、弗拉维奥·约瑟夫斯这三位，因为和《罗马人的故事7·恶名昭彰的皇帝》所叙述的时代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在下卷中介绍他们会更加适宜。

另外，有关水道工程专家S. J.弗龙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以及写过建筑学的，马库斯·维特鲁威·帕里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也将留到其他卷中介绍。

除去以上的这些人物之外，剩下来本卷要介绍的全是文学家。奥古斯都时代的代表性文人，除了《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曾经介绍过的李维以外，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三位都是诗人。文学价值姑且不论，文学作品本身是最能够反映时代的气息。不过，评价文学作品时几乎完全没有从这个视点评价过。作为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的书籍如下：

维吉尔（Vergillius Maro，Publius）

Aenies《埃涅阿斯纪》，田中秀夫、木村满三译，岩波文库，1940年，修订版1949年。

Bucolica《田园诗·农耕诗》，越智文雄译，生活社，1947年（中译本《牧歌集》——译者注）。

Georgica《农耕诗》，越智文雄译，生活社，1947年（中译本《农事诗集》——译者注）。

Aeneis《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21卷　　维吉尔/卢克莱修〈埃涅阿斯纪〉》，泉井久之助译，筑摩书房1965年，修订版1983年。

Aenies《埃涅阿斯纪　》（上、下），泉井久之助译，岩波文库，1976年。

Bucolica，Georgica《牧歌·农耕诗》，河津千代译，未来社，1981年。

贺拉斯（Horatius Flaccus，Quintus）

De arte poetica liber《贺拉斯诗论》，田中秀夫、黑田正利译，岩波书店，1927年（中译本《论诗的艺术》——译者注）。

Epistole《书简集》，田中秀夫、村上至孝译，生活社，1943年（中译本《书信集》——译者注）。

Carmina《歌章》，藤井升译，现代思潮社，1973年（中译本《歌集》——译者注）。

奥维德（Ovidius Naso, Publius）

Ars amatoria《爱的技术》，樋口胜彦译，思索社，1948年（中译本《爱经》——译者注）。

Ars amatoria《恋爱术》，樋口胜彦译，思索社，1949年（中译本《爱经》——译者注）。

Metamorphoses《转身物语》，前田敬作译，人文书院，1966年（中译本《变形记》——译者注）。

Metamorphoses《变身物语（上、下）》，中村善也译，岩波文库，1981年、1984年（中译本《变形记》——译者注）。

Ars amatoria，Remedia amoris《恋爱入门·相思病的治疗法》，藤井升译，WARABI（瓦拉比）书房，1984年（中译本《爱术·爱的医疗》——译者注）。

Fasti《祭历（丛书亚历山大图书馆I）》，高桥宏幸译，国文社，1994年（中译本《罗马岁时记》——译者注）。

Ars amatoria 《恋爱的技法》，樋口胜彦译，平凡社，1949年（中译本《爱经》——译者注）。

另外，从今年（1997年）6月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将会出版日文版的有关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全部作品“西洋古典丛书”，第一期预定发行的15卷的作品见下，进入罗马时代之后，仍然有大量的希腊语的作品，这反映了古罗马人提倡的双语主义。

亚里士多德：《关于天》池田康男译 （中译本《天论》——译者注）。

雅典奈俄斯（又译雅典纽斯）：《餐桌上的贤人们（1、2）》，柳沼重刚译（中译本《博学者们的桌前对话》——译者注）。

盖伦：《关于自然机能》，种山恭子译。

伊索克拉底：《辩论集I》，小池澄夫译。

马可·奥勒留：《自省录》，水地总明译。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13）》，户塚七郎译。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14）》，户塚七郎译。

塞克斯都·恩皮里柯：《皮朗主义哲学纲要》，金山弥平、金山万里子译（中译本《皮朗主义纲要》——译者注）。

色诺芬：《希腊史（1、2）》，根本英世译。

奥维德：《悲歌/来自黑海的信笺》，木村健治译（中译本《哀歌》和《黑海零简》——译者注）。

特罗古斯、查士丁：《地中海世界史》，合阪学译。

塞内加：《悲剧集（1）》，小川正广、高桥宏幸、大西英文、小林标译。

塞内加：《悲剧集（2）》，岩崎务、大西英文、宫城德也、竹中康雄、木村健治译。

二、第二手史料——后世学者所著的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

作者在介绍第二手参考资料时，通常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参考资料中所论述的观点，是作者本身认同的。这种做法

常见于以研究者为对象的学术论文中。

第二种是不管作者是否认同样参考资料所论述的观点，只要是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都一并记入。这种方法常使用于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作品中，因为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最新的学术研究结果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何况，有不少读者希望能从作品中读到不同角度的历史观，作为作者应该尊重他们的要求。

我通常是用第二种方法，因此，在我的参考文献表中，也包括了与我观点迥异的著作。

历史和数学不同，作者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数字。无论笔下的时代有多久远，里面出现全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作者唯有全情投入其中，才可能刻画出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内容。

当然，历史不会有标准答案，因为它不是数学。

青柳正规：《古代都市罗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90年。

青柳正规：《皇帝之都罗马——刻在都市的统治者雕像》，中公新书，1992年。

南川高志：《罗马皇帝和他的时代——元首政治罗马帝国政治史研究》，创文社，1995年。

ALFÖLDY, G., *Storia sociale dell'antica Roma*, Bologna, 1987.

ASHBY, Th.,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35.

ASSA, J., *Les Grandes Dames Romaines*, Paris, 1960.

BAILLIE-REYNOLDS, P.K., *The Vigiles of Imperial Rome*, Oxford, 1926.

BALTRUSCH, E., *Regimen morum. Die Reglementierung des Privatlebens der Senatoren und Ritter in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und frühen Kaiserzeit*, München, 1989.

BINDER, G., *Saeculum Augustum I*, Darmstadt, 1987.

BIRLEY, E., *Senators in the Emperor's Servic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39, 1954.

BRACCESI, L., *Epigrafia e storiografia*, Napoli, 1981; *Germanico el'imitatio Alexandri in Occidente. Germanico: La persona, la personalità, il personaggio*, Roma, 1987.

BRUNT, P.,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Local Ruling Classes in the Roman Empire*, Madrid, 1976;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1988.

BURNETT, A., *The Authority to Coin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 《Numismatic Chronicle》 137, 1977.

CAFIERO, M.L., *Ara Pacis Augustae*, Roma, 1996.

CAMPBELL, J. B.,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Oxford, 1984.

CARANDINI, A., *Schiavi in Italia*, Roma, 1988.

CARCOPINO, J., *La vita quotidiana a Roma*, Bari, 1983.

CASTAGNOLI, F., *Roma antica. Profilo urbanistico*, Roma, 1987.

CAVALLARO, M.A., *Spese e spettacoli. Aspetti economici-strutturali degli spettacoli nella Roma giulio-claudia*, Bonn, 1984.

CHRIST, K. & GABBA, E., *Caesar und Augustus*, 《Biblioteca di Athenaeum》 12, Como, 1989.

CIMMA, M.R., *Reges socii et amici populi Romani*, Milano, 1976.

COARELLI, F., *Il Foro romano II. Periodo repubblicano e augusteo*, Roma, 1985.

COLINI, A.M., *Il porto fluviale del Foro Boario a Roma*, 1980.

CORBIER, M., *L'aerarium Saturni et l'aerarium militare. Administration et prosopographie sénatoriale*, Roma, 1974; *L'aerarium militare, Armées et fiscalité dans le monde antique*, Paris, 1977.

CRACCO RUGGINI, L., *La città romana dell'età imperiale, Modelli di città. Strutture e funzioni politiche*, Torino, 1987.

CRAWFORD, M., *Economia imperiale e commercio estero, Tecnologia, economia e società nel mondo romano*, Como, 1980; *Coinage and Money under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85; *Money and Exchange in the Roman World*,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 60, 1970; *Roman Republican Coinage*, Cambridge, 1974.

CRESSEDI, G., *Riflessioni su un progetto per il Foro romano nell'età di Cesare*, Palladio II, 1989.

CROOK, J., *Consilium Principis. Imperial Councils and Counsellors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Cambridge, 1955.

D'ARMS, J., *The Romans on the Bay of Naples. A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y of the villas and their owners from 150 B.C. to 400 A.D.*, Cambridge, Mass, 1970.

DE CECCO, M., *Monetary Theory and Rom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DE MARTINO, F., *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IV*, Napoli, 1974.

DI PORTO, A., *Impresa collettiva e schiavo manager in Roma antica*, Milano, 1984.

DOSI, A. & SCHNELL, F., *I soldi nella Roma Antica*, Milano, 1993.

DUNCAN-JONES, R., *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Cambridge, 1990.

FABBRINI, F., *L'impero di Augusto come ordinamento sovrannazionale*, Milano, 1974.

FABRE, J., *Libertus*, Roma, 1981.

FINLEY, M.I., *Problemi e metodi di storia antica*, Roma-Bari, 1987.

FORNI, G.,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Milano-Roma, 1953.

FRASCHETTI, A., *Roma e il principe*, Bari, 1990.

FREIS, H., *Die cohortes urbanae*, 《Epigraphische Studien》 2, Köln-Graz, 1967.

GABBA, E., *Appiani Bellorum civilium liber quintus*, Firenze, 1970; *Le città italiche del I sec. a.C. e la politic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RSI)》 98, 1986; *Geografia e politica nell'impero di Augusto*, 《RSI》 101, 1989.

GAGÈ, J.,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Paris*, 1950.

GALLOTTA, B., *Germanico oltre il Reno*, 《Facolta di lettere dell'Università statale de Milano》 34, 1981.

GARNSEY, P. & SALLER, R., *The Early Principate. Augustus to Trajan*, 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No. 15, Oxford, 1982;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1987.

GIARDINA, A., *L'uomo romano*, Roma-Bari, 1989.

GIRARDET, K.M., *Die Lex Iulia de provinciis*, 《Rhein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130, 1987.

GRANT, M., *Storia di Roma Antica*, Roma, 1981; *Gli Imperatori romani*, Roma, 1987.

GRELLE, F., *Stipendium vel tributum*, Napoli, 1963.

GROS, P., *Aurea Templa. Recherches sur l'architecture religieuse de Rome à l'époque d'Auguste*, Roma, 1976.

GROS, P. & TORELLI, M., *Storia dell'urbanistica. Il mondo romano*, Bari, 1988.

GUIZZI, F., *Il principato fra "res publica" e potere assoluto*, Napoli, 1974.

HOPKINS, K., *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200 B.C.-A.D.400)*, 《JRS》

DE MARTINO, F., *Storia della costituzione romana IV*, Napoli, 1974.

DI PORTO, A., *Impresa collettiva e schiavo manager in Roma antica*, Milano, 1984.

DOSI, A. & SCHNELL, F., *I soldi nella Roma Antica*, Milano, 1993.

DUNCAN-JONES, R., *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Cambridge, 1990.

FABBRINI, F., *L'impero di Augusto come ordinamento sovrannazionale*, Milano, 1974.

FABRE, J., *Libertus*, Roma, 1981.

FINLEY, M.I., *Problemi e metodi di storia antica*, Roma-Bari, 1987.

FORNI, G.,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Milano-Roma, 1953.

FRASCHETTI, A., *Roma e il principe*, Bari, 1990.

FREIS, H., *Die cohortes urbanae*, 《Epigraphische Studien》 2, Köln-Graz, 1967.

GABBA, E., *Appiani Bellorum civilium liber quintus*, Firenze, 1970; *Le città italiche del I sec. a.C. e la politic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RSI)》 98, 1986; *Geografia e politica nell'impero di Augusto*, 《RSI》 101, 1989.

GAGÈ, J.,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Paris*, 1950.

GALLOTTA, B., *Germanico oltre il Reno*, 《Facolta di lettere dell'Università statale de Milano》 34, 1981.

GARNSEY, P. & SALLER, R., *The Early Principate. Augustus to Trajan*, 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No. 15, Oxford, 1982;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1987.

GIARDINA, A., *L'uomo romano*, Roma-Bari, 1989.

GIRARDET, K.M., *Die Lex Iulia de provinciis*, 《Rhein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130, 1987.

GRANT, M., *Storia di Roma Antica*, Roma, 1981; *Gli Imperatori romani*, Roma, 1987.

GRELLE, F., *Stipendium vel tributum*, Napoli, 1963.

GROS, P., *Aurea Templa. Recherches sur l'architecture religieuse de Rome à l'époque d'Auguste*, Roma, 1976.

GROS, P. & TORELLI, M., *Storia dell'urbanistica. Il mondo romano*, Bari, 1988.

GUIZZI, F., *Il principato fra "res publica" e potere assoluto*, Napoli, 1974.

HOPKINS, K., *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200 B.C.-A.D.400)*, 《JRS》

LO CASCIO, E., *L'organizzazione annonaria*, Civiltà dei Romani I, Milano, 1990; *State and Coinage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 《JRS》 71, 1981; *La riforma monetaria di Nerone: l'evidenza dei ripostigli*, 1980.

LUTTWAK, E.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London, 1976.

MacDOWALL, D.W., *The Western Coinages of Nero*, New York, 1979.

MANN, J.C., *Legionary Recruitment and Veteran Settlement during the Principate*, London, 1983.

MATTINGLY, H. & SYDENHAM, E.A.,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II*, London, 1968.

MAZZARINO, S., *L'impero romano*, Roma, 1956.

MAZZOLANI, L.S., *Iscrizioni funerarie sortilegie e pronostici di Roma Antica*, Torino, 1973.

ME di Maggiore Cristina, *ROMA VRBS IMPERATORVM AETATE*, Roma, 1986.

MENCH, F.C., *The Cohortes Urbanae of Imperial Rome*, Diss. Yale, New Haven, 1968.

MILAN, A., *Le Forze Armate nella storia di Roma Antica*, Roma, 1993.

MILLAR, F. & SEGAL, E.,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Oxford, 1984.

MILLAR F., *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 《JRS》 63, 1973; *The Emperor, the Senate and the Provinces*, 《JRS》 56, 1966;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7; *Emperors, Frontie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31 B.C. to A.D. 378*, 《Britannia》 13, 1982.

MOMMSEN, Th., *Römisches Staatsrecht II-2*, Basel-Stuttgart, 1963.

MORETTI, G., *DIE ARA PACIS AVGVSTAE*, Roma.

NEUMEISTER, C., *Das Antike Rom. Ein Literarischer Stadtführer*, München, 1991.

NICOLET, C., *Il mestiere di cittadino nell'antica Roma*, Roma, 1980.

NIPPEL, W., *Aufruhr und "Polizei" in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Stuttgart, 1988.

NOÈ, E., *Storiografia imperiale pretacitiana. Linee di svolgimento*, Firenze, 1984.

PAOLI, U.E., *Vita romana. Usi, costumi, istituzioni, tradizioni*, Milano, 1995.

PARATORE, E., *La letteratura latina dell'etá Repubblicana e Augustea*, Milano, 1993.

PERELLI, L., *Il movimento popolare nell'ultimo secolo della repubblica*, Torino, 1982; *La corruzione Politica nell'Antica Roma*, Milano, 1994.

PFLAUM, G., *Les carrières procuratoriennes équestres sous le Haut-Empire*, Paris, 1960.

PIANTA DEL PLASTICO DI ROMA, Museo della Civiltà Romana.

PRAUSE, G., *Herodes der Grosse*, Hamburg, 1981.

PURCELL, N., *The apparitores: a study in social mobilit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51, 1983.

RICKMAN, G.,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RODDAZ, J.-M., *Marcus Agrippa*, Rome, 1984.

ROMA CONSTANTINI AETATE, Museo della Civiltà Romana.

SADDINGTON, D.B.,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49 B.C.-A.D.79)*, Harare, 1982.

SALLES, C., *Les bas-fonds de L'Antiquité*, Paris, 1982.

SCHÜRER, E., *Storia del popolo giudaico al tempo di Gesú Cristo I-II*, Brescia, 1985-87.

SERRAO, F., *Impresa e responsabilità a Roma nell'età commerciale*, Pisa, 1989; *La iurisdictio del pretore peregrino*, Milano, 1954.

SHERWIN-WHITE, A.N.,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1973.

SIRAGO, V.A., *Principato di Augusto*, Bari, 1978.

SORDI, M., *Il confine nel mondo classico*, Milano, 1987.

STARR, Ch.G.,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Cambridge, 1960.

SUTHERLAND, C.H.V., *The Emperor and the Coinage: Julio-Claudian Studies*, London, 1976.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Tre élites coloniali. Roma, la Spagna e le Americhe*, Milano, 1989; *Roman Papers IV*, Oxford, 1988; *I confini settentrionali durante il principato di Augusto*, 1934.

TALBERT, R.J.A., *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Princeton, 1984.

TIBILETTI, G., *Principe e magistrati repubblicani. Ricerche di Storia Augustea e Tiberiana*, Roma, 1953.

TORTORICI, E., *L'attività edilizia di Agrippa a Roma*, Il bimillenario di Agrippa, Genova, 1989.

VALERA, G., *Erario e fisco durante il principato: stato della questione*, Storia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II, Milano, 1983.

VEYNE, P., *Il pane e il circo*, Bologna, 1984.

VITUCCI, G., *Ricerche sulla "praefectura urbi" in età imperiale*, Roma, 1956.

WALLACE-HADRILL, A., *Image and Authority in the Coinage of Augustus*, 《JRS》 76, 1986.

WATSON, G.R.,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1969.

WEAVER, P.R.C., *Familia Caesaris: A Social Study of the Emperor's Freedmen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2.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London, 1969.

WELLS, C.M.,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1972.

WHITTAKER, C.R., *Les frontières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1989.

WISEMAN, T.P., *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 139 B.C.-14 A.D.*, Oxford, 1971.

ZANKER, P., *Augusto e il potere delle immagini*, Torino, 1989.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VII

臭名昭著的皇帝

[日] 盐野七生◎著　涂华忠◎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从美丽的卡布里岛到火烧罗马城
短短54年间，罗马皇帝几经更迭
四位皇帝是否果真臭名昭著？

是英雄创造的时代已远
还是暴君当道的世纪来临？
他们究竟是帝国覆亡的推手
还是帝国变局中的一页？

王石王巍 |作序|

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日）盐野七生著；涂华忠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086–3463–0
I. 罗… II. ① 盐… ② 涂… III. 古罗马－历史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5977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Ⅶ : Akumei Takaki Kouteitach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8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涂华忠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

[日] 盐野七生 著
涂华忠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银币故事
金币故事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第一章 皇帝提比略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乌斯
第四章 皇帝尼禄
后记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本书中涉及的事件是公元1世纪之后50年内发生的事情。此外，我撰写的《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是预示罗马帝国覆灭的公元4世纪。从这个时代往前追溯300年，回到公元1世纪，正是罗马人对罗马历代帝王谩骂指责的年代，但同时也是罗马人自身觉得幸福的时代。

原本“臭名昭著的皇帝”这个题目源于与这些皇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古罗马知识分子，比如塔西佗，以及追随这些大师脚步的西欧史学家们对皇帝的评价。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借用这个题目意思却与之相反。当我们武断地认为这些皇帝都不是明君时，事实果真如此吗？想必大家确实有此疑问。然而，在这些恶名昭彰的帝王们的统治时期，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无论从铸造技术还是金银纯度，都让公元4世纪的货币望尘莫及。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写作本书时，我的立场只是旁听，而并非他们的辩护人。就好比辩护人出示大量史实，证明他们是明主而非暴君时，我只能坐在旁听席上，认真聆听监察官与辩护人的说辞，认真思考真相到底如何。

经过连日审判，我得出一个结论，公职人员与私人果然不一样。想想看，如果是单纯的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他，做别人的朋友，我们会觉得心情愉悦，做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我们会觉得非同寻常，责任重大。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抛开私人感情，站在公职人员的立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过程中就会涉及平衡问题，即暴君与明主的界限问题，或许这正是如何在公职人员与私人两种身份之间保持平衡的共同之处。

顺带提一下，此处介绍的银币正面的头像是卡利古拉，他没有把握好平衡。而银币背面则是奥古斯都，说到巧妙地把握平衡，他是罗马人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也是帝国政权时期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是卡利

古拉的曾祖父，然而卡利古拉似乎没有继承奥古斯都对行事尺度的清醒认识。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与其他职业相比，政治家容易受指责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家都相信谁都可以当好政治家。打个比方，钢琴赛的评委往往是由有名的钢琴家担任，一个人再怎么喜欢音乐，如果仅仅只是爱好的话，公众是绝不容许由他来给钢琴选手们投票的。不过如果换成政治的话，规定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不这样的话，就会被指责为反民主。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说人民大众是作为源泉的政治体制，就是由一群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来评价专业政治人士的体系。

这样看来，对政治家而言，关乎他们生死的问题就是获得政治门外汉们的支持。从虽有真才实学却没有从事过政治事务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学者、评论家还是媒体都应归于不懂政治这一范畴。政治家应该去挑战的是，在保持政治专业人士应有的气概与能力的同时，还要保证政治门外汉们对自己的支持等等之类的高超技能。遗憾的是，克劳狄乌斯皇

帝没有成功挑战这样的技能。我是基于怎样的理由下此结论，读完本书，读者们自会知晓。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有很多人，明明在诸多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才华，却不能灵活使用这些才能以获得全方位的成就。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多面手”的人，换言之，也即不会成长的人。因为人必须通过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件事才能获得成长，而非蜻蜓点水，无所专长。

因此，这些“多面手”的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不安，担心自己一直一事无成。这种不安，表现为做某件事时会常常不小心行事过度。我认为皇帝尼禄也属于“多面手”，是个不幸的男人。

但是生活在罗马的人们却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建立过程之中。如若尼禄行事避免太过专横跋扈，也不会在30岁时就被逼得自杀身亡。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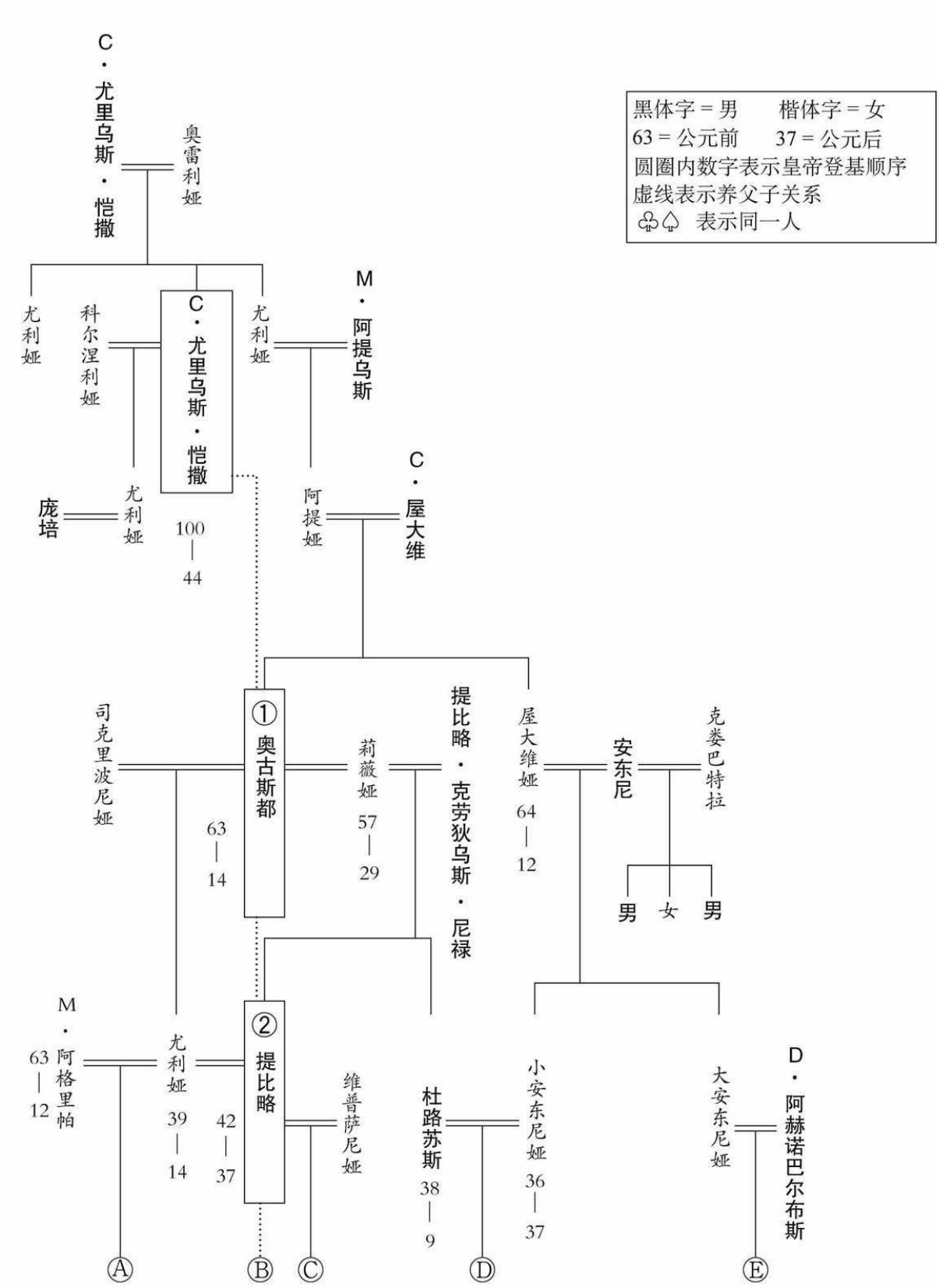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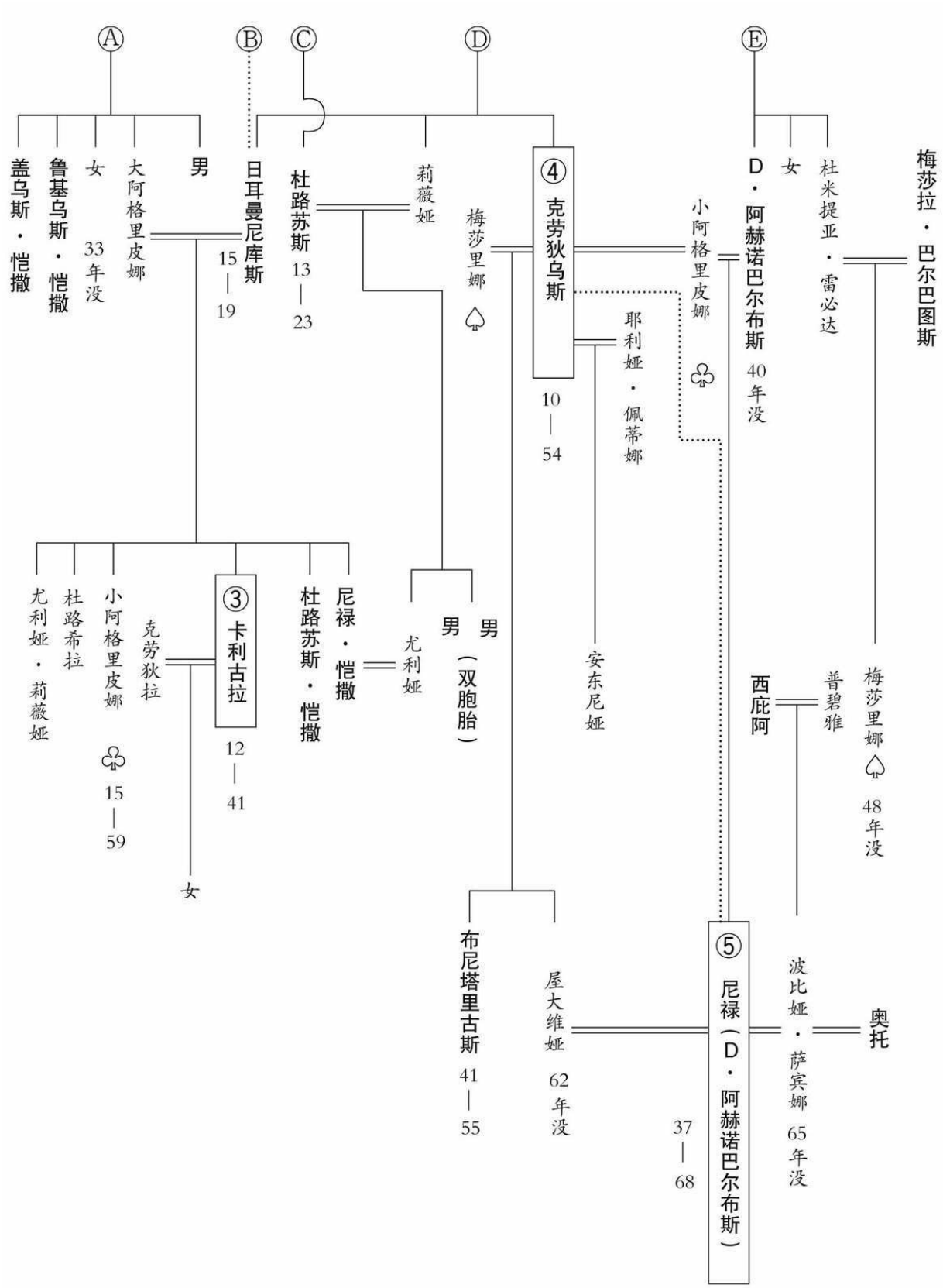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尤里乌斯——克劳狄斯王朝图谱（略去一部分）


黑体字 = 男　　楷体字 = 女
63 = 公元前　　37 = 公元后
圆圈内数字表示皇帝登基顺序
虚线表示养父子关系
♧♤ 表示同一人
C·尤里乌斯·恺撒
奥雷利娅
尤利娅
科尔涅利娅
C·尤里乌斯·恺撒
100
44
尤利娅
M·阿提乌斯
庞培
尤利娅
阿提娅
C·屋大维
司克里波尼娅
①奥古斯都
63
14
莉薇娅
57
29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
屋大维娅
64
12
安东尼
克娄巴特拉
男
女
男
M·阿格里帕
63
12
尤利娅
39
14
②提比略
42
37
维普萨尼娅
杜路苏斯
38
9
小安东尼娅
36
37
大安东尼娅
D·阿赫诺巴尔布斯
Ⓐ
Ⓑ
Ⓒ
Ⓓ
Ⓔ


梅莎拉·巴尔巴图斯
Ⓐ
Ⓑ
Ⓒ
Ⓓ
Ⓔ
男
大阿格里皮娜
33年没
女
鲁基乌斯·恺撒
盖乌斯·恺撒
日耳曼尼库斯
15—19
杜路苏斯
13—23
莉薇娅
梅莎里娜
④ 克劳狄乌斯
10—54
小阿格里皮娜
D·阿赫诺巴尔布斯
40年没
女
杜米提亚·雷必达
耶利娅·佩蒂娜
安东尼娅
梅莎里娜
48年没
尼禄·恺撒
尤利娅
男
男
（双胞胎）
杜路苏斯·恺撒
③ 卡利古拉
12—41
克劳狄拉
女
小阿格里皮娜
15—59
杜路希拉
尤利娅·莉薇娅
西庇阿
普碧雅
布尼塔里古斯
41—55
屋大维娅
62年没
⑤ 尼禄（D·阿赫诺巴尔布斯）
37—68
波比娅·萨宾娜
65年没
奥托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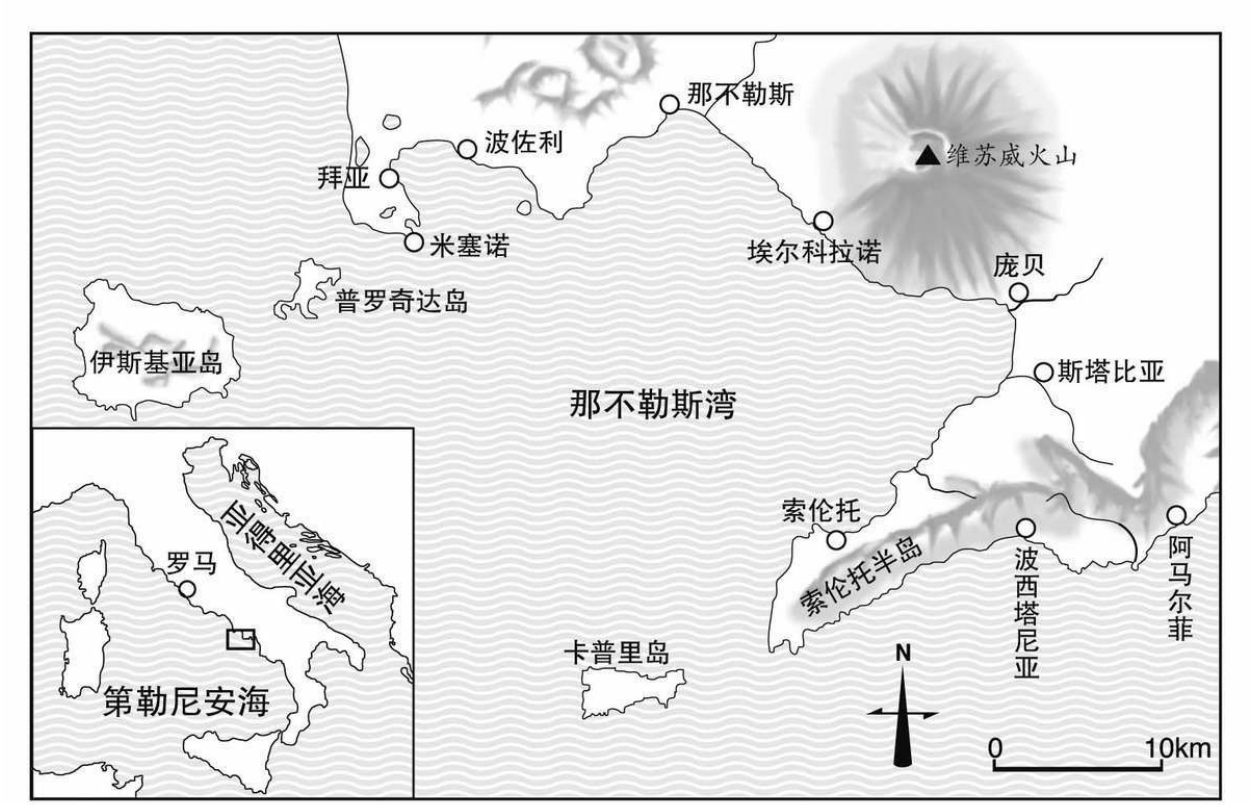
皇帝提比略

（14年9月17日—37年3月16日在位）

卡普里岛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以南3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名叫卡普里的小岛，今天搭乘水翼船只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座岛上。如若有闲暇，加之想要走上甲板呼吸海上清新的空气，又或想观赏周围的美景的话，可以选择搭乘联络船前往，即使这样，一个半小时到达小岛仍然绰绰有余。

然而，那时候不论如何热衷于提升船只性能的古罗马人，在动力方面也不得不依靠人力和海风。据说普通的三层帆船时速可以达到两三海里（1海里约合1.852千米），如果顺风的话可以达到时速5海里。但那不勒斯湾是一个只适合进行划船或独木舟练习的平静海湾，卡普里岛气候与罗马大同小异，是意大利气候最为舒适之处。因此，卡普里岛又被称为“皇帝的御用船”。可是，提比略需要的并不是游玩用的游乐船，而是把卡普里岛当成了一艘能够办公用的政务船。无论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商港波佐利还是军港米塞诺出发，都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到达卡普里岛。



卡普里岛及其周边环境

时光荏苒，卡普里岛如今已成为地中海沿岸为数不多的疗养胜地，游人们谁都可以涉足此地。然而，历史回溯到2000年前，整座卡普里岛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这是由于奥古斯都大帝用伊斯基亚岛与卡普里岛的前主人交换了这座岛屿，最后才把整座岛屿纳入自己的名下。作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居然愿意拿比卡普里岛面积大4倍、又有温泉的伊斯基亚岛去交换卡普里岛，不难想象卡普里岛的迷人之处。其实，从罗马时代起，卡普里岛就有“那不勒斯湾珍珠”的美称。遗憾的是，奥古斯都虽然钟情于卡普里岛，生前却未能好好在卡普里岛畅游享受一番。大概是奥古斯都大帝在那不勒斯周游之际，才顺道在岛上作了短暂停留，随后就与世长辞了。对于终生日理万机的奥古斯都而言，卡普里岛虽是一个适合放松的胜地，虽然他想去度假，却因政务繁忙而始终未能成行，前往卡普里岛或许是奥古斯都一个未竟的梦想。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围绕的卡普里岛是一座没有沙滩的岛屿，往来的

船只只有岛屿北边的一处码头可以停靠。据说岛上有一座奥古斯都修建的别墅，坐落在离岛岸不远的一处高台之上。虽说是高台，但离海面也不过10米左右，以至于渔夫们能清晰地辨认出站在列柱回廊上的皇帝。每当这时渔夫们就会停下手中捕鱼的活计，纷纷向皇帝行问候礼，皇帝就会站在高台的回廊上向他们轻轻地挥手示意。每逢岛上居民的祭典，奥古斯都大帝大都会愉悦地参加。

风景优美的卡普里岛，充斥着欧洲各大名牌商店，现在早已成为一个观光度假的旅游胜地。从停靠船只的码头搭乘缆车，一转眼的工夫就可以到达海拔146米高的卡普里岛中央广场。来此旅游的游客们希望充分地享受卡普里岛的阳光，而非卡普里岛周遭的景色，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岛上的饭店全都集中在卡普里岛的南面，一处最适宜日光浴的地方。

我背对着为了争乘缆车而喧嚣不已的人群，独自一人踏上了从中央广场分出来的一条小道，打算顺道造访位于小岛东边的提比略皇帝的别墅。要到这处遗址就得舍弃便捷的缆车或汽车，虽然这是一条从海拔146米延伸到海拔336米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那么危险，沿着平缓的上坡路，越往前行民居越少，左边的那不勒斯湾渐渐地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也记不得在过去的这30个寒暑往返了多少次，也记不清要花多长时间才可以到达这座别墅，更记不清这段路程有多远的距离，因为每一次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同一个情形。

在我脑海里，在那个没有缆车的年代，提比略皇帝要到达这座按照自己要求建在卡普里岛最东边断崖上的别墅，这也意味着他得爬到海拔350米左右的高度。即使按现在的标准折算，当时的海拔也有336米，因为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大概要低6米以上。按照古罗马人的性格，肯定会立刻就把上山的道路铺好，但提比略当时是否会安然地坐在轿子里，由一群倔强不屈的奴隶抬着一路摇晃而来呢？其实，即使提比略到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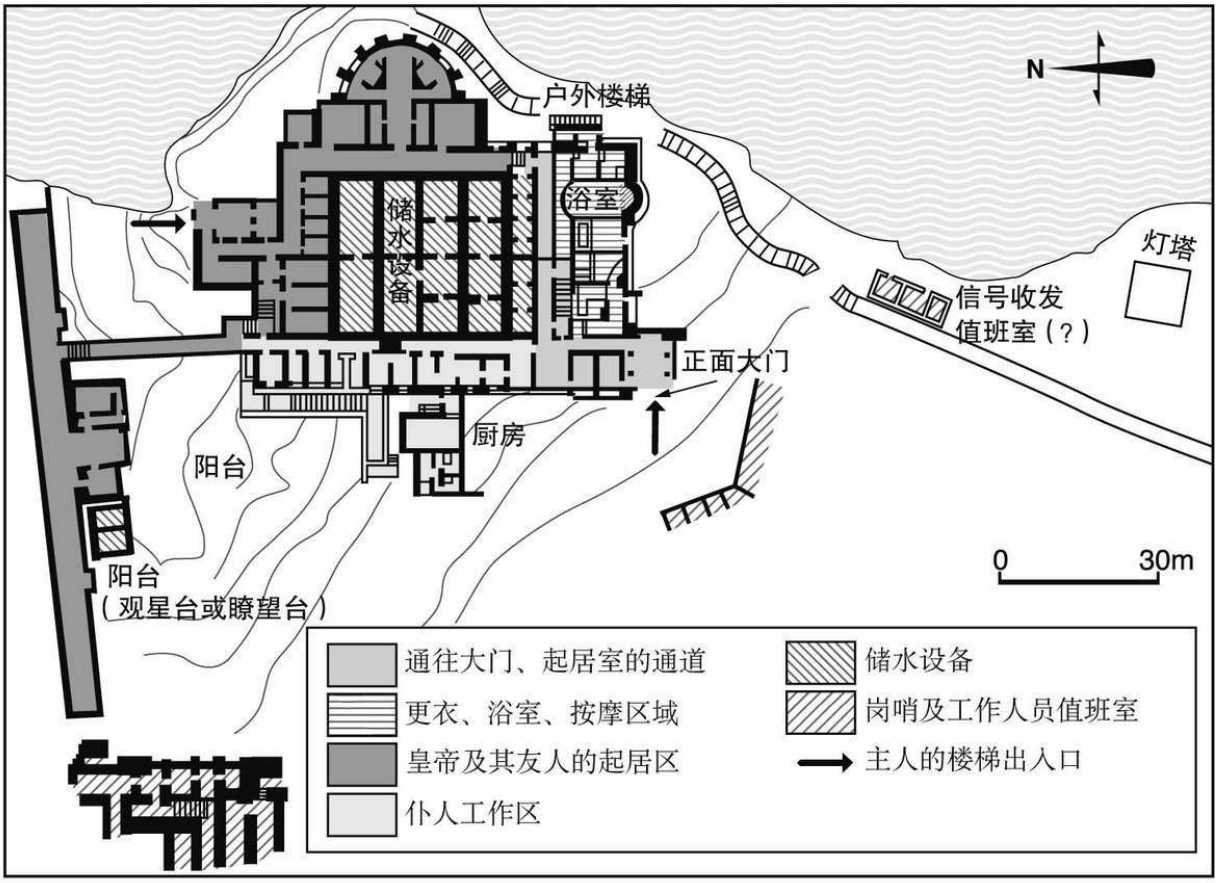
年，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硬朗，也许是因为在船上的时间较长，很少有运动的机会，到别墅的这段路才总是由他自己走上来的吧。

虽然身体没有提比略那么硬朗，但我也坚持走完了这一段路程。走完最后200米的路程之后，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提比略是一个性格多么孤僻的人。此外，如若想观察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其继任者提比略之间的性格差异，只需要比较一下卡普里岛上的两座别墅就能洞悉到这一点，途中，我一直这么自言自语着。

被称为“乔伊斯别墅”（宙斯别墅）的提比略别墅坐落在断崖最高处，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然而，从规模庞大的储水槽来看，应该能够充分满足当时罗马人对生活孜孜以求的舒适需求。话虽如此，这栋豪华舒适的别墅，并不是提比略皇帝的退隐之所。他并没有在退位之后隐居于此，不再过问政事。事实上，提比略从公元27年直到逝世的那10年时间里，虽然一直身处卡普里岛却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尽管他的性格孤僻，但并没有放弃统治罗马人民的责任与义务。进而言之，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帝国，在提比略统治之下更加稳如磐石。

我一直有个习惯，在游览古代遗迹之后，就会立刻在脑海中重新描绘出这些建筑物的复原图。我觉得建筑物如若复原的话，那么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会随之“复活”。在我设想的世界里，他们至今仍然活着、呼吸着。

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他。然而，在我眼中的恺撒并非独来独往，他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部下。我有时甚至能听见他们传来的欢声笑语。即使在跨越意大利北部卢比孔河这攸关一生的时刻，恺撒大帝发出“越过此河，将是人生的悲剧；如若不越此河，我们将会灭亡”的慷慨悲歌之后，仍然有着大批的追随者不顾性命而追随着他，我无法想象恺撒这样极具魅力的皇帝会感到孤独。



乔伊斯别墅平面图（这座别墅跟一般的罗马别墅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特色，即主人的居住区与用人的工作区一目了然。）

我也很难将奥古斯都与孤独联系在一起，恺撒是一位凡事都必须经过自己决断的皇帝，而奥古斯都则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自己作决策。然而我所见到的奥古斯都，身边总有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跟随，是其在作决策时重要的商量对象，这样的奥古斯都，显然是与孤独无缘的。

然而，唯有提比略，我才能想象他被孤独深深困扰的情形。他那高大健壮的体格，即使面对其背影，也不会觉得单薄。而他修长的身形，严厉得似乎在拒绝别人的援助。

倘若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或是面临着人类难以生存的沙漠，一个孤独的男人将无从选择，他仍然可以活在自己构建出来的虚幻世界

之中。从乔伊斯别墅眺望出去的景致，是美丽的地中海地区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也是一处能让人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愿景的地方。从东北部延伸至东部的索伦托半岛那柔软静谧的景致使人变得十分安详，目之所及，宽广的那不勒斯海湾碧波荡漾，而稍远处西北部的米塞诺海角，入夜后灯火闪烁，不难想象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间，一个不善交际的男人，身处这样的绝世美景之中是多么的另类。

提比略刚继位时，并没有那么讨厌与人交往。从心底而言，他应该是努力地尝试过，不，或者应该说过犹不及吧。

皇帝继位

虽然记录具体日期的史料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我们都很清楚奥古斯都大帝逝世的时间是公元14年8月19日，而提比略继皇位的时间是9月17日。此外，与23年后提比略去世的地方相同，奥古斯都下葬的地方同样也位于那不勒斯近郊，把他的遗体运回罗马花了12天。从这两件史实可以推测，奥古斯都的遗体运回罗马首都应该是公元14年9月之后的事情。据说，由于当时意大利时值盛夏，所以移灵都在夜间进行，或许因此时间就拖到了9月10号以后吧。毕竟要把皇帝的遗体运回首都，不能仅仅依靠马车。当士兵抬着奥古斯都的遗体回罗马首都之际，徒步紧随其后的正是提比略，奥古斯都逝世的时候他也在场。

这不仅因为提比略是奥古斯都的亲戚，奥古斯都生前早已将各种权力交付给他，将其视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所以，在运送遗体的军队沿阿皮亚大道北上的过程中，他肯定早先离队骑快马赶回了首都。因为他有责任召集元老院，由元老院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怎么进行，此外，还得宣布奥古斯都的遗嘱。皇帝的遗嘱并非私事，属于公事之列。依照惯例，奥古斯都在年初写好遗嘱后要交给维斯太贞女（Vestalis，女祭司）保管。此时会场中坐满了500多位元老院议员，人人洗耳恭听。出

于公正、公平，遗嘱由一位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法务官宣读。遗嘱开头第一句话，在宽阔的元老院会场回荡：

> 特此声明，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盖乌斯和鲁基乌斯，我把赠与他们遗产的二分之一与六分之一留给提比略。

奥古斯都大帝的独生女儿尤利娅生了两个儿子，即盖乌斯与鲁基乌斯，不久后奥古斯都收留他们，亲自抚养。可是这俩兄弟，分别于公元4年与公元2年去世，23岁和18岁的年纪就去世确实令人感到十分痛心，不过这些都是10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事实上，元老院的议员们早就明白这两位年轻的继承人能力不足，只有他们的祖父奥古斯都会为外孙的早逝而发出感叹。而时年55岁的提比略无论能力还是功劳，都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继承人。

事实上，奥古斯都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端倪。公元4年，奥古斯都收当时45岁的提比略为养子，同时请求元老院赋予他为期10年（这一时限其实可以随意更改）的“护民官特权”，元老院最终同意了。此外，公元13年，奥古斯都还把全部领地的统治权与整个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都交给了提比略，让他成为与奥古斯都一样的实际共同统治者。为提比略铺好了自己逝世后的统治道路后，奥古斯都才与世长辞。或许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确实做得相当完备了。在奥古斯都的遗嘱中，他仍然延续按罗马人司空见惯的方式，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第一顺位继承人，这等于指明了提比略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毕竟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容易出现的最大问题，应当是指挥中枢的突然断裂。

奥古斯都让提比略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把遗产留给丝毫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却是缄口不言。显而易见，恭听遗嘱的议员们大都认为，原本作为皇位继承人的两名外孙早已不在人世，奥古斯都别无选择，不得不任命已有妻室的提比略作为其继承人。然而不

论是古罗马还是在其他地方，靠着女人扶摇直上的人，终究逃不出一辈子遭受蔑视的命运。

因此，说得通俗点，奥古斯都的遗嘱还是有不够“干脆利落”的毛病。与恺撒的遗嘱相比，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恺撒在任命不满18岁的奥古斯都做继承人时，并没有“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量力而行”等等之类的附带条件。如果真要加上这么一条的话，那么奥古斯都在与军事实力悬殊的死对头安东尼的较量中肯定会暴露出这个问题。当时罗马正处在恺撒遇刺后的动乱之中，在战场上与敌人实力的差距，会给恺撒继承人打下不适合继承皇位的烙印。正因为恺撒“干脆利落”的遗嘱，才对奥古斯都大有裨益。

然而，奥古斯都应当会说自己并没有给提比略附加条件。不跟不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的18岁毛头小伙提条件，却向经验与功勋都十分丰富而卓著的50岁男人提附加条件，这两者并不相同。一想到向后者提附加条件这件事，就总让人感到好笑。可是，即使在字面上没有明确写出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奥古斯都还是巧妙而隐晦地提出了他的附加条件。

在他逝世前的10年时间里，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为养子，这也是把提比略作为继承人重点培养的一段时间，他让已经有儿子的提比略收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日耳曼尼库斯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虽然在他死后迫不得已必须由提比略继位，但这一举动等于表明提比略的继承人是日耳曼尼库斯。

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提到：“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两个外孙盖乌斯与鲁基乌斯”，后面一句话就立刻提到要将皇位传给提比略，对此却未作任何解释，只是提到10年前的陈年旧事，让人感觉到他还是没有忘却往事，对确立继承人一事稍嫌犹豫。其实，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我们只领会到了奥古斯都意思的一半。奥古斯都在遗嘱中刻意提到10年前早逝的两个外孙，言外之意，就等于挑明了今后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

身上，必须流淌着他这位“奠基者”的血。遗嘱中只字未提传位给提比略的理由，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提比略只是日耳曼尼库斯继位前的过渡继承人而已。提比略刚好在这一年满了55岁，而担任莱茵河防御军团总司令的日耳曼尼库斯却只有28岁。单从年龄角度来看，这条曲线继位道路铺设得十分巧妙。

然而，尚未正式继承皇位之前，遗嘱就把这一顺位继承关系挑明，那么提比略的内心世界又有什么样的斗争呢？端坐在元老院会场中的议员，大家的目光应该都聚焦在默默聆听遗嘱的提比略身上，这其中肯定会有人怀揣着十分恶意的好奇心，观察着提比略聆听遗嘱的表情。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的统治，应该始于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吧。

可是，假设曾一度被遴选为过渡继承人的战友阿格里帕仍然健在，在公元14年的元老院议会场中听到了上面的遗嘱，他的心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也毫无血缘关系，他仅仅是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步得到提升，最终才成为奥古斯都的心腹的。再假设如若当初恺撒没有提拔阿格里帕，在共和国时代非出身名门不可为军官的罗马军团中，阿格里帕最高只能升到百人队队长。又假设他没有进入罗马帝国的军队，阿格里帕说不定会一生碌碌无为。所以，如果他成为日耳曼尼库斯的过渡继承人，应该不会感到是屈辱，而是无上光荣的喜讯。

提比略却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直系血亲。在罗马改国体为共和制之际，克劳狄乌斯家族就带着5000名“被保护人”（clientes）迁往罗马。换言之，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历史就是罗马的历史。与之相比，奥古斯都的祖父靠什么起家根本就无从考证，这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虽然收养奥古斯都为养子的尤里乌斯家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为罗马共和国崛起而供应的人才方面，却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克劳狄乌斯家族是一个曾经拥有过28名执政官、5名独裁官、7名财务官、6名凯旋将军与20名次席凯旋将军的显赫家族。提比略的母

亲出身于利维斯家族，这个家族也隶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旁支。在提比略祖先中声名显赫者非常之多，在此举以下几位：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312年担任财务官，他不仅利用职权修建了罗马第一条大道（也可谓是当时罗马帝国高速公路的阿皮亚大道），还因为负责架设罗马第一条自来水管道而名垂青史。（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与迦太基的第一战取胜。（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第二次腓尼基战役中，为了阻止占据意大利的汉尼拔同从西班牙赶来支援的胞弟哈斯德鲁鲍尔会合而参与战斗，并取得梅陶罗河会战的胜利。这次战斗导致汉尼拔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当然，克劳狄乌斯家族为罗马帝国提供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愚蠢的人也为数不少。臭名远扬者如下：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450年，罗马贵族与公民阶层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就是罗马贵族阶层堡垒“十人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克劳狄乌斯·普鲁克斯——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罗马军队的一个败军之将。通常罗马是不会处罚败军之将的，然而只有他被撤职。在今天看来，撤职的原因有点好笑。罗马人在战斗前习惯先用鸟类来占卜吉凶，占卜过程中他选中的鸡不肯啄食诱饵，他气得大叫道：“难不成你想喝水！”然后就把它扔进了海里。他的这种行为被认为非常主观，不适合担任军队的指挥官。（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按照传统，贵族不能担任罗马的护民

官，他却选择成为平民的养子来担任这一职位，并且投靠到恺撒的阵营之中。这在成员皆为名门贵族的元老院眼中，他只是一个替恺撒派扶马鞍的丑角。（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

公元4年，提比略在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后，传闻不再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一签名来签署公文，而是取而代之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这一签名，签名的变化表示他是尤里乌斯家族的成员。但是他身上依旧流着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不过这种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提比略利用登上皇位的契机，让克劳狄乌斯家族重现元老院体制时期的辉煌就行了。

然而，提比略的不幸在于他赞同奥古斯都的政治理念，这与他本身所背负的家族传统截然相反。换言之，提比略本应该继承代表旧的共和体制的家族传统，但他认为元首制这种新体制才能将罗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精神上支撑提比略这种想法的，是克劳狄乌斯家族源源不断为国家提供人才的这种自傲。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对国家利益优先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负，即使国体变更成元首制，这种精神依旧沉积于提比略的血液之中。

在遗嘱中，奥古斯都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提比略之后，宣布又将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妻子莉薇娅。之后，莉薇娅被尤里乌斯家族收为养女，同时也将她的名字改为尤利娅·奥古斯塔。

不得不重提的是，像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阶层的遗产继承，与将财产赠与公民和士兵不同，这种继承也可以称之为权力的转让。所以，奥古斯都把遗产的三分之一赠与了莉薇娅，表明莉薇娅也因此获得了三分之一的皇帝的权力。奥古斯都并不是把爱情置于首位的人，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多么老谋深算的人。

如前所述，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此外，他更是皇后莉薇娅英年早逝的次子杜路苏斯的长子，也有传闻称杜路苏斯是奥

古斯都的私生子。给予莉薇娅三分之一的权力，事实上是早就预定由莉薇娅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来继承的。至于留给莉薇娅的长子提比略的部分，只要三分之二就能解决。同时，让莉薇娅做尤里乌斯家族的养女，是为了防止赠与莉薇娅的权力流出尤里乌斯家族。

大概有很多人会认为奥古斯都太过眷念于将权力留在尤里乌斯家族之内，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奥古斯都这样行事的目的，其实最终还是想维持罗马帝国政局的稳定。因为罗马政局一旦失控，内战就会爆发。至于被视为过渡继承人的提比略心里打的什么算盘，那可不是奥古斯都顾得的事情了。

遗嘱的后半部分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提到过。然而在详细记载赠与居住在首都附近的公民和官兵的遗产金额之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给帝国今后的继承人留下了遗言。

“超越现有帝国疆域的任何扩张，全部不可行。”

这是继任者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对作为奥古斯都继承人的提比略而言，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皇帝都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早已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无须再作纠缠；然而遗嘱的问题在于奥古斯都语焉不详的是，他没有直言所谓的“现有帝国疆域”到底是指莱茵河，还是易北河。此外，奥古斯都还在留给罗马帝国全体居民的《功业录》（亦称《奥古斯都功德碑》）中这样写道：“我国舰队通过‘俄刻阿诺斯’（今北海），从莱茵河口东征辛布里人。以前不管是海路还是陆路，从未有罗马人经过这里，而此地的日耳曼民族派出使节，希望与我及罗马帝国国民建立友好关系。”

这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要称霸，但是在9年前，提比略曾经率领军队攻至易北河岸边，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辛布里人世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进攻到此地的提比略，如今已是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这样想来，易北河应在帝国的版图之内。那么，聆听奥古斯都“遗言”的所有议

员，恐怕都认为帝国的北边就以易北河为界了。

在弥留前的几天，奥古斯都火速召回提比略，在没有第三人的情况下，他们商谈了很久。至于他俩到底谈论了什么，这也是信守承诺的提比略至死都未曾透露分毫的一个千古之谜。或许奥古斯都说应该把军队撤回莱茵河吧。对于从战场撤退这件遗留在罗马史上名声扫地的事件，奥古斯都直到临终前仍然保持缄默，这也成为困扰提比略的一大难题。

在宣读完遗嘱之后，就要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如何举行了。决定很快就出来了，用国葬之礼来安葬奥古斯都。翌日清晨葬礼就开始了。由于国葬是尚未等元老院通过就决定的，所以一应物事早早就准备好了。更何况在夏末之际，遗体也必须立即冰镇妥善保存。罗马人的葬礼并非将遗体安置在棺木中，而是放在床榻上，以便大家跟亡者告别，感念亡者的功劳。之后人们把遗体运往火葬场。身为奥古斯都养子兼继承人的提比略，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恺撒神殿前宣读悼词。在奥古斯都陵的火葬结束后，骨灰安置在庙宇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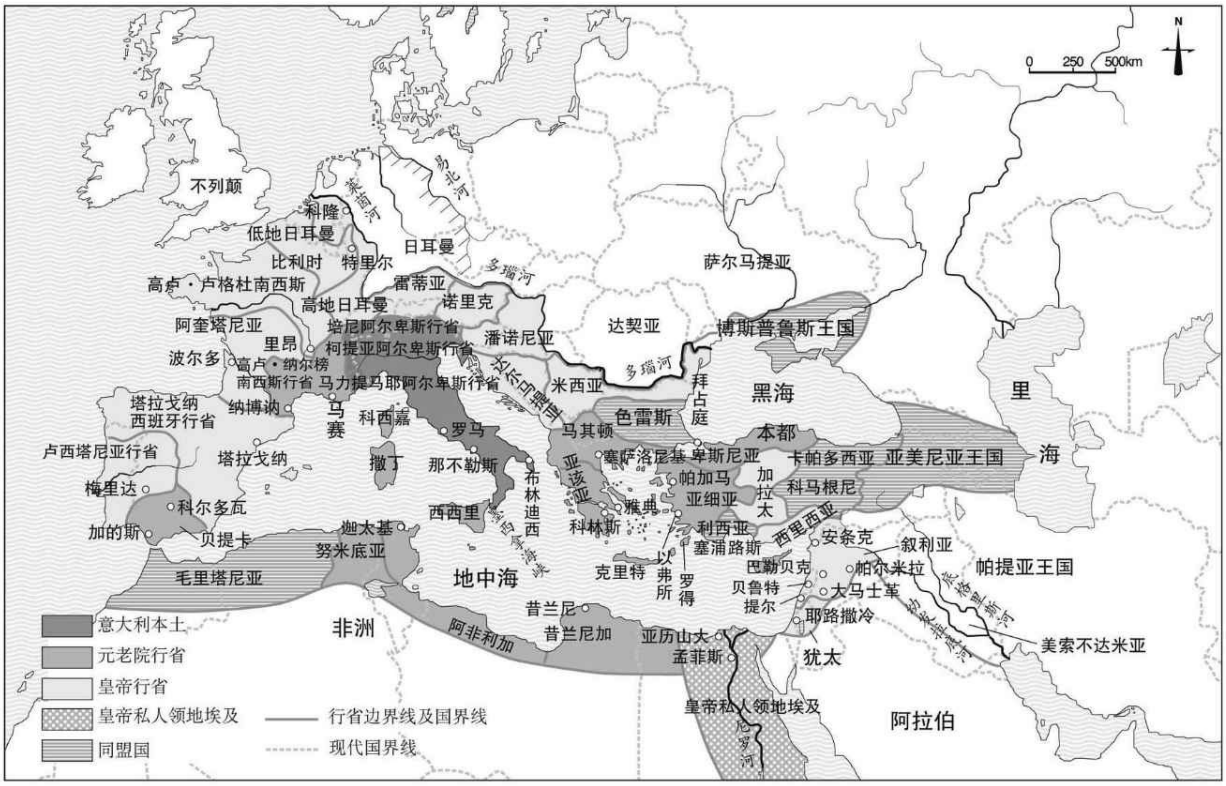
元老院商议后，决定将驾鹤西归的奥古斯都封为神，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神君奥古斯都”。

权力的转移似乎进行得一帆风顺，提比略本人却要求元老院议员们慎重考虑继位一事。

其实，这种做法提比略心中自然有他的算计。他深知自己将接任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是依照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来进行的，然而也有内容非常模糊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个奥古斯都的“遗产”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提比略希望在元老院有了明确的决断之后，再开始他的统治。

可是，要正式继承罗马帝国的皇位，只有先皇的指定还不够，还必须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以及全体罗马公民的认可。元老院用投票来决定，而公民则用欢呼声的大小来决定。虽说这两种表达方式有许多差

异，但如果缺少了他们的认可，新任皇帝是不可登基的。这种方式有别于中国等其他帝国的皇帝继位制度，也是掌控罗马帝国统治权的一大特色。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14年）

罗马帝国的掌权者，终究还是属于“SPQR”（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意思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一类范畴。因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认可”，就表示“委托”这个人代为治理。当时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与我们今天举行的“选举”类似呢？如若是选举的话，就应该在这种制度中明确任期的期限，然而在没有明确任期的前提下，就将统治权委托给某人——罗马帝国实际上仍是共和制外衣包裹下的君主制。这也是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布置出的局面，因此不得不保留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彻底击败安东尼，在罗马世界中唯我独尊，然而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宣布要恢复共和制。在他亲笔所写的《功业录》中正式表明了这一态度：“从那时起，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如果对这番宣言深信不疑，那罗马帝

国就不再是元首制，而是共和制。与为了元首制还是共和制而争论不已的罗马不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和元首制的定义一致，并且元首的权威与权力，恰好如奥古斯都宣称的那样。

威尼斯共和国国会选出的元首，实行终身制，也不存在世袭，但元首对内对外都代表着“威尼斯的颜面”。威尼斯元首拥有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只相当于当今国会中200票中的1票，或者等同于当今内阁中的“十人委员会”的17票中的1票。此外，国会和元老院的议员实行的都是世袭制，而元首却是一任。若不遵循这个规则，威尼斯就不能被称之为元首制了。因为威尼斯领土面积狭小，加之人口十分稀少，才使得这种体制能够延续下来。

另一方面，古罗马对于元首的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又该作何解释呢？

与威尼斯类似，罗马元首也是“罗马的颜面”，通常会在钱币上铸上元首的头像与名字。此外，罗马元首还是罗马宗教界的尊长——大祭司，这也从某种意义上确认了他的权威。只是在权力方面，罗马与坚持共和制的威尼斯则完全不同。

第一，拥有罗马帝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身份。

第二，拱卫全国和首都罗马的近卫军，是其直属军团。

第三，在被分成“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的领土中，拥有“皇帝行省”并对其完全负责。

第四，通过其任命的“皇帝财务官”掌控全国征税权，包括由元老院派遣的直辖行省总督治理下的“元老院行省”。

第五，拥有“护民官特权”，并有权召开公民大会。根据保障公民权利的《霍滕修斯法》（Quintus Hortensius），法案即使被元老院否决，但只要还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一样可以定案，成为可施行的政策。用

今天的观点来解释，即使是国会反对，国民依然拥有公投表决的权利。

此外，“护民官特权”还附带着否决权。关于否决权的用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有无否决权的异同，就应当明白这项权力的厉害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原为拉丁文的“VETO”的这种权力依旧被世人使用。

第六，罗马帝国的元首有权发布临时措施令，也有人将之译为敕令。要统治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很多事情必须立即采取对策。但是要将这种临时性措施法令化，也就是让它变成可长久实施的政策、法律必须通过元老院的决议。这也是罗马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

第七，元首拥有几乎所有行政官的任命权，对于部分高级行政官，虽然没有任命权，但还掌握着推荐权。

第八，奥古斯都把原本属于罗马公民的控诉权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换言之，他本人还兼任了最高法院院长一职。

独揽各项大权的元首都是世袭。

这些条款都是对罗马帝国元首的真实写照。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断言：“奥古斯都开创的既不是王政，也不是独裁，而是以元首为名的国家体制。”我不明白他是不了解实情才这么说，还是明知内情却刻意挖苦呢？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奥古斯都强调的“第一公民”含义的话，它只是“罗马公民的第一人”而已，还算不上正式的称谓。而且，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全部碑文中可以看到，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这是对罗马皇帝的别称。“第一公民”这种称谓，不过是独揽大权并开创了“一人统治政体”的奥古斯都的一个障眼法罢了。然而，这个把戏背后会滋生许多隐

患，毕竟人类往往只考虑眼前的情况。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提到罗马人的明快、逻辑严谨和法治精神，还数恺撒采用的终身独裁官制度是较为快捷高效的政体。独裁官在罗马帝国内的位置等同于危机处理系统，独裁官下面的元老院及所有下设机构的任务，就是执行敕令。这样一个组织分工合理，结构明确。恺撒虽然采用终身制，但没有采用世袭制，而是由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指定继承人，之后此人再指定下一任继承人，如此延续。当然，这种做法与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继承制度相同。不过，即使是五贤帝时代，在大约150年前也曾经遭受过激烈的反对。此外，终身独裁官这一称谓还是显得太过直白。正因为毫不掩饰心中的意图，恺撒才遭人暗杀身亡。

在今天奥古斯都的研究者中，批评他的大有人在，说罗马帝国后来的灾祸，就是起因于他留下的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我同意他的继承体制不分明，但不至于去批评他。因为在我看来，幸亏奥古斯都留下了这个模糊不清的继承体制，罗马最终才会形成完整的元首制体制。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明白“第一公民”的权力基础并不明晰，至少得靠血缘来维系这种传承，才对继承者的血缘关系有所要求吗？然而，这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带来的弊端，使得提比略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尤其是提比略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遭受的损失更严重。距奥古斯都逝世都快要过去一个月了，但提比略对继承皇位一事仍旧小心谨慎，我觉得他此时的心情绝不会是塔西佗说的“渴望至极却故作犹疑”的心态。

在奥古斯都葬礼之后数日内召开了会议，公元14年9月17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标志着提比略开始正式统治罗马。会议刚开始，当年担任执政官的两名议员就以共同提议的方式提出如下提案：

一、按照惯例，在奥古斯都逝世后，应授予提比略“元老院第一人”的称号。

二、前一年提比略已获得“全罗马军队最高指挥权”，今后应当继续

享有这项权力。

三、10年前授予提比略的“护民官特权”仍旧有效，并且是无限期的终身权力。

四、与在世时的奥古斯都一样，将保卫罗马所需的一切权力尽归于提比略。

虽然史料没有把议案通过的细节详实地记录下来，但最后这项提案估计还是被通过了。因为在这之后，全国上下纷纷掀起了向提比略宣誓效忠的浪潮。首先是两位执政官向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是元老院的议员们宣誓效忠，再后就是被召见的仅次于元老院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的宣誓效忠，之后是公民阶层宣誓效忠。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两位执政官的提案中，并非是询问众人是否赞同提比略成为新皇，而是要求议员认可如上列举的第一项权威，以及后面的三项权力。罗马元首制的特点就此表露无遗。罗马皇帝的权力从来就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在大家认可之后，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皇帝。

在获得具有委托意味的“承认”之后，提比略应众人的要求起立演讲，但是演讲内容十分出人意料。

首先，提比略讲到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要妥善处理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单凭他一个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唯有奥古斯都，才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如此重责大任。所以，一旦决策失误就会使罗马帝国陷入危机，提比略在奥古斯都晚年实际上参与治理后对此深有感触。随后，他转向元老院的议员们继续演讲道：

“然而，罗马不乏可担重任之贤士。既然如此，我以为，大权尽归一人并非上策，广纳能人贤士，帝国的长治久安还会困难吗？”

历史学家塔西佗素来不喜欢提比略，他认为，提比略不希望别人觉

得他志满意得，这番演说不过是遮掩之词，绝非肺腑之言。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提比略的生父支持共和制，他曾为恺撒效力，参加过高卢战役。这样的交情，纵使他没有对恺撒刀剑相向，却仍被认为是“3月15日”暗杀的同伙。所以，在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就将此人列入惩罚的名单内，使得他不得不带着当时年幼的提比略到处流亡。在以肩负罗马共和的使命而引以为豪的名门贵族之中，克劳狄乌斯家族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齐名。流淌着克劳狄乌斯家族血液的提比略，此时便向原本与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求助。毕竟在历史上，就连以武力取胜的恺撒，也曾为了建设新罗马，请求战败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出手相助。但是，大多数元老院议员听了提比略的话之后，都极力想躲开这件麻烦事，他们恳请提比略赶快接受“第一公民”的称号。而剩下的少数人，脸上浮着与塔西佗相同的冷笑。

提比略终于开口道：

“我深知，一己之力难当此重任，如诸位执意相托某事，我从之。”

阿吉尼斯·葛斯立即接话道：

“恺撒（提比略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他也就变成恺撒家族的成员），说相托则从之，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阿吉尼斯·葛斯是提比略唯一爱过的女人维普萨尼娅（Vipsania）的现任丈夫。由于提比略被迫与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结婚，导致了他与维普萨尼娅夫妻两人劳燕分飞。然而，与尤利娅的不幸婚姻破裂之后，提比略也不曾想过再与其他女子结合。提比略虽然具有转移窘境的机智，但在回答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放弃公务。然而，事与愿违。勉强取舍，实在与吾道相左。”

葛斯再度发言，此时他的脸上恐怕还浮现着刚才的冷笑。

“非求取舍之道。我想听到的，乃国唯一，一人可治一言也。”

接着，葛斯又假惺惺地歌颂奥古斯都的功勋，称赞提比略长久以来在战场上和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

可是，提比略还是没有答应接受这个称号。终于，一位叫庞蒂斯的议员站起来说道：

“恺撒，想让国家群龙无首的状态拖到什么时候呢？”

元老院的焦急心态在所难免。毕竟距奥古斯都驾崩都快过去一个月了，驻扎在莱茵河畔的帝国军团也传来边境有变的信息。

提比略终于点头应承了下来。即使他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年龄、经验、功劳和能力上都是可以接任皇位的第二任“第一公民”，也意味着新皇帝终于确立了。此时，提比略还差2个月满55岁。

元老院会场中的这番针锋相对，我认为并非如塔西佗推测的那样虚伪与反虚伪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小插曲，它如实呈现了元首制下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提比略请求元老院赞同，这正是奥古斯都巧妙创造出来的由皇帝统治、元老院协助的管理模式。葛斯当然有理由反对。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奥古斯都对众人直言的部分，罗马仍旧是共和体制，元首只不过是全体公民中的“第一公民”。然而事实上，指定“第一公民”的却是上任“第一公民”，而元老院只有同意的份儿。其实，在葛斯看来，也许是提比略的举动让人觉得可笑吧。因为对于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提比略视而不见，反而摆出一副“第一公民”姿态与元老院平等地对话，还请求元老院协助。

其实葛斯是在借题发挥，毕竟他与提比略都了解奥古斯都架构的“第一公民”政治体制内所隐藏的矛盾。

虽然这样说，当时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设计这种违背常理的制度——掩盖在共和制下的君主专政，并且成功维持其运作40年之久呢？

研究者认为，奥古斯都拥有相当敏锐的政治直觉。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帝王与元老院的对立关系中保持平衡，并实现双赢。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权力斗争中，奥古斯都从来都是依靠武力才大获全胜的。不管他本人多么温和谦逊，作为实实在在的失败者，元老院在他面前也不得不采取慎言的做法。提比略获得的权力是前人靠实力获得之后“拱手相让”，也不符合奥古斯都明确表示的血缘继承模式。换言之，他这个继承人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提比略情愿从字面上理解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从而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帮助。

有人提议授予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国母”称号，提比略说：“授予女子头衔应谨慎行事，对我也一样。”从而拒绝了这项提议。实际上，他也拒绝了元老院打算授予他的“国父”封号。

此外，他还下令禁止在公共场所设置他的塑像，禁止称呼他为“主人”的人再次使用这种称谓。下面是公告的内容：

> “提比略”乃家仆之“主人”、士兵之“将军”、公民之“第一公民”而已。

无论如何称呼提比略，他都早已是事实上的皇帝，跟随在侧的人从未断绝。一次元老院会议上，有议员提议仿照“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9月”也改为“提比略”。但提比略仅仅说了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驳回了这项提议。他说道：

“‘第一公民’超过10人时，那又该怎么办呢？”

下属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会让听到的人心里面极为不快，因为听这话的人感到其他人会认为自己是个浅薄的人，几句无聊的奉承话就说得自己心花怒放。不过，世上的确也不乏溜须拍马之人，能让上位者逗趣取乐，很多人乐此不疲。顺带一提，在提比略之后，这种阿谀奉承不曾间断，也有皇帝欣然接受，虽然更改了月份名称，但是历经2000多年之后，流传至今仍被使用的称呼不过只有7月和8月的代称而已。

奥古斯都被神化了，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升格成了“神之子”。在罗马帝国“颜面”最为重要的宣传媒介——硬币上，提比略的侧脸旁边就刻着“神之子”的文字。然而，在公文中，提比略将“提比略的神圣职责”改为“提比略的辛苦任务”，又把“遵从提比略的命令”改为“接受提比略的建议”。继位后的提比略，正式的名字自然是“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可是这个名字只有在给东方各同盟国的正式公文中才使用。如果面对罗马公民，则使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因为“奥古斯都”这个名字，给人一种“神圣”的距离感。创造了共和外衣下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奥古斯都，肯定是明白“奥古斯都”这个词的含义，才以此为名的吧。

提比略在元老院会议中说道：

“元老院诸君，以前我已经一再申明，今后也将肯认。身负无限大权之‘第一公民’的治理，是否做到了不昧己、不草率，应以是否忠于元老院及公民来衡量。此心昭于天下，我就无悔了。为什么呢？对于‘第一公民’之重任，诸君中必有人愿体谅之，此乃吾之主（意译则是所有者），我深以为然。”

即将登基的提比略所提到的“第一公民”，并非只有权威、而权力却与领导阶层相等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奥古斯都创设的“第一公民”身兼权威与权力，提比略也把这些统统继承了过来。但是为了巩固统治，他

不得不极力保持“权力”，同时尽量削减自己的“权威”。他理解的“第一公民”不能翻译成“元首”，更不能说成是“皇帝”。虽然我们还不太习惯这种称呼，但也只能说他是“第一公民”，至少在他统治的前10年，他一直努力想成为他设想的皇帝。

罗马帝国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即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已达500万人；仅靠召集住在首都的几万人来进行选举，公民大会早已名存实亡；更何况，元老院议员们又得为因此耗费的巨额经费大做文章。所以，就任“第一公民”后，提比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执政官以下国家要职的选举，由公民大会转移到元老院。他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减轻议员们的这项负担，重振元老院这一国家领导阶层，让他们襄助帝国治理。

提比略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元老院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元老院同意了。奥古斯都在驾崩前一年将这项权力分与提比略，提比略却在继位那一年就做了这件事，这表明他身为“第一公民”，也没有独揽各项权力。

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能够在各种矛盾中稳若泰山。刚说不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可一旦危机降临，又马上改口大声说“第一公民”应当身先士卒前往第一线，指挥大家摆脱困境。提比略继位时发生的“危机”，是指驻扎在潘诺尼亚负责多瑙河防线的3个军团以及负责莱茵河防御的8个军团的叛乱。虽然称之为叛乱，但那其实不过是士兵要求改善待遇而发生的罢战。然而参加罢战的人都拿着武器，如果稍有失误，便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过，对于要求“第一公民”身先士卒的呼声，提比略却置之不理。一年前，日耳曼尼库斯就成为莱茵河沿岸8个驻守军团的总司令。提比略甚至把“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日耳曼尼库斯分享，奥古斯都的遗嘱还预定了他就是继提比略之后的皇帝。提比略把对这次危机的处理，全权交给这位跟他共享权威与权力的28岁的年轻人。

要回应潘诺尼亚3个驻守军团的要求，还得从首都罗马派人前往。由于军中缺乏能够真正掌握3个军团且兼备权威与权力的总司令，提比略原本预定前往并完善多瑙河防线，结果因为奥古斯都驾崩而搁置。这次，提比略派自己26岁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前往此地。近卫军团军团长之一的塞亚努斯也率领两个大队、共2000名近卫军团的士兵随行。等待杜路苏斯一行的是潘诺尼亚3个军团1.8万名士兵。提比略决定坐镇罗马，静观这两个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军团哗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诺尼亚军团发生了反对提比略的军团哗变，竟是因为军团长普拉耶斯对下辖士兵的体恤。在这位军团长得知奥古斯都驾崩，以及提比略将继承皇位这一信息之后，就以凭吊先皇、恭贺新皇为由，给所属军团的士兵们休假。而士兵们也暂时摆脱了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以及严酷的军事训练，共有3个军团的士兵们聚集在夏季营地中晃来晃去，三五成群地扎堆聊天，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

人一旦有了空闲，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这些士兵也不例外。他们逐渐开始担心奥古斯都死后自己的命运，毕竟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帝国40年之久。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自己效忠的对象换成了新的主人。罗马军团的士兵大都是志愿入伍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对今后可能会失业的不安与恐惧。

然而，在这份不安与恐惧没有消退之际，他们又想起了平时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与严酷的军事训练的辛苦。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才激起这些念头。巧合的是，最会煽风点火的士兵，也正好就在这座军营。这个名叫贝肯尼斯的家伙，曾是罗马剧场中调动气氛的能手，现在却是军团的一名士兵。这名口若悬河的士兵对大家煽风点火道：

为什么我们要像奴隶似的，必须听命于人数不多的百人队队长，甚至比百人队队长还少的大队长呢？若不趁此时新皇根基未稳，或恳求或威胁上面的官员，去改善我们的待遇，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想想，我们忍耐长达三四十年的兵役，忍受衰老，忍受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痕，为了什么？不就盼着有朝一日可以拿到工资退役回家！可是退役也不过是个幌子，到后来还不是假借援助国家之名，仍旧要我们做相同的工作？就算苟活下来熬到退役，那些人又巧立名目，说是殖民开发，二话不说就把我们送到沼泽或不毛之地，最后我们还不是一无所得？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啊！

兵役本身就是付出多、收益少的累活，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等于是以每天10阿斯的价格为他们卖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些钱要花在衣服、武器、帐篷上，拜百人队队长所赐，连装病不去干活都得花钱！最后手里剩下的钱还有多少？这还不算完，不守军规还要被鞭打，跟敌人战斗有死有伤，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战场残酷，营地贫困，这些何时到头啊？要我们忍受这一切，不是不行，得有条件。

条件就是：每天1第纳尔，服役16年。此外，绝不在同一军旗下、同一营地上工作。还有，退役金必须以现金支付。

近卫军一天领2第纳尔，16年之后就能回归故里。我并不是对他们有意见，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确实钱多事少待遇好，但是现在给我们的待遇，只够我们在荒野之地待在帐篷看着敌人罢了。

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往往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这番说辞自然不能全信。罗马军队的军服、武器、帐篷和粮食等由国家提供，说这些要自掏腰包当然不足为信。然而，个人的衣物肯定得自己掏腰包，对百人队队长的孝敬当然也没有包括在上述薪水之中。

每天10阿斯的薪水，那么年薪就是225第纳尔，这些都是事实。只

不过，罗马帝国的近卫军一天却领不了2第纳尔，只有1.875第纳尔。此外，服役三四十年还不能退役实在夸张。不过，退役金因为财源不足，逾期不发倒是很有可能。

这段蛊惑言论中最真实的部分，就是与其他防线相比，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的环境更艰苦、更劳累，付出的辛劳更多。和南方的西班牙、北非，或是生活水平较高的叙利亚和埃及相比，可以说这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处于蛮荒之地，面对的敌人也最凶悍勇猛。如果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士兵们将获得如下表所示的薪酬：

	近卫军团兵	军团兵（现状）	军团兵（要求）
日薪	1.875第纳尔（30阿斯）	0.625第纳尔（10阿斯）	1第纳尔（16阿斯）
年薪	675第纳尔	225第纳尔	360第纳尔
退役金	5000第纳尔	3000第纳尔	3000第纳尔须现金支付
服役年数	16	20	16
服役地点	本土	行省	行省

说明：第纳尔——银币，阿斯——铜币。

虽然贝肯尼斯只是区区普通一兵，但他满腹牢骚的演讲完全俘获了士兵们的心。士兵们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充斥在整个潘诺尼亚军团驻扎的营区。不知是否是为了平息士兵的激动情绪，军团长普拉耶斯决定派身为大队长之一的亲生儿子回罗马，向皇帝转述士兵们的请求。这样，士兵们总算平静下来了，虽然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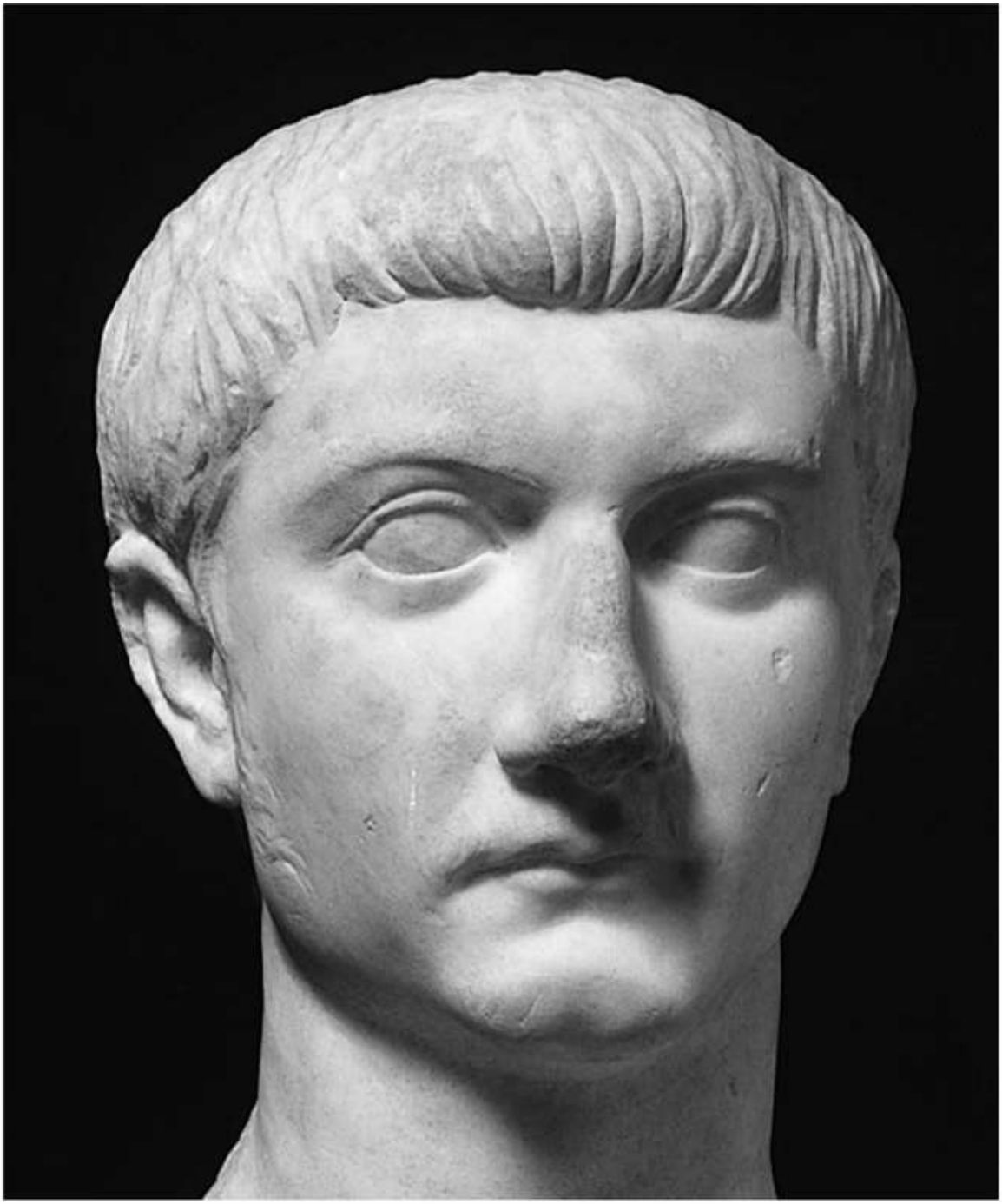
但是，被派到营地附近的纳乌波尔图斯参与桥梁和街道建设的小分队士兵们，得知本队营区发生骚乱的信息之后，竟然开始在当地掳掠起来。纳乌波尔图斯被罗马赋予“地方自治体”的地位，并认可其自治。这种地方，怎能允许如此暴行？百人队队长们前往劝阻，士兵们就将矛头对准百人队队长和工程的监军。

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分为两种，分别是有权参加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以及没有这项权力的下级百人队队长。下级百人队队长管理80名士兵，对比现代军队体制，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中士，是中队长级别的指挥官。在军团中，士兵们一旦暴动，往往是下层的百人队队长最先遭殃。

在痛打百人队队长之后，士兵们哗变的气氛更加高涨。他们返回自己军队驻扎的营地，使一度恢复平静的营区再度骚乱起来。这一次遭殃的还是百人队队长。哗变者们首先向眼前的长官发泄怒气，触犯军规的士兵想到肯定会遭到严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骚动更是变本加厉。整个大营陷入混乱之中，牢房被毁，关押的犯人趁乱逃了出去。这些犯人也加入骚乱之中，暴动愈发严重，甚至有百人队队长惨遭杀害。提比略闻讯后立即决定派儿子杜路苏斯前往处置骚乱。

杜路苏斯在2000名近卫军和皇帝护卫队——日耳曼骑兵中队的保护下抵达潘诺尼亚军营。等候他们一行的情况十分糟糕，与其说是来到罗马军团的营地，倒不如说身陷敌营。似乎是为了表示对新皇儿子的尊敬，哗变士兵们纷纷出营，跑到路上来迎接。然而，与往常迎接长官的礼仪不同，这支哗变部队没按军团、大队、中队的顺序列队，也没有挂上军团旗或队旗，士兵衣冠不整，态度骄横，丝毫没有向长官问候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不如称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这位26岁的皇子依然面不改色地从哗变士兵中间穿过，直接走到营区中央。这些士兵好像早已就事先串通好了，就在杜路苏斯踏入营地的瞬间，哗变士兵们迅速堵上了营区的各个出入口，让杜路苏斯一行进退

两难。其余的士兵则全数包围营区中央讲台，冲着台上的杜路苏斯大声叫嚣，满口威胁恐吓。



杜路苏斯

杜路苏斯抬手示意士兵安静，随即宣读提比略的旨意：

> 屯于潘诺尼亚之3个军团，是我一手打造，随我征战多年（公元前12—前9年，公元6—9年，共计6年）。我在此与各位约定，在先皇逝世的悲哀稍微消减、政务如常的时候，我一定把各位的请求转告元老院。
>
> 我现在派自己的儿子前来，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逾权之请，须呈元老院。诸位之请求是否被采纳，取决于元老院商议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下，望各位慎重从事。

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完提比略的这番敕令之后，断言这只是提比略争取时间的惯用手腕。从塔西佗的观点不难看出，他认为提比略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自己居然无法定夺是否接受士兵们的请求，还得跟元老院商议，根本就是很荒谬的事情。莫非每次面对强敌开战与否也要同元老院协商不成？

提比略的确也是在争取时间。姑且不论士兵们所提要求的对错，而提比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是否接受这个要求不仅涉及驻扎在潘诺尼亚的这1.8万名士兵，更影响到罗马全军15万士兵。届时，这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会演变成影响帝国稳定的政治问题。我相信提比略的真实答案应该是“拒绝”。

即使服役期满却不能退役这件事确实有必要改善，但其他要求不能来者不拒，否则就将打破奥古斯都打造的体制。奥古斯都这么做，也是在综合考虑了罗马帝国的人口以及经济条件之后，协调各方面利益才得到的结果。提比略在55岁之前，几乎都在奥古斯都身边，他对此知之甚深。此外，奥古斯都还把士兵年薪从恺撒定的140第纳尔提高到225第纳尔。如果每次皇权交替就增加士兵薪酬，国家财政肯定会入不敷出。进而言之，提比略统治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基础上健全国家财政体制。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安抚这手执武器、剑拔弩张的1.8万名士兵。毕竟像恺撒那样，面对此情此景只凭一番话就能稳定军心的人物，在古罗马是十分罕见的。提比略除了尽量争取时间，实在是别无他法。

即使这样，提比略还是把自己的儿子派到这里。听完敕令后，士兵们态度依然强硬，叫嚣着要改善待遇，并包围了杜路苏斯，随行人员中甚至有人被石头砸伤。此时，杜路苏斯就连提比略所说的“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都没做到。所以士兵们的要求不变，对于“日薪1第纳尔、16年后退役”的条件毫不松口。杜路苏斯无疑是受制于人。营地里四处弥漫着骚动，总让人有种太阳西下后会出事的不祥预感，虽然众人各自回帐，却没人放心安眠。

这夜，万籁俱寂，夜空干净得没有丝毫杂质，月华满地，让人深深迷醉。如此良辰美景愈发凸显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不安。然而，这一晚正好月食，只见原本点亮秋夜的满月，渐渐出现了缺口。士兵们对天象一无所知，认为这是凶兆，纷纷从帐篷中冲出来对着缺月祈祷，希望高挂夜空的月亮恢复如初。

杜路苏斯从帐篷中出来，也看到了月食。只不过，他和大多数随从都明白个中原因。接着，杜路苏斯马上想到这是个机会，利用得当这次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落幕。于是，他命令随从秘密召集在士兵中有声望的百人队队长。

不管士兵如何祈祷，月食仍然在继续着。看到月亮缺口越来越大，士兵们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也随之蔓延；当月亮完全消失、夜空一片漆黑的时候，他们的恐惧达到顶点。燃烧在营地各处的火把，跳跃的火光照耀在伏地悲鸣、瑟瑟发抖的士兵身上。

接到命令的百人队队长悄悄靠近这些士兵。他们分别来到自己中队的士兵身旁，对陷入绝望而恐惧发抖的士兵们说：

“你们究竟打算把皇子软禁到何时？你们考虑过后果吗？跟随叛乱的主谋是不错，但你们觉得那些家伙会如愿以偿给你们加薪吗？退役后谁能给你们土地，那些家伙有能力治理国家吗？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中队最后才加入叛乱，趁早脱身不就没事了吗？”

哗变的士兵们听到这番话开始动摇了。先是老兵与新兵分开，接着各中队开始列队，之后是大队，最后一个军团集合起来。这样一来，士兵们恢复成重视秩序的罗马人，轻视不守秩序、不知礼仪的野蛮人，自尊心又回到了他们身上。也有士兵主动捡回被弃置一旁的军团旗与大队旗，把它插在营帐前面。就在这时候，月亮开始慢慢变圆。这次，面对光芒渐盛的月亮，士兵们祈求月亮宽恕自己所犯的罪行。

翌日清晨，杜路苏斯召集士兵。杜路苏斯只有26岁，他的演讲仍然缺乏足够的感召力，然而，由于良好出身带来的优雅气质以及得体的语言，加之他在台上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屈从于恐吓和胁迫的态度。接着他又用言辞诱惑道：“只要你们发誓重新恢复成遵守秩序的罗马军团，并且愿意将此事委托与我，我会写信上呈父皇，恳请父皇施以宽容之心，重新考虑大家的请求。”这些士兵中虽然仍然存在抵触的声音，但不久就被绝大多数赞同的声音所压制。杜路苏斯选了3个人作为信使，他们分别是：潘诺尼亚军团的军团长普拉耶斯的儿子、一名自己的随从和一名首席百人队队长。百人队队长若能成为首席，就是可参与司令部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这个人选表面上是哗变士兵的代表，然而个中意味值得深究。此时心中满是悔意的士兵们根本没人留意到这一细节。

信使离开之后，营区重归平静，似乎这些士兵都在对提比略的答复翘首以盼。只有杜路苏斯不以为然，也许当他离开罗马的时候，早就得知提比略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

杜路苏斯下令，传唤造反主谋贝肯尼斯及其另一个同伙。两人一进帐篷就被立即处死，为了避免其他士兵们看到，尸体被埋在距离营区很

远的森林中的一处偏僻地方。

除掉两名主谋之后，偏激分子很快也被杜路苏斯逐一清洗。这个清洗名单好像早就拟定好了，交由近卫军和潘诺尼亚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们负责执行，清洗运动执行得十分彻底。

对此，士兵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且，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又要继续住在这个只是为了夏季扎营而搭建的帐篷营区中，士兵们的心情更加抑郁。阴雨霏霏，而且还时常会变成倾盆大雨，这时帐篷里就是一片泽国。士兵们不由得心生恐惧，认为这是天神对他们反叛行为的惩罚。对于当时不惜揭竿而起要求改善待遇的要求，早就置之脑后了。

住在帐篷中的不便，杜路苏斯也感同身受，不过他一直在等着，看士兵们何时沉不住气，再采取后续行动。

处在前线的夏季营地只是临时基地，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满足基本的饮水、能防御敌人就行了，所以夏季营地大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与此相比，要从秋末住到来年初春的冬营地，则多设在生活便利的村镇附近，士兵们也不用帐篷扎营，而是住在常备的营房里。此外，冬营地有士兵们亲密的女友等候，这是服役期间的单身罗马士兵无法抗拒的诱惑。

首先，第八军团的士兵最先提出返回冬营地，接着第十五军团的士兵表示赞同。只有第九军团的士兵说要在夏季营地等候回复，但又担心只有自己留守且离敌人很近，万一情况有变，无法应对。这样一折腾，3个军团都想立即回到温暖舒适的冬营地去。

杜路苏斯看着士兵们出发的背影，思考着如若在冬营地，那么仅靠军团长普拉耶斯就能管理好这些士兵了，于是他当即决定返回罗马。然而，士兵们一直盼望新皇帝提比略的“答复”，好像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罗

马。

与此同时，驻扎在潘诺尼亚之北更遥远的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也发生了哗变。不过这个“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从爆发到结束，都与潘诺尼亚军团大相径庭。首先，潘诺尼亚有3个驻守军团，莱茵河沿岸则有8个。单从人数而言，潘诺尼亚仅有1.8万名士兵，莱茵河沿岸达到了4.8万名之多。

日耳曼尼库斯

被称为“日耳曼军团”的军队负责莱茵河防线，沿莱茵河上游、下游分为两个部分：上游因为地势较高，又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下游因地势较低，又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分别配置了4个军团。各军团的军团长直接指挥6000名士兵，高地日耳曼军的4个军团之上还有负责统筹的军团长，低地日耳曼军也有另外一名军团长。公元12年之前，提比略是整个日耳曼军团的总司令，公元13年起则由日耳曼尼库斯接任。总司令全由奥古斯都的亲信担任，是因为他要用这支劲旅拿下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正因如此，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比其他地区多，实力也最为强劲，堪称罗马帝国军队的精锐。

精锐之师也并非一朝一夕打造的，军队需要能征善战，不断积累对敌经验，磨炼意志，做到令行禁止，才能成为精锐之师。公元14年初秋的哗变，就是刚入伍立即被派到日耳曼的新兵引发的。

罗马军团的士兵，首先必须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当时，罗马公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半岛。而那群从南意大利被送到北方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对边境防御一无所知的新兵们，除了要迅速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恶劣气候和地形之外，枯燥乏味的边疆防御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感到厌烦。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待遇。与驻守潘诺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一样，他们

也认为趁皇权更替之际，向新皇帝提比略提出要求改善待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日耳曼军团哗变与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表明了立场，愿意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然后才提出要求改变待遇的精明要求。

其实，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并不是讨厌提比略，只是他们认为由先皇的血亲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才顺理成章。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出，士兵们早有主见，他们认为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知道整个军团鼎力相助，必定会暗自窃喜，到时自己成了皇帝继位的有功之臣，那么他们改善待遇的要求，日耳曼尼库斯一定不会拒绝。

日耳曼尼库斯却出人意料地断然拒绝了，他甚至率先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要求士兵也宣誓效忠。这样一来，士兵们的待遇要求肯定就泡汤了。另一方面，来往于各地的商人是当时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之一，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消息也通过这些商人，传到了莱茵河下游的营地中。

与潘诺尼亚军团的哗变不同，低地日耳曼4个军团的骚乱并非有人蓄意煽动，而是在士兵中间自然发生的。所以，士兵不是一开始就要求改善待遇，而是哗变发生之后才提出来的。百人队队长最先承受士兵的怒气，这是两次哗变的相同之处。对于这次以星火燎原之势瞬间蔓延整个夏季营地的哗变，军团长凯奇纳束手无策。此时，日耳曼尼库斯因征税滞留高卢，闻讯后，他立即放下手边工作，迅速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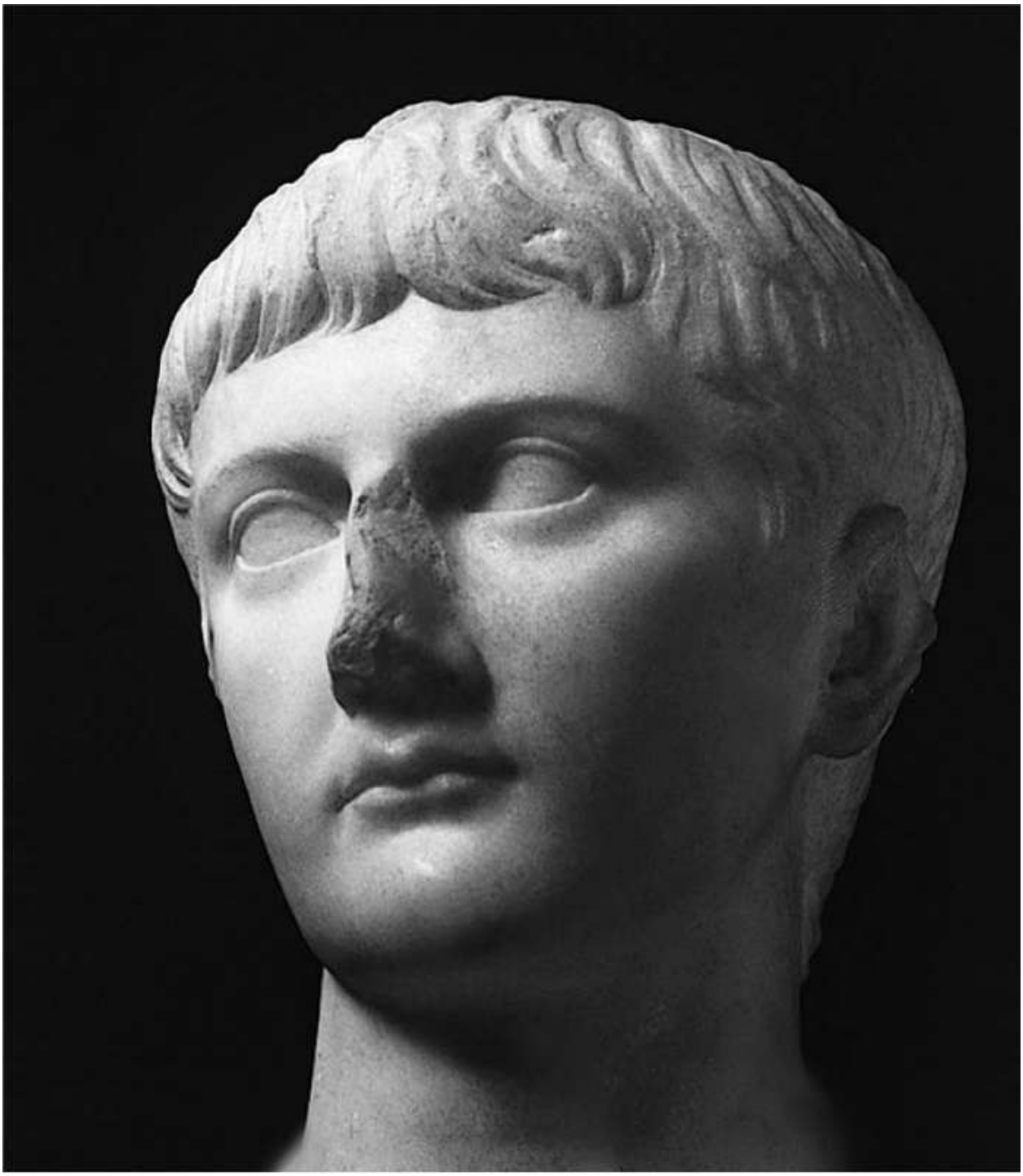
按照惯例，全体士兵应出营迎接总司令，4个军团士兵自然没有失礼。放眼望去，这群士兵似乎悔不当初，尾随日耳曼尼库斯进入营地之后，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队伍立刻解散，士兵满口怨言，骚乱顿起。

站在营区中央的讲台上的日耳曼尼库斯，首先命令士兵们依照中队、大队与军团的序列各自归队站好。士兵们不得不服从命令，然而，他们拖拖拉拉，费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情愿。日耳曼尼库斯很有耐心地等他们归队后，才开始发表演讲。

首先，日耳曼尼库斯对先皇奥古斯都在天之灵深表敬意，接着历数提比略过往的种种战功，并将其归功于在场士兵的出生入死。然后又说道，不但意大利全国支持提比略继承皇位，高卢行省也没有表示异议，帝国内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新皇继位而发生骚乱。大多数士兵都沉默不语。这时，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提到了这次哗变。这位时年28岁的总司令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

“士兵服从的铁律精神消失了吗？罗马人尊重秩序的传统精神消失了吗？谁赶走了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斥问之下，士兵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一边脱去上衣，身上露出的全是战争和鞭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一边开始抗议。为了免除土木工程工事的劳役，他们只好去巴结百人队队长，原本就微薄的薪水更加捉襟见肘。可见架桥铺路是多么辛苦的活儿啊。如果挖战壕、钉栅栏、运军粮、砍伐工程所需的木材、准备柴火等等是不得不做的任务也就罢了，可是谁想到，这些都是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士兵们闲着没事干，胡乱生事，就做完一件差使又想新招来折磨人。士兵们的不满终于发泄出来。老兵们纷纷控诉兵役期限过长，新兵纷纷质问先皇的遗产赠金何时兑现。士兵们不分新老，都纷纷表态将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



日耳曼尼库斯

日耳曼尼库斯听到这话，仿佛听见恶魔的声音一般，迅速从台上跳将下来，背对士兵，快步走向自己的营帐。这时，几个距离较近的士兵拔出刀剑将日耳曼尼库斯团团围住，威胁他回到台上。他高声断喝：

“如果背信弃义，就不如以死相谢！”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话音刚落，他抽出腰际的剑往胸口刺去。幸好身边的人眼疾手快，及时阻止，否则日耳曼尼库斯也许就英年早逝了。可是，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剑反而激起了士兵们的反抗心理，甚至连远处的士兵们也大喊：“要刺就刺进去呀！”更有甚者，他身旁的一个士兵竟然把自己的短剑递给他，还说：“试试，这把更锋利！”然而，第一个倒下的，就是这个对出身高贵的年轻总司令无礼冒犯的士兵。眼看士兵脸上稍微露出怯意，幕僚们将日耳曼尼库斯拉进了帐篷中。

日耳曼尼库斯一行在军团长的大帐中商议对策。他们得到消息，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派人邀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起行动。可以想象，如果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也参加叛乱，首先掳掠的，就是富裕的乌比人的根据地（今德国科隆），然后向西进犯，将会波及高卢。另外，完全可以预测，一旦乱军兵锋转到西方，防线空虚的消息泄露，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必然会乘虚而入。当局面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时，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军团内部解决这起哗变。担当此次重任的日耳曼尼库斯与前往潘诺尼亚军营的杜路苏斯不同，提比略没有向他传达任何旨意。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和侄子兼养子的日耳曼尼库斯，提比略当然是一视同仁，他甚至赋予日耳曼尼库斯仅次于自己的军队大权。提比略重法制，恶逾矩，在他看来，将旨意传给日耳曼尼库斯，会让这个年轻人缩手缩脚，他不会这么做。不过，不要忘了，提比略是“第一公民”。四面楚歌的28岁的总司令，决定以这个名义写一道敕令。这份伪造的敕令中有如下三项表明是皇帝提比略承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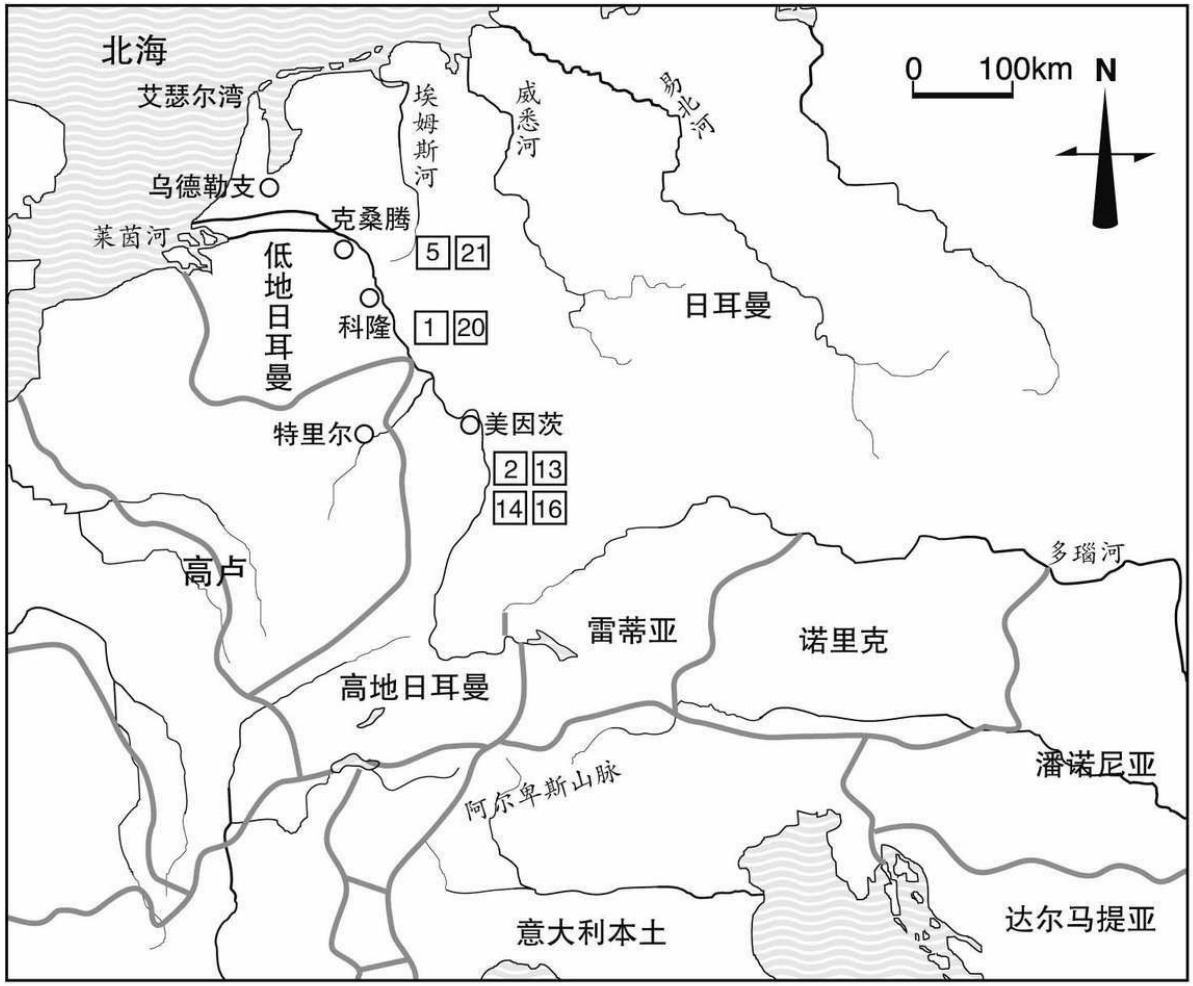
一、服满20年兵役者，可退役。

二、服兵役满16年者转预备役，除非遇敌袭迎战，其余情况可免兵役。

三、先皇之遗赠，加倍赏赐。

然而，这些哗变士兵们以为日耳曼尼库斯有意拖延，转而要求他立即兑现。于是大队长们马上着手办理退役手续，只是关于先皇的遗产赠金，日耳曼尼库斯承诺，返回冬营地佩特拉（今德国克桑腾附近）后兑现。可是，第五、第二十一军团不肯妥协。迫不得已，日耳曼尼库斯和幕僚们只好拿出全部财物，凑齐金额支付给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们。费尽周折，这两个军团终于肯出发前往冬营地。第一、第二十军团也愿意在冬营地接受支付，于是由军团长凯奇纳率领，向科隆进发。只不过这支队伍由满载着从日耳曼尼库斯那里抢来的货车打先锋，而且队伍散乱不堪，军旗倒拽着前行。

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哗变终于解决了，随即火速奔赴高地日耳曼军团的驻地。对于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动向，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直在静观其变，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这个军团必须要妥善处理。莱茵河上游的4个高地日耳曼军团，此时已经在军团长席里斯的指挥下，前往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今德国美因茨，Mainz）的冬营地驻扎下来了。



莱茵军团的配置（城市名称旁方框内的数字表示驻扎在冬营地的军团番号）

日耳曼尼库斯刚抵达摩功提亚库姆的冬营地，就召集士兵，要求他们向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与进驻冬营地后心情舒畅不无关系，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军团等3个军团的士兵们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只有第十四军团的士兵略显迟疑。日耳曼尼库斯察觉到了，他担心这种情绪会波及其他军团，所以即使没有人提出任何要求，他还是主动承诺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享有与低地日耳曼相同的特殊待遇。于是第十四军团也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见士兵们都服从命令，日耳曼尼库斯认为高地日耳曼军团已无后顾之忧，当即策马沿莱茵河北上，前往科隆的冬营地，迎接元老院使节团的到来。

元老院派遣使节团前来，只不过是将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大权一事传令各处军营而已。然而，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不解其中内情，对使节的来意产生了误会。他们猜测使节团前来，就是要把日耳曼尼库斯许诺的特殊待遇取消掉。在科隆的冬营地里，除了第一、第二十军团之外，全是等着办理退役手续返乡的老兵。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的许诺成为泡影，他们比谁都担忧这样的事情，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哗变再一次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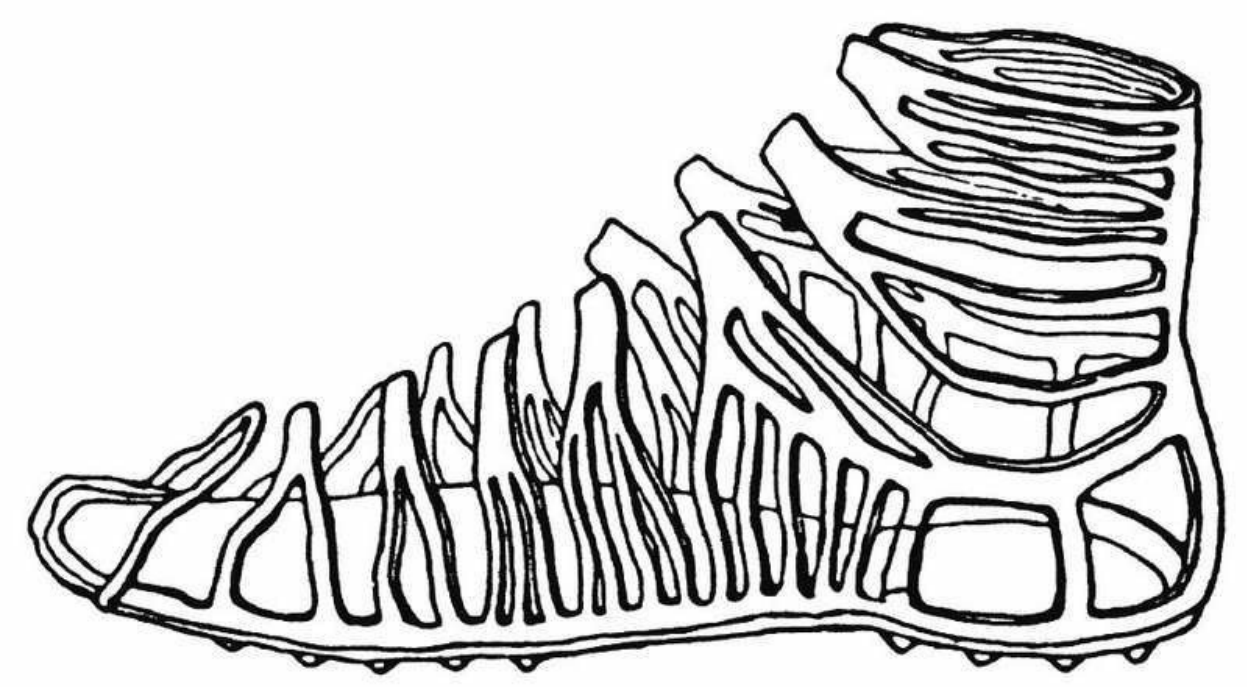
万籁俱寂，夜黑风高，这些哗变士兵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总司令的营房周围。因为是冬季扎营的基地，官兵都不住帐篷。总司令住在独栋的营房，罗马人称之为“维拉”。他们潜入到最里面的日耳曼尼库斯房间，这已经不是士兵所为，而是演变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了。这群哗变士兵当晚就被击退，然而哗变已经波及整个军营。

第二天清晨，日耳曼尼库斯召集所有士兵，再把引发士兵骚乱的使节团团长普兰克斯请上台来，向士兵们说明来意，士兵们暂时平静了下来。

然而，没有人因此而认为情况可以得到控制。有幕僚建议，驻扎美因茨的4个军团已经宣誓对皇帝效忠，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冬营地相对安全，可以考虑转移过去。日耳曼尼库斯责任感比常人强烈，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过考虑到至少可以让家人避开危险，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决定转移。他犹豫是因为妻子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认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有奥古斯都庇护，不惧任何危险，因此她坚决不走。最后，日耳曼尼库斯以她怀有身孕和两岁的儿子为由终于使她点头松口，同意离开。就像敌军来袭仓皇出逃一般，他们开始准备避难。

其他军团长的家人也决定同总司令的妻儿一起转移。不过，目的地不是美因茨的高地日耳曼军团驻地，而是高卢行省。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已经敌我不分的罗马军团士兵，高卢行省的人民要安全得多。

在准备货车和避难用的行李时，女仆们不禁低声哭泣，哭声惊醒了酣睡的士兵。他们纷纷跑出营房，发现怀抱幼儿的阿格里皮娜坐在车上，部分高官们的妻子和少数护卫跟在后面。另外，当这些士兵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将要前往高卢行省，而非寻求自己同胞的庇护时，他们如遭重击一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直言不讳，罗马士兵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卡力加[罗马军队百人队队长（与现代军队中下士相似）以下士兵穿的皮制凉鞋式军靴]

阿格里皮娜怀里的幼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儿子，名叫盖乌斯，也是士兵们的吉祥物。士兵们很疼爱这个娃娃，他们给他穿上特制的幼儿军装，还为他做了名为“卡力加”（caliga）的凉鞋式罗马军靴。士兵们给幼儿盖乌斯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卡利古拉”，后来就变成士兵们对总司令幼子的昵称。如今这个孩子竟然因为自己而无处容身，甚至要让被他们一贯看不起的高卢人来负责她们的安全，这无疑是对自己怀有戒心，要让自己的军人之名蒙羞。士兵们围住正要出发的车驾，恳求阿格里皮娜不要走。另外一群士兵则来到日耳曼尼库斯跟前，恳请他不要

草率行事，以免使罗马军团蒙羞。日耳曼尼库斯见时机到来，就登台训话。这些言辞虽然有些冗长，但我认为如实反映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人的性格，于是把它全文翻译整理了下来：

对我而言，妻儿重要，可重不过父皇与这锦绣河山。父皇以权威管理国家，治理军队，我已无后顾之忧。不瞒大家，上任第一天起，我就准备为了各位的荣耀牺牲妻儿。但是眼下，我不得不让她们离开，因为你们已非昔日令行禁止的良兵。我不愿你们错上加错，对奥古斯都的孙女、提比略的儿媳妇下手。如果你们将继续行暴，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

今天，我眼看着你们不顾法纪，为所欲为。除了“乱军”，我还能怎么称呼各位？对身拜总司令的皇子群起而攻之，还称得上是士兵吗？对元老院使节团的议员们无礼犯上，还是罗马公民吗？罗马人历来敬重使节，尊重人权，这种精神让敌人心悦诚服，而今你们却肆意践踏。

有士兵不听指挥、无视命令，神君恺撒只要说声“各位乡亲们”，这些人就能改邪归正。在士兵面前，神君奥古斯都仅凭英姿气势就能威慑全军。我没有两位先贤的气度和威望，眼下又令各位做出被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战友所不齿之事，今后我恐怕要名声扫地。

第一、第二十军团的士兵们！两年前，父皇率领你们转战日耳曼原野，踏平蛮族，获得无数荣誉和嘉奖。莫非，你们今天要我带着让人痛心的噩耗回首都复命？杀害百人队队长，驱逐大队长，囚禁元老院议员，营地血流成河，士兵敌意森寒，难道你们要我这苟活的总司令向他报告如此惨状吗？

第一天阻止我自裁的朋友，现在想来，是我错看了；相反，递短剑给我的士兵，才是我的盟友。悔不当初，如若我当时故去，就不用因目睹你们的种种暴行而痛心疾首。你们选出来的总司令，如今至少已为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中被日耳曼人杀害）和3个军团报仇雪恨了吧。我明白，罗马人所蒙受的屈辱，必须亲手雪耻。即使

高卢行省的人民有意代劳，神明也不允许我们将如此光荣的事情借他人之手达成。

驾鹤西归的神君奥古斯都啊！在日耳曼英年早逝的父亲杜路苏斯啊！我，日耳曼尼库斯诚心祈求，请你们洗净这群士兵心中的罪恶与污秽吧！也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让罗马人将同室操戈的怒气，转向敌军日耳曼人吧！

现在，你们清醒了，我愿意重新接纳你们。如果你们愿意释放使节团，宣誓效忠皇帝，并将妻儿归还给我，那么，请停止一切暴行并交出主谋，这是最好的表示。唯有如此，我才能相信你们真心悔改，相信你们依旧忠诚。

士兵们悔不当初，觉得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句句在理。话音刚落，就有很多士兵开始叫道：

“让阿格里皮娜回来！”

“卡利古拉是我们看护着长大的，不要把他交给高卢人！”

“我们有罪，请让我们杀敌赎罪！”

日耳曼尼库斯以身怀六甲、冬日严寒为由，拒绝送回阿格里皮娜。至于卡利古拉，他承诺士兵们有重归之日。回营前，日耳曼尼库斯留下一句话：“其他事情，自便。”

哗变士兵们忙着获得宽恕，把带头哗变的主谋们一个个用铁链绑住，带到第一军团长的跟前。对这些主谋的审判是这样进行的：士兵们拔出刀剑，围绕讲台站着。这些主谋被一一押上讲台，由大队长向台下的士兵们询问这人有没有罪，如若有罪呼声很高，这个人会被即刻推下台就地正法。每处决一个人，士兵中就会响起欢呼声，仿佛杀了这些前一刻还是朋友的主谋，他们的罪行就荡然无存了似的。

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对这种处决方式置之不理。站在他的角度考虑的话，虽然罗马人早就没有拿活人做祭品的习惯，但这种行径无疑是野蛮而残酷的。因为这不是他的命令，而是借士兵们的刀除掉哗变者，所以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置之不理。

日耳曼尼库斯没有使用武力，就成功地将士兵们最为痛恨的百人队队长重新洗牌。由于他使用的是较为“民主”的方式，才使得他声名鹊起。

这些百人队队长被挨个儿传唤到总司令跟前，在如实汇报了自己的姓名、所属百人队、出生地、服役年限、有无战功等之后，如果作为上司的大队长或所辖军团的士兵们认同这名百人队队长的勤勉与正直，他就接着当他的百人队队长；如果被认定为贪婪残暴者，则就地免职。

就这样，科隆的冬营地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屯扎在克桑腾营地的第五、第二十一军团的士兵们在得知科隆的“审判”之后，义愤填膺。这些士兵在所在营地掀起了暴动，并且比其他军团都更加强硬和彻底。如若要处罚，我想这些士兵是最应该受到惩罚的。日耳曼尼库斯决定在事情没闹大之前想办法解决，如果有必要，即使同为罗马军人，也会刀剑相向。科隆和克桑腾都是莱茵河沿岸的基地，于是日耳曼尼库斯下令备好渡河的船只。就在出发之前，他先派快马信差带着密函，送往克桑腾营地的凯奇纳军团长处。密函中写道，他将亲自率领军团顺莱茵河而下，要凯奇纳在自己抵达前妥善处置，否则将会把整个克桑腾冬营地夷为平地。

凯奇纳将没有参与暴动的士兵召集在一起，把密函上面的内容转述给了他们。这些士兵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只有赶快行动。

夜幕降临之后，自相残杀的行动拉开了帷幕，战况非常惨烈。毕竟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每天寝食相处的手足士兵。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暗使得他们无法看清楚刀砍下去的对象，致使很多无辜的士兵都莫名其妙地被杀死。

在抵达触目惊心的罗马军营之后，日耳曼尼库斯见到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惨象。但日耳曼尼库斯别无他法，只有叹息道，这根本就不是处置而是虐杀，但此刻他也只能下令，把死者的遗体火化掉。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味，让幸存的士兵内心也开始变得十分凶残。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要让这群血脉贲张的士兵们恢复正常，只有让他们再淋一次来历不同的鲜血。不是内乱却上演了手足自残的惨剧，要想洗雪这个罗马军团中前所未闻的污名，唯有把刀枪对准莱茵河对岸的敌人。虽然10月底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作战的季节，但日耳曼尼库斯依旧匆忙下令在莱茵河上飞速架桥。

此时对舒适地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而言，祸从天降。在他们看来，10月底并不是罗马人发起进攻的月份，出人意料的是，杀红了眼的罗马军队竟突然攻了过来。由于毫无防备，结果当然是罗马军队一举大获全胜，将日耳曼人杀得丢盔弃甲。用日耳曼人的血来祭奠亡灵的罗马士兵，觉得这似乎已经洗刷了自己的污名，于是温顺地跟着百人队队长回到科隆和克桑腾的营地。日耳曼尼库斯终于能向远在罗马的提比略报告了——日耳曼军团的哗变已经被平息了下去。

于是，提比略召集元老院议员开会，向他们报告了杜路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已经解决了潘诺尼亚军团以及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事件。然后，他又说服元老院同意日耳曼尼库斯对士兵们承诺的3项特殊待遇，不仅是驻扎在日耳曼的8个军团受惠，屯扎在潘诺尼亚的3个军团也依照此例办理。在他看来，毕竟总不能一边让步，另一边又不认账。如果总是用同一种手法，说不定哪天潘诺尼亚军团又会闹腾起来。元老院的议员们也感同身受，这项提案终于得到了通过。

在元老院会议上，提比略没有提到日耳曼尼库斯以下犯上用他的名

义伪造敕令、向士兵们让步的事件。一想到提比略那种要强的性格，不难想象出他在会议当天是何种心情。不久，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提比略就提议取消了3项中服役期限缩短为16年以及奥古斯都的遗产赠与金加倍这两项特殊待遇，元老院附和着，使得这项议案差点完全沦为白条。不过，提比略倒是努力执行了20年服役期满退役这一条。因为提比略在军队的经验丰富异常，十分了解士兵们渴望期满退役回家的心情。为了确保财源足以支付士兵的退役金，他也把各方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声音置之脑后。

虽然提比略把平乱的重任交给日耳曼尼库斯与杜路苏斯，但继位不久的提比略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首都罗马，去等待着潘诺尼亚军团和日耳曼军团平乱的消息。不难想象，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加上罗马帝国铁蹄下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太大，最终导致提比略要去解决的问题将会层出不穷。

公共安全

提比略直到55岁才成为“第一公民”，也就是当上有实权的皇帝，但我想刚刚继位的提比略早就会预料到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皇帝。因为提比略从继位之初就好像不管不顾似的，一点也不在乎笼络人心的政策是否重要。

何谓罗马帝国呢？这正是一个由尤里乌斯·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以此为蓝本建成的一个庞大建筑物。如若把这项工程交给一个完全不了解恺撒意图的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个人极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蓝图上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最后变成一栋风格迥异的建筑。为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这项工作必须由能够完全了解设计者意图和建筑者想法的人来主持建造，此外，修建后的建筑物必须非常牢固，今后不管后面的人怎么去改变它，都不会改变它原来固有的基础。而奥古斯都交给

提比略的工作，正是这份枯燥乏味但异常艰辛的工作，我想对于提比略而言，除了早已驾鹤西去的奥古斯都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到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

何谓“和平”呢？当然不是仅仅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就能实现的梦想，而是只有让罗马人民能够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才可谓是真正的“和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隐含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范式”。

提比略在继位后不久大力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不断完善罗马帝国的公共安全。假如公民们才迈出家门一步，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国家的保障的话，可以想见，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社会活动也肯定会销声匿迹，这种状况肯定会使得人心惶惶。于是提比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诸如偷盗、抢劫、伤害、杀人，还有角斗场中的流氓无赖行为，全部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加以明文禁止。此外，由奥古斯都亲手创建的9000人近卫军团士兵，全部被提比略从罗马城中心迁出，屯驻到建于罗马东北部的常驻基地。从近卫军团执勤的地点来看，他们就好似今天国家中的警察一样。罗马帝国并未在意大利半岛部署任何军团，因此，作为被部署于意大利仅有的军事力量，近卫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罗马帝国的日常秩序。

说到底，只有“公正”才是最高的“安全保障”，可是，公正必须依靠正常的司法系统才能得以维系。罗马的审判过程是，告发者陈述理由要两天，辩护方的辩论也要三天；此外，提比略一定会全程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一直到法官完成判决。提比略非常喜欢旁听关于下属行省总督违法乱纪的审判。提比略身材十分高大，身体强健，加上那一套宽大的白色托加，双目炯炯有神，目光犀利，不苟言笑，言辞锋利地审问被告。在这样的场景下，提比略更像监察官而非政治家。他正是一位在那种场合会让人备感威严和压力的最高权力统治者。

紧缩财政

不得不提的是，公正不应仅仅局限于司法范畴，也应纳入作为德政基础的税收制度。提比略对税收制度的理念较为坚持——绝不增加税款。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要遵循先皇奥古斯都定下的规矩，而且，提比略本人也非常肯定不加税的合理性。（有关奥古斯都的税收制度，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国家财政收入有着这样的特色，即便还没有出台新一轮的开支，总额也会不停地攀升。罗马帝国的疆域虽然还是维持原有版图，然而，从奥古斯都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差不多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了。这时候，就有这样的议论出现了：到底是只用维持现在的税收制度就行了，还是应该上调行省公民税收比率？提比略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应该把他们当做是剪取羊毛的羊，而不是宰杀来食肉的羊。”

把收税的对象称之为“羊”其实是一种太过直接的说法，那么这些人心中会怎么嘀咕呢？他们真的会觉得一年被剪一次毛比被宰了吃掉好吗？如果真的晓得会被屠宰掉，他们即使在实力不济的情形下，也会舍命相搏。要是一年只用缴10%的行省税就能避免被宰杀的话，他们就会乖乖地顺从。此外，也应感谢当时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年代，他们也不需要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与邻近部族的战斗中。如若遇到外族入侵、土匪强盗袭击之类防御“狼来了”的危机，现在都由霸主罗马帝国的军队来挑起重任。假如罗马霸权之下的行省人民如果都能这样考虑，对于罗马统治者而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不用增强军事实力，但仍能够建立巩固的“安全保障”。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思考、提比略所赞同的“合理性”。

然而，就算是不管不顾，每年的财政支出仍会只增不减，必须想办法解决国家财政面临的困境。为了贯彻收支运行的合理性，其中包括兑

现20年服役期的承诺，提比略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税体系。

其实，奥古斯都实行的并非宽松的财税政策。作为帝国的奠基者，奥古斯都不得不考虑赢取民心的政策。话虽这样说，奥古斯都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心的向背问题。奥古斯都设立的罗马帝国皇位，必须同时取得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认可才能继位。此外，一旦二者收回认可，就将直接影响到坐在皇位上的人。

考虑到“认可”或是“选举”，并不是由“有投票权的人”依据人气的高低来决定支持与否的，还是有不少人是通过对才华、力量、功劳等进行评估之后，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拉丁语称之为“virtus”。即便有例外的情形，但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还是必须找到契合点。

埃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安葬法老的陵寝金字塔；希腊的代表性建筑物，是供奉着庇护生灵的众神的神殿；然而，提到罗马的代表性建筑物，答案却是让罗马公民生活舒适的街道、下水道、桥梁、议事堂、港口和浴场等基础设施。为什么罗马会如此重视公共事业？他们的公共事业如此兴盛，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传统精神中找出答案——从事这种公共事业工程，是上层精英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这两点在罗马帝国是共生共荣的。

奥古斯都在位的40年内，完成了原本用来对付对手安东尼的公共事业，这些建设的数量相当可观。在安东尼战败之后，这些公共事业随即转化为巩固奥古斯都帝王统治的重要基石。虽然当时的奥古斯都靠战友阿格里帕与梅塞纳斯两人协助完成了这些事业，然而，他还是有资格自夸：“留给我的是一个满是砖瓦的罗马，我身后的却是一个大理石的罗马。”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大量地列举了他的政绩，从中不难看出，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收买民心的。

那么，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又该怎么做呢？从结果来看的

话，不到紧要关头，提比略是纹丝不动的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财税制度的重建。最终，提比略还是认为大规模的建设不宜过多，原因在于奥古斯都完成的工程可谓不胜枚举，仅仅维护这些建筑没有庞大的资金根本就不可能。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比略才推动了两项公共建设，当然，最有影响力的当数首都罗马。第一个工程是奥古斯都神殿。提比略认为有必要盖座神殿来供奉成为神君的先皇奥古斯都。第二个工程是全面修缮庞培剧场。庞培剧场是罗马仅有的两座用石头建筑的永久剧场之一，由于经常被使用，加之年久失修，对其进行修缮十分必要。

虽然提比略在首都及意大利本土对公共工程并不热衷，但他在行省大兴土木，特别是在位于多瑙河帝国防线前沿的潘诺尼亚，兴建的工事颇多，甚至在北非还发现不少关于提比略事迹的碑文。显而易见，提比略重视实用性的个性忠实地被这些建筑反映了出来，对于光鲜亮丽的新剧场他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修建街道、桥梁等基础设施。

此外，罗马人还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认为领导阶层还有为公民提供玩乐的义务。在2000年后的今天说到古罗马，一定会让人联想到“面包与马戏”。拉丁文一词中“马戏”是“色克斯”（circus）。提到“面包”的话，那个时候的小麦都是不要钱免费配给的。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还没认识到累进课税制度的帝国，最终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使得富人会想到把财富分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保障社会的稳定。盛行于古希腊的是各种戏剧，而充斥于古罗马玩乐场所的却是击剑等各种竞技角斗。

奥古斯都与其养父恺撒相似，在玩乐方面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仅在《功业录》中记载的项目就有：

> 角斗比赛8次，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竞技者的体育比赛3次，战车比赛7次，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角斗每年1次，非洲野兽狩猎表演

26次，模拟海战1次。

只不过这些比赛的总数，都是40年间的总和。

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除了将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赛这种与宗教祭典合并的表演之外，对于此外其他的所有活动，都不再扮演资助者的角色。当然，这不意味他会立法禁止这些活动，而是意味着皇帝不再用钱来资助这些活动了。特别是在举行角斗比赛之际，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也可以理解为提比略不爱好这种比赛罢了。然而，恺撒与奥古斯都不能被理解为爱好角斗比赛。对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非常讨厌这种血腥的死亡游戏，一般老百姓对此却十分狂热。所以恺撒与奥古斯都才会去迎合这些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

事实上，角斗场内的确有不少人是靠它生存下来的。由于失去了皇帝的赞助，也引发了角斗士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场面。这种每天都与死亡打着交道的工作，使得这些角斗士们赚得到很多的金钱，此外还有来自妇女们的欢呼声，甚至还发生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跟角斗士私奔的故事。当然，角斗对于罗马人而言，只是比拳击赛稍微残酷一点的运动罢了。

执政官以下各种重要职位的选举办法都被提比略进行了改动，结果是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中举行。对此，元老院的议员们十分高兴，然而，这也等同于宣告普通公民丧失了免费去看热闹的门票。

假如重要职位仅仅依靠议员们互相推荐才能选出的话，那么参选的元老院议员们就没必要进行选举。在普通罗马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的时代，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赞助竞技团，免费请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去观看角斗比赛，这就成为他们动员家中助选员们从事拉票工作的主要手段，甚至发生了贿选买选票的事件。他们之所以千方百计想要当上这种除了固定经费之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的职务，是因为这种职务表明了自

己属于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罗马帝国领导层。

当选举被提升至元老院，元老院的候选人为此可以少花很多钱去参选，这些候选人当然笑得合不拢嘴。对于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而言，除了丧失免费看戏的机会之外，最令人期待的一年一度选举时的额外收入也化为乌有。此外，随着提比略时代的到来，普通公民原来享受的另外一笔赏金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罗马皇帝的这一职位，是由元老院议员加上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决定的，奥古斯都深谙这一点，毕竟他才是打造这一系统的创始人。所以，奥古斯都不会对在经济上给这两者优惠政策置之脑后不顾。

元老院议员一职只是名分，即使担任行省总督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公职。要想担任元老院议员这一职务，奥古斯都规定要有100万塞斯特斯才有资格任职。不过，万一哪位议员的财产不足100万的话，那么作为皇帝，将会从财政上予以救济。只不过这项帮扶政策也是由皇帝提出来，最后由元老院通过才算数。不难看出，这项政策是通过雄厚的国家财政实施的以元老院议员为对象的扶贫政策。

此外，在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老百姓中，属于中上阶层的骑士阶级，皇帝会起用他们来担任负责征收税款的皇帝财务官等行政职务，才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实力，当然这些官员的薪酬颇丰。

提及位处中下阶层的罗马公民，皇帝经常向这些阶层发放名为赏金的红包，这部分钱不需要经过元老院议员们的同意，因为这钱来自皇帝自己的荷包。对此，《功业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 公元前29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
> 同年——居住在罗马帝国领土其他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0塞斯特斯，共有12万人受惠。

公元前24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

公元前23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分12次免费发放给贫困的居民。

公元前12年——每人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公元前5年——首都罗马的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32万人受惠。

公元前2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发给有资格免费领取小麦的贫困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20余万人受惠。

那么，提比略会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他并未拒绝资助财产不足百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议员，但要求需要资助的议员在元老院会场中承认自己出现了财政赤字。但没有议员愿意这样丢人现眼，所以使得提出申请的议员人数直线下降。大概在提比略的思维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帮扶那些因为自己铺张浪费而导致财务窘迫的议员。

提到如何对待骑士阶级，提比略的做法与奥古斯都毫无二致。提比略不仅仅把对他们的帮助局限在经济领域，他甚至大胆任命一些骑士阶级担任军团长。可以说，提比略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善用身处罗马社会第二等级的这些人。

提到公民政策议题，提比略全面废除了以皇帝赏赐为名的补助政策。由格拉古兄弟中胞弟——盖乌斯·格拉古所创立的《小麦法》却延续了下来，这部法律从立法以来已经延续了150年之久，能够保障贫民无偿领取小麦。当初恺撒发放的人数达到了15万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增加到20余万人，而到了提比略统治时期，人数甚至日益攀升。因为这项《小麦法》是对罗马人称之为“无产者”的贫困阶层的一项社会福利政

策，为历代皇帝所赞扬。

如若一直维持奥古斯都时代的开支规模，那么随着拥有公民权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总有一天会破产，因而增加税收的政策趋势将不可避免。当时，假如提高征收行省税的话，被统治的当地人就会起来反抗，而要镇压这些反抗就得出动军团。此前，罗马军团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军队还行，如若还要用来对付内乱的话，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增强军事实力又会加重帝国的经济负担，最终又循环到了加税的恶果。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迫在眉睫。在奥古斯都去世后随即发生的军团哗变，可以理解为财政将要破产的先兆。如若找不到可以用来支付退役金的新财源，那么服役期届满的士兵也会无法退役，原本承诺20年的服役期限将会延长至30甚至40年。假如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会打击士兵的士气，罗马帝国的防御体制也会陷入危机之中。

当然，重建完备的财政制度是提比略面临的重要课题，如果要在不增税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只有紧缩财政开支。但是，提比略自己也清楚，这项政令必然会招致各方的不满。

提比略完善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即使是对于经济概念一无所知的我，也不难想象其中的艰难。如果强力推行的话，罗马帝国是否会跌入经济萧条的危机之中呢？截至奥古斯都统治时代，这一时期的公共事业或竞技活动应该促进了经济活动，皇帝的赏金也应该刺激了消费。提比略对于奥古斯都制定的这些政策，要么全面废除，要么铁腕压制。

然而，一冷静思考，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首先，新的工程建设虽然日益减少，但是罗马帝国需要不断维修的建筑、下水管道以及街区的数量仍然十分惊人。身处罗马的工程师有这样一句名言：“石头是朋友，水是敌人。”哪怕是小小的坑坑洼洼，只要

风吹过就会留下沙土与种子，被雨水浇灌之后，就会生根发芽、杂草丛生。而这些在风中摇曳飞舞的杂草将会成为建筑物极大的威胁，使得它们很有可能倒塌。所以无论是街道还是建筑物，表面必须保持光滑，绝不能让沙土以及水分残留下来。而只有不断对这些建筑物进行监管和维修，才能保护它们。所以，就算新的建设工程日益减少，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而人力与技术基础仍然十分坚实。

作为最大的赞助者，皇帝已经停止继续资助竞技活动，对于从事这些竞技的人，比如抗议的角斗士们，或许在经济上会有所影响。这种不满源于被剥夺了免费看热闹而产生的抱怨情绪。当然，在古时候，这些就业方式是会很少得到任何保障的。

奥古斯都统治的40多年中，用赏赐命名的奖励也仅仅发放了7次。这种平均每6年发放1次的补助，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

因此，公元1世纪上半叶，提比略统治下的辽阔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建成的经济圈已经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促使罗马帝国国库的积蓄也在不断增加。但“皇帝行省”，除了原本文明程度很高的叙利亚之外，其他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行省的税率为当年收益的10%，当然也不能期望这些行省缴纳更多的税收。除掉南法行省与南西班牙行省之外，整个高卢地区与希斯帕尼亚两个区域的经济实力都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安全形势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道路网等基础建设已经日益完善。

只要有了安全感，人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如果考虑“迁徙”与“定居”两者的能量消耗和财富累积的差距，定居的好处是不容忽视的。在提比略继位前的50年，恺撒通过战争已经使得高卢人进入安全的范围之内，避免了日耳曼民族的铁蹄践踏。有史料显示，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们从狩猎民族过渡为农耕民族。此外，基础建设的普及也促进了农畜产品的互市贸易。

在这样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紧缩财政也并不需要在所有领域削减开支。只需把单纯的浪费，以及并非必要的开支略作调整就行了，这肯定不会导致经济萧条。人类素来习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来判断一件事情。实体经济并非陷入了困境，但是让人感觉到出现了经济萧条，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提比略比奥古斯都更加“吝啬”。

撤离日耳曼

提比略继承皇位之后的工作：第一，确立皇帝的统治地位，并巩固帝国政权；第二，不断完善国家的财政制度；第三，一系列帝国战略上的问题，即帝国北方的防线是继续维持在莱茵河呢，还是应继续推进到易北河？

在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答案，从提比略时代到百年后塔西佗时代的罗马人，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就是莱茵河。然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就曾经尝试过征服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但在何时，谁拿主意放弃的，没有人能够回答得上来，因为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对此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派往日耳曼的军队就暗示了他们的意图，但最终又退回了意大利本土。这是发生在罗马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他们两位当事人都对此缄默不语，不知道是否是奥古斯都至死都不能放弃征服日耳曼民族，这个撤退的烂摊子才交给提比略去处置的呢？

被现代学者认为“野心太大”的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之旅，于公元前12年正式拉开序幕。当时他让妻子莉薇娅的养子之一——杜路苏斯率军前往。杜路苏斯大胆运用战略，于公元前11年、前10年在日耳曼原野上不停地征战，并于公元前9年抵达了易北河。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统帅在回国途中，从马上摔下来丧失了性命。公元前8—前7年的日耳曼战线总指挥则由他的亲哥哥提比略担任。然而，由于奥古斯都失去了战

机，导致罗马军队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而提比略也于公元前6年隐居罗得岛。直到公元4年，提比略才重返战场，使得日耳曼战线恢复了生机。公元5年，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团再度挥师至易北河。奥古斯都在遥远的罗马，应该是一直在梦想着完全征服日耳曼人指日可待吧。

在公元7年，与莱茵河并称为罗马帝国两大防线的多瑙河南线，居住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原住民发生了反抗罗马帝国的大规模暴动，当时有能力平叛的将领仅有提比略一人。在提比略离开日耳曼战线之后，就把罗马军团在日耳曼的军权授予了瓦鲁斯，一位奥古斯都远房亲戚的女婿。然而，公元9年秋天，瓦鲁斯和3个军团在条顿堡森林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对于希望称霸日耳曼的奥古斯都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奥古斯都最终挺了过来。提比略第三次就任了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由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队不停地在日耳曼平原征战，时间从公元10年到12年，战火延续了3年的时间。

公元13年，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召回首都罗马，这或许是奥古斯都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想把统治罗马帝国的皇权交付给提比略。但在我看来，对罗马帝国即将完成的日耳曼霸业，奥古斯都想在日耳曼尼库斯手上实现。同年，日耳曼尼库斯取代提比略成为日耳曼军团前线的总指挥，日耳曼尼库斯就是20年前在日耳曼逝世的杜路苏斯的大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别称，原本这个称谓是留给杜路苏斯的。然而在罗马，父亲的称号成为儿子的名字一事并不鲜见。此外，由于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自然得到了奥古斯都的疼爱，这也成为奥古斯都把征服日耳曼的事业交由日耳曼尼库斯完成的原因吧。

公元前12年伊始，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的军事行动虽然停滞了不少时间，但前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还是白白地浪费掉了，难道奥古斯都没有考虑过与其一事无成，还不如把军队撤回到莱茵河吗？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在于如果前面是一条将要撤退的战线，而日耳曼尼库斯又是将会接任提比略皇位的重要人物，奥古斯都怎么会把他摆在那里呢？如若因为这件名声扫地的事件而使得罗马历史上第三任皇帝的仕途遭受挫折，那么岂不是极不明智的吗？

在此，不得不重申的是，罗马皇帝是由元老院议员以及罗马公民的选举认可才能继位的，作为继任皇帝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罗马人所认同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最高尚的“品德”和公民们公认的“力量”，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奥古斯都将日耳曼军团的军队指挥权托付给日耳曼尼库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奥古斯都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完成征服日耳曼的事业，最终使得罗马帝国称霸日耳曼地区。我们知道最终提比略还是下令把日耳曼军团撤回到莱茵河。即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支持，但上文的假设也依然会成立，这不是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撤军的决定还是由提比略作出的吗？

对于罗马史上第一次名声扫地的事件，提比略应该是小心翼翼地算准了时机才撤军的，虽然这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意愿。只不过提比略并没有等来撤军的机会，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哗变让撤军时机稍纵即逝。

罗马军团下属的不服管教，总司令负有非常大的责任。为了平息哗变而出台的伪造敕令，却仍然没有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没有人比日耳曼尼库斯更感痛苦的了。随着秋意渐浓，日耳曼尼库斯知道自己的责任来了，他命令罗马士兵们从冬营地出击，去进攻正在准备平安过冬的日耳曼人部落，然后好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回营。而且，早在日耳曼尼库斯两年前出任日耳曼战线的总司令以来，就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美称名不符实。虽然刚迎来29岁，但这位年轻气盛的总司令决定，明年初春，军队必须要完成称霸日耳曼的使命。罗马有着前线总指挥官负责一切战略部署的传

统，假设最高司令官提比略不干涉的话，那么身居罗马帝国军权第二位的日耳曼尼库斯，其行动就更加无所羁绊。

公元15年初春，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大军越过莱茵河。其中，美因茨营地的4个军团2.4万名士兵，加上行省平民补充的1万名士兵。下游的克桑腾冬营地则是由凯奇纳率领4个军团2万名士兵与新兵5000人，也一同跨过了莱茵河。他们从南边和西边夹击的作战策略，成功地分裂了由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因歼灭瓦鲁斯3个军团而意气风发的日耳曼民族统一战线。罗马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到阿尔米纽斯岳父的耳里，使得他不得不选择归顺。日耳曼尼库斯在承诺归顺后的礼遇之后，答应将他迁往莱茵河西岸。而阿尔米纽斯的妻子也跟随她的父亲归顺了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她身怀六甲，最后就在罗马军营中生下了一个男孩。罗马人以保障他们的安逸生活为借口，将这个男孩送到了意大利生活。作为日耳曼民族自由与独立旗手的阿尔米纽斯，他的胞弟、身为部族长老的岳父、妻子和儿子悉数被罗马军队一齐掠去。

当年发生的日耳曼战役，罗马军队大概是因为与凯奇纳的军队会合才形成将近6万大军，使得己方始终保持了较大的优势。此外，被阿尔米纽斯歼灭罗马3个军团时夺走的其中一面军团旗——第十九军团的银鹫旗，也被罗马军队成功夺了回来。在罗马军队进攻途中，他们经过了埋葬着6年前死难者遗体的条顿堡森林。历史学家塔西佗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内容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此不再赘言。

罗马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声势浩大。然而，随着寒冬的逼近，在他们准备返回莱茵河畔冬营地时，日耳曼人的游击战突然间打乱了罗马军队的计划。凯奇纳军团兵分两路后导致兵力分散，加上腹背受敌，好不容易才狼狈地撤回到克桑腾的营地。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军队，在归营的途中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回营过程中损失的士兵人数比战争折损的还要多得多。

元老院批准了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下属3位军团长在首都举办的凯旋仪式。我想这大概是元老院接受提比略的建议而举行的。除了为4位将军举行凯旋仪式，元老院还提议因日耳曼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授予提比略“国父”的称号，但是对于这个称号提比略断然拒绝。如果提比略真接受了“国父”称号的话，就不能从日耳曼撤军了。然而，仅仅用凯旋仪式来为这些将领们庆祝，那么“胜利后撤”的说法也能够被人接受了。

不知是否是元老院的决议使日耳曼尼库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翌年，即公元16年，他攻入了日耳曼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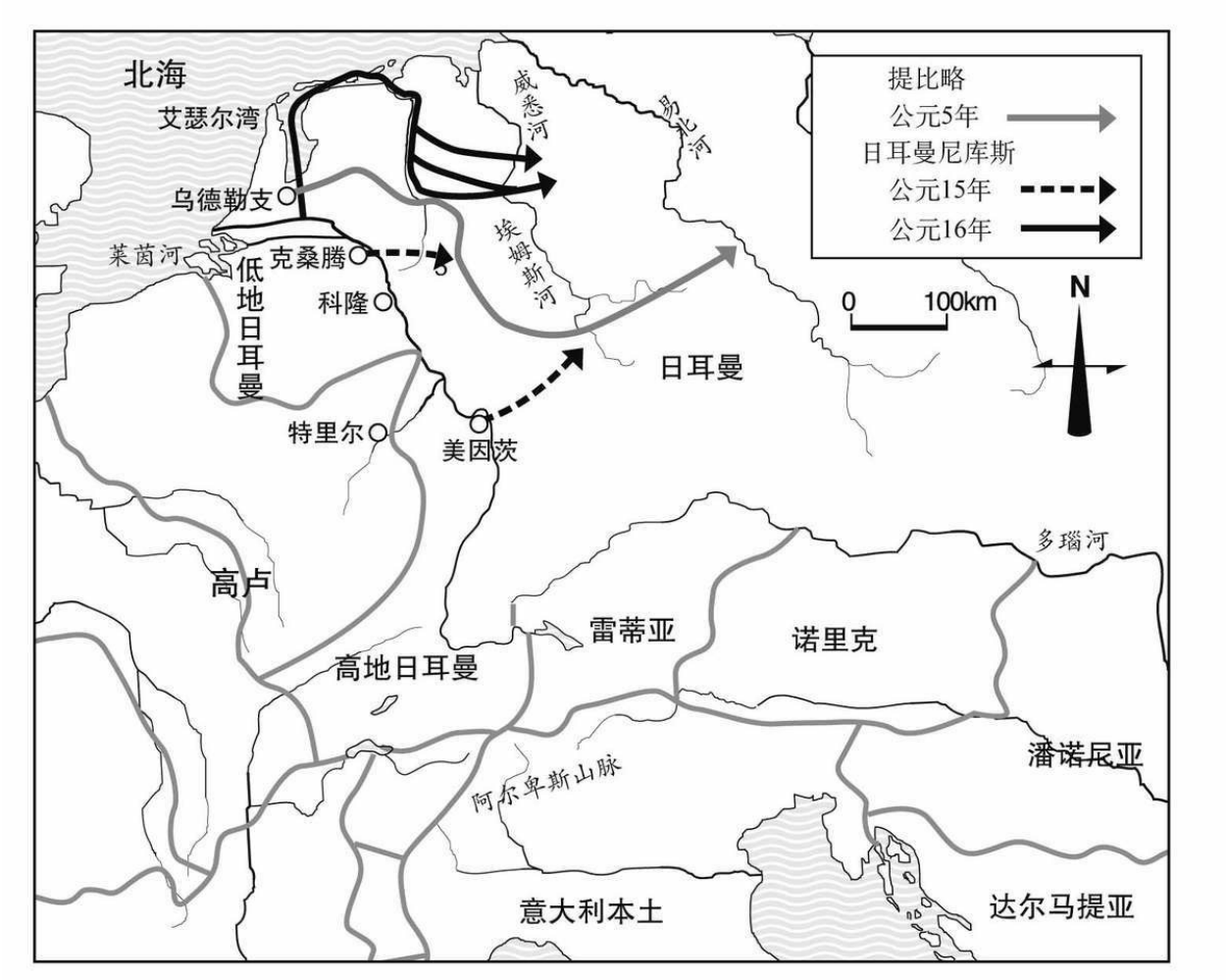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刚刚补充完新兵的8个军团共8万大军，沿着莱茵河顺利直下，穿过北海，并逆着埃姆斯河北上，直捣日耳曼的心腹。阿尔米纽斯也首次以会战的方式迎战罗马军队，然而，在战术方面还是罗马人比日耳曼人更胜一筹，罗马军队在前面两次战争中都是以全胜收场。日耳曼尼库斯用掳获的敌军武器，在战役发生的地点铸造了胜利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荡平莱茵河与易北河间的日耳曼人的我皇提比略之大军军威浩荡，在此将胜利献于最崇高之神祇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神君奥古斯都。”同年，他又从敌人手中成功夺回了瓦鲁斯将军遇害时被夺走的三面军团旗中的第二面军旗。

这一年的回师南下也不太平。虽然没有受到日耳曼人游击战的阻击，加之战斗中的损耗也没有多少，波涛汹涌的北海却让罗马军队尝尽了苦头。此外，日耳曼的地形和气候也给罗马军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日耳曼尼库斯经过艰苦跋涉才率军撤回到莱茵河畔的冬营地，但是，他又在考虑明年春天的战事该如何安排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提比略邀请日耳曼尼库斯回首都举行凯旋仪式的信被送到了前线。日耳曼尼库斯立即提笔回信，恳请提比略能够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他就能够完成称霸易北河的大业。但是，提比略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翌年，公元17年5月26日，首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罗马

人庆祝征服日耳曼民族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凯奇纳及其他3位将军身穿凯旋礼服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其中还有拉着象征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即载有阿尔米纽斯妻儿的车驾。接下来，凯旋仪式的高潮到来了，驾着4匹白马拉的战车，31岁的年轻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登场了。在这辆战车上还坐着他的3个儿子与2个女儿。他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也在凯旋仪式之列。在公开场合，日耳曼尼库斯与2000年后的欧美领导人相似，经常有妻子陪伴在他的左右。而罗马人也与2000年后的现代人一样，不惜对这位年少有为、家室和睦的总司令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凯旋仪式结束后不久，提比略就公布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下一处任职地，当然不是日耳曼前线，而是距离日耳曼路途遥远的东方。理由十分简单，皇帝的继任者必须出马亲自去东方完成重要的任务。



提比略与日耳曼尼库斯的进军路线

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写道："禁止日耳曼尼库斯从战争中脱身。"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功受到了提比略的妒忌。

我们暂且像塔西佗所认为的那样，承认是提比略出于妒忌更改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任职地点。其实，提比略如果有意继续日耳曼战争，他还得重新任命总司令。适合接任日耳曼尼库斯，而且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选其实也不乏其人。这个人就是提比略的亲生儿子，亦即日耳曼尼库斯的义弟——29岁的杜路苏斯，他的战功在于平息了潘诺尼亚士兵的哗变。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提比略并没有指派任何人（包括杜路苏斯）

接任日耳曼尼库斯的位置。更进一步，提比略竟然废除了低地日耳曼军团、高地日耳曼军团共计8个军团的总司令职务。这些措施也说明了提比略不想再继续日耳曼战争了。

然而，阿尔米纽斯仍然毫发无损，此外，令罗马人颜面尽失的三面军团旗也只夺回两面。但罗马人好歹在战场上再次证明了罗马军队的实力超群。虽然阿尔米纽斯苟延残喘了下来，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纠合整个日耳曼统一战线了，而分崩离析的日耳曼民族也没有实力再去对抗罗马军队。从整体局势来看，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似乎是胜利的，提比略也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与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误解他如出一辙，其他人对他作出的命令仍然抱有很大的成见。

莱茵河防御体制

把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至易北河，将野蛮而彪悍的日耳曼民族纳入帝国版图，以此来保障北部的安全，奥古斯都在28年之后才完成这一梦想。然而，坚决贯彻这一战略的提比略，并不是只简单地将士兵从日耳曼地区撤回。虽然从公元17年开始莱茵河再次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这却分散了军团营地。

截至战略调整前，罗马军队一直把建立在莱茵河西岸的冬营地作为一个基地。通常，每年一到春季气候转暖，罗马军队就越过莱茵河向东发起进攻，入秋后又撤回西岸，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冬营地过冬，就这样延续了28年。然而，战略调整后莱茵河自身就成为一条天然防线，冬营地也就再也不是过冬后春天出击的基地了，这里也变成一个除了防备敌军来袭外，他们常年居住的定所。现在的这一状况也使得他们不能把4个军团或2个军团的士兵汇集一处。如果兵力太过集中，反而会使得营区之外的防卫出现空隙。此外，如果将大量的士兵汇集在同一个地方，就会有出现3年前那样哗变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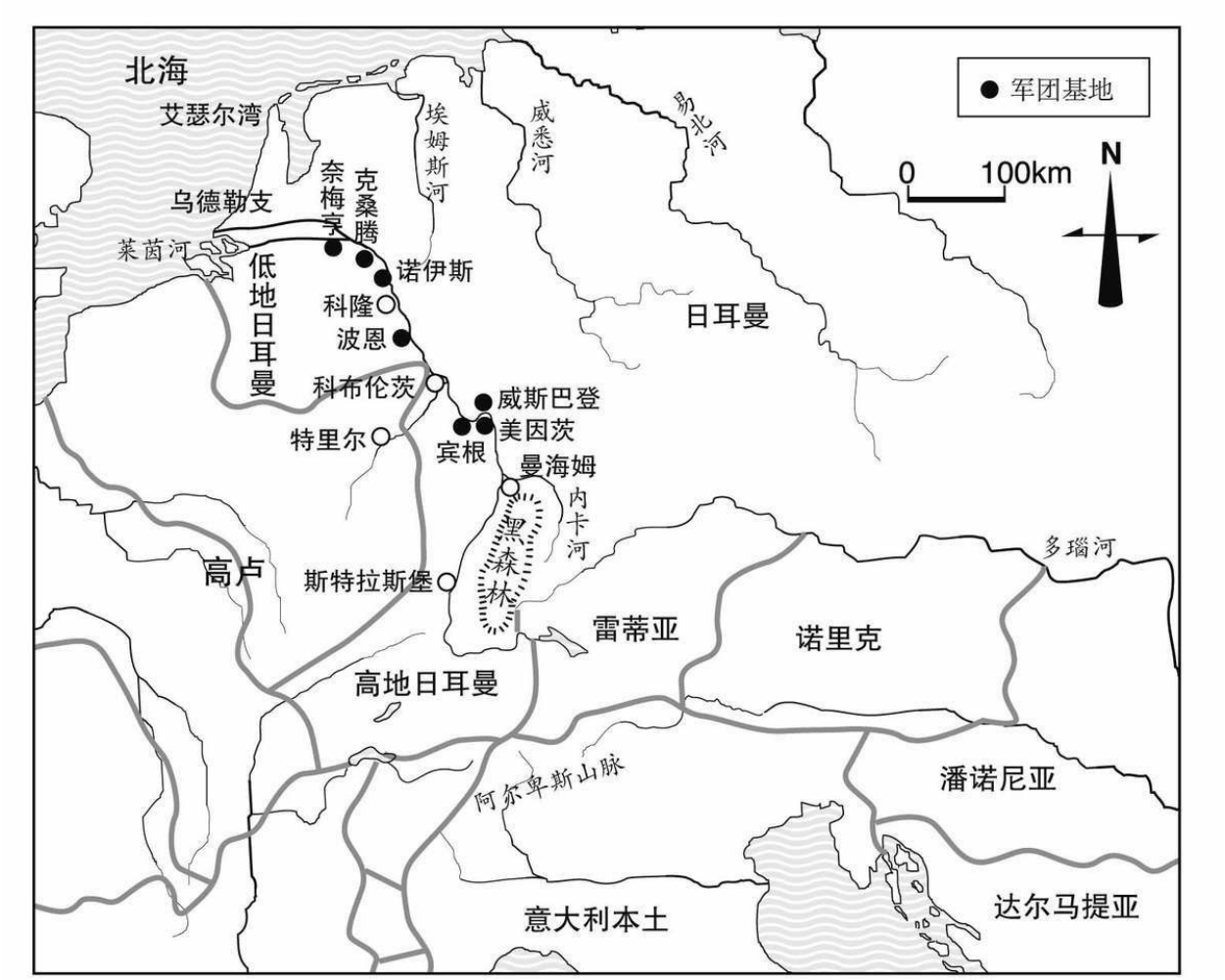
虽然在新的调整方案中，仍然把莱茵河分为上游与下游，分别称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各设置了4个军团，但将两个地域的分界线改为现德国的波恩与科布伦茨的中部。

其中，虽然位于莱茵河的西岸却被称为日耳曼的地区，是因为居住在西岸的居民是日耳曼民族。虽然恺撒把这些人民纳入了罗马帝国，使他们成为定居的民族，但从人种上而言，他们与定居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并无差异。即使在日耳曼就是德国这一现代观念中，莱茵河西岸还是称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属于联邦德国。而位于莱茵河最下游的地区属于今天的荷兰。

话题再回到古罗马，在波恩北方的“低地日耳曼”，以前将4个军团分别安排在佩特拉（今克桑腾附近）和科隆尼亚（今科隆附近）的两个基地中，然而在战略部署调整后由北往南这4个军团被分散部署到诺维欧马格斯（今奈梅亨）、佩特拉、诺法耶吉姆（今诺伊斯）和波恩纳（今波恩）4个基地。至于驻守在康弗恩特斯（今科布伦茨）及以南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日耳曼军团的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来的驻防态势，仍然驻扎在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这大概是3年前这里并没有发生哗变的缘故。但是，从美因茨开始往西的比恩昆（今宾根）、往北的亚奎·马提亚凯（今威斯巴登），军队分散驻扎在这些地方。威斯巴登在那时一直冒着温泉，对于非常喜欢温泉的罗马人而言，自然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因茨又有道路通往奥古斯塔·特雷维洛伦（今多利亚），从莱茵河上游的阿尔根特拉屯（今斯特拉斯堡）也有宽阔的道路沿着莱茵河到达美因茨。当然，这些道路也自然被罗马人所利用。在国境上也再没有部署兵力的必要了，也就是说随着莱茵河防线确立之后，美因茨与同样闻名的后方城市斯特拉斯堡，都一举成为罗马军队的常驻基地。

虽然莱茵河西岸的兵力布置就此得以解决，但是莱茵河东岸的问题依旧存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即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在此国境上修

筑了几个小城，并且在其中部署了中队规模的守军。



罗马帝国莱茵河军团的重新调整图

可是，提比略却把这些士兵全部撤走了。与此同时，原本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几个部族，与罗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却被提比略迫搬到西岸，把狭长的莱茵河东岸一带变成无人区。至于这个区域的面积长宽几何，都缺乏精确的数据。但因其是部族搬出而形成的无人地带，所以应该不会只是几百米的规模。那会是有多少公里呢？从当地的地势来判断，应该能够达到几十公里。这一无人区只能用来白天放牧牛羊，进行耕作是被禁止的。

之所以要沿着莱茵河设置带状的无人区，大概是为了在敌人来袭的

时候更早地发现吧。可是，事实上这一无人地带从未发挥过它的效用。在对提比略的脑袋里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个主意而感到困惑的时候，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曾经说过一段话：

> 最值得日耳曼民族骄傲的，应该就是在自己领土的四周扩张广袤的荒地。这些荒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它表明了排斥周边的其他部族，没有意愿和他们交流这一决心；其二，则是基于安全保卫上的考虑，能够免遭敌人的突然偷袭。

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人，入乡随俗一直都是人类的共识。所以我想大概提比略的治国方略也贯彻了这一思想。换言之，就是用日耳曼人的办法来对付日耳曼人。

然而，把全长1300多公里的莱茵河沿岸，以及比莱茵河更长的多瑙河沿岸，全部变成无人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在莱茵河沿岸的无人区只适用于莱茵河下游平原较多的地区。没有平原的其他地区要怎么防御呢？提比略也借鉴了恺撒的经验。

也就是只与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多瑙河北岸地区的几个日耳曼部族，结成了友好关系。用罗马人较为熟悉的说法，就是与他们缔结了“被保护人”（clients）关系。“clientes”翻译成现代英语是“客人”（client），但并非是脑海中浮现的“客人”这一意思，把它理解为部下对于上级的关系会比较接近罗马人的想法。这些部族并不是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行省公民，因此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虽然他们没有必要缴纳税收，但是他们被要求必须提供兵力，由此看来他们形成的是一种同盟国关系。在东方，罗马就和各君主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尚未确立君主制的日耳曼民族，罗马帝国只能与部族缔结同盟关系。

可是“被保护人”关系一到罗马人手中，就连上下这单一的关系都失

去了。部族等级的人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包括世袭权的罗马人的权利，就算是在军中担任辅助兵的部族人，也只要服役满25年，就能够赋予罗马人的公民权。

就像是翻滚向岸边而来的海浪一样，在经过与海中四处露出的岩石撞击后，力量也会减弱。恺撒虽然仅仅到过莱茵河的东岸两次，且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但恺撒已为之后的提比略打好了基础，提比略把它运用得更广，将其建成一个长期培养的固定体系。

罗马人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一基本统治路线闻名。提比略把这种传统观念确立在了帝国的防御体系中。

目前并不存在公元1世纪前半叶帝国北方防御体制完全是提比略一人独立完成的史料。但是，后来继承提比略的卡利古拉毫无建树确实非常清楚；再往后的克劳狄乌斯虽然抱有对帝国运营的热忱，但在防御体制上并未作出什么改动。这之后的尼禄也正如前两位皇帝一样，完全没有显示对此表现出丝毫热心。所以，在重整北方防卫线的韦斯帕芗皇帝继位前的半个世纪里，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防卫系统一样，一直延续着提比略所构思和实施的状态。从半世纪后韦斯帕芗得过且过的态度来看，或许连将与莱茵河平行、在曼海姆附近汇入莱茵河的内卡河河谷地区纳入帝国版图也是当初提比略策划实现的。在战略上，这确实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举措。因黑而被称为黑森林的地方，作为日耳曼人逃走躲避的地方再好不过。而如今，黑森林已归入了帝国的领土。如果仅限于安全保障这一领域，我个人更愿意相信提比略继承了尤里乌斯·恺撒，而并非是奥古斯都的继承者。

考虑到这些情况，提比略并未将这重编的防卫体系运用于当地，而是将其实行于首都罗马。提比略拥有的是以建立多瑙河防卫为目标的6年和日耳曼实地战斗5年的经验。他熟知日耳曼民族，了解当地地势气候，更理解身处战地的士兵心理。只要指令传达系统发挥正常效能，手下的部将组织有序，即使不到当地，政策同样能够得以执行。然而，首

都的公民对坚守罗马一动不动的提比略给出了年迈慵懒的恶评。提比略在这段时期也已步入了他的花甲之年。

东方问题

虽说掌握人事权就像手握大权一样，但要付诸实践并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更改他人的工作地点这种事情，也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以及周围人的认同。因此，将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从莱茵河畔调往幼发拉底河畔，首先要得到日耳曼尼库斯本人点头同意才行；其次还要有让元老院和公民也赞许的条件。大概提比略真正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更改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达到从日耳曼地区撤军的目的。但是，要巧妙地达成他的目标，就必须让把日耳曼尼库斯调派东方的理由能为众人所信服。显而易见，当时大多数的罗马公民对历时28年之久的日耳曼战役终将获胜这点深信不疑。

一件名为“法国浮雕”的绝世珍品就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它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1厘米、25.5厘米的大浮雕，制作于公元17年。这个大型浮雕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刻有恺撒、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弟弟，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杜路苏斯，他们都是发展罗马与日耳曼民族关系的先驱者；中段刻的则是提比略、日耳曼尼库斯等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家人；最下面则取景为被征服的日耳曼人群像。就算现今看到这幅作品的人也一定会这样想到，公元17年春为迎接日耳曼尼库斯而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意味着罗马完成了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伟业。也就在那一年，罗马军队也完成了从日耳曼的撤离，不了解事情原委的人是绝对想都不会去想的吧。另一幅收藏在维也纳历史博物馆的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浮雕“奥古斯都浮雕”与“法国浮雕”不同，这幅作品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因为绝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仍然居住在罗马帝国国界以外的地区内。要从攻占的地区撤退，并且是快经历了28个年头才征服的领地，最后却要撤退，在罗马史上要作出这样史无前例决断

的帝王，势必要蒙骗众人，其中不仅是本土的国民，还有敌方的日耳曼人，于是就想到利用华丽的凯旋仪式或者是精美的浮雕来迷惑众人的眼光。而且，对被视为胜将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任地变更一事，也就必须拿出能够让众人信服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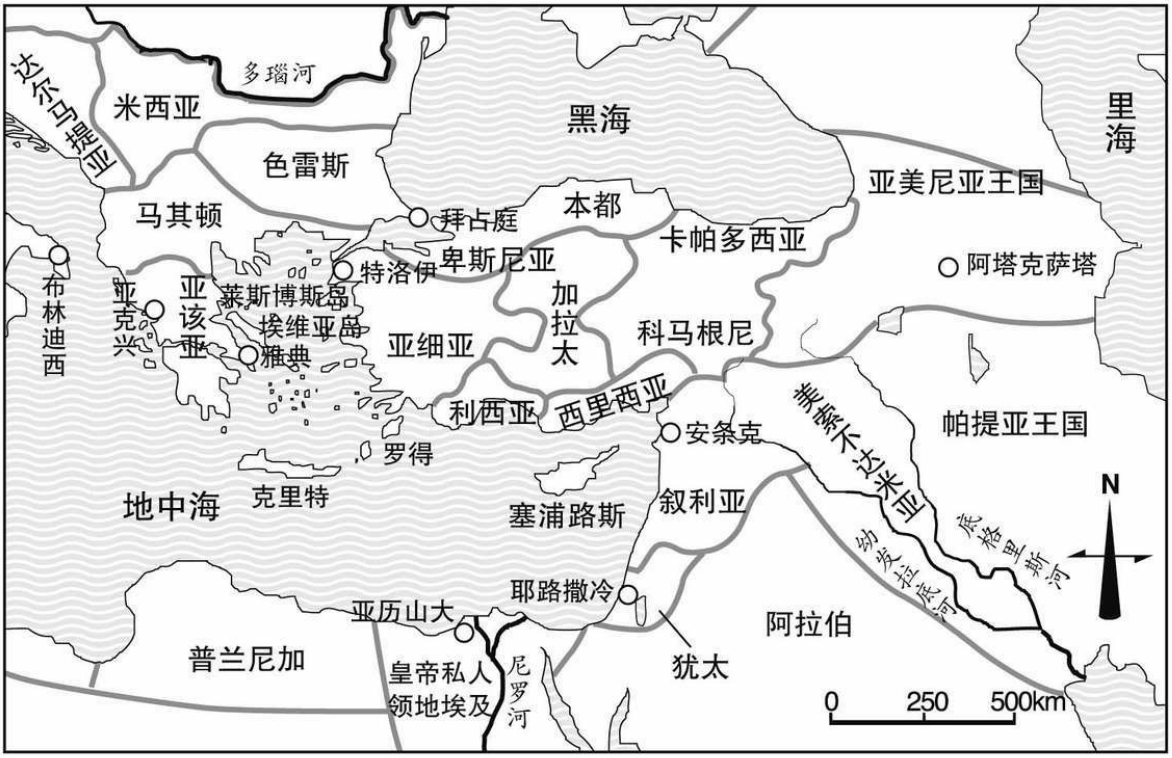
法国的浮雕

奥古斯都浮雕

帕提亚王国问题正是罗马帝国当时所谓的东方问题。然而，帕提亚王国没有能够对付罗马帝国的国力。如果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出现像与迦太基作战时互有输赢的情况，罗马的最后胜利仍是毫无悬念的。即使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力量无法战胜罗马，却足以威慑邻近诸国。而且，帕提亚王国邻近各王国都是属于罗马帝国打造的“被保护人”体系。正是与这些同盟国的合作，才形成了罗马的东方防御体制。

为了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从罗马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就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此事。卢拉加斯、庞培和罗马帝国其他非常优秀的将领，无时无刻不把帕提亚王国当做目标，进行称霸东方的事业。即使没有直接和帕提亚王国交手，却通过在周边展开军事活动，成功实现了对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封锁。而要彻底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将准备出发远征的恺撒却遭到谋杀，此事不得不搁置下来。

恺撒被谋杀后，奥古斯都在内乱中继承罗马帝国皇位，也开始着手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然而，奥古斯都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纠纷的。当一提到以外交途径解决纠纷，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日本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在一个平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奥古斯都的外交途径却是先以军事力量震慑，再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历史的无数次证明，这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外交方法。显而易见，理性不会使得人类自发地清醒过来，而只有在武力的强迫下才会认清事实的本质。奥古斯都采用这一手法也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要点。



公元前21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在从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和平条约的签约仪式。罗马帝国的代表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在出席签约仪式前，带领军队对帕提亚王国实行“武力威慑”的也是这位时年21岁的提比略。在这一年签订的条约中，两国再次确认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在承认贸易自由的前提下，双方发誓不互动干戈，这次谈判才得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次缔约之后，两国除了偶尔进行的细微调整之外，友好关系维持了35年。现在，重新调整的时期又一次来临。在两国关系处于略微调整的公元2年，奥古斯都派往东方的是时任“皇太子”的盖乌斯。如同上次一样，出席者也必须是皇位继承人。作为完全的君主专制国的波斯民族帕提亚王国，如对方出席的不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话，其出席资格是不被认可的。这和现代的民主国家喜欢有能力的人来负责谈判具有同样的道理。

所以，把日耳曼尼库斯从日耳曼调回来之后派往东方，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足以让日耳曼尼库斯本人与罗马公民接受。对提比略而言，把因完成称霸为受众人信任的日耳曼尼库斯派到东方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使撤退也能在不致使不满情绪爆发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提比略的东方政策完美地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行事作风。换言之，他也是左手以武力威慑、右手摇着橄榄枝倡导和平。但是外交手段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先行的宣传战。

提比略随即致函元老院，要求元老院立即授予即将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最高司令权”。元老院也经过了简单的决议，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是派往东方最适合的人选。帕提亚王国获知这个决定后，一定感受到罗马帝国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在作好准备之后，日耳曼尼库斯在公元17年的秋天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如同他总带家人同行的一贯作风，

这次虽然把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留在罗马，但他还是将怀有身孕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以及5岁的小儿子卡利古拉带在了身边。这一行程日耳曼尼库斯兼顾希腊等地的观光，不愧为一段十分惬意的旅程。

早在把日耳曼尼库斯派往东方之前，提比略就把他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派往了多瑙河前线。由于莱茵河上建立防线以后，同样与日耳曼民族相对的多瑙河沿岸的防御体系的确立，就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奥古斯都式的统治方式也被提比略沿袭了下来，把养子与亲生儿子两人派往前线之后，提比略自己坐镇首都指挥。显而易见，皇帝身在首都是负责罗马帝国运转的“大脑”，而派往前线的军团长正好是“四肢”。

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

日耳曼尼库斯虽然只有31岁，但他是一个很受欢迎与爱戴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有着非常帅气的外表，而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还有着非常显赫的出身背景。除此之外，妻子又是奥古斯都的孙女。又身为三男三女的父亲，子女众多也使他赢得了庶民的拥戴。而且，还有日耳曼尼库斯为倾听手下士兵的心声，夜晚装扮成兵卒走访士兵帐篷的逸事。2000年之后，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还在称赞他是一位“充满热心的将军”，而在士兵眼中，他是位非常注意民主的上司。当然，日耳曼尼库斯性格开朗，温文尔雅，对谁都彬彬有礼。虽然他会一见到士兵们暴动，就失望得想要举剑自残；或是看到许多船只因受到北海狂风的侵袭而沉没时就感到绝望，感觉都是自己的失误，而想要跳海自尽。但是这些举动在普通的罗马人眼中，恰恰是他心怀仁慈，是一位十分体贴下属的领导人的表现。另外，他对于以元老院主导为特色的共和制有着无法掩饰的亲近，正因为如此，在保守的元老院议员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大受赞赏。日耳曼尼库斯率军从罗马南下，沿着阿皮亚大道前往布林迪西进军之际，沿途挤满了祈求他平安归来的罗马人。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从布林迪西港登船出发，虽然遭受了3天冬季强烈季风的影响，但还是安然无事地踏上了希腊的国土。公元18年1月，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造访了位于希腊最西端的亚克兴角。大海正对在亚克兴角前，正是在半个世纪前的公元前31年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率军与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联军，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亚克兴角海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最终，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上建造了神殿以感谢神灵赐予的胜利，在此可以看到前面的大海。日耳曼尼库斯首先来到这座神殿祭奠先皇奥古斯都，而后他也参观了一下神殿附近的安东尼军队的营区遗迹。现如今，日耳曼尼库斯成了提比略的养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他的生母安东尼娅，正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与安东尼的女儿。换言之，在亚克兴角海战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正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外祖父。

当然，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半世纪前亲生外祖父决战时的战场，并非是出于好奇才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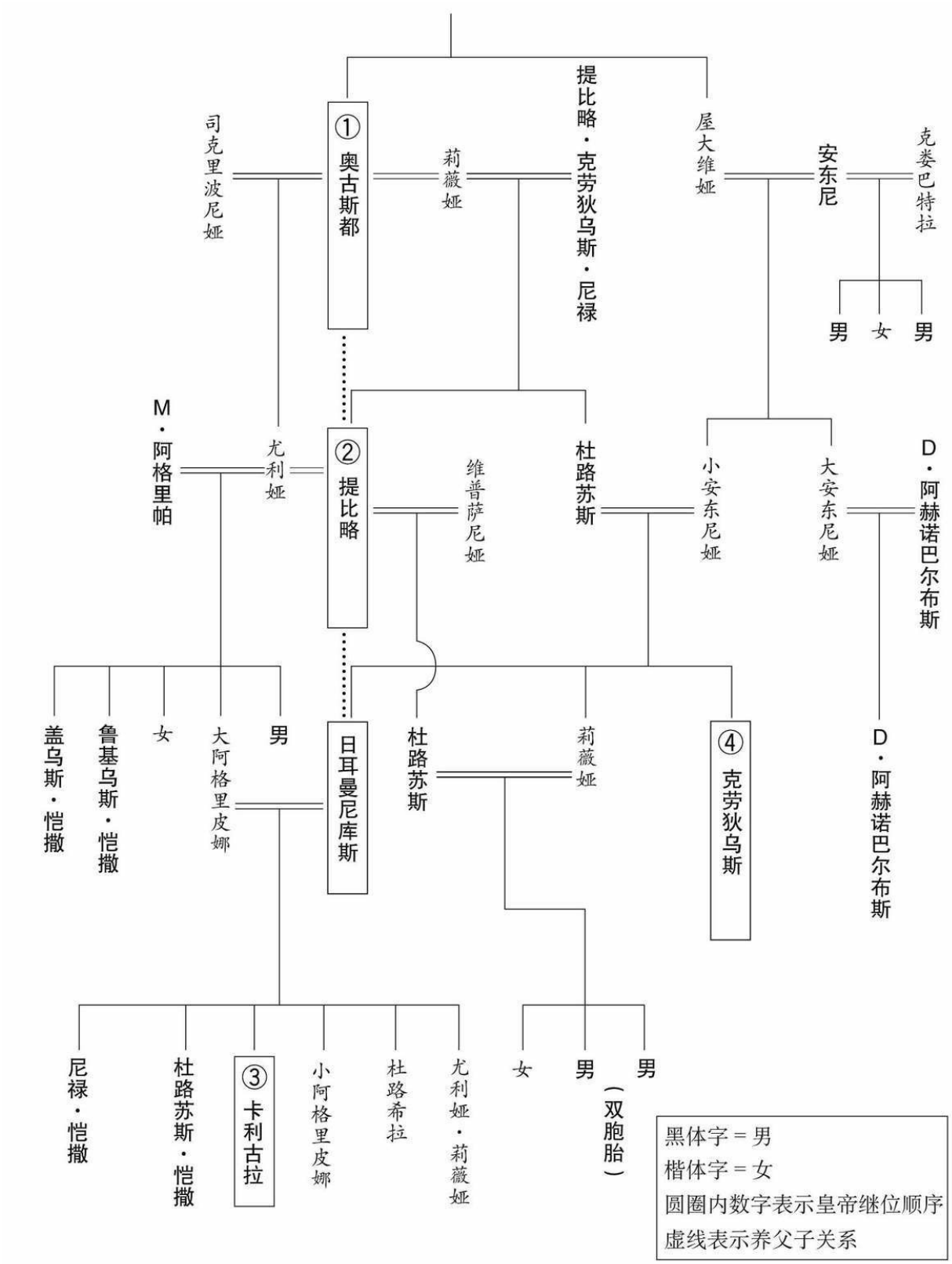
日耳曼尼库斯到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缅怀受命运捉弄而败北的外祖父，以及在他指挥下不得已与自己的国家刀剑相向的罗马士兵们。发人深省的是，罗马人当时竟然没有对日耳曼尼库斯这一行为予以弹劾。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如今登上皇位的提比略的亲生父亲，就是长年与奥古斯都为敌之人。罗马人不是就这样简单地原谅了失败者，就像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评论的一样，“甚至于要同化败军之将”。罗马人的这种败者观，在古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很奇特的一件事，丝毫没有丧失其吸引力。因为，在往后无论哪一个帝国，败者都是落到被斩首的下场。

在《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出生的28年前，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希腊那年，当时的希腊人也拥有像普鲁塔克一样的罗马观吗？实际上，日耳曼尼库斯及其部属不仅在各地大受欢迎，就连在这样没有驻扎

任何罗马军团的希腊，他们也享受了一段不需特别保卫的惬意之旅。

日耳曼尼库斯横穿希腊之旅，仅在雅典稍作休息，之后取道埃维亚岛经海路抵达了莱斯博斯岛。阿格里皮娜就在这个岛上生下了她的小女儿——尤利娅·莉薇娅。在他们离开莱斯博斯岛踏上近在咫尺的小亚细亚海岸后，日耳曼尼库斯仍不急于赶快结束这段旅程。接着他们前往北边的特洛伊，寻访了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中的古战场遗迹。对在莱茵河以及多瑙河流域的战场度过了青春时代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从意大利开始的东行是他有生以来的首次体验。此外，他也没有需要赶路的理由，倒是提比略任命的几名“事务员”得加紧行程，他们必须赶在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之前，做好各项工作准备以备随时执行。

日耳曼尼库斯家谱图系（到三个女儿出生为止）


①奥古斯都
司克里波尼娅
莉薇娅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
屋大维娅
安东尼
克娄巴特拉
男
女
男
②提比略
尤利娅
M·阿格里帕
维普萨尼娅
杜路苏斯
小安东尼娅
大安东尼娅
D·阿赫诺巴尔布斯
盖乌斯·恺撒
鲁基乌斯·恺撒
女
大阿格里皮娜
男
日耳曼尼库斯
杜路苏斯
莉薇娅
④克劳狄乌斯
D·阿赫诺巴尔布斯
尼禄·恺撒
杜路苏斯·恺撒
③卡利古拉
小阿格里皮娜
杜路希拉
尤利娅·莉薇娅
女
男
男
（双胞胎）
黑体字＝男
楷体字＝女
圆圈内数字表示皇帝继位顺序
虚线表示养父子关系

一直在持续的亚美尼亚皇位继承权争夺战，导致了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亚美尼亚人民厌倦了出身罗马并由奥古斯都支持而登上皇位的沃诺内斯的统治，想把沃诺内斯赶下皇位后让本都王的儿子——被人民认为具有东方君主风范的泽诺尼斯当亚美尼亚王。从奥古斯都选出的王子这点看来，沃诺内斯肯定具有统治的能力。不仅如此，这位王子也应该有罗马统治者才有的能力与干练。然而，罗马人认定的君主就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在波斯人观念中，君主是妻妾成群、准备战争、准备狩猎以及举办宴会的领导人。在价值观上，东方和西方确实存在着差异。从亚美尼亚被驱逐的沃诺内斯逃到了叙利亚，受到了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保护。亚美尼亚敢做出这种与反罗马无异的举动，正是因为它认为有邻国帕提亚作为靠山，才使它拥有了付诸行动的勇气。而帕提亚国王一直打算把亚美尼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也认为这是一次把罗马的影响力从亚美尼亚抹去的良机。不管怎么说，按照罗马一贯的东方政策，即以西边的叙利亚行省与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基地，对帕提亚王国形成封锁。

不过，对于使罗马和帕提亚王国之间可能随时爆发战争的这种挑衅行为，提比略作出了冷静而透彻的对策。亚美尼亚对于罗马帝国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屏障这点是不会变的，当然，这并非单纯的出于占领欲想据为己有，把它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从文化与历史角度出发，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同样都属波斯文明圈。在提比略看来，亚美尼亚皇位的人选只要能让下属的亚美尼亚人民满意，使国内安定、政局稳定、确保亚美尼亚今后继续保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这就够让罗马帝国欣慰了。或许提比略早已完成对此事的调查，知道觊觎皇位的泽诺尼斯是亲罗马的本都王的儿子，而他本人也并未站在反罗马派的一边。提比略让泽诺尼斯当上亚美尼亚王，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泽诺尼斯的名字必须改为阿尔塔什斯，即从希腊名改为亚美尼亚名。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日耳曼尼库斯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到达阿塔克萨塔，即亚美尼亚两个首都之一，在阿塔克萨塔完成亚美尼亚新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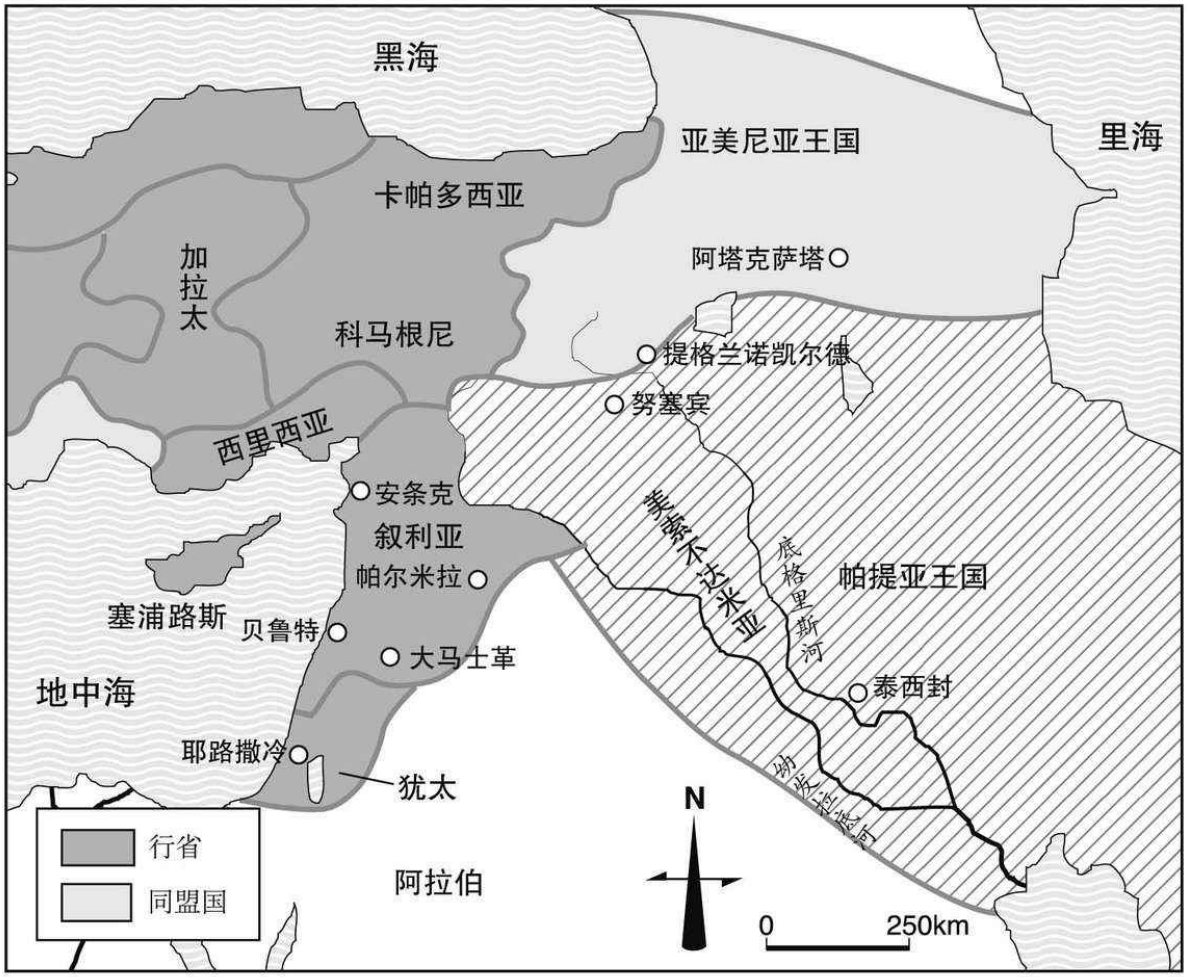
的继位仪式。就这样，亚美尼亚新国王的继承仪式在亚美尼亚人的欢呼声中落下帷幕。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操作下，帕提亚王国的计划至此全部落空。看清现实的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连忙派遣使节到日耳曼尼库斯处，提出愿意与罗马重新缔结友好条约，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即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进行缔结协约仪式。如若任由叙利亚行省保护的前任国王沃诺内斯一直待下去，有可能变成新国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其中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将保护沃诺内斯的地方迁移到离亚美尼亚更远的地方。对此，日耳曼尼库斯同意了，打算把沃诺内斯转移到小亚细亚的罗马行省。就在护送途中，沃诺内斯不知出于何故想要逃跑，最终被追随而来的百人队队长杀死。当然事情是否如此，真相不得而知，然而，不再有威胁亚美尼亚王国局势的人了。

这一年，罗马帝国在以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同时，也顾及了帕提亚王国。直到公元34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到阿尔塔什斯国王去世为止的16年中，可以说罗马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关系到罗马帝国东方安定关键的亚美尼亚王国收归手下，在这件事情上大获成功。

其实，除了助亚美尼亚王登基、重新与帕提亚王国缔结友好条约之外，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之行，还有另外一个虽没有前两个声势大，但也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完成对于东方君主国家中算是小国的已与罗马结成同盟（事实上的属国）的卡帕多西亚与科马根尼的处置。虽说没有大国帕提亚与中等国家亚美尼亚那么棘手，但是这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重要任务。虽说从现代的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个小国位于土耳其的最东部，但与罗马帝国的直辖行省叙利亚一样，同样都是封锁第一假想敌帕提亚王国这一举措上的重要棋子。在公元18年，卡帕多西亚的老国王阿尔科拉欧斯因有反罗马的行动而被召回并扣留在罗马帝国本土，卡帕多西亚皇位的继承问题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在科马根尼王国还未遴选出继承人的情况下，国王也驾鹤西去。

当然，提比略的决定很快就出来了，把这两个王国都变成罗马的直辖行省，只是做法不同而已。提比略把具有执政官历练的维拉尼斯，派为卡帕多西亚的第一任总督，把卡帕多西亚纳入罗马帝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此外，他派没有执政官历练的法务官瑟维鲁斯担任科马根尼的第一任总督，可以猜测提比略可能想把这个小国当做其邻地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直到培养出皇位继承人。提比略对这两个王国的处置手法不同，源于前者国王是犯有过错，而后者的国王是自然死亡，所以存在着差异。再没有哪个民族像罗马人这样能看菜下饭（Case by Case）、操纵自如的了。20年之后，科马根尼再次成为独立的王国证实了提比略的先见之明。



帕提亚王国及其周边地图（公元18年之后）

在卡帕多西亚和科马根尼两国成为罗马的行省之后，自然两国的国民就有了缴纳罗马税制中规定的行省税等种种税款的义务。虽提比略明知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还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税率。因为东方的民众早已习惯了专制君主的统治，所以只要这样特殊的民族情感没有爆发，统治者不论是东方人还是罗马人对他们而言就不会有区别。只要税率比以前低，受到拥护，人民就不会对新的统治阶层产生反感。说起来，一直处心积虑健全财政的提比略，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毫无节制榨取行省人民财产的皇帝。

与此同时，提比略也在罗马本土实行减税政策，他把从前饱受恶评的1%的营业税（即消费税）降低为0.5%。但对于全面停止征税的要求，提比略出于保证罗马防御经费财源的考虑断然拒绝。由于有两个行省新增加的税收，所以有了减少税率的条件，但是这一减税政策也只持续了一段时期。实际上，过了不到两年税率又恢复到减税前的样子。

总督皮索

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其实意外就隐藏在背后。日耳曼尼库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皮索的关系恶化，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由于日耳曼尼库斯被提比略赋予整个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权”，也就是说在处于整个东方区域行政官中地位最高的叙利亚总督也应听命于他。虽然这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推测，但他们认为在日耳曼尼库斯出发时，握有提比略密令的皮索也踏上了赴任叙利亚之路。此外，几位现代学者还推测，提比略选择把相当于日耳曼尼库斯叔辈的皮索派往东方出任叙利亚总督，也有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监督的考量。然而，事实证明这次的人事安排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皮索没有履行好从旁监督这一职责，只起到一个横加干预的作用。皮索是一个喜欢越权行事的人，而且还是典型中的典型。

除此之外，如若女人加入男人之间争端的话，那只能使男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最终导致场面无法控制。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最引以为傲的，是身为神君奥古斯都的直系血亲这一点，所以她总在各场合抛头露面，连军团的阅兵典礼也要参加。阿格里皮娜的这种做派使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萌生了对抗心。这位总督夫人也开始经常出入军团消磨时间。两个女人之间的抗衡发展到了各个方面，这样的抗衡在对权威和权力只能次于日耳曼尼库斯的皮索态度上也日益暴露。皮索甚至

对日耳曼尼库斯要求调派1个军团的命令充耳不闻，毫无反应。

当然，并非上述一件争端就使得日耳曼尼库斯对皮索产生了不满。从公元18年至次年的这个冬季，日耳曼尼库斯偕同家人前往埃及，打算在埃及避寒。然而，埃及是皇帝的私有领地，在罗马身兼重职的人不论是谁，不经皇帝的许可是不能入境的，这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有规定。在日耳曼尼库斯看来，既然身为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进入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埃及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在没有得到罗马的提比略许可的情况下便进入了埃及。对于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埃及特别是首都亚历山大，由于这块土地与他的外祖父安东尼渊源颇深，所以他的心里洋溢着亲切感。

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埃及之旅，按照他时年32岁“热情洋溢的领导人”的性格观察的话，应当完全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愿进行的。此行，他们前往合葬在亚历山大的墓地的外祖父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灵庙。此外，在身边缺少护卫的情况下，他们还以一副希腊式的短衣打扮游走在亚历山大的街道。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是希腊人的城市。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周游人人向往的尼罗河，兴致勃勃地观赏沿岸的金字塔与寺庙。当他听说亚历山大的居民缺少食物之后，就把原本要运往罗马囤积的小麦开仓济贫，将粮食分发给了亚历山大人民，这种举措自然使得他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更愿意把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太子”，看做是当年率领埃及军队顽强对抗罗马惨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的外孙子。

提比略在得知日耳曼尼库斯在埃及的举动时，回想起他当初在日耳曼军团哗变时伪造诏书放他一马的事情，越发恼怒，在元老院中公开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斥责。当然，提比略的斥责也有一定的道理，理由有三：其一，日耳曼尼库斯身居罗马要职，却轻率地以希腊式的打扮出现在埃及街头巷尾。其二，视神君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为一纸空文，在没有获得皇帝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埃及。其三，无视埃及直属长官的

权力，违背长官之意，私自开放粮仓。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元老院也深表认同。于是日耳曼尼库斯收到了一封要他谨慎行事的正式信函。

然而，还未等这封信送到日耳曼尼库斯手中，日耳曼尼库斯与家人早就离开了埃及。因为他是就算受到责备也不会放在心上这一性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期望的埃及之旅也得到了实现。

多瑙河防御体制

就在罗马帝国东方安全防御体制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努力下得到巩固之际，罗马帝国西方的安全防御体制，也如同提比略的规划，在其子杜路苏斯的执行下，多瑙河防御体制最终确立下来。

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对手，正是日耳曼民族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马柯曼尼人。而马柯曼尼人的族长马洛勃杜努斯自幼在罗马长大，非常熟悉罗马有着强大的国力，所以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如果一直由马洛勃杜努斯统治多瑙河北岸的话，提比略自然会十分省心。这位一直拒绝与阿尔米纽斯并肩作战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洛勃杜努斯，由于部下的叛乱而身陷囹圄。在危急情况之下，马洛勃杜努斯向提比略请求援助。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完全没有越过莱茵河或多瑙河进攻日耳曼的打算，他甚至拒绝派遣罗马军团前往驰援。不过同时，提比略的确也下令，承诺在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提供一个让马洛勃杜努斯及其家人栖身之所。最后，为了保全性命，这位日耳曼人领袖也只能委曲求全。

当向元老院报告了这件事情之后，提比略列举了下面几条理由来强调对此事件处理的合适之处。

对于罗马人而言，再也找不出像马洛勃杜努斯这样危险的日耳曼

人，他非常有能力，而且在日耳曼民族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罗马帝国能够好好地利用他，收降他，用贵宾的身份使其归顺而不是把他俘虏过来，不仅可以削弱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民族的力量，在危急时刻还可以向马洛勃杜努斯辅之以罗马军团，让他对付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把这位日耳曼政治逃亡者当做对付日耳曼的王牌。事实上提比略的这一招也发挥了作用，自马洛勃杜努斯到了拉文纳开始悠然的生活后，提比略只要看到多瑙河北岸的部族有南下进攻的迹象，就会拿出这张王牌对他们进行恐吓。

对政治逃亡者与人质，罗马人并不会冷遇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总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王牌加以利用。当然也是为了在紧要关头，可以利用他们翻盘。

不久之后，因击溃马洛勃杜努斯而将族长一职收入囊中的卡杜阿尔达斯也遭到叛变的境遇，他同样也转向提比略请求援救。提比略也为卡杜阿尔达斯准备了栖身之所，把他安排在了法国南部的海港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自此有两张王牌已紧握在提比略手中了。

此后，统率了马柯曼尼人的瓦尼斯，又被提比略认可了，上升为罗马帝国的“朋友”身份，就这样跟这个多瑙河北岸的独立王国缔结了同盟关系。就是这样的做法或许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政治吧。实际上，罗马正是凭借这种冷静透彻的外交策略，使帝国在莱茵河东岸和多瑙河北岸都争取到了盟友，实现了对日耳曼英雄阿尔米纽斯的孤立目标。然而，这位抱有联合全族人民击垮罗马梦想的日耳曼风云人物，在两年后的一次小战役中身亡。恰好在此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人也发生了内讧，提比略乘机一举成功地将这个地区纳入了罗马帝国版图。这确实也证明了提比略在元老院上的演讲并不是谎言：“罗马帝国的安全，并不是靠军事而是靠政治来保障的。”塔西佗非常讨厌提比略，但他的著作《编年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维护罗马帝国的安全，正是提比略心中最为挂牵的。”

日耳曼尼库斯之死

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9年春离开埃及，返回叙利亚。前路危险重重，在那里等待日耳曼尼库斯的，是对他反感心理与日俱增的总督皮索。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在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的总督府内，经常可以看到两人争执的情形。随后，皮索去了帝国辖区西岸的小亚细亚，而日耳曼尼库斯则动身返回帕尔米拉。就在此时，又到了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与帕提亚王国重新缔结新友好条约的时候了，日耳曼尼库斯需要经帕尔米拉往东去参加缔约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只好结束了这个夏天的沙漠旅程回到了安条克。然而，没过多久，日耳曼尼库斯却因高烧病倒在床。

这突如其来的高烧，却在第二天早上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到了夜里又再度袭来，谁也没有料到，隔天清晨又退了下去。在日耳曼尼库斯没有发高烧的时候，他还如平常人一样起居生活，然而每晚高烧必然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即使白天稍微退烧，也没能恢复到正常体温。在高烧的来回折腾下，这位年轻将军的生命日益衰竭。

日耳曼尼库斯卧床不起，病榻边围坐的众人都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病是总督皮索下毒引发的。在这样的声浪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发烧还不到10天，就在对围在病床边的妻子与战友托付报仇的遗言后撒手人寰。公元19年10月10日，日耳曼尼库斯病逝，年仅33岁。

日耳曼尼库斯是一位非常优秀、对敌人极为宽恕的将军。他的离去不仅使得叙利亚，也让整个东方地区都为这位青年将领的死感到惋惜。东方地区的居民，除了罗马人，就连希腊人、犹太人和闪米特人也前来安条克中央广场参加他的火葬仪式。虽然此时已经进入了不宜航海的季节，然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还是捧着丈夫的骨灰，带着7岁的卡利古拉和刚满1岁的女儿，踏上了返回罗马的道路。由于天气十

分恶劣，船只经常停靠岸边，走走停停历时两个月才返回罗马。

如果是下毒致日耳曼尼库斯死亡，然而毒性的发作太漫长。历史学家塔西佗更倾向于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皮索毒害，而皮索又是受了提比略的密令这一说法，他这样描写道：

> 不论是从躯体之美、英年早逝的年龄，还是从离世的缘由以及亡于东方这一远离故土之处等这些情节来分析，日耳曼尼库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确实如出一辙。两人都拥有极为强健的身躯，都出身显贵，却都在刚刚踏入而立之年的30岁出头就客死他乡，成了家族暗斗的牺牲品。
>
> 不过，与亚历山大大帝有所不同，日耳曼尼库斯待人宽厚，不只会贪图享乐。虽然只有一段婚姻，他也享受到了子女绕膝之乐。
>
> 对作为将军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如果日耳曼战役没有遭到故意为难，他肯定能留下足以与亚历山大大帝媲美的战绩。如果他生而为王，拥有行动的自由和制定决策的权力，那他所造就的业绩绝对能轻松地超越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功上的成就。因为，无论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其他众多的才华方面，日耳曼尼库斯都略胜一筹。

历史学家塔西佗虽然是以罗马帝国最有权威的身份写下了这段话，但这一段话的某些见解却让现代的研究者不禁觉得好笑。甚至有研究者这样认为："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根本谈不上是罗马帝国的损失。"更何况，现在已形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日耳曼尼库斯都亡于疟疾的定论，只不过亚历山大大帝被毒害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当然，不论谁英年早逝都不免会让人有惋惜之情，更何况是这样一位生前受人爱戴尊敬的人物。就连知道他所存在缺点的人，在他意想不到的死亡之后，也会将这些小毛病都抛诸脑后。驻守在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们为这位曾经的将领之死感到痛心。这大概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起源吧。

罗马人在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人将会经海路抵达科孚岛后，都自发地聚集到了这个距科孚岛尚有两日行程的登陆港——布林迪西港上。提比略从罗马派遣来的3个近卫军团大队，也抵达了此地。在群众带着叹息之声的迎接中，手捧骨灰坛的阿格里皮娜与遗属登上布林迪西港。

古罗马时代，鲜花是用来祝福活着的人或是插在坟前用的，所以对于这样刚刚过世的人而言，则是依据各自的财力燃烧相应的物品给这位故人以示悼念。然而到了基督教时代，演变为点燃蜡烛悼念，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经过由3000名近卫军防护的阿皮亚大道时，前来悼念日耳曼尼库斯的罗马人络绎不绝，富裕一点的人则焚烧昂贵的香料，贫穷的人则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焚烧来祭奠他。在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人们也都自发地穿起了丧服。而年轻的寡妇阿格里皮娜和遗属的样子，更是让人热泪盈眶。

这些人群中还有从多瑙河前线赶回来的杜路苏斯，此外，日耳曼尼库斯的胞弟克劳狄乌斯、没有随同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两个儿子，还有以当年还在职的两位执政官为首的众多元老院议员也都来到离首都100公里左右的特拉提纳迎接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从特拉提纳开始的阿皮亚大道几乎是一条线直通罗马。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就在家人和政府高官的护送之下，沿着这条路被送往了罗马。

随着距罗马渐近，道路两边迎接的人愈来愈多。群众的惋惜声掩盖了周边所有的声音，在一片悼念中焚烧物品的烟雾似乎形成一片巨大的乌云遮住了蓝天。这种现象简直就是群众集体失控。

在阿皮亚大道的尽头，民众一直望眼欲穿的人物却并未现身。日耳曼尼库斯的养父提比略，以及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连日耳曼尼库斯的生母安东尼娅都未出现。送葬队伍进入罗马广场的时候，提比略都还是没有现身。而在第二天的国丧典礼上，致悼词也都是由他的义弟杜路苏

斯完成的，提比略、莉薇娅、安东尼娅都未现身。被视为竞争对手的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实际上是感情很好的两兄弟，比日耳曼尼库斯小两岁的杜路苏斯的悼词，句句深入人心。然而，在进入灵庙下葬时，提比略也仍旧没有现身。

对于缺席葬礼，提比略给出了如下的解释：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尼娅因伤心过度而卧病在床，也致使他与莉薇娅不得不出于对安东尼娅的考虑而未能出席。

对于非常讨厌出风头的提比略而言，这或许听上去有几分道理。而身为崇尚“冷静专家”的提比略，对“热情洋溢的领导人”想来没有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这并不是只需根据个人的好恶作出反应的场合，而是关乎礼仪正确与否的葬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是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是个需要为自己撑场面的了不起的公众人物。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葬礼的态度，失礼得连为自己辩护的余地都没有。

实际上，人们习惯于拿从前的事与现在进行比较。当人们想到在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父亲尼禄·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在日耳曼地区因意外堕马去世的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特意到罗马以北500多公里外的意大利帕维亚迎接，之后又全程陪同护送遗体回到罗马这段往事，就会为现在这样一位与先帝完全不同、拥有冷血性格的帝王感到痛心。

然而，此时的罗马人还没有像百年后的塔西佗那样，想到日耳曼尼库斯正是被提比略派人毒害的。虽然也曾怀疑他是被毒害，但他们坚信这只是总督皮索的个人行为。不过，对于没有出门迎灵、没有参加葬礼的提比略，在这一点上，他也失去了罗马人对他的信服。罗马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哀悼日耳曼尼库斯，为他服丧。一起停工，这就是今天时髦的说法。

罗马停止了它的运转：审判无限延期，贸易场关门，商铺停止营业，工场鸦雀无声，学校也休课，唯一见到人群的地方就是神殿附近。

提比略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向首都的所有罗马人发出了如下公告：

> 有无数为国捐躯的伟人，但是像这样受到国民深切哀悼的，也只有日耳曼尼库斯一人。你们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的悲叹，对于身为父亲的我以及他的所有亲人，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但是现在的我们更应该节哀顺变。
>
> 作为称霸世界的国家的领袖与公民，我们不应该存在那种只有身处小国的人民才拥有个人的悲叹。苦楚的忍受，悲戚的泪水，虽说这些作为对逝者的悼念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已到了需要我们振作精神、重整旗鼓的时候。应做到与神君恺撒和奥古斯都一样，在面对独生女死亡的时候极力掩饰个人伤悲，面临孙儿相继早逝时仍旧坚持继续履行好他的责任。
>
> 在此，我不去举最近的例子，然而，罗马人曾多少次忍受自己军队的失败？经历过多少将军离世的悲伤？忍受过多少历史上显赫家族的衰败？
>
> 每位领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然而只有国家才是永恒的。所以，你们应回到各自的岗位。你们所期待的大地母神的庆典也即将来临。而所谓的日常经营也是由工作和每日的期盼所组成的。

至此，全民疯狂的心理终于得以平复了。罗马人开始逐渐回归到各自的岗位，学校重新开课，母亲们也同以往一般专心家务。可是，在把总督皮索提到法庭上进行制裁这一问题上，罗马人并没有让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舆论的动向，不等判决就知道皮索一定有罪了。

审判皮索

总督皮索在日耳曼尼库斯病倒时，并不在安条克。在日耳曼尼库斯

病倒之后，他也没有赶回安条克。时隔不久，他便收到了日耳曼尼库斯与世长辞的消息。有传闻讲道，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喜不自胜，如果真是如此，她还真是个愚蠢到极点的女人。面对这种情势，皮索与同行的儿子、朋友和幕僚慌忙商量对策。讨论的焦点在于，他是否要返回任职地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以填补因日耳曼尼库斯之死而造成的东方防御体系总司令一职的空缺？或是立即赶回罗马，向皇帝以及元老院为自己与日耳曼尼库斯发生的争执进行说明？然而，意见出现了分歧，皮索的幕僚主张回安条克去补缺；而他的儿子与朋友却劝告他赶快回罗马澄清事实。作为元老院的重量级人物，皮索也十分纠结于应该如何二者择一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他突然开始对驻扎在叙利亚的前日耳曼尼库斯部属的4个军团士兵实施怀柔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皮索最终决定返回罗马。

由于耽误了太多时间，皮索的首都之行远远落在阿格里皮娜之后。更何况他选取的是一条绕远的路线，他选择从中部的安科纳登陆，而不是从南部的布林迪西港口返回罗马本土，之后顺弗拉米尼亚大道而下，在返回途中甚至还放弃陆路，而下到台伯河采取了水路的方式。他到达罗马时，已是提比略发布了公告、全民为失去日耳曼尼库斯而心理创伤得以平复之时。就这样，他连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立即就被拉上了审判席。

围观的人高声呼喊判处皮索死刑，元老院会场中的审判正是在这种声浪中开始的。提比略若是一个在乎舆论的皇帝，那么审判的结果按照罗马公民所期望的走向比较有利。如此这般，提比略没有迎灵、没有出席葬礼的旧账就可以不再提起，而且，后世的罗马人也一定不会给他安上教唆毒害日耳曼尼库斯的罪名。提比略却在审判伊始这样说道：

> 皮索总督乃家父（奥古斯都）之友，也曾担任军团长。承蒙各位认可，我才派他远赴叙利亚，辅助日耳曼尼库斯治理东方。因此，冷静乃审判之必须。其与日耳曼尼库斯之间的矛盾，是否因皮

索自恃功高、争强好胜所致？又或因日耳曼尼库斯轻佻所致恶果，抑或这就是他人犯罪所成？仰仗各位冷静慎重决断。

皮索乃接受包括军团指挥权等行省公务任命后被派遣的公职人员，若其明目张胆越权乱纪，此乃罪责难逃。又，如若抗日耳曼尼库斯之命，此亦是罪责难逃。若其对于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以及他的死带给我的悲伤表现出欣喜之意，我一定会憎恨他，禁入我家之门。然而，我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挟“第一公民”之威报私人之怨。

反之，若其罪证确凿，定当严惩，不论是谁处之，必将以严酷之刑告慰日耳曼尼库斯之子及家族。

至此，是否真有煽风点火之徒存在？是否真有道听途说之徒造谣？议员诸君，望各位切切明辨是非。若真有其事，我必将其人碎尸万段。若日耳曼尼库斯死于毒害，其遗体仍置于广场，外族人亦可见，必将凶手擒拿以祭其在天之灵。

至于对手下那些图谋不轨的军团，皮索是否对其进行了煽动，抑或只是道听途说的控诉人极度夸张的伪证，对此各位有必要进行明辨。如果是后者，即使控诉人是我们的朋友，也必定要作好受到我责难的心理准备。如果真像众人所言，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毒害，他的遗体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中央广场。而他的死因至今不明，这也是此时此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也为儿子之死而痛哭流泪，恐今后伤痛难息。然而，被告亦有家室，愿诸君留辩解之机，使其言明日耳曼尼库斯之不妥之处，查明真伪。希望各位弃传闻于不顾，慎重决断。只此或能告慰我之伤心。

我以皇威誓言，无论是谁，皆有辩护之权，皆有检举之权。仍望诸君竭尽全力，以护被告之权。

法之所及，不分贵贱，然而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我放弃一般之裁判，而送至议员诸君之殿前。望诸君，度天时，晓地利，循罗马之旧规，沿罗马之程序，依序而行。

议员诸君，我最大之心愿，乃弃杜路苏斯之泪与吾之伤痛以及周遭的一切声音于不顾，冷静决裁，以告慰养子在天之灵。

这场审判必定会比一般的审判时间长，不仅要算上陈述诉讼理由的2天，辩护方的3天辩护时间，而在这中间还得再经过6天商议之后才宣布判决结果。告发者有在日耳曼战役中担任日耳曼尼库斯手下军团长的凯奇纳、维拉尼斯、维特里乌斯3人，也有在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时自愿跟随的将军。他们对皮索的罪状作出了如下的陈述：

首先，皮索对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士兵们放任自流。

其次，皮索对各同盟国的国王专横跋扈。

上述两项皮索的罪状，引发整个东方地区公民们对谋害最高负责人日耳曼尼库斯之人皮索的怨恨。此外，军团内部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而军团内亲近总督皮索的不良分子，甚至把皮索尊称为“军团之父”，但这种做法，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团内有良知士兵们的鄙视，这样的皮索注定会遭到弹劾。

而第三点谈到的是皮索使用魔法与毒药，把日耳曼尼库斯谋害而死。告发者强调，皮索之妻普兰希娜苦心钻研东方魔法，甚至把施展魔法作为个人爱好。作为最后的陈述，告发者还提及皮索甚至企图教唆军团士兵把矛头对准祖国。

然而，对皮索实施辩护的一方论调十分弱势。对皮索在军团内实行怀柔政策、放任军团纪律这些指控，辩护方无法拿出证据进行否认。皮索与各同盟国国王之间的不合、国王们对他产生不满情绪，都是不争的事实。提比略一直强调的是皮索是否服从命令这点，即使他们能够反证皮索并没有完全抗拒日耳曼尼库斯的命令，但也不能说忠实地履行了职责。于是，皮索的辩护方只能把辩护的重点放在是否毒害问题上。

他们辩护道，毒害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告发者一方认为，皮索在安条克总督官邸内举办的宴席上，亲自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杯中下毒，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两人不合是公开的事实，如若两人确实同时出现在了宴席上，那自然会招来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的眼光。

元老院内的情势急转直下，让场外关注着审判过程的群众也不由得定住了一般。即使元老院判皮索无罪，也休想从周围群众的手中逃脱，皮索注定不可能安然离开议事厅。他只能在一队近卫军团的护卫下，躲在四周用布幕围住的轿子里逃回家中。虽然如此，在他的孩子们的激励下，皮索还是坚持每天前往元老院，直到最后一天的辩护结束。

然而，元老院议员们的眼中满是轻蔑与敌意。提比略接连几天连续出席审判，但是一直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没有显露出怨恨，也没有表示出同情，他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旁人无法猜透的高深莫测的神情。与丈夫一样同处于众矢之的的普兰希娜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转而向以往就很亲密的皇太后莉薇娅寻求庇护。

辩护方告知皮索，就算毒害的罪证不足不被判处死刑，他也逃不掉不服从命令的罪责。唯有自杀谢罪，才是拯救儿子们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皮索只能选择自尽。

在判决之日的早晨，人们发现了已经自刎而亡的皮索的尸体。不过，元老院根本就不在乎被告的生死，还是作出了如下判决：

一、从所有官方的记录中清除皮索之名。

二、皮索之财产半数充公，剩下的部分留给身处罗马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长子葛尼斯，但葛尼斯必须放弃皮索一姓。

三、与父亲皮索同往叙利亚的次子马库斯，其元老院议员资格被剥夺，只获得其父遗产500万塞斯特斯，并在10年之内不得踏入首都罗

马。

四、皮索之妻普兰希娜受皇太后莉薇娅庇护，不予问责。

皇帝提比略拥有接到控诉后给予最后裁决的权力。由于被告皮索已死，无法进行指控，但是提比略还是行使了这项权力，也就是使用了“最高裁判权”。

首先，提比略拒绝在官方记录中清除皮索的名字。因为即使是向罗马宣战的马克·安东尼，他的名字也仍然保留在了官方的记录之中。此外，他也否决对皮索次子马库斯撤销元老院议员资格、处罚放逐10年的审判结果，并允许他与兄长葛尼斯一样继承父亲所留财产一半的权利。对于这样的撤回决定，提比略给出了“身为儿女者不能违背父亲的命令”这样的理由。至于对皮索之妻普兰希娜的处置，则维持元老院的决议。

对于提比略“最高裁判权”中的决定，元老院没有异议。然而，有两名议员站出来提议，为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铸造黄金像，供奉在复仇之神马尔斯的神殿内。对于这项提议，提比略却拿出了“此类神化的做法，只适宜在战胜其他国家时使用，自家人的悲剧应将与悲伤一同埋葬”的理由予以了拒绝。

就这样，引发罗马人万众瞩目的皮索审判，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民间舆论对这样的裁决也感到满意。判决的内容却让后世的罗马人对提比略是否参与毒害引发了质疑，与此同时，日耳曼尼库斯遗孀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也产生了憎恶之情。阿格里皮娜身上流着奥古斯都家族的血液，她也一直以此为傲。她一直痛恨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巧取豪夺了皇位的提比略，如今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使得这种痛恨比往日更甚。在她心目中，提比略是为了清除日耳曼尼库斯，避免出现皇位的争夺者，才指使皮索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毒害。

当然，提比略没有顾及日耳曼尼库斯之妻的胸中恨意，更何况他的个性又是满不在乎的类型。不过，是否仍任由“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继续扩大，这是一个攸关帝国稳定的重大政治课题。这次审判堪称审判之典范，可以说是罗马人对法律创始人精神原貌的再现，也因此产生了事后要对这个“神话”加以干预的必要。

皮索审判之后不几日，元老院提议，让在审判中慷慨陈词的告发者凯奇纳、维拉尼斯和维特里乌斯出任祭司，提比略予以同意。原本属于骑士阶级的这3名日耳曼尼库斯的部属，被任命为原本只有元老院阶级出任的祭司一职，这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也是元老院怀柔日耳曼尼库斯旧部的一项措施。此后，这3人得到了提比略的重任，特别是维特里乌斯，当罗马又面临必须在东方地区进行重整的时候，提比略赋予他与日耳曼尼库斯公元17年出使东方时一样的权力。如果这只是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派的人员进行怀柔，那将他们提拔成祭司也就可以了。然而，提比略后来对他们的重用，证明他知人善任的一面，也再一次证明提比略绝非率性而为的人。

阿格里皮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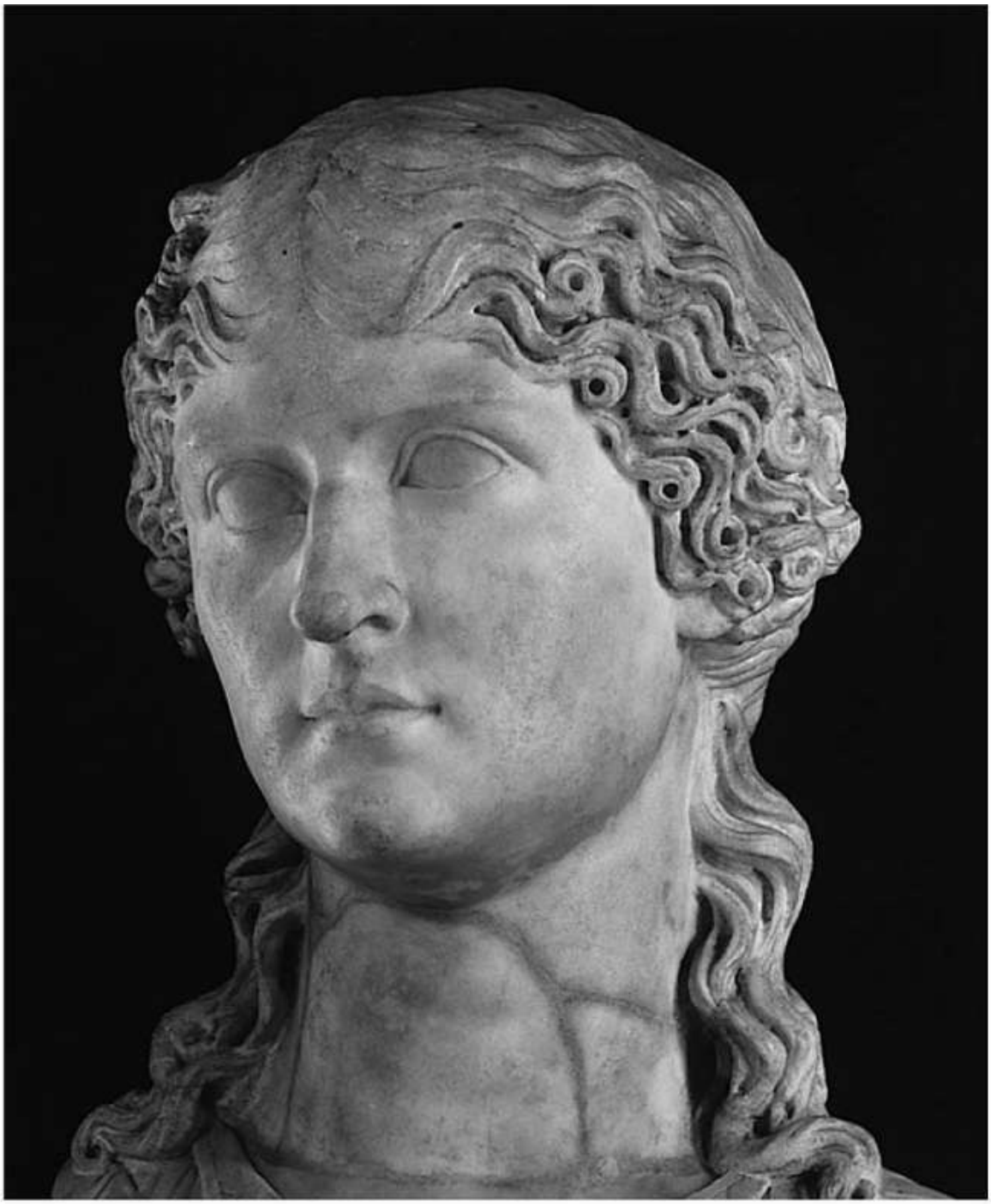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驾鹤西去之后，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成了尤里乌斯一门的恺撒家族的族长。在把日耳曼尼库斯纳为养子一事上，提比略也同样遵从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依照罗马法规定，家长权力大到可以掌握家族人员的生死，但与此同时也肩负了保护家族的重任。而当他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离世后，作为罗马法律上的祖父，提比略也把保护日耳曼尼库斯子孙的重担接了过来。

陪伴着已故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提比略来到了元老院，在经过一番说明之后，提比略希望元老院议员给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特殊关照。虽然尼禄·恺撒已完成了他的成年礼，然而年纪仅为14岁，离担

任公职时间还很长。在罗马，必须到25岁才有资格担任账务监察官员一类的重要公职。此外，具有一些基层公职的经验，也是成为账务监察官候选人的条件。对此，提比略向元老院提出了特殊关照：其一，免除尼禄基层公职的经验；其二，承认尼禄在达到资格年龄的5年前，即20岁时可竞选账务监察官。

想必在场的元老院议员们，很快就领会了提比略提出这些请求的盘算。提比略向来喜欢大家称呼他为“第一公民”而非皇帝，即使这种叫法有些伪善。提比略继位后一直致力于与元老院协调步伐，并且忠实继承了奥古斯都仍旧想把帝国最高统治权留在尤里乌斯家族的遗愿。所以，元老院议员们都感受到了提比略的用意，于是同意了这项请求。表面上是共和体制的罗马，但葫芦里卖的还是君主专制的药，这是既成事实。

哪怕是尤里乌斯家族中的一员，但只要跟公职沾上了边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同意，这就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的基本模式。针对里面的内涵，即使是奥古斯都也未对罗马历来的家长制进行修改。正因为如此，提比略行使了这一家长权，决定了尼禄的婚事。女方是杜路苏斯的女儿尤利娅。因为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妻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所以尼禄·恺撒等于是跟姑妈之女订婚。对于这种安排，罗马民众相当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值得尊崇的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孤，也因为这项婚约得到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即使如此，也无法抹灭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仇恨。因为，公元21年，执政官换届，虽然提比略无意连任，但仍然与杜路苏斯一起被推举为候选人，并双双获胜当上了新一届的执政官。显而易见，提比略的精心算计，都是为了提高杜路苏斯的权威而采用的手法，父子两人都如愿以偿当上执政官。公元19年，是提比略前次担任执政官的时间，而另一名执政官正是日耳曼尼库斯。在阿格里皮娜看来，亲生儿子尼禄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正不断下降。



阿格里皮娜

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已经62岁了，即使现在他发生什么意外也并不会影响罗马政局。此时尼禄15岁，而杜路苏斯33岁。如若希望皇位顺利交接以确保政局稳定的话，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按照提比略——杜路苏斯

——尼禄这种顺序。可是阿格里皮娜对看重血缘关系这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两年前杜路苏斯得到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然而其中一个早夭，可另外一个已2岁。对于提比略来说，这是他的长孙。阿格里皮娜非常担心原本应该由自己儿子继承的皇位，就此被提比略家族抢走。在阿格里皮娜看来，血缘名分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如今的继承人与奥古斯都生前的希望背道而驰。这个2岁的孩子相当于阿格里皮娜小姑子的儿子，可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杜路苏斯，却从未出现在奥古斯都在世时皇位继承人名单中。

阿格里皮娜想到这件事，满脑子就被偏执的念头所占据。此前的仇恨加上如今的担忧，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敌意无以复加，发展到最后演变成了可称为“阿格里皮娜派”的党派。然而，在公元21年，这个党派还未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相结合。因为，当时这只不过是一群围在阿格里皮娜身边对提比略满腹牢骚的女人罢了。

要集结这么多对提比略发牢骚的女人，事实上并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罗马上流社会，提比略向来不讨女人喜欢。在提比略36岁那年与其妻尤利娅离婚后，在这将近30年里，提比略对女人更是不闻不问。如果提比略真的有情人，喜好八卦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就绝对不会不去刨根问底，所以可以断言提比略并没有拈花惹草这种习性。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不适合当丈夫的人也没有什么大碍，可他的行为确实也让女人们捉摸不透。从提比略的生活方式来看，他不参加聚会、不喜欢游乐，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禁欲主义者”，大概这些都是提比略不讨女人喜欢的缘由。

当然，提比略也并非同性恋，并非不会对女性产生情愫之人。也许提比略心目中的唯一爱人，就是其子杜路苏斯的母亲维普萨尼娅，但奥古斯都为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尤利娅结成连理，却命令他与维普萨尼娅离婚。直到公元20年维普萨尼娅离世，提比略与维普萨尼娅只是偶然才会遇到，她更是小心翼翼避开提比略。不难想象，萦绕在提比略脑海中

的，应该是30年前两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公元21年，提比略登基后初次离开首都罗马。并非外地有等着他前去处理的事务，而是他想向世间宣告，同任执政官的儿子杜路苏斯将会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想借此机会让杜路苏斯积累最高领袖的历练。从提比略一直待在经阿皮亚大道就可以到达首都的那不勒斯近郊，可看出他此次离开的意图。

当然，33岁的杜路苏斯也的确非常有能力。在元老院年轻一辈与年长者之间的分化愈演愈烈时，身为年轻一辈带头人物的他成功地化解了双方的对立。此外，他还在公共事业中肃清承包商不法行为。除了军团士兵负责的一般道路之外，在大多数都承包给私营“企业”的罗马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系统中，招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中标的民间企业容易相互勾结。杜路苏斯身为执政官，对此疾恶如仇，对双方都提出了控告，取缔了这样的不法行为，重新将竞争规则导入企业之间的运营。这样一来，因不法行为而膨胀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开销也得到了大幅缩减。

然而，事关帝国的运营，单靠在罗马帝国高级职位的执政官并不能尽善处理。特别是在维持帝国和平问题上，罗马帝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提比略必须亲自处理。负责处理北非和高卢暴乱的不是执政官，而是提比略本人。

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此时的提比略必须作出选择，是应该回到首都亲自进行指挥，还是继续留在那不勒斯附近，在远处对此事进行指挥。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提比略选择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不得不立即展开对情报的收集，并建立一个上下通畅的指挥系统。提比略在这方面的才华可以说十分完美。他将从全国收集来的情报作为参考，作出恰当的指示或建议写在书信中。手持书信的信差，一直快马加鞭地往返于阿皮亚大道。

沙漠游牧民族

北非骚乱，指的是曾效力于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并拥有相当丰富的军队历练的塔克法里纳斯，率领沙漠游牧民族侵略罗马行省的骚乱。在这些沙漠游牧民族看来，罗马扩大耕地的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原来喜欢四处游牧的民族，总是会对农耕民族产生仇恨。而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存模式，就是掠夺农耕民族。

罗马帝国为了提防游牧民族的侵袭在此派驻了一个军团。这一地区，即包括现今的突尼斯与利比亚的阿非利加行省属于元老院管辖，也即元老院行省，行省的总督也是由元老院议员互相举荐而担任。当然，这也是奥古斯都深谋远虑的一个实例，由元老院议员选派的新总督前往行省进行治理时，其实他并没有获得军团的指挥权。就算政治由他负责，但在军事上则无权过问。即使当地有常年驻守的军团，其指挥权也在皇帝任命的军团长手里。换言之，奥古斯都实际上也凭借将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文武官员，实行权力分管、相互制约的方法，以达到强化皇权这一目的。

当然，奥古斯都打造的上述体制，唯有在没有内忧外患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效用。先前，可能成为内忧的迦太基居民，通过重建首都海港城市迦太基，以及修建水道、街道等其他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城市的罗马化，因此对罗马造成不了威胁。而谈到外患，只要东边的埃及与西边的毛里塔尼亚处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就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现在罗马帝国只剩下南边的敌人令人十分担忧。所谓南边的敌人，指的就是沙漠游牧民族。不过，只要他们没有能干的领袖，在罗马人眼中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强盗。只要完成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警察的任务，只需要1个军团加上后援部队不足1万人的兵力，就足够抵御这些人的袭击了。

熟知罗马军队作战方式的塔克法里纳斯掌控这些沙漠游牧民族之后，原本各自为政的强盗群体，现今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恐怕以警察

这种程度的防御就难以加以控制了。提比略掌握到这一情况之后，早在两年前就从驻扎在多瑙河的军队中抽调了1个军团驻守在北非。这样也许就能把塔克法里纳斯赶进沙漠，然而，在支援的军团离开非洲后，沙漠游牧民族又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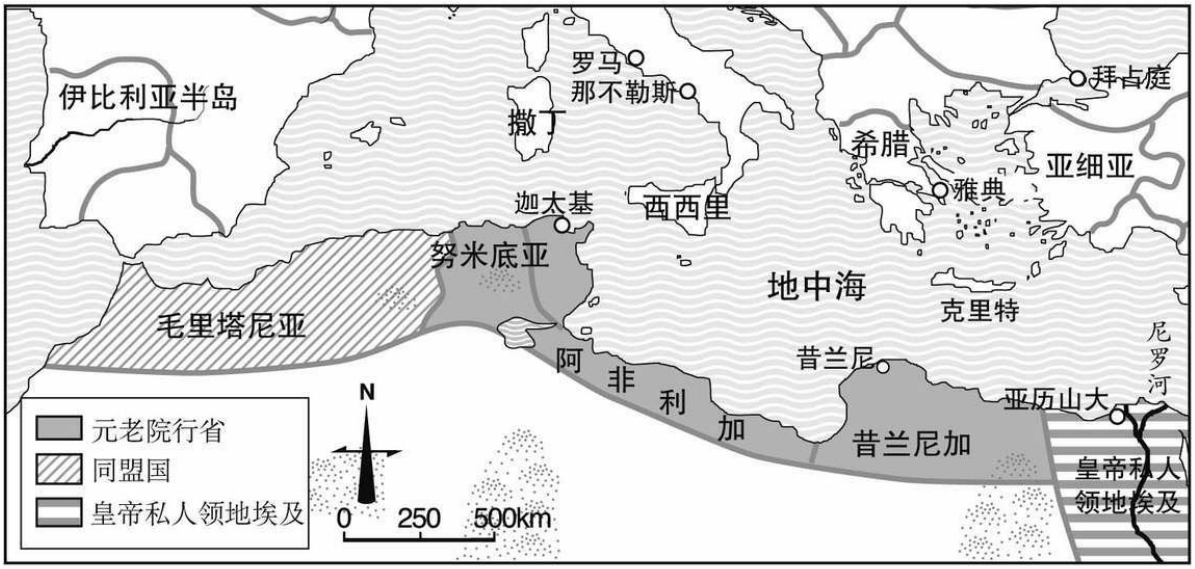
直到公元21年，提比略才下定了要彻底解决沙漠游牧民族问题的决心。然而，提比略希望不增加军费，也不准备扩充负责整个帝国防御的25个军团，也没打算抽调其中的一个军团派驻北非。因此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北非行省问题，提比略仅在此地、此时（直至此问题得到完美解决）妥协地修改原本文武分管的制度。他将有军团指挥权的总督派遣前往当地，把原为军团长的任务——制定抵抗侵略者政策，移交给了总督。

如此这般，北非行省内的指挥系统得到了统一，以政治和军事互相结合的形式来全面抵御沙漠游牧民族。当然，这种体制与莱茵河前线、多瑙河前线、面对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等皇帝行省的体制相同，这些防线经常与敌人对峙。不过有差异的是，北非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而非提比略握有决定权的皇帝行省。于是，提比略向元老院请求，希望从中选出一位能当此大任的总督人选，以行使当地罗马军队的指挥权。

元老院围绕提比略的要求反复商讨，虽然过程十分热烈，却始终没能锁定一位合适的人选。其实元老院议员们心中的算盘跟以前一样，都希望住在海港城市迦太基这样一个舒适的总督官邸里，至于那沙漠里的帐篷，则能不去就不去。最后结果，竟是提比略获得了完全委托给皇帝处理这样的答复。

但是，提比略当然不会独自处理这个问题，随后又列举了两位元老院议员，也正是提比略心目中的军事才华横溢的议员，要求元老院从中作出选择。被提名的两人——雷必达和普拉耶苏斯，当然，他们也拥有在元老院会场中发表意见的权力。雷必达，这位出身于从共和制时代起就声名显赫家族的议员，他以身体抱恙、女儿还待字闺中为由拒绝了这

项差事。当然，他不忘赞美普拉耶苏斯，认为他更能胜任此职。至于新任的元老院议员普拉耶苏斯，似乎觉得临阵脱逃会让人觉得他胆小畏缩，既然被提名，也就点头应诺了。不出所料，心中落下块大石头的议员们，立刻愉快地把票都投给了普拉耶苏斯。这样一来，解决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难题，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只要方针政策正确，依罗马的军事实力，要解决这些游牧民族，剩下的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果不其然，两年后，遁地无门的塔克法里纳斯战败而亡，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骚乱也就冰消瓦解了。



北非

德鲁伊特教

与此同时，高卢行省也发生了叛乱。高卢行省发生的叛乱并不是因为外敌的入侵所致，招致民众不满的高额贷款利率是罪魁祸首。在罗马帝国本土利率上线被设定在12%，行省却没有对此设限。姑且不论70年前恺撒时代贪图48%高利率的布鲁图，在经济学理论上，投资被视为“高风险”的皇帝行省金融市场，得到“高收益”也是值得期待的。在罗

马化程度稳步推行、属于元老院行省比较安全的法国南部地区，却并没有发生叛乱。显而易见，南法行省与罗马帝国本土相同，在金融方面都是“低风险低收益”地区。

70年前高卢行省也出现过叛乱，但被恺撒镇压了。公元21年，叛乱再度爆发，虽说此次叛乱是由被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的民族引起的，但实际上他们到处借贷的痛苦，刨根究底是由罗马征收的行省税所致，所以把矛头指向罗马中央政府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叛乱主谋都有一名尤里乌斯，他们都拥有罗马公民权。

当时称霸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以长远的眼光确立了高卢将来的统治模式，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给予被征服的部族首领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家族姓名与罗马公民权。按照罗马式的思维来理解，赠与自己的家族姓名，就意味着把他们收为自己的“被保护人”。时髦的说法，也即“开分店”、“召集喽啰”。受此恩惠，“长发高卢”的领导阶层，都冠以尤里乌斯的姓氏，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公民。无论罗马公民权还是“被保护人”的关系，都是可以世袭的权利和义务。公元21年，发动叛乱的3个主谋都是名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也并不意味着恺撒的高卢政策有问题，因为只有东部的“尤里乌斯”发动叛乱，西部和南部的高卢人并未起来反抗。

可是，反抗罗马帝国的叛乱为何由东高卢而起？如若贷款的利率过高、矛盾重重，那么暂不考虑罗马化进程较快的南法地区，为何与东高卢罗马化程度相近的西高卢却并未发生叛乱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当时记载的片段来推测。然而，我认为，在由学生引发叛乱的背后，其实高卢宗教界的祭司阶层也参与其中。

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对高卢进行重新划分时，把“长发高卢”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族的首都比布拉克特（今欧坦），发展成为一个学问之

都。当然，如若把它称为大学城的话，则稍有不妥。感觉上这里的性质更接近于中学以及大专。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在于此地的教育机构，目的在于为高卢的优秀学子提供较高等的教育，而想要继续深造的，罗马、雅典、罗得岛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可以远赴这些地方求学。

其实，奥古斯都不是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也并非对于教育抱有热忱，他只是想从一手掌握高卢的宗教、司法、教育的民族宗教祭司德鲁伊特手中夺回教育的权力。学习希腊、罗马式的思想正是当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提及司法，则是由被罗马派遣的行省总督负责，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项权力也从德鲁伊特手里争取了过来。与罗马不同，高卢有被称为德鲁伊特的独立祭司阶层，而这些祭司拥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垄断了宗教、司法与教育权。

但是，对德鲁伊特的干预，奥古斯都没有就此罢休，虽然并没有对德鲁伊特教施行镇压，但严禁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皈依这个宗教。罗马人对于容许实施活人祭奠的宗教，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是迦太基人的宗教，都非常讨厌，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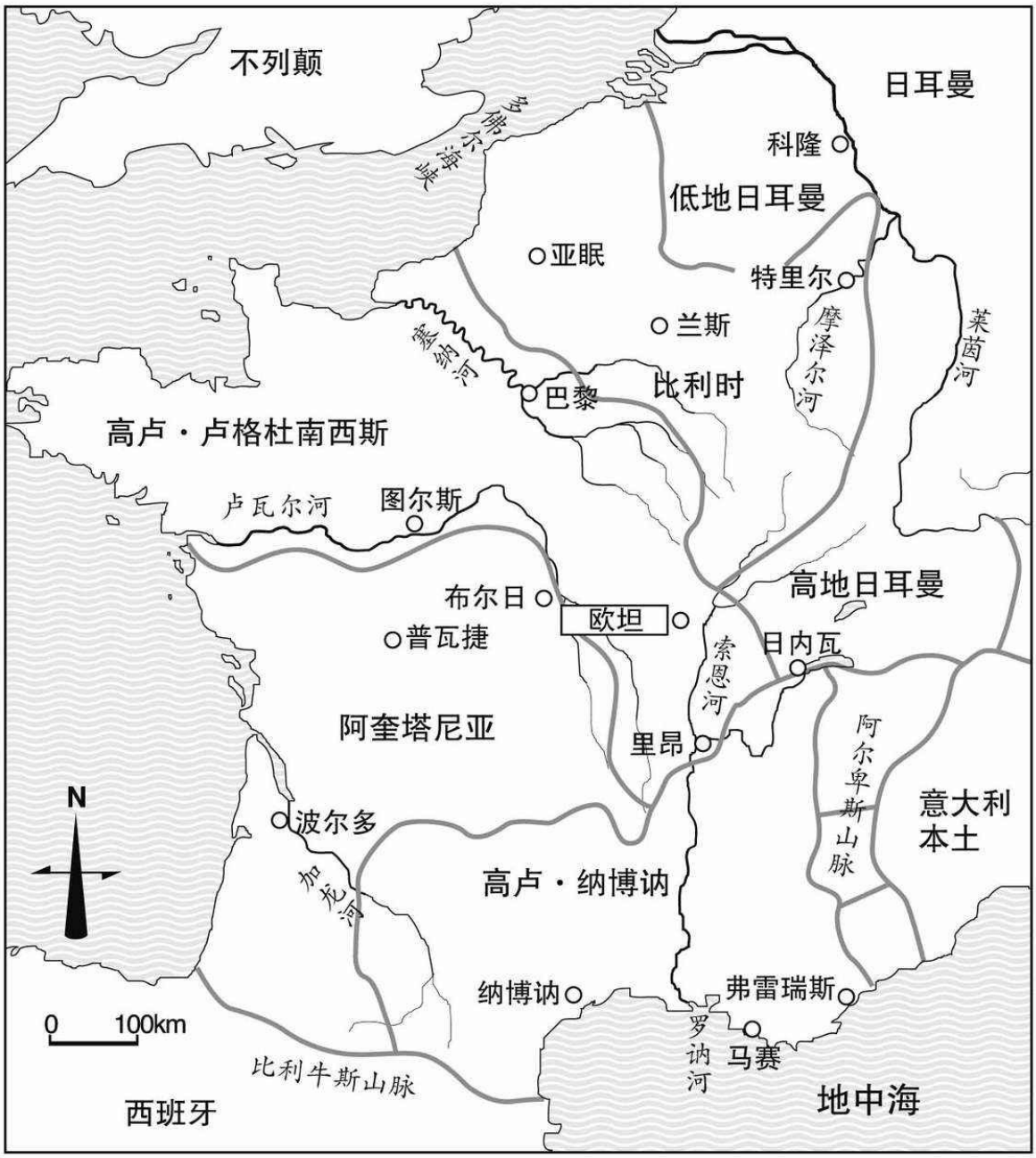
由于高卢几乎所有领导阶层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出台这项禁令，使得高卢的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在高卢领导阶层中的影响力顿失。在攸关生死存亡之际，祭司们想到了把宗教和高卢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而祭司们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牵连到这一场冲突中来，非常容易。如此这般，对高利贷的愤怒与高卢民族主义相结合，演化成为高卢东部地区欧坦城发生叛乱的导火索。然而，造反者的盘算也出现了失误。

祭司们第一个失误在于，他们预测罗马帝国的莱茵军团放弃了征服日耳曼，日耳曼尼库斯也被改派到东方之后，就变成一个不再设有皇族总司令的莱茵河防御军团，肯定会导致乱无军纪、士兵们厌战。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被证明错得十分离谱。由于提比略在此地精心布局，军团长并非依出身定职，都是能力超群的将才。基地牢固之后，无论是设备

还是功效，都会相比日耳曼战役时有很大的提升。并且，军团自身的任务，不只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而担任军务的士兵们不仅要防御日耳曼人的侵略，还要在后方稳定高卢的政局。所以，遇到任何骚乱，还未等提比略的命令下达，他们早就起身镇压去了。

祭司们第二个失误在于，他们误认为，和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一同从事军务的辅助部队中，那些高卢出生的士兵如若知道高卢人起事，一定会抛弃罗马的军队投身这边来。实际上，罗马军团中被送至镇压起义前线的高卢士兵根本就不为所动，他们毫不犹豫地挥刀砍向造反的高卢人。

祭司们的第三个失误在于，他们在不寄希望于南法地区的情况下，竟然连高卢西部与高卢北部都没有一起起兵就立即起事。可想而知，公元21年的叛乱就只局限在高卢东部。其中叛乱方作出的最不妥当的安排就是，他们叛乱的地点，居然离罗马帝国莱茵河驻军近在咫尺。



高卢全境

祭司们第四个失误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拥有罗马军队最高司令权的提比略年事已高，又身在罗马之外。他们深信，待在气候温暖的南意大利的这个垂老的皇帝，想必早已荒废了他的政务。当然，发生这种失误

也在所难免，因为就连首都的罗马人都这样认为，并对他横加指责。

但是，高卢的叛乱分子与罗马人不知就里的是，提比略是一个十分重视承担责任的人，喜欢安排部下各司其职。提比略的确不在首都，他的情报却是源源不断，却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镇压这起叛乱的主导权，提比略全权交付给了莱茵河防线的两名军团长。

在镇压东高卢的叛乱上，这两位军团长实际只动用了8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加上辅助兵共2.5万人。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击败了超过4万名的叛军。身为主谋者的3个“尤里乌斯”都自尽身亡，许多被他们蛊惑的学生也大多死于非命。

提比略在平定叛乱后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战斗的始末，就连反提比略派的塔西佗也评价是一份“毫不隐瞒、毫无夸大”兼具客观性的报告。在书信中，提比略把能迅速成功平定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军团长们的责任感与杰出的能力。对他明知发生叛乱却不肯回罗马坐镇，甚至连杜路苏斯也待在罗马不曾前往前线一步的指责，提比略这样辩解道：

“若因一两个民众的叛乱就手忙脚乱，实在有辱最高领导者的德行。此外，离开统治世界的罗马城赶赴前线，简直是遭人耻笑的事。”

罗马军队镇压高卢叛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于是，元老院对为全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提比略举行凯旋仪式一事给予了应许。这种拉丁语称为“欢迎”（ovatio）的仪式，胜利者是骑马接受庆祝的，这比坐在4匹马拉战车出席的“凯旋”（triumphus）仪式规格要低一些。

时年63岁的提比略当即上书元老院，表示感谢。信中他这样写道：

在面对比高卢更加善战的日耳曼民族时，罗马军队从未尝败绩。我年轻时也获得过不计其数的“凯旋”荣誉。即使如今我已年

迈，还是欢喜地接受这种能在罗马城中骑马凯旋的欢迎方式。但对此并不是出于我对荣誉的渴望。

提比略的性格就是喜欢在适当的时候挖苦对方几句。

叛乱中成为学生根据地的欧坦城的学校，后来并未被封锁。虽然史书未记载叛乱平息后的贷款利率是否降低，然而，史书上再也没有“长发高卢”人发泄不满情绪的记录，大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吧。

史书记载欧坦城中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件史实，就是提比略把“德鲁伊特”全部赶出高卢一事。高卢（希腊语读做凯尔特）的祭司们只好逃亡到了不列颠（今英国）。下面可能是一些玩笑话，以圆桌骑士而闻名的亚瑟王孩提时代的教师——魔法师梅林，据说就是一位德鲁伊特祭司。

宗教观念

从现代版图来看，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荷兰东部和德国西部都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地区。在我看来，在叙述了祭司德鲁伊特被从这一大片区域驱逐出高卢后，也有必要来了解皇帝提比略的宗教观念。虽然，这与提比略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他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已经开始传教，在提比略的统治接近尾声时，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先说结论，那么，我认为提比略若是知道耶稣基督说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一句名言，那么他一定会是第一个对此表示赞同的人。不论是尤里乌斯·恺撒，还是奥古斯都，他们看来政教分离不过是个常理，没必要刨根问底。若是他们俩在生前就知道死后会被当做神明，也不会觉得别扭吧。多神教的神明与一神教的神明，不同

之处在于，后者连信众的生活方式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他们就只是庇护世人这单一的角色。开辟通往元首制道路的恺撒，与随后将这条路高速公路化的奥古斯都，两者想必都很适合保护走在这条路上的罗马人。维修这条高速公路却是交给提比略的工作，不论谁来继承他的职责，就是保证高速公路不能沦为乡间小道。显而易见，其辛苦程度完全不逊于前者，但任务的性质迥异，当然，提比略对此比谁都更加清楚。

正是这个提比略，对任何神化他的举动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可谓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对于元老院仿照把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的先例，把9月改为提比略的提议，他断然拒绝，也拒绝了“国父”称号。至于在神殿中设立他的塑像的提议，他也以觉得没有一定的政治必要为理由，予以否决。当然，提比略只接受了神化皇帝习俗历史悠久的东方行省的做法，其余一概没有同意。他也不准亲生母亲莉薇娅的地位和待遇，超出先太后的规格。直到离世，他始终保持总归一死的凡人心态。何况一生都贯彻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竟是大祭司——罗马宗教界的第一人。此外，在罗马的宗教史上，自始至终都不曾有过独立的祭司阶层。我认为没有比这两件事更能体现罗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的例子了。所以在罗马，政教分离一直被认为是不辩自明的道理，也是理所当然的。

众神的责任在于保护个人，对个人集结成的共同体（Les public）的“保护”，则变成了政治任务。因此，只要不成为引发社会不安的因素，承认宗教自由也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成为罗马领导人一贯的宗教观念。

3个世纪前，在不曾有人幻想过元首制的共和制年代，从希腊传来的一种叫狄俄尼索斯（酒神）信仰的宗教俘获了罗马女性的心灵。这是一种提倡畅饮葡萄酒、酒醉后狂欢却算不上犯罪的宗教。元老院却以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为由，强制进行打压，并将其彻底肃清。罗马帝国在不断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让相继纳入其霸权之下的各民族的神明也

进入了自己的体系。即使罗马人自己并未皈依，但也允许信徒们建造礼拜堂与神殿。越来越多的不同信仰的人搬到首都罗马，自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在公元前后的100年内，大概是恺撒与奥古斯都的时代，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宗教观念最为开放。在首都罗马，埃及教、犹太教都有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这也是宗教很守本分，并没有打算染指皇帝的权责范围内的缘故。

提比略面对这样的宗教观念，也和先前的恺撒与奥古斯都一样，都属于合理主义者。当台伯河河水泛滥，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城中心被淹之际，惊慌失措的元老院提议打开西比拉的神书，向神明求救。提比略却认为解决洪水问题是人的责任，并未赞同此举，同时要求元老院成立对策委员会应对洪水灾害。就算是对于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合理主义仍然是提比略行事的准则。所以，提比略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发生。

有一年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举行了一个活动，在提比略看来这已经算染指政治领域了。对此，提比略发布了临时命令，把4000名罗马的年轻犹太人送往撒丁岛，让他们去承担防御强盗的差事，并把其他犹太人赶出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之后临时命令才能上升为法律，提比略却没有向元老院提出要求，或许提比略只是想通过这一时的手段暂时压制这场活动吧。实际上，时隔数年后，犹太人再度回到罗马聚居，建成了犹太社区。罗马的犹太人被驱逐之时，提比略仍旧沿用奥古斯都的政策对待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比如，提比略并没有废除犹太教徒将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耶路撒冷神殿的做法。此外，犹太教徒也不用在罗马军队服兵役，因为犹太教徒一旦去当兵，就必须对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效忠，这必将打破他们唯一忠于犹太神的誓言。而提比略对于那些舍弃了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也允许他们服兵役，并且可以在军中担任公职。实际上，甚至有犹太人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晋升到埃及长官一职。

实际上，以可能造成社会不稳为由而被赶出意大利的，不仅仅是犹

太教徒。在这一时期，埃及的伊希斯教徒也被驱逐出境。而他们被驱逐的原因，是他们以捐款的名义要求信徒掏钱的行径被认为超过了界限。的确，当地曾经发生过很多因捐献的香油钱过多，而对伊希斯教提出控诉的家庭。同样受到责难的还有占星师，当他们发誓以后绝对不再收取报酬后，才被免予处罚。

从上述的种种可以看出，提比略虽然承认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极其讨厌将不信教的人也卷入宗教的做法。也正是这位提比略，却接受了犹太人聚居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社区提出的要求，允许他们保持犹太式的审判方式，甚至承认了仅限于他们内部的司法权。多元宗教繁生的罗马帝国，如若所有的民族都能遵守“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信念，那么，最为高兴的当属罗马皇帝们，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例外。

灾害对策

公元22年，提比略请求元老院授予其子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在给元老院的书信中，他罗列了如下几条：首先，他给出客观评价，称赞了杜路苏斯的能力，中肯的语气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出自亲生父亲之口。其次，提到杜路苏斯幸福的婚姻生活，而且杜路苏斯现已有3个孩子，这与当年提比略从奥古斯都手中接掌大权时相仿。再次，提比略陈述了杜路苏斯历时8年的边境防卫军团长历练，也曾获得过凯旋仪式的荣誉，并两次担任执政官。提比略还提到，从上面举的例子可看出推举杜路苏斯是非常正确的，并非临时起意。最后，提比略认为如若元老院同意请求，并授予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杜路苏斯必将勇敢挑起治理帝国的重任。

对于提比略的请求，元老院毫无异议。时年63岁的提比略为了实现帝国政权的平稳交接，正式完成了接班人的指定工作。杜路苏斯时年34

岁。

看似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然而后面的工作还有许多。不仅皇位继承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承认，而且，遴选皇位继承人也得经过元老院认可，否则皇帝的政令也不过是临时性办法。如果要成为长久实施的政策，就必须经过元老院这一关，否则还是无法实现它的法律化。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元首制。对于中国的皇帝而言，要当上罗马皇帝真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此外，罗马皇帝与波斯等东方的君主制相比，只有用上“罗马式”这个形容词，才更能表达这种制度的真正内涵。

那么，皇帝应该怎样去处理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变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奥古斯都在与元老院打交道一事上花费了一番功夫，当然，提比略对此也是颇费周折。

元老院设定的议员总人数是以600人为上限，由于多数的议员因公务游走在罗马帝国四面八方，但最后的决议，也仍然需由400到500位议员经过反复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然而，耗时冗长的讨论也时有发生，而且结论也是迟迟才能推出。元老院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就好似报废了的机器一样，功效顿失。正因为如此，提比略才会想到采用人数较少的委员会这种模式解决难题。由他设置5至10人的议员组成对策委员会，在及时地讨论了提案之后，马上作出应对之策。此外，委员会的这些议员们不仅承担决策义务，还得亲自前往事发地，把解决方案负责执行。当罗马帝国遇到地震或火灾等灾害问题时，委员会在其处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公元17年，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南部地区遭遇了大地震。而强地震之后的火灾使得灾情愈发严重，位于震区的萨迪斯、马格尼西亚与菲拉德菲亚等城市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就连名城以弗所也没能逃脱余震的破坏。这些属于元老院直接管辖的“亚细亚行省”地区，通常都要经过元老院的商讨才能拟定对策交付办理，然而在如今的灾情威胁之下，拿出对策刻不容缓。

提比略在获得灾情报告后，马上要求成立应急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对他提出的对策进行及时的决断。

一、为实施紧急援助及重建基础设施，从国库拿出1亿塞斯特斯进行救援。

二、对灾区受灾的人民，免征行省税5年。

1亿塞斯特斯有多少钱呢？这个数字相当于保卫罗马帝国的全部军队一年工资的一半。第二条的行省税，现在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国税与地方税。

帝国负责紧急援助及社会资本的重建，就是提比略的灾害对策的核心思想。然而，由于帝国免除了受灾人民5年的行省税，所以个人家庭的重建只能依靠自身。

由提比略创设的灾害对策不止一次发挥了效用，即使是在后世的罗马皇帝当政期间，如果遇到天灾，还是沿用了同样的办法。然而，受灾情况的大小，决定了紧急援助的金额与免征行省税的时间长短。可是，免税时间都不会少于3年。而提比略的救灾对策之所以能成为典范，受后人顶礼膜拜，是因为公元17年小亚细亚南部的重建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传闻，灾区萨迪斯城在3年之内就完成复兴，而当地人民3年内就恢复了缴税能力。

儿子之死

然而，就在小亚细亚灾区重建工作稳步推行，战胜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后的工作日益走上正轨，国内外一片安详的公元23年，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乎提比略预料的不幸事件——刚被罗马人公认为继承人的杜路苏斯突然去世。不难想象，对于一位64岁的父亲而言，35岁的儿子离世是多

么沉重的打击。贵为皇帝，提比略失去的是帝国的继承人，然而，这又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出席葬礼就能解决的问题。提比略不曾生病，有着非常健壮的身体，可是他已经64岁了，按罗马60岁老年的标准他已超过了4岁。

站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的提比略完全不像一位刚痛失爱子的父亲，他以一贯冷峻严肃的态度将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托付给了元老院。他请求所有元老院议员能把17岁的尼禄·恺撒与16岁的杜路苏斯·恺撒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进行照顾。

对于那些希望罗马帝国由流着奥古斯都之血的人来继承的人而言，提比略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大政奉还”。有很多人对此欢喜异常，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正是阿格里皮娜，她的身份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尼禄·恺撒与杜路苏斯·恺撒的母亲。

若阿格里皮娜是个聪明有头脑的女人，这种时候她就应比杜路苏斯在世时更谨言慎行。随着提比略年事已高，只需要耐心等待，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很快就会继位。然而，阿格里皮娜却在此时蠢蠢欲动。

阿格里皮娜煽动此前反对提比略的妇女们，共同形成了反提比略派，并把这股势力引往罗马男人的世界中。只要敬仰日耳曼尼库斯的男人都加入其中，这将无异于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合流。当见到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以皇位继承人身份游街时，阿格里皮娜被仇恨吞噬；看到杜路苏斯之死，她心中又多增加了一分欣喜与傲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阿格里皮娜认为提比略已经无牌可出。

然而，此时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阻碍了阿格里皮娜的计划。此人就是与阿格里皮娜同住在帕拉蒂尼山孤独生活的莉薇娅。拥有“国母”称号的莉薇娅是神君奥古斯都之妻。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在皇族内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对于阿格里皮娜而言，莉薇娅既是已故丈夫的亲生祖母，又是让他深恶痛绝的提比略的亲生母亲。众多现代学者

认为，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阿格里皮娜派，与其说是为了推翻提比略以使儿子继位，不如说是阿格里皮娜为巩固儿子地位，把继承皇位的这种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提比略是如何看待阿格里皮娜的这种种举动呢？或许，他认为阿格里皮娜只是在等待他的离世。就在提比略之子离世的这一年年末，这位64岁的皇帝又失去了4岁双胞胎孙子中仅存的一个。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提比略对于皇帝的责任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为什么是这样呢？显然分担提比略部分工作的人都驾鹤西去，提比略埋头案间，应该可以暂时忘却个人的不幸与伤悲吧。在其子死后，对于帝国最有权力的提比略而言，应当是比以前更加繁忙和充实了吧。

安全防卫

第一个建设街道的民族并非罗马人，但不仅仅建一条街道，而是将其阡陌纵横、连成网络，提高运输效率，并且付诸实践的却是罗马人。第一个制定法律的民族也并非罗马人，然而，最先想到把法律分为各种部门，形成法律体系，建成法治国家，发挥效用且付诸实现的也是罗马人。这两个事例共同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顺应实际要求、及时作出“维护”，以避免功能退化这样的人类社会的现实规则。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对法律进行修订，就是法律上“维护”的真正含义。对于法律体系的创始人是罗马人的说法无人质疑，然而，罗马人从未认为法律被制定后就要一成不变地捍卫到底。“法律”也应当像街道一样，适时作出必要的“维修”。这种理论适用于各种体制。换言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体制，都应该符合实际地作出“维修”，如果疏于“维修”，体制本身也会出现疲劳，直至最后崩溃。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经济的。对功能的不懈追求，就是只有通过对既有的力量高效且灵活、巧妙地加以运用，才可能达成目标。正是这种被称为罗马人“哲学”的理论，也正是这种“从自身做起”的精神，才使得罗马人战胜了与自己势均力敌的迦太基和希

腊。在罗马人看来，就算是神君奥古斯都创设的体制，也绝非一成不变。对于从奥古斯都时代传承下来的体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这种做法，本身与继承奥古斯都的传统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修改，才能永远维持创设者本人的意图。这样一个只要作出适时“修改”就能维持其效用的体制，对于体制的创设者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显而易见，这说明了他已经完美地将雏形制造了出来。在这方面奥古斯都的才能，确实是值得单独提出加以赞赏的。

然而，“维修”一事并非是交给谁都可以完成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懂得在什么地方修改，懂得如何保持系统的运作，懂得如何维持功能，以及在实行过程中具有决断力与执行力。从这方面来看，提比略的确是自恺撒以来最适合担任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的人选，对此，现代的研究者也没有任何异议。这种“修改”的最好例证，就是以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目的对防御系统进行的调整。

提比略对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后定下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没有进行更改。也就是说，也许是出于对公元1世纪当时的人力与经济实力的考虑，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由25个军团、15万罗马公民组成的主要兵力，加上不足15万行省人民所组成的辅助部队，总计近30万军人来保障国家安全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而提比略对这种形态也没有加以改变。就连《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记述的军团分布的情况，在14年后的公元23年，也没有重新布防。提比略只是重新调整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前线的几处驻守兵团的任务。

在罗马帝国莱茵河前线，驻扎在上游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与驻扎在下游的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总计8个军团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以征服日耳曼、将霸权推进至易北河为目的，防守莱茵河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对于8个军团的数目，提比略并没有进行增减。而继续对他们冠以“日耳曼军团”的名称，对高卢也能产生心理上的安抚。罗马仅仅在里昂驻扎了1000名士兵，以

维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安全。提比略完全放弃易北河、撤回莱茵河这个决定，单从推进高卢罗马化这一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如若高卢发生骚乱，而8个军团从易北河撤回的话，从时间上讲根本就来不及。

提比略对多瑙河南岸一线的7个军团的布防也未进行调整。这里的局势比起莱茵河前线更加复杂多变。

在莱茵河前线方面，决定把此地设为帝国防线的恺撒，已经完全征服了直至莱茵河的全部地域，所以提比略只要防御好不失守就算完成了任务。在多瑙河前线，恺撒也曾设想把这里作为帝国防线，但在着手实施前就遇害身亡，所以后续工作实际上是由奥古斯都来完成的。由于奥古斯都并非那种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领袖，所以战斗任务就交给了阿格里帕，而阿格里帕死后则由提比略接任。虽然两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将军，却并非如恺撒一般有天赋。多瑙河防线的最终确立，是依靠一城一池的速度缓慢推进的，如果从刚开始的年代算起的话，前后花费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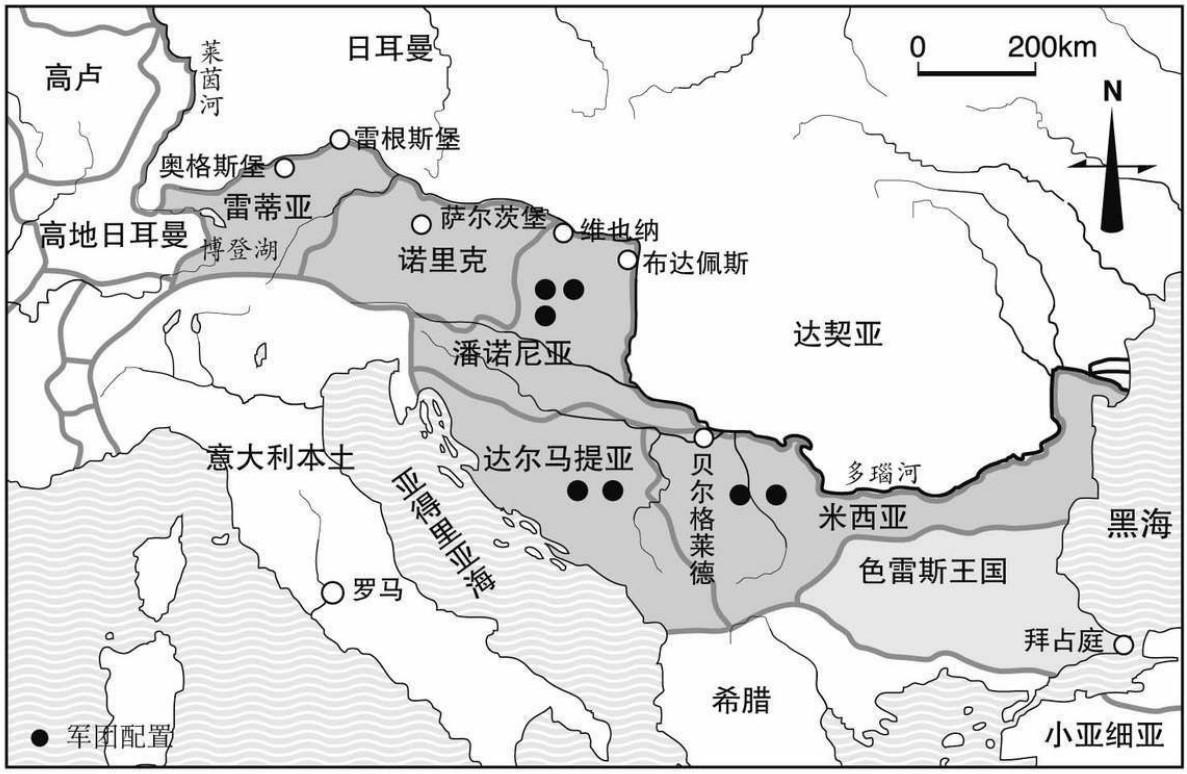
对于多瑙河防线，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这样写道："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眼中，多瑙河是'政治上的国界'而非'军事上的国界'。"言外之意，虽然多瑙河被确定为防卫线，罗马帝国事实上却没有完成到多瑙河为止的疆域的霸权事业。蒙森还提到，当时的多瑙河就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易北河，也不过是地图上的国界罢了。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被纳入罗马帝国也是提比略时代之后的事情了。

虽然罗马史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且蒙森根本没有单独拿出来叙述的必要，但是在罗马人看来，多瑙河与易北河有一个本质差异——罗马人放弃了易北河，却对多瑙河死抓不放。虽然这一过程十分缓慢，然而，罗马确实在确立多瑙河防线的事情上一直努力，这可以从提比略对防御体制的调整中看出缘由。

罗马人把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注入黑海的多瑙河南岸作出了如下的划分，从上到下分别划分为：雷蒂亚、诺里克、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米西亚与色雷斯。提比略必须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是完成全区的防御，不如说是确立罗马在此地的霸权。因此，在多瑙河流域如何布置安排7个军团，就成了与战役推进紧密相连的大问题。

第一，提比略布防的目标是地处多瑙河最上游的雷蒂亚行省。因为早前提比略的军事行动，山岳地带和从这里到多瑙河的平原地区，包括博登湖和奥格斯堡都已纳入了罗马统治之下。虽然当时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还没有成为罗马军队的营地，然而，罗马的霸权已经从此地延伸至多瑙河。提比略在此未布置任何军团，因为此地离西北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不远，随时可以派军队过来处理突发事件。

第二，提比略在以流入多瑙河的因河为界的东部诺里克行省，也没有部署任何军团。此地，即萨尔茨堡早已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即使是困难重重的阿尔卑斯山区也被罗马帝国占领，而罗马帝国的霸权延伸至多瑙河流域也指日可待。我认为，提比略大概是想把称霸雷蒂亚和诺里克的任务，交给固守莱茵河一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团”。



多瑙河流域图

第三，提比略在位于多瑙河上游的潘诺尼亚行省布防了3个军团，只要这个地方的称霸任务顺利完成，那么也能实现对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称霸。由于此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罗马暂时也没能完全实现对这个地区的称霸。而在此地的罗马军队的任务，攻大于防。实际上，驻扎在潘诺尼亚行省的这3个军团是7个军团中实力最强的。

第四，至于位于潘诺尼亚以南、又不与多瑙河相连接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提比略也在此安排了2个军团。因为维护好了这里的和平，对保证与此仅有亚得里亚海之隔的罗马帝国本土的和平来说意义深远。当然，这2个军团在必要时刻也能北上驰援潘诺尼亚军团。

第五，提比略在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行省布防了2个军团。这个地方的霸权确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军团在此地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攻击多瑙河对岸，而是保护多瑙河南边的希腊免受袭扰。罗马帝国

要永远保持“霸主”的地位，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只有保护好霸权下的被保护人，才有继续当“霸主”的权力。

第六，地处多瑙河最下游的还有一个色雷斯王国，提比略采取了和处理东方地区亚美尼亚问题时相同的策略。提比略之所以这么安排，其实是凭借这个事实上是罗马属国、形式上是独立的王国的区域来防御多瑙河下游。

前面已多次讲到过，提比略与多瑙河北岸的几个部族确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一政策的确保之下，加上多瑙河北边盟友的奥援，很容易保证罗马帝国实现未竟的多瑙河南岸霸业。所谓的“分而治之”，是敌我都很适用的策略。

但是，提比略对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重整”，却并不局限于军队调整。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有叙述，罗马的一个军团，从军团长到士兵，从工程师、医生到财会，总人数约为6000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新开发殖民地时，尤里乌斯·恺撒通常是将整个军团的退伍军人都移过去，原因在于罗马军团中有维持开发的几乎所有人才。此外，恺撒也没有补充因年老、战死或重伤而短缺的士兵，因为他的目的是进攻。恺撒创立的以进攻为主要任务的军队，后继者的做法性质相同最好。防御却是提比略首要的任务。谈到防御的话，质量与数量都同等重要。因为除了帕提亚王国之外，已经演化成为元首制的罗马，他们共同面临的最大敌人都是战役中以量求胜的蛮族军队。

补充罗马帝国军队中的缺员士兵是提比略要做的第一件事。而补充士兵，能够让罗马帝国现役的25个军团，每一个都能成为充分发挥防御作用的独立单元。然而，仅仅把人数补足是远远不够的，维持军团质量这一课题也不容忽视。如若让社会边缘人混进军队，极有可能会出现扰乱军纪、军心不稳的局面。

而且，随着服役时限的届满，所有的士兵都梦想着早日归乡。对于这种想法，提比略允许服兵役届满20年的士兵可以退役，也保障了退役金的发放。在赞助角斗比赛上备受指责的提比略，对于发放士兵退役金倒是十分大方。

此外，扩充罗马军队中的辅助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对主要战斗力和非主要战斗力的合理使用，直接影响到军事成果的大小。在军团长看来，统率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团，要比行省人构成的辅助兵军团更容易。在莱茵河防线的各军团的辅助士兵，虽然他们在莱茵河西岸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为敌，然而这些士兵也是日耳曼人。此外，辅助部队没有人员限制，使得各军团都有故意压缩人数的倾向，以方便扩大实力。

提比略对辅助兵的名额进行了限制，他规定辅助兵的名额可以与正规军的名额相同，然而，绝对不能超过军团正规士兵的名额。当然，提比略也延续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做法，规定服役期满的辅助兵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此外，提比略也知道“军团士兵”与“辅助士兵”有着抱怨之处，他们除了服役期满还不能退役之外，还得参加土木建设。虽然提比略知道这些情况，然而，士兵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进行桥梁、街道建设，是罗马的传统。提比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让这些士兵承担过重的劳役。虽然没有任何史书对此予以记载，我想提比略一定采取了一定的折中方案。因为，现代德国南部、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四通八达的罗马街道网络，几乎都是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建成的，而士兵们未以此为借口，再次爆发“罢工”。

此时，提比略所进行的“调整”，就是由军团长承担一切事务的执行。在他看来，唯有实行责任分担，才能保持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运行。

那么，要采用分担责任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人选自然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就连厌恶提比略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得不说：

“从未有一任皇帝能像提比略这样知人善任。”

提比略在选贤任能方面，始终贯彻知人善任与实力至上的理念。军团长必须具备军事才能，行政官必须具备行政才能。而与别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行省总督则起用名门贵族，这种渊源源自共和制时代，出身名门的人担任总督更有利于外交谈判。虽然选拔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在知人善任和实力至上两个条件方面从未改变过。哪怕是出生于行省的罗马公民，也不会因为出身而影响仕途。曾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一度被逐出罗马帝国本土的犹太人，在提比略看来，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担任埃及的长官。而遴选总督和军团长级别的官员，提比略对实力至上为基础的判断更加明显。且不论提比略其后的四任皇帝能力怎么样，仅他们统治时期负责军事和治理行省的人物，每一位都出类拔萃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大吃一惊了。提比略不是提拔这些人，就是提拔这些人的后代。此外，提比略向整个帝国的人灌输并让他们深信，只要有实力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这一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论一个组织有多么完美，只有人才会让它发挥作用。

“提比略在其子杜路苏斯离世之前，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革。”塔西佗这样记载道。提比略在其子死后无心政务，将一切都委托给了身边的亲信塞亚努斯。

然而，对于塔西佗的这些记载，笔者存疑。首先，提比略在其子死之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缺乏史书证实。其次，提比略所做的工作，与其称之为“改革”，还不如称之为“修改”更为贴切。当然，仅仅是在工作中制定路线还远远不够，还要监督是否得到落实，再根据执行时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修改”，这样，才能期待得到成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一年时间根本不行。更何况，提比略返回罗马与经历儿子之死，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塔西佗对自负的人完全不了解。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自负的人。对于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绝不会因为儿子的离世，而允许自己败在悲伤的脚下。普通

人遇到这样的悲剧，肯定会以泪洗面、无所事事。然而，自诩为不是普通人的人，即使是死也不会自暴自弃。恐怕只有当最大的伤痛袭来之际，他才会奋起埋头于艰苦的工作之中吧。只有这样，自负的人才能够活下去。当普通人摆脱悲伤拾起工作时，自负的人才与此同时感到身心疲惫吧。公元25年，在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去世两年之后，有议员称颂提比略的政绩，并提议为他兴建神殿。塔西佗引用了提比略在元老院婉拒的演讲，记载如下：

> 我无非是难逃一死的平凡人而已，我操劳之工作，议员诸君都能够做到。为了不让各位赋予鄙人的崇高地位蒙羞，我克勤克俭，不敢放松，对鄙人而言，已经是辛苦之至了。
>
> 后世会怎样评价鄙人？我所做之事是否不坠先祖之名？是否有助于维护各位议员诸君的立场？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和平？此外，为了国之利益，即使批评如潮，我仍旧不为所动，努力完成心之所想，后世是否会给鄙人些许正面颂扬呢？
>
> 若有，对鄙人而言，那才是真正的神殿，也才是最美且永远被铭记的雕像。另外，就算是用坚固的大理石所造之神像，若后世的唾骂不断，那它只是个比坟茔还要低贱的事物。我之渴求，乃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众神在赐予我精神上的宁静之际，赐给我洞悉人类法则的能力。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这难道会是两年前因丧子而情绪低落、抛开所有政务的人说的话吗？这又何尝不是看淡生死之人的一种宣示呢？一位当代研究者用如下的拉丁语格言来形容皇帝提比略，非常合适：

“FATA REGUNT ORBEM！CERTA STANT OMNIA LEGE.”

（不明之事乃命运之域，确定之事乃法之所辖。）

对于我们这些两千年之后活在当世的人而言，想必很难对提比略的

想法产生共鸣。议事厅内用心聆听的议员们，对提比略并不认同。部分议员认为提比略所谓的生命短暂是出于他的谦逊，而另外一群议员则认为这是提比略没有自信的表现，余下的议员们都认为这正好是提比略精神上的卑劣之处。然而议员们较为一致的观点在于，身居高位的人本应追求更高之境界，在这方面，先皇奥古斯都的确比提比略更加出色。塔西佗这样评论道：

> 虽然只要成为最高权力者就能享受到许多特权，但他们有一件必须至死追求的事——给世人留下关于自己的美好回忆，因为不重视名声的人，就是轻视道德的人。

与其说这句话阐明了古代与现代领袖的差异，倒不如说它更加让人思考，让我们体会到了不论古今内外，作为一位领导人的艰难。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终归会死的凡人的提比略，他竭尽所有来完成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使他的帝国统治顺利进行，对于这一点，连一直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塔西佗都给予了赞许。

罗马帝国的边境，随着提比略对军团的重新布防而更加巩固。罗马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拥有不必担心敌人袭击的安全感。所谓的“和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边境安全。对于无须担心外敌入侵的罗马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身边的事，就是走出家门也不用担心会遇上强盗或窃贼。在这方面，提比略贯彻了公共安全第一的政策，并且这样的政策遍及地方政府。提比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执行得很彻底。

对于一国而言，仁政的最佳评估标准就是税收。对此，提比略未增加任何新税种，也没有上调税率，甚至对未能坚持公正征税的人进行了严惩。只要税收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真缴纳。而对于将征税事务交由私人代办的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征税工作的公正，只要警戒过度征税而非逃税就行了。

不论提比略在治理国家事务上多么能干，当他一回到家中，仍然还得面对命运之神对他的制约。

与家族的关系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段故事发生于公元26年，这些故事全部是由塔西佗描述的。

第一个故事，是由一个名叫杜米提亚斯·阿福洛的人，以通奸罪控告与提比略同属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为开端。根据奥古斯都所制定的法律，在帝国政治体制下的罗马，犯通奸罪的人将会被判处流放外地的刑罚。就此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判决。然而，因为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身为阿格里皮娜派系中的得力干将，也是阿格里皮娜的表姐妹之一，这项判决让阿格里皮娜怒火中烧。在阿格里皮娜眼中，这是提比略背地里跟她耍花招，故意要让她难堪。阿格里皮娜打算跑到提比略面前，将她忍受已久的不满和愤怒全部发泄出来。

这时提比略正在供奉有神君奥古斯都的祭坛前面跪拜，可阿格里皮娜还是无法等到仪式完毕就开口嚷道：

“提比略！难道你就是这样为神君奥古斯都鞠躬尽瘁的同时，对其亲人赶尽杀绝的吗？在你的心中，哪还有先皇奥古斯都神君的位置？！如今还遗留有神君奥古斯都神圣精神的，绝不在那尊神像，而是活生生的我，这个流着神君尊贵血液的我！我之所以穿着丧服，是因为如今我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告发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只不过是对我进行攻击的预演罢了。就因为她对我的忠心，你把她定罪？”

这时候，从祭坛前面站了起来的提比略，紧紧拉住为了发泄平日积攒的怨恨而怒骂不止的阿格里皮娜的手臂，用仆人们听不懂的希腊语低

声说道：

“你发怒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没能得到罗马的统治权。”

在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和其奸夫普鲁尼斯都有罪的判决作出后，阿格里皮娜的愤怒情绪愈演愈烈。

第二个小故事，是在上一个故事发生不久之后发生的。当提比略前来探望卧病在床的阿格里皮娜时，阿格里皮娜对这位同属恺撒家族现又身为族长的人哭诉道：

“请你可怜可怜我孤独一人的现状，赐我一个丈夫吧。现如今的我还处于盛年。对于我这个贞洁的女子，正式结婚才是唯一的慰藉。在地域辽阔的罗马帝国，一定会有接纳日耳曼尼库斯遗孀与孩子的高尚的男人。”

对此，提比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就离开了阿格里皮娜的房间。就连塔西佗也作了这样的评论：“阿格里皮娜的再婚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再婚问题，而是一个与帝国统治的后继者紧密相关的问题。”

第三个故事是在提比略与阿格里皮娜家人共进晚餐时发生的。

这天夜里，虽然阿格里皮娜坐上了餐桌，但她一直沉默不语，也没有动手吃饭的意思。察觉到这种异状的提比略，从盘子中取了一个水果，递给她说道：“很新鲜，尝尝吧。”虽然阿格里皮娜接住了水果，但尝也没尝就马上递给了仆人。提比略对阿格里皮娜没有说什么，转身对母亲莉薇娅说道：

“她怕我毒死她。所以，我对她那么冷淡应该也不奇怪吧。”

塔西佗描述的这些都是提比略家族中发生的小故事，也都是从与阿格里皮娜同名的一个女儿所写的回忆录中筛选出来的。这个小阿格里皮

娜后来成了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也即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妻子，尼禄皇帝的母亲。如此说来，这就是10岁少女眼中的皇帝家族的氛围。此外，对于年近70的提比略而言，家庭以外的元老院（从他的出身阶层来看，也属于自家人）也不是可以让他感到满足的地方。

与元老院的关系

就被赋予强大的权力这一点而言，要想了解罗马帝国元首制时代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参考今天美国总统与议会——其中的过半数是由与总统所属的党派相对的党派人员组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权力的授予来讨论这个话题。与前者比较而言，后者是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从古罗马至今接近2000年，人类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类，也是因为建立在这些进步之上的。美国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统所属政党与参、众两院都过半数席位的党派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当时的古罗马也存在这种情形。

不得不注意的是，哪怕是元老院反对，其实皇帝还是可以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这些仅仅局限于皇帝的通告、敕令以及临时性措施范围里面。假设要想使之上升为罗马人的“法律”，不论名称是否为“元老院最终劝告”，都得经过元老院议决通过。

如果元老院只是附议通过皇帝提出法案（政策）的机构，那么即使“元老院最终劝告”具备立法权，但他们仍然没有发挥立法机关的功能。若是这样的话，皇帝乃至“第一公民”，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就不存在了。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正因如此才拥有吸纳了罗马各界重量级人物的优点，但是如果这种平衡出现倾斜，就会带来危害更大的结果，这将会演变成帝国的两大势力正面对决。需要强调的是，看似与元老院共同分享国家主权的普通罗马公民，实质上还是应该把他们归为“保皇派”。免费配给小麦等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资助角斗

比赛等等活动其实质也是选举造势活动。说白了，这些手段其实都是皇帝收买“保皇派”的主要方法。当然，把这些手段单纯划分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也是不对的，虽然提比略为了完善财政体系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再资助角斗比赛，但没有停止发放免费小麦，提比略甚至没有减少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从实质上而言，这还是一项社会福利。

罗马帝国被称为“元老院体制”也没错，然而，一个由元老院主导国家体系运转的体制也会出现血缘循环问题。在尤里乌斯·恺撒降世的30年前，也即格拉古兄弟时代，就有人已经知道这种体制有着巨大的缺陷。在与迦太基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代，“元老院体制”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制终究无法摆脱僵化的局面。不过，不管首先攻击这个体制的格拉古兄弟，还是最终击溃它的恺撒，都不曾幻想过要废除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既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罗马人的传统。简单地想，共和制时代的罗马就是元老院主导体制，哪怕罗马帝国后来成为元首制，体制还是由皇帝主导的，元老院并没有消失。

那么，尤里乌斯·恺撒是如何处理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罗马式微妙关系的呢？

他以武力战胜了最大的对手，即元老院一派拥护的庞培，而他也没有分享权力的性格。在恺撒成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之后，就开始不断向元老院（议会）提出议案，并要求全部认可，失败的元老院也只能通过恺撒的法案。也许是恺撒意识到皇权主导的形式过头了，于是他就用元老院中亲皇派的名义提出建议，换言之，就是把他的议案用议员立法的形式获得元老院通过。然而，毫不知情成为法案提案者之一的西塞罗，后来知道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

谋杀恺撒的主谋，其实是以布鲁图为首的元老院议员们。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并不是反对恺撒实行的政策，而只是想把“皇帝主导体制”拉回到“元老院主导体制”的模式。暗杀恺撒的行动中并没有普通罗马市民的参与，这也暗示了恺撒的暗杀事件并不是政策对错的问题，而是元老

院对政治体制不认同的反抗举动。

对元老院而言，奥古斯都继承恺撒的遗愿，收拾了布鲁图，击败了安东尼；这样看来，奥古斯都是当然的胜利者。不想重蹈覆辙的奥古斯都没有对元老院掉以轻心，但他也没有改变以皇帝主导的这种体制。对于年纪轻轻就成为最高当权者的奥古斯都而言，时间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他非常懂得审时度势，让情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甚至会趁元老院已经遗忘之际顺水推舟地提出法案，于是可以立即获得通过。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可谓是皇帝与元老院关系最为顺畅的一段时期，当然，与其说是元老院的大力配合，还不如说是奥古斯都更善于算计。

提比略没有两位先皇以武力取胜的优势，在血缘上他与先皇没有任何联系。除此之外，提比略与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恺撒，以及出身骑士阶级的恺撒养子奥古斯都不同。当然，提比略并不属于罗马社会的圈外人士，他出身于自元老院主导下一直是罗马社会主流的克劳狄乌斯家族。正因为如此，提比略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一公民”应当与元老院合作统治罗马帝国。提比略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充满诚意地去实践。只不过，我觉得他做得太过头了。

两大势力并立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容于现实。对于元老院的统治能力，恺撒与奥古斯都没有心存幻想，所以他们也不会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希望破灭。提比略也不能算做是幻想，然而，他对元老院的期望值超过了真实水平。

提比略经常不带护卫，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与其他议员一样，他最喜欢坐的也是最前排。当然，提比略也会和其他议员一起起立迎接执政官走入议事厅。他对于议员非常有礼貌，并一直努力与元老院竭诚合作、共商国是。提比略统治伊始，就连他这位最高司令官权责范围内的事，如军团士兵服役期满退役问题，他还是要在元老院同意之后才执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尊重元老院表现之一斑。

提比略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希望元老院议事之际更加自由活跃。然而，如若有人附和他人发言，提比略会面露不快，并要求这位议员阐明自己发言的真正目的，因为表达同意意见的只有执政官与皇帝。当然，我也曾经多次提到，提比略禁止议员们称他为“皇帝”，而是要求议员们称他为“第一公民”。

提比略不论是请求元老院，还是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口气一直都很严厉。即使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赞同的意见，但冷漠的语气总让聆听的议员感觉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全身发凉。显而易见，不懂幽默是提比略的最大缺点。恺撒有能力让反对派喜笑颜开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然而，对此不能奢望提比略。当议员们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忘记元老院是国策决策机构，而想把一切责任抛给皇帝的时候，提比略的语气就变得辛辣无比。这时候的提比略，仿佛就是用言语的利剑戳得他们体无完肤，要他们认同元老院的权威与责任，言语上毫不留情。然而，若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心里暗自高兴。

当然，元老院600位议员并非完全丧失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若25岁担任账务监察官，到了30岁就可以自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所以罗马元老院还有汇集人才的作用。然而，帝国经常需要不计其数的人才才能保证它的运行。至于提比略选拔人才与知人善用的能力，连塔西佗都肯定其“目光锐利”的一面。如若认为一个人非常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提比略就不会在短期内调动这个人的任职地方。而罗马帝国短期任职的，只有法务官、执政官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出任元老院行省总督的这些官员才会只有一年的任期。

因此，经常在元老院会场中见到的面孔，其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力不怎么样的人了。无论如何，共和制年代遗留下来的元老院，当然是罗马帝国显赫贵族聚集的地方，就算是能力拙劣，只要有众人耳熟能详的家世背景，都能在元老院里有一个议席。提比略喜欢的是通过实力进入元老院的议员，有很多这样的议员被派往边疆戍国，委以重任。也只有从

原任职地前往新任职地的短暂时间，他们才能够待在罗马。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老院的大多数议员都喜欢坐等现成，又喜欢到安全而又富庶的行省担任总督累积历练，回来好邀功请赏。虽是如此，提比略仍然想调动元老院议员们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对此，提比略毫不懈怠，简直就是努力过了头。为了避免人数众多、效率低下的议事方式，提比略打算使用委员会的方式作为替代，以提高议事效率。当然，委员会中的成员仍然是议员。

由奥古斯都创立的“第一公民”主导的罗马政体，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眼中，这种制度并非纯粹的皇帝制度，而是“元首制”。因此，罗马帝国并非由皇帝统治，而是由“第一公民”负责。“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就像国家的双足，相互协调着推动国家政体的前行。若是严格的“元首制”，那么就必须与刚才讨论过的内容吻合。然而，对于此种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在描述奥古斯都的《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强调过了。“第一公民体制”只是奥古斯都用在外面的酒瓶，而真正在瓶内装的还是元首制。我想，提比略继位之后，大概也认为罗马的政治体系是元首制。与奥古斯都说一套做一套不同，提比略十分相信元首制的存在理由，也努力捍卫它的存在。

然而，元老院的现实与他的期望南辕北辙。不难想象元老院议员们热烈讨论的背后，是提比略的失落与疲惫感。在此，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心情，元老院讨论如有人出任某地职位时，是应该孤身赴任，还是可以偕妻同往？

这位议员提出，派出的总督不论是到兼理军务的皇帝行省，还是到只负责治理的元老院行省，都应禁止偕妻同往。这条法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提案者引用自身的例子，讲述了他40年的外地任职中，妻子一直留在罗马养育6个孩子，但夫妻感情仍然十分牢固。在强调提出这个提案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引发议员们的哄堂大笑之后，他开始阐述法案的中心思想。

此前的法律禁止偕妻赴任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非战时期偕妻前往极有可能惹是生非，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此外，战争时期她们也会出于害怕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而女人与生俱来不喜欢纪律约束的特点，也会使得丈夫部下变成毫无秩序的一群人。另外，不喜欢吃苦也是女人的本性，如此这般，会让戍边的罗马士兵，反感自己的辛劳任务，从而丧失战斗力。

此外，如若给女人掌权机会，她们就会变得异常冷酷、争强好胜。也发生过下面这些广为人知的例子，有的军团长夫人以上级的身份动辄使唤百人队队长，染指军事演练，甚至对军事行动指手画脚等。

虽然元老院行省不负责军事任务，但也不乏偕妻子同行而酿成灾祸的案例。元老院下辖行省的总督经常在回到本土后，因违法乱纪、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总督夫人惹出的事，而致祸起萧墙。此外，在罗马行省中也有不少人以提供商机为名，借机接近总督夫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这种链条一下子就清晰了，从而出现了行省官员服从总督、总督服从总督夫人这种现象。总督夫人也由此渐渐变得妄自尊大，越发不可控制。

公元前215年，罗马制定的《奥庇乌斯法》等法律中规定严格限制偕妻子赴任，所以上述问题并未出现。然而，时隔250年后，不仅仅是戍边，就连赴行省的任职也变成了太平的任务。大概正因如此，上至总督，下至下属的其他高官也偕妻赴任的现象一时风靡。结果，无论是在行省军队营地，还是在总督兼任大法官的审判场所，这些官太太们都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主人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此项提案，元老院一扫往日的隐晦，议员们都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对此，许多议员持反对的立场，其中一位议员这样反驳道：

由于时局所致，才导致了250年前的严格禁止偕妻赴任条文的出现。也是当时周边环境险象丛生，罗马才如此规定罢了。往昔征战频

繁，我官员至外族纳降土地赴任，当地居民的敌意确实不小。然而，如今帝国治下一片和平，还有何担忧呢？

当然，从家庭内部来讲，为了满足太太们的需求而赋予她们必要的权限，也不至于影响到家庭和睦。此外，从家庭外部环境来讲，这种做法也不至于影响到罗马统治下的基础（指行省人民、同盟国的国王）的关系。

在此，还有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太平时代，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必须由夫妻共同承担。

当然，对危及行省统治的言行举止理应予以管制。然而，丈夫在辛辛苦苦结束任务回到家中，还得要由法律来规定是否安排他的妻子在家中等候吗？

不可否认，野心勃勃、耽于享受的女人大有人在。然而，男人就与上述的种种丑恶完全无缘吗？即使这样，在面对处处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行省，男人还是依旧被赋予担当重任的义务。此外，如若男人们卸任返回罗马，遇有违法乱纪指控，不论是谁都会一口咬定其妻教唆而致？照这样说，单身男人全部都是清廉洁白、奉公守法的典范？而此前总督们的落网也都是偕妻赴任的诱因？

大概是这样的男人喜欢把玩忽职守的责任全部推到女人身上吧？即使官太太们想要利用夫君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然而，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时局所致的《奥庇乌斯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罗马法，忘记与时俱进，已经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达成法律的目标。我们也不必因为一两位丈夫对夫人管教不力，就用法律来限制所有的官员。

女人原本就是善变的，容易被虚荣心驱使，或者憧憬其他女人所掌握的权势或财富。此类女人，即使经与她们结为连理，我敢保证这类婚姻也很难持续下去。如若还横加长年分居的壁垒，夫妻情感就会变淡，简直与离婚无异。这么一来，孤身赴任的丈夫，老是挂牵罗马的妻子，大概也不会专心政事了。

担任主席的执政官也持这种观点。他曾说过："不论他地位多么崇高，只要担任帝国使命者，都无法避免前往异地任职。神君奥古斯都也曾多次前往西方或东方履职，而皇后莉薇娅经常陪伴左右。我自己也曾因军务长年驻扎在伊利里库姆不能回乡。然军规不允许，只得孤身前往，其间妻子常常引我思量，导致精神涣散、业不专精。"

由此，提议禁止偕妻赴任的法案，遭到投票否决。

对于元老院此时的审议结果，提比略委婉地提出忠告：此案事关各位利益，热烈讨论无可厚非，然而我还是恳请大家对国事认真商议，而非把精力枉置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难发现，元老院在讨论是否偕妻外出赴任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提及讨伐野蛮民族入侵行省的军团长人选时，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议员们经过漫长讨论，个个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居然还是把责任推给了提比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提出严禁偕妻赴任议案的此位议员，也即前低地日耳曼军团军团长凯奇纳，随后因驻地变更，追随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目睹了日耳曼尼库斯妻子阿格里皮娜与皮索之妻的矛盾。从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爱出风头的个性来看，这位议员提出这项法案也是有据可循。而站在提比略角度出发，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不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都是造成提比略精神压力的最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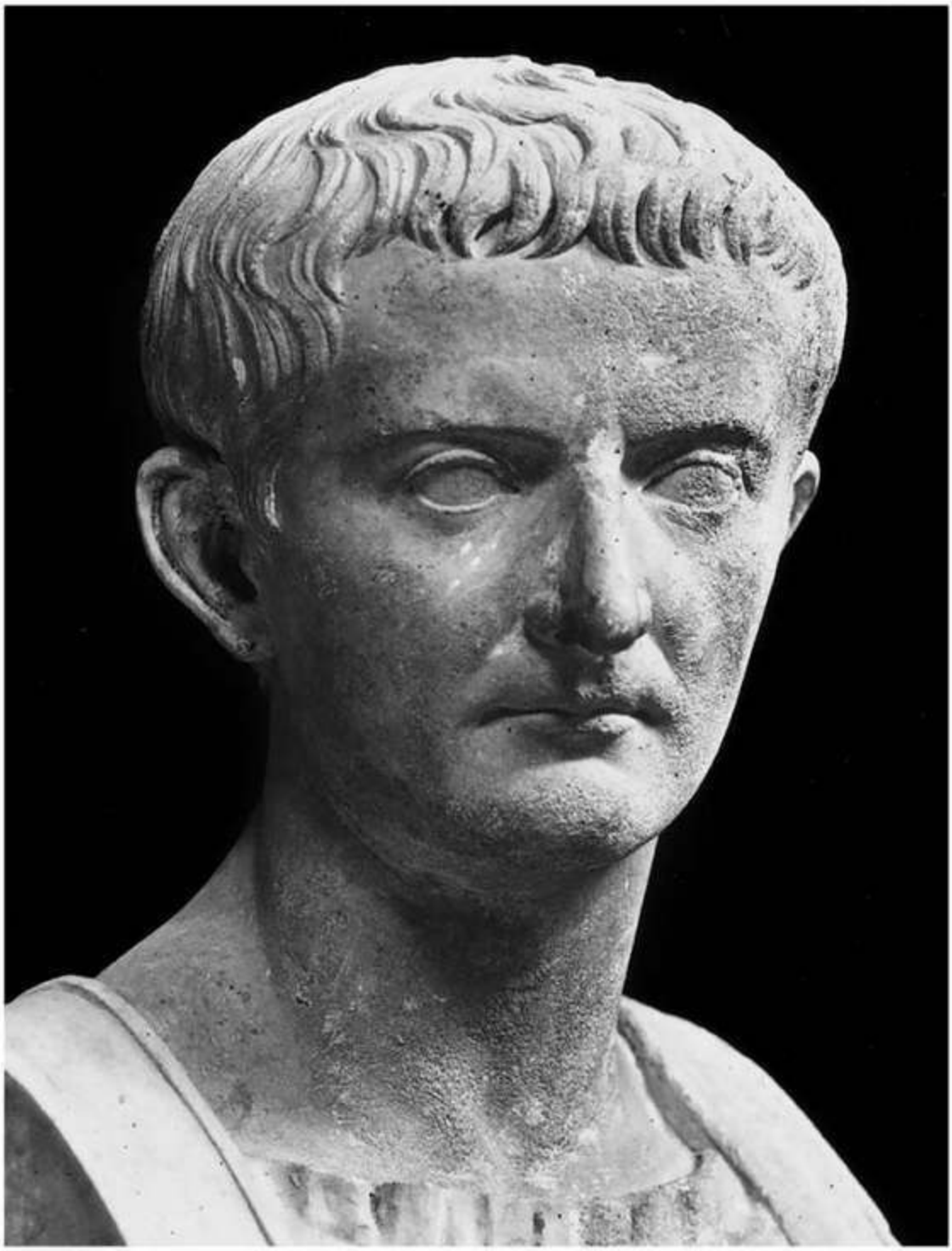
公元27年，在时年68岁的提比略心中埋藏多年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离开了首都罗马，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成为了他最后的归宿。

隐居卡普里岛

想必那在350米高处的悬崖上依山而建的巨大储水槽，当时应该是做好精心的准备才动工的，因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大理石之类的所有材料，都从那不勒斯运出，途经30公里的海路。

提比略虽然远离世俗隐居卡普里岛，当然这并非是隐退（退居二线、甘于淡泊），也不是退位（放弃当下的权力地位）。在小岛上，提比略依然统治着帝国。我哭笑不得想说，这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如果把提比略的这一行为也叫做“离家出走”，那么他是有“前科”的。从提比略36岁起的7年之内，他一度抛下地位和家庭，隐居到罗得岛。然而，那时奥古斯都当政，提比略是真的隐退，也可以称之为退休。今非昔比，事隔33年后的第二次“离家”，他根本就不能对帝国的事业撒手不管。即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有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毕竟他们不过才20岁、19岁，都还稚嫩。另外，他本人似乎也没打算退位。6年前，提比略离开罗马，住到那不勒斯近郊，那段时间他一直遥控指挥。其间，他确立了收集各地情报和畅通无阻的传递系统，与元老院以书信往来商议国政，虽然这种方法前后延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对帝国的统治小有成效。提比略或许因此而信心十足，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续更久。我不禁想，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仍然在岛上兴建了设施齐全的宅邸，以便他舍弃氛围诡异的家庭，抛开无心政事的元老院，在卡普里岛逍遥自在。



提比略

历史学家塔西佗批评提比略的第一条，就说他道貌岸然，是个伪君子。我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塔西佗所指的伪善，只是在字典上的解释——看起来慈眉善目，背地里做尽坏事；然而，我总觉得提比略是个不会掩饰、直言不讳的人。提比略这种始终表里如一的个性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反而会让事情变成僵局。

不管恺撒如何独断专行，但他一直都是住在位于喧闹的罗马广场的大祭司宅邸。奥古斯都的居住之所略微安静，然而距离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并不远，从山上的皇宫出发，不用5分钟就可到达。

罗马上流社会的女性，以及元老院议员的素质，并没有从两位先皇时代的让人叹服突然变成提比略时代的良莠不齐。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反省自身、改正不足之处。对于这一点，恺撒和奥古斯都非常了解，所以没有奢望太多。

下定决心隐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也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能切实促进帝国的统治，维持帝国正常运转，在何地、如何进行，并没有区别。可是，这不是政治家的思维，而是官僚的思考方式。

“伪善”的英文“Hypocrisy”与意大利语的词语“Ipocrisia”，其实它们的词源都是希腊语。只是，在此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得更清楚，把希腊语写成拉丁文的话，就是“Hypokrisia”一词。

换言之，这个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他们造词时想到的，不只是日语字典所说的虚有其表的善行。古希腊人把伪善分为上等与下等，日语字典解释的伪善，只是下等。

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上等伪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假仁假义”。希腊的哲学家们甚至认为，这种伪善对政治家而言，是必要的手段。它不是必要的恶，只是具有积极意义层面的“恶”罢了。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古希腊的政治家中，仅仅只有伯里克利贯彻了这种说法——表面上佯装民主政治，实际上独裁30年。如果在这方面他堪称希腊的表率的话，那么在共和制的外衣下把控政局40年的奥古斯都可以算是罗马的代表了。更有意思的是，从2500年前至今的古代政治家中，他们获得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人。人们只要觉得自己握有主权就心满意足，不太在意实际操作，只有情况不妙时才会想起行使主权。

无上下之别，行事无法违心，这就是提比略的缺点。希腊语中，“伪善”来自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换言之，伪善就是一种表演。讲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装模作样。无论公事还是私事，没有人比提比略的演技更加拙劣。他这种个性最戏剧化的表现，就是隐居卡普里岛。也正因如此，在西欧，由于长期受到塔西佗对提比略苛刻指责的影响，直到1600年以后，才有另一位历史学家沃特站出来为提比略辩护，后来又有蒙森等多位研究罗马史的权威挺身为他翻案。然而，他们也一致认为，隐居卡普里岛是提比略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失误。所谓政治，就是在官僚式思考中，认为不可能的“技巧”。大家不妨想象美国总统隐居到联邦领海内的某个小岛，幕后统治美国联邦、甚至全世界的情景，首先站出来抗议的肯定是媒体。即使塔西佗等历史学家不是大众传媒，但他们相当于当时的媒体。

塔西佗特别讨厌提比略这一点，因为他隐居卡普里岛时，既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通知元老院，只说他要出席设在先皇奥古斯都驾崩之地诺拉的神殿祭典，然后就离开了首都罗马。谁也没有想到，提比略这一去，居然10年都没有回到罗马。

要是不把提比略的举动看成“退休”，只当做“离家出走”，就不难理解提比略的这种做法，打算离家出走，有谁会弄得天下皆知呢？

不明就里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们都认为，提比略在神殿祭典结束后没有回到罗马，是打算在气候宜人的卡普里岛稍作休养。他们丝毫不认为提比略放弃了治理的责任，并且时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而且，

对不坐镇首都罗马就无法治理罗马帝国，他们也深信不疑。

至少议员们清楚，要统治帝国，必须收集情报，最佳的情报集散地，就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速度，而是抢得先机截获情报，早一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然后更早一步下达命令。收集情报应该考虑获得情报的速度，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利用奥古斯都时代设置的政府邮政系统——在高速公路化的罗马街道上快马加鞭相继传递，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要到达首都至少需要10天。海路虽然容易受到风向影响，如若顺风顺水的话，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那不勒斯湾的军港米塞诺，也要9天时间。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随时可以收集情报，然而处理对策滞后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在于掌握情报的人没有真正领会其价值，进而迅速采取措施，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理论上，只要确立通畅的收集情报和传递命令的系统，并使之有效运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处理情报，物尽其用。

实际上，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之后就发生了两件大事，他迅速而又精准的反应不得不让人交口称赞。

从罗马沿萨拉里亚大道北上10公里左右，有个叫做佩特洛的小镇，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导致5000人死伤的惨剧。起因是小镇上举行角斗比赛，木结构的观众席轰然坍塌，这次比赛的原先设想在于赢利，并不是为选举活动造势。比赛场地只可以容纳1万人，结果硬生生地挤进去了2万多人。提比略不喜角斗比赛因而不再赞助，此类比赛少了许多；政府高官的选举也从公民大会变成元老院议员相互选举，不以选举为目的的比赛又有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暌违10年，佩特洛小镇举行角斗比赛自然吸引了无数百姓，对比赛素来怀有极大热情的百姓们自然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塔西佗说死伤者达5万人之多，然而中世纪手抄本数字误写的极多，减掉一个零更接近事实。更何况，从佩特洛小镇的规模来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方建一个可以容纳5万人以上的庞

大的圆形角斗场。最佳容纳人数应在1万人左右。除了容纳人数超出场地极限之外，主办方吝啬建设经费也是观众席坍塌的原因。

提比略得知后立即下令，动员首都和邻近村镇的所有医师前往佩特洛治疗伤员。同时，要求佩特洛以及邻近所有村镇的普通家庭收留伤员，决定由国库承担死者的丧葬费用。提比略致信元老院，要求通过如下决议，换言之，要元老院立法施行。

一、拥有40万塞斯特斯以上财产者，方可举行角斗比赛。

二、观众席可木制，然而地基必须彻底修整，否则，不可搭建观众席。

佩特洛角斗比赛的主办人被判处流放并立即执行，才使得这件事画上句号。

在这次事故还没有被淡忘时，位于罗马“七丘山”之一的西里欧山却被付之一炬。由于当时山上几乎没有公共建筑，所以遭此大难的都是民居。提比略知道后立刻发放救济金，首都的居民们也纷纷效仿皇帝伸出援手，使灾民得以早日重建家园。这次重建活动并没有对灾民实施免税，因为灾民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市民，他们原本就不用缴纳直接税。幸好提比略反应迅速，指责他不在首都的声浪也趋于平静。元老院甚至决定，要感谢提比略对灾区采取迅速准确的措施。

然而，不论救灾活动处理得多么及时准确，罗马的公民们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满意提比略的表现了。罗马的居民们开始认为，自己被长期在外的提比略舍弃了。至于元老院，议员们除了不满之外，更加认为这是提比略的侮辱。因为提比略送来书信只是要求他们同意，这只能说明元老院权威不再。提比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以“第一公民”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他决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不仅要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实质性的皇帝，凌驾于公民和元老院之上，还要坐实皇帝的“名分”。

并且，即使远离首都仍然可以治理国家，治理得越得心应手，越能证明元老院可有可无。体会到自己无用武之地，真是世上最憋屈的事儿。于是，百姓和元老院的议员们都有了自己的理由，对提比略的评价越来越差。无论是谁，都会认为耳提面命好过被遥控操纵。然而，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似乎毫不在乎人心向背，更何况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受舆论摆布的人。

为了使得卡普里岛的生活与罗马一样，岛上除了必要的仆从之外，和提比略一起隐居的只有不到10位朋友。其中并没有任何女子或以情人或者朋友之妻的身份随行。元老院议员也只有一名。这群身份不一的随行人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通晓提比略所喜好的天文学和希腊学，然而没有人可以和他商议政治或军事，没人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他们就像是远离公事，在周末的乡村里围坐桌前，惬意享受。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在提比略隐退罗得岛时就随侍在侧，他们可以算是提比略为数不多的朋友了。

卡普里岛以东的悬崖上有座别墅，如果您曾经从南方的海面上举目远眺，脑海中也许会浮现罗得岛中部林都斯悬崖上的神殿吧。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上，纯白的大理石神殿点缀其间，可以说这座神殿集中体现了希腊人的审美意识。然而，无论罗得岛上的神殿，还是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今天都只留下了残存的遗迹，我们只能在脑海中描摹原状，想象它们曾经的壮丽。在我脑海里提比略在罗得岛生活了7年，或许他也想在卡普里岛上找到当时的感觉吧。罗得岛的神殿供奉神祇，卡普里岛的行宫则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提比略虽然极力排斥可能被神化的事情，几近走火入魔，然而选择舒适的居住环境，则另当别论。游林都斯的希腊神殿时，我觉得能住在这里挺不错。每次造访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时，也会浮现同样的想法。提比略此人，即使离家出走，选择目的地也是眼光独到。遍览地中海众多岛屿，提到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景致令人心旷神怡，罗得岛和卡普里岛都是名列前茅的绝佳选择。此外，提比略并不需要忍受乡村生活的不便。因为卡普里岛上的房间布置得尽

善尽美，他完全可以享受媲美罗马皇宫的舒适生活。

卡普里岛的乔伊斯别墅

当我把上面的内容告诉一个意大利人时，他问我，提比略是否想做神呢？我明确地回答他，不是。神殿是祈求神佑的场所，并非沐浴或按摩之类放松身体的地方，也非畅饮美酒、大啖美食的享乐之所。对信奉多神教的古人而言，个中差别显而易见。然而，有意思的是，希腊人喜欢在风景迷人的地方建神殿，罗马人则偏好在风光明媚之处修别墅，让难逃一死的凡人尽情享受俗世的快乐。提比略尽管痴迷希腊学，但他骨子里仍是罗马做派。

在游览林都斯卫城遗址之时，我骑在驴背上，走过撒满碎石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摇摇晃晃，尝尽颠簸。我不禁好奇，提比略是靠什么往返于卡普里岛的？农民才会骑毛驴，上流社会的罗马人不好此道。难

道是坐在轿子里，让强壮的奴隶抬轿往返？提比略隐居后并非一味困守卡普里岛，他还是会时常出岛游览周围景致，然而始终没有返回首都。卡普里岛虽然气候温暖，当寒冬到来的时候，依然会让人感到寒风刺骨。

在我思考这些细节之际，恰好看到一本相关著作，是特奥多尔·蒙森写的《罗马行省，从恺撒到戴克里先》（Die Provinzen von Caesar bis Diocletian）。书中记载，在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第一个获得优胜的罗马人，正是提比略。按公元纪年的话，当时是公元1年，时值第19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四年一次）。每一届运动会都会记录各项比赛的优胜者，书中记录的名字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使用的原名。并且，提比略于同年隐居罗得岛。罗马方面没有任何史书，那么他一定是以隐居的私人身份参赛。他参加的项目是四匹马拉的战车比赛，跟电影《宾虚》中唯一震撼的场景相同。这件事发生在提比略41岁时的夏天。

假如情况属实，那么对他身形高大、胸膛宽厚、体格健壮匀称、目光犀利、视力超群、鲜少生病的评价，很可能是确有其事。罗马人一般用冷水或热水兑饮葡萄酒，据说提比略是直接饮用，并且每次要喝很多。这可能得益于他体力过人、身体强健吧，更何况罗马人素来喜好饮酒。有条小路可以从码头通往海拔300米悬崖上的行宫，不过这条乡间小道碎石遍地，雨天就无法通行。提比略不会放任不管，即使蜿蜒曲折，他一定会把整条路铺好。当然，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仅仅凭借双腿上山下山也不无可能。要是我也穿上跑鞋的话，这对于我也同样不是个问题。

虽然提比略保证可以住得舒适，又能享受知性的谈话，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毕竟跟普通人不同，是一个公众式的人物。要彻底解决公务，需要很多“左右手”。然而，这些“左右手”都有一个缺点，这些人在有着出类拔萃才华的同时，也有超出常人的野心和欲望。此外，随着要

他们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他们能够行使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在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后，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就成为他最为倚重的肱股之臣。

塞亚努斯

出身于罗马帝国第二阶层骑士阶级，鲁基乌斯·尤里斯·塞亚努斯其人并非罗马社会的第一阶层“元老院阶级”。定居首都的骑士阶级大多在“经济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罗马帝国中的有钱人；然而，塞亚努斯不在此列，他属于成员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骑士阶级，只能算是中等阶层。因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持续推行起用骑士阶级的政策，所以塞亚努斯的父亲后来官拜近卫军军团长，而且任职于唯一设在意大利境内的“近卫军团”。公元14年，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随即提拔塞亚努斯，让他同样成为近卫军军团长官。次年，其父因升任埃及长官前往亚历山大任职，于是提比略命塞亚努斯接任，成为意大利近卫军长官。以34岁之龄担任这一要职，这在罗马可谓是第一例。一个聪明有能力的“左右手”，必须要分析冷静、三缄其口、观察细致。而在这方面，塞亚努斯似乎确实有其常人所不能及之处。

此时，皇室的女主人莉薇娅已是80多岁了，而提比略又没有妻子，所以在他离开罗马后，家族权力自然落到40岁出头的阿格里皮娜手里。然而阿格里皮娜不仅以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血的嫡孙女自居，还认定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谋权篡位，并且深信提比略指使皮索毒害日耳曼尼库斯。更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并不明白伺机而动的道理。

历史学家塔西佗持这样的观点，出于对媳妇的憎恶，提比略隐居后命令塞亚努斯全力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不过，大多数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阿格里皮娜和仍旧信奉“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日耳曼军团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反对提比略的政变。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在巩固

罗马帝国的大目标之下，从提比略重视各司其职的人生哲学来考虑，再没有比时常就拿奥古斯都的血缘关系来大肆炒作、只知道出风头的女人更令人厌烦的。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强迫，与他的独生女尤利娅结婚，而尤利娅就是阿格里皮娜的母亲。正是因为提比略无法忍受这类女人，才使得两人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维护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和首都罗马的秩序，是9000名近卫军的任务。从恺撒时代起，来自莱茵河以西日耳曼的日耳曼士兵负责保护皇帝，如今已成定例，所以近卫军团不需要负责皇帝的安全。近卫军团以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为责任，这同今天日本附带机动组的“治安厅”很相似。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塞亚努斯。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时，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2年。或许塞亚努斯在等待转任埃及行省总督——这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官员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父亲已经站在上面。然而，提比略的用人标准，除了实力至上，还有知人善用。他并没有调整塞亚努斯近卫军团的长官职务，而是任命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担任埃及行省总督。

罗马人毕竟是法治体系的创始人，塞亚努斯可以利用的武器，除了类似机动组的9000名近卫军之外，还有法律。尤其是处罚严厉的叛国罪法与通奸罪法。

叛国罪法从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制定，此法规定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其立法目的在于对破坏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人，严惩不贷。关于这部法律的著名案例，是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审判，当时哲学家西塞罗担任监察官，恺撒负责辩护。进入帝国政权时代，奥古斯都加以修改，并冠上修订者姓名，称为《尤里乌斯叛国罪法》。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适用范围，在原有的“公民共同体的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意图谋害“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长”，即被称为“第一公民”的皇帝者，同样适用。毋庸置疑，公元前44年恺撒遇害一事是修改法律的真正原因。《尤里乌斯叛国罪法》制定以后，意图暗杀皇帝等同于企图破坏国家。这条法律与同

样出自奥古斯都之手的通奸罪法成了皇帝一派对付政敌的强大“武器”。我们不能忘记，罗马是法治国家，要消灭政治上的敌人，主要是利用法律来动手脚。假使一个人被判决有罪，判处叛国罪会被处以死刑，判处通奸罪则是流放到荒芜之地。

既然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在他统治时期自然有案例适用这两条法律。皇帝的独生女和外孙女因通奸罪被判处流放之刑，而当时的执政官穆雷纳意图行刺奥古斯都，被判决为叛国罪而处以死刑。

司法体系中没有设置监察官一职，这是古罗马的司法特点。虽然有辩护人，然而监察官由告发的当事人担任。哲学家西塞罗，在共和制时代以律师身份闻名，他虽然为人辩护，真正让他在法庭万众注目的，是他揭发别人时的兴奋活跃。而且，苏拉担任独裁官之后承认告密者的权利，他规定，只要告密者胜诉就可以获得被判有罪的被告财产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是原告给的报酬一样。

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塔西佗和他之后的史学家的态度，他们批评这种制度是为了报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告密的重要诱因。然而，只有恺撒完全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奥古斯都没有将之废除。提比略曾公开声明，奥古斯都的言行举止都是他的法律，所以他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体制。他所作的“修改”是，为了防范没有确凿证据而胡乱告密带来的弊端，可以揭发告发者的不法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变成收拾残局，以前著名的西庇阿审判（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就证明了司法容易被当做排除政敌的武器。

显而易见，塞亚努斯有十分适合担任警察性质的工作能力，这也没有辜负提比略对他的赏识。他深知提比略厌恶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告发他人，所以他竭尽全力搜集证据。他最擅长的手段，就是故意设套去寻求证据。他用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让对方放松警惕，当他人敞开心扉、吐露心事时，就叫仆从隔墙偷听，然后让这个仆从出庭作证。他还经常让元老院议员们参与检举揭发工作，使得大家对原告的说辞深信不疑。

如此一来，阿格里皮娜周围的人，纷纷因叛国罪或通奸罪而被排挤。罗马上流社会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对自己的仆从都怀有戒心，惶惶不可终日。

随后，塞亚努斯以提比略驾崩后的皇位继承权为诱饵，成功离间了阿格里皮娜的长子尼禄·恺撒和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的关系。两个年轻人才20岁出头，思虑不周，只知沉溺于五光十色、浮华奢侈的社交圈，十分容易产生竞争心理从而为人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依旧为了维护帝国安全，殚精竭虑。

在莱茵河下游以东（罗马霸权还未触及）定居的一支日耳曼民族，突然起兵反抗罗马帝国。这些不在罗马控制之下的日耳曼人为何要做出不可以思议的造反行为呢？其实这是提比略针对日耳曼民族的策略之一，同他们形成交易罗马军用皮革的贸易关系。事情发端于商业原因，然而日耳曼人原本就对提比略不得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带状无人区的规定有诸多不满。低地日耳曼军团出兵镇压，双方展开激战，罗马军队在损失了900名士兵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然而，提比略根本就没打算改变坚守莱茵河防线的战略，他继续下令，禁止以替这些战死的士兵报仇为名的任何复仇计划，特别是向莱茵河东岸用兵。

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初提比略让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担任莱茵河8个军团的总司令，而不是把他调往东方，那么罗马早就在日耳曼地区彻底称霸了。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观点不同。这个时期，阿格里皮娜与他的大儿子尼禄·恺撒开始拉拢这些官兵。不过，这是身为历史研究者所必备的推理而作出的假设，目前没有史书可以证实这个推测。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被排除在外的阿格里皮娜怒气高涨，憎恶滔天。我们也能理解当时参与战斗的士兵们的愤愤不平，而连

百年之后的塔西佗都指责提比略禁止为900名士兵报仇雪恨的命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自古以来，相较进攻，防守更容易让人非议，甚至招来指责谩骂。

公元29年，莉薇娅逝世，享年85岁。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一年，而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却已生活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莉薇娅不仅是提比略的生母，而且还是先皇兼其养父奥古斯都的妻子。这一次，罗马公民都认为提比略会返回罗马参加祭奠仪式。因为从公私两个角度而言，提比略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莉薇娅的儿子，都理应亲自回罗马负责处理丧事。

然而，提比略让罗马公民失望了，他仍然没有回到罗马，只从卡普里岛致函元老院。信中要求元老院勿违背其母亲的心愿，葬礼从简，尽量减少谥号，不愿莉薇娅被神化。此外，信上还提到应由17岁的盖乌斯在葬礼上宣读悼词。以卡利古拉这个昵称而闻名的盖乌斯是阿格里皮娜的小儿子，是莉薇娅英年早逝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孙，也就是她的曾孙。

提比略在信函最后写道，由于国事堆积如山，片刻不能释手，故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万望谅解。

确实如此，恺撒与奥古斯都不但没有出席自己母亲的丧礼，甚至母亲临终之时都不在身旁。不过当时事出有因，恺撒正在进行高卢战役，奥古斯都身陷屋大维时代的内乱之中，他们都无法抽身。当时，事关国政的所有重责大任都由提比略负责，然而如今在卡普里岛上安然度日的提比略是不能和恺撒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的。更何况，从卡普里岛快马加鞭的话只要一天就能到罗马。

然而认真思考的话，不难想象举行葬礼不仅是为了安葬死者，更重要的是安慰生者。所以对沉浸于悲伤中的人而言，出席仪式实在更加让

人痛苦。出于礼貌，仅仅回应别人节哀顺变的宽慰已经让人难受，有时不禁想要大声呐喊，不要管，让自己一个人安静片刻，痛苦得只能熬到仪式结束才会觉得松口气。大概提比略还是会在卡普里岛上，一个人眺望眼前辽阔的蔚蓝大海，独自悼念母亲吧。当然谁都清楚提比略借口国事繁忙这个理由太过牵强，太过苍白。

社会的评价大多是就事论事，通常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所以，上至元老院议员，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一致认为提比略冷血薄情，连对自己的母亲都不例外。展现自己对母亲的关怀，可以掩盖几乎所有缺点，这是古今内外永远不变的人之常情。提比略不期望别人理解他，他也不想去了解别人。有些研究者认为，要维持帝国的稳定，就必须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我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把行动延后。虽然提比略在军事方面能力出众，在制定策略方面还是赶不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皇帝。

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

依照罗马帝国的习惯，在莉薇娅葬礼之后不久，将会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提比略写给元老院议员们的信函。对于阿格里皮娜与长子尼禄·恺撒企图发动政变一事，提比略只字未提，只说阿格里皮娜对他的敌意难以消除，已经23岁的尼禄·恺撒仍旧放浪形骸，尤其对他喜好男色的癖好嗟叹不已。提比略并非要求元老院审议，这只不过是一封牢骚满腹的信函罢了。

然而，议员们相信无论是谁都明白这封信的真正意图，但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聆听着。显而易见，这封信正表明了提比略打算铲除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意图，皇位之争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念完信后，全场一时静默。终于有几位议员打破了沉默，提议以这

封信为议题进行讨论，不过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其中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说，我们都清楚地听到提比略的严厉指责，但他没有要求我们如何行事，不如就此作罢。支持提比略的一位议员提议，今后皇帝会回心转意，此事不如日后再议。对于这种意见，元老院大多数人纷纷赞成，决定改日再议。

罗马的普通民众在得知此事之后，纷纷涌向元老院会场。他们围着议事厅异口同声地说道，批评日耳曼尼库斯的家人并非皇帝提比略的本意，由于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挑拨离间，才使得身在卡普里岛的皇帝有如此看法。此时罗马平民的愤怒主要是针对塞亚努斯，而不是针对提比略。参加抗议的普通民众，大多数人都抬着阿格里皮娜和尼禄·恺撒的雕像，高喊不许任何人动他俩一根汗毛。这群人聚集在议事厅前寸步不离。

提比略接获报告之后，立即致信元老院。他在信中说道，他将颁布皇帝敕令禁止任何游行示威，并绝不轻饶向元老院施压的暴徒行径。接着又再次批评阿格里皮娜母子，严厉指责元老院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逃避职责，导致皇帝威名受到损害。

在提比略不肯让步的强硬态度面前，民众的示威气势顿时消了下去，元老院也只好开始重新审议。国家重大案件的审判也是元老院的工作之一，所以元老院此时又变成了法院。提比略那位能力超群又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塞亚努斯，也许在担任陪审团的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出示了许多他收集到的证据吧。

在此说“也许”，是因为关于皇帝提比略的史书中最详细的一本——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其中公元29年中期到31年年末的记载，在中世纪遗失；而塔西佗以外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详细记载这次审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监察官陈述指控理由也好，辩护方的反驳也罢，场面一定非常激烈。因为，除了皇帝提比略的殷切盼望之外，查阅其他叛国罪的审判案例，场场都是原被告双方依循法律、

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地热烈辩论。审判皮索花费了很长时间，这次审判阿格里皮娜母子肯定会考虑其他因素。这两个案例有天壤之别，后者在皇帝颁发敕令禁止示威后，元老院再也没有外部压力。而且，提比略一开始就站在原告一边。

公元29年年底，阿格里皮娜母子被判处有罪，母亲阿格里皮娜流放潘达特里亚岛（今文托特内岛），其子尼禄·恺撒流放逢替阿岛（今蓬扎岛）。他们犯的是扰乱国家安全罪，所以都被视为“国家公敌”。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被判处死刑，我想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同日耳曼军团勾结发动政变，阴谋篡国本身就是罪行。在古罗马的审判中，经常围绕图谋及是否采取行动展开激烈争论。曾经，无论是否有叛国行动，都可依叛国罪法判处死刑。在罗马史上著名的喀提林审判过程中，时年37岁的尤里乌斯·恺撒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至于西塞罗，他主张意图谋逆也应判处死刑，并且执政官可用手中权力加以制裁。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不可避免地因为这种立场而遭人诟病。我认为，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然而暗中图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流放是比较恰当的刑罚。因为，正如恺撒在喀提林审判中所主张的，把危险分子一个个与社会隔离，就能把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极度反感。他们虽然没有示威抗议，却对法庭辩论过程并不关心，他们认为提比略讨厌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法庭判决。罗马人深信，家庭稳定是保持社会健全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他们看来，像公公弹劾媳妇和爷爷弹劾孙子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的一个案子。

在我看来，提比略本人应该是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的。因为提比略早已命人在母子两人流放的岛屿上布置了相当规模的储水设备，当然，设备肯定比不上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文托特内岛，也即阿格里皮娜的祖父奥古斯都曾流放过提比略母亲尤利娅的地方，岛上的储水设备是当时修建的，提比略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整、扩建。虽然现在遗址早已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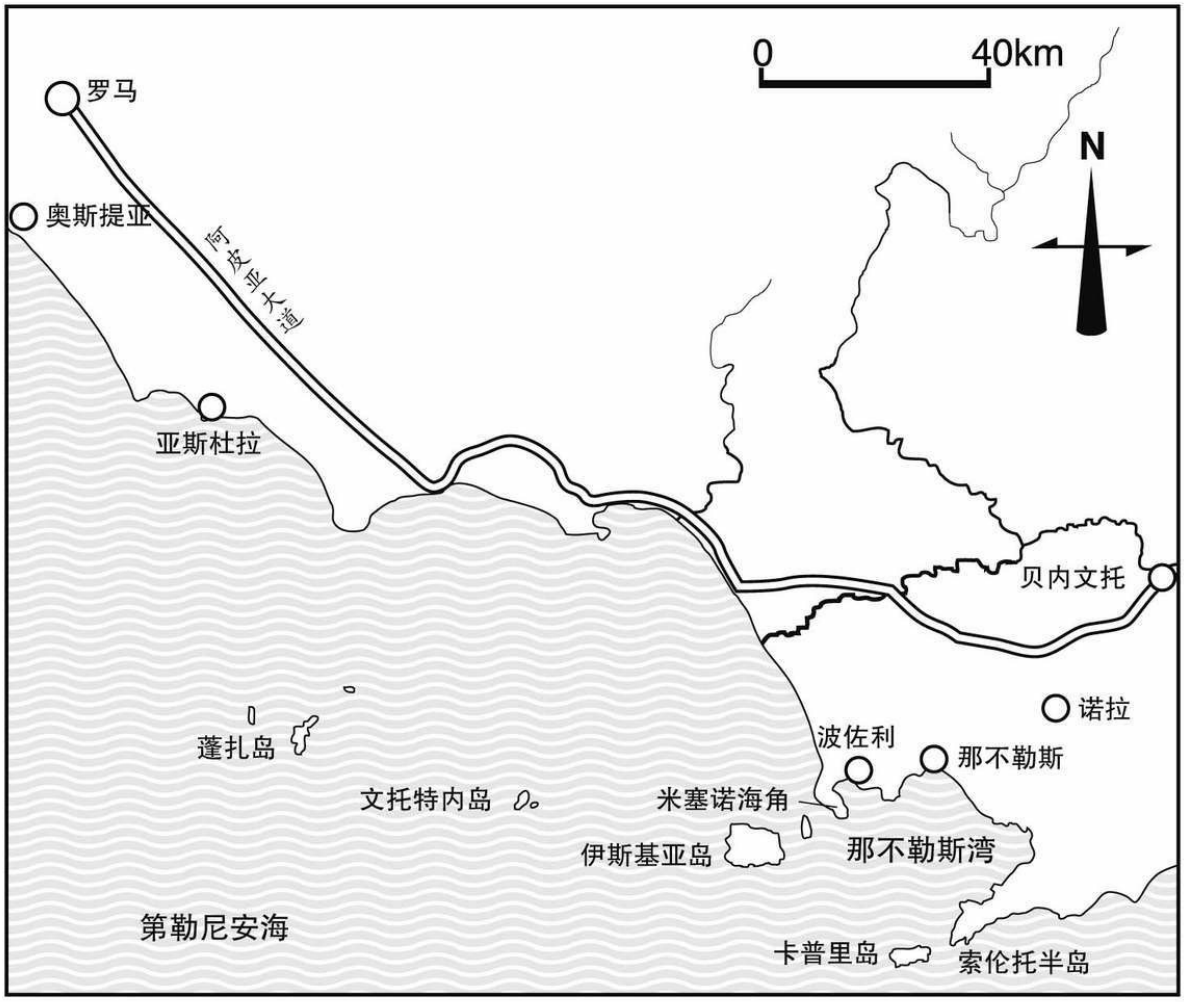
海水淹没，然而设备之完善是唯有罗马人才有的大手笔，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提比略大概心里面这样想，连我都避岛而居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都算不上孤零零的岛屿，从南往西北方向，依次是卡普里岛、伊斯基亚岛、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四座连成一串的岛屿，各岛之间距离30公里左右。即使不用担心生活用水，但四座岛屿的舒适程度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今天，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紧随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的步伐，致力于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打造观光景点。然而，受正面强劲北风的影响，岛上的饭店没有与时俱进，至今还是青年旅馆，岛上的景观也比较单调，只能吸引单纯喜欢原始意趣的观光客。景观变成绝美胜景，是由于目之所及并非一目了然，让人没有一探究竟的欲望；视线中有了遮掩，层叠掩映自然产生不同的趣味，能使人流连忘返。相反，如果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海，我们只能说是单纯地接触自然罢了。伊斯基亚岛的温泉久负盛名，可要说起岛上的景致，还是卡普里岛要略胜一筹。那不勒斯湾左接米塞诺海角，右连索伦托半岛，有这两个天然屏障，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北风柔和，加之百看不厌的美景，这座小岛2000年来一直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疗养胜地。当我踏上文托特内岛时，认为这里适合静心写作，可是如果要我在文托特内岛和卡普里岛中间二选其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卡普里岛。显而易见，主动隐居与被迫流放，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公元30年，在确定流放的阿格里皮娜及长子尼禄·恺撒各自前往流放地之后，塞亚努斯的下一个目标选择了阿格里皮娜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不知是因为交恶的兄长失势落魄而兴高采烈，还是因为年仅22岁容易疏忽大意，塞亚努斯居然可以轻易地利用他的妻子搜集到了证据。根据塞亚努斯到手的证据，当年两名执政官之一，以叛国罪告发杜路苏斯·恺撒。就这样，元老院判决杜路苏斯·恺撒有罪，他也被列为国家公

敌。不同的是，这次既不是死刑，也不是流放到某个岛屿，而是软禁在山上皇宫的一处地下室内。对阿格里皮娜势力的清洗依然持续，然而没有任何人被处以极刑。甚至挑明了反对提比略的阿吉尼斯·葛斯在被判有罪后，也只是把他软禁在执政官的官邸。流放蓬扎岛的尼禄·恺撒也在这一年死掉了。有人认为他是不服从警卫而惨遭毒手，也有人认为他是万念俱灰之后自杀身亡的。



那不勒斯湾与周围的四个岛屿

这一年，塞亚努斯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似乎已经权势熏天。次年，即公元31年，他与提比略共同担任执政官。提比略登基后，与他同期担任执政官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如果提比略认为有必要提高他选定的接班人的权威，他就会出任执政官。公元17年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以及公元21年日耳曼尼库斯亡故后晋升为继承人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提比略都和他们一同担任执政官。事隔9年，塞亚努斯获此殊荣，难怪他会得意忘形。

塞亚努斯的倒台

提比略经常受到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批判，说他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只是行事过于阴险奸诈。他指的如是提比略收拾塞亚努斯这一事件并没有错，确实手段十分阴险奸诈。

话虽如此，但不用阴险之计，怎么能除掉塞亚努斯呢？对手年届50，正当盛年，并且担任近卫军团长官15年之久，手握精兵，肯定培养了一大批心腹。提比略是包括近卫军团在内的全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然而士兵服从的直属上司不是他。同这个掌握9000名精兵15年的人物相比，皇帝虽然是他的上司，身边却只有极少数负责护卫的日耳曼士兵，如果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塞亚努斯察觉提比略的动作，那么连防御城池都没有的卡普里岛将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提比略必须谨慎谋划，准备周全。在我看来，提比略从与塞亚努斯一同出任执政官时起，就意味着已经出招了。

那么，提比略对塞亚努斯委以重任，又如此提拔塞亚努斯，如今却拔刀相向，这是为什么呢？

有研究者给出如下解释：他们认为，提比略竭力撇清他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一事中的关系，他要向罗马社会表明，这次行动完全是塞亚努斯的擅自行为，而自己一直隐居在卡普里岛并被蒙在鼓里。

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正是由于提比略指责阿格里皮娜母子，元老院才开始审判他们，并且提比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在提比略看来，塞亚努斯不过是搜集证据时必要的“左右手”而已。如果提比略一开始就打算在事后装做不知情，何必要出面不断从正面抨击呢？这样做简直愚不可及。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持以下论调：提比略频频出手让塞亚努斯惶恐不安，他花钱收买提比略手下的近卫军，甚至消防队的队员，极尽拉拢之

能事。

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塞亚努斯是在东窗事发前才收买士兵的。正如塔西佗批评提比略行事阴险一样，他原本就小心谨慎，除去他的接班人塞亚努斯，肯定不是仓促决定。一旦对方惊慌失措，做出一些自掘坟墓的傻事，提比略自然就会借这个机会动手。

很多罗马史专家认为，提比略察觉到塞亚努斯的野心会对自己产生威胁，所以才决定出手。

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提比略对罗马社会的说辞，他心里应该另有打算。我们难道不能认为，塞亚努斯的野心勃勃与提比略的贵族气质相冲突了吗？

小说《恺撒的事业》（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的作者贝尔托·布莱希特对恺撒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乌斯·恺撒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们时，他会用议员们乐于接受的语言，而当对象是士兵们时，他就选择士兵们容易理解的说法。也许面对女性，他的措辞也会因人而异吧。"然而，无论何时，恺撒永远是恺撒。这种评价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作家特有的观点。只有"永远是自己"，才能真正表现出贵族气质来。提比略同样具备了这种贵族气质，只可惜他天生没有"见人说人话"的"技能"，因为他实在不会演戏。不过，正因为他确信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出身、成长以至他原有的性格，都让他的这种贵族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具备贵族气质与重视他人实力并知人善用，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一定与"见人说人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起用人才是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自己办事，而不是换位思考。换言之，提拔人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如若那个人因而得到不错的利益，不过是凑巧获得报酬的结果而已。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绝对不允许他提拔起来作为“左右手”的人翻身成为“大脑”，进而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即使自己可以放低身段平等相处，他也是绝对不会允许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的。

提比略为何会把塞亚努斯放在身边15年呢？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是个能力不凡又忠心耿耿的“左右手”，然而，提比略肯定不曾想过把塞亚努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而塞亚努斯肯定也不了解提比略的真正盘算。

在5年前，塞亚努斯就露出了不满足于“左右手”的第一个征兆。当时，塞亚努斯请求仍在罗马的提比略，恳请同意他与两年前逝世的杜路苏斯的遗孀莉薇娅结婚。莉薇娅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妹，相当于提比略的侄女，同时她又是提比略亲生儿子之妻，所以是亲上加亲的皇族女子。如果提比略同意塞亚努斯娶莉薇娅为妻，就意味着塞亚努斯正式加入了皇室。

对于塞亚努斯的这个请求，提比略不置可否，这种含糊的态度让塞亚努斯满怀希望。我想公元25年，提比略可能已经在考虑隐居卡普里岛。要在卡普里岛的皇帝行宫的大岩石上开凿一个庞大的储水槽，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以如果要在卡普里岛隐居一两年，在岛上统治帝国的话，首都的治安必须委托给可靠之人。更何况，当时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计策已经基本成型，而塞亚努斯正是提比略用人之际的不二人选。

提比略于公元27年隐居卡普里岛，并利用塞亚努斯，于公元29年、30年成功肃清阿格里皮娜势力。至此，塞亚努斯已经没多大用处了。而一个人的利用价值降低，他的野心就显得十分有威胁了。

塞亚努斯的不幸正是自以为能够体会提比略的心意，并成功肃清了阿格里皮娜一派的势力，为此拼尽全力的自己一定更受提比略赏识，以为自己会接着受到重用。更何况，提比略还亲自担任执政官，为自己首次担任执政官保驾护航。因此塞亚努斯深信，在提比略之后，他肯定会

成为不可取代的罗马帝国皇帝接班人。

然而，提比略让塞亚努斯产生了错觉，使其认为与莉薇娅的婚事已经就在眼前了。正是这种皇室成员的幻想，使得55岁的塞亚努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公元31年1月1日伊始，塞亚努斯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政官工作，此时他干劲十足。不过，同样身为执政官的提比略仍旧闭岛不出，所以塞亚努斯是首都罗马最高掌权者。此外，他手握9000名精兵，身兼近卫军团长官一职。就连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只有出身名门才能在元老院有一席之地的议员们，对塞亚努斯这个“新摄政”也是无计可施，这些议员们都冷眼看着他干劲十足地去摄政。然而塞亚努斯却不守本分，他越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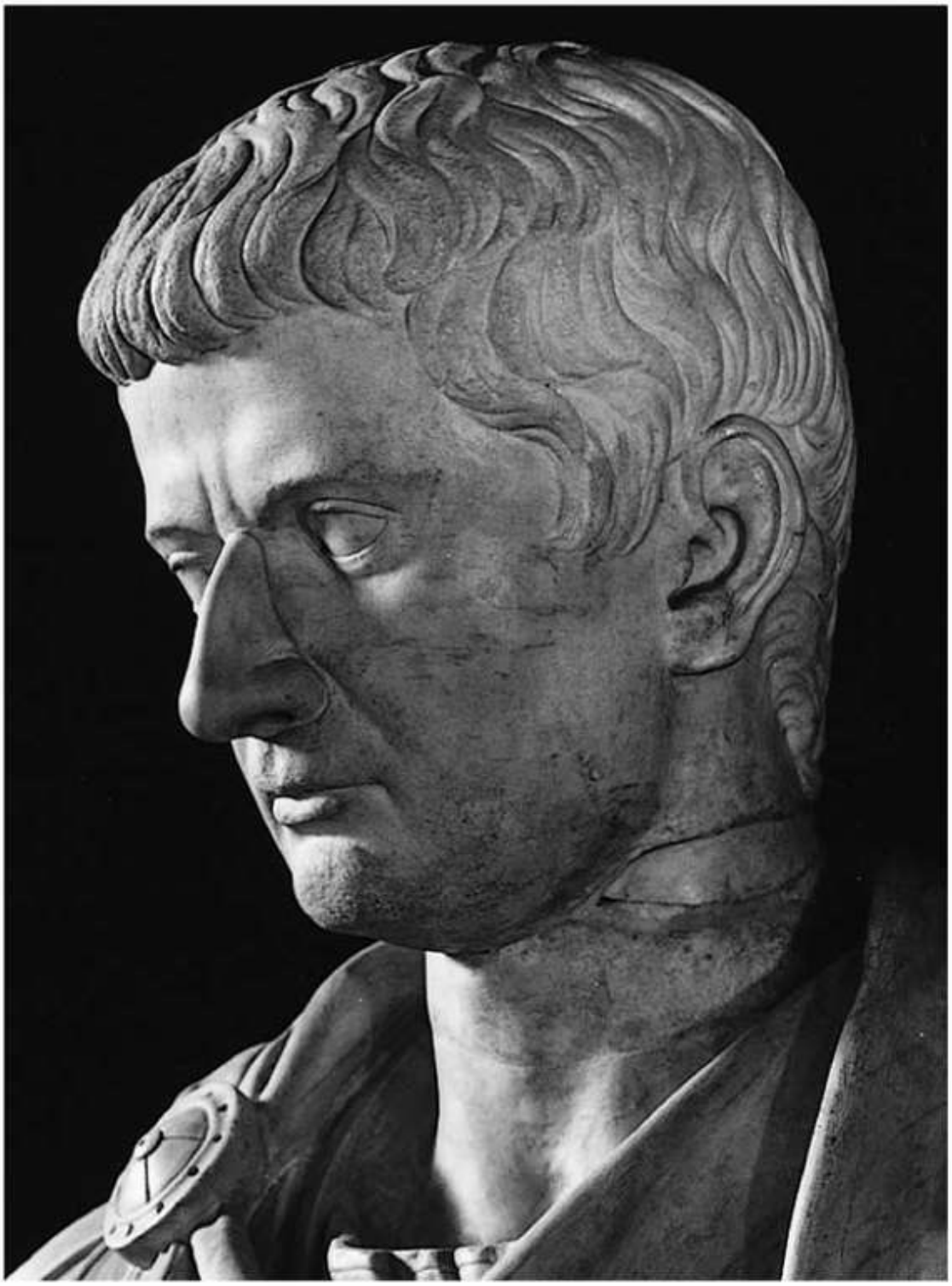
塞亚努斯身为执政官，居然亲自检举西班牙行省的总督路奇乌斯·亚伦提乌斯。理由在于路奇乌斯滥用总督职权，从事不法行为。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提比略从不轻饶在行省执政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提比略亲自反驳了塞亚努斯的这项指控。

在按惯例从卡普里岛送到元老院的信函中，提比略陈述了如下理由：尊重行省人民委托他人指控总督的权利，然而检举任期中的官员可能妨碍治理行省。所以，应在总督卸任回到罗马之后才会追究责任。也许提比略考虑到不检举任期内的官员应上升到治理帝国的政策，所以他额外要求元老院将这个建议通过，并加以立法。

对塞亚努斯的行径心怀不满的议员为数不少，加之提比略的建议又言之有理，以压倒性的票数迅速通过了不检举任期中的官员的法律。这使得塞亚努斯的不安第一次涌上心头。

即便如此，塞亚努斯作为现任执政官的地位并没有立刻动摇。进入帝国政权时期，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最高负责人，而执政官是首都罗马与意大利的最高负责人，并与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地位差不多。

按照惯例，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应由有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所以，刚完成的禁止检举任期中的总督法对此同样适用。换言之，塞亚努斯大可不必担心自己在执政官任期内遇到此类的“反击”。然而，如若借用英国某位研究者的形容词“terrible”（可怕），即拉丁文的“terribilis”，72岁高龄的提比略真是名副其实这个词语的注脚。提比略在为期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刚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于1月1日辞去了执政官一职。



永远“可怕”的提比略

古罗马的惯例是两名执政官共同进退。

随着提比略宣布辞职，塞亚努斯不得不紧步其后尘。公元31年下半年，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是“候补执政官”。

这样一来，塞亚努斯开始惊慌失措了。似乎从此刻开始，塞亚努斯同任职于行省的自己人互通消息，也开始用钱收买近卫军团的士兵和消防军们。这种类似垂死挣扎的动作，都被事无巨细地报告给远在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不过，塞亚努斯那时还是近卫军团长官。他毕竟掌握着战力不俗的9000人的精锐部队，万一大事不妙，他随时可能会一声令下包围卡普里岛。

另一方面，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密令卡利古拉到岛上见驾，如有必要，会释放那位被囚禁在皇宫地下室的杜路苏斯·恺撒。提比略出此下策自然不是因为担心阿格里皮娜两个儿子的安危，他只是为了防范塞亚努斯借着日耳曼尼库斯遗孤的名号，掀起政变，毕竟日耳曼尼库斯至今在罗马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另外，他还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重新任命马克罗前往首都罗马主持大局。

10月17日夜，马克罗秘密返回首都罗马，在来到位于罗马东北部的近卫军团营区之后，他立即将9个大队长全部召集起来，然后拿出提比略的委任状，宣布即刻起由他接管近卫军团总司令一职。接下来，马克罗拜访了一位名叫雷古拉斯的执政官，亲手递交了封存完好的提比略信函，并传达提比略的口谕——在明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信函。随后，马克罗去见塞亚努斯。他先告诉塞亚努斯，自己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近卫军团长官，仿佛是为了避免塞亚努斯产生任何疑心，马克罗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消息。他说，明天，在执政官宣读的信件中，提比略将请求元老院授予塞亚努斯护民官特权。塞亚努斯喜不自胜，他忘了深究自己被免除近卫军团长官一职意味着什么。

依据元老院的规定无故缺席会被处以罚款。第二天，即10月18日，

为了免受财产损失议员们纷纷出席，议员们一边腹议，这次肯定又是例行公事地宣读提比略的书信，然后投票表决，应当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边陆续进场。议事厅中没有安排固定座位，通常是先到者先坐。然而，大家每次都会心照不宣地留出最前排的座位。前排的座位是长者或能力超群的议员们的专座，即使这些议员姗姗来迟，也没人敢去坐。这天塞亚努斯却认为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应坐在最前排。

会议在两名执政官进场之后随即开始。在不疾不徐地拆开昨夜收到的提比略信件之后，雷古拉斯执政官开始当众宣读起来。

虽然塔西佗的《编年史》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但是让人惋惜的是他的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幸失传。也因此使得我们无从得知提比略书信的内容。塔西佗素以厌恶提比略闻名，然而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作家的专业水准相当自负。用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达好恶，是业余爱好者的习惯，不合专业人士的作风。历史学家记述史实，通常会在其后附加注释或评语，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至于专业作家，历来避免发表个人评论，只是陈述历史事件，就能让读者体会到书中人物是否伟大或渺小。塔西佗对这两种方法运用自如，所以他被人们公认为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史实，我经常会产生和塔西佗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阅读他所作的批注或记载的史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传达史实。换言之，我相信他的专业功底，才是我信任他著作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尤里乌斯·恺撒的亲笔文章，或者把他从碑文上摘取的史实重点和其他史学家进行比较，其中的差异一目了然。塔西佗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摘要”，然而其他史学家，尤其是狄奥·卡西乌斯，完全变成了发表自己观点的著作。所以他笔下的罗马历史人物，说话口气都是一个模式，给后世的研究者在区分人物、了解人物性格时带来不小困难。甚至尤里乌斯·恺撒的语言也有失简洁明快，就好像是一个50岁老头在喋喋不休，实在大煞风景。

塔西佗不是这样，在研读他的著作时，要时刻牢记他非常善用上述两种方法，否则就会轻易地被他的文字叙述牵引着，从而忘了自己的初衷。我也一直认为，自从伏尔泰开始，近现代屡次出现为提比略翻案的事件，并不是找到了比塔西佗的记载更可信的历史记录，而是大家把他的作品读通、读熟、读透了才产生的想法。

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只好将就现有的材料。所以，关于公元31年10月18日在元老院会场宣读的提比略书信，我只能借用其他史学家的观点。通过这些解释，我们很清楚，当天提比略的长篇大论，根本目的就是让塞亚努斯垮台，堪称“传世之作”。

提比略在这封书信中首先提及七零八碎的国政琐事，接着强调维护帝国安全的重要性，突然话题一转，罗马帝国处在危机之中，信函在这里陡然变换了语气。提比略在信中说道，如果此时回到罗马，仅靠现有的护卫并不安全，希望元老院派一位执政官来随侍保护。因为执政官有权指挥近卫军团，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朝堂危急，需要动用近卫军团以防不测。议员们原本以为信函内容是老生常谈，一听到这话，立刻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当提比略严词质问支持塞亚努斯派的两位议员时，议员们才开始集体转变态度。紧接着提比略不留情面地指责塞亚努斯罪不可赦，犀利的言辞朝所有议员铺天盖地而来。塞亚努斯不仅阴谋颠覆国家，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他的罪名是叛国罪。这件事情由皇帝亲自揭发，一一列举的证据就是指控理由。信函的最后，提比略要求元老院立即将塞亚努斯就地正法。

塞亚努斯对事态的急转直下大惊失色，这种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元老院的绝大多数议员十分厌恶塞亚努斯，趁塞亚努斯还在怔愣的空隙里，迅速通过了对他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决议。执政官叫到被定罪的塞亚努斯时，他茫然若失，没有任何回应，念了三次名字才反应过来。

当天，塞亚努斯被押解到罗马广场的牢房内，随即就被执行死刑。罗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塞亚努斯曾经因修复庞培剧场有功而在剧场一角为其立像，民众把这座塑像抬出来，敲得粉碎。民众对塞亚努斯的类似密探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罗马人朝着塞亚努斯的尸体发泄怒气，并将其碎尸后扔进台伯河中喂鱼。近卫军们没有人敢为前任长官出头求情，全都在这段时间内闭营不出。在一周之内，包括其长子在内的塞亚努斯派势力，就以同党的罪名受到牵连并处以极刑。

对于提比略而言，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无谓的流血事件。然而，祸福难测，让他痛不欲生的折磨也由此开始。

在塞亚努斯提出要与莉薇娅结婚之后，就与其结发妻子亚比卡塔离异了。然而，亚比卡塔在得知儿子也受到牵连后，绝望地选择了自杀。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她却给提比略写了一封信，并送到了卡普里岛。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后面一连串变故。

亚比卡塔在信中提到，早在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尚未离世之时，她的前夫塞亚努斯和杜路苏斯的妻子莉薇娅已经暗通款曲。8年前正是这对奸夫淫妇密谋毒杀，才导致了杜路苏斯的英年早逝。在信中她甚至详细描述了下毒手法。此外，这两个人会起意杀人，不只是为了除去两人天长地久的障碍，还有一点，虽然杜路苏斯并没有察觉妻子出轨，但对塞亚努斯怀有莫名的敌意，这使得塞亚努斯十分惶恐。对于这封信中所述的内容，提比略倒也能够略有记忆，因为杜路苏斯经常当面抗议他重用塞亚努斯一事。

72岁的提比略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这一年冬季离开卡普里岛，回到温暖的意大利本土南方度过寒冬。他在岛上一待就是9个月，甚至不许执政官前来探望。他一整个冬天没有踏出卡普里岛一步。

对于提比略的统治才能，现代的研究者赞誉极高，他们这样写道：

提比略在成功消灭塞亚努斯之后，有着非常好的时机重返罗马，再次统率帝国开创盛世。甚至塔西佗也认为提比略统治的前10年是毋庸置疑的好时期，此后的7年好坏参半，最后6年就是暴政。从公元31年处死塞亚努斯到公元37年驾崩正是这最后6年时间。后面我们再讨论这6年的统治是否如塔西佗所说的那么不堪。然而在普通民众看来，让庞大的罗马帝国精巧地运作都是一些表面功夫，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骄傲，而真正的领袖在于唯有一直带领他们不断向前。如果提比略在乎舆论和后世的评价，那么公元31年年底的确是他返回罗马的良机。如果他顺应民意回到罗马，他就不用背负统治后期施政不仁的骂名了。

然而，提比略并没有回到罗马。公元31年年底，我们都认为是重返罗马的绝佳时机，提比略沉寂了两个月后，和元老院以信函往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方式。虽然方式相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提比略不再压抑自己的愤怒，甚至可以说是“不管不顾”了。不过，他的“不管不顾”并不是对帝国不理不睬，而是只针对元老院阶级。显而易见，人如果能预见结局，就不会轻易破罐子破摔。

提比略在审判皮索时，曾经极力避免让父亲的罪责波及后代，甚至数年后还让皮索的一个儿子担任执政官。可是，现在这样的提比略早就不复存在了。塞亚努斯有三个孩子，长子已经被处决，剩下的两个孩子中有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也被皇帝下令杀害了。被怀疑和塞亚努斯有奸情，并与之共谋毒杀亲夫的莉薇娅也被迫自杀。然而，铲除塞亚努斯全家并不能平息提比略的怒气。被认为属于塞亚努斯派系的议员们在劫难逃，据说就连他们家中的奴隶们也被下狱。塔西佗写道：逐一记录这次事件中一连串受害者的姓名时，虽然难受得几欲呕吐，但又不能不把这些事实记载下来。这些事件使得指导整个罗马社会的元老院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被塔西佗等史学家们定义为“暴君恐怖时代”中的历次审判，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一个特别的情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提比略

的怒气冲天并不是恐怖时代形成的唯一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的议员们也使得这种恐惧心理不断地蔓延开来。毕竟，叛国罪的审判要在元老院进行，涉案的被告和原告都是元老院的议员。发展到最后，执政官都彼此反目成仇，仿佛是先下手为强，要在被指控之前先把别人拉下马。我们可以把古罗马时代的这项叛国罪法比做日本的《破坏活动防治法》（即《破防法》），人们凭借这个法律来指控而演变成先发制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问题，而就好像雪球越滚越大。提比略对此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在以前，他会积极介入，要求执法必须做到勿枉勿纵；现在，刑罚是否忠实执行他毫不关心。结果，有犯人一入监牢就杳无音信。提比略采取不管不顾态度的一年后，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阿格里皮娜和囚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相继去世。这难道不是警卫士兵被提比略的漠不关心影响所致的例子吗？

在记录提比略造成的死难者名单时，虽然塔西佗说他光是写名字就觉得心里十分难受，然而还是有其他研究者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根据一位名叫奇亚切里（Ciaceri）的意大利研究者的研究资料记载，提比略统治时期有63人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这些人还包括塞亚努斯掌权时代的审判人数，不仅仅是发生在“六年暴政”时期的人数。更何况塔西佗连正常死亡的人都算进去，也没有区分死因到底是处死还是自杀。在这些人中，选择自杀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告后身陷绝望，为了保护财产和家人只好自寻短见；而另一种则是体力衰弱，自知时日无多，选择了自杀。人在体力、智力、精神等方面都衰竭之后通常会苦苦挣扎以求长寿，但罗马领导阶层对年老体衰后的苟延残喘厌恶至极，历史上他们选择绝食等死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以及随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都选择绝食而死。

关于63人这个数目是多是少，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恺撒从未使用过叛国罪法，奥古斯都统治40年也不过两三个案例。如此说来，提比略时期达到63例的确坐实了恐怖时代之名。然而，恺撒与元老院矛盾

激化时，暂且算做战争，杀人无数；奥古斯都正值恺撒遇刺后的内乱纷争，他把以西塞罗为首的300名元老院议员以及2000名骑士阶级成员划入布鲁图派彻底清洗，换言之，奥古斯都在内乱中屠杀了罗马社会第一、第二阶级的2300人，而在这些人中未经审判即被就地处决的有130人，免于一死的人也难逃家产全部充公的命运。总而言之，恺撒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痛下杀手，而奥古斯都则是吸取恺撒的教训自我防范过度，在肃清反对派之后，他们对罗马人的“慈悲”精神才最终让他们声名鹊起。

然而，考虑到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不同之后，问题就不再是数量的多寡了。话虽如此，公元32年以后，提比略不再执著于指控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议员们以为他送来的书信中会犀利地指出模糊不清的控诉理由，没想到就连那些根本不构成指控理由的“理由”，他都不再关心，完全放任自流。

不难想象，提比略造成“恐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清除元老院的害群之马。阅读辩护的文章之后，63名被处死的人中，只有寥寥几个让人觉得杀了可惜。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让人赞同提比略的感叹，元老院议员的素质低得让人叹息。元老院议员一共600名，即使在通过选举选贤任能的今天，真正担得起贤能之名者有多少？在人才选拔方面，难以兼顾数量和质量，这是古今内外不变的现实情况。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为提比略开脱罪责，因为奥古斯都实现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正是通过对这600名议员的怀柔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不管是不是他“不管不顾”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是他刻意肃清元老院中的害群之马，但实际上牺牲的是元老院阶级的成员。罗马普通民众对提比略同样是满腹怒气。

虽然罗马普通民众既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被没收家产，然而，在提比略20年紧缩财政的政策之下，大多数人感到经济十分不景气，而且这种日子仍在继续。罗马帝国根本没有增加新的建设，只对公共建筑

进行了一般的修缮整理。奥古斯都时代数次发放的皇帝赏金，现在已经好久没听说过了。此外，皇帝不仅不再赞助民众最喜欢的角斗比赛等各种活动，还禁止别人主办，百姓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此类娱乐。此外，如果提比略仍然在罗马指挥着罗马帝国的话，那当然是不能对他进行任何指责的，提比略却远在风景秀丽、温暖舒适的卡普里岛，独自享受舒适悠闲的生活。此外，提比略居然以叛国罪的名义，冥顽不灵地妄图粉碎建国以来象征罗马传统与权威的元老院。当时的罗马人对提比略的看法十分糟糕。

如果此时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边境，或者与势力强大的东方国家帕提亚突然爆发战争，抑或众多行省中有那么几个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那么罗马人的注意力肯定会转移到这些“新闻”上，哪还有空对老皇帝的日常言行说三道四呢？提比略从登基以来就通过稳固的政策和从不间断的监督，使罗马人在往后的20年内，都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大事”，这得归功于提比略把帝国治理得太好了。然而，人们总是追求“新闻”。如果没有“大事”，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聊胜于无。毕竟，天下太平，就连作为主食的小麦也没出现过不足的情况。提比略统治的23年间，只有一次因粮食不足引发骚乱。因小麦价格暴涨使得罗马公民民怨爆发，最后演变为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在闻讯后，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发来指示，小麦毫无理由涨价，因为他清楚地记载了小麦的库存量。在提比略的打压下，抗议小麦价格高涨的活动也烟消云散。说明白点，提比略统治后期怨声载道，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殚精竭虑施行德政，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义的事吗？

流言蜚语

被白色高墙围绕的行宫耸立在卡普里岛的断崖上，里面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最高当权者，这怎么会不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去猜测他的日常生活呢？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的10年间，从未在罗马的任何公共场合出

现。与奥古斯都不同，提比略也不会去参加岛上居民的祭典。卡普里岛水源稀少，所以提比略不但在行宫安装了储存雨水的蓄水槽，农民也可以使用这个便利。可是，即使农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蓄水槽，但与替他们修建蓄水槽的皇帝却从未谋面。他们知道皇帝是否还在岛上的唯一途径，就是看码头是否停有御用的快艇。

提比略即使离开卡普里岛返回本土，他的御辇四周仍是挂着布幔，也不允许别人靠近问候。能够见到提比略的人大多是前往异地上任的总督或皇帝的财务官，此外能觐见皇帝的人寥寥无几。提比略坚持贯彻知人善任的原则，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的任期自然就延长，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也自然就更少了。至于每年交替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因为元老院掌握人事权，他们不需要面见皇帝领受任务。换言之，了解提比略生活起居的人越来越少。越是在神秘的面纱后遮遮掩掩，越会令人无端猜测，让人的想象愈加漫无边际。

理智的塔西佗只记载了“提比略强行将少年们带回岛上，猥亵之”，可是另一位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类“传闻”兴致勃勃，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根据这些记载，提比略在卡普里岛犯了以下恶事：

第一，嗜酒。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都会用水或温水兑饮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喝纯酒可以算得上酒量好。当然，提比略喝下的酒自然不少。

第二，发明下流猥亵的性游戏。提比略把从各地搜罗到的少男少女按男女搭配，每一组有一位此道高人从旁调教，然后三个人在提比略面前表演。提比略要求分组表演，是因为各组要求以不同的体位性交。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提比略已经衰退的性欲。

第三，提比略发明了新花样——在7000平方米的官邸用地内，让打扮成牧神或精灵的少男少女们藏在各个森林或洞穴里，提比略只要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就要给提比略表演性交。虽然总面积7000平方米是确有

其事，可是其中尽是林木，根本不见森林和洞穴。

第四，提比略特意挑选出幼小的少年男女，称他们“小鱼儿”，他惬意地躺在宽敞的罗马式浴缸内，让“小鱼儿”们在他大腿间穿行，享受“小鱼儿”们的舌头和牙齿触碰他性器官的快感。记载中还说提比略老而弥坚，性欲旺盛。甚至在一次给众神献祭的祭典中，他看中一个帮忙的美貌奴隶，等不及仪式结束就带她到别的房间颠鸾倒凤。

时至今日，那不勒斯当地居民依然深信所谓的“提比略传闻”。他们说，当年这些惨遭提比略蹂躏的受害者，任务完成后都会被无情地从300米高的悬崖上投进大海，没留一个活口。

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些“恶行”大多是付之一笑。论及提比略的古代历史学家一共10位，其中有2位希腊人和2位犹太人。我们暂且不说支持提比略的罗马人帕特库鲁斯和犹太人斐洛，老普林尼和塞内加虽然也记载了提比略性格孤僻，然而都没有说他品行不端。希腊人普鲁塔克也曾提到他在卡普里岛的孤独生活，但他同样没有说提比略道德败坏。犹太人弗拉维奥·约瑟夫亦然。罗马的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虽然嘲笑老皇帝在岛上和占星师们浑噩度日，但也没有提到他在性生活方面的丑恶趣味。在提比略驾崩30多年后出生的苏维托尼乌斯，是唯一一位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对他这些事详细记载的史学家。对于这些流言，塔西佗寥寥数语带过，此后的狄奥·卡西乌斯的记录略微详细，但与苏维托尼乌斯相比却望尘莫及。更何况，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罗马皇帝传》也和今天的色情杂志大同小异。

据说，喜欢和“小鱼儿”们共浴的还有年迈的奥古斯都，这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性行为是古罗马男人梦寐以求的美事。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可以完成，这是人之常情。提比略的被现代人视为“禁欲”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更加刺激了民众的幻想吗？

金融危机

74岁高龄的提比略在最高当权者必不可少的冷静方面仍然出类拔萃。他对公元33年罗马金融危机的出色处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在已经转变成同室操戈的元老院中，有人指控某议员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这是金融危机的前兆。指控的理由不是该议员违反了法定年利率最高上限12%的规定，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尤里乌斯·恺撒法》。所有金融业者都必须将资金的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这就是《尤里乌斯·恺撒法》。我们不清楚所谓的“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然而恺撒是首位开疆拓土、选拔人才的开创者，当时可能是出于若就此放任自流会导致国内金融空洞化的考量，所以他制定了这部法律。毕竟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尽管本土的利率上限为12%，行省却无限制，有议员就效仿布鲁图，收取48%的利息。面对12%与48%的利率差距，别说布鲁图，其他人肯定也会转移资金。恺撒制定这部法律，就是希望在这种情况可以控制时加以引导使之规范。

并非是因为罗马的金融业者遵纪守法，才使得《尤里乌斯·恺撒法》能够通行至今。金钱遵循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使向行省融资的收益高也肯定伴随着较高的风险。相反，本土内的融资收益低也使得这种风险随之降低。

罗马帝国维持了60年的“和平”，对行省融资的风险自然有所降低。“风险”降低，“收益”却没有缩水。最后，导致《尤里乌斯·恺撒法》形同虚设，也没有人遵守将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的规定。所以属于富裕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中，暗地里操控金融业的有很多。

然而，形同虚设，并不意味着废止了这部法律，所以违反《尤里乌斯·恺撒法》，同样可以作为检举的理由。元老院闹翻了，因为一旦开庭审议，绝大多数议员都会被问罪。

接到元老院请求后，提比略当机立断，以一年半为限，要求众人自行调整资产以符合“一定比例”的规定。

罗马帝国的金融业者开始四处奔走催讨债务，他们同时也中断新的融资申请，以适应“一定比例”的规定。如此一来，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大概因为行省有很多大规模农庄，才使得意大利本土的债务人受到的冲击比行省大得多。而本土由于恺撒制定了《农地法》，中小规模的农庄居多。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这也使原本日渐下跌的本土土地价格更是一落千丈。为了偿还债务，地主纷纷售地变现，随着地价滑落，破产者不断出现。至此，金融市场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只有依仗国家出面力挽狂澜。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按今天的说法，必须得“投入公共资金”。为此，提比略决定从罗马帝国的国库中，划拨出1亿塞斯特斯投入金融市场。不过，“公共资金”不是通过金融业者直接投入。提比略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不经过金融业者，而是直接由“公”的委员会借给“私”的债务人。这种由“公”至“私”的融资为期3年，无息。然而，债务人须以价值2倍于债务的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债权人——国家。

公元33年的金融危机在提比略的政策实施之下，暂时得到了缓解。不知是否已经能够满足“一定比例”的规定，抑或是担心失去低风险的融资对象，金融业者们不停地再度融资。

提比略这样的政策其实治标不治本。塔西佗把原因归结于法律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起初严格遵守执行，后来渐渐地丢在一边。但是我认为，金融业的影响源于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学者的说法是，本土内的利率通常在5%左右，然后根据风险变化适当调整；行省的利率控制在10%到15%之间。这样一算，罗马本土与行省之间的确存在2到3倍的利率差。至于对行省融资，由于罗马人自己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行省的融资风险充其量算中等水平，虽不及本土低，但也不算高风险。低风险低收益和中等风险高收益孰优孰劣，这一点谁都

明白。罗马的金融业者遵循的也是“金钱”规律，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就会把多余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欧洲或非洲。正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才使得行省得到了发展，从根本上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和平”。其实，公元33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并不是本土经济“空洞化”的前兆，应该说是本土与行省的“平等化”。进一步而言，就是本土与行省利率差距缩小的前兆。我有理由认为，罗马帝国主义与后来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罗马帝国本土公民与行省人民，尤其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化”。

时隔17年，东方问题在金融危机刚结束时随即爆发，当然这也需要提比略亲自出马处理。公元18年，在罗马帝国的大力援助之下，阿尔塔什斯在继任亚美尼亚皇位之后，励精图治，使得亚美尼亚王国国泰民安。然而，随着亚美尼亚国王的驾崩，帕提亚再度插手亚美尼亚事务，造成问题日益复杂化。帕提亚希望从王族中选择亚美尼亚新王，摆脱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掌控。

帕提亚人认为在卡普里岛深居简出的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应该没有精力再介入东方事务。然而，他们错了，即使76岁，提比略依旧雄风不减当年。

知悉帕提亚的举动，提比略即刻派遣维特里乌斯前往东方。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屏障，提比略根本不想把亚美尼亚王国拱手让给帕提亚。提比略推选原本被送来作为人质、后来在罗马长大的梯里达底作为亚美尼亚新王的人选。维特里乌斯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新王登基时不能够与帕提亚开战。维特里乌斯奉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此外跟17年前的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他也被授予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指挥权。

此时的维特里乌斯也是提比略善用人才的一个典型。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原地不动，提比略只是冷眼旁观帕提亚等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彼此短兵相接，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成功地让梯里达底登上皇位。

和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是提比略最大的希望，因为亚美尼亚是东方君主国家中唯一可以牵制势力强大的帕提亚的国家。亚美尼亚不用向罗马帝国纳税，也不需提供兵源。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就是新王必须站在罗马帝国一边。

维特里乌斯在完成使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叙利亚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安条克。此时，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免除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的职务，并将其送回意大利。彼拉多并非是因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被遣送回国受审，而是因为身为犹太地区长官却玩忽职守，就罗马行政官的立场而言，理应被检举。也许犹太人社会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动乱，都是彼拉多恶政导致的。提比略包容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然而不能容忍因此造成社会不安。总而言之，本丢·彼拉多不是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年轻木匠之死而被指控，而是以玩忽职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审。

公元36年，罗马帝国“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发生火灾，大角斗场观众席下的一家店铺是起火点，这一年也是在彼拉多被召回国的同一年。这座可容纳15万人的角斗场有三层观众席，当时只有一楼是石材结构，上面两层是木结构，是由尤里乌斯·恺撒重建的。石材结构的下方各种店铺挤满了前来大角斗场观看演出的观众。

火势从一家店铺蔓延，不仅把并排的店铺烧个精光，大角斗场的木造部分都被波及，大火在当时北风的吹动下，肆虐到了阿文庭山。古罗马人一般会购置两套住房，闹市的居所无法满足宁静的要求，阿文庭山自然是首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阿文庭山属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所以，比其他山丘离市区更远的阿文庭山，除了共和制时代遗留的几座神殿以外，都是住宅区。因此，除了大角斗场和神殿等公共建筑之外，受此次火灾波及的还有民居。

提比略对这次火灾的处理同样迅速彻底。他立即拨出100万塞斯特斯作为救助金，并成立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灾情调查

与灾后重建的协商和执行。除了1名是执政官任命的之外，提比略任命了5名议员中的4名。提比略任命的4个人，分别是3年前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后过世的阿格里皮娜的3名女婿，以及杜路苏斯的女婿，即提比略的孙女婿。换言之，委员会成员中有4位皇族。这个安排，对于首都公民和元老院而言，是难得出于政治考虑而作出的人事安排，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提比略抛弃了我们”的观点。这对历来自信满满无视舆论的提比略而言，此时此刻也应该是心力交瘁了吧。

最后的日子

我们在史书中寻找提比略身心俱疲的征兆，其实可以从他冷静彻底地肃清塞亚努斯后不久的公元32年看出。

公元32年，元老院以叛国罪互相倾轧，彼此争斗得不亦乐乎。恰逢此时，身为提比略友人之一的议员科塔被告发，罪名是他在用餐时以提比略及其家人作为谈资。其实科塔很冤枉，他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根本算不上批评就被认为此举有损提比略的威名，真是让他百口莫辩。为此，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寄来书信，内容如下：

> 议员诸君，如果我早知欲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明了今日落笔之内容，那么，即使诸神降下我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我也甘之如饴。

接着，提比略介绍了他与科塔的多年友谊，盛赞科塔对罗马帝国所作的贡献，然后，以下面这句话结尾：“进食之闲谈成检举之证词，让人不胜唏嘘。”

然而，这封书信的开头部分被塔西佗解读成：“提比略本人是自作自受”，“他的罪行以及犯罪事实带来的深重罪恶感，让他不得不自我坦

白”。

对此，我有不同的理解。我不认为提比略受困于深重的罪恶感，而是元老院的素质低得出乎意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他对此深表绝望。餐桌上无意义的话题居然被当做叛国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元老院，即使不是提比略，任何人都不知道“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今日落笔之内容”。总之，对手越愚蠢，要传达什么、如何传达，都会变得难上加难。

独自背负所有责任的人的自我怜悯，甚至会偶尔流露出“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这样的感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怨自怜呢？感叹为什么一切都得由自己一人承担，这是凡事都得靠自己单打独斗的人偶尔会陷入的情绪低谷。只要能摆脱这种暂时的低迷心理，这个人又会以差不多忘记自怨自怜的能量，重新振作，“单打独斗”。实际上，即使提比略在众人面前坦露心迹，一吐为快，当次年遭遇金融危机、再下一年起历时两年解决东方问题，以及之后的灾害处理，他依然继续单打独斗。

提比略曾经以辛辣无比的言辞戳得人体无完肤，他至死也不会流露出丝毫绝望或脆弱之情。然而，提比略已经身心俱疲，此时的他真的老了。

公元36年到37年的冬季，在凛冽刺骨的西北风中，77岁高龄的提比略离开了卡普里岛，来到那不勒斯湾以西的米塞诺海角上的别墅过冬。在此地过冬，不但可以免受寒冷的北风和西北风的袭扰，还能从正面远眺到维苏威火山，那真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这座别墅由共和制末年的一位杰出将军鲁库卢斯建成，当然，他以奢侈生活、吃遍天下美食闻名于罗马，然而，最后此地却成了提比略的私有财产。虽然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遗迹，不难想象这座别墅反映出鲁库卢斯的贵族品位，一定是座美丽漂亮的海边别墅。提比略似乎对这座别墅情有独钟，经常到此过冬。

公元36年到37年这一年的冬季并不寻常，77岁的皇帝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提比略有生之年不曾生病，也没有遵循医嘱，随心所欲活到古稀之年，如今，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无力继续支撑。提比略凭借强烈的责任感来治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肯定明白权力顺利交接的重要性。有三个人具备接替提比略成为第三任皇帝的资格，按长幼依次是：45岁的克劳狄乌斯、24岁的卡利古拉，以及提比略的年仅16岁的嫡孙葛梅鲁斯。

提比略首先排除年纪适合的克劳狄乌斯，这事出有因。克劳狄乌斯虽然是提比略的亲侄子，然而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时，克劳狄乌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以提比略养子的身份成为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所以克劳狄乌斯成了提比略本家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现任家长。如果让他成为皇位继承人，就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志——唯尤里乌斯家族的男性可继任为皇帝。正因为自己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所以要在家族内挑选继承者，这不是提比略的风格。

归根结底，提比略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的接班人，不是奥古斯都预定接替他的日耳曼尼库斯仅剩的遗孤卡利古拉，就是以他的嫡孙的身份加入尤里乌斯家族的葛梅鲁斯。

提比略于公元37年3月16日驾崩。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说提比略的死法很符合“可怕的提比略”的死亡方式——他因枕头窒息而死；然而，提比略驾崩时才10多岁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却认为提比略死于衰老，我也认为他是自然死亡。提比略终年77岁零4个月。

罗马帝国是由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打下框架、提比略奠定基石，不论塔西佗等共和制拥护者如何批判提比略，都不能改变上述事实。

此外，还有研究者批评提比略没有施行任何新政。在我看来，提比

略没有施行新政非常重要。因为，奥古斯都一手架构的完美帝王政治体系，如果继承者的做法稍有差池，肯定会因一时的改革而前功尽弃。但是，提比略继承了奥古斯都的遗志，为巩固奥古斯都所架构的体制专心致志，殚精竭虑，所以之后无论由谁执掌天下，罗马帝国的基石已经坚如磐石了。

虽然有默默无闻的努力，但是提比略还是很难获得民众的称颂。此外，也没人能够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进行辩护。而且，罗马人经常会以政治上的不当言行，彰显出提比略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在得知提比略驾崩后，罗马人举国欢庆，他们纷纷涌上街头，高喊："把提比略扔进台伯河！"

幸好，有人在提比略驾崩不久便对他的政绩给予了正确评价。可惜的是，提比略在罗马公民或元老院的议员之中缺少这种"朋友"。这个人是埃及行省首都亚历山大的居民、一个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斐洛。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被称为"犹太的柏拉图"，此外，他还是亚历山大城中犹太人社会的代表。欲知这位犹太领袖如何评价提比略，我们只能借助他的著作了解一二：

> 皇帝提比略驾鹤西归后，盖乌斯（通称卡利古拉）继承了一个疆域宽广的庞大帝国，幅员之辽阔几乎囊括全世界所有的陆地与海洋。整个帝国公正立法，严正执法，如今，无论大小的"争斗"已是过眼云烟。帝国各处，无论东西南北，陆地海洋，都和谐地统一于罗马帝国的名义下。帝国之内，蒙昧之民和开化民族和睦相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平等共事，为了维持彼此祈求的和平，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
>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人赞不绝口。在人们累积的财富之中，黄金和白银是货币也是工艺品，随处可见。遍及整个帝国的通商网络，让财富与物产的交流更加频繁。帝国军力强盛，编制了完备的步兵、骑兵和海军。帝国之境，皆可安居。因此，整个帝国是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帝国疆域从幼发拉底河绵延至莱茵河，日出日落之地似乎也在其中。

这一切殊荣，并非只有住在罗马的公民有权享受，欧洲之民、亚洲之民亦可，换言之，帝国全体居民都可享受。当然，第一个继承这样繁盛帝国的幸运帝王，是盖乌斯。不管是个人或是帝国规模，也不论财富、权力或繁荣的基础，一应俱全，无须再造。幸福就在门外，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门迎接。

提比略曾以犹太人可能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将他们暂时从意大利本土驱逐了出去。如若他在天之灵知道自己死后竟然有一位犹太人给予他如此美誉，不知他将作何感想？

近现代历史研究者不断对提比略进行重新评价，当然，这应该归功于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是因为历经180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过去我们只能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还原历史，现在可以参考罗马帝国各地发掘出来的众多碑文和其他历史数据，使得我们的著作更加接近真实。其中，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贯彻始终的，就是以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蒙森。他评价提比略是“罗马最优秀的帝王之一”。

谨以此文——“皇帝提比略”，献给1996年逝世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先生。高坂先生在世时曾说，罗马皇帝之中，他尤其对提比略心有戚戚焉。在我询问理由之前，高坂先生就已与世长辞，然而，在如今我写完提比略后，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第二章

皇帝卡利古拉

（37年3月18日—41年1月24日在位）

年轻的新皇帝

罗马帝国上上下下，特别是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的居民们，都欢欣鼓舞地迎接提比略的驾崩和卡利古拉的登基，仿佛是漫长严冬后春天造访一般。一位24岁零7个月的英俊潇洒的年轻人继承了77岁老皇帝的皇位。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然而，民众的喜悦不只如此。

首先，对于应由神君奥古斯都的血亲继承皇位深信不疑的人而言，目睹父母都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的卡利古拉登基，总算等到了“大政归还”的一天，夙愿得尝。

其次，素来与皇帝对立的元老院，也非常赞成卡利古拉继承皇位。在议员们的印象中，卡利古拉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一贯亲近元老院，他们也认为卡利古拉应该不会效仿提比略，恣意妄为地寄封信来要求元老院同意，根本无视元老院权威的存在。况且，卡利古拉乳臭未干，根基尚浅，有利于元老院把持朝政。

普通民众自然双手赞成，他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日耳曼尼库斯神话”似乎成为现实，获得圆满结局，自然喜之不尽。更何况，提比略禁止角斗比赛之类的财政紧缩政策让他们压抑太久，迫切想要品尝快乐的滋味。

至于罗马帝国的士兵，尤其是驻守莱茵河防线的8个军团，他们把卡利古拉继位看做自己人生的喜事，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毕竟新皇的童年是在军营和他们一同度过，带给他们无数欢笑。他们看着小小的孩子蹒跚学步，给他做小巧的“卡力加”（罗马军靴），陪他嬉戏玩耍，所以，士兵们都不叫他的本名盖乌斯，而是亲昵地称他“卡利古拉”（小军靴）。当时，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育有三子，年纪最小的卡利古拉被士

兵们视为吉祥物。如今，卡利古拉成为他们的新皇，众望所归。所以，卡利古拉登基时，并没有发生类似提比略登基之初士兵要求改善待遇的抗议事件。这种暴动通常发生在有弱点的对手身上。提比略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然而，在这方面卡利古拉大可高枕无忧。

公元37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像卡利古拉一样，在万民的拥戴之下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换言之，没有人能在毫无敌意、举国欢庆的情况下手握天下大权。并且，民众们对新皇帝的祝福，是发自心底的最诚挚的祝福。

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人们会思变求新：一种是希望摆脱危机，另一种只是单纯地想要一些新鲜的改变，没有什么特别的迫切需要。在前者，发出期盼的人既不幸福也不富足，而后者幸福而富裕。民众对卡利古拉的态度就是后者。正如犹太人斐洛所写："幸福就在门外，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门迎接。"

在提比略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卡利古拉被奉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位也象征着罗马帝国将继续享受盛世繁华，几乎所有人都对此信心满满，其中也有历史学家斐洛。

公元37年3月16日，提比略于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与世长辞。

3月17日，皇帝驾崩的消息传遍罗马。

3月18日，元老院迅速通过决议，将所有权力尽数授予卡利古拉。此时，议员们甚至连护送提比略遗体回到罗马的卡利古拉的影子都还没见到。

3月28日，提比略的遗体抵达罗马。在阿皮亚大道恭候多时的两名执政官的陪同下，护送遗体的卡利古拉前往元老院。议事厅中，除了仍

在行省工作未归的议员之外，其余所有议员都在等候这位差5个月满25岁的年轻人。他们告诉卡利古拉，元老院已于10日前决定授予他统治帝国的一切权力。我们知道，要成为罗马皇帝，必须同时获得元老院和公民的认可。这一天，元老院对他正式“承认”。卡利古拉进入首都时，民众们热情的欢呼声和抛来的鲜花，就是他们“认可”的最佳证明。

卡利古拉从元老院获得了以下的统治权力：

“第一公民”——这一称号并不是罗马公民“第一人”的正式称号，但它是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能支配行省人民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中的“第一人”。虽然这一称号并不太过张扬，但这也只不过是奥古斯都根据以公民平等理念为基础的共和制时代的传统、充分发挥他处心积虑的一个缩影。与这种罗马特殊政情没有关系的行省人民不会使用“第一公民”的称号，经常是用演变成“皇帝”别称的“恺撒”来称谓最高统治者。

“皇帝”——罗马士兵们钦佩指挥官能力的一种称呼，后来，在恺撒时代结束后就专指罗马最高司令官。意即，卡利古拉获得罗马最高军事指挥权。

“护民官特权”——这意味着皇帝管理军权，而护民官就管理行政权。这项权力能够进行政策立案，即使遭到元老院的否决，护民官也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定元老院的决议。

概括而言，只因为卡利古拉身上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血，元老院就把罗马帝国象征性的尊称、最高军事指挥权以及最高行政权都授予这位未满25岁的年轻人，即，全权委托他治理庞大的帝国。

在5个月后卡利古拉25岁生日之时，元老院甚至决议再送他一个礼物——“国父”的尊贵称号。

尤里乌斯·恺撒在55岁遇害前数月才获此殊荣。

奥古斯都在他统治帝国30载后、61岁时才获封“国父”。

提比略统治时期曾3次获赠此尊称，然而都被他婉拒了。

卡利古拉在25岁生日当天获得这个称号，他竟然坦然受之。其实，“国父”这个称号不是元老院随便授予的，必须由民众请愿，元老院受理后通过决议才能赠与某人。这又一次证明了举国上下对卡利古拉的一致拥戴。

在极短的时间内，卡利古拉就获得元老院与民众的全力支持，手握大权，荣誉等身。即使他对统治帝国不甚了解，仅从他在提比略统治后期的所见所闻也应该完全明白什么样的统治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前提下，卡利古拉却被无数的大权与荣耀包围着。卡利古拉在元老院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布他将采取与提比略截然相反的治理方式。议员和市民们对此十分赞成。卡利古拉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演说内容让聆听之人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满怀憧憬。这位年轻的皇帝许下了如下承诺：

一、所有因政治理由被放逐国外者，允许回国。

二、全面废除了通称为“告密”的情报制度，对今后有此行为者定严惩不贷。

然而，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没有人注意到罗马帝国各地向皇帝送呈报告的情报收集系统随之全面瘫痪这个弊端。接下来是卡利古拉“施政方针演说”的其他条文：

三、提比略把每年作为罗马中央政府要职的执政官、法务官、财务监察官、按察官的选举放到元老院，但今后仍然移交给公民大会决定。

仅在意大利，有投票权者就逾50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直接

选举，早就名存实亡。因此，卡利古拉的这个承诺，名义上是尊重拥有投票权者，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如果议员互选自然不需要选举活动，如果在公民大会中选举，选举活动就无可避免。所谓的选举活动，比如款待拥有投票权者，或者免费提供角斗比赛争取选票等等。参选者一想到这些竞选经费，立刻愁眉苦脸，然而无心参选的普通民众对此类活动自是欢迎之至，兴致勃勃。

四、废除了备受批评的税收制度。

无论是什么税收都会有人不满，卡利古拉以妨碍经济活动为由，宣布废止1%的营业税。这项税收是奥古斯都为了筹措防御经费而设置的，即使后来面对巨大的减税废税声浪，提比略也没有让步。卡利古拉的废止宣言中，对替代财源只字未提，大概他根本没想到这一方面。

五、在提比略时期以散播反社会言论被放逐国外的作家，允许他们回国并出版发行他们的作品。

然而，缺乏历史书籍考证当时涉及的作家与他们的作品。

六、被提比略流放的演员，允许他们回国。

提比略素来不喜“观众”之间因冲突而引发的混乱，所以他以此为由，把有名的演员赶出本土。

七、卡利古拉作为“第一公民”常住罗马，并出席元老院所有会议。

上至元老院讲议员，下到黎民百姓，大家都对此宣言好评如潮。先皇提比略令人想之生厌，现在已经被民众彻底遗忘。他的遗体回到罗马5天后，就被火化安葬在奥古斯都陵，当时没有人像刚得知提比略驾崩时一般，破口大骂：“把提比略扔进台伯河喂鱼！”和提比略孤独的人生终点相呼应，国葬如晴朗阴冷的冬日一般悄无声息、毫无延误地结束了。这表明民众对他已经漠不关心。

除了分配给民众及士兵们的遗赠金部分外，提比略其余的遗嘱都被置若罔闻。不是卡利古拉，而是元老院对此视而不见。提比略留下遗嘱，皇位由卡利古拉与提比略嫡孙葛梅鲁斯平等继承，然而元老院改成卡利古拉一人；反而是卡利古拉把没有获得皇位继承权的葛梅鲁斯收为养子。收为养子，言下之意就是继承皇位的第一人选。元老院想尽办法来遗忘提比略，一面倒地支持卡利古拉也是对他们极度厌恶的提比略的反抗，当然，卡利古拉对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

皇帝也好，国王也罢，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都应经过加冕才能登上皇位。然而，罗马皇帝没有加冕这一仪式。奥古斯都开创了有罗马特色的帝国政权，在这种体制之下，皇帝表面上只是“第一公民”，没有与普通民众严格区别的“皇冠”。把罗马皇帝当做是“无冕之王”就好理解了。出现在货币上的皇帝侧面头像，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无冕之王”的姿态。

话说回来，罗马皇帝与其他国家经过加冕仪式正式登基的国王或君主相比，他们手中的权威和权力更大。然而，把皇帝头上空无一物地刻成雕像或铸在货币上也不太美观。罗马的货币不仅在罗马帝国境内流通无阻，还是信用度极高的国际货币，就连帝国周边的野蛮民族也奉为重宝。所以，罗马皇帝经常是头戴用月桂树枝或橡树枝编制的月桂冠或市民冠出现在货币上。无论皇帝的“冠”是用真的树枝编的，还是黄金做的，它的样子说是“皇冠”，不如说是树叶装饰的缎带更贴切。因为在男人脖子的位置，这种头冠会在脖颈处用缎带打个结，但这样的装饰也与皇帝威严的形象不符，因此，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后世罗马帝国皇帝对皇冠的外形也进行了改进。然而，不论怎么改变，皇冠在罗马帝国政权的初期与中期都主要采用缎带式。但是这些“皇冠”不知为何，与他们总是相得益彰。虽然新皇帝没有加冕典礼，但他获得元老院和民众认可之后就开起新的统治，这也符合罗马人一贯讲究合理性的性格。

所以，虽然没有加冕仪式，没有登基大典，甚至卡利古拉连人都不

在首都的情况下就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从3月18日起，在元老院授权下罗马帝国进入了卡利古拉时代。当卡利古拉结束在元老院的“施政方针演说”与提比略的葬礼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引起一贯重视家族的罗马人的响应。

对于暴风雨将至的消息，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置之不理，他义无反顾地登上了早已准备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的船只。他在天气骤变的情况下依然下令开船。他此行是要去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取回因流放而不幸丧命于此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兄长尼禄·恺撒的骨灰是他真正的目的。

罗马人以眼泪和狂热欢呼卡利古拉怀抱骨灰坛返回罗马。罗马人的眼泪，是为日耳曼尼库斯客死他乡的妻子与孩子而流；罗马人的狂热，是民众对年轻的统治者不忘亲人产生的共鸣。卡利古拉把两位亲人的骨灰都安葬于奥古斯都陵，接着，他又发行了记述此事的货币。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卡利古拉非常清楚他此番作为的政治意义。

卡利古拉能够借此解脱。然而，从提比略这条锁链中获得解脱的，不仅仅是卡利古拉，对于元老院与罗马的公民而言，他们都有同感。当然，这也是解读卡利古拉统治的关键所在。

成长背景

从提比略手中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之后，卡利古拉不用担心外患，而内忧也早已被消灭在萌芽之中了。此外，虽然在没有提高税率、增设新税的前提之下，罗马帝国的财政体系已整顿得十分完善了，哪怕是除去必要的开支，在国库中还盈余了2.7亿塞斯特斯。拉丁文中有意为“从锁链中获得解脱”的单词，被称为拉丁语长子的意大利语中也有这个词。然而，一个词通常有几种意思，这个词也有引申义为“恣意妄为”，或“行为肆意”。

从享受自锁链中解脱的自由之后想要为所欲为，从卡利古拉过去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卡利古拉只有25岁，然而在他的半生中可谓是遇到许多波折。

公元12年8月31日，即奥古斯都驾崩前两年，罗马以南50公里以外的安提姆（今安齐奥）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卡利古拉。如今的安齐奥不过是个小渔村，然而在古罗马时期，上流社会在此建造豪宅，是个优雅的海滨城市。卡利古拉之后，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尼禄也出生在安齐奥。当时的这个海滨城市交通便利，风景宜人，如果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乘船，转瞬即至；若沿阿皮亚大道南下，中途取道正南方的道路，也不过近在咫尺。

据说孩提时代的卡利古拉和幼年的奥古斯都很像，都非常惹人喜爱，奥古斯都甚至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了一个卡利古拉的雕像，每次回到卧室都要亲吻一下。卡利古拉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的儿子，也即奥古斯都的亲外曾孙。

然而，卡利古拉不能长住安齐奥或罗马，因为他被经常随父亲一同上任的母亲搂在怀里，前往远在北国的莱茵河军团基地。卡利古拉未满2岁就离开了罗马，随后不到一个月，曾祖父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叙述过，提比略即位时莱茵河驻防军团发生了哗变，也提到当时2岁的卡利古拉帮助陷入镇压困境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解决暴乱。2岁到4岁的卡利古拉在边境防御军团士兵们的看护下成长，可谓是士兵们的吉祥物。从此时开始，大家不叫他的本名盖乌斯，而是昵称他为“卡利古拉”。

由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要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卡利古拉在快满5岁的时候，随父母返回罗马。5月26日，日耳曼尼库斯亲自驾驭4匹白马拉的战车，载着卡利古拉、10岁的尼禄·恺撒与9岁的杜路苏斯·恺撒出现

在凯旋仪式上，整个罗马为之沸腾。由于家庭的幸福美满，这似乎也是30岁的日耳曼尼库斯受民众拥戴的原因之一。

5岁的卡利古拉同年年底随调任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一路上，他和父母穿越希腊，绕道小亚细亚，前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体验这漫长的旅途。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每次都跟着日耳曼尼库斯赴任，她只带了卡利古拉，将两个大点的儿子留在罗马接受教育。日耳曼尼库斯地位崇高，好奇心十分强烈，所以在年幼的卡利古拉眼中，这趟闲适安然的旅行应该充满了乐趣。途中，他们在爱琴海的小岛上略作停留，身怀六甲的阿格里皮娜在此地生下女儿。

时年6岁的卡利古拉还未在安条克的总督官邸住满一年，次年就随父母前往埃及。从埃及回到叙利亚还不到半年，时年33岁的日耳曼尼库斯就于公元19年10月10日与世长辞。所以，卡利古拉7岁失去了父亲。虽然，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死于疟疾，然而，日耳曼尼库斯从病倒到离世的10天中寸步不离的阿格里皮娜，包括去世的日耳曼尼库斯本人，都认为是叙利亚总督皮索下毒谋杀了他。随后，年幼的卡利古拉在母亲的携带下乘船返回了罗马。

实际上罗马帝国领导阶层的后代中，幼年丧父的例子并不少见。由于自幼丧父或者父亲一直在海外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通常由母亲负责教育孩子、守护家庭。然而，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异于常人，她对提比略充满憎恨，而卡利古拉正是在母亲手捧父亲日耳曼尼库斯骨灰之后的7年间，即他7岁到14岁这段性格形成时期，在母亲的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少年卡利古拉正是在养祖父提比略与亲生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关系日益恶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提比略正是在卡利古拉15岁那年隐居到了卡普里岛。两年之后，卡利古拉的曾祖母莉薇娅，即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孀过世。对于阿格里皮娜和她的孩子们而言，莉薇娅的去世，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压制提比略的人。

同年，因被判决犯有叛国罪，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大哥尼禄·恺撒分别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次年，卡利古拉的二哥杜路苏斯·恺撒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囚禁在皇宫的一处地下室里。

卡利古拉的母亲被流放之后，他被寄养在了祖母安东尼娅的家中。正如其祖母的名字所示，其祖母的父亲是被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迷惑后，向罗马帝国倒戈相向的马克·安东尼，而其母则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后来安东尼娅与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成婚，她继承了母亲踏实稳重的性格，不像她的父亲那样浮夸。虽然她早年丧夫却没有再婚，也没有传出任何闲言碎语。而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正是看中她这一点，安排她的居所作为属国（罗马帝国的同盟国）王子们被扣押在罗马当人质的接待家庭。寄养在祖母家中的卡利古拉结识了各国王子，并成为他们的同学与小伙伴，这其中包括了色雷斯王子、犹太王子等。对卡利古拉而言，17岁到19岁的两年时光，也许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从这些异国王子身上，他受到极大的影响。然而，就在此时，卡利古拉的大哥尼禄·恺撒在流放地蓬扎岛去世了。

公元31年，在提比略动手收拾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前不久，卡利古拉被提比略召唤至卡普里岛，提比略就在岛上为他举行了成年礼。成年礼通常是在16岁，迟一点也就是在17岁举行，19岁才举行成年礼确实比普通人晚了很多。然而，如果相信当时提比略检举的理由，此时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正为了联合反对提比略的势力而四处奔走。阿格里皮娜大概是因为这样，才忘记了小儿子的成年礼。

卡利古拉的成年礼后的两年，21岁的他被选为财务监察官，这意味着他开始履行身为罗马领导阶层的责任，踏出了他公职生涯的第一步。他也在这一年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然而，这一年噩耗接踵而至。年初，被软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地下室的二哥杜路苏斯·恺撒逝世。同年秋，流放于文托特内岛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也与世长辞。

公元36年，即罗马“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火灾的同年，卡利古拉

年轻的妻子因难产而死，孩子也不幸夭折。卡利古拉的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

公元37年3月16日，也即卡利古拉丧偶后不久，提比略逝世。这位还未迎来25岁生日的年轻人，这位仍然保持着独身没有小孩的轻松生活的年轻人，却集所有的权力与所有人的尊崇于一身。因此，与前任相比，这位年轻的最高当权者，不能像提比略那样不受欢迎，也要考虑整个罗马帝国的国家利益。不对，这种说法似乎显得卡利古拉没有责任感，事实并非如此。他必须满足罗马公民的要求，并将其实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财政是否支持他的统治。卡利古拉非常幸运，他拥有提比略留下的2.7亿塞斯特斯。

统治之初

卡利古拉获得元老院和公民赋予的全部权力之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随即，他宣布要废除1%的营业税（相当于今天的消费税）。他并没有立即下令全面停止征收营业税，而是在公元37年降低为0.5%，直到公元38年才开始全面废除。民众因为废除税金，自然会拍手称快。

随即到了6月1日，卡利古拉遵照提比略的遗嘱，向下层公民和士兵们分发遗赠金，按人头发放300塞斯特斯。由于提比略没有忠实执行莉薇娅的遗嘱，卡利古拉于7月19日第2次发放莉薇娅的遗赠金，金额同样是300塞斯特斯。士兵们通过这两次发放遗赠金，获得了相当于年薪一半以上的报酬。

当然，这些开支不是用国库中的钱财来发放，而是用莉薇娅和提比略的私人财产来支出。因为卡利古拉继承了他们的遗产，所以卡利古拉执行了提比略与莉薇娅遗嘱。这样一来，在罗马人眼中的卡利古拉既是一位不会积蓄个人财产又是一位热心公共利益的皇帝。

8月31日是卡利古拉的生日，当然这也是一个令罗马人举国欢庆的节日。卡利古拉并未把这一天看做普通的生日，就在同一天，他举行神君奥古斯都神殿的祭祀仪式。神殿早已竣工，只差兼任大祭司的皇帝举行祭祀大典，当时提比略不愿返回罗马，所以才推迟到现在举行。提比略的时代在元老院和公民的眼中好像根本不存在，罗马帝国的皇位仿佛是奥古斯都直接传给了正在举行仪式的卡利古拉。卡利古拉在这种氛围之下，提议把自己登基的3月18日定为国庆节，元老院与罗马民众当然同意了这个提议。9月27日，元老院接受了罗马民众的请求，顺水推舟地通过决议将“国父”尊称正式授予卡利古拉，而卡利古拉毫不推辞就接受了下来。这位25岁的年轻人获得了恺撒与奥古斯都两位“神君”所拥有的荣誉。

因此，3月28日到9月27日的7个月内，卡利古拉从回到罗马再到获得“国父”称号的这些日子里，首都罗马每天都像是在过节一样，各地都举办了连续好几日的角斗比赛、4匹马拉的战车竞赛、体育竞赛和戏剧表演。罗马民众们脱下普通的朴素短衣，穿上有节日气息的白色或其他带有鲜艳色彩的短衣，参加神殿祭典，祈求罗马帝国在卡利古拉的统治之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街上经常能够见到头戴花冠的妇女和孩子们载歌载舞。公民痴迷于角斗比赛，他们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呐喊助威，直到声嘶力竭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罗马人不论是谁都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就好像是漫长的寒冬之后春天终于来临，然而，这个“春天”的到来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

大病

当年10月，以往总是出现在公众眼里、沐浴在罗马民众欢呼声中的卡利古拉，突然消失了踪影。

卡利古拉仍然年纪尚轻，虽然体型瘦削，但他的身体十分健康，从

未病过。这一次他却因高烧卧床不起，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在我的想象中，这可能与卡利古拉刚当上皇帝高兴过度，再加上连续7个月夜以继日的庆祝有关。当罗马人听说卡利古拉发高烧，立即想起他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临终前的情形，非常惶恐焦急。首都罗马、意大利本土，包括遥远的行省，甚至连身为一神教徒而不能宣誓效忠皇帝、也不需服役的犹太人都在举行祭祀，祈求卡利古拉早日恢复健康。

卡利古拉即位至今才过去7个月，他除了发放赏金、举办祭典、赞助观赏活动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为何民众对他如此拥戴？对此，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城犹太人社会中的领袖——斐洛，这位被誉为学富五车的“犹太人的柏拉图”，我觉得他的叙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 罗马人在得知卡利古拉重病的消息后，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不但立即抛开了先前令人生满足的各种娱乐，而且戒除了赌博这类不良嗜好。全国气氛为之一变，充斥在家家户户、大街小巷中的，到处都是不安、担忧、惊慌与失意，仿佛整个罗马都和他一起倒下了。然而，席卷帝国的这场“大病”甚至比卡利古拉的病情更为糟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后者仅仅是对肉体的折磨，而前者波及的范围更广。罗马人一直追求的力量、和平、希望、幸福，以及能够享受这一切的坚定信仰，所有的一切在明天是否都会化为乌有呢？这种深深的不安和担忧让罗马人都患上了心病。他们担心从明天开始，无政府状态将会取代过去的和平与幸福，而饥饿、战争、破坏、抛弃耕地、没收财产、杀人越货、绑架诱拐将会层出不穷，不是奴隶却被强制为奴，最后悲叹命运多舛，含恨而终。
>
> 帝国所有民众都清楚，只有卡利古拉康复才能拯救大家脱离苦海，除此之外都无济于事。
>
> 无论哪个城市，无论大街小巷，只要罗马的旅人经过，人们都争先询问卡利古拉的病情；当得知卡利古拉正在康复，人们就在街上欢欣起舞。因为卡利古拉痊愈，消除了民众对未来的忧虑和彷

徨。

再没有任何史料，能比这位犹太学者的记载更能显示罗马的帝王政治给人民带来的福祉。罗马帝国历经尤里乌斯·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筑框架、提比略奠定基础，直到卡利古拉继承帝位，才有今天稍具规模的罗马帝国。由于人们担忧卡利古拉之死将会宣告罗马帝国的终结，甚至连被统治阶层都为卡利古拉的康复祈福。卡利古拉在登基后的7个月内，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由此可见举国上下祈求他早日康复，并不是出于民众对卡利古拉政绩的认同。卡利古拉彰显了罗马帝国政治的优越性。实际上从“政治方面毫无建树”的结果来看，反而会更有效果。

在宣布要采取与提比略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之后，卡利古拉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然而卡利古拉所谓的截然不同的统治，仅限于废除税收、举办庆典、赞助活动之类收效显著的收买人心的较为花哨的活动中。卡利古拉沿用提比略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不太关注的行省治理、边界防御等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调整。此外，提比略发掘的人才依旧在行省和帝国防线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没有受到首都罗马长达7个月庆典的影响，也没有作任何调动。借用历史学家蒙森的话，这些人才可谓都是“提比略的门生”。我能够想象得到，卡利古拉在与晚年的提比略共同生活的6年内肯定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论是总督还是军团长，没有任何权力比人事权更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手中权力的作用。如若手握人事权的官员一旦变动，那么他手下的人员也会一起调动。幸运的是，在卡利古拉短暂的4年统治期间，他几乎没有更改提比略当初定下的人事安排。联系卡利古拉喜欢夸耀权力的个性，这样的例子对于罗马帝国而言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公元37年秋的大病让卡利古拉性情大变，许多历史学家持这种观点。我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大病之前，卡利古拉有所顾虑，很多事情想做却不能做。痊愈后就不再顾忌，随心所欲，如此而已。

卡利古拉目睹了不受民众欢迎而深受孤寂之苦困扰的提比略晚年惨淡的景象。也许卡利古拉当时就在心里告诫自己，绝不品尝那种滋味，绝不要孤独终老。卡利古拉不满25岁就继承了提比略的帝位，他其实是个心思细腻、易受影响又容易伤感的人，还常被失眠所困。可是如今他掌握了权威和权力，拥有一切，甚至受到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人民的敬爱。

拥有一切的人最为担心的是失去现有的一切。所以，卡利古拉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提比略不同，他集中全力来维持如今拥有的一切。或许是举国上下为了祈求他早日康复而焚烧牲礼形成的烟雾和气味，给了卡利古拉莫大的勇气来抛开曾经的重重顾虑。因为，他生病前有所顾虑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作为能否收拢人心，只不过是对社会舆论有所顾忌才缩手缩脚。然而，现在所有人都很明显地支持卡利古拉。

作为罗马帝国最高当权者，卡利古拉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除去养子葛梅鲁斯。在先皇提比略的遗嘱中葛梅鲁斯同样拥有皇位继承权。然而，在提比略驾崩还不到8个月之时，18岁的下一任皇位继承人葛梅鲁斯就被25岁的皇帝卡利古拉下令处死了。与此同时，欢天喜地庆祝皇帝卡利古拉康复的民众，只能默认这件事情的发生。

神化

从公元37年冬到公元38年初夏的7个月里，年轻的统治者正陶醉在权力的美妙之中。25岁的卡利古拉观念里的“权力”，跟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认为的“权力”—— 罗马式的权力不同，而是少年时期的同学兼好友的东方王子们教给他的东方式权力。

作为东方专制君主的后代，当他们有朝一日回归祖国登上皇位，头上自然有璀璨的王冠，被称为王，官员子民都得对他行礼跪拜。然而，

对于他们能否回归祖国继承皇位，卡利古拉有绝对的话语权，但他是“无冕之王”。只有士兵称他“皇帝”，普通民众只以“第一公民”称呼他，谁都没想过要对他行礼跪拜。东方历来实行君主专制，西方的历史和传统都与东方不同，奥古斯都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才创造了“无冕之王”这个“罗马特色的皇帝”。因为“无冕”，卡利古拉反而不明白它凌驾于“有冠”的国王之上，所以他对“王冠”的有无始终耿耿于怀。

卡利古拉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合理的，他想到了一个消除差异的办法，就是成为比帝王更高的神祇，并且不是罗马多神教中的众神之一。在希腊和罗马的多神教中，众神之间划分等级，最高神祇是朱庇特（希腊称宙斯），其次是海神涅普顿（希腊称波塞冬），接着是天后朱诺（希腊称赫拉）、智慧女神密涅瓦（希腊称雅典娜）、美神维纳斯（希腊称阿弗洛狄忒）三女神，然后是战神马尔斯（希腊称阿瑞斯）和阿波罗两名男神，这些是一级神祇。死后被神化的恺撒、奥古斯都，顶多晋升到下位神祇。由于自己身上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所以卡利古拉也认为自己是神，不过他不甘心屈居下位神。当然，他也不打算成为一神教的神明。卡利古拉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产儿，所以他希望自己能跟最高神祇朱庇特合二为一。

我们通常见到的希腊、罗马神像，都是裸露上身并且赤足的姿态。如果想要表现凡人神化后的英姿，或者是过世后的塑像，不是赤脚、赤裸上身，就是像著名的“普里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像”一样，身穿甲胄，双足赤裸。然而，卡利古拉是自己尚在人世就让自己神化，并且还以这种形象出现在罗马人面前。

卡利古拉似乎模仿宙斯，把头发和胡须染成金色。当他须发金黄、赤裸上身、光脚走进元老院时，议员们被吓得大惊失色。有时候，卡利古拉会以另一种装扮出现在公众面前，身穿短衣，外面披着缀满东方风情宝石的披风。他有时会手执象征宙斯的黄金闪电盾牌，也会模仿海神波塞冬手握三叉戟。今天，对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当红歌手或者模仿他们

的那些身穿奇装异服、打扮怪异的年轻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并不会大惊小怪。当时不可能如此前卫，罗马领导者的形象，历来要求稳健刚毅、老成持重。所以，卡利古拉这种打扮让议员们哑然失色，也让普通民众大吃一惊。议员们不禁心想，莫非是那场大病烧坏了卡利古拉的脑子。

刚开始并没有人批评他，甚至有些年轻人和民众觉得这样“很有趣”，为他鼓掌喝彩。在兴趣方面，卡利古拉和年轻人以及普通民众大同小异。

快乐

角斗比赛和战车比赛在卡利古拉解禁的娱乐活动中最具代表性，而且这两项运动都能让罗马民众为之疯狂。

由奴隶出身的职业角斗士进行的比赛采用一对一的形式。据说这项比赛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体育项目，罗马征服伊特鲁里亚之后，自然引入了这项活动。对于这种经常出现不死不休局面的比赛，罗马人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一）因残酷而厌恶；（二）虽然残酷，但可以欣赏到角斗士的技艺；（三）因残酷而喜欢。当然，这无关个人好恶，只是单纯将娱乐作为掌控人心的手段，换言之，除了像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以此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之外，提比略属于第一种态度，西塞罗、塞内加、小普林尼等知识分子属于第二种态度，罗马公民和卡利古拉则是最后一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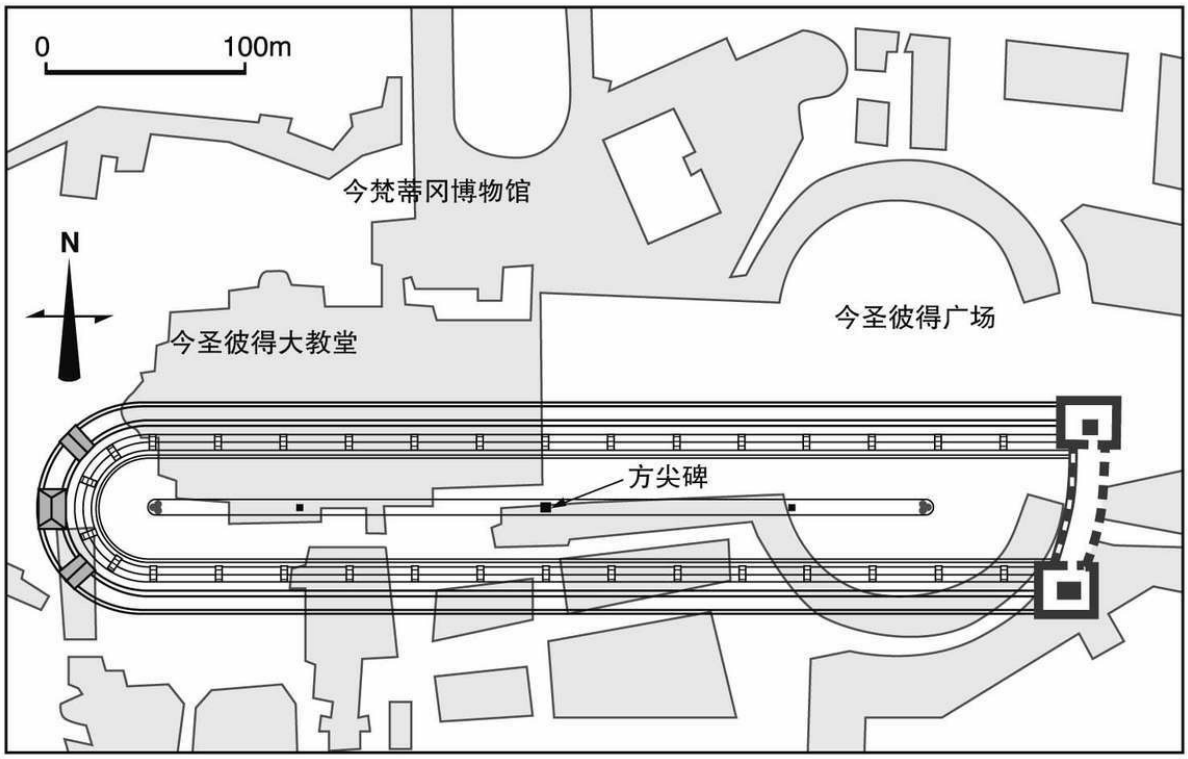
卡利古拉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即把原本一对一的职业角斗士比赛，改为职业角斗士与重刑犯的业余对抗。没有受过任何剑术技能训练的普通人加入这项比赛，场面自然更加残酷。卡利古拉赞助了这项比赛，民众们非常欢迎，我们不难理解这种狂热。

提到战车比赛，这个项目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是由选手驱使4匹马拉动的华丽战车。参加这项比赛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此外选手还应具备可以同时驾驭4匹马的高超技术。这么说来，古罗马的战车比赛和现代的F1方程式赛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参加战车比赛的，不是富裕阶层、善于御马的人，就是职业队。

一支职业队，通常由提供资金的所有者、管理战车和马匹的负责人以及驾车出赛的选手组成，一般分成绿、蓝、白、红四队。卡利古拉是绿队的狂热支持者，他经常出席比赛结束后在马厩里举行的庆功宴。要是绿队获胜的话，他有时会提供200万塞斯特斯作为嘉奖。卡利古拉身为皇帝却是狂热的战车比赛迷，这也是能引起罗马民众的共鸣之处。

如果自己拥有战车，我们难免会想亲自上阵，体验一下比赛的刺激。可是，卡利古拉毕竟不是提比略，没有提比略年轻时候参加四年一度的希腊奥林匹亚角斗赛的自信。因此，卡利古拉在后来兴建了基督教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的地方（今梵蒂冈），建了一座可以驾着4匹马的战车自由驰骋的私人比赛场所。因为这里必须从市中心越过台伯河才能到达，所以兴建私人比赛场所时没有任何问题。

战车比赛的“角斗场”和体育比赛的“比赛场”很像，都是较长的椭圆形。只是，希腊式的体育场（185米）以及边长固定的“露天体育场”，都没有“圆形角斗场”长，即场地较小。不能同可以容纳15万人的“大角斗场”相提并论，仅卡利古拉的私人角斗场就有500米长，与圣彼得大教堂后方到圣彼得广场的距离相当。场地中央是否有带状区域，这是“圆形角斗场”和“露天体育场”的第二个区别。战车要围着带状区域绕好几圈，所以“圆形角斗场”要保留中间地带。



卡利古拉的角斗场

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大败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征服埃及，他曾从埃及运回方尖碑，摆在“大角斗场”的正中间。卡利古拉也建了一座私人使用的“圆形角斗场”，然而，他认为中央带状区域也必须摆放方尖碑，所以，他命人制造大型船只，以便原封不动地把方尖碑从埃及运回罗马。卡利古拉的所有行为都要花掉一大笔钱。今天，这座高达25米的方尖碑现在的位置已经移动了百米左右，耸立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广场的正中央。

同提比略统治时的罗马完全不一样，卡利古拉时代各种娱乐活动、运动项目盛行，可是后来被批评为“面包与马戏”。

所谓“面包”，我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它是根据共和制时代的《小麦法》制定的一个主食小麦的免费发放系统，目的在于救济贫民。受惠于这个政策，已经数百年没有人因饥饿而死。古罗马时代，尤其是

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绝对不是通过舍弃弱势群体进行统治。

因此，拉丁语“circus”（场地）也被英语引用，读做“色克斯”。如果，今天我们要在意大利全面废除足球比赛，不论政府多么为民众着想，也不管政绩如何优异，我们都可以断言这会遭到强烈反对。究根探底在于皇帝是否应该赞助此类活动，然而在标榜平民主义的帝国政权下，举办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最好的例证就是提比略，他从不理会民众的需求，如果他参加总统选举，十有八九会落选。所以，不论“面包”还是“马戏”，问题在于国家财政是否能够支撑得起这些活动。

战车比赛（电影《宾虚》场景）

卡利古拉统治早期还有提比略留下的资金盈余可以应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愈演愈烈，实在是万幸。正因如此，罗马人只需尽情享受卡利古拉为他们提供的娱乐就可以了。对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心满意足的

人们自然全部认同。

“奥古斯塔”这个殊荣只有奥古斯都的遗孀莉薇娅有幸获得，卡利古拉决定授予刚过世的祖母安东尼娅这个尊称，元老院同意了。卡利古拉年少时母亲被流放，是祖母把他抚养长大，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安东尼娅是马克·安东尼的女儿，他曾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联合向罗马宣战。后来，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成为最高统治者，他没有把安东尼娅看做仇敌之女，而是把她当做亲外甥女，视同家人一样对待。女性的“奥古斯塔”相当于男性的“奥古斯都”。给予家人一样的待遇跟授予“奥古斯塔”的尊称，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奥古斯都，他不会做到如此地步；提比略也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这种事并不是私人感情，想给就给，不必顾虑，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如果我们把“奥古斯都”译为皇帝，那么“奥古斯塔”就是皇后的意思。

不管何事都应该有分寸，但卡利古拉才不管什么分寸不分寸。

虽然叛国罪的控诉状可以烧毁，但是，卡利古拉没有替死于流放之地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平反，因为元老院作出的有罪判决无法改变，他不得不把死于非命的母亲和两个兄长的骨灰葬在奥古斯都陵之内。

除兄长之外，25岁的卡利古拉还有3个妹妹，分别是22岁的小阿格里皮娜、20岁的杜路希拉与19岁的尤利娅·莉薇娅，提比略在晚年安排卡利古拉的3个妹妹和名门之后结成连理。卡利古拉继位时的誓言里，把3个妹妹的名字加在自己后面。依照罗马传统，妇女没有公开的社会地位，就连长年陪伴奥古斯都的莉薇娅，都是在他的遗言中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卡利古拉打破了这个传统。以往，不论她们的家属身份以往跟最高权力者多么亲密，能发挥多大的权力，毕竟女人只能活跃于家族之内。而今，卡利古拉让女人们也能享受公开的社会地位。通常，性格乖僻的人，大多胆小。这类人往往选择笼络明显支持自己的人，形成自己的圈子，而不是在陌生人中寻找盟友。这一类人还有个特征，他们的盟友往往都是血亲。放在卡利古拉身上，他厚待妹妹们，对自己的

妻妾反而非常冷淡。

从21岁到27岁的6年中，卡利古拉有过4次婚姻。其中有一位妻子去世，两位离婚，他28岁驾崩时陪葬的是第四任妻子卡耶索妮雅。卡利古拉一生中随处可见母亲和妹妹的影子，妻子的踪迹却难以找到。

通常情况下，货币上雕刻的都是皇帝的头像，然而卡利古拉赐予3个妹妹这项殊荣，她们可说是罗马的“第一夫人”，地位高于卡利古拉的妻子。这3位女性的性格各不相同，从下面可见一斑：

小阿格里皮娜争强好胜，美貌聪慧，野心勃勃；杜路希拉古典气息浓郁，性格温柔，多愁善感；尤利娅·莉薇娅敦厚朴实，却不起眼。三姐妹中，杜路希拉深受年长5岁的哥哥宠爱。

哥哥深爱妹妹，这有违伦常，并不被世人接受。然而卡利古拉认为自己就是神，在神明的世界里这种事无伤大雅。因为，在被视为神祇的埃及皇室，像克娄巴特拉嫁给自己的弟弟那样，姐弟、兄妹通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公元38年初夏，杜路希拉离世，芳龄21岁。无论是谁，在如此风华正茂之年去世实在令人惋惜。对卡利古拉而言，这更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卡利古拉抛开一切策马离开首都，身边只有少数护卫，他甚至没有出席葬礼。我们并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去西西里，或许他精神恍惚，索性信马由缰，不知不觉中一路南行，清醒过来已经到了西西里。卡利古拉第一次见到墨西拿海峡，以及漂浮在海面上的西西里岛，这似乎有助于他恢复冷静。然而，卡利古拉只是恢复冷静而已，杜路希拉之死并没有让他改变分毫。他返回罗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杜路希拉神化。在罗马历史上，死后封神的只有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而今，卡利古拉这位21岁的年轻的妹妹也被封神。

现在很难找到关于罗马民众对卡利古拉评价的历史资料，因为就连

塔西佗的《编年史》一书，唯独关于卡利古拉一卷的内容在中世纪完全散失。如果我们从其他历史学家的记录中选取比较可靠的部分来看，普通民众的态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卡利古拉非常担心失去民心，所以他不改初衷，依然赞助角斗士比赛和战车比赛等娱乐项目，还强迫其他有权有势的人士举办这些活动。

另外，卡利古拉非常清楚，公共事业建设，即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提供娱乐活动一样，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

卡利古拉曾说道，现在罗马已有7条引水渠供水，今后将在此基础上建设新的引水渠。随着居住人口的不断增加，罗马成为世界之都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供应丰沛的水源，也是为了防止疾病发生的有效政策之一。然而，这个引水渠建设与现有的引水渠相比，实在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土木工程。因为，水源的源头距离罗马70公里，其中10公里以上的长度要架设高架引水渠。公元38年，工程开工，直到公元52年才完工，正值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这条渠道被命名为“克劳狄乌斯引水渠”。此外，另外一条引水渠“亚尼斯·诺福斯”，也是由卡利古拉破土开工建设的。这样一来，加上原有的7条引水渠，罗马共建成引水渠9条，相当于每天可以为每一个罗马居民提供900升水。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后的今天，罗马居民的供水量只有当时的一半，甚至缩减到三分之一。

当然，卡利古拉心里也非常明白，确保粮食安全则是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但罗马帝国本土已经很久没有实施粮食自给自足的方针。于是，提比略任命的“水利局局长”堪当大任，此外他任命的“粮食局局长”也十分有能力，所以从来没有人抱怨小麦不足或售价提高。然而，卡利古拉想要有所作为，所以把他前往西西里时的想法付诸实践。小麦从产地埃及运回罗马时必须经过墨西拿海峡，卡利古拉打算沿海峡修建海港。墨西拿海峡横亘在意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之间，波涛汹涌，海浪湍急，是公认的难关。所以建设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即使遭遇狂风暴

雨，满载小麦的船只也能够轻松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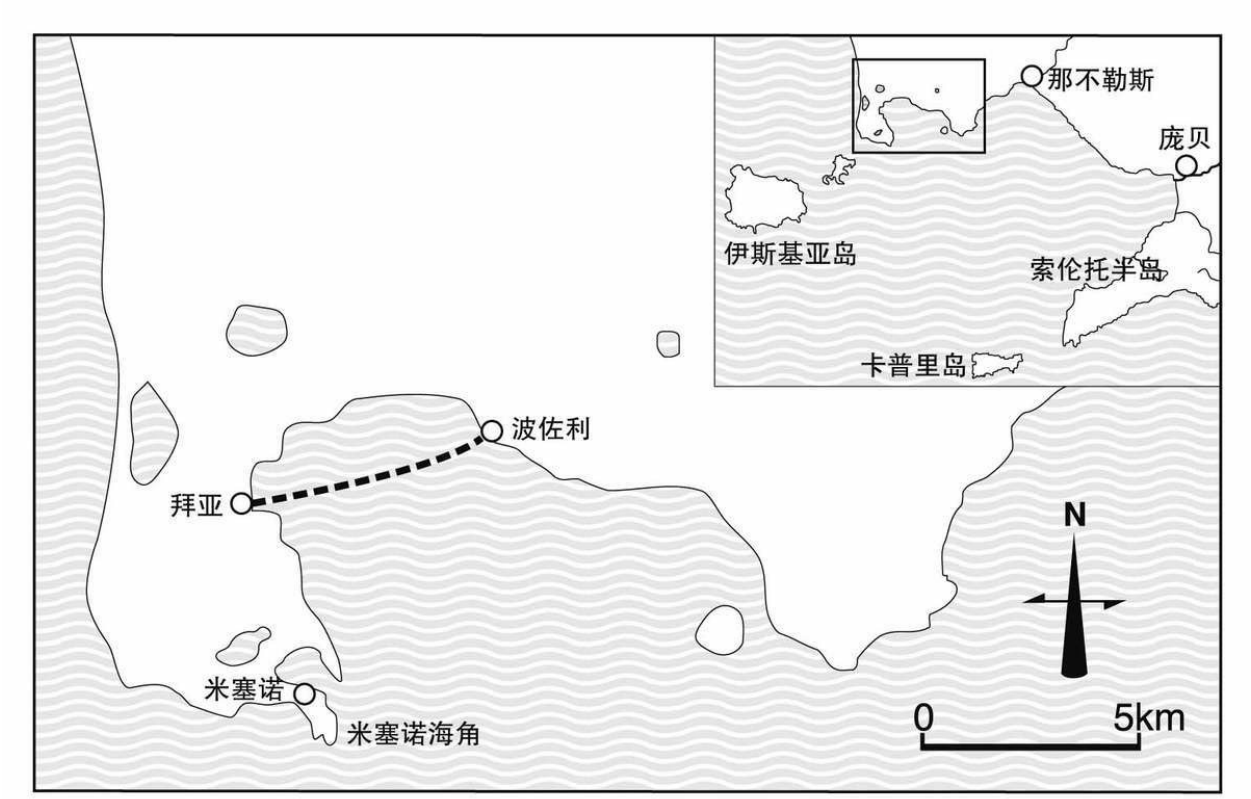
对于这种以完善基础建设为目的的公共事业，普通民众好评如潮，欢迎之至。因为，罗马人了解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它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发展。然而，基础建设通常工期都比较长，皇帝只在破土动工和竣工之际出席视察，平时建造者都是默默无闻地埋头施工。换言之，这种工程缺乏话题性，没有轰动效应。卡利古拉对此颇有微词。

当时是公元38年10月，首都发生火灾，史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古罗马建筑的墙壁和柱子都使用石材，所以不太容易引发火灾。然而为了减轻天花板和屋顶的重量，这两处一般都用木料，这也是罗马建筑的最大弱点。

得知火灾的消息后，卡利古拉自然当仁不让地指挥灭火，毕竟他才26岁，年轻力壮，体力充沛。

另外，卡利古拉以这次火灾为契机，下令火灾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国家负担。此举当然令民众欢欣鼓舞，不过这也是日后导致国家财政崩溃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卡利古拉收买民心的政策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即希望做些开创性的创举，让罗马民众有新的感受。

以那不勒斯为起点，向东可达庞贝，往西则是绵延的海岸线，其中波佐利到军港米塞诺随处可见罗马上流社会的度假别墅。此地气候温暖宜人，温泉喷涌，风景秀丽迷人，在这样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别墅，人们认为这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波佐利是一个商业港口，附近生机勃勃。与之隔海相望的是拜亚，那里满是优雅时尚的高级别墅。卡利古拉放出豪言，他要策马走过连接波佐利和拜亚的海上通道。



卡利古拉的“海上通道”

两地按照今天的算法相隔4.5公里。卡利古拉命人把征调的大量船只放在海面上并排成线，以桅杆为中心在左右铺上木板，然后在木板上铺上厚土，成为一条平坦的大道。

在看到皇帝的布告后，波佐利和拜亚盛况空前，民众围得水泄不通，载满乘客的小船覆盖了周围的海面。

卡利古拉就在这条由船只连接而成的通途上来回往返。踏海而过时，卡利古拉一副罗马士兵装扮，他头戴以鲜绿色橡树枝编制的“公民冠”，身披黄金刺绣的披风，左手持骑兵圆形小盾，右手御马。其中，“公民冠”以受实现罗马和平的奥古斯都喜爱而广为人知，同时也是军人挽救战友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卡利古拉返回时的演出更是叫人叹为观止。他身穿从埃及取来的亚

历山大大帝的黄金铠甲，舍骑马而坐两匹战马拉动的战车。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征服波斯，当时在罗马为人质的帕提亚王子是波斯的达雷欧斯的后代，所以卡利古拉让帕提亚王子乘坐另一辆战车走在前面，他自己假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紧随其后。当然，无论去程还是归程，火红披风迎风飘扬，马上英姿飒爽的卡利古拉的年轻玩伴，以及一支近卫骑兵一直跟随卡利古拉，踏浪前进。面对此情此景，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声。然而，表演结束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泡沫一般转瞬即逝，除了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人们都赞誉有加，似乎感叹象征皇帝的年轻力壮和帝国的繁荣昌盛的绚丽烟花一般，这个话题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卡利古拉的目的，即使花费不赀，也要完全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卡利古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彰显自己没有王冠却凌驾于头戴王冠的诸王之上，希望自己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卡利古拉所做的史无前例的事情，远不止于上面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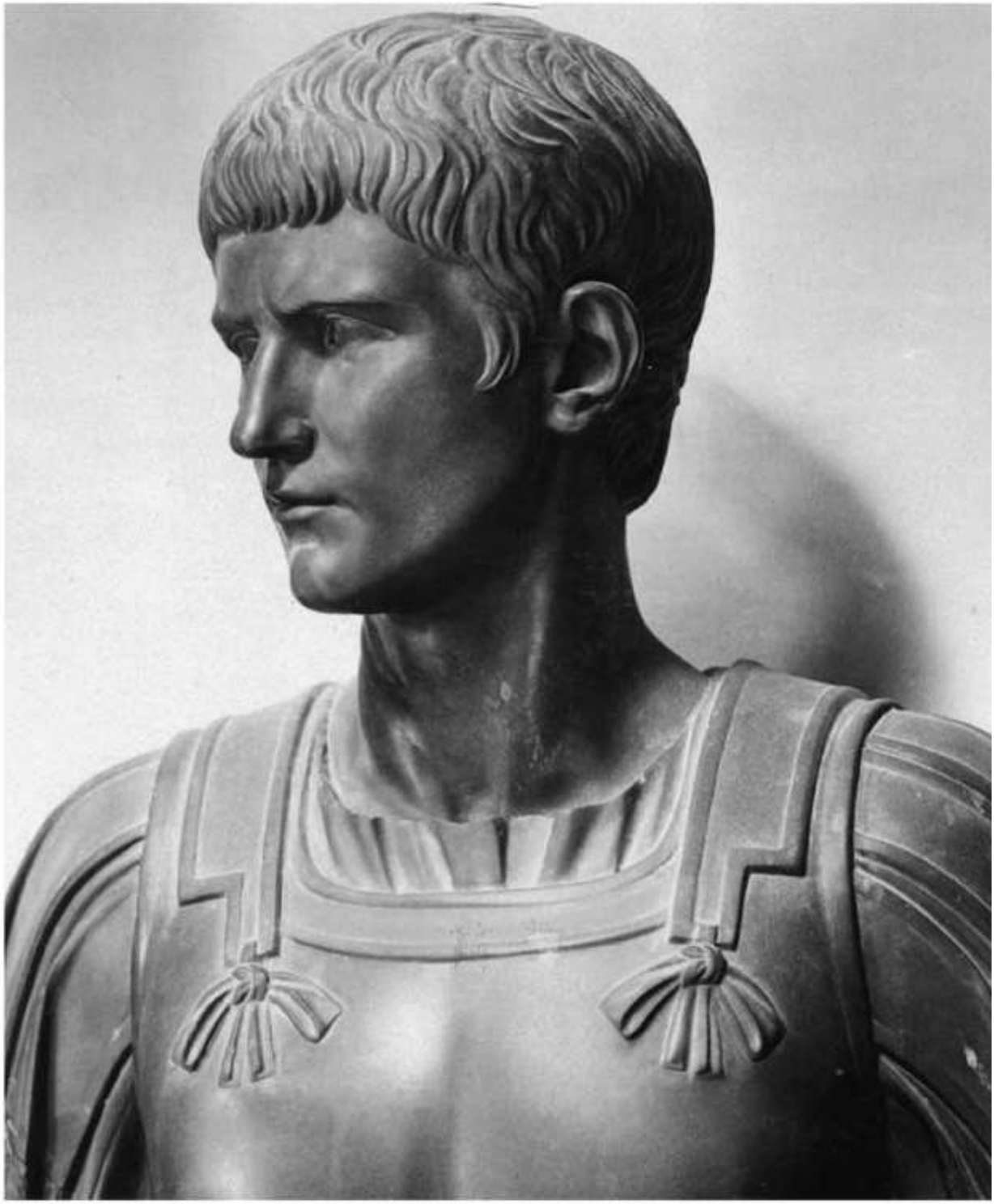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有这样的记载，船只一般有三层桨，卡利古拉却要求建造十层桨的大船。用精美绚烂的绢做帆，绢上有花纹，颜色会随阳光而产生变化。船上备有浴室、客厅和卧室，甲板上建了回廊。树木葱翠欲滴，果实缀满枝头，人们置身其间，尽情享受丰盛的佳肴。

距卡利古拉时代1400年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旷世奇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前辈阿尔贝蒂·利昂纳·巴蒂斯塔想要探究中世纪传说的真相，他就到从罗马出发，沿阿皮亚大道南下30公里左右的内米湖，即罗马沉船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然而，当时受潜水条件限制，没有成功。18世纪，也有人尝试过，但是最终也以失败收场。直到20世纪，对古罗马时期如痴如狂的墨索里尼再三催促，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探测。此时已经是考古学的全盛时期，虽然经过了1900年，最终从干涸的湖底发掘出两艘古船。船底都极为平坦，充分表明这船是为了漂浮在水面上，而非用于航行。两艘船一艘长67米、宽20米，另一艘比较大，长

71米、宽21米。当时的人们在船上发现了很多用来铺设地板的颜色各异的大理石、马赛克与雕塑，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制的航行设备与烹饪工具。

为此，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兴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收藏这些古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这些船体非常不幸地被毁坏了，遗留至今的只有幸免于难的大理石、马赛克与青铜制品。

目前，没有史书可以证明是卡利古拉下令打造了这两艘船。但不论在卡利古拉前后，罗马历史上不乏锐意进取的帝王，他们敢于打破陈规，做出史无前例的创举，不过绝大部分建设都是为了满足公共用途。然而，卡利古拉最擅长的，就是公器私用，他一时心血来潮修建的私人建筑只会让人觉得浪费。



卡利古拉

2000年后的今天，郁郁葱葱的树木倒映在内米湖上，一派恬淡宁静。类似别墅的豪华游艇在这小而安静的湖面上漂浮，荡漾，在这样的游艇上举办宴会，应该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卡利古拉是如何产生如此绝妙想法的呢？台伯河流经罗马市区，当时河中的岛屿就已经建造成船只的模样，可能就是这些岛屿带给他灵感。或许，幼年时候随父亲日耳曼尼库斯游览埃及时体验过的尼罗河上华丽的巡游船——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遗产之一，也是他灵感的源泉吧。

根据船只被焚毁以前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两艘在内米湖中发掘的罗马船，既不是被烧毁，也不是船坏了才沉没的，而是故意沉到湖底的。卡利古拉遇刺后不久，所有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被遗弃，而豪华游艇可能就是那时被沉到湖底的。当然，也没有任何史书表明，卡利古拉之后的皇帝把这些船作享乐之用。

筹款

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卡利古拉就把皇帝的个人财产，以及国库中的库存挥霍殆尽。由于卡利古拉赞助各种娱乐活动，提比略当初留下来的2.7亿塞斯特斯早就被挥霍一空。随后，他虽然绞尽脑汁筹措资金填补财政漏洞，然而在他的统治即将迈入第三年时，已经黔驴技穷。但卡利古拉依然旧习难改。

首先，浪费这点，不论哪种形式的浪费都只会愈演愈烈。其次，普通民众已经对卡利古拉一掷千金的做法习以为常，卡利古拉本人也担心“财尽缘断”。所以，筹款是26岁的卡利古拉最关心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对普通民众一掷千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自己最稳固的支持者是普通民众，而非元老院。

不能减少支出，但又要尽快摆脱财政危机，那么只有增加财源收入

这个办法了。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那就是“繁荣”。这是因为太平盛世长达70年之久，基础设施在此期间覆盖帝国全境，以及实行从共和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各民族、各城市高度自治的统治方式。如果有统计数据或图表，经济实力一定是呈现向右上方上升的增长趋势。

如果仅仅依靠自然增收来促进税收，那么税收也会逐渐增加。营业税最能直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当时的税率很低，虽然只有1%，但是卡利古拉也废除了这项税收。

不论卡利古拉再怎么爱花钱，他也不敢把行省税提高10%。毕竟，统治者可以对被统治的行省人民征税，然而一旦提高税率，他们必定立即起来反抗。无论封建专制的君主国，还是承认自治的“自治城市”，直接税率只有10%。虽然在古代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常识。此外，万一发生暴动，就必须出兵镇压，最终只会增加财政负担。

一边维持松散的财政，一边又要迅速健全财政制度，当人们面临这种难题时，绞尽脑汁后一般都会采取权宜之计，暂时纵容。于是，只有卡利古拉一贫如洗，其他人依然富裕，即使不富有也不至于贫困交加。即使这样，卡利古拉也没有苛待真正的贫苦公民，他继续实行免费发放小麦给穷人的救济政策。

我们看看卡利古拉的筹款措施，没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反而让人苦笑连连。在这方面，卡利古拉可谓创意无限。

从没有生命的家具、珠宝饰品，到活生生的当做仆从的奴隶，卡利古拉把皇帝家中的这些东西都拿来拍卖。可是，他没有在首都罗马拍卖，而把地点安排在相当于高卢行省的都城里昂。如果有人问在里昂拍卖的原因，我想理由大致有三：

第一，如果在罗马拍卖，实在有失皇室体统。

第二，卡利古拉希望尽可能地把卖价提高。如果按实际价格卖，家具、珠宝饰品、奴隶根本赚不了钱。奥古斯都、提比略，甚至卡利古拉，或者皇族女性，他们都是罗马上流社会，这毋庸置疑，然而他们拥有的奢侈品并不比那些靠贩卖奴隶发家的暴发户多。所以，如果想卖高价，只能拍卖奥古斯都用过的床，或者莉薇娅喜欢用的珠宝饰品，甚至从出生开始就为皇室服务的奴隶。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充分利用附加值。

我们可以预测，首都的民众对皇帝一家已经非常熟悉，遥远的行省人民则不然，他们因此而对皇族更加心怀敬意，更加憧憬。卡利古拉会如何选择，答案显而易见。

第三，不管行省人民对皇族如何尊敬，如何憧憬，没钱的人想买也没有钱。所以卡利古拉的出售对象是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富人。毕竟专程从罗马穿越阿尔卑斯山运到里昂，运费就要花不少钱，这样一来售价自然昂贵。听说，得知这个消息，高卢各地都有很多人前来参加拍卖，这说明能够以高价买下有附加值物品的，大有人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把行省算在内，帝国的经济实力的确在增长。

当富裕的行省人民躺在奥古斯都用过的床上时，他们在想些什么呢？无论如何，要解决迫在眉睫的资金不足问题，卡利古拉靠这种方式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行省人民原来的税率是收益的10%，卡利古拉虽然不打算提高这项税率，但他也彻底放弃了减轻行省人民税收的可能性。换言之，实际上卡利古拉不允许行省人民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行省人民一旦成为罗马的公民，他们就没必要缴纳行省税。

此外，卡利古拉还规定，拥有罗马公民权的行省人民只能将公民权

传给他的儿子。在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行省人民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之后，对其亲戚家族同样适用，并且承认这是一项可让子孙后代沿用的世袭权利。因为公民权只能传给直系男孩，行省出生的罗马公民愤愤不平，他们出示恺撒或者奥古斯都赋予的“Diplōma”（特权书）以示抗议。然而，卡利古拉以证书过期无效为由，拒不承认。

卡利古拉明白，确保罗马军队的兵源远比增加行省的税收重要，所以他允许直系男孩继承罗马公民权。行省人民以“辅助兵”的身份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那么他的儿子自然也具有公民权，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有资格志愿参加“志愿兵”。罗马坚持实行志愿兵制，以此确保兵源，卡利古拉也不能视而不见。

卡利古拉的窘迫境况依然没有改善，这自然归咎于他没有减少支出。于是，卡利古拉想到了增加新的税种。可是，税制的基本体系由神君奥古斯都设置，不能随意更改，他只能略作改动。

在罗马的民事诉讼规定中，审判开始必须向国库缴纳诉讼金额的2.5%。另外，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撤销起诉，就免除缴纳的义务。然而，卡利古拉对这个规定略作调整，无论审判情形如何，都要缴费。

此外，卡利古拉还规定，对罗马市内销售的燃料也要收税，但史书没有明确说明税率多少。

甚至色情行业和妓女，他也规定要纳税，税率方面同样不可考。至于搬运工，据说税率是每天收益的八分之一。

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把卡利古拉筹款的种种窘相生动有趣地加以列举，只是绝大部分是当时不太可靠的夸大言辞，直到百年之后，苏维托尼乌斯才把这些片段加以整理编纂。虽然大部分不太可信，然而据说卡利古拉连遗书都涉及了这些方面。如果考虑罗马的实际情况，这其实是个出乎意料又非常有效的办法。

罗马人在指定遗产继承人时，通常指定由平日敬重有加之人继承。于是，先皇奥古斯都对六等亲以内的亲属免征遗产税。然而，卡利古拉认为这是一项可以征收的税金，居然强制罗马人在遗产继承人中加上他的名字。除了现金之外，卡利古拉可继承的遗产，从房屋等不动产到奴隶、角斗士等“活资产”都包括在内。卡利古拉一旦继承遗产之后，他可没有忘记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金，自然是立刻拿去拍卖换钱。根据奥古斯都的法令，六等亲以外的人继承遗产必须缴纳5%的遗产税，当然也无从考证卡利古拉缴没缴这笔税。

然而，这里面有别的问题。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是奥古斯都遗产税的征税对象。卡利古拉动手调整后的结果，等于把手伸向罗马公民的钱包。

征收燃料税，向搬运工收税，甚至对色情行业和妓女征税，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公民权，人们认为这是对被统治阶层收税，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公民权所有人自然不会表示异议。然而，插手遗产继承税，就对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作为一个法治民族，罗马人非常尊重私有财产，不论贫贱，即使是一张床，他们也会清楚地列在遗产中。所以，人们认为卡利古拉侵犯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权。此外，卡利古拉还忘记了更重要的事。

只要不触犯自己的利益，不管国家还是私人提供的马戏团或者娱乐活动，人们都欣然接受，也不吝啬表示他们对活动赞助者的支持。如果他们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会立刻翻脸，曾经的支持顷刻间作鸟兽散。然而，卡利古拉没有考虑到这种现实。刚继位时民众们对卡利古拉的狂热追捧日益降温，卡利古拉对此无法忍受。

前往高卢

公元39年秋，卡利古拉登基2年半之后，时年27岁的他突然前往高卢，从此时到公元40年夏返回首都的7个月内，当时的史学家大致记录了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可是，对于卡利古拉这么做的原因，也许他们不太关心，并没有记录在册，而后世的研究者只能依靠推测。研究者们认为，卡利古拉已经拥有了一切，而他唯一缺乏的只有军事上的荣誉，也许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通常，人们想要有所作为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卡利古拉不喜欢被称做罗马公民的“第一公民”，他想要的“凯旋将军”称号则是士兵们对胜利的军团长的尊称。恺撒自不用说，奥古斯都与提比略都曾被称为“凯旋将军”，只有卡利古拉不是。如果卡利古拉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那么在甫登基之初，去博取战功的几率应该非常之高，因为那时人们对卡利古拉非常狂热。遗憾的是，卡利古拉那段时期是在不分昼夜的庆典中度过的。在我看来，登基2年半的卡利古拉，除了想要军事上的荣誉之外，他最缺的仍然是“钱”。

当时，罗马军力强盛，拥有15万人的主力军团，以及与主力部队人数差不多的辅助兵。即使是位于东方国力强胜的帕提亚，如与这样的罗马军队为敌，纵然小规模的、零星的战斗能够取胜，大规模的战争必败无疑。卡利古拉身为军队最高统帅，他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支力量。

然而，在奥古斯都的策略中，总计30万人的军队力量是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他为此留下禁止扩大帝国疆域的遗嘱，所以罗马人都相信卡利古拉不可能违背这条遗嘱。

所谓的防线，仅靠击退犯边之敌无法维持边境稳定，必须将来袭的敌人击退，然后乘胜追击，深入敌人腹地，直捣黄龙，再凯旋回营，重新构筑防御体系。否则，就不能算是做好了“防御”工作。

在奥古斯都时代，延伸至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军团基地只是单纯的冬营地，提比略将之改为帝国防御体系基础的常驻基地。这么做并不是要让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认为罗马军不会越河侵犯。相反，这是提比

略对日耳曼民族的宣言，如若轻举妄动妄图侵犯莱茵河以西，即使穿越莱茵河，罗马军团也会不辞辛苦地还以颜色。因为，在提比略决定从日耳曼撤退之后的20多年里，即使军事行动有所收敛，罗马军队仍然经常越过莱茵河，攻击日耳曼人。

此外，关于以莱茵河为帝国防线一事，卡利古拉时代其实也没有达成一致战略。奥古斯都直至临终前都在幻想称霸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虽然他在遗嘱中禁止扩大帝国版图，然而没有说清楚帝国疆界是易北河，还是莱茵河。所以，就连出生于卡利古拉时代10年后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都深信，如果把征服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的霸业交给日耳曼尼库斯，奥古斯都的梦想早该实现了。然而由于提比略嫉妒日耳曼尼库斯军功显赫，最终使得这件事情前功尽弃。日耳曼尼库斯此名，是代表“征服日耳曼之人”的称号，而卡利古拉就是他的儿子。公元39年，当时的卡利古拉打算征服日耳曼并非匪夷所思。如果能够子承父业，完成父亲遗志，没有任何军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再者，把日耳曼变成行省后要征收行省税，收缴战利品，这些肯定可以一次性解决卡利古拉国库入不敷出的问题。

卡利古拉到达高卢之后，在里昂略作停留，就急忙赶往莱茵河前线。然而，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他虚心听取了提比略任命后一直没有调动的军团长的忠告，他最终没有对日耳曼发动进攻就返回首都了，尽管他有权调动8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共计近10万人的兵力，首都百姓也肯定会鼎力支持。不过，他还是会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今天，我们经常在敌人面前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早在公元39年10月，卡利古拉就进行了类似的军事活动。军队最高统帅卡利古拉在漫山遍野的士兵面前发表演说，最后他说：“希望各位养精蓄锐，把力量和士气留待与敌军交手之时。”

卡利古拉不得不放弃进攻日耳曼，接着他把视线转向不列颠。自从尤里乌斯·恺撒进攻不列颠之后，此后过了百年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即

使搁置不管也不会对罗马产生威胁，所以罗马没有理会。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认为，只要多佛尔海峡附近，即高卢附近（今肯特地区）的各个部族能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实际上，卡利古拉想要进政不列颠是有原因的。有几名不列颠人在部族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高卢，请求罗马派兵干预。然而，这并不符合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传统作战理念。说明白点，卡利古拉进攻不列颠，只是他毫无根据的心血来潮而已。

即使是卡利古拉头脑发热，要付诸实践依然有诸多障碍。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进攻的兵力从何而来？距离高卢最近的只有驻守里昂的1000名士兵。前线必须有人防守，如果从莱茵河抽调军队，8个军团最多只能调动2个。伊比利亚半岛有3个军团，但最多只能抽调1个。卡利古拉不得不决定征集相当于2个军团人数的志愿者加入军队。当然，这笔军费又让卡利古拉更加头疼。

按照罗马军队备战习惯，首先得将确定的因素先准备下来，也即备齐兵力、武器、军粮等，至于精神、士气等不确定因素，那是后话。罗马军历来号称是以后勤补给获胜，确保补给线自然是军团长的首要任务。换言之，开战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撑，军团长首先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对获胜后的战利品和行省化后的行省税垂涎不已，卡利古拉才意图染指不列颠，可是一想到军费问题，他不得不放弃。导致国库空虚的主因，一直实行松散财政政策的卡利古拉难辞其咎。

也许卡利古拉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决定在多佛尔海峡进行军事演习，向不列颠展示实力。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卡利古拉命令士兵们捡拾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然而我认为，这不是卡利古拉的命令，肯定是为了阅兵式而被带到高卢北部边远地区的士兵们备感无聊，才只好捡贝壳。实际上，卡利古拉只是检阅了沙滩上的军队，以及命人在海角前端设置灯塔罢了。

公元40年5月末，卡利古拉历时2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罗马，可是他没有回到被称为“顺城圣区”的市中心。罗马自古的风俗是凯旋将军在凯旋仪式之前不可进入市中心，卡利古拉遵循古制，在8月31日将为他举行凯旋仪式前暂住郊外。然而，这次仪式并不是驾驭4匹白马拉动的战车，而是称为“简化凯旋仪式”的骑马凯旋礼。对卡利古拉的要求元老院向来是照单全收，只是他仅仅做了军事演习和阅兵典礼，允许他用正式的凯旋仪式实在站不住脚。然而，卡利古拉似乎心满意足，仪式虽然很简单，但他故意把典礼安排在他28岁生日当天。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简化的凯旋仪式，他仍然可以听到前来参加仪式的士兵称呼他“皇帝陛下”。由于长达7个月的行省巡视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卡利古拉就集中精力，使出浑身解数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

先对有钱人动手就是卡利古拉所谓的尽快筹款办法。而元老院阶级正是卡利古拉指的有钱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钱，“叛国罪”刚好派上用场。元老院原本满心以为，“恐怖时代”应该随着提比略的驾崩而宣告结束，没想到这种恐怖卷土重来。以阴谋刺杀卡利古拉为借口，他的2个妹妹被流放，离世的妹妹杜路希拉的前夫雷必达和高地日耳曼军团团长格图里克斯被迫自裁。卡利古拉与元老院的关系，从登基后的狂热欢迎逐渐冷却，原本还维持表面的协调，经此一事，已经彻底翻脸。卡利古拉对有钱人阶层“痛下杀手”，原本与此毫无关系的罗马人应该会觉得大快人心，然而，如今甚至连他们都开始同情元老院阶级了。因为人们获得太多，就会感到厌烦。对于卡利古拉，罗马人已经开始生厌了。

筹款迟迟没有进展，另外，卡利古拉也许察觉到民众正在从对他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于是他打算去帝国东方视察，借此避开这种尴尬的局面。东方地区以富饶闻名，相较西方而言，东方的子民更欢迎日耳曼尼库斯之子继位。或许卡利古拉还认为东方地区更容易筹款吧。

然而，让卡利古拉如临大敌的问题终于浮现在他的面前。说实话，

他这也是自食其果。

罗马人与犹太人

近现代的研究者大多从犹太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古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部崇尚自由的犹太人顽强反抗罗马人的历史。然而，如若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是否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就没有反抗罗马的统治呢？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以及东方地区各民族，他们也进行了抗争，只是没有顽抗到底。那么，犹太人为何抗争不止呢？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必须得找到答案。

难道是前者追求自由意识的淡薄，后者追求自由的意识强烈？抑或是，罗马人与前几个民族对“自由”的定义与犹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同？

诚如出生于罗马元首制时代的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言：罗马人有着“将失败者同化”的统治精神。犹太人是失败者，但他们拒绝与罗马人同化，不只是罗马人，他们也拒绝与其他民族同化，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这个民族的宗教——犹太教，禁止他们如此行事。摩西“十诫”等同犹太人的宪法，不可违背，“十诫”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之外，尔等不得尊他物为神。”既然是一神教，这位神祇肯定心胸狭隘，因为他不承认犹太教之神以外的神明。为了在多神教支配的时代坚定立场，虽处弱势也对自己的宗教深信不疑，那么相信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相信自己是神选中的子民，这种选民思想成为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犹太人被困巴比伦、埃及，不得不委身为奴、凄惨度日之时，这种选民思想，以及期待救世主出现的想法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重返巴勒斯坦后，这个信念依然没有改变。在这一点

上，古犹太人仅次于希腊人，有着非常明显的孤立倾向。一般而言，稍具规模的城市一定有犹太人聚居区，即使身处同一个城市，他们也不会和其他居民融合。并不是犹太人不与其他民族交流，毕竟住在城市的犹太人大多从事金融业和商业，这方面的交流比较频繁，他们本身也有长才。除此之外，即融合或同化，他们毫无兴趣。因为其他民族有不同的神祇，承认了异民族的神就变成多神教信徒，这与犹太人信仰的一神教完全不能共存。然而，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的东方统治者希腊人，以及之后的罗马人都是多神教民族，其特点就是承认其他民族的神明。

犹太人在多神教盛行的古代只能算是一个异类，如果他们只是偏居一隅，不与外界往来的话，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牧羊度日，当然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然而，由于财富都集中在城市里，使得他们极度渴望住在城里。

此外，关于法律，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定义也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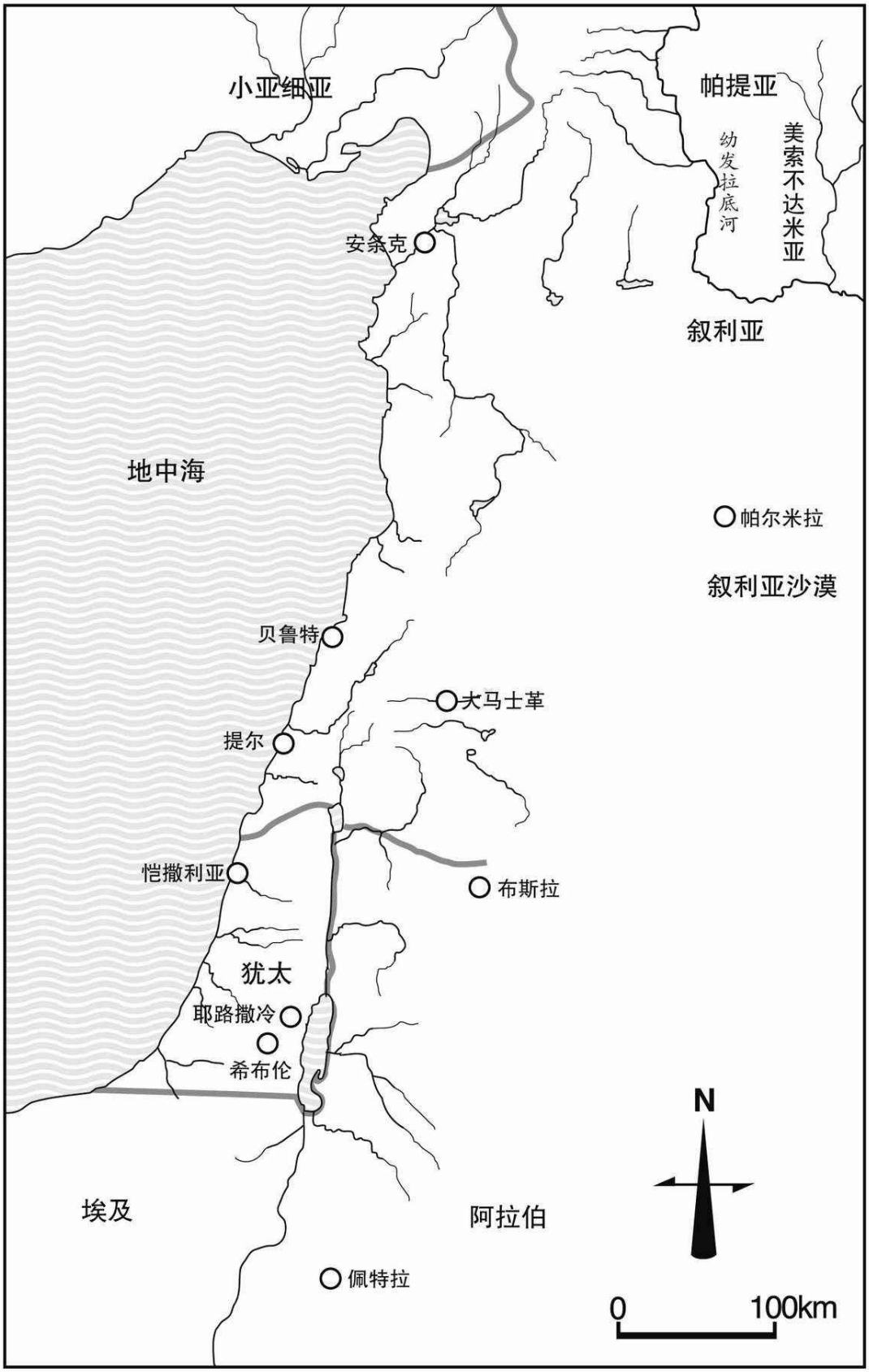
“法律”对于犹太人而言正如摩西“十诫”，是神明赐予人类并要求人类遵守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是摩西把这些条款在隐蔽处刻在石片上，当他向众人展示时，如果不说这是神谕必须遵守的话，人们都不相信，也无法接受。可是，既然说了是神明的旨意，那么人就不得随意更改，必须严格遵守。

相反，在罗马人看来，“法律”是人类自己思考，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由罗马公民们决定是否立法，然后使之成为律法。所以，不符合现状，无法更好地为当下服务的条款肯定要修正过来。

当然，罗马也有类似摩西“十诫”的法律，不过这并非出自神明的旨意，而是由人自己制定出来的。这就是公元前449年公布的《十二表法》，与名称一样，《十二表法》包含12个条款。然而，罗马人耗费了近200年的时间才使得《十二表法》有名无实。罗马人在不断修正使法律符合实际的过程中，法律往往变得面目全非，难辨初文。

换言之，罗马人是让法律符合世人，而犹太人则是要求世人符合法律。但犹太人的“法律”只适用于本民族，而罗马人的“法律”却是整个帝国都可通行，所以罗马人的这种法律精神甚至流传至今。为什么这样讲呢？罗马人观念里的“法律”不是宗教，归根到底仍是法律而已。正因如此，罗马人创造出了符合各民族的基本构想，后世将此称之为“罗马法律的精神”。

在同化定居国内的异民族时，罗马人采用的具体做法是赋予这些民族罗马公民权。按照当时的政策，拥有这项权利可以免缴行省税，所以很多民族趋之若鹜。然而，也有人不愿接受这项权利——古代的“特殊典型”犹太人。根据恺撒制定的法律，医生和教师不分民族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这一政策也随着帝国政权的发展而逐渐遍及全国。犹太人非常优秀，医生、教师数不胜数，可是真正利用这项权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因为他们如果成为罗马人，就不得不遵守罗马的法律。


小亚细亚
帕提亚
幼发拉底河
美索不达米亚
安条克
叙利亚
地中海
帕尔米拉
叙利亚沙漠
贝鲁特
大马士革
提尔
恺撒利亚
布斯拉
犹太
耶路撒冷
希布伦
埃及
阿拉伯
佩特拉
N
0
100km

同理，志愿加入罗马帝国军队的犹太人也是少之又少。如果成为罗马士兵，就必须对军队的最高统帅——皇帝宣誓效忠。然而，他们深信，犹太人只能忠于自己的神明，如若违背，必遭报应。

罗马政府很开明，体谅犹太人情况特殊，免除他们服兵役的义务。然而，这反而不利于犹太人融入罗马帝国。

以辅助兵的身份服役满25年就可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是最迅速的大批量产生罗马公民的方法。粗略计算一下，每25年就会产生15万罗马公民。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犹太人非常不合群。

犹太人游离于体系之外，选择成为罗马世界中的异乡人。这不是罗马人逼迫所致，而是犹太人出于自愿决定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地中海世界推行希腊化，所以同作为统治者的希腊人相比，犹太人一直是二等公民。罗马人继承希腊人统治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变化。作为一等公民，不仅要保护自己，同时也有义务保护别人。如果不接受这个义务，那么即使优秀如犹太人，也只能心甘情愿地做二等公民。

当然，例外总会存在，这个例外大多是住在城市的犹太人，其中又以知识分子居多。然而，就连今天的以色列人依然认为他们是叛徒。

“普遍”与“特殊”，换言之，罗马人与犹太人开始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年，那一年庞培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庞培战胜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并用和平条约牵制帕提亚王国，又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于是，希腊文明拉开了序幕。此时，庞培提出，如果犹太人想在罗马霸权下继续保持独立，必须修正犹太教祭司阶层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犹太人拒绝接

受，于是庞培出兵耶路撒冷。他没有亲自指挥，只派出部分兵力，所以没有立刻攻下耶路撒冷。然而耶路撒冷在三个月之后还是破城了。大获全胜的庞培独自进入神殿，他并非为了夸耀自己的胜利，而是出于对犹太教神殿的好奇。庞培注定失望，禁止崇拜偶像的犹太教神殿里空空如也。庞培走出神殿的感想纯真直白，他说："里面一无所有。"

犹太人在知道庞培进入犹太教神殿之后群情激奋。因为按照教规，非犹太教徒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大神殿，更何况内殿这神圣之地，一年也只允许大祭司进去一次。罗马和希腊的神殿都可以自由进入，所以庞培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带士兵不带武器就是遵守礼仪。可是在犹太人看来，他成了渎神者。

"普遍"并不是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接受"特殊"并认可其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当然，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方面，罗马人的本事让人望尘莫及。

公元前48年，尤里乌斯·恺撒为追击法萨卢斯战役中战败的庞培，进军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滞留亚历山大城期间，他着手协调统治者罗马人与被统治者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朝良好的方向发展，对象涉及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次年，即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恺撒离开亚历山大时以"我来，我见，我征服"作为寄语，赠给了在与法尔纳凯斯的战斗前，经过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人。这句话尤里乌斯·恺撒首次明确了统治阶层罗马人与被统治阶层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尤里乌斯·恺撒采取了两种做法，每一种做法都听取了犹太人的请求。第一种，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犹太人后的300多年里，希腊人在东方世界中成为了统治阶层，而犹太人一直处于劣势地位，恺撒赋予犹太人与希腊人在经济上一样的权利。第二种，可谓是给予犹太人"不用履行公务"的特别优待，恺撒允许犹太人不担任包括军务在内的所有罗马帝国公职。恺撒驾崩时，除了罗马人，由于失去了第一个认同他们的统治者与保护者，犹太人的眼泪与悲伤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民族。然而，请

求恺撒认可自己特殊性的同时，犹太人也错过了融入罗马社会的大好时机。时隔不久，陆续有高卢人、西班牙人出任罗马帝国元老院的议员职务以及行省总督，而希腊人、埃及人出任罗马帝国元老院的议员职务的情形也不断出现，甚至有人成为皇帝，然而犹太人始终没有产生这种人物。犹太人在要求别人承认自己“特殊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亲手切断了通往“普遍性”的道路。

奥古斯都继承皇位之后，依然沿用恺撒的犹太人政策，只要对帝国统治有利，他不惜背负骂名，奥古斯都不愧是务实的罗马人。除了务实的性格，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肯定听取了阿格里帕的建议，因为阿格里帕曾前往当地详细调查，且通晓常识。犹太王族多次使用阿格里帕这个名字也是从此时开始，这可以算是犹太人向这位奥古斯都的“左膀右臂”表示感谢和敬意。此外，罗马帝国的务实方针能够沿用30年之久，显而易见，犹太人中务实正直的杰出人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希律王虽然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但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取胜，最终掌握了犹太大权，他不愧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物。这个人在庞培势力强大时依附于庞培，而在恺撒大败庞培重建犹太王国时，他立刻跑到恺撒跟前，请求恺撒赐予他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称，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恺撒的附庸。在恺撒遇害之后，他又以东方势力强大为由，投奔了暗杀恺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然而，支持恺撒的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与这两个反恺撒的人物在腓立比战场上一决高下时，他又用非常冷静的态度保持着中立。之后，在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权力斗争中，他再次以东方实力强盛为由，转而支持安东尼。安东尼觉得简直如虎添翼，所以无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如何央求，安东尼都没有把犹太王国作为礼物送给她。

希律王在安东尼战败之后，立刻改变效忠的对象，转而投向更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对于迅速来访的希律王，奥古斯都承认他的犹太皇位，也把他当做罗马帝国的盟友。小国当权者的忠诚度因情况而变化，这种自保策略，希律做到了极致。然而，罗马帝国也并不是因为他实行

了一些亲罗马政策就欣然承认了他的皇位，比如兴建恺撒利亚（意为“恺撒之都”），送两个儿子到罗马留学。奥古斯都在冷静地分析了他的利用价值后才作出决定。

第一，希律王是个彻底的专制统治者。犹太的专制统治者，意味着他不允许犹太教的祭司参与朝政。因为对宗教不插手政治怀有疑虑，所以罗马人没有设置独立的祭司阶层。

第二，对于希律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皇位能否长久，所以驻守东方地区的罗马军团是他最大的靠山。而对于奥古斯都而言，确保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位于罗马直辖领土叙利亚和埃及连线上的犹太王国，最好能够站在罗马一边。如此，才能形成冷静且正常运转的互助关系。

第三，按今天的说法，奥古斯都作为跨国公司的总裁，有理由相信由当地人担任国情特殊的犹太王国的分公司负责人更合适。而且希律王非常希腊化，即他是西化的东方人，能够充分领会奥古斯都的政策。

第四，要统治在帝国东方地区形成聚居区网络的犹太人，他们的精神家园——耶路撒冷的动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古斯都对此非常了解。无论身在何处，犹太教徒有义务捐出部分收入给耶路撒冷的神殿。集中财富意味着手握财源的祭司阶层权力增强。奥古斯都需要帮手以强权压制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温床的犹太祭司阶层。整个东方地区的稳定建立在耶路撒冷的稳定基础之上，事关整个犹太人社会的稳定。

30载光阴在这种情况下转瞬即逝。罗马人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同犹太人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便成功地把这个特殊的民族纳入帝国体制之下。然而，公元4年，希律王离世，异变突生。

犹太王国被希律王一分为三，分别传给他的3个儿子。菲利普分得犹太王国的北部，希律·安提帕分得犹太王国的南部，亚基老则分得以

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间部分。前两个儿子的统治权得以顺利继承，然而亚基老继承的耶路撒冷出了问题。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动暴动，要求恢复祭司阶层神权统治，他们首先免除了希律王任命的大祭司，接着开始驱逐“污秽”的其他居民离开他们的“圣城”。于是，犹太教的圣地血流成河，稚气未脱的亚基老只好请求叙利亚的总督出兵相助。此时叙利亚的总督是瓦鲁斯，这位总督在5年后与3个军团一同殒命日耳曼条顿堡森林。瓦鲁斯没有出动军团强行镇压，他建议发动起义的激进派犹太人代表前往罗马，当面向皇帝禀明他们希望废除王权、恢复祭司摄政的请求。为了向皇帝陈情，共有50名犹太人代表被选出前往罗马。

从巴勒斯坦到罗马得走海路，往返的时间加上在罗马停留的日子，至少得要半年时间。激进派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并没有像小孩一样乖乖等着。不知是为了要造成既成事实，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狂徒般命运的驱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瓦鲁斯不得不出动叙利亚的守军加以镇压。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希律王的老办法，通过武力才让耶路撒冷重新恢复了稳定。

站在帕拉蒂尼山上的阿波罗神殿前，已经66岁高龄的奥古斯都接见了这些代表们。皇帝站在通往神殿的石阶上，聆听并排站在台阶下的50名代表陈情。奥古斯都允许这些代表们的背后站了8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来自定居于台伯河对岸的第14区。耶路撒冷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海外犹太人的心弦，这一点相信奥古斯都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

然而，对于这些犹太人的要求，奥古斯都严词拒绝了。尊重希律王的遗言是奥古斯都拒绝的重要理由，是奥古斯都身为希律王指名的遗嘱执行人的义务。不用说，奥古斯都真正的用意是不承认神权统治。希律王时代，犹太人的税赋非常之高。奥古斯都拒绝废除王权，但希望用减轻税赋来回答这些犹太人。

留在国内的同胞不满意代表们带回来的这个答复，暴动再度爆发。无奈之下，奥古斯都只好放弃没有能力平息暴乱的年轻国王亚基老。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用两年不到的时间废除了王权，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可是，奥古斯都根本不打算让犹太教的祭司管理国家。几经考虑，针对希律王留给亚基老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地区，罗马政府决定将其纳入直接管辖范围，由耶路撒冷权力阶层组成的长老会保留行政权。换言之，罗马把内政的自治权留给犹太人。

公元6年，耶路撒冷和犹太中部地区在经过多次波折之后，都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然而，它们只能归为B级行省。因为，到这里任职的长官都出身罗马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其直属上司是负责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而不是皇帝，相当于把耶路撒冷划归叙利亚行省之下。

奥古斯都并不是不重视，才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央部分编为B级。如果那个地区暂时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奥古斯都以及其后的提比略通常将之划入行省范围，直到下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长大成人。就像现代企业先从总公司派人前往暂理事务，等到当地有合适的人选再与之交接。其实，奥古斯都并没有放弃犹太人治理犹太人的盘算。

商业发达的恺撒利亚有很多希腊居民，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也以稳健派居多，犹太长官的宅邸就建在此地，而非耶路撒冷。罗马留在此地驻扎的军队不是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而是在叙利亚征集的希腊志愿辅助兵，只有3000人左右。这样一来，这些士兵在与大多使用希腊语的犹太人没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安抚犹太人。

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摩擦因为观念迥异也时有发生。罗马人为了准确把握实际情况，在这个地区归入行省后立即进行了人口与资产调查。犹太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罗马人这样做是要把他们变成奴隶。在他们看来，行省税缴给身边的国王就可以了，要上缴给远在罗马的皇帝实在难以接受。犹太人无法理解花钱保护自己和其他民族安全有什么用。耶稣基督曾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从他的回答

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犹太人必须向罗马人缴税？"言外之意，我们除了捐钱给犹太教的神殿之外，为何还要交钱给罗马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没有几个犹太人明白宗教无法取代安全防卫。

犹太人在向行省过渡的这段困难时期，居然没有发生任何暴动，有两个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犹太人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分为两种类型，居住在没有岩石的海港城市、思想较为开明的犹太人，与由农民或耶路撒冷下层人为核心的激进派犹太人。第一种类型欢迎罗马的直接统治所带来的稳定秩序，因为他们大多从事工业、金融业与商业，能够理解罗马人为什么要进行调查和征收行省税。

其次，奥古斯都起用了叙利亚总督瓦鲁斯，来完成犹太行省化这一艰苦的工作，这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物。

总督瓦鲁斯首先确保了稳健派犹太人居多的海港城市的自治权，如此一来，在犹太中部地区，不仅仅是耶路撒冷，从恺撒利亚开始，形成了许多在内政上拥有自治权的城市。这项政令的第一个目的是实施罗马统治的原则"分而治之"，第二个目的则是尽量削弱耶路撒冷的影响力。言外之意，就是使得稳健派与激进派分化开来。

对于耶路撒冷的特殊性这一点，总督瓦鲁斯也没有忘记。宗教人士介入司法是神权统治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对于遵循神明赐予的律法进行裁决的犹太教而言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所以，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纳入直接统治后，祭司阶层负责司法的做法仍然保留了下来。

当然，严格遵守罗马法律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的义务，罗马法律当然也会制裁犯罪的人。

相比较而言，犹太教徒没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他们犯罪时一般用犹

太法律作为裁决基础。摩西“十诫”的后半部分就规定禁止杀人、奸淫、窃盗、作伪证、侵犯民宅。当然，这也是罗马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所以交由犹太教处置也是合理的。只是判处死刑时必须经过作为“皇帝代理”的犹太“长官”同意，否则没有效力。

谈到耶稣基督的案子，也是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们组成的法院判决之后，经过当时的犹太长官本丢·彼拉多同意后执行死刑的。然而，当时本丢·彼拉多屈从于祭司们的压力，以洗手的象征性动作表明，这是你们（犹太方面）决定的事情，不是我们（罗马方面）决定的事情，从而导致了耶稣被判处死刑。依照犹太教的律法，随意口称神祇之名的人都会被处死，然而在多神教的罗马这只是小事一桩。如果当初本丢·彼拉多坚持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代表的罗马法律行事，那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对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罪名，并且虽有隐患却没有造成真正的危机，依照罗马法律规定最多也只是被判处流放。可是，如果耶稣被判处流放至黑海地区，而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日后的基督教也就不会发展壮大了吧。而本丢·彼拉多的玩忽职守给罗马帝国埋下了祸根。

总督瓦鲁斯的犹太政策是在充分考虑犹太人特殊性的同时遵守罗马的普遍性要求，然而，彼拉多担任犹太长官时，瓦鲁斯已经离世。

皇帝掌管帝国的金银币铸造权，然而使用频率最高的铜币的铸造权，除了帝国之外，拥有自治权的城市，比如雅典、斯巴达一类“自治城市”，也可以铸造。只是，首都罗马的铸造权则由元老院负责。受罗马直接统治的行省没有这项权力，因为行省以罗马钱币为流通货币，当然，皇帝的头像无一例外地都被铸在了货币上。

罗马帝国把犹太王国纳为行省，希律王时代铸造的钱币就不能继续使用，代之以罗马货币。然而，摩西“十诫”里就明文规定禁止雕刻塑像，所以导致了犹太教没有偶像崇拜。

针对这种情况，总督瓦鲁斯在犹太行省发行的是没有皇帝头像的铜币，因为铜币的流通频率较高，但并没有改变金币与银币的设计，因为普通民众很少接触到金币和银币。

此外，总督瓦鲁斯十分尊重犹太教的习俗，发布了禁止非犹太教徒进人耶路撒冷神殿参拜的戒律，违者处死。此外，奥古斯都与妻子莉薇娅历来排斥包括犹太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罗马上层人士，却例外地向耶路撒冷神殿捐赠了大量钱物。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成为行省人民后，罗马人没有把能够彰显军事实力的军队驻扎在耶路撒冷，而是改在100公里之外的恺撒利亚驻扎，以避免刺激他们。除此之外，罗马帝国还规定恺撒利亚的驻军若事出有因不得不前往耶路撒冷时，必须将皇权的象征——军旗留在恺撒利亚才能拔营。

继任者提比略沿用了这个由叙利亚总督瓦鲁斯身先士卒执行的奥古斯都犹太政策，我们应该说他贯彻得更彻底。提比略继位之后，瓦鲁斯似乎还是叙利亚总督。

耶路撒冷神殿原本供奉着罗马人捐赠的没有皇帝象征的供品，然而考虑到犹太人会觉得非犹太教徒的供品弄脏了神殿，于是提比略下令，将这些供品都移到恺撒利亚供奉先皇神君奥古斯都的神殿内。此外，犹太教大祭司在祭典上的法衣原本也由罗马方面保管，放在耶路撒冷神殿内，提比略也命令将之归还，让犹太人自行保管。曾经，法衣由异教徒的罗马人保管，每当祭典之际犹太祭司前来借用时，都必须花7天时间以消除衣服上的污秽之气。

公元21年，顺利实现犹太行省化的普布利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瓦鲁斯与世长辞。提比略以他对国家鞠躬尽瘁为由，下令以国葬之礼厚葬了这位总督。纵观瓦鲁斯一生，出生低微，却在军团中受到赏识，接着被选为执政官。随后又在日耳曼、非洲、叙利亚被委以要职，临终又得享

国葬。在重视出身背景的由元老院把持朝政的共和制时代，这无疑是天方夜谭。对于出身寒门的有识之士，由恺撒开创、奥古斯都确立、提比略加以巩固的帝政时代，实在是施展才干的伟大时期。

提比略在瓦鲁斯去世之后并没有掉以轻心，所以犹太人的治理比较顺遂。当然，历届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直接接触的犹太官员中，由于对此民族的特殊性一无所知而治理不当的官员大有人在。身为犹太长官必须有所准备，时刻保持清醒，因为一旦犯错被提比略得知，立即免职，并且被召回本土接受审判。从公元26年起，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就是个典型。他让扛着军旗的军队进人耶路撒冷，并受到犹太人多次发生骚乱的牵连，最终导致他被撤职。

其实，罗马的当权者未必是犹太人反抗的主要原因。犹太人作为一贯处于弱势的民族要从被害意识中获得解放，走向自由，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人满脑子都是受害者意识，面对强者时经常反应过度。所以，在其他行省无足轻重的小事，到犹太人身上就会变成大问题。

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不仅被提比略完完整整地继承了过来，而且在他手上执行得更为彻底。奥古斯都时期的政策针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的犹太人，提比略把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囊括在内。此外，他还不只是扩大政策适用范围，还考虑到东西方的差异，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因地制宜”与“分而治之”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罗马帝国基本的治理方针。

之所以提比略会贯彻奥古斯都的犹太人政策，这并非是奥古斯都执行不到位，而是因为有些问题在奥古斯都时代不甚明显，到了提比略时代就迫在眉睫了。犹太人除了只遵从神明的法律外，还有另一个特点。

希腊人与犹太人

希腊语“代阿斯珀拉”（Diaspora，大流散）意为离开故国定居海外，现代普遍认为这是犹太人特有的一种现象。姑且不提犹太人被强制迁徙到巴比伦和埃及的例子，但单论定居海外，希腊人早有先例。罗马人在各地兴建名为“科洛尼亚”的殖民城市只是政策移民，而非人们自发迁移形成的人文现象。就自主性移居而言，希腊人堪称先驱，而犹太人则是紧随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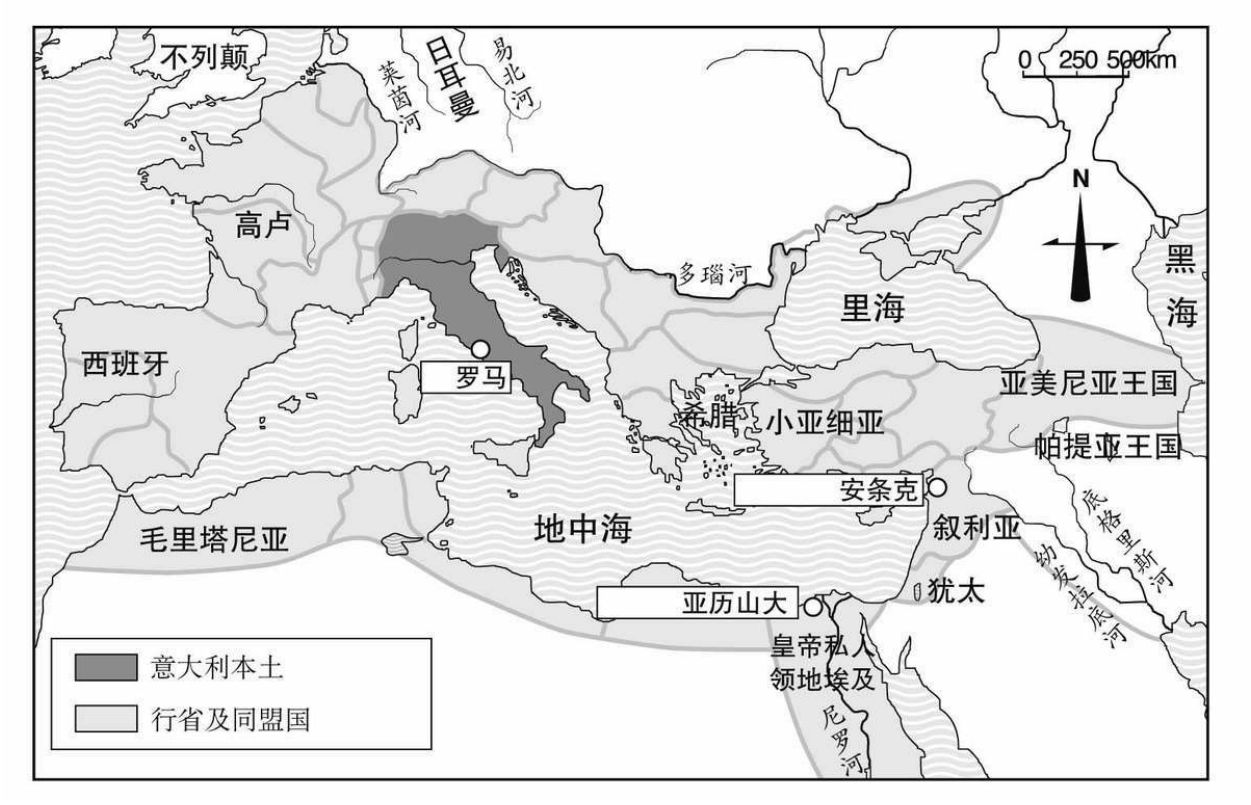
然而，两个民族的迁徙，在本质上则是天差地别。

首先，希腊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新的城市，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商业，慢慢地积累财富；与此相反，犹太人则是迁移到现有的发达城市，在那里从事手工业、商业与金融业，以此积累财富。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就开始向地中海周边移民，不论东南西北，在各地都兴建自己的城市，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座犹太人自己兴建的城市。很显然，犹太人不会移居到贫瘠之地。

公元前后过渡时期，地中海周边的东方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然而在罗马帝国等西方的各个城市中并没有同等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因为罗马虽然是霸权国家的首都，但西方的富庶之地并不多。

然而，实现“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普及基础建设，使西方的经济迅速提升，以往差距颇大的东西方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也许有人认为财富都集中到罗马了，事实却不是这样。罗马、亚历山大与安条克是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然而只有罗马属于西方地区，亚历山大和安条克都在东方。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很重视整个帝国的财富流通，他们并不认为必须把财富都集中到罗马。行省税并不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进贡，而是保障他们在帝国境内安全的保护费。

不管怎么说，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提升的西方经济实力逐渐引起了犹太人的兴趣，此时的西方地区也真正具备了犹太人移民的条件。恰逢此时，提比略登基为皇。



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

提比略与犹太人

从一直重用叙利亚总督瓦鲁斯，以及采取各种缓和措施避免刺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等事，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非常了解犹太人的种种特殊性。正因为这份了解，他也深知，对推行普遍标准的罗马帝国而言，固执地保留其特殊性的犹太人会带来什么危害。怎样才能让以神明的律法为圭臬的民族和遵循人类法律的人民和平共处？若对他们不闻不问，随时会出事。在东方地区，比如节庆期间希腊居民和犹太居民经常发生冲突，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希腊人是多神教民族，与罗马人在法律是人类创造的观念上最为接近，同时他们毫不抗拒地接受了与罗马人同化。

摆在提比略面前的是如下事实：

亚历山大城总人口过百万，居民分5个区居住，其中3个区是希腊人，剩下的2个区都是犹太人。然而今天缺乏罗马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只能推测当时的人口数量，肯定有超过40万犹太人住在这个城市。位于东方的另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安条克的犹太人口也大致差不多。

罗马一共划分14个行政区，其中只有1个区允许犹太人居住，况且移民到罗马的犹太人十分稀少。因为罗马开始富裕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发生的。研究者估计，犹太人定居罗马的应该在2万人左右。在100万人中的40万人与100万人中的2万人，这一数据中大概隐藏着允许“特殊”又贯彻“普遍”的对策。

提比略承认东方各个城市犹太人聚居区沿用奥古斯都时开始的办法，即同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本民族内行使司法权，除了执行死刑必须经过罗马总督或长官的许可之外，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沿用耶路撒冷的做法。换言之，提比略承认东方地区的犹太人有权依照神明的法律进行审判。

此外，认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周六安息日，可以说也是提比略一个高明的决策。休假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是向众神献祭的节日，人们通常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参加祭祀仪式，观赏祭神的角斗比赛或戏剧等等。所以，犹太人除了向神明祈祷之外什么都不做的休假方式，实在令希腊人与罗马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对犹太人而言，摩西“十诫”的第4条既然规定了“安息日即是圣日”，若不遵守必遭天谴。身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居然能够忍受犹太人“什么都不干”的习惯，而自己在每周六努力干活。对此，提比略也别无他法，这是因为在百万人口中犹太人达到40万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百万人口中犹太居民只占2万人的西方地区，提比略实行的政策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项政策没有限制或禁止犹太人迁移，然而他们必须甘心接受西方不同于东方的不利条件。摩西“十诫”中规定了犹太人每周六“什么都不干”，所以提比略爽快地同意了，然而提比略不允许犹

太人聚居区享有自行审判的司法权。犹太教徒要移居西方地区，不论是谁都必须严格遵守罗马法律。由于犹太人只有2万人，处于弱势，所以这项政令可以顺利进行。

然而，就是这位提比略，强制要求包括耶路撒冷在内不分东西方，各个城市的犹太人都要遵守这一条规定：承认犹太人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迁移自由在内的所有犹太人的特有习俗，但坚决反对任何以反罗马为目的的行为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这些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必须时刻牢记这一条。公元19年，时任犹太总督的瓦鲁斯对犹太教徒推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提比略以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强制从罗马本土驱逐所有住在罗马的犹太人，虽然这只是暂时的。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绝不允许他们演变成社会动乱的根源，这就是由提比略确定的罗马人对异教徒的政策。

在犹太人聚居较集中的帝国东方，提比略继承了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方针政策。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因历史等种种因素使得两者的关系日益恶化，提比略的策略是站在调停者的立场，不偏不倚，公正裁决。毕竟帝国的东方是建立在这两个民族之上的。

和愿意接受与罗马人同化的希腊人不同，犹太人不愿被同化，所以管理犹太地区时让犹太人自己来做负责人是上上之策。我想，提比略对此心知肚明。然而，提比略一直没有合适人选，虽然他对候选人之一希律王之孙希律·阿格里帕评价不错，但又指责希律·阿格里帕缺乏责任感。因此，提比略不得不维持由叙利亚总督指挥下的“长官”直接统治这一办法。

提比略驾崩之前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对罗马的帝政赞誉有加（参见前文），足以证明当时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非常满意罗马人从恺撒、奥古斯都到提比略持续一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当然，卡利古拉也承袭了这些政策。身上流着奥古斯都之血的卡利古拉一定会将这项政策执行得更好，以斐洛为首的犹太人

对此深信不疑。

卡利古拉与犹太人

我们人类，不论是谁，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种族偏见这一意识。但有两个必要前提才会意识到这一点：首先，过着每天都能见面的共同生活；其次，两者之间有着利益冲突，也即利益不一致。在地中海东岸长期生活并存在利益冲突的，就是希腊人与犹太人，而无关罗马人。当然希腊人与犹太人都非常能干，正因如此，他们在各方面都会形成利害冲突。且不提经济方面的较量，两者在学术领域也有着很强的竞争关系。由于希腊人的航海才华呈压倒性优势，所以，大概海运是他们唯一没有利益冲突的领域。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文明时代，历时3个世纪之久。在这个时期两个民族的身份变成了统治者的希腊人和被统治的犹太人。表面上的确如此，这也有助于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然而，希腊人统治的最后据点在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战败之后，也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罗马人从公元前30年开始，成为了这一地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被统治者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就不得不成为了“同居”关系。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期，而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不断深化，这样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对立关系不可能在转瞬间冰消瓦解。此外，可以说在罗马霸权之下，这两个民族的选择明显两极分化：希腊人选择与罗马人同化，犹太人则拒不接受。

即使这样，拥有可以将失败者同化这种特质的罗马人认可特异分子——犹太人的特殊性，把他们纳入统治体系。对犹太人而言，我想从恺撒、奥古斯都以至提比略的这一个世纪，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希腊人统治时期要好得多。犹太人如此拥护卡利古拉登基，恰恰证明他们希望罗马

人继续维持帝国政权统治下去。

然而，卡利古拉根本不懂罗马皇帝的“无冕之王”才是凌驾诸王之上的本质，在他心目中只有成为各个民族的“神”，才能超越凡间的各个国王。

于是，卡利古拉的举动让犹太人十分为难。在卡利古拉大病时，犹太人献上供品诚心祈求他早日痊愈，然而犹太人根本不能认同卡利古拉是神。与犹太人不同，希腊人是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多一个神明也无关痛痒。如何对待宣布“我即神”的卡利古拉，这再次激起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对立关系。双方的这种大规模对立冲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正式爆发，这是因为在帝国的东方地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势均力敌，不相伯仲。

公元38年，卡利古拉继位后才一年，亚历山大就爆发了民族冲突。刨根问底，起因是希腊人借卡利古拉之名发泄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换言之，是希腊人先对犹太人寻衅生事。

停泊在港口的所有犹太人的船只都被抢劫焚烧，甚至连犹太人集中居住地的百姓也不能幸免，家里都被抢劫一空。哪怕是从居住的地方出门都不能保障安全。希腊人甚至把卡利古拉的雕像搬到犹太教的教堂内，借此讥讽犹太人胆小怕遭天神报复的心理。

为了平息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纠纷，派驻埃及的皇帝代言人——罗马官员责任重大。时任埃及长官的是弗拉库斯，由提比略提拔上台的他一改以往的仁慈，果断地强硬出招。但是，此次他没有居中调停，而是支持希腊人。在他看来，年轻的皇帝卡利古拉即位才一年，他的统治生涯必定很长。况且国内都知道卡利古拉自封为神，所以强硬镇压尊卡利古拉为神的希腊人肯定困难重重。至此，亚历山大的这场暴动，演变成了以埃及长官弗拉库斯带头的大规模镇压犹太人事件。

弗拉库斯首先废除周六安息日，以犹太人没有权利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由，把以往5个区中可以居住在2个区的犹太人全部赶到1个区。犹太人被赶走的地区，400多间房屋与犹太教教堂都被焚烧得干干净净，在希腊居民的嘲笑声中，36名祭司被带到角斗场接受鞭笞。

而犹太人经营的工场被关闭，商业活动全部停摆。由于担心希腊人打砸，就连贩卖日用品的商店也关了门。被称为东方第一大城市的亚历山大约有半数城区陷入混乱之中。

犹太人除了直接向罗马皇帝投诉之外别无他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法律允许直接上诉，犹太人大概已经习惯提比略23年来未曾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了。所以，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决定向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上诉。虽然卡利古拉自诩为神，然而他毕竟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犹太人满怀希望地想见到卡利古拉之后能请皇帝居中调停。

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一致决定，由学富五车、在犹太人社会中威望高、号称“犹太的柏拉图”的斐洛担任前往罗马的使节团首席代表。因为斐洛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他又不吝于承认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点，坚信罗马帝国政权下犹太人生存的可能性，是稳健的都市犹太人，所以尽管他年届古稀，仍然被认为是最佳人选。此外，他资产颇丰，可以负担使节团所有成员的花费。

当然，斐洛的优点不止于此，他有一个会让罗马政府产生好感的家庭背景。斐洛的胞弟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他是一位非常有钱的金融业者，正如名字所示，他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同时他还管理着卡利古拉的祖母安东尼娅的财产。由于卡利古拉几乎继承了祖母的全部遗产，盖乌斯管理着皇帝在东方地区的私有财产。此外，斐洛家族中还有一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亲戚，名为马库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也是“财经界”的重要人物。他跟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贝蕾妮丝结为连理，马库斯也因为这桩婚姻，和卡利古拉的挚友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成为亲戚。

另外，斐洛的一个儿子拥有罗马公民权，他叫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德罗斯。他选择在军队里工作，在父亲担任使节的同年他业已晋升为罗马军队的大队长了。此后，这位犹太裔的罗马人取得了显赫的位置，他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担任犹太长官，尼禄皇帝时代出任埃及长官，韦斯帕芗皇帝时代晋升为近卫军团长官。尽管被罗马人同化的犹太人十分稀少，然而，还是会有部分人活跃在罗马社会各个领域。

公元38年初冬，经过长途跋涉，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终于来到了罗马。他们一直以为卡利古拉会立即召见，却迟迟不见有人通知。他们拜托身在罗马的希律·阿格里帕向卡利古拉说情，而卡利古拉的答复是等希腊使节到达罗马后再一起召见。希腊人经常避免冬季出海，加之他们没有向皇帝上诉的紧迫感，所以出发得非常迟缓。希腊人如果秋天没有出港，势必会到第二年的春季才出发。如此看来，希腊使节团抵达罗马应该是在公元39年春意盎然之际。当然，亚历山大的希腊人派遣了一个以学者为首席代表的使节团前往罗马，他就是名为亚比昂的著名哲学家。而提比略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学者”。当然斐洛并不惧怕口若悬河的亚比昂，然而在这一段长时间的焦躁等待中，斐洛对身为调停者的卡利古拉感到深深的不信任。

终于等到希腊使节团抵达罗马，可以谒见皇帝了。在罗马“七丘山”之一——埃斯奎里山上面积广阔的“梅塞纳斯大宅”的皇帝私宅内，卡利古拉接见了双方代表。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亲信，他去世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奥古斯都，所以这个能将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的景区也变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卡利古拉原本打算在这里招待罗马上流社会人士，欣赏戏剧表演。当他前往视察时，顺便把希腊人和犹太人双方的使节团叫到了“梅塞纳斯庭院”。因此，这次接见不是在固定的议事厅中面对面地坐着，而是三方都站着交谈。我把斐洛记载当天会见的全部过程翻译了下来。卡利古拉在此时快要迈入27岁的年龄了。

我们被带到皇帝跟前的时候，充满敬畏地把头低了下来，双手

前伸，口呼“敬爱的皇帝陛下”。随即，卡利古拉用极度挖苦嘲讽的口吻说：“原来就是你们啊，听说你们憎恶其他神明。其他民族都承认我是神，只有你们，信仰禁止你们口呼其他神明的名号，所以不肯承认我是神啊。”卡利古拉说完之后，两手高举，看着天空，对着神明大放厥词，让我们难以忍受。

与对我们的态度完全相反，皇帝对希腊使节团的亲切仿佛是在挖苦我们。希腊人因此得意洋洋，以夸张至极的动作和恶心而低贱的话语去拍皇帝的马屁。一位叫伊西多罗斯的希腊代表甚至说：“尊敬的主人，如果您知道这群家伙在亚历山大干下的蠢事，我敢说，您会更加厌恶他们。您大病之时，亚历山大的居民举行祭祀，献上祭品，诚心祈求您早日康复。可是只有这些家伙，就是这群犹太人，他们说神明不允许，竟然不为您祈祷，实在可恨。”

我们异口同声地反驳：

“伟大的盖乌斯（卡利古拉的名字），请您明鉴！伊西多罗斯对我们的指责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请您明察。您贵体染恙，我们也为您奉上牲礼，而且不像他们只用了几头，我们奉上100多头家畜诚心祈求。并且，我们依礼为您正式祈祷。把祭礼办好，并不是在祭坛前宰杀家畜，把它们的血洒在祭坛四周，然后把肉带回家吃掉。而是宰杀后要等牺牲化为灰烬，这才是真正的祭祀。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不仅如此，我们不止一次举行这种祭祀。您登基后的两年内，我们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您继承皇位之时，第二次是您病倒、整个帝国和您一起生病消沉的时候，第三次是您与日耳曼人作战时，我们举行祭礼祈求您凯旋。”

卡利古拉对于我们诚恳的辩白却如此讽刺道：“那我就算你们确实举行过牲礼。然而牲礼是献给神明的，你们信奉的宗教却口口声声说神明只有一位。难道你们在献给唯一神明的祭祀中会去祈求另一位神幸福安康？”

口不择言的卡利古拉一边说，一边检查布置在庭园各处的表演

场地，根本没有放慢脚步。他逐一检查各处让贵客观赏的表演场地，不停地在楼上楼下来回走动，若有不满意之处，他当即下令改过来。然而，这种做法就意味着需要浪费更多的钱财。

我们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不断地在楼上楼下来回走动。这期间，希腊使节们毫不客气地继续指责我们，肆意嘲笑我们。然而，对于卡利古拉偶尔的发问，他们回答不出所以然来，所以皇帝和希腊使节团之间的对话，时断时续，没有顺利进行下去。

突然，卡利古拉向我们发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碰猪肉？"

这个刻薄的问题又引起希腊方面的哄堂大笑。然而，我们依然诚恳地回答道："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律法，不同的律法就会有不同的忌讳。希腊人也不例外，山羊数量多，又便宜，然而他们不吃山羊。"

卡利古拉大笑，然后他说："这简单，因为难吃嘛。"

在这种氛围下皇帝接见我们，这让我们困惑不已，心情更加沉重。卡利古拉接着又问："犹太人现在行使的政治权利有哪些？"

我们开始讲解的时候，他侧耳倾听，说明他愿意理解我们的立场，然而风云突变。我们说到重点的时候，正在检查的卡利古拉就踏进了庭院中央宽阔的表演台。因为卡利古拉开始下达命令，我们只好打住。他命令在四周的窗户上缀满如玻璃一般白色的稀有石头打磨成的薄片，这样既可以采光，又可以使里面的观众免受强风或强光的伤害，一举两得。之后，他又面向我们，问道："刚才你在谈什么？"

接着刚才说到一半的话，我们又开始重新讲解，可是卡利古拉依然没有放慢脚步。他刚踏进下一个表演馆就再次下令改装。这次他要求更换用来装饰表演馆墙壁的画。

才吩咐完，我们以为他会认真听我们解释，没想到他突然说道："我觉得你们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说的那么糟糕，然而你们的确是一个不幸又愚昧的民族，因为你们居然不承认我继承了神明的本质。"

他说完这话扬长而去，我们也只好回去了。

不论是罗马的史学家，还是后世的作家对卡利古拉的描写，都不及与卡利古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这位犹太人写得栩栩如生。不论是2000年后的阿尔贝·加缪在戏剧《卡利古拉》中刻画的人物，还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意大利各自拍摄的《卡利古拉》的电影中，化身为性与暴力怪物的卡利古拉，这些题材都来自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皇帝传》。这本传记是苏维托尼乌斯在卡利古拉作古百年之后，收集流传在街头巷尾的传言编写而成。然而，卡利古拉并不是一个幸运或者不幸的怪物，他的头脑也并没有那么愚昧。只是他的不幸，抑或是罗马帝国的不幸，是让一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从政治的立场出发去肩负政治上的责任。对于卡利古拉而言，其实他也有批评眼光。卡利古拉曾经开玩笑地讲道，要任命他的一匹爱马英西塔土斯担任元老院议员，这其实是在嘲笑元老院议员们素质的降低。然而，这种玩笑话流传到他身后，就变成了他要把一匹马任命为元老院议员的狂妄举动。

虽是这样说，但是批评与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政治实践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新闻就是进展顺利”一样，是一件脚踏实地的工作，同时也要求有始有终。随机应变固然不错，但容易见异思迁，对政治实践者而言这无疑是自掘坟墓。

我们只能说，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的罗马之行有得有失。失败之处在于犹太人的不利环境根本没有获得改善。但还是有成功之处的，即卡利古拉重新任命的长官不允许亚历山大的希腊人继续对犹太人横行霸道。作为罗马帝国东方地区发达的经济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条克齐名。当然，犹太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才使得亚历山大能够发挥经济中心的职能。

卡利古拉在斐洛回到亚历山大不久就再次前往行省，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在莱茵河沿岸和连接多佛尔海峡的高卢发生的故事，此处不再赘

述。随后，他在返回罗马之后，举办了一场虽然仪式简单但也算做凯旋的庆祝活动。然而，恰逢此时，因巴勒斯坦又生事故，卡利古拉的目光再次转向犹太人。

势力对决

莱茵河前线为迎接卡利古拉举行了军事演习，随后又在罗马举行了凯旋仪式，所以当这么大的消息传到东方的犹太地区时，似乎变成了卡利古拉征服了日耳曼民族的信息。为此欢欣鼓舞的希腊人准备搭建供奉卡利古拉的祭坛，并在此举行牲礼祭祀。

希腊人的行为深深刺激了犹太人。愤怒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来，把大理石祭坛砸得粉碎。这件事当然上报给了返回罗马的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原本就对犹太教徒没有任何好感，接到报告后果然大发雷霆，他武断地决定必须用武力解决。对于卡利古拉的决定要是发生在今天，肯定非常轰动，一定是电视里的头条新闻，以及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卡利古拉给负责治理犹太的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去信，命令佩特罗尼乌斯打造一个以卡利古拉为模特儿的最高神祇朱庇特神像，并将这尊雕像安放在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

作为先皇提比略起用的一位行政官，佩特罗尼乌斯看到卡利古拉的命令时大惊失色。更糟的是，卡利古拉的这个命令不只是给佩特罗尼乌斯的密令，他甚至昭告天下，所以，很快在犹太人中传了开来。

犹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这股洪流之中，他们把行政官的宅邸围得水泄不通，要求佩特罗尼乌斯想方设法避免亵渎神明的行为发生。对于这个消息，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等地的海外犹太人也是忧心忡忡，毕竟，耶路撒冷大神殿是犹太人崇高无比、不容亵渎的“圣地”。如果放任不管，一定会引起整个犹太人聚居区

的揭竿而起。

总督佩特罗尼乌斯略施小计，他密令制作神像的泰勒斯工场尽量拖延工期。面对犹太人的要求，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点头作为回答，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于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都暂时平息了。

罗马这边，卡利古拉满心期待自己的命令尽快执行。然而他望穿秋水，都没有接到报告说，已经在禁止偶像崇拜的犹太教大神殿竖起了他的神像，甚至连神像制作好的消息也没有影子。于是，卡利古拉再次致信总督佩特罗尼乌斯：

> 看来你罔顾我的命令，接受了犹太人的示好。换言之，你宁愿博取他们的好感，也不愿履行你的职责。你这是不从皇命。那么，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身为皇帝的我有必要让你们清楚不从皇命的后果。所以我认为，你自我了断最为妥当。

一言以蔽之，卡利古拉命令佩特罗尼乌斯自裁谢罪。这中间有个操作问题，按当时的条件，从罗马到安条克需要一个月。所以，当卡利古拉的命令还在地中海向东传达时，下令的卡利古拉已经驾鹤西归了。

总督佩特罗尼乌斯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罗马皇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全面对决也因此烟消云散。然而，卡利古拉导致的罗马帝国统治上的“裂痕”，不仅仅是犹太问题。

围绕亚美尼亚王国是亲罗马还是偏向帕提亚，罗马和帕提亚的关系开始面临危机。所以，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不得不在与帕提亚交界的幼发拉底河畔驻扎了2个军团。

北非西部的毛里塔尼亚王国，70多年来一直是罗马可信赖的盟国，这个国家也因为卡利古拉的轻率行为与罗马产生嫌隙。

毛里塔尼亚王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致是今天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奥古斯都时代，即使毛里塔尼亚王国没有皇位继承人，罗马帝国也与其保持着同盟关系，并没有将它纳为行省。他安排败给恺撒的努米底亚末代帝王尤巴的儿子，与马克·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女儿结婚，并让他们统治毛里塔尼亚。到卡利古拉时代，毛里塔尼亚的国王是这两个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马克·安东尼，也即卡利古拉的曾祖父。卡利古拉继承皇位之后，无法忍受有着血缘关系的特洛梅斯担任友好国家兼盟国的统治者，实际上就是藩属国的国王。卡利古拉把特洛梅斯召到罗马之后立即处死，并宣布要把毛里塔尼亚变成罗马行省。为了反抗这一举动，毛里塔尼亚人掀起了反罗马运动。通常而言，治理帝国难免会发生一些问题，可是就连罗马人历来很放心的毛里塔尼亚也问题丛生。

卡利古拉的执政不仅仅让国库濒临崩溃，而且在外交方面也是困难重重。

反卡利古拉行动

恐怖行为并非因文明程度不高而发生，也不会因为参选落败而不择手段才引发，而是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导致大家都认为只有杀掉他才可以改变当下的政治局面。

公元40年到41年，卡利古拉身处的环境从他登基时的狂热拥捧到现在的迅速退烧，让人怀疑这一切是否像梦境一般虚幻，而且这种变化之快不过才3年半而已。卡利古拉甚至连担任罗马公职资格要求的30岁年龄都还未满。

普通民众一般不太关心外交，他们享受作为社会福利的“面包”和博取民心的“马戏”，照理说卡利古拉的支持率应该很高，他的支持率却出

现下滑，究其原因是卡利古拉征收燃料税。也许在卡利古拉看来，这项税收是代替废除的营业税，然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燃料，即使能够免费领取小麦的贫民也必须使用燃料。虽然民众可以免费欣赏角斗比赛、杂耍等各种表演，抗议征收燃料税也时有发生。罗马人聚集在角斗场中大声抗议，卡利古拉只好派出近卫军团前去镇压。

对于卡利古拉在外交等所有帝国施政上的失策，完全有能力掌握情报、分析判断的元老院对此也有所了解，他们却像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不敢轻举妄动。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卡利古拉攻击的目标锁定为元老院，他利用叛国罪法对准目标大开杀戒，害怕明天大祸临头的恐惧让议员们不敢贸然行动。

第二，在议员们看来，如若身为日耳曼尼库斯之子的卡利古拉有什么意外，至今仍然流传着“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前线守军一定会有所动作。

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本名盖乌斯，对意思为“小军靴”的“卡利古拉”这个名字非常抵触。然而，在军队中实力最强的莱茵河沿岸军营里，士兵们把幼年的盖乌斯视为吉祥物，看着他长大。所以，即使卡利古拉继承皇位，他还是士兵们的“小军靴”，是背负士兵们希望的日耳曼尼库斯之子。

第三，元老院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卡利古拉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周全，没有计划好推翻卡利古拉后如何治理帝国。元老院中有部分议员是顽固的共和主义派，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恢复共和制。进入帝国政权时代已经过了70年了，几乎所有议员都成长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体制下。废除帝王政治、恢复共和制的想法对于这些议员而言非常不切实际，轻举妄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卡利古拉在施政上的失败已经让人无法袖手旁观。

第四，扳倒卡利古拉并不容易，他周围戒备森严。奥古斯都吸取恺撒的教训，恢复恺撒曾经解散的日耳曼士兵贴身侍卫制度，这也是他长寿的原因。卡利古拉把这个编制扩大，禁卫军也成了他的护卫队。近卫军被称为罗马军队的精英，成员都是从帝国各地驻防军团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士兵。卡利古拉还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麾下的日耳曼军团中挑选人才担任近卫军队长。换言之，“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忠诚信仰者负责护卫卡利古拉。这样一来，即使元老院议员们的勇气可嘉，但也不能贸然行事。

然而，最后杀害卡利古拉的，竟然是他认为对自己最忠心的“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信仰者，这简直是命运对他的嘲讽。

遇害

公元41年1月24日，献给神君奥古斯都的帕拉蒂尼祭典在皇宫的所在地——帕拉蒂尼山上举行。按照罗马帝国的习惯，祭典在祭祀仪式之后都会有戏剧表演与角斗比赛，而戏剧表演的时间正是帕拉蒂尼祭典的第5天。

卡利古拉心知肚明，先皇提比略恶评如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从不出席这类活动，所以不论是戏剧表演还是角斗比赛，卡利古拉一定会出席观看。当天，他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上午的表演。

从议事厅通向皇宫有一条短程地下通道。卡利古拉在下午1点左右，起身准备享用午餐。然而，就在卡利古拉即将走出地下通道之际，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用剑从背后朝他的脖子砍下去；另一名近卫军大队长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也拿剑从正面用力刺进站立不稳的卡利古拉的胸部。一眨眼之间，卡西乌斯·卡瑞亚就再次举剑向倒在地上的卡利古拉头部砍去。

皇帝卡利古拉在日耳曼人警卫赶到现场时已经遇刺身亡，而她的第四任妻子卡桑尼娅也是胸部中剑，气息全无。1岁大的女儿杜路希拉，则是被人从乳母怀里夺过来摔到地下通道的墙壁上而夭亡。被称之为卡利古拉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日耳曼尼库斯，享年28岁零5个月，他的统治只维持了3年10个月零6天。

由于涉及卡利古拉遇害一事的所有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都死去了，所以后世的研究者只能猜测他遇害的真正原因。研究者认为，杀害卡利古拉意味着近卫军干涉皇位更替开了先例。此外，还有人认为，近卫军团士兵受到了金钱的诱惑最终刺杀了卡利古拉。我对第一种观点比较赞同，近卫军团士兵受金钱诱惑的论调，我不敢苟同。

近卫军团的士兵确实在卡利古拉遇害之后，在帮助克劳狄乌斯继位上功不可没，此外，每个士兵都得到1.5万塞斯特斯的褒奖，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卡利古拉遇害之后。

此外，并非近卫军团的9个大队共9000名士兵全体参与了此次谋杀，涉及此案的只有2个大队，更何况，涉案的2个大队也并非2000人都参与了谋杀。实际上，决定谋杀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是统领这2支队伍的2名大队长与20多名士兵。

这2名直接动手的大队长，先不说拿了多少钱，他们以谋杀皇帝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时都相当从容。而他们手下的士兵以及以团结闻名的近卫军团其他士兵，都未有任何反抗举动。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士兵被金钱引诱了。

卡西乌斯·卡瑞亚既是刺杀卡利古拉的主谋之一，也是两个实际动手人之一。查阅史书，我们发现，公元14年，即27年前，卡西乌斯·卡瑞亚正是当时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中的一名百人队队长。

公元14年，正是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的同一年，皇位更迭使

得当时的士兵以为提高待遇的机会来临了，从而掀起了哗变，这是莱茵河军营最为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点我在提比略的章节里已经叙述过，年仅2岁的卡利古拉可以说是间接帮助父亲镇压了暴动。时任百人队队长的卡西乌斯·卡瑞亚手执利剑保护日耳曼军团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一家，英勇地挡在哗变士兵们面前。

罗马帝国的百人队队长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中队长，他们一般指挥80名士兵，有“罗马军团的脊梁”的称号。然而，在罗马的军队编制中，他们只是下级士官，军官的资历通常从指挥800名士兵的大队长开始计算。贵族子弟或者同当权派沾亲带故之人，他们入伍后经过一段适应期就可以直接晋升大队长一职。犹太人，比如权威人士斐洛的孩子，也可以跳过百人队队长，直接担任大队长。因此，一位军团长或大队长，如果他曾经担任百人队队长，那么就可以确定他在军队之中是从底层爬上来，是有真才实学的。

通常，从17岁志愿入伍开始，没有身家背景的普通人要到30岁左右才能晋升到百人队队长。如果公元14年卡瑞亚30岁上下，那么到公元41年，他应该55岁多了。就摸爬滚打慢慢晋升的普通士兵而言，55岁多担任近卫军大队长，算是职位晋升得比较顺利的了。另外，近卫军团士兵服满16年可以退役，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普通士兵，大队长一级的将领不在范围之内。所以，50多岁依然是现役军人，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只是，60岁以上的一般都退役了，除非担任军团长。

公元14年到41年之间，没有任何关于卡西乌斯·卡瑞亚的线索。然而，从公元14年到16年的两年之内，正是令日耳曼8个军团恢复秩序的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渡过莱茵河，同日耳曼民族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刻。军队从春天到秋季进行远征，冬季就回到莱茵河沿岸的营地。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两年内，于暴乱之际声名鹊起的百人队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必定是鞍前马后地追随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冬季不利于作战，士兵们一般都在营地休整。卡利古拉这位被士兵们昵称为“小军靴”的总司令的

儿子，就穿着士兵们特制的幼儿军靴在军营里成长着。

卡西乌斯·卡瑞亚也很有可能参加了公元17年在首都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的凯旋仪式。凯旋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凯旋将军的战功，当然也有慰劳协助将军立下战功的士兵的目的。借着隆重的凯旋仪式，将军和士兵们共同分享无上荣耀。日耳曼尼库斯温和敦厚，他肯定不会忘记在危难关头拔剑护卫自己家人的卡西乌斯·卡瑞亚。凯旋将军有权选择一名士兵同他一道回罗马参加仪式，卡西乌斯·卡瑞亚肯定是最佳人选。

同年秋，卡西乌斯·卡瑞亚大概也追随着日耳曼尼库斯启程前往东方。因为，有许多日耳曼尼库斯亲信的军团长或大队长的名字，出现在被提比略派往东方的随行名单中，让人感到他似乎把莱茵河沿岸的总司令部整个搬到了幼发拉底河。

如若卡西乌斯·卡瑞亚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随行，那么他应该会跟随日耳曼尼库斯、其妻阿格里皮娜以及儿子卡利古拉一同前往埃及。此后，他们从埃及回到叙利亚不久，日耳曼尼库斯病逝，阿格里皮娜怀抱亡夫骨灰，领着7岁的卡利古拉回到本土。这一连串事件发生时，卡西乌斯·卡瑞亚应该都在场。

然而，在这之后，关于卡西乌斯·卡瑞亚的线索又断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进行推测，最少也要具备有用的史书。不难推测，卡西乌斯·卡瑞亚也许是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军营，因为失去总司令的士兵除了军队别无去处。在提比略的励精图治之下，罗马帝国北方的防线最终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而罗马帝国确立防线这种不起眼却非常重要的工作，人才不可或缺，肯定是需要诸如卡西乌斯·卡瑞亚这类出类拔萃而又忠心耿耿的军事专才的。

晋升到近卫军大队长就可以到首都工作，这是每一个士兵都艳羡憧憬的职位。我想，卡西乌斯·卡瑞亚回到首都时应该是“小军靴”卡利古

拉继位之后。而卡西乌斯·卡瑞亚此后的工作就是贴身保护卡利古拉。不论卡利古拉出现在里昂、莱茵河前线基地，还是濒临多佛尔海峡的高卢北部，都应该能发现卡西乌斯·卡瑞亚的身影，这已经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卡西乌斯·卡瑞亚过这样的生活眼看就有4年了。

有流言说，卡利古拉经常笑话没有妻室、一直单身的卡西乌斯·卡瑞亚是同性恋，所以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就是原因，卡西乌斯·卡瑞亚因憎恨卡利古拉而痛下杀手。对皇帝宣誓效忠却施以毒手，只是这种程度的憎恨实在没有说服力。想想卡利古拉性格还不成熟，说是嘲笑，撒娇的成分可能要多一点。况且，卡利古拉自幼丧父，和母亲一起的时间也不长，那么，卡利古拉也许会把与日耳曼尼库斯年龄相仿的卡西乌斯·卡瑞亚当做父亲一样来对待。

然而，我想，皇帝卡利古拉的言行都让忠诚的卡瑞亚感到痛心疾首。当卡西乌斯·卡瑞亚想到年届花甲、退役后只能孤独度日，心中仿佛像父亲大义灭亲杀了不肖子一般，举剑刺向“小军靴”卡利古拉，就像是自家的丑事自家料理一样。

卡西乌斯·卡瑞亚杀了卡利古拉之后，命令手下把吓得躲起来的克劳狄乌斯带回近卫军营区，让士兵们称呼他“皇帝”。虽然，卡利古拉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但克劳狄乌斯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其实他们是一家人。在元老院作出反应之前，卡西乌斯·卡瑞亚已经抢得先机，让生米煮成了熟饭。家长具有很大权力这一观念早已深深植根于罗马人的家庭观念之中，所以卡西乌斯·卡瑞亚才能快速地了结此事。

木已成舟，元老院只好接受，他们迅速同意让克劳狄乌斯继任皇帝，以杀害皇帝的罪名判处卡西乌斯·卡瑞亚死刑时，他一言不发地坦然赴死。而萨比努斯追随卡西乌斯·卡瑞亚自尽身亡。这两个人都指挥着2000名士兵，作为大队长要想说服这些士兵并不是难事。此外，他们是扳倒暴君卡利古拉、让克劳狄乌斯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然而他们从容就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是一开始就以必死的

决心来犯下这滔天之罪的。另外，近卫军团所有士兵每人发放1.5万塞斯特斯赏金，难道不是为了避免士兵们对处死两位大队长的抗议吗？

然而，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只有如下事项：

公元41年1月24曰，皇帝盖乌斯遇刺，妻子与女儿也难逃此劫。

近卫军两位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和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以及少数近卫军士兵是谋杀的主要行动者。没有证据显示元老院议员参与其中。

卡利古拉遇害后没多久，卡利古拉的叔父克劳狄乌斯被人发现，并带回近卫军团营区，接受士兵对这位“皇帝”的欢呼。元老院只好承认这个事实。

卡西乌斯·卡瑞亚和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束手就死，但参与行刺的士兵没有被问罪。而普通罗马民众对卡利古拉之死反应冷淡，无人叫嚣把卡利古拉丢到台伯河中，也无人为卡利古拉流泪。

卡利古拉的遗体被迅速火化后，骨灰并没有安置在皇族墓地奥古斯都陵，而是被葬在了埃斯奎里山庭园的一角，后世人并不清楚具体的埋葬之处。

卡利古拉在世时，要求制造完成后分送帝国各地的他的塑像，目之所及都被毁坏。正因为卡利古拉遇刺后他的塑像立即被捣毁，留存至今的卡利古拉塑像十分稀少。大概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梦魇，罗马人彻底抹去了卡利古拉的一切痕迹。随后，出人意料的50岁新皇帝登基，新的时代来临。

第三章

皇帝克劳狄乌斯

（41年1月24日—54年10月13日在位）

意外继位

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是克劳狄乌斯，他既是提比略的侄子，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卡利古拉的叔父。公元前10年8月1日，克劳狄乌斯出生于今天的法国里昂地区。他的出生地位于法国中北部落后地区，被罗马人称之为“长发高卢”，而非“托加高卢”，即罗马化的（罗马人所谓的文明化）发达的南法高卢地区。其父杜路苏斯时任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此外还担任南法地区之外整个高卢省的总督，作为身兼两职的官员的家眷，理所当然地都住在高卢省的首府卢格登（今里昂）。

正如名字所示，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东尼娅，是马克·安东尼（莎翁的戏剧中则念作马卡斯·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虽然奥古斯都战胜了有意勾结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势力的安东尼，然而奥古斯都却把安东尼的儿女当做是自己的孩子一般，并把他们抚养长大，使得他们都有了栖身之所。奥古斯都将安东尼娅嫁给了他的继子——其妻莉薇娅与前夫所生的一个儿子杜路苏斯。罗马共和体制末期权力斗争的两位主人公，对于皇帝克劳狄乌斯而言都是他的亲人，安东尼是他的外祖父，奥古斯都则是其外祖母的胞弟。

由此可知，克劳狄乌斯的身上也流淌着奥古斯都的血，然而年纪轻轻的卡利古拉之所以能够抢在克劳狄乌斯之前捷足先登，继承皇位，究其原因，并非如古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是因为克劳狄乌斯身体有缺陷所致，而是另有玄机。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我早已提到，在奥古斯都即将逝世的最后几年，所有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皇位继承人都早已不在人世。所以奥古斯都在认提比略做养子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要提比略收养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的要求。虽然提比略也是莉薇娅的儿子，然而，

他在血缘上跟奥古斯都没有一点关系。不过，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与其弟克劳狄乌斯，和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奥古斯都一直坚持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够继承皇位，并希望通过让提比略收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的办法，在提比略死后能够让帝国的皇位再一次回到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手上。然而，由于日耳曼尼库斯的英年早逝，提比略的皇位继承人成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卡利古拉。

这也就意味着，借由养父子关系，皇位从奥古斯都传到提比略再到卡利古拉，都被尤里乌斯家族的男人牢牢把持着。

另一方面，由于克劳狄乌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被奥古斯都的养子提比略认做养子，即他的兄长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所以克劳狄乌斯成了从共和制时代以来就是名门望族的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留存下来的唯一的后代。换言之，克劳狄乌斯不属于尤里乌斯家族，他仍旧还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人。当然，克劳狄乌斯不是没有野心觊觎皇位，只是他没有资格而已。

由于克劳狄乌斯不是尤里乌斯家族成员，基于这个原因使得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生前都没有承认过克劳狄乌斯是皇位继承人之一。此前，奥古斯都一直坚持皇位必须保留在尤里乌斯家族的男性手中，而提比略也恪守奥古斯都的遗旨，所以他们甚至从未将克劳狄乌斯纳入皇位继承人考虑范围，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然而，卡利古拉在位才短短4年时间，这一事实将奥古斯都的计划全盘打乱，加之尤里乌斯家族之中已经没有男性来继承皇位。只有让一个人继承皇位才能避免重返共和制，从而继续维持罗马的元首制。近卫军大队长卡瑞亚曾向卡利古拉发过肝脑涂地的尽忠誓言，所以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较为牢固的观念，那就是皇位继承人必须流淌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液。即使克劳狄乌斯不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然而他的母亲与外祖母始终与奥古斯都是血脉相连的。

继承皇位的克劳狄乌斯，正式的全名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从克劳狄乌斯的全名不难看出，提比略是名，而克劳狄乌斯是家族名，至于恺撒与奥古斯都则是后来所有的皇帝都要继承的头衔，因此可以称其为“皇帝名”，而拥有“日耳曼霸主”意思的日耳曼尼库斯则是他父亲杜路苏斯的昵称，这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称霸非洲的西庇阿”）中的阿非利加努斯意义相同，这在古代被称为家族名。在罗马，家族名是可以在子孙后代中世代继承的，所以与现在的姓氏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与卡利古拉都拥有家族名“尤里乌斯”，然而克劳狄乌斯并没有尤里乌斯这一名称，他以“克劳狄乌斯”作为家族名称。基于恺撒描绘的帝国蓝图，由奥古斯都拉开序幕的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这一段历史中，从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开始，到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以及第五位皇帝尼禄，这段时期前后长达一个世纪。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意指在出身于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皇帝们统治下的时期。这是因为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卡利古拉都属于尤里乌斯家族，而克劳狄乌斯以及被他收做养子的尼禄则是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这两个大家族并不是没有关联。提比略本来就出身于克劳狄乌斯家族，而不论是克劳狄乌斯还是尼禄则各自的母亲都与奥古斯都血脉相连。“尤里乌斯王朝时期”与“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为何没有分开，而是统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的原因就在于此。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从罗马建国初期开始就一直是名门望族。

在此，我为何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说明两个家族的联系呢？原因在于罗马的君主专制正是凭借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正当性，才能保证罗马帝国政权的延续。

能让被统治者认同被统治的理由，是建立在所谓统治者正当性的基

础之上的。总统和首相通过直接选举中的得票数，或者是间接投票方式的国会记名投票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在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的罗马元首制时代，要继位称帝，就要征得元老院和公民的认可。言外之意，即使是在元首制时期，罗马人仍然把统治的正当性放在重要的位置。理由是再简单不过的，不管是在何种政治体制下，如果被统治阶层不给予一致支持的话，就无法执政。从这一方面可以说“一致支持”就是“认可”的意思。

奥古斯都也正是考虑到政局的稳定才拘泥于必须要由血亲来继承皇位的。卡利古拉遭遇刺杀这种震惊朝野的事件刚过去没多久，克劳狄乌斯虽不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人，然而他和奥古斯都血脉相连，才使得克劳狄乌斯出人意料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皇位。这也说明了由奥古斯都开辟的元首制体系，在历经70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一致认可，否则就算近卫军先斩后奏拥立克劳狄乌斯为帝这件事做得再滴水不漏，克劳狄乌斯的执政期也不可能有13年那么长。

历史学家皇帝

即便是在“健全的精神存在于健全的身体之中”的主流观念支配着当时罗马帝国之时，罗马人还是接受了一个身体上有着明显缺陷的人成为他们的新领袖。

克劳狄乌斯大概因为年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他总是拖着右腿走路。由于身体的不均衡，总不能保持左右平衡。也许是因为无法进行日常锻炼，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弱不禁风。克劳狄乌斯走起路来两膝不住地发抖，步履艰难。此外，他还有不停地摇头、一紧张就会口吃的毛病。克劳狄乌斯的身高也低于平均水平，体态不佳，脑袋不大，倒三角脸，尖下巴，三条深深的皱纹刻在狭窄的额头之上。

若非要评价一下他的外表，只能说虽五官俱全，然而组合出来的是残次品。可能稍微注重一下自己的仪表就会使自己的心情变得高兴一点，然而从不缺钱来打扮自己的克劳狄乌斯对此毫不在意。

如此不修边幅的克劳狄乌斯不被皇室的女性们所仰慕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克劳狄乌斯23岁时去世的奥古斯都一直很看重他的优点，对亲戚间的关系不是很看重的提比略虽然没有给克劳狄乌斯特殊照顾，然而也没有亏待过他。不过，兄长日耳曼尼库斯倒是克劳狄乌斯最大的保护者。

罗马帝国扣留了许多盟国皇室成员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对于这些小孩而言，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皇室成员一起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官邸中长大，在相同的屋檐下玩耍，是友好的玩伴与同学。虽然是作为人质来到罗马的，然而除了不能随便回到祖国外，王子们依旧是王子，这就同英国殖民地贵族阶层的子弟留学英国或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留学美国的性质一样。只是，这些小孩子出乎意料地喜欢恶作剧，而克劳狄乌斯这样有身体缺陷的小伙伴往往成为他们欺负的对象，但克劳狄乌斯年长5岁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一直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欺凌。日耳曼尼库斯不仅深受奥古斯都疼爱，而罗马帝国的女性们也对他仰慕不已，他还是一个极富责任感的人。在他看来，弟弟在1岁时丧父，此外还身有残疾，作为兄长要好好保护弟弟才行。克劳狄乌斯正是在兄长的庇护之下，才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童年和青春期。或许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才能在继位称帝之后，在罗马帝国施政方面诠释了“不健全的身躯也可以孕育出健全的精神”这一理念。

即使是在克劳狄乌斯长大成人之后，奥古斯都以及提比略都从未考虑过对他委以任何军职和官职，反倒默许他从事于他从小就热爱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克劳狄乌斯若非卡利古拉遇难之后继承皇位，可能终生都会与“历史”为伍。

据传克劳狄乌斯的历史学研究与写作的指导老师，正是晚年的提图

斯·李维。

我已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参考文献中对提图斯·李维作了详细的介绍：

>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从32岁开始一次10册地撰写出版《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在他一生中，一共发行了142卷，这些著作又被罗马人赞誉为罗马历史研究的金字塔。这部《罗马史》记述了罗马开国到公元前9年的史实，只是大部分在中世纪时遗失了，现存的部分不到原书的三分之一，这使罗马史研究者扼腕叹息。

李维与构架起希腊历史金字塔的希腊人修昔底德一样，都出生在动荡的年代，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关注历史。当然，关怀“人性”正是关注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理解为怀旧情怀。生在乱世自会要比生在太平盛世的人更关心人们的种种行为背后的人性。尤其是极具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而又置身官场之外的人，更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李维10岁——尤里乌斯·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内战随即爆发。

11岁——由庞培率领大军，即主张罗马维持共和制的元老院派，与由恺撒率领的反对共和制的反元老院派在希腊法萨卢斯平原大战。被恺撒打败的庞培在逃亡埃及时被杀害。

12岁——恺撒就任罗马独裁官。

13岁——恺撒开始清除庞培余党，并将战火烧到北非，并在塔普苏斯战役又一次取得胜利。拥护共和制的小加图自杀而亡。

14岁——恺撒取得了西班牙孟达会战的胜利，给拥护共和制一派致命一击。

15岁——恺撒出任终身独裁官，真正意义上的元首制开始了。3月15日，以布鲁图为首的14名元老院成员在元老院会场内将恺撒谋杀。

16岁——由于形势日下，策划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逃亡到希腊，并打算与恺撒派的安东尼和屋大维一决生死。在首都罗马，共和制先驱西塞罗遭到杀害。

17岁——恺撒的反对派和恺撒派在希腊的腓立比荒野上激战，最终恺撒派获胜，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战败自杀。

随后，恺撒派（反元老院体制派）发生内讧，一分为二，分为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个派别，权力争夺战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李维28岁时的亚克兴角海战之后才成定局。次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自杀身亡，一时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权倾朝野。

32岁——更名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宣布要恢复共和制。然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奥古斯都要确立元首制耍的第一个花招而已。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生，公元14年卒。李维公元前59年生，公元17年卒。虽然皇帝和历史学家所处的立场截然不同，一个是时代的参与者，一个是时代的观察者，然而可谓同属一个时代。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直至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李维都亲眼见证了。

共142卷的《罗马史》记载了从罗马帝国的建立到公元前9年间共744年的历史。作者李维生活的那一段历史，即记载了由共和制转变为元首制时期的历史的那部分只遗留下了零星记载，这让研究罗马史的历史学家们十分惋惜。虽然李维生于奥古斯都时代，他却是一位共和制的拥护者。如果这些史书能保存下来的话，我们就能从共和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奥古斯都是如何在向众人宣布恢复共和制之后瞒天过海，然后又将共和制转为元首制的。

据说奥古斯都在这142卷书还保存完整时就通读了这些书，并称李维是“庞培的拥护者”。虽然言语间戏谑了李维，这位建立起元首制的元勋奥古斯都却从未考虑过将这位庞培支持者所写的书打为禁书。提倡发行共和制先驱西塞罗的全集也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克劳狄乌斯虽然和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掌门人兼皇帝的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然而即使是他在青年时期师从“庞培支持者”，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丑闻。

在读了克劳狄乌斯被推上皇位之前，即他50岁前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之后，不难看出他深受李维的影响，这不由得让我透露出一丝苦笑。

最初，克劳狄乌斯撰有《伊特鲁里亚史》，篇幅长达20多卷。之后又撰有《迦太基史》，共8卷。对于罗马而言，《伊特鲁里亚史》描写了在罗马建国初期伊特鲁里亚人从称霸意大利中部，再一点点遭受罗马帝国的侵略直至完全被罗马侵占同化的历程。《迦太基史》记录了迦太基民族与正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在经过3次布匿战争之后，最终臣服于罗马的史实。虽然这两个民族与罗马的斗争史各不相同，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战败国。虽然克劳狄乌斯生在胜利者一方的罗马帝国，然而在他全身心扑在记录历史的时期，他关心的却是战败国的历史。

克劳狄乌斯写的另一本书是关于失败政治家西塞罗的传记，通篇都能看出他在为西塞罗辩解。也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也可能是作为这部传记的延续，克劳狄乌斯开始着手写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书，也就是记录恺撒遇害、动乱再次发生的时代的历史事件。克劳狄乌斯原本打算要给描述这段历史的书起名为《内战记》，然而受到母亲安东尼娅的忠告，他在写到第2卷的时候就没再写下去了。因为内乱时期的主角不管是安东尼还是奥古斯都，大多数人都是克劳狄乌斯的血亲，他和局外人李维的立场终究是不一样的。一直都喜欢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克劳狄乌斯，似乎是出于好意要把布鲁图和安东尼好的地方记录下来。安东尼娅虽是安东尼的女儿，但出于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的考

虑，她极力劝阻儿子克劳狄乌斯不要写这样一本书。

克劳狄乌斯虽然不能再接着写《内战记》来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无法放弃对当时历史的关心，他写成了全书共41卷的《和平记》。既然这是一本记录和平时代的书，那么就应该是描写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式和平。因为罗马在此之前并不能称之为“和平”。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由罗马皇帝亲手写的历史书可谓是一级史书，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史书全部遗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根据流传下来的克劳狄乌斯写的演讲稿与碑文，学者们推测他学识渊博，调查也做得很详细，只是他的文章缺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闪光点和深刻的意境。学者们都认为正因为后人把他的作品当做“学者的文章”来对待，才致使他的书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想来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尽管克劳狄乌斯没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史书，然而对克劳狄乌斯而言，潜心钻研历史和写作的前半生，对他继承皇位之后帮助良多。在他被推上皇位之前，除了卡利古拉心血来潮地委任他当了几个月的执政官外，他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务上的经验。克劳狄乌斯从书中学到的知识积累到50岁时，在应对一切都是陌生的事物时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这也意味着罗马帝国产生了一位历史家皇帝。

执政之初

公元41年1月24日下午1点，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利古拉遇刺身亡，不足4年的卡利古拉政权便戛然谢幕。

行刺卡利古拉的凶手与主谋，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和他的同谋在刺杀成功后做的第一件事，没有去占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也没有像刺杀恺撒的布鲁图和他的同谋们一样退守到卡匹托尔山上，更没有盘踞在最高神祇朱庇特神殿证明这是他们的正义行为。卡瑞亚率领

一队士兵找到因害怕而躲起来的克劳狄乌斯（表面上是拥立，实际上就是挟持），将他带回位于首都罗马东北方向的近卫军军营。

这是因为，虽然是两名大队长率领的20个左右的手下人犯下行刺皇帝的滔天大罪，但是，他们仍然期待其余7个大队长和麾下的士兵，尚有1万名左右的近卫军士兵能够拥护他们。近卫军所谓的“拥护”，是指皇帝换成了别人，他们支持的依旧是元首制。即卡利古拉的取代者，必须和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换皇帝不改政体才是行刺者卡瑞亚心中的真实意图。

正是为了对抗唯一有可能会反对继续实行元首制的元老院，卡瑞亚才把克劳狄乌斯当做人质，带回近卫军军营。

一般而言，人质有两种用处：一种是恐吓。即如果对方违抗自己的意愿，那就杀死手中的人质。另一种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利用人质号召世人归顺，用以分离消灭反对势力。

克劳狄乌斯既不是罗马名门望族的族长，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只不过是一位专注于记录历史的50岁老人，就算他被杀了，对于元老院而言也是无关痛痒的。显而易见，卡瑞亚抓了克劳狄乌斯做人质自然是企图挟天子以令天下。在卡利古拉遇刺后，一直支持元老院的首都警卫队听闻近卫军纷纷拥立克劳狄乌斯时，当下见风使舵，转而拥立克劳狄乌斯。如此一来，9个大队近1万人的近卫军与3个大队的首都警卫近3000人的支持方向就确定了，这就意味着首都罗马，意大利本土所有的军事力量都站在了维护元首制的旗帜之下。

拥护共和制派在卡利古拉遭到刺杀之后，立即抓住时机，在元老院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的他们，原本就是少数派，现在又见大势已去，除了保持沉默别无他法。不过若是就如此屈服在近卫军之下，元老院就会威严扫地，更何况如若元老院让近卫军的傀儡当上皇帝，罗马的前途也会更让人担心。

元老院立即展开了行动。1月24日晚上，派出两位护民官做代表与身在近卫军军营的克劳狄乌斯会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直接听听克劳狄乌斯对时局的看法。

两位使者带来的元老院信函中有以下两项内容：

（一）若克劳狄乌斯愿意当回平民，那么就将不追究其当天的行为。

（二）若想要成为“第一公民”，克劳狄乌斯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同。

从信函的第二项中就可以看出，其实元老院心中已经认同了继续在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

虽然是被强行推上帝位的，然而克劳狄乌斯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他向使者表明，虽然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第一公民”，然而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就会迎难而上。

当然，克劳狄乌斯绝不是突发对权力的渴望。对罗马精英分子影响至深的哲学，既非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也不是苏格拉底哲学，而是希腊哲学的后起之秀——斯多亚学派哲学。斯多亚学派反对封闭式的城市国家，宣扬世界国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奉献公众是精英们的责任，这恰巧是罗马精英们的抱负。作为出身于精英阶层的人，几乎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来探索人性、钻研历史与写作的克劳狄乌斯，在面对意料之外的皇位时，心中奉献大众的想法油然而生。此时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

就在当晚，元老院一致通过了将卡利古拉拥有的一切权力赋予克劳狄乌斯的决议：“第一公民”称号、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可无条件动用否决权的护民官特权、罗马宗教中地位最高的大祭司，此外，继承恺撒

与奥古斯都这两个名字的权力。也即只有“皇帝”才能享有这些权力，承认了克劳狄乌斯的地位。大概是元老院在被年轻的卡利古拉折腾过之后，50岁的克劳狄乌斯更让人放心吧。

既然要继续实行元首制，就不能让行刺皇帝的人逍遥法外。克劳狄乌斯继位之后，做的头件事就是追究刺杀卡利古拉的人。不过克劳狄乌斯下达的只是处决大队长卡瑞亚的命令，而由于另一位大队长萨比努斯的名声没有卡瑞亚响亮，克劳狄乌斯似乎是想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至于参与谋杀卡利古拉的另外20余名士兵，念在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行刺，最终宽大处理，不问责作罢。

虽是卡瑞亚亲手杀死了“小军靴”，但他在没有牵连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坦然接受了死刑。大概是卡瑞亚在亲眼见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克劳狄乌斯继位后，觉得用自己的死来终结暴君的统治，是死得其所。同谋萨比努斯虽然免于死刑，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去追随卡瑞亚。这或许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战友情谊。随着两位主谋都以死告终，行刺卡利古拉一事也算是处理完毕了。

以下内容已重申多次，就连我都有点想跳过去不再多说了，然而这一点又刚好极其重要，无奈之下只好再啰嗦一遍。

即使是罗马采取元首制时代之后，SPQR，即“罗马元老院和公民”，是权力的根源这一点从未改变。皇帝的统治权是由元老院以及罗马公民这些“有权者”赋予的。所以，罗马皇帝可以开始行使统治权的标志，不是举办加冕大典，而是得到元老院和公民的许可。

罗马是一个地跨欧洲、中东、近东以及北非的庞大帝国，受到通讯不发达等落后条件的影响，“有权者”反映他们的意见是有局限性的，即能反映自己意见的“有权者”实在少之又少。如果举行民意调查以了解皇帝的支持率的话，反映的也不过是元老院、首都罗马市民以及本土意大利居民的“意向”而已。

拥有罗马公民权是成为“有权者”的必备条件，如此一来，行省人民就不能称之为“有权者”，也就没有委任他人统治自己的资格。然而从被统治者角度出发，行省人民与罗马公民有着相同的地位。此外，行省人民的人口10倍于罗马公民，他们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像小孩一样听任使唤。因此，也曾发生过行省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动与起义。罗马中央政府赋予行省人民控告行省总督实行暴政的权利，所以行省人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发言。

如果当时罗马帝国有民意调查这个东西，并且对行省人民进行民意调查的话，在首都和本土支持率极低的提比略在行省的支持率肯定会高得离谱。不过对于历代皇帝而言，意大利本土与首都罗马的支持率，就足以反映出民众对他们的拥戴程度。

除因宗教原因，犹太人不能称呼恺撒和奥古斯都为“神君”外，备受罗马公民和各行省人民拥戴的这两位皇帝都一直被他们视为“神君”。而其后的提比略与卡利古拉两人，前者为了顾全整个帝国的利益，不惜牺牲首都罗马人民的支持，以致得到的评价极其糟糕。而后者则太过重视首都人民的支持，最后引发财政崩溃，直至葬送了自己。

克劳狄乌斯下定决心当皇帝之后，在他的脑袋里面，早已把罗马建国以来的罗马历史，被罗马人引为前车之鉴的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历史，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创造的希腊历史，也就是先祖们的历史反复加以借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克劳狄乌斯关心历史就等于不一味地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众人的创造力，即他并不认为“个人创造历史”，而是相信“人类创造历史”。所以他并不觉得借鉴先人的例子是一件羞愧的事。先人当中，恺撒和奥古斯都更是被他引为执政的榜样。

然而，克劳狄乌斯在元老院宣誓时，他提到的效仿对象只有奥古斯都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恺撒。这是因为他宣誓的对象是元老院。恺撒虽然保留了元老院，却一直都在打压元老院提倡的以寡头治理为特色的共和制。相反，奥古斯都则宣誓要恢复共和制，并始终做出尊

重元老院参政权力的姿态，尽管这只是他用来巩固自己政权的幌子。他甚至表示要恢复奥古斯都的施政模式，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元老院会造反了。

提比略不仅是一个口碑极差的皇帝，在隐居到卡普里岛之后仍旧不放手帝国的统治权，在政治上更是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对于这样一位先皇，克劳狄乌斯当然是只字不提。

尽管克劳狄乌斯没有对外表示要把恺撒和提比略当做自己的摄政榜样，但很明显，他的统治模式还是受到了这两人极大的影响。尤其在财政管理和行省的治理上，他很有提比略之遗风。这是因为，若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话，唯有遵循提比略的治世之道。

确立了相同的目标，然而左右过程的却是当事人的能力高低。克劳狄乌斯踌躇满志，也有实现壮志的决心，然而他缺少领导人应当具备的某些特质。

50岁的克劳狄乌斯在罗马人眼中正处于成熟的巅峰，但他执政之初的表现十分平庸。到他宣布要恢复奥古斯都的治世方式为止，一切都还顺畅。然而接下来，他提倡恢复罗马自古以来着装的优良传统，落实的第一步，就是提议将其法规化。

“罗马公民应随时穿着托加。”

放到现代社会，也只有流行歌手才会穿着奇装异服，而先帝卡利古拉却时常衣着怪异，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克劳狄乌斯的用意。在《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里所介绍的，托加是一种庄重威严的服装，并不适合日常穿着。平日要保持威严仪态的元老院议员和律师另当别论，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当中，是有无产阶级存在的，穿着托加他们还怎么工作呢？元老院的议员虽然能理解要求人们穿托加的用意，但不觉得有必要为此立法。当身着托加的他们从新皇帝口中听到这个要求

时，出于礼貌，虽然没有发出轻蔑的爆笑，但还是不禁面露冷笑。

第一次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满堂的爆笑使克劳狄乌斯不再镇定，他开始结巴。一结巴就拼命想把话讲好，结果嘴角堆满了唾沫。向来不注重仪表的克劳狄乌斯似乎没有发现，一直没有把唾沫处理掉，结果唾沫就变成了口水从嘴角流出。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克劳狄乌斯的首次演讲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画上了句号。

尽管如此，克劳狄乌斯的执政生涯并没有戛然而止。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克劳狄乌斯奉献大众的意愿坚定，丝毫没有因为第一次公开演讲的失败而受到打击。

其二，克劳狄乌斯很走运。元老院中的少数议员，在目睹了克劳狄乌斯的丑态之后，更激发了他们要为新皇帝鞠躬尽瘁的情怀。这部分议员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举足轻重、富有才华的人。他们深知推行元首制才是罗马帝国的治世之道，所以愿意倾尽全力辅佐新皇帝。这一派议员的代表人物，就是提比略起用的人才之一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即克劳狄乌斯拥有可以沿用提比略提拔的人才这一优势，这一点无疑是克劳狄乌斯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助推力。

重树威望

克劳狄乌斯执政的当务之急，是重树因不足4年的卡利古拉统治而对元首制失望的民众的信任。

克劳狄乌斯宣布，不再执行“反叛国家罪”的刑罚。由于这条法律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所以他没有废除它，而是下令保留这条法律，但不再执行。克劳狄乌斯还批准因这条法律被流放的人回国。

包括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卡利古拉的两个妹妹在内的许多流放犯人，都借此赦免机会回到意大利本土。这两个人中的小阿格里皮娜丝毫没有流放外岛的憔悴模样，反倒是神采奕奕地回到了本土。追求生活的舒适是罗马人的天性，哪怕是被流放到偏远之地也不例外。早在流放小阿格里皮娜之时，提比略就命人在岛上修建储水池，为了能使她在因暴雨天气不能出海的日子也能吃到鲜鱼，还挖了大鱼塘，用引流进来的海水养鱼。当时正值26岁的小阿格里皮娜是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后来她当上了克劳狄乌斯的皇后，最后成了罗马帝国下一任皇帝尼禄的母后。在历史上，为了便于区分同名的她与她的母亲，称她为“小阿格里皮娜”。小阿格里皮娜在岛上过了一年的流放生活，回到本土的她已经成了一位游泳健将。

“反叛国家罪”这条法律的行使对象大多数是元老院的议员门，新皇帝宣布不再执行它，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除此之外，克劳狄乌斯又推行了一系列深受元老院欢迎的政策。

克劳狄乌斯效仿提比略时代，将选举执政官等罗马帝国中央政府要职的场所，从公民大会移回到了元老院。议员们为此省去了为竞选经费头疼的烦恼，自然表示欢迎。可是克劳狄乌斯引用提比略的施政方式也就到此为止。他不仅没有禁止选举活动中的各项娱乐，还采用褒奖的形式，鼓励以皇帝为首的富裕阶层对活动进行赞助，民众因将选举地移回到元老院而产生的不满也因此得到了纾解。然而，克劳狄乌斯的政策转换，应该是个人喜好的成分大于政治目的。与向来厌恶各种娱乐的提比略刚好是两个极端，克劳狄乌斯对这些活动乐此不疲。有些看起来一板一眼的学者，却热衷于拳击或职业摔跤，克劳狄乌斯就属于这类人。

此外，克劳狄乌斯比谁都明白他的任务，就是收拾卡利古拉留下的烂摊子。

首先，克劳狄乌斯必须重整因卡利古拉奢侈淫逸而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当然，他从没想过要用增加赋税的方式恢复财政，可能是为了避

免同提比略一样被世人诟病，也没有采用提比略削减财政支出这种办法。身为史学家的克劳狄乌斯深知罗马的惯例，领导者最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重视公共利益，进行基础建设。

克劳狄乌斯用卡利古拉所缺乏的坚定的意志，重新启动卡利古拉开工但未完成的两条大规模水利工程。工程承包商们没有了卡利古拉时代经费不到位的顾虑，一心扑在了工程上。尤里乌斯·恺撒有两大规划：其一，就是将罗马的奥斯提亚海港建设成整个地中海地区一流的港口；其二，抽干意大利中部的富基努斯湖的湖水，把它开垦成良田。只是恺撒的后继皇帝没一个人去实行。而克劳狄乌斯又向这两大公共事业工程发起了挑战。

大家都很怀疑，不靠增加税收、也不靠削减财政支出就能重建财政的可行性。然而克劳狄乌斯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的根据不是专业的经济知识，而是常识。

一、重新征收被卡利古拉废止的1%的营业税。

规定征收这个税金的是奥古斯都，克劳狄乌斯既然表示要效仿他的执政方式，恢复这个税收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世上是没有让人乐意的税收的，就算是神君制定的税收也不例外。卡利古拉为了得民心，废除了这项税收，现在要重新征收，大家的感受就如同被征收新税一样。为了平息大家的不满，克劳狄乌斯就宣布免征卡利古拉时代征收的燃料税等各项杂税。这么一来，税收体制同卡利古拉时代以前的税收一样，少而精。克劳狄乌斯的税收制度比卡利古拉时代以前更加精简。

二、不削减必要的经费开支，不必要的开支一项不留。

这么一来，没有了以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笔支出。大家认为举办戏剧表演、杂技表演、竞技赛、剑术比赛是必要支出，所以照常举行。相反，为了省下维修费用，克劳狄乌斯在卡利古拉时建造的、用来从埃及

搬运25米长方尖碑的大船上装满石头，沉到海底给奥斯提亚海港工程的堤坝做基石。

克劳狄乌斯从不注重仪表，当然对住所也毫不挑剔。没有人会愿意住到奥古斯都那简陋的住所去，提比略就在帕拉蒂尼山上盖了新居，只是在他隐退到卡普里岛之后便停止了施工，完成这个建筑的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就住到了那个房子里。尽管不是新的宫殿，但对于假公济私没有任何想法的他而言已经足够了。

光靠这些举措，不禁让人怀疑重整财政的效果，然而事实是，这些举措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提比略是在公元14年继位的，那时他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紧缩财政政策。而克劳狄乌斯继位，是公元41年。在这不到30年的太平盛世里，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增长。

罗马的税收制度采取的是百分比征收法，而非固定税。如征1%的营业税、5%的遗产税、5%的关税、10%的行省税、25%东方进口奢侈品税。克劳狄乌斯继位之后，包括整个罗马帝国的大经济圈已经开始运转，财政的恢复只要靠自然的税收增加就能达到。

依靠税收的自然增长来构架财政稳定，税收收入渠道就得畅通。如果放任征税者的违法行为的话，管道就会堵塞。克劳狄乌斯身为罗马帝国皇帝，如果在大众面前过度抛头露面一定会惹来物议，然而为了保证税收渠道的透明公正，克劳狄乌斯不顾这些，他热衷于参加法院的审判。通常而言，他会把杀人和偷盗案件交给别人处理，对于税收，他清楚公正的税收是实施仁政的根基，是值得皇帝用心去监督的。在这一点上，克劳狄乌斯和提比略如出一辙。

卡利古拉留下的第二个烂摊子，就是在他在位的短短4年时间内，萌生了一系列外交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北非的毛里塔尼亚王国的问

题；其次是犹太问题；最后才是卡利古拉在多佛尔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又撤回罗马，从而引发的不列颠问题。

北非

毛里塔尼亚问题是罗马帝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在北非一带，还牵扯到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稳定，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卡利古拉杀死了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却没有安排代替他的人选，这种草率的行为造成了曾是忠诚同盟国的毛里塔尼亚王国的反叛。面对如此局面，他只好用军队镇压叛乱。克劳狄乌斯根本没有想过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这与其说是不把毛里塔尼亚放在眼里，倒不如说罗马是绝对不会跟反罗马的国家和平谈判的。如对方有任何异议，罗马允许对方派使节团来罗马上表，然而如果对方不上表，企图用武力反抗罗马的话，罗马方面就会诉诸武力。这就是罗马的态度。由卡利古拉留下的毛里塔尼亚叛乱的烂摊子，克劳狄乌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摆平了。此后，这个地区也是以“帝国主义”之名被统治，即以非常罗马化的方式进行统治。

借着便于管理叛乱之地的理由，原毛里塔尼亚王国被罗马帝国分为“毛里塔尼亚·汀吉塔纳”（摩洛哥首都塔吉尔的毛里塔尼亚）与“毛里塔尼亚·恺撒恩西斯”（舍尔歇的毛里塔尼亚）这两个地区。当然这两个地区都是罗马的行省。前者的首府是塔吉里（今日的塔吉尔），后者的首府是恺撒利亚（如今的名称是阿拉伯语的舍尔歇）。

克劳狄乌斯指派罗马官员出任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并在治理上沿用尤里乌斯·恺撒在北非的治理方法。围绕建设殖民城市这一核心，克劳狄乌斯将大量的退伍军人和罗马公民志愿者输送到这两个地区，在这些

城市之间建造罗马式的道路网来振兴产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地区以东的原努米底亚王国的努米底亚行省、原迦太基的阿非利加行省，还有在克里特岛长官管辖之下的昔兰尼加行省在内的北非西部全境和这两个行省，后来的小麦出口量，达到了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之多。

毛里塔尼亚被分割之后的北非

前文中曾叙述过，埃及供应给罗马的小麦占了罗马进口小麦量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个比例是克劳狄乌斯重新开发北非西部全境后得出的数字。在此之前，出口到罗马的埃及产小麦占的份额比现在的更高。对于以小麦为粮食，却主要靠进口小麦的国家而言，单由一个地区供应粮食的话，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北非地区能够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以后，加上出产量几乎等于整个罗马本土小麦产量的西西里岛，罗马等于有了3条生命线。

这里的北非，实际上指的是以向南方延伸的沙漠为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不过这一带的罗马化进程不只停留在产业振兴的层面上，人才的挖掘和提升经济实力有着必然的联系。不仅是发展经济，负得起

守护刚起步的经济责任的人才也是紧缺的。换言之，对有军事才华的人而言，这将是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同时还急需能保证经济和军事顺利进行的行政方面的人才。这种人才需求，促进了迦太基裔的居民融入罗马帝国体系之内。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罗马所灭。罗马经过3年的攻城战，终于将其首都攻陷，并在城中撒满了海盐，使其成为一块不毛之地。公元前46年，尤里乌斯·恺撒重新兴建这座曾是地中海地区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并用迦太基这个曾使罗马人难以忘怀的宿敌之名来命名。90年之后，仍旧是罗马行省的迦太基经济再度复苏，但它早已是农业大国和贸易强国。取得这些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克劳狄乌斯的这种“帝国统治方式”。甚至在150年后，这里还诞生了另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

犹太问题

犹太问题是卡利古拉留下的另一个烂摊子。由于犹太问题是多地区问题，他们包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居民，以及在亚历山大等城市和希腊人混居的犹太人。应对这些依旧抵制罗马化的犹太人，克劳狄乌斯采用了特殊问题特殊解决的方式。对于前者，克劳狄乌斯引用奥古斯都的犹太人管理方式；对于后者，他则用提比略的统治办法。

事隔35年之后，克劳狄乌斯决定，再次任用犹太人做国王来统治居住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聚居的犹太人。这就如同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不是由总公司的人担任，而是聘请当地人担任。被委以统治犹太人重任的是希律王家族的一位成员。他的名字在西方被读做尤里乌斯·阿格里帕，犹太人则读做希律·阿格里帕。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尽管这对罗马而言有好有坏。希律·阿格里帕幼年曾在罗马当过人质，他既是卡利古拉的玩伴，与克劳狄乌斯交情也非常深厚。

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王子，始终没有得到提比略的信任。如果提比略有让尤里乌斯·阿格里帕王子做犹太国王的打算的话，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然而一直没有提拔他，是因为提比略觉得这个人不是值得依靠的盟友。一直待在“象牙塔”活到50岁的克劳狄乌斯就与之不同，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在此，顺便提一下，卡利古拉与犹太人有过武力冲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他打算打造与其相仿的朱庇特神像强行竖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神殿中。然而，这起冲突在卡利古拉死后烟消云散。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拖延不从之后，使得卡利古拉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在任期满后，这位总督回到了罗马。

然而，住在亚历山大地区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日益恶化，犹太人方面甚至出动了以哲学家斐洛为首的使团直接向克劳狄乌斯告状。克劳狄乌斯针对这个问题则贯彻了提比略的策略，也即罗马做中间人出面调停，但对两边都不偏袒。

克劳狄乌斯继承皇位不久之后，就发出了一封题为《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的公文，罗马皇帝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单从题目就能有所了解。

这份公文的诉求对象，既不是住在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也不是住在此地的犹太人，而是“亚历山大公民”，这当然是有深意的。它表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的所有希腊人居民和犹太人居民，都应该摈除民族偏见，把自己当做“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分子。这也表明，产业和贸易之都亚历山大的繁荣发展与当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齐心协力密不可分，为此，罗马也誓将竭尽全力地调停此事。简明扼要而言，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若哪一方心存不满，在向对方发泄之前，应该先来罗马这边告状。不过克劳狄乌斯也承认，要让两个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都不同的民族同心协力，要看他们是否有包容精神。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他都希望他们相互包容。

实际行动就是，取消了应该给在3年前的暴乱放火事件中资产蒙受损失的犹太人的赔偿。因为如果理赔的话，要对犹太人进行赔偿的就是加害者希腊人，如果这样处理，可能会再次引发暴乱。

然而，对遭受损失的犹太人居民，克劳狄乌斯再次确认了提比略对他们做的所有承诺：

（一）犹太人拥有把亚历山大的5个区中的2个区作为居住区的权利。

（二）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每年给耶路撒冷大神殿捐款。

（三）赋予犹太人居住区裁决权，然而死刑必须得到埃及行省长官的许可。

（四）周六为安息日。

（五）免除军役等差役。

既然贯彻了提比略的做法，就等于承认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等与罗马相同的办法，即犹太人与希腊人在商业上享有平等权利。然而，第5项是罗马考虑到犹太教的特殊性特许的。由于罗马方面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希腊人居民就以一种“不得不如此”的别扭心情包容了这件事。

罗马帝国的沙漠中常有强盗出没，红海地区则苦于海盗猖狂，驱逐这些不法之徒，维护和平是拥有霸权的罗马帝国职责所在。在埃及，驻扎着以两个罗马人为军团长率领的、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组成的军团。

然而罗马军队是由主力军团兵和人数相同的辅助兵组成的，罗马方面积极地征用当地人任辅助兵。事实上，在维护埃及和平的重任中起了

至关重要作用的希腊人与埃及人辅助兵团，其小队长和中队长指挥层大多数是希腊人与埃及人。对于在商业上享有和自己同等权利，却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理由，不用为维护和平出力的犹太人，希腊人心中愤愤不平。用现代的说法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在希腊人眼中是“躲在别人的保护伞下”的懦夫。将地中海地区分而治之，会导致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相互仇视情绪，单靠理解包容来消除这种敌视心理，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

虽然矛盾重重，克劳狄乌斯还是以公开的方式表明立场，亚历山大城终于平静如常了。希腊人和犹太人最终承认自己是“亚历山大居民”的事实，这倒不是得益于克劳狄乌斯的劝解，而是他们屈服在克劳狄乌斯在公文最后表露出来的威胁语气。世事，通情达理的人永远都是少数，对于剩下的大多数，威胁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当多数人都屈服于强大军事力量的压力之下时，通情达理的少数派即刻会占据上风，这就是威胁的优点。克劳狄乌斯在公文《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信》的最后写道：

> 罗马“第一公民”今后是否还会推行以体谅大家为出发点的政策，就看各位的表现了。

克劳狄乌斯新官上任后立即就烧的犹太问题这把火，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然而这期间克劳狄乌斯还是犯了看人不准的错误。正如提比略生前看准的一样，希律·阿格里帕极具野心，他是不会满足于罗马同盟国君主这个位置的。不能疏忽对这位犹太王行动的监视，成了邻国叙利亚行省总督的大事。

希律·阿格里帕管辖的领土基本上就是奥古斯都认可的希律大王时代的领土范围，不过可能是仗着自己和克劳狄乌斯私交甚密，加上克劳狄乌斯生性懦弱，希律·阿格里帕一定是觉得自己在耶路撒冷可以为所欲为了。希律大王去世后，奥古斯都曾下令禁止修建城墙将耶路撒冷的街道围起来，阿格里帕却无视此法规，修起城墙来。叙利亚总督得知此

事后，不得不以坚决的态度在克劳狄乌斯面前告了阿格里帕一状。

希律·阿格里帕要调整政策，他要招集罗马帝国东方各属国的国王来开会。这消息又被叙利亚总督汇报给了克劳狄乌斯。在克劳狄乌斯严厉的警告之下，这个计划最终流产。罗马跟这些东方列国单独地结为盟国，因为这些国家是罗马和其最大的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罗马更不可能让这些国家之间形成同盟关系。

虽然中间也经历了一些坎坷，然而“以夷制夷”式的犹太民族统治，还是进行得十分顺畅。希律·阿格里帕在位3年后去世，这对于克劳狄乌斯而言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是玫瑰又是毒药的有才的希律·阿格里帕，不再是罗马帝国的威胁；忧的是，希律·阿格里帕的儿子年幼，不能继承皇位，所以他将不得不放弃由犹太人统治犹太人的治理方法。

经过公元41年到44年3年的犹太王统治之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地区又重新回到以前罗马直接管辖的管理方式之下。即皇帝委任的摄政长官，在直接上司叙利亚总督的监督下治理犹太人。

克劳狄乌斯既然遵从提比略时期对犹太人的管理体制，那么实质性的东西也要按照提比略的做法来办。在犹太地区，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是容易让人联想到统治者罗马帝国，就都尽可能地清除掉。执政官驻地在恺撒利亚，军营也驻扎在那里。雕塑和军旗都一律禁止带入耶路撒冷，以避免皇帝的塑像可能被说成是搞偶像崇拜。

在历任执政官当中，当然也不乏无知鲁莽的长官，也导致了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然而，历来有中东地区“火药桶”之称的巴勒斯坦地区，在此之后还是享有了20年的和平。自从希律大王去世后，犹太便被纳入罗马帝国直接管辖之下。如若从公元6年开始算起的话，尽管是被异教徒的罗马人统治着，犹太人度过了60年的太平日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远征不列颠

不列颠问题，是卡利古拉留下的最后一个烂摊子。这倒也不是仅仅因为卡利古拉在多佛尔海峡边搞军事演习，结果还没出海就撤了军，所以不列颠人才不愿意善罢甘休。不列颠问题在50年前奥古斯都时期，还没有那么迫切。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就演变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了，这才是克劳狄乌斯远征不列颠的理由。

英国当时被罗马人称为不列塔尼亚，这是根据不列颠英语发音而来的。不列颠正如国名的由来一样，这一点与国土的四分之三自始至终都在罗马帝国境外的德意志不同，英国有过被罗马征服的历史。引用英国学者最喜欢的说法，就是正因为不列颠曾经被罗马统治过，所以不列颠人不是日耳曼（德国）人一样的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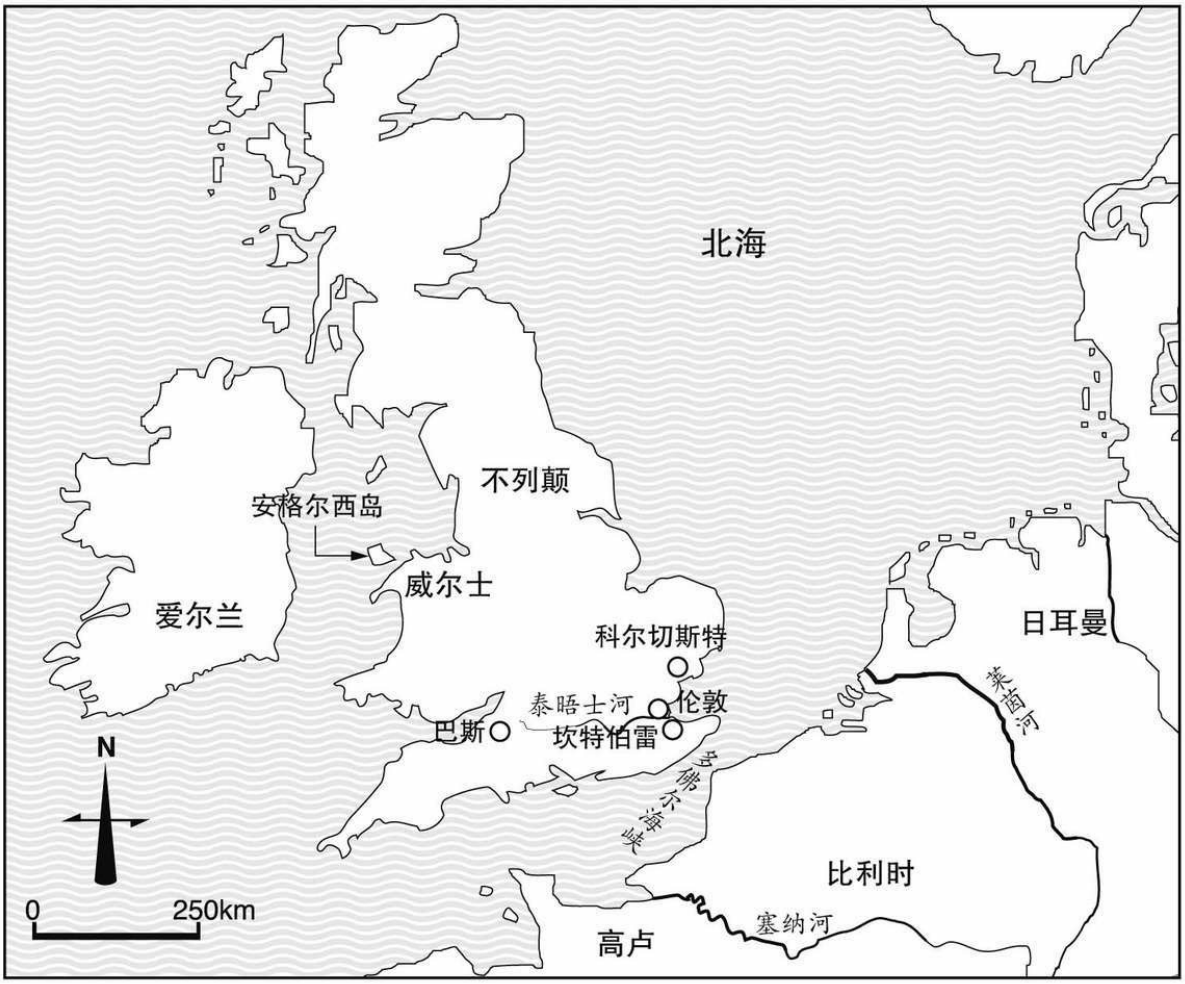
不列颠分别在公元前55年和次年与罗马有过两次交锋，这都是尤里乌斯·恺撒率领罗马军团远征不列颠时期的事了，距克劳狄乌斯时代已有百年历史。

当时恺撒的出发点不是征服不列颠。对于称霸整个高卢地区的恺撒而言，他要做的只是阻止反对罗马的高卢人渡过多佛尔海峡逃往不列颠。此外，属于高卢人的卑尔根（比利时）人也大量迁徙到不列颠。所以恺撒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高卢人中的反对派和高卢东北部的高卢人、高卢后裔的不列颠人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罗马帝国。

与此同时，恺撒作出了要横渡莱茵河攻打日耳曼人的决定。恺撒最初攻打不列颠人的出发点就和攻打日耳曼民族一样，是想借此举牵制敌人，而不是想称霸。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恺撒还是想征服不列颠，因为与一直向东延伸的日耳曼不同，不列颠是一个岛国。

当时，恺撒的战略是很有效果的，整个高卢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部、德国西部与瑞士）都臣服于罗马霸权

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奥古斯都时代，在他统治的40余年间，罗马对高卢地区的掌控地位更加稳固了，况且不列颠人也始终没有威胁罗马帝国的霸权。多佛尔海峡对岸的不列颠肯特地区的百姓，与高卢地区被罗马征服之前一样，还是和高卢百姓保持着贸易往来。面对这样的局势，奥古斯都当然没有必要出兵去攻打不惹麻烦的不列颠。



不列颠

到了提比略时代，罗马和不列颠之间依旧保持着间接来往。然而虽然当时两国之间的来往，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暗地里却风起云涌。

被罗马人称做高卢人的凯尔特人，在现代有凯尔特人（希腊语）与高卢人（拉丁文）两个称呼。他们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叫凯尔特，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则被叫做高卢。而没有被罗马人纳入统治体系之下的爱尔兰人，罗马人也把他们称为凯尔特人。德鲁伊特教是凯尔特人信奉的民族宗教，这种宗教有专门的祭司阶层，该民族的宗教、司法、教育都被他们掌管着，他们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高卢民族的各部落领袖。即使凯尔

特人信奉多神教，但从宗教与信众的关系方面来看，与一神教的犹太教是相似的。罗马人没有专门的祭司，因为在他们看来，司法、教育和军事本该是人类能够独立思考才产生的，所以，凯尔特人设置祭司的做法自然无法被他们所接受。此外，用活人祭祀是凯尔特人宗教习俗之一，虽然罗马人深受埃特鲁斯坎民族的影响，然而凯尔特人的活人祭祀根本不能为罗马人所容忍。罗马人之所以厌恶迦太基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习惯杀掉小孩来当做祭祀用品。

被征服之后的高卢人的德鲁伊特教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打压，只是以往受祭司影响的范围被罗马人日益挤压。

罗马公民权被尤里乌斯·恺撒授予屈服于自己之下的高卢各部落的酋长。罗马承认公民权的世袭性，因此，不论哪一个民族或部落成为罗马公民，都必须严格按照罗马法律行事。

如此一来，酋长虽然是高卢的上层阶层，然而在法律上，他们的地位和罗马人是平等的。不过，这些部落的支配权就与他们被征服之前类似，仍旧被该部落的酋长们把持着。所以，即使部落酋长统治下的人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事实上也得严格按照罗马法律行事，这种支配其他民族的方法，实在是现实主义的罗马人绝妙的统治策略。结果，德鲁伊特教祭司手中原本掌握的影响力和司法权也日渐丧失殆尽。

奥古斯都在高卢中部的比布拉克特（靠近现在的欧坦）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之后，祭司们原来垄断的教育权也日益弱化了。今后有望成为部落首领的青少年便从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学习希腊与罗马的课程。他们中若有想继续深造的，也有渠道前往罗马或雅典留学。

这样一来，祭司们手中就仅仅剩下了初级教育了。然而，部落酋长们痴迷于争取罗马公民权，年轻人热衷于想参加罗马军队的辅助兵，商人迫切地想与罗马开展贸易，也即这些高卢人掀起了一股拉丁文学习风潮。祭司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给凯尔特人灌输自古以来传统的教育，

其教育的施教内容变成了实用的读写加减运算。不过，读和写的内容还是拉丁文，计算也使用拉丁数字，要是祭司们能够将自己的存在定位于宗教层面的话，他们或许还能存活在高卢下层阶层，然而危机意识逼着他们走向了绝境，最终，他们开始反抗罗马帝国以求得生存。

高卢地区德鲁伊特教祭司们最后的反抗即是发生在提比略统治初期的叛乱，叛乱爆发后不久就被镇压了。由于欧坦的学生们也参与了这起叛乱，这当然引起了皇帝提比略的高度重视。最终，他以此次叛乱破坏了社会稳定为由，将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驱逐出高卢地区。被驱逐的祭司们便逃到了罗马人管辖外的不列颠。虽然不列颠与高卢地区只有一道狭窄的海峡隔着，但他们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把这里变成凯尔特人宗教的根据地。如若克劳狄乌斯放任这些祭司们的行为不管，恐会给统治高卢地区带来意想不到的阻力。于是，在与尤里乌斯·恺撒远征不列颠时隔一个世纪后，克劳迪乌斯再次远征不列颠。这就是此次远征不列颠的来龙去脉。

延续奥古斯都的政治是提比略与克劳狄乌斯继位表明的首个态度。提比略甚至还宣示，对他而言，奥古斯都式的执政方式就是法律。当然，这并不代表他要全部照搬照抄奥古斯都的执政方式。毕竟他们都是罗马人，认为法律应该服务于人，而不像犹太人认为的那样，认为人应当适应法律。言外之意，克劳狄乌斯认为“法律”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修订。

奥古斯都去世后，掌握统治权的提比略将奥古斯都生前征服日耳曼的毕生梦想束之高阁，而克劳狄乌斯则违背了奥古斯都不得再扩张领土的遗训，一心要称霸不列颠。只是，他们两人肯定不觉得自己没有遵守奥古斯都的政治策略。因为他们俩一直都是遵循奥古斯都要以保全帝国防线为首位的基本方针。

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卡利古拉将罗马军队集结到多佛尔海峡边的时候，心里在盘算什么呢？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

这是卡利古拉一时心血来潮，于是就把这个历史事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可是事实上，卡利古拉并不是疯子，智商也不低。当时导致卡利古拉计划落空的原因，在于他浪费无度致使国库亏空。而克劳狄乌斯之所以能远征不列颠，是因为他做出这个举动是在他继位后的第二年，这也是卡利古拉财政改革后，显露出效果的一段时期。所以我推测卡利古拉最终功亏一篑是受制于财政问题。

另外，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年前的公元42年，不列颠各个部落中最强大部落的国王克诺贝利努斯在多年的励精图治之后，与世长辞。这位国王的领地首府，是在罗马人统治后叫做伦迪尼姆（现在的伦敦）的东北方约100公里外的卡姆洛杜努姆（现在的科尔切斯特）。克诺贝利努斯的去世，动摇了太平盛世的不列颠。他的弟弟和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兵戎相见。争夺皇位的战火甚至烧到了一个争夺者的领地——当时被称为卑尔根沿岸的高卢东北海岸。

罗马与小领地领主之间是“保护”关系，即罗马是保护者，这些领主则是被保护者，保护者有帮助被保护者的义务，被保护者则要服从保护者。这就是所谓的罗马式相互安全防卫体系。既然牵扯到了高卢地区，就算是其东北部，也是在罗马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罗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兵不列颠了。

克劳狄乌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当然明白这种事要交给军事专家负责。被委以不列颠远征军总司令的是和克劳狄乌斯同岁的奥尔斯·布劳迪斯将军。在此之前，他是潘诺尼亚的总督，因出色地逐步完成了确立多瑙河防卫线这项困难的工作而声名远播。

布劳迪斯分派到的兵力共有4个军团的2.4万名士兵加上高卢地区、莱茵河以及出生于西日耳曼和西班牙的辅助兵，总共4万名的精锐士兵。恺撒在97年前第二次出兵不列颠时的兵力，是5个军团3万名士兵加上2000名辅助兵共3.2万人。两相比较，两次出兵数量不相上下，目的却完全不同。恺撒出兵是为了打击敌人，牵制他们。而克劳狄乌斯出兵

是为了征服。恺撒当初发动的高卢战役也是以征服为出发点的，然而那时他只有4个军团，所以他下令，要在开战之前重新编制出2个军团。历经8年之久的高卢战役就是靠这10个军团6万名士兵们才得以胜利完成的。

在发动远征时，采用何种征服策略的决定权在最高司令官。枭雄恺撒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一决雌雄的策略，而文将克劳狄乌斯则是采用保证在不被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投入兵力，慢慢征服的战术。结果，幅员辽阔的高卢虽是不列颠国土面积的3倍以上，然而高卢战役还有战后处理才花了8年时间，不列颠战役却前前后后延续了20年的时间。

克劳狄乌斯采用这样的战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没有军事经验。当时的罗马与恺撒时代的罗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克劳狄乌斯不得不把军队都派遣去驻守边防。所谓的“保证在不被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投入兵力”，他能调遣的兵力也就只有4个军团，即克劳狄乌斯只能靠4个精锐军团征服不列颠，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当然不敢贸然行动。

首先，克劳狄乌斯从前线总司令布劳迪斯以前任职的潘诺尼亚抽调1个军团到前线，这么一来，驻守多瑙河防线的部队就由7个军团削减到6个军团。

随后克劳狄乌斯又下令，要从驻守莱茵河的8个军团里调遣3个军团前往前线。这样一下子调走了3个军团，剩下的5个军团面对日耳曼恐怕难以保护罗马帝国。于是他又下令重新编制2个军团，加入到驻守莱茵河的军团中。克劳狄乌斯作出这样的调遣，是因为出征不列颠的主力必须是精锐部队。他也是不得已才想出这样的办法。

虽然打得很艰难，然而克劳狄乌斯用只比奥古斯都当时调用的25个军团，外加2个军团的兵力，就把不列颠的国土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征服不列颠后，就得占用3个军团长期驻守当地。这样一来，莱茵河与

多瑙河这两条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上，就各自少了1个军团。在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上，克劳狄乌斯严守提比略的防御方式，所以即使少了1个军团，防御任务也足以完成。这也说明，能够进行如此调配都要归功于提比略皇帝建立的防御系统。

布劳迪斯率领的4万人的罗马军顺利地横渡多佛尔海峡，并从不列颠东南部顺利登陆。不列颠人的武装和战略与恺撒时代并没有多大改变。总司令布劳迪斯决定先攻打克诺贝利努斯两个儿子驻守的科尔切斯特，因为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能攻下不列颠最强大的部落，那之后征服其他部落就势如破竹了。

在泰晤士河南边，双方打响了第一场正面交锋。最后罗马军大获全胜，不过罗马军没有立即渡过泰晤士河乘胜追击。他们在原地等候从罗马赶来的皇帝克劳狄乌斯。

元老院中理解和支持克劳狄乌斯的少数派中，有一位威望很高的议员维特里乌斯。皇帝委任他代理国事后，他就经海路到达马赛，在高卢登陆后，又顺道去了其出生地里昂游览，最后才慢条斯理地抵达在泰晤士河边恭候圣驾的罗马军营。克诺贝利努斯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泰晤士河南畔的战役中阵亡，一个落荒而逃到威尔士地区。所以簇拥着皇帝的军队，在渡过泰晤士河直到科尔切斯特，这一路上，就如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军队一路长驱直入，顺利占领科尔切斯特。

克劳狄乌斯在科尔切斯特制定了一系列不列颠行省化的基本政策。其实，目前罗马征服的也不过是不列颠的一小片地区。不过，皇帝只管拟定基本政策，至于如何执行那就是军队将领们的职责了，更何况不列颠行省化的基本策略和其他行省是大同小异的。让退役的士兵们迁移到当地建设殖民城市，给予原住民地区“区域自治权”。再以殖民城市为中心，用罗马式的道路网将整个区域联结起来，这就是罗马治理各个行省的基本路线。于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退役士兵移民至科尔切斯特，建

设殖民城市这一计划就这样定案了。

克劳狄乌斯在定出这些决策之后，就打道回国，将剩下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将军们。他离开首都长达6个月，然而待在不列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6天。

回到罗马的克劳狄乌斯，获悉元老院要为他举行凯旋仪式。既然是正规的凯旋仪式，那身为凯旋将军的克劳狄乌斯就不得不驾驭由4匹白马拉的战车，然而从克劳狄乌斯的身板来看估计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后可能是让随从驾战车，他则坐在战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吧。

元老院又赋予克劳狄乌斯唯一的儿子使用寓意“称霸不列颠之英雄”的“不列塔尼库斯”称谓权，尽管不列塔尼库斯当时只是3岁的幼儿。

布劳迪斯在克劳狄乌斯回国之后，立刻率领罗马军队，全面展开了称霸不列颠的战役。强将手下无弱兵，抑或是英雄惜英雄，布劳迪斯的手下个个骁勇善战，他手下的军团长之一韦斯帕芗，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人称霸不列颠的战略是从科尔切斯特所在的埃塞克斯地区一直向北推进到诺福克。在占领这一带后，罗马军又将战线转移到泰晤士河南畔。罗马军在南畔把坎特伯里、伦敦、巴斯连成一条包围线，开始了称霸不列颠的第二波攻击。罗马人自古喜爱温泉，当罗马士兵在巴斯（罗马时代又称其为亚奎·索利斯）发现温泉时，他们简直高兴得发了疯。虽然历史学家塔西佗没有提及，然而从意大利来的人对不列颠的印象就是“天上地下都是水”。到了现在，由于终年潮湿，即使是现在意大利生产的鞋子到了英国，不出几天就会坏掉。可以说巴斯的温泉使这些被迫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罗马人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公元47年，即不列颠战役打响后的第四年，总司令布劳迪斯让位于后继者，功成身退回到罗马。克劳狄乌斯和元老院商议决定让这位大功

臣以骑马代替战车的简化方式列队游行，庆祝他的凯旋。布劳迪斯离任后，不列颠战役的战线扩展到了威尔士地区。罗马人称为摩纳岛的安格尔西，这一地区大体上与威尔士地区接壤，也正是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当年逃亡后的聚居地。然而，直到下一任皇帝尼禄继位，才把反罗马的祭司们完全从英格兰和威尔士驱逐至爱尔兰。

秘书官体系

对历史现象进行大的区分的话，可分为著名历史事件和非著名历史事件。时髦一点的讲法就是看这件事有没有成为新闻。然而，正如企业不能光靠召开记者发布会就能壮大企业一样，维系帝国运行也绝不能像历史纪年表中列好的事情那样去做，不然一定会走向灭亡。由此看来，维持帝国运行的，绝大部分靠的是那些被称为“行政”的不起眼的工作。也许有人就会认为，既然这样，那就把“行政”上的事交给手下的将军、总督或长官去做不就得了？话虽如此，但总得需要有人下达命令指挥他们行事。比如，“殖民城市”建在哪里？哪一座土著居民城市要赋予他们“区域自治权”？罗马式“高速路”要通往哪些行省？等等，这些决策不属于行政范畴，而是政治上的事。因此，被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委以治理帝国重任的“第一公民”，就不得不负起下达决策的重任。

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疆土囊括了中欧、西欧、中东地区、近东地区以及北非。如此辽阔的疆域，就算是日常事务，工作量也多到难以计数。辛苦不算，由于没什么新闻价值，这些接连不断的工作还没有回报。所以对于负责人而言，相当高的觉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很难持之以恒，有始有终。

恰好，在意外继位之前用了50年岁月研究历史和写作的克劳狄乌斯，很明白这些没有新闻价值工作的重要性。他做过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除了远征不列颠之外，其他就没有了。在莱茵河防卫线上，他也只

是贯彻了驻守的原则，还有对于另一条防卫线多瑙河，他也只是完善了防御系统。然而，与奥古斯都同门的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相比而言，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缺少他们所具备的贵族特有的骄傲。这位老实本分的皇帝，诚心诚意地想得到元老院的帮助。在征求元老院就审判体系法制化意见的会议上，他这样讲道：

> 我提出的这项改革草案，要成为法律之前，必须得到各位的同意。在此，我希望各位能够独立认真地斟酌后再决定。如果有不赞同这项草案的，请提出代替方案。要是拟定代替方案需要时间，也可以以后再行商量。
>
> 各位议员，为什么要各位提意见呢？假设元老院首席议员给我的草案提意见，各位议员不经思考就表示“同意”，走出议事厅后却说“我已经提过意见了”的话，这实在是元老院不应该有的做法。

克劳狄乌斯刚继位时遭到元老院议员的冷笑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克劳狄乌斯早已经习惯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说话也不再结巴了，加之像维特里乌斯这样愿为皇帝肝脑涂地的议员也越来越多。不过，就算是皇帝钦点要立法的法案成为国家法律，也需元老院一致通过才行。无论是“终身独裁者”的恺撒还是对外一直自称“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抑或是隐退到卡普里岛仍抓着政权不放的提比略，都严守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可以说是罗马元首制的根基。这么说来，从决定国家政策这一点来看，身为国家政策的最高负责人，皇帝作出的决定等要称做政治的话，那么身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所做的工作也同样能称做是政治了。如果这就是罗马元首制的话，那么要让这体制有效地运作，就需要一个能够正确忠诚地执行皇帝和元老院决策的机关，即在皇帝和元老院之间需要一个新的职能部门。

帝国的运营随着元首制时代的推进日益复杂化。面对这样的局势，

如果想要保持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就要设立不同职能的职能部门。

提比略隐居的卡普里岛上，不论是在皇帝的别墅附近，还是在离其别墅较远的地方，都修建了多处规模很大的官邸，今天来看这些古迹，可以得知虽然隐退了但还掌握实权的提比略，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部门系统。只不过他向来行事低调，所以至今也无法得知这些官邸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

作为提比略的外甥，克劳狄乌斯却是习惯公开行事的人，所以他将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秘书官体系对外公开。

然而，罗马当时并没有培养官员的机构，就连产生官员的社会阶层都不存在。如果要问在这样的现实当中也能充分发挥职能的是何种组织的话，答案肯定是罗马社会中有钱而又有影响力的家庭。

在罗马严格地遵守各司其职原则的奴隶、称之为“解放奴隶”的原奴隶阶层是怎样支撑着罗马有权有势的家庭的，这是没有奴隶的罗马家庭不能想象的。用人中地位最高的人被称为“玛尤尔朵姆斯”（Major Domestic），是意大利语中“执事”一词的来源。能做到这个职位的一般都是解放奴隶。罗马人会让用人的孩子做自己孩子的伴读，这也是出于维系用人体系的必要而产生的，这也不难看出罗马人物尽其用的理念。

年近50岁的克劳狄乌斯会成为皇帝，这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所以他身边自然也就没有党羽和谋士。又由于身体上的残疾，更没有人对他心怀敬意。当上皇帝的克劳狄乌斯不仅结巴还淌口水，要想找到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朝堂助手，就得从家中的用人中培养。皇宫好似首相的官邸，克劳狄乌斯家中优秀的奴隶和解放奴隶构建成了秘书官系统，打理着官邸上下。当时优秀的原奴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希腊人构成的。

单就听到“纳鲁奇索斯”、“帕拉斯”这样的名字，就知道他们不是希腊的自由公民，而是少年俊朗奴隶的称呼。这些奴隶要么与主人克劳狄

乌斯同龄，要么略小几岁。所以，50岁左右的纳鲁奇索斯是个当官的好手，这对于重用他的克劳狄乌斯来说十分放心。这些原本是奴隶的官员主要有以下职责：

“阿贝厄皮斯托尼斯”（ab epistulis），从字面上来看是“信件官”的意思，用罗马官方语言拉丁文或是帝国东部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的所有奏折，都要先汇集到这里。他们负责拆信、阅读、研究商讨，然后写上自己的意见，再将奏折呈给皇帝定夺。如果遇到发布公告或是临时法律的情况，就将拟稿的工作交给“学术部”，再将“学术部”写好的文件公布。如果要制定永久性法律，就以皇帝立法的形式提出，请求元老院表决。

字面上来看，“ab epistulis”虽是“信件官”的意思，然而研究罗马历史的学者一致认为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内阁秘书长。放到由政治家出任内阁秘书长的日本，信件官相当于最高幕僚的内阁副秘书长。

克劳狄乌斯委任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家里的解放奴隶阶层的用人之一，纳鲁奇索斯。

纳鲁奇索斯因为工作需要，见克劳狄乌斯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帮克劳狄乌斯安排行程，除了他的家人，如果没有跟纳鲁奇索斯预约，就不能见克劳狄乌斯。

“阿拉特沃尼普斯”（a rationibus），直译过来就是“财务部”，这个部门的职能就同现代的一样，负责一切财务上的工作，克劳狄乌斯任命解放奴隶阶层出身的帕拉斯为部长，在他下面根据每一项税收分别设科室。有负责征收元老院行省的行省税收科、皇帝行省的行省税收科，负责收取5%的奴隶解放税科、遗产税科、营业税科，以及负责皇帝私人领土埃及的征税的税收科等等。每个科室的科长都出身于被称为“解放奴隶”的原奴隶阶层，他们的手下也都是奴隶。

“阿里贝里斯”（alibelis），直译的话只能说是“信访部”，实际上就是负责受理全国各地寄给皇帝的请愿书和陈情表的部门，克劳狄乌斯让家中的用人，原奴隶阶层的卡里斯杜斯担任部长。送来的任何请愿书，都要经过卡里斯杜斯的把关才会送达克劳狄乌斯手中，只要卡里斯杜斯认为没有上达给皇帝的必要，克劳狄乌斯就不会得知此信的内容。克劳狄乌斯和卡里斯杜斯会就信件内容一起商讨对策，再将决定下达给相关部门。

“苏贝斯库特沃恩”（Subscription），直译过来就是“记录部”。他们负责把皇帝对请愿和陈情的批复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阿可格里恩贝斯”（a cognitionibus），是“知识部”，其实就是“档案部”。负责整理克劳狄乌斯手边的所有文件，以备用得着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司法类文件更是反映出了克劳狄乌斯对司法的重视程度——整齐到可以和法务部的文件室媲美。

“阿斯土迪斯”（astudiis），是学术部，正好反映出克劳狄乌斯喜欢钻研的特性，煞是有趣。但事实上，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协助皇帝作研究，而是以皇帝的名义拟写书面布告。演讲的讲稿虽然是自认为颇有学识的皇帝自己写，然而像是要刻在大理石碑、花岗岩或是铜碑上的碑文，就得靠聪明能干的奴隶们出马了。

上述的几个部门就是克劳狄乌斯设置的秘书官系统的基本构成。能够让皇帝的工作富有效率正是设立这个系统的目的。不仅如此，这个系统还能分担帝国最高统治者肩上的重担，这对于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克劳狄乌斯而言，无疑是福音。这个秘书官系统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虽然克劳狄乌斯出生于法国里昂，然而由于一年之后父亲杜路苏斯在日耳曼这块土地上去世，他也就随母亲安东尼娅回到了首都罗马。从那时起到他50岁，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政治与军

事，所以他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都不曾有机会踏出意大利本土一步。可能他的活动圈不过也就是罗马到那不勒斯的这个范围，或许他对意大利北部和那不勒斯以南的意大利一无所知。在当上皇帝之后，他也仅离开本土一次。在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口乘船抵达法国的马赛，上岸走旱路横穿高卢地区，然后渡过多佛尔海峡抵达不列颠。历时6个月的外出，可以说是克劳狄乌斯此生仅有的行省之行。不过，虽然克劳狄乌斯没有在多个行省的生活经验，然而作为皇帝的他，行事都是以整个帝国为出发点的。

得益于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发起的收集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的碑文并将其出版发行的举动，我们这些生于后世的人，才有机会了解罗马皇帝们那些没有被记录在册的政绩。借由这类研究，被只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历史学家们安上罪名的克劳狄乌斯和提比略才得以平反。就只论克劳狄乌斯，在他执政下铺设道路、决定殖民城市、重建同盟国系统、在附属国没有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时将其行省化等等这些举措，都切实地在整个帝国得以推行。自己没有到过的地方，没有亲自视察过的地方，他都能给出切实有效的决策，这都得归功于他50多年积累的书本知识。然而，书本上的知识要经过实践才能上升为认知。在哲学上来讲，所谓的认知，就是依靠理智来探寻事物的本质。说得明白点，发现本质才是最重要的。

多年积累下的知识是克劳狄乌斯拥有的财富，虽然克劳狄乌斯是意外当上皇帝的，然而他一直都不曾放弃个人的意志。在“结合实际”这一点上，克劳狄乌斯就比不过一路实践过来、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缺少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具备的“结合实际”这一特质的克劳狄乌斯，只好寄希望于别人的协助。

要说谁最了解克劳狄乌斯，也最能辅佐好他，当然莫过于首席内阁秘书长纳鲁奇索斯。

然而，任何体系都有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以启用解放奴隶和奴

隶为特色的秘书官体系就有不好的一面。

譬如，将军们在经历数年征战沙场的生活后回归朝堂，要是通不过纳鲁奇索斯这里，根本就不可能面见皇上报告。元老院的议员有事想和皇帝商讨，纳鲁奇索斯就会说“第一公民没时间，有事就和在下说吧”等等。至于负责各行省财务的“皇帝财务官”们的报告对象，则是负责财务的秘书官帕拉斯，而不是克劳狄乌斯本人。

罗马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很大的流动性，然而从上而下大致可以分为元老院、骑士、平民、解放奴隶与奴隶等阶层。

元老院议员自然应划归于元老院阶级，指挥2个军团以上的军团长大多数出身于骑士阶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行省总督则全部是由元老院阶级担任，而皇帝财务官一般由“经济界”的“骑士”担任。这些罗马社会上层人士，不论他们多么地得到皇帝器重，但如若不向奴隶阶级出身的秘书官们低头，就可谓是和皇帝咫尺天涯。

罗马社会上层人士中开始蔓延着不满与愤怒，这些人自认为自己肩负着罗马的未来，他们开始痛恨秘书官群体，特别是被他们称之为“三人圈”的妄自尊大的纳鲁奇索斯、帕拉斯与卡利斯杜斯这三个解放奴隶。除了引发不满与愤怒之外，使用解放奴隶的秘书官体系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

罗马帝国规定，只要有足够的资产和子女的话，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在这种规定之下，解放奴隶在罗马社会商界中取得成功，活跃于地方自治政府中的例子也不鲜见。然而，这群人毕竟是出身于奴隶，没有任何背景。此外，克劳狄乌斯迟早也会退位。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除了依靠自己之外别无选择。正面的作用是，这样的想法可以变成努力上进的原动力。负面的作用是，在罗马社会产生了金钱万能的风气。这群忠于皇帝、能力突出、热心敛财的秘书官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即将公

共事业工程承包出去。秘书官们热衷于以此敛财。克劳狄乌斯不注重自己本身财富的积累，他的亲信们却对此兴致盎然。甚至有传闻称秘书官帕拉斯敛财达到了3亿塞斯特斯之多。而在罗马帝国中，要成为元老院议员，拥有的财产也只不过是100万塞斯特斯罢了。

要这些最高当权者的贴身人物们完全杜绝对社会地位高的人傲慢无礼的态度，或是杜绝利用自己的地位敛财的行为，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人是最经不住诱惑的。不过就算消除不了，也是可以克制的。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执政生涯中并不是没有他人的辅佐，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总是有人在旁辅佐。不过，这几位皇帝拥有能让手下人心存敬畏的才能，这恰好是对左右手无形的牵制。所谓“敬畏”，字典中的意思是“敬重与畏惧”。不仅仅只是让人“敬重”，还得让人“畏惧”。在克劳狄乌斯的性格中，刚好没有能让人敬畏之处。换言之，就是克劳狄乌斯容易被人轻视。结果，原是奴隶的秘书官们觉得在克劳狄乌斯手下可以恣意妄为。不仅仅是秘书官们小瞧他，就连女人也不把克劳狄乌斯放在眼里。

皇后梅莎里娜

克劳狄乌斯在50岁继位之前曾结婚3次，离婚2次。与第一任妻子乌鲁葛妮拉离婚后，与第二任妻子耶利娅·佩蒂娜结婚，婚后二人虽育有一女，但最终还是离婚了。克劳狄乌斯无论是从身材上还是从精神层次上来看，都不是女性倾心的类型。所以离婚应该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估计他是被妻子们抛弃的。虽然身材和精神层次不占优势，不过，当他的伯父提比略和兄长日耳曼尼库斯做了尤里乌斯家族的养子后，克劳狄乌斯自然就成了罗马名门望族中的显贵、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掌门人。做了望族的一家之主以后，自会有女人愿意委身于他，此时身形和精神层次的劣势不再是问题。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小了35岁，是共和制时代的名门梅莎拉家族之女梅莎里娜。

梅莎里娜的外祖母是马克·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女儿，通过她母亲杜米提亚·雷必达这一层关系，梅莎里娜和尤里乌斯家族是有血缘上的联系的。罗马有把父亲的名字女性化给女儿当名字的习惯，如果有两个女儿的话，就让两人共用一个名字。所以，因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热恋而名声大噪的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生的两个女儿都叫安东尼娅。历史学家为了便于区分两人，就在她们名字前面冠上“大”、“小”，称姐姐为“大安东尼娅”，妹妹则叫“小安东尼娅”。梅莎里娜的外祖母是大安东尼娅，小安东尼娅嫁给了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生下了日耳曼尼库斯与克劳狄乌斯。和梅莎里娜结婚的克劳狄乌斯从辈分上来讲，与梅莎里娜的母亲是表姐弟。顺便提一句，大安东尼娅的儿子杜米提亚· 阿赫诺巴尔布斯，也就是梅莎里娜的伯父，后来娶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卡利古拉的妹妹小阿格里皮娜，生下了克劳狄乌斯之后的下一任皇帝——尼禄。

梅莎里娜

梅莎里娜在嫁给年长自己35岁的表舅时，肯定做梦也没想过自己很快就会成为皇后。公元41年，梅莎里娜的丈夫克劳狄乌斯意外继位，本

人没有像卡利古拉那样兴奋异常，然而16岁的梅莎里娜比自己丈夫更加欢喜不已。她的兴奋不仅是来自丈夫的继位，也出于自己身体内流着神君奥古斯都的血。为此，这兴奋被双倍放大。女人比男人更看重血缘关系，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大阿格里皮娜和她的女儿小阿格里皮娜身上也看得见。或许女人要保证自己地位的正当性，就只能依靠血缘关系。后来，皇后梅莎里娜又为苦于膝下只有一女的克劳狄乌斯产下一子，母以子贵，这以后她更是飞扬跋扈。

由奥古斯都设计的皇位世袭制，势必提升生下皇位继承人的女性的地位。如果是因能力出色而被收为养子继承皇位的，那么生母是谁就不再是问题。然而，世袭制这个制度的立足点是重视血缘胜过能力，所以皇家的女人，特别是生下皇位继承人的母亲的地位会提升，正是这个制度的必然性。

此外，我个人还觉得，克劳狄乌斯本身的性格也助长了他妻子的嚣张气焰。

克劳狄乌斯并不是一个能让周围的人产生敬畏之心的人，这一点可以从秘书官系统的运作上看出一个大概。甚至是连解放奴隶出身的秘书官们都不把他当一回事，那么女人们自然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此外，正如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样，克劳狄乌斯不太注意自己家中的事务，倒不是他没有家庭观念，而是克劳狄乌斯在继位之前一心扑在历史研究上，继位后又醉心于国家的治理。他心里想着，家中事务家人自己打理就好。他无法忍受一群女人在他耳边唠叨个不停，所以只要不打扰到他，她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克劳狄乌斯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导致皇后梅莎里娜越来越肆无忌惮。她的虚荣心、物欲和性欲都急速膨胀。不难想象，正是克劳狄乌斯的纵容，才使得她的欲望无限膨胀。

在丈夫克劳狄乌斯的凯旋仪式上，梅莎里娜的虚荣心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公元44年，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不列颠的战事仍然还在进行当中，然而为了庆祝久违的领土扩张传来的捷报，首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

仪式。这让喜欢参加节日的罗马市民狂欢不已。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居然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梅莎里娜的身影。

凯旋仪式是罗马帝国共同体的成员为迎接以武力为共同体创造利益而举行的仪式，当然也是凯旋将军和手下的将士们为感谢神灵庇佑取得胜利而进行的仪式。换言之，只有真正参加过战斗的人才有资格站在游行队列中，就算是队伍中有女人，她们也只能是战俘，那也是献给神灵和众人观赏的战利品。参加罗马凯旋仪式的真正主人公是军队的将领，如同恺撒时代一样，恺撒就让奥古斯都骑马在队伍中前进。又如，奥古斯都让皇位继承人马尔凯斯与提比略在公众面前亮相，驾着4匹马拉的战车，让马尔凯斯与提比略两个年轻人骑马紧随其后。在梅莎里娜之前，从未有过皇后参加凯旋仪式的先例。百姓把这件令众人哗然的事情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19岁的梅莎里娜充耳不闻。她并不是知道丑闻产生的原因但故意装做不知道，而是她根本就不明白所以才视而不见。克劳狄乌斯明明很清楚凯旋仪式的意义，然而这位年轻的妻子在他耳边吵着说连元老院都承认自己生下的儿子可以使用寓意“称霸不列颠之人”的不列塔尼库斯这个名号了等等，估计是经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克劳狄乌斯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不过，克劳狄乌斯也因此背上了连自己无知的妻子都管不住的骂名。

梅莎里娜之所以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并不是因为她出身贫寒。相反，她的父母双方都出身于共和制时代的显赫家族，她的丈夫更是罗马名门望族的后代。只是这位年轻的皇后自幼就铺张浪费，当上皇后之后更是铺张无度。当她的丈夫还是一个虽出身名门但只醉心于学问的人的时候，她的面前就堆满了各式罕见的奇珍异宝。年轻无知的梅莎里娜却没就此满足，物质欲望反而更加膨胀了。

想要得到一个东西，就会不择手段。梅莎里娜只要利用奥古斯都制定的通奸罪，被定罪的人的家产就会被充公到国库，而她则把原本要充公的财物收入囊中。因此遭殃的哲学家塞内加被流放到了科西嘉岛。她

甚至动用叛国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一旦一个人被判了此罪名，那就是死罪一条，抄家也会更彻底。梅莎里娜动用这两条法律，并非是她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为达目的，她如果用通奸罪不能给人定罪，就动用叛国罪置人于死地，简直是无法无天。

在罗马帝国举行的审判中，被告人自己辩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然而，一旦原告是皇帝的话，那么被告人家中的奴隶用人就会人人自危，向他们收集对原告有利的证词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以梅莎里娜的本事，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一个人是根本做不成的。可是她做到了，这无外乎是那些解放奴隶晋升的秘书官在一旁协助。他们熟知家中克劳狄乌斯与其妻子的强弱关系，自然就会为强势的一方效力。还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劳狄乌斯，他那任由她胡来的做法，更是助长了梅莎里娜的气焰。只要妻子不在耳边烦他怎么都可以的克劳狄乌斯，在妻子递上来的诉状上肯定是看也不看就会签字。梅莎里娜的演员情夫被波比娅（尼禄皇帝的岳母，即下一任皇后波比娅·莎宾娜的母亲）抢走，怒火中烧的她用通奸罪逼得波比娅自杀的事件，就是梅莎里娜滥定他人罪名以满足私欲的最好例子。克劳狄乌斯在逼死波比娅的诉状上签字后几日，在宫中宴请群臣。看到没有偕妻子波比娅同来的西庇阿，克劳狄乌斯甚是纳闷，便向西庇阿询问他妻子的去向。西庇阿只答道："她已经死了。"便一言不发。克劳狄乌斯这才隐约想起自己几天前好像在写着"波比娅"的诉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可是克劳狄乌斯对家庭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当梅莎里娜的魔掌伸向德高望重的人物时，元老院和一般百姓开始渐渐意识到了这位年轻皇后的险恶用心。克劳狄乌斯在位的第7年，即公元47年发生的阿吉阿提库斯自杀事件就是使大众看清梅莎里娜真面目的事件之一。

事发当年刚好57岁的法雷里乌斯·阿吉阿提库斯，乍一看他的名字

会误以为他是罗马人，实际上他出身于南法显赫的阿洛普洛格斯部落。虽然当时南法早已经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不过罗马允许这些显赫部落继续存在，所以部落的自主权得以保存。罗马授予了这些部落中的上层阶层罗马公民权，恺撒时代甚至授予这个部落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所以他们已经逐渐融入了罗马社会。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表彰阿洛普洛格斯部落在东方地区军事上的战绩，所以把阿吉阿提库斯赐予他们，成为了法雷里乌斯的家族名，并沿用了下来。法雷里乌斯分别于公元35年和公元46年两次当选为执政官，换言之，法雷里乌斯爬到了罗马帝国中央政府中最高的位置。

法雷里乌斯虽然是行省公民，但不是第一位当上罗马帝国执政官的人。在法雷里乌斯之前，恺撒提拔的西班牙出身的巴尔布斯，在恺撒遇刺后被选为执政官。不过，法雷里乌斯倒是第一个出身于南法行省的执政官。此外，他也不是罗马退伍军人留在殖民城市的后裔，而是罗马人把南法地区纳入统治之下，罗马人口中蛮夷的后裔。不过，罗马人对法雷里乌斯的崇敬已经超越了种族的鸿沟，是一种单纯的对一位为国家出生入死的人的崇敬。这位蛮夷出身的人其实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罗马人了。所以当法雷里乌斯买下卢库鲁斯建的别墅，也即前共和时代一位将军的庭院，并装饰一新时，并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但可惜的是，法雷里乌斯买下的这座被称为罗马最美庭院，同时也被时年22岁的梅莎里娜看中了。为了得到这座庭院，她决定用叛国罪诬告法雷里乌斯。告发的理由肯定是她背后的人教给她的。梅莎里娜这样指控道，法雷里乌斯出身于南法，他的很多亲人都在驻守莱茵河防御前线的辅助军团中担任指挥官，法雷里乌斯和他们企图谋反要篡夺克劳狄乌斯的皇位。克劳狄乌斯没有仔细看控告阿吉阿提库斯的诉状就在逮捕令上签字了。法雷里乌斯要求面见克劳狄乌斯澄清事实。法雷里乌斯在见到克劳狄乌斯之后，条理清楚地陈述了自己无罪的事实，而克劳狄乌斯似乎也认同了他无罪的事实，然而，梅莎里娜根本就不是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女人。克劳狄乌斯不知道受到了梅莎里娜什么样的摆布，结

果，自认为已经洗脱罪名的法雷里乌斯却接到了皇帝劝他自尽的信函。

时年57岁的法雷里乌斯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嘲笑自己居然死在女人的阴谋之下后，随即割腕自杀身亡。就这样，那座庭院就成了梅莎里娜的囊中物。

梅莎里娜同样旺盛的性欲也被历史学家们有所提及。

不知道是她这方面的欲望本身就很强，还是因为丈夫夜里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她才导致她的出轨。历史学家们这样记述道：皇后每晚都会走出皇宫所在的帕拉蒂尼山，到建在山丘附近的大角斗场观众席下面林立的妓院里接客。据说平民聚集的大角斗场下面的妓院里的妓女是全罗马最廉价的，所以客人的素质也是最低的。然而，不管是苏维托尼乌斯、塔西佗还是狄奥·卡西乌斯，写下这些事都是比梅莎里娜晚半世纪以上的历史学家，这种传闻应该只是人们街头巷尾的谈资罢了。

话虽如此，我们也不能断定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克劳狄乌斯每日为政务所困，到吃晚饭的时候都狼吞虎咽，甚至连正式的晚宴上都会昏昏欲睡。所以就算梅莎里娜真的把陌生男人叫到隔壁房间里发生什么，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克劳狄乌斯发现。然而，皇宫毕竟不是不透风的墙，不能不避嫌。况且，贵为皇后委身于下贱之人得到的快感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梅莎里娜是否有这样的癖好不得而知，也无法求证这些流传到后世的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但梅莎里娜自我控制力极差倒是确有其事。然而强调“自制力强的女人没有女人味”的正是男人。

不管事实如何，“梅莎里娜”在现代意大利语中就是无法节制自己性欲、谁都能够去睡的女人的代名词。所以，要是意大利男人说“你就像是梅莎里娜”时，最好知道他绝对不是在夸你像一位皇后那么漂亮。

拜放纵的年轻皇后所赐，从元老院到平民，他们看克劳狄乌斯的眼

神都与以往不同。只有克劳狄乌斯本人却一点都没觉察到。因为从小开始，比起赞誉与尊敬，他更习惯于受到轻蔑与讨厌的目光。况且身为一国之君的他，此时有堆积如山的工作必须要处理。

人口普查

要统治甚至是治理好一个帝国，克劳狄乌斯心里非常清楚，依靠的是细致的工作，也即依靠不会引人注目的工作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对于重视推行切实可行的措施的人而言，就必须正确地把握好当下形势。克劳狄乌斯为了更好地了解帝国当下的情况，决定进行人口普查，这次调查距上一次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举行的人口普查已经过去了34年。由于共和制时代进行人口普查的部门是财政部，所以为了进行这项普查，克劳狄乌斯恢复了自从罗马进入元首制后就被废除的财政部。财务部由两名官员组成，任期至少要一年半，由克劳狄乌斯与一直为他鞍前马后效劳的维特里乌斯亲自担任。

据调查显示，可以服兵役的17岁以上的罗马男性公民达到了5984072人之多，而在公元14年人口普查时，这部分人只有4937000人，在短短34年间，就增加了100多万人。行省的人口增长率高于意大利，这可能是因为克劳狄乌斯制定的政策，即罗马统治下的行省出身的人，只要参加罗马军的辅助兵并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也表明，成年男性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的脊梁”这一群体已经超越了本土的疆界，并逐渐在行省中壮大。

克劳狄乌斯执政期间，除了远征不列颠外，没有进行过其他军事行动，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其实如果他意图要加强军事能力或是用武力扩张罗马帝国版图的话，以他的能耐完全可以做到，而且从当时莱茵河上的防御部署来看，只要克劳狄乌斯有意出兵，是极有可能达成当年奥古斯都想要称霸埃尔维河以内的整个日耳曼地区的夙愿的。不过不得不

说克劳狄乌斯的过人之处正是在于有能力却不举兵征战。

事件的起因是，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民族中，有几个部落趁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交接的空隙，侵入莱茵河西岸。起初罗马军一度处于劣势，不过在刚上任不久的科尔布罗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乘胜追击渡过莱茵河深入敌军腹地。

以铁一般的纪律来要求手下士兵的科尔布罗（出生地好像是南法）在军中却很受爱戴，他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也使他在士兵中威望很高。如果让他带领这个军团去征服日耳曼地区的话，多数人都会觉得称霸整个日耳曼地区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科尔布罗带兵渡过莱茵河追击敌军时，皇帝的亲笔信到了。信中说道，要他在给予敌军以沉重打击后，停止东征，带兵撤回莱茵河驻守。在这一片区，克劳狄乌斯自始至终都恪守提比略的方针。

接到通知的科尔布罗只叹了一声“以前的将军们真幸福”，就整顿好部队，退回到了莱茵河畔的驻地。不过，这位一心想要出征的将军，在日后被派到了东部地区负责前线的防御工事，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转变态度，率先履行比起出征更重视防御这一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由此看来，在罗马，就连一介武夫也很擅长思维的转变。

克劳狄乌斯虽然没有让科尔布罗继续追击，但为了褒奖这位将军的功劳，他同意为科尔布罗举行代表罗马人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

这场凯旋仪式中，还有一位将军也获准参加了，那就是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库尔蒂乌斯·鲁弗斯，不过这不是表彰他在军事上的功绩。

鲁弗斯明白如果只是坐等敌人攻上前来，就难以保证将士们的士气不被磨灭，于是他不仅动员士兵们去开矿，还动员他们去铺设道路等等。让士兵参加土木工程建设，是罗马历来在和平时期最常见的军队使

用方法。

然而，当时矿山的产矿量很低，开矿劳作还很辛苦。厌烦了的士兵们暗中写了一封信给克劳狄乌斯，希望皇帝能同意让鲁弗斯与科尔布罗一同参加凯旋仪式。因为他们想着鲁弗斯参加完凯旋仪式后，可能就会心无憾事，就此解甲归田。

克劳狄乌斯同意这两位将军同时参加简化的凯旋仪式，不过科尔布罗和鲁弗斯没有沉浸于这一荣誉的喜悦中而就此退休，而是更加干劲十足地回到军营中。回到军营的鲁弗斯想用修建工事来贡献国家，就下令士兵们停止挖矿山，转而去挖连接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运河。见到这种情景的士兵们脸上是一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无奈。

杜米提亚·科尔布罗是否是提比略当年提拔的青年将军之一已无从考证，然而库尔蒂乌斯·鲁弗斯确实是那些人才之一。据传鲁弗斯是角斗士出身，被提比略发现提拔后，出任阿非利加行省的财务监察官，之后被召回罗马担任司法官，之后又被派去驻守莱茵河。虽然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他的评价很不好，然而他是一个明确自己的立场、忠诚有实力的人，可以说他是推动罗马帝国前行不可或缺的一个齿轮。

邮政体系

就算一部机器，它的每一个齿轮都品质优良，但也没法保证组合出来的机器效率就会提升，齿轮间良好的磨合度才是高效率的保证。这就好比每天发一班时速500公里的列车，却不如每15分钟发一班时速300公里的列车更能够提升效率。

早在公元前波斯帝国就有了高速公路式的道路，然而把这些道路连成道路网的是罗马人；最初使用邮政的也是波斯皇帝，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邮政网的还是罗马人。

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设立的国营邮政体系称之为“cursus publicus”，直译的话就是“官用信差”。光从字面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是专门为官府传达公文和情报的。要治理庞大的帝国，“官用信差”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共和制时代，书信来往要不就委托私营邮政，要不就差使自家的奴隶去跑一趟。

到了元首制时代，既然罗马帝国创建了官用信差制度，公家的公文和信息就利用官用信差传达，而普通百姓的书信往来就用共和制时代的方法。不过，一开始只是作官府驿道用的罗马式军用道路网，到了后来也准许民间信差使用。

罗马道路每10公里或15公里就会设置一处“mutationes”，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交换所”。交换所之间的间隔因地势而定：山岳地带每10公里设一处，平原地带每15公里设一处。通常交换所里会有备用马匹，有些地方还会有备用信差。平均每隔5个交换所左右，就会设一个名叫“mansions”的“驿站”。在这里，除了像交换所一样换马补给以外，还可以吃饭住宿。另外还有马厩、修马车的人、邮政办事员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在现在看来，“mutationes”相当于是现代的高速公路边的加油站，而高级公寓“mansion”的语源“mansiones”，等同于现代配备有汽车旅馆、餐厅与修理厂等的大型服务区，同时还有提供咨询旅途各种必备资料的作用。

一直坚信“民众最关心的是治安，而维持安定就是维持治安”的第二任皇帝提比略，除了扩展驿道网的覆盖面外，还在各个驿站设置警卫处。这样一来，不管是人们出行还是书信的送达都变得更加安全。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推行的改善邮政政策就是对民间开放国营邮政体系，改变其官府专用的状态。

史书中没有记载克劳狄乌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从他一直想要改善被派去参加自己发起的不列颠远征的将士们的生活环境来看，再考虑到不列颠行省当时正在开发，他可能就想至少要改善邮政体

系，使远在水汽腾腾的不列颠而出生地却是在干燥的意大利的士兵们，能方便快捷地和在本土的家人通信。而当时的不列颠比其罗马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落后。

不过，受到国营邮政的受众拓宽到平民这一措施的冲击，私营邮局举步维艰，私营邮局再度复苏已经是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的事了。

克劳狄乌斯是一个着眼于诸如邮政体制改革等能切实改善民众生活环境的举措的皇帝。他另一个惠民举措就是立法限定辩护费不得超过一定的额度。

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讨厌罗马人，他也不会否认罗马人是法律体系的创始人。熟知辩护重要性的罗马人，自古就有律师活跃于法庭之上。不过当时普遍认为为当事人辩护是上层社会的责任，所以一直是免费提供的。

不过，光靠个人的责任感是无法维系法律系统的。这种贵族捆绑式的免费服务，会使一些有能力但穷困的律师不再接受人们的委托，这最终还是会损害到罗马共同体的利益。加之即使是再完善的体制也会被钻空子，虽然请律师不用辩护费，然而往往要送礼给律师，或是委任人让律师成为遗产赠与对象之一等等，所以实际上还是有偿的。共和制时代末期，罗马最著名的律师西塞罗是出身于农村的骑士阶级，他正是钻了体制的空子才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罗马共和制时代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律师，这不仅仅是因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就意味着金钱，还因为成功律师的名声是进军政界的跳板。当时执政官等国家要职是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律师辩护的能力直接与拉票能力挂钩。不过由于律师的选票一般是那些请他辩护的人或将来可能委托他的人投的，所以任凭一个律师的辩护能力再高，如果他收的费用高的话，也是得不到选票的。所以自然而然的，那时的辩护费用必须得设置一个限额。

进入元首制时代之后，奥古斯都摄政时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仅限于文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的，到了提比略时代则把这项选举移回到元老院举行，卡利古拉摄政时又把这项选举交还给公民大会，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这项选举又转回到元老院，可谓几经波折。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选举的地点，而是执政官这个职位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吸引力。第一，现如今是元首制，执政官大权旁落；第二，执政官任满后，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前往行省任总督，然而由于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对利用职务之便敛财的行省总督的处罚十分严厉，只要总督被发现利用职权威胁行省人民，证据确凿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冒死积累的财富也会被悉数充公，所以总督们也不敢在行省敛财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也难怪会有人想通过当律师来获取财富了。因为明着说是免费辩护，其实暗地里走后门成风，而且送礼的人送的钱往往是没有上限的。不过这样一来，保障被辩护者的权益就成了痴人说梦。

为了保障公民享有较为平等的辩护权，克劳狄乌斯实施的政策是，认同律师收取辩护费，并设定上限。辩护费的上限是1万塞斯特斯，这相当于一名普通士兵10年的薪水。这个价格绝不便宜，然而要明白的是，辩护费是以这个价格封顶的。而且，正如罗马法律中最重要的一条，保护私有财产所示的一样，罗马人向来尊重个人所有物，包括有形的财物和无形的才华。所以在罗马，较高的收入是优秀的律师应得的。

克劳狄乌斯施行的政策成绩斐然，然而他偶尔还是会暴露出一些继位以前研究历史时的习惯。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有点吹毛求疵（拘泥于细节）。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表示要举办“百年节”（Ludi Saeculares），因为这一年恰逢罗马建国800周年。

大家都很不解距上一次“百年节”不过才64年，还不到100年，怎么又要举办？对此，身兼历史学家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作了以下解释：

上一次“百年节”，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是在公元前17年共同举办的，但这其实是算错了时间，因为按一个世纪举行一次“百年节”来算的话，今年才是罗穆路斯建立罗马的第800周年，也就是说，公元48年才是举行庆典的正确年份。

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建国的，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只好同意了。不过罗马的第一次“百年节”是在公元前17年举行的，当时奥古斯都还特请诗人贺拉斯撰写了《百年节赞歌》，甚至对举办的地点、流程等细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这些来看，我觉得奥古斯都是故意算错举办年份的，对于他而言，罗马到底建国了多少年无关紧要。他结束罗马内战，确立了元首制，到了公元前17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一派祥和，罗马公民作为唯一的霸权者，站到了肩负罗马和平重任的最前线。看到自己的成就，奥古斯都选择在公元前17年举办庆典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强罗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公元前23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把统治大权抓在手里，成了元首的他之后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成立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7年，罗马帝国成立。所以他选择这一年举行“百年节”，规定“百年节”的细节，并把这些细节刻在大理石碑上，嵌于罗马广场的一角。凡此种种看来，他故意算错建国时间举办庆典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罗马人的民族自豪感。

公元48年刚好是罗穆路斯建国800周年。虽然克劳狄乌斯深知奥古斯都的用意，然而学者的学术良知不容许他对这样的学术性错误坐视不理，就算这个“错误”是神君奥古斯都犯的。

身兼大祭司的克劳狄乌斯任命维特里乌斯协助他举办“百年节”，不过公元48年的“百年节”，连细节都照搬奥古斯都的规定。至于“百年节”的实况是怎样的，还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我觉得，通过举办“百年节”让罗马人深刻体会到能称之为罗马帝国领路人的除了克劳狄乌斯别无他人。公元43年，他已经58岁，是在位的第7年。远征不列颠的行动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他防御也充分体现了帝国防御系统的牢固，不仅如此，他还做到了保障整个帝国和平这一皇帝的首要职责。管理行省，罗马历来的做法是，在行省驻扎罗马军团，让退伍军人建设殖民城市，给予原住民充分的自治权，让他们管理内政，建立地方自治体等等。克劳狄乌斯围绕这一核心措施，在各个城市间铺设罗马式街道，形成城市网。从此罗马对行省的统治从恺撒、奥古斯都的大动脉时代进入无处不在的微血管时代。不过这种实际但不浮夸的政绩，往往是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等热衷于追逐奇谈怪论新闻的知识分子所不关注的部分。

虽然一边是拥有权力、负责统治国家的皇帝，另一边是没有实权然而可以作出自己的评判的普通公民，不过他们同为罗马人。只要是罗马人，自然就会明白加大对基层的建设就是强国之本，克劳狄乌斯的贡献，百姓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

克劳狄乌斯港

在此，先抛开行省不谈，克劳狄乌斯仅在首都及其附近，就对公共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的建设。

公元38年，即卡利古拉时代开工动土的水利工程，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也还在继续施工。这条水渠全长70公里，其中有10公里必须要修高架水渠，这样浩大的工程，到了克劳狄乌斯手中时离竣工期限只剩4年时间。还有另一条同期开工的水渠如果也竣工的话，给罗马提供生活用水的水渠就会增加到9条，到时候每天可给每位首都居民供应900升的用水。而卫生条件的改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能随时给市民提供新鲜的饮用水。

不管是谁，对自己开创的事业会更加上心，这是人之常情。因此，皇帝克劳狄乌斯对自己下令动工的奥斯提亚港湾工程的重视程度，比对卡利古拉留下来的水渠工程要高。这项外港工程是在克劳狄乌斯继位的第二年上马的。这说明他一继位，就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开始考虑建设这些公益工程。可惜的是，在这项历时12年的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他却惨遭杀害，奥斯提亚外港的竣工典礼最后是由继任皇帝尼禄举行的。

不过，当初克劳狄乌斯修建奥斯提亚外港的构想遭到建筑师们的一致反对，就连古代第一位撰写建筑书籍的维杜卢维乌斯也断言，在河口修建港湾实在不是良策，因为港口最终会被河流从上游带来的泥沙淤塞。

然而，克劳狄乌斯是一位钻研历史的人，历史学家的眼睛关注的是人。克劳狄乌斯可能是认为，称得上是世界之都的罗马要修建海港，不是只要地理条件符合就能随便选址的。我想克劳狄乌斯可能就是用这个理由来反驳建筑家们的论调。台伯河是罗马人的灵魂，依着台伯河的流势，罗马人修建了如下文复原图中所示的各种设施。奥斯提亚这座城市刚好坐落在台伯河的入海口，只有在奥斯提亚修建海港，才能使台伯河发挥其河运的作用。所以，克劳狄乌斯认定罗马的外港只能、也必须是台伯河入海口的奥斯提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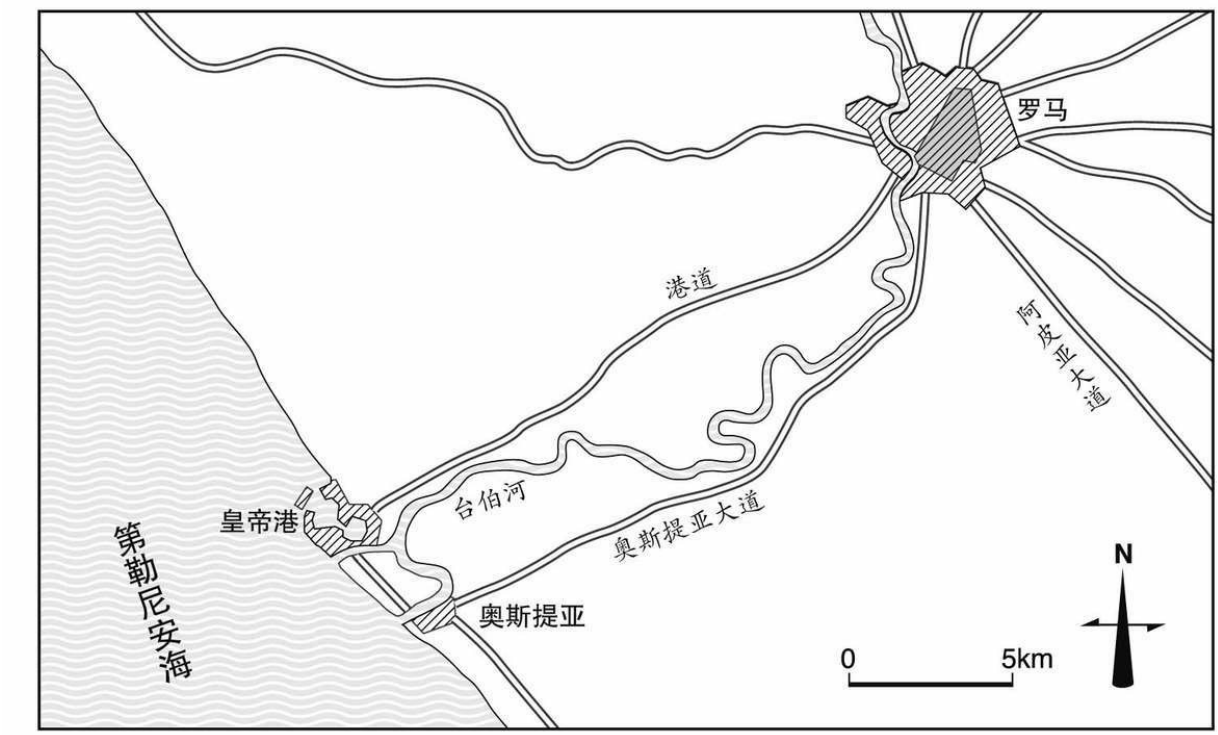
可是，如何避免港口被台伯河河水带来的泥沙淤塞，确实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也是受克劳狄乌斯之命，把奥斯提亚建设成正规的海港的工程师们该考虑的问题了。

总体而言，工程师们想出来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提案：不在日后必定会被泥沙淤塞的地方选址修建海港。

第二种提案：港口的地址选在奥斯提亚港西北方向30公里处的海岸上，大概是现在的罗马列奥纳多·达·芬奇机场的南边地带。

第三种提案：在港口和台伯河之间修建运河，这样船只就可以不经由奥斯提亚，从运河驶进台伯河，逆流而上抵达罗马。



罗马与奥斯提亚港、新港（皇帝港。图拉真皇帝在进行大规模改建后）的位置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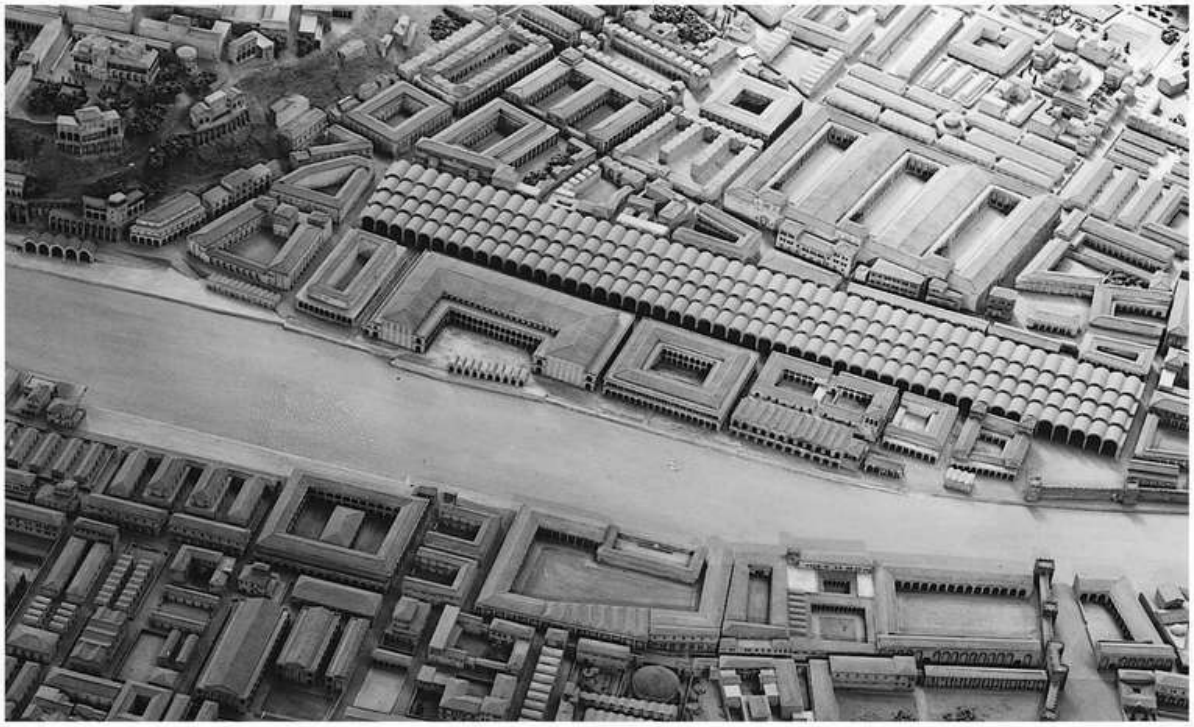
第四种提案：在即将建设的港口和罗马之间铺设道路，这样就可以从港口走陆路直达罗马。即修建“Via Portuensis”（直译为“港道”，现在中文中被称为柏图斯大道。）

第五种提案：在港口除了修建码头、仓库和其他必备设施外，其他诸如交易场所、各个交易公司的办公室，则建在奥斯提亚港内，并在新建港口和奥斯提亚港之间修路，用陆路联通两个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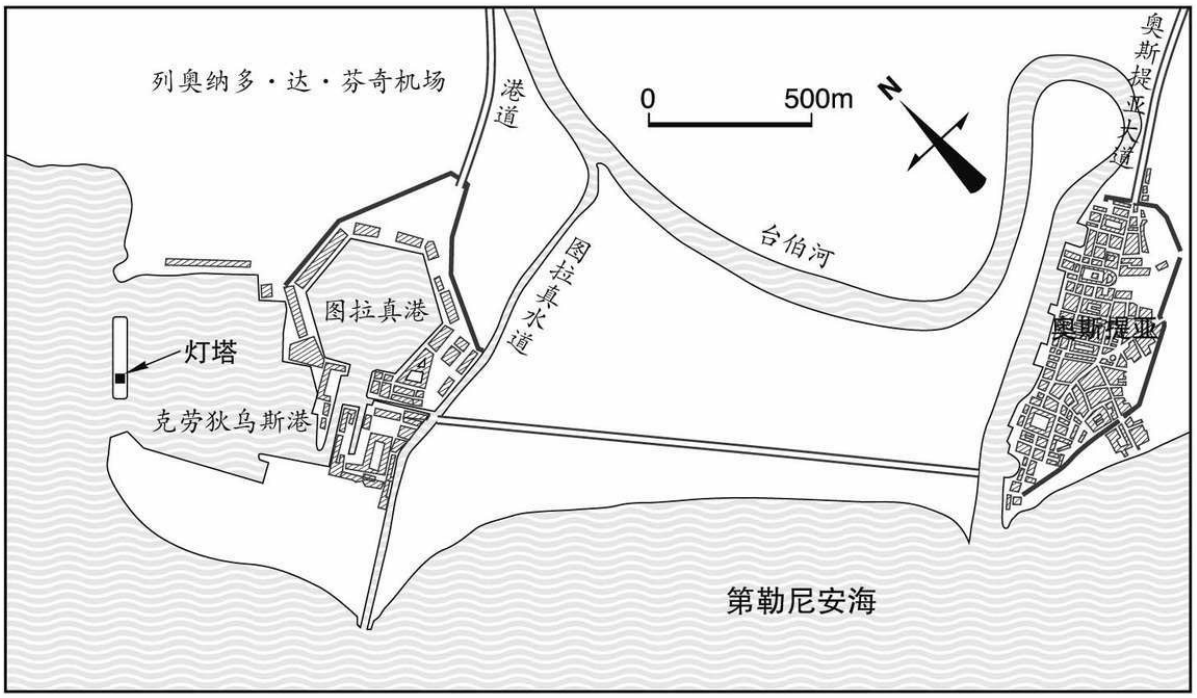
然后从奥斯提亚到罗马，有两种走法。既可以像往常一样走台伯河这条水路，也可以走奥斯提亚大道这条陆路。

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但我们仍能够从半个世纪后继位的皇帝图拉真作了大改造后的港口景观来观察当时的港口。显而易见，为罗马帝国

各地往来罗马的大量船舶建设一个避风港，应当是克劳狄乌斯当初要建设这个港口的一个目的。而选址在奥斯提亚港则是想保留和罗马一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奥斯提亚港的功能。不过虽然要继续使奥斯提亚发挥海港城的功能，然而由于它坐落在河畔，不适合在此修建避风港，所以克劳狄乌斯才想到要建新港口来补奥斯提亚港的不足。这座以克劳狄乌斯来命名的海港，让我们这些后人不禁感叹罗马人的土木工程是对大自然发出挑战的庞大工程。



台伯河岸港口（复原模型）



奥斯提亚与皇帝港（图拉真皇帝进行大规模改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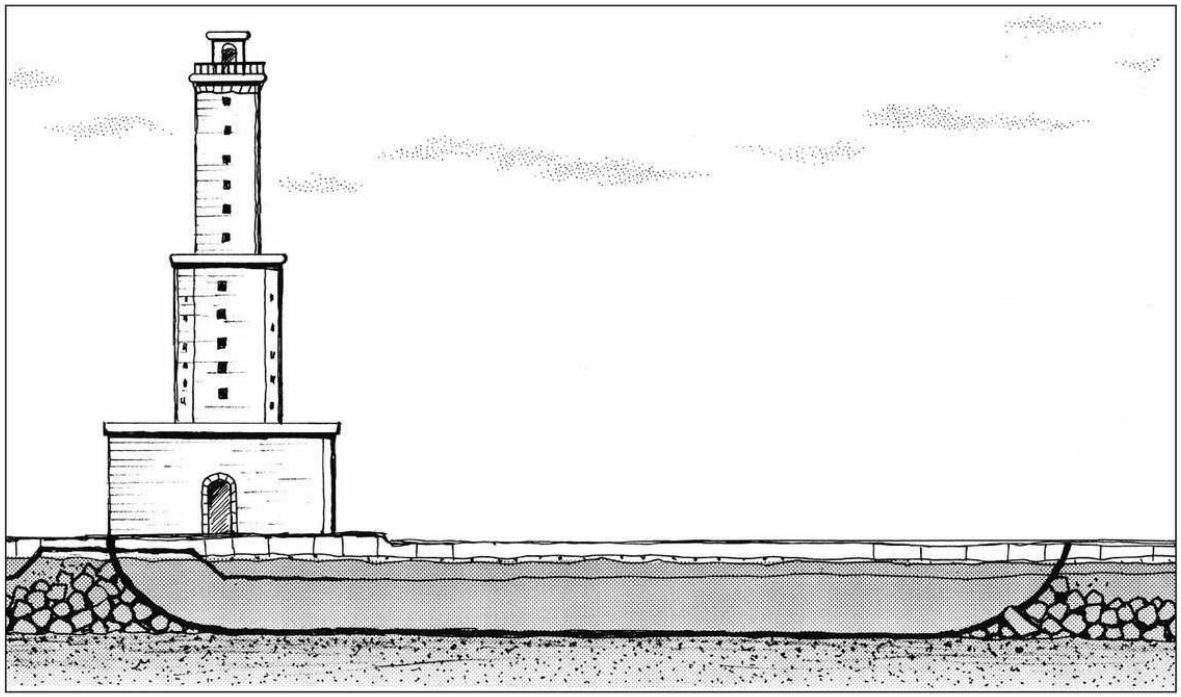
克劳狄乌斯港的动工是从挖地基开始的，虽然在海岸的沼泽沙地上挖地基很容易，然而要让来往于地中海的船舶在此出入或停靠，港口的水深最浅也得5米，这才是问题所在。

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出，打好地基后，接下来就是建设延伸到海里的堤坝，以及从台伯河右岸开挖最终与新港码头相连的河道。这条河道在50年后被当时的皇帝图拉真改造后，称为“图拉真水道”。这两项工程是同时施工的。

完工后的这个大型船坞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水深在5米以上，码头总长达2500米，伸入海中约1100米。号称可以同时对一字排开的300艘船进行卸货作业。

建防波堤的方法，则是用铁索将不计其数的重达7吨的巨型石灰岩绑起来沉到港口两侧的海中。

除了左右环绕的防波堤外，港口的正对面也修了防波堤，上面矗立着一座灯塔。这样的构造使海港的出入口分别独立，进港口和出港口的宽度都是206米。



摇身一变为防波堤兼灯塔的卡利古拉大船（想象图）

当年，卡利古拉要从埃及运25米长的方尖碑回罗马，然而又不想把这些方尖碑切割后分装上船，为此就特制了一艘大船。据和卡利古拉同一时期的博学家老普林尼的记载，以及现代考古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完全复原这艘船。船身是用冷杉树打造的，光吃水线下面部分的重量就达800吨，中央桅杆要4名船员手牵手才勉强围得过来，船身总长105米，宽20.3米。船一共有6层，满载时的排水量是7400吨，船上需要的水手据说达700到800人之多。正如前文提到，这艘船后来被克劳狄乌斯装上石头沉到海里做地基，而这就是新建海港的中央灯塔防波堤的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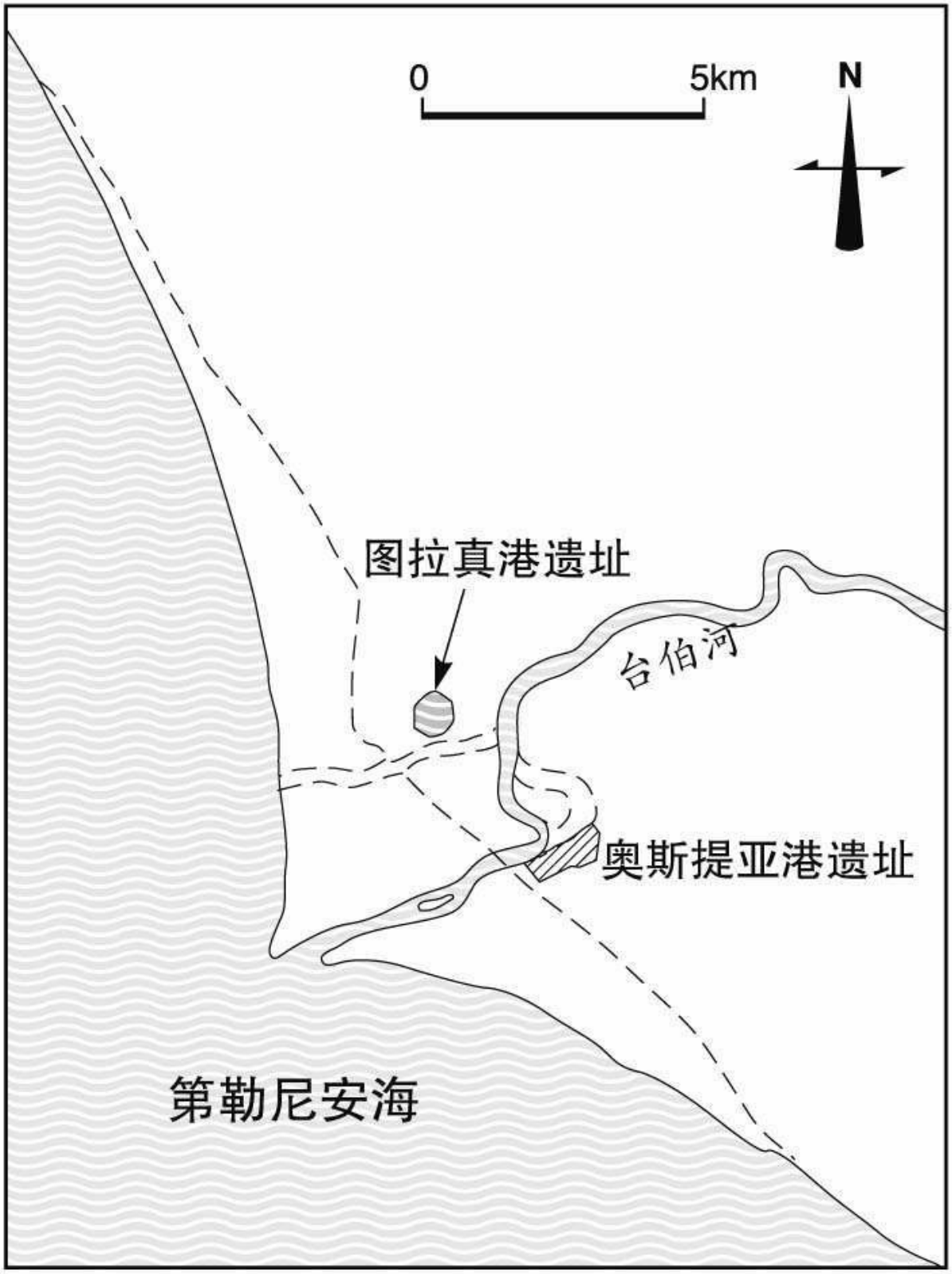
这艘船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古罗马人造船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只是

为了运方尖碑，卡利古拉就不惜破费地命人打造了这艘船，也难怪国家财政会崩溃。继位的克劳狄乌斯觉得这种大型船不实用，就没有使用，不得不说他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样一来，古代的“泰坦尼克号”就以图中所示姿势，被沉到海底。当然也有船身用的木材耐海水腐蚀的原因。

把桅杆和护板全部拆除后，这艘大船就只是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器皿”。在里面装满了石头后，被沉到深达7米的海底，再在其四周沉入巨石，用铁链把船绑在这些石头上固定好。就这样，船只就变成了头顶灯塔的中央防波堤了。

在克劳狄乌斯手里完成的罗马真正的外港，方便了往来的船只。享有税收优惠的小麦运输船，在冬季也能自由地前往罗马。虽然塔西佗等人曾批评罗马粮食依赖进口，然而后来罗马采取的还是粮食依赖进口的原则，并尽力补救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罗马坚持粮食依靠进口政策，对于以出口小麦到首都罗马和意大利全国为生的埃及和北非而言，其实就是在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帮助。

本来是出于某一目的修建的出色工程，势必会带来其他意想不到的好处。由于在台伯河和新港之间修了一条河渠，这就等同于台伯河多了一条支流，这样一来，以前海潮和台伯河上游流下的河水在汇合时经常引起水淹罗马街道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台伯河入海口距罗马20公里，我曾经一直认为海潮再怎么也不可能逆流20公里，然而看了1966年佛罗伦萨大洪水后，这个观念彻底地转变了。当时，离城市很远的第勒尼安海的海潮逆阿尔诺河而上，在韦奇奥桥附近与因雨暴涨的河水汇合后，水漫到了大街上。可见潮水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克劳狄乌斯之后，罗马极少有发洪水的记录，这估计就是新建的海港发挥的意外作用。



如今的海岸线（虚线代表古代海岸线）

在半世纪以后，皇帝图拉真对海港进行了改造，港埠变成了两个，克劳狄乌斯港和图拉真港，然而人们统称它们为“Portus Augusti”（皇帝港）。不过，流经奥斯提亚的台伯河以及连接皇帝港的支流带来的泥沙，改变了海岸线，现在的海岸线如图所示，皇帝港被泥沙形成的陆地围住，只剩下古时的图拉真港这个呈六角形的海湾还有水。

历经2000多年后，海港成了今天的这种景象。不过我倒不觉得这仅证明了曾经反对在入海口建港口的建筑师维杜卢维乌斯们极具前瞻性，而且还诠释了一个对比，即国家发挥职能的时代与国家没有发挥好职能的时代的差别。

一位曾在军团中负责铺设罗马街道的工程师自夸地说道：“我们铺设的道路100年之内不需改建。”必须搞清楚的是，他的意思是指“百年之内不用改建”，而不是说100年内都用不着保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国家的治理。和平不是说只要当上霸主就可以一直维持，只有平时的用心经营，才能保持。土木工程也一样，竣工之后平时的保养是必不可少的。在罗马帝国还在发挥其国家职能的时代，疏通台伯河河底淤积泥沙的作业从未被忽视过。号称是迦太基港两倍大的、地中海规模最大的皇帝港，在罗马帝国时代发挥了500多年的作用，可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就变成了陆地中的沼泽。

自取灭亡的梅莎里娜

克劳狄乌斯孜孜不倦地履行皇帝的职责，奈何家门不幸，这使他头疼不已。正在奥斯提亚视察港口建设进度的克劳狄乌斯，收到了一封奉命留在罗马处理政务的秘书官们的来信。

年轻妻子梅莎里娜放荡的作风一如既往，不过如果她偷情的对象是演员或是花花公子，克劳狄乌斯倒也不想追究，这倒不是克劳狄乌斯不

爱他的妻子，而是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政务需要他去处理，分身无术的他根本无暇去管家里的事。妻子梅莎里娜的行径越来越出格。

皇后梅莎里娜这次“外遇”的对象是被称为美男子的西里乌斯，他不仅是元老院的议员，还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按照罗马的规定，如果不是出身皇族，年龄超过40岁才能当选执政官。这样看来，他绝不是个徒有外表的年轻花花公子，况且他还单身。

时年23岁的梅莎里娜被西里乌斯迷得神魂颠倒。如果这只是单纯的外遇，皇帝最多就把它当做是闲话，听了就过，可是梅莎里娜居然想要和他结婚，而且还付诸了实践。

按照罗马的结婚仪式，得先进行鸟卦再选择结婚日期，结婚当天要在新人面前杀牲祭祀，然后两人签下结婚契约，接下来就是宴请亲友。趁着克劳狄乌斯不在罗马，梅莎里娜举办了一场真正的婚礼，这是不容置疑的重婚。不知道她梅莎里娜脑袋里在盘算什么，难道仅仅是单纯的年轻女孩没头脑吗？然而男方也不是小孩啊。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真如历史学家所说，他们想杀了克劳狄乌斯谋权篡位，如若事实如此，难道他们没有搞错顺序？难道不是应该先杀了克劳狄乌斯再结婚才说得通吗？再说梅莎里娜也有皇位继承权，她也算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的。

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们纳鲁奇索斯、帕拉斯与卡利斯杜斯在得知皇后重婚的事情后，一致认为这次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于是决定先向克劳狄乌斯报告。这封信反复恳请克劳狄乌斯尽早返回罗马处理此事。

虽然奥斯提亚距离罗马仅仅20公里，然而得到消息的克劳狄乌斯没有即刻启程回罗马。要说他是在想对策，还不如说他此刻什么也没有考虑。他还像往常一样每天出现在工地上视察。

皇后梅莎里娜在这期间也得知克劳狄乌斯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到了这时候，她好像才开始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如果她只是通奸的话最多被指控判处流放之刑，然而，对于违反婚约重婚罪的妻子，假使丈夫要行使家长权的话，她只能是死罪一条。

梅莎里娜决定亲自去奥斯提亚，跟克劳狄乌斯坦白。她到这时候，仍然坚信自己见到克劳狄乌斯之后能将他说服。在她心目中，克劳狄乌斯一直以来都是对她言听计从的。然而，当她吩咐奴婢为她准备去奥斯提亚的马车时，却无人听从她的命令，连家中的下人们都不敢理会梅莎里娜。看到这种情形的梅莎里娜便叫来女儿屋大维娅和7岁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要他们在克劳狄乌斯回家时，替梅莎里娜求情。此外，她还拜托罗马唯一的职业女祭司长替她向克劳狄乌斯求情，饶她一命。梅莎里娜在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就独自躲进了从法雷里乌斯手中夺来的别墅，即连名字都未改的“路克鲁斯庭院”之中。

在秘书官们的催促下，克劳狄乌斯终于起身回到罗马，审问关押在案的西里乌斯。不知审问时克劳狄乌斯是何感受，在此过程中他始终不发一言，全部由秘书官们代为发问。西里乌斯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他被判自裁，即刻执行。

克劳狄乌斯很犹豫怎么处置梅莎里娜，不知道用公罪来判决还是当做家务事来解决。加上一双年幼的儿女照母亲梅莎里娜教的话语，乞求父亲能饶母亲一命，女祭司长也劝说克劳狄乌斯，至少要给梅莎里娜一次解释的机会。

克劳狄乌斯终于向身边的纳鲁奇索斯发话道，命那个不幸的女人明天早上过来解释，说罢就起身离开了。

纳鲁奇索斯没有替克劳狄乌斯召见梅莎里娜。这个解放奴隶太了解克劳狄乌斯的心思了，他担心克劳狄乌斯见了梅莎里娜以后，就会把愤怒、受辱的心情抛到九霄云外，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和梅莎里娜重归

于好。回到原来的样子，就表示梅莎里娜又可以为所欲为。

身为内阁秘书长的纳鲁奇索斯，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传唤近卫军的百人队队长，假传克劳狄乌斯的旨意，下令诛杀梅莎里娜。得令的百人队队长便率领着一队卫兵，向“路克鲁斯庭院”直奔过去。

梅莎里娜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百人队队长把短剑递给她并说这是皇帝的意思时，梅莎里娜握着短剑却始终没有勇气自杀。她痛哭流涕，双手发抖得无法将短剑刺进自己的胸口。见皇后迟迟不动手，没有耐心的百人队队长便夺过剑，结果了她的性命。年仅23岁的梅莎里娜就这样被刺死了。

克劳狄乌斯在得知妻子梅莎里娜的死讯后似乎麻木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表现出悲痛与愤怒的情感。对丧母的一双年幼儿女也没有特别的关爱。被妻子戴了绿帽子的这个60岁的老男人只是埋头于自己的政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秘书官们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拆毁了梅莎里娜的雕像。梅莎里娜的尸体也是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火化的，她的骨灰没有被放进奥古斯都陵里，甚至连被埋何处从那时起就是一个未知的谜。

罗马人在经过这起事件之后，心目中对克劳狄乌斯的评价就是“一个连妻子都不当他是一回事的皇帝”。这对克劳狄乌斯而言，他的公众形象可谓是跌到了谷底。不过，克劳狄乌斯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忘了那些不痛快的事。我倒不觉得这是他健忘的缘故，而是在当上皇帝之前，他过了50多年不被人重视的日子，这样的经历没有教给他被人敬重的意义。可是，脑海中完全没有受人敬重这个概念的他，却为百姓做了许多值得敬重的实事。不过，没有这个概念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受得了别人的冷眼。不在乎众人投来的异样眼光的克劳狄乌斯，发表了一次演讲，并按照演讲内容落实各项政策。这篇演讲稿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高度评价为“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

开放国门

这件事的始末源于众人讨论如何补充元老院的议员空缺。奥古斯都对元老院进行改革后，议员席位就固定为600席。然而许多议员由于公职不在罗马，有事要议员全员出席这个想法就变得不可能，况且有了空缺，也不是说需要补充人员就能立马找到人选的。到了公元48年，元老院席位空缺似乎到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程度。当时，是否让一个人进入元老院补缺，最后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克劳狄乌斯有意操纵元老院，安排支持他的人进元老院，巩固元老院中站在他这一边的实力，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然而，与党羽幕僚绝缘的克劳狄乌斯在50岁时，正是在党羽的背景下继位摄政的，加之自己是历史学家，钻研历史的皇帝关心的不是如何在元老院中培养自己的势力，而是在罗马帝国中，元老院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不过给元老院定位不是他自己想到的，而是有件事提醒了他。

高卢各个酋长们在得知元老院要大量补充议员这一消息之后，马上给元老院递交了请愿书，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按照罗马帝国的规定，要担任罗马帝国的要职，候选人必须要有元老院的议员席位，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就表明他们想要参与罗马中央政府事务。

自古以来被称为“纳博讷行省”的南法就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这里不仅出过元老院议员，也出过执政官，所以这一地区的酋长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将联名请愿书递交到罗马的是被恺撒征服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酋长们，他们就是短发的罗马人口中的蛮夷之地“长发高卢”的权力阶层。

首先，我想大家不会忘记，这些人正是百年前被恺撒打败的人们的

子孙。保留部族，并把罗马公民权赐予部族的统治阶层，这是恺撒对臣服的高卢的处理。再一点，就是高卢人甘愿屈服于罗马人之下，并希望能参与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治，而不是发誓夺回独立权并伺机而动。这就和殖民时代的印度不是向英国政府要求独立，而是希望得到大英帝国的国会席位，进而参与大英帝国的中央政治相似。

面对被统治者的这般要求，身为统治者的罗马元老院又会作何反应呢？

针对这件事元老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皇帝克劳狄乌斯也列席参加。可以预想，反对的声音十分激烈。

确切地说，在93年前，恺撒行使终身独裁官的权力，给“长发高卢”的部落酋长们元老院的席位时，也遭到了出身于意大利的元老院议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普通百姓也肆无忌惮地讽刺这些酋长，例如嘲笑他们是“拉丁语都说不好的议员”、“连去元老院的路都找不着的议员”，要不就笑他们托加下面居然还穿裤子（高卢人特有的服饰）。当年参与暗杀恺撒计划的人数量众多，可是暗杀计划并没有被泄露出去，这是因为即使元老院的议员没有打算加入布鲁图等人组成的刺杀小组，然而知道谋杀皇帝这一消息的议员也对此三缄其口，选择不对外声张。这估计就是议员对恺撒同意行省的酋长参与元老院这件事的报复。

恺撒的前车之鉴，让把不被行刺这件事当做头等大事的奥古斯都，取消了允许“长发高卢”的酋长们参加元老院的政策。后来的提比略和卡利古拉也沿用了这种做法。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元老院的议员们“排外”的立场也丝毫没有动摇。这次就这个问题在元老院会场里开展的讨论中，持反对意见的人的理由如下：

“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还没缺人才到找不到元老院议员的合适人选。”

“以前的元老院议员的席位虽说只有300席，然而光靠罗马居民组成一个元老院都绰绰有余了，而且当时的元老院还管理着意大利本土的其他部落。现在的罗马更是不缺有能力有荣誉感的统治人才。”

“虽然神君奥古斯都赋予居住在北意大利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的权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难道还不够吗？现在居然让原则上只是俘虏的行省人民也能出入元老院，这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情。”

“一旦让行省人民进入元老院，现在已为数不多的昔日名门势必会遭到排挤，这让这些名门的脸面往哪里搁？”

“现在要求赐予元老院席位的人的祖先，曾消灭了我们罗马的一个军团，还在阿莱夏包围了神君恺撒。这些还都是不久前的事情，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曾经攻打罗马、将我们的祖先逼上卡匹托尔山的高卢人，和这些人正是一个民族的，难道我们要忘记这段历史吗？”

“高卢被我们征服后，我们已经把罗马公民权给予了高卢地区的原统治阶层，实在没有必要再给他们元老院的席位和治理国家的职位了。”

在一片反对声中，克劳狄乌斯开始了发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作的演说内容，可以从1480年后的1528年，在法国里昂挖掘出来的石碑上的碑文得知。在此我为大家翻译历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载，虽然塔西佗说过自己写这本书时很多东西参考了《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因为当时塔西佗是写给罗马人看的，所以生在2000多年以后、非罗马人的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求助于注释。不过我写的不是研究性论著，所以在此就直接把注释放在了正文中，还请大家谅解。

在此，我不禁想起我的先祖，我最早的祖宗出身于萨宾人克劳苏斯。公元前500年，他移居到罗马，罗马人不仅把出身外族的他与

他的家人当做是同样的罗马公民，还让他当上了元老院的议员，使他成为了贵族。祖先们的做法，就算到了这个时代，也可以成为我们统治国家的方针。一个人，不管他出生何地，不管他的族人是否曾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只要他优秀，我们都应该把他吸收到中央来，施展他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第三任国王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公元前673—前641年在位）征服了阿尔巴隆加地区之后，尤里乌斯家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移居过来的。而克伦卡尼斯家族则是从败给第一任国王罗穆路斯的卡梅里欧地区移居过来的；还有出了大小加图的波尔吉斯家族的祖籍则是图斯库洛城，那里是伊特鲁里亚的发祥地，直到公元前380年，那里的人民才拥有了罗马公民权。

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说明了，因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到意大利南部的卢坎尼亚地区，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罗马全国的人，不管他们曾经是否是罗马的手下败将，只要是他足够能干，就把他们召集到罗马来，加入元老院，这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过去。后来我们的神君奥古斯都给这种趋势指明了更明确的方向。公元前49年，他把原本只是到卢比孔河的国境线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又将只是行省的意大利北部纳入本土的版图。原本罗马公民权只是针对个人的，然而如此这般，包括居民、土地，整个北意大利都是罗马的了。

此后，随着帝国国内的和平日益稳定，对外领土的扩张，这种趋势越发强劲。行省出身的优秀人才竞相加入协助罗马主力军团作战的辅助军团，正是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使得已显疲态的罗马帝国再次恢复了她的生命力。

我们罗马人父辈，是否在为恺撒提拔了西班牙出身的巴尔布斯而后悔？是否在为给予臣服于恺撒之下的南法行省居民中的贤能以和罗马人同样的待遇而后悔不已过呢？他们的后裔也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对罗马的爱，丝毫不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罗马人差。

在战场上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国家的兴盛却

只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没有想要接纳以前的敌人，使他们融入本土百姓的生活中，老是把他们当做外来人。

然而，我们罗马帝国的奠基者罗穆路斯，明智地选择了和希腊人不同的对策，在战败宿敌后，并没有排斥他们，把他们融入罗马人的队伍之中。我国的历史上，也出过其他国家出身的领导者。七位国王中，第二任努马王出身于萨宾人，第五、六、七任国王则是出身于伊特鲁里亚人。早在公元前310年，财务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就任用解放奴隶的孩子承担我家的重任。这些例子说明，给解放奴隶的下一代开放出仕之门，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最近才有的事，而是在很久之前就有过了。

当然，诸君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作为高卢民族的一个分支，歇诺内斯人在公元前390年攻陷罗马，曾有一段时间占领了我国大部分领土。然而像乌尔斯奇人和耶奎人这些历来就被视为是罗马人的民族，谁又能断言他们以前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祖先被高卢人俘虏过，也有过不得不送人质到伊特鲁里亚人地盘去的屈辱。公元前321年，萨莫奈人打败了罗马的两个军团，他们命令已经解除武装的罗马士兵在长枪中间穿过。这就是现在的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考地乌姆之耻”。正是这样一个让我们饱受屈辱的民族，早在很久以前就与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成了跟我们一样的罗马公民。

对比罗马与其他民族发生过的战争，每次与高卢民族之间的战争都能短期内一决高下，并且战争之后，高卢人与罗马人都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和平共处的。然而，到了现在，“长发高卢”的人民由于教育、和罗马人通婚的原因，在生活习惯方面已逐渐被融合。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拥有的资源带到罗马和意大利来才是明智之举，而不是和他们划清界限。

议员诸君，现在我们深信不疑的惯例，其实在当时也是突破性的尝试。曾经，国家的重要职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贵族把持着，后来罗马市民也可以在政府里担任职位，接着担任官职的人选扩展到了住在罗马之外的拉丁人，再后来是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百姓，就这样官职的大门越来越对人开放。

议员诸君，现在我们对要求我们表明态度的高卢人开放门户，在将来这势必也会成为罗马的传统之一。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引用了许多先人们的例子，而在将来，这件事也将会成为供后人引用的先例。

这是一次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精彩讲话，是高尚宽容精神的展现，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盛赞它为“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宝贵教训之一”，这个盛名克劳狄乌斯当之无愧。当然，罗马人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不会让闪光的理想销声匿迹。

在皇帝克劳狄乌斯发表了这篇演讲后，这次讨论以赞成票占多数通过了高卢人出任元老院议员的请求。然而，这并不是承认所有的“长发高卢”的酋长都有资格担任。议员中的反对者同意让步，但他们的附加条件是要稍微修改一下这个提案，即行省的各民族要分阶段地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最先获得这个资格的只有埃杜伊民族，它是高卢东北部地区最强大的民族，自古就和罗马交好。然而在阿莱夏防卫战的时候，它投奔了韦桑热托里克斯，一同与恺撒为敌。可是取得胜利的恺撒不仅原谅了他们的背信弃义，还让他们继续保持高卢地区的强势地位。现在，就连这样的埃杜伊人都获准进入元老院了，其他的高卢人，获得加入资格肯定也是迟早的事。既然高卢人获准了参与中央政治资格，那么西班牙人、希腊人、北非人、埃及人甚至是东方人享受这种“福利待遇”也指日可待，虽然可能会花上一段时间。

恺撒的治国理念被克劳狄乌斯继承和发扬，并身体力行地把这个理念从意大利半岛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

话说回来，我们日本人在批判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排外主义之前，是否应该先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给予了朝鲜人帝国会议的席位了吗？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政府中了吗？

然而，向高卢人大开进入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之门，其实顶多就是让那些一心死守既得利益、满口闭关锁国言论的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反思，让行省出身的开放论者感动而已。罗马人的精明之处在于，在一面实行开放国门政策的同时，一面制定停止政策实施的法案，以备不时之需。

奥古斯都一直秉持恺撒的开放国门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地遵循恺撒的大部分政策。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安上一个“刹车”来制衡。所谓的“刹车”就是分别在公元前2年和公元4年制定法规限制奴隶解放，这部法律即使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仍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奴隶解放限制法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抱着奴隶制度违反人权应该废止的观点去讨论古罗马的奴隶制度的话，那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其实在罗马帝国崩塌、进入基督教世界之后，奴隶制度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因为教会认为，没有领悟到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的人，和基督教徒是不能处于相同地位的。所以在教会的默许下，还存在着非基督教徒的奴隶。奴隶制度得到全面废止，是倡导尊重人权、以人为本的启蒙主义之后的事，所以在18世纪末各个国家都集中发表了废除奴隶制度的声明。在古代，连哲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从未质疑过奴隶社会。古代人对奴隶的看法，倒不是觉得他们和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不应该和自己享有相同的权利。他们是因为“不幸运”才沦为奴隶的。他们要么因为战败、被海盗俘虏或是无力偿还欠下的债务被剥夺自由，而沦为奴隶；要么就是一出生就是奴隶的后代，或是被父母卖了当奴隶。所以，不管是主人恩典还是偿还了债务，大家都广泛认同奴隶翻身做人。那些被海盗劫持或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人，他们的境遇都是一样的，只要交了赎金，就都能恢复自由之身。普通人与奴隶的区别，不在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

在于有没有碰上这等“不幸运”的遭遇罢了。

比起用界限把蛮夷和希腊人严格划分开来的希腊人，选择跳出城市国家的桎梏、转变为领土国家的罗马人更有远见。在雅典和斯巴达，没有解放奴隶这个阶层的存在，然而在罗马这个阶层确实产生了，并生存了下来。罗马人甚至还把罗马公民权赋予了这个阶层中杰出的人才。

罗马人家庭对奴隶的依赖到了没有奴隶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地步。在此，以国家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的家庭举例：每日清晨为主人刮胡子的，是奴隶；做饭服侍的，是奴隶；负责教育儿女的家庭教师，大多数是奴隶；管家的，是奴隶而不是女主人；就算是在战场上，准备武器装备的，也还是奴隶；被元老院议员假借名义去做不能曝光的生意，甚至还要代主人打理生意的，是奴隶；还有，把主人口述的话写成书信的，是奴隶；在普通百姓还不能使用国营邮政的时候，远赴东方为主人送信，再把回信带回来的，是奴隶；远赴海外替主人管理资产的，也还是奴隶，等等。

虽然奴隶们支撑起了整个社会，然而他们很少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比起出身决定身份地位的自由阶层来，他们是生活在凭本事说话、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奴隶有良好的教养，或是有语言天赋、表演才能、经商头脑，再或者有某方面的特殊才能，他就会被竞相争要。而这种奴隶也是离解放奴隶最近的一个群体。哪怕一个奴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但与之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感情。所以在古罗马时代，解放奴隶的事情很常见。其实在奥古斯都制定解放奴隶的法规之前，官府也一直没有干涉奴隶主的这种做法。在这种形势下，与其冒险去采取会引起动乱的举动，还不如顺应形势实行奴隶解放。

针对奥古斯都制定的奴隶解放限制法，许多现代学者把这部法律归咎于奥古斯都的保守，然而，我倒认为这恰是证明奥古斯都善于从现实出发的一个例子。

把不是罗马公民的人罗马化，即异族同化，这是罗马人的做法，正如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的一样，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提拔他们当中的优秀人才；其二对因服役等方式对保护罗马帝国安全作出了贡献的人进行褒奖。然而如果一直放任奴隶解放形势不管的话，就等于对解放奴隶大开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方便之门，这势必会导致素质较低的奴隶也能成为罗马公民，从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到时候，不仅罗马公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会被拉低，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现代国家对非法移民大量增加的现象极为敏感，奥古斯都也一样，他必须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研究者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用的标题是“奴隶与罗马公民”，这是因为在罗马，将奴隶解放就意味着让他们加入罗马公民的行列。

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立法通过了《夫里斯——卡米勒斯法》。这部法律是用两位提案者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当时的执政官。然而事实上，这部法律的真正拟定者是奥古斯都，这么做是因为如果所有的法案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恐有独裁之嫌。就连恺撒也采用此法来避嫌。而一直用“第一公民”代替“皇帝”来称呼自己的奥古斯都与提比略都深谙其道。

概括而言，《夫里斯——卡米勒斯法》是一部限制遗嘱解放奴隶的法律，5年后通过的、同样是用两位时任执政官的名字命名的《艾里——森第亚法》，主要针对主人在世时，限制他们随意解放奴隶。

《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不限制家中的奴隶在3人以内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是主人愿意，可以全数解放他们。《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主要针对奴隶较多的家庭。家中奴隶在4人到100人之间，只有遗嘱中特意提到了，才可以解放最多半数的奴隶。家中奴隶超过100人但不超过500人，可以解放五分之一的奴隶。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遗嘱里要解放的奴隶数不得超过100人。

《艾里——森第亚法》对《夫里斯——卡米勒斯法》中主人在世时的情况进行了移植，并对一些限制作了详细的补充。

在这部法律中规定，不允许曾被国家或主人问罪，也就是有前科的奴隶拥有与其他解放奴隶同等的权力，就算是他们获得了自由也不例外。此外，他们财产也要被充公，居住地必须得搬到离罗马100罗马里（约合150公里）之外。然而如果他们放弃罗马公民权，那么居住地限制就可以解除，也可以享有财产私有权。当然，出台这样的法律就是要阻止有前科的奴隶成为罗马公民。

这部法律还规定了，20岁之下的主人判断力不充分，所以不承认其解放奴隶的效力。20岁之上的主人，打算解放奴隶的年龄超过30岁，与原来的做法相同，只要在律政人员面前宣读释放宣言，才能确认其效力。然而解放的奴隶人数必须要控制在这两部法律规定的人数之内。若主人20岁之上，而解放奴隶的年龄没到30岁的话，就得由专门的审议委员会对此进行认真审议才能决定是否有效。该审议委员会由10位委员组成。首都罗马的审议委员会，其成员为5名元老院的议员与5名“骑士阶级”的骑士组成。在地方审议委员会，必须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能出任委员。不过即使是审议委员会同意这名奴隶解放，若这名解放奴隶未满30岁，虽然认可他本人的财产私有权，然而不认可其子女继承解放奴隶财产之权利。此外，拥有3万塞斯特斯的私有财产，是解放奴隶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条件。阻拦解放奴隶的后代成为罗马公民，正是以上重重限制设定的真正目的。

只有血缘相通的同类，才会被希腊人认可为拥有公民权。而罗马人定义的公民权，则代表的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因此，解放奴隶对罗马人而言，是在遵守“志同道合”这一罗马传统的前提下，只要能够达到防止品质恶劣的人混入造成罗马精神被拉低的目的，那就够了。所以，在管制奴隶解放时，不是“禁止”而是“限制”。不过，不得不加以限制原因，是解放奴隶的数量已经很庞大了。然而在限制奴隶解放之后，仍旧

有50人、100人规模的奴隶获得自由。为此，解放奴隶这一社会群体也就自然地产生并存在着。

提比略完全秉承了奥古斯都的这种对待解放奴隶的态度，不过，提比略也有不同于奥古斯都的地方，他拥有将军的特质。得益于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他很擅长辨别一个将军是否有才能。他在法国南部，甚至是在“长发高卢”提拔了许多指挥官级别的人才。在奥古斯都时代，这些被提拔的行省人，最多能当到辅助军团的队长。可是提比略提拔的人才可以官至罗马主力军团的指挥官。罗马帝国的国门开放方针就是国门一直为优秀的异族分子打开着。

元老院门户开放政策，可谓是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国门开放路线的延伸。正如克劳狄乌斯所言，其并未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进行改革，而仅仅是在遵循罗马人的传统。生在罗马霸权时代的希腊人、《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曾这样写道：“罗马人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会把自己的手下败将同化这一统治模式。”普鲁塔克的故国是希腊，就算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仍然活着的时期，又或是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最为活跃的时期，虽然希腊存在奴隶阶层，然而根本没有解放奴隶这一概念。

被称为元首制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他执笔时期刚好正值“五贤帝”当政前期。不过克劳狄乌斯和在其之前在位的三位皇帝都在塔西佗讨厌对象之列，原因会在后面提到，在这里就不费笔墨了。不过既然是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自然会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事实。只是因为塔西佗讨厌这些执政者，所以他在记录他们的政绩时，好政绩和坏政绩的介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政绩是“好”，塔西佗在记录完摄政者的演讲或政策后，不会在结尾批注自己的评论。他这是在说，虽然自己不喜欢这个人，然而他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相反，如果政绩是“不好”，在记录之前，他就会对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

克劳狄乌斯再次确定了行省人民可以加入元老院的演讲，就被塔西佗划入第一类。

然而，接下来要讲到的事情，在塔西佗的记录方式中就只能被划入后一类了，也就是说，是被塔西佗定位为“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位历史家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到“克劳狄乌斯是一个根本不能自己生活、习惯被老婆管教的男人”。的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

克劳狄乌斯在梅莎里娜死后又恢复孤单一人的状态，这时的他也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克劳狄乌斯有过3次婚姻，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安东尼娅已经出嫁了，下面还有小女儿屋大维娅与小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如若一个人不能生活，那么找个情人应该就足够了，而克劳狄乌斯曝光的情人就有两个。原因在于，克劳狄乌斯根本不会像提比略那样，担心自己再婚会导致皇位继承问题复杂化而保持单身。他平日里总是嫌人啰嗦，希望别人不要来打扰他，可是当没有了名正言顺的妻子，他的心里就老觉得少了些什么。与其说他是习惯了被妻子管着而选择再婚的，倒不如说他不习惯孤独。在我看来，克劳狄乌斯还是那种最后会被再婚妻子左右的人。

如果克劳狄乌斯真要再婚的话，他还得亲自去寻找。虽然，克劳狄乌斯并非女人喜欢的类型，他却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做着皇后梦，向皇帝自荐或是由人推荐的女人也为数不少。此外，以嫁给克劳狄乌斯的梅莎里娜为例，只要不犯下重婚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任何女人而言都是再美妙不过的了。克劳狄乌斯却做不到自己去选择自己的皇后。他是一个从未被女人的目光追逐的男人，一旦有了可以自己选择的权力时，不可名状的恐惧反而占据了心头。所以，秘书官们成为克劳狄乌斯选择皇后的任务执行人。

解放奴隶三人帮组成的秘书官，在反反复复算计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之后，最终决定，每人各推荐一名人选。把共计三人的皇后候选人送到

了皇帝面前。

纳鲁奇索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克劳狄乌斯的第二任妻子耶利娅·佩蒂娜，只是在生下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娅之后，最终两人劳燕分飞。

卡里斯杜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罗利娅·包丽娜，她是皇帝卡利古拉的第三位妻子，与卡利古拉结合不久就离婚了，他们也没有子嗣。

帕拉斯选出的皇后候选人是尤利娅·阿格里皮娜。为了区分与她同名的母亲，历史学家通常把他的母亲称为大阿格里皮娜，把她称为小阿格里皮娜。她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卡利古拉之妹。然而她是一个寡妇，她的前夫诺巴布早已去世。

这三位皇后候选人都在30岁左右，都出身于上流社会，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外貌都不相上下。可是就算只是从三位候选人中选一个人出来当妻子，克劳狄乌斯也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克劳狄乌斯命令三名秘书官说说为什么会推荐各自的人选。

纳鲁奇索斯推荐佩蒂娜的原因如下：佩蒂娜是克劳狄乌斯的前妻，重新做回妻子的话也不会给家庭带来巨大影响，再者她与克劳狄乌斯之间有一个女儿，所以她会好好照顾梅莎里娜留下来的两个孩子，做一个称职的母亲。

卡里斯杜斯推荐包丽娜的理由是：包丽娜本身没有子嗣，所以她会全心全意地养育两个孩子。当初她和卡利古拉离婚，是因为丈夫移情别恋，然而她是品行端正的人。此外，包丽娜被称之为罗马第一美女。如若克劳狄乌斯与前妻佩蒂娜重归于好的话，恐怕得意忘形的她会搅得家里鸡犬不宁。

帕拉斯推荐小阿格里皮娜的理由听似十分充分：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女，而日耳曼尼库斯至今仍

然保持较高的名望，娶她为妻，就能让尤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两大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其次，包丽娜膝下无子，估计是因为她不能生育，如果娶了她，恐怕皇帝也不能再得子嗣，可是已生有一子的小阿格里皮娜就没有这种缺陷。帕拉斯如此这般地一点破，恰如其分地点中了克劳狄乌斯这个男人心中的真实想法。

好笑的是，到了这份上，克劳狄乌斯还是无法下决断。发展到这种局面，皇后候选人自身的积极性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家出身的小阿格里皮娜有一个优势，即她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可是她想要嫁的人和她是叔侄关系，这层关系对她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

历史车轮前进到这时，罗马帝国终于出现了一位不满足于仅仅做权力者妻子、想要自己掌管天下的女人。时年34岁的小阿格里皮娜与她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一样，都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体内流着与奥古斯都相同血液的人。她一直坚信自己统治罗马帝国也是名正言顺的。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她根本不在乎采取怎样的手段，而且她还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自己写回忆录的女人，她比她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头脑更加聪明。

小阿格里皮娜曾是皇帝卡利古拉之妹，然而她不满足于此。她的盘算是先当上皇后，等克劳狄乌斯驾崩之后再成为皇太后，进而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当然，她也没想过为克劳狄乌斯生儿育女，在小阿格里皮娜心目中，皇位继承人早就有人选了，小阿格里皮娜12岁的儿子正是她以后摄政的傀儡皇帝人选。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就算是嫁给叔叔，她也根本不在乎。

小阿格里皮娜不断出招终于征服了克劳狄乌斯。可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叔侄结为连理的设想，这总得要给大家一个说法才行。这时，一直在旁辅佐克劳狄乌斯的维特里乌斯自告奋勇，说要为两位新人分忧。于是一场喜剧就在元老院议员和市民面前上演了。

维特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一同担任执政官，也是克劳狄乌斯在财务部门的下属，此前与克劳狄乌斯一起负责了人口普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在元老院议员面前这样讲道：

> 议员诸君，吾皇克劳狄乌斯肩负着统治整个帝国的重任，日常生活之苦累，为常人之难以设想。如此劳累之重任，唯有人替吾皇分忧家中大小琐事，才能使得吾皇从家中琐事里抽身出来，全神贯注于国家的治理事务之中。而能替他分担家庭事务的，除了一位任劳任怨的皇后，还能有谁呢？能够理解埋头于国家大事的皇帝，除了一位同甘共苦的皇后，还能有谁呢？吾皇自幼就遵纪守法，继位后又心无旁骛地专心政事，如此伟大的皇帝，难道不应当需要一位耐心听他诉说辛苦的皇后吗？难道就不需要一位养育年幼儿女的皇后吗？

听了这番慷慨陈词之后，元老院的议员一致点头应允。维特里乌斯的声音逐渐提高：

> 议员诸君，小阿格里皮娜身上流着的血有多么之尊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确实，和胞兄之女结为连理，这并无先例。可是，以前我国法律禁止表亲结婚，然而现在表亲结婚不是已经变得很常见了吗？

话虽如此，不过议员们还是觉得不妥，这可是叔叔与侄女之间的婚姻，加之两个当事人的身份门第，这件事的性质可就不是两情相悦的人结个婚这么简单了。不过，应对这个情况的场景剧早就已经被编排好了。这时，一位议员突然走到会场外，一群被打点过了的普通百姓就已经在外面等候着了。这些百姓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制定法律准许克劳狄乌斯与小阿格里皮娜叔侄两人结婚，随即这位议员开口高声呼吁要求元老院赶快出台法律同意。会议场外百姓的呼吁，即刻消除了场上议员们对

这件事的顾虑。

然后轮到维特里乌斯进行最后的表演，他转头面向克劳狄乌斯，这样问道：

“若是元老院和公民要求您与小阿格里皮娜结为连理，您会接受吗？”

克劳狄乌斯答道：

“我只是一位罗马公民，作为罗马帝国的主人元老院与罗马全体公民，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不能拒绝。”

至此这场喜剧圆满结束。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喜剧与悲剧总是会在古雅典与古罗马同一天不断上演。或许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人生并非由单一的喜剧或悲剧主导，悲剧与喜剧交错进行才是我们人生的真谛，而皇帝克劳狄乌斯的人生就正好诠释了古人的这一想法。

在摇身一变成为皇后之后，小阿格里皮娜可谓是百分之一百二地在利用克劳狄乌斯的弱点，克劳狄乌斯为了避免皇后在身边烦他，所以看也不看就会在皇后递来的文件上签字。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将自己升到“奥古斯塔”（Augusta）的地位。而“奥古斯都”（Augustus）是先皇的称谓，正如“恺撒”（Caesar）也是皇帝的称谓一样。它被先皇奥古斯都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奥古斯塔”在拉丁语中是“奥古斯都”的女性称谓形式。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在他的遗嘱中把“奥古斯塔”这个称号赐给了皇后莉薇娅。可是小阿格里皮娜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个称号。

接下来，小阿格里皮娜用自己的名字给城市命名，这不仅是罗马史上，甚至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疯狂做法。

由于古代文明的核心是城市文明，所以建设作为国家执政的“核心”城市就是摄政者们的首要任务。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之都，而以亚历山大大帝等皇帝名字命名的城市，还不仅仅只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处。此外，还兴建有恺撒利亚，是为了纪念尤里乌斯·恺撒，或是为了献给他的养子奥古斯都。提比略也有提比略城，克劳狄乌斯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就是靠退伍军人移民到行省兴建殖民城市，借以形成国家统治中心，这也是罗马自古以来的行省治理政策。在以罗马皇帝名字命名的城市，几乎全是由皇帝派遣退伍军人建设的殖民城市，这也就是为何鲜见以女性之名命名城市的缘由。

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时任8个军团的总司令，正在进行日耳曼战役，所以小阿格里皮娜出生在了今天的德国科隆市。由于这一地区是日耳曼民族实力强劲的乌比人的大本营，这一部族曾经在高卢战役中拥护恺撒。由于是友好部族的地盘，所以日耳曼尼库斯才放心把家眷安顿在此地。奥古斯都的左右手，小阿格里皮娜的外祖父阿格里帕，是将科隆作为罗马军队冬营地的第一位将军。

尽管这个地方与外祖父和父亲有极深的渊源，然而小阿格里皮娜却不能简单地以上述理由，外加出生地为借口，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罗马帝国在退伍军人移居到当地，并建设好殖民城市之后，才能冠上下令者的名字，这也一直是罗马帝国城市命名的传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小阿格里皮娜下令让退役的军人移居到科隆，并把这里升级成殖民城市，所以科隆在古代的名字是“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Agrippinensis），意思即为小阿格里皮娜的科隆。其实，“科隆”（Colonia）不过是拉丁文中意为“殖民城市”的德语的发音罢了。拥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这在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以后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荣耀，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也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了这份荣耀。

这种令人恶心的手段本应该引起社会哗然的，然而，元老院和公民居然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大家作出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是，“小阿格里皮娜”这个词本身就有与阿格里帕相同的含义，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小阿格里皮娜的殖民城市”，而是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阿格里帕的殖民城市”。原因之二是，莱茵河是罗马帝国军事策略中的防线，而莱茵河沿岸最具战略价值的是科隆，把这个城市升为以拥有罗马公民权居民为核心的“殖民城市”，作为前线基地，与罗马帝国的利益并不相悖。此外，对于科隆的殖民城市化，当地的乌比人也举双手赞成。虽然乌比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然而由于长期和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许多人与罗马士兵通婚，其实大家也都承认科隆实际上已经被罗马化了。如果科隆成为罗马的殖民城市，就代表着乌比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在将来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小阿格里皮娜的手段可谓巧妙，她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野心，还让自己的要求与国家利益融为了一体。然而，她也有女人特有的任性妄为的性格，她容不得任何女人胜过她，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她容不下和自己竞争皇后宝座的两个女人，特别是被称之为罗马第一美人的罗利娅·包丽娜。

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国内的占卜师靠替人算命赚钱。所以小阿格里皮娜就捏造了一个罪名，说包丽娜曾请占卜师替她卜了一卦，看看自己有多大胜算能跟皇帝克劳狄乌斯结婚。诉状交到克劳狄乌斯面前时，他照例毫无主见地就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小阿格里皮娜就把皇帝签了字的诉状交到了元老院。

诉状背后显然是皇后的阴谋，元老院的议员们自然十分清楚，然而因为克劳狄乌斯已经亲手签字了，所以也只好执行。元老院命令可怜的包丽娜只带500万塞斯特斯财产离开罗马。然而小阿格里皮娜这还不满足，不知道使出了什么阴招，最后逼得包丽娜自杀身亡，这才解了她的气。

小阿格里皮娜不是梅莎里娜。虽然在专横这一点上，梅莎里娜与小阿格里皮娜十分相似，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不像梅莎里娜那样任性与淫荡，小阿格里皮娜专横是因为她在冷静地按照计划前进，实现自己的野心。小阿格里皮娜既没有情夫，更是持家有道。此外，她也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尤其是对她那12岁的亲生儿子杜米提亚的教育，她更是周到细心。

哲学家塞内加

在罗马帝国首都，想要找到一位精通阅读、写作与数学以及东方通用语希腊语与西方通用语拉丁语的老师并非难事。然而，如何培养爱子杜米提亚具有帝王才能，小阿格里皮娜最为急切。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师从亚里士多德，她觉得有必要替儿子请一位哲学家来教他。仍然在科西嘉岛流放的哲学家塞内加，成为了小阿格里皮娜的最佳人选。

公元前4年，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的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后世研究者对他的评价极高，他们一致认为共和制时期罗马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当属西塞罗，而元首制时期罗马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则非塞内加莫属。虽然塞内加并没有出生于罗马本土，但他在罗马长大，幼年时期他跟随身为议员的父亲居住在罗马。虽然他的父亲是议员，然而因为出生于西班牙，所以只能算是罗马新贵。这些新贵对儿女的教育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塞内加家中的三个孩子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们家的三个兄弟中，尤以次子路奇乌斯最有才华。

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塞内加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不过长大后他也担任过帝国的公职。公元31年，这时已经是提比略摄政时期了，塞内加出任财务监察官，那时他大约35岁，这算是他为官生涯的第一步。

在罗马，只要担任过财务监察官，只要皇帝不表态反对，就可以获

得元老院的席位。进入元老院的塞内加，他的才华大放异彩，不过这却遭到了同样在辩论方面才华横溢的皇帝卡利古拉的厌恶。卡利古拉本想找个借口将他除掉而后快，幸而卡利古拉身边的人替他求情，说反正他也是将死之人，犯不着出手杀他，塞内加这才逃过一劫。当时才华横溢的塞内加是宴会上的常客，可能是每天都过着狂欢放纵的生活的关系，他似乎得了在现代被称为结核病的大病。由于大病，他反而平安地度过了卡利古拉时期，然而在克劳狄乌斯时代，他又得罪了皇后梅莎里娜。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才招致皇后的嫉妒，而是他是以克劳狄乌斯之妹为中心的反梅莎里娜派举办的聚会的常客，当然仅是这个理由是构不成流放之罪的。后来他因与皇家成员通奸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判流放。那是公元41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他应该在45岁左右。

塞内加是一位喜欢喧嚣生活的哲学家，早已习惯了罗马的风情，因而科西嘉岛的流放生活肯定使他无聊到了极点。不过这8年的流放生涯，给他送来了两份大礼：第一份礼物是，虽然他极不情愿放弃奢华的生活，然而在大自然里，素淡的饮食，每天规律的生活使他的病魔全消。第二份大礼是，在岛上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之中。随着小阿格里皮娜使用了点小伎俩，让皇帝赦免了塞内加的流放之刑，他才得以重返罗马。当塞内加回到罗马时，他的健康体魄甚至让老朋友们大吃一惊。

小阿格里皮娜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仅挑选塞内加给继位前的皇子施行帝王教育，而且还让他出任皇子继位后的辅佐官。也就是说，不得不文武兼备的罗马皇帝的“文”的培养就全权由塞内加担此重任。这么看来，小阿格里皮娜还得给皇子找一位教授“武”的老师。在其继位前指导武艺，在其继位之后负责安全。

小阿格里皮娜选择了塞克斯图斯·阿夫拉尼斯·布鲁斯负责皇子“武”方面的重任。塞内加是西班牙出身的罗马公民，而布鲁斯则是出身于南法的罗马公民。布鲁斯与在元老院中崭露头角的塞内加不同，他

是在军营中脱颖而出的一位佼佼者。布鲁斯从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一步升到了手下有800名士兵的大队长。历史学家蒙森把提比略提拔的行省出身的人才称为“提比略门徒”，布鲁斯就是提比略门徒之一。他虽然天赋不高，然而踏实稳重，非常有责任心，正是提比略欣赏的类型。布鲁斯在战争中失去了左臂，年纪可能比塞内加小五六岁。

可能小阿格里皮娜是打算在等皇子继位之后，再对塞内加另作安排，让他做皇帝的辅佐官，所以目前她给塞内加的正式职位只是元老院的议员。然而小阿格里皮娜清楚，如果布鲁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位，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于是她决定让布鲁斯担任近卫军团的长官。近卫军是由1万名精锐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的营地离罗马城中心不远，不仅如此，近卫军更是意大利本土唯一一支具有强劲战斗力的部队。

就这样，小阿格里皮娜给12岁的儿子安排了两位老师，才华堪称罗马第一的哲学家与比罗马人更英勇的将军来教育他。关于孩子要从小就开始培养这一点，小阿格里皮娜倾注的心血比谁都多，她就是想到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才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虽然如此安排，小阿格里皮娜选择的这两位皇子的老师，今后还得辅佐他的继位，却都并非罗马本土出生。他们有一个出生于西班牙，另一个出生于南法，可是竟然没有人觉得不妥。显而易见，罗马帝国不是单纯地支配行省，而是将行省当做是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帝国的一个有机体。

能左右皇帝克劳狄乌斯作决定的，当然不仅仅有小阿格里皮娜，还有被称之为“解放奴隶三人帮”——希腊奴隶出身的秘书官集团。如果他们站出来唱反调，小阿格里皮娜的计划肯定会胎死腹中。然而，小阿格里皮娜早就了解到这层利害关系，并没有忘记怎么出招。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拉拢帕拉斯，因为当时他推荐了自己。帕拉斯是“解放奴隶三人帮”中的一员，他有一个叫菲利克斯的弟弟。小阿格里

皮娜向帕拉斯保证会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实现他对弟弟的期望，并且付诸行动了——小阿格里皮娜动用才智，软磨硬泡终于让克劳狄乌斯同意派菲利克斯赴犹太地区担任行政长官。

这位解放奴隶出身的长官不负小阿格里皮娜的重望，非常出色地管理好了民情复杂的犹太地区。由此可见，小阿格里皮娜并非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这样，小阿格里皮娜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告一段落，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提高亲生儿子杜米提亚的地位。这一次阿格里皮娜和帕拉斯又配合得相当默契。而且小阿格里皮娜另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她深谙趁热打铁的道理。

尼禄出场

小阿格里皮娜在荣升皇后未满一年，即公元50年，她就成功说服皇帝克劳狄乌斯收自己的儿子杜米提亚为养子。当然，克劳狄乌斯早已有一位叫不列塔尼库斯的儿子，根本没有必要收小阿格里皮娜带来的孩子作为养子。然而小阿格里皮娜用下面这些话说服了克劳狄乌斯：

> 自从以那样的方式失去了生母之后，不列塔尼库斯就变得胆小怕事。然而，他现在才不过9岁，离长大成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他最需要有个人能把他当做亲弟弟一样来保护，而能保护不列塔尼库斯的，年长他4岁的杜米提亚是不二人选。现在把13岁的杜米提亚收为养子，将来让他和不列塔尼库斯的姐姐屋大维娅结婚的话，那么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血缘上，他们都是兄弟关系。这对将来要继承克劳狄乌斯的皇位的不列塔尼库斯而言，也等于是获得了一个得力干将。

不知道是被小阿格里皮娜说服的，还是禁不住她的逼迫，克劳狄乌斯只好签字同意了。反正皇帝克劳狄乌斯公开表示，要收妻子带来的这个比自己亲生儿子大4岁的孩子做养子，以后还要让养子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屋大维娅结婚。

此后，小阿格里皮娜把儿子杜米提亚·诺巴布更名为尼禄·克劳狄乌斯。“尼禄”在克劳狄乌斯家族出身的萨宾人的语言中意为“勇敢之男”，是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男性最常用的名字。

就在其精心策划之下，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正逐渐成为现实。次年，即公元51年，小阿格里皮娜在尼禄满14岁的时候为他举办了成人礼。罗马成人礼，是预示着这个人已经过了与奴隶和平民一样穿着齐膝短衣的年龄，可以享有穿着长及脚踝的托加的权利。获准穿戴托加就表示这个人可以在公众面前露脸了。一般而言成人礼是在孩子17岁的时候举行的，最早也没有小于16岁的。

除了被认可成年，年仅14岁的尼禄还获得了预备执政官的资格，言外之意，他只要满21岁就能拥有执政官的被选举的权力。与此同时，元老院还封给他“Princeps Uventus”的尊称，意为“皇帝接班人”。对于尼禄获得的封赏，在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时代曾经出现过，那时奥古斯都把这个封号赐给预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孙子们。

此外，小阿格里皮娜也不忘替儿子笼络人心，加强尼禄在百姓心中的印象。她以庆祝尼禄成年的名义，以尼禄之名，将数额不菲的钱分配给军团的士兵，同时还举办了角斗比赛，邀请百姓前来欣赏。与此同时，小阿格里皮娜依照计划让布鲁斯荣升近卫军军团长。小阿格里皮娜的种种手段，使皇帝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日益边缘化。

公元53年，在小阿格里皮娜的督促之下，尼禄与屋大维娅正式完婚。这时，他们又以尼禄已成年且婚姻大事尘埃落定为借口，时年16岁的尼禄终于跨入了元老院的大门。然而，此时的尼禄尚无正式的元老院

席位，所以他们又安排他请求元老院表决，通过以政策立案选调议员的方式立足元老院。

当然，在小阿格里皮娜与塞内加的通力合作之下，这个主意与演讲的内容已经形成，我们当然也不能轻视尼禄，时年16岁的尼禄也是一位年少有为、能力超群的少年。他的此次演讲共有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以特洛伊古战场而闻名的小亚细亚伊利欧斯人提出恳请罗马帝国能免除当地居民的行省税的议题。尼禄持赞成的态度发表了这个演讲，请求元老院们通过减免行省税的决议。他富有激情地讲道，特洛伊沦陷之时，罗马人从伊尼亚德逃亡到意大利的，回顾历史，伊利欧斯人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既然同宗同源，免除伊利欧斯人的行省税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于伊利欧斯是属于希腊语言圈，而罗马人又是双语民族，议员们不用人翻译也可以听得懂希腊语，所以尼禄就用希腊语向议员们演讲以示亲近。

第二部分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向最近遭受火灾的博洛尼亚人发放救济金的议题。博洛尼亚是罗马帝国境内的一座城市，所以这部分演讲尼禄就用拉丁文。尼禄说这次火灾波及范围广，光靠地方自治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国家有必要伸出援手。尼禄建议向博洛尼亚人援助的救济金额应为1000万塞斯特斯。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关于是否应再次给予爱琴海的罗得岛自治城市议题。这次尼禄又换用希腊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由于其祖先留下的丰功伟绩，罗马帝国赋予了雅典与斯巴达获得自治城市的地位，他们不仅内政自理同时也有免税权。然而，罗得岛人民也有过与这两个城市媲美的辉煌过去。由于雅典与斯巴达人民享有永久免税权，所以即使不认同罗得岛人民永久免税权，至少也应免除他们的行省税义务。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关于最近小亚细亚南部发生的地震议题。小亚细亚属于希腊语言圈，所以尼禄用希腊语发表了演讲。尼禄讲道，虽然

这个行省富庶，不需要国家的援助，然而为了帮助当地人民完成重建工作，他提议也应该对他们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

虽然议员们不需要翻译，然而不同的议题用不同的语言来陈述，这难免有太爱出风头嫌疑。尼禄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聆听演讲的议员们留下他年轻而又有教养、聪明而又富有领导才能的良好印象。大概议员们对尼禄的表现十分满意，他的4个提案都以赞成票占多数的情况被元老院通过了。尼禄的首次亮相圆满收场。

从尼禄首次出场我们可以看出，从提比略时代开始的罗马中央政府应对行省遭受灾害的措施，已经全面深入地融入了整个帝国的体系之中。中央政府会根据受灾情况的不同，实施不同的援助方式。中央政府在遇到灾情特别严重的地震时，会先行拨付临时援助款给受灾地区，用这笔资金进行紧急救援与重建当地的基础设施。虽然中央政府并未把救灾款项直接发到灾民手里，然而依受灾程度的不同当地人民也会享受3至5年的免税政策。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央政府除了负责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之外，当地人不用缴税，自己家庭的重建还得依靠自己。上述情况只针对行省人民，如若是受灾地主要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居民为主，或是由移居到当地的罗马人建设的殖民城市的话，除了原本他们不用缴税之外，援助款也会水涨船高。看来，将因地制宜这一理论运用到极致的，非罗马人莫属。

晚年的克劳狄乌斯

公元53年，克劳狄乌斯已经年满62岁了，然而他是绝不会无度地放任皇后小阿格里皮娜的野心不断膨胀的。克劳狄乌斯还有着统治罗马帝国的热忱，而首席秘书官纳鲁奇索斯早就看不惯小阿格里皮娜的专横跋扈，也想在克劳狄乌斯身旁帮助他继续摄政。

罗马帝国发起的不列颠战争已经前前后后持续了10年时间，已经基本上控制了英格兰的局势，而至于威尔士的战况在军队进入山区之后，一度遭受了很大的挫折。罗马帝国每隔几年就按批次地把一些能干但称不上天才的总司令派往前线，这种做法可谓是下下策。此外，根据罗马目前的实际情况，它能调到威尔士前线的兵力也只不过3至4个军团，导致了战争屡次三番不能胜利收兵。先不提克劳狄乌斯的军队后勤工作怎么样，他甚至连治军的经验都从未有过，这样一来，可以说他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然而，罗马军队进行的征服不列颠战役并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战争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顺利的，这是由于有很多的优秀人才，如后世的皇帝韦斯帕芗，就是从军队中成长起来的。

而罗马帝国西方的另外一条防卫线，莱茵河与多瑙河防御可以用“坚持”这个词来形容。作为罗马帝国的同盟国，色雷斯王国一直以来都替罗马帝国肩负着多瑙河下游地区的防御任务。这个王国发展到提比略时代王室已经后继无人，之后就被罗马帝国纳为行省。在那种情势下形成的提比略边防体系，在已经延续使用了30年之后还发挥着良好的作用。连在黑海一带出没的海盗，对这一防线也是谈虎色变，不敢轻举妄动。显而易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边境地区。

在南方的防线上，罗马帝国也确保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沙漠另一端的游牧民族会突然进行袭扰，扰乱北非的稳定与安全。不过罗马虽然失去了一直扮演缓冲角色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在南方边境线也只派驻了一个军团的兵力。此外，罗马还积极组织当地行省居民编成辅助军团，让他们保家卫国，抵御外敌。

东方地区是摆在罗马帝国的安全体系问题中，最为棘手也是最难全面解决的重大课题。当然，这倒不是以敌人的文明发展程度来划分的，因为罗马帝国的西方是落后的蛮夷民族，而东方的对手则是高度文明的帕提亚王国。自共和制时代起，罗马保障东方地区安全的策略，就是在罗马的庇护下支持一批中小型的君主制国家，让他们连成一线形成罗马

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君主制国家国内局势十分复杂多变，经常因皇位继承而爆发政变，从而使得罗马帝国东方陷入动荡之中。此外，如若这些君主制国家王室之间互相联姻，一个国家发生内乱，其他国家就会出兵干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实罗马帝国最大的假想敌帕提亚王国，因国王去世引发政局动荡的变故也时有发生。不过罗马帝国对发生内战的帕提亚王国采取的政策通常是，不乘人之危、作壁上观的态度。然而最令罗马帝国头疼的是，每一位继位的帕提亚新国王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势，都会约定俗成地出兵，袭扰罗马帝国的邻国亚美尼亚王国，而亚美尼亚王国是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网上的重要屏障。公元51年，帕提亚王国又一次进攻亚美尼亚。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也感受到了威胁的逼近，此时，叙利亚总督飞鸽传书向克劳狄乌斯紧急报告，称罗马帝国不可能躲过烧来的战火，应随时准备应战。然而，克劳狄乌斯正忙于收尼禄为养子，称这不过是件芝麻大的事情，不用慌张而弃之脑后于不顾。不过幸运的是，帕提亚举兵进攻亚美尼亚，到了冬季受不住严寒就撤兵了，次年春天也未再动干戈，这起战事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收场了。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罗马帝国更加意识到注意帕提亚王国的一举一动的必要性。

此外，罗马帝国面对的另一个东方难题，就是如何管理犹太人的问题。对一直以自我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被罗马同化的犹太教徒，克劳狄乌斯也继续采取了罗马自古以来对犹太人的做法，即只要他们不反抗罗马的统治，就不干涉他们的特殊性。此外，克劳狄乌斯还认为对犹太人的统治就应该交给犹太人负责。所以他任命希律·阿格里帕统治整个犹太地区。公元44年，希律·阿格里帕逝世，由于他的儿子阿格里帕二世过于年幼，罗马帝国收回了统治权，直接管辖这一地区。

公元50年，克劳狄乌斯决定再次把犹太地区的统治权委任给成年的阿格里帕二世。然而，这位年轻的国王虽继承了他父亲的统治热情，却是一个平庸之辈。克劳狄乌斯意识到阿格里帕二世的平庸无能，不相信

他能够统治整个犹太地区，于是把犹太地区一分为三，让阿格里帕二世治理其中的一个区域，而派遣另外两位总督治理剩下的撒玛利亚与加利利区域。阿格里帕二世与两位罗马总督开始了短暂的统治。而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并未划入这三个区域，而是由罗马直辖。然而，这种安排也埋下了隐患，要求神权统治的犹太人，与要求将宗教和政治分开的罗马人混居，就好像在他们之间埋下了炸弹，加之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矛盾的长期存在，使得这一地区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显而易见，中东“火药库”古已有之。

克劳狄乌斯一般接见受命赴任外地的官员。而包括总督、执政官与军团长在出发之前，都会先觐见皇帝，表达对皇帝委以重任的感谢，并与之辞行。克劳狄乌斯面对这些官员通常会这样回答道：

“站在我的角度，你们替我分担统治帝国的重任，让我减轻负担，我才应该感谢各位。”

经常会有人纳闷，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如此大费周章，或是扶植中小君主专制国家，或是安抚犹太教徒来统治东方地区呢？为何不直接统治这些地区呢？按照罗马当时的兵力与实力，要想这么做的话根本不在话下。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一点是，若是罗马帝国把这些地区行省化了，光靠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要想维持这个地区的行省的安全，几乎是天方夜谭。再说负责整个罗马帝国防卫的25个军团共15万人加上与正规军数量相同的辅助兵，就是罗马目前能养得起的全部兵力。当年决定远征不列颠时，克劳狄乌斯也只敢增加了2个军团。若是罗马帝国继续扩大军事实力的话，就需要“挤”出大批的军费作为基础。而最有效的“挤”法就是增加行省税。然而，任意增加税收必然会引发行省人民的暴动，然后罗马就得出兵平定暴动，这样一来又得增编军队，最终结果就会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之中。当然，罗马是绝不允许自己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的。

拥有罗马公民权是加入罗马军团的必备条件。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

奥古斯都打造了25个军团共15万名士兵的庞大军事力量。当时罗马公民（17岁以上可以服兵役的男性）总数为500万人，到了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罗马可以服兵役的公民增加了100万人，达到600万人。照增幅计算的话，可以把军团扩充到30个，将士兵人数增加到18万人。然而提比略在其在位的23年间，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他始终没有扩充军事力量。克劳狄乌斯在决心远征不列颠之后，也仅仅扩编了2个军团共1.2万名士兵。在成功称霸不列颠后，克劳狄乌斯认为在当地只派驻2个团的兵力已足够，就又把罗马帝国军团的总数缩编为25个军团的规模。

不论是奥古斯都、提比略，还是克劳狄乌斯以及之后的皇帝们有着和现代专家们一样的看法，“security”（英语）一词的语源即“安全”（securitus，拉丁文），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安全保障，而是指以各种手段实现的安全保障。换言之，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就能构建社会安全的观念。也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并没有改变本土及首都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策略。

公元51年，恶劣气候阻断了海上交通，影响到了小麦的进口。首都台伯河畔与奥斯提亚这两处仓库里库存的小麦只能维持15天的供应。

在库存的小麦只够供应15天的消息传出以后，罗马居民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不仅仅是市场上小麦价格大幅上涨，而且贫民们也十分担心，原本免费分发的小麦会中止发放。由于保障“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是皇帝的两大重责，所以遇到这样的天灾，愤怒与责难的矛头往往都会对准皇帝。针对罗马帝国这种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政策，历史学家塔西佗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

此时，克劳狄乌斯下令把各地的小麦集中到罗马，此外随着天气转好，在发生民众抢粮之前问题就被解决了。然而，这样临时性的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皇帝采取临时对策应对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不过，出现这样的粮食危机，光是指责小麦依赖进口这一国家政策，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

早在罗马共和制时代，由格拉古兄弟推动《农地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着眼于奖励自耕农（个体农民）的积极性，这部法律最后在尤里乌斯·恺撒正式颁布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罗马帝国的粮食危机。用时髦的说法，这部法律正如现代政府热衷于扶持中小型企业一样。此外，格拉古兄弟还推行了另一项政策，就是针对罗马贫民阶层的社会福利性法律《小麦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免费向贫民发放小麦。

曾经担任过护民官的格拉古兄弟，以及打下了元首制基础、担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有着社会中下层出身人民的强大民意基础，才推动了对这些政策重视程度的提升。而议员阶层是既得利益的大地主阶层，世世代代享受着元老院的议席，可谓是中下层阶级的对比阶级。美国学者中甚至有人并非开玩笑地说道，前者就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而后者则是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当然，后者是以元老院为主导的支持共和制的人为主，所以理解成为共和党也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美国的两大党派，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党派一样不能单纯地划分成左派和右派，显而易见，罗马的“两大阵营”也不能简单地在政策上一分为二。这是由于大多数的罗马人比起意识形态来讲，更加看重治理能力。

坚持元老院体制的人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保全握在手中的利益，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理论武器在于共和制这一意识形态。这一派理论家的代表人物有西塞罗，此外，还有因崇尚这种理念，而刺杀了恺撒的议员布鲁图。

虽然，在恺撒打倒了共和派之后，他最终还是被共和派谋杀身亡，但共和派最终还是败在了恺撒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奥古斯都的手上。就这样，罗马进入了元首制时代。如果用当今的美国来打比方，就是美国进入了“民主党”连续执政的时代。古罗马的“共和党”只有在元老院中拥有过半数的席位，也即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形成反抗皇帝的势力。然而，皇帝这一方也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左派政权。

罗马与迦太基发生布匿战争后，西西里岛被罗马纳入帝国版图，之后西西里岛出产的小麦就大量涌入罗马帝国本土，这对本土的农民而言，可谓是第一次冲击。居住着众多希腊人的西西里岛上大型农场发达，而且西西里岛产的小麦比意大利出产的小麦便宜，所以本土产的小麦就失去了竞争力。格拉古兄弟本来打算要强行推行、但由于遭到暗杀而被迫中止的《农地法》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面临生死考验的本土农民。

当然，不能把古罗马人冠以头脑不灵活这一看法，他们也不会只给自己留下唯一的选择。既然本地产的小麦没有竞争力，那就改种其他有竞争力的作物。意大利半岛虽没有辽阔平原去大量种植小麦，它的地势却适合广种葡萄与橄榄。虽然不是粮食作物，然而这些农作物在市场上极具销售潜力，也推动了意大利农业的再次复苏。根据恺撒制定的《农地法》形成的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中心的形式，恢复了意大利本土的农业。然而主要粮食小麦依靠进口的体制，在本土农业复苏后也一直没有任何改进，这又是为何呢？

倘若一定要用现代的说法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其实就是把问题交给市场自行调节。当然，这也是罗马人统治帝国的一种策略。罗马人的出色之处在于不会凡事都依靠自己去处理，如果有其他人办得到就会把事情交给那个人去处理。既然有更适合种植小麦的辽阔土地，那就让那个地方种植小麦，到时再把那个地方的小麦进口过来供自己食用。这就是罗马人的想法。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本着这样的想法，加之不能只将精力放在本土，而是必须要放眼整个帝国的元首制时代的到来，自然就导致了粮食自给自足这一目标被搁置到一边的结果。

罗马帝国境内自耕农奖励的对象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农民。在罗马，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奖励自耕农的同时也是一种拉拢选民的策略。不过行省的人民不在奖励的范围之内，行省的农

业，一般是罗马人雇用当地人经营的大型农场模式，所以就算不给当地人农耕奖励，也不用担心会对选票造成影响。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现代社会的跨国企业，其实早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就已经出现了，因为行省的大农场的运营就是雇用廉价的奴隶与行省人来维系的。

发生于提比略晚年的金融危机，用现代的话而言就是“信贷危机”。为何这么说呢？金融业界的人不愿意放贷的对象不是行省的大型农场，而是帝国本土的自耕农。当时提比略采取的对策是，坚决执行恺撒制定的关于信贷的法律，即金融界融资的一部分资金必须要对本土投资。另外提比略还拨款1亿塞斯特斯，实行3年无利息借贷，援助本土的中小型企业，以避免本土农业走向泡沫的现象。

即使大环境十分不利，然而本土农业还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原因就在于改种其他农作物，并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品质。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印度国王将胡椒等香料出口到罗马帝国，意大利出产的高级葡萄酒却摆满了他们的餐桌。

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罗马帝国粮食依赖进口是出于统治策略上的考虑，是不能随意变动的，皇帝们能做的，只有努力保证本土小麦的供应。譬如提比略经常留心小麦的供应量，卡利古拉则补偿破损的小麦运输船只，而克劳狄乌斯做的是建造大型海港，改造奥斯提亚湾。历史学家塔西佗之所以对小麦进口政策口诛笔伐，其根源在于他只盯着粮食安全，忽视了国际政治的现实。

不管怎么样，即使连人口超过百万的罗马城都没有出现过因为饥荒而人口锐减的情况，意大利本土也从未发生过要求粮食的游行示威。然而，如若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估计皇帝的宝座也坐不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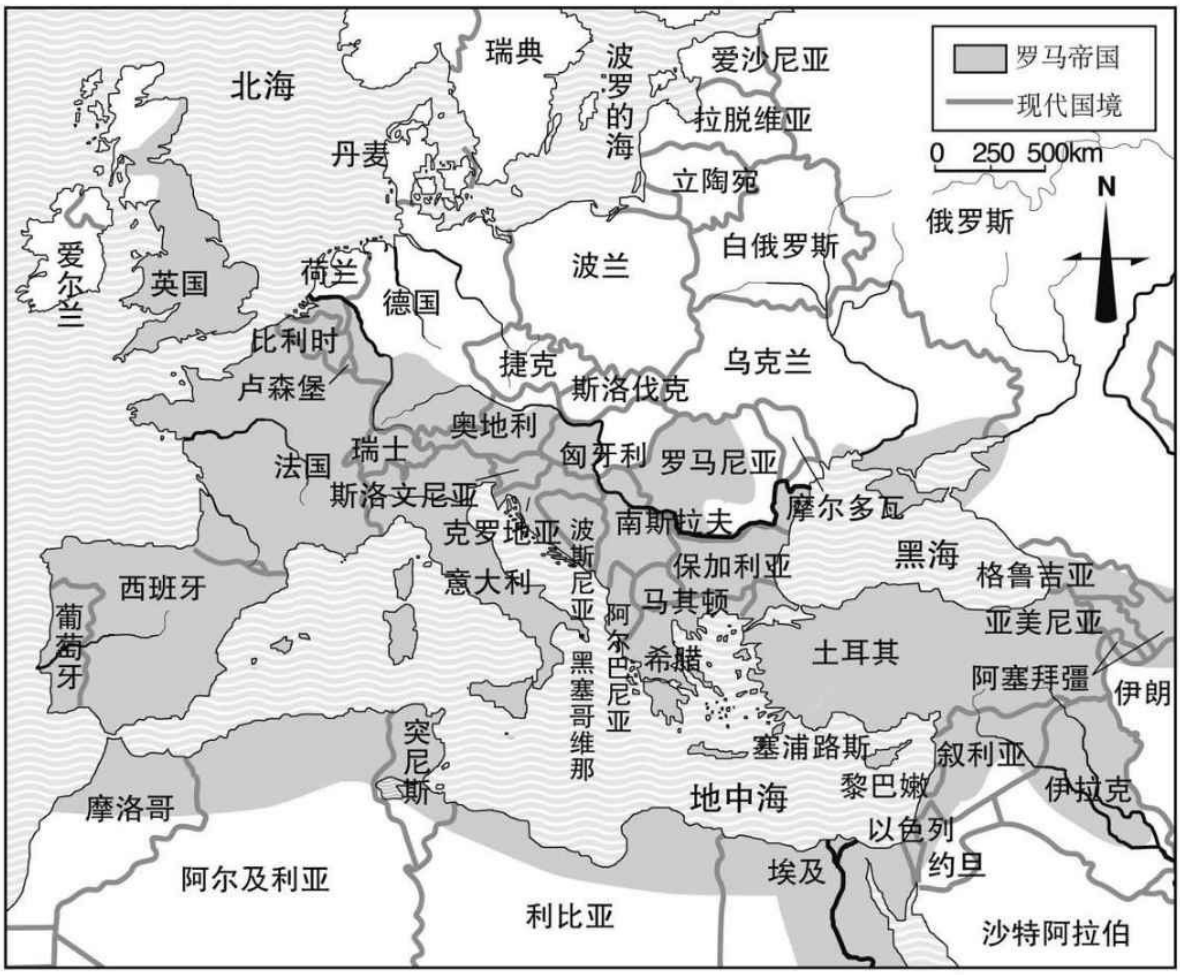
在罗马人眼中，皇帝的责任即国家的责任，除了保障罗马帝国的“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之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义务。提比略不仅保障了“国家安全”，还保障了“粮食安全”，然而人

民对他的评价仍然不好，因为提比略为了健全国家财政体系，采取了紧缩财政支出的措施，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了牺牲品。到了克劳狄乌斯时代，克劳狄乌斯不得不去收拾卡利古拉造成的财政崩溃的烂摊子。然而，当时正处于太平盛世，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没有必要用像提比略那样紧缩财政的手段去保障国家与粮食安全。此外，作为历史学家，克劳狄乌斯深谙基础设施工程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

公元52年，由卡利古拉动工、克劳狄乌斯续建的两条引水渠工程都已完工。罗马的基础设施工程一般都会以发起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然而罗马人都想忘掉卡利古拉，所以这两条水渠就被命名为“克劳狄乌斯水渠”。2000年之后的今日，在罗马近郊的平原上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条水渠的遗迹。

除了剩下的最后的输水工程，奥斯提亚的海港建设工程也接近尾声。而此港口一旦建成，这里将会是地中海地区设备一流与船只停泊量第一的大型港口。

克劳狄乌斯在本土还实施了另一项公共工程。他要抽干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富基努斯湖的湖水，把它变成耕地，然而，这项工程中途夭折。由于引流渠运河没有完工，使得湖水泛滥成灾，最终出现了人员伤亡。本来是要恭迎皇帝出席的运河竣工庆祝典礼之处，变成了纳鲁奇索斯和小阿格里皮娜在皇帝面前相互指责的地方。小阿格里皮娜指责负责整个工程的纳鲁奇索斯私吞了部分工程款，修建豆腐渣工程。虽然纳鲁奇索斯是解放奴隶出身，然而自恃常年替皇帝代行政务，面对皇后的指责，他当然不会缄默。他回敬了皇后一句：“什么都不懂的女人给我闭嘴。”夹在两个人中间的克劳狄乌斯则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项恺撒规划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在经历了1850年之后，才在19世纪正式完工。现今望着眼前的一大片耕地，的确很难想象当时曾是一片波光荡漾的湖泊。如若当时古罗马也有环保人士的话，要完成这项工程恐怕比登天还难。



罗马帝国版图全盛时期（五贤帝时代）

不过，纳鲁奇索斯会向皇后回嘴道“什么都不懂的女人给我闭嘴”也不奇怪。在小阿格里皮娜专心于让她的儿子尼禄在元老院的议员面前露脸的时候，身为首席秘书官的纳鲁奇索斯正忙于协助皇帝处理那些平凡琐屑的政务，这些政务虽没有公共工程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少了这些工作，帝国就无法支撑下去。当时纳鲁奇索斯协助皇帝做的“平凡琐屑”的工作之一，就是对拜占庭人民提出的减税要求作出回应。

公元1世纪，君士坦丁堡（英语为Constantinople），也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虽有罗马帝国的出入黑海要道这一特色，然而，它只不过是

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市。当时，虽然当地并未发生地震，也没有发生火灾，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君士坦丁堡人民向克劳狄乌斯请求减免税收。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克劳狄乌斯决定免征当地居民5年的行省税。减免行省的税收，在免税期间要居民自己想办法恢复经济，是罗马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免税措施的施行，原因是地震、火灾、洪水等天灾也好，还是经济不景气等人为因素也好，都不会发生改变。

克劳狄乌斯逝世

克劳狄乌斯在公元54年的秋天已经度过了63个春秋，而罗马帝国在他的统治之下也经历了13个年头。虽然克劳狄乌斯从未奢求过帝国的皇位，然而现在，他甚至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摄政的13年间他全心全意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富基努斯湖水的排干造田工程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耗费他多年心血的奥斯提亚港工程完工在即。在克劳狄乌斯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另一方面，小阿格里皮娜的阴谋也已经万事俱备。也就是说，她需要借助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身份所做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皇帝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再者，如果等皇子长大成人，能自理国政时，她自己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恰好就在此时，对克劳狄乌斯最忠心耿耿的纳鲁奇索斯身体抱恙，从罗马到那不勒斯近郊去修养。对小阿格里皮娜而言，此时下手可谓是天赐良机。

历史学家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小阿格里皮娜给喜欢吃菌类的克劳狄乌斯食用了毒菌。克劳狄乌斯在吃下毒菌后并没有立即发作，到了深夜，毒性大发，就这样命丧黄泉。

然而，对于克劳狄乌斯之死，并没有立即公之于众。次日，即10月13日正午，皇宫之门大开，近卫军军团长布鲁斯率领1000名近卫军拥戴着尼禄出现了，直到此时克劳狄乌斯的死讯才公之于众。

在近卫军团的拥戴之下，尼禄径直奔赴罗马近郊的近卫军营地，他受到了近卫军士兵们“万岁”的高呼。似乎是13年前克劳狄乌斯继位时的情形再现，尼禄向近卫军士兵们保证，将会给这些士兵每人发放1.5万塞斯特斯作为奖赏。

近卫军团拥护尼禄的消息传到元老院之后，议员们立即决定将皇帝所有的权力赋予尼禄，这也与13年前的情形如出一辙。

然而，尼禄继位较13年前克劳狄乌斯继位时不同之处在于，充斥在元老院的氛围，与得知尼禄继承皇位消息后罗马公民的反应，不论是议员们还是罗马公民都乐见这位17岁的年轻皇帝继位。议员们高兴之处在于，今后他们再也不用忍受解放奴隶出身的秘书官们目中无人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是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一直受制于妻子的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的国丧吊唁词由塞内加亲自执笔，由尼禄诵读。然而，据说当尼禄读到吊唁词中称赞克劳狄乌斯处事慎重、殚精竭虑这一段时，议事厅台下哄笑声一片。

将已故的克劳狄乌斯神化，就是尼禄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份议案。正因为如此，才让克劳狄乌斯和凯斯与奥古斯一样并列为“神君”。然而，在大家看来，其实这都是小阿格里皮娜在背后指使尼禄才有这份提案。而这份提案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通过将克劳狄乌斯神化这件事转移大家怀疑小阿格里皮娜弑夫的注意力。虽然克劳狄乌斯死后追封，他的遗嘱却没有被公之于世，也没有人提到遗嘱的事。由于皇位继承人不是尼禄，所以不敢公布遗嘱，历史学家们这样断言。

既然追封克劳狄乌斯为“神君”，就要建造供奉他的神殿，供奉他的神殿却没能像恺撒与奥古斯都的神殿一样，建在罗马城中央的罗马广场中，而是被盖在了罗马“七丘山”里没有重要建筑物的山丘之巅。后来，由于负责这项工程的尼禄一开始就无心修建神殿，所以神殿在中途被搁置了下来。

或许在罗马人看来，尼禄这种做法虽然对兢兢业业的克劳狄乌斯有点不公道，然而若要将他和恺撒与奥古斯都摆在同等位置，确实也有点过头了，所以在罗马的历史上被尊称为“神君”的，除了恺撒与奥古斯都之外别无他人。

虽然皇帝克劳狄乌斯死后被追封为“神君”，但仍旧逃脱不了被人当成笑料的命运。在嘲笑克劳狄乌斯的人中，做得最过分最狠毒的莫过于尼禄的老师，即随后出任尼禄皇帝辅佐大臣的哲学家塞内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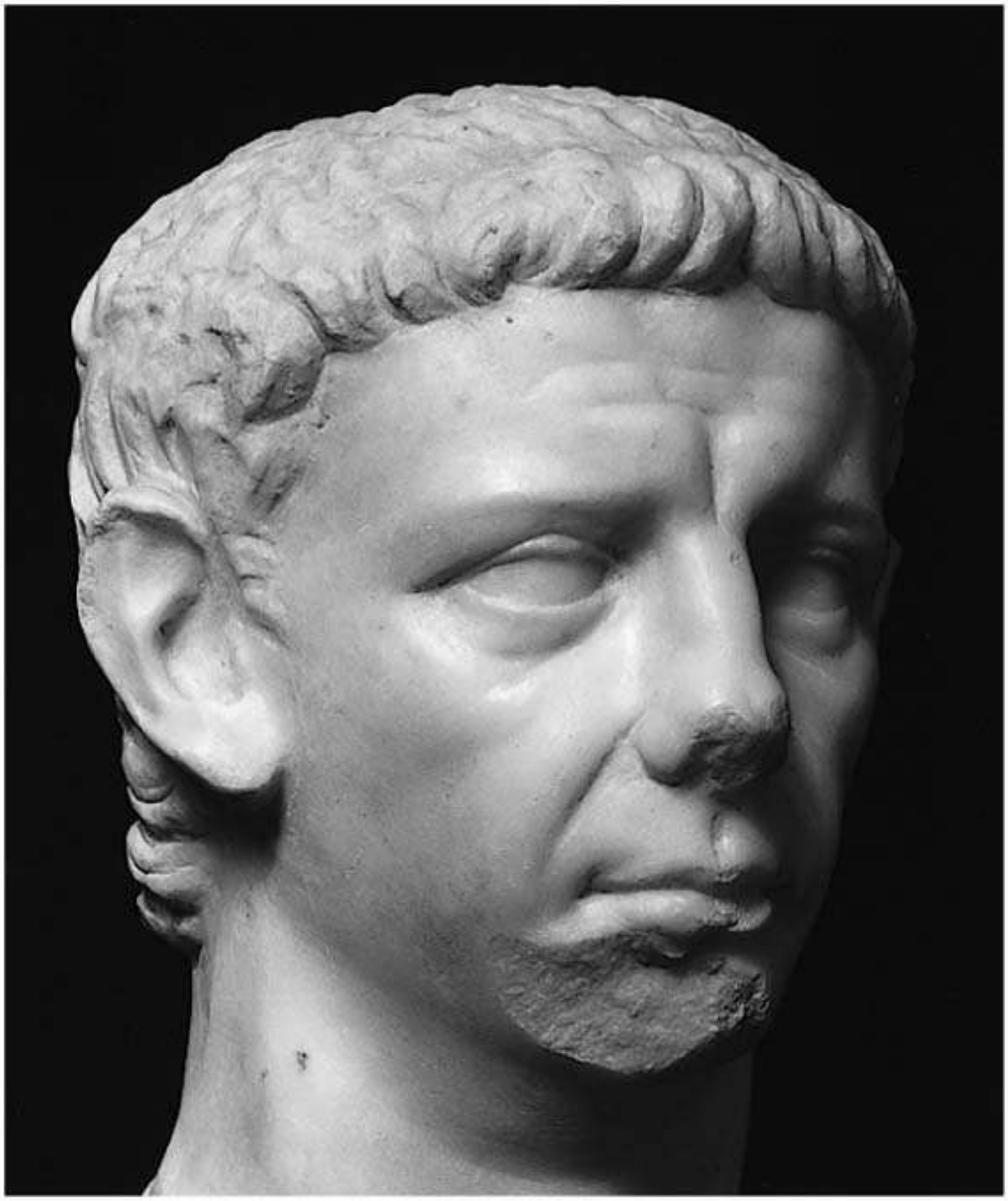
塞内加是罗马元首制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悲剧作家，他在当上尼禄的辅佐大臣之后，是罗马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位参与国家政治的人。为了嘲弄皇帝克劳狄乌斯，他甚至发表了一篇名为Apokolokyntosis的文章。

在现代，研究者们也百思不得其解这个“Apokolokyntosis”一词的意思。然而，从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内容来看，似乎可以理解成“被拒绝的神君”。大体是描写克劳狄乌斯死后，接受众神的审判，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配“神君”这个称号的皇帝，最后由神君奥古斯都判他有罪。所谓的讽刺性文章，如果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体味到它的好笑之处，所以现在出版的Apokolokyntosis，比原版的“注解”要多很多。不过当时这篇文章就算没有很多注解，听的人也会觉得很好笑吧。塔西佗盛赞塞内加“有卓越的文采，拥有符合所处年代趣向的感性”。这种讽刺性的文章，如若不在事情发生后立即撰写，那么最好永远都不要写了，所以可以推断这篇文章是在10月13日克劳狄乌斯驾崩后就开始写了。从12月17日开始的罗马农神萨图努斯祭祀这一段时间是罗马人的“假日”（vacances），估计尼禄在出席祭祀典礼的时候就朗诵了这篇文章，在座的众人也肯定被内容逗得爆笑吧。然而，我在时隔2000年之后才读到这篇文章，除了感受到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身上最常见的现象，即缺乏对人性的关怀之外，别无其他感想。

然而，克劳狄乌斯自身也并非无可挑剔。一个从小到大就不被人尊

敬的人，自然不能理解被人尊敬所带来的涟漪效应及其重要性，所以他才会一心认为只要兢兢业业地做事，就会获得别人理解。

人性往往是没有那么容易暴露的。在我看来，在大多数人类的内心深处实际是希望被舒服地欺骗。其实，皇帝克劳狄乌斯不就是一个擅长舒服地欺骗他人的超人吗？而恺撒与奥古斯都都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达人。他们后来成了罗马史上令人无比敬仰的“神君”，在世界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明星”，难道此类事实不正好证明了人性的这一面吗？



克劳狄乌斯

在克劳狄乌斯63岁时，小阿格里皮娜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使得罗马帝国一代皇帝成为牺牲品。然而，克劳狄乌斯与世长辞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没有尽职到最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记载道，晚年的克劳狄

乌斯出现了衰老迹象。我觉得克劳狄乌斯的衰老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是到了一定年纪的缘故，而是这13年来的摄政生涯心力交瘁的缘由。提比略在位的23年，差不多是克劳狄乌斯的2倍，不过这是因为他隐居到适合保养自己身体的卡普里岛长达10年之久，才保证了他这么久的在位时间。可能有人会反驳，奥古斯都在位40余年，那是因为他不是个简单的人，也即奥古斯都并非淳朴而脚踏实地之人。

与提比略不同，克劳狄乌斯经常出席元老院的例会，要求议员们积极参与国政商议，他还经常出席法院听审，虽然人们批评他说皇帝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甚至还引起了陪审团的厌恶，然而他都不理会，继续频繁地出席。其实他内心深处希望法律能够惩恶扬善。克劳狄乌斯在这样尽心尽力地努力了13年之后，难怪他会耗尽心力。克劳狄乌斯被害的确令人感到遗憾，然而死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就算克劳狄乌斯死后，真的会被传唤到罗马的众神面前接受审判，也应该会可怜他吧。此外，我也深信奥古斯都一定不会降罪于克劳狄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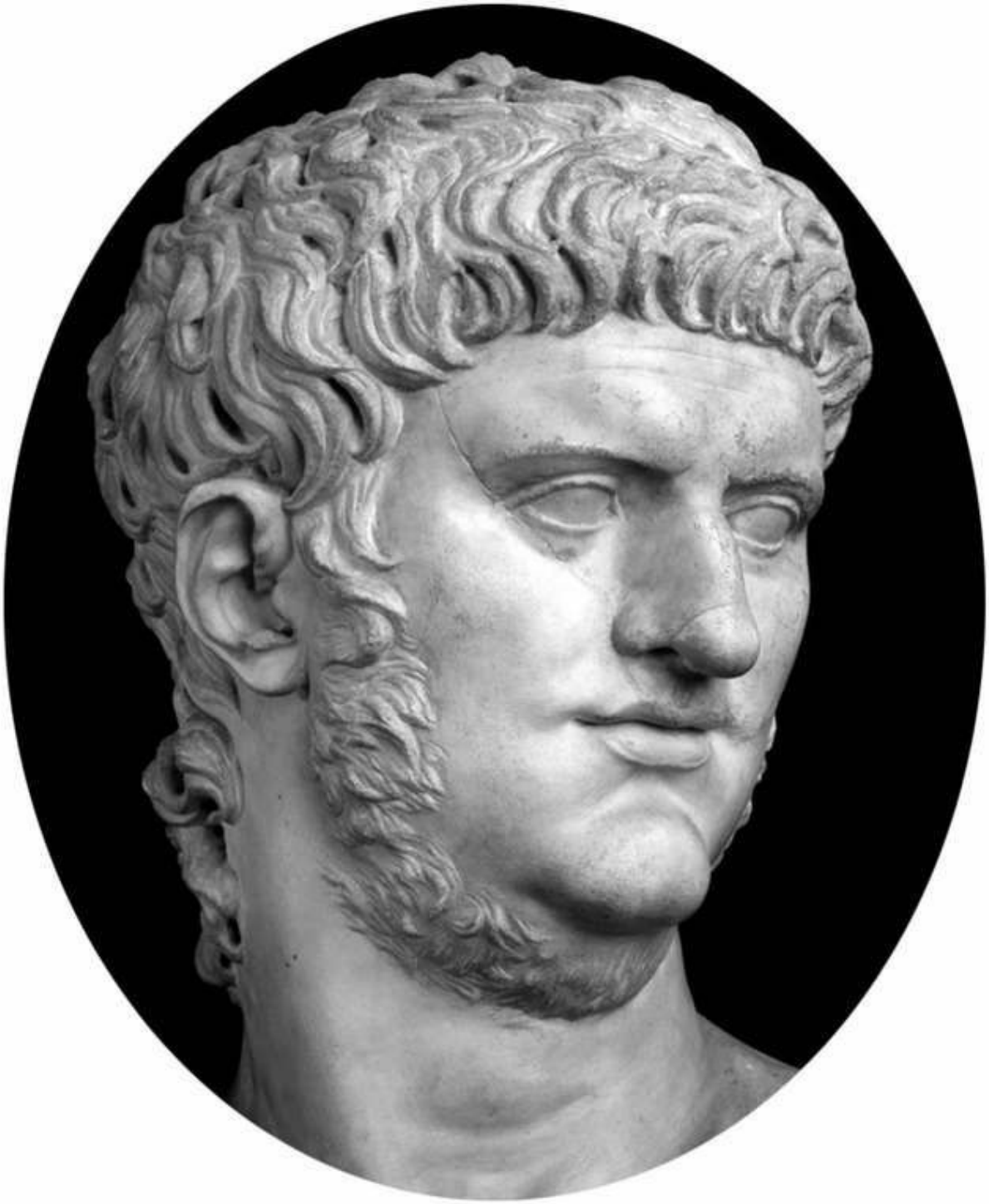
对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直忠心耿耿的解放奴隶纳鲁奇索斯此后的行踪，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有研究者认为他用全部的财产换得生存，在帝国本土南方过着平民般的生活。也有人认为他最后死于监狱之中。不管是哪一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当塞内加文采洋溢讽刺克劳狄乌斯的文章，被尼禄大声朗诵的时候，纳鲁奇索斯的同僚帕拉斯在下面聆听之际，纳鲁奇索斯一定不在他的身旁。

当代的研究者中有人持这样的观点，纳鲁奇索斯之所以会前往那不勒斯附近休养，并非是出于身体上的不适，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才导致了他逃避现实。这样看来，大概纳鲁奇索斯与克劳狄乌斯一样，都为帝国心力交瘁了。

第四章

皇帝尼禄

（54年10月13日—68年6月9日在位）



少年皇帝

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时，时年16岁零10个月。当时，罗马规定年满30才有资格担任公职。因此，由一位年轻的皇帝接管罗马帝国在罗马历史上非常罕见。如若罗马当时存在大众媒体，或大众传播媒体最擅长的民意调查的话，那么刚刚即位的尼禄可能与卡利古拉继位时一样，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尼禄与卡利古拉继位时面临的情形十分相似，他们前任皇帝的摄政并未出现极大的失误，也未出现政局不稳、财政拮据、怨声载道的情况。毕竟，罗马帝国皇帝的两个首要工作即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尼禄继位时并未有这方面的顾虑。

然而，人不会因为不存在困难就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人性现实的一面往往是在细枝末节中挑剔万分，并把这些瑕疵当做不满的借口。正因为我们必须和这些人打交道，丸山真男先生才会有“政治就是高难度的欺骗”这样一句名言。普通公民欢迎尼禄继位，只是希望转换心情而已；而元老院支持尼禄继位，则是期待他能够废除令议员们长期不满的解放奴隶主导的秘书官体制。

年轻的新皇登基毫无疑问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想看，先皇年逾花甲，行动迟缓，演讲时又喜欢引经据典，就像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说教的历史学家。然而，现在的新皇帝是10余岁的少年，他朝气蓬勃又不失稳重，并且谈吐不俗，这自然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然，元老院对秘书官制度颇有微词也有一定的缘由。克劳狄乌斯刻意安排解放奴隶加入“骑士阶级”，正是这种做法使得议员们非常不满，因为骑士阶级是罗马帝国仅次于议员阶层的第二阶层。况且，罗马历来重视前线的后勤工作，所以，在议员们看来，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

借口，以纳鲁奇索斯为首的秘书官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皇宫之内。

话说回来，秘书官制度被当代学者公认为是幕僚制度的发端，所以这一制度在当时应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各个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加在皇帝身上，仅凭皇帝一己之力不可能圆满解决。虽说元老院对秘书官体制牢骚满腹，却能够接受议员参与朝政的辅佐官制度。塞内加从其父辈开始，就一直属于议员阶层。因此，这位学识渊博的议员，愿意担起辅佐皇帝的重任，对于个中内情，他比别人更加清楚。

尼禄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了由塞内加亲自撰写的“施政方针演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

二、对于元老院所持有的权力，予以尊重。

三、司法独立，皇帝不得干预。

四、将“Domus”（私宅）与“Res publica”（国家，此处意译为“官邸”）分开。

上述四项内容被这位年少的皇帝下令刻在铜板上，并规定每年年初新任执政官就任时必须予以宣读。

同时代的罗马人，或者不同时代、但同属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他们只要听到这些内容都能够心领神会。然而，我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灭亡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说明。因此，在聆听到第一条的时候，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尼禄所谓的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指政体实行共和制，也即由“第一公民”实际统治罗马公民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所谓“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元首政治”，因此，罗马人无法理解这种制度并不奇怪。这种体制正是奥古斯都创造的“精致的

虚构”（delicate fiction）。正如恺撒所言，大多数人都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现实，显而易见，元老院对尼禄宣布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时自然欢迎之至。

只要认真一思考的话，提比略、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在继位不久，都纷纷表示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然而，包括尼禄在内的4位皇帝，后来无一例外都饱受来自元老院的诟病。如果说他们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即位时的宣示，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此后元老院会对他们指责不断。但在我看来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此，虽然他们宣称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可他们是否具备让“精致的虚构”正常运行的冷静与清醒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要始终保持这种冷静与清醒非常困难。塞内加在心爱的弟子将满17岁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宽容》（De Clementia），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让弟子加强理论学习，才有此一著作吧。打开书本，一位花甲智者对施行德政的热忱扑面而来，著作的内容是强调身为皇帝为何必须秉持宽容之心。这本书要呈给尼禄，因此塞内加的行文方式是向尼禄答疑解惑。整本书以拉丁文写就，简洁质朴，用词考究，塞内加当然不愧为与历史学家塔西佗并称罗马元首制时代的著名文人。

刚刚继位的尼禄

这本书用大量笔墨叙述宽容在皇帝下达政令时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塞内加并没有提到始终保持宽容所必需的清醒与冷静。然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让人读后觉得出生于西班牙的塞内加比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塞内加这样记载讲述同情与宽容的差异：

> 眼之所见而生之精神反应，是谓之为同情，定不顾及产生此种结果之缘由；反之，宽容深究此结果之缘由，才可谓此种精神反应

与知性完美相处于一隙。

得遇良师，尼禄可谓非常幸运。然而，我们都明白教育的成果不在先生的本事，而是取决于学生的资质。话说回来，塞内加的著作可以算是一种“君主论”，但是和1400年后的另一种君主论大不相同。塞内加的“君主论”重在阐述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拥有的权力，但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则是系统而冷静地分析如何获取权力并将之牢牢掌握。也可以这样说吧，前者立足于人性本善论，而后者立足于人性本恶论。因此，君主论，也可以称之为领导论，在西方文明历经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遗留下来的竟然是后者，非常有意思。

话虽如此，尼禄在塞内加的理论指导下，以“宽容”为自己的口号。尼禄时代铸造的货币上也多次使用“宽容”一词。

尊重元老院的权力是尼禄施政方针演说的第二条要点。实际上“元老院的权力”指的是元老院从共和制时代就拥有的“元老院劝告”立法权。换言之，即以临时措施法（与今美国总统令相似）——限制奥古斯都制定的皇帝权力为前提，使元老院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对于这种措施，元老院肯定欣然同意。

说明白点，第三条就是宣示司法的独立。罗马法院的院长由时任法务官担任，由于没有专门的检察官，所以原告或其代理人还必须身兼检察官，维护自身的权力。当然，被告也会委托辩护人。原告和被告双方各自的人证和物证准备充分后开始辩论，最终的裁定权掌握在陪审团手里。

然而，罗马帝国皇帝参与审判，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变得十分常见，当时的罗马人在法庭上经常能看见皇帝提比略与皇帝克劳狄乌斯的身影。当然，他们俩并非不加挑选地出席任何审判案件，能让他们放下手边政务、拨冗前往倾听的案例几乎都是行省人民对行省总督或者长官

的控告。因为在他们看来，应该避免任职于行省的总督或长官因滥用职权引起的贪污或恐吓行为，这是治理行省人民的最大问题所在。

提比略以严词质问将被告逼到穷途末路，克劳狄乌斯则用翔实可靠的证据让被告百口莫辩。不难想象，陪审团的裁决肯定会在皇帝们如此干涉下受到一定的影响。

按照罗马的规定，要成为陪审团成员必须有一定的资格与财产。因此，实际上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即罗马社会中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甚至因滥用职权而被控告的行省总督或长官们，也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出身。如此一来，审判就演变成同样背景的人之间的互相审判。这种审判自然会产生弊端——共和制末期，总督们在行省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之后，即使被行省人民揭发，他们依然会逍遥法外。

为了根除弊病，奥古斯都当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他喜欢的称谓“第一公民”这种超越罗马社会各阶层的身份来参与司法审判，并将之制定成为律法固定下来。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自然恪守这种做法。由于皇帝们毫不放松，所以进入元首制时代之后，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情况确实得到有效遏制。追捧共和制的塔西佗甚至也留下这样的感叹：“政治居然会变得如此清澈，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频频驾临法庭，使得这成为罗马特权阶层十分厌恶皇帝的原因。

“第一公民”不会染指司法审判，尼禄这样的信誓旦旦的表白，意味着尼禄与提比略或克劳狄乌斯不同，他不会干涉审判。确保司法独立，不论从什么角度思考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古罗马，这种做法无疑是放任自行裁决做法的死灰复燃。

在第四条施政方针中，尼禄提出私宅与官邸分开。显而易见，尼禄的这个宣言是要纠正克劳狄乌斯的做法，其目的不过是表明他将废除秘书官体制。同第三条一样，这也是为了获得元老院的支持。议员们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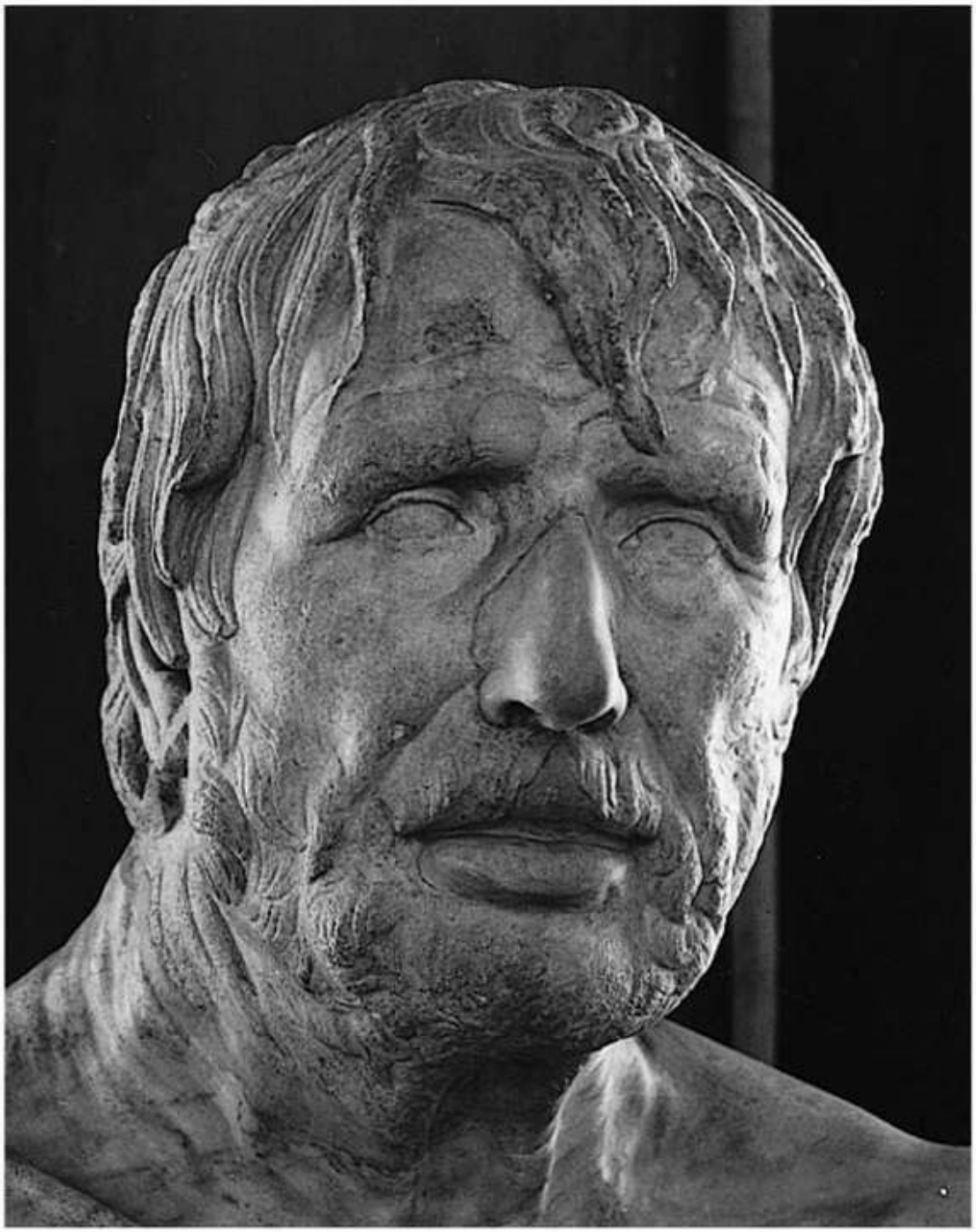
解放奴隶，一贯客套谨慎，但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他们。显而易见，议员们对于尼禄表示要废除秘书官体制肯定会拍手称快。

秘书官体制变成辅佐官体制，但是要治理好疆域辽阔的帝国必须有大量的帮手来维系这个系统的运转。所以，与其说尼禄打算废除秘书官体制，倒不如说是将之转变为非正式的幕僚系统更为恰当。这种体制无法像克劳狄乌斯时代那样昭然于世，却同样发挥奥古斯都或提比略时代的辅佐功能。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明白尼禄即位时的施政方针几乎一面倒地偏向元老院。塞内加不仅贵为议员，还是饱学之士，更是一位作家。罗马的元老院不只是单纯的立法机构，也不只是公职要员的人才储备库，而是当下时髦的“媒体”，对这一点，塞内加肯定心知肚明。其实事实也是如此，议员们差不多是罗马历史上唯一从事写作的生力军。此外，从提比略时代开始，元老院会场中讨论的所有议题都会被定期收录为《元老院纪事》（ Acta Senatus），散发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况且，并不一定非得是“广大群众”，才能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在仰仗考古学之外，身处今天的我们要了解罗马历史也只能依靠这些元老院议员们的论著。作家出身的塞内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着非常好的思路，他认为要获得舆论的支持，首先要赢得元老院的支持。

针对曾经富贵显赫如今却贫困潦倒的元老院议员，经由塞内加设想，最后以皇帝尼禄之名提出的法案获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并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每年发给穷困的议员50万塞斯特斯。这项措施，其发放对象并非所有无法维持生计的贫苦居民，它只对难以维持元老院议员生活水准的议员发放。如果新议员中也有贫困之人，又该如何？通常情况下，进入元老院的财产资格是100万塞斯特斯，所以新任议员中由于没有年金而无法保住元老院议员资格的人应该没有。尼禄得益于这些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哪怕是他在自杀身亡之后依然得到人们“尼禄之五年良好政绩”的评价。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元老院相当于“媒体”。此外，尤

里乌斯·恺撒也明白元老院的“媒体”功能。恺撒期待推翻由元老院一手主导的政治体制，他的《内战记》一书，原原本本记录了自己推翻“元老院媒体”的这一过程。



塞内加

尼禄宣布对重新施行奥古斯都政治的确抱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一点

我们不吝于肯定，然而奥古斯都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对执政者的冷静清醒有极高的要求，不是凭借单纯偏袒元老院就可以完成这个“精致的虚构”。饱学之士塞内加是否清楚其中的复杂性？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表白有什么样的功效，也不论实行元老院政策的对错与否，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继位的尼禄以及辅佐官塞内加执政能力能否经受得住帕提亚王国的考验。公元54年深秋，罗马收到消息，帕提亚军队入侵罗马帝国东方屏障亚美尼亚王国。

强国帕提亚王国

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王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约定两国的国界定于幼发拉底河，双方盟誓不互动干戈，这一年也即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的74年之前。时年21岁的提比略代表罗马帝国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与帕提亚王国缔结了和约。

这个条约并非同盟条约，只是相互约定彼此维持友好与和平。成王败寇这样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东方人的思维之中，换言之，对于同盟关系他们毫无概念。假设当初恺撒没有遇刺身亡，而是继续率领军队进攻帕提亚的话，很有可能战胜帕提亚进而与之缔结同盟条约。先打败对手，再与之建立关系，这就是罗马人的同盟关系。

奥古斯都在恺撒遇害身亡之后，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必须面对罗马人的两次耻辱——公元前53年克拉苏军队全军覆没，以及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军队远征失败。与帕提亚军队交锋时，罗马军队屡尝败绩。奥古斯都本人也不敢夸口说自己仅凭军事实力可以拿下帕提亚，于是他选择缔结和平条约。当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所谓的同盟关系，就像罗马人所谓的“朋友”（amicus），是自己人。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和平条约，就是非敌非友，关系暧昧不明。

所以，罗马加强了对帕提亚王国北、西、南三面的军事部署，从三面制约帕提亚，提防它拔刀相向。

形成这个包围圈的除了叙利亚行省和埃及等罗马直接统辖的地区之外，还有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以及诸如在奥古斯都时代形成的犹太国等中小君主国家。上述这些国家都是与罗马帝国缔结了同盟关系的国家，同盟国不必向罗马缴纳行省税，但在罗马出兵时，必须提供兵力，或援助以军粮与武器等等。

当然，无论是哪种系统或体制都并非完美无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弊端和不足。罗马东方防御网唯一的要害，就是与帕提亚王国接壤的亚美尼亚王国。如果不让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那么所谓的帕提亚包围圈根本就无法形成。

然而，正是这个亚美尼亚，卢库鲁斯与庞培率领的罗马军队在共和制末期对亚美尼亚的战争屡战屡胜。卢库鲁斯甚至一度涉足里海海岸。正因为罗马拥有实力超群的军事力量，才使得亚美尼亚可以按罗马的意志选择合适的国王人选，最终推动两国结盟并将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

可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亚美尼亚比罗马其他东方同盟国更加靠近东方，无论语言、生活习惯还是观念，都属于帕提亚王国称霸下的波斯文明圈，所以波斯人历来把亚美尼亚视为自己的领土也在情理之中。并且，持有这种想法的帕提亚人自信满满，因为罗马人一直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势之下的亚美尼亚对策，即帕提亚对策，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到彻底根除。在帝国西方世界可以贯彻到底的方案，在东方世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正因为如此，这个“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才在罗马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虽然罗马帝国的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然而确实可以保证今后

几十年的安稳日子。这是因为罗马不仅仅只依靠对话沟通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采用一面武力威慑一面用外交手腕来处理的两种手法，才使得这种针尖上的和平得以维系下来。

帕提亚趁机入侵亚美尼亚引发的“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往往是他们认为罗马皇帝在身体衰老或年幼的时候，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公元34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久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时年75岁高龄。帕提亚武断地认为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头脑亦不甚清醒，所以趁机进攻亚美尼亚。但是，借用某位研究者的形容，提比略是“年岁越高越深不可测”。提比略接到报告后立刻派遣后来成为克劳狄乌斯助手的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前往亚美尼亚，向亚美尼亚表明罗马的立场——坚决支持。维特里乌斯是手握重权的东方罗马军队总司令，他当即挥师开往亚美尼亚。这般声势浩大的军事力量就是极好的威慑，所以帕提亚王只能乖乖地从亚美尼亚撤回军队。

公元54年，帕提亚王国又故伎重演，然而从时间来看，距上一次失败仅仅过去20年。这一次他们又轻率地认为年幼的尼禄皇帝刚刚即位，根基未稳，应该没有办法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显而易见，帕提亚这次又要铩羽而归。此时罗马帝国还有塞内加坐镇，他并不可怕，但是出身行省的他对于保卫帝国安全怀有极高的热忱，也有积极挑战的勇气。虽然尼禄没有提比略干脆利落，他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再度爆发时却表现出了快刀斩乱麻的气概。

起用科尔布罗

面临帕提亚王国的威胁，塞内加在紧急选派东方总司令的人选方面眼光独到。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曾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8年的时间，是一位统率了4个军团和辅助兵共4万兵力的将军，为莱茵河下游防线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罗马帝国虽然进入元首制时

代，他们在机动防御方面淋漓尽致地使用了主动出击战法。言外之意，他们会不时越过莱茵河袭扰日耳曼人，而非在莱茵河畔苦等敌人上门，以此让他们领教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不敢轻举妄动。之所以这条防线稳固，原因在于科尔布罗的积极战术十分奏效。也正是这位科尔布罗，在施展他的拳脚时也会被掣肘，罗马帝国深入日耳曼地区的军队本该更上一层楼，就在克劳狄乌斯一声令下之后，就遗憾地撤回到莱茵河防线。

科尔布罗这位将领来自南法行省，其身上洋溢着有异于其他战友的特质。科尔布罗麾下的士兵对他爱戴有加，他在敌军中也是赫赫有名。这倒并非出于科尔布罗性格温厚，对谁都亲切温和。与之相反，他是一位以严厉著称的将军。同起用他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不同，众人敬畏正是科尔布罗在敌我双方都声望极高的理由。虽然科尔布罗的年龄无从查证，我推算他于公元54年被派遣到东方时大概在55岁上下。放眼这一阶段驻守帝国各处边境的军团长们，除了科尔布罗能够担当奔赴帕提亚前线的重任之外，别无其他合适人选。

然而，没有把所有的权力交给科尔布罗是塞内加的严重失误。公元55年春，科尔布罗离开莱茵河驻地，长途跋涉来到幼发拉底河驻地接受重任。唯恐颜面扫地而被轻视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是科尔布罗见到的第一张丧气脸。

然而，将领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瞧不起对方的情形，不过，这并没有发展到影响罗马帝国东方政策的地步。由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之间尚未正式开战，科尔布罗的正式职位并非军队的总司令，而是帝国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两个行省的总督。叙利亚总督指挥4个军团，位居罗马帝国驻守东方军队中的首要位置。所以没有设置军团的小亚细亚东部的两个行省总督位居叙利亚总督之后。然而，罗马方面给夸德拉图斯的命令是要他把手下的4个军团匀出2个给科尔布罗，他负责南部，西边交给科尔布罗，通过两面夹击的战略把帕提亚军队赶出亚美尼亚。塞内加这样的

命令，充分暴露出他缺乏军事经验的幼稚与浅薄。

是否进行军事行动，取决于指挥系统是否统一。若是不遵循这个原则，强行推动军事行动的话，注定会走向失败。我想，科尔布罗应该对战场进行了仔细查看了吧。只要冷静耐心观察，肯定会发觉帕提亚国王任命其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之后，就不再采取任何军事活动了。其实，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根本没有和罗马短兵相接的意图，可惜罗马没有丝毫察觉。即使如此，眼下也还没发展到必须即刻出兵的程度。更何况，夸德拉图斯送来的2个军团还未完全准备好出动。

科尔布罗在经过再三思索之后，认为这些士兵要经过训练才可以投入战斗。同时，他希望在军团训练期间，身在罗马的皇帝，其实是塞内加，能够察觉到有必要整合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

然而，科尔布罗始终未能等来罗马新的战略指向。加之帕提亚军队始终未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进攻，战场上丝毫体会不到紧张氛围。实际上，另外一件事吸引了尼禄和塞内加的全部注意力，让他们把东方问题抛在了脑后。

反抗母亲

小阿格里皮娜用尽各种手段让儿子尼禄成功登上皇位，想必还处于洋洋得意之中。一切都在小阿格里皮娜的算计内，即使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还是觉得疑点重重，可是当克劳狄乌斯因误食蘑菇中毒身亡的消息公之于世之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甚至没有要求宣读先帝的遗嘱，就认可先帝的养子尼禄而非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继任皇位。小阿格里皮娜以辅佐10余岁的新皇之名，行统治之实。此刻看来，小阿格里皮娜似乎滴水不漏地实现了她的野心。

实际上，小阿格里皮娜成为皇太后之后，远比当皇后时期更强调自己的存在。小阿格里皮娜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出现在尼禄身旁。甚至连元老院的会议，她都下令把场地从罗马广场附近的元老院会场迁到山上的皇宫内。显而易见，这是为了让躲在一边的自己能够听到会议内容而使出了另一个招数。

为了在罗马帝国经济圈中承担基础货币而发行的货币始终保持着面值与成本一致这一特点。与此同时，历代皇帝的头像也会出现在这些货币之上，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统治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谁，这就是货币的宣传作用。然而，皇帝更迭并不会导致货币回收，或重新铸造刻有新皇头像的货币。基础货币的目的在于维持信用，只要面值与成本一致，不论货币上是几代前的皇帝，还是共和制时代的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这也就是它与现在的纸币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在罗马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头像，都会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货币上持续流通，话虽如此，新皇帝发行的货币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

对于此次新货币的发行，小阿格里皮娜采用她和儿子面对面的图样。虽然，罗马曾经出现过女性头像的货币，而以女神头像为图案代表罗马国的货币也很多。然而，将皇帝与皇太后以彰显地位平等的面面相对形式，铸在同一枚货币上，这种钱币确实罕见。这种图案的货币还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只剩下金币，却无人敢说流通量超过金币的银币（第纳尔）不会有这种样式。今后可能会在考古过程中发掘到这种银币吧。总而言之，小阿格里皮娜在尼禄继位之后，获得的权势完全符合她的预期。小阿格里皮娜甚至连皇帝的告示都要求使用“奥古斯塔·玛特尔·奥古斯提”（Augusta Mater Augusti，崇高的皇帝之母）这样的字句。

小阿格里皮娜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想要掌权的女性，可惜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尼禄是小阿格里皮娜的亲生儿子，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子，尼禄很可能与她有相同的思维与想法，也有可能效仿她的做法，但是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母亲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儿子也想如

此，这很正常。如果认为10多岁的稚儿还没有自立，只能说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是机关算尽。姑且不论尼禄是否天赋异禀，总之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饱学之士塞内加的得意门生。更何况，尼禄本身是个头脑精明、天资聪颖的少年皇帝。依照小阿格里皮娜的性格来推测，不难想象，她肯定是每天会对着一个模子出来的儿子说，你这个皇帝是我一手造就的。显而易见，普通家庭中10多岁的男孩与母亲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在这对皇室母子之间也经常上演。

尼禄与母亲

尼禄对小阿格里皮娜也渐渐心生不满，事件源于他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可特的女奴隶，然而小阿格里皮娜对这样的人无疑是鄙视万分。起初，尼禄想尽办法躲过母亲的视线，他还请塞内加帮忙。塞内加并不乐意，然而在尼禄眼泪汪汪的哀求下，塞内加让皇宫近卫军队长的表兄弟阿尼乌斯替阿可特赎身。成为解放奴隶的阿可特假装阿尼乌斯的恋人，塞内加安排其与尼禄相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最后还是传到小阿格里皮娜耳中。小阿格里皮娜得知尼禄与这名女奴隶之间的关系后，震怒异常，破口大骂。实际上，让小阿格里皮娜恼火的并非尼禄已娶了屋大维娅却又与别的女人勾三搭四，而是他居然自降身份和一个女奴隶纠缠。所以小阿格里皮娜的语气中充满了恶毒的语言。然而，看不起儿子爱上的女人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把儿子放在眼中，震怒中的小阿格里皮娜对此毫无意识。

尼禄对母亲小阿格里皮娜表达不满时，塞内加与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不但出谋划策，还积极从旁给予帮助。紧接着，尼禄的反抗行为，是解除了财务部门负责人帕拉斯的职务，他是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中的一员。尼禄曾经宣布要废除克劳狄乌斯时代的秘书官体制，那么将帕拉斯撤职可谓是名正言顺。纳鲁奇索斯和卡里斯杜斯二人都早已权势尽失，尼禄又怎么不会拔掉帕拉斯这颗眼中钉呢？

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之所以有今天，帕拉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论是举荐小阿格里皮娜作为克劳狄乌斯的皇后人选，还是协助小阿格里皮娜实行拥立尼禄的计策，他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显而易见，小阿格里皮娜对于他被撤职有如断腕之痛。为了让帕拉斯甘心卸任，塞内加答应他两个条件：其弟继续担任犹太长官，保障帕拉斯下半生平安。塞内加认为小阿格里皮娜可能会阻止帕拉斯卸任，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瓦解小阿格里皮娜和帕拉斯的同盟关系。不得不从命的帕拉斯灰溜溜地离开了首都罗马，这也彻底激怒了小阿格里皮娜。

小阿格里皮娜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一下子就冲到了儿子尼禄的房间，根本不管前面有什么人，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倾听，就一股脑儿地发泄自己的怒气，像洪水一样根本无法停住。

你之所以有今天靠的是谁？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让你成为皇帝？如今你却对我不仁不义，真是枉为人子！难道靠着独臂（暗指失去左手的布鲁斯）与流放犯（暗指塞内加）这两个家伙，你就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管得住这个国家？

因为我有尤里乌斯家族的血缘，你这个出身并不显赫的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的家伙才能成为皇帝！居然连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都不承认，我看连14岁的不列塔尼库斯都比你更合适，他也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儿了！我要是带不列塔尼库斯到近卫军营地去，近卫军的士兵一定会顺从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比起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养子，身为克劳狄乌斯嫡子的不列塔尼库斯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你这忘恩负义、不守孝道的家伙，必遭天谴！！！

小阿格里皮娜这番不经头脑思考的臭骂，足以让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兴奋不已。然而，尼禄在此之前只想尽量避免与母亲碰面，彼此相安无事，这番话却让他心生畏惧。像这样的母亲不是发牢骚抱怨几句就完事的，她既然说得出恐怕

就真会那样干。正因为这样，这位 小阿格里皮娜
身体欠佳、才能泛泛、性格平庸而又毫不起眼、可怜万分的不列塔尼库斯的命运已经注定。

虽然一直对塞内加与布鲁斯褒扬有加的史学家们断定，他们肯定没有参与刺杀不列塔尼库斯，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帮凶。假设，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拥立不列塔尼库斯，与尼禄对立的话，依然信仰“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士兵们很可能会掀起哗变。况且皇帝年少又无子，那么能够强调自己有权继承皇位的就是竞争对手，而非后代。消灭竞争者的唯一办法就是除掉这个人。卡利古拉也曾下令杀害先皇提比略的嫡孙葛梅鲁斯。虽然奥古斯都收留了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儿子，并把他扶养成人，然而，克娄巴特拉认为是恺撒唯一的亲生儿子小恺撒，也被奥古斯都除掉了。

并没有人以小恺撒之死为借口，去指责奥古斯都，也没有人因为葛梅鲁斯之死，去非难卡利古拉。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不列塔尼库斯死于宿疾——哮喘发作。当然，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疑点重重，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种说辞。1600年之后，法国剧作家拉辛在17世纪以《不列塔尼库斯》为题创作的悲剧，就是这个事件的写照。

不列塔尼库斯之死对小阿格里皮娜的打击应该比任何人都强烈，她却又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主儿。对她而言，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的确感到了挫折，当然这并非出于其喜爱不列塔尼库斯这个继子，而是小阿格里皮娜担心失去权势而已。时年40岁的小阿格里皮娜对尼禄开始了报复行动。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策划积累一定的钱财。凭借她的血缘与地位，她通过遗产继承也积累了相当一笔财富。小阿格里皮娜将原本由经纪人代为管理的私有土地、投资悉数进行了置卖。

其次，小阿格里皮娜将筹措到的资金全部交给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

军团。当克劳狄乌斯还在位时，小阿格里皮娜就以今天的科隆是其出生地为由，将这座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接着迁入退役士兵，让这个城市变成殖民城市。小阿格里皮娜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她之所以投入重金，就是为了让这个以自己之名命名的城市名副其实地罗马化。然而，小阿格里皮娜真正的目的是要拉拢驻守莱茵河防线的士兵。只要能把7个军团共4.2万名士兵的这支精锐之师收为己用，没有人能够阻挡她的野心。虽然小阿格里皮娜远居深宫，却开始与驻守莱茵河的军团长官们暗度陈仓。

再次，小阿格里皮娜开始同自己的儿媳交好。屋大维娅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其弟不列塔尼库斯又英年早逝，因此整天郁郁寡欢。小阿格里皮娜就安慰她，拉近和媳妇的关系。屋大维娅朴实无华，为人低调，罗马民众对她有着深深的同情与敬爱。相反，小阿格里皮娜在百姓中间风评不佳，如果她能和屋大维娅拉近距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她的不好评价。

尼禄不愧是有其母亲的风范，根本不会让小阿格里皮娜有任何得逞的机会。尼禄首先调开母亲身边的护卫，即让她从高高在上的“崇高的皇帝之母”变成一个普通人。接下来，尼禄又把她赶出皇宫。如此一来，小阿格里皮娜虽然住在帕拉蒂尼山上，但是她只能搬到外祖母安东尼娅生前的住所。与此同时，尼禄把小阿格里皮娜的名字从各类邀请名单中去掉，使得她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骤然减少。此外，对小阿格里皮娜痛恨万分的尼禄更是变本加厉，尽干一些曾经会招致母亲批评指责的事情。

尼禄的玩伴大多和他同龄，他呼朋引伴，整夜带着他们在罗马城里溜达闲逛。外出时，他们都会乔装打扮成普通人，让别人看不出来他们的身份。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城里简直如鱼得水，胆大妄为。有一次因为他们闹腾得太过火，接到居民投诉的警察赶来调解，结果他们居然和一队警察当街动武。当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制伏了这群年轻

人，队长猛然惊觉皇帝也在其中，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被无罪释放。不过，据说次日一早出席元老院会议时，尼禄脸上挨揍的伤痕还依稀可见。

然而，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看来，年轻人有发泄的必要，所以尼禄眼下淤青未消地出现在元老院他们也没有过问。尼禄年方17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儿子尼禄继位不到一年，小阿格里皮娜的影响力完全丧失了。为了削弱小阿格里皮娜的权力，正是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的鼎力支持下，年方17岁的尼禄才能做得如此周密。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不会甘心认输，也没有就此罢休。小阿格里皮娜加紧了筹措资金的步伐，也继续与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们密切联系。如今，小阿格里皮娜还是屋大维娅的头号保护者。此外，小阿格里皮娜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过去的点点滴滴。据说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据此为考，虽然这部回忆录现在已经彻底散佚，但在历史上应该确实存在过。小阿格里皮娜在能够著书的罗马女性中算是一朵奇葩。然而，对于羽翼日益丰满的儿子而言，这样的母亲确实让人头疼。

统治之初

然而，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四处展现其活力之际，攸关罗马帝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决策，正在元老院激烈讨论着，并且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讨论的议题之一即是解放奴隶问题。元老院议员们已经对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的活跃极为不满，尼禄宣布废除秘书官体制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完全称心，他们强烈要求大力管制解放奴隶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有议员提议，获得自由成为“解放奴隶”者一旦违法，应

当让其恢复奴隶身份，并建议立法予以确定。

对于这样的提案，当然有议员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议员的理由如下：

如果仅仅从个别解放奴隶的例子来看，已经获得自由、甚至得到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隶之中，确实有人不配拥有这种待遇。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例子就立法限制所有奴隶，这与因噎废食有何不同，这种提案显然是不对的。解放奴隶在罗马社会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不争的事实，罗马社会中、下层的重要成员也有他们的一分子。自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积极实行解放奴隶政策至今已过百年，这项政策几乎成为罗马的传统。派驻行省工作的事务幕僚，首都的下层公务官员，意大利本土地方政府的管理层、实际负责祭典的工作人员、消防军、警察等等都是解放奴隶。甚至今天跻身于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的议员，他们的祖先出身于解放奴隶的也不在少数。

按照罗马的传统，拥有罗马公民权有两种类型：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和没有选举权的“拉丁公民权”。同样，解放奴隶也分两种类型：一类是法律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与原主人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类是私人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依然留在主人家中。私人许可解放奴隶可以转化为法律许可奴隶。私人解放奴隶是否符合罗马公民身份的表现，是判断其能否转化的唯一标准。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判断“自由”（libertus）这一公益的利弊，应当遵循先例依据个案进行区别处理，而非制定法律一概而论。

这次会议尼禄也出席了，辩论的结果是大多数议员赞同后者的意见。容许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国家，正是国家机能充分发挥的表现，罗马帝国拥有这种气度。

然而，元老院议员承认解放奴隶拥有人权，却并不承认奴隶的人

权。自古以来，罗马就明文规定，如果奴隶弑主将实行连坐，同一屋檐下的奴隶都会被问罪，不仅仅是凶手一个人会被处以死刑，所有奴隶都会被处死。然而，由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用这条法律，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凶手被处死。

就在元老院讨论解放奴隶议题之际，负责首都罗马警卫的一位长官死在了家中奴隶的刀下。这位被杀害的谢肯图斯家中有400名奴隶。普通罗马公民游行，认为处死所有奴隶不符合时代精神。然而，元老院态度十分强硬，拒绝让步。如若法律不符合当下的时代，只要加以修改使用新法，旧法自然就遭到了摒弃。但是，这些属于上层阶级的议员家中拥有成百上千的奴隶，元老院出于这种担心拒绝修订法律。

虽说尼禄有地位与权力插手此事，然而他没有染指此事。塞内加也不愿推动法律修正。因为尼禄即位时宣布要“尊重元老院的权力”，他们要遵守当初的诺言。在罗马公民泪眼相送之下，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400名奴隶全部被处以极刑。稍稍值得欣慰的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过，这是由于奴隶们再次深深体认到连坐的可怕，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变得灵活，抑或是皇帝开始干预，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公元57年，也即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的第二年，尼禄再次当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这也是继公元55年之后，尼禄第二次成功当选。罗马传统的资格年龄是43岁，元老院选择1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这一要职，充分表明元老院迫切希望尼禄当选。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而是希望借此限制皇帝的权力。执政官是罗马最高官职，让尼禄出任这一职务意味着把“第一公民”这种非正式的皇帝职位融入罗马的共和制体系中。

此前我已经提到，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元首制可谓是“精致的虚构”政体。用更为严密的话来解释，“皇帝”仅仅是罗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将士们效忠的对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不用宣誓效

忠“皇帝”。议员如若担任军职，则有宣誓效忠“皇帝”的义务，然而如若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只是普通的议员的话，他则不用宣誓效忠“第一公民”或“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简称“SPQR”（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可以看出，元老院与公民才是罗马权力的来源，而“第一公民”仅仅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个人”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话虽如此，可是“第一公民”为何可以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这是因为“第一公民”拥有以下权力：

“最高司令官”——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动军团兵加上辅助兵共计30万人的庞大军队。

“护民官特权”——罗马共和制时代设立的护民官是为了保护平民的权利，然而《霍滕修斯法》又规定，只要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哪怕是在元老院遭到否决，也同样可以上升为法律。由此可见，护民官拥有了可以执行与元老院不同意见的特殊权力。此外，议员通过的所有决策，哪怕是高票通过，护民官还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所有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今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非作为常任理事国才拥有权力，关键在于他们拥有否决权，即现代拉丁文中也用到的“VETO”。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形同虚设，也即否决权所向披靡。

“大祭司”——拥有罗马宗教界的最高地位，罗马帝国规定的祭祀日期，由他主持祭祀大典。

“国父”——是在受罗马公民们的委托之后，元老院授予的一项尊称。虽然提比略再三拒绝这一称号，在我看来，这种拒绝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尤里乌斯·恺撒与奥古斯都欣然领受这个尊称，这一称谓是

超越元老院阶级与普通民众等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全体国民之“父”。每一位国民在公正而优秀的“父亲”带领之下，才能安心地各司其职，完成自己的义务。在罗马帝国，身处家族最高地位，就会拥有非常强大的“家父长权”（家长权），所以“国父”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家中最大的家长。

因此，“最高司令官”、“护民官特权”、“大祭司”与“国父”都是共和制时代就存在的职位与尊称，这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依据罗马的法律，当所有“合法”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变成“非法”的最高权力者。即使这样，罗马仍然用只表示公民“第一人”的“princeps”来称呼，显而易见，没有比这更具欺骗性的叫法了。把罗马帝国置于一人之下，是奥古斯都认为最现实的统治模式，因此，要达成这种设想唯有依靠“精致的虚构”。

元老院本身就是所谓的合法机构，对于其中的非法性自然是心知肚明，要让“第一公民”担任执政官，使其受到元老院的监督，是把不合法转化为合法的最好手段。

在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40年里，他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兼任着执政官。而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统治了23年里，备受元老院非难，原因在于其出任执政官仅有3次。虽然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统治时间极短，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4次担任执政官。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在位13年，兼任执政官总共有5年的时间。显而易见，罗马帝国几任皇帝都经历了“精致的虚构”台面下的交锋，对此深有感触。而新任皇帝仅仅是一位10多岁的少年，按照元老院的盘算，让其担任执政官易如反掌。身为议员的塞内加对个中原委自然是心知肚明。

在你来我往的“攻防战”之中，为了让形势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是花招频出，彼此试探。公元58年，元老院通过决议，让年满20岁的尼禄担任“终身执政官”。果不其然，尼禄不想被纳入体制之下，予以严词拒绝。至于尼禄拒绝是纯粹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塞内加的怂恿，我们无从查考。在这件事情之后，尼禄此后一改以往向元老院倾斜的态度，对

于元首制则是欣赏不已。

首先，尼禄考虑到普通公民阶级历来与元老院阶级对立这一点，以自己的名义赠与每个平民400塞斯特斯，作为拉拢民心的举措。

随后，恺撒时代开始的退役士兵的安置政策，被尼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安置地点改为意大利本土。此外，他还勇于打破陈规，从士兵们的愿望出发，并非以整个军团为出发点，让他们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安置政策，对于退役士兵们而言，也意味着可以重新回到故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有为了避免本土人口流失的现象，另一个目的在于期望退役士兵们在故乡获得土地之后，能够全心全意地拥护尼禄这位政策制定者。因此，这项措施还有另一层含义，以罗马人为主的军团兵，向行省进行殖民促进其罗马化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经济政策

罗马帝国的各种政策的调整，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变革。为了弥补“艾拉留姆”（Erarium，元老院行省税）出现的空缺，尼禄从“费斯库斯”（Fiscus，皇帝行省税）中拨出4000万塞斯特斯用以弥补。尼禄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成功地整合了原本一分为二的国库，当然，要完成这种合并，必须在另一个国库出现赤字时最有利于操作。

因此，这两种税收原本一致。不论是作为直接税的行省税，还是作为间接税的关税等其他税种，在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都大同小异。为了避免与元老院形成对立关系，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地将税收分开，分别称之为“Fiscus”与“Erarium”。元老院中的议员们互相推选产生总督，负责元老院行省治理，而皇帝行省总督或其他官员则由皇帝亲自任命。行省既然分为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那么从行省征收到的税款自然是前者由元老院支配，后者由皇帝支配。奥古斯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瞒天过

海，化解了元老院的不满，成功将罗马帝国的政治模式转化为“第一公民统治”。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必要常驻军团。通常情况下派驻军团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抵御强敌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行省除外，大多数皇帝行省都位于罗马帝国的边关地区，十分落后。然而，反观元老院行省，大多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区，罗马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奥古斯都开始施行这套税制之际，皇帝行省经常是入不敷出，也经常使用“Erarium”来填补“Fiscus”不足造成的皇帝行省税的亏空。

这种经济差距随着政局稳定以及基础建设的不断推进日益拉近。直至奥古斯都一个世纪之后的尼禄时代，皇帝行省的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与元老院行省不分伯仲的程度。实际上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尼禄命令元老院行省总督尽量压缩开支，这当然不是元老院行省经济下降的缘故，而是因为皇帝行省经济增长较快。流动性强的狩猎民族在经济上要劣于流动性弱的农耕民族，由于不用担心敌人入侵，皇帝行省的农耕民族安心劳作，税收也随着生产的增加而水涨船高。

显而易见，所谓的统一国库，尼禄无非是把“Erarium”纳入“Fiscus”内，这种改革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因为就连税收也由皇帝控制了。

谈到尼禄时代的经济政策，其在位14年间推动了三大改革：第一项改革正是前文所述的统一国库；第二项是提出全面废除间接税的议案；第三项是进行货币改革。其实第三大改革说是修订更为贴切，我想在实施这项改革的公元64年再加以叙述，大家更容易理解，因而在此暂且略去不表。我们先来看尼禄于统一国库次年提出的全面废除间接税的事例。

在此，我们先谈这些改革的结局的话，即使是尼禄在罗马社会怨声

载道下选择自杀之后，第一项与第三项改革依然继续实行；只有第二项改革，甫一提出就遭到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核心内容几乎被全数剔除之后才勉强过关。正因为如此，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在全面废除间接税等相关议题上，尼禄与元老院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必要讨论第二项改革。

公元58年，虽然时年20岁的尼禄继续担任执政官，他却拒绝了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官头衔。虽然元老院的400位议员每一位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议长，尼禄还是宣布召开元老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尼禄提出了全面废除间接税的提案。

正如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表格，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都有缴纳间接税的义务。在这一类税收中，以宝石、丝绸和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从东方地区进口会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有5%的一般关税与1%的营业税。奥古斯都制定这种税制之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享受减税政策，部分皇帝行省甚至可以享受1.5%或2%的优惠关税，然而，当时罗马帝国本土及其他地区的关税高达5%。

元老院对于尼禄统一国库的提案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由此可以判断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之间的税收在尼禄时代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这也可以视为皇帝行省经济实力提升的标志之一，更进一步而言，皇帝行省的优惠关税政策大概也取消了。虽然缺乏证明优惠关税取消的历史文献，然而就在尼禄提议全面废止关税之际，议员们的发言中除了“二十分之一税”之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税收的字眼。随着皇帝行省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可以判断关税应当统一为5%，当然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另当别论。

奥古斯都实行的税制改革

	罗马公民	非罗马公民（行省人民）

直接税	没有直接的收入税 解放奴隶税5% 遗产税5%	地租税或行省税 税率为收入的10% （服兵役的行省人民免直接税）
间接税	关税1.5%—5%（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征收25%关税） 营业税1%	

而废除这5%的关税，正是尼禄提案的核心内容，他的理由是废除关税会进一步促进贸易，进而提高经济实力，最终使得占据大头行省税的“什一税”增加。

对于尼禄的提案，议员们当然不赞同这种荒唐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根本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如若废除关税，他们更不用缴纳关税，从而引发了帝国财政危机。在议员们认为，废除关税可能增加行省的税收目前只是推测而已，是否行之有效不得而知。更何况废除关税期间替代关税的钱从哪里来？恐怕只有通过提高行省税率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很可能演变成影响帝国统治上的危机，进而危及帝国的治理与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如今有部分研究者经过计算，如果废除关税，会导致罗马帝国国库约1亿塞斯特斯的损失，约占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这种乐观的推测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如何先想办法把废除关税带来的空缺填补上，才是当时元老院更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尼禄似乎是个积极经济论者，他根本就不担心这种缺口。

尼禄亲自提议废除关税，并希望元老院予以通过将之上升为法律。可是，如果直接投票表决的话，肯定会被元老院挡下来，这样一来身为皇帝的尼禄也肯定会颜面尽失。于是，有议员提出修正案，内容是废除事关“粮食安全”的必需品小麦的“二十分之一税”，万般无奈之下，尼禄也只好接受。

议员们亲自否定了尼禄关于废除关税的提案，虽然表面上是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20岁的年轻人。因为不久前尼禄曾对议员们乱下指令，使得议员们怨声载道。

罗马是全国唯一拥有大型角斗场的地方，卡利古拉皇帝专程命人从埃及运来25米高的方尖碑，仿照罗马样式兴建了一座私人角斗场，这座角斗场位于台伯河西岸的梵谛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Vatican）。尼禄下令加以改装，并开放为公民们的娱乐场所。

正是在卡利古拉兴建的这个角斗场，尼禄举办了一场类似今天田径比赛的体育竞赛。此外，他还命令罗马上流社会的元老院阶级与骑士阶级的男人到场中进行比赛，然后邀请普通罗马公民入场观看。

这些议员如果穿着托加的话，即使膀大腰圆也不会太过突出，有时甚至象征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让人觉得稳重可靠。他们沐浴或按摩放松时肯定会脱掉衣衫，然而只有服侍他们的仆从奴隶看到他们的赤裸上身。尼禄命令他们在角斗场上裸露上半身，接受观众席上普通民众眼光的打量评判，根本就是一件让人羞辱的事情。这还不算完，这些议员在青年时期就早已荒废了运动，然而尼禄居然要求他们跑步与跳跃。与希腊人不同，在罗马人看来，体育只是青少年用来锻炼身体的手段，绝非这些心怀国家社稷的议员们该做的事，这根本与他们的身份不符。然而，议员们虽心怀不满，也只得依从了皇帝的命令。

不用说，罗马公民们肯定兴高采烈地来看热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让国会议员、高级幕僚或者财经界的大佬们赤裸上身参加田径比赛，各大媒体肯定会连篇累牍大肆报导。甚至连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也会不惜掏腰包去看热闹。说不定罗马公民们还会拍手称赞小尼禄真有能耐。这不是明摆着揭人短处吗，议员们不喜欢这飞扬跋扈的年轻人也就不足为怪。然而，与此同时，一位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完成的丰功伟业，正在远离罗马帝国千里之遥的东方前线上演。

亚美尼亚战线

赶走篡位的帕提亚王之弟，让亚美尼亚王国重回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科尔布罗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了亚美尼亚前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望眼欲穿也未能等到从罗马传来改变战略的任何消息。罗马军队同帕提亚对峙的指挥系统依然没有统一，直到与帕提亚王谈判休战，他与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还是维持着互不隶属的状态，抵抗帕提亚的兵力也是两人各自领军。虽然夸德拉图斯碍于尼禄的命令不得已分给科尔布罗2个军团，再加上从驻守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抽调的1个军团，共1.8万名士兵构成了科尔布罗的主要战斗力量。此外，虽然米西亚军团还有6000名辅助兵，加上同盟国的援助以及行省人民的志愿兵加入，这部分兵力不超过1万人。把上述兵力相加也仅仅有3.4万人上下。加之叙利亚行省派来的2个军团根本无法上战场，所以，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前线的兵力根本就不是帕提亚的对手。

帕提亚王国可以算做罗马帝国唯一的假想敌，虽然叙利亚行省是与之对峙的前沿阵地，经济十分发达，但仍然属于由皇帝直接管辖的“皇帝行省”。长期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是罗马帝国在东方地区唯一的军事存在，更肩负着保卫帝国东方安全与稳定的重任。

驻守在莱茵河、多瑙河及不列颠，或北非沙漠的罗马军团同样以护卫帝国边界为首要任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中除了部族酋长之外，普通居民都还是身穿兽皮的野蛮人。由于这些防线地处边境，驻守在这些地区的生活十分艰苦。此外，同文明国家的军队相比，蛮族的动向更加捉摸不透，所以这些地区的防御军队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然而，叙利亚的情况与上述边境地区不同。当时罗马帝国有三大都市，分别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条克。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安条克也是塞琉古王朝的首都。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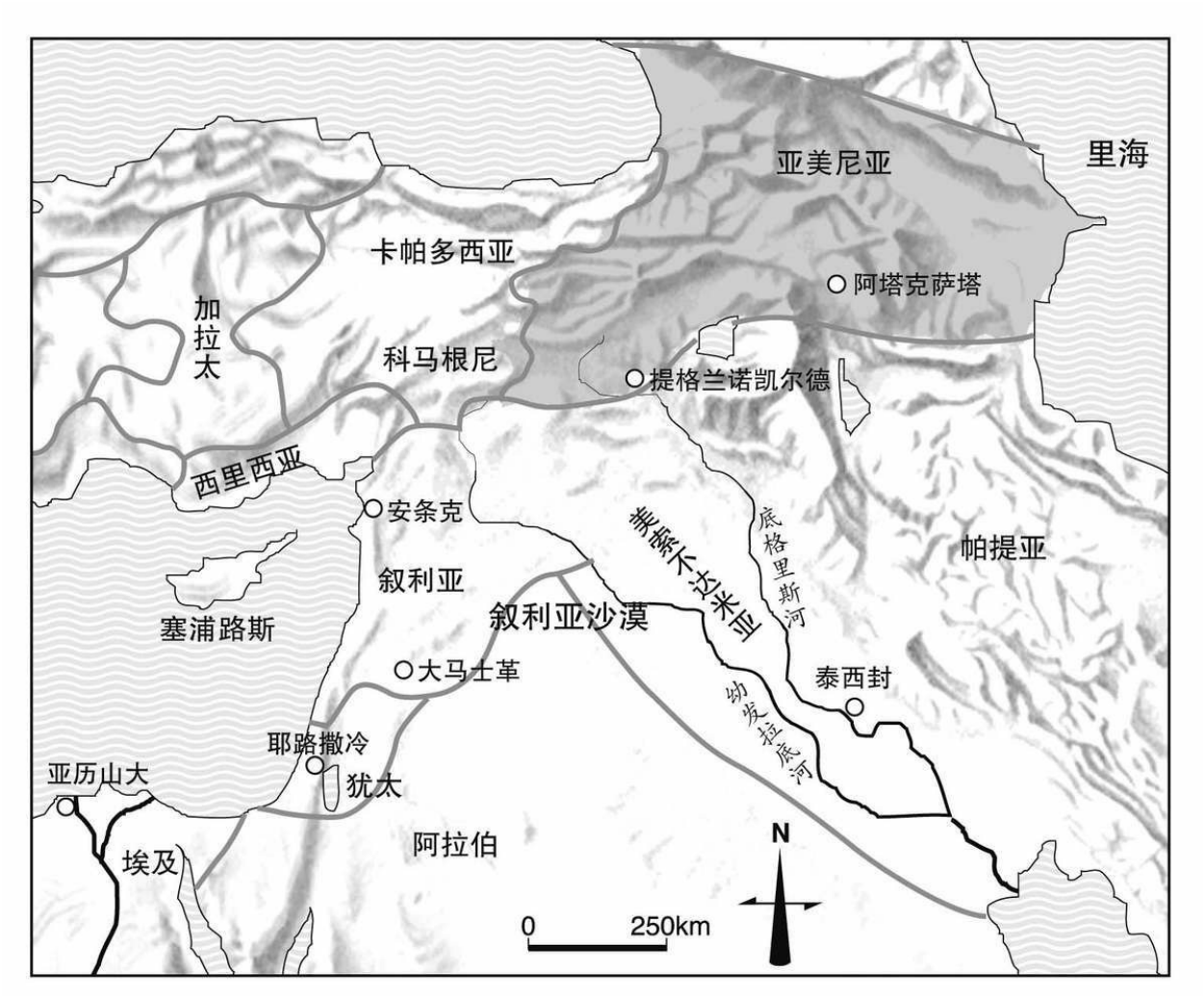
叙利亚“边境”的特色，是当地居民一直与国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居民有着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得叙利亚十分繁荣。尽管两国敌对，但这并不会妨害到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只是生意伙伴，只有对方入侵之时才会暂时变成“敌手”。此外，4个罗马军团的驻地就设在繁华的安条克这个商业气氛浓郁的城市。由于叙利亚的“和平”氛围十分浓厚，前后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当地的罗马军团都不想打仗，居然出现了部分士兵与本地人合伙经商的例子。

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虽然长年担任叙利亚总督，但已经步入了老年。而时年50多岁的科尔布罗正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刚刚抵达边境就无法忍受当地的环境。科尔布罗的原驻防地位于莱茵河防线中部，属于地理与气候都十分糟糕的低地日耳曼，那里不仅要警惕从莱茵河中游到河口地区的陆地敌人，还要提防对手渡海而来。然而，科尔布罗刚一上任，就感觉到了东西方虽然有着质的差别，在艰苦环境方面却是难分伯仲。小亚细亚到亚美尼亚之间是绵延的陡峭山脉，从叙利亚往东到幼发拉底河之间是如同大海般一望无际的沙漠，它们都摆在了科尔布罗眼前。

科尔布罗出身南法行省，但他的作风极似古罗马时代的将军。由于驻守安条克的两个罗马军团士兵早已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科尔布罗到达叙利亚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禁止士兵们在屋檐下睡觉。这样一来，士兵们不得不从军营中搬到帐篷内居住。与此同时，他以身体条件为由，命令不适合军务的士兵与即将退役的士兵免除差役，把他们调整到类似今天的后勤岗位。按规定，罗马军团兵役年龄是17至45岁，即使是老兵年龄上限也不会超过45岁。然而，此项规定并不适用于百人队队长以上的指挥官，而只适用于普通的士兵。

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科尔布罗终于完成了这两个军团士兵的选拔。加之，一个驻守多瑙河防御前线的军团也从米西亚行省移师过来。与此同时，罗马盟国派出的援助部队也抵达了叙利亚。自古以来，罗马就有

与盟国协同作战的传统，其主力是称为军团兵的重装步兵，所以同盟国派来的参战兵力只是骑兵、弓箭手等一类轻装步兵。由于科尔布罗将不适合作战的士兵调换之后，出现了人员空缺，有传闻科尔布罗选用了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的农民来填补空缺。总而言之，士兵人数要远远少于皇帝拨给他的3.4万人。科尔布罗在低地日耳曼军团时曾经指挥了4个军团加上辅助兵近5万人的兵力。然而，也不知道罗马帝国的指挥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科尔布罗在抵御强国帕提亚的前线时，手中的兵力居然比与日耳曼人作战时还少。如若是恺撒，他肯定会自己筹款招募新兵，整编队伍，及早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今非昔比，当下的时局已不允许这种共和制时代的模式。眼下，皇帝与手下的军团长们等级早已固定了下来，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扩充兵力。所以，除了有效地利用手中的兵力之外，科尔布罗别无他法。



亚美尼亚及其周边

公元57年，尼禄与元老院之间的“攻防战”逐渐向有利于战局的形势迈进了一步。就在公元57至58年的这个冬季，科尔布罗率军来到险峻的山区进行严苛的军事训练。当然，不是所有地形和气候恶劣之所都可以作为训练场地，科尔布罗选择在小亚细亚东边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境山区进行训练。这种选择除了可以向亚美尼亚人进行军事恐吓之外，还能让训练有素的士兵随时攻入亚美尼亚，可谓一举两得。

科尔布罗选择的训练营地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原上，搭建帐篷必须先凿开冻结在地表的冰块。然而，寒冷的天气使士兵接二连三地被

冻伤，甚至有人在夜间巡逻时被冻死。罗马军装的特点在于手脚暴露在外面，士兵们就穿着这种军装在凛冽刺骨的冰雪寒风中进行训练，而科尔布罗本人也穿着这种军装四处巡视士兵。许多罗马士兵不堪忍受这种严苛的环境，当了逃兵，原本经过筛选的队伍再次缩减。

虽然科尔布罗身材魁梧、沉默寡言，但他并不是一个粗鲁蛮横的将军。然而，只要士兵们一见到科尔布罗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扬，他周围的氛围瞬间有如凝固了一般。虽然迟到两次在其他军团算不上什么，然而科尔布罗规定迟到一次就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对于弃旗逃跑的士兵则就地正法。如此严酷的训练之下，逃兵现象时有发生，其他军团对归队的逃兵不计前嫌，然而，科尔布罗军团的逃兵即使回来也难逃一死。正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训练之下，在次年初春，这些原本在安条克堕落不堪的罗马士兵精神焕发，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最精锐的部队。

早在公元54年底科尔布罗就被派往东方。公元58年5月，此时可以说是他蛰伏3年多等来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命令士兵们拔营，挥师进入亚美尼亚境内，然而他并非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将军。

与刚刚登基的帕提亚王谈判停战，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派出的是一位下级军官负责谈判，而科尔布罗却派出一位高级军官负责谈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尔布罗非常懂得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进而达成停战的目的。科尔布罗进入亚美尼亚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他一马当先走在军队前列，在脑海里出现两种达成目的的方式——选择开战，或选择谈判。

虽然罗马帝国将亚美尼亚王国纳入统治之下，然而受地缘文明差异的影响，其国内始终存在着亲罗马派与亲帕提亚派，并进行着拉锯战。帕提亚王之弟继承亚美尼亚王位以来，亲帕提亚派的势力自然盖过亲罗马派。科尔布罗率军挺进亚美尼亚，无异于孤军深入。在科尔布罗看来，他手上不足3万人的兵力很可能遭遇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联合夹击。所以在帕提亚军队出兵之前，

科尔布罗希望能与亚美尼亚新王——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进行谈判，尽快达到战略目的。

经过几次彼此试探的小规模战斗之后，科尔布罗派遣使节求见梯里达底，恳求直接会面。然而可惜的是，科尔布罗的期待终究落空。年轻的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虽然暂时接受了会谈的要求，可是关键时刻仍举棋不定。为了打破僵局，科尔布罗将事先写好的提议递交给梯里达底。为了减少军团长的束缚，罗马一直有将空白的委任书交给被派到前线负责战事的总司令的传统，然而科尔布罗的提议可谓胆大包天。

罗马的军装

待在东方的3年里，科尔布罗丝毫没有荒废这段宝贵的时间，他一直打探帕提亚王夺回亚美尼亚皇位的真正缘由，最终找到了答案。

公元51年，沃洛吉斯继承帕提亚皇位，然而他并非先皇的嫡子。其弟梯里达底却是先皇后之子。梯里达底生性敦厚老实，把帕提亚皇位让给了沃洛吉斯。沃洛吉斯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责任替弟弟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思来想去，只有亚美尼亚皇位最适合梯里达底。公元52年，也即沃洛吉斯继位后的第2年，帕提亚出兵亚美尼亚，此时罗马支持的国王仍然在位。时逢克劳狄乌斯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及早作好了应战准备，帕提亚军队又遇到严冬的影响，所以撤军之后就没有任何动静。

帕提亚军队一旦察觉罗马军队的防御漏洞，通常不会轻易放过。而克劳狄乌斯驾崩与尼禄皇帝继位之初，正是天赐良机。公元54年，帕提亚军队再度举兵，并且成功占领了亚美尼亚，将体弱多病又饱受百姓诟病的国王赶出了亚美尼亚，并成功地让梯里达底当上了亚美尼亚王。

科尔布罗在弄清楚了个中原委之后，却发现手中无牌可出，因为罗马方面实在没有可以让他们凭借军事力量拥立为王的合适人选。再者，对于沃洛吉斯本人而言，也没有与罗马军队作战的计划，只是想保住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而已。对于这一点，科尔布罗十分清楚。

那么，科尔布罗究竟向沃洛吉斯及其弟梯里达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下面是提议的主要内容：

> 科尔布罗将向罗马帝国皇帝禀告，请求尼禄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作为交换，梯里达底必须承认罗马帝国的霸权，把亚美尼亚的皇位视为罗马皇帝的封赏。

将皇位视为罗马的封赏收下，意味着承认罗马霸权，科尔布罗深知，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这意味着臣服。科尔布罗还告诉沃洛吉斯，若是帕提亚愿意舍名求实，那么罗马帝国也存在舍实求名的可能性。

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政策，如若从卢库鲁斯远征和庞培称霸开始算起，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20余年的历史，然而这个提案可谓是颠覆性的大胆构想。在我看来，让一个深受罗马文化熏陶并且深爱罗马文化的王子一直待在亚美尼亚皇位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地仔细观察之后，科尔布罗应该明白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看来我们会认为这项提议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并未变成现实。沃洛吉斯根本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弟梯里达底成为罗马的附庸，作为帕提亚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再者，如若点头答应

了，肯定会引起帕提亚国内的强烈反对，进而影响到他的皇位。科尔布罗在收到沃洛吉斯拒绝的答复之后，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亚美尼亚问题了。

科尔布罗命令所有的士兵往东北方向开拔，目标直指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至此，上至军团长，下至士兵，目标都已经很清晰了。

攻占首都

阿塔克萨塔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也即原苏联最南边的一处地方，现在只是生活着很多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小村庄。令人难以想象，2000年前这里是亚美尼亚王国繁华的首都。

罗马军队并非长驱直入径直攻进阿塔克萨塔。科尔布罗在行军途中把部队化整为零，每个分队分别安排了进攻目标，即沿路上的各个城堡要塞。一路上军队采取地毯式进攻，逐个击破，最终兵临城下。把这绵延展开的军队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半圆缓慢推进，渐渐形成围攻阿塔克萨塔之势。很明显，这是为了更轻松地攻克阿塔克萨塔而作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一开始就放弃抵抗，开战之前他就望风而逃，因此，科尔布罗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首都。同年年底，罗马军队占领亚美尼亚王国首都的消息传回国内，百姓们欢呼雀跃，高呼“皇帝”以称颂军队最高总司令尼禄。处于元首制时代的罗马，所有胜利的荣耀最终都由皇帝霸占。亚美尼亚又再次回到罗马的掌控之中，沉浸在喜悦中的尼禄、元老院以及普通民众都对此深信不疑。

虽然梯里达底确实逃之夭夭，然而对于这位前线指挥官科尔布罗而言，根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的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面对变幻莫测的敌情，科尔布罗没有撤军，他

决定继续战斗。科尔布罗苦于兵力有限，认为很难守住阿塔克萨塔，同时为了消耗敌军物资，让他们即使回城也无军需可用，科尔布罗下令坚壁清野，当然，他同时也考虑到保障城中居民的安全。公元58年到59年冬，罗马军队一直驻守在阿塔克萨塔。次年春，科尔布罗率军向亚美尼亚王国的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进发，在弃城之前，他们纵火烧毁了阿塔克萨塔。

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遗址在如今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西抵黑海，东达里海，南接底格里斯河，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古代王国。虽然从阿塔克萨塔到提克拉诺科塔，按直线距离计算少说也有400公里，加之军团长要确保如此长距离行军的军粮供应十分不易，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士兵们高涨的士气。如同攻克阿塔克萨塔一样，科尔布罗对提格兰诺凯尔德也是各个击破，地毯式包围。更何况第一首都阿塔克萨塔破城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使得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军民早已草木皆兵。

由于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守军望风而逃，罗马军队同样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这座城市。攻下这两座城市，意味着罗马凭借军事力量肃清了帕提亚在亚美尼亚的势力，对于这样的战果，罗马会洋洋得意。在皇位继承上，尼禄决定沿用奥古斯都的亚美尼亚政策，让罗马遴选的王子继承皇位。当此大任的王子名为梯里达底，他与东方各王室都有血缘关系，血缘上没有问题。可是对亚美尼亚人而言，这位长于罗马的王子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在国内一没地盘二没人脉，换言之就是空降国王。为了让梯里达底坐稳这个皇位，尼禄命令科尔布罗留下1000名罗马军团兵、1000名辅助兵与500名骑兵作为护卫。

如果认为仅凭这些兵力就可以保护这位空降国王稳坐江山，那么这位22岁的皇帝尼禄对于军事实在是太过天真。现实果然如此，一年不到这项决策就漏洞百出，所幸夸德拉图斯病逝后科尔布罗接任叙利亚总督，这是尼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与此同时，尼禄又愚蠢地把指

挥系统一分为二。

至此，被称为“尼禄初期的五年”的统治可以看做这位暴君最初的德政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尼禄的这五年德政是因为塞内加和布鲁斯从旁辅佐。有这种想法的代表人物是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皇帝，没有人质疑这位明主之言，可是我深有疑虑。诸位看看当时所谓德政的真实情况：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很多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时代遗留的组织和人才，帝国因此得以正常运转。另外，国内政局稳定，几无大事，这算是尼禄之幸。至于安全防卫，最多不过亚美尼亚一处。更何况这个隐患原本可以尽早解决，只是由于尼禄决策失误才多花费了10年时间。如若这5年的确是塞内加和布鲁斯负责帝国政务，姑且不论以近卫军保护尼禄为首要任务的布鲁斯，我认为依靠塞内加的外交与军事才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位身兼哲学家的文人，塞内加缺乏军事与外交经验却担任辅政一职，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统治上的纰漏。当然，没有经验并不能作为被指责的口实。现代人亦然，各国总统或首相，都是从没有任职经验的人群中选举产生。塞内加的确是一流的哲学家、悲剧作家与讽刺作家，于政治却只属于二流角色。在此“二流”指的是只能勉强应付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会撰写并留下许多史实，他们属于文人，即传统上与权力无缘的人群。所以，他们在潜意识中会对同类惺惺相惜。尖酸刻薄的塔西佗也会对塞内加处处维护，确实发人深省。

我认为塞内加没有完全发挥“尼禄初期的五年”的影响力。尼禄与恩师塞内加的关系，正如尼禄极力摆脱母亲一样也是日渐疏远。换言之，尼禄即使是在“初期的五年”这一时期，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进行决策。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恩师塞内加肯定会对他施加影响，而“初期的五年”不可能就此终结。

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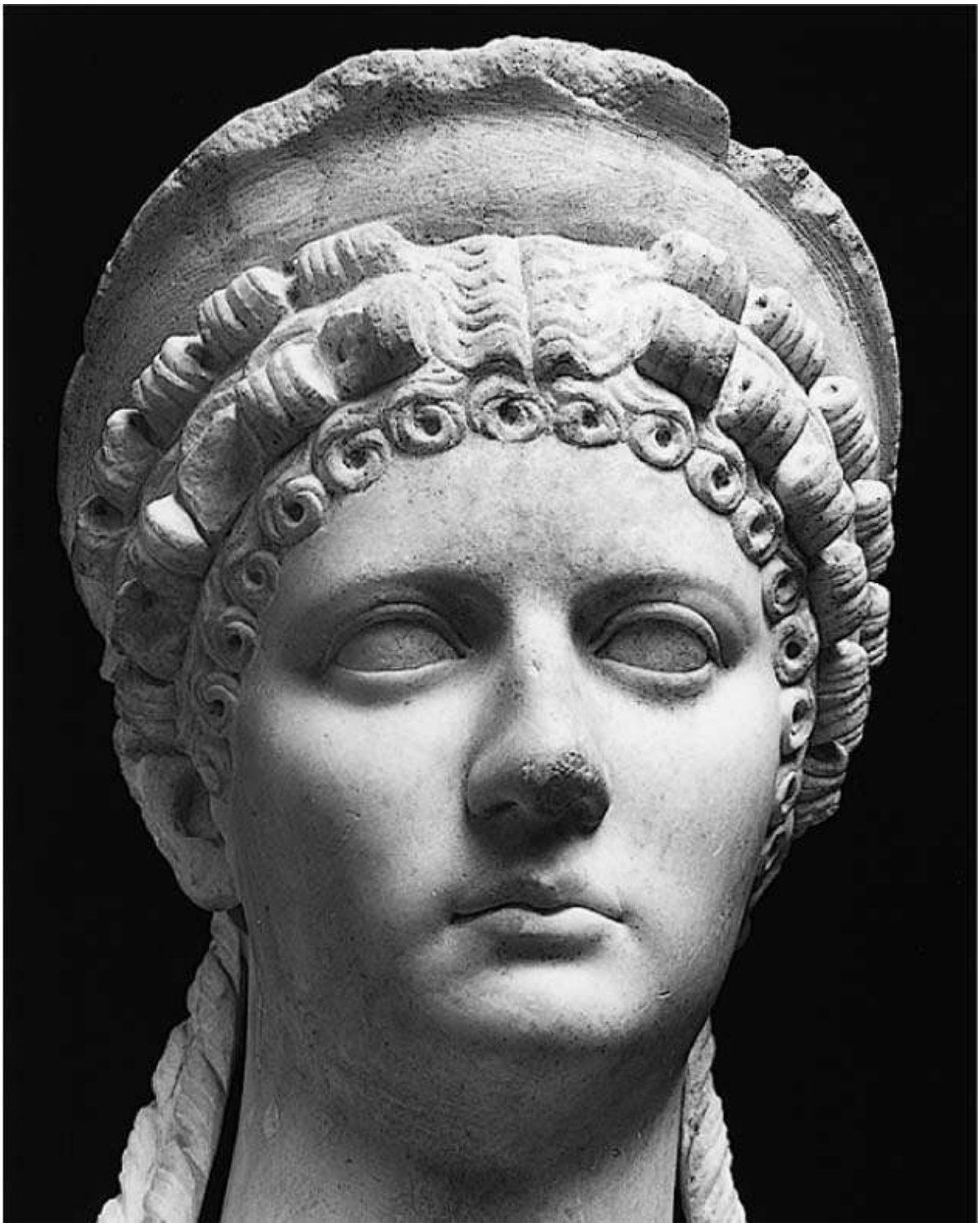
每当遇到迫在眉睫的问题，尼禄就很容易产生走向极端的倾向。我觉得这也是尼禄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尼禄在即将满20岁之际，钟情上了一位名叫波比娅·萨宾娜的女人，虽然她并非出身于高贵的书香门第，但其祖父的确曾在多瑙河防线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是历史学家蒙森所言的“提比略门生”之一。有传闻波比娅虽算不上罗马第一，却也颇有姿色；略有聪慧但也并不出类拔萃。波比娅不像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那样野心勃勃，但也是一位颇为在乎自己魅力的女性。

波比娅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骑士阶级的富豪。当她育有两个孩子后却选择离婚，波比娅再婚的对象选择了另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儿子。这位名叫奥托的年轻人也是尼禄的友人，而他再婚后的妻子正是尼禄想入非非之人。

当尼禄还是“皇太子”时，他迎娶了先皇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他们的结合可以视为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并非是导致尼禄与屋大维娅这对夫妻关系淡漠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屋大维娅呆板无趣、性格沉闷。尼禄的第一个恋人阿可特原本是个奴隶，她真心实意地爱着尼禄，却不懂得体贴人，尼禄很快就对阿可特感到厌腻了。此时，波比娅出现在尼禄的视线里，她楚楚动人又善解人意，身份也适合做尼禄的情人。

对于尼禄而言，将波比娅的丈夫这个障碍撇开易如反掌，他任命奥托出任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行省总督。奥托经常陪尼禄整夜嬉戏，但是就任行省总督一职后，他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个边境行省长达9年的任期内，奥托的治理堪称典范。尼禄死后出现了三个因争夺皇位而丧命的皇帝，而这位奥托正是其中之一。



波比娅• 萨宾娜

尼禄除去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但波比娅并没有点头同意成为

他的情人，这倒不是因为她深爱奥托，而是屈居情人她心有不甘。而正是这个问题让年轻的尼禄走向了极端。

如果要立波比娅为皇后，唯一的办法是与屋大维娅离婚，然而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根本就不会同意。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所言也不无道理，因为先皇克劳狄乌斯收尼禄为养子，使他有资格登上皇位。与先皇之女屋大维娅结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皇位。所以，小阿格里皮娜自然不同意尼禄的鲁莽行事。

然而，与她那令提比略难以忍受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一样，这位小阿格里皮娜一生最大的依仗也是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惜她一直不曾醒悟，奥古斯都驾崩23年后出生的尼禄认为，做“皇帝”需要的是“实力”而非“血缘”。

面对态度强硬的母亲，起初尼禄束手无策，然而，不久竟想除之而后快。

解放奴隶阿尼克特斯成为尼禄选中的帮手。阿尼克特斯曾任米塞诺海军基地将领，此人颇有才能，可惜品行不佳。他曾是尼禄少年时的体育老师之一，和尼禄的关系一向亲密。但是，小阿格里皮娜没有提拔他，因而他对小阿格里皮娜一直心怀不满。

这次谋杀必须瞒过众人耳目，要让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个巧合。尼禄接受阿尼克特斯的建议，命人打造一艘船底开洞的船，以便船只出海后能迅速失事。于是，尼禄到处宣传他与小阿格里皮娜重归于好的信息。大体的内容是不管她的母亲多么啰唆，他还是会听从母亲的教诲。

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V. 马拉诺的素描）

他们很快选好3月20日为下手的日子，就在工匠的保护神——智慧

女神密涅瓦（Minerva，希腊称雅典娜）的祭典日，恰逢工人们都休息，同时也是大家熟知的3月15日恺撒遇害的“弑父日”（Idus Martiae）的5天之后。就在这一天，尼禄在位于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海角附近的巴科里别墅举办招待会，以庆祝女神密涅瓦的诞辰为由招待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3月20日晚夜色十分美好，尼禄的重臣塞内加与布鲁斯等也出席宴会。在他们看来，22岁的年轻人殷切款待母亲的情景一定是久违的盛宴。从别墅极目远眺，就在这个3月份的大海，有如巨大的银盘中盛满了水一样，很少见到这么平静的海面。

宴会在半夜结束了，尼禄亲自送母亲小阿格里皮娜到码头搭船返回海边的别墅。当时的场景正如儿时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一样，尼禄热情拥抱将要登船的小阿格里皮娜，挥手作别。

不出预料，船沉了，然而预料之外的事让尼禄大失所望，小阿格里皮娜并没有溺死。

在卡利古拉时代，小阿格里皮娜曾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流放期间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厉害的游泳本领。再者，船只是在波佐利湾沉没，这里以风平浪静著称，卡利古拉曾将船只连成一片，骑马从上面驰过都没有问题。加上事发当晚海面十分平静，静得仿佛一面剔透的镜子。小阿格里皮娜的泳姿在静谧星空的映衬下想必十分迷人。据说出海捕鱼的渔夫碰巧救起她时，她不慌不忙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命令渔夫将船只靠岸。

回到别墅后，小阿格里皮娜顿觉蹊跷，察觉此事绝非巧合，而是儿子故意设下的陷阱。然而，她故作冷静地写了一封信，让一名信得过的解放奴隶送呈皇帝尼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虽然船沉了，但万幸的是我只是肩膀受了点皮肉伤，不用担心。”

尼禄正在焦躁地等待母亲的死讯，夜不能寐。突然接到这封信之后，顷刻之间方寸大乱。塞内加与布鲁斯被紧急召至尼禄处，尼禄向他们哭诉坦白了一切，并央求解决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塞内加与布鲁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但他们三人都十分清楚小阿格里皮娜肯定知道了内情，按照阿格里皮娜的性格，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他们也会跟着遭殃。塞内加提议，授意近卫军出手要省事得多。布鲁斯反对，理由是近卫军士兵不可能举剑击杀日耳曼尼库斯之女，他们只好放弃这个打算。最后，他们决定让阿尼克特斯再次下手去弥补他的过失。此时，夜如白昼。

阿尼克特斯首先把小阿格里皮娜的解放奴隶带到仆人面前，诬陷这名奴隶奉小阿格里皮娜之命谋杀皇帝，并在他张口反驳之前迅速杀人灭口。事有凑巧，这位解放奴隶正好身佩短剑，这柄短剑自然成为了生事的把柄。

随后，阿尼克特斯率领部下直奔小阿格里皮娜的别墅。刚一到达就把这栋住宅围得水泄不通，并冲了进去，把所有仆人都赶了出去。卧床休息的小阿格里皮娜看见这些来势汹汹的歹徒们仍故作镇定。她还一本正经地躺在床上平静地说道，如果儿子命他们前来探望，就转告她已无大碍。

当阿尼克特斯与部下将小阿格里皮娜的床团团围住时，她这才突然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她只指着自己的腹部说道："你们要杀我的话就刺向这曾经孕育尼禄之处。"然而话音未落，她就被利剑刺得体无完肤，包括她的腹部。

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别墅从波佐利、拜亚、巴科里一直绵延至米塞诺海角的海岸线上，随处可见。为了掩人耳目，入夜后小阿格里皮娜的遗体被悄悄运出，草草火化之后就交由胆大的奴隶们挖坑掩埋了。这位贵为皇妹、皇后，最终成为皇太后的尊贵女性就葬于此，然而六亲不认的尼禄从未涉足此地。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塞内加才以叛国罪的罪名公开了处死小阿格里皮娜的消息。元老院议员与罗马公民们对小阿格里皮娜本来就没有好感，所以即使心里十分怀疑，但表面上仍然佯装确有此事。

然而，罗马人自古重视家庭，对他们而言，不管何种理由，弑母始终是有违伦常的大罪。对此，尼禄非常清楚，所以他极度担心议员们和普通民众会唾弃他，很长时间不敢返回首都。几番犹豫反复之后，尼禄还是决定回去。然而，令他十分吃惊的是，首都的罗马人纷纷欢迎他回来，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敌意，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另一方面，罗马公民们都对丧父的屋大维娅寄予深切同情，罗马也没有无后可以离异的传统，所以尼禄不敢急着和屋大维娅离婚、再娶波比娅。至于波比娅本人，她可能深信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皇后，所以大概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情人身份。因而，除去小阿格里皮娜这个障碍之后，他们持续了3年的情人关系。当然，这当中也许与塞内加提出的暂时不宜刺激民心的建言不无关系。然而，弑母的煎熬让尼禄比任何人都要痛苦。22岁的尼禄每晚都被亡灵骚扰而夜不能寐。

亡灵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三者也能看见，典型代表就是哈姆雷特看见其父的灵魂；另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得见，比如布鲁图看见恺撒的亡灵。仆人们每次听到尼禄在睡梦中号叫的时候急忙赶过去，却什么也没见到，所以让他辗转难眠的应该是后者吧。在元老院会议上，尼禄指责母亲为了实现她统治帝国的野心不惜命令解放奴隶前来刺杀，议员们也做出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可是尼禄无法说服自己，他始终不能坦然以对。对于此时的尼禄而言，比起与妻子离异同情人结合，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加重要。

惊慌失措的人通常会收到很多忠告，人们告诫他回到出发点，弄清楚自己的目的，再重新出发。与当时的罗马知识分子一般，尼禄痴迷于希腊化。然而，尼禄以外的罗马人，甚至希腊文化造诣颇高的塞内加也不认为有必要引入希腊精神，并将之融入日常生活，当然他也很喜欢希

腊文化。不过尼禄的倾向，就是偏好走极端。他固执地认为应该引进希腊文化，让它落地生根，从而使罗马变成文化之都。

今天，罗马历代帝王的头像都收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要分清头像的制作年代并不困难。因为以痴迷希腊化著称的哈德良（Hadrianus）皇帝就是最佳分界线，他之前的皇帝没有留胡须，在他之后的皇帝们都蓄有胡子，非常容易辨认。希腊人习惯蓄络腮胡，比如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罗马人没有这种习惯。罗马男性必须将脸上的胡子打理干净才算成年男子的样子。罗马人尊重希腊人在哲学、美术或文艺方面的才华，却看不起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把胡子刮个精光就是罗马人与希腊人划清界限的表现。

除了尼禄之外，哈德良之前的罗马皇帝都不留胡子。也许因为年轻，尼禄的胡子也十分少，最多只能盖住下巴而已。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尼禄效仿希腊人而付出的努力。从当时货币上尼禄的头像，我们可以知道刚即位时他并没有胡子。当他决意弑母时，他的头像下巴上有些许胡须，这与他对希腊化的喜爱溢于言表的时间大致重叠。

罗马奥运会

公元60年，这一年正是小阿格里皮娜离世后的一周年，尼禄正若无其事地筹备他的计划，并打算在首都罗马实施。

为了此项计划，尼禄筹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并将其命名为“Ludi quinquennali”（五年一届的竞技会），普通人称之为“尼禄节”，即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翻版而已。尼禄非常喜欢希腊，也很喜欢猎奇，所以为了区别于四年一届的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他把罗马的竞技会规定为五年一届。

据记载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生在公元前776年，当时的竞技项

目除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田径项目之外，还有拳击与摔跤等项目，但参加比赛的都是男性。古代奥运最后一天没有马拉松比赛，马拉松其实是近代的产物。但是当时也有重头戏，就是让观众为之疯狂的四匹马拉战车之间进行的竞赛。

普通比赛只要有健壮的身体就可以一决胜负，然而战车竞赛则不然，要参赛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所以，参赛者以有钱人居多，这也是观看率高的原因之一。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获胜，他像罗马的凯旋将军一样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拥戴。在奥运会中获胜，为阿西比亚德往后的政治生涯增添了筹码。这充分表明，无论古今，奥运会的优胜者都被人们视为英雄。

提比略在罗得岛隐居期间也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大胜而归。尼禄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也曾经荣获过月桂冠。毫无疑问，这两位都是罗马上流社会人士，也都曾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参加战车比赛。然而，提比略登基后根本没想过要把这项比赛搬到罗马。

可是，反观尼禄，他不仅精心策划还付诸了实施。在他的观念里，罗马帝国的男子必须效仿古希腊男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努力锻炼身体，然后在五年一届的比赛中向大家展现自己的身体。

除了体育竞技之外，尼禄还认为有必要在罗马举办兼具诗歌与音乐的比赛，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并享受这一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希腊文化。诗歌与音乐被视为希腊化的精髓，让普通民众接受它、习惯它，徜徉其中，罗马帝国才能转变为文化国家。尼禄本人喜好诗歌音乐远胜于政治军事，他也坚信自己于此道天赋异禀。爱好未必能够创造，和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一样，尼禄可能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事实上，倡导文化国家，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努力扩大文化交流，这些更适合业余爱好者。

民众们对这个比赛的称呼“尼禄节”真是名副其实。这个庆典使用了

包括大角斗场、梵蒂冈角斗场、庞培剧场、马萨鲁斯剧场以及巴尔布斯剧场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这样一来整个罗马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会场，民众们可以免费进场观看比赛。参赛者都是业余选手，虽然不是专业人士，比赛却别有风味。当然，为了调动气氛，尼禄还组织了“皇帝团”拉拉队。就这样，庆典的目的完全达到，尼禄的这场“罗马奥运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圆满落幕。

然而，让罗马人理解竞技本身的美丽与乐趣绝非一朝一夕可成，这是项大工程。为此，尼禄兴建了“体育馆”（Gymnasium），可是只有青少年光顾，成年男子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尼禄想出一计，在体育馆旁边盖一座罗马式浴场以吸引民众。浴场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们可以沐浴、按摩、嬉戏、休息。这个浴场反响不错，但是依然没有成年男子去体育馆锻炼。因为在罗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锻炼身体是成长的必经阶段，既然长大成人了，体育锻炼自然可以告一段落。

“尼禄节”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同奥运会不相伯仲的罗马竞技比赛，然而由于尼禄自杀身亡，竞技只举办了两届就随着尼禄的离世一起被历史湮灭。体育馆也难逃被拆毁以作他用的命运，只有浴场得以保存至今。

有趣的是，尼禄对希腊美学倾倒不已，然而他的身材丑化速度也不遑多让。

尼禄17岁继承皇位，当时他圆圆的脸蛋透出几分稚拙可爱，可惜此后货币上的头像却愈发臃肿。他举办“尼禄节”时不过二十二三岁，本是风华正茂之年，但胖嘟嘟的脖子破坏了这份美感。或许很多罗马公民觉得尼禄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加强体育锻炼。

应该是体质导致尼禄年纪轻轻就过度肥胖。但是他非常喜欢重视肉体美的希腊精神，其痴迷程度远远超出他对无视肉体之美的政治。有时候我不禁会想，要在矛盾和挫折之中保持精神平衡，实在不容易。

肥胖的尼禄

公元61年，即举办“尼禄节”的次年，时隔数年帝国边境又起骚乱，不列颠人揭竿起义。另一个边境问题，依然是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两起骚乱发生在帝国东西两侧，对国内稳定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普通公民可以不考虑这些变动会有何影响，身为维护帝国安全最高负责人的尼禄却不能不闻不问，他必须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才不负“皇帝”之称。当然，具体应对措施是现场指挥官的问题，皇帝要负责考虑根本的解决之策。

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来看，在不列颠问题上24岁的皇帝表现得无可挑剔，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尽如人意。万幸这一失策没有给帝国带来根本性恶果，因为彻底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科尔布罗的助力也不可或缺。不过，事无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后来成为尼禄外交策略的一个成功典范。

不列颠问题

有一种军事行动可以来去自如，即入侵别国、烧杀掳掠、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犯下滔天罪行后溜之大吉的强盗行径。然而，如果入侵的目的不仅仅是侵占领土，还要把当地居民与自己同化，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首先，若欲以武力称霸，为免夜长梦多，被侵略者反抗之心渐长，速战速决乃上策。所以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倾全军之力，尽快一决雌雄。投入大量军力，赶快分出胜负。若以微弱兵力徐徐图之，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马基雅弗利也认为，干坏事必须心狠手辣、不要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同理，侵略这种恶行也应该速战速决，之后妥善处理，这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都有利。当然，主张任何侵略都是罪行的理想主义我们不作讨论。直白地说，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侵略史的串演，换言之，即人类恶行的大串联，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性现实。至于如何把随之而来的伤害减至最低，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尤里乌斯·恺撒入侵高卢是罗马人最成功的一次“恶行”。在他看来，等待元老院裁决与虚度青春并无二致，他索性四处筹款，最后自己出资招募了10个军团，历时8年终于征服了高卢。当时，辅助兵部队制度未曾出现，所以10个军团只有6万人，再减去高卢战役中折损的士兵，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不过，这支队伍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是历史

上威名赫赫的名将——恺撒麾下的精锐之师。高卢战役耗时8年，随后又用1年进行战后处理。对高卢的处理，恺撒没有报复泄愤，也没有调整统治阶层与部族的等级差异，他赋予被征服者罗马公民权，同意部族自治。此外，恺撒没有强求高卢人移风易俗，也不强迫他们使用拉丁语，他甚至以保护高卢民族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为己任。至于行省税和关税，他体谅高卢开发程度不高，所以短期内的税率低于其他行省，希望可以借此改善高卢的经济状况。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堪称典范，非是高卢民族不欲独立，而是归顺罗马之后，他们积极融入罗马世界，少有擦枪走火之事。历史学家蒙森写道，高卢人称呼自己是罗马人，而非高卢人。高卢得以迅速罗马化，得益于恺撒“干坏事一鼓作气、善后处理深思熟虑”。

然而，可能由于主张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于军事上还是半瓶子水的缘故，导致罗马人处理不列颠的方式与高卢截然相反。

最初征讨不列颠的4个军团很快缩减成3个，再往后只有2个军团继续征服行动。虽然有辅助兵制度，辅助兵力与正规军相当，可是2个军团士兵1.2万名，两者相加不过2万人。况且，其中的精锐部队可能不足1万人，同恺撒的5万精锐可谓天差地别。称霸高卢历时8年，征服不列颠耗费18载依然遥遥无果，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在前线指挥官，而是因远居罗马的皇帝战略部署不当。

当时，军团长每隔两三年必须轮换，他们能做的就是一步步地扩张，让退役士兵迁入此地后建立殖民城市，城市之间以罗马式街道相连，新城与原自治城市一同构成治理行省的“核心”。这种罗马的传统做法，并无不妥，只是进展太过缓慢。

公元61年，不列颠发生的反罗马暴动，事发地点不是自由之地，而是已经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地方。所以，这次暴动反映了罗马统治不列颠，没有成功。

不列颠暴动的发起人是一名叫做波狄卡的女性，波狄卡原本是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部族长的遗孀。其实，暴动并非由她发起，只是她的两个女儿不幸被罗马人玷污，所以大家推选她做领导者反抗罗马。

在高卢战役中，恺撒与被征服者的女性之间，虽然算不上强暴，但是他们确实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然而，被征服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发生反罗马的暴动。当然，恺撒也没有遮遮掩掩，为了表示“补偿”，他授予这名女子的父亲罗马公民权（也许该女子的父亲原本就属于统治阶级），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名称尤里乌斯赋予这个家庭。在距离恺撒统治百年之后的尼禄时代，出现了一名叫做盖乌斯·尤里乌斯的日耳曼人部族长，此人声称自己是恺撒后人。可见，不管在何处播种，只要彼此心满意足自然相安无事。不列颠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才会导致反罗马暴动的产生。

当然，这些只是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事情的真正缘由是这样的：

首先，不列颠尚未完全被征服，可是对于手下败将的不列颠人，罗马人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姿态，肯定会刺激不列颠人。其实，罗马人这般做派不难猜测，他们摸不准旧敌什么时候会找帮手来对付自己，实在难以把这种对手视为盟友，又怎么会和他们平等相处呢？征服的时间越长，各种问题就会逐渐显露。

其次，金钱问题。这不是由于10%的行省税过高，而是缴纳税款时必须另行贷款，然而，借贷的利率又高得十分离谱。意大利本土的法律规定借贷利率最高上限为20%，但是行省可以随意乱定比例。不巧的是，在落后地区不列颠的金融业者全是罗马人。

布鲁图在共和制时代末期，在行省放高利贷，利率高达48%，西塞罗对此愤慨不已，有书信为证；那么想必在逐渐成为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不列颠，这种高利贷也是猖狂无忌。因为不列颠没有完全被罗马掌控，

所以在此地放贷也要承担一定风险。风险越高利率越高，这是经济上的逻辑。防止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是“战后处理”中极其重要的工作。然而，不论是克劳狄乌斯，还是尼禄，他们没有在前线指挥的经验，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传闻尼禄的辅佐官塞内加由于在不列颠投资高利贷，因而累积了巨额财富。皇帝的近臣尚且如此贪财，何况别人？所以要让他们控制经济的恶性扩张，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没人管控，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享受暴利的人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金融业者。不列颠人不仅对金融业者不满，所有罗马人也成了他们愤怒的对象。他们认为罗马人只把不列颠人视为可以尽情压榨剥削的对象，如此，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变成了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为此后悔不已。恰逢此时，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的苏维托尼乌斯（此人并非《罗马皇帝传》的作者）率领驻守不列颠半数的罗马士兵，大肆驱逐死守摩纳岛（今安格尔西）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与信徒，导致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移居至科尔切斯特的罗马退役官兵受到不列颠人的攻击，而罗马军队的屠城更刺激了暴动者的疯狂，他们甚至全歼了一个赶来支援的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面对不列颠行省的首都科尔切斯特彻底沦陷，外加一个军团全军覆灭这种惨败，根本无法继续保持淡定。军团长与皇帝财务官等人命令苏维托尼乌斯即刻回城增援，但是不及苏维托尼乌斯率军从安格尔西返回，这些暴动者已经穿过多佛尔海峡，直奔高卢逃窜而去。

由于军队元气大伤，导致了罗马的军事部署也出现了漏洞，已经无力抵挡暴动者的怒火。遇害的不只罗马人，与罗马人友好的不列颠人也不能幸免，老弱妇孺皆不例外。据说遇害者达7万人之多。这是因为不列颠人不会把俘虏当做奴隶贩卖，投降者一律格杀勿论。

总督苏维托尼乌斯可以运用的兵力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说力量十分薄弱；并且高卢没有罗马驻军，所以只有等待救援一途：从莱茵河派

出援兵，或者等待西班牙的罗马驻军赶来增援。然而在这紧要关头，敌人不可能给罗马军队任何喘息的时间。面对暴动者的强大攻势，别无他法的苏维托尼乌斯只能决定在平原上布阵，与暴动者正面对决。仍然带有野蛮气息的不列颠人对这种战术并不娴熟，而罗马军队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评论的“不愧为昔日将军后代”一样，罗马军队大获全胜。敌军几乎全军覆没，8万多具尸体铺满了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己方几无折损。骚乱处理至此结束，接下来交给身处罗马的尼禄皇帝来收拾残局。

为了填补被歼灭的一个军团出现的军力不足，尼禄下令从负责防守莱茵河的军队中拨出2000名军团兵、8个大队辅助兵以及1000名骑兵开往不列颠，兵力总计约1.1万人。同时，他派解放奴隶波里克雷特斯前往不列颠视察。皇帝的特使原本是奴隶，这不免遭亲罗马派的不列颠人耻笑。然而，这位波里克雷特斯非常称职，根据他的报告，尼禄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不列颠的治理政策。

没有资料明确记载改革的详细内容，我们清楚的是，尼禄没有任何报复行动。他反而以此为契机，180度改变了征服者罗马人对被征服者不列颠人的态度。此外，尼禄把苏维托尼乌斯召回罗马，重新选派了佩特罗尼乌斯担任不列颠的新任总督。这个安排对苏维托尼乌斯并不公平，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并大败敌军，然而要让不列颠人知道罗马改变对他们的统治方式，除了人事调动之外别无他法。

不出所料，不列颠人在此后400年间很少发生反抗罗马的暴动了。当然，罗马的称霸大业远远没有画上句号。不过，就今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而言，当时的不列颠人已经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另一方面，从这个时期开始，作为德鲁伊特教象征的凯尔特文明被逐出不列颠，他们逃往爱尔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就在英国与爱尔兰的信仰分化为新教与天主教前夕，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早已泾渭分明。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尼禄适当调整了不列颠的统治策略，然而，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上很难发现他的高明之处。我想，可能是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差异太大的缘故。不列颠问题是帝国内部问题，它是帝国对一个地区的统治失误。而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一样，它影响着整个帝国的安全防御。

也许我们该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罗马支持的梯里达底这个空降国王对亚美尼亚的统治不足一年，足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人事安排。亚美尼亚是被帕提亚重新掌控，还是继续亲罗马，无论哪种结局都必将影响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系统的功能发挥。况且，亚美尼亚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将会决定与帕提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尼禄眼前有三种选择：

（一）罗马帝国若没有其他合适人选，除了依靠军事实力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之外，别无他法。

（二）亚美尼亚王国的两个首都已经被罗马占领，那么为绝后患，索性把问题不断的亚美尼亚王国纳为罗马的行省。

（三）要么对于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的计策予以采纳。也即认可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但作为交换条件，梯里达底必须宣誓服从罗马皇帝。

如果选择（一），庸碌无为的梯里达底是否有能力统治亚美尼亚，这个问题让人忧心忡忡。

如果选择（二），把王国变成行省由罗马直接统治，要在亚美尼亚实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不太现实。亚美尼亚王国是属于波斯文明圈的文明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行省与仍然较为野蛮的色雷斯王国不能一概

而论。将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纳为行省时，罗马会给予对方高度自治权，亚美尼亚原本与帕提亚亲近，如果给了它类似希腊或叙利亚等希腊裔城市的高度自治权，那么这个行省最终不过徒具虚名，罗马白费力气罢了。

尼禄也不敢采用方案（三），因为这会让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定下的政策完全改变。其实他非常清楚，要维持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方案（三）是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他担心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强烈反对，理由是承认帕提亚王的弟弟成为亚美尼亚王，无异于当面打脸，让罗马颜面扫地，威信荡然无存。

面临选择时，以下几个条件帮助尼禄作出决定：

（A）自古以来，亚美尼亚的上流社会就分为亲帕提亚派与亲罗马派，如今两个首都尽由罗马掌控，亲罗马派必然得势，罗马方面大可借助他们的势力达成目的。

（B）首都是国家的核心，罗马占据着亚美尼亚的两个首都，在军事上非常有利。

（C）大部分民众希望把亚美尼亚变成罗马的行省，这意味着帝国的版图有所扩大。

最终，尼禄的选择是兼具（一）与（二）的策略：如果能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他事休提，否则，就把亚美尼亚变成行省。然而，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与帕提亚的矛盾，刺激全面冲突的爆发。

科尔布罗得知这个决定后建议身在罗马的尼禄，必须安排一位只负责亚美尼亚战线的军团长。尼禄欣然采纳，他任命信仰军事至上的贝图斯为军团长，负责亚美尼亚前线的军事指挥。

公元62年，因尼禄的任命，甫上任的贝图斯获得3个军团，其中2个

军团从莱茵河抽调，再加上辅助兵以及同盟国的参战兵，总人数超过3万。另外，科尔布罗也掌握3个军团，不过他只负责履行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责，即他负责全面防守幼发拉底河以西，提防帕提亚军向西进攻。科尔布罗致力于加强幼发拉底河西岸一带的要塞防御，如此，罗马在这一地区的防线可谓铜墙铁壁。这样看来，尼禄的战略是把军事力量分为两个拳头，从两边包抄夹击帕提亚，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

大家都认为帕提亚王会御驾亲征，可是能在皇位争夺中获胜的人不可能脑袋空空。既然罗马在这一带的防御固若金汤，帕提亚王肯定不会自投罗网，傻瓜一样故意用头去撞铜墙铁壁。他的大军自然会避开西边的罗马防线，转向贝图斯率军集结的西北部寻找突破。更何况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并非与罗马开战，他只是希望能确保弟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因为弟弟把帕提亚的皇位让给了并不正统的自己，他想以此作为弥补。

连我这个军事方面的门外汉都能想到的情形，当时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不可能没有预料到如此结果。也许科尔布罗明知结果，他刻意为之只是想试探贝图斯的深浅吧。毕竟没有亲身经历无法理解个中内情。

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贝图斯即将击溃帕提亚军队，让亚美尼亚真正成为罗马的领土，因为大家都乐意听到好消息。假如公元62年有民意调查，那么此时尼禄的支持率想必会非常可观。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偶尔会有奇怪的行径出人意料，然而于政事上他表现得可圈可点，不列颠问题妥善安排，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当机立断，这些都会让百姓觉得他足够担当统治帝国的重任。所以尼禄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帝国最高负责人的职责，即使偶有出格的言行，无非就是为民众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而已。

向首都罗马供水的水道并非出自同一个源头。罗马人通常将有泉水涌出的水池视为圣地，禁止游泳。当然，神圣的水池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意是为了保证饮用水的纯洁干净。

可是尼禄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跳进了其中一个神圣水池中游泳。然而，水池中的泉水温度比较低，所以尼禄当晚就发高烧，昏倒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奇迹般地康复过来，但是首都的居民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尝到苦头后尼禄并没有再犯，而罗马民众们也没有表示不满，反而认为这是他朝气蓬勃的表现，更加拥戴他。

然而，高支持率经常与陷阱相伴相生，为了避免掉入陷阱就需要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可是尼禄对此实在没有天分。不巧的是，尼禄就在此时失去了两名能够不计个人得失直言不讳的大臣。

塞内加下台

负责尼禄安全的近卫军长官布鲁斯因病离世，这也是尼禄失去左膀右臂之始。后世有种说法很盛行，说布鲁斯之死是尼禄授意所为，不过从他当时的症状来看，很可能死于咽喉癌。可是，塞内加也因布鲁斯之死心里面打起了退堂鼓。

同塞内加一样以文笔优美著称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甚至这样写道："布鲁斯之死决定了塞内加权力开始丧失。"

与塞内加相仿，塔西佗的文学造诣非常之高。虽然他们都身为元老院议员，然而塔西佗在仕途上的成就最多是行省的勤务工作，塞内加却是辅佐皇帝、担当国家要职，两人不可相提并论。塞内加身处罗马帝国权力核心，才深刻体会到知识分子在这个职位上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如果只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区别仅仅在于没有实权。换言之，要让别人认同你所发挥的影响力，前提是有人愿意接受，就像没有了读者，作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位哲学家与悲剧作家，塞内加从尼禄12岁时就开始陪伴这位

年轻的帝王，前后14年。前6年他的身份是教师，后8年他的身份是尼禄的辅佐官。然而，塞内加并未在尼禄登基之后，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影响力。图拉真皇帝所谓“尼禄初期的五年”的时代，我认为更早以前尼禄就开始自立了。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没有察觉儿子极度渴望自立，然而塞内加应该是早有所感。换言之，在“读者”尼禄的成长过程中，“作家”塞内加逐渐发现尼禄的目光不再专注于自己。

然而，此时被塔西佗称之为“塞内加的权力”依然不可小觑。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重责大任并不轻松，这份工作让贵族气质浓厚的提比略皇帝偶尔发牢骚抱怨几句，让克劳狄乌斯皇帝殚精竭虑。尼禄喜好音乐诗词远胜于政治军事，所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就由他人代劳，这个人就是塞内加。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法案中得到证实，这些法案都以尼禄的名义提议，目的是获得元老院的支持。塞内加能够发挥这些“权力”，少不了尼禄的许可，当然也离不开布鲁斯的支持。

当然，不论塞内加多么富有涵养，他毕竟出身西班牙行省，没有罗马名门贵族必备的世代相传的“被保护人”（clientes）。其实这些“被保护人”就是类似后援会的组织。这匹荒野上的孤狼能够纵声长啸，完全是由于布鲁斯时刻以锐利的目光警惕四周，毕竟他掌握驻守在意大利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即1万名近卫军。

世间不论哪种权力，拥有者总会受到无权者的强烈批评，并且露出破绽时遇到的攻击更猛烈。尼禄已经逐渐脱离塞内加的影响范围，元老院肯定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布鲁斯在世时塞内加已经开始受到攻击。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不只塞内加，但是似乎是杀鸡儆猴，他被特意提出来批评，仿佛他是不列颠发生骚乱的罪魁祸首。偏偏就在此时，布鲁斯撒手人寰，对塞内加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塞内加醒悟过来，他脚下的基石开始松动了，如果继续跟随尼禄，上演荒野孤狼走投无路的悲剧实在有违塞内加的本性。所以他选择退隐，回归平凡，重新执笔。此时的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垂垂老矣。

还有现代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塞内加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无法忍受尼禄的暴政，于是以布鲁斯之死为借口，远离仕途。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不仅在“知识”的道路上求索，更会在“知识”的道路上一较高下。既然要分出胜负，一旦明白自己没有胜算，自动退出也是理所当然。

更何况，到此时此刻，尼禄在统治上虽然发生过因为对军事无知造成的失策，或是一意孤行举办罗马奥运会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暴政。元老院议员们没有谋划任何阴谋，民众们也没有不满，甚至边境上的驻守军团都没有任何骚动。真实的塞内加远比现代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他更加坚韧，可是他竟然选择退隐，我深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不稳了。

这场恩师与学生话别的场景在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我们简短描述的话，就是塞内加对尼禄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希望回归田园；尼禄则感念恩师劳苦功高，恭祝恩师颐养天年。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的真伪，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一场师生情深意重的表演而已。塞内加当然希望在公共场合向尼禄说清退隐的缘由，尼禄也须对这段经年情谊表明态度和立场。66岁的恩师与25岁的学生，就这样平静地分道扬镳了。

但是，尼禄的自我控制力不强，此后再没有人能够直言不讳地进谏了。与此同时，尼禄迅速处理了不列颠问题，又决定使用武力积极介入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大力赞扬。

由于布鲁斯已死，塞内加归隐，没有人会阻止尼禄的任何决定。不久，尼禄与屋大维娅离婚，随即迎娶情人波比娅。尼禄对离婚的屋大维娅处以流放之刑，进而命人在流放之地将她杀害。据说因为尼禄害怕民众们太过同情屋大维娅，不满他休妻另娶，进而以抗议示威来支持屋大维娅，所以痛下杀手。无论如何，继弑母之后，杀妻又为尼禄添上了暴虐的一笔。

尼禄无端杀害无辜妻子一事，并没有因为其背上污名而画上句号。身为皇帝，尼禄的权威和权力有效发挥需要前提，就是成为先帝克劳狄乌斯的养子并与其女屋大维娅结婚、生育儿女，这样才是合法的。然而尼禄与屋大维娅没有后代就离婚，意味着他失去了合法性，正因如此，才招致小阿格里皮娜强烈的反对。再者，就奥古斯都定下的“血缘”继承制度而言，小阿格里皮娜的反对并没有错。小阿格里皮娜可以证明他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是尼禄已经把她杀了。尼禄这个皇位的正当性越来越不堪一击。波比娅成为皇后之后没有被百姓接纳，她不像阿格里皮娜一样野心勃勃，却处处讲究排场，追求奢华。但是，人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不幸，只要稍有不顺，它就会变成导火线，焚烧一切。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和心爱的女人成婚，春风得意的尼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正如履薄冰。

已经步入25岁的尼禄愈发专横跋扈，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实力”而无须“血缘”这个靠山。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意味着元老院、公民与军队将以更严苛的标准重新审视皇帝的能力。

罗马军队的投降

在尼禄的命令之下，前往东方上任的贝图斯把手中所有的军队都投入到了亚美尼亚。可惜的是，贝图斯却大意地将军队分为两个部分，导致攻击力分散，此外对军粮的补给路线也根本就是疏忽大意。尽管如此，罗马军队的进攻还算顺利，从当年年底贝图斯送回罗马的书信来看，罗马军队仿佛已经征服了整个亚美尼亚。对此，尼禄龙心大悦，下令兴建纪念碑庆祝胜利。

然而，就在贝图斯的报告传递到地中海以西时，异变陡生。贝图斯的罗马军队突然遭到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率军突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此时，由于兵力分为两个部分，当时贝图斯手上不到2个军团。

与公元55年一样，尼禄再一次重蹈覆辙，公元62年他又一次分散帝国东方的指挥系统，导致贝图斯与科尔布罗地位、权限相当，手中的兵力也在伯仲之间。如此一来，原本应该放在首位的战略部署毫无意义。更为糟糕的是，贝图斯完全没有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手下的兵力，他又不经大脑地把不多的军队再度一分为二。罗马军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帕提亚王并非傻瓜，他肯定会抓住这个破绽猛烈进攻。果不其然，贝图斯的军队惨遭失败，又苦于军粮不足，他们只好悻悻地逃回冬营地。然而祸不单行，就连冬营地也被团团围住，帕提亚王还下令猛攻不止，束手无策的贝图斯只得命部下快马加鞭向科尔布罗紧急求援。

科尔布罗在得知贝图斯率军深陷敌围之后，遵循罗马的战略传统，将他的军队也一分为二。首先，他严令一半部队死守幼发拉底河的帝国防线，同时下令将船只连接形成浮桥。他还在东岸的帕提亚领土上兴建堡垒，保证一声令下士兵们可即刻攻入帕提亚。接着，他开始准备军粮，囤积起来的大量小麦由骆驼队负责运输。随着寒冬即将来临，加之此次远征条件艰苦，形势危险，他们必须尽快深入敌军腹地。罗马军队历来凭借称之为“军备补给站”的作战方式所向披靡，同出身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相比，行省出身的科尔布罗更加忠实地贯彻了这一作战传统。科尔布罗率军从叙利亚沿小亚细亚以东北上，直扑亚美尼亚。

对于科尔布罗的排兵布阵，古代历史学家们众口不一，有人认为科尔布罗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援军迟迟不至。然而，塔西佗对科尔布罗的战法却是赞誉有加，在他的笔下，科尔布罗的首要目的是增援友军而非征服亚美尼亚，行进过程中他身先士卒，激励士气，日夜兼程。然而，贝图斯并不知道科尔布罗正率军对他驰援，可能是因为科尔布罗派出的信差落入敌手，信息无法传递。然而，四面楚歌的贝图斯没有抗拒到底，就在此时早早地缴械投降了。实际上科尔布罗三天后就赶来增援，如果贝图斯再坚持三天，结果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天不遂人愿，贝图斯向帕提亚王投降，沃洛吉斯欣然受之。

恐怕连沃洛吉斯也没有想到此行会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这次战役的规模远远称不上战争，然而却改写了帕提亚对罗马的连胜纪录。沃洛吉斯对投降的贝图斯军队几乎没有任何惩罚，这也说明了他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或者可以这样说，沃洛吉斯根本没打算和罗马正面交锋。

由于沃洛吉斯看中了罗马军团引为骄傲的土木工程建设特长，他并未命令解除贝图斯的军队武装，而是命令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迅速架设一座桥梁。此外，沃洛吉斯还提出了另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求罗马军队从亚美尼亚境内全面撤出。败军之将的贝图斯不得不全部答应下来。

随后，向西南撤退的贝图斯残部与北上的科尔布罗军团迎头相遇，幼发拉底河岸边成为他们会合的地点，具体而言，就在离罗马军团受命搭建桥梁不远处的下游。科尔布罗的士兵们眼见贝图斯的士兵们因屈辱而表情僵硬，纷纷上前给予他们拥抱，并报以同情，听他们诉苦。

军团长们与士兵们的热情截然相反，由于气氛尴尬，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会面。

科尔布罗原本打算以己方的武力优势为依仗，促使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签订和平协议，然而贝图斯的败北让一切功亏一篑，他不禁开口抱怨。贝图斯反驳，他说沃洛吉斯不可能长期滞留亚美尼亚，只要静待时机，到时全面反扑，亚美尼亚又会重回罗马的怀抱，所以局势并没有改变。

听了这样自我开脱的狡辩之后，科尔布罗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尼禄没有命令我进攻亚美尼亚，我的任务只是保卫叙利亚行省。因为你们陷入困境，我不能袖手旁观才率军到此。再者，这一带对敌军的主力骑兵非常有利，我的部队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已是幸运至极。"

贝图斯与科尔布罗的会面不欢而散，贝图斯率领残部退回卡帕多西

亚，科尔布罗自然率军返回叙利亚。

科尔布罗前脚刚回到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使节后脚就到了此地。这位使节传达了沃洛吉斯的要求：拆除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堡垒，同时摧毁桥梁。

面对沃洛吉斯咄咄逼人的要求，科尔布罗回复道，如若帕提亚全面撤离亚美尼亚，他们愿意满足帕提亚王的要求。

面对科尔布罗强硬的回复，沃洛吉斯也不得不让步。由于幼发拉底河以东是帕提亚的领土，在这块土地上保留罗马的军事堡垒与被用刀抵着喉咙无异，让帕提亚时刻提心吊胆，而科尔布罗手中的堡垒正是这把刀。身为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只能进行防御，无权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攻击。当然，如果科尔布罗借口与帕提亚人发生了冲突等则另当别论，而沃洛吉斯也认为科尔布罗寻找时机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科尔布罗在东方待了8年，这8年没有白待，对帕提亚王室的秘密他了如指掌。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最大的短处在于他非嫡出，如果臣子谋逆，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自己。

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这种私底下“交换意见”开始频繁往来于帕提亚王沃洛吉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之间。公元63年，帕提亚王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觐见尼禄，随行的一队护卫中，科尔布罗安插了一位手下的百人队队长。

特使将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亲笔书信上呈罗马皇帝尼禄。古今内外，外交公文自始至终都在打官腔，很容易让人产生云里雾里之感，弄不清真实意图是什么。然而，如若仔细整理一下这封帕提亚王的书信，还是可以得出以下要点：

一、关于亚美尼亚的主权属于帕提亚王国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以往帕提亚与罗马交战总是取胜，也从旁证明了众神始终支持帕提亚王

国。

二、细观最近的战局，我们俘虏了前来提格拉尼斯挑衅的贝图斯军队，本可以将之全数歼灭，却允许他们撤军。这展现了帕提亚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显示出帕提亚人的宽容大度。

三、我弟弟梯里达底是神明之官，而帕提亚的神明之官禁止跨海航行。关于他就任亚美尼亚王一事，如果要求他亲自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加冕，即使他本人同意也无法实现。

所以，沃洛吉斯的提议是，让梯里达底前往罗马军队的营地，以罗马士兵为证，在皇帝雕像前加冕亚美尼亚王冠。

不久前贝图斯送来的形势乐观的报告书，与尼禄眼见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尼禄立即召见与帕提亚王特使同行的科尔布罗手下的百人队队长，仔细询问。这位百人队队长如实回答了实情，罗马军队完全被赶出亚美尼亚，此外，帕提亚军队也已全面撤军。于是，尼禄立即召开了相当于今天的内阁会议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Concilium）会议。

所谓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也即奥古斯都开创的由“第一公民”皇帝、当年任职的2名执政官、法务官（相当于各个部的部长），以及元老院的20名议员代表共同列席的会议。尼禄在这次会议上如实报告了情况，并同与会成员共商对策。关于此事，最终形成两种意见：开战；或者从大局出发，为了和平委曲求全，咽下把亚美尼亚皇位拱手让人的屈辱。与会人员绝大多数同意“开战”，在他们看来，罗马只有战胜后谈和的传统，根本没有战败后谈和的先例。这位特使只好带着尼禄拒绝的答复回国复命。

如果罗马帝国再起战端，败军之将贝图斯根本难挑此大任。眼下可当重任的只有科尔布罗，然而科尔布罗却身兼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这一职位通常只负责日常行政与司法工作。于是，为了让科尔布罗能够专心

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尼禄重新任命他人负责处理行政与司法工作。

元老院经过决议，授予科尔布罗东方“最高”绝对指挥权。虽然科尔布罗负责的地区只是东方，但是这份权力足以令他与皇帝平起平坐。这如同是拥有一份无须经过皇帝同意的空白委任状，科尔布罗使用外交手腕或军事行动来解决东方问题，都不受任何约束。提比略曾经把这项大权授予奉命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科尔布罗继日耳曼尼库斯之后成为了第二位拥有如此大权的将军。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终于得到了统一。

被召回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早作好了被追究责任的准备，然而没想到仅仅被尼禄挖苦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尼禄这样讥讽道：

“听说你感到恐惧时容易瑟瑟发抖，所以我也不吓你了，在你担心被追究责任而装病之前，我已经决定原谅你了。”

由于指挥权的统一，科尔布罗可以调动4个军团、辅助兵和同盟国参战兵，共计5万人的兵力参战，但科尔布罗没有沾沾自喜，他没有丝毫懈怠。科尔布罗开始接触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至今已经8年，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挥师北上。此行的目标是亚美尼亚本土，这里距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并不远，不过与之交手的却是帕提亚军队。对于这次行动，首都民众激动不已，元老院议员们静候佳音，尼禄比任何人都要期待。回顾罗马与帕提亚的战斗，无论是克拉苏还是安东尼都以失败收场，所以这一次是一雪前耻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从出任莱茵河防线的低地日耳曼军团长伊始，就以反应迅捷、当机立断的战术闻名天下，其他将领都公认科尔布罗是当时罗马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帝国上下都对科尔布罗一定能大胜而归深信不疑。因此，只要科尔布罗击败帕提亚，就意味着罗马帝国将重新控制亚美尼亚。

然而，至于科尔布罗心里面在盘算什么，别说普通民众或者元老院

议员，甚至连尼禄也毫不知情。虽然科尔布罗手握可以调动5万大军的指挥权，然而他并非一心一意只想打仗。

当时的罗马

就在东方战场科尔布罗挥师北上的同一年，罗马帝国本土的小意外却接踵而至。

首先，罗马帝国本土南部一个名为庞贝的中等城市发生了地震。庆幸的是，城市受灾程度并不严重，不需要国库出力，所以庞贝能够独自重建。然而，如有先见之明的话，此次地震或许是16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庞贝及其周边地区的前兆吧。

接着，尼禄下令兴建的马尔斯广场旁的体育馆受到雷击，引发了大火。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座体育馆无人问津的原因，我想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更是人迹罕至，所以这次火灾中无人伤亡。尼禄当即决定重建体育馆。对于把希腊锻炼习惯引进罗马，这次意外并没有给尼禄的热情泼上冷水。

同年，波比娅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尼禄也首次当上了爸爸。这个女婴出生不久就被大喜过望的父亲命名为奥古斯塔，意即神圣的存在与尊贵的皇后之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女婴出生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尼禄当时的悲痛我们不难想象。

为了讨好波比娅，尼禄不断搜集奇珍异宝送给她，不仅仅是满足她的虚荣心，也是为了赢得她的欢欣。女儿出生，尼禄也送给波比娅礼物，感谢她替自己生下第一个孩子。虽然女儿夭折，尼禄为了安慰妻子的丧女之痛，想出的名目实在是多如繁星。其实，波比娅·萨宾娜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恶名昭彰，她并未强求“皇后”的封号，也没有对事关重大的人事调动指手画脚。的确，虽然她很贪婪，可是也不足以影响

国家财政，充其量就是效仿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泡个牛奶浴罢了。随着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身为尼禄的妻子有一些符合身份的奢侈浪费无伤大雅，这些行为尚不至于动摇帝国的根本。

然而，波比娅铺张浪费的习性让首都的犹太人眼前一亮，他们利用这个便利，进入皇宫做起了生意。居住在首都明显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使得罗马的犹太人口成倍增长。然而，罗马的人口与经济实力依然不能跟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会相提并论，此外，与东方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不同，罗马的犹太人不能按照犹太教戒律行事。奥古斯都早就规定了罗马帝国的西方地区，犹太人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此后历任皇帝都忠实执行了奥古斯都的规定。

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章节中，我们也曾叙述过，由于教规所限，犹太教徒始终拒绝成为罗马公民，这也说明了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永远是一群格格不入的人。所以，由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犹太人感到弱势，他们非常希望拥有保护人。如果从捍卫犹太人社区的角度出发，这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把奢华的珠宝首饰赠与贪婪的皇后，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虽然波比娅对犹太教并不感兴趣，然而她却与首都罗马的犹太人往来密切。实际上，波比娅仅仅是一个世俗的女性，她对宗教毫无兴趣，也许正因如此，她不认为自己庇护的团体是宗教团体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却让她的丈夫尼禄，在2000多年内一直被后人指责是一位反对基督教的皇帝。

公元63年，发生了两件大事，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第一件事在元老院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还被苛刻的塔西佗称之为“可耻的传统”。

罗马帝国的官员选拔有着自己的特色，类似执政官与法务官一类罗马要职通常由元老院选举产生，行省总督则是在具有执政官经验的人选之间抽签后决定。然而，由奥古斯都提议、元老院通过的《尤里乌斯

法》（参见《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规定育有子女者优先考虑就任罗马帝国的公职。奥古斯都提出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缓解帝国统治阶层生育减少的情况，所以这部法律可称之为“促进生育法”。所谓的优先，指在选举中票数相同时，育有子女者当选公职；如果双方均育有子女，子女多者优先当选公职。至于抽签，曾担任执政官的人选中，有子女者具有抽签资格，膝下无子者就丧失了权利，还得把公职让给有子女的人。这部法律已实施了长达80年之久。

罗马是举世公认的法治国家，然而法律是人制定的，就总会有人找到办法去钻空子，使之为自己谋利。“促进生育法”的漏洞，就是虚假的养父子关系。

每当罗马帝国临近公职选举或行省总督的抽签之际，人们为了形成养父子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活跃非常。而当选举或抽签结束之后，养父子关系立即解除，人们又变回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有子女的议员们对这种现象心怀不满，纷纷抗议。这是我对塔西佗的评论深以为然之处，诚如他所言，的确是“可耻的传统”。

养育子女十分艰辛，无论经济还是精神方面，没有子女的人比较有利。可是他们还不满足，非要以伪装的养父子关系来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育有子女者的权利，所以议员们众口一词，向元老院提出法案，纷纷提出取消因伪装的养父子关系而得到的公职。

不出所料，元老院以高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投赞成票的议员中同样有并无子女的人，这说明了罗马帝国不愧是一个法治国家。与此同时，这项法案的修正案也一并通过，修正案规定不认可此类养父子关系中养子的遗产继承权。如果失去遗产继承权，那么即使成为养子也无利可图，钻法律空子接受这种关系的人肯定会下降。随着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有子女的人而言，罗马帝国“高级公职”的天平再次倾向他们。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元老院。为了规范行省总督的行为，防止他们

在行省一手遮天，罗马允许行省人民检举行省总督。然而，由于这项规定，使得司法变成攻击对手的“工具”。行省总督们都不希望任期结束后还要接受审判，所以他们在任期内都极力与当地的权贵阶层保持友好关系。因为非权力阶层要向罗马法院起诉，障碍重重，权贵阶层则不然。这本来算不上穷凶极恶，但是应该把握分寸，适可而止，超过限度就会演变成总督与行省权贵阶层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公正公平的统治应该兼顾所有弱势的行省人民，一旦总督和行省的权力阶层相互勾结，那么处于弱势的行省人民势必求告无门。所以，罗马长期以来承认行省人民检举总督的权利，并一直贯彻着这项权利的实施。

然而，一些行省人民并不买账，出现了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呼声。这个人正是克里特岛的一个居民，他出言不逊，放言罗马总督的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间。元老院得知后十分震怒，要求将该男子处以流放，同时提议颁布法令限制行省人民的言行。

对于元老院提出的法案，尼禄并不支持。与之相反，尼禄提出了废除行省人民感谢决议的法案。所谓感谢决议，就是针对总督卸任时的一种传统。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行省人民的感谢决议，变成对总督治理的“打分表”。这项法案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从这个插曲我们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即使是行省人民也非常桀骜不驯，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虽然科尔布罗出身于行省，却是一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将军。科尔布罗出身行省，却悍勇非凡，不能把他与出身于南法而又善于口出狂言的克里特人相提并论。也正是这位将军，使得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被完全颠覆了。

外交战

科尔布罗拥有全权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空白委任状。此外，他还手握5万雄兵。挥师攻入亚美尼亚之后，罗马军队很快越过幼发拉底河继续前进。而沿途阻碍罗马军队的要塞堡垒都被逐一攻陷，亲帕提亚派贵族的领地也遭到掠夺。罗马军队像推土机一样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整个亚美尼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此时，帕提亚军队在亚美尼亚的负责人是梯里达底，他的兄长沃洛吉斯身在帕提亚却心系在亚美尼亚的弟弟。兄弟两人得知科尔布罗军队的行军概况之后，明白罗马这次是下定决心动真格了。于是，二人立刻联名派遣和谈使者面见科尔布罗。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科尔布罗对帕提亚使者以礼相待，认真听他说明来意。不过，他并没有答复使者，而是命一位百人队队长将回复的信函送到梯里达底的军营。下面是科尔布罗的回复内容：

> 尔等在无足轻重的战斗中（意指与贝图斯的战斗）侥幸获胜，狂妄得忘了自己的低劣实力。为了让你们从傲慢中醒过来，我军出动以来有何战果，你们心知肚明。我罗马军队的铁蹄踏将而来，亚美尼亚势必沦为焦土。尔等最好相信，罗马军队想要达到的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若是梯里达底识时务的话，是不是应该在亚美尼亚化为焦土之前，把它当做我皇的礼物拜谢领受呢？
>
> 至于沃洛吉斯，奉劝采取聪明人的做法，尽早与我罗马帝国恢复友好关系，专心统治自己的国家，不要多管闲事。我早就知道你们东方外敌经常入侵，尔等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力抽调全军与罗马正面对决。反之，除了亚美尼亚之外，罗马的其余地区皆无战事，后继兵力将源源不断，这点想必尔等非常清楚。如若想要正面交战，胜利一定属于罗马。如此，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尔等将遭受罗马军队的沉重一击。

在这封信函中，科尔布罗只提到梯里达底最好接受罗马皇帝赐予的

亚美尼亚皇位，具体如何操作，他只字未提。所以，收到这封信的梯里达底和得知内容的沃洛吉斯把对接受的具体做法，理解为罗马帝国同意了先前沃洛吉斯派人送给尼禄的议和方案。方案的内容是，梯里达底愿意接受尼禄亲自加冕，但是碍于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航行的传统，加冕仪式只好改在罗马军营内尼禄的雕像前进行。

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心里一直盘算着，若是罗马同意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帕提亚自然没有异议。于是二人联名转告科尔布罗，他们愿意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愿意暂时休兵。收到消息之后，科尔布罗立即遣使告诉梯里达底，要求与其面谈。

之所以故意不提加冕的具体方法，这也是科尔布罗早就打算在和梯里达底面谈时的一大筹码。所以，与梯里达底的谈判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科尔布罗派出高官提比略·亚历山大与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担任与梯里达底直接谈判的使者。笔者曾在前文中提到过提比略·亚历山大，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决心融入罗马社会，担任罗马公职，最终舍弃了犹太教成为罗马公民。提比略·亚历山大在科尔布罗的安排下，成了军备补给站的负责人。而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则是科尔布罗的女婿，是科尔布罗军团的第5军团长。他们对帕提亚的情况非常了解，是科尔布罗的左膀右臂。科尔布罗甚至提出，在谈判结束之前，把这两名高官留在帕提亚的军营里作为人质。如此这般之后，终于使得梯里达底相信了科尔布罗的诚意，所以他除了回复愿意接受谈判之外，还表示由科尔布罗指定时间与地点。

为了趁热打铁，科尔布罗把时间定在了数日之后，地点就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之所以短短几天后就举行面谈，想的正是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而谈判又安排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为的是通过罗马军队东方最高司令官与即将诞生的亚美尼亚王在此地谈判，就是要让贝图斯军队大败于帕提亚军队的阴晦一扫而光。

科尔布罗与梯里达底达成直接会谈的共识。当天，两人都各自率领

20名骑兵，在相互靠近时，也许是出于对长者的敬重，梯里达底率先跳下了坐骑。科尔布罗看在眼里，也下马步行。两人快步走近后，彼此握手拥抱致意。科尔布罗称赞梯里达底没有鲁莽行事，作出了务实明智的选择。而年轻的梯里达底则夸奖科尔布罗，过去8年间经常听到他的赫赫威名，今天则是第一次有幸识荆。让对手肃然起敬，这正是科尔布罗的拿手好戏。梯里达底还提到，沃洛吉斯皇兄也认为，科尔布罗虽是对手却仍然值得相信。现在，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正出现在他的眼前，还对梯里达底赞誉有加，让这个头脑简单的帕提亚年轻人感激涕零。结果，梯里达底居然逞能地说道："其实为我加冕，到罗马去也可以。"

谈判后半段的内容没有留下记录，然而从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推测，我们可以知道科尔布罗的外交策略斩获颇丰。数日之后，科尔布罗先为梯里达底举行了加冕仪式的前半部分。

尼禄的塑像被放置在了罗马军营的正中央，而塑像前又搭上了祭坛，武装得五花八门的罗马人与帕提亚人围在祭坛四周。科尔布罗则站在祭坛边，看着头戴亚美尼亚王冠的梯里达底径直走向祭坛。梯里达底先向尼禄的塑像行礼，接着取下头上的王冠摆在祭坛之上。加冠仪式的后半部分将在罗马举行，因为接下来的仪式，必须由远在罗马的尼禄亲手把这顶王冠重新戴在梯里达底头上。

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可以航海，那么怎么去罗马呢？科尔布罗说，虽然路途遥远，但又不能违背祖制，从陆路去罗马是最好的选择。从帕提亚到罗马，是一段令人目瞪口呆的距离。我们不清楚他们如何渡过夹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走陆路肯定能到，只是时间更长而已。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曾以胞弟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为由，拒绝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如今，他自己掉进了科尔布罗的圈套。因为走陆路就不会违背神明之官的戒律。然而梯里达底原本就向往罗马，科尔布罗劝说了几句，他立刻就点头同意了。对此，沃洛吉斯只好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

为梯里达底举行的前半部分加冕仪式结束之后，科尔布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虽然梯里达底身处罗马军营，却迅速被大家接受，还不依不饶地向邻座的科尔布罗追问很多年轻人特有的问题。比如，夜间巡逻为何要分为4班，每班3小时，百人队队长又为何特意在巡逻前报告？为何必须等号角响起之后大家才能离席？为何军团长帐前的篝火彻夜不熄？对于梯里达底的问题，科尔布罗像慈父般逐一回答。罗马军队严谨的纪律使得这位年轻的亚美尼亚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与此同时，也对即将前往的罗马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此时科尔布罗和梯里达底之间，肯定使用东方地区最普遍的希腊语进行交谈。

梯里达底向科尔布罗提出一个要求，恳求在出发之前向在帕提亚的母亲和兄弟告别。对此，科尔布罗赞扬他孝悌有礼。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梯里达底甚至将自己的幼女留给科尔布罗作为人质，自己返回了帕提亚。

沃洛吉斯见到回国的梯里达底，弄清楚来龙去脉后，对即将前往罗马的胞弟担心不已。沃洛吉斯立即修书科尔布罗，要求科尔布罗信守以下承诺：

第一，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的途中与抵达罗马之后，不能以臣服者的待遇对待他。

第二，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遇见罗马行省总督，希望不要禁止他们的出迎与拥抱。这表示罗马帝国对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与罗马高官一视同仁。

第三，梯里达底停留在罗马城期间，希望给予他与罗马帝国执政官同等待遇。执政官所到之处历来有12名护卫为其“开道”，所以希望罗马方面能对梯里达底表示同样的尊敬。

第四，梯里达底在拜会罗马皇帝尼禄的宴席上，准许其带佩剑。因

为帕提亚的传统中，解除武装之后的会见象征着臣服。

科尔布罗一看到这样的语句，自然能够体会到沃洛吉斯对深入敌营的梯里达底的一片赤诚关爱之情，为之十分感动。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帕提亚王的忧虑理解为维系王室体统，远胜于其弟的个人安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嫡出的帕提亚王子梯里达底在罗马受到屈辱，那么帕提亚王宫内极有可能将矛头对准非嫡出的沃洛吉斯。科尔布罗对于沃洛吉斯的担心自然了然于心，毕竟对他而言，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重建和平工作是由他一手主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圆满落幕。随后，科尔布罗给沃洛吉斯回信，誓言一定严格遵守这四项要求。此外，科尔布罗是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有权命令众人按他的要求行事，所以他把这些要求写成文书，发往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会经过的各行省总督和长官处，让他们依令行事。

亚美尼亚问题的解决

事情已成定局，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除了答应之外别无他法，话说回来，身在罗马的尼禄皇帝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用剑道术语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博弈，即他们两人都被科尔布罗“一剑击中”。尼禄接到科尔布罗传来的汇报，大概是在公元63年底到64年春季之间。他原本期待接到的是击败帕提亚军队的捷报，可没想到收到的却是与敌人缔结和平条约的报告。尽管他们赋予了科尔布罗空白委任状，可是科尔布罗的做法完全有悖皇帝与“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的原定方案。

对于和平协议，皇帝可以行使否决权，而作为罗马帝国的法治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也有权力不承认罗马军团长擅自与敌人缔结的协议。不管是他们当中的谁，只要站出来行使自己的否决权，科尔布罗的外交成果将化为泡影。然而，幸运的是，尼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们不但没有一点否认之意，反而对协议表示欢迎。而尼禄行事甚至更为乖

张，宣布愿意负担梯里达底一行全部的旅费，并通过科尔布罗向帕提亚转达了这一消息。

之所以会出人意料地回应这份和平协议，罗马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帕提亚王室作为罗马的宿敌，竟然答应要特地赶来罗马，并亲自从罗马皇帝手中接下王冠完成加冕仪式，这足以证明在帕提亚面前，罗马牢牢占据了上风。这让普通公民、元老院与皇帝都不会太过挑剔。只是想象罗马皇帝将亲手把王冠戴到跪在地上的帕提亚王弟弟的头上，对于大多数罗马人而言，就能够忘记帕提亚人夺走了历来由罗马决定亚美尼亚王的耻辱。

其二，这个原因与第一条原因并不一致，它源于部分罗马人能正视大多数罗马人不愿面对的现实。

与科尔布罗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深知要分裂同属于波斯文化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难于登天。然而，若是亚美尼亚与帕提亚过从甚密，帝国的东方防御体系将一触即溃，所以拉拢亚美尼亚是必然的。挑起与罗马帝国的事端绝非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而科尔布罗也将沃洛吉斯为了保护胞弟梯里达底地位的心意，转告了罗马皇帝与议员们。他们知晓帕提亚并无敌意，所以，这些人认为即使帕提亚王的胞弟把持着亚美尼亚的皇位，如若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和罗马维持同盟关系，那么承认梯里达底的国王地位并无不妥。我认为尼禄也应该看破了这一点。在面临现实抉择时，哪怕是尼禄太过争强好胜，也不会被虚荣心左右。

回到帕提亚之后，梯里达底向母亲与兄长话别，并举办了饯行宴会。此后就带着大批随从与妻子出发了，这也很有东方君主的一贯做派。一路上他们受到沿路各个行省总督与民众的欢迎。梯里达底的这一趟陆路旅程，前后共用去了9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军队，走陆路从罗马到叙利亚的安条克，加上渡过亚得里亚海的2天海路，总共需要125天。至于帕提亚到安条克的距离，如果按军队的行军速度，大概也要150天

时间。同样的路程，梯里达底花了将近两倍的时间，不难想象他们是何等悠闲，一路游玩到了罗马。

罗马与帕提亚的骑兵队共同护卫梯里达底的加冕之旅。然而，梯里达底一行每天的花销高达80万塞斯特斯，即使罗马国库充盈，9个月的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在罗马看来这是和平的代价，还是比较划算。公元65年，梯里达底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花了9个月终于平安抵达罗马。从梯里达底在尼禄雕像前完成了前半部分加冕仪式至今，算起来已经有一年了。

身为神明之官，梯里达底不能走水路。但是登上罗马帝国本土时，由于尼禄当时正好在那不勒斯为这行人接风洗尘，所以他只得打破禁忌，花了两天渡过亚得里亚海。要是这一行人继续从陆路踏上罗马帝国本土，他们就必须由北意大利进入，尼禄当然不可能到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去迎接梯里达底。帕提亚与罗马之间原本就相隔甚远，而且就全程而言走海路也不过两天时间，所以梯里达底可能就要求手下对这条约束神明之官的戒律明知故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走水路，最终赶到那不勒斯迎接的尼禄与梯里达底共同沿着阿皮亚大道，回到罗马。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同盟国君主的待遇，而是帝国的贵宾级待遇。尼禄与梯里达底年龄差不多大小，两人很快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尼禄决定在罗马广场举行加冕仪式的后半部分。手捧王冠、一袭紫衣的尼禄站在广场中央的讲坛上，身披金色王袍的梯里达底则跪在尼禄面前。尼禄亲手将亚美尼亚王的王冠戴在梯里达底头上。站在讲坛左边的是身穿白底红边托加的议员，站着右边的则是身穿金色东方式样服装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官员。为了观看这难得的盛况，罗马市民们把罗马广场挤得满满当当，在场的市民更是欢声雷动。在这次仪式上，成为亚美尼亚王的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还被罗马赠与了“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

在平和而肃穆的气氛中，加冕仪式结束，随后在庞培剧场的宽阔回

廊中举行国宴。布置豪华的宴会氛围同样是一派祥和。尼禄此时志得意满，心情愉悦，他不仅送了许多贵重礼物给亚美尼亚新王梯里达底，还许诺罗马会竭尽全力协助亚美尼亚重建7年前被科尔布罗攻陷与焚毁的首都阿塔克萨塔。这里所说的协助，指派遣建筑技师和能工巧匠前往阿塔克萨塔援建，也即技术支持。后来尼禄果真兑现了这个许诺。梯里达底将重建的阿塔克萨塔更名为尼禄尼亚（尼禄之都），以示感激。

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在达成了此次罗马之行的目的后，率领众人重返东方。归去也是循着陆路返回，只是梯里达底长途跋涉的目的地不再是帕提亚，而是亚美尼亚。如此一来，科尔布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担任罗马军团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卸任后的科尔布罗奉命回到叙利亚行省，出任叙利亚总督。这次，科尔布罗的新使命，是监视进入新形势下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关系发展。这次人事变动虽然不是提拔他，但科尔布罗仍然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与帕提亚的两国关系十分重要。

舍名求实，这是帕提亚选择的做法。那么，罗马帝国就真的愿意舍实求名吗？

亚美尼亚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享受着与罗马其他同盟国不同的待遇。作为独立国家，同盟国没有向罗马缴纳行省税的义务。然而，他们却有责任派兵参加罗马发动的军事行动，也即今天的“后方援助”的义务。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关系，才能被称为罗马的同盟国。在罗马的众多同盟国之中，只有亚美尼亚不必出兵参战，也不必进行后方援助。虽然亚美尼亚是东方仅次于帕提亚的大国，然而这样的特别待遇也太过引人注目了。

对于亚美尼亚皇位的继任者，罗马通常采用特殊的方式来安排以控制亚美尼亚，不过奥古斯都与尼禄的差异，仅仅在于此次是由帕提亚人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当然，今后帕提亚人会有什么举动无人知晓，所以罗马方面自然不会也不能放松对亚美尼亚的监视。换言之，罗

马在叙利亚设置4个常驻军团，未来也不会变动。这可谓是一场赌博。其实外交何尝不是另一种赌博？然而，这场赌博最终以罗马胜出告终。

对于维系与罗马帝国的友好关系，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不遗余力，往往让人怀疑他不是帕提亚人。对于梯里达底这位新任亚美尼亚国王，罗马帝国并未采取任何会危及他皇位的活动，也非常尊敬他。只要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王国平安无事，那么，帕提亚王沃洛吉斯自然不会轻起事端，这么一来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之间也相安无事。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在图拉真皇帝时代来临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维持和平友好。对于两个大国之间这50年的和平，想必现代许多国家的人都会给予积极的肯定。

为梯里达底加冕的3年后，尼禄众叛亲离，最终自杀身亡。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闻讯后向罗马的元老院递交了以下请求：你们如何评价尼禄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但是尼禄对帕提亚与亚美尼亚有恩。所以，希望你们允许我们每年继续举办尼禄感恩节。

对罗马而言，与帕提亚维持友好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即使元老院断定尼禄为“国家之敌”，他们还是决定答应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请求。

科尔布罗是个深谙“战争是端着武器的外交，而外交是没拿武器的战争”这一道理的将军。

早在科尔布罗到任亚美尼亚几年之后，他就建议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以此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尼禄在更早之前就采纳科尔布罗的建议，罗马就不会耗费12年来处理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了。不劳民伤财的领导者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我深以为然。

歌手首演

正当梯里达底一行还在向罗马缓慢进发的公元64年，罗马的加冕仪式仍然在等着梯里达底的到来，可是，罗马国内就像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烟消云散了一样，到处洋溢着和平的气氛。因此，元老院与公民们对尼禄的支持率直线上升。照理说，身为皇帝获得的支持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强的自制力。然而，每逢支持率上升，尼禄就会乘机把以往因自重而自我压抑的事情全部翻出来，逐一实施。不出意外，尼禄的怪癖又出现了。

尼禄自幼就喜好诗歌，尤其喜欢用名为“齐特拉”（Cetera）的竖琴给自己伴奏，吟唱自己作的诗。他对自己喜好的解释是，吟诗奏乐是希腊化的精髓。其实如果他喜欢，自娱自乐倒也无妨，可他偏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想要唱给大家听。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深信这是希腊化的精髓，才有理由让众人听他唱诗。

尼禄从继位以后一直到梯里达底抵达罗马加冕为止，总是召集皇宫内的侍者与随从，为他们表演唱诗。尼禄最担心的是，普通罗马人总会觉得希腊化太过纤柔而极其反感，从而使得听众对他的才华心存偏见。然而，时年27岁的尼禄继位已有10年，而国民对他的高度支持更是提升了他的自信心。一直以来他就自恃才华横溢，厌倦了表演给只会溜须拍马的宫里奴才们欣赏，强烈希望有一天能公开表演，请罗马公民给自己的才华作出评判。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将其付诸实践。

话虽如此，若是真的站在“罗马精神”的发源地首都罗马进行表演的话，尼禄还是缺乏这样的勇气。出于这样的考虑，尼禄把他首次登台献唱的地方选在了那不勒斯郊外的剧场。那不勒斯正如它的希腊名称尼亚波利（Neopolis）一样，是希腊人迁入之后才繁荣的城市，到了罗马时代，仍旧保留着浓郁的希腊化氛围。即使是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曾这样写道：“这里与希腊本土城市并无二致。”尼禄因此才会盘算到，自己以竖琴伴奏吟诗的形式来诠释希腊化精髓，那不勒斯的居民应该能够理解并欣赏。

复原的竖琴

果不其然，尼禄表演之际涌入了大量的观众，整个剧场被拥堵得水泄不通。然而，这些人并非前来感受“希腊文化精髓”，而是想瞻仰“唱歌的皇帝”。由于尼禄出现在剧场的身份是艺术家，而非皇帝。所以令大家失望的是，他没有以一袭紫衣、头戴黄金月桂冠的扮相出现在观众眼前，而是穿了比专业演员还要朴素的罗马短衣。虽然对这副打扮有些失望，但观众们对站在舞台上卖力抚琴、吟唱自己诗作的尼禄皇帝，还是在仔细聆听他的演奏，掌声不断。这场首演增加了尼禄的信心，很快就敲定了下一场演出的地方为罗马城，在象征罗马精神的堡垒之地展示希腊文化之精髓。而尼禄的下一个目标更为宏大，即前往希腊文化的发祥地，一展自己的风采。然而，尼禄首演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美好的愿望。

罗马大火

公元64年7月18日至19日夜，首都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下，一家店铺突发火灾。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到周边的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罗马到了夏季，就会遭遇西罗科风的袭击，它是非洲吹来的西南风。这股风一旦吹起，就会让浸润在习习西风中的罗马街道气温骤升，像蒸笼一般。还好，这股西南风通常不会停留太久，可偏又不巧这

一年的西南风有点异常。起火的大角斗场观众席被烧毁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当天夜里火势就蔓延到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甚至还烧到了平民聚居区“苏布拉”。皇族的官邸都集中在帕拉蒂尼山上，那里共和制时代发家的望族宅邸也很多，全都被大火无情吞噬。西里欧山上也是高级住宅林立，山的低地一带则是百姓的房屋，不过大火才不管豪宅还是草屋，全都一焚而空。

每逢罗马人在建设帝国的新兴城市之际，总能发挥令人惊叹的都市规划才能，然而如此才能却没有应用到自己的首都建设上。由于罗马城是自然产生的首都，如果要规划罗马的建设布局，城中的“七丘山”就必须被列为规划对象。这“七丘山”可以说是罗马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再加上罗马发展成“世界之都”之后，由于人口大量涌入，人口超过了百万，其他都市难以望其项背。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放言，继承时接手的是砖瓦的罗马，他会留下大理石的罗马。然而，奥古斯都所指的仅仅是公共基础建设。要容纳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不得不依靠名为“因斯拉”的五六层高的集中楼房。“因斯拉”是中下或下层民众的楼房。除了墙壁用石头建造之外，地板与天花板全都是木质结构。此外，为了扩大屋内空间，二楼以上的窗户大多向外延伸到街道上空。这样一来，原本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这种类似于大杂院的集合楼房，一般是相邻的两栋楼共用一堵墙壁，换言之，楼房之间根本就没有空隙，“因斯拉”群是一栋接一栋，十分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整个住宅区将无一幸免。

富人奢华的独幢建筑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些豪宅的建材大多是大理石和马赛克，反映出整个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柱子与柱子间的横梁不是石头而是木质结构。就算横梁上雕龙画凤，再怎么装饰也还是木材。还有，富人家的仆人住房与仓库都在楼上，这些地方的地板和门窗的框也都是木质结构的。当时罗马只有神殿、会堂与剧场等公共建筑物才会用铁制的卡子把石材连在梁上，豪宅也没有做到这一步，所以

一旦火焰烧到梁上，房屋塌顶是迟早的事。

而罗马帝国当年就已经有消防队了。罗马帝国的消防队由奥古斯都一手组建，分7个大队共计7000名消防员。然而，由于当时还未发现橡胶，他们当然不能用塑胶水管引台伯河的河水来灭火。所以，人们只能用传递接力的方式来运水灭火。在这样的情形下，消防队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在大火波及之前把可燃的完好建筑物摧毁，以达到阻止火势蔓延的目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消防队在日后却成了指证尼禄教唆纵火的铁证之一。

这场大火烧到第6天傍晚才被成功扑灭。然而，火灾还没有就此结束，余火在强烈的东风之下再度复燃，又连烧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这场大火的肆虐之下，罗马这个“世界之都”在9天的时间内几乎化为灰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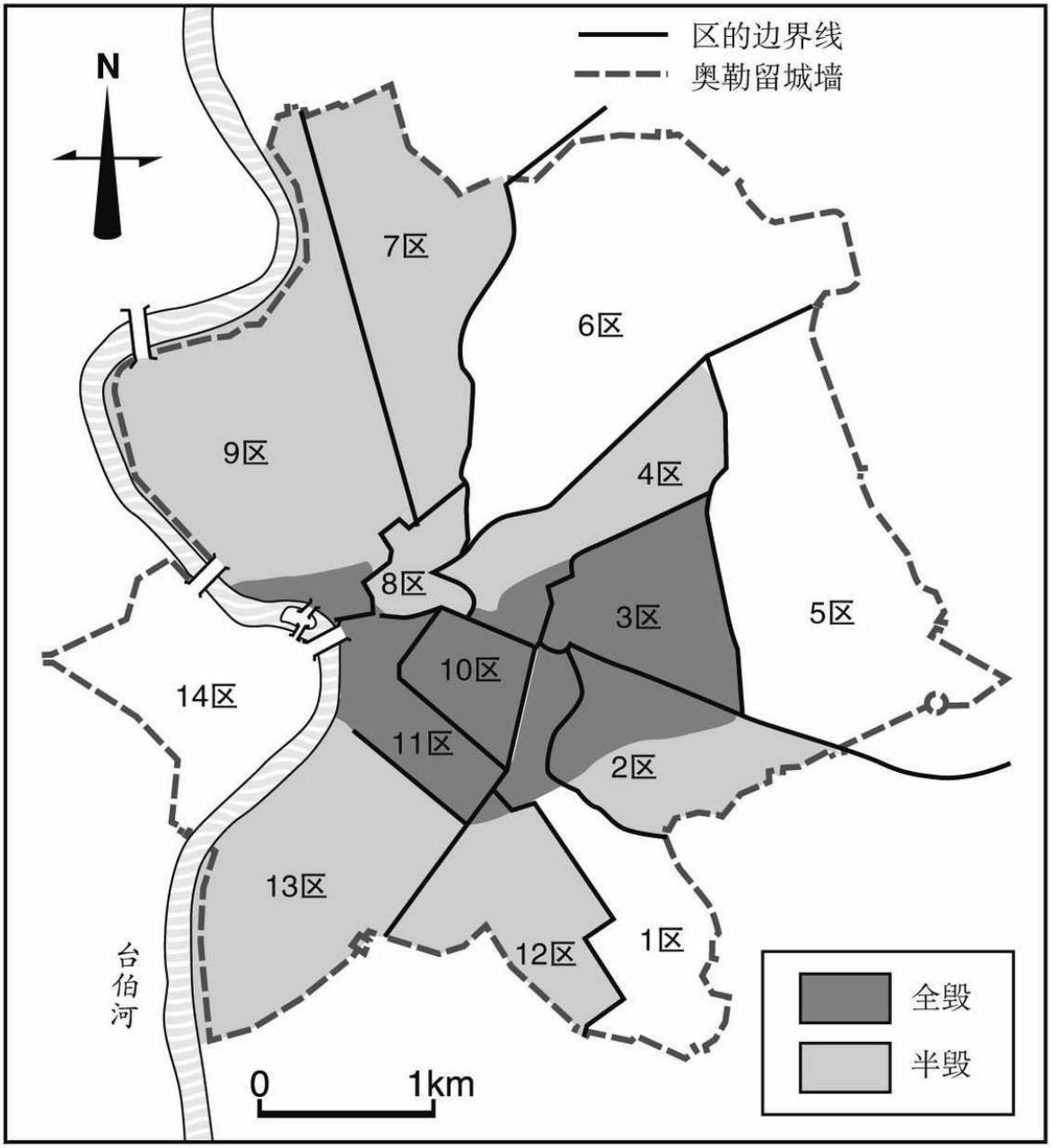
不巧的是，尼禄在罗马火灾发生时并未在罗马。当时，尼禄为了躲避酷暑，跑到了罗马以南50公里外的海边小镇安齐奥的别墅之中。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尼禄才知道罗马发生了大火，立即驾着两匹马的战车，沿阿皮亚大道北上赶回首都。他在埃斯奎里山上的别墅没有被大火波及，不过这位27岁的皇帝并没留在家中。他带头指挥救灾，接连发出指令，罗马公民们在他的调度下井然有序地进行救火。

林立在离城中心最近的马尔斯广场上的公共建筑等，由于没有受到火灾的波及，所以向灾民开放。此外，凡是万神殿（现在我们所见的，并非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建筑物，而是阿格里帕修建的建筑物）、尤利娅选举会场、以“庞培”与“屋大维娅”等命名的回廊、有屋顶的建筑物等等，全部被用做灾民的避难场所。不过，要收容所有灾民，单靠这些建筑远远不够。所以尼禄下令从近卫军团兵营中运来大量帐篷，搭建在这些公共建筑物周围的空地上，也作避难场所用。于是在马尔斯剧场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帐篷村。

尼禄除了为灾民提供避难场所，并没有忘记给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

们提供食物。他下令将奥斯提亚港卸货后存放在仓库里的小麦，以及堆积在码头的小麦，全部运往罗马。繁忙的奥斯提亚大道与台伯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小麦，送到躲过火灾的面粉厂磨成面粉，最后发到灾民手中的，是面粉或面包。然而，灾民们仅仅依靠面粉做成的汤与面包为生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尼禄还命令罗马附近的乡村提供乳酪、蔬菜和水果供应罗马。由于首都罗马有9条水道供应日常用水，资源充足，只有饮用水是唯一不缺乏的物资。

由于灾民们大都一无所有，使得灾民中有许多人投靠了灾区以外的亲戚朋友。尼禄便又下令将罗马小麦的零售价格下调，由往日1摩第（modius）10塞斯特斯降低为3塞斯特斯。



14个行政区的火灾受灾情况（为了帮助理解，在此，特加上当时并不存在的公元3世纪建的奥勒留城墙）

然而，在这场大火中，不幸被烧死、被倒下的建筑物压死、或是被逃难的人潮挤死的到底有多少人，当时的史学家们并未留下确切的数字。塔西陀记录了一次郊外剧场倒塌所造成的死伤人数，然而对公元64

年的罗马大火的伤亡人数却没有记载。现代研究者绝大多数持这样的观点，虽然火灾烧毁房屋无数，然而并没有带来巨大的伤亡。电影《你往何处去》（Quo Vadis）对这次火灾的描绘，基于基督教反罗马的特定立场，在描述死伤时有夸大其实的成分。然而，作为“世界之都”的罗马在这次大火中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一点毋庸置疑。

罗马帝国首都被奥古斯都划分为14个行政区域，并沿用至火灾发生之时。在大家看来，大火无情，是不会分行政区域焚烧的。事实上，罗马虽然并没有规规矩矩地按照计划来建成，然而罗马人却利用宽广的街道与广场划分各个行政区。

完全被烧毁的行政区域是以帕拉蒂尼山为中心的第10区以及大角斗场所在的第11区，还有平民居住的第3区苏布拉。这几个区都是城中心的核心部分，然而同在市中心的罗马广场与神殿较多的卡匹托尔山幸免于难，肯定是集中于这一带的公共建筑物全是大理石建筑材料的缘故。

部分被烧毁的包括第2、4、7、8、9、12区和第13区等7个行政区。位于罗马西北部的第7与第9行政区，是在复燃的大火中才被波及的。

逃过一劫的行政区域有第1、第5和第6行政区，以及台伯河西岸的第14行政区共4个行政区。这可能是因为起火点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大角斗场，而这几个区则分布在罗马城的郊区。

重建

首都罗马的这场大火，使得在14个行政区中全部被焚毁的有3个，半焚毁的多达7个，可谓是损失惨重。在大火之后，罗马不得不对受灾区进行全面重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募捐。募捐一事，在几年之后里昂火灾之后也再度上演，罗马向里昂也捐了400万塞斯特斯，数额与罗马重建时大致相当。罗马既然从行省首都里昂都

获得了400万塞斯特斯的捐款的话，想必富饶的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也不会太少。自提比略时代伊始，形成灾区捐款传统之后，自然灾害时互相捐款已经变成惯例。尼禄在罗马重建时指挥若定，只是皇帝下达的命令全都是罗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在尼禄的观念里，罗马的重建仅耐火还远远不够，还要更加美观。

第一，规定街道比以往更宽，尽量让街道笔直平坦。

第二，住宅建筑的高度限制在60步（约17米）以内。

第三，建筑物之间的间隔，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2.5步（约70厘米）。如果空间足够，还应尽量放宽间隔。所有建筑都要有属于自己的外墙，禁止使用同一外墙。

第四，建筑用的横梁只能用石头，而不能用木材。

第五，“因斯拉”应有自己的庭院。

第六，作为面向街道的住宅的防火措施，各住宅建筑物必须设置石柱门廊，这个门廊的经费由国库开支。

第七，清除了瓦砾与大火焚毁残留物的土地，应当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第八，如果在规定时限内重建自己的房屋或者自己租住的住宅（因斯拉），国库给予奖励。

第九，住宅建筑的所有者必须在自家的庭院内建储水池，而且有义务储存备用水。

第十，水管的重建工作不能自己随意改建，应当交由专业的水管修复人员管理。

当然，这是为了杜绝无耻之徒撬开水管偷水。也正因为如此导致水压偏低，使得道路边与广场公共水管的消防工作也几乎作废，这也是对这次大火深刻反省之后得出的教训。

第十一，将大火后残留的瓦砾全部运到台伯河岸。从奥斯提亚运小麦的船只，返回时必须顺着堆满瓦砾和废墟的河道走，并且顺道把这些堆积物带到奥斯提亚的沼泽地，因为要充分利用堆积物，所以不能随意乱倒在指定的场所之外。

上述政策就是灾后重建的全部政策。重建的经费开销非常大，单靠行省的捐款是杯水车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尼禄改造罗马城中心的同时，兴建“黄金宫殿”的原因。因此为了确保这些资金的运转，也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之前稍微提及过的货币改革。

尼禄的货币改革，把原来7.8克纯金制造的奥里斯金币，减至7.3克，而3.9克的第纳尔银币，减至3.41克。此外，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也从100%下降到92%，但铜币纯度不变。罗马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规定之后，87年来首次有人加以改革，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货币贬值，然而我不赞同这种说法。

首先，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如若非要将这次货币改革与大多数货币贬值政策相比，只是区区0.5克，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对于尼禄的改革，元老院与市民毫无异议，这也是一个事实。

货币贬值虽然代表经济实力的衰退，但是得益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尼禄时代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一路向上发展。经济增长跟货币的流通量密切相关，但是黄金白银的产量并不一定和经济增长同比攀升。正因如此，近代开发使用纸币，但是古代人还没有这种观

念。

同以前相比，黄金白银的产量略微增长了一点，然而经济增长更快。这样一来，能想到的有效经济政策就是缩小金银币的大小。当时，作为流通货币的条件是材料价值与币面价值必须一致，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掺入杂质降低纯度。在经济实力衰退的第3世纪，金银币纯度变低已经成为罗马的一个特色。但是在1世纪的尼禄时期，还没有必要这么做。

为了灾后重建和兴建黄金宫殿的罗马大改造，尼禄的的确确很需要钱。但是动机不良未必后果就不佳。尼禄对金银货币的改革，一直沿用到五贤帝时代后公元215年的卡拉卡拉皇帝再次改革为止，长达150年之久。这跟我们熟悉的货币贬值不一样，反映了罗马帝国经济增长，是现实稳妥的改革证据。

尼禄皇帝兼顾建设与财源的重建政策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在灾民与非灾民齐心合力下，罗马建设已经在全体市民的投入中快速进行。罗马也比之前更加井然有序，街道格局也变得更加规整。因此倒苦水的人也有，阳光洒进了罗马的各个角落，空气变得更加闷热。但是，一贯对尼禄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却对尼禄赞赏有加，说他此举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

黄金宫殿

作为男人，都有修建宏伟建筑的理想。因此，罗马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惯例，即权贵阶级投入自己的私有财产建设公共建筑，然后将之慷慨赠与国家。这与其说是利益的社会回馈，还不如说是一种名誉的社会返还，而且受赠方会在建筑物上镌刻上捐赠方的名字作为回礼。

当然，身为皇帝的尼禄也不例外，然而他的目标不是庞培剧场或恺

撒、奥古斯都神庙那样独栋的设施，而是另有策划。此外，尼禄肯定是以国库来支撑他的梦想，而非自己出钱来实现梦想。在尼禄看来，让国库来完成这些工程是可行的。尼禄跃跃欲试地设想，从帕拉蒂尼山、经西里欧山之下的低地、再到埃斯奎里山开工，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改造计划。

时至今日，在我们游览罗马之际，很难想象西里欧山下的低地没有“圆形露天大剧场”（Colosseum）的罗马的样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圆形露天大剧场”时会觉得它就应该那样设计，因为可以眺望盘踞帕拉蒂尼山下的罗马广场遗址。然而，当时的罗马剧场并非有如今天所见的断壁残垣，而是神殿、会场以及各种纪念柱整齐排列的地方。从这里延伸出去还可以看见卡匹托尔山上的众多神殿，往北眺望可以看见雄伟的恺撒与奥古斯都广场，即此地是拥有众多公共建筑的罗马市中心区域。

历朝历代争先恐后进行公共建筑的有权者并不在少数，然而不会给人以低俗的感觉。以石柱廊为例，如果它仅仅只有支撑房屋的作用，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数量。然而并列的柱子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美感。集中的建筑物也是这样，也能产生出力量与美感。如果说在眺望茫茫海洋的断崖上建一个孤立的神殿是希腊人的审美观的话，那么将众多建筑集中起来，向外人展现力量与美感就是罗马人的审美观。

然而，尼禄痴迷于希腊文化。尼禄所想的是尝试在罗马城中心重现希腊称之为“阿凯迪亚”（Arcadia）的绿色世外桃源，于是下令兴建“黄金宫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完全占用了从帕拉蒂尼山到埃斯奎里山全部共计50万平方米的土地。

尼禄在帕拉蒂尼山下开始了他的工程，拉丁语直译为“穿行大厅”的“Domes Transitria”采用了列柱回廊的建筑风格，正中放置了4米高的黄金尼禄雕像。穿过“穿行大厅”，沿欧比斯山丘前的道路右侧往上，即“圆形露天大剧场”所在的低洼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广阔的人

工湖。欧比斯山丘上“黄金宫殿”（ Domus Aura）主楼面对着这个人工湖，而主楼的背后就是埃斯奎里山。这个地方被计划用于饲养动物的公园。据说，人工湖的水从遥远的罗马东北的特沃利引流而至。欧比斯山丘上人工湖一带全部修建了长达1.5公里的三排列柱的回廊。主楼雄伟壮观，甚至连建筑物的天花板都可以旋转，还可以利用上面的机关将花瓣撒落在游人头顶之上。可以说，黄金宫殿是融合了奢华、技术与梦想于一体的宏伟建筑。

在我看来，尼禄将意为私宅的“Domus”命名为这些建筑十分不妥，这是他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黄金宫殿没有栅栏也没有墙。皇帝的私人住宅本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的，然而人工湖与自然公园罗马公民都可以随意进出。这也是尼禄想把城中心变成绿地的原因。如果那时候有生态学家，我想他们肯定会与尼禄产生共鸣。

然而，对于城市的理解，罗马人与尼禄并不相同。在罗马人看来，作为一个城市，特别是市中心，拥有可供城市正常运转的设施就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希望享受绿地美景大可以到郊外的山庄或别墅。此外，对于拥有第二栋房子，罗马人非常执著，所以他们往往在别墅中费尽心思营造美丽的庭院。这种痴迷可以与近代的英国人相媲美。

这些建筑被尼禄命名为“黄金宫殿”之后，他还感觉不够，甚至还夸口说这里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话传到那些渴望在城市中拥有庭院却十分贫困的公民耳中，不免有些刺耳。然而，炫耀并非尼禄的真正用意，他只是希望公民们可以到这里放松休憩。

“黄金宫殿”随着尼禄自杀身亡也搁置了下来。然而，此后的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都对“黄金宫殿”进行了改建。韦斯帕芗皇帝将人工湖改建为“圆形露天大剧场”，而把黄金雕像的尼禄头像换成了太阳神的头像；提图斯皇帝在庭园的西南角建了一个浴场；图拉真皇帝把主楼拆除后也重建了一个大浴场；哈德良皇帝在“穿行大厅”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神殿。经过这些皇帝们的改建，原来的“黄金宫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在皇

帝们有意无意的破坏之下，民众的反感逐渐消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尼禄与罗马人的城市观非常不一致。在罗马人看来，比起波涛翻滚的湖面，宽敞的“圆形露天大剧场”更让人赏心悦目；比起放养动物的自然公园，温暖的浴场更让人心旷神怡，罗马人利用城市的方法不外乎如此。

此外，选错了日子重新动工也是尼禄的失误。

公元64年，就在年初动工的“黄金宫殿”即将落成时，突如其来的罗马大火将“黄金宫殿”也焚毁了，本来重新动工的日期应当稍微推迟一下，然而尼禄好像忘了一般。虽然尼禄一心致力于灾后重建，但对“黄金宫殿”的重建更是不遗余力。在普通民众看来，“Domus”等于私宅，所以尼禄花力气的重建当然让他们愤怒。在罗马公民之间，见面居然会开这样的玩笑：“趁尼禄还没把罗马变成私宅之前，赶快从罗马搬走吧！”

让罗马公民更为愤怒的是，这次火灾造成的灾区差不多与尼禄的“黄金宫殿”预想用地完全吻合，从而引发了罗马公民的纷纷质疑。保护私有财产在罗马实行得非常彻底，即使是皇帝要想要土地，也得出钱向所有者购买。然而，购买需要跟所有者分别交涉，没有充足的时间与金钱，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若是房屋被烧毁，所有者一般都会放弃土地，所以购买起来会比较轻松。因此，罗马大火是由尼禄下令纵火这一谣言也传开了。灾民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尼禄在埃斯奎里山的别墅中手抱竖琴，遥望着大火中的罗马，兴高采烈地唱着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沦陷一节的内容。这些谣言加重了灾民们痛恨尼禄的情绪。

罗马公民对尼禄的反感与敌意，使得27岁的尼禄浑身不自在。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罗马公民，所以他们理应对自己感恩才是。虽然在罗马大火之前，尼禄偶尔会被罗马公民嘲笑。但从整体上而言，尼禄仍然是一位受罗马公民尊重的皇帝。现在，情势急转直下，尼

禄继位以来第一次被敌意包围，这使得他惊慌失措，因此患上了强迫症。为了打消人民对他的敌意，尼禄绞尽脑汁。就在此时，很多心怀叵测的人趁机向尼禄兜售诡计。

迫害基督教徒

在追查罗马大火纵火嫌疑过程中，为何尼禄会把矛头直指基督教徒呢？犹太教与基督教都一直拒绝融入罗马社会，为何犹太教就可以免遭尼禄的迫害呢？

公元64年夏，作为侥幸逃过火灾的4个行政区之一，犹太人居住的是台伯河西岸第14区。之所以他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源于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在这一区中建立自己的聚居区。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晚年时期，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左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其信徒们开始传教，主要对象是与信徒们民族相同的犹太人。罗马帝国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犹太人社区，所以罗马帝国也是基督教的传教范围之一。因而，在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与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基督教徒都与犹太人生活在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聚居区。

然而，新的运动往往最先遭到身边人的反抗，犹如基督被判刑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的敌视态度。在尼禄时代，罗马的基督教徒大多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数并非住在犹太人聚集的第14区，而是居住在台伯河对岸的第12区。虽然第12区曾被恺撒下令拆除，但仍然保留了共和制时代塞尔维马斯城墙的外沿。因为是郊区，虽然在大火中受到损毁，程度却并不严重。

由于罗马人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宽容民族，他们认为基督教无非是犹太教的分支，只要不引发社会骚乱，就不会使得罗马宽容的方针改

变。然而，在罗马人看来，宽容并不意味着赞同，仅仅是正视对方的存在。在我看来，罗马人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可谓是真正的宽容。

罗马人与当地的犹太人没有太大摩擦，这当然与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无关系。只有自己才是神明选中的子民，犹太人对此深信不疑。若是其他民族与他们一样，他们的地位就受到冲击。因此，即使热衷于在自己民族内部坚持信仰，犹太人根本不打算向其他民族传播其宗教。我们也从未曾听过犹太教传教的新闻吧？

然而，基督教与犹太教恰恰相反，耶稣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这完全不符合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过，我觉得耶稣的平等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民思想。话说回来，选民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对待他人态度的不同，也导致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不同。换言之，犹太教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不热衷，基督教恰好相反。

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在其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十分有代表性：在罗马传教的圣彼得拜访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儒、尼禄的亲信佩特罗尼乌斯，热心地游说他皈依基督教。然而，佩特罗尼乌斯不为所动地回答道：

“我深知你们的说教没错，但我死之时，自会饮毒自尽，请你们不要打扰我吧。”

乖乖听话就不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肯定不会放任不管。在他们看来，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不相信这位上帝的人说明他还没有了解真正的宗教。所以，基督教徒坚信拯救这些可怜人就是他们的使命，不过这对那些非基督徒而言就是多管闲事。当时的罗马绝大多数人是非基督徒。

从多神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罗马人眼里基督教徒的多管闲事就是桀骜不驯。《新约·使徒行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描述圣保罗在希

腊传教时，在众多神像（希腊人也是多神教徒）的最后面找到一尊名为“献给未知之神”的神像。和圣彼得不同，圣保罗属于激进的传教士，他对在场的希腊人大声嚷道：“这尊神正是我们唯一之神。”听到这种武断的话之后，希腊人愤怒地将圣保罗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城外。

人类智慧还有尚未涉及的领域，而献给未知的神正是对尚未涉及领域谦虚的表现。如果武断地认为找到了无所不知的唯一之神，对于多神教的希腊人而言，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能够接纳战败者的信仰，导致了罗马的神祇超过了30万个。然而，即便是罗马人十分宽容，他们与怒而赶走圣保罗的希腊人如出一辙。

此外，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感情。罗马人击败埃特鲁斯坎人，随后将他们同化，除了活人祭祀之外，罗马人在这个过程中向埃特鲁斯坎人虚心学习，包括如何建造拱门、如何举行仪式和角斗比赛等。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人被罗马人战胜，出于对迦太基人用婴儿来祭祀行为的极端蔑视，就把他们的首都焚为不毛之地。由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教也有活人祭祀的风俗习惯，罗马人也将他们赶出加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和不列颠，并为他们感到羞耻。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厌恶在祭奠神灵时用活人作为祭品。

当然，在弥撒之中，基督教也有用面包与葡萄酒祭奠的习惯，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肉，葡萄酒象征着耶稣的血这一点，罗马人对此十分清楚。然而，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与在神灵前供奉牛羊，再把它们宰杀、烤熟、分吃是一样的道理。基督教徒一直强调耶稣之死是一种牺牲，道理大抵如此。

基督教徒吃牺牲者的肉，饮牺牲者的血，而罗马人只吃献祭的牛羊肉。在罗马人看来，基督教徒比埃特鲁斯坎人、迦太基人还要野蛮，甚至比蛮族凯尔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普通罗马人基本是厌恶唾弃。

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徒的态度稍微有些不同。在历史学家塔西佗看来，基督教徒就是破坏罗马人打造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始作俑者、阴险的敌人。300年后的罗马帝国，的确验证了塔西佗的观点。

与尼禄时代的犹太人相比，同一时代的罗马基督教徒聚居区规模相对较小，势力低微，没有强盛到必须斩草除根的地步。此外，他们没有犹太人那样的好运，可以获得皇后波比娅的庇护。综上所述，罗马基督教徒当然是纵火罪最好的替罪羊。基督教徒除了犯有“纵火罪”，尼禄还指控他们犯下了“憎恶全人类罪”。

尼禄实施的逮捕并非撒网捕鱼，而是顺藤摸瓜。先逮捕了几个自称是基督教徒的人，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其他基督教徒，等其招供之后再予以判刑。当然，所谓的判刑一般都是死刑，然而不经审判直接推赴刑场又与罗马法律相悖。所以，在接到告密后，这些司法机构才采取行动，在证据齐全之后立即予以处决。

对这次清剿基督教徒的行动，以塔西佗为首的史学家都没有记载这次殉教者的确切人数。然而，有部分研究者从骇人听闻的刑讯手段，以及罗马以外城市基督教徒的组织规模等推测，处死的基督教徒有二三百人。要一次处死这么多人，的确非常吸引眼球。然而，尼禄并非简单地将其处死，而是当成了一场残酷的表演。传闻梵蒂冈的角斗场就是当时的刑场。

一些基督教徒被强迫穿上兽皮，然后被野狗群咬死。其他人则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是罗马时代比较普遍的刑法。还有一部分人被用于夜间表演，一个个被绑在并排的柱子之上，然后活活烧死。被烈火焚烧的人肉柱，映得观众席上大气都不敢出的观众满脸通红。尼禄也在角斗场上的战车里，欣赏这残酷的“表演”。

这次基督教徒所遭受的残酷死刑，在市民的心中引起了与尼禄预期相反的情感。塔西佗不相信尼禄纵火，但是他依然这样写道：

即使这些人罪有应得，但是过于残酷的刑法让民众动了恻隐之心。其实人们都清楚，这些基督徒会遭此厄运绝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只是满足一个人的暴虐罢了。

尼禄原打算将纵火嫁祸给市民讨厌的基督教徒，从而消除市民对他的怀疑。然而尼禄失算了，反而使传闻他故意纵火的谣言愈传愈凶。

罗马共和制时代与元首制时代的历史中，最有名的既非尤里乌斯·恺撒，也非奥古斯都，而是尼禄。他不仅十分出名，也可谓是罗马皇帝的代表。当然，罗马帝国延续期间并非如此。在罗马灭亡之后，基督教徒取代罗马人成为世界主人公后才有此定论。公元64年，尼禄迫害基督徒而成为罗马史上的名人。基督教徒极其反感尼禄，称其反基督教。对尼禄的评价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然而，尼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只局限在首都罗马，或许他只是为了转嫁纵火案，而此后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基督教徒称五贤帝为“贤主明君”，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统治时期没有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发生。图拉真皇帝时代，耶路撒冷与安条克两名主教殉教。此外，里昂的基督教也曾经被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镇压过。然而除了局部地区受到镇压之外，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帝国全境。而镇压的理由并非宗教问题，大多是借口维护社会治安。

进入3世纪，迫害扩散至罗马全国，但这也是从公元202年到250年间的短暂现象。公元250年一过，局势完全转变，公元253、257、258年，都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份。

基督教徒在公元260年到303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任何迫害。这对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无疑是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然而，公元303年后基督教徒又遭受了新一轮迫害。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决定重建罗马帝国，然而，他决心把“打乱罗马人创建的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基督教徒彻底肃清。光看这一时期皇帝对基督教徒所下达的清扫令，就可以明白戴克里先的决心多么坚定。这一时期对于基督教徒而言是最大的受难时期。幸运的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下诏承认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才使得灾难结束。基督教徒虽然卷进了帝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他们最终成为了胜利的一方。

上述的例子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比较引人瞩目的事件，因而仅仅把尼禄看做基督教徒的敌人未免有失公允。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理由，除了指控他们是纵火犯与胁从犯之外，把“憎恶全人类罪”也强加在了基督教徒头上。然而，当时罗马人所说的“全人类”只是“罗马帝国”的意思。尼禄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第一个迫害基督教徒的当权者。

唱歌的皇帝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其实尼禄的性格太过稚嫩，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批评、反感与仇视。然而，正因为尼禄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又不能坦然面对别人的批评、反感与仇视，这种性格使得他经常产生偏激的倾向。要么就是手忙脚乱地想扭转局势而丑态百出，要么就是反应过度地进行回击。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由于不能保持精神平静而产生的心态。当尼禄看到民众对遭受酷刑的基督教徒产生怜悯时，心里也开始感到惴惴不安。

翌年，即公元65年，第二届“五年庆典”——罗马奥林匹亚运动会正式拉开了帷幕。罗马人通常将此盛会称之为“尼禄节”。在这个节庆中，尼禄希望以身体、诗歌和辩论来展现希腊化的精髓。举办此次盛会的初衷，就是要将希腊化融入罗马人的生活中，同时也是为了挽回其逐渐失

去的民心。因此，尼禄向民众表示，他将为自己创作的诗配上曲，参加歌唱比赛。其实，尼禄已经在那不勒斯彩排过，当时就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因此他信心十足。而尼禄很早之前就打算在罗马民众面前进行表演了。

这下子元老院如临大敌，为了降低皇帝自降身份、甘当艺人丑闻的热度，除了内定让尼禄获得辩论与歌唱的冠军之外，元老院别无他法。

对于元老院的好意，尼禄予以严词拒绝。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根本无须元老院插手。他表明自己要与其他参赛者一样平等比赛，服从裁判员的严格裁判，用自己的实力赢得桂冠。对此，元老院只能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

皇帝表演本身就吸引人，门票免费，罗马的春光又适合出门，所以那天的庞培剧场人山人海。可容纳3万人的露天剧场居然座无虚席，实在是因为尼禄的出演刺激了群众的好奇心。

从尼禄登上舞台伊始，就沐浴在群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之中。尼禄等这高涨的热情告一段落之后，手抚竖琴，和着自己创作的曲子，深情款款地唱出自己的诗作。从流传至今的几首诗作来看，尼禄的确有这方面的才华。至于曲子，当时无法录音，我们不好判断他的谱曲才华。套用那个时代的评论家的评价，用日语而言就是“下手の横好き”（越是拙劣之人越好瞎摆弄）。声音就是歌手的生命，尼禄的声音还不错，只是不够洪亮。

这些评价对观众而言毫无意义。尼禄唱得很卖力，唱完后他就用身上希腊式短衣袖子擦汗。罗马帝国的上流阶级通常用专用的布擦汗，如若要保持这一礼仪，就得命令仆人把布送到台上来，如此一来，就违背了他不想以皇帝的身份来比赛的初衷。等待评委们评分时，尼禄和其他选手一样，单腿跪着把竖琴抱在怀里，谦虚地安静等待。这一举动让观众很开心，不断为尼禄鼓掌喝彩。尼禄是否胜出，历史学家们没有留下

记录，不过比赛确实非常成功。如果在评委评分的基础上再加上观众投票，尼禄肯定获得优胜，因为没有一个参赛者得到的掌声和欢呼声盖过尼禄。

然而，观众席前面正襟危坐的议员与骑士阶级的男人，满脸鄙夷。观众中有来自行省和同盟国的贵宾，当他们见到艺人打扮的罗马皇帝时，也是一脸惊愕。

比赛非常成功，尼禄对此也很满意。虽然尼禄眼看就要满28岁了，然而在某些方面依然懵懂无知。他不明白人类是种很复杂的生物，亲近和敬意难以在他们心中并存。他也不知道，没有民众的尊敬与支持，皇帝的工作没法进行。年末，发生了一起针对尼禄的暗杀事件，史称“皮索的阴谋”。

皮索的阴谋

盖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的出身正是这种案件中最具典型的。首先，皮索的家庭背景好。他出身于共和制时代的名门望族，也即尤里乌斯·恺撒后妻的娘家。从不把婚姻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恺撒都选择与这个家族联姻，也不难看出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在元老院的地位。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对于成为皇族的尤里乌斯家族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为了消除隐患，卡利古拉在位时，曾经把他流放到外地，克劳狄乌斯上任时才得以回国。

作为一名心胸宽广、亲切友善的绅士，皮索身材健壮，即使人到中年仍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与不到30岁就肥头大耳的尼禄相比，无论身穿军装还是托加，皮索都是一个有魅力的罗马男子。至于才能与性格，并无特别之处。也许因为他并非才华出众、个性突出，所以才会被挑中在尼禄遇害后担任皇帝。

同决定刺杀尤里乌斯·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相比，这个“皮索的阴谋”明显不同。

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源于对国家体制的分歧而产生两个派别，一派支持庞大帝国由皇帝一人统治，另一派则赞成仿照旧例由元老院统治。换言之，恺撒属于革新派，而布鲁图属于守旧派。恺撒与部分人的私人恩怨，也掺和在了“布鲁图的阴谋”之中。

这次未遂暗杀事件并没有上述两个原因。这些策划者当中的确有忠诚的共和制主义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推翻元首制，恢复共和制。因为大家都普遍认为，由皇帝一个人治理的元首制要比由元老院少数人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实际得多。这些策划者大约20到30人之间，却没有一个人是出于个人野心、私人恩怨以及恐惧害怕，全都是担心罗马帝国的未来才出此下策。出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责任感而参与谋杀策划，这正是他们的理由。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连主谋都没有。这次暗杀并非由单一的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因为大家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集体商讨出的计划，并决定了刺杀尼禄后的继位人选。除去皮索，这些策划者中的其余人员全是亲近尼禄之人，儿时的伙伴、偏袒尼禄的议员。其中居然还有尼禄的启蒙老师与谋士塞内加。亲近尼禄之人策划暗杀尼禄，与卡利古拉遇刺极为相似，但不同于布鲁图刺杀恺撒，其目的不在改变国体而只是想换一位皇帝而已。卡利古拉与尼禄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人，除了暗杀他们别无他法。

然而，暗杀行动之前为何会走漏风声呢？

参与者中有一位名叫斯卡耶维努斯的男子，仿佛是要把遗嘱在自己生前兑现一般，居然早早作了财产分配。斯卡耶维努斯以答谢的名义，把财产悉数分给以前忠实侍候自己的仆人们。而得到财产的人中有个解放奴隶，名叫米里库斯。斯卡耶维努斯一再吩咐米里库斯把短剑磨锋利

点，再准备好止血药与绷带，将有大事发生。

米里库斯仔细一想，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斯卡耶维努斯，主人会把他们支开，与这些男子密谈，而以前从未发生过此等怪事。米里库斯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随即将这些情况告诉妻子，同样是斯卡耶维努斯家仆人的妻子对丈夫说，即使你闭嘴不说其他人也会说漏嘴，到时候就会被当成共犯抓起来，还不如现在就去告密。米里库斯带上斯卡耶维努斯吩咐他磨好的短剑，去了尼禄当时住的郊区行宫。尼禄由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失火，加之“黄金宫殿”尚未完工，暂时住在郊区的一处行宫。

听到米里库斯的告密之后，尼禄大吃一惊。自即位以来，这10多年从未有人想过要谋杀他。他深信自己与在位4年就遭到杀害的卡利古拉不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君主。然而，尼禄还是被吓得够呛，他赶紧传唤亲信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Tiglinus），下令他全面搜查。接替布鲁斯近卫军长官一职的提格里努斯出身低贱，他希望通过对皇帝的绝对效忠来掩盖自己的出身。

被捕后的斯卡耶维努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说把短剑的刀刃磨利并无他意。尼禄犹豫不决，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这位解放奴隶，还是这位议员。就在尼禄差点被斯卡耶维努斯说服之际，情势急转直下，提格里努斯再次拷问了米里库斯。米里库斯招出了来访者中有位名叫纳塔里斯的客人，与主人聊得十分投机。

于是，纳塔里斯也被缉拿归案。属于骑士阶级的纳塔里斯，在罗马仅次于元老院阶级。当他见到血气森森的刑具时，吓得浑身发抖，接着供出了皮索与塞内加。斯卡耶维努斯得知纳塔里斯招供后，也许觉得大势已去，很快说出参与其中的人名。塞内加的侄子——诗人卢坎赫然在列。

卢坎与尼禄生活在同一时代，和伯父塞内加一样，也是出身西班牙行省。他从小由伯父教导，与尼禄算是同门师兄弟。奥古斯都定下的

《百年节赞歌》是诗人贺拉斯的得意之作，尼禄把卢坎从雅典的最高学府召回，要求他创作尼禄节的主题赞诗。在尼禄看来，奥古斯都时代的国民诗人贺拉斯与维吉尔同样声名显赫，这个任务交由卢坎相当于给了他同等的荣耀。卢坎拥护共和制，他的长篇叙事诗《法萨卢斯》，描述了尤里乌斯·恺撒与庞培的生死决战，其偏袒共和派庞培的立场一目了然，不过尼禄依然重用了他。然而，尼禄万万没有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年轻人也背叛了他。

面对严刑逼供，激情的年轻诗人也弯下了腰。他提供的名单让审讯者难以置信，上面居然有他母亲的名字。

为了抓捕谋叛者，提格里努斯手下的近卫军团把罗马翻了个底朝天。皮索自知前途无望，他在近卫军赶来之前割腕自杀了。被选为次年行政官的拉特拉努斯，来不及自杀就被直接押赴刑场，当即处死。

哲学家塞内加是积极参与，还是装做不知情，抑或与他完全没有干系？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纳塔里斯指认塞内加参与谋杀，他的供词只是说，他受皮索之命拜访塞内加，告知皮索对塞内加不愿见他的埋怨，同时带回塞内加的答复。塞内加的回答似乎无懈可击。

“如果经常见面，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如今，我已经退隐，成了普通人，这样的我能否安度晚年，全在皮索一身。”

塞内加仅凭这句话，就被判定有罪。对这位曾经的授业恩师兼辅政大臣的老哲学家，尼禄下令“赐死”。换言之，尼禄命他自行了断。

这位哲学家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即使割腕，血液也并不多。所以为了及早解脱，他躺进了放满热水的浴缸，但是没有如愿。最终，在为了促使发汗的蒸汽室的热气中才得到解脱。他在生前没有严厉批评尼禄，他有个愿望，希望在与朋友讨论哲学的过程中安静去世。就这样，罗马史上唯一一个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与世长辞。塞内加曾经

对尼禄寄予厚望，竭尽所能地辅佐他。退隐之后，尼禄如何看待他，对这一点塞内加本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说尼禄“辜负”了塞内加，或许他也会觉得，对一个洞察力远胜常人的哲学家而言，这实在太过浅薄。即使如此，他引退后的著作仍旧保持一贯的飘忽忧郁，我不禁认为，这是老师在远处守望弟子。

与之相反，武士素来以简单直率为美德，他们在临终前的发言反而十分悲壮豪迈。

近卫军团大队长弗劳斯是原计划下手行刺的要犯，当尼禄质问他为何要对曾发誓效忠的皇帝刀剑相向时，弗劳斯这样说道：

“我恨你！当你还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皇帝时，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忠诚。可是，眼看着你大逆不道弑母杀妻，痴迷于竞赛，后来又热衷于唱歌，甚至沦落到纵火犯罪，我只希望你死！”

百人队队长相当于如今的中队长，身为百人队队长的阿尔普斯气愤地严词谴责尼禄后，平静地走向了断头台。尼禄质问道：“为什么要害我？”阿尔普斯回答道：“要挽回你犯下的种种错误，除了杀了你别无他法。”

显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不依靠选举而又想要促进政权更迭时，唯有采取恐怖手段，才能改变一人独揽大权、乾纲独断的现状。参与此次暗杀阴谋的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意即拥有投票权。

纳塔里斯因指认同党得免一死，其他人被下令自裁或处以死刑。鲁弗斯与提格里努斯同为近卫军长官，虽然他也是审问者，然而审讯过程中被抖出参与策划暗杀后也难逃一死。“皮索的阴谋”就此功亏一篑。不知道尼禄怎么打算，他公开了所有审判过程，还以出版物的形式公之于众。难道他不担心民众们看了这些出版物后，同情这些暗杀者，甚至接受他们的言论思想？根据奥古斯都制定的《叛国罪法》，对帝国的第一

公民图谋不轨，与反叛国家同罪论处。所以这些人是罪有应得。

显而易见，在获悉对方意图置自己于死地时，没有人会感念旧情。尼禄原本心胸开阔，如今对谁都揣有防备心理。过了不久，心爱的妻子波比娅也与世长辞。尼禄因此变得更加孤独，疑虑重重，这导致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的权力极度膨胀，愈加飞扬跋扈。对这种事情极为敏感且热衷的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就这样写道：恐怖时代再次降临。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是尼禄的密友之一，讽刺文学《萨蒂利孔》（Satiricon）就是他的杰作，他也被下令自裁。如果要说明尼禄是彻头彻尾的暴君，佩特罗尼乌斯是所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中的最佳人选，相当于从不同角度呈现罗马人对尼禄的评价。在以基督教徒的立场描写罗马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佩特罗尼乌斯就是主角之一。

可是，无论怎么假设都必须有说服力。比如批判罗马的体制，如果单从基督教徒这一方面进行论述，根本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最具说服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列举这一阵营支持者们批评的例子。如果连皇帝的亲信都持反对皇帝的态度，那么更具说服力。在小说家眼里，这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在这些以文章为武器的人口中，与其说是“战略”还不如说是“构造”。

虽然亲近尼禄的人不断离他而去，但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滥用职权、不理朝政。似乎是等待皮索的阴谋结束一样，帕提亚王胞弟梯里达底为了前往罗马加冕，经过9个月长途跋涉后终于踏上了意大利国土。如前所述，尼禄亲到那不勒斯，以国宾之礼迎接宿敌帕提亚人。最终，在罗马首都举行的盛大加冕仪式圆满落幕。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亚美尼亚皇位之争，又使得罗马与其头号假想敌帕提亚再度确保了“和平”。罗马广场上的典礼场地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当尼禄亲手把皇冠戴在跪着的梯里达底头上时，民众们对着尼禄山呼皇帝。真正的功臣是科尔布罗，然而市民并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恢复和平的有功之臣只有尼禄。尼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功劳由谁所立，只要一

经承认，最后尽归尼禄。沉浸在和平喜悦中的的市民发出阵阵欢呼，作为回应，尼禄下令关闭雅努斯（Janus）神殿大门。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敞开代表战争，关闭意味着和平，这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

尼禄原本以罗马公民中“第一公民”这种虚伪的名号称呼自己，现在他享有民众给予的“皇帝”这种颂扬声，仿佛是在公民大会中以掌声、欢呼声的高低来选举一样。那么，此时的尼禄应该重拾皮索阴谋揭发时被动摇的自信了吧。

每天与历史相伴，重温曾经的一切。在这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决定成王败寇的不是那个人资质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如何运用自己的资质。从这一点来说，尼禄始终在门外打转。他尽干不讨巧的事情，好不容易获得的名声又丢失了。也许在尼禄看来，只要民众支持他，做什么都无所谓吧。在他仿佛获得“和平之神”的赞誉之际，尼禄已经下定决心前往他心驰神往的希腊旅游。然而，这次并非皇帝视察，而是去希腊参加比赛，一展歌喉。

青年将领

尼禄若是个未雨绸缪的人，那么“贝内文托的阴谋”肯定会让他搁置希腊之旅，也应该使他清楚，莱茵河防区与巴勒斯坦等问题不断的地方更值得视察。虽然“贝内文托的阴谋”在萌芽状态就被尼禄掐灭了，也不如“皮索的阴谋”规模浩大，并未对他造成多大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次阴谋影响深远，尼禄更应该深刻反省、思考，寻求根本对策，而非单纯地事后处理。因为罗马军队主力军团首次出现了反对尼禄的迹象。

以这些阴谋策划者聚集密谈的城市为名的“贝内文托的阴谋”，于公元66年正式酝酿成型。这次行动计划由军团的青年将领组织暗杀。他们并没有打算废除帝国政权恢复共和制。作为罗马军队的精英，他们虽然

常年戍守边关，却年纪轻轻就身居军团长或大队长等要职。虽然罗马帝国早就规定他们是今后能够统率4个军团以上的军团长的后备人选，然而由于与29岁的尼禄年龄差距不大，这群热血青年经常指责尼禄没有资格担当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次阴谋的核心策划人物是一位名叫维尼奇亚努斯的青年将领，作为化解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功臣科尔布罗的女婿，他认为这是为国分忧解难的最佳时机。“贝内文托的阴谋”大概是意欲暗杀尼禄后拥立科尔布罗。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此次阴谋与“皮索的阴谋”不同，没有详细史料，我们只能推测。尼禄曾经公布“皮索的阴谋”的审问过程，然而针对“贝内文托的阴谋”，尼禄以“不值得”为由，没有这样做。尼禄趁他们在贝内文托密谋时全部予以逮捕，居然全是军人。也就是说，参与阴谋的人全是誓死效忠皇帝、拼死捍卫国家利益的青年将领。由于罗马帝国规定，军人不在公民的审判范围之内。事到如今，他们必须接受军法处置。然而，这次结果并未经任何审判马上就出来了，不到10人的青年将领全部被处死。而尼禄则若无其事地照原计划前往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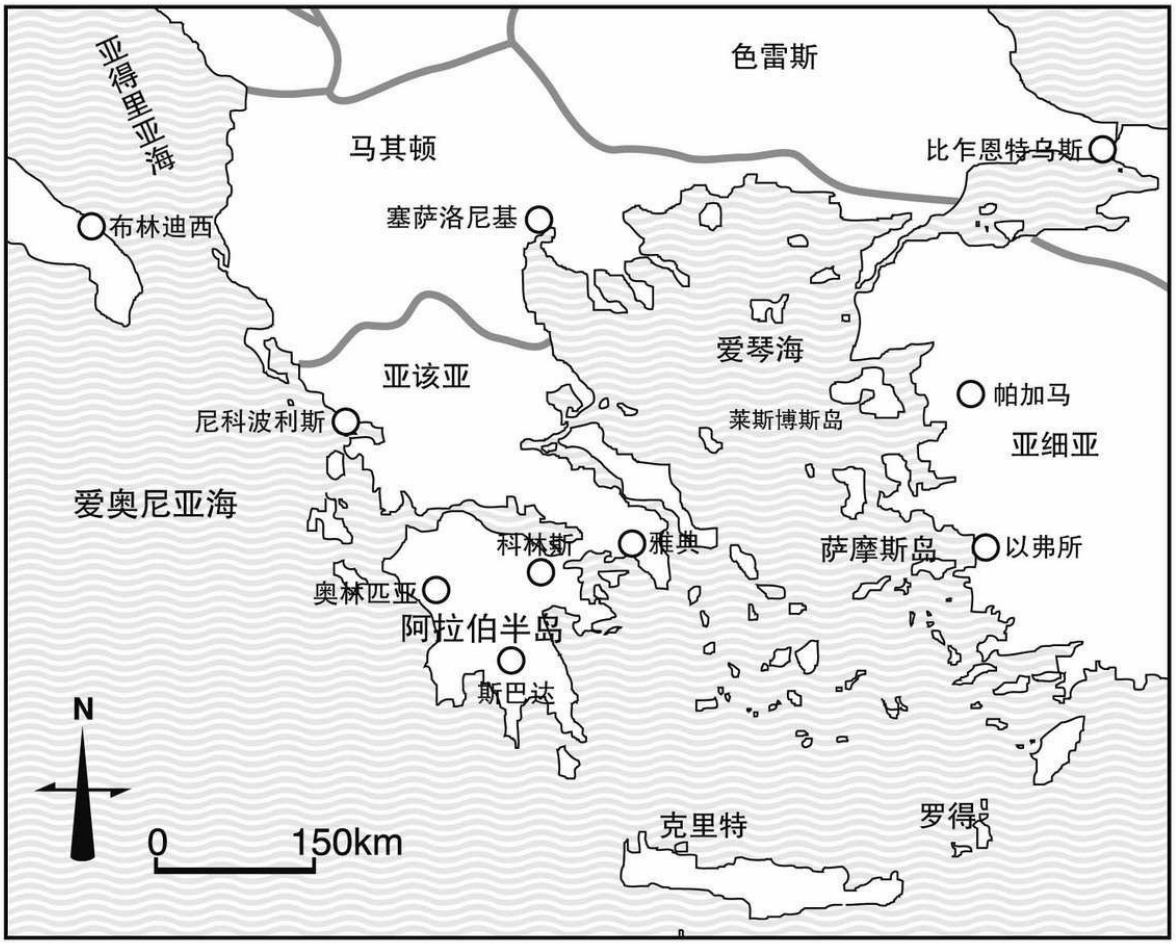
希腊之旅

罗马帝国历任皇帝都会前往各地视察，然而尼禄却是一个特例，从未视察过罗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罗马帝国疆域宽广，西起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抵莱茵河口，南接撒哈拉沙漠，统治了600多个民族。尼禄作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亲自前往视察过的地方居然仅仅只有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几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转战罗马帝国东西南北各处的尤里乌斯·恺撒暂且不论，就连擅长纸上谈兵的奥古斯都，从他继位前的内乱时代到登基以后，也亲自去过很多地方。提比略虽然55岁之后才登基，但在他即位之前有着极为丰富的外地巡视经历。甚至只当了4年皇帝的卡利古拉，在位期间也目睹了

莱茵河与多佛尔海峡，这还不算他少年时代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经验。虽然克劳狄乌斯登基时对国情一无所知，然而远征不列颠时他也亲自到过疆场。尼禄与前任皇帝们相比，继位时罗马一派太平，没有动乱与战事，然而他对国情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尼禄统治罗马帝国，截至其去希腊之前，已经12个年头了。这12年间，尼禄见到的只有罗马到那不勒斯这一段国土。

与其说尼禄的希腊之旅是为了收集信息，不如说亲自前往沐浴它的新鲜空气，借此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更为恰当。可惜的是，尼禄根本没有领悟到这个真谛，也缺乏单纯的好奇心。作为一国之君，只要尼禄想做没有什么不可能。另外，皇帝亲自驾临，戍守边关的士兵们肯定欢迎之至。



希腊及其周边国家

在我看来，尼禄的性格虽不属于多疑一类，然而，作为一种探索，无论事前计划得多么周密，旅行一定会遇到计划外的情况。可是，尼禄与其他年轻人不同，他担心遇到意外。举办“罗马奥运会”与兴建“黄金宫殿”来改造罗马市中心，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新事物，这也说明了他并非厌恶新事物。但是，这些归根到底也是“计划内”的安排。此外，尼禄从未进行过即兴演讲，选择首次登台表演的地方，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不勒斯；有了拉拉队作为坚强后盾，才敢在罗马登台表演。

尼禄并非以皇帝身份来完成这次憧憬的希腊之旅的。相反，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带上“奥古斯特阿尼”拉拉队，与其他选手比试自己的表演

才华。此外，虽然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与科林斯竞赛并非开赛之年，然而，在尼禄的强令之下又开办了这些竞赛。由于尼禄要参赛，原本没有的音乐项目，也在奥运会中增加了进去。拉拉队卖力的声援，加之蜂拥而至的希腊人的喝彩，各地举行的竞赛中，尼禄都获得了冠军，也获得了不少黄金桂冠。通常，奖励冠军的桂冠都是用月桂树的枝叶编织而成，然而由于尼禄获得了冠军，唯有此次桂冠是专门以黄金铸造。

尼禄憧憬中弹竖琴的阿波罗神

即使是这样，尼禄在这次希腊之旅时也履行了皇帝的职责。其中一件是下令开凿科林斯峡谷，使之成为连接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的运河，其目的是为了缩短绕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和距离。尤里乌斯·恺撒是首先想到这个工程的皇帝，可惜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打算建造此项工程。因为，这对维护地中海区域的“和平”无关紧要。从军事角度分析，科林斯海峡通航没有太大优势，但是经济方面会获得极大利益。希腊由于人才大量流入罗马帝国出现衰退，开凿科林斯海峡可以改善希腊的经济状况。

然而，尼禄驾崩之后这个工程也被搁置了，再也无人问津。19世纪，苏伊士运河这一举世瞩目的工程完工之后，这条运河才得以顺利完成。虽然重新动工时隔1800年之久，然而有传闻在重新动工之际，工程现场还发现了尼禄时代开凿岩石的遗迹。

也许是为了回报其获得的众多桂冠，或是为了在自己钟爱的希腊留下印记，总而言之，尼禄这次“巡演”顺带给希腊人带来了一份大礼。尼禄宣布将希腊全境都升格为“自由都市”。在此之前，由于雅典与斯巴达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只有这两座城市获得了“自由都市”称号。而这种升格，意味着内政自治，行省税全免。尼禄赋予希腊全境与雅典和斯巴达同等的特权。所以，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对免征收入10%的行省税感到开心。显而易见，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希腊人会把尼禄视为最杰出的皇帝这种狂热。

然而，尼禄驾崩不到两年，这些全部变成一纸空文。心智成熟、性格健全的韦斯帕芗皇帝认为，区别对待行省非统治之良策。憧憬希腊化，与冷静处理政治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是，韦斯帕芗皇帝依然承认雅典与斯巴达的特权，这其实也是“政治”。

话说回来，尼禄有时候还是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比如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由于指挥系统不统一，尼禄耗费了10年时间。所以在处理犹太叛乱一事时，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一开始就交由韦斯帕芗全权处理。

然而，我们只能说，尼禄这一时期言行不成体统。他一方面命令韦斯帕芗全权负责镇压犹太暴动，另一方面，他又愚蠢地命令前线的士兵们避免出动。尼禄在希腊旅途中如此矛盾的指令，大概是他把这些命令视为对“贝内文托的阴谋”的后续处理吧。虽然，此时的罗马军队一派安静祥和，然而从罗马军队之后的变化来看，尼禄的决定实在愚蠢至极。

军团长之死

罗马帝国在莱茵河防线驻守了8个常驻军团，以保障帝国的边境安宁。被称之为高地日耳曼军团的，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

茵河上游至中游河段防御。称之为低地日耳曼军团的，也是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茵河中游到下游的防御。罗马帝国共有25个军团，守护莱茵河的8个军团是公认的精锐军事力量。然而，此时担任高地与低地日耳曼军团长职位的，刚好是斯克里波尼乌斯家族的兄弟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将领。

斯克里波尼乌斯兄弟俩被尼禄召到了希腊。与此同时，他也传唤了科尔布罗。科尔布罗时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负责幼发拉底河的防御工作。

作为最高司令官对下属的命令，尼禄在信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三位军团长毫无防备就直奔希腊报到。然而到达希腊后，尼禄并未召见，他们没有等到皇帝设宴招待的通知，而是赐死的命令。提格里努斯奉命出迎，他指挥近卫军士兵包围了莱茵河的两位军团长，逼迫他们自杀身亡；迎接科尔布罗的是尼禄派来的近卫军士兵，科尔布罗从他们手中接到尼禄的亲笔书信，命其自裁。

塔西佗的《编年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最为翔实，可惜这个时期以后的内容都失传了，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的功臣科尔布罗最后的命运到底如何。至于他临终前是何心情，除了想象之外别无他据。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没有犹豫，也没有申辩，爽快地举剑自裁。这三位军官，是否确实参与了“贝内文托的阴谋”，还是由于年轻气盛的将领们一时口误而造成的冤案？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尼禄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的确处死了长期驻扎在帝国最重要的两条防线——莱茵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三名军团长。更有甚者，尼禄是先将他们调离了有部下忠心支持的军队之后才命令他们自裁，这种做法的确十分卑鄙无耻。

即便将军队的最高将领处死，军队也并未出现反尼禄的行动，这说明军队上下都在讨好皇帝，有研究者这样记下了当时的场景。确实如此，即使自己的长官遇害，在这一时期属下的士兵们也没有发生叛变。

虽然没有行动，但反叛的心理正在酝酿之中。经此一事，以罗马公民为主的罗马军队对尼禄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此后一年内他们发起的叛乱我们就无从解释。尼禄无凭无据地处死三名军团长，这让他与整个罗马军队为敌。造成这种结果，与其说是尼禄行事过于草率，还不如说他蠢得无可救药。

若是尼禄对军队置之不理，他可能会永远待在希腊。作为皇帝就必须处理此事。尼禄离开罗马期间，一应政事皆由解放奴隶赫利乌斯处理，经赫利乌斯再三劝告，他终于在一年半后返回了罗马。传闻于公元68年1月下旬，尼禄从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登陆。

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终于回到本土。在尼禄看来，凯旋将军的待遇才对得起他的此行，故而，在那不勒斯与罗马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

凯旋仪式

在希腊之旅全程陪伴尼禄的拉拉队每人手持一块宣传牌，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宣传牌上详细记录着获胜的各场赛事，在罗马的凯旋仪式中，这是凯旋之人进城时获得的待遇。为了让目不识丁的人也能了解情况，尼禄下令在宣传牌上描绘了他表演时的情景。宣传牌的尽头紧跟着一支队伍，他们高举获胜的奖品黄金月桂冠，据说月桂冠居然有1808顶，那么宣传牌也应该不少于这个数。尼禄作为凯旋将军，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出场了。除了头上戴的不是橄榄枝编的月桂冠，而是黄金月桂冠之外，尼禄依照罗马帝国的古代礼仪，身披绣有金线的深红斗篷，驾着由4匹马拉的战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到达罗马广场之前的行进路线严格遵循传统，然而经过罗马广场之后却没有登上卡匹托尔山，亲赴最高神祇朱庇特的神殿表示感谢。出人

意料的是，尼禄刚进入罗马广场就往左转，耸立在帕拉蒂尼山之巅的阿波罗神殿才是凯旋仪式的目的地。作为艺术之神，阿波罗掌管着艺术。尼禄自认为不是战场上的胜利者，而是艺术上的胜利者，所以他坚信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是阿波罗神，阿波罗神才是他应该感谢的对象。

在历史学家的记载中不难发现，尼禄的凯旋仪式让罗马公民欢欣鼓舞。在罗马人看来，有趣新奇的事物都值得享受。更何况这次凯旋仪式打破常规，人们还可以看到春风满面的尼禄。

实际上，大获全胜的凯旋仪式，是人们为了庆祝国家安全得到保障而举行的庆典，这与手抱竖琴、自弹自唱的“巡演”结束后的凯旋完全不一样。所以，罗马的民众们迅速从狂热中回过神来，错不在普通人身上。

然而，对于罗马人迅速冷却的表现尼禄非常不满。在他看来，罗马人缺乏文化素养，于是他动身前往那不勒斯，他认为那里的文化水平高于罗马城。另外，在罗马他只能在奥运会期间登台演唱，但是在那不勒斯则可以完全任由他高兴，随时随地引吭高歌。可惜天不遂人愿，尼禄到达目的地之后突然接到报告，高卢发生暴动。

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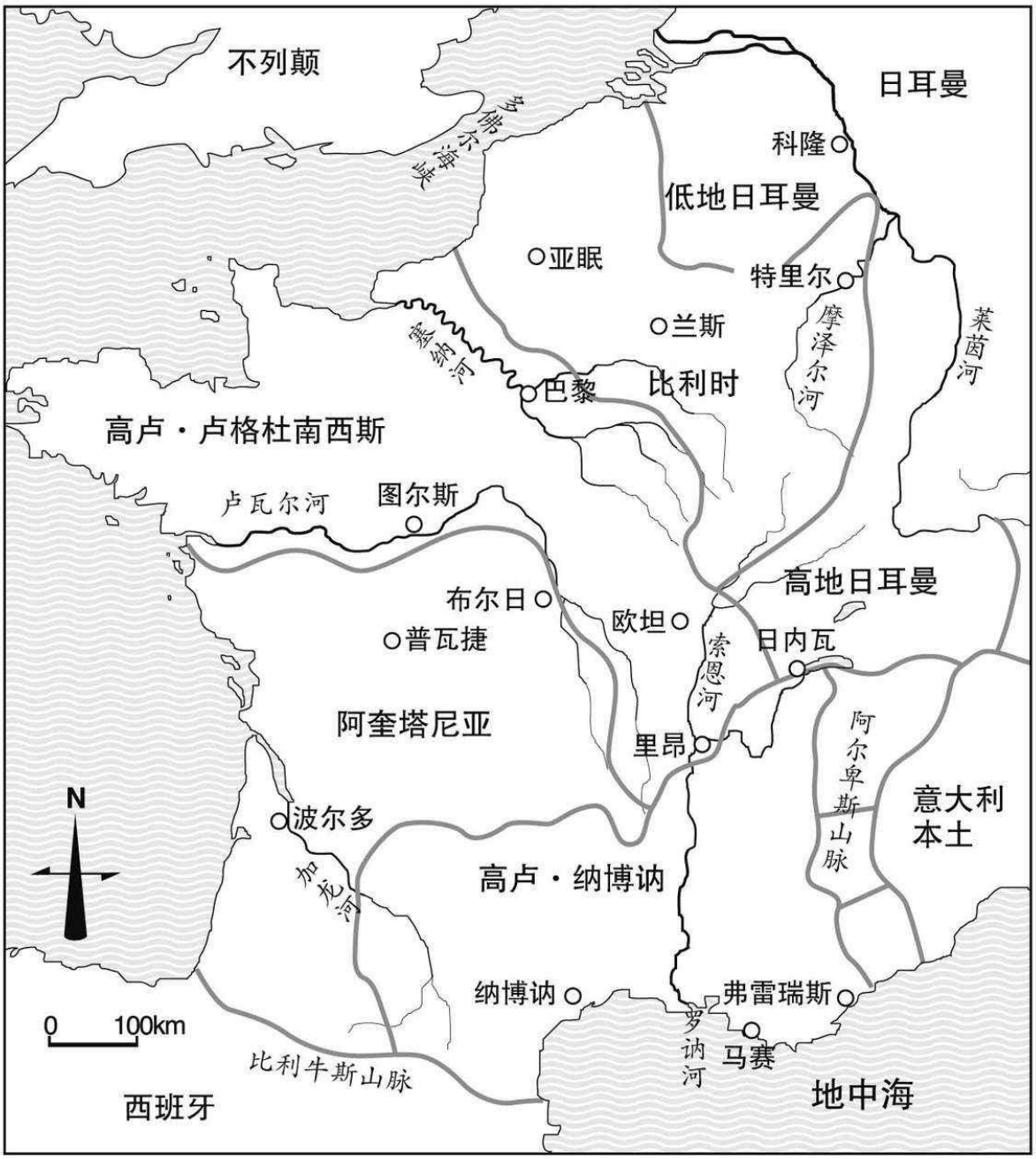
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不管是谁，只要一听到盖乌斯·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名字，立刻就明白所指何人。比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名字对2000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如雷贯耳。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名字。首先，温德克斯表示这个人是高卢人；尤里乌斯家族中，名为盖乌斯的男性多不胜数。百年前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高卢部族首领，所以高卢人从此以尤里乌斯作为自己的家族名。虽然名字较长，然而只有温德克斯才表示他出身于高卢的一个地方，即阿奎

塔尼亚（今亚奎丹）。

从父辈开始，这位高卢人的家族已经成为元老院的一员。这种结果得益于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皇帝制定的法律，它规定：高卢人可获得元老院议员席位。起初，这部法律承认当时与罗马历来友好的埃杜伊部族有资格加入元老院。当时大家都可以预见，既然允许部分部族加入元老院，那么其他部族获得这个资格也是早晚的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位温德克斯的父亲就不是埃杜伊族，而是属于阿奎塔尼亚族。

后来，子承父业的温德克斯也成为议员，然而议员职位并非终点，温德克斯甚至出任高卢行省中的重镇“高卢·卢格登”（里昂行省）的总督。如果把这里与罗马化进程较快的“高卢·纳博讷”（南法行省）进行比较，罗马人肯定认为这里比较落后。但克劳狄乌斯这部允许“长发高卢”（法国中北部）的权贵成为议员的法律，从立法到尼禄时代仅仅过去了20年时间，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开放乃至同化速度之快，实在让人惊叹。

东邻莱茵河，北接多佛尔海峡，西至大西洋，南抵比利牛斯山脉，罗马帝国高卢全境分为5个行省（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其中，除南法行省是元老院行省之外，其余4个行省都是皇帝行省。这4个行省中日耳曼行省位于莱茵河西岸，是防线的最前沿，所以罗马在此设置了常驻军团。此外，比利时、高卢·卢格杜南西斯与阿奎塔尼亚没有驻军。在“长发高卢”的首都卢格登（现在的里昂），罗马只驻扎2个大队（士兵不到1000人）。换言之，20年前行省出生的人没有资格进入元老院，如今罗马不仅让他负责治理高卢，还授予他军权，即使他手下的士兵不足1000人。罗马开国路线由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经克劳狄乌斯再次验证，到温德克斯一代终于结出“果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温德克斯“果实”最后居然起兵反抗尼禄。



高卢全境

按理说，温德克斯应该义愤填膺地煽动高卢人：

“在我看来，尼禄根本不配为皇帝，拥护尼禄的罗马人自然没有资

格统治我们。罗马人统治我们已经百年了，如今正是我们获得解放、赢得独立的大好时机。”

然而，温德克斯用的却是这样的言语：

“尼禄把罗马帝国占为己有，整日沉溺于各种消遣、娱乐而萎靡不振，哪里还有泱泱大国一国之主的风范？他大逆不道，谋害生母，甚至以叛国重罪逼死贤臣良将。作为一国之君，他却喜欢化身歌手，琴技不佳，曲不成调，他自己居然沾沾自喜。这种不称职的首领应该及早下台，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高卢，拯救罗马人，拯救帝国。”

温德克斯的这番说辞很快鼓动了大约10万高卢人。实际上，这位总督号召群众时用的身份不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另外，他还鼓动同僚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说他最有资格取尼禄而代之，成为罗马“第一公民”。

然而，就在卢格登总督温德克斯给西班牙总督加尔巴的亲笔信还在比利牛斯山脉途中时，莱茵河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已经出动，准备镇压此次叛乱。

这8个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不仅得提防前面日耳曼人的入侵，还得防着背后的高卢人生事。一旦高卢发生叛乱，军团长无须皇帝下令，就必须直接出兵平叛。从军团中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库尔蒂乌斯·鲁弗斯，正是时任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军团长，当他接到温德克斯聚集高卢人叛乱时，当即发兵镇压。

尽管号称10万大军，高卢人依然不是精锐的罗马军队的对手。何况，温德克斯与他手下的高卢人并不希望和罗马军队开战。所以，这支队伍顷刻间溃不成军。也有历史学家记载道，高卢人损兵折将接近2万人。然而，这支罗马军队成功镇压了反抗尼禄的叛乱之后，居然对军团长鲁弗斯说道：“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

这些罗马军人成功镇压了高卢人的叛乱，但他们反抗尼禄的心情与高卢人大同小异。对于士兵们的劝进，鲁弗斯拒绝了。在他看来，或许是士兵必须忠于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或许是在军团里历尽千辛万苦晋升至骑士阶级，连担任议员都还不够资格，又怎能奢望自己可统治帝国呢？他对此举棋不定。然而，反抗尼禄的行动已是此起彼伏。

崛起

西班牙总督加尔巴没有像鲁弗斯一样彷徨犹豫，而是立即响应了温德克斯的叛乱号召。加尔巴出身名门，祖辈们都是议员。加尔巴在统治行省的8年时间里，以德政著称，作为一个公职者，可谓是问心无愧。在他看来，20年前才被获准进入元老院的高卢人都能忧国忧民，作为罗马人岂能甘落人后呢？

伊比利亚半岛今天被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则被分为三块：覆盖东部与北部的“希斯帕尼亚·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南部的“贝提卡行省”，以及西部“卢西塔尼亚行省”。伊比利亚半岛的3个常驻军团全部集中在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总督是加尔巴，他也是3个总督中最年长的一位。

加尔巴接到报告，高卢人的叛乱被轻易镇压，温德克斯也自杀身亡，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加尔巴的决心。加尔巴说，行省总督宣誓效忠的对象仅限于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等于表明自己反尼禄的立场。公元68年4月2日，距离尼禄的凯旋仪式不到两个月，当时他正大肆庆祝自己的表演成功，引得非议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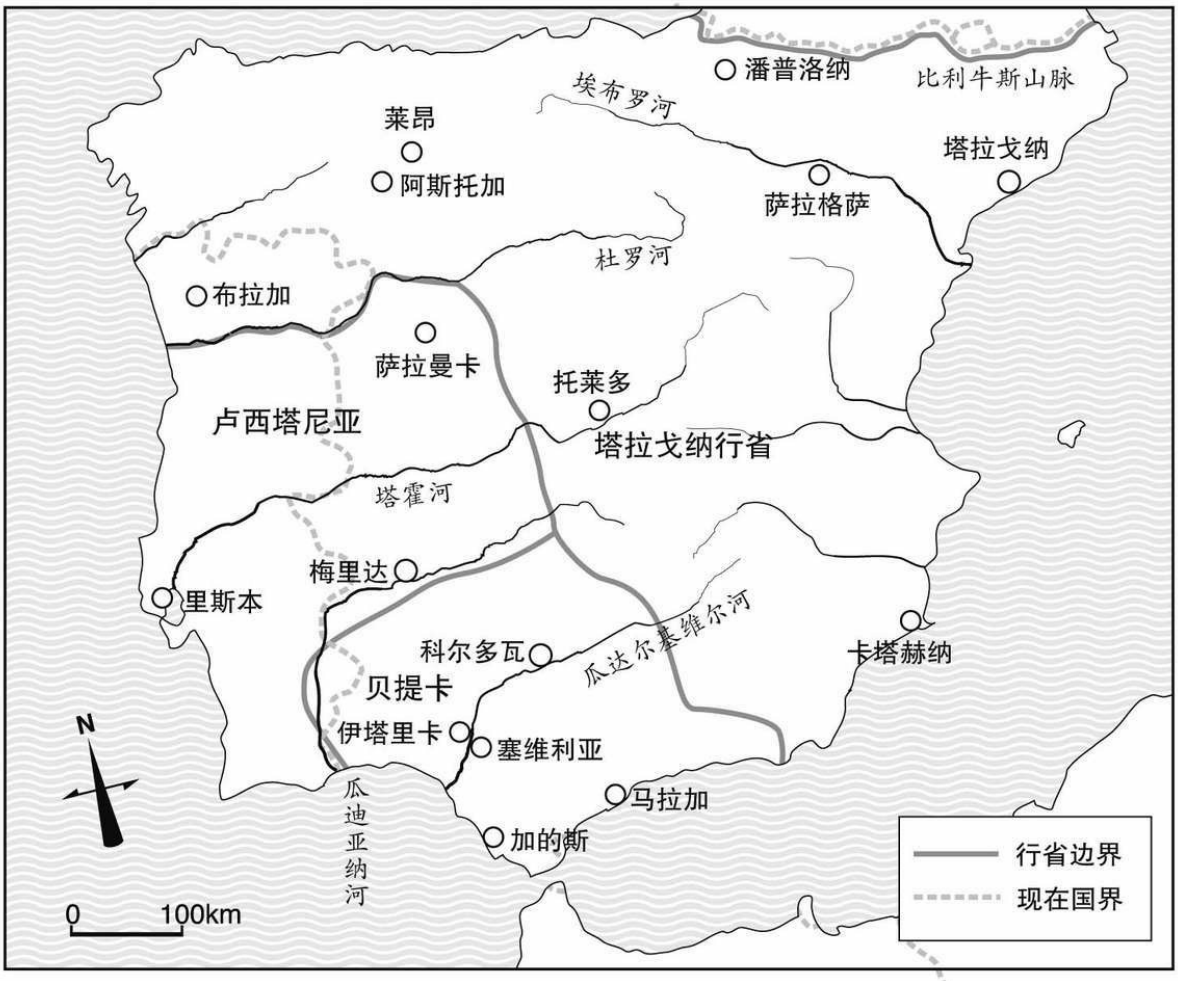
卢西塔尼亚行省的总督奥托对加尔巴表示支持。很早之前，派驻贝提卡行省的财务监察官、即代理总督的凯奇纳也公开表示支持加尔巴。换言之，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拉开了反尼禄运动的帷幕。高卢人温德克

斯发起叛乱时，尼禄丝毫没有担心。然而，尼禄对加尔巴的异军突起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加尔巴家族自共和制时代就十分显赫。这次，尼禄不得不离开那不勒斯，急忙赶回首都。

然而，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因军团长鲁弗斯举棋不定，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亦然。加上元老院依然保持观望，在这种情况下，尼禄觉得还有希望挽回局势。

元老院接到报告，加尔巴在西班牙又扩充了一个军团的兵力，所以他们通过决议，把加尔巴定为“国家公敌”。按照规定，要编制一支由罗马公民权利所有者组成的正规军，首先必须获得最高司令官即皇帝的同意，接着由皇帝向元老院提议，元老院通过之后方可执行。加尔巴擅自扩军，是对元老院的冒犯。

然而，这次反抗尼禄的暴乱，扩散到了罗马公民之中。小麦是罗马公民的主食，把小麦运到罗马有专门的船只，但是民众居然发现船上运载的是改建角斗场用的沙子，这还是出自尼禄的命令，这彻底引发了民众对尼禄的不信任。我曾反复强调过，罗马皇帝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的“安全”与“粮食”。身为皇帝，既不能有效控制负责国民“安全”的军队，也不把保证“粮食”放在心上，罗马民众忍无可忍。



伊比利亚半岛

元老院开始与“国家公敌”加尔巴联系，加尔巴本人在很久之前也派心腹潜入罗马卧底，双方暗度陈仓时日已久。当然，尼禄被蒙在鼓里。

元老院的议员全都是罗马社会的富裕阶层，思想较为保守。在他们看来，72岁的加尔巴比30岁的尼禄更有安全感。再者，加尔巴功勋卓著，经验丰富。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写道：“很多人都认为，虽然尼禄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正统人选，然而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当加尔巴率军攻向罗马的消息传来时，摇摆不定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终于作出了选择。

国家公敌

局势突然变得对尼禄非常不利，一直以来信任有加的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早已不知所踪。提格里努斯手握1万近卫军，这也是驻扎在罗马帝国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他不见了，尼禄就失去了一个依仗。而另一位近卫军团长官利比德乌斯拜倒在加尔巴的麾下，成了尼禄的敌人。

就像从即将沉没的船里仓皇出逃的老鼠一样，从尼禄的警卫到伺候其平常生活的奴隶全都逃得一个不剩。他原本准备逃往埃及的船只因为船员纷纷离开，现在空无一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尼禄被元老院判决为“国家公敌”。笔者曾一再重复过，“第一公民”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谓，只有同时获得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认可才有权统治帝国。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之后，意味着他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元老院发布公告后，由利比德乌斯一人指挥的近卫军决定拥戴加尔巴为“皇帝”。当然，这些士兵也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尼禄失去了元老院与公民的认可，意味着丧失了统治国家的权力。尼禄受到元老院派出的大批士兵的追缉。

即使这样，尼禄仍然没有自杀的勇气。由于尼禄曾经给予希腊特殊政策，在他脑海中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只要能够亡命希腊，希腊人一定会笑脸相迎。他甚至一度考虑逃往帕提亚，然而，眼下最担心的仍是扑朔迷离的命运。

民间有这样的传闻，虽然尼禄最后众叛亲离，但仍有4个地位卑微的仆人始终不离不弃。其中一个解放奴隶在罗马城外有住宅，位于首都以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与诺门塔纳大道之间，距首都6公里，尼禄一行决定逃到这栋住宅。大概是这个地方较为偏僻，加上人烟稀少，所以远方的声音清晰可辨。逃进房间之后，顺着东风，甚至连近卫军士兵们“皇帝加尔巴，万岁！”的欢呼声都传到了尼禄的耳朵中。

在后来的传闻中，尼禄此时痛不欲生的处境被描述得更加夸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尼禄知道有人会到这个藏身之处抓捕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行了断，并最终付诸实施。他甚至在临终前还说了“可怜的艺术家将要死了”这样一句遗言，然而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尼禄喜欢咬文嚼字的性格来判断的话，他也许真的说了吧。这句话与他在“黄金宫殿”竣工前夕说的“终于建好像样的住宅了”相似，经常会让人产生歧义。

公元68年6月9日，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尼禄离世，享年30岁零5个月20天。尼禄继位时不满17岁，他在位的时间超过了14年。

接下来则要考虑怎么安葬尼禄了。奥古斯都陵由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兴建，然而时局注定尼禄无法安葬在那里。所以，与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的待遇相仿，尼禄的骨灰被埋在别处。在经过简单火化后，尼禄的遗骸被儿时的乳母及初恋女奴阿可特埋在了其生父杜米提亚家族的墓地内。这处墓地位于马尔斯广场上，然而具体地点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尼禄墓前祭奠他的鲜花水果从不间断，这一点是卡利古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从祭奠物品的数量与新鲜程度来看，这些东西不仅仅出自尼禄的乳母与阿可特。死者为大，罗马公民对自杀身亡的尼禄还是比较宽容的。假若抛开尼禄曾经的帝王身份，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更何况，尼禄并非碌碌无为，除了没有善始善终，多少还是有些政绩。换言之，作为领导者，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必不可少。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是由奥古斯都一手开创，到尼禄时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我看来，尼禄之死并非单纯意义的奥古斯都血统断绝，而是象征着奥古斯都一手创立的“精致的虚构”的帝国政权终结。

卡利古拉遇害之后，或多或少拥有奥古斯都血缘的后裔，都会被拥

立为新的皇帝。元老院和罗马民众不但不反对，反而赞成如此行事。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得以顺利继位。他登基时近卫军的确是一大助力，但是仅凭这个依靠不可能让元老院和民众们忍气吞声长达13年。所以，按今天的说法，克劳狄乌斯登基是各方势力互相妥协、达成共识的结果。

同卡利古拉相仿，尼禄也没有后代。但是在庞大的罗马帝国，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的人并非没有。单论女性一脉，有人嫁到共和制时代已是名门望族的埃米利乌斯家族，也有人嫁入同为名门的尤里乌斯家族。然而，这类人大多遭到清洗，因为卡利古拉或尼禄认为他们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可是如若人们依旧坚信，继承了奥古斯都“血缘”之人就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么肯定能找到符合条件的幸运儿。如果如愿以偿，那么“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可能会加上一个埃米利乌斯什么的名称，变成“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埃米利乌斯王朝”等等，奥古斯都开创的政治体制应当可以万古长青吧。

然而，现实始终不是理想，元老院与尼禄分道扬镳，他们最终选择了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加尔巴，并不认为这么做有悖礼法。士兵和普通民众也不以为意。至此，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被罗马的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们抛弃了。自卡利古拉死后，换个人来当皇帝就可以维持统治；尼禄死后，加尔巴无法稳坐皇帝的位子，帝国一年半之内内战频发，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为何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人认为不应该如此选择皇帝继承人呢？

同少数人掌握统治权、多数人共同执政的共和制不一样，君主制是君王一个人独揽大权，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有效监督。实际上，元首制也好，君主制也罢，人类历史上的统治方式基本都有缺乏有效监督这类缺点。

然而，只有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元首制存在监督机制。

相信各位在看了我所做的图表之后应该会明白，下面这个巧妙的框架正是罗马皇帝权力构建的基础。

然而，正是奥古斯都创立的这个界限模糊不清的权力框架，才能实现其统治帝国的构想。在奥古斯都看来，他的这个构想相较少数人把持的共和制更为优越，庞大的罗马帝国更适合采用他开创的元首制。奥古斯都沿着恺撒指明的方向前进，已经见证了奥古斯都预见的正确性，因为后来的帝国统治并无大的纰漏。罗马帝国的“和平”并不会因为个别皇帝的统治不力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

奥古斯都不仅仅亲自搭建了这个体系，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对于他创造的这样一个“精致的虚构”体系他心知肚明。然而，要娴熟地驾驭这个体系为己所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必不可少。

我们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个身居高位同时又拥有娴熟高超的政治才华之人，简直可遇不可求。所以，哪怕是君主制的许多方面都是捏造且失于精巧缜密，然而世袭制仍然是君主制国家的首选。在君主制国家眼中，即使统治者没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如若辅佐之人拥有这种才能，实际的政治生活同样可以照常运转。换言之，纵使统治者是弱智或者脑瘫，只要他与前任“血缘”相继，他照样可以统治帝国。当然，要让这个系统维持运转，这也是拥有卓越政治才华之人的责任。也即是说，通过承认权威却不授予权力的方式，弥补了缺乏监督机制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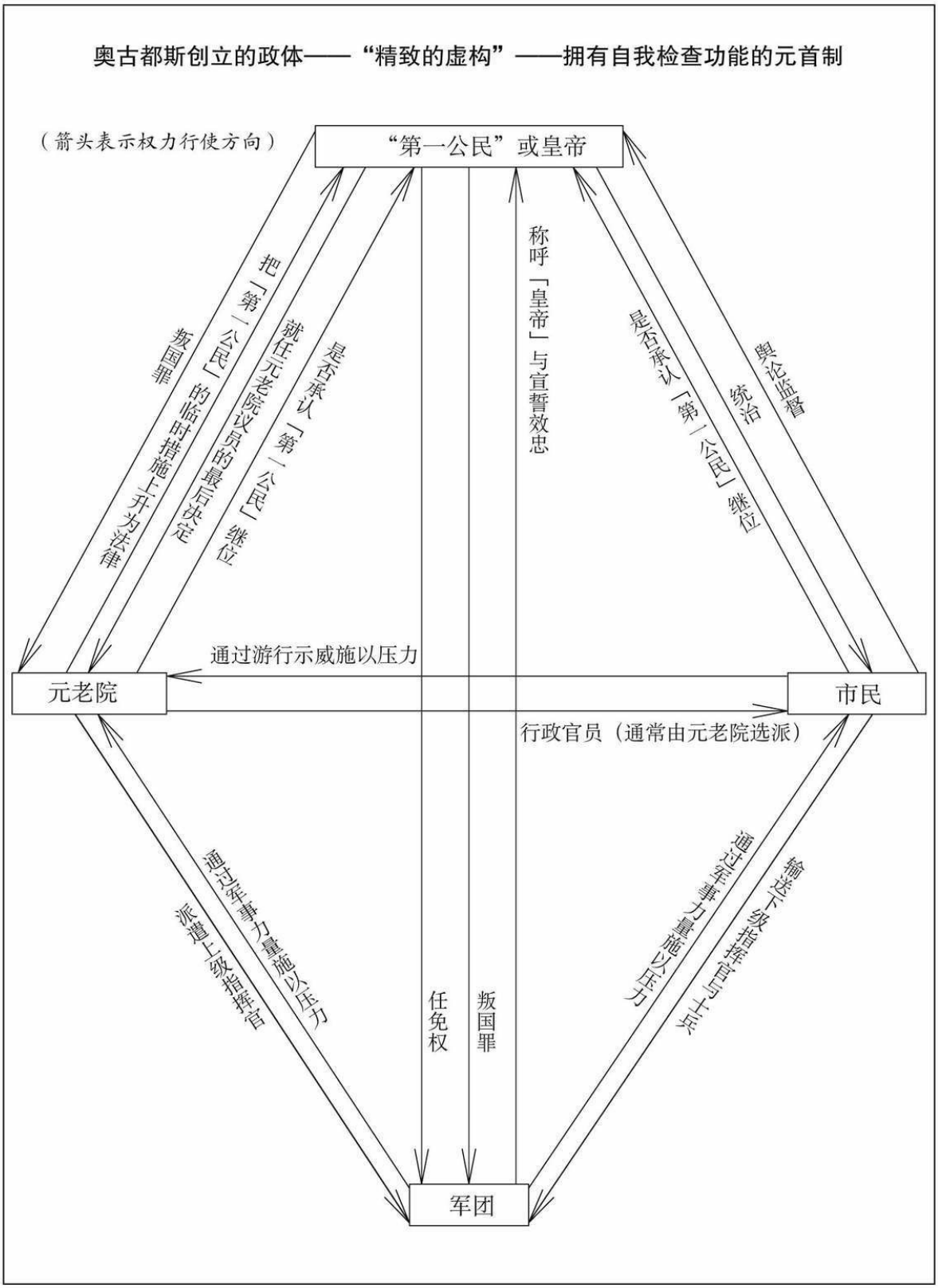
然而，罗马人与这种君主制没有丝毫联系。按照传统，罗马的权威与权力向来尽归一人。因为比起个人的“血缘”关系，罗马人更看重的是能力。即使是在元首制时代，世袭制也并不为罗马人接受。如果真要让罗马人接受世袭制，必须设置可以让他们安心的监督机制。

那么，奥古斯都为何如此钟情于世袭制呢？首先，相比出身都市的恺撒，奥古斯都则出身于农村，他对家族拥有更强的向心力。然而，奥古斯都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没有半点私心，这一点与家族企业的创

始人热衷于让儿子继承家业不同。在奥古斯都看来，世袭制可以避免争夺皇位导致的内乱，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自古以来，世袭制并非罗马的最高统治者采用的传统。因此，仅凭“血缘”想当上皇帝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获得元老院和民众的认可。此外，为了使得世袭制更加巩固，士兵们在宣誓效忠自己的最高司令官的同时，也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

然而，这只是表面规定，真实情况如前（《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在奥古斯都的巧妙平衡之下，将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把权力利用得炉火纯青。没有驾驭这些权力的天赋，或者没有勇气使用这些权力，那么拥有权力也是枉然。因而，是否拥有权力完全取决于表面上的规则。对于罗马皇帝而言，如若元老院与罗马公民撤销对他的认可，罗马军队也拒绝宣誓效忠，那么即使身为皇帝，到那时也会沦为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表面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尼禄走投无路这个案例。

显而易见，在这种表面规则的操控下，“血缘”关系变得无足轻重。而罗马人认为的“血缘”，并非今天所谓的附加值，归根到底罗马人还是崇尚实力至上的一个民族。血缘对罗马人而言，只有拥有实力才会产生价值。尼禄之后的罗马帝国皇帝，全都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罗马人早已不再唯奥古斯都的血缘论事了。


奥古都斯创立的政体——“精致的虚构”——拥有自我检查功能的元首制
（箭头表示权力行使方向）
“第一公民”或皇帝
元老院
市民
军团
把「第一公民」的临时措施上升为法律
叛国罪
就任元老院议员的最后决定
是否承认「第一公民」继位
称呼「皇帝」与宣誓效忠
是否承认「第一公民」继位
统治
舆论监督
通过游行示威施以压力
行政官员（通常由元老院选派）
通过军事力量施以压力
派遣上级指挥官
任免权
叛国罪
通过军事力量施以压力
输送下级指挥官与士兵

与共和制时代末期一样，对于没有附加值的实力而言，也难逃正面冲突。与一天时间就摆平了卡利古拉遇刺后的局势不同，尼禄自杀身亡后，罗马恢复和平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罗马的内乱期间，先后出现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直到韦斯帕芗继位才算大局已定，而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半的内乱。这位继任的皇帝身上既没有流着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更不是出身于诸如加尔巴、奥托与维特里乌斯等元老院阶级。韦斯帕芗仅仅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其父甚至没有稳定的职业。

虽然罗马人与奥古斯都的“血缘”进行了诀别，然而他们并没有否定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制。罗马帝国的元首制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建框架，经提比略奠定基础，最后由克劳狄乌斯修修补补才最终确立下来。甚至连感情上倾向于共和制的塔西佗也不能否认，最符合罗马帝国现实的，除了元首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作为一个并非意识形态类型的民族，罗马人仍然是一个善于与现实抗争的务实主义群体。公元68年夏伊始，虽然罗马帝国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动乱，但在此期间并没有探索新的政体。元首制已经成为罗马的共识，问题仅仅在于谁能够有幸成为“代表”而已。但是正因如此，奥古斯都原本辛辛苦苦为元首制设置的监督功能，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许是我错了，其实暗杀皇帝似乎也成为正常的监督手段之一。

奥古斯都开创的政体是“精致的虚构”

后记

同为罗马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为何要对罗马皇帝们口诛笔伐呢？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意大利街头提问：“既是知识分子又身价不菲的人是谁呢？”意大利人的答案肯定会是：“左派。”

塔西佗身为元老院议员，而苏维托尼乌斯则是皇帝的秘书官。塔西佗比苏维托尼乌斯大约早出生15年，然而并没有两人生卒年的史料记载，不过传闻他们都活了60至65岁。可是，无论是《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还是撰写《罗马帝王传》的苏维托尼乌斯，他们都生活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罗马帝国时代。

塔西佗在尼禄自杀而亡的那一年大约13岁，而苏维托尼乌斯则尚未降生。罗马帝国在尼禄死后，陷入了一年半的混乱状态，在这两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他们经历的罗马皇帝如下（括号内表示在位时间）：

韦斯帕芗（公元69—79年）、提图斯（公元79—81年）、图密善（公元81—96年）、涅尔瓦（公元96—98年）、图拉真（公元98—117年）、哈德良（公元117—138年）。

罗马帝国“五贤帝”中，后面三位皇帝占了三席。

对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出生地，历史学家们并不十分了解，然而普遍推测塔西佗出生于南法行省。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的家族姓名是尤里乌斯，出生地记载得很清楚，就在法国南部的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尤里乌斯·恺撒在发动高卢战役时代，就曾经授予过很多

高卢实权派罗马公民权，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名尤里乌斯与元老院议员席位等授予了他们，阿格里科拉的祖先应当就是恺撒拉拢的对象。罗马帝国有这样的惯例，即行省出身的人被提拔为元老院议员之后，通常会选择同样出生地的人做自己的女婿。不难推测，法国南部名为高卢·纳博讷的地区很有可能是塔西佗的出生地。

与同样出身行省、最终跻身罗马上流社会的塔西佗不同，苏维托尼乌斯出生于意大利本土，其父是第十三军团的一名大队长。从苏维托尼乌斯的经历推断，他属于罗马帝国的中等阶层。不管怎么说，他们一位是元老院议员，一位是皇帝的秘书官，哪怕是没有处于罗马帝国的权力核心，当也应该是处于接近权力核心圈的地位。

从这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来看，他们都坚持国家大事不应由个人独揽大权，而应当由元老院这支精英队伍挑起重任，显然上述立场表明他们都属于支持共和制的一派。身为议员的塔西佗身上的这种倾向十分强烈。然而，他们两人都生活在罗马秩序井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

如果只是单纯地反对某一种体制，往往会造成自身力量的损失。保存实力又能到达反对体制的目的，唯有提出一个能够取代现行体制的新的制度，才是正确的做法。也只有这样，反对体制才能取得积极的功效。

可是，随着罗马帝国政权的日益巩固，罗马人已经日益认可这种体制，在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罗马帝国政权时代，不可能一味地反对体制，而新的制度也很难产生。甚至连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都没想过摧毁元首制度，回归共和制。

在这种前提下，如若无法提出足以取代旧体制的新制度时，理性的反体制者又如何谋求出路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批判。然而，一个人如果无法相信自己言语所具有的力量，他很容易变成为批判而批判，或者堕落为专门揭露别人丑闻的小人。就像研究者经常说的“塔西佗式悲观主义”，我想他产生悲观情绪的真正原因，并非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是因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担忧。这种想法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最后变成了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说的：“该记的不记，记的都是不该记的。”试想一下，假如报纸上的社论与周刊杂志的八卦新闻，全是今天我们日本人留给后人的史书，那么后人会怎么来看呢？然而，罗马皇帝的不幸之处在于，塔西佗功力深厚，远非写社论的记者可比，他的文章引人入胜，而苏维托尼乌斯亦然，他的文章比周刊杂志的文章更有意思，很适合作为人们闲聊的谈资。正是他们俩功力深厚的文笔，这些文章才得以流传2000年之久。共和制时代的知识分子西塞罗也早就有这样的名言：“无论何时，批判当权者的文章总是受人追捧。”而我们在日本也很容易读到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译本了。

罗马人论述罗马皇帝与非罗马人论述的罗马皇帝，这两种形象大相径庭。对于罗马元首制时期600名议员失去决策国家大事的“自由”，对于非罗马人的希腊人斯特拉波、犹太人斐洛与约瑟夫·弗拉菲乌斯等而言，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一件史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是被统治阶层。对于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会受到罗马帝国是否正常运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记载更为客观，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而，非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就是：“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不会有丝毫隐瞒。

然而，由于这些非罗马人远离帝国权力核心，这也成为他们论著的硬伤，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相比，他们的作品缺乏真实性和说服力。仅仅从流传后世这个角度出发，由于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对批判皇帝不遗余力，也迎合了基督教徒们的口味，使得他们的作品流传

更加深广。

塔西佗的作品对后世的罗马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想介绍其中的一些章节。这本书与他崇拜的岳父阿格里科拉有关，名为《阿格里科拉》。笔者向大家介绍他担任不列颠总督时的一些段落，主要记述他如何治理：

> 阿格里科拉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停战期间，实施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虽然不列颠人散居在各个部落过着自己的野蛮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拥有彪悍的好斗性。阿格里科拉了解到不列颠人的这种天性，通过竞争关系培养他们过上和平与安定文明生活的习惯。不论是不列颠人为公家或自己修建神殿、论坛（集会广场），还是建造石屋，都会给予奖赏。阿格里科拉积极奖励劳动者，惩罚懈怠者，如此一来，不列颠人之间自然形成竞争关系，总督大可作壁上观，根本就没有必要强制他们干活。
>
> 阿格里科拉让不列颠人部落族长的儿子们学习提高修养的必修课（英语是Liberal Arts）。他还不忘奉承这些族长几句，说不列颠人的聪明远胜高卢人的热情。这样一来，此前一直拒绝学习拉丁语的不列颠人都希望可以早日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拉丁语。阿格里科拉甚至夸奖不列颠人身穿托加的姿态更加富丽堂皇，而罗马服饰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
> 就这样，不列颠人逐渐忘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迷恋上了罗马式回廊、浴场与饮食方式。无知而又浅薄的他们以为自己正在迈向文明，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们成为奴隶的证明而已。

在不列颠，罗马人所做的不仅仅是盖祭祀场所、列柱回廊、议事厅、歌剧院以及浴场。如今的英国还留下诸如街道、上下水道等大量的古罗马遗址，都是当时罗马人的杰作。而痴迷庭院的现代英国人喜欢栽种花草，这当中有很多种类也是由罗马人移栽不列颠的。另外，现代英语中，大约有40%的单词来源于拉丁语。有些英国知识分子在聊到德国

人时，不经意间会流露出德国人是一个没有经过罗马文化熏陶的野蛮民族这样的轻蔑语气。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写过，恺撒跨越多佛尔海峡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历史。如今，关于古罗马的研究，英国人的成绩足以鹤立鸡群。没有英国人的研究罗马史将无从谈起，当然，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

对于现在英国人的这副姿态，不知塔西佗知道了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再次出言挖苦道，不列颠正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奴隶化了吧。

然而，当不列颠人从笔直平坦的街道一眼望去，他们的心里应该清楚，比起过去劳力伤神的道路，现在运输货物应该更加省时省力；当不列颠人站在宽敞屋檐遮挡下的会场内，他们的心里应该知道，哪怕是经常下雨，也同样能够高兴地在里面聊天。养成洗澡的习惯可以预防疾病，铺设水道就不用到远处取水，摆事实讲道理可以避免冲突，这些都是不列颠人从罗马人那里学到的生活习惯。正如塔西佗所言，虽然不列颠并不寒冷，但天地间弥漫着水汽。所以，不论是穿着罗马式长袍还是短衣，不列颠人应该不会再饱受这些天气的困扰了。

现代发达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与武断地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奴隶化结果的塔西佗如出一辙。他们拥有了一切，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拼命工作为了电冰箱、洗衣机、汽车是错误的，极力想说服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从未考虑过自己是否真有这种资格。更进一步而言，不知道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是否认真思考过，电冰箱、洗衣机让女性减少了多少负担呢？

笔者从心底十分尊敬塔西佗，他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然而，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抗议几句："塔西佗，你怎么能这样讲呢？"

大事年表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4	提比略被奥古斯都任命为罗马帝国下一任皇帝的继承者；此外，奥古斯都也指明了提比略之后为日耳曼尼库斯	提比略重返日耳曼战线，除易北河之外，其余重要河流全部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犹太希律大王驾崩，犹太国一分为三，三个儿子分别执掌一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要求恢复神权统治，引发暴动，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出兵镇压	
5		14 年后，提比略挥军再度进抵易北河畔		
6		罗马军队开始进攻马柯曼尼人	犹太教徒再生异变，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中部地区被纳为罗马行省	
7		潘诺尼亚与达尔马提亚发生暴乱，提比略立即与马柯曼尼人和谈		
8				（中国）汉朝被王莽所灭，新朝开始
9		夏，罗马军队征服了潘诺尼亚；秋，瓦鲁斯指挥的 3.5 万人罗马军队与阿尔米纽斯的日耳曼军队短兵相接；瓦鲁斯 3 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中部条顿堡森林全军覆没；冬，达尔马提亚向罗马议和		
10	提比略三度担任日耳曼战役总司令。翌年、再获连任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3	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召回罗马，授予罗马全军“最高指挥权”。其后，日耳曼尼库斯接手日耳曼战线指挥权			
14	为了确定罗马帝国的人口总数，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共同进行了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约494万人拥有罗马公民权。8月19日，奥古斯都在那不勒斯驾崩，时年76岁。9月17日，提比略被元老院推举为“第一公民”，继任罗马帝国第二任皇位	由塔克法里纳斯领导的北非反罗马的暴动正式爆发；罗马军队驻潘诺尼亚营地发生哗变，提比略派儿子杜路苏斯前往平叛；罗马军队驻低地日耳曼营地也发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从高卢前往平叛；在经过流血整肃之后，成功镇压了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哗变；罗马军队进攻日耳曼人		
15		春，日耳曼尼库斯率约6万罗马大军越过莱茵河，俘虏了日耳曼人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岳父及妻子，并将他们带回罗马		
16		日耳曼尼库斯带领8万大军攻入日耳曼腹地。成功击溃阿尔米纽斯军队。撤军时受到恶劣天气的干扰，损失不小		
17	5月26日，首都罗马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了凯旋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将前往东方赴任。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被提比略画上了休止符，同时重新布防莱茵河防线；提比略要求元老院授予日耳曼尼库斯“最高指挥权”。秋，日耳曼尼库斯与其妻阿格里皮娜、其子卡利古拉出发前往东方		小亚细亚南部地区遭受大地震袭击，损失惨重。提比略拟定赈灾政策，重建灾区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8	小亚细亚小国卡帕多西亚与科马根尼被提比略纳入直辖行省。罗马帝国营业税下调，由1%降至0.5%（设置了时限）	1月，日耳曼尼库斯访问亚克兴角海战的遗址	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并为新王阿尔塔什斯举行加冕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到达埃及，至次年离开	（中国）赤眉起义
19	提比略以犹太人扰乱社会治安为借口，将他们暂时驱逐出境		春，日耳曼尼库斯从埃及返回叙利亚，随后前往帕尔米拉；10月10日，日耳曼尼库斯病故	
20	元老院审判叙利亚行省总督皮索，罪名是不服从日耳曼尼库斯指挥等，最后自裁而亡			
21	杜路苏斯成为执政官，提比略移交政务，前往那不勒斯近郊，并在当地滞留了一年时间；为解决北非叛乱，提比略任命新总督，整合指挥系统；原叙利亚总督奎里努斯去世，提比略决定用国葬厚葬奎里努斯	塔克法里纳斯发动的骚乱声势日大，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北非的统治；罗马驻莱茵河军队镇压了高卢东部的叛乱，事件起因于高利率税赋过高		
22	在提比略的请求之下，元老院授予了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			
23	杜路苏斯突然死亡。提比略对莱茵河及多瑙河等罗马帝国的防线重整进行了调整，并下令补足军团人员空缺，对辅助兵总额等进行了规定	塔克法里纳斯战死，北非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刘秀战胜王莽，新朝灭亡
25				（中国）刘秀即位，史称光武帝，建立东汉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7	提比略把卡普里岛当做隐居地；罗马郊外一个名叫佩特洛小镇角斗比赛场观众席突然倒塌，导致了5000余人伤亡；罗马西里欧山遭遇火灾焚毁一空			（中国）赤眉起义失败，向光武帝投降
28		莱茵河下游的一个日耳曼部族掀起叛乱，罗马军队损失了900名士兵才将叛乱镇压下去		
29	莉薇娅（提比略的母亲，即奥古斯都的遗孀）离世；年末，日耳曼尼库斯遗孀阿格里皮娜与长子尼禄·恺撒被判有罪，分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与蓬扎岛			
30	对阿格里皮娜母子的流放判决正式执行。阿格里皮娜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也因被指控反叛国家而定罪，处以监禁；尼禄·恺撒死于流放地			
31	1月1日，协助提比略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与提比略同时出任执政官；提比略辞去执政官职务。随后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长官一职，重新任命马克罗担任此职。10月18日，提比略致信元老院，揭发塞亚努斯犯了叛国罪，元老院通过决议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对塞亚努斯执行了死刑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33	阿格里皮娜于流放地文托特内岛离世。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也离世；有议员被揭发在行省滥放高利贷，导致金融波动，地价暴跌，这也是罗马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提比略拟定公共资金的投入等多项措施，化解了困局			
34			帕提亚乘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什斯去世之际，介入亚美尼亚内政。次年，提比略派维特里乌斯前往叙利亚解决此事，帕提亚从亚美尼亚撤兵	
36	罗马的阿文庭遭遇大火，提比略立即命令救援，起草重建计划			
37	3月16日，提比略在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海角别墅中驾崩，时年77岁；3月18日，日耳曼尼库斯幼子卡利古拉被元老院授予所有的权力；卡利古拉继任为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9月27日，卡利古拉获封“国父”称号。10月，卡利古拉重病			
38	夏，卡利古拉之妹杜路希拉离世；卡利古拉公布新供水管道的修建方案；10月，罗马发生火灾		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与犹太人矛盾升级，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以斐洛为首席代表的犹太使节团前往罗马面见卡利古拉陈情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39	罗马帝国财政处于崩溃边缘；春，卡利古拉接见犹太人与希腊人使节团	秋，卡利古拉前往高卢视察，放弃了进攻日耳曼计划		（中国）东汉，对全国农田及户口进行普查
40	5月下旬，卡利古拉回到罗马，8月31日为其举行了凯旋仪式。卡利古拉怀疑其妹小阿格里皮娜及尤利娅·莉薇娅对自己图谋不轨，将她们判处流放；与此同时，卡利古拉与元老院关系日益恶化	3月，卡利古拉放弃进攻不列颠，于多佛尔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希腊人与犹太人在犹太地区的对立日益尖锐。犹太人砸毁祭祀卡利古拉的祭坛。卡利古拉命令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在耶路撒冷大神殿建造罗马主神朱庇特塑像	
41	1月24日，近卫军团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及科尔涅利乌斯·萨比努斯行刺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离世，时年28岁。卡利古拉之妻凯索尼亚与女儿同时遇刺身亡；当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卡利古拉的所有权限授予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黄袍加身，成为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对《叛国罪法》予以废止，流放文托特内岛的卡利古拉之妹阿格里皮娜得以重返罗马		统治犹太的权力，被克劳狄乌斯交给希律王家族的希律·阿格里帕。耶路撒冷等犹太中部地区恢复35年前的国王统治。克劳狄乌斯将亚历山大拉回正轨	
42	克劳狄乌斯计划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建设一个新港，同年破土动工	作为不列颠势力最大的部族领袖克诺贝里努斯离世，权力争夺战从不列颠蔓延至高卢东北		
43	罗马帝国远征不列颠，克劳狄乌斯任命奥尔斯·布劳迪斯为总司令	4万罗马大军在布劳迪斯的指挥下，从不列颠东南登陆，并在泰晤士河初战告捷；渡过海峡之后，克劳狄乌斯进入科尔切斯特城会见罗马军队，并制定了把不列颠行省化的方案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44	首都罗马为克劳狄乌斯举行凯旋仪式。让人吃惊的是其妻梅莎里娜赫然在列		由于希律·阿格里帕离世，罗马帝国再次接管犹太	
47	罗马为远征不列颠的总司令布劳迪斯举行了简单的凯旋仪式；因梅莎里娜诬告，使得原执政官法雷里乌斯·阿吉阿提库斯自杀身亡			
48	克劳狄乌斯对罗马帝国进行人口普查，约有598万人拥有罗马公民权；克劳狄乌斯举办“百年节”；克劳狄乌斯之妻梅莎里娜犯重婚罪，被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纳鲁奇索斯下令处死			
49	克劳狄乌斯与侄女小阿格里皮娜（卡利古拉之妹）结婚，这也是其第四次婚姻；哲学家塞内加因被指控通奸而流放到科西嘉岛，小阿格里皮娜将之召回罗马，命其负责教导儿子杜米提亚·阿赫诺巴尔布斯（下一任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后来升任近卫军长官的布鲁斯担任武术教师			
50	小阿格里皮娜劝说克劳狄乌斯收其子杜米提亚为养子，随后，杜米提亚更名为尼禄·克劳狄乌斯		克劳狄乌斯任命阿格里帕二世担任犹太国王，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划为罗马直辖行省，分而治之	
51	尼禄时年14岁，小阿格里皮娜为其举办成年仪式；罗马帝国受到恶劣气候影响，小麦减产，导致储备量不足		沃洛吉斯继位为帕提亚新国王	犍陀罗艺术诞生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52	于卡利古拉时代开工兴建的两条供水管道竣工，取名为“克劳狄乌斯水道”		帕提亚进攻亚美尼亚，罗马出兵，帕提亚望风而撤	
53	尼禄与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完婚，并在元老院第一次发表了演讲			
54	10 月 13 日，克劳狄乌斯驾崩，时年 63 岁（有传言称遭小阿格里皮娜下毒而亡）；就在当天，尼禄接受了近卫军团的“皇帝”称号。元老院也决定授予尼禄一应大权；尼禄继任为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时年 16 岁		帕提亚攻占亚美尼亚，沃洛吉斯任命其弟梯里达底就任亚美尼亚皇位；罗马任命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为总司令，出兵亚美尼亚	
55	对于母亲小阿格里皮娜的专横跋扈，尼禄渐生反抗之意；由于担心小阿格里皮娜拥立克劳狄乌斯之子不列塔尼库斯为帝，尼禄谋杀了不列塔尼库斯		春，科尔布罗出任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行省总督，与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分别指挥两个军团，对帕提亚作战	
57	尼禄合并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的财政税收，实现了国库的统一		从这一年的年末到第二年的年初，科尔布罗带军进入小亚细亚山岳地带，进行高强度练兵	（日本）倭奴国向东汉进贡，汉光武帝颁发金印
58	尼禄对于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官”称号予以拒绝；元老院否决了尼禄提议废除间接税的议案，随后双方达成折中议案		5 月，科尔布罗率军发动进攻，攻入亚美尼亚。科尔布罗建议帕提亚上奏尼禄，请求罗马授予梯里达底亚美尼亚皇位，帕提亚拒绝。罗马军队兵不血刃地攻占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将帕提亚军队赶出了亚美尼亚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59	3 月 21 日，尼禄弑母		春，罗马军队将阿塔克萨塔付之一炬，向亚美尼亚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进发，再次不费一兵一卒攻下该城。尼禄令梯里达底担任亚美尼亚王	
60	罗马首次举办五年一届的比赛“尼禄节”，规模十分庞大			
61	亚美尼亚再次爆发危机。荣升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科尔布罗向尼禄献策，请求派遣军团长全面负责亚美尼亚战线，尼禄采纳了这个意见，任命贝图斯负责亚美尼亚战事	不列颠爆发了反抗罗马的暴动，罗马 1 个军团遭到歼灭，约 7 万人遭到残杀。远征安格尔西回师不列颠的行省总督苏维托尼乌斯，率领 1 万名士兵与不列颠人展开激战，以胜利收场		
62	罗马首都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病逝；尼禄谋士塞内加隐退；尼禄与妻子屋大维娅离异，迎娶波比娅·萨宾娜。随后，将屋大维娅流放远方，并将其谋害致死		贝图斯到达亚美尼亚前线，统率 3 个军团。科尔布罗也统率 3 个军团，并担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一职；陷入帕提亚的包围圈，贝图斯率部无奈投降，被迫同意从亚美尼亚撤军；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遣使面见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要求拆除科尔布罗建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的所有堡垒以及河上桥梁。科尔布罗提出条件，要求帕提亚从亚美尼亚全面撤离，帕提亚方面予以同意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3	帕提亚王遣使抵达罗马，向尼禄当面递交帕提亚王的亲笔信函。罗马拒绝议和，授予科尔布罗东方地区最高指挥权，准备开战；位于帝国南部的庞贝遭受地震袭击；尼禄建于马尔斯广场的体育馆遭遇雷击，被焚毁		5万罗马大军在科尔布罗的率领下，成功攻入亚美尼亚，并逐一攻陷了帕提亚的军事要塞；帕提亚请求议和，并按照科尔布罗的答复，向罗马表示愿意签订和平条约，双边暂时休兵；科尔布罗与帕提亚国王之弟梯里达底直接面谈。梯里达底同意前往罗马接受加冕	
64	尼禄开工建造“穿行大厅”；在那不勒斯露天剧场，尼禄首次以歌手身份出场表演；7月18日夜，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下方的店铺发生火灾，火势持续了9天，随后蔓延至罗马全城。尼禄指挥灭火行动，救助灾民，灾后重建等；与上次改革时隔87年，为了保证灾后重建及市中心改革所需资金，尼禄推行货币改革；在兴建“黄金宫殿”之后，尼禄饱受诟病；以纵火罪、“憎恶全体人类”等罪名为借口，尼禄大肆逮捕基督教徒，并予以判刑，然而坊间仍然有“尼禄下令纵火”的传闻		梯里达底前往罗马	

（续）

公元（年份）	罗马帝国			其他世界
	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5	春，尼禄在第二届“五年节（尼禄节）”中纵情高歌；年末，尼禄发觉了一起二三十人的暗杀行动，被称之为“皮索的阴谋”的矛头直指尼禄。除一人外，皮索、拉特拉努斯等皆被处死或自杀谢罪。塞内加被怀疑参与其中，遂自杀身亡。尼禄妻子波比娅离世；梯里达底到达罗马，在罗马广场从尼禄手中接受亚美尼亚王冠。此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半个世纪相安无事			
66	尼禄再次挖出“贝内文托的阴谋”，作为科尔布罗的女婿，维尼奇亚努斯等青年将领，欲谋杀尼禄，拥立科尔布罗当皇帝，然而阴谋败露，这些嫌犯全部被处死；尼禄以歌手的身份，到希腊旅行		犹太发生暴乱，尼禄命韦斯帕芗全权处理	
67		科尔布罗、高地日耳曼军团长与低地日耳曼军团长，三人被尼禄召到希腊，命令他们自杀谢罪		
68	1月，罗马为从希腊返回的尼禄举行了凯旋仪式；在西班牙发起叛乱的加尔巴，被元老院判决为“国家公敌”；罗马公民对于“粮食安全”怨声载道，反尼禄活动声势日大；元老院宣告尼禄为“国家公敌”；罗马近郊的近卫军一致决定拥立加尔巴为“皇帝”；6月9日，尼禄在罗马郊外的藏身之处自杀身亡	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温德克斯率10万人揭竿起义，反抗罗马，遭到鲁弗斯统率的高地日耳曼军队残酷镇压；4月2日，西班牙行省（希斯帕尼亚·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响应温德克斯，加入反对尼禄阵营。奥托（卢西塔尼亚行省）和凯奇纳（贝提卡行省）两位西班牙行省实权人物也表示支持加尔巴。加尔巴又扩编一个军团		（中国）建造了白马寺，并从西域引入佛教经典

参考文献

一、第一手资料（如若能翻译的，则尽可能提供给读者译本）

塔西佗（Tacitus，Publius Cornelius）全部著作：

《编年史》（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1年

《日耳曼·阿格里科拉》，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同时代史》，国原吉之助翻译，筑摩书房，1996年

苏维托尼乌斯（Svetonius Tranquillus，Gaius）：

《生活中的恺撒》《名人》

《罗马皇帝传》（上、下），国原吉之助翻译，岩波文库，1986年

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罗马历史》

塞内加（Seneca，Lucius Annaeus）全部著作：

《关于人生的苦短》外二篇，茂手木元藏翻译，岩波文库，1980年

《论愤怒》外一篇，茂手木元藏翻译，岩波文库，1980年

《道德信函集——伦理信函集》，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

会，1992年

《自然研究——自然现象与道德生活》，茂手木元藏翻译，东海大学出版会，1993年

《悲剧集》1，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2卷，大西英文、小川正广等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悲剧集》2，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4卷，大西英文、木村健治等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老普林尼（Plinius Secundus，Gaius）

《自然历史博物馆》

《老普林尼博物志》，大槻真一郎责任编辑，八坂书房，1994年

斐洛（Philon）

《晋见盖乌斯》（Legatio ad Gaium）又名《遣往盖乌斯（卡利古拉）处的使节》，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5卷，秦刚平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0年

普鲁塔克（Plutarchus）

《平行的生命》

《道德》

《普鲁塔克英雄传》全12卷，河野与一译，岩波文库，1952年

《普鲁塔克英雄传》（上、中、下），村川坚太郎编，筑摩文艺文库，1996年

《回忆录》13，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6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回忆录》14，西洋古典丛书第1期第1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年

《回忆录》6，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3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0年

《回忆录》2，西洋古典丛书第2期第16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

《回忆录》11，西洋古典丛书第3期第4卷，户塚七郎翻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

二、第二手史料——后世学者所著的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

ALEXANDER, W.H., *The Communiqué to the Senate on Agrippina's Death*, 1954.

ANDERSON, J.G.C., *Trajan on the Quinquennium Neroni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JRS）》1, 1911.

ATKINSON, D., *The governors of Britain from Claudius to Diocletian*,《JRS》12,

1922.

AUGUET, R., *Caligula ou le pouvoir à vingt ans*, Paris, 1984.

BAKER, G.P., *Tiberius Caesar*, London, 1929.

BALDWIN, B., *Nero and His Mother's Corpse*, 《Mnemosyne》, 1979.

BALLAND, A., *Nova Urbs and "Neapoli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65.

BALSDON, J.P.V.D., *The Emperor Gaius*, Oxford, 1934; *Roman Women*, London, 1962; *The Romans*, London, 1965; *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1979.

BARBAGALLO, C., *La catastrofe di Nerone*, Catania, 1915.

BARDON, H., *Les empereurs et les lettres latines d'Auguste à Hadrien*, Paris, 1940.

BEAUJEU, J., *L'incendie de Rome et les Chrétiens*, 1960.

BELL, I.H., *Jews and Christians in Egypt*, 1924.

BÉRANGER, J., *Recherches sur l'aspect idéologique du principat*, Basel, 1953.

BIANCHI BANDINELLI, R., *Roma. L'arte romana nel centro del potere*, Milano, 1969.

BOETHIUS, A., *The Neronian "nova urbs,"* 《Corolla Archaeologica》, Lund, 1932;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1960.

BONACASA, N., *Arte Romana: Scultura*, Roma, 1979.

BONNER, S.F.,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77.

BORCH, H.C., *Roman Society: A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Lexington, Mass., 1977.

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22.

BRUNT, P.A., *Stoicism and Principate*,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975; *The revolt of Vindex and the fall of Nero*, 《Latomus》, 1978.

CARCOPINO, J., *Ostie*, Paris, 1929;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1930; *La vie quotidienne à Rome a l'apogée de l'empire*, Paris, 1939; *Aspects mystiques de la Rome païenne*, Paris, 1941.

CARSON, R.A.G., *Coins of Greece and Rome*, London, 1970; *Principal Coins of the Romans I-III*, London, 1978-81.

CARY, M. & SCULLARD, H.H., *A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75.

CASSON, L., *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4.

CHARLESWORTH, M.P., *Pietas and Victoria, the Emperor and the Citizens*, 《JRS》, 1929; *The Virtues of a Roman Emperor: Propaganda and the Creation of*

Belief, London, 1937;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39; *Nero, some aspects*, 《JRS》, 1950.

CIACERI, E., *Le vittime del despotismo in Roma nel I secolo dell'impero*, Catania, 1898; *La congiura pisoniana contro Nerone*, 《Processi politici 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PPRI)》, Roma, 1918; *Claudio e Nerone nelle storie di Plinio*, 《PPRI》, Roma, 1918; *Nerone matricida*, 1941-42; *Tiberio successore di Augusto*, Roma, 1944.

CLARKE, M.L., *The Roman Mind*, London, 1956.

CLEMENTE, G., *Guida alla storia romana*, Milano, 1978.

COARELLI, F., *Guida archeologica di Roma*, Milano, 1974; *Roma*, Bari-Roma, 1983.

COLLINGWOOD, R.G. & MYRES, J.N.L.,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I* , Oxford, 1937.

COLUMBA, G.M., *L'impero romano*, Milano, 1944.

COWELL, F.R., *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61.

CUNLIFFE, B.,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Firenze, 1979.

DE FRANCISCI, P., *Arcana Imperii III-1*, Milano, 1948.

DEMOUGIN, S., *L'ordre équestre sous les Julio-Claudiens*, 1988.

DE REGIBUS, L., *Politica e religione da Augusto a Costantino*, Genova, 1953.

EARL, 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of Rome*, London, 1967.

FABBRINI, L., *Domus Aurea*, 《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 1983.

FABIA, Ph., *Sénèque et Néron*, 1910;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Lyon, 1929.

FERGUSON, J., *The Religions of Roman Empire*, London, 1970.

FERRERO, G., *Le donne dei Cesari*, Milano, 1925.

FRANK, 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33 A.D.,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 Baltimore, 1940.

GARZETTI, A., *Aerarium e fiscus sotto Augusto*, 1953;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Roma, 1960.

GATTI, C., *Gli "equites" e le riforme di Tiberio*, 1953.

GENTILI, B.,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Roma, 1976.

GRANT, M., *Aspects of the Reign of Tiberius*, 1950; *Roman Imperial Money*, London, 1954; *Roman History from Coins*, Cambridge, 1968; *Nero*, 1970; *The Jews and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3; *History of Rome*, Roma, 1981.

GRIFFIN, M.T., *Seneca, 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 1976; *Nero, the end of a dynasty*, 1984.

GRIMAL, P.,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Paris, 1960.

HAMMOND, M., *Corbulo and Nero's Eastern Policy*,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934.

HARDY, E.G., *Claudius and the Primores Galliae: A Reply and a Restatement*, 1914.

HARRIS, H.A., *Sport in Greece and Rome*, Ithaca, 1972.

HAVERFIELD, F. & MacDONALD, G., *Roman Occupation of Britain*, Oxford, 1924.

HEINZ, K., *Das Bild Kaiser Neros bei Seneca, Tacitus, Sueton und Cassius Dio*, Bern, 1948.

HEMSOLL, D., *The architecture of Nero's Golden House*, in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Sculpture in the Roman Empire* (ed. by HENIG, M.), 1990.

HENDERSON, B.W., *The Chronology of the Wars in Armenia A.D.51-63*, 《Classical Review》 15, 1901.

HEUBNER, H., *P. Cornelius Tacitus. Die Historien. Kommentar*, Heidelberg, 1963-82.

HOPKINS, K.,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HUMPHREY, J.H., *Roman Circuses. Arenas for Chariot Racing*, London, 1986.

JOLOWICZ, H.F.,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Cambridge, 1972; *The Roman Economy*, Oxford, 1974.

JOSSA, G., *Giudei, pagani e cristiani*, Napoli, 1977.

KENT, J.P.F., *Roman Coins*, London-New York, 1978.

KNOKE, F., *Die Kriegszüge des Germanicus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22.

KORNEMANN, E., *Tibère*, Paris, 1962.

LANCIANI, R., *Rovine e scavi di Roma antica* (1897), Roma, 1985.

LAVER, P.G., *The Excavation of a Tumulus at Lexden, Colchester*, 《Archaeologia》 76, 1927.

LE GALL, J., *Le Tibre, fleuve de Rome dans l'aniquité*, Paris, 1953.

LEON, H.J., *Ball Playing at Rome*, 1946.

LEVI, M.A., *Nerone e i suoi tempi*, Milano, 1949; *Il tempo di Augusto*, Firenze, 1951.

LUGLI, G., *Roma antica. Il centro monumentale*, Roma, 1946.

LUTTWAK, E.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a, 1977.

MacDONALD, W.L.,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1965.

MAGDELAIN, A., *Auctoritas principis*, Paris, 1947.

MANNI, E., *La leggenda dell'età dell'oro nella politica dei Cesari*, 《Atene e Roma》, 1938.

MARCHESI, C., *Seneca*, Messina, 1920.

MARKUS, R.A.,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4.

MARROU, H.I.,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65.

MARSH, F.B., *The Reign of Tiberius*, Oxford, 1931.

MARTINAZZOLI, F., *Seneca, studio sulla morale ellenica nella esperienza romana*, Firenze, 1945.

MATHIEU, H., *Messaline*, Paris, 1961.

MATTINGLY, H., *The Events of the Last Months of Nero, from the Revolt of Vindex to the Accession of Galba*, 1953; *Roman Impe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1957; *Roman Coins*, London, 1960.

McKAY, A.G., *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 Ithaka, 1975.

MEISE, E.,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Iulisch-Claudischen Dynastie*, München, 1969.

MOMIGLIANO, A., *Aspetti dell'antisemitismo alessandrino in due opere di Filone*, 1930; *Corbulone e la politica Romana verso i Pari*, 《Atti del Ⅱ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udi Romani》, Roma, 1931; *La personalità di Caligola*, 1932; *L'opera dell'imperatore Claudio*, Firenze, 1932; *Literary Chronology of the Neronian Age*, 1944.

NEUMEISTER, C., *Das antike Rom. Ein literarischer Stadtführer*, München, 1991.

NEWBOLD, R.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D.64 fire at Rome*, 《Latomus》, 1974.

NONY, D., *Caligula*, Paris, 1986.

OMODEO, A., *Saggi sul Cristianesimo antico*, Napoli, 1958.

PAOLI, U.E., *Vita romana*, Firenze, 1958.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1928.

PASCAL, C., *Seneca*, Catania, 1906; *Nerone nella storia aneddotica e nella leggenda*, Milano, 1923.

PASSERINI, A., *Le coorti pretorie*, Roma, 1939; *Caligola e Claudio*, Roma, 1941;

Per la storia dell'imperatore Tiberio, Pavia, 1947.

PFLAUM, H.G., *Essai sur 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Paris, 1950.

PHILIPSBORN, A., *L'abandon des esclaves malades au temps de l'empereur Claude et au temps de Justinien*, 1950.

POLACCO, L., *Il volto di Tiberio. Saggio di critica iconografica*, Roma, 1955.

PROFUMO, A., *Le fonti e i tempi dell'incendio neroniano*, Roma, 1905.

PUCCI BEN ZEEV, M., *Cosa pensavano i Romani degli Ebrei?* 1987.

QUIDDE, L., *Caligula, Eine Studie über römische Cäsarenwahnsinn*, Leipzig, 1894.

RABOSSI, M., *La coniazione di Nerone. La riforma dell'oro e dell'argento*, 1953.

RADICH, V., *Political dissidence under Nero: the price of dissimulation*, 1993.

RAMSAY, W.M.,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London, 1890.

REYNOLDS, B.K.P., *The Vigiles of Imperial Rome*, Oxford, 1926.

ROGERS, R.S., *Criminal Trials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under Tiberius*, Middletown, Conn., 1935; *Studies in the Reign of Tiberius*, Baltimore, 1943.

ROMANELLI, P., *Storia delle provincie romane dell'Africa*, Roma, 1959.

ROSTOVTZEFF,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impero romano*, Firenze, 1965.

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onuments, *Roman London*, London, 1928.

SCRAMUZZA, V.M., *The Emperor Claudius*, Cambridge, Mass., 1940.

SEAGER, R., *Tiberius*, London, 1972.

SHERWIN-WHITE, A.N.,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1980.

SILVAGNI, U., *Le donne dei Cesari*, Torino, 1927.

SMALLWOOD, E.M., *Some Notes on the Jews under Tiberius*, 1956;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67;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Leiden, 1976.

SORDI, M., *I primi rapporti fra lo stat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e l'origine delle persecuzioni*, 1957.

SUTHERLAND, C.H.V., *Two "Virtues" of Tiberius, a Numismatic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 Reign*, 1938; *Aerarium and Fiscus during the Early Empire*, 1945; *Coinage in Roman Imperial Policy, 31 B.C.-A.D.68*, London, 1951; *Roman Coins*, London, 1974;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1, 31 B.C.-A.D.69*, London, 1984.

SYDENHAM, E.A., *The Coinage of Nero*, London, 1920.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52; *Tacitus*, Oxford, 1958; *Roman*

Papers, Oxford, 1977; *Domitius Corbulo, Roman Papers II*, 1979.

THORNTON, M.K., *The enigma of Nero's Quinquennium*, 《Historia》, 1973.

TIBILETTI, G., *Principe e magistrati repubblicani*, Roma, 1953.

VAN BERCHEM, D., *Les distributions de blé et d'argent a la plèbe romaine sous l'empire*, Genève, 1939.

VAN OOTEGHEM, J., *Les incendies à Rome*, 1960.

VEYNE, P., *Le Pain et le Cirqu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 pluralisme politique*, Paris, 1976.

WARMINGTON, B.H., *Nero, reality and legend*, 1929.

WATSON, G.,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1969.

WEBER, C.W., *Panem et Circenses. Massenunterhaltung als Politik im antiken Rom*, Düsseldorf-Wien, 1983.

WHEELER, R.E.M., *London in Roman Times*, London, 1930.

WILLRICH, H., *Caligula*, 《Klio》 3, 1903.

WIRSZUBSKI, Ch.,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 Cambridge, 1950.

YAVETZ, Z,. *Plebs and Princeps*, 1969.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Ⅷ

危机与克服

[日] 盐野七生◎著　葛奇蹊◎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这是一段帝国陷入悲痛时期的历史
边民伺机而动，同胞兵刃相向
罗马世界即将崩塌，多名皇帝死于非命

在一连串的考验下，罗马能否浴火重生？
还是陷入混乱的分裂，告别昔日光辉？

8

王石王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日）盐野七生著；葛奇蹊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86–3515–6
I. 罗… II. ① 盐… ② 葛… III. 古罗马－历史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248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Ⅷ : Kiki To Kokufuku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9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葛奇蹊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

[日] 盐野七生 著
葛奇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序
第一章 皇帝加尔巴
第二章 皇帝奥托
第三章 皇帝维特里乌斯
第四章 帝国的边境
第五章 皇帝韦斯帕芗
第六章 皇帝提图斯
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
第八章 皇帝涅尔瓦
附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银币故事

当写到已经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时，我所想到的是，如果中间和下层出了问题，无论上层再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相反，如果中下层还在充分发挥作用，只需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吸收因上层部分的争斗而产生的弊病。尼禄自杀后开始的长达一年的内乱让习惯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塔西佗这些上层知识分子慨叹帝国即将走向终结，但实际上帝国还在充分运转着。

在距离参加内战的军团通行的街道不远的帝国货币铸造所里，没有员工会盗取金银，经皇帝尼禄改革后的优质货币被不断制造出来，运往庞大帝国的各地而不会在途中遭到劫掠。刻有接连更替的皇帝肖像的银币被不断铸造出来，但是在流入市场时该皇帝已经被杀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甚至拥有将悲剧变为喜剧的活力。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最近的演讲中说“危机也是转机”，不知道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的领导者们是否也这样认为，但是从结果来说，尼禄皇帝死后开始的危机确实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转机。

当然，转机不会凭空出现，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将危机化为转机，接下来登场的韦斯帕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从尼禄皇帝到之后内乱期的三个皇帝执政期间，来自首都罗马并且在罗马社会中属于第一阶级——元老院阶级的人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韦斯帕芗虽然来自意大利本土，但并不是出生于罗马，并且他属于第二阶级的“骑士阶级”。罗马人所说的“新贵”（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新鲜血液”）得以进入到既有的领导阶层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罗马帝国内，这直接导致了在下一个时代帝位向行省出身者开放的结果。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可能有的读者要抗议了，为什么完全没有关于封面上介绍的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以及罗马人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塞斯特斯铜币的说明呢？说句实在话，因为暂时没有必要对这些货币进行说明。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都确立的货币制度（虽然在此期间为了满足现代所说的货币供应量，曾一度经历过尼禄的路线修正）是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在200年中一直健全发展的证据所在。这200年间罗马帝国的关键货币一直保持稳定，这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意为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在时代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种货币制度也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个方面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它的建立者是图密善皇帝。但是这个人不仅被同时代的人处以“记录抹杀刑”而名声大损，并且

和提比略皇帝一样，也没能得到后世的史学家们为他平反。笔者在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的过程中，经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名法庭上的辩护律师，这是因为笔者对于世人经常说的“民众的呼声就是神的心声”、“历史的裁决”从心里不敢苟同。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尼禄（54—68）

加尔巴（68—69）

奥托（69）

维特里乌斯（69）

韦斯帕芗（69—79）

提图斯（79—81）

IMP CAESAR DOMITIANVS AVG GERM
TR P VIII IMP XIII CENSOR PERP

图密善（81—96）

涅尔瓦（96—98）
（数字表示在位时间，全部为公元后）

序

本书讲述的是从皇帝尼禄的死开始到图拉真登场为止的不到30年之间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从公元68年夏天到公元97年秋天为止这29年间的历史。在此期间有7人登上了皇位，即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

被誉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史学家的塔西佗就有一部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Historiae，正如英语中的“History”，除了有研究过去的“历史”之意外，还有“值得记录的事情”这层意思。在这个时期度过了自己13岁至42岁近30年人生的塔西佗当时一定也怀有将“同时代人的证词”记录下来的初衷。所以，国原吉之助教授将此书的日语译本题名为“同时代史”，可以说很正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

但是，塔西佗的另一部代表作Annales（《编年史》）更接近于后世的我们所定义的“历史”。因为讲述从提比略的即位到尼禄的死为止的这部著作是以塔西佗出生40年前开始到他15岁之前的时代为对象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时期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最近的过去”。

在讲述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现在”的《同时代史》中，塔西佗本人在开头关于这30年是怎样一个时代进行了概括，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告诉了我们。翻译过来，大致如下：

> 我接下来想讲述的是罗马帝国被埋没在苦恼和悲痛时期的历史。与敌人之间不断发生的残酷战斗、同胞间的不和与反目、行省人民发动的叛乱，就连宗主国的和平也是在流了很多血之后才得以确保的。多达四名皇帝死于非命（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图

密善），罗马市民之间的战斗发生了三回，与行省人民和外敌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但这些只不过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

在帝国的东方展开的战役（指犹太战争）以罗马所期待的良好结果收场，但帝国的西方并没有那么顺利。针对跨越多瑙河入侵的蛮族制定的对策中表现出了苦心焦虑，行省高卢的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发生动摇，虽然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萨尔马提亚人和斯维比人给我们的军团造成巨大损失，达西亚民族甚至在败给罗马后依然声势高涨，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拥立自称是皇帝尼禄的冒牌货，试图挑起反罗马的战争。

除此之外，意大利本土也因接踵而来的灾难而遭殃。坎帕尼亚地区富庶的城镇被淹没（指维苏威火山喷发导致庞贝等城市被掩埋），首都罗马被大火侵袭，古代的神殿被破坏，连卡匹托尔山上的最高神朱庇特神殿也被这些罗马人亲手烧毁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所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话虽如此，在这个罪恶横行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存在品行高洁的人，诸如陪伴被流放的儿子一同前往发配地的母亲、不忍抛弃被流放的丈夫从而放弃了安稳的宗主国生活的妻子、展现出勇气的亲属、没有因为岳父的落魄而与妻子离婚的丈夫、在严刑拷打下依然对主人恪守忠诚的奴隶，被令自杀的人也表现出了不输于古人的豪迈，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在这个时代，天地给予了人们很多预兆和警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明确地告诉人们众神的意志更多的是要对罗马人进行惩罚而不是保障罗马人的安全。

读到这些，想必任谁都会觉得公元1世纪最后30年的罗马帝国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而且塔西佗在讲述他的“最近的过去”的《编年史》中也对提比略至尼禄为止的这一段罗马帝政大加批判。如果他的批判是正确的，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罪恶曾经横行长达82年之久的国家。如果我们重拾散见于塔西佗著作各处的作者的思绪，就会发现将罗马帝国从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是涅尔瓦以及紧随其后的图拉真。

塔西佗的这种历史观决定了后世对罗马帝国的评价。后世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尔库斯·奥勒留称为“五贤帝”，也说明了塔西佗历史观的影响之深远。

这五人确实拥有堪称为“贤帝”的才能。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五人是贤帝，前后的皇帝们都是暴君或昏君？如果是这样，罗马帝国为何没有更快地灭亡呢？五贤帝的统治时间前后共83年，罗马建立帝政直到灭亡却经历了500年的岁月。仅靠80多年的善政绝对无法另外维持400多年。

虽然放弃了征服喀里多尼亚（现在的苏格兰），却没有从不列颠全面撤退，因此“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的表述与事实相反。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塔西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撒谎。倾向于只关注事物的黑暗面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与塔西佗年龄相仿、同时也是塔西佗好友的小普林尼没有像塔西佗那样愤怒绝望，但是这位小普林尼只留下了一些信件，并没有著书立说。

另外，危机总是指的消极现象吗？这种疑问油然而生。首先，人具有一种“将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机看得比其他任何时代的危机都严重”的性

格倾向。并且，纵观罗马的历史，也并非因为万事顺利步向兴旺，之后因诸事不顺而逐渐衰退。罗马是自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在克服几度袭来的危机中逐渐兴盛起来的。

公元前390年，首都罗马一时被凯尔特人占据在当时不也面临过一场危机吗？在那前后让罗马人苦不堪言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又如何？与萨莫奈人之间持续40年的战役又如何？被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入侵而陷入的苦战呢？（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与强国迦太基之间前后持续百年的死战，特别是与名将汉尼拔对阵的长达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这难道不算危机吗？（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击败宿敌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之后，罗马人也并非永久摆脱了危机。

将罗马社会的不公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格拉古兄弟时代，意大利半岛的各部族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罗马的公元前90年的“同盟战争”，以及马略和苏拉彼此肃清对方数千名追随者的10年内乱（参阅第3卷《胜者的迷思》），这当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足以撼动罗马帝国基石的危机。

此外，还有庞培和恺撒之间围绕国家制度展开的战争。结果就在到恺撒获胜为止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之后没多久，以恺撒被暗杀为导火索再次爆发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14年的权力斗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

这些危机的共同点便是它们都是各个时期的罗马人在被迫必须作出是甘愿走向衰退还是克服困难东山再起的选择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和“克服”反复上演，即使在步入五贤帝时代，罗马开始走上衰退期之后一如既往。笔者甚至认为将罗马人的历史改称为“危机与克服

的历史”都不为过。

不过，罗马在迈向兴盛的途中克服危机后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而一旦进入衰退期，危机虽然依旧有望克服，但与进一步的繁荣之间的纽带就会被切断。危机都已经克服了，为什么还不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呢？笔者思考，追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正是找到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关键所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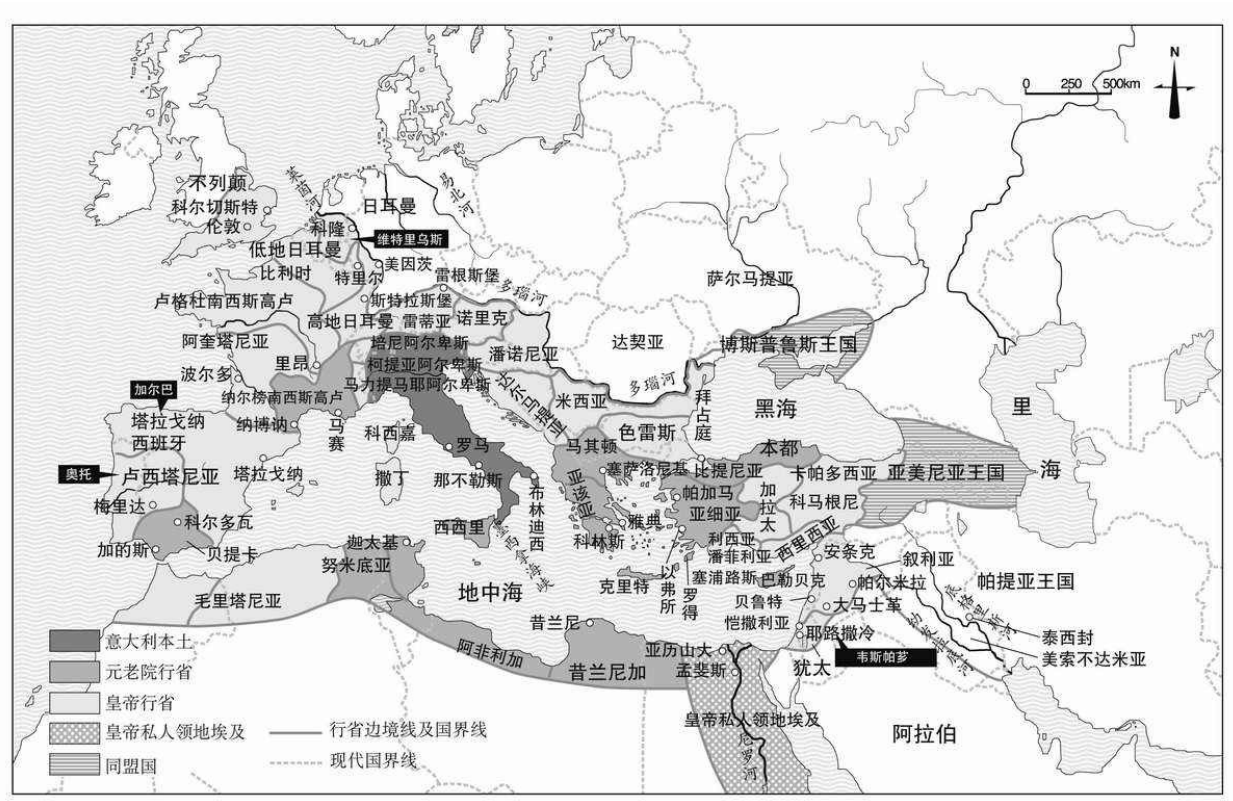
笔者接下来要讲述公元1世纪最后30年间罗马人所直面的危机，有一点是塔西佗不得不同意的，就是在这之后，罗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不过，仅就这个时代最开始的这一年，即公元69年来说，罗马帝国的混乱程度之严重甚至让人觉得塔西佗在写到“这险些成为帝国的最后一年”时所感到的愤怒与绝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使在2000年后的现代，如果政府在一年之内三次垮台的话，就算不是倾向于将所有事情都朝消极黑暗的方向解释的人，也不得不慨叹自己生不逢时！

帝政初期皇帝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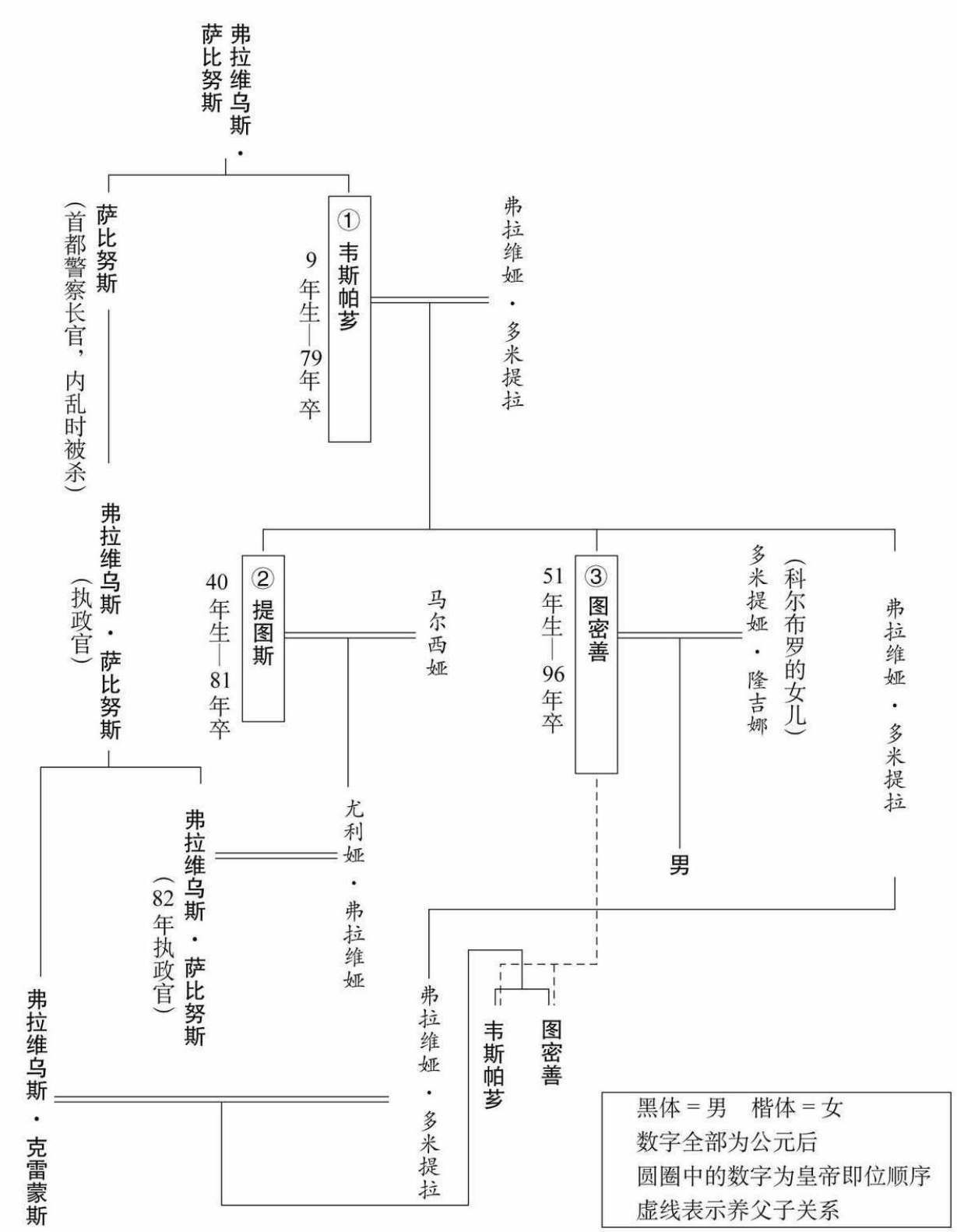
皇帝	生卒年	在位时间
奥古斯都	公元前63—公元14年	公元前31—公元14年
提比略	公元前42—公元37年	公元14—37年
卡利古拉	公元12—41年	公元37—41年
克劳狄乌斯	公元前10—公元54年	公元41—54年
尼禄	公元37—68年	公元54—68年
加尔巴	公元前3—公元69年	公元68—69年
奥托	公元32—69年	公元69年

维特里乌斯	公元15—69年	公元69年
韦斯帕芗	公元9—79年	公元69—79年
提图斯	公元40—81年	公元79—81年
图密善	公元51—96年	公元81—96年
涅尔瓦	公元26—98年	公元96—98年
图拉真	公元53—117年	公元98—117年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68—69年）以及4个皇帝的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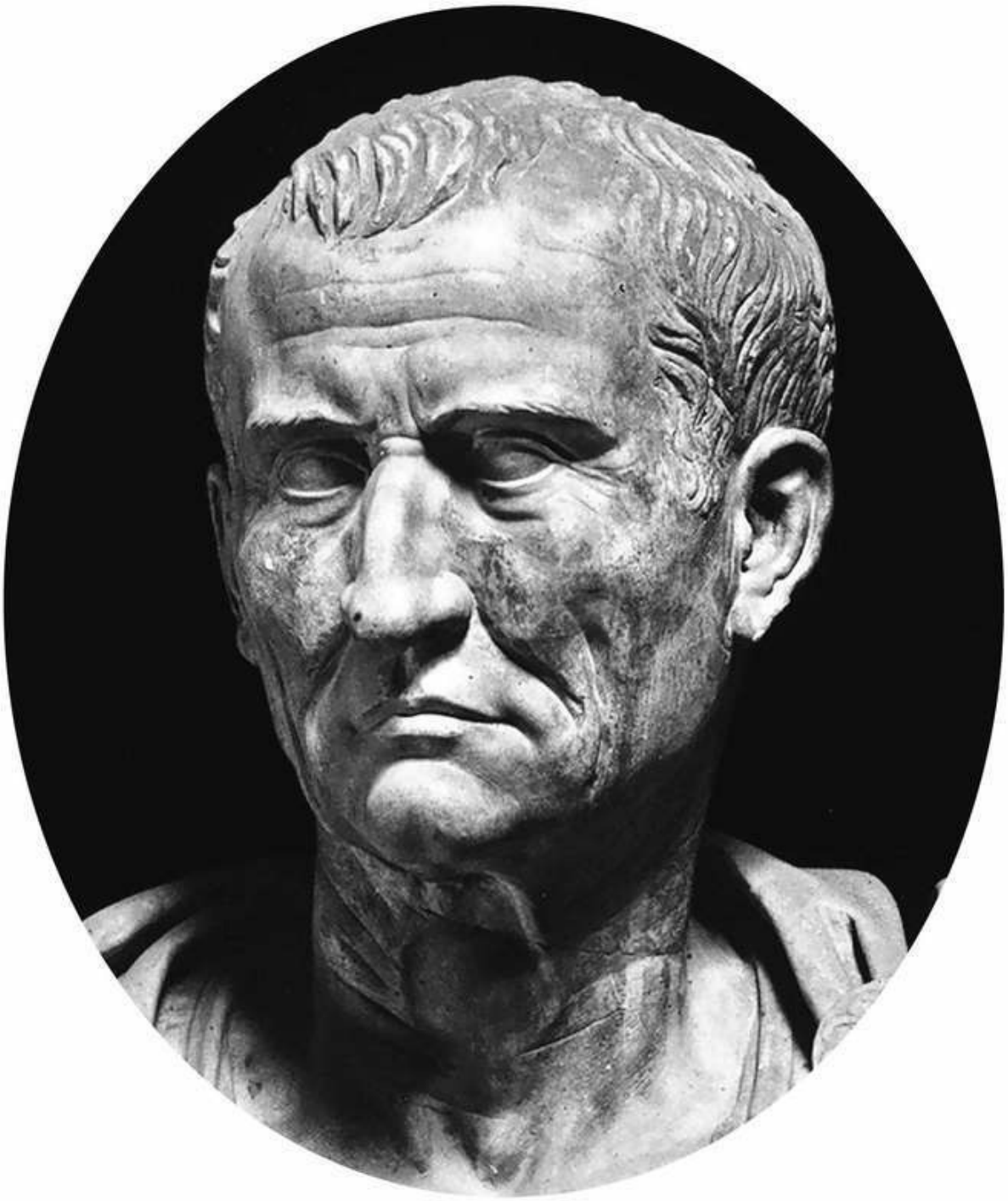
弗拉维王朝谱系图


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
①韦斯帕芗
9年生—79年卒
弗拉维娅·多米提拉
萨比努斯
（首都警察长官，内乱时被杀）
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
（执政官）
②提图斯
40年生—81年卒
马尔西娅
③图密善
51年生—96年卒
（科尔布罗的女儿）
多米提娅·隆吉娜
弗拉维娅·多米提拉
男
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
（82年执政官）
尤利娅·弗拉维娅
弗拉维娅·多米提拉
韦斯帕芗
图密善
弗拉维乌斯·克雷蒙斯
黑体＝男　楷体＝女
数字全部为公元后
圆圈中的数字为皇帝即位顺序
虚线表示养父子关系

第一章

皇帝加尔巴

（68年6月18日—69年1月15日在位）



尼禄的死给罗马人带来的问题

公元68年6月9日，皇帝尼禄驾崩。此前，由驻扎在西班牙的军团推举为皇帝的加尔巴率领军团进军罗马，元老院仅仅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承认加尔巴为“第一公民”，罗马市民也袖手旁观，抛弃了尼禄。穷途末路的尼禄无奈只能自刎身亡，死时年仅30岁。他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信任。既然是否具有“罗马公民权”是获得军团兵或近卫军士兵资格的首要条件，这些人也可谓是堂堂正正的“有权者”了。

但是，虽然成功推翻了尼禄的统治，看起来元老院和市民对事态却没有充分的正确认识。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加尔巴代替尼禄成为皇帝，罗马帝国的统治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延续。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到现代为止，人类想出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甚至共产主义政体，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分离的状态。虽然有很多人梦想过消除这种状态，但那只不过是乌托邦，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经营是不相符的。

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政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离一直延续下来。既然延续是既定事实，被统治者便向统治者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在统治上的“正当性”、“权威”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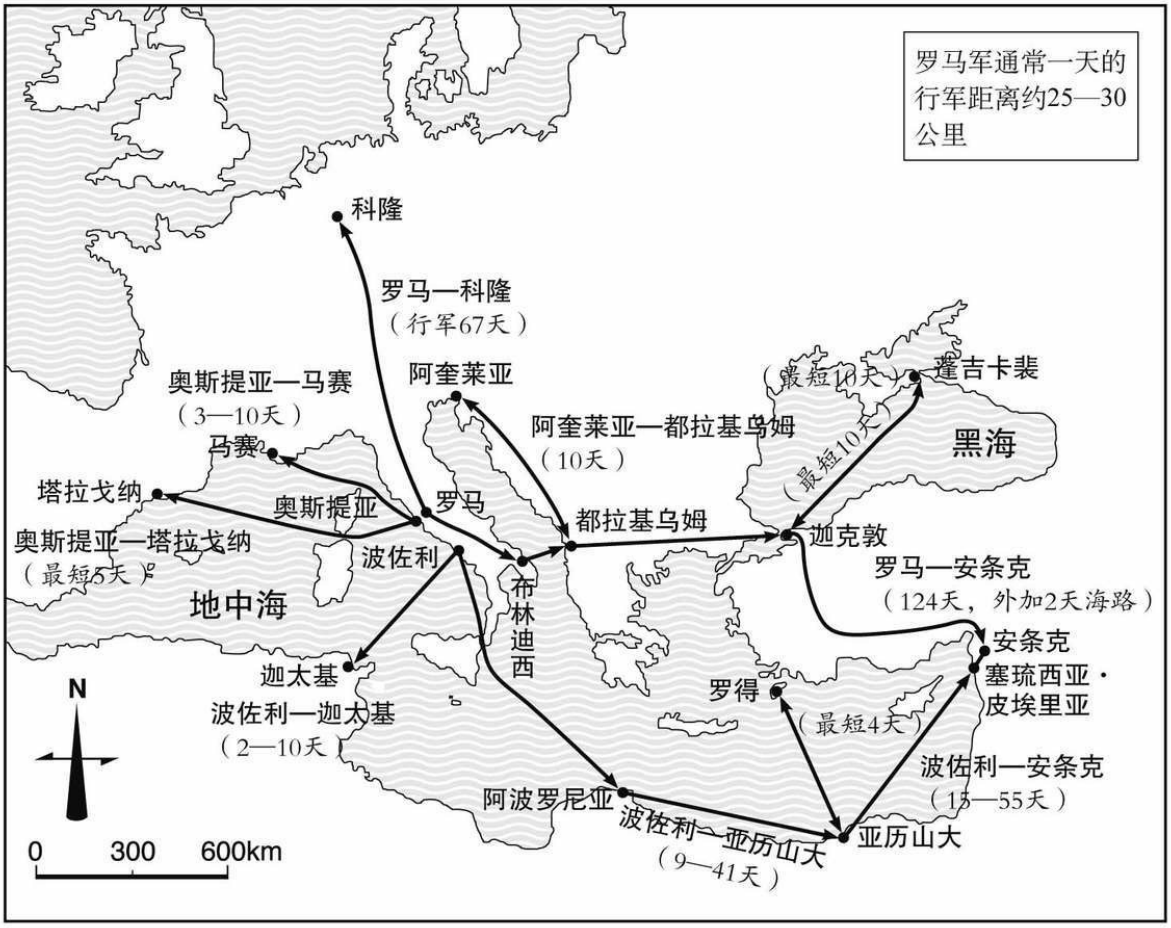
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政中，“正当性”指的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权威”指的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缘继承关系，“力量”指的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大职责——安全和粮食的保障，以及处理帝国经营上的各种事情所需的能力。虽然拥有“权威”，但是被认为缺乏“力量”而失去

了“正当性”的事实决定了尼禄的命运。并且，尼禄之后的皇帝们也被要求必须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在这一点上与尼禄之前的皇帝们没有任何不同。

不仅如此，除“正当性”与“能力”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能够取代奥古斯都“血统”的别的“权威”，所以问题便更复杂了。

首先，自称为帝的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得到并接受军团的推举是在公元68年的初夏，随之马上得知了尼禄自杀的消息。他在此时应该迅速前往罗马，进入帝国的首都罗马，确保自己皇帝的地位。元老院给予了认可，相当于罗马公民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也欢迎加尔巴的登基，因此可以说他具有了“正当性”。和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加尔巴缺少这种“权威”，但说到“力量”，他自身便具备。如果可能的话应尽早入主罗马，展示自己不辱皇位的能力。过去被称为塔拉戈纳行省的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他的任地，从总督官邸所在的塔拉戈（现在的塔拉戈纳）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如果顺风直行只需航行5天。就算担心海路不安全而选择陆路，绕过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到达罗马一个月也足够了。即使是在横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被罗马人称为“海边的阿尔卑斯”的地区道路还没有充分建起的100多年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到达马赛也只用了12天，从马赛到西班牙北部山中的莱利达也只要17天。在罗马道路网络的建设工作有突破性进展的100年后，只要加尔巴有意加快步伐，从塔拉戈纳到罗马只是一次沿干线道路的旅行。



与帝国各地的联络所需要的时间（出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World”）

可是，加尔巴到达罗马的时候已经进入秋季。虽然无法得知准确的到达日期，但可以推测加尔巴在途中空耗了7月、8月、9月三个多月的时间。迟迟没有到达罗马只是因为中途驻足下来欣赏风景，他甚至没有想过利用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的这段时间来对诸多事务作出必要的安排。这意味着在必须为持续长达一个世纪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灭亡这件大事收拾残局的关键时刻，加尔巴却将权力置于真空状态下达三个月之久。

看来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过高估计了元老院早先赋予他的“正当性”，他觉得只要有元老院的承

认，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登上皇位了。并且，他本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得他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接替尼禄担任皇帝的最佳人选，同时他72岁的高龄也让他丧失了应对这种事态时最为急需的果断。

即使在罗马步入帝政时期之后，要想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也必须具备“出身于罗马”而且“属于贵族身份”这两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因为这两个条件在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支持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算与卡利古拉和尼禄一样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安齐奥，或是像克劳狄乌斯一样出生于高卢行省的主要城市里昂，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籍贯”必须是首都罗马。正因如此，最先提出帝政构想的尤里乌斯·恺撒将籍贯为韦莱特里也就是出身于地方的屋大维指定为继任者的同时还收他为养子，主要由于恺撒家是世代久居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

建国800多年来，由于自然衰败和权力斗争两方面的影响，出身罗马的名门贵族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加尔巴家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名门之一。并且，到了帝政时代的罗马，单凭名门贵族的头衔已经不足以让被统治阶级接受他的统治权力了。除了出身名门之外，拥有担当国家要职的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条件。在这个方面，加尔巴也是合格的。在帝政时期“唯才是举”的风气下，罗马也经常会任用出身于地方或行省的人担当总督、司令官，借用史学家塔西佗的话，出身于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并且曾担任行省总督之职的加尔巴就成了人们想到的唯一胜任皇帝的人选。

当初举兵反抗尼禄的高卢总督温德克斯也点名推举加尔巴代替尼禄继任皇帝。因为虽然被委以行省总督的重任，但高卢民族出身的温德克斯应该很清楚，即使起兵反抗，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负责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司令官鲁弗斯在部下对自己说出“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的话后一口拒绝。既然鲁弗斯能够被任命为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可见他是一名很有才能的武将，但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北部的科莫，属于在罗马社会中被视为第二阶级的

骑士阶级。与此二人不同，尼禄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血统，生父阿赫诺巴尔布斯家也是从共和政体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出身于首都的名门贵族。时代虽然在不断变化，但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并没那么容易发生变化。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来看，尼禄死后的罗马人对于满足“首都出生的贵族”和“担任过要职”这两个条件的加尔巴登上皇位没有心怀抵触，或许也是在保证不与过去发生急剧割裂的前提下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在这种状态下能否继承皇位全靠加尔巴个人的“力量”决定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韦斯帕芗是在公元68年夏天的这个时候企图起兵称帝的话，绝对不会成功。此人的出生地虽在意大利本土的范围之内，却是一个地方的小城市——瑞耶提。父亲非但不是元老院的议员，从军团退役后还去瑞士经营过高利贷业。唯一的哥哥在首都罗马担任行政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只是一名有待出人头地的官僚，弟弟韦斯帕芗则选择了军旅生涯。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地方中产阶级家庭。

相反，加尔巴出身于首都罗马的上流阶级，生辰不详，一般认为是出生于公元前3年左右。他在奥古斯都取得和平的罗马度过了性格的形成期，在成长到具有资格就任公职的30岁时得到提比略的提拔，始任高卢阿奎塔尼亚行省长官，后来回到提比略身边担任执政官。公元39年被卡利古拉皇帝任命为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官之一。结束四年任期后回国，等待他的是为征服不列颠而随同克劳狄乌斯皇帝前赴当地的一次旅行。实际上征服不列颠的计划已经由普劳提乌斯和韦斯帕芗等职业军官付诸实施了，名门贵族出身的加尔巴或许更适合担任皇帝随行团的一员。此时加尔巴47岁。之后，被选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赴任，经历了指挥一个军团的一年任期。阿非利加行省分属于元老院行省，因此任期与共和政体时代相同，最多一年。之后返国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元老院议员。到了公元60年，皇帝尼禄将年过六旬的加尔巴任命为皇帝行省之一的西班牙东北行省的总督。从那时开始到尼禄驾崩为止的8年间，加尔巴一直在西班牙任职。

行省总督是统治行省的最高负责人，从经验上来说加尔巴有着在阿非利加行省的1年以及在西班牙东北行省的8年经历，其间加尔巴一次都没有被行省人民控告过。罗马承认行省人民对总督的控告权利，将此作为监督总督统治的手段，因此没有受到过控告也就可以理解为加尔巴的统治达到了让人民满意的程度。实际上，他起兵称帝后曾在西班牙组建起一个军团，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不少西班牙人对加尔巴招募士兵的积极响应。

然而，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的防卫战略上都不是“最前线”。加尔巴受任管辖的塔拉戈纳行省本来安排有3个军团，但在出征不列颠时被调走2个军团后，伊比利亚半岛全境便长期维持只有1个军团驻扎的状态。只在风平浪静的行省进行过统治的加尔巴就任皇帝时没有得到来自最前线的将士们的热烈支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加尔巴需要尽快确保皇帝之位。

但统率着壮观大军的加尔巴在前往罗马时如此不慌不忙，不但没有做此时应该做的事，反而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掌握人心的政策

步入帝政以后的罗马有个惯例，每逢皇帝登基或发生了值得举国欢庆的事件时都要向首都的平民和在行省工作的军团兵们发放赏金。当然一起分享喜悦只是表面原因，掌握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每人每次的赏金金额相当于军团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金额达到这个数目无疑会促进消费。这种收买人心的政策不仅颇受帝政的创始者奥古斯都的推崇，就连始终贯彻财政紧缩政策的提比略也照例效仿。如果以为五贤帝时代不需要采取收买人心的政策可就错了，也不要以为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不曾用钱收买过“有权者”的心。进入4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苦于因经济衰退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可能难以实施这

项措施，但是在发放赏金的政策上，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和信奉异教的皇帝们态度完全一样。德国人卡尔· W. 韦伯（Carl W. Weber）曾在一部研究著作中对历代皇帝发放赏金的情况作过统计。

历代皇帝赏金发放一览（单位：第纳尔银币）

	皇帝	在位时间（年数）	次数	总额（万）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	奥古斯都 提比略 卡利古拉 克劳狄乌斯 尼禄	公元前31—公元14年（44） 14—37年（23） 37—41年（4） 41—54年（13） 54—68年（14）	7 4 2 2 1	13995 5200 3000 3000 2000
	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	68—69年	——	——
弗拉维王朝	韦斯帕芗 提图斯 图密善	69—79年（10） 79—81年（2） 81—96年（15）	1 —— 3	1500 —— 5000
		96—98年（2		

五贤帝时代	涅尔瓦 图拉真 哈德良 安东尼·庇护 马尔库斯·奥勒留	） 98—117年（19） 117—138年（21） 138—161年（23） 161—180年（19）	1 3 7 9 7	1500 13000 19500 16000 25000
	康茂德	180—191年（11）	6	17000
塞维鲁王朝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卡拉卡拉 亚历山大·塞维鲁	193—211年（18） 211—217年（6） 222—235年（13）	6 4 5	22000 8000 12000
	戴克里先 君士坦丁大帝	285—305年（20） 306—337年（31）	? ?	（之后发生通货膨胀） 31000 30000

登上罗马帝国皇位的人认为这是为成就大善而不得已为之的小恶，但却是“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加尔巴却说，士兵不应是依靠金钱买来的，而应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参军，所以没有实行这种政策。诚然他所言不假，但只靠正确的言论是无法施政的。塔西佗仅用下面的一行字便诠

释了加尔巴：

> 与其说他天赋异禀，不如说他只是完全没有邪恶的资质而已，总之他是个平庸的人物。

在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担任接班人对于加尔巴来说担子太重了。

话虽如此，他的失策绝非只有没发放赏金这一项。

副手人选

既然统治仅靠一人之力无法达成，副手的人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被统治阶级一般都通过副手的人选这张“石蕊试纸”来检验统治者的力量。其实加尔巴应该提拔在自己起兵称帝时第一个表明支持态度的行省总督奥托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虽然不像加尔巴那样出身于名门贵族，但同属首都罗马的元老院阶级。也就是说，继承血统优良的尼禄之位的加尔巴如果选奥托坐第二把交椅，民众表示拒绝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二，奥托做了10年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他在此期间的善政甚至在首都罗马都广受好评。

伊比利亚半岛对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来说并非“前线”。但是，行省统治的好坏是整个帝国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是不变的。因为一旦行省人民发动叛乱，就必须将防卫“前线”的一部分兵力调往镇压。只要施政的结果能让被统治阶级相对满意，那么在广大的伊比利亚半岛全境

驻扎6000名士兵足矣。罗马帝国承认行省人民控告行省总督的权利，与其说是出于公正，不如说是为了节约整个帝国的安保费用。

如果当时加尔巴选择奥托做副手，那么结果就是创下长年公正行省统治业绩的两个人坐上帝国统治的第一、第二把交椅。只有加尔巴一人的话，和帝国最前线地区的行省总督比起来会缺少一些“分量”，但若是和奥托联手，这种负面因素就淡化了。毕竟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前线”只包括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

第三个好处在于奥托36岁的年龄。对于自称为帝的加尔巴，奥托比其他行省总督更早地表明了支持态度，单从这一件事来看，奥托虽然心怀野心，但是还没有达到必须立刻实现的程度，他的想法是暂且支持72岁的加尔巴。事实上，奥托随加尔巴一同前往了罗马，公元68年冬天的这个时候正在首都罗马。将奥托选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对于加尔巴来说也意味着可以拉拢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

然而加尔巴在次年，即公元69年，将维尼乌斯选为执政官。此人在加尔巴还是总督时就在其手下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虽然深受加尔巴信赖，但只不过是派驻到一个安全行省的指挥官罢了。他的名字对于守卫帝国“前线”的将士们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仅仅由于这一次人事安排，加尔巴便失去了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原因是：

第一，奥托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第二，驻扎在最前线基地、肩负着帝国防卫任务的将士们大失所望。

第三，本来因为加尔巴的良好出身才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发现他提拔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任第一副手，对加尔巴产生了不安和不

信任的感情。加尔巴超过70岁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不安的因素。

第四，得罪了居住在首都的平民。尼禄在平民们的眼里，不管是留下了好印象还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他起码都是一名像样的皇帝。罗马的市民在要求皇帝尽量做好事的同时，也希望他具备皇帝的风范。加尔巴的所有行为却是消极的老人才会做出来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他没有发放过一次赏金。

这已经不是获选的维尼乌斯个人的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更有甚者，维尼乌斯被选为与皇帝平起平坐的执政官后，便只专注于中饱私囊，这等于加尔巴在人事安排上犯了双重错误。

加尔巴在帝国的财政重建上也犯了错误。到宣布政策实行这个阶段为止的做法倒还差强人意，但落实到具体办法的时候只招来了一片笑声，他居然要求归还尼禄发放的赏金和物品。尼禄虽然热衷于送礼，却并没有讨好有钱有势的人，他更喜欢资助处于罗马社会下层的歌手、演员、骑士和角斗士。并且尼禄的统治时间长达14年，听说要将自己多年前获赠的钱财归还，有谁不会感到困惑呢？即使真的归还了，这种程度的金额能给大帝国罗马的国库增益多少也值得怀疑。加尔巴的财政重建政策最终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谈资而已，他即位三个月以来只干了这些事情。

尽管如此，身在“前线”的司令官们依然正在向加尔巴传来宣誓效忠的消息。之所以用“正在”这个词，是因为在公元68年年末，只有距离首都罗马最近的莱茵河防卫军司令官鲁弗斯的宣誓书送到了加尔巴手里，来自远方的叙利亚和交战中的犹太方面的宣誓书还在沿地中海向西的送达过程中。

身为帝国最前线防卫负责人的这些人向加尔巴宣誓效忠应该不是因为他们认可了加尔巴作为皇帝的能力，毕竟这些人延续了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彻底奉行的实力至上路线。也就是说，不考虑身世和出生地，只要

实力足够就会得到任用，而且这种倾向在看重实力的军事领域尤为明显。同时他们也具备“在元老院中占有议席”这个就任帝国要职时的必要条件。然而，身为“新贵”的他们既非代代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出身，籍贯也不是首都罗马。即使他们有充分的“肩负帝国防卫任务”的使命感，但毕竟都是新进人员，对既有体制的象征——元老院会更尊重一些。加尔巴可是元老院明确表示支持的人。

“前线”的司令官们对加尔巴抱有好感的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对先帝尼禄的失望以及反而因此产生的期待感。史学家蒙森称为“提比略一派”的军官当中诞生了很多军事人才，为帝国的防卫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有名的人是与罗马历史上的头号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缔结了永久友好关系的科尔布罗。尼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单是出于猜疑便赐死了这位受实力派武将推崇的科尔布罗将军，这些武将不可能忘记至今才过去一年的这场冲击。

但是，加尔巴对这些军人投来的好意大泼冷水，他解除了守卫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鲁弗斯的职务，并将其召回了本国。并且，召回本国后并没有让他担任别的什么要职，只是单纯解除职务，命他返回本国而已。

接着任命年事已高且性格消极的弗拉库斯接替鲁弗斯前往任地，大概他是觉得这个弗拉库斯不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另外又任命维特里乌斯担任空缺的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因为加尔巴推测同为元老院阶级出身的维特里乌斯会坚定地支持自己。

但是这次人事安排的结果只招来了士兵们的愤怒。鲁弗斯在士兵当中德高望重，同时在罗马帝国的“前线”中，莱茵河沿岸的前线气候恶劣、地势险峻，而且是与勇猛的日耳曼民族为敌，因此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受重视。尽管也有根据需要临时调遣军团的情况，但是常设七八个军团，集结多达4.2万到4.8万兵力的前线在帝国中仅此一处。被称为“日耳曼军团”或“莱茵河军团”的这些军团属下的士兵们也怀有自己是

最前线卫士的强烈自负。他们一定觉得只在安全和平的西班牙行省任过职的加尔巴没有资格干涉军务。反加尔巴的势头在莱茵河前线而不是别的前线兴起，便是出于以上原因。

公元69年1月1日，首都罗马迎来了两名新任执政官，并召开了当年首次的元老院会议。在古代罗马，1月1日是开始新一年工作的日子，不过当天没有讨论什么议题，只举行了新任执政官的就任仪式。对于与心腹维尼乌斯一起就任执政官的皇帝加尔巴来说一定是心情不错的一天，因为根据罗马的政体，正式就任执政官这个地位最高的公职便意味着加尔巴体制的真正起步，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都在登上皇位时兼任了执政官。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些罗马士兵聚集到位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军团基地，以拒绝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方式明确了反对加尔巴的态度。

维特里乌斯称帝

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信息传达的速度往往会左右事情的进展。

在古代的罗马，有一种白天用狼烟、夜晚用火把在要塞之间依次传递信息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仅限于有敌人入侵这种可以符号化的信息传递，并且只在最前线使用。在广大帝国内传递信息只能依靠人员换乘在帝国的大道上每隔10—15公里设置的驿站（Mutationes）配备的马匹。

这样一来，利用马匹传递信息的速度有多快便成了重要的问题，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准确史料完全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只能通过推测。多位史学家一致认可的只有公元前49年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沿罗马古道北上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时的数据。当时丢弃行李策马疾驰的恺撒一日的行进距离为百罗马里以上，1罗马里约等于1480米，所以相当于日行150

公里左右。要在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式大道上急速奔驰，就算丢弃行李，所有人员都骑马，最高司令官恺撒身后也有包括参谋和日耳曼骑兵护卫在内的数百人跟随。各处驿站不可能为所有人都准备了换乘的马匹，所以150公里的距离肯定是乘同一匹马跑完的。而且，与2000年后的今天不同，当时罗马的大道没有灯光。因此，夜晚无法骑行。另外也不可能连续10天无休止地赶路，这150公里应该是白天的行进距离。

与此相比，公元69年时，为传达拒绝效忠皇帝的重大消息而经由罗马式大道前往罗马的传令兵由于只有数骑，因而得以充分利用了各驿站的换乘马，但同样受限于无法在夜间赶路这个条件。并且，恺撒从罗马乘马前往马赛是在5月，传令兵从现今德国的美因茨南下前往意大利的罗马是在1月，所以必须将穿越严冬的阿尔卑斯山这个绝对的不利因素计算在内。因此一天的行进距离应该和恺撒那时差不多，最多150公里。

距现在的法兰克福西南偏西方向37公里的美因茨在古罗马时代是不能让法兰克福人踏入一步的重要的军团基地，所以从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到罗马的距离在古罗马时代的大道全线数值尚未得到确认的现阶段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不过倒是有史实可以证明从科隆行军到罗马需要67日。罗马军团通常每日行军5小时，时速5公里左右，所以一天的行进距离大概为25—30公里。既然需要67日，粗略计算下来的距离约为1800公里。如果将科隆到美因茨之间的距离算做200公里，减去后变为1600公里，即使一天能行进150公里也需要10天。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猜想，因为美因茨是莱茵河防卫军的最大据点，通往帝国首都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大致区分的话也至少有两条路线，两条路线的共同点是全线都位于罗马式大道即高速公路的干道上。

第一条路线先是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通往位于西南偏西方向的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现在的特里尔），从这座摩泽尔河畔的重要基地沿大道朝正南方向前进至维松提奥（现在的贝桑松），从那里经莱芒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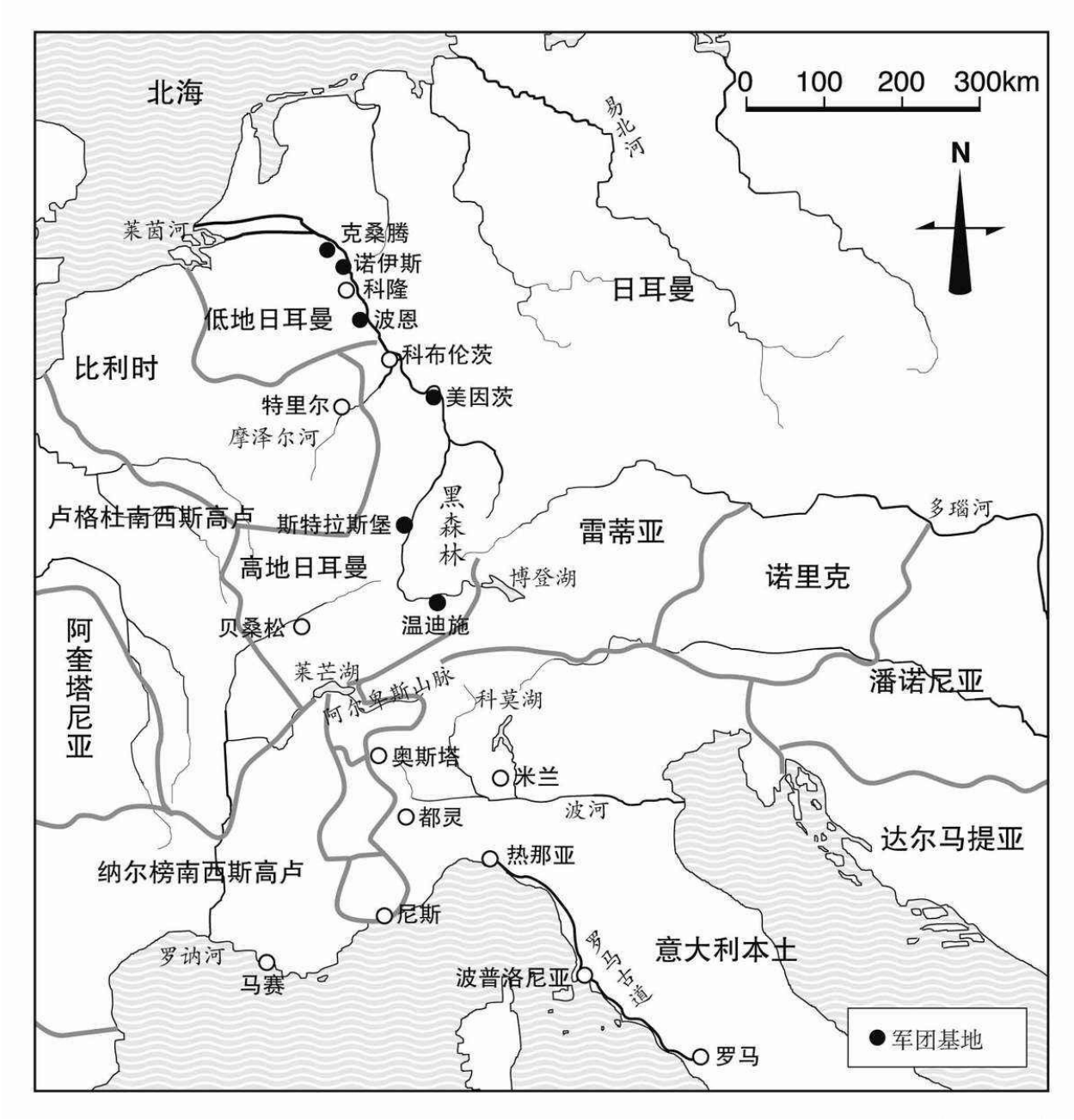
穿越阿尔卑斯山，再经由意大利的奥古斯塔·普拉埃托利亚（现在的奥斯塔）到达奥古斯塔·塔乌里奥鲁姆（现在的都灵）。从都灵到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当然也有道路相通，从热那亚出来后只要沿罗马古道南下就可以到达罗马了。

另一条路线是从美因茨出发沿莱茵河上游前往军团驻扎的基地阿根图拉特（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然后从斯特拉斯堡继续向莱茵河上游前进至博登湖，进入今天的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的科莫湖，再从科莫湖经由米兰至热那亚，最后到达罗马。

从美因茨的军团基地出发的传令兵选择的是哪条路线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军团兵们拒绝效忠皇帝这个重要的消息在1月10日前后传到了首都，因为从这时开始到15日为止的数日期间，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半年前只有驻扎在帝国后方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军团对当时的皇帝尼禄说“不”，而如今在公认为帝国最前线的莱茵河负责防卫的七个军团对现任皇帝加尔巴说了“不”。而且，遭到不信任的不单只有加尔巴一人，支持加尔巴的元老院也同样遭到军团兵这个有权者集团的不信任。

1月1日，正在美因茨过冬的军团兵们通过了拒绝宣誓效忠加尔巴的决议，不仅如此，在写给首都罗马的拒绝信中，军团兵们还全权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第一公民”（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人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遭到不信任的是加尔巴，而非元老院。



从莱茵河沿岸到意大利

然而，集会结束后返回的士兵们应该也在各自的营寨中继续讨论对策。对于身为罗马士兵的他们来说，拒绝向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效忠的行为在现代相当于犯下了严重违反军纪的错误，足以移交军事法庭处理。不难想象士兵们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处于何等亢奋

的状态，而亢奋状态往往会夹杂着不安。

次日，再次聚集起来的军团兵们没有改变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加尔巴的态度，但撤回了委托元老院来确定接替加尔巴人选的要求，决定拥立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继任，传令兵也立刻携带决议书出发前往首都罗马。

为什么排斥加尔巴而拥戴了维特里乌斯呢？关于这个问题塔西佗没作解释，所以也只能凭想象猜测，大概可以列出几个理由：

第一，加尔巴指挥下的西班牙一个军团的士兵当年同样曾排斥最高司令官尼禄皇帝而拥立了加尔巴，但当时是忧国忧民的高卢人温德克斯率先起兵反抗尼禄，加尔巴对此积极响应之后军团兵们才表明了态度。也就是说，驻扎在西班牙的士兵们对皇帝尼禄的不信任是直属上司加尔巴主导的结果。

与此不同，莱茵河畔的军团兵们拒绝效忠是普通士兵们自己发挥主导权的结果，司令官、军团长和大队长都没有积极参与。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士军衔的百人队队长似乎也只是顺从了普通士兵的意愿，普通士兵们可能因此更为不安。消除这种不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搬出自己的司令官。这样一来，从司令官到士兵的全体人员都成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的共犯。

如果他们的司令官是鲁弗斯的话，想必他们会从心里拥戴这位武将。但是鲁弗斯被加尔巴解除职务并召回了本国。加尔巴给予鲁弗斯的这种待遇大概也是招致士兵们反感的一个原因。

之前曾多次介绍过，在帝国的最前线莱茵河担任防卫任务的“日耳曼军团”分为莱茵河的上游和下游两个地区。守卫上游的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守卫下游的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的规模都是4个军团。

在公元69年1月的时候，加尔巴任命弗拉库斯担任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担任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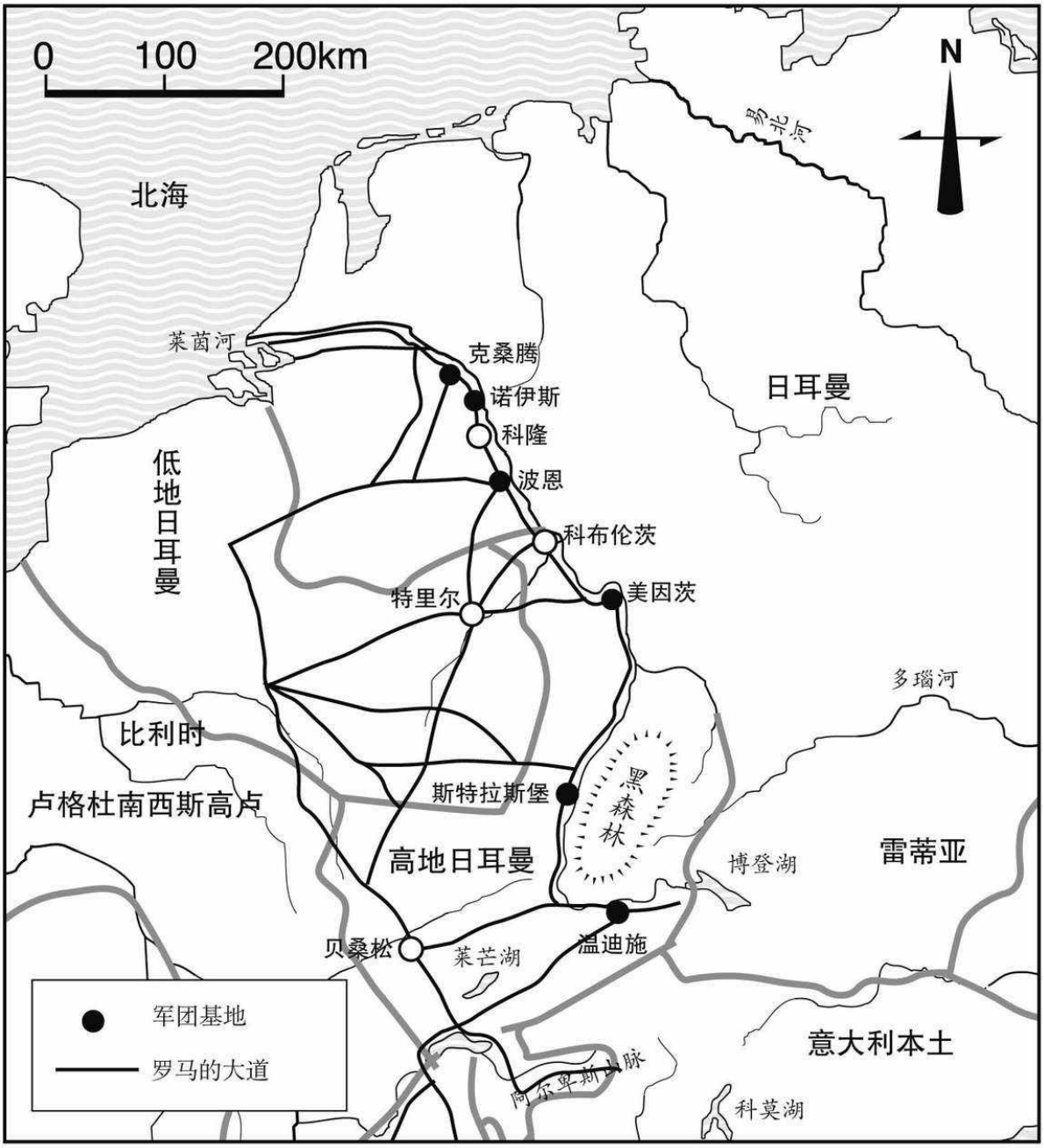
年老、消极且不得人心的弗拉库斯在士兵们的眼里很不称职，这样就只能指望维特里乌斯了。可是士兵们对维特里乌斯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年54岁，上任没多久，还毫无建树，也不存在什么负面影响。不过，维特里乌斯的父亲曾在提比略手下崭露头角，也是皇帝克劳狄乌斯所倚仗的得力帮手，士兵们一定会单纯地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管怎样，他们觉得既然在南国西班牙享受和平军营生活的士兵都有决定罗马皇帝的权力，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把守最前线的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推举出来的人物是不是维特里乌斯都不要紧。然而，维特里乌斯却不假思索地轻易接受了推举，罗马人已经忘却了的近百年的内战再次让帝国的上空笼罩起一片乌云。

加尔巴遇害

据笔者推测，日耳曼军团在美因茨达成的反加尔巴决议在1月1日至1月2日之间出现了急剧的升级，这个消息传到首都罗马至少经历了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差，因为不知为何，得到消息的加尔巴作出的对策只考虑到了1月1日的决议。

1月1日达成的决议是拒绝效忠皇帝加尔巴，但也包括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皇帝人选的内容，当时加尔巴肯定是想再次确认元老院的支持。元老院这个既得权益者，因此会本能地避免内乱。在最高权力者继承不明确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内乱。由于加尔巴本人没有子嗣，所以公开宣布将年龄刚过30岁的皮索收为养子，并确定为继承人。皮索同加尔巴一样是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名门贵族出身，包括哲学家塞内加也牵连在内的“皮索的阴谋”败露后曾与同族的人一起被流放，前不久尼禄死后才得以回国。这次人事安排不仅没有顾及在前线驻守的军团兵们

的感受，反而很明显是为了博得偏向名门贵族、讨厌尼禄的元老院的好感。驻守前线的士兵们对于这位既没有奥古斯都血统、也完全没有军团经验的上流阶级出身的“少爷”不可能举双手赞成。



莱茵河军团的配置和主要道路网络

如果1月1日和2日的两个决议在当时同时到达罗马的话，加尔巴的继承者人选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维特里乌斯称帝意味着拥立他的日耳曼军团会发动反皇帝、反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

办法是将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寄予厚望的人物一并推举为皇帝，比如行省统治经验丰富且年龄适中的奥托，或者是在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当中有较高威望的鲁弗斯等人。本来，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也并不是因为钟情于维特里乌斯才推举他为皇帝的。只要驻守前线的士兵们愿意接受更合适的人选并放下武器，自认为皇位唾手可得的维特里乌斯的立足点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就算加尔巴同时得知军团兵们的两个决议，他在人事安排上应该也不会作出什么改变。资质平庸的人在本能上都会避开资质比自己优秀的人，平庸的人也不会想到吸纳有着自己不具备的才能和资质的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然，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也就称不上平庸了。

总之，加尔巴再一次在人事上失败了，不过这次的人事失败可是让迄今为止一直支持加尔巴的奥托超越了忍耐的限度。

不仅加尔巴，连元老院也得知了日耳曼军团士兵们的决议，同为元老院议员的奥托也必定知道了。本以为72岁的加尔巴命不长久，谁知他指定的皮索只有30岁，此外举兵反抗加尔巴的维特里乌斯54岁。即将37岁的奥托觉得错失这次机会的话自己就永难翻身了，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

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在这半年中对加尔巴大失所望，因此充满活力、性格积极开放而受士兵们欢迎的奥托很容易就笼络了他们。听到拥立维特里乌斯的消息而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的元老院大可忽略不计。普通市民对于当初加尔巴入主首都时的欢迎态度一转而变，如今甚至可以听到缅怀尼禄的呼声。刺杀皇帝的政变计划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成形并即将付诸实施。

公元69年1月15日，在罗马的中心——古罗马广场，皇帝加尔巴被人从乘坐的轿子里拖出来杀死了。按照计划，与加尔巴一起刚刚在两周前就任执政官的维尼乌斯也将被杀死。可怜的皮索由于是加尔巴的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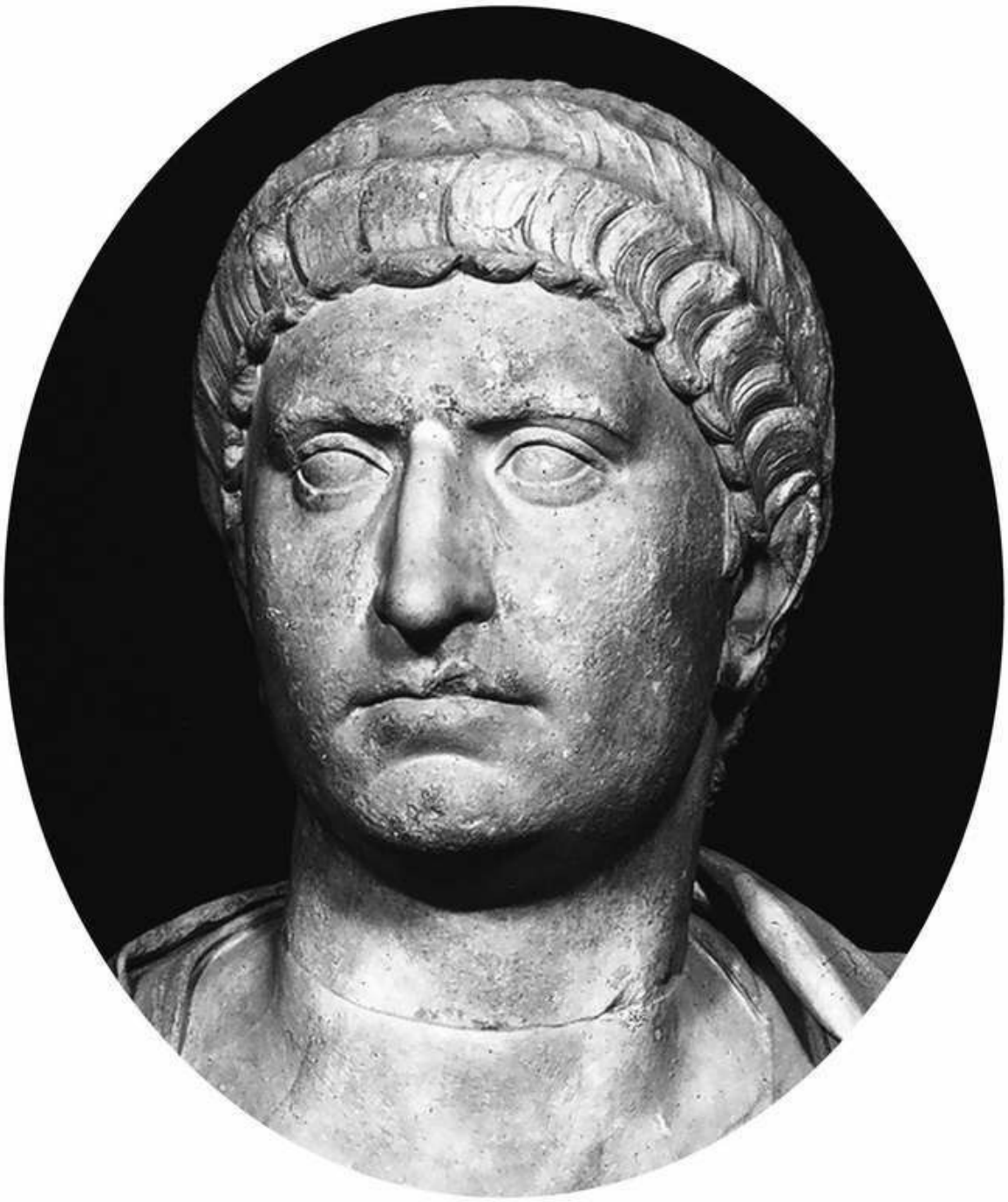
子，同样未能幸免于难。

在首都罗马郊外的近卫军团兵营中等待报告的奥托在得知结果后马上听到近卫军团士兵对自己高呼“皇帝”，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内，元老院议员们能够做的只有追认既成事实了，因此只能承认了他“第一公民”的身份。

第二章

皇帝奥托

（69年1月15日—69年4月15日在位）



帝国最高权力者的交替在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信息传达速度依然是让事态比预期更为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消息从美因茨传到罗马需要10天的话，从罗马返回美因茨也必定需要10天。身在美因茨的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得知奥托接替加尔巴登基的消息应该是临近一月末的时候。这是有可能左右反抗加尔巴的最强大主力军日耳曼军团动向的大事件，所以奥托一定加快了传达消息的速度。

但是，日耳曼军团早在1月2日就决定拥立维特里乌斯，而军团兵们到了1月末才得知促使他们作出此等重大决议的主要原因——加尔巴被推翻的消息，其间相隔了近1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日耳曼军团已经开始准备全体向罗马进军，这是一次包括超过7个军团4万兵力的军团兵以及与此数量几乎相当的辅助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队一旦开动起来，就很难阻止住了。上任不久就被还没混熟的士兵们拥立为皇帝从而得意忘形的维特里乌斯眼中只有皇帝之位，结果只能由新皇帝奥托来消除死去的加尔巴埋下的隐患。

说句题外话，共和政体和帝政时期的罗马对于派遣到前线的司令官、驻守在行省的总督以及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地方自治体和退役士兵移居的殖民城市都赋予了比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宽大的自由裁判权，这种做法得到马基雅弗利的高度称赞。为何这会成为罗马的传统，笔者认为理由不仅仅是马基雅弗利所赞赏的责任体制的明确化。诚然，没有必要在所有事情上都一一请示中央政府，前线司令官的行动被赋予了更高的自由度，他们可以随机应变地展开行动，每个人的才能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另外，就像提比略皇帝坚持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体制的确立，广大帝国的统治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但是，罗马人应该是在考虑了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的信息

传达速度的基础上才给予了各地大范围的自由裁判权。毕竟在欧洲内部的传达就要花费10天，如果要与帝国东方的中近东进行联络则要用掉整整一个月。总之从结果上来看，这种做法明确了帝国各地的个别责任体制，各责任人的行动也因此可以充满活力地展开。

话题回到公元69年1月，像这个月一样，古代罗马的信息传达速度迟缓造成事态扩大的例子此外一定还有不少，笔者甚至想到了“擦肩而过”这个词。要想避免擦肩而过带来的危害，只有慎重行动这一个办法。

帝国中仅次于莱茵河防线的重要前线是多瑙河一带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和正在巴勒斯坦地区参加犹太战争的韦斯帕芗是这条“东方前线”的负责人。前者指挥4个军团，后者麾下则有3个军团。

罗马军团的配置（括号内为细分）

公元 方面		公元前30—公元9年 *1	公元9—42年 *2	公元43—47年 *3	公元48—68年 *4	公元69年 *5
	不列颠	——	——	4	2	3
	伊比利亚半岛	4	3	3	1	2
	莱茵河防线 （低地日耳曼）	7 （5） （2）	8 （4） （4）	7 （4） （3）	7 （4） （3）	7 （4） （3）

西方	（高地日耳曼）					
	多瑙河防线（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米西亚）	8（5）（3）	7	6	7（2）（2）（3）	7（2）（2）（3）
东方	叙利亚	4	4	4	4	4
	犹太	——	——	——	3	3
	埃及	5	2	2	2	2
	北非		1	1	1	1
合计		28	25	27	27	29

说明：*1. 奥古斯都时代（试图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时代）
*2. 提比略、卡利古拉时代（放弃征服日耳曼，将莱茵河定为前线的时代）
*3. 克劳狄乌斯时代（征服不列颠的时代）
*4. 克劳狄乌斯、尼禄时代
*5. 内乱期

前面已经提到，此二人向最高司令官皇帝加尔巴效忠的宣誓书正在沿地中海向西送达的过程中，毕竟那个时代的传递速度过于缓慢。携带宣誓书向西航行的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在希腊的科林斯靠岸时收到的情报是加尔巴死亡、奥托登基、维特里乌斯起兵，看起来提图斯是同时得知这三个消息的。

30岁的提图斯似乎陷入了短暂的困惑，应该就这样继续前往罗马，向登上皇位的奥托传达叙利亚和犹太的7个军团向新皇帝效忠的意思，抑或是让使者携带效忠的宣誓书送到奥托手里，自己返回东方？他不知如何抉择。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不是单纯的“使节”，他本人向奥托宣誓效忠便意味着整个“东方军团”会积极支持奥托。但如果只是委托使者前去，就等于是因为元老院认可，“东方军团”才跟着“消极地支持”。

结果，提图斯选择了不再前往西方，而是返回了东方。这个决定将父亲韦斯帕芗从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斗中解救了出来。

既然决定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军团手中，那么就需要重新统计一下各军团的配置，当中也一并列出了公元69年以前的各时代的推移情况。通过此表可以发现步入帝国时代以后“前线”的变化过程，以及罗马帝国是如何重视对军事力量的有效利用并努力避免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内乱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会造成国力浪费的事实。

奥托其人

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M. Salvius Otho）与加尔巴这种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世家出身不同，属于新兴的元老院阶级。直到祖父那一代之前都属于罗马社会中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祖父能成为元老院议员是因为奥古斯都的提拔。他的儿子，也就是奥托的父亲，是“提比略一派”的成员，担任过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等很多要职，当然也是元老院议员。由继承提比略实力主义的克劳狄乌斯皇帝赐予了跻身贵族的荣誉。

出身于首都罗马上流家庭的奥托少年时就活泼好动，不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类型，但正因如此，与小自己5岁的尼禄脾气相投，做

了皇帝的尼禄每晚逛街时他必定是随行人员之一。但尼禄偏偏迷上了这位挚友的妻子波比娅，他仿效当初24岁的奥古斯都爱上人妻莉薇娅时和莉薇娅的丈夫直接谈判令其将妻子相让的做法，也向奥托要求把波比娅让给自己。但是，莉薇娅的丈夫也就是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同意相让，与此相对，奥托却断然拒绝了皇帝的要求。22岁的尼禄并未善罢甘休，他决定任命奥托为帝国西边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想将其打发走。27岁的奥托还不是元老院议员，卢西塔尼亚行省属元老院行省，所以总督只能由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的元老院议员担任。对波比娅的恋情已经欲罢不能的尼禄便请求元老院给予奥托“前法务官”的资格，成功地将他调派至远方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担任总督。

当时的罗马帝国全境一片太平，到不属于最前线的卢西塔尼亚这种地方赴任，总督通常会带着妻子同行，但是波比娅·莎宾娜却留在了首都罗马。年仅27岁却被派遣到帝国西方的边境，考虑到奥托当时的年龄，这无异于被判处了无期的流放之刑。即使因此自暴自弃，在并非“前线”的任地玩忽职守，放荡不羁地眺望着大西洋度过自甘堕落的每一天，也许他得到的同情依然会多于非难。但是奥托足以让以前了解他的人们惊叹不已的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

首都罗马的花花公子摇身变为了充满活力、大公无私的行政官。卢西塔尼亚的行省总督官邸位于艾梅里塔·奥古斯塔（现在的梅里达），让退役士兵移居至此来建立行省统治的“核心”是帝国的一贯方针。梅里达也是扼守伊比利亚半岛要地的“核心”，与从北到南的恺撒·奥古斯塔（现在的萨拉戈萨）、塔拉戈（现在的塔拉戈纳）、托莱图姆（现在的托莱多）、科尔多巴（现在的科尔多瓦）、卡塔戈诺瓦（现在的卡塔赫纳）、西斯帕里斯（现在的塞维利亚）、马拉卡（现在的马拉加）一样，是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式道路网络的“要地”之一。沿向西的道路前进的话，就可以到达奥利斯普（现在的里斯本）。

与皇帝行省不同，元老院行省不会在非“前线”的地方驻扎军团，在

边境卢西塔尼亚，总督指挥下的军事力量也只有一个中队的程度。在罗马军中被称为“百人队”的80人组成的队伍由百人队队长直接担任指挥，高卢的主要行省“卢格杜南西斯高卢（里昂行省）”也只有一个大队的1000名士兵驻扎。帝国整体的防卫战略是必须向“前线”投入兵力，所以没有余力向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和平行省调派军事力量。

在卢西塔尼亚行省服役的军团兵中几乎没有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人。罗马公民权是世袭的，服役期满从军团退伍的士兵们会在当地获得土地作为退役金，移居后一般会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其间生下的孩子、孙子、曾孙都拥有罗马公民身份，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是成为军团兵的必要条件。帮助奥托维持卢西塔尼亚秩序的也是出生在西班牙的罗马人，安排相同人数的辅助兵来协助这支不足百人的军团部队的体制也与驻扎前线的军团相同。辅助兵在退役后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但是在服役期间不属于罗马公民。如果行省人民当中出现反对罗马的动向，负责保护成为众矢之的的总督的军团兵可能会由于与当地的渊源太深而站在当地人一方。换个方式来想，这相当于一名降落伞兵在敌人阵地中着陆一样。行省总督努力施行善政，除了因为害怕在卸任回国后被行省人民告上法庭之外，也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惹恼行省人民。

不管动机是什么，年轻总督奥托的行省统治非常成功。这并不是他一味地讨行省人民欢心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从始至终贯彻罗马式的统治方法，即视察行省的各个角落，下达必要的指示，并确保付诸实行，所以在首都罗马也受到了好评。花花公子的摇身一变甚至在女人们当中都成了热点话题。

在这10年间，奥托得知自己过去的妻子波比娅公然做了皇帝的情人，并最终举行了正式的婚礼，奥托却一直孑然一身。在西班牙住了6年之后，应该也听说了波比娅的死讯，但是尼禄并不打算让奥托回国。又过了三年，里昂行省总督温德克斯率先点燃反对尼禄的导火索，塔拉

戈纳行省总督加尔巴也跟着呼应起兵，先于其他所有行省表明支持加尔巴的便是统治卢西塔尼亚行省即将10年的奥托。尼禄被三名行省总督倒戈，元老院对此置之不管，近卫军团也见死不救，尼禄无奈在公元68年6月自刎身亡。7个月后，杀死加尔巴的奥托继任了帝位。

不少历史学家评价说，如果奥托不是出生乱世而是出生在一个和平时代的话，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统治者。然而，奥托的不幸却是在作为皇帝进行施政之前，首先必须专注于制定对策来对付已经开始南下的“日耳曼军团”。

说句实在话，奥托手上完全没有可供调遣的兵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没有用金钱收买的情况下成功召集了自己离开10年之间变得有些生疏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如果不是对奥托心悦诚服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犯下暗杀现任皇帝的滔天大罪呢？但是，对于犯下重罪后群情激昂的士兵们要求将加尔巴一派的元老院议员赶尽杀绝的主张，奥托断然拒绝。他还把加尔巴的遗体交还给家属，并确保火化和下葬顺利进行。同为先帝，但加尔巴的遗骨没有像尼禄那样享受到入葬奥古斯都陵的待遇，而是被埋在了加尔巴位于郊外的别墅庭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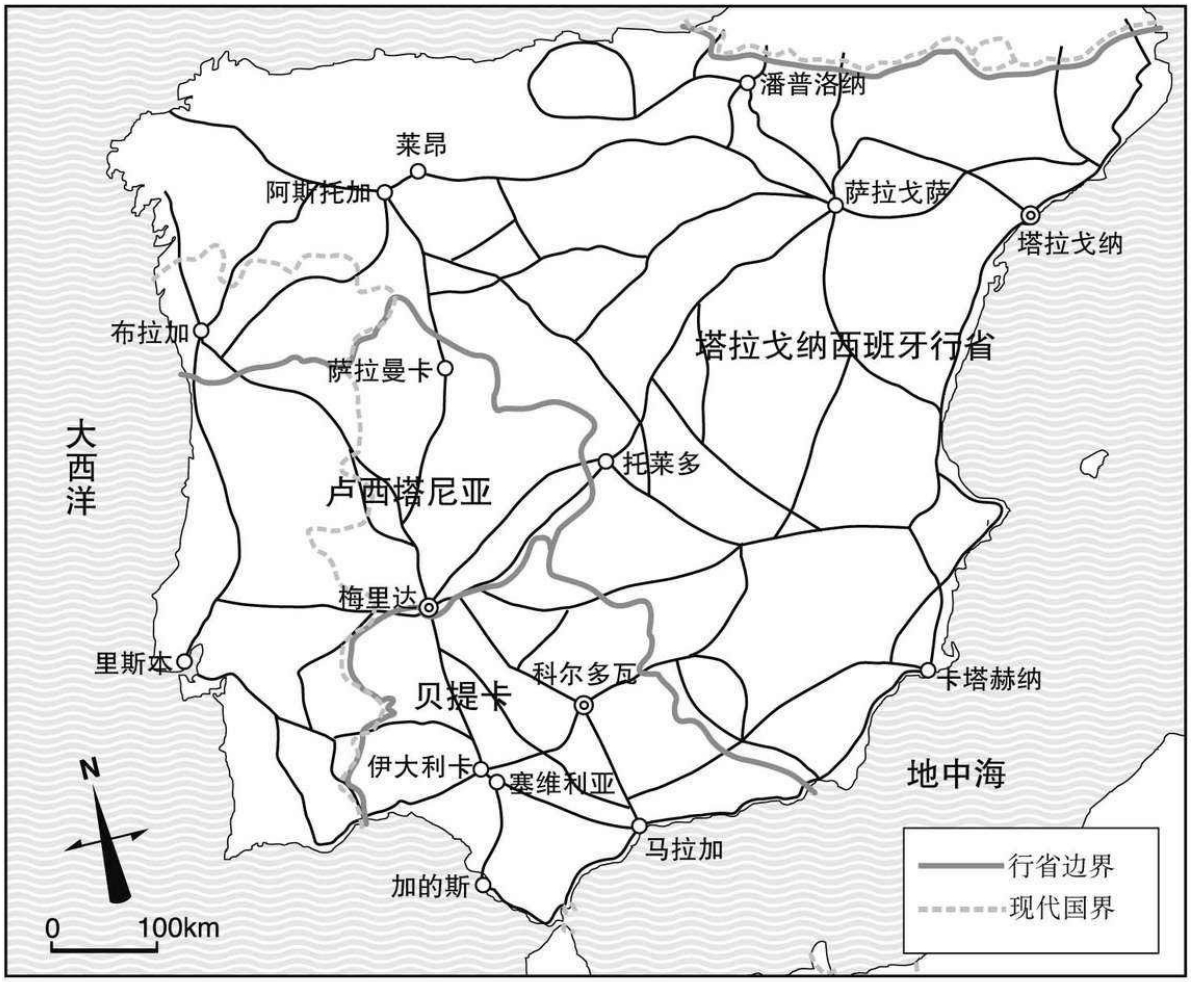
奥托虽然很巧妙地抓住了士兵们的心理，但兴兵南下的日耳曼军团的总人数毕竟近乎10万。奥托首先试图阻止日耳曼军团的南下行动，他向维特里乌斯提出共享皇帝之位的建议。但是被意想不到地推举为皇帝且得到最强的“日耳曼军团”支持的维特里乌斯，只想着借这股力量就任罗马皇帝之位，断然拒绝了奥托的请求。罗马人彼此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内战已不可避免，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严冬季节成了奥托的救星。让大军在二三月之间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是所有指挥官都力图避免的难题。正因为成功克服了这个困难，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军才不仅让当时的人惊愕不已，还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但是，从那个时代起的300年后，出于确保与阿尔卑斯以北的高卢之间联络线路的需要，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道路修建也有明显的进

展。全线铺装完毕自不必说，每隔8—24公里，也就是平均16公里的沿线都建造了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所需的各种设施。即使是个人旅行，在严冬时节也只需10日就能跨越。

但是，分兵两路南下的“日耳曼军团”每一路都有数万大军，按常识来说应该等待春天到来，但维特里乌斯急于行军，日耳曼军团的将士们也受到前往罗马这个念头的鼓舞，所以根本顾不得漫天纷飞的大雪，开始了直指南方的行军。

这样看来似乎奥托陷入了穷途末路，不过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因为防卫多瑙河的七个军团明确表示支持奥托，并且这不是“东方军团”那种消极的支持，而是积极的支持，甚至强硬到为了确保奥托的皇帝之位，不惜与“莱茵河军团”发生武装冲突。



西班牙行省的主要道路网络（其中一部分包括五贤帝时代的道路）

“莱茵河军团”对“多瑙河军团”

负责防卫多瑙河的“多瑙河军团”为何选择了支持奥托而不是维特里乌斯呢？

笔者认为并非由于他们认可奥托在卢西塔尼亚行省的统治业绩而断定奥托比维特里乌斯更胜任皇帝之位。偏远地区的总督只要立下赫赫战功，就可以成为士兵们的话题焦点，但一般的士兵不会关注行政方面的

业绩。并且奥托被派遣到卢西塔尼亚之前只是皇帝尼禄的玩伴而已，根本没有在“前线”军团作战的经验。防卫“前线”的士兵们最多不过是在他从背后刺杀了加尔巴继承帝位之后才知道奥托这个名字而已。

据笔者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表明支持新皇帝奥托的态度是因为在防卫多瑙河的士兵心中本来就对“莱茵河军团”有反感。

自尤里乌斯·恺撒称霸高卢全境以来，“帝国的‘北方前线’——莱茵河”的观念成为罗马人的常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奥古斯都企图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地区的想法最后只是一场南柯之梦，提比略巧妙地撤退后，北方前线便固定为了莱茵河，就这样一直过了半个世纪。

但是，尤里乌斯·恺撒的先见之明无人能及，他早就看出，对于罗马来说“北方前线”不只是莱茵河，还应包括多瑙河。然而，当时向多瑙河以南的征服计划却因为恺撒的遇害而搁置了下来。

既然能想到将易北河为止的区域划入帝国版图从而来缩短北方前线，那么奥古斯都应该也充分认识到了多瑙河前线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的时代以及继承他的提比略直至尼禄为止的时代，罗马都没有出现恺撒这样在短时间内实现霸业的军事天才。缺少的不是优秀的武将，而是天才。而且，与日耳曼民族多次大举入侵时的莱茵河流域不同，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的时代，多瑙河流域的蛮族还没有成为足以让罗马人提心吊胆的威胁。从结果来看，征服多瑙河的计划以平稳的速度进行，至于将多瑙河确立为帝国前线的事业，说得好听些，也只是“平稳而切实地”进行着。

关于这期间的情况，只要看看负责莱茵河前线和多瑙河前线防卫任务的军团基地在这个时期的设置地点就可以了解。莱茵河前线方面几乎所有基地都设置在了莱茵河沿岸，相反，多瑙河前线方面在这个时期的基地还设置在距多瑙河较远的内陆地区。多瑙河流域的雷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城市的前身都是罗马的军团基地，不过罗

马在这些地区建立常设军团基地是后来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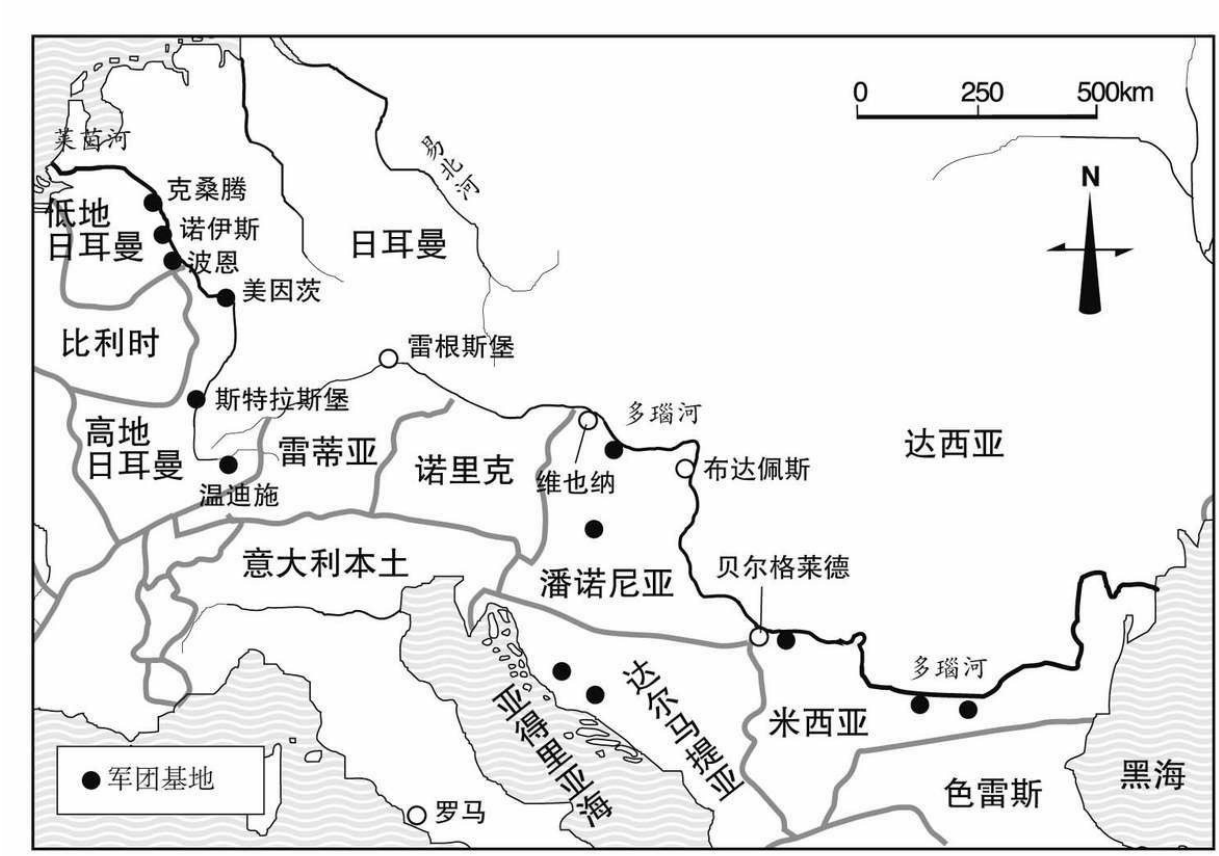
但是，莱茵河防线如铜墙铁壁般坚固也可以解释为蛮族的入侵现在尚且集中在防守相对薄弱的多瑙河防线。因此，需要继续加强莱茵河和多瑙河两防线，但并不是谁都具备先见之明。在公元69年这一年，为了保障帝国的安全而流血牺牲最多的不是防守莱茵河的士兵，而是多瑙河前线的士兵们。

然而，既有的观念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误差。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北方前线”仍然是莱茵河，防守帝国最前线的精锐指的也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基地的通称为日耳曼军团的士兵。

不过，当事人是最了解实情的。在多瑙河前线的士兵们看来，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在皇帝奥托尚且健在时只凭维特里乌斯是自己的司令官这个理由便推举他称帝，甚至向意大利本土出兵，企图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简直就是傲慢、不逊、难以容忍的越权行为。他们一定觉得不惜付出流血代价阻止蛮族入侵的是防守多瑙河的己方，日耳曼军团只是在已经成为铜墙铁壁的莱茵河防线过着安全舒适的都市生活而已，可以想象，就是这种想法使得他们对自己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奥托表明了支持态度。

投入到多瑙河防守的军事力量总共有7个军团，在数量上与拥立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防卫军相同。有如此大军支持自己，对于手下无兵的奥托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但是也存在着不利因素。与沿莱茵河南下进攻相比，从多瑙河流域出发向西前往意大利的距离更长。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与采取统一行动拥立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相比，“多瑙河军团”分别驻扎在3个行省，即达尔马提亚的2个军团、潘诺尼亚的2个军团以及米西亚的3个军团，各自分属于不同总督的指挥，3名总督对奥托的支持态度也不尽相同，目前只有军团长级别的军官们明确了支持态度。

不管怎样，奥托需要支撑到7个军团从多瑙河到来为止。可是，比“友军”从距离更近的地方前来的“敌人”即使在严冬中也没有放慢行军的速度。



莱茵河军团与多瑙河军团配置

走向武力冲突

在胜负攸关的时刻，领袖绝对必须亲自上阵。因为与外敌交战时最高司令官是否临阵会影响到作战人员的士气，所以没必要再赘述理由。当发生内战也就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时，领袖的亲自临阵更成为了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因为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所以敌我双方的士兵对于将兵刃指

向同胞的行为肯定都心存纠结，要想获胜就需要克服这种纠结心理。为了让士兵们消除疑虑，就必须让他们认为自己的作战不是出于对敌人的憎恨，而是为了自己的领袖。站在卢比孔河面前的尤里乌斯·恺撒在抛出那句“骰子已经掷下”的名言之前这样对士兵们说：“渡过此河将面临人世的悲惨，但不渡此河会导致我的毁灭。”恺撒通过直率地说出“渡河是为了不让恺撒毁灭”，从而成功消除了决定无视国法跟随自己“跨越卢比孔河”的士兵们心中怀有的疑虑。这样看来，领袖经常亲临现场与士兵们见面是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个理由是，需要控制部下的士兵们在获胜后有可能出现的鲁莽行为。

和同胞兵戎相见的行为就算结果再好，也无法摆脱因为做出了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事情而产生的自我厌恶的心情。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过于期待从这种消极的想法中摆脱出来，结果，比起回归理性，他们反而更容易委身于兽性，只有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命令才能阻止士兵们的鲁莽行为。

第三个就是与获胜一方对士兵们的控制同等重要的问题——对失败同胞的对待。这同样也只能倚仗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处置。实际上，确实曾有人对化为“野兽”的部下们的失控行为置之不管，其中的典型便是苏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他将敌我双方明确分开，与自己为敌的纵使是同乡的罗马人也要彻底赶尽杀绝。可是，彻底的排挤政策虽然让他自己得以在床上寿终正寝，败者一方的怨念却在之后的30年间深深扎根于罗马的社会中。

相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第二个苏拉的恺撒则赦免了所有失败的同胞，并赋予他们去留的自由，他明知道被释放的人们有可能会再次将兵刃指向自己，却依然冒着风险作出了这样的处置。

内乱终究会结束，对于战后的社会重建来说，没有比怨恨危害更大

的因素了。因此，胜利固然重要，但必须以一种不让怨恨残留下来的方式获胜，这才是内战的困难所在。能够尽可能杜绝这种危害的办法便是领袖亲自临阵。可是，在公元69年的内战当时，维特里乌斯却采用了将决定胜负的战斗交给先遣的部下武将，自己之后再来领取胜利果实的办法。

维特里乌斯将南下前往本国意大利的“莱茵河军团”分为了三军：驻扎在低地日耳曼诺瓦伊西乌姆（现在的诺伊斯）的第四军团长席西纳统率的第一军有军团兵、辅助兵共约3万人。他们采取的路线是从正南方向南通过现在的瑞士，穿过后世称为“小圣伯纳德”（Piccolo San Bernardo，法语为Petit Saint Bernard）的山岭后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北部攻入意大利。

驻扎在同属低地日耳曼的另一个军团基地波恩纳（现在的波恩）的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瓦伦斯统率的第二军规模不明，但据说士兵人数比第一军多。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二军选择了距离较远但行军更方便的路线。绕过高卢到达里昂，从里昂沿罗讷河畔南下。然后从马赛以北30公里处的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现在的艾克斯普罗旺斯）改向东前进，到达恺撒动用退役士兵建设的海湾城市法姆·尤里（现在的弗雷瑞斯）后，从那里经由安蒂波利斯（现在的昂蒂布）、尼西亚（现在的尼斯）、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到达高卢，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意大利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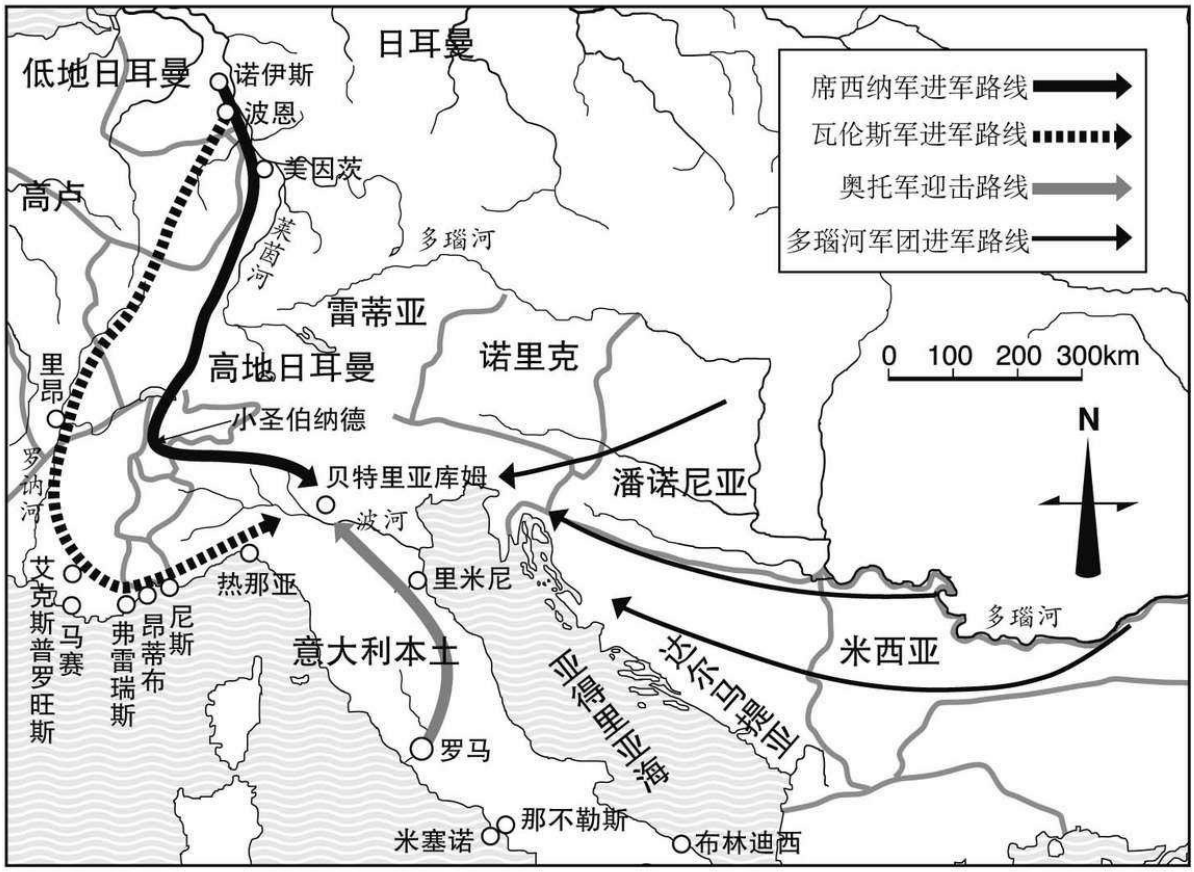
第三军由兼任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维特里乌斯本人率领，第三军出发时间落后，首先是因为维特里乌斯自己没有意识到身先士卒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募集新兵组成军团需要一定时间。

维特里乌斯认为要想打倒有“多瑙河军团”支持的奥托，确保自己的皇帝位置，需要向意大利境内总共派遣10万兵力。“莱茵河军团”包括驻扎在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军队在内，共有7个军团，全部派到意大利只有4.2万人，加上人数相当的辅助兵也不过8.4万人，还需要集结

1.6万至2万人兵力才能达到10万人。为此，维特里乌斯进入意大利的时间比席西纳率领的第一军进入意大利晚了两个月。

就算防线再坚固，莱茵河的对岸毕竟是勇猛的日耳曼各部族割据的地区，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做出将防守此地的士兵全部调到意大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从之后维特里乌斯的行动来看，比起帝国的安全来，此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他个人的野心，防守莱茵河的各军团士兵除了老兵、病号和伤员之外，名副其实地被“一个不留”地调往了意大利。他可能是觉得此时正值严冬，蛮族在冬天不会有什么行动，只要意大利的事情一解决，马上就将士兵们调回去，就能赶上蛮族行动活跃的夏季。然而这却招致了莱茵河以东的蛮族对罗马军的轻视。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得不怀疑维特里乌斯这个人对罗马皇帝一职的认知。他认为强迫士兵们在严冬行军时携带军粮会成为负担，便以此为由允许行军中的士兵们在所经各地筹集军粮。3万大军途经的现法国和瑞士地区的居民们如同遭遇了敌军一样，因为舍不得开支的维特里乌斯不是通过付钱来筹集军粮，而是认可了武力掠夺。这也成为了史学家塔西佗所说的“高卢行省的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动摇”的一个原因。恺撒的做法是对于计划在征服后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尽可能避免在当地搜刮，万不得已时也要采取用钱购买的方式，这种做法早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浅薄的考虑在以后会带来现实的灾难。



莱茵河军团和奥托的多瑙河军团的进军路线

决战波河

奥托针对踏着大雪一路行军来到意大利的维特里乌斯军制定的军事战略还算差强人意。

首先是阻止席西纳率领的第一军和瓦伦斯率领的第二军会合。其次，在波河阻挡敌人的进攻。阻止会合、死守波河当然是为“多瑙河军团”的到达争取时间。

波河在意大利的河流中算是条大河，但与莱茵河和多瑙河相比远远

称不上大。这条河从阿尔卑斯山发源，横跨意大利北部，注入亚得里亚海，横向排列几只小船，在上面铺上木板就可以轻易渡过。不过，正因为渡河容易，反而提升了这条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渡过波河之后就是几乎可以直线到达里米尼的艾米利亚大道，从面朝亚得里亚海的里米尼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穿越亚平宁山脉就可以直达罗马。另外，渡过波河后，从附近的皮亚琴察到热那亚也有大道相连，可以从热那亚经由罗马古道到达罗马。此外，也可以选择恺撒以前追赶庞培时从里米尼沿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道一口气南下直通希腊的海港布林迪西的路线。总而言之，一旦将波河拱手让给敌人，奥托就会被围困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内。死守波河的意义远远不止为“多瑙河军团”的到达争取时间而已。

尽管如此，罗马人铺设了在严冬也能行军的罗马式大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对防守一方是尤为不利的。但是，选项只有两种——仿效中世人的做法，因过于担心这种风险而只修建又窄又弯的路；或者敢于承受在一定情况下陷入不利的风险，看重道路网络带来的好处。

那么奥托是如何将这个相当不错的战略变为现实的呢？

首先，奥托为了阻止席西纳军和瓦伦斯军会合，打算让士兵乘坐基地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诺的舰队，在法国南部的海港弗雷瑞斯登陆，伏击从里昂南下的瓦伦斯军，但是奥托无兵可用。既然米塞诺舰队的海军登陆后只相当于一个军团的陆军，出动的目的也不是进行海上作战，因此舰队只负责运输任务就可以了。于是人手不足的皇帝奥托便命令首都警察和消防队全体动员，组成一个军团前往法国南部，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米塞诺舰队的提督。在“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无处不在的当时的地中海，也许比起海军来，让其担任海上警察的任务更为妥当。当然，虽说是提督，也完全不是什么身经百战的勇士。

以这6000人的兵力迎击从高卢南下而来的4万人的瓦伦斯军，想必奥托连做梦也不会期待自己能获胜吧！因为他的战略重点在于趁这个军团拖住瓦伦斯军团期间，自己指挥主力军击败席西纳军。因此，在北上前往波河死守的主力军中，最高司令官奥托的身边跟随着多名久经沙场的武将。以尼禄皇帝时代在不列颠爆发的民众大叛乱中用勇敢的方式平定事态的苏维托尼乌斯·鲍利努斯为首，安尼乌斯·盖鲁斯、马略·塞尔萨斯都是前线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其说这些人是因为支持奥托才与维特里乌斯军作战，不如说是因为奥托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正式成为了皇帝，身为一名罗马军将领听从其号令作战是天经地义的，才答应了奥托的招募。三人都做过执政官，比37岁的奥托年长十几二十岁。另外，最重要的是，与只担任过卢西塔尼亚这个没有一个军团驻扎的行省总督的奥托相比，这三个人拥有指挥过作战单位为两个军团以上的实战经验，其中鲍利努斯更是出色地完成了征服不列颠并将其纳入统治下的艰巨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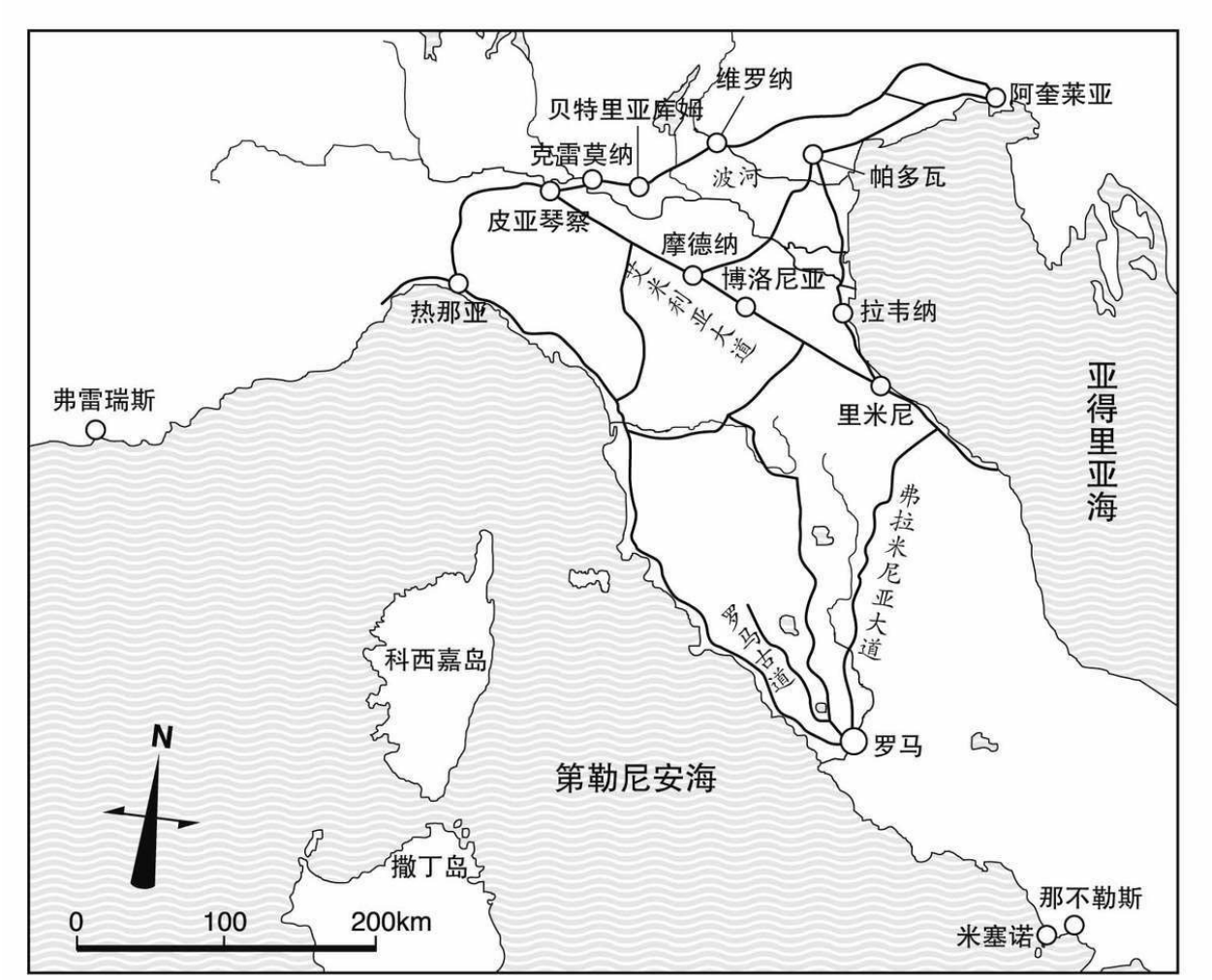
奥托缺的不是“将”，而是“兵”。

在独裁政体的国家，军事力量存在的真正理由首先在于镇压国内的反对派，而并非保护国民以防遭到外敌侵略，罗马帝国单在这一点上就不属于独裁国家。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本土没有常驻哪怕一个军团，罗马军的主力军团都部署在边境防线而非帝国的国境内。

常驻在意大利本土的军事力量只有1万名近卫军而已，目的是维持首都罗马和本国的秩序，9个大队9000名重装步兵加上各大队附属的骑兵才终于凑齐了1万名近卫军。此外，首都和各地方自治体也有和人口成相应比例的警察和消防队，但这些一般不能算做军事力量，所以本国的秩序维持（实为维持帝政的军事力量）只能依靠1万人的近卫军团。因此奥托在本国寻求支持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1万名近卫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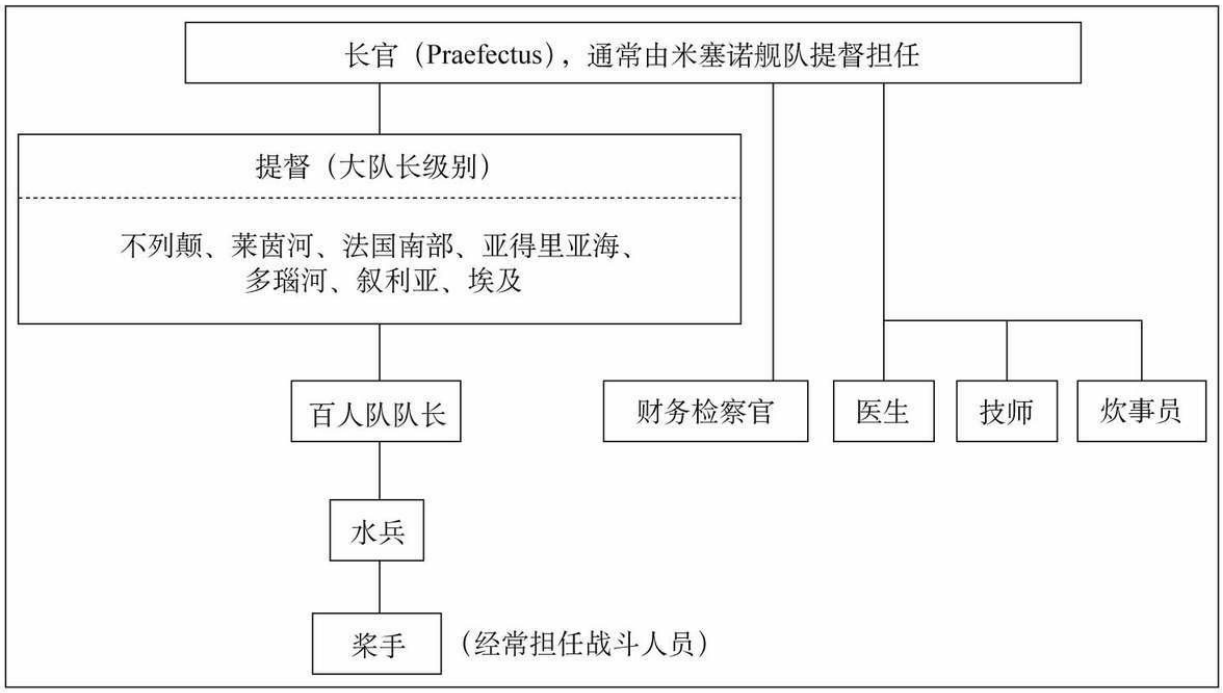
其次，还有尼禄皇帝统治末期时由驻扎在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水兵们组成的第一军团的6000人。尼禄为何组建了新军团，原因不明。研究者

中有人认为是因为尼禄曾经梦想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远征东方，但是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管怎样，在公元69年，意大利本土只有一个军团。然而，光是人数凑齐是不能形成战斗力的，还需要进行陆地战斗的适应训练。但是尼禄没多久就自杀了，过于信赖元老院认可的加尔巴还没来得及关注这种事也遇害了，奥托握在手中的第一军团是一群没有经过陆战适应训练的士兵。与以解放奴隶为主力的第一军团相比，近卫军团算得上精英集团了，但他们的服役地点一般都在首都罗马，很少调派到意大利本土之外的其他地区。因为持续着长久的和平，所以也没有必要出动。因此近卫军团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没有战斗经验。在实战经验上，和海军出身的第一军团士兵没有什么区别。



意大利北部到罗马之间的主要道路网络

这样一来，不只奥托，换做谁都会感到不安，他将2000名角斗士武装起来，组成了两个大队。



罗马海军的构成

角斗士角斗比赛和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都是罗马人最狂热追捧的人气体育项目，但是认为角斗士都是奴隶的观点只是后世的误解。这种命悬一线的危险职业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因此有很多自由民不惜投身其中，保守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自由选择角斗士作为职业的。首都罗马自不必说，一些中小城市也设有角斗士训练所，即使在没有比赛的日子，这里也聚集了很多专注于训练的人。由于终日武器不离手，他们当然可以马上转化为战斗力量。奥托决定无视元老院的反对，将这支角斗士部队送往前线。

必须死守波河的奥托军的主力部队只有这不足2万人，但是奥托还接到了已经从驻扎地点出发的其他军事力量的消息，也可以一并计算在内。

首先便是先帝加尔巴组建的名为“第七加尔巴军团”的一个军团正在前往意大利。另外，不列颠方面的第十四军团也正在纵穿高卢直奔首都

罗马而来。向奥托表明了积极支持态度的“多瑙河军团”虽然出于防卫上的考虑不可能调派所有兵力，但还是从7个军团当中的5个军团内各选出了2000名士兵，也就是说有合计1万人的先遣部队正在向意大利本土前进。

奥托的战略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除了从罗马带来的2万人之外，加上从西班牙和不列颠前来的2个军团的1.2万人连带2万名辅助兵以及“多瑙河军团”的1万人的先遣部队，共有5万大军，首先依靠这5万大军击溃席西纳的3万部队。接着如果成功击败从西边到来的4万瓦伦斯军的话，其间“多瑙河军团”的主力部队肯定会到达，这样就能轻易收拾由维特里乌斯率领南下的“莱茵河军团”残部。这就是奥托的战略。

如果一切能按预定方向发展的话，结果应该不出奥托所料。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是事情往往不会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所以领导者需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奥托的弱点就在于没有实战经验，如果他参加过实战，在一开始就不会制定这种一旦所有事情不按预定方向发展就产生不了效果的战略了。

计划落空的第一个原因是席西纳军虽然是寒冬行军，却在3月初成功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因此，奥托不得不急忙出动一部分军队前往迎击。向北前进的急行军包括近卫军团的5个大队以及附属的骑兵队和第一军团的1.1万人，加上2000名角斗士共计1.3万人。由在多瑙河前线扬名立万的盖鲁斯担任指挥，盖鲁斯接到的任务是确保波河两岸的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两个城市。

然而，奥托紧接着又得知了奉命阻止瓦伦斯军前进而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一个军团溃灭的坏消息，并且瓦伦斯在击溃这支由警察和消防队员组成的军团时连主力的军团兵都没有动用，只是派遣了一些军团的辅助兵，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这支辅助部队的指挥官是出身行省显赫家族的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诚然存在奥托的军团组建仓促的原因，但结果毕竟是行省人民战胜了罗马军。这件事并没有以阻止瓦伦斯军失败而告

终，出身高卢民族的一个部族特雷维里的克拉西克斯由此觉得罗马军团不足为惧，为半年以后的高卢骚乱埋下了种子。人对人的背叛往往不是由于恐惧而是轻蔑引起的。

不管怎样，对于从西方直奔意大利的4万瓦伦斯军来说，障碍从此不复存在，奥托也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据说此番奥托离开首都前往北方时，有近卫军团4个大队和附属骑兵组成的4000余人，甚至还加入了满期退伍的士兵。这支混成军如实反映了人手不足的奥托在当时的状况，确切的人数不明。不过，以鲍利努斯为首的将领阵容还是很豪华的，而且先遣部队给正在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前进的奥托带来的战果也足以让其精神为之一振。

1.3万人的先遣部队在盖鲁斯的巧妙指挥下战绩不俗，其中角斗士部队的表现尤为抢眼。幸运的是，由于对方的席西纳将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三，所以无论他如何努力指挥，最多不过发挥1万兵力的作用。盖鲁斯指挥的奥托军成功保住了死守波河的关键要地——皮亚琴察，无奈放弃夺取皮亚琴察的席西纳和平占领了与波河南岸的皮亚琴察隔河相望的北岸要地克雷莫纳，并将该地作为了前线基地。奥托一方对克雷莫纳也发起了攻势，因为只要克雷莫纳还在敌人手里，从东方经由阿奎莱亚正在迫近的“多瑙河军团”的前进道路就会被阻隔。角斗士部队渡过用小船临时搭建的浮桥，在克雷莫纳郊外展开了游击行动。角斗士们在这次行动中的作战也很活跃，席西纳军虽然成功合并了一分为三的部队，但是已经无法从克雷莫纳踏出一步。

为己方的战果精神大振的奥托遵照从罗马被强制带来的元老院议员们的意愿，允许他们留在了距前线有一段距离的摩德纳镇。将元老院议员带到前线来是为了告诉打算只依靠军团兵的推举便登上皇位的维特里乌斯，自己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者——元老院和市民的支持，因此自己才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皇帝。不过同时还有将元老院议员押为人质的目的，毕竟被奥托强制带离首都来到摩德纳的元老院议员中有不少秘

密支持维特里乌斯的人，甚至连维特里乌斯的亲弟弟也在其中。

另一方面，没能夺取皮亚琴察的席西纳非常着急。受维特里乌斯委托指挥3万名士兵的席西纳原来只是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地位和受维特里乌斯之托统率4万人的军队迫近中的瓦伦斯一样。急欲在瓦伦斯到达战场之前立下战功的席西纳制定的策略是利用伏兵战术歼灭渡过波河进攻北岸的奥托军，具体办法是让骑兵队发动攻击，将敌人诱入森林，再由潜伏在此的军队将其包围歼灭。进攻到波河北岸的贝特里亚库姆的奥托军是由曾经与擅长游击战术的不列颠人交手多次的鲍利努斯指挥的，这种计策对他毫不奏效。从森林中现身的席西纳军非但没有包围敌人，反而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至此，只要鲍利努斯一声令下便可歼灭席西纳军的一半部队，然后折回30公里路程发动攻击，就可以轻易攻下只剩下一半兵力把守的克雷莫纳。这样一来奥托就能成功确保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这两个重要据点，死守波河以及为“多瑙河军团”到达争取时间也会变得简单很多。

然而，鲍利努斯却迟迟没有发布缩小包围圈歼灭敌人的命令，席西纳军的将士趁机冲破包围圈成功逃脱，大概是因为鲍利努斯不忍下令让罗马人杀死自己的同胞。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件事遭到了部下士兵的鄙视。

内战的难度就在于此。尽管现在各为其主，但同胞之间彼此宽容对待是人之常情。不过同时不能让敌方得利，也就是要在有利于己方的前提下进行宽容处置，并且最重要的是不能招来己方士兵的反感。如果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相互矛盾的条件，就无法期待在同胞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恺撒的《内战记》是克服这种困难、成为内战胜者的绝好教科书。不过，虽然这本书在当时已经被广泛传阅，但公元69年的内战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没能践行恺撒的教诲，不能不让人觉得，能否“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决定因素不在于教授者一方，而在于学习者一方的资质。

总之，奥托一方错过了占得有利条件的绝好机会，并且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席西纳军和瓦伦斯军成功会合。

即使减去因席西纳军的失策而损失的兵力，合并后的维特里乌斯军也有6万人，不得不与之为敌的奥托一方召开了作战会议。如今分别驻扎在波河南北两岸的奥托军的全部兵力包括从罗马带来的2万人，加上陆陆续续进入意大利本土的“多瑙河军团”的1万人的先遣部队，此外从不列颠和西班牙经长途跋涉终于进入意大利本土的第十四军团和第七军团，总共可以集结5万兵力。从数量上来看，可以说双方势均力敌。

在作战会议上，意见分为两派：是趁此机会全军出动到波河北岸展开决战，还是在“多瑙河军团”到达之前继续保持隔岸对峙的状态？鲍利努斯、盖鲁斯、塞尔萨斯等实战经验丰富的武将都支持第二种方案，但是奥托的亲哥哥提提亚努斯和近卫军团长官普鲁克鲁斯以及态度最坚决的皇帝奥托主张立刻展开决战。奥托和他的哥哥以及普鲁克鲁斯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实战经验。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最终还是采用了最高司令官奥托的意见，决定进行决战。此时已是4月，由于波河是大河，支流很多，融化的雪水造成流域附近的地表软化，对于骑兵和重装步兵来说都是不适合作战的季节。

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

史称“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这次战役实在难以叙述。首先，对这场战斗叙述最详尽的史学家塔西佗“没有投入”。要想叙述自身没有实际参加的战斗，如果作者自己没有身临其境的心态，是无法表达清晰的，对于这一年的内战心怀厌恶的塔西佗无论如何也“无法投入”吧！“投入”指的并不是以此为乐，而是执笔的当事人是否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历史》的压轴内容是描写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惨败而归的情景。虽然自己没有参加战斗，但是描写这个场景时修昔底德的笔下充满了愤怒，那是修昔底德作为一个雅典人对于雅典军队的这次败北决定了祖国雅典走上衰退之路的愤怒，因此修昔底德描述这段内容时的笔锋始终贯穿着只有心怀愤怒和绝望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不掺杂感情的冷静语调，最终写就了这部叙述战争的杰作。

与这名雅典人相反，在30年后书写这场战斗的罗马人塔西佗很清楚，公元69年的内战对于祖国罗马的历史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单单怀有厌恶的心情。愤怒与厌恶不同，所以塔西佗的叙述变得很模糊，实际上我们甚至都不清楚不列颠的第十四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七军团最后是否参战，有的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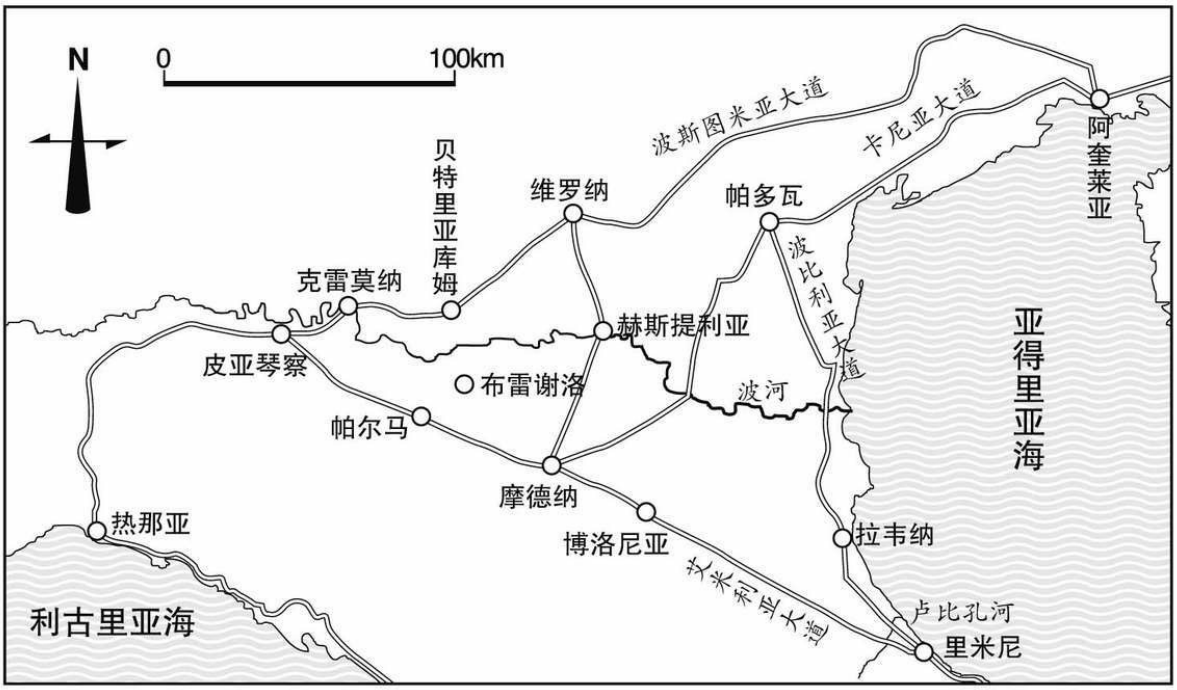
但是，笔者认为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及半年后发生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模糊不清，并不仅仅是因为塔西佗个人的心情所致，可能是其中存在着无论由谁来叙述都只能写得模糊不清的原因吧！

但凡在罗马史上足以留名的名将们指挥的战役，即使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叙述都无不清晰明了。在叙述汉尼拔、大西庇阿（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苏拉、卢库鲁斯、庞培（均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胜者的迷思》）、恺撒（参阅《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以及他们指挥的战役时费不了太多力气。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战斗目的很明确，都是通过取得胜利来决定整场战役的走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战术也是以合理的方式贯彻始终。当然，因为采用了敌人始料未及的手段而获得胜利的例子屡见不鲜，至于战术方面，虽然因人而异，但胜利必定是全身心投入的结果。然而，如果不能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效果，战斗的胜利就不能等同于战争的胜利，欧洲有一句格言——“皮洛士式的胜利”，形容的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皮

洛士虽然远征意大利并战胜了罗马军，但每次获胜时己方也蒙受巨大损失，结果只能仓皇狼狈地从意大利回国，这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最后部分作过介绍。如果是“皮洛士式的胜利”，那只意味着成为了战斗的胜者而并非战争的胜者。既然这是诉诸战争这种“人类的恶行”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有效利用手中的兵力对于司令官们来说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课题。效率与合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上述六人中没有一个是通过盲目投入兵力取得胜利的。总之，只要将焦点放在“战术应该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上，那么即便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战斗，在叙述时也犹如正在眼前发生一般，具有现场感。

公元69年以意大利北部为战场展开的内战中登场的武将，其能力远不及上述六人，他们确实有着对胜利的渴求，但是缺乏实现这个目的的冷静手段，无谓的流血牺牲都是拜他们所赐。这是一场缺陷完全暴露的“愚者之战”。

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克雷莫纳以东30公里的贝特里亚库姆周边为战场展开，首先两军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统一指挥系统。进攻方的维特里乌斯军虽然成功实现了两军会合，但是指挥官仍然由席西纳和瓦伦斯二人同时担任，二人率领各自军队展开了独自的军事行动，而且此时总司令官维特里乌斯还在高卢招募士兵，没有临阵。



波河流域全图

防守方的奥托军在指挥系统上也和梦游状态没什么两样。本应亲临战场担任总指挥的奥托把将士们送到波河北岸后，自己却决定在南岸的布里克塞路姆（现在的布雷谢洛）等待战斗结果，这简直是愚蠢至极。布里克塞路姆是波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前的河流中有沙洲，渡过河后可以很方便地到达距离20公里之外的贝特里亚库姆战场，不过虽说有沙洲方便渡河，毕竟是隔着一条河的20公里距离。并且就算彼此接壤，也不应将总司令部设在足有20公里远的后方，这是连不善于指挥战斗的奥古斯都都没有犯过的错误。

这成了奥托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本来，要想将无法放下包袱与同胞为敌的奥托军的将士们投入同胞相残的战场，就必须让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奥托，但是当事人声称要在河对岸等待战斗结果。士兵当中弥漫起厌战情绪，并且这种情绪因为受“维特里乌斯与奥托之间已经达成和解，所以战斗可以避免”的假情报影响而倍增。

奥托军指挥系统的不统一也成了败北的一个原因。由于奥托本人决定不出战，哥哥提提亚努斯和辅佐他的近卫军团长官普鲁克鲁斯作为其代理被委以总指挥的任务，二人都没有实战经验。相反，实战经验丰富的鲍利努斯、盖鲁斯和塞尔萨斯等老将却各自只分配到了一支军队。鲍利努斯先前又在与席西纳的战斗中遭到了士兵们的鄙视，盖鲁斯也因坠马受伤而无法继续在阵前指挥，仅凭身为元老院议员的皇兄担任总指挥，是无法期待按照一贯的战略有效发挥各军战斗力的。这支奥托军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根本就是疲于奔命，空耗战力。

公元69年4月15日发生的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自始至终都是散落在以贝特里亚库姆为中心的广阔平原各处的敌我双方展开的一场混战。并不是战场不够宽敞无法进行统一会战，而是缺乏在战略战术两方面拥有足够实力能避免无谓的牺牲并取得战果的人才。敌我双方都是罗马士兵，连军装都一样，军团的旗帜——银鹫旗从远处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说不定大开杀戒后会发现死的人是自己的父亲或兄弟，类似这样的悲剧在战场各处比比皆是。

分出胜负并不是因为维特里乌斯一方的指挥官的能力比奥托军的将领强，也不是因为在罗马军中被誉为最强之师的“莱茵河军团”士兵们的战斗力压倒了混编的奥托军，只是由于奥托军的士兵们对于与同胞交战一事心怀的顾忌更强一些而已。对于维特里乌斯军的士兵们来说，尚且远在高卢的最高司令官维特里乌斯没有参战已经是已知的事实，但是对于奥托军的士兵们来说，最高司令官奥托不参战却相当于本来应该在己方军队后方不远处坐镇指挥的人临阵脱逃。一开始就知道不会参战和一开始期待参战却希望落空给士兵们造成的印象是不同的，奥托军的士兵们只能在心中怀着失望走上战场。

愚者的战斗不仅在战况的进展上模糊不清，牺牲者的人数也不甚明了。获胜的维特里乌斯军的牺牲人数不详，失败的奥托军的情况也不清楚。凡是名将指挥的战斗，至少会留下获胜一方的牺牲者的准确数字。

公元69年4月15日的这场战斗连胜者一方的战死者人数都没有明确记载，说明两军都盲目投入了大量兵力。不管怎么说，维特里乌斯军获得了胜利，因为奥托军的将士们先投降了，并且这个结果在当日就传到了在波河南岸等待的奥托那里。

奥托自杀

得知本方败北的奥托作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决定，让30年后的史学家塔西佗一直赞不绝口。周围的人一致劝说奥托暂且撤兵，等“多瑙河军团”到达之后再进行最后的决战，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多瑙河流域进入意大利本土的入口阿奎莱亚。但是，奥托的心意已决，他将有可能把别人牵连进来的文件全部烧毁，严禁对身在摩德纳的维特里乌斯的弟弟进行报复，并嘱咐将士们争取博得胜者一方的同情，然后在当晚用剑刺穿了自己的胸膛。这是心意已决的一剑，听到声音的侍卫闯入房间时，奥托已经断气了。他只当了3个月的皇帝，死时37岁。

笔者觉得他的放弃有些为时过早，不过也许是受到斯多葛哲学的影响，罗马的精英大多极富公德心。就像塔西佗所说，奥托可能是希望用自己的死换来内战的结束。同时，奥托成为皇帝也不是他本人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如果比他小5岁的尼禄能够始终坚持善政，大概他根本不会想到由自己来做皇帝。尼禄的失政首先让高卢的总督温德克斯点燃了反对尼禄的战火，从响应这次起兵并支持加尔巴的时候开始，奥托才走上了称帝之路。如果是经过多年深思熟虑之后才具有的野心，想必不会如此简单地放弃。总而言之，正因为是偶然得来的帝位，在放手时才能如此干脆利落。

但是笔者又想，如果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为何不在确保为自己打拼的将士们今后的出路之后再自杀呢？如果胜者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话，倒是大可以放心离世，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他们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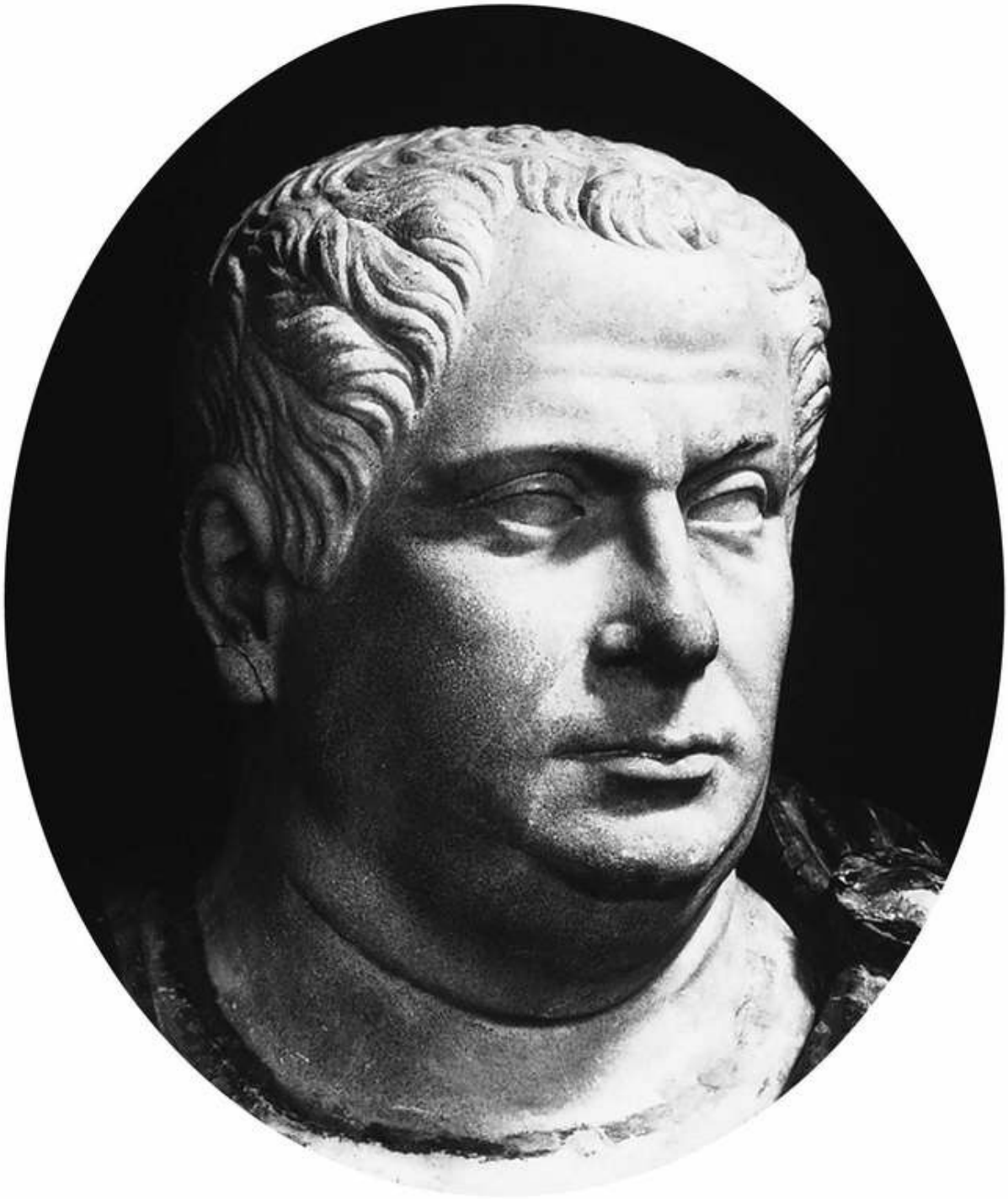
视为伟人。难道奥托没有看出来，直接的胜者瓦伦斯和席西纳以及对这两人发号施令的维特里乌斯都不是败军之将们能够托付将来的人吗？也许在用剑刺穿自己的胸膛之前，奥托心里仅有的念头只是不要像自己派人杀死的加尔巴那样死得那么惨——被生擒后杀死，砍下的首级被穿在长枪上，让士兵举着在古罗马广场上戏耍般地招摇过市，市民们纷纷向头颅投来石块。这大概是他最忌讳的。

尽管奥托干脆利落地自杀了，但罗马人之间的内战并没有到此结束，原因之一是维特里乌斯在绝对不可忘记的重要一点——对内战败军士兵的处置上犯了错误。

第三章

皇帝维特里乌斯

（69年4月16日—69年12月20日在位）



到了公元69年4月16日，前一天发生的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以及奥托自杀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意大利北部。同时，传令兵也快马加鞭赶往帝国东西南北各处报信，包括首都罗马、已经到达里昂的维特里乌斯那里、正聚集在阿奎莱亚的“多瑙河军团”处，此外还要利用海路远赴叙利亚和犹太等地通报维特里乌斯军胜利和奥托死亡的消息。

得知奥托军败北后从摩德纳到博洛尼亚避难的元老院议员们在接到奥托的死讯后马上承认了维特里乌斯“第一公民”的地位。另外，首都罗马在接到皇帝的死讯时正在举办竞技大赛，聚集在此的观众被告知新皇帝的名字后纷纷报以欢呼和掌声，这样一来维特里乌斯就得到了罗马市民的承认。之前已经多次提到，罗马帝国的正式主权者是元老院和市民，此前只受到“莱茵河军团”推举的维特里乌斯由此成为了正式的“第一公民”，也就是罗马皇帝。

尽管刚刚登基3个月的皇帝昨天自杀，首都罗马也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混乱。在负责维持首都罗马秩序的近卫军团和首都警察全部出动去前线的前提下没发生混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首都警察长官萨比努斯是个非常有能力的行政官，此人是犹太方面司令官韦斯帕芗的亲哥哥。与在军事领域大放异彩的弟弟相比，他选择了行政，用现代的话来说，等于迈入了官僚的世界。起用萨比努斯担任首都警备的负责人算得上是奥托在人事安排上的一个成功举措，多亏萨比努斯监管周到，这座连一名警察都不在的百万人口大都市才没有发生混乱。

第二个原因可以说是首都罗马的居民们对皇帝的意外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了。皇帝尼禄被迫自杀是在10个月前的公元68年6月，半年后皇帝加尔巴遇害，3个月后皇帝奥托又自杀身亡。市民们在竞技场被告知奥托死讯并问及是否赞同维特里乌斯登基时纷纷报以欢呼和掌声，并不是因为他们讨厌奥托而支持维特里乌斯，这不过是大众面对又一次的帝位更替所表现出的兴味索然的反应罢了。在双方的支持者齐聚的首都罗马没有发生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是由于大多数市民怀有的这种冷淡的情感。

在里昂得知奥托死讯的维特里乌斯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此前隔三差五举行的晚宴改为每晚都举行，并赠予自己年少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尊称，意思是“征服了日耳曼民族的人”。征服的对手并不是日耳曼民族而是奥托一派的罗马人，因此有些稀奇古怪，但是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皇帝和皇帝的血亲也有不少拥有“日耳曼尼库斯”称号的人，维特里乌斯可能是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儿子出身皇室。

其间，率领维特里乌斯军获胜的瓦伦斯和席西纳二将来到里昂报告战果，并祝贺维特里乌斯正式登基，二人此行带来很多败军之将。对于军团长级别的瓦伦斯和席西纳来说，作为行省总督征服不列颠而立下赫赫战功的鲍利努斯是老前辈，与其说是将败军之将押送至此，不如说是与老前辈和同辈结伴前来。

维特里乌斯一开始似乎用讽刺的言语挖苦了败将一番，不过最终还是赦免了全部败将的罪名，对于奥托的亲哥哥提提亚努斯也只表示兄弟同心并肩作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奥托一派中没有一个人被流放或者没收财产。到此为止还一切正常，然而在为奥托一方战斗的中坚力量——士兵的处置上，维特里乌斯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对败者的处置

在贝特里亚库姆平原战败的奥托军士兵是怎样一种心情，塔西佗没有记载。他们并没有拼尽全力，而是在战场各处与敌人交手期间战死者人数不断增加，待反应过来之后发现已经输掉了。并且，最终也没有亲临战场的最高司令官干脆利落地（或者说是任意妄为地）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本该统率残余士兵的司令官们也出发前往了里昂。获胜一方的士兵同样也被司令官们抛下不管，不过他们毕竟是胜者。这些胜者趁长官不在期间为所欲为地欺压败者。同为罗马军的军团兵，仅仅因为打了败仗就受尽虐待，他们一定备感屈辱，不过更令他们感到屈辱的是

隶属莱茵河各军团的辅助兵们的蛮横态度。军团附属的辅助部队由行省人民组成，对于虽然在战斗中失败但依然是堂堂罗马公民的军团兵来说，看到身为行省人民的辅助兵们摆出一副胜者嘴脸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屈辱。

出于避免这种事态的需要，最高司令官的亲自参战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同胞彼此交战的内战中，这是绝对的必要条件。

在距此一个世纪前的恺撒和庞培之间发生的内战中，恺撒每次获胜后看到庞培一方的士兵们跪下请求自己原谅时都会命令他们站起来，然后这样说：

“你们只不过是尽自己的义务罢了。”

士兵的义务就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因为自己的长官加入了庞培一方，所以士兵们也作为庞培的手下与恺撒作战。并且，恺撒还向部下（也就是获胜的士兵们）严正下令，不得碰败兵一根汗毛，不得侵占他们的财物，不得有任何侮辱败兵的言行。

一个世纪后的贝特里亚库姆却没有出现恺撒这样的人物，在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里昂，喝得烂醉如泥的维特里乌斯下达的命令竟然是将奥托手下各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处以死刑。

百人队队长担负着统率百名左右士兵的任务，相当于现代军队里的中队长，在罗马军中的位置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士军衔。中士一般是下级军官，但罗马军团的高级百人队队长拥有出席作战会议的资格，所以不能简单地归为下级军官。不过，这些百人队队长不仅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平时也和手下的士兵们同吃同住，他们有时态度严厉，冠以“魔鬼中士”的称号都不为过，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他们犹如父兄一般亲切。新皇帝的命令便是要杀死这些百人队队长，不知士兵们听到后会作何感想！原属奥托军的士兵们在心中萌生屈辱甚至憎恨的感情是必然的。最

后，死刑被无情地执行了。

想必维特里乌斯这个人对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多大的关心，他接下来的命令是让败军士兵参与克雷莫纳镇的圆形竞技场修建工程。修建圆形竞技场的理由之一是对卷入战争的克雷莫纳镇的人们给予补偿，还有就是准备在自己入主意大利时举行角斗比赛以示庆祝。

对于罗马的军团兵来说，在公共设施的施工现场工作不仅不是耻辱，还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广大的帝国中星罗棋布的道路就是军团兵们铺设的，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写有“第××军团铺设”碑文的纪念碑。

这些都是重体力劳动，但对于他们所属的帝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工程，并不是为了弥补在内战中与胜者为敌的罪行而被强制从事的工作。然而，克雷莫纳的居民却对被命令强制赶工的士兵们报以侮辱性言语，其性质之恶劣让人难以相信他们同样都是罗马公民。没过多长时间，士兵们的胸中就被败北的打击、屈辱的感觉和憎恨的心情交织而成的怨恨所占据。

新皇帝维特里乌斯是何时入主意大利本土的，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从里昂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北部需要10日行程，不知是在里昂耽搁太久还是旅途行进缓慢，似乎维特里乌斯在5月中旬才到达意大利北部。他到了克雷莫纳后在修建完成的圆形竞技场观看了瓦伦斯和席西纳为庆祝自己登基而举行的角斗比赛，被迫参加比赛的角斗士们肯定是奥托组建的那支在与维特里乌斯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的角斗士部队的幸存者，这是又一次有悖人之常情的愚蠢决定。

入主意大利本土以后，维特里乌斯的身份除了是与先帝奥托交战的胜者之外，还成了得到罗马帝国正式的主权者元老院和市民承认的唯一皇帝。在这个时候，无人可与之匹敌。能否收拾内乱后的残局，重新将帝国统合起来，全在于他本人的政治手腕。生于公元15年的维特里乌斯这一年54岁，比老得让人担心的加尔巴年轻了足足18岁，相比正处于30

多岁这个不上不下年龄段的奥托来说，年长了17岁。在古代的罗马，40—50多岁被认为是男人的鼎盛时期。在所属阶级上相比名门贵族的加尔巴，他更接近于新兴统治阶级的奥托，不过维特里乌斯身上披着从受提比略皇帝任用开始一直到克劳狄乌斯时代地位仅次于皇帝的父亲路奇乌斯留下的光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背后有号称罗马全军最强的“莱茵河军团”撑腰。只有良好的意愿以及将这种意愿传达给别人的口号的话，无论是革命、改革还是重建都是无法实现的。除了意愿和说服力之外，还需要权威和权力。维特里乌斯是元老院和市民承认的权威，并且也拥有“莱茵河军团”这个“权力”。

尽管如此，维特里乌斯并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在握的大权”。对于心怀积极的愿望却由于所处的立场而无法实现目标或者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所需实力的人，我们不必横加指责。但是，只要想干就能成功的人却不行动起来，那就是精神怠惰了。而且维特里乌斯不仅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甚至还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新皇帝维特里乌斯下达的第一条命令是解雇全体近卫军团的士兵，由于是不支付退役金的直接解雇，所以更应视为罢职。他的理由是这些士兵曾经站在奥托一方与维特里乌斯军为敌。作为罗马军一个组成部分的近卫军团的任务是保护最高司令官——皇帝。在贝特里亚库姆战役期间，奥托是得到元老院和市民承认的正式皇帝，按照恺撒的说法，在奥托手下作战的近卫军团兵只不过是在忠实地履行作为士兵的义务而已。但是，在维特里乌斯看来，他们也曾经听从奥托的命令将正式的皇帝加尔巴杀死，所以这些近卫军团兵不再拥有继续服役的资格，如果允许他们继续留任，可能会威胁到维特里乌斯自身的安全。既然如此，本应该仿效奥古斯都对安东尼手下的士兵采取的处置办法，在分发退役金并为他们找好落脚之处以后再解雇，然而他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被直接解雇的近卫军团士兵的态度从中立转为反对维特里乌斯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维特里乌斯很清楚，近卫军团的任务是保护皇帝，证据就在于虽然他解雇了近卫军团的士兵，但并没有废除近卫军，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将奥古斯都以来由每队定员1000人的9个大队组成的近卫军团规模增加为16个大队，加上附属骑兵队，兵力从原来的1万人左右变为了1.7万人。这1.7万人全部由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士兵组成，这进一步伤害了被解雇的原近卫军团士兵们的自尊。100年来，近卫军团兵在人们眼里一直是罗马全军中的精英，与在行省服役的军团兵相比，在期满退伍的年限和薪水上都享受明显的优待。但是现在地位低的军团兵得到任用，自己却被扫地出门，这使得他们彻底坚定了反对维特里乌斯的决心。

维特里乌斯不仅在近卫军团兵的处置上犯了错误，在随同奥托一方参战的士兵的善后问题上也是一错再错。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本来的任务是防卫边境，在处理时不能像当年的恺撒一样让他们自由选择重新回到庞培手下、就地定居还是返回故乡。即使不是维特里乌斯，换做任何一个人也只能将他们遣返到当初的服役地点，要命的是他的遣返方式，根本没有想办法在消除士兵们的屈辱感、愤怒和怨恨之后再将他们遣返，只是直接下令让他们回到服役地点。

只有海军出身的第一军团没有回到以前的服役地点米塞诺，而是被派驻到他们从未去过的西班牙。

第十四军团接到的命令是返回不列颠，但是这个军团如同俘虏一般，在返回途中一直处于辅助部队的监视下，也就是说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被行省出身的士兵监视着踏上归途。这带来了两个弊端：一是伤害了军团兵的自尊，二是让行省出身的士兵产生了看不起罗马军团兵的心理。这两个弊端在之后影响深远。罗马的边境防卫系统要靠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和辅助战斗力的辅助兵恪尽职守才能正常运作，一旦非主要战斗力从心中看不起主要战斗力，很显然就会发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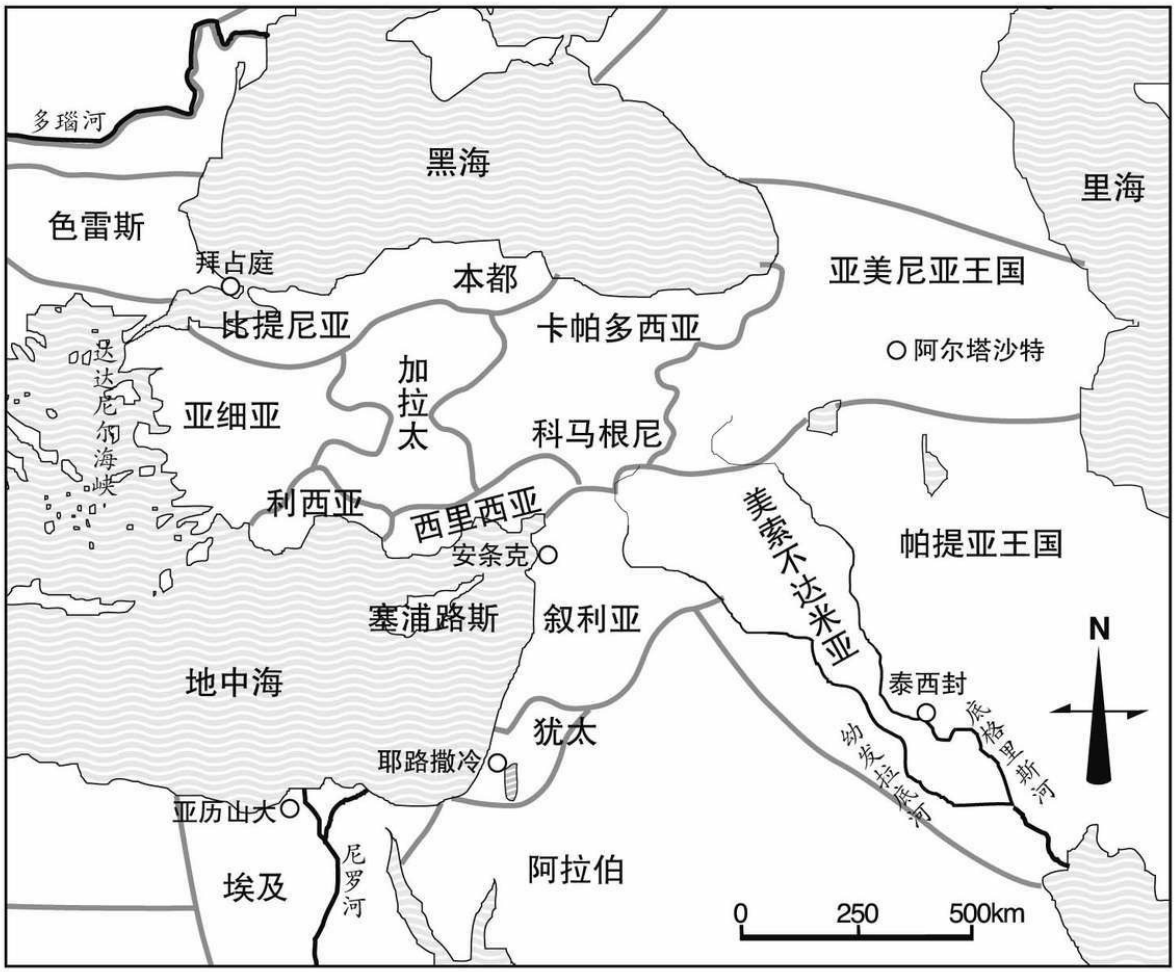
向东返回多瑙河流域的士兵们心怀的不满与向西方的西班牙和不列颠前进的士兵们是一样的，不，应该说他们有更强烈的怨恨。毕竟“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仅仅因为替奥托一方卖命便被强制从事圆形竞技场的修建，并且这种怨恨还传染给了虽然到达意大利却没有参加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士兵们。因为“多瑙河军团”的士兵在团结心上绝不输给“莱茵河军团”的士兵。

在奥托手下作战的士兵们返回之后，距离帝国最遥远的叙利亚和犹太方面也得知了奥托的死讯和维特里乌斯即位的消息。

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

继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之后，该讲述韦斯帕芗的故事了，在叙述完无能将领指挥的战斗后紧接着叙述名将指挥的战斗，笔者都有些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了。用通俗的话说，前三个人根本就是疲于奔命地任由事态自行发展，笔者甚至能够体会塔西佗为何对他们心怀厌恶了。

韦斯帕芗直到一年前为止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在这一点上与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在犹太战争中俘虏的犹太人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预言韦斯帕芗会成为皇帝时，他虽然没有付之一笑，却也没信以为真，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全身心投入。不仅如此，在加尔巴登基时，他还曾派遣自己的长子提图斯担任使者前往罗马表示支持和祝贺。加尔巴遇害、奥托继任皇帝后，自己由于正在参加犹太战争而没有派遣军团，不过还是表达了支持的意思。奥托在统计自己的军事力量时也将韦斯帕芗麾下的三个军团计算了进来。



罗马帝国东方

但是，当他得知奥托自杀和维特里乌斯登基的消息后，既没有送去祝贺也没有表示支持。其实从这个时候起，为了实现自己的登基大业，韦斯帕芗不再听天由命，而是开始着手制订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了。然而，负责防卫帝国东半边的各军团并非从一开始就一致拥护韦斯帕芗。

满怀着怨恨回到军营的“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对新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反感没过多长时间就转化为另外拥立一个新皇帝的愿望。本来，“多瑙河军团”的7个军团与驻扎在叙利亚负责防卫达达尼尔海峡东边的小亚细亚的4个军团关系很密切，双方不仅在地理上相距不远，而且每逢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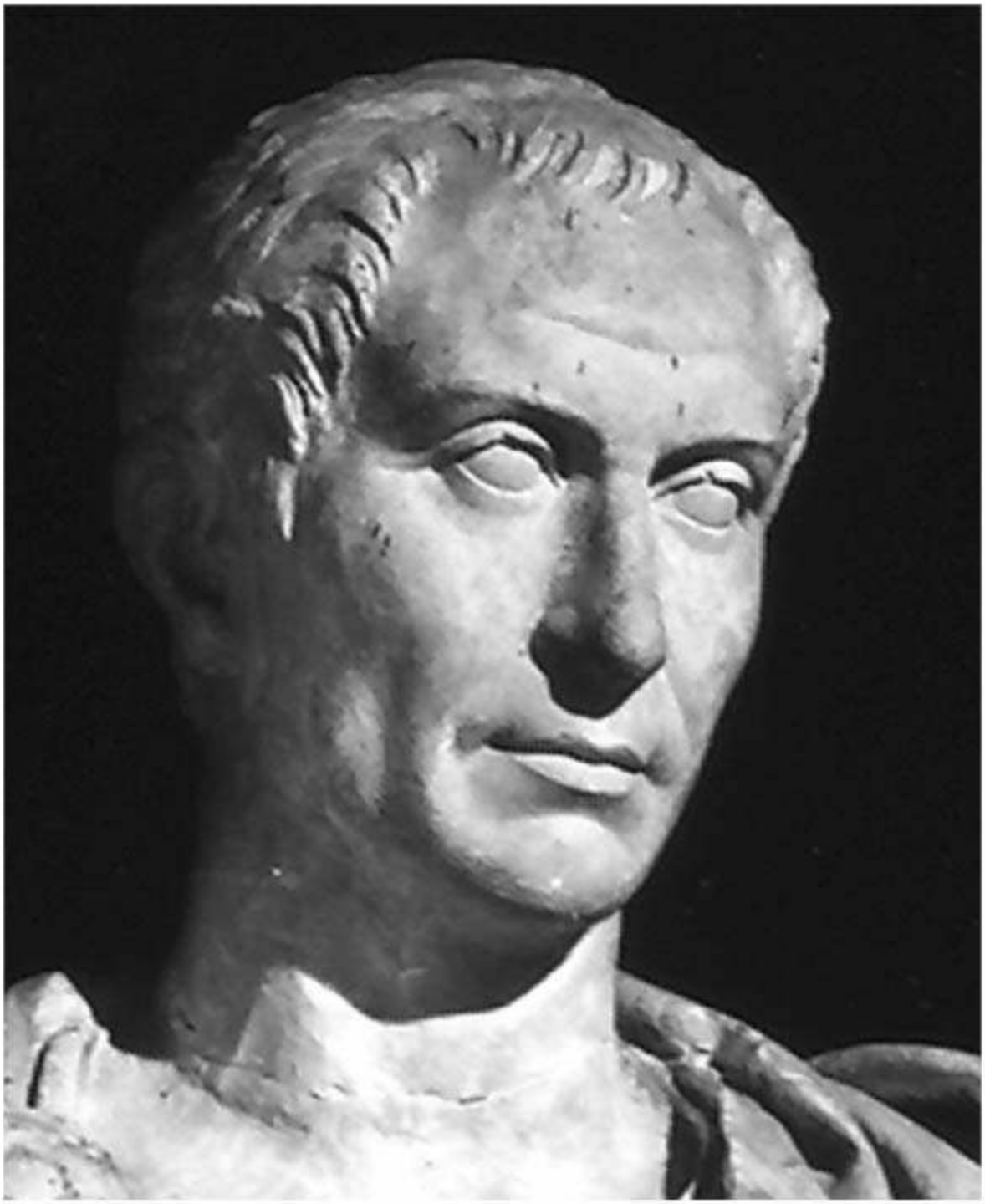
方前线需要兵力增援时，“多瑙河军团”尤其是驻扎在米西亚行省负责防卫多瑙河下游的3个军团一般都会派兵响应。皇帝尼禄统治时期，曾与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王国发生过争端，他们在当时就是名将科尔布罗指挥下的一部。如果科尔布罗还活着的话，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举科尔布罗来对抗维特里乌斯。但是，除了战略战术的才能之外还兼有外交手腕（也就是不费一兵一卒获得胜利的才能）的这名武将在两年前遭到皇帝尼禄的猜疑而被迫自尽。不过科尔布罗门下众所公认的才俊穆奇阿努斯仍然健在，还担任着统率4个军团的叙利亚行省总督，于是密使肩负着打探穆奇阿努斯意向的任务，从多瑙河流域出发前往了叙利亚的安条克。

史学家塔西佗认为互为竞争对手的穆奇阿努斯和韦斯帕芗彼此关系不和，但韦斯帕芗的儿子提图斯努力居中斡旋，成功让二人和好并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不无道理，因为负责防卫帝国西方的罗马军中地位最高的是“莱茵河军团”的高地日耳曼军或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与此相对，防守帝国东方的罗马军中地位最高的一直是统率着与大国帕提亚接壤的“幼发拉底河军团”的叙利亚驻军司令官。犹太方面的司令官韦斯帕芗似乎在岁数上比穆奇阿努斯年长，但是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不如他。不过，比起任务只是对依靠科尔布罗的努力确立了友好关系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动向进行监视的穆奇阿努斯，正在犹太方面打仗的韦斯帕芗确实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两年前，即公元67年，爆发的犹太战争直到由于尼禄的死而中断之前，犹太全境已基本被平定，只剩下攻占耶路撒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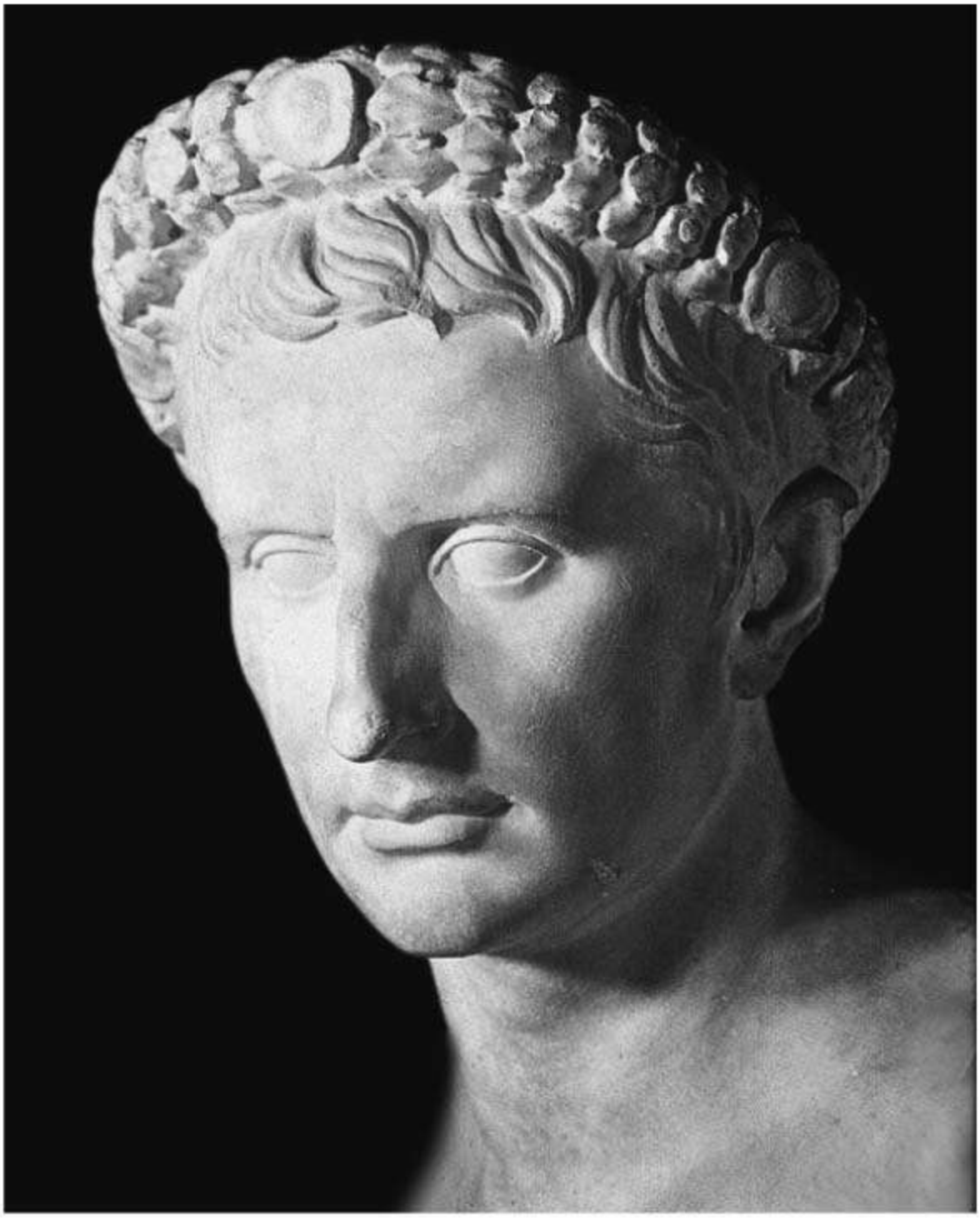
但是，笔者不认同塔西佗主张的“处在竞争关系中的两个人无一例外都会互相敌视”的人性论。对手之间存在的是竞争意识，并非互相敌视的意识，尤其是双方当事人都颇具才能时，这种程度更加明显，他们彼此反而会惺惺相惜，所谓嫉妒只不过是自己的能力不如对方时产生的下意识的表现。而且从此后穆奇阿努斯贯彻始终的合作态度来推测，也很难让人觉得二人的统一战线仅仅停留在“如果没有后生提图斯的居中

斡旋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的程度上。

首先，被“多瑙河军团”询问是否有意称帝的人是穆奇阿努斯而非韦斯帕芗，如果穆奇阿努斯不喜欢也不认可这个竞争对手的话，大可凭借韦斯帕芗在犹太执行战争任务期间擅自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做法相当于放弃任务的理由，将韦斯帕芗成为皇帝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然而穆奇阿努斯却想方设法将“多瑙河军团”对自己的支持转送给韦斯帕芗，为什么呢？



恺撒



奥古斯都

叙利亚行省总督盖乌斯·路奇尼乌斯·穆奇阿努斯大概是为数不多的

在公元69年就觉察到罗马帝国即将迎来新时代的罗马人之一，不过所谓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改变帝政。就连情感上属于共和主义者的塔西佗也不得不承认，统治区域广大的罗马帝国只能依靠帝政，帝政仍然作为政体发挥着作用。问题不在于政体，而在于由谁来担任这种政体的最高统治者。

事实上，始于恺撒时代的“应该由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也就是出身于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且继承了奥古斯都血统的人来担任皇帝”的惯例在尼禄时代画上了句号。与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但出身于首都罗马名门贵族的加尔巴统治也不长久，接下来成为皇帝的奥托既非首都出身也不是名门贵族，但至少他的父亲是元老院议员，因此他可以自豪地夸耀自己出身于罗马社会的最高阶层——元老院阶级。现在代替奥托的维特里乌斯从父亲那一代开始也跻身于元老院阶级。相反，韦斯帕芗的父亲却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军团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并且他虽然出生于意大利本土，却只来自一个地方自治体——瑞耶提。

是否属于元老院阶级对军旅生涯也有影响，如果是元老院议员的儿子，结束一段见习期后就可以一下子被提拔为大队长，让这些刚起步的公子哥担当重任是因为手下的10名百人队队长都是职业军人。关于韦斯帕芗军团生涯的记载是从他成为多瑙河流域的大队长之后开始的，不知道他是否是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上来的，不过至少他肯定担任过百人队队长。步入帝政之后的罗马军队从以前的讲究出身变为了重视实力，但是没有一点背景的年轻人仍然不可能被一下子提拔为大队长。

而且韦斯帕芗在军团内的晋升速度虽说不慢，但也绝对不是很快，在名声上远远不及罗马全军无人不识的科尔布罗。他在犹太战争中的表现说好听点叫稳扎稳打，说不好听点就是平庸无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平时绝对不会想到他会做出起兵称帝这种疯狂的事情来。

但是，韦斯帕芗也有优点——他是个常识健全的人。穆奇阿努斯不是一贯主张，要想终结公元69年发生的内乱、重建帝国，常识健全的人

是最堪当其任的吗？结束尼禄死后的内乱局面不能依靠创造新体制的方法，而是要恢复既有体制的功能才能成功。

总之，要想结束公元69年的内乱，与120年前创造新体制时的情况不同，如今已不需要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类型的天才人物，即使缺乏一些想象力，但只要具备能够清楚地了解现在需要做什么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健全常识就足够了。穆奇阿努斯不仅受过很多教育，多年的边境服役经历也让他练就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不过有趣的是，他认为来自统治阶级外部的韦斯帕芗比出身于既有统治阶级的自己更适合担当将帝国重新凝聚起来的旗手，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出身于地方的韦斯帕芗朴素诚实，比动不动就见风使舵的自己这个“城里人”更能胜任。此外还有一个人也认为韦斯帕芗更适合平定这个时期的内乱，这个人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不，应该说他虽然出身犹太，但是比一般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

埃及长官亚历山大

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出生于长期居住在埃及第一大城市亚历山大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伯父是被誉为“犹太的柏拉图”的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斐洛（拉丁语写作Philo），关于这个人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皇帝卡利古拉”这一章中作过介绍。这个家族是除耶路撒冷以外犹太人聚集最多的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区中最有势力的家庭，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是恺撒或者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要不就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赐予的。如《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所述，卡利古拉和犹太人的关系非常恶劣，不可能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他们，也就是说不可能将他们纳入自己所属的家族中。

哲学家斐洛一生都没有改变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家族中的一个成员马尔库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却选择成为罗马公民，并与在位至公元

44年的犹太王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贝蕾妮丝结婚，因此在犹太战争中协助罗马一方压制犹太的阿格里帕二世相当于斐洛的侄子。斐洛的亲弟弟叫盖乌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从名字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选择了成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此人在金融业取得成功后，曾担任埃及等东方国家皇帝的私产操盘手。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便是此人的儿子，不过他没有涉足犹太人擅长的经济领域，而是选择了投身罗马军团来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在犹太人中是不多见的。

他虽出身犹太民族，却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并且是亚历山大的权势家族的一员，投身军团后一上来就被委以大队长的职务，得到了与元老院阶级出身的罗马人一样的待遇。伯父斐洛代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集团前往罗马向卡利古拉皇帝请愿妥善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那一年，这个犹太青年在罗马军团中已经是指挥1000名士兵的大队长了。

之后的晋升也是突飞猛进，在6年后的公元46年开始的两年间，他被克劳狄乌斯皇帝任命为常驻犹太的长官。阿格里帕一世死后，由于儿子阿格里帕二世才16岁，克劳狄乌斯皇帝只能将犹太再次置于罗马的直辖统治下，但是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的统治手腕非常巧妙，在他任内犹太没有给罗马带来任何麻烦。犹太人对于他这种中途放弃犹太教改信他教的行为抱有的憎恶胜于原本的异教徒，并且当时他的年龄只有30岁出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想必他除了军事之外，在民事方面也才华卓越。

之后，他的事迹从罗马史的记载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了公元60年代，他又再次登场于连敌人帕提亚都认可的罗马军第一名将科尔布罗的旗下，这次不是作为一个军团的军团长，而是成为了由四个军团组成的科尔布罗全军的兵站负责人。罗马军非常重视兵站的作用，甚至存在“罗马军胜利的关键在于兵站”的说法，因此在这个方面担任最高负责人意味着比军团长的地位还高，他与年龄相仿的穆奇阿努斯同为科尔布罗麾下的高级将领。另外，这个归化罗马的犹太人可能是由于伯父斐洛

的影响，在修养上丝毫不逊于穆奇阿努斯。

科尔布罗被尼禄勒令自杀之后，穆奇阿努斯成为了东方叙利亚行省的总督。与此同时，等待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的是仅次于叙利亚的帝国东方要塞——埃及的长官职位。

埃及的亚历山大因为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语称为亚历山德罗斯）建造的，所以城市名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到克娄巴特拉时代为止一直是希腊裔的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作为征服民族的希腊人当然也大量定居于此。即使征服者换为了罗马人，希腊裔居民的比重也没有变化。很久以前，与希腊民族同样有很强的离散习性的犹太人也迁徙至此。亚历山大的居民构成分为埃及原住民、希腊后裔和犹太后裔，在经济实力上则是希腊后裔和犹太后裔平分秋色。出于这种复杂的情况，由罗马皇帝委派到此上任的长官往往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与帝国内的各行省不同，只有埃及是罗马公民委托皇帝进行直接统治的城市，所以统治负责人不需要由元老院议员出身且有执政官经历的“总督”来担任。“长官”只是个官职名，任命权不属于元老院，而是在皇帝手中。因此，当时在皇帝直属下担任帝国统治事务的“官僚”中资历最高的人就被视为埃及长官。有意思的是，罗马选择了犹太人前往大量居住着与犹太裔居民对立的希腊裔居民的亚历山大来担任埃及长官，并且还委托其指挥两个军团，这也是罗马“不论是否出身行省，唯才是用”政治的一个例证。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成为了第一个出生于埃及的“埃及长官”，并且这名归化罗马的犹太人很好地把握住了罗马人为自己提供的这个衣锦还乡的机会，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埃及和它的首都亚历山大开始了长期的太平日子，甚至让人误以为前不久的卡利古拉皇帝的焦虑和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苦心早已是遥远的过去。顺便提一句，这个人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首都警察的长官，原因是巩固了皇帝之位的韦斯帕芗将他召回了自己身边，而他也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犹太人。

笔者总觉得韦斯帕芗称帝的作战计划是他本人与穆奇阿努斯和这位亚历山大三个人共同制订的，这三人甚至考虑到为了保证以后的皇位继承顺利实现，将韦斯帕芗的儿子提图斯也列入了计划之中。

60岁的韦斯帕芗、年近花甲的穆奇阿努斯和亚历山大，以及30岁的提图斯，从韦斯帕芗的才能和性格来推测，当时大概的情况应该是他本人负责出谋划策，由其他三人来执行。经验丰富、心智成熟的三个壮年男子经过冷静的探讨商定结论后，与年轻的提图斯一起着手实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四个人的任务分配实在只能用“天衣无缝，简单明了”来形容。

韦斯帕芗称帝

从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来推断，4月15日开始的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次日即16日早晨确定的皇帝奥托的自杀、数日不久后公布的元老院承认维特里乌斯皇位的事实应该在5月中旬或者最迟5月末传到了帝国的东方。此时穆奇阿努斯身在驻地叙利亚的安条克，暂时处于休战中的韦斯帕芗驻扎在犹太的恺撒利亚，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则正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官邸中，三人应该分别听说了这些消息。然后从6月开始传来“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对维特里乌斯心怀不满和怨恨的消息，紧接着，“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便前来探询穆奇阿努斯是否有意称帝。

从这些事实可以断定，时近6月末在贝洛特（现在的贝鲁特）举行的三人会谈肯定是由穆奇阿努斯主导的。这次会谈并不是三人聚到贝鲁特秘密举行的，实际上三人都是在大白天率领自己手下的军团长、大队长和高级百人队队长堂堂正正出席了会谈。除他们之外，还有犹太的阿格里帕二世以及科马根尼和那巴提亚国王等帝国东方的同盟国君主参加。这样看来会谈明显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同时也怀有将“多瑙河军团”在内的帝国东方将士反对宗主国意大利的皇帝维特里乌斯的事实公

之于众的意图。负责防卫多瑙河的7个军团加上叙利亚的4个军团以及正在参加犹太战争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埃及的2个军团，总共有16个军团的兵力。即使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战斗力在罗马军中最强，也只有7个军团。由于维特里乌斯本人的失策，驻扎在不列颠的3个军团和西班牙的2个军团以及驻扎在北非的1个军团支持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出于防守上的考虑，16个军团不可能全被调到西方与维特里乌斯一方的7个军团交战，不过单单是防守帝国东方的16个军团全部倒戈反对维特里乌斯这一个消息就足以带来巨大的冲击了。

贝鲁特会谈的三名主要出席者逐一确定了韦斯帕芗称帝所必须实现的前提条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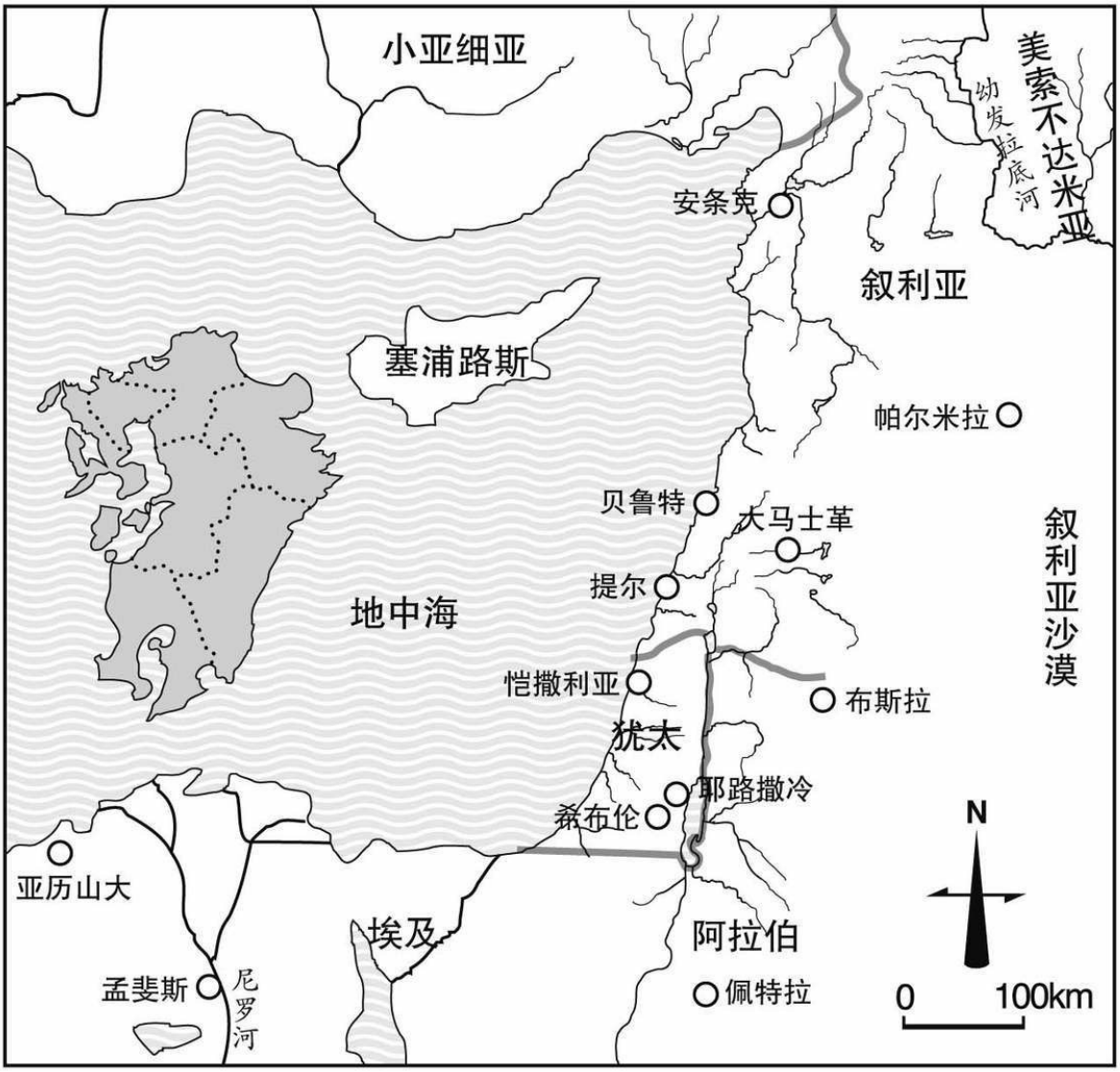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

（一）三人各自招募从麾下军团中期满退伍的士兵重新归队。

招募的对象是领取土地和退役金后开始平民生活的老兵们，罗马军团兵在退伍后一般多会在服役地附近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让他们应征归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二）集中在几个地点制造兵器，由此来提高效率。

战斗在即，兵器的更新换代必不可少，这项措施是要在安条克、恺撒利亚和亚历山大这三个罗马帝国东方的先进地区集中进行兵器生产。



犹太及其周边（为了表示距离感，使用的比例尺与日本的九州一样）

（三）在安条克铸造金币和银币。

这是为了用现金来充当军需资金，金币银币的铸造权本来是皇帝所有，但他们决定无视这个事实。至于所需的财源，似乎是向东方一带的富人们强制募捐得来的。

实际执行这三项计划的是负责行省统治的行政官僚，穆奇阿努斯和

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两人被委派对这些人的工作进行监督。

韦斯帕芗的工作则是到各个军团基地的军团兵面前“露脸”，因为只有犹太的3个军团认识他，叙利亚的4个军团和埃及的2个军团虽然听说过他的名字，却都不知道他的相貌。

韦斯帕芗辗转于各个军团基地，褒奖优秀的士兵，鞭策怠惰的士兵，其实就是想利用父亲般的温情来博得士兵们的好感。他没有用钱来收买人心，与其说是因为小气，还不如说是因为他没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

其实在进行第一阶段计划的同时，三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另外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向宗主国意大利派出密使，鼓动被维特里乌斯解雇的近卫军团旧部加入到韦斯帕芗一方。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等于在宗主国内部有了内应。

第二是向亚美尼亚王国和帕提亚王国派遣特使，重新确认并保证他们和罗马的友好关系。为了不让这两个国家趁罗马向西方出兵的间隙发动偷袭，需要事先作好安排。而这个计划的实施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为在尼禄皇帝时代通过科尔布罗的建议缔结的两国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有利无弊，两国都没有撕毁协约的意思。不仅如此，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还表示会派出2万名骑兵帮助韦斯帕芗实现称帝的愿望。

但是三人用委婉恭敬的语言谢绝了他的提议。帕提亚的轻骑兵是出了名的，如果得到这2万名骑兵无疑是如虎添翼，之所以拒绝是因为罗马人一贯主张在自己人之间发生战争不可以将他国牵连进来。马略和苏拉的时代、恺撒和庞培的时代、奥古斯都和马克·安东尼的时代都没有将别的民族卷进来的先例。可以确信，在这个时候，三人肯定也是毫不

犹豫地回绝了。

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就该开始第二阶段的计划了，这个阶段的任务分配同样完美无缺：

穆奇阿努斯率领军队前往意大利。

韦斯帕芗前往埃及，在那里待机。

犹太战争在翌年即公元70年春再次开战，总指挥由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担任。提图斯在此前的犹太战争中担任阵前指挥，表现突出，但这个30岁的年轻人还没有在战场上担任总指挥的经历。于是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埃及长官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做他的副官，在旁协助。

为什么率领军队前往意大利与维特里乌斯军交战的不是韦斯帕芗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推测是为了避免让韦斯帕芗的手上沾上同胞的鲜血。

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罗马的名门，可谓是贵族之后，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养子，维特里乌斯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但从父亲那一代开始就属于元老院阶级了。相反，韦斯帕芗不仅出身平凡，就连父亲都是职业不明的“凤凰男”。要想让这个先天不足的韦斯帕芗当上皇帝，绝对不能在此基础上再让他沾上同胞的鲜血了。

让韦斯帕芗在埃及待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四个理由：

第一，从埃及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来看，既然已经将总督尤里乌斯·亚历山大送往了犹太战场，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主持大局。

第二，意大利的必需品——小麦的一半（至少也是三分之一）是由埃及供给的，因此确保埃及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意味着可以从军粮上制约宗主国意大利的维特里乌斯政权。

第三个理由是，确保韦斯帕芗军在必要时能够呼应穆奇阿努斯军从海路攻入意大利的可能性。

第四，埃及距离犹太很近。也就是说，如果犹太战争比之前预想的更加麻烦的话，担任过战役总指挥的韦斯帕芗赶到前线用不着花太长时间。

韦斯帕芗要想确保帝位，犹太战争的顺利结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便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所谓安全，就是除了防卫外敌之外还要维持帝国内的安定。犹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犹太民族的叛乱在罗马看来是行省人民的叛乱，属于扰乱帝国安定和秩序的行为。如果不能成功镇压，罗马皇帝就等于被打上了不称职的烙印。

7月1日，在亚历山大，驻扎在埃及的2个军团推举韦斯帕芗称帝。

7月3日，在恺撒利亚，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3个军团推举韦斯帕芗称帝。

数日后，在安条克，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推举韦斯帕芗称帝。

紧接着，小亚细亚各行省的驻扎部队也一致推举韦斯帕芗称帝，各同盟国的国王们也以东方君主惯有的方式，对韦斯帕芗的登基表示赞同，并派遣隆重豪华的使节团到韦斯帕芗面前祝贺。进而，拥护韦斯帕芗称帝的呼喊声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传遍了多瑙河流域的各处军团基地。

将韦斯帕芗推上帝位的准备阶段就此结束，之后就剩下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了。

意大利本土的情势

在此期间，从之前的攻势转为守势的维特里乌斯一方都做了些什么呢？就结果来说，他们只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一件也没做。

维特里乌斯入主宗主国意大利应该是在贝特里亚库姆战役胜利结束的一个月后，也就是5月15日前后。5月24日到达了维特里乌斯一派在意大利北部的据点克雷莫纳，在那里欣赏完角斗比赛后，由瓦伦斯和席西纳带领着视察了贝特里亚库姆的战场，当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旦鲜血是从敌人身上流下来的，腥臭也变成了好闻的气味。”

这种不经大脑的发言有害无益，是失言的典型例子。通过道听途说得知这句话的“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群情激愤，即便是本方的“莱茵河军团”的士兵们，在听到这种话之后还怎么可能继续支持维特里乌斯？新皇帝维特里乌斯这一句话对于既不支持维特里乌斯一派也不支持韦斯帕芗一派的普通罗马人来说，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他结束战场视察后从该地渡过波河，沿艾米利亚大道向东前进。在经过附近的奥托的墓地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关心，不过多亏这样，先帝的墓地得以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到达艾米利亚大道尽头的里米尼之后，又从那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首都罗马。只要快马加鞭，3日便可走完这段路程，就算每天都停下来歇脚过夜，也用不了10天。然而维特里乌斯却花了50天，因为他没日没夜地举办庆功宴，所花的费用也都由所到各地附近的中小城市承担。

弗拉米尼亚大道相当于意大利现在的国道三号线，在古代的时候与相当于现国道一号线的罗马古道、现国道二号线的卡西亚大道同为联结首都罗马和帝国北方的干线道路，向南延伸的阿皮亚大道在现代成为了国道七号线。也就是说，在现代的意大利，除了高速公路之外的大多数国道都是由古罗马时代的道路稍加改良而成，其中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修建于公元前220年前后，已经有2200年的历史。单是看一看架设在险峻

山谷中的高架桥保留到今天的残骸就可以想象罗马时代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让人强烈感到罗马的道路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

但是，需要大量架设高架桥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与沿海边一路北上的罗马古道和穿梭于平缓丘陵之间的卡西亚大道不同，只有它是横跨于像脊背一样将意大利半岛一分为二的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大道。

并且总体来说，山岳地带与平原相比在经济上断然处于劣势。现在的国道三号线的沿线一带如果遭遇地震的话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重建起来。然而，罗马时代却不同，因为是干线，所以沿途布满了设施完善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喜好奢侈的新皇帝，从后来发掘的罗马时代的出土文物的品质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维特里乌斯一行不是只有皇帝和随行仆从，还跟着多达6万人的“莱茵河军团”士兵。对于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人们来说，这哪里是为自己的皇帝及其随行人员负担费用，分明是征服者对自己实施的一场体无完肤的强取豪夺。在只体验过莱茵河流域那种艰苦的边境生活的士兵们眼里，初夏的意大利仿佛天堂一样，没有了长官们的约束，一向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也变成了一群无赖之徒。

维特里乌斯和手下的6万名士兵终于在7月18日进入了首都。罗马的人们还不知道，半个月前在帝国的东方，韦斯帕芗已经称帝。从信息传递的速度来看，维特里乌斯应该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过他本来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吧！他一定觉得韦斯帕芗凭借自己的业绩才好不容易晋升到司令官级别，绝不可能会妄想当皇帝。维特里乌斯没有察觉新时代已经到来，也没有意识到肩负新时代使命的新人才只能在既有的统治阶级以外寻找的事实，他入主首都的过程简直就是近乎无知的傲慢的典型。

在罗马帝国，从共和政体时代就已经存在武装军队不得进入首都罗马内部的规定，被奉行800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马略和苏拉打破了这项传统（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但这也是暂时的，就

连打破国法、率军渡过卢比孔河的恺撒也只能尊重不让武装士兵进入罗马城的传统。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将近卫军团的驻扎基地搬到了首都，但他也是将驻扎地点设在了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首都划定的14个行政区之外。罗马是一个不仅包括敌人，就连本方士兵也不得在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进入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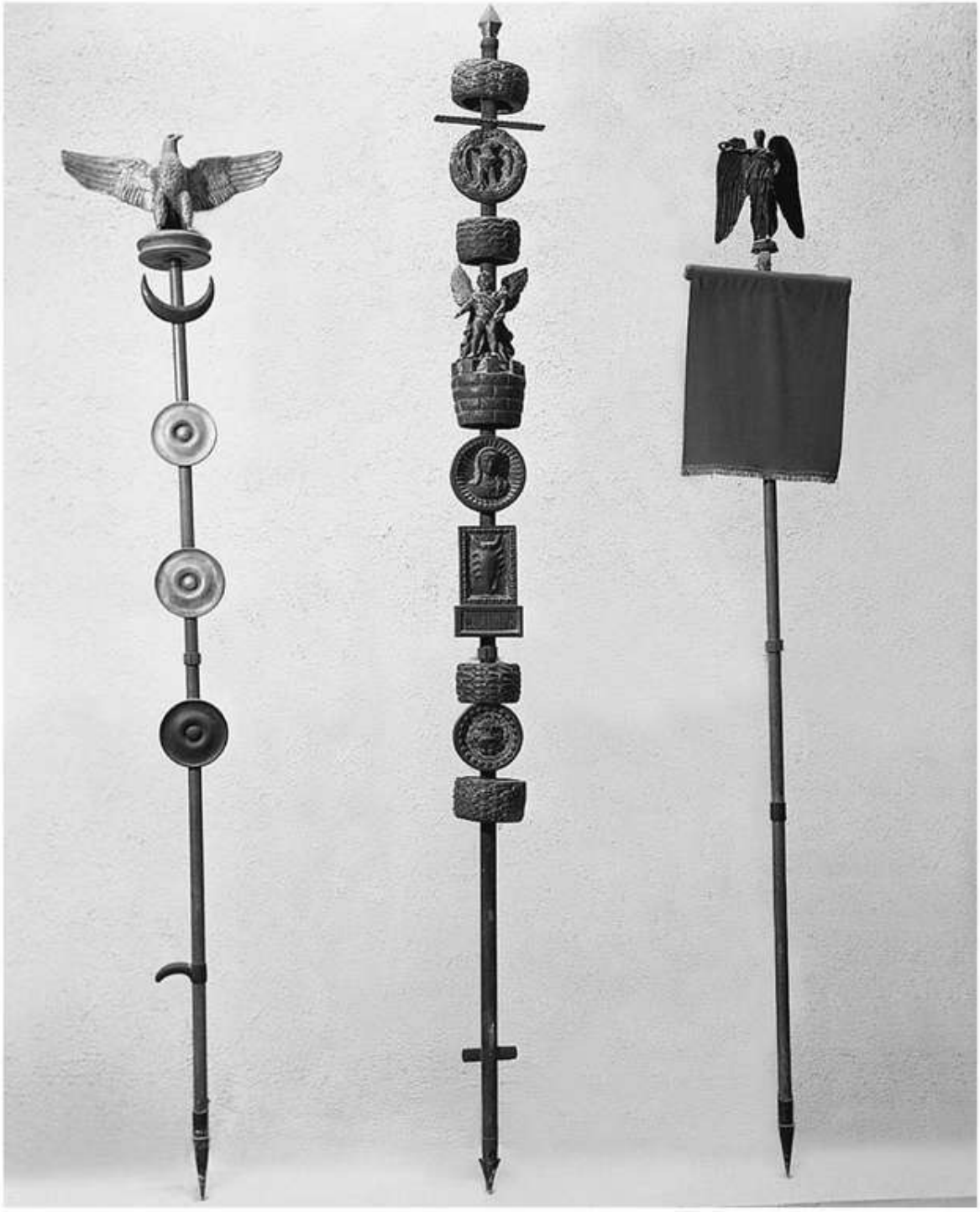
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经由穆尔维大桥渡过台伯河后，可以直接通往城市中心的古罗马广场。维特里乌斯手下的将士们如同胜利者凯旋一样全副武装，跟在军团旗和大队旗后面沿着这条道路成群结队进了城。

罗马的军团旗呈“鹫”的形状，在银制的鹫下面装饰有不同军团的标志，军团旗走在前方就表示后方跟着全体军团成员。公元69年7月18日的入城队伍共有4面银鹫旗，这代表有4个军团进入了首都。

如果不是以定员6000人的军团为单位，而是有军团的分队参加的情况时，就会在队伍最前方举起表示各大队的大队旗。这一天入城的大队旗有4面，这意味着即使军团全员没到齐，由1000名士兵组成的大队也可以代表“莱茵河军团”7个军团中剩下的3个支持维特里乌斯。换句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向首都居民炫耀防守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的4个军团和防守下游的低地日耳曼军的3个军团全部支持维特里乌斯的事实。

跟在重装步兵的军团兵后边的是军团附属的骑兵、负责弓箭和攻城器械的轻装步兵以及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部队。辅助兵也按照不同的出生地编为几支部队，由相同部族出身的队长和队旗带领着进城。既然人数达到6万，那么最前方的部队到达古罗马广场时最末尾的士兵肯定才走到穆尔维大桥上。皇帝维特里乌斯也在骑兵的簇拥下骑马入城，肥胖的身体从上到下全副武装，而罗马此时却正值盛夏，没有四匹白马拉的战车，这名凯旋将军也只好硬着头皮登上卡匹托尔山，感谢最高神朱庇特赐予自己的胜利。

聚集在沿途围观的罗马市民们纷纷对维特里乌斯和他的军队报以欢呼和掌声，然而史学家塔西佗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却极具讽刺，他说罗马这个城市不在乎胜者是谁，全都会用拍手喝彩迎接。至于这种欢迎是否能够持久则另当别论，就这个“另当别论”来说，罗马人可真是一群具有严格批判精神的人。



罗马的军团旗银鹫旗

如果只是想向首都的居民炫耀自己有“莱茵河军团”支持的事实，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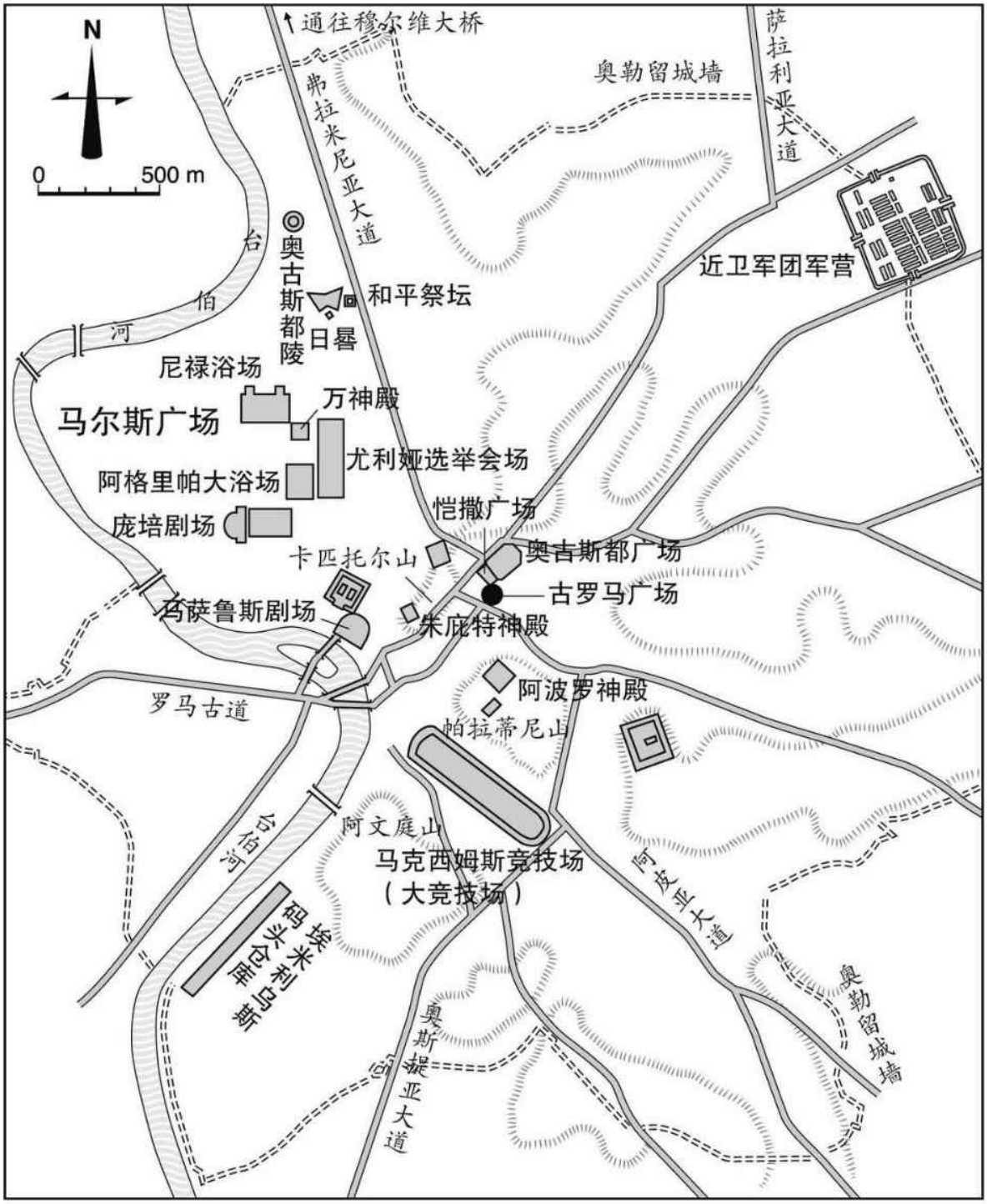
民众倒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之后依然将6万名士兵留在首都的做法只能说是愚蠢至极。维特里乌斯知道近卫军团驻扎的基地只有容纳1万名士兵的规模，于是将多出来的大批人马像放羊一样扔在了市中心。结果，整齐地立有圆形大理石柱的壮丽广场、会堂以及神圣的神殿内外瞬间变为了仅靠碎布头划分界限的野营地。由于维特里乌斯无暇顾及部下们的伙食问题，他们便将抢夺来的食物就地烹饪。并且此时正值盛夏季节，对于习惯了北国德意志气候的士兵们来说，在南国罗马即使半裸着躺在地上也很难入睡。谁要是想洗洗身子，也只能跳到眼前这条与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有着天壤之别、水流又缓温度又高的台伯河中。

也许你会说首都罗马有百万人口，这点人连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这种感觉就好比纽约的曼哈顿被一群从德克萨斯来的牛仔占据了一样。自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军制，规定即使是行省人民，只要在辅助部队中服满25年兵役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士兵的儿子已经完全可以应征成为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参加的军团兵。同时，退役后的罗马军团兵大多会与服役地附近的平民女子结婚，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得知，“莱茵河军团”的军团兵们的体内混有日耳曼或高卢血统的概率是很高的。跟随维特里乌斯进入罗马的很多“莱茵河军团”的士兵是第一次踏上宗主国的土地，第一次亲眼看见首都。住在弗拉米尼亚大道沿路的居民因为知道他们是沿途经过，或许尚可容忍，但是首都罗马的居民可要长期伺候这群赖着不走的人。

即便如此，入住皇宫的维特里乌斯如果当时果断着手施政的话，也许能够避免这种沉闷的气氛。但是维特里乌斯异常消极，不像是54岁的人。并不是说他人有多坏，只是他过于看重手下的两个将领——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实际获胜者瓦伦斯和席西纳，在政府的重要人事安排上都与这两个争风吃醋的人商量，只任命合他们心意的人选。拜其所赐，两名执政官以下的所有大臣分成了两派，再也无法制定意见一致的政策。结果就是士兵秩序混乱，居民怨声载道，瓦伦斯和席西纳在皇帝面前经

常肆无忌惮地展开唇枪舌剑，维特里乌斯也越来越沉溺在他原本就喜好的暴饮暴食中。只有元老院没有反对维特里乌斯，这是因为维特里乌斯还能够照常出席元老院会议。只要不被无视，元老院就知足了。然而从这一年的内乱来看，元老院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掌舵人了。

东方拥立韦斯帕芗的消息以及呼应而起的“多瑙河军团”的动向在夏天即将结束时也应该传到了罗马，但是维特里乌斯的消极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他听到韦斯帕芗称帝的消息后一笑而过，对于“多瑙河军团”的动向也只是说一个军团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最先传到罗马的只有驻扎在米西亚的第三军团起兵拥立韦斯帕芗这一个消息而已。但是，之后同类的情报如雪崩一样向维特里乌斯袭来。



公元69年时的罗马市区（为方便起见，也加上了公元3世纪建造的奥勒留城墙）

维特里乌斯一派没有预想到必定会发生的事态，当然就不会制定相

应的对策，只满足于舒适的首都生活。与此相反，东方的韦斯帕芗一派的作战计划却在稳步施行中。

帝国东方的情势

如前所述，韦斯帕芗一派对每个人的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的分配。

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率领军队前往西方，也就是宗主国意大利。

原先负责犹太方面的司令官韦斯帕芗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待机。

翌年即公元70年春再次开始的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由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担任。

埃及长官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则作为提图斯实质上的副官，参与犹太战争的大决战——耶路撒冷攻略战。

情况大致如上，但问题是如何将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3个军团以及驻扎在埃及的2个军团共计9个军团的军事力量分配到各项任务中。

首先，决定投入4个军团参与攻打耶路撒冷。仅仅是攻占一个城市的战斗，却认为原本用于压制大部分犹太地区的3个军团不够，还要从叙利亚调来1个军团，一共投入4个军团，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如果用攻占大阪城的思维来衡量地中海世界的攻城战是无法理解的，这与纯由战斗人员参加的日本式的攻城战不同，攻打的是住满了普通市民的整个城市。证据在于，在大阪和江户，只有城堡是被城墙和沟壑围着的，而在古代的地中海世界，不，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在继承了古代建筑形式的中世以后的整个西欧，城墙和沟壑是围绕整个城市建造

的，甚至让笔者认为不应译为“城墙”，而应译为“市墙”。因此，由士兵这种纯战斗人员组成的进攻一方必须面对士兵和市民，也就是战斗人员加上非战斗人员的集团。

人们往往会觉得大量非战斗人员的参与会让防御战的部署碍手碍脚，从而陷入不利局面，但实际并非如此。防御战不是兵戎相见的遭遇战，被破坏的城墙必须及时修复，武器的生产工厂也需要全天运转，所以当负责防卫的战斗人员全力专注于防守时，非战斗人员的协助就变得不可或缺，非战斗人员的人数多也就成为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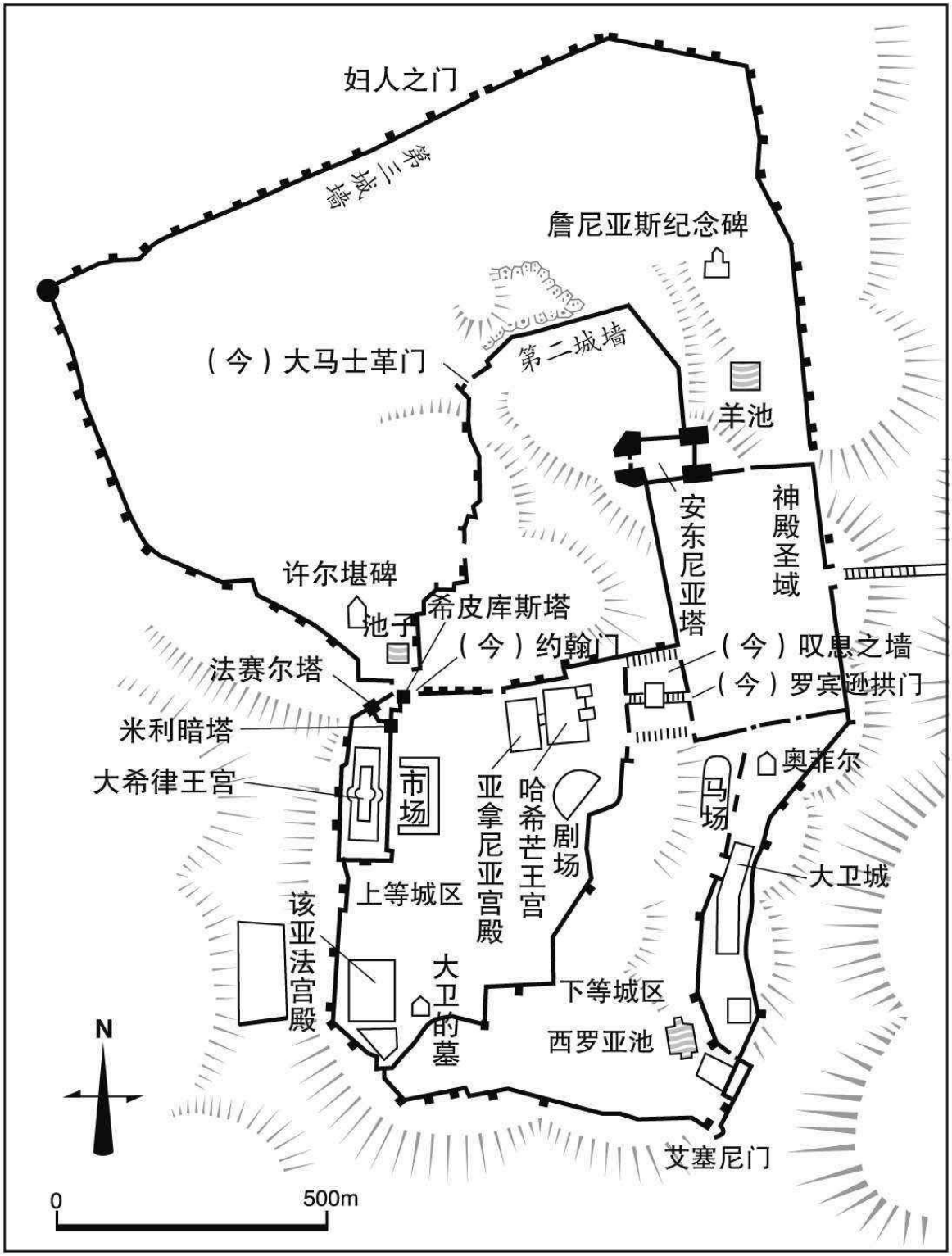
当然又有人会质疑，被包围的城市内存在大量非战斗人员的话，不是会加快水和粮食的消耗速度吗？但是一般说来，不管近郊的水源多么丰富，城市都只会建在可以确保饮用水的地方。或是通过挖井获取地下水的补给，或是储备雨水来利用，总之水的确保是城市存在下去的首要条件，耶路撒冷也不例外。

与水同样重要的是粮食，但是通常来说，当地最大的城市会成为进攻的对象，这是谁都能够预想到的。犹太地区的叛乱爆发于公元66年中叶，韦斯帕芗受皇帝尼禄任命前往镇压是在公元67年春天，但是到了公元68年的秋天，由于尼禄驾崩并且需要等待下一个皇帝的命令，尽管已经平定了犹太的大部分地区，只剩下攻占耶路撒冷了，韦斯帕芗却只能撤军，于是镇压犹太的罗马军进入了停战状态，直到公元70年春天才任命提图斯为总指挥重新开战。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方面得到了一年半的时间为守城做准备，因为罗马军在停战期间并没有对耶路撒冷实行包围。从犹太战争开始计算整整过去了三年，从停战时开始算也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市内储备起足够的必需品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同时，满足俭朴的犹太平民的饮食需求也比生活水平高的城市简单得多。

攻占大城市通常需要数年时间，比如攻占迦太基就花了三年。公元69年时的耶路撒冷同样利用停战期不仅储备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还修建起了坚固的城墙。

另外，韦斯帕芗一方却没有沉着展开进攻的充足时间，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耶路撒冷，就等于没有成功镇压犹太的叛乱。在耶路撒冷攻略战上碰壁的话，会让人怀疑韦斯帕芗是否有能力胜任皇帝之位，并给维特里乌斯一方提供反扑的机会，因此犹太战争也是确保韦斯帕芗皇位的一次考验。

由此可知，尽快解决问题是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最大目标。因此，新配了一个军团的4个军团加上附属的辅助兵远远不够，此外还让埃及驻屯军团的分队也参战，就连东方各同盟国的国王麾下的军队以及由于生活圈子大部分重叠而与犹太人向来不和的阿拉伯人也被动员起来。



公元66年时的耶路撒冷（出自山本书店刊《犹太战记1》）

让犹太民族出身且非常了解犹太人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参加攻略战也是考虑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便进行协商，不顺利的话便通过军事力量尽快解决问题的一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如前所述，犹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话，韦斯帕芗继任皇帝便会成为一场白日梦。

至于驻扎在埃及的2个军团，除了参与攻打耶路撒冷的大队之外，剩下的部队也是不能随同穆奇阿努斯前往西方的。因为首先不能让决定在此地待机的韦斯帕芗手下无兵，并且一旦耶路撒冷攻略战稍有拖延的话，韦斯帕芗也可以赶去增援。同时还需要考虑从海路攻入宗主国意大利的情况。

另外，就是由4个军团组成的叙利亚驻屯军，除了调去攻打耶路撒冷的1个军团外，即使是司令官穆奇阿努斯也不能将剩下的3个军团带到西方。

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的国王欣喜地重新确认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罗马的领导者们对他国人的信任在性质上有些许不同，在2000年后的现代想起来也非常有意思，他们不是将人分为可信任的对象和不可信任的对象，只对可信任的人抱以全部的期待，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别人都会抱以信任，但是只信任到“可信任的程度”为止。

那么，应该在何处画线来界定“可信任的程度”呢？罗马的领导者们不是将对方的善意或道德作为画线的标准，他们参照的标准是自己一方在军事上的防御力。他们在缔结了和平条约的对象国与本国的国境上依然会部署与以前规模相同的军事力量，这样就可以约束对方尽量保持与自己的友好关系，即使对方想破坏双方的友好关系，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这种理念的话，笔者认为可以用“制衡力”这个词。可以相信，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二代皇帝提比略巩固了基础的帝政罗马的军事策略就是建立在这种制衡之上的。

如果是这样看待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人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穆奇阿努斯本人，都不可能放空罗马帝国和亚美尼亚、帕提亚王国之间的国界——幼发拉底河的防线，将军队全部调往西方。

结果，穆奇阿努斯能够带到西方的军事力量加上辅助兵不超过2万，凭借这种程度的军事力量还敢于前往西方的穆奇阿努斯一定是觉得还可以指望表明支持韦斯帕芗的“多瑙河军团”的7个军团。但是请不要忘记，“多瑙河军团”最初打算推举为皇帝的不是韦斯帕芗，而是穆奇阿努斯，率军西进的任务交给穆奇阿努斯也是出于这个因素的考虑。总之，还没等到公元69年的秋天，韦斯帕芗一方的作战计划就已经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公元69年的夏末秋初，也就是维特里乌斯一方和韦斯帕芗一方还没发展到正面接触的时期，发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事情发生在莱茵河防线和多瑙河防线两个地点，前者的当事人是附属于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中的行省兵，后者的当事人是“多瑙河军团”的军团兵们。

如果是对预料中的事情作出应对，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在应对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时才需要真正的才能。在这个方面，维特里乌斯与韦斯帕芗的同伴穆奇阿努斯在能力上相比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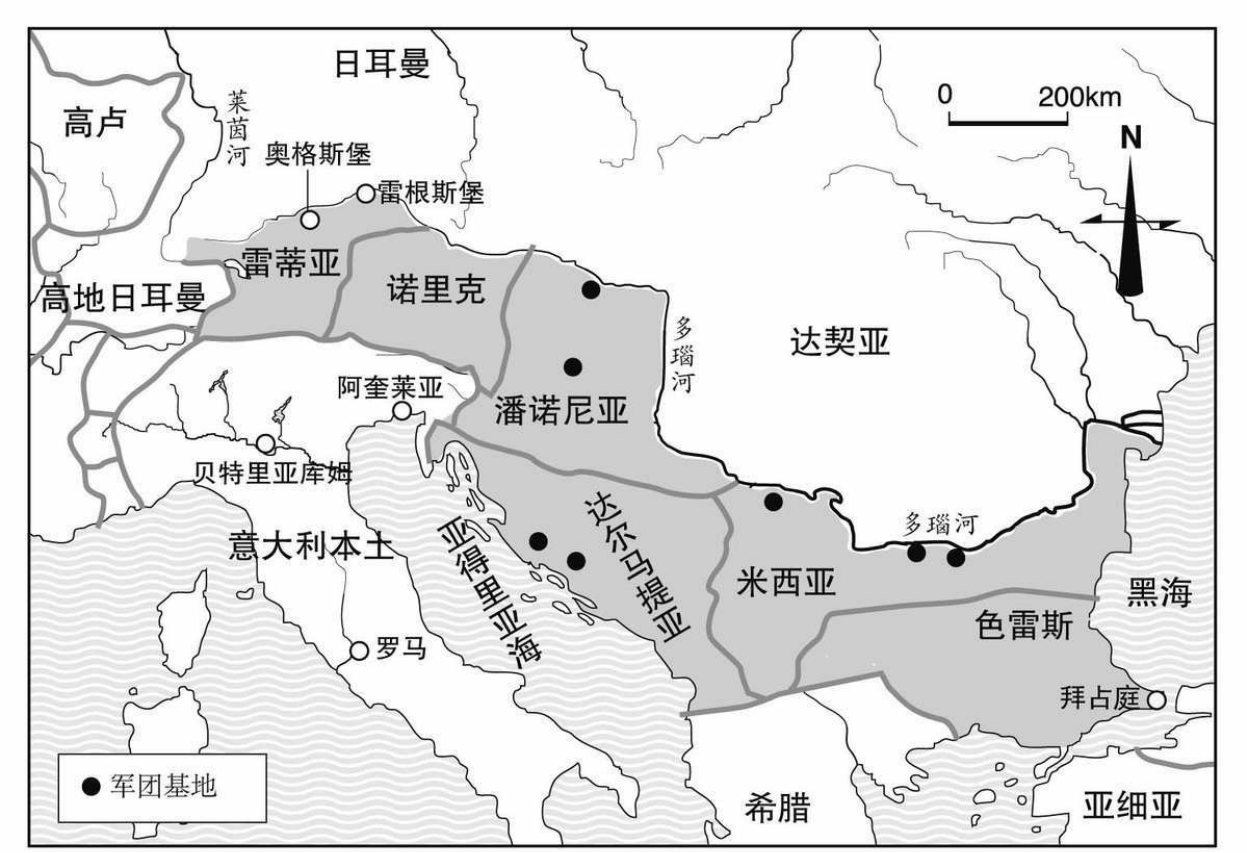
关于莱茵河防线的行省兵的叛乱，笔者想放到皇位斗争结束之后的公元70年来介绍，原因是维特里乌斯和穆奇阿努斯对于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到“高卢帝国”建国为止的一系列事件都采取了暂时搁置不管的态度。

不过二人的应对在表面上看来虽然相同，实质上却迥然相异。维特里乌斯必须优先对付眼前的敌人——韦斯帕芗一派的军团兵，所以不得已才暂时将莱茵河一带行省兵的叛乱放在一边，相反，穆奇阿努斯是故

意搁置不管的。维特里乌斯所倚仗的势力是负责防卫莱茵河的7个军团，本来应该协助这些军团兵的辅助兵们的叛乱势必会削弱“莱茵河军团”的战斗力，而穆奇阿努斯在作出处置前已经察知了这一点。

“多瑙河军团”

还有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就是“多瑙河军团”的军团兵们的行动，他们没等穆奇阿努斯抵达便擅自展开了行动。“多瑙河军团”的将士们仅仅在5个月前还在贝特里亚库姆为奥托一方作战，因为指挥系统的混乱而一败涂地。很多士兵虽然抵达了阿奎莱亚，却没来得及赶上参加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然而，获胜的维特里乌斯不管参战与否，将“多瑙河军团”的全体士兵都视为了战败者。只是由于曾为奥托一方作战，担当军团顶梁柱的百人队队长们全部遭到处决，士兵们简直就像被征服的蛮族一样，被逼迫修建罗马人娱乐用的圆形竞技场。后来好不容易得到归营的允许才返回了多瑙河流域，不用说他们心中积蓄的愤怒、屈辱和怨恨随时有可能爆发。



多瑙河军团的部署

之后他们接到了韦斯帕芗起兵反抗维特里乌斯的消息。虽然称帝的人不是他们当初希望的穆奇阿努斯，而是韦斯帕芗，但在他们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反对维特里乌斯就足够了，并且韦斯帕芗也是穆奇阿努斯积极支持的人。

“多瑙河军团”的将士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无法等到率领2万人的军队西进的穆奇阿努斯到达之后再展开行动，复仇的愿望驱使他们自己前往了西方。

“多瑙河军团”由驻扎在米西亚行省负责防卫多瑙河下游的3个军团、被调到潘诺尼亚行省防卫多瑙河上游的2个军团以及潘诺尼亚行省的南侧也就是隔着亚得里亚海与宗主国意大利遥遥相望的达尔马提亚行省的2个军团，共计7个军团组成。虽然可以统一归为多瑙河防卫军，但

由于分属不同的行省，所以也任命了3个行省总督。帝国边境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外敌入侵，因此行省总督就相当于军事上的司令官，任命权也掌握在帝国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手里。

但是，公元69年夏末在士兵当中自发而起的不稳定气氛超出了三个总督的掌控能力，他们身为司令官，对于维特里乌斯的不当处置没有提出抗议，而是置部下的死活于不顾，因此失去了士兵们的信任。三人中有两人秘密逃回了意大利。

军团长级别的指挥官们掌握了这支“多瑙河军团”的主导权。罗马军团以两个军团为一个战略单位，只被委托负责一个军团的话还称不上司令官，只能算是军团长，但这样反而有更多展现自己实力的机会，只要才能得到认可，30岁出头就晋升为军团长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公元69年秋天的这个时期，在掌握了主导权的军团长当中表现最抢眼的是马尔库斯·安东尼·普里默斯和阿里乌斯·瓦鲁斯这两个人，二人都只有30多岁，出生在法国南部图卢兹的安东尼·普里默斯在塔西佗苛刻的笔下是这样一个人物：

“在和平时代一无是处，一发生战乱便崭露头角。”

也就是说，燃烧着复仇火焰的士兵们在两名精神抖擞的将领带动下，无视穆奇阿努斯原地待命的命令而擅自展开行动了。

但是，被军团中处于下层的军团长们无视了自己的命令之后，司令官穆奇阿努斯表现出来的言行值得思考。

第一，对于已经行动起来的安东尼·普里默斯，他没有继续努力劝说对方在原地等自己抵达。

第二，他也没有让自己率领的东方军团加快行军步伐，追赶先行出发的“多瑙河军团”。

第三，接到达契亚人利用负责防卫的大多数军团都出发向西的间隙跨越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的消息后，他暂且中止西进，在确实击退蛮族的进攻之后才重新西进。

自尼禄皇帝时代起，帝国东方安全保障的关键——与大国帕提亚的睦邻友好关系在名将科尔布罗的全力推动下开始有所改善，科尔布罗自杀后，穆奇阿努斯一直是东方安全的最高责任人，在他看来，不管是自己负责的幼发拉底河防线还是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多瑙河防线，只要有外敌入侵都不能坐视不管。不过，这次的蛮族入侵没过一个月就被击退了，可见其规模还没有达到给帝国全体的安全保障带来巨大打击的程度。就算穆奇阿努斯以要事在身为由暂时搁置这件事情，相信也不会有人对他横加指责。虽说如此，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渡河入侵罗马领土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没有恶化之前解决为妙，因此穆奇阿努斯和他的军队“中途驻足”也是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式。但是由于这次“中途驻足”，穆奇阿努斯追上“多瑙河军团”已经是公元69年年末了。

笔者推测，穆奇阿努斯没准儿故意拖延了与“多瑙河军团”的会合，他有可能是打算将与必定出兵迎击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军团”之间的冲突交给安东尼·普里默斯指挥的“多瑙河军团”来处理，所以没有急着与他们会合。

从穆奇阿努斯此后的行动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冷静的人。冷静并不等于性格冷酷，而是指头脑冷静清晰，差不多相当于英语的“cool”。

内乱的平息单靠胜利是不能实现的，敌人其实也都是自己的同胞，用自己的手沾染同胞鲜血的行为能避免就应该尽量避免。本应带头平息这个国家“内乱”的韦斯帕芗决定在埃及待机的理由之一也是为了避免在内乱后成为皇帝时沾上同胞的鲜血，已经被公认为韦斯帕芗左膀右臂的穆奇阿努斯只要有机会避免沾上同胞的鲜血，当然也会选择这么做了。

旨在复仇的“多瑙河军团”和制造了复仇借口的“莱茵河军团”之间发

生冲突的话，势必会血流成河。然而，即使穆奇阿努斯率领的东方军团加入进来，也无法避免战斗带来的人员伤亡，这一点不会改变。

于是，被称为“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这场战斗在克雷莫纳镇和贝特里亚库姆之间直径30公里的平原上展开，虽然攻守易位，但是与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相同的是，交战双方仍然是维特里乌斯一派的“莱茵河军团”和打出支持韦斯帕芗旗号实际却原属奥托一派的“多瑙河军团”，穆奇阿努斯和“幼发拉底河军团”此时根本还没到达宗主国意大利和行省达尔马提亚之间的边境。

“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

接到安东尼·普里默斯率领的“多瑙河军团”正在逼近的消息后，正在首都罗马享受舒适生活的皇帝维特里乌斯和他手下的“莱茵河军团”的士兵们不得不如梦初醒了。他们决定出兵迎击，这次的目标也是死守波河。但是，身为皇帝同时又是最高司令官的维特里乌斯非但没有率军北进，甚至决定留在首都罗马，此外瓦伦斯又因病卧床不起，最后只能由席西纳率军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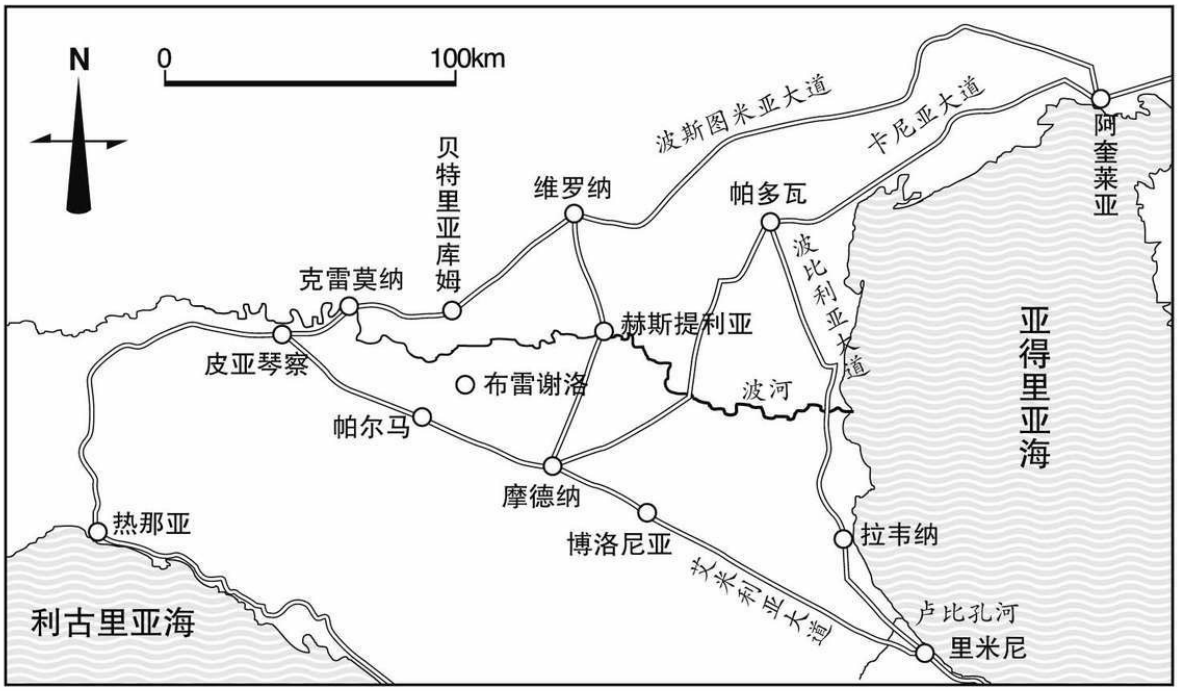
虽然目标同为死守波河，但是在上次战役中，对于防守方来说的敌人是从西方攻入意大利的“莱茵河军团”，因此，迎击方的前线基地是皮亚琴察，攻击方的前线基地是克雷莫纳。然而，这次的敌人是从东方攻入意大利的“多瑙河军团”，从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行省进入宗主国意大利后最先到达的重要城市是阿奎莱亚。从阿奎莱亚前往波河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从阿奎莱亚沿卡尼亚大道至帕塔维姆（现在的帕多瓦），从那里沿波比利亚大道南下到河口附近渡过波河，然后继续南下到达拉文纳（现在的拉韦纳），进而渡过卢比孔河进入阿里米努姆（现在的里

米尼），从那里就可以通过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抵罗马。

第二条是从帕多瓦通过平原一路南下到达波河，渡过波河后直指艾米利亚大道的路线。从皮亚琴察到里米尼的路程几乎由艾米利亚大道直线联通，这条道路沿线坐落着很多城市，它们的前身是意大利北部一带还被称为奇萨尔皮尼高卢行省时代的军团基地和退役士兵的殖民地，包括普拉森舍（现在的皮亚琴察）、帕尔马（现在的帕尔马）、穆蒂纳（现在的摩德纳）、波诺尼亚（现在的博洛尼亚）以及阿里米努姆。

第一条路线的好处是距离短，但也存在着河口一带土地松软不宜行走的缺点。如果选择第二条路线，距离会有所增加，但是可以在坚硬的地面上行军。



波河流域全图（再刊）

担任维特里乌斯军总指挥的席西纳判断敌军可能会从这两条线路的其中一条或者兵分两路渡过波河，于是他离开北上的军队前往拉韦纳，

因为驻扎在拉韦纳的舰队动向是阻止敌军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虽说是舰队，但不一定只在海上行动，在罗马军中，船上的战斗人员也经常登上陆地作为陆军使用。

但是，席西纳的估计很明显从一开始就错了。进入意大利之后的“多瑙河军团”没有选择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而是从阿奎莱亚沿波斯图米亚大道向西前往了维罗纳（现在的维罗纳），因为波斯图米亚大道经由维罗纳可以通往贝特里亚库姆和克雷莫纳。

席西纳的预测如果是作为军事战略倒还算切中了要害，但是他缺乏对人性的考虑，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作为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胜者，让失败的“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受尽了侮辱，只有不能理解被侮辱一方感受的人才会做出侮辱自己同胞的事情来。

“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想报仇雪恨。而人在急欲报仇雪恨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地选择当初含泪受辱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贝特里亚库姆和克雷莫纳，席西纳却猜不透这些。无论多么合乎道理的战略，没有对人性因素的考虑，就只是纸上谈兵。

然而，不知是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失误感到了绝望，席西纳在维罗纳作出了重大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从维特里乌斯一方来说可以用“背叛”来形容，而在席西纳看来，相当于对维特里乌斯的抛弃。

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于秘密支持韦斯帕芗一派的拉韦纳舰队提督的游说，或者是席西纳心中早已萌生了这个想法，和提督的交谈成为了催化剂。总之他心里至少很清楚，自己一个人叛变没有任何意义，必须带上手下的军队。

得知“多瑙河军团”开始向维罗纳集结的消息后，本来准备死守波河的维特里乌斯军一分为二。第一军立刻渡过波河进驻克雷莫纳，以此为前线基地。第二军也渡过波河，然后据守赫斯提利亚（现在的奥斯提利

亚），阻击位于正北方向维罗纳的敌军。

不久他们终于意识到“多瑙河军团”在渡过波河攻入首都罗马之前首先是要前往贝特里亚库姆和克雷莫纳。既然这样，从克雷莫纳和奥斯提利亚两处出兵，集结到维罗纳之后对西进的敌人进行夹击的作战计划也是可行的。

于是，作战计划开始了，率先发难的维特里乌斯一方的军队拥有总数6万人的可怕战斗力，相反，“多瑙河军团”一方的各行省、军团的部队都是分别到达的，全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到一起。如果当时席西纳有意利用这个机会的话，胜利必定会属于他。但是，席西纳在士兵们面前发表的演说不是鼓励士兵冲锋陷阵，而是煽动“倒戈”。

军官级别的人都赞同席西纳的意见，对皇帝维特里乌斯感到失望的人不止席西纳一个。但是，百人队队长和普通的士兵们都坚决反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仰慕维特里乌斯，维特里乌斯成为他们的司令官还不到一个月，并且当上皇帝以后的维特里乌斯没有为他们做过任何事，当然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做过。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百人队队长和普通士兵害怕“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的复仇。在半年前的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中失败的“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遭到了侮辱和冷酷的待遇，其命令来自维特里乌斯、席西纳以及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们，但是实际执行的却是下级将领和普通的士兵。只有他们是与受尽屈辱、生不如死的“多瑙河军团”的同行们直接接触并亲眼见到他们胸中燃烧着怨恨之火的人，这非常像战俘集中营的俘虏与集中营狱卒的关系，并且现在的双方同为罗马市民，也都是罗马军的士兵。

反对倒戈的士兵们抓住席西纳，将他套上枷锁投入了大牢，但这样一来维特里乌斯军便失去了担任总指挥的人，无法再称其为军队。不过“多瑙河军团”一方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负责防卫多瑙河这条帝国防线的“多瑙河军团”被分派到三个行省驻扎，负责指挥的三名行省总督中的两个人因为士兵们的弹劾而逃回了意大利本土，只有负责防卫多瑙河下游的米西亚行省的总督与手下的士兵们一起前往意大利本土。这意味着他也反对维特里乌斯，转而支持了韦斯帕芗。

这个名叫萨图尼努斯的总督与手下的3个军团一起进入意大利后，率领潘诺尼亚的2个军团先行到达的安东尼·普里默斯的处境就变得很微妙了。萨图尼努斯是受委托统率3个军团的司令官，安东尼·普里默斯虽实际统率2个军团，正式的职位却只是一个军团的长官。既然行省总督到来，“多瑙河军团”全军的总指挥权就必须移交给总督。

安东尼·普里默斯对此感到很不满，并且跟随他的潘诺尼亚的2个军团还是更希望由干劲十足的安东尼·普里默斯领导自己，而不是性格温和的萨图尼努斯。于是军团长安东尼·普里默斯便要求总督萨图尼努斯留在帕多瓦集结后续抵达意大利的友军。萨图尼努斯大概是颇有察言观色的眼力，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这个要求。如此一来，“多瑙河军团”的指挥系统终于得到了统一。

史学家塔西佗评价安东尼·普里默斯是个平时一无是处、战时才派得上用场的人，然而，如果不是平时也能有所作为的人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到了战时也难以发挥什么作用，因为成为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就是对部下的统率力。

统率力必不可少的理由在于目标的达成必须是完美无缺的，放到战斗中的胜利来说，就必须是压倒性的胜利，喜欢和敌人拼刺刀的想法仅限于单纯的好战分子。

亚历山大大帝

大西庇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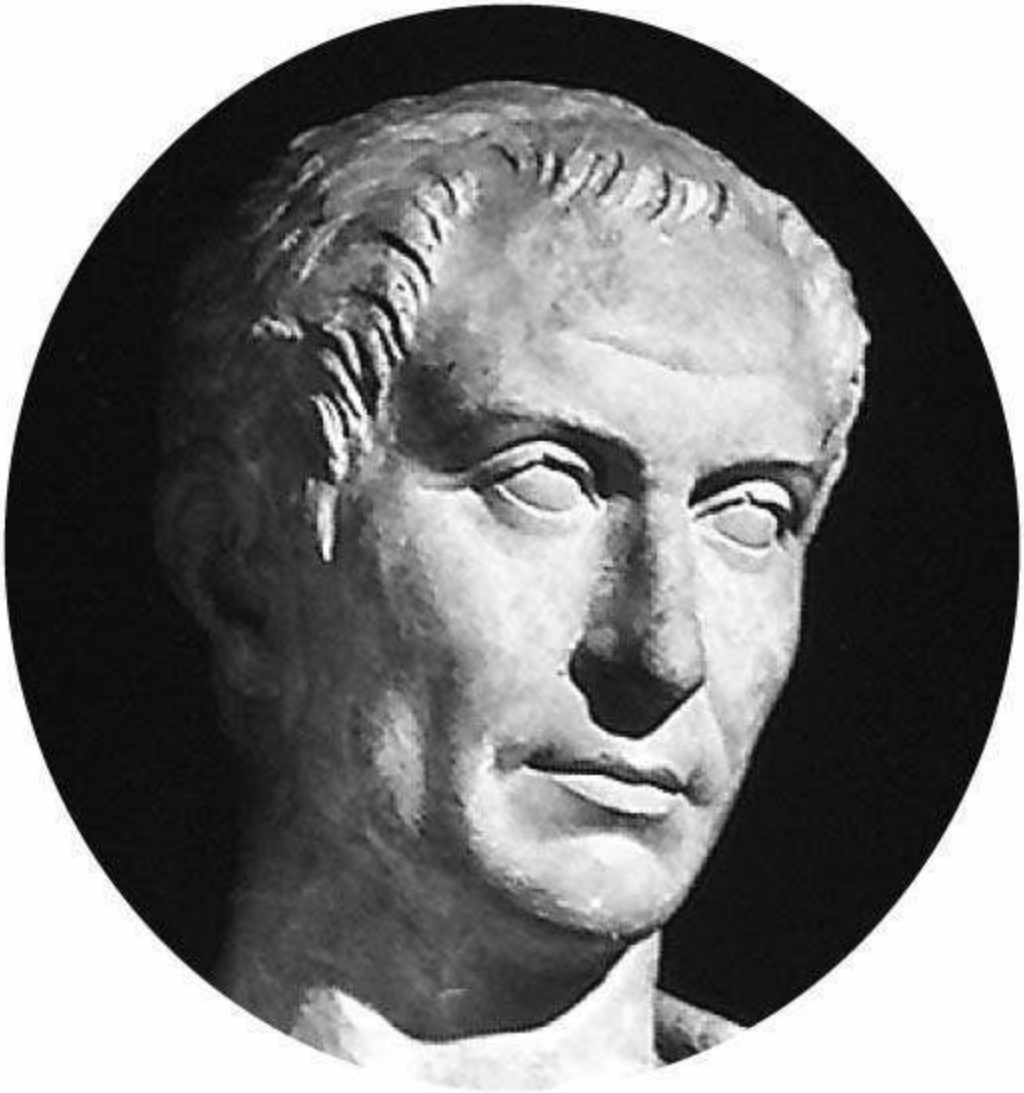
汉尼拔

“战争”这个人类无法超越的罪恶所具有的唯一好处就是，通过发动它可以一举解决此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取得压倒性胜利便毫无意义的理由也在于此，因为勉勉强强的胜利很有可能让战时的状态迟迟无法结束。

压倒性胜利也不是以敌方的死亡人数来计算的，相对而言，减少本方的牺牲更为重要。因为为了让胜利具有真正的意义，就需要让敌人陷入无法再战的状态，顾名思义就是每场战斗都必须是决战。因此比起将

敌人赶尽杀绝，保持本方实力是更有效的办法。牺牲者少的话，可以避免士气低落。如果要求士兵们看见直到昨天还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同伴在身边相继被杀死后士气依然能够不受影响，只能说这是无视人性的强人所难。

苏拉



恺撒

庞培

正因为最终目的是在避免无谓牺牲的前提下获得胜利，才需要对己方士兵的完美统率力。为了一口气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制定战略和战术时，也需要对手下的士兵拥有完美的统率力。

但是如果是对人数多达5万人的士兵行使这种统率力的话，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纵观古代西欧的战争史，屈指算来也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西庇阿、苏拉、庞培和恺撒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以少于敌人的兵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所以在战略战术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

物。但是，他们胜利的真正原因在于对自己军队士兵的完美统率力。

虽然手中掌握着兵力达5万的“多瑙河军团”，安东尼·普里默斯却缺乏这种能力。维特里乌斯一方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且拥有指挥数万兵力经验的席西纳也脱离了战场。另外，瓦伦斯在得知席西纳倒戈后顾不上大病初愈，取海路前往法国南部，准备在那里重整军队攻击从西方前来的“多瑙河军团”，但是在法国南部刚一登陆就被支持韦斯帕芗的高卢人俘虏。敌我双方人数共计10万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会以怎样的结果结束，从两军同样缺少有力指挥官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很容易推测出来。

公元69年10月24日展开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和第一次一样，自始至终持续着混乱的状态。尽管攻守双方互换了位置，但参战的士兵与第一次一样，都是维特里乌斯一派和奥托一派的士兵，此外这次也是攻方获胜。不过在这次，胜者的参战动机是复仇和雪耻，并且由于无法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得大量敌兵逃亡，次日又对这些人的逃亡地点——克莱莫纳展开了进攻。

“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没有忘记半年前在克莱莫纳圆形竞技场的施工现场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并且遭到克雷莫纳居民侮辱的经历。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悠久的克雷莫纳镇被彻底摧毁，居民不论有无反抗，都被斩尽杀绝。对居住着罗马同胞的这个城市实行的残忍屠杀让听说这个消息的人无不为之毛骨悚然，这就是历经两天的战斗和之后持续四天的克雷莫纳攻略战的结果。

包括非战斗人员的克雷莫纳居民在内，两军的死亡人数达到4.2万。

在庞培和恺撒之间展开的法萨卢斯战役中，两军合计有8万人参战，但庞培一方的战死人数为6000人，恺撒一方只有200人，合计6200人。失败的庞培军被俘2.4万人，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中却没有俘

虏，因为“多瑙河军团”将“莱茵河军团”和克雷莫纳的居民们一个不留地杀死了。被缺乏统率力的领导者指挥的集团已经不再是什么战士，而是变为了一群野兽。

在贝特里亚库姆战败和克雷莫纳发生惨剧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首都罗马，维特里乌斯没有和奥托一样选择自杀，但是也没有站起来准备迎击必定会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多瑙河军团”。他不是没有兵力迎击，在贝特里亚库姆和克雷莫纳战败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已经逃回维特里乌斯所在的首都罗马了。

塔西佗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的皇帝维特里乌斯：

> 他躲藏在庭院的树荫下，有人端来食物时才会抬起头，除此之外的时间都是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只对过去、现在、未来都失去了兴趣的动物。

对于知道维特里乌斯身体肥胖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一段令人有亲眼所见之感的描写。但即使首领已经是这样一副惨状了，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还是准备拼死一战，因为他们实在惧怕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多瑙河军团”士兵的复仇。

进攻方的安东尼·普里默斯也预料到维特里乌斯一派的残兵会拼死迎击。

他离开了化为废墟的克雷莫纳镇，渡过波河，从那里沿艾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然后从里米尼顺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抵达首都罗马的郊外，前后一共花了50天的时间。这个距离乘快马5天便能走完，他却用了10倍的时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害怕维特里乌斯军的残兵沿途设置埋伏，所以途中一直像瞎子摸路一样小心行军。艾米利亚大道是在能见度非常好的平地上铺设的

笔直道路，但弗拉米尼亚大道要穿过亚平宁山脉。

第二个原因是安东尼·普里默斯没有足够的统率力。要顾及全部5万兵简直是痴人说梦，结果走在最前头的安东尼·普里默斯的身后变成了一支杂乱无序的队伍。证据就是，瓦伦斯在没有他命令的情况下被处死，相反，席西纳却被释放。

第三，也许现在安东尼·普里默斯通过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获胜并摧毁克莱莫纳从而满足了复仇的愿望，现在又打算等待从东方前来的穆奇阿努斯和“幼发拉底河军团”了。

安东尼·普里默斯只不过是被委任指挥潘诺尼亚驻屯的1个军团的军团长而已，穆奇阿努斯是拥有4个军团指挥权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如今作为起兵称帝的韦斯帕芗的代理人，为了彻底打败维特里乌斯，正在向宗主国意大利前进。二人除了在军队中的地位有明显差距，在社会地位上也有天壤之别，穆奇阿努斯属于出身意大利的元老院阶级，安东尼·普里默斯却是行省出身。另外，在年龄上，与五十大几的穆奇阿努斯相比，安东尼·普里默斯只有三十出头。人在专注于行动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事情，等到行动告一段落后又重新在意起来。穆奇阿努斯击退利用罗马人同室操戈的机会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的达契亚人后继续西进，但“幼发拉底河军团”进入意大利的消息一直没有传来，结果安东尼·普里默斯又燃起了虚荣心，决定让自己成为导演废除维特里乌斯拥立韦斯帕芗这出好戏的主人公，不过这也是他这种人适于在乱世中立足的证明。

第四，不仅安东尼·普里默斯，“多瑙河军团”的全体士兵在结束贝特里亚库姆战役、摧毁克雷莫纳之后产生的情绪松懈也应该算做一个原因。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大仇得报，消解了心中的怨恨。得知“多瑙河军团”正在逼近意大利时，皇帝维特里乌斯曾下达过派遣援军的命令，但是西班牙和不列颠的5个军团只是抱着观望态度，等到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有了结果后，他们又纷纷表明了支持韦斯帕芗的态度。安东尼

·普里默斯认为维特里乌斯已经是瓮中之鳖。

维特里乌斯遇害

针对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缓慢南下的“多瑙河军团”，为阻止其接近首都而北上的维特里乌斯一派展开的数次迎击也因为士兵们在12月15日投降而偃旗息鼓，除了吃就是睡的维特里乌斯在第二天即16日知道了这个消息。

这名54岁的皇帝穿着丧服走出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前往古罗马广场。对于罗马的平民们来说，皇帝的身影真是久违了。维特里乌斯站在古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向围观的市民们宣告，为了让国家恢复和平，他愿意退位，然后把佩剑递给身边的执政官，说自己的生死交由市民们处置，执政官拒绝接受他递过来的佩剑。维特里乌斯又说会把皇帝的徽章归还康科迪亚神殿，自己移居到私人宅邸居住。

之前一直沉默倾听的市民们此时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他们坚持主张皇帝只能住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中，要求他回去，维特里乌斯伫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聚集在古罗马广场的人们为了防止他逃到帕拉蒂尼山以外的地方，将圣道（via sacra）之外的各个方向围了个水泄不通。维特里乌斯在民众的喊声中通过圣道登上帕拉蒂尼山，再次返回了皇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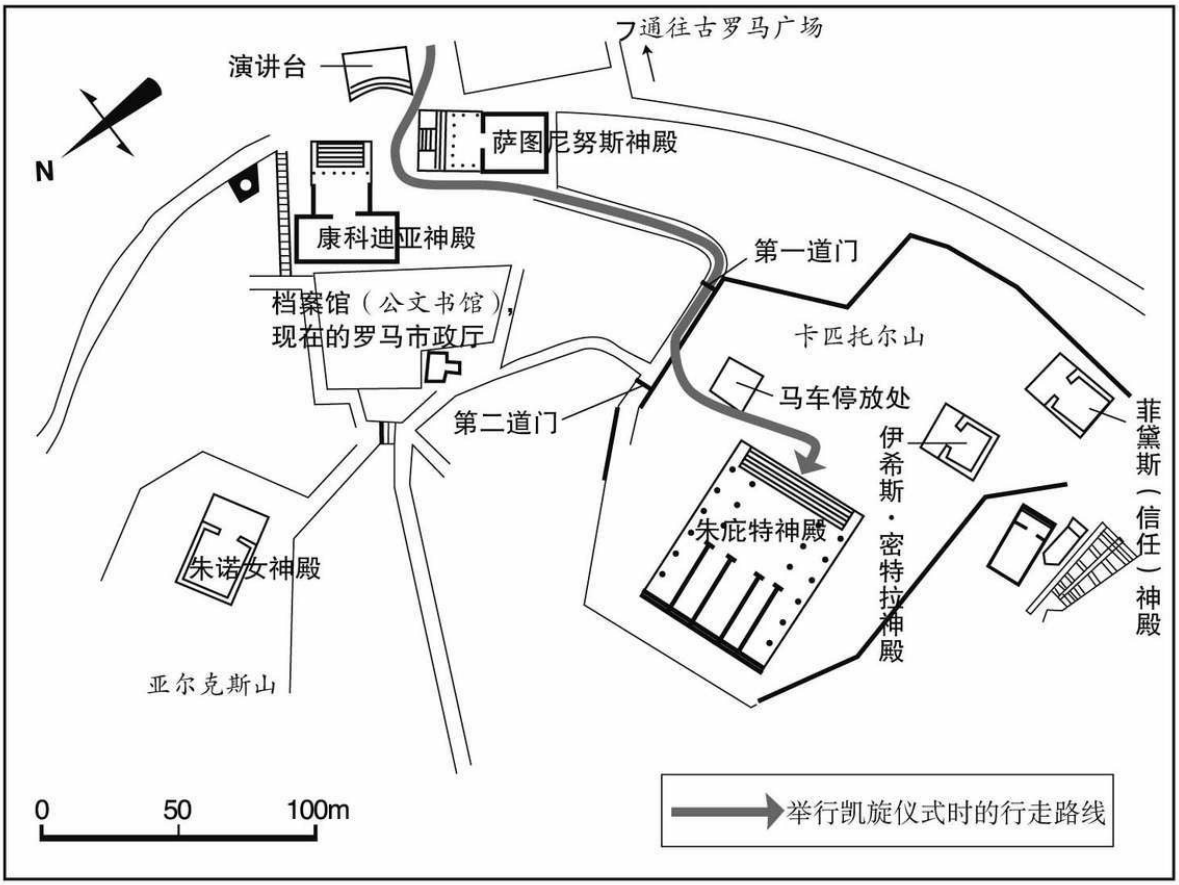
翌日，即17日，针对维特里乌斯表明退位之意的情况，元老院开始了行动，他们打算将皇位从维特里乌斯手里和平过渡给韦斯帕芗。为此，元老院的重要议员拜访了韦斯帕芗的亲哥哥——首都警察长官萨比努斯，维特里乌斯一派的残余势力得知这件事后群情激愤，因为事情的决定没有与他们经过任何商量，另外他们肯定也是因为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于是，他们把不安和愤怒投向了韦斯帕芗的哥哥萨比努斯。

18日，曾在多位皇帝手下担任行政官僚职务的萨比努斯也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与身在罗马的侄子也就是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一起逃到了卡匹托尔山上。卡匹托尔山又名卡比多里奥（Campidoglio），坐落着供奉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及其他神殿，是罗马市内唯一的圣域。萨比努斯觉得就算变为暴徒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也不会攻击这座山，然而已经因为不安和愤怒失去理智的士兵们就连这片圣域也包围了。

当晚，萨比努斯派遣使者前往卡匹托尔山旁边的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要求维特里乌斯命令士兵们解除包围，维特里乌斯让使者带回的答复却是，包围卡匹托尔山是士兵们的主意，自己无计可施。维特里乌斯已经失去控制局面和阻止事态扩大的能力了。

到了19日，天还没亮，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开始了对卡匹托尔山的大举进攻。本来为照亮山路而携带的火把都拿来用做了焚烧躲避在神殿内的人群的工具，扔出的火把点燃了石造神殿内各处的木材。即使不是塔西佗本人，任谁看到这种景象都会愤慨不已，而直到太阳高照之后，这幕惨剧还在聚集而来的罗马人面前上演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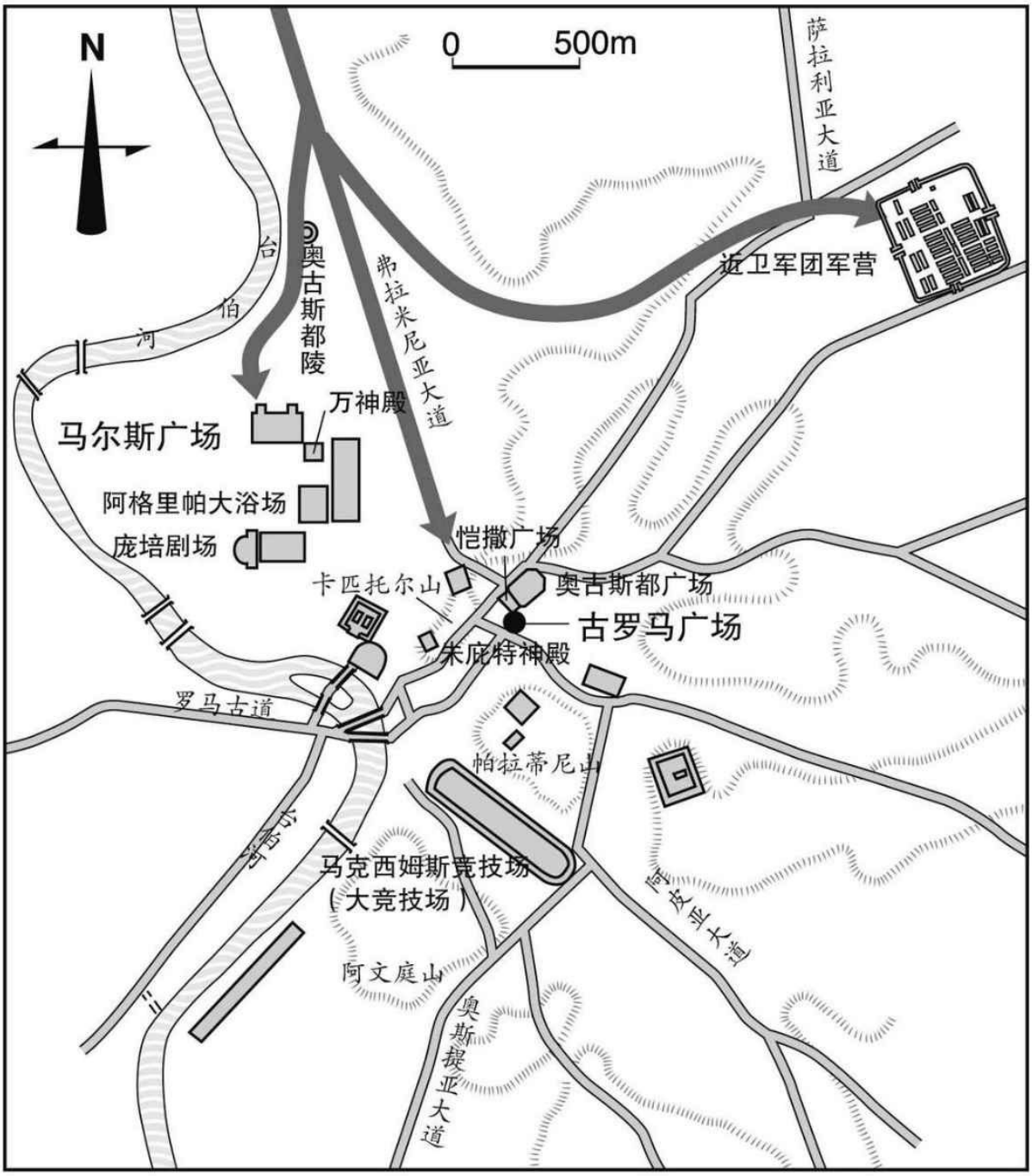
供奉着罗马众守护神的神殿不是被他国人、而是罗马人自己亲手烧毁的，并且不是意外的火灾，而是故意放的火。这是自公元前753年建国历经822年以来首次发生的可耻事件，据说亲眼看到神殿燃起熊熊大火时，之前还在投放火把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都茫然地愣在了那里。趁这个间隙，图密善成功逃走，萨比努斯却成了士兵们的俘虏。



卡匹托尔山上的神殿分布图（公元69年）

成为俘虏的萨比努斯被士兵们带到了维特里乌斯面前，维特里乌斯也打算救这个在首都警察长官的岗位上尽职12年的名副其实的公仆一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了统领部下的能力。

当日后半夜，安东尼·普里默斯率领的“多瑙河军团”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罗马以北15公里的消息传到了皇宫，萨比努斯的命运就此确定。他在束手无策的维特里乌斯面前被杀死，遗体被士兵们扔到了台伯河中。这样一来，能够让首都罗马避免成为武装冲突的舞台的唯一可能性荡然无存了。



罗马巷战中攻击方的进军路线（箭头）

第二天即12月20日，在马略和苏拉之间爆发的内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让首都化为武装冲突的舞台150年之后，罗马

市内再次展开了巷战。

并不是没人为避免巷战作出努力，维特里乌斯曾经通过因终生未嫁而广受人们敬仰的女祭司长送信给安东尼·普里默斯，表示希望用退位换来事态的和平解决，元老院和骑士阶级中也有个别人出面调停，安东尼·普里默斯对于将帝国首都变为巷战舞台的做法也心存顾虑。然而，维特里乌斯已经失去了控制手下士兵的能力，安东尼·普里默斯也不例外。能够在咄咄逼人的进攻方和恐惧绝望的防守方之间担任中间人的唯一人选萨比努斯被杀的代价太大了，因为这样就给进攻方制造了为自己支持的韦斯帕芗死去的亲哥哥报仇的正当理由。

不过安东尼·普里默斯还是制定了对策，争取尽快结束不可避免的巷战。他将手下的全体部队分为三军：第一军攻打近卫军团的兵营，第二军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行前往古罗马广场，第三军沿台伯河南下夺取与古罗马广场同样有很多公共建筑物的马尔斯广场。

乍一看，这项作战计划颇为合理，因为“多瑙河军团”是沿着联结意大利北部和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前来，如果目标是首都的话肯定会从北面攻来，但这项作战计划实际上暴露了安东尼·普里默斯在战略战术上能力有限。

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与帝国内的其他城市不同，唯独首都罗马没有被城墙包围起来。恺撒认为帝国的安全应该依靠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三大防线以及各处边境的防御来保障，帝国的中心——“世界的首都”罗马不需要城墙，于是推倒了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城墙——塞维利乌斯城墙（Mura Serviane），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0年。塞维利乌斯城墙虽然在各处还保有残骸，但是如果城墙不是将城市整体包围起来的话就派不上用场了，保留到现代的奥勒留城墙是在国境的安全保障开始受到威胁的3世纪后半期才新建的。因此，在公元69年末的这个时候，“世界的首都”罗马是一个没有城墙保护的城市，根本没有必要像攻打意大利北部的中等城市克雷莫纳那样发动攻城战，军队从东西南北任

一方向都可以入侵罗马。也就是说，让兵分几路的军队从各处攻入，阻断并孤立前来迎击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军队，迅速迫使其投降绝非天方夜谭。

并且，维特里乌斯的亲弟弟卢西乌斯率领的一支军队正在距罗马南方的阿皮亚大道100公里的塔拉奇纳（现在的泰拉奇纳）待机，有可能是准备一旦局势不利便逃往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后除莱茵河沿岸之外唯一表示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行省阿非利加。在这种情况下，在罗马市内迎击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们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肯定会向南逃走。结果，公元69年12月20日展开的巷战便从北向南波及了罗马的全部市区。

最激烈的战斗是围绕近卫军团的兵营展开的。因为是兵营，四周都有防御用的墙壁，营内也存有大量武器，并且进攻方和防守方都只有纯战斗人员参加。不过防守这里的是维特里乌斯从自己手下的“莱茵河军团”中挑选出来重新组成的16个大队共1.6万人的近卫军团兵。进攻方的主力是因为曾在奥托手下作战而被维特里乌斯解雇的9个大队共9000人的近卫军团兵旧部，这些士兵相当于正在攻打半年前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激战持续了一整天，维特里乌斯一派的近卫军团兵持续抵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据说每名士兵都是从正面受到的攻击，没有一个人转身逃走。

在其他地方展开的巷战却截然相反，史学家塔西佗这样描述：

> 首都的民众就像在竞技场观看角斗士比赛一样旁观了这一天在市内发生的战斗，他们对英勇奋战的人报以掌声和欢呼，对陷入苦战的人喝倒彩，并让他们加把劲。如果陷入劣势的人逃入店铺和民居中，他们会要求将其拖出来杀掉。然而他们却又趁士兵们全神贯注作战的机会，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应得的战利品。
>
> 首都到处上演着不祥的景象，令人唏嘘不已。士兵们打得你死

> 我活，死者横尸遍地，负伤者发出痛苦的哀号，同一时间的公共浴场和酒馆却人声鼎沸。在血流成河、堆积如山的尸体旁边，妓女们还在和嫖客讨价还价。一边是享受着和平的快乐人群，不远处的另一边却是被残暴押解的残兵败将。总之，整个罗马化为了一座疯狂和堕落的城市。
>
> 首都内的这次巷战在罗马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苏拉导演过两次，还有一次是秦纳。但是，现在与那时的区别在于民众的漠不关心。首都的民众对内乱的结果不感兴趣，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好戏，并且此时又正值萨图尔努斯节，民众就如同欣赏节日表演一样观看了这场巷战。对于他们来说，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帕芗哪一方获胜都无关紧要。就这样，首都的平民居然把对于国家的一场灾难变为了乐趣。

笔者能够体会爱国者塔西佗心中的感慨，但是又不禁觉得平民们这种“如同在竞技场观看角斗士比赛一样旁观罗马人巷战”的反应才是正确把握了现状。确实，公元69年末的首都内战对于罗马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然而民众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知道无论哪一方获胜，改变的只有皇帝的人选。并且凭借平民的智慧，他们肯定也知道，经过皇位屡次更替这种自然淘汰之后的结果便是相对来说略微好一些的“头领”登上皇帝的宝座。

塔西佗的特色在于他是一名无愧于史学家称号的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会将所有事情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经常记录一些与自己的期望截然相反的历史事件。

在上边的一段文字中，塔西佗大加指责罗马平民将国家的灾难当做一场表演来欣赏的行为，但是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可能对于罗马平民敏锐的批判精神印象更深。不过在此应该交代一下，后世的很多历史研究者都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塔西佗讲述的内容。另外，在苏拉和秦纳的内战时，民众之所以对其有所关心，是因为内战的走向会决定他们的生活

是否能够改善。那个时代的内战是由于元老院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对立而爆发的，苏拉属于元老院一派，与苏拉作对的马略和秦纳是平民一派的头领，所以在平民看来，应该声援谁不言而喻。（参阅《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

将话题转回到公元69年12月发生的巷战，除了正在展开激战的近卫军团兵营之外，其他战场的胜负都已经见了分晓。之前不得已逃到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中的维特里乌斯在此时不知出于什么想法，趁机离开了皇宫，他大概是打算逃出罗马，到泰拉奇纳的弟弟那里躲避。不过奇怪的是他却没有带上卫队，紧接着又改变主意返回了皇宫。但是就在这不一会儿的工夫，皇宫中的人连带用人在内跑得一个不剩。发现宫中已经没人的维特里乌斯不知又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到皇帝的私人房间去，而是走进了一处守卫们平时经常待的区域。“多瑙河军团”的士兵们没过多久就找到了藏在这里的皇帝，将他拖到了室外。

被捆住双手的维特里乌斯像头猪一样被士兵们赶着从帕拉蒂尼山上走下来，到达古罗马广场，在那里被轻描淡写地处死了。没有史实证明是安东尼·普里默斯下的命令，担任巷战总指挥官的这个人此时在哪里也无从查考。皇帝的尸体同重罪犯遭受的处刑一样，被扔到了眼前的台伯河中，他一共在位8个月，死时54岁。

由此，罗马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见证了三个皇帝的死亡。到此为止，历史上称为“三皇帝时代”，在塔西佗笔下“险些成为帝国最后一年”的公元69年也终于要画上句号了。

数日后，似乎等待已久的穆奇阿努斯到达了罗马。这位韦斯帕芗的左膀右臂（更恰当地说是智囊）没有效仿维特里乌斯半年前的所作所为，为了炫耀胜利而率军大举入城。穆奇阿努斯不是以内战的胜利者身份来到罗马的，而是以内战中崩溃的秩序重建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位冷静的统治行家立刻成功地将一切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下。

他首先向泰拉奇纳派遣军队，消灭了维特里乌斯的弟弟在那里驻扎的部队，卢西乌斯·维特里乌斯被处以死刑。这虽然无情，但也是为了不给维特里乌斯一派的余党留下主心骨。

其间召开元老院会议，让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二人当选了翌年即公元70年的执政官。韦斯帕芗还在埃及等待时机，提图斯也在为来年春天开始的耶路撒冷包围战进行准备，所以两人都没有到场，不过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无法在场，同样可以就任执政官。将实力上数一数二的这两个人推举为执政官也意味着罗马帝国秩序重建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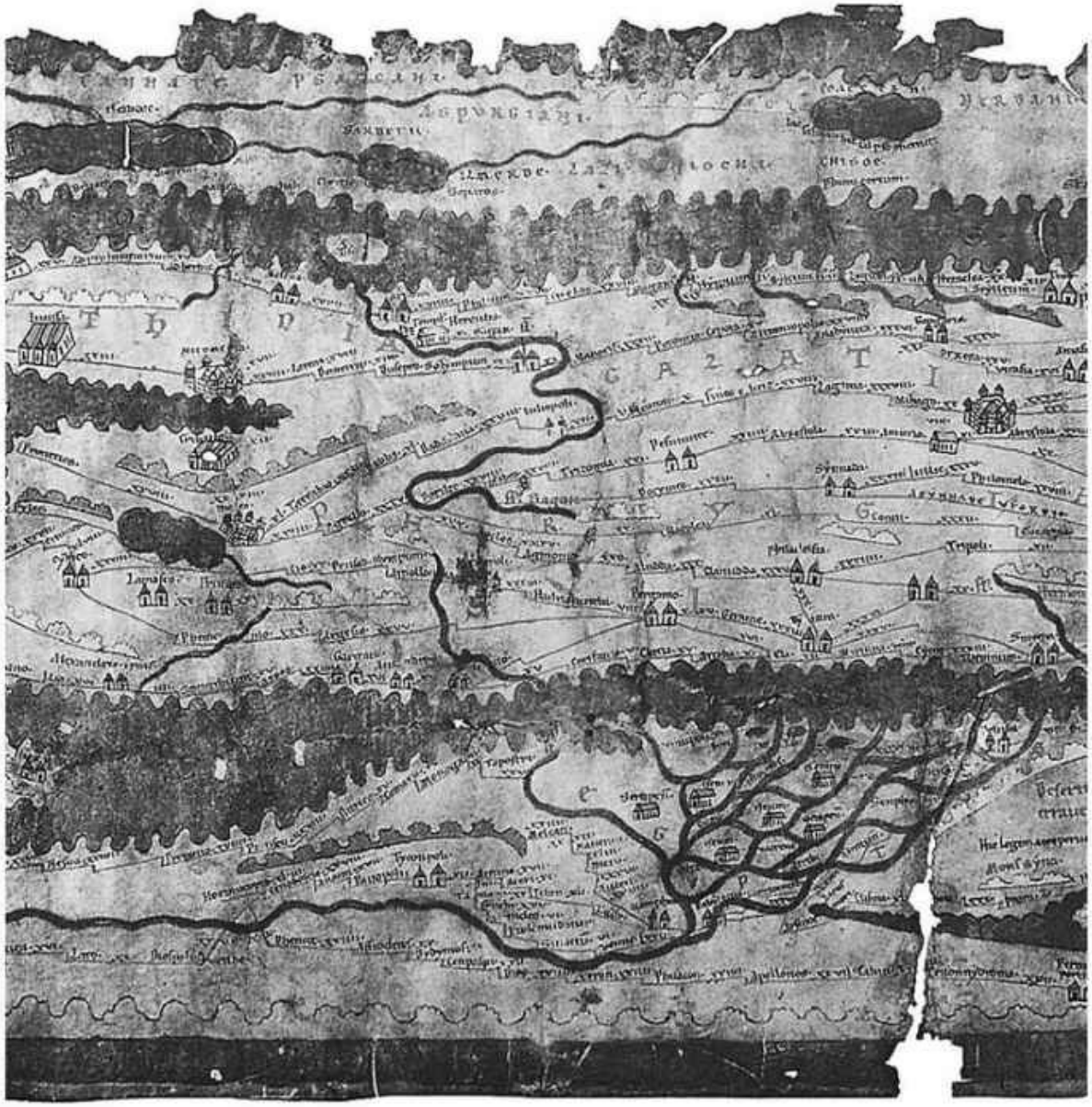
对于打倒维特里乌斯的真正功臣安东尼·普里默斯，虽然也向元老院提议论功行赏，但没有给予除此之外的任何报酬。安东尼·普里默斯对此无法接受，但他只不过是一名军团长，穆奇阿努斯却态度坚决，又是行省总督。仰慕安东尼·普里默斯的图密善又为他邀功请赏，但是穆奇阿努斯没有听从韦斯帕芗这个18岁的次子的要求。对自己的待遇大为不满的安东尼·普里默斯乘船前往埃及，直接向韦斯帕芗邀功，可是新皇帝的态度也未能满足这位34岁的野心家。这是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两人完美合作的又一个证明，并且在战时能有所作为的人未必在平时也能派上用场。

但是，就像史学家塔西佗所说，至此战争状态告一段落，并不等于恢复了和平与秩序。为了恢复和平、重建秩序，到韦斯帕芗返回意大利的公元70年秋天之前，穆奇阿努斯实际扮演了皇帝的角色，彰显其决心的第一项举措便是重建被烧毁的朱庇特神殿。

然而，和平的首要条件——秩序的恢复，仅凭重建神殿这种和平事业是无法实现的，官方身份还只是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穆奇阿努斯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便是在莱茵河周边爆发的行省兵们的叛乱。

第四章

帝国的边境



在《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写到恺撒和庞培之间发生的内战时，笔者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行省人民为何没有趁这个时候发动起义呢？二人都将军队把持在自己手中，此前被罗马人征服的地方在军事上都处于真空状态。恺撒刚刚征服了高卢，庞培称霸东方最多也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罗马世界的东西方，败给这两人的人们都还健在，如果这些人有意为自由和独立再战的话，罗马人之间自相残杀的内战正是一个好机会。

然而，在内战持续的三年半中，没有任何一个行省揭竿而起反抗罗马。被恺撒驱赶到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销声匿迹，没有尝试过一次在恺撒出现以前屡试不爽的跨越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罗马人之间的内斗还包括从恺撒被暗杀后到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终结内战为止的14年。不过这14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布鲁图与卡西乌斯对决安东尼与屋大维以及接下来的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冷战状态下，真正发生交战的只有腓立比战役和亚克兴角海战这两次，因此难以拿来作为比较对象。能够与公元69年的内战进行比较的只有120年前的恺撒与庞培的对决。

另外，由于尼禄的死而爆发的公元69年内乱仅持续了一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之间，除了依靠皇帝尼禄的决断成功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东方防线之外，利用罗马人互相争斗的机会起兵反抗罗马的民族不在少数。

在尚未实现全面征服的不列颠，由于要应对揭竿而起的原住民部族的反抗，在接到宗主国意大利的召集命令时，驻扎在此的3个军团中只有1个军团作出了响应。

在多瑙河防线方面，达契亚人抓住这个时机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正在向西进军的穆奇阿努斯只能和剩下的军团兵一起抵挡。

在莱茵河防线方面，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幸事件——罗马军中非主要战斗力的辅助兵攻击了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并且，这些日耳曼裔的辅助兵不仅配合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裔部族一起行动，还煽动同为罗马行省人民的高卢人，企图建立高卢帝国，从罗马的统治下独立出去，问题非同小可。

为什么在恺撒和庞培之间的三年内战中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三皇帝时代统治的短短一年之间，边境却如此动荡呢？

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于足以领导反罗马运动的行省实力派人士而言，庞培和恺撒都是在罗马世界中家喻户晓、数一数二的名人。相反，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在帝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却很低。不知道对手是谁的话，起兵反抗时也不会感到什么压力。

第二，庞培和恺撒都是拥有压倒性战绩的人物，前者扫除了地中海的海盗进而称霸东方，后者征服高卢并取得了对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两个人对于行省的实力派人士和居住在罗马防线之外的人来说，是让他们尝到完败苦果的始作俑者。

相反，另外三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虽然有担任行省总督的经历，却没有打过胜仗。在行省人民和边境的部族看来，他们并不是尽全力作战也无法战胜的对手。韦斯帕芗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此成功结束犹太战争对于韦斯帕芗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在于战场位置不同。

当时恺撒和庞培交战的战场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北非，最后又回到西班牙，可以说遍及罗马世界全境。相反，公元69年的战场只

有北非，并且前后两次都是在半径二三十公里的相同范围内交战。即使把首都罗马也算做战场，同样没有跨出意大利本土一步。在广大的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在帝国中央的意大利展开的战斗。

总之，可以将前者的例子当做以整个非洲大草原为舞台展开的大象之间的激战，感觉就好像由一头体格最大的雄象率领的象群从对于自己来说不是很宽敞的大草原正面排山倒海般冲过来一样。这样一来，连狮子也只能害怕得躲在草原的一角观望形势了，因为如果贸然踏入草原的话，很可能会被横冲直撞的象群踏成肉泥。连身为百兽之王的狮子都是这副模样，经常敢于成群结队与狮子为敌的鬣狗恐怕也只有屏住呼吸等待结果的份儿了。

相反，公元69年的情况却如同一群雄狮在大草原的中央为争夺配偶而展开决战一样，这不是一场让其他动物害怕得不敢动弹的激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是一场围绕着国家政体展开的斗争，结果将决定是一如既往地继续采用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还是选择对于罗马而言属于新政体的帝政。与此相比，公元1世纪的内战只不过是决定由谁来领导已经持续百年的帝政而已。在远离战场的大草原周边，不同的种群可以自由地展开行动。

塔西佗认为“虽然维特里乌斯的死让战争状态结束，但这不等于恢复了和平”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雄狮之间已经分出了胜负，但是大草原的其他地方仍然持续着混乱无序的状态，让这种状态恢复如初便成了新皇帝韦斯帕芗和他的左膀右臂——穆奇阿努斯的工作。

行省兵的叛乱

现代的我们听到“荷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遍地盛开的郁金香，还

有这是个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低于海平面的区域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的辛勤劳动的民族，但荷兰人同时也是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以超群的实力让世界为之一震的民族。荷兰对于人种的融合持宽容态度，所以现代的荷兰人中有不少黑人，但如果你想知道古罗马时代的“荷兰人”是什么样子，设想一支由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白皮肤荷兰人组成的足球队就足够了。在罗马时代的荷兰人祖先被称为“巴达维人”。

居住在莱茵河河口附近的这支日耳曼裔部族不是罗马的行省人民。因为不是行省人民，所以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罗马人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手，他们没有将巴达维设为行省，归入罗马的领土范围内，却与其缔结了同盟关系。双方约定，巴达维人向罗马提供兵源，作为交换，罗马尊重巴达维人的独立，并且当巴达维人遭到周边其他部族攻击时出兵协助。这种关系起始于第一个将莱茵河视为北部防线的人——尤里乌斯·恺撒。

恺撒将莱茵河划为防线的想法根据以下几项史实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一，早在征服了高卢时，他就已经承认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永久居住权。后来被划分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莱茵河西岸一带，抑或在现代来说是荷兰南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东部，在恺撒时代以前是跨越莱茵河向西移居高卢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带。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居民与同样称为高卢人、后来居住在法国的高卢人不同，属于日耳曼裔的高卢人。

第二，恺撒让住在莱茵河东岸且与罗马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日耳曼裔乌比人移居到莱茵河西岸，将后来的科隆相赠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莱茵河这条罗马帝国的防线。

然后恺撒还像对待其他高卢人一样，将自己的家族名“尤里乌斯”赐予了这些日耳曼裔的高卢人，从而与他们缔结了“clientes”（保护人，英

语为client）的关系。在现代看来，这种关系相当于本家和分家的关系，或者是帮会老大和手下，以及政治人物和后援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恺撒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创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证据在于他将罗马公民权赐予了这些部族中的实力派人士。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并且恺撒对于被纳入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人以及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外的民族也使用了这个方法，这明显是对罗马的霸权无法到达的地带——莱茵河东岸部族的一种怀柔政策。结果，住在莱茵河河口的北部也就是现代的阿姆斯特丹周边一带的巴达维人的部族长及其亲属也成为了罗马公民，开始使用“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

在这个方法开始实施的初期，西塞罗、小加图和布鲁图都认为恺撒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对他横加指责，这只能说他们的指责太目光短浅了。恺撒以自己的家族名相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见效最快的方法，证据在于，在恺撒死后继承其位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倒台之后，这些外族的“尤里乌斯”和罗马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一直延续了下去。恺撒早就看出，这些人和自己的“clientes”关系一定会在这些人的子孙和罗马帝国之间传承下去。这种策略才是当之无愧的“百年大计”，当然从实际来说岂止是百年，至少持续了400年之久。

将话题转回到巴达维人，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同时他们承担了提供兵源的义务，具体来说是作为向罗马军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提供辅助作用的“辅助兵”，在罗马人的指挥下服兵役。让其提供兵源不只意味着保证士兵数量，还能建立雇佣关系。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人就会变得保守。趋向保守后，采取起兵反抗罗马这种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这种辅助兵的利用制度在奥古斯都皇帝确立军制后作为罗马军的一项正式制度固定了下来。兵役期限明确规定为25年，满期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巴达维人中的罗马公民也迅速增加。然而，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权利仅限于部族长级别的人。第三代皇帝卡

利古拉为止的罗马皇帝都是尤里乌斯一族的人，与皇帝使用同样的家族名肯定也具有强调与部族其他人的身份差别的效果。

从以上这个例子来看，恺撒是一个用合理性来对待所有事情的人。赐予“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明确身份差别，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因为由行省人民或罗马的同盟国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会按相同地区或相同部族出身的人来分别组队，统率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通常由士兵们所属部族的族长级别的人担任。在仅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指挥官的任用上奉行实力主义的公元1世纪，任用辅助部队的长官时首先看重的仍然是权威，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许合理的思考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关系。

总之，在公元69年统率巴达维部队8000名士兵的指挥官名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他当然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并且这个“尤里乌斯”趁罗马人在宗主国意大利忙于内战的间隙，在莱茵河下游一带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

在讲述这件不到一年便得到解决的事件之前，笔者想先交代一点，在叙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反复用到这个事件的登场人物的家族名（Nomen）。之前以防过于烦琐，笔者一直极力避免将一个人的个人名（Praenomen）、家族名（Nomen）、家名（Cmgnomen）全部列举出来，比如在提到尤里乌斯·恺撒时只使用他的家名“恺撒”，但是这次有别的目的。之所以还要坚持使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这些家族名和家名，是因为笔者想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些人是在120年前从尤里乌斯·恺撒那里获赐家族名的人的子孙。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意识到，原来所有人发起的叛乱都是恺撒自己种下的恶果。

确实，完全是这样，下文中的“尤里乌斯”随处可见。但是，如果各位读者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产生以下想法可就错了——即便恺撒针对被征服民族的同化政策得到了《比较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的赞赏，但作

为一项政策却是失败的。

错误的原因在于，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非罗马人并非全部是这一次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试图借行省兵的叛乱创建高卢帝国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实现，便是由于高卢地区其他的“尤里乌斯”不同意。并且除了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尤里乌斯”，只列举一些人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帝国作出的贡献。

积极协助韦斯帕芗的犹太人埃及长官的名字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这个时期他正在帮助提图斯攻打耶路撒冷。

名传后世的水道系统研究著作的作者，是在公元69年担任首都罗马法务官的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除执政官之外只有法务官拥有，通过将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二人推上执政官之位从而着手恢复秩序的穆奇阿努斯如果没有弗朗提努斯的协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

最后就是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完全称霸不列颠计划的实施者——尤里乌斯·阿格里科拉。

仅从这几个例子便可以清楚地得知，恺撒在120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任何事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总是伴随着风险，仅仅遇到一些风险不能代表政策是错误的。证据在于，后来的罗马皇帝们谁都没有试图更改恺撒制定的这项“败者同化”政策，解决了行省兵的叛乱问题后着手重建帝国的皇帝韦斯帕芗也完全没有触碰这项制度。这说明没有任何一名统治者怀疑过恺撒式思考方法的有效性。所以，每次出现一个新的“尤里乌斯”，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只有让读者会心一笑的程度。

但是，除“尤里乌斯”之外，通过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却相当严重，后世的史学家蒙森甚至断定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这个问题让人不得不思考内乱产生的流毒是如何波及其他方面的。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

至今尚无法查证巴达维人的领袖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公元69年的年龄。尼禄皇帝时代的62年，率领巴达维部队跟随鲍利努斯参与征服不列颠的战役是这个人物在史料中的首次登场。年轻人就算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也不可能被委任为8个大队8000士兵的指挥，所以他的年龄至少有40岁，如果是这样，在公元69年时他大概有四十几岁了。另外，他在罗马军中的从军经历可以追溯到公元62年以前，恐怕这个巴达维人在罗马军中度过了足以让一名士兵满期退伍的25年的漫长人生。

罗马军的作战会议通常也会让辅助部队的指挥官列席，只要具备头脑和意愿，了解罗马军的所有情报（包括所有优势和弱点）是非常容易的。确实，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熟知并利用了这一点。

罗马军除了偶尔发动的远征之外，辅助部队的驻扎地点一般会设在该部队所属士兵的出生地附近，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惯例。因此来自莱茵河河口一带的巴达维部队的驻扎地应该位于“低地日耳曼”，也就是从波河到下游的莱茵河畔。维特里乌斯在称帝之前便是低地日耳曼的司令官，受称帝之后的维特里乌斯之命率军进攻宗主国意大利的席西纳和瓦伦斯两人都是低地日耳曼军属下的军团长。

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本人参与了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不过那场混战的特点是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和非主要战斗力的辅助兵统统参加了战斗，原因在于担任总指挥的人能力不足。并且那次战役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让辅助兵们觉得军团兵不足为惧。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部队的叛乱，也正是4月15日展开的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事情发生在胜利后辅助兵收到返回驻扎地命令后的夏天，在莱茵河沿岸爆发。

为什么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会萌生起兵反抗罗马的念头呢？史学家

塔西佗的说法是，因为韦斯帕芗一方通过安东尼·普里默斯下令巩固莱茵河沿岸的基地，以防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残部南下意大利。以塔西佗的著作《同时代史》为研究基础的后世的大部分学者都赞成这个说法。

但是笔者实在无法同意。因为如果“行省兵的叛乱是由韦斯帕芗引发”的事实曝光的话，对于打算称帝的韦斯帕芗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韦斯帕芗是不属于既有统治阶级的“新贵”，这个后起之秀煽动非罗马公民的行省兵去伤害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的行为被人知道的话，想必元老院和一般公民都会群起而攻之。连马基雅弗利都没说过“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马基雅弗利只是说“为达到目的应选择有效的手段”。让行省兵起来反抗罗马作为手段并不是绝对有效的，冷静的穆奇阿努斯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然而，安东尼·普里默斯虽然干劲十足，却是个目光短浅的人，说不定是他在没有接到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命令的前提下一意孤行，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取得了联系。不管怎样，在一年之间皇位几易其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混乱成了巴达维人的好机会，因为在内心实际上反对罗马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攻打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把守的莱茵河沿岸基地时，打的是韦斯帕芗一派的旗号。

对于日耳曼人而言，即使在白天也一片昏暗的森林才是他们的发源地，于是决定起兵反抗罗马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将会合地点选在了森林中。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向假托宴会之名邀来的几个巴达维人的实力派人士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日耳曼人拥有强大的灵魂，如今正是摆脱罗马统治的好机会，精锐部队都已前往意大利，在此期间防卫基地的军团兵都是些老弱残兵，然而基地内却遍地都是值得瓜分的物资。防守莱茵河防线的各军团早已今非昔比，现在只不过是保留着军团的虚名而已，罗马军团已经不足为惧。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似乎在演讲上也颇有心得，他所说的“保留着军团的虚名”具体来讲有如下的含义：

罗马的军团不只是按照“第一军团”、“第二军团”这样的数字来编排的，正式的名称应该是“第一××军团”，“××”的取名方式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采用军团组建人的名字。如第二奥古斯塔军团（驻扎在不列颠）、第八奥古斯塔军团（驻扎在米西亚）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字。第七克劳狄亚军团（驻扎在米西亚）、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驻扎在达尔马提亚）则是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组建的。

第二种是采用征募的志愿者所在地区的名称。如第一日耳曼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第十六高卢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第四马其顿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第九西班牙军团（驻扎在不列颠）都是在高卢东部、高卢西部、希腊北部和西班牙组建的。第五阿拉乌迪（Alouette）军团（“云雀军团”）是恺撒与庞培决战时召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组建的军团，“Alouette”是一种大量栖居在法国南部的云雀。

第三种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采用的都是很有气势的名字。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列举的例子都属于第三种。

比如，第三拉帕克斯（Rapace）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翻译过来就是“第三生猛军团”。

第十三弗尔米纳塔（Fulminata）军团（驻扎在叙利亚），意思是“第十三雷电军团”。

第十五普利米吉纳（Preminente）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和第二十二普利米吉纳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只能意译为“第十五、第二十二无敌军团”。

对于隶属这些军团的军团兵来说，这些名称也许能提高士气，不过

就算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没有提及这一点，旁观者看到的话确实也要忍俊不禁了。

接下来，巴达维人的领导者对部族的几个实力派人士这样说：

> 我们辅助兵与罗马军团兵相比，在步兵骑兵方面都已经毫不逊色。如果我们起兵反抗罗马的话，很明显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族首先都会紧随其后，莱茵河西岸的高卢人同属日耳曼民族，应该也会响应。然后这股反抗罗马的浪潮会扩展到高卢全境，罗马人自相争斗的现在正是好时机。即使我们对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基地发动攻击，韦斯帕芗一派的各军团也不会赶来救援，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个闲工夫。

他的游说成功了，巴达维人的几个实力派人士都拍胸脯表示赞同。

然而，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没有马上行动，他首先派人秘密前去笼络居住在莱茵河口的巴达维人西边的邻居卡尼法提人。这个部族使用的语言和习俗都和巴达维人相同，但部族成员人数较少，属于巴达维人的分支。卡尼法提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奇维里斯又派人前去笼络居住在更北边的弗里斯人，也得到了预期的答复。这样一来，奇维里斯就成功建立了与莱茵河河口周边一带的部族之间的统一战线。

事成后奇维里斯还向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结束后返回高地日耳曼的主要基地美因茨的辅助部队派遣了使者。这次拉拢也成功了，证据在于这支辅助部队没有听从皇帝维特里乌斯在得知打着韦斯帕芗一派旗号的“多瑙河军团”逼近的消息后发出的南下意大利的命令，相反却北上前去与奇维里斯会合。

在确保了友军之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他袭击了驻守在莱茵河口最前线据点的守备队。罗马军在最前线的基地

除了部队长和少许士兵之外没有配置军团兵，最前线基地的大部分勤务兵通常都是行省兵。发现坚守不住的队长选择了放弃，因此反抗罗马的第一仗奇维里斯不战而胜。之后攻打的几处据点由于也是只有行省兵把守，所以都轻易得手。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对高举双手从据点走出来的行省兵的处置办法也很巧妙，他一次都没有说过“跟随我一起反抗罗马”之类的话，本来自己也是打着韦斯帕芗一派的旗号。于是他告诉投降的士兵们，可以自由选择服从自己的指挥或是返回故乡。行省出身的士兵很多都是因为在故乡无法谋生而志愿成为罗马军辅助兵的，在他们的眼里，打着韦斯帕芗一派旗号的奇维里斯应该算做罗马军的一员将领，所以成为统率巴达维辅助部队的奇维里斯麾下在目前看来不能算是叛变。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叛乱的推进方式上也做得非常巧妙，他点燃战火的地点位于罗马帝国的最北部，并将“火势”朝着覆盖莱茵河下游地带的低地日耳曼行省的方向蔓延。所以即使宗主国意大利派出镇压部队，仅行军就要花上足足两个月时间。

初战告捷的奇维里斯又将他的笼络之手以莱茵河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伸向东方的手斩获了布鲁克特里人和滕克特里人，这两个部族是与罗马之间不存在友好关系的日耳曼蛮族。伸向西方的手的目标是涅尔维人和佟古累人，这两个部族都居住在莱茵河西岸，被恺撒征服后一直是罗马的行省人民，虽然属于日耳曼裔，实际却是高卢人。这两个部族也有很多男子在罗马军中担任辅助兵。低地日耳曼的罗马军这时已经开始动员军队对抗奇维里斯了，但尚未得知奇维里斯的笼络之手已经伸向了这两个部族，因此前往镇压奇维里斯的军队在出发时也带上了由这两个部族出身的人组成的辅助部队。

行省边界
现代国界
军团基地
N
0
100km
弗里斯人
日耳曼
巴达维人
布鲁克特里人
不列颠
卡尼法提人
克桑腾
滕克特里人
佟古累人
诺伊斯
乌比人
科隆
涅尔维人
波恩
科布伦茨
低地日耳曼
美因茨
雷米人
特里尔
特雷维利人
兰斯
摩泽尔河
塞纳河
比尔吉卡
巴黎
莱茵河
卢格杜南西斯高卢
图尔斯
林贡斯人
高地日耳曼
塞卡尼人
欧坦
阿奎塔尼亚
索恩河
日内瓦
里昂

日耳曼后裔部族居住地区

于是在战场上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情。被部署到罗马军的左翼和右翼的这两个部族的队伍在战斗开始的命令下达后根本没有行动，不，没有行动只是在一开始，之后也行动了起来，不过是朝着奇维里斯那个方向。后来发生的情况就不是战斗而是惨剧了，在场的罗马人不分军团兵、百人队队长、大队长，统统被斩尽杀绝。

乘胜追击的奇维里斯还利用同样的方式将防守莱茵河的舰队收入囊中。水手和桨手都是行省人民，所以只要把罗马公民出身的舰长级别的人杀死，事情就简单了。将莱茵河舰队收入囊中意味着在战术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罗马的所有军团基地都是沿着莱茵河建造的，这样一来对其发动进攻时便可水陆并进。

被围攻的罗马士兵

将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各部族纳入统率之下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叛军从这时开始对罗马的军团基地发动了正面攻击，目标是被称为“卡斯特拉·维特拉”（Castra Vetera，维特拉军团宿营地）的维特拉（现在的克桑腾）基地。这个军团基地位于连成一线的莱茵河防线的最北端，也是第五云雀军团和第十五无敌军团的驻扎地。不过在公元69年秋天，两个军团的精锐部队都已经跟随维特里乌斯前往了意大利本土，剩余兵力好像还不到5000人。高举罗马军辅助部队队旗的奇维里斯军包围了这里，然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派遣使者到基地内，要求对方宣誓效忠皇帝韦斯帕芗。

对于留在克桑腾基地的军团兵来说，抛下前往意大利支援维特里乌斯的同胞改为支持别人的行径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用说，他们拒绝了这

个要求。于是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指挥下，叛军从正面的莱茵河以及其他三个方向的陆地展开了全方位的包围战。

战斗在低地日耳曼打响的消息数日后传到了高地日耳曼最重要的基地——美因茨，驻扎在美因茨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弗拉库斯在原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维特里乌斯前往意大利以后成为了高地、低地两处基地的最高负责人，防守克桑腾基地就是他的任务。

但是，这名年老体弱的司令官原本只是因为手下的士兵表示支持维特里乌斯自己才顺水推舟跟随了他，其实他在内心支持的是韦斯帕芗。并且弗拉库斯手下军团长级别的将领中支持韦斯帕芗的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性优势，隶属高地日耳曼军的3个军团中，将领和普通士兵的想法却存在出入。尽管在这个阶段问题还没有表面化，但救援克桑腾的军队在组建时微妙地出现了拖延现象。

不过救援军还是组建起来了。具体战略是让在美因茨过冬的第四和第二十二军团北上，在波恩和诺伊斯分别与第一军团和第十六军团驻扎在这两处基地的军团兵会合，以共计4个军团的兵力对抗叛军。尽管号称4个军团，实际却没有达到2.4万人的规定编制。虽然不太清楚准确的数字，但是应该减去被调到意大利参与内战的军队人数。大致估计一下也只有不到总人数的一半。

救援军的总指挥当然由弗拉库斯担任，可是他随军行至诺伊斯后，却决定将实际的指挥权移交给年轻的迪利乌斯·沃克勒，沃克勒是驻扎在美因茨的第二十二无敌军团的军团长。

然而，从美因茨沿莱茵河前往克桑腾的行军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没有按计划筹集到足够的军粮，感到战乱将至的农民们纷纷把收获的粮食藏了起来，就算花钱也很难买到手。并且，人要是一直持续饥饿状态的话会变得容易发怒，将领们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心理隔阂从这时开始显露无遗，士兵们纷纷用无视军规的行为来表达对指挥官的不信任。不过

沃克勒的努力也有一些成效，救援军从克桑腾的基地前进到了距离克桑腾基地一日行军路程的地方。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攻占罗马军基地的计划顿时增加了难度，但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

维特里乌斯一方在10月25日结束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中败北的消息传到莱茵河下游的克桑腾所需的时间，即使是通过驿站派遣快马的方式也要用一个月。进攻方的行省兵和防守方的罗马兵到了11月末或12月初的时候也肯定知道了皇帝维特里乌斯兵败如山倒的事实。莱茵河下游一带正处于连野兽都行动迟缓的严冬季节，德国的冬天不仅寒冷刺骨，还会有降雨。“莱茵河军团”的士兵们得知自己拥立的维特里乌斯完败的消息后，想必心情变得就像德国北部的严寒天气一样，士气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也给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既然韦斯帕芗取代维特里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不能再以要求宣誓效忠韦斯帕芗为由对罗马军的基地发动进攻了。无论是谁登基，罗马的军团兵都有向罗马皇帝效忠的义务，原属维特里乌斯一派的“莱茵河军团”的军团兵们早晚会宣誓效忠韦斯帕芗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终于摘掉了他的假面具。至此，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一场行省兵与罗马兵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

即便如此，“莱茵河军团”士兵的士气衰退得实在太严重，起因是自己拥立的维特里乌斯败北让他们大失所望，对顶头上司的不信任也转化为了愤怒——“那些家伙是不是早就暗中期待着维特里乌斯败北了？”这种怀疑进而升级为深信不疑。怒不可遏的士兵们袭击了司令官弗拉库斯的卧室，将这名老司令官从床上拉下来杀死了。沃克勒扮做奴隶逃跑了，捡了一条命。

其间传来了美因茨的军团基地遭到敌人偷袭的消息，原来是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煽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发动了攻击。一听说这个消息，让罗马军团扬名于世的铁的纪律又复活了，沃克勒也重新担任了阵前指挥。为了救援美因茨，第一、第四、第二十二这三个军团在沃克勒的指挥下向南折返。如果美因茨落到敌人手里，莱茵河防线将全线崩溃。

美因茨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其间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对日耳曼裔高卢人的笼络行动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证明奇维里斯“首先展示军事上的成果，然后伸出笼络之手”的方法非常正确。在高卢地区很有势力的部族——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先后要求加入统一战线。

“高卢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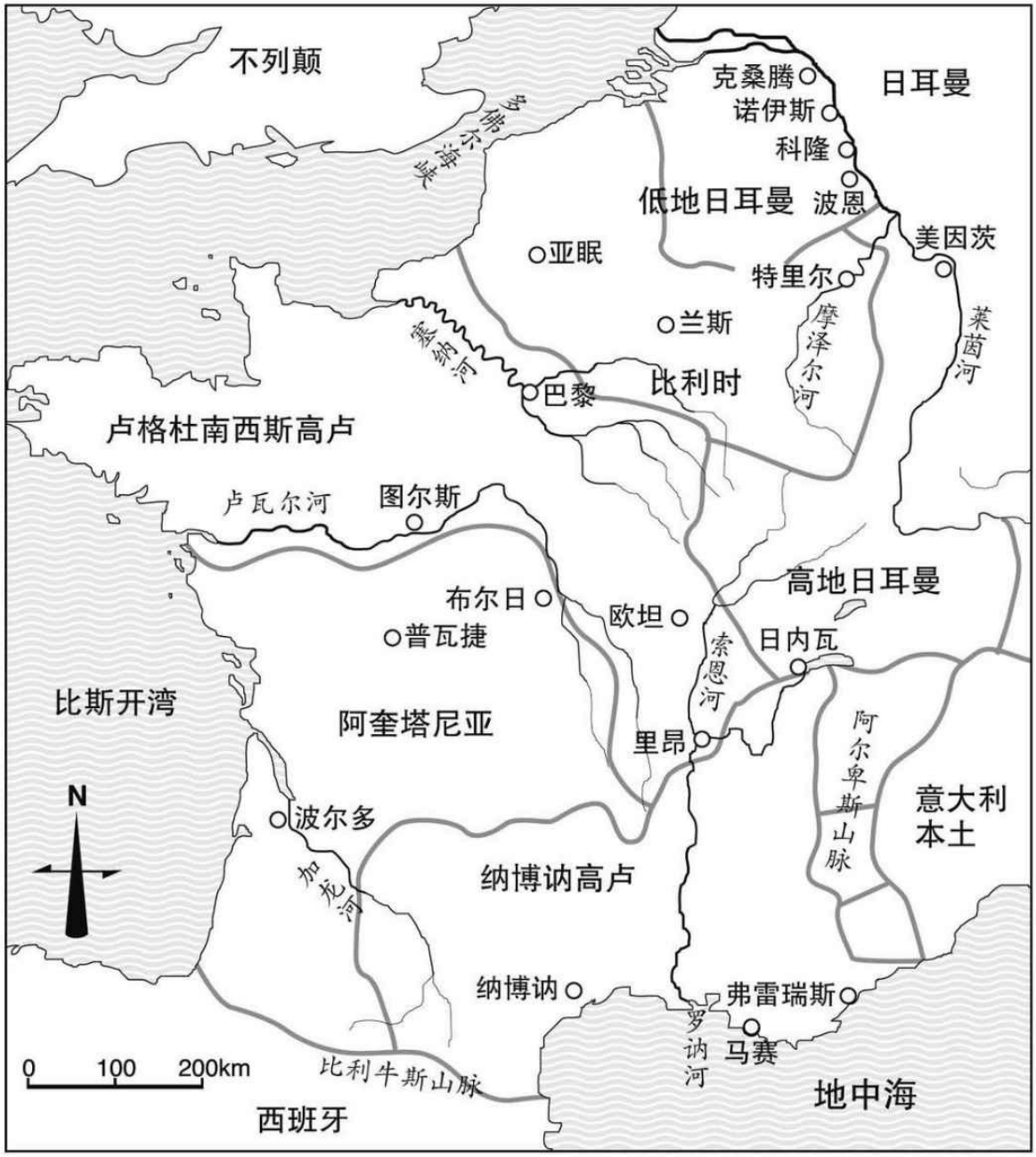
特雷维利人是居住在摩泽拉河（现在的摩泽尔河）周边的部族，自从败给恺撒、被纳入罗马统治以来，根据地一直在今天的特里尔。这个地方的古代名称为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是莱茵河各前线基地中重要的后方基地，近百年来一直享受着罗马人创造的城市化和经济繁荣的成果。处于相同环境的林贡斯人的居住地区在特雷维利人的南方。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反抗罗马的战火已经逼近高卢的中心地带了。

代表特雷维利人参加反罗马战线的有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尤里乌斯·托图尔和尤里乌斯·瓦伦提努斯三人，从他们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可以看出，三人都是部族内的实力派人士。

另外，林贡斯人的代表是尤里乌斯·萨比努斯，这个人是120多年以前恺撒在征服高卢时与一名女子生下的孩子的后代，也就是说他拥有恺撒的血统。他使用的个人名甚至都与恺撒一样，全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萨比努斯。如果恺撒知道自己后代中有人起兵反抗罗马，想必也只

能大笑一声，感到很为难吧。不管怎样，从恺撒那里获赐家族名的人的子孙——“尤里乌斯”们组成了反罗马战线的领导阶层，他们全部都有在罗马军中长年担任辅助部队队长的经历，并且其中的两人还参加过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为首的这五个人在科隆秘密会合，彼此宣誓建立统一战线。

选择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内西姆（科隆）作为会合地点是因为这里是莱茵河沿岸的行省人民居住的最大城市，将这里的乌比人拉入本方阵营的话，就可以将目前的行省“兵”对抗罗马兵的局面变为行省“民”对抗罗马兵的局面。只有将民间的人拉拢进来，才能彰显这是一场脱离罗马统治的独立运动。乌比人的代表也参加了秘密会合，在这一点上，表示全体部族都参战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出席意义也很重大。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精明能干甚至让塔西佗都赞不绝口。



高卢全境

在这次科隆会谈中，首次作出了创建“高卢帝国”的决定。建设一个包括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及涵盖从那里一直到比利牛斯山脉为止的高卢全境居民在内的大帝国，将罗马的势力驱

赶到阿尔卑斯山以南。这实在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与后来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殖民帝国内部爆发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无相似之处。不过一旦这个计划成功，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就会回到尤里乌斯·恺撒之前的状态。耐人寻味的是，会谈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高卢帝国”这个名字就来自拉丁语。这一点也让人想起后世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都不得不使用宗主国的语言来发起反对宗主国运动的事实。然而，导致这些“尤里乌斯”们发起的独立运动最后失败的原因却与后世的殖民地帝国完全不同。

不管怎样，创建高卢帝国的目标明确后，作为领导者的“尤里乌斯”们的士气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并且之后不久，高卢帝国还提前得到了一份“诞辰贺礼”。

这便是12月19日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发生的大火。在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裔的高卢人看来，供奉着罗马人的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起火成为了众神抛弃罗马帝国的证据，他们坚信这样一来脱离罗马帝国独立的计划必定会成功。头脑清醒的奇维里斯没有相信这样的迷信，但同伴们相信也没什么不妥，并且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自己也感觉到了罗马帝国正在走向灭亡。

卡匹托尔山起火的消息也传到了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那里，而且紧随其后的是维特里乌斯遇害的消息。沃克勒统率着一群垂头丧气、军心涣散的士兵，接下来将要面对更加严重的困难。然而沃克勒的肩上却扛着死守整条莱茵河防线的重担，也就是要守住防线上的各处要地，即美因茨、波恩、诺伊斯、克桑腾等军团基地。而且，波河和诺伊斯之间还隔着已经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派来的日耳曼人实际占领的科隆，用于传递情报命令和输送士兵的莱茵河舰队也落入了敌人手中。

不过，沃克勒在成功守住美因茨的基地后又再次率军北上，目的是救援已经据守城内战斗多时的克桑腾基地，他暂且顺利地将军队带到了诺伊斯基地。

在罗马军中说到军团，并不意味着只有罗马公民权的所有者才具有应征成为军团兵的资格。通常来说，军团是由军团兵和数量与此相当的辅助兵组成的。公元69年到70年的“莱茵河军团”内的各军团由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行省兵发动叛乱而人数有所减少，但还是有一些日耳曼裔以外的高卢人辅助兵存在。

罗马军的军团兵都穿着统一的军装，辅助兵的军装也是统一的。从军装来讲，前者属于重装备，后者属于轻装备。二者分别担任主要战斗力和辅助战斗力，在战术上当然也有区别。

如今已成为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同伙的特雷维利人的首领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利用军装相同的便利条件，让手下的士兵潜伏到了沃克勒指挥的罗马军团内部。罗马人没有强制要求所有场合都使用拉丁语，唯独军队内的语言必须是拉丁语。就算出身部族不同的士兵潜伏进来，只要会讲拉丁语，在语言上就不会露出破绽。

在诺伊斯的军团基地，沃克勒在出发前去救援克桑腾之前，照例向士兵们发表了演讲。他事先察觉到了士兵们沉重的心情，因此讲话时用的是一副悲壮的语调，借此来唤起士兵们对罗马帝国的爱国心。

听得入神的军团兵和辅助兵中潜伏着克拉西克斯手下的士兵，这些人对沃克勒嗤之以鼻，并大声斥责，打断了他的演讲。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从不知所措的士兵中间穿过，冲上演讲台将沃克勒拉了下来，并用辅助兵经常使用的长剑刺穿了他的胸膛。事情发生在转瞬之间，站在演讲台附近的两名军团长也遭受了和沃克勒一样的命运。

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出现在因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的士兵面前肯定是之后不久的事情，担任反罗马的首领的两个“尤里乌斯”要求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发誓效忠高卢帝国，当然，闯入军团基地内的叛军一方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将军团兵们包围了。

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

拥立维特里乌斯却遭到失败，因为行省兵的叛乱不得不在冬季辗转于莱茵河畔，现在甚至连指挥官都被杀了，军团兵们的心中可能只剩下绝望、疲惫和自暴自弃了。被迫陷入这种状态的人往往会拼命从别处找一个理由来支持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实施军制改革以来，罗马一直规定行省人民或辅助兵在服满25年军役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辅助兵的儿子也拥有应征成为罗马军团兵的资格。

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统治时期开始，莱茵河再次被确认为帝国的防线，根据这个战略，沿岸附近的克桑腾、诺伊斯、波恩、美因茨也成为了永久的基地。公元69年的“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除了被派往不列颠的一两个军团之外，在提比略之后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发生过人员变动。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体内却流着行省人民的血。

另外，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伍后也大多与军团基地周边的行省人民女子结婚，这是在边境服役的罗马士兵的常态。他们自己是罗马公民，所以生下的儿子也是罗马公民，意味着有资格应征成为军团兵。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兵的罗马人血统纯度在下一代会减为一半，从第三代以后会变得越来越低。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倚仗的是日耳曼和高卢的血统。

即便如此，军团还能在编制上属于罗马军团的理由是，虽然行省人民的血统占据了优势，但他们依然以自己是一名罗马公民而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一个人放弃“尤里乌斯”的家族名，甚至有不少人还以继承了尤里乌斯·恺撒后代的血统为荣。

但这也只限于他们尊敬罗马人，并借此和罗马人攀上某种关系的情

况。公元69年在罗马人之间发生的内战让罗马人的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使他们失去了对罗马人由衷的敬意。

在尼禄皇帝统治末期最先打出反罗马旗号的罗马高官是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尤里乌斯”并没有说过高卢应该从尼禄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脱离出来自己独立之类的话，他公开表示尼禄不胜任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位，因此他是以罗马人而不是高卢人的身份行动的。不过，如果这个人能活到公元69年末的话，他还能像一年半之前那样，以一名满怀忧国之情的罗马人的身份行动吗？说不定这个人也会与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等其他的“尤里乌斯”一起支持创建高卢帝国、从罗马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想法。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元69年的内乱对于罗马帝国而言是一场足以撼动帝国基石的重大危机，敬意往往比武力更容易成为有效的“制衡力”。

诺伊斯军团基地的罗马军团兵在强制下被迫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

“罗马的历史上，坎尼、卡莱以及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要是与这次诺伊斯的惨剧比起来，甚至可以说是散发着光辉的一页篇章。”德国史学家蒙森的这段充满感慨的话，笔者也有同感。但是，在完败给汉尼拔的坎尼会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被帕提亚的弓兵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卡莱战役[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了日耳曼人的圈套导致的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的这些战役当时，罗马人的无能还没有暴露出来。罗马人还能以身为罗马人为荣，行省人民也对其心怀尊敬，并为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深厚渊源感到自豪。坎尼、卡莱和条顿堡的败北纯粹是军事上的失败，因此败者坚决拒绝了对胜者宣誓效忠的要求，不，应该说他们甘愿选择成为俘虏。

在诺伊斯的军团基地发生的事情也在克桑腾的军团基地上演。克桑腾的军团兵们经过长时间毫无胜算的守城战后已经身心疲惫，而且防守美因茨基地的军团兵也已经紧随前面的同伴宣誓效忠了高卢帝国。只有

驻扎在今天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军团从这场“雪崩”中幸免，因此构成“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当中已经有6个军团向日耳曼裔的行省兵屈服。

难怪身为罗马人的塔西佗会慨叹这是“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并且，这些军团兵虽然发誓效忠高卢帝国，却仍旧没能避免沦为俘虏的命运。发誓效忠的罗马士兵们被带到了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少数拒绝效忠的士兵当场被杀。这样一来，莱茵河沿岸的所有罗马军团基地都落入了发动叛乱的行省兵手里。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莱茵河防线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首次彻底失守。

公元69年到70年的一年之间，发生了两件动摇罗马帝国安保体制的事件——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事件，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暴动为导火索、以马萨达要塞的玉石俱焚而终结的犹太战争。时间方面，前者爆发于公元69年夏天，到公元70年秋天结束，前后历经一年。后者从公元66年夏天开始，到公元73年春天结束，一共持续了7年。关于后世学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比较侧重于罗马帝国和犹太民族对决这方面，后者远远高于前者。除了关心罗马通史的人之外，似乎高卢帝国事件被人们遗忘了。

不过，距此30年后由塔西佗写就的《同时代史》叙述前者用了80页的篇幅，叙述后者反而只用了10页。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塔西佗对高卢帝国事件的关注度显然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战争的走势给帝国安全保障带来的是间接影响，相反，高卢帝国事件的结果却会直接影响罗马帝国。

犹太位于帝国东方安保体制的要害之地——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因此对罗马人而言同样是重要地区。但是，犹太问题对罗马来说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会波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次是犹太民族有可能煽动帕提亚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只要在这两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解

决问题就可以了，更何况犹太离宗主国意大利比较远。

与此相比，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想法成为现实，罗马帝国将要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以莱茵河为中心，西至比利牛斯山脉，东到易北河这个广阔范围内的敌人。再也没有什么“帝国北方的防线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之类的说法了，帝国的北方防线将退至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入侵。并且，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罗马军团依然存在并充分发挥着作用，这让犹太人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在提及时赞不绝口。相反，被视为罗马全军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上却已经土崩瓦解。要说两个事件哪一个给罗马人敲得警钟更响，冲击更强烈，肯定是高卢帝国问题。罗马人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所存在的差别即使时隔30年也没有改变。

与高卢帝国问题存在关系的人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创建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独立的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人，包括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奇维里斯所属的巴达维人等与罗马原本存在同盟关系的日耳曼裔部族以及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并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日耳曼各部族。

第二种是被这些日耳曼民族倒戈的罗马人。

第三种是居住在比利时、卢格杜南西斯、阿奎塔尼亚三个行省的高卢民族。

为了便于理解，用现代的不同国家来表示的话，第一种相当于荷兰和德国，第二种是意大利，第三种相当于比利时和法国。

很难让人认为是现代意大利人祖先的古代罗马人迅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应，并马上转化为行动，可以说他们的对策是有效运用可支配力量的典范。

反攻开始

到达首都罗马后立刻掌控住一切的穆奇阿努斯察觉到了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他决定将宗主国意大利的5个军团、西班牙的2个军团、不列颠的1个军团以及“莱茵河军团”中唯一完好无损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基地的1个军团，合计9个军团投入到反击作战中。这9个军团排除了通常会加入进来的辅助兵，只以军团兵展开军事行动。因为高卢帝国一方的主力是罗马军的辅助兵，与军团内的辅助兵是同行，所以不管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不列颠人，统统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来9个军团的总兵力只有5.4万人。再加上没有时间补充之前内战中损失的人员，所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4万人左右。无法离开首都的穆奇阿努斯挑选了两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这支军队的指挥，他们是凯利亚里斯和盖鲁斯。尽管此时正值冬天最冷的时节，使者依然捎带着军团派遣的命令乘快马赶往了西班牙和不列颠。

面对各部族的叛变倒戈，罗马是不可能不发起反攻的，日耳曼裔的“尤里乌斯”们一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以奇维里斯为首的“尤里乌斯”们的失算在于他们没有想到罗马会这么快就起兵平定内乱。

罗马一方的反攻确实也无愧于罗马人久负的盛名，既坚决又彻底，不过，实际粉碎这些“尤里乌斯”们的美梦的人却是另外一群“尤里乌斯”，也就是笔者归为第三类的高卢裔的“尤里乌斯”们。

这些高卢裔（用希腊式的称呼叫凯尔特裔）的高卢人当初对于日耳曼裔的高卢人提出的并肩作战的请求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然而，叛乱发展到创建高卢帝国的阶段后，他们也开始有所行动了。这些高卢裔高卢人在长期支持罗马的雷米人的居住地区召开了实力派人士共同参加的会议，围绕着“是参加高卢帝国的叛乱还是留在罗马帝国一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当年尤里乌斯·恺撒甚至慷慨地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了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所以被他征服的莱茵河西岸的主要民族——高卢人当中的全部实力派人士肯定也都获赐了“尤里乌斯”的家族名。也就是说，聚集在相当于今天法国北部的雷米人居住地的所有高卢的实力派人士都拥有“尤里乌斯”的名字。其实，雷米人的族长即会议主办人的名字就叫做“尤里乌斯·奥斯比克”。再加上克劳狄乌斯皇帝奉行开国路线的影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议员。

这些人其实已经察觉，“高卢帝国”只是个虚名，帝国的实质却是“日耳曼帝国”，并且他们也想起来，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后给高卢人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高卢人不受日耳曼人的侵略。因为在那以前，日耳曼人利用高卢部族之间的内斗跨过莱茵河入侵了西方，高卢人经历了长期任人宰割的岁月。当时恺撒断言，如果没有罗马，高卢早晚会屈服在日耳曼的统治下，高卢人听到这句话哑口无言。多亏罗马人守住莱茵河，日耳曼问题才得以解决，谁知120年后高卢人又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加入高卢帝国，高卢裔的“尤里乌斯”们对日耳曼裔的“尤里乌斯”们说了“不”。他们不仅不加入，还表明会以罗马军辅助兵的身份参战。但是这个计划因为穆奇阿努斯的一句“罗马人的麻烦由罗马人自己解决”而没有实现。不过，除了与莱茵河邻接的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之外的整个高卢决定支持罗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从意大利本土还是从西班牙和不列颠赶来的军团，在前往莱茵河沿岸地带的战场时都要经过高卢。另外，在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以外，也确保了军粮方面的补给，其好处不可估量。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相当于高卢人向罗马人作出了提供后方支援的承诺。

在这一系列的动向中，公元70年的冬天过去了，春天随即到来。罗马一方开始从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三个方向朝莱茵河进军。出兵迎击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一改当年在担任罗马军辅助部队指挥官时的短

头发、齐胡须的模样，变成了长发随风飘动、胡须半遮着脸的日耳曼风格。双方的旗帜都是高卢帝国，但是很明显，这是一场在罗马史上已经反复发生过并且此后也将几度上演的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对决。

将外形改为日耳曼风格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似乎也想将内涵变为日耳曼模式。日耳曼民族非常重用女占卜师，往往根据她们的卜卦来决定是否出战。罗马在对外扩张的共和政体时代也曾流行过在出征前卜算“鸡卦”，根据鸡的啄食方式来占卜吉凶的这种方法也没落了，但是步入帝政时代以后军团的主要任务变为了防御。因为在迎击来袭的蛮族时，根据鸡卦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出击的方法太不现实了。

得到尤里乌斯·奇维里斯重用的女占卜师的名字叫贝莱达，是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布鲁克特里人的年轻女子，她预言日耳曼人会成功称霸西方，歼灭罗马军。笔者觉得她说的都是废话，不过对于让驻扎在莱茵河沿岸的6个军团宣誓效忠了高卢帝国的奇维里斯而言，想必这是神灵对未来的启示。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将一名本来要处死的军团长俘虏送给占卜师贝莱达作为祭神的供品，不过这个名叫卢佩鲁克斯的军团长在被押送的过程中选择了自杀。

奇维里斯的日耳曼风格也表现在对俘虏的处置上，他把俘虏的罗马军团兵送给了年幼的儿子当玩具，不是让他们陪他一起玩，而是把他们绑起来，让儿子用剑刺他们取乐。

这样做也许可以提升日耳曼人的士气，但是对于高卢人起到的作用只有加深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戒备心，并且罗马这个民族绝对不会放过以非人的方式对待同胞的凶手。

罗马军正式开始反攻的消息让高卢裔（凯尔特）的高卢人发动了对日耳曼的作战。首当其冲的是高卢帝国一方的林贡斯人南边的塞卡尼人。塞卡尼人的族长也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同时也出席了雷米人主导召开的部族长会议。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支持罗马的立场，并

且战胜了尤里乌斯·萨比努斯率领的林贡斯人。高卢帝国的冰山一角就这么快地崩溃了，败军之将萨比努斯虽然成功逃跑，但是9年后还是被罗马人找到了。自称是恺撒私生子后代的这名男子被皇帝韦斯帕芗下令处死。

但是，高卢帝国只是损失了冰山一角。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依然率领着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族盘踞在莱茵河口和东岸一带，科隆、波恩、美因茨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率领的特雷维利人占据了莱茵河西岸一带。

代替留在埃及的韦斯帕芗率领罗马军正式反攻的穆奇阿努斯在挑选实际担任指挥的司令官和军团长时也显示出了冷静的头脑，就算曾经为前一年中相继倒台的三位皇帝中的任何一位效力过也完全不是问题，在低地日耳曼或高地日耳曼军中服役的经验才是选拔的标准。司令官之一的安尼乌斯·盖鲁斯曾经在高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过军团长，另一名司令官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也有在低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军团长的经历。因为日耳曼人身为原住民族对地形和其他一些事情了如指掌，并且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交战，所以就需要具备足以与原住民族抗衡的知识和经验。

总计9个军团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和英国聚集到了一起。凯利亚里斯作为典型的前线指挥官，没有等到全军集结完毕，当他到达被破坏后仅剩下少量残兵的美因茨时，手上的兵力恐怕只有从意大利带来的5个军团。凯利亚里斯决定只率领这些部队向特雷维利人的驻地进军，从西班牙、英国和瑞士前来的其他军团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盖鲁斯，他不想错过这个正适合作战的早春季节。

但是，即使只有2万兵力，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的战斗力依然很可观。美因茨到特里尔之间由一条古罗马大道相连，不过因为是山岳地带，行军速度肯定比不上平地，但是罗马军仍然保持5公里的时速，每

日行军9小时。罗马军通常的行军时间是一日5小时，所以这已经赶上急行军的速度了。能走得这么快是因为减少了行李的重量，特雷维利人的西邻雷米人可以提供“后方支援”。

他们在到达之后对摩泽尔河畔的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展开攻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占领了特里尔。获胜的罗马士兵们主张放火将特里尔全城摧毁，并杀死所有居民，理由在于这里是杀死沃克勒等罗马军将领的罪魁祸首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的故乡。他们认为将掠夺的战利品和俘虏变卖虽然是胜者的权力，但现在不需要这些利益，所以应该通过烧杀抢掠让特里尔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

胜利与宽容

面对意欲复仇的部下们，司令官凯利亚里斯这样说：

> 罗马人之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了，罗马军团兵的斗志之高妇孺皆知，而现在必须用这种斗志来重新对付帝国之外的敌人。

凯利亚里斯的这句话将士兵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被带到特里尔之后生活在悲惨状态下的曾发誓效忠于高卢帝国的罗马军团兵们。

尽管友军成功攻占了特里尔，但是这些人甚至没有从关押自己的简陋小屋和帐篷中走出来，更何况是在被解救后迸发出喜悦，与同胞互相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很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过，并且为犯下的罪过深深感到羞耻。危险和恐惧已经过去了，他们却依然躲在小屋和帐篷中。描写这种场面的一流高手塔西佗这样写道：“他们看起来甚至连阳光都想躲开。”

士兵们顺着凯利亚里斯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这才想起了成为俘虏的

同伴们。士兵们纷纷对着简陋的小屋和千疮百孔的帐篷呼喊，却没有人答应。士兵们又将视线转向凯利亚里斯，什么都没有说，眼泪却已布满了脸颊。凯利亚里斯抓住这个机会对士兵们说：

> 抛弃罗马帝国，向蛮族帝国宣誓效忠只不过是造化弄人。他们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以及之后的悲惨遭遇，追根溯源都是他们的司令官和几个军团长对皇位的觊觎，以及被抓住这一点的敌人利用的结果。所以，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对于他们以前的行为，皇帝（韦斯帕芗）和身为司令官的我可以一笔勾销。

看到士兵们听得入神，凯利亚里斯再接再厉，他下令迎接这些原先的叛徒返回攻打特里尔时搭建的罗马军团宿营地。然后又强调，不得取笑、侮辱或者冷落他们。

士兵们脱去这些可怜同伴们的破衣服，为他们洗净身体，然后换上军团兵的新军装。凯利亚里斯利用这个机会把因留在特里尔而被俘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召集到一起，讲了一段话。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在9年前的公元61年被当时的皇帝尼禄任命为驻不列颠第九军团的军团长，根据这个史实来看，公元70年的这个时候他肯定有50多岁了。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名前线经验丰富的武将是这样说的：

> 我本人既不是善于言辞的政治家，也不是律师，因为我选择了通过武器让罗马公民的存在理由获得认可的方式。但是，鉴于你们现在的状态（败者的状态），我想还是听听我拙劣的言辞比较好。如今罗马与特雷维利人还有林贡斯人之间的战斗结束了，与其胆战心惊，不如冷静地听听我的话。
>
> 希望你们回想起来这样一件事，当初罗马人踏入你们以及其他高卢人的土地（指的是从莱茵河至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卢全境）不是出于罗马人的征服欲，而是因为接到了你们祖先的请求。那时（恺撒征服）以前的高卢整天持续着部族之间的斗争，处于濒临毁灭的

状态。恺撒接受高卢部族的请求进入高卢地区，但是别的部族向日耳曼人阿利奥维斯塔请求支援。然后这个日耳曼人便想借此机会将高卢掌控在自己手中。日耳曼人的战斗力何其恐怖，罗马人与他们展开过多少次战斗，导致了多少人牺牲，只要你们回想起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罗马人决定将莱茵河作为防线，这当然是为了保证意大利的安全，但同时也是防止高卢全境被阿利奥维斯塔（与恺撒交战失败的日耳曼武将）的子孙占领。你们不会认为现在的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与生活在恺撒时代的他们的祖先不同，会对高卢人怀有好感，并能够和高卢人亲切交往吧？如果是的话，那简直就是幻想。

距那时已经过去了130年，可是日耳曼人一点没变。他们依然没有放弃跨越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想法，他们排斥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认为掠夺其他民族的物资是理所当然的，并一直持续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他们离去之后只会留下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日耳曼人当然会长期觊觎高卢这片肥沃土地的主人宝座。

并且这些日耳曼人将高卢人吸引到自己一方时惯用口号永远都是“自由”和“独立”这两个词，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人类社会的现实就是，但凡想将别人纳入自己统治下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会用这两个词当做旗号。

恺撒将高卢归入罗马的法律管理下之前，罗马人统治高卢用的是武力，这个事实谁都没有异议。但是，我们罗马人成为征服者后，行使这项‘胜者的权利’也是为了给整个帝国带来和平。确实，你们被迫负担了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为了保证民族间的和平是需要士兵存在的，雇用士兵就必须支付薪水，而薪水的支付只能依靠税金。

罗马向高卢提出的要求只有缴纳行省税这一项，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承认你们的自治权。不仅如此，自从这条路线的创始人——恺撒时代开始，便有很多高卢人被提拔担任了罗马军中的重要职务，就连行省总督的职位不是都交给高卢出身的人做了吗（此处指尼禄

时代的尤里乌斯·温德克斯）？罗马的方针是不搞歧视政策，也不闭门自封（指的是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改革以后，元老院的议席向行省出身者开放的方针）。

英明的皇帝会给行省人民带来利益，这对于我们罗马人来说也一样。但是，如果皇帝昏庸无能，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罗马人会受到直接的伤害。不过就像干旱少雨或是降雨过多的自然灾害让我们人类束手无策一样，对于皇帝的不英明或者是昏君的不理朝政、横征暴敛，也只有在能容忍的限度内容忍。认为让特雷维利人出身的托图尔和克拉西克斯来统治的话一切都会转好，也不用再纳税的想法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也要考虑到自己所属部族的安全，所以肯定还会保留军队以防备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

如果将罗马人从高卢驱逐出去的想法成为现实，当然这是上天不允许的，假使上天允许，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帝国全境必定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乱状态。

但是，罗马经过800年的漫长岁月，在幸运的眷顾下，通过严于律己，铲除意欲破坏和平的人，为自己和他人确立起了和平的局面。

如果这种和平被破坏的话，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高卢人。因为诱发战争的最大原因是对黄金和财富的欲望，如今这些正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正因如此，希望你们三思而后行。想想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和村庄中享受和平、安居乐业的情景，以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能够享有同等权利的事实，这是不是值得热爱和推崇呢？

你们和其他高卢人不同，有起兵反抗罗马的经历。请你们根据这个经历想想，是继续支持必定失败的叛乱，还是回到我们罗马人的怀抱，彼此成为共存共荣的同伴，希望你们慎重决定。

光是凯利亚里斯的这场演讲就足以说服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了，这就意味着居住在罗马帝国的领土——莱茵河西岸的日耳

曼裔高卢人也脱离高卢帝国回到了罗马帝国一边。剩下的只有日耳曼部族了，这样一来他们甚至失去了号称“高卢帝国”的资格。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和虽然出身特雷维利人却决定继续反抗罗马的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联名给凯利亚里斯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如果凯利亚里斯有意成为高卢帝国皇帝的话，二人愿效犬马之劳。然而这位罗马的武将连回信都没写。奇维里斯仍然不放弃，他又将写给凯利亚里斯的信件副本寄给了身在首都罗马的图密善，以期借图密善的告发让担心前线的司令官投敌的穆奇阿努斯解除凯利亚里斯的职务，将其召回本国。但是韦斯帕芗年轻的儿子图密善把信件转给穆奇阿努斯后，他只是扫了一眼便扔到垃圾桶里了。于是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不得不面对重新收复莱茵河西岸后直冲河口而来的凯利亚里斯的罗马军和已经集结完毕的盖鲁斯指挥的罗马军这两支军队的猛攻。

日耳曼人且战且退，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都在激战中阵亡，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妻子和妹妹也被罗马军活捉，日耳曼人在前往战场时有拉家带口的习惯。被敌军追赶的奇维里斯本想着撑到冬天后能喘口气，但是果断进攻的凯利亚里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他。穷途末路的巴达维人首领提出了与罗马军司令官进行会谈的请求，双方的会谈在莱茵河口浅滩的一处小岛上举行。

笔者推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和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应该是旧交，公元60年也就是距当时10年前的时候，二人都在低地日耳曼军中服役，前者是辅助部队的长官，后者是军团长。二人先后于公元61年和62年左右与手下的士兵一起被派遣到不列颠，参加了罗马的远征。之后二人分道扬镳，奇维里斯再次回到低地日耳曼，凯利亚里斯被派到多瑙河战线，在此度过了数年。彼此的年龄差距应该不超过10岁，奇维里斯的参军时间虽然长，但相当于韦斯帕芗远亲的凯利亚里斯和韦斯帕芗一样属于“后来居上”，所以也是在兵营中成长起来的。此外，在罗马军中，

不论是罗马人将领还是行省人民出身的辅助部队长，同样都是总司令官召开作战会议时的常客。即便今天二人已经彼此互为敌人，但促使奇维里斯决定与凯利亚里斯进行直接会谈并且凯利亚里斯也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前提下接受的背后存在着这样的背景。

关于会谈都讨论了些什么内容，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塔西佗在《同时代史》中的相关叙述正好在奇维里斯开口说话的部分中断了。并不是塔西佗在此搁笔，而是因为之后的记载在中世以后失传了。不过，虽然不清楚二人的谈话内容，谈话的最后结果还是知道的。

巴达维人没有被赶尽杀绝，也没有沦为奴隶，而是恢复到了与起兵反抗罗马之前相同的状态，被允许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者存续下去。并且他们没有加入行省，所以也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作为交换条件，他们需要作为罗马军中的辅助兵服兵役，这与起兵之前也是完全一样的。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没有被处死。话虽如此，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继续担任巴达维部队的长官，此后关于他的消息完全中断了。关于曾经起兵反抗恺撒的高卢人维钦托利以及在条顿堡森林中全歼罗马三个军团的日耳曼人阿尔米纽斯事后的消息，很多史书都一直追寻到他们去世为止，但唯独关于奇维里斯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如果他是被处死，肯定有人会记载下来，实际却没有相关记载，同时也没有证明他存活下来的史料。他有可能是恢复了平民身份，在莱茵河东岸的某个地方平淡地度过了余生。原因是被罗马军抓住的妻子和妹妹就好像被送回了他的身边一样，从此也没了音讯。

曾经得到这个奇维里斯重用的女祭司贝莱达倒是被送回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可能是罗马人觉得把她从即使白天也一片昏暗的森林之国转移到阳光普照的意大利就可以削弱日耳曼女巫的法力。据说这名日耳曼女巫在意大利重操旧业，生意非常兴隆。

至此，高卢帝国在不到半年内便土崩瓦解了，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巴达维人点燃反抗罗马的战火算起，也不到一年时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对于这次“高卢问题”的处置方式。

首先，对于背叛罗马后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军团兵们，只用一句“一笔勾销”便给予了宽恕。这些人身为罗马公民不仅背叛了祖国，作为罗马的正规军也违反了罗马军的军规，如果是现代的话，势必难免被移交军事法庭。

其次，身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人民却禁不住日耳曼人的笼络，打着创建高卢帝国的旗号，试图脱离罗马独立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也完全没有被追究。除了战死的人之外，在这两个部族的实力派人士当中被处死的只有叛乱的主谋之一——尤里乌斯·瓦伦提努斯一人。

第三个是前面提到的对巴达维人的处置。对于充当了叛乱发起者的这个部族，罗马也贯彻了“一笔勾销”的方针。

这一系列现象中唯独不存在“报复”这两字眼。比起行使“胜者的权利”，罗马人选择的是以“宽容”相待。不是因为他们醒悟到了人道主义的可贵，而是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效。

这个处置方式是否是凯利亚里斯一个人的主意呢？

从罗马军的传统来看，前线的司令官拥有几乎无限制的裁决权，与汉尼拔的讲和是大西庇阿自己决定的，恺撒征服高卢后也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了战后处理。至于科尔布罗，虽然由皇帝尼禄委以军队执行作战任务，却未经战斗就决定与帕提亚讲和。

只不过，这些前线司令官的决定需要事后经过元老院的表决和市民的赞同才能立法确定为国策，话虽如此，其实可以说他们的决定几乎没有被否决过。

凯利亚里斯不同于以上列举的几位在罗马史上光彩夺目的大人物，并且他的对手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只是发动叛乱的行省人民而已。在他决定投入9个军团的阶段，罗马一方可能就已经胜算在握了。只要胜券在握，怎样进行战后处理应该也会一目了然。

笔者猜想，凯利亚里斯从意大利本土出发之前就已经从穆奇阿努斯那里接到了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穆奇阿努斯正在意大利专心于确保韦斯帕芗皇帝之位的工作，而他采取的方法不是“报复”，而是“宽容”。

维特里乌斯曾经因为在对失败者的处置上失误而招致过怨恨，穆奇阿努斯没有重蹈他的覆辙，并且他还巧妙地将因存心报复维特里乌斯而把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夷为平地的罪魁祸首安东尼·普里默斯降了职，这就是他深谙冤冤相报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道理的证据。

穆奇阿努斯还让元老院表决通过了向遭受战火的意大利北部居民提供损失赔偿的提案，曾经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居民也被列入了赔偿名单中。“一笔勾销”的政策在宗主国意大利也得到了贯彻，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一派的人员中，被处死的只有他的亲弟弟卢西乌斯一人，战斗到最后的士兵无一人遭到刑罚。

话说回来，人对于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即使是上司的命令也不会妥善执行。所以凯利亚里斯应该也赞同穆奇阿努斯的想法，正因如此他才能稳住叫嚣着报仇的士兵们，重新接纳“变节”的军团兵，接受曾一度倒戈转向罗马的行省人民再次承认罗马霸权的要求，甚至还让主谋奇维里斯放弃了抵抗。

但是笔者认为促使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选择宽容而不是报复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罗马人自己认为发生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责任在于罗马一方，塔西佗也写道：“这只不过

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如果不是一年之间先后出现三个皇帝，各为其主的军团兵之间混战不休的话，行省兵的叛乱就不会发生了。如果罗马人没有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也不会让行省人民觉得罗马人不足为惧了。笔者认为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是在充分了解了个中情由的基础上才选择了“宽容”的处置办法。

正因如此，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宽容与冷静毫不矛盾。始终坚持“一笔勾销”的凯利亚里斯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更不可缺少“冷静”的任务——与战友盖鲁斯一起重建莱茵河防线。

“莱茵河军团”重组

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莱茵河军团”由于士兵被抽调到不列颠参与征服战争，从1世纪上半叶的8个军团减为了7个军团，分别是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

这7个军团经过高卢帝国骚动后唯一毫发无伤的只有驻扎在今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的第一军团，维特里乌斯下令让他们前往意大利似乎才是毫发无伤的真正原因。由于同样的原因，驻扎在克桑腾的第五军团也避免了军团解散。这个军团的大部分人都去了意大利，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士兵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不能如此轻易地就将恺撒创建的这个战功显赫的军团解散，因此只有这个军团被调任到多瑙河流域的米西亚行省。另外还有一个军团也免于被解散，就是驻扎在美因茨基地的第二十二军团。保留这个军团的理由是他们在看到“莱茵河军团”唯一的军团长——不畏艰险、恪尽职守的军团长沃克勒被行省兵杀害时竟无动于衷，所以要求他们在以后的任务中将功赎罪，这个军团的银鹫旗此后也镶上了沃克勒的名字。

除此之外的4个军团全部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担心保留下来会再次

引发类似的事件，而是要他们为自己身为罗马的军团兵却发誓效忠其他民族的可耻行为负责。不过，虽然军团被解散，却没有将军团兵们除名，而是将他们分别分配到了新组成的各个军团中。因为突然增添2万名无处可去的军团兵的话，很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至于协助主要战斗力的军团作战的辅助部队，既然连巴达维人都恢复到了叛乱以前的状态，其他行省出身的士兵们各自归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小变动。

叛乱以前都是由部族的实力派人士来指挥、由自己所属部族的部族民组成的部队，此后改为任命罗马人或其他部族出身的人担任指挥官，但是没过几年就又变回了原来的方式。毕竟这种新的选任方式有诸多不便，让出身本地的人来担任指挥能够更有效地团结士兵。虽说一切都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但此后的200年却再也没有发生过行省兵攻击军团兵的事件，可以证明公元70年的宽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不过，尽管罗马人在帝国西方始终坚持如此宽容的政策，在帝国东方的做法却截然相反。高卢帝国问题和犹太问题是发生在同时期的事件，但可以说罗马人对两个事件的应对方式有着天壤之别，理由在于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

犹太问题

如果说公元66年夏天爆发、73年春天以马萨达要塞的玉石俱焚告终的“犹太战争”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行省人民发起的一场反抗霸权者罗马的独立运动的话，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的高卢帝国创建事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两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犹太战争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叛乱，无论统治者罗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将问题暂且搁置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想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决。

犹太民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巴勒斯坦一带位于大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如果他们是居住在黑海东岸一带的话，犹太肯定会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因为如果处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长期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时叙利亚和埃及都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第二个特殊性是，他们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在统治者看来，越是优秀的民族越不好统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压到社会底层也不会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气。

第三个特殊性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的离散倾向。以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处犹太人聚集区为首，各个城市都存在犹太人的共同体。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与本国的连带关系非常强。具体来说，只要是犹太教徒，不管住在哪里，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与犹太民族相反，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市的代表锡拉库萨和塔兰托的居民只有在参加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运动会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希腊血统。就算科林斯灭亡，科林斯移民的后代——锡拉库萨的居民也不会起兵复仇，但如果要是灭亡耶路撒冷的话，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可能会起兵。一些学者表示，比起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来说，居住在希腊移民城市的海外犹太人在数量上要多得多。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没有对自己以外的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犹太人也有诸如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的独立时期，但这些都是自己国家内的独立，并不是将他国纳入统治下的帝国。而且，这个时代在他们的历史上稍纵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伦奴役的时代，他们也曾长年处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化（Hellenism）王朝（希腊裔国家）的统治下，最后又被罗马统治。

在历史上被其他民族长期统治的民族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肯定是受压迫的民族，当然会让人们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就是在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话很可能会带来精神构造上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自卫本能异常发达，失去了思考的灵活性而变得顽固不化。同时，对于任何事物都会反应过于敏感。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往往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梦中，犹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义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个特殊性会让人感到这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极致，就是与宗教的关系。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众神只是保佑人类、为其提供帮助的存在，相反，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存在，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惩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却容易衍生出宗教积极介入政治的神权政体。

加之犹太人还有着诸如巴比伦奴役时代被强制迁移到他国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身处异乡的情况下还想保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除了诉诸宗教外没有别的选择。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犹太人观念中的国家一直是神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权政体（意大利语Teocrazia，英语Theocracy）。

有意思的是，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不存在表示“神权政治”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表明古代的罗马人甚至没有设想过让神来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但是，如果全体犹太人一致推崇神权政体的话，应该只会与不接受神权政体的罗马人发生矛盾，犹太人彼此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冲突。然而，事实却是同样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中对于政体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这便是主张宗教优先的法利赛人和倡导重视政治的撒都该人。

除此之外，他们居住的场所也发生了分裂，有的犹太人继续居住在犹太国内，有的移居到了海外的希腊移民城市。犹太国内的居住区也分成了内陆地区和海边地区，耶路撒冷城内还出现了贫困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分化，情况很复杂。

现代的研究者们将这些人统括起来分成了两派：贫困的犹太人属于对罗马的强硬派，富裕的犹太人属于稳健派。当然，在亚历山大拥有一家小店铺的犹太人比起在加利利的山野放羊的犹太人确实要富裕一些。但是，对统治者罗马采取强硬还是稳健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财富的多少，更多依据的是与异族接触、共生的必要性有多大。对于住在城市的犹太人来说，正因为这种必要性比较高，所以本来由于选民思想的影响而性格封闭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变得开明起来。

对于这个既特殊又复杂的犹太民族，罗马是如何应对的？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皇帝卡利古拉”一章中罗马人与犹太人、希腊人与犹太人、提比略与犹太人、卡利古拉与犹太人等各个小节，此外，“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也曾单列出“犹太问题”一节进行过介绍，在此重新梳理一下：

第一，结束后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300年后，罗马人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希腊人，提高了此前一直处于统治阶级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希腊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趋于了平等。

像斐洛这种开明的犹太人高度评价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的罗马帝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自己的帝国在东方世界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的自由竞争才能实现。

第二，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动不动就容易陷入敌对关系，罗马采取的方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在双方

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在作为统治者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和犹太人同样是被统治者，《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介绍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敕令《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表明罗马这种立场的好例子。

第三，对于犹太人主张自己所拥有的“特殊性”，充分给予承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二）允许每年继续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三）除死刑的宣判执行以外，允许犹太人社区内的法律自治，但只限于帝国东方的犹太人社会。

（四）免除军役及其他国家公职，但对于有意参军、奉公的人仍然保持开放政策。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为安息日。

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假日是供奉神灵的祭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这种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一定显得很奇怪，但同时罗马人也将犹太人严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视为了他们自己的祭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祭日，因此也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一项名为《小麦法》的小麦免费发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生活。相当于“面包与马戏”中的“面包”，虽然这种做法被后世大加抨击，但也是一项兼顾社会福利和争取选民的政策。

小麦的发放通常一个月进行一次，有时发放日正好赶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这种情况时犹太裔的市民就无法前往马尔斯广场的一角领取小麦，因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负责发放小麦的当局会将属于犹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如果只是5人、10人，负责给数万人发放小麦的当局不会搞这种特殊待遇，这也可以证明兼有犹太教徒和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这两种身份的犹太人在首都罗马也有相当的人数，同时也表明罗马人有着尊重不同习俗的理念。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末期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之外，从犹太人处于罗马直接统治下的公元6年开始的60年间，罗马人一直对犹太人奉行这种政策。不过罗马人唯独没有允许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因为如果允许的话，恐怕无法避免这种影响波及海外的犹太人社会。作为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交换条件，罗马一直致力于在犹太地区实现由犹太人的国王领导的统治政体。如果能确立起像大希律王时代的那种世俗王权，就可以抑制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念头。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同的。罗马人的“自由”意为在有军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能够建立神权政体才是“自由”。罗马人60年来承认犹太人特殊性的统治政策只能暂缓犹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脚步，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这种愿望。

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认为，60年后爆发的犹太人叛乱是菲利克斯、菲斯托斯、阿尔比努斯、弗洛鲁斯等历代犹太长官施行暴政的结果。罗马人史学家塔西佗也曾写道：“犹太人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弗洛鲁斯那个时期为止，在弗洛鲁斯担任长官期间爆发了叛乱。”

这四个人担任犹太长官的时间是从公元52年到66年为止的14年间，如果这14年间的罗马行政官的暴政是爆发犹太叛乱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罗马的中央政府能够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容忍地方长官们在问题最多的犹太地区施行暴政呢？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尼禄皇帝时代的长官，尼禄虽然在很多方面犯了统治错误，唯独在涉外政治上展现出了了不起的见识。在他统治的14年间，除了统治末期的犹太，没有任何一个行省对罗马发起过叛乱。虽说在挑选担任行省统治直接负责人的总督、司令官和长官时只要沿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建立起来的人才网络就可以了，但是尼禄在用人方面确实有超凡的才能。

不过，尼禄既不是一人独揽皇帝大权的提比略，也不是为了公务而鞠躬尽瘁的克劳狄乌斯，他对于皇帝责任之外的事情，比如诗歌的自作自吟，还有罗马的城市绿化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如果是提比略的话，肯定会马上将统治失当的犹太长官召回送上法庭，严厉追究责任。当然，挑选继任的长官时也会比以前更加慎重。皇帝的职责就像驾驶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只要驾驭其中任何一匹马的缰绳发生操作失误，战车就会撞到运动场的观众席，连带驾驶者一起粉身碎骨。也许尼禄缺乏的是这种紧迫感。

即使如此，笔者还是无法同意尼禄手中的“缰绳”偏偏会在犹太上操作失误的说法，并且是连续四人，时间长达14年。

关于这个疑问，塔西佗下面的这句话也许能作为解答：

> 犹太人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难以忍受的存在，就在于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与帝国其他的居民不同。

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经提到过，作为征服

者的罗马人一直努力同化被征服者，并试图将他们吸纳为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希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和北非人都赞成并且加入了罗马的这条“败者同化”路线，相反只有犹太人以一神教为由加以抗拒。并且，他们不仅抗拒被同化，还固执地坚持建立神权政治，对于不接受他们要求的罗马不断进行反抗。

虽然希腊人存在反犹太的情绪，但是与希腊人不同，在社会立场和职业上都与犹太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罗马人却没有反犹太的情绪。不过到了与犹太人发生直接接触60年后的这个时期，也许罗马人终于也开始对犹太人心生厌恶了。

一旦对犹太人心生厌恶，犹太人的所有行为都会变成厌恶的对象。就像塔西佗所说，犹太人的割礼是为了区别于别的民族，一神教是从对其他众神的轻蔑中产生的信仰，拒绝服兵役和担任公职表现出缺乏对帝国的爱国心，积极增加人口是为了超越其他民族，他们拒绝崇拜仿照人类模样雕刻的神像只代表对人类的蔑视，没有舞蹈也不伴随有体育竞技的犹太教祭祀死气沉沉，足以让人们对人生产生绝望，禁止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也逐渐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封闭性的一种体现。

不能说四名犹太长官的心中不存在这种反犹太的情绪，并且这四个人与远在帝国西方、和犹太人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塔西佗不同，他们必须日日夜夜与犹太人来往，并且还肩负着统治这些犹太人的任务。

对于接到命令镇压游行的警察部队队长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驱散游行人群，而是对手下队员的掌控。如果放任不管，受到游行队伍挑衅而心里燃起憎恶之火的队员很可能会像野兽一样对游行队伍发动攻击。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对部下进行掌控的“缰绳”有多么重要。

连续四任犹太长官的残酷统治的背后可能也潜在有长官们的焦躁心理吧！尽管没有酿成大祸，但光是列举这个时期发生的犹太人叛乱，其次数之多恐怕就会占去很多篇幅。被称为“短剑党”（杀人者）的恐怖组

织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犹太全部地区，另外，从大神殿的重建工程结束的两年前开始，耶路撒冷出现大量失业者。建立神权政体的大义正道，失业造成的生活不安，中近东地区特有的酷暑，使得当地难免不生状况，这要求直接负责人需要比以前更加慎重。然而，就在要求对这些地方长官的任务执行进行监控并预先制定对策的时候，皇帝尼禄却缺乏这种坚决、持续的责任感。

叛乱爆发

埋下的火种被点燃的契机是长官弗洛鲁斯从耶路撒冷大神殿的宝物库中没收17塔兰特金币充当了欠缴的行省税。尤里乌斯·恺撒在年轻的时候曾被海盗生擒，海盗向他开出的赎身钱是20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用平民的生活开支来比较的话，相当于560人一年的收入。在弗洛鲁斯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用来代替没有缴纳的行省税罢了。

但是，问题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是犹太教徒每年都会义务捐赠2德拉克马香火钱的圣地，是将捐款奉献给神的地方，不是储蓄自己钱财的银行，更不是以拖欠税金为由便可以随便提款的账户。然而弗洛鲁斯不仅没有反省自己的冒失行为，反而决定对发起暴动的犹太人实施强硬的镇压，这当然会让犹太人的愤怒更加强烈。

并且犹太人一方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愤怒。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冲动起来便无法在中途停下来，要一直冲到无路可走为止。以17塔兰特金币为起因的暴动发展成了将罗马势力从耶路撒冷赶出去的战争，时间是公元66年6月。

不过，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都参加了暴动，他们分为激进派和稳健派。激进派指的是此前游荡于犹太内陆地区的“短剑党”，

他们这次成功地将耶路撒冷的下层民众卷了进来。稳健派是处于耶路撒冷上层阶级的人们。

内部不团结使得激进派的行动更加过激了。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为了让本来没有信念却出于立场而不得已支持稳健派的人明白“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而且在这个时候，激进派内部也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过激的行动愈演愈烈。

因畏惧暴徒而逃入王宫内的罗马守卫队听到对方承诺缴枪不杀后纷纷投降，之后却全部惨遭屠杀。

稳健派的主心骨——大祭司和他的弟弟一起成为了恐怖事件的牺牲品。

罗马的卫兵驻扎在马萨达的要塞落入了前来袭击的激进派手中。

统治犹太北方的阿格里帕二世以犹太人的身份出面劝说却无功而返，夏秋之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反罗马暴动开始向犹太地区的西部和南部扩散。

居住在恺撒利亚等希腊移民城市的希腊人对这次事件产生了危机感，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反犹太情绪，因为危机感而倍增的反犹太情绪朝着直到昨天为止还同住在一个城市的犹太人爆发了。同样的现象还波及了叙利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长年的敌对情绪也一触即发，罗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亚历山大由于犹太人长官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果断采取应对措施才得以避免事态过于严重，但是问题已经发展到管辖犹太的叙利亚行省总督不出马便无法解决的程度了。

叙利亚总督塞斯提乌斯是名将科尔布罗的继任者，就任总督后不幸患病，两年来一直将实际工作交给副手穆奇阿努斯负责。然而，率领军

团攻打耶路撒冷的任务是不允许交给别人代理的。由于罗马考虑到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所以向犹太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派遣罗马正规军团只有在130年前的庞培时代发生过。

率领第十二军团和阿格里帕二世的友军一同南下的塞斯提乌斯攻占了一些支持叛军的城镇后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不出所料，犹太一方的反击非常凶猛，同时，塞斯提乌斯的指挥也缺乏积极性，结果没有攻下号称耶路撒冷最大要塞的大神殿所在的丘陵地区。此时已经到了11月，即将步入冬季，也许是打算来年再战，塞斯提乌斯决定撤退。

然而，撤退往往比进攻要难，比起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慎重的安排。抱病在身的塞斯提乌斯大概没有这么充足的劲头了。犹太人得知罗马军团撤退的消息后高奏凯歌，并对撤退中的罗马军发动了袭击。据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记载，罗马军团和友军加在一起的战死人数为步兵5300人、骑兵480人。就算不是犹太人，看到这个数字后也会认为犹太一方大获全胜。塞斯提乌斯返回叙利亚安条克的总督官邸后不久就病死了。

罗马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当时正在希腊的皇帝尼禄那里，尼禄任命穆奇阿努斯接替塞斯提乌斯的职位，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通过坚决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了。虽然现在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主要职责仍然是监视东方的两个大国——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的动向。尼禄觉得犹太问题超出了叙利亚总督的职权范围，他决定起用韦斯帕芗作为犹太问题的唯一负责人。尼禄此时正游走于希腊全境为他自作自吟的诗歌进行“巡演”，不过还是妥善处理了这件事情。而且尼禄还起用了因为在自己的诗歌巡演中打瞌睡被发现而自认出头无望的韦斯帕芗，可见他的性格也是不拘小节的。

韦斯帕芗决定出动3个军团参与计划于来年即公元67年春天开始的镇压叛乱犹太人的军事行动。事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发生了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间的暴力冲突。

至此，在130年间一直坚持充当调停角色的罗马终于开始了与犹太的正面对决。犹太问题牵扯到的绝不只有犹太民族本身，这种复杂性是让罗马坚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从帝国东方的对决关系来看，依靠寻常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犹太问题的：

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亚历山大、安条克、大马士革为首的希腊移民城市。

犹太人激进派和犹太人稳健派的对立——耶路撒冷、犹太内陆地区。

希腊裔居民联合罗马士兵与犹太裔居民的对立——以恺撒利亚为首的犹太地区内的港湾城市。

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的观点是，要想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出动罗马的正规军才行。另外，根据这位犹太人史学家的记载，面对罗马的正式反击，犹太方面也确立起了联合激进派和稳健派的迎击体制。

犹太人约瑟夫斯

在此出现了一位人物，为了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话题，需要先对他进行一下介绍。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犹太战记》的作者，从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个犹太人。

他出生于公元37年，与皇帝尼禄同岁。父亲出身祭司阶级，母亲拥有犹太王室血统，因此他出身高贵，也受到过符合犹太上流阶级身份的系统教育。然而，他似乎是一个智力方面比知识方面更为优秀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为了了解犹太教的整体面貌曾经徒步寻访各个宗派。与撒都该派、艾赛尼派都有接触，也曾体验过沙漠中的教团生活，后来又与

法利赛派走得很近。无论从出身阶层还是智力方面来说，他都是应当进入犹太社会领导层的人。

公元64年，27岁的约瑟夫斯第一次来到了罗马，他此行是作为最年轻的成员随同使节团前去向皇帝尼禄请愿，要求释放在菲利克斯担任长官的时期率众在罗马发动暴动而被押送至罗马的犹太人。

这位年纪轻轻、头脑清晰的犹太精英在乘船从犹太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首次目睹了沿途的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各座城市，尤其是管理所有这些城市的帝国首都——罗马。这个时期的体验很可能在约瑟夫斯几年之后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到达帝国的首都罗马后，这个年轻的犹太精英没有甘做一名纯粹的旅行者，通过一名犹太演员的介绍，他结识了皇帝的妃子波比娅·莎宾娜。皇妃波比娅是罗马犹太人社会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彼此相识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美丽又善解人意的波比娅也不会拒绝接见一位相貌英俊、满腹经纶的犹太青年。约瑟夫斯并没有提及自己当时是否也面见了皇帝尼禄，尼禄当时正在为罗马一场大火的善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可能没有闲工夫接见这位犹太使节团中年龄最小的年轻人。总之，约瑟夫斯成功通过皇妃向皇帝请愿，准许被囚禁的犹太人返回故乡。

考虑到从犹太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返回犹太的旅途所需的时间，以及受季节影响的海上路况，约瑟夫斯一行回国的时间大概应该在公元66年秋天之后。刚回国不久，约瑟夫斯就被任命为迎击罗马军的前线指挥官。这名29岁的年轻人刚刚见识过罗马帝国的威严后就被派到最前线与罗马为敌，不知他作何感想。

如果是不了解现实的人，大可随心所欲地做着美梦。另外，借用尤里乌斯·恺撒的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只想看到自己期望的现实的话，看一看自己想看的罗马帝国就可以了。”约瑟夫斯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人，对于不想看到的现实他也会直接面对，在这一点上比起他的同胞

来更接近于对手罗马人，他就是这样一名犹太青年。

《犹太战记》就是他这样一个人写就的关于同胞毁灭的故事，这是一部由热情和冷静综合而成的历史杰作，在日本已有译著出版。出版者为山本书店，从译文到小标题、地图、插图，无不倾注着编辑山本七平先生的精心编排，是一部难得的译著。山本书店除了这部《犹太战记》之外，还出版了《犹太古代志》、《自传》、《驳斥阿比安》等约瑟夫斯的全套著作。可见已故的山本七平先生对于这个让现代的以色列人在理性上认可其重要性、在感情上却又憎恶至极的约瑟夫斯有多么的关注。

犹太战争

公元67年5月，韦斯帕芗率领的罗马军开始向犹太北部的加利利进军，约瑟夫斯已经偕同胞们在此严阵以待。

如果有人能够通过罗马军这次的“量”，了解“质”的话，一定会感到罗马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这次与塞斯提乌斯去年只派遣驻扎在安条克的一个军团加上犹太阿格里帕二世援军的情况不同了。

作为主力的第五、第十、第十五这三个军团无一不是名将科尔布罗训练过的精英军团，在解决了亚美尼亚、帕提亚的问题后依旧驻扎在小亚细亚，现在已经沿着地中海的东岸到达至此了。

协助主力各军团的辅助兵人数与军团兵基本相同，这些行省兵的出生地都在所属军团的驻扎地点附近，所以原先在多瑙河沿岸服役的第五和第十五军团的辅助兵有很多来自巴尔干。驻扎在叙利亚的第十军团的辅助兵则大多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出身。

此外，韦斯帕芗军还得到了统治犹太东北地区的阿格里帕二世的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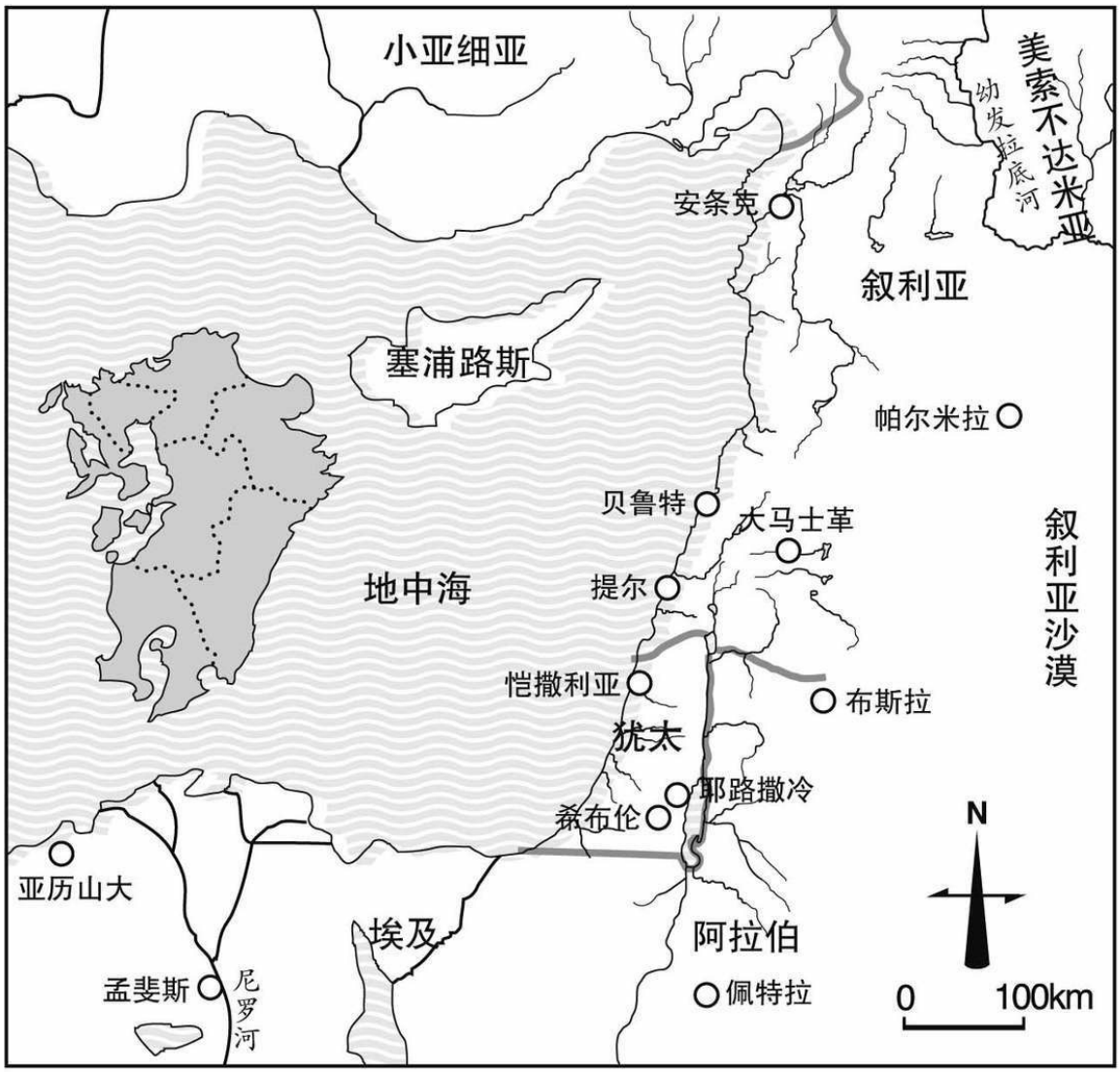
太士兵以及那巴提亚和阿拉伯士兵的支援，因为他们的国王与罗马缔结了同盟关系。

全军总兵力为6万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组建一支从语言肤色到饮食习惯全部迥然相异的部队了，对于罗马军的司令官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军团内的语言统一为拉丁语，可是被调来参战的阿拉伯士兵不可能听得懂。罗马的皇帝多为军事经验丰富者出身，也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军人势力有多强，而是如果有人能率领一支鱼龙混杂的军队取得战果的话，那他到了政治舞台上也能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迎击这支罗马军的犹太军却只是由犹太人组成的集团，可见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这种大义正道在别的民族中很难找到共鸣者。从这一点来说，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战争就如同《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所讲述的，是一场古代社会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对决。

由于要等待从各地前来的军团和同盟国军队到达，韦斯帕芗在接到任命半年后即公元67年5月才终于展开了军事行动。这个人作为武将的能力与当时罗马军的其他司令官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之处，回顾他此前的经历，在战略上远远不及名将科尔布罗，也不是一名善于运用各种华丽战术的才华横溢的指挥官。话虽如此，他也绝不是一名平庸的武将，能够集谨慎、踏实、持久力和健全的常识于一身的人就已经不是凡人了。虽然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俘获普通士兵的心，但韦斯帕芗偏偏还拥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和力”。

他于公元9年11月出生在首都罗马沿萨拉利亚大道向东北行走60公里处的列阿特（现在的瑞耶提），之前已经提到过，他的出身非常低贱，依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片天地。



犹太及其周边（为了表示距离感，使用的比例尺与日本的九州一样）

弗拉维乌斯·韦斯帕芗的军旅生涯开始于提比略皇帝时代，他也是史学家蒙森笔下的“提比略一派”中的一员。在军团内晋升到大队长之后，他仿效当时罗马常见的晋升途径，参加首都的选举并当选为财务检察官。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一阵后，又当选为按察官。之后曾一度重返军团生活，在此期间提比略皇帝驾崩，开始了卡利古拉皇帝的时代。

卡利古拉是个问题很多的皇帝，但还是保留了前任提比略构筑的人

才网络，所以在风雨交加般的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期间，韦斯帕芗没有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期间，30岁的韦斯帕芗还成功当选了法务官。在当时的罗马，有担任法务官经历的人也就意味着拥有被委任指挥一个军团的资格。

罗马是一个霸权国家，军队负有防卫庞大帝国全境的职责，所以不会让有指挥军团资格的人游手好闲。韦斯帕芗从法务官的职位上卸任后马上被任命为负责防卫莱茵河的第二军团的军团长，派驻低地日耳曼。到了公元43年，决定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命令34岁的韦斯帕芗与指挥下的军团一起前往不列颠。

当时的不列颠战线由曾在确立多瑙河防线的工作上表现出色的普劳提乌斯担任总指挥，整个战线挥洒着克劳狄乌斯皇帝征服不列颠的热情，也是年轻武将们一显身手的舞台。在年龄和经验上都毫不逊色的韦斯帕芗的军事才能在不列颠战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担任总指挥的人能力出众的话，手下的军团长们也更容易立下战功。韦斯帕芗东奔西走，表现活跃，最后被授予了凯旋勋章。在步入帝政时代的罗马，通常只有皇帝才能享受到驾驶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席凯旋仪式的待遇，军团长级别的人只能得到低一级别或者更低级别的勋章。韦斯帕芗获此殊荣后产生了巨大效果，公元51年，42岁的他当选为执政官。

不过，其实他只是以候补身份当选执政官。罗马帝国必须向元老院管辖的近10个行省派遣总督，并且担任总督必须拥有10年的执政官经验，所以需要大量培养执政官人选，因此即便是候补也有出头的机会。韦斯帕芗应该有两个月的执政官经验。10年后的公元62年，韦斯帕芗成为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前往官邸所在的迦太基赴任。

但是，就在结束一年的任期后即将被任命为可以指挥多个军团的“皇帝任命的司令官”并前往皇帝管辖的行省赴任时，发生了在尼禄皇帝的诗歌巡演上打瞌睡的事件。韦斯帕芗本人和周围的人都认为他的仕途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这件事过去两年后，尼禄又重新将韦斯帕芗

提拔为指挥犹太战争的司令官。

公元67年，韦斯帕芗58岁，约瑟夫斯30岁。民族、出身、性格、年龄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犹太地区遭遇了，此前二人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起兵6万攻打犹太的罗马军显示出了司令官韦斯帕芗的性格，稳扎稳打地向前推进。他们的作战计划是一边对犹太全境展开地毯式攻击，一边南下逼近耶路撒冷，当然，攻击重点都集中在各战略要地上。然而，约瑟夫斯率领的犹太军队挡在了罗马军团的面前。

约瑟夫斯在书中自夸的战术确实精妙绝伦，但依然没有超出出奇制胜的范围。不过他的计策竟然能阻挡罗马军主力47天，也难怪约瑟夫斯会自夸。但是笔者认为韦斯帕芗在战略战术上已经达到极限的解释更为妥当，被敌人出奇招阻挡47天之久，如果是大西庇阿、苏拉或者全盛时期的庞培或恺撒的话，想必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担任司令官副手的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虽然也是一名身先士卒的勇将，却是有勇无谋。

纵然如此，对手既然是组织完善、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奇招也早晚会有用完的一天。英勇的约瑟夫斯和他的犹太同胞们大败而归，很多人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当俘虏，他们负责死守的尤塔帕塔城也于7月20日陷落。据约瑟夫斯统计，这一战死了4万人，1200人被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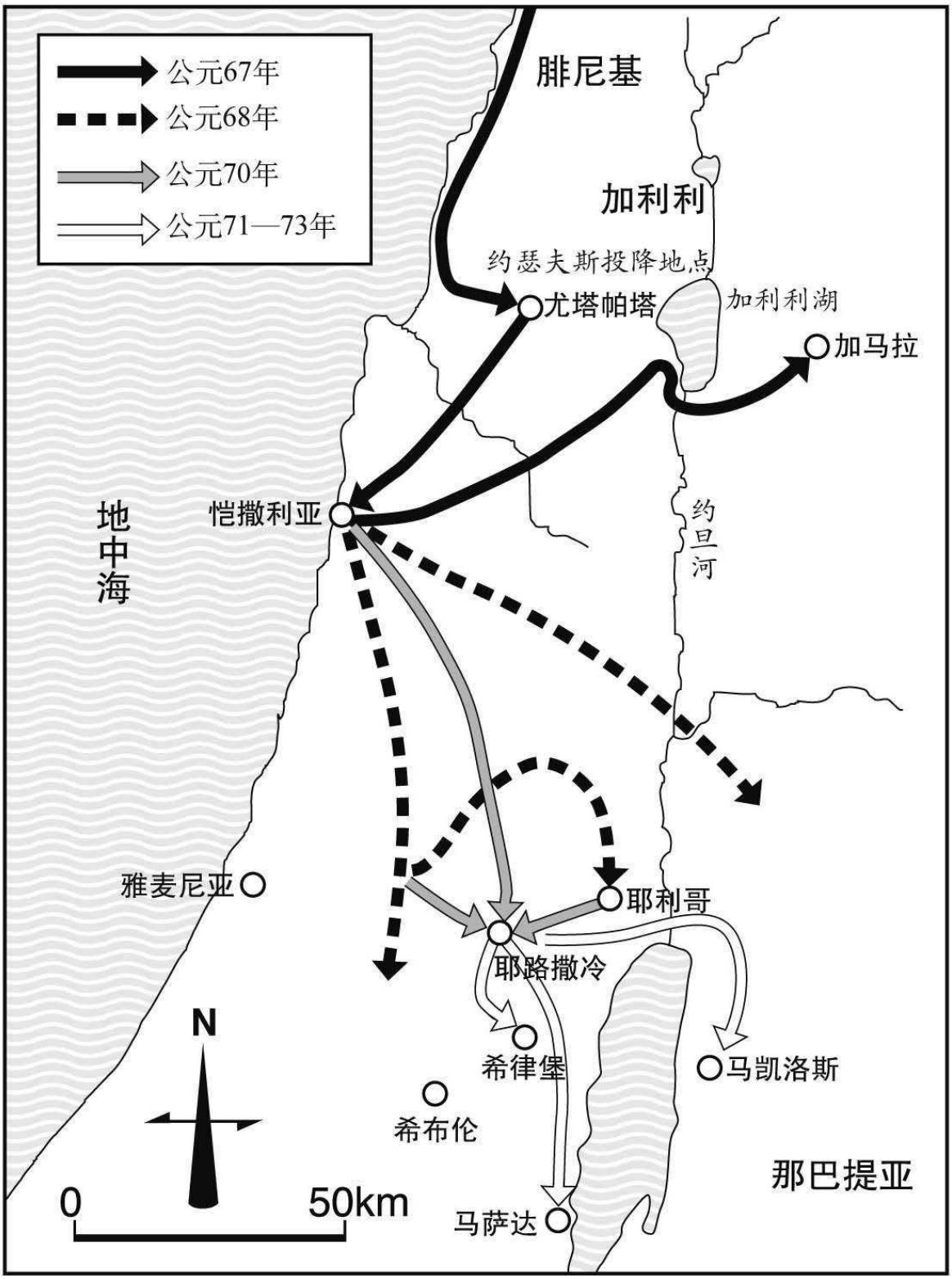
但是，约瑟夫斯逃走了，他藏进了当地很多洞穴中的一个。不过这里早有先来的客人了——城内的40名长老。约瑟夫斯劝这些人向罗马军投降，可能因为他才30岁，还不想死。又或许是因为约瑟夫斯对罗马帝国有所了解，不想成为这场大局已定的战争的牺牲品。然而，即使他说罗马人会赦免所有投降者，40名长老也没有听从他的劝说。相反，他们坚定不移地主张全员自尽才是犹太教徒应有的风范。

虔诚的犹太教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只有唯一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自由应该献给为侍奉这位神而建立政体的国家。因此，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死不足惜。”

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自杀行为是在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期待的“自由”时所面临的必然结果。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地争辩期间，他们藏身的洞穴被罗马士兵发现了。韦斯帕芗派来了劝说投降的使者，但长老们的想法没有改变。最后，他们决定通过抽签来集体自杀，最先抽中的人由第二个抽中的人动手杀死，照此顺序直到最后抽中的人自杀为止。


公元67年
公元68年
公元70年
公元71—73年
腓尼基
加利利
约瑟夫斯投降地点
尤塔帕塔
加利利湖
加马拉
地中海
恺撒利亚
约旦河
雅麦尼亚
耶利哥
耶路撒冷
希律堡
马凯洛斯
希布伦
那巴提亚
马萨达
N
0
50km

罗马军在犹太战争中的进军路线

但是，40人中的其他人相继被杀后，最后留下来约瑟夫斯和另外一个人。据现代的数学家称，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是可以让其中一人活下来的。不过约瑟夫斯在书中这样写道：

> 不知是命运之神的作弄还是神的旨意，我和另一个人留到了最后。因为不希望在抽签之后杀人或者被杀，我便劝说那个人相信我，一起活下去。

他的劝说成功了，二人举着双手从洞穴中走出来，被罗马军带回了营地。罗马士兵们用一种好奇心大于憎恨的心情迎接了这名让本方在原地被困一个半月的敌将。尤其是约瑟夫斯如此年轻，更是让提图斯惊讶不已。

与约瑟夫斯年龄相仿的提图斯虽然正在执行镇压犹太叛乱的任务，然而他却完全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非常崇拜以犹太人的身份坐到埃及长官位置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并且不顾阿格里帕二世的姐姐贝蕾妮丝犹太公主的身份，疯狂爱上了她。提图斯和他的父亲韦斯帕芗一样，完全不存在种族偏见。淳朴的提图斯被这位将罗马军团阻挡在一个地方47日之久的犹太指挥官的年轻和品格征服了，于是他下令，罗马士兵不得碰约瑟夫斯一根汗毛。

但是，父亲没有忘记指挥官的职责，他向儿子交代，约瑟夫斯是即将被押送前去面见皇帝尼禄的俘虏，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约瑟夫斯得知这个消息后，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这个犹太俘虏要求与罗马的司令官单独谈谈。韦斯帕芗应允了，但还是让儿子提图斯和两个朋友陪同自己出席，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约瑟夫斯其实完全没有偷袭敌方司令官的打算。

预言

约瑟夫斯率先开口："或许你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斯的犹太人，但其实我是神派来向你转达一件事的使者。"然后他接着说，"神说继承尼禄之位的是你和你的子孙，为了确认这个预言的真伪，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韦斯帕芗没有相信，因为尼禄的母亲继承了神君奥古斯都的血统，约瑟夫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公元67年夏天，尼禄的皇帝位置安然无恙。并且韦斯帕芗出身低贱，此时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会取代当时的领导者，尤其是韦斯帕芗本人首先就没有这种想法。

于是在场的朋友之一马上反驳约瑟夫斯："假如你有预言的能力，那为什么没有向尤塔帕塔的居民们预言，他们的城镇会陷落，而你自己也难逃被俘的命运呢？"约瑟夫斯回答："自己曾经预言过，但是他们不听。"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的这段记载有强烈地为自己辩护的味道，所以他记载的内容不一定都是事实，不过据他自己说，韦斯帕芗后来相信了。笔者猜想，与其说韦斯帕芗后来相信了，不如说是他虽然不相信但也无意推翻他的预言。

虽然不至于达到犹太人那个程度，但罗马人也是很迷信的。看到鸡欢快地啄食，士兵们会欣喜地认为这是好兆头。但是，罗马的领导层不管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都非常清醒，因为他们会私下命令在前一天不给鸡喂食。

不管怎样，约瑟夫斯的计划成功了。他不必再担心自己会被押送到尼禄那里，提图斯也可以公然地和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犹太人称兄道弟了。

连塔西佗也对这次“预言”作过记载，至于这么做到底是像约瑟夫斯所说的真的是神的旨意，还是像笔者所说的，这是约瑟夫斯在一生中下的最大赌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笔者这么解释的根据在于以下几点：

公元67年7月——约瑟夫斯预言尼禄之后的皇帝将是韦斯帕芗。

公元68年6月——尼禄自杀。

公元69年7月——东方各军团拥立韦斯帕芗称帝。

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在公元67年的年龄：

尼禄——30岁。

韦斯帕芗——58岁。

提图斯——28岁。

约瑟夫斯——30岁。

如果是站在约瑟夫斯的立场上，估计笔者也会打这个赌。约瑟夫斯只预言韦斯帕芗会继尼禄之后成为皇帝，但并没有预言到尼禄的死亡。如果尼禄没有被迫自杀，从年龄上来看，先死的很可能会是韦斯帕芗。假如韦斯帕芗不打这个赌，等待约瑟夫斯的将是被押送到尼禄面前的命运，运气不好的话会在30岁就英年早逝。从尼禄的年龄来看，想知道预言是否应验肯定要等到很久以后，所以试着预言一下也没什么损失。即使预言不中，约瑟夫斯也不会失去什么。笔者推测，30岁的约瑟夫斯当时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加尔巴成为皇帝，证明了约瑟夫斯的预言落空，但是韦斯帕芗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他没有去找约瑟夫斯质问为何预言没有应验，也没有将约瑟夫斯套上枷锁投入大牢。得知加尔巴登基后的韦斯帕芗派遣提图斯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向新皇帝表示支持和效

忠，提图斯在途中得知了加尔巴死亡、奥托登基的消息。对于新皇帝奥托，韦斯帕芗既没有积极地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至此，约瑟夫斯的预言第二次落空，可是他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韦斯帕芗的心中还惦记着这个年轻犹太人的预言，还是因为他觉得约瑟夫斯的出身和头脑在镇压犹太的叛乱上有用武之地？从韦斯帕芗凡事都讲究平衡的态度来看，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在一年后的公元69年7月，罗马皇帝的归属又从奥托变为了维特里乌斯，得知这个消息的东方各军团不接受维特里乌斯登基，纷纷支持韦斯帕芗称帝。

自称为帝的韦斯帕芗至此才相信了约瑟夫斯在两年前作出的预言，于是约瑟夫斯被释放，恢复了自由身。不过他没有离开罗马军的营地，不知是韦斯帕芗挽留还是约瑟夫斯自己决定留下。

如之前提到的，公元69年7月以后的韦斯帕芗阵营明确了每个人的角色分工。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率军西进，韦斯帕芗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待时机，重新打响的犹太战争的总指挥由提图斯担任，埃及长官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协助提图斯一同指挥，约瑟夫斯留在提图斯的阵营内，协助攻打耶路撒冷。实际上，约瑟夫斯后来确实曾三番五次劝说坚守耶路撒冷的同胞们投降，虽然城内给出的答复都是拒绝。

公元70年9月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约瑟夫斯也继续与提图斯一起行动，次年提图斯凯旋返回罗马的时候也带上了约瑟夫斯。在确保了皇位之后，韦斯帕芗将自己的家族名“弗拉维乌斯”赐予了约瑟夫斯，从此以后，约瑟夫斯的名字就变成了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按照罗马的习惯，家族名一般写在前边，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但为了阅读时的节奏感，不少研究者都写成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总之，约瑟夫斯后半生一直留在首都罗马以著书为生。

正统的犹太教徒绝对不会原谅约瑟夫斯的这种行为，虽然他们也阅

读他的著作，否则无法了解犹太发动叛乱反抗罗马的这段历史，但他们依然没有饶恕这些著作的作者。直至今日，犹太方面对约瑟夫斯的评价还是“叛徒”。

以犹太人的身份在罗马历任多种公职的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与约瑟夫斯一样，也被犹太民族视为叛徒，但这个人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与罗马人共同进退的道路。相反，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却是从犹太一方叛变过来的。但是，没有这个叛徒写就的著作，犹太人就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且约瑟夫斯的著作还被翻译成拉丁语和当时的国际通用语希腊语出版，具有将犹太叛乱的因果关系和事件经过向犹太以外的世界广泛介绍的功绩，连正统的犹太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犹太人对约瑟夫斯同时抱有憎恨和矛盾这两种情感，不，应该说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情感才更加增添了他们的憎恨。

但是，从约瑟夫斯和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以及第一个给予提比略恰当评价的哲学家斐洛等人的选择可以得知，有些犹太人相信犹太教徒同样可以在罗马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哲学所主张的“普遍”与犹太人的宗教所倡导的“特殊”是可以共存共荣的。现代人往往认为犹太人是全体一致反抗罗马统治者的，也很少有人对此抱有疑问。但是，这属于只看到人类社会一个侧面的倾向，用恺撒的话说，就是“只想看到自己期望的现实”，笔者认为这很难给犹太人自身带来好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现实就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种必须和平共处下去。玉石俱焚虽然可以感动后世，但终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约瑟夫斯是没有痴迷于这种满足的一个例外。

战争中断

公元67年5月开始的罗马军对犹太叛乱的镇压行动在平定约瑟夫斯把守的加利利地区后，将战线转移到了犹太的中央地区。然而，战争的

发展既不豪华也不迅速，虽说很好地反映了总指挥韦斯帕芗坚忍持重的性格，但是也可以看出韦斯帕芗有意放慢进攻节奏的迹象，原因是迎击的犹太一方的老毛病——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了。

被派往犹太的罗马军的任务只是镇压叛乱，至于是用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由前线的司令官全权决定。韦斯帕芗认为只要犹太一方发生分裂，稳健派占优势的话，就可以和平解决，所以有意给犹太方面留出充足的时间。话虽如此，为了给对方造成一旦展开攻防战则耶路撒冷必败的印象，也需要适时地展现出罗马军的声势。所以尽管步调缓慢，但开战一年后的公元68年夏天，罗马的军队还是将战线从北、西、东三个方向推进到了耶路撒冷周围。

但是，就在整个战争只剩下攻打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战争却突然中断了，原因是得知了皇帝尼禄自杀的消息。将韦斯帕芗任命为犹太战争总司令的就是尼禄，所以决定暂且停战直到尼禄之后的皇帝下令韦斯帕芗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为止。这个决定很符合韦斯帕芗不喜欢擅自决断的性格，他将儿子提图斯派往罗马面见新皇帝加尔巴也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可以继续执行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加尔巴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但是，前往罗马的提图斯在途中得知了加尔巴驾崩和奥托登基的消息。接下来的奥托也只是为起兵称帝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疲于奔命了三个月，便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结果，一直等待罗马方面回复的韦斯帕芗给了犹太一方长达一年半的休战时间。

犹太一方当然将这段时间用在了增强防御、储备粮食等现实的防卫对策上。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准备在攻防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前来耶路撒冷共度逾越节的犹太人，却没有以战争将至为由阻止他们。非但如此，甚至还宣称会奖励像往年一样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的行为，他们断言唯一真神守护的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入异教徒罗马人的手中。从耶路撒冷离开的都是稳健派的犹太人，即使不属于激进派的人当中也有很多相信

有神坐镇的圣地耶路撒冷不会沦陷而留了下来。

战争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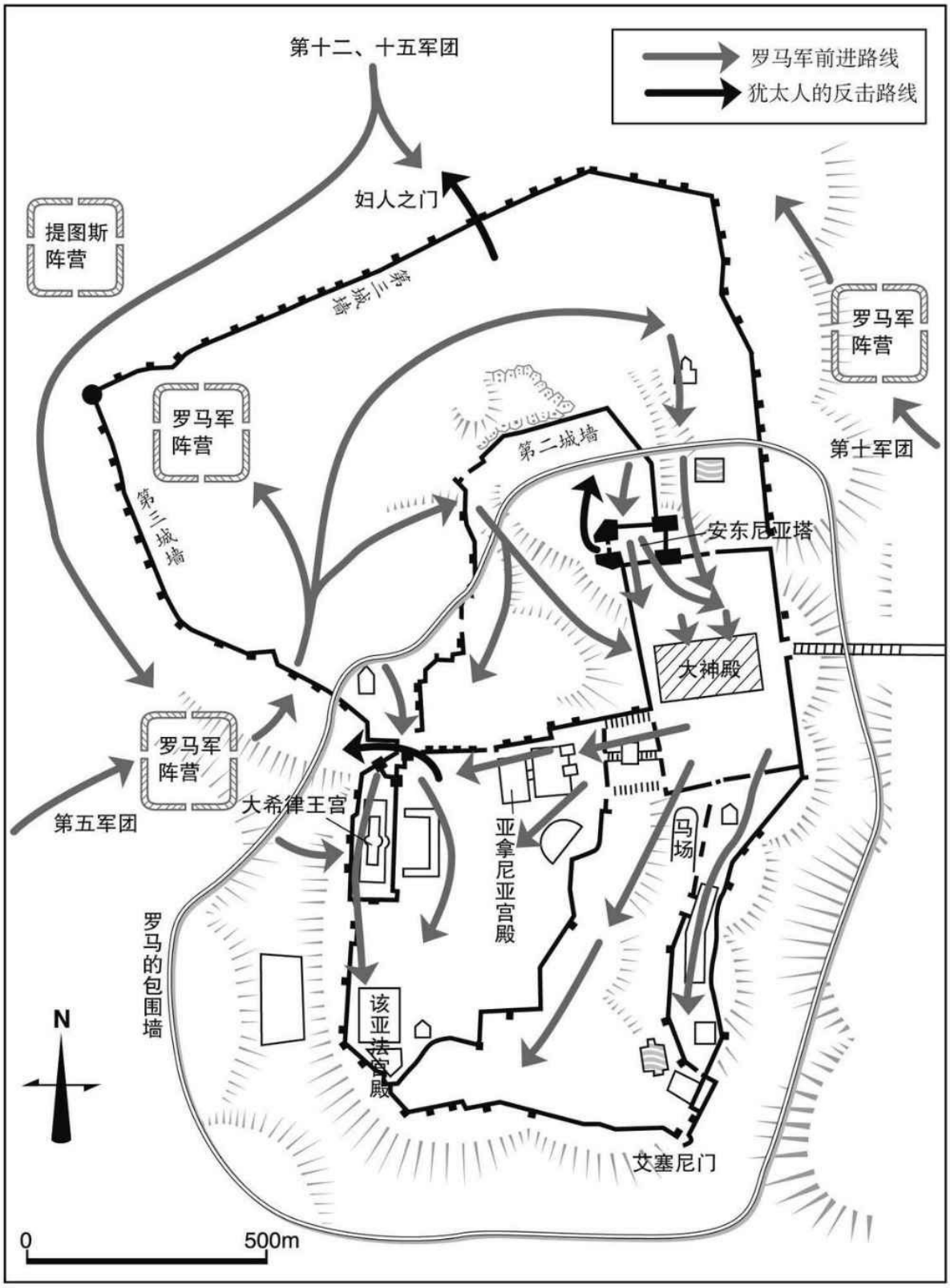
公元69年7月，韦斯帕芗刚被拥立为皇帝后就决定重新打响耶路撒冷攻略战。因为出于巩固韦斯帕芗皇位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关系到之前所述的对东方全境的犹太人社会的影响，犹太战争是绝对输不起的。

由于韦斯帕芗需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待时机，所以决定由提图斯接替他担任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主力部队除了参加过上一阶段战役的第五、第十、第十五军团之外，又加入了第十二军团，共有4个军团。新参战的第十二军团是三年前由叙利亚总督塞斯提乌斯指挥撤退时败给犹太军队的那个军团，韦斯帕芗给了这个军团雪耻的机会。与停战之前一样，主力的4个军团仍然有各同盟国的士兵加入，统治犹太东北地区的阿格里帕二世也亲自参战。罗马军以多国部队的阵容打仗，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兵力，不如说是为了告诉与自己为敌的一方（这次是犹太一方），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其他各国与统治者罗马是同心协力的。

攻打犹太首都耶路撒冷的罗马军中加入了犹太军队，而指挥这支罗马军队的提图斯身边也有不少犹太人。让30岁的提图斯心悦诚服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是在名将科尔布罗手下久经沙场的军事专家，接下来是犹太王室的阿格里帕二世，还有已经与提图斯成为亲密朋友的约瑟夫斯。这样一来理所当然的结果就是，罗马军的参谋本部中不论罗马人还是犹太人，都强烈希望能够和平占领耶路撒冷。

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战斗。维特里乌斯被杀后，韦斯帕芗成为了唯一的皇帝，所以他不能无休止地拖延前往首都罗马的行程，话虽如此，他肯定也不放心把攻打耶路撒冷的任务交给儿子，自己前往罗马。年纪尚轻且缺乏战场经验的提图斯指挥的战斗一旦出现拖延太久的迹

象，韦斯帕芗就必须从埃及赶过来。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如此为什么韦斯帕芗自己不继续担任总指挥呢？拥有“健全常识”的韦斯帕芗很清楚，当时罗马帝国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的继承人迟迟不确定造成的。他已经决定将来让长子提图斯继承自己的皇位，所以耶路撒冷攻略战也具有给提图斯“镀金”的意义。为了提高提图斯的威望，同时也是为了将耶路撒冷作为凯旋的皇帝韦斯帕芗送给意大利民众的“礼物”，攻占耶路撒冷的目标必须尽可能早日实现。


第十二、十五军团
罗马军前进路线
犹太人的反击路线
妇人之门
提图斯阵营
第三城墙
罗马军阵营
罗马军阵营
第十军团
第二城墙
第三城墙
安东尼亚塔
大神殿
罗马军阵营
第五军团
大希律王宫
亚拿尼亚宫殿
马场
罗马的包围墙
该亚法宫殿
N
艾塞尼门
0
500m

耶路撒冷攻防战（参考了山本书店刊行的《犹太战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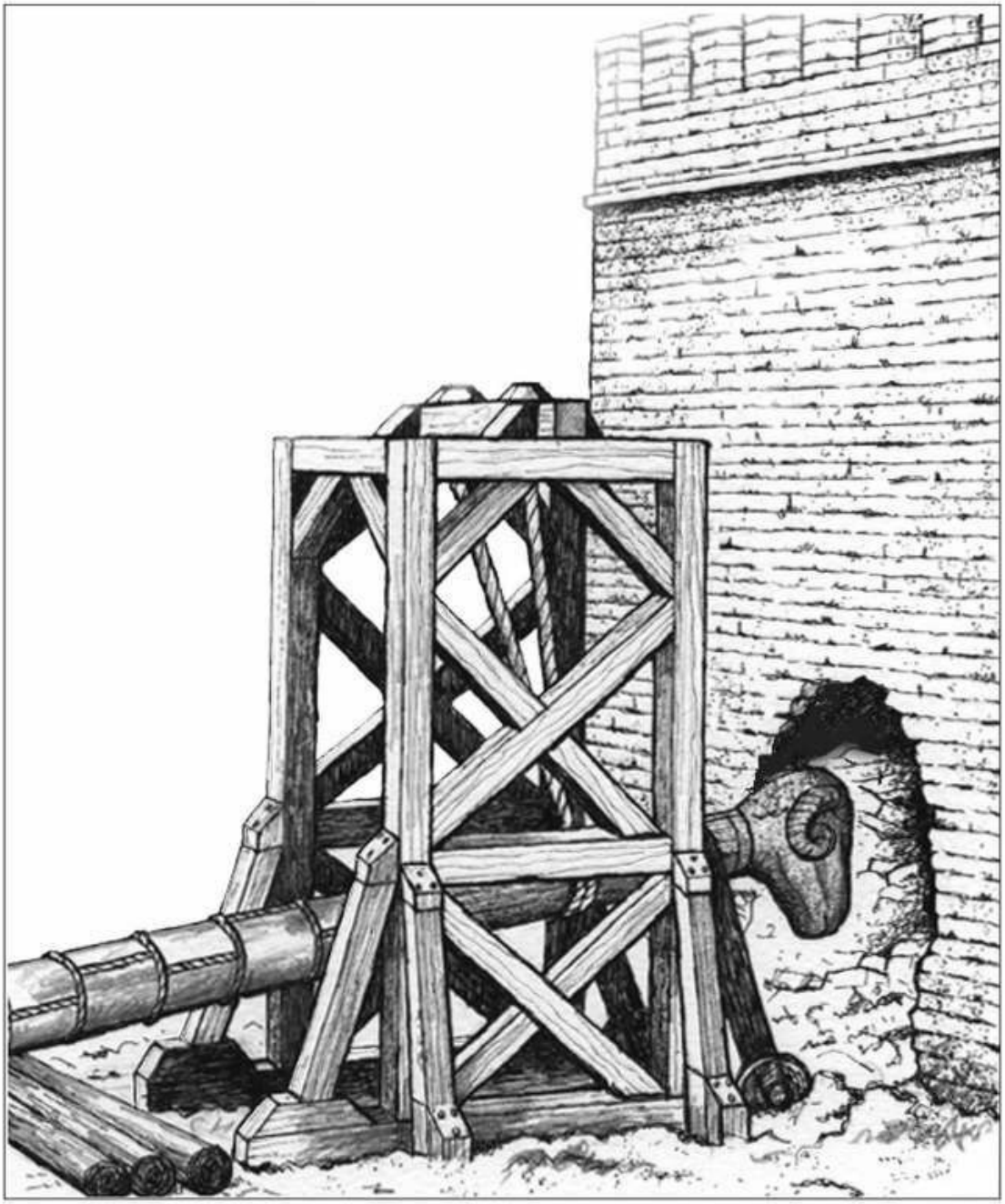
激进派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耶路撒冷市内已是一片抗战的呼声，如果攻击方的罗马期望尽快解决的话，唯有一战了。公元70年春天，提图斯指挥的4个罗马军团在耶路撒冷城前布下了阵。

耶路撒冷是一座四周被悬崖峭壁包围的天然要塞，要想攻占此地，只能从没有深谷天险的北面进攻。耶路撒冷还有坚固的城墙保护，甚至让人纳闷，罗马为什么允许让行省的一个城市建立起如此完善的防御设施，而且城墙不止一层，而是两层、三层地重叠在一起。一些重要建筑周围更是耸立着高塔和坚固的石墙，就连作为宗教场所的大神殿也有两层城墙保护。

罗马人自己的首都没有城墙，却允许自己统治的民族在城市周围建起坚固的城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巩固整个帝国防御能力的要塞，但只限于这些被征服者没有对征服者罗马发起反抗的时期。一旦他们发起反抗，罗马人就要面临为打破允许被征服者建立的这些坚固城墙而耗费心力的局面。不过既然选择了败者同化政策，这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风险，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防战也因此连日上演激战。

当然，罗马军依照惯例在开战前进行了劝降的尝试，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在公羊冲破城墙之前”。公羊指的是用于打破城墙的一种破城锤，罗马军的军规规定，在城墙被打破前投降的人免死，不投降的人格杀勿论。在公元70年的攻防战中，打算接受罗马的劝说开城投降的犹太人全部被市内的激进派杀死了。

为什么在脱离罗马人独立的立场上意见一致的犹太人会变成杀戮同胞的凶手，进而演变为马萨达要塞的集体自杀事件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破城锤“公羊”（复原后的假想图）

对于以纯粹为至上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没有比不纯的行为更让人唾弃的了。越是纯粹，就越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的不纯。激进派只能是越来越激进，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自由”得不到允许的话，就只有选择死。对于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来说，阿格里帕二世和约瑟夫斯的劝说当

然不会有效果。

耶路撒冷陷落

耶路撒冷在持续5个月的激战后陷落了。8月10日，大神殿起火。9月8日，犹太人在市内的抵抗开始趋于缓和。9月26日，抵抗全部停止。

关于牺牲者的人数，塔西佗认为死者和俘虏加在一起一共有60万人。但是据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记载，整个犹太战争期间的俘虏人数为9.7万人，耶路撒冷攻防战中的死者多达110万人。

其中一多半是犹太人，但很少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大多都是从犹太全境来到耶路撒冷共度逾越节却被卷入战争的人。另外据约瑟夫斯称，其实大部分死者不是被罗马兵杀死的，而是因为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场所导致密度过高，并且是在5月份遭到包围，发生了大范围的疾病和饥荒。

然而，至于在攻防战期间耶路撒冷城内到底有多少人，现场证人约瑟夫斯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推测。根据他的推测，大概有270万人。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人，城内肯定会拥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牺牲的人数确实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罗马人严格地执行了“投降者免死，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的政策。并且，投降时间仅限于公羊开动之前，之后再投降的人不能划入“免死名单”的行列，只能沦为与战利品无异的俘虏。

据约瑟夫斯记载，俘虏中唯一幸免的是一些年轻俊俏的男子，他们被挑选出来用于参加日后的罗马凯旋仪式，一部分17岁以上的男子则被送往埃及充当苦力，此外绝大多数的俘虏都沦为了奴隶，被提图斯作为

赠与各行省的礼物，或者被送往圆形竞技场与角斗士和野兽对决。16岁以下的男子和女子被分给了士兵，士兵们肯定是将这些人卖给了奴隶商人，以赚取一次性收入。

耶路撒冷的大神殿被烧毁的事件说明，罗马方面以后不会再允许犹太教徒设立犹太教的宗教圣地，虽然没有废除住在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成年男子每年都可以捐赠2德拉克马香火钱的制度，但是将捐赠对象从以前的耶路撒冷大神殿变为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因为阻断金钱流通的话，就可以让犹太人因积蓄财力而膨胀的势头和实力受挫。不过，这是真实的目的，另外还需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饰。从此以后，只对犹太人开征的这项“犹太人税”就被冠以了一种“美名”——作为免除帝国防卫任务的交换条件而缴纳的税金。

此外，耶路撒冷独有的大祭司长制度也被废除，由70名祭司组成的耶路撒冷自治机构“七十人会议”也被废除。同时，此前罗马因顾及民族感情而没有在耶路撒冷驻扎军队，今后也常驻了由一个军团和附属的辅助兵组成的1万士兵。

这些举措都表明，始于尤里乌斯·恺撒对犹太的宽容路线在120年后发生了大转变，这就是此前一直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充当调停角色的罗马人首次直接与犹太人进行对决的“犹太战争”的结果。

不过罗马人这种冷酷无情的严厉政策针对的只是长期反抗罗马的犹太人，对于没有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的待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另外，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犹太教的信仰。

据守城池的犹太人集体自杀后，马萨达要塞陷落了。犹太全境的反罗马势力完全消失三年后，也就是公元73年，皇帝韦斯帕芗批准了在耶路撒冷和现在的特拉维夫之间的雅麦尼亚城设立犹太文化研究所的计划。对于犹太人而言，“文化”指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具体来说是律法

书籍的研究。罗马人无意禁止犹太教，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但是，耶路撒冷的陷落也助长了由于长年的利害冲突而怀有强烈反犹太情绪的希腊人的势头。攻占耶路撒冷后，提图斯曾顺道前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一些希腊裔的居民等候在野外剧场，见到提图斯后请求他将安条克的犹太裔居民驱逐出城。提图斯表示拒绝，理由是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家园，驱逐出去的话他们会没有容身之地。然而，希腊裔居民仍然不依不饶，又要求撤掉罗马人下令设立的刻有犹太裔居民各项权利的青铜板。提图斯同样拒绝了，罗马人的观念中不存在民族净化思想。

另外，罗马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倾向在军事镇压后的犹太地区也得到了发挥。

犹太东北地区——与以前一样仍然是由犹太王室阿格里帕二世统治，所以划为了犹太人的自治区域。

集中在犹太西部的恺撒利亚等港湾城市——罗马在这些地方的作用是调解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在犹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犹太社区也得到了沿袭。

耶路撒冷和内陆地区的城镇、村庄——在犹太人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确立罗马的直辖统治，也就是说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叙利亚行省总督手下的长官统治，而是换为犹太行省总督统治。

此外，犹太也与帝国的其他行省一样，开始在区域内铺设在当时来说相当于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络。

落实了这些政策之后，提图斯才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在那里等到春天后取海路前往罗马。父亲韦斯帕芗早在耶路撒冷大局已定的时候就出发去了罗马。

耶路撒冷陷落后，还有三座城池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分别是耶路撒

冷南方15公里的希律堡、死海东边的马凯洛斯和死海西边的马萨达，全部是耶路撒冷陷落后成功逃脱的激进派固守的据点。

提图斯觉得攻打这些要塞用驻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军团就足够了，于是让参与耶路撒冷攻略战的其他三个军团返回了之前在叙利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驻地，反正从现在的情况来说也不着急攻占。之后没多久希律堡和马凯洛斯两处要塞就被攻了下来，但是攻占马萨达却用了三年时间。据守城池的人连带妇女孩子加在一起不过几百人，以数千人的兵力却打了三年，当然有守城一方顽强抵抗的原因，不过攻方也确实没必要急着把城池打下来，因为对于罗马来说，“犹太战争”在耶路撒冷陷落后就已经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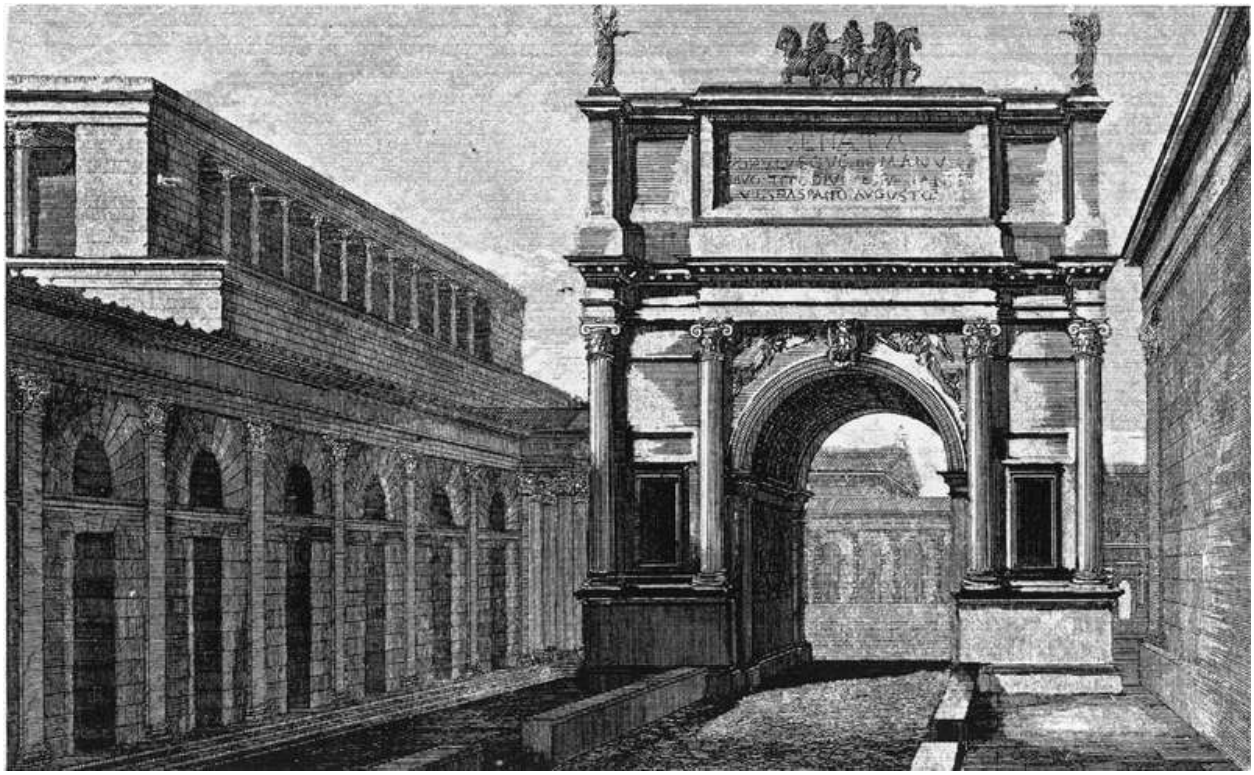
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明确了“不进行反抗的犹太人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的命运只有死或者成为奴隶”的基调，因此犹太人的反罗马运动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偃旗息鼓。再次爆发类似事件是到了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的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远征帕提亚的途中被犹太人从背后暗算，让罗马举国激愤。这一次的反罗马运动遭到多次镇压，一直持续到了哈德良皇帝的时代。公元130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哈德良皇帝前往巴勒斯坦，不仅对犹太全境进行了军事镇压，还采取了以前的罗马皇帝从来没有实施过的强硬政策。他将耶路撒冷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出境，以后彻底禁止犹太教徒到耶路撒冷居住。同时还禁止割礼，甚至通过对罪犯实行割礼的方法明确了歧视犹太教的态度。

失去家园的犹太人散居到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犹太人所谓的“散居”（Diaspora）并非始于公元70年的提图斯时代，而是由公元130年的哈德良一手造成的，是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皇帝的政策所致。然而，就连这位哈德良皇帝也没有禁止犹太教信仰，或者废除罗马帝国内各城市的犹太人社区享有独特习惯的权利。罗马始终贯彻“只要不反抗罗马，就承认信教自由”的政策，另外，不知是不是因为哈德良皇帝的强硬政策奏效的影响，从此以后犹太人的反抗完全销声匿迹了。

前几年，在古罗马广场南侧的提图斯凯旋门前，罗马的犹太人社区举行了庆祝以色列建国50周年的活动，这次庆典也含有“罗马帝国灭亡了，犹太人依然存在”的意义。

笔者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脸上不禁浮现出了微笑。真要庆祝的话，不应该在提图斯的凯旋门前举行，在哈德良修建的万神殿前庆祝不是更合适吗？但笔者随即改变了想法，因为庆典毕竟还要考虑到舞台效果。万神殿作为建筑的价值姑且不论，它宣扬的是同时接受不同民族神祇的多神教精神，因此作为不承认其他民族神祇的犹太教的庆祝场所并不合适。此时还是在凯旋门前那雕刻着一座士兵们肩扛七座烛台等犹太教圣物参加提图斯凯旋仪式模样的浮雕下面举行更有助于提升庆典的效果，因为天主教徒每年同样也会在没有发生过教徒殉难事件的竞技场由教皇举行庆祝天主教战胜罗马帝国的弥撒。

罗马人的犹太人政策始于公元前63年庞培征服犹太之后，在公元前47年恺撒实施犹太民族待遇改善政策后迎来转机，除了卡利古拉这个唯一的例外，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皇帝都始终坚持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但是从公元66年开始到73年马萨达陷落结束的犹太战争再一次改变了这项政策。不过，虽说发生了改变，其实只是罗马人观念中对犹太教徒“宽容”的内涵与以前相比更明确了而已。承认信教的自由，并且对于犹太教义规定的犹太人特有的生活习惯也全部承认，前提是不反抗罗马帝国。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略战也好，公元130年强制执行的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的举措也好，都是对叛乱的镇压，并非对信仰的排斥。对于承认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存在自相矛盾的方法。



提图斯的凯旋门（复原后的假想图）

但是，犹太教是不承认其他民族神祇的一神教。信奉这种教义的犹太人不管能否居住在耶路撒冷，都会一直希望在以普遍为宗旨的罗马帝国内拥有“特殊性”，这是无法改变的。犹太教徒希望自己在罗马帝国内保持异国人的身份，并且他们一直保持了下去。

然而，同样身为一神教徒，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开始明确脱离犹太教的基督教徒却走了一条与他们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成为罗马帝国内的“异类”，而是试图取代罗马的“普遍”。不过这个问题到了公元4世纪之后才浮出水面，所以笔者准备等到叙述那个时代的相关章节时再进行详细讨论。

提图斯凯旋门的浮雕，肩扛着已变为战利品的犹太式烛台的罗马士兵

公元1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犹太战争以耶路撒冷陷落这个戏剧性事件收场，让同时代的罗马人将目光转向了犹太民族。塔西佗在《同时代史》中对这场战争进行叙述之前，先从摩西开始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回顾了一番，比起对战争本身的叙述，他将更多的篇幅用于介绍之前的历史。相反，犹太人自己的历史著作却只是讲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对“敌人”罗马的叙述极少，这可能也是标榜“特殊性”的民族具有的一个特色。

尽管塔西佗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敌人”，但却始终认为犹太教“是迷信而不是宗教”。迷信在词典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信仰”。对于深信“承认别人信仰的信仰才是正确的信仰”的多神教徒罗马人来说，不承认别人

信仰的一神教只能是一种错误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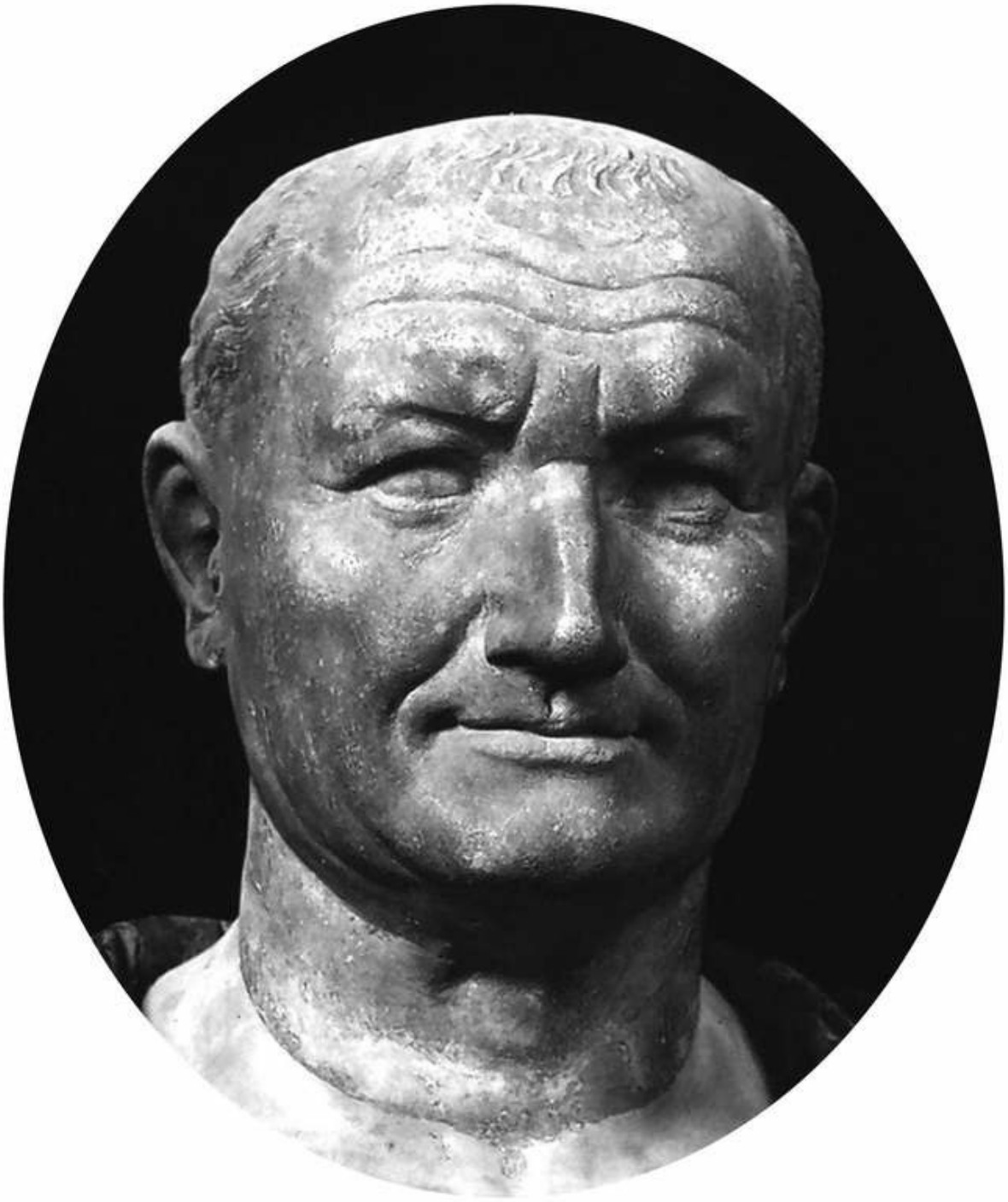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距此1800年的公元1870年，史学家布克哈特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讲课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为止的罗马皇帝们没有接连立法将基督教奉为唯一宗教的话，罗马人的宗教也许会延续到今天。”

第五章

皇帝韦斯帕芗

（69年12月21日—79年6月24日在位）



前往罗马

韦斯帕芗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取海路西行，公元70年10月时在意大利通往东方的窗口——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登陆，阔别5年的次子图密善前来迎接，他已经成长为一名19岁的青年了。

60岁的韦斯帕芗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就被承认为“第一公民”，但是回国的行程还是拖延了10个月，他对外宣称是由于风向不合适导致无法从亚历山大起航，实际上是在等待耶路撒冷攻略战的结果。为了确保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地位，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本国肯定更为有利。

最终，韦斯帕芗在埃及的“等待时机”从公元69年7月被东方军团推举为皇帝时算起，前后共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然而，在此期间他并不是单纯地等待时机，他与率军西进的穆奇阿努斯一直保持着联络，虽然从二人之间的距离和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来看这种联络不会太频繁，不过韦斯帕芗确实经常接到穆奇阿努斯的报告，因为在此期间从埃及送到元老院的韦斯帕芗的书信内容不像是一个没有掌握确切情报的人能够写出来的。

另外，公元70年5月到9月末，他肯定也从担任总指挥的长子提图斯那里不断接到了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战况报告。从耶路撒冷到亚历山大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0公里。

但是，韦斯帕芗并不是一个凡事不吐不快的人。受到他全权委托率军西进的穆奇阿努斯享有几乎毫无约束的言行自由，指挥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提图斯也没有被父亲事无巨细地指指点点。毕竟他指派了久经沙场的武将同时也是埃及长官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来弥补因提图斯年纪尚轻且完全没有担任总司令官的经验所带来的不利。攻击方的罗马军主力

包括参与过犹太全境镇压行动的3个军团外加另外1个军团，共4个军团。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士兵人数只有2.4万人，但也足以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了。就算耸立在天险之地的坚固城池耶路撒冷有百万大军，韦斯帕芗也毫不怀疑能够攻破它。唯一的问题是时间，攻占迦太基足足用了三年时间，耶路撒冷攻略战却不能允许拖这么久，因为在维特里乌斯死后成为唯一皇帝的韦斯帕芗不能一直让意大利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关于韦斯帕芗选择埃及作为“等待时机”地点的理由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将埃及生产的小麦掌握在手中，从而在军粮方面对维特里乌斯一派占据的意大利本土进行牵制。自从主食依靠进口以来，宗主国意大利的粮食需求量有三分之一是埃及提供的，所以将埃及掌握在手中就等于获得了强力的武器。但是，韦斯帕芗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始终将这把“利刃”收在鞘中，一次都没有拔出来过。他在给元老院的书信中也丝毫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打算，而是只把它当成了一种无声的压力。但是，鉴于塔西佗也曾提及过这件“武器”，可见它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无声的威胁。人们往往对于有声的压力会进行反抗，对无声的压力却毫无知觉。韦斯帕芗原本给人的印象只是个单纯的武夫，谁知他在洞察别人的心理上还是个行家。

“等待时机”期间的韦斯帕芗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件事，在罗马的西方版图上可能根本就无须做这件事，但是在东方却能产生不可小觑的效果。

一天，一个盲人和一个瘫子被带到韦斯帕芗面前，他们说为了治好自己的残疾，二人曾前往供奉着古埃及神灵的神殿参拜，神灵告诉他们到韦斯帕芗那里让他摸摸就能治好，所以二人请求韦斯帕芗用手摸摸他们的残疾部位。

韦斯帕芗是一个不怎么相信奇迹的务实的罗马皇帝，在心里大概不愿意接受二人的请求。但是周围人一个劲儿地劝说他，以迷信为由回绝

他们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办法，因为帝国东方的人们同样是罗马皇帝的子民。尽管心中老大不愿意，但他还是摸了摸这两个人的残疾部位。于是，就在他的手刚碰到的时候，盲人睁开了眼，瘫子也能站起来自由行走了。周围的人齐声欢呼“奇迹”，两个受益者也满脸浮现出感恩之情，跪下亲吻了韦斯帕芗的脚。不用说，韦斯帕芗创造的“奇迹”传遍了整个埃及和巴勒斯坦，甚至在叙利亚的安条克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想必这是某些人安排的“表演”，可是40年前耶稣基督不是也成就过让盲人复明、让瘫子重新站起身的奇迹吗？要想表演奇迹，治疗内脏的疾病是不太好的选择，因为治愈病症的表演如果不能让人清楚地看出来就起不到效果了。所以，可以说罗马皇帝韦斯帕芗成就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奇迹。

但是，虽然同属罗马帝国，西方和东方却是不同的。在西方，就算把恢复视力的盲人和能够重新行走的瘫子摆在面前，最多也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西方对于领导者的要求不是具有超能力，而是作为一个人具有多大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的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维持和平与稳定。返回意大利本土之后的韦斯帕芗不需要再表演奇迹，等待他的是比这更加困难的任务——重建内乱后的帝国。

帝国的重建

即便如此，韦斯帕芗依然算是个幸运儿。巴达维人出身的辅助兵发起的叛乱后来演变为高卢帝国创建事件，导致了莱茵河防线的崩溃，而这个问题没到秋天就解决了。四年前在犹太地区爆发的犹太民族叛乱的最高潮——耶路撒冷攻略战5个月后也终于告一段落，带着城池攻陷的消息沿阿皮亚大道北上前往首都的快船肯定也在途中顺便通知了韦斯帕芗。在帝国西方的莱茵河与东方的多瑙河两处地点发生的让罗马人忧心忡忡的这两起事件都已经尘埃落定，韦斯帕芗也可以启程前往首都了。

另外，韦斯帕芗不在意大利本土期间，穆奇阿努斯施行的各项政策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在这10个月中扮演皇帝角色的其实是穆奇阿努斯。

以下试列举一下穆奇阿努斯在此期间的政绩。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并不是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处理这些问题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开始处理的。同时处理的原因在于，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甚至无法分清孰轻孰重。

第一件事是将驻扎在帝国西方的9个军团全部召集起来，投入到对以建立高卢帝国为旗号发动叛乱的日耳曼裔高卢人的镇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英明的决断。由于这个决断，从叛乱爆发开始不到一年，从明确打出高卢帝国旗号的时间点上开始算只过了两三个月，就成功地让莱茵河防线摆脱了瘫痪状态。假如等到韦斯帕芗回国后再作出应对的话，支持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势力可能就会遍及莱茵河东西两岸了，至少肯定会波及日耳曼裔高卢人居住的莱茵河西岸和莱茵河东岸（现在的荷兰和德国全境）。那样的话罗马帝国就会倒退到与130年前的恺撒时代相同的状态，并且为了确立本国的防线而不得不再次与日耳曼人展开全面对决。

从公元69年到70年之间的情况来看，可能还不至于投入全部由主力军团兵组成的9个军团5.4万人的兵力，但是穆奇阿努斯准备投入大军一举解决问题。战斗状态拖得越久，敌我双方彼此憎恨的情绪也会越强烈。相反，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并且战后的处理工作和新对策的制定也能不受怨恨情绪的影响，更加理性。

罗马的很多武将共同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没有身为武将的自负，也就是说没有虚荣心。他们对于以多打少的行为丝毫不会心存犹豫，因为本方人数越多，就可以越快地解决问题，减少敌我双方的伤亡。如果有人对于投入对方10倍的兵力攻打只有500人左右把守的马萨达要塞的行为嗤之以鼻，那就是不了解罗马武将的精神。在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也有介绍，罗马军的作战是在确保兵力、兵器、军粮补给等确

定要素之后才开始的，他说这样一来我军在每个士兵的士气方面也会占据优势。也就是说，精神面貌这种非确定要素是最后才考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军队将这种非确定要素摆在了第一位，失败是必然的。

穆奇阿努斯在迅速解决日耳曼裔高卢人的叛乱后所作的战后处置也非常合情合理。笔者之前已经介绍过，罗马始终坚持“一笔勾销”的政策，就连叛乱的发起者巴达维人在投降后得到的待遇都是维持叛乱前的状态。犯下了发誓效忠高卢帝国这种叛国罪的罗马军团兵们同样没有被追究。对于处置如此宽大的原因，罗马方面给出的回答简单明快——这起事件是罗马人自己为争夺皇位自相争斗而掀起的余波，罪责不在他人。

这件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意味着罗马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因为对方实力强大，不得已才妥协。这样一来，巴达维人和高卢的行省人民以及一度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的罗马军团兵们都可以在没有任何负罪感的状态下重归罗马帝国。

对于失败的维特里乌斯一方也是坚持“一笔勾销”的政策，穆奇阿努斯没有忘记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后对失败者处置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爆发。维特里乌斯一方成为牺牲品的只有率军抗战到底的他的弟弟和年幼的儿子两个人。维特里乌斯的家眷和亲属都没有遭到流放的处罚，对于元老院内的维特里乌斯一派也不予追究，维特里乌斯挑选麾下莱茵河军团的军团兵组建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也没有一个人被解雇。

不过，近卫军团是在意大利本土配置的唯一的军事力量，所以不能让曾经支持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士兵们全部聚集在这里。于是穆奇阿努斯提出将维特里乌斯扩编至15个大队1.5万人的近卫军团恢复到以前的9个大队9000人的规模，把他们分批派到了负责防守帝国各处防线的军团中。唯有这项举措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把分成多批次派驻各处军团

的工作与将9个大队9000名士兵全部替换为支持韦斯帕芗的士兵的工作同时进行。公元71年，在结束犹太战争回国的提图斯举行凯旋仪式之后，这位皇子被任命为近卫军团的长官。近卫军团的长官代代由罗马社会中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的人担任，所以让本来与父亲共享多项权力、甚至称其为第二皇帝都不过分的提图斯就任这个职位明显是一次降职的人事变动。但是，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看重的都是实际利益，他们以不造成反感和怨恨为优先条件，将近卫军团中的维特里乌斯余党一举扫清，从而铲除了统治者换代时容易发生的社会不安得以滋生的土壤。在此重新强调一下，近卫军团真正的威力不在于士兵的质和量，而在于将兵营设在首都，成为意大利本土内唯一的军事力量。

穆奇阿努斯没有在失败者的待遇问题上犯错，对于在内乱中受害的城镇村庄和个人的损失赔偿也没有根据胜者和败者的身份进行区别对待，当中包括成为战场的波河流域、被胜利的士兵们无秩序的行军连累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各处城镇以及对赖着不走达半年之久的维特里乌斯军忍无可忍的首都罗马的市民们。要求赔偿的地方自治体和个人的数量、赔偿的金额肯定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数字，穆奇阿努斯在内乱刚结束的公元70年1月就早早设立了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牵扯到三个皇帝的公元69年的这场内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大利本土成为了战场，损失赔偿的对象是足以影响到韦斯帕芗能否坐稳帝位的本国民众，也就是有权者，所以需要尽快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穆奇阿努斯也迅速启动了因内乱而烧毁的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重建工程。在罗马的众神中，朱庇特（希腊名为宙斯）被奉为最高神，供奉朱庇特神的神殿在罗马的历史上一直是有幸能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向神谢恩的场所。也就是说，华丽的凯旋仪式最后都要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中以严肃的祈祷收场。驾着四匹马拉的战车凯旋时赢得群众喝彩的将军在登上卡匹托尔山到达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后必须走下战车，一个人身披大红斗篷缓步登上白色大理石的台阶，

进入神殿。而这座备受人们尊崇的朱庇特神殿不是被别人、正是被罗马人亲手放火烧毁的。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远在莱茵河地区的行省人民深信连众神都已经抛弃了罗马帝国，于是一下子揭竿而起，险些建立了高卢帝国。因此需要将迷信的平民对帝国的将来怀有的不安尽快扫清。朱庇特神殿的重建工程没等皇帝回国就动工了，韦斯帕芗回国后也亲自加入了背着石材向卡匹托尔山的山顶攀爬的建筑工人队列中。

在罗马帝国的西方和东方，最高领导人为了赢得人们的敬意和好感所表现出的姿态也不同。在东方，奇迹的作用比较大，而在西方，加入建筑工人的行列更为有效。如果东方的人看到皇帝背着石材加入搬运工的行列，不知会有何反应。

不过，韦斯帕芗在回到一切都由穆奇阿努斯安排妥当的意大利本土之后，可不是光顾着扮演搬运工了，因为西方的民众虽然不在乎最高领导人有没有超能力，但是会要求他们尽职尽责。

话说回来，韦斯帕芗最幸运的事归根到底还是得到了穆奇阿努斯这个无可替代的帮手。

第一个理由是，穆奇阿努斯在10个月间推行的各项政策减轻了即将作为皇帝开始真正统治的韦斯帕芗肩上的担子。

第二个理由在于穆奇阿努斯的处世方式。韦斯帕芗返回意大利本土后，这名无可取代的帮手没有认为自己的任务结束了而将接力棒完全交给韦斯帕芗后一走了之，也没有要求执政官的职位，或是像克劳狄乌斯皇帝统治时代的维特里乌斯（皇帝维特里乌斯的生父）那样要求与皇帝一起就任比执政官地位还高的财务官。与现任皇帝同时就任执政官或财务官往往比平时就任能够获得更高的权威和权力，穆奇阿努斯领会了韦斯帕芗决定设立皇位世袭制的想法，将这两个位置让给了韦斯帕芗的两个儿子。如果当初穆奇阿努斯硬是要求得到这些官职的话，没有他的协助便无法登上皇位的韦斯帕芗想必也不会拒绝。对于穆奇阿努斯没有就

任这两个官职的事实，只能理解为他自己没有这个意愿。

话虽如此，在韦斯帕芗回国后，穆奇阿努斯并没有完全退居幕后。虽然没有就任公职，但是他的存在就好像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手下的梅塞纳斯，以对诸般国事出谋划策的私人顾问身份陪伴韦斯帕芗走过了他皇帝生涯的前半段。到了后半段，便渐渐没有了他的消息，可能是因为儿子提图斯对韦斯帕芗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了吧！

穆奇阿努斯写有几部研究地理的著作，其中的一些只言片语留存到了今天，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他的作品在独创性和文章表现力上都平庸无奇。

然而，留下平庸著作的人不一定能力平庸，在实务能力和写作能力上都属超一流的恺撒当然是个例外，但拥有超一流实务能力的奥古斯都的写作能力也只有让人忍不住发笑的水平。要是著书立说的话，韦斯帕芗恐怕也要被归入平庸作者的行列。但话说回来，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平定了在尼禄死后席卷罗马帝国的混乱，他们二人确实具有一流的实务能力。

韦斯帕芗最大的任务就是重建因为内乱而伤痕累累的罗马帝国，但是与当年必须平定内乱并重新团结全体罗马人的奥古斯都相比要容易一些。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他的统治时期面临着必须让不习惯帝政的罗马人接受这种制度的困难。第九代皇帝韦斯帕芗在这个方面却不用担心，因为在这100年间，罗马人理解了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对帝政达成了稳定的“共识”（拉丁语源是Consensus）。因此，罗马帝政的危机指的不是皇帝统治制度的危机，而是因为每个成为皇帝的人对其职责的胜任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危机。

韦斯帕芗肩负的帝国重建这个任务因而不需要恺撒具有的那种对于

创造新体制来说不可或缺的先见之明和创新能力，也不需要像肩负着确立新体制的任务的奥古斯都那样拥有超一流的政治能力。只要有足够的责任感，这就是一个充分可行的课题。要解决这种课题，只要拥有健全的常识就可以了。用一句话来评价既不善于创新也不具备超群能力的韦斯帕芗，就是他是一个“健全的常识者”。在罗马帝政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的这个时期，要想克服所有制度都无法避免的危机——“制度疲劳”，依靠健全的常识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才是最好的办法，公元70年时的罗马又一次迎来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领导者。

另外，拥有健全常识的人并不是要告别过去的所有，韦斯帕芗成为皇帝后的正式名字为恺撒·韦斯帕芗·奥古斯都皇帝（Imperator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由恺撒创始、奥古斯都确立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在尼禄驾崩后画上了句号，但是由恺撒勾勒出蓝图、奥古斯都建成的罗马帝政却被弗拉维王朝的创始者韦斯帕芗继承了下来。并且从此之后，无论谁做皇帝，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式名字依照惯例都会加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充分反映了即使废除不胜任的皇帝也依然会沿袭帝政统治制度的这种罗马人的理念。韦斯帕芗作为皇帝的第一项声明就是他将会继承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的政治。这表明虽然史学家塔西佗认为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是昏君从而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很多罗马人并不这么想。不过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卡利古拉、尼禄以及接下来先后即位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这是因为这些皇帝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属于不称职的皇帝。

战神雅努斯

一般认为，韦斯帕芗的统治生涯开始于他被东方军团的士兵们拥立为皇帝的公元69年7月1日，但是从以上讲述的种种情由来看，似乎应该将70年11月视为他实际统治的起点，亲政的时间一直到他驾崩的公元79年6月为止，也就是韦斯帕芗61岁—7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岁月中，他从一个只体验过边境军团生活的武将变成了一个在执行任务前必须要事先了解帝国全境状况的政治家。

这名从军团中摸爬滚打一路爬上来的皇帝提出的目标是和平与秩

序。秩序不稳的话也很难维持和平，所以他不过是把当年的“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重新提出来而已，然而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内乱之后反而更容易得到罗马市民们的赞同。

他首先关闭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因为供奉这位双头神的神殿大门敞开的话就代表罗马正处于战争状态，关上的话就可以恢复和平。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个道理不用专门解释也很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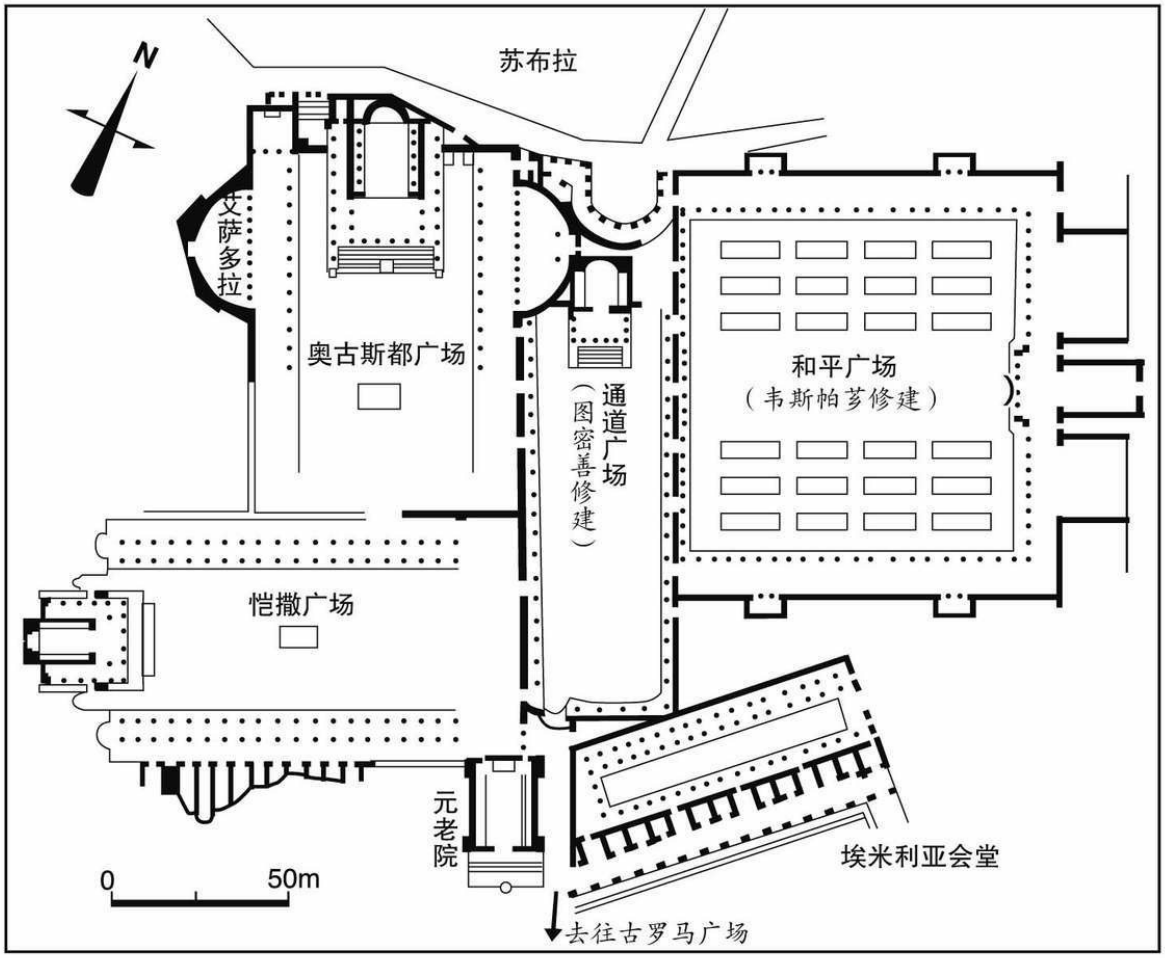
韦斯帕芗其人

韦斯帕芗公布了建设“和平广场”的消息，并马上着手动工。看看保存至今的古罗马广场遗迹便可得知，“广场”（Forum）指的是集政治、经济、行政等国家运营所必需的功能于一身的地区总称。这样的广场在罗马时代的城市俯拾皆是，“Forum Romanum”的意思是“罗马的广场”，可以视为帝国的中枢。

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统治地区的扩大，共和政体时代的古罗马广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恺撒在古罗马广场的北侧附近修建了“恺撒广场”，奥古斯都也在更北侧的地方修建了“奥古斯都广场”，扩建了这些汇集国家运营必需功能的场所。如《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所述，恺撒修建的“广场”可以说是一座小型的古罗马广场，与古罗马广场一样，有神殿以及用于审判和经济活动的会堂，也有保存希腊语和拉丁语书籍（当时为卷轴）的公立图书馆。在一处名为“艾萨多拉”（Exedra）的半圆形角落设有私塾，由此可见这些广场也是提供很多都市生活必要设施的场所。

韦斯帕芗的“和平广场”在功能上与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一样，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修建的，都是最高领导人给市民提供的公共生活场所。在罗马，公共建筑的名称一般会采用修建者的名字，所以命名

为“韦斯帕芗广场”，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他却命名为“和平广场”，目的是告诉广大民众，恢复并维持和平是自己作为皇帝的最高目标。



涅尔瓦皇帝时代（96—98）的“皇帝广场”

没有命名为“韦斯帕芗广场”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出身地方且不是来自既有的领导者阶级的韦斯帕芗没有出身首都的名门贵族恺撒和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身上的那种“高贵血统”，在两位众所公认的“神君”的广场旁边修建自己的广场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他还是不敢像神君那样将广场冠以自己的名字。

虽说如此，韦斯帕芗并没有为自己的低贱出身妄自菲薄。他成为皇帝后，曾有大臣向他进言，据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曾经到韦斯帕芗的出生地瑞耶提附近造访，那里修建了供平民参拜的祠堂，所以建议韦斯帕

芗对外宣称自己身上有赫拉克勒斯的血统。众所周知，可以追溯到罗马建国时期的名门贵族恺撒的身上流淌着特洛伊陷落时逃到意大利而被奉为罗马人祖先的埃涅阿斯的血液，因此也就等于继承了埃涅阿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的血统。独裁者苏拉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有维纳斯的血统，所以韦斯帕芗宣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民众应该也会相信。但是他却是一个常识健全的人，大臣的建议被他大笑着驳回了。如果接受这个建议的话，说不定会招来元老院议员们的耻笑。

韦斯帕芗身体强壮，脸形犹如没有完全膨胀起来的面包，乍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平民出身。所以与自己出身不相符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既没有修建华丽的宫殿，也从未踏入过尼禄那座虽没完工但留有华丽装饰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一步。妻子在犹太战争期间去世后，独身的他也没有再迎娶妃子。虽然有情人，但不是罗马上流社会的女子，只是小时候认识的解放奴隶。他当然不会让这名女子当皇妃，也不允许她插手公务和其他任何事情。韦斯帕芗的日常生活一直很俭朴，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成为皇帝后仍保持着士兵的身份。按照一般惯例，面见皇帝之前都要事先接受搜身以防藏有武器，但韦斯帕芗却废除了这项规定。

他的言行举止也不是很讲究，虽然会说当时被视为文化代名词的希腊语，但绝对不是一个能感动听众的演讲高手。不过这位乡土味十足的皇帝却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幽默感。

因为自己出身卑贱，韦斯帕芗一般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求见，他甚至接见过公然呼吁打倒帝政的少数派群体——共和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在首都罗马教授哲学的人。

韦斯帕芗当时曾耐心倾听过他们当中的一人在自己面前兜售恢复共和政体的说辞，但最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从此以后，这一派的哲学家们就得到了一个名字——"犬儒派"。

他身体一直很健康，所以有一次得病卧床不起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留下这样一句话：“可怜的我，快要成神了。”因为皇帝在死后被神圣化已经成了惯例。不过由此可见，对于罗马人来说神不过是这种程度而已。

但是，韦斯帕芗绝对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他从当政的公元70年秋天开始（更应该说是从称帝的69年夏天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让两个儿子继承皇位和以法制化的形式确定皇帝权力的想法。在常识健全的韦斯帕芗看来，明确皇位继承人可以杜绝争夺皇位的现象，确定皇帝权力可以改变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以来的皇帝们与元老院关系不和的状况。

《皇帝法》

韦斯帕芗有两个成年的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明确他们皇位继承权的做法当然含有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但是在韦斯帕芗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后的弗拉维王朝步入了史称“五贤帝时代”的盛世，这个时代的五位皇帝政绩显赫的最大原因在于养子继承制度，这种说法是史学界的定论。然而，五人中的四人都没有子嗣，唯一例外的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让他成年的儿子康茂德继承了皇位。有子嗣的人抵挡不住世袭的诱惑是人之常情，另外家庭作为培养领导人的机构在当时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所以这种体制很容易让世袭制度被第三方接受。

但是，尼禄的下场证明只确立世袭权力是不够的。韦斯帕芗为将来的继承人提图斯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从第一线退下来，让儿子提图斯担任犹太战争的大决战——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就是这个目的。

然而，尼禄的下场还给了他另外一个教训——如果被元老院打上不

胜任皇位的烙印，具体来说就是，如果被元老院以过半票数表决为“共同体罗马的敌人”的话，纵然是皇帝也会瞬间沦为一介草民。失去元老院的信任，一切就结束了。就连一直以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血统而自豪的尼禄也不例外，何况与尼禄相比出身卑贱、在罗马的统治阶级中不过是个后起之秀的韦斯帕芗。所以他认为从巩固皇帝赖以倚仗的基础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享有的权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韦斯帕芗的这种想法在不可替代的帮手穆奇阿努斯的协助下，被准确且迅速地实现了。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被杀后没过10天的公元69年12月末，穆奇阿努斯来到首都，由于自己没有召集元老院的权力，所以他让拥有召集权的首都法务官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召开会议，在议席上向议员们提出了审议通过这两项措施的要求。

关于皇位的世袭，穆奇阿努斯引用了韦斯帕芗的原话：“皇位继承人问题无非就是承认我两个儿子的继承权，否则就倒退回到无政府状态的二者选一的问题。”

在一年中经历了皇位的三次易主，每次都只能事后追认的这种无力感让元老院的议员们对有利于稳定政局的皇位世袭制投赞成票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点，也就是对皇帝权力的明文规定清楚地写在今天的罗马卡匹托尔美术馆保存的碑文上。这部题为“韦斯帕芗皇帝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的碑石大意如下：

一、正如神君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皇帝韦斯帕芗也拥有与他本人认为合适的国家和君主缔结同盟及友好条约的权力。

二、正如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

一样，皇帝韦斯帕芗也拥有召集元老院的权力、向元老院提出法案的权力，以及撤销法案的权力。

三、由皇帝召集的临时元老院会议通过的法案与一般元老院会议通过的法案具有同等的效力。

四、在举行负责意大利行政的法务官、财务官、执政官等公职以及负责行省统治的皇帝行省总督、元老院行省总督、埃及长官、负责税务的皇帝财务官等公职的选举时，皇帝推举的人应该得到与其身份相符的待遇。

五、首都罗马的居住区域需要扩建时，正如克劳狄乌斯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韦斯帕芗也拥有对其进行扩建的权力。

六、只要无损于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不管是什么举措，都承认韦斯帕芗提出议案并付诸实施的权力。这也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曾经享有的权力。

七、正如以上三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韦斯帕芗也拥有对元老院会议和市民集会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的权力。

如果各位之前读过《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话，肯定会觉得这些权力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集于一身的各项权力没有任何差别。确实如此，上述权力中的（一）是登上皇位就可以获得的权力，因为皇帝本来就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军事和与此脱不开干系的外交都是皇帝的工作。（二）和（七）是取得“护民官特权”就可以行使的权力。（三）和（六）其实也是无须法律明文规定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皇帝们自始至终都在行使这两项权力。（四）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推举的人被任用的可能性，但是有皇帝做靠山的人在选举时自然会得到优待，没必要专门诉诸法律来明文规定。笔者觉得这一条暴露了韦斯帕芗与生俱来的品格低下。

但是，在100年前创建帝政的奥古斯都没有以这种露骨的方式明确自己的权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对君主政体有强烈的排斥感，想一想恺撒被暗杀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不过历经一个世纪之后的公元70年，往往被视为“元首政体”的罗马独有的君主政体取得了很多业绩，终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罗马公民和被统治阶级的行省人民的一致认可，对于露骨的表现表示反感的只有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而已。并且，在讲究实际的武人韦斯帕芗看来，就算成为皇帝之后也应该以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可以行使的各项权力，以防之后有人说三道四。

FOEDVS VEC VM QVIBVS VOLET FACERE LICEAT ITA VTI LICVIT DIVO AVG
TIVLIO CAESARI AVG TIBERIOQVE CLAVDIO CAESARI AVG GERMANICO
VTIQVE EIS SENATVM HABERE RELATIONEM FACERE REMITTERE SENATVS
CONSVLTA PER RELATIONEM DISCESSIONEMQVE FACERE LICEAT
ITA VTI LICVIT DIVO AVG TIVLIO CAESARI AVG TI CLAVDIO CAESARI
AVGVSTO GERMANICO
VTIQVE CVM EX VOLVNTATE AVCTORITATVE EIVS SVA MANDATV VEL EIVS
PRAESENTE VEL EO SENATVS HABEBITVR OMNIVM RERVM IVS PERINDE
HABEATVR SERVETVR ACSI LEGE SENATVS EDICTVS ESSET HABERETVRQVE
VTIQVE QVOS MAGISTRATVM POTESTATEM IMPERIVM CVRATIONEMVE
CVIVS REI PETENTES SENATVI POPVLOQVE ROMANO COMMENDAVERIT
QVIBVSVE SVFFRAGATIONEM SVAM DEDERIT PROMISERIT EORVM
COMITIS QVIBVSQVE EXTRA ORDINEM RATIO HABEATVR
VTIQVE FINES POMERII PROFERRE PROMOVERE CVM EX REIPVBLICA
CENSEBIT ESSE LICEAT ITA VTI LICVIT TI CLAVDIO CAESARI AVG
GERMANICO
VTIQVE QVAECVNQVE EX VSV REIPVBLICAE MANIFESTATI DIVINARVM
HVMANARVM PVBLICARVM PRIVATARVMQVE RERVM ESSE E
CENSEBIT EAGERE FACERE IVS POTESTASQVE SIT ITA VTI DIVO AVG
TIBERIOQVE IVLIO CAESARI AVG TIBERIOQVE CLAVDIO CAESARI
AVG GERMANICO FVIT
VTIQVE QVIBVS LEGIBVS PLEBEIVE SCITIS SCRIPTVM FVIT NE DIVVS AVG
TIBERIVS VEL IVLIVS CAESAR AVG TIBERIVSQVE CLAVDIVS CAESAR AVG
GERMANICVS TENERENTVR IIS LEGIBVS PLEBISQVE SCITIS IMP CAESAR
VESPASIANVS SOLVTVS SIT QVAEQVE EX QVAQVE LEGE ROGATIONE
DIVVM AVG TIBERIVM VEL IVLIVM CAESAREM AVG TIBERIVM VEL
CLAVDIVM CAESAREM AVG GERMANICVM FACERE OPORTVIT
EA OMNIA IMP CAESARI VESPASIANO AVG FACERE LICEAT
VTIQVE QVAE ANTE HANC LEGEM ROGATAM ACTA GESTA
DECRETA IMPERATA AB IMPERATORE CAESARE VESPASIANO AVG
IVSSV MANDATVVE EIVS AOVOQVE SVNT EA PERINDE IVSTA RATAQ
SINT ACSI POPVLI PLEBISVE IVSSV ACTA ESSENT

SANCTIO

SI QVIS HVIVSCE LEGIS ERGO ADVERSVS LEGES ROGATIONES PLEBISVE SCITA
SENATVSVE CONSVLTA FECIT FECERIT SIVE QVOD EVM EX LEGE ROGATIONE
PLEBISVE SCITO SVE FACERE OPORTEBIT NON FECERIT HVIVS LEGIS
ERGO IDE NE FRAVDI ESTO NEVE QVIS OB EAM REM TOTVM DARE DEBETO
NIVE CVI DE EA RE ACTIONEM IVDICATIONEM ESTO NEVE QVIS DE EA RE APVD
[illegible]ENITO

《皇帝法》碑文（藏于卡匹托尔美术馆）

韦斯帕芗在维特里乌斯被杀后成为唯一的皇帝时，就已经由元老院承认了以下几项权力："全军的最高指挥权"、"护民官特权"、"最高裁判权"、"奥古斯都的尊称"、"第一公民"。前三项是"权力"，后两项是彰显"权威"，即使不专门成立《韦斯帕芗皇帝法》（以下简称《皇帝法》），权力和权威也会得到保障。所以《皇帝法》在任何人眼里都只不过是为了不让人说三道四而明文规定了各项权力而已。然而，这项《皇帝法》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追加在这些权力之后的"Sanctio"，意译过来是"对罚则免除的承认"。并且可视为给这一项条款埋下了伏笔的上述中的（六），即"只要无损于国家利益，皇帝便拥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力"，这一项条款在"对罚则免除的承认"的保障下发挥了更强的效力。

也许让内阁法制局来制定法律条文的话也会是这种结果，但是这项"Sanctio"中的内容与其他部分不同，为了不招致误解而字斟句酌，完全是用典型的法律学家的文体写成的，结果使全文的意思晦涩难懂，现将其内容逐一列举如下：

这项《皇帝法》确立后，一、皇帝对市民集会或元老院的决议表示反对时，不予追究责任。二、无须缴纳任何罚金。三、不承认任何人有权以皇帝实施了反对市民集会或元老院决议的政策为由对其进行控诉或弹劾审判。

如此明确皇帝权力的《皇帝法》不是由他独一无二的助手穆奇阿努斯以皇帝提出的法案也就是皇帝立法的形式确立的，而是要求元老院以立法的形式——"元老院劝告"来表决通过的。换句话说，这样做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法制化的举措不是皇帝韦斯帕芗本人提出的，而是元老院主动要求的。提案者通过追加的"Sanctio"和《皇帝法》到底想表达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项法案通过并签了名之后，你们就没有

弹劾皇帝的权力了。

韦斯帕芗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尼禄那样失去元老院的信任，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被打成“国家公敌”而被迫自杀。不过，这项《皇帝法》的确立对于帝政罗马来说确实意味着重大的转变，它代表元老院再也无法对皇帝进行弹劾审判，并且失去了通过过半的票数表决将皇帝打成“国家公敌”来更换政权领导人的权力。由于这项法律的颁布，元老院失去了连帝政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都认可的对皇帝的监督功能。

韦斯帕芗提出这种程度的要求是因为他能够置帝政百年的业绩于不顾吗？奥古斯都没有贸然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在共和政体向帝政过渡的那个微妙的时期，他无法对强烈反感帝政的罗马人视而不见吗？如果奥古斯都站在韦斯帕芗的立场上，他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在罗马史上几乎是罗马代名词的“罗马的元老院”随着罗马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它的功能。

在王政时代，元老院是集合各家族的家长向国王提出建议的机关，成员人数从一开始就固定为300人。

公元前509年罗马过渡到共和政体之后，元老院的成员人数和集合实力派人士的功能一如既往，但是从提出建议的机关变为了执行机关。如果把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元老院比作现代的私营企业，差不多相当于在员工（市民）的上层组成一个有300名成员的董事会。由全体员工每年从这300人当中选出两人担任为期一年的社长。选出两人是因为需要一人主管国内，另外一人主管国外，共和政体时代的“国外”指的是指挥扩张霸权的战争。

步入帝政后，相当于董事长的皇帝不再是从董事会当中选出，而是由世袭制确定的或前任董事长以收为养子的形式提名的人就任不限制任期的终身董事长。市民集会也变成了市民们在竞技场中报以欢呼或大喊

反对的形式，所以通过全体员工的选举来产生董事长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第一个尝试改成这种形式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但他真正的意思是，罗马这个“企业”既然已经成长为世界级规模的国际大企业，仍然延续每年更换一名企业领导人的制度以及300名董事会成员的合议制度，会妨碍企业在运营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笔者认为，帝政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追求统治能力的提高时所不可避免的一种过渡政体。

将恺撒的这种想法变为现实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却在董事会中保留了弹劾不称职董事长的功能——他赋予了元老院对帝政进行监督的权力。

但是，即使步入帝政时期后，罗马的元老院也不仅仅是监督机关，还是储备在将来就任国家要职人员的机关，所以奥古斯都才认为赋予元老院与其地位相称的权限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从人的心理来看，如果期待对方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话，给予足够的权限是最好的办法。就连凭借军事力量推翻了“元老院体制”的恺撒也没有做出废除元老院这样的暴行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增加了元老院的人员编制。不过，恺撒勾画的罗马帝国不是共和政体时代那种元老院主导的政治体制，而是皇帝主导的政治体制。到了恺撒之后的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作为一个机关负责储备人才、辅佐皇帝经营国家的色彩进一步加强了。尽管如此，一旦认定在位的皇帝不称职，它仍然有权提出不信任案。

但是在韦斯帕芗的《皇帝法》中，即使皇帝被认定不称职，元老院也无权提出不信任案。笔者推测，就算奥古斯都站在韦斯帕芗的立场上，他也根本不会考虑颁布《皇帝法》。

因为对于被剥夺了不信任（用当时罗马的话来说是弹劾审判）权限的元老院来说，在位的皇帝被认定不称职时，唯一能采取的手段只剩下暗杀了。也许有人会说被表决为“国家公敌”唯有自杀一条路，所以自杀

和被暗杀没什么区别。但是，拥有“武器”却不使用和“武器”被收缴了想用也用不了是完全不同的。笔者之所以不想给韦斯帕芗作为领导者的表现打满分，就是因为他知道法制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还是断然实行了法制化。即便是法律，也能反映出制定它的人有着怎样的人格。

也许韦斯帕芗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心做皇帝了，但是这项法律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26年后被暗杀的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越是努力想要排除风险，就越容易被风险拖下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风险存在的话，人的紧张感就会增强，所以他们有意无意地都会想修正政策路线。也就是罗马皇帝不得不经常考虑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虽然韦斯帕芗通过制定这项《皇帝法》从而向帝政的专制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有意思的是他在位的9年期间政局始终很平稳。他的统治硕果累累，甚至当初根本没必要剥夺元老院的不信任权限。按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件。没有事件值得记载固然源于他的善政和好运，但笔者认为韦斯帕芗的平民阶级出身和日常的行为加上他健全的常识也给别人造成了他是一个好皇帝的印象。“平民皇帝”便是韦斯帕芗的皇帝形象，对此他比任何人都感到满意，也很清楚这种形象的效果。

但是，没有事件值得记载也表明他肯定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前就进行了妥善处置。历数韦斯帕芗回国后的业绩便可以得知他对待内乱后的帝国重建有着怎样的想法，以下将不按照年代顺序，而是分几项来进行介绍。

继承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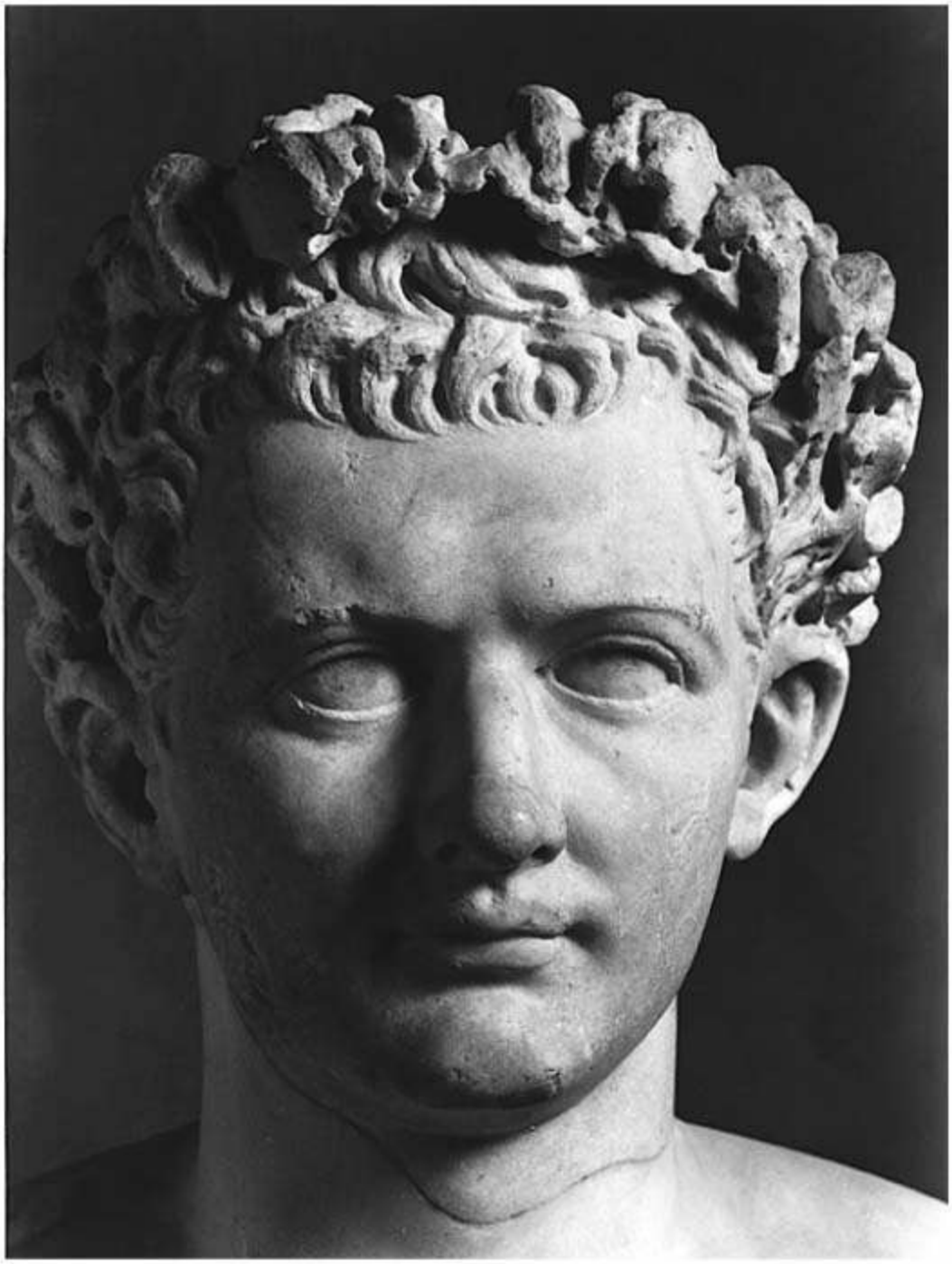
之前已经介绍过，公元70年1月，韦斯帕芗还在埃及等待时机，提

图斯也没有着手开始攻打耶路撒冷。由穆奇阿努斯策划召集的元老院会议选出了韦斯帕芗和提图斯两人担任当年的执政官。次年即公元71年，也是通过穆奇阿努斯的安排，让仍然在埃及等待的韦斯帕芗当选了执政官。

公元70年秋天韦斯帕芗回国以后，父子几乎每年都当选执政官（公元72、74、75、76、77、79年等年份），韦斯帕芗与儿子之外的人分享执政官职位只有公元71年和73年这两年，执政官职位由这父子三人以外的人当选只有公元78年一年。

韦斯帕芗将长子提图斯推到幕前的计划绝非与他分享执政官职位这么简单。

提图斯



图密善

在庆祝犹太战争结束的凯旋仪式上，父子二人分别驾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以凯旋将军的身份露面。公元71年春天举行的凯旋仪式的特点

就是没有主角、配角之分，两个人都是主角。

并且韦斯帕芗皇帝在凯旋仪式刚一结束，就赐予了儿子提图斯使用与自己一样的个人名“Imperator”的权力，此外甚至还将“绝对指挥权”和“护民官特权”赐予了他。拥有最高指挥权相当于成为统率罗马全军的长官，是皇帝才能拥有的权力，所以提图斯依旧坐的是第二把交椅，但他拥有了包括市民集会的召集权和否决权等强大权力的“护民官特权”，其实在身份上几乎等同于皇帝了，因此可以解释为他和父亲之间已经是平起平坐的共同统治者了，这和晚年的奥古斯都给予自己的继承人提比略的待遇相同。

此外，韦斯帕芗还把“恺撒”这个称号赐予了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所以从此以后，皇帝的称号就固定为了“恺撒·奥古斯都”，皇位继承人的称号则固定为了“恺撒”。韦斯帕芗深信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不确定是导致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才明确了皇位继承人的称号，一来可以满足自己作为父亲让儿子继承皇位的心愿，二来可以将帝国发生内乱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

针对元老院的对策

身为专制色彩浓厚的《皇帝法》推行人的韦斯帕芗，对元老院的态度其实还是很温和的，这可能跟他自己具有的政治平衡感有关，同时也是他考虑到占据元老院议席的很多人的出身都比他高贵的缘故。

即使他没有重要的议题，也必定会出席在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召开的元老院会议，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在统治期间几乎每年都兼任执政官，需要以议长的身份参加。

在会议上，他会奖励踊跃讨论的人，对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洗耳恭听。无论听到多么辛辣和恶毒的批判，他都不会表露出不高兴的样

子。不过他也会据理力争，但是没有恺撒那种凭借机智和幽默以简洁的一句话戳到对方痛处惹来满场爆笑从而让反对者孤立无援的讲话技巧，他最多也只能是把脸上的皱纹泛起来，说些诸如“全怪我这把年纪还来当皇帝，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之类的话。不过会场的气氛往往还算和谐，韦斯帕芗虽然没有才气，但还是有些亲和力的。

韦斯帕芗能够赢得议员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曾经公开表明不会以叛国罪的名义将元老院议员送上法庭。既然已经确立《皇帝法》，根除了弹劾皇帝的可能性，就没有必要再三番五次强调这件事情了。这么做表明在其淳朴的乡下人外表下，隐藏着他对伪善行为的效果怀有的深刻理解。韦斯帕芗不单有亲和力，还是个圆滑世故的人。

另外，他也没有忘记给经济条件困难的议员提供资金援助。因为不管怎么说，担任终身无薪的元老院议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100万塞斯特斯以上的资产。韦斯帕芗自己在被推举为元老院议员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钱，他让哥哥萨比努斯做担保人后才好不容易借够了钱，在元老院中占据一席之地。

皇帝韦斯帕芗还重新启用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创设并积极利用的委员会方式，这是一种当议题需要快速解决或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时，不是通过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反复讨论表决，而是委托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解决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的着眼点是促进统治的高效化。这不禁让人想起，韦斯帕芗是继提比略之后第一位熟谙军事、为了执行军务而将自己的足迹洒遍帝国全境的皇帝。

人才录用

韦斯帕芗刚刚登基后就明确表示自己要沿袭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的政治路线，他并没有说谎。他任用了12个出身行省的人担任

元老院议员，并且如果只是给他们元老院议席的话，那就与克劳狄乌斯皇帝向中央地区和北部地区的高卢人开放元老院大门的做法没什么区别了，实际上韦斯帕芗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因为他赐予了其中5人贵族的称号。

按照罗马元老院历来的惯例，发表演讲时为了向诸位议员致意，总是以一句“Patres Conscripti”开头，直译过来相当于“各位父老，各位新进人士”。“父老”指的是建国以来的名门贵族，具体来说包括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乌斯、瓦莱里乌斯、埃米利乌斯等家族，像西塞罗这种在家族中第一个成为元老院议员的人就不是“父老”，而是“新进人士”中的一员。也就是说，韦斯帕芗将前面5个人抬举到了几乎和父老同等的地位。因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这个既有的统治阶级无法继续发挥作用导致了尼禄政权的倒台和之后的混乱局面，所以韦斯帕芗想给活力日渐衰退的统治阶级注入新鲜血液，而这些作为“新鲜血液”的人都是凭实力晋升上来的，家族代代属于统治阶级的人也无话可说。

在这5人之中，有3个人的名字流传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

M.乌尔庇护·图拉真——率领第十军团从犹太战争开始一直战斗到最后的武将，后来的图拉真皇帝的父亲，出身于西班牙。

C.尤里乌斯·阿格里科拉——8年后被派遣前去征服不列颠的武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身于高卢。

L.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被提拔的时候不过是一名法务官，之后历任包括“水道厅长官”在内的各种部门的公职，并著有流传至今的古罗马水道系统的解说书，这个人很可能也是高卢出身。

包括这3个名人在内的12剂“新鲜血液”的出生地遍布西班牙、高卢、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帝国各处的行省。相对于将元老

院的门户向帝国西方的行省出身者开放的恺撒和克劳狄乌斯，韦斯帕芗则是将帝国东方的行省出身者也吸纳到了元老院中。

虽然还不至于让他们跻身于贵族行列，但当时的民众很清楚在元老院中占据议席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要职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来的，不论是执政官、行省总督，还是指挥数万士兵的司令官，只有元老院议员才有可能担任。所以一旦当选议员，便是光耀乡里，当地居民无不为之庆贺。实行了这种平均化政策以后，无论宗主国还是行省，同样都是罗马帝国一员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增强了。

但是观察这12人的名字后发现，12人中有4人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能够赐予行省人民“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只有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4个人。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所以这两人赐予的家族名必须是“克劳狄乌斯”，就像被韦斯帕芗赐予家族名的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应该被称为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一样。

首先，卡利古拉对这种事情毫不关心。奥古斯都不是不关心，而是在这个方面属于比较保守的人，所以对于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行省出身者始终持消极态度。继承他位置的提比略一直积极任用有实力的人，他手下的人被后世称为“提比略一派”，但是他的信条是绝不会做奥古斯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到处赐名。结果，最后剩下的就是尤里乌斯·恺撒，这样一来，韦斯帕芗也成了恺撒在12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的受益人。虽然有一些“尤里乌斯”发动过叛乱，但是罗马帝国确实也有不少跻身到帝国中枢、为国服务的“尤里乌斯”。

针对骑士阶级和平民的对策

尽管自己出身于罗马社会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但韦斯帕芗并

没有给予他们特殊的待遇，他的这种政治平衡感还是很值得称赞的，不过他在这个方面也只是按照先人指明的方向前进罢了。

这个方面的“先人”指的是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共和政体时代的政治被元老院阶级垄断，骑士阶级只能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奥古斯都将他们带入了行政领域，让这些由于在经济活动上经验丰富而在实务能力上出类拔萃的人负责帝国统治方面的实务工作，使得他们成为了统治广大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官僚”。因此，可谓之共和政体时代的“经济界”的骑士阶级在步入帝政以后变成了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罗马社会分为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阶级、解放奴隶、奴隶等阶层，罗马人并没有废除这种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阶级制度，而是让它延续了下来。不过却承认了五个阶级之间的流动性，不仅承认甚至还鼓励流动。奴隶可以变成解放奴隶，只要具备资格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成为平民阶级。骑士阶级出身的韦斯帕芗也凭借在军团中的业绩和公职经历进入了元老院，甚至当上了皇帝。

如果让社会的构成人员人人平等，反而会造成疏远外部人员的结果，因为对于新进人员，不可能马上就承认他们拥有与既有人员同等的权利。如果承认的话，会招来既有人员的反对。只要想一想在现代仍然悬而未决的种族歧视现象在社会底层引发的严重问题，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像古代罗马这样，承认社会的阶级差别，也承认阶级间的流动性，就没有拒绝外来人员加入的理由了。首先让他们加入到下层，之后能否提升地位全看个人的努力。另外，对于一开始就展现出自身实力的人，可以马上允许他们提升到与自己实力相符的阶级。为了捍卫民主政体而不得不一直坚持人人平等的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对于其他城邦出身的人和奴隶来说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相比来说，共和政体时代由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和进入帝政时代后变为君主政体的罗马社会却开放得多，笔者相信这个史实拿到现代也是值得思考的。古代的罗马

虽然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确实是实现了机会均等的社会。韦斯帕芗的业绩不过是建立在由恺撒开辟、奥古斯都巩固、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不断修正改善的基础上。

韦斯帕芗通过《皇帝法》的制定剥夺了元老院弹劾皇帝的权力，但是没有就此便认为自己和儿子们的地位安然无恙了。平民阶级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所以也是堂堂正正的有权者。在帝政历经百年后的公元1世纪下半叶，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都改为由元老院选举决定，市民集会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召开了。然而，这些有权者并没有完全失去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由国家主办或皇帝要员们举行的各种角斗士比赛和祭祀活动成为了平民们反映意见的场所。虽说是平民，但同时他们也是罗马公民，他们以此为荣，在表达意见的时候毫不客气，让统治者很是头疼。不管皇帝的兴趣是观看角斗士比赛还是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市民们都非常欢迎他出席，因为这是他们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意见的场所。

奥古斯都在履行皇帝职责的同时也经常在这种场合露面，使得他在平民当中的口碑节节攀升。提比略虽然也充分履行了皇帝的职责，本人却隐居在卡普里岛，而且也不喜欢出席观看角斗士比赛，这成为了平民们对他评价不高的原因。作为皇帝是否称职尚且是个疑问的卡利古拉和尼禄却意外地备受平民爱戴，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们二人的“全勤”。

后世将这种做法称为“面包与马戏”（代表食物与娱乐），认为是罗马帝国的最大弊端。然而，“面包”的制度可以为贫困者保障食物来源而不至于让他们饿死，“马戏”对于罗马帝国的民众来说也有着娱乐之外的意义。为了证实这一点，下面介绍一段韦斯帕芗亲身经历的轶事。

犹太公主

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秉承父命参加犹太战争期间，疯狂地爱上了犹太的公主贝蕾妮丝。贝蕾妮丝是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重登王位的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相当于协助罗马一方参与犹太战争的阿格里帕二世的姐姐。她比提图斯大12岁，曾经与两名东方国家的君主有过婚姻经历。

父亲阿格里帕一世才气超群，青年时期在罗马接受教育时甚至被提比略皇帝视为心腹大患。大概是比起儿子来，他的才能更多地遗传给了女儿的缘故，弟弟因性格忠厚而被罗马方面视为理想盟友，姐姐贝蕾妮丝却不同，她性格耿直，有强烈的自尊心，如果发现罗马人的长官企图迫害犹太人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严正抗议。她不仅天资聪颖，还受过广泛而深入的教育。此外，虽然她的肖像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史学家们的描述，她还是一个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的美女。

而提图斯在外表和内心方面都与父亲韦斯帕芗颇为相似，不过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身上没有父亲的那种圆滑。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在《犹太战记》中描述的提图斯是一个身为总司令官却在打仗时与普通士兵无异的人，所以只能说他是一个勇将，而并非智将。他是一个淳朴且有良心的青年，但是头脑不够冷静。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迷上了这位美丽、知性、比自己年长的东方女子。

贝蕾妮丝对于提图斯表达的爱意似乎也给予了充分的回应。阿格里帕二世协同姐姐一起到罗马向韦斯帕芗进行亲善访问时，这位皇子和犹太公主得以再次相会。提图斯让自己的情人住进了皇宫，他当初爱上贝蕾妮丝的时候已经和育有一女的妻子离了婚，所以是个自由的单身汉。罗马人不觉得和犹太女人同居是什么丑事，当时皇帝一家住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中，同住的还有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犹太战争后被提拔为首都警察长官的原埃及长官、犹太人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也经常出入于此。对于这些事，罗马人甚至都不会提起。

如果提图斯仿效恺撒对克娄巴特拉那样，与这个出身高贵的犹太女

人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的话，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如果提图斯不是皇位继承人，只是一名普通行政官的话，就算与这个犹太女人正式结婚，罗马人也不会横加阻拦。贝蕾妮丝的姐姐就嫁给了一名从罗马派来的犹太长官。但是，淳朴的提图斯不愿意让自己爱的人一直没有名分，而他偏偏又是现任皇帝的继承人。

对于提出正式结婚请求的儿子，不知韦斯帕芗是如何回答的，不过民众却对此给出了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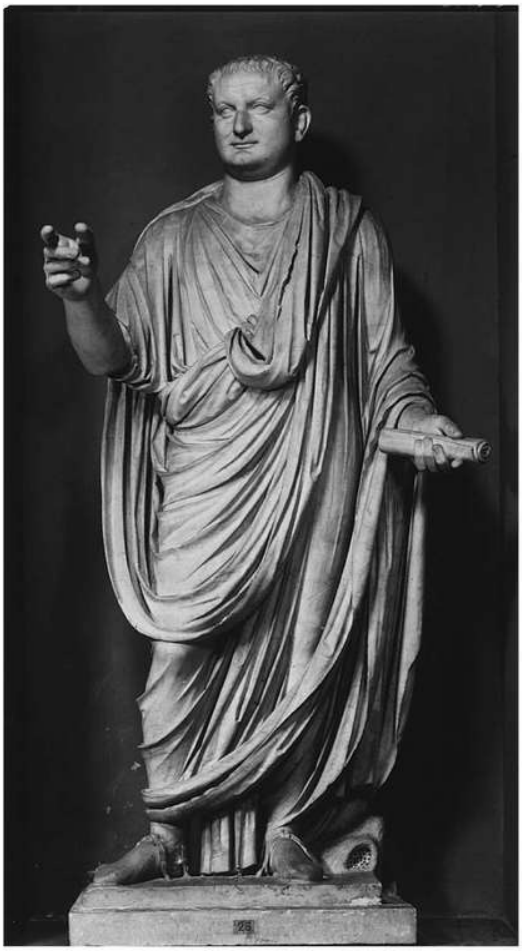
当天，韦斯帕芗和提图斯坐在竞技场的贵宾席上，想必犹太公主贝蕾妮丝也列席了。挤满观众席的群众向他们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声。

罗马的民众不是因为提图斯期望的结婚对象是犹太人而提出抗议，对于他们来说，一提到东方国家的公主，首先想到的就是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尽管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们没有忘记马克·安东尼就是因为对希腊裔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鬼迷心窍才把弓箭对准祖国罗马的。不管是希腊裔还是犹太裔，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区别。单是东方国家王室的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担心再次回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那个时代。

提图斯最终放弃了爱情，贝蕾妮丝返回了犹太。9年后，韦斯帕芗去世、提图斯继承皇位时，贝蕾妮丝再一次来到罗马。但是提图斯成为皇帝后也没有忘记当年民众在竞技场上演的那场大抗议活动，这个犹太女人只能再次返回东方。

然而，提图斯虽然放弃了爱情，却没有放弃对这段爱情的忠贞。与贝蕾妮丝离别以后，他没有再另外寻找别的结婚对象，甚至连情人都没有。他那时才30岁出头，之后终身未娶。尤里乌斯·恺撒在与提图斯相同的年龄时曾说过，身处上层的人比身处下层的人在自由上更受限制，提图斯大概能够切身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皇帝即使有《皇帝法》护身，但如果觉得这样便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就等于自掘坟墓。

圆形竞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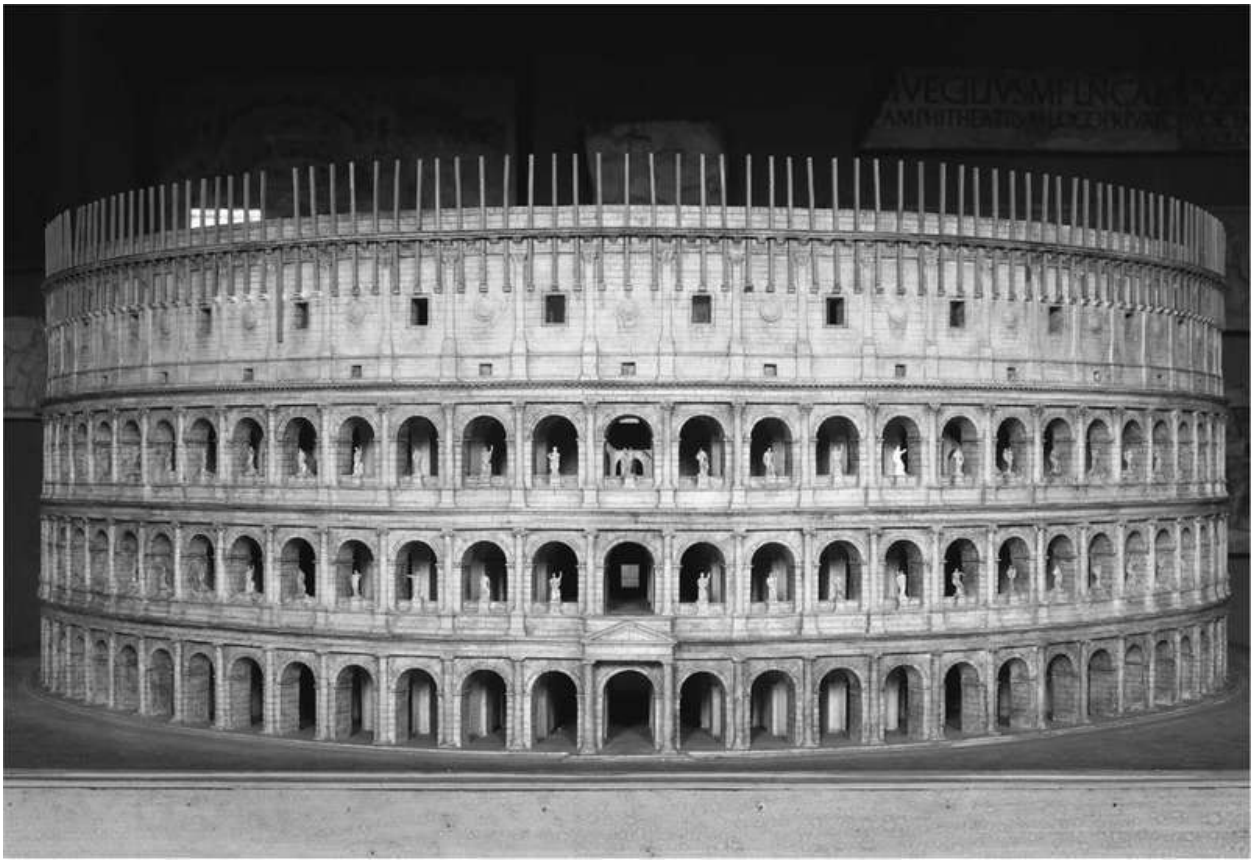
提图斯

在现代，如果要用一张图片来表示罗马这座城市的话，大家通常都会想到“Colosseum”（圆形竞技场，意大利语为Colosseo），它的修建者就是韦斯帕芗皇帝。所以这座圆形竞技场的正式名称是“Amphitheatrum Flavium”，翻译过来就是“弗拉维乌斯圆形剧场”。半圆的剧场建筑形式是希腊人首创的，所以在名称前面加上意为“将两个半圆合在一起”的希腊语“Amphi”，就成了圆形剧场，根据场地中举行的活动种类来意译的话，应该译为“圆形竞技场”或“圆形斗技场”。其实场地的形状更近似于椭圆，这种样式的野外竞技场完全是罗马人的独创。只有首都罗马修建的这座圆形竞技场被通称为“Colosseum”，是因为在修建黄金宫殿的当时，尼禄在旁边建造了一座自己形象的巨大雕像（Colossus）。韦斯帕芗没有破坏这座雕像，但是把尼禄的脸改成了太阳神。没有破坏这座雕像是因为它庞大的体积很受民众的喜爱。

修建圆形竞技场的地点是尼禄本来准备用于建造人工湖的一块平地，尼禄建造人工湖的目的肯定是想为市民们提供散步的场所——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古罗马广场和恺撒、奥古斯都的“广场”附近增添绿化植被和清新的空气，但为什么韦斯帕芗要牺牲这些好处，在这里建造能够容纳多达5万人的圆形竞技场呢？

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讲述尼禄皇帝的章节，笔者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说——尼禄修建包含一处可以划船游玩的人工湖和饲养野生动物的自然公园在内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是想绿化罗马的市中心，这本身就是他的首都改造计划。并且笔者认为这项计划没有得到市民好评的原因在于尼禄和当时的市民对于都市的改造计划上存在分歧。喜欢希腊的尼禄肯定是想将首都罗马改造为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Arcadia，理想国），但是对于在郊外一般都拥有另外一套住宅的市民来说，城市不是享受绿化的地方，而应是人们聚集的场所。尼禄也许会说，自然公园和人工湖一样可以让人们聚集起来，游玩享受。

然而，“享受”这个词对于个人和集体的意义是不同的。市中心不仅是聚集民众的场所，还需要让民众一起参加某项活动才算充分得到了利用。取消人工湖的计划而改为修建圆形竞技场的韦斯帕芗才是理解了市中心价值所在的人。



圆形竞技场的复原模型

但是尼禄可能又会反驳，市中心已经有大竞技场了。

大竞技场的意大利文写作“Circo Massimo”，起初能够容纳15万人，后来扩建为能够容纳25万人，是一座用于举办四匹马拉战车竞速比赛的大型竞技场。但是，一旦达到这么大的规模，反而很难保证每名观众都实际参与进来，因为他们的注意力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分散了。相反，如果是5万人的规模，并且集中在封闭空间内的话，人们的参与意识会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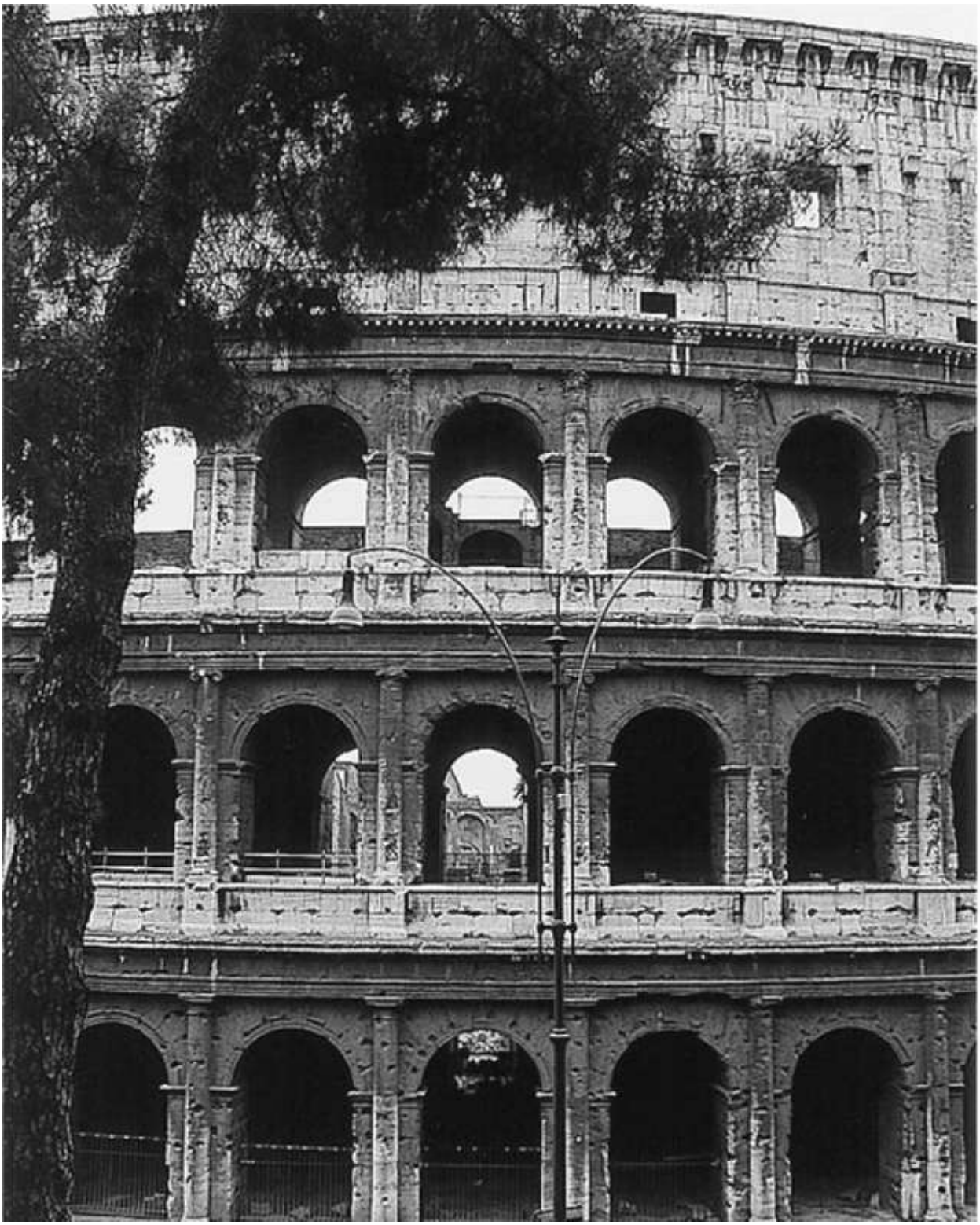
圆形竞技场的大小正适合皇帝与民众会面。5万人的规模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来说，正好不大不小。并且对于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韦斯帕芗来说，修建圆形竞技场除了可以提供娱乐场地之外，还可以提供让民众对自己的施政发表赞同或反对意见的场所。市民们也正确理解了韦斯帕芗的意图，对于修建人工湖持批判态度的他们听说要修建圆形竞技场，都举双手表示赞成。

现代的圆形竞技场

圆形竞技场在外观和技术上都是旷世的杰作，这种规模，让人既不会感到笨重，也不会感到单调。它采用了罗马人喜爱的拱门，拱门两侧用圆柱固定，在连成一片的拱门内部修建人像。一楼使用的柱子是厚重的多立克柱式，二层的柱子是轻盈的爱奥尼亚柱式，三层的柱子是纤细的科林斯柱式。每层采用不同风格的柱式，可以避免有笨重单调的感觉。读者们可以与据说是模仿这种方法建造的墨索里尼时代的新城市EUR（罗马博览会新区）的建筑物比较一下。

在功能方面，由于出入口的巧妙设计，据说一旦发生事故可以在15分钟内保证全体观众安全撤离。用于格斗的猛兽可以通过地下的运输装置运送到地面上，而不会伤害到管理人员。此外，为了防止观众被罗马强烈的阳光晒伤，利用帆布在观众席顶上制作了顶盖。据说每当圆形竞技场要举行活动时，都是由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水兵们负责这项工作，但

是直至今日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办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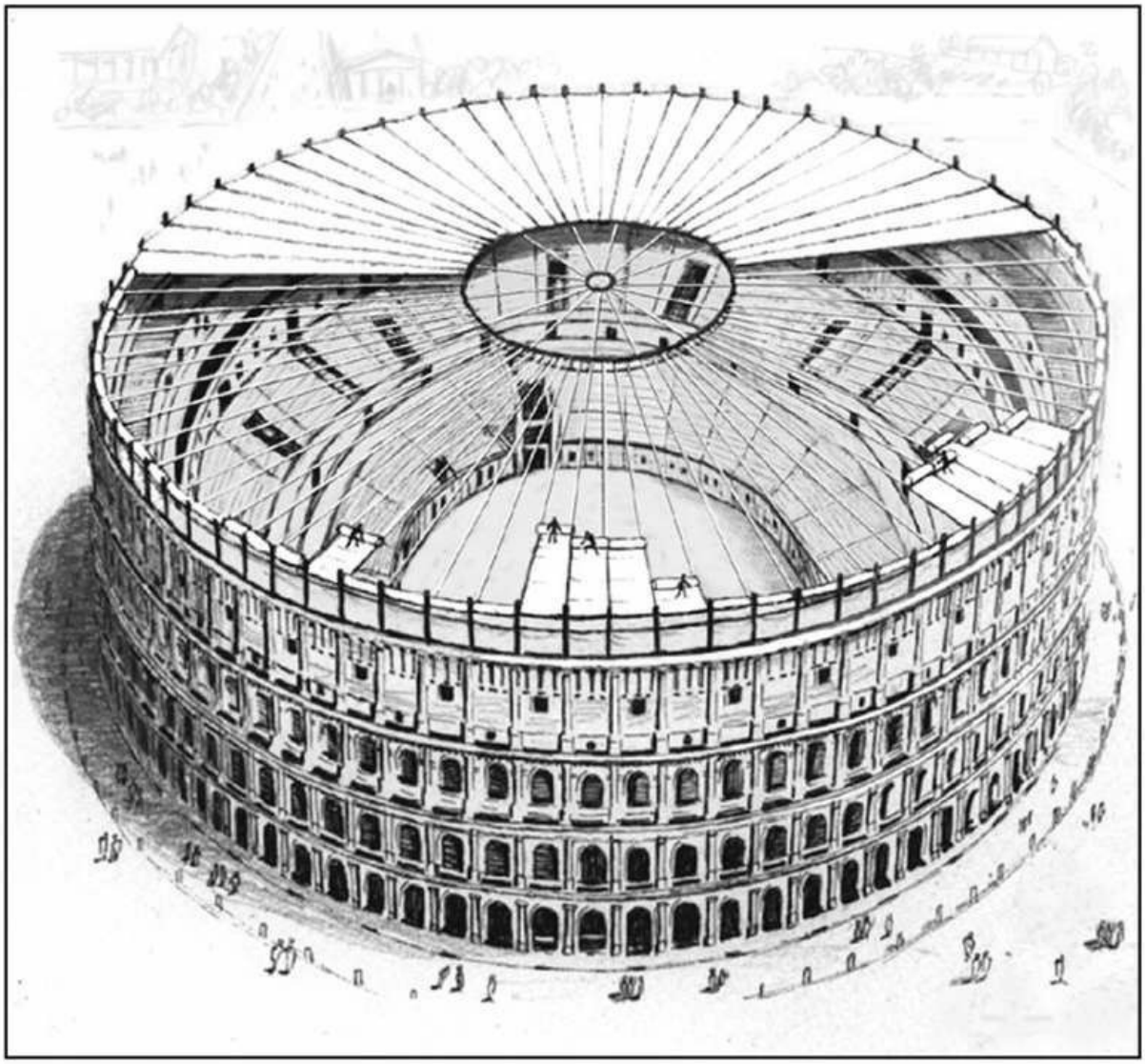
圆形竞技场的三层拱门

劳动文明宫（EUR）

这座圆形竞技场直到2000年后的现在依然耸立在地上，让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但是我们看到的圆形竞技场只相当于罗马帝国时代的三分之

一。被基督教统治之后，罗马的公共建筑物变为了现成的石料供应地。拜其所赐，能拆的地方全被拆掉了。每个拱门内立着的人像、墙面上的大理石板统统遗失殆尽，我们今天看到的圆形竞技场不过是残留下来的“骨架”。德国文豪歌德曾经说过，到意大利旅行光有肉眼是不够的，还要带上心灵之眼。圆形竞技场就是一个好例子。

建设“和平广场”呼吁恢复和平和秩序，建设圆形竞技场提供娱乐场所，同时拉近皇帝与一般市民的距离，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韦斯帕芗得到市民们一致支持的最重要原因还是钱。由于尼禄松散的财政政策和一年内乱带来的秩序混乱，国家财政的重建已经是燃眉之急。而在财政重建方面最有名的人首推韦斯帕芗，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他是最称职的国税厅长官。”



圆形竞技场（复原假想图）

现代的足球场

他被评为“最称职”是有依据的。韦斯帕芗既没有提高税率，也没有胡乱增设新的税种，他只是思考过如何才能增加税收，并且成功了。韦斯帕芗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在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罗马的国家财政是如何构成的。

财政重建

曾经有很多学者下大工夫研究过罗马帝国的国家财政，然而直到今天也未能窥其全貌，恐怕以后也很难指望将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并不

是因为罗马人不重视税制，漫无计划地横征暴敛。相反，罗马的皇帝们很清楚，以较轻的税率进行大范围征收的税制才是善政的根本，基本上在税制的制定上都保持简单的原则，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没有足够的现存史料能够把握其整体特征。因为到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割据各地的封建诸侯和豪族们随心所欲地征收苛捐杂税和过路费，在税收方面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拜其所赐，人们都不再关心罗马时代的税制了。恐怕后人都认为那个时代存在的关于古罗马税制的史料根本没有抄写下来进行保存的必要，都遗失了吧！不过从散见于各种史料中的史实来推测，罗马帝国的税制大致如下：

年收入

一、税收

（1）直接税——古代城邦国家的市民认为，公民的权利是参与国政，义务是通过服兵役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即使城邦国家雅典的市民也只有服兵役的义务，没有缴纳直接税的义务。罗马也是由城邦国家发展而来的帝国，成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的条件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作为帝国安保负责人的罗马市民只有缴纳这种别名为“血税”的“税”，而不会被要求缴纳直接税来代替兵役。不过雅典和罗马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不只限于出生于意大利本土或行省的罗马人，即使是出身行省的他国人，只要作为辅助兵服满25年兵役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医生和教师在直接开始从事治疗和教育的阶段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例如恺撒大范围赏赐被征服民族的权贵阶层）或个人的原因（例如韦斯帕芗赐予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获得了罗马公民权。除了可以被纳入罗马法的保护下之外，还可以免除直接税，这都是罗马公民权保障的直接利益。

因此，直接税大部分来源于行省税。换句话说，没有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行省人民由于被免除了负责保障帝国安全的义务，所以就要承担安

保费用。这项行省税以获利的资产和个人为征税对象，税率规定为收益的10%。女人、小孩和老人被认为不属于获利群体，所以没有被归入征税对象的行列。

然而，仅以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为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也是存在的，便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首创的、在古代独一无二的遗产税，税率为5%，不过六等亲以内的家属亲族被排除在征税对象之外，也并非每年都必须缴纳的税种。此外还有针对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征收的奴隶解放税，这种税的税率为该人以前作为奴隶被贩卖时身价的5%。关于这种税，笔者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详细介绍过了。

（2）间接税——罗马帝国大致有两种间接税。

关税——奥古斯都时代根据各地的经济实力，分别征收1.5%到5%不等的关税，到了帝政历经百年后的韦斯帕芗时代，地方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减小，帝国全境的关税率固定为了5%。不过，对于通过埃及的海关进口的香料、丝绸和宝石等东方的奢侈品，依然保持奥古斯都时代25%的关税率。

营业税——类似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为1%。不过，作为主食的小麦从尼禄皇帝时代开始不再是征收对象。

依靠征税获得的收入大致就是以上情况。

二、国有的金、银、铜及其他矿山收入

罗马帝国尽可能避免国营事业，但只有矿山是国有化的，重视矿山带来的收益不是唯一的理由，也是因为帝国政府的职责之一是保持帝国内流通的货币面值与制币材料的价值一致。

三、国有土地的租赁收入

把意大利本土和行省的全部地域加在一起的话，罗马确实拥有面积辽阔的“国有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罗马帝国将这些地租赁给耕作者，国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相当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公元前59年，当时还是执政官的恺撒颁布了《尤里乌斯农地法》，完全保障了农民的租地权。由于该项法案承认了租地权的世袭，并规定租赁20年以后让渡给农民，所以与其说农民是佃户，不如把他们当做从国家借来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自耕农更为贴切。土地的租金为一年收成的10%，除了农耕之外，畜牧业也采用这个税率。

以上都是一般年收入，此外还有两种临时的年收入：

（1）变卖战争胜利后获得的战利品而取得的收入。

（2）没收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或流放的人拥有的资产而取得的收入。

但是，韦斯帕芗无法指望能获得这些临时收入，因为罗马步入帝国时代以后，主要任务由征服变为了防卫，并且韦斯帕芗本人也曾公开表示不会以叛国罪为名控告元老院议员。以下，我们再来看看管理国家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年支出是怎样的情况。

一次，笔者有机会见到了前首相宫泽喜一先生，向这位经济专家请教了多年以来的疑问——在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税率都比罗马帝国要高，这是为什么？宫泽先生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现代国家要负担社会福利开支。

那么，古代罗马的年支出中是不是没有社会福利的部分呢？

年支出

一、军事费用

各位读者应该没有忘记，皇帝的首要职责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维持和平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安全的保障就等于粮食的保障，对于这一点，罗马帝国的人们都没有意见。

在韦斯帕芗的时代，需要不断对不列颠进行征服活动，同时也要在犹太地区驻军，所以一直保持28个军团。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为16.8万人，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辅助兵人数也基本与此相同。对于这些士兵，国家除了要负责他们的吃住和武器装备，每年还必须支付薪水。另外，军团兵在20年后期满退伍时，还可以享受到在古代来说很稀奇的退役金。用不着史学家塔西佗和哲学家塞内加提醒，也可以知道维持“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要花钱的。

二、公共事业费

能够以30万人的兵力坚守住广大罗马帝国周围的所有防线，是因为铺设了能够让大批士兵和重型武器快速移动的罗马式道路网络。罗马人认为桥梁也是道路的延长，所以他们不会有“完全用石头铺设道路，却用木头修建桥梁”的想法，如果铺设道路的话同时也必须架设桥梁，不是与道路同在一条线上，则架设了也没用。另外，为了让道路网络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只要有必要，罗马人当然也会修建堤坝和运河，因为这些也是道路网络的一部分。不管前面是大海还是河川，都会修建必要的港湾。

修建这些基础设施最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全部由军团兵负责，这使得明确区分军事费用和公共事业费用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或者说两者密不可分更贴切，因为当时的高速公路系统——罗马道路网络对民间也是开放的，并且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一项国家出资负担的公共事业是神殿的建造。罗马信奉多神教，所以神殿的数量也很多。不仅有朱庇特、阿波罗和维纳斯这些高级神，罗马人将“融合”、“信义”这些理念也还原为了神。这些神殿的修建

一般是通过竞标的方式委托给被称为“Societas”（英语society的词源）的民间企业负责施工，这种施工方式也被其他同样重要的公共事业——上下水道、公共浴场、竞技场所采用，和平广场和圆形竞技场也都是委托民间企业修建的。很多Societas都不止一个资本家，而是多名出资人共同经营，可以说是近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

在首都罗马，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很多都是在共和政体末期由个人通过私人投资修建的。例如庞培剧场、恺撒广场、尤里乌斯会堂、尤里乌斯投票场等。包括这些在内的很多建筑物都是依靠个人捐资建造，没有使用国家的钱。但是，任何建筑物在完成后都需要定期维护保养。公共事业费的相当一部分都被用在了道路、上下水道以及公共建筑物的维修上。

三、人力资源费

既然帝国幅员辽阔，在管理上就需要很多人力。在首都罗马任职的执政官、法务官、财务检察官、按察官等政府高官都是没有薪水的，但是在首都罗马任职的事务官僚却有薪水。另外，派驻行省的总督可以领取必要的经费，在总督手下工作的官僚当然也是有薪水的，在这些人身上支出的人力资源费肯定达到了相当的数目。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罗马帝国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区，却没有成为一个官僚王国。也许是因为包括征税事务在内的很多事情都委托给了民间负责，就连首都罗马也没有一座政府办公室之类的建筑。

四、节庆费

这也是多神教国家特有的一笔开支，罗马人没有每周日公休的惯例，献给众神的节日就是他们的休息日。节庆费开支庞大的原因是，除了在神殿举行祭祀的开支外，按惯例在祭祀之后举行的以敬献给众神为名义的各种竞技大会耗资庞大。对于罗马人来说，休息日的意思就是在神殿向神祭拜之后与这些神一同欣赏竞技比赛和格斗。

五、社会福利费

按照《小麦法》的规定，居住在首都的市民拥有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Modius）小麦的权利。

这个措施的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到韦斯帕芗皇帝统治时期为止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小麦法》在公元前123年由当时的护民官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首创。当初的目的是保证贫民以市价60%的“政治价格”购买作为主食的小麦，但是后来这项法案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从公元前1世纪起固定为了免费发放。步入帝政以来的领取人数为20万人左右，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约合30公斤）的小麦。

领取小麦的条件是居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限定为居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的原因是古今东西的贫困者都容易涌向大城市。同时，能够直接或间接表明是否支持皇帝的也正是这些居住在首都的“有权者”，所以《小麦法》也是一项针对有权者的对策。

女人和10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资格领取。这样的话，从理论上来说，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属于骑士阶级的Societas的管理者都可以申请领取。

然而，《小麦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将贫困的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话虽如此，因为是针对有权者的对策，所以只把对象限定为贫民阶层的话就会失去效力。于是罗马当局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想要得到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的小麦和节日活动免费入场券的待遇，必须由领取者本人申请获得承认上述权利的证明书（Tesserae Frumentariae）。因此就给申请人带来了很多无形的障碍，比如需要与平民和解放奴隶一起加入到马尔斯广场的长队中，还得忍受在排队时碰到熟人的尴尬，并且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领到手。通过采取这种方法，确保了真正需要福利的人才能够领到小麦。

“面包与马戏”

后世的人们批判罗马人时首先举出来的就是“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理由是罗马人有国家保障食物，所以不需要工作，终日以观看国家举行的格斗等节目为乐。

在此假设有一家五口罗马人，三个孩子中大一点的两个孩子已经过了10岁，其中一个孩子是女孩，不到10岁的最小的孩子是男孩。这一家的成员中有权享受《小麦法》的只有父亲和长子两人，两个人每月领取的小麦配给量是10摩第，约合60公斤。然而似乎发放的不是小麦粉，而是脱谷后还没有磨成粉的小麦粒，每天的发放量为2公斤。那么首先磨粉就需要花钱，磨成粉后罗马人一般会采用两种烹饪方法，第一种是拿到面包房烤成面包，第二种是加入蔬菜或奶酪蘸着汤吃。不管哪种方法都要花费开支。第一种方法需要向面包房支付费用，第二种方法需要负担购买另外的食材所需的费用和燃料费。假如不将这些开支计算在内的话，每天食用2公斤小麦获得的热量大约为4000千卡，一家五口人就凭这些热量能维持生计吗？

日本的生活保障制度在就职获得收入后就不能再享受了，然而，在古代罗马，即使有工作也不会失去领取小麦的资格。因为一家五口人以每天4000千卡的标准领取小麦，只能保证不饿死，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保障。没结婚的人得到的待遇也差不多，虽然每天可以免费领取1公斤小麦，但还需要支付房租，另外还要买衣服。最重要的是每天光吃小麦会营养不良，导致生病。所以找到工作赚取收入是绝对有必要的，国家给予的保障只是不让人饿死罢了。

“面包与马戏”的原文是拉丁文，可见是罗马人自己发明的说法，但这只是讽刺作家的夸张形容，如果囫囵吞枣地笼统理解，就无法搞清历史的真实情况。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这项《小麦法》的存在，百万人口的城市罗马的民众才不至于饿死。另外，类似这样的社会福利

随着帝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也逐渐普及到了地方城市和行省，所以在这样一个广大的罗马帝国中，由于饥饿导致的集体死亡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一笔吗？毕竟这是距今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而直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和亚洲发生饥荒的场面。

然而，就算发放给每个人的小麦量只达到保证不饿死的程度，20万人口也会给国库带来沉重的负担。据说1摩第小麦的市价平均为10塞斯特斯，但是不能以市价来计算《小麦法》给国库带来的负担。并且从尼禄时代开始，小麦是不收税的。所以，除了向生产者支付的批发价之外，还要算上装载到Societas的船只上运抵奥斯提亚港的运费。全部计算进来的话，1摩第小麦的成本价差不多是6塞斯特斯左右。

20万人一年所需的小麦总量为1200万摩第，这样的话所需费用为7200万塞斯特斯，那么罗马帝国的社会福利费就相当于支付给罗马全军将士薪水的三分之一。保障平民不饿死的政策是需要一笔相当大的费用的。但是，历代皇帝依然坚持奉行这项政策。对于没有资格享受《小麦法》的平民的需求，也一直通过完善港湾和仓库的设施来保证供给量的充足和价格的稳定。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在于安全和粮食的保障，所以一旦在其中任何一项上做得有所欠缺，很可能会在竞技场接见民众时迎来嘘声，甚至有被杀死的危险。

但是，对于了解现代福利制度的我们来说，国家的社会福利应该还包括医疗和教育。

然而，罗马人不认为这两项属于国家的职责。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在每处军团基地常设的军队医院。连前线的军团基地都有如此完备的医疗设施，帝国的首都罗马却没有本应该修建的大医院。如果要想讨市民的欢心，皇帝们本可以争先恐后地修建大医院。但是，皇帝们争先恐后修建的“大建筑”却是浴场，还有可以在夏季供给充足水源的水道设施。此外，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首都罗马的复原地图中，也找不到与医院同样

重要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学校。

教育与医疗

古代的罗马人并非对医疗和教育漠不关心，尤里乌斯·恺撒早在公元前45年就颁布了对于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不问本人的出生地、民族和肤色，统统赐予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拥有罗马公民权也就意味着被免除了行省税这项直接税。恺撒的想法是，通过免除直接税，让这些人从事医疗和教育来适当地回报社会。换做现代的日本，就是不管出生在日本还是韩国，或是美国、德国、印度，都赋予日本国籍，并且免除在日本的所得税，以此来吸引人才到日本从事医疗和教育事业。也就是说，通过给予优待措施来生成知识产业的自由市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促进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合理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而是出现无数的小规模诊所和私塾。从事医疗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在供奉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附属的诊所，或者是在医生的私人住宅中。私塾方面则是在神殿、广场或会堂的一角提供教学场所，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恺撒广场就留存有似乎是出自中小学生手笔的涂鸦。

克桑腾军团基地的军队医院平面图（■为病房）

恺撒的这种制度在罗马帝国期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笔者认为，始终坚持将医疗和教育委托民间的这种方针正是罗马的社会福利费用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过重负担的重要原因。总之，因为罗马帝国始终奉行除了

国家必须经手的事情之外一切委托给民间的方针，所以才实现了现代所谓的“小政府”。

但是这项制度能够在罗马人当中固定下来，根本原因在于罗马人自身对教育和医疗的看法。

罗马人认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意愿、资质和经济宽裕的人才应该接受的。如果奴隶有这种意愿和资质，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也有机会和主人的儿子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另外，在罗马社会中，接受教育的水平高低不会给出路带来影响。历代皇帝中没有一人曾经到当时的最高学府——雅典或罗得岛留过学，不过这些皇帝却无一不热衷于在帝国的首都罗马修建国立图书馆。图书馆在当时本身就是研究所，同时，罗马的官方记录包括元老院的议事录都是公开的，所以保存这些记录的Tabularium（意译为公文书馆），也可以称为研究机关。并且，富裕的家庭在子弟的教育投资上都不惜重金。如果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能够为城里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的话，就可以享受免除直接税的优待。人们都乐于聚集到环境好的地方，出身于帝国行省的有潜质的青年就如随风飘舞的草木一样涌向罗马，他们通过向罗马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可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

罗马人对于医疗的看法也许来自他们的生死观。为了维护帝国这个共同体的和平而负伤的人由国家保障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是，对于生命（在日本来说就是寿命）罗马人看得比较开，所以在实施治疗时也只会在有可能治好的前提下才竭尽全力。历代的罗马皇帝中没有一人曾经为了延年益寿而四处求医。不仅如此，不少社会地位高的老年人在病倒卧床不起、意识到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会拒绝继续接受治疗，选择通过绝食的方式自尽。罗马人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某种手段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越是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头脑、精神和肉体方面消耗殆尽后越不希望自己继续活在世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强调应在有生之年尽量享受生活的斯多葛哲学才得以在当时深入人心。

此外，希腊的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的教诲也经久不衰，他认为比起得病之后再治疗，提高身体本来的抵抗力更为重要。罗马皇帝们更热衷于大浴场和水道系统的建设而不是大医院，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学说的影响。

保持身体清洁的习惯有助于提高免疫力，保证摄食量可以维持体力，避免生病。韦斯帕芗时代在罗马有两处公共浴场，一处是奥古斯都时代的阿格里帕捐资修建的，另一处是尼禄皇帝修建的。除此之外，在韦斯帕芗之后继承皇位的提图斯在圆形竞技场上方的高台修建了第三座大浴场。

罗马时代虽然也叫做浴场，但实际除了主要的沐浴和按摩设施之外，还包括运动场、图书馆、游乐场所和庭院，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综合设施。先洗净身体，通过按摩舒筋活血后，至于是下棋、打球还是读书、散步，全看个人爱好。值得一提的是，恺撒为医生提供了免除直接税的优待，而韦斯帕芗将同样的优待也赐予了按摩师。一来是因为罗马人喜欢按摩，二来也是因为他们重视按摩带来的功效。入场时间是从黎明到下班结束的下午2点，到日落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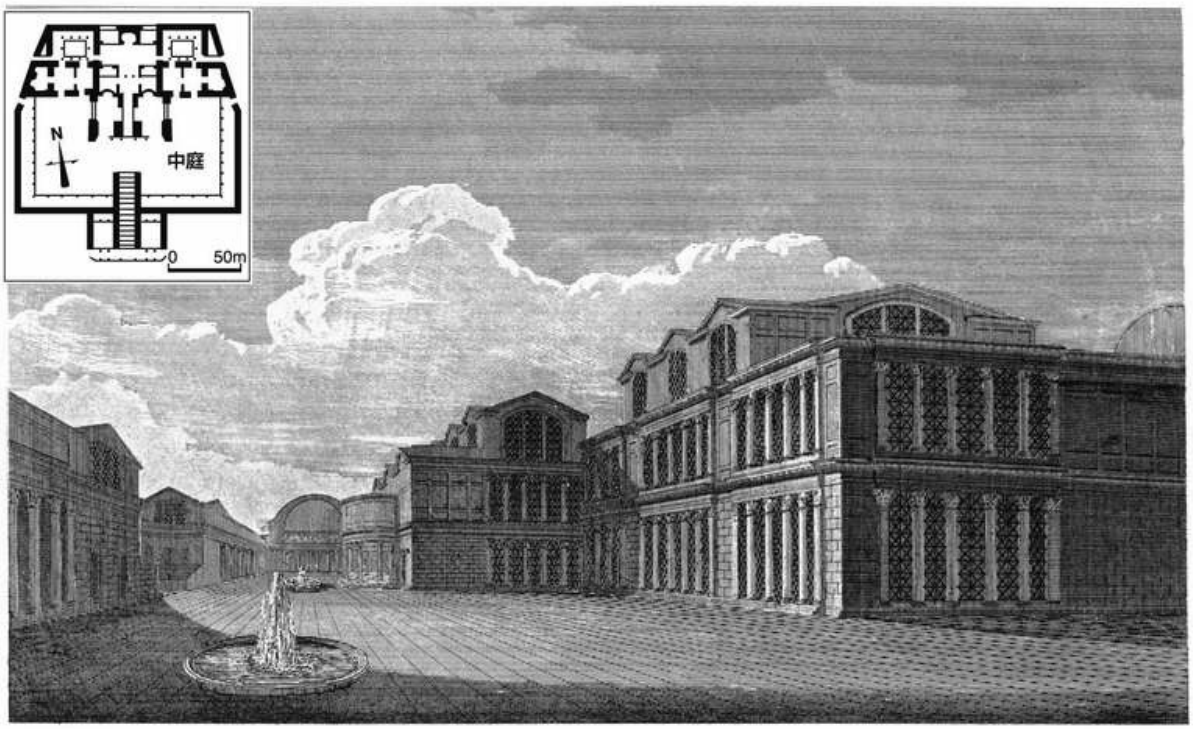
这种罗马独有的“浴场”的入场费为男性0.5阿斯，女性1阿斯。女性的入场费较高，让身为女性的笔者有些不满，也许是女性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吧！儿童可以免费入场，享受免费的还包括士兵以及就任公职的解放奴隶和奴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浴场”面向上到元老院议员下到奴隶的各个阶级开放，另外，如果碰上特殊的节日，全体人员都可以免费入场。

0.5阿斯相当于一个面包加一杯葡萄酒的价钱，依靠这种程度的入场费来维持提供温、热、冷三种水的浴室正常工作，还要经营包括其他多种设施在内的面积广大的高级浴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非国营不可。正因为提供娱乐休闲和保持卫生水准这两个目标的存在，公费的支出才能维持下来。这种罗马式的大公共浴场在罗马帝国内比比皆是，就

连意大利境内的中小城市庞贝，即便没有医院的遗迹，却保存有浴场的遗迹。笔者在帝国最北部边境的英国亲眼看到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城墙附近的浴场遗迹时不禁笑了出来，因为这座浴场建在小溪边上，就像日本的温泉一样。不过建筑风格是地地道道的罗马式，采用的是坚固的建筑方法，构成也很符合逻辑。

以上介绍的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年度预算，预算一般都会反映出该国民众的思考方式，罗马帝国的“预算”自然也反映了罗马人的想法。削减这些反映罗马人想法的预算就等于否定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想要提高既有税种的税率，必定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因素，所以也是无法实现的。就连被称为昏君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也不敢贸然改变税制。话虽如此，目前面临着重建因高卢帝国骚动而濒临崩溃的莱茵河防线、征服不列颠、在犹太常驻一个军团进行直辖统治等各种问题，所以很多部门的财政吃紧，迫切要求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来增加税收。



提图斯的公共浴场（复原假想图与平面图）

那么，被后世誉为最称职的国税厅长官的韦斯帕芗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寻求财源

韦斯帕芗拥有健全的常识。如果是常识健全的人，在面临财政重建问题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正确把握现状。公元73年，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就任了财务官，于是现任皇帝和下任皇帝两个人一起在帝国全境实施了国情调查。

在帝国全境实施的国情调查自从步入帝政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包括韦斯帕芗在任期间，一共实施了三次：

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皇帝和帝位继承人提比略就任为期一年半的财务官。

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皇帝与最佳搭档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就任财务官。

公元73年——韦斯帕芗皇帝和帝位继承人提图斯一起就任财务官。

罗马人是在古代唯一进行过国情调查的民族，这种调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准确了解符合服兵役年龄的成年男子，也就是17—45岁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步入帝政以后，变为了了解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境居民生产手段的调查。因此与其说罗马帝国施行的“国情调查”与现代实施的国情调查相近，不如说更接近于现代每年实行的税务申报。尽管征税的实务工作也可以委托给私营企业承担，但是这些人只负责征收，不负责核查。与这种税务申报相似的国情调查并非每年都实施，而是每隔30年实施一次，原因是实施一次会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并且当时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现象，所以经济状况的变化还是非常平稳的。

虽说如此，韦斯帕芗的意图当然在于通过实施国情调查而实现实质上的增收。距上次实施调查也已经过去了26年。这26年除去其中的一年之外一直持续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只要用常识来判断就知道其间的经济水平一定提高了。

韦斯帕芗实施的另一项增收政策是对笔者在上述罗马年收入的第三项列举的国有土地的租金收入方式进行改良。

恺撒在公元前59年颁布的《尤里乌斯农地法》规定了国有土地租赁的面积上限，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小自耕农。

户主可以借地500尤格（约合125公顷），以每个儿子的名义可以借地250尤格，但是全家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

这样一来，划分国有耕地的最小单位就是250尤格，另外，期满退伍的士兵得到的冲抵退役金的土地下限似乎是200尤格。如果国有土地的借地和出租的最小单位为50公顷的话，比这个单位更小的土地就不会成为租赁或提供的对象。

但是，并非每块土地都适合这种分割法，各个地区肯定都存在“零星农地”。这些不足200尤格的土地由于租借了邻近土地的人扩大耕种面积而成为了事实上的租用地。但实际上没被划入租用地，所以没有向国家缴纳地租的义务。这种状态到当时已经持续了130年。

韦斯帕芗对这些“零星农地”也逐一进行了精确的丈量，并划为征税对象，仅此一项就增加了不少税收。

皇帝韦斯帕芗增加税收的最后一项措施在喜好花边新闻的罗马人当中成了众矢之的，他新设了一项名为“Vectigal urinae”的税种，直译过来就是“小便税”。

卫生意识很强的罗马人很热衷于下水道的建设，同时对于在城市的重要场所设置公共厕所也是乐此不疲。不过韦斯帕芗设立的“小便税”的征收对象并不是公共厕所的使用者，而是收集公共厕所的尿液用来去除羊毛中的油脂的纤维业者，理由是这些人使用尿液赚取了利润。

就连儿子提图斯也忍不住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觉得父亲是不是做得太过了。韦斯帕芗拿起一把银币凑到儿子的鼻子下面问道：“有臊味吗？”提图斯回答：“没有。”于是这位皇帝说：

“没有吗？但这可是小便税的税收啊！”

在现代的欧洲，“韦斯帕芗”这个词语在各国语言中成了公共厕所的通称。在意大利一般说到韦斯帕芗，指的不是罗马皇帝，而是公共厕所的意思。

韦斯帕芗之死

公元79年6月24日，皇帝韦斯帕芗去世。一开始得病时他曾到故乡的温泉疗养过，但是毫无效果。于是他说皇帝必须站着死去，刚要起身就断了气。享年70岁，在位一共10年。

不过这个幽默的武将出身的皇帝是在完成了所有帝国重建的任务后才去世的。还有一些已经着手但还未完成的事情，但是他相信长子提图斯和次子图密善会在继承皇位后妥善处理，所以走得很放心。

罗马帝国发行的金、银、铜三种货币通过保持面值和制币材料的价值一致，从而在促进经济的健全发展上发挥了关键货币的作用，但同时也被作为了将皇帝的统治业绩传遍帝国全境的宣传手段。一般来说正面是皇帝的侧脸，背面雕刻着象征其业绩的图案。也有雕刻着缩写文字的硬币，韦斯帕芗皇帝时代发行的货币雕刻的文字有如下内容：

皇帝恢复了和平

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们确立了永久的和平

恢复了军队对国家的忠诚

韦斯帕芗是市民自由的保护者

皇帝统治公正

为身为罗马公民感到庆幸

罗马公民，万岁！

韦斯帕芗实现了自己在登上皇位时承诺的和平和秩序的恢复，他是以既有统治阶级之外的身份成就的这两个目标。韦斯帕芗死的时候，元老院阶级内也不再有人对帝国的最高权力者皇帝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感到反感了。如同他在临终的床上所“担心”的“可

怜的我，快要成神了”，韦斯帕芗死后确实被神化了。有趣的是，在罗马帝国连成为神也要看生前的业绩。

之后，儿子提图斯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原因之一是制定《皇帝法》预先保障了他的继承权，不过在父亲统治期间，他和父亲共同统治取得的业绩也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妥善处理了罗马人视为行省人民叛乱而不是宗教问题的犹太战争也成为了提图斯的有利砝码。在讲述罗马人的历史时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罗马皇帝在军事方面的知识、能力、业绩会经常接受考验，从拉丁语“Imperator”一词的定义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六章

皇帝提图斯

（79年6月24日—81年9月13日在位）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比39岁继承皇位的提图斯更想努力当好皇帝的了，如果当时有“公仆”这种说法的话，提图斯肯定会从心里抱有这种信念，并且为成为一名公仆而努力。他可是遵照国民的意愿放弃了终身幸福的人。

提图斯出生在一个叫做“因斯拉”（insula）的出租公寓里，这也反映了他父亲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他接受的可不是一般的平民教育。当时，父亲韦斯帕芗深得皇帝克劳狄乌斯的头号亲信——解放奴隶纳尔奇索斯的器重，所以小提图斯也得以成为了皇帝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学友中的一人。他每天前往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学习拉丁语、希腊语、逻辑学、辩论术、武艺、骑术、乐器演奏等课程。他的身体不弱，但是身材矮小，体形和举止都全无高贵可言，不过性格倒是直率，也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这种往返于简陋的公寓和皇宫之间的走读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因为父亲韦斯帕芗希望他到军团中去积累实地经验，而不是留在皇子的身边当陪衬。儿子随父亲一同前往任地在罗马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小提图斯离开了母亲和故乡罗马，到父亲的任地——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开始了新生活。父亲被调往不列颠之后，提图斯也随同前往，后来又转移到了北非。提图斯随同父亲辗转各地，积累了实地经验。当然，在此期间也积累了不少军务经验。他28岁这一年，在被任命为犹太战争总司令官的父亲手下升任为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父亲被推举为皇帝后，30岁的提图斯代替父亲成为了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而他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努力想成为好皇帝的提图斯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条件。年龄、经验、业绩，没有一个欠缺的。此外，多亏他与韦斯帕芗作为共同统治者施行的善政，当时也不存在必须以强权压制的反对势力。但是，这位充满善意的皇帝当政期间，却被接二连三的天灾搞得疲惫不堪：

公元79年6月24日——韦斯帕芗去世，提图斯继承帝位。

两个月后的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以庞贝、赫基雷尼亚（现在的埃尔科拉诺）为代表的那不勒斯湾东部沿海一带的多座城市被毁灭，据说死亡人数达到5000人。

公元80年春，首都罗马的市中心发生大火。

公元81年夏，包括首都在内的意大利全境发生瘟疫，造成大批民众死亡。

同年9月13日，皇帝提图斯的生命之火燃尽，享年40岁。他在位的短短两年间似乎一直在为各种灾害的善后工作日夜操劳。

庞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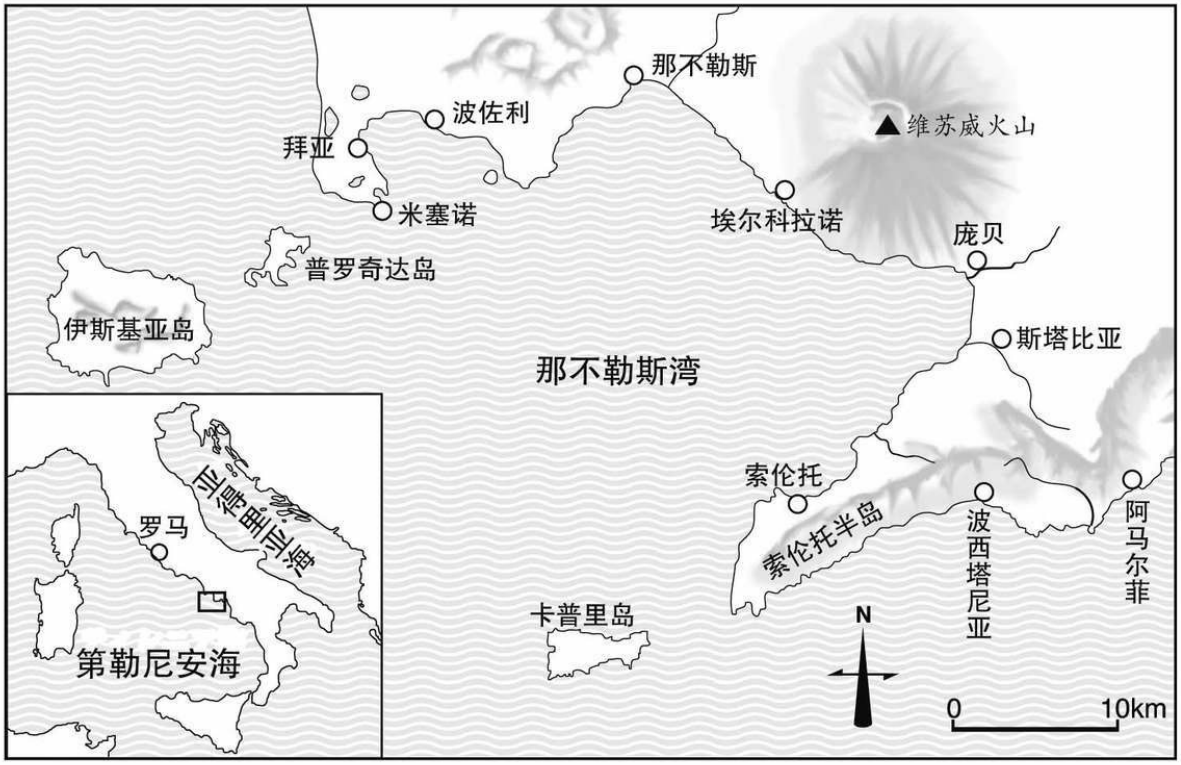
在此，笔者又将面对与讲述犹太战争时遇到的问题相似的难题——对于在罗马史上稀松平常但是被后世赋予重大意义的事件应该如何处理。

公元66年爆发、在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防战中达到高潮、以公元73年马萨达的陷落为终结的犹太战争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现代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历书、传记、小说。对于现代的以色列人来说，马萨达的要塞遗址已经成为了圣地。

公元79年夏天的维苏威火山大喷发将庞贝和埃尔科拉诺夷为平地，由于发生在意大利境内，使得这个事件更增添了悲惨和不幸的色彩。虽说如此，这只不过是罗马人在1000多年的罗马历史中遭受的众多灾难之一。在1800年后的19世纪开始发掘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了参观游客最多的名胜，即使是不知道古罗马广场的人也听说过庞贝。但是，在同时代

的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受灾地庞贝的名字。在20世纪已经无人不知的庞贝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过是“坎帕尼亚地区诸多富饶的城市”之一。不过正因如此，庞贝被作为罗马帝国时代大量存在的典型的一座地方城市保留了下来，得以在2000年后再度重现，不断进行发掘工作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笔者通过这套题名为“罗马人的故事”的书想讲述的是罗马的通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必须遵循一个标准，即叙述的事件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具有多大的意义。如果详细叙述庞贝遭到的不幸可以揭露出罗马当时的统治体制内包含的种种问题的话，笔者当然会不惜笔墨。然而，庞贝遭受的灾难与神户大地震不同，是一次百分之百的天灾。无论在维苏威火山喷发后采取何种对策，都不可能减少死亡的人数。



那不勒斯湾及其周边

并且，就如庞贝在当今时代的知名度一样，介绍庞贝的著作可以说

是浩如烟海。与通史相反，介绍单一历史事件的著作被称为“专著”，关于庞贝的详细论述，我们可以参考大量的专著，所以以下只介绍必不可少的内容。

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地区的人们对地震已经习以为常了。位于那不勒斯西方的贸易港波佐利、高级避寒地拜亚、军港米塞诺到伊斯基亚岛之间的地区是有大量温泉涌出的火山地带。另外，从那不勒斯向东前进可以到达维苏威火山和坐落在山麓的庞贝城，17年前，即尼禄时代的公元62年，庞贝及其周边曾遭遇过强烈的地震。不过公元79年的庞贝已经基本从17年前的地震导致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了。

然而，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它已经900年没有喷发过了，人们都以为它变成了一座死火山。绵延到山顶的山脊上长满了树木，公元前1世纪斯巴达克斯发动起义时，支持这名角斗士的奴隶们就是逃到了这里。这里也没有休眠火山和活火山特有的光秃表面。所以在喷发的时候，造成了大批人员死亡。因为人们以为是常有的地震，全都躲在屋里等待地震结束。

然而当天可不是平常的地震，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灼热的碎石像冰雹一样落了下来。虽然每块的重量不大，但是堆积起来足以压坏房顶。看到房顶落下来，人们终于意识到必须避难了，但这时距喷发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小时。开始喷发的时间是下午1点左右，所以人们决定逃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这时落下的碎石已经越来越大，速度也加快了。人们纷纷用衣服和垫子护住头部，打着灯笼逃往别处。

但是真正让避难人群丧生的是之后悄然袭来的含有大量火山灰的云状气流，不幸正处于下风位置的人们无论逃到哪里，都躲不过这种被后世称为“气浪”（Surge）的瓦斯云。位于庞贝南面5公里处的斯塔比亚埃（现在的斯塔比亚）受气浪的影响也死了不少人，庞贝和埃尔科拉诺的居民似乎都是死于窒息。8月24日下午1点开始的这场悲剧在第二天早晨终于结束了，庞贝和埃尔科拉诺都被埋在了堆积高达4米的碎石和火山

灰下。最后又下了一场掺杂着火山灰的大雨，于是这层4米厚的堆积物变成了和水泥一样硬的覆盖层。

关于死亡人数，有人说是2000人，也有人说是5000人。庞贝的人口大概在1.5万到2万人之间。沿海的避寒地埃尔科拉诺的居民大多都逃到了海边，但是由于地震的影响，海上波涛汹涌，无法让船靠岸后乘船出航，这些人都被火山灰的气浪吞噬了。

现场证人

有一个人见证了公元79年夏天的这场悲剧。

从米兰向北走30公里可以到达浪漫的科莫湖，湖畔的城镇科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让退役士兵移民至此的时候。普林尼·采西利尤斯·塞孔都斯在尼禄时代的公元60年出生于此，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的这一年他18岁。由于父亲早逝，他被单身的舅舅收为养子，火山喷发时他正在舅舅的服役地——与维苏威火山隔着那不勒斯湾遥遥相望的军港米塞诺。

普林尼的这位舅舅是他母亲的哥哥，也就是37卷本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的作者普林尼·塞孔都斯，他将这部大作献给了皇帝提图斯。这个人于公元23年在科莫出生，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56岁。

历史上为了区分，将舅舅和外甥分别称为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日本一般称为大普林尼和小普林尼。进行区分是因为舅舅和外甥同为国家公务员，并且虽然写作对象不同，但作家身份是相同的。不过，在从事公职的同时也担任专职作家的生活方式在恺撒时代以来的罗马并不新鲜，也许更准确地说，这种类型的生活方式在古代的罗马是稀松平常的。

大普林尼年纪轻轻便离开故乡前往首都求学。这名地方出身的有志青年得到的第一份公职是莱茵河军团附属骑兵部队的队长。之后作为皇帝的财务官前往南法行省赴任。皇帝财务官是负责征收行省税等税收的负责人，所以他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地方税务署长。他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业绩似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后来以相同的身份先后前往北非、西班牙和高卢北部赴任。回到首都罗马后担任了要职，最后被任命为驻扎米塞诺的海军司令官。据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与直属上司韦斯帕芗冲破了阶级地位的偏见，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普林尼曾经告诉韦斯帕芗，自己的著作活动丝毫没有影响到公务，调查和研究都是利用睡觉时间进行的，韦斯帕芗听后也只能微笑着表示许可。实际上他执行公务以外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研究工作，这让和他住在一起的外甥经常投来敬佩的目光。

外甥小普林尼的公职生涯与舅舅稍有不同，他起初先是担任军团的大队长和军团附属的会计检察官，接着当选了首都的护民官。之后跻身元老院，同时成为国家财政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每年的财政支出。图拉真皇帝继位后，他就任了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的行省总督。在此期间他与皇帝图拉真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了解当时罗马帝国的最佳资料。

不可思议的是，生活在帝国最强盛时期的这个性格平和的乐天派居然和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但是对于任何事都以悲观的态度看待的塔西佗成为了好友，也许是因为小普林尼对大自己10岁的塔西佗的文学才能心怀敬佩吧！无论与自己是否同行，小普林尼都不会嫉妒别人的才华。这两个人同时也是律师，曾经一起为人辩护过。

关于公元79年夏天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事件唯一的现场记录是这位小普林尼写给塔西佗的两封回信，因为塔西佗要求他告知大普林尼去世的情况作为自己写作历史著作的材料。回信的时间应该是塔西佗着手开始写作《同时代史》的公元100年前后。这样一来，这两封信就成了火山喷发20年后的“证词”。

以下笔者将翻译这两封信的全部内容，关于维苏威火山的大爆发和庞贝城的消失过程已经有很多著作论述，各位读者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毕竟在讲述通史时不可能像只关注某一历史事件的专著那样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面俱到。之所以将书信的内容全部翻译，除了介绍现场证人的证词这个目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通过这两封信来了解代表帝政最盛时期的这两个人（不，应该加上老普林尼，共三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姿态。

第一封信

普林尼向塔西佗致以诚挚的问候。

为了将舅舅去世的情况正确地流传于后世，您要求与他关系最亲近的我提供一些素材。如果能够通过您的文笔流传后世的话，舅舅虽死也一定能获得不朽的荣耀。所以，我首先对您表示感谢。因为这样一来，即使舅舅默默无闻地被永远地埋在那座风光明媚的名城的瓦砾之下，也会与因那场无法忘记的天灾而去世的人们以及被掩埋的城市一样，被后世永远记住。舅舅写成的著作已经足以保证他名垂后世，您的文笔更是让这种保证稳如磐石。

我经常在想，被神赋予能够名垂青史的才能或者为后世著书立说的才能的人真的是幸运儿，更为幸运的就是同时被赋予这两种能力的人了。舅舅通过他自己的著作得到了后一种幸运，前一种幸运如今通过您的文笔也可以得到了。所以，我欣然接受您的要求。不，多亏您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作为外甥的我才能为舅舅的永垂不朽有所贡献，我从心中为此高兴。

当时舅舅担任舰队的指挥，身在米塞诺基地。那天正是8月24日下午1点，我的母亲首先发现了情况不对，她看到巨大的黑云后喊了出来。舅舅洗完日光浴和冷水浴后在寝室内吃了些简单的午饭，像往常一样坐到桌前，听到喊声后提着拖鞋赶到了阳台。官邸位于海滨的高台上，阳台是观察这场奇异景观的最佳场所。形似黑云的巨大烟雾扩散得满天都是。从远处（出事地点距离米塞诺半岛有40多

公里）观察无法得知是哪座火山，后来才知道是维苏威火山。维苏威火山喷出的巨大烟雾呈现出伞松树的形状，长长的树干直冲云霄，前后左右分出很多分支。不知是由于喷发产生的威力冲上云霄后劲道有所减退，还是由于烟雾本身的重量使然，烟雾从中间逐渐向左右散开，颜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呈白色，有的地方呈灰色，还有的地方呈红黑色。这种颜色的变化有可能是受到了火山灰和碎石的混合比例的影响。

舅舅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研究欲望，为了可以更近地观察这个奇怪的现象，他让人准备了小型的快船。当时他也曾对我说："想来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但是我想先完成舅舅交代的功课，所以对他说我要留在家中。

舅舅离开官邸前往军港后，塔斯克斯的妻子莱克提娜寄来一封信，信中写到他们住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别墅也遇到了危险，唯一的逃跑路线只有海路。因此舅舅的心思从博物学的研究转向了担任舰队的司令官，他马上派遣一支加列船队出港，自己也上了其中一条船。这不只是为了朋友的妻子莱克提娜，也是为了要拯救很多处于危险之中的人。那一带（应该是埃尔科拉诺）气候舒适，景色宜人，有很多别墅和居民。

船队离开米塞诺军港，向正东驶去。途中与很多满载难民的船只擦肩而过，但米塞诺舰队的船只依然直奔危险的目的地，径直向东行驶，因此充分地观察到了正处于喷发高峰期的维苏威火山恐怖的全貌。

帆船的甲板上开始落下火山灰，随着船队接近，火山灰的温度也越高，数量也越多。后来又开始落下灼热的碎石和仍在燃烧的石块，船队已经不可能靠近海岸了。越接近岸边，海面上的波涛越是汹涌，并且还被突然出现的浅滩阻挡了航线，火山灰流也已经到达了海边。

舅舅在看到这个情景的瞬间犹豫了一下，他肯定动了放弃营救返回的念头。然而据后来向我讲述一切的舵手讲，舅舅在当时说运气会眷顾有勇气的人，下令船队驶往庞贝阿努斯的别墅。庞贝阿努

斯的别墅位于东南方向的斯塔比亚，但是当时的那不勒斯湾已经变成了一片惊涛骇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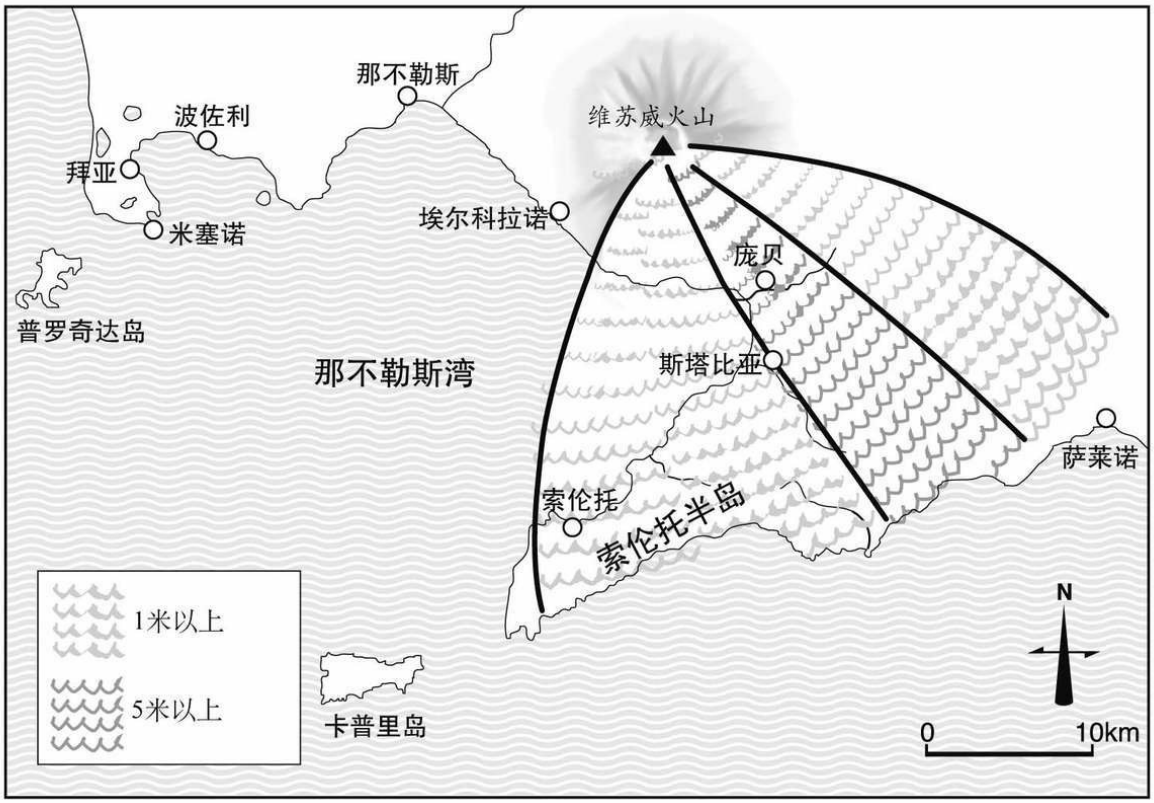
在庞贝阿努斯的别墅，虽然已经大难当头，但似乎人们觉得危险不会马上降临，码头还停靠着一些被仆人们装满了财物的船只，一旦风向有所好转就扬帆出海。舅舅到达这里时风向依然没有变化。庞贝阿努斯害怕得心脏都快碎了，不管舅舅怎么安慰这位朋友都无济于事。为了不让他觉察到生活发生了剧变，舅舅与他一起入浴、按摩，之后又共进了晚餐。

在此期间，维苏威火山的山脊线已经被岩浆染得通红，到处喷着火焰。夜幕降临之后，喷火的景象更是鲜明光亮。为了安慰因看到这个景象而心生绝望的人们，舅舅四处奔走解释说这是居民忘了关火引发山上的小屋起火。之后舅舅回去睡觉了，据说他睡得很熟，由于身体肥胖而鼾声如雷，连寝室外的人都能听到。

过了一会儿，寝室所在的内院的地面开始颤动，地表凸起。落下的火山灰和碎石的数量和速度也不断增加。舅舅如果就这样在屋内熟睡不起，石块和火山灰不久就会把门封死，恐怕再也出不来了。他被人叫起走到外面，发现彻夜未眠的庞贝阿努斯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商量对策了。现在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别墅内，还是到别墅外面避难。

别墅和庭院一直不间断地摇晃着，剧烈的震动仿佛要将地面翻个底朝天一样，连站着都会感到困难。并且不只是上下晃动，还伴随着由远渐进的感觉，迟迟没有停止。即使到屋外避难，也会面临被滚热的碎石烫伤的危险。但是，大家都认为逃到屋外避难的危险程度更低，于是全体人员把枕头、坐垫等物品放在头上，用长长的布条固定住，做好了逃出去的准备。

其他地方应该已经天亮了，但是维苏威火山下风一带的人们却身处比平时的夜晚更加恐怖的黑暗中。虽然维苏威火山散发着大量的火焰和光亮，黑暗却丝毫没有减退。人们纷纷提着灯笼，顶着黑暗赶往码头，他们想亲自确认一下是否可以乘船出海。



维苏威火山的火山灰大量堆积的地区

然而人们看到的大海却比前一日更加汹涌，风向也依旧是逆风，这样一来只能返回别墅了。舅舅在镶着马赛克的地板上铺上临时床铺，躺了上去，向人要了两次凉水喝下。其间，散发着强烈的硫黄味的空气开始悄悄地在周围弥漫起来，人们纷纷撤离。舅舅也在两名仆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但是又随即倒下，断了气。据我推测，死因应该是火山喷出的气体导致呼吸困难，舅舅在平日呼吸道就不是很好。

人们得以重见天日已经是舅舅去世三天后了，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舅舅依然保持着倒下时的姿势。身体没有破损的地方，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仿佛不是一具尸体，更像是在睡觉的样子。

其间，母亲和我在米塞诺……算了，这些事情已经和历史无关，而且您想了解的是舅舅的真正死因，所以我决定在此停笔。但是，我只想再强调一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在现场亲眼看到的事实，要不就是当时的现场目击者在事后亲口告诉我的。

当然，对这些事实的取舍全凭您自己判断，因为书写历史毕竟不同于写信，将一些内容公之于众与告诉朋友也是不同的。

此致敬礼。

第二封信

普林尼向塔西佗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要求我继续透露在讲述舅舅死因之前的信件中欲言又止的部分，也就是说希望我回忆一下自己留在米塞诺的时候遭遇了怎样的不安和危险。

“纵然我心中的不幸和恐惧将再次生起，也要把它们讲出来。”（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一句话。）

舅舅乘船离开之后，我继续学习一直到傍晚，因为本来就是为了学习才没有和舅舅同行的。学习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洗澡、吃晚饭，然后睡下。因为受到了地震的影响，我睡的时间很短，也睡得很浅。不过，坎帕尼亚地区虽然频发地震，但当晚的地震还是很特别的，不只有震动，还伴随着好像要坍塌的感觉。

母亲冲进了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好也刚从床上起身，我们想的一样——去把熟睡的对方叫醒。

母亲和我在庭院的一角坐下，从庭院往出走几步就可以直通海岸。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勇气十足还是年少不懂事（当时只有18岁），让人拿来提图斯·李维的书，专心地看了起来，并且不是简单地读读，而是还画出了重点。当时宅邸中还住着一名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舅舅的朋友，他看到坐在庭院中的母亲和在旁学习的我之后很是生气，指责了我的若无其事和母亲对儿子的放纵。但我不为所动，继续读书。

就这样到了早上，借着清晨微弱的光亮向周围看去，房子基本上都倒塌了。我们居住的别墅处在与周围隔离开来的高台上，虽然不豪华，却很坚固。但是看到周围一片狼藉的景象后，家人们当然

也担心起来这座别墅的安危了。

最后我们决定到屋外避难，流离失所的邻近居民看到我们从别墅出来走向郊外后也纷纷跟了上来。在恐惧的驱使下，比起坚持自己的想法，遵从他人的决定往往是更聪明的选择。这样一来，在我们和仆人的后面拉起了一条长长的队列。

走到房屋稀疏的郊外后，我们暂且停止了脚步。这里发生了很多异常的情况，让我们又惊又怕。装着贵重品和临时必需品的货车明明走在完全平坦的道路上，却开始左右摇晃起来，根本无法停止，把石头卡在车轮两侧也不管用。

此外，放眼望去的大海也与往日不同，海水退去的沙滩上散落着死掉的鱼和贝类。对面是一片令人胆寒的巨大黑云，浓烟中夹杂着火焰散发出的光，简直就像划过夜空的一道闪电。

正当母亲和我驻足观看眼前的景象时，之前提到的从西班牙来的舅舅的友人凑上来喊道："如果你的哥哥、你的舅舅普林尼还活着的话，最担心的就是你二人的安全；如果他不幸身亡的话，最放不下的也是你二人的安危。在避难的事情上，你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母亲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在确认舅舅的消息之前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他听到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一个人去避难了。

过了不一会儿，浓烟笼罩住了整个海面。卡普里岛在之前早已从视线中消失，现在连近处的米塞诺海湾也看不到了。母亲察觉这个情况后，劝说我快逃。她说，你还年轻，跑得动。我上了年纪，身子不中用了，只要不拖累你，死也甘愿。劝说的语调已经近乎哀求了。而我却反复回答，没有母亲，我也不会苟且偷生。然后我拉着母亲的手快速跑了起来，母亲终究从了我的意，但还是不住地责怪自己拖慢了避难的速度。

这时已经开始有火山灰落下。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不经意地回头望去，发现一片浓雾状的东西从背后袭来，就好像河川中的水蔓延了整个大地一样。我对母亲说："我们离开主路吧！免得

被后面的人踩死。”

我们母子二人避开有大批难民涌来的主路，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歇了歇脚。此时已是深夜，但既不是没有月色的夜晚，也不是浓云密布的夜晚，而是一个令人感觉奇妙的夜晚，犹如被关在黑灯瞎火的密闭房间中一样。黑暗中只听得到嘈杂的人声，女人的哀叹声、孩子们的哭喊声和男人们的怒骂声，还有寻找亲人的声音、夫妻彼此确认对方身份的声音。有些人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有些人为罹难的亲人悲痛，还有些人受不了等待死亡的恐惧而选择了自杀。很多人高举双手向神灵祈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喊已经没有什么神灵了，世界将持续这样的黑暗直到终结。

因为恐惧和绝望而讹传的消息数不胜数，造成了更多的悲剧。据传米塞诺的一处建筑倒塌，另一处建筑被大火包围。虽然都是假消息，但当时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因而加剧了人们的绝望感。

周围稍微变得亮堂起来，但绝不是因为早晨的阳光，而是火灾的缘故。所幸的是火灾没有蔓延到近处，但是又有灰尘降落下来，这次是浓重的火山灰。我们只好屡次起身掸掉身上的灰尘。稍有怠慢，身上就会布满灰尘，最后被压死。我没有被人们的恐慌传染而动摇，或者混入人群一起逃难，也没有绝望地呼喊，而是冷静地采取了行动。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不由得都想夸奖自己一番了。不可思议的是，我当时丝毫没有觉得自己会与其他大多数人一起命丧于此，也没有觉得自己迄今为止的短暂一生以及今后的所有可能性会随着自己生命的终结而烟消云散。虽然想想当时的状态，比起活下去来说死亡也许更可以给人带来安慰。

这片充斥着灰尘的浓雾最后终于渐渐散去，变成了一片普通的烟云。之后慢慢看见了阳光，但是这一天的太阳本身是很暗淡的，就像日食时候的太阳一样。我们无法相信周围发生的如此巨大的变化。因为能够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像覆盖了一层积雪一样，被掩埋在了火山灰的下面。

我带着母亲和几个仆人返回了米塞诺。踏入宅邸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充分休息。当夜也是在恐怖和希望交织的

状态下度过的，担心地震还会发生或是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恐惧心理挥之不去。要是在平日，我肯定会对人们的杞人忧天一笑置之。但是不管心存多大的不安和恐惧，我和母亲的心意已决，我们坚持在得到舅舅的消息之前绝对不从这里离开。

小普林尼的这两封信是怎样被引用的呢？只能很遗憾地说，塔西佗《同时代史》中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在中世纪时失传，因此我们无从知晓。

阵前指挥

公元79年8月24日的这个惨剧的消息传到首都罗马应该是在不到两天后的26日前后。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罗马深知信息传达的重要性，所以一般不是在确定事情经过之后再报告，而是在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上就会迅速传达。并且发生惨剧的地点是那不勒斯湾沿岸，在那一带拥有别墅是显赫地位的象征，所以对于住在首都的达官贵人来说也绝不是事不关己。

提图斯既不是出身原有的领导阶级元老院，家境也不是很富裕，所以在那不勒斯一带没有自己的别墅。但他毕竟是皇帝，虽说仅仅上任两个月，却肩负着保证安全和粮食的最大职责，并且提图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愿望不逊于任何人。余震尚在持续，他却已经决定在当地设置救灾总指挥部，由自己亲自担任阵前指挥。火山喷发时的风向大概处于维苏威火山由西到南的90度扇形区域内，此外的地区可能没有人死亡，但肯定还是受到了地震的影响。总而言之，那不勒斯湾沿岸一带都应该被视为受灾地区。

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典型地方城市庞贝被堆积高达4米的碎石和火山灰掩埋，并且被随后下的一场雨凝固，所以死者的尸体都无法处理。不

过神殿的圆柱和圆形竞技场的上半部分在当时应该是露在地表外面的，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被风沙和植物覆盖，直到近代被发掘出来后才得以窥见庞贝的整体面貌。尽管皇帝提图斯心怀善意，但在公元79年，庞贝和埃尔科拉诺等被掩埋的城镇和村庄也只能持续着无人问津的状态。

但是，有很多受灾者幸运地逃过了此劫。坎帕尼亚地区在意大利是有名的富庶地带，人口密度在当时也是最高的，对于提图斯担任阵前指挥的当地的指挥部来说可能有数不尽的工作要做。

罗马人认为，在床上铺上垫子，然后用单肘撑在上面以横躺的姿势吃饭才是真正的用餐方式。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吃饭是孩子和奴隶的用餐方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家中设置一间餐厅的人家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吃饭。不过，如此悠闲的用餐方式在罗马时代也只限于晚饭的时候，早饭和午饭以及工作繁忙、时间紧张状态下的晚饭都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匆匆解决。这种方式对于当时的罗马来说相当于现代人观念中的站着吃饭，也就是日本所说的站在大街上吃饭的感觉。在受灾地区忙于救援活动的提图斯每日的用餐方式也与罗马人观念中的正确用餐方式相去甚远，除了要举行皇帝必须参加的祭祀活动之外，他根本不会返回罗马。

提图斯之所以能够专心投入受灾地区的重建活动，是因为他在父亲韦斯帕芗统治期间作为事实上的另一位皇帝共同治理过国家。他习惯了皇帝的日常工作，也完善了必要的人脉和机制。关于提图斯采取的救灾对策的详细情况，塔西佗的《同时代史》一定有过相关叙述，但是这一部分在今天也已经失传，所以我们无从了解。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按惯例没有亲属的死者的资产要划归国库，在这次事件期间作了更改，没有亲属的死者的财产全部用于对同乡受灾者的救助活动。庞贝是一个海外交易盛行的城市，庞贝的居民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拥有资产。由于全家人遇难而没有继承人的这些财产没有收归国有，而是用做了向幸免于难的人提供援助的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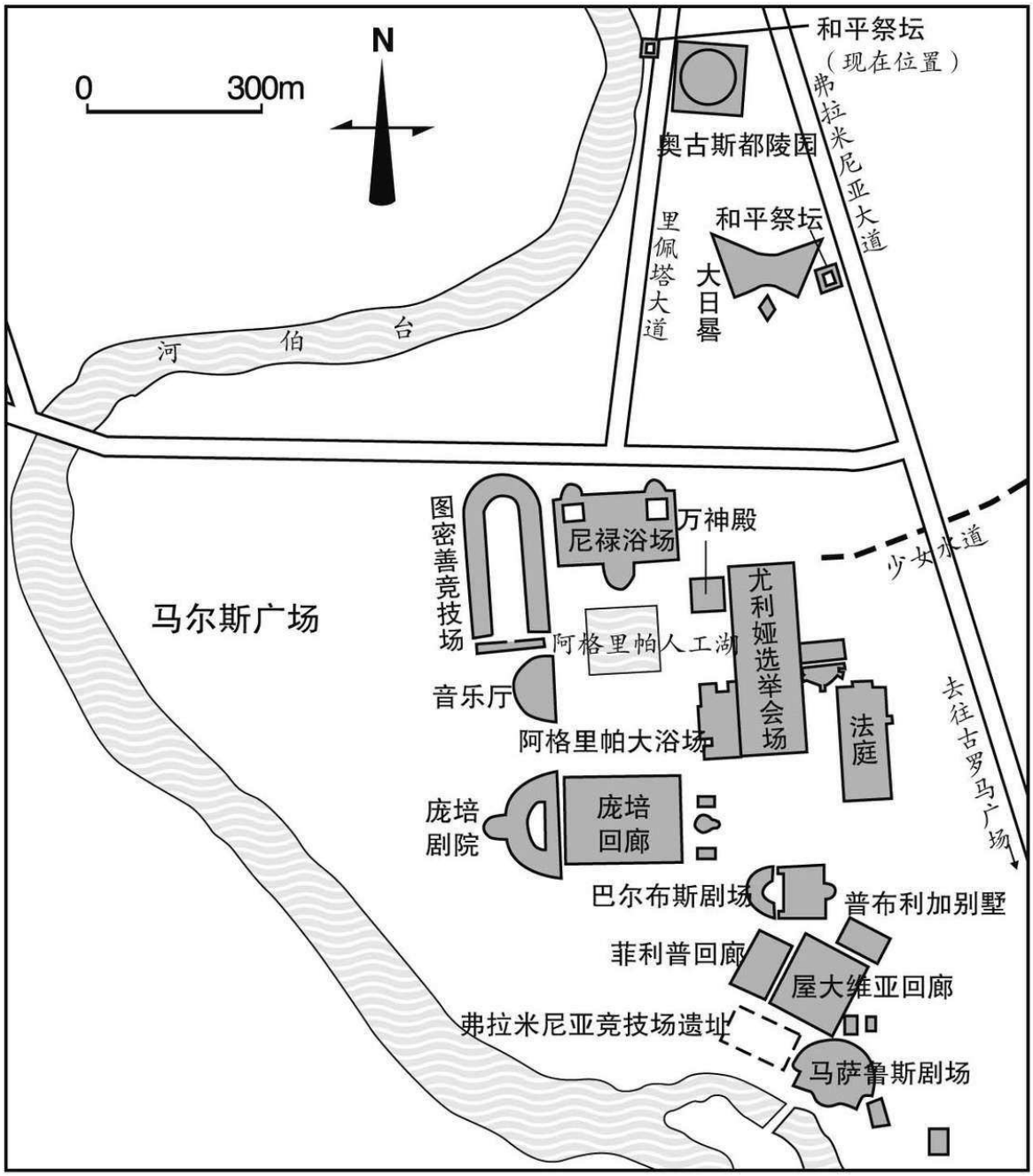
税制方面的救援政策也无从得知，如果同样的惨剧发生在行省的话，首先要实施的就是免除三至五年的行省税。但是坎帕尼亚地区位于意大利境内，行省税这种直接征税本来就不存在，不过当时有可能实施了关税和营业税的免税措施。还有就是基础设施的恢复建设，只有这一项完全是国家的工作。公元79年的大惨剧发生后，让地方自治体来建设基础设施未免负担太重。虽然在17年前即公元62年地震时，庞贝确实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重建。

到了公元80年后，提图斯皇帝依然继续着在当地总指挥部的生活。这一年4月在首都罗马发生火灾的消息迫使身在坎帕尼亚地区的提图斯急忙赶回了罗马，接踵而来的灾难让这位40岁的皇帝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公元80年的火灾让卡匹托尔山到马尔斯广场的南半部分之间的地带受到了损害，规模虽然没有达到尼禄时代那场有名的“罗马大火”的程度，但是那片地带矗立着各种公共建筑。好在建筑都是用坚固的石材建成的，不至于倒塌，不过在灭火后要是置之不管的话也随时会有倒塌的危险。据说损失最严重的是台伯河附近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这座竞技场是在特拉西梅诺湖畔败给汉尼拔而战死的弗拉米尼乌斯在担任执政官时修建的，通往意大利北部的两大干线道路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也是他留下的业绩。这条道路在修建后的300年间一直发挥着干线道路的作用，以修建者的名字命名的竞技场也同样一直被当做竞技会场和少年们的体育训练场使用。但是在公元80年的火灾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损伤严重，政府似乎不得不放弃重建的尝试。不过竞技场的遗迹也没有存续多久，它本来就是一座由厚厚的石壁组成的，变成一户户民居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在现代，这座竞技场已经成为了以犹太会堂为中心的犹太裔罗马公民的居住区。

但是，在300年的岁月中，人们早已熟悉了这片公共区域，并且修建者弗拉米尼乌斯是平民阶级英雄，他修建竞技场的目的也在于为平民

提供专用的体育竞技场。在之后的共和政体时代，弗拉米尼亚竞技场一直是平民阶级的根据地，虽然市民集会还是在古罗马广场举行，但护民官召集的平民集会一定是在弗拉米尼亚竞技场举行。从共和政体时代步入帝政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只要是了解统治为何物的人就应该很清楚有必要修建新的建筑来代替无法再使用的弗拉米尼亚竞技场。



公元1世纪末的马尔斯广场

提图斯肯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死神已经在慢慢逼近他。建设新的竞技场来代替弗拉米尼亚竞技场的工作只能等待下一任皇帝图密善来完成了。今天被称为纳沃纳的美丽广场的前身就是古代

的“图密善竞技场”。

损失程度仅次于弗拉米尼亚竞技场的公共建筑物是紧靠其北的奥古斯都修建的“屋大维亚回廊”和恺撒修建的“尤利娅选举会场”。

以这些建筑为主的公共建筑的重建费用都是通过提图斯皇帝自费资助和罗马富裕阶级的捐款筹措的，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为公共事业捐款就相当于现代所说的“Noblesse Oblige”（受尊敬者的义务）。

在先帝韦斯帕芗的时代开工的弗拉维乌斯圆形剧场（通称“圆形竞技场”）也终于在这一年完工。提图斯为了激励因维苏威火山喷发和首都罗马的火灾等灾难而情绪低落的市民，决定举行盛大的完工庆典。一完工便散发出灿烂光芒的圆形竞技场中随处可见盛装打扮的男女老幼，最上层是向奴隶开放的区域。虽然不太清楚完工庆典到底持续了几天，但是不难想象，人们的注意力肯定集中在角斗士比赛上。这种危险格斗的主人公——角斗士有三分之二出身于奴隶，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自由民。虽然危险系数高，但是有望获得高额的报酬，所以也有不少自由民选择角斗士作为自己的职业。另外，格斗的高手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赢得富家女子的芳心也不再是梦想，类似于现代的拳击手或其他格斗运动的选手。

皇帝提图斯在尼禄计划修建黄金宫殿的地方修建了名为“提图斯浴场”的罗马式公共浴场，这座浴场包括一些沐浴的相关设施和体育馆、图书馆、游戏室、庭园等设施。据说他本人也经常到这里沐浴，而且没有规定皇帝入浴时就禁止其他人进入。他经常带着朋友和熟人一起来沐浴，但是脱光衣服后，皇帝和一般市民还有奴隶之间就没什么区别了，这正是提图斯所希望的。然而，罗马式的浴场虽然有男女之别，却没有元老院议员和平民的阶级差别。在别墅滞留期间的小普林尼因为停留时间短暂，也没有必要专门在宅邸内准备浴室，而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场沐浴。对于罗马人来说，入浴要经过温浴、热气浴、冷浴三个阶段，不像日本人烧些热水就可以了。

提图斯之死

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的“史无前例的瘟疫”发生于公元81年，但无法得知这场瘟疫有多严重。

不管规模有多大，瘟疫终究是发生了，提图斯也早早成立了专门针对这场瘟疫的对策委员会。在这次瘟疫中，通常都是在各自的诊所从事治疗的医生们被总动员起来。希腊人占大多数的医疗系统工作人员因为被赋予了罗马公民权而享有免除直接税的特权，但同时也负有和罗马人一样的义务。不知是托这种体制的福，还是因为瘟疫流行的规模本来就有限，或者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到了入秋的时候瘟疫便退去了。然而，年富力强的提图斯本来没有染上瘟疫，但是却病倒了。

生病的原因也许是频发的灾难让他积劳成疾。仿效父亲韦斯帕芗在当年病倒时回到故乡的温泉疗养的做法，提图斯也回到故乡养病。弟弟图密善随同前往，但是提图斯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时间为公元81年9月13日。公元40年12月30日出生的提图斯死时还不到41岁，只当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皇帝。

得知皇帝死讯，每个人都从心底为之悲叹，就连反对他和犹太公主结婚而曾经在竞技场提出强烈抗议的普通市民也非常敬爱这位认真听取民众意见、终身未娶的皇帝。在受灾地区担任阵前指挥的皇帝，经常在公共浴场现身的皇帝，平民心中的理想皇帝，这些就是提图斯带给民众的印象。提图斯从未向市民发放过已成为惯例的奖金，但是市民们都知道他在每次发生灾害时都慷慨解囊，捐助自己的私人财产。

作为皇帝权力监督机关的元老院传统上一向拥有很强的反皇帝势力，但这次元老院同样为提图斯表示深切的哀悼。反皇帝一派的元老院议员们最害怕的是被人告发而遭到弹劾，而提图斯从来都不会听取这些告发。提图斯曾经说过，比起让别人去死，他宁愿选择自己死。

元老院也是与皇帝合作来统治帝国的机构，皇帝是否胜任是他们评价的标准。在这个方面，提图斯不仅在首都罗马和本国意大利的统治上业绩出色，而且兼顾了整个帝国的统治，从而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仅举数例就可以证明，比如西班牙、北非的努米底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被称为亚细亚行省的小亚细亚西部道路网络的全线修复等。在意大利境内，也在公元79年下半年修复了马奇亚水道，公元80年又修复了奥勒留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一部分。从公元79年开始修建的当今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到当今克罗地亚的普拉为止的道路是一项全新的工程，因此这条道路采用提图斯的家族名“弗拉维乌斯”，被命名为“弗拉维娅大道”（Via Flavia）。

纪念他战功的凯旋门却因为没有加紧赶工，到他死后才建成。提图斯皇帝与父亲一样，都积极支持元老院向行省出身者开放，因此也赢得了行省人民的好评，但唯一例外的是居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原谅烧毁耶路撒冷大神殿的提图斯，也不会忘记这名将耶路撒冷失陷的记录永远刻在“提图斯凯旋门”上的元凶。但是，决定与罗马人和平共处下去的犹太人并不讨厌提图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居住在帝国境内各座城市的犹太人曾经对提图斯进行过指责。《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和提图斯之间的友情从他们12年前相识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彼此尊重的状态。

然而，唯独喜好讽刺的罗马人不甘于只是对他大加赞扬，与提图斯处于同一时代的一个人就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在位时间短的话，谁都能做个好皇帝。”

提图斯在位两年便与世长辞，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图密善，这位皇帝的统治却长达15年。

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

（81年9月14日—96年9月18日在位）

“记录抹杀刑”

罗马帝国有一种名为“Damnatio Memoriae”的刑罚，意译过来就是“记录抹杀刑”。这是一种在元老院进行正当的审判，也就是由原告一方阐述控诉的理由，担任被告代理人的辩护人展开辩论之后，再由全体议员裁决审判的皇帝弹劾体制。用现代的话来说，类似于将不信任的当权者送上法庭的体制，正因为针对的是比以强权著称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权力还要大的罗马帝国皇帝，弹劾的方式当然也更为严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项处置：

一、被判有罪的皇帝的所有雕像都必须破坏。

二、从所有官方记录和碑文中将该皇帝的名字删去。

三、剥夺该皇帝的所有后代使用“Imperator”作为个人名的权力。

四、皇帝在位期间制定的所有暂定措施法（未经元老院的表决许可而发布的敕令）都要废除。

对于不相信来世、因而最看重今生的成就和死后名声的罗马精英们来说，没有比“记录抹杀刑”对名誉影响更严重的刑罚了。这件针对皇帝的强力武器掌握在罗马帝国的元老院手中，笔者多次提到罗马帝政与后世的所有帝政都不同，具有一种监督机制正是其原因。当然，如果与罗马元老院并驾齐驱的两大有权者的另一方——罗马公民权所有者（在现代来说就是住在首都的市民们）团结一致支持皇帝的话，就算是元老院，在使用这件“武器”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了。但是，市民们对皇帝统治业绩的表达意见只能是在竞技场中，或者是冲到正在召开会议的元老院施加压力。在现代的国会中被选为议员的话就不能无视选民的意见，罗马的元老院却是终身制，只要不犯罪就不会失去议席。

这样一来，如果市民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向，并且皇帝弹劾派在元老院议员中占据多数的话，元老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件“武器”。韦斯帕芗通过的《皇帝法》也没有否认这项权力。因此罗马帝国特有的这项制度一直是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想要理解罗马的皇帝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的话，最快的办法是想象一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以及与总统所属的党派对立的党派占多数的上下两院的关系。

尼禄就是被这项“记录抹杀刑”宣判的皇帝之一。卡利古拉皇帝事实上也遭到了这种待遇，只是没有被公开定罪。理由有两个：第一，卡利古拉的性格乖张，干了很多让苏维托尼乌斯这种喜好奇闻异事的史学家的好奇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事情，但是在统治上无所作为，所以没留下什么值得抹杀的记录。第二，性格温和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不喜欢对前任施行过于严厉的处置。尼禄皇帝的14年统治时间比卡利古拉的4年长很多，值得抹杀的“记录”当然也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尼禄是在生前被定罪的，因此对现任最高当权者进行弹劾审判的色彩就更强一些。

如果官方记录是被刻在铜板上，就会将铜板全部熔化。如果是刻在大理石或其他种类的石头上，则会推倒毁坏。只是这些记录往往体积庞大，除了被定罪的人之外多刻有其他的人和事，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将当事人的名字删除或覆盖掉。对于2000年后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正是一个可以考验知识和想象力的好机会。不过，对金、银、铜币却不采取这种处置方式，因为这些钱币广泛流通于帝国全境，将其全部回收重铸、交换新币几乎是不可能的。多亏这个原因，刻有尼禄侧面肖像的货币才得以继续流通下去。

这种处置方式现代也有，墨索里尼修建的各种建筑物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不能把建筑物本身全部破坏，所以只采取了用水泥将墙面上雕刻的墨索里尼的名字抹去的方法。卡利古拉和尼禄流传至今的肖像非常少，也是在他们死后遭到破坏的缘故。此外，下面即将讲述的图密善在死后也被处以了“记录抹杀刑”。

如果是尼禄的话，笔者也会认为他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但是，至于图密善，却不能简单地断定他是个不称职的皇帝。如果对于史学家塔西佗的评价完全地相信则另当别论，但是笔者在《罗马人的故事4 ·胜者的迷思》的末尾已经提到过，就算是帝政时代最著名的史学家，笔者也不会全盘相信。

另外，笔者也不得不对“记录抹杀刑”这种刑罚本身的存在理由心存疑问。罗马这个民族不管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帝政时期，对于自己经历的败北和犯下的错误都不会避而不谈。抹杀记忆的用意在于希望将一想起来就令人厌恶的皇帝及其统治的一切相关内容都忘却，所以笔者认为在制定这项刑罚的同时却以不现实为由而继续使用雕刻着该皇帝的侧脸或业绩的货币的这种做法不符合罗马人的作风。并且继尼禄和图密善之后险些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人是五贤帝之中非常有名的哈德良皇帝。要不是后任安东尼·庇护坚决反对，连五贤帝之中都要有人被处以这种有损名誉的刑罚了。元老院的“记录抹杀刑”不就是元老院的报复措施吗？不能忘记的是，报复往往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感情用事的产物。

图密善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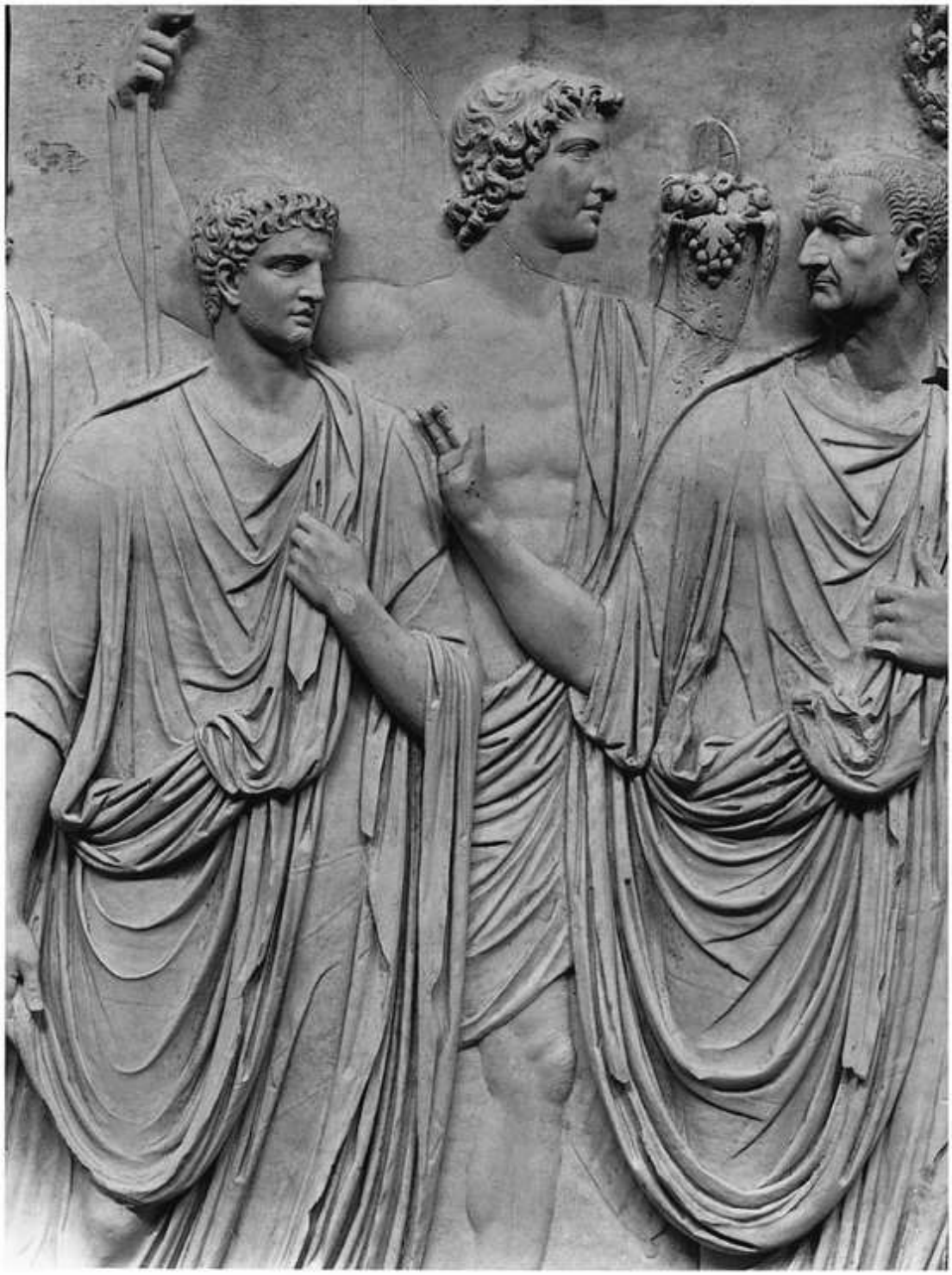
哥哥提图斯去世的次日，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以皇帝·恺撒·奥古斯都·图密善（Imperator Caesar Augustus Domitianus）的名字继任了皇位。他生于公元51年，所以继位时只是一名30岁的年轻人。皇位的继承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也是因为父亲韦斯帕芗决定自己的继承人由长子提图斯和次子图密善先后担任，并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韦斯帕芗在世时，提图斯和图密善就已经拥有了皇位继承者的称号——“恺撒”，所以与提图斯登基的时候一样，图密善继承帝位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父亲韦斯帕芗知道图密善在30岁的年龄继承皇位的话，想必也会感到意外吧！他虽然在生前已经为两个儿子的皇位继承之路作

好了充分的铺垫，但是应该也不会想到与图密善年龄相差无几的提图斯仅仅当了两年的皇帝便与世长辞，提图斯本人当然也不会预料到。

如果揣测一下韦斯帕芗的心中所想，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在自己之后继承皇位的提图斯当时40岁，从其年龄来看统治时间应该能够达到10—15年。韦斯帕芗当时肯定相信，在此期间提图斯也可以像自己培养他那样，给将来必定会继承皇位的弟弟图密善提供积累统治经验的机会。

韦斯帕芗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与提图斯一起作为共同的皇帝治理国家的，为的是让提图斯积累统治经验。提图斯当上皇帝后只要继续坚持这个路线就可以了，但是韦斯帕芗在统治的10年期间对于次子图密善却完全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他肯定是觉得提图斯成为皇帝也会像自己对待他那样给图密善提供同样的机会。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年龄相差11岁，恐怕提图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继承帝位时的年龄不到40岁，认为自己还能活10—15年甚至是20年也不足为奇。他的打算应该是由自己为弟弟提供机会，就像以前父亲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专注于应对灾害的两年过去后，死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好在事先都已经作好了充分的铺垫，图密善的登基没有碰到任何阻力，但是这名30岁的新皇帝并不具备进行统治所必需的实务经验。



图密善（左）和韦斯帕芗（右）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图密善登基暗含着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他完全没有军事上的经验。

正如“Imperator”这个称号所示，罗马皇帝的最大职责是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保障整个帝国的安全。如果有必要的话，必须亲自率领军团与敌人作战。即使在平时皇帝也肩负着进行监管以确保防卫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任务。也就是说，皇帝必须熟谙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并且要具备运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战略上的才能往往来自天生的资质，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有曾经在战场作战的经验。即使战场经验丰富的百人队队长也不一定能够胜任率领数个军团的司令官。但是，战术上的能力却受到实际经验的影响，因为左右战斗结果的因素往往是随机应变的能力。

提图斯曾经跟随军人出身的父亲韦斯帕芗辗转帝国各处的基地，参加犹太战争的三年间在前线积累了担任司令官的经验，所以有机会提高自己军事上的能力。所幸的是，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的12年统治期间，由于两人制定了充分的防卫对策，除了尚处于征服过程中的不列颠之外，罗马帝国没有经历战争。但是从图密善的立场来看，这也意味着他得不到提高军事能力的机会。

图密善继承了年轻有为且被万人称赞为明君的提图斯的位置之后，总是在各个事情上被人拿来与哥哥相比，想必他一定觉得不自在。然而，比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对兄弟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这些差异正是了解二人统治风格的关键。

父亲当上皇帝那一年，提图斯30岁，而图密善才刚刚18岁。提图斯在30岁之前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当权者。相反，弟弟却从18岁起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皇帝。与平民风格的提图斯相比，图密善具有一种经常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贵族风格，这也是二人生长环境不同所致。提图斯对帝位是否怀有野心尚且是个疑问，而

图密善在就任帝位的时候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意愿，可以想象除了二人的年龄差距这个原因之外，生长环境的不同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只要看看兄弟俩的妻子的出身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哥哥提图斯的结婚对象是无名小卒的女儿，而图密善成为皇子后迎娶的妻子却是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的小女儿，据说军团兵背叛皇帝尼禄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尼禄赐死了科尔布罗。在心理成熟期上存在的11年的差距体现在了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提图斯体格肥胖、身材矮小，图密善却身材瘦长，是个体态和五官都非常俊美的年轻人。

何谓罗马皇帝

后世的我们在翻开古罗马历史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地就使用“罗马皇帝”这个称谓，然而古代的罗马人即使在进入帝政时代后对于统治者也不使用“皇帝”，而是称呼他们“第一公民”（Princeps）。“Imperator”（皇帝）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对军队司令官的称呼。由于这个词的起源，生活在帝政下的罗马人平时只有军团兵会称呼“Imperator”，一般市民也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称呼。

接下来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称呼包含的不同意义。既然“Imperator”指的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作为部下的士兵们就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为命令和服从关系不明确的军队无法发挥军事组织的功能。

但是，“第一公民”却不同，因为这个称呼指的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中的第一号人物。所以这个称呼也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打败名将汉尼拔、实际上终结了与宿敌迦太基之间对决的大西庇阿也拥有这个称呼，在律师界获得成功的哲学家西塞罗也被称为法律界的“第一公民”。从这个称呼的确立过程来看，罗马市民对于“第一公民”完全没有

绝对服从的义务。

给意为“第一号人物”赋予实质上的君主称呼的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相信尤里乌斯·恺撒通过自称“独裁官”来明确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做法是导致被暗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奥古斯都没有使用容易让人联想到君主政体的“独裁官”，而是使用了有浓厚的共和政体味道的“第一公民”，成功地笼络了罗马从共和政体走向帝政之后地位和权力有所减弱的既有统治阶级——元老院。

但是，这样一来罗马的皇帝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体——绝对服从的对象“Imperator”和并非绝对服从的对象“Princeps”，这也是笔者将其命名为“精致的虚构”的理由之一。有不少历史学家批判奥古斯都以这种暧昧的方式创设的帝政，但是笔者无法赞同这些人的观点。因为笔者认为，唯有以实为“皇帝”但自称“第一公民”的方式才能让共和政体持续了500年之久的罗马变成一个帝国。只要看一看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帝国就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效果了。

首先，对于广大帝国全境的统治，自上而下的君主政体比以合议制为特色的共和政体具有更高的效率。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统治效率上（Governability）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帝国的经营需要能够担当的人才，哪一种体制对于确保人才更为有效。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势必无法摆脱优先考虑自己的权益的宿命，所以元老院主导的体制更容易形成封闭的统治阶级；君主政体的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所以必然需要广纳贤士。罗马帝国向被征服的行省人民开放门户就是选择了皇帝主导的帝政而带来的结果。

如果当时主张罗马应由意大利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议员继续统治的人，也就是西塞罗、庞培和布鲁图等“共和政体派”获胜了的话，罗马帝国应该会成为后来的大英帝国及其他帝国那样，由宗主国将殖民地纳入统治之下的帝国。但是，罗马却沿着被布鲁图杀死的尤里乌斯·恺撒设

想的路线，创造了一个包括宗主国和行省在内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帝国。史学家吉本认为，比起探讨罗马为何灭亡的问题，更应该探讨的是罗马为何能够存续那么长时间。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难以整合的帝国，但是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罗马人不是对别的民族进行统治，而是将别的民族同化为了罗马人。大英帝国的衰退是由于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独立或反叛却直到罗马帝国灭亡都没有发生过。

鉴于罗马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如此长久，就算其暧昧的形态遭到再多的批评，奥古斯都创设的“精致的虚构”也是行之有效的。不过，正因为它的“精致”，这种体制的运用也不得不受到当事人的性格和资质的影响。除了被认为不胜任皇帝之职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之外，笔者按照自己的判断将这种精致体制的当事人分为如下几类：

一、相信罗马皇帝只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在位前半期的提比略、在位全部时期的克劳狄乌斯和提图斯。

二、虽然不相信，却装做相信的样子——在位全部时期的奥古斯都和韦斯帕芗。

三、既不相信，也不装做相信的样子——在位后半期的提比略，以及图密善。

虽然知道自己登基是迟早的事，但是图密善还是因为哥哥的意外死亡在30岁就当上了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赐予自己的妻子多米提娅“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称，“奥古斯塔”是皇帝的固定尊称“奥古斯都”（Augustus）的女性名称形式。笔者将其译为“皇后”，但就算成为皇帝的妻子也不是自动获得这个尊称的。奥古斯都为了让共和政体的印象继续下去，在自己死后以遗言的形式将这个尊称赐予了妻子莉薇娅。继莉薇娅之后享有“奥古斯塔”尊称的人是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妻子、尼禄皇帝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多米提娅是帝政百年期间获赠“奥古斯塔”的

第三个女人。

但是没有任何罗马人对此表示异议，元老院似乎也打内心同意，也没有发生民众在竞技场举行抗议的事件。首要原因是多米提娅是为帝国作出突出贡献而获得民众一致认可的科尔布罗的女儿。不仅如此，在经过只有情人的韦斯帕芗、放弃与犹太公主的恋情而一直独身的提图斯皇帝的时代之后，她是又一位真正的第一夫人。她容貌姣好，举止高贵，恐怕没有比她更适合“奥古斯塔”这个名字的女人了。因为她的外表太漂亮，可能会给人以冷峻的印象，但在这一点上也会让人想起莉薇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图密善在青年时期迷上了这名有夫之妇，用尽百般解数才终于娶到她，这一点也与以人母的身份嫁给奥古斯都的莉薇娅非常相似。不过奥古斯都是通过直接与莉薇娅的丈夫谈判得到的她，图密善却没有这样处理。莉薇娅的前夫在前妻和奥古斯都的婚礼上担任了保证人，多米提娅的前夫埃利乌斯·拉米亚别提参加婚礼了，他一辈子都在记恨这个夺走自己妻子的男人。

但是图密善没有模仿卡利古拉皇帝的做法——将就任后的半年时间完全用于举办祭祀和宴席来与市民一起庆祝即位，他甚至没有举办什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身为皇帝该干什么。

公共事业（一）

没有确切的史料表明公共事业的建设内容和日期，所以只能作一些推测，不过图密善在成为皇帝后很早就着手致力于三项公共事业：

第一项是中世纪以后变为纳沃纳广场的图密善竞技场（Stadium Domitiani）的修建。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已经无法再使用，所以有必要为平民修建他们自己的体育设施。只有这座竞技场在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以后得以保留了图密善竞技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对于这项公

共设施的修建心存感激的平民们不惜违抗元老院的决议，没有改变建造时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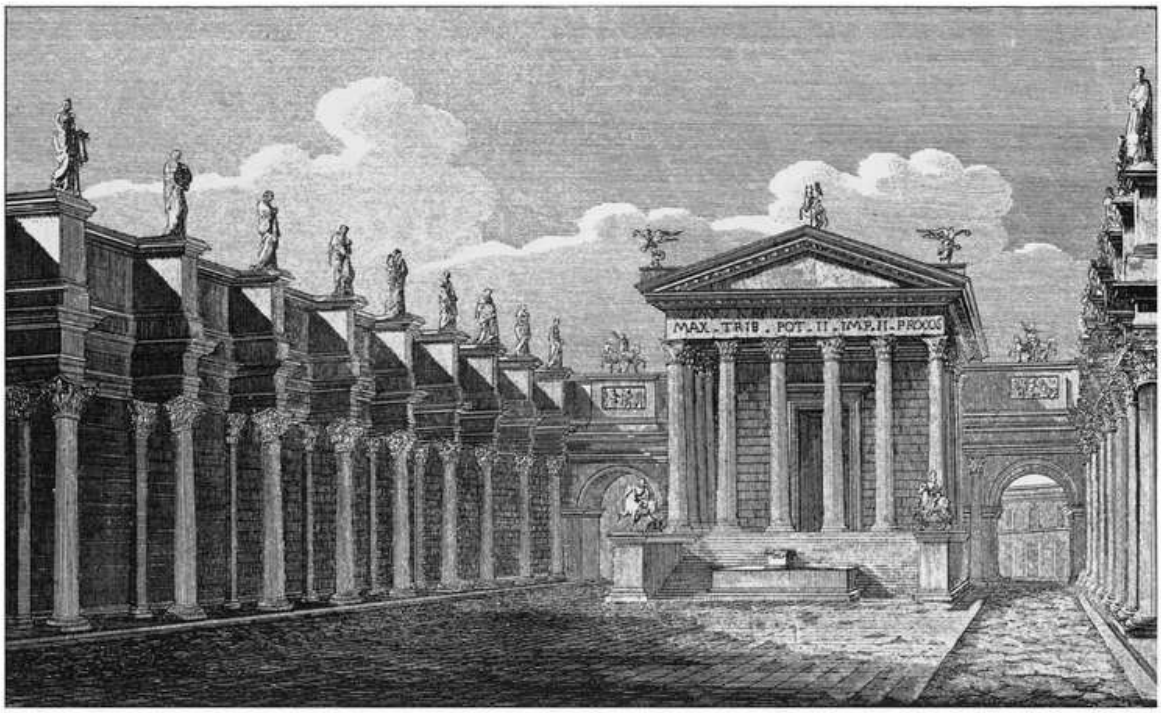
第二项公共建筑是父亲修建的、在哥哥执政时竣工的圆形竞技场。其实最上层的部分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按照当初计划完成修建对于韦斯帕芗的儿子图密善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工作。

第三项公共建筑是图密善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因而使用下一任皇帝涅尔瓦的名字命名的，在现代还被成为“涅尔瓦广场”的一系列广场化建筑。

这一带是被奥古斯都建造的广场和韦斯帕芗建造的“和平广场”夹在中间的一处120米×　45米的狭长地带，穿过这里然后再横穿过恺撒广场就可以到达古罗马广场，所以这一带被用为联结苏布拉地区和古罗马广场之间的通道。但是苏布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平民居住区，古罗马广场却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且这个地位还在不断提升。图密善认为应该改善这个联结地带被摊贩、拔牙业者、刮胡业者占据的状况。

图密善竞技场（复原模型）

现代的纳沃纳广场



涅尔瓦广场（复原假想图）

罗马人所认为的“广场化”是在四周的一边修建神殿，剩下的所有三个边用圆柱回廊围起来，圆柱回廊的里面通常用来开设店面或办公室。这种建筑样式是罗马人比较喜欢的空间利用法。

不过这些都是面向首都居民的事业，图密善所认为的皇帝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却是无愧于“Imperator”这个称号、能够保障整个帝国安全的最高责任人。在他看来，不应该等到遭到袭击的时候再发起反击，而是应该事先建立完善的防御体制，以阻止蛮族的入侵。他感到建立这种体制的时机已经到了。就这样，在谈到罗马的防御体制时不可不提及的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开始了。然而，在着手修建之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士兵的待遇问题，第二是日耳曼人的问题。

提高军饷

实际上，皇帝图密善提高士兵的薪水已经是罗马帝国110年不遇的事情了。据现存的史料只能知道军团兵（而且是没有任何职务的一般军团兵）的年薪，下表显示了年薪的变化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服役年限20年和期满退伍后得到的3000第纳尔退役金没有发生过变化。

罗马军团兵年薪的变化

	第纳尔银币	塞斯特斯铜币	阿斯铜币
共和政体时代	70	280	1120
尤里乌斯·恺撒提薪后	140	560	2240
奥古斯都提薪后	225	900	3600
图密善提薪后	300	1200	4800（日工资约13）

这个时代的非熟练劳动者一天赚的工资为12阿斯，所以军团兵的衣食住应该能够得到保障，并且他们还能享受到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退役金制度。此外，即便因生病或负伤而休假也能得到薪水。虽说如此，和喜欢的女人约会所需的“住”以及外出时的“衣”和“食”还是由士兵们自己掏腰包。

图密善的提薪政策在元老院那里的口碑很不好，他们批判皇帝是想用金钱来收买士兵。但是，就算那个时代没有通货膨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也已经过去了百年有余，生活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考虑到帝国财政规模扩大的因素，百年之后的提薪政策应该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并且图密善虽然提高了每名士兵的平均薪水，却一直致力于减少罗马全军的士兵数量，在统治的末期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他采取的是

一种精兵政策。因为和平已经持续了百年，在此期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断推进，所以帝国全境的经济取得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奥古斯都的时代，肯定有很多年轻人不加入军团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对于百年之后的那些没有资产的（不工作就无法生活下去）年轻人来说，维持生计的出路已经不再只有加入军团这一条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持整个军团的素质就只有在报酬方面进行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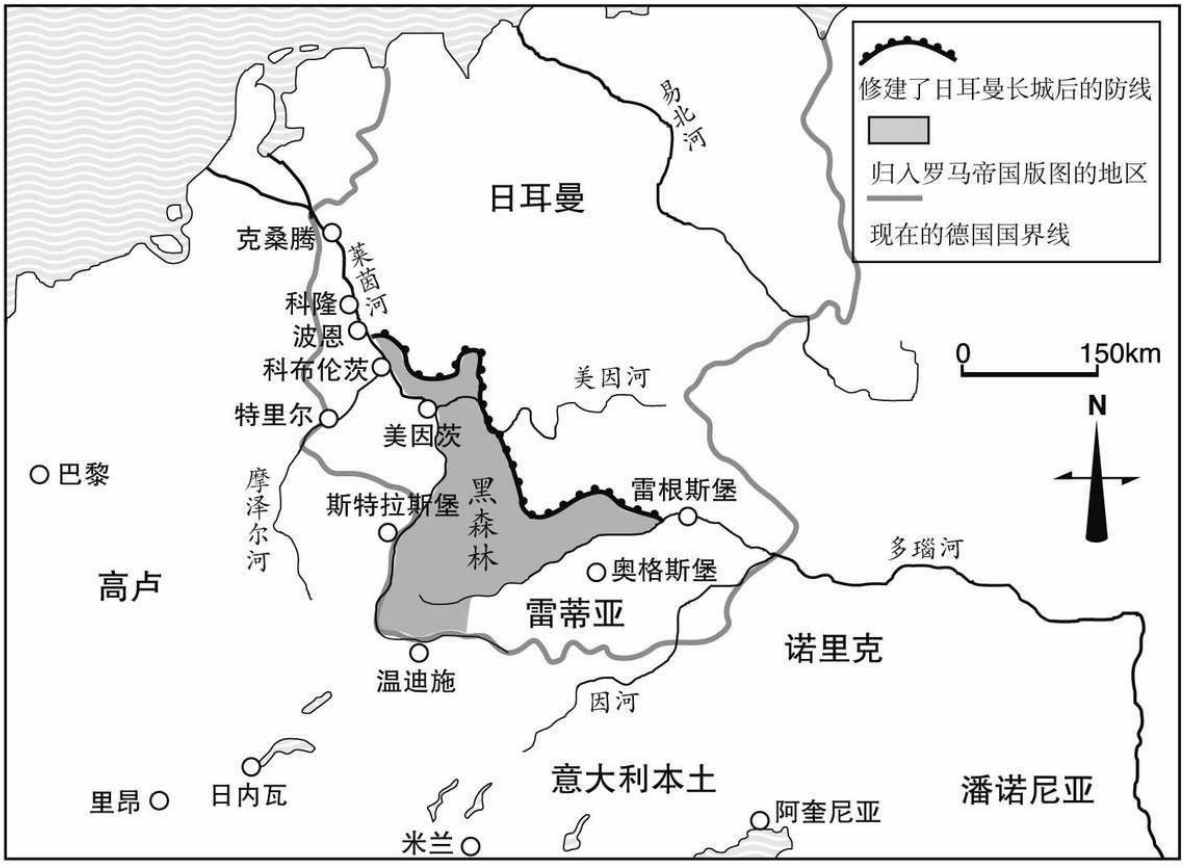
图密善在此施展了一个与他的年轻很不相符的老辣手段——提高军饷，但是规定提升的部分暂且交由军团的财务检察官保管，这些公积金在期满退伍时与退役金一并领取。拿到现代的日本来说有点像“公司储备金”，士兵们接受图密善这种处置方式的原因在于，与不服役到期满退伍就无法拿到的退役金相比，在期满退伍之前战死或负伤的士兵家属同样可以领取这笔公积金。在图密善以前的时代，司令官和军团长会给死去的士兵家属发放一些抚恤金，但是这只是长官们出于个人的意愿，并没有像退役金那样得到制度化。因此，有拿到钱的，也有很多没有拿到的。图密善所做的就是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予以制度化。

日耳曼长城

接下来将要介绍委派待遇改善后的军团兵修建而成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也可以翻译成“日耳曼边墙”。如果想知道修建它的必要性，只要看看地图就足够了。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上游的这片地带是防御上最薄弱的环节。河流的上游逐渐接近山岳地带，如果想在山岳地带通行的话，只有沿着河边走，并且，两条河接近水源地的地方在白天也是一片黑暗，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因此被称为“黑森林”（Schwarzwald）。罗马士兵在与敌军面对面的遭遇战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是生活在帝国北部防线对面的却是擅长利用未开拓的地势进行游击作战的日耳曼人。他们甚至公开宣称“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如果退到森林中，他们就会占据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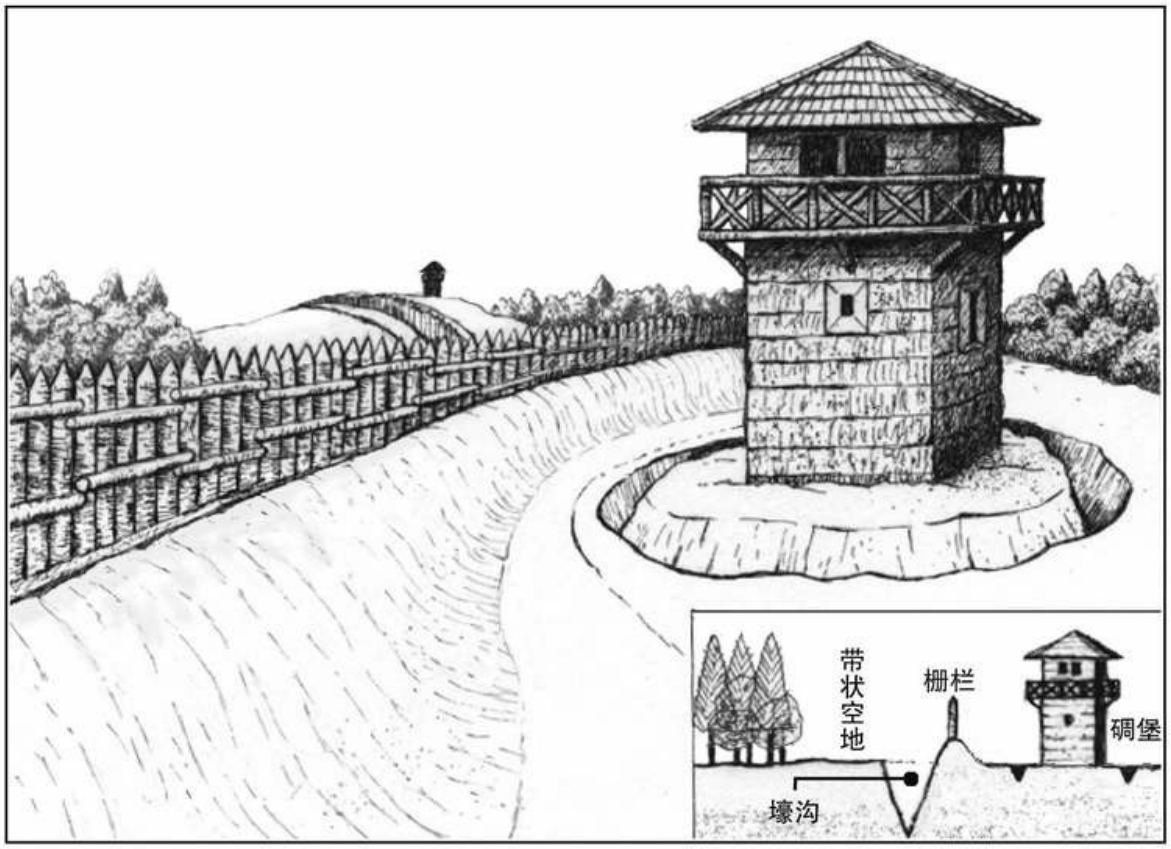
势。就连在不列颠的森林中取得胜利的恺撒也没有贸然与日耳曼人在森林中作战过。

这样一来，在某一地点让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连接起来，产生将包含两河的上游和黑森林地带的所有地区划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想法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这种想法似乎在提比略皇帝时代就已经初见雏形，在图密善时代以前有过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上作战经验的皇帝只有提比略一人。并且，据说图密善对于提比略留下的命令文书和政策立案文书持有的关心胜过文学和诗歌。提比略抛弃了奥古斯都“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中部地区，将其纳入罗马统治下”的想法，致力于将划分日耳曼的西部和中部的莱茵河打造成防线。提比略不可能没有发现将“黑森林”搁置不管的危险性。但是，提比略之后的皇帝们没有继承他在这个方面的事业，是因为提比略已经将莱茵河防线修筑得如铜墙铁壁一般，无须再担心日耳曼人的入侵了。不到危险关头就不考虑对策，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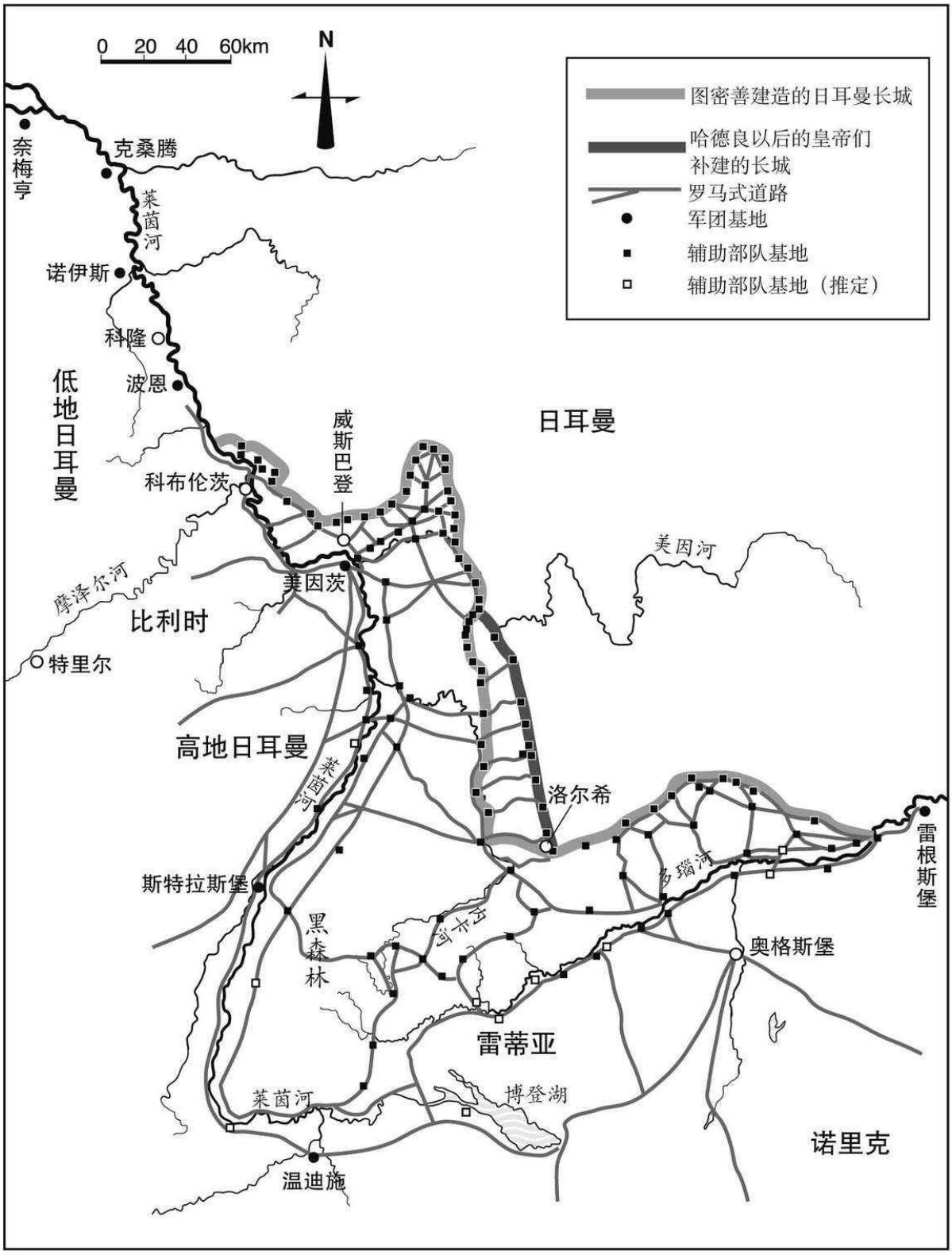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

但是，因为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如果不跨越历来的防线——莱茵河，攻入日耳曼人居住区域就无法成为现实，所以必须优先考虑通过和平方式或诉诸武力让生活在这里的日耳曼人屈服。这样势必会遭到元老院“发动无谓战争”的非难，但笔者认为图密善采取的是优先考虑必要性的政策。实际上，在他之后的皇帝们，比如图拉真和哈德良尤其认识到了这座城墙的重要性，都非常热衷于城墙的加固事业，图拉真皇帝还专心于多瑙河防线的强化，这些都是因为通过让日耳曼长城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不用再担心莱茵河防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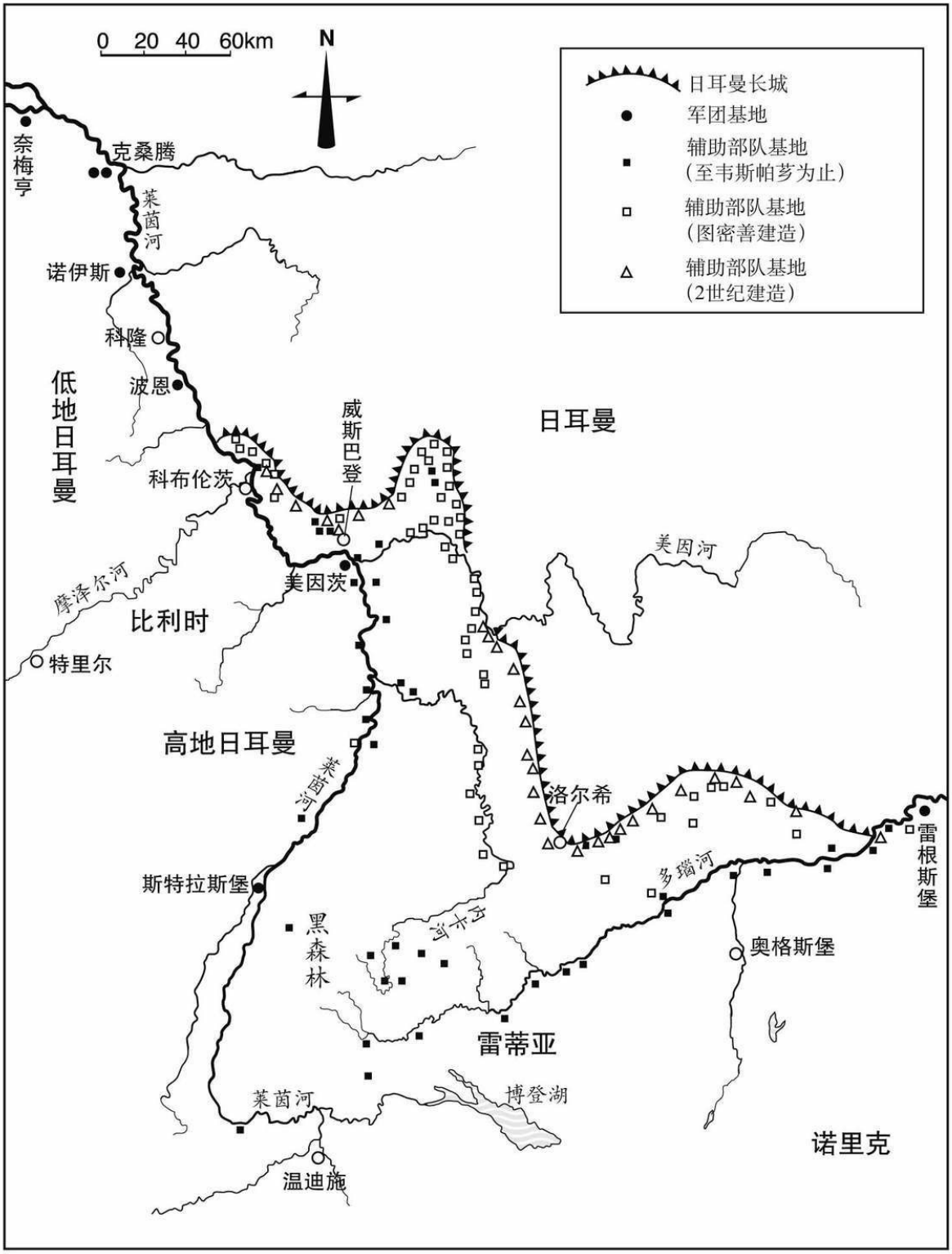


日耳曼长城（想象图，剖面图）



日耳曼长城（出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

日耳曼长城与其他地区的罗马防卫体系相同，也是由碉堡、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道路网络构成。



修建完成时的日耳曼长城（出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那么，具体来说日耳曼长城是以怎样的形式、在哪里修建的呢？

在现代能看到的罗马帝国时代的边境城墙只剩下划分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的一段了，这段哈德良皇帝修建的城墙被英国人称为“哈德良城墙”。各处重要据点由石墙联结在一起，可能人们以为这就是罗马时代的边境城墙了，但是这种形式的“Limes”（边境城墙）只能在古代的不列颠（现在的英国）看到。同样都是边境城墙，但从构造上来说不列颠和日耳曼的城墙已经有所区别，为应对来自沙漠的敌人而建造的幼发拉底和北非的防线则更为不同。

日耳曼长城每隔400—700米的距离修建一座边长40米的四方形碉堡，各碉堡之间的距离根据所处地势不同而有所出入。如果是能见度好的平地，距离就长一些，复杂的地形则短一些。各碉堡之间没有石造的墙壁联结，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结。即使只过一夜的宿营地，罗马军也会挖出深达3米的壕沟，在上面搭上木栅栏。考古学调查发现了很多石头，但是木头都已经腐烂，壕沟经过2000年的岁月也大多消失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罗马帝国时代很可能存在过“V”字形的壕沟连成一片的情况，其中可能联结有木栅栏。壕沟和木栅栏应该连接了很长一段距离。罗马军团附属的骑兵起用大量日耳曼人的做法始于尤里乌斯·恺撒，可见日耳曼这个民族的骑术自古就很有名。罗马人必须防备的也是武装来袭的日耳曼骑兵团，并不是以商业或其他的和平目的来到罗马帝国的单个日耳曼人。按“V”字形深度挖掘的壕沟和几米高的木栅栏具有延缓骑马军团攻击的效果。此外，碉堡的主要目的是监视，而不是据守在此迎击敌人。

一旦确认敌人来袭，碉堡会利用狼烟或火把向左右的碉堡和处于后方的辅助部队基地传达消息，另外也有用快马传达消息的时候。图密善为了方便和后方的部队基地以及各碉堡之间的联络，在各碉堡之间铺设了道路。如果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不能应付敌人的话，由罗马市民兵组成的军团就会出动。日耳曼长城的主要战斗军团的驻扎基地位于现

在德国的美因茨、现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以及现代的苏黎世和巴塞尔中间的温迪施这三个地方。

但是，美因茨距“Limes”很近，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和最前线的“Limes”之间横跨着黑森林地带，于是图密善铺设了横穿黑森林中央的罗马式大道。在白天也一片漆黑的森林中贯通罗马式大道的做法和在现代开通高速公路是一样的。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森林当中的道路是细长弯曲的，是由人类用脚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走出来的。罗马人却在这样的地方开通了大道。罗马式大道是用石头铺设的很平坦的道路，大约宽5米，两侧还有排水用的沟渠。并且出于防卫上的考虑，也是为了避免铺设好的石头松动，将道路两侧一带可能扎根到道路下面的树木统统砍倒了。罗马式的大道不只是铺设一条让人和马匹可以通过的大道就够了，在白天也一片漆黑的森林中的日耳曼人的据点——大森林中贯通罗马式的大道也含有将这片大森林罗马化的意思。

现代的黑森林中也有几条“Autobahn”（高速公路）通行，但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无论高卢人还是日耳曼人，看到“Autobahn”时想必也会为罗马人的技术水平瞠目结舌吧！凭借这条道路的建设，可以不用移动肩负监视高卢任务的斯特拉斯堡的军团基地，随时赶到最前线的“Limes”，这样一来也没有必要在现瑞士境内的温迪施设置军团基地了。

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地点位于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边界——相当于沿着莱茵河从现代的波恩和科布伦茨的中间前进至美因茨的北边，然后从那里向东跨越莱茵河。然后将内卡河划入防区内，向南至洛尔希，从那里向东以弧线形式到达雷根斯堡。在罗马时代称为“卡斯特拉·雷吉纳”的今天的雷根斯堡一带与多瑙河防线衔接，这就是日耳曼长城，全长542公里。这样一来，莱茵河与多瑙河这帝国北部的两大防线得以相互连接，意味着可以以更少的军事力量实现更高效的防御了。实际来说，之前需要8个军团防守的莱茵河防线现在只需要6个军团就足够

了。

这条日耳曼长城由四个要素组成——监视用的碉堡、辅助部队的基地、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驻扎的基地、负责彼此之间联络的道路网络。这样应该完全可以理解罗马的道路在所有方面都是罗马帝国的动脉了。

这条日耳曼长城完全修建结束是到了哈德良皇帝时代之后。纵然是名声再差的皇帝，或者是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皇帝开创的事业，只要认为有效，就会毫不犹豫地坚持或加强，这是罗马的领导者们值得称赞的一面。

日耳曼长城甚至被2000年后的军事专家们评为防卫体系的杰作，但它毕竟不是在无人之地修建的，所以在修建之前当然要先解决与居住在预定修建地区的日耳曼人之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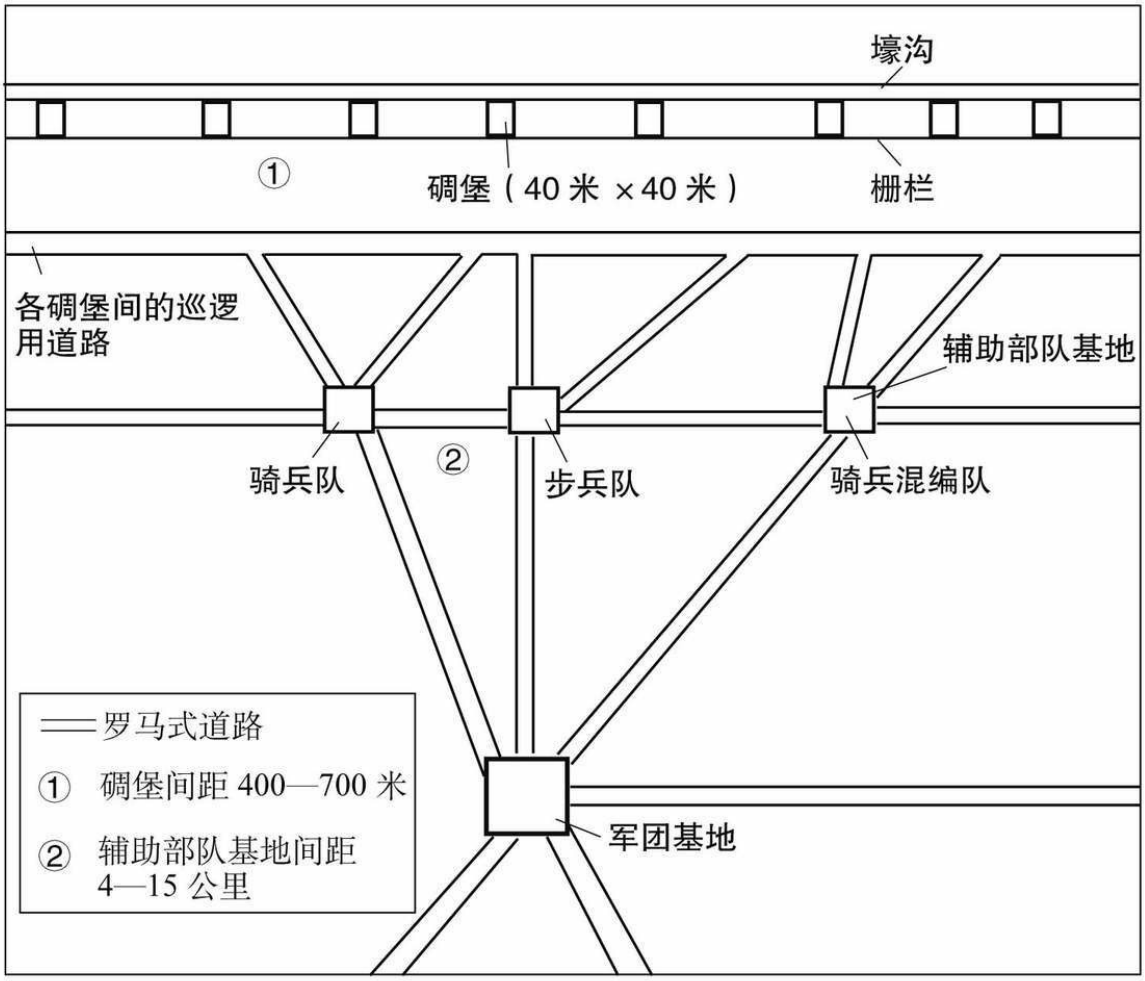
加利蒂人

从东注入莱茵河的支流中有一条叫做美因河，生活在这条河南岸的部族是可谓日耳曼民族中最弱小的马提亚奇人。提比略当年的战略是与可能建立友好关系的所有部族都交好，甚至包括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因此这个部族得以通过销售本地的特产与罗马人保持着交往。然而，这个马提亚奇人却处于在自己的栖息地北部至东部生活的强大的加利蒂人的控制下。加利蒂人是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部族，图密善的策略是首先将马提亚奇人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然后在马提亚奇人居住地的北边到东边修建“Limes”，最后确立针对加利蒂人的防卫体制。因此，日耳曼长城的修建便从美因河流域开始了。

既然“Limes”的修建是综合的防卫体制，在其修建的地区当然要优先考虑军事设施。边长40米的碉堡、方圆400米的辅助部队基地、在其间铺设得如天罗地网般的道路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与主要战斗力的军团

驻扎的基地联结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将林林总总的这些地加起来，需要的土地相当可观。虽然马提亚奇人没有被赶出居住区，可以留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但是在他们看来，等于被夺走了相当大面积的领地。然而图密善并不是无偿征用这些土地，作为征用这些军事上所需土地的交换，他提供了经济援助。也就是说他赎买了这些土地。马提亚奇人并不是战败者，所以罗马人不能以胜者的姿态沿袭将土地的一部分国有化的形式。并且马提亚奇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将异族纳入统治下的原则是能让他们觉得脱离同为日耳曼人的加利蒂人、加入罗马一方更为有利。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对马提亚奇人的同化就成功了。

然而，防卫体制的确立往往会引发对象部族的反感，加利蒂人不会对在自己眼皮底下修建“Limes”置若罔闻。没有公开宣布“Limes”的修建而是以对高卢地区进行国情调查的名义前往当地的图密善不得不转换为军队总指挥的角色，他强烈地意识到“Imperator”的身份，并渴望名副其实地率领军队取得战功。继承帝位两年后迎来的与加利蒂人的战争足以让这位32岁的皇帝热血沸腾了，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在战场上的实战经验。



日耳曼长城（略图）

尽管如此，罗马军还是战胜了加利蒂人，但赢得并不漂亮。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让对方心服口服的胜利。所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庆祝战胜加利蒂人的凯旋仪式和开始使用“Germanicus”这个尊称（意为“征服了日耳曼民族的人”）的图密善遭到了元老院的冷笑，一般公民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但是，凡事有坏也有好。如果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加利蒂人，图密善可能就会开始与日耳曼民族真正作战了，赢得不漂亮正好可以提醒他不要忘了主要的目标是修建日耳曼长城。第一阶段沿着内卡河修

建“Limes”的工程得以继续，第二阶段将内卡河划入防区内部的“Limes”修建完成对于负责工程的军团工程师们来说已经近在眼前了。到了五贤帝时代，整个修建工程才全部结束。只有身在首都、不知道最前线情况的人才不了解日耳曼长城的重要性，元老院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甚至将图密善对战败的加利蒂人采取宽大处置的做法也作为了批评的理由之一。

用“Limes”将莱茵河与多瑙河这两大河流的上游一带包围起来的话，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就可以成为一道铜墙铁壁。不过现在多瑙河一带的修建还没有完成，这个地区的防卫强化即军事国界化的工作不能再拖延了，因为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已经开始表露出团结的动向了。对于图密善来说下一个军事课题或者说对于罗马帝国整个防卫体制来说下一个课题就是这条多瑙河防线了。

在此用表格列举出相关各国对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现代欧洲的两大河流的称谓。

莱茵河（全长1320公里）	多瑙河（全长2858公里）
拉丁语——Rhenus	拉丁语——Danuvius
意大利语——Reno	意大利语——Danubio
法语——Rhin	德语——Donau
德语——Rhein	匈牙利语——Duna
荷兰语——Rijn	罗马尼亚语——Dunărea
	塞尔维亚语——Dunav
	保加利亚语——Dunav

内阁

罗马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历史事实。然而，强大的权力也意味着肩负更多的责任。图密善在继任帝位时踌躇满志，并且他很年轻，还是一个讨厌虚伪的人。他觉得皇帝和元老院共同统治帝国的做法是奥古斯都掩人耳目的伎俩，皇帝才是实际的统治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想法。图密善接下来经手的是对“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Concilium Principepium，笔者译为“内阁”）的改革。

《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讲过，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这个机关最初的成员为21人，之后不久增加为26人。具体来说包括“第一公民”即皇帝，任期一年的执政官1人，从公职人员中各选出1名代表担任相当于现代的部长的法务官、财务检察官、按察官、财务官，以及从元老院议员中抽签选出20名成员。皇帝兼任执政官的年份比较多，也有不设置财务官的年份，即使设置也大多由皇帝兼任，所以成员人数不是固定的。不过由这个“内阁”实际负责帝国的统治才是创设者奥古斯都的真实用意，这项制度在之后的100多年也一直不间断地保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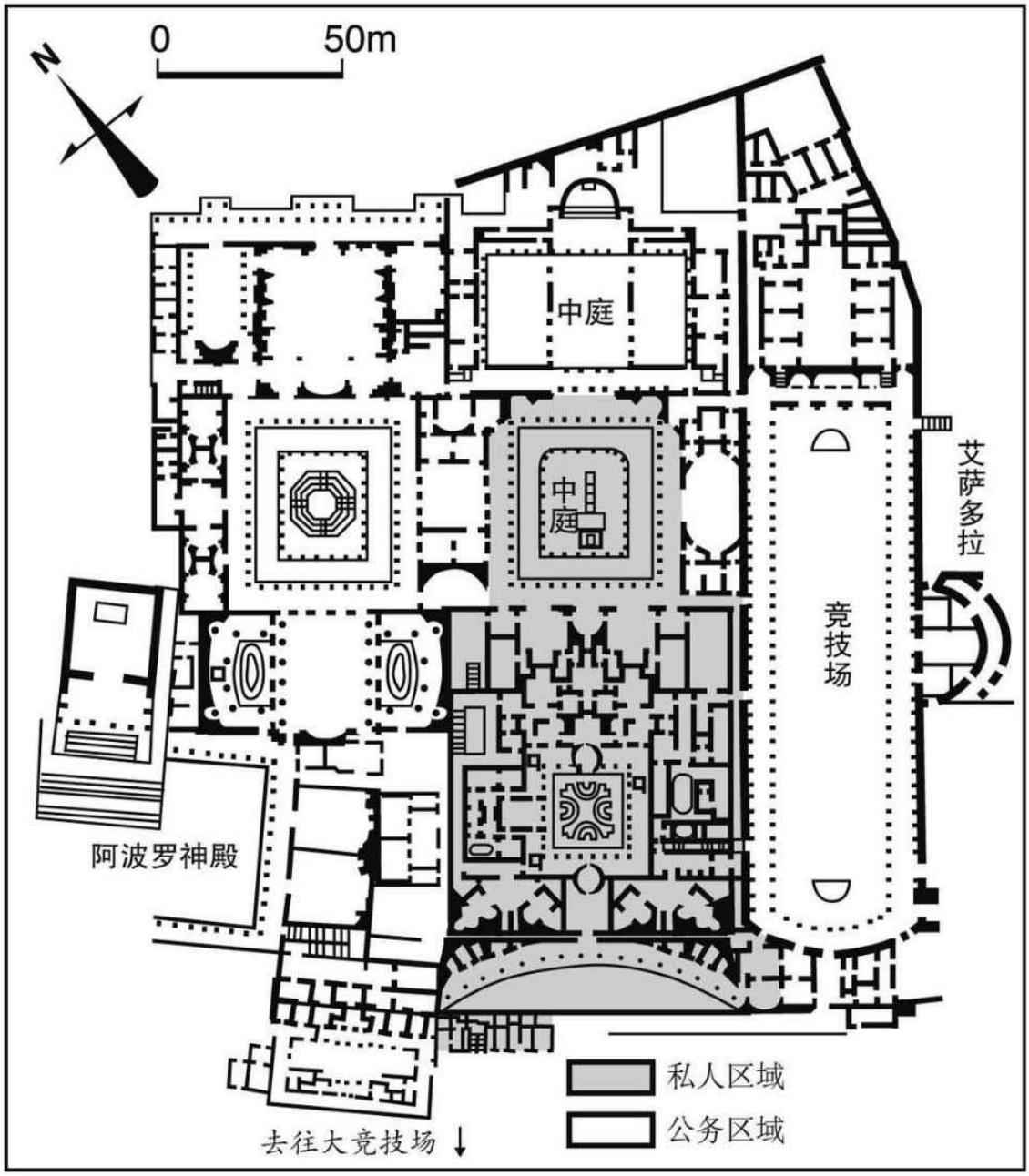
图密善实施的改革是减少原本属于元老院的20人的名额，代之以骑士阶级出身的人。

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是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阶级，共和政体时代的国政被元老院垄断，所以骑士阶级一直专心于经济活动，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属于“经济领域”的人。但是进入帝政时代后，政界向这些人敞开了大门。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以及其他皇帝都热衷于起用骑士阶级出身的人。骑士阶级在共和政体时代本来是骑上战马参与祖国国防事业的骑兵，因此而得名。在进入帝政时代之后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些人成为了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僚。皇帝需要培养这种为自己卖命、对抗元老院的帮手。

埃及长官、各行省的皇帝财务官、在现代相当于知事的首都行政长官、首都警察的长官、近卫军团的长官、上下水道的最高负责人、地方自治体的议会长等职位几乎都是骑士阶级出身的人。另外，随着帝政的推移，各军团的军团长、指挥数个军团的司令官也越来越多地由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担任。但是，起用这些人的皇帝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将这些骑士阶级出身的人培养成对抗元老院的势力，反而是让这些人进入元老院，来压制代代都是元老院阶级的反抗。

让这些人进入元老院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让他们当选财务检察官或护民官就可以了，因为只要担任这些官职就可以在元老院中自动获得议席。要不然就是由皇帝推荐业绩显赫的人，让元老院也不得不承认。骑士阶级出身的人也认为进入元老院是件荣耀的事情，一般都乐于接受。以韦斯帕芗为首，在本书登场的人物有一半以上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元老院议员。这意味着帝政让这些在共和政体时代被排除在国政之外的人充分得到了机会和地位。

但是，图密善是第一个削减元老院在“内阁”中的名额、让骑士阶级出身的人跻身元老院的人。在他看来，骑士阶级已经是担当帝国统治的一股有生力量了，所以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是一项能够让元老院赞成的改革。不过元老院的反抗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浮出水面，因为吸纳了骑士阶级出身者的“内阁”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笔者想象，图密善改革后的罗马帝国的“内阁”比起通常由国会议员担任大臣的日本内阁来，更像由总统任命的议会之外的人构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府。虽然不知道在图密善的“内阁”中元老院议员的20人名额有多大程度的减少，但是在元老院一方来看，骑士阶级出身者“入阁”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皇帝权力的滥用。



帕拉蒂尼山上的图密善宫殿

虽说如此，看起来只有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在图密善的手下得到重用，但是元老院议员并没有被完全无视。提比略皇帝开创的委员会方式已经作为帝政统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固定了下来，图密善把提比略

视为皇帝的模范典型，所以一旦有需要他会通过这种委员会方式立刻选出五名委员来解决问题。这种机关的委员被定为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图密善还实施了所谓的“官邸”组织化，具体做法是完善秘书官机制，协助皇帝集中处理大量的政务。关于各秘书官的负责领域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已经讲述过，其性质与最先采用这种机制的克劳狄乌斯皇帝时的机制相同。不过，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机制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口碑却很差，原因在于他起用了解放奴隶这种出身奴隶的人。图密善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他的秘书官全部都是从骑士阶级中选拔出来的。

不知道是为了让这个官邸的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想让皇宫变成更符合罗马皇帝身份的样子，图密善利用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半面积修建了宏伟的宫殿。这座宫殿完全不是私宅，而是将公共建筑与官邸合并在一起，其中还包括一座可以邀请市民们前来观看竞技比赛的真正的“体育场”。这座宫殿建成以后，以前还有其他人居住的帕拉蒂尼山成为了专供皇帝居住的地方。

司法

图密善似乎是一个性格严谨的人，他不仅是为了维护功能而尊重秩序，更是一个喜欢秩序的人，凡事若非有条不紊就难以放下心来。

这种性格如果是发挥在明确规定剧场或竞技场前方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的座次上面，完全可以让人付之一笑，然而若是用在严格执法方面，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胆寒。

罗马从建国时开始就存在着负责保卫圣火的女祭司组织，她们在30年的任期内负有保持处女之身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就要遭受被活埋的处罚。这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女人住在古罗马广场东南边的一个地方。

尽管并非终身禁止结婚，但这些女人从小就要成为女祭司，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妙龄阶段接触不到男人。虽说这些女人并非完全没有曝出过风流韵事，但过去的皇帝从未严格实施过这项自古以来的法律，图密善却不同。并且与男人有染的是统率众女祭司的女祭司长，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按照自古以来的法律，女祭司长被处以活埋之刑，和她有染的男人也在公众面前被鞭打致死。

但是，尊重秩序的做法在很多时候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好的结果。以法制化的形式严禁未成年人卖淫，并对唆使卖淫的人处以严厉惩罚的做法始于图密善。对于罗马人来说，未成年指的是17岁以下。

图密善最讨厌的是行省统治负责人的渎职。罗马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产生了一种允许行省人民控告任期结束后的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制度。行省总督全部都是元老院议员，作为行省人民的代理来控告前总督的人一般也是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的人。被称为“Orator”的罗马时代的律师们有时会担任原告律师，有时也会为被告辩护。按照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规定，他们的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并一直持续了下来。兼任律师的史学家塔西佗的经济状况不明，不过鉴于他的身份是资产下限为100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议员，应该属于富裕的阶级。至于他的朋友小普林尼，本来就出生于富有家庭，并且继承了在维苏威火山喷发中死去的大普林尼的遗产，所以肯定也是富人。在他们看来，1万塞斯特斯的律师费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数目。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接受“Orator”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庭上进行控告或辩护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职责，皇帝们应该也有相同的想法。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经常出席这种关乎行省统治成果的法庭审判，图密善也沿袭了这种方法。就连只对皇帝的花边新闻感兴趣的苏维托尼乌斯也在著作中对图密善为行省统治的公正所作出的努力赞不绝口。行省统治的好坏是足以左右整个帝国统治的重要问题，在罗马帝国中，不论皇帝还是厌恶帝政的塔西佗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相同的认识。

笔者看到公元4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间，也就是康斯坦丁大帝时代首都罗马的地图时，首先感到的是400年前修建的公共建筑还保留着建成时的面貌。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历代皇帝都注意经常修复维护。比如阿皮亚大道在公元300年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第二个感触是“世界的首都”罗马居然没有本应存在的大规模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这个原因笔者已经阐述了很多次，并且提出过一个假说，即这些设施都是罗马式的“民间活动”的结果。

但是，这张地图上还缺少一种罗马帝国始终没有过的建筑，就是管理广大的帝国所不可缺少的行政官僚聚集的区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行政中心，这在“世界的首都”罗马的历史上不曾有过。

也许可以说罗马帝国和现代相比官僚体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罗马帝国是人久居的地方，并且统治着比后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广阔的地域。从各种史实来推测，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这样来解释：

不存在行政中心意味着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如果对这个问题寻根问底，就产生了另外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也可以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呢？学者们的研究、特别是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地方自治

罗马人从领土只有意大利半岛的时代开始就已经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立的制度了。那个时代的“中央”指的是胜者罗马，“地方”指的是在和罗马的斗争中失败的意大利境内的其他部族以及希腊和伊特鲁里亚裔的各城市，从那时开始罗马就已经将“中央”应该负责的事情和可以委托给“地方”的事情分开了。这种倾向在进入拥有广大领土的帝政时代之后，以宗主国和行省的形式被继承了下来。对于现实的罗马人来说，

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才继承了下来，而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维持大帝国的统治。从结果来说，罗马帝国不是仅靠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而是通过巧妙地同时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构筑了能够发挥两者优势的体制。

简单来说，“中央”的工作是安全保障、税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被尽可能地委托从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罗马人称为“地方自治体”（Municipia）的城市肯定都有地方议会，议员通过选举被选出。从庞贝遗迹中留下的涂鸦可以看出，比起市民集会变得有名无实已久的首都罗马，地方的选举更为盛行。

步入帝政以后，不仅宗主国意大利，行省也出现了很多“地方自治体”，但是如果只承认自治却没有财源的话，也无法行使自治的权力。为了让地方分权充分发挥效力，财源的确保不可或缺。这个时代还不存在地方税这样的税种。

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缺乏这方面的考虑大概是因为创建帝政是他优先的课题，但是肩负确立帝政任务的第二代皇帝提比略以及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不仅限于宗主国，同时在行省也努力确保各地方自治体的财源。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进了一步。所以地方财源政策并不像日耳曼长城那样，由图密善着手、后世的皇帝们继续完成的。但图密善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热心，也就是说从这个时代起，碑文上就很清楚地开始记载地方自治体的财源状况。

从碑文可知，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地方自治体所有的土地、事务所和店铺的租金。具体说来，比方说如果想在城镇中心的“广场”的圆柱回廊内开店的话，就要向作为地主的地方自治体缴纳租金。此外还可以得到公共浴场的洗浴费和水道使用费等收入。罗马时代的“高速公路”不征收使用费，不过水道是要征收使用费的。

但是，不仅没有地方税，公共浴场的洗浴费也属于低廉的政治价

格，即便是水道，只要使用城镇各地随处可见的水就可以免交使用费。只对将水道引入自家的人征收费用根本就不足以成为自治体的财源。也许会让人怀疑地方自治体是如何维持下去的，但是请不要忘了，地方自治体的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个人的出资或自发的捐赠。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捐赠资金是家境富裕者的职责，同时也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街道和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的工作，但这些设施的维护修理是地方的事情。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很多炫耀自己捐资维修工程的碑文。

整个罗马帝国可谓是由共同体和个人一起管理的，它作为国家可能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但有意思的是它的体制却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公共事业（二）

这是一个重视个人作为的时代，所以理所当然，罗马皇帝的工作中少不了公共设施的建设事业，罗马皇帝就好像身兼建设省大臣的职位一样。图密善在这个方面的业绩远远超过了父亲和哥哥。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首都罗马内的公共建筑之外，发掘出的碑文中可以确认是由图密善修建的工程达到了相当大的数目。如果考虑到一些碑文被“记录抹杀刑”破坏，实际的数目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以下试列举已知的工程：

罗马近郊的蒂沃利、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西西里岛西部的港湾城市也是与北非迦太基的联络港马尔萨拉等各处城市的水道工程。

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埃及负责宗主国意大利所需小麦的三分之一供给量。

位于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的全面修复工程。图密善与父亲和哥

哥不同，是希腊文化的崇尚者。

铺设时间比阿皮亚大道还要早的联结首都罗马和加普亚的拉蒂纳大道的全线修复。从常识来考虑，从首都罗马到意大利南部的道路同时也是通往帝国东方的联络线路，只有一条阿皮亚大道肯定不够，铺设多条线路是理所当然的。

铺设了虽然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但在整个罗马时代依然被冠以建设者名字的图密善竞技场（现在的纳沃纳广场）和图密善大道。从罗马南下的阿皮亚大道从今天的锡纽萨进入内陆可以到达加普亚，而图密善铺设的是从锡纽萨沿海岸南下，经商港波佐利到达那不勒斯的道路。这样一来经陆路到达军港米塞诺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曾有人留下诗歌咏叹，以往在黎明从罗马出发，日落时候才能到达，现在只用两个小时。此外还铺设了从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两条干线交会的加普亚通往波佐利和那不勒斯的两条街道，但根据目前的史料无法得知是图密善修建的，还是在他去世两年后成为皇帝的图拉真修建的。无论怎样，罗马道路不是单纯的道路，还包含着政治策略在内。

环绕撒丁岛的道路网络的建设。在撒丁岛铺设道路网络将其罗马化，在罗马人看来是一种文明化的措施，与在白天依然阴暗的日耳曼森林中铺设罗马式的道路具有相似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再允许长期认为掠夺不是罪行的当地牧羊人继续任意妄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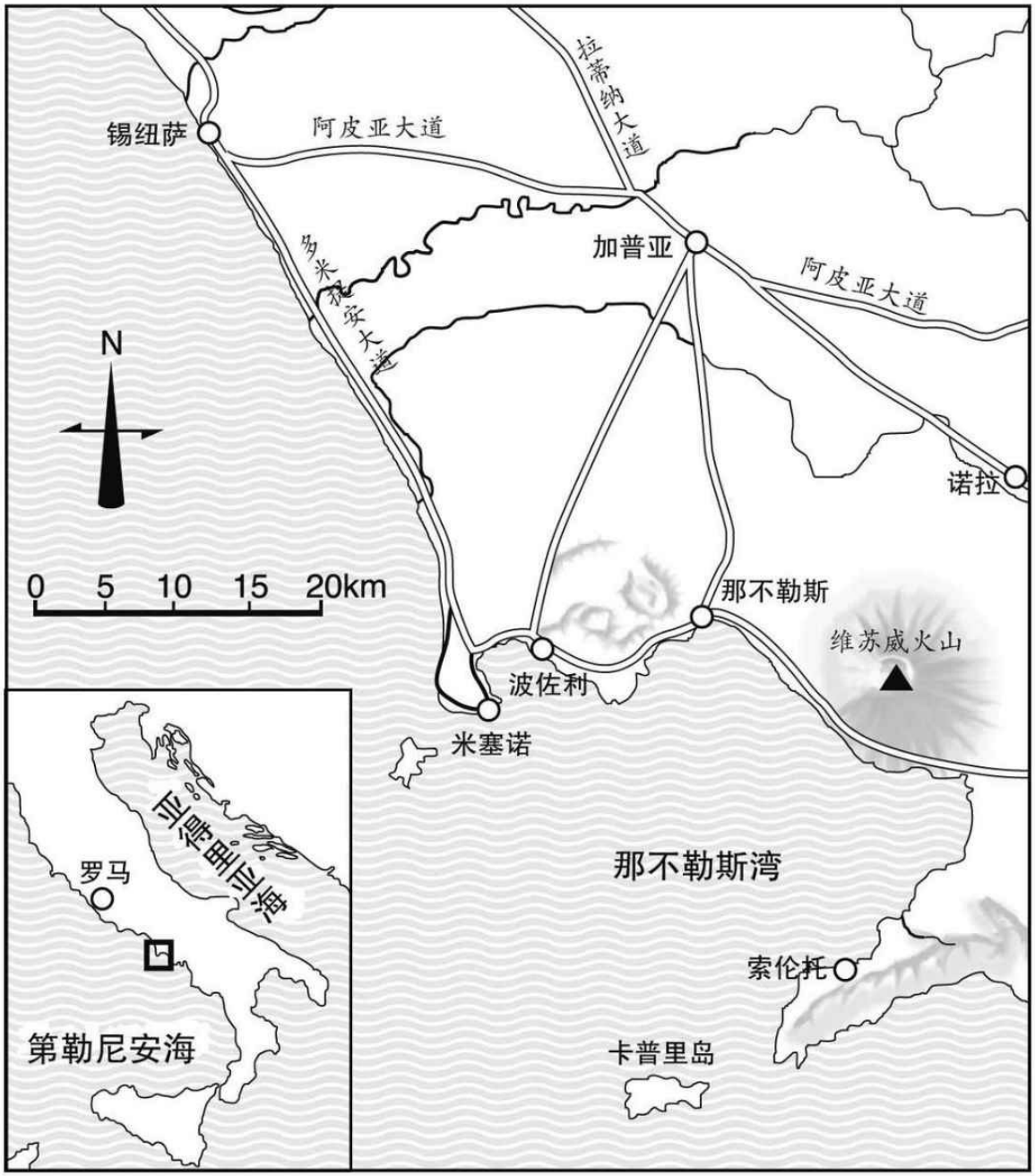
全面修复奥古斯都在西班牙贝提卡行省铺设的奥古斯塔大道，完成时间是公元90年。

修复联结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驻地迦太基和努米底亚行省的泰贝斯提斯（现在的泰贝萨）军团基地的道路。

铺设联结多瑙河下游的今塞尔维亚、罗马帝国时代的米西亚行省的2个军团基地的道路，完成时间是公元92年。值得一提的是，多瑙河下

游全域此前被一并划入米西亚行省，图密善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将其一分为二。将一个行省分为两个行省，行省总督也需要安排两名。位于前线的行省总督的统治工作也就等于国防，因此由皇帝任命的武官担任，并被赋予两个军团以上的指挥权。皇帝图密善非常热衷这一带最前线的街道网络整备工作，大概是因为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史学家蒙森将罗马帝国的国境分为军事国境和政治国境。军事国境指的是在河流沿岸建设军团基地，或是在无法倚仗河流这种天然屏障的地方建设“Limes”，明确告诉敌人，如果入侵的话这些防线将立刻进行还击。除了具有这种牵制作用之外，也可以节省投入的兵力。另一方面，政治国界指的是罗马帝国长年视为的国界，由于之前没有特别的必要，所以虽然向军事国界化的方向发展，却依然没有完成防线的建设。



加普亚周边的道路网络

莱茵河的军事国界化是提比略完成的，图密善则通过建设日耳曼长城，实现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地带的军事国界化。实现多瑙河军事国界化最终阶段的工作也是从图密善开始的，不过他只是开了个头，多瑙

河防线的军事国界化经图拉真直到哈德良皇帝时代才完成。

举办夜间竞赛

但是，图密善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大事”，他也是一个深知“小事”重要性的皇帝。这段经历被后世的人们概括为一句“面包与马戏”而大加批判，但是认为有权者都具备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只是一种对人性的幻想。如果这种幻想能够成为现实的话，原本也就不需要什么政治宣传了。总之，不用担心饿死，并且还能免费观赏竞技比赛，对于市民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并且图密善还是第一个举办“夜间竞赛”的皇帝。

灯火的价格昂贵，所以市民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他们看来没有比能够在容纳5万人的圆形竞技场中借着通明的灯火观看夜间比赛更令人神往的事情了。皇帝和富裕人家点着灯吃晚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一般市民只能是在太阳落山前吃晚饭，这种公元前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状态到了公元后也没有任何变化。罗马的夜空并非一片漆黑，尤其在夏天更是带有美丽的藏青色，令人叹为观止。夜间竞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举行的。

虽说如此，出资举办夜间竞赛肯定会需要一大笔开支，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记载，国家举办夜间竞赛也只限于在重要的祭祀节日时。这种比赛按照惯例一般由皇帝提供饮食，所以在观战期间无须自己购买食品和酒。

但是，又要建设“Limes”，又要投入资金完善基础设施，还要和蛮族交战，再举办夜间竞赛的话甚至让人担心国家财政会不会入不敷出，然而有意思的是罗马帝国依然保持了财政的健全。继承图密善帝位的涅尔瓦以及之后的图拉真也没有为国家财政的重建费心思。因为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共同举行的国情调查（Census）使得“不提高税率，而是

保证应征收部分的财源”的税制得以推行，从而促进了国税的增收。韦斯帕芗被同时代的人嘲讽为吝啬鬼，却被后世的研究者评选为最理想的国税厅长官，正因为继承了他的位置，儿子图密善才得以广泛开展大规模的事业。充分发挥功能且公正的税制是仁政的根本，将其与安全保障和社会资本的充实一并视为“中央”工作的罗马人正可谓是熟谙为政之道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人才”。凡夫俗子随处可见，但“政治人才”并不是那么多，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人的宿命就是在完成一件事情后必然会面临由此产生的新问题，34岁的图密善将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就是多瑙河防线的强化，也可以说是多瑙河的军事国界化。

不列颠

在讲述公元85年开始的与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之间的战争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征服不列颠的战争，虽然二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如果罗马想要不仅征服不列颠即现代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还要执著于完全征服喀里多尼亚即今天的苏格兰地区的话，多瑙河防线的确立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最先着手不列颠征服战争的是尤里乌斯·恺撒，在其登陆不列颠的90多年后，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再次发动了战争。所以真正对不列颠发起征服战争应该是从公元43年开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图密善的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已经完全被征服，只剩下对苏格兰的征服了。位于科尔切斯特的不列颠行省的首府也转移到了罗马人称之为“伦底纽姆”的伦敦。不过，单是罗马人所说的不列颠，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征服战争就耗费了40年时间。想到面积相当于不列颠3倍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只经历了8年，不免让人觉得这场战争的进度过于缓慢

了，笔者认为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与宗主国意大利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出于确立安全保障体制的需要，必须尽可能早一些结束。不列颠和罗马之间只隔着一道海峡，没有必须尽早解决的必要性。

第二，罗马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威胁高卢的手段，在不列颠却没有其他的办法。

当初恺撒迫使高卢的领导者们在罗马式胜者对败者的同化政策或日耳曼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明确分开的政策之间两者选一。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的威胁对于高卢人来说是胜于一场噩梦的现实。高卢人在恺撒时代选择了罗马，并且在120年后的“高卢帝国”骚动时也选择了罗马而不是日耳曼。与高卢人不同，不列颠人却没有威胁自己的外敌存在。不列颠和日耳曼之间隔着北海，居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也不会成为威胁。8年和40年的差别并不代表不列颠人比高卢人更强。

第三个理由是，发动称霸战争的人对“称霸”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在不列颠称霸战争上指的就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想法不同。

恺撒首先以武力征服高卢全境，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进行了笔者在《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命名为“战后处理”的高卢重组工作，早早将高卢全境变为了罗马的行省。具体来说，保留所有既有的部族，将自己的家族名“尤里乌斯”和罗马公民权赐予部族长们，让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成员。如果是强大部族的部族长还可以在元老院获得议席，这成为了招致保守派的西塞罗和布鲁图反对的原因之一。

另外，克劳狄乌斯则采用了逐步扩大罗马霸权的称霸方式。第一是武力征服，第二是重组，与此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与恺撒相同。但是恺撒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克劳狄乌斯却以地方为规模推

进，逐步扩大建设范围。不管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更合适，这种政略（Strategia）的差异只能归结为当事人性格的差异。

第四个理由是罗马人对于高卢和不列颠的看法不同。

对于第一个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人恺撒来说，不列颠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高卢的地盘而需要事先打倒的对手。在即将成功征服高卢时对不列颠施以一些打击就足可以避免不想屈服罗马的高卢人和不列颠人联合起来，所以没有深入不列颠。

然而，如果恺撒没有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从他的政治策略来看，可能会推进对不列颠的完全征服战争。如果真的是这样，征服战争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恺撒式的战后处理也会在不列颠施行。但是这些都是假设，从假设来说，图密善的时代高卢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占据元老院600名议员中的40个席位，而不列颠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只停留在0—1人，这种倾向以后也没有什么变化。从罗马元老院的性质来看，成为元老院议员就意味着要负担起整个帝国的政治责任。想到后来在研究罗马的领域中最热心的英国人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但是罗马时代的英国确实比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偏僻的色彩。只要看看元老院议员出生地的情况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差距。同样是被罗马征服，比起克劳狄乌斯，不如让恺撒征服更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这种附带“chester”这个词尾的地名来自拉丁语表示“要塞”意思的“Castrum”，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话题回到图密善时代的不列颠，就算进展再缓慢也毕竟花了40年，当时的罗马军组织最完善，所以也有一些成果。克劳狄乌斯时代的军团基地在科尔切斯特，但到了图密善时代将常驻不列颠的3个军团设置在了加的夫、切斯特和约克。并且从韦斯帕芗任用的阿格里科拉就任总督的公元78年到84年的7年间，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深入到了他们称之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腹地。他们不仅进攻至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分界线，罗马舰队甚至航行到了苏格兰北部。难怪当时的阿格里科拉的女婿

塔西佗深信不列颠和喀里多尼亚的称霸战争就要结束了。

但是，后世的欧洲人承认塔西佗是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经常引用塔西佗的一段话来抨击罗马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是《阿格里科拉》当中的一段文章，文中进行演讲的“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应该是塔西佗虚构出来用以表达自己想法的不列颠人。

> 罗马是一个不值得屈服或服从的民族，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陆地上已经没有让他们继续挥霍的地方了，所以现在他们又将手伸向了大海。敌人富裕会勾起他们的贪婪，敌人贫穷就会助长他们的自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满足罗马人的饥渴。他们假借帝国之名到处烧杀抢掠，他们还说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他们正在将世界变为一片沙漠。

塔西佗被视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虽然是征服者一方的人，但并没有忘记对自己国家的批判。另外，从被罗马军进攻的一方来看，肯定也会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己无关。正如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介绍过长期反抗罗马的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在此又提到了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的言论，所以虽然不一定比得上塔西佗，但笔者也不是对良心毫不在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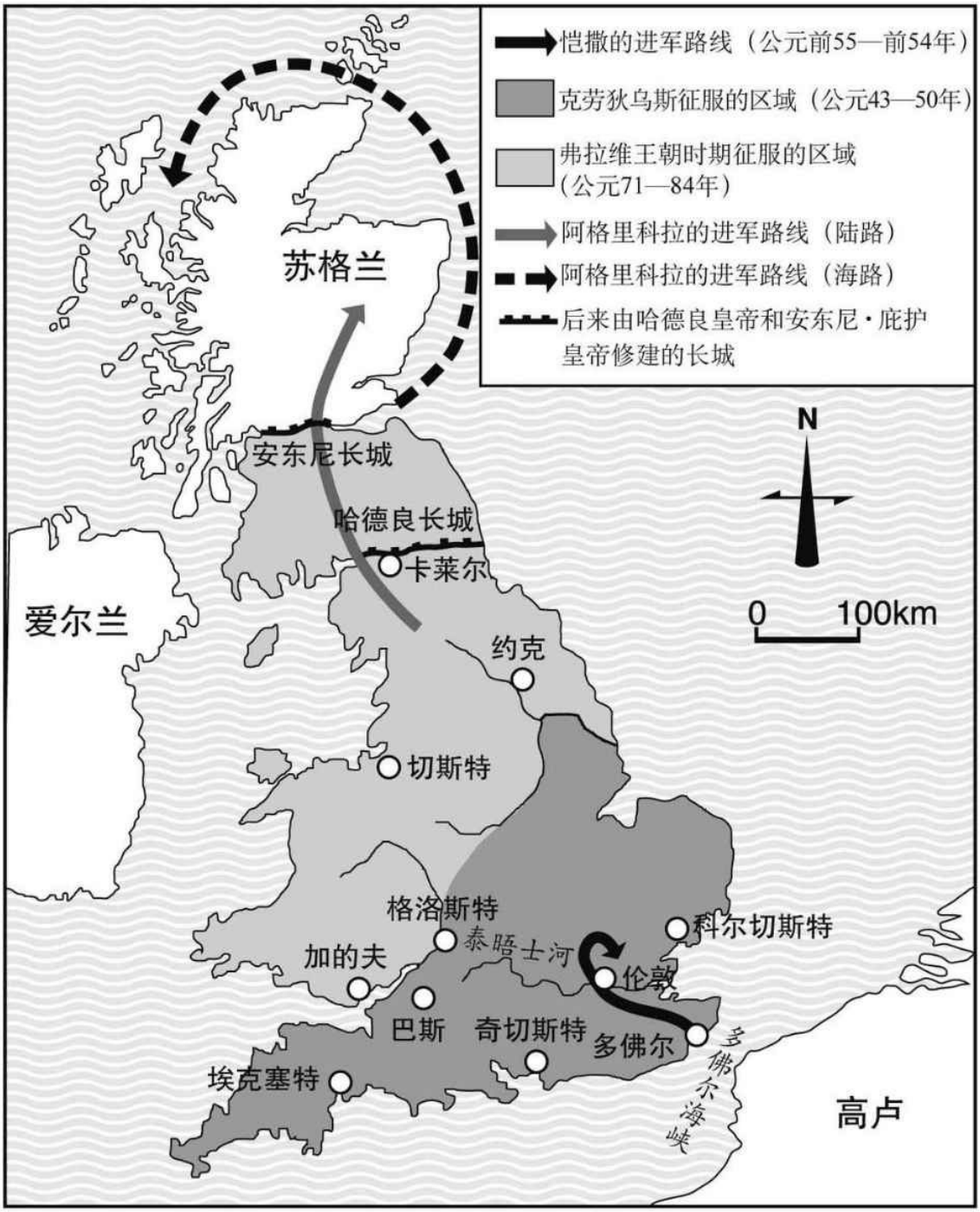
然而，在其他地方读到塔西佗吐露的别的言论后，笔者又感到身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此顺便介绍一下。这是题为《日耳曼》的著作中的一段话，这部作品如其名称所示，是一部介绍罗马人的宿敌日耳曼人的著作。首先在介绍完共和政体时代的情况后，塔西佗这样写道：

> 从那个时代到图拉真皇帝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竟然已经过去了210年。战胜日耳曼人到底需要多少年！在此期间付出了多

大牺牲！

萨莫奈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就连帕提亚人都没有让我们如此担心过。可是遇到日耳曼人却……

只列举一下败给日耳曼人的我方执政官就有这么多：卡尔波（公元前113年）、卡西乌斯（公元前107年）、斯卡乌尔斯和卡比奥以及马略（公元前105年）。在这些败仗中罗马失去了5个执政官军团（相当于10个军团）。



阿格里科拉征服苏格兰的进军路线

奥古斯都皇帝时代在条顿堡森林发生的瓦鲁斯和3个军团的全军覆没事件（公元9年）是最大的一次悲剧，但即使在我们获胜的战斗中罗马一方的牺牲也不少。马略在意大利境内的反击（公元前101

年）、神君恺撒在高卢的作战（公元前58年）以及从（公元前12年）杜路苏斯开始，到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攻入敌方日耳曼领地的战斗，无一不是经过一番激战才获得胜利。除了后来卡利古拉的愚蠢行为之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公元69年）巴达维人又趁罗马混乱之机发动叛乱，招致了高卢骚乱。这一次日耳曼人破坏并掠夺了罗马军的军团基地。但所幸的是这场骚乱很快就平息了，到了现在（公元100年之后），罗马军终于变得无往不胜了，但还是没有完全征服日耳曼民族。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根据对手的不同也会变得好战，想来让人觉得好笑，即使对于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人能够持宽容态度，但是对于无法完全征服的日耳曼人，经常批判自己国家的塔西佗也不得不把爱国放在前头了。并且在公元80年代，皇帝图密善的头脑中所一直在意的也是日耳曼问题。

达西亚战争

公元84年冬天，图密善将7年以来一手负责征服不列颠的总督阿格里科拉召回了意大利本土。塔西佗在《同时代史》的开头不情愿地写道“不列颠成功征服之后却被放弃了”，就是因为阿格里科拉的回国使得罗马对苏格兰的征服战争中断了。不过罗马虽然放弃了喀里多尼亚，其实并没有放弃不列颠。

但是图密善为何在这个时候放弃对苏格兰的征服呢？

那个时期的图密善确实需要更多的军团来强化多瑙河的防线，在此之前生活在北岸的几个日耳曼裔部族就经常在多瑙河下游频繁活动。将不列颠的军团换防到多瑙河的话就无法继续进行对苏格兰的征服。更换指挥官是改变战役进行方式的最有效方法，只要派遣防守型的指挥官去

代替善于进攻的阿格里科拉就可以了。

从图密善之后的皇帝们特别是哈德良皇帝对不列颠的政策来看，图密善在公元84年采取的政治策略绝不能算一个错误。然而，将攻势转为守势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批判。以前提比略放弃奥古斯都进攻日耳曼中央地区并划易北河为国界的计划，而撤退到了莱茵河的做法就曾遭到塔西佗的大肆批判。

因此笔者认为图密善所犯的错误不是放弃对喀里多尼亚的征服，而在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勇将阿格里科拉的才能。那个时期的罗马在多瑙河战线最需要攻击型的司令官，如果图密善将回国的阿格里科拉派到多瑙河前线，任命他担任与达契亚人战争的前线指挥官，多瑙河战线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十分推崇阿格里科拉的塔西佗对图密善的看法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强硬了。

虽然都说图密善曾仿效提比略治国，但提比略除了军事才能之外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才能和经验不仅可以发挥到战场的指挥中，也可以在任用部下的将领时发挥很大作用。接下来将要讲述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是最能够体现出图密善在这个方面能力欠缺的例子。

只要有人想以海盗行为代替通商，通过掠夺而不是农业和手工业来获取生活来源的话，防卫的必要性就不会消失。防卫的结果以武力决胜负的情况明显多于和谈是因为双方的“想法”（Concept）或价值观不同。罗马帝国形成了独特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帝国内的各民族能够拥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对于与自己“想法”不同的外部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没有省过心。学校讲授的罗马史告诉我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是由于那个时期发生了蛮族入侵，但这完全是误解。纵览罗马在共和政体和帝政时期的全部历史，可以说时刻伴随着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能够从首都罗马遭到入侵的公元前390年一直存活到罗马再次被蛮族蹂躏的公元410年这长达800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依靠它完善的国防力量。实际上，即使在公元5世纪蛮族入侵时，东罗马帝国也逃过了灭亡的命

运，因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它的防卫系统的作用。入侵的蛮族也避开了东罗马帝国，而是去攻击防卫系统无法发挥功能的西罗马帝国。

既然可以说民族间的冲突起因于“想法”的不同，不想成为失败者的话就不能忘记努力加强国防能力。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粮食”的保障是在保障了“安全”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的目标。对皇帝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军事上的业绩，英语“Emperor”来自意为军事最高负责人的拉丁语“Imperator”，这是皇帝无法避免的宿命。

公元85年临近冬天时，罗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生活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的达契亚人大举渡河，攻入了罗马领土的南岸。不过本来蛮族的入侵虽是新闻，却也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这次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紧接着快马来报的急使传达的消息是，前往迎击的军团大败而归，指挥军团的米西亚行省总督萨比努斯战死。

图密善决定亲自上前线，并将在次年春天开始的罗马军的反攻中担任前线总指挥。他打算带上近卫军团的长官弗斯库斯作为实战指挥官。弗斯库斯的经历无从查证，但是近卫军团与防卫边境的军团不同，可以说是没有前线服役经验的部队。这名叫做弗斯库斯的长官穿的倒是华丽的近卫军团长官军装，图密善将实战的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人只能说是他的错误。与蛮族交战的特点在于他们没有什么战略战术，而是一股脑地大举入侵，很难应付。这个道理跟正规军不善于和游击队作战是一样的。其实应该任用曾经和喀里多尼亚的游击队交战长达6年的阿格里科拉。图密善并不讨厌阿格里科拉这个人，他甚至给予了阿格里科拉充分的荣誉，对其尊敬有加，很难理解他为何没有任用阿格里科拉。

不过，公元86年与达契亚人的第一场战役还是以罗马的胜利告终。罗马一方动员了5个军团的主要战斗力以及数量相当的辅助兵，还有近卫军团的一半兵力也参战了，总兵力超过6万人。在投入了大量兵力后，罗马成功地将达契亚人赶回了多瑙河北岸。

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提出了结束战争和缔结和平条约的请求，遭到拒绝。因为罗马已经制定了第二战的目标——进攻多瑙河北岸，捣毁达契亚人的根据地。

图密善对第一战的胜利感到很满意，他让弗斯库斯全权负责第二战，自己返回了首都罗马，因为皇帝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过就算图密善继续留在前线，第二战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既然他能提出修建日耳曼长城，在战略上应该还算有敏锐的感觉，但是实际的战役通常会接连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只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挽救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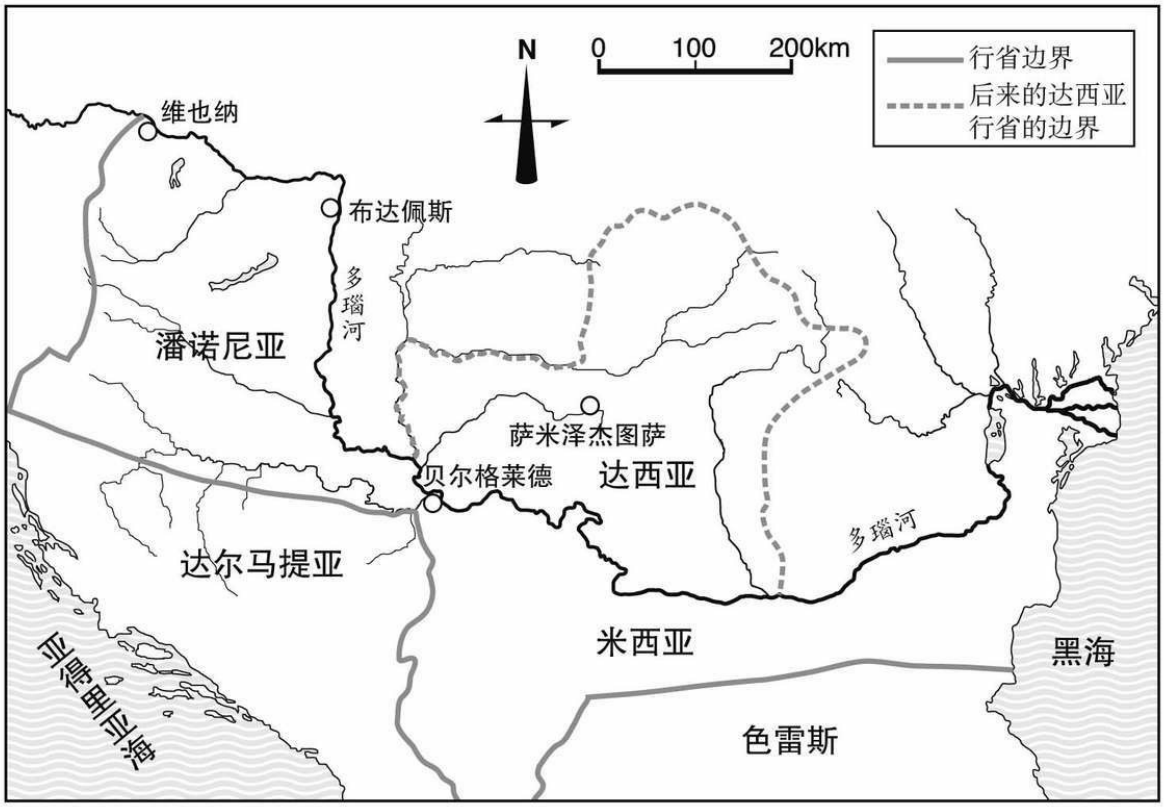
图密善接到的第二战结果是一场大败，一个军团和近卫军团全军覆没，担任总指挥的弗斯库斯战死，军团的银鹫旗也被敌人抢走，可谓脸面丢尽。这场对达西亚的战役是在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到罗马尼亚一带进行的。失败的地点并不是在达契亚人的根据地萨米泽杰图萨，而是在渡过多瑙河开始北上的地方遭到了前后左右的夹击。

这场失败对于图密善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毕竟是罗马人，遭到败北时罗马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雪耻。

雪耻之战花费了一年时间准备。罗马人很少会将在之前的战役失败的军队调往后方，换用新的兵力作战，而是会让失败的士兵们再次投入战场。“雪耻”这种形容用于罗马军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司令官毕竟战死了，需要选任接替者。这次的选择也变得慎重了，图密善任命的是尤里阿努斯。他曾经担任过常驻米西亚行省军团的长官，和骑士阶级出身的弗斯库斯不同，他是元老院议员，也担任过执政官。这项人事变动似乎含有避免元老院批评的意图，话虽如此，尤里阿努斯确实熟知当地情况，也有和达契亚人作战的丰富经验。不过这次雪耻战并没有增加兵力投入，民众所知道的也只有将驻在迦太基的一个大队经地中海调往多瑙河来填补阵亡者的空缺。

公元88年，率领罗马军渡过多瑙河向达契亚人的领地进攻的尤里阿努斯成功地将敌军引诱到平原地带。一旦在平原上展开交战，罗马军就所向无敌了。结果罗马一方大胜，这次轮到罗马士兵追杀四处逃窜的达西亚士兵了。但是罗马军没能攻下达契亚人的根据地，原因是冬季将至。深知此片地区冬天寒冷的司令官尤里阿努斯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拆掉用木船搭成的浮桥，让士兵修整，以待来年春天再战。



多瑙河中下游及其周边区域

反图密善的动向

通常来说，对现实的不满会在情况恶化时才爆发出来。公元88年到89年之间的冬天对于罗马来说是情况好转的时期。所以不知为何，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会让手下的两个军团推举自己为皇帝来发

动反抗图密善的叛乱。深入探究的话，也许可以列出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元老院内部的反图密善派不满对于独裁统治的方式毫不掩饰的图密善，所以在背后煽动了叛乱。

第二，想趁图密善专心于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之机篡权。

第三，帕提亚问题。图密善不仅要应付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人，还要时刻注意幼发拉底河东部的大国帕提亚的动向，萨图尼努斯肯定是想借这个机会在西边点燃反图密善的战火。在这个时期，帝国的东方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皇帝尼禄的人，这个人前往帕提亚要求由自己带头展开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叛乱的开始。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的“皇帝尼禄”一章中笔者曾经提到过，尼禄确立了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和平，所以帕提亚国王对尼禄非常感激。如果罗马在传统上的假想敌帕提亚有意反抗罗马的话，打出尼禄皇帝的旗号是相当有效的。在帝国的西方，尼禄是个遭到元老院、市民、军团三方抛弃最后自杀的皇帝，但是他通过解决帕提亚问题给东方带来了和平，所以在东方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然而，就算当权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帕提亚并不想改变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在图密善的要求下，冒充尼禄的人被无条件地移交给了叙利亚行省总督，不用说在移交之后他马上就被处决了。

所以，如果认为帕提亚会拥立伪帝尼禄反叛罗马，从而点燃叛乱的战火的话，那只能说是对情况的判断失误。不过与图密善处于同时代的塔西佗曾经写道：“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打算拥立自称皇帝尼禄的冒牌货来掀起反抗罗马的叛乱。”实际来说这次事件很简单就解决了，但确实让罗马人在一段时间内出了一身冷汗。此外，与伪尼禄事件一样，在高地日耳曼发生的叛乱也轻松地解决了。

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让手下的士兵推举自己为皇帝是

公元89年1月12日的事情。图密善知道以后，马上命令驻扎在西班牙的第七军团长图拉真率军火速赶往美因茨，自己则率领剩余的近卫军团兵北上。但是，皇帝和图拉真都白跑一趟，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马克西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率军南下，在波恩和科布伦茨的中间地带击败了萨图尼努斯的军队。到了1月25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萨图尼努斯自杀，推举他为皇帝的士兵们承认自己的轻率举动后获得了赦免，这次叛乱中的流血事件至少连内战都称不上。

但是，在问题解决后到达美因茨的图密善却认为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在他看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背叛自己。萨图尼努斯在自杀前烧毁了一切有可能连累他人的文书，这让图密善非常生气。他将自己认为是萨图尼努斯同谋的军团内的几个将军处决了，然后任命从西班牙横穿高卢前来的图拉真担任了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幸运女神

很难说命运是以什么机缘发生变化的，难怪有些人将人类的幸与不幸归结为幸运女神随兴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只有30多岁的图拉真就不会被提拔为防卫从莱茵河畔的波恩经日耳曼长城一直到达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为止这段重要的前线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了。他的父亲曾经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手下作为军团长参与过犹太战争，所以图拉真和韦斯帕芗那种从军团中脱颖而出的背景不同。但是韦斯帕芗虽为骑士阶级出身，却是在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罗马人。图拉真的父亲虽然被皇帝韦斯帕芗提拔为元老院议员，名列贵族，却是西班牙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图拉真在9年后被皇帝涅尔瓦收为养子，成为了第一个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但如果一直在西班牙指挥一个军团，过着太平日子的话，就算涅尔瓦再贤明，也不可能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图拉真作为前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9年

业绩弥补了他行省出身的不足，避免了既有统治阶级的反对。不仅罗马军，任何国家的军团都有的共同点是，被委任为前线指挥就意味着升迁。在危险的前线服役和在安全的后方服役，虽然官职名同样是总督，实质却大为不同。在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任这个要职，让图拉真有机会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但是，只比图拉真大2岁的图密善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虽然在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大胜，周边的情况却急剧变化，容不得他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和平协定

现代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都是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城市。从维也纳向东缓缓流向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在布达佩斯转而向正南流向贝尔格莱德，在那里又继续向东以曲线的形状注入黑海。如果不是以和时代没有关系的地理学的观点，而是以和时代有密切关系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的话，对于罗马人来说到维也纳为止的流域为多瑙河的上游，从维也纳到贝尔格莱德是中游，从贝尔格莱德到黑海是下游。公元1世纪末的皇帝图密善以东西方向为根据，也就是从多瑙河的上游到下游将之前的两个行省改为了四个行省。将潘诺尼亚行省分成了“近潘诺尼亚”和“远潘诺尼亚”，将米西亚行省分为了“近米西亚”和“远米西亚”。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化防卫体制。

罗马帝国的存续就在于保住从多瑙河的中游到下游的这条防线，罗马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到了公元1世纪末的时候。至于多瑙河的上游地带，因为修建了联结莱茵河沿岸的波恩和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的日耳曼长城而实现了军事国界化，即所谓的“铁壁化”，所以是已经解决完的课题。

但是尽管罗马人遵循始于恺撒、由提比略巩固的政策，完善了防卫体制，但他们认为国境并不是内外隔绝的，还要允许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说他们甚至鼓励人和物的交流。因为即使是居住在防线外部的部族，如果通过向他们提供兵员和物产交易机会从而可以建立与罗马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么即便称不上友军，至少也不再是敌人了。罗马就这样一直坚持与国境外的一些部族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也就是“分化统治”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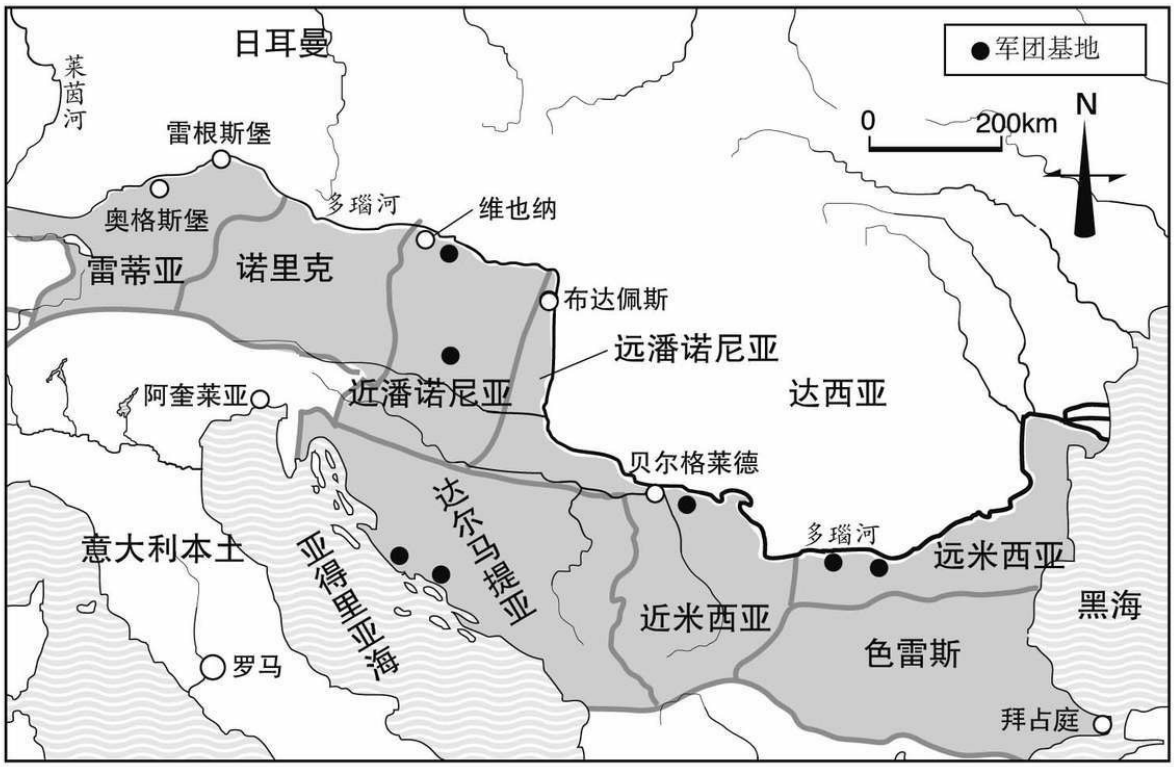
因此，居住在国境外的部族并不是威胁，这些部族团结起来才是威胁。达契亚人成为威胁就是因为族长自称为王，成功团结了周边的弱小部族。

达契亚人的势头在能力出众的领袖德凯巴鲁斯的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了。德凯巴鲁斯不仅希望统一自己部族所在的多瑙河下游，还怀有合并中游的马科曼尼、库瓦迪和亚基盖斯等部族，在多瑙河北岸建立一个大王国的野心。马科曼尼、库瓦迪和亚基盖斯都是通过兵员援助和物产交易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的部族，居住在维也纳西面到贝尔格莱德为止的多瑙河北岸一带，属于日耳曼裔部族。

这三个部族分别展开了反对罗马的行动，他们并不是在罗马大败给达西亚之后行动的，而是在罗马大胜雪耻之后，可能是他们觉得同样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的压力减弱了。不管怎样，在多瑙河下游大胜达契亚人的罗马这次又将面对多瑙河中游的新敌人。

皇帝图密善认为同时与中游和下游的多个敌人为敌的话，罗马一方将陷入不利境地。实际上，他最初尝试的多线作战也以失败告终。达西亚的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寻找着挽回大败之后的颓势的机会，双方的利害在此达成了一致。与达西亚缔结和平协定后，罗马可以专心对付中游三部族的反抗，可以说迫使大国罗马不得不选择外交手段的达西亚提高了自己在多瑙河北岸全域的声势。

罗马和达西亚缔结和平协定的确切时间由于图密善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而无从查考，不过笔者认为应该在公元94年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罗马军在多瑙河中游的反击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总之，图密善以友好国君主的待遇迎接了代替国王访问罗马的王子。



行省重组后的多瑙河军团配置

和平协定的内容也因“记录抹杀刑”的缘故而不甚明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罗马败给达西亚时被达西亚俘虏的罗马士兵全部被送还，罗马按人头每年向达西亚支付2阿斯的铜币。

不知道俘虏确切有多少人，并且每人每年2阿斯的赎金是永久的还是规定了年限的，也无从查证。

也许在图密善看来，既然攻入达西亚根据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只有用金钱赎买的方式才能救出被困在根据地的罗马士兵了。另外，2

阿斯相当于在公共浴场洗浴4次的钱，如果是在市场购买小麦粉的话只能买500克，这只相当于士兵年薪的1/450。也许图密善认为如果只需付出此等程度的代价就可以解除对多瑙河下游的担忧的话，确实比较划算。

但是这件事招致了罗马人的非难。罗马人可以忍受一个军团6000名士兵全军覆没，但若是用金钱买来和平，即使只是出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也可以让他们寝食难安，这种感觉就好像失败者向胜利者支付岁贡一样。和平是否是用任何代价都值得交换的？即使到了帝政的中期阶段，罗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仅就缔结协定后的数年来看，牺牲自尊心换来的和平发挥的效果还是很大的。达西亚国王一直遵守着协定，罗马军也进攻到了多瑙河北岸，对长期处于友好关系却趁机入侵罗马领土的三个部族施以了彻底的打击。

其间，图密善经常视察前线，努力巩固军团基地。配置在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基地被改建成一座石造建筑林立的城市也是在这个时期。与处于和平关系的达契亚人的居住地相接的多瑙河下游南岸也实现了基地的城市化，也就是完善化。罗马人对于缔结了和平协定的对手也不会放松警惕，这不仅不是一种矛盾，更应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与他们在处于友好关系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境上部署军团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图密善明知会招来元老院和市民们的非难，却毅然和达契亚人缔结和平协定的做法，从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来看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

计量器

笔者的专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写作的内容不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

意大利还是古代的罗马，都只能算是业余的。所以笔者所写的罗马史不是一部学者的罗马史，而是一部作家的罗马史。不过看了布莱希特或尤瑟纳尔的作品后也可以知道，就算是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既然选择了题材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所以在调查研究的必要程度上学者和作家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学者和作家对待这些工作的态度不同。一言以蔽之，学者倾向于相信史料，作家不一定会轻信史料。

至于为什么不会轻信史料，有两点不可忽视的因素。笔者认为历史上的“证据”可以大致分为历史记述和考古学上的成果。历史记述本来就是很难保持客观的人类书写并保存下来的史实，考古学上的成果也仅限于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东西。历史记述毕竟是已经加入了人为因素的史实，至于考古学上的成果……只要拿罗马这个城市来做例子就足够了。现代的罗马是在古代罗马的上面修建的，如果要想彻底弄清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首都”的全貌，只能让住在现代罗马的全部居民移居到别处，对整个罗马进行考古发掘才行。庞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地被火山灰掩埋，人无法继续居住，所以不必将人全部迁走就可以对这座古代城市进行全面发掘。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证据或史料具有如此不确定的性质，但不以这些为基础的话就无法书写历史。然而深深相信和抱有疑问毕竟还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这个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看法。

不属于学者的笔者对于人性的看法在书写罗马史的时候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就是在判断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做的事情是否有益于共同体即国家时，比起参照塔西佗等历史学家的评价，笔者更愿意选择将后任的皇帝是否继承这名皇帝的政策或事业作为判断的标准。

使用这个“计量器”后发现，罗马史上最好的统治者当推恺撒和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就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罗马人也只称呼这两个人为“神

君”，想必是因为和笔者有共同的感受吧！这两人之后的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断定为昏君，但利用笔者的“计量器”来评价的话有相当的可能可以为他们挽回名誉。那么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典型的尼禄又怎样呢？

尽管与帕提亚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尔布罗的精心准备，但最后拍板还得是皇帝尼禄。结果，当时的两大强国间的这种良好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撕毁协定的不是帕提亚，而是罗马一方的图拉真皇帝。在关系良好的这半个世纪之间就任帝位的皇帝除了内乱时期的三人之外，分别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和涅尔瓦。他们自始至终都恪守了尼禄签订的与帕提亚的和平协定。在攻击型的皇帝图拉真之后继承帝位的防守型皇帝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在半个世纪中也继续奉行尼禄对帕提亚的友好路线。单论外交方面，不得不说尼禄的功绩确实很大。

那么同样出自尼禄之手的“黄金宫殿”的修建应该如何评价呢？

这项事业是崇拜希腊文化的尼禄计划在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修建的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绿化得很好的理想国。其良好的动机无疑可以得到现代的环保主义者的赞赏，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非但如此，甚至有诸如恺撒之类说出“以坏结果收场的事情往往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这种话的人。尼禄的梦想——绿色之乡罗马的市中心由于韦斯帕芗修建的圆形竞技场、提图斯修建的公共浴场、图拉真修建的更大的公共浴场以及哈德良修建的神殿，而从地上消失得不留痕迹。在对于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利用这一点上，尼禄和其他罗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罗马式的想法是，市中心应该是市民们聚集到一起进行某种活动的场所，尼禄做出与多数罗马人想法相反的事情，也只能承认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与尼禄同样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图密善皇帝的业绩又应该怎样来评价呢？

笔者以前介绍的他所有的业绩，除了执法过于严格这一点有所缓和之外，其他的都被以后的皇帝继承了，未成年人的卖淫禁止法也沿用了很长时间。然而，比这些都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它通过联结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从而提高了防卫功能。虽然这项事业被塔西佗等文人忽视了，但是图密善以后的皇帝们无不为这道城墙的巩固工作费尽心血。和阿皮亚大道一样，只要铺设的意图明确、地点选择正确，留给后人的工作无非只有巩固和维护了。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可以说是图密善的最大功绩。

那么，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图密善在公元96年去世，继承他的是涅尔瓦。不过涅尔瓦登基没到一年就将图拉真收为了养子，明确了皇位继承者的人选。之后不久涅尔瓦去世，图拉真代之成为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图拉真在成为皇帝后也一直留在之前的任地高地日耳曼（包括日耳曼长城），为公元101年即将开始的史上有名的达西亚战争作准备。也就是说，图密善死后不到五年，由他促成的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就被皇帝图拉真一手撕毁。

看来罗马人还是无法接受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达契亚人虽然败给了罗马，却声势依然高涨”，塔西佗的这句话想必是公元1世纪末时所有罗马人的心声。另外，史学家塔西佗比图密善小四五岁，顾名思义，和这位皇帝是同时代的人。

市民看待图密善的眼神肯定变得冷漠了起来，不过图密善本人应该不是那么在意，他大概很相信皇帝权力的绝对优越性。这一点以及喜欢独处的封闭性格都与他视为典范的提比略极为相似。

图密善和提比略一样，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皇帝，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就不会与任何人商量而立即执行。其中之一就是教育上的改革。这也和日耳曼长城一样，是一项被之后的皇帝们继承的政策。不，这项政策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也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应该说比

日耳曼长城的寿命还要长。

教育课程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与皇帝尼禄同样出生于公元37年，看他的名字可能会以为是出生在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但是他实际上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萨拉戈萨沿埃布罗河逆流而上的一个城镇卡拉奥拉，以前是行省人民身份。在很小的时候被从事教师职业的父亲带到罗马居住，所以算得上是在罗马长大的。根据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法律，教师可以和医生一样获得罗马公民权，于是他仿效父亲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同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在此之前就得到父亲的培养，接受过高于家庭经济实力的教育。

他在22岁时回到西班牙，当时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了。昆体良返回故乡继续执掌教鞭，但并不是在小城卡拉奥拉，他似乎选择了行省总督的驻地塔拉戈纳。被推举为皇帝代替尼禄位置的总督加尔巴前往罗马时，昆体良也一起同行。这样一来，昆体良就成为了从公元68年到69年亲眼见证三个皇帝相继上台的人。

曾经关照过自己的加尔巴被杀后，这个32岁的西班牙人就这样留在了罗马，在帝国的首都重操教师职业。身为一名教师，他比父亲要成功。因为在不到40岁时，他就开设了教授雄辩术的学校。比起学校，这更像一座高等教育机关，相当于现代的大学预科班（Low School）。他的学生出类拔萃，塔西佗、小普林尼都是昆体良开设的“Low School”的毕业生。后来的哈德良皇帝在青年时代也在这里学习过。昆体良不仅授课，还亲自在法庭上担任辩护人，可以说他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了一起。

一边开办学校一边兼做律师的昆体良的清贫是出了名的，不过他无

非是亲自实践了“律师依靠多数人没有的知识能力为他人服务”的信条而已。有这种人做父亲，家人也许会吃不少苦。小普林尼看不下去，于是出资帮昆体良的一个女儿嫁了出去。勤俭节约的皇帝韦斯帕芗对昆体良很有好感，向这个西班牙人每年支付10万塞斯特斯的薪水，于是他成为了第一个从国家手中领取薪水的教职人员。

提图斯和图密善当上皇帝之后也继续支付给昆体良薪水，但是图密善曾经打算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去做别的事情。不知道这是皇帝的想法，还是屡次召见昆体良进宫后商量的结果。不管怎样，古代唯一成体系的教育论著就这样诞生了。

拉丁语的“eloquentia”（英语eloquence，意大利语eloquenza）翻译成日语就变成了“雄辩”或“辩论”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的技术，多翻译为“雄辩术”或“辩论术”。但是“eloquentia”还有一个意思是有效使用语言从而恰当表达自己想法的修辞术，所以也是一种修辞学。笔者经常将其翻译成“说服力”，而不是“雄辩”或“辩论”。

至于学习“eloquentia”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有效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但由于使用的“武器”是语言，所以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功效或是目的。

那就是在用语言表达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的过程中，让想法本身变得更明确的功效。这样一来，“eloquentia”就成为了形成人格的一种手段。古代的罗马人最为重视“eloquentia”的学习，将修辞学视为不可缺少的教养科目，就是因为习得这种技术之后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或律师，此外还可以期待让自己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功效。从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罗马人的文体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也是重视“eloquentia”的结果。

昆体良著述了12卷本的Institutio Oratoria，按字面翻译过来是“雄辩术原理”，不过根据内容意译的话，可以译为“教育论原理”。因为这部

著作是昆体良以20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为基础写成的，他在书中告诫教师们如何才能指导青少年学习不可或缺的教养，从而成为社会未来的领导者。

著作内容是关于“eloquentia”的实际形态“oratoria”的历史、含义、教导指南以及在法庭上实际应用的例子等，这些归根结底是为教学者写的。理由是委托其著书的图密善和昆体良本人都非常清楚对于国家来说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教育并非针对可以自学成才的天才，其目的应在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根据恺撒的规定，从事教育的人无论是什么人种、民族，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从而享受免除行省税这种直接税的优待。自那以后，图密善是第一个着眼于国家级别教育重要性的人，这一点怎么称赞也不为过。

这部著作于公元95年写成，次年在罗马刊行。数月后，图密善遭到暗杀。然而，这部著作是关于培养罗马帝国领导层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在之后很长时间一直都是从事教育者的必读书。即使在刊行1000多年后的中世后期也曾经再版，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西欧中世的一名知识分子会评价其为“学习拉丁语会话和写作方法的最佳手册”。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官方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拉丁语，使用了大约1000年。

但是，同时代的人们往往非常严厉。在这部著作刊行的时候，反响不只有称赞。有名的讽刺诗人马提雅尔就曾这样评价昆体良的这部心血之作：

> 达到了让无法坐在教室的椅子上安心学习的学生和以阴险恶毒闻名的罗马的律师们的形象永留后世的目的，没有比这部著作更完美的指南了。

笔者在读完后也觉得这部著作就和学校讲授的内容差不多，不免为

马提雅尔的评语失笑，不过原本来说，期待教育论能够给人以快感就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切地说，这部著作比起现代的日本文部省的指导要领来要有趣得多。毕竟到了2000年后的现代，这部拉丁语的散文著作还在不断再版。

恐怖政治

本书一开始曾经介绍过塔西佗著《同时代史》，在此重新引用其开头部分：

>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
>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所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据塔西佗称，这里写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发生在公元81年到96年的图密善皇帝时代，笔者一直很佩服塔西佗的文笔，但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塔西佗的这一段非难用来评价因内战而无暇顾及祭祀活动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的话可能还比较合适，形容图密善则不是很恰当。他曾经为了举行

始于奥古斯都的“百年节”，从多瑙河的前线赶回遥远的罗马。在首都期间，他恪尽职守地担任了大祭司。

如果说有什么招致了怀古派塔西佗的不快，那可能就是图密善非常热衷于建设和修复供奉阿波罗、伊希斯等这些被罗马人视为外来神的神殿。并且图密善还有一个方面和尼禄比较相似，积极资助发源于希腊的体育、诗歌、辩论等竞技大赛。他在占据帕拉蒂尼山一半面积的皇宫内也兴建了竞技场，这项每四年由皇帝主办的罗马式奥林匹克大会和真正的奥运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也会放下武器举行竞技，但罗马由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原因，已经不存在内战了，所以只是单纯的竞技大会。

不过这种竞技大会由于有皇帝的资助，所以除首都和意大利本土之外，在行省也举办。竞技内容有标枪、铁饼、赛跑、拳击以及两匹或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等，而且似乎没有出场资格的限制。

但是这些竞技比赛不知为何遭到了喜欢希腊文艺却讨厌希腊式竞技大会的罗马知识分子的抨击。与受人尊敬的塔西佗不同，就连并非顽固的反图密善分子的小普林尼在法国南部滞留期间也留下了一封为当地竞技大会停办感到欣喜的书信。从当时的这种“媒体”来看，即使图密善没有无视罗马历来的传统，至少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不过塔西佗所说的“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却完全是误解。图密善执法非常严格，他甚至恢复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通奸罪法》。从图密善自身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行为轻浮、朝三暮四的人。

至于“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一句，前半句是批评图密善的恐怖政治，后半句是说恐怖政治带来的灾难，问题是牺牲者到底是什么人。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反图密善的史学家们留下的数字比较可信，因为这部分正好是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主要理由。

在图密善统治的15年期间，尤其集中在后半期，有8—9人被处以了死刑，5—6人被处以流放刑，3—4人因对公共生活感到绝望而隐居。

这些人几乎都是元老院议员。对于元老院议员塔西佗来说，他们是自己的同僚。此外被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人还有一些占星师和希腊的哲学家。流放占星师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预知命运，从而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罗马的统治阶级历来对占星术不感冒，虽然罗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毕竟是“世界的首都”。一旦有了钱，人就会搞一些算命占卜，古今东西都一样。对占星师的流放始于提比略时代，但不管如何驱赶，这些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又都回到了首都。

至于将希腊的哲学家们从宗主国流放出境的处分，也有必要弄清当时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

希腊哲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一直很富于创造性，之后的哲学家们按当时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靠变卖老本过活的人”。然而，将地中海世界纳入统治之下的罗马人虽然对希腊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却非常尊重他们的文艺，因此希腊被罗马统治之后哲学家们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市场。雇用希腊人的家庭教师被视为有权有势、家境富裕的象征。大西庇阿和格拉古兄弟都接受过希腊学者的教育。雇用在当时以学问之都闻名的埃及亚历山大学习过的高卢人担任家庭教师的恺撒家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倒算是个例外了。

但是，随着帝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帝国全境的人才纷纷来到首都罗马。恺撒的教师优待政策成为了打破希腊人垄断教育界这种格局的决定因素。图密善就是委托西班牙人昆体良编制教育课程的。“教师等同于希腊人”这种情况已经是历史了。虽然希腊语作为和拉丁语同等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变化，但已经变成由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北非出身的人教授希腊语的时代了。

亲眼看到自己的市场减少时，当事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创造出别人没

有的特色，于是自称哲学家的希腊人开始高谈起民主体制和暴君的对立关系来。关于这二者的素材在最盛时期的希腊史上也应有尽有。

这些人所倡导的民主体制指的是元老院和市民拥有主导权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暴君指的是步入帝政时期后的皇帝。对于皇帝们来说希腊哲学家成为了“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物），相当于现代得不到签证派发的人。将这些人从宗主国意大利驱逐出境的措施从提比略时代就开始了。然而，单是教授希腊哲学或语言并不等于反社会的言行，并且这方面的需求本来就源源不绝，所以和占星师一样，流放只是暂时的，不过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对哲学家们的这种措施没有招致一般市民的反感，因为罗马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讨厌摆弄空论的民族。与其说图密善因流放哲学家而遭到罗马知识分子们的厌恶，不如像他父亲所说的这样更加贴切：

“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

图密善流放的是此后被称为“犬儒派”的一批希腊哲学家。看来即使是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

但是，笔者认为塔西佗大加非难的并不是称为恐怖政治牺牲品的人数，而是站在恐怖政治最前线的告发者，以及默许这些人的活动的图密善。如果是这样，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就需要知道译为“告密者”、“间谍”、“告发者”的帝政时代的“Delator”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Delator”

罗马的法庭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审判长由元老院选出的当年的法务官担任，对前行省总督进行控诉的时候，原告方代理检察官由被称为“Orator”的辩护人担任，当然“Orator”也经常担任被告的辩护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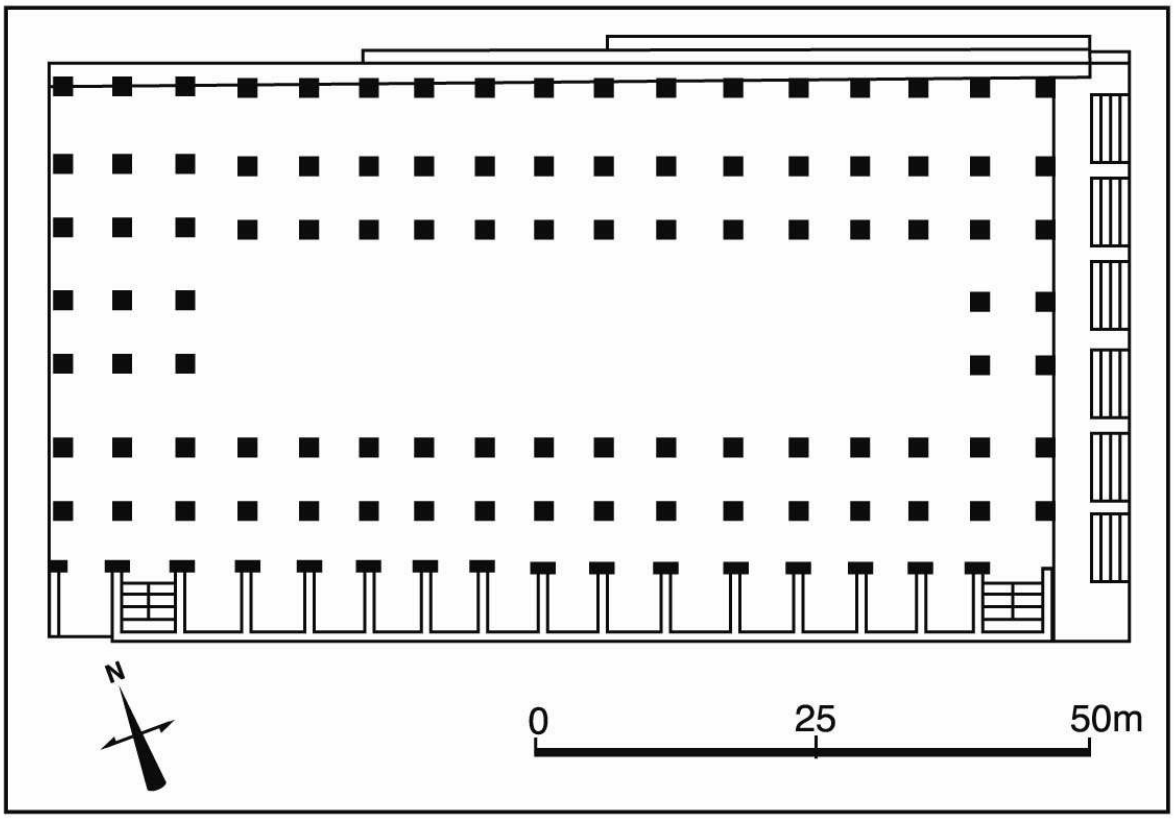
过，“Delator”因为被译为“告发者”，所以专攻告发，不会为被告方辩护。

陪审员被称为“Centumviri”，直译过来是“一百个男人”。从图拉真皇帝时代开始增加到180人，陪审员的称呼则一直是“一百个男人”。这些男人每年选举一次，从元老院、骑士、平民这三个有资格的阶级中通过抽签选出。出于保证判断客观性的原因，获得资格的条件是拥有某个水准以上的资产。

以首都罗马为例，审判在以修建者尤里乌斯·恺撒命名的巴西利卡·朱里亚（Basilica Giulia）会堂（又称“尤里乌斯公会堂”）内进行。这座会堂呈一个101米× 49米的长方形，在进行审判的日子会用幕布将会堂分为四个部分，同时进行四场审判。罗马人是法治系统的创始者，所以打官司的事情很多。100名陪审员也会被分成四组，每场裁决分别由25名陪审员来决定。

“尤里乌斯公会堂”的四周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旁听。在罗马，辩护人经常会放开声音进行辩论技能的较量，旁听人也不会保持沉默。据说如果是西塞罗这种善于取悦大众的辩护人担任告发或辩护的话，会有大批听众到场，他们的掌声和欢呼甚至让其他三场审判都无法进行下去。如果辩论冗长乏味，旁听人也会不屑一顾，坐在会堂台阶上用小刀刻出棋盘来下棋，打发时间，等待判决。

让昆体良称赞为罗马史上最优秀律师的西塞罗曾经写到，陪审员经常会受到旁听者的影响。他的文章读起来似乎是执法人在揭露执法不公正一样，不过这或许是古今东西不变的人性的一面。



尤里乌斯公会堂（Basilica Giulia）平面图

“Delator”与检察官和辩护人担任的“Orator”不同，是专攻检察工作的。在罗马帝国，这个职位和辩护人一样都不是公职，而是私人从事的职业。也就是说以获得报酬为前提的职业。但是，“Orator”在名义上是精英的职责，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与此不同，“Delator”的报酬是没收有罪人资产的一部分。这一点让“Delator”被视为掠夺资产的职业，是其惹人厌恶的一个原因。无法得知“一部分”到底是多少数额，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四分之一。

“Delator”最被人厌恶的是他们会不择手段，比如使用引诱调查、胁迫等手段取得证词，找出证据、证人，从而将被告推上法庭。不过“Delator”不是匿名的情报提供者，因为他们会在法庭上陈述控告理由，虽然不是公职，但也绝非隐秘的存在。以这个拉丁语词为源头，英

语也派生出了“delate”、“delation”等词语，前者的意思是“控告”，后者的意思是“告发”。

所以笔者认为与其将“Delator”译为“告密者”、“间谍”，不如译为“检察官”更为贴切。不过需要记住这种工作在现代属于公职，在罗马时代是私人的职业。这个职业虽然遭人厌恶，不过也是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因为“Delator”的攻击专门针对的是元老院议员，所以不难理解会遭到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些元老院议员的厌恶，除此之外的人估计也不愿意和检察官扯上关系吧！现代人一般也希望尽量不要和检察官有什么瓜葛。读到小普林尼留下的书简后发现其中有“这次的Delator很不好对付”的字句，其他书简中也记录着“Delator”和“Orator”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情况。同为“辩护人”的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对“检察官”心有敌意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有必要明确下面一件事情。有很多“Orator”身兼元老院议员，而“Delator”却没有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Delator”在法治国家中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事这个职业未必就可以得到尊敬。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曾经不择手段想要送克林顿总统上法庭的斯塔特别（独立）检察官将攻击目标从总统转移到参众两院的显要人物身上的话，就和罗马帝国的“Delator”比较接近了。不能忘记的是，在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在对手看来也可以期待通过落选来排除敌人，但是在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议员都是终身制，这两者之间当然也免不了激烈的斗争。

“Delator”遭到对手元老院的厌恶，在社会上的出头机会也被封杀了，但是并没有被排挤出人类社会之外。图密善死后继承帝位的涅尔瓦有一次在皇宫举行晚餐会，当晚的主宾是在图密善时代闻名的“Delator”维因特内，面见有如绅士的涅尔瓦本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这位皇帝突然说：“如果梅萨利努斯还活着，不知现在会怎么样？”虽然在晚年失明且生活贫困，但梅萨利努斯却是图密善手下和维

因特内齐名的“Delator”。皇帝涅尔瓦问完，与会者中立刻有人回答：“会被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宴会。”

“Delator”制度到了五贤帝时代也没有被废除，可见罗马人是容许这项制度存在的。所以问题不是牺牲者的数量，而是皇帝在扫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时是否使用了这种制度。提图斯在任时根本不听信这些人的控诉，图密善却充分利用了这项制度。即便如此，笔者也觉得“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段塔西佗的表述过于夸张了些，不过站在既是律师又是元老院议员，同时还确信元老院的存在意义因而同情共和政体的塔西佗的立场上来看，说图密善是个死敌都不为过。毕竟，图密善就任了终身财务官，这连他的父亲韦斯帕芗、哥哥提图斯，甚至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皇帝连尝试一下都不敢。

“终身财务官”

财务官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官名，在共和政体时代财务官从有执政官经验的人当中选出，权威比执政官还大。在任期上，其他官职都是一年，唯独财务官是一年半。本来的任务是国情调查，所以任期也相应较长。国情调查指的是调查资产和符合兵役条件的人员，所以出于公正的考虑，选拔历任所有官职、达到事业顶峰的人来担任被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不过财务官除了国情调查之外还有其他权力，其中之一就是招标修建符合国家政策的公共事业。当时的高速公路，也是罗马的第一条大道阿皮亚大道就是在公元前312年由当时的财务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铺设的，此人也是修建罗马第一条上水道的财务官。此外，财务官还拥有端正国家风纪的权力。罗马人认为不是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拥有端正国家风纪这种权力的财务官最关心的是

国家的上层建筑——元老院议员也是理所当然的。财务官还有一个权力是剥夺被认为不适合担任罗马领导层的元老院议员的议席。也就是说，只有财务官有权力将一旦进入元老院就终生无须担心失去议席的元老院议员从其位置上赶下来。这是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为防止权力滥用而设置的一种监督机制。出于相同原因，财务官的名额为两人。

但是，进入帝政时代后，奥古斯都与后继者提比略一起率先破例就任了财务官，财务官从此变为了由皇帝兼任。不过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以及韦斯帕芗、提图斯就任财务官后都在表面上做的是国情调查的工作，直到任期结束都没有使用过驱逐元老院议员这件“武器”。传家的宝刀正因为不拔出来才能成为宝刀。

到了图密善时代，这个先例被打破了。公元83年秋天，也就是他继承帝位仅仅两年后，他和另外一人一起就任了财务官。到一年半的任期结束的公元85年春天，又就任了终身财务官。尤里乌斯·恺撒曾经创设过“终身独裁官”这种新官职，“终身财务官”却是图密善创建的，当然也是他独自一人就任。

元老院感到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大规模的公共事业都是凭借皇帝的地位和名义推动的，国情调查也在10年前刚施行过。罗马的国情调查与现代不同的是由国家进行的，和现代税制下的财产申报非常相似。鉴于调查的困难性，当时的人认为30年施行一次比较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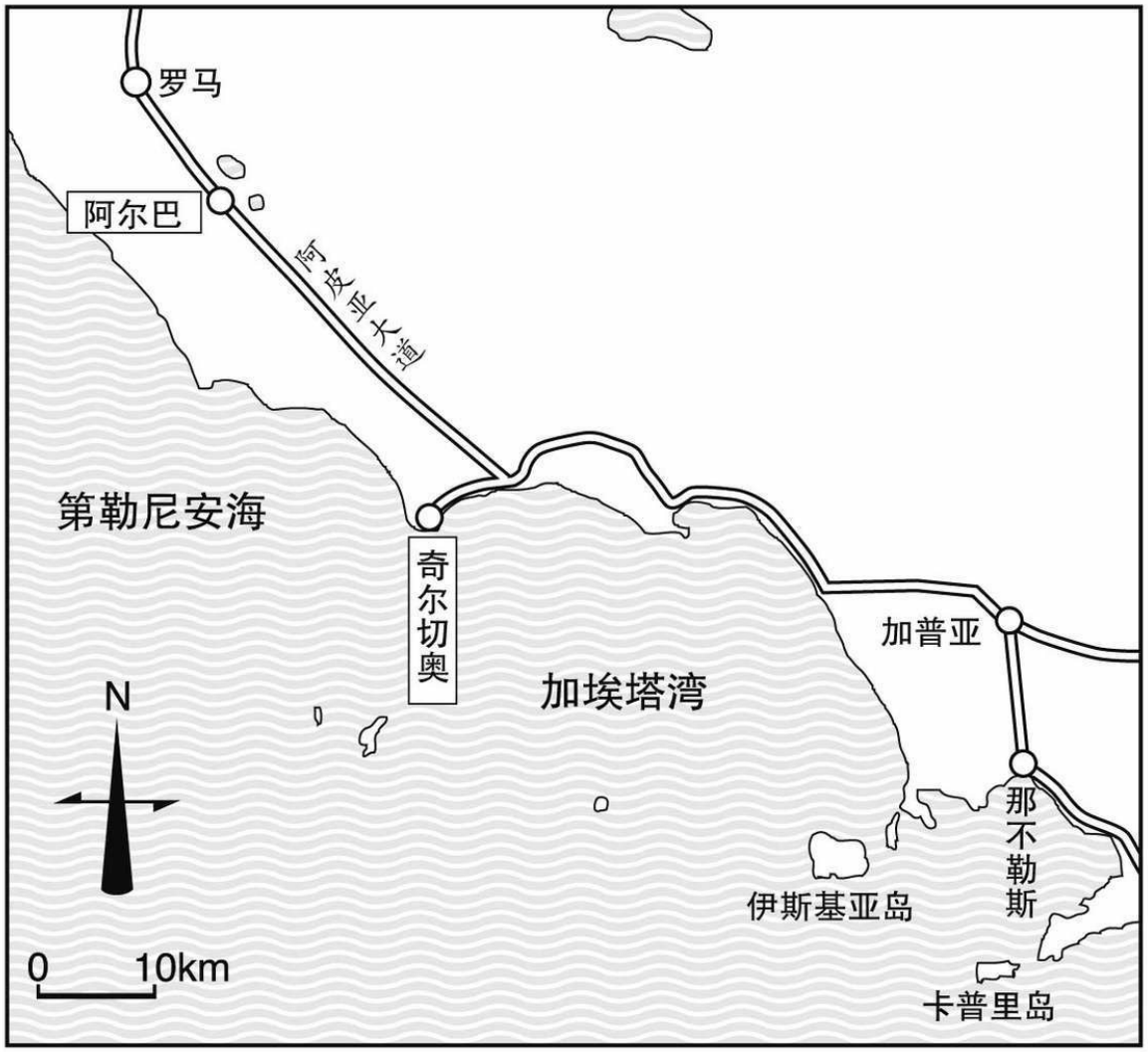
因此，图密善对财务官的执著并非出于公共事业或国情调查的必要，这即使不是元老院议员也很容易想到。但是，图密善在就任终身财务官以后也没有经常拔出手中的“武器”。不过元老院议员们都很清楚皇帝已经有利器在手了。

图密善第一次拔出这件“武器”是在公元87年，他以阴谋反抗皇帝的嫌疑，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审判了亚细亚行省总督凯利亚里斯。两年后，又发生了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图尼努斯的叛乱事件，虽然在爆发

后马上就被镇压了。这两次事件都被认为是元老院内的反皇帝派唆使拥有军团指挥权的行省总督克拉斯的结果。这个时期的图密善在忙于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和防范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奔波于前线和首都之间。

人到了40岁前后可能就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了，“武器”最终还是被拔了出来。图密善将“Delator”用在了歼灭元老院内反皇帝派的作战中。试想一下，如果斯塔独立检察官在当时将自己的那份执拗转向参众两院的议员的情形，就很容易理解公元90年代以后受图密善意旨驱使的“Delator”和元老院之间那种紧张的关系。元老院议员的成员之一塔西佗的笔锋直指图密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并且图密善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不知为何，人总是对出身高贵的人表现得很宽容，如果是出身平凡的人执掌权力的话，他们会变得歇斯底里。塔西佗批评图密善的“高贵的出身也被视为了一种罪”这句话意味深长，出身不高贵却当上皇帝的人必须像提图斯一样，一天没做好事就觉得有所损失，也必须像韦斯帕芗一样，就算再想回到故乡瑞耶提，也绝对不会行使皇帝的权力为这座小镇谋取特殊利益。



图密善的别墅所在地（□表示的区域）

弗拉维一族和名门贵族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不能相比，在两代之前甚至无从考证他们以何为生，这个地方出身的家族后来居然想通过就任终身财务官来将元老院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元老院虽然减员明显，但名门贵族出身的议员们依然健在。

并且图密善不仅在土地有限的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宏伟的皇宫，还在阿尔巴和奇尔切奥分别修建了山庄和海边别墅。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很容易就能购入大面积土地，从现在留存的遗迹可以想象出奇

尔切奥的别墅规模非常大，让人觉得这才当之无愧的是罗马皇帝的休息场所，其壮丽程度甚至应该称为宫殿而不是别墅。皇帝经常带着口无遮拦、喜好讽刺的诗人马提雅尔来这里度假。和这座奇尔切奥的别墅比起来，就连提比略的卡普里别墅也相形见绌。比图密善这座“别墅”更为宏伟、规模更大的皇帝别墅只有40年后由哈德良皇帝在蒂沃利修建的“别墅”。

图密善估计会说，自己没有耽误任何为市民修建的公共事业。确实如此，但是尽了公共义务不等于在私人方面可以为所欲为。尤里乌斯·恺撒在比图密善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地位越高，言行的自由就越受到限制。”

暗杀

公元96年9月18日，皇帝图密善被暗杀。他一共在位15年零5天，再过一个月就将迎来自己的45岁生日。

这次暗杀并不是元老院内反图密善一派的议员们制造的。

也没有听说过像尼禄皇帝末期由行省总督温德克斯发动的弹劾皇帝的行动。

军团对皇帝的忠诚度很高，导致尼禄倒台的导火线——军团兵将自己的司令官推举为皇帝的事件虽然在7年前的美因茨曾经发生过一次，但之后再没有过类似事件发生。

安全和粮食都有保证，时而举行的夜间竞赛也向市民们提供了充分的娱乐活动，所以一般市民没有什么不满。图密善利用“Delator”打压元老院的行为在罗马平民看来就和现代的我们旁观政治家们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过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权力斗争，所以这没有成为对皇帝心生不

满的理由。

总之，元老院、市民、军团、行省都没有参与暗杀图密善的行动。那么到底是谁如此大胆地策划并实施了杀害现任皇帝的行动呢？

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图密善就曾经说过，他爱上了和自己同岁（也可能比自己大一点）的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的女儿多米提娅，并成功迎娶了这个已为人妻的女人。面容娇美、气质高贵的多米提娅在失去妻子的韦斯帕芗统治期间、放弃了对犹太公主的爱情之后终身未娶的提图斯统治期间以及之后在30岁继承帝位的图密善统治期间，一直是罗马宫廷首屈一指的女人。当时肯定找不到比她更适合做第一夫人的完美女性了。她既不倚仗权力作威作福，也不刻意装扮成庶民风格，行为举止非常自然，是一个大方得体的完美女人，无愧于图密善赠与她的“皇后”尊称。图密善也从心里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们之间生下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但这并没有给两人的爱情蒙上阴影。

最初的“阴影”是在图密善成为皇帝三年后出现的。当时的图密善为了修建日耳曼长城，经常去莱茵河前线，与加利蒂人交战时也经常不在罗马，当他时隔很久回到罗马时，听到了皇后与他人有染的谣言，据说对方是悲剧演员帕里斯。32岁的图密善没有深入调查就轻信了这个谣言。帕里斯被处死，皇后也被废黜后离开了皇宫。史学家们所记载的“吃完晚饭后到睡觉之前的时间，图密善最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的习惯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养成的。也有的史学家认为自从提比略去世后，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无人问津，唯独图密善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其真伪很难确定。不过，自那以后孤独确实一直伴随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外还有一人也不得不沉寂在孤独之中。

仅在位两年便去世的提图斯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尤利娅·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尤利娅丧父后回到了娘家。那时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她搬到叔叔图密善的皇宫居住。

尤利娅当时年近20岁，无论容貌、性格还是教养都和皇后多米提娅正好相反。她给人的印象是貌不惊人，有些多愁善感，为人低调。

不知从何时起，这两人的关系从叔叔和侄女变成了男女关系。因为住在皇宫里本来不可能逃过侍者们的眼睛，但二人的关系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是，图密善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不知经过怎样的方式，他没到一年就又将皇后召回了皇宫。多米提娅重新坐上了宫廷女主人的位置，然而尤利娅也继续住在皇宫里。如果她想再婚的话随时都可以，她却没有这么做。

尤利娅的突然死亡让这种同居状态广为人知，侍者们都传言，是图密善在她怀孕后强迫其堕胎而致其死亡。

多米提娅

尤利娅

既然多米提娅能够带着愤怒和屈辱忍受丈夫的这段恋情，那么竞争对手的死应该可以让问题得到解决。尤利娅·弗拉维娅的惨死是公元88年前后的事情，距图密善被暗杀的公元96年有8年时间。在这8年间，图密善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任何女人。

然而，人的心里总是包含着难以理解的成分。在竞争对手活着的时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一方死后，竞争对手就不是活着的女人，而是变成残留在男人记忆中的女人了。对于教养良好、性格要强、举止高雅的女人来说，没有比活在男人心中的竞争对手更难以对付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女人胸中迸发出的憎恨就会指向心中还留有情敌影子的男人。并且，尤利娅死后，本来很内向的图密善逐渐敞开了心怀，经常一个人去别墅度假。这不禁让多米提娅怀疑他在阿尔巴的山庄和奇尔切奥的海边到底在想什么。

在这种男人身边的女人想必有一种苦恼和憎恶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不过这只是她本人的想法罢了，根据过于薄弱，不足以说服周围的人忠诚地为她做事。到了尤利娅死后7年的公元95年，发生了一件让周围的人同仇敌忾的事情。不同的是，占据皇后心中的是苦恼和憎恶，亲戚和周围的人感到的更多是恐怖。

皇帝韦斯帕芗有提图斯和图密善两个儿子，此外还有一个女儿，这三人似乎是姐弟关系。不太清楚姐姐弗拉维娅的结婚对象是谁，不过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个和自己同名的女儿。结婚对象不明是因为她的结婚时间是在父亲韦斯帕芗当上皇帝以前，还是负责防卫帝国全境的20名将军之一的时候。韦斯帕芗的孙女将要结婚的时候，韦斯帕芗已经是皇帝了，所以选择结婚对象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个弗拉维娅嫁给了韦斯帕芗的哥哥——也就是在内乱时期被杀害的萨比努斯——的孙子克雷蒙斯。值得一提的是，惨死的尤利娅也和克雷蒙斯的哥哥结婚了，所以相当于同族结婚。这肯定是皇帝韦斯帕芗想让弗拉维一家继承帝位所想出的对策。

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这个女人和丈夫克雷蒙斯生了两个儿子。提图斯没有儿子，图密善的儿子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图密善继承帝位后，决定将侄女的这两个儿子定为皇位继承人，收为了养子，并让他们改名韦斯帕芗和图密善，让曾经为帝国领导层预备军编

写过“教育课程”的昆体良负责教育这两个孩子。

但是，两个年轻的皇位继承者的生身父母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当时一起皈依了罗马诸多宗教中的一个，尽管罗马的宗教政策非常宽容，但问题还是发生了。初期的基督教人士声称这个宗教是基督教，但真实情况无法查证。总之，这个宗教不是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希腊、罗马的多神教，而是从东方传来的一神教。

皇帝图密善曾效仿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举行“百年节”，并打算通过振兴罗马自古以来的宗教从而将帝国统合到一起，在他看来，这件事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罗马承认信仰自由，但下任皇帝人选的父母选择了异教而不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这已经不是信教自由的问题了，绝不能坐视不管。

公元95年入秋时，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夫妇遭到了指控，不用说这是“Delator”们积极搜查证据的结果。经过正式的审判后，判决克雷蒙斯死刑，妻子弗拉维娅流放。流放地为罗马时代被称为“潘达特里亚”的小岛文托特内。这个小岛是开国皇帝流放放荡女儿尤利娅的地方，也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流放策划反对自己的阴谋的媳妇大阿格里皮娜的地方。它位于奇尔切奥东南50公里的海上，并不是一个荒芜的孤岛。成为皇族的流放地之后，岛上修建了贮水池和养鱼用的大型鱼池等设施，所以生活上没有任何不方便，这种待遇相当于对危险分子的隔离。

但是，皇帝的亲戚克雷蒙斯被处以了死刑。因为弗拉维一族是新兴阶级，还不能适应同族中有人被处死。并且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同族成员。恐怕当时弗拉维一族全体成员都陷入了恐惧之中，如果这种恐惧和皇后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恐怖行为如果是身边亲近的人策划，成功率也会提高。

图密善在卧室熟睡时，皇后多米提娅手下的解放奴隶袭击了他，名字叫做斯提法努斯。不过皇帝当时45岁左右，体格强健，所以肯定不是

斯特法努斯一人所为，应该还有同党，但是不太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和人数。暗杀者们闯入卧室之后马上从里边把门锁上了。

不知道在紧闭的门内打斗持续了多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数百名皇宫侍者和警卫被人阻止了，无法进入事发现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一群人打个措手不及，图密善力尽身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事成之后的处理也很快。此时赶到现场的警卫将全部暗杀者当场杀死。随后马上恭迎与皇帝图密善一起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登基。

被告知图密善死讯的元老院想必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们马上召开会议，当场确定了所有对策。图密善生前在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中都很有威望，所以必须加快节奏。

不知道是出于谁的主意，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涅尔瓦马上得到了皇帝的所有权力。正式继承罗马皇位必须有元老院的承认，于是元老院迅速承认了涅尔瓦的皇帝之位，并且，还通过了将死去的皇帝图密善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决议。确定这项处罚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为了牵制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暗杀现任皇帝的主谋是谁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被提起。

既然与皇帝尼禄一样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死去的图密善就不能被葬到奥古斯都陵中。他的奶妈偷偷将图密善的尸体领来火化了。这名女奴隶在图密善小的时候代替生母抚养他，之后也一直留在他身边伺候。图密善曾经修建弗拉维神殿，以供奉死去后被神化的父亲韦斯帕芗，奶妈也将他葬在了这里。不可思议的是，她是将图密善的骨灰和事先葬在这里的尤利娅的骨灰混在一起埋葬的。图密善由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甚至连墓碑都无法修建，却可以和尤利娅在九泉之下长相厮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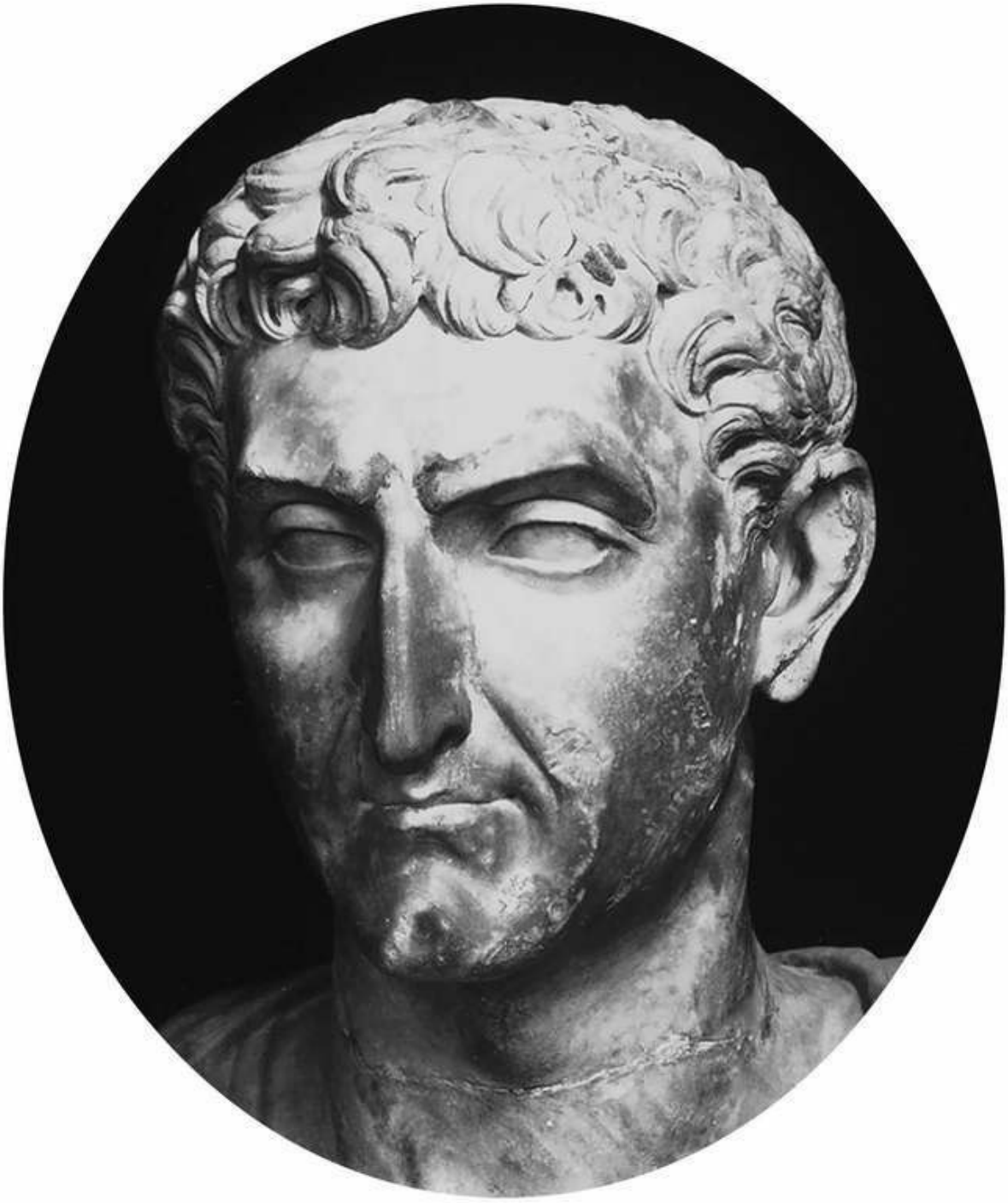
至此，继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的第二个世袭皇族——

弗拉维王朝在经历27年统治后也结束了。从韦斯帕芗的登基开始到图密善的死为止的27年，共经历了3位皇帝。现代的很多史学家一致认为，弗拉维王朝皇帝们的最大功绩是缓解罗马帝国的危机，让帝国重新步入了正轨，并且通过实施修建日耳曼长城等多项政策，恢复了帝国的活力，奠定了让罗马帝国取得进一步繁荣的基础。不过这个评价不是着眼于人性的弱点，而是这些人为国家（Res publica）做了哪些事情。

第八章

皇帝涅尔瓦

（96年9月19日—98年1月27日在位）



从涅尔瓦开始的5位皇帝被后世称为“五贤帝”。因此，从涅尔瓦登基的公元96年开始到马克·奥里略去世的公元180年为止的时期在罗马历史上称为“五贤帝时代”。

过渡政权

马尔库斯·寇克乌斯·涅尔瓦（M. Cocceius Nerva）出生在离首都罗马不远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城镇纳尼亚（现在的纳尔尼），家族从很早以前就属于元老院阶级。他出生的时间为提比略统治时期的公元26年。在43岁经历了内乱，之后在韦斯帕芗统治时期度过了44—53岁的几年时光，在提图斯和图密善统治时期则度过了55—70岁这十几年。在44岁时和韦斯帕芗一起担任过执政官。公元90年又和皇帝图密善一起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他的家族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一直到进入帝政时期后为数不多的元老院贵族，然而他不支持图密善，但也不反对他。他是一个平衡感很好的绅士，没有什么野心，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既没有担任行省总督的经历，也没有统率军团的经历，在一生中只是一个首都罗马上流阶层的精英分子罢了。

不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将涅尔瓦推上了皇帝之位。涅尔瓦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出头的人，但是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不是亲图密善的一派，所以不用担心招来反图密善一派的反抗，同时他也不属于反图密善的一派，所以也不会刺激到支持图密善的人。并且，他还是塔西佗等中流阶层的知识分子推崇的“高贵出身”。经历了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到弗拉维王朝世袭皇统后，人们逐渐发现了其中存在的缺陷，涅尔瓦没有子嗣，并且已是70岁的高龄，基本不会再有后代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恰好是有利的条件。

元老院当然也十分欢迎自己当中的一分子登基。此外，被视为图密

善一派的近卫军团和在边境服役的各军团也很爽快地向新皇帝涅尔瓦表示了忠诚。一般市民倒是将这次登基当成正常的权力交替罢了。新皇帝涅尔瓦没有忘记在和市民们一起庆祝皇帝就任时给他们发放赏金。近卫军团、边境军团和市民并没有积极地支持涅尔瓦，而是采取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可以说是消极地支持。虽说已经过去了27年，但军团之间自相残杀的内乱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所以边境军团都保持慎重的态度。图密善被害之后的帝国在表面上得以保持了稳定，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微妙状态下的稳定。涅尔瓦不仅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很多人肯定感到涅尔瓦的登基是一个“过渡政权”。

元老院因为图密善出人意料的死亡而恢复了活力，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把涅尔瓦当做“过渡政权”。但是这些人试图以典型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的登基为契机，夺回帝国统治的主导权。并不是要恢复到共和政体时代那种元老院主导的体制，而是要改变皇帝的主导日益增强的现状，让皇帝和元老院一起来统治帝国。从皇帝涅尔瓦的立场来说，当然会不遗余力地配合。

在就任皇帝后的首次元老院会议上，涅尔瓦成立了让元老院独立于皇帝司法权之外的治外法权。这样一来，不管皇帝如何利用“Delator”来进行审判，元老院议员都可以免于死刑。不过虽说是治外法权，但只是针对皇帝拥有的司法权发挥效力的“治外法权”，在除此之外的一般刑法和民法中，就算是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

于是涅尔瓦又确立了能够实际削弱“Delator”权力的法律。这项法律确立后，解放奴隶和奴隶就无法再提供对主人不利的证词了。另外，由于决定对图密善处以“记录抹杀刑”，所以在图密善时代被流放或是资产被没收的人们得以回国，没收的财产也被归还。但是涅尔瓦除此之外没有改变由图密善制定的其他政策，而是一一继承了下来。

元老院对涅尔瓦没有任何不满。人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物，只要成功排除自己憎恨的人，就算继承该人成立的政策，他们也毫不关心。

另外，平衡感良好的涅尔瓦对亲图密善一派没有采取报复措施，也没有给予反图密善一派优待。他一直奉行量才而用的人事政策。弗朗提努斯被任命为相当于水道厅长官的“curator aquarum”，并且他根据这个时期的经验写成了《关于罗马水道的论考》（De aquae ductu urbis Romae）。小普林尼也是被涅尔瓦提拔的人才之一，他获得了相当于国税厅长官的职位，对于既不追求财富也不轻视财物的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涅尔瓦是个幸运的人。首先他不像韦斯帕芗那样需要重建帝国的财政，因为图密善在工程和军事上消耗了大量财源之后依旧保持了财政健全。并且，由图密善动工、在涅尔瓦继承皇位后完成的两座建筑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是首都内的“涅尔瓦广场”，另一个是从奥斯提亚沿台伯河而上的船只停靠的港湾附近兴建的“涅尔瓦仓库”（Horrea Nervae）。

但是，消极的支持也包含着随时可能转为反对方的危险。在涅尔瓦的统治过去一年后，所有人都意识到需要在这种危险降临之前采取措施。因为推崇图密善的近卫军团已经开始表现出不稳定的动向了。

涅尔瓦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没有听取元老院的意见，而是自己作的决定。公元97年10月他突然公布了人选，让人们惊讶的不是指定继承人这个行为，而是被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实在出乎意料。

图拉真登场

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以养子的身份被指定为了继承人。他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也就是行省出身。不过他的父亲曾经在韦斯帕芗手下任军团长，韦斯帕芗当上皇帝后又推举他进了元老院，得以名列贵族，所以虽然是“新贵”，但也属于罗马社会的领导层。图拉真在公

元97年时担任包括日耳曼长城在内的高地日耳曼的防卫军司令官，时年44岁。无论在社会地位、军事经验还是年龄上，都是连顽固的共和主义者都无法挑剔的合适人选。另外，消极支持元老院色彩浓厚的涅尔瓦的各边境军团也非常欢迎图拉真。一名喜欢讽刺的史学家甚至曾写道，涅尔瓦跻身五贤帝之一的理由只是因为他选择了图拉真作为继承人。

71岁的涅尔瓦不仅将44岁的图拉真指定为了继承人，在指定的同时，还允许图拉真使用和涅尔瓦同样的称呼——“Imperator”，并授予他皇帝的权力之一——“护民官特权”。另外，还决定让图拉真和自己一起参选任期从次年1月1日开始的公元98年的执政官。虽然选举是在元老院内进行，但若是和皇帝一起参选的话，当选基本是确定无疑的事情。总之，涅尔瓦不仅将图拉真指定为继承人，还指定他为共同的统治者。看来罗马还是明确要走上一个皇帝倒下去、另一个皇帝继续统治的帝政之路。

公元98年1月27日，皇帝涅尔瓦去世，死因为自然死亡，统治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他的骨灰被葬在了奥古斯都等历代皇帝长眠的奥古斯都陵。

图拉真的亲戚、当时22岁的哈德良从多瑙河骑马赶往科隆尼亚（现在的科隆），将涅尔瓦的死讯通知了图拉真。

但是，这位45岁的新皇帝在1月1日就任执政官时没有回到首都，接到死讯时也没有前往罗马。被图密善从率领一个军团的军团长提拔为指挥三个军团的司令官的图拉真很清楚，作为武将的自己成为皇帝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像涅尔瓦那样，而是图密善唯一未完成，或者说唯一没能做到的事情。图拉真返回首都罗马的时间是在继承帝位一年多之后的公元99年夏天。

罗马的人事

盛久必衰是历史的常理，罗马人的历史也不例外。但是，在写了罗马人的历史之后，笔者并没有感伤于盛久必衰的常理，而是思考起另外一件事——罗马史就好像接力赛一样，既有的领导者的功能衰退后，肯定会有新的人才在跑道上等待着接力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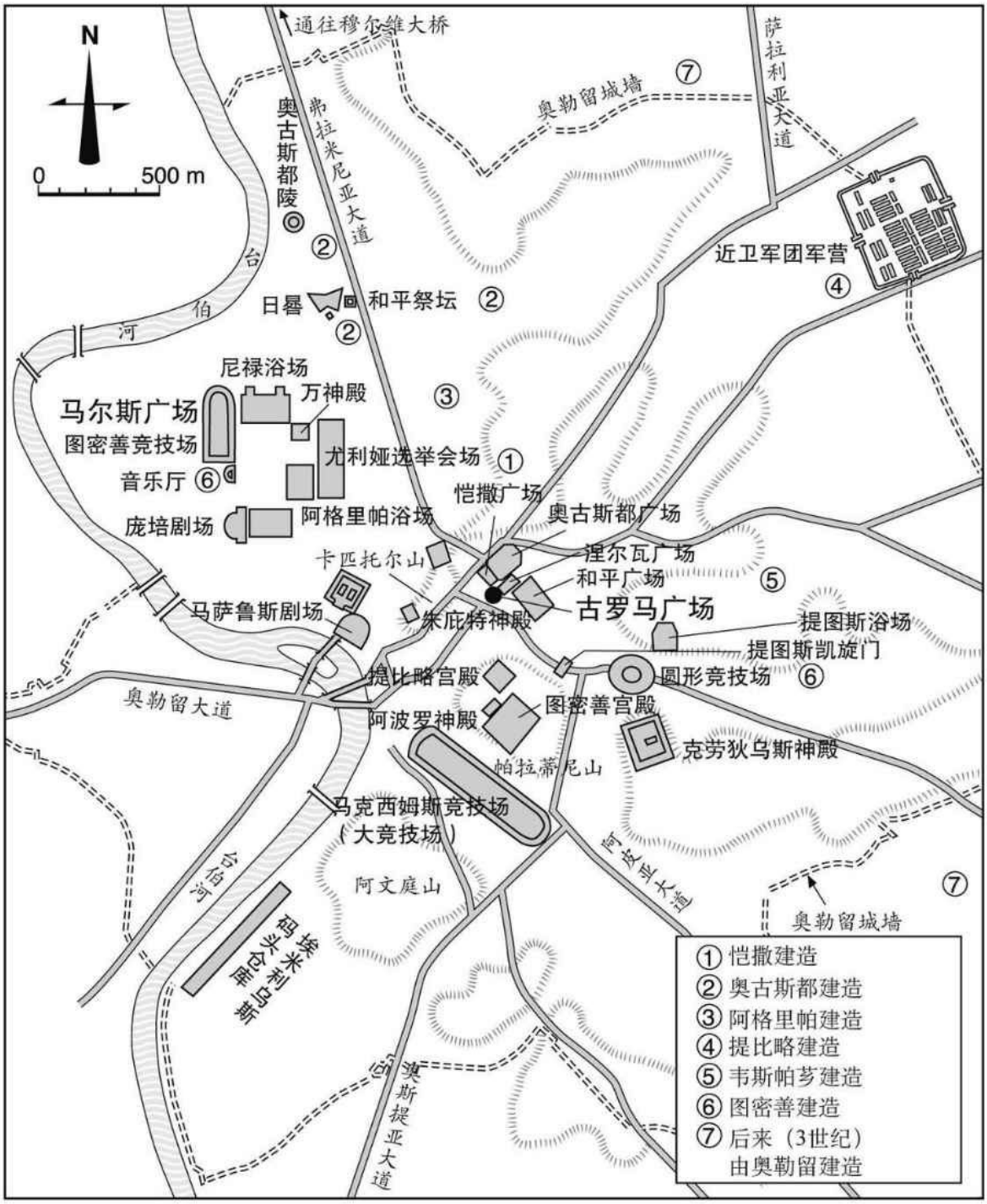
权力者能够保持权力，有不少时候是因为没有可以取代的人，所以只能勉强维持。换句话说，因为后继无人，所以陷入功能不调的既有统治阶级才能依旧保持权力。结果就会造成共同体本身无法停止衰退，最后走向灭亡。也就是说，没有接过接力棒的人才一直跑，最后倒在跑道上死去。

笔者认为罗马的历史与此不同，国政的任务是管理国家，和较量体力为目的的接力赛跑还是不一样的。在前者的情况下，必须由现在正在赛跑的人自己来选择下一个人选，因为权力也包括后继人选的决定权。罗马的历史与接力赛跑的相似之处在于，现在拥有权力的人会积极任用并培养替代自己的人。

众所周知，韦斯帕芗以前是提比略门下的人。图拉真的父亲得到了韦斯帕芗的任用，他自己则是被图密善提拔起来的。尤里乌斯·恺撒也广泛任用行省出身的人，奥古斯都则在帝国管理上利用了骑士阶级这个罗马社会的第二阶层。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任用了有资质的后起之秀，并将他们培养为了接力的主力，也就是领导者阶层。

当然，他们也是因为自己在进行统治时需要帮手，才任用新的人才，给予他们成长机会的。但是，对于人来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为自己做的事情同时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也有益，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因此，不管是私人利益等于公共利益也好，还是像克劳狄乌斯皇帝实行的开放国门（参见《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没有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也好，问题不在于动机而在于结果。从结果来看，不得不承认罗马的领导者们在下一代领导者的培养上是很成功的。毕竟现在已经有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登场了。尤里乌斯·恺撒和克劳狄乌斯

皇帝比任何人都积极任用行省出身的人才，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会说些什么呢？



公元98年时的罗马市区

附录

一位罗马诗人的生与死

马尔库斯·瓦莱里乌斯·马提雅尔（M. Valerius Martialis）于公元40年前后在西班牙北部出生。出生地比尔比利斯是夹在萨拉戈萨和托莱多之间位于罗马大道沿线的小城镇，位于萨拉戈萨西南100公里处。和同为西班牙出生的教育家昆体良的出生地卡拉奥拉也仅隔100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位诗人在那里完成了初等、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可能是在行省塔拉戈纳的首府塔拉戈纳完成的。既然他能够接受这么高水准的教育，就算家境不算富裕，至少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名年轻的野心家在24岁的时候为了出人头地来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在共和政体时代，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意大利地方出生的人为了取得成功曾来到过罗马，到了帝政时代，这种倾向扩展到了帝国全境，想出人头地的人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来到罗马。西班牙人马提雅尔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尼禄时代已经有塞内加这样的西班牙出身的文人大放异彩过了。

虽然来到了“世界的首都”，但是马提雅尔既不像塞内加那样是元老院议员的儿子，也不是游手好闲仍然可以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他必须自己去赚取生活费。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只要有打算就可以成为昆体良那样的教师，或是应征帝国首都不断需要的国家公务员，还可以像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那样做一名律师。然而，马提雅尔并没有“那种打算”，他打算靠写作为生。不过古代不承认著作权，如果能写出畅销作品，出版商当然欢迎，以后出版作品也会变得更容易，但是收入不会随着销量升高而增加。于是这名诗人决定寻找赞助人。但是公元1世纪后半期没有像曾经援助过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梅塞纳斯这种富于同情心的赞

助人。另外，马提雅尔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存在着让权力者和富人不便施与赞助的内容。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维吉尔和贺拉斯擅长创作庄重宏大的叙事诗和歌颂众神的祭祀歌，马提雅尔的作品特点却在于以机智和讽刺性的幽默将现实的人生展现给读者。与维吉尔和贺拉斯的“厚重”文学相反，马提雅尔的文学被世人评价为“轻薄”的文学。

马提雅尔在文学史上被视为“epigram”的高手，“epigram”本来是从墓志铭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形式。“epigram”虽然已经跳出了墓志铭的范畴（英语的墓志铭一词为“epigraph”），但还是一种短诗形式的文体。所以很多人将其意译为“警句”或“讽刺诗”。至于长度，通常为10行以内，也有以3行结束的情况。不管怎样，这种文体形式都是由最后一行来决定的，所以“epigram”的创作出人意料地难。只要读一读马提雅尔创作的几段“epigram”，就可以理解罗马时代的“讽刺诗”是什么。

致律师涅乌鲁斯

不知为何只有在旁听席喧闹的时候，你才会抬高你的声音。涅乌鲁斯，你是律师吗？还是个讼棍？在这种喧闹中无论你怎么抬高声音，别人也无法判断你到底是律师还是讼棍。

可是，现在旁听席安静下来了。涅乌鲁斯，你现在说话吧！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真正的本事。

致批评家雷利乌斯

不出版自己的作品，却只知道批评我的作品的雷利乌斯啊，你能不能停一停？先让人们看看你的作品再谈别的。

致法布鲁斯

真是不错，你在昨晚的宴会上给客人们喷的香水。但是说到菜品，只够喂饱一只小鸟的。

确实是很有排场的款待啊！一边被香水的气味包围，一边忍受

着饥饿。不过我的朋友，身上全是不能吃的香水味，在我看来就跟洒满香料的木乃伊一样。

致三流医生

你以前是个眼科医生，现在以角斗士为生。不过你现在在竞技场做的事情就是以前在治疗室所做的。

这样看来，上流阶级为了顾及体面当然不会赞助这种文人了。来到罗马的20年中，赞助马提雅尔的似乎都是些不懂文学的新兴富人。就算他能依靠这种赞助继续维持生活和创作，赞助的金额也相当微薄，他一直在一间借来的集体住宅的三层房间中居住，这种境遇一直没有改变。这种公寓被称为“因斯拉”（一种鸟的名字），楼层越高租金越便宜。尽管如此，马提雅尔的创作热情丝毫没有减退，这位“epigram”的高手的决心非常坚定。他的作品似乎在遥远的不列颠也被广泛阅读，从如下一段，可以得知他后来成为了畅销作家。

致弗拉库斯

很多人对我说，庄重悲壮的文学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赞赏和崇拜。我当然也知道，但是我的文学首先是受广大群众欢迎的。

成为马提雅尔赞助人的是皇帝图密善。

如前所述，教育家昆体良和讽刺诗作家马提雅尔都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行省。昆体良仅年长3岁，所以可以视为同龄人。图密善比马提雅尔年轻11岁，和昆体良有十四五岁的差距。

虽然出身行省，但昆体良是教职人员，根据恺撒的法律，教师和医生无论出身何处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所以他们也被授予了公民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免交直接税。

然而，马提雅尔不喜欢从教，所以即使在罗马住了20年，身份依然是行省人民，没有权利得到《小麦法》规定的每天1公斤的免费小麦，也无法免费欣赏只要出示证明书就可以自由入场的圆形竞技场和其他竞技场举行的表演，因为两者都是只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才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总之，马提雅尔的身份一直是居住在罗马的异国人。

如前所述，皇帝图密善每年支付昆体良10万塞斯特斯，委托他为教授辩论和修辞的教师们撰写《雄辩术原理》课程。但图密善给马提雅尔提供的待遇没有这么正式。皇帝和讽刺诗作家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赞助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马提雅尔是畅销书作家，所以在出版方面不需要帮助。这位比皇帝大11岁的西班牙诗人所希望的与皇帝的关系是，在皇宫里和皇帝共同进餐，并经常随同皇帝前往阿尔巴和奇尔切奥的别墅。有趣的是，皇帝图密善居然能同时充分利用严谨的教育家和喜欢恶作剧的讽刺诗作家两个人。昆体良还被委托教育两名年幼的皇位继承人，马提雅尔则是皇帝的聊天对象。并不是因为这位讽刺诗人的拉丁语不如昆体良，马提雅尔的拉丁语非常好，问题在于使用拉丁语所表现的内容。马提雅尔自己也曾写到，自己作为作家的读者群不是孩子和处女，而是面向成年人的。也就是说，马提雅尔关心的不是人“应有的样子”，而是“现在的样子”。

没有确切的史料表明皇帝向这位讽刺诗人支付过年金。不过图密善不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了行省出身的马提雅尔，还让他跻身骑士阶级。要成为在罗马社会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至少需要拥有40万塞斯特斯的资产，但借住在公寓中的诗人肯定没有这么多钱，所以可以说这也是皇帝赠与的。另外，在这个时期，马提雅尔买了一幢有小庭院的住宅，这幢住宅的购买资金应该也是图密善相赠的。不管怎样，年轻内向、喜好独自散步的图密善确实喜欢在闲暇的时候与这名以犀利的警句引人苦笑的“epigram”作家一起度过。这位诗人曾经给皇帝写过这样的讽刺诗：

致恺撒·图密善

皇帝啊，现在送给你我的第五卷作品。在书中我讽刺了所有出现的人，他们大概对此不会有什么不满。不仅没有不满，甚至还会高兴。因为正是被我写入书中，他们才能为世人所知，托我的福，他们获得了永生。

但是，你可能会说，虽然知道你的作品广受欢迎，不过你能得到什么报酬呢？

挣多少钱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我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也许正是这种率直合了图密善的胃口。这位诗人还向皇帝提出了要求：

致恺撒·图密善

在你统治的这条罗马大道中，我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但是房子位于一处狭窄深谷对面的高台上，经常缺水。马尔奇亚水道的大量水源就在附近，我甚至能听见流动的声音，自己家里却像一滴水都没有的沙漠。鉴于这种现状，请皇帝陛下赐予寒舍水源。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对于我来说就像朱庇特神殿得到神灵赐予的降雨一样。

独门独户的房屋可以申请付费接通水道到自己家，也许水道局的技术工人马上来到马提雅尔的家中，利用技术弥补地形的不利，为他装上了水道。总之，这是皇帝的命令，只是没有留下确切的史料可以证实。

致恺撒

（“Imperator”是士兵们对皇帝的称呼，“奥古斯都”则过于庄重，所以一般称皇帝为“恺撒”。）

恺撒啊，如果你的手头有我的作品，请一定读一读。我保证世界统治者的严肃面孔会缓和下来，深深刻在眉间的皱纹会消去。就连凯旋仪式上也允许人们开玩笑，凯旋将军被士兵们嘲笑两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所以请一定读一读我所写的字句。

你不是一个拒绝玩笑和幽默的人。托您检阅（图密善就任终身财务官的谐音）的福，我以后只能用一些无伤大雅的表达了。

没错，我的书中可能充满了淫秽、戏谑的字句，但我作为一名作家灵魂是健全的！

公元96年9月18日，这位快意诗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皇帝图密善被暗杀了。取而代之的皇帝涅尔瓦禁止复仇行为，所以和先帝关系亲密的马提雅尔的生活免于了危险。不过他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于是诗人打算投靠涅尔瓦，发表了题为“所有的恐怖与图密善一起消失，自由、幸福和美德归来”的一首诗，试图讨涅尔瓦的欢心，获得资助，结果却失败了。风度翩翩的涅尔瓦根本不会考虑资助这名品格欠缺的“epigram”作家。过了没多久，涅尔瓦去世，皇帝变成了图拉真。他又对图拉真作了同样的尝试，但图拉真专心于与达契亚人的战争，很少回到首都。并且图拉真皇帝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诗人这种职业。

到了公元98年，马提雅尔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他的年龄已经接近60岁。和图密善的关系过于有名，所以没有人愿意资助这个和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人物走得太近的人。

诗人回到了故乡西班牙，并得到了同乡一名有钱的女性读者资助的住房和生活费。这位一直单身的“epigram”高手也终于决定结婚了。

小普林尼以旅费的名义赠与时隔34年后离开罗马回到故乡的马提雅尔一些钱。他们虽然同为文人，但无论性格、作风、出身还是经济状况都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不过小普林尼不像塔西佗那样排斥所有与自己想

法不同的人，他具有开明的精神，性格也非常稳重，对于马提雅尔能够不持有社会和文学上的偏见。

但是，虽然在故乡西班牙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但作家视为生命的创作动力却减退了。马提雅尔的创作源泉来自现实的人生，自从他离开了饱受他嘲弄、鱼龙混杂、善恶并存的国际都市罗马后，便失去了能够公开宣称自己“作为作家的灵魂健全”的创作意愿，大概是乡下的生活过于安逸了。乡下没有创作者所需的“毒素”，这种毒素只有大都市才有。不过他还是接受小普林尼的劝告，出版了《讽刺诗》的第12卷，只是其中的内容大多都是罗马时代创作的作品的集成。作家的灵魂一去不复返，他也再没有回到罗马，在慨叹失去了罗马给予自己的一切之后，这名诗人于公元102年与世长辞，时间是图密善被暗杀的6年后。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被首都的显要人物遗忘的马提雅尔，是因为小普林尼给朋友写的一封信。信中这样说：

> 富于创意、强烈激昂、酸甜苦辣应有尽有，只是少了一份天真，这就是马提雅尔和他的诗。

这段评论尖锐并且很到位。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认为这种无聊的作品会马上销声匿迹，相反，马提雅尔创作的“epigram”在2000年后的现代依然流传着。如果有好的译本，建议各位读一读。就算为了让暂时严肃的脸庞变得缓和，让刻在眉间的皱纹消去吧！最后再引用一段马提雅尔的诗：

致博斯特姆斯

> 你说从明天开始享受人生？那太迟了，博斯特姆斯。应该从今天开始享受。不，从昨天开始就享受人生才是更聪明的生活方式。

大事年表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宗主国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0		尼禄任命加尔巴为西班牙东北部塔拉戈纳行省的总督		
62			韦斯帕芗被任命为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	
65				这一年，贵霜王朝的丘就却入侵印度西北部
66			6月，以犹太长官弗洛鲁斯没收耶路撒冷大神殿的17塔兰特金币为导火线，爆发了叛乱。犹太激进派决定对弗洛鲁斯采取强硬措施，屠杀了罗马守备队全体成员。马萨达要塞落入激进派手中。到秋天为止，反罗马的暴动扩大到犹太西部和南部。各地的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对立激化。11月，叙利亚总督塞斯提乌斯率领的罗马军攻打耶路撒冷失败，在撤退中惨败于犹太军。尼禄命令韦斯帕芗负责镇压犹太叛乱	
67		尼禄将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召至希腊，命其自裁，任命穆奇阿努斯接替其职位	5月，韦斯帕芗开始进军。7月，尤塔帕塔陷落	（中国）在洛阳城西修建白马寺
68	元老院通过决议，宣布尼禄为“国家公敌”。**近卫军团决定推举加尔巴为“皇帝”**（Imperator）。6月9日，尼禄自刎，终年30岁。秋，加尔巴偕同奥托进入罗马。加尔巴指定维尼乌斯与自己共同担任次年的执政官	高卢行省总督温德克斯起兵反抗尼禄。初夏，塔拉戈纳行省总督加尔巴被军团兵推举为皇帝。温德克斯表态支持加尔巴。卢西塔尼亚行省的奥托也表态支持加尔巴。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鲁弗斯被加尔巴解职，召回罗马，由弗拉库斯接替。维特里乌斯被任命为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反加尔巴的势头兴起	夏，罗马军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包围耶路撒冷。由于尼禄驾崩，正在镇压犹太的罗马军队暂且停战。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携带韦斯帕芗和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效忠加尔巴的宣誓书前往罗马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宗主国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9	1月1日，皇帝加尔巴和心腹维尼乌斯就任执政官。1月上旬，加尔巴指定皮索为自己的继承人。1月15日，奥托设计暗杀了加尔巴，同时维尼乌斯和皮索也被杀死。**奥托得到近卫军团的支持，就任皇帝，元老院也给予承认**。奥托为了阻止日耳曼军团南下，向维特里乌斯提出共享皇位的建议，被一口拒绝。3月初，皇帝奥托出动1.3万名士兵迎击席西纳军，坚守波河南岸的要地皮亚琴察。席西纳军人驻波河北岸的要地克雷莫纳。奥托军在波河北岸包围席西纳军的计划失败，使得席西纳和瓦伦斯两军成功会合。4月15日，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开始。维特里乌斯军击败奥托军，奥托自刎，终年37岁。**4月16日，元老院承认维特里乌斯接任“第一公民”**。5月15日，新皇帝维特里乌斯到达意大利北部。解雇了奥托一派的所有近卫军团成员，起用“莱茵河军团”的士兵接手近卫军团。命令奥托一派的其他军团的士兵全部返回原来的服役地点。5月24日，维特里乌斯到达克雷莫纳，视察贝特里亚库姆的战场。7月18日，维特里乌斯和手下的6万武装部队进入罗马。10月24日，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开始	1月1日，负责防卫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在美因茨通过决议，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加尔巴，表明了反加尔巴的态度。1月2日，该军团撤回前日决议中“委托元老院全权决定‘第一公民’人选”的要求，决定拥立维特里乌斯。维特里乌斯一派的日耳曼军团总数十万人，分三军开始南下，席西纳、瓦伦斯、维特里乌斯各领一军。防卫多瑙河的7个军团表态支持奥托。为阻止席西纳军和瓦伦斯军会合而前往法国南部迎击瓦伦斯军的奥托一方的一个军团全军覆没。维特里乌斯将奥托一派的各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处以死刑，命令原奥托军的士兵在克雷莫纳修建圆形竞技场。夏，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人与莱茵河一带的日耳曼裔部族一起起兵反抗罗马。奇维里斯收编莱茵舰队。9月，安东尼·普里默斯率领“多瑙河军团”起兵支持韦斯帕芗，没等穆奇阿努斯到达便向西进军。达契亚人趁多瑙河军团转移的机会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被穆奇阿努斯击退。之后，穆奇阿努斯重新西进	提图斯在希腊的科林斯得知加尔巴死亡、奥托登基和维特里乌斯起兵的消息后，向罗马派遣使者表示支持奥托，自己返回东方。6月，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拒绝了“多瑙河军团”推举自己称帝的建议，推举韦斯帕芗为皇帝。6月末，韦斯帕芗、穆奇阿努斯、亚历山大三人在贝鲁特举行会谈。三人一致赞同确保兵源、兵器、军需资金的三项举措，重新确认了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帝国东方的全部军团和各同盟国明确了反维特里乌斯的态度。穆奇阿努斯率领军队前往意大利，韦斯帕芗在埃及待机。亚历山大随同提图斯前往犹太为犹太战争做准备。7月初，驻扎在埃及、犹太、叙利亚的各军团和小亚细亚各行省的驻屯部队推举韦斯帕芗为皇帝。各同盟国的国王纷纷表示支持韦斯帕芗登基	（中国）后汉的王景治理黄河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宗主国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69	维特里乌斯一派的“莱茵河军团”和韦斯帕芗一派的“多瑙河军团”发生激战，“莱茵河军团”大败，克雷莫纳镇化为废墟。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逃往罗马。普里默斯率领的“多瑙河军团”渡过波河，经由艾米利亚和弗拉米尼亚两条大道前往首都罗马。12月15日，为阻止“多瑙河军团”靠近而悲伤的维特里乌斯一派士兵投降。12月16日，罗马的维特里乌斯宣布退位。12月19日，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被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用火把烧毁。12月20日，罗马爆发巷战。维特里乌斯在古罗马广场被杀死，终年54岁。**12月21日，韦斯帕芗开始实质上的统治**。12月下旬，穆奇阿努斯进入罗马。维特里乌斯的弟弟卢西乌斯在泰拉奇纳败给罗马军，被处以死刑。《韦斯帕芗皇帝法》颁布	席西纳率军北上，在拉韦纳劝说“莱茵河军团”起兵反抗维特里乌斯没有成功，被投入大牢（后来被韦斯帕芗一派的士兵释放）。瓦伦斯在法国南部试图重组维特里乌斯军，但是被支持韦斯帕芗的高卢人抓获（之后被处死）。奇维里斯攻打罗马军团的克桑腾基地。西班牙和不列颠的五个军团表明支持韦斯帕芗。“莱茵河军团”得知维特里乌斯军败北的消息后发生混乱，杀死了司令官弗拉库斯。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对美因茨的莱茵河军团基地发动袭击，最后被击退。奇维里斯与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裔高卢人的领导者在科隆举行会谈，决定创建“高卢帝国”。沃克勒前去救助被包围的克桑腾，却在诺伊斯被杀害。诺伊斯军团基地的罗马士兵被强迫向奇维里斯的“高卢帝国”效忠。克桑腾、美因茨也步其后尘，莱茵河沿岸的所有军团基地皆落入叛军手中		
70	1月1日，元老院承认韦斯帕芗为“第一公民”。穆奇阿努斯决定投入9个军团镇压“高卢帝国”。穆奇阿努斯开始重建朱庇特神殿。10月，韦斯帕芗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	高卢裔高卢人决定不加入“高卢帝国”。春，罗马军从意大利、西班牙和不列颠三个方向开始向莱茵河进军。凯利亚里斯率领罗马军攻打特里尔。日耳曼裔高卢人重新支持罗马。秋，叛乱终结。“高卢帝国”覆灭	春，提图斯指挥的罗马军在耶路撒冷城下布阵，开始攻打耶路撒冷。8月10日，耶路撒冷大神殿被烧毁。9月26日，耶路撒冷陷落	
71	结束犹太战争胜利凯旋的提图斯就任近卫军团的长官。韦斯帕芗着手修建圆形竞技场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宗主国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73	韦斯帕芗和提图斯就任财务官，实施国情调查。采取大幅增加税收的政策		马萨达要塞陷落	
74				（中国）班超出使西域
79	6 月 24 日，韦斯帕芗去世，享年 70 岁。**提图斯继承帝位**。8 月 24 日，维苏威火山大喷发，庞贝等城市湮没，死者不计其数。老普林尼去世。提图斯前往受灾地，在救灾指挥部坐镇指挥			
80	罗马市中心发生大火。韦斯帕芗修建的圆形竞技场完工			
81	意大利全境发生瘟疫，大批平民死亡。提图斯成立救灾委员会。9 月 13 日，提图斯去世，终年 40 岁。**9 月 14 日，弟弟图密善继承帝位**。图密善在此后的 15 年统治期间，修建了图密善竞技场等大量公共设施，完善了首都罗马的基础设施建设			
83	秋，图密善就任财务官	图密善着手修建日耳曼长城，并镇压了对此表示反抗的高卢地区的加利蒂人		
84		冬，在不列颠前后征战七年的总督阿格里科拉领命回国，征服苏格兰的军事行动一时中断		
85	春，图密善就任终身财务官	晚秋，达契亚人跨越多瑙河入侵南岸。前去迎击的罗马军大败，担任指挥官的米西亚行省总督萨比努斯战死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宗主国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86		图密善偕同近卫军团长官弗斯库斯前往多瑙河前线。罗马军在与达契亚人的第一战中获胜，将达契亚人赶回了多瑙河北岸。图密善返回罗马。罗马军在第二战中大败，弗斯库斯战死		
87			亚细亚行省总督凯利亚里斯因策划反叛图密善而被处死	
88		尤里阿努斯率领罗马军在多瑙河北岸大胜达契亚人		
89		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图尼努斯发动叛乱被镇压。驻扎在西班牙的第七军团的长官图拉真被任命为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在此前后，多瑙河中游一带的三个日耳曼裔部族起兵反抗罗马。罗马与达契亚人缔结和平协定。罗马军大胜三部族		班超出任西域都护（公元 91 年）
95	受图密善委托，教育家昆体良撰写《雄辩术原理》（次年刊行）			
96	9 月 18 日，图密善被暗杀，终年 44 岁。**元老院承认涅尔瓦为皇帝**。元老院决定对图密善实施“记录抹杀刑”			
97	10 月，涅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继承人			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
98	图拉真就任执政官。1 月 27 日，涅尔瓦去世，享年 71 岁。**图拉真继承帝位**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为方便读者查阅，也将翻译的著作列入）

塔西佗（公元56—120年）

《年代记》（上、下），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1981

《日耳曼尼亚阿古利可拉》，国原吉之助译，筑摩学艺文库，1996

《同时代史》，国原吉之助译，筑摩书房，1996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69—122年以后）

《罗马皇帝传》（上、下），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1986

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

《普林尼博物志》，大槻真一郎编，八坂书房，1994

小普林尼（公元61、62—113年）

《普林尼书简集》，国原吉之助译，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

昆体良（公元35—96年以后）

《辩论术理论》，西洋古典丛书第III期11，森谷宇一等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

马尔提阿里斯（公元38年到41年间—102年）

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公元37、38—100年）

《犹太战记1 · 2》，新见宏译，山本书店，1975—1981

《犹太战记3》，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82

《犹太古代志》（全11卷），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9—1984

《驳斥阿比安》，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7

《自传》，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8

卡西乌斯·狄奥（公元150—235年）

二、日文资料

《庞贝灭亡之日》，金子史朗，原书房，1988

《马萨达》，Y. 亚丁，田丸德善译，山本书店，1975

《庞贝》，浅香正，芸舛堂，1995

《西塞罗选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9

三、后世撰写的历史书、研究专著

ABBOTT, F.F. & JOHNSON, A.C.,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1926.

ALFÖLDI, A., *The Moral Barrier on Rhine and Danube*,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ANDERSON, J.G.C., *The Road System of Eastern Asia Minor*,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JHS)》 17, 1897.

ARIAS, P.E., *Domiziano: Saggi e ricerche No. 9*, Catania: G. Crisafulli, 1945.

BACHRACH, P. & BARATZ, M.S.,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1962.

BALLANTI, A., *Documenti sull'opposizione degli intellettuali a Domiziano*, 《Ann. Fac. Lett. Napoli》 4, 1954.

BERETTA, I., *La romanizzazione della valle d'Aosta*, Milano-Varese, 1954.

BERSANETTI, G.M., *Vespasiano*, Roma, 1941.

BIRLEY, E.B., *Th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41-54, Durham 1952;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 Britain after Agricola and the End of the Ninth Legion & Britain under the Flavians: Agricola and His Predecessors,*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Kendal, 1953; *Senators in the Emperor's Servic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39, 1953.

BLAU, P.,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BRAND, C.E., *Roman Military Law,*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BREEZE, D.J.,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egion: The First Cohort and the Equites Legioni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 59, 1969.

BROGAN, O., *The Roman Limes in Germany,* 《Archaelogical Journal》 92, 1935.

BURN, A.R., *Agricola and Roman Britain,* London, 1953.

BURR, V., *Tiberius Iulius Alexander,* 《Antiquitas》 I, Bonn, 1955.

BURY, J.B., *A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its Foundations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27 a.C.-180 d.C),* London, 1913.

BUTLER, R.M., *The Roman Walls of Le Mans,* 《JRS》 48, 1958.

CAGNAT, R., *Les Frontières militaires de l'empire romain,* 《Journal des savants》, 1901; *Le colonie romaine de Djemila,* 《Mus. B.》 27, 1923.

CANTARELLI, L., *La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Studi Romani e Bizantini》, Roma, 1915.

CASSON, 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CAVAIGNAC, E., *Les Effectifs de l'armée d'Auguste,* 《Revue des èetudes latines》 30, 1952.

CHARLESWORTH, M.P., *Trade Routes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CHEVALLIER, R., *Rome et la Germanie au 1er siècle: Problèmes de colonisation,* 《Latomus》 20, 1961.

CHILVER, G.E.F., *The Army in Politics A.D.68-70,* 《JRS》 47, 1957.

COLINI, A.M., *Stadium Domitiani,* Roma, 1943.

COLLINGWOOD, R.G., *The Archaeolog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30.

CROOK, J.A., *Consilium Principis,* Cambridge, 1955.

FABRICIUS, E., *Der Obergermanisch-rätische Limes des Römerreiches.*

FORNI, G.,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Università di Pavia, Milano-Roma, 1953;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Athenaeum》 36, 1958-59; *Limes*, 《Dizionario Epigrafico》 4;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II-1.

FORTINA, M., *Un generale romano del primo secolo dell'impero*, C. Licinio Muciano, Novara, 1955; *L'imperatore Tito*, Torino, 1955.

FRANK, 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Baltimore, 1927.

FRERE, S.S.,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67.

FROVA, A., *The Danubian Limes in Bulgaria and Excavations at Oescus*,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GARZETTI, A.,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vol.6, Bologna, 1960.

GROSSO, F., *Tendenziosità dell'Agricola*, Genova, 1954.

GSELL, S., *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Domitien*, Paris, 1894.

HAMMOND, M.,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Roman Emperor from the Death of Nero in A.D. 68 to that of Alexander Severus in A.D. 235*, 《Memoirs of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4, 1956; *Composition of the Senate, A.D. 68-235*, 《JRS》 47, 1957.

HARMAND, L.,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C.à 235 ap. J.C)*, Paris, 1960.

HARRER, 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Syria*, 《Dissertation, Princeton》, 1915.

HATT, J.J., *Histoire de la Gaule romaine*, Paris, 1966.

HAVERFIELD, F., *Military Aspects of Roman Wales*, London, 1910.

HAVERFIELD, F. & MACDONALD, G., *The Roman Occupation of Britain*, Oxford, 1924.

HENDERSON, B.W., *Five Roman Emperors: Vespasian, Titus, Domitian, Nerva, Trajan, A.D. 69-117*, Cambridge, 1927.

HOGARTH, D.B. & MUNRO, J.A.R., *Modern and Ancient Roads in Eastern Asia Minor*, 《Supp. Papers of the Roy. Georg. Soc.》 3, 1893.

HOMO, L., *Une leçon d'outre-tombe: Vespasien financier*, 《Revue des Ètudes Anciennes》 42, 1940; *Vespasien, l'empereur du bon sens*, Paris, 1949.

KAHRSTEDT, U., *Domitians Politik zwischen Donau und Main*, 〈Bonner Jahrbücher〉 145, 1940.

KLOSE, J., *Roms Klientel-Randstaaten am Rhein und an der Donau*,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14, Breslau, 1934.

KRAFT, K., *Zur Rekrutierung der Alen und Kohorten an Rhein und Donau*, Bern, 1951.

KRUEGER, P., *Codex Justinianus*, Berlin, 1915.

LANCIANI, R., *Forma Urbis Romae*, Roma, 1989

LAST, H.,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1, 1936.

LAUR-BELART, R.,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LEMOSSE, M., *Le Régime des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 haut-empire romain*,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droit romain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23, Paris, 1967.

LEVI, M.A., *La Politica estera di Roma antica*, Milano: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1942; *La clemenza di Tito*, 〈Par. Pass.〉 9, 1954; *La legge dell'iscrizione CIL VI, 930*, 1958.

LUGLI, G., *La villa di Domiziano sui colli Albani*, 〈Bull. Comm. Arch.〉 45, 1918; *Nuove forme dell'architettura romana nell'età dei Flavi*, 〈Atti 3º Convegno naz. di st. dell'Architett.〉, Roma, 1939.

MacDONALD, sir G., *The Roman Wall in Scotland*, Oxford, 1934.

MANFRÈ, G., *La crisi politica dell'anno 68-69 d.C.*, Bologna, 1947.

MANN, J.C.,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MANNI, E., *Lotta politica e guerra civile nel 68-69 d.C.*, 〈Riv. Fil.〉, 24, 1946.

MARSDEN, E.W.,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MATTINGLY, H., *British Museum Catalogue of the Coins of the Roman Empire vol.2*, London, 1930; *Vol.3*, London, 1936.

MATTINGLY, H. & SYDENHAM, E.A.,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vol.2*, London, 1926; *Vol.3*, London, 1930.

MICHEL, A., *Tacite et le destin de l'Empire*, Paris, 1966.

MILNE, J.G., *Catalogue of Alexandrian Coin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32.

MOMIGLIANO, A.,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55; *Terz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6; *Ricerche sull'organizzazione della Giudea sotto il dominio romano (63 a.C. - 70 d.C.)*, Amsterdam: A.M. Hakkert, 1967; *Quar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9.

MOMMSEN, Th., *Römisches Staatsrecht, vol.5*, Leipzig, 1887-88.

MUNRO, J.A.R., *Roads in Pontus, Royal and Roman*, 〈JHS〉 21, 1901.

NEWTON, H.C., *The Epigraphical Evidence for the Reigns of Vespasian and Titus*, 〈Cornell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6, 1901.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58.

PASSERINI, A., *Le Coorti Pretorie*, Roma, 1939; *Le due battaglie presso Betriacum*, 〈St. Ant. Class. offerti a E. Ciaceri〉, Roma, 1940.

PIGANIOL, A., *La Notion de Limes*,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LATNER, S.B.,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29.

RACHET, M., *Rome et les Berbè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ollection Latomus〉 110, Bruxelles: Latomus, 1970.

RAMSAY, A.M., *The Speed of the Roman Imperial Post*, 〈JRS〉 15, 1925.

RITTERLING, E., *Zu den Germanenkreige Domitians am Rhein und an der Donau*, 〈Jahreshefte〉 7, 1904.

ROMANELLI, P., *La Cirenaica Romana 96 A.C. - 642 D.C.*, Verbania: A. Airoldi, 1943.

ROSTOVTZEFF,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Impero Romano*, Firenze, 1933.

SCHLEIERMACHER, W., *Römische Archäologie am Rhein 1940 bis 1950*, 〈Historia〉 2, 1953.

SCHÖNBERGER, H.,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JRS〉 59, 1969.

SOLARI, A., *La Crisi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Soc. Ed. Dante Alighieri, 1933; *Il Rinnovamento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Soc. Ed. Dante Alighieri, 1938.

STARR, C.G. J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 - A.D. 324*, 〈Cornell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2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1.

SYME, R., *Rhine and Danube Legions under Domitian*, 〈JRS〉 18, 1928; *The Impe-*

rial Finances under Domitian, Nerva and Trajan, 《JRS》 20, 1930; *Notes sur la légion III Augusta,*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38, 1936;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Tacitu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The Lower Danube under Trajan,* 《JRS》 49, 1959.

SZILÁGYI, J., *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épondér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ères de l'émpire roma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 1953.

THOMPSON, E.A.,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TOUTAIN, J., *L'origine historique des grandes cités rhénanes,* 《Mémorial d'un voyage d'études en Rhénanie de la Societe Nationale des Antiquires de France》, Paris, 1953.

TREU, M., *M. Antonius Primus in der taciteischen Darstellung,* 《Würzburger Jahrbücher für die Altertumswiss》 3, 1948.

TURNER, E.G., *Tiberius Iulius Alexander,* 《JRS》 44, 1954.

VAN BERCHEM, D., *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76, no.302, 1955.

VAN SICKLE, C.E., *The Repair of Roads in Spain,* 《Classical Philology》 24, 1929.

WALTON, C.S., *Oriental Senators in the Service of Rome,* 《JRS》 19, 1929.

WATSON, G.R.,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8, 1959;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69.

WHITE, 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s after Two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WILKES, J.J., *Dalmatia: Histor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ZANCAN, P., *La crisi del Principato nell'anno 69 D.C.,* Università di Padova, 《Pubblicazioni della Facoltà di Lettere e Filosofia》 16, Padova, 1939.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IX

贤君的世纪

[日] 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这是一个罕见的幸福时代
罗马三位贤君展现出优秀领导者的多样风貌
堪称后世明君的典范

如何创造一个黄金世纪
需要贤明的君主，完备的制度
或是强盛的军队？
罗马贤君，如何再现罗马荣光？

王石 王巍 |作序|

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日）盐野七生著；计丽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86–3610–8
I. ① 罗… II. ① 盐… ② 计… III. ① 古罗马－历史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873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Ⅸ : Kentei No Seik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0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

[日] 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第一章 皇帝图拉真
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
第三章 皇帝安敦尼·庇护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纵览整部罗马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在共和制时代处于快速发展期，到元首制时代进入平稳发展期，直至后期帝制时代开始走向衰退。公元1、2世纪被认为是元首制时代，其中后一个世纪又被称做“五贤帝时代”。个中缘由只要看看货币就会明白，而且一定会让你心悦诚服。这一时期的金、银、铜币，首先，质量上乘，材质无可挑剔，金属含量高，丝毫没有辱没罗马帝国主要货币的名声。其次，铸造技术高超，能够体现出罗马历史上处于最鼎盛时期的技术水平。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国力的难道不正是货币吗？

几乎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中，都会说图拉真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版图最大。其实，在始于他的五贤帝时代的这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不仅仅是版图如此。在罗马，人们喝葡萄酒通常要兑水。如果不兑水直接饮用，会被说成酗酒。如果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提比略酗酒的话，那么，到了公元2世纪酗酒的皇帝

就是图拉真。也许，要做到名至实归的“至高无上的皇帝”，需要比常人有更充沛的精力，所以不得不直接喝纯葡萄酒。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在欧美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种普遍倾向：他们之所以关注作为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的皇帝，是因为这些皇帝对文学和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只看到了哈德良皇帝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哈德良远非只是这样一个人。

通过战争，图拉真使帝国拥有了最大的版图。继他之后成为皇帝的哈德良，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但凭这一点就让人感到其不一般的气魄。当然，哈德良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耗费了绝大部分时间巡视帝国的边境，为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遗余力。作为帝国最高权力者，他前往各地时不需要军队随行保护，这难道不是帝国天下太平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

他对于艺术的爱好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陈列于欧美博物馆中的希腊时代的雕像，大部分都是罗马帝国时代仿制的。但是，这些雕像

的制作质量之高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仿制。它们中的大多数仿制于哈德良时代。如果不是那个时代对仿制品质量要求极高，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精美的雕塑品。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对高质量的追求，才使得那时的能工巧匠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刻有哈德良皇帝肖像的货币做工极为精美，也从另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的制作工艺水平。在完成本书的写作后，我把这枚硬币做成了首饰。当然为了不引起他的不满，我找了一家技术最好的珠宝店。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图拉真皇帝喝葡萄酒时从不兑水。那时，哈德良年纪尚轻，总会陪伴他畅饮到最后。与前两位皇帝不同，安敦尼·庇护皇帝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凡事他都不会做得过于极端。在写这位皇帝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后来的英国乡绅形象。安敦尼·庇护皇帝行事中庸，也正因为如此，他是个缺少激情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后来的绅士们效仿的榜样。

图拉真皇帝不仅在多瑙河流域打过仗，也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作过战，因为连年征战，他不到64岁就离开了人世。哈德良皇帝为了到各地视察，足迹踏遍了帝国的疆域。与图拉真相仿，他去世的时候，年纪也不算老。与前两位皇帝算不上长的寿命相比，安敦尼皇帝的寿命算是长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从未离开过首都罗马，包括罗马的近郊；另一方面，他非常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在这一点上，他同样可以成为后来的大英帝国绅士们的榜样。让我们为以和平方式实行统治的安敦尼·庇护干杯！当然，我们饮用的酒要像古罗马上流社会人士喝的那样，是用

纯净之水兑出来的、醇香扑鼻的上等葡萄酒。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事实上，我现在非常困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想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

上罗马史课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塔西佗的优等生。为什么说他是优等生呢？因为对于教授提出的问题，在其他学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想法后，他提出的意见无论是其风格的简洁还是词汇选择的准确性，都好像他亲眼所见。他的描述非常有现场感，其见解远高于其他人。认为他是天才、向他脱帽表示敬意的不光有学生，连教授也不禁深表赞许，对他频频点头不已。

这时，坐在教室后面的我举手要求发言。我会说，如此这般的史实也都考虑进去的话，难道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与塔西佗的意见不同的见解吗？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他的《编年史》，我才得以完成《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这部作品；正是因为有他的《阿格里科拉传》和《同时代史》，才有了我的《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

暑假结束后回到学校，校园里却不见了这位优等生。问其他同学，说是因为他父亲的任职地调动，他已经转校。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时感到非常困惑。

在本书中，我要讲述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这三位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至161年。因为据说塔西佗是公元120年离世的，所以自然没有可能向他索要有关这三位皇帝统治情形的著作。但是，对于公元98年到117年图拉真皇帝的统治，只要他有心写，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对于写图拉真，塔西佗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同时代史》的内容

始于公元69年的内乱，虽然留存到现在的也只剩下对这一年的叙述，但是，这部作品很可能写到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被杀为止。因为在这部作品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 写完这部作品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想用我的晚年时光来书写神君涅尔瓦和皇帝图拉真。

遗憾的是，塔西佗没有兑现对读者的承诺。不是因为他封笔不再从事写作，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同时代史》后执笔写了《编年史》，讲述的事件始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去世，终于皇帝尼禄自尽，却没有去写涅尔瓦和图拉真。

历史学家塔西佗出生于公元55年，过世于公元120年。如果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他的一生与所处时代及其著作之间的关系，请详见下表。

塔西佗著作一览（年代全部为公元后）

拉丁语书名	汉译书名	涉及的年代	写作时期	当时在位的皇帝	写作时的年龄
Agricola	《阿格里科拉传》	40—93	98	涅尔瓦、图拉真	43岁
Germania	《日耳曼地方志》	至1世纪	97—100	图拉真	43—45岁
Historiae	《同时代史》	69—96	106—109	图拉真	51—54岁
Annales	《编年史》	14—68	115—117	图拉真	60—62岁

说明：公元55年出生并于公元120年去世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其担任公职生涯是这样的：在韦斯帕芗皇帝时代（69—79），他担任过相当于副军团长的大队长（Tribunus）；在提图斯皇帝时代（79—81），他当选过财务检察官（Quaestor）；在图密善皇帝时代（81—96），他当选过法务官（Praetor）；在涅尔瓦皇帝时代（96—98），他担任过候补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按惯例，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通常都会进入元老院。所以，塔西佗进入元老院，一定是在图密善皇帝时代，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30岁。
在那个时候，只要担任过执政官，即便是候补执政官，在经过10年的停职期后，等待他的应该是行省总督的职位。
但是，到了公元107年，塔西佗还是没有当选行省总督。他没有孩子。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防止人口减少”，制定过一项政策。政策规定，同等资格的候选人中，优先考虑有3个以上孩子的有过执政官经历的人。所以，很可能塔西佗就卡在这一点上了。但是，话虽如此，因为皇帝认可其能力而不受这条规定约束的事例也不少。所以，可以想象，对图拉真来说，尽管塔西佗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却不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行政官员。有意思的是，作为文人的塔西佗，在遭到他无情谴责的皇帝在位期间一次次地被启用任职，但在贤君图拉真皇帝在位期间，他却没有受到过什么重用。这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的才能的高低究竟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55岁前后到60岁出头是他写作的最佳时期。按照编年顺序来看的话，作为《同时代史》的续篇，塔西佗最有可能写的应该是涅尔瓦和图拉真，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最佳的年龄段里，他没有写这两位皇帝，而是选择了去写《编年史》呢？毕竟这部作品只能算是《同时代史》的前篇。

现代研究者中有人提出，也许因为记述尚在世的皇帝会有诸多不便。所以就算是塔西佗这样的学者，最终也选择了讲述已故皇帝们的故事。比塔西佗年轻一代的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罗马十二帝王传》也只从尤里乌斯·恺撒写到图密善，没有涉及涅尔瓦以后的皇帝。所以这一推测也许是有道理的。

塔西佗说过，完成《同时代史》的写作之后，如果还活着，打算写涅尔瓦和图拉真两位皇帝。就在同一个地方，塔西佗还写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少有的幸福时代，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无论作出怎样的评价，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都无须担心自身的安全。”然而，尽管如此，他终究没有下笔。也许是计划在写完起初并未打算写的《编年史》

后再写，但此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是在认真研究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的性格后所作出的推测。

执笔写历史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一、生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讲述受好奇心驱使而探究到的事情；

二、以史为鉴——让历史成为现在或将来的前车之鉴；

三、对于经受了痛苦磨难又在感情上难以自拔的同胞们怀有强烈的、充满悲愤的情绪。

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希腊人希罗多德，他是《历史》一书的作者。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国人吉本，他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大概只能首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为什么物质和精神都应该占优势的祖国雅典竟会败给斯巴达？作为一个雅典市民，修昔底德无法把自己心中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宣泄到写作以外的其他地方，于是就有了他所写的这部历史著作中的巅峰之作。

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这位罗马帝制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身上或许是融合了第二、第三两种类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种类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发自内心的愤怒来唤醒自身创作欲望的作家。

如此一来，我想既然他说图拉真时代是“少有的幸福时代”，那么他没有写图拉真时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测的依据。尽管塔西佗总在批评自己的同胞，但骨子里他终究是一位爱国者。所以，图拉真统治下的幸福时代，对他来说，反而失去了写作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公开

表示要写图拉真，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从提比略到尼禄时代的《编年史》，因为他们让他找到了创作的动力——愤怒的情绪。

尽管如此，塔西佗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他不写图拉真时代的真实原因。所以我的上述想法，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事实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关图拉真统治的、可信的文献资料完全不存在。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不仅后世称他是五贤帝之一，甚至同时代的罗马人也盛赞他是“Optimus Princeps”（至高无上的皇帝），元老院还一致同意把这个称呼作为他的正式称号。

图拉真时期的统治状况，同时代的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没有写，200年后，为了给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写续篇，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的6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了《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这部历史巨著。《罗马十二帝王传》只写到图密善，作为其续篇，《皇帝传》从哈德良皇帝开始写起，但是中间就像掏了一个洞似的略过了涅尔瓦和图拉真。就算涅尔瓦因为在位只有一年半时间可以忽略掉，但图拉真的统治整整持续了20年，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竟然没有一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去写他。

不对，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此人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个希腊人，名叫狄奥·卡西乌斯。他是元老院议员，担任过行省总督。只是在此人的著作中，可信的只是他本人作为“现场见证人”的对塞维鲁王朝时代的记述。其余部分只要没有确切可信的旁证，其可信度就很低。这是后世研究者们一致的看法。既然如此，可以说只信赖文献资料的、吉本时代的罗马史研究者们感叹史料太少，也就无可厚非了。毕竟，对于优等生塔西佗转校最感困惑的，应该是那些对他的见解佩服至极的教授和学生。

罗马史的研究者们习惯把后世的研究著作称为“二手资料”，他们称做“一手史料”，或称“原始史料”，又称“初始出处”的有以下六类：

一、文献资料（罗马时代的人留下来的文章）；

二、考古学家发掘并整理出的成果；

三、碑文（石碑、铜板等等）；

四、金、银、铜币等货币；

五、以建筑及肖像为代表的造型艺术；

六、写在纸草纸上的文章（仅限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一带）。

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开始受到关注是在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这对研究对象为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史料的方式可以说还只是近期的事情。因此，现代的我们不需要像吉本时代的人那样大发感慨，因为他们只能依赖第一类史料。无论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还是图密善，他们都受到了塔西佗无所顾忌的犀利评判。他们之所以现在能够被重新认识，正是因为有了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作为研究参考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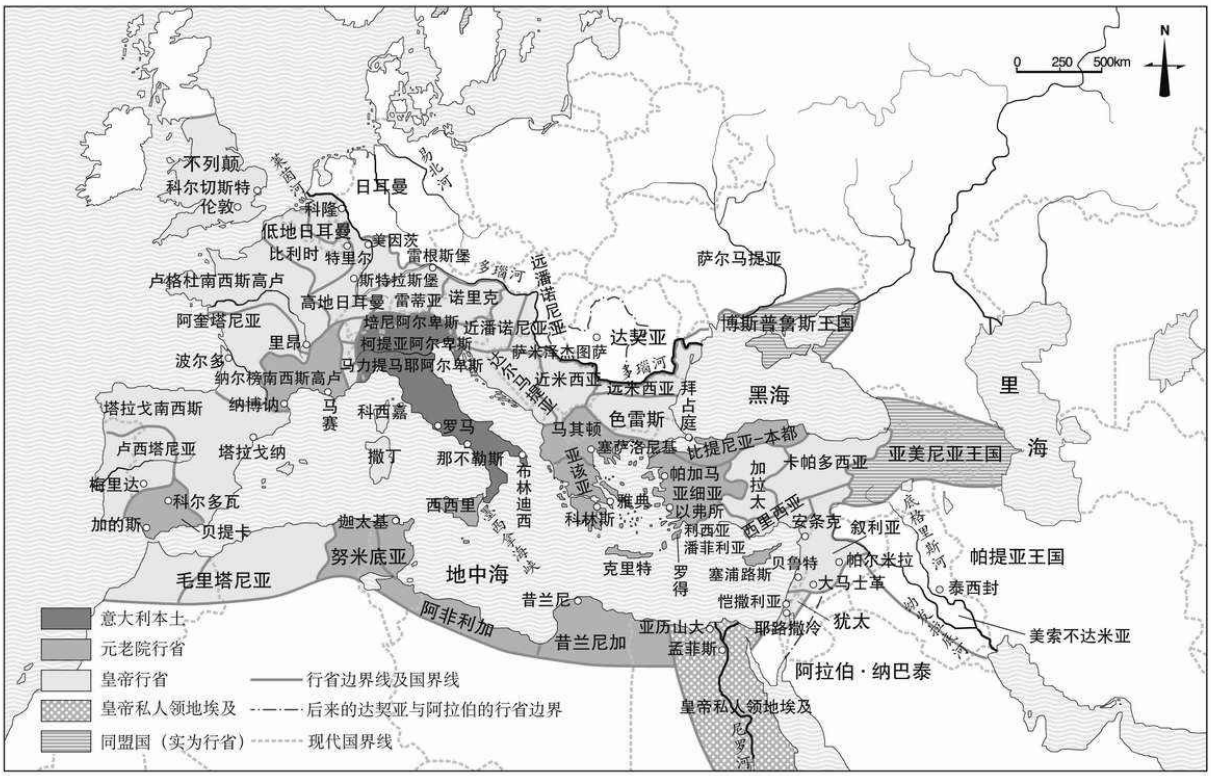
既然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没有减弱，那么，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塔西佗的“转校”依然是一件让人深感遗憾的事情。

对历史的叙述必须倾注全部的理性、感性和悟性，否则很难弄清真相。而塔西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其最佳年龄段43岁至62岁是在图拉真皇帝的统治之下度过的。在涅尔瓦皇帝统治期间，塔西佗最后一次当选候补执政官，以后没有再担任公职。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放松的，时间也应该是充裕的。虽然我们知道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地方志》、《同时代史》和《编年史》的写作中，但是为什么他偏偏不写图拉真皇帝的统治，而只写下了“少有的幸福时代”这一句话呢？尽管这是他可以用他成年人成熟的眼光亲眼看到的时代。

无论如何，塔西佗的这句话决定了后世历史学家对图拉真的看法。同时，考古学、碑文、货币、造型艺术以及纸草纸文献也都证实了他们对图拉真的这种看法。

同时，尽管我无法依赖塔西佗这句话作为研究的“基础”去展开讨论，却也决定了我的态度。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和《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皇帝们被说成是昏君，是否果真如此呢？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展开的。相反，在本书中，好像众人一致认为这些皇帝都是贤帝。那么贤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罗马人盛赞他们是贤帝？这些成了我思考的核心问题。

不管怎样，虽然把那个时代称做五贤帝时代的是后世，但是同时代的罗马人同样把这一时期叫做“Saeculum Aureum”（黄金世纪）。



罗马帝国全图（图拉真皇帝即位之前）

第一章

皇帝图拉真

（98年1月27日—117年8月9日在位）

AVGGERDAC
ANO
ENVANET

通向皇位之路

在王政时代已是名门贵族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不必说，“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诸位帝王——恺撒的养子、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其后的提比略、卡利古拉、尼禄等——都出身于首都罗马。尼禄皇帝自杀后，爆发内战的一年里，相继出现了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这三位皇帝。他们的“原籍”也是罗马。

终结内乱后登上皇位的韦斯帕芗，最先打破了帝国最高统治者都出身于首都罗马这一传统。被称为“弗拉维王朝”的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三位皇帝，他们的“原籍”是位于罗马东北约60公里处的列阿特（今瑞耶提）。奥古斯都皇帝把帝国的主体意大利半岛分成了11个州。首都罗马加上那不勒斯是第一州，瑞耶提属于第四州。因此，出生于此地的韦斯帕芗只能算是外乡人。但是，在他儿子图密善遭暗杀后继承皇位的涅尔瓦，其“原籍”是首都罗马，所以看似潮流又回来了。但是，正是这位涅尔瓦，对这股潮流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涅尔瓦皇帝指定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为其皇位继承人。图拉真出生于公元53年9月18日，出生地是意大利卡（Italica），属于西班牙南部行省贝提卡。现在，这座城市依旧沿用罗马时代的名字——意大利卡。意大利卡位于距罗马时代的西斯帕里斯（今塞维利亚）西北8公里的地方。但是它不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地方小镇，因为从地中海到大西洋贯通伊比利亚半岛的、当时的主干道之一要穿过意大利卡市中心。从加的斯经由塞维利亚和梅里达北上的大道，也要穿过意大利卡的市中心。罗马人虽然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遍及帝国全域，却唯独缺少修建环形道路的意识。在罗马人的思维中，所谓道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城镇，或者是在乡村，都应该通往人类居住的中心区域。即便是小小的城镇意大利卡，人和运载物资的

车辆穿梭于大道上的情形一定是司空见惯的。

而且，意大利卡还有其他城镇所没有的特殊性。所谓“意大利卡”，意思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城镇。正像这个地名所表示的那样，这是罗马人在本土之外建起来的第一座殖民城市，建于公元前206年，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决定兴建的。正是他在4年后的扎马会战中战胜名将汉尼拔并取得布匿战争的胜利。当时，恰逢布匿战争打得最难解难分的阶段，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一次次地上演着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战，伊比利亚半岛刚从迦太基手中夺来成为罗马的领地。为了让来到这里的士兵们在期满退役后有个定居点，于是兴建了殖民城市意大利卡。

当时罗马军团中的士兵全部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由于服兵役期间不允许结婚，所以，可以认为被送到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单身。留在意大利卡的退役士兵们，也像后来的其他罗马殖民城市的男性一样，一定是跟当地女子结婚的。结婚对象可能是西班牙原住民中的女孩，也可能是频繁来往于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北非姑娘，还可能是身上流着迦太基血液的女子。因为在成为罗马领土之前，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是迦太基人。没听说有人特意从意大利本土接女孩子过来的事例，这是因为，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这个民族对于与其他民族通婚不会有抵触情绪。因此，尽管图拉真的祖先毫无疑问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公民，但是他一定是混血。正因为如此，对于第一个出身于行省的罗马皇帝图拉真进行大书特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上面所讲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罗马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的出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限于罗马，后来变成了意大利本土的地方城市，接着又变成了行省，这一过程充分显示出罗马帝国与后来的其他各帝国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也就是说，作为胜利者的罗马不是对曾经是失败者的行省实施奴役，而是通过把曾经作为失败者的行省拉进来，创立一个大的共同体，共同构建罗马帝国。在皇帝出身

的变化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最具体形象的体现。

因为图拉真出身于行省，所以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可以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他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清楚。在罗马历史上，“图拉真”的名字开始登台亮相已经到了他父亲那一代。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后来的皇帝图拉真也只是28个罗马军团之一的军团长的儿子而已。

在发生于公元66年至70年的犹太战争中，与他同名的父亲在总司令官韦斯帕芗的指挥下，率领第十军团参加了战斗。到了耶路撒冷攻防战之时，总指挥是提图斯。他父亲作为负责进攻的4个军团之一的军团指挥官，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个时期，儿子到了已经举行或即将举行17岁成人礼的年龄。也许，当时的他就在第十军团的军团长营帐前，遥看了作为犹太教大本营的大神殿被大火毁于一旦，从而宣告耶路撒冷彻底沦陷的全过程。在当时的罗马，权贵阶层人家的孩子成年前通常由母亲负责养育，成年后这一任务改由父亲负责。

图拉真很可能是在老家意大利卡接受初级教育，在贝提卡行省的首都科尔多瓦接受中等教育，然后才被送到在帝国东方执行军务的父亲身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罗马人很重视实地教育。无论父亲的现任职位是什么，进行实地教育的地方通常都是军团。财务检察官的职位是进入统治者阶层的龙门，若要参加此官职的竞选，通常需要历练10年，少则也需要三四年的军团履历。刚刚告别少年阶段的图拉真虽然经历了攻陷耶路撒冷的胜利，但是，之后的他很可能没有回故乡，而是继续留在了军团，只是我们不清楚他所在的军团在哪个前线。因为他父亲率领的第十海峡军团在犹太，所以他也有可能就在他父亲身边度过了其见习期。他跟随被召回的父亲到罗马，第一次亲眼见识帝国首都罗马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皇帝韦斯帕芗不仅推荐这位曾经的部下、图拉真的父亲为元老院议员，还让他加入了贵族的行列。

韦斯帕芗是第一个出身于意大利地方自治体的皇帝，但是，他并没

有特别关照那些属于与自己同一阶层出身的人。倒是出身于帝国西方西班牙的图拉真的父亲，尽管出身于行省，却因为韦斯帕芗的推荐，进入了元老院。像他这样进入元老院的行省出身的人，就像《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讲到过的那样，也有很多来自帝国的东方。图拉真即皇帝位后掀起的意大利本土和行省平等化的浪潮，实际上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青年时代的图拉真因为父亲的高升，身份也随之改变。公元75年，他父亲受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前往官邸所在地安条克。随父亲一同前往的图拉真也在结束见习期后，升任了“大队长”。他的这个职位不是军团基层锻炼者经过百人队队长之后才能得到的大队长（Tribunus）之职，而是10个大队长中的首席，也叫“副军团长”（Tribunus Laticlavius），直译叫“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个名称的缘由，首先是因为首席大队长的红色披肩与元老院议员的托加颜色相同；其次，只有这个身份的人才可以把披肩从肩上垂下来。担任首席大队长是元老院议员子弟才能享有的特权，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这位首席大队长年龄不足25岁，但是，当军团长因故无法履行职责时，他必须替代军团长承担起整个军团的指挥。把如此重任交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是因为作为指挥官的后备力量，给予他们的一种实地锻炼。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广为世人知晓的是，他们作为文人的身份，都属于元老院阶级，所以两人都担任过“穿红披肩的大队长”。只不过，这两个文人的军旅生涯都止步于“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一职位。

图拉真以22岁的年龄担任了副军团长之职。作为帝国的安全屏障，其最重要的防线之一——叙利亚行省就是他最初的任职地。

父亲图拉真被任命为叙利亚行省的总督，但是他的这一总督之职，其重要性是任职于其他行省总计多达30位总督难望其项背的。罗马帝国当时的重要防线是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而行省叙利亚就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与罗马的假想敌国帕提亚王国隔河相望。尽管当时罗

马与帕提亚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但是即便双方正处于关系良好的时期，它依然是一个让罗马在防卫上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的国家。罗马在叙利亚行省常驻3个军团。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军团，韦斯帕芗皇帝还决定在帕提亚北方，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亚美尼亚王国边境驻扎2个军团，向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犹太派驻1个军团，向埃及派驻2个军团。这8个军团负责帝国东方的安全保障。作为主力部队的军团兵就有4.8万人，再加上辅助部队的兵力，共计多达近10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叙利亚总督兼任这支军事力量的总指挥。所谓叙利亚行省总督，在罗马一直以来就是帝国东方军队总司令的同义词。

关于图拉真的父亲在韦斯帕芗手下参加犹太战争之前的经历，我们一无所知，也许与韦斯帕芗一样，是从百人队队长开始其军团生涯的“基层成长者”之一。在公元75年至79年的4年间，他顺利完成了这个重要职责。仅此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个相当有能力的人。对于儿子图拉真来说，父亲大概也是一位最好的、言传身教的老师。然而，两年后的公元77年，这位父亲让儿子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已经24岁的图拉真尽管还是副军团长的身份，红色的披肩还是挂在左肩上，但是，他要去的地方却是驻扎在帝国西方最重要的边境军团——莱茵河军团。在那里，他在与东方感受截然不同的寒冷和雨水中度过了3年时光。其间，韦斯帕芗去世，继承皇位的提图斯任命图拉真的父亲为亚细亚行省总督。也许是有过共同战斗经历的提图斯皇帝想补偿这位老将在过去4年间的繁重工作，特意把他安排到无须与敌人针锋相对、充满和平气息的小亚细亚西部行省工作。但是，尽管任职的地方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是以弗所和米利都这样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高的城市集中的行省，父亲还是没有把儿子叫过去。因此，从24岁到27岁的4年里，图拉真得以在边境继续“学习锻炼”。

公元81年，已经28岁的图拉真迈出了罗马人称之为“光荣的职务”的

第一步——他当选了财务检察官，任职地应该是在首都罗马，工作性质如同这个官衔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负责检查国家经费的收支情况，任期是一年。

这个时期，他父亲应该已经顺利结束亚细亚行省总督的工作，没有再担任新的要职。不清楚他是留在罗马继续担任终身制的元老院议员，还是隐退回了故乡意大利卡。他的死亡时间也不明。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他被授予了贵族的身份，但只是“新贵”的第一代而已。

但是，属于“新贵”第二代的儿子已经开始担任属于元老院阶级的工作了。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他再次回到边境，重新开始了“穿红披肩的大队长”的军团生活。只是不清楚具体在哪个边境。罗马军团中，与士兵几乎从不流动相反，高级别的军官调动非常频繁。因此可以推断，他很有可能穿梭于各军团之间。时间是在公认人事安排最出色的皇帝图密善时代。到了公元83年前后，好像他也进入了元老院。公元87年，已经34岁的图拉真进入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二阶段——当上了法务官。任职地同样是在首都罗马，从事的是审判长等司法方面的工作。在罗马，只有当选过法务官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就算战时因故会忽略这个条件，在平时罗马人一定会遵守这些规定的。

图拉真在结束法务官的任期后很快被任命为军团长，任职地是西班牙。在这里，几乎没有可能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因为西班牙被罗马同化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他接手的军团是驻扎在此地已久的第七杰米那军团（杰米那，音译，意思是此军团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军团整编而成。——译者注），同时他又兼任了占后世西班牙三分之二面积的塔拉戈南西斯行省的总督。所以，他一定是在军团基地所在的莱昂和总督官邸所在的行省首府塔拉戈纳之间往来奔波，甚至没有时间回故乡意大利卡。

就这样，图拉真35岁的这一年过去了。如果像这样，他一直在西班牙常驻的话，一定不会有后来的图拉真。然而，这一年过后，命运的转

机就早早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公元89年，担任莱茵河上游防卫任务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萨腾尼努斯发动了叛乱。身在首都罗马的皇帝图密善亲自率领近卫军团北上平叛。与此同时，他命令图拉真率麾下的第七军团也向日耳曼开进。只是，由于负责莱茵河下游地区防线的低地日耳曼军队行动迅速，在图密善到达之前，已经镇压了叛乱，司令官萨腾尼努斯自杀，一切早已结束。甚至图拉真率领军团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横穿法国到达莱茵河的时候，为镇压叛乱而遭毁坏的美因茨军事基地重建工作也已经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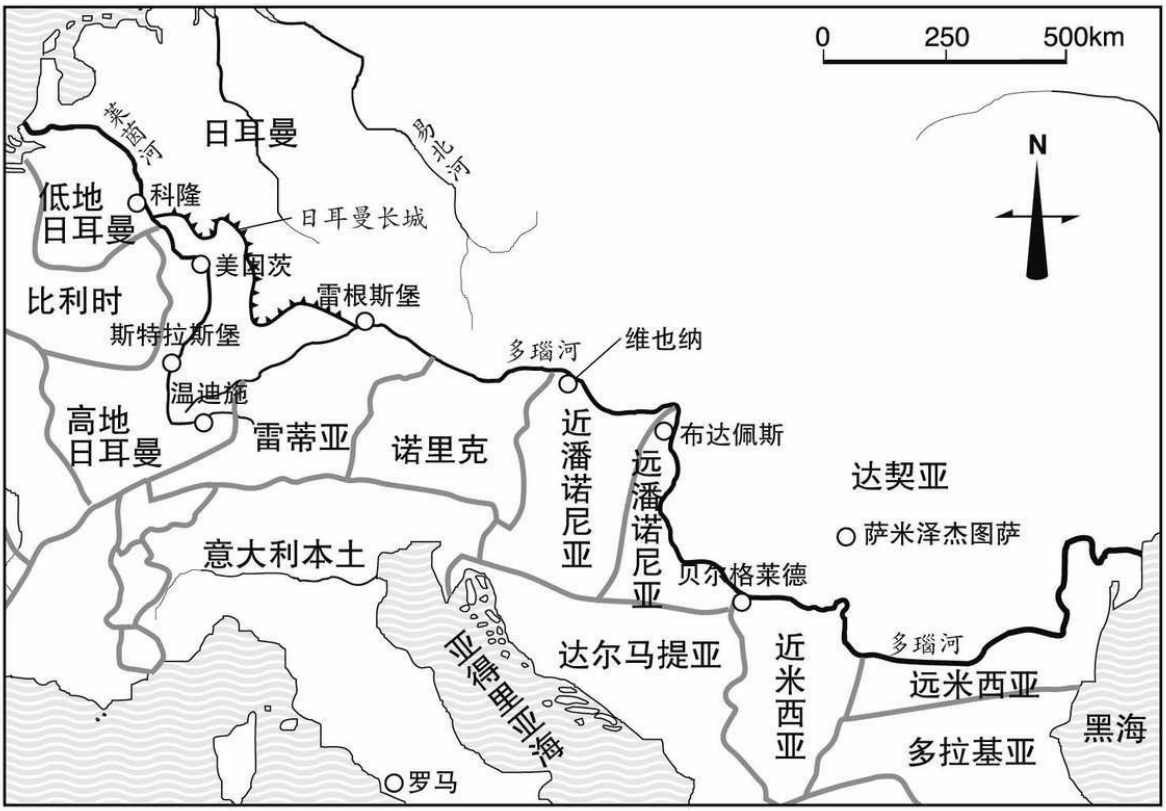
但是，对于36岁的图拉真来说，这次长途跋涉并非一无所获，他有幸得到了年长他2岁的皇帝图密善的赏识。当时的情形好像是这样的：虽然图拉真随同第七杰米那军团返回驻扎地，但图密善已经对他有了新的打算。他准备把这位优秀的年轻军团长从西班牙这样安稳的地方调出来。因为萨腾尼努斯自杀后，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高地日耳曼军队的司令官位置出现了空缺。

然而，当选过法务官的人才可以担任1个军团的军团长职位，而司令官下面有3个军团。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有些大。担任1个或2个军团以上战略单位的指挥官，必须当选过执政官才有资格出任。

在第二年，即公元90年，为选出公元91年的执政官而进行的选举中，图拉真被提名为执政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因为皇帝的推荐被提名就等于当选。就这样，图拉真以38岁的年纪早早到达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三个阶段，并且他当选的不是为了培养执政官经验而设置的过渡性“候补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而是“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任期于1月1日开始。就这样，只因属于元老院阶级才有资格担任“光荣的职务”的他这回又当上了“正式执政官”。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也曾当选过法务官，但他们的最高官职只是“候补执政官”。从父亲那代才开始进入元老院阶级的图拉真，此时已经开始显山露水。

到了公元92年，皇帝图密善随即任命已经有过执政官经验、资格身份完全符合规定、时年39岁的图拉真为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并兼任高地日耳曼行省总督。这又是一个要职。图拉真的任职履历向我们显示出了军事才能和文职才能并重的、罗马精英的培养过程。

与其他防线所在的地区不同，皇帝图密善对高地日耳曼防线应该有特别的想法。负责高地日耳曼防线的4个军团中，有2个军团常驻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从美因茨到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有一条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这条屏障的防卫也属于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职权范围。修建这条日耳曼长城的正是图密善。皇帝把这样一个地方交给了图拉真。



莱茵河至多瑙河一带

自公元92年至97年的5年间，图拉真的确也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期

望。然而，公元96年秋天，皇帝图密善遭暗杀身亡。好在皇帝换成涅尔瓦以后，图拉真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尽管他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图密善皇帝的举荐。

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图拉真在5年间的所作所为卓有成效，更是因为罗马人对功过是非的评判很公正。尽管他们会判处某个人“记录抹杀刑”（Damnatio Memoriae，《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某个方面是有所贡献的，那么他的贡献并不会被抹杀掉。相反，罗马人通常会记住他的这一贡献。就连总是对皇帝图密善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坦诚地写下了自己在公职上的升迁就是在图密善时代。

新即位的皇帝涅尔瓦当时已是70岁高龄。据传言，元老院推荐涅尔瓦的理由，第一是他没有儿子，第二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当然这只不过是传言而已。真正的理由应该在于涅尔瓦的出身门第显赫。尽管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的地方城市纳尔尼，但他出身于共和制时代世袭的名门贵族。在公元1世纪末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名门贵族屈指可数，已经不足10家。在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前往卡普里岛过隐居生活期间，为数不多的随行者中就有涅尔瓦的祖父。提比略本人学识丰富，所以他只挑选同样学识渊博、可以与他平等对话的人陪伴自己去卡普里。提比略和涅尔瓦祖父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元老院议员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更像是两位学识高深的老友之间的关系。涅尔瓦家族的男性都是元老院议员。但是在百姓的眼里，这个家族的人与其说是政治家倒不如说是学识渊博的人。尽管图密善皇帝与元老院关系紧张，但他不得不从元老院中挑选与自己共同执掌执政官之职的人选，他选择了涅尔瓦。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死后，涅尔瓦会坐上皇帝的位子。

总之，涅尔瓦之所以能登上皇位，给人的感觉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给人印象深刻的、突出的优点，而是因为他没有明显的缺点。当上皇帝后的涅尔瓦需要顾忌的不是请他坐上皇位的元老院，而是近卫军团和在帝

国边境上执行军务的各个军团。因为他们是图密善的支持者。图密善不仅让士兵们实现了期待已久的加薪愿望，并且经常亲赴前线，深得士兵们的拥戴。

公元96年9月18日，已统治罗马帝国15年、再过一个月就满45岁的皇帝图密善，年纪轻轻就遭遇了暗杀。这位皇帝在元老院的口碑实在欠佳，元老院议员们都很不喜欢他。然而，在罗马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19世纪历史学家蒙森却对他评价极高。暗杀图密善不是元老院内反图密善派的议员所为，也不像皇帝尼禄那样，归因于行省对他的不满，他是在熟睡之际遭到袭击而被杀的，是宫廷内的人所为，凶手是皇后身边的解放奴隶。

不能说元老院跟这件事毫无干系。就在皇帝被杀的那个晚上，曾经与图密善共同执掌过执政官之职的涅尔瓦就接到了通知。在第二天一早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迅速通过了涅尔瓦即位的决议。甚至还决定用“记录抹杀刑”惩处图密善，把这位刚刚故去的皇帝的所有成绩一笔勾销。从深夜到第二天一早的短短时间里，如此高效率地通过这么多决议，可见一定有什么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元老院没有追究，当然也没有人怀疑主谋是否有可能会是貌似性情温和且不具备政治家性格的涅尔瓦。真相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得知图密善遇刺的消息后，留在首都的近卫军团和驻扎在帝国边境基地的各军团都没有采取行动。这一情况表明元老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政权更替”变成既成事实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士兵们静观事态的状况并没有能够维持很久。一年时间过去了，由衷钦佩图密善、盼望早日查出图密善遇害真相并找出元凶的近卫军团，看到涅尔瓦依然没有任何作为，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甚至把皇帝涅尔瓦禁闭起来，强烈要求他查找出元凶并处以极刑。

涅尔瓦也认为有必要收拾这一局面。我想，71岁的涅尔瓦不是担心

自身的安全，他担心的一定是近卫军团的不满情绪会影响到在边境执行军务的所有军团。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内战，尽管已经过去了28年，但是对罗马人来说，那是一场噩梦。为了防止这样的历史重演，涅尔瓦大概是没有与元老院商量就独自作了一个决定。因为，当他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最感到震惊的恰恰是元老院的议员们。

公元97年10月27日，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前结束祭祀仪式后，皇帝涅尔瓦举起右手阻止其他人正准备离去的脚步。茫然的人群于是转身面向皇帝。涅尔瓦没有开场白，而是开门见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他决定把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收为养子，让图拉真和自己共同执掌“护民官”（Tribunicia potestas）和“罗马全军总指挥”（Proconsulare maius），同时提名图拉真为次年即公元98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和自己一起担任执政官。

这等于宣布图拉真是共治皇帝。也正因为如此，第一位出身于行省的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大家很自然地以为，尽管图拉真当选几乎已成定局，他还是应该利用冬季的休战期回首都罗马，出席元老院举行的执政官选举大会。然后，在来年1月1日召开的元老院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向涅尔瓦表示感谢。等这一系列活动结束后，可以再回莱茵河沿岸的驻地。那一年正值44岁的图拉真已是一位深晓战事无常的军人。所以，从元老院议员到平民百姓，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行省出身的图拉真，面对在他面前已经铺就好的、通向皇位的道路，一定会跑到罗马到涅尔瓦面前向他表示感激的时候，他的举动却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公元98年1月1日，首都罗马完全不见图拉真的身影。即使在科隆，获悉涅尔瓦于1月27日去世的消息后，他依然选择了留在前线。

话虽如此，既然当了皇帝，维护首都罗马和本土意大利半岛的秩序

就是他应尽的职责。留在国内的唯一一支军事力量，即近卫军团，竟然会做出禁闭现任皇帝这样的举动，这意味着国内的秩序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图拉真决定暂时不回首都，他把近卫军团的指挥官和他们的亲信召到了科隆。对于这位皇帝的命令，那些近卫军团的军官们自然必须服从。然而刚到科隆，他们就被处决了。就这样，近卫军团内不安定分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留在首都的1万名近卫军团兵虽然对涅尔瓦很不满，但是他们都很敬畏图拉真，也就听从了他的严厉处置。顺便提一句，涅尔瓦是一位文官，没有指挥军团的经历。正因为如此，他才指定图拉真为自己的接班人。

那么，图拉真推迟回首都罗马想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图拉真是在科隆接到涅尔瓦死讯的。科隆属于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管辖范围。按照罗马军团管辖范围的划分，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图拉真是不允许越境进入这个区域的。但是公元97年10月，在成为涅尔瓦养子的同时，图拉真拥有了罗马全军的统率权，也就是皇帝的专权。公元98年1月，在科隆逗留意味着在涅尔瓦死后继承皇位之前，图拉真已经在充分利用涅尔瓦授予他的共治皇帝的身份了。再过8个月，他将满45岁，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正式登上皇位之前，这位出身行省、恰逢年富力强的最佳年龄登上皇位的罗马皇帝，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他要继承图密善未竟的事业，尽管这项事业会违背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遗训，即禁止继续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因此，既然决定将这件事付诸实施，就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胸怀大志

由于违背神君奥古斯都的遗训，所以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因为他们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主权人。在罗马，所谓的皇帝，不过是受这两大主权人的委托开展政治活动的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而已。什么是“说服他们的理由”，只要想一想元老院和罗马公民

权所有者这两大权力阶层为什么不接受图密善皇帝的做法，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讲述图密善皇帝的章节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讲述，所以这里我只简述一下要点。罗马人已经把莱茵河防线建成了铜墙铁壁，又因为日耳曼长城的完工，完成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河流上游地区的防御体系。在这时的罗马人面前，新出现的敌人是达契亚人，他们已经把势力扩大到了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对罗马来说，生活在多瑙河这条天然防线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怕，只有当它联合周边部族时才会构成威胁。罗马无法再对达契亚人置之不理，是因为正如他们的首领自称“国王”所表明的情况那样，他们已经成功联合了其周边一些更为弱小的部族。

达契亚人因为有了德凯巴鲁斯，其势力得以迅速扩大。德凯巴鲁斯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领袖，野心很大。除了居住在多瑙河下游自己的地盘，他还兼并了生活在现在的匈牙利至南斯拉夫一带及多瑙河中游的其他部族，企图在多瑙河北岸建起一个统一的王国。为了表示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一野心，他甚至侵入罗马的领地——多瑙河南岸。

德凯巴鲁斯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取得了成功，迎战他的罗马军团被打得溃不成军，指挥军团的米西亚行省总督在战斗中阵亡。

图密善决定亲征前线。在皇帝同时又是罗马全军统帅的指挥下，投入了5个军团的兵力，最终这场战斗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达契亚国王提出了和谈请求，图密善未经元老院讨论就一口回绝。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战斗中，罗马军团横渡多瑙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直指达契亚的首都。

然而，满怀第一仗胜利的喜悦已经回到首都罗马的图密善，得到的有关第二次作战结果的报告却是罗马军队大败。参加战斗的近半个近卫军团和另一个军团被歼，担任总指挥的近卫军团的指挥官阵亡，甚至银

鹫旗也落到了敌军手中，这让罗马人备感耻辱。第二次战斗发生在现在的塞尔维亚至罗马尼亚一带。罗马军团主动进攻达契亚人，然而，这一战罗马军团非但没有攻入敌方的首都萨米泽杰图萨，反而在渡过多瑙河开始北上的时候受到了来自敌军的夹击，结果一败涂地。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却没有让图密善皇帝彻底丧失锐气。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再战，以雪前耻。这次，他任命尤利安努斯为总指挥。此人长年在多瑙河防线执行军务，对当地的情况相当了解。

公元88年，尤利安努斯率领军队横渡多瑙河，向达契亚人发起了进攻。他巧妙地运用战术，成功地把敌军诱至平原地带。一旦会战的战场变成开阔的平原，罗马军队将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罗马军队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达契亚士兵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然而，罗马军队最终还是没能攻入达契亚人的首都，因为冬季到了。深知当地冬季严寒的尤利安努斯把军队撤回到多瑙河南岸，拆除了用船只串联起来的浮桥，让士兵们进入休整状态，直至第二年春季。到了次年，即公元89年，罗马军队并没有北渡多瑙河。

这是因为图密善选择了与达契亚人和解。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要对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萨腾尼努斯的叛乱事件作善后处理，尽管这次叛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平息。

二是有必要牵制帕提亚王国，因为有人假借尼禄皇帝之名竟得到了响应，再次点燃了反抗罗马帝国的火种。

三是也许他认为罗马军队的手下败将达契亚人并不足惧，反倒是那些在多瑙河中游一带挑起战端的日耳曼各部族更需要认真对付。

除了在多瑙河下游，担心把战线扩大到中游地带的图密善，和吃了

败仗后，试图挽回劣势的德凯巴鲁斯都无心再战。为了签署和平条约，达契亚王子代表国王来到了罗马。图密善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竟是不低于接待友好同盟国君主的规格。也许图密善认为，可以因此腾出力量彻底清除掉在多瑙河中游一带挑起事端的日耳曼部族。事实上，在与达契亚达成和平条约后，罗马军队就把战斗力集中到了中游地带。战斗的结果是，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连成一片的罗马军团基地发起进攻的日耳曼各部族不得不败退回以前的居住地区。

图密善与达契亚国王之间签署的和平条约，其内容因为图密善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罗马为被俘罗马士兵向达契亚支付每人每年2阿斯的赔款。这些罗马士兵是罗马军队在与达契亚军队的第二次战斗中失利而被俘的。

我们不知道被俘士兵的具体人数，也不清楚为每人每年支付2阿斯是永久性的还是有年限的赔款。

站在图密善的角度去看，既然攻入达契亚首都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很渺茫，那么为了拯救囚禁在达契亚的罗马士兵，也许只能靠赔款了吧。

2阿斯是一个士兵年收入的1/450，相当于去公共浴池4次的门票钱。如果在市场上购买小麦粉，也只够买500克。若能以此换来多瑙河下游地区安宁的话，这个代价或许并不算昂贵。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罗马人的强烈不满，就像元老院派的塔西佗严厉抨击所表明的那样，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一味地趋于恶化。普通民众对图密善的评价原本并不差，然而，就因为这一赔款事件，连普通民众也开始对这位皇帝冷眼相看了。

战斗中，罗马失去了一个军团加上近半个近卫军团总计上万名士兵，对于这一事实，罗马人忍下了。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用金钱换取和平的现状，尽管支付的只是象征性的金额。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咽

不下这口气。他们认为每年为每个俘虏支付2阿斯是失败者向胜利者支付的年贡。所谓和平，是否值得付出任何代价来获取呢？对罗马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即使在帝制就要进入中期的这个时候，依然无须重新思考。

以图密善的性格，他之所以与达契亚签订和平协议，我想很可能是在各种情况好转之前采取的缓兵之计。然而，两年后，他遭到了暗杀。这一切，受图密善皇帝的青睐而出任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图拉真，在其与多瑙河防线相接的任职地已看得一清二楚。

只年长自己2岁的图密善皇帝被杀一年后，因涅尔瓦皇帝的推荐，图拉真得到了共治皇帝的地位，并得以与皇帝涅尔瓦分享执掌罗马全军总指挥，而不只是纯粹的皇位继承人。他马上用上了这一权力。来到自己管辖地以外的科隆，就是他开始运用自己享有的这一权力的有力证据。三个月后，涅尔瓦辞世。开始独享罗马皇帝权力的图拉真宁愿选择推迟回首都罗马的时间，也要继续进行眼下的“工作”。这就是典型的图拉真风格。20世纪的美国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的罗马皇帝中尤其务实的一位。

所谓眼下的“工作”，在他获悉涅尔瓦去世的消息时，人在科隆这一点已经有所暗示，是为了完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称做低地日耳曼的防御体系。连接高地日耳曼和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日耳曼长城防线大概在他担任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5年间已经完成。

急于完善莱茵河全域和多瑙河上游地区防御体系的理由非常充分。这是因为当把战斗力投入与达契亚部族的交锋中时，可以防止可预见的、来自背后的危险。在罗马军队把兵力集中到多瑙河中下游一带的时候，那些时刻在寻找入侵机会的蛮族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时机，乘机攻打地处偏远、防守力量薄弱的莱茵河下游。

图密善皇帝性格冷静，行事谨慎，在战略上很有先见之明。但是作

为统治者，他的“致命弱点”在于缺少实战军事经验。在他即将开始军团见习生涯的时候，由于尼禄皇帝去世后发生的内乱，这个机会随之落空。他的父亲韦斯帕芗尽管自己曾经是从军团基层锻炼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他即位皇帝且社会局势稳定后，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给次子图密善提供体验军务的机会。也许是考虑到图密善是继兄长提图斯之后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任命他为大队长或军团长有所不妥。为此，图密善在体验军团生活的最佳年龄，即19岁到30岁，只接受了帝王教育。后来，因为其兄长提图斯皇帝英年早逝，他成了罗马全军的总司令，时年只有30岁。

只要有天赋，即使没有经验，这个缺陷也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即使缺少军事天赋，还可以启用合适的人才，让他来辅佐自己，就像奥古斯都曾经启用阿格里帕那样。而图密善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叫阿格里科拉，在不列颠前线任职。然而，也许正因为图密善从来没有体验过真实的军务生活，所以对军团生活的向往格外强烈，而且他深信自己具备军事才能。

设计并修建了日耳曼长城这一行为应该说他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与达契亚部族之间的作战，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显然缺乏军事上的才华。

第一，战场秩序混乱。他没有能够把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现场总指挥两人阵亡，说明在投入战斗前，没有制定明确的战术策略，冒冒失失地陷入了混战。

第三，对达契亚王国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他没有集中投入兵力，导致作战结果二胜二负。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使他不得不最终签署了耻辱的和平条约。

作为同辈人，军事经验高出很多的图拉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图密善在军事才能上的缺陷。罗马优秀的指挥官总是会在战斗中毫不犹豫地投入比敌方更多的兵力。因为集中投入大量兵力可以尽早结束战斗，不仅能够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同时军费支出也会减少，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随着战争状态的持续而引起的战场周边居民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有一句话说得好："罗马军团因后勤保障而取胜。"

所谓后勤，字典解释是在后方负责粮食、武器等一切军需物资的补充、供给和运输。如果希望后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生活在战场周边的人们的支持不可或缺。

图拉真考虑将来在以达契亚为敌人的战斗中，投入两倍于图密善皇帝时代的兵力。为此，仅靠多瑙河防线的现有兵力远远不够，还需要从邻近的莱茵河防线调动军队。如此一来，莱茵河防线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为了在兵力减半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地完成防守任务，他选择了优先完善莱茵河防御体系。

在统治罗马帝国的第一年，即公元98年，图拉真几乎都是在莱茵河沿岸度过的，并在这年冬季移师多瑙河沿岸。他要亲自指挥，为再次打响战斗作好战前准备。罗马军队没有专门的工兵，军团全体士兵既是土木工程师同时又兼做工匠。

因为图密善已经建好了包括圆形竞技场及大浴场在内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所以，从公元98年冬天至翌年夏天，图拉真在多瑙河沿岸的"工作"，好像是修建连接这些基地的大道和桥梁。罗马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在战争开始前，首先要把"基础设施"修建得非常完美。我在想，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万一打了败仗，如此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会让敌人的追击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方便与否放在了第一位。认真考察这一时期开展的土木工程建设，可以发现，图拉真领导下进行的后来的那些土木建筑工程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如果前面有崖壁挡道，他会直接把崖壁削为平地，而绝不绕过崖

壁，另辟蹊径。其实这个做法不是图拉真一个人的特点，在罗马人建设的土木工程中比比皆是。只是这位行省出身的人，或许比普通的罗马本地人更像罗马人吧。

当图拉真终于以皇帝的身份踏进首都罗马时，已经是公元99年夏末以后的事情了。

回到首都

因为图拉真是从多瑙河出发前往罗马的，所以普遍认为，他首先通过现在的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到达亚得里亚海，经过一天的海上航行，在意大利中部海港安科纳登陆，接着沿海岸线南下一段距离，再沿瓦勒利亚大道进入罗马。这是图拉真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进入首都时行走的路线。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史料留下来。如果图拉真走的路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从东方进入首都罗马的。由于历代皇帝的努力，全程除了海路，整个行程只要走已经铺就完成的罗马大道即可，距离是罗马纵向穿过法国到达伦敦距离的一半。事实上，只要看一眼地图，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属于当时罗马领导阶层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坚信多瑙河防线的走向对于帝国的安全保障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罗马到贝尔格莱德的距离比从罗马到巴黎还要近。在罗马时代，地图上的距离可以认为与实际距离相等。现在，西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公路网密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从罗马去巴黎要比从罗马去贝尔格莱德所需时间短。但是在罗马时代，这两个地方修建的道路网的密度几乎没有区别。

从东方进入首都的图拉真皇帝受到了无数百姓的欢迎，人们竞相目睹这位皇帝的尊容。应该说，他们对图拉真花了近两年时间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了解，所以，他们的关心纯粹只是出于好奇。

第一，图拉真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

第二，在此之前，图拉真几乎都在行省担任公职。所以，在首都，他还是一张陌生的“脸”。

第三，即位皇帝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在首都出现。

在首都的元老院议员全体出迎他们的皇帝，想必他们的好奇心也很强吧。元老院不仅同意先皇涅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继承人，同时也在涅尔瓦死后，承认了图拉真为新任皇帝。但是，即便是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想目睹这位行省出身、即位一年半后才首次出现在首都罗马的皇帝的心情，想必也与首都的普通百姓没有任何不同。

图拉真在城门前下了马。白色短衣外面套着银色的钢铁胸甲，红色大斗篷在肩头随风飘动。一身装束非常符合身为皇帝、同时也是罗马全军统帅的身份。只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没有骑马进入首都，而是徒步走进了罗马城。如果他与奥古斯都一样个子不高的话，很容易被淹没在欢迎他的人群之中，好在图拉真是一位体格健壮的高个子。即使人潮如织，也挡不住他高出众人的头部。

百姓是如何看待这位皇帝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骑着马威风凛凛地进入首都，更能让他们感到满足吧。但是，包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内的现场的元老院议员们，因为图拉真的这一举动对他的好感陡然增加。

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同为帝国两大权力集团。尽管元老院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且其任期又是终身制，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立法机构，所以有点类似现代国家形态中的国会。此外，担任国家要职的人几乎都从元老院议员中选举产生。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公职，无论是财务检察官，还是法务官，亦或是执政官，自从实行帝制以来，都是通过元老院内部的选举产生的。图拉真就是因为得到元老院议员们的投票，才有了身份上的转变。也就是说，两年前，在涅尔瓦指名自己为继承人之前，图拉

罗马将军的军装

真与他们一样，不过是600位议员中的一员而已。现在，他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却在回到首都时，没有骑在马上俯视他们，而是与他们一样，徒步走进了城门。四十几岁的年龄，在议员中，属于中间一代。这个时期，罗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帝制这一政体，就连拥护共和制的塔西佗也写道，为了有效推行辽阔帝国的统治，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更合适。但是，与共和制时代相比，不能不说元老院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站在元老院议员们的立场上来说，皇帝绝不能轻视自己的存在。

作为皇帝，图拉真开始了在首都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

不过，图拉真并不需要建造华丽的皇宫，因为图密善在帕拉蒂尼山上，占了此山近半的面积，建成了无论外观上还是功能上都无与伦比的皇宫。皇宫由官邸和公馆两部分构成。除此之外，图密善兴建的别墅也足够令他满意。如果想感受山上的凉爽空气，阿鲁巴山上有山间别墅；如果想看大海，奇尔切奥有海滨别墅。图拉真只建了一栋别墅，地点是奇维塔韦基亚。但是，这栋别墅算不上豪华，而且，还是在几年后，这个地方变身为海港城市以后才建起来的。

皇宫举办夜宴的规格很普通，凡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谁都能够承办得起。受到邀请的元老院议员甚至为他的简朴而感到惊讶不已。在

个人生活方面，图拉真绝对算得上一个勤俭节约的皇帝。

其妻普洛蒂娜出生在法国南部尼姆，所以她也是第一位出身行省的皇后。她是一位既有教养又聪明的女人，但算不上是美女，行事也不张扬，所以无须担心遭人羡慕或妒忌。作为皇后，她的身份自然高于元老院议员们的夫人。但是，女人通常会羡慕甚至嫉妒同性的美貌与财富，而教养和聪明，却不会让人羡慕，也不会生出嫉妒。

图拉真的徒步风格在来到罗马后也没有改变。他讨厌坐轿子出行，只要是在市内，不管去哪里，他都选择步行。按照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法律规定，在市中心坐轿子出行的只限已婚妇女。当然，不喜欢受百姓瞩目的皇帝也会经常利用轿子。常坐轿子出行的皇帝有提比略和图密善，这或许也正是这两位皇帝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

只要不出现紧急事态，元老院一个月举行两次会议，每次图拉真都会出席。会议开始前，作为议长的执政官入场，全体起立欢迎是元老院会议的惯例。图拉真也和其他议员一样，总是起立欢迎，好像这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同时，他也很少早退。可见他自始至终保持了勤勉、朴实的作风。

元老院内展开讨论时，图拉真的“徒步风格”也没有改变。他从来不会采用高压的态度，即使是冗长的演讲，他也会耐心地认真听到最后。当然，在阐述自己的意见时，他的态度总是很明确。图拉真不像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那样有做辩护律师的经验，因此，他不是一位善于用华丽的辩护技巧赢得全场喝彩的讲演家。尽管如此，就像同为元老院议员的小普林尼证实的那样，由于其“话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充满自信的语气、不怒自威的神情、真诚率直的目光”，让所有人不由自主地认真倾听。

图拉真向元老院议员们承诺，绝不以叛国罪的名义判处元老院议员死刑，而且他很好地遵守了这一承诺。在他统治的20年间，没有一位元

老院议员因此而被处决或遭到流放。

所谓“叛国罪”，实质上是因为反对皇帝而被扣上的一个罪名。它让元老院议员们不寒而栗的原因是，即使议员从未有过造反或谋杀皇帝的念头，仅仅因为与皇帝政见不同，就有可能被加以此罪。也就是说，“叛国罪”实际上是皇帝为了肃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势力而采用的一个手段。这样的罪名已经出现过几起。提比略皇帝统治末期，其恐怖政治尽人皆知。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就像图拉真同时代的塔西佗发泄其愤懑所描述的那样，恐怖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想忘也忘不掉。这样的情形仅仅就是几年前的事情。

图拉真则是一个公正而诚信的男人。在他长达20年的统治期间，只出任过3次执政官。这样一来，元老院议员们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做到其“光荣的职务”的最高职位，即出任执政官的位置。此外，图拉真还充分运用了“候补执政官”制度。在每年1月1日就职的“正式执政官”在任期内辞职时，“候补执政官”马上顶上去。因此，当过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人数大增。理所当然，元老院对图拉真的好感也随之不断提升。

只是，在帝制时期，执政官的含义有了变化。在共和制时代，文如其意，执政官就是“执政”的最高负责人。但是进入帝制时代以后，执政的最高负责人变成了皇帝。为了消除元老院对帝制的不适反应，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一次次地亲自出任执政官，这样做可以让人们误以为罗马虽然进入了帝制时代，实际上只是共和制时代的延续。为了不要像尤里乌斯·恺撒那样遭暗杀，或许这样的伪装也算得上是权宜之计吧。毕竟布鲁图的死去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人怀念共和制时代。

韦斯帕芗皇帝也曾经无数次出任过执政官。奥古斯都创立了“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但是，这一王朝延续到尼禄去世后宣告终结。随后的皇帝韦斯帕芗建立起了“弗拉维王朝”。作为新“王朝”的创建人，他与奥古斯都的立场相同。因此，他也需要通过一次次担任执政官，以期强化自己与元老院融为一体的形象。弗拉维王朝稳定以后，继

续沿用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图密善皇帝犯的过错之一。

但是，图拉真不同。因为他没有孩子，没有必要建立“乌尔庇乌斯王朝”。大概他觉得如果让元老院议员尽可能多地得到做执政官的机会可以获得他们的好感的话，不也是好事一桩吗？而且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数大量增加也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辽阔的罗马帝国总是需要“人”来帮助皇帝分担国家事务，并且，随着帝国统治的各种制度不断完善，越发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在罗马，担任要职的元老院议员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阶层，叫“执政官阶层”（consulares），指的是那些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甚至当某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是由属于执政官阶层的人担当时，便可以推断出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例如，对于天灾，如水灾的善后处理，如果负责人是“执政官阶层”的人，那就意味着不是单纯的抗洪行为，而是要彻底地治水了。

古代罗马的“君主论”

图拉真的执政思路，使得小普林尼有机会当选执政官，并为我们留下了他于公元100年9月在元老院进行的就职演说。他的就职演说题为“献给图拉真的颂词”，感谢图拉真给了自己成为执政官的机会。他就任执政官的时间不是始于1月而是9月。因为40岁左右的小普林尼当选的不是正式执政官而是候补执政官。

他的《颂词》极为冗长，要看完它需要有图拉真一样的耐心，让人深感他作为辩护律师，获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这篇《颂词》不仅长，而且充满了对图密善皇帝的谴责和对图拉真皇帝的赞美。阅读这篇《颂词》，至少可以了解到，好的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是一位人缘极好的人）眼中的皇帝应该是怎样的。也就是说，《献给图拉真的颂词》是一

篇出自古代罗马人的“君主论”。摘取其中要点，内容是这样的：

首先，小普林尼强调，图拉真登上皇位“与其血统全无关系。先皇涅尔瓦收他为养子，看中的是图拉真的真才实学，而不是他的好高骛远”。

为了避免政局的变化不定，罗马人接受了世袭制，但是他们对世袭制又一直心存疑虑。他们担心领袖个人野心过大，也就是私欲过大的心情，很容易让人想起某国的一句话：“与其推荐那些自己想出人头地的人，倒不如推荐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

小普林尼明确表示，罗马皇帝是“由全体元老院、罗马公民、军队、行省和同盟国共同构成的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其目的“除了保障帝国全体公民的自由、繁荣和安全，别无其他”。他还说：“被委以统治一切的皇帝必须从我们所有人中选出。”《颂词》的最后一行，拉丁语的原文是“Imperaturus omnibus eligi debet ex omnibus”。对于经过启蒙主义时代的近代西欧国家为政者来说，这是“必须时刻警惕的事情”。这句话非常有名，甚至在大英帝国的下院会议上，有人即便直接用拉丁语说这句话，会场内的所有人也都能马上理解。

关于法治国家皇帝的权力，小普林尼说了以下这番话。当时图拉真一定就坐在会场的最前面。

“我知道您并不想拥有高于我们元老院议员的权力，但是我们希望您来掌握这样的权力。”他接着又说，“所谓皇帝，他不应该立于法律之上。相反，法律应该在皇帝之上。”

说起来也的确如此。因为罗马有一个惯例，皇帝即位时，要在执政官面前宣誓忠实于罗马的法律，而且这样的宣誓不止一次，他还要在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面对蜂拥而至的罗马公民再次宣誓。

至于被赋予了巨大权力的皇帝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给世人这个问题，小普林尼说：“不是作为主人，而是作为父亲；不是作为专制君主，而是作为一个公民。”从人性的角度上，“既要开心活跃，同时也要认真；既要朴实，同时不能没有威严。必须胸怀坦荡，落落大方”。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样，以我辈之见，这个人简直就是超人。但是，也许罗马人认为，既然成了最高权力者，就必须像一个超人。顺便提一句，罗马还有一个惯例，就是历代皇帝要继承“国父”（Pater Patriae）这个称号。第一个接受这一称号的是尤里乌斯·恺撒。图拉真回到首都的时候也接受了这个称号。现代的国家认为这种称号体现的是“家长制作风”（温情主义，家长一言堂），对此，通常会持否定的态度。日本企业在发展到最鼎盛期的时候，常常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日本企业经营者们的“家长制作风”。

关于与元老院并列为罗马帝国两大掌权者之一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小普林尼对图拉真说：“您所掌握的统治权应该用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这个国家属于所有公民。因此，皇帝有义务倾听公民的声音。”

这里有一段有关图拉真的后任皇帝哈德良的插曲。为了要举行祭祀仪式，哈德良走在前往神殿的路上。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这个女人说要向皇帝请愿，哈德良回答说“现在没有时间”，抬脚准备继续前行。那个女人于是对着他的背影喊了起来：“既然这样，你没有权力统治我们！”

听到此言后，哈德良转身回到女人身边，听取了她的陈述。

所谓“人”，是对贫富差距、对现实利益非常敏感的动物。小普林尼版的“君主论”也没有略去有关金钱的论述，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图拉真沿袭涅尔瓦的对皇帝资产的使用方法。对此，小普林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皇帝资产的使用方法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也享有这一资产的共同所有权。同时，我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罗马的岁入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来自元老院行省的各种税收，通常进入国库；另一类来自皇帝行省的税收，一般归入皇帝名下，由皇帝支配。这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率先实施的制度。在当时，除了埃及，皇帝管辖的行省都在边境，边防的军费支出很多。但是，这种做法很容易成为公私不分的温床。因为钱是国家的，却归皇帝一个人调配使用，让人感觉好像这些钱被当成私有财产一样用掉了。当然如果把钱用在建设竞技场、浴池之类的公共设施上，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在建造豪华别墅等等，免不了遭受非议。帕拉蒂尼山上的雄伟皇宫是图密善建的，后任皇帝涅尔瓦命人在皇宫墙上挂了一块石板，上刻“Villa Publica”（公共别墅），还要求正门随时处于打开的状态。图拉真当然不希望自己像图密善那样饱受非议。到了他统治的时代，石板依然挂在那座皇宫的墙上。

罗马公民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需要承担军务，因此对他们免征行省税。他们需要缴纳的唯一的直接税是遗产税。

这一税种是奥古斯都皇帝提出并规定的。他认为，事实上并不承担军务的罗马公民也免除纳税义务是不公平的。他把这一税种的收入用来支付期满退役士兵的退役金，税率5%，六等亲以内的近亲免缴遗产税。

但是，罗马人知道如何偷税漏税。把一个人收为养子，使他成为六等亲以内亲属的人大有人在。于是新的规定出台了。无论是谁，一律不享受免税。这好像也是图密善做的事情。

图密善遭暗杀后继承皇位的涅尔瓦对这个税法作了修改。新的税法规定，直系亲属继承遗产，全额免征遗产税。还规定如果金额在2万塞斯特斯以内，无论谁继承，一律全额免征遗产税。小普林尼指出，这也

是图拉真应该继承的政策之一。理由是“罗马公民权应该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权利。不应该在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之际，再让他们承受失去财产的痛苦”。我想，这句话真的应该让某些国家的税务官员们好好听一听。

关于帝国内部皇帝实施统治的权限，继元老院和罗马公民之后，小普林尼提到了军队。他通过盛赞图拉真一直以来在军团内的做法，阐述了军队与皇帝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正是因为图拉真的做法，理所当然，他深受士兵们的拥戴。

> 您与士兵们一起忍受饥渴。即便只是演习（据说罗马军演习的认真程度甚至高于实战），您也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与跟在您身后的所有骑兵一样流汗，一样面对纷扬的尘土。在这些士兵中间，您之所以备受瞩目，缘自您身为士兵的优秀和勇敢。在投枪训练中，看到投枪过来，您避开它的动作比谁都敏捷。看到士兵刺中了您的铠甲或盾，您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恼怒而是对其大加赞赏。因此，您既是一位冷静观察的旁观者，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战地指挥官。您在检查士兵们的武器时，发现有问题马上让他们更换；看到哪个战士背负的行李过重，您会接过来替他背；对于病者和伤痛者，您又像亲人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结束对所有属下士兵的最后检查前，您从不会自己先走进帐篷休息，因为您不允许自己在所有士兵进入休息之前，自己先休息。

对着图拉真，小普林尼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战争并不可怕，但是战争不应该由我们挑起。”用拉丁语说，就是“Non times bella nec provocas”。这是现在的士官学校必教的一句话。

继军队之后小普林尼提到了行省。那么，关于皇帝该如何对待行省这个问题，他又是怎么说的呢？他对图拉真强调说：“行省人民也是罗马人的一分子。”他还说：“因为大自然不可能把恩赐均等地分给每个地

方，所以对于需要帮助的地方，理所应当给予帮助。”他还讲述了包括行省在内的罗马帝国的现状：“贸易往来使东西方有了交流。因此，现在生活在帝国内的所有民族都清楚自己生产的、可供出口的物产是什么，也知道什么东西自己不生产因而需要进口。”

从小普林尼的话能够推测出，罗马帝国是涵盖了现代欧洲和北非、中近东地区的一大经济圈。对于皇帝来说，维持这样一大经济圈正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而这也是以小普林尼为代表的，在知识、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均属于当时罗马上流阶层的人心目中对君主的期待。

做人实在很不容易。人不能够获得好评就继续保持、受到批评就放弃不做这样简单地去做事情。当你因受到好评而继续保持时，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人们其实早已厌倦你的做法了。相反，因为受到批评而放弃原有的做法并代之以相反的做法时，曾经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不知何时忽然意识到原先的做法其实很有必要，转而又希望恢复原来的做法，等等，类似的情形变化层出不穷。

涅尔瓦是五贤帝中的第一位，虽然只有不到一年半的短暂任期，但他还是施行了仁政。但是，对图密善皇帝的做法矫枉过正成了他统治的缺陷。

图密善是位严厉的统治者，他对负责行省统治的总督总是严加监督。涅尔瓦认为这样做有损元老院的声誉，完全放弃了对总督的监管。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快显现出来。刚进入图拉真时代，行省人民对总督行为不端的指控大幅度增加。在罗马，总督任期内不允许对其提起诉讼，必须等他的任期结束。每当这时，像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样的元老院议员兼辩护律师，他们或受行省人民的委托作为公诉人，或受前总督委托作为辩护律师参与此类案件。对于新出现的这一情形，尽管他们曾经把图密善批得一无是处，大概也不得不承认放弃监管的结果就是如此严重。因为，这些案件的审判结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行省人民获得胜诉。

图拉真与元老院不同，他对图密善没有憎恨的感情，所以才更真切地认识到对总督疏于监管的弊病。再加上他其实和图密善一样，深知行省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帝国的整体命运。

按规定，元老院行省不归皇帝管，派到这些行省去的总督也是从元老院内部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当然派往皇帝行省的总督，任命权在皇帝手上。

图密善不分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对所有总督一律加以严密监管。图拉真即位的年龄恰恰是图密善死去的年龄。尽管在对总督进行监管的想法上，他与图密善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做法更加灵活。如果行省人民指控频繁，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行省是元老院行省，图拉真首先会把这个行省暂时收归为皇帝行省。这样一来，作为皇帝管辖的行省，皇帝就可以任命他认为有利于恢复该行省秩序的合适人选做总督。

解决空洞化的对策

图拉真还提出了图密善没有提过的法案。在元老院会议上，图拉真用他“话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充满自信的语气、不怒自威的神情、真诚率直的目光”，呼吁议员们通过了一条法案，内容是要求作为罗马社会领导者阶层的元老院议员把至少三分之一的资产投资到意大利本土。

当时，罗马的主要产业还是农业。但是，在尤里乌斯·恺撒提出振兴自耕农的《农地法》以后，农业在意大利本土变成了中小自耕农占绝大多数的格局。这些中小自耕农都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因此他们又是有权者。而这条法律没有涉及的行省大多以大规模农庄为主。给人的感觉好像意大利本土是中小企业集中的地方，行省才是大企业云集的地方。随着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作为有产阶级的元老院议员自然把投资

的目标转向了行省。毕竟投资大企业比投资中小企业更安全而且获益也更高。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渐趋稳定，本土和行省在安全方面的差别也在不断缩小，而行省出身的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增加也加速了投资行省的这一趋势。甚至有议员放言说，自己在意大利本土只有位于首都罗马的家和海边的别墅，其余资产全部投资到行省了。如果对这种状况继续放任不管，显然，作为帝国中心的意大利本土将会出现空洞化现象。

图拉真提出这条法案，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状况。他所提出的三分之一资产也是现实的。因为如果要求所有资产都投入意大利本土，一定会有人设法寻找其他出路。如此一来，再好的法律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议员们可能也认为三分之一可以接受。总之，这个法案顺利获得通过，并很快付诸实施。在小普林尼留下来的一封书信中提到，意大利本土内，从主人家的宅邸到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农地、农民住宅以及劳动场所都已经完善，并且意大利本土内的大面积农耕地将升值。可以想象得到，在图拉真提出这条法案后，一定有为数不少的元老院议员不得不从投向行省的资金中撤回一部分转而投向本土。事实上，投资本土农业还可以得到利息上的优惠。

意大利本土农业的健康发展才是保障帝国中心稳定的关键所在。对此，就连那些声誉不佳的皇帝们也有同样的认识。所以在那些皇帝的时代里，意大利中小自耕农们得到了很多实惠，其中之一就是享受利息上的优惠政策。通常，年息率为12%。但是，罗马有一个政府机构，说它是“中小企业金融国库”想必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向这个机构贷款，年息率只要5%。即使是大规模农庄，如果该农庄在意大利本土内，向这个机构贷款的年息率好像也只要6%。而且不管是中小自耕农，还是大规模农庄，申请贷款时虽然需要提供担保，但是没有规定本金的归还期限。所以，实际上等同于永久性贷款，每年只需支付5%—6%的利息即可。

育英基金

为了防止国内空洞化现象的日趋严重，图拉真实施的另一项政策是统称为“儿童基金”的法律。这是当时的罗马人认为用来培养下一代的基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育英基金制度”。

事实上，在图拉真之前，此类制度并非完全没有，只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属于个人行为，而且已经开展得相当不错。

尼禄皇帝时代，有一个名叫赫尔维乌斯的人。他的出生地是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阿蒂纳。作为振兴故乡阿蒂纳的基金，他捐赠了40万塞斯特斯，条件是接受捐赠的市议会拿出利用基金获得的利益，向婚后定居在阿蒂纳的年轻人每人提供1000塞斯特斯的生活津贴。

还有，在图密善皇帝时代，小普林尼为了培养下一代，也向其位于意大利北部、美丽的科莫湖畔的故乡捐赠了神殿和图书馆。小普林尼的祖辈一直都很富裕，同时，他本人又热衷于承担富裕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后世把这叫做“位高责重”）。此外，他还向科莫市捐赠了价值高达百万塞斯特斯的土地，条件是市政府要把一年可预期达3万塞斯特斯的收益用做育英基金，资助那些市内贫困家庭子弟直至其成年。在当时，3%的收益应该是很低的，所以，小普林尼捐赠的土地很可能是森林地区。当时的罗马人认为，投资这样的地方安全性高，但是收益率偏低。

在这里我就不多举例了。总之，图拉真皇帝提出的就是这一类的育英制度，并把这种制度作为国家政策执行。

以振兴意大利本土农业为目的而设立的罗马帝国的“中小企业金融国库”，资金不是从“艾拉留姆”（Aerarium，元老院行省税）中出，而是从“费斯库斯”（Fiscus，皇帝行省税）中出，放贷的利息收入作为育英基金的资金来源。利息收入的收款方不是“中小企业金融国库”，而是贷款人的农场土地所在的地方自治体。由于年化率只有5%的超低利息，

这使得贷款变成永久性借款的概率非常之高。因此，可以想象得到汇入地方自治体的利息收入也是稳定的、持久的。作为育英基金的资金来源，最理想的莫过于金额稳定且年年都有入账来源。

根据图拉真的《育英基金法》，接受资助的资格年龄截止到成年，同时，对金额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嫡出男孩——每月16塞斯特斯

嫡出女孩——每月12塞斯特斯

庶出男孩——每月12塞斯特斯

庶出女孩——每月10塞斯特斯

按照罗马时代的惯例，男孩17岁成年，女孩14岁成年。孩子成年后，不需要归还曾经接受过的育英基金，哪怕是分期归还。当时军团兵的月薪是75塞斯特斯。

也许现代的女权主义者会因为对男女不同性别提供资助的金额不同而提出批判，但是在1900年前的古代，能把女孩列入资助范围，已经是一大进步。还有，虽然资助金额有别，但是，把庶出的孩子也列入资助范围，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一项举措。但是，基督教只承认在神前宣誓结婚后所生的孩子，那还是罗马时代之后的事。在基督教的国度，允许庶出的孩子继承遗产更是近代的事情。

图拉真提出此项法案，是以培养下一代为目的的。因它的实施而获益的，不仅仅是直接享受该基金资助的本土贫困家庭。

这是因为，第一，由于自己支付的利息是用在自己居住地区的贫困孩子们身上，所以农民们很乐意支付应付的利息。

第二，有利于促进享受到这一法律的地方自治体的崛起。尽管《育英基金法》规定了每人每月的资助金额，但是，没有规定接受该基金资助的人数。由于资金来源是利息收入，因此，不同的地方自治体，资金充裕度不同，有的地方收入相对很少。但是，地方自治体不能根据资金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决定资助者人数。显然，通过这条法律，能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得到实惠是皇帝的本意。因此，利息收入较少的自治体，通过动员小普林尼这样的富裕大户来尽可能地弥补资金的不足。

就这样，作为个人行为的育英活动和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的育英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同时，这条法律也为有效防止意大利本土人口流失起到了作用。不能不说，这也是提出这个立法的图拉真想要的结果。造成所谓国内空洞化的现象，首先就是从人口流失开始的。

在意大利全境，《育英基金法》的受益者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史料留下来，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还是知道凡雷亚一地的情况。凡雷亚是一个很小的小镇，位于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之一皮亚琴察的近郊。尽管这个镇很小，但是，接受育英基金资助的人据说就有18个男孩和1个女孩。

此外，有些地方根本无法奢望有更多的利息收入，就连耕地稀少的首都罗马也一样。而大都市罗马正因为大，贫困家庭的数量自然相对也多。于是，图拉真对《小麦法》作了修改。《小麦法》规定每月向贫困家庭免费提供约30公斤小麦，他提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贫困家庭的儿童。原来的规定是只有成年公民才有资格领取免费的小麦，图拉真把资格年龄下调到了10岁。根据小普林尼留下来的记录，按照新的规定，可免费领取主食小麦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人数达5000人。

规定元老院议员必须把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于意大利本土的法律，以及规定向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育英基金的法律，先不论起草这些法律的图拉真本人是否早已预料到，总之，它们还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

到了图拉真时代，600名元老院议员中，行省出身的人所占的比例有增无减。而且，皇帝本人也是行省出身的人。因此，本土出身的议员们自然会带着怀疑静观这一切。由于登上帝位的图拉真出身行省，所以这些议员们自然担心帝国的中枢会因此离开罗马，离开意大利本土，迁到图拉真的出生地西班牙。然而，上述两个法律的出台，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因为这两个法律是以激活本土经济为目标的政策，体现了图拉真对意大利本土的重视。

也许图拉真本人早已意识到自己必须首先消除大家的这种疑虑，所以，他即位皇帝后，一直没有回过故乡，甚至也没有到过伊比利亚半岛。他也没有在故乡意大利卡建造神殿，现在依稀可见的神殿遗迹等公共建筑物都是在图拉真死后修建起来的。

当然，图拉真并非为了有意识地拉大本土和行省之间的差别而提出上述两个法案，尤其是《育英基金法》。自然，也不是为了获取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议员们的好感而制定这两个法律的。图拉真认为意大利本土应该成为各个行省的楷模，让首都罗马的市政建设成为行省各城市建设的样板，让意大利地方自治体的自治体系成为行省各城市自治体系的榜样。

这两个法案的立法目的虽然很微妙，却是不一样的。规定元老院议员必须把资产的三分之一投资于意大利本土的法案，目的在于提高领导层对本土发展的关注度。因为人们只有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钱来进行投资，才会真正关心投资对象的发展状况。

说到《育英基金法》这项法律，图拉真一定真心希望它能在各行省推广开来。皇帝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图案不仅出现在金币上，同样也刻印在了银币和铜币（塞斯特斯）上，而这两种货币作为日常流通货币被广泛使用。希腊和迦太基时代的货币与罗马时代的货币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马货币图案呈多样化，且货币上文字很多。应该说这也是罗马为政者的高明之处，他们把货币作为绝好的宣传媒介而有效利用了它。因

此，对于后世的研究者们来说，罗马货币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而图拉真不过是按照罗马人的行事风格，把货币有效利用起来的其中一人而已。

表现皇帝与孩子们在一起的金币

图拉真统治期间，广为人知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大兴公共工程。公共工程最先从首都开始，逐渐扩大到行省。只是，在公元99年秋至101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生活在首都罗马的图拉真，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作

为。因为此时的他另有事情需要考虑。当然，这个时期的罗马也有一些原因导致对公共工程的需求并不多。

图密善同样是位热衷于兴建公共工程的皇帝。在他遭到暗杀时，尚有几个工程在建，这些工程都是在涅尔瓦时代完成的。由于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所以，像广场和建在台伯河岸的大仓库的命名都是冠以涅尔瓦的名字。与现代意大利人不同，古罗马人的工程进展速度很快。但是即便如此，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建筑绝无可能。所以，这些建筑的开工时间应该是在图密善时代。对于首都罗马的居民来说，他们与建筑工地相邻而居的生活应该持续了很久。

尤里乌斯·恺撒制定了一个法律，可以称之为《缓解交通堵塞法》。根据这项法律，首都罗马白天禁止载货马车通行，但专为公共建筑工地运输物资的马车除外。

罗马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有的学者认为，到了图拉真皇帝时代，罗马的人口更多。因此，市区一定嘈杂无比。装满了沉重石材的马车，伴随着车轮发出的沉闷的声音穿行于人群之间。尽管公路都铺上了柏油，但是在那个尚不懂得使用橡胶制作轮胎的时代，仅是装满建筑材料的马车络绎不绝，就足以令人难以忍受。对于居民来说，他们有时候一定会盼着尽早从这种喧嚣中解脱出来，毕竟不是人人都有郊外别墅。

与图拉真同时代的、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狄奥·克瑞索托指出，罗马皇帝的三大职责是：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维护国内统治；三是充实社会资本。对皇帝的职责比常人有更强意识的图拉真不可能不关心基础设施的完善。事实上，后来他成了可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的公共设施建设高潮的领头人。但是，不管愿望多么强烈，没有建筑师的帮助终究只是空想。在公元100年的时候，绝大部分工程师被派往多瑙河边境地区还没有回来。

图拉真要与达契亚重新开战的想法始终未变，为此他要作好周密的战前准备。首先，他决定投入三倍于图密善当年所使用的兵力。除了驻防在多瑙河中游至下游前线的7个军团，他还把驻扎在温迪施的第十一克劳狄乌斯军团、驻扎在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从莱茵河防线调过来。此外，又新整编了2个军团，分别命名为第二图拉真军团和第三十乌尔庇乌斯军团。除了这些兵力，他还要从莱茵河防线和幼发拉底河防线以分队规模抽调兵力前来参战。所以，仅作为主力参战的罗马军团兵就达8万人。再加上罗马军队在战斗中还要投入辅助部队及具备特殊技能的部队。其中，有光着上半身作战的日耳曼士兵，有身着东方式长袍上战场的弓箭手，还有以攻势凌厉闻名的北非毛里塔尼亚骑兵。这就是多国籍的、军装五彩缤纷的罗马军队。在使用各种不同语言交流的人群中，一队身着华丽戎装的近卫军团兵穿行而过。罗马军队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缩影。

图拉真发起的达契亚战争，投入了军团兵8万人，再加上略少于这个数字的辅助部队士兵，总计达15万人。这支由罗马最高统帅率领的战斗部队是罗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图拉真把在战地的一切战前准备工作交给了李锡尼·苏拉。自从图拉真于公元99年夏天回到首都以后，苏拉一直留在前线担任指挥官。他与图拉真是同乡，两人年龄相仿，而且军团生涯好像也都在一起度过的。他是图拉真的知心好友，皇帝比任何人都信赖他。

然而，战前准备工作就绪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发起进攻。小普林尼曾经当着图拉真的面说过：“战争并不可怕，但是战争不应该由我们挑起。”不仅如此，罗马和达契亚之间还有一份由图密善皇帝和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之间签署的和平条约。所以，图拉真不能贸然出手，他需要发动进攻的借口，需要掌握达契亚方面违约的证据。也就是说，他必须等待达契亚方面首先出手。就在这时，一部分达契亚士兵看到集结在多瑙河对岸的罗马大军心生恐惧，鲁莽地采取了一些授对方以口实的行

动。消息很快传到首都罗马。适宜远征的春季一到，图拉真就离开了首都，时间是公元101年的3月25日。

身着各色军装的罗马军队士兵（拍摄自图拉真记功柱）

达契亚问题

公元14年去世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曾经留下遗训，禁止罗马帝国进一步扩张霸权，至此已过去近90年。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又明确界定了“进一步扩大”国界的范围是到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撒哈拉沙漠为止。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曾经攻打不列颠（今英格兰和威尔士），并征服了这一地区。但是，这次军事行动不能算是违反奥古斯都遗训的行动，因为很早以前，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攻打过这一地区。除了征服不列颠，罗马帝国采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为了维护帝国边境的稳定或是镇压内部的叛乱。

尽管这是罗马帝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然而，关于图拉真发起的这场战争的详细情形，可以说几乎已无人知晓。图拉真无法激起历史学家的悲愤情绪，无法使他们产生写作的激情。甚至作为贤帝，他居

然连传记也没有。有关征服达契亚的史料也只有下面三种：

一、传说是图拉真亲笔书写的《达契亚战记》（Commentarii Dacii）。

二、卡西乌斯·狄奥所著《罗马历史》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述部分。

三、在被称为“图拉真记功柱”的胜利纪念碑上，有记述战争过程的、超过200米长的浮雕。

虽然考古学调查可能有助于为这三种史料提供实证，但是由于战场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所以考古学上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进展。

据说《达契亚战记》是图拉真模仿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亲自著述的。凡是研究罗马史的人自然都会认为要是这部著作保留下来就好了。然而，遗憾的是，如今这部作品已经无迹可寻，唯一留下来的只有一行后来有人引用过的话。

其次，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历史》中，也只能找到有关五贤帝时代的部分片段。

只有图拉真记功柱，在过去了1900年以后的现在，依然挺立在原址上。如果你希望近距离观看浮雕上的每一处细节的话，那么，位于罗马郊外罗马博览会新城（Esposizione Universale Roma，简称EUR。——译者注）的罗马文明博物馆里有高质量的复制品。图拉真记功柱是一部用凿子代替笔书写的“达契亚战记”，只是它的缺陷很明显。尽管全长达200多米，画面数量也多达140多个，毕竟它与文章所传达的信息量和准确性不可同日而语。刻画在白色大理石浮雕上的士兵们手里拿的所有枪和剑都是铜制的，充分证明了当时的罗马人非常注重现实。虽然在帝国

灭亡后，这些铜制的枪、剑都被取下来熔化，可能已经做成了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能够想象得出的是，在这些铜制武器留在各自所在位置上的那个时代，这些浮雕的逼真程度一定非常之高。图拉真记功柱不只是历史史料，同时也是罗马造型艺术的杰作。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要讲述达契亚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可以想象，让研究者们哭笑不得的是，就算阅读了他们这些专家的著作，我们依然无法把握这场战争的全貌。既然不能把握战争的全貌，自然就无法透彻地理解这场战争。也因此，要清楚地讲述这场战争难上加难。但是，就我本人而言，在研究了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所有画面后，自认为对这场战争似乎有了一些了解。所以在这里，我想对这根圆柱上每个画面进行说明，来取代我用自己的理解对这场战争的过程的整理所作的描述。我知道，如果能把这根圆柱上的所有画面都拍成照片刊登出来是最理想的，但是鉴于版面的原因，显然做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只选取若干画面的照片，希望读者朋友们谅解。

图拉真记功柱

第一次达契亚战争

图拉真率领罗马军队于公元101年春季横渡多瑙河。关于渡河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卡西乌斯·狄奥在《罗马历史》中完全没有提及。图拉真的《达契亚战记》中也只有刚才提到的有人引用过的那一行字：

“Inde Berzobim, deinde Aizi processim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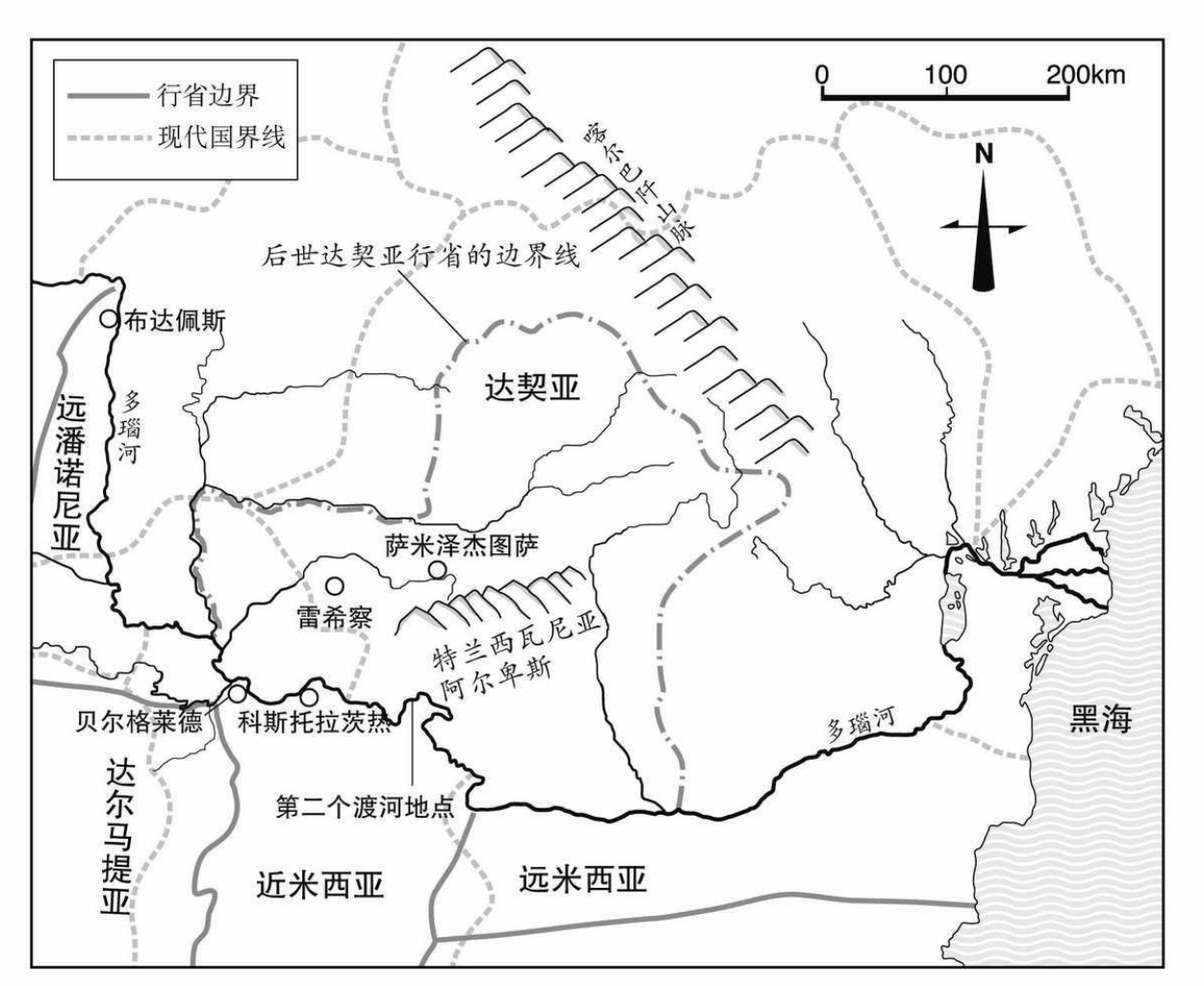
翻译过来应该是：“我们的军队向贝尔佐宾和埃兹挺进。”

研究者们认为贝尔佐宾就是现在罗马尼亚境内的雷希察，至于埃兹在哪里尚不清楚。不管怎样，目标应该是达契亚人的首都萨米泽杰图萨（现在依然使用此名）。所以，为了攻打位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北侧的这个地方，罗马军队一定是绕过山脉西侧，顺着流入多瑙河的河道支流，通过贝尔佐宾，向东北方向挺进的。

由此可以推断，罗马军队横渡多瑙河的地点很可能是罗马时代的费米拉孔（今科斯托拉茨热）。此地位于现在的贝尔格莱德以东直线距离60公里的地方，而贝尔格莱德的起源就是罗马军团的基地。这就是说，公元101年，罗马军队是在现在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国界线相接的一带渡过多瑙河，然后一路向东北进入罗马尼亚的。在过去了1898年后，北约军队空袭了南斯拉夫，多瑙河上的许多桥梁被毁。而当年图拉真北渡多瑙河就是在北约军队空袭的地点略靠下游的位置。

虽说图拉真在军团基地和要塞位置部署了防守人员，但是，仅靠船只相连做成的桥，要保证10万大军全部过河，显然耗时太长。而且，把如此规模的大军集中在一个地点，再用若干天的时间横渡多瑙河，在战术上也是极不明智的。因此，兵分两路实施渡河的说法变得更加有力。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除了科斯托拉茨热，另一个渡河地点又会是哪里呢？

科斯托拉茨热被认为是罗马军队的第一个渡河地点。从此地向东直线距离100多公里处，多瑙河向北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公元98年至101年的备战期间，在这里集中进行了公路建设等土木工程，削崖修建的公路痕迹现在仍然依稀可见。此外，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的间隙兴建的、连接多瑙河南北两岸的第一座石桥也在这一带。第一次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兵分两路后，第二支部队的渡河地点在这一带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渡河利用的一定也是用船串联起来的桥。如果横渡多瑙河的地点确定是这里的话，那么，第二支部队很可能在过河后向北行军，并在雷希察与第一支部队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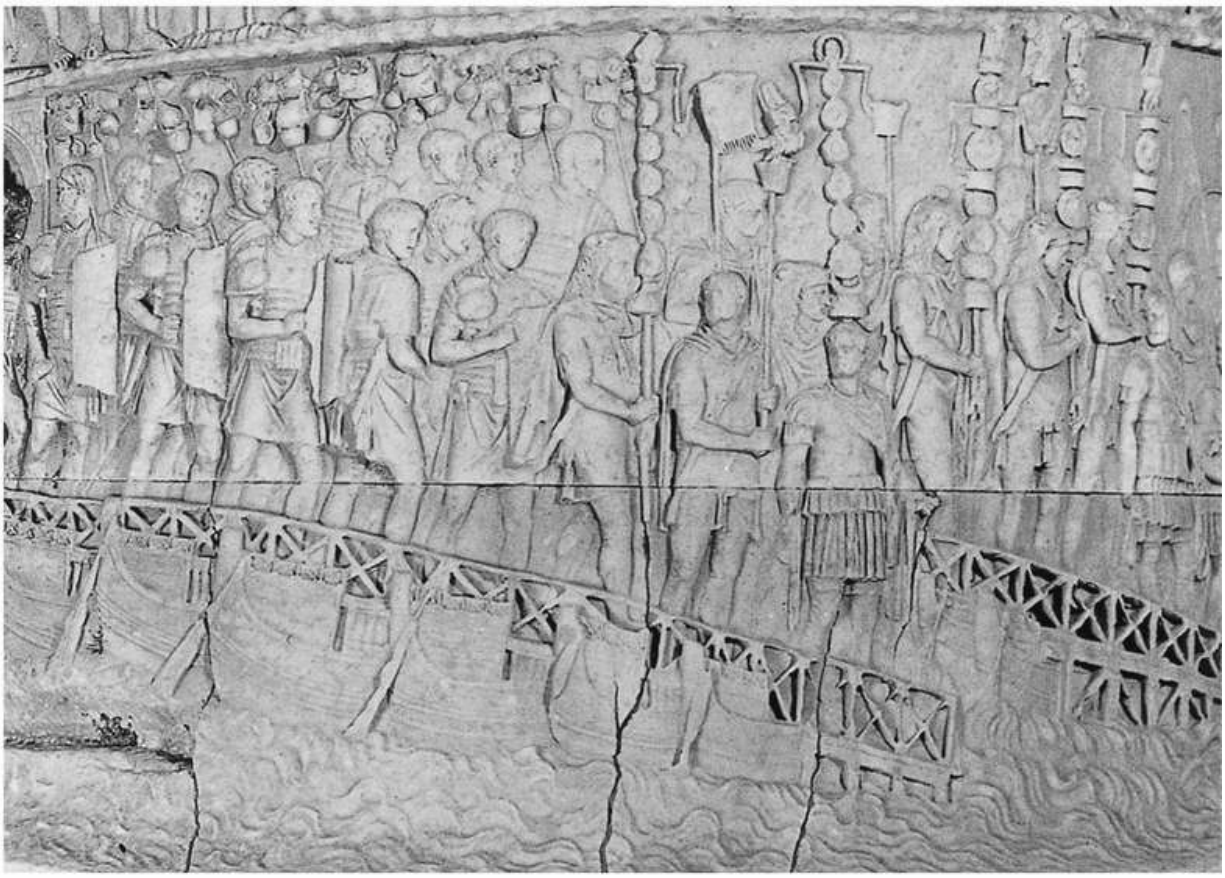
达契亚以及周边地区

刻在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战记，自下而上呈螺旋形展开。每个情节之间用细小的树枝相隔。恺撒的《高卢战记》中，没有铺垫，直接进入故事的主题。与此相似，这部“达契亚战记”的故事也是直接从多瑙河沿岸开始的。

（1）这个画面上有面向多瑙河而建的、用于监视的要塞。要塞虽小，却都是石结构。周围有一圈木栅栏围着，保护层有两道。看得出有很多建木栅栏的圆木堆在一起。稍微高一些的要塞，最上层是一个高台，长长的火把从这里伸出来。让人很容易想象到罗马军队在紧急状态

下是如何传递消息的。要塞附近还有全副武装的哨兵们在站岗。

（2）这个画面上有几座石结构的建筑物。用木栅栏围起来的一角应该是储藏军粮的仓库。盛满葡萄酒的酒桶就装在船上。不管是用凉水还是温水兑着喝，葡萄酒是罗马士兵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饮品。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气候条件允许，罗马人称霸的地方，无论是哪里都会有葡萄园。德国最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摩泽尔葡萄酒的产地曾经就是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地方。



罗马军队横渡由船只连成的桥

（3）接着换下一个画面。这里是建筑物鳞次栉比的街道，有会堂和高耸的石结构建筑。装备齐整、从城门出来的罗马军团兵开始横渡由船只连成的桥。河中是多瑙河河神。他探着半个身子，正安详地看着眼

前的这一切，似乎在祝福罗马军队顺利渡河。

说到装备齐整，其实不仅仅是作战的装备，还有行军的装备。因为除了武器，士兵们的长枪头上还绑着从不算太多的粮食到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量的军团兵，行军时必须背负的装备，加上穿在身上的盔甲，据说重达40公斤。

再说桥。虽说是用船只连起来的，但是并非简单地把船只横向排好后，在上面放上木板。首先，为了减小水流的冲力，船头必须对着上游。其次，如果船与船之间连得太紧，船体就要承受全部水流的冲击，船桥会不可避免地被冲垮。所以，每艘船之间必须有一定的间隙。为此，必须用粗壮结实的木头把它们连接起来。最后才是在上面铺设木板。另外，罗马人为了防止从船桥上渡河的马匹、载货车辆踏空落入水中，甚至还装上了木栅栏。

此外，渡河地点也不是河面越窄越好。因为河面窄的地方通常水流也比较湍急。所以，桥适宜建在河面开阔、水流缓慢的地方。因此，在欧洲第一大河多瑙河上用船只连成的桥，全长至少超过1公里。

（4）到这里，图拉真才出场。这个画面上的他，作为总司令官，不是威风凛凛骑在马上的姿态，而是坐在马扎上。将军们围在他的周围，正在举行作战会议，一侧是渡过多瑙河后继续行军的士兵队伍。皇帝左侧还有一个人也坐在马扎上，据说此人就是图拉真的好友，在达契亚战争中担任副将的苏拉。

（5）这个画面是部队过河来到多瑙河北岸后，在敌人的地盘上举行第一次祭神仪式。用做祭品的牛和羊被带了上来。图拉真以祭司的形象主持仪式，祈求士兵们英勇作战的同时，也祈求诸神能保佑自己取得胜利。在这里，图拉真的祭司形象，只是脱去了红色大斗篷和钢铁制的胸甲，在白色短衣外披了件托加，再用托加的一端覆盖在头上而已，非常简单。

（6）画面一变，换上戎装后的图拉真再度登场。他正对着集合完毕的士兵们演讲。士兵们的背后是密密麻麻竖立着的军旗。认真聆听演讲的士兵们身上的军装五花八门，一看便知，皇帝的演讲对象不只是属于罗马公民的军团兵。仔细想想这也正常。因为罗马军队要取得战斗的胜利，除了由罗马公民构成的主力部队之外，由行省人民构成的辅助部队协同作战也必不可少。

虽说演讲的对象是士兵，但是，罗马军队不会连声高呼："加油！"图拉真没有留下他的演讲内容。但是，只要看看其他将军的演讲内容，就可以推测出图拉真的演讲主题就是鼓励和动员。

演讲者首先会列举一些确定的因素，如士兵人数、军粮调配情况等。他会把不确定因素放到演讲的最后，如士气，也就是士兵的求战欲望等等。他会说，如此这般，与敌人相比，我方的优势显而易见。所以结果如何，就要看你们的士气了。加油！之所以人们都说"罗马军队靠后勤保障取胜"，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后勤这一确定因素得到了保障，才能充分调动士气这一不确定因素。

（7）也许有人会认为，因为第一场动员演讲就在敌人的地盘上进行，所以，演讲结束后马上就会向敌人发起进攻。但是，图拉真记功柱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就像祭神仪式那个画面上看到的背景一样，在渡过多瑙河、司令官们还在举行作战会议的时候，士兵们已经着手搭建坚固的宿营地了。接下来的四个画面，都描绘了士兵们使用石材、木料搭建宿营地的情形。不分军团兵还是辅助兵，所有人都在参与这项工程，只不过工程的最重要部分要由军团兵中掌握熟练土木工程技术的士兵负责。同一时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行省，仅仅靠驻扎在那里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兵，就建起了提姆加德一整座城市。由此可见，罗马军团兵在土木工程上的造诣非常之高。达契亚地区无论气候还是地势都与撒哈拉沙漠相反，在这里搭建宿营地之类的事情，对罗马军团兵来说易如反掌。在士兵们全力以赴搭建宿营地的几个画面中，描绘了图拉真皇帝视

察工地的情形。因为建设牢固的宿营地也是重要的战略任务。

有时候断了士兵们的退路，让士兵们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这样做战斗的效果会更好。也有时候，事先保证了退路，让士兵们知道一旦形势不妙有路可退，放心地投入战斗效果会更好。因为心情放松的感觉会像弹簧一样，能激起士兵的士气。当然，究竟哪种方法更好，要看具体情况。罗马指挥官采用的几乎都是后者。

（8）充当工兵的罗马士兵所做的土木建筑工程不只是搭建宿营地。当时的欧洲还是遍地森林。所以，砍伐树木、打通道路的作业必不可少。因为行军途中无法浇注柏油，所以，路要尽可能修得平坦。遇到河流，要就地伐树建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军队的行军速度，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熟知当地地形的敌人采用游击战术，毕竟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罗马指挥官需要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士兵看得见敌军。

（9）一名达契亚俘虏被带到了正在视察工地的图拉真面前。俘虏没有戴无檐帽，大概只是个普通的侦察兵。因为达契亚权贵阶层的人都习惯戴无檐帽。

专注于搭建宿营地的罗马士兵

根据罗马军的惯例，即便对方只是一介普通的侦察兵，审讯俘虏也要由指挥官亲自负责。所谓收集情报，不只是单纯地收集客观的数据，同时还要找出隐藏在表面事实背后的某些东西。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

作，不允许总司令官偷懒，交由他人去做。

（10）通过审讯俘虏，图拉真好像获悉了敌军就躲在河对岸的森林中这一事实。这个画面描绘的是战争即将开始前，士兵们在作战前准备的情形。画面上有精神饱满的战马和神情严肃整装待发的军团兵，刻画得非常生动逼真。

达契亚士兵的服装（右边是国王德凯巴鲁斯）

最先出发的是骑兵和步兵，步兵的任务是伐林修路。紧随其后的是军团兵，也被要求边砍树修路边前进。

（11）果然不出所料，罗马军队来到森林尽头开阔的平原时，达契亚军队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图拉真率领的罗马军队和德凯巴鲁斯率领的达契亚军队之间展开了第一场大战，历史上叫做“塔帕伊（Tapae）之战”。2000年后的今天，已经无法确定此战的战场的具体位置，好像是在距离达契亚王国首都萨米泽杰图萨以西约50公里的地方。

塔帕伊之战中，罗马军队似乎没有充足的时间摆开他们最擅长的会战阵型，部队没有按左翼、中部和右翼的阵型发起进攻。图拉真记功柱上，战斗的画面连着有好几个。每个画面都是军团兵中的骑兵、重装步兵和作为轻装步兵的辅助部队混杂在一起的场面。罗马士兵和达契亚士兵混杂在一起混战，白刃战似乎是塔帕伊之战的真实场景。只能看出达契亚士兵既没有戴头盔也没有佩胸甲，他们全身的装束非常简单，只是短衣加裤子，配上剑和盾而已。相反，罗马军队中，主力部队士兵身穿钢铁制的胸甲，辅助部队的士兵穿着皮革制的胸甲。在后者之中，格外引人瞩目的是光着上半身作战的日耳曼士兵。这大概是他们的习惯吧。画面中，骑马技术高超、没有马镫也能随心所欲驾驭坐骑的北非毛里塔尼亚骑兵闯入敌阵之中，冲散了敌方达契亚士兵。毛里塔尼亚骑兵还因为他们在战斗中利用腕力和马的冲力投枪，因而以战斗力极强而闻名。

（1）在街上放火的罗马士兵

（2）溃败的达契亚士兵

所有这些画面中，图拉真都在关注着战斗的进程。画面上还可以看到敌军背后，站在树林前的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的面孔。

（12）塔帕伊之战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这场战斗自始至终

打得都很激烈。有罗马士兵拿着砍下来的达契亚士兵的头颅给皇帝看；也有罗马士兵无暇给皇帝看，只从敌人头上割下一缕头发叼在嘴里继续战斗。

罗马士兵一路追击败兵，前面突然出现一堵城墙。城墙上，立着被达契亚夺走的队旗和绑有被杀罗马士兵脑袋的长枪。不知道是否是图拉真的命令，画面上罗马士兵正在火烧全城。

（13）图拉真站在士兵们前面，称赞他们作战勇敢。

（3）夸赞士兵们作战勇敢的图拉真

（4）图拉真和达契亚使节

（14）五位达契亚使节求见图拉真，图拉真带着幕僚出来迎接。达契亚使节们没有头戴无檐帽，说明他们不属于达契亚统治阶层。看到此情形，图拉真应该对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提出和谈的诚意产生过怀疑

吧。

（15）塔帕伊之战结束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继续前进的罗马军队像地毯式清除一样，攻打并烧毁所有妨碍他们前进的城镇、村落以及堡垒。见到男子一律格杀勿论，见到老人、女子和儿童就抓起来移送到多瑙河南岸，只剩下狗、牛、羊等家畜。

这时，公元101年冬季好像快到了。图拉真在达契亚留下一半军队，自己随同另一半军队向南回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过冬。

（16）达契亚国王为了转移已经追至距离首都50公里处的罗马军队的进攻矛头，制订了一个方案——向位于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军团基地发起进攻。进攻目标是远米西亚行省的诺维伊，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意大利卡军团。诺维伊相当于现在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从达契亚王国到诺维伊只要沿河边一路南下即可，途中绝没有可能遭遇罗马军队。

然而，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的计划实在有失周密。首先他小看了横渡多瑙河这件事。事先没有作好周密的渡河准备，骑兵就已经催马下河，士兵也挤满了渡船。整个渡河过程中损失了不少兵力。好在达契亚人口众多，而这也是达契亚对罗马构成威胁的原因之一。

（17）终于过河上岸的达契亚士兵，对诺维伊基地发起了围攻。罗马士兵从城墙上展开反击。因为一半以上的兵力被派去攻打达契亚，所以防御战应该打得异常艰难。这时，德凯巴鲁斯再次判断失误。他没有料到罗马皇帝会亲自赶来救援，毕竟诺维伊只是一个军团基地。他自己没有参加进攻诺维伊的作战，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敌方统帅会亲自赶来增援基地。

（18）在这个画面上，背景是林立的石结构公共建筑物以及圆形竞技场。由此推测，图拉真过冬的地方一定是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军团基地，很可能是近米西亚行省的首府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如

果是这样的话，顺多瑙河而下，没有600公里无论如何到不了诺维伊。如果选择走陆路，因为多瑙河是一条防线，所以，以提高战时行军速度为首要目的的道路修建应该已经完成。

图拉真记功柱上的这个画面描绘的是基地前河岸边的情景。有的士兵正在往船上搬运军粮，有的士兵穿着军装正在依次上船。图拉真身着便装，也就是托加，正准备登船。自从把多瑙河当做防线以来，同莱茵河一样，罗马在多瑙河安排了船队，甚至还有专门用来运送马匹的运输船。

（19）在这个画面上，罗马船队顺着多瑙河正在往下游前进，其中一艘船由皇帝亲自掌舵。进入下游地带后，多瑙河的河面渐渐开阔，转而向东。到了这里，划桨动作越快船速也会越来越快。此外，机动部队大概是走陆路向东去的。

（20）距离敌人正在攻打的诺维伊以西五六十公里的地方是伊斯克尔基地。就在该基地附近，图拉真和士兵们弃船上岸，与走陆路前来的机动部队会合后，前去救援诺维伊。这时的图拉真换上了军装，他骑在马上，行进在军队的最前面。紧随其左右、身后的是身着各色军装的士兵们。

（21）前去侦察的骑兵队回来了，在向皇帝报告敌情。

（22）了解敌情后，图拉真下令，首先出动的是来自北非的骑兵部队。

（23）迎战这支毛里塔尼亚骑兵部队的是萨尔马提亚人的骑兵部队。萨尔马提亚人是达契亚统治下的一个部族，他们的特征是士兵和马匹全部披挂鱼鳞状的盔甲。

在毛里塔尼亚骑兵的猛烈进攻面前，对方即便是全副武装也毫无用

处。图拉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罗马骑兵部队加入了战斗。面对罗马军队的攻势，达契亚方面全无回击之力。画面上，光着上半身的日耳曼步兵团也加入了战斗。背景是达契亚的货车队列，车上装满了掠夺来的物品，是他们袭击基地周边百姓居住区抢夺而来的。又是一场白刃战，双方混战在一起。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并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终。

（24）一身戎装的图拉真带着三个幕僚正在视察士兵们搭建的宿营地。这是罗马士兵早就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时，一些达契亚老人带着女人、孩子来到他的身边。他们表示愿意归降，希望罗马军队放自己一条生路。这些人没有戴帽子，显而易见，他们并非正式使节。达契亚部族与日耳曼民族相似，有把女人和孩子带到战场上去的习惯。

（25）尽管第一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图拉真救援诺维伊基地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个画面中，有的士兵把俘虏双手反绑后串联在一起；有的军医正在为负伤的士兵治伤；还有的士兵为了迎接明天将要来临的下一场战斗，正在检查队旗和军号。

（26）第二场战斗是在多瑙河下游一带进行的。这场战斗的主角是主力部队，即重装步兵团。

由于这一带是平原，因此罗马军队好像采用了最擅长的会战方式。罗马人的会战方式是首先包抄敌人，最后予以彻底消灭。这个画面中，军团兵手持长枪，围着敌人，正在发起进攻。他们手握铜制枪和剑，其逼真程度堪与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战斗场面相媲美。

（27）为了确保围而歼之的战术取得成功，必须有骑兵配合，绕到敌人背后协同作战。

罗马军队的骑兵手持长枪，正冲向被逼得节节后退的达契亚士兵。达契亚士兵一旦摔倒在地，等待他的命运就是被踏扁。战场上堆起了一

座座达契亚士兵的尸山。

（28）这个画面是战斗结束后，皇帝在作总结演讲，他称赞士兵们作战勇敢。所有人都看着正在演讲的图拉真，崇敬之情形于颜色。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会战要取得胜利，担任总指挥的人是否具备军事才能非常重要。

（29）这个画面是押送到宿营地的达契亚俘虏。接下来的画面是皇帝在表扬每一个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特别勇敢的士兵。

（30）这个画面是一些女人正在刑讯被脱光了衣服的三名俘虏。其中一名俘虏的发型是罗马式的短发，而且没有蓄胡须。所以，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个画面描述的是达契亚女人正在刑讯被捕的三名罗马士兵。但是，刑讯的不远处，图拉真正坐在马扎上与士兵们说话。所以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生活在基地附近的居民，之前遭受过达契亚士兵的袭扰，被抢走了粮食等所有东西。此时，情形已经彻底改变。他们出于报复的目的，在戏耍达契亚士兵。因为罗马军队自带军粮参加战斗，而达契亚人则通过掠夺满足军粮需求。

（31）结束对诺维伊基地的救援后，图拉真再次登上了船。尽管达契亚老人们不断向这位皇帝哀求，但是，他们（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作为俘虏的命运已无法改变。

就这样，达契亚军队进攻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作战企图以失败告终。向着多瑙河上游一路前进的图拉真和士兵们终于可以放心过冬了。

（32）又是新的一年。图拉真记功柱继续用浮雕的形式，向我们描述了公元102年春季以后的“达契亚战记”。

这个画面与前一年一样，描绘的是正在往船上装运军粮的士兵和准备通过由船只连成的桥的军团兵。从军团旗帜上的标志可以了解到，这

是驻扎在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波恩是莱茵河防线基地之一。

同样，与上一年一样，罗马军队依然在行军途中在路旁修建宿营地和堡垒。但是，这一年，图拉真改变了战术。一定是上一年达契亚人攻打位于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军队基地诺维伊，让他作出了改变战术的决定。

公元102年的达契亚战役，他采用了兵分两路的战术，向位于山脉北侧的、达契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发起进攻。一路进军的路线与上一年相同自西绕过山脉，另一路从东侧绕到山北侧。这就意味着，在离开位于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前线基地的时候，他已经决定采用围而歼之的战术了。上一年冬季，达契亚军队攻打诺维伊的时候，已经证明了即便是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从东面绕过山脉到达多瑙河也是完全可能的。既然自北向南可以，那么反方向也应该可以。

只是，自东迂回的路线与自西迂回的路线相比，显然困难得多。自西迂回的路线前一年已经走过，沿线已有坚固的宿营地和开通好的道路，还有留下来的一半军队。但是，对罗马军队来说，自东迂回的路线还是第一次走，并且距离又是自西迂回的三倍。因此，图拉真决定由骑兵和年轻力壮的精锐军团兵组成从东侧迂回的军队，姑且称之为第二路军。这支军队由率领毛里塔尼亚骑兵团的、威震一方的卢修斯·昆图斯担任总指挥。如果说，图拉真的同乡、出身西班牙的李锡尼·苏拉是第二号人物的话，那么出身北非的昆图斯可以说是第三号人物。图拉真本人和苏拉一起率领第一路军自西迂回。

（33）浮雕上关于第二年“达契亚战记”的重点好像放在了对第一路军进军过程的描述。接连几个画面描绘的都是罗马军队从延伸至坚固宿营地及木栅栏的桥上通过的情形。每个画面都有皇帝带着苏拉等幕僚。图拉真与图密善皇帝不同，图密善总是让军队先行，而图拉真是一位与军队不离片刻的皇帝。

（34）图拉真再次见到留在敌人地盘上过冬的士兵们，并向他们表示慰问。

（35）在皇帝一旁，士兵们已经着手在伐林修路了。虽然从西侧迂回的路线距离目的地较近，可以放慢行军的速度。但是，显而易见，第一路军行军的这条路线将成为联结多瑙河北岸辽阔的达契亚地区和多瑙河南岸罗马领土的主要通道。罗马军队在战争结果尚未出来以前，就已经在考虑胜利以后的事情，并为此开始修建基础设施了。

（36）三位达契亚使节前来拜会正在视察备战工作的图拉真。从着装上看，他们应该是富庶人家出身。但是，他们没有戴帽子，所以，这些人可能只是达契亚某部落的代表而不是达契亚国王的重臣。他们发誓脱离国王，向罗马军队投诚，归顺皇帝图拉真。达契亚内部出现分裂正是罗马方面所希望的。

（37）场景一变，画面上是在宿营地内举行祭神仪式的情景。图拉真以用托加一端盖住头部的祭司形象主持这一仪式，供品是价格不菲的牛和羊。举行这样的仪式预示着战斗就要开始。

（38）献上祭品，祈求诸神保佑的图拉真这次以一身戎装的形象站在士兵们面前进行战前动员。战前祭神和对士兵们进行动员，是罗马军队必不可少的两个仪式。当然，遭遇敌人突然袭击，匆忙迎战的时候，就无法像这样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举行仪式。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战斗结束后，补上祭神仪式和动员讲演。罗马人相信，这样的弥补方式，诸神是会谅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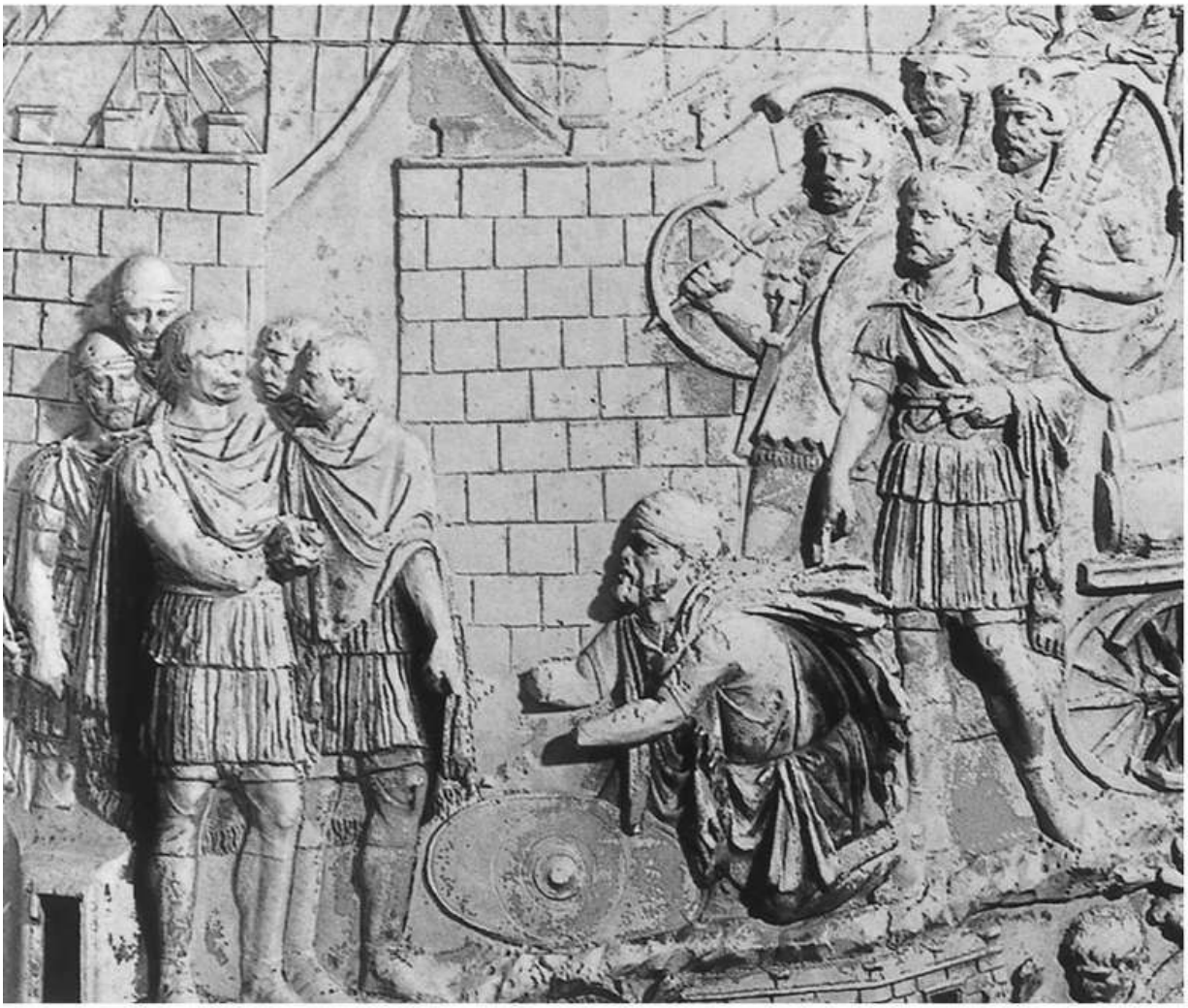
（39）这也是图拉真发动的达契亚战争中的一个特色，他没有在战前动员演讲结束后马上出兵投入战斗。图拉真记功柱上有好几个画面描绘的都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工地。工地上的主角是把盾和枪等武器放在一旁、从事土木工程劳动的军团兵。在劳动中，他们依然身着军装。这是因为一旦有敌人来袭，他们必须立即起身迎战。画面上，可以看到达契

亚士兵在山头上正探头探脑地寻找机会。

感觉好像是罗马军队用在备战工程上的时间比参加战斗的时间还要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说过的一句话：“罗马军队以镐取胜。”我在想，像这样经常参加土木工程建设，从而成为土木工程专家的话，一旦结束20年的军旅生涯，退役后，他不是就可以顺利融入市民生活了吗？20年的军旅生涯，始于17岁。所以，如果未能升任百人队队长，以一介士兵的身份退役的话，就是37岁，他可以拿到服役期满后的退役金。如果用这笔退役金作资金，开始建筑事业的话，在没有大规模建筑商出现的地方乡村，无疑应该可以获得成功。现代国家的军队也培养某些领域的专家。但是，因为服役时间过长，在回归市民生活后，他在服兵役期间掌握的技能在应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规定服役的年限是，作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军团兵为20年，作为行省人民的辅助部队士兵为25年。这一规定在有效利用资源这一点上，我认为非常有意义。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古代吧。

（40）鼓励军团兵建造石结构城堡的同时，身穿军装的图拉真接见了达契亚使节。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位达契亚人戴着圆圆的毡帽，穿戴也很整洁。也许因为知道此人与之前的那些达契亚使节不同，士兵们正远远地注视着这边。因为如果这是达契亚国王派来和谈的正式使节的话，那么战争很可能就要拉上帷幕。

事实上，这位使节正是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派来请求和谈的。为了交涉和谈的条件，图拉真也向国王派去了自己的心腹苏拉和近卫军团长官利维亚努斯为使节。不过，图拉真记功柱上没有记录下这一段细节。由于罗马提出的条件和达契亚方面提出的条件相去甚远，谈判破裂，战争再度降临。这时传来了自东而来的、由卢修斯指挥的第二路军已经临近目的地的消息。



图拉真和达契亚使节

（41）决战好像进行了不止一次，原因是达契亚方面没有投入全部兵力。国王德凯巴鲁斯不想与罗马军队主力发生正面冲突。然而正因为如此，感觉罗马方面的进攻都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达契亚军队采用了游击战术。当他们来袭时，罗马军队奋起击退他们，然后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当敌人再次来袭时，士兵们再度投入战斗，战斗结束，再继续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此反复。总指挥图拉真的军事风格不像恺撒那样以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见长。他更擅长采用张开大网，再一点一点稳稳收紧这一类型战术。图拉真记功柱的浮雕也忠实地呈现了这一情形。当时的罗马人即使没有参加战斗，也能充分理解图拉真的这一战

术。犹太战争期间，韦斯帕芗皇帝利用的也正是这种战术。

就像30年前的犹太战争已经显示出来的那样，一旦罗马军队开始收拢包围圈，没有一个对手可以与之抗衡。看到一车车沿自己修建的道路运来的军粮，又看到一个接一个城堡被攻克，罗马军队士气大振。相反，达契亚士兵或在战斗中被杀，或在城堡被攻陷之时，无处藏身，只能向首都方向拼命逃窜。城市一旦被围，不管愿不愿意，只能面对决战了。

（42）这次决战罗马军队投入了全部战斗力。达契亚士兵在后方督阵的国王德凯巴鲁斯的指挥下也奋勇作战。只是，尽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但是罗马军队没有采用在开阔平原的战斗中通常采用的会战战术。这是因为罗马人注意到达契亚还是一个未经开发之地，森林地带一直延伸到距离首都不远的地方。浮雕上呈现的场景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达契亚士兵也像罗马士兵一样，一边砍伐森林一边作战。

（43）然而，一切抵抗终究是徒劳的，因为仅次于首都的重要大城市落入了罗马军队之手，国王的妹妹被俘。被罗马军队俘虏的达契亚贵族人数在不断增加。

（44）大批戴着帽子的达契亚贵族放下手中的剑和盾，跑到还在继续基础设施建设的罗马军队前请求和谈。这次来的人很多，而且显然都是有权势的人。图拉真记功柱上，这些人的后面，可以看到国王德凯巴鲁斯的身影。看得出，使达契亚部族得以兴旺的这位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

但是，画面上没有德凯巴鲁斯跪倒在胜利者图拉真面前的情形。这意味着达契亚国王虽然请求和谈，却没有亲自参与谈判。当然，图拉真也没有亲自参与和谈。

罗马转向帝制后，与共和制时代一样，除了军事指挥权，从和谈过

程到和谈条约的缔结，都是全权交给前线总指挥负责的。敌我双方条件达成共识后，总指挥署名，然后，和谈文书会送到首都罗马。在共和制时代，需要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通过，在帝制时代，只要皇帝和元老院同意，和谈内容即正式生效。

公元102年，当时的图拉真完全可以沿用这一传统，而且他又是皇帝，只要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和谈结果就可以马上生效。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把达契亚的代表送到了罗马，让这些人直接与元老院谈判。

元老院认为图拉真这样做，表明了他对元老院的尊重。但是，我不这么想。我想，他是把与达契亚和谈的这个“球”“踢”给了元老院。因为我认为，图拉真从来就不认为和谈可以彻底解决达契亚问题。当然，拖延战争也不是作为总指挥官的他所希望的。

第一次达契亚战争历时只有一年零几个月，因和谈通过而告结束。和谈内容如下：

一、罗马授予达契亚国王“罗马的友好同盟”称号，达契亚从此成为罗马帝国的同盟国。

二、罗马保证国王德凯巴鲁斯和全体重臣地位不变。

三、达契亚国王同意罗马派遣一支军队驻扎在首都萨米泽杰图萨近郊。

四、罗马没收包括攻城武器在内的所有达契亚的兵器。

五、拆除达契亚在多瑙河北岸的所有城堡要塞。

六、双方同时释放对方俘虏。

七、达契亚保证以后不再侵犯位于多瑙河以北的、与罗马建有友好关系的部族。

作为胜利者的罗马军队接受这样的条件似乎有些过于温和。但是所谓的“罗马的友好同盟”，事实上是罗马附属国的意思。在图密善时代，曾经与罗马帝国订立过对等条约的德凯巴鲁斯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地位，应该是个问题。

（45）图拉真记功柱上的这个画面是胜利女神维多利亚。关于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的描述，到这里就算结束了。这年冬天，与达契亚相反，罗马上空阳光明媚，让人感觉不到冬天已经来临。在这里举行了以图拉真为主角的凯旋仪式。这位时年49岁的凯旋将军得到了“德基乌斯”（Dacicus）的尊称，意思是“征服达契亚的人”。

第二年即公元103年至104年，罗马与达契亚之间处于和平状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帝国其他前线也是同样情况。所以，这两年里图拉真不再需要军装。

身穿托加的皇帝循规蹈矩地参加元老院会议，检查达契亚战争之前已经法制化的各种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开始关注作为皇帝的另一项重大职责——完善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他人在罗马，但是多瑙河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已经启动。事实上，这项工程就是在与达契亚刚刚达成和谈后就着手动工的。

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意思是“芬奇的列奥纳多”。用他的出生地来代替姓氏称呼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姓，而是为了把他与其他众多的同姓人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当人们称呼某人为某地的某某时，证明此人尚在人世时，就已经是一位名人了。“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是一位在图

拉真时代参与并完成了所有标志性公共建筑建设的建筑师。

其实无须小亚细亚出身的哲学家克瑞索托强调，罗马皇帝一直以来就有以下三大职责：

一、保障国家安全，也就是对外政策。

二、治理国内秩序。

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一条和第二条要形成相关的政策，需要得到元老院的通过。只有第三条，皇帝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实施。因为完善帝国全域内的基础设施，所需经费不是从国库里出，而是从皇帝的公库里出。

因此，罗马皇帝同时兼任了事实上的建设大臣。不同的皇帝，因其性格不同，他们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一种情况是皇帝自身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方案通常由皇帝提出，建筑师只负责解决技术问题，并把方案变成现实。

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自觉缺少艺术修养。这样的皇帝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建筑师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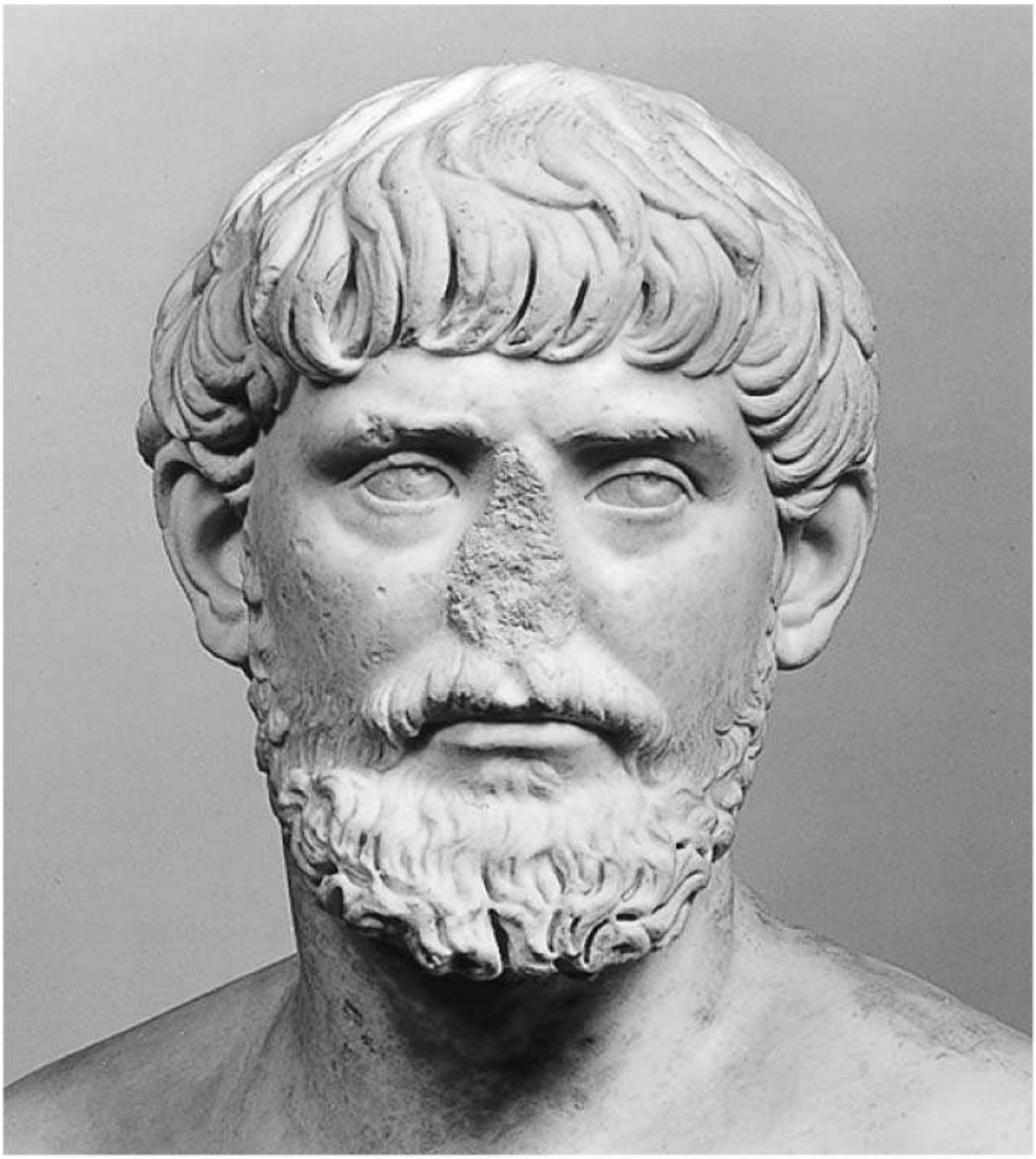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尤里乌斯·恺撒和继图拉真之后的皇帝哈德良。此外，提出建造“黄金宫殿”的尼禄皇帝也属于这一类，虽然他的设计与罗马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应该减分。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韦斯帕芗皇帝和图拉真。圆形竞技场（Colosseum）是韦斯帕芗建的。这类皇帝统治期间的建筑师名留后世的概率自然要高很多。

用不着我多作解释，“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和“芬奇的列奥纳

多”，他们的才能完全施展在不同的方面。阿波罗多洛斯的才能用在了解决他全权负责的项目上，而列奥纳多的兴趣却在于探求事物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称阿波罗多洛斯为建筑家或建筑工程师，却不知道什么样的称呼适合列奥纳多。

也许就因为上述原因，列奥纳多在土木、建筑领域表现出来的才华只体现在极少量的一些图纸上。而阿波罗多洛斯则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迹，为现代考古学家们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研究实物。列奥纳多在有生之年不够幸运，除了像科学家那样探求事物基本原理的精神之外，他没有能够遇到一位愿意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负责的皇帝。



阿波罗多洛斯

列奥纳多的家乡不是佛罗伦萨，他却成为了以佛罗伦萨为发祥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最高体现者。同样，希腊人阿波罗多洛斯尽管出生在大马士革，却是所有建筑师中，最具备罗马风格的建筑师。我想，他和图

拉真一定是极其相像的两个人，因为图拉真虽然出生于西班牙，却比罗马人更像罗马人。

在彻底解决达契亚问题之前，图拉真没有亲自负责过一项像样的公共建筑项目。因为那时的他，不得不把阿波罗多洛斯牢牢地拴在多瑙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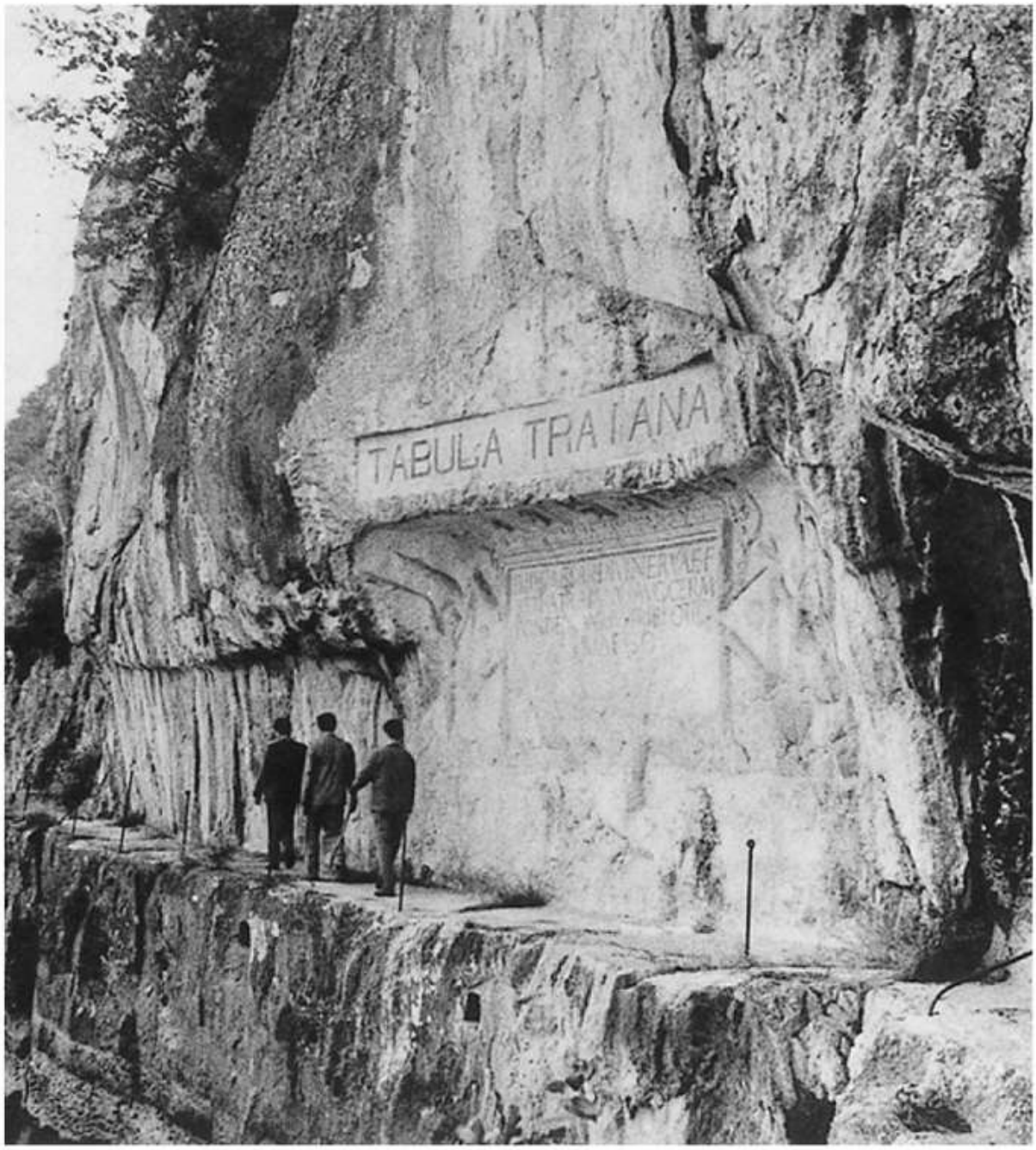
英语中，建筑师及建筑工程师叫“architect”，意大利语叫“architetto”。它们都是以希腊语派生出来的拉丁语“architectus”为词源的。把它译成无法体现出拉丁语为词源关系的日语时，我想与其翻译成“建筑师”，不如翻译成“构筑师”更贴切。因为，罗马时代的“architectus”必须负责所有土木工程，不管是用于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当然，这与罗马人的土木工程本身很难区分军事用途或非军事用途有关，像道路和桥梁的设计修建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结束后，阿波罗多洛斯接到的任务就是建桥。

如果在普通的河面上修建石结构桥，有罗马军团中的那些普通工程师就足以完成。但是，“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接到的任务是在多瑙河这条大河上架起一座石桥。

在波涛滚滚的大河上建桥有过先例。那是在15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下令修建的，就在欧洲仅次于多瑙河的莱茵河上。据说那座桥建在波恩和科隆之间的某个地方。莱茵河在那个位置的河面宽度不足500米。还有，恺撒下令建的桥是木结构桥。这次，图拉真要求建一座石结构的桥，位置在多瑙河中游，是河面宽度远远超过莱茵河宽度两倍的地方。因为图拉真建这座桥的目的是要联结罗马本土与达契亚属地。

现在，多瑙河两侧还能找到一点桥墩的遗迹，因此还可以确定阿波罗多洛斯在现场指挥完成的这座桥的所在位置。北岸位于罗马时代叫做德罗贝塔的城市，现在叫塞维林堡，属于罗马尼亚；对面的南岸是在塞尔维亚。

那么，为什么建桥的地点一定要选在这个位置呢？



图拉真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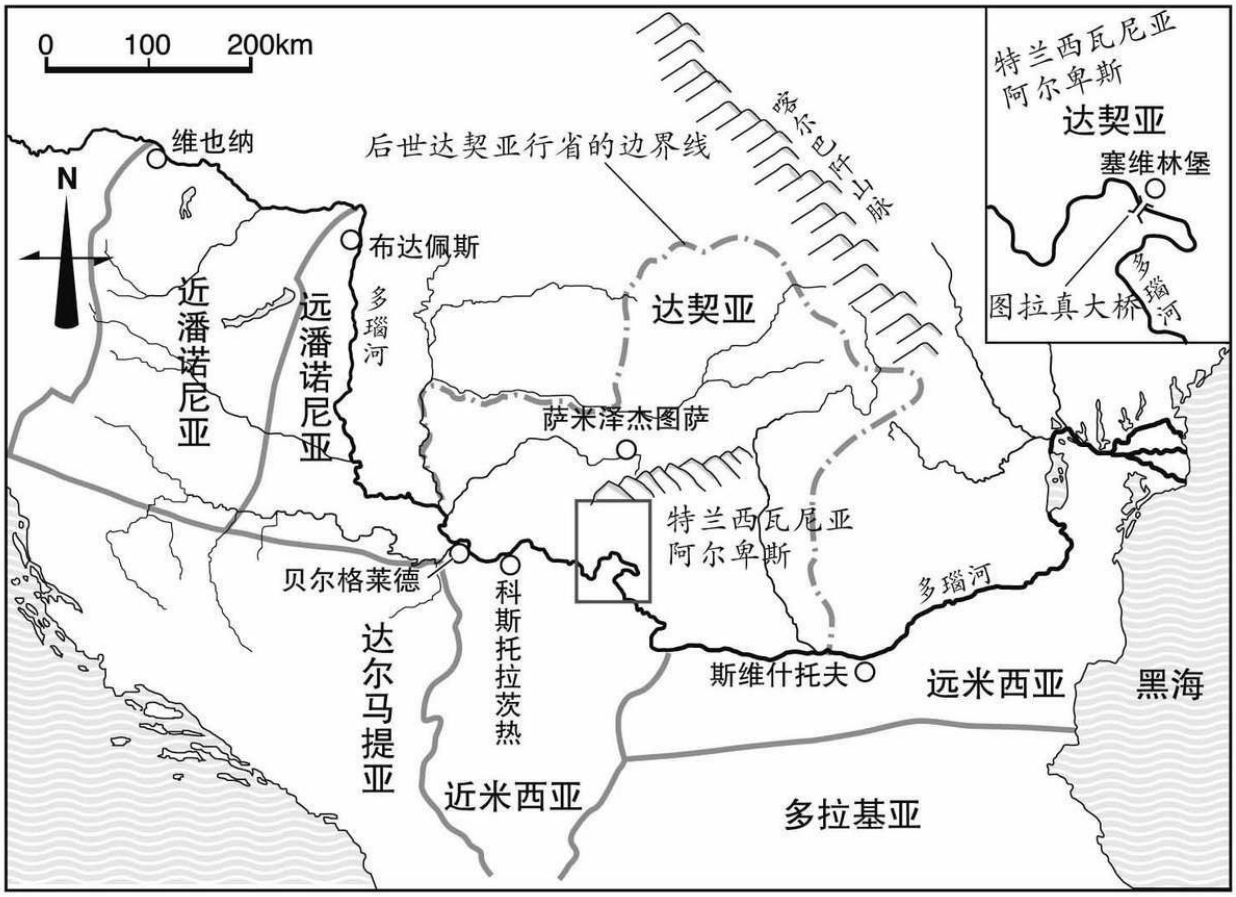
首先，过了桥来到多瑙河北岸后，从这里绕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

斯山脉，可以直线到达达契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

其次，方便与其他战略要地的交通。这座大桥现在还叫图拉真大桥（Tabula Traiana），其建筑风格非常符合阿波罗多洛斯的作品风格。现在，这座桥已经完全淹没在水面以下，看不到它的原貌了。因为它与劈山而建的大道相连，因此，在罗马时代，想与费米拉空（今科斯托拉茨热）和辛吉杜努姆进行往来联系非常便利。

建桥的地方属于近米西亚行省。这个行省位于国界线上，所以有2个军团常驻。贝尔格莱德是第四弗莱维亚军团的基地，科斯托拉茨热是第七克劳狄乌斯军团的基地。

一旦发生紧急状况，作为辅助部队的第二军团可以从远潘诺尼亚行省首府阿奎因库姆（今布达佩斯）自西北赶到达契亚；第一意大利卡军团可以从远米西亚行省诺维伊（今斯维什托夫）基地自东南赶到达契亚。也就是说，图拉真大桥正好位于4个军团基地在多瑙河中游沿岸的活动范围的交叉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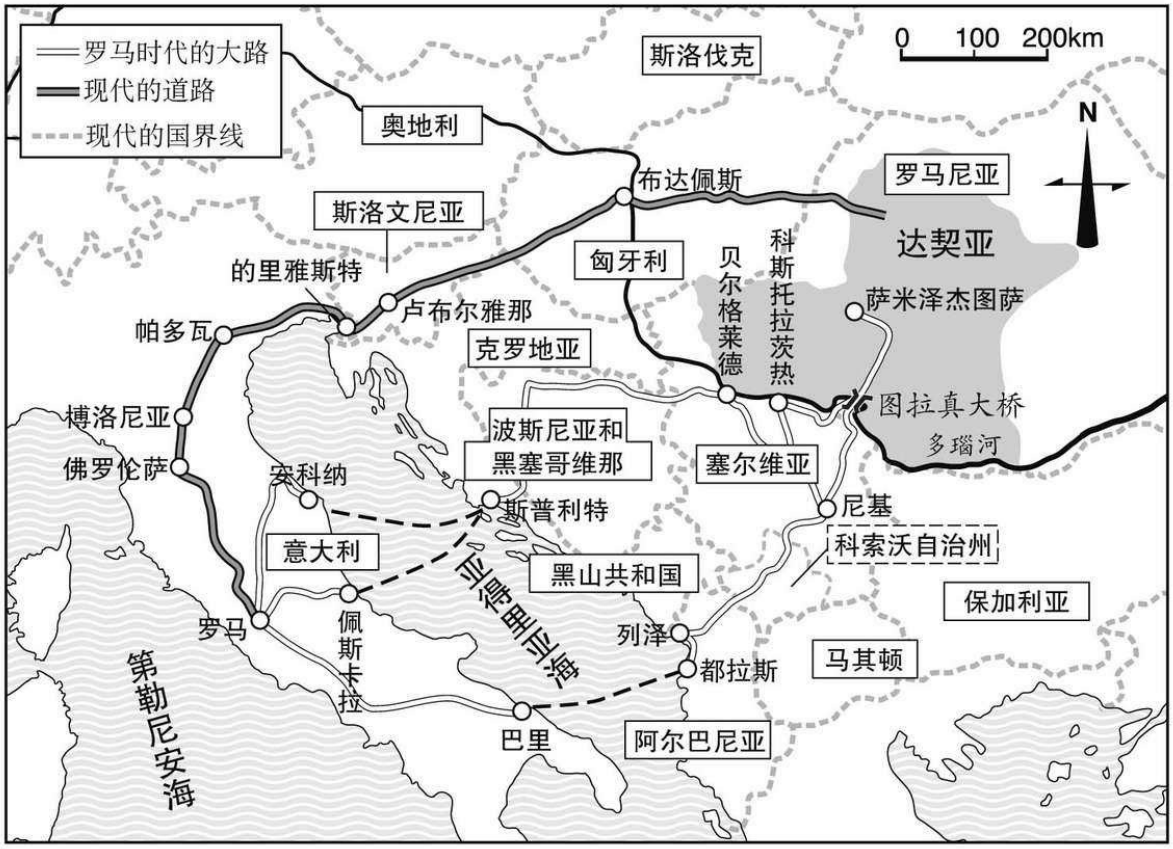


图拉真大桥和达契亚以及周边

第三个理由是在帝国最前线的多瑙河上建起这座桥，方便了它与帝国首都罗马之间的交通往来。

建桥的地方有一条向南延伸的罗马大道。从纳伊苏斯（今尼基）沿这条道路向西南走，在里斯（今列泽）抵达亚得里亚海。出了亚得里亚海，快的话只要一整天，慢的话也只需要两天的航程就可以到达意大利半岛。登陆意大利后，意大利境内完善的道路网甚至会让你迷失方向，不知道该选择走哪条路去罗马。此外，从贝尔格莱德沿罗马大道向西，也可以到达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帕拉托（今斯普利特）。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从斯普利特到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海港安科纳只需要横渡亚得里亚海即可。就算发生了需要皇帝亲临现场的大事，也能保证军队的行

动迅速快捷。走这条路线与绕道意大利北部抵达罗马的路线相比，无论是距离还是时间上都会大大缩短。



从罗马到达契亚

我有一个罗马尼亚朋友住在罗马，他父母生活在罗马尼亚西部。他很少选择坐飞机从罗马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再折回向西的出行方式。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开车去。理由是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那么，他会选择走哪条路线呢？

首先，从罗马经过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到帕多瓦，再到的里雅斯特，他会走意大利人引以为傲的高速公路。从的里雅斯特向东北穿越斯洛文尼亚，目的是要避开在克罗地亚境内的旅途。然后进入匈牙利，虽然这样走有点绕远。进入匈牙利境内后，目标直指位于东北方向的布达佩斯而不是直接向东去。到布达佩斯后再转而向东，越过国界线，进入

罗马尼亚境内。

当然，从罗马到罗马尼亚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你想沿着2000年前古罗马人走过的路线走一遍的话，现在依然可行。

首先，只要走高速公路，从罗马到达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安科纳或位于安科纳以南的佩斯卡拉非常容易。这两个港口都有摆渡船到斯普利特，这种船可以装运汽车。此外，同样先走高速公路，到达巴里，从巴里到列泽以南、罗马时代的都拉基乌姆（今都拉斯）。这条路线同样有可以运送汽车的航路。

如果在斯普利特上岸，需要穿过克罗地亚，纵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在通常简称为“波黑”。——译者注），并在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渡过多瑙河才能进入罗马尼亚。如果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上岸，行驶的路线变成了先穿过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然后通过塞尔维亚，再横渡多瑙河进入罗马尼亚。从上面所列自罗马到罗马尼亚需要经过的地方，我们知道，在经过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科索沃战争以后，除非记者，实在不适合普通百姓开车旅行。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战争中遭到毁坏的道路及桥梁还没有得到修复；同时，旅途中的住宿也得不到保证；此外，为数不少的当地居民依然拒绝交出武器。可以说，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说治安状况良好。到这些地方旅行，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过去了近1700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更危险了。

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只是为了保护帝国本土内的居民不受生活在罗马帝国境界之外的人——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人——的侵扰而享有的“和平”。罗马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相邻而居的民族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相安无事的状态反而让人感觉不太正常。所以，罗马作为具有霸权地位的国家，其职责之一就是对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纷争进行调停。

调停首先由行省总督出面。如果行省总督解决不了，就从中央下达

指令，皇帝会写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过去。如果这样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的话，罗马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出军团。罗马时代的希腊哲学家克瑞索托提出的皇帝三大职责中的第二条，我把它翻译为“治理国内秩序”。但是，如果忠实于原文进行翻译的话，应该是“治理行省秩序”。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是只要成功抵御外敌就可以实现的。只有同时成功解决了帝国内部的纷争，才能实现“罗马人维持的世界秩序”。在普通百姓看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选择最近的路线放心旅行，不管你去哪里。

可以说，图拉真大桥是古罗马科技的结晶之一。在阿波罗多洛斯的指挥下，建成这座大桥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建设者就是士兵。采伐石材和木材等工作由辅助部队的行省士兵负责，需要建造技术的主体施工部分工程由军团兵负责，因为他们熟悉此类工作。此时，罗马和达契亚之间已经达成和谈协议，所以估计士兵们都是把盔甲、武器等放在基地内，穿着短衣从事劳动的吧。罗马人非常讨厌工程遥遥无期地拖延，再加上图拉真大桥是建在水量丰富的大河上。所以，尽早完工直接关系到工程的成功与否。尤里乌斯·恺撒下令在莱茵河上建的桥只用了10天时间，那是因为建桥地点河面较窄，建的又是木结构桥。而在多瑙河上建石桥，从开工到结束也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想，这一定是突击施工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士兵们有着长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建筑施工经验，才使得大桥有了在短时间内建成的可能。

IMP CAES NERVAE TRAIANO AVG GER DAC P M TR POT COS II P P

为纪念图拉真大桥建成而发行的塞斯特斯铜币。正面是图拉真，背面是变形的拱形大桥。

为了纪念此桥的建成，同时也出于宣传罗马拥有了可以在多瑙河上架设如此巨大规模桥梁的技术的目的，在大桥建成后的第二年，图拉真发行了塞斯特斯铜币，图案是一座拱形的桥。这是因为铜币是圆形的。

罗马人把桥梁看做是道路的延伸，所以他们修建的桥面通常与路面高度一致。如果你看到的桥有台阶或坡度，那一定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修建的。

考虑到流经桥下的河水涨落情况，必须把桥的高度设计成在水量猛增时也不会被淹。同时，要使桥梁高度与道路一致，直接从一边河岸建到另一边河岸，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桥脚必须深入内陆距离河岸很远的地方。同样，在河的另一边，也要延伸至距离河岸很远的地方。这样一来，桥的长度大大增加，高度自然也可以增加了。根据建桥位置的地势条件，建桥方法各有不同。但是，罗马人建桥的基本原理就是上面的要求。

图拉真大桥

关于桥梁，与其看实为外行的我生涩的解释，倒不如看图可以一目了然。在这里，我想介绍的是选自加利亚佐所著《罗马的桥》中的图，首先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其建造规模。

全长——1135米

高度——27米

宽度——12米

桥体由20个石结构桥墩支撑。

桥墩间隔——33米

高度——1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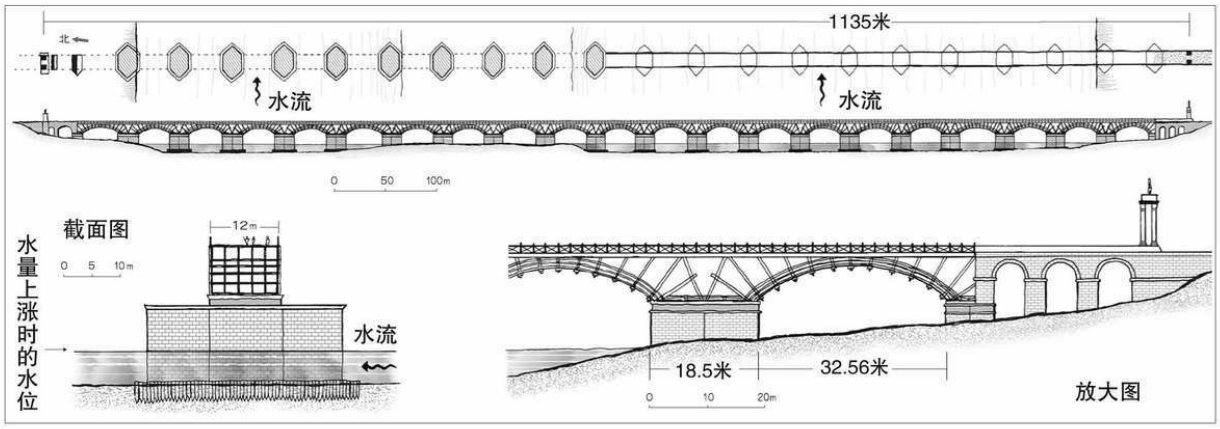
宽度——18.5米

桥墩下面埋木桩，桩与桩之间紧密无缝，木材的耐水性出乎意料地好。水城威尼斯的下面就埋了无数木桩。

桥墩之间的距离达30多米，三层桨战船通行完全没有问题。

建这种巨大的桥墩时采用的施工方法是，先用紧密无缝的木栅栏围住一个地方，排空里面的水，然后再在木栅栏内建桥墩。我问过一位在本州和四国参加过建桥工程的人，他告诉我，尽管机械化程度与现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当时的罗马人采用的施工方法与现在的完全一样。

这座连接多瑙河左岸的德罗贝塔和右岸的本都的桥梁，只有桥墩部分是石结构，桥面部分用的是木板。当然，如果在陆地上建近1公里长的桥梁或高架引水渠，即使要求全程都是石结构，罗马人也具备这样的技术。图拉真大桥采用石材和木材混用，一定是出于减轻整座桥体重量的考虑。因为桥墩不仅要支撑桥体，还要承受桥下水流的冲击。再加上这座大桥与帝国其他地区的桥不同，它的长度不是数十米，而是超过了1公里。



图拉真大桥（复原图。最上层是从上往下看的桥的平面图）

按照罗马公共设施建造的惯例，建这样的工程，会在所用石材的表面刻上参与施工的军团和大队的名称。从图拉真大桥存留下来的极少遗迹中，可以确定第二西斯帕尼亚军团和第三布列塔尼亚军团，以及第一克里特军团的各个大队都参与了该桥梁的施工建设。用大队称呼的部队是由行省出身的士兵构成的辅助部队。当然，这些大队也都参加了第一

次达契亚战争。因为图拉真为了建这座桥，在与达契亚达成和谈协议后，并没有让士兵们马上回原来各自的驻地。

无论是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浮雕，还是铜币上的图案，都显示出图拉真大桥有上下两层。很可能下层用于装载有沉重武器及粮食的货车，并用于通常以三列纵队行军的重装步兵通行，上层用于负责警戒的士兵和老百姓通行。罗马帝国不禁止百姓过境交流，他们甚至鼓励内外往来的交流。因为和平时期人与物的交流越频繁，越容易降低生活在国境外蛮族的掠夺欲望。罗马人把掠夺欲望的消退叫做文明化。

图拉真大桥是罗马时代规模最大的一项建筑工程。但是，根据100年后的卡西乌斯·狄奥的描述，“因为痛恨这座桥被蛮族利用，哈德良皇帝下令，桥的木结构部分被解体”。当然桥本身并没有因此失去它的用途，因为有记录说，后来这座桥得到了维修加固。但是，到了帝国末期蛮族入侵愈演愈烈的时候，木结构部分遭到彻底破坏。作为一座桥，它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6世纪前后开始，每个世纪总会有一两个人对此桥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到了17世纪，终于有人画出了图纸，尽管只是石结构的桥墩部分。到了19世纪中叶，第一本研究该桥梁的正式书籍出版。然而，到了那个世纪末期，奥匈帝国为了方便大型船只在多瑙河上航行，对破损已经非常严重却依然矗立在河中的桥墩实施了爆破，自此图拉真大桥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现在，我们只能通过研究者们掌握的桥体复原图和位于罗马博览会新城的罗马文明博物馆里的模型来想象它作为桥梁发挥作用的那个时代的情形。

让我们回到1900年前的古代吧。看到罗马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建造如此规模的大桥，而且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超短时间完成，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又是怎么想的呢？

罗马方面声称建这座桥只是为了联结位于多瑙河右岸的本都和位于多瑙河左岸的德罗贝塔。因为本都本来就是罗马的属地，德罗贝塔则在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结束后成了罗马的基地之一。这个理由应该说是成立

的。还有，因为达契亚与罗马已经建立了同盟关系，所以，图拉真大桥的竣工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维护两国间的和平。这一理由同样成立。

但是，在达契亚方面看来，罗马军队在第一次战争期间建起来的石结构扎营地从德罗贝塔一直连到了达契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更何况，战争结束后罗马没有从这些扎营地撤走全部士兵。

我们不清楚图拉真皇帝是否是故意刺激这位达契亚国王。至少，从种种迹象来看，我想他多少是有这想法的。只是关于这一点，没有人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不管怎样，对达契亚来说，罗马建造图拉真大桥就是公然的挑衅行为。同时，对于德凯巴鲁斯来说，他忘不了自己在图密善时代，曾经以强硬的姿态得到过对己有利的和谈结果。虽说罗马皇帝换了，但是，那次经历不过是10年前的事情而已。

达契亚国王认为第二次战争一定会来。这次他改变了策略。他要鼓动帕提亚国王和自己联合起来，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攻打罗马帝国。达契亚使节好像确实去了帕提亚国王的宫殿。只是，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与罗马接触之前，帕提亚王国虽然一直拥有可以对罗马边境形成威胁的军事力量，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攻下罗马。这个国家只有在国王更替的时候，才会威胁罗马的领土。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通过向外国示威，来控制国内局势。在公元105年，帕提亚并无这方面的需求。

从黑海到红海

对于达契亚国王试图拉拢帕提亚的情况，图拉真知道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与帕提亚接壤的叙利亚行省，其总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帕提亚的动向。当然，总督并不需要派遣间谍冒险潜入帕提亚。那时来自东方的物产必须通过帕提亚才能进入罗马，而罗马正是东方商人的最

大顾客。所以，只要用心收集并分析商人们带来的情报，就可以了解到帕提亚的现状，其准确率非常之高。罗马帝国的国界线无论在哪里，都是开放的，与帕提亚之间的国界线又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开放。

也许是知道了达契亚国王拉拢帕提亚的策略失败，也许是将计就计，要好好利用这件事情，这个时期，图拉真计划兼并阿拉伯。

罗马人叫做阿拉伯的地方不是后来的阿拉伯半岛，而是以盛产香料、没药以及珍珠而闻名的、富庶的阿拉伯半岛南部，罗马人叫这个地方为“肥沃的阿拉伯”（幸福的阿拉伯），省略形容词，就是阿拉伯，指的是现在的约旦一带。

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涅利乌斯·帕尔马接到图拉真的命令后，只带了属下的一个军团就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兼并。纳巴泰王国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兼并该地区无须诉诸战争。仅靠一个军团就完成了对阿拉伯的兼并，是因为帕提亚对此没有任何动作。成功兼并约旦，使得罗马帝国确立了从黑海到红海的边界线。

这条边界线始于黑海，在幼发拉底河岸沿着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国界线一路南下，在幼发拉底河转向东南方向去的地点离开河岸继续南下，经过帕尔米拉，再通过波斯特拉（今布斯拉）、费拉德尔菲亚（今约旦首都安曼）以及纳巴泰王国的首都佩特拉附近，直达与红海相接的亚喀巴。

被罗马帝国兼并成为行省的地方，罗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兴建相当于古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式大道。现在的约旦纳入罗马帝国后被命名为“阿拉伯纳巴泰行省”。在这里同样开始了可以称做干线的道路铺设。这条大道纵贯约旦，从大马士革出发，经过布斯拉、安曼，到达亚喀巴。根据现在发掘出来的石板路标，可以知道它完成的时间是公元114年。行省阿拉伯的首府不是安曼，而是布斯拉，原因一定是因为这里距边境更近。驻扎布斯拉的是第三昔兰尼加军团。

后来，阿拉伯的劳伦斯攻打亚喀巴时，不得不穿越灼热的沙漠。但是，在罗马时代，尽管灼热的状况相同，却有铺设完好的大道，只要沿大道行进就可以了。最近有报道说，约旦政府要在安曼和亚喀巴之间修建一条高速公路。

至此，故事的情节总在古代和现在的时间隧道中穿梭，不时地偏离主题。这是因为我在学习罗马史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并且感受到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我非常希望阅读此书的您能与我共享这一想法。同时，我也在想，罗马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却总是做不到呢？有人和我持有相同的疑惑，他们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里，我想介绍其中一个人的调查结果。这是一条模拟路线，模拟了从苏格兰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从罗马帝国的西端到东端的行进路线。除了不得不走海路以外，全程利用古代的罗马大道。罗马大道每隔1罗马里就有一块石板路标，在这里我就用罗马里来表示距离以示对历史的尊重。1罗马里相当于1.478公里。

从安敦尼·庇护皇帝时代所建长城附近的达拉斯哥，经过哈德良长城，到军团基地所在地约克是222罗马里。

从约克到伦敦是227罗马里。

从伦敦到多佛尔是67罗马里。

横渡多佛尔海峡，到法国布洛涅的海路是45罗马里。

从布洛涅经过亚眠到兰斯是174罗马里。

从兰斯到里昂是330罗马里。

从里昂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意大利的米兰是324罗马里。

从米兰到罗马走艾米利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是426罗马里。

从罗马走阿皮亚大道到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布林迪西是360罗马里。

从布林迪西横渡亚得里亚海，到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都拉斯的海路是40罗马里。

从都拉斯到拜占庭（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走埃格纳提亚大道是711罗马里。

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是283罗马里。

从安卡拉沿罗马大道到地中海一侧的塔索斯（今塔尔苏斯）是301罗马里。

从塔尔苏斯到叙利亚的安条克（今安塔基亚）是141罗马里。

从安条克到黎巴嫩的蒂洛斯（今提尔）是252罗马里。

从蒂洛斯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是168罗马里。

合计4071罗马里。这6000公里的旅程不需要出示“护照”。

如果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甘愿接受被纳入罗马文明圈的命运的话，第二次达契亚战争就不会爆发了。但是，自视甚高的达契亚人最终选择了与罗马兵戎相见。达契亚国王家里金银堆积如山，因为当地盛产这些东西。又因为这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君主的手中不仅掌握着权力，也聚敛了国内的财富。

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君主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总是努力维持常备的军事力量，后者则在需要军队的时候用钱招募士兵。

第二次达契亚战争

公元105年春，达契亚单方面撕毁和平条约，挑起了战端。德凯巴鲁斯向罗马在达契亚境内的扎营地、正在铺设道路的第七军团以及多瑙河下游的罗马领地同时发起了进攻。

6月4日，图拉真皇帝离开首都罗马，达契亚战争正式爆发。让我们回到图拉真记功柱上，通过追溯每个画面来了解这场战争。

（46）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浮雕对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的描述从图拉真在意大利中部的海港城市安科纳登船开始。画面上有一座位于山顶的、为女神维纳斯而建的神殿，还有港口附近为纪念图拉真取得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的胜利而建的凯旋门。这两个建筑物显示的地点就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安科纳。

(47）画面上有无数条海船，罗马军队分乘这些船，横渡亚得里亚海。摇橹的士兵们穿着短衣，盔甲放在脚边。图拉真身披大红斗篷，站在其中一艘船的船尾，大声地和着摇橹的节拍，领着众人在喊号子。一群海豚出现在波浪之间，显示了船队正在海上航行。

（48）图拉真和士兵们横渡亚得里亚海，并在现在的克罗地亚海港城市登陆。前来迎接的所有居民都身披罗马式斗篷，后面宏伟的石结构建筑林立。由此可见，这个地方不是达尔马提亚行省的首府索林，就是位于其南边的海港城市斯普利特。

（49）图拉真一身便装，短衣外披了件斗篷骑马向内陆进发。市民们在道路两侧目送他们离去。人群中有女人和孩子。

（50）画面上，正在举行正式的祭神仪式，祭品是几头牛，脖子上挂着用蔓草和花编成的项圈。虽然奔赴前线是当务之急，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向神祈求是万万不可怠慢的重中之重的事情。士兵和市民全体参

加了祭神仪式。

（51）也许是正在过河吧。士兵们同时利用船只和石桥在行军。

（52）皇帝和士兵们进入了一座建造雄伟的城市。图拉真正在主持祭神仪式，上面有用做祭品的牛。

如果图拉真登陆的地点是斯普利特的话，那么图拉真记功柱上的这些城市应该是现在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城市。虽然这一带距离意大利本土较近，但是，在罗马时代这里的文明程度已经高得令人有些难以置信。

（53）在这片巴尔干地区，随着距离多瑙河前线越来越近，画面中的背景建筑和石结构城堡也多了起来。罗马骑兵军团一边侧目看着这一切一边疾驰而过。

周边居民出来迎接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图拉真。从服装和头发的长度来判断，他们是达契亚人。人群中有女人和孩子。罗马帝国对于生活在国界线以外的人，只要他们爱好和平，专事劳作，允许他们移居到罗马领地内。

（54）人群中，身着罗马式服装的居民也很多。罗马帝国多民族的居民构成即使在边境地区也是如此。

图拉真在人群的簇拥下，向祭坛倒葡萄酒，祈求罗马军队胜利。我也觉得罗马人祭神的频率有点过高。但是在即将进入战区的时候，向诸神祈求保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

（55）这里，场面变了。画面是士兵们把盾放在一旁，穿着短衣，脱下一只袖子正在砍伐森林。看着这样的场景，我真切地感受到，罗马军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即使有诸多不便，也宁愿利用已有的路；而前者则为了方便行军，每一次都是边修路边行

军。

（56）场面又变了。这个画面描绘的是攻打位于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军队基地的达契亚士兵们。达契亚士兵参加战斗时只穿上衣和裤子，不戴胸甲，即使官至高位也是如此装束。护身就用大型的盾。在发动攻势的达契亚军阵前指挥的是蓄着胡子、戴着帽子的达契亚高官。由此可见，国王德凯巴鲁斯反对罗马的呼吁是得到达契亚举国支持的。

（57）处于防守的罗马士兵并不示弱。比罗马帝国任何边境的士兵们都要艰苦的是驻守在多瑙河防线的士兵们。在气候、地势、精神及肉体等各方面都很险恶的环境让平凡的士兵们变成了精锐之师。对于多如蚂蚁的达契亚士兵的进攻，他们积极应战，绝不后退一步。

（58）战斗好像不是隔着防御工事进行的，而是罗马军队走出基地迎战达契亚人的进攻。图拉真记功柱上有好几个画面描绘了双方激烈的白刃战。这些足以让人们想象到罗马军队士兵手持铜枪铜剑作战的逼真的画面，不愧是浮雕作品的杰作。

（59）战况逐渐向有利于罗马方面发展。随着画面的推进，被打倒在地的达契亚士兵人数在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最终决定罗马军队胜利的是图拉真率领的骑兵队的到来。达契亚人只能留下无数尸体逃回多瑙河北岸。

这时秋季来临，罗马军队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再横渡多瑙河，反攻达契亚。东欧的冬天异常寒冷。在第二年春天向北发动进攻之前，有必要让士兵们得到充分的休整。

这个冬季发生了一个插曲，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与罗马为敌，不是因为他念念不忘要消灭罗马帝国，而是因为他有野心。他希望与罗马之间缔结一个对达契亚方面

有利的和平条约，就像图密善时代所缔结的条约那样，然后在多瑙河北岸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为此，他总是在发动侵略战和寻求和谈之间一次次地变换策略，让人琢磨不透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可是，德凯巴鲁斯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罗马人不是一个甘愿长期容忍只对对方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不平等条约的民族。

罗马还在继续修建道路。但是，修路地点不知道是在多瑙河南岸的罗马领地，还是在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领地。不管怎样，达契亚军队乘着罗马军队因和谈正在进行而放松警惕的机会，袭击了正在修建道路的第七克劳狄乌斯军团。这次袭击非常成功，达契亚军队成功抓获了军团长和10名罗马士兵。达契亚国王准备用这张“王牌”，向罗马皇帝要求有利于自己的和谈条件。

被俘的军团长朗基努斯，担任驻扎在多瑙河沿岸基地科斯托拉茨热的第七克劳狄乌斯军团军团长之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在第一次达契亚战争中，就没有辜负图拉真的信任。他还是一位出生在首都罗马的名门之后，祖辈都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

这样一个人物被俘，如果坐视不管，难免会引起元老院的不满，从而成为元老院的对立面。也许达契亚国王认为行省出身的图拉真不可能会担当这样的风险。

朗基努斯虽然被俘，但是，达契亚国王既没有把他捆绑起来，也没有把他投进监狱。在达契亚城堡内，他的行动完全自由。甚至德凯巴鲁斯还劝他多与当地居民接触，允许他带着照顾他生活起居的解放奴隶外出散步。他希望自己优待朗基努斯的做法可以传到图拉真的耳朵里。

当然，达契亚国王也没有忘记把罗马的这位军团长叫来，向他打听罗马皇帝的军事计划。对此，朗基努斯的回答总是同一句话，就是“不知道”。

德凯巴鲁斯还向位于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军团基地发动了进攻，但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就算是德凯巴鲁斯，也不得不相信翌年春天，罗马军队必定进行反攻。这年冬天，达契亚国王终于决定使出手中的这张王牌。

达契亚提出的和谈条件是：第一，罗马承认多瑙河北岸直到黑海的全域为达契亚领土；第二，罗马向达契亚赔偿其对罗马作战时所付出的战争费用。

只要罗马接受这两个条件，达契亚国王就释放朗基努斯和10名俘虏。他让朗基努斯负责劝图拉真答应达契亚方面的这些条件，并签署和谈条约。

听到国王提出的这个要求，罗马的军团长终于点头了。他答应给图拉真写信，暗地里却让解放奴隶——他的仆人设法弄来毒药。因为他有行动自由权，所以并没有太费周折。

我们不知道朗基努斯给图拉真的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很可能他没有用德凯巴鲁斯看得懂的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写的。朗基努斯借口图拉真认识自己的仆人，坚持让仆人把这封信送到图拉真手中。然后，估算着送信的解放奴隶已经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这位罗马将军喝下了毒药。

失去“王牌”的达契亚国王怒不可遏。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罗马皇帝作出让步的幻想。

这次德凯巴鲁斯亲自给图拉真写了一封信。他提议，图拉真用那个可恶的、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的解放奴隶来交换朗基努斯的尸体和10名罗马兵俘虏。他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10名俘虏中职位最高的百人队队长。

图拉真既没有答应和谈也没有答应交换。解放奴隶和百人队队长就这样留在了罗马营地内。

百人队队长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也是罗马军团的中坚。但是，解放奴隶是罗马公民的可能性实在很小。虽然罗马对解放奴隶打开了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大门，但却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有孩子，其次要有3万塞斯特斯以上的资产。前线的司令官通常都是单身赴任，长期在这样的主人身边服侍的仆人有妻室儿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主人对他很好，把他从奴隶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个“解放奴隶”很可能还没有取得罗马公民权。

如果按达契亚国王的要求，把这个非罗马公民的解放奴隶交出去，那么那位将军、元老院议员，同时也是共和制时代以来的名门之后的遗体就可以送回来了。

关于这段插曲，在罗马元老院拥有一席之地的希腊人、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说过这样一句话：

“图拉真认为与其给朗基努斯一个葬身的坟墓，不如保证罗马帝国的尊严更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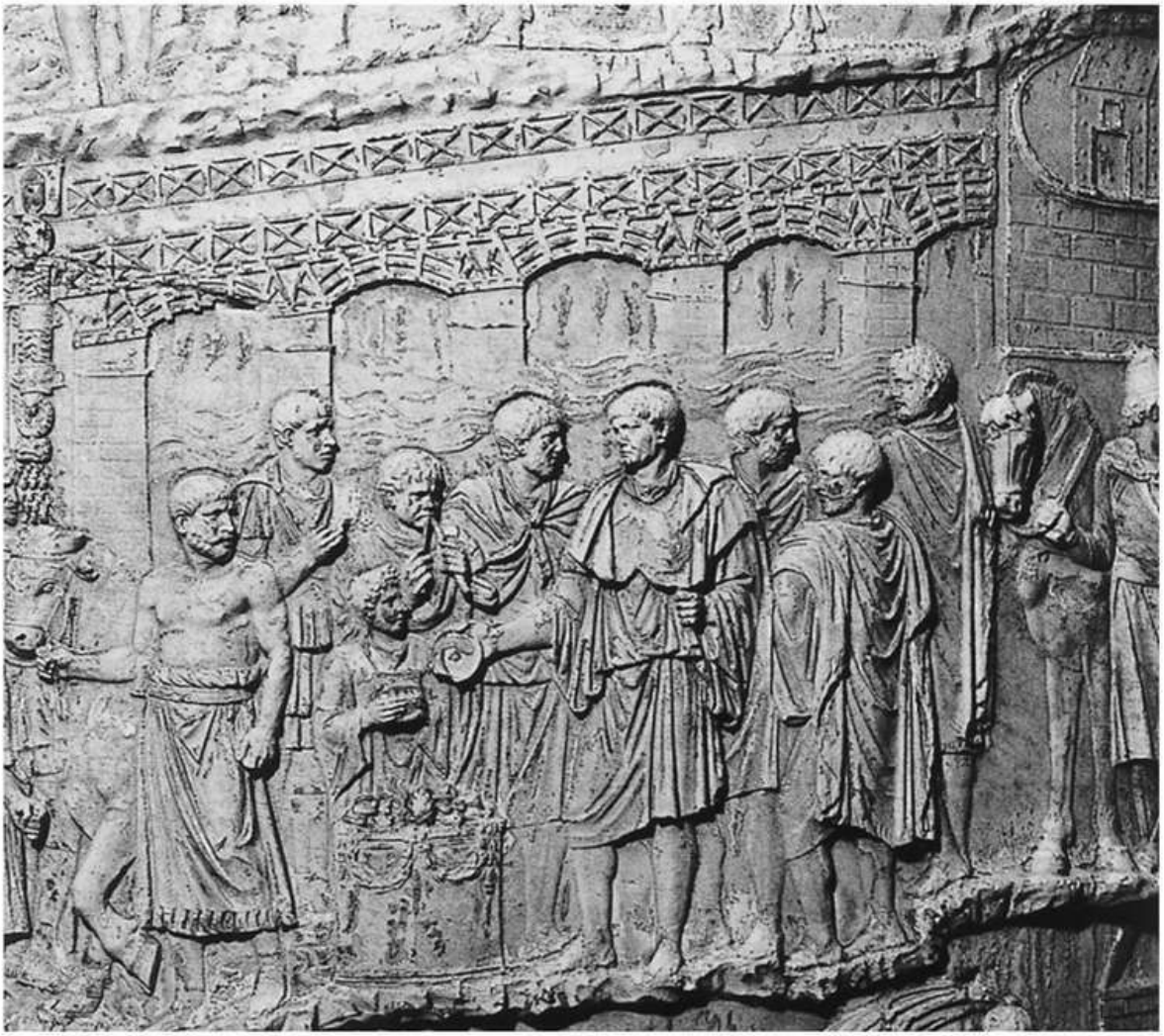
图拉真记功柱上没有这一段插曲。浮雕接着前一年夏天，继续讲述在多瑙河下游取得阻击战胜利后的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翌年，即公元106年春季，罗马军队开始反攻。这一年图拉真52岁。

（60）罗马军团集结在本都。这是阿波罗多洛斯指挥修建的大桥的起点。画面上，作为主要战斗力量的军团兵全副武装，身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装束。被他们簇拥着的图拉真正在主持简单的祈祷仪式，向祭坛献酒。他身后雄伟的图拉真大桥遮挡住了所有的背景。

（61）画面上是周边的部族酋长们在桥对岸的德罗贝塔出迎的情

形。他们在达契亚国王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为选择投靠达契亚还是投靠罗马犹豫不决、踌躇不前。但是此刻，这些人的眼中流露出的是投向罗马的决心。

（62）罗马军团兵的行列、举着军旗的队伍正绵延不绝地在过桥，百人队队长走在各队的最前面。走在骑兵团最前面的是皇帝图拉真。背景有罗马士兵修建的城堡。至此，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军队走的是与第一次战争时一样的路线。



图拉真大桥前集合的罗马军队

（63）这个画面描绘了前一年遭到达契亚人袭击后的残余部队与皇帝重逢的情形。这支部队在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留在了达契亚。

画面上，这些士兵与随皇帝同来的士兵一样精神振奋。他们队伍整齐，正在前进，显示出士兵们也怀着和图拉真一样的决心。鼓着两腮吹奏笛子和喇叭的军乐队在为士兵们加油鼓劲。

（64）演讲坛上，图拉真带着幕僚们在进行战前动员。士兵们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站在演讲的皇帝后面的幕僚中，据说就有时年30岁的哈德良，他在图拉真之后继承皇位，成为罗马的皇帝。

（65）在以石结构做屏障的坚固城堡内，众人正围着皇帝召开作战会议。罗马军队中，除了幕僚及军团长级别的人之外，由行省出身的士兵构成的辅助部队的指挥官、士官身份的百人队队长中的代表列席参加作战会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富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的意见比“参谋本部”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更受重视。

（66）为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士兵们行军途中也戴着头盔。对面，是士兵驱赶着满载军粮的载货马车正在同方向行进。

（67）在这里，部队分成两路，说明图拉真围而歼之的战术拉开了帷幕。

（68）士兵们正在往要塞中搬运刚到的军粮。面前的行军队伍中有佩戴盔甲的军团兵、身穿皮革胸甲的辅助部队士兵、光着上半身的日耳曼士兵，以及来自东方的、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衣、身背箭筒的弓弩兵，显示出罗马军队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可以说，罗马的军队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缩影。

（69）士兵们全副武装，手持镰刀，正在收割麦子。这表明公元106年已经进入夏季。这个画面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其他事情作出判断。

通常，受到进攻的一方，无论是为了储备军粮，还是为了军粮不被敌方抢去，都会提前完成收割。没有收割，是否意味着罗马士兵已经占领达契亚属地，并深入了首都萨米泽杰图萨附近呢？根据研究者们的推测，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中，图拉真投入了13个军团，加上辅助部队，组成了总计多达15万人的一支大军，远多于第一次战争的参战士兵人数。

（70）这个画面表现的是先行出发的辅助部队与达契亚军队的第一场接触战。下一个画面是达契亚士兵，无论是在城堡内还是在城堡外，得知罗马军队临近，都表现出极度不安的状态。

（71）在达契亚城堡前，罗马士兵和达契亚士兵之间展开了激战。达契亚士兵作战也很勇猛，但是，尸体遍地的白刃战的结果还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终。

（72）罗马军队的“网”正稳稳地、一点一点地在收紧。这个画面描绘的是一场攻防战，围绕建在首都周围的一个坚固城堡展开。此城堡的作用是为了保护首都萨米泽杰图萨。罗马士兵正在向城堡发起进攻，达契亚士兵在城墙上向下投掷石块进行防守。城墙下面是达契亚士兵的尸体，他们是被罗马士兵的箭射中后，从城墙上头冲下掉落下来的。大概在首都周围的其他城堡，也展开了同样的攻防战。

（73）图拉真利用攻防战的间隙，带着幕僚视察战场。对面是绵延相连的达契亚城墙。看得出来，在城墙的建筑手法上，达契亚人和罗马人并不相同。罗马式城墙使用的是长方形石材。与此不同，达契亚的城墙建设方法是把小石子嵌入木板或石板之间。不过，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在每个重要的位置上，都建有瞭望塔。达契亚的这种建筑方式用于环绕城市的城墙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是建造大规模建筑物，却不适用。至于用于建桥，那是绝对行不通的。

这堵高高的城墙显然是攻城的障碍。因为相比较攻守双方，无疑在上面进行防守的条件要有利得多。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大炮。

不得不进行攻城战的时候，罗马军队通常运用三种战术：

一、挖地道，直抵城墙下面，然后用木材围住一个地方，里面放入可燃物并点上火。接着就是等待木材燃烧出现真空状态，导致上面的城墙坍塌。

二、用木材垒成与城墙等高的堡垒，或者建若干与城墙等高的高塔，把敌人压制在城墙内，以此解除自下而上进攻的不利因素。

三、作为攻城武器，向城墙抛掷直径达30厘米的石弹，摧毁城墙。同时，其他士兵以龟甲型的阵型，头顶盾牌一边注意护身一边接近城墙，并从被毁城墙的位置攻入城内。

针对达契亚的城墙，图拉真判断无须使用第一和第二种方法，有第三种就已足够。下一个画面描绘的是攻城武器已经运至集结完毕的士兵们身后。

（74）达契亚方面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冲出城门，向罗马军队发动了白刃战。面对冲在最前面杀入罗马军队的达契亚将领，罗马士兵好像显露出了一丝慌乱，尽管这只是在瞬间的事情。

（75）罗马军队的攻城行动并没有被城墙外的白刃战所牵制，他们终于成功攻入城墙内。画面上是攻入城墙的军团兵和协助攻城、正在射杀敌兵的辅助部队士兵们。

（76）城堡沦陷。达契亚贵族屈膝跪倒在率领幕僚们进城的图拉真面前。同样的场景，大概在以保卫首都为目的而建的其他城堡上也重复上演了。进攻的包围圈在不断缩小。

（77）首都萨米泽杰图萨终于进入了罗马军队的视线。这座城市的城墙采用了罗马式的石结构筑城方法。不知为什么，这里没有隔着城墙展开攻防战。出人意料的是，达契亚人竟然在城内四处放火。也许是已

经意识到沦陷不可避免，他们不想把首都完完整整地交到敌军手中。

（78）在熊熊燃烧的街上，达契亚人表现出种种绝望神情。有人举着双手，咒骂命运对自己不公；有人抱头匍匐在地；有人从容喝下毒药；有人欲抱起毒性发作倒在地上的同伴。

这是一个集体自杀的场面。各种情形一一呈现在画面上，密度之大无愧于浮雕雕刻杰作的称号。

（79）还是集体自杀的场面。有一个体格魁梧、神情沉着的人，大概是一位将军。他站在前面，旁边放着一个装有毒药的壶。在他面前的是伸着手请求给自己毒药的达契亚士兵们。这位将军亲手把毒药递到每一位士兵手里。他背后是仰面倒在地上的一位达契亚年轻的士兵，可能喝过毒药后，药性发作了。双手抱着这个士兵遗体的大概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

（80）选择出逃的达契亚人也很多，其中一人就是国王德凯巴鲁斯。出逃的情形非常混乱，称之为溃逃或许更合适。罗马军队则井然有序地在追击敌人。两者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81）攻下敌人首都后，图拉真接见了跪倒在地、祈求宽恕的达契亚人。士兵们正在从敌人弃逃后的街上往外搬运战利品。

（82）一个大队长举着右手在向称赞士兵们勇敢作战的图拉真敬礼。士兵们好像已经在对自己的司令官高呼："大将军！"意思是胜利者。可见此时，罗马士兵们已经确信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83）尽管胜利的结局已经不容置疑，但是罗马军队毕竟是罗马军队。军团兵又把石材扛在肩上，开始了在战略要冲位置上筑建堡垒。伐林修路的施工也在进行。同时，在较窄的河面，紧急搭建桥梁，继续追

击达契亚人。敌人一路向北逃窜。

（84）达契亚士兵并非一味地只顾逃跑，趁着夜色袭击罗马士兵宿营地的达契亚士兵为数也不少。罗马士兵们在防备敌人的袭击。说达契亚士兵勇猛，不只是评价，而是事实。国王德凯巴鲁斯透过树丛看着这一切。

（85）尽管国王亲临战场，但是达契亚方面的战况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改善。达契亚士兵们只有一边提防着后面罗马军队的追击，一边继续向北逃窜。

（86）追击还在继续，图拉真不忘鼓励士兵们。

（87）罗马士兵们打捞出达契亚国王藏在河中的财宝，正在往马背上装，准备运回罗马。

（88）与此同时，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把士兵们集中在森林里，向他们作最后一战之前的动员演讲。

（89）达契亚人再也不愿意听国王的话了。他们中有人乘机逃跑；有人把剑插入自己的胸膛试图自杀；有人伸着脑袋请同伴帮忙杀死自己；有人挥剑砍向求死的同伴；还有达契亚贵族跑到图拉真阵营里表示愿意投降，归顺罗马皇帝，并祈求饶命。至此，达契亚王国彻底土崩瓦解。

（90）只剩下少数骑兵的国王德凯巴鲁斯继续逃窜。罗马骑兵团继续追杀他。关于追杀国王的情形多达好几个画面。随着画面的推进，被射中落马的达契亚骑兵人数在不断增加。

（91）德凯巴鲁斯被四面八方逼近的罗马军队追得走投无路。达契亚国王弃马跪倒在一棵树下，举起短剑刺进了自己的胸膛。没有人试图阻止他自杀，相反，罗马骑兵好像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尽，也许是出于军

人的同情心吧。但是，随后国王的脑袋被砍了下来。

（92）被反绑着双手的俘虏们和一位穿戴整洁的年轻姑娘——可能是国王的女儿，被带走了。

（93）银制大盘上放着达契亚国王的脑袋。两位军官端着这个大盘来请罗马皇帝鉴定。德凯巴鲁斯企图建立与罗马帝国并驾齐驱王国的梦想持续了不到20年。

（94）罗马军队对逃亡者的追捕行动还在继续。对追随达契亚与罗马作战的周边小部族也毫不留情。

（95）尸体堆积如山，成群的俘虏被带走。画面上的背景是群山，由此可见，清除残余势力的战斗延伸到了达契亚最北端的山岳地带。

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的末日

（96）达契亚人向着更北的方向继续行进。这些人没有被杀也没有被抓。但是，罗马军队禁止他们继续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上。

长长队伍中的老人、女人和孩子们背井离乡，沦为难民。被这些人牵着走的有牛、猪和羊群。……

公元106年夏天，达契亚战争宣告结束。

凯旋

53岁的胜利者得胜归来，把首都罗马带进了狂欢的热潮之中。

达契亚王国的灭亡意味着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敌人已不复存在。

图密善时代不得不吞咽下去的屈辱的和谈结果也成为了过去。

多达5万人的俘虏和达契亚国王丰盛的财宝，让罗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胜利者的喜悦之中。

图拉真宣布将达契亚纳入罗马帝国的行省行列。

自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禁止版图进一步扩大以来，罗马在帝制政体下，尽管防卫成了主要战略目标，但是并非没有纳入过新的行省。细数一下，就有小亚细亚的本都、加拉太、卡帕多西亚、科马根尼、巴勒斯坦的犹太、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以及不列颠。只是，罗马人认为犹太变成行省是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他们发动叛乱，罗马人不得不在镇压他们的叛乱后将其纳为行省。其余各国，除了不列颠，都是他们的国王主动把自己的国家交给罗马，和平过渡成为罗马行省的。而且，这些王国都是罗马事实上的附属国。他们是罗马的同盟国，本来就在罗马的霸权势

力之下。所以，他们变成行省，在罗马人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只有不列颠变成行省是依靠军事力量征服的结果。也许你会觉得罗马人怎么会愿意花上长达40年的时间，去征服位于帝国最北部的国家呢？

图拉真征服达契亚的战争进行了两次，但实际作战时间加起来不过两年。但是，在罗马人看来，这次胜利与尤里乌斯·恺撒花了8年时间，用图拉真三分之一的战斗力，征服了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德国西部、瑞士在内的“高卢”，从而称霸这些地区留给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罗马人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达契亚成为罗马帝国新的行省，足以让罗马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举起双臂，高喊“太好了”。

事实上，兼并了达契亚后的图拉真时代是罗马帝国版图最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图拉真才会模仿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写下了《达契亚战记》，因为后者在其统治的共和制末期也极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版图。

也许从即位皇帝时开始，图拉真一直很在意自己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总之，他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非常谦虚和谨慎。然而，在达契亚战争完胜以后，他不再低调行事。公元107年初举行的凯旋仪式以其盛大的规模和奢华的场面，让罗马人惊诧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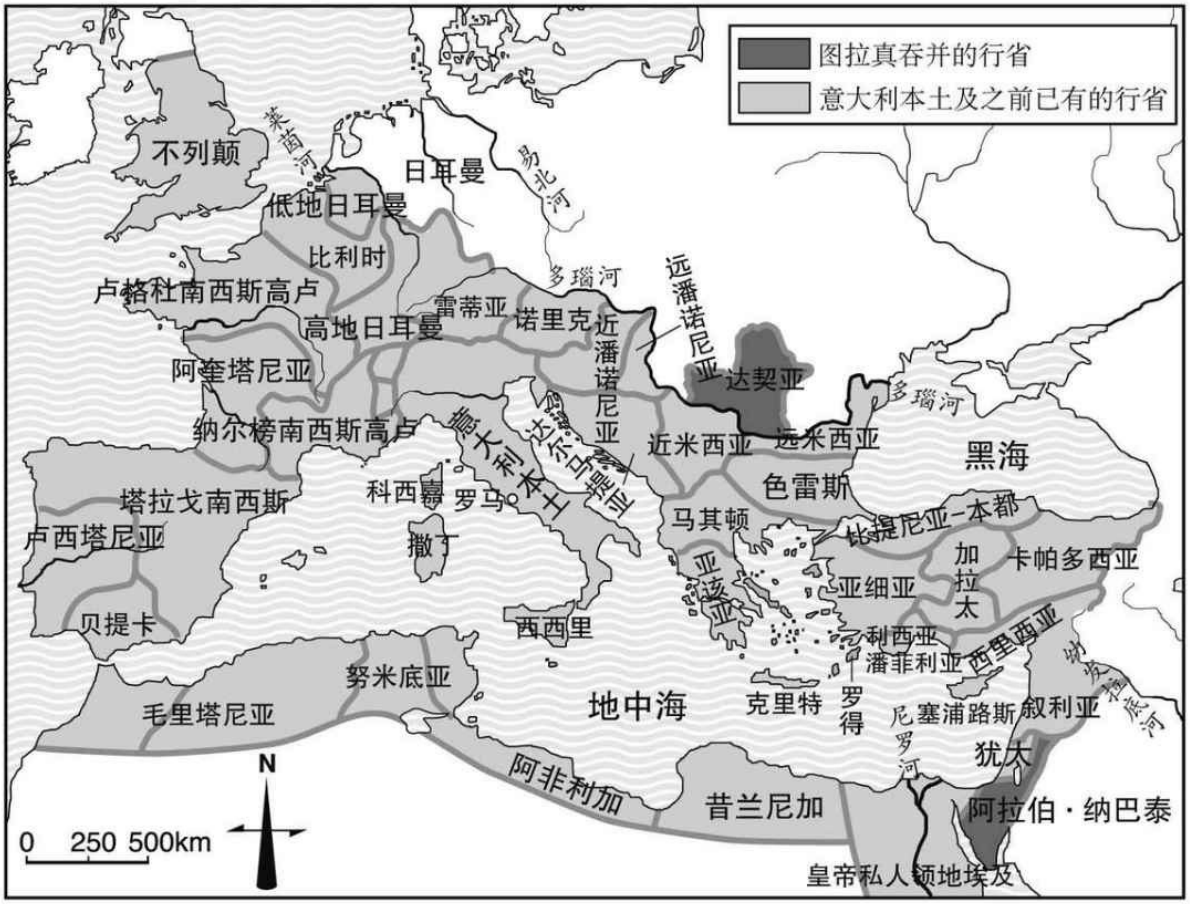
乘坐四匹白马拉的战车、身披嵌金丝的紫色斗篷、头戴绿色桂冠、体格高大魁伟的图拉真，在罗马人眼里也许是托付帝国命运的最佳人选吧。

走在他前面的载货车上是被囚的达契亚贵族们。仅仅在10年前，他们还向罗马要求为罗马的俘虏每人每年支付2阿斯，作为归还俘虏的条件。罗马人虽然不是一个记仇的民族，但是，没有人不会为内心的憋屈得到释放而感到畅快淋漓。

达契亚国王堆积如山的财宝不得不分装在几辆载货车上。图拉真宣布把这些财宝全部用于公共建筑事业上。

为庆祝这次战争胜利而举行的竞技和演出活动，也是帝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古罗马圆形竞技场举行的角斗比赛，据说有上万名角斗士参加，其中大多数是被捕的达契亚士兵。有的俘虏不得不与在角斗士训练所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角斗士角斗，最终难逃命丧赛场的结局。有的俘虏不得不与同伴角斗而在绝望中死去。



吞并达契亚后的罗马帝国版图

在圆形竞技场，还举行了野兽之间或人兽之间的角斗。为庆祝达契

亚战争的胜利，据说共投入了1.1万头野兽。

如此壮观的场面整整持续了123天。其间，首都罗马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此期间，死去的达契亚俘虏不计其数。据说俘虏的总数达5万人。没有死的俘虏，等待他们的便是做奴隶的命运。

战后处理

图拉真皇帝没有单纯地把达契亚王国变成罗马行省，没有对曾经在多瑙河北岸耀武扬威并对罗马构成威胁的敌人进行清算，也没有要求他们臣服罗马。因为他想让他们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图拉真只允许战争初期早早表示愿意投降、发誓归顺的达契亚人继续居住在达契亚。对战败后的达契亚人，无论老人、女人还是孩子，不允许他们继续在故国生活，图拉真把他们全部驱逐出达契亚，远远赶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多达5万人的俘虏和奴隶也被带离故国。达契亚几乎成了一个空国。

图拉真让生活在达契亚周边的人移居到这个几乎已经变成空国的地方。这些人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很多地方。为此，达契亚居民的构成彻底改变，达契亚成了一个风俗习惯、语言表达互不相通的人们的混合体。于是，图拉真开始在他们中间普及罗马人的语言，即拉丁语，作为他们的普通话。我们知道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语言都是以拉丁语为母语发展起来的。而罗马尼亚远离这些拉丁语系国家，但是罗马尼亚语也属于拉丁语系。只要会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可以听懂一半左右，因为现在的罗马尼亚就是曾经的达契亚。

无论是翻译成《列传》，还是翻译成《英雄传》，这是一部希腊和罗马名人的传记作品，作者希腊人普鲁塔克出生于公元50年前后，死于公元120年至125年间。与公元53年出生并在公元117年去世的图拉真是

不折不扣的同时代人，而且普鲁塔克为了写传记需要了解第一手资料，为此，他曾经多次前往罗马，并长期在罗马逗留。说他是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的见证人之一毫不为过。同时，他与元老院议员们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

普鲁塔克说过这样一句话：

“罗马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同化战败者。”

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并成功地把高卢变成了行省，其后的高卢被认为是罗马行省化的模范，就是因为胜者恺撒实行了同化败者的政策。他允许战败者高卢人继续存在；原谅了在阿莱夏之战中把刀剑指向自己的人；同意高卢各部族继续生活在原居住地。不仅如此，他还兴建了罗马式大道，把高卢各城镇联系起来；赋予部族有权阶层世袭的罗马公民权；为部族长提供元老院议席。甚至还把自己的门第姓氏尤里乌斯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同族人。

恺撒遭暗杀后，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了他的思想。他的开国方针成了罗马帝国行省统治的基本理念，他的政策得以稳固。也就是说，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罗马帝国这一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图拉真即位皇帝的事情了，因为他身上流淌着的是曾经的失败者的血液。罗马过渡到帝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迦太基灭亡时候那样，把盐巴撒到沦陷的城市里使其变成不毛之地、全体居民沦为奴隶被带走的情况。

进入帝制时代以后，罗马继承了恺撒的行省统治思想。这种做法让来自曾经的失败之地的希腊人普鲁塔克为胜利者罗马人大献溢美之词。

那么，图拉真为什么要对达契亚的住民进行大换血，而没有采取同化当地失败者的政策呢？

难道是罗马度过兴盛期达到鼎盛期后，作为胜利者表现出来的傲慢自大吗？

或者是为了让罗马人从此彻底摆脱图密善时代被迫品尝到的屈辱的痛苦记忆？

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是图拉真和图密善皇帝一样，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达契亚问题，只能把它变成一片荒芜之地吗？

关于在达契亚变成行省的过程中对居民进行大替换的情形，与图拉真同时代的普鲁塔克和塔西佗都没有留下一句谴责的话。不仅如此，他们似乎对图拉真的所有政策主张都非常认同。

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塔西佗出身于法国南部行省，希腊人普鲁塔克出身于希腊南部。这两个身世、背景迥然不同的人难道都超越了各自的出身、民族和社会地位，而对罗马帝国——他们现在的命运共同体——持有完全相同的感情吗？

为了作出客观评价，我想，我们有必要研究相关背景，来了解恺撒对高卢的战后处理和图拉真对达契亚的战后处理的不同。

恺撒所面对的是由近百个部族组成且各自为政的高卢民族。日耳曼民族恰恰是利用高卢民族内部相互间的不和谐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从莱茵河东部对它进行入侵。恺撒是这样忠告高卢人的："如果现在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结局不外乎两个——一是沦为日耳曼民族的奴隶，二是选择在罗马的同化政策下自由地生活。"

除了日耳曼威胁论这一张"王牌"外，恺撒还有另外一张牌——那就是高卢民族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部族组成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联合体。

既然如此，各部族之间一定会发生利害冲突。每当出现利害冲突

时，处于劣势一方的部族就会求助于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这也是日耳曼入侵高卢的原因之一。也许高卢人对此也早有意识，所以，他们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任务交给了一年一度举行的酋长会议。但是，由于各部族势均力敌，协调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恺撒在征服高卢后，允许高卢各部族酋长会议继续每年召开一次，只是负责协调的人即议长，换成了罗马人。这样做的结果是，自从罗马军队保护高卢人不受日耳曼入侵以后，他们开始由从前的狩猎民族转变成为安心劳作的农耕民族。

图拉真没有恺撒那样的王牌。首先不存在一个会从背后威胁达契亚的强大民族。同时，达契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它的统治者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

恺撒实行的是同化战败者的政策，图拉真没有实行同样的政策。两者从方法上来看完全相反。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这两种做法都取得了成功。尽管罗马在达契亚只驻扎了1个军团，但是，这个行省让罗马中央政府可以不用过多地操心。

当然，这不是因为征服了达契亚才得以有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图拉真没有忘记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巩固多瑙河防线的重要性。

首先是西侧相邻的莱茵河防线。从莱茵河河口经过日耳曼长城到雷根斯堡的这条防线被确定为帝国的国界线。多瑙河防线始于莱茵河防线的东侧。沿着多瑙河的流向，一直到下游，都有罗马的军事基地。罗马人说的“superior”和“inferior”，用在河流上，意思分别是上游的“高处”和下流的“低处”。此外，也用于表示距离罗马“远”和“近”的意思。

“近潘诺尼亚行省”有3个军团基地，分别位于维多波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距离维也纳30公里、地处下游的卡农顿（今奥地利佩特罗内拉）和布雷格提奥（今匈牙利苏尼）。

“远潘诺尼亚行省”——阿奎因库姆（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近米西亚行省”——有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维纳提乌姆（今科斯托拉茨热）2个基地。

“远米西亚行省”——有诺维伊（今保加利亚斯维什托夫）、杜罗斯托鲁姆和河口附近的特劳埃斯米斯3个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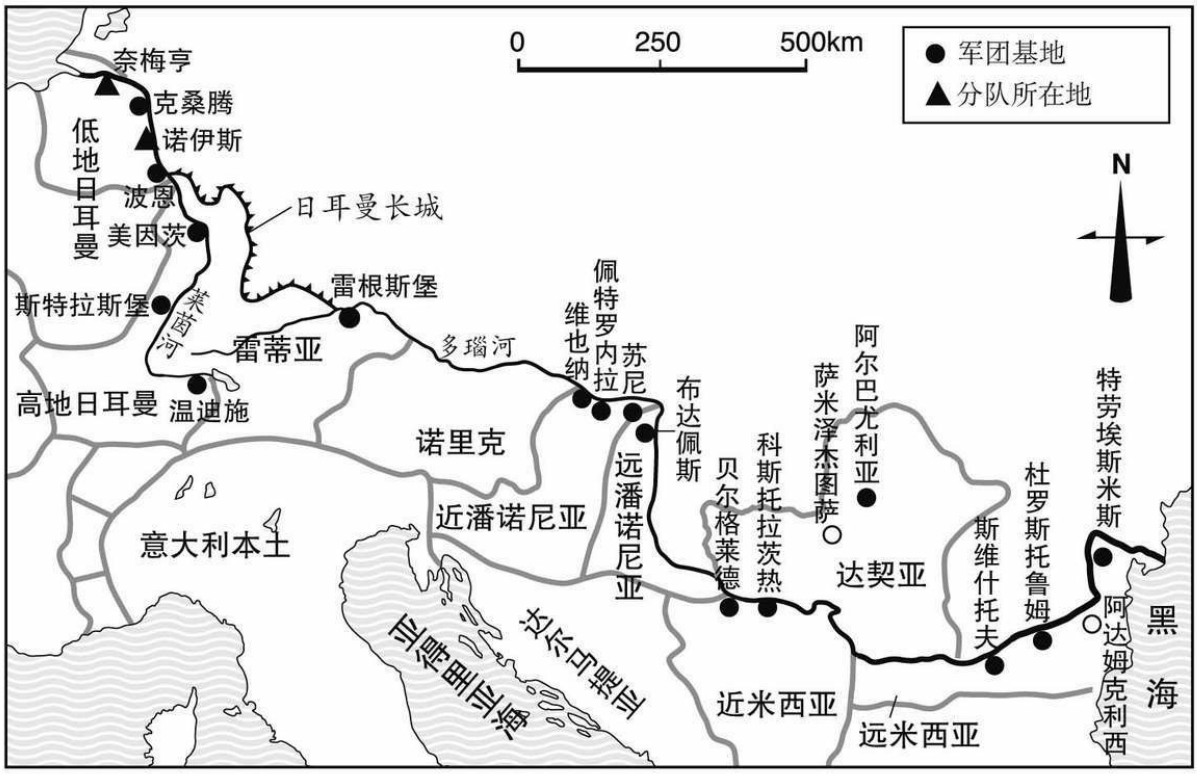
“达契亚行省”——有艾普伦（今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基地。

以上共计有10个军团基地，驻扎的军团数量也是10个。4个行省分别派驻一位元老院议员担任总督。作为主力部队的军团兵达6万人，加上辅助部队士兵，从多瑙河中游到下游的区域内共部署了多达12万人的兵力。

达契亚王国昔日的首都萨米泽杰图萨更名为“萨米泽杰图萨的图拉真殖民都市”。大批参加过达契亚战争的期满退役士兵住进了这个城市，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达契亚行省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同时，一旦发生变故，他们还可以成为保卫城市的后备力量。此外，图拉真还在位于多瑙河河口附近的阿达姆克利西山上修建了一座胜利纪念碑，隔多瑙河睥睨北方。

上述举措所取得的成果有如下几项：

一、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



莱茵河、多瑙河两河流域的防线

二、稳定了历史上以多民族聚居为特点的巴尔干地区。

三、作为东方与中欧的物资中转基地，黑海西岸的希腊系各城市变得更加活跃。欧亚之间通过多瑙河也能够进行交流了。

不用说，达契亚变身行省后也建起了罗马式的基础设施网。即使在150年以后蛮族大举入侵的时代，达契亚依然为罗马帝国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

达契亚战争结束后，图拉真获得了普通公民、元老院、军队以及各行省的支持。同时，他的行省出身这一原本的不利因素也渐渐转变成为有利因素。对此，图拉真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公共建筑事业

一个人开展工作的方法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一件一件地去完成。

另一类是把所有事情都考虑进去，然后同时进行。

以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为例，列奥纳多·达·芬奇属于后者，而米开朗基罗则是前者。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工作方法总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种划分有一个前提，就是“基本上”如此。

罗马五贤帝中，图拉真和哈德良被评价为最重要的两个皇帝，这是所有人一致公认的。根据上述论点，对于这两个人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进行分类。基本上，图拉真的工作开展方法属于米开朗基罗类型，而哈德良则属于列奥纳多类型。如果要写他们，显然，米开朗基罗的类型写起来要容易得多。

只是，艺术家是“个体”，他们的工作方法更多是基于他们的性格。但是，作为“公众人物”，对于皇帝工作方法的划分，绝对不能说是纯粹地基于他们的性格。因为，作为一位皇帝，如果没有突发事件，他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一件一件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但是一旦发生紧急事态，他必须优先解决新的突发问题。如果图拉真即位的当时，幼发拉底河前线乌云密布的话，估计他也不可能把心思只花在解决达契亚问题上了。我想，这两位皇帝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之前的皇帝都很好地履行了各自的职责，这才使得他们有了依自己的性格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图拉真虽是公众人物，却以个人的方式发起了达契亚战争。让我们回顾一下战争结束后，与图拉真同时代的哲学家克瑞索托提出的“罗马皇帝的三大职责”。把它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

一、保障边境安全；

二、维护国内政治秩序；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就第一条而言，图拉真一定认为由于达契亚问题的解决和随之确立的多瑙河防线，这一职责已经顺利完成。

从第二条工作的性质来看，就算图拉真希望早日完成，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一条不适宜采用第一类工作方式。只要他在位一天，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坚持做下去。

至于最后的第三条，事实上，从公元107年至112年的6年多时间里，图拉真都在全力以赴地努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当时，罗马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好，非常有利于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一、维持防线需要经费，但是战争所需费用更高。随着达契亚战争的结束，罗马帝国得以从庞大的战争费用开支中解脱出来。

二、在短时期内，不能指望生活在达契亚行省的居民可以缴纳行省税。因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外来的，所以在这些人的基本生活状态稳定之前，不能向他们征税。尽管有一小部分达契亚人被允许继续居住在达契亚，但是他们饱受战乱之苦，与那些移民们一样，他们也必须从头开始。还有一部分新居民是罗马军队的期满退役士兵。他们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不是行省税的纳税对象。

从共和制时代开始，罗马的税收制度规定，刚刚成为行省的地方、经济状况恶化的时期以及遭受地震、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可有几年免除收入的10%的行省税。同时，原本5%的关税和1%的营业税也减至原税额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这个制度同样适用于达契亚行

省。所以，尽管是暂时的，但是来自达契亚行省的税收应该难以满足驻扎在达契亚的1个军团所需的经费。话虽如此，征服达契亚还是给罗马人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足以让他们对行省税忽略不计。

三、达契亚地区有以金银储量丰富的矿脉而闻名的矿山。

四、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积攒下来的、数量庞大的财宝。

图拉真一心一意建设的无数公共建筑事业，其财源都出自第三条和第四条。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第五条。这一条为图拉真兴建的各项公共建筑更加实用、美观、宏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五、以阿波罗多洛斯为首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可以投入一项又一项的公共建筑事业建设中了。

达契亚战争结束后，多瑙河沿岸不再需要这些人。因为殖民城市的建设和一般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军团随团的技术人员和士兵就足够了。

其结果是，不仅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甚至在帝国整个疆域内都掀起了公共建筑事业的高潮。其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让我在查证这些建筑的过程中累得疲惫不堪。如果要悉数列举出来的话，恐怕用上20页稿纸也不够。因此，我只列举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这些建筑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一位皇帝和一位建筑总工程师，这两个50多岁的人，他们的激情、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执行力彻底折服了我。建设横跨多瑙河这条大河之上的图拉真大桥所体现出来的高超的工程技术、推崇外形壮观的设计风格和重视实用性的建造方式等等，在当时的帝国全境内遍地开花。我想图拉真这个男人在对待公共建筑事业的态度上也与其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样，表现出的是磅礴大气。他亲自主持的工程大多数集中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拉开意大利本土与行省之间的差距。同他所制定的所有其他政策一样，图拉真的真实想

法是，首都罗马应该是帝国所有城市的楷模，意大利本土应该是所有行省的榜样。

前面已经提到过，相关文献史料少之又少是历史上的图拉真的一大特点。既然如此，人们很自然会产生疑问：我们是怎样确定公元107年至112年间他主持的那些工程的？凭什么说我们掌握的情况还相当准确呢？

自从实行帝制以后，罗马的职业分工又进了一步。当然与现在的企业相比，还没有走出手工业制作的阶段，但是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的阶段。以建筑市场为例，所需资材分别由不同的专业工厂提供，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已经很平常了。

建筑物的主体是砖块。公元前2世纪就已发明了混凝土制造方法的罗马人，采用的建筑方法是用混凝土把一块一块的砖垒砌起来，这就有了基本墙体。墙体建成后刷上灰泥，然后在灰泥表面或画画，或张贴大理石板。至此，墙体才算全部完工。因为所需砖块数量惊人，所以，制砖工厂自然生意兴隆。

这些制砖工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要在砖块上压印工厂名称和制造时间等，然后再进行烧制。这就是商标。因为是在砖块尚未变硬的时候压印上去，然后再烧制的，所以只要砖头在，商标也就留下来了。当然，并非每一块砖都有商标，应该是每包砖头中有一块印有商标。这一点，从带商标的砖块数量上可以推测得出来。

有一些学术论文专门研究了印在罗马时代的砖块上的商标。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元前1世纪中叶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带“商标”的砖块。实行帝制后，从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到弗拉维王朝，每经历一个王朝，这种砖块的数量就会有所增加。到了公元2世纪的五贤帝时代，它们的需求数量进入鼎盛时期，到了3世纪开始减少，直至4世纪几乎销声匿迹。

印有商标的砖块

需求量的变化和随之出现的行业分工化趋势大概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风向标。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4世纪基督教的兴起极不利于经济的繁荣。既然基督教重视来生甚于现世，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是对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人来说，他们看重的只是现世。掀起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应该是他们自信心大爆发的一次体现。

也许有人又会提出另外的疑问：就算印在砖上的商标让我们了解到砖块制作的时间，但是，我们又如何知道它们用于建筑的年份呢？为什

么说关于建筑物的建造时间，我们“掌握的情况还相当准确”呢？

考虑到现代社会有库存的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与建一座医院需要花上30年时间的现代意大利人相反，古罗马人的施工速度非常快。就连圆形竞技场也只用4年时间就建成完工了。建设横跨多瑙河这条大河的图拉真大桥也只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不难想象，砖块未待入库就直接从工厂送到了施工现场。因此，我认为制造时间和使用时间之间，应该相差无几。

当然，从开工到完工，时间跨度达10年以上的情况也不少。这种情况，通常是加上了装修的时间，因为对细节处的装修非常耗费时间。通常情况下，完工仪式要在所有工程都结束，能够投入使用时才举行。

为什么罗马人的施工速度如此之快呢？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视生产效率的民族，甚至有学者称罗马人是“效率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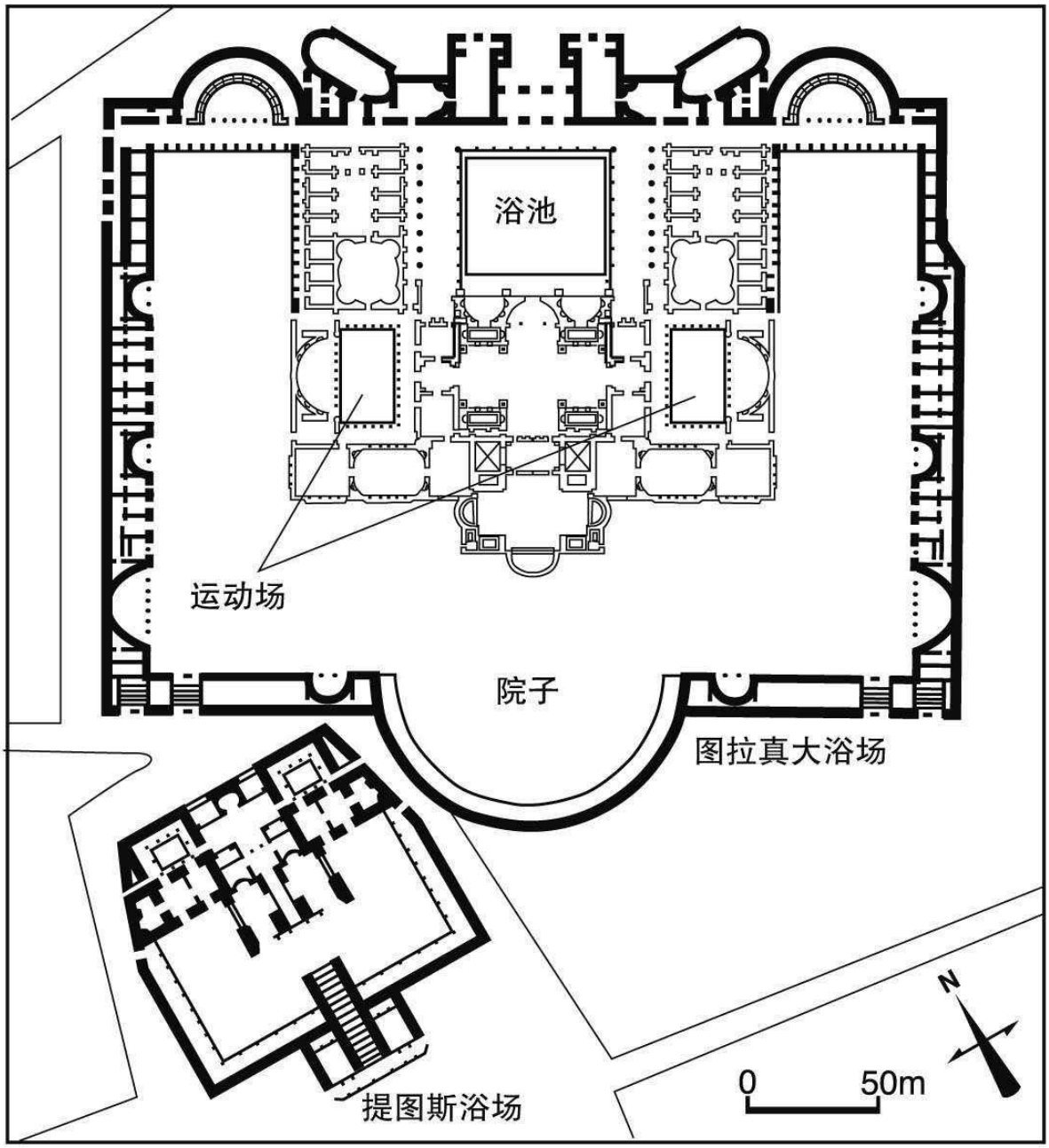
前面已经说过，我想就在这里选择几个图拉真主持下兴建的公共建筑中影响较大的进行介绍。首推的应该是“图拉真大浴场”（Thermae Traiani）。这个大浴场占据了整个奥比欧山丘。这座山位于罗马七个山丘之一的埃斯奎里山西侧。就在这座山丘的西南，已经有一个大浴场，是提图斯皇帝修建的。这两个大浴场的建成，使得尼禄皇帝修建的“黄金宫殿”的主体部分被完全埋入了地下。

无须多加说明，罗马式的“浴场”，除了洗浴设施，更是一个集各种娱乐设施为一体的娱乐中心。按照罗马人的生活理念，他们把一天分成了“工作”（negotium）和“休闲”（otium）两大部分。“浴场”向他们提供了消磨闲暇时间和保持个人卫生的两大功能。建设图拉真大浴场用了两年时间。浴场需要大量的水，由于可以利用尼禄兴建的“黄金宫殿”的水渠输送，所以无须修建新的水渠。

但是，图拉真还是修了一条新水渠。这条水渠建在自西进入罗马的

古罗马大道沿线，目的在于提供工业生产用水。台伯河右岸后来有了梵蒂冈，南边是一大片平民居住区，叫“特拉斯特维雷”，意思是“台伯河对面”。在罗马时代，右岸除了富人们临河而建的住宅外，还有卡利古拉皇帝兴建的竞技场。此外，大多数手工业者也生活在这个地区。特拉斯特维雷已经有一个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修建的蓄水池。图拉真在它的北侧，也就是现在的梵蒂冈东面，与该蓄水池毗邻处又修建了一个蓄水池。与奥古斯都一样，他的政策是要振兴台伯河以西开阔地带的工业。水首先被引到蓄水池贮存起来，然后再输送出去使用。所以池里的水不是饮用水而是工业生产用水。不过话说回来，引来的水质原本是可以饮用的，在被直接引入蓄水池之前，这些水曾经是用做饮用水的。

罗马人把这种城中蓄水池叫做“海战表演池”（naumachia）。因为在庆祝蓄水池完工的时候，奥古斯都把船开进蓄水池进行了一次海战表演，供市民们欣赏。很可能图拉真也模仿了第一代皇帝的这一做法，只是，奥古斯都在位的44年间，海战表演只进行过一次。与“蓄水池”相比，“海战表演池”的名称更令人心动，于是这个称呼就固定下来了。“奥古斯都海战表演池”和“图拉真海战表演池”指的都是工业生产用水的蓄水池。



两个相邻而建的皇帝浴场

不管怎么说，图拉真在首都罗马兴建的公共建筑物中，最著名的当属“图拉真广场”。这一大型建筑物是建于古罗马广场附近的、皇帝们兴建的广场中的最后一个广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广场。在了解了有关

它的背景知识后，站在这个遗迹上，除了感慨，我忽然想到一句不知是谁说过的话：“大就是好。”我于是情不自禁有了想笑的冲动。一想到图拉真和阿波罗多洛斯二人的组合，竟以如此规模的杰作作为收官之作，我忍不住笑了。图拉真广场不仅雄伟，而且非常壮观。它的气势彻底征服了我，同时它的美也让我深深折服。

以浮雕的方式再现了达契亚战争的图拉真记功柱就建在这个广场里面。

现在我们称做“皇帝广场”的一带和古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一同成为帝国统治的中枢，是在共和制末期，即尤里乌斯·恺撒进行扩张事业的时期。共和制时代，国家的中枢机关只有位于埃米利亚会堂和元老院南边的古罗马广场。

恺撒首先重建了元老院会场。接着，在元老院会场北侧，兴建了“恺撒广场”。夹在元老院会场和埃米利亚会堂之间的道路通往苏布拉平民区。

“广场”（Forum）这一名称，很难翻译成日语这种没有受到拉丁语影响的语言。词典的解释是“位于古罗马城市中心的大广场，是政治、经济、司法的中心，也用做商业交易、审判及市民集会的场所”。它是一个公共场所，日语吸收了这个意思，甚至把纯粹说话聊天的场所也命名为“广场”。就像前面讲述的那样，古罗马广场内建有行使政治权力的元老院议事厅、可用于审判或商业交易的大厅、神殿（神殿的下面是国库）、用于集会演讲的讲坛，以及凯旋门和胜利纪念碑，它同时起到点缀市容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有什么事情，这里就是市民们聚集起来的地方。

“广场”因恺撒的设计而成为具有独特罗马风格的建筑式样，它把古罗马广场具备的这些功能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形状呈长方形，一条边建有神殿，另三条边建有带顶的双层列柱走廊。走廊内侧是商业交易的

办公室和店铺，还有不少私塾学校。被神殿和走廊围起来的内部是广场。中央矗立的是一尊兴建该广场的人的骑马像，即恺撒的骑马像。神殿前面的台阶在面向人群演讲时用做讲坛。

也许你会认为这个广场的建设者是最高权力者，因此这个地方是神圣的，应该充满肃穆的气氛，有卫兵站岗护卫，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除了有祭祀仪式的日子这里的气氛略显严肃外，其余时候，男女老少在这里频繁穿梭，热闹异常。这就是古罗马广场，也是恺撒心目中的“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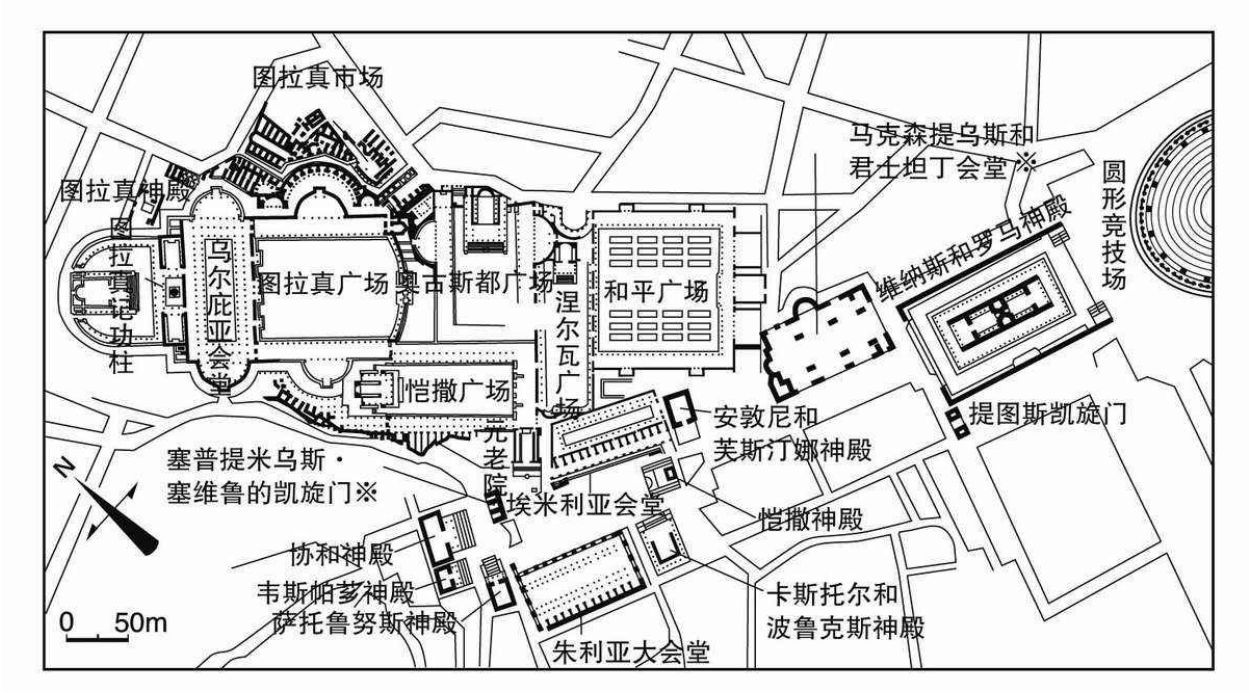
尤里乌斯广场（Forum Julium），也就是恺撒广场的建造理念，连同恺撒在其他诸多方面的想法一起，被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了下来。继恺撒之后修建广场的是奥古斯都皇帝，所建广场叫“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i），其规模是恺撒广场的近两倍之大。我想，至少在规模上要超过前人的这种虚荣心，我们应该给予谅解吧。广场的基本形状未变，只在左右两侧分别加出两个半圆状的布局式样。

下一位在这里修建“广场”的是韦斯帕芗皇帝。经历了尼禄皇帝死后的内战，又镇压了犹太叛乱的这位皇帝，修建的广场没有冠以自己的名字，而是选择了用“和平广场”（Forum Pacis）这个名称。

韦斯帕芗皇帝兴建的和平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之间有一个窄长的空间，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皇帝把它变成了“广场”。这原本是一条苏布拉地区通往古罗马广场的道路，他把这条纯粹的通道升格成了有神殿和列柱走廊环绕的广场。这条路彻底改变了模样。原先的石板路变身“广场”后，铺上了大理石。罗马百姓前往古罗马广场的时候，就像走进大宅邸的列柱大厅，他们就穿着草鞋从大理石的地面上走过。

因为图密善皇帝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加上完工时间是在下一任皇帝涅尔瓦在位期间，所以这个细长形的广场就被命名为“涅尔瓦广场”（Forum Nervae）。

图拉真也决定建一个“广场”。但是可以用来建广场的地方只剩下奥古斯都广场的西北侧。西南是卡匹托尔山，前面的空地已经被恺撒广场占据，东北是苏布拉平民居住区。和平广场的东南在其延长线上有圆形竞技场，中间过于狭窄。如果建在奥古斯都广场的西北侧，同样过于窄小，因为背后有奎里尔诺山连绵的山脊阻碍。



五贤帝时代的皇帝广场和古罗马广场（为便于区别，后来的建筑上标了※）

图拉真希望建一个比所有前任皇帝广场都要大的广场，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他采用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方法，把奎里尔诺山山脊线以下的山坡削平，并在下面开辟出一大片平地。

图拉真和阿波罗多洛斯这两个人的性格实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修建大道，他们可以削去多瑙河沿岸的岩壁；为了修建阿皮亚大道的支线以缩短距离，他们也可以削去特腊契纳的山腰。总之，凡遇到阻碍时，两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正面突破而不是迂回解决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得到了五倍于奥古斯都广场的土地面积。

印有图拉真广场入口的硬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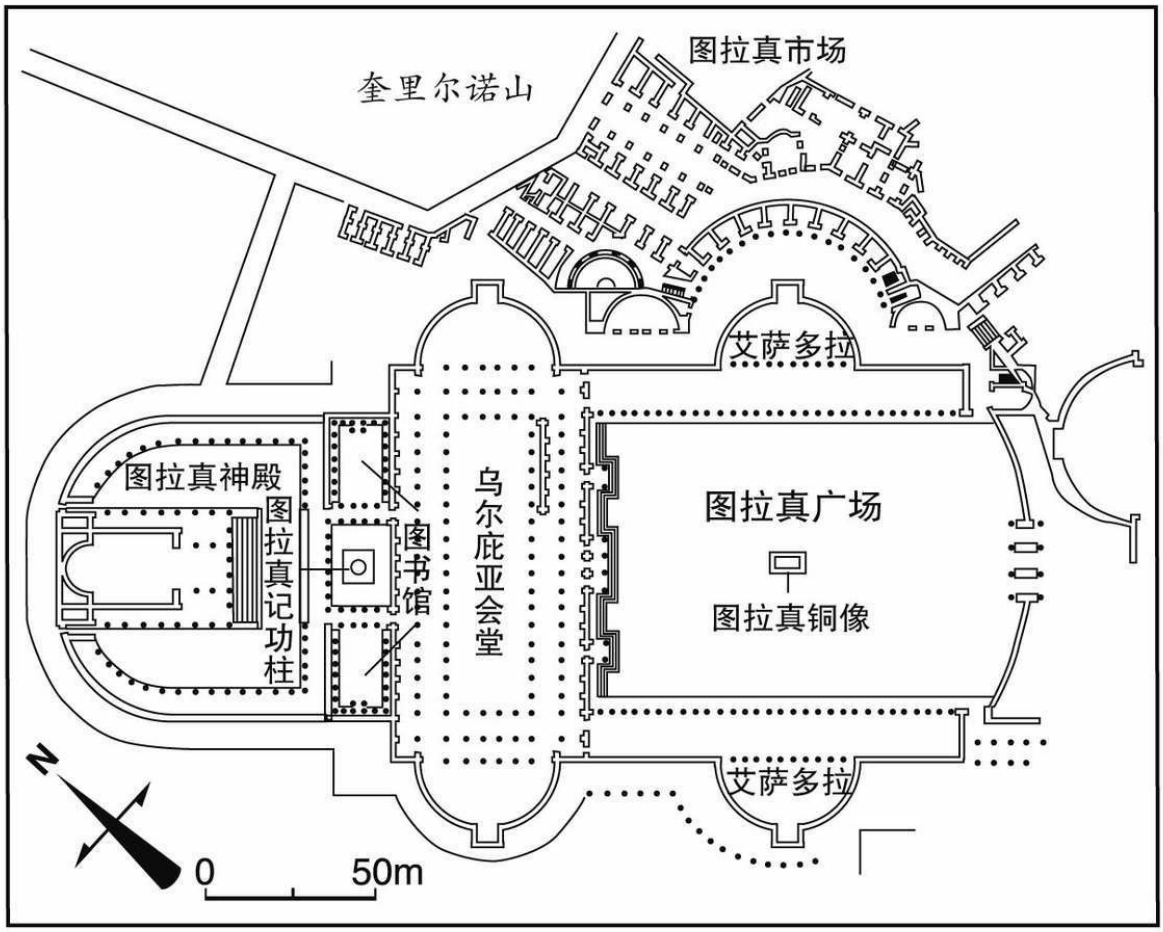
但是，图拉真想要的不只是比所有前任皇帝广场都大的广场，他还想要一个拥有更多功能的“广场”，是所有前任皇帝广场都不具备的。阿波罗多洛斯同样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

人们来到图拉真广场，最先进入眼帘的是列柱。穿过列柱进到里面，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地面铺着大理石的巨大广场。广场的三条边都用双层列柱走廊围绕着。这么多的圆柱连成一片，气势非凡。列柱内侧是办公场所和店铺，左右是连通的半圆形建筑，这里是孩子们上学的学

校“艾萨多拉”。正面高出几个台阶的是乌尔庇亚会堂（Basilica Ulpia），建有屋顶，可以遮阳挡雨，地面是色彩斑斓的大理石。这里用于商业谈判或审判。乌尔庇乌斯是图拉真的家族姓氏。

会堂对面沿墙而建的是公共图书馆，里面有陈列卷轴读本的书架。图书馆分左右两个馆，一个馆陈列的是希腊语读物，另一个馆陈列的是拉丁语读物。

通过螺旋上升的浮雕描述达契亚战争的图拉真记功柱就建在这两个图书馆的中间，而没有建在从远处也能看得到的广场中央。大概是为了方便人们既可以从下面往上看，也可以在会堂和图书馆的台阶上就近欣赏吧。除去基座，高达40米的圆柱上面，是身穿军装的图拉真铜像。只是在进入基督教时代后，圣徒彼得的铜像取代了它。圆柱下面是图拉真和他的妻子普洛蒂娜死后埋放骨灰的地方。在公共建筑物下面是为捐造者事先建造好的墓地，这样的做法不仅在希腊本土，而且在希腊人定居的小亚细亚西部，自古就有。一定是希腊人阿波罗多洛斯把这一习惯用到了图拉真记功柱的建造设计上。



图拉真广场全貌

图拉真记功柱的里侧，计划要建一座三面用列柱走廊围起来的神殿。这是献给神君图拉真的，建造任务自然落在下一任皇帝的身上。只要没有意外的变故，罗马皇帝通常会被神化。大概图拉真从没怀疑过自己也会被神化吧，因为他为后任建这座神殿预留好了位置，同时还留下了阿波罗多洛斯设计的图纸。他确实是一个思维缜密的人。

与在多瑙河上修建石桥的时候一样，阿波罗多洛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让委托人图拉真的名字永留青史。他在削平奎里尔诺山的斜坡上建了几个人工平台，形成一大商业中心。这种有效利用斜坡的做法，即便对现代的建筑师们依然有借鉴作用。现在，这一带叫图拉真市场，

顺着奎里尔诺山下行的路可以进入这里。因为是建在斜坡上，所以站在这里，下面的广场一览无余。

就这样，图拉真的愿望得以圆满实现，他建成了所有前任皇帝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广场。首先，规模之大非以前的广场所能及；其次，不仅有会堂，还有图书馆和描绘达契亚战争的圆柱，甚至还有巨大的商业中心。除了这些，广场中央还矗立着驾驭四匹战马的图拉真铜像。

罗马时代的广场不是为了军队的阅兵仪式而建，它是人们集会、工作和学习等日常生活的场所。只有这样的生活场所才是真正的“广场”，这就是罗马人的观点。

在过去了190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出如此雄伟、壮观的图拉真广场的全貌，以及以它的建成作为收官之作的皇帝广场的全貌。

必须一提的是，一心为了在德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的场所向希特勒展示军队阅兵仪式，墨索里尼在这里铺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使得皇帝广场横遭分割。我们知道，右边可以看古罗马广场、左边可以观皇帝广场、正面可以眺望圆形竞技场的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墨索里尼在努力保护罗马时代的遗迹上面花过不少气力，但由于铺建了这条左右两侧配有绿地的大道而遭人痛批。现在，道路的左右两侧一直在进行考古挖掘作业。可是，只要不拆除这条墨索里尼命名为皇帝广场大道的路，那么要想完全复原罗马时代的中枢完全没有可能。倘若不能完全复原，那么要想象其全貌终究是难事一桩。事实上，韦斯帕芗的和平广场已经被其他建筑物挡得严严实实，建在图拉真神殿上面的建筑也不可能拆除。所谓考古学，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展开工作的一门学科。通过研究及调查获取的知识必不可少，但是，仅此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还要加上想象力。

为此，我想说三个常识性的问题。当你站在遗迹上的时候，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

第一，罗马人建造的所有建筑物，都是把人类的存在放在第一位进行设计的。只要想象一下圆形竞技场可以容纳5万人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种规模对圆形竞技场来说是最合适的。电脑制图只能为我们提供模拟的“盒子”，却无法让我们体验到“盒子”加“人”的感觉。

第二，在现代人类活动的区域内保留下来的遗迹，大多数都在5米以上的低洼处。但是，古罗马广场和皇帝广场却不是一开始就建在低洼地上的。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间，由于建筑物的倒塌，石头、砂砾的不断堆积，导致地面上升。后人就在新形成的地面上，建起新的建筑物，铺设新的道路，遗迹随之被掩埋。19世纪中叶，在这里进行了挖掘工作，终于重现了旧时的原貌。也就是说，到了现代，古代罗马的地上一层变成了地下一层。

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遗迹，不是因为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淋等自然侵蚀所造成的。进入基督教统治时代后，这些遗迹被看做是异教的象征，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也成了建筑资材的最便捷的提取场。雕像、圆柱、多色大理石地面、刻有浮雕的墙面，能拆的都被拆走了。甚至贴在墙上的大理石板，因为容易揭下来，也全部被拿走了。石材本来就是切割好的，所以揭下来就可以直接用做建材。

如果你想看罗马时代的圆柱，与其找它的遗迹，不如直接去基督教教堂。不仅方便，还能看到很多。这就是当今的现实。即使在讴歌古代复兴的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对古代建筑资材的使用上不尽相同，但是遗迹被看做建筑资材的提取场的情况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在当时，唯一的例外是米开朗基罗把戴克里先皇帝的浴场中心部分变成了教堂。除此之外，没有一处逃过变成建材提取场的命运。甚至连圆形竞技场也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原因据说也是因为能取走的都取走了，留下来的只有混凝土加固过的砖块。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既无法取走又没有可再用的价值。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有人把它们挪做了墙体。图密善皇帝的竞技场（今纳沃纳广场）周边公寓的墙就是原本用来支撑竞技场观众席的墙

体。

连美国人都说，图拉真是务实的罗马皇帝中尤其务实的一位。他建造的所有公共建筑都具有实用性。在首都罗马以外，我最先想说的就是奥斯提亚港湾的建设。

罗马不靠海，所以需要在台伯河河口建港口。图拉真首先把奥斯提亚建成了港口。奥斯提亚本来就是一座临河的城市，没有船只避风港。再有，因为台伯河的水流从上游带来的沙土，海岸线不断向海里退去。因此船要在奥斯提亚靠岸，必须沿河逆流而上。为此，来自东方和非洲的大型船只能到那不勒斯附近的部丢利（今波佐利）靠港，在那里卸下物资，再通过阿皮亚大道运往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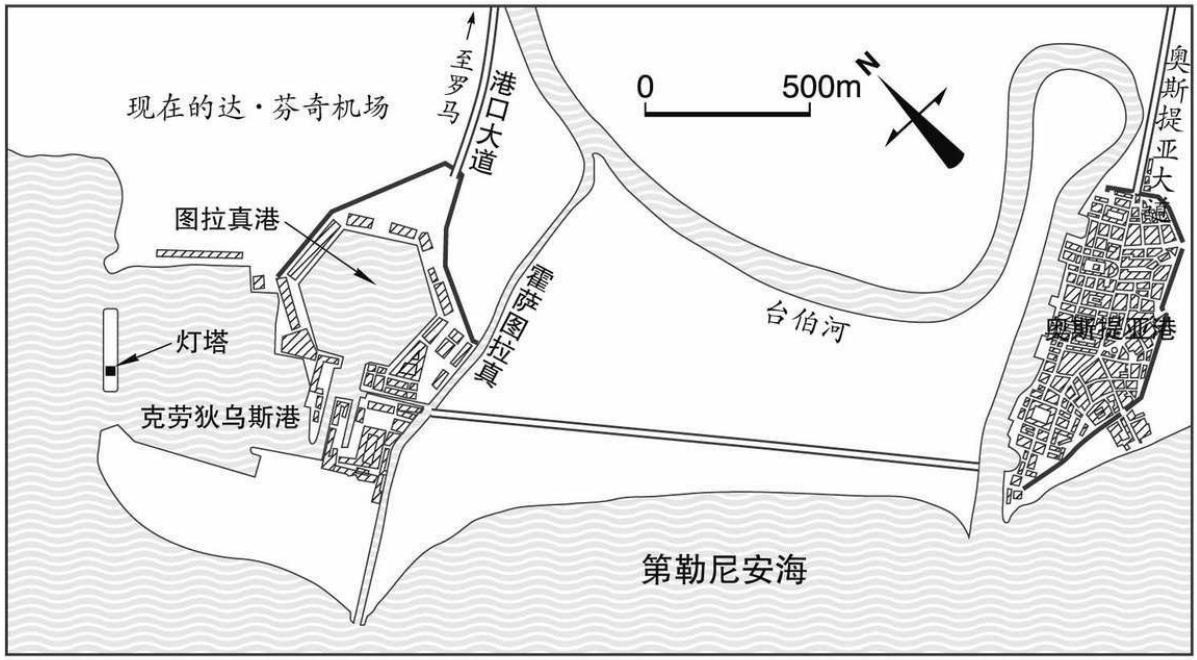
尤里乌斯·恺撒最早意识到首都罗马附近需要有一个可供大型船只安全靠岸的港口，克劳狄乌斯皇帝把他的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关于当时的建筑情形，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已经作了详细描述，在这里不再重复。然而，到了半个世纪后的图拉真时代，鉴于港口的吞吐量以及其他情况，有必要对港口进行改造。

图拉真和阿波罗多洛斯在克劳狄乌斯港再往里的位置，新建了一个六角形的海湾状码头。六角形的每个边都可以横向停靠船只。码头上还建了仓库。就这样，这里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港口。不仅避免了顺河而下的泥沙淤积，还能同时停靠多艘船只并装卸大量货物。在有了这样的新的运输体系后，大船上的货物卸到小船上，通过运河，进入台伯河，再逆流而上运至罗马。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港口随之荒弃。现在，克劳狄乌斯港已经完全被埋在地下，图拉真港成了一个六角形的池子。从被叫做“霍萨图拉真”（Hossa Traiana）的图拉真港到台伯河的运河也名存实亡，只有近海捕鱼的小渔船还会利用这条运河。这个曾经是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现在只用于从渔船上卸下供罗马人吃的鱼这类东西了。

图拉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并不满足于只修建奥斯提亚港一个港口。因为无论什么事，仅靠一个方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图拉真在另外的地方又建造了三个港口。其中两个此前曾经是渔港，他把它们改造成正式港湾。另一个则是完全新建的，之前那里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

第一个曾经的渔港所在地是安提乌姆（今安齐奥）。因为这个地方建有皇帝别墅，又是卡利古拉、尼禄出生的地方，所以，已经有小型的港口。图拉真把它改造成了避风港。地中海的风向随时都在变化，当时船只遇难的主要原因就是遭遇暴风雨。之前，船只遇到暴风雨，只能想方设法开往奥斯提亚港。图拉真为他们的船只提供了躲避暴风雨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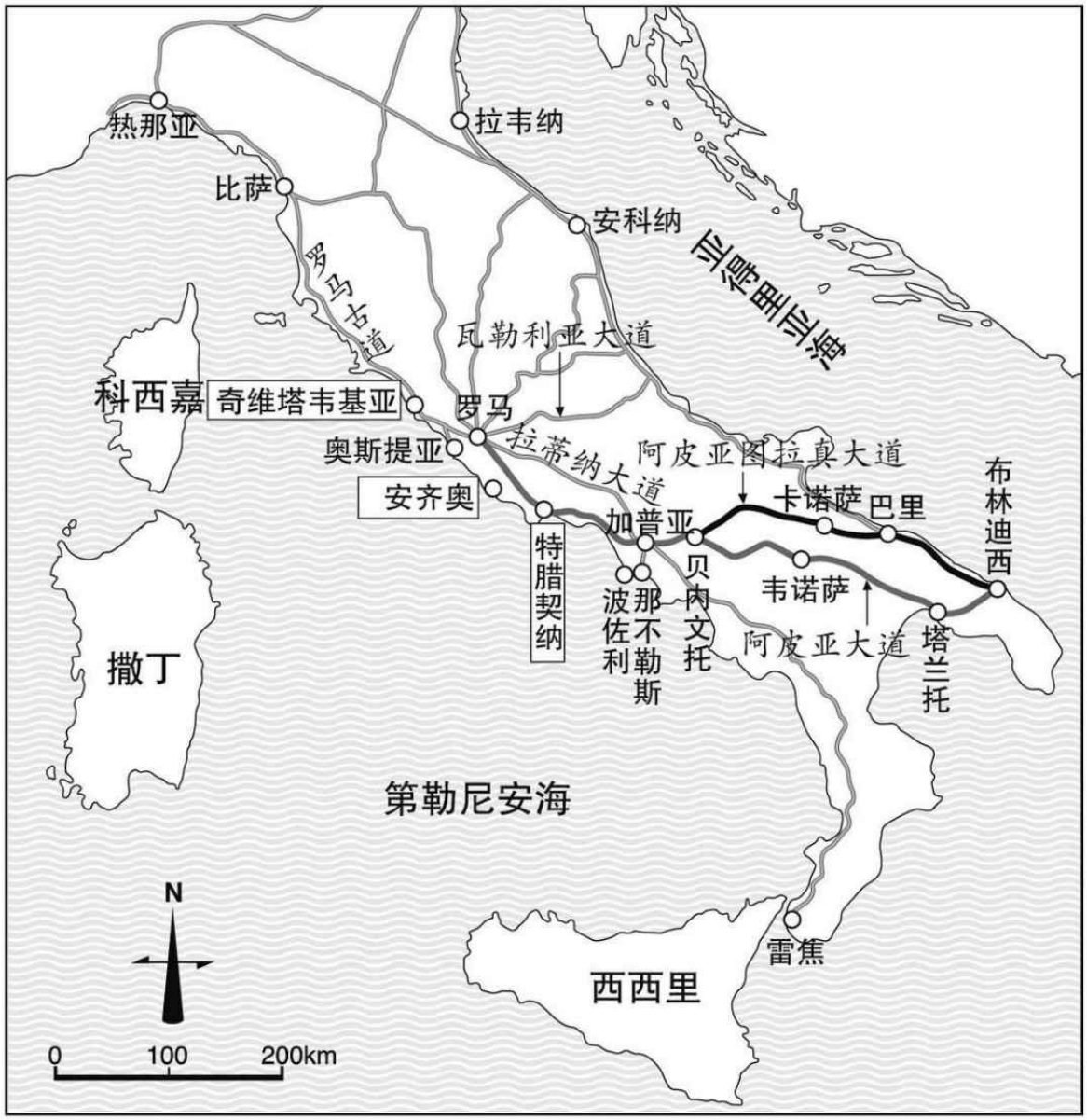


图拉真皇帝改造后的奥斯提亚港湾

泰拉奇纳（今特腊契纳）港兼具避风港和装卸港的双重用途。因为从特腊契纳到罗马有一条几乎笔直的阿皮亚大道。

这两个港口位于罗马南边。位于自罗马向北的罗马大道沿线的森图姆塞利（今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是图拉真新建的港口。这里同样兼有避风港和装卸港两种功能。森图姆塞利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仓库很多”的意思。由于该港口的建成，当时负责向首都罗马供应小麦的、来自科西嘉和撒丁岛的船只可以直接进入奇维塔韦基亚港口，航路缩短了许多。在这里卸下的货物再通过罗马古道运往罗马。为此，奥斯提亚港的负荷量大大减轻，也为来自东方和北非的船只提供了方便。

意大利半岛一直伸向地中海中部。罗马从共和制时代开始，作为主要粮食的小麦一直是依赖海外进口。长筒靴形状的意大利半岛东侧是亚得里亚海，西侧是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的一侧有意大利中部的拉韦纳和安科纳（现在还用此名称），意大利南部已经有巴里乌姆（今巴里）、布伦迪西姆（今布林迪西）、特兰特（今塔兰托）等港口。绕到第勒尼安海的一侧，则自北向南有热努亚（今热那亚）、比萨（现在还用此名）、奇维塔韦基亚、奥斯提亚、安齐奥、特腊契纳、波佐利、拿波里（今那不勒斯）、雷吉乌姆（今雷焦）等港口。“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海上。



意大利半岛的主要大路和港口（ 为图拉真改造成港湾后的地方）

在注重效率的图拉真看来，他一定认为改变随罗马历史一起流传下来的传统，不需要任何犹豫。其结果是被罗马人称为“大道女王”的阿皮亚大道变成了复线。

公元前312年在阿庇乌斯领导下兴建的第一条罗马大道——阿皮亚

大道，从罗马出发，经过特腊契纳到达加普亚，在这里与同样从罗马出发、由内陆南下的拉蒂纳大道会合后，进入内陆，经过贝内文托姆（今贝内文托）、维努西亚（今韦诺萨）到达塔兰托。从这里向东再走70公里，抵达终点布林迪西。这条道路现在依然还在使用，叫七号国道。

公元107年，图拉真考虑从贝内文托到布林迪西再建一条支线，以期实现道路的复线化。这条支线在贝内文托与南下的阿皮亚大道分离，指向东方的亚得里亚海，经过卡努基乌姆（今卡诺萨）到达布林迪西。最初的阿皮亚大道在离开贝内文托后，要穿过层层山谷。所以，与此相比，这条命名为阿皮亚图拉真大道的道路，其优势在于只需越过亚平宁山脉，就可以到达普利亚地区的平原。

这条大道在巴里附近，与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的大道会合。于是，罗马有了两条向东延伸的干线。再加上从罗马出发，沿瓦勒利亚大道一路向东，到亚得里亚海再沿海南下，直抵布林迪西的大道，通往东方的路就有了三条。

最初的阿皮亚大道因为遇到海边的悬崖而不得不绕道。图拉真则采用劈山修路的方法，使这条路的距离大大缩短。为此，特腊契纳的山腰被劈开一大块。从悬崖顶上垂直铲凿的痕迹，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清晰可辨。站在这里，没有新的感慨，也没有其他任何感受，只有一个想法：又是这样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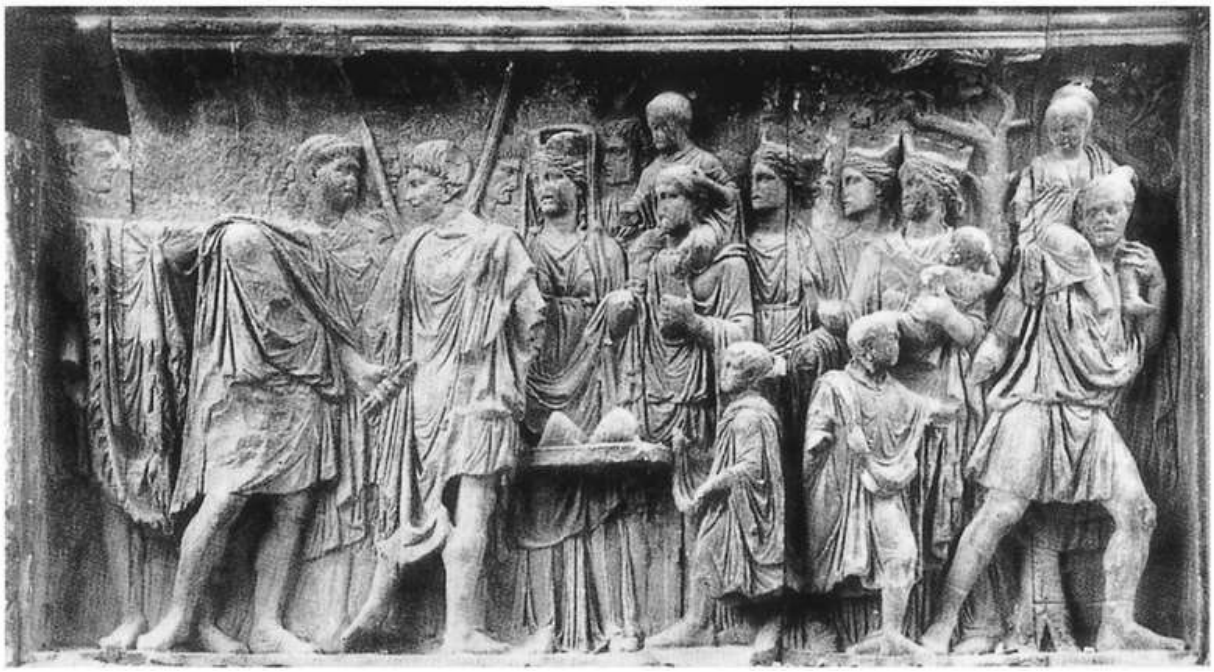
意思为“阿皮亚和图拉真的大道”的这条阿皮亚图拉真大道的起点是贝内文托。为了纪念这条大道的开通，在贝内文托建造了一座凯旋门。

既然这个凯旋门不是为图拉真凯旋而建，所以也许你会认为实用不是它的目的。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件东西，无论其实用性多强，终究比不上让人心情愉悦更为实用。拱形的凯旋门不仅是大道的装饰性建筑，同时也起到了宣传大道建设者功绩的作用。贝内文托的凯旋门上，雕刻的是推出育英基金政策的图拉真向孩子们发钱

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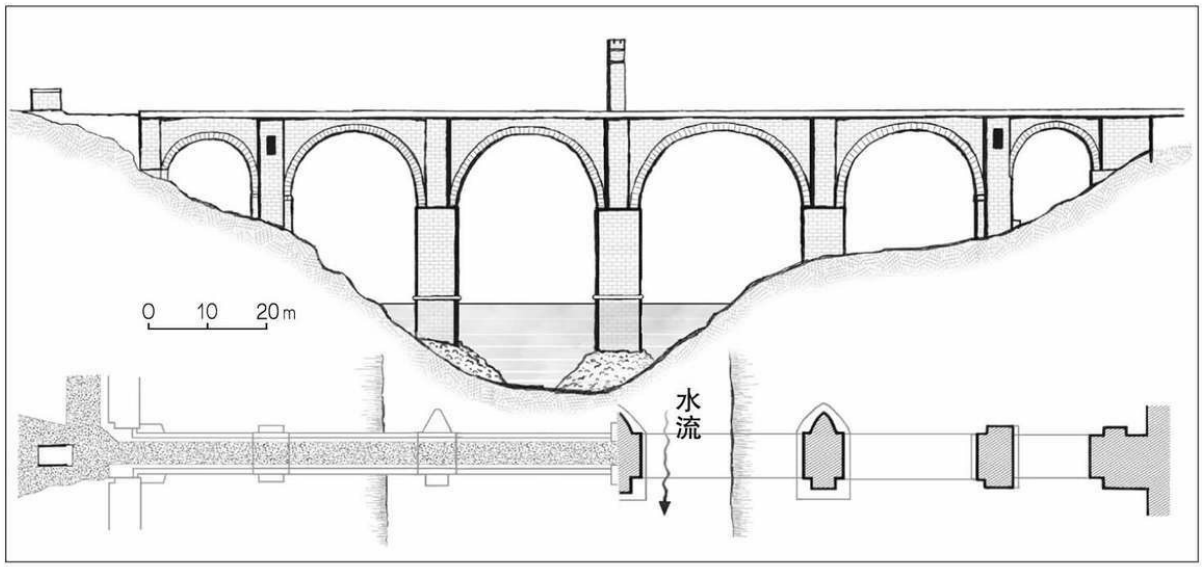
图拉真主持的公共建筑中，仅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而且还只是列举了其中主要的一些建筑，其质和量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那么，如果扩大到帝国全境，其数量之庞大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头痛。因此，对于意大利本土之外的公共建筑，我只列举一个例子。最具代表性的还要数西班牙的阿尔坎塔拉桥。这座桥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见到这座桥的人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感慨，罗马人建的桥竟是这样的！同时他也会明白，为什么桥既是大道的延长线，又是大道的装饰性建筑。这座桥是典型的一例，既实用又美观，展示出罗马人建筑的高超水平。这座桥建在流经阿尔坎塔拉的塔霍河上。由于靠近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界线，所以有人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图拉真要把桥建在如此偏远的地方？那是因为在罗马时代，伊比利亚半岛属于罗马帝国，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干线需途经此地。这条大道从现在的加的斯向北，通过希斯帕利斯（今塞维利亚）以及图拉真的出生地意大利卡，到卢西塔尼亚行省首府古斯塔埃梅里塔（今梅里达）。从那里再向北，经过阿尔坎塔拉，到达布拉卡拉奥格斯塔（今葡萄牙的布拉加）。从城市的名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修建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干线之一。阿尔坎塔拉需要一座水量大增时也能保持纹丝不动的桥梁。

贝内文托的凯旋门



向孩子们发放育英基金的图拉真（凯旋门的一部分）

阿尔坎塔拉桥



阿尔坎塔拉桥桥梁侧面图（上）和平面图（下）

只是这座现在依然是名桥的桥不是图拉真皇帝建的。碑文上有这样的内容：建造者：尤里乌斯·雷切尔及其朋友，感谢图拉真提供了帮助。这里所谓的帮助，应该不是指资金帮助，而是派了工程师去。对于从未为故乡做过一件好事的图拉真来说，有人愿意以地方出身的皇帝为榜样，参与公共建筑事业，他一定由衷表示欢迎。皇帝以身作则，以此带动其他人一起参与的代表是奥古斯都，也许，图拉真是效仿第一代皇帝的做法吧。以身作则需要旺盛的精力，在这一点上，图拉真无疑是优秀的。

被图拉真“带动”起来的人中，我想介绍几位。因为有文献及石碑，所以有幸让后世的我们认识他们。我在这里列举的人只限于捐赠了具体的公共建筑设施的人，而不包括提供资金支持的人。

小普林尼——向自己的出生地科莫市捐赠了神殿和图书馆。

小普林尼的岳父卡尔普尼乌斯·法巴图斯——向科莫市捐赠了列柱走廊。

公元113年的执政官科尔涅利乌斯·多拉贝拉——向自己的出生地科菲尼昂捐赠了公共浴场。

佩特罗尼乌斯·墨德斯图斯（属于骑士阶级）——全额承担了的里雅斯特半圆形剧场的改建费用。

图拉真的贴身仆人、解放奴隶乌尔庇乌斯·维苏威——向意大利中部的切尔韦泰里市捐赠了学校。

出身西班牙的元老院议员——向自己的出生地科尔多瓦捐赠了会堂。

图拉真的第一号亲信李锡尼·苏拉——替没有为出生地提供任何好处的皇帝，在连接塔拉戈纳和巴塞罗那的大道上建造了凯旋门。

在现在的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有个人向市里捐赠了图书馆。

弗拉维王朝时代进入元老院的、小亚细亚出身的三位元老院议员——共同向以弗所捐赠了图书馆。

捐赠的公共建筑物中图书馆最多，是因为当时的读物都是手写的，非常昂贵，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

由此可见，把自己的财富回赠社会的不仅仅是被后人称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人——罗马社会领导阶层的元老院议员。即便是原来的奴隶，能否向自己的出生地或打算安享晚年生活的地方城市捐赠公共建筑，只取决于一个条件——就是他是否有足够的资产。

同样在地方自治体，也具备被图拉真“带动”起来的条件。先皇涅尔瓦提出的有关个人遗产继承的法律同样适用于地方自治体：非直系亲属继承，需要缴纳5%的遗产税。遗赠给公共组织是否需要纳税，我们不

清楚。假如遗产税或赠与税的税率过高，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但是5%的话，地方自治体应该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正因为如此这般的条件都具备，所以，图拉真时代出现了公共建筑事业的高潮。当然，尽管建筑物建造目的是为了公用，却也不能没有计划地乱盖乱建。小普林尼在比提尼亚行省担任总督期间，曾经写信给图拉真，询问是否可以允许建菩尔萨浴场。对此，图拉真是这样答复的：

“如果建设所需的费用不会使菩尔萨市的财政负担过重，同时能确保建成后的管理费用，可以同意建造公共浴场。”

之后，关于尼西亚在建的体育中心，小普林尼再次向皇帝征求意见。这个中心附设剧场，也许是因为场馆规模过大，也许是因为偷工减料，尚未建成就有几个地方开始坍塌。他向图拉真讨要主意，对此，图拉真的回答是这样的：

希腊人这个民族真是无话可说，一说到建体育场就忘乎所以。因此体育馆的规模才会越建越大。他们真应该好好学一学如何满足于适合自己的规模。

为了便于理解公共建筑和行省统治密不可分的罗马时代，我想介绍下面这封信。

普林尼致图拉真皇帝

尼科美迪亚居民为了建造引水渠，已经耗资331.8万塞斯特斯，仍尚未完工。非但没有完工，甚至因为停工，侵蚀情况非常严重。为此，不得不又拿出20万塞斯特斯新建了一条引水渠。但是，这条引水渠目前也处于半途而废的状态。虽说这样的结果已造成很大的浪费，但是为了向人们提供生活用水，别无选择地需要继续投入资金。

为此，我亲自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水源没有问题，水质很清澈，水量也很充沛。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水引到市区。我想，只能像最初那样，把拱桥连起来，建一座高架桥。但是，最初建起来的拱桥可以利用的少之又少。因此只有重建。我想，第一次建引水渠时，用的石材可以拿来继续使用。其余部分用砖块就可以了，因为用砖块施工方便而且费用也相对较低。

为了不再重蹈以往的覆辙，我请求派引水渠和建筑方面的专家来协助完成这项工程。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确保在您的统治期间建造起来的公共建筑不会辱没您的崇高威望。

图拉真皇帝回复普林尼

向尼科美迪亚市内引水的必要性我已充分了解。希望你全力以赴完成此项工作。同时，追查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负责人的责任——工程是怎样开始的？为何半途而废？等等。我等待你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报告。

图拉真怀疑工程的发包方和承包人之间有不正当的交易。罗马在共和制和帝制时期，公共建筑的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正之风，是受到严加监管的事情之一。

对行省人民的不正之风，图拉真当然会感到愤怒。但是，有时候他对耿直的部下小普林尼也会发泄不满。对于比提尼亚行省总督提出的派遣引水渠和建筑专家，皇帝是这样回答的：

你那儿不可能没有建筑师。因为帝国内不存在没有这方面专家的行省。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求我从罗马派遣专家？更何况，罗马现在还需要特意从希腊请专家来参与建设。

小普林尼任职的比提尼亚行省位于面向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小亚细

亚西北，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希腊人为数不少。而且，图拉真开展公共建筑事业的左膀右臂阿波罗多洛斯虽然出生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却是地地道道的希腊人。小普林尼的任职地是希腊人居多的帝国东方，所以，图拉真的意思是，你想要建筑工程师，自己在当地找吧。读到图拉真的这些话，真的很想笑，甚至让人有一种情不自禁想偷看这位皇帝真容的冲动。只可惜留下来的肖像上，他的表情无一例外都是沉着稳重的。

可以说，罗马的公共建筑事业没有希腊人就无法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希腊人，只要与罗马人合作，通常都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希腊人之间的合作，结果却往往不甚理想。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从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希腊人就是一个想象力和进取心都超常的民族，但是，在组织能力和效率方面，这个民族总是得不了高分，只能是不及格。既然上帝不同时予人两物，只有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了。

在罗马皇帝的职责中，除了保障边境安全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维护国内政治秩序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说是维护国内政治秩序，实则意味着维护罗马帝国全境的秩序，说极端点，就是维护行省统治的秩序。

行省治理

行省治理的好坏，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要问题。

所谓行省，原本是罗马实施征服后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所谓行省人民就是被征服的人民。如果这些人起来造反，罗马只能派出军团予以镇压。即使没有发展到叛乱的地步，只要出现不稳定的迹象，罗马也会派遣军事力量驻扎在那里。但是为了防备外敌入侵，常驻国界线的

军事力量不能减少。这样一来就只有增加军队的数量。由此增加的费用也只能通过增加以行省税为主的各种税收来补充。如此一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行省人民难免会因为纳税负担加重而产生不满，从而起来反抗。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罗马规定：

第一，不得提高税率。这是基本政策。

第二，通过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努力促进行省的经济发展，以此提高行省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做不是因为罗马人已经认识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人只要不必担心会饿肚子就会追求安稳。过激化行为通常是绝望的产物。既然罗马的税收制度是按收入的百分比来征收，那么只要经济发展活跃，行省税、关税和营业税自然会随之增加。

行省治理的第三条策略是彻底贯彻地方分权制。

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中，有很多人在服役期满退役后留在了当地，加入当地的殖民城市建设。罗马把这些殖民城市和地方自治体变成了行省统治的中心。那些成为罗马地方自治体的城市，本来就是原住民的城市，也就是行省人民的城市。“自治”的方式在意大利本土和城邦的传统影响时间较长的希腊系城市采用的是“选举”的形式，这与以部族酋长统治为传统的高卢所实行的世袭制形式不同。但是，罗马人是务实的民族，他们并不介意行省采用什么样的“自治”方式，只要当地居民接受就可以。

但是，过分纵容地方分权，国家就会解体。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在较长的时期里，实现令人满意的统治，是因为它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如何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课题。罗马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课题。他们把“地方”内政交给各地方自治体，“中央”则对这些地方自治体所属的行省施行统一管理。

行省总督从帝国中央——罗马派遣。行省人民有义务服从总督对全行省的统治。当然，如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很难指望义务会得到很好的执行。于是，罗马给了行省人民监督权。如果他们对总督的统治不满，可以向中央提出指控，条件是指控必须等总督任期结束之后提出。因为，尽管是指控的形式，实质上它也是对行省总督工作的鉴定。这样的鉴定应该贯穿整个任期。其次，审理在首都罗马进行，原、被告双方都必须到庭。再则，行省总督的任期只有一年，行省人民无须忍受太长时间。

作为原告行省人民的代理而担当公诉人之职的是兼任辩护律师的小普林尼和塔西佗这样的元老院议员。因为元老院协助皇帝统治帝国是帝国的国策，那么弄清行省人民不满的原因也是元老院议员的责任。也就是说，这是公务要求。律师费有规定，上限是1万塞斯特斯（相当于一个士兵10年的薪金收入）。所以，因无法承受庞大的律师费而选择忍气吞声的情况并不多见。

这一制度开始执行是在进入帝制时代以后。此时的罗马，基本国策已经由强调对外扩张转为重视对内建设。于是，通过施行仁政确保国内稳定的政策受到重视。甚至连塔西佗，这位曾经把很多皇帝批得一无是处的人，也说与共和制时代相比，进入帝制以后，行省总督的“透明度”更高了。原因之一是皇帝们都很重视对受到指控的行省总督的审判。他们经常亲临现场，聆听审理的整个过程。被告是元老院议员，判决结果由他的同僚——其他的元老院议员——投票决定。皇帝虽然立场中立，但是他亲临现场意味着最高权力者的重视。

站在被告席上的前行省总督当然允许有辩护律师，但是毕竟与从前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和图密善等皇帝都是以积极参与对他们的庭审而闻名。至于提比略，还有一件很出名的事，就是他总会在法庭上提出尖锐的问题，不仅被告本人，甚至连辩护律师也会不知所措。图拉真虽然不会提出过于尖锐的问题，但他也是经常光顾庭审

现场的皇帝之一。

那么，为什么指控前行省总督的状况始终没有停止过呢？

关于罗马帝国内的行省，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它们分成了“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两类，区别在于行省是否有常驻军队。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是皇帝。所以，有他领导下的军团驻屯的行省是皇帝行省，没有军队驻扎的行省是元老院行省。皇帝行省通常都在边界线附近，需要军团常驻。元老院行省因为地处内地，而且行省化历史较长，比较稳定，所以无须部署军事力量。这是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之间的区别。

担任皇帝行省的总督要求有军事方面的才干，所以任命权在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也就是皇帝的手上。

另一方面，担任元老院行省总督，条件是出任过执政官。任命方式是通过元老院议员互选产生。

日语中，这两种人都叫总督。同样，几乎所有行省总督都在元老院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用拉丁语原文的话，首先他们的官名就不一样。皇帝行省的总督叫“Legatus Imperiale”，元老院行省的总督叫“Proconsul”。前者的意思是“皇帝特使”，后者的意思是“代执政官”。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前者来自军队，后者来自政府部门。

皇帝行省总督的任期不止一年，通常都是若干年。任免权都在直属上司皇帝的手中。

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任期是一年，与执政官一样。目的是尽可能地为更多的元老院议员创造机会。超过一年的情况几乎没有。对元老院议员来说，这是个名誉职位，所以即使当选为行省总督，也不领取工资。与皇帝行省必须时刻防备外敌来犯不同，元老院行省的特点就是太平，无

须整天神经紧绷。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就会有人乘机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因为后世的我们知道的这类审判中的被告，几乎无一个例外都是元老院行省的总督。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区分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让皇帝来任命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不就可以了吗？然而，如果你试图这样做，就算是好评如潮的皇帝，估计也会立刻被从他的皇帝宝座上赶下来。因为罗马帝国的真正掌权者不是皇帝，始终都是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所以元老院行省的总督只能由元老院选举产生，监管他们的只能是行省总督的检举制度。

小普林尼是直接参加庭审的人，有时候作为原告的代理，有时候为被告作辩护。从他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我想介绍两例此类庭审。这两例庭审，皇帝都出席并聆听了辩控的全过程。

其中一例是指控西班牙南部贝提卡行省（图拉真出生地的行省）总督库拉希克斯而进行的庭审。

原告不是该行省的几个居民，而是整个行省，指控的理由是受贿。原告揭发库拉希克斯担任总督期间，收受的贿赂足以积累起庞大的财产。贝提卡行省议会议员来到罗马后，请小普林尼担任原告代理，他接受了。作为公诉人，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邀请了另一位同事一起担任原告代理。因为需要搜集证据，仅靠一个人很难做得周全。审判行省总督不只是司法的判决，同时具有政治意义。所以关注审理过程的人，以皇帝为首，非常多。

公诉人小普林尼和他的同事在审理开始前确定了起诉方案。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而不同时指控所有被告，因为贝提卡行省议会指控的除了总督库拉希克斯，还有两位副总督加上库拉希克斯的妻子、女儿、女婿以及贝提卡行省警察长共计7人。小普林斯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其中有库拉希克斯发布的命令文书和库拉希克斯写给他在罗马的女

友们的亲笔信。所以，要证明库拉希克斯有罪非常容易。因为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终于从债务中解脱出来了，我可以一身轻松地回到你们身边了。我已经攒下了400万塞斯特斯。不过我为此出卖了半个贝提卡行省。

不知道是因为知道公诉人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而感到绝望，还是因为已经意识到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庭审开始前，库拉希克斯死了。不清楚是病死还是自杀。但是，被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指控可以撤销，罗马法律允许缺席审判。这个案例除了受贿罪，还适用渎职罪。因为被告中的大多数都是“官员”。

当然被告方也有辩护律师。

此人叫雷斯提托斯，和小普林尼一样也是元老院议员。按照小普林尼的说法，他是一个“在这样的庭审中表现老练、反应灵敏、遇到不可预知的证据或证人时能迅速作出反应的人”。但是，即便是如此优秀的辩护律师，雷斯提托斯好像也放弃了为库拉希克斯作无罪辩护。因此，辩护集中在了两位副总督身上。他让他们说因为是上司的命令，不得不服从。两位副总督没有否认受贿的事实。非但如此，他们还承认自己曾经索贿并得到了贿赂。但是，他们辩称自己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至此，法庭上的争论焦点集中到了对于上司的命令，下属是否不分对错，都有义务服从这个问题上。为了推翻被告方提出来的这个论点，小普林尼和他的同事着实“捏了一把汗”。

为了寻找判例，原告的两位辩护律师找到了军团，也就是军事法庭，并且他们的努力有了回报。因为他们用下面的话辩驳了被告方的辩护律师：

“在罗马，即使是上司的命令，如果这个命令违反法律，军团兵就没有服从的义务。”

指控总督的这场庭审，审判长由执政官担任，陪审员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判决结果如下：

前总督库拉希克斯——有罪。因为被告已死，无法进行体罚，所以只判处没收财产。但是，对他就任总督前和之后的财产要分别处置。就任总督前的财产由其女儿继承，就任总督以后的财产全部归还贝提卡行省；已用于还债的部分向债权人索回，还给贝提卡行省。

这一判决有两点很值得人关注：

第一，弗拉维王朝时代固定下来的、父母之罪不株连子女的判例中，又多了库拉希克斯案一例。

第二，与图密善时代相比较，刑罚轻了很多。图密善受到元老院议员的憎恨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行省总督的不正当行为处罚过于严厉。那么，刑罚变轻，是不是也反映了图拉真不喜欢过于严厉的做法呢？

两位副总督——有罪。理由除了受贿罪，还有一项，就是盲目服从上司的命令。这样的人不适合担任公职，二人被发配到边境地区5年。

贝提卡行省的警察长——有罪。被判处逐出意大利本土2年。也就是说，这2年内，他不得踏进首都罗马甚至意大利本土一步。

库拉希克斯总督的女婿——因证据不充分，被判无罪。他只是随妻子前往贝提卡，没有担任或公或私的工作。

库拉希克斯的妻子和女儿——无罪。与其说是因为证据不充分而被判无罪，不如说是因为犯罪的可能性极小而作出的无罪判决。有关这两个人，原告方的辩护律师小普林尼从一开始就认为无罪，所以他甚至没

有寻找证据。

姑且认为胜诉的小普林尼和他的搭档拿到了辩护费的上限近1万塞斯特斯。在罗马时代，这笔钱规定由委托人分两次付清，第一次是提出委托时，支付6000塞斯特斯，第二次是判决出来后，支付余下的4000塞斯特斯。辩护费包括取证及寻找证人的经费，所以，这样的付款方式也许是考虑到会有败诉的可能吧。

顺便提一句，诬告者会被处以诋毁名誉罪。

图拉真时代，民事审判的陪审员总数有所增加。原来是100人，后增加到了180人。100人的时候，陪审员分4组，每组25个陪审员，分别负责一个庭审。所以有4个庭审同时进行。但是人数增加到180人以后，不知道是负责一个庭审的陪审员人数增加到了45人，还是同时进行的庭审数增加了。总之，增加到180人以后，“百官法庭”这个称呼没有变，尽管它的意思是“100个男人”。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十二个愤怒的男人》，其中陪审员的称呼在罗马时代就已经这样叫了。

第二个案例中，小普林尼担任的是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原告是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比提尼亚行省人民，被告是担任该行省总督的巴苏斯。

指控的理由是巴苏斯在任期间收受赠品，并根据自己的好恶对行省人民区别对待，只重用他怀有好感的人。

对此，被告方辩护团进行了反驳。他们称巴苏斯的统治是公正的，原告方收买部分行省人民起来反对他，这件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作为行使统治的责任人，巴苏斯不仅不应该受到弹劾，反而应该给予嘉奖。

于是，原告方改变了策略。他们把巴苏斯接受的赠品数量和价格作

为问题提了出来。于是，行省总督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礼品成了辩论的焦点。

根据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法律，只要馈赠物的总额不超过1万塞斯特斯就可以接受。但是，在其后图密善执政的15年间，他严格要求行省总督做到公正。受到他的执政思想影响的罗马人认为，不管馈赠物是什么，一概拒绝接受才是值得赞赏的态度。

亲临庭审现场的图拉真说，在担任高地日耳曼行省总督的时候，自己也接受过赠礼。但是，只限生日和萨图努斯节（对罗马人来说是冬季休假）。他还坦白地说事后都归还了。出席庭审的元老院议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决主张不允许收受礼品，一派认为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接受。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好像是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总之，对巴苏斯作出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后来，尤里乌斯·巴苏斯依然坐在元老院议席的位置上。

有意思的是，审判巴苏斯时，站在比提尼亚行省一方，作为原告辩护人的维拉努斯后来任职比提尼亚行省总督，一年后结束任期，刚回到罗马就受到了比提尼亚行省人民的指控。这次指控没有进行庭审，因为行省人民撤诉了。但是，这件事引起了皇帝图拉真的警觉。他想，来自比提尼亚行省人民的指控如此之多，或许原因不在派去那儿的总督身上，而是在行省方面。

但是，比提尼亚是元老院管辖的行省，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得随意干涉。如果皇帝想要运用自己的权力来解决比提尼亚的问题，他最好按照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提出并定下来的做法，也就是设立一个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然而，图拉真这个男人的性格特点是遇到问题从不选择迂回战术，他会果断实施正面突破。再加上所谓的法律只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有些事情是可以变通的。

这种做法也是提比略开的先例。那就是如果有必要，元老院行省可以暂时划归皇帝行省。图拉真很好地利用了皇帝的这一权力。尽管只是暂时的，但是，比提尼亚行省成了皇帝的管辖范围。被派往该行省的总督，任务之一就是弄清该行省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同时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该行省的总督官名由“Proconsul”变成了“Legatus”。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从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发迹的“中继站”，变成了皇帝直属特使的位置。图拉真任命小普林尼担任该行省的总督，一定是在庭审巴苏斯时，看到小普林尼的表现，听到他辩护时的见识，而对他倍加赏识吧。因为，在这之前，小普林尼甚至从未去过比提尼亚，而且，无论是在皇帝行省还是在元老院行省，他都没有担任过总督之职的履历。

就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为后世的我们了解罗马帝国行省统治提供了依据。信件是在小普林尼驻比提尼亚期间，也就是公元111年至113年春季的一年半时间里写的。当时，小普林尼的年龄在50岁左右，皇都图拉真也是50多岁快60岁了。

小普林尼

《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写到过的普林尼（C.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是小普林尼的伯父，也是巨著《博物志》的作者。为了区别于那个普林尼，在这个普林尼的名字前，欧美人用“年轻的”、日本人用“小”来称呼。他是一位人品极好的人，对于同行文人，他从不妒忌，也不带任何偏见。他会由衷地赞美对方的才能。他是罗马社会领导者阶层元老院中的一员，为此，他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他还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积极参与把财产回馈社会的活动。他热心关照自己的熟人，对自己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员备感骄傲。他是一个懂得感受幸福的罗马人，甚至仅仅因为妻子喜欢自己的作品就会感到幸福不已。塔西佗与他不同。作为同时代人，塔西佗总是在指责自己国家的缺点，为

这些缺点悲愤激昂，结果成了一名悲观主义者。性格如此不同的这两个人，不仅作为文友相处融洽，而且在辩护律师的工作中，两人也经常合作。这些事实让人觉得很有些不可思议。也许既有悲观主义者又有乐观主义者，才构成了这个人类社会的全貌吧。

塔西佗比小普林尼年长五六岁。小普林尼写给塔西佗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 我知道您绝对不会炫耀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在欣赏您的作品时，最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甚于其他任何时候。
>
> 不知道后世的人们是否会记得我们。虽然我认为我们多少有一些被记住的价值。我不会说，这是由于我们的天分，因为这样说显得过于傲慢。我只想说，这是源于我们的勤勉，源于我们的热忱，源于我们对名誉的尊重。
>
> 人生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显赫的声誉。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我想至少还值得从默默无闻和被忘却中得到拯救。

看到这样的话，我不由自主地起了同情心。于是，我一边嘟哝着说没关系，我会引用你的东西，一边继续阅读他的作品。同时我也在猜测，塔西佗读到这封信时是怎么想的。我想，塔西佗一定不会写回信。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与谦虚的小普林尼不同，他坚信自己有历史学家的天分，坚信能为后世留下辉煌名声的是自己。

塔西佗也属于元老院阶级，因此，他应该也是一个家境殷实的人，拥有符合元老院阶级身份的资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他曾经捐赠过图书馆或者为贫困家庭孩子的育英基金提供过资助。当然，他也没有帮助过自己的文友，更别说向皇帝举荐什么人。关照熟人之类的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既不炫耀自己的作品，也从不夸奖朋友的作品。

因此，对于这两人的作品，后世给出的评价是，小普林尼的作品是“幸福的罗马行政官文人的墨宝”，相反，称塔西佗的著作是“罗马帝政时期最优秀历史学家的杰作”。

因为最适合做朋友的小普林尼缺少创作成熟作品必不可少的、也可以说是恶意的“毒”。因此，此人留下来的作品只是一些写给朋友知己的书简以及与图拉真之间的往来信件，外加当选候补执政官时的演讲。除此之外，好像也写过一些东西，只是，水平仅限于得到妻子的称赞。

我想请读者朋友们再看一遍他写给塔西佗的信，就从“不知道后世的人们”开始读到最后。在阅读的过程中，把其中的“我们”换成“罗马人”：

> 不知道后世的人们是否会记得罗马人。虽然我认为罗马人多少有一些被记住的价值。我不会说，这是由于罗马人的天分，因为这样说显得过于傲慢。我只想说，这是源于罗马人的勤勉，源于罗马人的热忱，源于罗马人对名誉的尊重。
>
> 人生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显赫的声誉。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我想至少还值得从默默无闻和被忘却中得到拯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段文字放到某一卷的卷首。

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是元老院议员，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在他们给以恶评的图密善皇帝统治时代，屡次担任过公职。年长的塔西佗在涅尔瓦皇帝时代当选过候补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当选过候补执政官。只是，做到行省总督的只有小普林尼一个人，因为塔西佗尚未为自己的公职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就结束了他的人生，虽然小普林尼被派往比提尼亚行省的时候，塔西佗尚健在。还有一点，他

们俩都没有孩子，更别说有3个孩子了。所以他们都不是《有孩子的元老院议员优待法》这一条法律的受益者。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统治阶层下一代子女人数日渐减少。该法律规定，官职选举中，优先考虑有3个以上孩子的人选。此外，每个官职都有若干年的停职时间，但是，根据该法律，有3个孩子的人不适用这一规定。

当然，这不是绝对条件。即使一个孩子也没有，皇帝也有权让他成为不受这条法律约束的人。图拉真对小普林尼就使用了这一权力。

塔西佗应该是罗马帝制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相信同时代的人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能力的作家并不代表他一定是有能力的行政官，而且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以统治公正而闻名的图拉真时代。在对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布里斯库的庭审中，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合作进行了辩护，而坐在审判长位置上的正是图拉真。那么，图拉真起用小普林尼难道只是看中了他对比提尼亚的了解吗？还是像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所评价的那样，这位务实的皇帝要的不是一位能够写文采漂亮的报告的特使，而是要一位能够忠实履行职责的特使呢？

不管怎样，假如塔西佗也担任了行省总督，情形又会怎样呢？这一设想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备感好奇，欲罢不能。

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元老院议员必须担任的国家官职，包括财务检察官、法务官和执政官，其任职地都是首都罗马。但是，行省总督不同。代执政官虽然是元老院议员仕途的终点，但是不能自由选择任职地。任职地要通过抽签决定。这个官职任期只有一年，但是在开展日常政务和司法活动的同时，必须弄清该行省存在的问题，解决总督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超出总督职权范围的问题则向元老院汇报，并请求元老院对解决方案进行立法，就好像对铺设完成的罗马大道用心进行维护维修，使其继续发挥作用一样。

皇帝的工作与此相同，只是范围更大，遍及帝国全境。如果塔西佗担任过行省总督的话，那么，他应该会更深刻地理解皇帝的职责之严肃和重要，并因此让评论家的身份得到升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塔西佗或许就会从“罗马帝制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跃成为“贯穿共和制和帝制时代的罗马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了。他的写作能力，堪与尤里乌斯·恺撒媲美，他的批判精神是创作杰出历史著作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不是唯一条件。

被后世评价为“幸福的罗马行政官文人墨宝”的小普林尼的著作中，称得上是白眉之作的《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总共由124封信组成，其中73封是普林尼写的信，51封是图拉真的回信。这部书已经有了日文版，就是国原吉之助教授翻译的《普林尼书信集》，收录于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只是，这部译作不是全文翻译，而是节译。前面介绍的小普林尼写给塔西佗的信就没有收录进去。小普林尼写的73封信中只收录了32封，图拉真写的51封回信中也只收录了12封。但是，既然日语版已经有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我的感想。

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就算小普林尼的信确实出自他自己亲笔所写，那么，皇帝图拉真的信也是亲自回复的吗？

事实上，皇帝官邸有一个部门，直译叫“书信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小普林尼写给图拉真的信首先由该部门的官员拆看，然后向皇帝汇报。皇帝对此作出口头答复，再由“书信科”官员写成文字，送到比提尼亚。

专门研究了这些信件的学者对拉丁文原文进行逐字分解后得出的结论令人咋舌：几乎所有回信都是图拉真亲自回复，而绝非出自其他官员之手。因为连专业水平不高的我也知道，无论是口述还是亲笔书写，这些信一定出自敢于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人。

那么，图拉真皇帝为什么会如此诚恳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小普林尼

呢？

前面已经提到，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小普林尼担任总督的比提尼亚行省从元老院行省变成了皇帝行省。鉴于这一特殊情况，负责解决该行省问题的责任人此时是皇帝图拉真。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情况。

比提尼亚一带在米特拉达梯国王时代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本都王国（《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有详细描述），成为罗马行省以后依然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经济发达、城市居多、人口较为稠密的地方。以行省首府尼科美迪亚为首，这里有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再后来的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拜占庭、尼西亚、菩尔萨等城市，还有黑海南岸的赫拉克利亚和锡诺普等等。另外，面向黑海以及东部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地理位置，也使这里成了一个战略要地。把小普林尼派到此处的时候，图拉真心中已经悄悄萌发了远征帕提亚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几年后变成了现实。帕提亚王国与亚美尼亚王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可以轻易分割开的。远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后方的稳定。比提尼亚行省就属于远征帕提亚的大后方之一，而且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也是帝国极为重要的地方之一。

当然，皇帝没有把自己的这一想法透露给他的特命全权总督。因此，小普林尼天真地相信图拉真要求重建财政、维护社会秩序都是为了比提尼亚行省的发展，因而干劲十足。

小普林尼去行省各城市了解了财政问题的原因后，写信给皇帝，说向罗马派遣表敬使节团和对米西亚行省总督进行表敬访问，两项所需的1.2万塞斯特斯的支出毫无必要。比提尼亚行省没有军队驻守，米西亚行省兼顾保护比提尼亚的安全任务。他说，自己只是给米西亚行省总督送去了表敬文书。他询问这样做是否妥当。图拉真回信说：“你做得很好，我亲爱的塞古都斯。”

尽管重建财政是当务之急，却不能削减岁出。就像前面讲到的，为了居民用水，需要建设引水渠。当然，总督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弄清之前工程发包时的不正当嫌疑，并追查相关责任人。此外，同样是前面提到过的体育中心的建设。皇帝已经下令，体育中心的规模只要符合该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即可，所以需要缩小规模后重新开工。

对于小普林尼提出的为了重建财政，是否有必要强制下调利息这个问题，皇帝表示反对。他回答说："我充分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但是由国家强制下调利息，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正精神。"对"私"强制下调利息等于强迫"私"向"公"提供资金，大概他是不希望因此出现行省人民的骚乱。

至于图拉真为什么要如此执著于重建比提尼亚的财政，原因是当财政出现漏洞的时候，获利者一定只有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出现动荡。相反，施行仁政归根结底就是要建设本分人不吃亏的社会。

维护社会稳定的障碍是一小部分人占据权力，组织封闭，排除异己。小普林尼提出是否可以允许消防员成立工会。对此图拉真回答：消防员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不宜成立工会组织。他讨厌政治结社。

我非常佩服这两人之间的通信有如此之多。小普林尼因为写信对象只有一个人，所以每月平均写4封信可以理解。但是，图拉真写信的对象绝不止小普林尼一个人。仅仅在皇帝行省任职的总督就有13人之多，还要加上各军团基地从负责人即军团长，到各级长官、财务负责人等，少说也有10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百姓的请愿书等等，需要他回复的信件很多。就好像公司董事长创建主页后，需要答复所有进入主页的电子邮件一样。我想就算有人求我，我也不想当这个罗马皇帝。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这一切却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小普林尼写给

图拉真的信中，甚至写到了前往比提尼亚的旅行路线，尽管初看这件事情好像跟比提尼亚行省总督并无关系。作为皇帝的代理，他甚至把自己进入比提尼亚时，比提尼亚行省人民如何迎接自己的经过也写信向皇帝作了汇报。

“勤勉”是同时代人献给图拉真皇帝的颂词之一。像提比略皇帝，尽管与图拉真一样，创建了“主页”，但是，对于进入主页的邮件，他一概不作答复。而图拉真皇帝却认真地一一作答。所以，前者得到的是很差的评价，后者得到的则是极高的好评。特别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们对以这两位皇帝为代表的类型的评价倾向于哪一方，与他们担任的职务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随时发送“电子邮件”，即报告。

那么，对于以地中海为中心，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皇帝们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要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情报必不可少。为了使报告和指令的上传下达顺畅、安全，他们很早就发展了国营的邮政制度。由此可见，他们早就了解情报传递的重要性。以公务为目的的国营邮政系统也服务于普通百姓。在这一点上，它与出于军事目的而遍布罗马帝国的罗马大道一样。罗马的大道也为民间的物资交流所用。

至于罗马为政者如何收集信息，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一、来自在各行省担任公职的人的汇报。

二、来自行省人民的消息。

第一种情况，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小普林尼写给图拉真的信。

第二种情况又可以分为四类：

（1）行省议会代表一年一度前往首都罗马作表敬访问。因为是表敬访问，所以与元老院和皇帝会谈无疑是行程内容之一。

（2）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院外活动。按罗马时代的说法，则是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这种活动在（1）的表敬访问制度尚未固定下来的共和制时代尤为常见。格拉古兄弟的被保护人在北非，原因可追究到其祖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庞培的被保护人在他本人统治的中近东。尤里乌斯·恺撒作为全高卢的保护人而闻名。总之，征服一个地方后，成为这个地方的保护人，就是罗马的风格。

进入帝制时代以后，这样的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因为不再是征服的时代，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有名的利益代表已经消失。但是，因为还有（1）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尽管院外活动的重要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只要地方和中央还有联系，无疑它还是有用的。帝制时代的保护人中，有与行省人民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在行省任职的总督，有与行省经济往来密切的人等等，通过这些人的介绍，使得正在作表敬访问的行省代表有了参加皇帝的宴请，也就是私下接触皇帝的可能性。

（3）与（1）一样，是行省通过正规途径，直接向皇帝请愿的方法。请愿好像以文书的形式居多。罗马帝国为此还在官邸内特设了一个接收请愿书的部门叫“文书科”。

（4）是最激进的信息收集方法，同时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接触方法，即审判行省总督。因为是审判，所以有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辩论。通过辩论，不仅总督统治的问题，就连该行省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会一起弄清楚。进行庭审的时候，被告、公诉人、被告方辩护律师、陪审员都是元老院议员。这种时候，皇帝只要在首都，一定亲临庭审现场。甚至有的皇帝为了出席庭审，推迟前往别墅的时间。

庭审行省总督的制度是为反映行省呼声之目的而制定的，是了解行省现状的绝好机会。

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责任人，皇帝通过这些方法收集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帝国统治的政治策略，作出判断。对于当场可以解决的问

题，他会马上下达指令。如果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来解决的问题，他会交给元老院，请他们制定相关的法律后实施。就连从不回复“电子邮件”的提比略皇帝，据说他的日常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罗马皇帝们即使不遭遇暗杀，其统治时间也只有20年左右。也许过于繁重的工作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

图拉真统治期间，皇帝和元老院相处非常融洽。这是罗马时代和后世的人们给出的一致评价。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图拉真作为一位领袖很会关心他人。

小普林尼曾经请求皇帝给予自己的朋友、熟人特别关照，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他曾经请求皇帝授予给自己治过病的、出身于埃及的希腊人医生以罗马公民权；希望皇帝同意朋友苏维托尼乌斯（《罗马皇帝传》的作者）享受“有3个孩子的特权”。也许小普林尼尽管人格高尚，也一心想着要好好利用皇帝这个关系。对于小普林尼的这些要求，图拉真既没有置之不理，也没有给他难堪，而是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当然，不是所有要求他都满足。毕竟图拉真虽然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终究他还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与他相比，作为既得权力阶层，元老院比皇帝的保守倾向强烈得多。我想，皇帝能与这样的元老院保持良好关系，也有部分原因源自他们相似的思想基础。

话说回来，帝制时代的小普林尼也好，共和制时代的西塞罗也好，阅读他们的书信，感觉都跟走关系有关，让人以为罗马社会似乎是靠人际关系来维系的。但是，关系到选拔人才，作为一个制度难道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罗马人没有中国的科举制那样的制度。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的罗得岛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可以算做是当时的大学。但是，在这些地方学习过的人仅靠这一点，是不可能进入帝国中枢的。以培养精英为目的的机构只有元老院。但是，有一个当议员的父亲，也不意味着就可以自动进入元老院。要进入元老院，条件是当选过财务检察官或护民官，并顺

利结束任期。皇帝有推荐权，所以经过军团基层锻炼的人也有可能进入元老院。

罗马人在人才选拔方面注重关系，我认为是他们务实主义性格的一种体现。所谓关系，就是你推荐一个人就要为你的推荐负责。如果推荐者人格高尚又有才能，那么他推荐的人同样人品好又有才能的几率也会高。当然，风险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通过客观的考试选拔人才难道就能完全规避风险，就不会出现无能或品行低劣的行政官吗？

共和制时代，只要是西塞罗推荐的年轻人，尤里乌斯·恺撒一概收为自己的部下，因为他赏识西塞罗的见识。图拉真对小普林尼提出的请求基本上也给以满足，同样因为他认可小普林尼的诚实和一心为公的精神。选拔人才是一场竞赛，参赛者不只是录用者和被录用者两个人，还要加上推荐者。这些参赛者都要承担责任，我想这就是罗马人经常采用靠关系录用人才的理由。

不管是认真听取他人建议的结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所做的事被人喜欢总是好的。图密善皇帝做一件事的时候，元老院经常怨声载道。而图拉真做同样的事情，别说反对，就连元老院议员自己也会去做。他们既没有抱怨，也没有不满。想象一下确实有点意思。

小普林尼写给皇帝的信，常常以“主君”（Domine）开头。所谓主君，意思是“统治自己的人”，在基督教中就是“神”的意思，因此通常翻译成“主啊”。但是，在罗马，就是“主君”一个意思。

讽刺诗诗人马提雅尔在他的诗中称皇帝是“主君”，对此图密善皇帝置之不理，让元老院非常生气。塔西佗还因此断定图密善是一位专制君主，对皇帝的称呼也改成了“恺撒”或是“第一公民”。此后仅仅过了十几年，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又称呼皇帝为“主君”，图拉真坦然接受了。为此，就连不指责他人缺点就难受的塔西佗也没有批评他。甚至图拉真在亲生父亲和姐姐死后，神化他们，为他们铸造了纪念银币这件事情，也

没有人提出异议。提比略对“主君”这一称呼很敏感，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他都表现得很神经质，说：“主君是我家用人对我的称呼，大将军是士兵对我的称呼，第一公民是公民对我的称呼。”他这样解释完全无助于人们对他产生好感。人真是难以捉摸啊！

不管怎样，图拉真是元老院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位皇帝。元老院还给了图拉真一个称号，叫“Optimus Princeps”。之前没有一个皇帝得到过这样的称号，直译就是“最高第一公民”，意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图拉真最初推辞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件事情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罗马人心目中的理想皇帝是怎样的。

被罗马人看做是理想皇帝的这位皇帝，对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待的呢？还有，在法治国家罗马帝国担任过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直接参与过与法律相关工作的小普林尼对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的呢？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中，在后世最著名的就是关于二人如何对待基督教徒的部分，我想在这里作全文介绍。顺便提一句，行省总督享有对行省人民的司法权。

普林尼致皇帝图拉真

主君啊，当我难以作出判断的时候，我总是询问您的意见。因为您会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引导迷茫中的我，为无知的我指明前进的方向。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接触过对基督教徒的审判案例。因此我不知道这种审判该如何进行。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可以起诉？反国家罪或无信仰者的刑罚适用于什么样的罪状？被指控的当事人年龄能否作为减轻刑罚的依据？对于成年人和25岁以下的年轻人，尽管都是基督教徒，是否需要像其他刑罚一样区别对待？为自己是基督教徒而表现出悔意，并愿意放弃这一信仰的人，是否可以赦免他的罪？或者，不管他现在多后悔，只要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就要给予处罚？还有，对于从未做过一件坏事的人，仅仅因为他是这个邪恶组

织的一员，就应该给予处罚吗？

对于被指控为基督教徒的人，目前我采用以下一些做法。

首先，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们，你们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吗？如果回答说“是”，我让他们想清楚，并告诉他们如果说谎，我只能采取刑讯手段。因为我认为，皈依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没有多大关系，仅执迷不悟这一条就可以定罪。

到最后依然坚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中，也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这些人有权向皇帝上诉，所以我把他们押送去罗马了。然而，不知道是否受我这一做法的影响，告发基督教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情形也起了变化。

首先罗列有很多人名的匿名告发增多，为此我改变了我的做法。

第一，遭到告发的人，如果表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或者在我第一次审讯的时候向诸神祈求，并对您的肖像表示敬意的人，以及诅咒基督教的人，一律无罪释放。为此，我叫人在法庭上准备了您的肖像和供奉肖像所需的香料和葡萄酒。

第二，即使是被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人，虽然一开始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但是后来翻供否认自己是基督教的人，或者曾经是基督教徒现在已经不是的人，不管这个曾经是3年还是20年，一律判处无罪。当然，判他们无罪释放的条件是他们要敬畏我们的诸神，诅咒基督教的神。

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基督教徒的罪行或过失是这样的。他们在规定的那天（大概是星期天）黎明集合，齐唱赞颂基督的歌，唱歌结束后，庄严宣誓。宣誓的内容不过是不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不盗、不抢、不通奸，严守承诺，发誓受托保管的东西必须按委托人的要求随时归还等等。这个仪式结束后，大家回家一起用餐，吃些面包，喝点葡萄酒。很普通也没有恶意。当然，根据您的意思，凡是与我宣布过的秘密社团相勾结的集会我是禁止的。

被告如果是奴隶的话，我想有必要在审讯时进行拷问。然而，

在审讯两个他们称之为副主祭的女奴隶时，并没有发现邪恶而疯狂的迷信以外的东西。

因此，在了解您的想法之前，我决定推迟一切与基督教相关的审判。因为我认为，关于裁决的尺度，我应该征询皇帝的意见。现在的情形是，第一，被告发的人很多；第二，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性别，这样的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

受这种迷信蛊惑的除了城市，也已经殃及地方。但是我感觉可以防止这种蛊惑的继续蔓延。因为一度被废弃的神殿和寺庙因前去敬神的人的增加而变得热闹起来了。还有，被宣判无罪的祭祀活动也已经出现，尽管时间还不算太长。把用做供品的家禽肉拿来售卖的人在减少，这一情况现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者的人之中，我想大多数只是因为新鲜而被骗入教的。因此我认为，这类人只要有悔改的表现，并决心脱离基督教的话，应该予以免罪。

图拉真回复普林尼

亲爱的塞古都斯，你根据法律处置被告发的基督教徒的做法非常好。因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用规范帝国全域的标准来处理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基督教最初出现在罗马帝国的东方，公元2世纪的这个时候尚未波及帝国西方。图拉真时代殉教的主教有两个人：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另一个是安条克的主教。）

搜捕基督教徒，借口有罪强行追查这样的做法不可取。当然，受到正式检举，并招供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对于弃教者应该予以关心，但是，他们必须明确表示敬畏我们的诸神，明确表示自己的悔意。只要这些想法明确，不管以往怎样，都可以免罪。

匿名告发没有任何法律价值。接受这样的告发，违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在这里，我想顺便介绍一下《圣经·使徒行传》中圣保罗对信徒们

的教诲：

> 你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张扬，互不说坏话、发泄不满，也不起争端。因为神的孩子都是完美无缺的，是纯洁的。同时也为了不给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授以口实。
>
> 尽管生活在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里，你们必须恪守神的教诲，就好比黑夜里双手捧着一盏明灯。

虽说同为一神教，但是，与屡屡反对罗马的犹太教徒不同，基督教徒以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为分水岭，与犹太教划清界限，并进一步加强了暗中活动的做法。但是，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对立，与其说是宗教的对立，不如说是源自文明观不同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对立，这种对立虽发展缓慢却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图拉真的私生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没有写图拉真皇帝的个人生活。那是因为实在没有可写的东西。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去看，罗马皇帝无疑是邪恶、堕落的罗马社会的象征。然而，在图拉真身上，你找不出一丝一毫跟邪恶或堕落有关的东西。很多人之所以能出人头地，是因为他们身后有一群亲人或亲戚为他们铺好了路，让他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诸多好处。但是，像这样能帮得上忙的人，图拉真一个都没有。

图拉真没有孩子。他有一个比他年长5岁的姐姐叫马尔恰娜，姐弟俩关系非常好。弟弟当上皇帝后，姐姐也住进了首都罗马的皇宫。但是，她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份，生活简朴，不好出风头，非常满足于管理家中事务。姐姐唯一担心的是弟弟的健康。但是，图拉真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从来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也无须她过多操心。姐

姐死后，弟弟神化了她，把她加入了诸神的行列里。对此，罗马人全然不介意。因为就连被罗马打败的失败者的诸神，他们也会授予“罗马公民权”，这才有了30万之众的神。基督教徒有一个说法曾经流行一时，说罗马有意把基督教的神也纳入诸神的行列中，但是因为基督教徒的拒绝最终没有成功。对罗马这样的提议，基督教徒自然会拒绝。因为假如接受这个提议，基督教就不是一神教了。

马尔恰娜有一个女儿叫马提蒂亚，图拉真非常喜欢这个比自己小15岁的外甥女。这个女人的性格与她母亲相似，同样无法为编年史的作者提供写作素材。

在这方面，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也一样。可以说，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妻。只要看她与同住在皇宫中的大姑子相处融洽的关系上就可以略见一斑。马尔恰娜和马提蒂亚出生于行省西班牙，在小镇意大利卡长大，普洛蒂娜则出生于南部法国行省的主要城市之一尼姆，在罗马长大。她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人，甚至可以聊有关希腊哲学的话题。其修养之高，据说超过她的丈夫图拉真。

但是，这个女人同样不喜欢抛头露面。图拉真没有封她“奥古斯塔”（Augusta，意思相当于“皇后”），对此，她丝毫没有怨言。有意思的是，图拉真没有封妻子“皇后”的称号，却在姐姐马尔恰娜死后，给了她“奥古斯塔”的封号。

这三位女性都是皇帝身边的人，自然她们的地位不容忽视。既然她们如此质朴，罗马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也不敢张扬。因此，图密善时代的夫人们那种盘得高高的、夸张的发型在图拉真时代已难得一见。

图拉真对自己的姐姐、姐夫、外甥女、外甥女婿以及妻子的亲属都没有给予特殊的照顾。他把外甥女的女儿萨宾娜嫁给哈德良，也许与自己是哈德良的监护人身份有关。但是，哈德良的升迁跟他没有关系，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说，对待别人的事，图拉真总是尽可能地给以

满足。但是，对自己家的事情，却从不徇私，非常光明磊落。

普洛蒂娜

马尔恰娜

至于图拉真的缺点，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能指出的其中一条据说是饮酒。其实他和普通罗马人一样，每天当星星还在天空闪烁的时候起床，结束一天繁忙的公务后入浴、按摩，然后用晚餐，这时他会喝一点酒。当然，并不是说他离不开葡萄酒。只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习惯用凉水或温水兑酒喝，而他从不兑水，这才是他被说成酗酒的原因。

图拉真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让漂亮的年轻人陪侍他共进晚餐。

那么，他的这一嗜好是否带有邪恶、自我堕落的倾向呢？有人认为，望着被夕阳染得通红的天际，听着树叶摇曳发出的声响，结束一天的生活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小普林尼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图拉真来说，他最大的享受来自美少年们。无论是希腊时代的作品，还是罗马时代的上等仿制品，年轻人的雕像之美总是令人叹为观止。图拉真的这种感情不是同性间的爱，他只是欣赏未成年少年纯真的美，就像欣赏风景一样。证据是图拉真的“风景”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外界所传或议论。

私生活健康，缺点也只是这些无伤大雅的事情，让传记作家实在难以下笔。正因为如此，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没有好运到可以有他的传记留下来。

被誉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于皇帝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称呼，图拉真一度拒绝接受，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而是因为他想在自己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时候再接受。对于图拉真来说，他已经取得了达契亚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帝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版图。但是他认为要配得上这个称号，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完成之前的诸位皇帝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

帕提亚问题

罗马与帕提亚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希腊罗马文明与波斯文明的关系。亚历山大大帝消灭了波斯帝国。但是，在大帝死后出现的希腊诸国中，希腊人能掌控的地方，即便是旧波斯领地内，也只成功保住了其临近地中海的西边部分。而把这些希腊人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正是罗马人。因此，罗马与帕提亚的正式接触始于庞培称霸希腊诸国。其后的经过简要介绍如下。

公元前63年，庞培消灭了希腊诸国之一的叙利亚塞琉古王朝，为罗马称霸中近东一带奠定了基础。希腊诸国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埃及已经成为罗马事实上的附属国。（《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有详细描述。）

庞培、恺撒和克拉苏结成的“三头同盟”中，庞培的名气如日中天，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屡屡建功立业。受到这两人成就的刺激，公元前54年克拉苏决定远征东方，征服帕提亚。遗憾的是，一年后惨遭失败。总司令官克拉苏以下的将官，除了率领500名骑兵逃脱的卡西乌斯，其余全体阵亡。4万人的远征军，最终逃到叙利亚安条克的不足1万人，其中包括那500名骑兵。2万人阵亡，被俘人数多达1万人。这些俘虏虽然躲过了被杀的命运，却被送到了帕提亚王国最东北边境的梅尔夫，终生在那里服役。这种遭遇无异于被发配到边疆。[《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有详细描述。]

公元前44年，击败庞培拉开内战序幕的恺撒准备远征帕提亚。远征的目的之一是为9年前的战败报仇雪耻。其次，通过这次远征，让中东各国重新认识罗马的实力，并救出1万名罗马俘虏。然而，就在出征前的3月15日，恺撒遭到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派的人暗杀。[《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中有详细描述。]

公元前36年，为了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抗衡，试图向东方扩张势力的安东尼，与他的情人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扩张领土的野心一拍即合，开始了第二次远征帕提亚。但是，这次远征再次以失败告终。在8个月的远征中，11万大军损失了2万人。尽管这次失败不是毁灭性的，却也改变不了失败的事实。一心想成为恺撒继承人的安东尼，野心落空，还给后人留下一个未解决的隐患。[《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有详细描述。]

公元前21年，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前的屋大维）认为不解决帕提亚问题，就无法实现帝国东方的稳定。于是，在帝国建立还不到10年

的情况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而不依靠军事手段解决。当然，他所谓的外交手段并非单纯的通过对话。帕提亚与亚美尼亚接壤，他首先发兵攻打亚美尼亚，并与亚美尼亚订立了同盟条约。然后拿着这份同盟条约，与帕提亚进行谈判，并最终签订了友好条约。

条约的内容是这样的：帕提亚承认亚美尼亚归罗马统治；幼发拉底河为罗马和帕提亚各自势力范围的界线，双方互不侵犯；允许并尊重两国国民之间的通商自由。帕提亚方面接受了上述所有条件。谈判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进行，当时21岁的提比略代表奥古斯都参加谈判并签署了条约。

帕提亚方面归还了在33年前打败克拉苏军队和15年前战胜安东尼军队时抢走的所有罗马军团旗帜——银鹫旗，并且归还了帕提亚士兵从阵亡的罗马士兵身上剥下来的、作为战利品保存起来的罗马将士的盔甲和武器，但是并没有归还俘虏。因为33年前被送到梅尔夫的罗马士兵已经全部死亡。（《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有详细描述。）

此后，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维持了70余年的和平时期。

帕提亚王国是典型的东方专制国家，为了继承王位，内讧不断。每当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时，他们就会对外采取强硬措施。还有，与自己同属波斯文明的亚美尼亚竟臣服于异域文明的罗马帝国，这对帕提亚人来说也是难以释怀的事情。

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最终被打破，是在进入尼禄皇帝时代以后。这次挑起战争的是帕提亚。罗马派往前线迎战的是名将科尔布罗。

尼禄任命科尔布罗指挥大军，甚至给了他一份空白委任状，全权委托他解决帕提亚问题。科尔布罗是一位武将，但是他时刻都在关注中东的情势。所以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他还是认为从国家形态到生活习惯，把亚美尼亚长期置于罗马统治之下是不现实的，因为与罗马

相比，帕提亚距离亚美尼亚要近得多。因此，科尔布罗提出了一个方案，帕提亚国王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就是亚美尼亚国王的候选人由帕提亚国王推荐，罗马皇帝主持亚美尼亚国王的加冕仪式。皇帝尼禄也同意了这一有名无实的解决方案。亚美尼亚国王来到罗马接受由尼禄皇帝主持的加冕仪式是在公元65年。自此，和平再次降临到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并且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次问题得以解决，虽说是科尔布罗做了工作，但是也显示了尼禄在对外政策上的政治敏感性着实了得。（《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有详细描述。）

公元68年至70年，罗马发生内战，后来又有犹太叛乱。但是，帕提亚不仅没有乘其之危，甚至还主动提出向罗马派遣援军。由此可见，罗马和帕提亚之间，以这种形式相处，多么受帕提亚方面的欢迎了。（《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有详细描述。）

图拉真接手的正是这种状态下的帕提亚问题。依靠军事力量远征帕提亚，似乎并无必要。然而，长期和平的状态会麻痹当事者。事实上，来自帕提亚的挑衅行为并非完全没有。

对罗马人来说，帕提亚问题的导火索常常是亚美尼亚。帕提亚把亚美尼亚列入了本国统治势力范围的一个国家，在帕提亚宫廷之上，地位仅次于帕提亚国王的就是亚美尼亚国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尼禄的和平条约才得以长期维持。帕提亚国王是专制君主，专制君主最害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患，即可能威胁到自己王位的人。只有让危险人物成为名誉、权力以及财富均居帕提亚第二的亚美尼亚国王，并让他远离自己，帕提亚国王的位置才能安然无恙。

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由衷敬佩名将科尔布罗。他到访罗马后，又把尼禄当兄长般看待。尼禄也没有亏待他的殷勤，派出工程师团队，帮助其重建了亚美尼亚首都。为了表示感谢，梯里达底甚至把首都改名为尼禄市。可以看出，出身帕提亚王室的这位国王有多么强烈的亲罗马倾向了。梯里达底去世的时间不清楚，据说他比公元37年出生的尼禄小几

岁。梯里达底寿命较长，在亚美尼亚国王位置上的时间也不短。如果他比尼禄小三四岁的话，可以推断，图拉真即位的公元98年，他尚在世。那个时候，帕提亚国王已经从沃洛吉斯换成了帕科鲁。梯里达底一死，帕科鲁国王就把自己的儿子阿克西达瑞斯扶上了亚美尼亚国王的位置。此时，因为与尼禄之间的条约依然有效，所以叙利亚行省总督代替皇帝，为亚美尼亚新国王举行了加冕仪式。

公元110年帕科鲁去世，继承帕提亚国王王位的是帕科鲁的弟弟奥斯罗埃斯。即位后不到两年，这位国王就以无能为由，要推翻侄子阿克西达瑞斯，让阿克西达瑞斯的弟弟帕尔塔马西里斯当亚美尼亚国王。围绕亚美尼亚的王位，亲兄弟之间分成两派，引发了争端。新国王在帕提亚军队的帮助下，向亚美尼亚发起进攻。现任国王于是向罗马皇帝发出了求助。

罗马和亚美尼亚是同盟关系。对于同盟一方提出的求助，另一方给予回应是同盟者的义务。同时，对罗马方面来说，未征求罗马皇帝的意见，擅自更换亚美尼亚国王，是违反尼禄与帕提亚之间和平条约的行为。无疑，帕提亚国王的做法让罗马皇帝颜面扫地。但是，帕提亚没有直接攻打罗马。另一方面，面对弟弟的进攻，亚美尼亚国王在国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如果要派遣援军，那么只要是驻扎在与亚美尼亚接壤的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就应该足够了。

但是，图拉真认为此时正是从根本上解决帕提亚问题的绝好机会。他所谓的从根本上解决，就是通过军事力量，彻底铲除这个隐患。图拉真是一位遇到阻碍绝不迂回绕行，而是果断采取正面击破的人。45岁当上罗马皇帝的图拉真此时即将迎来自己的60岁。

远征

公元113年10月27日，带着市民和元老院对自己马到成功的期待，图拉真皇帝离开了罗马。同行的将军与达契亚战争的时候几乎一样，只少了一个人。图拉真率领比自己年轻一代的这些武将，准备在达契亚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再次赢得胜利。然而，远征帕提亚的参谋中少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人。

少的这个人正是李锡尼·苏拉，他是图拉真的同乡，与图拉真年龄相仿，任职地也几乎相同，因此他既是图拉真的好友，又是图拉真的第一亲信。遗憾的是，达契亚战争结束不久，他就去世了。公元107年以后，敢于对图拉真犯颜直谏的人再也没有了。好在图拉真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强，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弥补了这一缺憾。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如果苏拉还活着，很可能图拉真不会远征帕提亚。图拉真不缺少追随他的、有能力的武将。但是，追随偶像的人，其想法往往比自己的偶像还要过激。更何况，图拉真并不完全信任绝对忠诚的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这又是成功者身上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

参加这次远征的将军与达契亚战争的时候是同一批人。但是，在他们指挥下作战的军团，由于战场从多瑙河移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自然不是之前的那些军团了。当然，军团不需要新编，因为卡帕多西亚有2个军团，叙利亚有3个军团，犹太有1个军团，罗马时代称为阿拉伯的地方现在叫约旦，那里有1个军团。仅这些就已经7个军团了。如果再调来埃及的2个军团，光是主力部队就达9个军团，共计5.4万人。除了主力部队，罗马军队通常还有辅助部队的士兵以及有特殊技能的士兵参加战斗。所以，投入帕提亚远征的兵力合计达10万人之众。前线基地是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罗马帝国虽然在较长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状态，但是在防卫方面从不松懈，始终处于临战的状态。从战略要地的设施到军粮补给以及为确保这一切而完善的帝国动脉——道路网，所有的一切都是完善的。从黑海到红海的帝国防线建设已经完成并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发掘出来的、每隔1罗马里就有一块的路标上，显示的建设年份都是在帕提亚战争之前。

也就是说，只要图拉真有此想法，任何时候都可以越过黑海——红海防线，向东攻打帕提亚。

秋日阳光下，图拉真离开了罗马。沿着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到达贝内文托，从这里，走在自己修建的阿皮亚图拉真大道上向布林迪西行进。这一次，他带上了女人——不只带了妻子普洛蒂娜，还带上了与普洛蒂娜年龄相仿的外甥女马提蒂亚。高官去地方任职妻子随行，这在罗马帝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那都是去和平、安稳的行省（小普林尼也带了妻子去比提尼亚），带女性上战场没有过先例。

庞培在横扫东方之行时，没有带妻子同行。恺撒在高卢战争的8年间，也是独自度过的。当然因为离异，当时的他没有妻子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即便有妻子，大概也不会带她同行。对于罗马武将来说，让妻子随同前往战地是否合适，是无须再三思量的一件事情。曾经因为克娄巴特拉随同安东尼出征，就让安东尼手下的士兵们愤怒不已。

也许图拉真只是想把她们留在安条克，并没打算带去帕提亚，所以无须担心。但是，只要战争一打响，与埃及的亚历山大相匹敌的、在东方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安条克，就会变成前线阵地。或许，图拉真比普通公民和元老院议员更相信，即使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帕提亚，只要有他图拉真在，一定稳操胜券。

从布林迪西坐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在希腊登陆后，来到第一个落脚点雅典时，帕提亚国王的使节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受国王奥斯罗埃斯的委托，使节前来请求图拉真同意让帕尔塔马西里斯即位亚美尼亚国王。对此图拉真置若罔闻。他继续挥师向东，从希腊进入小亚细亚。经过小亚细亚南岸，到达叙利亚安条克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13年年末了。

事实上，当帕提亚国王得知雅典谈判破裂后，向安条克发起了进

攻。当然，所谓的进攻其实只是制造点小麻烦而已。所以一接到图拉真接近的消息，帕提亚军队马上撤走了。

在适合远征的春季到来之前，图拉真是在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度过的。这里是帕提亚战争的前线阵地。其间，他应该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检查，并选拔了远征军。具体情形不详，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帕提亚战争的、同时代人写的文献，也没有像记录达契亚战争的图拉真记功柱那样的物证，更无法从卡西乌斯·狄奥在100年后写的历史著述中查找线索。好在还是有人执著地寻找相关记录。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好像图拉真只带了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叙利亚的3个军团、犹太的1个军团以及约旦的1个军团，共计7个军团参加远征，但不是所有将士都参加。因为处于边防要地，各军团基地需要留下至少2个大队。所以，远征军人数不是7 × 6000人，而是7 × 5000人，主力部队为3.5万人。

图拉真认为这个战斗力还不够强大，于是他命令莱茵河防线的1个军团和多瑙河防线的3个军团移师幼发拉底河前线。他没有选择从距离更近的埃及调兵，理由大概有两个：第一，虽然只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才有成为罗马军团兵的资格，但是根据罗马开国之初以来的做法，驻扎在东方的军团中，很多士兵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当地人。甚至这样的当地人在军团中占了大多数。图拉真无心让这样的军团去参加远征。第二，他更相信自己亲自指挥下参加过达契亚战争的士兵们。

为了确保基地自身的安全，这两个防线同样分别留下了两个大队驻守。所以，参加远征的人数大概是4×5000，共2万人吧。这样，仅主力部队就达到了5万人，再加上辅助部队的士兵，共计10万人。不知道为什么，远征比达契亚大得多的大国帕提亚，图拉真调动的军队与达契亚战争的时候相比并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

公元114年春天，图拉真留下家眷，把她们托付给时年38岁的哈德良后，离开了安条克。同行的是已经与他很默契、参加过达契亚战争的将军们。行军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第十二雷鸣军团基地梅利泰纳（今土耳

其的马拉蒂亚）。这个位于最前线的基地是韦斯帕芗皇帝建立的，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前面就是亚美尼亚。

从梅利泰纳继续向北走罗马大道到达萨塔拉（今土耳其的凯尔基特）。这里是第十五阿波利纳里斯军团的驻军基地。在这里，大部队与从多瑙河移师而来的军团先遣部队会合。

图拉真把周边各国的国王和酋长们召集到了一起。发生战争时，参战的罗马军队通常是一支多国籍军队。能够让这些小君主国和豪族参战，本身就是罗马统治已经覆盖了他们的居住地的证明。所有人都响应了罗马皇帝的号召，唯独不见亚美尼亚新国王帕尔塔马西里斯的身影。

图拉真下令全军向艾雷盖亚（今土耳其的艾尔祖鲁姆）进发。艾雷盖亚位于罗马帝国和亚美尼亚王国国界线的东部。这意味着罗马军队开始向亚美尼亚境内发起进攻了。而帕尔塔马西里斯真的很有意思，他竟然在艾雷盖亚等候图拉真的到来。

帕尔塔马西里斯极力辩解，说自己没有应召前去萨塔拉，是因为在前往萨塔拉的途中受到了前国王的阻挠。他说，因为亚美尼亚前国王阿克西达瑞斯无能，所以，同是帕提亚王室出身的自己才会取代他即位国王。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和尼禄皇帝之间签订的条约，因为罗马皇帝只有主持加冕仪式的权力。他还说，对于图拉真皇帝主持加冕仪式，他没有异议。

说完，帕尔塔马西里斯摘下戴在头上的亚美尼亚国王王冠，把它放在了图拉真的脚边。

图拉真正色答道，帕提亚国王可以不经罗马皇帝同意，擅自撤换亚美尼亚国王之类的话，在尼禄条约中找不到一个字。他让帕尔塔马西里斯和一行随员滚出去。

随即，在距罗马军队扎营地不远的地方，帕尔塔马西里斯和他的一行随员全体被杀。

一接到报告，图拉真马上宣布，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合并，成立行省，并任命有过执政官经历的卡提留斯·西维勒斯就任新行省总督。图拉真没有把王位还给前国王阿克西达瑞斯，还杀了帕提亚王室成员帕尔塔马西里斯。至此，罗马和帕提亚彻底撕破脸面，即将进入正面对决。

接到图拉真命令的将军们率领各自的军队分散到了亚美尼亚全境。群情振奋，好像要争相立功。其中卢修斯·昆图斯率领的军团跃跃欲试，他们离开历史上作为罗马势力范围边界的幼发拉底河，一直打到了底格里斯河上游。这年夏天，这一带的重要城市尼西比斯（今努赛宾）很快被攻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国界线相接的一带）全部落到罗马军队的手中。在这次远征行动中没有展开一场正式会战。

得知这一消息的首都罗马一片狂欢。这时，图拉真向元老院提出愿意接受自己曾经拒绝过的“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

短暂的秋季到了，漫长的严冬已经临近，官兵们需要休整。图拉真受到当地贵族的盛情款待，他没有回安条克，就在战地和士兵们一起度过了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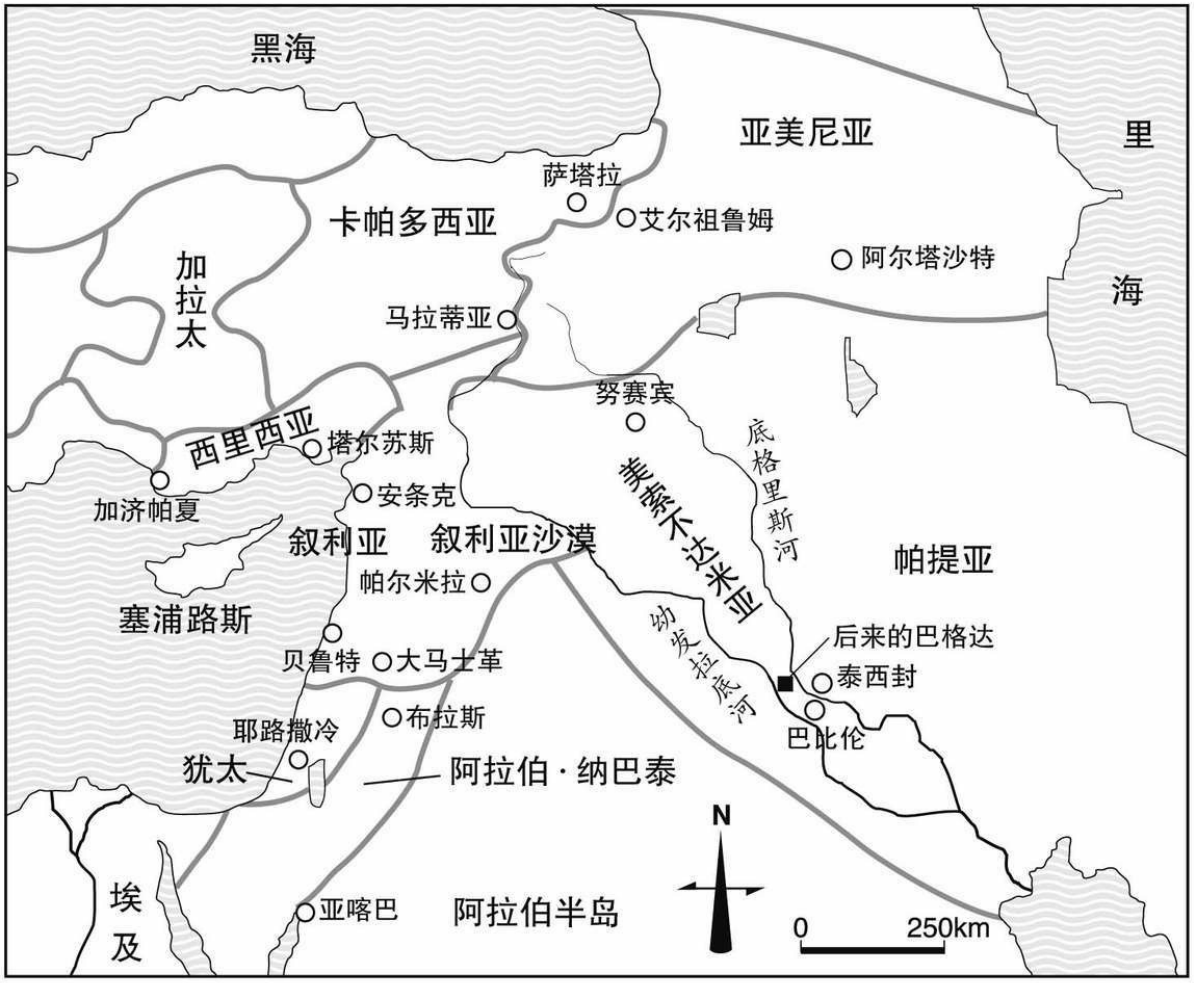
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15年，从春季到秋季，罗马军队继续向东、向南扩大着占领的范围。图拉真也来到了底格里斯河畔。他宣布，已经被彻底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全境也纳入了罗马行省之列。

新的势力范围一经确定，罗马帝国东部的国界线就不再是从黑海沿幼发拉底河到红海的这一条线，而是变成了黑海、亚美尼亚、底格里斯河以及红海出口的阿拉伯半岛。也许图拉真曾经这样想过，也许他做过

这样的梦，他要进一步扩大称霸的版图，征服帕提亚王国，继而与印度直接接壤。有记录显示，几年前，曾经有印度使节来到罗马与图拉真会面。根据研究者的研究，还有来自中国的使节也到访过罗马。不管怎样，这年年底，为图拉真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元老院，早早决定要授予他“帕提库斯”（Parthicus）的称号，意思是“帕提亚征服者”。

不清楚图拉真是否是因为对战果感到满意，这年冬天他回到了安条克。然而，在图拉真逗留期间，安条克发生了地震，皇帝因此受了轻伤。图拉真不迷信，但是，士兵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

公元116年，罗马把进攻目标定在了亚述和巴比伦曾经风光无限的地方。春天一到，图拉真离开安条克，率领南下而来的军队向东直抵底格里斯河，然后沿河南下，直指帕提亚王国首都泰西封。这条路线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路线一样。当然，图拉真不是为了效仿亚历山大大帝而选择这条路的。选择前人，特别是亚历山大这样具备异乎寻常的战略眼光的人所开辟的行军路线，就像选择数学定理一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简便合理的。这与古代港口现在依然被用做港口的道理一样。当然，选择45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走过的路线，对提高士兵的士气也相当有效。



图拉真远征帕提亚时的中东

向帕提亚王国首都泰西封（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40公里处）发起的攻城战役尽管因为找不到任何文献资料，不知其详情，但好像没有持续很久，城市就被攻陷了。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罗马式攻城武器在这次攻城战中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帕提亚国王奥斯罗埃斯在城市沦陷前已经逃走。罗马军队的战利品是黄金制成的宝座和国王的一个女儿。在士兵们清理首都期间，图拉真带领幕僚去了距泰西封不算太远的古都巴比伦。据说当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是我再年轻一些，或许军队已经开进印度了。可惜……”

因为攻陷帕提亚首都，连元老院议员们也不禁欣喜若狂，他们只能强忍着，让自己不至于失态。元老院一致同意只要皇帝图拉真愿意，举行什么样的凯旋仪式都不为过。

图拉真此时的年龄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的三倍。他没有带领队伍向东，而是转向南方，来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波斯湾。

之前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别说是罗马皇帝，就连军团长级别的人也没有过。如果把波斯湾纳入罗马统治之下，那么就意味着来自东方的通商路线黑海、波斯湾和红海悉数落入罗马的控制范围之中。这样一来，帕提亚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其重要性将大大降低。

对罗马来说，之所以解决帕提亚问题有难度，原因之一就是以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为两大中心的罗马帝国东方与作为东方物产中心的帕提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因此，守卫帝国东方的幼发拉底防线只能作为“开放的国界线”，“边境的城墙”（屏障）不能建得太高，因为只有确保帝国东方的经济稳定，才能保证包括西方在内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安然无恙。

如果帕提亚王国从地球上消失，或者迫使它成为一个小国蜗居于波斯湾以东的话，那么承担着罗马帝国东方经济发展任务的希腊系居民，很可能会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那样深受鼓舞，把他们的经济交流活动一步步向东扩展。帕提亚境内星星点点地坐落着许多希腊人的城市，那是亚历山大留下来的礼物。若是幼发拉底河这条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边界线消失，由于当地人同属希腊民族，那么在这一区域实现共存共荣易如反掌。

至于图拉真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对帕提亚的战争，因为没有可查证的史实，所以只能依靠想象。如果他想到过亚历山大大帝，那么远征帕提亚不是因为他对一个未知之地充满好奇，也不是因为他无止境的领土占

有欲，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魅力——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遗产之一，即促进东西方人和物的交流，对他有一种深深的吸引力。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方已经发展成为人和物交流的一大中心，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西方不可同日而论。所以，如果远征帕提亚取得成功，到那个时候，图拉真才是名至实归的“至高无上的皇帝”了。

但是，结论下得太早，结果很可能只是一场梦。

帕提亚王国被认为是专制君主国家。但是，它不是一个强权在握的国王下面官僚机构完善、国家运作规范的王国，而是国王统辖各地割据势力的国家形式。因此，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当王室因继承人问题发生内讧时，各地割据势力因为支持对象不同，会发生争端。此时的帕提亚尽管仍属于波斯民族的国家，但是，与亚历山大大帝攻打的波斯帝国在形式上已经完全不同。

当然，这种形式的国家，在受到外敌威胁时，会显示出其另一面。因为一旦帕提亚王国被征服，各地方势力就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如果在以前，罗马总是善待征服地的权贵阶层，授予他们家族名号，把他们吸纳进统治机构等等。但是，达契亚战争结束后，达契亚民族被彻底从其原住地清除出去。这样的战后处理方式就不允许帕提亚的那些地方割据势力怀揣幻想。

如果这些割据势力纷纷调集各自的兵马，集结到逃亡中的国王身边，奋起反对罗马的话，对图拉真来说，或许并不难对付。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大流士也曾集结了15万人的兵力，后来增加到30万人之众。尽管图拉真不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是个天才的统帅，但是，图拉真率领的也是一支以辽阔大地为战场、善于打会战并在战斗中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

不知道是否因为满足于到达波斯湾，图拉真决定回安条克过冬。沿着幼发拉底河逆流而上到达中游，从那儿再顺着罗马大道向西回到安条

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内爆发了起义。

不清楚这次起义是否和逃亡中的国王奥斯罗埃斯有关，也不知道这次起义是否是各地方势力相互间商议的结果。总之，帕提亚方面利用游击战术，向驻留在当地的罗马军队发起了反击。这次反击，与其说是为了拯救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帕提亚王国，不如说是各个地方势力痛感自己已陷入危机之中。

战争中，正规作战不是胜利就是失败。但是游击战不同，就算没有取得胜利，也不能说它失败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起义大大牵制了罗马军队，它在这个占领后已经变成要塞的地方动弹不得，而且事态愈演愈烈，甚至有军团长中了游击战的诡计而战死。在安条克的图拉真接到的报告显示出美索不达米亚全域内的起义呈现出了烽火燎原之势。

等到翌年春天，大举攻打起义者，罗马军队或许可以彻底浇灭这把火。但是，火浇灭后该怎么做？如果继续依靠军事力量进行压制，投入帕提亚战争的11个军团就要全部困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地。然而，罗马帝国的防线不只是东方。继续占据美索不达米亚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帝国能承受得起吗？

在安条克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官邸，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图拉真的指挥下，参加过达契亚战争和帕提亚战争的大多数将军，为了罗马帝国的荣誉，力主大举反攻。但是我们不清楚图拉真的想法。我们只知道，迄今为止从不知道生病为何事的皇帝病倒了。此外，已经63岁的图拉真除了帕提亚问题，还有一件事情让他担心。

图拉真率领罗马军队向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远征的前一年，即公元115年，犹太发生了叛乱。原因与以前一样，是出于对希腊系人民的反感，并且，他们对周围希腊系人民的憎恶进一步转移到了对霸权者罗马人的憎恶。希腊人很有经济头脑，在这方面犹太人丝毫不在希腊人之下。这两个民族的人很难做到利害一致，极易导致民族感情激化。此

外，希腊人对于与罗马人共生共荣持欢迎的态度。但是，犹太人不一样。严格奉行一神教的犹太教徒拒绝共存，他们总是伺机闹独立。他们认为罗马专心对付帕提亚的这个时期，正是奋起反抗的最佳时机。

然而，犹太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行省人民叛乱，对罗马人来说，就不是单纯的叛乱，而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而且是从背后下手的卑劣行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希腊人是擅长贸易的民族，犹太人也是长于通商的民族。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的希腊人之间互有来往。自然，生活在罗马境内的犹太人和生活在帕提亚境内的犹太人之间也有交流。罗马方面因此认定导致犹太人叛乱的导火索是帕提亚。事实上，有研究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为采用游击战术反击罗马军队的帕提亚人提供了后援。

发生在犹太的叛乱之火很快蔓延到了帝国版图内的埃及、昔兰尼加以及塞浦路斯岛。叛乱的始作俑者犹太人没有攻打罗马的军事基地，他们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希腊系人民的商店和农庄。埃及行省长官手中握有2个军团，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导致叛乱范围迅速扩大，因此遭到免职。新派去的年轻将领托尔波在希腊系人民的配合下，成功镇压了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叛乱。发生在塞浦路斯岛的叛乱，行为非常过激，当地人对非犹太人一律格杀勿论。他们把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关进圆形竞技场后大开杀戒。最后，从帕提亚战争中抽调出第七克劳狄乌斯军团，才得以镇压塞浦路斯的叛乱。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从此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塞浦路斯，否则以死罪论处。

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燃烧起来的这把反叛之火并没有完全扑灭，还在四处起烟。同时已经发展到帕提亚西部地区的游击战也必须予以全面打击。适合作战的公元117年春季已经来临，图拉真却没有向东出发。这一年7月的月底，他终于离开安条克，目的地却是罗马。在他的妻子普洛蒂娜、外甥女马提蒂亚的陪伴下，身患重病的皇帝

坐上船向西出发了。帕提亚战场的总司令官换成了哈德良。

去世

向西行驶的船上旅行时间并不长。沿着小亚细亚南岸向西航行期间，图拉真的病情突然恶化，船不得不就近停靠在塞留斯（今加齐帕萨）港口，等待病情稳定继续前进。然而，皇帝的病始终不见好转。公元117年8月9日，皇帝图拉真因病去世，离64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几天。图拉真统治罗马帝国长达20年，临死前，他指定哈德良继承皇位。

简单的火葬仪式后，骨灰在同行的妻子普洛蒂娜和外甥女马提蒂亚、近卫军团长官的守护下，继续前往罗马。从带着雄心壮志向东去的那一年算起，已经过去了4年时光。市民和元老院没有为皇帝举行丧礼，而是用凯旋仪式迎接他们的皇帝归来。皇帝骨灰瓮放在四匹白马拉的战车之上。凯旋仪式的主人公是已故之人，这样的凯旋仪式在869年的罗马历史上尚属首次。

图拉真

正因为他是位得到高度评价的好皇帝，所以图拉真的雕像在经过了1900年后的现在依然还有很多。站在其中一个雕像前，我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你会如此地努力？”

大理石雕像当然不会回答我，因此就由提出问题的我来代为回答。从学术的角度讲，这只是假设。词典对“假设”的解释是为了合理解释事实所作的假定，也就是想象。当然，想象是基于种种事实的基础展开的，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想象只是空想。因此，我试图揣测图拉真的内心想法，作出这样的回答：

“因为是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所以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常见吗？那些因为是女人中的第一个人，或者因为是东方人中的第一个人，所以他或者她只能格外地努力。

不管怎样，在图拉真统治的20年间，他真正做到了一心一意地认真履行皇帝的职责。

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

（117年8月9日—138年7月10日在位）

HADRIANVS

少年时代

公元76年1月24日，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良（P. Aelius Hadrianus）在意大利卡出生。这个城镇在古代叫西斯帕尼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图拉真也出生在这个城市。哈德良比图拉真小23岁。意大利卡是公元前3世纪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让退役后的士兵在当地留下兴建起来的殖民城市。所以，可以认为，出生于此地的罗马人，祖籍都是意大利本土。我们不清楚图拉真的祖先出生于意大利的何处，但是，我们知道哈德良祖先的出生地。那是一个叫哈德利亚的小镇，位于意大利中部，靠近亚得里亚海，据说地名就源于亚得里亚海。

图拉真的家族进入罗马社会统治者阶层——元老院阶级——是在他父亲这一代。与他的家族相比，哈德良的家族要早许多。公元前1世纪，在与元老院一派的斗争中尤里乌斯·恺撒获胜。他是一位愿意选用行省出身的人，哈德良的祖先就是因为恺撒的推荐进入了元老院。只是后来，在历史上似乎销声匿迹了。也许是因为缺少才能，哈德良的父亲最高只做到法务官，当然不幸早逝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他去世的时候还未达到担当执政官的资格年龄。

到了公元1世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图拉真家族，其地位突然超越了哈德良家族。在韦斯帕芗皇帝时代，图拉真的父亲曾立下赫赫战功。经他的推荐，哈德良的父亲进入了贵族行列。这两个家族有姻亲关系。侄子经叔伯的推荐成了元老院议员中地位较高的贵族。后来登上皇位的图拉真与哈德良的父亲是表兄弟关系。

父亲哈德良和出生于加的斯的波利娜结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女儿与母亲同名，儿子就是哈德良。母亲娘家位于100公里开外、同属贝

提卡行省的一个小镇。虽然出身良家，也不过是镇上一个普通女子。姐姐波利娜嫁给了出生于同一行省的塞尔维亚努斯。

尽管哈德良是元老院阶级中地位较高的贵族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罗马帝国的特殊环境中长大。10岁之前，哈德良不过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乡下孩子。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哈德良的父亲不是猝死，因为在临死前，他为儿子指定了监护人。

监护人有两位，一位是图拉真，另一位是阿奇利乌斯·阿提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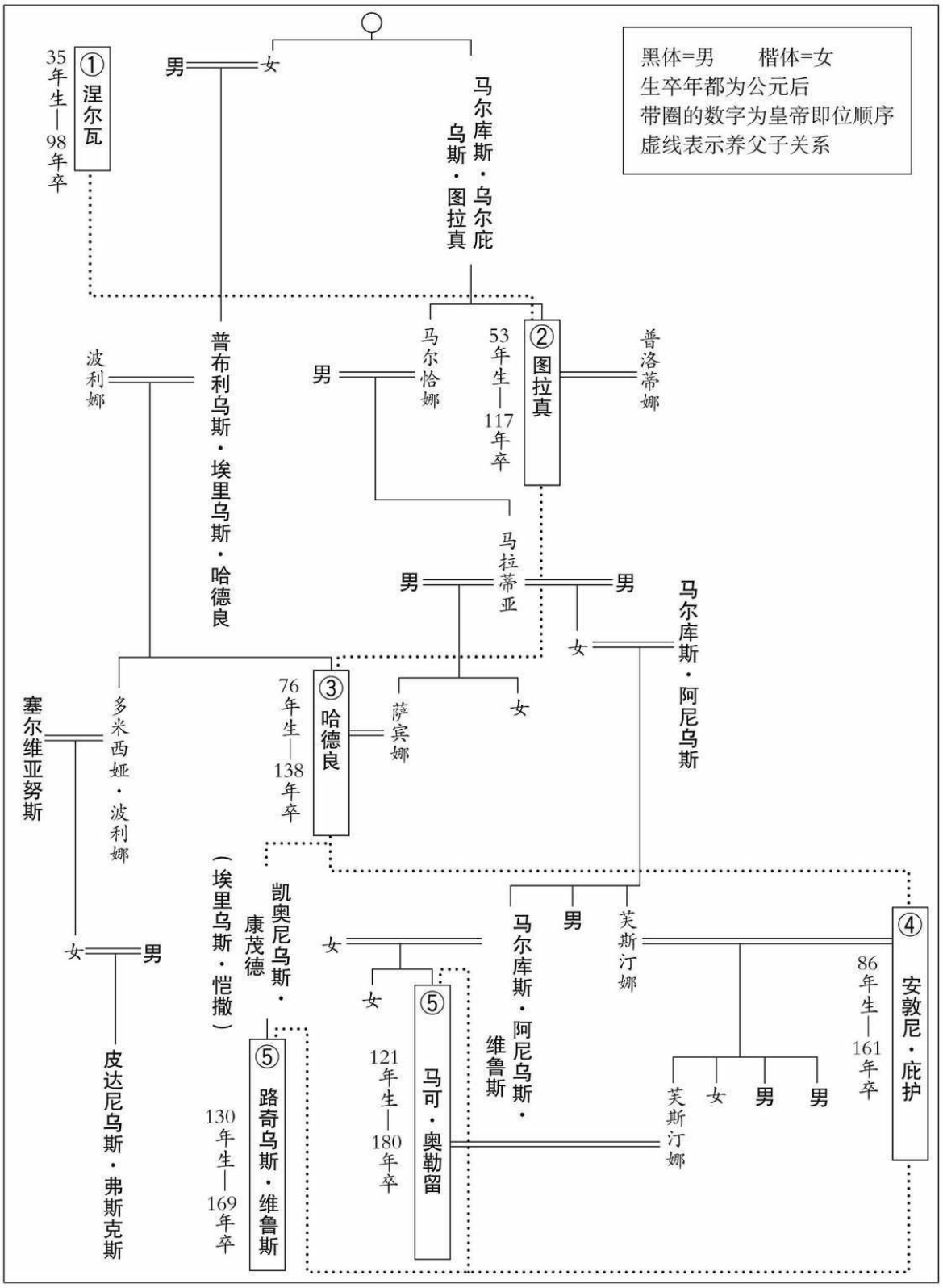
当时，图拉真33岁，还只是军团中的一位大队长。没有人能够预测到12年后他会当上皇帝。哈德良的父亲仅仅因为是同乡又是表兄弟的原因，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当时33岁的图拉真。另一位监护人阿提安也是同乡，属于骑士阶级（equitas），在罗马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接受监护人委托时，他的地位如何不清楚。但是，作为身强体壮、行省出身的人，他一定以图拉真的父亲为榜样，正走在军团生涯的发展道路上。为了儿子的将来，哈德良的父亲没有选择把他托付给居住在罗马的贵族，而是选择了年纪尚轻却很有发展前途的这两个人。

在罗马社会，因战争或其他诸多原因过早失去父亲的孩子很多。所以，委托他人做监护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接受委托后的监护人通常也会尽力完成好这一职责。父亲早早去世的小普林尼就是在伯父大普林尼身边长大的。可能是哈德良的两位监护人图拉真和阿提安商量后的结果，他们决定让这位10岁的少年到首都罗马接受中等教育。于是，哈德良来到了意大利卡无法比拟的大城市罗马，从10岁到14岁，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其间有一年，可能住在图拉真的家里。因为图拉真当选法务官后回到了罗马。据说他上的是昆体良的私塾。昆体良受图密善皇帝的委托，著有《教育论原理》。

在罗马上学期间，精美的希腊文化让聪明的少年哈德良大开眼界。学习希腊语是出身于罗马精英阶层家的孩子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少

年时代的哈德良热衷的不只是希腊语，而是希腊文化的全部。为此，在一起就学的少年伙伴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希腊人”。然而，这件事成了两位监护人担心的原因。

共和制时代的罗马精英认为，罗马男人必须具备质朴而刚毅的性格。进入帝制时代后，尤其在首都，具有质朴而刚毅性格的人已经大不如从前。与意大利本土相比，这种性格在偏远地区保留得更为纯粹和长久。图拉真和阿提安都是质朴而刚毅的男人。在他们看来，沉溺于希腊文明等同于软弱。于是，14岁的哈德良被送回了故乡意大利卡。


黑体=男　楷体=女
生卒年都为公元后
带圈的数字为皇帝即位顺序
虚线表示养父子关系
①涅尔瓦
35年生—98年卒
男
女
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
②图拉真
53年生—117年卒
普洛蒂娜
马尔恰娜
男
波利娜
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良
马拉蒂亚
男
男
女
马尔库斯·阿尼乌斯
③哈德良
76年生—138年卒
萨宾娜
女
多米西娅·波利娜
塞尔维亚努斯
女
男
皮达尼乌斯·弗斯克斯
凯奥尼乌斯·康茂德
（埃里乌斯·恺撒）
⑤路奇乌斯·维鲁斯
130年生—169年卒
女
女
⑤马可·奥勒留
121年生—180年卒
马尔库斯·阿尼乌斯·维鲁斯
男
芙斯汀娜
④安敦尼·庇护
86年生—161年卒
芙斯汀娜
女
男
男

涅尔瓦皇帝到马可·奥勒留皇帝的系谱（略去了一部分）

然而，哈德良又让这两位监护人起了新的担忧——哈德良迷上了狩猎。意大利卡位于低矮的丘陵地带，骑在马上追猎野猪、小鹿，感觉非常畅快。虽然狩猎与质朴刚毅并不相悖，但是在重视平衡的罗马人传统中，热衷或沉迷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好现象。于是，在故乡生活了3年之后，已经有过兵役见习期的这位年轻人再次被叫回了罗马。

由此可见，哈德良的这两大爱好，即对希腊文明的迷恋和对狩猎的狂热，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养成。这两个爱好粗看似乎毫无关联，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感性。在哈德良的一生中，他始终是个感性的男人。

青年时代

再次被叫回罗马的这位年轻人，等待他的是最基层的行政职务。这一定又是两位监护人商量后的结果。这个部门在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存在。工作内容主要是审查奴隶变成解放奴隶后，是否已满足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个职位上的工作并非只此一项。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另一项工作也放在了这个部门，那就是审查遗产继承和监护是否得当。如果审查结果符合条件就予以核准，如果需要通过裁决，就转到法务官那里。该部门共有10名工作人员，都是20岁上下的人。

无论在共和制时代还是帝制时代，罗马精英的培养体系完全一样。2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要负责处理民间琐事，接触人类社会的最底层。按察官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监督公娼制度是否正常健全；财务检察官的任务是检查经费的收支情况；护民官则保护普通百姓。一句话，都属于社会工作。从事过这类工作，也担任过要求是通才的军团士官后，年满30岁就可以进入元老院并成为元老院议员，负责的工作就不再局限于社

会工作，也要参与国家大事。

因此，哈德良在20岁前后，担任的下一个工作就是军团士官。

第一个任职地是驻扎在远潘诺尼亚行省的第二辅助军团。军团基地位于现在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多瑙河防线的要塞之一。也就是说，他被送到了前线。

他在军团中的地位很高，担任的是副军团长（Tribunus Laticlavius）之职，我把它翻译成“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是出身于元老院阶级的人的惯例。“穿红披肩的大队长”是10个大队长（Tribunus）中的首席。在图拉真的章节中已经有过描述，因为他们的正式军装有一条“披肩”，与元老院议员的托加同色，都是红色，要从肩上垂下来，因此得名。担任该职位的人需要一定的能力。如果仅仅因为漂亮的军装就自以为是的人是难以胜任的。因为，担任该职位的人，其地位仅次于军团长。当军团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时，必须马上代替军团长，指挥6000名军团兵加上辅助部队士兵，共计1万人。

让一个对军务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20来岁的年轻人担任责任如此重大的职位，也许你会认为过于轻率。但是在罗马帝国，这却是常有的事。因为，既然担任了受人尊敬的职位，理应担负起更重的责任。尽管暂时对军务一无所知，但是，他的周围有很多专家。没有红披肩的大队长多数是军团基层锻炼者。尤其在“罗马军团骨干”的百人队队长中，不乏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因此，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像空降兵那样降落到军团基地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尽管表面上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却免不了让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们内心颇不以为然。因此，对于此时的哈德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们表面上的尊敬变成发自内心的敬佩。当然这需要能力。好在士兵们都是战斗在最前线的人们。他们很清楚，指挥官的无能会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年轻的哈德良似乎合格了。

过了大约两年时间，他接到了调令。这次的任职地是位于多瑙河下游的远米西亚行省，身份是第五马其顿军团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该军团的驻扎地在特劳埃斯米斯，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附近有负责守卫多瑙河下游和黑海的舰队基地。

在该地任职期间，皇帝图密善遭遇暗杀。涅尔瓦在元老院的大力支持下继承皇位。公元96年似乎过去得很匆忙，这一年哈德良20岁。

第二年，即公元97年10月，涅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皇位继承人。两个月后的公元98年1月27日，年事已高的涅尔瓦去世。

根据《皇帝传》一书的描述，为了让图拉真尽早知道涅尔瓦的死讯和他继承皇位的消息，时年22岁的哈德良沿着多瑙河上游一路策马狂奔，一气通过日耳曼长城，来到位于莱茵河中游的科隆，赶去通知图拉真。也许正因为图拉真是自己的监护人，所以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时间正值隆冬，那一带的这个季节天寒地冻。虽然走的是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那也是因为他年轻才做得到。这里有一个疑问。先皇去世和新皇帝登基这样重要的消息，为什么没有从罗马一路北上送到科隆，而是从罗马送到多瑙河下游，再由哈德良骑马带到科隆呢？对于这个疑问，我决定不作展开。因为已经过了45岁的图拉真，看到曾经“让自己担心”的哈德良长大了的样子，他又是冒着严寒远道而来，感觉比当上皇帝还要高兴。

不清楚哈德良在随后的日子里是否留在图拉真身边，协助一心一意备战达契亚的皇帝；也不清楚一年半后，是否与终于回到首都罗马的图拉真在一起。或者传递完消息后，又返回到多瑙河下游的基地，继续履行他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职责。公元101年，哈德良当选为财务检察官，迈出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一步。年龄刚刚25岁，他的第一步走得非常顺利。

但是，皇帝图拉真没有特别关照他这位财务检察官，反倒因为关系

亲近，还委派他兼做另外一件事——当皇帝因故不能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他要把写有皇帝意见的文书拿到元老院，并在会上宣读。

第一次代替皇帝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时候，他受到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嘲笑。他们取笑这位年轻的财务检察官拉丁语“地方口音”太重。虽然当时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但是，罗马还有一种通用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因此，不管你的希腊语说得有多好，但如果拉丁语说不好，就没有资格成为帝国的精英。为此，哈德良开始发愤学习拉丁语，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克服了由少年时期养成的地方口音。无独有偶，尤里乌斯·恺撒的写作能力也是经过了磨炼，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称赞他的写作“看不出丝毫小地方的土气”。

哈德良的勤奋刻苦让自己得到了新的职位。在顺利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他担任了编辑《元老院纪事》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的具体工作是：在对元老院会议上的讨论内容及决议等进行汇总后，让专职记录的人记录下来并进行妥善保管。但是，该部门的工作不只是保存记录，还要抄送很多份，发到帝国全境的所有行省、军团及地方自治体。因为能看到这些记录，所以即使在边境的人，也能够了解首都的情况。这就是现代研究者说的“罗马时代的报纸”。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但是，设立这个叫“curator actorum senates”的职位，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的人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如果一定要翻译这个职位的话，就是《元老院纪事》负责人。被委以这项工作，表明哈德良的拉丁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看不出丝毫小地方的土气”的程度。

这个时期内他结婚了，新娘萨宾娜是图拉真的姐姐马尔恰娜的外孙女，也是皇帝的外甥女马提蒂亚的女儿。哈德良的父亲与图拉真是表兄弟关系。所以，与萨宾娜结婚，使得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图拉真没有孩子，在他最近的亲属中，哈德良是唯一的男性。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哈德良萌发了自己想当皇帝的念头。图拉真的继承人就是自己。要继承皇位，23岁的年龄之差正合适。当然，要实现

自己的这个雄心壮志，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图拉真最看重公正。尽管是亲属，不，正因为是亲属，反而得不到特殊的照顾。44岁那年被涅尔瓦指定为继承人之前，图拉真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皇帝。相反，哈德良在25岁那年，这件事已经进入了他的筹划之中。实现这一愿望的方法，恰恰由于图拉真是个公正的人，反而更加简单容易。与其去作一些风险性很大的冒险尝试，不如脚踏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公元101年到102年，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爆发。哈德良好像是中途才加入这场战争的。当时，他没有被委以重任，所以也没有什么战功记录在案。事实上，与其说是参战者，他更像是一个观战者，只是待在图拉真的大本营里而已。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中，据说有这样一句话：那时，他已然是图拉真关系最亲密的圈子中的一员。罗马帝国皇帝们的回忆录随着帝国的灭亡早已消失。根据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说法，能够陪伴图拉真畅饮葡萄酒到最后的正是哈德良。在其他下属一个个被皇帝灌倒后，只有年仅25岁的哈德良能够陪伴他到最后。事实上，身为司令官的图拉真，其身边的人，包括每一个列席参加作战会议的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勇将。与他们在一起，会让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感到有压力。

萨宾娜

哈德良

到了3年后的公元105年至106年间，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一开始，图拉真便对哈德良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军团长，统率驻扎在波恩的第一密

涅瓦军团，参加达契亚战争。以30来岁的年纪，指挥包括主力军团兵和辅助军团兵共计1万人的部队，这种情况在罗马并非绝无仅有。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接受任命是在战时而不是平时。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达契亚战争期间的罗马军队，就像突然被放归山野的猛虎，彻底投入战斗。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这正是表现其战略战术才能的最佳时机。哈德良充分抓住了这次机会，在战场上，他率领的第一密涅瓦军团表现突出。很快，在驻扎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防线的军团中间，哈德良的名字被传了开来。

迈向皇帝之路

达契亚战争取得完胜之后，哈德良随图拉真回到罗马。同年，他参加法务官竞选并顺利当选。从此，他进入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二阶段。为此，他要承担“既得利益阶层回馈社会”的义务。这项义务在罗马就是出资举办角斗士比赛和竞技比赛。所需的400万塞斯特斯是图拉真替他出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哈德良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另一方面，图拉真作为他的监护人，也算是尽义务。在罗马社会，监护人的意思就是“代理父亲”。

说到监护人，除了图拉真，哈德良还有一个，名叫阿提安。他在图拉真登基后被提拔为近卫军团指挥官。于是，哈德良有了皇帝和近卫军团指挥官这样两位实权在握的监护人。

结束法务官任期后，作为前法务官，已经具备了担任行省总督的资格。只是，仅有过法务官的经历，只能担任任命权在皇帝的皇帝行省的总督。元老院行省的总督选举权在元老院手中，只有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才有被选举权。

因此，哈德良任职的地方位于多瑙河前线的远潘诺尼亚行省，这是

他曾作为“穿红披肩的大队长”驻守过的第一个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行省首府阿奎因库姆（今布达佩斯）也是军团基地的所在地。作为总督，他的任务不仅仅只是率领军团，负责防卫。同时，他又是对包括地方百姓在内的整个行省实施统治的责任人。时间是在达契亚刚刚成为行省之后。因此，位于达契亚西侧、负责监视达契亚的布达佩斯，其重要性大大提高。任命他掌管远潘诺尼亚行省，充分证明了皇帝图拉真对他的信任。

已经31岁的哈德良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当时，萨尔马提亚人看到达契亚王国灭亡后，自以为是地认为多瑙河北岸势力最强大的部族非己莫属。于是，他们横渡多瑙河，试图入侵罗马领地。作为回应，哈德良率领的第二辅助兵团一举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第二年，哈德良应召回国，离开了远潘诺尼亚。原因是他被推荐为执政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既然是皇帝推荐，那么在元老院的选举中，候选等于当选。以32岁的年纪当选执政官，除了破格，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述了。图拉真曾受到图密善皇帝的偏爱，第一次当选执政官时，年龄虽不大，但是也已经38岁。所以，32岁当选只能说是既破格又破例。传说这是李锡尼·苏拉强烈推荐的结果。苏拉是图拉真的同乡、同龄人、第一亲信，也是最好的朋友。也许苏拉早就看出，哈德良尽管也是出生于西班牙，但是，他与图拉真和自己的性情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才最适合成为图拉真的接班人。

然而，年纪轻轻就担任执政官之职的哈德良，在4年后却遭遇了低谷，非常不得志。

原因之一是，非常认可他的苏拉在哈德良当选执政官之前不幸去世。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苏拉的去世，被称做图拉真手下“四大天王”的几个将军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他们对哈德良的破格升迁颇有微

词。图拉真不能无视他们对哈德良的抵触情绪，同时，他好像也在反省自己是否过于重用哈德良了。

图拉真是信仰公正至上的人。正因为哈德良与他关系亲近，才更不愿意表现出有偏袒行为。

这样一来，哈德良在35岁以后的4年间，虽有“前执政官”的资历，却始终无缘成为行省总督。当然，图拉真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他。因此，在哈德良未被委以重任期间，才会让他替自己做一些事情，如起草正式演讲的草稿等等。

这4年间，哈德良都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相信就算回忆录留存至今，我们也不可能找出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思想活动。在他最不得志的4年中，最后一年即公元112年，哈德良被希腊雅典市授予了“执政官”（archon）的称号。这是雅典在鼎盛时期的最高官职，也是一个荣誉头衔。梭伦和特米斯托克利斯都曾经得到过这一荣誉。随着城邦国家雅典的衰落，罗马时代的雅典“执政官”除了荣誉头衔，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雅典方面授予他这个荣誉称号，目的是希望哈德良作为皇帝家庭成员之一能够做雅典的保护人。少年时代外号叫“希腊人”的哈德良，一定对这个荣誉满心欢喜。

哈德良虽然不得志，但是他依然不失为一个引人关注的人。毕竟年纪尚轻，仍有机会。这个时期，罗马出现了两大派系，一派不看好哈德良，另一派非常认可他，而且，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呈现表面化。前一派是自认为拥戴图拉真的将军们，后一派则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和前一派一样受到图拉真的重用，但是，地位多处于军团长的级别。在这段时期，图拉真对哈德良的态度很不明朗，或许这正是担心两派对立的图拉真真实思想的写照。

当然，图拉真不是一个因为有这种顾虑而完全束缚自己用人安排的人。公元113年，出发远征帕提亚的图拉真的随行人员中，哈德良出现

在了其中。

一位年长自己的女人

《皇帝传》的作者说，哈德良37岁那年，再次返回前线是因为皇后普洛蒂娜的推荐。他还说普洛蒂娜特别欣赏哈德良。这里所谓的“欣赏”，是“爱恋”或是“喜欢”的意思。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

首先是普洛蒂娜的年龄问题。我们知道她去世的年龄，却不清楚她出生的年份。从图拉真身边的人的夫妻年龄差距来推断，很可能普洛蒂娜比丈夫图拉真小12或13岁，比哈德良大10至11岁。顺便提一句，哈德良与妻子萨宾娜的年龄差距是12岁。

那么，能让年长自己10岁的女人“欣赏”的年轻男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是漂亮。当然这里说的漂亮不是指容貌，应该是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美”。

第二，是年轻。这不是说年龄越小越好，它的意思应该是随时能让人感受到充满活力的青春朝气。没有一点朝气的年轻人很多；从另一方面来看，充满朝气的中年人却也不少。

第三，是思维清晰。这一条，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年长的女人爱上的年轻人是能成为下一代中的佼佼者的人。

第四，是感性。正因为看多了缺少感性的丈夫和同龄男性，所以才会喜欢感情丰富、又努力自我克制的男人。

第五，是要胸怀大志。既然能打动一个对世间百态了然于心的女人

的心，可见，这种胸怀大志不是仅满足于出人头地或成为有钱人之类的小想法，它必须是远大志向。为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当事人一定会比普通人处心积虑得多。

哈德良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但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要求则不同。即使不具备上述五个条件，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夫妻。女人对丈夫的要求，是懂得人情世故，并且能让她感到踏实就可以了。哈德良似乎更加擅长与年长自己的女性沟通，他与普洛蒂娜、图拉真的姐姐马尔恰娜和外甥女马提蒂亚这些年长的女人们相处非常融洽，却始终与妻子萨宾娜的关系欠佳。原因在于萨宾娜比他年轻，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他的妻子。对哈德良来说，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让身边的人有一种安全感。

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试图求证普洛蒂娜和哈德良之间的真实关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两人间是否有性关系。普洛蒂娜是一个有教养、有自尊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情感并不等于性。她并不害怕出轨行为暴露后，女人遭到流放，男人被处死刑。而是一旦发生性关系，两人就会变成平凡的男女关系，这样的结果会让她感到非常失望。再说，图拉真是个不错的丈夫。哈德良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既然如此，她有什么必要让两人的关系沦落为庸俗的男女关系呢？普洛蒂娜不是希腊悲剧中的费德拉。在尊重自己的感情方面，可以说她是个利己主义者。还有，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哈德良，只能说，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我坚信这两人之间不存在性关系。正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性关系，所以，普洛蒂娜才会一直活在哈德良的心中。

先不论是否是皇后力荐的结果，总之，哈德良参加了帕提亚战争。只是，这次他没有像第二次达契亚战争那样，率领军队参加战斗，因为图拉真任命他担任了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换言之，就是在战争期间，他

要负责看守后方基地安条克。但是，在地位等同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东方大都市安条克，想过奢华的官府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后方基地，对于重视后勤的罗马来说，就是补给基地。因此，负责后勤保障的任务就落在了总督哈德良的身上。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保证随图拉真同来的普洛蒂娜和马提蒂亚的安全。

普洛蒂娜

驻扎在帝国东半部的所有军团都在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管辖之下。因此，他同时又是帝国东方防线的负责人，“名气”很大。但是，在帕提亚战争期间，哈德良没有亲自率领军团参加战斗的“实绩”。图拉真把战场指挥权统统交给了那些经验丰富的将军们了。他们自达契亚战争以来一直追随图拉真共同作战。因为没有找到有文字的任何史料，所以我们不清楚自尊心极强、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的哈德良，是如何度过37岁至41岁之间的这一段“蛰伏期”的。但是，他终究是哈德良。尽管身在后方，他一定睁大了清醒的眼睛，注视着帕提亚战争的进展。

在图拉真皇帝的章节中，已经作过详细描述。图拉真怀着必胜的信念发动了帕提亚战争，结果却与这位皇帝的期待相悖。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的皇帝大概听从了妻子和外甥女的劝说，答应回首都罗马。从安条克走海路向西出发之前，他任命叙利亚行省总督哈德良为远征军总司令，命令他继续战斗。

然而，沿着小亚细亚南岸航行的途中，图拉真的病情急剧恶化。船紧急停靠在最近的港口塞留斯，等待病情稳定后继续航行，然而结果却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公元117年8月9日，被全帝国人们盛赞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图拉真结束了64年的人生。据说临死前，他把哈德良收为养子，并指定他继承皇位。

然而，这件事成了哈德良登基之谜的起源。至今，论述此事的研究论文依然层出不穷。

登基之谜

图拉真真的是在指定哈德良为皇位继承人之后去世的吗？还是在皇帝去世后，皇后普洛蒂娜暂时隐瞒了图拉真去世的消息，同时，紧急派出信使前往安条克通知哈德良，等哈德良接受属下军团的宣誓忠诚，造

成登基的既成事实后，才公布皇帝死讯的呢？一直以来，大家怀疑的正是这一点。

皇帝临死前，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普洛蒂娜、外甥女马提蒂亚、禁卫军团长官阿提安和皇帝的御医4个人。

图拉真宠爱的外甥女马提蒂亚好像比普洛蒂娜小两三岁。但是，她与几乎同龄的这位舅妈相处非常好，就像一对姐妹，对普洛蒂娜总是言听计从。她也很欣赏女儿萨宾娜的丈夫哈德良，甚至充耳不闻女儿向她发泄的对丈夫的不满。对女婿来说，她无疑是个理想的岳母。

近卫军团两个长官之一的阿提安和图拉真一样，受哈德良父亲之托，作为监护人，从哈德良10岁开始，就一直在照顾他。

而皇帝的御医，几天后却蹊跷地死了。

认为图拉真并没有指定哈德良继承皇位的人提出了以下三条论据：

一是亚历山大大帝死前也没有指定具体的继承者，只留下一句遗言，说："把帝国交给有统治能力的人。"

二是有传言说，图拉真生前曾经对法学家奈拉提乌斯·布里库斯说过："万一自己发生不测，我的帝国就拜托您了。"

三是在帕提亚战争期间，图拉真给元老院写过一封信，内附一份名单。说是为了避免帝国统治出现空白，万一自己发生不测，请元老院从中推选继位者。当然这也是传闻。

第一条即使在事发当时也只不过是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传言。图拉真是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绝不可能为了效仿亚历山大大帝而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何况，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合适的人选可继承皇位，而图拉真则有这样的人选。

第二条也由于图拉真是一个务实的人，所以其可能性极小。法律方面的专家，正因为是专家，才更容易受到已有法律条文的束缚。而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推荐“内阁司法部部长担任首相”这类事情，图拉真是一定不会做的。

问题在于第三条。图拉真以公正为终生信条，对元老院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所以，这个做法不是没有一点可能。问题是元老院没有收到过那样的信，而且，是否真有这样一份名单也不清楚。

当时的罗马人不像后世的研究者那样执著于要解开这个谜团。因为只要冷静观察，在当时的领导者阶层中，确实没有比哈德良更适合继承皇位的人。

第一，41岁的年龄让人们感觉很放心。

第二，哈德良迄今为止的经历也无可挑剔。他担任过各种职位，有足够的资历成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

第三，哈德良思维清晰。这在元老院里也是众所周知的。

第四，他在军团将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根据哈德良写的《回忆录》，8月9日他在安条克接到了被图拉真收为养子的消息。

8月9日，皇帝在塞留斯去世。

8月11日，东方军团的将士们向他宣誓效忠——“大将军”的欢呼声在新皇帝哈德良的身边响起。

从塞留斯到安条克，海上距离400公里。坐高速船，两天就能到达。如果照看皇帝的人决定隐瞒皇帝去世的消息，只要拖延两天再向外

宣布就可以了。而且，因为图拉真一生表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又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哈德良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尽管皇帝在临死前指定继承人的决定非常仓促，但是，当时的人们相信哈德良继承皇位是图拉真的真实心愿。

图拉真在哈德良10岁那年成为他的监护人，在随后的30年间，他们虽然时有分离，但是，作为监护人，很难想象图拉真会不了解形同儿子的哈德良的性格。

首先，他应该清楚哈德良在每个职位上都充分履行了他的职责。论责任心，哈德良完全没有问题。

其次，哈德良在历任公职时表现出来的、作为领导者的潜质尽人皆知。所以，说图拉真不放心他实在说不过去。

对于罗马人来说，只要哈德良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和对狩猎的嗜好不是太过分，都是“德”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图拉真在64岁之前，的确一直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按照图拉真的性格，如果说是因为担心将军中有一些人怀有对哈德良不满的情绪，这样的解释也让人难以接受。

按照我的想象，很可能是图拉真在哈德良身上看到了某种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那种东西或许可以叫做性情。它不会成为他讨厌哈德良的理由，但是，它会让他感到不安。这种东西在女人普洛蒂娜的眼里，是一种魅力，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对于男性图拉真来说，即使在理性上，他可以接受，但是，真要指定其为继承人，会让他犹豫再三。

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叫“临终”（in extremis），意思是最后时刻。现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都还在使用这个拉丁语。哈德良继承皇位正是在“in extremis”。

当上皇帝后，哈德良在安条克写了送往罗马元老院的第一封亲笔信。

信中，他首先为自己未等元老院同意就接受军团的忠诚宣誓表示了歉意。同时，他为自己的这种做法作了解释。他说帝国的统治不允许出现空白，即便是极为短暂的空白期。的确，从安条克到罗马，往返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或许元老院对此也深有同感，总之，对于哈德良登基，元老院的态度非常积极。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罗马皇帝只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才能正式成为皇帝。

信中还提出了一个请求，表面上看，这个请求似乎名正言顺，实际上，它暗含了非常深的含义，那就是把已故图拉真神化。这件事情同样必须征得元老院的同意，现任皇帝才能把它付诸实施。涅尔瓦统治罗马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也成了罗马诸神中的一个，就是因为图拉真提出把先皇神化并且在元老院接受这个请求后而得以实现的，所以，新皇帝只是请求把先皇神化而已。但是，在罗马，继承人至少与先皇要有养父子的关系。所以，如果图拉真成了神，那么养子哈德良就是“神之子”。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在恺撒被神化以后，尽管肉身依然是凡人，却成了“神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德良与奥古斯都一样。不同的是，因为图拉真的养父涅尔瓦也是神，所以，哈德良是两个神的“后代”。

拥有多达30万个神的罗马人，对于皇帝死后被神化，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但是，在政治上，“神之子”却拥有不容小觑的力量。之前他不过是集中了罗马帝国精英的元老院的一员，成为神之子后，就成了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奥古斯都充分理解并运用了神化的这一作用。不难想象，拒绝成为奥古斯都第二的哈德良，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哈德良身在安条克，已经早早开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作准备了。

身为皇帝的哈德良

作为皇帝，哈德良得到了正式名字，叫“Imoerator Caesar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同时，他的统治，按罗马人的说法叫“皇帝的日常作息”（dies imperi）——在堆积如山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开始了。

首先是犹太问题。发生在两年前，即公元115年的犹太教徒叛乱还没有完全镇压下去。为了彻底镇压这次叛乱，罗马派出了勇将托尔波。哈德良指示他尽快终结这场叛乱。犹太人有很强的散居倾向，只要地方合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定会有他们的居住区。所以，要稳定帝国东方，就不能允许犹太社会处于不安稳的状态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发生在不列颠的原住民暴动。不列颠原住民的居住地好像是后来的苏格兰与英格兰接壤的地带。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须皇帝亲征。因为在不列颠常年驻有3个军团。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里还会发生叛乱呢？犹太人造反是利用图拉真全力投入帕提亚远征的这个机会。同样，不列颠人也认为，此时正是奋起反抗罗马的好时机。因为当兵力集中在辽阔帝国的某个地方时，其余地方的防卫就会减弱。这种时候，减弱的不是实际的防御力量，而是防御的意识。骁勇善战的喀里多尼亚（今苏格兰）人正是瞄准了罗马驻军思想麻痹的机会发起了暴动。但是，正因为问题出自上层的思想意识，所以，只要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认真对待，态度严厉，驻扎在当地的军团兵就会受到感染。事实上，罗马军团刚一开始反击，不列颠问题就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是发生在北非毛里塔尼亚行省的叛乱。关于这次叛乱的详情不清楚，只知道，托尔波在结束对犹太人叛乱的镇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毛里塔尼亚行省，去解决此次叛乱。因此，这次叛乱在发生之初就被早早镇压了。但是，这次叛乱，性质与前面提到的两次叛乱不同。它不是在罗马发动帕提亚战争时借机而起的。

叛乱的主角好像是毛里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他们在达契亚战争和帕提亚战争中，作为罗马军队的组成部分，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事实上，这次事件反映出的是他们的队长卢修斯·昆图斯的态度。一方面，

看到后期的图拉真对帕提亚战争表现软弱，他大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对于哈德良继承皇位，他更是不满。所以，对哈德良来说，尽管这次叛乱规模很小，也必须予以镇压。

第四个问题是位于多瑙河北岸的萨尔马提亚人的问题，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罗马领土，哈德良决定亲自出马，理由是这个对手在他常驻布达佩斯、担任行省总督时曾经打过交道。当然，这只是表面理由，事实上还有一个不能公开的理由，那就是他要从帕提亚战争中撤出驻扎在多瑙河的军团。而皇帝亲自率领这支军团前去击退入侵蛮族的理由，可以模糊撤军的意图。

也就是说，刚刚登基的哈德良亟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不伤害罗马帝国名誉的前提下，结束先皇发起的帕提亚战争。

事实上，哈德良对这件事早有打算。有一位英国研究者说过："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和平必不可少。为了帝国的将来，哈德良决定冒险一搏。"而哈德良正是这样去做的。

奥古斯都曾经试图扩大对日耳曼的称霸，直至易北河。但是，继他之后的提比略皇帝则冒着风险，果断地把军团撤到了莱茵河沿岸。而哈德良面临的是与提比略相同的风险。此时，将士们还在摩拳擦掌准备继续战斗；元老院因罗马军队攻陷帕提亚首都还沉浸在欣喜之中，甚至他们一致同意，只要图拉真愿意，举办任何形式的凯旋仪式都可以接受。因此，哈德良要撤军，必须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承受来自将士们和元老院的反对和蔑视。

提比略皇帝把总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调到了东方，同时，把年年都要向日耳曼发起进攻的罗马军队留在了莱茵河畔的军事基地，从而实现了撤军日耳曼的计划。哈德良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哈德良被图拉真任命为指挥帕提亚战争的总司令官。但是，他以击

退萨尔马提亚人的入侵为由去了多瑙河前线。

于是，东方防线重新退回到了帕提亚战争开始之前、图拉真确立的从黑海到红海的防线。参加帕提亚战争的东方各军团也分别回到战争开始前各自的驻扎地，努力保护黑海至红海的防线。

哈德良对将军们的安置与提比略皇帝不同。日耳曼尼库斯被提比略调到东方，与属下将军们一起去了新的任职地。但是，前往多瑙河前线的哈德良没有采用调任的方法，他直接让将军们回罗马去了。理由是自图拉真登基皇位以来，一直与他同甘共苦的这些将军不能缺席专门为图拉真——实际上是图拉真的骨灰——在首都举办的凯旋仪式。当然，哈德良的真正用意是为他们事实上的隐退作准备，而且，结果也确实如此。在他们回到意大利本土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前线。

看到罗马军队不再打过来，帕提亚国王于是回到了首都泰西封。原本已经扩大到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反抗罗马的游击战活动，好像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偃旗息鼓了。帕提亚国王重新任命了帕提亚王室的一个人为亚美尼亚国王。哈德良表示接受。

一切又回到了帕提亚战争开始之前的状态，只不过哈德良没有归还帕提亚首都沦陷时图拉真缴获的黄金宝座和国王的女儿，也没有派人代表皇帝和帕提亚国王坐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为帕提亚和罗马回归和平签署正式条约。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使那些反对他的、已经显出端倪的暗火燃烧起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军总是不体面的。他希望尽可能低调地完成撤军。他把图拉真任命的亚美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斯调到帝国东方防线担任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即叙利亚行省总督，这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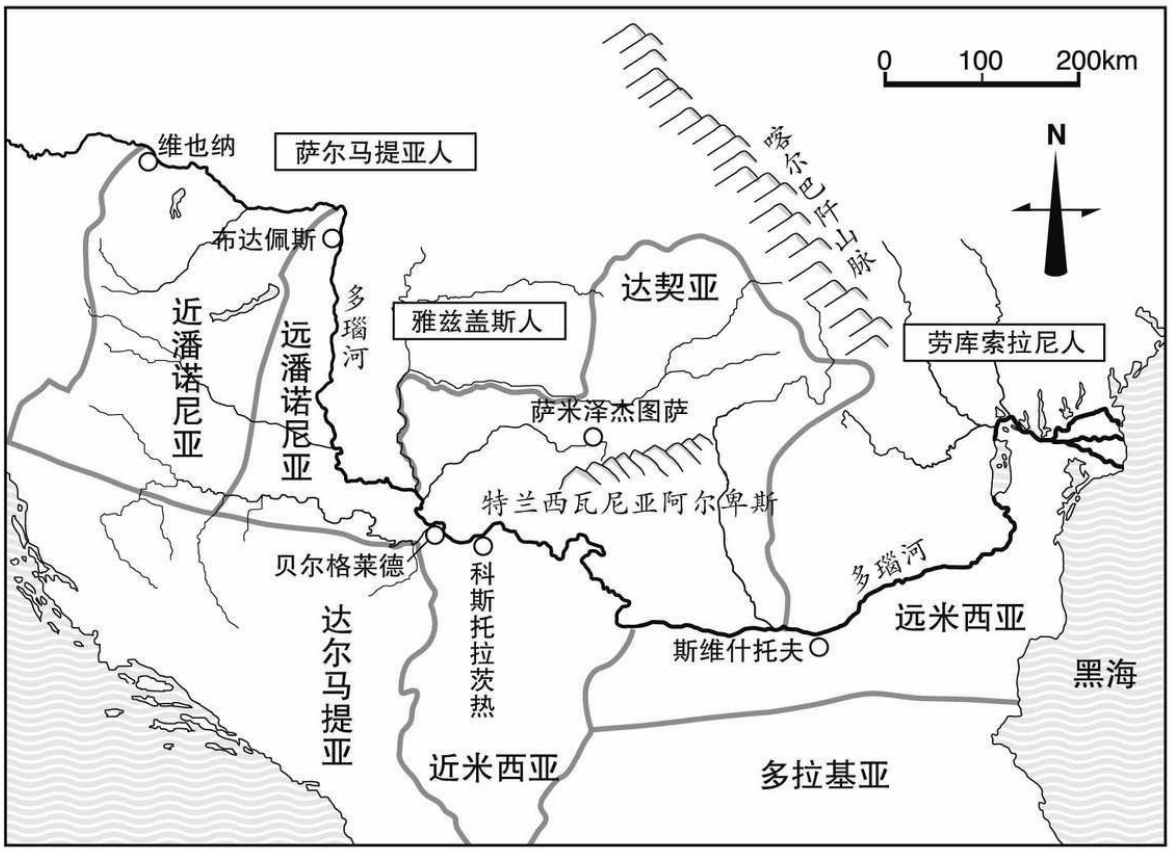
在东方结束了所有该做的事情后，哈德良于这一年的11月率领军团向西方出发了。部队穿过小亚细亚，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行军途中，他把随行的军团一个个安置在沿线的驻扎基

地。后来，有同时代的人评价哈德良是“immensi laboris”（不知疲倦的人）。他从不浪费机会和时间。

注入黑海的多瑙河下游北岸，夹在向北突出的达契亚行省和黑海之间，是劳库索拉尼人的居住地。该部族好像属于苏拉布人的一支。部族首领与哈德良进行了会谈，并成功缔结了同盟关系。按罗马惯例，哈德良向该部族的权贵们授予了罗马公民权。

第二年，即公元118年，哈德良来到了多瑙河中游地带。在达契亚行省和远潘诺尼亚行省之间，生活着雅兹盖斯部族。为了巩固与该部族之间的同盟关系，哈德良与该部族代表进行了谈判。从地图上看，你一定会奇怪罗马为什么没有把这里变成行省。如果这里变成行省，就可以大大缩短多瑙河防线。然而，对于长期与罗马保持同盟关系的部族，即使它是未开化的民族，罗马也会尊重它的独立地位。不过，从上面种种事例来看，哈德良似乎是一个喜欢通过上层之间的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人。

春天，皇帝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来到了远潘诺尼亚行省。在这里，他只能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萨尔马提亚人的问题。不过，他好像留在了布达佩斯的总督官邸，没有亲自出阵。因为英勇善战的将领托尔波在平息了毛里塔尼亚的叛乱后，已经来到多瑙河。他全权委托托尔波指挥作战，把这个蛮族远远地赶到多瑙河北部。这时，图拉真任命的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斗中阵亡了。



多瑙河流域

图拉真消灭了多瑙河北岸势力最大的达契亚王国，这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同时，也意味着达契亚人气焰嚣张时，悄无声息的中小部族开始猖獗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对手越分散越容易对付，但是，必须清楚，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外交手段，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蛮族的问题，是一件长期的任务。罗马人说这些人是蛮族，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罗马人不可相提并论，同时，也是法治民族罗马人对这些不习惯遵守承诺的人的蔑称。

在多瑙河前线逗留期间，哈德良收到了来自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的一封密信，内容是先皇的四位重臣正在密谋推翻他。

肃清

哈维迪乌斯·尼格里努斯——图拉真任命的达契亚行省第一任总督。在达契亚和帕提亚战争中是一位表现出色的将领，深受图拉真的信赖。

科尔涅利乌斯·帕尔马——横扫阿拉伯（今约旦）的功臣，阿拉伯行省第一任总督，两次当选执政官。

普布利乌斯·塞尔苏斯——也是图拉真手下的将军，同样当选过两次执政官，图拉真也只担任过三次执政官。

卢修斯·昆图斯——本书已多次提到过他。此人是出生于北非昔兰尼加（今利比亚）的将军，在达契亚和帕提亚战争期间，率领毛里塔尼亚骑兵勇敢征战，是图拉真事实上的左膀右臂。在图拉真记功柱上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图拉真。他和另外三人一样，仅凭“前执政官”的身份，当时的罗马人就知道他是元老院议员中属于地位最高一层的人。

哈德良不可能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英国研究者说过的那样，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和平必不可少。对于为确保和平，决心冒险一搏的哈德良来说，所谓的“危险”，就是因他的执政理念与图拉真的截然不同，因而受到攻击。

看完密信后，哈德良秘密派人给阿提安送去一封信，指示他马上采取行动。近卫军团中，有类似现在美利坚合众国FBI（联邦调查局）的职能部门。指挥官阿提安“马上采取了行动”，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在接到指挥官的命令后分头行事。

尼格里努斯在意大利北部法恩扎的别墅中被杀。

帕尔马在意大利中部特腊契纳的别墅中被杀。

塞尔苏斯在意大利南部拜亚的别墅中被杀。

昆图斯在旅途中被杀，不清楚他正要往哪里去。

这一结果让元老院备受打击，好像突然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首先，这四个人不是在被捕后判处死刑被杀，士兵也没有假扮成强盗半夜入室实施暗杀。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近卫军公然杀死的，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不曾有过。其次，这四个人都是“前执政官”。在图拉真统治的20年间，别说当选过执政官的议员，就连普通元老院议员，也没有一个人受到过谋杀皇帝罪或叛国罪的指控，更没有人因此罪名受到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担任过执政官的人中，有人受到过审判，那是因为他们在担任行省总督期间，实施苛政而遭到弹劾。因叛国罪受到审判的人一个也没有。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非常忌讳恺撒被杀事件重演。他把谋杀皇帝的行为等同于叛国行为，把叛国罪变成了法律。然而，这个法律被继他之后的几任皇帝利用来肃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在提比略、尼禄、图密善这三任皇帝的时代，皇帝和元老院关系不融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这个制度当成了清算反对派的武器。哈德良刚登上皇位，就杀死四个元老院中的有权势者，让元老院想起了曾经的噩梦。他们害怕图密善皇帝后期的恐怖政治会再次降临。

据说古代曾经发现过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里面对杀死四位前执政官作了辩解。哈德良声称自己没有下令杀死他们，杀他们是阿提安个人的意思。在《皇帝传》中，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论述。还有，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小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写的《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中，关于这件事情的解释也没有突破以往的说法。

尤瑟纳尔的这部著作是杰出的文学作品，采用了书信的形式。信是年事已高的哈德良在临死前，写给年轻的马可·奥勒留（哈德良之后的

第二任皇帝，被称为哲学家皇帝，是五贤帝中名气最大的）的。因为是老年哈德良的回忆，所以整部作品充满了忧郁的情绪。虽然这只是一部小说，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中，对相关事件的调查非常详尽。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找出它们的出处，或来自这个史料，或依据了那个史实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所著《尤里乌斯·恺撒的事业》堪称双璧之作。只是与生性乏味的、过于现实的恺撒相比，哈德良因为性格相对更具多面性，也更接近现代的人，所以作为小说主人公，写起来似乎更容易些。当然，布莱希特的作品写得非常传神，完美地展示了从共和制过渡到帝制的转变过程中恺撒那段充满了快乐的经历。

尤瑟纳尔描写哈德良的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据说因为这部作品，她作为女性，第一个成功跻身于法兰西学院。这本书的日语译本很早就有了，是多田智满子翻译的，题目叫《哈德良回忆录》，由白水社出版发行。在罗马时代的所有皇帝中，现代法国人最喜欢哈德良，想必也是尤瑟纳尔的功劳。先不论你是否接受尤瑟纳尔心目中的哈德良，至少《哈德良回忆录》是一部具有最高文学创作水平的杰作，它一定会让你享受到阅读这类杰作时的愉悦之情。

杀死四位前执政官可以说是哈德良一生中唯一的污点。那么关于这件事，尤瑟纳尔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对此，虽然篇幅较长，我还是打算作全文介绍而不是概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尤瑟纳尔表示敬意。因为我想，一篇佳作是不能够用概述来替代的。

> ……收到曾经的监护人送来的密信之时，正逢我接受萨尔马提亚人权贵们的归顺、即将返回意大利的时候。信中说，昆图斯回到罗马后，去见了帕尔马。还说，我们的对手利用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开始召集曾经的属下士兵。他还写道，只要这两个人继续密谋，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
> 我命令阿提安马上采取行动。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老人于是雷

厉风行地行动了。但是，他的行为超出了我的预想——他出击的结果是让我的对手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几个人在同一天被杀，相隔仅仅几个小时。塞尔苏斯在拜亚别墅中被杀，帕尔马在特腊契纳的别墅中被杀，尼格里努斯在法恩扎乡下的家门口被杀，昆图斯在结束与同伙的密谋后正准备上马回城的时候被杀。

一时间，首都罗马笼罩在恐怖之中。我那已不再年轻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表面上因为我的登基似乎放弃了自己的觊觎，内心里却正等待着看我出错。所以清除这四个人，一定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我的周围又一次充满了恶意中伤的谣言。

我是在回意大利的船上得知这一情况的，这让我非常震惊。无论是谁，一旦除掉了对手，一定会松口气。采取行动的人竟是我的监护人——一个长期以来对任何事情总是表现得无动于衷的老人。但是，在决定采取行动之时，他忘记了在以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我将生活在这四个人的死亡带来的阴影之中。

这让我回想起几件事：我想到了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因为肃清反对势力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污点的事实；我想到了尼禄在即位之初犯下的罪行，以及这些罪行与他后来的罪孽之间的关系；我还想到了图密善在最后几年虽然政绩平平，却在这一点上比起前面几位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失去了人性，他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虽然他身在皇宫中，却像是一头被逼到森林尽头穷途末路的野兽，最后只有面对死亡。

我的执政生涯从一开始就毁在了自己的手中。在有关我的记载里，这件事永远会出现在第一行，抹也抹不去。它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元老院——那个伟大又脆弱的政治集团，那个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团结一致的机构，一定忘不了他们的四位同僚因我的命令被杀这一事实。如此一来，那三个可恶的阴谋家和一个凶残的野兽就会被尊崇为殉道者吧。

我给阿提安送去一封信，严厉地命令他马上到布林迪西来，向

我解释他的所作所为。

他在港口附近一个旅馆的房间内等我。房间朝东，据说维吉尔就是死在这里的。我去的时候，他拖着一条腿到房间门口迎接我，他患了痛风。

当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从我的口中冲出的是一句又一句的批评和责备。

我对他说，我希望自己的执政是温和的、理想的，没想到我执政之初就杀死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罪有应得。尽管如此，至少也该摆摆样子。像这样缺少合法程序的处置，必定遭到众人的谴责。不管以后我的表现多么公正、多么宽容，这一次权力的滥用，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作为随时向我发难的口实。不仅如此，甚至连我的美德也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它将成为暴君传说的源头，再也难以在历史上抹去。

我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说，难道我就像嗜血成性的野兽那样，已经无法从人性的残忍一面中挣脱出来了吗？难道我也成为犯一次罪会导致犯另一次罪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子吗？

这位忠心耿耿的、年事已高的朋友，难道不是利用我内心希望尽快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的弱点，打着为了我的幌子，对长期以来他与尼格里努斯和帕尔马之间的不和作了了断吗？他不仅把我希望以和平方式推进的事业毁于一旦，而且把我回到罗马的执政经历变成了黑暗之旅。

老人问，可以坐下吗？坐下后，他把缠着绑腿的那条腿放到旁边的脚台上。我一边继续发泄着不满，一边把护膝盖在他那条病腿上。

他任由我一吐为快，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好像老师看着学生正勉为其难地背诵很难的课文一样。

我说完后，他用沉着的语调问我，你想过怎么对付反对你的这些人吗？他说，如果有必要，收集这四个人合谋试图杀你的证据并不难，虽然这有多大用处另说。他继续说道，要完成政权的顺利交

接，不排除异己是不可能的。我的职责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保证你的手是干净的。如果舆论要求有人作出牺牲，你把我从近卫军团指挥官的位置上撤下来就行了。我想，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他已经想好了对策，并建议我采用他的方案。他说，为了改善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如果需要我作出更大的牺牲，降我的职，流放我，我都愿意。

迄今为止，阿提安对我来说，是父亲，是一个忠实的领路人。他会给我零花钱，在我困难的日子里，给我鼓励。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他那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沉稳的面庞和静静地放在拐杖上的满是皱纹的双手。

很早，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总是装出很幸福的样子。因为他有深爱的妻子，虽然她身体不是太好；他有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他还有女儿的孩子们。他把自己朴实而强烈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外孙的身上，就像自己曾经的那样。他嗜好美食，喜欢希腊产的浮雕贝壳以及年轻的舞者。

但是，与所有这一切相比，他对我的爱总是放在第一位。在漫长的30年里，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护我，为我效力。

然而，我却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梦想，放在了他和我的关系之前。也许他认为对我真诚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却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太不可思议。他的真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理解，即没有一个人值得为之作出如此献身。即使到了这个年龄，我依然无法对此作出解释。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失去了地位。浮现在他脸上的笑容显示，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做。他知道，没有比立刻接受他的忠告更好的办法来回报昔日的友人。而且，敏锐的政治感觉证明，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对策时，尤其如此。

他不需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几个月的隐居生活之后，我成功为他争取到了元老院的议席。对于出身骑士阶级的人来说，这是最高

的荣誉。

他像个从不怠慢家人及工作的人那样，静静地安享富裕却不张扬的晚年。我也成了他家的常客，频频地前往位于阿尔巴诺山附近的他的别墅。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没有留下后遗症。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在会战前夜，进入罗马前，向恐怖之神供奉牺牲之类的事情已经成为往事一样。但是，我没有忘记，这次所供奉的牺牲中，还有阿提安。

……

多么动人的一个场面。作为同行，我不得不甘拜下风。在《哈德良回忆录》中，我想这应该是最动人的一个场面吧。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哈德良在得知四位前执政官的阴谋后，命令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马上采取行动”。那么，他所谓的“行动”难道只是逮捕这四个人，而没有杀掉他们的意思吗？

据说哈德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杀死四个人是阿提安擅自作出的决定。但是，有些事情，当事人不一定会说出真实情况。特别是当这件事必定会影响后世对自己的评价时更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认为当事人亲自写的就一定是事实，那就太幼稚了。还有，以哈德良所写的回忆录为基础，写成的《皇帝传》是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出版发行的作品，比哈德良时代整整晚了170多年。所以，它也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和其他“史实”一样，不得不思索一个永远不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被认为是史实的事情就一定是真相吗？

尤瑟纳尔的小说是立足于这一“史实”来写的。但是我想，也许她自身不希望哈德良身上有杀人的污点，不希望哈德良是个会做违反人性的事情的人。

那么，“马上采取行动”的“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采取行动，按照词典的解释，就是作出相应的处理。因为说是证据很容易找到，那么他的意思难道是拿证物证据，揭发并逮捕他们，然后进行有律师辩护的正式审判吗？

可是，如果那样做的话，难道就可以免遭非议吗？

罪名是叛国罪。这样的重罪要由元老院进行裁决。在先皇图拉真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被指控这一罪名，自然也就没有过这样的裁决。事实上，尽管作出裁决的是元老院，但是只要皇帝态度坚决，最后元老院总是会服从皇帝的意志。所以如果这四个阴谋家被宣布有罪，大概也会被执行死刑。但是，这样做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元老院议员们的恐慌呢？这样做难道就可以抹去以此罪名剪除政敌的事实吗？既然如此，那么，哈德良与提比略、尼禄以及图密善又有什么不同呢？图拉真从来不以叛国罪来置元老院议员于死地，而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却要用这一罪名来惩罚元老院中的四个位高权重者。因此可以说，他的处境极为不利。

君主或领袖的道德观与普通人的道德观不同。作为普通人，诚实、正直、忠诚和清廉是极好的美德。但是，作为公职人物，尤其是公职人物中地位最高的人，就不一定能守住这些美德。拉丁语中，同样一个词“美德”（virtus），如果是说普通人，可以翻译成“美德”。但是，如果是说公职人物，可以翻译成“才能”。但是，很多时候感觉这一译法似乎并不全面，所以屡屡被翻译成了“力量”。图拉真能做到普通人的道德观和皇帝的道德观相统一，是因为他功绩卓著。达契亚战争的胜利扩张了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如果有人试图谋杀图拉真，普通市民首先就不愿意，元老院也不会答应。正因为图拉真没有出现政敌的可能性，所以才无缘叛国罪。但是，哈德良不要说是扩张领土，就连战争他也决定远离，除非不得不打。不仅如此，为了把军队从图拉真远征之地撤回来，也做得小心翼翼，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还做好了遭到谴责的心

理准备。就像提比略，不惜违背奥古斯都的意愿，把军队从易北河撤到莱茵河时，作好了接受指责的心理准备一样。如果提比略不顾帝国全体的安全保障，而是和奥古斯都一样，一心要征服日耳曼，把称霸的脚步伸至易北河，元老院应该会支持他。还有，作为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塔西佗或许也不会那样指责提比略了。

如果说哈德良是在年事已高的监护人表白后才猛然醒悟的，那么在此之前难道他真的没有想过要杀掉这四个阴谋家吗？下令“马上采取行动”中的“行动”真的没有杀死的意思吗？杀死四个人真的是阿提安擅自作出的决定吗？

公元118年的当时，哈德良已经不是一个20或30来岁的年轻人，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再过半年，就要迎来43岁的生日。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在罗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官，资格年龄是40岁以上。

哈德良最出名的是他在统治期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了对帝国全域进行巡回视察上。他实施统治，一定亲力亲为。无论什么事，他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实际观察，然后作出判断。这就是他的性格。任何事情，必须由他自己来作决定。所以，对于先皇的四个重臣，同时又是元老院中的位高权重者，哈德良下达的命令，可能会是含糊其词的“采取行动”这么简单吗？再说了，他回到罗马以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对策。

如果用写小说的手法，对这件事情进行改写，我会假设哈德良下达的“采取行动”的命令中，包括杀死这四个人。

……我那年事已高的监护人等候在港口附近旅馆的一室内，拖着一条腿到房间门口前来迎接我。他患了痛风。

老人对着已是皇帝的我问，可以坐下吗？在椅子上坐下后，他

把缠着绑腿的那条腿放到旁边的脚台上。我很自然地把护膝盖在了他那条病腿上。

从我10岁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提安经常给我零花钱，在我困难的日子里会给我鼓励。他脸上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态度沉稳，那双满是皱纹的手静静地放在拐杖上面。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他似的，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毅然开口道：

“请你辞去近卫军团指挥官的职务。”

看到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被免去近卫军团指挥官之职后，阿提安过了几个月的隐居生活。随后，我成功地为他争取到了元老院的议席。对于出身骑士阶级的人来说，这是最高荣誉。

他的别墅位于阿尔巴诺山附近，我成了这座别墅里的常客。阿提安很富裕，但是不张扬，他非常满足于过安静的晚年生活。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提起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如果有人批评我的这篇文章缺乏文学色彩，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但是，政治是无情的。如果你不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更别提要实现人人幸福的目标。从政，权力基础稳固是前提。如果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的行使就不能贯穿始终。

我和一些学者不同，我不认为哈德良采取了转嫁责任的做法。我完全同意尤瑟纳尔的意见，是阿提安主动作出了牺牲。所谓牺牲，根据词典的解释，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虽死犹生。领袖身边有一个愿意为自己牺牲的人，我认为这就是领袖的“美德”力量。

挽回失地

公元118年7月，在离开罗马11个月之后，哈德良以皇帝的身份首次回到首都，迎接他的是罗马冷冰冰的气氛。哈德良以皇帝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时候，元老院议员们个个面孔紧绷，表情漠然。会上，42岁的皇帝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杀死四位前执政官不是自己的本意。虽然在接到有人密谋加害皇帝的报告后，曾下令马上采取行动。但是，我的本意只是要求查实此事，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行动。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误解了我的意思，擅自作出了杀人的决定。因此，我决定免去阿提安近卫军团指挥官的职务。"

接着，哈德良庄重起誓，以后不经正式审判绝不乱杀一位元老院议员，这样的不幸事件绝不会再发生。然后，他又明确表态，即使元老院议员应该受到处罚，那也要经过元老院的审判，而且在超过半数的元老院议员投票认为有罪的情况下，才实施惩罚。

议员们的表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因为哈德良没有像图拉真刚登基时那样，明确表态说绝不用叛国罪来惩处元老院议员。而且，他们也许在心里暗自思忖，刚刚杀死四个反对派，居然还能这样发誓。

哈德良希望元老院议员理解政治必须无情，在这一点上，他显然过于现实。因为，罗马帝国的正式掌权者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

回到首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德良大刀阔斧地作了一系列决定，让认真严肃的税务人员大跌眼镜。

为庆祝皇帝登基，哈德良向公民权所有者发放每人70第纳尔银币的一次性赏金。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的。因为在图拉真死后，哈德良接受忠诚宣誓时，为了削弱从帕提亚撤军的印象，已经向军团兵发放了一次性赏金，他们都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

除了"赏金"，哈德良还热心组织公民们热衷的表演，在圆形竞技场举办了角斗士比赛，在大竞技场举行了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比赛等等。

只是，这些事情都不是哈德良的首创，任何一位皇帝登基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不过是承袭了以往的惯例而已。举办这些活动、发放赏金的理由是和公民们同庆皇帝登基，所以，所需资金要从皇帝公库中支出。哈德良发放的一次性赏金，金额是其他皇帝的两倍。

哈德良收买人心的策略不只针对首都罗马公民。按照惯例，皇帝登基时，意大利本土的地方自治体及行省要向新皇帝赠送黄金制作的头冠。哈德良决定免去本土地方自治体的贺礼，来自行省的贺礼减半。这个决定的意义不只是减税这么简单。在古代，赠送黄金制作的头冠是表示恭顺的意思。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收到过不计其数的黄金头冠。免去这样的贺礼，意味着本土地方自治体从此与首都罗马的地位完全平等，行省也向平等迈出了一步。哈德良还把这一决定变成了法律，所以，只要不修改此项规定，作为帝国政策，它就要执行下去。

研究者中有人认为最早取消头冠贺礼的是图拉真。不管怎样，正是这两位出身于行省的皇帝，让意大利本土和行省开始走向平等。至于哈德良的下一个决定，图拉真一定做梦也没有想过。尽管这件事情实际上毫无必要。

要让这件事情收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必须出其不意，同时必须大获成功。就在几年前刚刚建成完工的、墙体还在发出耀眼光芒的白色图拉真广场上，他宣布，税金的滞纳部分一笔勾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皇帝有过如此大的手笔。中央矗立着先皇图拉真骑马雕像的开阔广场上，记录有未纳税人名单及金额的纸莎草文书堆积如山。熊熊燃起的大火把这些文书变成了灰烬。勾销滞纳金的这一举措，不仅惠及滞纳者本人，也惠及了其家族子孙。为此，皇帝公库和国库的岁入至少减少了9亿塞斯特斯。不明就里汇聚而来的市民们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情不自禁地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狂欢庆贺。

至此，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如果就此结束的话，辛勤劳作、规规矩矩纳税的人就会吃亏。哈德良深知只有建立一个正直人不吃

亏的社会才是善政的根本，他自然不会忘记要实施公平的税收制度。他决定，以后每隔15年登记一次不动产，根据不动产的价值来决定征税额。拖欠税款的不只是那些精明人以及生性懒惰者。因为“人口普查”（census）是30年到40年进行一次，其间，资产的价值难免会发生变化。为此，出现了很多愿意缴税却不能缴的人。

所谓公平的税收制度，换一个说法，我想应该是一种惠及面广并且浅显易懂的课税制度。根据研究者们的研究，罗马帝国已经实施了公平的税收制度。既然对税制有这样的认识，罗马的皇帝们自然会极力避免提高税率。关税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营业税为“百分之一”（centesima）、国有土地租赁费（因为几乎是永久性的，所以可以认为是税）为“十分之一”（decima）的固定税率，就是税率没有变化的最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哈德良也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在这样努力推行公平税制的同时，哈德良也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只是图拉真已经把很多福利变成了制度，所以哈德良只是对这些制度作了微调，以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它们是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养育资金的育英基金制度，向中小规模的农业及手工业者提供低息贷款的贷款基金制度，向元老院阶级中经济困窘的人提供援助的制度，向母亲品行不端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贫困母子家庭提供资助的制度。最后一条是哈德良的首创，附加了母亲品行不端以外的原因这一条件，很有意思。可见，罗马帝国的福利援助对象，必须是自身努力的人。

作为统治者，哈德良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无须把所有事情制度化或法制化。现代研究者中，有一个人评价哈德良是“功能和效率的信奉者”。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围绕着皇帝哈德良的气氛彻底改变。虽然元老院议员中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那次事件，但是，普通市民因为那件事本来就和自己没有关系，它只是特权阶层的不幸，所以，把它从记忆中删除，没有任何抵触。

这一时期，哈德良连续发行了新的银币和铜币。之所以没有发行金币，是因为银币和铜币的流通量远多于金币。大家都会使用的流通货币，也是罗马为政者用于政策宣传的媒体。哈德良在这些罗马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统治宗旨，它们是：

宽容（Pietas）

和睦（Concordia）

公正（Iustitia）

和平（Pax）

罗马帝国统治的最高权力者是皇帝。所以，刻在货币上的这些政见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哈德良。而施行这些政策的基础，因为图拉真的四位重臣已经除掉而变得非常完美。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举措就是为了让人们忘记曾经杀害四位前执政官的话，哈德良也太可怜了。善于运用政治策略的人，做任何事情绝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哈德良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元老院和市民们忘掉远征帕提亚无功而返的事情。罗马人确信自己才是霸权者。正因为他们信念如此坚定，所以才愿意承担起保障帝国安全的重任，甚至作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既然罗马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撤离远征之地更有损霸权者的声誉，没有一件事情比撤军远征之地更动摇作为霸权者的信心。

为了达到这一真正目的，哈德良不惜说了谎。在元老院，他说："图拉真决定回罗马前任命自己担任远征军总司令官的时候，重病在身的先皇指示我从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撤军，我服从了先皇的意志。"

按照图拉真的性格，即使他心里承认远征帕提亚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绝不可能说出"撤军"两个字。但是，可以证明此事的四个人已经

被杀，死无对证。虽然除了这四个人外，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也能作证，但是，他是哈德良的忠实支持者，无论说谎还是做别的什么，他都会站在哈德良一边。

此外，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此事，只要她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个人就是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但是，她和阿提安一样，也是哈德良的支持者。她保持了沉默。先皇的皇后好像离开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在宫廷举办的公共活动及私人宴席上都见不到她的身影。她回归宁静的生活，享受自小热爱的希腊文化。如果说她做了什么带点官方性质的工作的话，那就是担任了希腊哲学研究团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希腊哲学研究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尼禄的母亲阿格丽皮娜让他的儿子非常讨厌自己，是因为她动不动就会说："你当上皇帝都是我的功劳。"阿格丽皮娜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后代，在罗马社会属于贵族阶层。相反，普洛蒂娜只是出身于法国南部行省的一个女人，充其量只有世袭的罗马公民权。但是，说到生活品位，也许真的跟血脉没有关系。普洛蒂娜和哈德良都住在意大利本土，但是，两人之间好像仅限于偶尔的通信。哈德良因为被图拉真收做了养子，所以，在户籍上他们是母子关系。

在第一年放手实施笼络人心的政策后，第二年，哈德良也没有离开意大利本土。市民们很高兴看到皇帝留在首都。在斗兽场或竞技场的贵宾席上，只要看到有皇帝在，大家就会觉得很安心。从哈德良的角度来说，他留在罗马是为了监督各项政策是否得到了落实，同时，还要让大家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是个好皇帝。

他甚至没有出去打猎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罗马人认为，打猎是东方君主的嗜好。这一点，只要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就知道了，因为他也有这个爱好。而且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诸国君主们，也都继承了他的这一爱好。除了希腊诸国的君主，罗马人还知道，东方的各君主，从帕提亚国王、亚美尼亚国王到贝都因的酋长，在爱好打猎方面，兴趣

完全一致。还有一个原因，在意大利境内，所谓的狩猎，充其量就是追逐野猪或者鹿，这对于以捕猎狮子为梦想的哈德良来说，完全满足不了他的兴趣。

哈德良的另一个爱好是希腊文化。这个时期，哈德良同样没有表现出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一方面是为了不引起元老院中保守派的疑心，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被普通市民看做是与尼禄、图密善一样的皇帝，因为这两位皇帝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尽人皆知。不管怎样，他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要让大家承认自己是个好皇帝非常不易。

只要不是因为外出巡视意大利各地，或者有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的工作，他一定出席元老院会议。和其他议员一样，他会起身欢迎担任议长的执政官，并积极参与讨论。每一次他都不忘作出这样的声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作为皇帝，在必要时行使权力是为了罗马公民，而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他拒绝一切为他举行的竞技活动，除非庆祝他的生日。他努力和所有元老院议员平等相处。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总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他努力以“第一公民”而不是“皇帝”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作为皇帝，职责之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由于图拉真做得很彻底，所以，几乎没有必要再建新的基础设施。维护修缮工作随时都在做，所以，这一时期，哈德良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已经神化的先皇建一座神殿。图拉真广场建设之初，神殿的基础已经打好，设计也已经完成。在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的指挥下，这项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

作为“第一公民”，他的工作不只是参加元老院会议。罗马有一项法律，是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凡是教师和医生，不分人种、不论民族，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条件是，用合理的价格传授知识、医治病人。这项制度在当时依然有效，所以在罗马，诊疗所很多。只是，大规模的医院设施只有“台伯河中岛”上有。哈德良去那里看望了接受治疗的病人。

同样也是拜恺撒制定的这项法律所赐，在首都罗马，有很多私塾。但是，没有一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学府，大学一直是罗马称霸以前就很出名的希腊雅典、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罗得岛、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专利。所以，在罗马，就算哈德良想访问大学也无处可去。如果首都罗马或意大利本土有大学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去的。因为无论是慰问病人，还是激励学生，访问的根本目的并没有多大区别。

因此，不知疲倦、埋头苦干的哈德良，这个时期关心的对象是一般民众。只是，如果过分关注的话，即便是哈德良，难免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在首都，公共浴场多如牛毛。一天午后，皇帝去了其中一家公共浴场，很可能是图拉真浴场。在当时，这个浴场不仅新而且大，还很壮观，所以最受市民的欢迎，去的人也最多。去公共浴场与市民一起享受泡浴，是标榜自己民主的皇帝们常做的事情，所以哈德良不是第一个。但是，去浴场的次数，哈德良无疑最多。也许有人会担心保安的问题。但是，在浴场，所有人都是裸身。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在罗马史上，公共浴场内没有发生过一起行刺事件。或许这里比元老院会场，甚至比皇宫还要安全。在罗马，无论是雕像，还是竞技选手，罗马人早已看惯了裸体。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自己的肉体变老变丑，相信也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众人面前。皇宫里有正式的罗马式浴池。好在哈德良本来身体就很健美强壮，再加上这个时期他才40岁出头，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所以，他才会经常去公共浴场，在那里，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和大家一样赤身裸体。

这天午后，哈德良看到一位老者胡乱地在身上抹完肥皂（不是现在的肥皂，但是用途与肥皂相似）后，用力在浴场的墙壁上上下来回地蹭后背。记忆力超群的哈德良记起了这位老者曾经是自己手下的一名百人队队长。于是，他把他叫过来，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上了年纪的百人队队长自然认识哈德良。虽然现在是皇帝和市民的

关系，但是，他曾经是哈德良称为战友的士兵中的一人。他实实在在地回答说自己没有钱雇人帮自己搓澡。在古代，所谓搓澡，是用类似于小型镰刀的工具把身上的泥垢刮下去。也许你会担心会不会受伤。但是，那是个用小刀剃胡子的时代，所以，尽管刀具很锋利，只要熟练就不会有问题。

深表同情的哈德良于是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昔日部下专门搓澡的奴隶，一送就是两个，而且，雇用奴隶所需的费用也帮他出了。老兵感激涕零自不必说，而哈德良自己也心满意足地走在了回皇宫的路上。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下午再次走进浴场的哈德良，看到的是站在墙前蹭背的老人站了满满一墙。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应付这一场面的。或许刚看到时大吃了一惊，继而哑然失笑吧。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老人们的公开表演一无所获，以及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一事件成了市民们最开心的谈资笑料。

不管怎样，在透着寒冷的气氛中回到罗马的哈德良，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彻底改变了罗马公民对自己的看法。甚至，哈德良认为，自己离开首都罗马或离开意大利本土，已经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

两种除垢刀

是，统治的组织架构已经非常稳固，即使皇帝不在，“内阁”依然可以正常运转。但凡是功能和效率的信奉者，不用说，他一定知道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评价哈德良是“天才型组织者”。而哈德良进行的巡回视察，则成了尽情发挥他组织才能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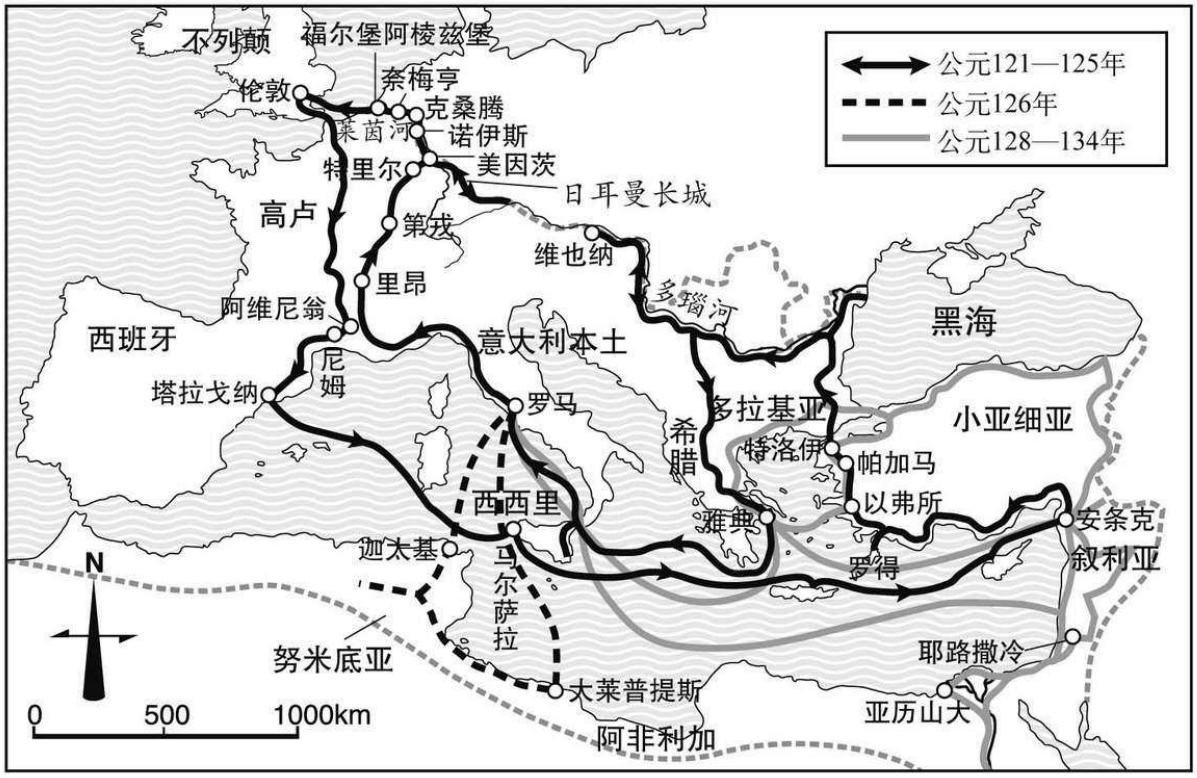
哈德良的“旅行”

罗马皇帝出门在外的时间之多超乎想象。原因是皇帝为了履行他的职责，必须作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所谓皇帝的职责，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有效统治行省，三是完善帝国境内的基础设施。但是，迄今为止，皇帝在全帝国境内进行巡回视察好像没有计划性。只有需要皇帝亲自出马时，皇帝才会出行。有战争的时候，皇帝出动的目的是亲征。既然到了这个地方，自然他会顺便视察周边地区的统治情况，同时，尽可能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对皇帝来说，实地考察非常有用。历任皇帝中，只有提比略自登基后，从未离开过意大利本土。那是因为，在56岁那年继承皇位以前，作为先皇奥古斯都的军队司令官，他的足迹几乎已经踏遍了帝国的重要地域。而且，当了皇帝以后，由于边防建设做得很彻底，所以，没有发生需要皇帝亲征的战争。就连图拉真皇帝，尽管发动了达契亚和帕提亚两场大的战争，在其统治期间，除了为军事目的，他也没有“旅行”过。没有公共事务的需要，罗马皇帝一般不会“旅行”。如果以旅游为目的离开罗马的话，一定会受到元老院和市民们的批评。尼禄皇帝之所以遭到抨击，正是因为他游览了他向往的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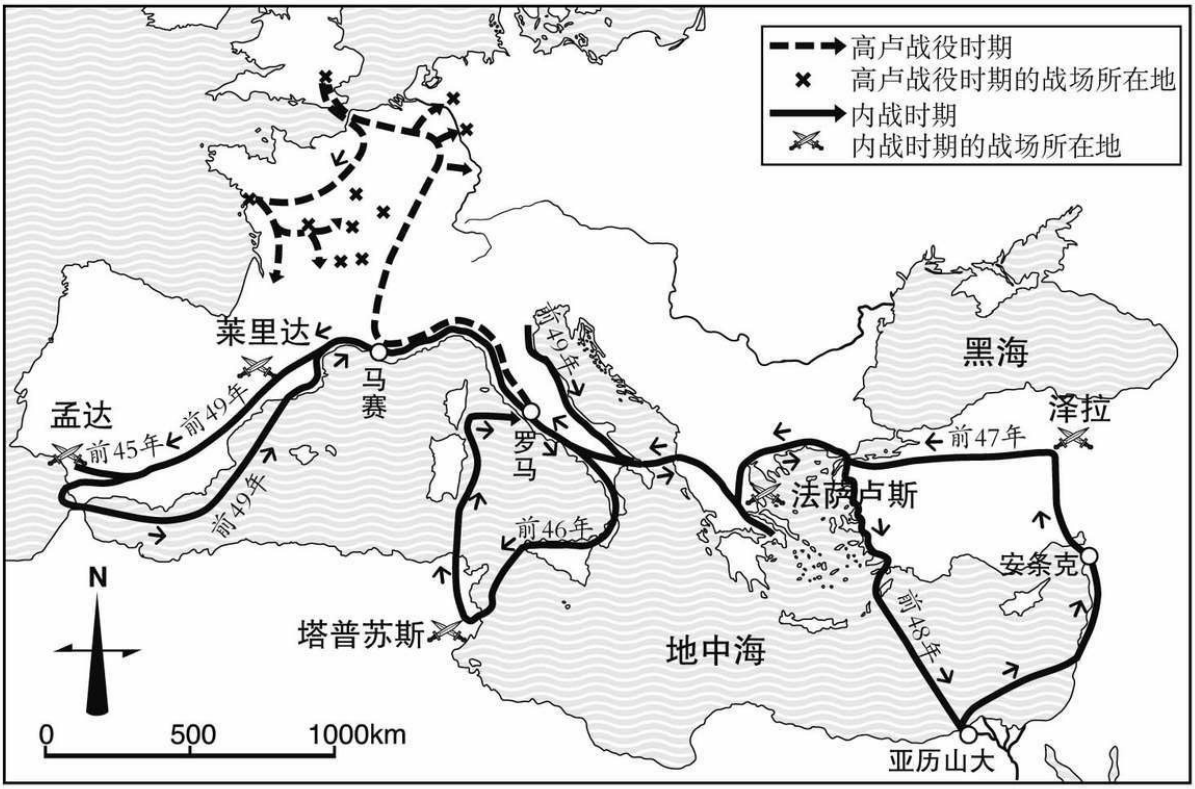
但是，哈德良没有在意罗马人的这种想法，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旅行”，目的是视察，并根据视察情况，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从他“旅行”的全过程来看，没有一位皇帝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范围也极广。唯一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事实上的第一代皇帝尤里乌斯·恺撒。但是，恺撒到过很多地方是因为转战各地的需要，而且，正因为他是恺撒，所以，在前往下一个战场的途中，常常就

便解决了希腊系居民和犹太系居民在经济权利方面的矛盾（很显然，这类工作是属于皇帝行省统治的职责范畴）。

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哈德良出行时，一个军团都不带。罗马人是一个崇尚现实的民族，只要皇帝的所作所为有成效，他们就不会向皇帝发难。这是哈德良敢于外出“旅行”的根本原因。然而，要让人们看到“旅行”的成果需要时间。因此，哈德良通过发行货币让人们随时了解自己的行踪。在货币上，印上当时的罗马人很容易理解的象征性图案和文字。例如，生活在帝国西部的人们，只要看到全新的银币和铜币，马上就会知道，皇帝视察了东部的以弗所等等。元老院因为会有报告送来，自然知道皇帝的行踪，而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其他地方的居民，通过新发行的货币也能了解自己的皇帝此时在何处。所以，从意图上来说，哈德良的做法与图拉真把建在多瑙河上的石结构大桥和被征服的达契亚的象征性图案刻在货币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刻在货币上的图案和文字与战争的主题无关。


不列颠
福尔堡阿棱兹堡
奈梅亨
伦敦
克桑腾
莱茵河
诺伊斯
特里尔
美因茨
日耳曼长城
高卢
第戎
维也纳
里昂
多瑙河
阿维尼翁
西班牙
意大利本土
黑海
尼姆
塔拉戈纳
罗马
多拉基亚
希腊
小亚细亚
特洛伊
帕加马
以弗所
西西里
雅典
安条克
迦太基
马尔萨拉
罗得
叙利亚
努米底亚
耶路撒冷
大莱普提斯
亚历山大
阿非利加
N
0
500
1000km
公元121—125年
公元126年
公元128—134年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尤里乌斯· 恺撒转战各地

正因为他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作为后人，尽管看不到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也能找到哈德良旅行的路线。对于哈德良来说，所到之处，只要有需要，马上着手解决问题是常事。于是，这些地方都会立起一块记录这件事的石碑。通过这些史料，我们知道哈德良的巡视，不是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是走走形式，夜夜歌舞升平的那种。哈德良巡视过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边境及偏远地区。因为他要视察的是边防设施，所以自然会是这样的地方。

哈德良出行不带军团，甚至带皇后一起出行也只有一次。但是，哈德良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地、由着性子走到哪儿是哪儿，也不像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皇帝出行会带很多不干事的宫里人，常常与他随行的是一支建筑领域的专家队伍。此外，他也带过诗人一起出行，在旅途中可以陪自己聊聊天。只要不是不适宜旅行的冬季，在显示皇帝所到之处的货币发行时，哈德良已经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他的确是一

个“immense laboris”（不知疲倦的人）。

公元121年，新的一年到了。1月24日是哈德良的生日。41岁半登基的哈德良迎来了自己的45岁。为庆祝皇帝生日，首都罗马举行了竞技会。与往年的生日不同，这一年，皇帝向全体市民发放了一次性赏金。理由很充分，就是提前祝皇帝巡回视察圆满成功。

4月21日是罗马的建国纪念日。大家都相信罗马建国是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由罗穆路斯创建。每年的这一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已成惯例，皇帝兼任大祭司。在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里，哈德良以祭司的形象，用托加的一端遮住头部，主持了这一神圣的庆祝仪式。仪式结束后，皇帝宣布要在首都罗马建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殿。根据神话传说，罗马建国始祖罗穆路斯是维纳斯女神的后代，传承了女神的血脉。

就这样，哈德良在动身踏上旅途之际，作好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准备。换言之，他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避免元老院和公民们产生被皇帝抛弃的感觉。第一个目的地是帝国西部。

为什么他最先去的不是东部而是西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帝国东半部在结束帕提亚战争的时候，哈德良已经大体上完成了设施的建设。

莱茵河

从首都罗马出发，沿罗马古道北上，进入相当于现代法国南部的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然后顺罗讷河逆流而上到达里昂。在罗马时代，里昂叫吕格杜努姆。可以认为，这个城市是除去法国南部之外的、整个高卢的中心。

尤里乌斯·恺撒在征服高卢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作为失败一方的

高卢各部族的聚居地。后来的皇帝们继承恺撒的做法，建设大道，把这些城市连了起来。所以，在罗马时代盛极一时的高卢城市，源于罗马人建设的城市极少，而里昂就是这极少的城市之一。里昂是罗马人建起来的城市，在古代，它的地位远比巴黎重要。如果单纯从地理条件上作比较，在法国，显然巴黎要优越得多。但是，如果把罗马帝国西部全都考虑进去的话，无疑里昂更加重要。因为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还是意大利半岛，亦或是莱茵河前线，从里昂去这些地方，几乎都是等距离的。

除了驻扎在莱茵河沿岸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军团以外，在包括法国南部的高卢全境，罗马没有派一个军团常驻。里昂也只有一个大队，不到500人的士兵实在称不上是常驻军队。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把皇帝职权范围内的金银币铸造厂设在了里昂。铜币的铸造权在元老院，所以，铸造厂就设在首都罗马。

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高卢后，战后处理做得非常完美，以至于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经过了200年以后，罗马仅在高卢东端的斯特拉斯堡派驻了一个军团，而该军团的主要任务只是守卫莱茵河防线。这样的事实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好的政治路线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的节减。

正因为高卢是罗马化的典范，哈德良在里昂的任务非常简单。他无须视察高卢全境，在里昂只逗留了几天，就出发前往莱茵河防线。

从里昂沿罗马大道北上，经过第比奥（今第戎）后，继续北上，到达摩泽尔沿岸的奥古斯塔特雷维罗伦（今特里尔）。这里是特雷维利人的家乡，奥古斯都把它建成了一座城市，比利时行省的首府就设在了这里。哈德良把莱茵河防线的所有负责人召集到了特里尔。从莱茵河河口到日耳曼长城的莱茵河防线，自北向南，有基地位于贝特拉（今克桑腾）和波纳（今波恩）的低地日耳曼2个军团、基地位于莫根提亚肯（今美因茨）和阿尔金图拉特（今斯特拉斯堡）的高地日耳曼2个军团，共计4个军团负责。把高地日耳曼、低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两位总

督和两位总督指挥下的4个军团的军团长以及在各基地任职的高层士官们召集起来，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特里尔。因为这里是与各基地相连的大路交会处。

特里尔会议的议程一定是前线的现状汇报。会议结束后，哈德良沿莱茵河去了美因茨，目的是视察前线。因为没有蛮族来袭的报告，所以我想，他一定带上了所有参加特里尔会议的人。一位指挥官，如果只了解自己负责的区域，那么要让这个区域的防卫做到尽善尽美绝无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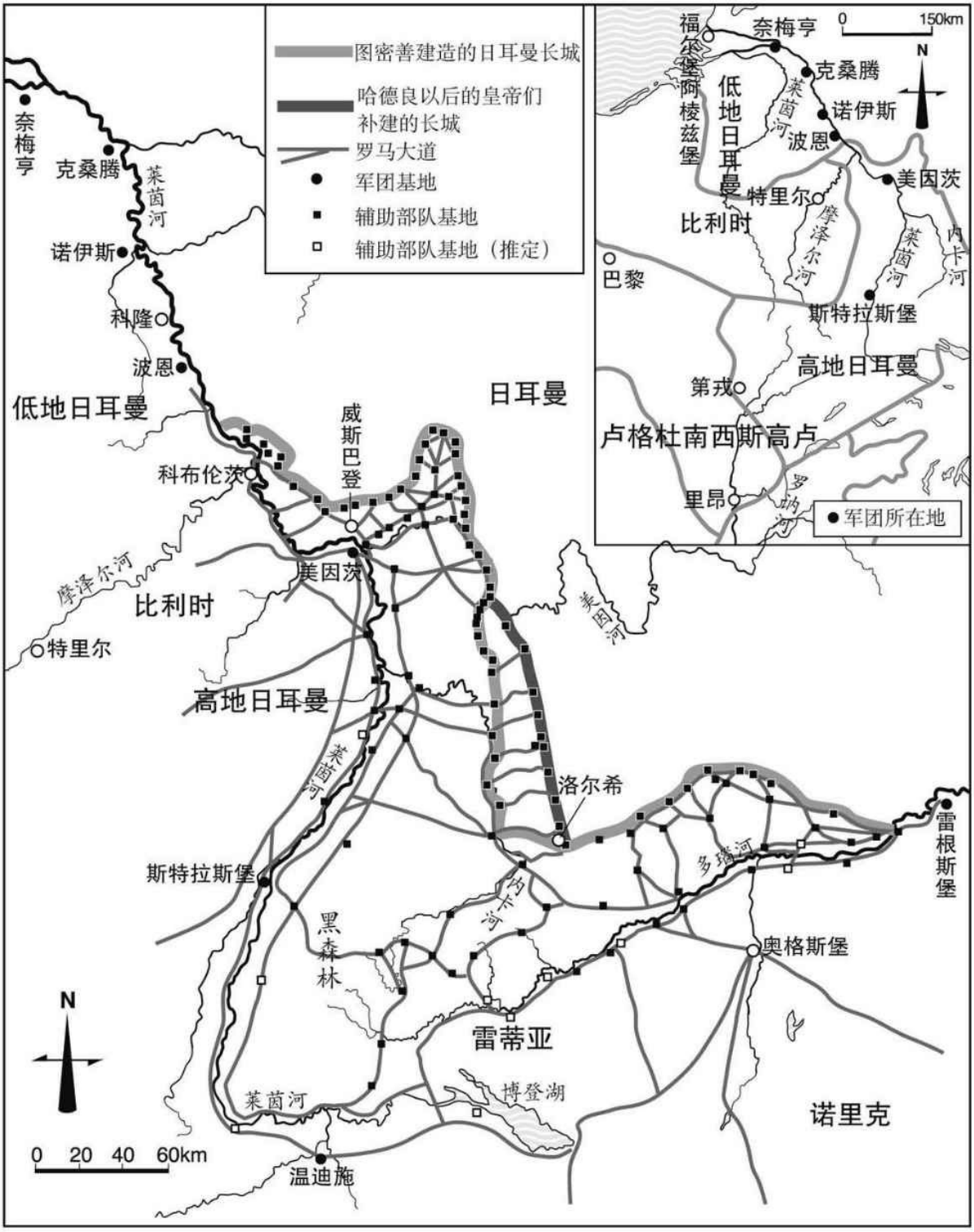
视察整个莱茵河防线，首先从日耳曼长城开始。视察过程中，发现问题当即确定解决方案并立即执行。在图密善皇帝所建日耳曼长城中间地段，往东增建了约30公里，就是这个时期哈德良视察的成果。

其间，哈德良始终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在一起。

结束对日耳曼长城的视察后，皇帝一行回到美因茨，顺着莱茵河的流向，又视察了低地日耳曼防线。此时已进入公元121年的秋天。

在这里，他还视察了波恩。这里是第二次达契亚战争期间，他指挥过的第一涅尔瓦军团的驻扎地。他也视察了军团的分队基地诺瓦埃吉姆（今诺伊斯）和图拉真组编的第三十乌尔庇乌斯军团驻扎的克桑腾。随后，经过莱茵河河口附近的分队基地诺维奥马基（今奈梅亨），在河口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科林哈德良”（意思是“哈德良广场”。——译者注）。这一带现在属于荷兰境内。在罗马时代，罗马的手已经伸到了包括乌特勒支在内的莱茵河河口一带。在当时，乌特勒支叫特莱尔腾。顺便提一句，现在位于福尔堡阿棱兹堡的科林哈德良并不是军团及其分队驻守的基地，这里是罗马帝国的自治体之一，原住民有自治权，在当时叫“地方自治体”。当然，承认其自治权的是哈德良。这个地处偏僻的穷乡僻壤，得到了一个文明的名字——科林哈德良。也许你会想到，哈德良之所以给这个地方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里也建了一个广场吧。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能等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不管怎样，哈德良巡视

的第一年，全部花在了莱茵河防线。



日耳曼长城[出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和莱茵河防线（右上图）]

日耳曼长城与罗马在其他地区的防御体系一样，由碉堡、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和纵横交织的罗马大道构成。

这年冬天，他就在该前线的某个基地度过。考虑到第二年春季的日程，他过冬的地点应该离河口很近。在北欧严寒的冬季里，就连青壮年男子也不敢轻易走出户外，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很可能住在以基地为中心的、军民混住的城里，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克桑腾度过，而不是在只有军人居住的军团基地。

重建

哈德良在视察莱茵河防线期间，做了所有在以后巡视其他地方时，同样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重建防御体系。不是改变防线的位置，也不是迁址军团基地，更不是改造联结各基地的道路网，他对整个防御体系进行了合理的重建。对设施已经退化的地方，毫不犹豫地加以修复；需要加固的地方立即予以加固，使整个防线更符合现状的需要。一位研究者对哈德良所做的事业给出的评价是“重建”（shake-up），翻译成日语应该是“革新”。

接触罗马史，感受最强烈的是罗马人做事情一以贯之的延续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阿皮亚大道。阿庇乌斯把大道从罗马修到了加普亚；继他之后的人从加普亚修到了贝内文托；接下来的一个人又从贝内文托修到了塔兰托；再后来的什么人从塔兰托修到了布林迪西。至此，阿皮亚大道才算完成。在这条大道建设完成后，罗马人依然还在继续。尤里乌斯·恺撒对阿皮亚大道进行了全线修复。奥古斯都也对弗拉米尼亚大道实施了全线修复。以他们为代表，其后的皇帝和权贵们不断对已有设施进行修复或扩建。在罗马人看来，重建和新建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公共事业。如阿皮亚图拉真大道。图拉真认为与其绕山路南下，不如直达海岸线再南下更合理。于是，他在贝内文托，把这条大道一分

为二，直接修到了布林迪西。阿皮亚大道是第一条罗马式大道，又是南下的干线道路，在当时被誉为“大道女王”。即便是这样一条道路，罗马人也没有特殊对待。只要需要，就毅然决然地进行重建；如果不需要，就不作修改。假如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那么，罗马人堪称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哈德良出身于西班牙，但是，他也是真正的罗马人。以莱茵河防线为例，哈德良需要做的只是“革新”，因为之前的几位皇帝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里乌斯·恺撒最早确定这条防线；提比略稳定了这条防线；图密善通过建设日耳曼长城，进一步提高了这条防线的作用。

那么，哈德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实现帝国安全保障的重建呢？

所谓组织工作，不管它本身多么完善，决定其职能的终究是人。哈德良在人事安排上，可谓颇费心思。

高地日耳曼和低地日耳曼这两个行省的总督都是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司令官。前线行省相当于军事行省，所以，总督是军事和民事两方面的负责人。担任这样的总督，可以没有当选过执政官，但是，担任过法务官是基本条件。因为只懂军事的人成不了真正的军事家。前线行省通称皇帝行省，属于皇帝的管辖范围，总督任免权都在皇帝手中。哈德良巡视高地日耳曼、低地日耳曼两个行省时，两位总督都是先皇图拉真任命的。也许是图拉真眼光确实不错，哈德良没有换掉他们。但是，在巡视其他地方时，哈德良撤换过总督。当然，他没有采用生硬的做法，如免职、撤换等，而是采用了迂回的方法，保全他们“光荣的职务”。首先，他以回元老院的名义，免除其职务，然后由皇帝提名参加执政官选举。在他们有了执政官的经历后，再派往远离前线的、和平的行省，去担任元老院管辖下的行省总督。这样做的结果是，负责帝国安全保障的前线总督，全部变成了哈德良认为能力足够强的人。

军团长的任免权也在兼任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手中。作为军团长，统率的是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6000人和来自行省的人数相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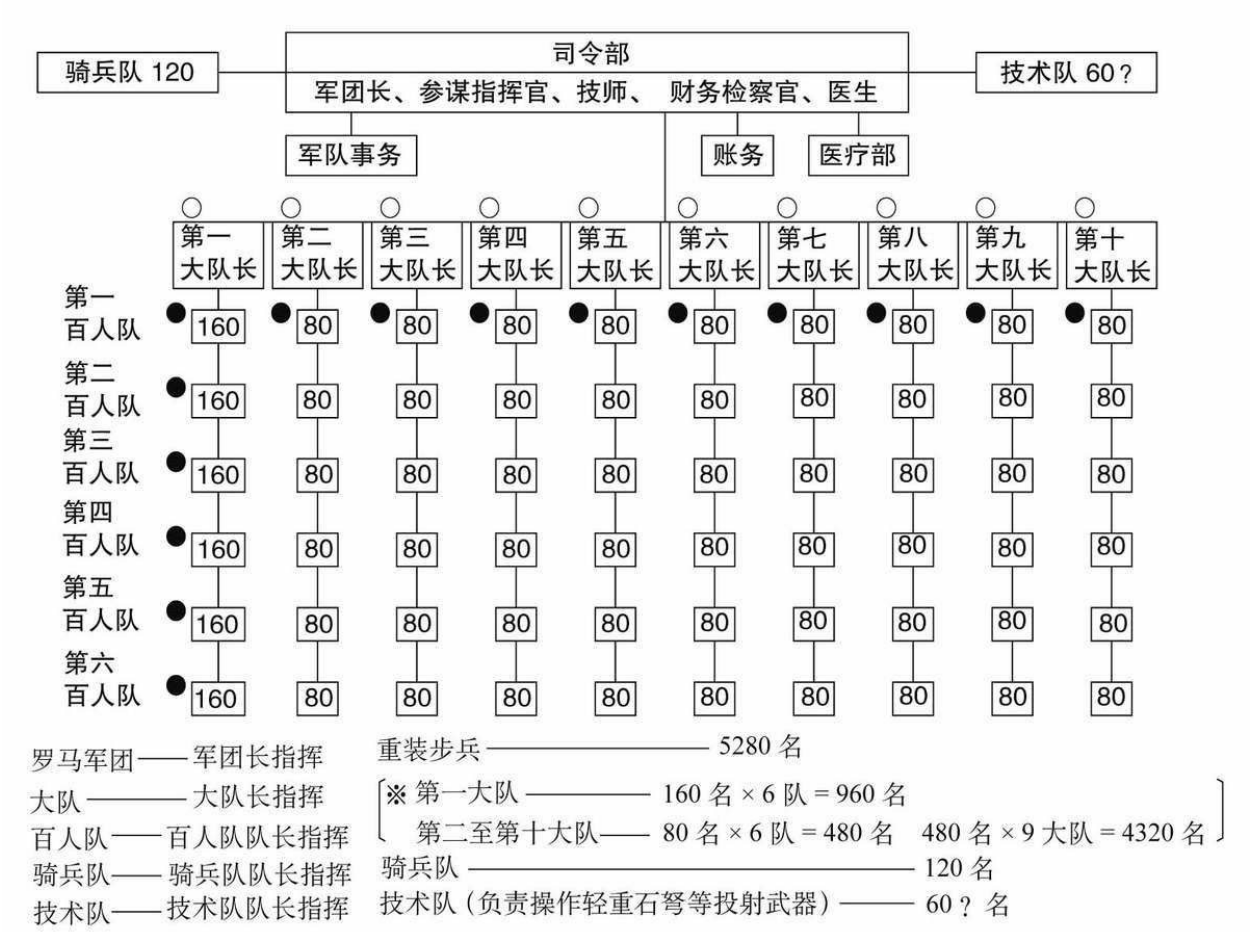
辅助兵，其资格条件是担任过法务官。身经达契亚和帕提亚两大战争的图拉真，任命了不少虽然资格条件不符但军事才能突出的人。对这样的人，哈德良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免除其职务，让他们回到首都罗马。认为确有能力的人，皇帝推荐他当选法务官。在有了法务官资历后，再派他回到前线。在平时，只有遵守秩序，组织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就像下页图表所反映的那样，罗马军团中有10个大队长。除了第一大队长指挥960名士兵外，其余9个大队长的手下都是480名士兵。罗马军队里，说到分队，其实就是大队。所以，如果有分队驻扎的基地，防守该基地的责任在大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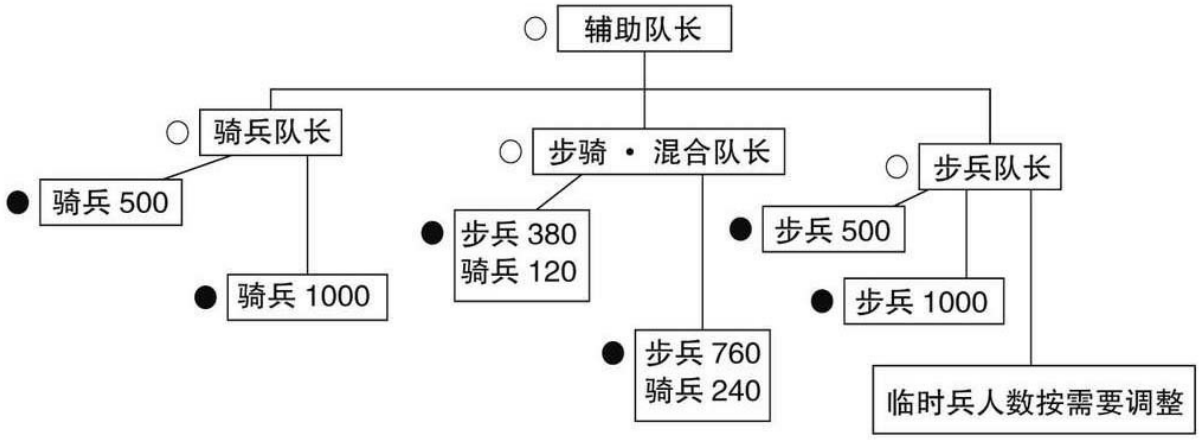
大队长由军团长任命。与军务能力相比，军团长更倾向于任命那些受士兵们欢迎的人为大队长。因为进入帝制以后，军团的主要目的变成了防守。对于这一倾向，哈德良进行了改革。他要求任命大队长必须以军事能力为首要条件，而不是士兵中的人气。当然，“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职位，只有元老院子弟才能担任，因为这是给元老院子弟的特别待遇，这一个传统做法没有改。自身担任过这个职务的哈德良很清楚，作为帝国领导阶层的预备力量，让他们一开始就担任重责，亲身体验实际事务非常重要。

大队长之后是下士官百人队队长。他们是“罗马军团的中坚”。这个名称是共和制时代留下来的。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第一大队的百人队队长统率160名士兵外，其余的百人队队长下面只有80名士兵。百人队队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尉，只是翻译成中士好像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尽管是下级军官，但他们之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权参加军团长及司令官召集的作战会议。

罗马军团（罗马公民兵，约6000人）



辅助部队（行省兵，4500—6000人）



说明：指挥官级别的将领来自部落酋长的子弟，他们也是行省人，但是多半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2. 财务、医疗由军团相关部门的指挥官协助辅助部队。
〇印——有资格参加司令部的作战会议者。
●印——有1个人可以参加作战会议的大队。
（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与大队长不同，对于百人队队长的任命条件，哈德良加上了他是否受士兵们欢迎的条件。原因大概是因为百人队队长总是和士兵们在一起，无论是在军团基地，还是在野外的宿营地，他们与士兵们在同一个房间内或同一个帐篷里生活起居。不像大队长，有军官专用的设施。用餐的时候，百人队队长也要和士兵们在一起。不过，话虽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士兵中的人气有多高，仅凭这一点，是不能当百人队队长的。哈德良为百人队队长人选定的标准是身体强健，性格开朗，主动热情。因为只会对部下温和，是无法胜任“罗马军团中坚”的职责的。

再接下来是罗马军队中的主力军团兵。军团对士兵的选拔也很严格，不是你志愿加入就可以加入，也不是考试通过后就可以马上成为军团兵的。事实上，罗马军队很早就已经对新征士兵有所要求。只是在执行上，不同的司令官或军团长，有的会比较严格，有的却很宽松。为此，哈德良制定了标准，并下发到全军。从此罗马军队有了统一的征兵标准。

首先用年龄限制来筛选志愿者。在平时，应征年龄为17至21岁。有紧急事态发生时，放宽至30岁。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也是条件之一。但是，年龄等条件都符合要求，有不良前科的人和奴隶商人一律不得录用。

其次，对身体条件也有要求。身高必须在1米65以上，体格和视力也要达标。

此外，智力也是检查内容之一。这不是要求志愿者有多高的智商，只是要求有普通的读写计算能力。罗马一直采用双语制，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存。但是，军队中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所以如果拉丁语特别好，

会比较有利。

志愿者通过上述测试后，还不能马上加入军团，通常还要经过4个月的“试用期”（probatio）。在此期间，要测试他们是否适应集体生活。他们还要参加预备役的演习，当然使用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顺利结束“试用期”的人才允许入伍。他们会拿到刻有所属军团及自己姓名的金属身份牌（signaculum）。他们要把身份牌挂在脖子上，向诸神和皇帝忠诚宣誓（sacramentum），之后，才正式成为军团兵。期满退役的年限分别是，军团兵20年，不要求有罗马公民权的来自行省的辅助兵25年，海军26年，只有近卫军团兵为16年。期满退役时，根据在军团中的地位，可以领取相应的退役金。辅助兵还会得到世袭的罗马公民权。

像这样片面追求士兵的素质，使得对于来自帝国各地士兵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后来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哈德良应该对这样极端的做法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把罗马军队变成了行省人民的军队，使罗马军队失去了罗马的特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依据的佛尔尼教授发表于1963年的II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直译叫《军团兵招募法》，里面有这样的一张表。

表中记录了每个行省的详细数据。在这里，我只摘录行省出身的军团兵总数。还有，这个数字仅限陆军，不包括海军和近卫军团。

《军团兵招募法》中收录的表（单位：人）

	奥古斯都——卡利古拉	克劳狄乌斯——尼禄	韦斯帕芗——图拉真	哈德良—3世纪末
意大利本土	215	124	83	37

行省	134	136	299	2019

话虽如此，如果你真心相信这个数字的话，难免会有错误的认识。这是因为：

一、既然罗马时代的公文都已不存在，那么可以参考的就只有考古调查发掘出来的碑文。还有，或依然躺在地下，或被挪作新建房屋的材料，或遭毁损后又回到土里的众多史料，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始终是个未知数。

二、这个数字不是每一年的数字，也不是这个时期全军人数的总计。

三、如果不考虑罗马军团兵的总数和每年因期满退役、战死及病死而需要补充的缺员人数，表中的数字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研究者们认为一个军团每年出现的缺员人数在240人左右。

军团及军团兵数和缺员数（估算）

	奥古斯都——卡利古拉（公元9—14年）	克劳狄乌斯——尼禄（公元41—68年）	韦斯帕芗——图拉真（公元69—117年）	哈德良—3世纪末（公元117—192年）
军团总数	25	28	30	28
军团兵总数（人）	150000	168000	180000	168000
每年的缺员总数（人）	6000	6720	7200	6720

因此，我想上面这个表也有必要一并列出。

也就是说，第一个表中的数字并未正确反映罗马军队的全貌，它只是反映了一种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负责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士兵，由意大利本土出身的人更多地转向了行省出身的人。

原因是生活在繁华帝国的本土——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即使不服兵役，也有很多其他谋生手段。事实上，尤里乌斯·恺撒时代，作为主要兵源地的意大利北部，经过200年以后，已经被多瑙河沿岸地区，即现在的巴尔干地区取而代之了。军团兵人数少于意大利本土的行省只有希腊。那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希腊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以及通商、海运及建筑美术等方面的才能的影响。

罗马军队中，出身于非意大利本土的人开始加入的时间，要追溯到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作战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时代。而且，从那时起，这种状况成了罗马军队的常态。尤里乌斯·恺撒率领的罗马军骑兵，几乎都是曾经的对手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继恺撒之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迄今为止的惯例变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构成罗马军队的两大部分是有罗马公民权为条件的军团兵和行省人民的辅助兵。

出身本土的罗马人和出身行省的罗马人，所占比例发生逆转，也许是从韦斯帕芗到图拉真的时代。还有，可以确定的是，在哈德良以后，这一逆转比例的差距越来越大。

原因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出身行省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人数不断增加。首先，军团兵中，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相识相知，期满退役后结婚，继续留在兵役地附近的人很多。其次，辅助兵期满退役时，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是世袭的，这就意味着其子女也名正言顺地成了罗马公民。而且，因为父亲的职业，孩子志愿加入罗马军团就成了极自然的一个选择。

因此，出身本土的士兵人数和出身行省的士兵人数比例逆转，不能笼统地说是因为出身本土的人不愿意服兵役的结果，更不是兼任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因为自己是来自行省的罗马公民，因此，更愿意选择行省出身的人，而不选择意大利本土出身的人。

我想起了本田宗一郎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能继承本田精神，无论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来做本田的社长。罗马人，尤其是哈德良，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吧。那么，哈德良是如何把“罗马精神”灌输给士兵们的呢？

首先，他全面推出了高强度的实战模拟演习。罗马军队的训练之严格自古有名。即使是在军团兵互为敌人的模拟作战中，双方也是真刀真枪地打。演习中，打伤战友一律不问责。当然，演习之外打伤战友，掌握士兵生杀大权的军团长会给以严厉处罚。

有人认为连日不断地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不如改行当角斗士更能赚钱。于是，他们会选择中途退役。在罗马军团，士兵期满退役时可以拿到退役金，而中途退役，也会有很多特殊待遇。其中之一，引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的内容，是这样的：

> 恺撒把地方自治体议会议员的候选资格年龄，也就是被选举权的资格年龄分成了三种：
>
> 一、无兵役经历者——30岁以上；
>
> 二、作为军团兵，服过兵役的人——23岁以上；
>
> 三、服过兵役中的骑兵，或担任过百人队队长的人——20岁以上。
>
> 恺撒还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他们是犯罪者、作伪证者、军团逃兵以及被流放者、角斗士、演员、妓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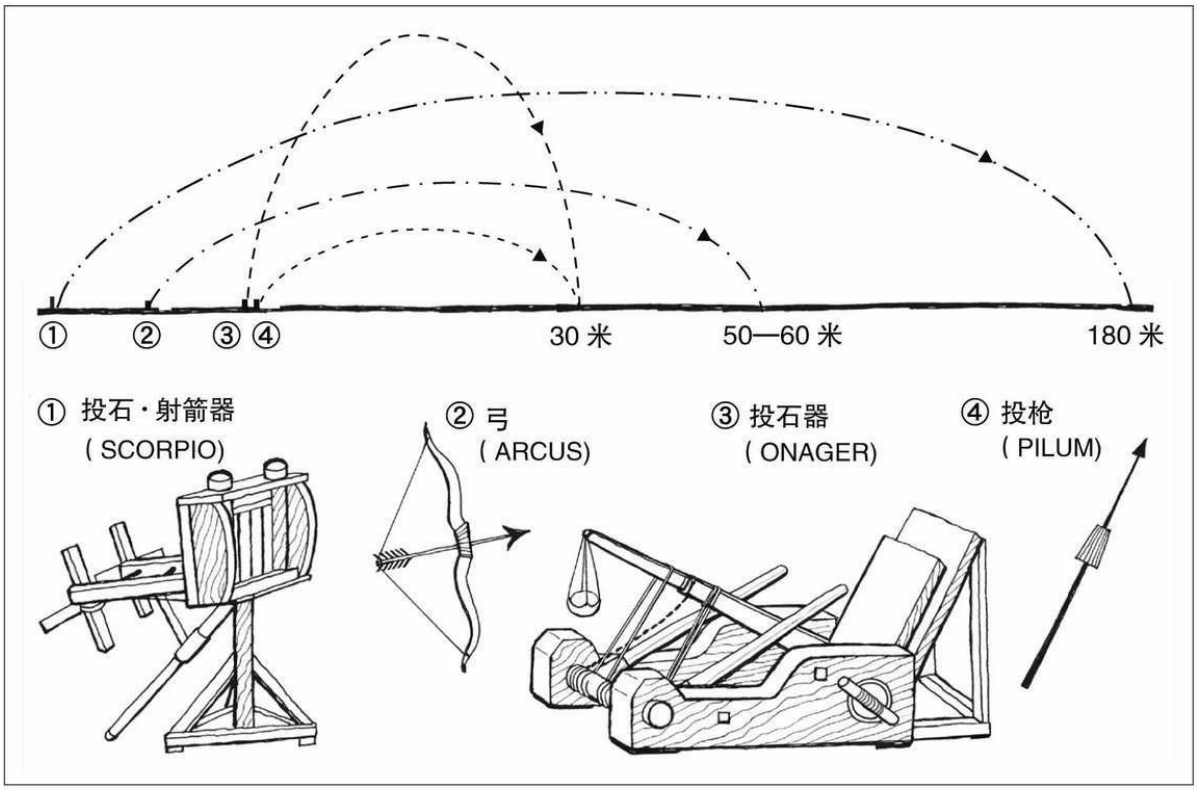
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这个法律，到了2世纪以后的哈德良时代依然沿用。

行军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之一。只要不是事发突然，罗马军队行军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一天的行军路程是30公里上下。行军中，每个人必须自带15天左右的干粮，武器加上粮食、餐具等，全部装备重量达40公斤。

据说哈德良在检阅士兵行军的时候，与士兵们一起徒步行军。非但不骑马，甚至从着装到其他装备，都与普通士兵无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们懂得，既然成了罗马的战士，首先必须学会吃苦耐劳。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皇帝，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

演习中，哈德良加入了又大又重的攻城武器使用方法这一项。罗马军团中有专门负责管理这种武器的人，却没有专门操作这种武器的士兵。通常的做法是，军团兵按负责人的指示操作武器。所以，只要是军团兵，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有记录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曾经复原了罗马军队的这种机械武器，并进行了实际操作。根据这一记录，据说石弓，当时叫“弓”（arcus），射出去的第一支箭命中了50米开外的靶子，第二支箭把扎在靶子上的第一支箭漂亮地断成了两截。除了石弓，还有一种叫“蝎子”（scorpio）的投石器，用于投射长达60厘米的超强箭。射出去的箭据说一下子射穿了立于340米开外的、厚度达2厘米的板子。现代研究者绘制了图纸，对罗马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的射程距离作了图解。



各种兵器的射程距离

从这些图上可以看出，与其他同时代的国家相比，罗马军队在兵器机械化的先进程度上远远走在了前面。除了兵器本身有很高的精确度以外，它们都做成了可移动的武器。甚至，百人队队长指挥下的每个军团中队就配有一个“蝎子”。努力提高机械化程度是最高司令官同时又是皇帝的责任。使用这些机械则是军团兵的任务。这大概就是哈德良的想法吧。

演习之余，皇帝对士兵们在基地内的日常生活，也作了严格要求。

起床、用餐、就寝等，一切听从喇叭声指挥；夜间站岗打盹是死罪；基地内，不得有罗马式城里必有的列柱走廊，也不可有庭院；罗马人用晚餐时，通常一条胳臂要支在类似床的桌子上，但是，在基地内，即便是晚餐，这样的进餐方式也是不允许的；偷盗战友的财物，立即开除；士兵可以抗议或反对，但是，严禁聚众抗议，必须通过百人队队

长；无正当理由或未经上司同意擅离基地，会受到严惩。

话虽如此，哈德良并非只是单纯地严格要求士兵们。他视察了基地内的医院。为了让伤病员都能得到充分治疗，他逐一检查了医院设施及人员配备的情况。罗马军团都有附属医疗队，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护士。甚至还有为马、牛治病的兽医。罗马军团基地内的医院向生活在基地周边的居民开放。虽然身为百姓，但是他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基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情理上和策略上来说，这也应该吧。军队的医院允许有庭院，这一点确实符合哈德良的想法。他深知，如果只重视精神生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很难指望士兵能发挥较强的战斗力。这是一支被称为以后勤补给取胜的罗马军队。哈德良视察后勤，并根据视察结果作出的指示往往一语中的，让人不得不深表敬佩。

军团长下面有两位专门负责基地内务的指挥官：一位是财务检察官，是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另一位是基地总管，负责基地内部的管理。基地总管的重要任务是补充并保管兵器和粮食。

由于前线基地时刻处于和敌人对峙的状态，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所以，为了防备这一情况，往往在不知不觉间，粮食和武器补充过多，结果出现了大量库存积压。

克桑腾军团基地的军队医院平面图（■为病房）

库存过多，粮食就会发霉腐烂，导致无法食用，只能丢弃。兵器长时间不用也会生锈，即使送到军团所属的兵器修理站，依然可能无法修复，不能使用的兵器堆积如山。这就是说，虽然主观上从未想过要浪

费，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购买军粮、军需的经费浪费极大。

哈德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他在军团基地、军粮供给地以及联系两者的补给线之间推行了系统化的管理。只要流通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有过多的库存。这种做法的成效就体现在基地内的库存量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内。

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哈德良重视效率的想法。同样，这样的想法在加强防卫力量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罗马军队分为军团兵和辅助兵。军团兵为主力部队，辅助兵以辅助作战为任务。辅助部队由行省人民构成。公元69年以前，辅助部队由出身同一个部族的人构成，指挥官也由该部族之长的族人担任。尼禄皇帝死后发生内乱的那一年，就有行省利用这次混乱造反起义。当时的主角就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辅助兵。正因为辅助军团的士兵构成来自同一个部族，所以他们要拿起武器转而反对罗马非常容易。

吃过一回亏的罗马，在结束内战后，从韦斯帕芗时代开始，改变了辅助部队的构成。由原先清一色的同族人，变成了不同部族出身的人。指挥官也变成了由罗马军团的老兵来担任。

其结果是，虽然依然保留了辅助兵的名称，但实质上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正规士兵。期满退役时，不仅可以领到退役金，还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这些做法进一步推进了辅助兵向正规士兵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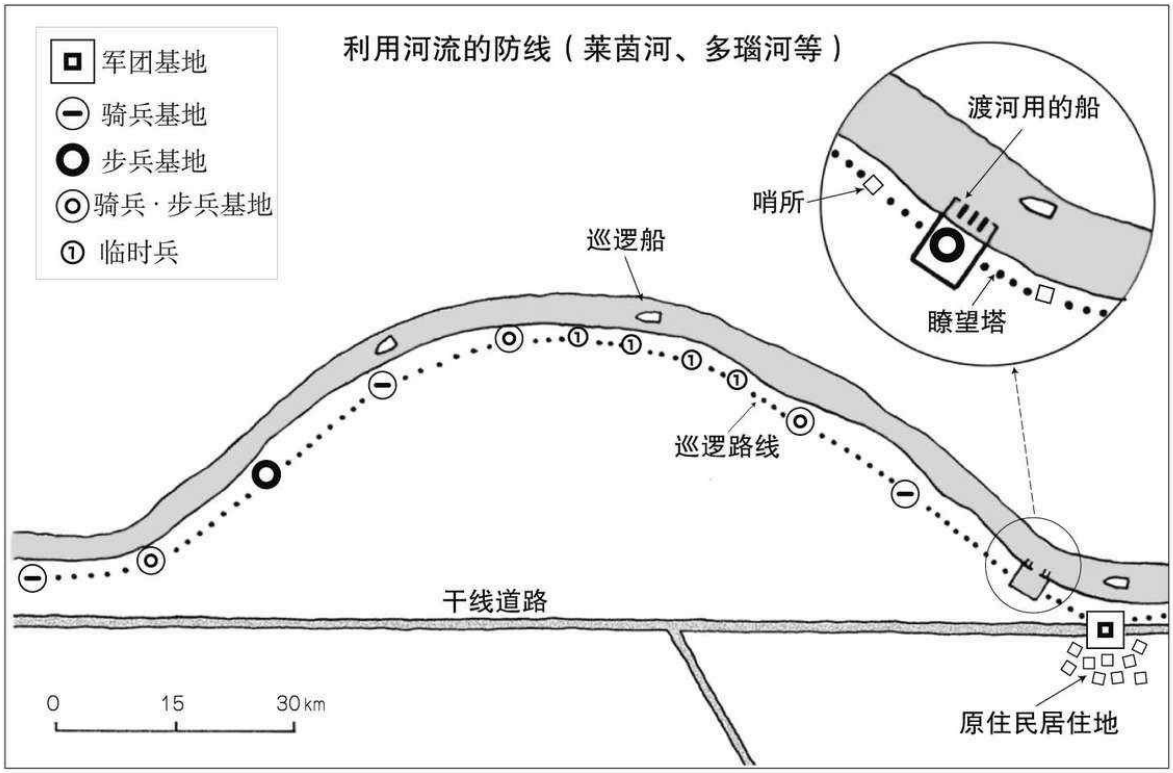
“和平”是哈德良的格言。他相信要维护和平，首要条件是确立防御体系。但是，在帝国财政方面，他并不希望增加军团兵。在他统治期间，甚至还成功裁减了2个军团。事实上，增加辅助兵的做法也行不通。因为，这样做违反奥古斯都制定的政策，即辅助兵人数不得超过军团兵人数的规定。虽然辅助兵已经变成了正规的兵力，但是，他们始终都是行省人民。在负责帝国安全保障的罗马军队中，即使在数量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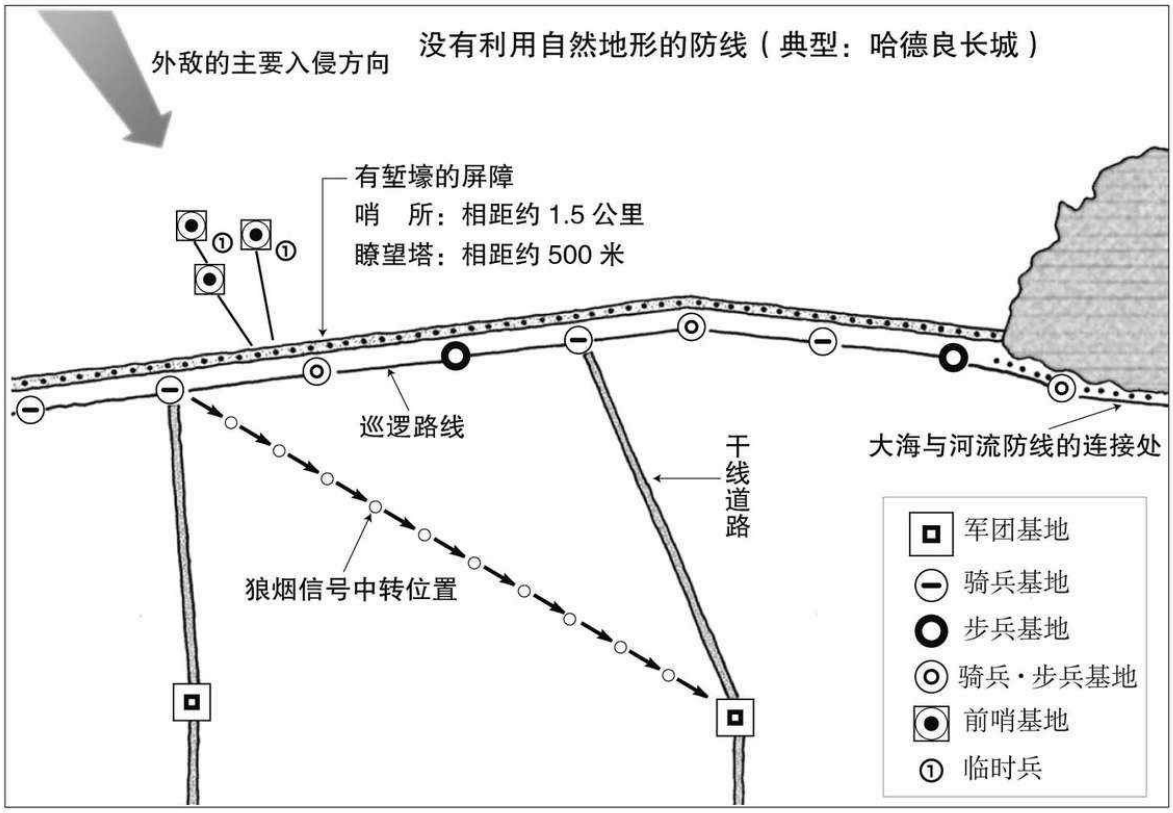
省人民也不能超过罗马公民。

哈德良通过招募临时兵（Numerus），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谓“临时兵”，直译的意思是“数目多的人”或“众多的人”。临时兵由居住在周边的行省人民中的志愿者构成。他们不定期服役，也没有兵役期限的规定。说起来有点像季节性的服兵役。他们主要担任警戒任务。因为不能指望他们会有战斗力，所以，无须对他们进行训练。临时兵在服役期间，饮食起居可以得到保证，还能有些许薪酬。所以对于农闲期的农民及一时失业的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制度。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因为是临时性的士兵，所以，在他们退役时，无须支付退役金，也不需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在不增加罗马公民人数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既补充了战斗力，同时，还有利于消除因贫困引起的叛乱苗头。


利用河流的防线（莱茵河、多瑙河等）
军团基地
骑兵基地
步兵基地
骑兵·步兵基地
临时兵
渡河用的船
哨所
瞭望塔
巡逻船
巡逻路线
干线道路
原住民居住地
0
15
30 km


外敌的主要入侵方向
没有利用自然地形的防线（典型：哈德良长城）
有堑壕的屏障
哨　所：相距约 1.5 公里
瞭望塔：相距约 500 米
巡逻路线
干线道路
大海与河流防线的连接处
狼烟信号中转位置
军团基地
骑兵基地
步兵基地
骑兵·步兵基地
前哨基地
临时兵

（上下图都摘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因为是临时充当士兵，所以我们不清楚临时兵的具体人数。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以及不列颠，每个军团好像有500人左右。军团兵6000人、辅助兵略少于6000人的军队里，500人的数字，我想只能说是对军事力量的补充，但算不上是加强。

以上是哈德良在视察包括日耳曼长城在内的莱茵河防线全线时，做的全部事情。这些事情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发行刻有“日耳曼前线军队”（Exercitus Germanicus）的货币应该可以接受。在以后的巡回视察中，哈德良的风格与这一时期完全一样。就是说，无论走到哪里，非做不可的事情和解决此地独有的问题，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例如，在莱茵河沿岸，不需要修建新的屏障。但是，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不列颠，却需要这样的屏障。

哈德良在处理这两件事情时，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明确军团基地内部的责任体系。为了加强组织架构的功能，明确责任之所在是首要条件。在组织架构中，经常会有一些非常不希望责任分明的人，原因是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喜欢承担责任。既然人类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能会消失。但是，一个组织架构内，如果这样的人占了多数，那么这个组织的功能就会弱化。

哈德良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军团基地是罗马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些地方后来成了后世欧洲的主要城市，恰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军团基地内部，不仅有医疗设施和公共浴场，甚至还有成衣铺、银行和邮局。没有的只是为士兵的妻儿所建的设施。因为，罗马军队中，在服役期间，下级军官以下的士兵禁止结婚。当然，在父亲服役期间出生的孩子，在父母结婚后，承认其为嫡出。还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罗马的军团基地内没有宪兵。

哈德良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军团基地的人员数。但是，他明确了

每个人的职责范围。从军团基地的人员一览表中看以看出，职责分工非常细，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要转嫁责任绝无可能。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比出身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的皇帝哈德良，努力让和自己一样出身行省的士兵们牢记在心的罗马精神。

不列颠

皇帝哈德良的统治达21年。其间，他待在意大利本土的时间有3次，加起来只有7年。从45岁到58岁的13年间，基本上都巡游在各行省之间，进行视察。

前面已经讲过，我把哈德良在巡回视察过程中，完成的业绩大致分成了两类：

一、无论走到哪里，非做不可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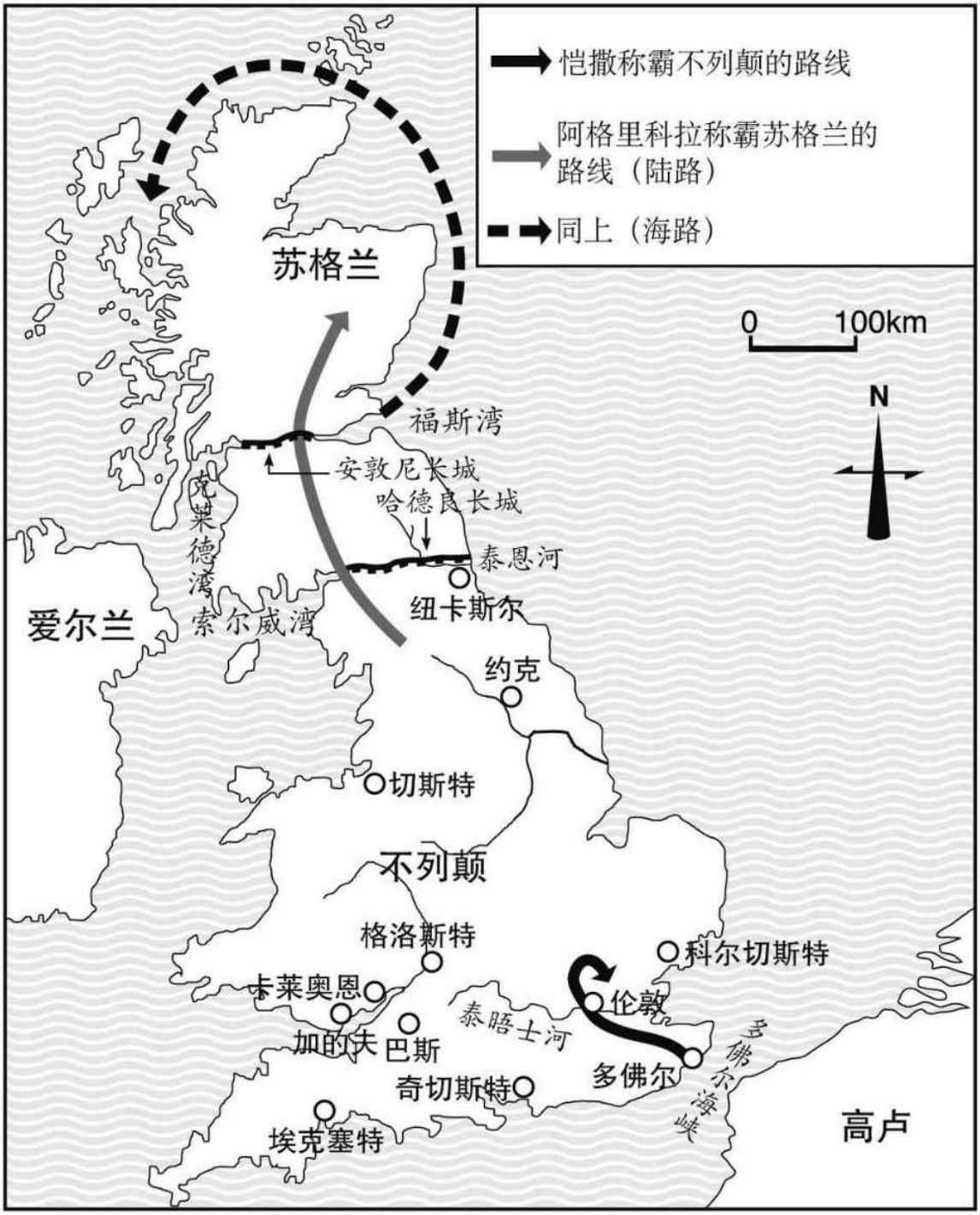
二、解决此地独有的问题。

关于第一类事情，在视察莱茵河防线的章节中已经讲过，所以，在有关哈德良以后的出巡篇幅中，我将略过不讲，而只讲第二类事情。但是，请读者朋友不要忘记，不管他走到哪里总是有第一类事情要做。正因为在哈德良每一次巡游中，都有第一类和第二类事情要做，所以他的出巡才有了意义。它们让我们充分理解到，哈德良耗费如此长的岁月巡回视察帝国各地的意图。

公元122年的春天一到，已经46岁的哈德良登船离开莱茵河河口向不列颠出发了。不列颠之行一定是早有计划。因为5年前的117年，在这里发生了布里甘特人起义、第九西班牙军团惨遭歼灭的不幸事件。虽然哈德良即位后不久，从大陆派遣另一个军团，增援常驻的两个军团进行

反击，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但重建不列颠防御体系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罗马在不列颠常驻有3个军团：第二奥古斯塔军团驻扎于威尔士地方加的夫附近的伊斯卡（今卡莱奥恩）；第十二瓦莱里亚胜利军团驻扎于英格兰西部的德瓦（今切斯特）；第六胜利忠诚军团驻扎于英格兰东部的埃布拉库姆（今约克）。这3个地方的军团基地与以伦底纽姆（今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之间，早已布满了罗马式的道路网。因为罗马在伦底纽姆统治的时间已经很久。还有，相当于高速公路的大道，也分别从切斯特和约克通到了罗马人称为喀里多尼亚的地方，即后来的苏格兰。在图密善皇帝时代，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也是身为罗马军队的将军阿格里科拉提出了主动进攻的作战策略，使罗马帝国的征服步伐迈到了苏格兰的腹地。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不列颠（为方便起见，加入了安敦尼· 庇护皇帝建的长城）

公元117年发动叛乱的布里甘特人是一个土著民族，生活在当时尚

未区分开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这个部族更早的名称并不清楚，布里甘特是罗马人取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意思是山贼或强盗。英语中的brigand可能就是以这个拉丁语为词源的。既然罗马人为这个民族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很抵触向罗马化的方向发展，拒绝定居下来从事农牧业。

但是，并非所有布里甘特人都拒绝罗马化。随着罗马人移植而来的果树及花草扎根开花结果，英格兰受罗马的影响不断加深。生活在这一带的布里甘特人不断被罗马同化。也就是说，生活在这个部族居住地以南的布里甘特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罗马的同化。也许发生在公元117年的起义，是起因于居住在北部的布里甘特人，看到自己的同族人日益受到罗马化的影响而心生不满的结果。因为他们残忍虐杀的不只是罗马士兵，对站在罗马一边的布里甘特人同样毫不留情。

罗马是称霸一方的国家，他们的责任是要保护接受其统治的人们。哈德良要重建不列颠防御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为了保护已经接受罗马化的人免遭外族的侵扰，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

古代罗马人称为“哈德良壁垒”（vallum Hadriani），现代英国人命名为“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的这个屏障，是不列颠行省的防御设施，始于泰恩河河口，经过纽卡斯尔到索尔威湾，共80罗马里（约合117公里）。全程由石结构城墙、塔楼以及要塞构成。没有利用大河这种天然界线。在这一点上，与日耳曼长城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日耳曼长城就建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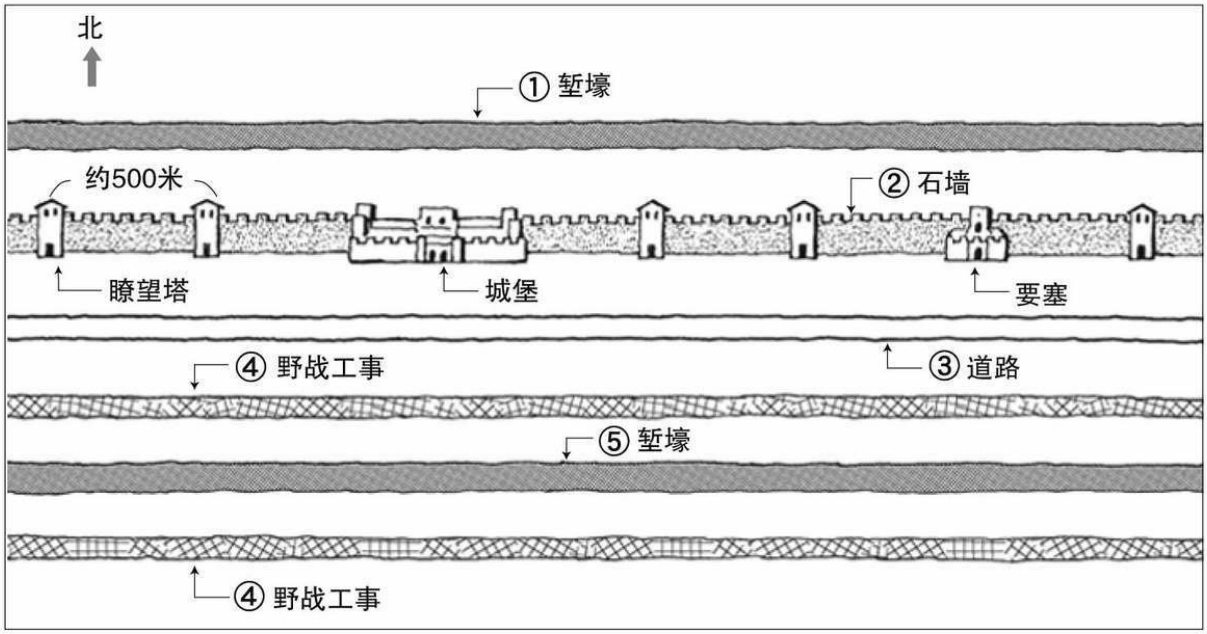
石结构城墙的剖面图，如下页图所示，“北”属于罗马帝国之外，“南”属于帝国以内。因此自北向南：

（1）堑壕——是一条宽度为9.1米、深度为9米的V字形壕沟。贯穿城墙最顶部有一条监视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堑壕最深处。建堑壕的目的，首先是对付蛮族的马队进攻，其次是阻碍蜂拥而至的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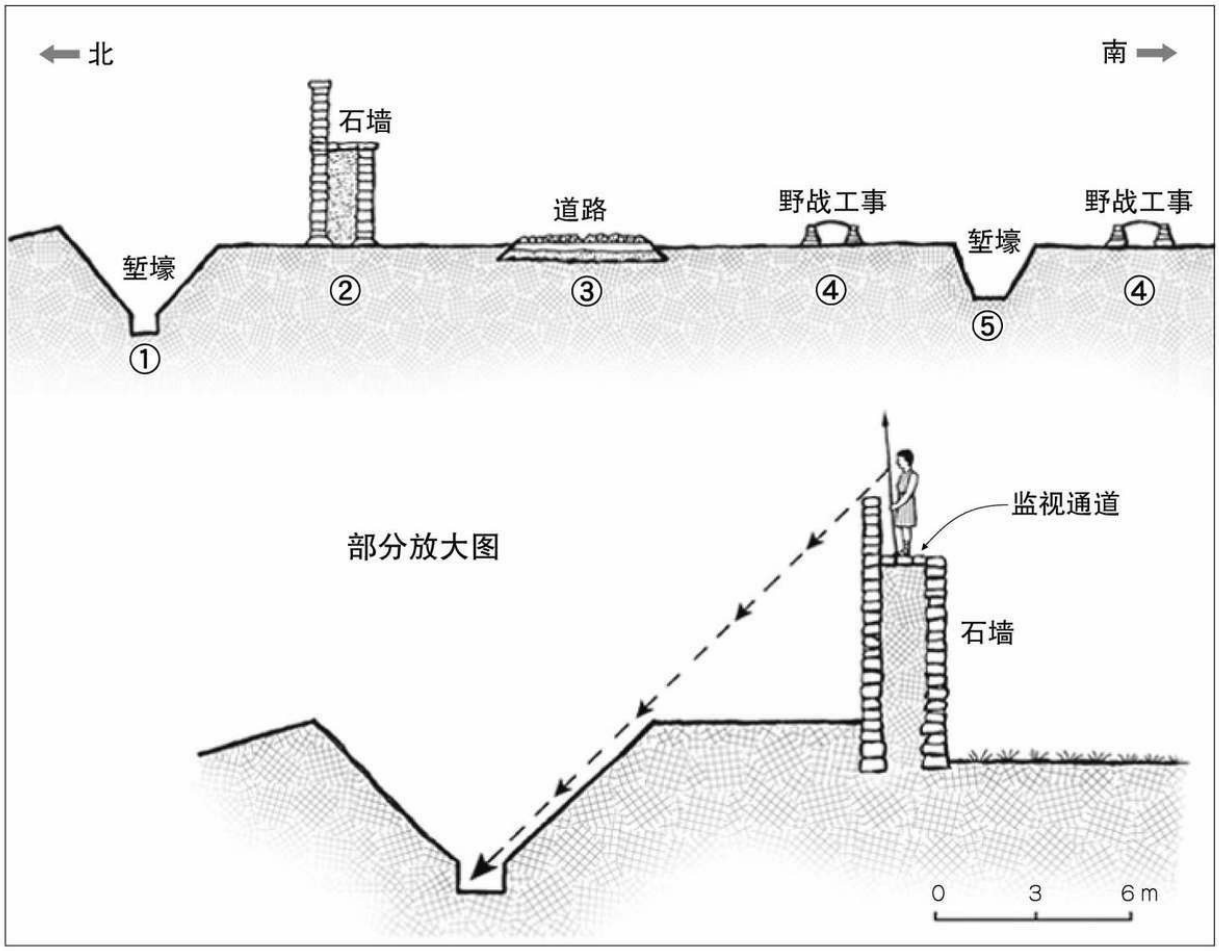
集体进攻。

（2）石墙——向北部分高度为6至10米，南侧为4到6米。高度不同是因为地势造成的。石墙厚度与地势无关，都在3米左右。

（3）道路——沿石墙而建的路，全线按罗马式大道建造而成，即全线铺设。目的是为了马匹和货车也能顺利通行。大路的宽度也和罗马大道一样，为两车道。



哈德良长城的模型图



只有石墙位置（没有塔之类的位置）的截面图

（4）野战工事——这是一条高3米、宽6米、距离很长的堤防线，同样沿城墙而建。共有两条，是平行的。两条工事之间有堑壕。

（5）堑壕——宽度和深度都在6米左右。

如果外敌骑马试图突破城墙，（4）和（5）可以起到阻挠的作用。如果蛮族成群袭来，它们也有双重屏障的作用。哈德良长城包括（1）到（5）的全部内容。

哈德良长城的各个要冲位置都建有城堡、要塞和监视塔。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以及地势的原因，分别部署了守备队。位于平原地带的城堡

上部署的是骑兵部队、骑兵和步兵的混合部队；位于丘陵地带的城堡上部署的是步兵部队；以警戒为任务的塔楼上部署的是临时兵；设在哈德良长城外侧的前哨基地，部署了由辅助兵和临时兵构成的混合部队。各城堡要塞之间的平均距离为1.5公里。监视塔之间的距离因受地势的影响，平均500米。

这是最前线。从这里，有罗马式大道通往军团基地。一旦哈德良长城抵御不住外敌的入侵，位于约克和切斯特的两个军团基地，可以派出主力部队迎战敌人。

1900年后的哈德良长城，因为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又因为长期被当做采石场而得不到保护，因此与罗马时代的其他遗迹一样，想知道它曾经的样子，只能借助自己的想象力了。英国人非常重视对古罗马的研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条长城又是位于自己国家境内的重要的罗马遗迹，因此，他们为保护这一遗迹，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甚至，这条长城沿线还出现了小型旅馆，为参观遗迹的客人提供住宿方便。这里成了初夏到初秋，适宜周末旅行的一个景点。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如此，这里并没有带上一丝庸俗的商业气息，非常符合英国人的作风。罗马时代的遗迹，即便在意大利境内，也应该交给英国人来管理是我一贯的主张。位于不列颠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雕像，在质和量上，绝对比不上意大利本土的，就连大英博物馆中的文物也不例外。但是，英国人悉心照料罗马时代留下来的遗物，难道真的只是单纯地出于对古罗马的热爱吗？又或者是他们依恋这样一种信念，即继承古罗马人的是大英帝国子民自己？不管怎样，站在哈德良长城上，要追忆强者们曾经的梦想，必须在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的冬季去。建造这座长城的哈德良前往不列颠的时间是春季至夏季。这是英国最好的季节。但是，在此执行军务的罗马士兵们，却要在寒风凛冽的地方守护这条建成后的长城，防御来自被大雪覆盖的敌人阵地的进攻。守护帝国的疆界并非易事。

顺便提一句。哈德良之后的安敦尼·庇护皇帝时代，在哈德良长城

以北，连接福斯湾和克莱德湾的中间，又建了一条长城，叫“安敦尼长城”。如果以这条线为边界线，并作为罗马帝国的防线稳固下来的话，那么后来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进入了帝国的版图以内。这样一来，意味着苏格兰也将被罗马同化。然而，作为接受了罗马化的地区和未罗马化地区的界线，帝国防线最终停留在了哈德良长城上。而这一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自为政。

我想，看到这两条长城的人，即使不是军事专家，也能感觉到，哈德良长城是亲临现场的人构想并建造的成果。相反，安敦尼长城则是以收集到的情报为基础规划建造起来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成果。

不清楚哈德良于公元122年的何时横渡多佛尔海峡进入高卢。但是，从他随后的行动范围来推测，离开不列颠的时间很可能是夏末或初秋。他需要视察的帝国疆域太大，时间不允许他等到士兵们把哈德良长城建成后再离开。不列颠多雨，所以在建造这条长城时，必须考虑把粮库建成高脚楼，还要考虑在前线服役的士兵们的卫生条件，并根据罗马人的风格，又要考虑舒适性。所以，在潺潺流动的小河畔还建起了浴场。然而，包含这一切设施的长城建成后，哈德良却无缘亲眼一见就离开了人世。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有人很幸运地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则享受这些人带来的成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成果尤其如此。

就像前面所述，在受罗马化影响至深的高卢，需要哈德良进行改革的地方几乎没有。我们只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建设阿维尼翁。就在这个地方，哈德良接到了先皇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去世的消息。我们不清楚，哈德良听到这位总是默默支持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毅然站出来为他撑腰的女人去世的消息时，是怎样的心情。我想，就算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保留至今，也不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关于个人情感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事实，得知普洛蒂娜去世的消息之后，皇帝哈德良在这个女人的出生地尼马苏斯（今尼姆），为这位户籍关系上的养母修

建了一座神殿。

西班牙

鉴于上述原因，哈德良在高卢的逗留时间很短。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哈德良还接到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消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地居民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和以往不同。不是希腊系居民和犹太系居民之间的冲突，而是发生在埃及原住民中间的一场骚乱。起因是一头牛。

自古以来，埃及就有一种信仰——崇拜牛为神圣之物。甚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为此还记录下了“往事”。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那不是一头普通的牛，而是吸收了日月之精华的牛，证据就是这头牛皮肤上呈现出来的特殊斑纹。人们于是深信，这种斑纹表明它吸收了来自太阳和月亮的神奇力量。

当时，圣牛来到了地球上，人们在它身上发现了其他牛身上没有的斑纹。人们欣喜若狂。然而围绕着把这头牛放在哪个城市、交给什么人来奉养等问题，当地住民之间发生了争执。相信这种神奇事情的人们竟然是罗马帝国的子民。

对此，哈德良认为无须亲自出手解决，他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亲笔信，余下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驻埃及的行政官。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听到劝告头脑就会冷静下来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起争执。所以哈德良认为，自己早晚必须去埃及，重整那里的统治秩序。只是眼下他在西方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公元122年至123年冬季，皇帝在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度过。在塔拉戈纳，他召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殖民城市和地方自治体的代表。

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出身于行省的辅助兵不是罗

马公民，但是，因为他们为保卫帝国出过力，所以在他们期满退役时，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所以，简单计算一下，每25年就会诞生15万新的罗马公民。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国策。因为这一制度，罗马帝国保证了前提条件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军团兵的数量。但是，如果长期维持这样的政策不变，难免会造成新老罗马公民之间出现矛盾。因为无论新老公民，既然都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他们的利益当然也一样。除了必须遵守罗马公民法的规定外，同样无须缴纳相当于收入的1%的行省税。

于是，老公民心里就会产生不满。他们的不满，导致了新老公民间的针锋相对，在有三个行省的伊比利亚半岛，具体表现在招募军团兵时，新老公民都不予配合。

老公民统称“意大利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意大利本土。图拉真和哈德良也属于这一派人。面对应招军团兵，这些老公民平静却明确地说“不”。另一方面，统称为“西班牙人”的新罗马公民，则态度强硬地回答说“不”。之所以一派态度平静，一派强硬，大概跟哈德良属于老公民派有关。新公民派担心属于老公民派的皇帝会向老公民派妥协，提出损害自己既得利益的方案，于是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作为帝国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有必要采取措施。

在塔拉戈纳召集两派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不知道哈德良采用了什么样的调停策略。根据罗马人惯常的做法，很可能提出了妥协的方案。即凡是罗马公民都能享受到的各种权利中，某些权利只对新公民设限。所谓某些权利，应该不是免除行省税这种关乎实际利益的权利，很可能是地方自治体议会的议员候选资格之类的权利。人这种动物，只要流动性有保证，还是愿意接受待遇上的不同。已经有300年历史的罗马公民和3年前刚刚成为罗马公民的人之间，这种不同的待遇只要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更利于社会的稳定。

不管怎样，哈德良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来到塔拉戈纳后，他没有回故乡意大利卡，也没有建纪念皇帝登基的建筑物。这样做或许是为了

不刺激到这两派。

在西班牙停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哈德良正在总督官邸独自散步，一个奴隶手持利刃突然向他刺来。等人们得知变故，匆匆赶来时，皇帝已经制伏了刺客。他把犯人交给了来人。后来，当他知道这个犯人因为神经错乱才有此行为后，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下令给他治疗。

这一插曲让人联想到这样两件事：

第一，很可能在罗马时代，对于疯子已经不问责了。

第二，尽管已经47岁，但是，哈德良的体格尚好。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是信心十足。

哈德良在西班牙唯一的消遣就是骑着马在故乡的山野上狩猎。

然而，就像在等待春天到来似的，哈德良接到了一个重大消息。这是叙利亚行省总督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称，帕提亚王国出现了不稳定的动向。尽管和埃及的骚乱一样，都是来自东方的消息。但是，帕提亚王国出现动荡，与发生在埃及的、围绕神牛问题的当地居民之争不能相提并论。哈德良相信外交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皇帝决定亲自前往。

地中海

这次旅行从西班牙出发，目的地是叙利亚。要自西向东横向穿越罗马帝国。因为决定中途不作停留，直接前往叙利亚，所以这次选择海上旅行，自西向东要横跨地中海。

虽然是皇帝航海旅行，但没有大规模的护航队。因为罗马早就清除了曾经的海盗巢穴。长期以来，地中海一直享受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带护航队旅行，本身就是安全与和平的明证。本来就不喜欢兴师动众的哈德良，好像只带了三四艘快船就出航了。

从塔拉戈纳港到罗马外港奥斯提亚，顺风的话，只需要5天时间。即使只靠划桨，20到25天也能到达。途中回趟罗马非常方便，但是哈德良没有这样做。因为一旦回去，脱身就不那么容易了。具体航程我们不清楚。总之，离开塔拉戈纳以后，他可能站在船的左舷，一路上眺望着撒丁岛南端。到了位于西西里岛西端的马尔萨拉时，停靠了一下。接着，绕过西西里南端，到达克里特岛。然后，站到船的右舷，望着克里特岛的北边，一路向塞浦路斯岛驶去。经过塞浦路斯后，继续航行，直到安条克外港塞琉西亚。如果他走的路线是这样的话，那么，季节应该是初夏。从塔拉戈纳只需要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就可以进入安条克。

尤里乌斯·恺撒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充分利用旅途中的时间，写下了比较论的文章，题为《类推论》，还送给了西塞罗过目。这两人虽是政敌，但是，对于写文章，两人的观点一致，就是清晰明了。哈德良与恺撒也有共同之处。不仅行动范围广，而且两人都是不肯浪费时间的人。那么，在近两个月的航海期间，他都想了些什么呢？

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连传说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想象。他在进行思考时，面对的是一片大海，不是咆哮不休的北方大海，也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是初夏平静的地中海。从飞机上看下去，就连拖着一条白色浪花的渔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罗马人称地中海是“我们的海”或“内海”。它是罗马帝国全体民众的海，既不存在现在这样200海里主权的问题，也不会发生捕鱼船被抓的事件。也许这期间，他思考的是两年后实施的罗马法汇编的事情。这里的想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猜测，其唯一的依据是哈德良回到首都罗马后开始实施的这一浩大工程，无论在工作的内容上，还是在人选的问题上，初期就已经基本确定。苏

拉最先尝试做过这件浩大的工程，后来恺撒也尝试过，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完成。

东方

皇帝到达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时，那里已经处于临战状态，作好了随时应对帕提亚战争的准备。然而，哈德良没有选择战争。他决定采用领导人会谈的方式，与帕提亚国王协商解决问题。哈德良很清楚帕提亚的特殊情况。他知道，帕提亚王国对罗马帝国摆出强硬的态度，并非国王所愿，更多的原因是国王受到了来自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两国领导人会议的地点定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哈德良没有带军团随行。

关于帕提亚国王与罗马皇帝之间的会谈详细经过，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知道结果：那就是避免了一次战争危机。罗马方面曾经担心帕提亚军队会进攻罗马帝国的领地。但是，帕提亚国王回到首都后，马上下令解散了军队。帕提亚与罗马不同，除了正常的警备以外，这个国家没有常备军。当战争爆发时，常常临时组织军队。而且，帕提亚历代国王最害怕的不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国家，他们最害怕的是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来自帕提亚东北部的亚细亚高原部族的进攻。哈德良选择领导者之间的会谈，不是因为他只喜欢这种手段，而是他认为，解决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问题，高层会谈是有效的。

就这样，帕提亚问题轻松得到了解决。既然已经到了帝国的东方，从不肯浪费时间的哈德良决定从安条克北上，进入小亚细亚，视察小亚细亚南部和西部。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现代的小亚细亚南部是向德国输送劳动力的一大劳动力来源地。与土耳其语这种当地的通用语言相比，在这个地方，使用简单的德语沟通起来更方便。但是在罗马时代，这里是个城

镇，拥有可容纳上万人的半圆形剧场。拥有可容纳上万人的公共设施，意味着这是一个人口数倍于这个数的城市。从飞机上看下去，小亚细亚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但是，走进里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富到历史上的强国都要争相占为己有。在罗马时代，这里属于元老院行省。这意味着，这里的罗马化历史已经很久，社会稳定，不需要驻扎军队。作为帝国最高责任人，需要亲自抓的事情极少。所以对哈德良来说，这一定是一次可以满足他从小的愿望和好奇心的旅行。

哈德良访问了罗得岛。罗得岛的意思是蔷薇花盛开的岛屿，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在当时，还是文化中心之一。按照哈德良的性格，想必他会去林都斯神殿吧。这个神殿建在高高的悬崖上，必须攀爬险峻的小路才能到达。回到小亚细亚西端后，他也去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纳苏斯、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出生的米利都、美丽的商业港口以弗所以及曾经的希腊诸国之一、后来一直是文化中心之一的帕加马，还到了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的故事发生地特洛伊。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化都起源于小亚细亚西部一个叫爱奥尼亚的地方。现在，这里属于土耳其的领土。但是，即便是现代，只要到这个地方旅行，你依然会抑制不住地怀念起希腊文化。所以，这些遗迹依然保存完好，应该说，这一带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本土并没有两样。也许，哈德良与比提尼亚出生的美少年安提诺乌斯相识，就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在小亚细亚。哈德良没有直接去雅典，尽管到爱奥尼亚旅行的人都会想去。因为，从季节上来说，他还可以继续视察边境。

哈德良

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皇帝和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进入了欧洲大陆，并向北去了色雷斯。色雷斯曾经是为亚历山大大帝培养骑兵的地方，这个山岳地带作为马的产地非常出名。罗马帝国的军团中，有很多骑兵出生于色雷斯。

经过色雷斯，到达多瑙河防线。这里是哈德良在青年时期度过军旅生涯的地方，也是他登基后，回归首都罗马前，进行过重建的地方。因此，视察期间，需要做的事情很少，视察的速度也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多瑙河河口开始视察，直到维也纳所在的中游地带。在视察莱茵河防线时，他已经完成了对日耳曼长城的全线视察。所以，作为罗马全

军的最高司令官，这个时候，皇帝哈德良完成了对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两大帝国防线的视察。

冬季已经临近，皇帝的行程朝向了南方。他打算在亚该亚行省首府雅典过冬。

雅典

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向往的地方，到了48岁才得以亲眼所见。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哈德良曾经被他的学友们取了一个外号，叫“希腊人”，他的两位监护人图拉真和阿提安曾经因为担心他过于迷恋希腊，把他送回了西班牙乡下，让他远离只会培养出软弱性格的希腊文化，代之以学习质朴而刚毅的罗马式生活。后来，军务和政务又占据了哈德良的全部生活，所以，尽管从距离上来说，意大利距离希腊不远，但是，对他来说，希腊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一次，哈德良来到雅典，一待就是6个月。这就不只是过冬了，很可能他把出身于比提尼亚的美少年也叫到了雅典。

哈德良是第一个蓄胡须的罗马皇帝。从共和制初期开始，罗马男子已经习惯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我想这是因为，历史上，罗马的崛起和希腊的衰退正好在同一个时期。罗马人大概不愿意自己被看成与希腊人一样吧。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自古以来，希腊人一直喜欢蓄长而浓的胡须。但是，深受罗马人爱戴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希腊人，留下来的肖像却几乎都没有胡须。所以，罗马人养成不蓄胡子的习惯也很正常。

罗马成为强权大国后，希腊进入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胡须成了通称“学者”的教师的标志。即使是现在，看到一个不知名的男性肖像，如果蓄有胡须，我们常常会认为他是“学者”。在图拉真活着的时

候，哈德良即使心里很想蓄胡子，但是，也许终究没有这个胆量。

当然，就像图拉真记功柱上看到的那样，罗马男人并非没有一个蓄胡须的。在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有专职的奴隶，每天早上为主人剃胡须。距离那个时代，帝国历史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其间，热爱希腊文化的尼禄曾经遮遮掩掩地蓄过一些胡须。到了哈德良时代，也许这种顾虑已经不再需要了。不管怎样，哈德良保存到现在的肖像都是有胡须的，当然这些肖像都是他当上皇帝以后的肖像。那个时候，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罗马皇帝蓄希腊式的胡须已经不会成为新闻。继哈德良之后的皇帝们，留下了来的肖像绝大多数都是蓄胡须的形象。尽管不像女人的发型那样变化繁多，但是，蓄胡须也是一种时尚。

哈德良在访问希腊之前已经开始蓄胡子。只是，哈德良就像第一次出国旅行似的，只要是希腊的东西，每一项他都愿意亲身体验。雅典市内自不必说，像德尔菲、科林斯、斯巴达、奥林匹克等所谓的名胜古迹，他全部游览到了。还有，虽然没有记录，他一定也去了矗立在苏尼翁海峡的波塞冬神庙，在那里欣赏了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的日出景象。他甚至还迷上了厄琉息斯秘仪，这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厄琉息斯秘仪是一种宗教，因为起源于距离雅典不远的厄琉息斯而得名。这一宗教信奉的是宙斯的姐姐、富饶的大地之神德墨忒尔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仪式通常是在夜里秘密举行，一切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所以被称做秘仪。希腊人认为年年必至的冬季，是德墨忒尔在哀叹与女儿的别离。因为女儿要去冥界6个月，不能回来。这是一种民间宗教，与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一样。自古以来，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在希腊人中间一直都很盛行。拉丁语叫巴克斯的信奉狄俄尼索斯神的宗教仪式，有唱又有跳，气氛非常热闹。与此相反，只因为与冥界有关，厄琉息斯秘仪是在夜间悄悄举行，而且对信徒的选择也很严格。如果说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是大众宗教的话，那么厄琉息斯秘仪则是少数精英的宗教。所谓宗教，不管是什么教，一定有利益值得期待。厄琉息斯

秘仪向信徒承诺的是死后可以得到平安。在罗马，皇帝兼任大祭司，是负责祭祀罗马守护神的最高权力人。然而，加入这个秘仪的皇帝却大有人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和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就是其中的两人。奥古斯都是一位冷静的统治者，他加入该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需要顾及被统治者希腊人。克劳狄乌斯加入该教是在登基之前。希腊和罗马都是多神教世界。虽然他们加入了希腊精英的宗教——厄琉息斯秘仪，但是，保守的元老院没有说一句责难的话。到了4世纪末，因为皇帝狄奥多西毅然推行一神教——基督教，厄琉息斯秘仪与古代其他众多宗教一起，被作为邪教遭到了扼杀。

秘仪在厄琉息斯的一个深洞内于深夜举行，所有参加者都会携带短刀前往，虽然这是禁止的。但是，哈德良总是一个人前去参加，既不带武器，也禁止警卫同行，忠实地遵守古代的规则。

欧美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展出的哈德良皇帝雕像与皇妃萨宾娜的雕像放在一起的不多。相比之下，与他宠爱的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放在一起的占了绝大多数。皇帝与这位比提尼亚出生的美少年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引人关注。

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图拉真曾经任命小普林尼作为特命全权总督赴任此地。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多希腊族居民。但是，出生于此的希腊人，没有任何特别，特别的只是安提诺乌斯容貌之不同寻常的美。

不清楚安提诺乌斯是何时、何地与哈德良相识的，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11月27日，却不清楚具体是哪年的11月27日。从我们唯一清楚的、他的殁年开始倒推，再加上被神化之人的特权——裸体雕像所显示的身体年龄进行推测的话，与哈德良相识的时候，很可能安提诺乌斯在15岁左右。这位希腊人身上所流露出的东方甜美的忧愁多于希腊人的知性，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希腊人。成熟、内心充满激情的48岁的罗马皇帝爱上了这位美少年。他俩的相识可以形容为“命运的邂逅”。这一次，哈德

良爱上了同性年轻人，而不是异性。这是发生在他视察向往已久的希腊文明圈之旅期间的事。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对于“美”的敏感反应，是人类感情极其自然的流露。对美的敏感反应发展成为爱也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古代希腊是男性的世界。所谓“男性的世界”，指的是男性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在这个“男性世界”里，也有女同性恋者。女诗人萨福就是其中一例。成年男性爱上少年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一句话，你可以把这种感情看做是，只要热爱希腊文化，就会爱上美少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爱美少年就不是希腊作风。事实上，伯里克利从来无缘少年之爱，他爱的始终只有女人。而他却被认为是比一般希腊人更像希腊人的人。

伯里克利是雅典人，生活在雅典人自诩自己就是希腊的那个时代。对于伯里克利来说，希腊是他的祖国，不是憧憬的地方。但是，对哈德良来说，希腊却是他憧憬的地方。无论他付出怎样的努力，希腊都不会成为他的祖国。

我没有一丝一毫小看哈德良的意思。我只想说，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你会非常理解他的那种感情。

本来只是为了过冬，却逗留了6个月之久。可见哈德良在希腊并非只是像游客一样，两眼闪着光，欣赏自己向往的这个地方。他是皇帝。正因为是皇帝，就有他可做的事情。

哈德良是个有梦想的人，同时他也是个现实的人。看到的希腊，尤其是雅典，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光，他的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也许，正是这样的感觉让他产生了重振雅典的念头。

雅典衰退的原因就在雅典人身上。希腊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发展平台易如反掌。按现在的说法，希腊人才外流导致本地人才缺少才是希腊衰退的根本原因。

如果继续放任这一状态，留在希腊的将是那些走不出去的人。如此一来，经济就会衰退，社会活力也会随之衰弱。一个社会失去了活力，人和物就只有出没有进了。罗马在多瑙河畔保护着希腊的安全，但是所谓真正的安全保障，如果后方不能承担起后方的职责，一切都是徒劳。如何让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全域，再次兴旺起来，也是罗马帝国统治者面临的一个课题。

哈德良是一个冷静而现实的人，他应该不会想让雅典重回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因为民族与人类一样都是有寿命的，要让进入老年期已经很久的希腊，重返青壮年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哈德良很可能设想要把雅典建成一座文化艺术及观光城市，把希腊建成一个商业及观光地。

尽管历史已经进入了罗马时代，但是历代罗马皇帝都没有想过要把文化艺术的中心迁到罗马去，它还在雅典。因此，如果要把这个城市变成文化艺术城市，只需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运行体系即可。然而，只有教授和学生的城市，充其量只能促进人和物的流入。为此，哈德良着手对那些曾经实用的、现在已成为名胜古迹的雅典公共设施进行了彻底的修缮。同时，他还为雅典市新建了一座公共建筑，叫“经济中心”，是一个很壮观的市场。对此，雅典市民自然是喜出望外。

为了使全希腊成为观光之地，他倡议开展希腊自古就有的四大竞技活动，以期找到出路。

希腊在鼎盛时期，曾经有四大颇具影响力的竞技活动。每当举行这些活动时，人们会从希腊各城邦纷纷前去助阵。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会

临时休战，为这些竞技活动让路。

皮提亚竞技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希腊中部的德尔菲。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阿波罗的。

尼米亚竞技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古斯。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宙斯的。

科林斯地峡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地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科林斯。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波塞冬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山区的奥林匹亚。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主神宙斯的。

这四大竞技活动的举办安排非常合理，每年总有一个地方会举行竞技会。古代希腊人心目中的“竞技”主要形式是体育竞技。但是，除了这一种形式以外，音乐、诗歌、戏剧等，只要是希腊人心目中的文化，都是竞技活动的内容。竞技会举办地，以神殿为中心，有很多活动场馆。当然，神殿内供奉的神，一定是这些竞技活动奉献的对象。希腊人在各个场馆都装饰了希腊雕刻及绘画。所以，前来观看竞技的人们，可以同时接触到希腊艺术的精粹。

哈德良为了振兴这些活动，不仅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为活动助兴，还拿出赏金奖励优胜者。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聚拢人气。只要人多了，物也会随之丰富起来。总之，哈德良想通过同时采用精英之道和大众之道的方法，使希腊重新获得生机。希腊正好有一个精英和大众都接受的东西——德尔菲神谕。苏格拉底也曾经去求过。

哈德良在以雅典为首的全希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有人认为这是源于他个人对希腊的热爱。但是，我认为，除了这一条，还有一个原因。作为皇帝，他有统治上的考虑。为庆祝他捐赠给雅典市的奥林匹亚

宙斯神殿完工，在该神殿完工3年后的公元128年，发行了刻有“Olympeion”的货币。对于哈德良来说，在雅典建造神殿和视察军团基地一样，都是为了政治。但是，在修复后的老街和新的街区之间，他建了一个拱形门，上刻“至此以前为忒修斯（被认为是雅典建国的始祖）所建雅典，自此以后为哈德良所建雅典”，充分反映了哈德良表面上对人宽容，本质上却是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极强的个性。

当然，仅仅6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完成上面说的所有事情。事实上，公元124年秋到125年春，在雅典逗留期间，他只是提出设想、制订实施方案，并下令着手建设而已。与建在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不同，对于“哈德良所建雅典”，他要在建成完工以后，亲自去看一看。不对，他只想亲自去看一看而已。

既然回到了希腊，那么，他一定会从这里直接回意大利。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实在没有资格去体验哈德良的旅行。最适合旅行的季节——春季还没有过去。而且，在希腊逗留6个月之后，哈德良已经彻底迷上了希腊。所以，当他乘船离开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以后，目的地却不是意大利本土的港口城市布林迪西，而是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上的大多数城市是希腊移民建设的。由于罗马使用双语制，希腊语和拉丁语并存。所以，虽然与意大利本土只隔了一个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但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领土以后，通用的语言依然是希腊语。特别是岛屿的东半部分，曾经被叫做“大希腊”（Magna Graicia）的一带，锡拉库萨、塔兰托、墨西拿等，由希腊人以殖民的方式兴建起来的城市非常多。在这些希腊色彩浓郁的城市里，一定也留下了哈德良的足迹。保存至今的记录中，说他登上了当时埃特纳活火山，不是因为对火山本身感兴趣，而是为了在埃特纳山上欣赏从东边海面冉冉升起的太阳。据说在埃特纳山上看到的日出是七彩的。在古代，这里是有名的景观之一。

这年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哈德良终于回到了首都罗马。为了尽早

让全帝国知道自己已经回到意大利本土，皇帝发行了刻有这条消息的银币。离开意大利四年半回来后，必须通过发行货币，上刻“皇帝回到意大利”（Adventui Augusti Italiae），告知全帝国，的确有点意思。但是，正因为哈德良喜欢亲赴各地视察，所以，他才能够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只是，普通百姓不会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哈德良组织并举办了由1835组角斗士参加的比赛。比赛期间，他向首都罗马普通市民通报自己已经结束巡视之行回到了罗马。

所有人都以为这下皇帝会踏踏实实地留在罗马了。然而，哈德良踏踏实实待在罗马的时间只是一个冬季。公元126年春天一到，已经50岁的皇帝再次动身向北非出发了。这个男人行事风格的确出人意料。可想而知，他与妻子之间一定相处不好。不过，这一次出巡纯粹只是为了工作。

北非

哈德良一行从首都外港奥斯提亚出发一路直奔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因为被撒上了盐而变成不毛之地的迦太基，在经过了3个世纪后的此时，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在罗马到迦太基沿线的海底，现代水下考古工作人员打捞无数在此遇难的船上遗物的工作还在进行。这些遗物充分显示，迦太基成为罗马领地以后，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代一样，再次成为北非物产的一大集散地。除了物，迦太基还有杰出的人物如马克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龙托。哈德良不仅让他进入元老院成为议员，还请他负责马可·奥勒留的教育。从其个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名称来看，他似乎是拉丁人。实际上，他曾经是迦太基人。

以迦太基为首府的阿非利加行省是元老院行省，罗马化历史较长，

因此很稳定。和高卢的里昂一样，首府迦太基只驻扎了不足500名士兵。守卫漫长防线的军团基地在西侧相邻的努米底亚，负责抵御来自埃及以外的昔兰尼加到毛里塔尼亚（今利比亚到摩洛哥）的沙漠民族的袭扰。哈德良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察这个军团。

哈德良在迦太基几乎没作停留就向西南出发，通过铺设在北非的罗马式道路网，进入了拉姆巴斯希（今阿尔及利亚的龙柏斯）。这里是守卫非洲防线的唯一一个主力部队——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基地。

通过在龙柏斯发掘出来的纪念柱（现收藏于卢浮宫美术馆）上所雕刻的文字内容，我们仿佛听到了哈德良在视察期间讲话的声音。在为纪念皇帝巡游而建的这根纪念柱上，刻画了哈德良在看完士兵们的演练后，面对整整齐齐站在自己前面的士兵们发表演讲的场面。在毒辣的白日照射下，参加近乎实战的演习的是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全体士兵和第二西班牙骑兵部队以及附属于罗马军团的由行省人民构成的辅助部队。

哈德良站在士兵面前，首先称赞了军团兵在训练时，战术运用非常熟练。他说，这是士兵们利用前线执勤及建设城墙、要塞等防御设施的间隙刻苦训练的成果，所以更值得赞赏。他又说，作为战士，每一名士兵对战术的运用越精通，对帝国精简军人数量越有利。士兵人数的减少，可以大大减轻帝国在防卫方面的经费负担。

接着，他表扬了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军团长费边·卡图里努斯的治军能力。4年后，在皇帝的推荐下，此人当选了执政官。

随后是对骑兵部队的讲话，他盛赞骑兵运用的战术。他说：“这种战术看似简单，但是，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能熟练运用。身负沉重的全副武装、高举长枪的第二西班牙骑兵部队让我看到了他们冲锋时无坚不摧的力量和训练有素的战术。”

最后，他没有忘记对辅助部队的士兵们讲话。他慰问了在部队指挥

官科尔梅阿努斯的领导下从事要塞建设的士兵们。他说：“正是你们的付出，才使军团兵和骑兵在战斗中得以更出色的发挥。也正因此，使你们的家园、土地以及家人免遭来自沙漠游牧民族的袭扰。”

我有一点感想。我想，哈德良作为最高司令官对士兵所作的演讲应该很出色，完全可以和尤里乌斯·恺撒的演讲媲美。根据同时代的记录，据说士兵们绝对拥戴哈德良。我想，这一点完全可信。

相信哈德良在视察其他地方时，也会作类似的演讲。同样，为了纪念皇帝亲临视察，为了让士兵们记住皇帝的到来，一定都建了纪念碑。此外，好像为了告知天下自己履行了皇帝职责似的，每视察一个地方，哈德良都会发行一套纪念自己巡回视察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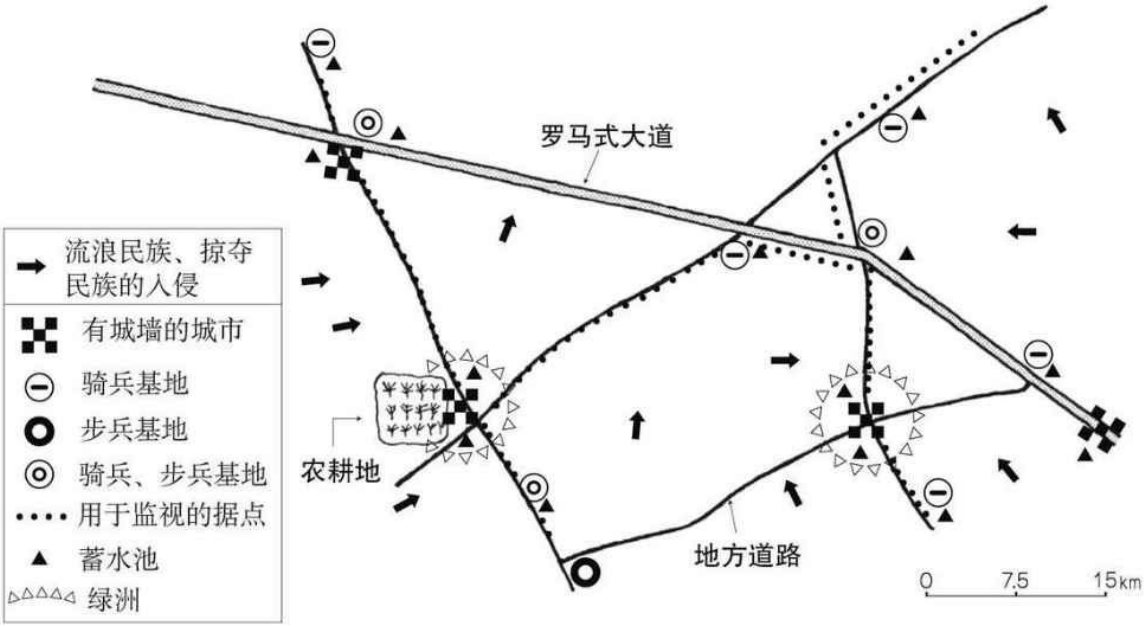
北非及周边地区

在龙柏斯军团基地，哈德良召集来了从昔兰尼加到毛里塔尼亚的前线所有指挥官，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下令要求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必要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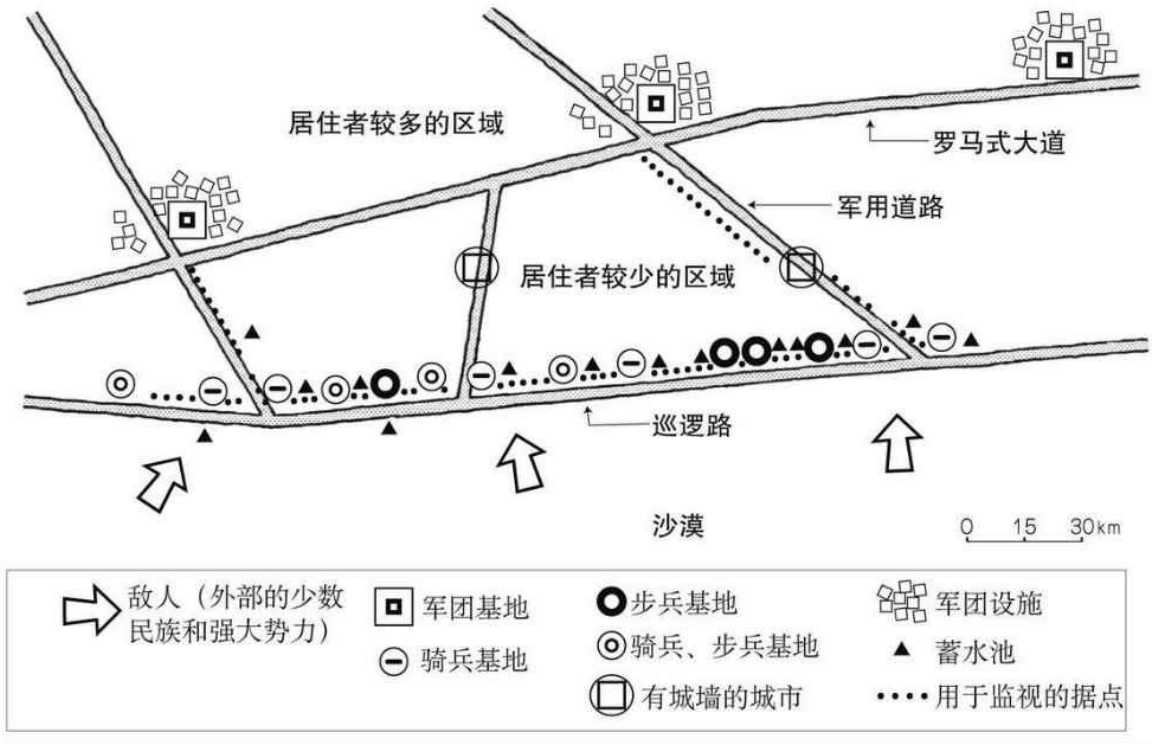
因为历代皇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非洲前线的设施建设基本已经完成。此时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现有军事力量，使之发挥更高的效率。请读者朋友们参看下页的图。守卫利比亚到摩洛哥前线的是一个军团的6000名士兵加上分队规模的骑兵以及人数相近的辅助兵，保守估计不超过2万人的兵力。因此，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成了当务之急。

来自沙漠民族的袭扰必须予以击退。虽然他们来袭只是掠夺财物，不会侵占土地。但是，如果这种袭扰的频率过高，当地居民会无法容忍，长此以往，他们会设法迁往临近大海的城市避难。一旦居民离去，田园就会荒芜。天长日久，就会变成沙漠。要防止出现沙漠化现象，必须通过不间断地种植农作物，保证绿色植物的生长。在古代北非，绿洲很多，不像现在变成了沙漠。原因是最初的迦太基和随后的罗马都很重视振兴农业。迦太基人甚至拥有技术性极强的农业书籍。消灭迦太基后，罗马很快把这种农业书籍从腓尼基语翻译成了拉丁语。此外，这两个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保护定居的农民不受来自沙漠游牧民族的侵扰。罗马帝国灭亡后，北非的居民很多是定居下来的曾经的游牧民。我想，他们理解只要有绿地就会有降雨的道理，也理解为保护绿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平”的道理。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
（昔兰尼加、阿非利加、毛里塔尼亚等行省）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高的地方
（北非的一部分以及叙利亚行省等防线）



（上下图都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离开龙柏斯后，哈德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部相邻的塔姆加第（今提姆加德）。这是在图拉真时代，根据图拉真皇帝的指示，为第三奥古斯都军团期满退役士兵退役后留在殖民地所建的殖民城市，建设者是正在服役的军团兵们，他们在服役期间为自己建造了退役后的落脚之处。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建成后的城镇呈正方形，感觉好像把军团基地放大后搬过来的一样。不过，就因为它不是基地，所以城中有半圆形剧场，有作为公共场所的广场，就连公共浴场，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14个之多。罗马人面临沙漠的威胁，也要营造完美的罗马式生活。

统称殖民城市的这种共同体，绝大多数是退役士兵与当地女子结婚后定居下来而形成的城镇。罗马中央政府不仅承认其自治，还给予多方优惠政策，帮助殖民城市发展。一方面是希望这些城镇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同时，还因为它们在安全保障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这里的居民曾经是军队中的“老兵”。现役军团基地附近，只要有退役士兵居住的城镇，这个地方的防卫力量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加强。

除了非洲前线，罗马在所有前线都采用了这一做法。罗马军团基地不是孤立存在的，附近有地方老百姓居住的“平民居住区”（canabae）。在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城堡、用于监视的要塞及监视塔构成的军事“屏障”内侧，相当于基地城市的“平民居住区”、退役士兵居住的“殖民城市”以及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的地方很多。这些都是“地方自治体”，罗马承认其自治权。这些地方通过罗马式大道相连，形成了功能性更强的统一有机体。正因为如此，仅仅15万人左右的主力士兵，不仅守住了整个帝国，还为后来的欧洲那些起源于罗马军团地基的主要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一个基地，如果只有驻扎的军团，那么在罗马军队撤离后，它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逐渐荒废。但是，罗马军队的基地是一

个有机体，有当地的百姓生活在附近。所以，在罗马军团撤离，甚至罗马帝国灭亡后，地方百姓移居到基地内，依然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

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哈德良的巡回视察中，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前线军团基地。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走访地方百姓居住的地方，按罗马人的说法就是行省人民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对罗马来说，这些人不只是被保护对象，他们同时也是参加防卫的人。

哈德良访问了退役士兵居住的城镇提姆加德之后，向东沿罗马式大道回到阿非利加行省（今突尼斯、利比亚北部），视察了萨布拉塔、的黎波里和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等沿海城市。在布匿战争时期，这些城市都属于迦太基，因此，居民都是迦太基人。遗留至今、保存完好的遗迹大莱普提斯，因为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出生于此地，一下子发展成为宏伟的大城市。但是，在这位迦太基族的罗马皇帝出生前20年，哈德良已经为这个城市建起了大规模的罗马式公共浴场。在这一带的城市里，罗马帝国没有派驻一个军团甚至一支部队。建浴场意味着要有水渠，罗马时代的北非，不仅已经有了纵横交错的罗马式道路网，而且，也建起了漫长的高架引水渠，水就从山区引到城市。

离开大莱普提斯，哈德良坐船回到了罗马。这次巡视始于公元126年春季，回到首都罗马的时候，据说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大概这次旅行的日程安排很紧。

接下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哈德良没有离开首都，也没有离开意大利本土。大概是这期间，他开始了《罗马法大全》的编纂工作。

《罗马法大全》

所谓法律，是决定“善良和公平的艺术”（ars boni et aequi）。这句话出自法学家培特· J.杰尔苏（P. J. Celsus）。他受哈德良之邀，参与了

把罗马法集大成的这一项大事业。顺便提一句，我把拉丁语“ars”翻译成了“艺术”。它的意大利译语是arte，西班牙语也是arte；法语是art，英语也是art；德语是Kunst。被认为是“善良和公平的艺术”的罗马法，反映了罗马人的法律观。他们认为，所谓法律应该顺应时代，作相应的修改。罗马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150年前后的600年间。其间，罗马建国，意大利半岛统一，在与大国迦太基的生死较量中胜出，并称霸于地中海。说起来，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应该只考虑本民族即拉丁民族即可。

第二个时期——公元前150年至公元300年的450年间。这个时期，大量的其他民族加入了罗马帝国。相应的，法律变成了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法律。这一时期的罗马法已经可以称做国际法了。

第三个时期——公元4世纪到6世纪的约250年间。这是从君士坦丁皇帝把东方的基督教变成国教，直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发行《罗马法大全》（Codex Justinianus Repetitae Praelection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为止的时期。

用一句话概括，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的罗马法是真正的罗马法，第三个时期的罗马法，我认为它已经变成了东方化的、基督教的法律。

在哈德良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尝试把第一和第二个时期的真正的罗马法进行汇编。两人做这件事的时间都在公元前1世纪。

第一个人是独裁官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关于这个人，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有详细描述）。苏拉思维清晰，又具备大胆果敢的行动力，而且为了实现目标，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但是，恒心不是

一成不变的。为了完成元老院强化政策，他甚至出任了独裁官。但是，当他看到这一政策成功后，却选择了引退。而且，从刑法尤其先进的法令集大成的工作中也抽身而退了。

第二个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他成为终身独裁官以后，找出了苏拉未完成的法令集大成，开始挑战民法的法令集大成。遗憾的是，因为他遭到了布鲁图的暗杀，这项工作再次半途而废。

在前两任的尝试过去了170年以后的此时，皇帝哈德良为什么又要再次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呢？

他在帝国内巡回旅行的目的是视察帝国防线。在视察过程中，为了重建帝国安全保障体系，他废弃了一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也重新整理了他认为可以继续保留的东西。

所谓的法令集大成，不是单纯地把所有法令汇总起来就可以的。首先，要把不好的法令，或者因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事实上已经失效的法令全部废除，同时，要制定必要的新的法律，然后，再把数量庞大的法令进行汇总整理，重组罗马社会的规则即罗马法。所谓整理、重组，无论是军备还是法律都是一样的。我想，哈德良的确是一位对罗马帝国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建”的人。

受哈德良之邀，参与罗马法集大成工作的法学家中，我们只知道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涅拉修·普利斯库斯、培特· J.杰尔苏以及塞尔维乌斯·尤利安努斯。

这三个人无疑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只是单纯研究法律的、类似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三个人不仅法律知识丰富，而且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哈德良选择他们来做这项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在罗马，精通法律的人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只要以法律知识是否足够丰富作为选择

条件就可以了。因为，掌握法律知识的人，一定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个人中，普利斯库斯年纪最大，他的经历也最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他一直都是皇帝的“内阁”成员之一。他是元老院议员，因此，大概也担任过几次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国家要职。

杰尔苏好像比哈德良年长几岁，在图拉真时代，曾担任过法务官，并两次当选执政官。此人也是哈德良的“内阁”成员之一。除了多达39卷的《学说汇纂》（Digesta）以外，其著作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书信集、评论等。他是一位出生于法国南部的罗马人。

根据后来的职业生涯推断，尤利安努斯接到哈德良的任命，负责这项工作的时候，大概在30岁左右。他出生于曾经是迦太基领地的阿非利加行省。他的全名叫路奇乌斯·奥克塔维厄斯·科尔涅利乌斯·尤利安努斯。因此，有一种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他的祖先是迦太基人，在罗马人征服迦太基后，被卖身为奴。后人又从奴隶成功变身为解放奴隶，并得到了昔日主人的家族名称。在帝制时期的罗马，这样的人并不罕见。

此人同样多次担任过罗马的重要职位，如财务检察官、军团大队长、国税厅长等。国税厅长之职，小普利尼也曾经担任过。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管理从元老院行省收上来的税。杰尔苏也出任过这个职位，卸任后，还担任过管理来自皇帝行省的税收的总管。除了上述职位，尤利安努斯还担任过只有元老院议员才有资格担任的法务官。在哈德良时代，他似乎晋升到了“光荣的职务”的中间阶段。

下一代皇帝安敦尼·庇护刚登基，他就当选了执政官兼任祭司。在罗马，大祭司是皇帝。此外，他还曾经任职低地日耳曼驻军的司令官。

尤利安努斯好像寿命很长。在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代，他依旧还很活跃，曾赴西班牙出任塔拉戈纳行省的总督，还到阿非利加行省（首府

迦太基）担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然后才结束官职生涯。此人留下了多达90卷的《学说汇纂》。

这三个人分别都留下了各自的《学说汇纂》。由此看来，我想，哈德良应该没有让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共同来完成《罗马法大全》，而是分门别类，每人负责一部分，交给他们各自完成。普利斯库斯也留下了《学说汇纂》，只是不清楚一共有多少卷。尤利安努斯负责的是按年度分类的临时措施法的集大成，内容是皇帝有权在征得元老院同意之前发布的命令。这部集大成没有和《学说汇纂》编在一起，而是作为独立的著作留了下来。这三个人使用的基本资料是，保存于公文书库中的、由历任法务官记录下来的判例。

完成这一大事业并正式出版这部《罗马法大全》，据说是在迎来哈德良统治第14个年头的公元131年。从此，罗马的政治家、行政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凡是与法令及判例相关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罗马法大全》了。也就是说，6世纪中叶，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完成的《罗马法大全》出版发行的400年前，罗马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法令集大成。甚至现代罗马法研究者们也说，查士丁尼完成的只能算是东方基督教性质的《罗马法大全》中，也转载了大量哈德良时代三位法学家整理的、集大成中的法令及判例。也就是说，哈德良重组的罗马法成果，也被查士丁尼吸收进了他的《罗马法大全》中。我想，这就是哈德良在法律方面作出的具有历史和法律意义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就让我们交给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吧。在这里，我只想从这三人的《学说汇纂》中摘录一些有意思的内容。需要声明的是，我只是从学者们明确指出为哈德良时代制定的法律中，摘录几例而已。现代法学界，把一生都献给了对罗马法研究的研究者依然为数不少。

一、不以叛国罪提起诉讼。一想到哈德良本人登基之初，即以此罪名惩处了四位前执政官的事情，这一条似乎显得有点虚伪。但是，也许这条法律已无必要，因为后来它受到了统治阶层的藐视。

二、对故意杀人、过失杀人以及正当防卫杀人实施区别对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后两者无罪，但是，新制定的法律倾向于无罪。

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的人，按照之前的规定，其资产全部充公进入国库。新的罗马法规定，留下其总资产的十二分之一给他的家人。其实，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实施仁政，这一做法早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这一条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已。

四、明确遗产继承权。罗马人很早就承认私有财产权，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哈德良制定的法律还规定，不得接受不相识之人赠与的遗产，不得接受有子女的熟人赠与的遗产。我想，制定这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继承权，摆脱来自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有形无形的压力。

还有一条法律规定，父亲死后11个月出生的孩子有要求继承遗产的权利。也许你会说妊娠时间不是9个月吗？对此，我们并不清楚罗马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想的。

五、士兵服役期间不得结婚。在其服役期间出生的孩子只能算庶出。但是，这个庶出的孩子也为家庭一员，享有遗产继承权。

此外，关于士兵的资产也作了明文规定。规定指出，在其阵亡、病死甚至自尽后，家人有继承权，但违反军规被判死刑的除外。这条法律一定是哈德良重建军事力量期间实施的。也就是说，这是一项提高士兵社会地位的法律。

六、对于攻击并掠夺因船只遇险游到岸边的落难者的人，之前的法律通常不加以追究。新法规定，对于这种行为，按盗窃行为严加惩处。

七、严禁对孕期女性进行处罚。

八、关于奴隶，新法规定，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严禁主人滥杀奴隶

或割除其身体的任何部位；禁止主人动用私刑。若有必要应该提起诉讼，交给法庭裁决。

严禁在家设置禁闭奴隶或其他用人的设施。

虽然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但是严禁把他们卖到妓院或角斗场。

主人或主人家成员遭奴隶杀害时，为获取证词，对用人采用持续刑讯的范围，只限用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或现场附近的人，而不是所有用人。

当确定罪犯就是奴隶，并决定判处其死刑的情况下，原法律规定，要对这家所有奴隶执行死刑。新法废除了这一条，并明文规定，只判处罪犯一个人死刑。事实上，之前的法律虽然规定有连坐，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没有那样执行了。尼禄皇帝时代，曾经因为连坐，一次处决了400个奴隶。对此，当时的市民们群情激奋，抗议声此起彼伏。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因连坐受到惩处。

九、明文规定了埋于地下的金子及其他物品的所有权。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发现金子或物品的人为土地所有人，那么，埋藏物全部归此人所有；如果金子或物品所埋之处为公有土地，原规定埋藏物归国家或地方自治体所有，新法则改成了土地所有者和发现藏物的人平分埋藏物；如果金子或物品所埋之处为他人土地，则由土地所有人和发现藏物的人平分埋藏物。

几年前，有报道说，一位英国农民在自己所有的农地里发现了大量罗马时代的硬币，他得到了那些硬币，因为他有这些埋藏物的所有权。由此看来，哈德良的法律在现代英国似乎依然有效。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大英博物馆是否会把这些罗马时代的货币统统买下来。大英博物馆里收藏有多达10万枚的罗马时代的硬币，博物馆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展出这些硬币，供人们欣赏或研究。我想与其把这些新发现的硬币拿出去拍

卖，让它们散落在社会上，不如集中保存于一个地方供人们随时欣赏，更符合人类共同遗产的使命。我不知道，那些硬币后来的命运如何。

让我们再回到哈德良的法律上来。除了上面这些规定外，还有几条法律，非常符合哈德良疾恶如仇的性格。

十、严惩擅自修改用于买卖活动的重量等计量器具、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的人。哈德良认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一定是公正。

十一、严禁为获取廉价、方便的建材而毁坏有历史价值的古老建筑。按现代人的想法，就是保护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其他宗教一律遭到排挤的时代，这条法律彻底失效。

十二、禁止公共浴场内的男女混浴。罗马人早已习惯裸体，几乎所有神像都是裸体，参加竞技比赛的选手也是半裸体。所以，迄今为止，罗马人从来没有禁止过在浴场的男女混浴。欣赏眼前女性美丽的裸体或许会让人们联想到活生生的维纳斯。只是，话虽如此，类似“性骚扰”的行为并非全然不存在。对“公”与“私”相当敏感的哈德良皇帝不能容忍这类事件。

禁止男女混浴需要相应的设施。之前所建的公共浴场都不分男浴和女浴。而且因为坚固，改造这些浴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通过划分入浴时间来区分男浴和女浴。上午第七时（13点）之前为女浴时间，第八时（14点）到日落（18点前后）之前为男浴时间。在罗马时代，男人劳作的时间通常是从日出到下午1点。当然，关于入浴时间的规定，各行省按照当地的习惯可以作适当调整。例如，有矿山的地方，浴室会开到夜里9点。禁止男女混浴，是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所以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然而，对此心怀不满的真的只是男性吗？或许女性也会有不满吧？

不管怎样，严禁男女混浴，绝对受到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欢迎。落

落大方的罗马式沐浴从此永远不再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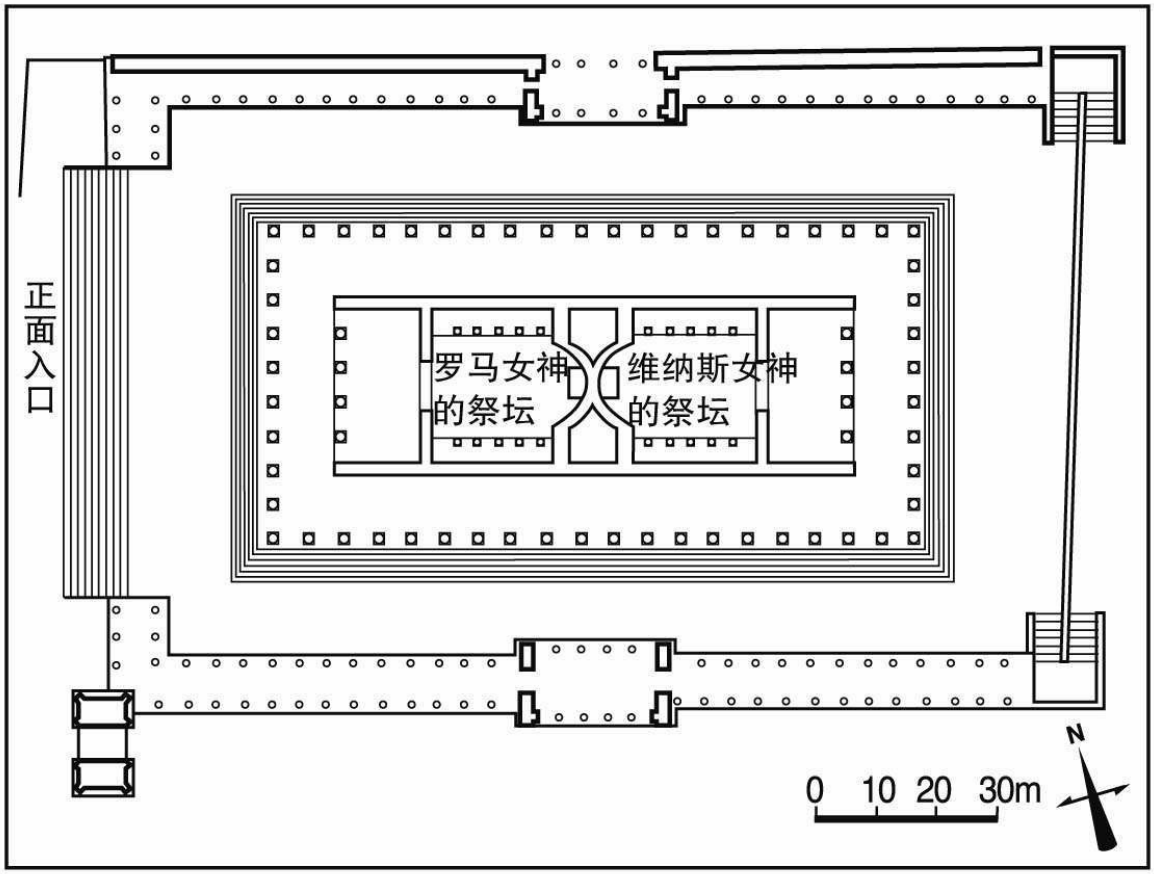
维纳斯神殿

哈德良在公共建筑领域方面，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很少。原因是图拉真时代，出现过建设大规模公共建筑的高潮。古人留下来的史实，都是“新”的，是同时代人的成果。所谓“新”，是指少且引人注目。而经常做的事情就不叫“新”。对于罗马人来说，修理或修复已有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很少会被记录下来。只有道路或桥梁等，因为希望对其进行修缮的人是直接受益者，所以，为了感谢实施修缮的人，会留下一些记录。只是，这些史实不会出现在文献史料中。后世的我们，只有通过发掘出来的石板、铜板上的碑文才能得以了解。根据这些碑文，我们了解到，哈德良巡回视察之际，带建筑师及技术员团队随行，是因为他有明确的目的。对于那些无须通过发行货币进行宣传的皇帝的日常职责，他也做得很完美。所谓保持，难道不是检测一个组织机构是否健全的有效指标吗？到了哈德良时代，建于首都罗马市中心的公共建筑物，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至于阿皮亚大道，其使用寿命已经长达400年。

话虽如此，罗马时代皇帝的三大职责之一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者，不能无视社会舆论，如果只做与“新”毫无关联的事情，他很难长期稳坐权力之巅。哈德良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在第一次巡察出发之际，他宣布要兴建一座神殿，用来供奉女神维纳斯和同为女神的、神化的罗马。

这座神殿建在古罗马广场东南端，圆形竞技场前面，建筑形式非常特别。按照以往的建筑方法，在一座神殿内可以同时祭祀两位神，即维纳斯和被神化的罗马。但是，哈德良建的这座神殿，因为两位神是背靠背连在一起的，只能分别祭祀。这座颇具独创性的神殿内部，特别是祭祀维纳斯女神一侧的神殿内部，圆柱都是产自希腊的深红色大理石，现

代人称其为“古代红”。地面据说是用灰白色和红色大理石铺就的马赛克图案。现在，这座神殿只剩下两位女神背与背相连部分的一点内壁，所以，我们不清楚祭祀罗马女神的神殿部分，用于圆柱和地面的大理石是什么颜色。不管怎样，与壮观的图拉真式样相比，华丽是哈德良的特色。



维纳斯和罗马神殿平面图

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建设者，哈德良与图拉真不同。图拉真是把所有与建筑相关的事情都交给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希腊人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去完成。哈德良则与尤里乌斯·恺撒同属一个类型，他有自己的想法，建筑师及工程师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而已。对于建筑界的行家来说，他这类人应该不太容易打交道。哈德良的建筑师们不像阿波罗多洛斯，只要了解图拉真的性格和他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充分展示作为建筑师的才能。然而，正因为恺撒和哈德良不是建筑专家，所以，他们才不会受建筑概念的束缚，才能想出集多种功能于一处的广场设计，才能想到两位女神背靠背连在一起的、这种前所未闻的建筑式样。这两人中，恺撒是幸运的。他的设计在后来各位皇帝兴建“广

场”时，得到了传承。而背靠背连在一起的神殿设计风格就没那么走运了。毫无疑问，这样的风格美观又华丽，却没有一个后人模仿。也许罗马人不太适应在祭拜完维纳斯女神后，出门绕到相反位置再去祭拜罗马女神的做法吧。这座神殿因其独创性成为到访首都罗马的行省人民必看的名胜，而罗马人民却用行动对皇帝的这一独创性神殿作出了评价。他们常常只祭拜两位神中的一位，省略祭拜另一位神。事实上，行省人民中好像也没有人模仿这座神殿的式样。因为，在罗马帝国境内找不出一个地方留下过这种样式的神殿。

对于这座颇具独创性的建筑，阿波罗多洛斯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女神站起来会穿透神殿屋顶。”这话传到了哈德良的耳朵里，让皇帝感觉很不爽，被说成是外行令他难堪。哈德良的统治开始以后，阿波罗多洛斯参与公共建筑事业的机会少了很多，而这件事让他更加受到冷遇。我想，哈德良充其量只是个艺术爱好者，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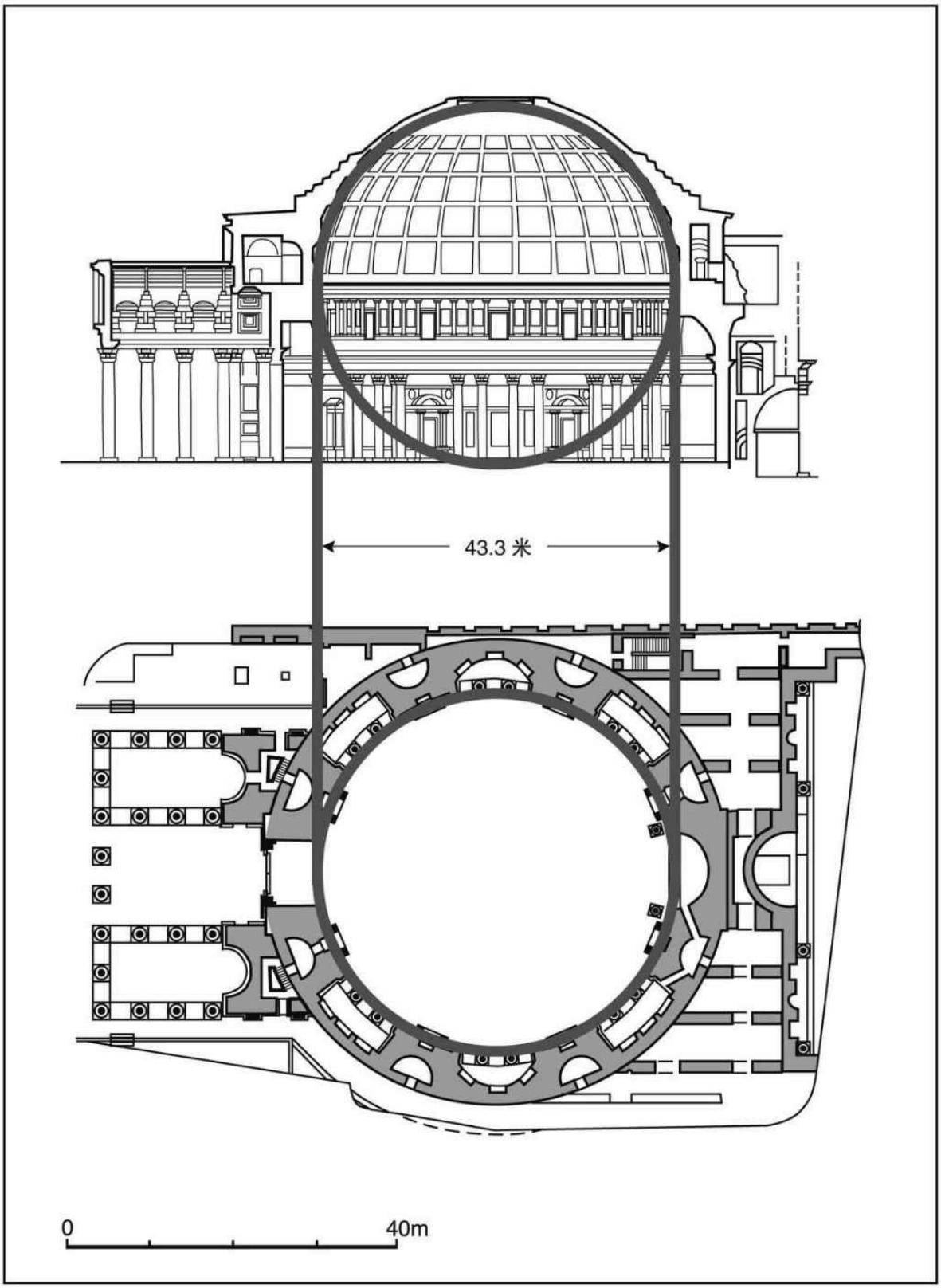
然而，尽管他是外行，他的设计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技术完美结合后，却创造了辉煌的成果。最好的一个例子，我认为非万神殿莫属。

万神殿

虽然后世对其内部有过若干改动，万神殿依然不失为古罗马留存至今的、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万神殿最早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由阿格里帕建造。当时，尤里乌斯·恺撒把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收做养子，打算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奥古斯都缺乏军事才能，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恺撒提拔了一名年轻武将，做屋大维的助手。此人就是阿格里帕。恺撒的眼光非常独到，这位名叫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武将对奥古斯都非常忠诚，无论在他登基之前或之后，态度始终如一，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忠臣。他还是奥古斯都独生女的第二任丈夫。夫妇俩生了很多孩子，使奥古斯都后继有人。所以他也是个忠义之士。

阿格里帕在公共建筑事业方面也是皇帝的最得力助手。在首都罗马，他建起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建筑物。首都的第一座正式公共浴场就叫“阿格里帕浴场”。到了哈德良时代，这座浴场依然还在使用。曾经身份低微的他，得到恺撒的提拔，一跃成为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阿格里帕为了表示感谢，计划建造“万神殿”（Pantheon），意思是“祭祀所有神的神殿”。于是，公元前15年前后，他在自己所建浴场的北侧，恺撒所建尤里乌斯选举会场西侧，建起了这座万神殿。

万神殿遭遇过几次火灾。虽说这座神殿是石结构建筑，但是，木材的使用量出乎意料地多。一旦下面的木板着起火来，架在列柱上面的梁、用木材支撑的天花板、用瓦片覆盖的屋顶就会坍塌下来。虽然受损不太严重的部分得到了修复，但是到了哈德良时代，万神殿几乎已经完全倒塌，重建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后世的我们看到的万神殿，完全是哈德良重新建的。神殿正面刻着“M. AGRIPPA L. F. COS TERTIVM FECIT”，意思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所建。这是哈德良为了对第一个建造者表示尊重而刻上去的。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阿格里帕建造的万神殿不是圆形而是方形的。哈德良在原万神殿的位置上，重建了一个式样完全不同的万神殿。


43.3 米
0
40m

万神殿（平面图和截面图）

相比较用文字进行说明，不如看图更加直观。所以在这里我省去了说明。我想，不用一根木材、大胆创新方面，万神殿与圆形竞技场堪称绝世双璧。关于建筑，就连比常人更外行的我也不得不为其圆形之完美而由衷地赞叹。

从力学上来说，圆形也许是最牢固的结构。此外，万神殿中支撑半圆形屋顶的水泥天花板，不只是单纯地越往上越薄。为了减轻天花板的重量，在向上建筑的过程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浮石。这座万神殿是多神教的象征。在基督教时代，这座神殿得以保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其结构牢固，不容易毁坏；另一个原因是它被基督教用做了教堂。在诸神像合围而成的圆周边上，神像换成了耶稣和圣徒们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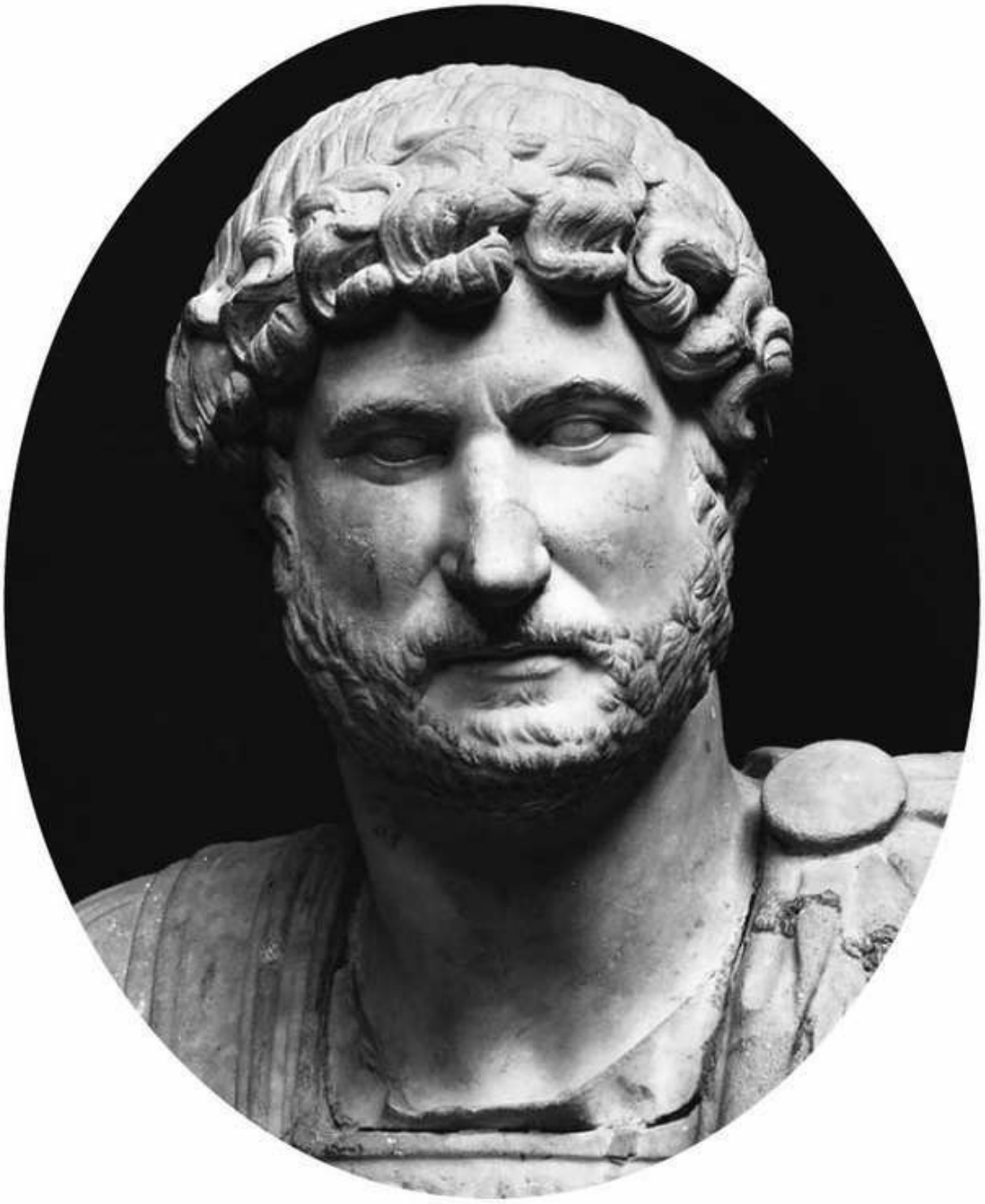
现在，万神殿又恢复了罗马时代的原貌。它不再是基督教的教堂，雕像也基本拆除干净了。站在神殿中央，从半圆形屋顶正中央的洞口，眺望着与罗马时代完全一样的、好像染过似的蓝天，我想，哈德良在想到圆形的设计时，或许有一种想要飞翔的感觉。或许他在想自己真是个天才。在古代罗马时代，没有人认为“我是神”这种想法是对神的不敬。就在他这样想的瞬间，他已经超越了艺术爱好者，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直到现在，万神殿依然影响着众多建筑师。就好像现代竞技场，无论是棒球场还是足球场，为了使观众席不受风吹雨淋和日晒，设施都如同圆形竞技场的翻版似的。

哈德良别墅

罗马皇帝不仅享有绝对的权力，同时也拥有巨额的财富。首先，随着对外称霸的政治需求不断推进[《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中有详细描述]，富饶的埃及成了皇帝的私有领地；其次，经济活动发

展的过程中，皇帝作为“地主”，来自帝国全境的农耕地的收益归他所有；再次，因为矿山都是国有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矿山挖出来的金银铜铁等财富，也都属于皇帝。



此外，以行省税为首的各种税收，只要是来自皇帝行省，即属于皇帝管辖的行省，也要进入“皇帝公库”。当然，金银铜必须铸造成货币，又因为皇帝行省几乎都位于前线地带，所以，“Fiscus”（皇帝行省税）收入的一大半要用做边防经费，这也是实情。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地方在罗马时代是帝国边境，常驻3个军团，有总计1.8万名军团兵和人数几乎相等的辅助部队士兵，以及哈德良时代增添的临时士兵。我常常在想，仅靠这两个边境地区缴纳的“皇帝公库”的收入，有可能满足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开支吗？然而，尽管这方面的开支数额巨大，皇帝作为大财主的这一事实却是不会改变的。

罗马始于城邦国家，它的真正主人是公民，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受公民委托来行使权力的人。在罗马，作为掌权者的公民虽然把权力赋予了他们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绝不允许皇帝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这种情形在雅典也一样。伯里克利在雅典施行事实上的独裁统治长达30多年，但是他的个人财富没有丝毫的增加。尤里乌斯·恺撒虽然在政治斗争中不惜钱财，但是他没有把钱用于改建或建造私宅，就连去温泉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西部度假时，他也选择了借住朋友的私人别墅。在成为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之后，恺撒只建过一个庭院，位于台伯河以西。就连这样一个庭院，他还特意留下遗言，要求自己死后赠与罗马公民使用。因为恺撒属于“体制”内的人，他是受“体制”约束的。与他相反，同时代的西塞罗因为不属于“体制”中人，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在罗马最高级的住宅区帕拉蒂尼山上拥有自己的宅邸之外，西塞罗还有8处别墅，其中位于拜亚的别墅曾经接待过恺撒。正因为他处于“体制”之外，没有一个人指责他奢华的生活。

进入帝制以后，因为上面提到的理由，皇帝的财源充足，拥有巨大的财富。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在帕拉蒂尼山上建了公馆和私宅，只是建筑非常简朴，值得称道的只有它所在的位置，因为帕拉蒂尼是当时的罗

马最高级的住宅区。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别墅是必不可少的。奥古斯都的别墅是其妻莉薇娅名下的别墅。他唯一花钱较多的是建在卡普里的别墅，但那是他用自己私属的伊斯基亚岛换取属于那不勒斯市的卡普里岛后建造的，而且新建的别墅本身既不奢侈也不华丽。

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出身克劳狄乌斯家族，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门第显贵。在他登基前就已经有足够多的别墅，所以，除了在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一座官邸之外，有名的就只有卡普里岛上的别墅了。同样，除了所处位置风景绝佳，其建筑的规模和豪华程度都不及普通元老院议员的别墅。

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既没有建私宅，也没有盖别墅，他把钱花在了建造豪华游艇上。这艘游艇就在内米湖上，却不能够让他逢凶化吉。游艇建成不到4年，他被杀了。

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为人节俭，从不铺张浪费。但是皇后梅莎里娜热衷于假公济私之举，这也是他作为皇帝得到的评价欠佳的原因。

第五代皇帝尼禄因为在罗马市中心建造了黄金宫殿而出名。事实上，这座宫殿兼具官邸、公馆和私邸的用途，整个规划非常大胆且符合生态要求。宫殿内有一大片绿化带，还有大面积的人工湖、牧场。这座宫殿是为市民建的，向市民开放。但是，把它命名为“Domus”（宫殿）误导了人们的想法，成了问题的根源。“宫殿”的意思是建于市内的独立建筑，“别墅”的意思是建于郊外的独门独院的房屋。黄金宫殿是后世的人对它的意译，直译的意思是“光芒四射的私邸”。把最高权力授予尼禄的罗马公民对“Domus”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他们认为，既然皇帝建造了“光芒四射的私邸”，那么他就不再适合拥有最高权力。

经过一年半内战之后登基的韦斯帕芗以及继他之后的提图斯没有建官邸、公馆或者私邸，只建造了圆形竞技场。可以认为这也是他们顺利完成统治的原因之一。但是，随后登场的图密善皇帝与他们不同。

这位皇帝不仅兴建了大量公共建筑，同时在帕拉蒂尼山上也建了一座豪华建筑，兼具官邸、公馆以及私邸的用途，占地面积极大。整座建筑的规模之大，使得他之后的皇帝们无须对其进行扩建。此外，他在凉爽的山区阿鲁巴建了一座山庄，在海边的奇尔切奥建了一座华丽的别墅。不能不说，这一切直接影响到了他作为皇帝的评价。与尼禄皇帝一样，他遭到暗杀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肖像全部被毁。

接下来的一任皇帝涅尔瓦在位仅一年半时间，因年事过高去世。所以即使他有心建别墅也没有时间。但是，图密善死后登基的他，在因私开支方面一定行事谨慎。继涅尔瓦之后的图拉真为了不重蹈图密善的覆辙，与涅尔瓦一样，行事也很谨慎。

图拉真建造了无数公共建筑，甚至让人怯于统计。但是，一方面因为他出身于行省西班牙，同时，在当上皇帝之前，他一直在前线任职，所以我想，他在罗马很可能连私邸都没有，也没有建一座类似于私邸的建筑。他只是把图密善皇帝建的住宅等直接拿来用了。作为私人用途的建筑，他只建了一栋别墅，就在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附近。但是，根据小普林尼的说法，这栋别墅极其简朴。继他之后的是哈德良，这是一个有品位的人。

哈德良想要的别墅一定要符合他的趣味爱好，首先在地点的选择上，他非常慎重。市内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他也没有选择罗马近郊，而是选择了距离罗马以东30公里处的提布尔（今蒂沃利）。

别墅建在蒂沃利，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因为不在首都罗马圈内，所以不必担心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一旦有什么情况，因为距离罗马不算太远，不会影响他的公务。第二，因为地处乡村，所以可使用的土地面积很大。第三，阿涅内河流经此地，用水方便。第四，有提布尔丁大道与首都相连，还有，从蒂沃利沿瓦勒利亚大道还可以直接到达亚得里亚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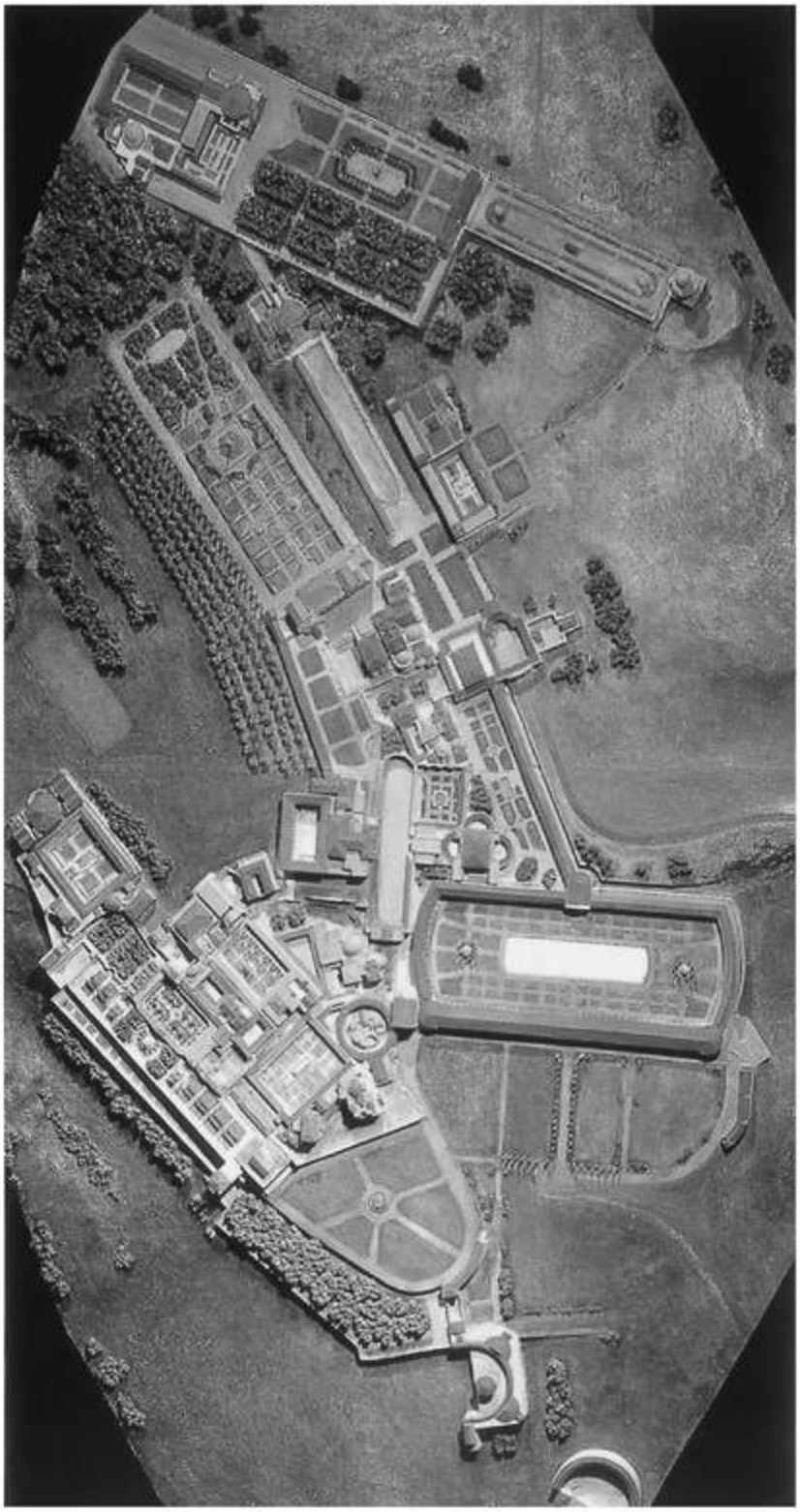
既然是皇帝，在巡回视察帝国各地的时候自不必说，就是在私邸度假期间，也是公务缠身。提比略后来一直住在建于卡普里岛悬崖上的别墅里，但是，到了波浪滔天的冬季，就要转移到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别墅，因为从这里可以走陆路直达首都罗马。同时，位于海军基地附近，意味着还可以接到来自海路的报告或情报。哈德良建在蒂沃利的别墅以哈德良别墅（Villa Adriana）之名而闻名。与提比略在卡普里的别墅一样，这栋别墅内同样设有公务活动区。对于无法从公务中抽身的皇帝来说，是否有全线铺设的罗马大道直接与首都相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根据印刻于所用砖块上的制造商商标可以推断出哈德良别墅动工建设的时间。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最早的砖块是公元123年的。在砖块需求量极大的罗马，工厂接到的订单一定很大，而且交货期很紧，通常应该是刚做好就要送往施工现场。如果开工时间是公元123年，那么就是哈德良登基6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在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也就是说，他已经走在旅途中了。公元123年这一年，正是为了与帕提亚国王之间进行最高层谈判，从西班牙横越地中海到达叙利亚的那一年。

因此可以断定，在他当上皇帝回到罗马的公元118年，再到离开首都的12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决定要建一座别墅，并且选定了地点，甚至设计好了基本格局。根据自己的喜好建一个休闲地一定是他很早以前的梦想。但是，就连公共建筑都不放手交给建筑师的哈德良，不可能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来做。因此还可以断定，他在视察帝国各地的时候，一定在考虑自己要建一座什么样的别墅。这座别墅从开工到完工耗时极长，建成后的别墅完全不同于罗马时代的任何一座别墅，说好听点是具有独创性，但是，严格来说，不过是一件业余爱好者的作品。

加上周边的土地，整座别墅规模宏大。现代美国大富豪保罗·盖蒂

受这座别墅的影响，在美国西海岸的马里布也建了一座别墅，但是，规模只有它的五分之一左右。连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富豪，也只能做到罗马皇帝的五分之一的规模，想想还真有点意思。更何况，这两人手中掌握的权力……



哈德良別墅复原模型

哈德良皇帝开始第二次大范围旅行是在公元128年，距离别墅开工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在这一阶段，别墅的结构应该还不明朗，因为这座别墅中的“哈德良风格”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第二次巡回视察到过的地方。大概皇帝在视察帝国各地的过程中，随时都在向蒂沃利传递自己的想法。无论是纪念品，还是艺术作品，我想他都有很强的收集癖。

研究者们说，在蒂沃利的别墅建设中，哈德良仿造了很多他在视察帝国各地时所看到的、符合自己趣味的东西。哈德良要把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世界引入别墅中，在这一点上，恺撒与他截然不同。恺撒认为，不管符合不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他来说，世界就是家。难道这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和纯粹的罗马人之间的不同？或者是这两个男人的“器量”不同？如此说来，我想起来了，尤里乌斯·恺撒是没有收集癖的。

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negotium”（工作）与“otium”（休闲）泾渭分明，非常清楚。普通市民通常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午工作，下午休息。条件还不错的市民，除了市内有一个家，通常在乡下也会有一个家，目的是为了确保农牧业的生产和收获。作为公众人物，皇帝却不能像市民那样把每一天的时间划分得如此一清二楚。但是，对于哈德良来说，他应该是把蒂沃利的别墅，包括别墅的建设过程看成了自己的“休闲”。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这座别墅中投入所有自己的嗜好。

但是，哈德良不是一个置工作于不顾的皇帝。在有关图拉真的章节中曾经介绍过一个插曲，我认为很值得回顾一番。

有一天，哈德良作为大祭司前往神殿主持祭祀仪式的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她要向皇帝请愿。皇帝说了一句“现在没有时间”，抬脚准备继续前行。那个女人于是对着他的背影喊了起来：

“既然这样，你没有权力统治我们！”

哈德良于是转身回到女人身边，听取了她的陈述。

再次“旅行”

公元128年夏季，已经52岁的哈德良开始了第二次漫长的旅行。第一次旅行是视察帝国西方，这次旅行的目的则是视察帝国东方。视察是一件耗时很长的事情，这一点，想必他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所以，在离开首都罗马前，他接受了元老院一再表示要授予他的、10年来他一直在推辞的“国父”的称号，并授予了妻子萨宾娜“奥古斯塔”的封号，意思相当于“皇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所以我想，他的“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职责”更恰当。之所以接受“国父”的称号，也许是他自觉自己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向元老院和公民表明自己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人。

船离开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以后，首先向南驶去，穿过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狭窄而水流湍急的墨西拿海峡后转而向东，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侧，进入爱琴海域。从这里开始北上，目的地是他心向往之的雅典。

上一次逗留雅典是3年前的事情。这3年间，根据哈德良的指示，在“忒修斯的雅典”旁边，“哈德良的雅典”的建设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资金的流动可以带动人的流动。虽然雅典不可能恢复到伯里克利时代那样，但是在哈德良振兴雅典的政策推动下，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地一定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哈德良在希腊各地巡回的过程中，在雅典逗留的时间加起来长达6个月之久。和上次一样，这一次他也参加了厄琉息斯秘仪。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频频出席了公共建筑物的完工仪式。这些建筑物都是他上次逗留雅典期间下令建设的，其中有“奥林匹亚宙斯神殿”。这座建筑物象征了希腊的重振，为了纪念它的完工，哈德良发行了刻有“Olympeion”字样的货币，不是纪念币，而是用于日常

流通的货币。它证明哈德良是把振兴希腊当成了一项国家大事来做的。

为了向哈德良表示感谢，雅典市民授予这位罗马皇帝“奥林匹乌斯”的称号。它意味着哈德良加入了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行列。在这一点上，希腊和罗马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把希腊和罗马文明看做一个整体进行论述。但是，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在很多方面，希腊和罗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在罗马，尚在世的人是不允许神化的，相反，希腊人不反对神化一个活着的人。也许这是希腊更靠近东方的缘故，因为东方人普遍认为国王就是神。尽管哈德良在新旧雅典城之间的拱形门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哈德良的雅典”，但是他拒绝一切自己下令建设的建筑物上冠以自己家族的名称。对于这样一位皇帝，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的雅典市民能给予他的，或许就只有把他加到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行列中了。哈德良理解雅典市民的感情，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雅典人神化自己的做法，虽然这一做法只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境内有效。事实上，哈德良虽然成了诸神之一，但是他在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内只拥有一个祭坛而已，没有自己的神殿。作为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的愿望，接受馈赠也是统治上的一个策略。

视察希腊不仅安全而且舒适，这种感觉与视察前线基地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哈德良并没有带皇后萨宾娜同行。随行的人中，除了美少年安提诺乌斯，还有就是诗人弗罗鲁斯。在整个旅途中，弗罗鲁斯充当了他的聊天对象。他不愿意带那些不懂得欣赏希腊文化的人，即使是妻子也一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但是，他又与尼禄不同，因为尼禄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愉快的6个月过后重新开始处理的公务，对他来说，只是极其自然的工作内容的改变而已。

公元129年春天一到，他离开比雷埃夫斯港，从海上向小亚细亚西岸出发了。在以弗所上岸以后，一路上直奔小亚细亚北部。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视察以锡诺普为中心的、毗邻黑海的小亚细亚北部地区。随行的人中，没有一个来自皇宫中的、派不上用场的人。与以往一样，这次与

皇帝同行的人以建设领域的专家为主，人数不多。一行人还去了特拉比松（今土耳其的特拉布宗）。这个城市位于黑海南岸各城镇的最东面，从这里再向东50公里就是亚美尼亚王国。这个地区没有罗马的军团基地，但是起源于希腊的这些城市依然属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

结束了对黑海地方的视察以后，哈德良沿着罗马帝国的边界向南进入了小亚细亚内陆，目的是视察萨塔拉和美利提尼（今马拉蒂亚）。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罗马行省是卡帕多西亚，而萨塔拉和美利提尼则位于罗马防线的最前沿。前者是第十五阿波利纳里斯军团的驻扎基地，后者是第十二雷鸣军团的驻扎基地。为了向全帝国的人民告知皇帝已经来到这里，哈德良发行了货币，上刻“Exercitus Cappadocicus”（卡帕多西亚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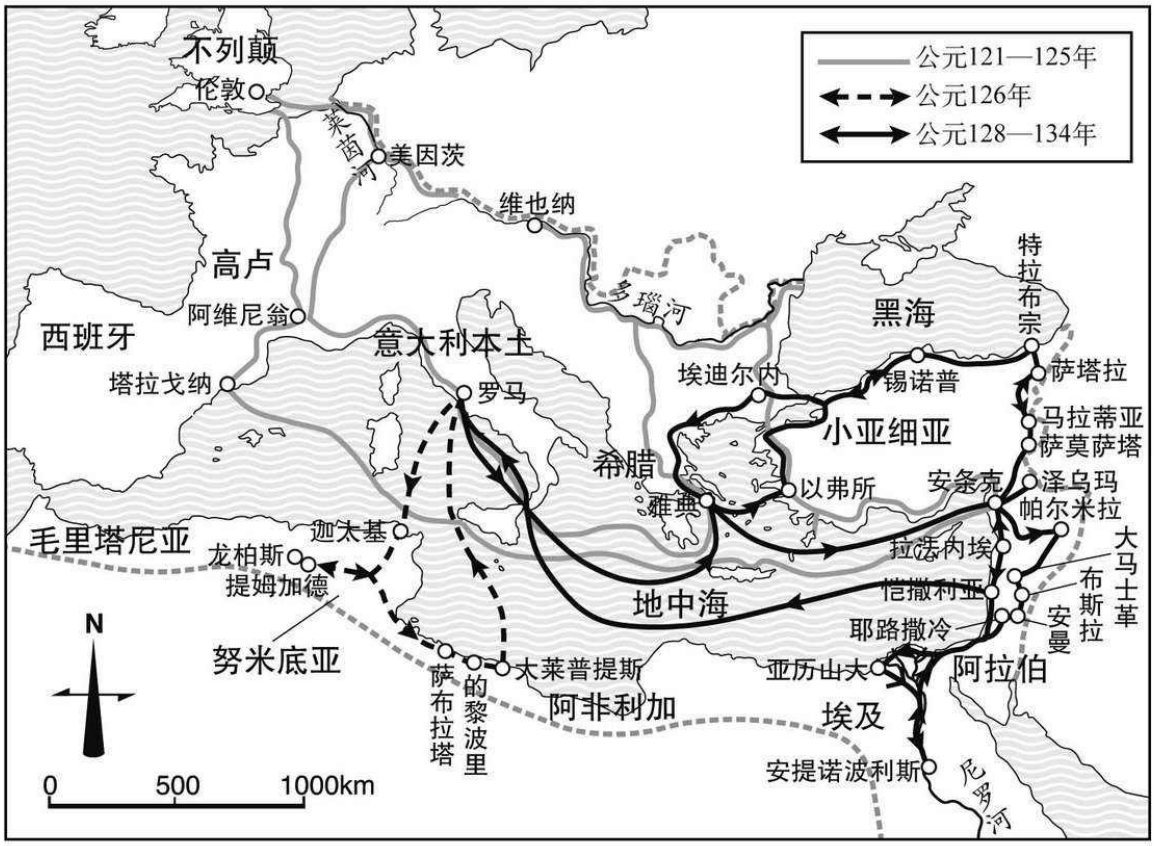
有一篇短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德良是如何视察国界线上的防御设施的。从前后内容来看，这篇短文可能出自这一时期伴随哈德良视察的弗拉维乌斯·阿里安之手。

> 我们来到了洛希尼岛。这是一个基地，驻扎着由辅助部队士兵构成的5个大队。我们一行首先视察了武器库，然后又看了围绕基地的屏障以及在屏障外侧的堑壕，接着看望了伤病员。离开病房后，去仓库了解了粮食的储备情况。同日，我们还视察了附近的城堡及要塞，检阅了骑兵的演习。在骑兵队基地，我们绕过基地屏障，从屏障外围视察了堑壕，同样也访问了医院，视察了粮库和兵器库。

此外，皇帝每到一个基地，应该都会向士兵演讲，激励大家。对于担任边境防卫任务的士兵们来说，他们每天都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所以，皇帝的到来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阿里安是出生于小亚细亚比提尼亚行省尼科美迪亚的希腊人。他的名字中有弗拉维乌斯的家族名称，表明了他父亲那一代，在从韦斯帕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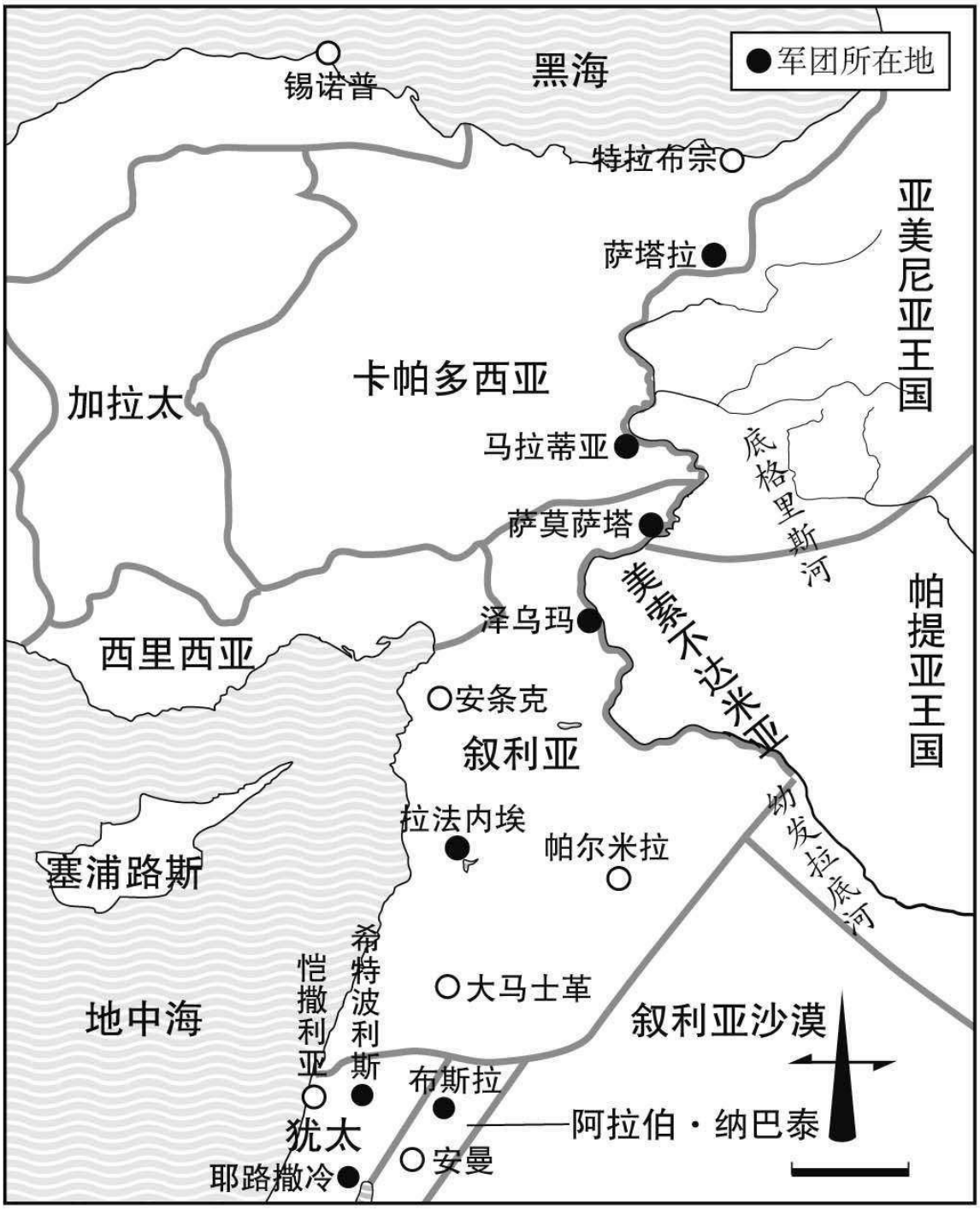
到图密善时代里，因为弗拉维王朝某个皇帝的推荐，取得了罗马公民权。据说他的出生年份是公元95年前后，因此年龄比哈德良小20岁左右。他热爱以哲学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为自己身上流淌着希腊人的血液而深感自豪。同时，他又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罗马帝国事业的希腊人。他教养高深，思维清晰，还有敏锐的洞察力。哈德良非常欣赏他。在这次巡回之旅开始两年后的公元131年，哈德良任命他担任了卡帕多西亚行省的总督，当时他只有36岁。前线的防卫任务很艰巨，哈德良连续6年没有撤换他。其间，他为击退来自东北部的蛮族的侵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担任总督期间，阿里安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发表了有关防卫问题的论述，并献给皇帝哈德良。上面引用的一文就摘自他的著作。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阿里安既是一位行政官员又是一员武将，深受哈德良的喜爱和重

用。在顺利结束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的任职后，皇帝没有把他调到其他前线继续承担前线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了雅典负责行政事务。雅典是一个享有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自由城市，罗马官员无权干涉其市政。所以，是年已经43岁的阿里安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以个人的名义取得雅典的公民权。不惜牺牲一个有能力的武将，把阿里安送到雅典，反映了哈德良的真实想法。因为这位武将和他一样，对希腊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他认为雅典就应该交给这样的人来管理。一年后哈德良去世，继他之后的皇帝安敦尼·庇护也许认为把雅典交给阿里安不失为良策，所以，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里安都在雅典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小亚细亚东部及叙利亚

取得雅典公民权以后，阿里安作为文人的才能开始显现出来。他敬

重色诺芬，因为色诺芬与他一样文武兼备，也因此，阿里安的才能在讲述历史故事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留存至今，共有7卷。即使在现代，它依然不失为一部关于亚历山大的阅读性强、可信度高的历史传记。作为历史传记，它与库尔提乌斯·鲁夫斯的《亚历山大史》（Historiarum Alexandri Magni Librix）一样，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接着说哈德良。结束了对卡帕多西亚前线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一行去了叙利亚。从卡帕多西亚到叙利亚只要一路南下即可到达。此行的目的是要在安条克过冬，时间是公元129年至130年的冬季。安条克是帝国东方与埃及的亚历山大齐名的大城市。哈德良是个从不肯浪费时间的人，所以可以想象，他在安条克逗留期间，一定视察了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军团基地。叙利亚与另一个大国帕提亚接壤，常驻有3个军团，其中2个军团的基地位于从小亚细亚到安条克的沿途。它们是第十四弗拉维军团基地和第四西提卡军团基地。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萨塔（今土耳其东南部萨姆萨特），后者位于泽乌玛（今土耳其巴尔奇斯）。只有第三蔷薇军团的基地在安条克以南的拉法内埃（今叙利亚沙玛）。

罗马有28个军团，军团基地也有28个。除了视察军团基地，哈德良还要视察辅助部队的基地、骑兵部队的基地、城堡和警戒哨位等等。同时，他也一定视察了由期满退役士兵建设起来的殖民城市以及原住民的地方自治体，它们也是罗马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虽说视察是哈德良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件苦差事。

在视察某军团基地时，一天，在晚餐席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与哈德良同行的人中有一个以讽刺诗见长的人，名叫弗罗鲁斯。他在席上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

我可不想做皇帝

整日走在不列颠人中间

往来于（边境）

忍受斯基泰的严寒

哈德良当即回了一首：

我可不想做弗罗鲁斯

整日进出廉价酒馆

徘徊于酒桶之间

忍受胖蚊子的叮咬

在这里我把拉丁文原文也写下来。因为只要用罗马发音就可以，所以很简单。

ego nolo Caesar esse,

Ambulare per Britannos ,

Latitare per ...

Scythicas pati pruinas

ego nolo Florus esse,

Ambulare per rabernas,

Latitare per popinas,

Culices pati rubunolus

这一时期，哈德良完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外交工作。不清楚具体地点在哪里，好像是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某个希腊系小城。在这里，他邀请了中东所有地方的首领，据说连帕提亚国王也来了。罗马和帕提亚这两个东西方强国的最高权力者能够坐在一起，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哈德良的目的绝不仅止于此。一直以来，与这两个大国相邻的小国，常常见风使舵，投向两者中更强的一方。现在，让这些态度摇摆不定的中东地方首领出席帕提亚国王和罗马皇帝的友好会面活动，对他们的心理一定会产生影响。

14年前，图拉真攻陷帕提亚首都时，抓获了帕提亚的公主，并把她作为人质一直扣押在罗马。此时，哈德良把这位公主送还给了其父帕提亚国王。这次会面并非因为帕提亚方面出现反罗马的迹象，为处理这种局面而进行的。因此，罗马方面完全没有必要以返还人质为条件，要求帕提亚方面作出妥协。但是，哈德良归还了人质，由此可见其外交手段之高明。外交和战争一样，常常因为出其不意的战术，收到最佳效果。这次会谈的结果是确保了中东一带的和平。

公元130年，新一年的春季，哈德良离开安条克前往帕尔米拉。帕尔米拉位于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的接近正中间的地带，是叙利亚沙漠中心的一座城市。但是，就像它的名字——“棕榈（椰子树）之城”所表明的那样，它是个绿洲城市，是骆驼商队从东方运向西方的物资中转地，因而很繁荣。因为经济实力的雄厚，独立意识更强，又因为通商方面的有利条件，所以，帕尔米拉繁荣无论对帕提亚还是对罗马来说都是好事。但是帕尔米拉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经常受到沙漠民族贝都因人的侵扰和掠夺。在贝都因人的意识中，掠夺不是罪孽，而是正业。然而，他们的这种正业一定会伤害到他人，一定会有人成为受害者。如果商队因为痛恨贝都因人的这种正业而选择其他通商路线的话，帕尔米拉就会彻底失去生命力。但是，帕尔米拉这个民族只会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活动，却不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

罗马的势力发展到达幼发拉底河以后，担负起了保护帕尔米拉的责任。帕尔米拉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同时贝都因人也被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从此，帕尔米拉的富豪们不必再担心贝都因人的掠夺。顺便提一句，贝都因人的“正业”被禁止后，罗马帝国把他们编入防守边境的军队中，以此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帕尔米拉是一座位于幼发拉底河防线的边境城市，对于罗马来说，它非常具有象征性。它不像其他防线的“屏障”，栅栏、堑壕、城墙和堡垒绵延相连，是封闭的“屏障”。这是一个开放的“屏障”，由联结瞭望塔、堡垒、军团基地以及通往各个军事要塞的大路构成。虽然这个“屏障”建在北非沙漠的前方，但是，幼发拉底河防线在防御敌人来袭的防御体系中，在保护，不，应该说是在鼓励人与物产交流方面，作为威慑力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只要守住帕尔米拉，就证明开放的“屏障”——幼发拉底河防线是有效的。在沙漠中，罗马大道呈放射状从帕尔米拉铺设到了安条克、大马士革及红海的亚喀巴。哈德良离开安条克后，只要选择走其中的一条大道即可。

结束了对帕尔米拉的访问后，哈德良选择了去大马士革。在沙漠中，罗马式大道几乎呈一条直线，从帕尔米拉到大马士革只有230公里的路程。

他在大马士革只是稍作停留而已。他选择这条路线的真正目的是前往波斯特拉（今布斯拉）基地，视察驻扎在阿拉伯行省（今约旦）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不用说，和视察其他基地时一样，他一定视察了这里所有的设施，观看了士兵的演习以及面对士兵作了演讲。他还发行了货币，上刻“Adventui Aug(usti）Arabiae”（皇帝视察阿拉伯）。当然，这是为了让帝国民众了解皇帝已经来到中东沙漠，正在这里视察这一事实。

罗马军团

至此，哈德良完成了对罗马帝国所有主要防线的视察，它们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不列颠、北非、联结黑海至红海的幼发拉底河防线。在视察过程中，皇帝除旧立新，重新整顿后的军事力量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我想就从犹太人写的《犹太战争史》中摘选一段来进行说明。篇幅略有些长，作者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

> 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罗马人的见识只能表示敬意。他们甚至要求在军团基地劳动的奴隶也参加训练。对奴隶们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处是，当敌人来犯时，他们也能拿起武器，加入防御作战中。事实上，罗马人制定的所有军事制度，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们之所以能守护这样一个辽阔的帝国，不是得益于运气，而是缘于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努力的结果。
>
> 战时，罗马士兵理所当然要拿起武器迎击敌人，但是他们不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拿起武器，在平时，它们也从不贪图享乐。武器就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须臾不离。他们每天勤于训练和演习，从来不会等待在实战中检测自己的作战能力。
>
> 罗马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其激烈程度与实战几无二致。不，应该说在演习中，他们的气势和严肃程度与实战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实战中才能做到不会惊慌失措，不会自乱阵脚，不会抱怨身体疲劳，不会打乱作战阵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百战百胜。罗马士兵和其他国家士兵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没有一个敌人像他们那样过着严格的军团生活。对于罗马士兵来说，军事训练就是不流血的实战，实战就是伴随有流血牺牲的训练。这样说应该不会有错。
>
> 罗马的军团兵很少突袭敌人。他们在攻打敌人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用栅栏围住一个地方修筑坚固的宿营地。他们会慎重选择修建宿营地的位置，从来不会盲目行

事。营址确定后，全体士兵马上投入劳动。如果因为战时的需要，不得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修建宿营地时，他们会首先平整土地。因为地面不平坦，适合防御的四角形营地就无法充分体现其有效性。像这样，因为罗马士兵兼做工兵，所以他们在行军的时候，总要背负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

无论是在共和制时期还是在帝制时期，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也要修建牢固的宿营地，是罗马人一贯的做法。对他们的这一做法，现代战争的专家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一方面，士兵们知道一旦战况失利，自己有地方可退，就会在战斗中表现勇猛；另一方面，如果打了败仗，只要逃回宿营地，他们可以在这里平息内心的恐惧，恢复内心的平静，有利于在下次战斗中，表现更加勇敢，从而挽回失地。也就是说，虽然建造牢固而安全的宿营地时付出了辛苦，但是，它为士兵们提供了心理上的依靠，辛苦是有回报的。

犹太人继续评价罗马军队：

他们会在宿营地内搭建很多帐篷，用原木连起来的栅栏环绕在整个宿营地的外侧。瞭望塔建在栅栏做成的屏障的重要位置上，每个瞭望塔之间都配有重兵器，以投石器为主的各种重兵器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四边形营地的每个边都有一个门，门的宽度适合可移动的重兵器及士兵们列队进出。

宿营地内的中央通道把营地一分为二。通常，中央通道的一边是仓库、病房和士官们的帐幕，另一半是士兵们的帐篷。军团长的帐幕既高又大，位于宿营地的正中央，就像神殿一样。

罗马人的宿营地变成固定基地后，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士兵集合的地方可以用做广场，兵器修理所可以用做工匠的车间，审判违反军规的士兵以及军团长召集将官会议的会场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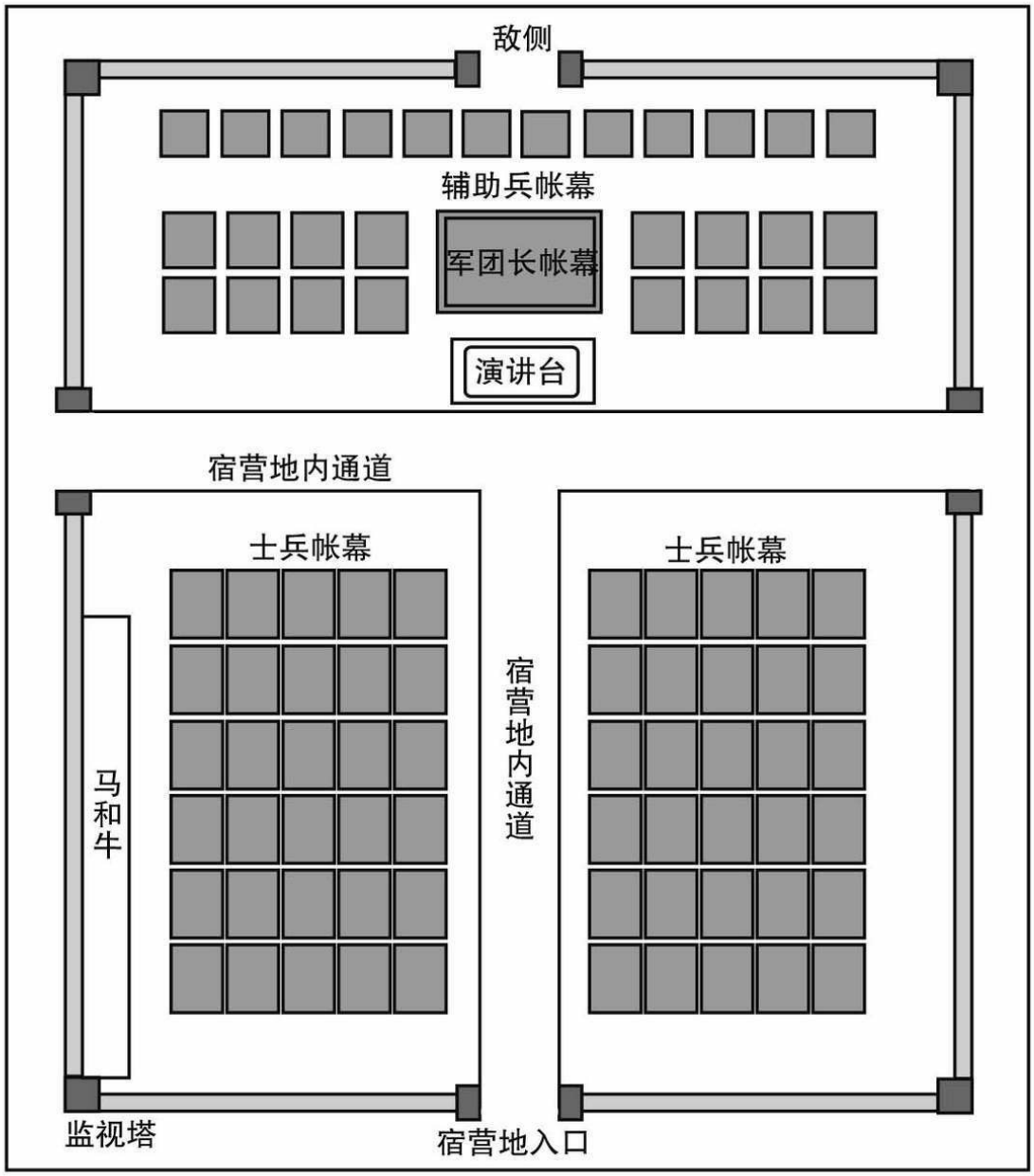
用做大会堂，兼做法庭。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的营地，因为士兵们早就习以为常，所以无论是环绕宿营地的栅栏还是别的设施，其修建速度之快，整座宿营地之牢固，令人惊叹不已。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在栅栏外侧，挖一条深度和宽度都为4腕尺（约2米）的堑壕。这一切都与普通村落无异。

宿营地修建完成后，士兵们进入各自的帐篷。随后，由当天值勤的小队整齐有序地开展其他工作，包括分配柴薪、粮食、水等。

罗马军队规定士兵的一切行动要听从军号的指挥。在军号响起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提前进餐，就寝，四班倒的夜间岗哨、起床等也要听军号的号令。

天快破晓的时候，起床号响起。在第一声军号中起床的士兵们在各自的百人队队长面前列队。百人队队长清点士兵人数后，前去向他们的上司——大队长报告，然后，大队长带领百人队队长们一起前去向军团长报告，并接受军团长的指示，随后再把军团长的指示传达给士兵们。罗马军队这种上传下达的方式同样用于实战，所以在战斗中，即使改变战术，也能迅速而准确地传达下去。因此，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罗马军队按照命令，都可以做到阵脚不乱。

出发离开宿营地的时候也要听从军号的号令。在军号的指挥下，所有人参加宿营地的拆除工作，没有一个人会偷懒。第一声军号是拆除、折叠并捆绑帐篷的命令。第二声军号是行李装车、推出重兵器、牵出马匹及牛的命令。这些事情完成后，军队在宿营地外集结。全体士兵队伍整齐，看上去就像参赛的马匹排成一条直线，准备冲向跑道一样。然后，第三声军号响起，这声军号是催促迟到者，同时命令百人队队长和大队长清点士兵是否全部到齐。最后，他们会点燃环绕宿营地的栅栏，因为他们认为与宿营地被敌人占用相比，不如重建更有利。



罗马军队宿营地略图

出发的准备工作完毕后，站在军团长右侧的发令员用拉丁语连续三次问大家是否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每一次，士兵们都会斜着举起右手敬礼，同时齐声回答：“准备完毕。”

之后行军开始。全体士兵就像在战场上坚守各自阵地一样，安静而有序地走在自己的位置上。军团兵佩带胸甲和头盔，腰的两侧

佩剑，佩带在左侧腰部的罗马短剑比佩带于右侧腰部的短剑要长一些。走在司令官周围的是步兵部队，他们只拿长矛和圆形的盾。余下的军团兵除了投枪和长方形的盾以外，还要携带锯、镐、斧子、铁锁以及用于搬运的皮制宽运输带、可用来割皮的大型刀具，再加上三天的粮食等等，让人感觉他们背负的行李比牛或驴拉的辎重车还要重。

骑兵们右手拿长矛，剑佩带于右侧腰部，盾挂在马鞍的一侧，箭筒背在背上，装在箭筒内的箭又尖又长。骑兵们用的头盔和胸甲与步兵们用的是同一类东西（罗马人不按社会地位区分骑兵和步兵，只按他们的性质区分。作者是出生于犹太的犹太人，对于这位东方人来说，想必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一定让他深感惊讶）。骑兵的装备和战场上担任两翼进攻的骑兵一样，他们就走在司令官的周围。此外，在罗马军队里，由哪个军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要通过抽签决定。

以上就是罗马人的军队在宿营地建设、行军方法以及装备方面的真实情形。同样，在战斗中他们也不会盲目行动。因为每一个计划都关系到相应的行动，而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下一个计划。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少出错，即使出错，他们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加以改正。

罗马人认为，与预想之外的运气所带来的成功相比，宁可在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出错。他们的理由是，无计划的成功会让人忘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而经过周密的准备后的失败是积累经验的有效途径，可以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其次，凭借运气获得的成功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经过周密准备后，尽管结果不好，但是至少心里很踏实，因为他作过努力，因为他充分考虑过对策。

罗马人通过军事活动，不仅锻炼了肌体，也锻炼了意志。军事训练帮助他们克服了恐惧心理，严厉的军规教给了他们集体生活的方式。在罗马的军队里，私自逃跑会被判死刑；即使是一丝小小的失误，如果影响到了整个军团的安全，也会受到重罚。士兵们最害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司令官。当然，司令官并非只会严厉对待士兵，

对于值得称赞的士兵，他们从不吝惜褒奖之词以及奖励。他们很善于在严格和宽容之间找到平衡。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绝对服从指挥官，而这一点，正是罗马军队可以保证有序行动的重要因素。

战场上，罗马士兵不会擅自打乱战斗阵型，他们一定会和战友同进共退，就像一个整体。他们的耳朵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命令，他们的目光不会离开军旗，他们的手脚会按指令迅速行动。即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如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敌人在战场上占主动等，甚至命运女神的意志都不能削弱他们的斗志。就好像他们完全相信，与运气相比，自己更强大、更可靠。

收集尽可能全面的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对形势作出判断，制定战略计划，然后按计划行动。这就是罗马民族。他们在实施计划时的效率之高以及计划制定前考虑问题之周密着实令人赞叹。他们的帝国版图之所以可以东到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北及多瑙河和莱茵河，想来理应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他们所征服的地域如此辽阔，但是，与征服者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显然还不算大。

以上是我对罗马军队所作的详细描写。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赞美罗马军队的意思。相反，我是为了安慰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们，告诉他们，你们被征服不是因为你们自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因为罗马人非同一般的素质。同时也是为了劝告那些试图挑起叛乱的人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对付的人是罗马人，从而让他们把叛乱的想法扼杀在萌芽之时。最后，我衷心希望我对罗马军队所作的描述，对那些关心罗马的人们有所帮助。

我知道这是犹太人对罗马军队的溢美之词，但是，这些文字留给我的印象好像罗马军队只是一架精巧的军事机器。然而，罗马军团兵不是纯粹的“齿轮”，而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我想介绍两块墓碑，它们属于战斗中阵亡的士兵。通常，罗马人的墓志铭上会有本人生前写过的话：

有生之时，我一直享受着畅饮的快乐，所以，你们在有生之年也要尽情畅饮。

我在心里默默起誓，为了和平我要尽我一己之力，我做到了。

我发誓要杀死达契亚人，我做到了。

我希望参加凯旋仪式并纵情享乐，我体会到了。

我想当首席百人队队长，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回报，我得到了。

我想膜拜女神的胴体，我膜拜过了。

《犹太战争史》的作者感兴趣的是罗马军队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罗马士兵的人性。

关于这位作者，我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作了详细描述。这位犹太人生活在公元1世纪后期，很可能与罗马人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他曾经是反罗马的犹太军队的指挥官之一，与罗马军队有过正面交锋的经历。他亲眼见识过总司令官韦斯帕芗率领的罗马军队是如何镇压犹太叛乱的。上文是他对这支军队的评价，他用心观察并研究了罗马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公元70年前后的罗马军队，不是公元130前后哈德良改良后的罗马军队。但是，一个高效的组织与时间的推移没有关系，因为，对一支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是它的效率性和功能性。

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在犹太战争期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罗马军队。在图拉真时代，一直采取进攻态势的罗马军队大概与约瑟夫斯描述的韦斯帕芗时代的罗马军队一样，作为军队，充分展示了其威力。但是，到了哈德良时代，他要求罗马军队即使在和平时代也要保持这样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帝国维持不增加税收的、和平的唯一方法。我们知道，战时表现出色的军队在平时不一定强大，但是，如果一支军队在平时有着

功能完善的组织机制，那么它在战时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哈德良耗费整个统治期间的大半时间视察帝国边境的目的，也是为了确立在和平时期也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防御体系。

罗马皇帝的职责是保障“安全”和“食物充足”，其中保障安全为先。因为只要安全有了保障，人们才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所需的食物。统治者的责任就是向人们提供这样的生活环境。保障“食物充足”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保障“安全”超越了个人努力的范围。哈德良的方针自始至终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他不惜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确立防御体系，是因为他深知要避免战争，在防卫上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尽管“整日行走在不列颠人中间，往来于（边境），忍受斯基泰的严寒”，他也不得不为之。而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的确怯于“想当皇帝”了。

从大马士革到红海的亚喀巴有一条全线贯通的罗马式大道，是图拉真皇帝时代铺设的。结束对幼发拉底河防线的要塞之一——波斯特拉军团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沿着这条大道去了费拉德尔菲亚（今约旦首都安曼）。到了这里，他没有继续向南，而是转身去了犹太行省，目的是为了视察罗马帝国的“火药库”——犹太的统治。

罗马在这个问题不断的行省常驻了2个军团。驻扎在北部的是第六铁壁军团，在南部的是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向犹太派驻军团是在公元70年以耶路撒冷沦陷而告终的犹太战争之后，只是，当时常驻犹太的罗马军团只有一个。图拉真皇帝统治末期，犹太再次发生叛乱。这次叛乱被镇压后，常驻军团增加到了2个。

哈德良要削减军团的数量。他没有打算编组新的军团来加强在犹太的军事力量，而现状又不允许他从其他防线调动军队。为此，他必须依靠现有的2个军团来控制暗流不断涌动的犹太地区。哈德良需要决定如何安置军团，基地设在何处。

他把第六铁壁军团的基地设在了犹太北部的希特波利斯，这里距离

毗邻地中海、传统上一直亲罗马的城市恺撒利亚不远，如果与驻扎在波斯特拉（位于其他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战的话，完全可以控制住犹太北部。

问题是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的基地应该设在何处。这个军团负责的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犹太南部。公元70年犹太叛乱镇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这个军团安置在了耶路撒冷市内，哈德良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维持这一现状。

他没有选择维持现状。他在耶路撒冷北侧为第十军团另建了一个基地，并以该基地为中心，兴建了城镇，取名为“埃利亚卡匹托尔”。埃利亚是哈德良的家族名，所以，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哈德良之城。卡匹托尔是首都的罗马七丘之一，上面只建有神殿，祭祀以最高神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个神圣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城。哈德良为距离这座圣城不远处的城市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并把它作为军团基地，对此，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想呢？犹太教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任何神。卡匹托尔山是罗马式多神教的象征，连失败者的诸神也会在得到“罗马公民权”后进入这里。哈德良给基地所在城市取这样一个名字，意味着他在一神教麦加的旁边建了一个多神教的城市。应该说，它反映了哈德良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另一面。

同时，哈德良还下令禁止犹太教徒实施割礼，不，不是单纯的禁止。对于罪犯，他要求强行对其实施割礼，以表明自己极度鄙视此种行为。对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所谓割礼，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自己是犹太教徒。然而，对于不信仰犹太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尊重身体、随意伤害肉体的野蛮习俗。

哈德良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成了犹太人中暗流涌动的起因，只是当时这股暗流并没有喷发。前面已经提到，约瑟夫斯在文章中写的那些话，是对试图挑起叛乱的人提出的“忠告”。他的同胞，即犹太教徒，之所以没有起事并非因为看了他的“忠告”而犹豫不决，更不是因为他的“忠

告”而放弃叛乱。犹太教徒深信自己是被神选中的民族，是正义的代表，是最优秀的人。因此他们最听不得其他民族的忠告。约瑟夫斯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在他们眼里，他是个叛徒，是把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了罗马的叛徒。犹太人之所以没有马上起义，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好起义的准备。

这是两件严重伤害犹太民族信仰的事情，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胆敢这样做呢？还有，埃利亚卡匹托尔的第十军团基地内，很早就建有犹太教堂。然而，这座教堂也被哈德良拆除，取代它的是祭祀希腊罗马宗教中众神之首朱庇特的神殿。

难道是热爱希腊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与生活在东方的希腊人一样，也染上了反犹太的情绪？自古以来，居住在东方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一向交恶。

原因之一是，在希腊时代，东方的统治者是希腊人，犹太人长期处于其统治之下。原因之二是，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在经济活动方面能力超群的民族，他们之间有利害冲突。第三个原因是，罗马成为统治者以后，希腊人非常合作，而犹太人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坚决不予配合。

犹太人并不要求在罗马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向统治者罗马要求的只是在经济活动方面与希腊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原因是，如果他们要求社会中的平等权利，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与权利相应的义务，即公务、军务以及向罗马皇帝宣誓服从。但是，这样做会违背犹太教教义，因为犹太教要求教徒只服从自己的神。对他们来说，要求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足够了，因为单纯的经济活动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罗马人的义务。而希腊族居民通过承担相应的义务，表现出了对罗马帝国统治的服从，因此，他们极度反感犹太人的利己做法。

那么，哈德良难道只是因为和希腊人有相同的文化而在感情上也感染了希腊人的反犹太感情吗？或者对于他来说，自己为确立帝国防御体

系四处奔波，而犹太教徒却坚持拒绝合作，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恶？然而事实上，他并非讨厌所有犹太人。在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却也有一些犹太人选择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如约瑟夫斯，如在罗马军队中一步步高升的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哈德良深恶痛绝的只是那些坚决拒绝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的、狂热的犹太教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应迟钝，对于哈德良显而易见的挑衅行为，犹太教徒在哈德良逗留当地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举动。这让哈德良误以为自己对犹太的打击已经完成，在犹太作短暂停留后出发去了埃及。此时，希腊王国之一的埃及已经非常稳定，在经过罗马两个世纪的统治后，这个辽阔的地域只要常驻一个军团就已经足够。维护经济富裕、国土辽阔的埃及只需要一个军团，与此相比，除了毗邻海岸的希腊系城市，罗马在贫穷而面积狭小的犹太巴勒斯坦，却需要常驻两个军团。针对这一情形，致力于提高防御体系效率的哈德良，一定比常人有更深的感触。

埃及

这次，哈德良把皇后萨宾娜也带到了埃及。应该说，对希腊文化毫无兴趣的人是不会对希腊的城市产生兴趣的。但是，当时的埃及虽然属于希腊文化圈，却充满了异国情调，几乎很少有人不被其深深吸引。尤其是近现代西欧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他们对埃及的兴趣之浓，充分反映出埃及在欧洲人眼中有着极其浓厚的异国情调。也许哈德良认为，尽管萨宾娜对当地文化毫无兴趣，但是在她身边的罗马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应该会很乐意来埃及。这是他对妻子萨宾娜极其难得的一次关照。

但是，哈德良终究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在埃及逗留期间，他没有把时间花在陪同妻子观光上，他视察了埃及行省长官全权负责的、位

于行省首府亚历山大的行省统治机构，也视察了第二图拉真军团位于亚历山大不远处的尼科波尔基地。最后，才把已经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其中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访问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希腊的名字叫“Mouseion”（缪斯神庙）。

之所以把这里叫做“图书馆”是因为这里曾经收藏过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收集的万卷读本（卷轴）。只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尤里乌斯·恺撒攻打亚历山大时，这些读本中的一大半被烧为灰烬。此时，图书馆中的读本很多是后来收集的，藏书不如以前那样多，但是，藏书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不会辱没图书馆称号的程度。

有藏书的地方自然会吸引阅读这些书的人。所以，图书馆成为研究机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埃及进入罗马统治的时代之后，拥有缪斯神庙的亚历山大成了与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和罗得岛不相上下的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不，与以人文学科为主流的雅典和罗得岛相比，埃及的亚历山大除了人文学科，还有自然科学学科，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中心。

顺便提一下，公元前1世纪，罗马上流社会阶层认为“在雅典接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水平最高。尤里乌斯·恺撒出身于名门望族中的名门望族，但是经济条件却不富裕。他的母亲奥雷利娅很有教养，也热衷于对儿子的教育，却没有能力为恺撒雇用希腊人做家庭教师，于是她请了一位高卢人做自己独生儿子的家庭教师。此人曾求学于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就好比现代社会毕业于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哈佛的印度人或新加坡人。根据历史学家蒙森的说法，作为“非本土人士”的这位高卢人，向“罗马史上唯一的创造型天才”尤里乌斯·恺撒传授了大量的知识，其中包括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当时的国际通用语希腊语、有助于开阔思维以及视野的哲学和历史、有助于逻辑性思维及表达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能促进和谐感的数学和音乐等等。恺撒后来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

的有关医生和教师的法律。他规定，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和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肤色，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也许正因为他是恺撒，才会致力于提高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待遇（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承担缴纳行省税的义务）。

实行帝制以后，罗马的皇帝们依然优先关照这些服务于罗马上层的研究机构，连图拉真皇帝的妻子普洛蒂娜也担任了希腊哲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她不是学者，人们只是期望她作为所长可以帮助研究所的发展。同样，哈德良对雅典的支持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皇帝以直接过问的方式保证了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学习的研究者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皇帝用他的私人领地——埃及行省收缴上来的税金支付这些研究者的年金。所以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实际上就是出资人访问受资助的机构。

为了对皇帝的到来表示欢迎，学者们举行了研讨会，即通过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哈德良作为学术圈外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本应该做的事情便只是倾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倾听者。

罗马皇帝与学者们展开了辩论。他谈锋犀利，说得学者们哑口无语。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认为哈德良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的确，在这种场合，皇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我想，哈德良只是没有忍住罢了。

哈德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这个人是否很好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社会地位在他眼里只是第二个标准。对他来说，普通士兵也好，行省出身也罢，都不是左右他评价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缪斯神庙的学者们从皇帝那里领取年金。所以在哈德良看来，既然搞研究可以拿到工资，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从事研究。我想，这大概就是哈德良在驳倒学者们的论点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每个人履行自己职责的重要性，不只是体现在

军队和行政界，学术界也一样。我想，这也是他的想法。

只是被哈德良驳得哑口无言的学者好像并没有理解他的本意。据说其中有一人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个身后有30个军团（实际上是28军团）的人，我们怎么可能驳倒他。但是，在著名学者和皇帝展开辩论的时候，在场旁听的学者中还是有人理解了哈德良的想法。其中一人叫托勒密。哈德良访问图书馆的时候，他年仅30岁。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领会了哈德良的意思，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是革命性的集各学科之大成。还有一人叫盖伦。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的时候，他在帕加马刚刚崭露头角。后来他出版了论述解剖学方法的著作。这部著作非常有名，后世的我们因此得以了解罗马时代的医学水平已有如此之高。这项研究成果就是他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完成的。1300年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对解剖产生兴趣就是缘于此人的这部著作。

缪斯神庙融合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后很长时间里，这个研究机构一直运转正常。哈德良虽然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但是他没有停止提供资助。

这个插曲也说明，哈德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最高权力者。罗马时代的人所写的唯一一部关于哈德良的历史传记《皇帝传》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哈德良的：

> 皇帝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修养极高，同时，对数学、几何学及绘画的理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还热衷于学习演奏乐器和唱歌的技巧，而且从不背着人偷偷练习。
>
> 他唯一缺少的是拒绝放纵行乐的能力，甚至他还写过几首情诗，赞美他所爱的人。
>
>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达人，甚至他可以熟练地使用角斗士的那些复杂而危险的武器。

他的性格很复杂。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总之，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

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即“他的性格很复杂”之后的部分，被认为是讲述哈德良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史料。小说家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中也引用了这段内容。至于“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句话，大概没有一个人看到后不会哑然失笑吧。但是，哈德良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吗？或是《皇帝传》的作者观测的视角值得推敲？我想以“和蔼可亲”为例加以说明。

《皇帝传》中写哈德良章节的作者也好，认可这一评价的读者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和蔼可亲才叫真正的和蔼可亲，否则就不是。然而，哈德良只对他认为值得和蔼相待的人才会表现出和蔼可亲。

神职人员这一类人对任何人都必须和蔼可亲，这是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作为普通人，如果对所有人都和蔼可亲的话，难道不是意味着他对所有人都不和蔼可亲吗？也许因为哈德良是罗马皇帝，是最高权力者，所以人们才会要求他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和蔼可亲。但是，他做不到。

该严厉的时候他会很严厉，该平易近人的时候他会平易近人，值得他亲切以待的人他会亲切以待，他认为不值得亲切以待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乖僻的一面。还有，可以纵乐的时候他会尽情享受，需要自制的时候他会变成禁欲者；需要吝啬的时候他从不顾忌别人的想法；应该给予褒奖的时候，他不惜给予重奖，甚至重到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认为无

须坦诚以待的人，岂止是不坦诚，他甚至还会撒谎；认为值得以诚相待的人，他诚恳的态度让人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认为不值得宽恕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追查到底。相反，认可一个人的功绩时，他会表现出稳重、宽容和礼貌，甚至令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哈德良。

在忠实于自己的事情上，哈德良从不“变化不定”，而是“一贯如此”。

但是，按照哈德良式的这种“标准”，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场合完全有可能受到皇帝不同的对待。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不知所措，结果就有了“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样的评价。

我想再介绍一个插曲，也许会有助于大家对哈德良的了解。

即使到了现代，《罗马十二帝王传》（De Vite Duodecim Caesarum）依然是一部畅销书，广为人们传阅。这本书在日本很早就有译本。作者是苏维托尼乌斯，比哈德良大6岁左右，是在罗马任职的官员之一。他是小普林尼的朋友，所以他一定也是塔西佗的文人圈中的一位。人们知道他好像不是因为他是官员，而是因为他是作家。《罗马十二帝王传》从尤里乌斯·恺撒写到图密善共12位罗马皇帝。同现在一样，在当时就吸引住了为数众多的读者。顺便提一句，公元300年前后写的《皇帝传》讲述的是哈德良以后的皇帝，是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续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没有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内容。

不管怎样，苏维托尼乌斯生前不只是一个普通官吏，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入主人长期不在的皇宫的人。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与后来的《皇帝传》相比，闲话或流言蜚语的色彩很浓。想必作者对闲话的兴趣超乎常人，因此，他一定深受宫中女人们的欢迎，因为宫中女人都很喜欢闲话，喜欢流言蜚语。后来，哈德良免去了苏维托尼乌斯的职位，把他从皇宫中赶了出去。

理由是他对皇后萨宾娜的态度过于随便。对于他的遭遇，世人深表同情。他们认为这位家臣只是对皇帝并不爱的妻子态度熟稔了一些就给予这样的惩罚未免过于严厉。但是，哈德良尽管不爱萨宾娜，萨宾娜终究是皇帝的妻子。按照哈德良的想法，上对下可以不拘小节，相反，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必须做到有礼有节，有规有矩。

对于身边的人来说，像哈德良这种性格的人实在很难相处。只要对哈德良的想法理解不透，很容易被皇帝弄得不知所措，结果只好仰天大声喊着“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回过头来依然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也许皇后萨宾娜并非有意去了解什么，却也发现长时间留在哈德良身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尽管知道在他身边很难，依然有人不得不待在哈德良的身边。

美少年

来到埃及的皇帝好像例行活动一样乘船游览了尼罗河，这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皇后和那些追随皇后的贵妇们，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埃及，只要乘船在尼罗河上逆流而上，途中随时下船走进建在河畔的神殿，就可以看到应该看的一切。乘船游览尼罗河等同于游览名胜古迹，而且还有贵妇们同行。这次旅途一定不同于哈德良以往随行人数少又禁欲的旅行。

载着皇帝和皇后的华丽御用船队到达距亚历山大300多公里的尼罗河上游时，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皇帝宠爱的美少年——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安提诺乌斯在尼罗河里溺水身亡。史学家们口径一致地说，哈德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像女人一样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人能劝得住他。

那么，安提诺乌斯真的是不小心落水溺亡的吗？可在当时，罗马人

中间很盛行游泳，所以他应该会游泳吧。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同船旅行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人注意到他落水。

难道他不小心落水后，受到了据称是“尼罗河主人”的鳄鱼的袭击，当人们发现，并要救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咬死了？

或者安提诺乌斯是为了哈德良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因为占卜者预言哈德良有生命之虞。当然这个说法是基于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死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为了拯救心爱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爱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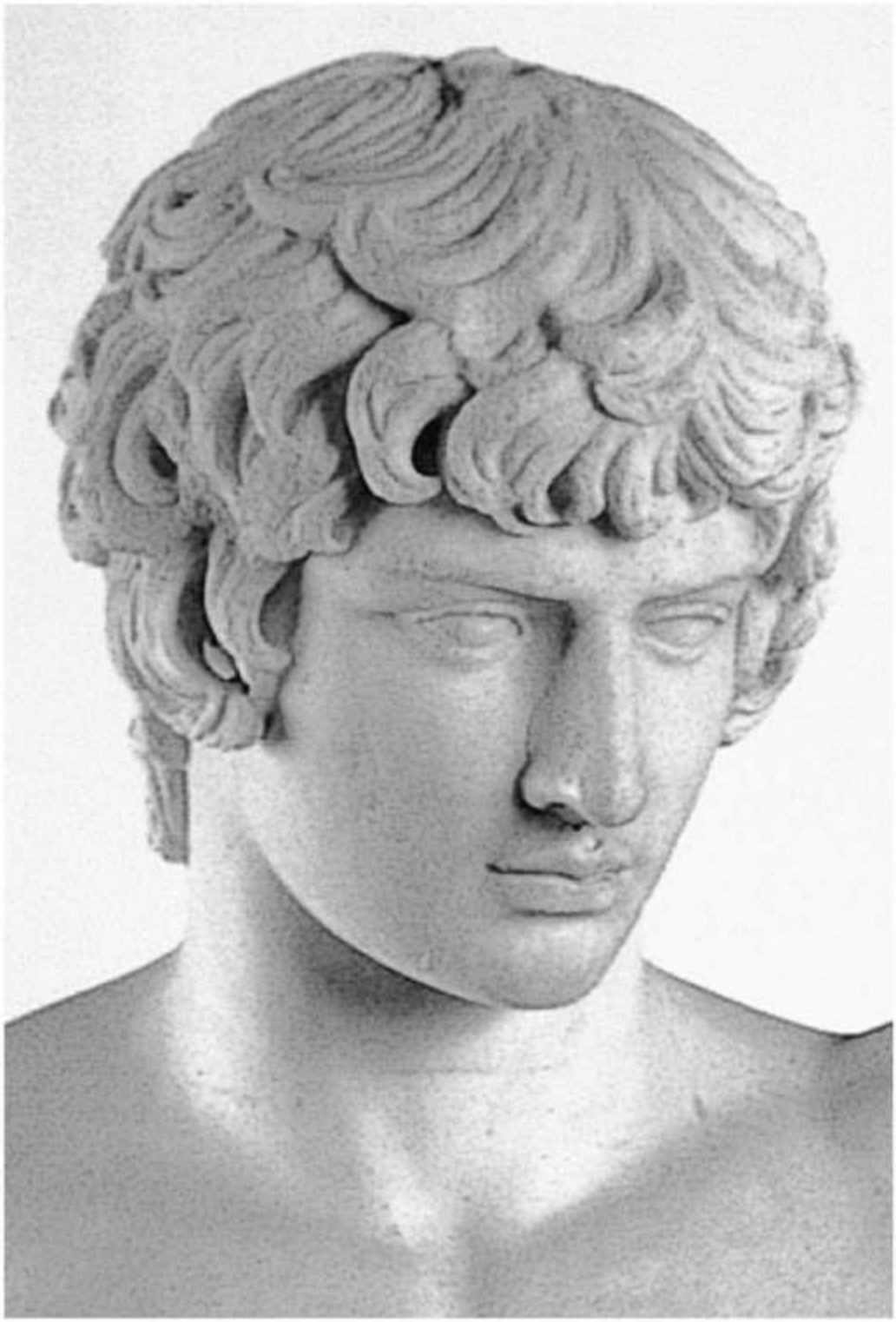
罗马社会不像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有恋童癖的男性是得不到公民权的。罗马权贵虽然可以有恋童癖，但是不能公然蓄娈童。哈德良无所顾忌地爱恋安提诺乌斯，让看重罗马传统的人们极度不满。罗马史学家在讲述哈德良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提及这件事情。安提诺乌斯溺亡事件，皇后以及随行的贵妇们是如何看的，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皇后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高高兴兴地继续她的尼罗河之旅。可以想象，对她来说，安提诺乌斯的死和一个用人的死没有区别，她也不会同情哈德良。也许她和她的随行贵妇们与《皇帝传》的作者一样，并不相信哈德良的说法，说安提诺乌斯是为了让他远离死亡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既然死于事故的可能性极小，也不是自我牺牲，那么安提诺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呢？

从保留至今的众多雕像中，我们可以想象，公元131年安提诺乌斯死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还不到25岁。我们不知道这位少年与哈德良相识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假设是在哈德良去他的出生地比提尼亚的时候，即公元124年，那么，当时安提诺乌斯只有15岁上下。在其后的7年间，哈德良一直把这位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美少年带在身边。

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数量极多。看到这些雕像，感觉他的确很美，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甚至让人会有性的冲动。但是他的表情很呆板，看上去一点也不机灵，才智几乎为零。看上去顶多只是一个娇嫩的美少女换成了少年的形象而已。再看哈德良充满智慧的肖像，难免让人猜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相配才成就了他们如此融洽的关系。但是，哈德良是一个非常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人。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安提诺乌斯自尽的原因是他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后，感觉自己的容颜日渐衰退，因此害怕失去哈德良的宠爱，于是选择了在哈德良尚未厌倦自己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普通的年轻人来说，20岁上下的年纪，别说是容貌衰退，应该正是不断增色的时候。但是对于安提诺乌斯这样因为少年的美貌而得宠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安提诺乌斯

但是，如果安提诺乌斯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的话，他的心境又会是怎样的呢？

女人要留住男人的心，最好的方法不是一直待在他的身边，而是和他保持距离，而且是去一个永远不可能追到的地方。哈德良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人，在他身边，一定少不了看到他大发雷霆。即使有时候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人们也弄不懂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这样和蔼。

安提诺乌斯是比提尼亚出身的希腊人，阿里安也是比提尼亚出身的希腊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类人。阿里安是前线的司令官，又是文人，哈德良与他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从希腊文化到罗马军队的防御体系等等。皇帝格外垂爱这位年轻的部下，但是，他们之间是知性的关系。但是，皇帝和美少年的关系不同。尽管安提诺乌斯会漫不经心地写几首诗，会弹竖琴，还有一张让人觉得无与伦比的完美的侧脸。但是，光靠这些很难长期吸引哈德良。而且，希腊美少年已经到了年龄和肉体都趋向成熟的时期。

那么会不会是安提诺乌斯为了永远留住哈德良的爱才选择死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如愿以偿了。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像个女人一样哭得昏天黑地，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之中。首先，他神化了已故的安提诺乌斯。在埃及有一个传说，凡是被居住在尼罗河中的鳄鱼吃掉的人都会变成神，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哈德良的决定。其次，哈德良在事故发生地的对岸，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安提诺波利斯”（安提诺乌斯之都），还让希腊系的埃及人大批移居此地。人们很高兴移居到安提诺波利斯，无须哈德良采取强制措施，因为皇帝建的这座城市充满了希腊情调。接着，哈德良又铺设了一条从尼罗河畔的这个城镇穿过沙漠，到达苏伊士湾的罗马式大道。这条大道沿着海湾一直延伸至红海。这样一来，安提诺波利斯就可以作为一个物资中转站而变得繁荣起来。因为来自东方的物资要运到亚历山大，首先要从红海进入尼罗河，再在尼罗河

上顺流而下经过安提诺波利斯。虽然哈德良像女人一样失声痛哭一场，但是上述举措绝对符合哈德良的作风，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经过冷静思考后作出的决定。

这一时期，哈德良也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他终于骑着阿拉伯产的骏马捕猎了狮子。好像为了挑战55岁的年龄一样，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体力。也许哈德良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愿意相信，安提诺乌斯的死就是为了让自己避免将要临头的灾难而作出的牺牲。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恢复了视察工作。皇后和跟随她同来的一行人出发回罗马后，离开已经开工建设的安提诺波利斯的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他首先去了叙利亚的安条克，从那里进入小亚细亚，北上到达黑海，再从黑海向西，前往希腊，最后来到了雅典。沿途，他又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哈德良波利斯”。现代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埃迪尔内就是他建的这座城市，埃迪尔内是“哈德良”的土耳其语读音。

在雅典，很容易找到优秀的雕刻家。皇帝让他们雕刻了大量已故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好像为了永远留住心爱的人的美丽一样。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完全没有宗教的感觉，有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在经过漫长的基督教时代，现在依然保存下来如此之多，可见当初雕刻的数量之多该是多么惊人。哈德良把这些雕像送到了希腊以东的罗马世界，但是，在罗马好像只有他的私邸“哈德良别墅”中有，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安提诺乌斯的雕像，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举动要让帝国西方的人们去信仰已经神化的这位宠儿。由此可见，无论内心多么悲伤，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应该照顾罗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而，这个时期降临在哈德良身上的不幸并不只是他失去了自己宠爱的年轻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一直以来暗潮涌动的犹太人的反叛终于爆发了。在雅典逗留期间获知这一消息的哈德良，不顾此时已经进入冬季，毅然回到安条克。他要收集精确的情报并根据这些情报制订对策。

犹太叛乱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禁止割礼和建设“埃利亚卡匹托尔”是哈德良有意为之的事情，是在挑衅犹太教徒。不管其他民族如何认为，对于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仪式。罗马人允许失败者信仰自由，因此禁止割礼违背了罗马的这一方针。自从罗马与犹太人直接有了关系以后，200年来，无论是共和制末期的最高权力者还是进入帝制以后的皇帝们，没有一个人禁止割礼。不仅如此，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罗马一直采取了承认犹太教徒特殊性的政策。除了割礼问题，更没有人在犹太教徒视为圣城的耶路撒冷眼皮底下建设军团基地，还取了“埃利亚卡匹托尔”这样一个含义明确的名字。纵观哈德良的整个统治，我们知道他有极强的洞察力，因此，他绝无可能不了解犹太的特殊性。事实上，后来通过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政策，解决了犹太问题以后，虽然没有明确解除割礼的禁令，但是，哈德良已经不再要求严守这一禁令，甚至采取默认的态度对此放任自流。我想，他真正的用意并非永远禁止犹太教徒行割礼。

在这200年间，虽然时有冲突，罗马对犹太教徒几乎始终如一采取了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多神教的罗马世界里信仰一神教，允许他们有割礼的习惯，允许他们因为信仰一神教而不承担帝国公职和军职的义务，允许他们在其他人工作的星期天休息。总之，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其他的一切，罗马都接受了他们的特殊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宽容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绝不允许有反帝国统治的行为。图拉真皇帝把阿拉伯（今约旦）纳入了行省行列，之后，哈德良皇帝确立了从黑海到红海的帝国东方防线。犹太位于阿拉伯行省以里，因此，在罗马统治下，要稳定犹太这个地方，帝国的防线战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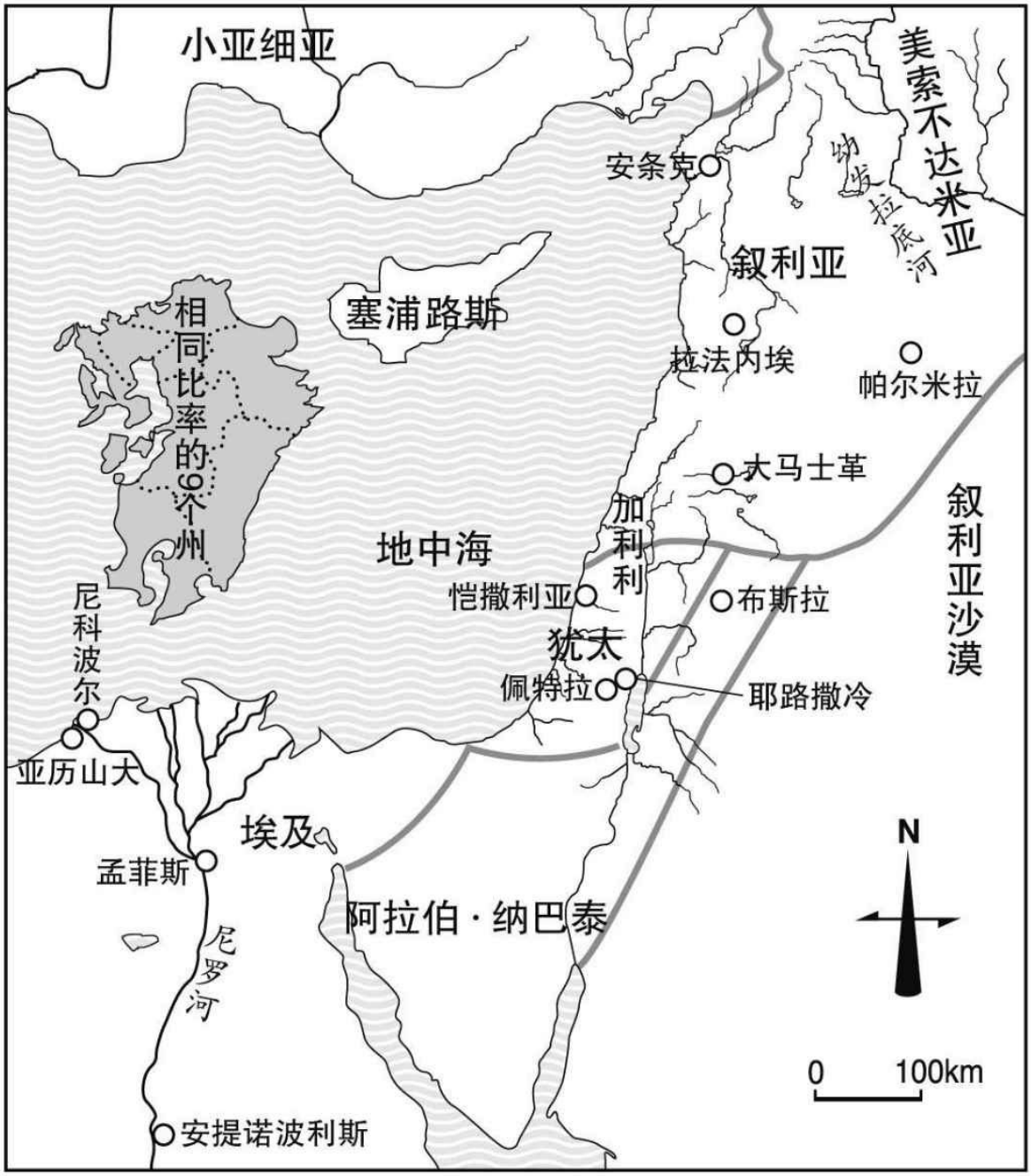
《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已经讲过，在罗马帝国内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犹太教徒倘若居住在黑海以北，罗马人在安全问

题上不会太在意他们。但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北面是叙利亚行省，东面是阿拉伯行省（今约旦），南面和西面是属于埃及行省的区域。更糟糕的是，生活在这里的犹太教徒并不安分。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犹太教徒都高举创建一神教国家的标语来反抗罗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分化态度非常强烈。只要规模像样些的城市，一定会有犹太人的居住区。生活在那些东方城市的犹太人，虽然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希腊系居民时有冲突，但是他们接受和罗马帝国共生共存的现状。只有那些居住在犹太本土的犹太人，坚持维护犹太教的纯粹性，也许与其他文明接触越少越容易保持纯粹性吧。正因为这个原因，反抗罗马的运动总是发端于犹太本土，确切地说，是发端于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

公元131年秋天爆发的犹太叛乱有两位领袖：他们是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和拉比·阿基巴（Rabbi Akiba）。前者自称救世主，是这次叛乱的直接指挥者。后者是犹太教的祭司，他不只是参与叛乱，他还宣扬这是一场圣战，从宗教方面来支持科赫巴。巴尔·科赫巴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星星的孩子”，所以他才自称救世主。对此，拉比·阿基巴大声叫好，说：“他才是犹太之王！他就是救世主！”

人类社会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不仅限于犹太人，那就是，当激进势力开始强大的时候，保守势力就会退缩。这个时期，在耶路撒冷，原本为数不少的稳健派渐渐失去势力，他们或者投向激进派的阵营，或者找亲朋好友帮忙离开耶路撒冷去国外。这一年是公元131年，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的驻兵好像只是分队，规模很小。驻扎在犹太的两个军团中，一个在北部的加利利地方，另一个第十军团因为埃利亚卡匹托尔城尚未建成，一部分在南部，大部分在恺撒利亚。巴尔·科赫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耶路撒冷。身在雅典的哈德良就是在这个时候获悉这一紧急报告的。



战争前的犹太周边地区

第二年，即公元132年，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的科赫巴铸造了银币和铜币。发行货币是表示独立的最直接的象征。货币表面刻的是“耶路撒冷”，背面刻的是“以色列解放元年”。后来，人们在发掘出来的这些

货币中，还发现了刻有“次年”字样的货币。当时在耶路撒冷流通的罗马货币很多，有韦斯帕芗、图密善、涅尔瓦、图拉真以及哈德良多位皇帝的货币，因为在罗马帝国，即使皇帝换了，刻有各位皇帝头像的货币依然通用。科赫巴要求大家把这些货币拿来，用锤子砸扁刻有皇帝头像的一面，然后还给大家。他没有想过要把这些货币熔化后再铸造成新货币。

这次叛乱没有严密的计划，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考虑过兵力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在叛乱初期它成功了。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纷纷加入志愿兵行列，也有人提供了武器。

他们筹集武器的办法非常巧妙。当地有兵器制造业者，罗马军团基地与他们签署了武器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犹太人制造业者要把制成后的武器送到基地。但是在制造过程中，他们做了手脚，出来的成品变成了次品。罗马军队不会接受次品，尤其是在哈德良视察之后，即使很小的一点瑕疵，也不会放过。于是制造业者就把这些所谓的次品，也就是罗马军队不接受的兵器，暗地里转手卖给了科赫巴。

同时，犹太商人也积极配合叛军，大大地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他们按照购买合同，把葡萄酒送到罗马军团的基地，但是，他们在酒中掺了毒。很多士兵喝了这种酒后虽然没有死去，却病倒了。

像这样，连商人也在支持叛军。其结果是，在犹太巴勒斯坦的罗马军队补给彻底中断。此外，地震的发生也让犹太人似乎看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在即。

哈德良是在叙利亚安条克接到这些报告的。他制订了反击计划。

理所当然，他决定派出驻扎在犹太的第六铁壁军团和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2个军团。只是，罗马军队的2个军团通常应该有1.2万名士兵，但是这2个军团因为缺员补充不及时以及病患者众多，能上战场的只有1

万人左右。就算加上辅助部队中的2个骑兵大队和4个步兵大队，也只有1.4万人。他把指挥这支队伍的任务交给了犹太行省总督路福斯。

接着，他命令第三蔷薇军团离开北方相邻的叙利亚行省出兵犹太，并决定由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担任指挥。该军团基地位于距离犹太并不很远的拉法内埃（今叙利亚沙玛）。

同时，他命令驻扎在阿拉伯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从东方相邻的约旦出兵。作为辅助部队，贝都因的2个大队加入了这个军团。

他还从位于西南方向的埃及调遣了一个军团，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编组的辅助兵一个大队也加入了这个军团。

除此之外，他又向莱茵河、达契亚行省、多瑙河各前线也下达了按分队规模集结的命令。这时候的罗马军队依然是一支多民族的混合军队，由罗马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色雷斯人、希腊人、加拉太人、阿拉伯人还有与叛乱无关的犹太人构成，总兵力大约有4万人。

皇帝哈德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不列颠行省总督尤里乌斯·塞维鲁斯。因为出兵的命令已经下达，所以这一人选大概是哈德良一开始就已经定下的。按常理，在罗马军队中，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的地位绝对高于不列颠行省总督塞维鲁斯，但是，他的这个决定是向尼禄学的。之前的一次犹太叛乱中，当时的尼禄皇帝就提拔了韦斯帕芗为总司令官，原因是他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名声大震。

提拔塞维鲁斯的理由也和尼禄的时候一样，因为在对付游击战方面，他经验丰富。也许你会认为喀里多尼亚（后来的苏格兰）山野多雨，而犹太的沙漠很干旱，两者完全没有相同之处。但是这只是表象。事实上，苏格兰多森林，犹太的沙漠中岩洞随处可见，两个地方对于一个外来的人来说，都像是迷宫，只有熟知地形的当地人才能进出自如。此外，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在喀里多尼亚还是

在巴勒斯坦，都不可能采用会战的方式，因为会战方式只适用于平原。

塞维鲁斯必须穿越帝国，从最西北长途跋涉来到最东南。前线司令部一定是等到塞维鲁斯到来后，才从安条克移师恺撒利亚的。哈德良决定不上战场，但是他也去了恺撒利亚，并且一直在那里逗留到战争结束。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也出现在这个前线司令部，此人曾经参加过先皇图拉真发动的几次战争，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老态尽显。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哈德良交给了他一个任务，改良耶路撒冷攻防战中将要使用的攻城武器。也许战斗正式打响的时候，哈德良已经清楚地预料到了战争的结束。这次犹太叛乱与公元70年的那次叛乱一样，以耶路撒冷的沦陷而告终。

镇压犹太北部加利利叛乱的行动好像非常顺利。军队在挺进犹太中部后，塞维鲁斯改用地毯式搜索的战术，把全军分成了小规模的部队。这种战术虽然耗时长，但是成功率极高。罗马军队开始正式反击的时间，再早也应该是在公元132年夏季以后，而犹太战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33年年底。

犹太教徒叛乱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教条主义者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因为他们努力要做到纯粹，为此，他们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不纯。其宿命就是过激行为的不断激化。

巴尔·科赫巴不能原谅放弃割礼的人们，不管他们与哈德良的禁令是否有关。他禁止没有接受过割礼的男子出入耶路撒冷，否则一律处斩。这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居住，条件是必须接受过割礼。

犹太人的保守稳健派中，有不少人用从头冲水的洗礼方式来替代割礼。但是，自称救世主的科赫巴和支持他的阿基巴都拒绝这样的洗礼方式。

在犹太人中，用洗礼代替割礼的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并不承

认科赫巴是救世主。因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于是，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科赫巴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偏激，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迫害程度，他们是要消灭基督教。

尽管犹太人中既有犹太教徒也有基督教徒，但是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时，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不和，开始分离，只是还没有走到决裂的地步。然而，以公元132年为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彻底决裂，互为敌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也许到现在，这种悲剧性的敌意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犹太人战争看似进展缓慢，但是，罗马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可谓稳扎稳打，步步紧逼。到了公元134年初，耶路撒冷沦陷，犹太战争宣告结束。与64年前一样，一把火把耶路撒冷彻底烧毁了。

持续了两年的这场战争中，犹太人占领过的50个要塞遭到破坏，985个村落被烧毁，多达50万名犹太人被杀，俘虏被卖身为奴，价格等于或低于家禽的售价。卖后剩余的俘虏被送到加沙，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重建被他们自己破坏的城市。

尽管如此，叛乱之火并没有完全扑灭。位于耶路撒冷西南的佩特拉成了公元2世纪的“马萨达”（马萨达是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中，犹太人最后负隅顽抗的地方。——译者注）。但是到了公元136年，这里也被彻底毁灭。巴尔·科赫巴战死，拉比·阿基巴被捕并死于刑讯。

与当年的马萨达一样，对于罗马人来说，犹太人在佩特拉的最后抵抗只是小事一桩，完全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公元134年年初，耶路撒冷的沦陷已经宣告了犹太战争的结束。皇帝哈德良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亲笔信，告知他们战争已经结束。只是，信中全然没有表现出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只是很平淡地写了一句话：“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健在令人高兴，在这里，我也要向你们报告，我和我的士兵们也都安好。”

不少研究者推测可能是罗马方面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但是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犹太方面的史料只是盛赞巴尔·科赫巴是犹太的英雄，认为战争结局应该归咎于犹太民族的宿命，因为公元136年9月26日，在佩特拉进行抵抗的最后一点星火熄灭的时间，正巧与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是同一天。犹太的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罗马方面损失的记录，只说罗马士兵因为喝了有毒的葡萄酒，病倒者很多。按照我的想象，可能是因为哈德良太累了。当时的他已经58岁，而且在两年半前他就不再巡察各地，一直待在前线司令部。

犹太人的大流散

皇帝虽然把作战的指挥权放手交给了手下经验丰富的将领，但是耶路撒冷沦陷后，他没有把犹太战争的战后处理权交给别人。此时，犹太已经不再叫做犹太，巴勒斯坦成了它的正式名称。

耶路撒冷的名字也随之消失，变成了埃利亚卡匹托尔。根据罗马的市政规划，哈德良对耶路撒冷市区进行了重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市区基本轮廓保留了犹太民族曾经的最大敌人哈德良所建的城市原貌。罗马人所建的城市中，中央大道一定自北向南贯穿市区。现代的耶路撒冷，始于大马士革的中央大道，就是这样一条大道。除此之外，哈德良时代留下的其他印记也随处可见。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始终是他们的圣城。然而，圣城现在的情形，却是哈德良为了彻底杜绝犹太教徒叛乱而采取的激进措施形成的。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讽刺。

因为公元134年结束的犹太民族叛乱，让哈德良对犹太教徒实施了让犹太人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彻底逐出了耶路撒冷。

“大流散”（Diaspora）这个词同时有“播撒种子”的意思，所以它不

是单纯的贬义词。犹太人与希腊人相似，自古就有很强烈的“散居”倾向。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可以移居到任何地方，然后在那里建立起只属于自己的社区。他们会移居到其他民族所建的城市，但是不会融入那个民族中去。这时候，他们的“散居”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

强制“流散”犹太人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700年，是亚述的命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这次移居的目的地是巴比伦，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之囚”。如果要追溯更遥远的古代，还有摩西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成功返回祖国的传说。

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强制性让犹太人“大流散”的事件，直到哈德良再一次采取这一措施。但是，这次犹太人的大流散与亚述、巴比伦时期不同，当时犹太人“大流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集中优秀的劳动力。哈德良实施的“大流散”只是禁止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不指定流散后的居住地，犹太人可以去任何一个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流散的对象也不是所有犹太人，只限于犹太人中的犹太教徒，并且只禁止他们生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常常成为反罗马的源头。

哈德良的这条禁令不针对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人，即此时更名为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也不适用于生活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教徒。在这一点上，哈德良遵从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皇帝以来采取的对犹太的政策，即只要不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便可以承认犹太人的习惯。但是尽管如此，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教徒恐怕已经牢牢记住了历史的教训：只要反对罗马，等待他们的就是“流散”。因为在哈德良的统治初期，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当时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发动叛乱，杀戮当地居民。结果，哈德良一纸禁令，犹太人从此不得再进入塞浦路斯。

就这样，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犹太人大流散政策经元老院决议通过，于公元135年正式生效，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色列建国。就这样，搅得哈德良心神不安的犹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从此，

犹太教徒再也没有发起过大规模的叛乱。

研究罗马史时，已经再无必要提及犹太民族。但是通过回顾以往的历史，我想，或许对我们理解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会有一点帮助。

罗马人和犹太人

公元前63年，在出征东方期间，庞培成为了第一个与犹太正式接触的罗马人。由于这位罗马将军名震地中海，而当时的犹太内讧不断，于是，犹太人请他进行调解。庞培提出，犹太人应该重新认识政教一体的统治体系。

罗马的宗教没有教典，因此没有专门的祭司阶层。所谓祭司，就是向普通信徒传授、讲解教典（或者圣经）的人。犹太教是以教典为依托的宗教，因此，祭司阶层的权力很大，他们认为政治应该依据教典来实施。而在罗马，既没有教典也不存在祭司阶层，政教分离非常自然。

庞培作为罗马人所提出的政教分离方案自然遭到了犹太人的拒绝。于是，这位罗马将军认为既然如此，就只有通过武力来征服犹太了，于是他向耶路撒冷发起了进攻。经过三个月的对抗，犹太最终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庞培下令摧毁了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管辖之下，但是承认其自治。

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恺撒在征战埃及的归途中经过犹太。这个时候的他，在与庞培及其追随者的抗衡中胜出，正在一步步地确立自己在罗马世界中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此前一年，他在亚历山大停留期间，已经同意犹太人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与希腊人同等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恺撒的想法也与庞培有所不同。

恺撒接受了犹太人的请求，让犹太教的最高祭司做犹太自治政府的

领袖。他认为在犹太政教可以不分离。当然这一宽容政策的条件是犹太人不反罗马。据说三年后，恺撒遭到布鲁图及其同伙的暗杀后，很多犹太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奥古斯都以恺撒描绘的伟大蓝图为基础创立了罗马帝国。我在想，如果他像继承恺撒的其他很多想法一样，继承了恺撒对犹太的政策的话，其后罗马与犹太的关系是不是会完全不同呢？

对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如何实行统治，是以庞培为首的罗马元老院和恺撒发生激烈冲突的分歧所在。元老院派坚持沿用元老院体制，认为国家应该由罗马社会的精英，即300位（进入帝制时期后增加到了600位）元老院议员来统治。在政治史上，这种体制叫寡头政治。恺撒与他们针锋相对，他的理由是：首先，300人合议进行统治的效率极其低下；其次，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元老院阶级的僵化，导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丧失；再者，因为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实施的政策是同化包括曾经的战败者在内的所有人。领导者阶层一成不变的体制不利于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

假若支持元老院体制的庞培、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所代表的共和制一派在斗争中获胜的话，罗马会不会一直维持共和国的政体呢？或者会不会成为像后来的英国和法国那样，属于本土统治殖民地类型的帝国呢？然而，胜利者是恺撒。通过本土和行省一体化，他使帝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罗马走上了一条普通的帝国之路。

站在伟大设计者的角度去看，普通帝国的罗马是这样的。

罗马征服西方的这一时期，西方还没有统一的国家，部族数量众多，相互间纷争不断。罗马征服当地部族后，承认他们居住的村落及其周边地区为地方自治体，享有自治权。同时给部族首领和家人以世袭的罗马公民权，把他们接纳到帝国之中。此外，在每个重要的位置建设殖民城市，作为罗马军团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高速公

路”——罗马大道遍布各地，联结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和罗马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在帝国的西方，罗马实施统治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

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东方的历史与西方不同。希腊以东，城邦国家和王国的历史很长。罗马人非常善于协调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东方，可以供士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殖民城市极少，这样的城市是帝国潜在的防御基地。于是，罗马人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了城邦和王国上。希腊系各城市继承了城邦传统，非常配合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统治之下，希腊人不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且与近邻城市发生争执时，罗马人会出面调解；当他们受到外敌入侵时，罗马人会出面保护自己。因此，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此外，对于那些习惯中央集权制即王权的地方，罗马采取的政策是把王国变成罗马的同盟者，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不用说，帝国的大动脉——纵横交织的罗马式大道也遍布了东方各地。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存就是罗马帝国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恺撒作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伟大设计者，才会认为犹太的特殊统治形式完全可以接受。

当然，不同于“普通”的“特殊”无疑是异类。犹太民族有着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想，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神教徒，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犹太战争史》的作者约瑟夫斯为了替犹太民族辩护，写下了《反阿皮翁》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 法律规定，希望在犹太人的法律下生活的其他民族，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不遵守犹太人的法律，只想得到生活的便利，拒绝他们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代表了同时代罗马人的看

法："犹太教徒对于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即使表面上并未表露，内心总是怀有强烈的憎恶感。"塔西佗甚至断言说，犹太教不是宗教，只是迷信，因为它完全否认他人的神。

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以上帝不允为由，拒绝承担公职和服兵役的义务，却在经济方面要求平等的权利。在罗马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看来，这样的民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希腊系居民，他们对犹太系居民最没有好感。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了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发现的一条航路，犹太人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犹太人不但不会开发新的航路，甚至连危险的海域都不去，他们只想着如何卖掉货船运来的物资挣钱。帝国东方的暴乱，可以说几乎都发生在希腊系和犹太系之间。为此，罗马不得不经常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出面进行调停。克劳狄乌斯皇帝《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一例。

统治者的职责之一是调解其统治下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方面，罗马从来不辞辛苦。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不同。

如果你认为自由中还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你所持的就是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观念。但是，对于犹太教徒以及近代基督教徒来说，他们的自由中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遵循神的教诲建设国家。也许你认为免除了他们的公职及服兵役义务，也同意他们有周六和周日，就是给了他们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他们要的那种自由得不到承认，就是没有自由。

既然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全面接受他们的特殊性，即按照他们的愿望，允许其在巴勒斯坦建设政教一体的国家又有何不可呢？有上帝选民思想的犹太人并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渗透到其他民族中去，我们甚至很少听说犹太教徒的传教活动。因为他们认为犹太教徒的人数过多，上帝选民的珍贵之处就会被弱化。既然这样，允许他们在帝国的

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司阶层统治的国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犹太人满足于此，并且愿意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不也算是一件好事吗？正因为他们在犹太本土无法实现这种自由，所以，居住在帝国东方各城市的犹太人才会带着怨愤不时地揭竿造反。

在经济权利方面，恺撒让犹太人享有了和希腊人同等的权利，他的这一政策很值得我们思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围绕宗教的，所以常常陷于孤立。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与帝国相连的“血脉”就是经济活动。恺撒认为有必要阻止犹太民族的封闭倾向。当然，他这样想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他知道封闭是导致关系激化的温床。

继恺撒之后的奥古斯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继承了恺撒的思想，唯独在犹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恺撒相左。奥古斯都是一位罕见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人物，他甚至超过了恺撒，但是他构思不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蓝图。他认为对于犹太这一特殊群体，实施间接统治才是上策。于是，犹太人中的希律王成了统治犹太的真正主人。由希律王统治犹太还有一个好处，希律王是个专制君主，他绝不允许以最高祭司为首的祭司阶层对政治指手画脚。所以，只要希律王的统治能够持续，在犹太就有可能实现政教分离。我想奥古斯都作为西方人，也许他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统治必须做到政教分离。

奥古斯都对犹太问题的处理方法决定了其后罗马帝国对犹太的政策。希律王死后，犹太人要求恢复神圣统治，奥古斯都一口拒绝。他选择了从罗马派遣长官，对犹太实施直接统治。但是，他给了犹太人更多的自由，甚至连司法权也予以认可，当然杀人除外；还成立了由70位长老组成的议会，并对该议会提供支持。

奥古斯都一定以为自己已经给了犹太人足够的自由，然而，犹太人依然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误会。

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的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犹太是

怎样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另一类着眼于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是如何的宽容。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他们做的都是无用功。因为不管犹太人如何坚称自己深受罗马人的压迫，罗马人永远也不会理解；相反，不管罗马人如何强调自己对犹太人已经宽容之极，犹太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疾呼“我们要自由”。

尤其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的提比略皇帝，他过于顾虑犹太人感受的种种做法让人觉得那不过是善意的无为之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述的那样，无疑，“提比略统治期间，犹太是太平的”。也许因为皇帝的态度如此，罗马的官员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为了不刺激犹太人，一味地维护犹太人，甚至不惜违反罗马的司法制度，处死了耶稣基督，因为正是控制了耶路撒冷、对犹太社会有强大影响力的祭司阶层强烈要求处死这位自称救世主的犹太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致力于为希腊人和犹太人进行调解的罗马人也在改变。罗马人的改变或许与犹太人态度的强硬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除了卡利古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件（《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有详细描述）之外，罗马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始终是宽容的。例如，继卡利古拉皇帝之后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再度尝试了由犹太人统治犹太的方式。遗憾的是，犹太方面对罗马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罗马方面的焦虑感也在增强。它体现在，派往犹太的官员们对犹太的统治越来越严厉，引起的后果就是在尼禄皇帝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犹太叛乱。自恺撒遭暗杀以后的110年间，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到了这个地步，对于犹太所提出的建设政教合一国家的要求，罗马已经不可能作出让步了。而犹太人依然坚持只有满足这一条件，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以统治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把此前的统治者希腊人赶下了台。为此，犹太人曾一度对罗马人心怀感激。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的这个时候，曾经的感激已彻底变成了敌意。

后来先后成了罗马皇帝的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对犹太的叛乱都实施了镇压。其间，因为尼禄皇帝的死以及其后的内乱，镇压中断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的镇压给罗马带来了导致耶路撒冷沦陷的犹太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66年，终于公元70年秋天。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我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作了描述，所以在这里略去不提。但是，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和以后，犹太的情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耶路撒冷自治机构“70人长老议会”被迫解散。

第二，此前，罗马在耶路撒冷连一个中队也没有派驻，此后则派驻了一个军团。这意味着罗马不再承认犹太自治，而要对其实行直接统治。

第三，无论居住在犹太本土还是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凡是犹太教徒，作为义务，每人每年要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犹太战争之前捐献的对象是耶路撒冷大神殿。在此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捐献对象改成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事实上，韦斯帕芗没有太复杂的想法，他只是想借此对犹太祭司阶层实行经济制裁，从而阻止犹太人的反罗马活动。但是，对犹太教徒来说，这一规定触犯了他们的神，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屈辱。

希腊的德拉克马与罗马的银币等值。如果研究者们所说的每人2德拉马克正确的话，那么也就是每人2银币。在韦斯帕芗时代，军团兵的年薪是225银币。所以2银币相当于一个士兵年薪的1/112。10年后，到了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时候，士兵的年薪提高到了300银币，所以犹太人捐献的金额，在公元84年以后，只是一个士兵年薪的1/150。罗马时代，消费者购物需要缴纳营业税（或消费税），税率是1%。所以从金额上来说，只要没有穷到吃不上饭，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负担。然而，问题不在金额上。

“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除了犹太人的神，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当做神。作为犹太教徒，他们必须遵守这一戒律。因此对他们来说，尽管金额不大，但是由于捐献的对象是朱庇特神，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戒律的规定。

由于献给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捐款只向犹太教徒征收，所以，人们给这一捐款取了一个名称叫“犹太人税”。这个说法深得犹太人的赞同。因为犹太人更愿意把一年一度向朱庇特神捐献的2德拉克马看做是罗马向犹太人征收的税而不是捐献。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心情很容易理解。但同时，我想这也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摩擦。

尽管如此，按塔西佗的说法，“在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以及图拉真的统治期间，犹太都是太平的”，只是，这种太平不过是犹太人把怨愤压在心底的、表面上的“太平”而已。

图拉真皇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非常理性，因此在犹太人眼里，他也是一位好皇帝。尽管如此，当图拉真专注于攻打帕提亚的时候，他们还是乘机举起了反旗。公元115年，犹太发动起义，激起了罗马人的极大愤怒。罗马人最憎恨毁约和乘人之危的行为。再加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叛乱中犹太人与敌人帕提亚暗中勾结。如果罗马方面得到的这个情报属实，显然这是卖国行为。这次叛乱除了犹太本土，还波及了塞浦路斯以及昔兰尼加等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一情况促使罗马果断采取了措施。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镇压犹太人的这次叛乱。

这一时期，“和平”暂时得到了恢复。我想这一定是哈德良的想法：他想通过清除涌动于地下的反叛岩浆，来彻底解决犹太问题。如果恺撒之后的皇帝们采用了他的方式，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到哈德良执政时，距离恺撒时代已经过去170年。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唯一的目的已经变成了维持帝国的秩序。对于哈德良

来说，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一件。他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是无所忌惮的，他不仅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而且还建起了一座名叫“埃利亚卡匹托尔”的城市。为了惩罚为此敢于造反的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对犹太人采取了“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全部逐出耶路撒冷。

有研究者批评哈德良在打压犹太教徒势力的同时，助长了基督教徒的势力。但是，这样说并不公平。哈德良没有打压所有的犹太教徒，他打压的只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他没有采取任何打压措施。在犹太激进派与罗马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彻底决裂。基督教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居住在耶路撒冷。

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犹太人是否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哈德良对犹太教徒的感情始终是冷漠的，他对犹太人的处世理念深恶痛绝。犹太教徒认为，真理只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神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哈德良看来，他们的这种处世理念是视而不见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态度，是过于自我的表现。他无法接受犹太人对信仰其他诸神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轻慢，无法接受犹太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神而憎恨人类的偏见。由于深受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哈德良有这样的想法非常自然。因为希腊哲学的本质是不墨守成规，可以随时提出质疑。如果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也起来反抗罗马，发动叛乱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样对他们实施镇压。

攻占耶路撒冷的公元134年春，皇帝哈德良离开恺撒利亚，乘船返回罗马。途中没有再去别的任何地方。这时距离他离开首都已经6年多了，他的统治也已经过去了17年。回国途中，他一定在想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

晚年

5月底，哈德良已经回到首都罗马，所以，他一定是在公元134年年初，攻占耶路撒冷后马上对战后处理作出指示，然后就踏上了回国的旅途。罗马元老院一致通过用凯旋仪式来欢迎皇帝相隔6年后的归来，但是哈德良拒绝了。他把这一荣誉让给了塞维鲁斯——这位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犹太战争的总司令官。当然，塞维鲁斯虽然得到了这份荣誉，但是他的凯旋仪式规格远远低于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哈德良的凯旋仪式。他没有能够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只是骑在一匹白马上。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只有作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现在凯旋仪式上。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只能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接受规格低一些的凯旋仪式。为塞维鲁斯举行凯旋仪式应该是在两年之后，因为在罗马军队占领佩特拉，犹太叛乱之火最终灰飞烟灭以后，塞维鲁斯才得以回到首都。在这期间，元老院通过了皇帝提出的法案，彻底驱逐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使犹太人“大流散”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政策。尽管如此，有关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这一明显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一句话也没有提及。

在与相隔6年回到首都的哈德良接触后，元老院议员中的大多数人感觉他变了，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变化还不是很大，至少还没有人认为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像其后《皇帝传》的作者评价的那样，在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看来，哈德良从来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这就是哈德良。然而，在结束第二次巡回视察，又解决了犹太问题后，他从“变化不定”变成了“一意孤行”，在常人眼里，他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他变得严厉，变得怪癖，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大把花钱。同时，他又表现得异常吝啬、不诚实、冷酷无情。这一阶段的罗马社会正值从“壮

年”（Virlitas）迈入“老年”（Senilis）的转型期。

绝大多数研究者试图从他年事渐高的角度去解释他性情的变化。的确，自制力减弱是老年人普遍的特征之一。但是，公元134年哈德良回罗马的时候，他只有58岁。到138年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62岁而已。虽然古代因为幼儿死亡率高，导致平均寿命偏低，但是到了七八十岁依然身体健康的也大有人在。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把哈德良的改变归结为疾病。《皇帝传》中有这样的内容：“在巡回视察帝国全域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要在暴雨、严寒或酷暑中跋涉，这些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健康，最终使他倒在了床上，一病不起。”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哈德良回国后直到去世的4年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事实上，他依然带病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对国事的关心。同时，在满足个人爱好方面，他也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只是他再也无法掩盖体力的衰退。

从年轻时候起，哈德良对自己的健康一直充满自信，即使有时候体力透支也能很快恢复。对于渐渐变老的他来说，或许是因为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行动，所以内心产生了焦虑，结果导致性情大变。总之，这个时期，哈德良痛恨自己的身体。他的晚年与生来多病的奥古斯都全然不同。

但是，我认为除了年龄和疾病以外，导致哈德良改变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该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完。因为需要他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曾经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他感到极度不适。一直以来，性格自我的他突然失去了精神支柱。

当他一心一意履行皇帝职责时，他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权力必不可少。为了保证权力在握，他必须控制

自己的情绪。换句话说，他有所顾忌。但是现在，职责已经完成，于他而言，权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有所顾忌，不再需要在意元老院及民众对自己的评价。作为一名统治者，哈德良看重的是业绩而不是他人的评价。如果与业绩相比，他更看重评价的话，在言行举止方面，他一生都会小心翼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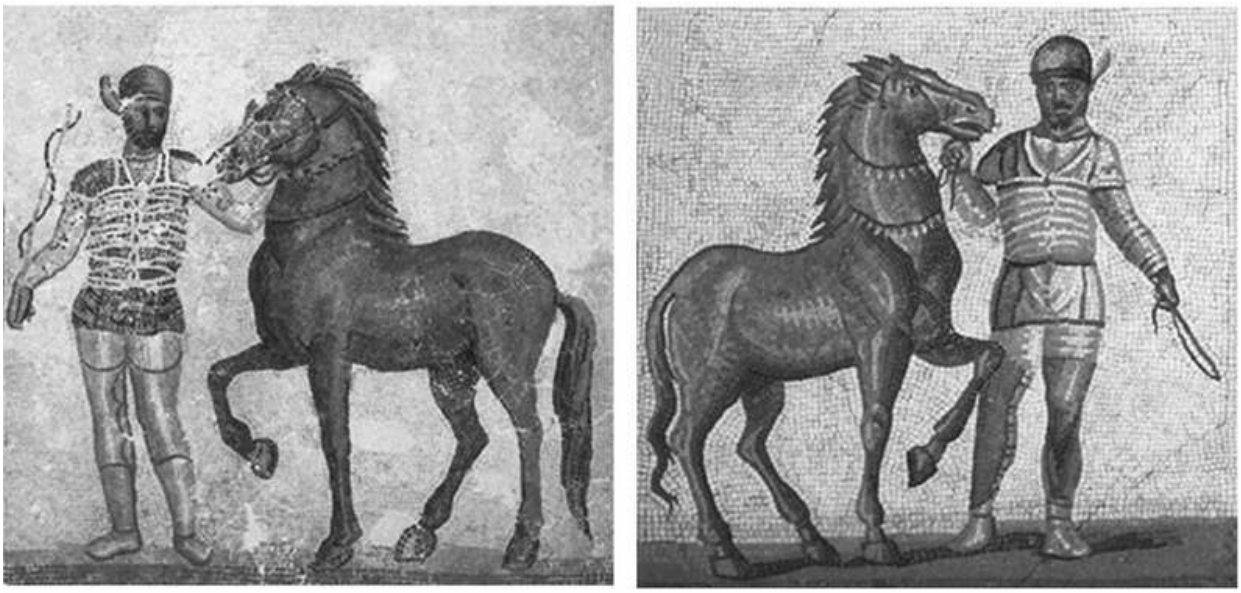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个逸闻，来认识一下不再有所顾忌的哈德良。

种种迹象表明，发生这件事的地点可能是圆形竞技场。既然是圆形竞技场，那一定是在举行角斗士比赛。角斗士比赛是罗马人最狂热的两项赛事之一。这一天，圆形竞技场淹没在5万多名观众发出的阵阵欢呼声中。哈德良忍受不了这种喧闹，他叫来时刻跟随在皇帝身边待命的布告官，要他下令全场安静。布告官心想，如果按照皇帝的要求命令观众安静的话，观众一定会对皇帝心生反感。于是，布告官走到贵宾席前面，向观众张开了双手。观众以为皇帝要发布什么消息，一下子安静下来，等待皇帝说话。布告官说："这就是皇帝想要的。"

得到的回应是观众们的哄堂大笑。哈德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命令有失考虑，他向布告官表示了谢意。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竞技场"（意大利语叫Circo Massimo）的大型比赛场馆，这里可容纳的人数是圆形竞技场无法相比的。最初，尤里乌斯·恺撒对这一赛场进行改造后，可容纳15万人，后来图密善和图拉真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可容纳人数多达25万人。2000年以后的现在，作为赛场，它的规模之大依然罕见。在这个"大竞技场"进行的比赛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战车竞速比赛，战车由四匹或两匹马拉着。为了举行这种比赛，必须保证有大量的赛马、战车和驭手，所需费用很大。同时还要有类似于现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团队组织，比赛就在这些队之间进行。主要的参赛队有四个，分别用白、红、蓝、绿四种颜色来区分。比赛中，选手要同时驾驭四匹马，所以他们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各队都会物色擅长驾驭马匹的年轻人，也会收买有一定天赋的奴

隶，训练他们成为优秀的驭手。在罗马，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战车竞速比赛的每个队都已经具备了完美的商业组织架构。



马赛克上留下的骑兵像

比赛开始后，战车要沿着宽大的跑道奔跑7圈，然后向终点冲刺。从上午到晚上，每个队都需要参加若干场比赛。这天的比赛结果是一名驭手成为了最后的胜者。

现场观众情绪激昂，齐声高呼“自由”，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涌向坐在贵宾席的哈德良。他们是要哈德良把那位驭手从奴隶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给他自由。

在如此氛围的赛场里，布告官即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再加上这天的布告官好像没有在圆形竞技场时的那个布告官机灵，他把皇帝的话写在告示板上，举着这块板绕场走了一圈。告示板上写的是：

> 诸位，这个奴隶不属于你们任何人，你们没有权力要求解放他，也没有权力要求我违背法律，解放这个奴隶。

顿时，巨大的赛场观众席上陷入了一片寂静。哈德良说得没错。但是，观众们认为，不管怎样总该为这位驭手做点什么。他们觉得，以前的哈德良一定会满足观众的愿望。

四驾战车竞速比赛的明星驭手与角斗士一样不全是奴隶。驭手的收入很高，受此诱惑，选择这一危险职业的罗马公民也不在少数。就算哈德良用自己的钱买下这名奴隶给他自由，这位驭手继续驭手生涯的可能性极大，他的主人无须担心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驭手。事实上，既然这位明星驭手表现如此出色，他的主人应该还会给他加薪。因为在罗马，奴隶也有挣钱的机会，所以才有“解放奴隶”这一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用自己挣的钱买回自由的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德良出手买下这位奴隶，不只是这位驭手本人，观众也会对他感激不尽，一切将会非常圆满。然而，哈德良此时表现出来的是性情乖僻的一面。

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完，哈德良也因此变得性情古怪。能让他的内心安宁下来的地方只有建于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意大利语不发“H”音，所以叫“Villa Adri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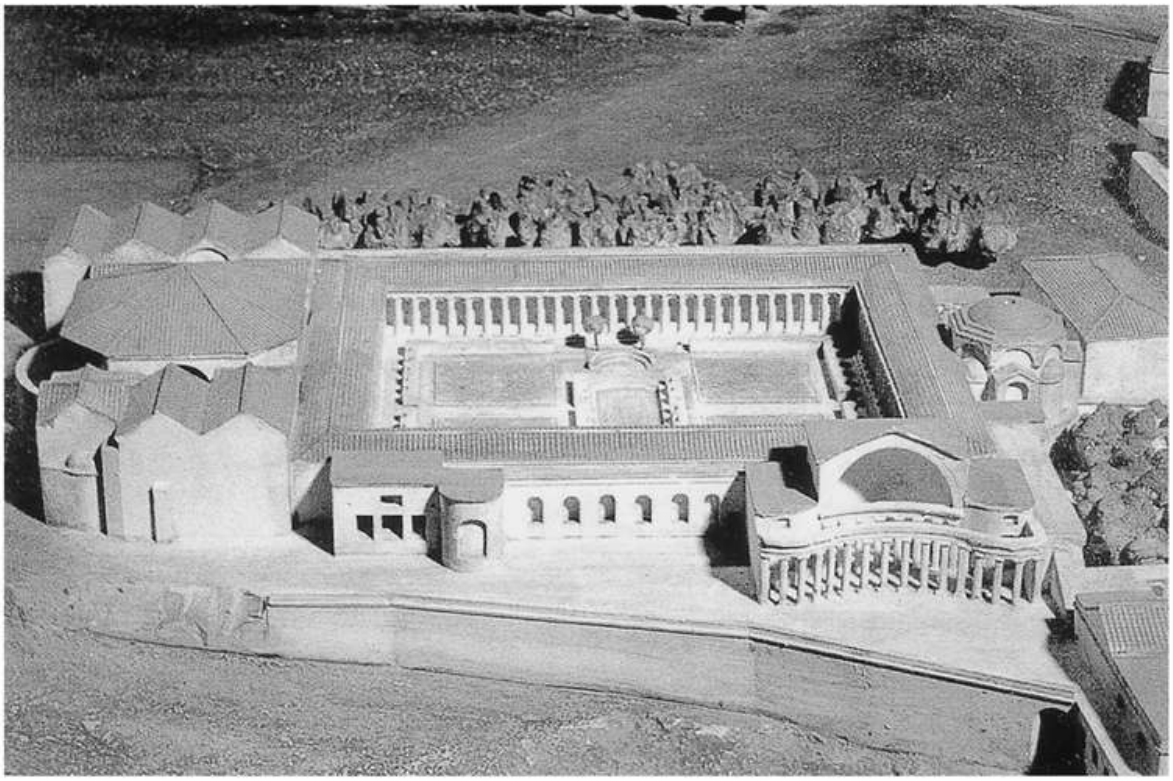
哈德良别墅里汇聚了皇帝哈德良很多回忆。所谓回忆，就是希望想起来的事情。所以收集在这里的，不是哈德良曾经亲眼所见、亲身所到之地的全部。首先，在蒂沃利别墅的回忆里，没有建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但是有吕克昂，一个因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而闻名的雅典高等教育机构；有雅典市的市议会——普吕坦内安国会厅；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埃及老人星（Canopus）。当然，他收集在别墅里的这些建筑模型，没有仿照原样，他只是根据这些建筑及建筑所在地留给他的印象，把它们做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状。研究者们很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意思，但是我想除了哈德良，大概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它们的含义。这栋别墅结构复杂，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罗马式别墅，非常符合哈德良的“复杂性格”特征。

这里还有数量庞大的美术品，大概是哈德良在视察帝国的旅途中购

买的。这些美术作品几乎都是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像仿制品。只是虽说是仿制，其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不管它们是在不断制造雕像仿制品的希腊得到的，还是哈德良把优秀的雕刻家送到罗马后在罗马制造的，总之，这些美术品都称得上是杰作，充分显示了哈德良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能力。

别墅里没有祖先们的肖像，这也是这栋别墅有别于罗马人普通别墅的地方。然而，别墅里见不到创造罗马历史的祖先们，不正是行省出身的皇帝哈德良的特点吗？

同样，这栋别墅里也几乎看不到罗马精英们喜欢摆在家里的希腊哲学家、诗人及悲剧作家们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哈德良的别墅里有很多男性和女性的雕像，其中有裸体雕像也有着装的雕像。



哈德良别墅一角（复原模型）

希腊人相信最美莫过于人体之美，而裸体又是最能体现美的形式。但是，用裸体形象来体现美的特权，只有诸神才有。因此，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人想表现裸体美，就要雕刻成诸神的形象。例如，如果把带箭筒的皮带从右肩挂到左腋下，就用阿波罗的形象；如果拿着一串葡萄，就用狄俄尼索斯的形象。罗马人承袭了希腊人的这种想法。因此，如果罗马皇帝的雕像是裸体像，那一定是他死后被神化后的作品。哈德良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几乎没有历史伟人像，因此，裸体雕像中没有先皇们的雕像。除了希腊诸神，裸体雕像只有安提诺乌斯年轻貌美的形象。

除了安提诺乌斯的雕像，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雕像看上去也是“感官冲击”远比“知性感受”要强烈得多。我想，如果可以把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刻家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都雕刻过的阿波罗像，或者，哈德良时代上好的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仿制品摆在眼前的话，比每天与一个活着时做事任性、有时还会说傻话的年轻人一起生活，应该更能感受到恬静、愉悦吧。

哈德良别墅内，无论是铺设了图案漂亮的彩色大理石地面的、只放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家具的室内，还是蓄有引自附近河流的、干净而清澈的水的池畔，都矗立着沉默的美丽雕像。遗憾的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已经无法步履轻盈地徜徉其间了。没有用人的搀扶，哈德良连走下台阶来到庭院都力不从心。此时的哈德良，就连他的不开心也会引发人们的同情之心。体力的衰退在不断加速。对他来说，更要命的是，他亲自建立的“内阁”统治机构组织齐全，不仅在他离开首都期间运转正常，而且，在他回到罗马，病倒在床上以后，这一帝国统治机构依然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它的职责。因为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已经60岁的哈德良除了在别墅深居简出，没有一件事情需要他操心。

工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另一种是连贯的工作。后者的缺点是工作结束后，就会无所事事。此时的哈德良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一件，那就是决定皇位继承人。

继承人问题

公元136年，回到本土将要满两年了，已经60多岁的哈德良知道自己不能再拖延继承人的人选问题了。体力的衰退早已难以掩饰，继续拖延就是不尽职责的行为。他与皇后萨宾娜没有生育子女，收谁为养子意味着此人将是皇位继承人。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成了元老院中有权势的人一见面就会聊起的话题。但是，并非人人手中都有“王牌”。自以为握有“王牌”因而表现得比谁都活跃的人，就是哈德良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

哈德良唯一的姐姐叫多米西娅·波利娜，她的丈夫就是这位塞尔维亚努斯。他与图拉真和哈德良一样，也是出身于西班牙行省的罗马人，年龄比图拉真大8岁，比哈德良大31岁。在图拉真被涅尔瓦指定为继承人，从而成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后，他受命在图拉真曾经的任职地高地日耳曼担任总督。涅尔瓦去世，图拉真登基的时候，作为高地日耳曼的总督，他协助推迟回罗马的新皇帝加固莱茵河防线。或许，他也曾率领军团参加过图拉真指挥的达契亚战争。只是，此人好像并不具备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因此也没能成为在图拉真发动的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将军。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避免卷入哈德良登基伊始就肃清四位将军的那起事件中去。作为罗马社会的精英，他当然也担任过“光荣的职务”，并担任过其中的最高职位——执政官。在图拉真时代，他当选过两次，哈德良时代当选过一次。共三次担任执政官的经历，再加上现任皇帝是他的内弟，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元老院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正是这一切，让塞尔维亚努斯变得狂妄自大。

从性格上来看，哈德良对待家人非常冷漠。我们找不到有关他生母去世的年份和他姐姐去世的年份的记录。如果哈德良对她们特别挂念或做过什么的话，应该逃不过喜欢写随笔的史学家们的笔墨。比哈德良大30多岁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大概并不了解哈德良的性格。在位皇帝哈德

良的姐夫有一个孙子，也就是哈德良外甥的儿子，叫皮达尼乌斯·弗斯克斯，当时的年龄大概是十七八岁。

塞尔维乌斯坚信自己的这个孙子才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我们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也许他利用自己是元老院实力派的身份，呼吁元老院议员拥立弗斯克斯；也说不定他一次次地召集秘密集会。总之，他的这些动作很快传到了哈德良的耳朵里。

哈德良极度厌恶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他对自己的绝对主导能力非常自信，因此他最讨厌有人瞒着他自作主张。虽然这不是谋害皇帝的阴谋，但毕竟插手到皇帝自己的事情。塞尔维亚努斯的举动触怒了哈德良，他派了一队近卫军到塞尔维亚努斯家，以谋杀皇帝的罪名，赐塞尔维亚努斯和他的孙子自尽。

元老院议员们好像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和一位刚举行完成人仪式的年轻人被迫自尽。临死前，他们甚至连接受审判并作出辩解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组织专家把罗马法编纂成集，并完成了这项集大成工作的正是哈德良本人。其中就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得以叛国罪提起诉讼。皇帝本人践踏了自己定的法律，这让元老院议员们想起了哈德良登基之初肃清四位最有影响力的元老院议员的旧事。他们的态度于是变得激愤起来。

事实上，哈德良有一个人选，他早就在考虑是否让此人来继承皇位。为了给群情激愤的元老院一个交代，也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自己杀害姐夫及其孙子的这一事实，皇帝公布了继承人的姓名。此人叫凯奥尼乌斯·康茂德，据说当时年龄在30岁上下。成为哈德良的养子后，改名叫埃里乌斯·恺撒。他的出生地是托斯卡纳地区，当时叫伊特鲁里亚，所以他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他的妻子是哈德良登基之初被肃清的四人之一——尼格里努斯的女儿，两人育有一个6岁的儿子。

对于这一人选，元老院的反应很冷淡。甚至有议员说哈德良之所以选他为继承人，就因为他是美男子。也有议员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似的，到处散布说，他是哈德良爱上安提诺乌斯之前喜欢过的人。埃里乌斯·恺撒有一双蓝眼睛。当听到2000年前美男子的条件是有一头金发一双碧眼，也许你会觉得好笑，然而在罗马时代，蓝眼睛就是美男子的条件。

埃里乌斯成为哈德良的养子，意味着将成为下一任皇帝。事实上，他不只是个美男子，他的言谈举止和气质也非常优雅，同年代的其他年轻人无法与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他也不像元老院议员们评论的那样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他喜欢优雅的、有品位的人和物；他善于言辞，演讲非常精彩，让听者心悦诚服。在反对他的人们列举的理由中，有一条是他爱好奥维德和马提雅尔的文学作品。但是，与冗长的维吉尔文学和过于庄重的贺拉斯文学相比，他不过是偏爱充满机智的奥维德和马提雅尔文学而已，而这仅仅是个个人爱好的问题。除了文学，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教养，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国之主。此外，他还是个非常看重家庭的男人。以我的想象，哈德良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处于补偿的心理——补偿自己为稳固权力基础，在登基之初肃清的四个人。因为埃里乌斯·恺撒当上皇帝后，他的儿子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继承人。此时只有6岁的这个少年身上，流淌着被肃清的四人之一——尼格里努斯的血液。

很难想象，像元老院指责的那样，这一人选只是哈德良一时的想法。在宣布埃里乌斯为养子的同时，哈德良也让他分享了皇帝的特权——“护民官特权”和“全军最高司令权”。同时为了与市民同庆继承人的诞生，哈德良花费3亿塞斯特斯举办了角斗士比赛和战车竞速活动，还发行了银币，正面为埃里乌斯的侧脸，背面为慈爱女神。我想，哈德良是真心诚意地想让埃里乌斯·恺撒来继承他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进行重建后的帝国。

埃里乌斯• 恺撒

然而这位被认为是合适人选的年轻人，身体不好。按照现代医学的解释，很可能他患了结核病。哈德良认为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所以他不理解年轻患者的痛苦，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他坚信只要锻炼，身体一定会恢复。

公元137年，又是新的一年。这一年，当选执政官的埃里乌斯·恺撒

被派往前线。因为哈德良指示他应该积累指挥军团的经验。他去的前线不是科隆、美因茨这样已经城市化了的地方，也不是安条克这样能保证舒适生活的城市，而是潘诺尼亚行省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虽然有完善的基地，但是，它是位于多瑙河畔的最前线基地。在罗马军团基地中，这是地势和气候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基地之一。

基地生活给埃里乌斯的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以在罗马过冬为由，在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后，回到了意大利本土。此时，本来就羸弱的他，身体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第二年即公元138年1月1日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按惯例，他应该向皇帝发表感恩演讲，感谢他指定自己为继承人。然而，就在这天的前一个晚上，他突然大口吐血，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

哈德良以新年伊始的1月1日不宜服丧为由，禁止为他举办国葬仪式，而且，他此时已经很常见的火爆脾气大发，说："我竟然会倚靠这座即将倾倒的墙。"他对自己非常生气，甚至说出了特别没有教养的话，他说："白白浪费了3亿塞斯特斯。"但是，埃里乌斯作为皇位继承人得到"恺撒"的称号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哈德良还是下令用符合这一称号的规格为他下葬，让他进入了就在不久前刚刚动工建设的新皇帝陵园中。因为奥古斯都建设的皇帝园陵已经满了，这才有了新的皇帝陵园建设。这个陵园（Mausoleum）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被改造成法王厅的城堡，叫"圣天使堡"，现在依然矗立在台伯河的西岸。

埃里乌斯·恺撒去世后，哈德良必须尽早决定新的继承人。

好像在十几年前，哈德良就已经注意到一个少年。他就是马可·奥勒留，哈德良之后的第二代皇帝。当时他的名字叫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他是出生于西班牙的、深得哈德良信任的、两度担任过执政官的马可·阿尼厄斯的孙子。马可·奥勒留出生在罗马，父亲早亡，从小由祖父抚养。在罗马长大的这位少年刚满6岁就进入了骑士阶级，8岁被选为祭司之一。当然，他之所以小小年纪能像这样平步青云，一定是借助了皇

帝的力量。当上皇帝以后，他用希腊语写过一部《沉思录》。从小他就是个勤勉好学之人，尤其醉心于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斯多葛派。皇帝哈德良揶揄这位少年探求真理的想法，甚至在他姓氏前加了“热爱真理”，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热爱真理的阿尼厄斯”。但此时，这位“热爱真理的阿尼厄斯”只有16岁。40岁登基的哈德良无法接受太年轻的皇帝。

公元138年1月24日是哈德良62岁的生日。这一天，早已不再邀请朋友熟人为自己举办生日庆宴的哈德良，邀请了一个人。接受邀请前往蒂沃利别墅的就是安敦尼。安敦尼的父亲出生于纳尔榜南西斯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他本人则出生于罗马近郊的拉努维奥，这年他52岁。当然他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是“内阁”的常任成员。也就是说，哈德良在巡回视察帝国期间，安敦尼是长期留守罗马的、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有一个女儿，儿子已经去世。

哈德良向安敦尼表示有意收他为养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安敦尼必须把快满17岁的热爱哲学的阿尼厄斯和已经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快满8岁的儿子路奇乌斯收为养子。对此，安敦尼只回答了一句“让我考虑一下”，之后向皇帝表示了生日的祝福。

一个月后，安敦尼再次到来，告诉哈德良愿意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于是哈德良立刻宣布，收安敦尼为养子，安敦尼收阿尼厄斯和路奇乌斯为养子。同时，他利用临时措置法，即可以不征求元老院的同意，由皇帝决定的法律，修改了有关养父与养子关系的法令。罗马法规定养父和养子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年龄差，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是多少岁，而哈德良和安敦尼之间只有10岁的年龄差。

指定安敦尼为继承人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元老院的欢迎，因为大家都对安敦尼颇有好感。就这样，继承人问题一解决，哈德良作为皇帝的职责全部完成了。

迎来死亡

温暖的春天开始降临到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但是住在里面的人一点也开心不起来。我们不清楚哈德良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因为古人说的病名靠不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病情在不断加重。此时的他，即便有用人搀扶，也已经无法行走，要去开阔而漂亮的庭院里呼吸室外空气，只能躺在四个用人抬的轿子上。

罗马时代的男人，特别是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是精英的男人，在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后，会认为活着是一种耻辱。对于周围的人来说，罗马统治阶层的男性们在这种时候选择绝食而死，完全可以理解。

服侍这位年老体衰的皇帝的用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奴隶，因为做事稳重、机灵，引起了哈德良的注意。有一天，皇帝叫来这位奴隶，把自己的短剑交给他，命令他用这把短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年轻的奴隶惊呆了，他流着眼泪乞求皇帝原谅，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哈德良很失望，但是没有强求。

年轻的奴隶担心皇帝哪天又会要求自己杀死他，于是向安敦尼报告了这件事。安敦尼大吃一惊，连忙赶往蒂沃利劝导皇帝："应该有尊严地接受病痛带来的一切后果。"

哈德良勃然大怒。他很气恼，他恨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听这样的劝解。他更生奴隶的气，口口声声说他犯了死罪。原因是他急急忙忙向安敦尼报告了这件事。他还向周围的人乱发脾气。安敦尼担心这个年轻奴隶的安全，甚至把他藏匿了起来。

但是，哈德良并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每次安敦尼都会赶往蒂沃利，到了后来，他甚至不再劝说，而是哀求他："您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就会变成弑父的罪人。"他收走了哈德良的短剑。

这让哈德良再次大动肝火。事实上，他已经几次三番地尝试用短剑自尽，无奈连刺入自己胸膛的力气都没有。他痛切地感到自己体力的极度衰弱。在他看来，收走短剑，意味着他已经被当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孩子。

蒂沃利别墅有一位御医，是希腊人。他是哈德良视察帝国之旅时随队的医生。哈德良非常严厉地命令这位忠实侍奉自己的御医为自己调制毒药，同时命令他对任何人严加保密。既然是皇帝命令，御医就有服从的义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服从等于犯罪。御医很苦恼，他既不能服从哈德良的命令，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再加上要求他这样做的是自己长期侍奉左右、内心非常敬佩的人，因此，他也不能告诉安敦尼。结果，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御医已经死去，他喝下了自己调制的毒药。

这件事终于让哈德良幡然醒悟，他再也不想方设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只能自己一个人生闷气，而要让自己开心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让病好起来，只是彻底痊愈绝无可能。于是，哈德良把无法向任何人发泄的怒气发向了元老院。

这个时期，元老院议员们经常受到来自蒂沃利的指控。对此，安敦尼首先会提交法庭，然后，一次次地拖延审判。元老院议员们对哈德良的看法已经彻底改变，原因就在哈德良不断地指控他们。《皇帝传》的作者写道：哈德良“已遭所有人嫌弃”。安敦尼劝说这位“父亲”换个环境，去海边住些日子。因为蒂沃利别墅虽然很大也很舒适，但是吹不到海风。

那不勒斯向西20公里处的海湾有皇帝的别墅。这栋别墅最早属于共和制末期的哲学家西塞罗所有。西塞罗死后，奥古斯都从他儿子的手中买过来，成了皇帝的私人别墅。其后的皇帝们一次次地对其进行修缮，现在已经变成一座非常宏伟的别墅。这一带温泉资源丰富，从共和制时代开始，罗马上流社会阶层的人们纷纷来这里建别墅。所以，作为度假胜地，这里非常出名。维苏威火山喷发导致庞贝以及周边城市被埋以

后，在开阔的那不勒斯湾，位于维苏威另一侧的波佐利、拜亚、米塞诺一带，作为度假胜地，也受到了罗马人的追捧，名气越来越大。

哈德良离开蒂沃利别墅后，沿着提布提那大道前往罗马。他一定是坐轿子去的，而且一定用布帘把轿子围得严严实实。他从东面进入首都罗马，没有停留，向南直接穿城而过。罗马人是现代化道路的创始者，但是在当时，他们还没有环线的概念。所以要通过一座城市，必须穿行市内。

从罗马向南沿奥斯提亚大道来到海边后，不清楚哈德良是沿海岸线继续南下，还是选择了沿笔直的阿皮亚大道到达特腊契纳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特腊契纳向南到那不勒斯湾，他应该走的是沿海岸南下的图密善大道。这条大道是图密善皇帝铺设的，是去海湾最近、也是最舒适的一条大道。公元前8世纪，处于向海外发展高峰期时期的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建设的第一个城市是库马。选择图密善大道前往库马，海湾就在它的前面。此时是初夏时节，是包括卡普里在内的南国那不勒斯一带最美、也是最舒适的季节。

在拜亚别墅住下来后，哈德良看着海面平静、犹如染过色的碧海，脑子里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作了一首诗：

Animula vagula blandula,

Hospes comesque corporis,

Quae nunc abibis in loca,

Pallidula rigida nudula,

Nec ut soles dabis iocos.

翻译过来，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我可爱的灵魂已经穷途末路，

一直以来，我的灵魂都是肉体高贵的宾朋，

如今却变得如此阴冷、灰暗，

我想该去那个世界的时刻到了，

那个没有快乐、听不到你曾经最喜欢的玩笑的世界。

等到安敦尼接到消息从罗马赶来后，哈德良终于闭上了眼睛。时间是公元138年7月10日，哈德良享年62岁零5个月16天，统治罗马帝国21年。

民众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元老院议员们听到皇帝去世的消息后应该是兴高采烈的。

新皇帝召集元老院会议，宣告了哈德良的死讯，同时提出神化先皇的建议，却遭到为数不少的议员的反对。

哈德良之前的皇帝中，除了提比略生前坚辞自己死后被神化，没有被神化的只有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三人。元老院反对神化哈德良，意味着他将被列入臭名昭著的皇帝行列。尼禄和图密善两位皇帝更是在死后受到了“记录抹杀刑”的处罚。对罗马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受到这种处罚更耻辱的了。一个人如果被元老院处以“记录抹杀刑”，那么，他生前的一切业绩都会从记录中删去，他的肖像会遭到毁坏，碑文上的名字也会被抹去。元老院没有给哈德良这样的处罚，但是既然有尼禄和图密善的先例，反对把他神化，事实上离“记录抹杀刑”也只差一步之遥了。安敦尼含着眼泪不断恳求议员们神化先皇。

好像是元老院不忍心辜负新皇帝的殷殷期望，结果，神化哈德良的决议最终得以通过。如果这时候元老院固执地坚持反对神化哈德良，并顺着这一势头决定处以“记录抹杀刑”的话，哈德良为重建帝国所付出的

一切心血早就消失在历史的一隅，不会传到后世。因为这件事情，安敦尼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庇护”，意思是“慈悲的人”，也因此，“安敦尼·庇护”成了历史上的安敦尼正式称呼。

安敦尼·庇护统治的第5年，也就是哈德良去世后的第5年，即公元143年，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哲学家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应邀前来参加4月21日举行的建国纪念活动，他向皇帝安敦尼和与皇帝并排而坐的元老院议员进行了一场演讲。我想介绍其中的两段话：

> 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
>
> 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

邀请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演讲是为了庆祝罗马建国，所以也许你会认为他是闻名全帝国的著名学者，年龄应该和皇帝安敦尼·庇护一样50岁出头，或者与先皇哈德良一样，已经60多岁。然而，艾利斯泰迪斯在作上述演讲的时候，只有26岁。也就是说，皇帝和元老院没有邀请著名学者，而是邀请了这位出身于小亚细亚、其学识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由此，我们知道了上面两段颂词不是出自已经在享受既得权益的中老年人之口，而是出自下一代年轻人之口。

当然这些话是说给罗马当时的统治者们听的。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离哈德良去世只有5年。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最适合刻到哈德良的墓碑上。就像1800年以后，有研究者说：“不是行省人民派代表到罗马诉说自己的要求，而是皇帝下到行省倾听行省民众的心声。”

第三章

皇帝安敦尼·庇护

（138年7月10日—161年3月7日在位）

IMP CAES M AVR ANTONINVS AVG

幸福的时代

要讲述这位皇帝的统治，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章节那样按年代顺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为什么不可能，我想，您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会了解。一句话，因为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也就是新的事情，这也是他作为皇帝实施统治的特点。

后来的人们把从涅尔瓦登基的公元96年，历经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到公元180年马克·奥勒留去世的这个时期叫做“五贤帝时代”。与五贤帝同时代的罗马人也把这个时期称做“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然而，真正配得上用“黄金的”（aureum）这个词来形容的三位皇帝就是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如果用皇帝的名字作为书名来写他们的话，可以用副标题对他们进行评价如下：

图拉真——“至高无上的皇帝”（Optimus Princeps）。

哈德良——“和平的罗马和永恒的帝国”（Pax Romana et Aeternitas Imperii）。

安敦尼·庇护——“稳定的秩序”（Tranquilitas Ordinis）。

从“稳定的秩序”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是用稳定的秩序统治帝国全域的时期。但是，稳定的秩序很难出“新”，同时，这一时期的皇帝也没有任何丑闻。如果有哪怕只是些微的“新”或“丑闻”，喜欢写随笔的编年史作家一定会欣喜若狂。既没有戏剧性的生活，又与丑闻无缘，不仅同时代的史学家们，对于后世的传记作家来说，写安敦尼都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情。因此，直至今日，关于他的传记，除了《皇帝传》中有一个章节之外，我们完全找不到。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能激起同时代人好奇心的举措，在他统治期间，也

没有发生任何能激起后世学者及作家产生好奇心的事件。

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贤帝”。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说法，一位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能力”（Virtu）、“运气”（Fortuna）和“时代的适应性”（Necessita）。马基雅弗利认为，即使有能力也有运气，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的话，就不是好的领袖。

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安敦尼·庇护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虽然他与前两者从性质上来说并不相同。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所谓幸福的时代也许就是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不同“类型”的领袖更替的时代。

在日本曾经有一个时期，每次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时，都会有人说：“与其推荐那些自己想出人头地的人，倒不如推荐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事实证明，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如果套用这个标准的话，我想图拉真应该属于“想出人头地的人”和“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各占一半的类型，哈德良显然百分之百属于“想出人头地的人”的类型，而接下来要讲述的安敦尼·庇护皇帝则百分之百是属于“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这一类型。只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安敦尼·庇护继承皇位的时候，正是最适合“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时代。

安敦尼·庇护出生于尼马苏斯（今尼姆）。在登基后，他的正式名字改成了“Imperator Caesar T.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Augustus Pius”。尼马苏斯位于罗讷河附近，属于现在的法国南部、当时的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在罗马时代的高卢，它是重要的城市之一，因嘉德水道桥（Le Pont du Gard）而闻名。这座高架引水桥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在。尼姆的原住民是高卢人，罗马承认高卢人的村落为“地方自治体”。它不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出生地——意大利卡那样，是作为罗马军团兵期满退役后居住的殖民地而兴建起来的城市。也就是说，在尤里

乌斯·恺撒的推荐下，进入元老院的这位出生于尼姆的人不是来自意大利本土，而是“罗马化了的高卢人”。不同于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祖先，安敦尼·庇护的祖先是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

作为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是第一代，安敦尼·庇护应该处于第三或第四代。他是祖父那一辈移居到意大利本土的，在尼姆早就已经没有房子和土地了。

事实上，与当时的人相比，现在的我们似乎更关注皇帝的行省出身身份。在罗马时代，除了第一代皇帝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是出身行省以外，后来，几乎没有人在意自己的出生地了。也许全帝国包括行省在内的人民，一致认为帝国是一个大家庭（拉丁语叫familiar）。事实上，安敦尼·庇护家族虽然是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但是到了他这一代，作为罗马公民已经是第三或第四代了，所以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行省的痕迹。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执政官，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是罗马人。

他出生在图密善皇帝最鼎盛的时期。公元86年9月19日，后来的这位皇帝在首都罗马沿阿皮亚大道南下30公里左右的拉努维奥诞生。也许是父亲因公务总不在家的原因，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祖父家度过的。祖父离世，父亲也去世后，他的外祖父担负起了养育他的责任。外祖父的别墅位于从首都罗马沿罗马古道向北20公里的拉鲁芬。这里就是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位年轻人接受了全面的教育，而且长得既健康又漂亮，深受大家的喜爱。他还继承了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内的众多亲属的遗产。在进入元老院之前，安敦尼已经是罗马屈指可数的富翁之一。对于罗马人来说，遗产不一定只留给直系亲属，它也可以作为奖励，留给同族中前途在望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奥古斯都提出了古代最早的“遗产税”，并使之成为罗马国家的税收之一。这一税种通称“二十分之一税”，只向罗马公民征收。但是如果继承人为直系亲属，则免征遗产税。

这一时期，一个出身元老院阶级的年轻人理所当然要走担任“光荣的职务”的发展道路，成为帝国的精英。安敦尼在图拉真统治期间的公元111年当选了财务检察官，公元116年进入元老院，同时当选了法务官。他当选执政官是在公元120年，此时已经进入哈德良的统治时代。其后，在负责国家行政的“内阁”中任职多年。“内阁”是皇帝哈德良因为长期离开本土视察帝国各地，而授权负责国家行政的一个机构。在49岁到50岁的那一年，他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出任了亚细亚行省的总督。其间，他广施善政，获得了一致好评，被认为是元老院人事安排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可以看出，安敦尼的职业生涯不是源自皇帝的任命，而是典型的元老院人事安排。也就是说，安敦尼完全没有在前线执行公务的经验。去行省任职也只是一次，而且还是在小亚细亚西部。这里的文明程度之高，在帝国境内屈指可数。罗马没有在这里驻扎军团兵，甚至连官邸警备都由当地的辅助部队的士兵担任。罗马皇帝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也是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责任人。不能不说，作为皇帝，他完全没有军队指挥的经验，是一大缺憾。

幸运的是，安敦尼继承的罗马帝国已经非常稳固，因为图拉真确立了多瑙河防线，哈德良又对帝国境内左右防御体系进行了整顿。的确，他不适合做乱世的皇帝。但是，统治一个和平的帝国，他完全可以胜任。因为他只要管理好正常的行政就可以。哈德良一定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指定安敦尼做自己的继承人。而安敦尼本人又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现状，所以，他才有可能在继前两位皇帝之后，成为又一位贤帝。

一个人登上最高权力者的位置后，通常会对人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尤其是意大利本土中唯一的一支军事力量——近卫军团的指挥官，皇帝通常会任命自己的心腹。但是，安敦尼既没有调整其他人事，也没有撤换近卫军团指挥官，他完全延续了哈德良安排的人事。至于近卫军

团长官，在任的时间更是长达20年，直到他主动提出辞呈希望隐退，才换成安敦尼选出的人。安敦尼·庇护之所以没有调整人事，一方面是因为哈德良的人事安排非常合理，因为他始终贯彻一条，即在合适的位置上安排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是因为安敦尼的用人观。他认为一个人只要长期担任一项工作，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他自始至终贯彻了自己的这一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安敦尼·庇护还是一位相当固执的人。

有一次，妻子芙斯汀娜因为他的小气对他发了一通牢骚。对此，皇帝这样告诫妻子：

“你真是个愚蠢的人。我现在是帝国之主，不再是从前那些东西的主人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浪费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是最卑劣最无耻的行为。”

正因为安敦尼·庇护的想法如此，所以在和市民们同庆皇帝登基时，他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动用皇帝公库的钱来发放“一次性赏金”（congiarium），而是用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发放。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公民权所有者（仅限17岁以上的男子）有20万人，加上驻扎在帝国防线的军团兵16.8万人，当时，接受“赏金”的人数多达36.8万人。据说每人拿到了75第纳尔银币，所以，这一次安敦尼的个人财产支出总额高达2760万第纳尔银币。

皇帝的日常生活没有改变，与登基前、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时候完全一样，虽然富裕却不奢华。首先他没有建宏伟的别墅，而仅仅满足于使用已有的别墅和成为皇帝后继承下来的皇帝别墅。事实上他的确也没有新建的必要，因为已有的别墅中，仅安敦尼最喜欢去的别墅就有8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3处他从来不去，那就是哈德良建在蒂沃利的别

墅、图密善建在奇尔切奥的别墅和提比略隐居的卡普里岛上的别墅。虽然以我的审美观，我认为这3处别墅比其他任何别墅都要漂亮。

世人评价安敦尼是个没有欲望的人，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说这样的话，只能证明此人极其缺乏想象力。因为安敦尼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性格，虽然他的统治方法与哈德良不同，但是并不影响他取得丰硕的成果。52岁的新皇帝登基后不久，公布了他的想法。

他宣布，自己不会去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他会留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对帝国进行统治。

他的理由有两条：

一、首都罗马是帝国的中枢，留在这里便于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制定政策或采取紧急措施。

二、减轻皇帝出行目的地城市或地方自治体的经济负担。

关于第一条理由，我完全同意安敦尼的说法。因为它关系到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组织，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传递命令。前面讲过，皇帝了解情况的途径大体分两类：一是来自以行省总督为首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汇报，二是来自行省的请愿。

在哈德良章节的最后部分，艾利斯泰迪斯于公元143年所作的演讲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 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

如同军事才能出色的指挥官那样，罗马人都清楚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对于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和速度方面格外用心。在历代皇帝的努力下，那个时代，在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和速度这两大要素方面，罗马帝国的国营邮政体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陆地上传递情报，走当时的“高速公路”——由罗马式大道构成的交通网，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骑马送往目的地。海上传递情报的时候，船只一进入港口，马上换乘最早出港的其他船只送往目的地。这种传递方法同样适用于普通邮件。艾利斯泰迪斯说：

> 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希腊语读法叫Hermēs，拉丁语叫Mercurius），会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关于安敦尼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如果他不去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的目的之一，只是为了减轻当地经济负担的话，那么哈德良实在太可怜了。的确，为了迎接皇帝一行的到来，一点费用不花是不可能的。但是，哈德良巡回视察的地方，绝大部分是边境地区，是皇后不会陪同去的地方。而随行的人中，又是以技术人员为主，几乎都是不需要花钱的人。视察军团基地的时候，他们住的帐篷与士兵们住的一样；需要留在城市里过冬的时候，有总督官邸就住官邸，没有总督官邸，就住在当地城里的权贵人家里，而且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当地的所谓“经济负担”极轻。不但如此，皇帝视察的结果，如果需要完善防御体系，需要铺设大路、架设桥梁，军团兵就要承担起这些工程。因为军团兵的薪酬自有国家开支，所以，应该说，在经济方面，获益的是皇帝视察的目的地。

因此，我认为安敦尼·庇护的这个理由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他的

真实想法不便说出来。首先，因为哈德良皇帝长时期不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意大利本土，对此，本土居民一定心存不满，安敦尼·庇护要消除大家的这种不满；其次，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哈德良上了年纪后，身心备受煎熬。对此，安敦尼一一看在眼里。哈德良41岁当上皇帝，而安敦尼登基的时候已经52岁。而且，安敦尼可能与《皇帝传》的作者看法一致，他认为使哈德良痛苦万分的疾病，就是长期巡回视察帝国边境的旅途劳顿造成的。提比略很长寿，他登基的时候已经56岁，统治帝国长达23年。他在统治帝国期间，就不曾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一步。因此，大概安敦尼认为要长寿必须善待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经过哈德良重建后的帝国一切正常，无须皇帝亲自出马前往各地监督检查。就这样，安敦尼·庇护活到了75岁，比62岁去世的哈德良长寿许多。

安敦尼·庇护几乎全盘继承了先皇的业绩，只对某些他认为不太合适的地方作了微调。而违背先皇意志的事情，他只做过两件，很难说这算不算微调的范畴。

其一，安敦尼·庇护刚登基就下了一道赦免令，撤销了哈德良在执政末期对元老院的无理指控。这件事情他做得顺情合理，既无损养父的名誉，也没有宣扬自己施行善政的意图。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是在“纠正”先皇的暴政。他在撤销先皇指控的时候说，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也会这样做。他的这一言行让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们更加觉得他是个“慈悲的人”（庇护）。

违背先皇意志的第二件事情是，按照哈德良的要求，他收了阿尼厄斯和路奇乌斯为养子。但是，哈德良还为这两位少年指定了未婚妻。他把曾经指定为继承人却因病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的姐姐配给了17岁的阿尼厄斯（后来的马可·奥勒留皇帝），把安敦尼的女儿配给了路奇乌斯（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并且定下了婚约。只是，对于8岁的路奇乌斯来说，他的未婚妻年纪太大了。虽然安敦尼·庇护知道自己应该尊重哈德良对年纪轻轻、30岁就吐血而死的埃里乌斯·恺撒的哀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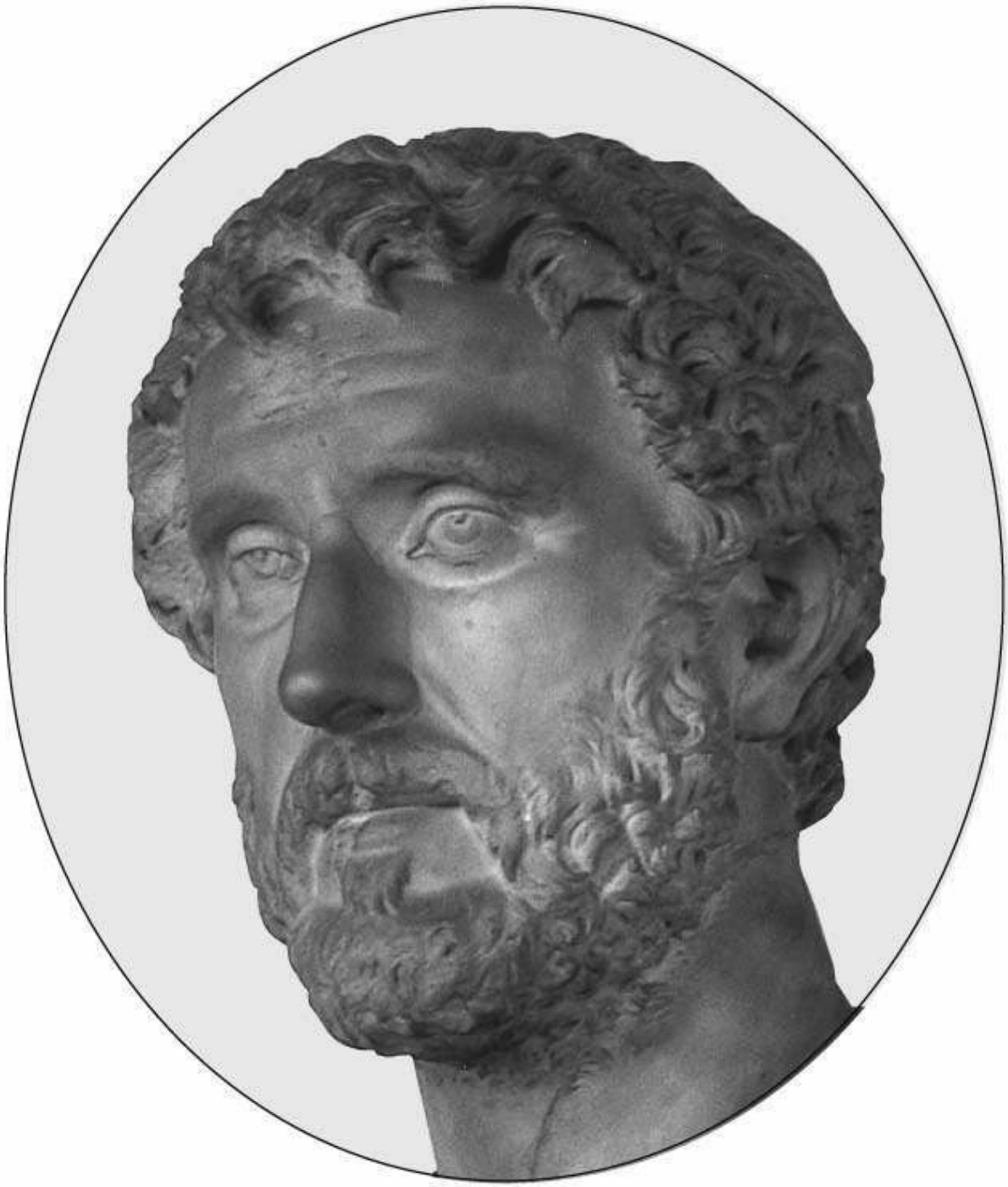
之情，但是他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小女儿了，因为两个儿子早夭，大女儿也在生产时死亡。他认为，从年龄上来看，女儿和阿尼厄斯结婚显然更合适。而且，他好像也想过，继自己之后的皇帝应该是阿尼厄斯，路奇乌斯要在阿尼厄斯之后。如果把女儿嫁给阿尼厄斯，那么自己的骨肉就是下一任皇帝的妻子。

当然，安敦尼没有擅自决定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个会把这种事强加于人的人，他叫来阿尼厄斯，征求了他的意见。这年已17岁、未来的“哲学家皇帝”经过考虑，同意了“父亲”的想法。

人格高尚的人

皇帝安敦尼·庇护做事从来不会擅作主张，无论是出台政策还是法案，一定会跟“内阁”或“法庭之友”这些智囊团商量。当然，他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作决断才征求智囊团意见的。对于如何统治罗马帝国，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一方面，因为他是继哈德良之后的皇帝，所以，有必要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避免独断专行。同时，通过“征求意见”，使自己的想法成为一项政策的做法也符合他的性格。

根据《皇帝传》以及其他历史书籍的描述，安敦尼是这样一个男人。



安敦尼 • 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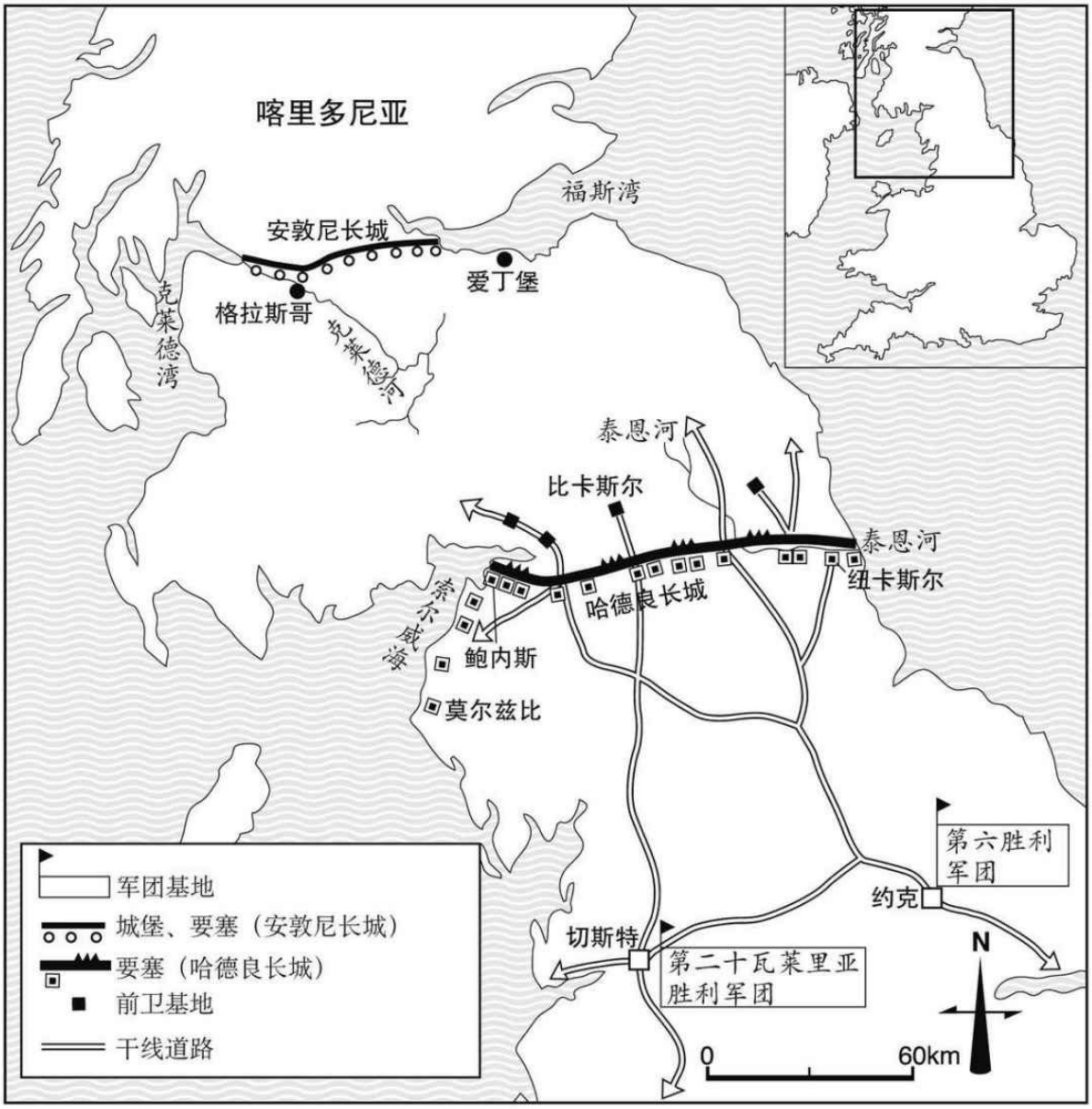
他是位美男子，长得很帅。即使在人潮涌动的人群里，他依然惹人注目。他身材修长，即使上了年纪以后，依然保持了很好的体形。但

是，因为他个子高，终究没有能够避免高个子容易出现的佝偻症状。为了矫正驼背，他在托加里面穿了一件紧身衣。

他举止大方，性格开朗、行事稳重，说话声音低沉，演讲浅显易懂。他的演讲不会让听众为之狂热，却能深入人心。与其说他是演讲达人，不如说是座谈高手更准确。

他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极其重视教育。对于两位年轻的继承人，他甚至亲力亲为地负责培养。哈德良曾经推荐迦太基出身的学者弗龙托进入元老院，并全权委托他负责教育年轻的阿尼厄斯。而安敦尼则把另一个继承人路奇乌斯的教育任务也交给了这位迦太基人。

安敦尼·庇护处理任何事情都好像春日里和煦的阳光一般。他非常擅长采用平衡的策略，不会把问题扩大，也没有丝毫的虚荣心。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不列颠（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犹太教徒叛乱的原因之一，是哈德良强制执行的禁止割礼法。公元134年耶路撒冷沦陷以及随后对犹太教徒实施“大流散”之后，哈德良不再提这一禁令。到了安敦尼时代，这一禁令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安敦尼明确解除了这一禁令，但是他没有解除犹太教徒不得居住耶路撒冷的

禁令。也就是说，他只解除了禁止割礼法，而“大流散”犹太人的法令依然有效。这一法令决定了犹太民族在其后1800年的历史。

罗马皇帝最大的职责是保障帝国边境的安全。为此，哈德良曾经亲赴前线地区，视察并重整了帝国所有的防御体系。皇帝安敦尼除了继承哈德良重建的防御体系，只建了一个冠以他的名字的前线防御体系，那就是“安敦尼长城”。安敦尼长城位于哈德良长城以北120公里处，长达60公里。在这条长城以北、相互呼应的瞭望塔最前端，还建了一个最前哨基地，感觉好像要深入苏格兰内陆一样。公元139年至142年，由于当地民众叛乱，驻扎在不列颠的3个军团被牢牢地困在那里。安敦尼长城和这个前哨基地，就是在镇压了当地民众的叛乱后建起来的。

建设安敦尼长城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防线，而不是为了取代哈德良长城。如果在当时，安敦尼长城成为帝国罗马的国界线，那么位于此长城以内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应该难逃被罗马化的命运。但是，罗马人既没有把自己的高速公路网延伸到那些地方，也没有把位于约克和切斯特的2个军事基地迁至那里。结果，喀里多尼亚（后来的苏格兰）被留在了罗马文明圈以外。

有一份记录保留至今，那是关于安敦尼·庇护皇帝时代罗马军团驻扎地的记录。当然，这些防御体系都是哈德良确立的，他不过是原样保留下来而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在帝国的鼎盛期，明确专事防守的哈德良和安敦尼时代，罗马是如何实现安全保障的。罗马统治者们认为“和平”不是理想，而是今世应该享受的利益，因此，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投资一样都不能少。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作为威慑力量，军事力量必不可少。

军团配置一览表

	行省名称	军团	军团名称	基地（当时地	基地（现在地名

		数		名）	和所在国家）
	行省名称	军团数	军团名称	基地（当时地名）	基地（现在地名和所在国家）
	Britannia（布里塔尼亚）	3	II Augusta	Isca Silurum	卡莱奥恩/英国
			XX Valeria Victrix	Deva	切斯特/英国
			VI Victrix Pia Fidelis	Eburacum	约克/英国
莱茵河防线	Germania Inferior (低地日耳曼）	2	I Minerva	Bonna	波恩/德国
			XXX Ulpia	Castra Vetera	克桑腾/德国
	Germania Superior (高地日耳曼及日耳曼长城）	2	VIII Augusta	Argentorate	斯特拉斯堡/法国
			XXII Primigenia Pia Fidelis	Mogontiacum	美因茨/德国
	Pannonia Superior (远潘诺尼	3	X Gemina	Vindobona	维也纳/奥地利
			XIV Gemin	Carnunt	佩特罗内拉/

多瑙河防线	亚）		a	um	奥地利
			I Adiutrix	Brigetio	苏尼/匈牙利
	Pannonia Inferior（近潘诺尼亚）	1	II Adiutrix	Aquincum	布达佩斯/匈牙利
	Moesia Inferior (远米西亚）	2	IV Flavia	Singidunum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VII Claudia	Viminacium	科斯托拉茨热/塞尔维亚
	Mo1esia Inferio人（近米西亚）	3	I Italica	Novae	斯维什托夫/保加利亚
			XI Claudia	Durostorum	锡利斯特拉/保加利亚
			V Macedonica	Troesmis	依格里扎/罗马尼亚
	Dacia（达契亚）	1	VIII Gemina	Apulum	阿尔巴尤利亚/罗马尼亚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	2	XII Fulminata	Melitene	马拉蒂亚/土耳其
			XV Apollinaris	Satala	萨达库/土耳其

幼发拉底河防线	Syria（叙利亚）	3	XIV Flavia	Samosata	萨姆萨特/土耳其
			IV Scythica	Zeugma	巴尔奇斯/土耳其
			III Gallica	Raphaneae	沙玛/叙利亚
	Palaestina (巴勒斯坦)	2	VI Ferrata	Scythopolis	贝特谢安/以色列
			X Fretensis	Aelia Capitolina	耶路撒冷/以色列
	Arabia（阿拉伯）	1	III Cyrenaica	Bostra	布斯拉/叙利亚
	Aegyptus(埃及)	1	II Traiana	Nicopolis	亚历山大东北/埃及
	Numidia（努米底亚）	1	III Augusta	Lambaesis	龙柏斯/阿尔及利亚
	Hispania（西班牙）	1	VII Gemina	Legio	莱昂/西班牙

合计28个军团
Legionaris（军团兵）……16.8万人 （主要战斗力）
Augiliaris （辅助兵）……14万人左右 （辅助部队及有特殊技能的兵力）
Numerus （临时士兵）……3万—4万人
此外，除了米塞诺、拉韦纳、弗雷瑞斯等军港以外，还在多佛尔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等地配置了海军。其组织构成除了海军士兵、划桨手、舵手，还有医生，与陆地的作战军团相似。

作为威慑力量，只要军备完善，那些试图挑起叛乱反对罗马帝国的人，就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必须先考虑清楚后果。也许正因为如此，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罗马军团需要认真对付的只有前面提到过的不列颠。而在其他防线，虽然偶尔会有外敌侵扰，但是，皇帝接到报告总是在事情解决之后。还有，帕提亚国王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时，虽然照例会对罗马表现出强硬姿态，但是，只要安敦尼写信与其沟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与哈德良相比，安敦尼·庇护更受东方专制君主们的欢迎，甚至远在里海附近的地方部族首领在安敦尼统治期间访问了罗马，并表示愿意归顺罗马帝国，而在哈德良时代，他们却拒绝访问罗马。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帝国子民每天生活在讴歌和平的生活中，享受着繁荣经济所带来的和平果实。

然而，天灾从来不顾及人类的辛勤努力。在安敦尼23年的统治期间，首都罗马发生了一次大火灾，造成340户人家无家可归；安条克发生了地震和火灾，市内部分地区不得不进行重建；火灾造成了迦太基市内受损等等。由于天灾不断，尤其是处于地震带上的小亚细亚西部和罗得岛发生的地震，让皇帝不得不下令成立赈灾委员会。此外，台伯河曾经洪水泛滥，阿拉伯行省瘟疫流行，法国南部的纳博讷也遭遇了火灾。

每当发生这类灾害，罗马人通常采用罗马式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是自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确立以后一直沿用的。它分三个步骤实施：首先，皇帝拨款发放给受害者；然后，从附近的军团基地调遣军团兵及辅助部队士兵，进行基础设施的恢复建设；最后，罗马皇帝发布临时措置法，就是根据受灾情况，在若干年内，免征行省税的制度。通常，免征年数为3至5年。

安敦尼统治期间的特点是诸事顺利，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管理行政即可。当然，诸事顺利是因为皇帝从不放松监管的结果。通常，当经济状况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时，公职人员的数量就会增加。但是，安敦尼在国库持续盈余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财政的节流。对于那些拿空饷的

人，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开除。因为安敦尼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把理由放在明处。对于这种情况，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对于国家来说，不承担责任而领取报酬的行为，就是无耻的浪费行为。”

抒情诗人米索米德（Mesomedes）出生于克里特岛，哈德良曾经为他发放年金，安敦尼果断削减了他的年金。理由是他没有发表作品，难以认定他是否具备领取年金的资格。

他坚持认为，把私有财产用于公共事业是那些富裕家庭应尽的职责。他的这种私有财产观也体现在小事上。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他也是一位频繁出入公共浴场的皇帝，只是，每次他都会给赤身相处的人们小小的惊喜。那就是皇帝去公共浴场的当天，对去浴场的所有人免收入场费。作为休闲设施，公共浴场的门票很便宜，金额本身并不大。但是免费这种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为此，安敦尼去浴场的日子，入浴者人数急增，使得属于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安敦尼认为皇帝是公仆中的公仆，所以他认为皇帝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起到表率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做什么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前两任皇帝几乎把一切都做好了。所以，继他们之后的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专心思考应该怎么做。

安敦尼认为，任何事情必须做到条理清楚、简单明了。同时，公正和透明是绝对条件。在人事安排方面，他尽可能避免为了情面而任人唯亲。因为他与熟人或朋友相处绝对平等，所以，他的熟人和朋友也不好强求这位皇帝。

但是，如果因此说他是一位完完全全的民主主义者，我只能说那也是罗马式的民主主义。哈德良曾经坚辞了10年的“国父”称号，安敦尼在

登基一年后就接受了。而且，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皇后的封号“奥古斯塔”给了妻子芙斯汀娜。我想，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做罗马帝国全体人民之“父”的。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要通过“怎么做”来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

登上皇位后的第三年，皇后芙斯汀娜去世。安敦尼用妻子的遗产和自己的资产，设立了一个基金，叫芙斯汀娜基金会。冠以亡妻之名的这个基金会向出身卑微的少女提供结婚资助。

像这样说不出任何缺点且人格高尚的人，往往会让人感觉很无趣。但是安敦尼不同，他的言行举止总是稳重中透着幽默，没有人因为他是皇帝而对他敬而远之。

皇宫举行宴会时，他经常邀请同盟国的君侯及行省的权贵们。以安敦尼为主人的宴请，应该是皇帝的筵席，却常常变成田园别墅里的晚餐会。每当这时，他会用自己的别墅或山庄所产的肉、鱼、蔬菜及果实等做成一道道菜肴供大家品尝。每上一道菜，他都会一一向客人解释材料是哪里弄来的。葡萄成熟的季节里，他会和众多罗马人一样，放下工作前往别墅，穿着短衣和农民们一起劳动。看着采摘下来的葡萄酿成葡萄酒，是皇帝安敦尼最开心的事。顺便提一句，与爱好狩猎的哈德良不同，安敦尼·庇护喜欢垂钓。总之，在安敦尼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完美乡绅的气息。

绅士的言行举止必须有风度，必须稳重。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有一次，他看到未来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因为一位家庭教师去世而哭泣。身担“父亲”职责的他教导“儿子”，说：

“要控制感情，有时候凭借贤者的哲学、皇帝的权力都没有用。这种时候，只能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努力自我控制。”

哲学家弗龙托虽然是迦太基人，但是他受哈德良的委托，负责身为

未来皇帝的这位年轻人的教育。当年轻人长大、以马可·奥勒留之名登基后，他给这位曾经的学生写过一封信，信中对已故的哈德良和安敦尼作了比较：

> 很难说我对哈德良怀有亲近感。他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面对他，我只有努力让自己不要拂逆他的想法。站在他面前，就好像站在战神马尔斯或冥界之神普路同面前一样，我总是紧张万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亲近感必须以自信和亲密为前提。他与我之间没有这样的亲近感，因此在他面前，我没有自信。我从心里尊敬他，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我对他有亲近感。
>
> 但是安敦尼不同。我像热爱太阳一样，像热爱月亮一样，不，我好像热爱人生、热爱爱人的呼吸一样爱他。我总是坚信，他对我也有亲近感，就像我对他怀有亲近感一样。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所谓史实，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是不能用做参考的。要验证史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比较。比较他实际接触两位皇帝时的年龄和地位。弗龙托出身旧迦太基，年轻时来到罗马，是一位成功的辩护律师。受哈德良之托，负责未来皇位继承人之一马可·奥勒留的教育是在公元138年。

这一年，哈德良62岁，因为疾病，性情变得越发暴躁，让伺候在他身旁的人们总是提心吊胆。虽然他把皇帝的权限分了一半给继承人安敦尼，但是无疑，哈德良依然是统治帝国已经20年的最高权力者。

这个时期来到哈德良面前的弗龙托，据说出生于公元100年前后。所以当时年龄大概在38岁上下。38岁的人面对62岁的老人，通常都会有点紧张，更何况对方还是罗马皇帝。而且，因为高龄和疾病，哈德良怎么可能会气定神闲地对待他呢？

公元143年，皇帝安敦尼·庇护把另一个“儿子”路奇乌斯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所以这位罗马皇帝与出身于迦太基的教育家之间，很可能接触较多。另外，哈德良和弗龙托之间年龄相差24岁，而安敦尼和弗龙托的年龄差只有14岁。顺便提一句，老师弗龙托和学生马可·奥勒留之间的年龄差是20岁。

考虑到存在这些不同的因素，因此，要掩盖哈德良和安敦尼的性格差异几无可能。按照哈德良的性格，即使在他身体好的时候，也不会让对方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从而消除紧张感；也不会让对方感觉月光般的宁静清澈，从而平静下来。但是，正因为他性格如此，他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重建，也就是改革。人格完满的人没有一位能够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但是，能够让人产生亲近感是一种“美德”，是马基雅弗利所提出的、作为领袖的三大条件之一。这个词的词源是拉丁语，应该是Virtus。与“力量”的译法相比，把“Virtus”译成“德行”应该更适用于那些让人有亲近感的人。比较而言的话，用在哈德良身上，把“Virtus”翻译成“力量”更加合适，用在安敦尼·庇护身上的话，也许翻译成“德行”更合适。

那么，马可·奥勒留是怎么看待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的呢？这两个人和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前者从他小时候起就给了他很多关照，后者毫无保留地为他提供了作为皇位继承人必须积累经验的机会。从《沉思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哈德良和安敦尼的看法。

马可·奥勒留

出自罗马最高权力者之手的《沉思录》，是继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之后出版并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著作。当

然，苏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图拉真、哈德良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也都写过回忆录或战记。但是，在帝国末期和随后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这些著作消失殆尽，留存至今的只有恺撒和马可·奥勒留的作品。在这部《沉思录》中，马可·奥勒留从自己向谁学习了什么开始写起，除了祖父、父亲、母亲、家庭教师（包括弗龙托）、哲学家等，对安敦尼·庇护的着笔也很多。但是，没有提及哈德良，虽然是他要求安敦尼收自己为养子，以便自己继承皇位的。也许不提哈德良，正是这位哲学家皇帝对哈德良的认识。

关于安敦尼，后世称之为“哲学家皇帝”的马可·奥勒留是这样写的。虽然有点长，我还是作了全文引用：

>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
>
> 决定一件事情时，要慎重、稳健，同时要有持久的恒心；不追逐社会名利而热爱工作，对工作要有耐心；应树立这样的态度：只要有利于公共利益，任何建议都要认真听取；公正地评价每个人的成绩；根据实际情况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并据此判断应该对其严厉处置还是宽厚以待；没有同性恋的性倾向（很显然，这一点是针对哈德良作出的评价）。
>
> 他一心为公，从不强行要求他人陪同自己一起用晚餐或去别墅，一切由朋友们自己决定。若有人因公务或私事拒绝邀请，缺席晚餐会或不去别墅，他既不会表现不愉快，也不会心存芥蒂，对他们的态度一如既往。
>
> 他处理政务时很慎重，虚心聆听他人的忠告或建议。作决定时，为了避免受周围人的意见左右，他亲自了解情况。与友人相处，他不受一时情绪波动的影响，因此始终与朋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
> 他满足于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因此自始至终可以做到平心静气。他不断培养自己的预知能力，不管预知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

也要力争处理完好。他从来不会因为做某件事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对象。他不喜欢毫无意义的鼓掌喝彩和阿谀奉承，这类事情会令他徒生烦恼，他认为没有这种烦恼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时刻关注国家的各种需求，尽力避免浪费国家财政，为此也承受了来自民众的不满。

他不是失去理智的信徒。他信仰诸神，但不依赖诸神。

他不会为了讨好他人而无原则地赞美他们，向他们提供不合理的帮助。对任何事情，他都是有节制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因为他不是为了面子做事，而是凭良心做事。因此反而容易达到目的。

幸运女神很关照他，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才能做到谦虚，才会没有那么多亟待他去解决的事情。

对于他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攻击他，说他是诡辩家，说他不知廉耻，说他是形式主义者。非但如此，他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很完美，没有虚荣心，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和他人。

他尊重真正的哲学家，蔑视徒有虚名的哲学家，无论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气有多大，也不会被他们的说教所蛊惑。

友善与稳重是决定他举止得体的两大要素。他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当然这并非因为他贪恋人生，他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很好地享受人生。在健康方面，他不会做任何毫无意义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会选择尽可能地自行康复。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求助医生或药品。

他从不妒忌有才能的人，这是他最大的德行。他会为有才能的人们提供机会和相应的位置，让他们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些才能包括演讲的才能，熟悉法律知识以及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才能，战略上的才能，等等。正因为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人才有可能一展自己的才华。他的这种做法遵循了罗马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因为皇帝以身作则，所以，古人的优良传统在罗马领导层中间

也得以复兴。

我还从他那里知道了优柔寡断、考虑不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学到了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一种行为的重要性；学到了遭受沉重打击时，先退一步，休息之后再采取行动的权宜做法；学到了尽可能不要有秘密，如果必须保密，只限国家大事；学到了在为公民提供娱乐活动、建造公共设施、向公民和士兵发放一次性赏金时要谨慎行事，把东西和数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在私人生活方面，我从他那里也学到很多。入浴必须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在私人宫殿和别墅的建设方面，不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不过分关注饮食；不关心衣服的数量和色彩；对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奴隶不以貌取人。

他在拉鲁芬时给我写的信中告诉我，在对拉鲁芬的别墅列柱走廊进行维修时，为了避免浪费，他是怎样要求的。还有，在对图斯库鲁姆的别墅进行维修时，他也努力避免出现同样性质的浪费。

皇帝安敦尼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举止合宜，没有厚颜无耻的行为，不会言辞激烈地伤害他人。有一个词叫“事无巨细”，对任何事情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的言谈举止总是恰如其分，而这又使得他的言行充分表现出和谐、有序和一以贯之。

每次想到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仅懂得享受快乐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虽然大多数人往往会经不住诱惑，控制不住自己，从而过度沉溺于享乐之中。

到了迟暮之年，他的健康和耐心开始衰退，但是他仍然懂得如何用稳重沉着来弥补肌体的衰老。就像我其中的一位老师克劳狄乌斯·马克西穆斯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有不屈精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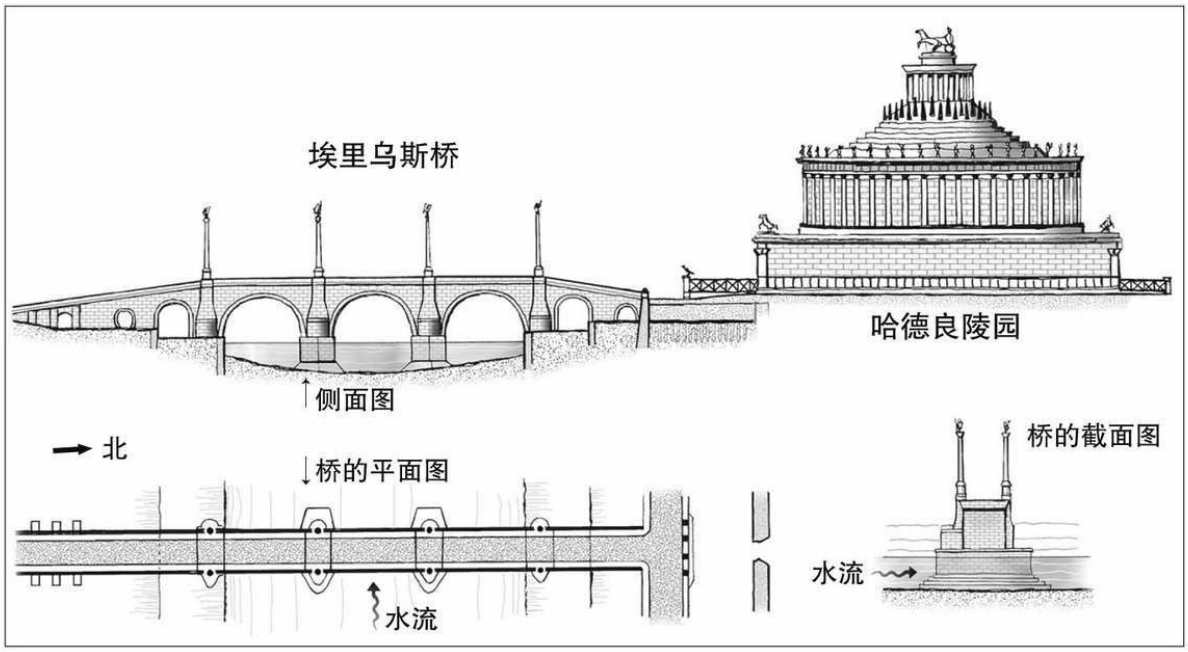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看出，马可·奥勒留皇帝一句未提哈德良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此外，他还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安敦尼·庇护时代兴建的公

共建筑少之又少。原因是两位前任皇帝，尤其是图拉真皇帝大兴土木，该建的基本上都已经建起来了。

被称为“哈德良陵园”（Mausoleum Hadriani）的皇帝陵园建于台伯河西岸，完成于哈德良去世一年后的公元139年。这项工程在哈德良生前已经动工，安敦尼继续这项工程，并完成了它的建设。后来成为法王厅城堡、被叫做“圣天使堡”的这个陵园中，埋葬了公元137年去世的皇后萨宾娜，138年初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同年夏天去世的哈德良。后来，安敦尼的妻子芙斯汀娜也葬于此。20年后，安敦尼也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陵寝。

根据哈德良的意见，他还在台伯河上建了一座桥，可以直接通往“皇帝陵”。安敦尼给这座石桥取名为“埃里乌斯桥”（Pons Aelius），与陵墓一样，意思是“哈德良的桥”。埃里乌斯是哈德良的家族名字。

除了这座桥，完全是在安敦尼皇帝时代新建的建筑物还有一个，那就是祭祀神化的哈德良的神殿。这座神殿位于万神殿附近，现在被用做税务机关等办公的地方。这座神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只剩下位于神殿右侧的科林斯式圆柱，而且是11根圆柱与圆柱之间被水泥填埋。这座神殿建成于公元145年，即哈德良去世7年之后。朝东的入口前面有一个广场。



哈德良陵园和埃里乌斯桥（复原图，摘自Vittorio Galliazzo,“I Ponti Romani”）

如果说“神君哈德良神殿”（Templun divus Hadriani）和供奉其他诸神的神殿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装饰墙面的38个人物的浮雕，它们寓意着构成罗马帝国的38个行省。现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的美术馆中只保留下其中的16个。任何人看到这些浮雕都会联想到，帝制时代的行省已经与共和制时代的行省完全不同，后者是屈服于罗马的，而帝制时代的行省之间却是平等的。行省人民不再是被征服的民族，他们同征服者罗马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卡拉卡拉皇帝时代，也就是公元212年，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都得到了罗马公民权，此时距离哈德良神殿完工不过67年而已。

哈德良把其统治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视察帝国全域之上。所以，用寓意着各行省的浮雕来装饰他的神殿最合适不过了，甚至让我不能不猜想这是哈德良自己的主意。

除了这些，在安敦尼时期新建的公共建筑就没有了。就像马可·奥勒留说的那样，安敦尼非常满足于对已有建筑、大道、桥梁和引水渠等

进行修缮维护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虽然重要却显得缺乏创新精神。

经过了幸运又幸福的23年之后，时间到了公元161年。这年春天的某一天，皇帝在拉鲁芬的别墅里吃过晚饭后不久，突然呕吐不止，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这天夜里和第二天一整天，高烧不退。这年已经40岁的马可·奥勒留和29岁的路奇乌斯·维鲁斯这两位皇位继承人马上从首都罗马赶了过去。第3天，又叫来了近卫军团指挥官。再过半年就满75岁的安敦尼只说了一句话“国葬不要太隆重”，随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罗马人认为，年老去世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有死者亲人会哀悼死者。但是安敦尼虽然是寿终正寝，元老院议员和意大利本土公民及行省人民却像死了一个年轻人似的，为他深深悲伤。所有人都为“安敦尼·庇护”（慈悲的安敦尼）之死而感到惋惜。

“国父”

作为安敦尼·庇护皇帝这一章节的结束篇，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到在哈德良皇帝章节的最后部分介绍过的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这位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学者当时刚满25岁。在皇帝安敦尼和元老院议员面前，他作了这样的演讲：

> 罗马世界终于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民主统治。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曾经的希腊城邦国家扩大了规模后的国家。领导者阶层集中了公民中有才华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体人民的这些人才来自帝国各地。
>
> 他们有的生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由于他们杰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军事构成的完美组织机构——由于这些代表帝国的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罗马实现了对辽

阔帝国的统治。

战争只有边境地区才会发生，帝国内部的纷争早已结束。帝国内到处洋溢着和平、繁荣和幸福，甚至让人觉得生活在帝国之外的、在部族纷争中度日的人们看上去是如此的可怜。

罗马的门户向所有人开放。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罗马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勤奋工作。皇帝主持祭祀仪式，庆祝全帝国人民共同的节日。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也可以自由举行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祭祀活动。这一宽容的做法维护了每个人的尊严和正义。

尽管人种、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罗马通过制定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实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共存共荣。同时，罗马还保证人们享受更多的权利，让人们知道，与罗马共存共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有幸的事情。

罗马世界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就是罗马帝国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是公元143年所作的演讲，这里说的是安敦尼统治进入第5年的罗马帝国。因此，也许有人会说，用这样的演讲内容来总结安敦尼·庇护的统治并不合适。

的确如此。因为在这次演讲之后，安敦尼的统治又持续了18年。但是，与罗马的道路网从兴建到完成的经过相比，这个结尾“完全合适”。

无论是概念还是铺设工程的彻底性，罗马的道路网可以看做是古代的高速公路网。罗马道路网从公元前312年开始兴建，到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的公元130年前后完成，历时整整4个半世纪。罗马世界的形成与此相似。尤里乌斯·恺撒最先向行省人民开放元老院议席，把行省纳入命运共同体。继他之后的皇帝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在延续他的基本方针方面保持了政策的一贯性。

为了让被征服的民族认可（拉丁语叫consensus）罗马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必须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与罗马大道是一样的。虽然罗马大道是以方便军团行军为目的而铺设的，却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一个组织机构无论多么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不可避免地老化，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必须通过改革，维持并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本书讲述的几位皇帝中，图拉真通过征服达契亚成功地巩固了多瑙河防线。通过巡回视察帝国全境，并对帝国实施重建的哈德良是担负起“改革”重任的人。继他们之后的安敦尼，他的任务不是“改革”，而是“巩固”改革成果。

假如艾利斯泰迪斯所作的这次演讲不是在公元143年的罗马建国纪念日，而是在安敦尼去世前的公元160年4月21日，我想，出生于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说的话很可能一样。

希腊人的历史和罗马人的历史最明显的不同是，前者是城邦国家之间争斗的历史，后者虽然时有权力之争，却没有城市间或部族间的争斗。

在罗马帝国，无论热爱希腊文化的皇帝尼禄和图密善多么努力，终究没有能够把奥林匹亚式的竞技会引入罗马。因为罗马人不能接受希腊人的理念：为了四年一度的体育、文化及音乐比赛，希腊人甚至可以暂时休战，汇聚到奥林匹亚。罗马征服各地以后，在帝国的西方，部族变成了“地方自治体”；在帝国的东方，“城市”享有市内自治权。在罗马的统一管理之下，部族间的抗争和城市间的争斗已经成为过去。我不怕被人说固执，我还要一次次地重复这样的话：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保障安全和粮食。保障粮食的前提是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因此，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与哈德良不同，安敦尼在统治帝国期间一直留在首都罗马。但是，

他想要的统治，不，不只是想法，他要实行的统治，就是确保罗马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帝国境内的全体人民都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

“国父”是授予皇帝的尊称，哈德良曾经推辞了很久，终于在10年之后接受了。因为他认为“国父”的称号是对皇帝作出的成绩给予的表彰。相反，安敦尼几乎在登基之时就接受了“国父”的称号，表明了安敦尼对这一称号的理解就是其字面的意思“Pater Patriae”。

尽管都是罗马皇帝，但是图拉真和哈德良作为统治者是对帝国实施了统治，而安敦尼始终在扮演父亲的角色。马可·奥勒留皇帝描述的安敦尼难道不是一位理想的父亲形象吗？

大事年表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53		9 月 18 日，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在西班牙南部贝提卡行省的意大利卡出生。		
54	皇帝克劳狄乌斯去世，**尼禄即位**。			
55	历史学家塔西佗出生。			（日本）倭奴国向后汉朝贡，接受金印(57)。（中国）东汉第一代皇帝光武帝薨，明帝即位（57）。（中国）洛阳城西创建白马寺(67)。
61		不列颠人起义反对罗马，遭到罗马军队镇压。		
66			第一次犹太战争(～70)。	
68	尼禄自杀。**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相继登基皇位**。			
69	**第九代皇帝韦斯帕芗即位**，开启了弗拉维王朝。			
70			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	
75	图拉真以“穿红披肩的大队长”的身份，随同任命为行省总督的父亲赴叙利亚任职。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76		1月24日，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良在图拉真的出生地——西班牙的意大利卡出生。		
77	图拉真调任至驻扎于莱茵河防线的军团。			
79	韦斯帕芗去世，**长子提图斯即位**。维苏威火山喷发。			
81	提图斯去世。9月14日，**弟弟图密善登基**。图拉真当选财务检察官。			（中国）《汉书》完成。
83	图拉真进入元老院。			
86	按照监护人图拉真和阿提安的安排，10岁的哈德良来到罗马。9月19日，安敦尼（后来的安敦尼·庇护）在罗马南部的拉努维奥出生。	哈德良之父去世。		
87	图拉真当选法务官。	图密善攻打达契亚失败。		
88		图拉真被任命为驻扎西班牙的第七杰米那军团军团长。尤利安努斯根据图密善的命令，横渡多瑙河，向达契亚发起进攻，洗刷了前耻。但是没有乘胜攻打达契亚人的老巢。		
89		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萨腾尼努斯叛乱。皇帝命令在西班牙的图拉真前去镇压。萨腾尼努斯自尽，叛乱结束。		
90	因皇帝的推荐，图拉真当选公元91年度的执政官。	根据监护人的安排，哈德良回到出生地意大利卡。		（中国）班超出任西域都护(91)。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92		图拉真被任命为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并兼任当地行省总督。		（中国）《汉书》作者班固死于狱中。
93	哈德良被召回罗马，就任行政官职，负责审查公民权、继承权。			
94		哈德良被派到布达佩斯军团基地，担任“穿红披肩的大队长”。图密善与达契亚缔结和平条约。		（中国）班超出使西域，50多国归附汉朝。
96	9月18日，皇帝图密善遭暗杀，享年44岁。元老院推荐**涅尔瓦为第十二代皇帝**。元老院通过决议，对图密善处以“记录抹杀刑”惩罚。		哈德良调任至位于远米西亚行省的第五马其顿军团。	
97	10月27日，涅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继承人。			（中国）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
98	图拉真和涅尔瓦共同担任执政官。1月27日，皇帝涅尔瓦去世，享年71岁。塔西佗撰写《阿格里科拉传》。塔西佗开始撰写《日耳曼地方志》（～100）。	1月28日，哈德良前往科隆，给图拉真带去了涅尔瓦去世、**图拉真即位第十三代皇帝**的消息。图拉真继续在莱茵河前线逗留。冬季，图拉真前往多瑙河沿岸。		
99	夏末，图拉真以皇帝的身份，首次回到首都罗马。			
100	9月，小普林尼就任候补执政官。			
101	哈德良当选财务检察官。3月25日，图拉真离开罗马，攻打达契亚。	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爆发。		（柬埔寨）在湄公河下游建立扶南国。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02	哈德良被任命为《元老院纪事》负责人。哈德良与图拉真侄女的女儿萨宾娜结婚。冬季，图拉真回到罗马，举行了凯旋仪式。元老院授予图拉真“德基乌斯”的称号。	与达契亚和谈达成协议（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结束）。达契亚成为罗马事实上的行省。		
103		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大桥建成完工。		（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
105	6月4日，图拉真离开罗马，再次前往达契亚。	春季，达契亚撕毁和约，袭击罗马军宿营地。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爆发，哈德良作为驻守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军团长参战。		（印度）《摩奴法典》完成。
106	哈德良当选法务官。塔西佗开始撰写《同时代史》（～109）。图拉真凯旋回罗马。达契亚被纳入罗马行省之列。	春天，罗马军队再次渡过多瑙河，攻入达契亚境内。夏天，达契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沦陷。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自杀。达契亚居民被迫移居到北部边境（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结束）。	罗马吞并阿拉伯（今约旦），建立阿拉伯·纳巴泰行省。	
107	年初，为图拉真举行凯旋仪式。哈德良被任命为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图拉真的心腹苏拉去世。			（日本）倭国国王帅升等向东汉献生口。
108	哈德良当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			
110			帕提亚国王帕科鲁去世。围绕亚美尼亚王国的王位，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矛盾激化。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11	安敦尼当选财务检察官。		图拉真把比提尼亚行省从元老院行省变成皇帝行省。秋季，小普林尼作为行省总督前往比提尼亚任职（～113年春），与图拉真互通书信。	
112	元旦，图拉真广场竣工。		雅典市授予哈德良“雅典执政官”的称号。	
113	5月，描绘达契亚战争的图拉真记功柱对外开放。图拉真利用亚美尼亚和帕提亚之间的矛盾，决定远征帕提亚，10月27日离开罗马。		哈德良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与远征帕提亚的图拉真同行。	
114	夏天，元老院授予图拉真“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		春天，图拉真离开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向帕提亚进军。罗马军队与帕提亚交锋，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成为罗马行省。	
115	塔西佗开始执笔《编年史》（～117）。元老院一致通过授予图拉真“帕提亚库斯”的尊称。		从春季到秋季，罗马军队到达底格里斯河。犹太一带发生叛乱。叛乱波及埃及、昔兰尼加、塞浦路斯。	
116	安敦尼进入元老院，并当选法务官。		冬天，罗马军队冬营地所在地安条克发生大地震，图拉真受轻伤。罗马军队占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帕提亚国王奥斯罗埃斯逃离沦陷的首都。罗马实现了最大的帝国版图。年末，到达波斯湾的图拉真为过冬回到安条克，美索不达米亚发生叛乱。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17	图拉真的骨灰送回罗马。为他的骨灰举行了凯旋仪式。	不列颠发生布里甘特人起义，驻扎于此的罗马军团被歼。	图拉真病倒。7月底，把身后事托付给哈德良后，离开安条克，踏上了回罗马的旅途。8月9日，哈德良获悉自己被图拉真收为养子的消息。同日，皇帝在西里西亚的塞留斯去世，享年63岁。**哈德良即位第十四代皇帝**。8月11日，东方军团的将士们向哈德良宣誓忠诚。11月，哈德良率领军团离开东方战线。	
118	哈德良的监护人、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命令近卫军团兵杀死四位前执政官。7月，哈德良回到罗马。哈德良宣布滞纳税金一笔勾销。			
120	安敦尼当选执政官。			
121	哈德良离开罗马前往高卢。开始第一次巡回视察之旅。	4月26日，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后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出生。哈德良从里昂途经日耳曼长城，视察莱茵河防线。		
122	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去世。	哈德良从莱茵河河口来到不列颠，下令建设哈德良长城；从夏季到秋季，横渡多佛尔海峡，进入高卢，建设阿维尼翁城。接到普洛蒂娜的死讯后，在其出生地尼姆为她建造神殿。冬天到达西班牙，在塔拉戈纳过冬。	埃及发生暴乱。哈德良命令埃及行省长官镇压叛乱。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23	在罗马近郊蒂沃利动工兴建“哈德良别墅”。	春天，接到帕提亚局势不稳的消息后，哈德良变更计划，向叙利亚出发。	解决了与帕提亚之间的危机后，哈德良视察了小亚细亚。第二年，哈德良从小亚细亚前往色雷斯，视察多瑙河防线，直到维也纳。	
124			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哈德良在雅典逗留。建造宙斯神殿。	
125	春天，哈德良离开希腊，访问西西里后，夏末回到罗马。			
126	春天，哈德良前往非洲，开始第二次巡回视察之旅。夏天，结束对非洲的视察后，哈德良回到罗马。哈德良命令法学家涅拉修·普利斯库斯等三人开始编纂罗马法令的集大成。			
128	夏天，哈德良出发，开始第三次巡回视察之旅（视察东方）。		哈德良到达雅典。	
129			哈德良离开雅典，视察小亚细亚、叙利亚。在安条克过冬。	
130	12月15日，路奇乌斯·凯奥尼乌斯·维鲁斯（后来的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在罗马出生。		哈德良视察犹太。在耶路撒冷近郊建城市“埃利亚卡匹托尔”，禁止犹太教徒行割礼。视察犹太之后，前往埃及。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31	按哈德良的要求编纂的《罗马法大全》完成。		在埃及游览尼罗河途中，深受哈德良宠爱的美少年安提诺乌斯溺水身亡。哈德良离开埃及，经过安条克、土耳其，前往雅典。秋天，犹太教徒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在巴尔·科赫巴和拉比·阿基巴的领导下，发动叛乱。	
132			年初，科赫巴占领耶路撒冷。哈德良从雅典前往安条克。罗马军队反攻开始。	（中国）东汉的张衡发明浑天仪和地震仪。
134	春天，哈德良返回罗马。		年初，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结束了犹太教徒叛乱。哈德良把参加叛乱的犹太教徒逐出耶路撒冷，犹太行省改名为“巴勒斯坦”。	
135			安敦尼就任亚细亚行省总督（～136）。	
136	哈德良以暗杀皇帝的罪名，处死姐夫塞尔维亚努斯及其孙子。哈德良收埃里乌斯·恺撒为养子，并指定其为皇位继承人。		9月26日，参加叛乱的犹太教徒固守的最后堡垒佩特拉沦陷。	
137	埃里乌斯·恺撒当选执政官，被派往潘诺尼亚前线。哈德良的妻子萨宾娜去世。为参加第二天在元老院举行的会议而回到罗马的埃里乌斯·恺撒于除夕之夜吐血身亡。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38	1 月 24 日，哈德良生日那天把安敦尼叫到别墅，表示要收他为养子。2 月，安敦尼答应做哈德良的养子，并按哈德良的要求，收马可·奥勒留和路奇乌斯·维鲁斯为养子。哈德良把马可·奥勒留的教育托付给弗龙托。7 月 10 日，皇帝哈德良在海湾的别墅去世，享年 62 岁。**安敦尼即位第十五代皇帝。**围绕神化哈德良的问题，安敦尼和元老院意见相左。为哈德良辩护的安敦尼被叫做“安敦尼·庇护”（慈悲的安敦尼）。			
139	哈德良陵园建成完工。	不列颠土著叛乱。		
140	安敦尼·庇护的妻子芙斯汀娜去世。			
142		不列颠叛乱被镇压。安敦尼·庇护在哈德良长城以北建设安敦尼长城。		
143	安敦尼·庇护把路奇乌斯·维鲁斯的教育托付给弗龙托。			（印度）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一世即位。
145	“神君哈德良神殿”完工。			
161	3 月 7 日，皇帝安敦尼·庇护在罗马近郊的拉鲁芬别墅去世，享年 75 岁。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为方便读者查阅，也将翻译的著作列入）

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约125—约180年）

Metamorfosi/Asinus aureus，Della Magia，Apologia

阿里安（Flavius Arrianus，约95—175年）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Historia India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及印度志》，大牟田章译注，东海大学古典丛书，1966年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　附印度志》（上、下），大牟田章译，岩波文库，2001年

阿里斯德岱斯（Publius Aelius Aristides Theodorus，117—约185年）

Panēgyrikos eis Rhōmēn

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年）

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

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vetonius Tranquillus，约69—122年后）

《十二皇帝传》，De viris illustribus，《罗马皇帝传》（上、下），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1986年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6—约120年）

《编年史》，《同时代史》，《日耳曼地方志》，《阿格里科拉传》，Dialogus de oratoribus

《编年史》（上、下），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1981年

《同时代史》，国原吉之助译，筑摩书房，1996年

《日耳曼 阿格里科拉》，国原吉之助译，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保萨尼亚斯（Pausanius，143—176年）

Descriptio Graeciae

《希腊游指南》（上、下），马场惠二译，岩波文库，1991—1992年

斐洛（Philon Judaeus，公元前30年前后——公元45年）

De vita contemplaiva

大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年）

《博物志》

《普林尼博物志》，大槻真一郎编，八坂书房，1994年

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61、62—约113年）

《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

《颂词》，《普林尼书信集》，国原吉之助译，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

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50—120年后）

《英雄传》

《普鲁塔克英雄传》（共12卷），河野与一译，岩波文库，1952—1956年

《普鲁塔克英雄传》（上、中、下），村川坚太郎编，筑摩学艺文库，1966年

弗龙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约100—约166年）

Epistulae

马提亚尔（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38～41—约103年）

Epigrammata，Liber spectaculorum，Xenia

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约50—约130年）

Saturae

约瑟夫斯（Josephus Flavius，37、38—100年）

Bellun Judaicum，Antiquitates Judaicae，Contra Apionem，Vita

《犹太战记》（1、2），新见宏译，山本书店，1975—1981年

《犹太战记》（3），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82年

《犹太古代志》（共11卷），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9—1984年

《反阿皮翁》，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7年

《自传》，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78年

二、后世撰写的历史书、研究书专著

ABRAMSON, E., *Roman Legionaries at the Time of Julius Caesar*, London, 1979.

ALBERTARIO, E., *Introduzione storica allo studio del Diritto Romano Giustinianeo*, Milano, 1935.

ALEXANDER, W.H., *The "Psychology" of Tacitus*, 《Classical Journal》 47, 1952.

ALFIERI, N., *I fasti consulares di Potentia*, 《Athenaeum》 26, 1948.

ALFÖLDI, A., *The Moral Barrier on Rhine and Danub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AMATUCCI, A.G., *La letteratura di Roma imperiale*, 《Storia di Roma》 25, Bologna, 1947.

ARANGIO RUIZ, V., *Pubblicazion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per la ricerca dei papiri Greci e Latini in Egitto*, Firenze, 1933.

ARIAS, P.E., *Domiziano. Saggio storico con traduzione e commento della "Vita" di Svetonio*, Catania, 1945.

ARNOLD, E.V., *Roman Stoicism*, Cambridge, 1911.

AUDOLLENT, A., *Carthage romaine*, Paris, 1901.

BAATZ, D., *Der römische Limes. Archäologische Ausflüge zwischen Rhein und Donau*, Berlin, 1975; *Die Wachttürme am Limes*, Stuttgart, 1976.

BADIAN, E.,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Pretoria, 1967.

BALLIF, Ph. & PATSCH, C., *Die römischen Strassen in Bosnien und der Herzegowina*, Wien, 1893.

BARADEZ, J.L., *Fossatum Africae*, Paris, 1949; *Organisation militaire romaine de l'Algérie antique et l'evolution du concept défensif de ses frontièr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ilitaire》 13, 1953; *L'Enceinte de Tipasa: Base d'opérations des troupes venues de Pannonie sous Antonin Le Pieux*,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BARCLAY, J.M.G., *Jews in the Mediterranean Diaspora: From Alexander to Traj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BARKER, P., *The Army and Enemies of Imperial Rome*, London, 1972.

BAVIERA, G., *Le due scuole dei giureconsulti romani*, 〈Scritti giuridici〉, Palermo, 1909.

BEGUIN, P., *Psychology et verité historique, Réflexions sur un récent ouvrage de critique tacitéenne*, 〈Antiquité Classique〉 23, 1954.

BELL, H.I., *Jews and Christians in Egypt*, London, 1924.

BENNETT, J., *Trajan, Optimus Prince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BESNIER, M., *L'île Tibérine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01.

BETTI, E., *Diritto Romano*, Padova, 1935.

BIANCHI BANDINELLI, R., *Roma, L'arte romana nel centro del potere*, Milano, 1969.

BIONDI, B., *Il diritto romano*, 〈Storia di Roma〉 20, Bologna, 1957.

BIRLEY, A.R., *Hadrian's Wall: An Illustrated Guide*, Ministry of Public Building and Works, London, 1963; *Hadrian: The Restless Emperor*, Routledge, 1998.

BIRLEY, E.B.,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RBRA)〉 pp. 31-47; *Britain after Agricola and the End of the Ninth Legion*, 〈RBRA〉 pp. 25-28; *Britain under the Flavians: Agricola and His Predecessors*, 〈RBRA〉 pp. 10-19; *Hadrianic Frontier Policy*, 〈Carnuntina〉 pp. 26-33;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pp. 54-67; *Hadrian's Wall and Its Neighbourhood*,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6-14.

BLAKE, M.E., *Ancient Roman Construction in Italy: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o Augustus*, Washington, 1947; *from Tiberius through the Flavians*, Washington, 1959; *from Nerva through the Antonines*, Philadelphia, 1973.

BLOCH, H., *I bolli laterizi e la storia edilizia romana*, Roma, 1947.

BOATWRIGHT, M.T., *Hadrian and C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OESWILLWALD, E., CAGNAT, R. & BALLU, A., *Timgad, une cité africain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892-1905.

BOETHIUS, A. & WARD PERKINS, J.B., *Etruscan and Roman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70.

BONFANTE, P.,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23.

BOWERSOCK, G.W., *A Report on Arabia Provinc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1, 1971; *Limes Arabicu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80, 1976.

BRAND, C.E., *Roman Military Laws*, London, 1968.

BREEZE, D.J. & DOBSON, B., *Hadrian's Wall*, London, 1980.

BRIZZI, G., *I sistemi informativi dei Romani*, Wiesbaden, 1982; *Studi militari romani*, Bologna, 1983; *Annibale, strategia e immagine*, Perugia, 1984.

BROGAN, O., *The Roman Limes in Germany*, 《Archaelogical Journal》 92, 1935.

BRUCE, J.C., *Handbook to the Roman Wall*, Newcastle, 1966.

BRUÈRE, R.T., *Tacitus and Pliny's Panegyricus*, 《Classical Philology》 49, 1954.

BURN, A.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the Antonines*, London, 1952.

CAGNAT, R., MERLIN, A. & CHATELAIN, L., *Inscriptions Latines d'Afrique*, Paris, 1923.

CAGNAT, R. & GAUCKLER, P., *L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de la Tunisie*, Paris, 1898.

CAMPBELL, J.B.,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Oxford, 1984.

CARY, M.,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49.

CASSON, 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CASTAGNOLI, F., CECCHELLI, C., GIOVANNONI, G. & ZOCCA, M., *Topografia e urbanistica di Roma*, 《Storia di Roma》 22, Roma, 1958.

CASTAGNOLI, F., *Topografia e urbanistica di Roma antica*, Bologna, 1969.

CHAPOT, V., *La frontière de l'Euphrate de Pompée à la conquête arabe*, Paris, 1907;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28.

CHARLESWORTH, M.P., *Trade Routes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CHATELAIN, L., *Inscriptions Latines du Maroc*, Paris, 1942.

CHEESMAN, G.L.,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1914.

CLARKE, M.L., *The Roman Mi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from Cic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56.

CLAUSETTI, E., *L'ingegneria militare dei Romani*, Roma, 1942.

COARELLI, F., *Roma (I grandi monumenti)*, Verona, 1971.

COCHRANE, C.N.,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

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 Oxford, 1940.

COLLINGWOOD, R.G., *Roman Britain*, Oxford, 1934.

CONDE de AQUIAR, *Italica*, Barcelona, 1929.

CONNOLLY, P., *The Roman Army*, London, 1975; *Greece and Rome at War*, London, 1981.

COOK, S.A., ADCOCK, F.E. & CHARLESWORTH, M.P.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 The Augustan Empire, 44 B.C.-A.D. 70*, Cambridge, 1952; *vol. XI: The Imperia Peace, A.D. 70-192*, Cambridge, 1956.

CORBIER, M., *L'aerarium Saturni et l'aerarium militare*, Paris, 1975.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Berlin, 1891-1916.

COSTA, E., *Crimine e pene*, Bologna, 1921.

CREMA, L., *L'architettura romana*, Torino, 1959.

CROOK, J., *Consilium Principis. Imperial Councils and Counsellors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Cambridge, 1955.

DAVIES, O., *Roman Mines in Europe*, Oxford, 1935.

DAVIES, R.W.,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1.

DECEI, A., *Le pont de Trajan à Turnu-Severin*, 《Anuarul inst. stud. clas.》 1, 1932.

DEGRASSI, A., *I fasti consolari dell'impero romano, 30 B.C.-A.D. 613*, Roma, 1952; *L'amministrazione delle città*, 《Guida allo studio della civiltà romana antica》, Napoli, 1959.

DELBRÜCK, H.,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 Westport-London, 1975.

DE MARTINO, F.,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Bari, 1980.

DESSAU, H.,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vol. I-III*, Berlin, 1954-55.

DEVIJVER, H., *Prosopographia militiarum equestrium*, Louvain, 1976-87.

DIESNER, H.J., *Kriege des Altertums*, Berlin, 1971.

DILL, S.,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05.

DIVINE, A.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Rome. A Military Study of Hadrian's Wall*, London, 1969.

DONNADIEU, A., *La Pompéi de la Provence: Fréjus*, Paris, 1927; *Fréjus: le port militaire de Forum Iulii*, Paris, 1935.

DRINKWATER, J.F., *Roman Gaul*, London, 1983.

DURRY, M., *Les cohortes prétoriennes*, Paris, 1968.

ESPÉRANDIEU, E., *Inscriptions Latines de la Gaule I, II*, Paris, 1928-29.

FENTRESS, E.W.B., *Numidia and the Roman Army*, Oxford, 1979.

FERRI, S., *Arte romana sul Reno*, Milano, 1931; *Arte romana sul Danubio*, Milano, 1933.

FINK, R.O., *Roman Military Records on Papyrus*, Princeton, 1971.

FORBES, R.J.,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I-VI*, Leiden, 1955-58.

FORNI, G.,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Milano-Roma, 1953;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Athenaeum》 36, 1958-59; *Limes*, Roma, 1959; *Sull'ordinamento e impiego della flotta di Ravenna*, 《Atti Conv. Int. Studi Antichità di Classe》, Faenza, 1968; *Esperienze militari nel mondo romano*, 《Nuove questioni di storia antica》, Milano, 1968; *Esercito e marina di Roma antica*, Amsterdam, 1987;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1.

FRANK, T. (ed.),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I, Egypt* (JOHNSON), Baltimore 1936; *III, Britain* (COLLINGWOOD), *Spain* (VAN NOSTRAND), *Sicily* (SCRAMUZZA), *Gaule* (GRENIER), Baltimore 1937; *IV, Africa* (HAYWOOD), *Syria* (HEICHELHEIM), *Greece* (LARSEN), *Asia Minor* (BROUGHTON), Baltimore 1938; *V, 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 (FRANK, T.), Baltimore 1940; *VI, General Index* (BROUGHTON & TAYLOR), Baltimore 1940.

FREIS, H., *Die cohortes urbanae*, 《Epigraphische Studien》, Bonn, 1967.

FRERE, S.S.,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67.

FROVA, A., *The Danubian Limes in Bulgaria and Excavations at Oescus*,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GABBA, E., *Sulla storia romana di Cassio Dione*, 《Riv. Stor. Ital.》 67, 1955; *Storici greci dell'impero romano da Augusto ai Severi*, 《Riv. Stor. Ital.》 71, 1959; *Per la storia dell'esercito romano in età imperiale*, Bologna, 1974; *Tecnologia militare antica*, 《Tecnologia, economia e società nel mondo romano》, Como, 1980.

GARBSCH, J.G., *Der Spätrömische Donau-Iller Rhein Limes*, Stuttgart, 1970.

GARZETTI. A.,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Storia di Roma》 6,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Bologna, 1960; *Problemi dell'età traianea: Sommario e testi*, Genova, 1971.

GATTI, C., *Riflessioni sull'istituzione dello stipendium per i legionari romani*, 《Acme》 23, 1970.

GATTI, G., *Il viadotto della via Aurelia*, 《Bullettino Comunale》 68, 1940.

GEIGER, F., *Philon von Alexandreia als sozialer Denker*, Stuttgart, 1932.

GIARDINI, A., *Società romana e produzione schiavistica*, Bari, 1981.

GIUFFRÉ, V., *La letteratura "De re militari,"* Napoli, 1979; *Il diritto militare dei Romani*, Bologna, 1980.

GIUFFRIDA IENTILE, M., *La pirateria tirrenica, Momenti e fortuna*, Roma, 1983.

GONELLA, G., *Pace romana e pace cartaginese*,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1947.

GOODENOUGH, E.R., *The Politics of Philo Iudaeus. Practice and Theory, with a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Philo*, New Haven, 1938.

GRANT, M., *Roman Coins as Propaganda*, 《Archaeology》 5, 1952; *Roman Imperial Money*, Edinburgh, 1954.

GRAY, W.D., *A Political Ideal of the Emperor Hadria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14.

GRENIER, A., *Manuel d'archéologie gallo-romaine*, Paris, 1934.

GRILLI, A., *Il problema della vita contemplativa nel mondo greco-romano*, Milano, 1953.

GSELL, S., *Les monuments antiques de l'Algérie*, Paris, 1901; *Inscriptions Latines d'Algerie I*, Paris, 1932.

GUEY, J.,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de Trajan*, Bucarest, 1937.

HAMMOND, H., *Pliny the Younger's Views on Government*,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49, 1938.

HARMAND, L.,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B.C.-A.D. 235)*, Paris, 1960.

HATT, J.J., *Histoire de la Gaule romaine*, Paris, 1959.

HEITLAND, W.E., *Agricola: A Study of Agriculture and Rustic Life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abour*, Cambridge, 1921.

HIGHET, G., *Juvenal the Satirist*, Oxford, 1954.

HOFFILLER, V. & SARIA, B., *Antike Inschriften aus Jugoslavien I, Noricum und Pannonia Superior*, Zagreb, 1938.

HOHL, E., *Die Historia Augusta und die Caesares des Aurelius Victor*, 《Historia》 4, 1955.

HOPKINS, K., *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1978.

HUMBLE, R.,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80.

ILARI, V., *Gli Italici nelle strutture militari romane*, Milano, 1974; *L'interpretazione storica del diritto di guerra romano fra tradizione romanistica e giusnaturalismo*, Milano, 1981.

Inscriptiones Graecae vol. I-XIV, Berlin, from 1873.

Inscriptiones Italiae, l'Unione Accademica Nazionale (ed.), Roma, from 1931.

JALABERT, L., MOUTERDE, R. & MONDÉSERT, C.,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I-V*, Beyrouth, 1929-59.

JARRETT, M.G. & MANN, J.C.,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Bonner Jahrbücher》 170, 1970.

JENS, W., *Libertas bei Tacitus*, 《Hermes》 84, 1956.

JOHNSON, R., *Roman Forts of the 1st and 2nd Centuries in Britain and the German Provinces*, London, 1983.

JORDAN, H. & HÜLSEN, Ch., *Topographie der Stadt Rom im Alterthum I, 1-3*; *II*, Berlin, 1878-1907.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vol. V, VI*, Paris, 1920.

KALINKA, E. & HEBERDEY, R., *Tituli Asiae Minoris*, Vienna, 1944.

KENNEDY, D.L.,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on the Roman Frontier in North-East Jordan*, Oxford, 1982.

KEPPIE, L.J.F.,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London, 1984.

KROMAYER, J. & VEITH, G., *Antike Schlachtfelder*, Berlin, 1903-12; *Heerwesen und Kriegsführung*, München, 1928.

LACEY, R.H., *The Equestrian Officials of Trajan and Hadrian*, Princeton, 1917.

LANCIANI, R., *Storia degli scavi di Roma I-VI*, Roma, 1902-04; *L'antica Roma*, Roma, 1970; *La distruzione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71.

LANDER, J.L., *Roman Stone Fortifications*, Los Angeles, 1984.

LAUR-BELART, R.,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LAZZATI, G., *Apologia di Aristide*, Venegono, 1938.

LEPPER, F.A., *Trajan's Parthian War*, Oxford, 1948.

LEVI, A., *Storia della filosofia romana*, Firenze, 1949.

LEVI, M.A., *La Politica estera di Roma antica*,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Milano, 1942; *Aspetti sociali della poesia di Giovenale*, 《Studi Funaioli》, Roma, 1955.

LIBERATI, A. & SILVERIO, F., *Organizzazione militare: esercito, vita e costumi dei romani antichi 5*, Roma, 1988.

LUGLI, G., *Roma antica, Il centro monumentale*, Roma, 1946; *Il Vaticano nell'età classica*, Firenze, 1946; *Fontes ad Topographiam veteris urbis Romae pertinentes*, Roma, 1952-69; *La tecnica edilizia romana*, Roma, 1957; *Itinerario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70.

LUTTWAK, E.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London, 1979.

MacDONALD, W.,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1965.

MacMULLEN, R.,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 Newcastle 1949. *Th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Durham, 1952; 2. Carnuntum 1955. *Carnuntina. Ergebnisse der Forschung über die Grenzprovinzen des römischen Reiches*, Gratz, 1956; 3. Rheinfelden 1957. *Limes-Studien. Vorträge des 3.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es in Rheinfelden*, Basel, 1959; 4. Nitra 1957. *Limes Romanus-Konferenz*, Bratislava, 1959; 5. Zagreb 1961. *V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Zagreb, 1963; 6. Stuttgart 1964.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Vorträge des 6.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es in Süddeutschland*, Köln-Gratz, 1967; 7. Tel Aviv 1967.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67: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Frontier Studies*, Tel Aviv, 1971; 8. Cardiff 1969.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69. Eigh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mesforschung*, Cardiff, 1974; 9. Mamaia 1972. *Actes du IX congrés international d'études sur les frontières romaines*, Bukarest, 1974; 10. Bonn 1974.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II: Vorträge des 10.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es in der Germania Inferior*, Bonn, 1977; 11. Budapest 1976. *Limes. Akten des XI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es*, Budapest, 1977; 12. Oxford 1979.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Oxford, 1980; 13. Aalen 1983.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III. 13 internationalen Limeskongress*, Stuttgart, 1986.

MAGIE, D.,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Princeton, 1950.

MANN, J.C.,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Legionary Recruitment*

and Veteran Settlement, London, 1982;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Zone in Army Recruitment*,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MANNA, M.G., *Le formazioni ausiliarie di guarnigione nella provincia di Numidia da Augusto a Gallieno*, Roma, 1970.

MANNI, E., *Recenti studi sulla Historia Augusta*, 《Par. Pass.》 8, 1953.

MARCHESI, C., *Della Magia*, Bologna, 1955.

MARCHETTI, M., *Le provincie romane della Spagna*, Roma, 1917.

MARENGHI, G., *Caratteri e intenti del Periplo di Arriano*, 《Athenaeum》 35, 1957; *Sulle fonti del Periplo di Arriano*, 《St. Ital. Fil. Class.》 29, 1957; *Periplus maris Euxini*, 《Collana di studi greci diretta da V. De Falco》 29, Napoli, 1958.

MARQUARDT, J.,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chez les Romains*, Paris, 1891.

MARIN & PEÑA, M., *Instituciones militares romanas*, Madrid, 1956.

MARSDEN, E.W.,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Oxford, 1971.

MATTINGLY, H., *Coin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I (Augustus to Vitellius)*, London, 1923; *II (Vespasian to Domitian)*, 1930; *III (Nerva to Hadrian)*, 1936; *IV (Antoninus Pius to Commodus)*, 1940.

MERLIN, A., *Inscriptions Latines de la Tunisie*, Paris, 1944.

MIDDLETON, P., *The Roman Army and Long-Distance Trade*,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1983.

MIHAILOV, G., *Inscriptiones Graecae in Bulgaria repertae I, II*, Sofia, 1956-58.

MOMIGLIANO, A., *An Unsolved Problem of Historical Forgery.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Journ. Court. & Warb. Inst.》 17, 1954.

MOMMSEN, T., *Digesta. Corpus Iuris Civilis* (ed.), Berlin, 1902; *Le provincie romane da Cesare a Diocleziano*, Torino-Roma.

NASH, E., *Pictori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968.

NESSELHAUF, H., *Tacitus und Domitian*, 《Hermes》 80, 1952.

OLIVER, J.H., *The Ruling Power. A Stud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Second Century after Christ through the Roman Oration of Aelius Aristides*, Philadelphia, 1953.

ORGEVAL, B.d', *L'empereur Hadrien: Oeuvre législative et administrative*, Paris, 1950.

OSGOOD, R.E. & TUCKER, R.W.,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ACKER, J.E., *The Forum of Trajan in Roma: A Study of the Monum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ARETI, L., *Storia di Roma e del mondo romano*, Torino, 1960.

PARIBENI, R., *L'Italia imperiale da Ottaviano a Teodosio*, Milano, 1938; *Optimus Princeps*, Messina, 1969.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Chicago, 1980.

PARKER, S.Th., *Romans and Saracens. A History of the Arabian Frontier*, Winona Lake, 1986.

PASSERINI, A., *Legio*, 《Dizionario Epigrafico》 4, Roma, 1949; *Le forze armate*, 《Guida allo studio della civiltà romana antica》, Roma, 1959; *Le coorti pretorie*, Roma, 1969.

PELLATI, Fr., *I monumenti del Portogallo romano*, 《Historia》 5, 1931.

PEPE, L., *Marziale*, Napoli, 1950.

PETERSEN, H.E., *Governorship and Military Command in the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1953.

PHILLIPS, E.D., *Three Greek Writers on the Roman Empire, Aristides, Crisostomus, Plutarcos*, 《Class. & Med.》 18, 1957.

PICHLER, F., *Austria romana*, Wien, 1902-04.

PIGHI, G.B., *Lettere latine d'un soldato di Traiano*, Bologna, 1964.

PIPPIDI, D.M., *Periplus maris Euxini*, 《Athenaeum》 36, 1958.

PLATNER, S.B. & ASHBY, Th.,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29.

POIDEBARD, A., *La trace de Rome dans le désert de Syrie*, Paris, 1934.

RAMSAY, A.M., *The Speed of the Roman Imperial Post*,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5, 1925.

RECHNITZ, W., *Studien zu Salvius Iulianus*, Weimar, 1925.

REDDÉ, M., *Mare nostrum*, Paris-Roma, 1986.

RÉMONDON, R., *Palmyra under the Aegis of Rom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3, 1963.

REYNOLDS, P.K.B., *The Vigiles of the Ancient Rome*, Oxford, 1926.

RICCOBONO, S., *Corso di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33-35.

RICHARDS, G.C., *The Composition of Josephus' Antiquities*, 《Classical Quartery》

33, 1939.

RICKMAN, G., *Roman Granaries and Store Buildings*, Cambridge, 1971.

ROBERTSON, A.S., *The Antonine Wal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ROMANELLI, P., *Leptis Magna*, Roma, 1925; *La vita agricola tripolitana attraverso le rappresentazioni figurate*, 《Afr. Ital.》 3, 1930; *Stor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dell'Africa*, Roma, 1959.

ROSSI, L.,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London, 1971.

ROSTAGNI, 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II: L'impero*, Torino, 1952.

ROSTOVTZEFF, M., *La vie économique des Balkans dans l'antiquité*, 《Rev. internat. des ét. balc.》, 1935.

ROSTOVZEV,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impero romano*, Firenze, 1933.

ROWELL, H.T., *The Honesta Missio from the Numeri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Yale Classical Studies》 6, 1939.

ROXAN, M., *Roman Military Diplomas*, London, 1985.

SALWAY, P., *The Frontier People of Roman Britain*, Cambridge, 1965.

SCAZZOSO, P., *Plutarco interprete barocco della romanità*, 《Paideia》 12, 1957.

SCHÖNBERGER, H.,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969.

SCHWARTZ, J., *Note sur la famille de Philon d'Alexandrie*, 《Ann. Inst. Phil. Hist. Or.》 13, 1953.

SCIVOLETTO, N., *Plinio il Giovane e Giovenale*, 《Giorn. It. Fil.》 10, 1957.

SEABY, H.A., *Roman Silver Coins II, I-2: Tiberius to Domitian. Nerva to Commodus*, London, 1955.

SERAFINI, A., *Studio sulle Satire di Giovenale*, Firenze, 1947.

SHERWIN-WHITE, A.N., *The Letters of Pliny: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mmentary*, Oxford, 1966;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1973.

SIRAGO, V.A., *La proprietà di Plinio il Giovane*, 《Antiquité Classique》 26, 1957; *Funzione politica della flotta misenate*, Puteoli, 1983.

SPEIDEL, M.P., *Exploratores. Mobile Elite Units of Roman German*, 《Epigraphische Studien》 13, Köln-Bonn, 1983.

STARK, F., *Rome on the Euphrates, the Story of a Frontier*, New York, 1968.

STARR, Ch.G. Jr., *Civilization and the Caesars.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thaca, 1954; *Aurelius Victor, Historian of Empire*, 《Amer. Hist. Rev.》 61, 1955-56;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Cambridge, 1960.

STRAUB, J., *Studien zur Historia Augusta*, Bern, 1952.

STRONG, E., *Art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30.

SUTHERLAND, C.H.V., *Coinage in Roman Imperial Policy, 31 B.C.-A.D. 68*, London, 1951.

SWOBODA, E., *Traian und der Pannonische Lim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SYME, R., *Some Friends of the Caesar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7, 1956; *Tacitus I, II*, Oxford, 1958.

TCHERIKOVER, V., *The Jews in Egypt in the Hellenistic-Roman Age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 Jerusalem, 1945.

TERZAGHI, N.,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da Tiberio a Giustiniano*, Milano, 1934.

TOYNBEE, J., *The Hadrianic School*, Cambridge, 1934; *Roman Medallions, their Scope and Purpose*, 《Num. Chron.》, 1944.

TOZER, H.F., *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Cambridge, 1935.

TRACY, S., *Philo Iudaeus and the Roman Principate*, Williamsport (U.S.A.), 1933.

TRAUB, H.W., *Pliny's Treatment of History in Epistolary Form*,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6, 1955.

VALENTINI, R. & ZUCCHETTI, G., *Codice topografico della città di Roma I-IV*, Roma, 1940-53.

VAN BERCHEM, D., *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6, 1955.

VENDRAND-VOYER, J., *Normes civiques et métier militaire à Rome sous le Principat*, Clermont-Ferrand, 1983.

VIDMAN, L., *Fasti Ostienses*, Praha, 1957.

VIELMETTI, C., *I discorsi bitinici di Dione Crisostomo*, 《St. It. Fil. Class.》 18, 1941.

VIERECK, H.D.L., *Die römische Flotte. Classis Romana*, Herford, 1975.

VITUCCI, G., *Ricerche sulla praefectura urbi in età imperiale (sec. I-III)*, Roma, 1956.

VON FRITZ, K., *Tacitus, Agricola, Domitia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rincipate*, 《Classical Philology》 52, 1957.

WAGNER, W., *Die Dislokation der römischen Auxiliarformationen in den Provinzen Noricum, Pannonien, Moesien und Dakien von Augustus bis Gallienus*, Berlin, 1938.

WARD PERKINS, J.B. & REYNOLDS, J.M., *The Inscriptions of Roman Tripolitania*, Roma, 1952.

WARRY, J.,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 1980.

WATSON, G.R.,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8, 1959; *The Roman Soldier*, New York, 1981.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London, 1974.

WESTERMANN, W.L., *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Mem. Amer. Philos. Soc.》 40, Philadelphia, 1955.

WEST, L.C., *Imperial Roman Spain: The objects of trade*, Oxford, 1929.

WETHERED, N.H., *The Mind of the Ancient World. A Consideration of Pliny's Natural History*, London, 1937.

WHEELER, R.E.M., *The Roman Frontier in Mesopotamia*, 《Congress of Roman Studies》, 1940.

WHITE, 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s after Two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66.

WHITTAKER, C.R., *Trade and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1983.

WICKERT, L., *Die Flotte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Würzburger Jahrbücher f. die Altertumswiss.》, 1949-50.

WILKES, J.J., *Dalmatia: Histor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69.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

条条大路通罗马

[日] 盐野七生◎著　韦平和◎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罗马是庞大帝国的心脏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将资源源源不绝地送至帝国的各个角落
把罗马人引以为傲的公共建设推广至西方文明

大道、桥梁、水道，打通帝国血脉，
滋养每一寸土地

医疗、教育、邮政制度，
给予人民最舒适健康的环境

10

王石 王巍 | 作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日）盐野七生著；韦平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86–3725–9
I. ① 罗… II. ① 盐… ② 韦… III. ① 古罗马－历史　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322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 Subete No Michi Wa Roma Ni Tsuzu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1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韦平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0

——条条大路通罗马

[日] 盐野七生 著
韦平和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铜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序
第一章 硬件基础设施
第二章 软件基础设施
结语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罗马与希腊、迦太基及其他古国的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罗马的金、银、铜币全部发挥基本货币的作用，同时兼具宣传的功能。具体来说，货币的一面雕刻当事人的侧面像，另一面则雕刻此人的丰功伟绩，而且硬币的四周环绕相关的文字。因此，其他古国往往几百年都是同样的货币图案，而罗马即使同一个皇帝，也会铸造多种不同图案的货币。光把货币排列起来，就可以写出一部罗马历史，而无论是雅典，还是迦太基、马其顿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在既没有报纸、电视，也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让普通老百姓了解最高统治者的功绩，最合理的方法就是使用他们日常拿在手里的货币。

那么，是谁想出了如此合理的宣传方法呢？这个人就是被德国历史学家蒙森称为罗马唯一创造天才的尤里乌斯·恺撒。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铜币故事

尤里乌斯·恺撒是一位凡事追求合理性的皇帝，正是他别出心裁地把硬币当做了一种宣传媒介来使用。在金、银、铜三种硬币中，主要集中于银币和铜币。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奥里斯金币价值1000美元，那么一个便士银币便相当于50美元，一个塞斯特斯铜币则相当于10美元。由于硬币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媒介，因此拿在手上越合适，其宣传效果越好。

正因如此，相当于古罗马高速发展时期的共和制末期和相当于稳定发展时期的元首制时期铸造的便士和塞斯特斯都具有明确的发行目的，做工极其精细。由于是宣传，所以让使用者一目了然，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也正因如此，后代的人通过这些硬币，便可以了解某位皇帝统治的第几年对道路进行了全面的维修，某位皇帝在统治的第几年在多瑙河上

架设了第一座桥梁。另外，从硬币的做工，还可以看出罗马造型技术的进步和衰落。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序

在这本书的开头，我想把写作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开诚布公地交代给读者。所谓著作，本来就是有了作者和读者以后才能成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本卷我尤其需要读者的协助。这是因为，唯独这一卷不得不采取与前面的9卷，还有后面的5卷，完全不同的结构。

早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的时候，我的大脑里便有了这个想法，那就是要把计划共15卷的《罗马人的故事》中的一卷专门奉献给罗马人修建的基础设施。而且这一卷的标题也确定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因为我相信，无论是译为公共设施也好，还是译为基础设施也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体现这个民族的天赋。

尤其是罗马人，他们对于同样认识到基础设施重要性的现代人来说，堪称“基础设施之父”。基础设施的英文“infrastructure”这个词本身就是现代产生的一个合成词，它由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表示“下层”或“基础”之意的“infra”和表示“结构”或“修建”之意的“structura”组合而成。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也只是发音略有不同而已。例如，最接近拉丁语的意大利语中，将之称为“infrastruttura”。总之，词源都是拉丁语，这本身便是罗马人乃“基础设施之父”的一个最好证明，所以完全有理由专门给这个主题奉献单独的一卷。

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本题为“古罗马的基础设施”的著作。即使在互联网上访问欧美著名大学的出版部门，得到的答复也都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记载几乎全部是组织研究各个时代的专家撰写各自专题的形式，而即便是这种通史，也连专门阐述罗马基础设施的章节都没有。我不由得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写这个题

目呢？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几分自鸣得意。因为我要挑战一下研究人员没有挑战过的事情。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研究人员不挑战这个题目，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罗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不可能对这个题目进行综合的论述。相反，我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为题写一本书，并为这个想法而得意，正可谓无知者无畏。

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呢？

罗马人的基础设施已经涵盖了道路、桥梁、港口、神庙、会堂、广场、剧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公共浴场、自来水等所有现代的基础设施。但这还只是硬件基础设施，它还包括安全保障、治安、税制以及医疗、教育、邮政、货币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只要不提到所有这些内容，都称不上是阐述了罗马的基础设施。

然而，现代学问的特点是专业化，还有它的最终归宿——细分化。因此，要克服这种“不可能”，学者们所采取的方法也就是细分化，即某一个人写道路，另一个人便以桥梁为研究课题。而且，这种细分化最终必然走向技术的研究论述。事实上，从技术方面谈论罗马某一类基础设施的研究书籍，则比比皆是。

但是研究领域的这种现状难以回答我们一个简单而根本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明明已经有人修出来的道路，罗马人却要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全部铺砌成罗马式的城市道路？而且，罗马城边明明流淌着著名的台伯河，并不缺水，为什么它却要“劳民伤财”地修建罗马式的引水工程，舍近而求远呢？没有人来回答这些根源性的问题。

“不可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难以叙述。所谓历史，乃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件顺着历史的河流依次发生，方可撰写，而一旦以基础设施为题，便不再具有时间的顺序。换言之，就是不能再按照时代的顺序叙述

下去。以道路为例，如果不往返于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800年，就不能写出罗马道路的历史。

总之，阐述罗马人修建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困难就在于，它要求作者能够自如地处理横跨欧洲、中东、北非的罗马世界以及上千年的古罗马时期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巨大跨度。而对于讲求专业分工的现代学术界来说，这种事往往被认为不是一门学问，因此专家学者不愿意去做这种事。另外，即使不顾一切地挑战这个题目，也极有可能因为主题过于宽泛，最终只能流于表面。

这个难题对于并非学者的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创作中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阅读时也会同样感到困难。对于卖文为生的我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这是因为我写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没有人看，或者读者不忍卒读。我的自鸣得意随即烟消云散，开始觉得连专家也不愿挑战的题目，像我这样的人只会是自不量力，只有放弃《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卷了。这个想法，在我调查一件事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罗马人是一个重视基础设施的民族，被现代人誉为“基础设施之父”。基础设施起源于罗马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在创造“infrastructure”这个合成词的时候，只有借用拉丁语。这一点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无人不知一样。

既然如此，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理应有“infrastructura”这个词，但是并没有。正因为没有，所以到了现代，人们才只好造出这个词来。

罗马人修建了如此大规模而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却没有用来表达它的词语，这是一件令人疑惑不解的事。因为，所谓语言是为了表达现实生活而产生的。按照这个想法，我查找了各种资料，结果遇到了一个词：moles necessarie。翻译过来，相当于“必需的大事业”。而且在使用

这个词的一篇文章中，在“必需的大事业”之前，有“人类的文明生活”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罗马人把基础设施视为“人类文明生活必需的大事业”。

这件事足以令我长时间地陷入沉思。此前我所想的词一直是现代的合成词“infrastructure”的词源“infra”和“structura”。同时还有历史学家们所称的“罗马文明的伟大纪念碑”这样的赞美之词。

然而，在罗马人的著述中，不仅文献，即使碑文中也从未出现过表示流传后世的纪念碑之意的词。罗马人并不是想让其成为流传后世的纪念碑而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而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生活所需而建造的。只是它最终变成了罗马文明的伟大纪念碑而已。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才下定决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一定要用一卷的篇幅专门写罗马的基础设施。

还有一件事，让我抛弃了是否写这一卷的犹豫不决。那是几年前，我与即将担任首相、声望很高的一位日本政治家见面。当时，他问我，当了首相之后，你认为应该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以全新的思路实施根本的、划时代的税制改革。非此莫属。”

他听后，回答我说：“税的问题上，没有梦想。”

“梦想因人而异，并不存在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客观标准。这并不是政治家、官僚领导的一类问题。政治家、官僚的工作应该在于提供一个基础，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自己的梦想和尊严。”

看了后来此君发表的政见，我明白白费口舌了。但这件事在我撰写罗马史的时候，起了作用。因为它让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生活在古代的罗马人是如何考虑公私之分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

究他们定义为“人类文明生活所需的大事业”的基础设施，找到答案。

鉴于此，我对读者有几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写作困难，阅读当然也会困难。在阅读这一卷的时候，不要期待像阅读战争描写较多的《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那样一气呵成地读完或者获得惊心动魄的快感。

第二个愿望是，在您阅读的时候，心中要有长达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不过，谈到罗马大道，话题却突然跳跃到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铁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次而已。

第三个愿望是，您的心中还要装着一幅世界全图，因为书中会有一些将西方大国罗马和东方大国中国进行比较的内容。

第四个愿望是，基础设施这个题目，从它的性质来说，往往看图片比用文章说明更容易理解。因此，书中不得不插入大量的地图、图纸和照片，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这一点也请读者谅解。为了表示这一卷与其他各卷不同，封面装订也做了变动。

总之，在读者开始阅读之前，就让读者作好思想准备，作为作者来说，会让读者觉得没有比这种说明更加怪异的了，但犹豫再三，我认为还是应该写，这也实属无奈之举。不过，如果您能够耐心地理解这些说明，并在阅读的时候，结合这些地图和图表，那么，有一点我可以向您承诺，那就是，这本书将让您懂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路”不仅仅是道路之意，而且您会通过这些“路”了解到罗马人真正的伟大。

0 250 500km
N
北海
都柏林
切斯特
约克
不列颠
卡利恩
哥本哈根
里加
莫斯科
维尔纽斯
明斯克
伦敦
阿姆斯特丹
柏林
布鲁塞尔
克桑腾
日耳曼
华沙
特里尔
科隆
基辅
卢格杜南西斯
巴黎
兰斯
波恩
美因茨
布拉格
斯特拉斯堡
奥格斯堡
威尔士
布拉迪斯拉发
萨尔马提亚
高卢
雷蒂亚
维也纳
苏尼
日内瓦
诺里克
布达佩斯
达契亚
基希尼奥夫
博斯普鲁斯
波尔多
里昂
阿尔卑斯山脉
卢布尔雅那
彼得罗内尔
潘诺尼亚
阿尔巴尤利亚
莱昂
阿奎塔尼亚
埃姆米兰
苏萨
阿奎莱亚
马尔底亚
依格里扎
比利牛斯山脉
纳尔榜南西斯
萨格勒布尔
特莱亚纳
布加勒斯特
卢西塔尼亚
萨拉戈萨
都灵
达尔马提亚
贝尔格莱德
科斯特拉克
锡利斯特拉
黑海
里斯本
马德里
纳博讷
马赛
萨拉热窝
莫埃西亚
斯维什托夫
君士坦丁堡
锡诺佩
特拉布宗
托莱多
巴塞罗那
塞米亚兹
意大利
索林
索菲亚
色雷斯
比提尼亚-本都
萨达克
亚美尼亚
梅里达
西班牙
塔拉戈纳
科西嘉
罗马
斯科普里
马尔马拉埃莱利西
加拉太
卡帕多西亚
塔拉戈纳
科尔多瓦
加普亚
马其顿
帖撒罗尼迦
伊兹米特
安卡拉
开塞利
马拉蒂亚
加的斯
贝提卡
撒丁
那不勒斯
塔兰托
布林迪西
尼科波利斯
萨姆萨特
丹吉尔
卡塔赫纳
帕加马
科默金
巴尔基斯
阿尔及尔
巴勒莫
雅典
亚细亚
舍尔沙勒
君士坦丁
科林斯
以弗所
科基亚-潘非利亚
塔尔索斯
安塔基亚
拉巴特
毛里塔尼亚
迦太基
西西里
锡拉库萨
亚该亚
希腊
卡莱
西里西亚
叙利亚
巴格达
龙柏斯
突尼斯
罗得
夏马
塞浦路斯
努米底亚
地中海
克里特
贝鲁特
大马士革
帕提亚
贝森
加贝斯
尼科波利斯
恺撒利亚
布斯勒
的黎波里
大莱普提斯
夏哈特
尼罗河
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
犹太
阿非利加
昔兰尼加
埃及
孟菲斯
开罗
亚喀巴
阿拉伯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意大利本土
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帝国最大版图
现代的边界线
当时的道路
州府兼军团基地
州府
军团基地
现在的首都
其他城市

罗马帝国主要道路网

第一章

硬件基础设施

道路

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将铺设道路称为“viam munire”。但“munire”原本还有“修筑壁垒（mūrus）”的意思，也就是说，古罗马人也许认为，铺设绵延不断的大道与修筑蜿蜒不绝的壁垒异曲同工。实际上，就物体本身而言，这两者并无二致。这是因为，罗马大道的干道在设计上全部用巨石砌成，包括4米多宽的车道和两侧各为3米宽的人行道，总体路宽超过10米，路基厚度也达1米以上，分四层铺设。只要将“水平”的大道“垂直”立起来，便完全是一道固若金汤的壁垒。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地球的东方和西方都正在开始大兴土木。

在东方有万里长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修建的长城，加上16世纪明代修建的长城，全长达到5000公里。

在西方则是罗马道路网。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500年间罗马人铺设的道路仅干道总长就达8万公里，如果加上支线在内，则长达15万公里。

为什么中国和罗马开始兴建全国性的土木工程的时候，一个国家选择了修筑长城，而另一个国家选择了铺设道路呢？当然，中国古代并非没有道路，同时代的罗马也并非没有壁垒。只不过是，重点是放在长城上，还是放在道路上。

显然，问题不在于技术能力，因为只要想做，两个民族当时都能够把“垂直”和“水平”互换。另外，罗马人也并非不用抵御外敌的侵略，不关心国家的防御。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之前，从时代上来说，在公元前的共和制时期，罗马人一直战争不断。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优先修

筑道路，而不是修建壁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和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的罗马人的不同就在于对国家应该兴建什么样的大工程这件事认识的不同。壁垒是断绝人的来往，而道路则是促进人的来往。那么，国家防卫这一最为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断绝与其他民族的来往来实现，还是通过促进本国内人们的来往来实现呢？

两个民族在这一方面观念的不同，对于中国和罗马这两大古代强国来说，甚至决定了以后的国家形态。

罗马人没有像同时代的中国人那样修筑翻山越岭、绵延不绝的万里长城，而是选择了修通10倍乃至20倍于长城的道路，他们把道路视为国家的动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认为修建一两条道路远远不够，而是让道路四通八达。正如只有通过人体的血管将血液输送到全身，人才能活下去一样，国家要健康地生存下去，也不可缺少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道路网络。

道路本身并非罗马人的发明，然而它的网络化，而且是实行日常养护的网络化，却完全是罗马人的独创。另一方面，通过道路网络化，促进了道路功能的飞速提高，这本身也把罗马人塑造成了一个注重现实、合理的民族。基础设施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并且需要漫长岁月才能建成，正因如此，它不仅仅是硬件领域的成果，而且还会对软件领域，也就是精神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如何建设基础设施，将决定这个民族今后的走向。我想，万里长城和罗马道路网这两者的不同，比地球东西方的差异更大。

那么，罗马大道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建成并维护的呢？这里，我们仅限于讨论被视为国家“动脉”的、全长达8万公里的干道。

一、谁拟订方案？

二、谁作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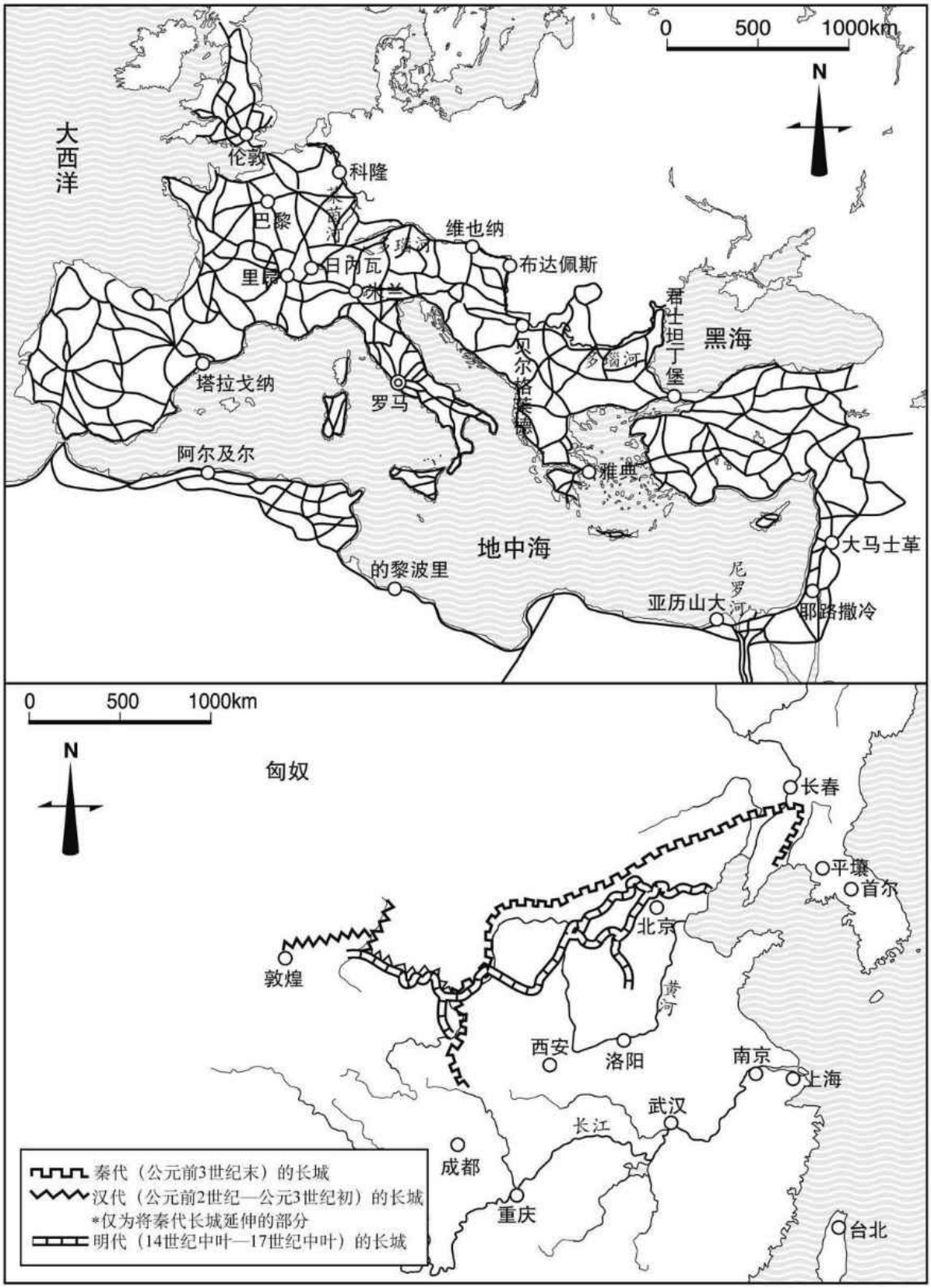
三、建设费用出自何处？

四、谁进行施工？

五、建成后，谁来养护、运营？

六、谁承担其他经费？

七、道路通行费是多少？


0 500 1000km
N
大西洋
伦敦
科隆
巴黎
维也纳
布达佩斯
里昂
日内瓦
米兰
君士坦丁堡
黑海
贝尔格莱德
塔拉戈纳
罗马
阿尔及尔
雅典
地中海
大马士革
的黎波里
亚历山大
耶路撒冷
匈奴
长春
平壤
首尔
北京
敦煌
西安
洛阳
南京
上海
武汉
成都
重庆
台北
秦代（公元前3世纪末）的长城
汉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的长城
*仅为将秦代长城延伸的部分
明代（14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的长城

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道路网（上）与各个时期第中一国章的万　里硬长件城基（础下设）施（　相同　比01例9尺）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这里先作一个简单的回答：

一、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二、元老院。

三、国库。

四、军队。

五、按现代来说，相当于主管公共事业的部委下面的公路局，或者类似于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

六、国家或者道路所经地方的地方政府。

七、免费。

除了道路，罗马人同时还修建了水道，这两者成为罗马基础设施的绝世双璧。关于水道的答案略有不同：

一、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二、元老院。

三、国库。

四、通过招标制度中标的“社团”（societas）负责施工。

五、水务局或者类似于自来水公司的机构。

六、国家或者地方政府。

七、公用水槽中整天都会有水，盛到容器里使用的部分免费。只有想要把水引到自己家里的人才支付相应的费用。

看到这里，谁都会想，罗马人根本不考虑是否合算。事实上，罗马人把基础设施视为“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当做极其重要的国家义务，也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领域。

在罗马共和制时期，修建道路和水道的审批程序是：由财务官或者执政官拟订方案，提交给元老院。元老院在审议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后进行表决。如果表决通过，拟订方案的人就成为工程的最高负责人并开始施工。

在罗马过渡到帝王制之后，拟订方案的人常常是皇帝本人，但是即使是皇帝拟订的方案，仍然全权委托元老院表决，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虽然《临时措施法》规定可以由皇帝一个人决定，但是罗马人也许认为，修建道路不能依靠只有皇帝在位时才有效的《临时措施法》。因此，修建道路法案依旧要由决定国策的元老院表决。元老院通过以后，皇帝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工程才能正式开工。

因此，无论是共和制时期还是帝王制时期，都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拟订方案，决定权也在罗马国家的立法机构、相当于现代国会的元老院。既然如此，修路费用理所当然出自国库，也就是说通过国税来筹措。

当时，罗马没有通过发行建设国债来筹措修路资金。类似于发行国债的概念，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进行布匿战争时，曾经存在过，但是它应该称为战时国债，接近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向富裕阶层强制进行的征税。因此，在战胜迦太基以后，这项政策便随之废除了。

布匿战争时期是罗马允许国家出现财政赤字的唯一例外，这是由于当时财政系统尚不成熟，而并非因为罗马这个国家重视财政健全制度。罗马的税制也确实简单，行省税称为“十分之一税”，关税称为“二十分之一税”，相当于消费税的营业税称为“百分之一税”，这些税都是全国通用的。由此可见，不提高税率是他们的税收政策。也许他们认为，与其征收苛捐杂税，最终官逼民反，派兵镇压，不如减轻税负更加明智。

但是，古罗马人缺少财政方面的知识，结果却导致了他们一直坚持健全的国家财政。由于铺设道路的庞大费用也必须通过相应的国库收入来筹措，因此不仅需要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分担，而且普通市民的参与也只能通过有权有钱的人修建、捐赠的方式弥补国家经费的不足。

阿皮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并非阿庇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个人出资修建的，但是埃米利亚会堂、尤里乌斯会堂却是马其顿战役的胜利者埃米利乌斯和高卢战役的胜利者尤里乌斯·恺撒个人出资修建，并捐赠给国家的公共财产。如果不把这种贵族义务计算在内，罗马的基础设施便难以达到当时的规模。罗马人没有现代的经济知识，他们没有想到累进税制这种征税方式，即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而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

罗马人也没有想到发行建设国债，因此在古罗马时期也不必为支付借款利息而苦恼。此外，由于无法征收道路通行费，正因如此，当时也不可能产生通过道路通行费收入偿还道路建设费之类的想法。不仅道路如此，水道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罗马人看来，基础设施是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因此既然国家征税，那么，由国家来负担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事。倘若古代罗马人听说现代的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困境，他们肯定会无法理解，会这样说：“不要借款，有多少预算做多少工程。正因如此，要明确国家能负担多少，其他部分能不能由地方政府和个人的公益活动来负担。”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既然国家决定不提高税率，也不借款，那么，如果不明确国家能够完成的部分，其他依靠地方政府和个人的话，基础设施也就只能是天方夜谭。

接着，由谁来负责实际施工呢？道路是由军队来负责的。这是因为，修建罗马大道本来的初衷是要修建功能完善的军用道路。

那么，建成后又由谁来进行养护、运营呢？答案是，道路和水道都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负责。罗马人认为基础设施是应该由国家来做的事，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想法在罗马帝国时期丝毫没有改变。虽然罗马统治者们都十分顽固，但是他们又都具有灵活性，那就是，即使前任皇帝臭名昭著，只要认为他开始的工程对国家有益，就会继续下去。而罗马人对基础设施的这种想法最终变成了巨大的成果，那就是遍布罗马帝国、全部由石头铺成的8万公里干道。正是这个罗马道路网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动脉。研究人员也断言说："人类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始普及铁路，人类交通运输的速度才超过了罗马大道。"

下面，再看水道。20世纪，人类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家中只要一拧水龙头，就会出水。不过，要缴纳水费。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这种文明的进步。世界上很多人面临缺水，这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罗马人经常用"文明"一词来表示人类的体面生活，而表示"文明"的词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意大利语，全部来源于拉丁语"civilitas"。

路本来是人走出来的，因此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必有路。对于罗马人来说，最初的路大概也是这种道路吧。在阿皮亚大道出现之前，罗马已经有几条历史悠久的道路。

萨拉里亚大道是“盐路”的意思。人们把台伯河入海口一带产的盐装在袋子里，放在小船上，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到罗马卸货。这些装满盐的袋子在罗马改由驴驮，沿着“盐路”运往内地，卖给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山地的人。对于早期的罗马人来说，盐几乎是唯一的物产，只要生产出来就肯定能卖掉。这条路自然而然就被人们称为“盐路”，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这条路多么重要。

“拉蒂纳大道”、“提布尔提那大道”、“诺曼塔那大道”的意思分别

是“到拉蒂纳的大道”、“到提布尔提那的大道”、“到诺曼塔那的大道”。这些都是联结罗马和与罗马有贸易往来的城镇的道路，与“盐路”一样，肯定也是自然形成的道路。自建国以后的400年，对于罗马人来说，道路大约就是这样几条。

对于道路的想法发生根本变化，始于从公元前312年开工的阿皮亚大道。这条路既不是用于运送物资的道路，也不是通往某个目的地的道路。道路的名称，以人名冠之。所谓阿皮亚大道，就是“阿庇乌斯的大道”的意思，是由当年的财务官阿庇乌斯拟订方案，元老院批准，并由阿庇乌斯亲自监督修建的，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罗马，法律也以提案人的名字冠名。例如：《森普罗尼乌斯道路法》、《尤里乌斯农地法》。这说明，当时已经进入通过制定法律决定国家政策，并视修建道路为国政的时代。

毫无疑问，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拟订了修建道路的方案，并在元老院的会议上说明了这条以全新的概念修建的道路将到达什么地方。他肯定说，首先，到达加普亚。因为加普亚位于当时罗马势力范围的南端。这一工程开创了罗马的士兵征服以后，再由罗马士兵修建道路的罗马人统治方式的先河。阿皮亚大道在公元前268年贝内文托归入罗马疆界时，随即延伸到了贝内文托，其后一直贯通到韦诺萨，进而又延伸至塔兰托，最后到达终点布林迪西时，已是这个亚得里亚海沿岸港口城市纳入罗马版图20年以后的事了。从开工到贯通花了整整70年漫长的岁月，是因为按照把道路通到统治下的疆土这一方针，工程也不得不分阶段进行。阿皮亚大道全线贯通的那一年，阿庇乌斯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在此20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开始修筑万里长城。

罗马人将阿皮亚大道称为“女王大道”。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最早的罗马式大道，也不仅仅是因为只要罗马帝国存在，它就是通往东方的大动脉，而是因为阿皮亚大道展示了罗马大道的一个样板。

首先，它必须完全起到军用道路的作用，那就是军队能够快速调

遣。

罗马通常不在征服的地方常驻占领军。这是因为战胜方与战败方往往会产生摩擦。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不常驻，一旦有事，迅速由基地派兵。公元前3世纪，军队驻扎在首都罗马，因此调遣军队时，便要从罗马行军至目的地，而确保一条从首都罗马安全抵达目的地的道路，则是当时军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罗马大道必须同时是一条带有政治策略的道路，而真正体现这种罗马思想的便是阿皮亚大道。阿皮亚大道通过的地方是早先还与罗马敌对的部落居住的地方。罗马人将道路一直通到他们刚刚征服的地方。军人手中用来打仗的剑换成了施工的丁字镐，所以修路所需的费用当然也由罗马承担。而且，罗马大道的特色之一在于它穿过城市的中央。罗马人不考虑环绕城市的环线。这是因为道路穿城而过，不仅便于罗马军队调动，而且方便这个城市的居民使用，这也是修路的目的之一。

以前，雨后路面便会泥泞不堪，车辆陷入泥潭是常有的事，但罗马大道不必有这种担心。由于路面平坦，而且经过铺砌，因此便于人们往来，缩短了人们交通上所花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车辆的载货能力。随着人员、物资流通的增加，改变了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提高了周围居民的生活水平。

败者对胜者再次拔刀相向，往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不满和在政治上被剥夺自治权。罗马没有犯这种错误。战败的城市成为“地方政府”，而且这种共同体内部的自治得到完全承认。

因作品《列传》而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将罗马国家的强盛归功于胜者对败者的同化，而对于这种胜者对败者的同化，也就是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作出最大贡献的便是罗马大道。只要看一看阿皮亚大道在什么时候修建，修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够懂得罗马人的统治哲学。

历史证明，通过修建道路与被征服者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的布匿战争。

几乎就在阿皮亚大道全线贯通的同时，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当时的战场是在西西里岛及其周围的海面上，因此意大利半岛幸免于难。然而，完全不是海洋民族的罗马却与海军强国迦太基为敌，并最终战胜了迦太基。这是因为那不勒斯、塔兰托这些希腊城邦为罗马提供了造船技术和熟练的水手。但是，在古代名将汉尼拔入侵意大利而发动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本应是罗马人擅长的陆地战，罗马人却体验了一次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是因为，所向披靡的汉尼拔盘踞在意大利半岛，也就是罗马长达16年之久。

企图一举灭亡罗马的汉尼拔不会没有考虑进攻首都罗马。但是他却没有尝试包围战。这并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他无法做到。如果要包围和攻陷一个城市，只有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反复进攻，才能达到目的。势如破竹、士气高涨的汉尼拔的军队也许完全有能力不断地发动进攻，但是却无法让罗马这座城市孤立无援。罗马不仅道路四通八达，而且它让罗马的男人移民，并与当地的女子结婚，通过这种形式实施混血政策，从而成功地同化了它所征服的城邦。这样，即使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也必须考虑到腹背受敌的危险。身处敌地，不允许他采取这样的包围战。终于，罗马开始转入反攻，战场由意大利转移到了北非。决定第二次布匿战争胜败的一场战役便是在迦太基领地内的扎马平原展开的、历史上著名的扎马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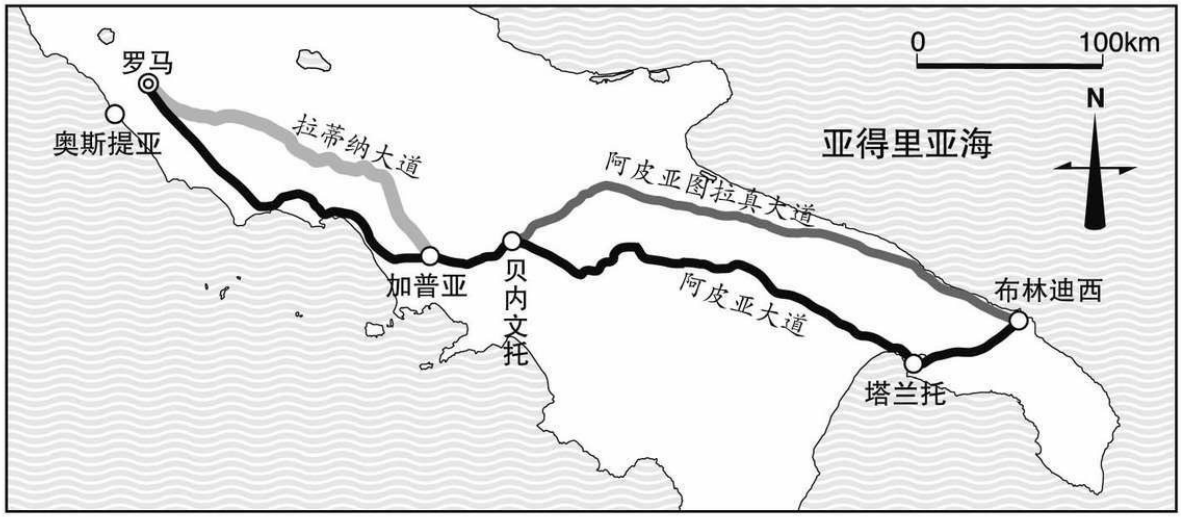
在这里，汉尼拔惨败于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军队，仅仅几个人逃回首都迦太基。迦太基议会倾向于坚持首都保卫战，但是唯独汉尼拔主张与罗马讲和。他凭着16年在意大利征战的经验，懂得迦太基与国内各个城邦清楚地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如果罗马包围了迦太基，那么这些被统治者会对统治者被围的首都迦太基见死不救。因此，他认为在扎马一战获胜的罗马军队进攻首都迦太基之前讲和是迦太基的必然出

路，因而坚决主张讲和。

迦太基议会接受了汉尼拔的意见，罗马与迦太基讲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宣告结束。但是除了汉尼拔以外，其他迦太基人是否理解当时讲和的必然性，不得而知。半个世纪以后，爆发第三次布匿战争，国内的各个城邦对迦太基见死不救，孤立无援的迦太基经过三年的坚守之后，最终城池被攻陷。公元前146年，迦太基从此在历史上彻底消失。

决定三次布匿战争胜败的，既不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也不是军事力量相差悬殊，而是国家形态不同。北非一带四通八达的古代道路网不是迦太基统治的时期修建的，而是变为罗马行省以后修建的。这说明，罗马的基础设施不是因为有经济实力所以才建设，而是因为认为它重要所以建设。

早在迦太基灭亡的100年前修建的阿皮亚大道之所以成为后来所有罗马大道的样板，第三个原因在于它表明了道路要有多种选择路线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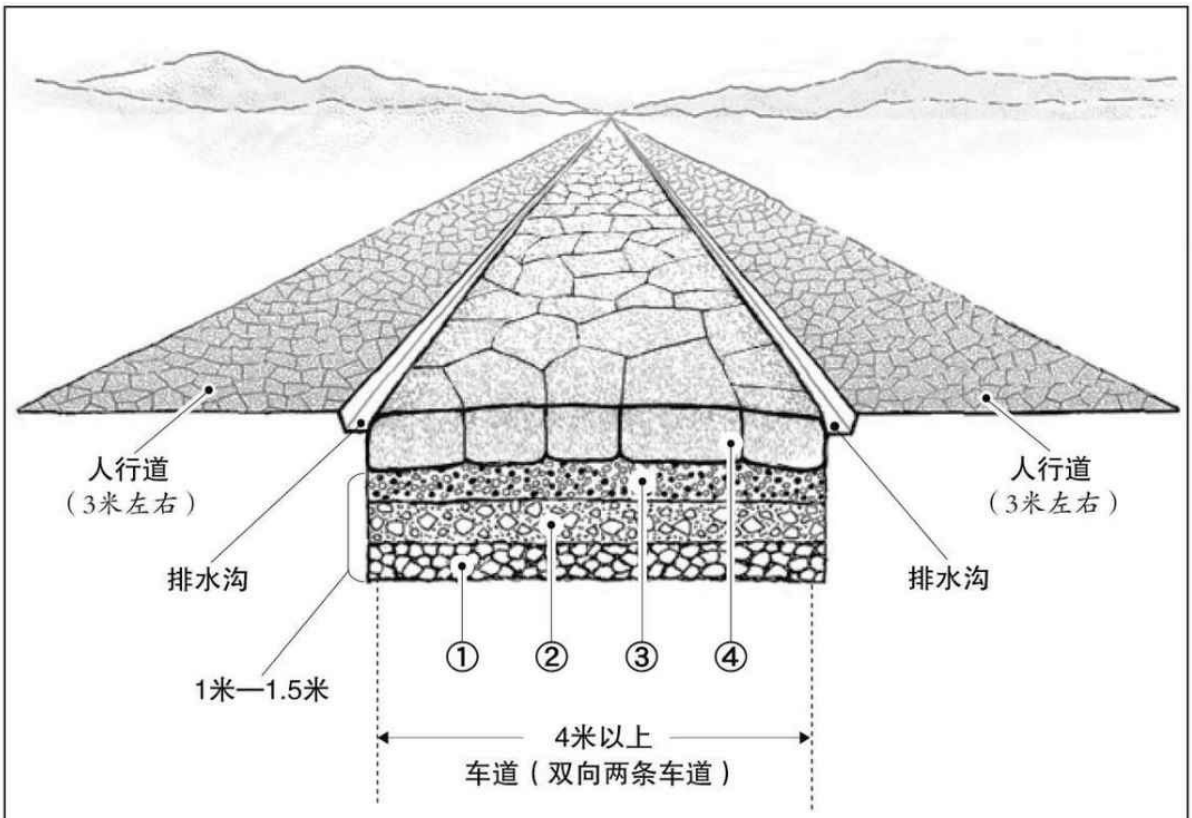
从罗马至布林迪西的两条大道

公元前312年以前，从罗马到加普亚已经有一条拉蒂纳大道，因此

如果需要一条联结罗马和加普亚的正式道路，只要对拉蒂纳大道进行全面改造应该就足够了。但是阿庇乌斯并没有选择改造那条穿过内陆地区的拉蒂纳大道，而是决定修建一条新的沿海道路。这样，罗马与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城市加普亚之间便有了两条干道。其后不久，从距离加普亚不远的贝内文托到终点布林迪西之间也有了两条线路：在共和制时期修建了米努基亚大道，到罗马帝国时期又修建了阿皮亚图拉真大道。

罗马人认为生活应该总是有多种选择，这种观念极其自然地让他们想到了将道路修建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全线铺装的道路并非罗马人的发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让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叹为观止的一条从波斯湾到达地中海的道路。但是发现道路只有网络化才能带来飞跃的效果，并将之变为现实的是罗马人。罗马的道路如果不作为道路网来考虑，就无法理解其真正的伟大。

然而，要让被征服者认识到罗马人铺设道路对他们自身也有好处，只有在罗马的道路比他们自己修建的道路更加方便的时候才会成为可能。那么，从阿皮亚大道开始的罗马式的道路究竟是怎么修建的呢？



①最底层：因地形而异，通常以 4 米—4.2 米宽挖至地表以下 1 米—1.5 米深，并平整后，铺上至少 30 厘米厚的石子。这种地基基础施工有两个目的：（1）即使是平原，通常也会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因此需要使其完全平坦；（2）为了防止厚度达到将近 2 米的四层地基的道路内部积水。

②第二层：将石头、石子、黏土混合后，铺在第二层。

③第三层：不使用自然形成的石块，而使用人工砸碎的小石块，使顶部铺成平缓的弧形。

④最顶层：铺满切割整齐、单边 70 厘米高的大石块。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修建起来的罗马大道一律不使用水泥，虽然当时并非没有水泥。

罗马大道的基本构造

在可以笔直穿过的平原上，罗马大道的基本结构如上图所示。

上述内容是车道或者主道的修建阶段。罗马大道的一大特色是车道两侧设有排水沟。为了保持道路的坚固，必须绝对避免在4米宽、1米厚的主道内浸入和积存雨水。

首先，让道路的表面形成一个缓缓的弧形，使雨水和积雪融化的水自然地流向道路的两侧，这些水流入排水沟以后，顺着路边的洞口流向道路的外侧。这种结构可以避免道路浸水。罗马工程师的信条是：“石为友，水为敌。”

罗马大道的第二个特色是，在铺石头的道路两旁附近严禁种树。如果有树，则一律砍倒。这是为了防止树根延伸到地下，破坏了四层路基的主体部分。

第三个特色是，与市区的道路一样，郊外的道路也是带人行道的道路。在城市附近和路口之类交通流量大的地方，车道两侧的人行道宽度超过3米，有些地方甚至达到5米。即使在交通流量小的地方，通常也有1米的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仅限于山腰地带和隧道内。即使是罗马人视为道路的延伸的桥梁，不论多窄，也必须设人行道。穿过树林的道路，则在宽达10米的车道和人行道的两侧，砍倒树木，以确保更加宽敞的安全地带。当然，这是为了防止盗贼从树林中袭击路过的人。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徒步旅行的人，因此这种顾虑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明确区分车道和人行道的原因不止于此。

罗马人修建的道路，正如现在罗马市区的科尔索街、里佩塔街、由广场向北延伸的弗拉米尼亚大道那样，只要地形允许，全部是笔直的道路。至于阿皮亚大道，更是一条长达43公里的笔直道路，即使驱车，也会令人惊叹不已。

不仅如此，即使在平原上，也要重新整地。如果遇到湿地，则打进无数的木桩，修成堤坝，然后在上面铺上道路。另外，无论桥梁下面是河流还是山沟，为了避免道路的上下起伏，罗马人都是在与道路同样的高度架桥。他们将在没有水的地方架设的桥称为“高架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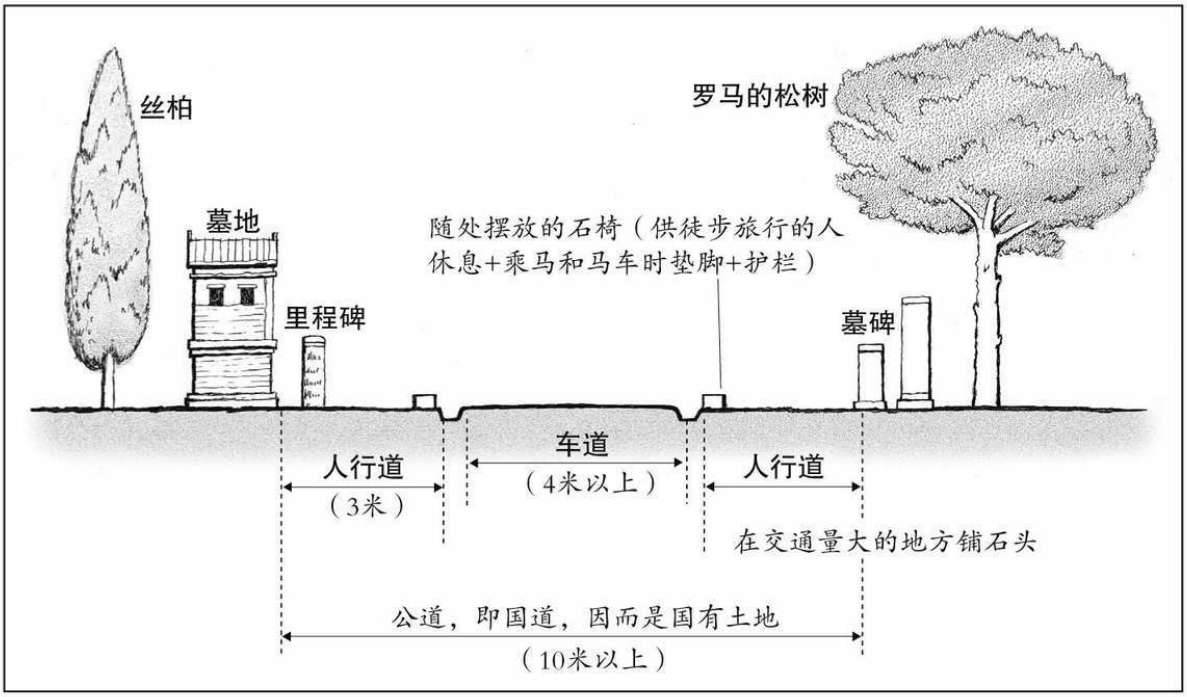
罗马人之所以采用这些修建道路的方法，是因为他们认为道路应该

是为了让人们尽可能快地到达目的地。既然如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区分人行道和车道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如果人行道和车道不分，由于要避让行人，就会失去修建道路是为了让马和马车全速驰骋的意义。在中间的车道上大摇大摆地前进的，只有通常排成三列纵队行进的军团兵。

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罗马共和国著名政治家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约·格拉古起草的《森普罗尼乌斯道路法》正式颁布实施。这部法律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公路法。该法规定，所有的罗马大道每隔一罗马里竖立一根石柱。古罗马的“里”等于“一千步”，换算成公里数，大约1.485公里。这种里程碑大约与人一样高，直径30厘米，上面刻有从道路的起点数第几个里程碑，因此，如果它是阿皮亚大道的第十个里程碑，旅行者便会知道这里距离首都罗马将近1.5公里× 10 =15公里。除此之外，古罗马的里程碑上，还刻有到附近城市的距离，起着各种信息布告牌的作用。另外，还有地址编码。据说，笔者的住处位于阿皮亚大道的第七个里程碑。以首都罗马附近的阿皮亚大道为例，按照这个程序施工的罗马大道的截面图如下。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习惯于在公路边上建墓碑、墓地，而这种习惯的创始人也正是阿庇乌斯。他临终前曾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墓地建在阿皮亚大道的旁边。

阿皮亚大道的第一个里程碑

自阿皮亚大道开工，迄今为止已经2300多年。时至今日，它仍然闻名于世，因此尽管阿皮亚大道距离罗马不远，还是被认定为重点文物，只要去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但是将其当做文物是最近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环城公路的时候，意大利人将这条历史大道断成了两截。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的人想要穿过这条古代阿皮亚大道，走到断成两截的地方的时候，只能注意左右来往的汽车，趁着没车的时候，横穿马路。但是当时罗马政府不能把阿皮亚大道和环线的交叉点地下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罗马人都是火葬，因此埋在墓地里的是骨灰，而犹太人、基督教徒不同，他们实行土葬，他们的墓在地下，这种形式的墓是公用墓地，公用墓地在地下与道路平行延伸。所以，如果重视阿皮亚大道的保存，这个交叉点只有修成高架桥。然而，自称古罗马人后代的现代罗马人却以没有这样做的资金为由，选择了将其断成两截。准确地说，自认为古罗马人后代的是极少的一部分现代罗马人，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罗马市民，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所以，谁能想到修高架桥呢？他们认为，工程应该全力以赴，尽快完成。“先人”花四年时间建成了斗兽场，而两千年后的“后代”连建一个医院也需要30年之久。这显然已经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思想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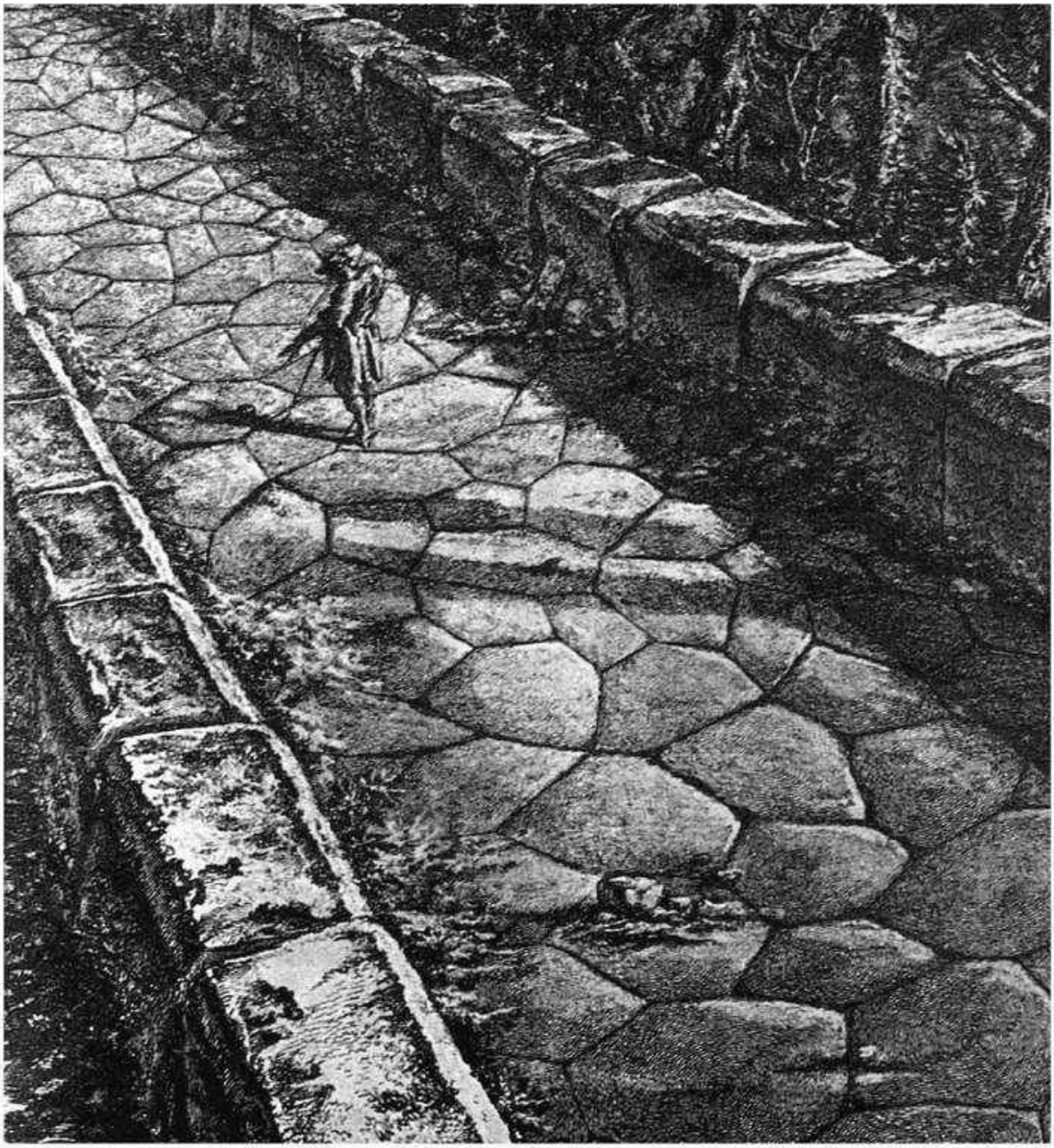
罗马大道截面图

加之，近年罗马的市政一直由左派掌权，左派的旗帜是为了市民，因此，被认定为文物的阿皮亚大道也必须成为对市民开放的场所，所以他们把这里建成了一条罗马市民散步的大道。

最终，这里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罗马史的研究人员中，也有一些有心人对此表示愤慨，认为如果古代的罗马人看到今天这个样子，也许会气得晕倒过去。我也认为，当年歌德在这里漫步，对古罗马产生无限遐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块充满历史感的地方，其后长期以来也无人问津，所以事到如今，不如保留其原来的历史风貌。这是因为，将它改造成游乐场以后，罗马大道便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让慕名而来的人产生误解。不仅意大利，欧洲各国，还有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罗马旅行参观。把它变成市民散步的道路也无可厚非，但是至少要将10米左右的路段，复原成这条著名的历史大道作为当年干道中的干道的时期的状态：分四层修建，完全不使用水泥，却严丝合缝，石头路面铺成平缓的弧形，两侧设有排水沟，再外侧是向远处延伸的、宽阔舒适的人行道，

随处可见的石椅，每隔一段距离竖立的里程碑石柱，还有给大道增添不少趣味的墓碑和墓地。如果将至少10米的路段复原成这样的历史原貌，慕名而来的游客便会理解，基石磨掉了棱角是因为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年久失修造成的。也许游人会想象到，这种年久失修是国家主管部门未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产生的，而国家不发挥应有的职能势必对个人也会产生影响。遗址的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所幸的是，古罗马广场现在还没有被改造，但斗兽场近年来日渐蜕变为一个商业化的迪士尼乐园。

据称，阿皮亚大道在修建的时候就完全具备坚固、功能性、美观的特色。这三点是古罗马时期公共建筑物一贯的原则，而不仅仅是一种方针。作为拟订这条大道施工方案的人，同时又是工程的最高负责人，阿庇乌斯为了确认道路的平整，据说曾经脱掉凉鞋，赤脚在路面上行走。另外，由于阿皮亚大道是干道中的干道，对道路的维护也绝不偷工减料。既然是动脉，当然应该努力让血流畅通。现在人们看到的阿皮亚大道，石头已经磨损，石缝间积满了尘土，在这样的道路上策马而行，一天绝对走不了70公里。在这样的道路上，有可能马会摔倒，即使不摔倒，也走不多远，远不如在道路旁边的平原上疾驰更快、更安全。古罗马时期的工程师们曾经夸口说，自己修建了一条一百年不用修补的道路，但是要保持修路当初的状态，绝对需要不断的养护。到了6世纪，一位拜占庭帝国的高官面对过了800年仍然保存完好的阿皮亚大道惊叹不已。而罗马帝国在此半个世纪以前已经灭亡了，而且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末期已经无人过问道路的养护，因此阿皮亚大道在6世纪的时候已经有300多年处于顺其自然的状态。不仅如此，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没有一个民族像罗马人这样认识到道路的重要性。古代的阿皮亚大道除了今天认定为历史古迹的路段以外，全部铺上了沥青，变为机动车道，成为国道7号线，到终点布林迪西的540公里的路段至今仍在使用。



绕过山腰的罗马大道复原想象图（18世纪铜版画，皮拉内西作）

因阿皮亚大道而千载留名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不仅是罗马大道的创始人，同时还是罗马基础设施中的另一雄观——罗马水道的创始人。而罗马水道也与阿皮亚大道一样，在公元前312年正式开工。在从首都罗马出发的12条大道中，阿庇乌斯修通了其中的第一条，他同时也

是修建通向首都罗马的11条水道中的第一条水道的人。也就是说，正是他告诉自己的同胞，路不仅仅是人踩才形成的，而水也不仅仅是到河里去汲就足够的。我时常不由得想，这个人的大脑里是什么样子，为何有如此多的奇思妙想？而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在1200年的罗马史中，也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尤里乌斯·恺撒，另一位便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阿庇乌斯并没有征服过其他民族，也不是为罗马扩疆拓土的将军。尽管如此，他也不是一位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政治家。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在公元前272年，罗马遭到古希腊人皮洛士王的进攻，尽管浴血奋战，最终两次都被打败。罗马的领导人中间弥漫着悲观情绪，元老院开始倾向于接受皮洛士提出的讲和要求。此后发生的事，我们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已经讲到，在此不再赘述。

当时因年事已高退出政坛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闻讯勃然大怒。这位修建了阿皮亚大道，开创了修建具有政治、战略意义的罗马大道先河的人是罗马名门贵族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的一员。阿庇乌斯这个名字是他们的家传常用名，因此叫这个名字的男子很多，为了将其中修建阿皮亚大道的阿庇乌斯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人们便称他为“财务官阿庇乌斯”，或者“失明的阿庇乌斯”。在罗马与皮洛士王浴血奋战的时候，阿庇乌斯已经因年老而几乎失明了。

行走不便的阿庇乌斯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元老院，并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发表了一篇几近训斥的严正演说。

他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是讲和的前提条件。闯进了我们家院子不走的敌人无论是讲和还是什么，绝对不能谈判。他的话改变了元老院的气氛。

这个故事对于罗马人来说，后来竟成为一个传统。这是因为罗马在被打败的时候绝不签订讲和协定，对于罗马来说，讲和只有在胜利以后

才签订，它成为罗马传统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在与迦太基这样的大国之间进行布匿战争的时候，罗马也咬牙拒绝了汉尼拔提出的讲和要求。

然而，当时考虑了国家百年之计，甚至是800年，乃至千年之计的阿庇乌斯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谁也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历史上没有留下一张他的肖像。有文献证明，在古罗马时期确有其人。后人甚至挖掘出了他的雕像的底座，但却没有发现他的全身像或者胸像。其原因也许是在漫长的中世纪并不关心基础设施建设。相反，在古罗马时期，这位“基础设施之祖”的肖像甚至被普遍挂在孩子们的教室，并排列在古罗马市中心的公共集会广场中央的会堂内，把他视为本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如今，驱车经高速公路去罗马，首先遇见的便是环城公路。环城公路是现代的产物，这是因为现代的人重视汽车交通的效率。但是汽车从罗马环城公路上行驶，与在伦敦、巴黎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在路上不断出现的道路标识上，写着蓝底白字的“SS.1. VIA AURELIA”，其中，“SS”表示国道，这个标识表示“国道1号线奥勒里亚大道”，指示从这个入口进入这条大道。沿着顺时针方向，绕罗马环城公路一周，映入眼帘的道路标识的顺序如下。作为参考，我们同时注明开工的年份。

国道1号线——奥勒里亚大道，建于公元前241年，自罗马至热那亚。

国道2号线——卡萨亚大道，建于公元前154年，自罗马至佛罗伦萨。

国道3号线——弗拉米尼亚大道，建于公元前220年，自罗马至里米尼。

国道4号线——萨拉里亚大道，建于阿皮亚大道以前，自罗马至波尔图皮切诺。

国道5号线——提布尔提那大道，建于阿皮亚大道以前，自罗马经蒂沃利，与同为国道5号线的、公元前307年开工的瓦勒利亚大道相接，最终至亚得里亚海一侧的佩斯卡拉。

国道6号线——拉蒂纳大道，建于阿皮亚大道以前，自罗马至加普亚。

国道7号线——阿皮亚大道，建于公元前312年，自罗马至布林迪西。

国道8号线——奥斯提亚大道，建于阿皮亚大道以前，自罗马至奥斯提亚港。

此外，还有一条并非起于罗马的单号国道，便是国道9号线。

国道9号线——艾米利亚大道，建于公元前187年，自里米尼至皮亚琴察。

将两千年前的罗马大道稍加改造，在几乎一样的路线上铺上沥青，就成了意大利的国道。而高速公路在意大利语中称为“Auto strada”，直译便是“机动车道路”，它们与国道不同，不允许步行。道路标识上标注的符号是A，从罗马至北部米兰的高速公路称为“A1”，至南部那不勒斯的高速公路称为“A2”，除此之外，还有两条东西方向的高速公路，均以环线为起点。

这样，意大利将古罗马的大道加以改造而变成的国道从数量上来看，也比高速公路这一现代文明的产物占有优势。这种现状并不是因为现代意大利人懒惰，而是因为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技术精湛，使其能够经得起两千年的沧桑岁月。

虽然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也许“条条大路出罗马”更为贴切。这是因为罗马是帝国的心脏，而从这个心脏向身体的各个部分输送血液的动脉便是罗马大道。在罗马大道中，起于首都罗马的一共12条，北至严寒的北海，南至酷热的撒哈拉沙漠，西至大西洋，东至幼发拉底河，再从英国至叙利亚，从德国、巴尔干至埃及，延伸到了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仅仅全线石头铺设的干道便多达375条，全长达8万公里。加上铺石子的支线在内，这张庞大的血管网络遍布了罗马帝国这个躯体。而所有这些大道中首屈一指的当数阿皮亚大道。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有“大道女王”之称的阿皮亚大道曾经是同化被征服者的政策手段之一，而且我们还提到，在道路修筑技术方面，与此前的道路截然不同。不仅如此，这些道路的路线也具有革命意义。

我们说过，罗马大道的一个特色在于它们从城市中央穿城而过，但并非只要是城市，就全部有罗马大道从其中央穿城而过。罗马人在修建大道的时候，首先确定在政治上、战略上最重要的城镇，然后让大道尽可能笔直地通向目的地，因此干道会避开那些不太重要的城镇。但是这些城镇并非被弃之不顾，而是用支线联结它们。这种想法与现代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是一样的。

继公元前312年开工的、最早的人工修建的道路阿皮亚大道之后，罗马人按照罗马式的道路修筑方法重新修建了自然产生的重要道路拉蒂纳大道、萨拉里亚大道和提布尔提那大道。但是，这三条大道的路名仍然全部保留原来的名称。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名称已经为人们熟知。

第五条罗马大道叫做瓦勒利亚大道，据说始建于公元前307年。这条大道并非起于罗马，而是起于提布尔提那大道的终点——蒂沃利，越过亚平宁山脉，通到亚得里亚海一侧的佩斯卡拉。由于萨拉里亚大道也

通到亚得里亚海，因此就形成了联结意大利半岛西面第勒尼安海和东面亚得里亚海的两条线路。从这条路的名称来看，也许是当时罗马的名门望族瓦勒利乌斯家族出身的执政官修建的。

接着修建的罗马大道是始建于公元前287年的克劳狄亚大道。伊特鲁里亚民族在与罗马的战争中战败后，日益被罗马人同化，而这条大道便是联结位于现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南端的萨图尔尼亚和罗马的一条道路。这条路随着联结罗马和位于托斯卡纳中心的佛罗伦萨的干道——卡萨亚大道的建成，不久便成为后者的一条支线。在铺设这条克劳狄亚大道的同一时期，阿皮亚大道也延伸到了意大利南部山区的韦诺萨。

但在这一年以后的40年中，罗马没有修建过一条干道。罗马的军队已经无暇顾及修路，而必须全力以赴于与强敌的战争。首先是针对意大利南部强大的希腊后裔大城市塔兰托的一场战争，紧接着便是与塔兰托请来的伊庇鲁斯地区的皮洛士王之间的战争，士兵们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公元前270年，罗马终于取得胜利。原本只是台伯河边的一个村庄的罗马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卢比孔河以南意大利半岛的霸主。当然，阿皮亚大道也就随之延伸到了塔兰托，不久延伸到了布林迪西。

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以后，本来应该能够全力修建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但是却没有重新开始道路的施工。这是因为仅仅6年后，即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了一场布匿战争，而此次战争的敌国是一个大国，与上次交战的希腊小国伊庇鲁斯不可同日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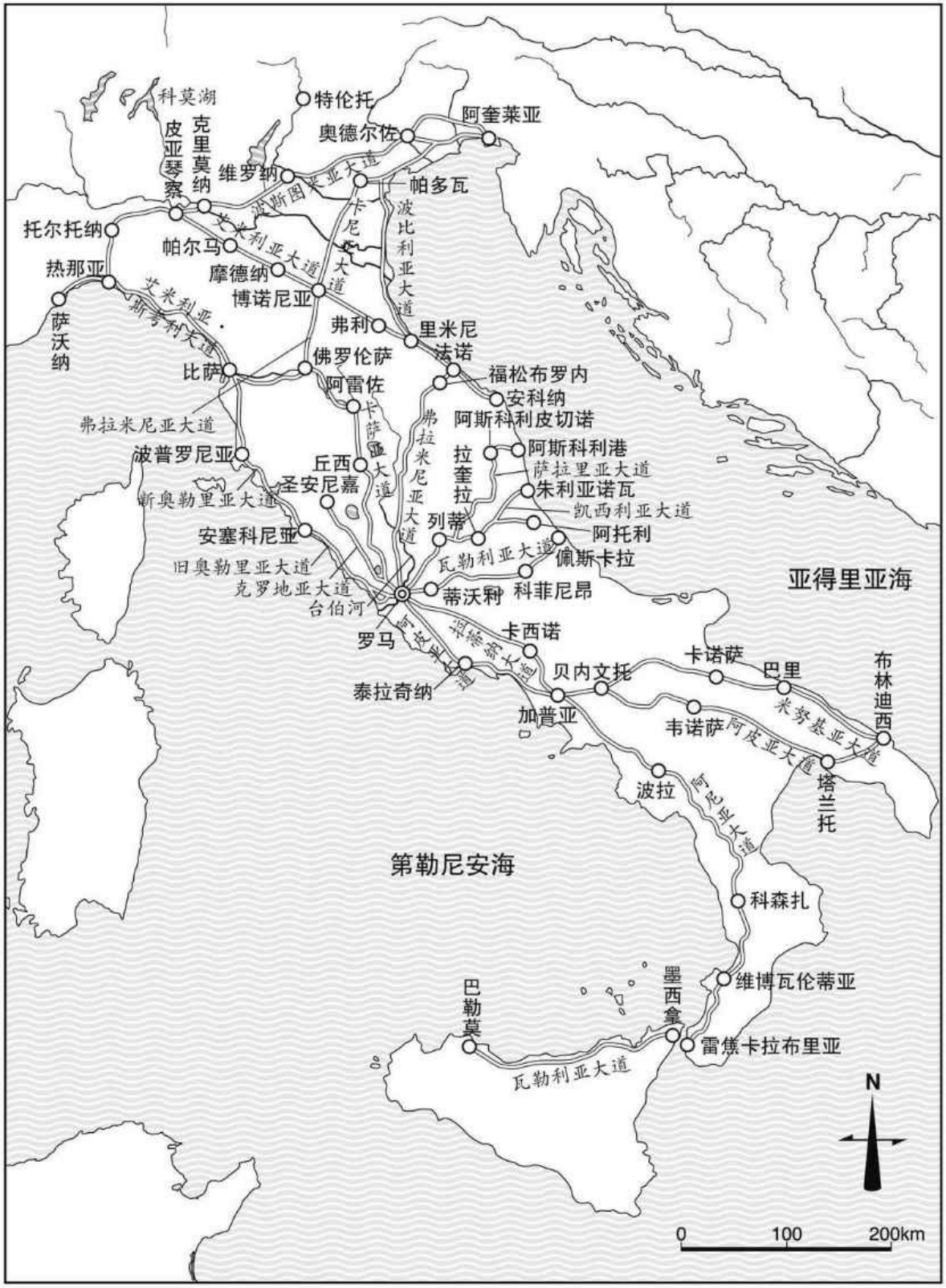
由于两个国家都没有取胜的实力，第一次布匿战争持续了23年之久，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但战场是西西里岛及其周边的海域，因此战火并未烧到意大利半岛。尽管如此，意大利半岛内却没有新修一条道路。这也许是因为工程需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被全部投入到与迦太基的战争了。

我有一枚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迦太基金币，每当我拿在手里凝视的

时候，便不由得感慨万分。我想，罗马怎么会与一个流通如此精巧、优质的金币的国家进行战争呢？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的罗马还没有本国的金币，而且，能够铸造银币也只是爆发布匿战争三年前的事。两国的经济实力竟有如此大的差距。尽管这场战争是因为迦太基控制了墨西拿海峡而发起的，但与强大的迦太基进行第一次布匿战争的20年中，毫无疑问罗马已经无暇顾及修建道路的事了。

当时的罗马人修建了阿皮亚大道，却连银币也没有铸造过。他们开始实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庞大的公共工程。他们认为，基础设施不应该是经济实力提高了才去建设，而应该是为了提高经济实力而建设的。

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获胜的罗马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赔款，而是领土。西西里岛由迦太基的领地变成了罗马的领地。当然，罗马人在西西里岛上修建了罗马式的道路。这条大道由执政官瓦勒利乌斯所建，取名为瓦勒利亚大道，联结离罗马本土最近的墨西拿和原本迦太基统治的巴勒莫。希腊和迦太基对西西里岛有漫长的统治历史，但是它们尽管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却对修建道路毫无热情。瓦勒利亚大道是西西里岛这个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上修建的最早的一条正式道路。而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意大利半岛上也重新开始了道路修建。


科莫湖
特伦托
阿奎莱亚
奥德尔佐
皮亚琴察
克里莫纳
维罗纳
帕多瓦
波斯图米亚大道
卡尼大道
波比利亚大道
托尔托纳
帕尔马
艾米利亚大道
摩德纳
热那亚
博诺尼亚
艾米利亚·斯考利大道
萨沃纳
弗利
里米尼
法诺
佛罗伦萨
比萨
阿雷佐
福松布罗内
安科纳
弗拉米尼亚大道
卡萨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阿斯科利皮切诺
阿斯科利港
拉奎拉
萨拉里亚大道
波普罗尼亚
丘西
圣安尼嘉
朱利亚诺瓦
新奥勒里亚大道
凯西利亚大道
列蒂
阿托利
安塞科尼亚
瓦勒利亚大道
佩斯卡拉
旧奥勒里亚大道
克罗地亚大道
科菲尼昂
亚得里亚海
台伯河
蒂沃利
罗马
阿皮亚大道
卡西诺
卡诺萨
巴里
布林迪西
泰拉奇纳
贝内文托
米努基亚大道
加普亚
韦诺萨
阿皮亚大道
塔兰托
波拉
阿尼亚大道
第勒尼安海
科森扎
墨西拿
维博瓦伦蒂亚
巴勒莫
雷焦卡拉布里亚
瓦勒利亚大道
N
0
100
200km

共和国时期意大利的罗马大道

据说，从罗马往北直至热那亚的奥勒里亚大道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缔结讲和协定之后不久开工的，可见罗马人对修筑道路的巨大热情。尽管如此，沿着第勒尼安海一路往北，穿过比萨，通向热那亚的这条两千年后的国道1号线竟然与阿皮亚大道几乎一样长。它的施工也分为三期进行：至科萨（安塞科尼亚），为旧奥勒里亚大道；至比萨，为新奥勒里亚大道；至热那亚，为艾米利亚·斯考利大道。这三条路统称为奥勒里亚大道乃是罗马过渡到帝制以后的事。这条大道的名称也照例以道路设计人兼施工负责人的名字命名，因此奥勒里亚大道就是“奥列里乌斯的路”之意，而且这条大道最终计划是与穿过法国南部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相联结的。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热那亚还不是一个大道终点的城市，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渔村。

随着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道路修建。这次道路修建开始于公元前225年开工的米努基亚大道。顾名思义，这条路是由一位名叫米努基乌斯的执政官设计，交给元老院批准后，并由其负责施工的。300年后，图拉真大帝对这条大道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改名为阿皮亚图拉真大道。

这条大道在贝内文托与阿皮亚大道分道扬镳，另辟一条道路，在终点布林迪西与阿皮亚大道会合。因此，阿皮亚大道不仅在罗马与加普亚之间，而且在贝内文托与布林迪西之间都实现了复线化。

所谓复线化，就是有多个选择。它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防止自然灾害。假如发生洪水、塌方而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时，有无其他选择，会让政府的功能出现很大的差异。第二，国家的防御。如果敌人控制了一条道路，自己能够使用另一条道路，就不至于成为瓮中之鳖。我们不能忘记，罗马大道本来最早是军用道路，如果说保卫国土需要按照重要性排列先后顺序的话，那么基础设施首当其冲，这对于罗马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常识。

公元前220年，当年的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开始修建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条大道与阿皮亚大道齐名，是罗马历史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条道路。如果说阿皮亚大道是罗马往南的一条最重要的干道，那么往北的最重要的干道便是这条弗拉米尼亚大道。从全长来看，阿皮亚大道为540公里，与之相比，弗拉米尼亚大道为340公里，不及阿皮亚大道，但是阿皮亚大道通过的多是平原，而弗拉米尼亚大道不同，它通过的地带大多数是山地。越过亚平宁山脉，直至里米尼的340公里，要翻山越岭，修成车道和人行道加起来4至10米宽的大道，可谓难于上青天。现存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是修建200年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对其进行全线改造以后的样子，由于是山地，溪流众多，考虑到涨水的情况，大道都是绕山腰而过，并且修建了许多高耸入云的桥梁。有的地方则穿过宽6米、长40米的隧道。

尽管如此，现代的国道3号线弗拉米尼亚大道与古代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走的并非是完全一样的路线。有些地方重合，有些地方则并行，另一些地方则离得相当远。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什么地方重合，什么地方并行，什么地方离得远，我们就会发现最早修建的时候，对地形的判断是如何准确无误。虽然同样是绕山腰而过，但是最早的道路都是尽可能选择降雪量少而又难以结冰的山腰。罗马大道通到什么地方是完全出于政治需要，而如何通过则由实际负责工程的军团工程师们决定。你也许会觉得，让道路从山涧穿过的方法会比较简单，而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选择绕过山腰，无疑是考虑到在涨水的季节，洪水有可能冲垮道路。上面我们曾经感叹过阿皮亚大道一往直前，那么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修建则是克服了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令人不由得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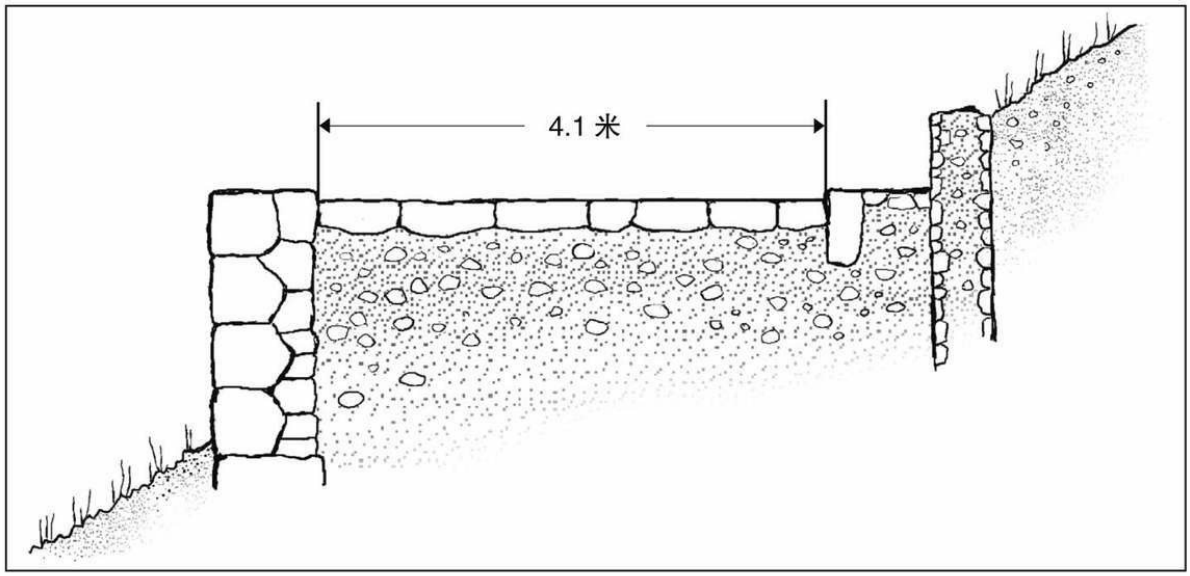
但这条弗拉米尼亚大道恐怕没有全线贯通到终点里米亚就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因而被迫中断。而且这一次战火烧到了罗马人的本土意大利。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发誓要打败罗马，带着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这是公元前218年的事。次年，即公元前217年，罗马军队离开首都，迎击汉尼拔的军队。他们在距离弗拉米尼亚大道不

远的特拉西梅诺湖边展开的激战中遭到惨败，而弗拉米尼亚大道的施工负责人，由于是当年的执政官，同时就任军队司令的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也在战场上阵亡。

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弗尔洛隧道（右为共和制时代，左为韦斯帕芗大帝时代）

所谓第二次布匿战争，指的是自公元前219年汉尼拔发动军事行动开始，直至公元前202年在迦太基领地内的扎马平原展开的扎马会战中罗马取得胜利为止的17年。在此期间，罗马仍然无暇顾及修建道路，而且，在公元前201年与迦太基讲和后，罗马又开始攻打马其顿，发动了与希腊的战争，修建道路的事一直搁置。不过，虽然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载，但如果考虑到罗马人的性情，毋庸置疑，他们最终还是修通了至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是因为在公元前187年罗马开始第三次大规模修建道路的时候，修建的是里米尼至皮亚琴察的艾米利亚大道。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几乎笔直地穿过罗马涅平原的大道作为国道9号线至

今仍在发挥着作用。而且，热衷于网络化的罗马人，理所当然地又修筑了一条联结皮亚琴察和热那亚的大道，与奥勒里亚大道联结。这是为了增强未能抵挡住汉尼拔进攻的意大利北部的防御能力。罗马人几近顽固地始终坚持选择修筑道路网来保障国家安全，而不是通过修筑壁垒来保障国家安全。在此以后，罗马一直在不断地缓慢而执著地修建意大利半岛的道路网。



沿山腰修建的罗马大道截面图

从罗马通往佛罗伦萨的卡萨亚大道始建于公元前154年前后，这就是现代的“国道2号线”。同一时期，罗马还修建了一条起自佛罗伦萨，越过亚平宁山脉，直至沿艾米利亚大道布署的军团基地——博诺尼亚的大道。到了现代，沿着这条道路，修建了与之平行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的最后一场战争。也许是因为它始终是围绕首都迦太基的攻防战，也许是因为对于罗马来说，与迦太基的这场战争已经不需要投入全部力量，所以它对罗马的道路修建完全没有产生影响。尽管在地中海的另一边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攻防战，但是在意大利相继铺建了许多道路。

在意大利北部，公元前148年开始修建现代称为国道10号线的波斯图米亚大道。这条道路联结了皮亚琴察和阿奎莱亚。罗马道路的网络化一直在不断地完善。而且，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对于罗马来说还不是它的本土。这是因为，直到恺撒将这个意大利北部行省合并到意大利本土之前，意大利的边境一直是位于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稍北的卢比孔河。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南部，公元前131年开始修建的阿尼亚大道把加普亚和雷焦卡拉布里亚两座城市联结起来。从首都罗马至加普亚之间，有一条阿皮亚大道，然后从加普亚至雷焦卡拉布里亚建一条阿尼亚大道。这是意大利半岛的道路网络通过每条大道传递接力棒的方式最终联结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从阿庇乌斯开始修建，历经200年的岁月，罗马人终于修通了一条贯穿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主“动脉”。

但是，如果有人对罗马人在修建道路上不分本土和行省的做法表示吃惊，就说明他不了解罗马人。在罗马人修建意大利北部道路网的几乎同一时期，他们还在铺建一条横穿法国南部的多美亚大道。另外，罗马人隔着亚得里亚海还修建了一条从都拉斯横穿希腊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这样，罗马就修通了通往东、西方的正式道路，按现代来说，便相当于高速铁路或高速公路。我们不能忘记修建道路的目的之一是同化被征服的民族，也就是说把昨天的敌人纳入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征服后随即修通道路，这是罗马人一贯的做法。

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末期，通过军事力量掌握霸权，又用这些征战的士兵修筑道路的政治家有：马略、苏拉、庞培、恺撒。如果说“罗马大道也是罗马政治”，并不为过。

在罗马大道实际发挥作用的时期是什么状态？要让两千年后的现代人想象一下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想一想我们熟悉的高速铁路的线路。

由于要让许多节车厢联结在一起的列车高速行驶，土地不能有起伏不平的情况。为了使地面保持平坦，就需要修筑得像堤坝一样的、高速列车专用的铁路。即使架桥，也必须修建在铁路的延长线上。

在古罗马时期，无论是道路还是桥梁，都是按照与此相同的想法修建的。这种修路的方法在意大利本土积累了成熟的经验以后，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如法炮制地运用到了行省道路网的修建上。罗马人完全没有因为是被它征服的行省而简化道路的修建方法或者偷工减料。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就地取材所造成的差异。在木材丰富、湿地遍

布的北欧，有不少道路是用耐潮湿的木桩打地基的。相反，到了北非、中东的沙漠地带，且不说没有木材，连石材也稀缺。这种情况下，还要坚持按照罗马的方式用石头铺路的话，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种地方，除了值得花费劳力从远处运来石材的主要道路以外，只能用石子铺设道路。不过，干燥地带也并非没有优势，那就是北欧无法奢望的强烈的阳光和雨季的集中降雨。罗马的工程师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他们将石子和黏土混合后铺设，并将顶部铺成平缓的弧形，然后等待雨季。道路经过雨季的浸泡，等旱季来临的时候，经阳光暴晒之后，便会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固的道路。罗马人擅长随机应变在道路施工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建造金字塔的埃及人和修筑道路网的罗马人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埃及人不惜一切地从远处运来需要的材料，相反，罗马人首先考虑的是就地取材。另一个不同之处还在于，是为了一个人死后修建工程，还是考虑有益于更多人的现世生活而修建工程。罗马公共事业的宗旨是：坚固、耐用、功能好而且美观。用阐述罗马建筑法的《建筑十书》一书的作者维特鲁威的话说，就是：坚固、有效、美观。

也许是罗马人本身对此相当自信吧，《博物志》的作者老普林尼这样写道：

“金字塔不过是毫无用处的、愚蠢透顶的权力炫耀。”

古罗马工程师弗朗提努斯著有一部研究罗马水道的著作。正因为他本人是一名工程师，所以留下了一句技术人员才会说出来的话：

“希腊的美术品以精致而闻名，但是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只能说毫无用处。”

尽管如此，与他们生活在同时代的许多罗马人却热衷于收集古希腊

的艺术品，而且大举到埃及参观旅游，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如今，我生活在罗马式基础设施完善的社会，只要去美术馆就能够欣赏希腊的杰作，时而去参观一下埃及的金字塔就觉得非常理想，这种状态与当时的罗马人相比并无二致。

然而，罗马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自信除了自身的信念外，还因为受到了希腊人的赞赏。就像异口同声一样，希腊的历史学家、文人和地理学家们都写道：罗马人创造了三项伟大的杰作，而在希腊，连鼎盛时期的雅典都没有关注过它们，那就是：街道、上水道、下水道。这也证明了每个民族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关于这些罗马大道的正式研究，从它们建成以后过了1700年，才由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开始。这位名叫尼古拉斯·贝尔吉尔（Nicolas Bergier）的年轻律师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兰斯，并在那里当律师。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去法院经过的路是一条古代的罗马大道。兰斯在尤里乌斯·恺撒统治高卢的时期，曾经是势力强大的雷米人的根据地，而在它成为罗马的行省以后，作为7条罗马大道会合的交通要道，依旧非常繁华。这样的一个城市，修建罗马大道的概率本来就非常高，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就此作罢。他辞去了律师的工作，将其后的一生奉献给了法国境内罗马大道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便是1622年在巴黎出版的《罗马帝国道路史》（Histoire des Grands Chemins de l’Empire Romain）。这部著作被公认为罗马大道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从那时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400年，因此，当然会有人认为罗马大道的研究应该应有尽有了。但是实际上远非如此。学者们没有浪费这400年，尤其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150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但这种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分工研究的，例如意大利的学者研究意大利，法国的学者研究高卢，英国的学者研究不列颠，西班牙的学者研究伊比利亚半岛。而当地出生的研究人员不关心的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以及北非一带，则由欧洲的研究人员成立小组去实地调查，这种状态

一直延续至今。铺石头的干道长达8万公里，再加上铺石子的支线在内，则长达15万公里，这个数字也是各国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罗马人在两千年前，在今天的各研究人员，甚至一个研究小组也无法彻底勘察的广大地区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有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个壮举。他是一位名为维克多·沃尔夫冈·冯·哈根（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的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急切地抢夺战败国顶尖的科学家，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美国的资助，这位德国人开始了他的调查研究。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起初他研究的是印加帝国的道路。但他认为，道路能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罗马大道进入他的视野，就好像预先注定的命运。

1959年，开始文献研究。

1960年，成立一个由研究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小组的全部人员都从事各种资料的调查研究。

1962年，研究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出发前去实地考察意大利半岛内的罗马大道。由于是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半岛的调查之行当年并没有完成，次年仍在继续进行。

1964年，两辆吉普车驶至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走遍这两个岛屿之后，经海路奔赴北非，开始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的调查之行。

1965年，两辆吉普车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调查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挪威之后，开赴巴尔干。

1966年，调查人员抵达中东地区。他们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展开了调查。此后，小组兵分两路：第一组奔赴英国和德国，第二组则奔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对该地区进行第二次调查。

1967年，小组分成了三支队伍：英国人组成的小组，负责调查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意大利人组成的小组，负责对意大利和法国进行第二次调查；团长冯·哈根率领的美国小分队开赴埃及东部的沙漠地带。

但是，就在这一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了中东战争。按照常识，为了躲避战火，这些调查人员最好是撤出战争地带，然而这些人却一直在埃及士兵喧嚣不宁的战场上，继续他们的调查之行。在这些人的一再恳求下，埃及军队指挥员最终同意了他们从苏伊士至亚喀巴的调查之行。由于西奈半岛当时战火纷飞，因此，他们沿着古代的罗马大道，行至亚喀巴之后，又经红海回到埃及，调查了穿过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罗马大道。冯·哈根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虽然战争开始了，但是我们仍然按照计划完成了调查。"不仅如此，到那一年秋天为止，他们还完成了小亚细亚南岸所有的调查，因此，他们走遍罗马大道的速度可以与尤里乌斯·恺撒相媲美。此后，他们途经保加利亚，调查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然后南下希腊，直奔目的地埃格纳提亚大道。这条路便是在500年中罗马军团开赴东方的路线。

埃格纳提亚大道隔着一天的海路与阿皮亚大道相望，是通往东方的最重要的一条大道。冯·哈根的小分队在调查了穿过希腊、南斯拉夫（当时）的这条大道之后，抵达了阿尔巴尼亚边境，并在此等候获批入境。但是调查队等待了多日，也没有获得批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不仅对本国人出入境限制严格，对外国人的出入境也严格限制。这件事不免令人遗憾。当时，这个调查小组未能进入的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和古罗马时期称为达契亚的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如果他们被批准进入阿尔巴尼亚，就能走到埃格纳提亚大道的终点都拉基乌姆，由此乘船到对岸的布林迪西，然后从阿皮亚大道一路北上，就能够到达罗马。未能实现这个计划的调查团沿着贯穿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加维纳大道北上，从东北方向回到了意大利。

1968年，调查团成员在罗马集合。经过实地考察，他们绘制了大量的图片，并将图片插入到研究著作中。著作标题用英语，题为“The Roads That Led to Rome”。在可以说走遍了罗马大道的调查之后，这个标题也许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感受吧。这部著作的初版最终在伦敦发行。

如此庞大的调查工作，难免让人想象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调查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冯·哈根介绍的“和我一起进行此次漫长的调查之行的伙伴”只有5个人：麻省理工大学的大卫·梅林（David Mehlin）、罗马大学的阿道夫·托默齐（Adolfo Tomeucci）、剑桥大学的罗宾·维卡斯-哈里斯（Robin Vicars-Harris）、斯坦福大学的英国人凯斯·里奇蒙德（Keith Richmond），还有制作地图的专家、意大利人迪诺·里格洛（Dino Rigolo），加上不是大学研究人员的冯·哈根在内，一共6个人，只能称为一个小规模的调查队。但他们工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是距离帝国首都罗马较近的主要干道，还是穿过帝国边境的大道，都由同一个人走遍。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即使有缺乏完整性的风险，通史也应该由一个人撰写。以同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似乎与专业分工高度发展的现代做法背道而驰，但我认为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次由年轻的研究人员开展的调查，其调查对象只局限于罗马大道。而关于这些大道上不可缺少的桥梁，只有留待其他人去调查。这件事是由意大利的一位学者完成的。

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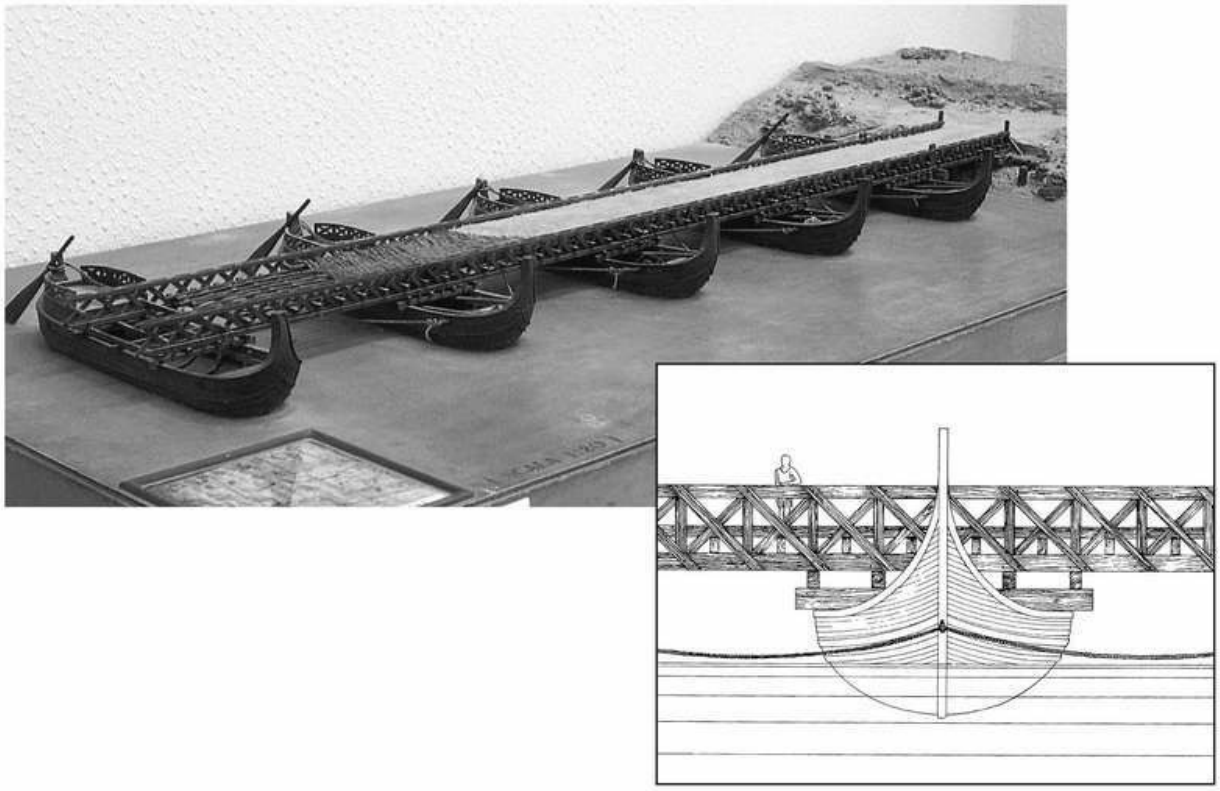
既然人类有依水而居的习性，那么无论谁都会想到要修造过河的桥梁。正因如此，有村落的地方，必有桥梁。桥梁的种类很多，有独木桥、吊桥，还有在河桩上铺板而成的桥。这里，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些原始的桥，而仅限于罗马人建造的桥梁。提到古罗马时期的桥梁，谁都会

想到高耸入云的石头桥。但是罗马人造的桥梁并不仅仅是这种石头桥。不要忘记，罗马人是随机应变的高手。另外，与两千年后的现代相比，他们在材料、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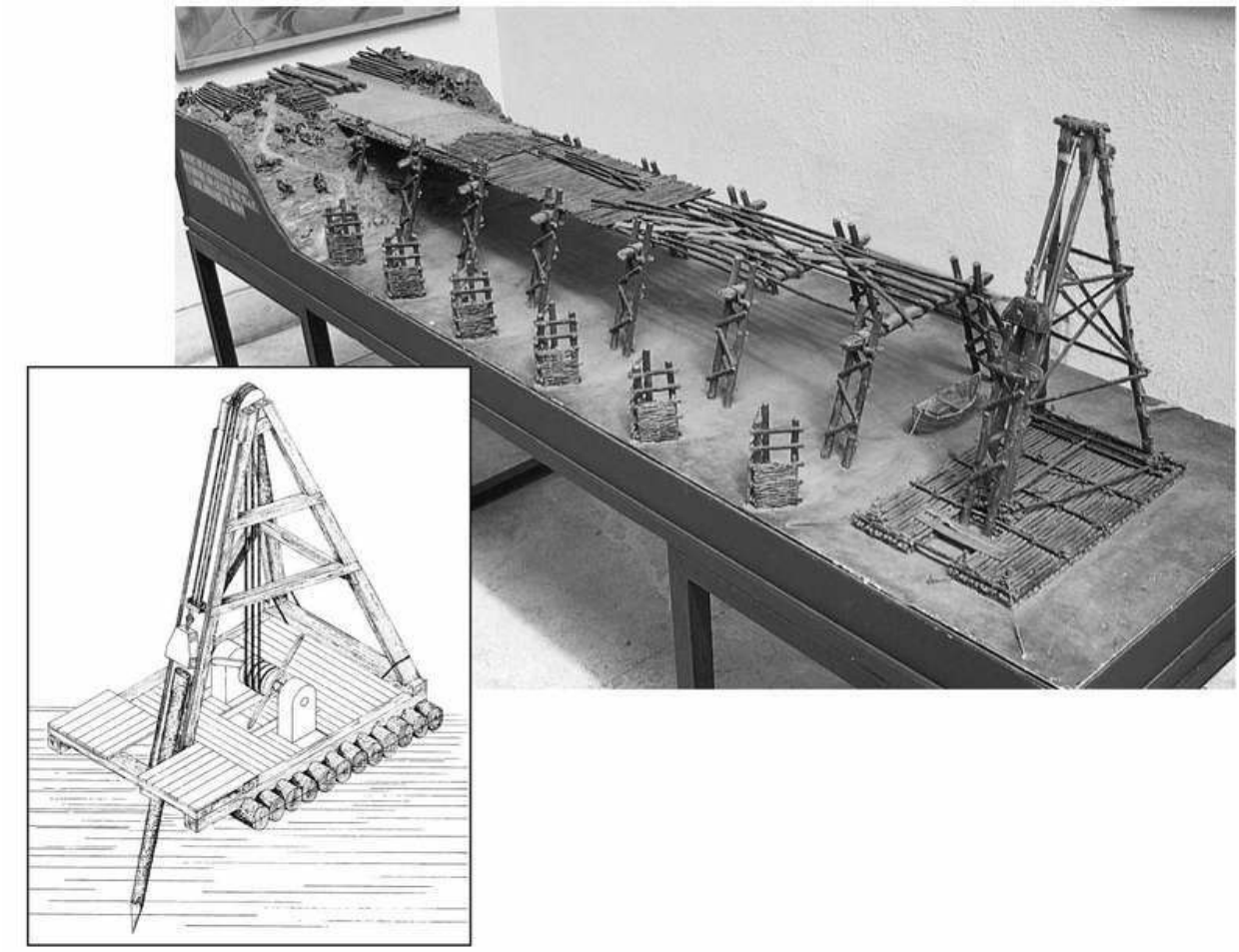
首先，是简单易造、临时架设的舟桥。将船排成一排，为了防止被水流冲走，船与船之间保持一定间隔。将这些船连在一起，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即告完工。据说，如果只铺木板，过桥时会发生晃动，因此他们先在船上绑上木头，再在上面铺上用水泥搅拌的石子，这样就可以使用相当长的时间。

除了这种舟桥，罗马人考虑的另一种临时桥梁便是木桥。这种桥最为著名的，也许是高卢战争中恺撒命令在莱茵河上打桩架设的那座桥。虽说是木桥，但建造非常合理，而且只用了十多天便将莱茵河这条大河的两岸连成了一体，因此罗马人的技术水平连日耳曼人也吓得发抖，这并非无稽之谈。这座桥是莱茵河上最早的一座桥。

有趣的是，之所以军队渡河不是分散地乘船渡河，也不是像汉尼拔那样在罗讷河上造筏渡河，而是造桥渡河，恺撒在他的书中曾写道，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和全体罗马市民的名誉。为了名誉而建，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但我想，所谓大事业，也许只是需要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荣誉心和自豪感才能称得上大事业。尽管如此，当时的这座桥在罗马人显示了自己几天便能建造出木桥进攻日耳曼人领土之后，便被恺撒下令放火烧掉了。他无意征服莱茵河以东的地区。可见，木桥在罗马人看来，不过是临时的桥梁。



舟桥的复原模型。右为舟桥局部图 （摘自Vittorio Galliazzo, “I Ponti Romani”）



恺撒在莱茵河上建造的木桥复原模型。左为在河底打桩的机械 （摘自Vittorio Galliazzo, “I Ponti Romani”）

不过，有一种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认为是临时的桥，而罗马人却完全不认为它是临时性的。这种桥罗马人称为“长桥”，它也是恺撒想出来的。

恺撒征服的统称为高卢的地方，按照现代的国家位置来看，包括法国和挪威的全部、瑞士和德国的西部以及荷兰的南部，疆土十分辽阔。在公元前1世纪，还有许多尚未开垦的土地，尤其在北部，分布着许多森林和沼泽。在行军的时候，遇到森林都尽可能选择绕道而行，但是如果连沼泽地也避开，势必无法行军。因此，在直接踩上去人和马都会陷进去的湿地，就必须想办法让军队走过去。于是，人们想到了在湿地上

打上木桩，然后铺上木板，再在上面铺上树枝。当地的高卢人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但恺撒并没有单纯地模仿这种做法。他让军队在铺平的树枝上又铺上一层碎石子，而且这种长桥不是修一座，而是并排修建多座。这正如不是一条车道，而是四车道、五车道一样。这样，不仅更加安全，而且还可以节约军队通过所需的时间。上页图表示的是这种长桥的建造过程，它是通过至今仍然时常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材料复原而成的。木材格外耐水浸泡。在北欧一带，罗马化等于开发，因此随着人们不断的开发，湿地也逐渐消失。长桥在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也不再有任何历史记载了。

尽管如此，提起罗马人造的桥梁，毕竟首先还是石桥。这是因为，如果说罗马式的石头大道是反映罗马人思想的一个外表，那么石桥也同样如此。

罗马人将桥梁称为道路的兄弟。道路是阴性名词，因此是姐姐，而阳性名词的桥梁则是弟弟。他们认为，既然是姐弟，那么必须是相互帮助的关系，正是有了这种关联与和谐的关系，耐久性、功能性和美观才得以成为现实。

按照这种思想建造的古罗马时期的桥梁与同时代其他民族的桥梁相比，还有与后世中世纪至近代建造的桥梁相比，下面的几种特质尤为突出。

第一，是石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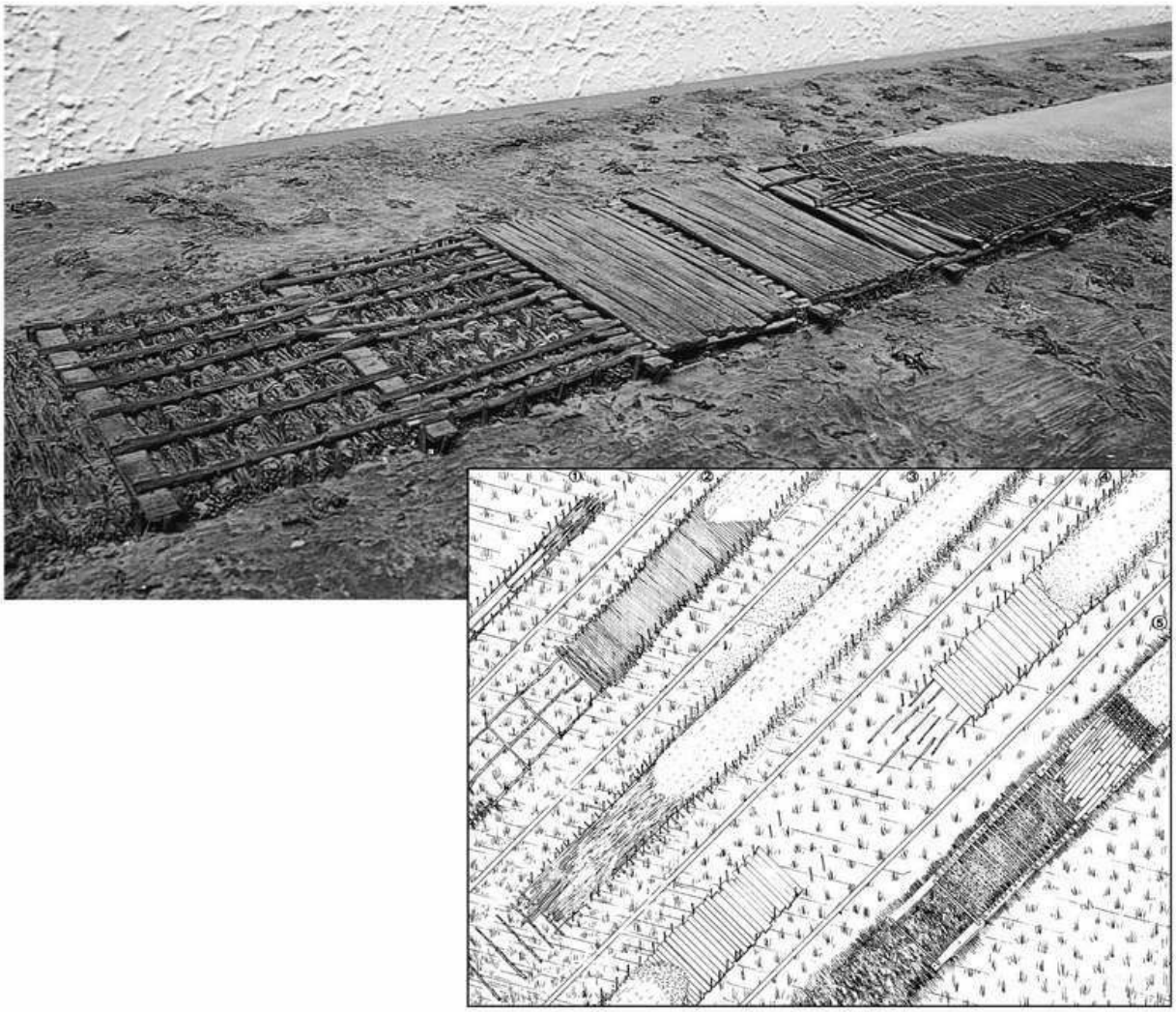
第二，不是拱桥那样上坡然后下坡的桥，而是水平架设的桥。

第三，即使是桥梁，也建在道路的延长线上。

第四，桥梁和与其相连的道路多采用同样的铺设方法。如果是石头铺砌的干道，则桥梁上面也用石头铺砌。如果是用石子铺设的支线，上

面的桥梁也同样用石子铺设。

第五，桥梁上面也严格划分车道和人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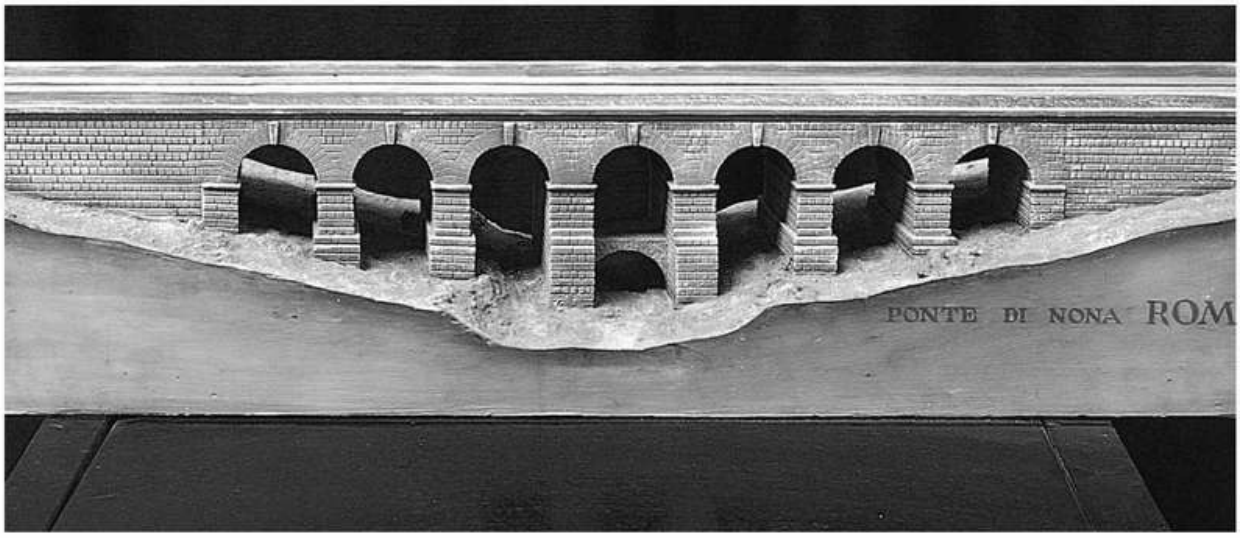
“长桥”建造中的复原模型。右为5条“长桥”的建造过程 （摘自Vittorio Galliazzo, “I Ponti Romani”）

第六，桥梁的两端多建有凯旋门式的门楼。这些门楼表示桥梁的出入口，同时也是一种装饰。

不过，正是由于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所以在桥梁养护的时候，也会同时对这些拱形的门楼进行修复。它的意义也同样与罗马历史有着

密切的联系。

罗马史经历了王国、共和国、帝国三个历史时期，而谈到道路和桥梁，则可以把焦点集中在后两个时期。从军事方面来划分，可以说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处于进攻的时期，而帝国时期则是处于防御的时期。在帝国时期纳入罗马统治范围的地方，只有不列颠（今英格兰）和达契亚（今罗马尼亚）。正如罗马帝国的标语“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那样，罗马自从进入帝国以后，就没有发动过征服别国的战争。



作为道路延伸的桥梁模型（罗马近郊的Ponte di Nona）

但所谓凯旋门，是为了迎接战胜回国的将士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罗马特有的建筑形式。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皇帝便成为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在共和国时期，将军是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建造凯旋门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并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流传后世。而对于作为帝国时期最高指挥官的皇帝来说，如果因为他们不是战争的胜利者就不建造凯旋门，则有失公允。无论如何，对于罗马的男人来说，成为凯旋将军，穿过罗马公民赠送的凯旋门，举办凯旋仪式，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举办过几次凯旋仪式，将成为他一生中的辉煌经历。

包括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奥古斯都在内，他以后的许多皇帝都未经历过凯旋仪式。胜利归来并举行凯旋仪式的皇帝只有两位，一位是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大帝，一位是征服达契亚的图拉真大帝。此时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根深蒂固。

尽管如此，掌握罗马最高权力的皇帝与罗马男人的最高荣誉无缘毫无疑问有悖常理。因此，从倡导“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政策的奥古斯都开始，建造道路和桥梁的皇帝也有了获赠凯旋门的资格。为了纪念对弗拉米尼亚大道进行全线改造的奥古斯都而建造的凯旋门，便矗立在这条大道的终点里米尼。越过阿尔卑斯山脉，通往高卢的大道也是由奥古斯都大帝铺设的，在这条大道的起点奥斯塔就建有一座奥古斯都大帝凯旋门。在整个罗马帝国疆域内，至今仍有许多为皇帝建造的凯旋门。它们几乎全部不是纪念胜利的凯旋门，而是为了感谢修建了大道或者大街，而由该地方的民众建造并送给皇帝的凯旋门。

率先推行这种做法的奥古斯都大帝在执行其他政策的时候，也以想出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而著称。他对并非战胜了敌人而仅仅是建设了基础设施就可以获赠凯旋门，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在战场上战胜敌人，对保卫祖国作出贡献，理所当然应该建造凯旋门，而为了公共利益铺路修桥也同样对保卫祖国有所贡献。当时，与其他民族作战的是军队，而从事铺路修桥的也是军队，所以奥古斯都所说的理由毫不费力地就被他们接受了。

而且，这也是符合罗马人的名誉观的。不仅如此，继这位奥古斯都大帝之后，建造凯旋门的人并不仅仅限于皇帝这样的公职人员。这是因为，即使私人，如果自费兴修了公共工程，同样被允许建造纪念其功绩的凯旋门。皇帝与私人的差异就是：皇帝的凯旋门是行省、地方政府赠送的；而私人的凯旋门则由其本人所建。这种差异，如果考虑到两者进行的工程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建设基础设施工程也可以获得凯旋门，由此可以看出罗马帝国公共事业的重要

性。这是因为，罗马人认为，它与战胜敌人、保卫国家具有同等的价值。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如说“条条大路出罗马”更能让人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犹如遍布人体的血管一样，覆盖整个罗马的道路网全部始于阿皮亚大道。而罗马大道不可缺少的桥梁也始于流经首都罗马的台伯河上的一座桥梁。

它就是萨布利休斯桥。这座桥意为“木桥”，据称建于罗马第四代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时期，因此建造年代应该在公元前620年左右。在

王政时期，这一带有市场，还有从奥斯提亚经台伯河运盐的船只停靠的码头，这座桥便起了联结这一带和台伯河对岸的作用。

公元前7世纪，罗马人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台伯河虽然称不上大江大河，但是，也不算狭窄，在这样的河流上架一座桥梁，当然也只有使用木材。但是，这座罗马最早的桥梁，甚至没有用铁钉来加固。当时，罗马的统治还没有到达台伯河的西岸，经常遭到伊特鲁里亚人等民族的进攻。在这种状态下，台伯河对于罗马人来说，也是一种壁垒。每当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桥梁便会被破坏掉。因此，这座桥在建造的时候，只是将木材组装在一起，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方便切断这条通道。

但罗马人冒着来不及破坏的时候，敌人会过桥直驱而入罗马市区的风险，仍然架设了桥梁。即使冒着便于敌人来袭的风险也要修建桥梁，这一点与铺设高速公路式的罗马大道出于同样的想法。如果说长达8万公里的罗马大道最早的一条是阿皮亚大道的话，那么据称多达3000座的罗马式桥梁，最早的一座便是萨布利休斯桥。它们都是按照同样的意图建成的，那就是，不是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和别人居住的地方隔离开来，而是将彼此联系在一起。早在还只是台伯河边的一座小城的时候，罗马人就有了强烈的向外拓展的倾向，而不是闭关自守。当时，伊特鲁里亚人比罗马人势力强大，而他们那里却看不到有一座桥梁考虑到了可以随时破坏的需要。

以首都罗马为起点的大道，从公元前312年开工的阿皮亚大道开始变成石铺的道路，实现了“高速公路”化，与此同时，台伯河上也开始相继架设石造的桥梁。按照罗马人的观点，如果大道铺石，那么桥梁也必须采用与之相同的构造。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铺石的干道，中央的车道宽4米以上，两侧并行的人行道宽均将近3米，而罗马建造的桥梁也明确分为车道和人行道。尤其是随着罗马成为世界之都，也许是考虑到了百万以上的人口，首都罗马的桥梁宽度也开始变成与大城市附近干道一样的宽度。由于通常使用的马车宽度在1.5米左右，因此，4米多宽的车道可以说是相向双车道。如果道路是双车道，那么桥上也是双车道。

虽然在建造方法上，罗马桥梁是罗马大道的延伸，但是地面上铺设的大道和河流上架设的桥梁还是有几个差异：

首先，是在建造工序中罗马的工程师最为重视的排水问题。

城市郊外的大道，通过将车道表面铺成平缓的弧形，让雨水流进车道两侧的排水沟，以此解决这个问题。而市内的大道，是将排水沟隐蔽在人行道下面，两者在将雨水引到车道两侧这一处理方法上并无不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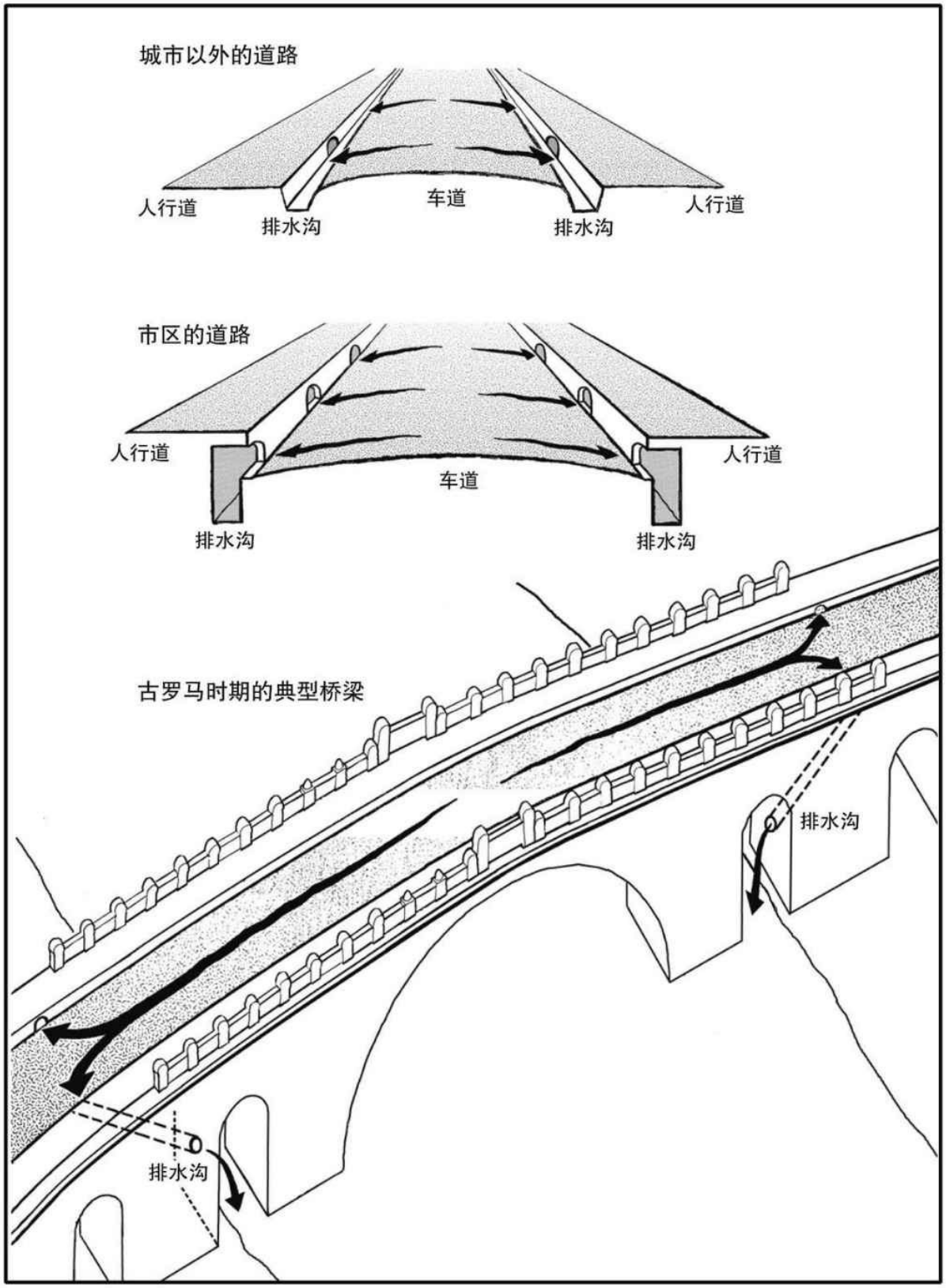
在这一点上，桥梁的雨水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桥梁本身呈平缓的弧形。下雨的时候，水会沿着平缓的弧线流到桥梁的两侧。但是这样，你也许会想，如果下暴雨，会不会造成桥梁的两旁突然淹没，无法通行呢？罗马的工程师们对于这个问题，也准备了解决方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在桥旁积水之前，让雨水顺着两侧人行道下面的暗沟流淌到桥下的河流中。这是因为，对于土木工程来说，水是第一大敌，对其处理的好坏会决定建筑物的寿命。

但是，修建道路的时候，是从地面往下挖1米多深，修筑地基，而桥梁是从水上通过的，当然，在进行桥墩施工的过程中谁也不能阻止河流的流淌。那么，罗马的工程师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按照下面的步骤解决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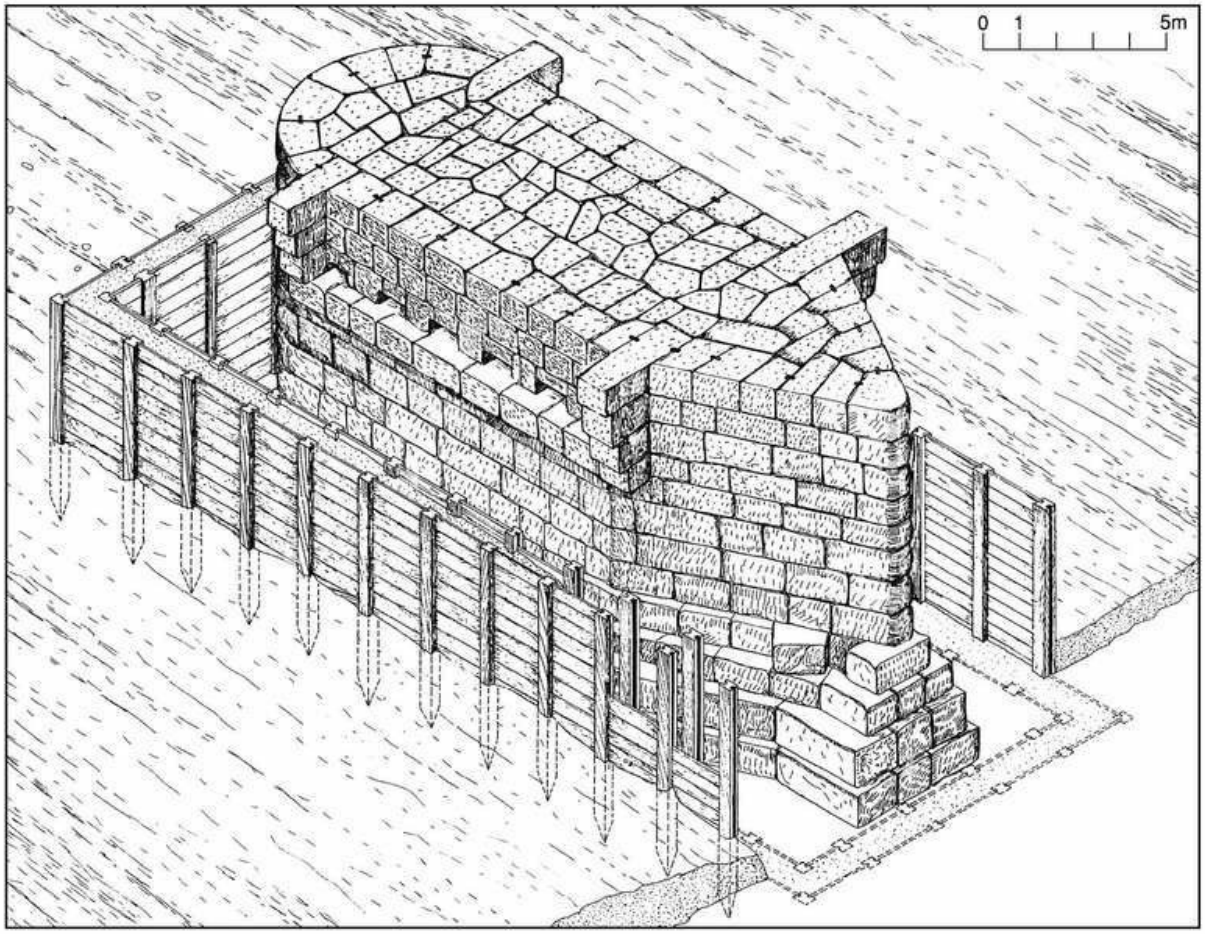
一、确定桥墩所处的位置，然后将其前后左右用木桩和木板围成一堵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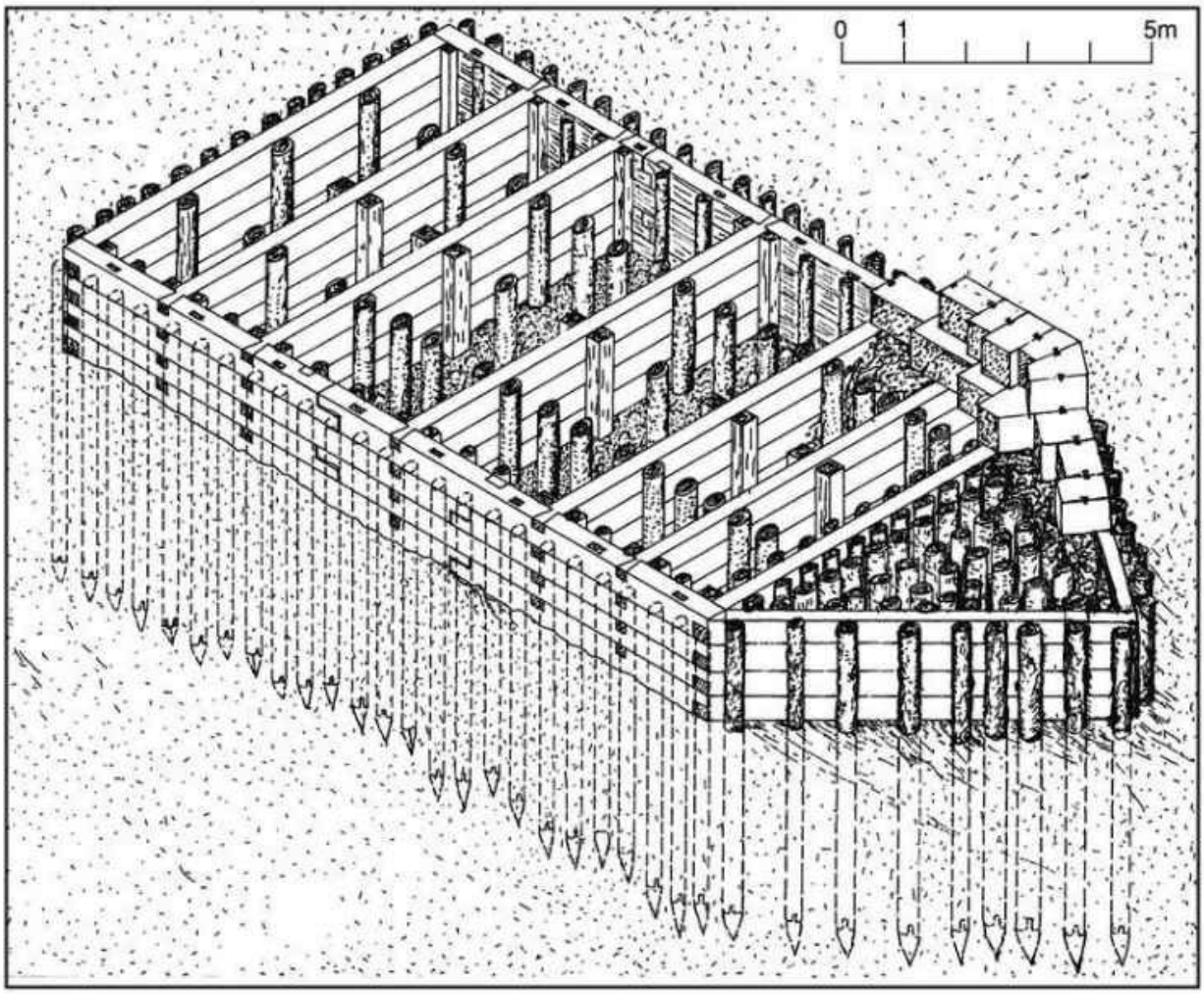
二、把围墙内的水排干。

三、这样，河床就形成了与干燥地面一样的状态。然后，将河床向下挖，并堆砌石头，建造起桥墩部分。


城市以外的道路
人行道
排水沟
车道
排水沟
人行道
市区的道路
人行道
车道
人行道
排水沟
排水沟
古罗马时期的典型桥梁
排水沟
排水沟

道路、桥梁的排水系统





桥墩施工方法：桥墩建在汲干水的围墙中。左图是在石头下面用木桩填实的方法（两张图均摘自Vittoro Galliazzo，“I Ponti Romani”）

这种作业方法除了作业机械化这一技术进步以外，即便到了现代也采用完全一样的方法。虽然多瑙河上的图拉真大桥那样长达1135米的桥梁采用了在石头下面进一步用防水木桩填实的方法，但是台伯河上只需150米左右的桥梁，当时并无这样做的必要。图拉真大桥只有桥墩部分用石头建造，桥墩上面则全部使用木头，而其他桥梁则从上到下都是用石头建造，而且连桥梁的栏杆部分也用的是石头。

为什么罗马人如此尽可能多地使用石头呢？两千年前的欧洲，森林比耕地还多，因此并不缺少木头。可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执著于使用石头

呢？

阅读研究人员的论文，我们便会知道，古罗马时期的桥梁每平方米能够承受2吨的负荷。

但是，据现代实际建造道路和桥梁的技术人员说，桥梁必须承受的重量有两种：

其一，是活载重。桥上通过的人、汽车、马车等是活动的重量，在这个意义上称为“活载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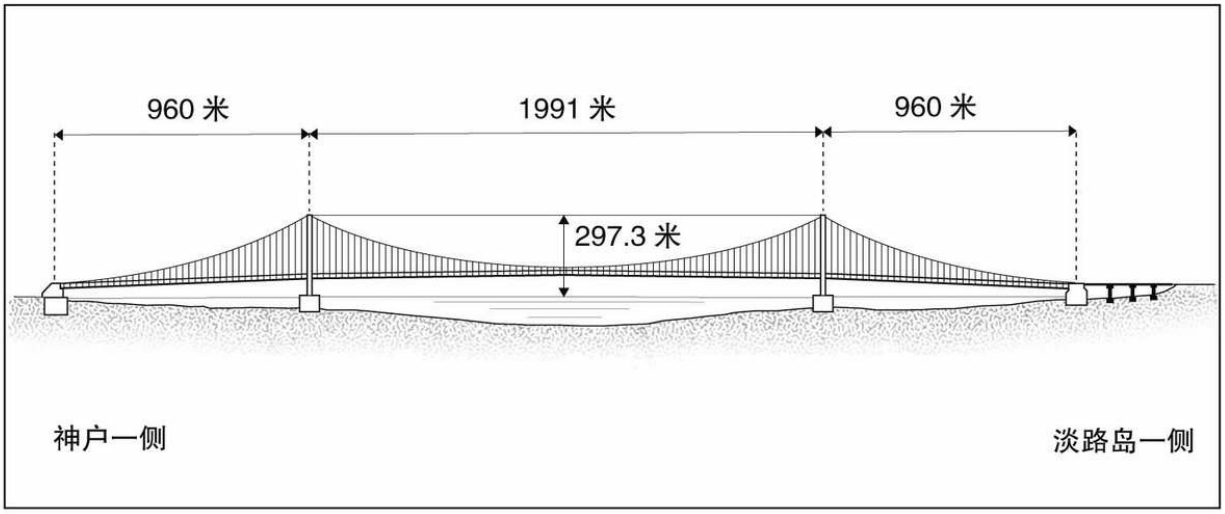
其二，是静载重。桥梁本身的重量是不动的重量，因此称为“静载重”。

据说，古罗马时期每平方米2吨的石桥载重应该是指“活载重”。而实际的“活载重”也许只是其十分之一（200kg/m2），乃至二十分之一（100kg/m2）。但当时的工程师们为了加强桥梁的耐久性，选择了大于实际需要的载重能力。不过，桥梁强度的“安全率”，也因此高达现代桥梁的三倍。

那么，桥梁必须承受的另一种重量“静载重”如何呢？按照现代的工程师对古罗马桥梁进行的推算，大约为每平方米10吨。

这样，古罗马时期桥梁的“活载重”和“静载重”的比例就为1 ： 5，合计载重达到每平方米12吨。

值得一提的是，两千年后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桥梁之一——明石海峡大桥的“活载重”和“静载重”的比例为1：10，这两种载重加在一起，每平方米为178吨。也就是说，历经两千年漫长的岁月，使用的材料和桥梁建造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明石海峡大桥侧面图

尽管如此，在台伯河上的11座只使用石头的古罗马时期的桥梁中，有5座至今仍在使用，有300座以上古罗马时期的桥梁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和车在上面通过。不仅如此，两千年后住在欧洲的人每天使用的欧盟货币——欧元上，也采用了古罗马时期的桥梁图案。

欧元有5、10、20、50、100、200、500欧元7种纸币，而它们的背面全部印有桥梁的图案。

5欧元——古代，古典式风格

10欧元——中世纪，罗马式风格

20欧元——中世纪，哥特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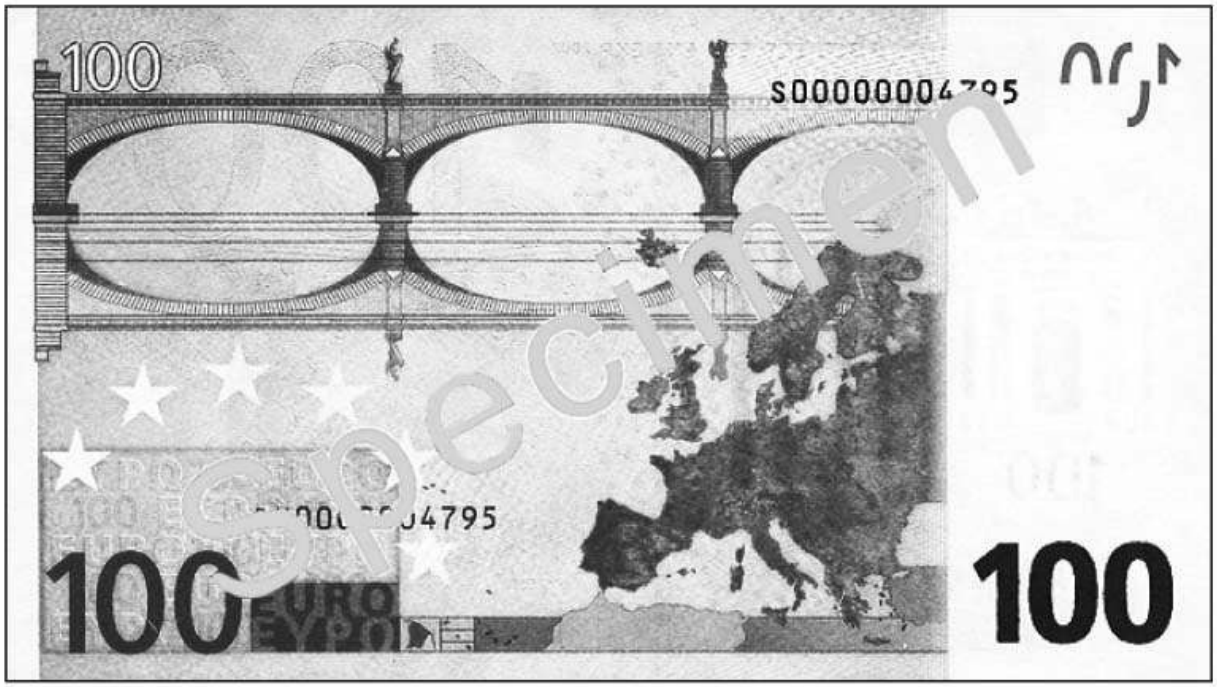
50欧元——近代，文艺复兴式风格

100欧元——近代，巴洛克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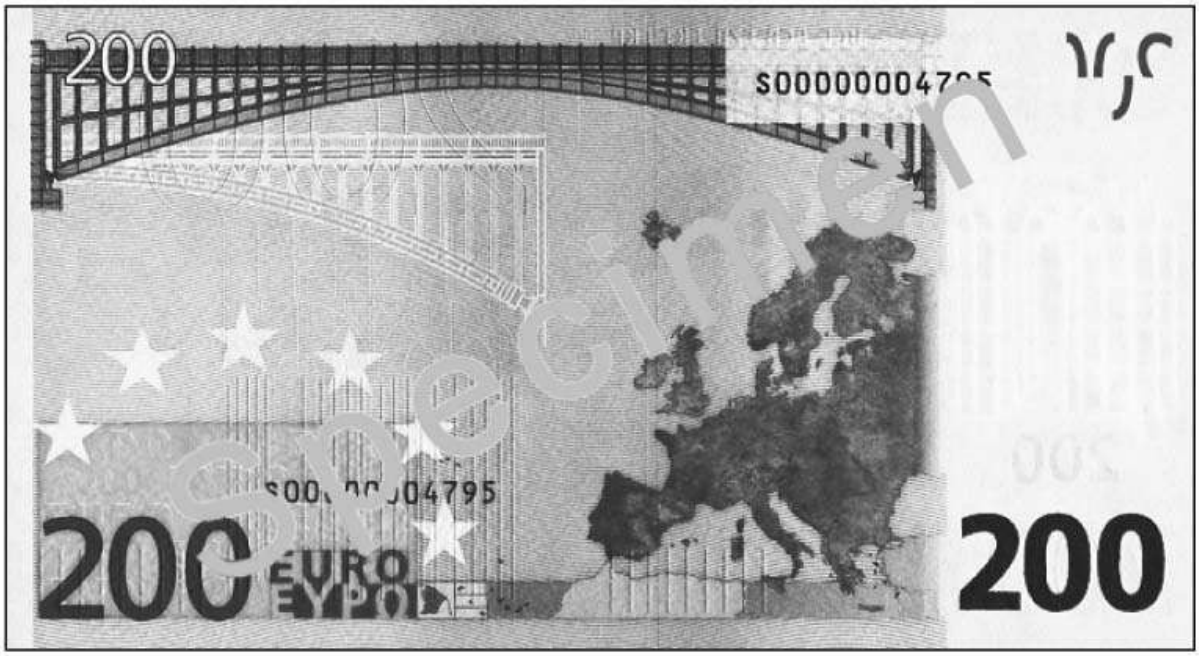
200欧元——现代，钢铁和玻璃

500欧元——现代，20世纪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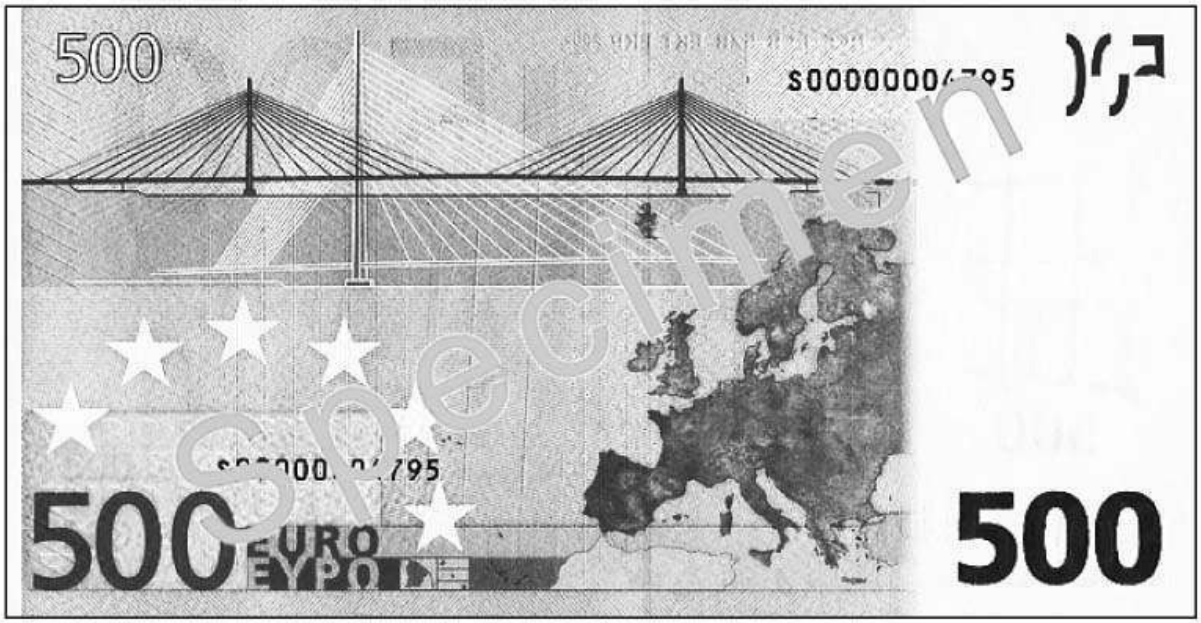
50欧元纸币 （近代，文艺复兴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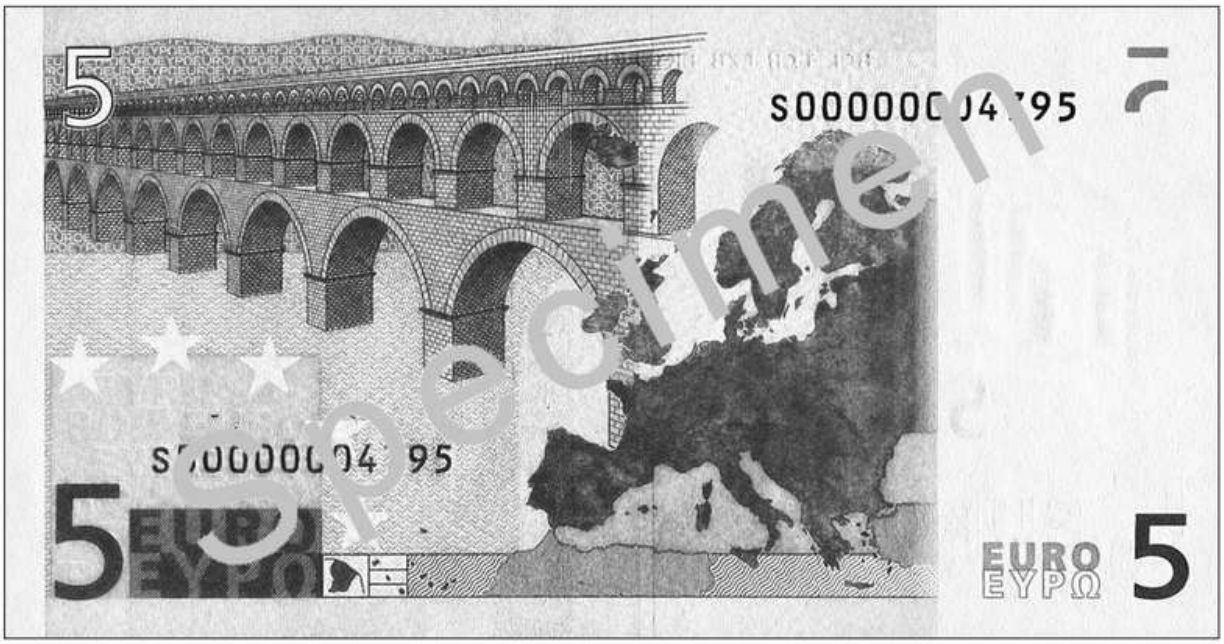
100欧元纸币 （近代，巴罗克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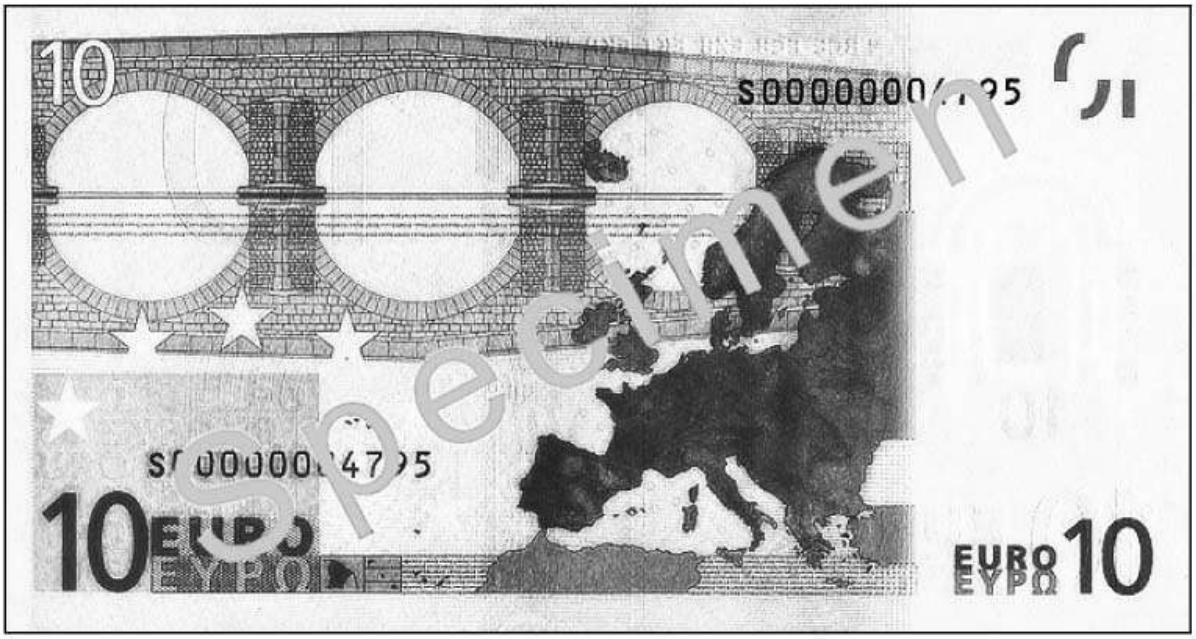
200欧元纸币 （现代，钢铁和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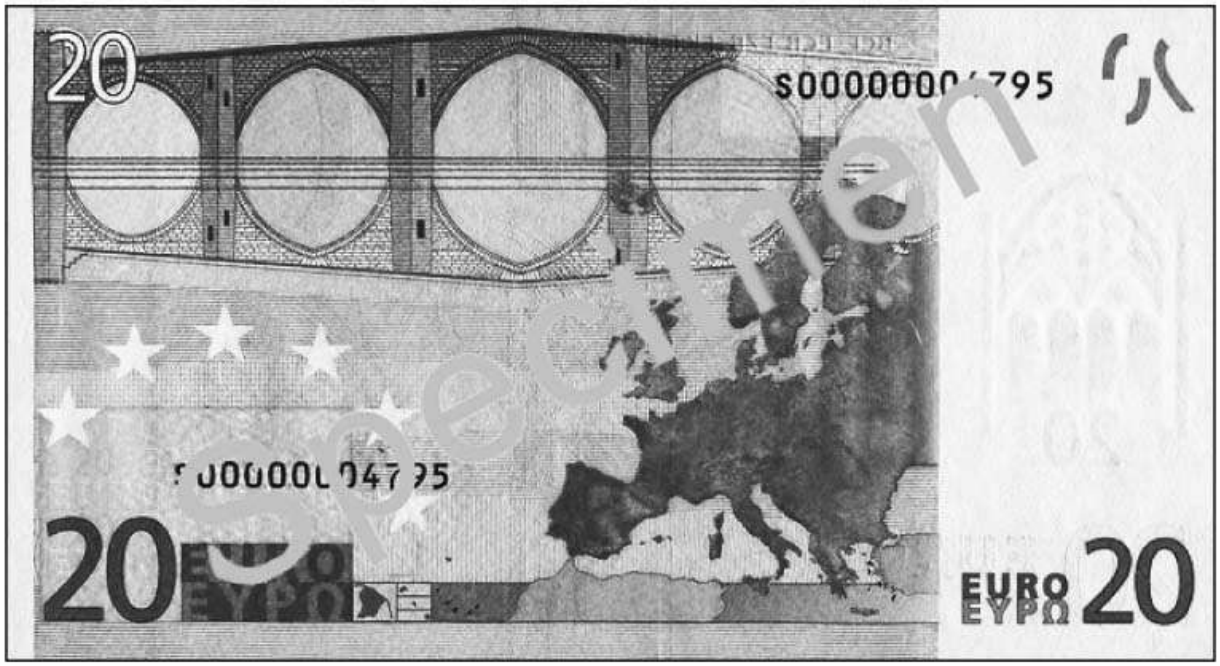
500欧元纸币 （现代，20世纪风格）
欧盟纸币上的各种桥梁图案（每张图片中的“specimen”意为“样本”）



5欧元纸币（古代，古典式风格）



10欧元纸币 （中世纪，罗马式风格）



20欧元纸币 （中世纪，哥特式风格）

所有的欧盟纸币都以桥梁图案相统一，也许是因为想要通过促进交流的“桥梁”而不是拒绝人与人交流的“壁垒”来象征欧洲联盟吧。而且，欧盟的“桥梁”绝对不能缺少那些至今仍在欧洲各地使用的古罗马时期的桥梁。我甚至想，如果把这些纸币给古罗马时期的工程师们看一下，他们一定会十分自豪。

我们的话题再回到古罗马时期。在那个时期，道路和桥梁都是不收费的，而水道也只有有限的一些可以征收水费，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阐述。因此，根本谈不上盈利。这一点让我越来越觉得，罗马人把基础设施视为不惜一切代价的一项重大工程。正因如此，这些工程建设的决定权掌握在相当于现代国会的元老院手里，而制订方案的权力和施工的最高责任则掌握在共和国时期在财务官、执政官手里，在帝国时期则掌握在皇帝手里。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如果它不将基础设施当做国家政治，而只是单纯的土木工程，那么绝对不会由同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官或皇帝管辖。

在整个古罗马时期，没有一条道路和一座桥梁经过当时执政官、独裁官或者皇帝的家附近，这一事实也反映了罗马人的一种思想，那就是基础设施必须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而不能以权谋私。

从罗马经佛罗伦萨、博诺尼亚通往米兰的意大利1号线高速公路，在靠近佛罗伦萨的地方，穿过了时任首相的选区阿雷佐。本来可以笔直通过的地方修成了一条弯曲的道路。这样的事情在古罗马时期，即使皇帝也没有做过。哈德良大帝位于蒂沃利的别墅，距离提布尔提那大道不远，但是联结这条干道和皇帝别墅的却是一条由哈德良大帝自费修建的私人道路。不过，这条路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无关人员请勿入内”的“私人道路”，因为住在皇帝别墅附近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自由使用。

有了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认识，当然就不会胡乱建设道路和桥梁。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由财务官和执政官明确优先顺序，并予以落实，而在罗马帝国时期，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则是将这两个官职集于一身的皇帝。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将视为一体的道路和桥梁分成以下几类：

（一）公路：由国家铺设，其后的养护由身为皇帝直属公务员的“大道监督官”负责。按照《道路法》，公路必须保证4米以上的铺石车道，左右各3米的人行道，此外还要每隔1罗马里建造一个里程碑，每隔一天路程要提供住宿和换马等服务。除了有徒步旅行的人以外，可以说罗马的干道提供与现代高速公路一样的服务。

（二）军用道路：单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建造的道路，大半为铺石道路，也有只铺石子的道路。但不论哪种铺设方法，车道均为相向双车道。有很多道路沿着防御的路线铺设，无论是铺设还是养护，都由当地驻扎的军团负责。

（三）支线：相对于按照国家政治需要铺设的干线道路，支线道路由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铺设。铺设工程和其后的养护都由地方政府负责。

（四）私人道路：铺设、养护都由土地所有人负责。但所有人以外的人也可以通行，因此应该视为个人私有土地内的道路，而不仅仅是通往居住地的道路。

根据研究人员的推算，这四种古罗马时期的道路全长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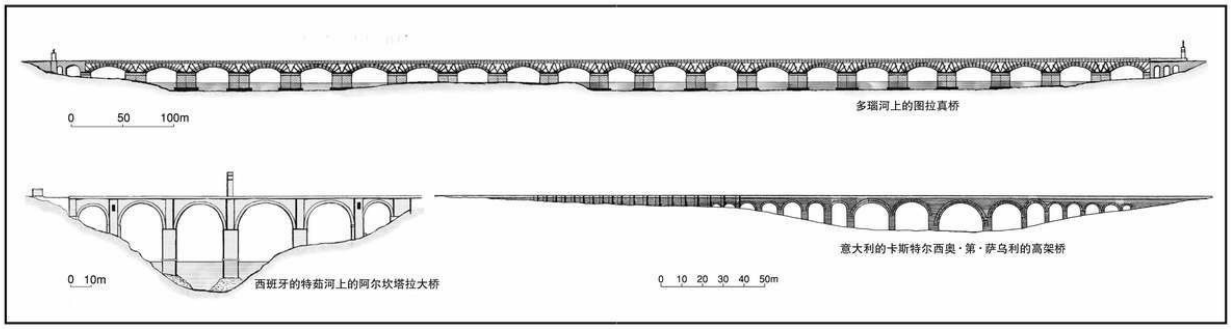
（一）8万公里

（一）+（二）+（三）15万公里

（一）+（二）+（三）+（四）30万公里

而建在所有这些道路上的桥梁，据称总共达到3000座之多。

说到这里，历史爱好者，甚至连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同样想知道，当时古罗马到底花了多少费用来建设道路和桥梁呢？然而，遇到这个问题，无论多么大胆的研究人员也只会三缄其口。其原因并非像其他事情一样，在古罗马时期曾经有记载，经历了中世纪便遗失了，而是罗马人本身没有相关的记载。至于施工人员之间的联系事项之类，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无论是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还是弗朗提努斯的《关于水道》，亦或百科全书式的老普林尼所著的《博物志》这样的著作中，都没有谈到建设费用。当然，更不用指望对基础设施并不是特别关心的历史学家的著作。



古罗马时期各式各样的桥梁

其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现代的基础设施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常常便是收购用

地，而这一点对古罗马时期的基础设施工程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第二，古罗马时期的基础设施工程，无法计算工程师、熟练工人的人工费。

因此，关于买地的问题，所需用地的宽度如上图所示，需要购买12米宽、数十公里至数百公里的土地。

水道无论是走高架引水桥，还是走地下通道，宽同样是大约2.4米。另外，桥梁是从河流上通过，所以有人也许会说不用购买土地。但是罗马人认为桥梁是道路的延伸，因此即使是斜坡，到水为止的土地也需要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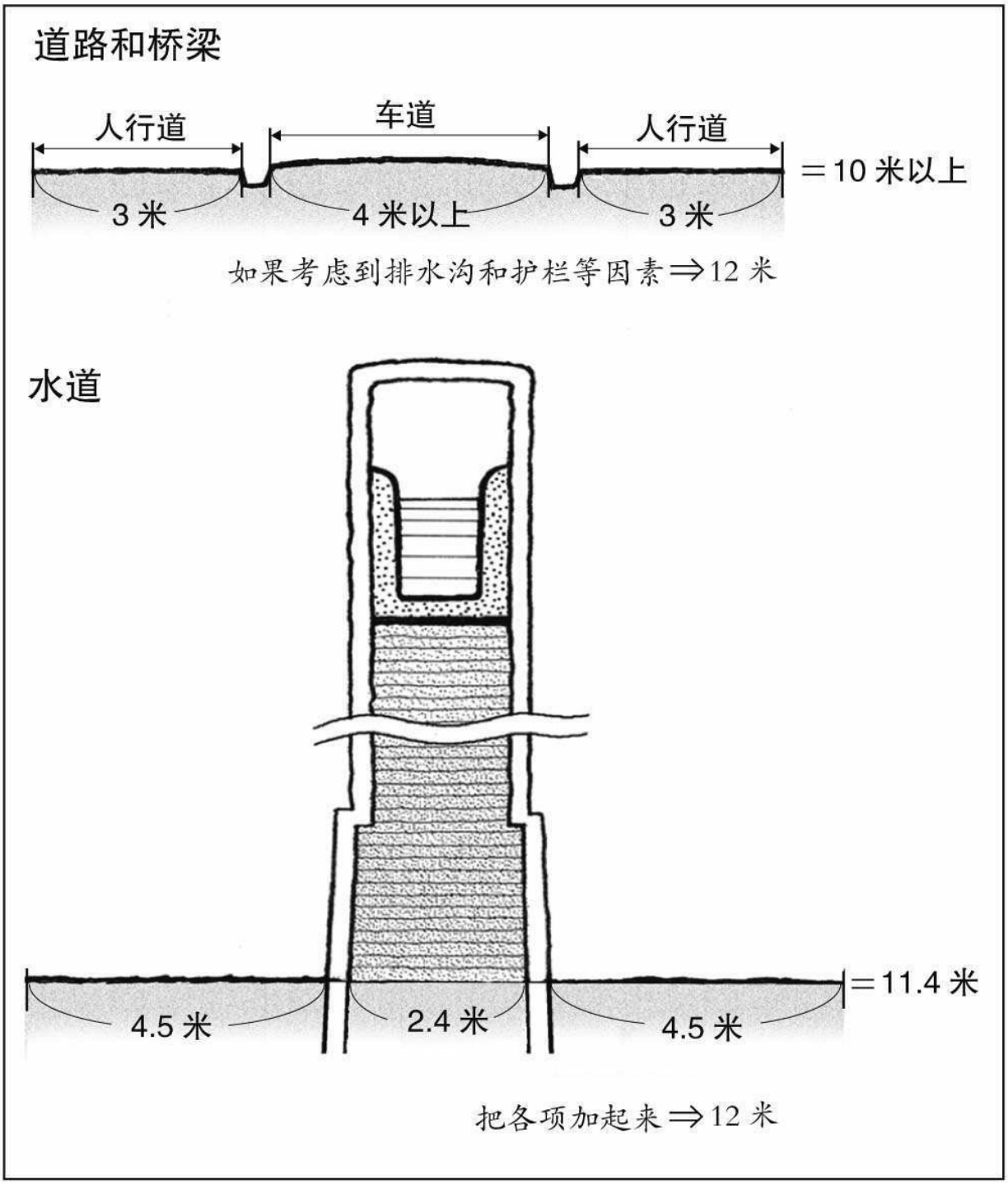
但是，根据古罗马的法律，私有财产绝对得到保护，不允许以公共事业为由强行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因此，只能由国家购买。

尽管如此，所需要的只是呈带状的12米宽的土地。据史书记载，有时所有人不愿意自己的土地被一截两半，国家便买下建设所需的土地和其两边的土地，再将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卖给别的人。不愿意土地被截断是因为，无论是道路还是水道，都禁止家畜在其间往来，因为这会给养护带来不便，也会影响道路和水道的保护。

在古罗马时期，国家购买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的土地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从尤里乌斯·恺撒建造恺撒广场时花费了6000万塞斯特斯巨资用于征地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确定了要修建道路、水道的时候，这一带的地价就趁机飞涨，或者土地的所有人不肯卖地之类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是因为，修路、架桥、引水道，首先从中受益的便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相当于当时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与现代的高速公路不同，徒步旅行

的人也可以使用，而且没有收费站，出口、入口也不是固定的，因此只要建造通到这些罗马大道的私人道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免费使用罗马大道。



道路、桥梁和水道所需用地的宽度

当时，水道也可以引到附近的农地和居民的家中。当然，这需要得

到水道局的批准，因为这会涉及通过地下通道内的水压问题。

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罗马人强烈的公共精神。甚至有人为了公共利益，把12米宽的带状土地捐赠给了国家。在古罗马时期，国家征地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这方面来说，它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天堂。

第二个理由，即无法计算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人工费，因为它和军费开支是重合的。

在古罗马时期，像神庙、广场、水道工程这样的基础设施工程，是采取通过招标制度由私营企业承包的方法。但是，唯独大道和桥梁，实际施工的是军团兵，尤其公路、军用道路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罗马大道本来的目的便是军用道路。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工人，都是属于军团的工程师和士兵。这样，就好像整个部队从事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修建一样，因此人工费都是从军费开支，也就无从知道总体的建设费用。而且，有趣的是，罗马人自己并不认为不允许存在这种不透明，而是认为存在这种现象理所当然。

罗马式的基础设施延伸到各个行省，是在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这个时期也是罗马的国家方针由攻转守的一段时期。随着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提出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成为现实，部署在整个国防线上的军团跟敌人打仗的日子比以往减少了。尽管如此，国家仍然需要居安思危，因此缩减军力自然是有限的。奥古斯都曾经说过：“坐着的士兵称不上士兵。”他认为，对于通过同化被征服的民族而开拓了疆土的罗马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保障国家安全。

而且，士兵们也不会抱怨说，自己是为了从事军务而参军的，并不是参军是来铺路的。当然，也许心中这样想，嘴里却说不出口。这是因

为，皇帝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要考虑道路从哪儿通到哪儿，获得元老院的批准后，又作为工程的最高负责人组织施工。所以，有义务服从皇帝的军团兵，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施工现场，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讲过，当时对铺设道路的皇帝都有赠送凯旋门的习俗，以示感谢，而这种凯旋门上，通常肯定会清楚地刻上“工程由第××军团的军团兵完成”这样的字样。这样，横跨欧洲、中东和北非的罗马帝国长达8万公里的干道几乎是由军团兵铺设的，而且罗马人认为，仅仅修路架桥，作为交通道路还不完整。

这就需要了解，统称为罗马大道的罗马式道路——也就是全线铺石头的道路——是用来运送什么的。

使用罗马大道的人

罗马大道，首先是用来把军团从驻扎地运送到需要派兵的地方的道路。虽然称为军团，但它并不是只指军团兵。罗马军团主要分为三类：军团兵，当这种军团兵的条件是必须享有罗马公民权；辅助兵，由行省的志愿兵组成；还有骑兵，也多为出身于行省的人。这三种分类，也可以称为重装步兵、轻装步兵、骑兵。在数量上，步兵最多。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首要的是军团兵，而军团的构成从罗马的战术上也分为这三类。

不过，罗马军团的编制还包括其他人员。因此，军团调遣时，战斗人员以外的人和车也会随之一同行动。首先是医疗队。除了救护伤病员的医生和护士外，罗马军团还配备给牛马等治病的兽医。其次是军团里的工程师。这些人相当于工兵队长，但是除了当助手的人之外，并没有专门的工兵队员。罗马军团的特色是，不仅军团兵是熟练的修路工人，还包括辅助兵在内的所有士兵都是“工兵”。甚至有人说：“罗马军队是靠丁字镐取胜的。”

此外，一切运输工具都带有轮子，以便可以在战场上移动。在行军的时候，还会有用牛车运送攻城器械的队伍一起同行。考虑到节省运送这种重型武器所需的劳力，铺设罗马大道的时候，必须尽量平坦、笔直，而且用石头铺设得密不漏缝，甚至刮风的时候也不会在路面上尘土飞扬。

另外，在行军时，也少不了运送野营帐篷、军粮的车辆。这些车辆往往都是牛车。也有人说："罗马军队是靠兵站（后勤）取胜的。"罗马人认为，战争最后依靠的是每个士兵的精神力量，而在此之前必须做的便是，创造一个能让每个士兵都发挥最大精神力量的环境，也就是"后勤"。

由这一切组成的罗马军团行军的时候，即使拥有4米宽车道的罗马大道，大概也会显得拥挤不堪。为了在行军的时候便于一般的路人通过，绝对需要与车道并行的人行道。

使用罗马大道的第二种人，便是普通的民众。所谓罗马大道，就是有人行道而且没有收费站的现代高速公路，这样想比较容易理解，因此它是无论是一般旅行的人还是运送附近农产品的车辆，谁都可以使用的道路，它与行人不能通过的现代高速公路不同。而且，罗马大道上，既有每逢节日便浩浩荡荡地出发去郊外别墅度假的城里人，也有一心想要在这个被称为“世界之都”的罗马创业，而从西班牙行省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横穿法国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经意大利北部千里迢迢来到罗马的人。另外还有艺术家为了得到权贵的赏识，满怀希望地从东方远道而来。

此外，从罗马大道获益的人，还有农民和商人。这是因为，在闭塞的山区，人们原来都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建设了道路网之后，村子里的农产品便可以容易地运到城里了。人们懂得了通过促进物产流通可以提高生活水平，而这些人占了使用罗马大道的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平坦笔直而且铺设整齐的罗马大道与以往的乡间土路相比，不仅可以缩短时间，而且能够运送更多的货物。交通的次数增加了，每次的运输量也增多了。

随着人员和物资的频繁交流，经济也会随之发展起来。遍布整个罗马帝国的道路网把罗马帝国连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这个罗马经济圈，不仅仅是现代的欧盟，而是覆盖了欧洲、中东和北非。如此大范围的经济圈，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人也没有实现。而经济圈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能够保持持久的和平。如果说“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因为成功地抵御了外敌的话，那只说对了一半。这是因为，罗马帝国还成功地消除了多民族国家容易发生的帝国内部的纠纷，才得以维持长久的和平，而且是长达大约300年的和平。而对维持这种“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作出贡献的，便是罗马大道。如果人要保持健康，那么，将血液输送到人体各个部位的血管必须正常地发挥作用。罗马的道路网便是罗马帝国的血管。这是依靠仅仅不足20万人的军团兵就能够维持庞大帝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原因。

利用罗马大道的第三种人是邮递员。古罗马的邮递制度采用国营邮政投递系统，但在古罗马，不是步行，而是骑马或驾马车投递邮件，并通过反复换马的方法加快速度。而且，这种制度并不是想要投送邮件的时候邮递员才会出发，而是不论有无邮件，邮递员都要定期往返。

这种制度也是尤里乌斯·恺撒发明的，当时在他正在远征的高卢和首都罗马之间需要快速联系，因而想出了这种办法。奥古斯都当上皇帝以后，将它变成了一种国营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动高卢战争的时候，恺撒的行动惊人地迅速，

令高卢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而恺撒之所以能够做到行动神出鬼没，正是归功于他想出来的情报传递方式。

首先，组织一支专门负责传递情报的士兵队伍。同时，在高卢通往意大利本土的路线上（当时的高卢还没有开通罗马式的大道，但是已经有通行的道路），每隔一天的骑马行程，配置一个更换人马的驿站。也就是说，马累了以后，可以换乘另一匹马，而且人也可以轮换。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接力方式，亦即驿传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已经变成了现实。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也并非没有传递情报的方法。但他们的传递方法是，只有需要传递事情的时候，才去传递情报，而恺撒的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创建了一个可以随时传递情报的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恺撒在当时比任何人都更快地获得情报，而他自己行动的时候也使用这个系统。当全速疾驰的马口吐白沫、气喘吁吁的时候，他便会跳下这匹马，骑上牵来的另一匹马继续疾驰而去。据说，紧急的时候，恺撒一天走的路程为100公里。即使他自幼擅长骑马，如果不采用这种换乘方法，肯定也不可能做到如此神速。所以说，神出鬼没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据说，在恺撒转战的地方，像线上的点一样，全部设有常备几匹马的站点。

在独创才能方面远远不及这位养父的奥古斯都，在把恺撒的指示变成国家政策的才能上，却丝毫也不逊色，而且这位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统治罗马长达40年之久，他有足够的时间贯彻任何一项政策。国营邮政制度就是由他完成的。

在尤里乌斯·恺撒转战各地、开疆拓土之后，奥古斯都得以专注于防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确立了罗马的和平。而传递情报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作为罗马的第一代皇帝，在他40年的统治期间，几乎全部在首都罗马统治整个帝国。只要看一看地图，我们便会看到，首都罗马位于罗马帝国的中央。只要全国各地的情报传递到罗马，皇帝的指令传达到帝国

各地，建立了这样的系统，即使不离开首都，也能够统治广大的领土。意大利本土内的道路网在共和国时期已经大致完成，而把道路网扩大到所有行省则是在建立罗马帝国之后。而且，随着道路网的扩大，用来收集情报和传达命令的国营邮政系统也不断扩大。

奥古斯都如此坚持建立这种制度，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与其养父恺撒不同，他自幼身体虚弱，而且不善于长时间骑马，不是那种活跃型的领导。不仅如此，与他的养父完全相反，如果由他指挥战斗，便必输无疑。此外，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帝国还处于形成过程。罗马帝国要把征服的地方变成行省，让它们与其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正在付诸实施。为了镇压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地方叛乱，作为罗马军队最高指挥官的皇帝需要有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才能，而奥古斯都并不具备这种才能。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缺陷，他只有依靠曾经追随恺撒的阿格里帕。当然，罗马帝国幅员辽阔，靠阿格里帕一个人显然难以平定天下。阿格里帕既然受到恺撒的赏识，自然有武将之才，但他并不是天才型的军人。虽然在与布鲁特、安东尼的交战中，他都战胜了敌人，但如果遇到汉尼拔，他也许就会一败涂地。在现实中，奥古斯都也是任用了多名武将。虽然奥古斯都并无武将之才，但他具备用人之才。也就是说，在取长补短方面，他是一个天才。他参考了阿格里帕的建议，派遣到至今尚未臣服的边境地区的总督人选都非常胜任，而且，在与这些驻扎在帝国战略要地、推动这些地区与罗马帝国融合的将军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在首都统治整个帝国的皇帝来说，必不可少。

铺设罗马大道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军团的调遣，而罗马的邮政制度也是出于统治广大帝国的需要而诞生的。但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建立的系统也可以转用于其他目的。这个为了联结皇帝和将军们而建立的制度，自然而然也逐渐被国内的人所利用。与道路有助于使帝国融合为一体一样，邮政制度也有助于使帝国各地的人融合为一体。古罗马执政者的目的，不是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之间建一堵墙来相互隔离，而是如普鲁塔克所言，通过“同化败者”，使整个罗马帝国融为一

体。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要避免的第一件事，便是各个民族和部族的孤立。

一种社会系统，不应当是为了社会上的当权者而存在，它必须符合普通人的要求，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它应该与发明人个人的能力无关。否则，它就不能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个系统，也不会有持续性。我想，所谓罗马帝国，就是由恺撒绘制蓝图，由奥古斯都建立，并由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巩固而形成的一个国家。国营邮政制度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提比略所做的事就是，每个驿站都配置一队治安人员，以保障罗马大道上行人、车辆以及邮政的安全。

恺撒是一位体力充沛、骑乘能力出色的人，一天能够驰骋100公里，而提比略据说也曾经昼夜不停地骑马驰骋过140公里。相反，奥古斯都即使去位于罗马近郊的妻子莉薇娅的别墅这样不到10公里的路程，并且只走弗拉米尼亚大道，也喜欢坐轿子前往。这是因为四面拉上帘子以后，可以在轿子里面读书或者躺着休息。然而，由体质如此不同的三个人修建的罗马大道，其各种设施却完全按照普通人的需要，这一点确实有趣。领导人也许不能忘记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即使背着装有“公务电报”的皮筒策马疾驰的人，罗马帝国也不要求他们一天必须走70公里以上。不过，一天走70公里在当时被当做一个标准，他们平均每隔8罗马里，就配置一处保持这个速度所需的设施，也就是用来换马接力的设施。像罗马的领导人这样践行“坚持就是力量”的人绝无仅有。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沿路配置的换马设施，就是驿站，比前面所说的“站点”更加单纯，有强烈的“只是能够交换马匹的设施”的意义。拿现代的高速公路来说，就相当于加油站这样的设施。

恺撒

奥古斯都

提比略

当时的公文，都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卷轴，因此把它装在一个皮筒内，背着筒策马驰骋，就是当年邮递员的工作状态，但这些人都带着证明其任务的“公文”。而且，按照奥古斯都施行的、可以称为《邮政法》的法律规定，携带这个证件的人必须达到所有规定的要求。当然，所需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由此看来，建立国营邮政制度的目的，在于传递公文，但是，虽然罗马人热衷于制定规章制度，但在执行的时候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反正都是寄到首都罗马，皇帝和元老院也都默许捎带行省总督给妻儿、亲友的信件。

但是罗马帝国的国营邮政制度，并不仅仅包括带着公文疾驰的马匹和邮递员。它还办理用马车投递的信件和包裹，这种马车可以称做邮递马车。在边境执勤的士兵们寄给祖国亲人的信，还有亲人寄给士兵的物品，都是采用这种邮寄方式。而且，如果使用马车的话，除了换马的站点以外，还需要能够修理马车的设施。除了邮递马车以外，罗马大道上还有用于运送普通旅客的私人马车和公共马车，因此旅馆也不可缺少。毕竟能够住在亲友别墅里的人不过是少数人。所以，考虑到大多数人，每隔一天的行程，在罗马大道上就设有一个设施完善的“驿站”。据说，驿站间的距离是每隔5个换马站设一个驿站，大约间隔60至70公里。这种“驿站”在拉丁语中称为“mansiones”，现代英语中的“mansion”（公寓）一词便是由此而来。古罗马时期的驿站，在现代来说就相当于简易汽车旅馆。

古罗马时期的邮递马车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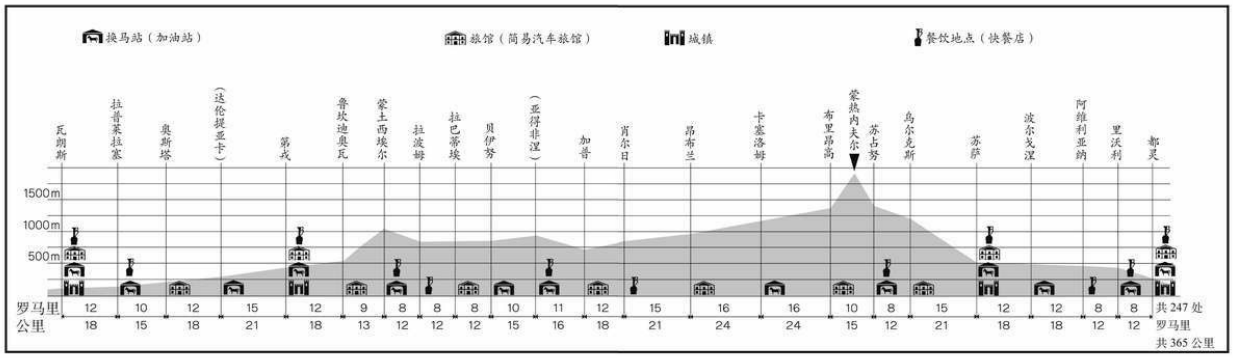
驿站间的距离并不固定，其原因与我们前面谈到换马站之间的距离时，只能以“平均”来说明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平坦的路面与崎岖的山区，无论是人还是马，疲劳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如果是阿皮亚大道43公里的笔直道路，即使是徒步旅行的人，一天也能走完，但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道，就不能指望走这么远。虽然据说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道由于铺设时地形选择非常合理，而且排水装置十分完善，所以冬天也能通过，但是它比通过平原的大道需要建设更多的设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有一幅图。这幅图说明了从今天法国的瓦朗斯至意大利的都灵之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沿线设置了什么样的服务设施。记载这幅图的史料出自公元333年从波尔多旅行至耶路撒冷的朝拜者留下的记录。这本名为Itinerarium Hierosolymitanum Burdigalense的游记特点在于，他记录了自己一路经过的大道上所有的设施。这位朝拜者之所以如此规规矩矩地把这些沿途的设施记录下来，也许是想要供他之后的朝拜者作为参考。但是它不仅成为公元4世纪到罗马旅行的人的一个参考，而且对后世的古罗马研究也作出了贡献。看到这张图，我想会让您理解我为什么把罗马大道看做当时的高速公路。

首先，城门一样的符号表示的是城镇。马厩一样的符号表示换马并有马车修理设施的地方，用现代的高速公路来打比方，便是带汽车维修站的加油站，在古罗马时期称为“站”。房子形状的符号表示有住宿设施的地方，称为“公馆”。用稻草编织的、装葡萄酒的包装袋的符号表示可以用餐的地方，如果是现代的高速公路，就相当于快餐馆，古罗马时期称为“他贝尔那”。它是一种坐下来就能用餐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小吃店。

在古罗马时期，今天法国的瓦朗斯和意大利的都灵已经是中等城市，因此城市设施完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法国的第戎和意大利的苏萨

这两个地方具备同样水平的设施，则是在罗马大道通到阿尔卑斯山脉之后的事，也就是说，是在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建成高速公路之后。如图所见，这是因为从这里开始终于翻过山脉了。



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大道沿线的各种设施（瓦朗斯至都灵）

表示每隔几罗马里有什么设施的这张图上，只有瓦朗斯至都灵的这条路。但是出自罗马人之手的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道并非只有这一条。我们要想到，罗马大道的特色在于复线化、网络化。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翻山越岭的其他罗马大道也大体上是这种情况，各种服务设施都非常完善。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意大利半岛是它的本土，它的北端环绕着阿尔卑斯山脉。在现代，意大利由西向东分别与法国、瑞士、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接壤，而在古代，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全部是罗马帝国的领地，因此罗马的干道理所当然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向西、向北、向东延伸。这些干道由西向东依次为：

从热那亚沿海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法国南部的一条大道。这条路直接越过比利牛斯山脉通向西班牙。

从都灵越过阿尔卑斯山，通向罗讷河沿岸的瓦朗斯，然后北上通往里昂的大道。

从位于都灵北部的奥斯塔越过阿尔卑斯山，经过格勒诺布尔，直至高卢中心地带的大道。

同样起自奥斯塔，不向西，而是往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莱芒湖，经日内瓦通往高卢的大道。

所以，仅仅越过阿尔卑斯山，向西的干道就有4条之多。

通到莱茵河和多瑙河最前线的干道有6条之多，而其中的4条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

到达莱芒湖之后，继续北上，通往莱茵河上游，经斯特拉斯堡，通往美因茨、波恩、科隆等这些边境最前线基地的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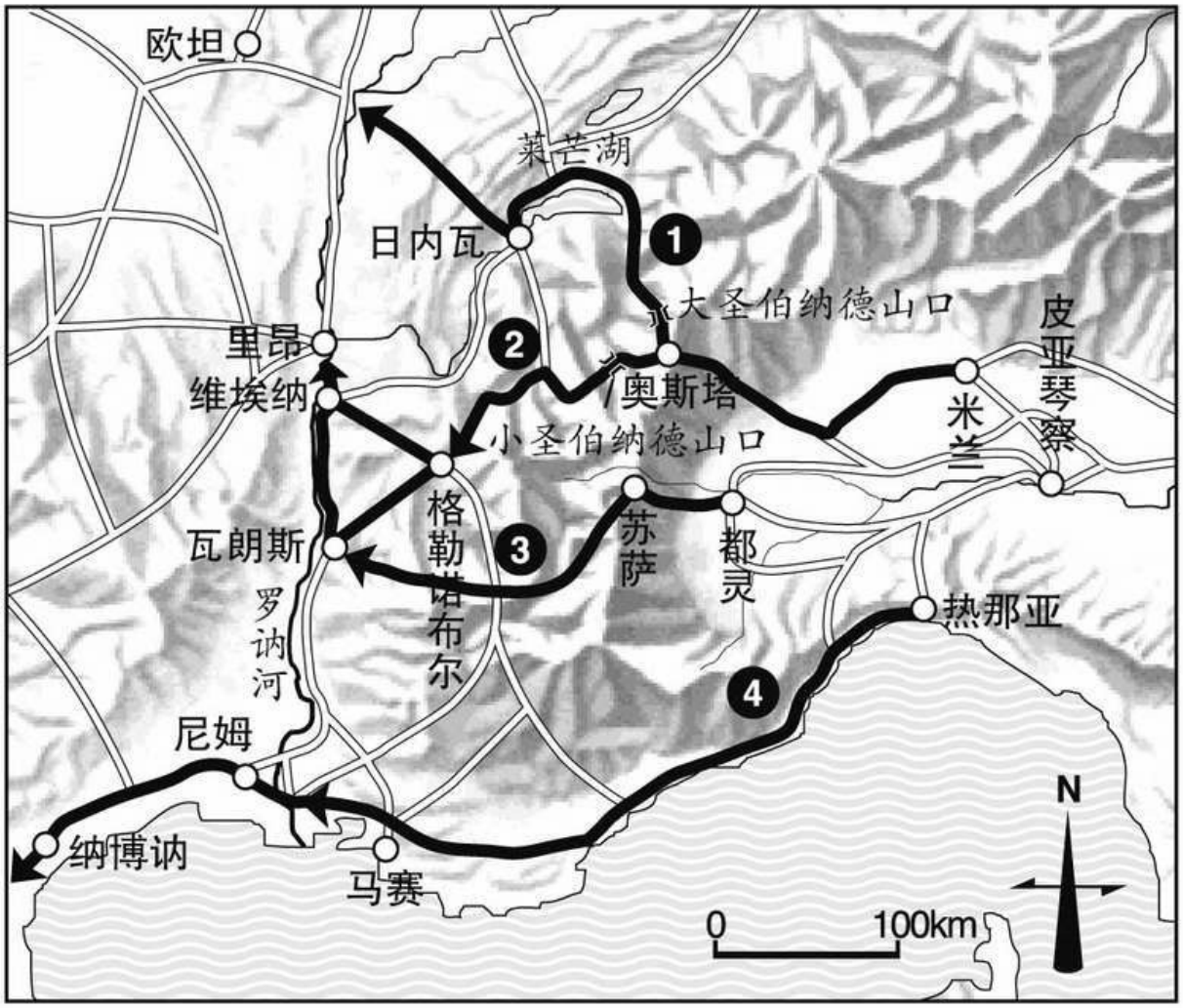
从米兰北上，至科莫湖，由此向北，沿博登湖岸，向奥格斯堡，通往雷根斯堡的大道。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在古罗马时期称为卡斯特拉莱基那，这里和莱茵河沿岸的军团基地美因茨之间有一条日耳曼长城相联结，因此是战略上的重要地点。

起自维罗纳、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大道，则是北上至特伦托，由此翻越阿尔卑斯山。然后，经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到达多瑙河的前线。

威尼斯水城是罗马帝国末期防御蛮族入侵而诞生的城市，因此在古罗马时期还没有这座城市。在古罗马时期，意大利东北部的重要城市就是位于后来形成威尼斯的海湾陆地上的阿奎莱亚。通向多瑙河这个帝国最前线，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大道也是起自阿奎莱亚。从意大利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后，便是维也纳、布达佩斯。保卫帝国最重要的防线的军团基地，全部部署在多瑙河沿岸，多瑙河与莱茵河一样，军队的船只一直保持巡逻。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现代欧洲各国的各个城市，全部是由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修通“高速公路”的罗马人变成城市的，一直延续至

今。



翻过阿尔卑斯山通向高卢方向的4条路线

有一次，我在科莫湖边的宾馆休养了数日。由于是休养，因此既没有带稿子，也没有带与工作相关的书籍。科莫湖作为一处疗养胜地，以风光秀丽著称，与南部的卡普里岛一样世界闻名。不过，我避开了喧嚣的地方和宾馆，住在了前面只有一片湖的、十分静谧的角落。

但是，虽然肢体在休养，脑子却还在运转，这也是我职业的不幸。我时而眺望暮霭中云雾缭绕的阿尔卑斯山，时而凝视水波不兴的湖面，开始思考这个湖当年不会不用于翻越阿尔卑斯山。想到这里，我站起身

来，请人准备了一条小船，赶到镇子的图书馆，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科莫本来不过是一个村庄，到了古罗马时期才发展成一个城镇。罗马人想，与其把科莫湖四周陡峭的湖岸削平，铺设大道，不如在湖上常备一支船队，来联结现代的意大利和瑞士。而最早决定在这里常备一支船队的罗马人便是尤里乌斯·恺撒。科莫湖上的船队后来消失了，是因为帝国末期入侵的蛮族烧掉了科莫湖上的船队以后，没有人再想去补充。

既然科莫湖曾经这样使用过，那么，莱芒湖以及其他许多的湖泊无疑也曾经被这样使用过。我们听到阿尔卑斯山脉，就会联想到悬崖绝壁一样的高峰，但阿尔卑斯山脉在许多地方也是对人类敞开的。这是因为沿着穿过山谷和湖泊的路走下去，人来车往都非常容易。况且，汉尼拔曾经带着大象越过了这条山脉。不过，罗马人想要的，是能够不受季节、天气这些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使用的道路。要寻找他们行为的理由，只要想一想做什么，怎么做才合理，便会明白。罗马人是古代唯一重视提高功能性和效率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全部力量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合理是一个基本条件。这是因为，瓦朗斯至都灵之间的罗马大道的各种设施确实配置得十分合理。

有一句格言：贤者学习历史，愚者学习经验。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既学习历史又学习经验，就不是真正的学习。因为历史是一种知识，而经验则让历史充满活力。

那是三年前我到多瑙河沿岸调查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乘飞机从罗马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在那里租了一辆带司机的汽车。我的目的是，首先北上到多瑙河，然后逆流而上，到达维也纳。因为，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维也纳这一带才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前线。

实地考察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到了维也纳，当我想扔掉汽车坐飞机回罗马的时候，在机场候机过程中，我却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想起来，从维也纳至罗马是通直达列车的，于是，我把空中旅行改成了地面旅

行。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到达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的里雅斯特，与从的里雅斯特到达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时间几乎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比当时的经验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多瑙河防线对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性。从最前线到意大利本土竟是如此之近！这样看来，皇帝在得知多瑙河防线被蛮族突破的消息后，为了进行还击，从罗马出发赶到维也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没有铁路，但是完全按照罗马的方式铺设的干道从多瑙河翻越阿尔卑斯山，一直通到罗马。这条古代的“高速公路”方便了罗马军队的北上，但也方便了蛮族的南下，当时的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在迎击敌人的战斗中在维也纳阵亡。要想接近那个时代的古罗马人，如果坐飞机从它的上面飞过去，是不可能体会到当时罗马人的感受。

罗马的道路网是帝国的动脉，正因如此，即使是阿尔卑斯山脉，也要翻越而过。在谈论它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尽管这些道路从山中穿过，但是丝毫不用担心会有强盗袭击过往的行人。罗马帝国从公元4世纪以后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在此以后的情况不敢肯定，但是直到罗马帝国处于强盛时期的公元2世纪为止，道路上的治安确实非常稳定。

我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才是罗马人完成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它并不仅仅是保卫国家，抵御敌国、蛮族的袭击。“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意思是“罗马创造的和平”，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保卫罗马帝国和境内的居民，抵御外敌。在本书中，我们专门插入了一张罗马帝国的全图。负责保障罗马安全的罗马军团基地全部部署在国界线上，或者能够迅速赶到国界线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罗马军队的主力就在边境执勤。

第二个部分是，罗马人自己认为，只有结束了帝国内部的纠纷，才能真正称得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早在建立罗马帝国之前，罗马便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在罗马人中，既有头上缠着头巾的东方人，也有将长发编成三股的北方高卢人。罗马的执政者们通

过安全保障、道路网、邮政体系、建造水道和浴场、制定罗马法律等措施普及“文明”，同时承认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对这个复杂的国家实行统治。这是因为，防止民族间的纠纷是实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曾是罗马帝国领地的地方，在今天纷争不断的地区就有巴勒斯坦、科索沃、马其顿。在提倡通过民族自决解决民族纠纷的现代，解决民族纠纷也许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治安。我想没有比这一点更能体现罗马人的现实倾向了。如果说保卫国境由军团负责，帝国内部的

稳定是政府的工作，那么，治安便是警察负责的领域。保障公众安全的警察制度的首创者是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而将这种制度推广并贯彻到整个帝国的则是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后者似乎相信，没有秩序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他深知，治安乃是重要性不亚于抵御外敌的重要基础设施。

实际上，无论建造多么完善的道路和桥梁，如果社会上盗匪横行，即使想要云游四方，也只能望洋兴叹。如果一个人走在街上会感到害怕，经济也会因此萧条。而邮政体系也只有觉得不会中途被偷走，人们才会利用邮政体系。罗马帝国的极刑是将犯人带到竞技场内，绑在柱子上，让猛兽活活咬死。除了暴君尼禄统治的一段时期外，直至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处以极刑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山贼和海盗的头目。我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写到哈德良大帝到外地视察时的感叹，并不仅仅是这位皇帝视察之行的规模。连军队也不带，只是寥寥的几个人，而且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虽说是在帝国境内，却如此大摇大摆地云游四方，不能不令人由衷感叹。

所谓史料，如果不能领会到书外的东西，就不能算真正读过。撰写哈德良大帝视察全国各地的编年史的作者对皇帝旅行中的安全未提一字。但谁都知道不是处在军队的保护之下。另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载的事情”来描述安敦尼·庇护皇帝统治时期的，是这位皇帝同时代的人。所谓“没有什么特别记载的事情”，正是国家太平无事的一个证明。编年史作者就是当时的“媒体”。所谓媒体，就是人们所说的这样一类人：如果是狗咬人，就不会当做新闻，反之，人咬狗，就会当做新闻。即使治安得不到保障，如果能够雇得起保镖，就能够得到保护。然而，允许这样做的，只限于有钱有势的人。所谓社会治安，应该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障。雇用专门的警卫，或者居民共同组织自卫队这样的事，乃是国家失去功能的一个标志。

人们把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正是由于失去了昔日

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是一个抵御外敌的能力、宗教和民族间和睦共处，还有治安的保障都已经土崩瓦解的时代。它指的就是一个“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崩溃的时代。封建领主代替业已崩溃的国家保护他们统治下的民众，而接受保护的民众要向领主缴纳贡赋。这些封建领主成为中世纪初期的主人公。在这段时期，道路和桥梁也开始由领主们收取通行费。所谓群雄割据，对于据守各地、争权夺利的当权者们来说，也许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一种文明的崩溃。甚至有人说，要恢复古罗马时期的开放与繁荣，只有等待中世纪即将结束的公元14世纪。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强盛时期的罗马。

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时期旅行的人，那么，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旅行必需品的地图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古罗马有地图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又是什么样子呢？

所谓地图，是收集情报的一种产物。霸权国家无一例外地知道情报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收集情报的结果变成地图也好，变成其他形式也好，在热衷于收集情报方面，所有霸权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其中仍然有所不同，那就是收集到的情报只是由统治者占有，还是公布于众。古罗马不论是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国时期，这种情报都是公开的。据说，只要是皇帝下令建造的公共建筑物，它们的列柱回廊的墙面上都会用彩色大理石张贴一张罗马国家的全图，通过这些彩色大理石的颜色区分各个行省。另外，市内的书店也出售各种各样的地图。

在拉丁语中，地图称为“itinerarium”。古罗马时期的地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文字说明的地图，另一类是用图画表示的地图。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只有其中的一种地图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使用目的不同。罗马人对这两类地图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

> 如果军团司令官没有负责防卫的整个地区的准确地图，就无法履行军务和公务这两个职责。就拿军团基地、辅助兵基地、部署在前线的要塞之间的距离来说，只了解英里数是不够的，必须熟悉它

们分布地带的地形，因此注明这些详细情况的地图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如果有除了自己负责的地方以外，还包括相邻的行省以至帝国全境的地图，是比较理想的。这样，如果得到报告，在帝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能够立刻判断它的重要程度，另外，皇帝下令调遣军团的时候，马上便能够当机立断，执行皇帝的命令。因此，只有“用文字说明的地图”是不够的，需要具备这两类地图。军团司令必须对许多人的生命负责，对他来说，不仅要用头脑把握这些必不可少的情报，而且要用眼睛来把握。

上面所说的是，对于统率1万人以上的军团司令来说的地图的重要性。而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地图同样重要。

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保存着几张古罗马时期旅行用的地图。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有以下两点：

它们是否可以当做地图，不得而知，在现存的四个古罗马时期的银杯上都刻有地图。它们都是为了用于旅行而制造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之所以这么说，第一个理由在于它的圆筒状的杯子形状。在罗马大道上，每隔1罗马里（约合1.5公里）就设有一个里程碑，而杯子的形状正是“里程碑”的形状。在拉丁语中，称为“Miliarium”。

第二个理由是，杯子的表面刻着文字和数字。用拉丁语刻的文字，表示沿途的旅馆、换马的站点和马车维修站、提供餐饮的设施，还有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城市的某个地名。用罗马数字标记的数字，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当然表示的是罗马里数。拿现代的高速公路来说，就相当于这个杯子上刻有简易汽车旅馆、带汽车维修站的加油站、快餐店，还有沿途的城市名称和它们之间相距的公里数。

现存的、挖掘出来的银制旅行杯上面，刻的是从西班牙最南端的重要港口加地尔（现为加的斯）至帝国首都罗马沿途所有的城镇和它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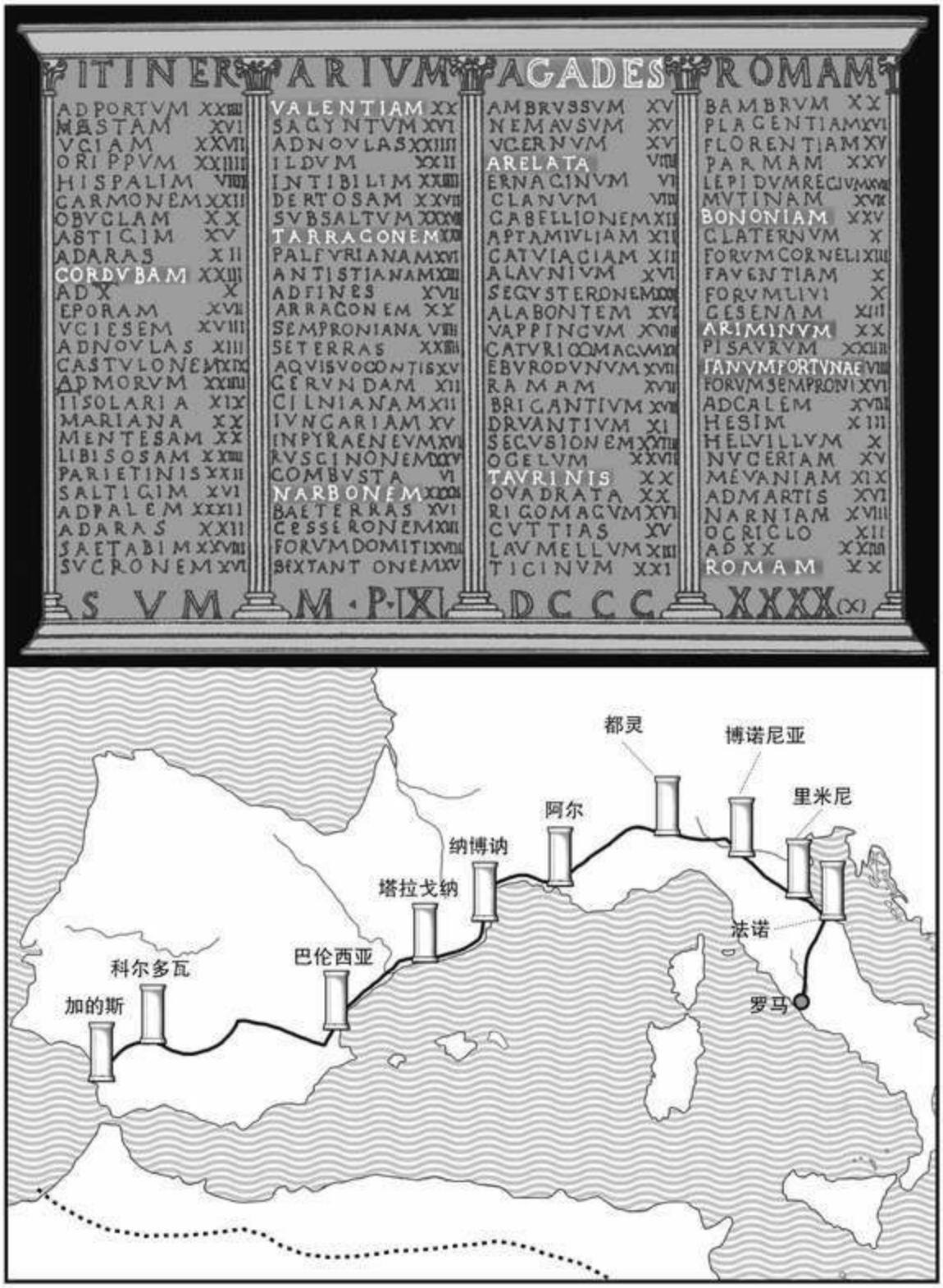
间的距离。这条大道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北上，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横穿法国南部，再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此南下弗拉米尼亚大道，到达罗马。这段路程是贯穿罗马帝国西部的一条大动脉，全长距离为1853罗马里，相当于2750多公里。必须越过的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途经的大河有埃布罗河、罗讷河和波河。这条绝对非同小可的路程平均每隔26公里就设有某种设施，给旅行者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这一点已经得到这个旅行杯的佐证。

古罗马时期旅行用的银杯（上面刻有城市名称和各城市间的距离）

这种杯子不会只有从西班牙的加的斯至罗马旅行的人才使用。对于从杯子上刻的城市——例如法国南部的纳博讷、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去罗马的人来说，肯定是非常方便的。途中的里程碑上，写有从这条大道的起点开始第几个“碑”，因此很容易知道从起点开始的距离，但是没有记载各个服务设施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杯子上却刻着所有这种有益的信息。这样，旅行的人就可以知道走多远会遇到什么设施，从而制订旅行的计划。想象一下，古罗马时期风尘仆仆的旅客从“驿站”里的店铺买一只这样的银杯，一边喝水，一边寻找它上面刻的地名和距离，那种情

景不由得让人会心地微笑。

从罗马至加的斯的全部路程都是按照罗马人的观念由国家负责管理的“公路”，也就是必须全线用石头铺设的干道像接力一样联结起来的道路，但是这2750公里只是遍布整个罗马的、长达8万公里的干道的极小一部分。这就是说，当时在其他主要大道上，也应该制造和销售这种旅行杯，这种假设也是有道理的。例如，从罗马通过里昂，越过多佛尔海峡，直至不列颠的伦敦；又如，从罗马穿过瑞士，沿莱茵河至科隆；从罗马，经阿皮亚大道，至布林迪西，由此经两天的海路后登陆，再横穿希腊，到达现代的伊斯坦布尔的道路。罗马的“公路”上，修建了各种旅行用的设施，这是当时许多人在流传后世的文章中所记载的一个事实。另外，在古罗马时期，全国各地都制造和销售画有名胜古迹的纪念品。我想，带有地名和距离的旅行杯比纪念品有益得多，所以需求应该也是很多的。



银杯表面的展开图（上）和加的斯至罗马的大道

除了这种杯子外，还有一种地图，让我想到是不是古代版的、将欧洲的饭店和餐馆按等级进行划分的米其林旅游指南。它属于“用图画表示的地图”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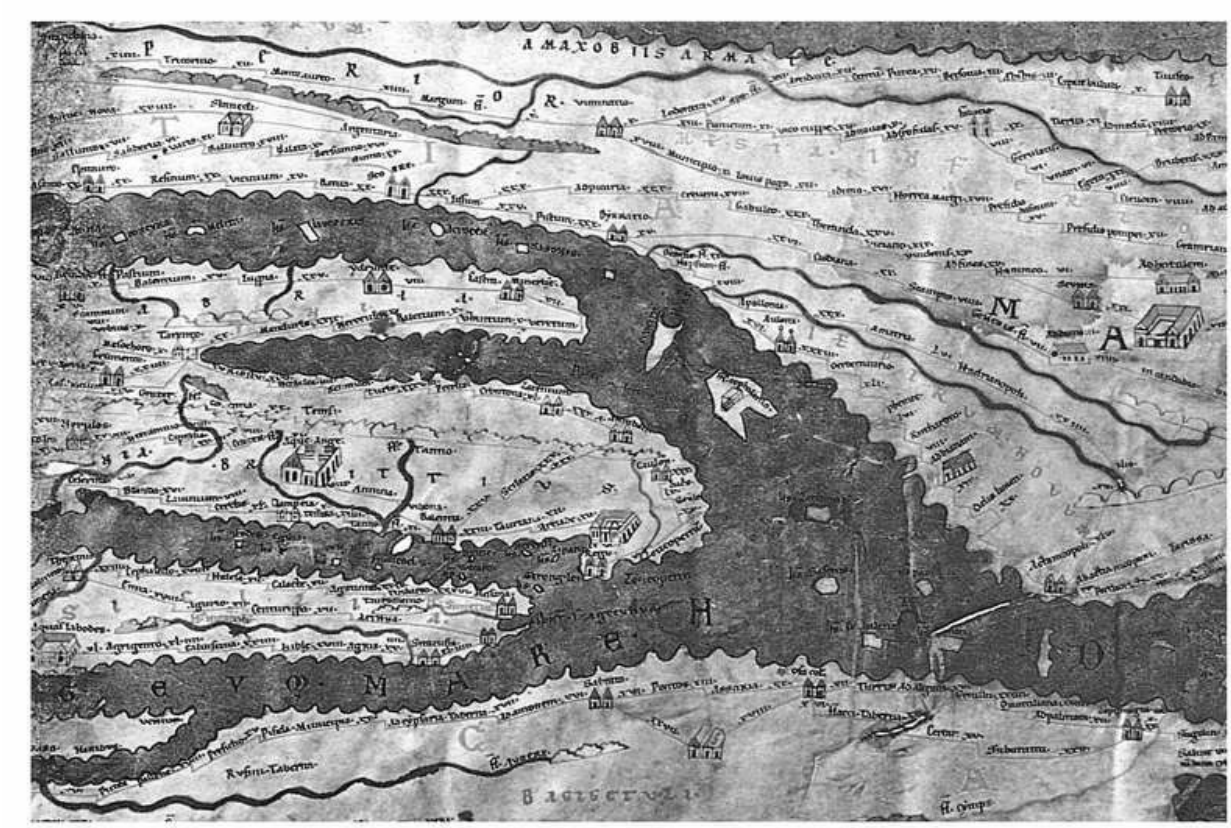
这类地图被称为“波伊廷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公元4世纪中叶前后制图，到11世纪的时候有人临摹，收藏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保存至今。它由11张羊皮纸横接而成一个卷轴，6.75米长，34厘米宽。不过，这幅古代地图的中世纪复制品在打开卷轴的时候，缺少了应该位于左端的不列颠（今英国）。因此，原版地图应该是用12张羊皮纸接合在一起后绘画而成的卷轴式地图，尺寸为7.4米长、34厘米宽。在这样大的羊皮纸上，画着西自不列颠，东至印度河，北起波罗的海，南至撒哈拉沙漠的“世界”情报。

罗马帝国东边的国界是幼发拉底河，因此这并不是罗马帝国的全图。但是经波斯直至流过印度西部的印度河这一片地区，是罗马的精英们视为先驱者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走过的地方。另外，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几乎唯一的假想敌国帕提亚（后来被波斯取代），这个中东地区一直是他们不敢放松戒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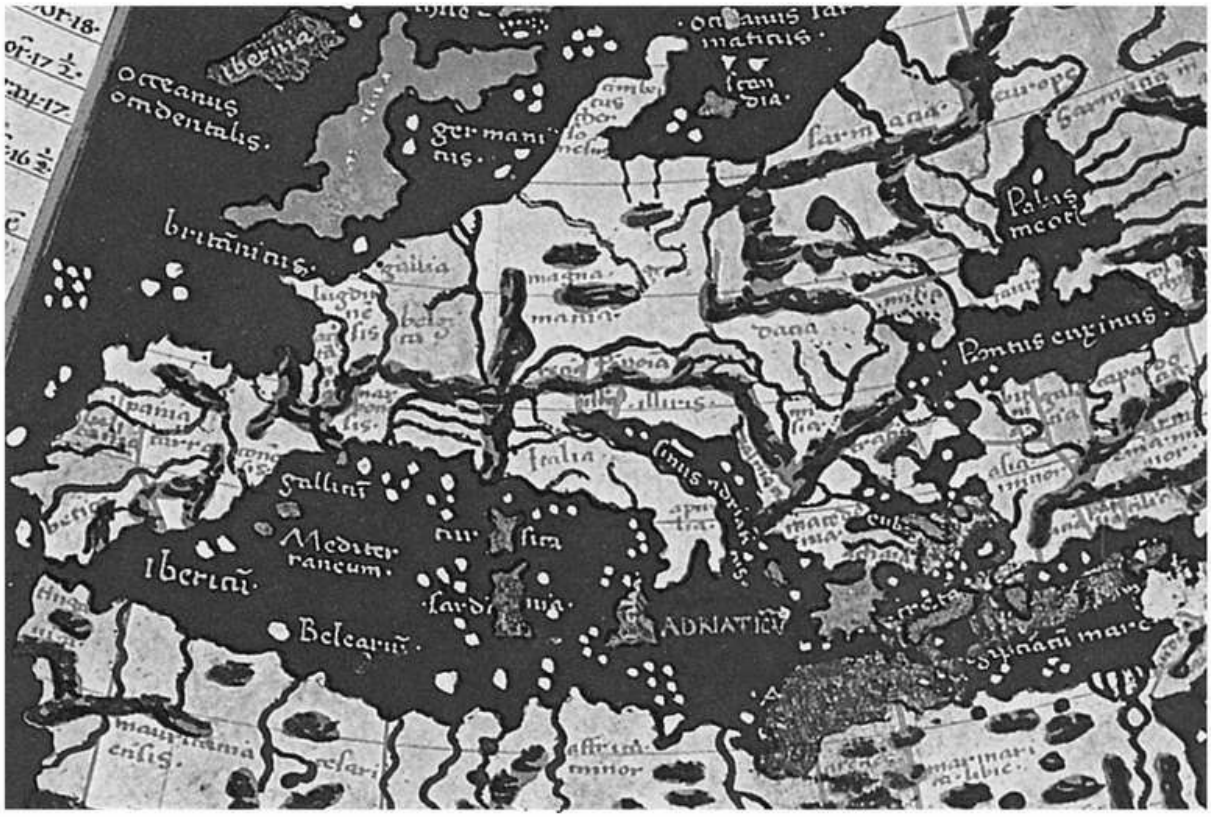
罗马人并不是不知道印度河以东的世界。早在公元2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从事研究的地理学家克劳狄·托勒密，这位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人就已经绘制出了现代人所用的这种地图。这张用拉丁语书写的、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上，画有从不列颠至中国的广大地区。罗马人不知道的是非洲大陆的中部和南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还有南北美洲。

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波伊廷格地图。它与克劳狄·托勒密的地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宁愿牺牲实际的距离，也就是通过变形，也要在地图中加入尽可能丰富的、有用的旅行信息。它在交通量大的意大利半岛上，使用了很大的版面，而地中海只画了一条绿色的带子来表示。我们已经习惯忠实于纬度、经度的托勒密式地图，但是要理解波伊廷格地

图，需要某种程度的适应。这种地图的目的，并不看重地理上的准确性，而在于提供对旅行有用的信息。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左边是意大利半岛的南部）



托勒密地图一例（欧洲及其周边）

古罗马时期恐怕已经出现多种地图并用的现象，这些地图包括：托勒密式地图、波伊廷格式地图、上述银制旅行杯类的地图，还有仅用文字说明的文字地图。用彩色大理石画在谁都能看见的列柱回廊墙面上的罗马全图，应该是托勒密式地图。军团指挥官携带的地图，应该是托勒密式地图和只有文字的“地图”。一般的旅行者使用的地图，则应该是杯子式和波伊廷格式地图。而这些在市内的书店、沿街的“驿站”和“站点”全都可以买到。

我之所以购买希腊、迦太基、罗马的金、银、铜币，并不是因为我有收集的兴趣，而是为了玩赏，想象一名士兵一年的工资会是几枚这样的货币，用一枚这种货币能买几公斤面粉。另外，有时也会根据货币的样式想到英国人、迦太基人的性格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迦太基的货币上面几乎不刻文字，而罗马的货币则同时用做对皇帝的宣传，因

此它的设计是在皇帝的侧面像周围环绕文字。货币是最好的史料。

由于我有此喜好，因此如果有古罗马时期的旅行杯的仿制品销售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但是没有人仿制，所以我只有前往罗马国立美术馆，隔着玻璃柜的一层玻璃，远远地观望。但是古罗马时期的地图仿制品，我却买到了。

波伊廷格地图本身是古罗马时期地图的复制品，因此我手上的是复制品的复制品。尽管如此，它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第一代复制品相比，也只是用纸上由羊皮纸变成了普通纸这一点有所不同，长度和宽度完全是原来的尺寸。而且，就像古罗马时期的旅行者实际使用时那样，把它装在一个贴小牛皮的箱子里，地图的两端分别由两根小棍固定，因此可以一边用手转动小棍，一边看想要看的部分。如果只是地图的复制品，也许不会有多大价值。在我20年前购买它的时候，花了10多万日元，这也许是因为它的箱子贴了优质的小牛皮吧，连箱子中装的说明书的封皮都是皮面装订。尽管是仿制品，却如此精致，也许首先是因为预料购买人数不会多。这种东西只有相当好奇的人才会购买。其次，是一个更冠冕堂皇一点的理由，那就是重现古罗马时期生活富裕的旅行者实际使用的状态。事实上，在这20年中，我常常把这幅地图从箱子中取出来翻看，仿佛自己也是一名社会上层的旅行者。

因此，下面将让读者看一看实物的照片，在此先谈几点我的想法。

虽然这是一幅西起不列颠、东至印度的地图（包括锡兰也画在上面），但是内容比较详细的，还是从不列颠至幼发拉底河的一段，这一点需要先提醒一下读者。也就是说，准确详细的信息只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内。虽然说是地图，在位于最东端的印度河附近，却注着这样一句话，令人忍俊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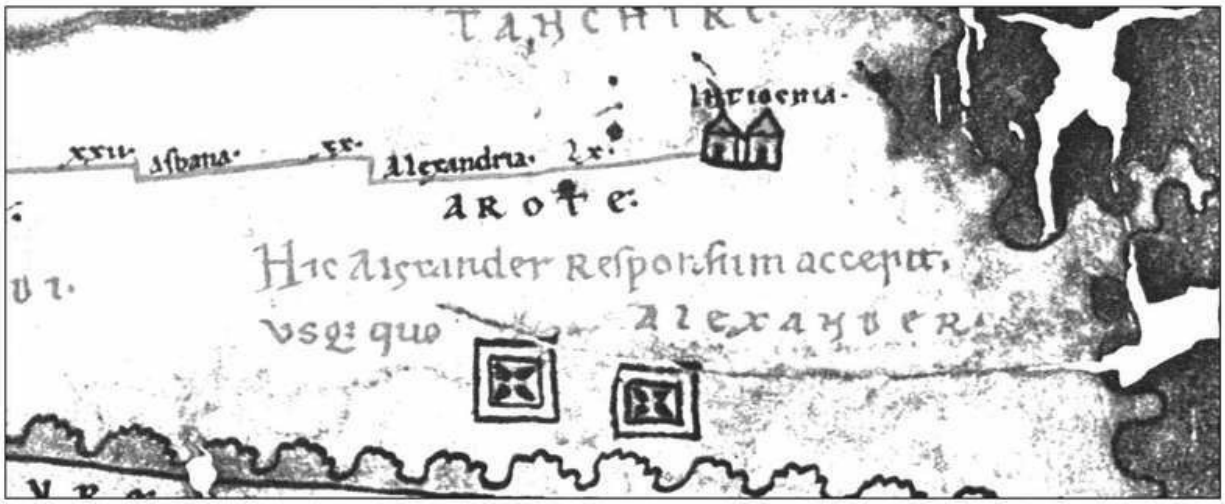
这里是亚历山大听见神谕的地方，神跟他说，亚历山大呀，你

走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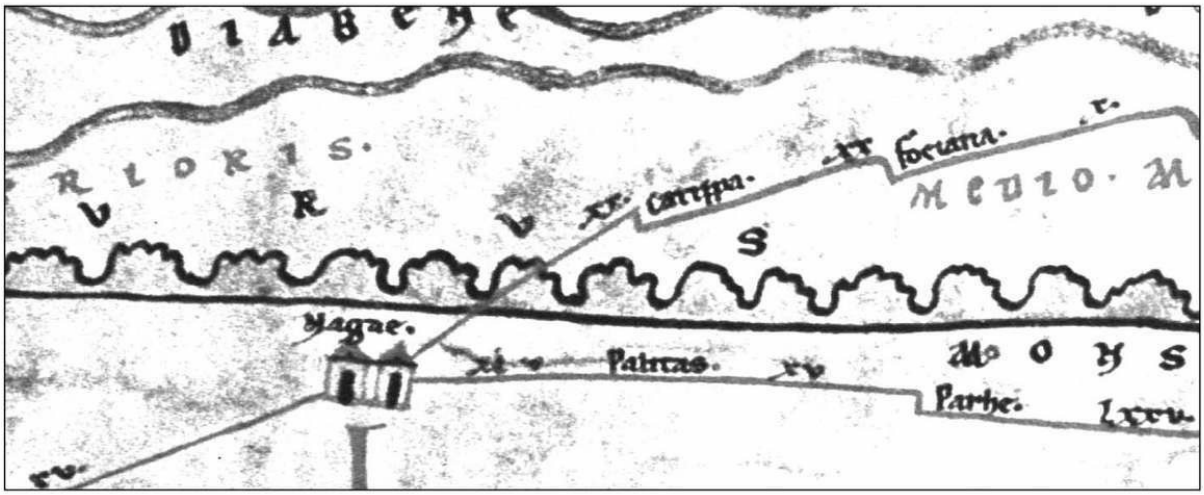
东征中的亚历山大大帝不管是不是听了神谕，到了印度河便返回了西方。地图上这样记述这个著名的典故，不乏幽默。

也许古罗马时期的地图制作人认为，只要是著名的故事，就应该全部写在地图说明上，所以地图上甚至有《旧约圣经》中的故事。在西奈半岛部分，有下面这样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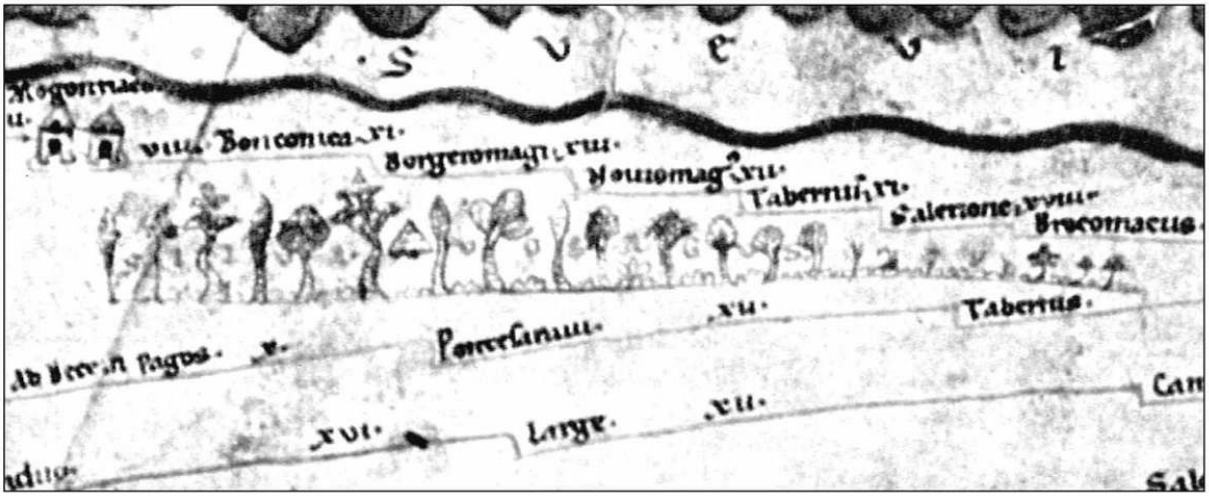
这一带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漂泊了40年的沙漠。



“这里是亚历山大听见神谕的地方，神跟他说，亚历山大呀，你走到哪里去？”



山脉（波斯附近）



森林（日耳曼附近）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在西奈山的地方，则写着：“摩西在此山受上帝赐予十诫。”

读到这样的说明文字，令人愉快，但是这种记述虽然在罗马帝国的边境能够看到，然而随着靠近帝国的中心，便逐渐消失了。这并非因为著名的历史故事少了，而是因为实际旅行所需的信息越来越多，没有地方记载这样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当时购买这种地图的人都是在罗马帝国境内旅行的人吧。

这种波伊廷格地图的特色是，许多基本信息都使用符号来表示。

大海用绿色的平面，河流用绿色的曲线，山脉用褐色的峰峦形状，森林用树丛形状来表示，这些都比较普通，而其他的内容则有些像漫画，令人赏心悦目。

在这幅地图制作的时间上，研究人员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公元4世纪中叶。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三大城市：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在这个地图上，这三大城市也是用特殊的符号标记的。

除了这三大城市以外，有六个城市是用城墙环绕的符号表示的，它们分别是：意大利的拉韦纳和阿奎莱亚，希腊的萨洛尼卡，土耳其的安卡拉、尼西亚、尼科美迪亚（伊兹米特的旧称）。这六个城市中，有四个位于帝国的东面，这也许是受到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0年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的影响。罗马帝国的中心从西面转到了东面。从此，拜占庭改称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的首都之意。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它改称伊斯坦布尔。另外，微不足道的城市尼西亚被列为六个城市之一，应该是因为公元325年著名的普世会议曾经在此举行，对于4世纪的基督教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样，公元313年，基督教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努力，终于得到社会公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把波伊廷格地图的制作时间推定为公元4世纪中叶前后，是因为这幅地图上面有始建于4世纪的圣彼得大教堂。尽管如此，上面也有为数众多的祭祀希腊、罗马诸神的神庙。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认了基督教，但他并没有禁止其他宗教。而到了公元392年，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宗教定为邪教，开始彻底清除这些异教。也就是说，罗马帝国从公元313年至392年长达80年的时间里，是一个众神共存的时代，包括希腊、罗马的诸神，叙利亚、埃及的诸神以及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教的神，尽管它们有地位上的逆转，但并不妨碍它们彼此共存。波伊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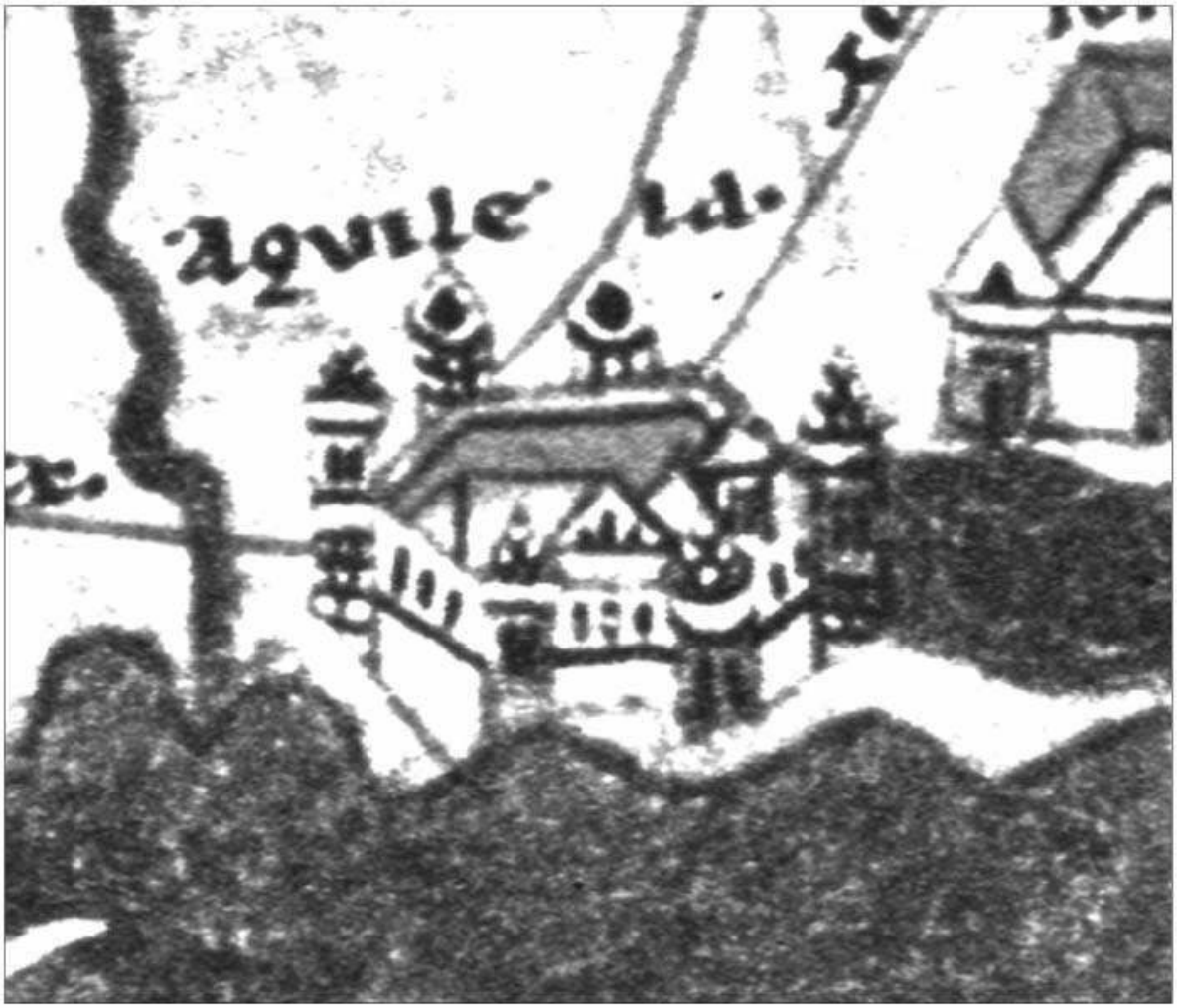
格地图对神庙和教堂同样标记，它也是反映诸神共存，也就是信仰不同的人可以共存的古代最后时期的一幅地图。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走陆路的旅行者来说，道路和可以住宿的城镇，对于走海路的旅行者来说，重要的港口和灯塔这样的设施，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都是必要的基础设施。因此，波伊廷格地图上的主角是用红色的直线标记的道路、沿着道路用罗马数字标记的距离数以及表示有住宿设施的房子形状的符号。

在波伊廷格地图上，道路采用红色的直线表示。在古代，红色是一种仅次于紫色的重要颜色，用这种颜色表示本身就说明波伊廷格地图相当于现代驾车旅行必需的道路地图。也就是说，这种地图表示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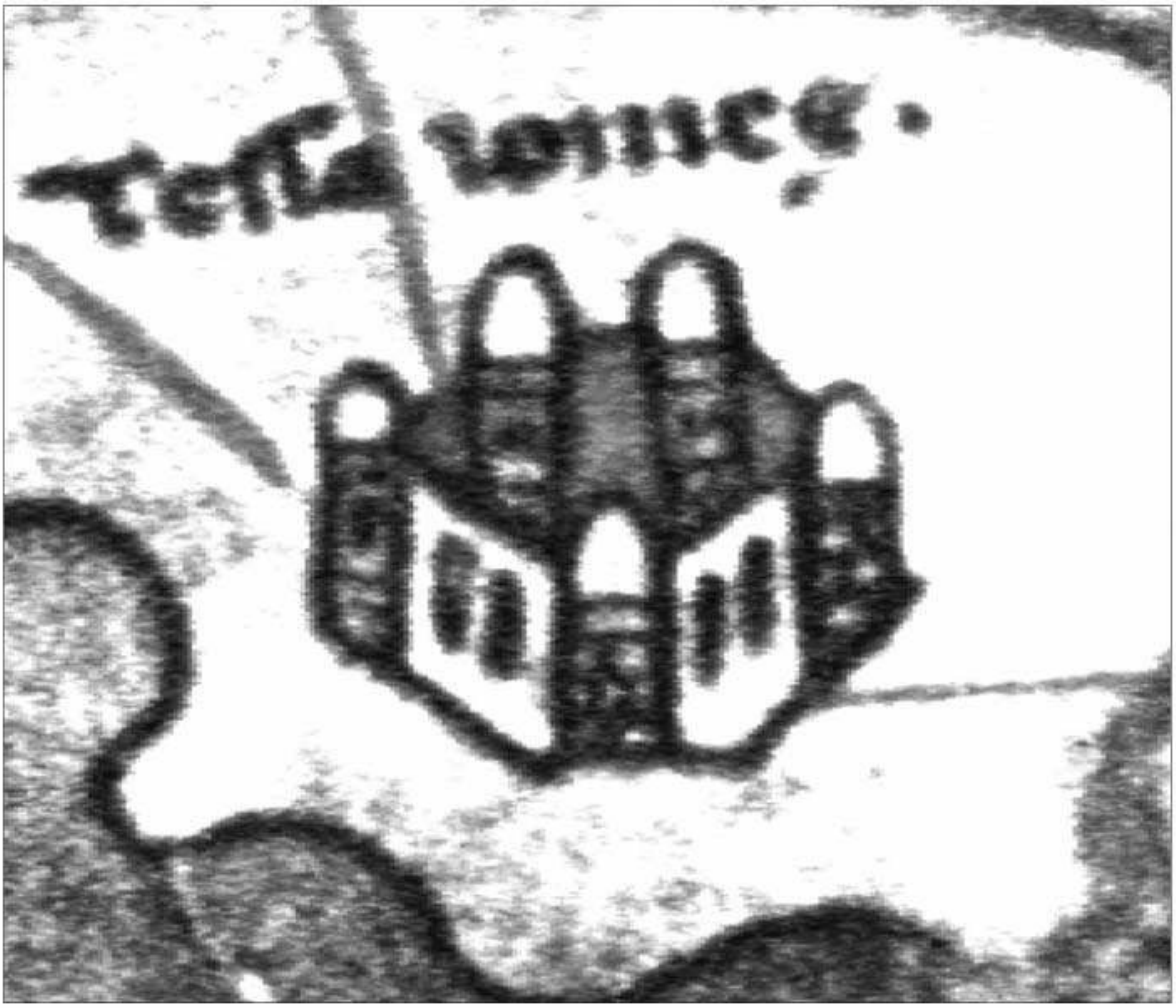
另外，所有的道路都用直线表示，并不完全表示道路本身是笔直的。波伊廷格地图的目的，不在于地形的准确性，而在于告诉地图使用者从哪儿到哪儿有什么道路，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几里。这一主要目的以外的内容都简化了，这本身也是地图制作者必须用心才能做到的一种智慧。

简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符号化。无论是神庙还是教堂，在古罗马时期都是用一种称为“巴西利卡”（Basilica）的、带屋顶的长方形会堂的符号来表示。古罗马时期的“巴西利卡”的意思是长方形大会堂，它的内部用于审判和经济交易。而到了制作波伊廷格地图的公元4世纪中叶，不断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与开始抬头的基督教势力正好呈反比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两条线交叉的时期。也许作为法治国家和自由经济象征的礼堂在当时有很多变成了基督教徒集会的教堂。值得一提的是，自中世纪以后至现代，教堂的别名就一直称为“巴西利卡”。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通称也是“圣彼得巴西利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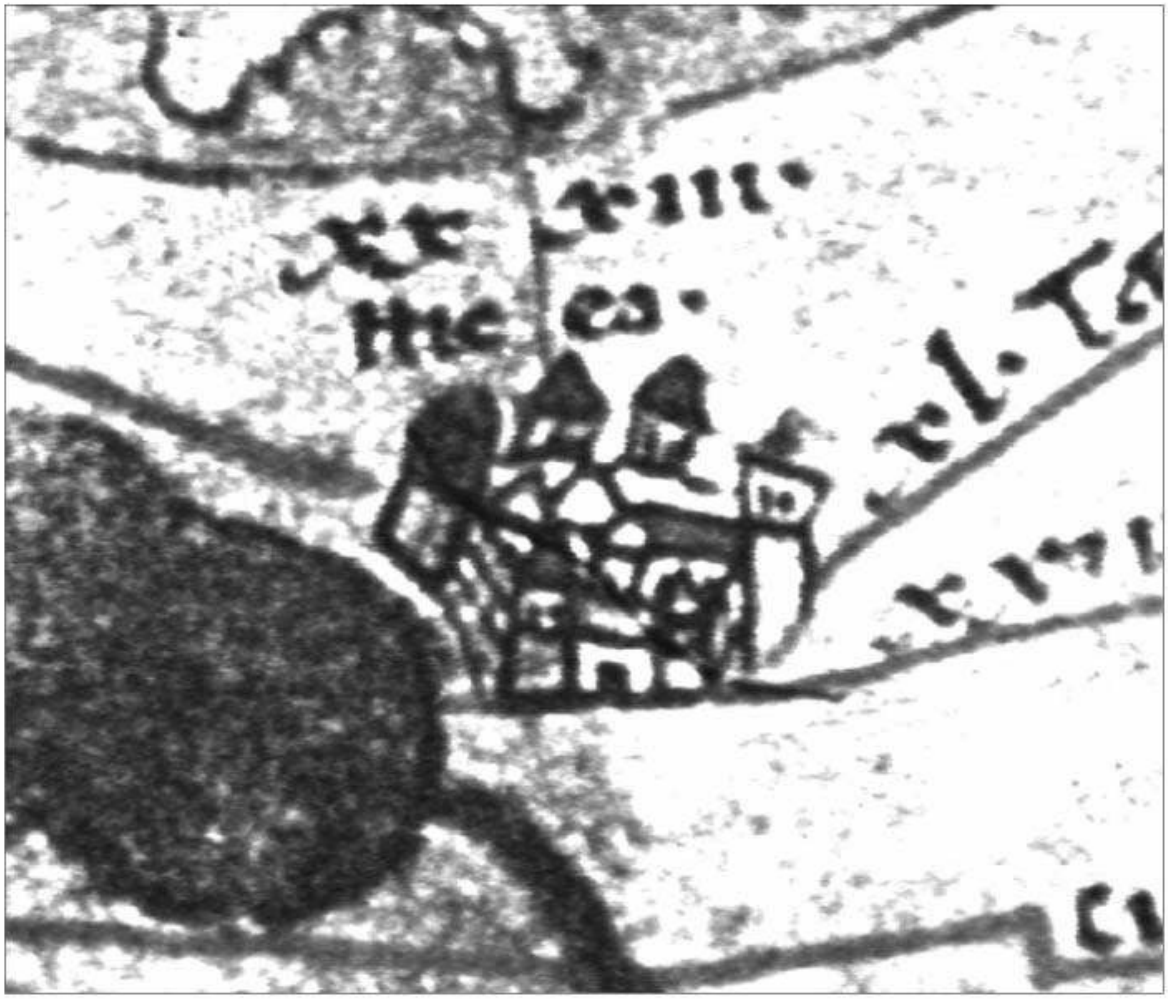
阿奎莱亚

拉韦纳



萨洛尼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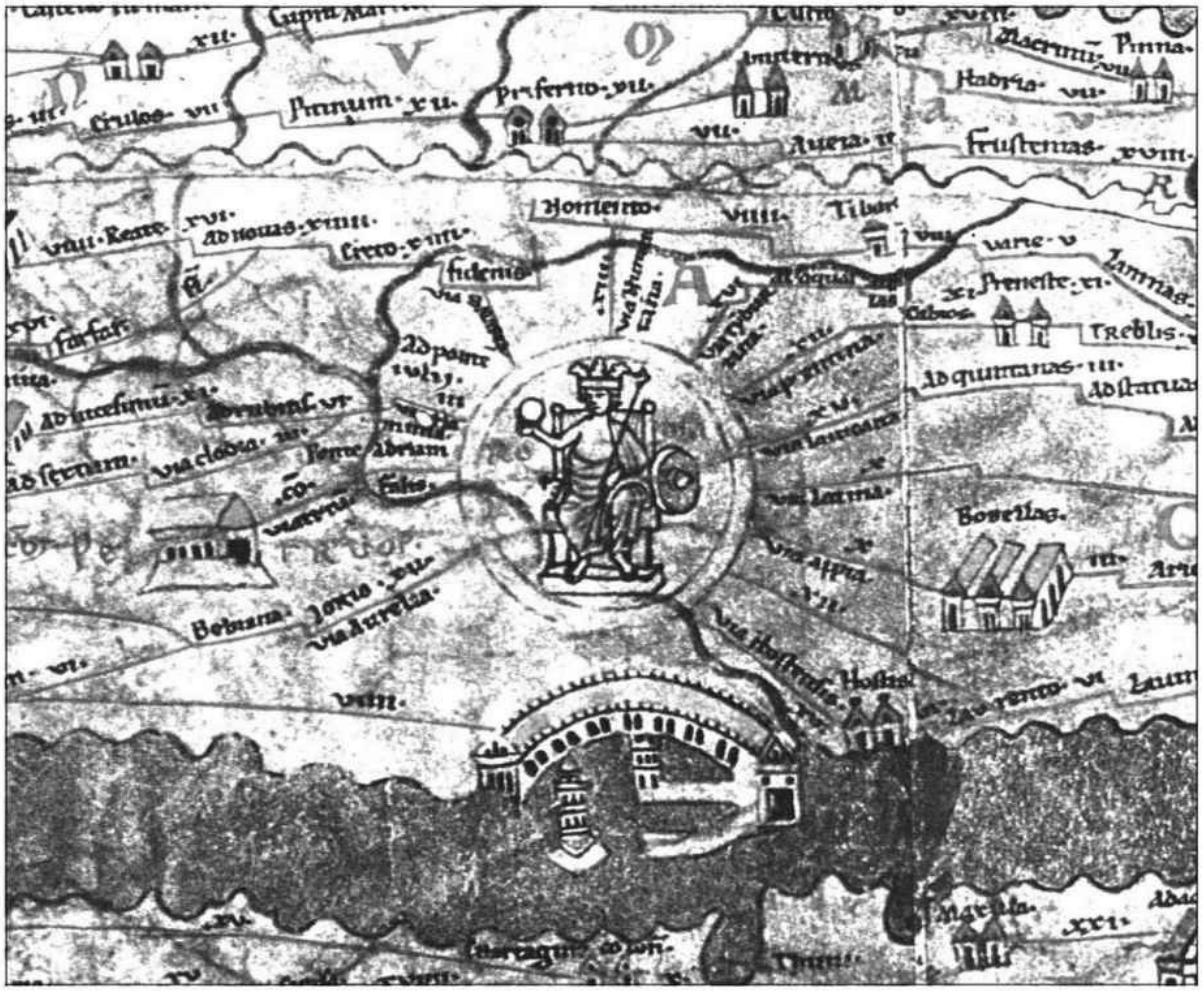
尼科美迪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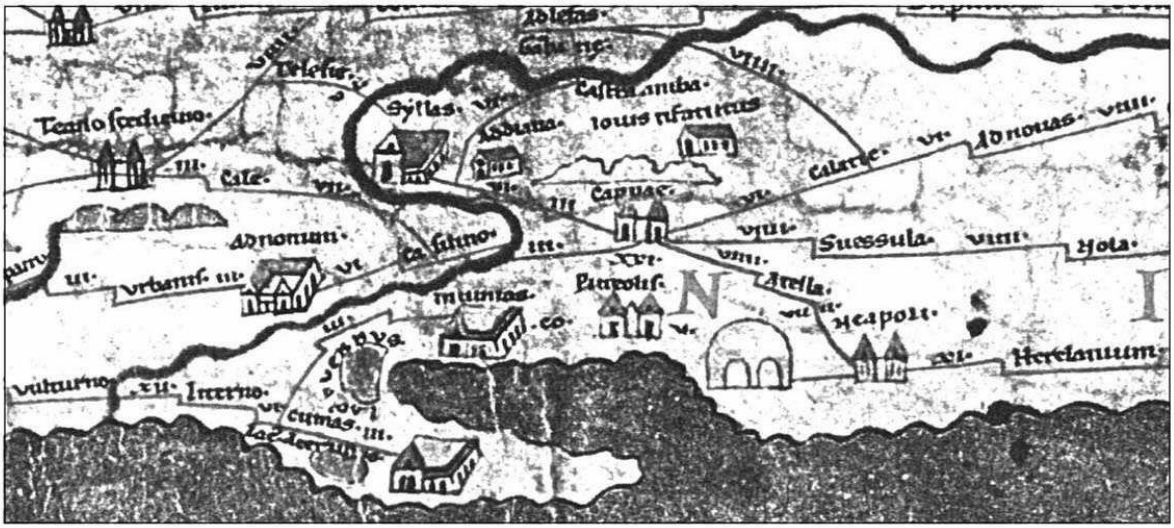
尼西亚

安卡拉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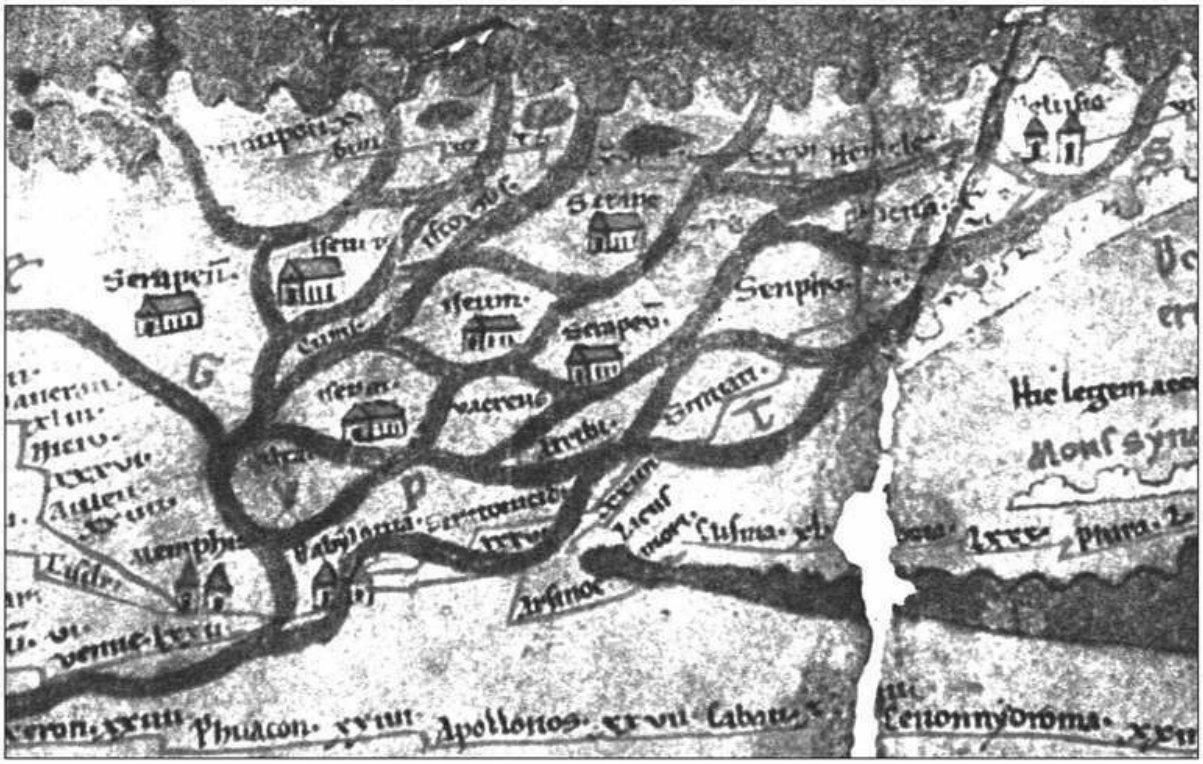
罗马周边（下方是奥斯提亚港



那不勒斯（最右侧的城市是那不勒斯，它的左侧是隧道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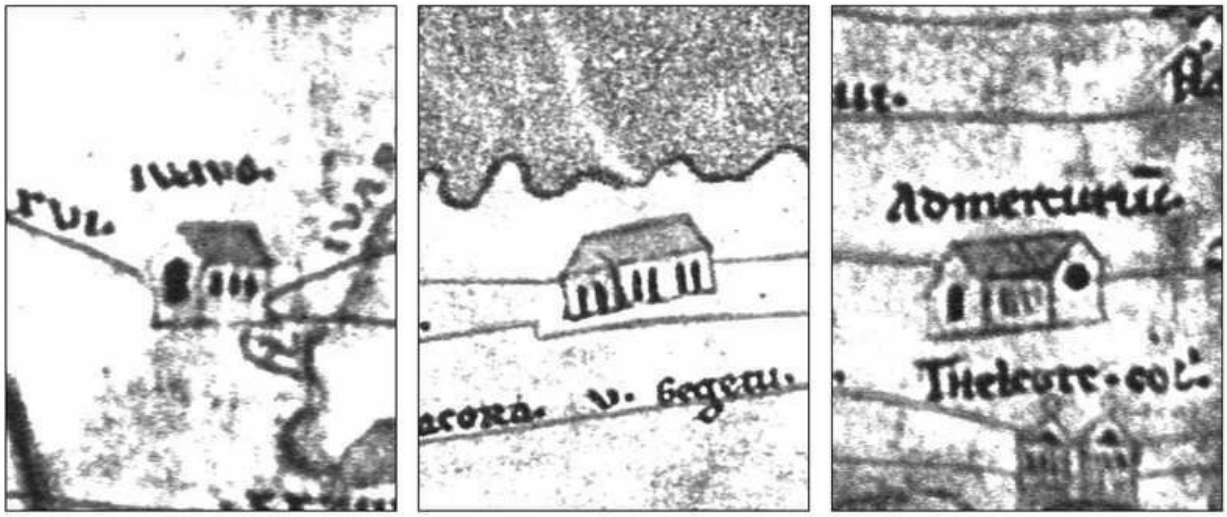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波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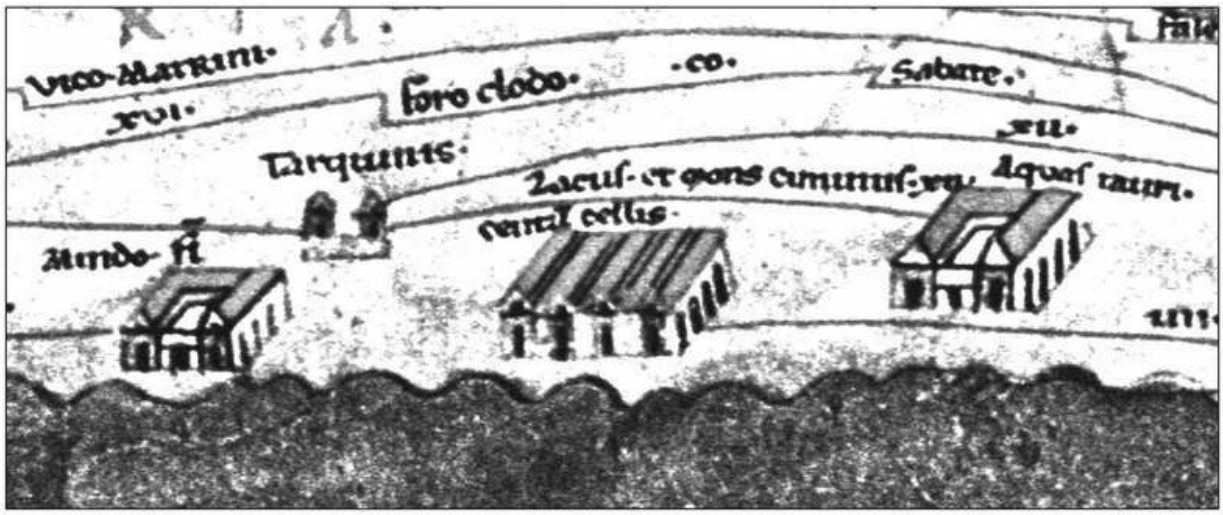


尼罗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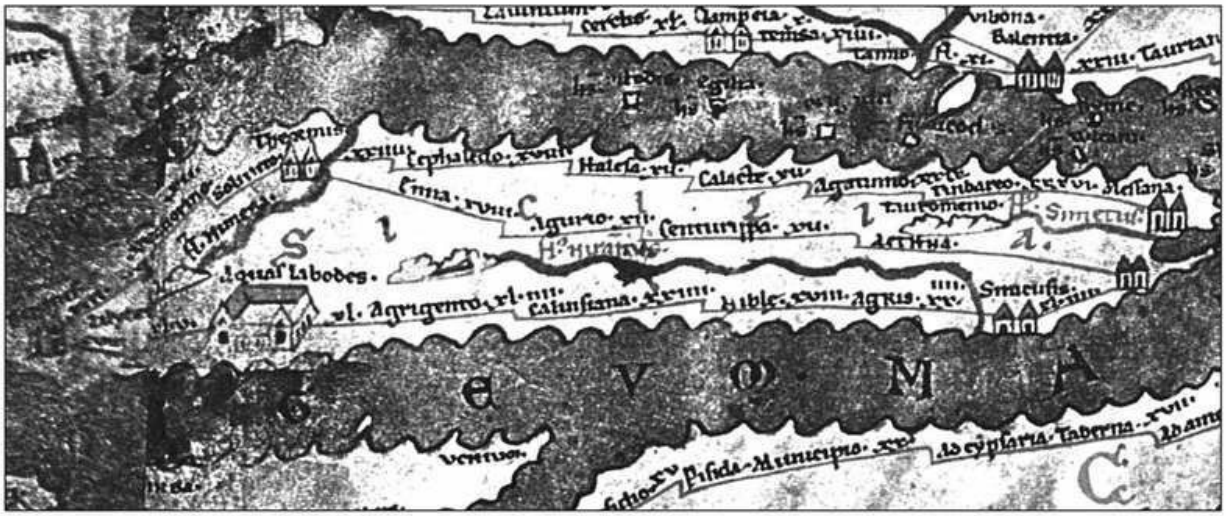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各式各样的长方形会堂（礼堂、神庙、教堂等）



仓库林立的奇维塔韦基亚港口（中央）



西西里岛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尽管如此，有不少证据表明，在这种波伊廷格地图制作的时期，古罗马依然国力强盛。其中一个例子便是，这幅地图上画有数量众多的温泉场所。罗马人认为，不仅拥有许多人口的城镇，连守卫边境的军团基地，洗澡的习惯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如果使用天然的温泉，而且位于干道附近，就会让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写道：温泉对于罗马人是一种磁铁，无论是旅途的风尘还是身体的疲劳，只要一泡温

泉，都能够一扫而光。它在波伊廷格地图上比城市更加突出。考虑到这种地图是为旅行的人制作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波伊廷格地图上的符号总数为550个，其中52个是表示温泉的符号。

多达550个的符号中，有429个用房子或者塔的符号表示可以住宿的地方。不过，这429处并非全部用同一符号表示，而是用4种符号。我将其依次起名为二星、三星、四星、五星，但这不过是按照城市大小猜想的一种假设。二星相当于简易汽车旅馆，用五星表示的城镇则意味着，按照旅行者付钱的多少，可以选择二星至五星的旅馆。在帝国的首都罗马曾经有成排的小房间，以至于考古学家惊呼："这是商务酒店！"

而且，在表示这些住宿设施的符号下面，用拉丁语标注了城镇和村庄的名称。我们只要看一看它们，便会明白，现代欧洲、中东和北非的大多数重要城市都是从两千年前古罗马时期的"可以住宿的地方"发展而来的。

综上所述，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许多旅行地图，既有银杯上的地图，也有波伊廷格地图。它们上面都标注有表示距离的数字，包括每隔一罗马里建造一个里程碑。

这里首先要产生的疑问是，旅行者是如何测量距离的？如果是行走的距离，只要数一数每罗马里建造的里程碑，就会知道。但是逐个数出每隔不到1.5公里就出现的里程碑显然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办法。另外，怎么知道从早晨出发走了多少距离？再走几里路，能到达有马车修理店的驿站？现代的汽车通过里程表显示的数字便可以知道这些，而古代显然不能指望这样方便。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道距离对于旅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罗马人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呢？

有住宿设施的城镇（表示该城镇中级别最高的旅馆等级）

温泉场所（高卢东部）

波伊廷格地图局部

虽然与现代的汽车里程表不同，但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了测量里程的仪器。当时，还没有发明齿轮，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齿轮的原理，并加以运用。据说这种仪器的结构是这样的：

长途旅行的时候，通常使用四轮马车，而四轮中每个车轮的圆周也大体是固定的。车轮转一圈，就会掉下一颗小铁珠。小铁珠达到10个的时候，就会掉下一个稍大一点的铁珠。如此反复，达到一罗马里（将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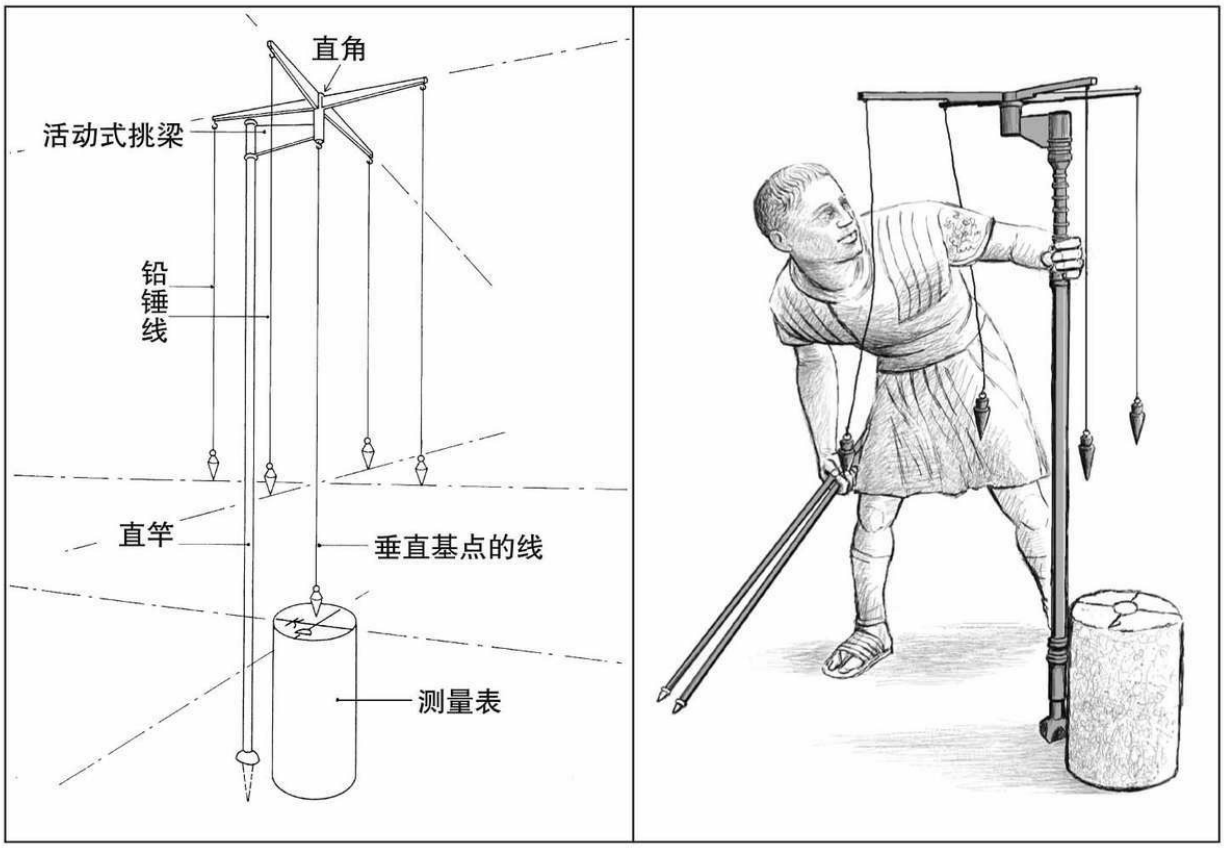
1.5公里）的时候，便会掉下最后的铁球。这种装置即使没有达到一罗马里，也可以在中途测量行走的里程，这是因为这种装置不是装在密封的盒子里，而是安装在马车后部的外侧，以便在中途也能够数出铁珠的数量。也许古代人与现代人不同，不需要十分追求准确和精密，因此这种程度的简单装置也就足够了。当然，这种里程表是安装在旅行马车上的仪器，而道路铺设工程之类的土地测量使用的乃是专用的仪器。

在古罗马时期，不仅修通了道路，建设了堪比现代高速公路的各种服务设施，而且制作了旅行地图，那么，旅行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这一点与出现铁路和汽车——也就是20世纪——以前并无太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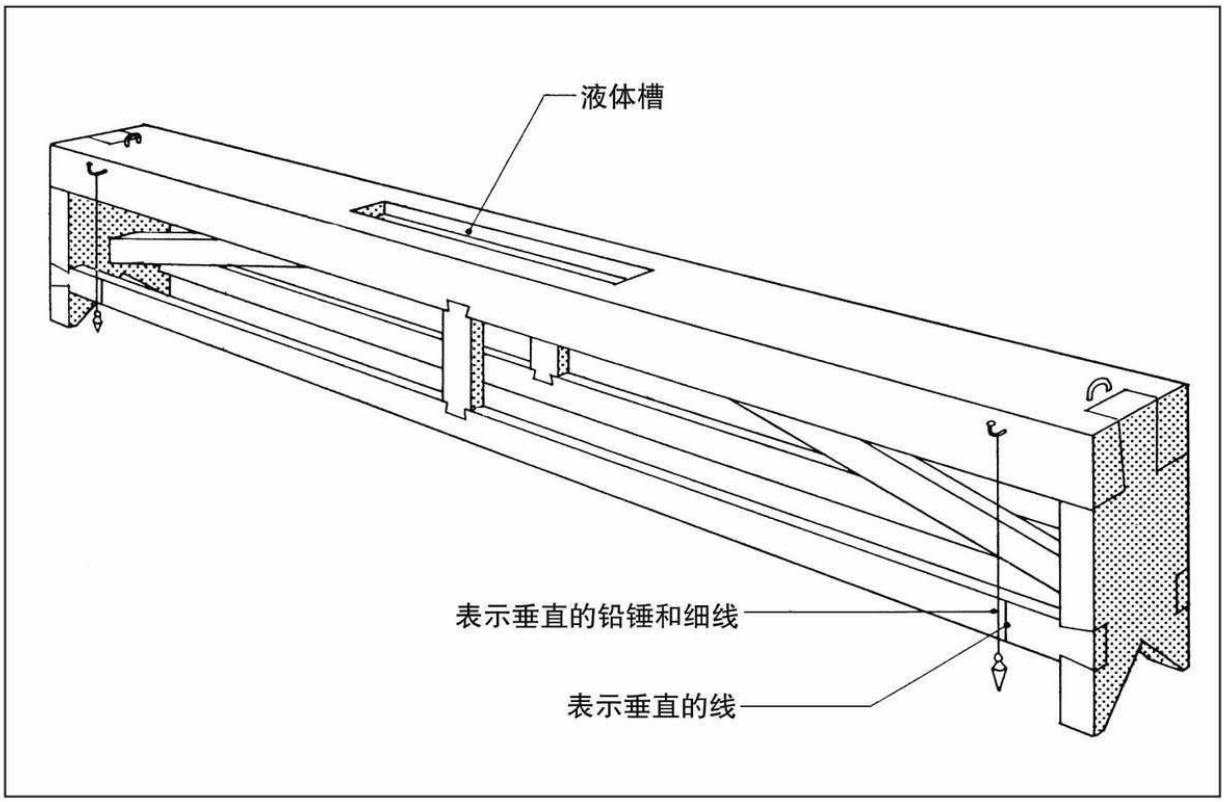
首先，就是步行。全线用石头铺设的干道和“公路”都严格区分双线车道和左右两侧的人行道，由此也可看到步行的人所占的比例不小，尤其是短途的行人很多。罗马大道与现代高速公路的不同，不是道路铺设的水平，也不是各种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而在于它有步行的人和道路免费这两点。

其次，是马、牛、驴等家畜。每逢有紧急传递前线的指挥官发给在首都的皇帝（皇帝同时也是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的“公务电报”的时候，一早就要乘马疾驰，而且每站都要换马。

另外，罗马人称为“国营邮政”的制度多使用邮递马车。这是一种四轮马车，为了保证安全，每天晚上在“公馆”歇宿，次日凌晨出发。它们不仅投递邮件，不少情况下还会捎带到外地赴任的行政官。马车的构造是轿式的，因此可以遮风挡雨。



直角测量仪（右为使用方法）



水平仪（测量是否水平的仪器）

即使同样是四轮车，有的车并不是四匹马，而是两头或者四头牛拉车。这种牛车往往是敞篷车，如果运送军用物资，就是武器、军粮等辎重，而运送民用物资，则是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当然，运送物资的时候，不仅用牛，还经常使用驴和马。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不仅首都罗马，连行省的城市在市区也几乎没有耕地。这说明，这些城市已经建立了从城外运进大量粮食以及各种物资的供应体系。

除四轮车外，还有轻快的二轮马车。这时候，一般由一匹或两匹马拉车。乘车的人也是一个或者两个人。即使装货，也只允许装载较轻的货物，因此也许相当于短途的小排量汽车或者赛车。

另外，还有一种称为“卡鲁卡”（carruca）的卧铺车。用蒙皮的车篷覆盖，既可以一边睡觉，一边旅行，也可以坐在床铺上一边下棋，一边旅行。蒙皮的车篷上左右各开一扇窗户，因此光线充足。有的人一边处理工作，一边打发旅途的时光，有的人则把这个时间用来一个人安静地读书。一天的行程平均下来为25至30公里。

那么，也许有人会想，没有马车那样自己出钱的旅行工具的人只有步行了，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当时实行一种类似于带司机租车的制度。由于是古罗马时期，所以是带赶车人租车。在现代，就相当于包租式出租车或者普通的出租车。这种行业的人也有工会。在大道的起点附近，出租马车的店铺鳞次栉比，因此只要谈好价钱，然后乘坐就行了。

付不起租车费的人，还有更便宜的旅行工具，那就是公共马车。我们想一想在西部片中司空见惯的驿站马车，便容易理解。这种马车每到一个公馆、站点、快餐店，都会停车，所以从停车的地点到目的地只要走人行道就行了。如果肯稍微多给点小费，也许还可以在目的地附近下车。即使遇到严格遵守公共马车规定的赶车人，旅客要走的距离最多也不到10公里。可以把它当做坐公共汽车旅行。

路边休息的人

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旅行的一家人

二轮马车

刻画旅客的浮雕

罗马大道就是这样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交通工具，但是到了交通量大的大城市附近，无疑噪音也非常大。与现代不同，既没有汽车尾气，也没有引擎的噪音。但是，那个时期还没有发明橡胶，也就是说，没有轮胎。人们用铁圈保护车轮外侧。无论大道表面如何平坦，铁圈接触路面上的石头所产生的噪音也肯定非常大。但是这也视习惯而定，也许古罗马人会说，来往的汽车产生的噪音更让人难以忍受。

所以，也可以说，对噪音的忍耐度要看生活习惯的不同，但是到了市区，由于这些因素会引起交通堵塞，因而难以处理。

在进入罗马帝国之前的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已经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即使要妥善处理这些蜂拥而至的人群，也是一项庞大的工作。罗马已经日益发展成为“世界之都”，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里，已经是大势所趋，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自费修建公共集会广场并赠送给国家的恺撒不仅扩大了古罗马市中心的古罗马广场，而且不惜破坏共和国时期的城墙，把一直连到马尔斯广场的地区纳入了市中心的范围。

但是恺撒似乎并没有认为扩大市中心会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也许他已经预料到，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到罗马。因此，他在进行扩大市中心的公共建设工程（在马尔斯广场，他在万神殿的旁边建造并捐赠了规模宏大的尤里乌斯选举会场）的同时，实施了防止交通堵塞的措施。这就是可以称为《尤里乌斯交通堵塞处理措施法》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日出开始到日落为止，严禁乘马车进入罗马市区，只有国家举行祭祀活动用的马车和用于公共建设的物资运输车辆例外。人和物资在有太阳的时候到达罗马，一律不允许在日落之前乘车进入市区。人只能步行，物资只能由行李搬运工背着进入市区。不过，日落以后便会解禁，因此一直在市外等候的运输车便会一齐拥向市区。住在临

街房子里的人，因为铁车轮和石板地面相碰撞产生的噪音而难以入眠。

城市生活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娱乐方面，都有许多优点，但是缺点也不少。正因如此，古罗马人热衷于在郊外拥有一栋别墅。这项尤里乌斯法谁也不想修改，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一直有效。据说，在尤里乌斯·恺撒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只是在首都罗马实行，而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开始也适用于意大利本土内的其他城市，随着古罗马实行帝政，又扩大到了行省的主要城市。到了公元2世纪的五贤帝时代，大多数城市都开始施行这部法律。

这样，乘马车到达罗马的旅客在进入市区之前，就要下车。如果通过的道路是阿皮亚大道，那么下车的地方就是这条大道的终点卡佩纳门的门前。但即使下了车，身体疲惫或者虚弱的人还有另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由两个人抬的轿子。这是因为，当时是允许使用轿子的。没有自家的用人来迎接的人也可以租轿子。总之，市内交通主要是步行。就任终身独裁官而实质上成为皇帝的恺撒，在从位于罗马广场的官邸去往布鲁图等人带刀埋伏的庞培剧场的回廊时，就是步行。图拉真大帝在从多瑙河前线回到罗马时，也是在大道的终点下马，徒步走进市内的。

由此经历了两千年岁月沧桑的现代罗马，已经看不见当年阿皮亚大道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的卡佩纳门。但是，这里至今仍是许多道路交叉的地点。它现在的名称是“卡佩纳门广场”。左边可以望见卡拉卡拉大帝的大浴场遗址，走近市内，正面便是昔日的大竞技场。右边相继进入视野的，则是古罗马时期代表性建筑的遗址，包括建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遗址、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门，以及圆形竞技场。

古时候，人们在这里只能放弃交通工具，徒步进入市内，但是现在汽车和公共汽车都通畅无阻地进入市内。也正因如此，现在罗马的市中心到处交通堵塞，充满了汽车的尾气。到了16世纪，米开朗琪罗设计了卡匹托尔广场，而作为罗马城的象征物被转移到卡匹托尔山上的马可·奥勒留皇帝骑马像在修复后为了防止尾气的腐蚀而被装入了附近美术馆的玻璃柜中。每当我走过卡佩纳门广场的时候，都会痛感从这里开始的罗马实在不是为了汽车而建造的。但是如果徒步行走，或者用人力车的话，现代人能答应吗？也许过去的人腿脚比现代人强健吧。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研究人员的主流看法，人类超过在罗马大道上行驶的速度，是由于始于19世纪中叶的铁路发展和进入20世纪以后汽车的普及。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400年中，交通工具一直是人类的脚、马和马车，这种状态始终没有变化，但是道路的状况越来越差。

在西罗马帝国已经崩溃的公元6世纪，阿皮亚大道仍然令访问意大

利的东罗马帝国大臣赞叹不已。这是自公元前312年开工开始，历经800多年后，对罗马大道的最高评价。但是，罗马大道能够经得起长达800年的漫长岁月和沉重的车辆的辗压，也归功于一直坚持的维修养护。罗马的工程师们曾经夸口说，罗马大道100年不需要维修养护，但他们说的是100年，而不是800年。罗马的各条大道有专门的养护负责人，称为“大道保护人”，相当于交通部公路局局长的职务。也就是说，阿皮亚大道的“保护人”是谁，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保护人”是谁，都有专人负责。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高级公务员负责管理，全长达到8万公里的罗马大道的干道一直发挥着帝国动脉的作用。

罗马人把这些干道称为“公路”。按照罗马人的观点，既然称为“公共的道路”，就意味着是国家负责的工作。不过，它并不拒绝在财政方面的私人赞助。相反，皇帝本人就自掏腰包修建道路，并鼓励私人赞助。在整个帝国，至今仍遍布着这样的石碑，这些石碑上刻着某某人捐赠了从哪儿到哪儿的路段的修理费用。在罗马道路网的维护方面，也实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三方参与的政策。

但是强大的罗马帝国最后也势所必然地开始走向衰亡。尤其是从公元235年开始的50年中，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史称“3世纪危机”。在政局动荡的半个世纪中，一年内就更迭了多位皇帝。政局的动荡势必导致经济的恶化。在这个时期以后，罗马大道便开始无人管理。在戴克里先大帝和君士坦丁大帝的强力统治下，暂时克服了“3世纪危机”，但是即使如此，罗马帝国的国力也已经无力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大臣通过的阿皮亚大道，是已经有300年无人管理的大道了。尽管如此，当时这条大道仍然令人惊叹，也许是铺设时工程技术水平的高超和其后500多年中坚持不懈的维修养护的结晶吧。

一位现代的研究人员曾写道：“只有保持政治上一贯性的国家，才可能有健全的路政管理。”

现代人所见的，是一个保持政治上一贯性的国家灭亡后长期无人管理、路石磨损、满地尘土，甚至杂草丛生、路面颠簸不平的罗马大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误以为这就是当初的罗马大道。以保存古罗马时期原貌为特色的庞贝街道也已经路石磨损，但庞贝只不过是意大利南部多个中小城市之一，而且这条街道是城里的一条通道。市内的街道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另外，城里正如我们现代限制车速一样，在古罗马时期白天

禁止马车往来。当时，城里的街道不需要像被称为“公路”的干道那样严格管理。

埃及人由于有尼罗河这样天然的交通运输线，因此没有修建过一条像样的道路。埃及的道路完全是古罗马时期的产物。

希腊人也由于海上交通发达，而且城邦之间斗争激烈，连想也没想过要修建联结各城邦之间的道路网。遍布希腊的道路全部是在处于罗马统治之下以后建成的。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开通了一条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惊叹的、称为“王道”的大路。这是一条联结从波斯湾附近的波斯波利斯至地中海一侧的萨迪斯的道路，长达2500公里。沿途每隔一定距离就建有一个驿站，但是否全线用石头铺成不得而知。根据比希罗多德晚100年的色诺芬的记载，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行军的时候，脚下是一片泥泞，因此也许当时“王道”已经成了历史。但是，长度相当于5条阿皮亚大道的这种道路在波斯只有一条。虽然是漂亮的大路，但是如果只有一两条，只要动用国王的权力和财力，修建它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但是罗马大道却是呈“网”状的8万公里，罗马大道最大的特点不是它的距离之长，而在于它的网络化。

我们不妨看一下地图。与用大量的文字说明相比，看地图更加直观。本书中，与罗马道路网的图一起，同时提供了现代的公路和铁路的交通图，以便读者比较两千年前和现代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因此，古罗马时期道路网的地图上，也使用的是现代名称：不用伦丁尼姆，而是用伦敦；不用鲁特西亚，而是用巴黎；不用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而是用科隆；不用维多波纳，而是用维也纳。

看到这些地图，就不难理解，遍布整个帝国的道路网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就是一张庞大的血管网，而且它是将罗马帝国融合为一体的最有效的手段。

在此，我介绍一下曾经是被征服国家的人的话，作为佐证。公元143年，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哲学家、当时年仅20多岁的艾利斯泰迪斯在罗马作了一次演讲。下面是他演讲的一部分。这个内容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作了介绍，这里请允许我再重复一下：

> 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
>
> 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

我忘了一件事，法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设施。

还有，在这个罗马帝国动脉流动的，有人，有物资，还有信息，而艾利斯泰迪斯也没有忘记提到信息传递制度。

> 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

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希腊语读法叫Hermēs，拉丁语叫Mercurius），会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古罗马时期与现代不同，信息不是马上就能送达。但是他们深知建立信息传递制度的重要性。

在说明罗马人社会的时候，我使用了“命运共同体”这个词，但在古罗马时期，并不存在这个词。他们用非常简单的“familia”这个词来表达，也就是“家庭”。对于他们来说，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正是由于有这种想法，他们才会不分本国还是行省，修建道路网，并且建立水道系统，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最为重要的水。

罗马人建造的基础设施，用罗马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文明生活所需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在硬件方面的主角之一是罗马大道，而另一个主角便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罗马水道。

水道

罗马为了引水而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架设高耸入云的高架桥，是不是因为罗马缺水资源呢？答案完全是否定的。首先，罗马城边就有一条大河，它就是即使进入枯水期的夏季也水量充沛的台伯河。此外，罗马城坐落在七座小山丘上，这些小山丘也有许多溪流，山间的洼地在下大雨的时候，就会变为一片湿地。据说罗马下水道的修建早于上水道，这也是因为需要把多余的雨水汇集起来，排入台伯河。如果不加管理，湿地便会产生大量的蚊子。当时，有不少城镇因为疟疾肆虐而让

人无法接近。

由于罗马并不缺水，因此自公元前753年建国起，至公元前312年为止长达440年的漫长岁月中，罗马与古代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是饮用泉水、井水、溪水。这种情况由于一位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政治家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此人就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他也是提出并修建了最早的罗马大道阿皮亚大道的人。阿庇乌斯修建了罗马式的人工道路，以之代替人和车的踩压而形成的自然道路。也许他认为，水也同样，依赖于自然是不够的，建立人工的稳定供应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程。与阿皮亚大道一样，公元前312年开工的罗马最早的水道，也以制订方案和工程最高负责人的姓而命名为“阿皮亚水道”。

当时的阿庇乌斯任财务官。古罗马共和制时期的最高官职是执政官，而财政官是从当过数任执政官的人中间选出来的。设置这种官职，最初的原因是开展人口调查，而当时人口调查的目的，是弄清服兵役的适龄青年人数。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做到公正，因此通常要从元老院德高望重的人中选拔。

另外，当时的罗马与周边的各个部族之间一直战争不断，因此执政官大多数时间都率领军团在外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内政自然而然地就经常由财务官负责，因而财务官的任务也增多了。而且，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相比，财务官的任期长达5年。我想，这给阿庇乌斯创造了一个环境，让他可以进行历时一年以上的公共事业。最早想到利用这个职位的人，便是阿庇乌斯。这是因为，此前没有一位财务官尝试过这样的事情。在阿庇乌斯之后，形成了一个惯例：没有战争时，负责公共事业建设的人由执政官担任；如果不问战时和平时，则由财务官担任。甚至在罗马实行帝制以后，皇帝想要开展一项大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在此期间也亲自兼任财务官。可以说，阿庇乌斯树立了一位财务官等于公共事业

最高负责人这一罗马传统的“里程碑”。

但是，在道路和水道这两大基础设施工程开工的公元前312年，罗马国家刚刚开始征服意大利半岛中部。正如还没有汽车，就修通了一条宽阔的机动车道；房子没有浴室，却先建好了自来水管道一样。尽管如此，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汽车，而且能够每天洗澡，所以，所谓基础设施，也许并不是因为有需要才去做，而应该是为了创造需求而去做。

虽然如此，在那个时期，能够想到并且建造不仅在意大利半岛，而且在成为覆盖欧洲、中东和北非的庞大帝国之后，仍然完全能够适用的基础设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毋庸置疑，阿庇乌斯把基础设施视为重要的国政，而不是单纯的土木工程。否则，他就不可能提出并实施罗马大道和罗马水道这两项国家百年大计，甚至国家八百年大计。

公元前312年对于罗马这个国家来说，是“基础设施元年”。这是因为阿皮亚大道成为后来所有罗马大道的样板，同样，阿皮亚水道也成为后来所有罗马水道的样板。

阿皮亚水道全长16.617公里。

其中，通过地下的长度为16.528公里。

地上部分总计89米。

地下的水道要挖地下通道，让水从通道中通过。地上的水道则要修建旱桥或者高架桥，让水从上面通过。与此后的罗马水道相比，阿皮亚水道的地下和地上的比例也高达158 ： 1，通过地下的距离远比地上要长。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为了防止遭到敌人的破坏。在建造罗马最早的水道的时候，最多只有周边二三十公里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罗马成为庞大的帝国之后建造的水道，同样是通过地下通道的距离更长，地上与地下的比例为2：4或2：5左右。其原因，第一是为了控制流动过程中的水

温升高，第二是为了防止流动过程中的水分蒸发。古罗马是一个南方国家，水温升高，水就会变质。由于是从路途遥远的山中引来的水，所以建设水道的目的，当然是稳定、随时地向市民提供优质的水。

阿皮亚水道的水源是罗马东部山地涌出的泉水。古罗马时期的水道工程人员是如何确定水源的呢？那个时代，并不像现代这样，有调查水质的化学知识和手段。

首先，他们从山地众多的泉水中，舀来检验用的水，通过人的肉眼对水本身进行观察。如果清澈无色，且无杂质，即为合格。

其次，是调查泉水周边的地区。草木的生长状态如何？土壤的颜色如何？调查对象还包括住在附近的居民，是否脸色好？眼睛的颜色是否清澈？骨骼如何？生病的人和残疾人的数量是否异常？同时，将舀来的水倒入优质的青铜壶中，放置数日，以检验水是否容易变质。除此以外，还要检验水煮开以后是否起泡，杂质是否浮到表面上来。总之，由于当时没有消毒剂，所以在决定水源时，各种勘察和检验都十分仔细。即使确定为水源，罗马人也不从湖面或者泉水的水面附近取水使用，而是挖一个坑道，通到湖泊或者山泉的旁边，以便引来深处更清澈的水，而不是使用水面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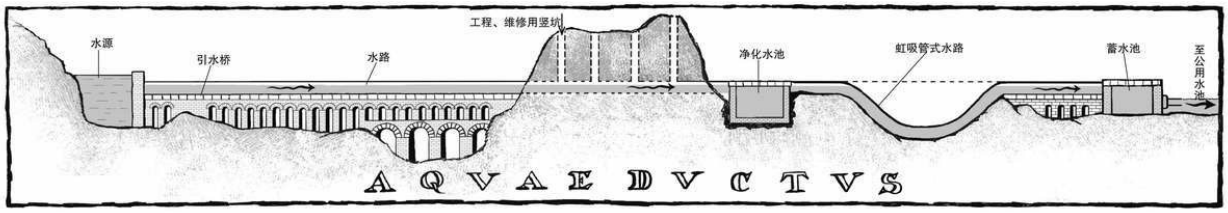
确定水源之后，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把水从水源引到城市，如果是道路，只要把路修得尽量平坦，人和车就会自己在上面行走。但是水与之不同，它自己不会流动。罗马人似乎还不知道地球有引力，但是懂得水往低处流的道理。

而且在没有消毒剂的时代，他们想出的保持水质清洁的方法就是让水不停地流动，也就是所谓的“流水不腐”。

虽然相比而言阿皮亚水道比较短，但其长度也仍然有16公里以上。而且，从山区到处于平原地带的罗马，其间既有山丘、低谷，也有河

流。因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水道修成多大的坡度，水才会流动。如果坡度过小，水就不会流动。相反，如果坡度过大，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所产生的水压显然都会破坏引水通道。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钢管，因此水流经的通道是用水泥来防护的。计算出适当的倾斜率，对于水道工程来说，是一项尤其不可缺少的工作。《建筑十书》一书的作者维特鲁威与《关于水道》的作者弗朗提努斯在倾斜率的说法上并不一致，但是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如果地势平坦，坡度似乎在0.2%左右。当然，这与如何消化复杂的地势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理应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维特鲁威认为它是0.5%，而且据说有些地方达到16.5%。

如果山丘不是很大，一般采用在山的侧面挖一个通道穿山而过的方法，为此需要从山上往山下每隔一段距离挖几个竖坑。如果将挖坑产生的沙土、石头运到外面，那么这种竖坑在工程完工的时候，应该就不再需要了。但是实际上，这种竖坑仍然是有用的。它用做维修人员检查情况或者施工的一个通道。



罗马水道的原型（从水源至蓄水池）

如果山谷不是太深、太大，罗马工程师就运用虹吸原理，沿着下降、上升的山谷的脊线修建坑道。流到山谷边缘的水通过坑道时下落，然后利用这个力，被送至山谷对面的山丘边缘。

但是如果山谷比较大，或者比较深，就不能使用这种虹吸方法。因此，罗马人采用与修路一样的方法，即从山谷的这一边架桥到另一边。不过，人车通行的桥梁与水通行的桥梁的不同，后者必须有一个坡度。

既然罗马人架设了这么多引水的高架桥，理应完全可以让行人、车马也从上面通行，但是罗马人不允许这样。即使允许，也只有人可以通行，而车和马则严禁从这些引水桥上通行。这是因为，需要维修时，它的上部可以随时打开，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铺盖在坑道上面的石头。

如果山谷下面有河流，当然不能采用虹吸的方式，而必须架桥，让水从桥上通过。桥上、桥下水流潺潺，交相辉映，往往令游人赏心悦目。

古罗马地下水道的建筑遗构并不是谁都能够看到的，但是建在地面上的高耸入云的高架引水桥，无论在罗马近郊还是法国南部的城市尼姆、西班牙中部的塞哥维亚古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每次我看到它们，都不由得感叹，仅仅为了水的稳定供应，竟然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当我看到穿过一望无际的沙漠，从水源地一直通到迦太基城市的那条古罗马时期的高架引水桥遗迹的时候，我不仅感动，而且彻底惊呆了。就在此时，我的身边走过一辆驴拉的车，上面堆满了装水的瓶子。那是一辆卖水的车。这令我不由得想起，在古罗马时期是没有卖水的小贩的。

尽管如此，罗马人并非为了炫耀权力和财力，而建造数十米高的高架引水桥，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罗马的工程师们了解利用水下落的力量把水压上去的虹吸原理，甚至懂得它的机械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机械化应用到水道上。当时，一些街道作坊已经在应用虹吸原理，但是水道工程的规模与之截然不同。因此，如果运送大量水的水道也运用虹吸原理，就只有把水引到高处，将水落下的力量变成水的推力。然而，“对方”不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而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必须推动极大的水量。而且，罗马人把水先放在蓄水池中，然后再输送到城市，所以城市内外的水道必须建成高架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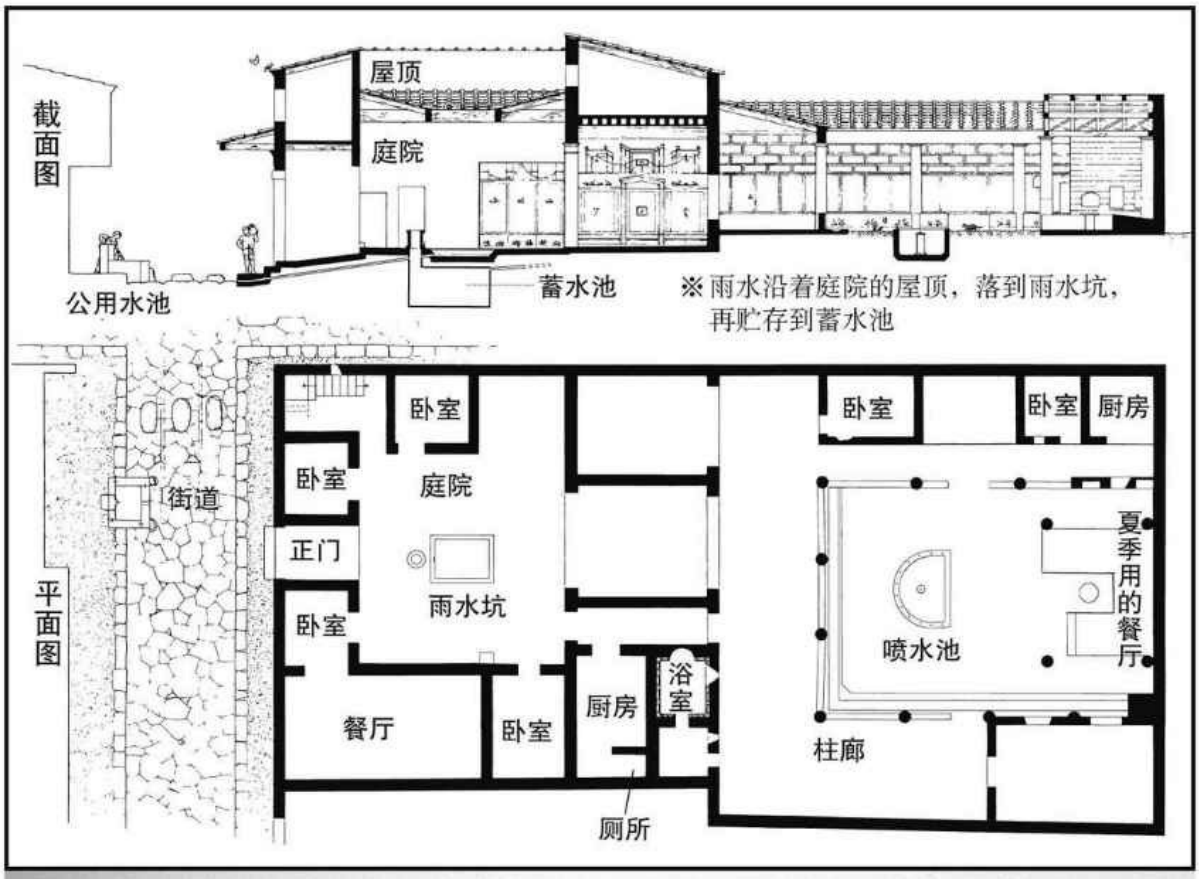
这种蓄水池所发挥的功能，首先在于贮存从水源地引来的水，并使杂质沉淀，再把水供应到市内。此外，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在枯水

期的时候，按照优先顺序供水，这种功能恰恰体现了罗马人的“公”和“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阐述。这是因为，在建造阿皮亚水道的时候，罗马的人口还比较少，要求蓄水池具备的功能也只不过是沉淀杂质就足够了。

据古罗马时期的资料记载，阿皮亚水道的水质相当好，因为它不是取自地表的泉水，而是往下挖16米深，把流进泉眼之前的地下水引到地下的坑道内。根据现代研究人员的推算，每天的送水量为7.3万立方米，作为给罗马市内的供水量是否足够，不得而知，但至少古罗马建造了稳定持续地供应人类用水的一个“里程碑”。而且，罗马人正如修建罗马大道那样，是一个喜欢有多个选择的民族，并不单纯地依赖于水道。即使在阿皮亚水道建成之后，他们也没有抛弃以往一直使用的利用雨水的方法。

罗马市内的民宅，无论是独栋住宅还是一栋多户的住宅，屋顶都不是朝向房子的外侧，而是朝向房子的内侧倾斜。这是因为，雨水沿着屋顶流下来，通过导水管贮存到地下的蓄水池，可以供日常使用。罗马与意大利北部相比，雨水稀少，而正是因为雨水少，所以他们才想出了利用雨水的方法。这种利用雨水的方法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优点，那就是，不需要到户外舀水。由于有这个优点，即使在修建了水道，可以稳定供应清澈的生活用水之后，罗马人也继续利用雨水。这是因为，这些雨水足可用于打扫、洗涤，以及浇灌种在庭院里的花草，用于冲水式厕所。另外，把水道的水引到自己家里，需要缴纳水费，这可能也是他们热衷于使用雨水的一个原因。

总之，罗马人在交通上采用了三位一体的修建方法，即作为干道的“公路”、作为支线的地方道路以及私有道路。同样，水也一直有三个选择，即水道、井、雨水。


截面图
屋顶
庭院
公用水池
蓄水池
※雨水沿着庭院的屋顶，落到雨水坑，
再贮存到蓄水池
平面图
街道
正门
卧室
卧室
卧室
庭院
雨水坑
餐厅
卧室
厨房
浴室
厕所
卧室
卧室
厨房
喷水池
夏季用的餐厅
柱廊

独栋住宅的雨水利用方法。上为截面图，中为平面图（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下为独栋住宅复原模型（中央向内侧倾斜的屋顶下面是雨水坑）

即使从它们让罗马人懂得了拥有多种选择的好处这个意义来说，阿皮亚大道和阿皮亚水道的建造也是罗马值得永载史册的两项伟大工程。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说过：“民众即使对于抽象的事情会判断错误，如果示之以具体的形式，他们也会具有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而阿庇乌斯通过修建道路和水道，证明了这一观点。阿庇乌斯能够推动如此伟大的工程，是因为他身居财务官的职位。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职位是通过市民集会选举而选拔任命的。

罗马第二条水道“旧阿尼奥水道”是在修建阿皮亚水道40年后的公元前272年开工的。这条水道的名称带一个“旧”字，是从帝制时期修建“新阿尼奥水道”以后开始的，因此在此之前，只称为“阿尼奥水道”。所谓“阿尼奥”，是一条在罗马以北3公里的附近流入台伯河的河流名称。旧阿尼奥水道的水源是流入这条河上游的溪流。据说，这两条水道的名称以河流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制订方案并负责工程总体监督的财务官有两个人，将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太长，便用河流的名称取代。

阿尼奥水道全长63.680公里。

通过地下的长度为63.352公里。

地上部分总计328米。

水量为每天175920立方米，相当于阿皮亚水道的2.5倍。

但是如果连续降雨，这条水道常常会变得混浊，水质不如阿皮亚水道。据说，这是由于这条水道直接引的是溪流，而不是地下水。

在这两条水道之后，与道路工程一样，水道工程也被迫中断了100多年。这100多年与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战争的年代完全吻合。也许古罗马人虽然知道这件事重要，但当时也无暇顾及基础设施了。

第三条罗马水道开工于公元前144年。在开工之前的两年，随着迦太基被烧毁，第三次布匿战争也终于宣告结束。这样，罗马便可以将大部分的国家经费投入基础设施上。

这条水道的设计人，便是当时任法务官的马西乌斯，因而这条水道也就被命名为“马西亚水道”。在罗马共和时期，法务官虽然也是一个要职，但是并不是像执政官、财务官那样高权威的官职。实际上，当初分派给马西乌斯的任务是阿皮亚水道和阿尼奥水道这两条水道的修复工程。不过，马西乌斯完成修复工程的调查工作之后认为，即使修复这两

条水道，也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罗马人口的需要，必须修建新的工程。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战胜了迦太基，又战胜了马其顿共和国，成为地中海一带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城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帝国首都。因此，马西乌斯在元老院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元老院不仅接受了他的想法，而且把只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的马西乌斯任命为工程的总监，甚至批准了罗马第三条水道建成后冠以马西乌斯的名字。

马西亚水道中的水也与阿尼奥水道一样来自阿涅内河，但是它比阿尼奥水道的水源来自远得多的上游，而且不是直接引溪流，而是以流入其中一条溪流的地下水为水源。因此，它的水质与后面将要讲到的维哥水道齐名，在最终修建成的11条向首都罗马输水的水道中，被评价为水质最好。

马西亚水道全长91.64公里。

地下部分80.56公里。

地上部分11.08公里。

地上部分中，有9.6公里为高架水道。

马西亚水道不仅水质最好，而且每天的输水量也达到了当时最大的输水量，为18.56万立方米。

这条水道与其他10条给罗马输水的水道一样，由于公元538年蛮族入侵而停用。尽管如此，在此前680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给罗马输送城市用水。虽然这与执政官和皇帝像对道路所做的那样，一直勤勤恳恳地对水道进行维修保养不无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要归功于年轻的法务官马西乌斯，因为正是他找到了最好的水源地，并建造了一条能够在保持水质的同时将水源地的水输送到90公里以外的罗马的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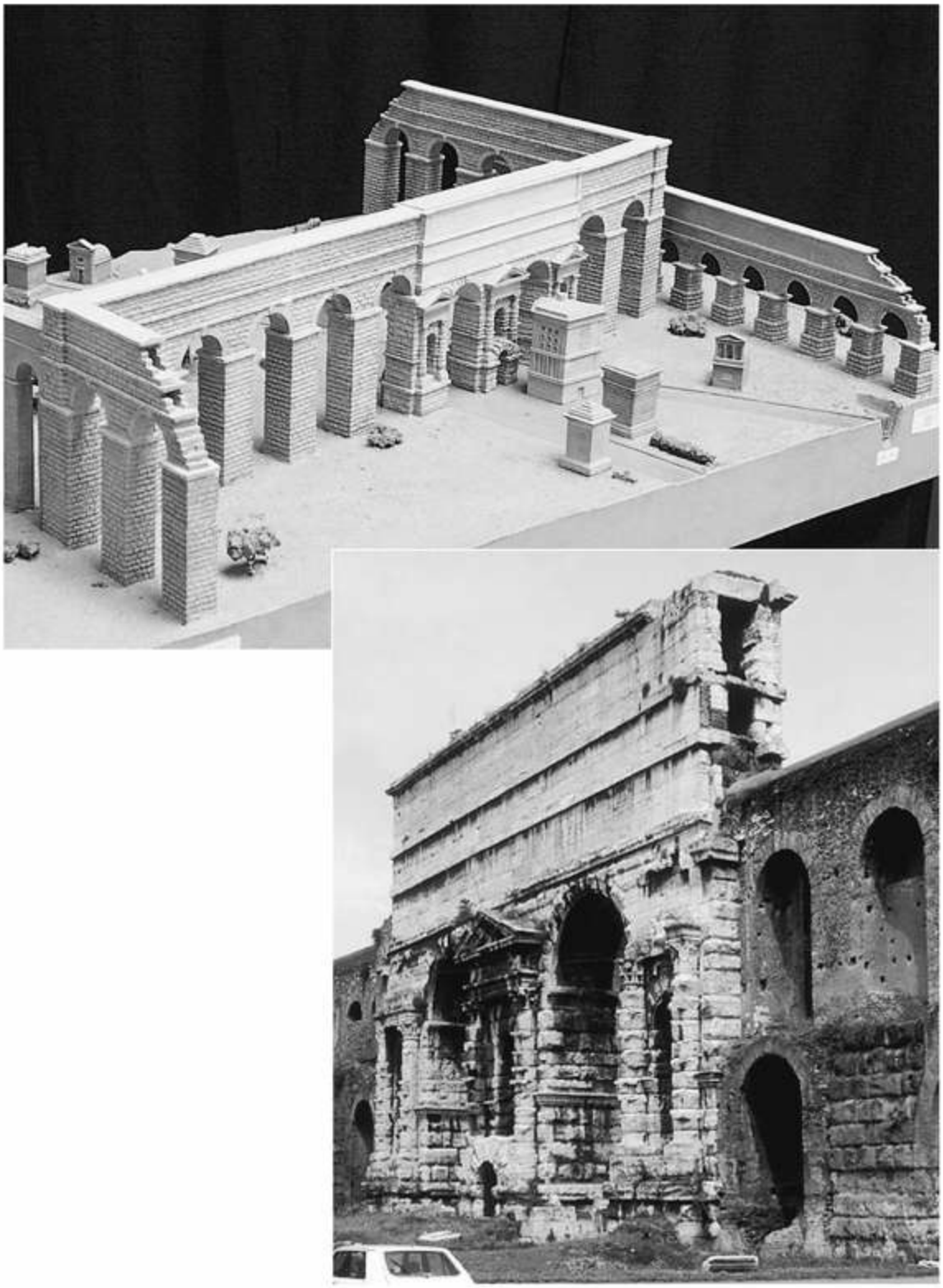
实际上，即使到了现代，马西亚水道也一直在发挥着它的功能。这

是因为，意大利统一后的1870年，人们又想起了它良好的水质，并恢复了对它的使用。而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在给罗马的市中心输水。它的名称也沿用古代的称呼，仍然称为“马西亚水道”。这条水道在古代每天输水量为18.56万立方米，而到现代，增加了60%，为30.24万立方米。许多古代的罗马大道变成了现代的国道而被重新使用，而罗马水道也并没有与罗马帝国一同灭亡。不过，现代复活的马西亚水道不是像过去那样“放任自流”，而是变成了拧水龙头的现代方式。也就是说，为了保持水的清澈，不得不使用消毒剂，因此它也带有漂白粉的味道。

公元前140多年已经建造了水质好、水量充足的水道，20年后，罗马又开始着手修建新的水道，因此毫无疑问，在地中海开始成为罗马的内海的时期，流入首都罗马的人口一直是不断增长的。

关于公元前125年开工的罗马第四条水道“特普拉水道”，现在只知道当年两位财务官的名字，无论是距离还是输水量都不得而知。“特普拉”这个水道名称以水源地命名，似乎也是因为这条水道由两位财务官制订方案，冠以两个人的名字太长，但唯独关于这条水道后人知之甚少。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它是沿着马西亚水道建造的，基本上相当于一条支线；其二，它后来被纳入100年后建造的罗马第五条水道。

尽管如此，特普拉水道对于罗马人来说，并非一条无关紧要的水道。公元前1世纪指的是自公元前100年开始的一个世纪，而这100年正值共和制的末期，在罗马史上，这是罗马当权者之间权力斗争最激烈的一个世纪。马略、苏拉、庞培、恺撒，这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卓越才能的当权者为了争夺霸权而相互争斗。而且这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围绕不同的古罗马国家方针的斗争，因此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斗争。苏拉和庞培是坚持一直以来的元老院主导体制这一派的领袖，而恺撒则想要实行对于罗马人来说耳目一新的帝制。



上为汇集5条水道的马焦雷门附近复原模型。模型右的三层水道分别为朱利亚、特普拉、马西亚三条水道。模型左手的两层分别为新阿尼奥水道、克劳狄亚水道。右为

今马焦雷门。

虽然这些人政治观点不同，却都需要罗马公民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无论是元老院的苏拉、庞培，还是恺撒，都热心于公共事业。尽管他们都宣称，身居高位就应该回报公共事业，这是罗马的传统，但是在获取民众支持这一点上，公共事业也是一项选举活动。苏拉修建了古罗马国家档案馆，庞培在马尔斯广场上修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剧场和与其配套的列柱回廊，赠送给市民。恺撒更是修建了不止一处。首先，在古罗马广场上修建了尤里乌斯会堂。然后，又修建了公共广场，扩大了古罗马广场。在马尔斯广场上，还修建了一条称为“尤里乌斯选举会场”的列柱回廊，在选举时用于投票，没有选举时则供市民散步。此外，他还下令开工建造了马萨鲁斯剧场。

我们不能说这些当权者只关注建筑物，而不关心道路和水道。恺撒启动了阿皮亚大道的修复工程，尽管他没有对全线进行维修。因此，如果这个时期的罗马缺水，肯定这些当权者会考虑修建水道。这是因为，虽然政治、经济场所和娱乐设施对城市生活都很重要，但如果缺水，首先会影响平民的生活。在共和制时期的罗马，平民也是拥有一票选举权的人。

然而，在堪称基础设施活跃期的这段时期，唯独新的水道工程一项也没有。究其原因，是因为阿皮亚、阿尼奥、马西亚、特普拉这四条水道输送到罗马的水满足了罗马人的需要，还是因为即使不能说足够，至少缺水问题不严重，水基本够用了呢？或者罗马历史学家们一致称为“内乱”的这个时期，无法进行像道路、水道这样为未来考虑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呢？

我认为这些都是原因。将自己的著作《建筑十书》呈献给当时的皇帝奥古斯都的维特鲁威在书中也曾经写过，皇帝的义务已经不仅仅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也不仅仅是建设罗马帝国，还在于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正因如此，在奥古斯都的养父恺撒手下的军团担任军事工程师的

维特鲁威才决定，通过写这本书研究包括民用建筑在内的建筑情况。

作为古罗马帝国开国皇帝的奥古斯都，同时也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路线的创始人。要想真正着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和平，而且基础设施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维护永久和平的最佳手段。事实上，在实行帝制的同时，罗马人的基础设施工程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仅进入首都罗马的水道，就有三条是在奥古斯都时期建造的，尽管他的统治时间长达40年。

按照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观点，好领导分为两种：其一，自己有无所不能的能力，因此事必躬亲的人。其二，自知自己没有无所不能的能力，因此把自己不能做的事委托给别人的人。

尤里乌斯·恺撒属于前者，而奥古斯都属于后者。

但是恺撒将这位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并将其定为继承人的时候，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个当时只有17岁的年轻人的性格。他富有政治才能，而缺少军事才能。因此，恺撒为了弥补他的这个缺点，提拔了一位与其养子同龄的、身份卑微的军团兵作为他的左右手。这就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

恺撒的眼光不久便得到了证明。在恺撒被暗杀后长达14年的内乱中，奥古斯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首先便是由于其与年龄不相称的、巧妙的政治和外交才能。但是靠政治、外交不能解决而只能诉诸武力的时候，阿格里帕的存在便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没有阿格里帕发挥了左右手的作用，那么奥古斯都也许就不会在与布鲁图之间发生的腓立比之战、与安东尼之间发生的亚克兴海战中取得胜利。因与被后世称为“埃及艳后”的克娄巴特拉的爱情而闻名的马克·安东尼，虽然缺乏政治才能，但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正因如此，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这场罗马内战的决定性战役中，将左翼的指挥权交

给了安东尼。虽然，天生的政治家奥古斯都缺乏军事才能，但他手下却有阿格里帕这样的战将。

公元前30年，随着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战败自杀，漫长的罗马内乱也宣告结束。覆盖欧洲、中东、北非的罗马帝国进入了当时年仅33岁的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虽然此后并非没有发生过战斗，但是由于奉行“和平”政策，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用建筑学家维特鲁威的话来说，“担心公民生命安全的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了坚定不移地“建设罗马帝国”的时代。

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由于军事才能受到赏识而被提拔、功勋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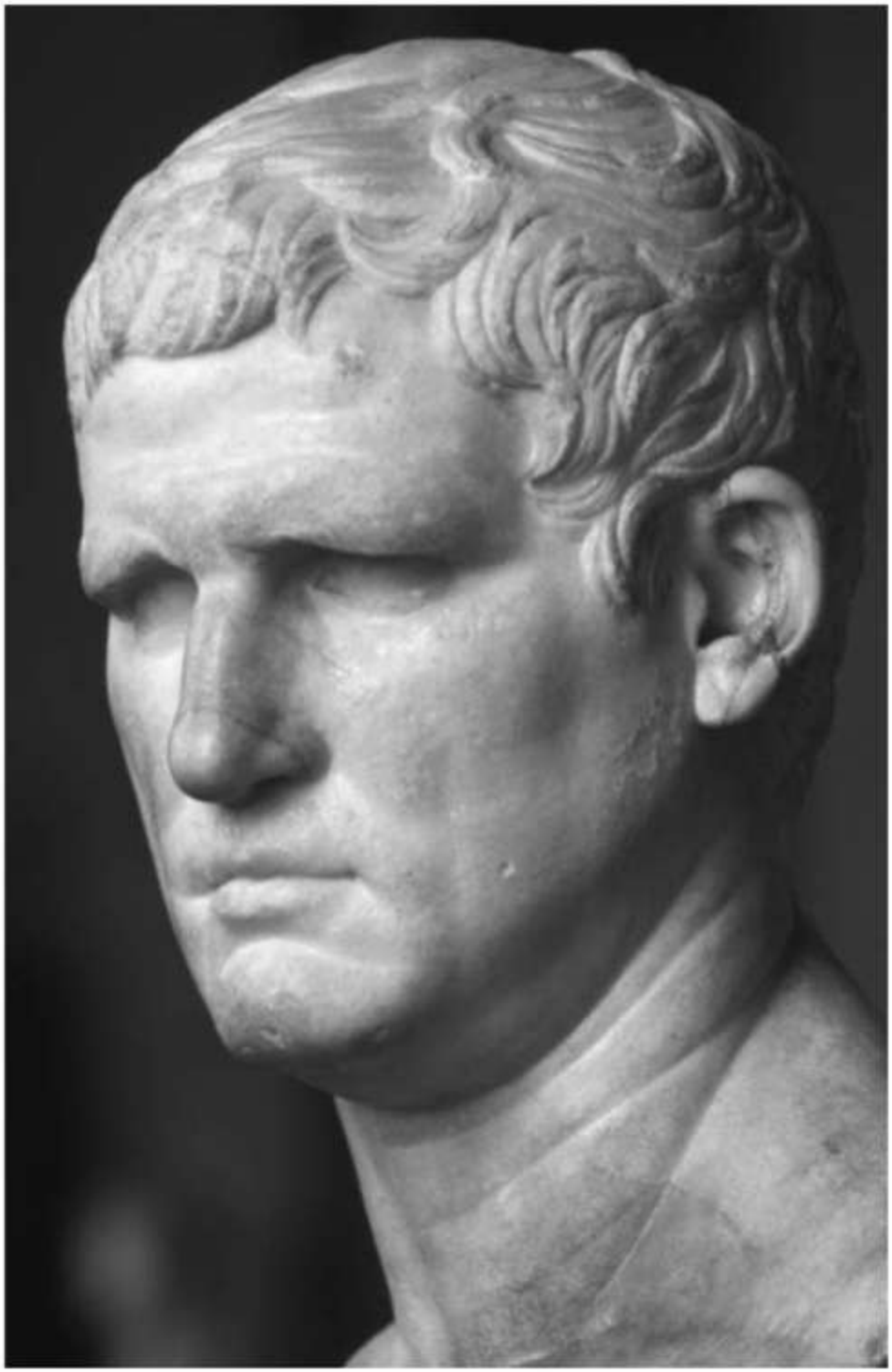
的阿格里帕似乎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这里正体现了奥古斯都的伟大之处。他没有冷落阿格里帕，而是给了这位盟友一个新的发挥才能的舞台，这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再借用维特鲁威的话，他自己来“建设罗马帝国”，而给予阿格里帕的角色是“完善基础设施”。这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阿格里帕在进入了以和平为旗帜的时代以后，仍是奥古斯都的“左右手”。

一名优秀的将领同时也是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奉命从事公共事业的阿格里帕组织了一个由240人组成的技术员队伍。这些人全部是奴隶，他们并不是从培养罗马技术人员的军团中选拔、组织起来的。也许这是因为，作为将领的阿格里帕懂得，工程师对于罗马军团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另外，这些人是奴隶，指的是他们都是昔日的被征服者。但是即使昨天还是敌人，只要是可用之才，就要起用，这也是罗马人擅长的一种利用被征服者的手段。阿格里帕组织的这支技术员队伍中，除了他曾经与之征战的高卢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以外，还有在建筑方面具有卓越才能的希腊人。

阿格里帕率领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了“完善基础设施”的巨大工程，但是他并没有排除罗马的技术人员。身为军团下属的技术人员，显然与军团兵一样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维特鲁威，也并非把退役后的生活全部用于写作《建筑十书》这本书，而是作为工程师参加了奥古斯都在阿格里帕的帮助下进行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全面改造工程。与其他公共工程不同，道路和桥梁原本就是为了军用而建造的，因此实际上由军团兵负责施工。也许指挥罗马公民出身的军团兵进行施工的工程师最好是罗马公民，而不应该是来自希腊的东方奴隶。虽然罗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有些时候完全消除民族差异并非一个聪明的做法。

但是，建造水道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采用的方法是：技术员队伍负责制定工程计划和建成后的维修，而实际的工程则委托中标的私人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工程的技术人员即使是奴隶身份，也无可厚

非。总之，阿格里帕组织的240人的技术员队伍当时实际上成为了掌管罗马帝国“公共建设”的一个部门。



马尔库斯· 阿格里帕

阿格里帕率领这支技术人员队伍修建了什么呢？要想列举的话，我想，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感到索然无趣，因此我们在此只列举一些著名的建筑。仅仅罗马市内，就有如下的建筑物：

万神殿。后由哈德良皇帝改建。

阿格里帕浴场。位于万神殿的南侧，是罗马最早的大规模公共浴场。

阿格里帕湖。位于浴场西侧，作为市民休憩的地方，四周用回廊环绕，森林郁郁葱葱，属于人工湖。

维普萨尼亚回廊。位于万神殿东北面，与古罗马时期建有“和平祭坛”的地方隔着一条弗拉米尼亚大道，回廊的墙面上装饰着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镶嵌的整个帝国的地图。维普萨尼亚是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亚·阿格里帕的家族名字。

从战场转向基础设施建设的阿格里帕，在行省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历经两千年依然耸立在法国南部尼姆的嘉德水道桥便是他下令修建的引水桥，用来供应尼姆居民的用水。

除了单个的公共建筑以外，他甚至建造了包括所有基础设施在内的城市。今天德国的主要城市之一科隆最初不过是获准住在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村落而已，而将它变成城市的正是阿格里帕。它在古罗马时期的名称是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只不过表示殖民城市的“科隆尼亚”转成德语后，改成了科隆罢了。

阿格里帕在行省也修建了正式的水道。也许他认为，帝国首都罗马仅仅靠维护已有的四条水道不够用，便又修建了两条水道。如果包括他死后建成的一条在内，则是修建了三条。这就是尤里亚水道、维哥水道和阿尔谢提那水道。

“尤里亚水道”以奥古斯都的家族名字尤里乌斯命名。

尤里亚水道全长22.9公里。

地下部分12.5公里。

地上部分10.4公里。

其中地上部分有9.6公里为高架水道。

每天的输水量为马西亚水道的四分之一，约为5万立方米。水质与特普拉水道差不多，因此应该属于中等。据说，建造这条水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满足罗马东部城区的供水。

但是阿格里帕倾注热情最多的一条水道，还是维哥水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条水道的主要目的是把水引到他建造的完全罗马式的大浴场——阿格里帕浴场。之所以说是“主要”目的，是因为它同时还向马尔斯广场供水。它从北面进入罗马市区，从今天的西班牙广场附近通过高架水道向南穿过市区，一直到达位于万神殿南部的浴场。之后，又进一步向南延伸。唯独这条水道的建成时间是清楚的。据说，公元前19年的6月9日正式向水道内放水。此时，罗马实行帝制已经11年了。

维哥水道全长为20.946公里。

地下部分19.104公里。

地上部分1.842公里。

其中地上部分有1公里多走高架水道。

每天的输水量为103846立方米。

这条水道与马西亚水道一样，水质非常好。与其他水道一样，它在

公元538年遭到破坏后，一直处于停用状态。到1453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帮助下，时隔900年这条水道被修复，重新投入使用。重新投入使用后的维哥水道按照意大利语的读音，称为“维尔吉内水道”，意为“处女水道”。据说，这是因为在寻找这条水道的水源的时候，工程师们遇到了一位少女，她领着他们找到了一处水质清澈的泉水，因此得名。

特雷维喷泉

两千年前的维哥水道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使用后，直至今天一直给

罗马市中心输水。包括特雷维喷泉、西班牙广场的喷泉，罗马市区为数众多的喷泉几乎全部使用这条水道的水。

不仅仅是喷泉，在罗马的旧城区，还可以见到许多整日哗哗流水的水道口，这些水也是从古代维哥水道流出的。由于它是罗马水道式的“放任自流”，因此与现代式的马西亚水道不同，唯独这条水道的水不需要借助消毒剂就能保持水质，因而没有漂白粉的味道。我在罗马的家前面的路上，沿路走10米，就有这种水道口。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没有消毒的水道不安全，别喝，但是我几乎不会听从这些忠告。我一边用这种水泡茶，一边想我喝的是阿格里帕的水。

阿格里帕在维哥水道建成7年之后便离开了人世，由240人组成的技术员队伍全部留给了奥古斯都。这位皇帝不仅解放了这些人的奴隶身份，而且把他们直接提升为“骑士阶级”，使他们越过了解放奴隶、一般市民、地方议员三个阶级。这就是具有理智气质的奥古斯都。他并非只是因为他们是他的盟友阿格里帕组织培养起来的人就给予这种优待，而是认可这些工程师的功劳。这样，作为阿格里帕的私人机构诞生出来的这支技术人员队伍就提升为罗马帝国的政府机构，堪称“公共建设部”。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马上利用他们建造了另一条水道。

罗马的第七条水道是阿尔谢提那水道。它于阿格里帕去世10年后的公元前2年建成。

阿尔谢提那水道全长32.9公里。

地下部分32.39公里。

地上部分510米，大部分为高架水道桥。

据说，输水量是11条水道中最小的，水质也最差。但是唯独这条水道的目的不同于其他，它不是用做市民的生活用水，而是供应工场作

坊。

这条水道主要是一条直接通到位于罗马西北偏北方向的马提尼亚诺湖中间的地下通道，从那里引水，并由罗马西面进入市区。从高架水道流下来的水直接流入巨大的蓄水池。现代称为“特拉斯提弗列”（意为台伯河对面）的台伯河西岸一带，由于在地理上靠近河流，以前一直是小工厂密集的地区。奥古斯都皇帝期望通过建立这一带稳定的供水系统，繁荣中小手工业。

蓄水池并不仅仅是挖一大片土地，把水储存在里面。它的内部全部用水泥采取了防水处理，其周围环绕着列柱回廊，因此完全像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净化水质的设施也非常完善，水从这个蓄水池供应给各个工厂。因此这一带使用各种水车和许多应用虹吸原理的供水机械。

罗马人把这个蓄水池称为“海战表演池”，引起了后代研究者们的许多猜测。但是在奥古斯都长达44年的统治期间，只有一次在这里的水面上用船只举行模拟海战，供市民娱乐。它也许是为了祝贺水道和蓄水池建成而举办的一项活动。在此之后，再也没有用蓄水池演出的历史记载，因此所谓的“海战表演池”应该是台伯河西岸建造的蓄水池的通称。比较务实的奥古斯都应该不会为了偶尔进行的模拟海战，而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修建水道和蓄水池这样的庞大工程。

继奥古斯都之后成为罗马皇帝的是提比略。这位皇帝统治期间，在水道建设方面没有任何建树。我认为，所谓罗马帝国，就是恺撒绘出蓝图，奥古斯都建构，提比略加以巩固而形成的一个国家。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是一位热心于维修养护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建造新的水道。这正如奥古斯都创建了国营邮政制度，而提比略则在每一个驿站部署了卫兵，以保障邮政和旅行者的安全一样。提比略就是这样一种人。

提比略在位的23年中，不仅对首都罗马，而且对从意大利本土到行省的主要城市的水道都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维护。这一点得到了许多碑文

的证实。水道也与道路一样，并非只要建成了便可一劳永逸。即使引水桥本身没有问题，如果不及时清扫其通道内部，水垢越积越厚，也会产生水压升高的问题。倘若水压超过了容许限度，便会影响到引水桥本身的构造。水道的日常维护如此重要，难怪有的石碑上刻着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表示感谢的文章。日常的维护正如维修自己的房子一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要人口不增加，罗马有7条水道便绰绰有余了。但是帝国进入“和平”时期以后，罗马作为帝国的首都，人口流入已经如同一种自然现象。卡利古拉登上皇位以后，由于他本人好大喜功，下令建造大型的水道，而且两条同时开工。这是公元38年的事。

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由于多行暴政，三年后便被人杀死。由于罗马人施工进度快，因此当时水道已经修建了相当远。最高负责人一死，工程也随之中断。

卡利古拉死后，克劳狄乌斯继承皇位，但是他没有立即重新启动水道工程。这可能是因为，他想优先建造自己设计的奥斯提亚港。另外，为了彻底征服不列颠而发起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在费用方面限制了水道工程。总之，直到公元47年以后，才重新开始水道建设工程，此时距离工程中断已经过去了6年。

但是工程重新开始以后，至竣工为止，仅仅花了不到5年的时间。这是因为克劳狄乌斯大帝把阿格里帕组织起来的240人的技术员队伍扩大到了700人，并把他们投入到两条水道的建设施工中。

公元52年8月1日，为了庆祝克劳狄乌斯大帝的生日，两条水道正式贯通。这两条水道中，一条以皇帝的家族名字命名为“克劳狄亚水道”，另一条因为以流入阿涅内河的溪流为水源而命名为“新阿尼奥水道”。这条水道建成后，在公元前的共和制时期建造的“阿尼奥水道”便改称“旧阿尼奥水道”。这样，罗马通过9条水道完成了稳定供水的体系。

克劳狄亚水道全长68.9公里。

地下部分53.8公里。

地上部分15.1公里。

其中地上部分有9.6公里为高架引水桥。

水质好，输水量为每天191196立方米。

新阿尼奥水道全长87.17公里。

地下部分73.20公里。

地上部分13.97公里。

其中地上部分有9.64公里为高架引水桥。虽然它的水质不是最好，但它的输水量是11条水道中最大的，为每天196727立方米。这个水量在罗马帝国全境所有的水道中也位居第一。

罗马的第十条水道称为图拉真水道。顾名思义，它是由图拉真大帝于公元109年建成的。水引自位于罗马西北偏北30公里的布拉恰诺湖。当然，不是直接引自这个大湖，而是以流入这个湖的溪流为水源。这条水道也是从西面进入罗马市区。建造这条水道的目的是改善台伯河西岸一带的供水状态，这里在现代就是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周边。据说，到公元2世纪的五贤帝时代，罗马市区的人口已经超过120万，而在并非市中心的台伯河西岸，人们居住的地区也一直不断扩大。

关于这条水道，今天已经无法了解它的详细构造。这并不是由于无人问津的岁月过于漫长而无从了解，而是因为它经历了多次修复，以供罗马教廷使用，使得现代人无从知道它古代的状态。罗马皇帝建造的水道把水输送到了对罗马帝国深恶痛绝的基督教中心，由此可见，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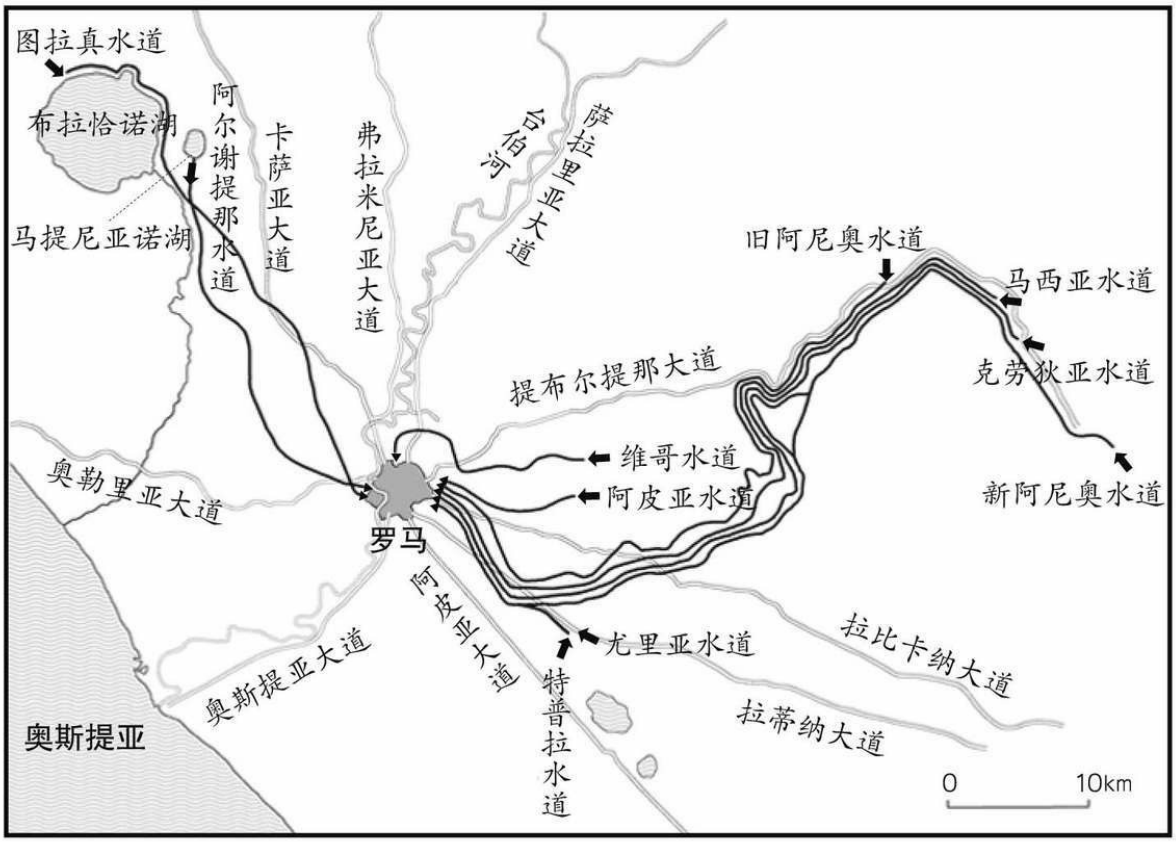
但是罗马教廷尽管觉得水不可缺少，却不愿意以皇帝的名字给水道命名。因此，图拉真水道取圣保罗的名字，改名为“保罗水道”。这条水

道至今仍在向台伯河西岸一带供水，输水量为每天95000立方米。

公元3世纪以后建造的罗马第十一条，同时也是罗马最后的水道，称为“安东尼亚娜”。它是以卡拉卡拉大帝的家族名字来命名的。这条水道的主要目的是把水引到卡拉卡拉大浴场。这个浴场作为著名的遗址保存至今。修建这条水道并非因为当时罗马市区缺水。向罗马市区稳定供水的系统早在克劳狄亚水道和新阿尼奥水道建成的公元1世纪中叶就已经非常完善，能够充分满足需要。否则，对罗马帝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建的哈德良皇帝不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

公元1世纪中叶的时候，向罗马输水的总量超过了百万立方米。按照百万人口来计算，每人每天的供水量为1立方米。学者们考虑到中途的供水和输水中的损失，认为每人每天的供水量应该在它的一半左右。即使如此，它也与现代的大城市处于同样的水平。以1983年为例，纽约为0.6立方米，伦敦为0.5立方米，巴黎为0.45立方米，罗马为0.46立方米，东京为0.47立方米。

在现代大城市中，正如在东京的首都高速公路见到的那样，市区高架桥上走的都是汽车，而在古罗马时期却是水。仔细观察一直通到市中心的高架引水桥的复原模型，便会发现当时水是“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的。人类的文明生活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充足的水可供使用，而满足这个条件的，当时并不仅仅是帝国首都罗马。



从水源地至罗马

只要是罗马大道的干道通过的城市，必有罗马水道。当然，水道的多少要根据人口而定，离水源地的距离也根据地形而有长短差异。意大利本土的小城市之一庞贝有一条水道，而行省高卢最重要的城市里昂则有四条。古罗马时期的巴黎还不是多么重要的城市，因此水道也与法国其他城市一样只有一条。

另外，离水源地的距离也不是根据城市的重要程度而定的，而是依地形而定。巴黎为16公里，今阿尔及利亚的舍尔沙勒为35公里，尼姆为50公里，里昂的四条水道中最长的一条为75公里，科隆为78公里，而必须从沙漠另一边寻找水源的迦太基则有132公里。如果说道路是当时的统治者政治意志的体现的话，那么水道也是如此。

要让与罗马人思想不同的民族理解和接受快速、安全的交通方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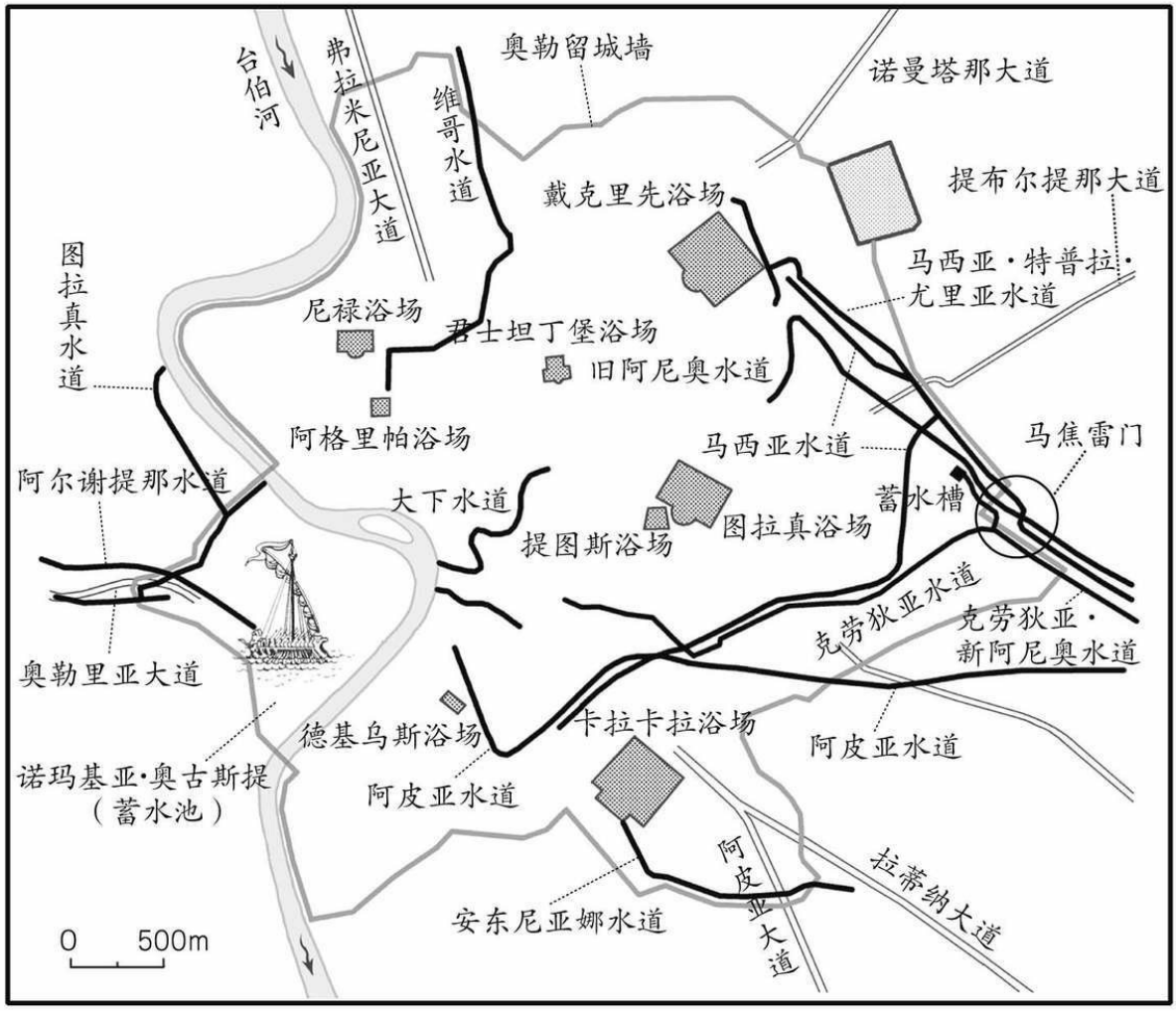
及稳定的供水所带来的好处，只有将实物展示在他们的眼前，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亲身体验之后，他们便会明白，与从远处的泉、井和河流汲水使用相比，从城内的公用水槽汲水使用要方便得多。实物展示的场地毫无疑问首选水道设施完善的首都罗马，还有各行省的首府。无论是阿尔及利亚的舍尔沙勒，还是法国的里昂、德国的科隆、突尼斯的迦太基，都是当时罗马帝国行省的首府。

罗马人是昨天的战胜者、今天的统治者，而行省的民众则是昨天的战败者、今天的被统治者。因此，罗马皇帝可以强制行省的民众建造水道。但是仅仅靠强制是不够的，让他们理解这样做的好处，也是一项重

要的工作。这是因为，与道路不同，水道的建造费用和维护费用都由行省的民众承担。

罗马大道原本是作为军用道路铺建的。如果普通的旅行者遇到军团行军，想必是要避让到路的一旁，让军团先过去。而且，肯定谁也不会对这种状态感到不满。但是正是由于根据军事战略的需要而铺建的，所以要求全线用石头铺砌的干道，也就是“公路”的铺设工程可以使用军团兵，而且工程的最高负责人理所当然地由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皇帝担任。总之，铺路的施工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其后的维护费用可以责令沿路的地方政府承担。

而水道则不同，从供水的比例上也一目了然，它是民用的。因此，无论是建设费用，还是维护费用，除了由作为地方政府的行省和称为地方自治体的各个城市分担，别无选择。罗马人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建造水道，是因为他们相信稳定的供水也是一种美好的现代文明。因此，为了在帝国全境普及水道，罗马中央政府不仅实行强制政策和实物展示，甚至派遣专家到全国各地进行技术指导。



进入罗马市区以后的各条水道

在过去与罗马人持不同观点的人居住的行省，是如何进行水道工程的呢？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我们引用了一封信，这里我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封公元2世纪任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总督的小普林尼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书信：

尼科美迪亚居民为了建造引水渠，已经耗资331.8万塞斯特斯，仍尚未完工。非但没有完工，甚至因为停工，侵蚀情况非常严重。为此，不得不又拿出20万塞斯特斯新建了一条引水渠。但是，这条

引水渠目前也处于半途而废的状态。虽说这样的结果已造成很大的浪费，但是为了向人们提供生活用水，别无选择地需要继续投入资金。

为此，我亲自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水源没有问题，水质很清澈，水量也很充沛。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水引到市区。我想，只能像最初那样，把拱桥连起来，建一座高架桥。但是，最初建起来的拱桥可以利用的少之又少。因此只有重建。我想，第一次建引水渠时，用的石材可以拿来继续使用。其余部分用砖块就可以了，因为用砖块施工方便而且费用也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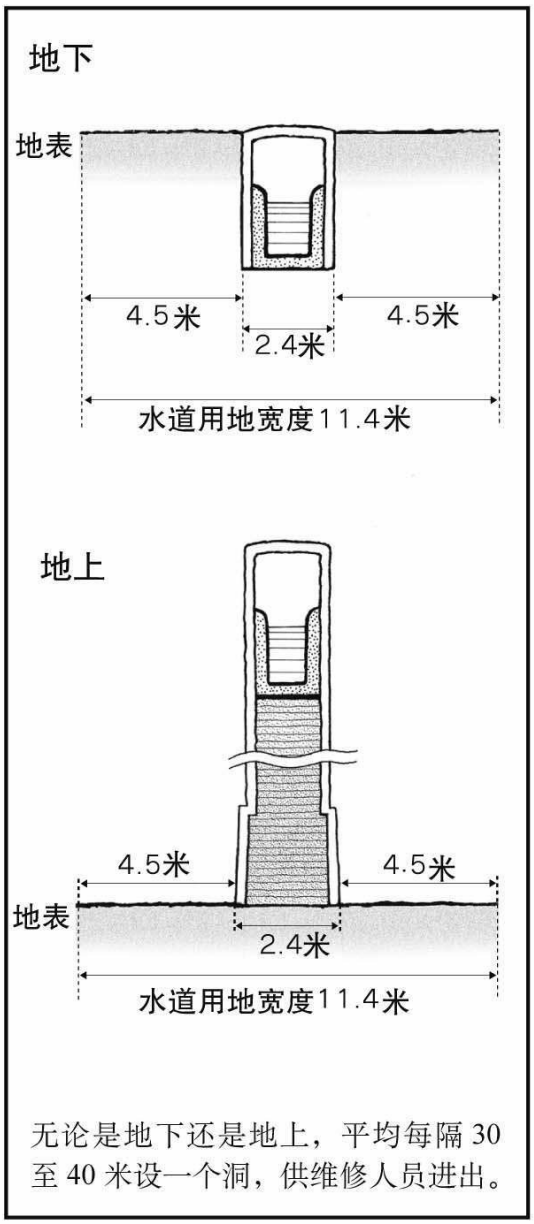
为了不再重蹈以往的覆辙，我请求派引水渠和建筑方面的专家来协助完成这项工程。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确保在您的统治期间建造起来的公共建筑不会辱没您的崇高威望。

尼科美迪亚的居民大半是希腊人。人们常说希腊罗马文明，可见两者关系之接近。但是对于这样的希腊人，要让他们理解水道的好处，也绝非易事。然而，即使面对以中东的腓尼基人为祖先的迦太基人，罗马也成功地建造了一条长达100多公里的高架引水桥。但是正是由于如此地不惜一切代价，罗马水道才像罗马大道一样，遍布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建筑和艺术上都相信自己无与伦比的希腊人也认为，罗马人的道路和上水道、下水道的建设是希腊文明自愧不如的。我们不能忘记，完善的上水道、下水道对于卫生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希腊诞生了医圣希波克拉底，却不关心上水道、下水道的建设，而罗马人在医学和医疗上都依靠希腊人，却热衷于上水道和下水道的建设，而且建造公共的大浴场，坚持保持身体的清洁。这两个民族的差异令人回味。我不禁想，也许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欣赏的俊美青年满街跑的雅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

那么，与罗马大道一样令希腊人折服的罗马水道到底是什么样子

呢？我们用简图来说明通过地下和地上的罗马水道。



罗马水道截面图（简图）

修建水道所需的用地宽度与道路基本一样，将近12米。实际上，在水道通过的地下坑道和地上的高架桥所需的2.4米宽的两侧，政府还要购买4.5米宽的土地作为水道用地。这是为了保护引水桥，同时也是考虑到便于维修养护。但是两侧的4.5米在进入土地紧缺的市区以后，有1.5米就足够了。

水道用地宽达12米，遇到私有土地时，便由政府收购。与道路一样，没有史料记载政府收购水道用地有什么困难。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罗马人关心公共事业，而是因为道路给居住在沿路的人带来利益，而水道也是如此。住在水道附近的人不会看着水从自己身边叮叮咚咚地流过去而袖手旁观。只要他们提出供水的申请，水道部门批准以后，水道的工作人员便会过来，进行施工，开始供水。不过，与从任何地方都能进入并且免费使用的道路不同，把水道引到自己家里以后，必须缴纳水费。

罗马大道由于主要目的是用于军事，所以可以使用军团兵进行施工。与此不同，罗马水道的施工是由建筑公司接到订单以后承包的，因此有关水道的建设费留下了一些史料。其一，是巨著《博物志》的作者

老普林尼记载的数字。据说，克劳狄亚水道和新阿尼奥水道的建设费用合计为3.5亿塞斯特斯。前者与水源相隔69公里，后者则从地下和地上通过了漫长的87公里。将这个费用一分为二，每条水道花费1.75亿塞斯特斯。这个数字除以用历史资料记载的当年水费收入25万塞斯特斯，得出的数字为700。如果这个数字正确的话，那么仅仅靠水费收入收回全部的水道建设费用，要等到700年以后。研究人员也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因为只凭这个数字，就连试算也不可能。但是许多人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与道路一样，罗马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水道是否合算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正如他们把罗马大道称为“公路”一样，他们认为罗马水道也应该是由政府来做的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人类文明生活必需的大事业”。这一点可以从称为“castellum”的蓄水槽的结构得到证实。

“castellum”是一个拉丁语词，英语的“castle”正是来自这个词，因此通常译为城或者城堡。城堡有集中驻扎士兵并根据需要让其出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与罗马水道的蓄水槽有相似之处。蓄水槽是先把引过来的水贮存起来，让其沉淀或者过滤杂质后，根据用途，配送到各条供水线路上。正因如此，罗马人将它命名为表示城堡的“castellum”，而不是表示贮存的“piscina”。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单纯为了蓄水、过滤杂质的蓄水槽，罗马人也称为“piscina”。而用现代语言只能译为蓄水槽的“castellum”的最重要作用在于配水。

由此可见，罗马水道的蓄水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它根据需要控制供水的优先顺序，因此并不是每条水道都是一个蓄水槽。《关于水道》的作者弗朗提努斯在涅尔瓦大帝时期曾经主管水道事务，他记载了涅尔瓦时期建成的9条罗马水道进入市区后通过的“蓄水槽”的个数。

阿皮亚水道——20个

旧阿尼奥水道——35个

马西亚水道——51个

特普拉水道——14个

尤里亚水道——17个

维哥水道——18个

阿尔谢提那水道——0个。可能是因为这条水道直接通到工厂专用蓄水池。

克劳狄亚水道和新阿尼奥水道——合计92个

这个数字中不包括弗朗提努斯死后修建的图拉真水道和安东尼亚娜水道的蓄水槽数量。因此，尽管只有9条水道，但蓄水槽总数就达到247处。值得一提的是，庞贝有1处。这里也体现出帝国首都罗马与小城市之一的庞贝的差异。但是庞贝也是罗马文明下的城市，这里至今还有按照不同用途和配水量分为三条配水路线的古代蓄水槽建筑。它在枯水期时优先顺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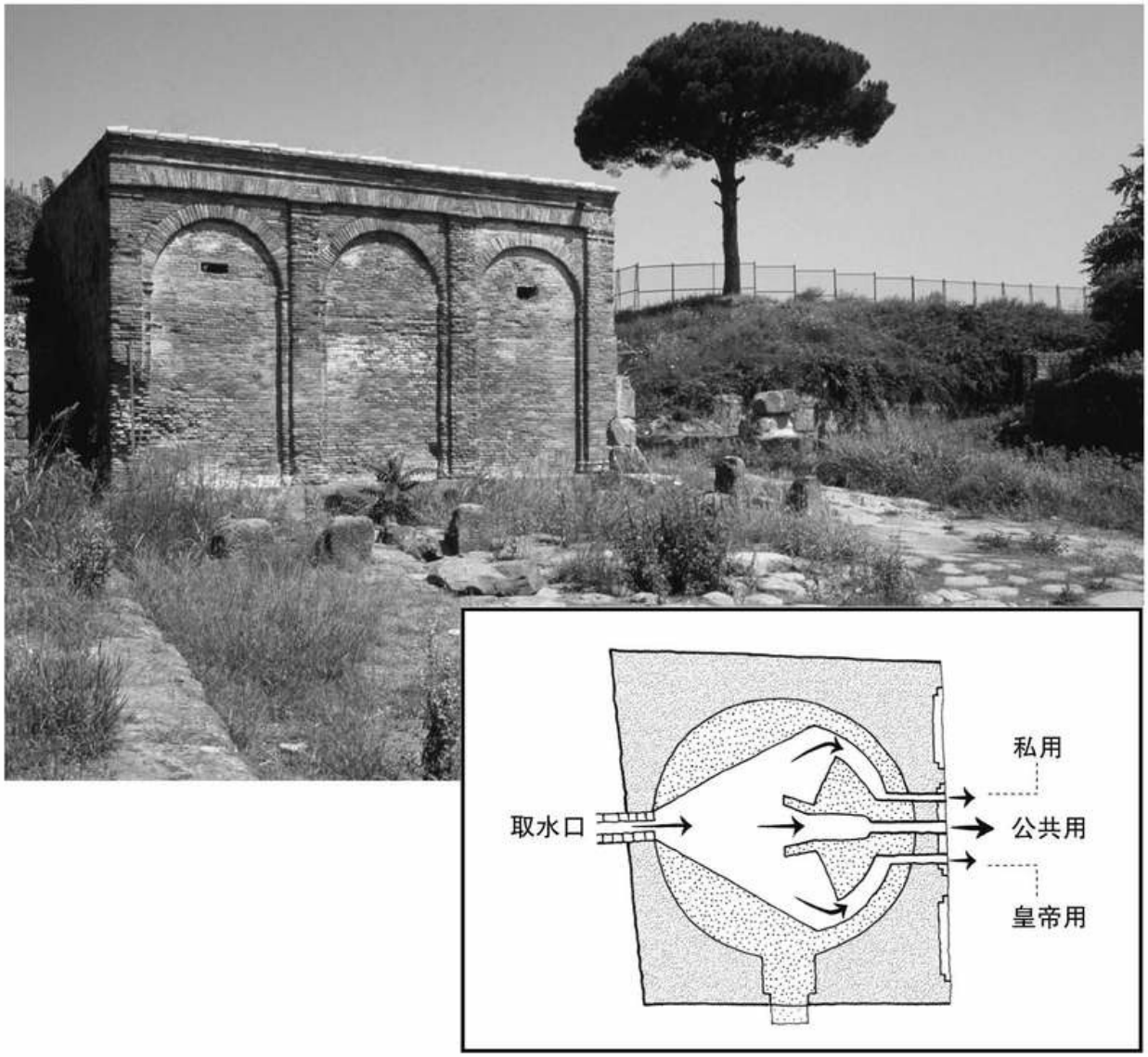
（一）公共用：其代表就是公用水槽，配水比例为总体的44.2%。

（二）皇帝用：不过，它并不仅仅指给皇宫及其他地方供水，亦即皇帝私用的部分。大型公共浴场是皇帝建造后赠送给市民的，因此它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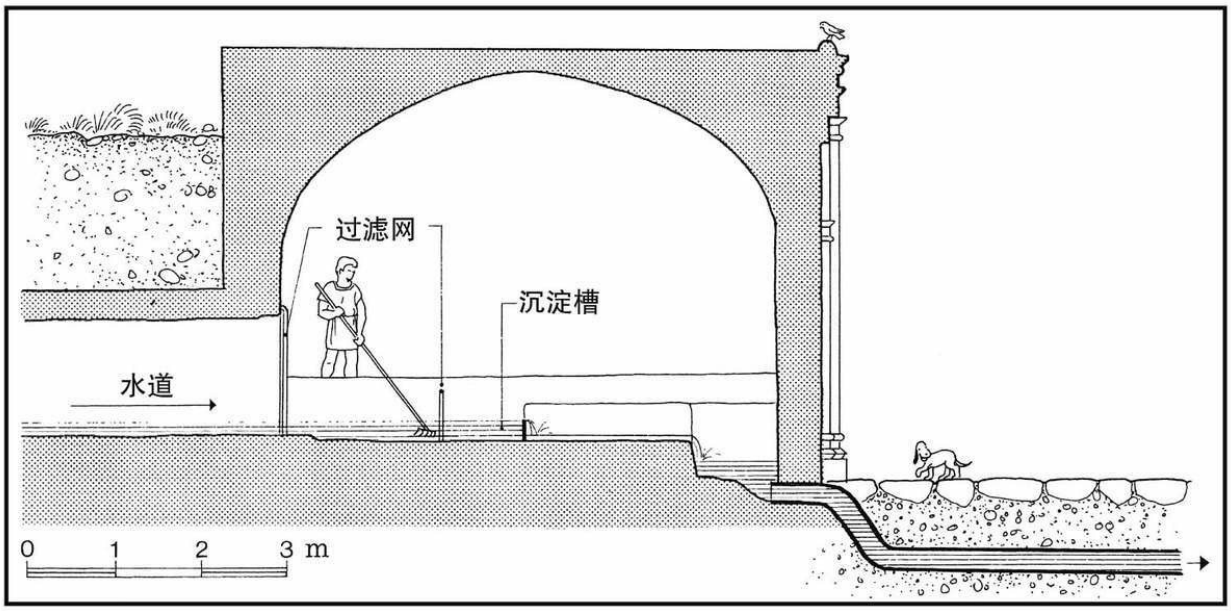
要的大量用水也算做皇帝用的水。通过这条配水路的水的比例为总体的17.2%。

（三）私用：申请引水到自己家中，获得批准后，由“水道局”的施工人员来铺设管道。给通过这条途径用水的人供水，称为私用水。在私用水中还包括给分散在郊区的别墅的供水。不过，由于担心水道内的水压下降，这种情况获得批准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私用水的比例占总体的38.6%。只有这一类用水的人才缴纳水费。也就是说，前两种被认为是公用的，用水免费。

罗马人并不是一切都认为应该先公后私。只不过他们认为，既然用公费修建的工程，当然“公”比“私”优先。保护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私有财产甚至被作为罗马法律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罗马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无论是道路还是水道，都没有强制收购用地的情况。在罗马人的社会中，有的时候是先“公”后“私”，有的时候则是先“私”后“公”，两者在相互平衡中共存。



庞贝的蓄水槽外观。右为蓄水槽的配水构造平面图，下为截面图（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既然罗马人有这样的思想，那么由军团兵这样的国家公务人员施工，而且花费国家的钱铺设的罗马大道用做私用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想要收取道路通行费的。但是事实上，这不可能。虽然罗马大道是像现代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人工铺设的道路，但是古罗马时期的道路是任何人从任何地方都能够进入的。如果在车辆高速行驶的铁路和公路上，突然出现人、马或者板车，会非常危险，但是在罗马大道上通过的都是马和马车，它们的速度不会太快，因此不仅没有挡墙，连栅栏也没有，甚至对徒步旅行者也是开放的。由于这个原因，罗马大道无法收取道路通行费。如果想要收取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桥梁的出入口收费。但是由于罗马人的观念是，凡事都要有多个选择，所以桥梁并不是一处。倘若所有这些桥梁的出入口都配置收费的工作人员，仅仅人工费就是一个巨大的开支，道路免费对于国家来说反而更加合算。只有哈德良大帝在位的时候尝试过一次道路收费，但它只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尝试便告终了。结果，罗马大道自始至终一直都是不收费的。

但是水道的情况不同。

首先，当局把总水量的将近一半配送到公共水槽，可以说发挥了水

道的公共作用。罗马人把这种公共水槽称为“公共喷泉”，但它们很少是从优美的雕刻喷出巨大水柱的那种类型，而是从雕刻成兽首的喷水口中，整日不断地流出水来。只要是从这里取水使用，无论多少都是免费的。根据各地的考古调查情况来推断，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要从家走40米远才会遇到一个公共水槽。这种公共水槽设在大路边上，因此溢出的水便会流到路面下边挖的下水道。这是因为，考虑到供应清澈的水，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罗马水道里的水是24小时不断地流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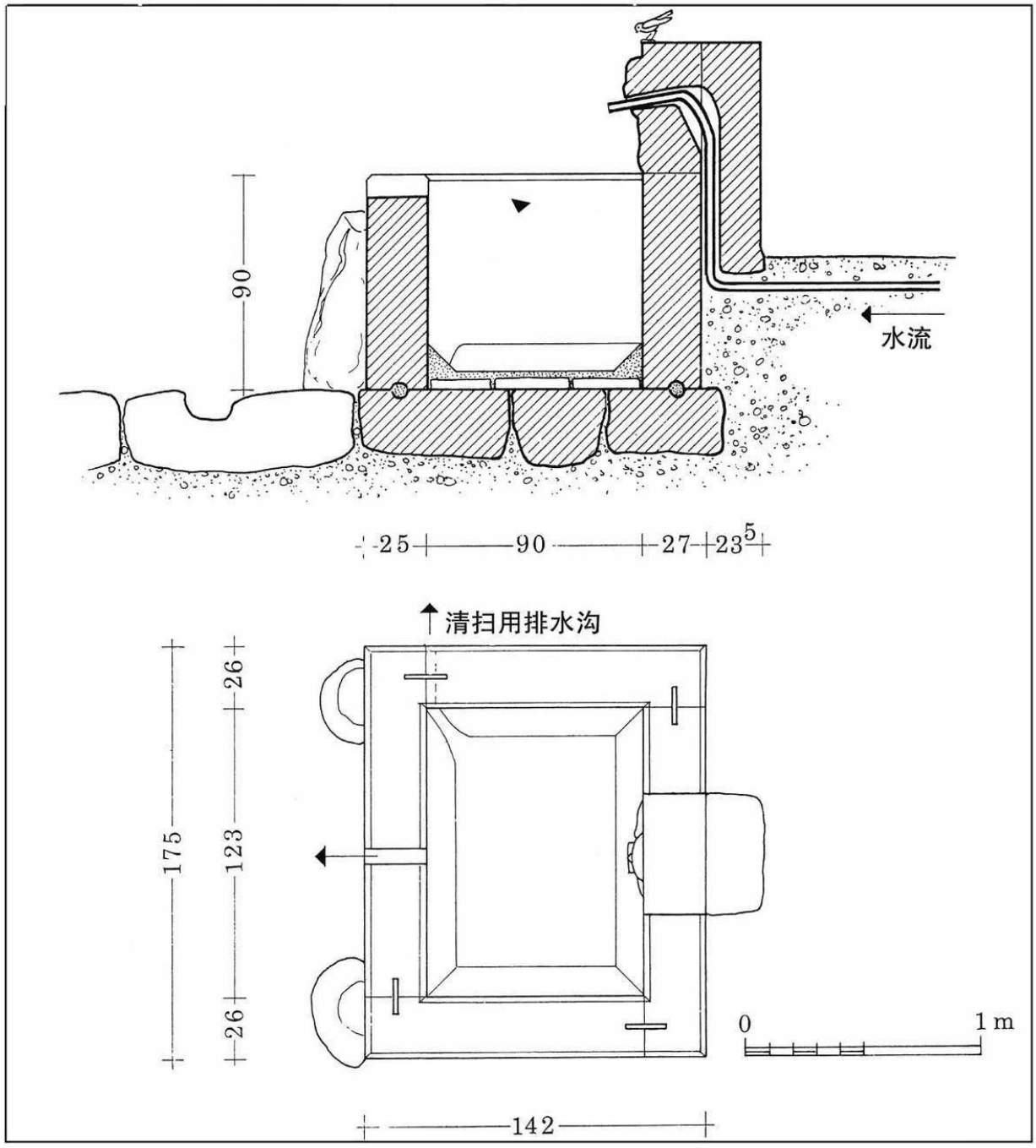
给公共水槽配水44.2%，加上17.2%的皇帝用水，后者主要是用于公共浴场，这两者加起来，可以说罗马水道总水量的60%是给市民的供水。它作为一项卫生措施也具有重要意义。饮用清洁的水，用清洁的水洗涤食物，用清洁的水做饭，而且每天去公共浴场洗澡，保持身体清洁。这多么有益于健康，有助于防止流行病！如果我们想一想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之广和统治的岁月之长，我们便会发现罗马历史上瘟疫流行少得惊人。

医圣希波克拉底提倡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加重要，而罗马则在整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了解，两千年后的今天地球上仍有许多人处于缺水状态，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感叹罗马人对公共事业的关注，因为他们毫不怀疑，稳定供应清洁的水乃是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大事业。正因如此，既然政府已经免费提供足够的用水，那么如果想要更多服务的话，政府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收费。走40米取水使用是免费的，而要将水引到自己家里，这种服务就超过了政府的责任。因此这种情况就属于私用，应该付费。而且，引水到家必须向“水道局”申请，获得批准后，让“水道局”的工作人员施工。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掌握“私用水”的数量，从而可以收取费用。

但是让居民缴纳水费的时候，如何确定水费呢？现代的自来水由于安装了测量用水量的仪表，只需要按照用水量缴费，但古罗马时期又是如何确定的呢？罗马水道通过昼夜不停地流水保持水的清洁。古罗马时期的“水道局”的任务就是，计量不停流动的水量。古罗马时期的水务工作人员通过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介绍这个办法之前，我们先谈一谈在古罗马时期是如何引水到户的。

想要把水引到自己家里的人必须首先申请。如果在首都罗马，要向皇帝提交申请。而在米兰、那不勒斯这样本土内的地方自治体，则是提交市议会的议长。如果是像科隆、里昂这样行省的首府，便是提交行省

总督。在巴黎、托莱多这样的行省内的地方自治体，则要向市议会的议长申请。另外，像雅典这样罗马特别认定的自由城市，要向所在城市的议会申请。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如此庞大的帝国之所以能够国泰民安，乃是因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绝妙结合。我们也许认为，不过是把水引到自己家里，这样做岂不小题大做吗？但是两千年前的罗马人却不这么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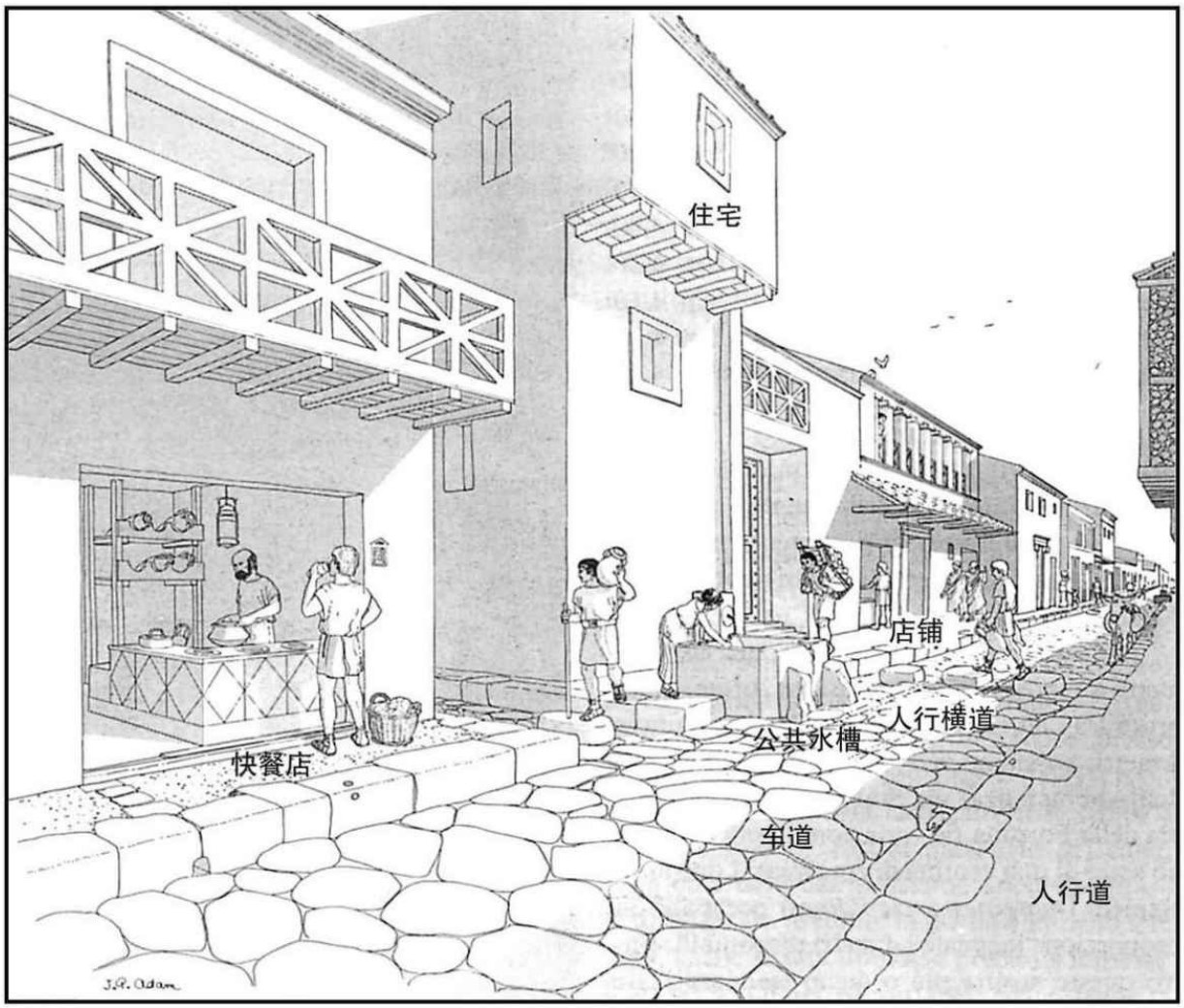
庞贝的公共水槽。下图为公共水槽的截面图和平面图（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在古罗马时期，稳定供水被视为政府负责向居民保证的义务之一，虽然收费，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批准私用水。在水道建设上投入巨大的财

力和人力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赞同，是因为它会带来公共利益。研究人员认为，从庞贝挖掘出来的古代蓄水槽所见到的公用、皇帝用、私用三者的配水比例与行省的其他城市的蓄水槽大致一样。其中，皇帝用水也包括公共浴场及其他公共建筑物使用的水，因此如果将它也计入公共用水，那么罗马水道输送的水公私比例应为6：4。也就是说，罗马水道输送的水60%为公共用水，40%为私用水，后者不允许超过40%。如果私用水超过40%，公共用水就会相应减少。在现代，家庭使用自来水的比例很高，在古罗马时期，使用公共水槽的人则占绝大多数。既然水道是公共事业，就必须将“私用水”控制在40%以下，那么是如何控制的呢？

首先，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是收取水费。在道路和桥梁都理所当然免费的那个时代，唯独水道是一个特例，需要缴纳水费。由于平均每隔70米就设一个可以免费用水的公共水槽，因此也许收费制度本身就有效地制约了私用水。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因为重视制约的作用而出现高昂的水费。

这是因为被纳入私用范畴的人中，有许多工作上要用水的手工业者。比如，染色业就需要大量的水。为了保证工业用水而建造专用水道的，是被公认为贤帝的奥古斯都和图拉真两位皇帝。相信罗马人不会无视水在产业方面的功效。对于工作上没有直接用水需求的富人，不能以“引水到自己家中只是为了奢侈享受”为由断然拒绝。这些有钱人家光在市区置有宅院，就能增加消费，从而活跃城市的经济。即使位于郊区的别墅，也有类似的作用。原本是农耕民族的罗马人心目中的“别墅”就是农牧业的生产基地。有人住，可以防止土地荒芜。一旦创造了安全、舒适的环境，人就能定居下来。安全可以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来保障，而保证舒适的首要条件便是稳定、清洁的供水。



庞贝的阿波坦查大道想象图
（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由于这些原因，古罗马时期的水道虽然收费，但是水费并不高。罗马帝国一年的水费总计只有25万塞斯特斯也未免太少了，它只相当于罗马市区最高档公寓一年租金的8倍或9倍。我们不由得怀疑，这会不会是中世纪的笔误或者罗马11条水道中的一条的水费。但是并无史料感叹当时水费昂贵。无论如何，基础设施的目的是公共利益，所以罗马人压根儿没有考虑过靠收费来收回成本。

鉴于上述原因，在古罗马时期，收费基本上没有能够阻止申请人的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将私用水控制在40%以下的方法之一，便是由罗马的皇帝、行省的总督来审批。也就是说，将申请手续本身复杂化，并延长审批的时间。它的真正目的便是防止申请的人过多。

方法之二，就是规定，即使审批以后，其有效期限也仅限于申请本人这一代，不允许世袭，也不允许继承和转让。在罗马公民权、国有土地租借权均为世袭的当时，水道权只限一代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父母死后，即使孩子继续住同一所房子，也必须重新申请引水到自己家里。另外，购买了已经引好水的房子的人也要重新申请批准使用水道的水。由此可见，一直确保60%公共用水也并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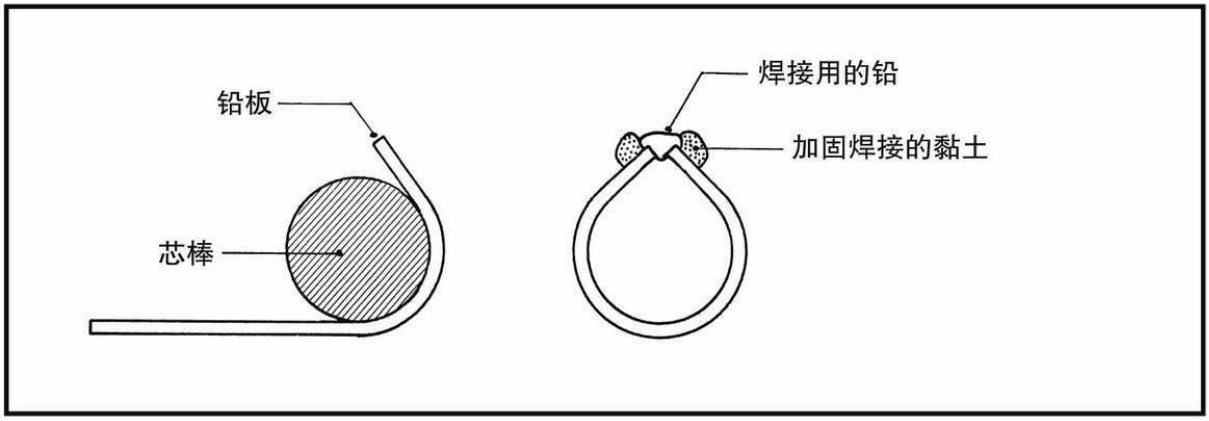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当时对于盗用水道的水的人处以巨额的罚款。据说，最高达到10万塞斯特斯。以军团兵来说，相当于84个人的年薪。但是似乎仍然有偷水的人。偷水也必须进行管道的施工。这也就是说，偷水的不法之徒与身为公务员的“水道局”内的人内外勾结。因此，工程的负责人甚至到早晨才将当天的施工计划通知他下面的工人。

如果发生偷水行为，不仅国家不能收取水费，而且在保持水道内的水压上也不能允许。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既然有《水道法》，就必须遵守。假如法律不切实际，可以修改法律。

那么，被划分为“私用”范畴的用水是如何确定水费的呢？为了保持水质，罗马水道是昼夜不停地流动的，这样使用的水量就无法测量。不能测量，就不能确定水费是多少。既然不能确定水费是多少，就无法收费。但是无论怎么不停地流动，水也是从总管通过分出来的输水管输送到家庭或者工厂的。

因此，古罗马时期的水务人员按照输水管的圆周来确定水费。铅制的输水管由粗到细共有10种，长度一律为3米。它们由制造铅管的工厂按照规格大量生产。然后，工程人员根据申请表上填写的使用目的和使用区域的面积等计算所需的水量，由此确定所用输水管的尺寸和数量。

此外，这种工程必须由专家进行，因此对于“当局”来说，用这种办法确定水费并不困难。



铅管的制造方法（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但是，用这种办法确定水费就说明，在古罗马时期即使家庭中也是通过不断地流动来保持水质。而且，昼夜不停地流水不仅可以保持水的清洁，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让下水道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由于有大量的水永不停歇地流动，下水道也会因此变得通畅，在卫生方面也会产生极好的效果。

希腊人把道路、上水道和下水道列为罗马人的三大独创，而这三者都不仅仅要建设，而且只有不断地发挥作用才有意义。正是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才令世人感叹。也许在对上下水道不感兴趣的希腊人眼里，古罗马时期的城市都相当清洁。

那么，在以“水流不息”为水道基础的古罗马时期没有水龙头吗？水龙头恰恰是存在的，而且原理与现代的水龙头完全一样。现代研究人员复制了一个与从庞贝出土的水龙头一样的东西，并作了实验，据说它的水平完全可以起到水龙头的作用。但是罗马人只有在维修和进行其他施工需要临时阻止水流的时候，才使用这种水龙头。这是因为罗马水道的基本特点就是“水流不息”。也正因为如此，罗马人才能够喝到没有消毒

剂味道的水。

这里我想谈一谈曾经轰动一时的一个假说。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灭亡的原因在于铅中毒。由于罗马水道使用铅管，因此古罗马时期饮用通过铅管的水以后，因铅中所含的毒素而产生慢性的中毒症状，不仅末梢神经受损，而且引起大脑功能障碍，这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这种说法作为一个假说有许多弱点，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我们先探究一下罗马人是不是当时对铅的毒性一无所知？

罗马人不仅知道铅毒，而且很了解。早在公元前1世纪发表的《建

筑十书》中，作者维特鲁威就阐述了铅的毒性，并谈到了防止铅中毒的方法。书中提到，铅溶于水以后会产生毒性。它对人体有害从铅管制造厂的工人的脸色和姿势就能看出来。因此，从健康考虑，应该尽可能少用铅管。如果想要供应有益于健康的水，最好使用木制的或者赤陶土制的输水管。

但是罗马水道却一直使用铅管。它们用在什么地方，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水源地一直到位于城市入口的蓄水槽，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都是石砌的通道，因此不需要使用铅管。问题在于从蓄水槽到公共水槽或者家庭这一段进入城市以后的输水管。这部分使用的是铅管。水要输送到各个地方，往往输水管也不得不弯曲。铅制的输水管易于进行这样的作业。欧洲北部挖掘到了木制的管道，欧洲南部挖掘到了赤陶土制的管道，但是在市区，绝大多数还是采用铅管。

那么，为什么罗马人明知有毒性，还继续使用铅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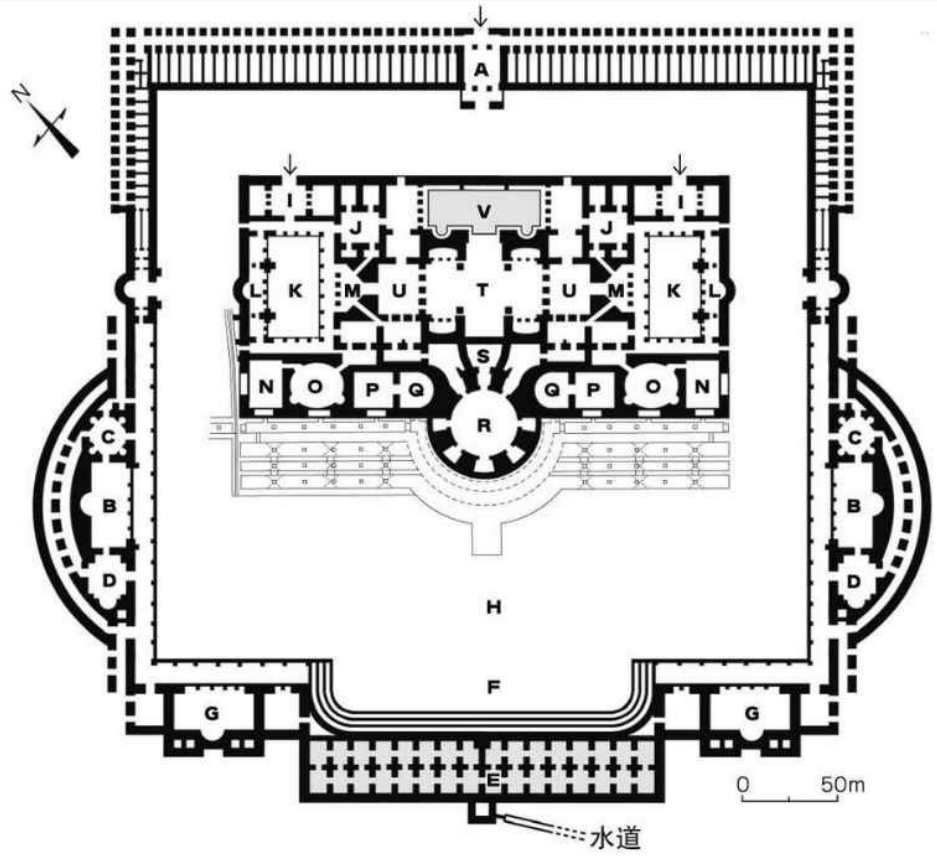
正如维特鲁威所写的那样，罗马人知道铅溶于水以后才会产生铅毒。既然如此，只需要尽可能让它少与水接触，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所幸的是，罗马水道“水流不息”的方式。由于在宽阔的通道中，水流也相当快，因此在引到比它狭窄的铅管中以后，流速更快。另外，由于不使用水龙头，在排水口也同样是采用“水流不息”的方式。这样，铅溶解到水中的危险就微不足道了。还有一点，我想，水中所含的碳酸钙也会降低铅毒的危险程度。我见过古罗马水道的坑道遗址，令人吃惊的是，其内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石灰层。这让我想到，水道之所以总是需要维护，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去除石砌的坑道内不断堆积的石灰层。但是如果是铅管的话，这种附着在管道内侧的石灰岂不正好成为隔开铅和水的一层隔膜吗？总之，市区水道使用铅管导致了罗马帝国灭亡的说法，在罗马水道的研究人员中完全被视为无稽之谈。

关于罗马水道，最后当然要提到大规模的公共浴场。因为没有水道的作用，它们根本无从谈起。罗马人喜欢洗澡令后人望尘莫及。即使是一个小城市，也有许多的公共浴场。这种情况在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我参观过位于今天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它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前线之一。当我看到前线士兵使用的浴场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这是一个引用河水的规模不大的浴场，但是这说明，即使在最前线，罗马人仍然坚持洗澡。而帝国首都罗马的浴场则规模更大，也更加豪华，因为它们都是由皇帝建造并赠送给市民的。

位于哈德良长城沿线的士兵浴场遗址

位于罗马市区的著名浴场，按修建的顺序有：阿格里帕浴场、尼禄浴场、提图斯浴场、图拉真浴场、卡拉卡拉浴场、德基乌斯浴场、戴克里先浴场、君士坦丁浴场。

除了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的左右手阿格里帕建造的浴场以外，其他所有浴场都是皇帝建造的。内部的构造都很相似，因此正如下页图所示的卡拉卡拉浴场那样，从浴场内外装饰的艺术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来看，公共浴场宛如古罗马时期的美术馆一样。据说，皇帝提比略因为喜爱阿格里帕浴场里的一尊雕像，觉得平民不能理解艺术杰作，便把它搬到了皇宫，但是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抗议，最终放回原位。



大浴场总体：337 米 ×328 米　　浴场部分：220 米 ×114 米

出入口的外面、左右两侧排列着商店，商店的二楼用于住宿。

A　出入口

B、C、D　展示绘画、浮雕等的美术馆

E　大型蓄水槽（双层构造）。水道直通到此处

F　从花园走下地下蓄水槽（地面铺砌）的阶梯

G　图书馆（2 个。右边收藏希腊语书籍，左边收藏拉丁语书籍）

H　用喷泉、雕塑装饰的大花园

I　进入浴场内部的入口

J　更衣室

K　列柱回廊环绕的体育场

L　展示雕塑的美术馆。正对列柱回廊

M　半圆形的学习区。雕塑摆在墙边，多用于朗读会等

N、O、P、Q　中央的浴池，每间都盛满不同温度的热水，所有房间为墙壁暖气。N 可能为厕所

R　热浴室。朝向外侧的半圆形的各处窗户大开，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朝南的好处

S　温浴室

T　冷浴室

U　喷泉（这两个喷泉，一个现在法国大使馆前的法尔内塞广场，另一个保留在梵蒂冈的院内）

V　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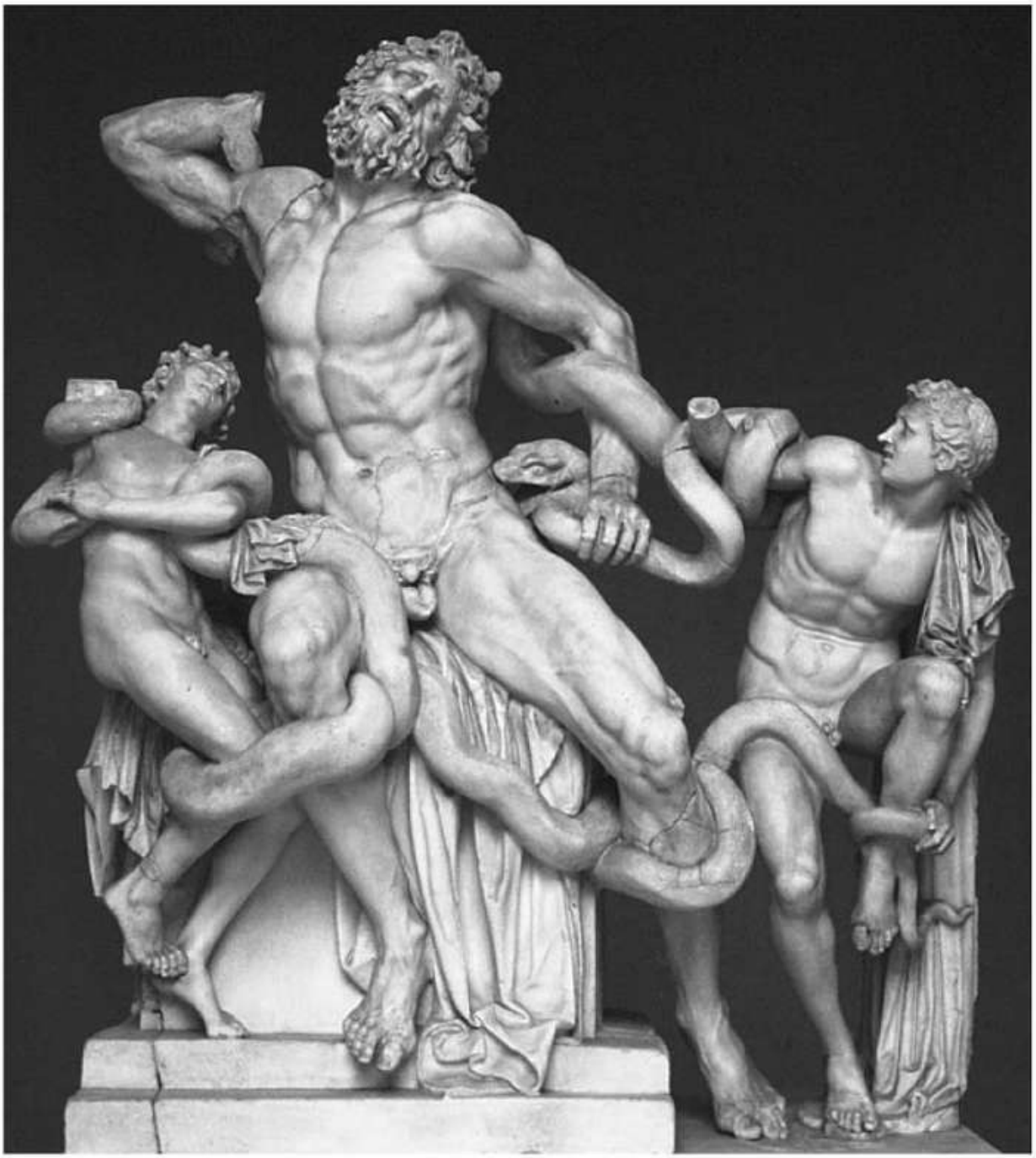
卡拉卡拉浴场平面图

现代人在美术馆看到的希腊、罗马的雕像中，有不少是从这些公共浴场旧址挖掘出来的。收藏于梵蒂冈美术馆的拉奥孔群像雕塑也曾经用于装饰图拉真浴场。现在收藏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称为“法尔内塞公牛”的大理石组雕，还有同样收藏在那不勒斯的“法尔内塞的赫拉”雕塑以及现在用于法国大使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法尔内塞宫前面广场上的两个喷泉，都是曾经用来装饰卡拉卡拉浴场的艺术品。至于来自戴克里先浴场的装饰，读者可以去参观一下将这个浴场遗址建成浴场美术馆附近新设的“八角形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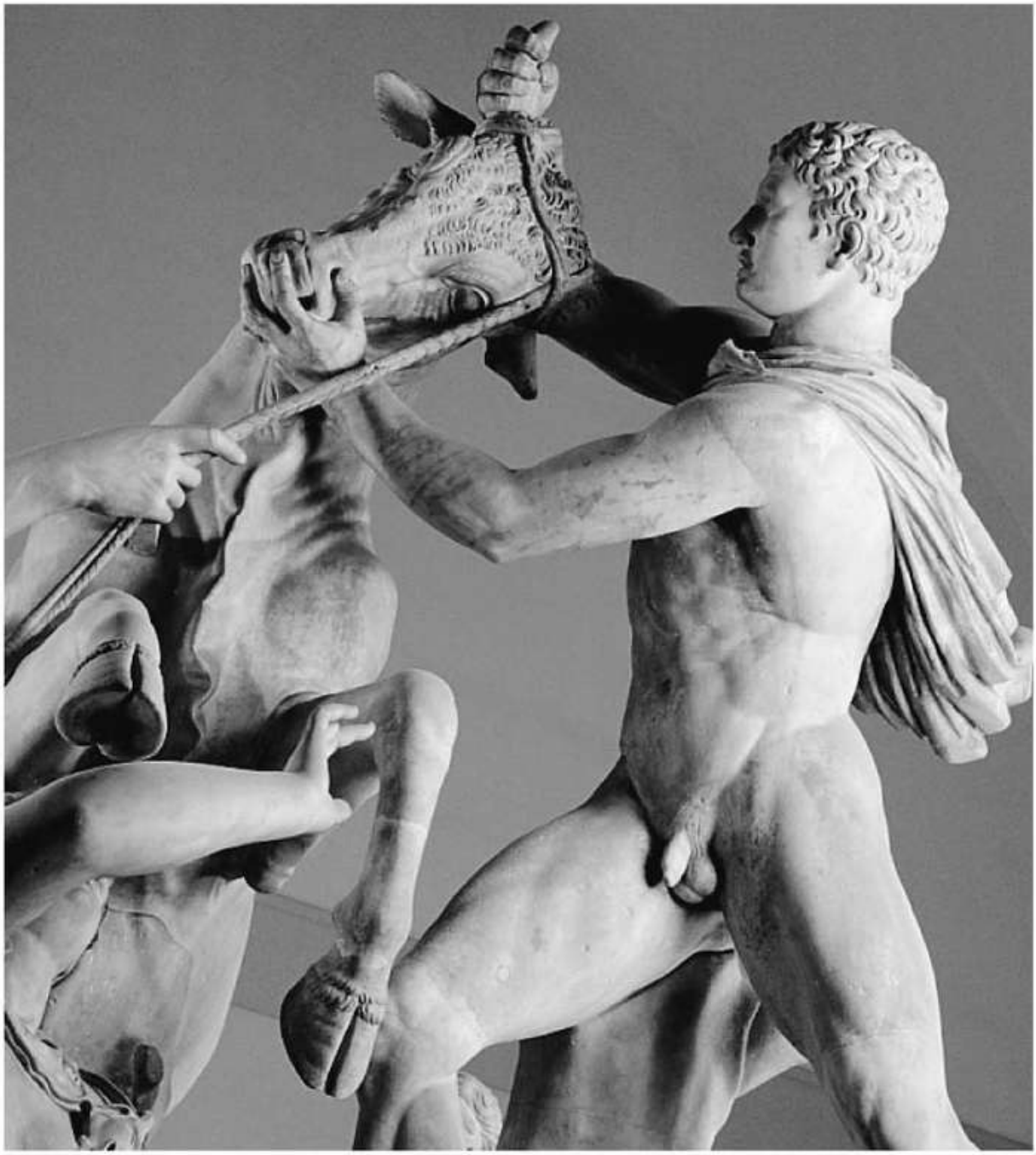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罗马的民众把用这些杰作装饰的浴场称为“我们穷人的宫殿”了。虽然有着这样豪华的设施，但是票价只相当于一个面包和一杯葡萄酒的价格，为半阿斯。而且，士兵和儿童免费。奴隶也可以进入浴场，如果他是公务员，则与服兵役的人同样享受免费待遇。在古罗马时期，每个城镇都有这种公共浴场，有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男女混浴的方式。从哈德良大帝时期开始，改为男女分浴。不过，由于不能把浴场内部分为男女两个部分，因此用时间来分开。大多数在家中做家务的女子从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可以入场。一早就出去工作的男子和上学的儿童则在下午2点至5点可以入场。

罗马的人口比罗马市区所有公共浴场能够容纳的人数要多得多，所以并非所有的人每天都去公共浴场。像皇帝这样有权有势的人家中都有浴室，而且有不少人只需要把水从上往下一浇就行了。然而，只要有了可以洗澡的环境，就会养成洗澡的习惯。正因为有足够的水可以使用和有保持身体清洁的习惯，才使得罗马历史上疾病的流行非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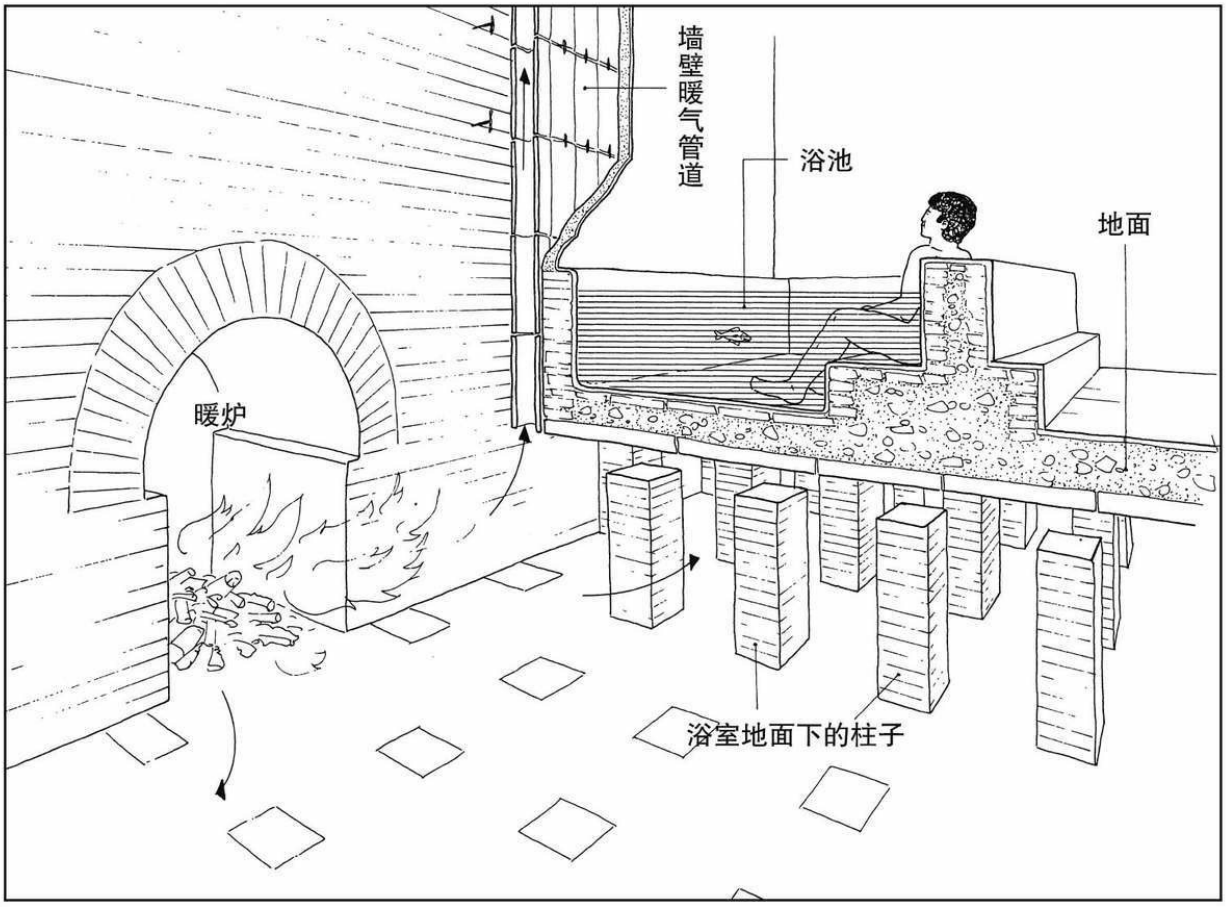
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境内各个城市的公共浴场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向大浴场供水的水道依然完好无损，而发生变化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往人们都不避讳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露体，但是人们逐渐觉得让他人看到自己的裸体是一件不好的事。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以后，罗马帝国的男人为了不裸露肩膀，开始穿托加，里面再穿一件长袖内衣。这样，以许多人混浴为特色的罗马式大浴场便没有了立足之地。加之，公共浴场装饰着许多裸体的雕塑，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些正是被视为邪教的应该清除的希腊、罗马宗教的象征。因此，它们有的被毁坏，有的被扔到台伯河，幸存的也被人们忘记，陷于无人问津的境地。昔日罗马平民的宫殿更是被拆得面目全非，一切能够用做教堂和民房的建筑材料都被拿走，成为只有砖墙还让人们依稀想象出昔日辉煌的巨大遗址。



拉奥孔群像



法尔内塞公牛



浴室的截面图（右）和浴池加温的构造
（摘自J.-P. Adam,“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此后，罗马水道还继续使用了将近150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水道的坑道内还一直流动着水。但是到公元538年，也终于宣告结束了。在这一年，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的将军贝利撒留开始抗击日渐频繁的蛮族入侵。

指挥防御的将军获得了一个情报：到了夜里，看见水道坑道的对面有灯光在闪烁。罗马市区依靠公元3世纪奥古斯都大帝修建的城墙来防御，但水道桥跨过这道城墙进入市区。贝利撒留为了防止蛮族通过水道坑道攻入罗马城内，下令封锁了进入罗马的所有水道的水源地取水口，同时在水道桥进入市区的地方用砖头和水泥封锁了坑道。罗马水道就此

成为历史。

由于此后蛮族仍然不断入侵，因此没有人试图把封锁的水道恢复原状。当时，罗马的人口已经减少到3万人，已经不需要为百万人口的城市建造的11条水道了。与之相比，有可能沿着水道桥入侵的蛮族更加可怕。中世纪的罗马的确黑暗。罗马大道不再有人维护，结果路面开始变得坑洼不平、尘土飞扬、杂草丛生，逐渐被废弃了。而罗马水道的废弃，则是短期内就造成了。只要国家没有强烈的意志和能力维护，无论建得多好的基础设施，也唯有死路一条。这不仅是硬件的基础设施，软件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第二章

软件基础设施

医疗

我有一张名为“ROMA URBS”（首都罗马）的地图，宽为95厘米，长为115厘米。因为是在商店出售的，所以应该谁都能够买到。不过，现代的罗马市政与古代的不同，十分缺少持续性。因此地图常常会脱销，这种脱销的现象往往持续很久，所以也许不会轻易弄到手。尽管如此，这张地图做工非常精致，可见现代的罗马人创意还是有的。这张地图是一张平面图，它用浅褐色标记现代的罗马市，然后在上面用黑色和灰色画出了帝制时期的罗马。上面标记了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建造的凯旋门和公共浴场，可见所画的公元4世纪时的“世界之都”。地图上还使用了蓝色来表示水道的高架桥和台伯河。

看着这张地图，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尽管画的是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但是公元前的共和制时期建造的主要建筑物几乎全部仍然健在。有些建筑甚至超过了500年。不过，臭名昭著的尼禄大帝的黄金宫殿变成了图拉真大帝下令建造的大浴场附属花园。阿格里帕建造的万神殿也在被一场大火烧毁后，由哈德良大帝按照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进行了重建，地图上标记的是后来的样子。这些都是例外中的例外，其他全部保留了建造时的样子。这证明了这些建筑都得到了不断的修缮。而对建筑物的妥善维护也说明了帝国的国力强盛。

看着这张地图，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我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古代的罗马与现代的罗马市是重合的，尽管这其实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其他许多城市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但是科隆、美因茨、里昂、伦敦以前是行省的主要城市，它们与帝国的首都罗马在规模和人口密度上不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上面有人生活，所以系统地挖掘只能是梦想。罗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项不为人知的主要工作便是，只要听说有改建工程，马上就要赶过去。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相反，罗马的

建筑商的烦恼便是，工程被赶来的“文物保护委员会”阻止。罗马一直没有修地铁，现在终于修了，也只有两三条线，而且挖到了很深的地底下。这是因为，往下随便挖一点点，就会碰到遗址。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的路面停车特别多。这是因为，现代的地下一层就是两千年前的地面一层，所以无法修建地下停车场。

不仅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尊重传统，兵营本来完全可以搬迁到其他地方，但是在罗马，它还是在两千年前的近卫军团兵营一样的地方，导致无法挖掘。因为近卫军团是罗马军队的精华，所以在宽阔的兵营地下应该埋藏着许多的雕像，但是这里一直作为军事设施列为军事禁区。

这是罗马的现状，乃至是其他许多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城市现状，英国的考古学家称，考古学最需要的是想象力。这种说法令人信服。

因此，这张地图不禁令我浮想联翩。另一件事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而学者们都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并不是他们不了解，而是早已了解而懒得提及。所谓学者，就是这样一类人，对于他们之间不言自明的事情就懒得提及。我与他们不同。令我这个外行感兴趣的是，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竟然没有大规模的教育和医疗设施。

古代的罗马人对教育、医疗不热心吗？连首都都没有正规的教育机构、医疗设施，这是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没有公立学校”、“完全缺乏医疗系统”的例证。它是否说明，在这个方面罗马人比较落后呢？

罗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专业的医生。有记载表明，公元前3世纪，希腊医生开始在罗马行医，因此在建国后的500年内，罗马人住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国家。但是没有医生并不等于没有医疗。罗马人的医疗从建国后就一直存在，而且他们认为有了这些医疗就足够了。这种医疗主要分为家庭医疗和求神保佑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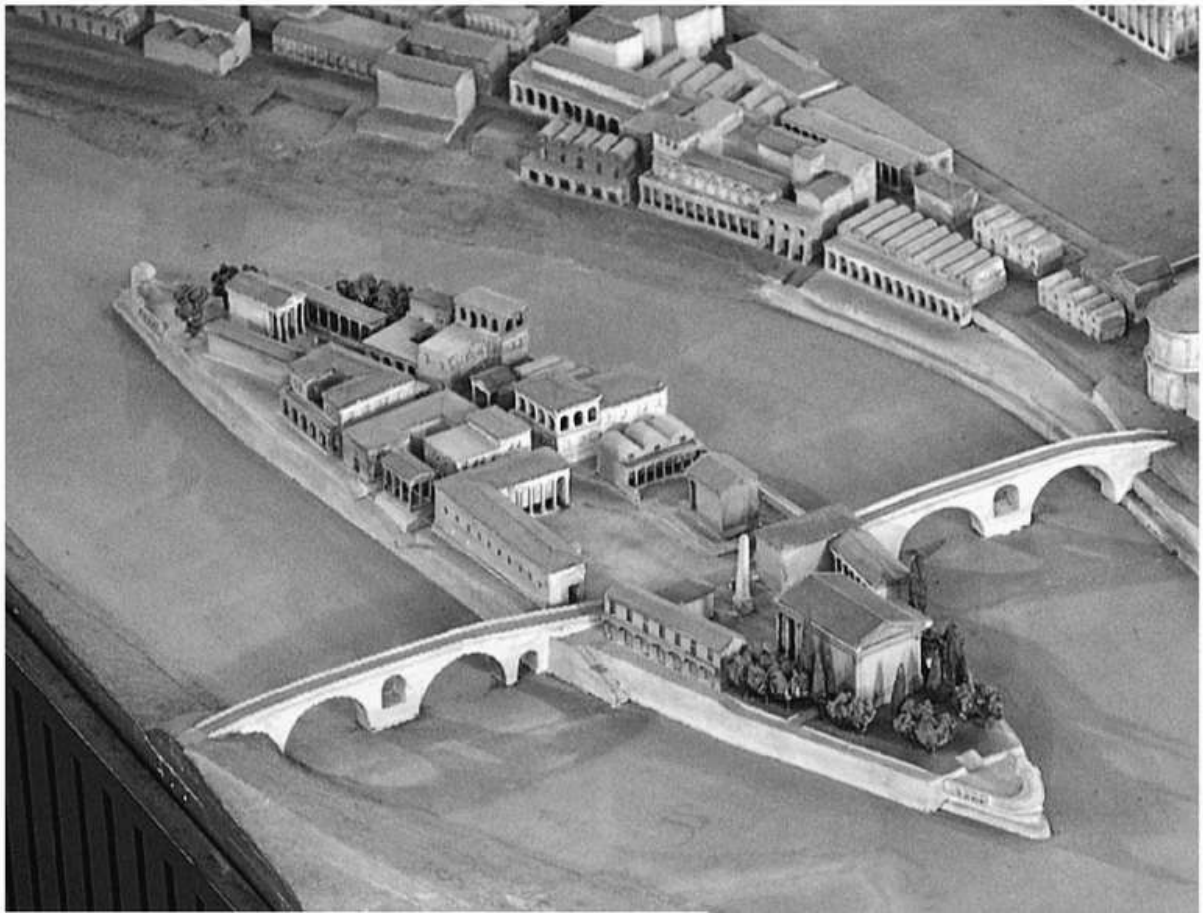
家庭中的医疗负责人是一家之长。罗马的家长权力非常大，但义务也多而繁重。家长不仅对家人，而且对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状况负责。在罗马首先普及的不是医疗书籍，而是阐述药草种类及其效用的书籍，这是因为当时存在家长这一消费群体。家长想方设法给病人治疗的时候，会让住在家里的奴隶当助手。在帮忙的过程中，奴隶们学会了治疗方法，这样就诞生了被称为“奴隶医生”的家庭医生。

医疗是家长的任务。这样的时期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这样做，在当时的社会不乏合理性。被尊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本质上也就是预防医学的集大成，其目的就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他主张，为此，必须保证健康的饮食、适度的劳动、充足的睡眠和卫生，而这些也是一家之长所要严格管理的事情。一位称职的家长还应该注意到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这并不是因为尊重人权，而不过是考虑保持劳动力。尽管如此，对奴隶也进行治疗，只有古代的罗马才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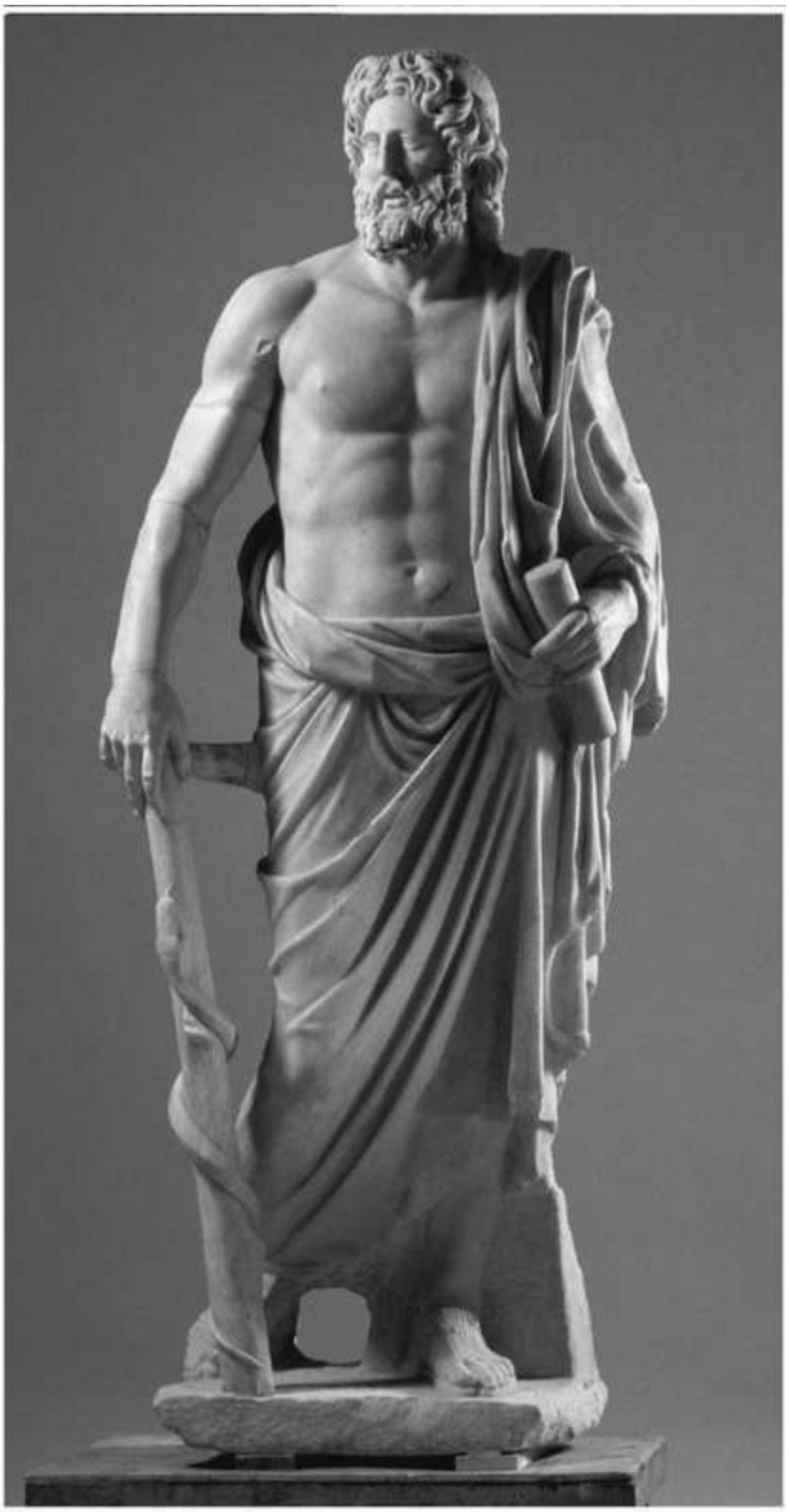
求神保佑是任何民族都有的共同倾向。无论什么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感到担心，因此只要有能够依靠的，什么都想要依靠。而在罗马，有许多可以依赖的对象。罗马人对自己征服的民族也毫不吝啬地授予罗马公民权，用现代某位学者的话来说，“甚至对被征服的民族信仰的神灵也授予罗马公民权”。正因如此，罗马神增加到了30万之多，所以给每种病配一个主管的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甚至知道掌管流行病的神，而发烧、腹泻、腰痛这些疾病就更是微不足道了。这些神灵都有一个小的寺庙，如果本人腰痛而无法动弹，就由别人替他去拜神。

但是罗马神也有等级制度，位于顶部的神是主神朱庇特（希腊神话中为宙斯）、他的妻子朱诺（赫拉）、密涅瓦（雅典娜）。掌管医疗的神也同样有等级，它的主神是希腊神埃斯科拉庇俄斯，他的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在现代的欧洲，大学医学系的毕业证书上，仍然使用一条蛇缠绕的权杖作为医生的象征。古罗马人将台伯河中的一个岛全部敬献给

了这位医神。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岛在公元前291年传染病流行的这一年进行了修建，而根据考古调查绘制成的复原想象图，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座医院，而是把整个岛都敬献给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一个神殿。由于它是河中的一个岛，因此这里与世隔绝，而且还有清澈的泉水，非常适合病人住在里面祈祷治愈。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近。这座台伯河上唯一的岛屿在帝国灭亡以后仍然与医疗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现代改成了医院。



台伯岛的复原模



埃斯科拉庇俄斯雕像

除此以外，在地中海世界还有许多与医疗有关的拜神的地方。真正有医生实施医疗，是在医圣希波克拉底设立医学校很久之后，在科斯岛等几个地方才出现。到神殿拜神的病人只是把自己闭居在那里，一心祈求出现奇迹。但是有意思的是，并不能说拜神就不科学。

首先，为了拜神，就被迫请一定时间的假。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让自己从平时的工作中完全解脱出来。

其次，虽说台伯河中的岛（台伯岛）过了桥就能到，但是与医疗有关的神殿往往建在远离人烟的山上。特别是，希腊人是一个喜欢把神殿建在高处的民族。因此，病人无论是自己走，还是骑在驴、马的背上，或者躺在担架上，都要经过这段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在体力方面对病人进行了考验。

这样，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会闭居在神殿里。而在闭居期间，即使不断食，也只有简单的食物。这样，就会清洁身体内部，从而离治愈更近一步。相反，体力衰弱而受不了粗食的病人，即使神灵就在身边，也只有等死。

另外，虽然同样是祭神祛病，罗马人与希腊人也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去的神殿往往都在温泉附近。甚至有一位研究人员说，温泉对于罗马人来说就像磁铁一样。这样，闭居期间，在卫生方面也会得到保证。温泉本身就有治病的效果。

最后，是同病相怜的环境。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患有相同病的人相互感到怜悯。人类虽然是无意识，却是非常自私的。在家里孤独地卧在床上的时候，对自己遭遇的不幸感到绝望的人，在左右都是病人的环境中，觉得自己病情不严重，就会感到幸运，从而产生战胜疾病的力量。当然，经过比较以后明白自己病情严重的人会更加绝望，甚至死亡。

因此，可以想象“拜神”的治愈率也许非常高。目前已经挖掘出的许多陶器，都是治愈的人感谢神灵而捐献的，形状仿照身体得病的部位。

另外，罗马帝国还有法律规定，如果奴隶生病，主人把他扔到神殿这样的地方，奴隶治愈以后，以前的主人就不能主张对这个奴隶的所有权。虽然后来有不少来自希腊的“打工”医生，但是这些医生只是给有权有势或者有钱的人治病，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依靠家长和求神保佑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对一直处于这种水平的古罗马医疗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是尤里乌斯·恺撒。但是，在许多方面都制定中央集权法律，把共和制的罗马改为帝制的恺撒在建立医疗和教育系统的时候，并没有采用国家控制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没有将医疗和教育作为政府负责的领域。不过，他没有忘记创造私人能够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

恺撒以10年任期为限就任独裁官，迈出了当皇帝的第一步。在第一年，即公元前46年，着手进行许多改革，其中包括制定“尤里乌斯历”。这些改革之一，便是给医生和教师授予罗马公民权。

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首都罗马，医生从事医疗，教师从事教育，人种、肤色、出生地、社会地位一律不问。当然，信仰的宗教不同，也不问。对于这项改革，生活在两个世纪后的五贤帝时期的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这样评论：“恺撒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即改善已经在罗马从事医疗的医生的环境；吸引更多优秀的医生来罗马。”

获得罗马公民权，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不小的好处。

第一，可以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恺撒所构想的帝国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立的国体，因此无论是医生还是教师，如果是希腊雅典出身，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但是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罗马法律都更加完善。私有财产得到完全的保护，即使被判有罪，也可以行使上诉权，等等。总之，处于罗马法律保护之下，绝对有利。

第二个好处是，假如希望成为医生、教师的人不是出身于像雅典这

样被罗马指定为“自由都市”、被承认完全地方分权的地方，好处就会更大。这是因为，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就会免除相当于收入10%的行省税。也就是说，不再有义务缴纳直接税。至于间接税，想当医生和教师的人一般不会去做生意，所以应该不用缴纳5%的关税，消费时必须支付的营业税不过商品价格的1%。尽管如此，由于行省的人也享受与祖祖辈辈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一样的待遇，所以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后，必须依法缴纳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必须缴纳的5%的遗产继承税。不过，如果继承人是血亲，那么这种税也是免除的。

此外，他们还可以享受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有的特殊待遇。其一，是由《小麦法》保证的、每月免费领取大约30公斤的小麦。只要愿意每月排一次队，就可以免费领到基本上不会饿死的主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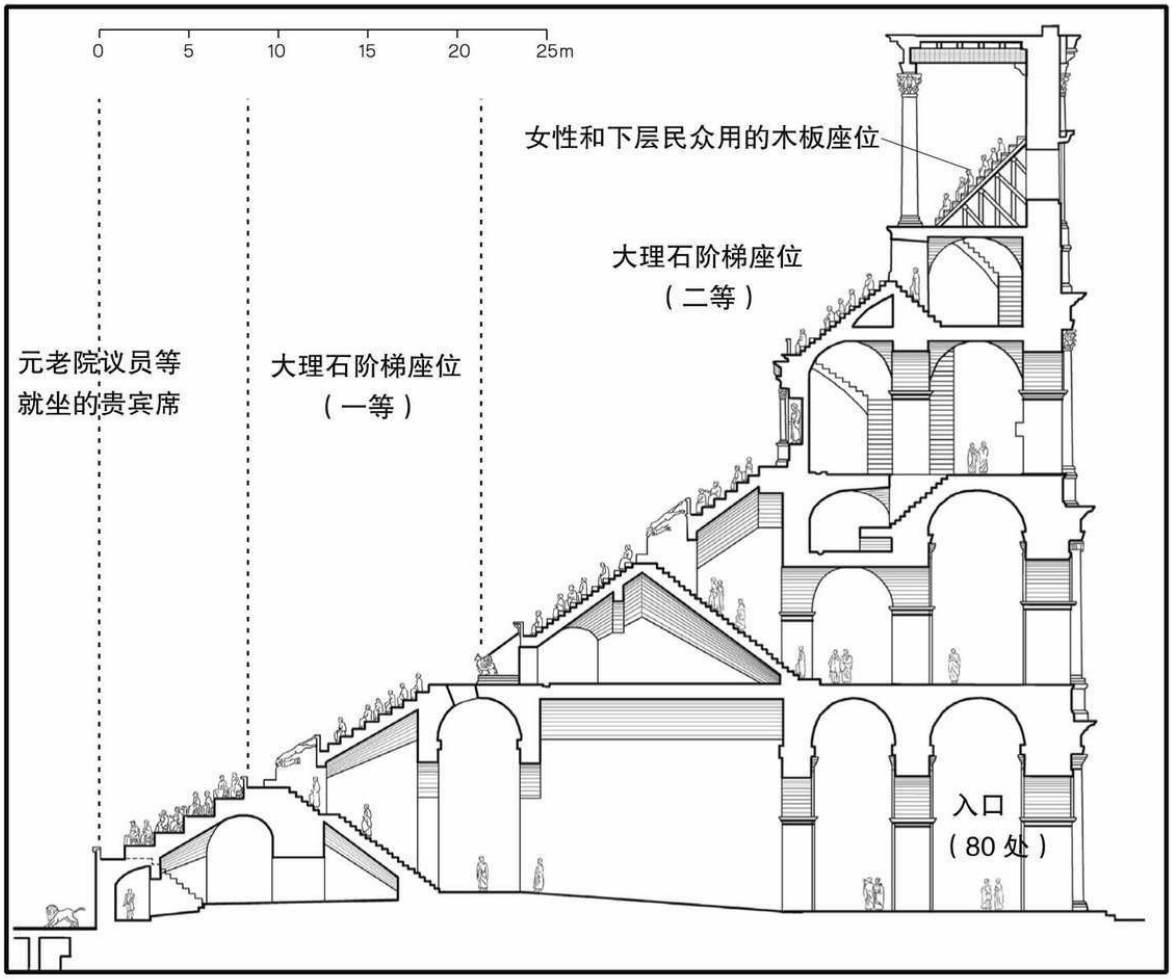
第二个特殊待遇是，如果有批准免费领取小麦的证明，就可以免费观看圆形竞技场的角斗比赛，还有在大竞技场举行的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比赛。也就是说，在娱乐方面，他们也可以享受与罗马公民一样的待遇。

尤里乌斯·恺撒没有拿出圣职这个概念招揽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所需要的医生和教师，而是采取了给在罗马从事医疗、教育的人以好处的方法。医生是一种圣职这个概念，早已以医圣希波克拉底让跟自己学医术以后自立门户的年轻医生宣誓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一句宣誓就是：“我将毕生当一名神圣、纯洁的医生，一心为病人考虑，谨慎行医。”在欧洲的医学系，与毕业证书一起，还会发给毕业生这个“希波克拉底的宣誓”。在有些开业医生的诊所，与毕业证书并排挂着写有这个宣誓的匾额。这样，如果医生乱收治疗费，对比两千五百年前的神圣、纯洁的医生宣誓，心里便会产生愧疚。

两千年前的尤里乌斯·恺撒并没有抱有这种期待。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在法律上和税制上，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让医生收取适当的治疗费从事治疗，让教师收取适当的学费教育孩子。他不是成立

公共机构，努力提高医疗、教育水平，而是把医生、教师放到一个自由市场。

结果，想要去罗马的医生和教师的数量激增。不仅保卫边境的军团也有了医疗队，而且，虽然工作地点在罗马，但工作性质有危险的警察和消防队也有了专属的医生。在市区的各个地方，不仅出现了许多相当于“白天医院”的小型诊所，而且有些医疗设施可以接纳少数病人住院。不过，这样的小医院，在百万人口的罗马全市地图上是不会标记的。



圆形竞技场的阶梯状座位

这里，我想读者会产生几个疑问。第一，恺撒对医生和教师的优惠政策是不是仅限于首都罗马？

实际上，恺撒所实施的优惠政策是针对在首都罗马从事医疗、教师工作的人。但是在古罗马时期，在首都罗马实行以后，波及了包括行省在内的整个帝国。从道路和水道的普及，到在竞技场观看表演，都是如此。这是因为，由此使国家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是罗马帝国领导人的一贯方针。所以，在恺撒死后，一代接一代的皇帝都继承了给医生和教师赋予罗马公民权的政策。到了五贤帝时期，皇帝仍然要求在行省也实

行这项制度。罗马作为首都，在所有方面都是整个帝国的样板。

第二个疑问应该是，在边境保障帝国安全的士兵的问题。罗马军队的主力是军团兵，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当军团兵，而帮助军团兵战斗的辅助兵都是行省出身的人。国家规定，这些辅助兵在满期退役时，赋予罗马公民权，而满期退役是指必须服满25年的兵役。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必须过25年才能拿到的罗马公民权，医生和教师马上就能拿到，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如果单纯比较取得罗马公民权所需要的时间，确实不公平。但是，非主力的辅助兵，也是罗马军团的一员，在服役期间衣食住都是由国家保障的。而医生和教师则是必须在“自由市场”生存的“自由职业”。我想，恺撒是这样考虑的。所以，对这两者的优惠政策当然会存在任务结束时和任务开始时的差异。

不过，由于没有见到确凿的史料，我们只能加以推测，赋予这两者的罗马公民权似乎还有世袭权和仅限一代的不同。

服满25年兵役后给予辅助兵的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而给医生、教师的公民权则似乎仅限一代。辅助兵的儿子作为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参加军团兵的例子，不胜枚举。另外，还有的人享受父亲让给的罗马公民权，成为给军团基地供应物资的商人。而医生、教师的儿子从事了其他职业，仍然拥有父亲享受的罗马公民权的例子，却闻所未闻。当然，有许多人与父亲一样成为医生、教师，有可能给人感觉他们取得的罗马公民权也是世袭的。

不仅如此，赋予医生和教师的罗马公民权，还有一点与行省士兵满期退役后被授予的罗马公民权不同，那就是，在取得后，会经常受到检查，是否真正在从事医疗、教育。过去，在古代属于罗马行省的多个城镇曾经发现一些铜板，上面写有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医生、教师的数量。

这是因为，也有一些人“钻空子”，在取得罗马公民权后，便放弃了从事医疗、教育工作。罗马人对于过去是被征服者，而现在对保卫帝国作出贡献的人，同样给予罗马公民权，把他们视为自己人。因此，通过医疗、教育对帝国作出贡献的人理所当然也会被纳入“同化败者”中。普鲁塔克在《列传》中认为，罗马的强大，最大原因就在于“同化败者”。不过，它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履行了义务。

我们前面说过，罗马帝国是由恺撒绘出蓝图、奥古斯都建构、提比略巩固而成的一个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罗马帝国越来越繁荣，帝国的各种制度也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医疗系统也不例外。医生的种类分

成了研究医生、家庭医生、开业医生、军医，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相对来说，职责范围比较明确的是家庭医生，他们继承了以前家长所做的工作。被视为领导阶级的元老院议员的家中，一般都有100多个用人，其中肯定有一至两个医生。但是，他们只是分担各种工作的众多用人中的一员，往往是奴隶身份。也许由于他们的工作只限于家庭，所以这种家庭医生并不享受恺撒的优惠政策。不过，如果这种奴隶医生成为解放奴隶，加入自由民，并开办个人诊所的话，他便有条件被授予罗马公民权。有许多人在成为开业医生后，仍然兼任原来主人的家庭医生，因此家庭医生未必等同于奴隶医生。

另外，即使皇家御医这种地位最高的家庭医生，也可以一边领取巨额的工资，一边为其他病人诊治。卡利古拉大帝和克劳狄乌斯大帝的御医曾经说过，给其他病人诊治能够挣60万塞斯特斯，所以皇帝只要给50万就行了。也许是他们利用皇帝御医的身份，作为开业医生拼命赚钱吧。著名开业医生的高额诊疗费曾经受到老普林尼等有良心的学者抨击，而讽刺作家则将之作为反面教材。

但是正因为是突出的例子，所以这些人才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许多医生即使身居高位，从事治疗的时候仍然只收取合理的诊疗费。也许是罗马公民权这个特殊待遇仅限一代，而且必须接受监督防止他们滥用特权。被称为“解剖学之祖”、生于小亚细亚帕加马的盖伦曾经长年在当时基础医学研究的最高学府——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博学园”学习，回到故乡后在角斗士训练所当了一名医生，后被看中，成为皇帝的御医。这位希腊人追求的不是利用皇帝御医的身份大发横财，而是继续他的解剖研究。

看病的医生（希腊浮雕）

不过，他似乎对御医的工作也尽心竭力。他不仅随同皇帝参加了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而且还著书阐述应对病人的方法。他认为，医生应该首先像亲人一样对待病人，但是最好避免过于亲密。在前去为病人看病之前，不应该吃葱、蒜，而且最好不要喝葡萄酒。除此之外，作为医生应有的态度，应该注意与病人之间保持平静的对话，使用正确、礼貌的语言，说话方式自始至终心平气和。如果病人有很好的教养，态度应该努力保持自然的谦虚，衣着也以选择稳重的颜色为宜，不要穿着华丽、流行的服装。后面还有，发型、胡须、指甲的修剪要考虑适合病人的气

质，非常有趣。盖伦医生的病人就是以思想家著称的马可·奥勒留。

由于当医生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样的现实利益，在古罗马时期的医生中，希腊人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并非土生土长的罗马人都对医疗毫不关心。由于他们已经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没有必要当医生。但是罗马人本来就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个性，他们擅长把各种现象收集、分类并记录下来。名声仅次于《博物志》作者老普林尼的罗马著作家塞尔苏斯编撰的《技术论》，分为农业论、医术论、辩证论、战术论四个部分。这本书大部分已经遗失了，但外科、内科等论及医术的八个章节还幸存于世。其中，他认为，在医生应该采取的态度方面，开始医疗之前需要诊察，而诊察之前要做的是收集信息。不过，听取病人惊恐不安的时候所说的话，并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稳定病人的情绪。坐在病人身边，拿起病人的手，一边亲人一般地跟他交谈，一边消除病人的不安。做完这些，才应该开始对病人身体进行触诊。这就是奥古斯都大帝时期的罗马人塞尔苏斯的医生论。

但是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这样，这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由于过于热心研究，想要从近处观察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丧命的老普林尼这样评论：

> 所谓医生，是一种乘人之危，在病人的危险和死亡上积累自己的经验的职业。世界上，唯独医生可以杀人而不偿命。

这番话到了讽刺作家的笔下，变成了下面的样子。在马提雅尔的讽刺诗中，就有两个版本：

> 我确实已经奄奄一息。但是门辛马柯斯啊，你领着100个弟子来给我看病，让100只手从我身上摸过去，它们都像北风一样冰冷，而我本来没有发烧，却一下子发起了高烧。

安德拉戈拉与我们一起洗澡，然后我们一起开心地吃饭。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死了。福斯提努斯啊，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死去？人们都猜测他是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了埃尔蒙克拉特斯医生来了。

有一位眼科医生开了一个诊所，失败后，只得改行当角斗士。诗人写了一首题为“致海鲍医生”的诗加以嘲笑：

以前当眼科医生的你，现在以角斗士谋生。可是你在角斗场上做的事，却是以前在治疗室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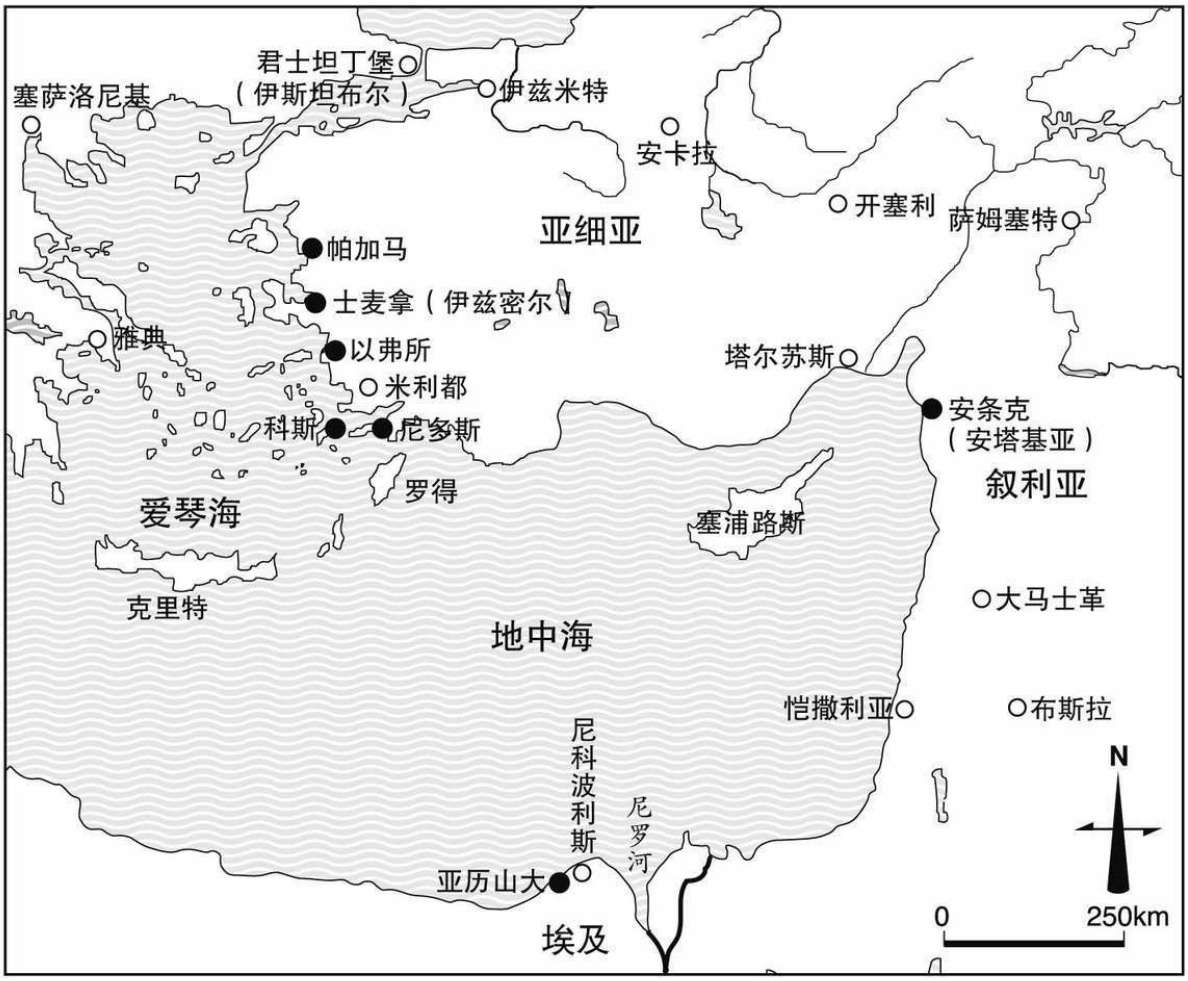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成为讽刺作家写作的素材也证明了罗马世界中医生的地位和收入的提高。

从收入的多少来看，研究医生无论如何不会成为讽刺作家的目标。在现代来说，学习基础医学的人、讲授医学的医学系教授属于这种研究医生。但如果以为这种医生会远离责难和嘲笑，则并非如此。

古罗马时期的医学校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帕加马、士麦拿（伊兹密尔的旧称）、以弗所、尼多斯，还有科斯岛、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地方都处于希腊化的东方，到古罗马时期医学术语还一直是希腊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医学校，不仅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理论，而且每个学生分配一个病人，同时学习临床医学。这些医学校的运营经费不是由学生缴纳的学费。医学校所在的行省，也就是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三个行省负担一切所需的费用，包括教授的年薪和研究设施。其中，埃及是皇帝的私人领地，因此，被誉为医学研究的“麦加”的亚历山大博学园靠罗马皇帝的资助金运营。

在日本，经常把亚历山大的“博学园”译为“图书馆”，这里收集了上万卷书籍（当时的抄本呈卷轴形状），因此这种翻译也不能断定为误

译。但是，这个词的词源希腊语“mouseion”如果直译过来，是学问、艺术女神缪斯居住的圣域之意。收集了书籍之后，想要读书的人便会聚集到这里，因此图书馆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研究机构。而且，希腊语“mouseion”变为拉丁语之后就成为“museum”，意为收集、展览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地方。这个含义被现代的梵蒂冈美术馆、大英博物馆所继承。但是古代的博学园是一个研究所，也是最高学府。如果说柏拉图在希腊雅典创办的“学园”是人文科学的“麦加”，那么埃及亚历山大的“博学园”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麦加”，以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研究而闻名。



古罗马时期的医学校所在地（●表示的城市）

关于在博学园工作的教授们的年薪，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有的史料上记载了“学园”教授的年薪。据史料记载，根据年龄不同，这些教授的年薪在4万至6万塞斯特斯之间，因此可以考虑博学园的教授也与此相当或者在此之上。此外，研究医生也允许给病人治疗，收取诊疗费。即使如此，也不能与开业医生相比。据说，罗马一位有名的开业医生留下了数千万塞斯特斯遗产。而研究医生遭受批评的地方在于他们医疗的专业化。

越是钻研，其对象越是走向细分化，这也是研究的一个必然宿命。

即使在古代，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科、牙科也是专业化的，但是对于对自己的专业以外的病情不予关心的希腊医生，罗马人无法赞同，因为与基础科学相比，他们更加看重应用科学。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给朋友的信中慨叹医疗的细分化倾向，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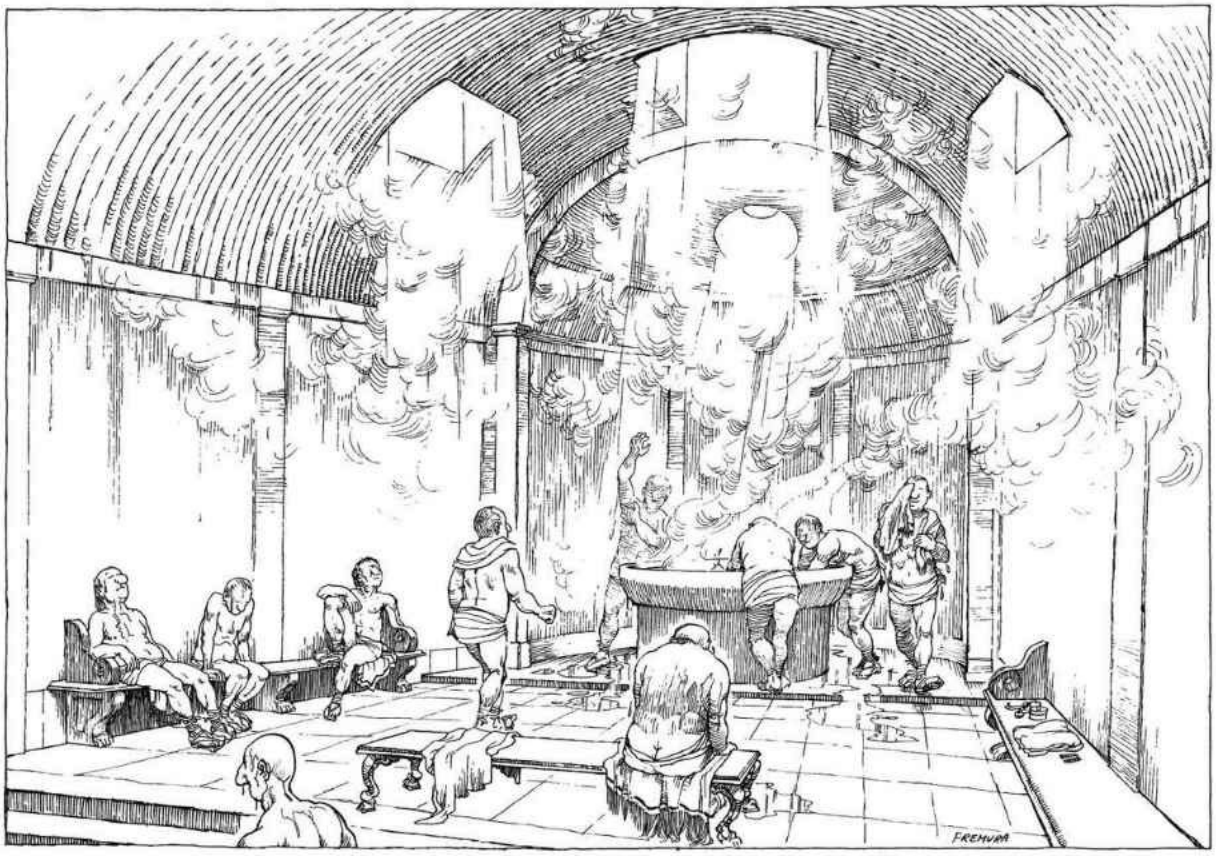
> 难以想象，当年希波克拉底在科斯岛传授医学时，每个生病部位就找不同的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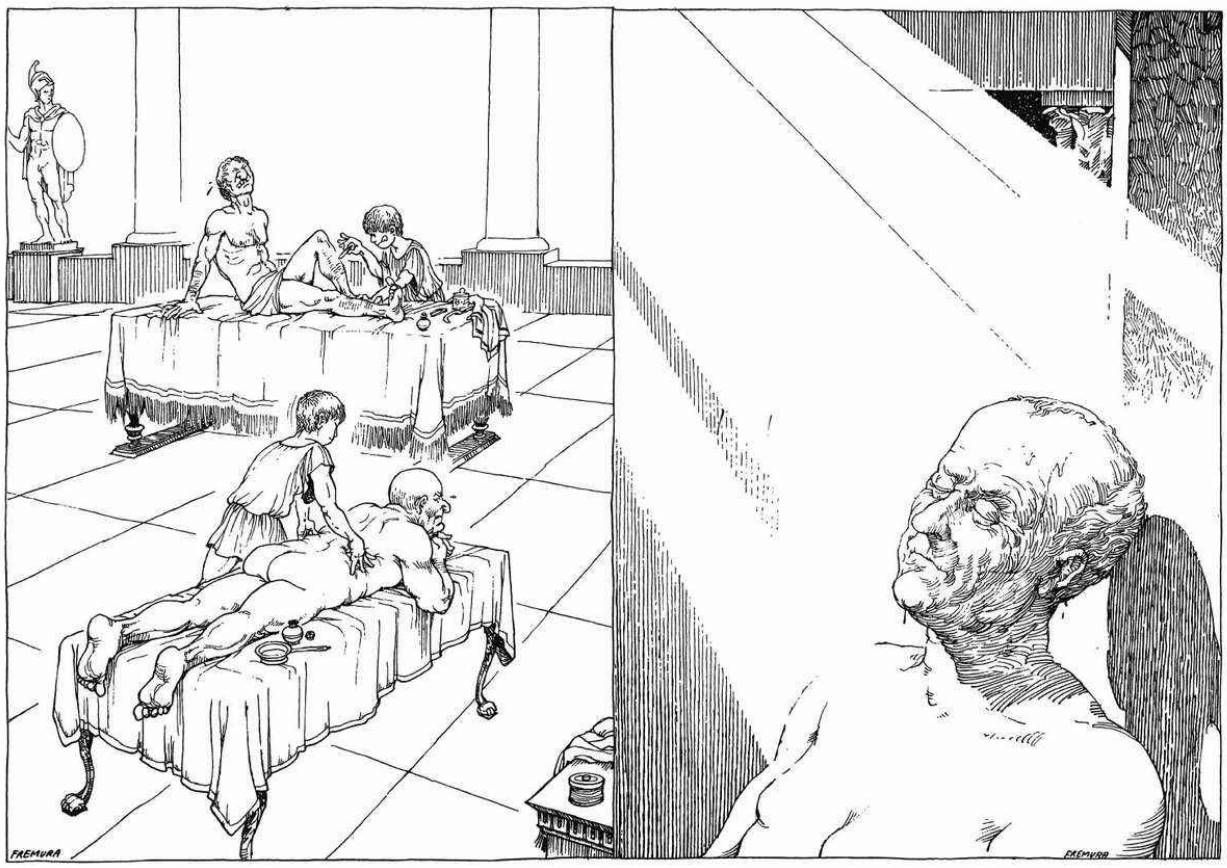
讽刺作家马提雅尔则感叹道："哎呀！到底我的命交给哪个医生好呢？"

因此，罗马人把医学研究交给了希腊人，同时自己想出了对医疗细分化的对策。那就是完善卫生设施，而这连鼎盛时期的希腊人也没有想到过。建造上下水道和公共浴场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的人保持清洁，而且罗马人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按摩。工作结束后，先洗个澡，然后让人按摩身体，做完这两样才开始吃晚餐，这是当时罗马人每天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清洁度的话，西塞罗绝对在苏格拉底之上。虽然人们经常把希腊、罗马文明相提并论，但这两个民族仍然有所不同。军医就是反映罗马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典型例子。

1970年，有一部叫做《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的美国电影。这是一部以朝鲜战争中在前线工作的两名军医为主人公的喜剧。我当时与一些年轻的外科医生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后，他们的感想不是针对这部非常成功的喜剧，而是说："美国人在野战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在意大利连大学医院里也没有。"

这与罗马人在两千年前的做法如出一辙。


FREMURA



浴场内的情境。上为热浴室，下为接受按摩的人（摘自“Terme romane e vita quotidiana”）

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曾经说过，尤里乌斯·恺撒之所以制定给所有从事医疗和教育的人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法律，目的是提高罗马世界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正是因为深知这是一项有效的政策，所以皇帝们都继承了这项政策，并一直重视让这个系统发挥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们把话题仅限于“医疗”。恺撒制定这个政策的最初动机，乃是保障自己率领的军团的军医。

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普鲁塔克在他的《列传》中，将尤里乌斯·恺撒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可见恺撒是一位具有雄韬伟略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方面都非常体恤自己手下的士兵。即使在战斗中，他也不会让他们无谓地牺牲。在执行军务的时候，即使他自己借钱，也要保证士兵们有足够的粮食。有人说“罗马军队靠兵站取胜”，而证明此言非虚，将之确立为罗马军队基本方针的，便是恺撒。而且他没有忘记照顾原来的部下退役后的生活。庞贝遗址遗留的文字表明，罗马帝国内的地方自治体在选举地方议会的议员时，要举行大规模的选举活动。有选举权的人是当地居住的、17岁以上的罗马公民。但是，被选举人的资格年龄是由恺撒规定的：

未服过兵役的人：30岁以上。

当过军团步兵的人：23岁以上。

当过骑兵或百人队队长的人：20岁以上。

这不是单纯的士兵优待政策。最重要的，首先是出于让士兵能够从军旅生活顺利地进入平民生活的考虑。

第二，从20岁或23岁以上这样的年龄，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项政策考虑到了因为疾病或者负伤不能继续留在军队的人。这是因为，从17岁开始服兵役，到45岁为止，为“现役”，而后来的奥古斯都规定的兵役期限正式实行之后，37岁便期满退役。这是罗马军队通常的服役过程。如果不是期满退役，似乎也不能领取退役金。而体恤士兵的恺撒没有忘记照顾这些领不到退役金的中途退役的人。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战胜暗杀恺撒的布鲁图，就是因为恺撒手下的士兵们加上已经进入市民生活的退役兵全部跟随了奥古斯都。据说，这支恺撒军团，即使战斗中负了重伤，濒临死亡，士兵也总是不肯合上双眼。士兵们深信不疑，总司令官一定会来到将死的士兵跟前，为他送行。这样的恺撒当然会考虑尽一切可能为士兵治疗，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方设法。

尽管如此，至今没有发现有史料——例如在军团工作的医生的墓碑——能够证明恺撒手下的军团中有军医。但是，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恺撒的想法的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军团中有医疗队，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医疗队要负责照顾6000名士兵。除了给人看病的医生以外，还包括给牛、马看病的兽医和当护士的奴隶，这样的医疗队多达30人。这支医疗队至少要有两位医生负责指挥。但是既然是军医，他们便也是军团兵的一员。罗马军团兵入伍的资格是拥有罗马公民权。虽然手上拿的不是剑，而是手术刀，但军医也需要符合这个资格。恺撒制定法律授予所有从事医疗的人罗马公民权，毫无疑问，首先是为了确保大量的优秀军医。而结果，这项法律对提高罗马帝国的医疗水平作出了贡献。这一

点，与作为军用道路修建的罗马大道对周边的人员和物产的交流作出了贡献，提高了生活水平，可谓殊途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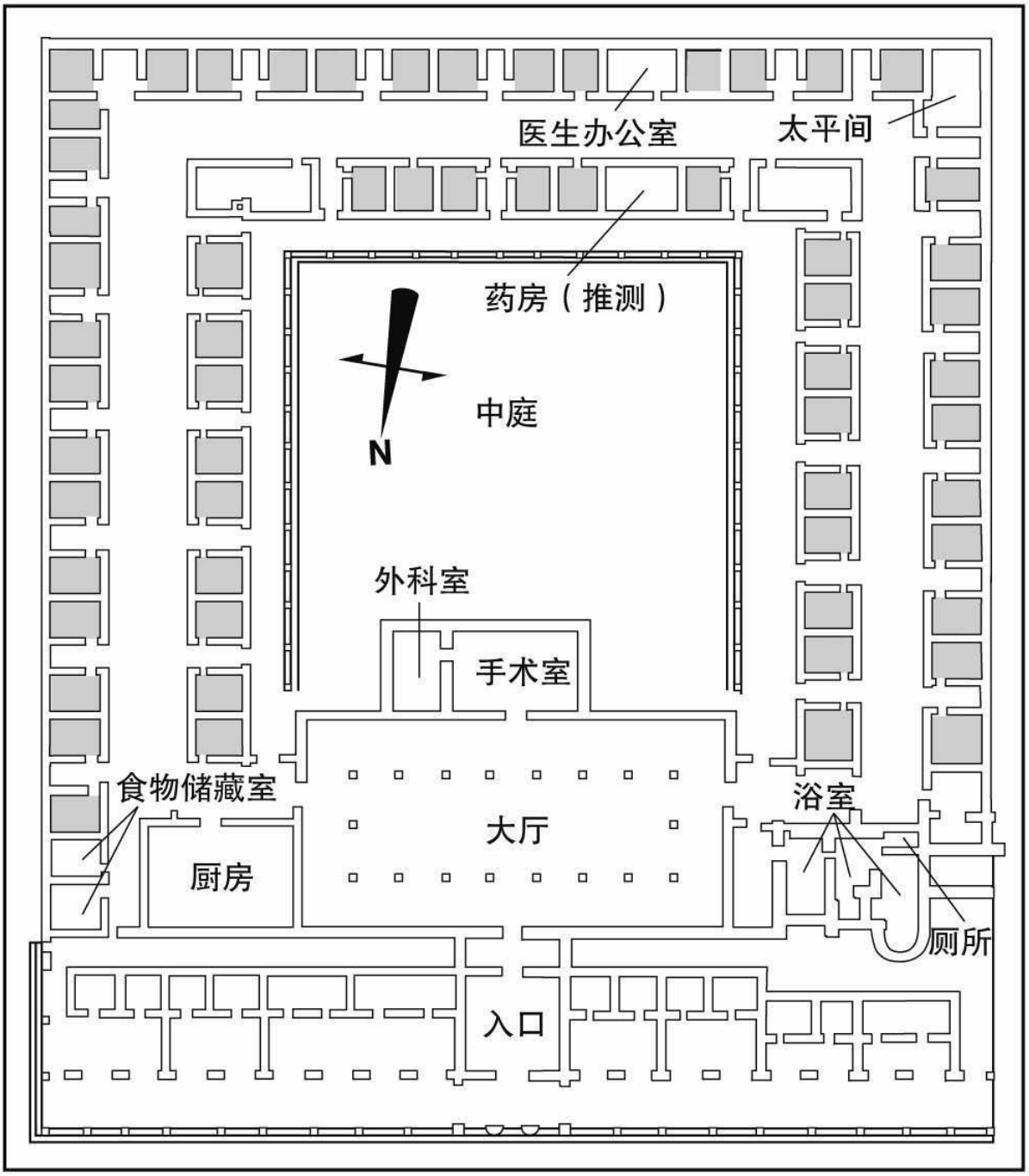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两千年前的基地军医院的设施竟然如此完善，也令人惊叹。军医院不只是在军团驻扎的地方才有。考古发掘表明，行省出身的辅助兵所驻扎的基地也有军医院。由此可见，当时不仅给罗马军团兵配军医，而且给辅助兵也配军医。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遗址的考古发掘之所以非常困难，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古罗马时期的基地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的城市。德国的美因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这些大城市的市中心要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介绍的克桑腾军医院，之所以能够了解它的全貌，不过是因为现代的克桑腾不是大城市，而且这个地方古代的基地和现代的城镇并不完全重合，这一点实属罕见。

克桑腾曾经是第三十乌尔庇亚军团的驻扎基地，在古罗马时期称为维提拉堡军团（Castra Vetera）。它是接近莱茵河帝国防线的前线基地，因此设在这里的军医院相当于野战医院。

这个医院忠实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采用朝内敞开的形式，为四角四面的结构，仿佛医院本身是军团基地一样。只有北面带有一个区域，可能是医院工作人员的住处，这一点与军团基地有所不同。

除了北侧的这个区域以外，医院本身的规模为边长83.5米、将近7000平方米的巨大四边形。如平面图所示，进门以后，便是排列着几根圆柱的大厅。这里可能是住院病人休息的地方。不过，按照通常的罗马建筑形式，大厅的中央部分应该是无顶的雕塑，但这里却是一个屋顶完全遮盖的封闭空间。这是考虑到北欧的地势和气候上的条件。紧挨着大厅的手术室也有几扇朝南开的大窗户，宽敞而且明亮。



克桑腾军团基地的军队医院平面图（■为病房）

医院中央是一个宽阔的院子，一边有40多米。视察过所有帝国防线的哈德良大帝要求基地内的广场用石头铺砌，用做士兵集合的地方，而

军医院的院子则允许用喷泉、花草树木来装饰。这样，住院的病人只要体力和天气允许，就可以在宽敞的院子里散步。院子的三面环绕着3米纵深的列柱回廊。它们的后面联结着两排病房。

医院总共有65个房间。除了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医疗器具、贮存药品的容器等推测可能是医生值班室、药房的房间外，研究人员推测，用于病房的应该是60个房间。每个病房的大小为3.5米× 4.5米，即15.75平方米。每个房间可以住3个人，因此，学者们称，这个军医院大约可以容纳180名住院病人。但是让我由衷感叹的是下面两件事：

第一，连成两排的病房之间的通道宽达6米。相比于担架车、医生、护士忙碌地你来我往、挤满病人家属和探望的人的现代医院，其宽敞令人感叹。

第二，各个病房的出入口与6米宽的中央通道并不直接相连的巧妙设计。罗马建筑的墙壁之厚已经得到了历经两千年风吹雨打的遗址的证实，即使内墙也有50厘米厚。这样的构造无疑保证了病房内的安静，让病人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且，古罗马时期的军医院并不只对军团的人进行治疗。既没有可以接受普通人的皇帝诏令，也没有经过元老院表决制定成法律的条文，所以这是自然而然地变成的既成事实。当时，有许多期满退役的军团兵在服役期间与结识的当地女子结婚，退役后也定居在基地附近，因此他们及其家属需要医疗的时候，自然也会去基地的医院。事实上，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军医院只能接受士兵，这说明中央政府也承认基地的军医院可以接受普通民众。罗马军团的基地在医疗方面也发挥了将行省罗马化的排头兵作用。

然而，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罗马帝国在边境上都有如此完善的医疗设施，却为何在帝国的首都罗马没有建一所大医院呢？

解开这个疑问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在行省也有设施完善的医院，但只是在军团兵、辅助兵常驻的基地。而在像科隆、里昂、伦敦这样的行省首府，完全好像小型的罗马一样，从广场、大浴场到圆形竞技场，这些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但是这些地方即使像帝国首都罗马一样有祭祀医神的神殿，却没有一所大医院。

第二，在罗马皇帝中，没有一个人像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拼命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而且，也没有史料记载，中央政府向神殿发出布

告，下令举行祭神仪式，祈求神灵延长死期将近的皇帝的寿命。在德高望重的皇帝病倒的时候，人们自发地去神殿祈祷。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且，达官显贵在知道死期将至的时候，有不少人选择自己绝食而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西塞罗的亲友阿提库斯、涅尔瓦大帝的祖父，就都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人。

从这些现象也可以说，恺撒提出，而奥古斯都将之变成政策的罗马帝国医疗体系反映了古罗马人的生死观。用俗话说就是，既然寿命已尽，就该顺从天命。对于年轻、健壮的人负伤或者生病，要竭尽全力加以治疗，而如果并没有遭遇不幸，寿命已尽，则从容升天乃是自然的生活态度。罗马人的墓碑多以D和M两个字母开始，它们是表示“致在两肋带着死者升天的两位天使”的意思的缩写。一般的民众相信，人死后，会有两位天使来迎接，拉着两个肩膀，让他升天。

当然，有教养的人并不抱有这样的幻想。哈德良大帝在绝命诗中感叹自己将要下到“阴暗、寒冷、空荡荡、没有人可以说笑的世界”。确实如此，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样一句话，它是一个不知名的罗马人刻在墓碑上的：

> 我死了，被葬在这里。现在的我只是变成了一撮灰，但是灰会变成土壤，土壤会渗透到大地，创造人类世界的基础。如此一来，我并没有死，而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这是一个严肃的墓碑的例子，下面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 我知道，洗浴、饮酒、女人是长寿的敌人。但是没有洗浴、饮酒、女人的人生不是人生。我这样想的，到52岁的时候，它结束了。

罗马大道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便开始从一排排的坟墓之间穿过。罗马人并不认为坟墓是不洁的东西。干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坟墓。第一个原因是，在人们聚集的市中心无法保证埋葬死人的地方。无论是奥古斯都大帝建造的奥古斯都陵也好，存放着图拉真大帝骨灰的地基上耸立的图拉真记功柱也好，在奥古斯都陵爆满后，哈德良大帝建在台伯河右岸、现代称为圣天使堡的皇帝陵也好，都位于罗马市中心以外的地方。皇帝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更不用说，只有在城市外面建造坟墓了。

第二个原因是，除了科尔涅利乌斯家族这样极少数的例外情况，罗马人大多是埋葬骨灰。骨灰是清洁的，不需要特意挖到很深的地下埋葬。伊特鲁里亚人和犹太人正是因为与罗马人不同，采用埋葬遗体，所以需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建造死人的墓地。同样是罗马帝国臣民的埃及人，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一直采用把尸体变成木乃伊后埋葬的方法。仅仅看一看坟墓，就可以想象这个民族的生死观。

罗马人的坟墓基本上没有只刻“某某人之墓”、只刻死者姓名的，几乎每块墓碑上面都刻有类似于墓志铭这样的信息。由于这些坟墓都面朝大道，所以这些给予生者的信息肯定极有可能会有人看到。

父母表达对不幸夭折的子女的惋惜之情的碑文当然很多。而更多的是像履历书一样的墓碑。另外，还有不少像前面介绍的、表达自己人生观的墓碑以及吐露对死去的丈夫或者妻子的爱情的墓碑。与地位高的人相比，平民要饶舌得多，而且，这些坟墓对于道路上来往的人来说，恰好也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罗马大道的干道是由4米宽的车道和两侧3米宽的人行道组成的。总共10米宽的道路外侧不允许栽种树木。由于是石头铺砌的路面，因此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地下树根蔓延，破坏这些石头的情况。但路旁人行道的外侧允许建造一排排的坟墓，墓地的周围也可以栽树。这样，风尘仆仆的旅行者可以坐在树荫下的墓地阶梯上，一边看着死者寄予生者的信息，一边休憩一下。在埋葬骨灰、还没有地狱概念的那个时代，生者和

死者可以这样相邻共生。但是这个情况在公元4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医疗制度也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而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由国家负责医疗是医疗制度的一个进步的话，这个时代终于来临了。在罗马划分的14个行政区中，每个区都建了医院，而且这些医院的医生都由国家支付工资。如果去这些医院，医疗全部免费。这是因为在以友爱和慈善为宗旨的基督教看来，支付不起诊疗费的穷人也有接受医疗的权利。

但是这只是一个场面话，而不是真心话。4世纪的时候，只是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基督教，并非所有的罗马帝国居民都已经成为基督教徒。许多平民在生病的时候，仍然跟以往一样，到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神殿或者主管发烧、腹痛的神灵的神庙求神保佑。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是它不愿见到的现象，因为它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的神。因此，他们要通过免费医疗把人们从神殿吸引到公立医院来。

然而，这并没有马上成功。基督教徒的医生不是按照医学知识的标准，而是以信仰的程度来选拔的，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治疗能力，所以人们仍然到城镇的医生那里看病，而且以往的神灵已经在心中根深蒂固，人们早已习惯于求神保佑。基督教下的公立医院制度取得成功，乃是在4世纪末狄奥多西大帝宣布禁止其他各种宗教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一律被视为邪教，信仰它们的人则被定为邪教徒，被判有罪。这样，就不再有人去神殿或神庙了。

把医疗当做以政府为主体负责的领域，需要庞大的经费。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现代国家预算中医疗费用所占的比例之高就可以明白。但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经济，由于种种原因，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就是处于破产状态。而在把医疗当做以私人为主体负责的领域的恺撒时期，罗马的经济力量却正在不断上升。因此，现代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罗马帝国完全缺少医疗制度，这种医疗制度并不是反映经济力量的一项政策。它是一个只能归于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私人为主体的概念

差异的问题。

如果要从如何看待“贫穷”这一点来比较一下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古代鼎盛时期和基督教兴起的古代末期，只要对比下面两个人所说的话便足够了。

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安于贫穷。——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

当穷人是幸运的事。——耶稣

基督教的“慈爱”到了近现代被“人权”取代，医疗也被认为是由政府主导的领域，直至今天。而教育也从由私人主导转变成了由政府主导，在这一点上与医疗是相似的。

教育

在罗马，有很长一段时期教育是父母的职责。名门贵族和富裕家庭聘请家庭教师教育自己的子女是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罗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而是因为当时提供教师的希腊的国内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也与医生的情况一样。

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希腊处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死亡及其后的希腊化时期。相对而言，希腊城邦的国力与叙利亚、埃及这样的希腊化大国相比，是比较落后的。尽管如此，希腊人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向海外发展的倾向，在本国内难以施展才能的时候，便会到海外寻求发展。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人才外流。当然，移居到希腊化国家的人居多。但是，也有些希腊的人才外流到了并非希腊化文明圈的地中海西部的国家。

当时，地中海西部势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迦太基，因此希腊人应该也可以移民到迦太基。但是迦太基人除了贸易以外，以封闭著称，对于学习当时的国际语言——希腊语采取消极的态度。

而在罗马，一定水平以上的家庭都要求子女同时学习本国语言拉丁语和国际语言希腊语。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爆发的布匿战争中的两大主人公——迦太基方面的汉尼拔，罗马方面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前者在30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希腊语，而后者自幼在希腊裔家庭教师中长大，能流利地说两国语言。而且，崇拜希腊对于罗马人来说，甚至成了一种传统。希腊的人才外流不是选择经济更加发达的迦太基，而是罗马，也有这个原因。

由于有供有求，公元前3世纪以后，罗马达官贵人的家中，希腊裔教师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成员。但是家庭教师也有“品牌”。顶级品牌是在雅典出生并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希腊人。其次是在作为学府而著称的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以弗所、罗得岛、叙利亚的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接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当然，品牌不同，支付的报酬也会不同。不仅西庇阿出身的科尔涅利乌斯一族、克劳狄乌斯一族这样罗马贵族中最高贵的门第，连平民出身的贵族格拉古一族以及据传是罗马首富的克拉苏一族的孩子，也都曾师从“顶级品牌”的希腊裔家庭教师。

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名门贵族，甚至不亚于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斯家族，但是在经济上处于中等水平。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出身于以学者著称的奥利乌斯一族。她也懂希腊语，具有很高的教养。这位母亲在选择独生子恺撒的家庭教师的时候，采取了实用主义，选择了一位据称在埃及亚历山大接受教育的高卢人。拿现代来说，就类似于聘用在牛津、剑桥学习过的新加坡人或者印度人。恺撒在少年的时候，跟着高卢人家庭教师不仅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还学习了从数学、地理、历史到逻辑学的所有知识。

可以想象，或许他这段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他在就任独裁官、能够为

建构帝国打基础时，首先决定授予医生和教师罗马公民权。正是由于他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不是罗马人，而是高卢人，所以他才能想到，不问民族、宗教，只要从事教育就授予罗马公民权，而且在实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不过，在我儿子看来，则是另一种解释：因为恺撒学习希腊语的时候一有错误就要挨打，对家庭教师充满了怨恨，所以在他长大以后，就要报复，进攻并征服了高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古罗马时期教师体罚学生，就跟以前英国的公立学校一样，也是事实。即使身份是奴隶，在惩罚主人孩子的时候也毫不留情。而在古罗马时期，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恺撒的法律规定：授予从事医疗的医生和从事教育的教师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当时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它甚至改变了时代的潮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罗马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享受充分的医疗，除了他们之外，便是在这些人的家中工作的用人和奴隶，这不禁让人想起“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属于中层以下阶级的市民则处于求神保佑的状态。

教育也处于与此相同的状态。在雇得起家庭教师的家庭中，奴隶住在家里，他们的孩子也与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在长大后理所当然地会就任公职，而自幼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的奴隶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得力助手，比任何人都更加宝贵。而且，有权有势的人家都有财产，在理财方面也需要有才能的人。总之，在罗马的上层家庭，无论是住在家中的奴隶的孩子，还是在奴隶市场上买来的年轻奴隶，都有合理的理由给他们提供教育。

有不少希腊裔教师移居到罗马以后，不当家庭教师，而是开办私塾，所以中层以下家庭的子女也就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能否付得起学费会让他们产生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只有增加教师的数量。恺撒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通过制定法律，将之政策化、制度

化。

这里便涉及学费的金额。恺撒实行的方法是，像对医生一样，把教师投入自由市场。因此，学费也完全不同。由于后面将要阐述的原因，不能无限地增加学生数量，因此支付给受欢迎的教师的学费比较高。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在没有完整史料留存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古罗马时期是两千年前的事，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文字记录遗留下来的数字。根据记载，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支付给私塾老师的学费为一个月8阿斯。

那么，8阿斯有多少购买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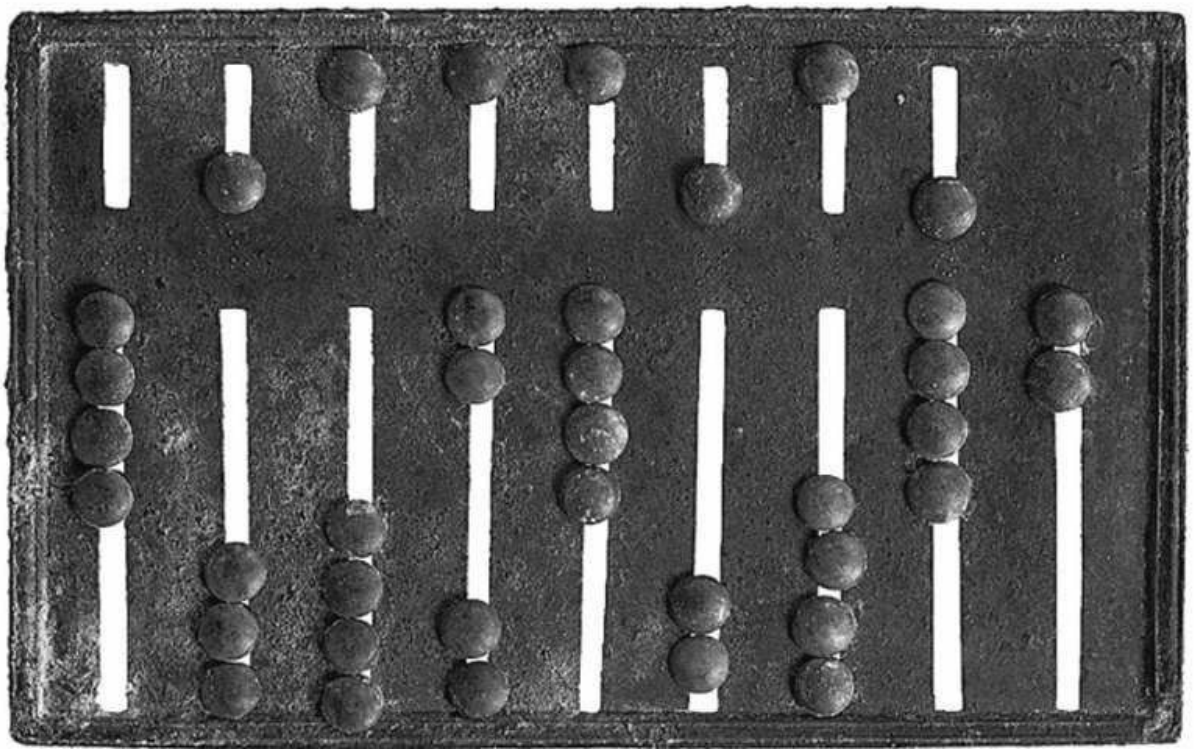
公共浴场的门票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成年男子每张门票只需半阿斯，成年女子每张门票需1阿斯。

另外，每公斤面粉的价格在1.5至5阿斯之间，由于是自由市场，这里面包括最差和最高质量的面粉。

非熟练工人的日薪为10阿斯左右。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的军团兵的工资在国家保障他们衣食住的基础上，按天计算为10阿斯。

即使家里有几个孩子达到学龄期，父母是非熟练工人，只要愿意，他们也能够让孩子上私塾。图拉真大帝制定了一项“育英基金”制度，目的就是资助贫穷家庭的孩子。按照这项制度，每个月发放64阿斯，因此8阿斯的学费完全支付得起，而且不需要缴教材费。初等教育的“读、写、算”的“读”，就是背诵老师朗读的古今文章。“写”就是把这些文章用铁笔写在学生自带的涂蜡木板上。至于“算”，在最初的一两年，用双手的手指就足够了。使用涂蜡木板这样的“笔记本”则是在进入分数计算以后。更加复杂的计算就需要用算盘。古罗马时期初等教育的对象是7岁至11岁。在这5年中，从学习字母和罗马数字开始，学习所谓的“读、写、算”。这个时期的小学对女子也开放，因此虽然数量不同，但都是采用男女同校的方式。



古罗马时期的算盘

在选拔罗马军团志愿兵的时候，条件就是拉丁语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在低额学费下初等教育已经非常普及。现代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古罗马的文盲率之低在古代来说令人吃惊。另外，军团兵寄给故乡的信，虽然遗留不多，但是从这些信来看，所写的拉丁语相当准确。它们不是出自军官之手，而是出自士兵之手。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一贯使用两国语言，甚至连皇帝的布告在属于希腊语圈的东方也使用希腊语。只有罗马军团内的通用语统一使用拉丁语。

古罗马时期的孩子在小学学习的数字，当然不是中世纪末才传到西欧并开始普及的、现代人使用的阿拉伯数字，而是现代在一些高级的钟表盘或者纪念碑的刻字上使用的罗马数字。没有零的概念。它们分别用Ⅰ、Ⅱ、Ⅲ、Ⅳ、Ⅴ、Ⅵ、Ⅶ、Ⅷ、Ⅸ、Ⅹ、L、C、D、M分别代表1、2、3、4、5、6、7、8、9、10、50、100、500、1000。

另外，他们也学习所谓的“九九乘法”。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就有上面写着1×1、2×2这样的九九乘法表的木版。为了便于计算，他们也使用算盘，从铜制的便携式小算盘至大型的算盘，各式各样。现在已经挖掘出了手里拿着大型算盘的商人浮雕。不过，在古代的中国和巴比伦都使用算盘，所以它并不是罗马人的发明。

在小学学习的数学范围到分数计算为止。分数的计算能力，对于罗马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是因为税的计算全部是分数：行省税为“十分之一税”，营业税为“百分之一税”，遗产税为“二十分之一税”。

私立小学，更准确地说这些私塾，开办在什么地方呢？通常它们都在广场的一角、街上有屋顶的地方。罗马的广场上都有一个半圆形的一角，称为“艾萨多拉”，作为市民的学习区。这也是从恺撒建造的广场开始的一种建筑形式。它的目的或许就是给私塾提供教室。在“艾萨多拉”中一般会沿着半圆形的墙面摆放着罗马史上伟人们的塑像，因此也适合用做教室。虽然是贴着大理石的墙壁，上面却至今留有“教师伊利乌斯是死猪”这样乱写乱画的痕迹。

街上也开私塾，学生人数通常为15人至20人。如果这样的学校就设在自己房子的窗下，可以想象，是多么吵闹不堪。有位诗人感叹过这种古罗马时期的“麻雀学校”，看了这篇文章令人忍俊不禁。

重现古罗马时期小学生的一天，大致是下面这样的情况：

早晨，被母亲或者家奴叫醒。罗马人习惯于星星还在天上闪烁的时候起床，日出便开始工作，因此大清早人们已经开始活动了。不过，哪个孩子都不喜欢早起，要在母亲的催促下，才开始洗漱。

接着，穿着打扮。气候宜人的季节，穿棉的或者麻的、一种称为“丘尼卡”的短衣服。春秋季节，丘尼卡就变为毛衣。再冷一些，毛衣也变厚，在皮凉鞋里面穿上长筒袜。怕冷的人在脖子上围上一条长围

巾，下雨的日子则穿带帽子的短式斗篷。这是因为，即使下雨，学校也不放假。

打扮完了，准备当天要带到学校的东西。涂蜡的笔记本，铁笔、算盘也是必不可少的。还需要折叠式的简易椅子。

这一切结束以后，去向父母道早安。然后，去拜家神与祖先的神龛。罗马人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族。

之后，坐在椅子上吃简单的早餐——面包、水、少量的水果。用完早餐，出门上学。在途中，经过路旁的酒馆时，一般买一个刚出炉的意式风味派，用做加餐。这是因为早餐比较简单，坚持不到午餐的时候。也有些孩子经不住刚出炉的喷香的味道，一边啃着一边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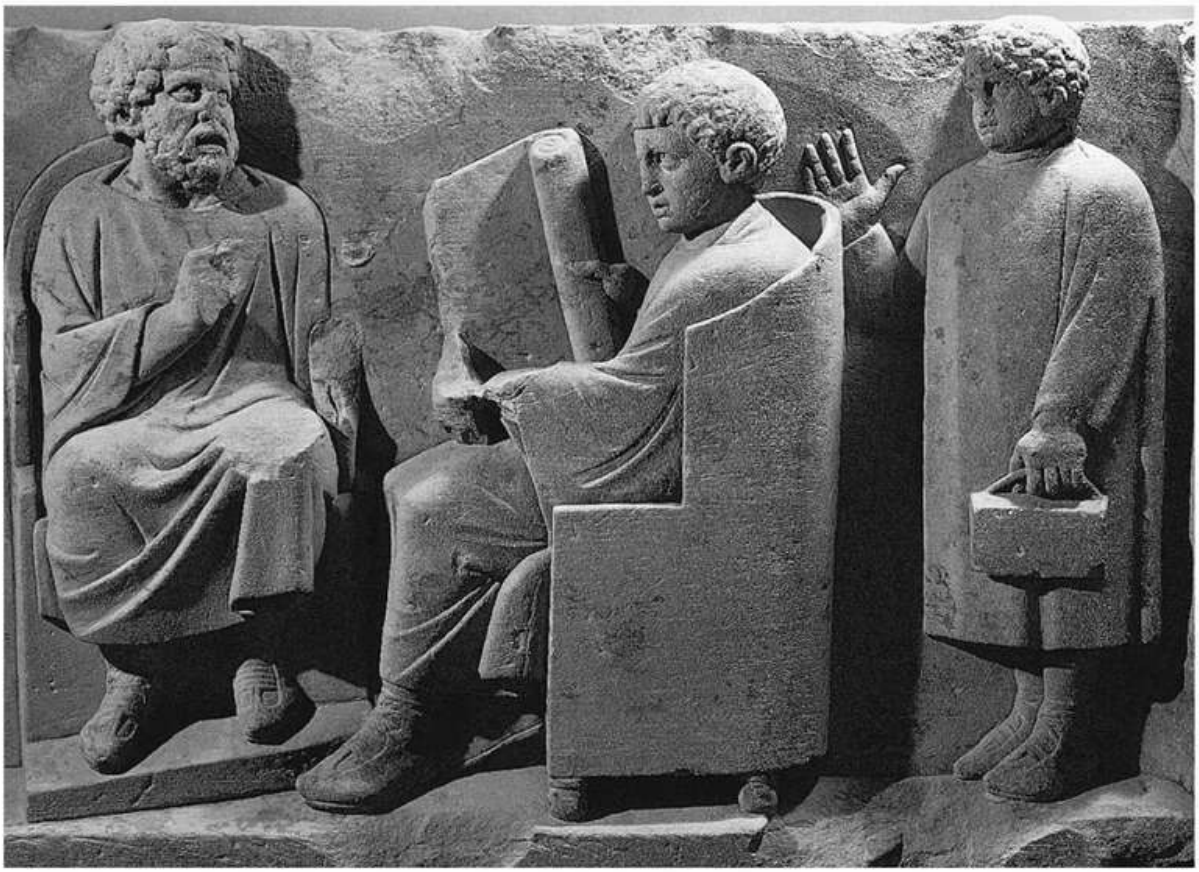
此时，大人们已经正式开始工作，而孩子们一直到正午都是学习时间。

下课后，回家。等候他们的是一顿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餐，便把学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赶到公共浴场。当然，不是为了洗澡，而是因为儿童免费的大公共浴场有宽敞的体育场和偌大的花园，在那里不论天气如何，都可以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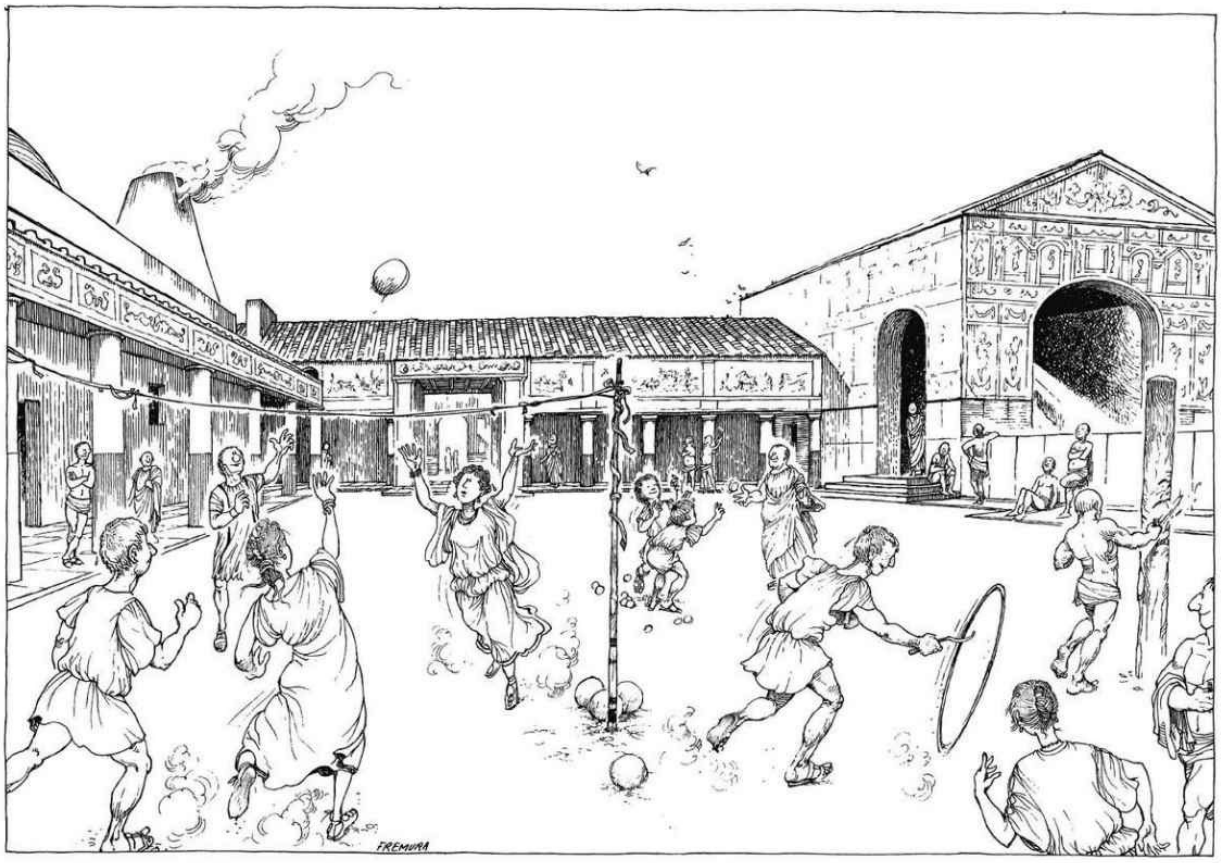
然而，这也只能玩到下午5点闭馆的时间。回家后，孩子与父母一起吃晚餐。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古罗马中等教育的教学对象是12岁至17岁的少年，相当于现代的初中至高中二年级。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制度中，中等教育非常重要，甚至拉丁语中的“教师”都来源于表示中等教育的“grammatici schola”一词。学费也稍微高一些。私塾式、露天，这些都与小学一样。但是，中等教育不仅加入了希腊语的学习，而且学习内容也集中于文学和历史。教材则是希腊和罗马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希腊文学方面，叙事诗人荷马和埃斯

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是必学内容，而拉丁文学方面，则有恩尼乌斯、卡图卢斯、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卡，因此就是整个希腊、拉丁文学史，学习无疑是一件辛苦的事。不过，并不是学习全文，而是采取教师挑选其中适当部分的方式，因此感觉上与其说是文学课，不如说是通过用文学作品做教材学习文章的结构。



古罗马时期学校的情境。站着的是迟到的学生（德国特里尔城出土的浮雕）



下课后，孩子们在公共浴场的院子里玩耍（摘自“Terme romane e vita quotidiana”）

上课一般按照下面的顺序进行：首先，教师朗读文章。其次，解释文章内容。再次，挑选重要的词语，寻找它的词源，学习它的含义。然后，查找其他人的作品，寻找是否有与之类似的词语。最后，是相互讨论感想或者批评的时间。这些内容水平相当高，准确把握词语的意思有助于培养向别人正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以擅长演讲而著称的尤里乌斯·恺撒说过，演讲的好坏取决于选择用词。

古罗马时期的中等教育应该也是学习一般教养的地方。17岁以后，少年们便走向各自的人生道路。因为军团兵的年龄条件下限也是17岁，而且17岁以后的年轻人接受的教育已经完全是专业教育了。

现代的研究人员将“rhetoris schola”翻译为“高中”。这是因为，它是17岁至20岁的年轻人学习的“学校”。从这里的教学内容来看，其目的是培养律师或者政治家。这里的教师称为“rhetor”，而现代这个词是指大学校长。在古罗马时期，这种学校的教师教的是雄辩术，也就是通过辩论传达思想的技巧。

使用的教材是西塞罗及其他这个领域著名人物的著作。而且，西塞

罗的许多著作都是将他自己在法庭上进行的辩论出版发行的书籍，因此最适合作为教材。如果想学习希腊式的雄辩术，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雄辩家吕西阿斯的法庭辩论集则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使用这些教材的教学方法是，教师首先将辩论本身进行分解：

一、揭示主题的序论；

二、列举事实和提出证据；

三、使用证据和事实展开对对方的反驳；

四、结论。

我没有学过法学，对于这些译词是否恰当没有把握，但是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起承转合”不仅仅是中国唐诗的结构章法，也是古今东西只要使用语言都可以适用的一个定理。用起句开头，用承句承接上文，用转句转折，用结句结束全文，所以，应该完全可以应用于法庭上的辩论和元老院会场上的演说。与用眼睛阅读的著作不同，用耳朵听的演说和辩论，如果结构不是十分明快，就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并不是只要采用起承转合的结构就足够了，不管怎样，必须让听众聆听你的话。除了内容以外，让听众聆听的技巧也非常重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声音会让人感觉比较好？另外，在什么地方、如何插入幽默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进行辩论是在哪里？听众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切都依赖于提高沟通技巧。这样，教材只依靠法庭辩论是不够的，还要涉及政治家、军官的演说。据说，尤里乌斯·恺撒的演说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局面，他的演说也是一个绝好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时期，几乎没有人终身只做过律师，而律师多半有过从政或担任武将的经历，因此雄辩术对于精英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

在现代，越是重要的人物，越是喜欢让人撰写演讲稿。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家中比较多见。在古罗马时期，没有演讲稿撰写人，而且他们也不会想要依靠这种专家。文如其人，文章会体现一个人的整体情况。正因如此，想要成为社会精英的年轻人必须掌握有效地表现自我所需的技能。

当时的罗马有的就是这些教育机构。这是因为，有许多行省出身的、野心勃勃的青年从法国南部、西班牙、迦太基到首都罗马留学。然而，虽然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却并没有更高的教育机构。这是古罗马的地图上没有标记大规模的学校的原因。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罗马建立霸权的时期，已经有雅典的学园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博学园这两个地中海世界的最高学府，罗马人在征服后也没有想过把它们搬到罗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它作为一项统治异族的政策也很妥当。另外，罗马人是一个重视实用性的民族，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满足培养精英的需要，让别的地方进行更高的教育就行了。

事实上，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和以万卷藏书著称的博学园都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研究机构，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研究生院。在这种最高学府学习过的罗马人有不少，包括曾经在雅典留学的西塞罗、诗人贺拉斯，但是没有一个人当过罗马的皇帝，这一点耐人寻味。至于奥古斯都，17岁便开始进入政治斗争的世界，因此连高中也没有读完。属于军团锻炼出来的韦斯帕芗大帝和图拉真大帝自不必说，连不是军团锻炼出来的哈德良大帝也没有上过大学。在古罗马时期，出人头地与学历毫无关系。然而，尽管社会不问学历，但是罗马帝国对于学园和博学园却给予国家资助。研究机构是国立的，这里的教师享受的年薪，相当于公务员的工资。

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私立学校，这是罗马帝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特色。恺撒制定的法律，目的在于赋予所有教师罗马公民权，也就是免除当时称为行省税的直接税。教师在享受这个

特殊待遇的同时，从事教育时必须收取适当的学费。没有国家指定的教科书、课程这样的东西，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完全由任课教师决定。如果教学效果不好，父母就会将孩子送到其他私塾，因此这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教师也必须不断努力。脱离这种竞争的是最高学府的教师。也许皇帝们虽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们懂得研究与竞争未必是一种好的关系。

但是后来，罗马帝国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国营。随着基督教统治的加强，教育制度也同时实行了国营化。

教师的资格也要通过考试来决定。考试的内容不是知识、教学方法，而是是否信仰基督教。教材也禁止使用教会认定之外的书籍。教会还严格监视教学方法。不过，教师开始领取固定工资，学生的学费也是免收的。当时，医疗体系国营化了，教育体系也国营化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时期，医疗和教育都是私营的，而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却变成了国营。那些认为社会应该用一种思想来统一的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想要实行的便是按照自己的思想重新组织教育和福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教会所做的就是这件事。半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灭亡了，留下来的是可以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东方的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的博学园不久也停办了。这是因为，怀疑是研究的根本。而当时人们成了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必须信仰基督教。

结语

在学习罗马史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基础设施乃是因为个人无法做到，因而由国家、地方政府代替个人进行的一项社会工程。按照罗马人的定义，基础设施是一种“人类文明生活必需的大事业”。我将之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两个方面。所谓硬件基础设施，由于体现为建筑物的形式，因而是眼睛能够看到的。所谓软件基础设施，是一种系统，因而是眼睛看不到的。下面具体列举一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硬件基础设施：包括作为交通设施的道路、桥梁、港口。神殿，还兼有进行集会和审判的作用，并且建有公共图书馆，可以称为市民生活中心的广场和巴西利卡（长方形会堂）。娱乐设施有希腊式的椭圆形竞技场、希腊式的半圆形剧场、罗马大斗兽场风格的圆形竞技场。在卫生方面，有上水道和下水道、公共浴场。

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安全保障、治安、税制、货币制度、邮递制度、扶穷济贫的系统、育英资金制度，还有医疗、教育。

在古罗马时期，不具备所有这些要素，就不能视为城市。事实上，看着研究人员绘制的罗马帝国内各个城市的复原地图，你就会想，它们就是一个个小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是其他城市的样板。

然而，在本书中，并没有谈到全部的基础设施。这是因为在前面的9卷中，我们已经涉及许多内容，而且我们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在每一卷中都必然谈到，在第11卷以后还将继续谈到。因为在罗马皇帝的三大义务——安全保障、内政、公共事业中，安全保障被排

在最前面，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罗马皇帝还是包括主要兵力和辅助兵力在内的30万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而且，罗马皇帝正式受到罗马公民和元老院这些有选举权的人委托，才能即位。在那个时期，人们认为，统治者的义务是保障被统治者的安全和食物。有了“职业”才会有“食物”的保障。而且无论是“食物”还是“职业”，只有“安全”得到保障，才能实现。因此，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最重要的，古今东西无一例外，都是安全保障。即使在现代，我们看一看居住在战乱地区的人颠沛流离的痛苦，便能理解这一点。

罗马人把这个最重要的义务交给了皇帝。我们译为“皇帝”的“imperator”这个词本来是士兵送给率领自己取得胜利的司令官的尊称。正因如此，在帝制以前的共和制时期，称为“imperator”的不止一人，那就是被获准在首都举行凯旋仪式的这些人。实行帝制以后，最高统治者同时兼任最高司令官成为惯例，因此在统治期间从未率兵打过仗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成为了“imperator”，即皇帝。

“皇帝”这个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在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写通史就不由得变为写军事史。每一次蛮族的侵犯都不是在帝国末期突然出现的。蛮族一直就有，而且一直想要侵犯罗马，但是在皇帝们有能力击退他们的时候，他们无法侵犯。

另外，在本书中未提及的不仅有安全保障。在硬件基础设施方面，没有涉及港口、神殿、巴西利卡、广场、半圆形剧场、圆形竞技场。这是因为在前面的9卷中，在谈到建造这些设施的权贵、皇帝的部分，已经讲过了。例如，关于广场，在讲恺撒的《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关于圆形竞技场，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都已经讲过，因此不再赘述。

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本书没有提到治安、税制、货币制度。关于这些内容，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详述，这卷的主人公奥古斯都无愧于古罗马第一代皇帝的名声，他奠定了罗马帝国

的全部基础。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得以把内容集中在人们耳熟能详的罗马大道，还有桥梁、上下水道上。这些也正是罗马人修建的基础设施的代表。

在今天，发达国家无论是道路还是铁路的设施都非常完善，所以他们在生活中往往会忘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其他国家，还不能期待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反而会让这些国家的人们想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水也是如此，至今全世界还有许多人处于缺水的状态。

这是因为经济上还比较贫穷，还是因为缺乏对建设基础设施的充分认识？是领导人缺乏实行上述想法的强烈的政治意图，还是持久的和平得不到保障？

2001年秋写于罗马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也将翻译的著作列入）

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前14年）

RES Gestae

《圣君奥古斯都功绩录》，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　《罗马十二帝王传》（上）（苏维托尼乌斯）收：1986年

阿庇安（Appianus，2世纪）

Historia Romana

阿森纳乌斯（Athenaeus，公元前2世纪）

Deipnosophistai

《餐桌上的贤人们》（1—5），柳沼重刚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7—2004年《餐桌上的贤人们》，柳沼重刚编译，岩波文库，1992年

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公元330—395年）

《编年史》（Historia）

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公元前1世纪）

De Architectura

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

De Agricultura

盖伦（Claudius Galenus，公元129—216年）

Gli Antidoti

《关于自然的功能》，种山恭子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8年

塞尔苏斯（Celsus，Aulus Cornelius，1世纪）

De Medicina

施威道纽（Gaius Svetonius Tranquillus，约公元69—122年以后）

De vita Caesarum

《罗马皇帝传》（上·下），国原吉之助译，岩波文库，1986年

斯特拉波 （Strabon，约公元前64—约前23年）

Geographia

斯帕提阿努斯 （Aelius Spartianus）等6人

Historia Augusta（4世纪末）

《罗马皇帝群像》，南川高志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起刊载

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约公元150—235年）

Historiae Romanae

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公元230—313年）

Edictum de Maximis Pritiis

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

《历史丛书馆》（Bibliotheca Historica）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年）

De Lapidibus

特土良（Quintus Septimus Florens Tertullianus，公元155或160—222年以后）

De Spectaculis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

Corpus Hippocraticum

《关于古代的医术》等8篇，小川政恭译，岩波文库，1963年

伐温提努斯（Faventinus，公元2或3世纪）

De Diversis Fablicis Architectonicae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

Naturalis Historia

《普林尼博物志》，大槻真一郎编，八坂书房，1994年

小普林尼（ 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公元61、62—约113年）

Panegyricus an Traianum

《普林尼书信集》，国原吉之助译，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

普罗科庇乌斯（Procopius，490年至507年之间—565年）

Historia Bellica

弗朗提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公元35—103年）

Da Aquae Ductu Urbis Romae

海伦（Heron of Alexandria，公元1世纪）

Mechanica

波利比奥斯（Polybius，公元前200—前118年）

Historiae

《历史》，城江良和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起刊载

二、后世撰写的历史书、研究专著

ADAM, J.-P., *La construction romaine. Materiaux et techniques*, Paris, 1984.

ALBENGA, G., *I ponti*, Torino, 1958.

ASHBY, Th., *The Classical Topography of the Roman Campagna*, British School at Rome I, II, III, IV, London, 1902-07;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35; *The Roman Campagna in Classical Times*, London, 1970; *Un archeologo fotografa la campagna romana tra '800 e '900*, British School at Rome, London, 1986.

ASHBY-FELL, *The Via Flaminia*, London, 1921.

ASHBY-GARDNER, *The Via Traiana*, London, 1916.

ASHBY-PLATNER,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929.

AURIGEMMA, S., *Villa Adriana*, Roma, 1961.

BAGGI, V., *Costruzioni stradali ed idrauliche*, Torino, 1926.

BALDSON, J., *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69.

BALL, J., *Egypt in the Classical Geographers*, Cairo, 1942.

BEHR, C.A., *Aelius 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 Amsterdam, 1968.

BERNARDI, M., *L'igiene nella vita pubblica e nella vita privata di Roma*, Udine, 1941.

BIANCHI BANDINELLI, R., *L'arte romana nel centro del potere*, Milano, 1969.

BIRLEY, E., *Hadrian's Wall*, London, 1981.

BLAKE, M.E., *Ancient Roman Construction in Italy, I: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o Angustus*, Washington, 1947; *II: From Tiberius through the Flavians*, Washington, 1959; *III: From Nerva through the Antonines*, Philadelphia, 1973.

BLOCH, H., *I bolli laterizi e la storia edilizia romana*, Roma, 1947.

BODEI GIGLIONI, G., *Lavori pubblici e occupazione nell'antichità classica*, Bologna, 1974.

BONACASA, N. 编, *Cirene*, Milano, 2000.

BORGHINI, G. 编, *Marmi antichi*, Roma, 1998.

BOWMAN, A.K., *Life and letters on the Roman frontier*, London, 1994.

CAPPELLI, R. 编, *Viae publicae romanae*, Roma, 1991.

CARCOPINO, J., *La vita quotidiana a Roma all'apogeo dell'impero*, Bari, 1978.

CARDINI, M., *L'igiene pubblica di Roma antica*, Prato, 1909; *Condutture delle acque nell'antica Roma*, Firenze, 1916.

CASSON, L., *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4.

CASTAGNOLI, F., *Topografia e urbanistica di Roma antica*, Bologna, 1969.

CAVALIERI, G. 以下2人, *Piemonte, Valle d'Aosta, Liguria, Lombardia*, Roma-Bari, 1982.

CAVALLO, D., *Via Cassia*, Roma, 1992.

CHARLESWORTH, M.P.,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26.

CHEVALLIER, R., *Les voies romaines*, Paris, 1972.

COARELLI, F., *Dintorni di Roma*, Roma, 1981; *Roma*, Roma-Bari, 1989.

COLONNA, G. 以下5人, *La Via Aurelia*, Roma, 1968.

COZZO, G., *Ingegneria Romana*, Roma, 1970.

CROOK, J., *Law and Life of Rome*, London, 1967.

D'ARMS, J.H., *Romans on the Bay of Naples: A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y of the Villas and their Owners from 150 B.C. to 400 A.D.*, Cambridge, Mass., 1970.

DE ANGELIS D'OSSAT, G., *Civiltà romana: tecnica costruttiva e impianti delle terme*, Roma, 1943.

DE CAMP, L., *Ancient Engineers*, New York, 1963.

DE MARIA, S., *Gli archi onorari di Roma, e dell' Italia romana*, Roma, 1988.

DE RUGGIERO, E., *Lo stato e le opere pubbliche in Roma antica*, Torino, 1925.

DOLCI, E., *Carrara, cave antiche*, Carrara, 1980.

DONINI, A., *Ponti su monete e medaglie*, Roma, 1959.

D'ONOFRIO, C., *Le acque di Roma*, Roma, 1977.

DUNCAN-JONES, R.,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74.

DUVAL, P.M., *La vie quotidienne en Gaule pendant la paix romaine*, Paris, 1952.

FERNANDEZ CASADO, C., *Historia del puente en España puentes romanos*,

Madrid, 1955.

FERRI, S. 编, *Vitruvio. De architectura*, Roma, 1960.

FOCILLON, H., *Gian Battista Piranesi*, Bologna, 1967.

FORBES, R.J.,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Leiden, 1965; *Notes on History of Ancient Road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Amsterdam, 1934.

FUSTIER, P., *La route*, Paris, 1968.

GALLIAZZO, V., *I ponti di Padova romana*, Padova, 1971; *I ponti romani*, Treviso, 1995.

GATTI, G., *Topografia ed Edilizia di Roma antica*, Roma, 1989.

GAZZOLA, P., *I ponti romani*, Firenze, 1963.

GIACOBELLI, M., *Via Clodia*, Roma, 1991.

GIACOMINI, P., *La rete idrica nelle città antiche*, Bologna, 1985.

GIOVANNONI, G., *La tecnica della costruzione presso i Romani*, Roma, 1969.

GIULIANI, C.F., *L'edilizia nell'antichità*, Roma, 1995.

GNOLI, R., *Marmora romana*, Roma, 1971.

GRANT, M. & POTTINGER, D., *Romans*, Edinburgh, 1960.

GREGORY, J.W., *The Story of the Road*, London, 1938.

GRIMALE, P.,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Paris, 1968; *Les jardins romains*, Paris, 1984.

GROS, P. & TORELLI, M., *Storia dell'urbanistica, il mondo romano*, Roma-Bari, 1998.

HAGEN, J., *Die Römerstrassen der Rheinprovinz*, Bonn-Leipzig, 1923.

HARRISON, D., *Along Hadrian's Wall*, London, 1962.

HEINZ, W., *Römische Thermen. Badewesen und Badeluxus in Römischen Reich*, München, 1983.

HIDE, W., *Roman Alpine Routes*, Philadelphia, 1935.

HODGES, H., *Technolog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0.

HOMO, L., *Roma imperiale e l'urbanesimo nell'antichità*, Milano, 1976.

JENISON, M., *Roads*, London, 1949.

KAHANE, A. 以下2人, *The Ager Veientanus, North and East of Rom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London, 1968.

KLEBERG, T., *Hotels, restaurants et cabarets dans l'antiquité romaine*, Uppsala, 1957.

KRETZSCHMER, F., *La technique romaine*, Bruxelles, 1966.

LANCIANI, R., *La distruzione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71; *Forma Urbis Romae*, Roma, 1989.

LANDELS, J.G., *Engineer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8.

LEVI, A., *Itineraria picta,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lla Tabula Peutingeriana*, Roma, 1967.

LEZINE, A., *Architecture romaine d'Afrique, recherches et mises au point*, Tunis, 1963.

LUGLI, G., *Le grandi opere pubbliche*, Roma, 1934; *La tecnica edilizia romana*, Roma, 1957; *Itinerario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70.

MACDONALD, W.,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86.

MARGARY, I., *Roman Roads in Britain*, London, 1957.

MARROU, L., *Histoire de l'e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55.

MARTINEZ, A., *El puente romano de Mérida*, Badajoz, 1983.

MARTINORI, E., *Via Flaminia*, Roma, 1929; *Via Salaria*, Roma, 1931.

MESQUI, J., *Le pont en France avant le temps des ingénieurs*, Paris, 1986.

MILLER, J.I.,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 to 641 A.D.*, Oxford, 1969.

MILLER, K., *Itineraria romana*, Stuttgart, 1916; *Die Peutingersche Tafel*, Stuttgart, 1962.

MOMMSEN, Th., *Der Maximaltarif des Diokletian*, Berlin, 1883.

MOONEY, W.W., *Travel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Boston, 1920.

PANIMOLLE, G., *Gli acquedotti di Roma antica*, Roma, 1968.

PAOLI, U.E., *Vita romana*, Firenze, 1973.

PASQUINUCCI, M. 编, *Terme romane e vita quotidiana*, Modena, 1987.

PAVOLINI, C., *Ostia*, Roma-Bari, 1983; *La vita quotidiana ad Ostia*, Roma-Bari, 1986.

PELLATI, F., *L'ingegneria idraulica ai tempi dell'impero romano*, Roma, 1940.

PELLEGRINO, A., *Itinerari Ostiensi*, Roma, 1984.

PIRANESI, G.B., *Antichità romane, ponti, teatri portici e altri monumenti di Roma*,

Roma, 1756.

QUILICI, L., *La Via Prenestina*, Roma, 1977; *La Via Latina*, Roma, 1978; *Dintorni di Roma*, Roma, 1981; *Via Appia da Porta Capena ai Colli Albani*, Roma, 1989; *Le strade Viabilita tra Roma-Lazio*, Roma, 1990.

RADKE, G., *Viae publicae romanae*, Bologna, 1981.

RIVOIRA, G.T., *Architettura romana, Costruzione e statica nell'età imperiale*, Milano, 1921.

RODDAZ, J.M., *Marcus Agrippa*, Roma, 1984.

ROMANELLI, P., *Topografia e archeologia dell'Africa romana*, Torino, 1970.

ROSE, A.C., *Via Appia in the Days When All Roads Let to Rome*, Washington, 1935.

SALAMA, P., *Les voies Romaines de l'Afrique du Nord*, Alger, 1951.

SCHMIEDT, G., *Contributo della foto-interpretazione alla ricostruzione della situazione geografico-topografica dei porti antichi in Italia*, Firenze, 1964.

SINGER, C.,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1956.

SQUASSI, F., *L'arte idrosanitaria degli antichi*, Tolentino, 1954.

STAHL, W., *La scienza dei Romani*, Bari, 1974.

STARR, C.,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Cambridge, 1960.

STERPOS, D., *Comunicazioni stradali attraverso i tempi, Roma-Firenze*, Novora, 1964; *Comunicazioni stradali attraverso i tempi, Roma-Capua*, Roma, 1966; *La strada romana in Italia*, Roma, 1969.

TARACENA, B. 编, *Carta Arqueologica de España*, Madrid, 1941.

THOMSON, J.,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Cambridge, 1948.

TOMASSETTI, G., *La Campagna Romana antica, medioevale e moderna, vol. I: La Campagna Romana in genere; vol. II: Via Appia, Via Ardeatina e Via Aurelia; vol. III: Via Cassia, Via Clodia, Via Flaminia, Via Tiberina, Via Labicana, Via Prenestina; vol. IV: Via Latina; vol. V: Via Laurentina, Via Ostiense; vol. VI: Via Nomentana, Via Salaria, Via Portuense, Via Tiburtina*, Firenze, 1979-80.

TORELLI, M., *Innovazione nelle tecniche edilizie romane tra il I sec. a.C. e il I sec. d.C.*, Como, 1980.

TRANOY, A., *La Galice romaine*, Paris, 1981.

TUFI, S.R., *Archeolog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Roma, 2000.

VAN DEMAN, E.B., *The Building of the Roman Aqueducts*, Washington, 1934.

VENDITTI, E., *La Via Portuense*, Roma, 1992.

VILLA, C., *Le strade consolari di Roma*, Roma, 1995.

VON HAGEN, V.W., *The Roads that Led to Roma*, London, 1967; 同书伊訳, Roma, 1978.

WARD-PERKINS, J.B., *The Ancient Road*, London, 1957.

WHEELER, M.,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WHITE, K.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London, 1984.

WISEMAN, F.J., *Roman Spain*, London, 1956.

著者多数: *Tabula Imperii Romani, Tergeste*, Roma, 1961; *Tabula Imperii Romani, Mediolanum-Aventicum-Brigantium*, Roma, 1966; *Tabula Imperii Romani, Aquincum-Sarmizegetusa-Sirmium*, Amsterdam, 1968; *Tabula Imperii Romani, Romula-Durostrum-Tomis*, Bucarest, 1969; *Tabula Imperii Romani, Lutetia-Atautuca-Ulpia-Noviomagus*, Paris, 1975; *Tabula Imperii Romani, Dyrrbachion-Scupi-Serdica-Thessalonike*, Ljubljana, 1976.

展覧会カタログ: *Il Trionfo dell'Acqua, Acque e Acquedotti a Roma, IV sec. a.C.-XX sec.* (全2巻), Roma, 1986; *Viae Publicae Romanae*, Roma, 1991.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I

结局的开始

[日] 盐野七生◎著　陈　涤◎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贤君奥勒留
高尚的品德和绝佳的能力无法力挽狂澜
罗马因蛮族侵扰而陷入长期战事

军人掌握强大的力量
同胞相残噩梦重演
帝国内外面临更严酷的考验
罗马的结局似乎已在道路的尽头

11

王　石　王　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日）盐野七生著；陈涤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86–3803–4
I. ① 罗… II. ① 盐… ② 陈… III. ① 古罗马－历史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126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I: Owari No Hajimar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2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陈涤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1

——结局的开始

[日] 盐野七生 著
陈涤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银币故事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第一章 皇帝马可· 奥勒留
第二章 皇帝康茂德
第三章 内乱时代
第四章 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曾说过，货币也是国力的反映，所以也是了解历史最好的指针。

但是，国力有能用眼睛看到的，也有用眼睛看不到的。落实到货币上，前者为金银含量等材料本身的价值，后者指的就是铸造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者明确反映国力，而技术上的衰落则需一段时期之后才会得以显现。也就是说，当我们注意到铸造技术方面的衰退的时候，其国力可能已经枯竭了。

从本卷书开始，罗马走上了逐步衰落的道路。货币也是如此，乍一看没什么，但再次细细端详，发现上面预示了帝国的衰亡。

盐野七生

2007年7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一个出色的人本应该取得出色的成绩，然而事实却总是不顺利。正因为如此，阅读历史的时候，愉快的同时又生出很多感慨。

真要追究个中缘由只怕很不容易。是生不逢时？还是适应时代的能力欠佳？我不想对他们品头论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逃避似的一路写下来。

然而到了众多历史学家所诟病的罗马衰退期，虽年代都已久远，我却还是无法释然。我不能继续“逃避似的”书写了。

如果用佛教词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谛观”。这个词除了表示“醒悟”，还有“事无巨细明察秋毫”的意思。

盐野七生

2007年7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马可· 奥勒留皇帝出生在气候温暖的罗马，却在维也纳死于多瑙河北岸吹来的凛冽寒风里。而两代后的皇帝塞维鲁出生在北非的大莱普提斯，本可以在地中海接受阳光慷慨的照耀，可最后却是在阴雨连绵的约克闭上了双眼。

罗马帝国的皇帝最重要的职责是保障帝国的安全，即率领士兵同敌人战斗。领导者的克己奉公对他们个人却是一种摧残。罗马时代精英们的词典中，似乎没有适应“障碍”这个词。

在欧洲采风过后经由罗马前往北非，携带的衣物必须全部替换，所以深有感慨：罗马帝国真是太广阔了。

盐野七生

2007年7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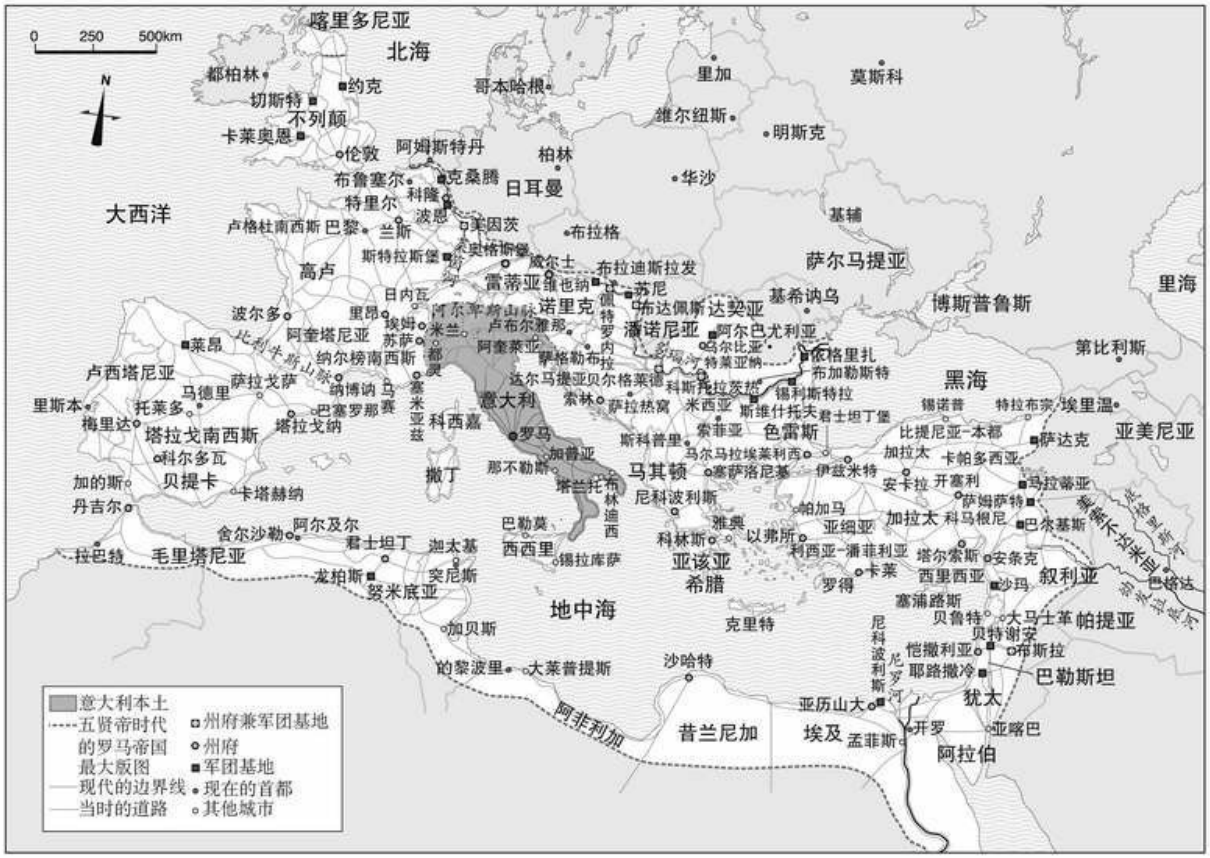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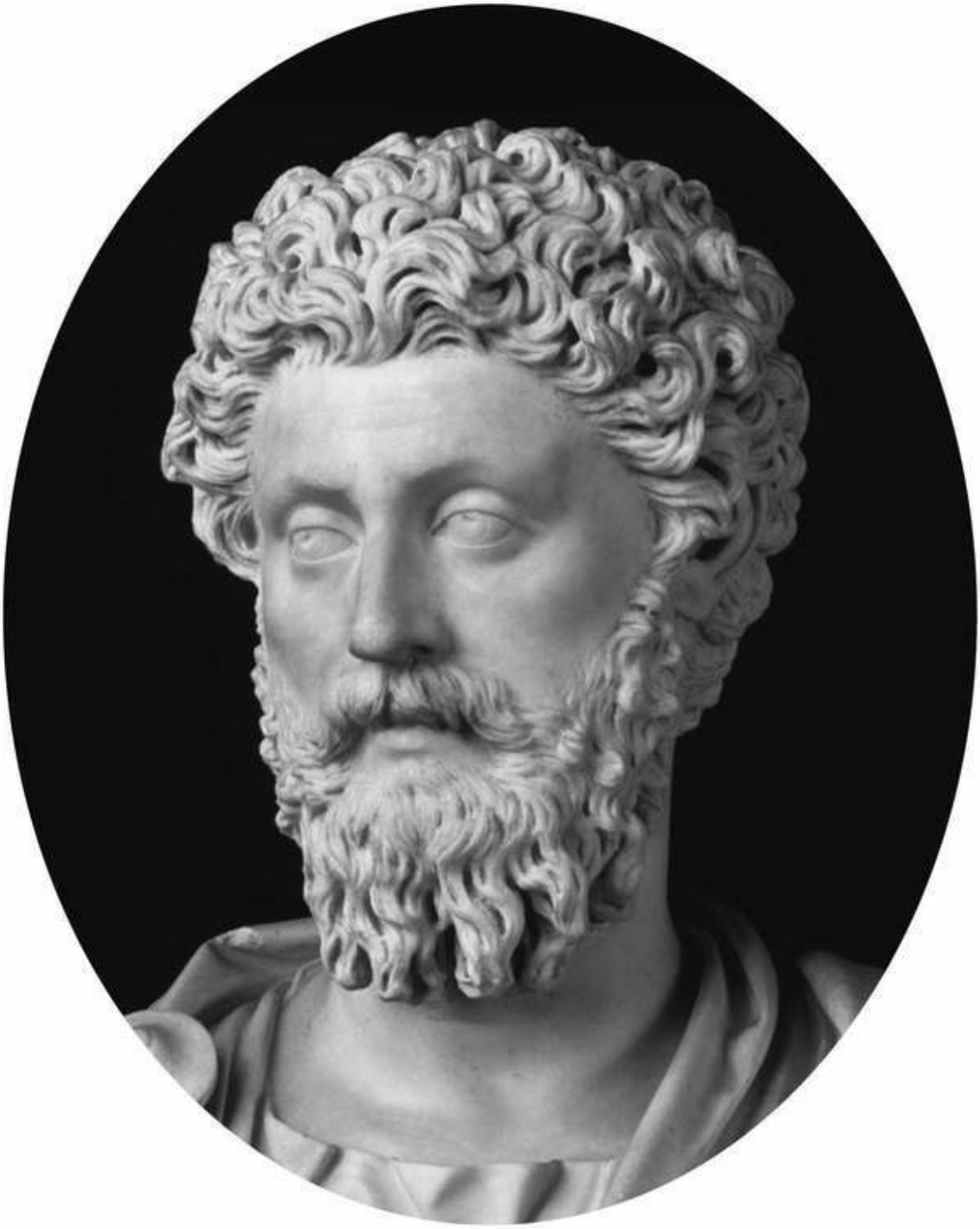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

第一章

皇帝马可·奥勒留

（公元161—180年在位）



序言

没有哪一位罗马皇帝能拥有马可· 奥勒留那样良好的口碑。此人位列五贤帝的最后，也因人称“哲学家皇帝”而赫赫有名。他不仅在当时深受人们的爱戴，直到今天，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其他罗马皇帝也没能像他一样一直享有如此崇高的声望。

如果论统治者的力量，那么罗马史上超越马可· 奥勒留的领袖也有几位，例如帝政事实上的创始人尤里乌斯· 恺撒，以及其后建立起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出身于行省却对故乡西班牙一视同仁的帝国统治者图拉真，不惜折损自身寿命巡视整个帝国辽阔疆域并重建防卫体系的哈德良。即使我们不看共和时代，只说鼎盛期的帝政时代，也能立刻列举出这些名字。然而，纵然是他们，在紧抓后世人心的两个有效手段——留下“声音”以及“形象”方面均不及马可· 奥勒留，因为哲学家皇帝在这些方面无疑更占优势。

马可· 奥勒留遗有一册后世人称为《沉思录》的书，正因这部著作他才获得“哲学家皇帝”的称谓。而从《沉思录》的书名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学术性的哲学著述。他身为罗马皇帝，要务之一就是出击蛮族，该书只是战斗间隙记录所思所想的小册子而已。马可· 奥勒留自少年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书里基本都是他的自省与思考。而现代的西欧学者则从不吝惜“古人伦理的极致表达”、“高贵灵魂的真情呐喊”等溢美之词。

柏拉图曾说，国家让喜爱哲学的人来负责政治是最为理想的。我们暂且不论柏拉图的这种论断是否恰当，对于启蒙主义运动过后的近现代学者而言，马可· 奥勒留正好是历史上实现了柏拉图理想的唯一案例。

不要无止无休地讨论人们究竟能否公正和善良，我们只需追求

公正善良的行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相关内容见《沉思录》卷十。——译者注）

这就是罗马大帝国最高权力者的“声音”。

而紧随声音的就是“形象”。马可· 奥勒留的骑马像至今仍旧屹立在罗马七丘之一的卡匹托尔山上。

即使有人不知道柏拉图，也可能没有读过《沉思录》，但只要一看这座骑马像，立刻就能感觉到它是至高无上的杰作。从古代到今天，两千年来人们制作的骑马像不可胜数，可就算有几万座，我相信马可· 奥勒留骑马像的地位也绝不会动摇。因为不管怎样，它使米开朗琪罗产生了利用的念头。

当初，这座骑马像并不在卡匹托尔山，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它一直位于罗马市中心南端的拉特兰教堂广场上。这座骑马像之所以能在4世纪末席卷罗马的基督教徒破坏与希腊、罗马相关作品的风暴中得以保留，却并不是因为狂热之徒中有人读过《沉思录》，也不是因为有人发现了骑马像的艺术价值，觉得销毁太可惜，因此对其伸出援手，只不过是当时人们单纯地误以为它是第一位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马可· 奥勒留蓄有浓密的大胡子，不知人们为什么会将他和总是刮净胡须的君士坦丁搞错，而正是因为这个误会，马可· 奥勒留骑马像才最终在当时22座罗马皇帝骑马像中仅存下来。据记载，其他21座骑马像，包括尤里乌斯· 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等皇帝的骑马像，因为和马可· 奥勒留骑马像一样均为青铜所制，结果都被熔化，然后转为他用，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后又过了一千多年，罗马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一光辉时代，即使不被误认为君士坦丁，即人们发现了这是马可· 奥勒留的骑马像，也不会将它投进熔化炉。还有遭受唾弃的异教徒

圣地卡匹托尔山，在长期闲置之后也出现了变化，开始人来人往地热闹起来。而负责这一带规划的，正是米开朗琪罗。这位文艺复兴晚期的代表性艺术家决定利用傲然屹立的马可· 奥勒留骑马像，作为重建卡匹托尔山的重要元素。就这样，哲学家皇帝不但在漫长的中世纪得以存留，现在又幸运地享受荣光，能在古时凯旋将军向诸神祈祷还愿的卡匹托尔山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完全是因为骑马像制作工艺精湛。试想，如果它在艺术价值上存在什么瑕疵的话，造诣极深的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绝不会将它安放在自己设计的广场中央。

不过，这场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不但使马可· 奥勒留得以重现，而且同样使其他皇帝在经过长眠之后再次苏醒。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以“复兴古代”为口号的，所以它也是大规模挖掘古代遗迹的时代。可是从地下走出展现身姿的皇帝们，大多只有上半身的胸像，纵然偶有全身像出土，也都是身披铠甲或者托加的立姿像。骑马的皇帝像，马可· 奥勒留依旧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这尊骑马像的风格非常不一般。骑在马上的马可· 奥勒留既没有身着最高司令官的甲衣，也没有披上皇帝那种华丽的袍衫，而是摘下头盔、脱掉胸甲，在短衣之外只罩了一袭轻薄的斗篷，似乎正在接受战士和市民们的欢呼。他既不是耀武扬威，也没有居高临下，是一位极其真实自然的皇帝。显然，这是极其高超的艺术家通过人物沉静的状态展现了他刚毅的性格，这是人和马的完美结合。后代考察罗马的历史学家吉本、蒙森、汤因比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马可· 奥勒留铜像，而作家歌德和司汤达所看到的，也同样是它。凡到过罗马的人，大家所共同瞻仰的，就是这尊马可· 奥勒留骑马像。因为只有这尊铜像既不像尤里乌斯· 恺撒像那样被安放在罗马市政厅，也不像奥古斯都像那样在美术馆里展览，而是矗立于卡匹托尔山上，在苍穹之下，沐浴着阳光。

不过，近来人们担心铜像遭到汽车尾气污染，不得不改在室内展出，所以马可· 奥勒留铜像最终也被搬进了卡匹托尔美术馆。500多年前

米开朗琪罗所确定的位置上，现在只剩下一个粗糙的复制品了。

1990年人们曾修复过这尊骑马像，修复完毕后将它从台伯河岸运回卡匹托尔山。虽然用大型货车装载，道路也并不遥远，可毕竟物品弥足珍贵。大型货车在晨曦之中，移动之缓慢真的如同马匹慢步。当时我正在路边眺望装运的情景，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美国男人的声音：

“太伟大了！我竟然在罗马遇见了罗马皇帝！”

马可• 奥勒留骑马铜像

身着铠甲的总司令官尤里乌斯· 恺撒

身着托加（大祭司服装）的奥古斯都

如果当时运送的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立像，那么游人未必会发出如此的感叹。要瞻仰罗马皇帝的话就必须面对他骑马的形象。对源于罗马文明的欧美人而言，这想必是他们最率真的感想。相比于其他罗马皇帝，马可· 奥勒留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好运气，连人们这种天真的愿望都能予以满足，真可谓独一无二。

成长时代

有一段时间，意大利的一家电视台曾播放过索尼的商业广告。画面先是逐个介绍这家企业的产品，最后画面渐暗，推出白色的大字，“It’s a Sony”（这就是索尼）。

我想如果拍摄罗马帝国的宣传广告，也可以用同样的构思。剧本就引用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我们在《罗马人的故事9 · 贤君的世纪》里已经探讨过这位年轻希腊学者的演说，现在还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如果这个广告是发表在报纸的一个版面上，那么完全可以用上部的三分之二刊登艾利斯泰迪斯《罗马颂词》中的语句，然后用下面的三分之一横向排列出大字，“It’s a Romeempire”（这就是罗马帝国）。

如果这个广告用电视来呈现，可以用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做背景音，同时推出相应的画面。当表述人们自由安全便捷的旅行时，最好采用阿皮亚大道上服装、肤色各异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影像。然后，在这个罗马帝国广告的最后，画面渐暗，仍旧是推出白色的大字，“It’s a Rome empire”。

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如下：

> 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

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

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

在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

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希腊语为Hermēs，拉丁语为Mercurius），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罗马世界终于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民主统治。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曾经的希腊城邦国家扩大了规模后的国家。领导者阶层集中了公民中有才华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体人民的这些人才来自帝国各地。

他们有的生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由于他们杰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军事构成的完美组织机构——由于这些代表帝国的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罗马实现了对辽阔帝国的统治。

战争远在边境，帝国的内部毫无纷争，每个角落都浸染着和平繁荣与幸福。而帝国之外执迷于纷争的各民族就显得太可悲了。

罗马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着。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相容并存的罗马世界，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安心工作。在这里，国家的节庆日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仪式，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也分别举行各自的祭典，这有助于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罗马人告诉我们，纵然人种和民族各不相同，纵然各种文化和宗教难以并存，可是通过完善的法律也能以法制为中心实现共存共荣。为了显示这种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利益，罗马人甚至保证了曾经的败者仍能享有很多权利。

罗马是个大家庭，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罗马世界就是这样的大家庭。

早在小亚细亚出身的艾利斯泰迪斯发表《罗马颂词》之前，整个帝国就已经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用历史学家吉本的话来讲，那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都是元老院议员，公元143年，艾利斯泰迪斯在元老院进行了这篇《罗马颂词》的演讲。这一年也是安敦尼·庇护继哈德良之后在位的第五年。

而当时26岁的艾利斯泰迪斯在演讲的最后，并没有面对着57岁的安敦尼· 庇护，而是面向自己的同龄人，已经取得恺撒称号、被确立为下任皇帝的22岁的马可·奥勒留，用下面的话作为结尾：

年轻人啊，你在高贵的宫殿中占有最高贵的地位，你的肩膀担负着沿先人足迹前进的责任！

身世

虽然从罗马七丘之一的西里欧山能登上自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又叫

斗兽场）南面延展开来的丘陵，但观光客却相当稀少。两千多年后，仍旧留存在这里的古罗马公共建筑，只有供奉被神化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宏伟的神殿，以及自东向西横跨丘陵南部的克劳狄亚高架水道桥。显然，连纪念柱都被移走只剩巨大墙面的神殿和断断续续的高架水道桥很难成为观光景点。如果不是对罗马历史非常感兴趣，肯定不会到这里驻足。所以这里虽距离观光客云集的斗兽场和罗马广场很近，却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宁静。

然而，却有一个完美的原因促使我们巡访西里欧山，那就是观赏水道桥遗址。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0 ·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曾经写道，通往现代东京市中心的是首都高速路，而通往古罗马市中心的则是高架水道桥。只要是熟悉首都高速路的人就很难想象道路附近鳞次栉比的会是高级住宅，然而在罗马时代，高架水道桥附近却属于上好地段。桥上跑的是汽车还是水流当然有所不同，不过更大差异恐怕还在于承载它们的是钢筋水泥立柱还是砖石圆拱，我认为二者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传说罗马的第二代国王努马经常到西里欧山一带和女神（Nymph）相会，可见这里自古就充盈着清澈的泉水和茂盛的植被。据发掘调查，这里曾有着很多深宅大院和数个聚居区，也接近市中心，可人口却相对较少，在罗马时代应该是高档居住区。马可· 奥勒留就出生于西里欧山，时间为公元121年的4月26日，时值哈德良统治的第4年。

马可母亲的娘家拥有丰厚的资产，并且母亲多米提亚· 露西拉是家族里的唯一财产继承人。据说其家庭资产包括两家制砖场。罗马时代的建筑框架，都是用砖石堆砌，中间采用灰泥黏合。看来，哲学家皇帝母亲的娘家在从事罗马时代的基础产业。

马可· 奥勒留的父亲出身于维鲁斯家族，追寻其先祖，可以得知他们来自罗马的行省西班牙。大约在马可· 奥勒留出生前的100年，他们迁徙到了罗马，是当时罗马人所谓的“外来户”之一。可是后来，他们顺利地融入了罗马社会，不但曾祖父成功进入元老院，而且被韦斯帕芗皇帝

升为贵族。话虽如此，维鲁斯家族的兴起却并不是特例，而只是当时罗马社会阶级间平常的流动变化而已。

到了祖父这一代就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祖父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深得皇帝哈德良的信赖。每当皇帝外出视察，阿尼乌斯· 维鲁斯经常接受委托，代替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在马可· 奥勒留出生的公元121年，祖父正好第二次就任执政官。五年之后祖父第三次当选。该职位不但是个荣誉，而且也掌握着权力。三次就任执政官的，除去皇帝哈德良之外，只有奥勒留祖父一人。

国家在共和时代的最高官职就是执政官，转变为帝制之后，皇帝成为最高权力者，而执政官虽然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任期也依然只有一年，实际上执政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不过，即使皇帝身在首都，元老院的会议议长却仍由执政官担任，在内阁之中，全权处理事务的也是执政官。也许帝政时代的执政官和现在的日本官房长官很相似，不，这个官职应该比官房长官的责任更重大。因为哈德良皇帝有三分之二的当政时间并不在首都。

不过哈德良也的确以知人善用而著称。因为有哈德良的推荐，阿尼乌斯· 维鲁斯曾三次担任执政官，其余的时间里也依然是内阁成员。毫无疑问，他是皇帝的重臣之一。这样看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资产，马可· 奥勒留生来就属于当时罗马社会的最上层。两年之后，他的妹妹降生了。当马可·奥勒留3岁时，父亲亡故。因为缺乏详细的记录，估计不是战死就是病故。幼年丧父的孩子一般由祖父收为养子，这种情况在罗马社会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祖父成了马可· 奥勒留的坚强后盾。

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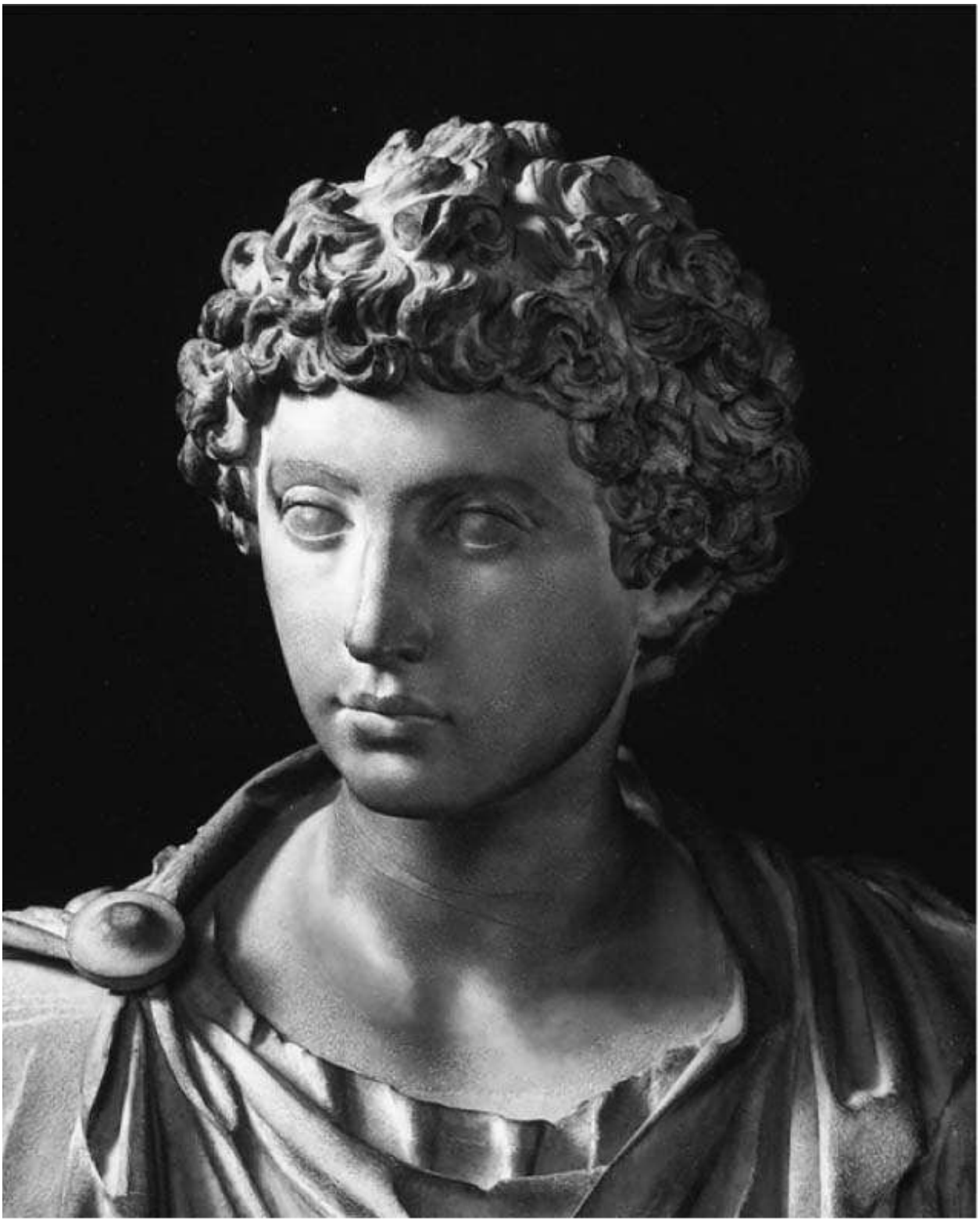
在罗马人的家庭里，婴儿一出生，父亲就用双手高举着，展示给亲友和仆人看。婴儿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祛除邪秽的仪式，此时给婴儿起名。我想之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九天才冠名，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的缘故。当一个人成为他人的养子，或是地位有所上升，往往会用家传的名字作为伴随自己一生的个人名，因为此人这时的社会生存率无疑比较高。后来的哲学家皇帝所起的名字，和他的父亲及祖父一样，都叫马可。罗马人的姓名由个人名、家传名、家族名三部分构成，在做皇帝之前，马可· 奥勒留所用的名字是马可· 阿尼厄斯· 维鲁斯。

罗马人的家庭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起名的同时赠给婴儿两种东西：一种是在又细又轻的金环上挂些东西，一摇就发出声音，有点类似于拨浪鼓；另一种是黄金质地的护身符，用一根细绳挂在脖子上，直到成人礼举行之前，这个护身符都不能摘下。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留有以下文字，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上流家庭养育孩子的状况。

> 在从前的罗马，一个经过正式结婚生出的小孩不可能放在女奴的小屋里，而是要生长在母亲的怀抱中。亲手养育子女不但关系到母亲的颜面，而且展示母亲的爱心，是非常风光的事情。流传至今的很多资料显示，格拉古兄弟（指提比里乌斯· 格拉古和盖约· 格拉古。——译者注）的母亲科尔涅利娅和尤里乌斯· 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养育孩子。她们毫不吝惜地倾注母爱，对孩子的文化修养和身体健康等方面无微不至，最终培养出了罗马的领袖。
>
> 可是如今，母亲的任务在婴儿落地时就宣告结束，为婴儿哺乳的是奶妈，断奶之后就利用学习希腊语的托辞，将婴儿交给来自希腊的女奴。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养育幼儿的通常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由好几个人共同负责。这些女人除了会说希腊语之外别无所

长，大多难以胜任其他重要工作。也就是说，孩子处在低贱的毫无教养的女奴们的包围之下，听着她们无休无止地闲谈，看着她们绞尽脑汁地偷懒耍滑头，结果整个家庭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小主人的内心感受和言谈举止，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养育子女正需要在这些细节上体察入微。



少年时代的马可· 奥勒留

多米提亚· 露西拉

塔西佗这个人生活在帝国的鼎盛期，可不管对什么事情都持悲观态度。所以我们在接受这位一流的帝政专家的言论时，还是打些折扣才好。不过，对公元2世纪培养孩子的现状大发感慨的，却并不只有塔西佗一人。在恺撒时代200年以后，统治阶层教育子女的方式恐怕也是当时诸多变化之一。马可· 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也谈到了自己是由奶妈哺乳的。

不过，他的母亲多米提亚· 露西拉却完全不是那种执迷于社交生活而把孩子甩给女奴的贵妇。马可· 奥勒留3岁时，父亲就故去了，而当时女子一般在15岁时就结婚，所以马可· 奥勒留的母亲成为寡妇时很可能还不到20岁。富有，年轻，又有生育的经验，这些都是罗马社会里再婚的绝好条件。尽管如此，多米提亚却没有再婚。她的儿子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年轻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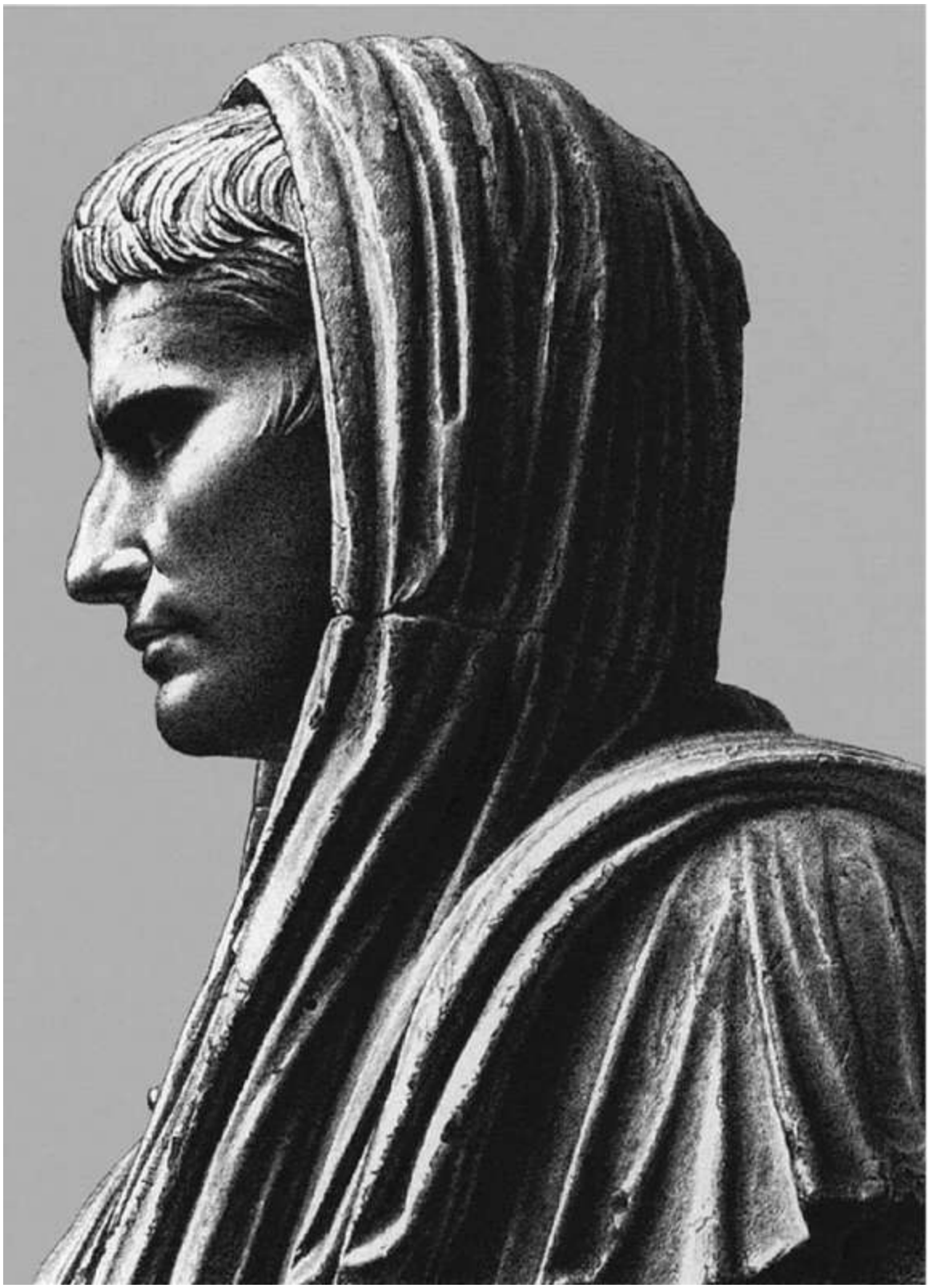
> 从我的母亲那里，我濡染了虔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行，甚而戒除恶念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本段译文参考了《沉思录》，何怀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译者注）

虽然马可· 奥勒留的母亲可能不像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和尤里乌斯· 恺撒的母亲那样，能够和以后活跃于政坛的儿子平等交流，但她也没有将育儿大事推给别人。马可· 奥勒留在确定成为下一任皇帝之后，仍旧和家庭教师之间保持书信往来。他在书信的最后，往往特地附上母亲发出的问候。一位母亲和孩子少年时代的教师之间密切的沟通于此可见一斑。

马可· 奥勒留的记忆里不曾存留父亲故去的情景，母亲的离开则是在他34岁的时候。所以他是在慈爱平和的祖父及母亲的守护下度过的少年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是罗马帝国的和平年代。

少年时代

公元127年，后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仅仅6岁，还使用着马可·阿尼厄斯· 维鲁斯的名字。然而就是在这个年龄，他就已经身处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贵族是当然的元老院议员，在罗马统治阶层的子嗣中，也曾有过15岁的成人礼之后就立刻位列骑士阶级的人。因为直到30岁才能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那么骑士就成了一个领袖的预备课程，所以15岁之后列为骑士的不乏其人。然而，如果一个人在6岁就做了骑士，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年轻。话虽如此，在位10年的皇帝哈德良也未必认为这个6岁的少年表现出了皇帝的潜质，毫无疑问，这更多是皇帝赐予忠臣的礼物。祖父维鲁斯经常在皇帝外出视察的时候代为处理政务，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对于马可而言，他也是父亲的化身。



奥古斯都

从公元128年开始，马可就要接受7岁到11岁的初等教育。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极为优越的他当然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到市井中的私塾去读书，而是聘请了家庭教师。当然，无论是进私塾还是聘请家庭教师，初等教育都是以读写和计算为基本内容，无须赘述，不过这一时期倒是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

像犹太教或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既然有经典，那么负责向一般信徒进行解释的祭司阶层就必不可少。而与此相对，信奉多神教的罗马社会里没有宗教经典，也就不需要专职的祭司或神职人员。这样也不必担心神职人员在行政事务方面多嘴多舌，进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教分离。现在我们认为所谓的政教分离就是政治由政治家负责、宗教由宗教人士负责，可是当时的情形仍旧有些不同。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信奉罗马诸神的成年男子都有担任祭司的资格。

因为不是专职的神职人员，所以在举行祭典时也没有专门的法衣。即便是罗马皇帝，通常的装束也不过是在短衣之外裹上托加，社会里的中上层男子都是如此。作为大祭司，皇帝必须在节庆日举行祭典，这时他也是身着托加来主持的。不过有一点不同。在元老院的会场，人们的托加并不遮挡头部，而在神殿前举行祭典时，人们会用托加把头部遮住。这是人们敬畏神灵的具体表现。每个罗马人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守护神，而各自的祭神仪式也不过是皇帝主持的祭典的缩小版，由遮挡住头部的家长主持，参与者也仅限于家庭成员和奴仆。在多神教的古代，诸神与人的亲密关系远超后世我们的想象。

7岁时的马可获得了一个称号，拉丁语叫做“Salius Palatinus”，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战神马尔斯的祭司会”，马可是其中的一员。在意大利半岛，供奉战神马尔斯的祭典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3月19日和10月19日，因为这两个日期代表着战争季节的开始和结束。仅在罗马一地，就有两组人负责这个延续已久的祭典，他们每组都有12名少年，每逢祭典，少年祭司们都要身着古代意大利的战斗装束：皮制的胸甲，军用的

斗篷，圆锥形的战盔，腰佩短剑，左手持八角形盾牌，右手持长矛。

12人组成的战团在街道上行进，时而停下来为战神马尔斯表演舞蹈，同时用长矛叩击盾牌，口唱赞歌。每当这种古老的仪式操练告一段落，沿街围观的人们就兴奋地拍手欢呼。献给战神马尔斯的赞歌全部用古拉丁语写就，对于一个7岁的少年来讲显然是太难了。可是少年马可却将其背诵得滚瓜烂熟，每次祭典都积极参加。所以，一个人不畏艰难，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刚毅性格应该在这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并且，成为皇帝的马可· 奥勒留十分尊重罗马的传统，或许就是少年时代教育与经历的结果。

到12岁就要开始接受中等教育。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17岁就步入社会，所以罗马人非常重视步入社会前的5年中等教育。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表示中学教师的词语“grammticus”也指代所有的教师。马可的教育环境优越，家庭教师们也都由声誉最高的希腊人担任，并且不同的学科由不同的人负责。可见在公元2世纪，随着学科的确立，培养学生的家庭教师也出现了专业分工。在《罗马人的故事10 ·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教育制度一节里，我们已经就教育内容进行过阐述，现在就不再重复了。不过有趣的是，当时人们很重视辩论，即“dialogus”。这种学习的重要内容就是首先要知道不同意见的存在，然后通过了解，掌握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技巧。这种辩论技巧在希腊以苏格拉底最为有名，在罗马人们将其应用于元老院会场和法庭。

然而，学习这些内容的12岁少年马可却迷上了希腊哲学家们的生活方式。他执意穿着粗布衣服听课，晚上就直接睡在地板上，虽然最后他还是没能拗过母亲，几天后结束了这种苦修，改为在铺有毛皮的床上睡觉，可如果用俗气的话来讲，这时的马可· 奥勒留已经掉进了希腊哲学的“陷阱”。而喜欢开玩笑的哈德良当然不会放过马可。因为马可的姓“维鲁斯”的意思是“真实”，皇帝就在其后加上了表示最大的词尾，“维鲁西姆斯”就成了皇帝给少年马可起的绰号，意为“真实最好”。

公元135年，经常离开首都视察帝国全境的哈德良自觉体力日衰，终于决定回归本国。相比于罗马市内的皇宫，59岁的皇帝更喜欢待在郊外的蒂沃利别墅。而14岁的马可在祖父的带领下谒见皇帝的机会并不稀少，因为此时的哈德良对这位少年的态度显然已经超越了对一个忠臣的孙辈通常的关注。

成人礼

对努力自强、尽职尽责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此时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选择继承人。这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话，那么无论以前的政绩多么出色，都如同画龙没有点睛，存在着前功尽弃的风险。哈德良走遍了整个帝国，缔造了罗马的黄金时代，同时他也致力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在继任者这个问题上，他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那一年，59岁的哈德良的目光停留在了30岁上下的路奇乌斯· 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身上。此人虽然身体纤弱，但品质与智力都无可挑剔。不过，在哈德良内心里，选择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缘由。

将近20年以前，哈德良继位不久，就动手清除了前任皇帝图拉真在位时的四位重臣。当时并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以图谋政变的罪名直接杀掉了。为了帝国由图拉真的军事扩张路线转变为专事防守路线，采取强硬手段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不能排除哈德良神经过敏的成分。那时的情景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四位重臣纵然在国策上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

埃里乌斯 • 恺撒

四位重臣中的尼格里努斯有一个女儿，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迎娶了她做妻子。夫妻二人生有一个男孩，当时年仅6岁。在这个男孩体内，实实在在地流淌着蒙冤的尼格里努斯的血液。在哈德良的内心里，之所以选择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作为继任者，是不是存在着对自己从前无奈手段的赎罪心理呢？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而这一年，少年马可15岁。

拉丁语“toga virilis”的意思是成人礼。男孩要脱掉少年时代的短衣，

换上成年男子的服装托加，宣示自己的成年并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或许此时祖父已经故去，也有可能是皇帝哈德良暗中帮忙，因为成人礼结束之后，马可很快就确定了婚约。

未婚妻就是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的女儿凯奥尼娜。不久之后，哈德良就宣布凯奥尼乌斯· 康茂德为皇帝的继任者，改名为“埃里乌斯· 恺撒”，成为皇帝哈德良的养子。马可因此成为下一任皇帝未来的女婿。马可和这位下任皇帝之间存在着15岁的年龄差距，如果一切顺利，埃里乌斯· 恺撒的儿子将来也有望继承父位，他比马可小9岁。或许，当初哈德良并没有把马可作为候补皇帝之一，他也本可以更好地辅佐埃里乌斯· 恺撒，并在其子继位以后以姐夫的身份尽心尽力地协助治理国家。大概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可能性，马可和凯奥尼娜才得以确立婚约。

有的人至死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升迁而不择手段地排挤、肃清别人，马可· 奥勒留就是这种人。哈德良应该也注意到了马可的这个特质，哈德良本人也绝不会为了升迁而去排挤别人，但他同时也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自己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反而会更加重视他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不难想象，哈德良的金手指还在发挥作用。15岁的马可被任命为首都罗马在拉丁节期间的行政长官。拉丁节（feriae Latinae）是一种古老的庆典，在距离罗马20公里的阿鲁巴诺山举行。两位执政官都要出席庆典，为了不耽误首都的行政事务，需要在庆典时期任命一位“特别长官”。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个名义上的官职，通常都在年轻的领袖后备队中选拔，可是马可对这一职位同样一丝不苟。顺便说一下，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就是被哈德良指定为下任皇帝的埃里乌斯· 恺撒，他对未来女婿的兢兢业业十分满意，特地赶往蒂沃利别墅汇报此事。

在公元136年，马可的家里喜事连连，十分忙碌，最后也是以喜事结束。比马可小两岁的妹妹克鲁尼菲奇亚和表兄渥米狄斯· 库瓦德拉特结婚。新娘的父亲和新郎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在罗马的上流社会中，表

亲之间的婚姻已经并不少见。而这种情况即使不回溯到共和时期，在百年前的帝政初期也是不可想象的。

帝王教育

尽管举行了成人礼，但马可毕竟只有15岁，学习非但不能因此而终止，围绕在马可周围的教师阵容反而愈加豪华。据说这些教师都是哈德良亲自指定的人选。如此说来，在老皇帝的心目中，对少年马可的评价可谓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仅举三位经过选拔的教师，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

出身于小亚细亚佛里吉亚的希腊人阿勒库桑多斯，是研究荷马的著名专家，在纯正的希腊语教学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托西乌斯· 阿贝尔出身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在罗马时代属于意大利，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出身于意大利的拉丁人。理所当然，他负责教授纯正的拉丁语。

北非曾是过去的大国迦太基的领土，来自那里的科尔涅利乌斯· 弗龙托指导马可的辩论技能。

罗马帝国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后世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哈德良治下的罗马帝国的确是世界性大国。其实即使历史学家没有这种论断，现代人也能从当时的教师人选上发现这一点。不过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教授少年马可的科目和自己的出生地全然没有关联，凭借的完全是自己精英分子的技能。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双语国家罗马帝国的两大官方语言，教师们除了讲授纯正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价值观，即有些人

的母语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希腊语，对于他们生硬的词汇或错误的语法，倾听的时候绝不能表露出丝毫的不快与轻视。语言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至于交流方法则是次要的。之所以不必特地纠正对方的语法和发音，是因为如果人们都在统治者跟前三缄其口，那么对统治者来讲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不论来自帝国的什么地方就都不是问题了。青少年时期的马可后来的教师里面不乏来自希腊、中近东和北非的人，不过都是根据这种实力主义进行选拔的结果。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那些受到重用的行省人，就像后代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几乎都认为自己是罗马人，而不是什么高卢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叙利亚人或北非人。当年掌握英格兰正音，同时对于语言上未必说得如此纯正的殖民地人民，同样愿意以绅士风度倾听的英国人无疑很多，但是印度和新加坡、埃及等地的人们几乎从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这就是虽然同为“帝国”，但罗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决定性差异。在确立精神修养的少年时代，马可· 奥勒留就是在哈德良所缔造的世界主义中度过的，然而还不到两年，马可的人生却发生了巨大改变。

公元138年1月1日，已经被确定为下任皇帝的埃里乌斯· 恺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之前，突然大口吐血而死。此前一年，为了锻炼身体，加上哈德良皇帝也主张其为了日后登基治国，应当体验边境军营的生活，埃里乌斯· 恺撒前往多瑙河前线。但是，他看上去似乎患上了肺结核，根本无法适应剧烈的环境变化。今天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是欧洲国家的首都，但这两大都市都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军团基地。虽然到公元2世纪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但和帝国首都罗马的舒适生活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当地的气候对出身于南国的他而言也十分严酷，纵使他30岁出头正值盛年却最终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

对皇帝哈德良而言，以前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寻找一个替代人选，因为62岁的老皇帝心里最明白，以前长

年累月地在外视察，过度的操劳和病痛正在煎熬着自己。

埃里乌斯· 恺撒死后还不到一个月，替代者就已经选出来了。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皇帝安敦尼· 庇护。他的祖上来自行省高卢，本人不但是元老院的议员，而且作为“内阁”成员深得哈德良的信赖。年龄是52岁，在注重成熟度的罗马社会里，这是富有竞争力的年龄。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安敦尼在埃里乌斯· 恺撒死前就是皇帝的候补者之一。首先哈德良与安敦尼两人在性格上就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相对于哈德良的犀利，安敦尼表现出来的则是稳健，这也正是哈德良所欠缺的资质。正如小普林尼所说：“元老院的议员们喜欢皇帝像元老院的成员一样行事。”在这一点上，安敦尼简直可以打包票。

安敦尼· 庇护

哈德良

从哈德良的角度看，安敦尼最大的好处在于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此外安敦尼52岁的年龄也是有利因素。哈德良当时62岁，他肯定认为比自己年轻10岁的继任者可以在位13年。只要维持住这13年，当时17岁的马可就30岁了，达到了就任国家要职的最低年龄要求。毫无疑问，自从埃里乌斯· 恺撒死去以后，在哈德良的头脑中，马可的存在已经是越来越重要了。

安敦尼作为继任者的唯一不利因素，恐怕是此人不够丰富的国外任职经历，他只在小亚细亚做过一年的行省总督。而且这个行省并不像卡帕多西亚（土耳其中部高原地区的古地名，主要城市为开塞利，公元前3世纪独立，公元17年并入罗马。——译者注）那样，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也必须丝毫不能懈怠地对假想敌帕提亚时刻保持警戒，其总督并不负有指挥边境防卫军团的任务，当地还盛行着希腊文化，如同西边一样舒适与和平。在罗马帝国，即使同样被称为行省，位于边境防线上的行省总督由皇帝亲自任命，一般选择有军旅经验的人。而没有防卫任务的行省总督则是在元老院议员们中间相互评选产生，只需具备执政官的经验即可。所以即使同样称为行省，也有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之分。二者还有一项区别，就是皇帝行省的总督任期经常能够长达数年，而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则规定为一年，因为这样可以使尽可能多的议员们分享到行省总督这种“荣誉”。安敦尼所担当的职务，正是“元老院行省”的这种总督。不过，总督时代的安敦尼广施仁政，在意大利本土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清廉、诚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他无疑胜任这一职务。

并且在皇帝哈德良看来，继任者缺乏行省经验可能也算不上了不起的问题，毕竟他本人已经视察过全部的36个行省，所有必要的行政措施都已推行下去。在马可成为皇帝之前的10多年间，让帝国保持现状不是很好吗？

然而，预计是13年，实际上却成了23年。

公元138年2月25日，皇帝哈德良宣布了新的继承人。这时安敦尼已经接受了哈德良提出的所有条件：第一，收养即将17岁的马可以及已故的埃里乌斯· 恺撒之子，现年8岁的路奇乌斯为养子。第二，在马可与埃里乌斯· 恺撒的女儿到达适婚年龄的时候，让他们履行婚约。第三，当路奇乌斯也到达适婚年龄时，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要嫁给他。

只要阅读一下这些条件，我们就知道哈德良不但重新构筑了帝国的防卫体系，而且还完善了帝国的法律体系，其追求尽善尽美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很明显，其实哈德良想让马可继承皇位，安敦尼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还有一点，在自觉来日无多的哈德良的内心里，充斥着对执政初期整肃图拉真四重臣的赎罪意识。他为其中一人的血脉安排了美好的前程。

就这样，在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都完成的5个月以后，皇帝哈德良终于撒手人寰。

今天我们往往喜欢强调这位皇帝的奇妙灵感和他对希腊文化的依恋，这虽然是事实，却并非他的全部。作为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排在尤里乌斯· 恺撒和奥古斯都之后的，我想就是这位哈德良了。他是卓越的政治家，拥有着自己的简明哲学，虽然没有像马可· 奥勒留那样有《沉思录》和骑马像传世，却留下了他的哲学思想，其代表就是至今屹立不倒的罗马万神殿。

罗马人的哲学

不管外形是圆是方，只有这座万神殿和其他为数众多的神殿截然不同。即使在雅典的帕台农神殿，参拜的人也只能面对雅典娜一个神。在人神关系方面，建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也因袭了帕台农神殿的做法。

万神殿的内部

而顾名思义，万神殿（Pantheon）则加进了不同民族甚至战败者们所信奉的神，是“供奉全部神的神殿”，并且，万神殿的特点还不仅如此。对从入口进来的人们而言，神殿里面的诸神并没有矗立在神殿深处，而是环绕在周围，从而构成建筑物本身。这座万神殿是唯一现存的保持着古罗马时代风貌的建筑，既没有立柱也没有横梁，宽度和高度却达43米。其实这些令建筑学家们吃惊不已的现象不说也罢，但优秀的建筑肯定能体现出建造者的哲学。真正令我们感叹不已的，正是万神殿的哲学。

进入万神殿内部，站立在浑圆的殿堂中央，抬头就能望见圆形天窗外的蓝天。这时，流连于此的游客仿佛都消失了，一切喧闹声都归于沉寂，在宏伟的万神殿内部，只有伫立在中央的你和排列在墙面上的诸神。在其他神殿里，被供奉着的神是主角，可是在万神殿里，人被守护神所围绕，成为主角。这种安排形式，是多神教的古代精神的具象化，也体现了罗马帝国的哲学。

这座万神殿当初是由奥古斯都皇帝的左膀右臂阿格里帕在公元1世纪主持修建的。可是到公元2世纪需要重建的时候，哈德良皇帝将其从方形改成了圆形，并且把诸神的位置从中央挪到了周围。哈德良属意待时机成熟后在马可守护下的罗马，正是“万神殿”所体现的罗马帝国。

顺便说一下，罗马的万神殿自建造开始到现代，已经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然而在这期间，却没有第二座、第三座万神殿出现，因为自从进入了一神教时代以来，直到今天，人们都视自己所不信奉的神为邪神。万神殿是多神教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纪念碑。

“庇护”的意思是“深怀慈悲的人”，在哈德良之后，安敦尼因“庇护”的称号而名垂青史。历史学家们评论安敦尼· 庇护治下是“罗马人最幸福的时代”。史学家吉本也曾感慨地说，该时期几乎找不到值得记录的问题。的确，这个皇帝态度宽容，行事果断，致力于人才的公平选拔，遏止了公帑的浪费，维持了健康的财政。他这些举措在23年的德政

中一以贯之，统治着大家族一样的罗马帝国。后世的研究者们将其列为五贤帝之一时，不曾有过丝毫犹豫。

不过，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专注于政治，或者说专注于政事，是因为在他执政时期，正好很幸运地享受到了先人的丰功伟绩。

说到先人的丰功伟绩，仅帝政时代，皇帝们在保障国家安全这一职责方面，就有很多重要事件。

帝国的安全保障史

尤里乌斯· 恺撒——征服了高卢全境，确定了莱茵河防线，阻挡住了日耳曼民族的侵略，对狩猎民族高卢人推行的农耕化十分成功。因为农耕民族以土地为生产基础，很难想象他们会舍弃自己的土地去侵犯别人的疆域。

奥古斯都——如果谈判的对象不像高卢人那样分成多个部族，而是有着领袖的统一国家的话，那么他也往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和帕提亚王国之间最终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就是因为外交比武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东方防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也由此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

提比略——此人真正建立起了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一起构成了帝国的北方边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起源，就是提比略为监视多瑙河对岸的蛮族而设立的营地。不过，这个皇帝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还在于整饬了帝国内部的治安。这虽不像抵御外敌那样光芒四射，然而重要性却毫不逊色。因为无论怎样铺设石板道路，面对旅途中盗贼袭扰的危险，道路网也难以发挥血管的作用。

克劳狄乌斯——尤里乌斯· 恺撒认为，面对日耳曼人的入侵，只靠莱茵河还不足以维持高卢的稳定，必须在不列颠建立霸权才能断掉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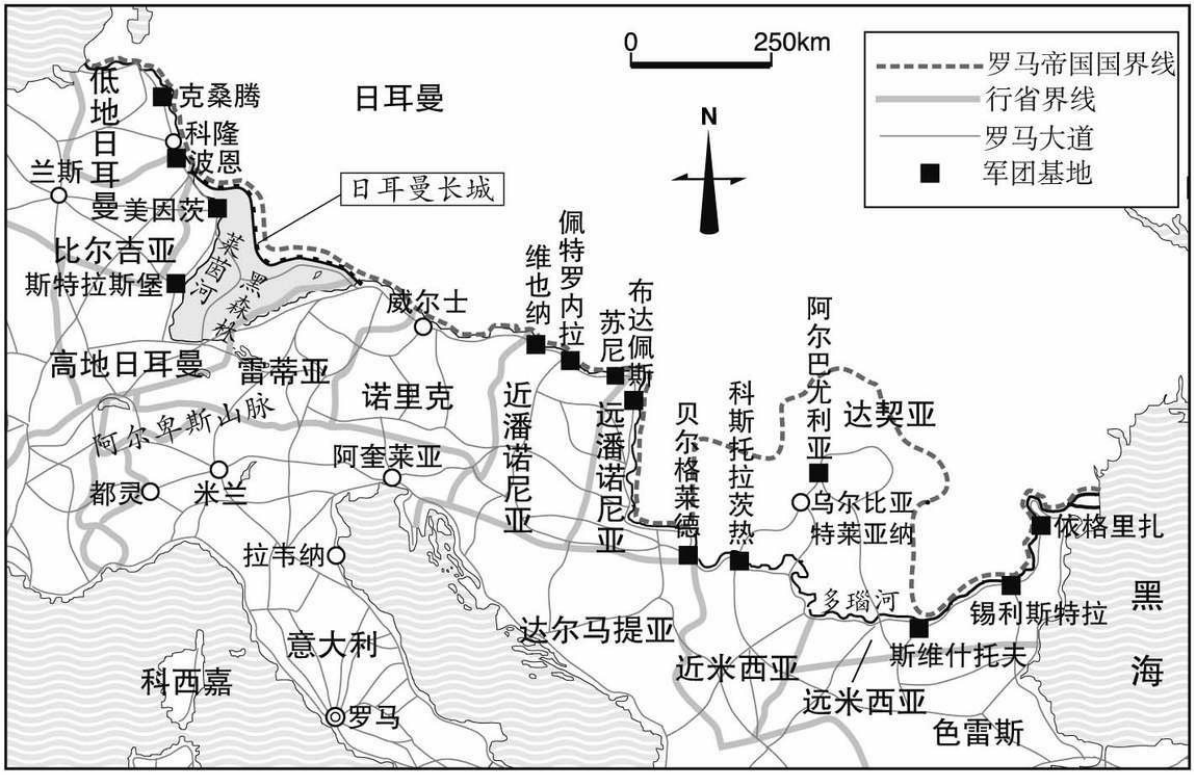
者的后路。

一百年以后，正是克劳狄乌斯实现了这个目标。结果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队只需在里昂配备一个大队，也就是说有1000名士兵就足够了。因为这1000人还负责守卫帝国设在里昂的金银币铸造所，相对于后世完全覆盖法兰西的高卢而言，罗马士兵的驻扎数量几乎接近于零。至于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另一个军团，仅从地势上也能看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死守莱茵河防线。

而一旦高卢安定下来，与其以比利牛斯山脉为界的西班牙也得以安定。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也驻有一个军团，因为他们需要隔着“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北非对峙。

对罗马而言，高卢的安定就是这么重要。当军事力量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上的时候，后方高卢的不稳定是不可想象的。

图密善——莱茵河与多瑙河都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因而这两条大河的上游都相互接近。对莱茵河与多瑙河两道防线而言，这一带就犹如人的软肋，也就是最薄弱的部分。提比略最早考虑到要强化这里的防卫，而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建立起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的则是图密善。因为日耳曼长城的修建，一向被日耳曼人视为自家庭院的黑森林（Schwarzwald）也被囊括进罗马的版图。以往人们不敢轻易涉足的可怕的黑森林，如今修通了罗马式的道路，不但利于行军，一般的旅人也可进入了。并且，莱茵河——日耳曼长城——多瑙河，由此形成一道相互联系的有机的整体，从北海一直延续到黑海，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军团的转移也变得方便，进而遏制了军费的膨胀。而图拉真的强化和哈德良的重建，也凸显了日耳曼长城战略价值的重要。因为罗马帝国在欧洲北部所面对的，并不是行动一致因而可以寻求妥协的帕提亚，而是以蛮族统称的众多部族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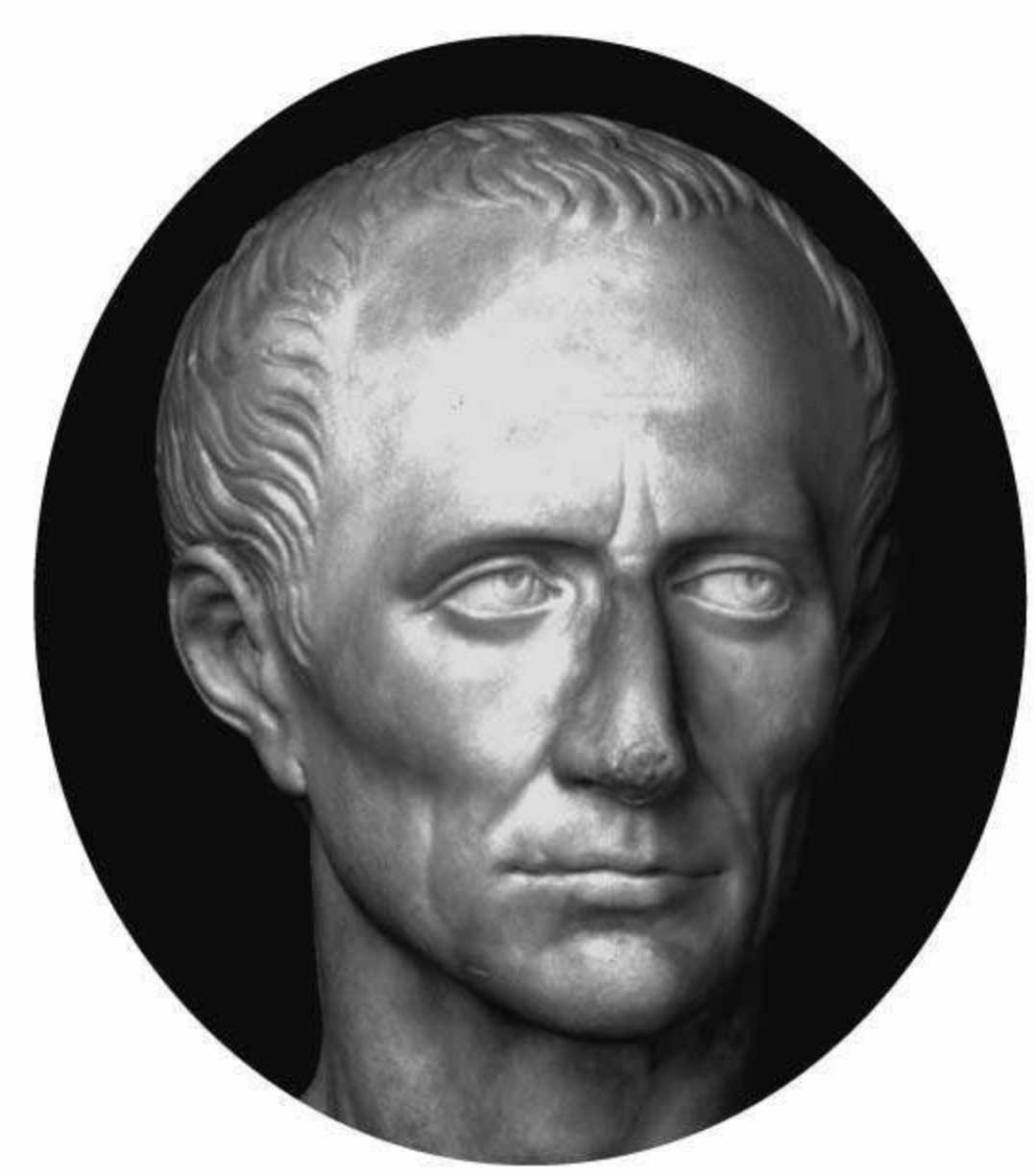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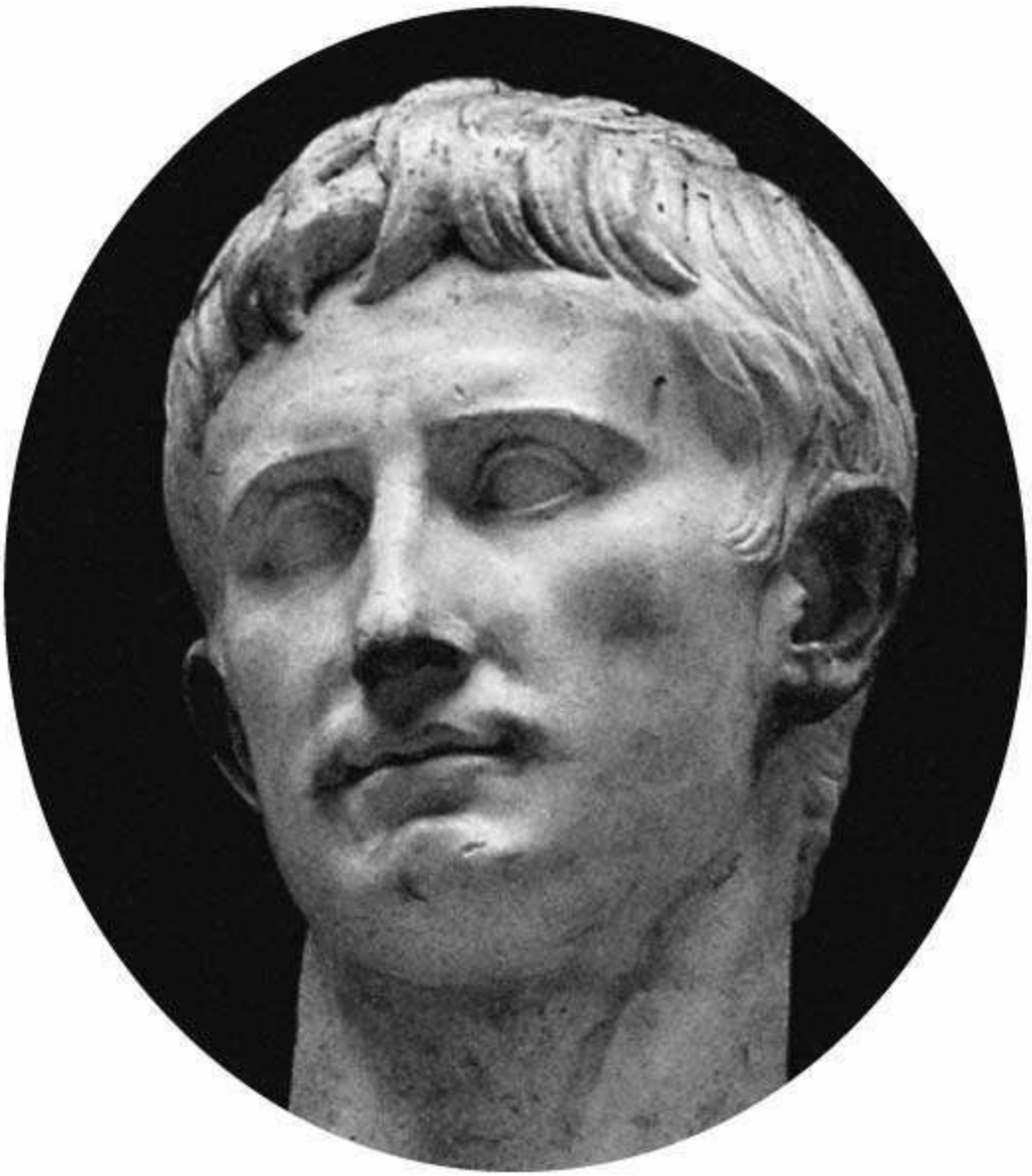
图拉真——对罗马而言，分散居住的蛮族虽容易各个击破，但一旦对方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分散的各部族就有团结起来的危险。例如达契亚部族的首领德凯巴鲁斯就拥有了自称为王的力量，罗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在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上，有一幅以“达契亚战争”为名的浮雕，展现了这场罗马取得全胜的战争。达契亚由此成为罗马的行省，多瑙河下游的居民也看不见对岸蛮族的踪影了。也就是说，多瑙河防线又强化了一大步。

罗马人对未开化民族感到束手无策的缘由之一，在于对人命的不同态度。每当要渡河时，相比于利用木筏或小船，罗马人更喜欢架桥。而蛮族却对自己在架桥技术方面的欠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利用木筏和小船强渡多瑙河时，对可能的牺牲无动于衷。图拉真征服了达契亚，将其划为一个行省。而元老院对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的颂词并不只是祝贺他战争的胜利，更是欢庆新领土的获取。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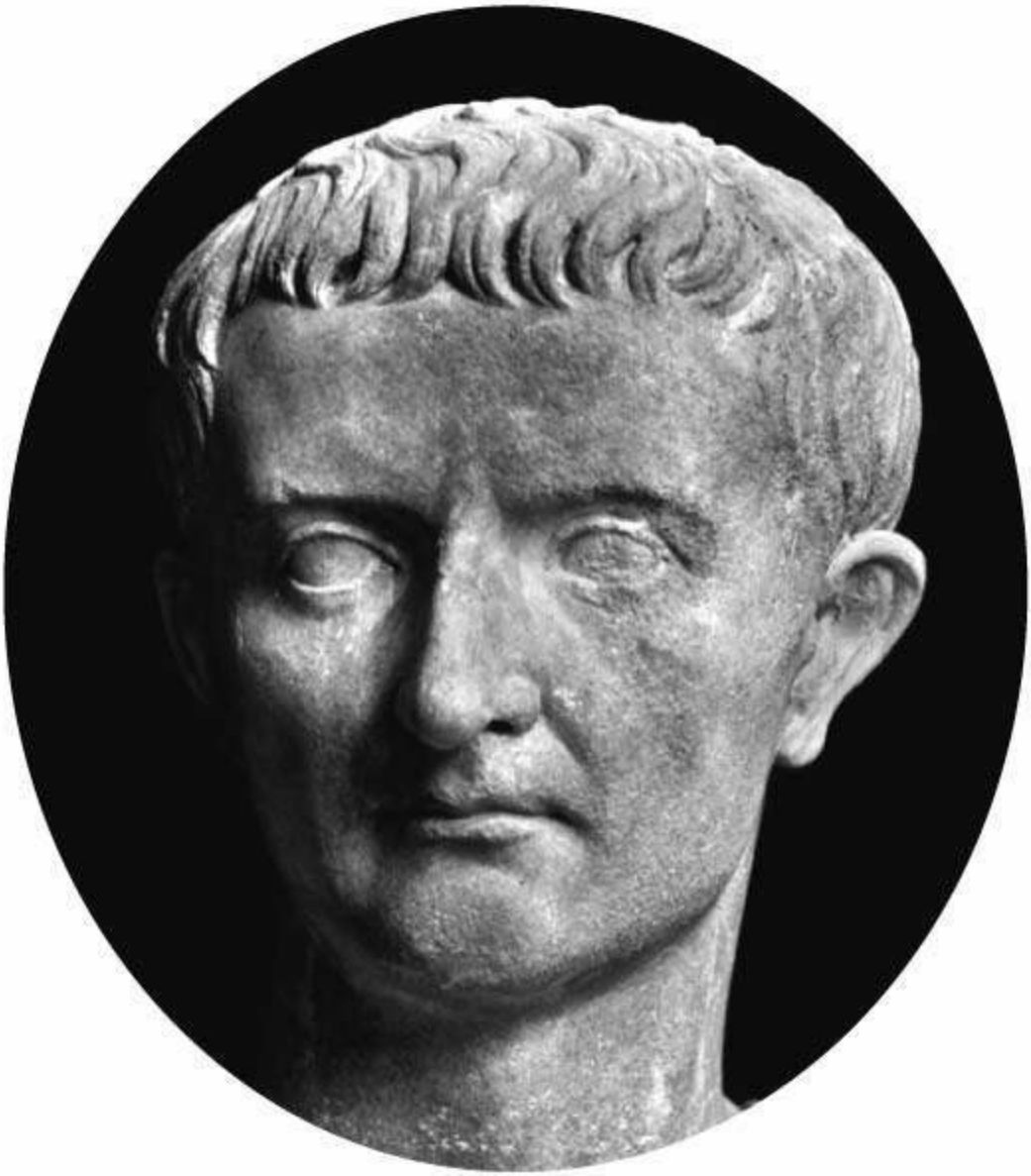
且有一点不能忽略，即元老院议员们虽然都安全地居住在远离多瑙河的首都罗马，可是却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日夜都能感受到蛮族的威胁。“头脑”与“四肢”思虑相通的组织是健全的，因而也是强大的。



恺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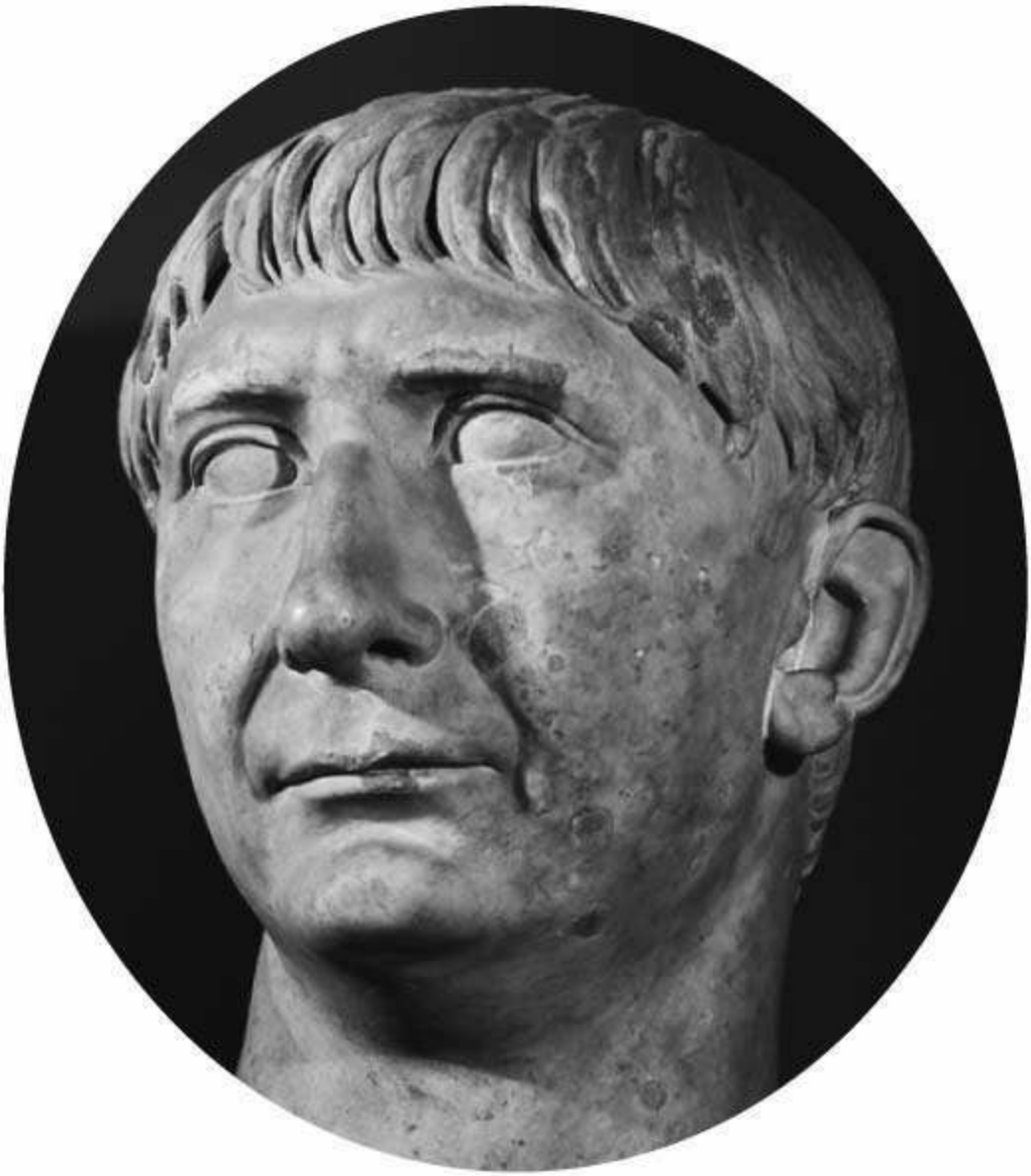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



提比略

克劳狄乌斯

图密善



图拉真

哈德良——和前任截然不同，这个皇帝一次也没有举行过凯旋仪式。不过此人所推行的坚守防卫策略不同于现代的和平主义。他谙悉人类欺软怕硬的本性，因而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在长达21年的统治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对帝国辽阔边疆的视察上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防线都固若金汤。换句话说，无论是北非沙漠深处的游牧民族，还是意图跨越幼发拉底河进行领土扩张的帕提亚，也无论是多瑙河与莱茵河岸边伺机而动的北方蛮族，还是企图越过哈德良长城的喀里多尼亚

人，都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严密的防守体系，轻易出手必定招致严厉的反击。现代人称这种战略为“威慑”。

尽管防线犹如铜墙铁壁，却并没有造成内外隔绝。罗马的国界本来就不是关闭的，应该说是开放的国界，而哈德良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到集市日，经常可以看到防线外部的蛮族也带着自己的土特产品进入防线内出售，然后购买罗马境内的物产。不只是普通百姓，就是驻扎在当地的军团也都从防线两侧的商品交流中购买必备的物资。当然，军团并非只有购买蛮族的物产才能满足日常所需，而是通过商业交流来抑制蛮族的掠夺欲望。这同样是极为高超的政治策略，后世的研究者称其为“半罗马化”。意思是当国境内推行“罗马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境外侧推行“半罗马化”。而所谓的“罗马化”，就是组成命运共同体。

不过，尽管遵循坚守防卫的路线，却同样是在强化防卫体系，而与之俱来的费用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罗马帝国却很难增加税收，正如“百分之一税”、“二十分之一税”等别名所示的那样，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确定的税率已经固定，对待拥有选举权的人，上调税率可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罗马的皇帝并不像基督教世界里的皇帝或国王那样“君权神授”，所有的权力最终都要归结到人上面。统治者只有在得到拥有权利的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的委托之后才能行使权力，所以凡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都是当权者。而间接税是主体，增税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公民。

那么，是不是可以向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行省民众增收行省税呢？这话说起来虽然轻巧，一旦推行同样困难重重。行省税又称“什一税”，顾名思义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古代，无论什么地方，税率都大致处于这个水平。迦太基按照25% 的税率征税，就被人说是高得异常。尽管免除了兵役，这种行省税的推行依然十分勉强。这时如果调高税率，必然招致叛乱。那样的话，就算没有外敌威胁，内乱也同样会破坏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建。在这种状态下推行改革，只能走节约之路。

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详细记录了哈德良皇帝的事迹。我想引用一段，来说明哈德良的施政方针：

> 军团长下面有两个专门负责基地内务的指挥官：一个是财务检察官，是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另一个是基地总管，负责基地内部的管理。基地总管的重要任务是补充并保管兵器和粮食。
>
> 由于前线基地时刻处于和敌人对峙的状态，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所以，为了防备这一情况，往往在不知不觉间，粮食和武器补充过多，结果出现了大量库存积压。
>
> 库存过多，粮食就会发霉腐烂，导致无法食用，只能丢弃。兵器长时间不用也会生锈。即使送到军团所属的兵器修理站，依然可能无法修复，不能使用的兵器堆积如山。这就是说，虽然主观上从未想过要浪费，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购买军粮、军需的经费浪费极大。
>
> 哈德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他在军团基地、军粮供给地以及联系两者的补给线之间推行了系统化的管理。只要流通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有过多的库存。这种做法的成效就体现在基地内的库存量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内。

我回想起自己撰写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这简直就像丰田汽车的“及时生产系统”（just in time）。

当然，发明丰田“及时生产系统”的人很难从两千年前的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什么启示。但我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明确了最重要的目标，再加上无往而不胜的意志力，就都能想出类似的策略。在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后世人们对哈德良皇帝的一个评价就是：“务实的罗马皇帝中尤其务实的一位。”

但是，哈德良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缺陷。正如很多精密机械，只要

一个齿轮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部机械设备的故障。为防范这种风险并继续发挥制度的效能，只能不断进行调整。我认为，安敦尼· 庇护虽是大家公认的贤明皇帝，他却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辩解说，制度已经在发挥效力了。可是，前一天万里无云，第二天就大雨倾盆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准备了雨伞，那么领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领袖之所以被赋予强大的权力，就是要让他未雨绸缪，在大雨不期而至的时候为大家准备好雨伞。哈德良真正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众人都未曾想到的时候，认识到了重建帝国制度的重要性并加以推行。

下任皇帝马可

公元138年7月10日，随着哈德良的过世，安敦尼· 庇护的时代开始了。不过他还不算正式登基，因为还需要元老院议员以多数赞成票的形式予以承认。然而这就像一家公司，如果退休的总经理指定了一个新经理，董事会都予以承认。注重实际的罗马人往往把老皇帝的逝去之日算做新皇帝统治的开始。事实上新皇帝安敦尼也没有浪费时间，尽管他并不是那种一掌权就变脸的人。

安敦尼已经把马可收为养子，所以自己就是养父。此时养父召见了马可，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马可应该废除与埃里乌斯· 恺撒女儿之间的婚约，转而与自己的女儿芙斯汀娜订婚。只有17岁的马可稍加思索之后，便应承了下来。而芙斯汀娜已经同埃里乌斯· 恺撒的儿子路奇乌斯订婚，安敦尼此举等于让埃里乌斯· 恺撒的两个遗孤同时解除了婚约。安敦尼虽然公正慈悲，可最终还是没能免俗，安排了自己的独生女成为下任皇帝的皇后，使老皇帝哈德良当初的如意算盘化做了泡影。

据说当时芙斯汀娜只有8岁，所以即便订立了婚约，却并不能立刻结婚。

然而，因为承认了这纸婚约，后来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也制造了近亲结婚的一例。

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妻子和马可的父亲是同胞兄妹，所以安敦尼也是马可的姑父，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和马可属于表兄妹关系。统治阶级往往喜欢在家族内部相互通婚，这种婚姻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结盟。罗马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以前离婚并不少见，所以下一代往往是同父异母，即便结婚也不是那种姑表近亲。历史学家塔西佗总是大张旗鼓地抨击统治阶级伦理混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伦理乱象有效地防止了近亲结婚的发生。到了公元2世纪，离婚的现象减少了，或者也可以说离婚现象消失了，五贤帝之中没有一人离婚，一夫一妻成为通行法则。然而这种能令墓中的塔西佗喜极而泣的伦理进步却导致了近亲结婚的增加，而婴儿的存活率大为降低也不知是不是由此导致的。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139年，18岁的马可首次担任了公职。他被选举为财务监察官，这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开始。在元老院所进行的选举中，马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推荐，候选也就等同于当选。当时25岁前后的人出任此职较为常见，18岁当选当然是太年轻了，是特例。人们称这种公职经历为“光荣的职务”，是领导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图拉真在28岁时，哈德良在25岁时，才开始分别走向该职位，但他们此前都积累了军旅经验，而马可则省略了这一步。很明显，这是皇帝安敦尼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接下来的公元140年，马可在皇帝的推荐下，很快就要作为候选人参加执政官的选举。

执政官本来有两位，其中的一位就这样被早早地指定了。所谓的“光荣的职务”，往往先是担任财务监察官，接下来成为元老院议员，然后做法务官、执政官等，按部就班地高升，而马可既不是元老院议员，也没有法务官的经历，出人意料地突然成为执政官，而且只有19岁。

早在公元139年，马可18岁的时候，皇帝安敦尼就授予了他“恺撒”的称号。按照常规，任何一个罗马皇帝都要将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尤里乌斯· 恺撒和奥古斯都二人的名字加进自己的正式名称中。我们以安敦尼· 庇护为例，他的正式名称是“皇帝· 恺撒· 提图斯· 埃里乌斯· 哈德良· 安敦尼· 奥古斯都· 庇护”，其中的“提图斯”是安敦尼的个人名，之所以还加进了“埃里乌斯· 哈德良”，是根据古代的记名办法，养父和父亲的名也要记入，而如果是下一任皇帝，名称中只需记入“恺撒”。又如马可，把出生时的姓名“马可· 阿尼乌斯· 维鲁斯”变成“马可· 埃里乌斯· 维鲁斯· 恺撒”，也可以这样理解，名称中只要包含有“恺撒· 奥古斯都”，就意味着“皇帝”，如果只有“恺撒”，就意味着“皇太子”。可见，哲学家皇帝早在18岁时，就已经获得了帝位的保证。在这里，我们除去五贤帝中在位时间只有一年半的涅尔瓦，将其余四位的职历列成表格，供大家参考。

如果是我，肯定会产生疑虑。可是当时，无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对执政伊始就宣布继承人的安敦尼· 庇护表示赞赏，认为他恪守了对先帝的承诺，是一位公正无私的皇帝。

从图拉真到马可·奥勒留四位皇帝的职历年龄比较

	财务监察官	法务官	执政官	被指定为下任皇帝	即皇帝位	过世
图拉真	28	34	38	44	45	64
哈德良	25	30	32	41	41	62
安敦尼·庇护	25	30	34	52	52	74
马可·奥勒留	18	—	19	18	40	58

不错，安敦尼的确遵守了他和哈德良之间的约定，将马可· 奥勒留确立为下任皇帝，可是这一切都建立在马可成为他女儿的丈夫这一前提之上。而哈德良也并没有临终嘱托，让两任后的皇帝人选马可在10多岁

就获得“恺撒”的称号，然后立即让他做执政官。哈德良在指定安敦尼为帝位继承人的时候，附带的条件只是让其将尚是少年的马可与路奇乌斯收为养子，尽管养子就意味着继承人。

也就是说，安敦尼· 庇护在登上帝位还不足一年的时候，急急忙忙加以实施的，竟然是给未来女婿提供关照。历史学家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而吉本之后，更将其定义为充满人格魅力的明君，塑造出了一个“慈悲的安敦尼”。不过话也说回来，人格高尚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是卓越的政治领袖。

安敦尼· 庇护的责任感非同一般，对继承人的培养也是一丝不苟。不过，他的培养方法并不是让继承人外出经历风雨，而是安排在身边积累经验。

公元139年，马可虽然只有18岁，却获得了“恺撒”称号，被确立为下任皇帝。因为安敦尼希望马可能和自己一起住在皇宫里，所以马可从西里欧山搬到了帕拉蒂尼山。

这一时期的马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豪华的教师团队网罗了北非的弗龙托、希腊的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等知名教授。虽然这些教授是被招到罗马的，教育对象是下任皇帝，可他们却坚持认为自己同马可依然是师生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师无须到弟子家去讲课，而是马可应该主动到教师家里来听课。无奈之下，安敦尼也只好接受了这一点，并且还开玩笑说，老师们从希腊来到罗马，舟车劳顿，可能不愿在罗马市内往来奔波。就这样，18岁的马可每天都走下帕拉蒂尼山，前往教师家中学习。冬去春来，到了公元140年，马可除了上学，还要承担起另外两项重要政务。

无论是共和制时期还是帝制时期，每年1月1日都是罗马的公务起始日。这一天不仅要召开新年第一次元老院会议，而且该年度执政官的任期也从这一天开始。公元140年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位，依照前一年的预

定，由距离19岁还有4个多月的马可来担任。而同他一起掌权的另一位执政官，则是皇帝安敦尼。和现任皇帝共事当然是极其崇高的荣誉，而每当皇帝想向一般公民宣示自己对某人的重视时，也经常采用这一办法。

在罗马，人们表述年份时，并不说建国多少年，而是说“某人和某人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对葡萄酒产地和年份的关注也是从罗马人这里开始的。罗马的美食家们一边把葡萄酒从陶壶注入玻璃杯或者银杯中，一边向客人劝酒说：“这是意大利南部萨莱诺出产、安敦尼和马可担任执政官那一年的酒（vinum）……”

附带提一句，“vinum”这个词在拉丁语系的意大利语中表述为“vino”，到了希腊语中，它又变成了“oinos”。只要观察一下现代各国语言中对“葡萄酒”一词的表达就可得知，在帝国西部的欧洲，种植葡萄并把葡萄酒推广开来的，就是古罗马人。法国和西班牙自不待言，甚至德国名酒“摩泽尔”的产地也位于罗马帝国境内。而同在帝国境内的英国之所以没能成为葡萄酒产地，是因为罗马人认为那里根本不适合种植葡萄。葡萄酒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所以我每当看到有人用英文“wine”来代表葡萄酒时，总觉得不能接受。就好像“地中海”这三个字，音义结合，相得益彰，“葡萄酒”这个词不也同样是形神兼备的译法吗？

言归正传。这一年19岁的马可需要完成的另一个重要政务，是担任“内阁”（consilium）的常任委员。和常年不在首都的哈德良不同，此时皇帝直接担任全权处理政务的内阁主席。内阁委员除了有皇帝，还有两位执政官，该年度如果财务官存在的话也要出席，法务官、财务监察官和按察官虽然都有好几个，但只要派出各自的代表列席会议就可以了。此外还有从元老院议员中抽选出来的15人。公元140年马可成了执政官，当然也就充分具备了参加内阁会议的资格。其实即便马可在年龄上不够资格，安敦尼也希望他能出席。就这样，内阁会议中皇帝旁边的位置，就留给了这个最年轻的人。

纵然年轻，可毕竟也是下一任皇帝，所以应该使其积累政务经验。安敦尼出于这样的考虑培养马可，本人也受到了元老院议员们的交口称赞，因为他没有去独霸权力，而是周到细致地考虑到了继承人的培养。不过这样贤明的举措同时也意味着马可无止无休、辛勤操劳的日子开始了。

罗马人的一天

罗马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无论是元老院会议还是内阁会议都在上午进行。如果这两大机构均无事可议，马可就跑到家庭老师之一的家里去接受一对一的教学。罗马人每天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各占一半，因而老师们也只在上午开展教学。

到了下午，马可也没有时间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去竞技场锻炼体魄。在人类社会里，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再加上乐于同他人分享权力的安敦尼甚至把皇帝的工作也一并推给马可，自己则始终在优哉游哉的闲散中度日。

其实马可真正感兴趣的学问是哲学，可是如此一来，他刻苦钻研哲学的时间恐怕就只有夜晚了。皇宫当然不同于一般家庭，不管灯亮到多晚都不会有人提出意见，可是这样的生活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何况次日一早如果内阁召集会议，基本上没有睡觉的马可还要跑去参加。当年图拉真和哈德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都是身处边境军团，亲率军士在多瑙河畔往来巡查，再看看首都皇宫中的马可，虽然环境无比舒适，但这样度过青年时代实在有些可怜。搬到皇宫的最初几年，马可的身边没有母亲的陪伴，如果有母亲同住的话，肯定有人惦记马可的健康。总之，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皇帝即使到乡间的别墅去，也都叫上马可跟随左右。虽然内阁会议和元老院会议不会在乡间别墅里召开，但无论皇帝身在何处，需要他亲自决断的事情总会找上门来，并且安敦尼执著

于古罗马人的田园生活，对扶犁耕田情有独钟。马可随侍皇帝左右，下午的散步和垂钓时也要听候吩咐，学习时间就更不得不推迟到夜晚进行了。

教师弗龙托

生活在将近一千九百年之后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窥马可青年时代的生活，是由于他与教师弗龙托之间往来的书信流传了下来。弗龙托是马可的拉丁文教师，所以与用希腊文撰写的《沉思录》不同，二者之间的书信大部分用拉丁语写就，偶尔夹杂一些希腊语。

致我最敬爱的老师

专门传递公文的信使终于出发了，而我才因此得以向您报告这三天的情况。话虽如此，可我向您的倾诉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我现在总算将30多件公文口述完毕，声音沙哑，累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致我敬爱的老师弗龙托

只有您能从我写作能力的不稳定上正确判断出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实际上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终于稍稍恢复了健康。因为我听从了医生的劝告，胸口的疼痛已经有所舒缓。我想克服病痛的唯一办法，就是认真遵从专家们提出的治疗方案。

尽管如此，我患病的时间却越拖越长，心理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真是太可悲了。因此现在我每天都在深刻地体会着健康的重要性。

再见！我的尊师。母亲也向您表达问候。

从不满20岁的这个时期开始，马可· 奥勒留直到死去，都一直被这

种“胸口痛”所纠缠。尽管痛感恢复健康的必要，可是他由衷地热爱学习，尤其是哲学。这种愿望到达了极致，使他不由得提起笔来，给老师写了下面这样的书信。在介绍这封信的时候，我忍不住要在旁边多嘴。我在大学里主修的也是哲学，唯一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了自己是个多么形而下的人。在热衷形而上的马可的字里行间插入括号，括号内的文字就是我这个形而下到无可救药地步的人的“声音”：

> 我狂怒不已，同时也极度悲伤，因为我所追寻的东西，丝毫不见踪影。
>
> （当然了，三千年的哲学史上，还没有可以轻易发现的真理。）冥思苦想之余，我不禁把自己的能力和其他哲学家作对比。
>
> （最好别这样。）
>
> 我茶饭不思，头脑中充斥的都是一知半解造成的焦虑，简直就要爆炸了。
>
> （这毫无意义。）
>
> 在雅典的议会里，当辩论出现白热化，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有一位议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每当争执不下的时刻，全体议员先回家睡上一觉，然后再作决定。现在我也要采取这个办法，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先去睡觉。
>
> （这就对了，这是最好的办法。）

信中的马可以令人感动的坦率表现出了真实的自我。但是马可的教师并非只有弗龙托一人。如果将来自北非的弗龙托比作马可高中时代的老师，那么其他灿若群星的希腊学者们也在负责马可的教育。可是马可并没有像对待弗龙托一样与他们每个人都保持书信往来。我想如果用平常的话来讲，这可能是因为希腊的学者们都有些俗不可耐。很多希腊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希腊人虽然受到罗马人的统治，可是希腊在文化上更胜一筹。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希腊文化的偏爱也对这种意识起到了强

化作用。凡是罗马的精英人物就都懂希腊语，然而在希腊，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未必通晓拉丁语。罗马帝国是双语国家，西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所以这种意识的源头还得从学习意愿上去寻找。

弗龙托来到首都罗马，在法庭上做辩护律师，取得了成功，最终被哈德良选拔为少年马可的家庭教师。不过这个弗龙托的家乡，却远在努米底亚行省，位于今天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君士坦丁。如果再上溯350年，那个地方还归迦太基领有，所以弗龙托遗有一篇《代表迦太基人在元老院的致谢演说》。然而他同时也无视自己的出身，坚持认为自己就是罗马人。那么他代表迦太基人去发表演说就如同一个仅是出生于静冈的日本人声称自己代表静冈一样。其实如果探寻马可· 奥勒留的祖先，会发现他们来自西班牙南部的贝提卡行省。

可弗龙托也是极其优秀的教师，他在写给学生马可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哲学告诉你该说些什么，而雄辩告诉你怎么说才令人信服。”

当时的马可痴迷于哲学，甚至一度模仿犬儒学派的哲学家，身穿粗布衣服直接在地板上睡觉，后来虽然不再坚持，但在内心仍存留着些许遗憾。而弗龙托这样开导马可：

“恺撒啊，我们先假设你同克雷安德和芝诺（二人均为公元前3世纪希腊形成的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认为幸福实际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善。他们采取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样的立场：一个人幸福的唯一条件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德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译者注）等卓越的哲学家一样，生来就具有非凡的智慧，可是你单单与这个愿望背道而驰，命中注定穿不上哲学家的粗布衣服，而是披着皇帝紫色的斗篷。”

就这样，师徒二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了将近30年。身披紫斗篷成为皇帝的弟子是老师的骄傲，弗龙托曾这样回复皇帝马可· 奥勒留写给自己的祝寿信：

>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人生感到充实和满足。可是我的人生不仅于此。你将来必定像我所强烈期待的那样，是个英明的皇帝。在你尚且年幼时，我就确信这一点。那么在你身居帝位的现在和将来，你也的确是公正完美的君主。身为教师的我还有一个长远的梦想，就是你能受到罗马帝国广大民众的爱戴，由衷地拥护你做他们的领袖。并且你还是我心目中暗自期待的弟子。这些虽然是你平时的自我要求，你却通过鼓舞性的言论引导了人们，充分展现出了领袖的风采。

很多年过去，在人生的最后，皇帝马可在《沉思录》中，这样阐述他领导下的罗马帝国的最终目标：

> 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个人的权利与言论自由都受到保护。实现这个目标，正是以全力保护全体臣民的自由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存在的理由。（相关内容见《沉思录》卷十二。——译者注）

文中关于法制平等、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观点，丝毫不亚于一千六百年以后在欧洲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想，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将其付诸现实。

对“res publica”这种共同体或国家进行运筹管理，并不是只要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就能够实现。如果不把共同体中那些和崇高理想距离遥远的成员拉拢过来，理想永远不能变成现实。人和人之间本来就各不相同，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千三百五十年以后出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说，构成共同体的民众尽管对抽象的事物判断错误，可是对具体事项往往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词典中所谓的“形而上”，就是“无法感知的形”、“超越有形的（事物）”，也就是“无形”。反之“形而下”则是“用形来展示的事物”、“具备形的东西”，也即“有形”。只靠形而上的思想无法推行政治，原因也正在于此。马基雅弗利还说，保证自由和法制平等虽然无比重要，可是民众最关注的仍旧是安全与食物的保障。对待民众，的确需要通过简单明了的“形”，而且是与他们最关注的事物相联系的“形”去宣示理想。

那么，怎样才能展示出崇高理想的具体的“形”呢？

这些已经不是通过课本就能够学到的东西，可以去实际体验，只能根据现实情况研究适当的对策。头脑中的冥思苦想未必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精神形成期的青年时代没有积累过实际经验的人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结婚可能是一个转机，可是在马可这里，婚姻非但没有带来转机，反而使当时的生活固定化了。

结婚

从公元145年开始，在马可写给老师弗龙托的信件的结尾，“母亲也向您表示问候”这句话变成了“我妻子也向您表示问候”。虽然母亲多米提亚· 露西拉并没有过世，可是马可却在自己24岁的这一年和皇帝的女儿芙斯汀娜结婚了。此前双方的婚约延续了7年，因为他们要等到新娘长到15岁。

皇帝安敦尼以从不关照亲朋好友而闻名，不过对自己的女儿却是例外。有人说，如果皇宫里没有芙斯汀娜，那么安敦尼宁可去流放地生活。在皇帝的安排下，马可获得“恺撒”称号后不久就住在皇宫里，包括

中间结婚，前后长达22年。这正符合安敦尼对“甜蜜家庭”的喜好。

不过，正如众人所称道的那样，皇帝并没有垄断所有权力。女儿大婚之际，女婿也第二次就任执政官，又成了皇帝的同事，真可谓双喜临门。在罗马，担任执政官是莫大的荣誉，甚至有“前执政官”这种专门称谓。当时罗马人只要一听说某某是前执政官，立刻就知道他肯定是元老院里的重量级人物。通常情况下30岁才是进入元老院的年龄，可是马可早在24岁时就已经是第二次成为执政官了。

马可的妻子芙斯汀娜

又过了两年，公元147年11月30日，芙斯汀娜产下第一个孩子。因

为是女儿，所以采用了祖母和外祖母的名字，即以多米提亚· 芙斯汀娜为名。

第二天，12月1日，因孙女的诞生而兴奋不已的安敦尼将皇帝的特权之一“护民官特权”分赠给了马可，同时赋予女儿“奥古斯塔”（皇后）的称号。

所谓护民官特权（tribunicia potestas），指的是共和制时代具有独特意义的护民官（tribunus plebis）所得到的特权。这个词翻译得十分精彩，因为在共和政体初期，罗马和希腊的雅典都发生了贵族和平民的严重对立，这个职位就是为了保护平民而设立的。之所以说是“特权”，是因为执政官以下的其他要职，都是在公民大会上由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贵族和平民毫无差别地投票选举出来的，唯有护民官是通过平民集会进行选举，只有平民才有权参选。我以前曾把这个职位比喻为工会主席。

皇帝拥有护民官特权是从尤里乌斯· 恺撒开始的，因为在他构想的罗马新秩序即帝制之下，罗马国内不允许存在体制与反体制两种力量。社会的分裂会造成国家的衰落，他可不想重蹈城邦国家雅典的覆辙。

恺撒之后，奥古斯都按照恺撒描绘的蓝图建立了帝国，护民官特权也作为历代皇帝的职责之一延续了下来，而现在安敦尼· 庇护却将其送给了马可，这就使马可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皇位继承人，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接近帝位的下任皇帝。在帝位继承人时期就获得“护民官特权”的还有图拉真，可图拉真是在44岁时才获得的，而马可仅26岁，就已经获得了未来职位的保障。如果这不是皇帝因含饴弄孙赠与女婿的礼物，那还能是什么呢？另外，赋予生产不久的、年仅17岁的女儿“奥古斯塔”的称号，也让我们看到了贤明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另一面。

奥古斯塔（Augusta）是奥古斯都（Augustus）的阴性词，“奥古斯都”既是开国皇帝的名字，同时也代表着后来的历任罗马皇帝，所以“奥古斯塔”指的是“皇后”，而绝不是“太子妃”。若用拉丁语称呼“恺撒· 奥

古斯都”指的就是皇帝，而“奥古斯塔”就是“皇后”。如果只有“恺撒”一词，则指“皇太子”。此时安敦尼的妻子已经去世6年多了，宫中第一夫人的位置长期空缺，也不排除皇帝可能有填补空缺的考虑，然而丈夫尚且只是“下任皇帝”，妻子却提前一步荣获皇后才拥有的名号，这令马可的地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哈德良皇帝之所以指定安敦尼为继承人，是因为安敦尼接受了把马可收为养子的这一条件。然而，登上帝位的安敦尼很快就撕毁了哈德良为马可订立的婚约，而把自己的女儿芙斯汀娜推过来李代桃僵，时至今日，又为她罩上了“奥古斯塔”的光环。因为妻子的捷足先登，马可认为自己是先成了芙斯汀娜的丈夫，然后才获得的下任皇帝的资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马可·　奥勒留和芙斯汀娜离婚，可是马可回答说：“如果离婚，那么我必须交出帝位。”就这样，先帝哈德良早就为马可安排好的皇帝位置，结果却被安敦尼·庇护拿来做了女儿芙斯汀娜的嫁妆。

结婚的马可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获得“护民官特权”之后也同样如此。皇宫生活从公元139年开始，直到161年安敦尼撒手人寰，其间经历了22年之久。如果从结婚后开始计算则是16年，这16年间夫妻二人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未满周岁就夭折了，但如果加上公元161年出生的一对双胞胎，这个帕拉蒂尼山上的“甜蜜家庭”简直就是个幼儿园。

几点疑问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内心里长期保留的疑问，共分三点：

一、自登上帝位开始，23年来，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行动范围就仅限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地区，这难道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没有影响吗？

二、对下任皇帝马可而言，这23年相当于从17岁直到40岁，为什么安敦尼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去体验生活呢？

三、在人的一生中，从精神到肉体，17岁到40岁之间都可谓最佳时期。

马可本人难道不曾向皇帝提出过请求，希望也获得去地方上积累经验的机会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提出并回答上面的第一条疑问。

后世不吝以“五贤帝时代”这个词来称颂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五人的统治，时间则是从公元96年开始直到公元180年间的一个世纪。只要是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会用“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来称呼这一百年。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前三章对帝制时期进行总结，而真正开始讲述衰落与灭亡过程的第四章，是从马可· 奥勒留死后，其子康茂德公元180年登上帝位时起笔的。

也就是说，吉本认为，罗马的衰亡是随着五贤帝时代的结束才开始的。不只是吉本，直到现代，盛行的观点都大致如此。正因为这样，也就没有人试图从安敦尼· 庇护的统治中探寻后来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实际上，如果只从表面现象看，安敦尼· 庇护的确是个贤明的皇帝，在公元2世纪，当时他的罗马人同胞也认为安敦尼· 庇护的统治具有“秩序支配下的稳定”（tranquillitas ordinis）的特征。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曾叹息，说这23年间简直“无事可记”。

除了在不列颠及北非的极少数冲突，包括与国界外伺机而动的蛮族之间，罗马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虽然有些继任者喜欢随意改变前任的人事安排，可安敦尼却完全加以延续，没作任何改变，甚至连围绕

着人事安排的情感变化都不曾出现，这种“稳定”代表了安敦尼的治国风格。人才录用的公正和战争的平息也使国家财政制度得以健全。既然国家财政保持着盈余，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变更行省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秩序，所以罗马帝国的城市核心与地方自治体也都能充分发挥功能。我在《罗马人的故事9 · 贤君的世纪》中所描述的安敦尼· 庇护，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时代里，幸运地治理着国家的皇帝，也即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们所认识到的贤明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形象。

并且从理论上看，即使蛰居于首都罗马23年，安敦尼也仍有充分可能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统治，因为这其实取决于组织机构能否迅速快捷地收集情报和发送指令。送抵皇帝处的情报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总督或军团长通过罗马派出的信使呈送而来的报告，另一种则是行省民众发出的请愿。而罗马的历任皇帝都致力于加强帝国的国营邮政制度，其水准之高在当时是不容置疑的。陆地上的罗马大道有如今天的高速公路，每个驿站都可以换马，日夜兼程。而海路上的每个港口都能保证信使换上最早出发的船只。直到一千七百多年以后发生了产业革命，人们才终于突破公元2世纪罗马人在安全和快捷两方面所达到的信息传递水平。故而，当安敦尼指出“留在首都罗马这个帝国中枢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也方便依此作出决策或发布紧急命令”，宣布自己不会像先帝哈德良那样去帝国各地视察时，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意见。而且，皇帝安敦尼· 庇护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也证明了自己的做法是无可指摘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发出“一切顺利，无事可记”的叹息就是证据。

其实安敦尼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不愿让自己犹如晚年的哈德良那样健康受损，所以才把活动范围局限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而结果说明一切，尽管皇帝除了在上述两地工作和休息之外从不去周边地区，帝国却完美地发挥着功能。当然，这也是皇帝对监督的确从不懈怠的缘故，虽然他进行的只是一种遥控式的监督。我想也正是这种成功的结果导致了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去关注皇帝安敦尼23年仁政背后的各种因素，因为如果有人问：“难道这种管理不完美吗？”我们似乎也只能回答：“不，

它很完美！”

身居意大利本土，而能够顺利统治整个帝国的先例，比安敦尼更为彻底的是提比略。此人连首都罗马都放弃了，直接搬到了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上统治帝国。不过，虽然登上帝位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可是像他那样在成为皇帝之前就踏遍了帝国全境的人却也是凤毛麟角。因为当年皇帝奥古斯都将责任重大的职位赋予了妻子莉薇娅带过来的与前夫所生的提比略和杜路苏斯两兄弟，把尚且年轻的他们送往各地的战场。提比略未能涉足的地方，恐怕只有北非了，也就是说，在56岁继皇帝位时，他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仅仅在小亚细亚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安敦尼不可与其同日而语。

而且，提比略同样没有忘记在情报的收集和命令的下达方面开动脑筋。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卡普里岛有沦为孤岛的危险，这时提比略会选择离开，搬到那不勒斯湾西侧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别墅里。这里和海上的联系很方便，并且同首都罗马之间有阿皮亚大道相连。很明显，这是为了避免情报断绝而采取的措施，而最后他也是在这座别墅里离世。

帝国初期提比略皇帝能做到的事，帝国鼎盛时期的哈德良皇帝当然也不会做不到，因为紧接着他登上帝位的安敦尼事实上就采用了同提比略相似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而且安敦尼和提比略在位的时间都同样是23年。可是，为什么只有哈德良却不惜折损自身的寿命，呕心沥血地到帝国各地去视察呢？

第一，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知识与经验的关系上。

有一句格言，智者学习历史，愚人学习经验。可是我认为，如果想成为智者，历史和经验两方面缺一不可。“历史”也可以说是书籍，学习它的好处在于能对古今中外人们无比丰富的思想与经验进行再体验，这些知识是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直接获得的。而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经验”会告诉我们怎样灵活运用这些依靠再体验而获得的知识。也就

是说，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只有和现实体验相结合才能成为可以灵活运用的知识。树立起这样的指导思想以后就会明白，那种认为只要依靠正确情报就能采取适当对策的论调，不但是过于依赖了没有知识含量的情报，而且制订出的对策也是充满危险的。

第二，出于他对于情报本质的认识。

情报不可能自动汇聚，在收集情报阶段，人为因素的掺入是无法避免的。

情报负责人只收集和呈送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情况，也就是说，在收集整理阶段就已经掺杂了个人对问题的认识标准即忧患意识，而且还不止于此，在接收情报加以利用的阶段，个人的问题意识就更无法回避了。即使在现今的计算机时代，这一点仍旧没有丝毫改变。哈德良之所以选择了身体力行眼见为实的做法，可能就是因为他谙知情报的这一性质。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忠诚的部下，也未必具备与他完全一致的忧患意识。

第三，在于他对合理与不合理的关系的认识。

他通过亲自巡回视察来重建帝国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合理”的。相对的，检阅承担防卫任务的兵士，对他们承受边境不便生活的苦劳表示慰问，用“你们挑起国家安全的重担”等豪言壮语去激励他们，所有这些都诉诸感性，因而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战场上的胜利必须依靠主力，但如果没有辅助力量从旁策应，主力就不可能运用得完美。合理与非合理的关系也是如此。对驻扎在边境上的军士而言，能够亲眼看到身兼最高总司令的皇帝、亲耳听到皇帝讲话的机会，无疑一生只有一次。罗马帝国疆域辽阔，防线漫长，由于当时交通情况所限，纵然是哈德良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视察同一地区。

罗马帝国是多民族国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跨国公司。总裁毫无遗

漏地巡视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当地法人，一旦发现问题立刻提出解决办法并加以实施，选拔负责人时也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发现了值得提拔的人才以后，不分人种和民族一律录用。——跨国公司的这些做法也是哈德良在20年间的国家治理中不断思考并加以推行的政策方针。

而与此相对，安敦尼· 庇护则类似于蛰伏于公司本部，根据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来管理跨国企业的总裁。他的全部海外经历只不过是董事时期曾在一家分公司担任过总经理而已。尽管如此，由于皇帝在位时期国泰民安，因而也没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当皇帝75岁故去时，整个帝国都沉浸在哀思之中。

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在安敦尼· 庇护在位的23年间，对下任皇帝马可· 奥勒留而言，就是从18岁直到40岁之间的时光，安敦尼为什么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和边境去体验生活呢？

虽然以前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不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可我还是找到了一位和我同样持有疑问的人。他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安敦尼· 巴勒教授（Anthony Birley）。据这位英国学者计算，马可真正离开皇帝安敦尼的生活可以说只有两天。23年乘以365天得到的结果超过8300天，可是马可只拥有两天自己独立的生活。该教授认为，皇帝安敦尼已经安排下任皇帝即自己的女婿马可充分参与了中央的政治生活，再加上帝国基本维持了和平，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让马可再去边境地区进行实地体验了。不过，只要想一想马可成为皇帝以后需要面对众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可以说，安敦尼的这种做法是“应该加以批评的”。

我内心的第三个疑问，就是在皇帝安敦尼身边生活，从18岁到40岁之间，难道马可自己不曾主动要求过到地方上去积累经验吗？对此问题，安敦尼· 巴勒教授一句话也没提。罗马时代的家长制权力十分强大，是不是养子马可只能遵从“父皇”的意见呢？

可是，在罗马的“儿子”里面，也有不少反对“父亲”的。当年在跨过

卢比孔河的恺撒麾下，就聚集着元老院议员的儿子们，以致西塞罗发出悲叹，称当时是“儿子张弓瞄准父亲的不幸时代”。西塞罗的儿子也是恺撒的拥护者，结果西塞罗只好把这个儿子送往希腊留学，以免他卷入内乱。而且，罗马时代人们在18岁到40岁的这段时期，和现代迥然不同。如果是一名军团士兵，那么此时20年的服役期即将结束，他会带着退役金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难道说，即使在这样的人生阶段里，马可也一直遵从着“父亲”的安排吗？

我认为，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应该隐藏在此间马可和恩师弗龙托频繁的通信中。很遗憾，这些信件还没有译文，每当阅读这些信件时，马可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诚实好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毫无抵触地接受别人教给的知识。好学生，重视家庭生活。身为皇帝，有着率先垂范的强烈自觉。对于自己的引路人充满深厚的敬爱之情。

马可忠实地恪守师长的教诲，在观赏有如现代一级方程式的四马战车竞速比赛时，也绝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看来所谓的帝王教育，还要求接受者必须作出巨大的牺牲。然而，在这些工工整整的信笺中，我们却丝毫没有发现一个年轻人所应该具备的强烈的独立精神，而当时人们对贤明的马可· 奥勒留皇帝的唯一批评，就是他的“虚伪”。（相关内容见《沉思录》卷九。——译者注）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因素是，或许登基前的马可和安敦尼一样，都不具备哈德良的那种忧患意识。现在我们只要用罗马大道的整修做比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马的工程技术人员曾夸下海口，说他们铺设的是一条一百年也无须整修的大道。可是，他们所谓的“无须整修”，指的是不必像尤里乌斯· 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图拉真那样，把道路最上层的铺路石全部掀开，重新修筑下面的四层路基。工程师们的意思绝不是说道路不用进行日常维护。事实上，每一条罗马大道都设置了一种名为“驿长”（curator）的官职，专门负责日常维护等必需的小规模工程，以使道路时刻保持在完

美的状态上。

哈德良的治国方式，就如同奥古斯都对弗拉米尼亚大道进行全线整修。距哈德良一百年后出现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曾说，直到他那个时代，哈德良重建的军事体制仍旧在充分发挥功能。

虽然真正的大修一百年进行一次就已经足够，但日常的维护必不可少。安敦尼· 庇护也好，马可· 奥勒留也好，恐怕都对这种“日常维护”的必要性缺乏自觉。晚年的哈德良变得性情暴躁，难以交流，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即便是对他毕生事业具备理解能力的人，也不能真正理解他，所以他才深感绝望和愤怒。顺便说一下，马可在《沉思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表达自己对安敦尼的温暖回忆，而对哈德良却只字未提。我认为，一个人和别人之间能否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可能并不在于他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在于他掌握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他对那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内心感受。

各位读者可能以为，本卷书会接续《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以马可· 奥勒留的统治为开篇，肯定想不到我竟然用如此之长的篇幅作铺垫。可是，如果不把这些背景叙述完毕，我们就无法谈论登基后的马可。因为和安敦尼时代“秩序支配下的稳定”截然不同，到了马可· 奥勒留时代，棘手的问题变得堆积如山。

作为罗马帝国口碑最佳的皇帝，关于马可· 奥勒留的传记和评论也为数众多。这些文字对马可的一贯评价是，他虽生于艰难时世，却是一位全力以赴、坦率处理所有难题的贤明皇帝。尽管他死后罗马帝国很快滑向衰亡的下坡路，但那也是从那他无德无能的儿子康茂德登上帝位之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成为皇帝的马可· 奥勒留连遭不幸，所以他在《沉思录》中流露出了失意与忧愁也情有可原。然而，我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简单的解释，因为我认为皇帝马可· 奥勒留所必须面对的众多难题可以分成四种：

一、像天灾这种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问题。

二、在安敦尼· 庇护治下的23年间，如果始终怀有忧患意识的话，有可能预测到的问题。

三、马可在登基之前，从18岁到40岁的时间里，如果去积累实际经验，那么做了皇帝以后的他可能改变对策的战略战术问题。

四、时代的变化。

在此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能把这四种问题放在脑海里。这并不是说皇帝马可昏庸无能，而是恰恰相反，这有助于大家更深刻地体会连贤明卓越的马可皇帝都不得不饱尝的苦恼。

皇帝马可· 奥勒留

公元161年3月6日，在罗马近郊别墅里小住的皇帝安敦尼· 庇护，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两天之后就死去了。与23年来国家“秩序支配下的稳定”相映照，他像睡着一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再有半年皇帝就75岁了，深感自己阳寿已尽的他只来得及留下了一句遗言和一道指示。遗言的内容是国葬不要过于奢华，而最后的指示则是吩咐侍臣把应该放在皇帝卧室中的幸运女神金像搬到马可的卧室中去。这样做只表示一个意思，即下任皇帝是马可。

当一个家庭里的长辈离世，首先要安排的就是死者的葬礼，帝王之家当然也不例外。安敦尼的养子和继任者马可的任务就是为“父亲”安敦尼举行国葬。然而马可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和比自己小9岁的弟弟路奇乌斯共同主持此事。当年安敦尼接受哈德良的要求，同时收养了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个人为养子，然而在安敦尼· 庇护治世时，只有马可被提拔到权力中枢，路奇乌斯则是配角，形象模糊，差距明显。因而在出席国

葬的元老院议员们看来，兄弟二人只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同时出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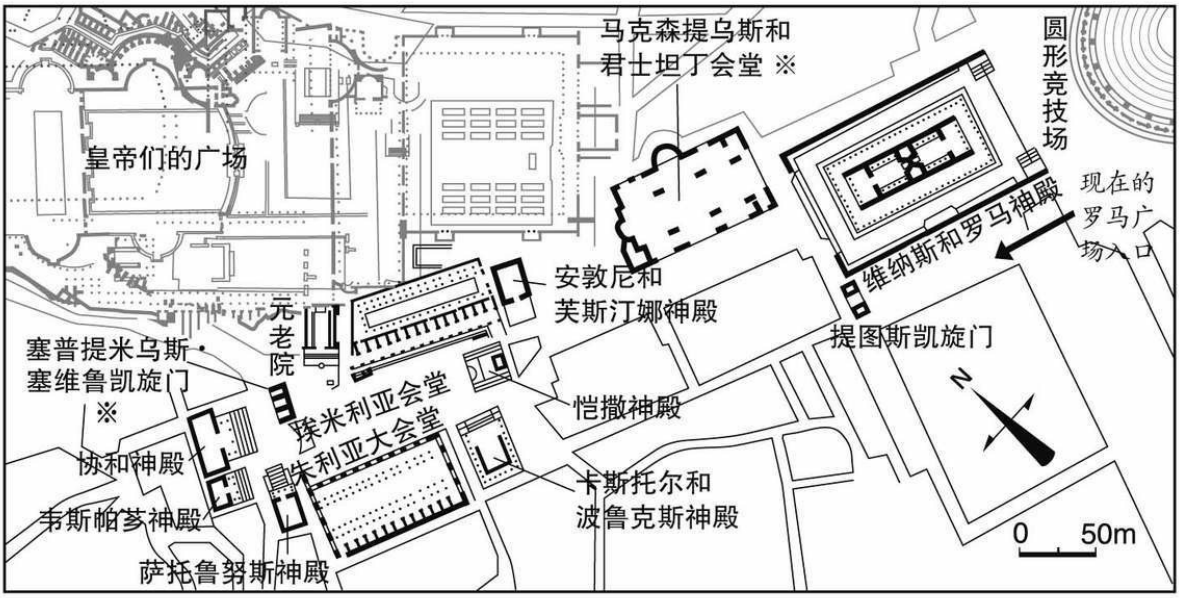
随着遗体火化完毕，国葬也就宣告结束。安敦尼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为国操劳，死后还想继续守护罗马国民，所以当他的骨灰被安放到人称“哈德良神殿”（Mausoleum Hadriani）的皇帝祠堂后，两位养子还有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提请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父神格化。

可是在罗马，连败者的神明也能获得类似公民权一样的存在资格，所以尽管说是提请决议，也只不过是让罗马人多达30万的神明多出一个而已，而并不是要树立一个像一神教的那种万能的神明。

实际上，前任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神格化很顺利地就实现了，因为早在马可提出请求前，元老院就已经全票通过了该决议。这和哈德良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元老院在安敦尼提出请求前，就迫不及待地通过了拒绝将哈德良神格化的决议，以至于安敦尼为推翻决议不得不苦苦哀求，几乎流下了眼泪。这是因为哈德良个性独断，在任内总是离开首都外出视察，而元老院则喜欢凡事与自己沟通的皇帝。安敦尼 · 庇护在位期间一直住在意大利本土，作决策时也一贯尊重元老院的态度，所以最后享受优待也是理所当然的。

神格化的同时，还要建设供奉升格为神的前任皇帝的神殿。献给安敦尼· 庇护的神殿竟然建在了罗马市中心地带罗马广场（Forun Romanum）。在罗马按照王政、共和、帝政依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罗马广场一直是政治、经济、司法和行政的中心地带，很像是现在的国会，元老院也位于此地。帝政时期的皇帝们先后建设广场，中心地带不断扩大，但只要一听“罗马广场”这个词，就连从未到过罗马的偏远行省的居民也会立刻知道，这一带就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总统与国会，而元老院居然以全票通过将“安敦尼· 庇护和芙斯汀娜神殿”（Templum Antonini pii et Faustinae）建在罗马的中心地带，也进一步证明了安敦尼将这一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作为继任者，马可直到40岁都一直围绕在安敦尼身边，政务处理能力不输给任何

人，毫无疑问，元老院的议员们也相信马可治国期间会像安敦尼一样，继续维持“秩序支配下的稳定”。



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广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

两位皇帝

皇帝的登基典礼在元老院的议事厅举行。既然是仪式，就有一套既定的程序。首先，由元老院的全体议员派出一位代表，面向前任皇帝指定的继任者发出邀请，请他就任皇帝。而被邀请的人则需表示自己无力承担此项重任，予以回绝。于是议员代表只好再次发出请求，对方此时才可以正式接受邀请，同时向议员们宣布自己出任皇帝所要采用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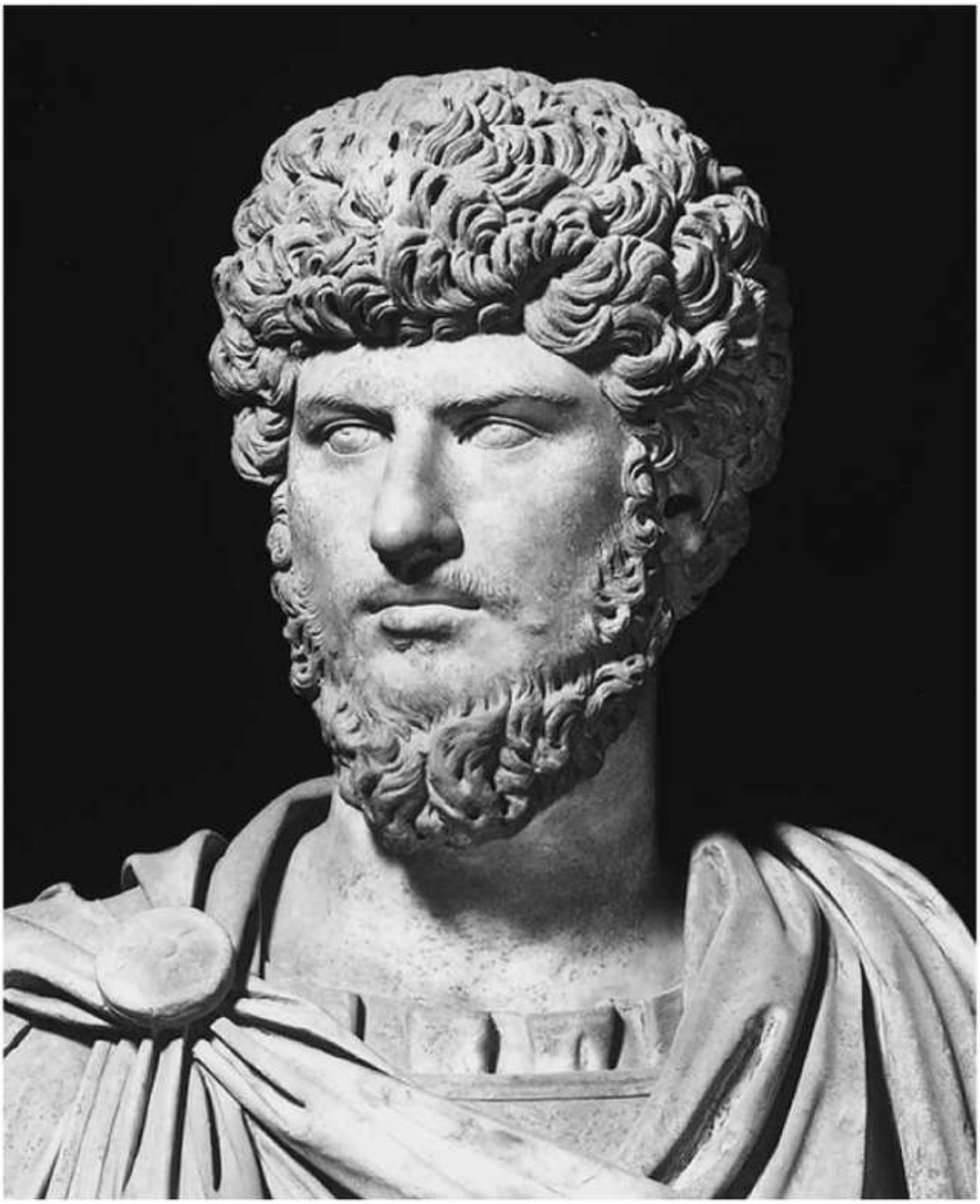
登基典礼至此才算宣告结束，因为不管怎么说，罗马的正式统治权仍属于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罗马帝国的皇帝只是接受他们的任命，代为治理国家。

可是，那一天的典礼打破了这套既定的程序。因为马可当场宣称，要接受登基邀请的不能只有他自己一人，而是他和路奇乌斯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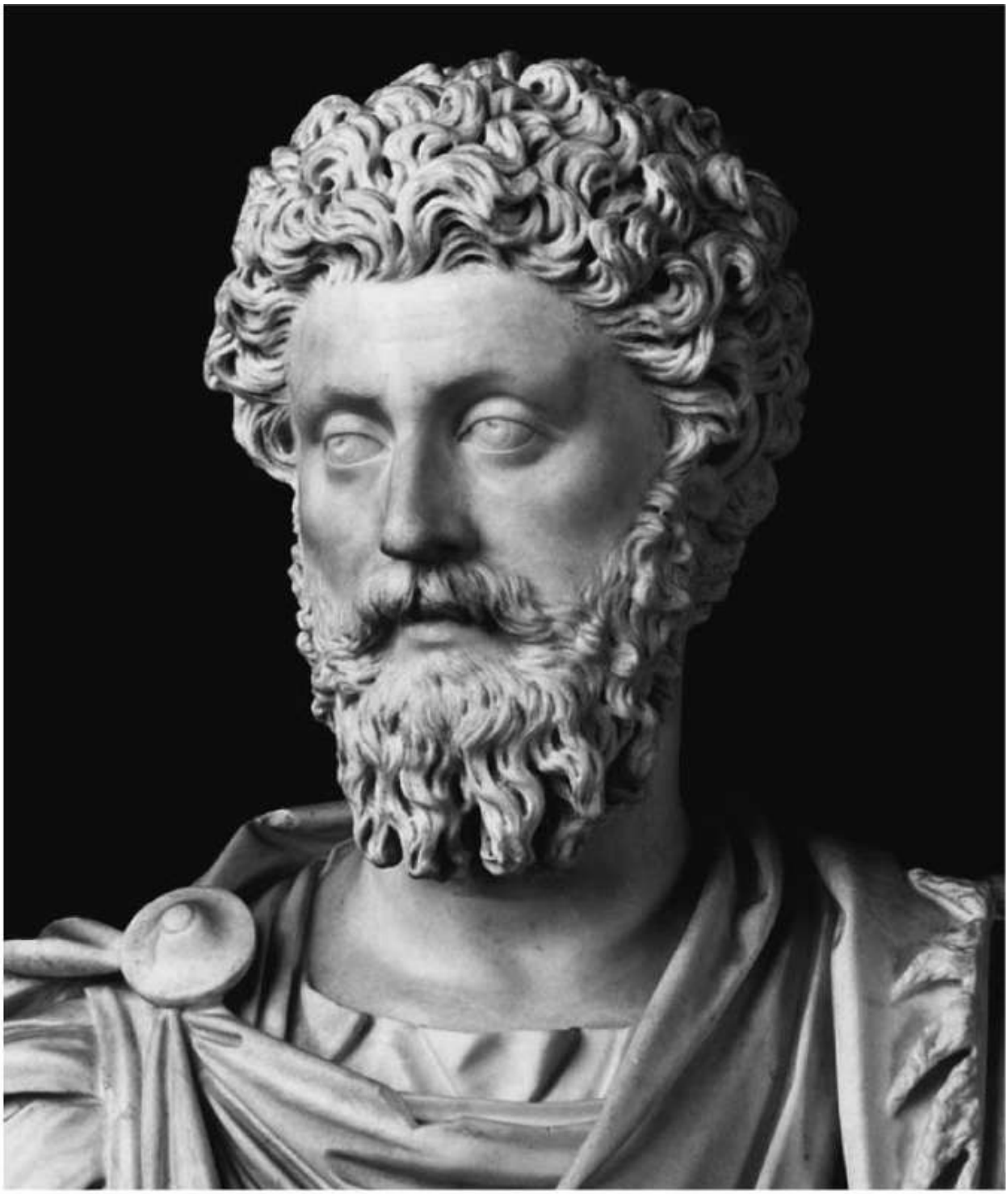
这可完全超出了元老院的预料，议员们都难掩惊讶之情。因为在罗马的帝政时代，还不曾有过同时树立两位皇帝的先例。然而，马可那静静伫立着的沉着姿态，表现出了深思熟虑后的坚定决心。于是元老院的代表只好同时向40岁的马可和31岁的路奇乌斯两人发出登基邀请。两人也依照惯例，拒绝过一次之后接受了邀请。两位皇帝还公布了自己的正式名称如下：

马可——“皇帝· 恺撒· 马可· 奥勒留· 安敦尼· 奥古斯都”（ImperatorCaesa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

路奇乌斯——“皇帝· 恺撒· 路奇乌斯· 奥勒留· 维鲁斯· 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Lucius Aurelius Verus Augustus）请各位注意，在两人的正式名称中，都含有“皇帝”、“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三个词。“恺撒”和“奥古斯都”应该不必再解释了，而意味着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一词，当年终身独裁官尤里乌斯· 恺撒使用了这个名称并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以后，自奥古斯都开始的后代历任皇帝都在自己的名称前冠上了这个词，意思是说虽然与尤里乌斯· 恺撒没有血缘关系，但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都是这位实质上的首位皇帝的继承人。



马可·奥勒留



路奇乌斯 • 维鲁斯

那么，马可· 奥勒留为什么要突破先例，毅然决然地实行两帝并立呢？而且两人还不是“首席皇帝”和“二号皇帝”的关系，而是拥有同样级

别的尊严与权力，完全平等的两个皇帝。

一、共同享有代表皇帝的“恺撒· 奥古斯都”的称号。

二、共同享有赋予罗马军队最高责任者的“全军最高司令权”。

三、共同享有保护一般公民权利的“护民官特权”。

四、共同享有“第一公民”的称号，意思是公民中的“第一人”。

罗马没有专职的祭司阶层，所以他们二人唯一不能共享的，是由皇帝兼任的大祭司。依据罗马的传统，这个职位只能由一人担当，于是马可· 奥勒留单独就任了大祭司。

我想当哈德良要求安敦尼收养尚处于少年时代的马可和路奇乌斯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让这两人同时就任皇帝，而是认为马可体质孱弱，一旦出现意外，路奇乌斯就可以顶替马可，履行皇帝的职责。后来安敦尼· 庇护即位，把意味着下任皇帝的“恺撒”称号只授予了马可一人，也很明确地表明了将来只让马可一人登基。而元老院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可· 奥勒留即位之后，再把“恺撒”的称号授予弟弟路奇乌斯，明确弟弟下任皇帝的地位。

可是现在，马可作出了与路奇乌斯共享帝位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在《沉思录》中，某些内容涉及了罗马帝制的反对者，即“反体制派”的人们。马可通过塞维鲁斯知道了这些人，并一一列举出了他们的姓名。除了其中一个，其余的都是元老院议员。我想，观察马可· 奥勒留对这些“反体制派”的记述，应该是了解他当时思想的一个有效手段。

马库斯· 波尔奇乌斯· 加图——为了和历史上的大加图相区别，史称此人为小加图。西庇阿· 阿非利加（约公元前235—前183）在第二次布

匿战争中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此后一直享有救国英雄的荣誉，是大加图基于共和制的罗马无须英雄的信念，将其拉上法庭，使其失去政治势力。小加图是大加图的后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同样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于是理所当然，小加图发誓要打倒的敌人，只能是尤里乌斯· 恺撒。这个人有名的地方在于，他与恺撒作战失败，逃到了乌蒂卡，明知投降就可获得赦免，却依然慷慨赴死。他并没有服毒或割腕，而是选择用切腹的方式自杀，悲壮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库斯· 尤尼乌斯· 布鲁图——小加图的外甥，同时也是小加图的女婿。此人执迷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是共和主义者，元老院派领袖。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暗杀了尤里乌斯· 恺撒。两年以后，在希腊的腓立比郊外，他同恺撒派的马克· 安东尼和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败走途中，刎颈自杀。

托拉塞亚· 佩多斯——是帝政时期有名的共和主义者卡艾奇纳· 佩多斯的女婿，此人撰写了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小加图的传记。在每年布鲁图的诞辰日，他家都要举办庆祝宴会。当尼禄下令杀掉母亲阿格里皮娜时，他从元老院退场以示抗议。这一举动当然会引起尼禄的愤怒，最后佩多斯被迫割破自己的血管自杀。

埃尔维狄乌斯· 普利斯库斯——托拉塞亚· 佩多斯的女婿，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曾受到岳父的牵连而入狱。获释后毫无顾忌地四处宣讲自己的共和主义主张，招致了皇帝韦斯帕芗的不满，被以图谋推翻帝政的罪名处以死刑。

普鲁萨的狄欧——图密善时代到图拉真时代的最有名的辩论家，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共和主义者的身份，但在《沉思录》里提到的共和主义者中只有他活了下来。

即使在帝政时代，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憧憬共和而遭到镇压。比如小加图就一直敌视恺撒，再比如布鲁图的投降也被恺撒所接受。恺撒曾

给立场对立的共和派雄辩家、同时也是自己友人的西塞罗写信，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 即使被我赦免的那些人日后再次朝我拔剑相向，我也不会感到丝毫懊恼。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只要活着就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我想别人当然也会这么认为。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后继者，也是他的养子。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刊行了被共和派视为“圣经”的西塞罗著作全集。历史学家李维从不掩盖自己共和主义者的身份，而奥古斯都却戏称他为“庞培迷”。而庞培和小加图、西塞罗以及布鲁图一样，都属于反恺撒派，后在与恺撒的法萨卢斯会战中败北。

也就是说，在罗马的帝政时代，人们只要没有推翻现行体制的行为，大可以自由向往共和。可是，如果作为帝国象征的皇帝本人也对共和政体态度暧昧的话，情况就会出现微妙的不同。因而皇帝马可· 奥勒留似乎也只能在并无刊行计划的私人笔记《沉思录》中，悄悄记下这些“反体制派”的名字。我想，即使只从这一行为观察，也不难理解马可推行两帝并立制度时的心情。罗马在共和时期，公职的特性之一就是复数并立制度。除了大祭司职位以外，就连职位最高的执政官也都是由两人共同担任。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到一个人手里。那么实施了帝制以后，只有皇帝是一人制，理所当然，皇帝一人集中了权力。恺撒和奥古斯都都认为，如果不推行这种专制体制就不可能成功管理这样的大帝国。这虽然是现实主义的考虑，可假如有人认为不论何种理由都不该垄断权力的话，那么在这种帝制之下，他只能加入反体制的阵营。即使在罗马的帝制政体稳固以后，共和主义者依然层出不穷，因为帝制下的共和主义已经成了理想主义。既然人称马可· 奥勒留为“哲学家皇帝”，那么他也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就是这个原因，最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两帝并立事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帝国能否在

这种体制下发挥功能。

皇帝路奇乌斯

两位皇帝的共同统治无比顺利地开始了。元老院起初虽然错愕不已，但他们还是正确理解了马可推行这一制度的真正意图。本对此事漠不关心的士兵和普通公民也都同样友好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按照皇帝即位后的惯例，在访问首都附近的近卫军军营时，两位也是共同出场，他们还同样按惯例给近卫军发放了赏金。至于庆典时送给普通民众的礼物，如在圆形竞技场（斗兽场）举行角斗比赛，或者在大竞技场举行四马战车比赛，两位皇帝也是同时出现在并排的贵宾席上。和70多岁死去的安敦尼皇帝相比，40岁的马可和31岁的路奇乌斯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民众十分满意。

路奇乌斯· 维鲁斯并没有像马可· 奥勒留那样接受过正统的帝王教育，不过“养父”安敦尼也让这个“儿子”拥有了一些“光荣的职务”，即23岁时就任财务监察官，24岁第一次就任执政官。安敦尼· 庇护过世的公元161年，执政官正巧是马可和路奇乌斯二人，当时马可是第三次任执政官，路奇乌斯则是第二次。安敦尼· 庇护肯定以为自己已经让哈德良托付的两个孩子充分积累了政务经验，可是，路奇乌斯· 维鲁斯直到31岁时，既没有军旅生活的经历，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在这一点上，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人简直毫无二致。

至于这个路奇乌斯的性格，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具备着一般次子性格的优点。他没有长子型的马可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却有着奔放豪迈的性情。如果说我们从马可与家庭教师弗龙托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自我控制下的坦诚，那么这个路奇乌斯的坦诚就完全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路奇乌斯并不是十分好学，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具备出类拔萃的教养。

并且，与自幼丧父的埃里乌斯· 恺撒相仿，路奇乌斯也生有一副令女性倾倒的纤美容貌。虽然不能无视他略微狭窄的额头，但额头下面却是一张瓜子脸，所以他用哈德良式的大胡子遮住下巴来改变这种脸型带来的纤弱形象。其实后来罗马历任皇帝都在模仿哈德良的大胡子。

对皇帝安敦尼而言，路奇乌斯即便拥有了“光荣的职务”，也仍然不是马可之后的候补皇帝。简单说来，他只是个板凳队员，本来与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订有婚约，这是哈德良早就安排好的，可是后来安敦尼把芙斯汀娜改许给了马可，对路奇乌斯的婚姻就不再问津了。

结果现在路奇乌斯· 维鲁斯已经31岁，却仍旧是个没有订婚的单身汉。不过，这一点发生在皇帝身上却正好是个优点，整个罗马的女性都为这个年轻的光棍皇帝而疯狂。

最值得浓墨重彩予以书写的，是这个路奇乌斯对马可的感情。待遇的差距往往造成羡慕和怨恨，可是路奇乌斯却完全不以为意，反而似乎认为兄长马可本该处处领先才是。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的确情同手足。

路奇乌斯性格和善，即位之后仍旧和马可一样，与恩师弗龙托保持着书信往来。所以从弗龙托的角度看，两个弟子同时登基，真是让人又高兴又自豪。而皇帝幼时的教育居然是由来自偏远行省的人负责，这也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极好的理由，说罗马是一个世界主义国家。

而从马可这方面看，登基的公元161年是于公于私都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年。

首先，8月31日，妻子芙斯汀娜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样40岁的马可就已经有过11个孩子。可是11个孩子中的4个不到1岁就夭折了，这一年出生的双胞胎中也有一个在5岁时死去，长大成人的只有5个女儿和这对双胞胎中的另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即位的皇帝康茂德。到第

二年，即公元162年，马可家又诞生了一个女婴，随后又有婴儿降生但很快死掉了，如果加上公元170年最后出生的女子，马可前后共生养过14个孩子。看来，哲学家皇帝在制造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也和哲学方面的思考一样认真。然而在政务方面，仅凭认真是远远不够的。

饥荒与洪水

他们遭到的第一个灾难，就是农作物的歉收。或许是公元161年的气候就不正常，往年的夏季几乎不下雨，而这一年的雨天却格外多。这当然会影响农作物的收获。罗马人的主食是小麦，这些小麦除了从埃及、北非以及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购入之外，意大利本土也有出产。可是这一年小麦颗粒无收，并且葡萄、水果和蔬菜等其他农作物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灾民的悲号传到首都，即位不久的两位皇帝只能埋头商讨对策。然而祸不单行，到了秋季，台伯河水又出现了严重泛滥。

现在的台伯河因两岸筑有高高的堤坝，中间的河水缓缓地向下游流淌。然而这样的护岸工程是19世纪建设而成的。在这之前的台伯河水是直接流过两岸人家的房前。如果沿着台伯河的东岸向下游走，与曾经的哈德良神殿“圣天使堡”相对，西岸鳞次栉比的房屋尽收眼底，比沿河岸修筑的车道还要低五六米。现代的护岸工程修筑前的台伯河河岸也就是这个高度。

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地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

罗马现在的纳沃纳广场就是当时的图密善竞技场（Stadium

Domitian），今天仍旧能看到的通往竞技场入口的大门已位于地面以下。而附近的万神殿（Pantheon）是至今唯一保持完好的罗马时代建筑物，当时需要登上台阶才能到达神殿入口，但是现在，游客必须走下万神殿前面广场的缓坡，才能进入神殿的内部。这是因为只有万神殿存留至今，而周围的古代建筑早已崩塌，被掩埋在地表之下，后来各朝代又在上面大兴土木。台伯河向西弯曲，东边的陆地在罗马时代是公共建筑比较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即战神广场），尤其在这一带，现在的地下一层实际上是古代的地上一层。每当人们一修建地下停车场，随便一挖就会挖到地下古迹。所以人们只好把汽车停在路边。如上页图所示，台伯河水泛滥时，容易受灾的也正是这一带。

因此尽管有常任官员专门负责台伯河岸的整修，但帝国的首都罗马仍旧不能避免洪灾，尤其是在马可即位之初的这一年，洪水尤其肆虐得厉害。虽然没有造成公共建筑的倒塌。但洪水的消退相当耗费时日。

正当焦头烂额之时，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紧急报告又接踵而至，帝国的东方有危险的动向。不难想象，对帕提亚国王而言，罗马皇帝的更替期正是发起军事行动的绝好时机。这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并非不可预知。然而，这一年帕提亚军队对亚美尼亚进攻却完全超出了罗马军队的预料。

东方战云

罗马人对情报的收集从不懈怠，所以情报并不短缺。当时罗马帝国和帕提亚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相互对峙。无论哪一段的罗马防线，都允许内外居民往来通商，是“开放的国境”，而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罗马境内的东方都市，无论是安条克还是大马士革，或者帕尔米拉，都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

另外，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间地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一带，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遗留下来的希腊人建起很多城市。而幼发拉底河西侧广阔的罗马帝国境内，主要都市的居民也都是希腊后裔。对这些人而言，所谓防线是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才在意的东西，而在和平时期，几乎等同于没有。

因此情报就可以自由传递。在幼发拉底河上来往的人，容貌、服装、语言等完全相同，就连派遣间谍潜入帕提亚王宫，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帕提亚在罗马皇帝更替时期发起的挑衅也一再重复，甚至到了令人感到愚蠢的地步。可是这一次，位于安条克的叙利亚总督府还是大意了。为什么呢？自从哈德良皇帝重建帝国防卫制度，东方的防线坚如磐石，持续了44年的和平或许已经太久了。

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四世率军侵入的地区，并不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广阔的叙利亚行省，而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即位于帕提亚王国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罗马的传统政策，是利用结盟的亚美尼亚去牵制帕提亚，所以历代罗马皇帝都十分期待亚美尼亚的王位掌握在亲罗马人士的手中。

然而，相对于罗马，亚美尼亚在文化上更从属于帕提亚。因此出于现实考虑，尽管附加了其必须是亲罗马人士的条件，罗马的领导阶层却也不得不认可由帕提亚王室成员出任的亚美尼亚国王。而帕提亚之所以接受“亲罗马人士”这一条件，也不外乎是惧怕罗马的攻击能力。因此一旦出现可乘之机，帕提亚经常要挑起事端。

攻入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进展神速，他们围攻首都，并利用不安的居民发动叛乱，成功驱逐了亲罗马的国王，拥戴反罗马的帕科鲁斯取而代之。而罗马当然无法对这样的事态袖手旁观。

只是叙利亚的行省总督所对峙的是拥有庞大军事组织能力的帕提亚王国，所以罗马帝国赋予了他远超于其他行省总督的权力。其他行省总

督只具备本行省驻军的指挥权，而叙利亚的行省总督则是幼发拉底河防线上卡帕多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4个行省的总负责人。所以每到紧急时刻，除了驻扎在自己任职地叙利亚的3个军团，还有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古阿拉伯即今天的约旦地区的1个军团共计8个军团都会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麾下。

这里有一点需要事先明确，那就是记述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两位贤君40余年统治的文献史料格外稀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只能进行“大概如何如何”之类的推测。那么这一段的史料为什么稀少呢？

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所谓的文献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当事人自己书写的记录。

第二种是与当事人相对立的人写的。

第三种则是“局外人”写的。而所谓的局外人，当然有除当事人以外的同时代的人，而且在空间上，也包括远离首都罗马的偏远行省的居民，在时间上，也包括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阐述以往历史的人们。

那么这三种文献史料在各个时代是以什么样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呢？

我认为公元前1世纪正是拉丁文散文的黄金时代，因为以上三种文献史料都充分存在着。

第一种文献史料的代表为尤里乌斯· 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第二种文献史料的代表则是西塞罗的所有著作。西塞罗这个人，简直可以称为书信狂，以推心置腹的阿提库斯为首，从恺撒到布鲁图都是他的通信对象。所以西塞罗的著作和恺撒的著作一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只要第一种史料和第二种史料内容充实，深受其影响的第三种史料的质量也绝不会逊色。这包括可视为优秀文学作品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ius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译者注]的两部著作，以及出自恺撒部将之手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等。如果同时代人的记录很丰富的话，那么几百年后的人们就会很容易地阐述过去的历史。即便是对两千年后关注罗马的我们而言，那一政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献史料最为丰富的时代。

这是因为该时代的当事人尤里乌斯· 恺撒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

护，至少他本人感觉到了辩护的必要性。如果想用言论作为武器，那么只有让自己的支持者理解事件经过，并说服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人才能做到。文笔不凡的恺撒知道，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客观叙述比自我辩护更有效果。因此记述的虽然是他自己的言行，但他没有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恺撒”。所以尽管著名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恺撒的自辩书，但人们还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那么，恺撒为什么认为有自我辩护的必要呢？具体到《高卢战记》，因为恺撒有必要向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说明为什么罗马必须去征服高卢。当时小加图义正辞严地指责恺撒，说他不等元老院作出决定就擅自攻入高卢，这就是无视元老院的证据，所以应该解除恺撒的总督职务，交给被他击败的日耳曼人。对恺撒而言，如果不想垮台的话，绝对应该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而执笔《内战记》的目的，则是把他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予以正当化，而他这一次并不是未有元老院的许可而出击蛮族。卢比孔河虽然仅仅是一条小河，却是罗马本国与北意大利行省的边界。依照规定，罗马军人不得率军由此南下，带领第十三军团一起渡过卢比孔河的尤里乌斯·恺撒已经触犯了罗马的国法。罗马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建成法律体系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法治国家。面对这样的民众，恺撒当然有必要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得不触犯国法。

当权者如此热衷舆论战，反对派当然也不会沉默。在军事方面，反恺撒派的头面人物是庞培，在元老院，小加图主导了论战，而西塞罗的著作则为反对派提供了理论支持。西塞罗撰写了一部名为《加图》的书，歌颂小加图剖腹自杀的壮烈行为，转眼之间，恺撒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反加图》，对西塞罗的观点予以回击。这个时代的确是武力称霸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唇枪舌剑的论战时代。

公元1世纪初叶，既不是武力称霸的时代，论战的风气也逐渐衰退，帝政开始走向前台。为使自己不像恺撒一样遭到谋杀，奥古斯都一

方面公开宣称共和政体的回归，背后却稳固扎实地推行帝政。狮子披上了斑马皮，暂时按捺住百兽之王的咆哮。也就是说，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而言，大张旗鼓地出版自我辩护的书籍，恐有此地无银之嫌，政治上反而不利。他留下的《奥古斯都功德碑》（简称《功业录》）只是列举了他统治期间传给后世也无关痛痒的措施。

当权者推行怀柔政策，反对派也就失去了锐气。所以说，“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剥夺了反对派的存在理由。因为在万千人面前，帝政也能维持罗马国家运转的事实得到了充分展示。我认为，在想象力方面恺撒可能略占上风，但在推行政策方面，奥古斯都的手腕无疑更加巧妙。

可是，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随着帝政的稳固，狮子开始掀掉斑马皮。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话语增加了，而是因为皇帝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自己辩护了。而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帝政适合于统治辽阔的疆域，不再采取反体制的行动。不过，他们虽然不再反对皇帝的统治体制，但当皇帝出现不胜任的情况时，他们也不会噤若寒蝉。这种体制内反对派的代表是塔西佗。此人被视为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充满了悲观情绪，虽然令人有些望而却步，但的确是忧国之士的真诚呐喊。悲愤真可谓杰作之母。

公元2世纪是五贤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出现的历史著作本应为数众多，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一开始就叹息有关图拉真皇帝的史料过于稀少，其实，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作为当事人的皇帝们的言论。不过贤明的皇帝们连“必要之恶”都没有沾过，所以他们也的确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只有哈德良皇帝曾经从事过“必要之恶”，所以他写过回忆录，目前却已经散佚。而马可· 奥勒留的《沉思录》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并没有记载试图向他人表达的事项，在该书中没有“他人”存在的空间。

如果连当事人们都是这种状态，那么塔西佗自然也就失去了阐述事实的兴趣。而这些事实也表明，对皇帝们表示不满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文献史料极度缺乏。后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些人当时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文献，而且也包括碑文和货币。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平安无事的稳定时代注定也是歉收的时代。

那么，当动荡年代再次到来时，历史著作就会显现活力吗？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思维如同肌肉，需要不停地锻炼。换句话说，就是一旦长期疏于思考，感觉也会变得迟钝。

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161年。当时叙利亚的行省总督是阿提狄乌斯·科内利安努斯，此人老迈年高，已经决定退休，每天都在等待新皇帝任命的下任总督到达。因为安敦尼时代的史料欠缺，我们无法得知此人承担叙利亚总督的重任已经多久了。不过，安敦尼· 庇护只要觉得一个人胜任职位，就会毫不在意地让他一直做下去。以往曾有先例，相当于罗马市长的“首都长官”职务竟然被同一个人占据了20年之久，直到这位“首都长官”本人提出了隐退的要求，安敦尼才让别人取代他。

我想，不论是多么称职的官员，在同一职位上停留10年、20年绝非良策。历史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安敦尼· 庇护是对人事安排不作轻易改变的皇帝。在习惯于安定生活的时候，突然传来的帕提亚国王亲率大军入侵亚美尼亚的消息，显然是叙利亚总督科内利安努斯最不愿听到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他就有采取行动的义务。

作为东方防线的最高负责人，科内利安努斯命令卡帕多西亚总督塞达狄乌斯· 塞维利安努斯率领两个军团中的一个进攻亚美尼亚，迎击帕提亚大军。

对卡帕多西亚的驻军下达的迎击命令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负责守卫卡帕多西亚行省的两个军团的基地都位于亚美尼亚国界附近，只要越过国界向东进发就可以了。然而，面对帕提亚国王亲自率领的大军，却

只命令一个军团出击，我们只能说，在拥有过44年之久的和平之后，罗马人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如果把技术人员和医生等特殊人员也计算进去，那么罗马的每个军团由6000人组成。而哈德良皇帝重建了帝国的防卫体系，每个战略要地都配备了一个军团，他们像佛珠一样彼此相连，构成了帝国的整个防线。也就是说，每个军团都分别担负着基地及其周边的防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命令整个军团全体出击，6000人也不可能全都离开驻地。实际上，就算军团长率先出动，高举着代表军团的银鹫旗，跟随他的也只有6000人的一半。当危险程度稍低时，或许也能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在罗马的军团基地附近，肯定会有辅助兵基地。由行省民众组成的辅助兵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在数量上相同或略少，但在哈德良所建立的防卫体系里，绝不允许只让辅助兵守卫基地而军团兵倾巢而出的情况发生。出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团也是如此，兵士的数量有可能达到6000人，但主要作战力量恐怕只有3000人。而东方的君主则普遍认为，能亲率大军才是王者的证明。

通过身在安条克的叙利亚总督发往罗马的第二份战报，是由突围的士兵层层递交上来的。当时军团遭到包围，士兵奋勇抵抗，最后整整一个军团全军覆没。前敌指挥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虽然是出身高卢的将领，但他效仿以往的罗马武将，承担起失败的责任，愤而自尽。

对于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而言，必须采取紧急对策的时候到了。一是因为一个军团的覆灭是军事上的巨大损失，二是因为一向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惨遭失败，必然会对形势复杂的东方产生深刻影响。

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并不是只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帕提亚王国相对峙这么简单。在两大强国之间，还有类似亚美尼亚的为数众多的小王国，以及处于当地豪门部族支配下的领地。他们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缓冲作用，而这也正是中近东地区所特有的情况。这些国王和领主之所以站

在罗马一边，并不是出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单纯对罗马军事力量的仰慕。东方的人们追随强者，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所以所向披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总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只要阅读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记就可以知道，每当他获得全胜，周边的国王和豪族都会带着黄金桂冠前来劳军。黄金桂冠表示归顺之意，他先以雷霆万钧之势取得胜利，收集黄金桂冠，接受周边地区的归顺，然后再度进军，胜利之后再度收集桂冠。反复重复这一过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就了东征大业。如果必须一个一个地击溃面前的敌人，那么纵然他发动闪电战，也不可能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打到印度。因此在东方世界，罗马必须不断宣示自己的强盛，否则罗马将失去缓冲地带，不得不与帕提亚直接对峙。

军团配置一览表

	行省名	军团数	军团名	基地（当时地名）	基地（现在地名及国名）
	Britannia（不列颠）	3	II Augusta	Isca Silurum	卡莱奥恩 / 英国
			XX Valeria Victris	Deva	切斯特 / 英国
			VI Victrix Pia Fidelis	Eburacum	约克 / 英国
莱茵河防线	Germania Inferior（低地日耳曼）	2	I Minerva	Bonna	波恩 / 德国
			XXX Ulpia	Castra Vetera	克桑腾 / 德国
	Germania Superior（高地日耳曼及日耳曼长城）	2	VIII Augusta	Argentorate	斯特拉斯堡 / 法国
			X XII Primigenia Pia Fidelis	Mogontiacum	美因茨 / 德国
多瑙河防线	Pannonia Superior（近潘诺尼亚）	3	X Gemina	Vindobona	维也纳 / 奥地利
			X IV Gemina	Carnuntum	佩特罗内拉 / 奥地利
			I Adiutrix	Brigetio	苏尼 / 匈牙利
	Pannonia Inferior（远潘诺尼亚）	1	II Adiutrix	Aquincum	布达佩斯 / 匈牙利
	Moesia Superior（近米西亚）	2	IV Flavia	Singidunum	贝尔格莱德 / 塞尔维亚
			VII Claudia	Viminacium	科斯托拉茨热 / 塞尔维亚
	Moesia Inferior（远米西亚）	3	I Italica	Novae	斯维什托夫 / 保加利亚
			XI Claudia	Durostorum	锡利斯特拉 / 保加利亚
			V Macedonica	Troesmis	依格里扎 / 罗马尼亚
	Dacia（达契亚）	1	VIII Gemina	Apulum	阿尔巴·尤利亚 / 罗马尼亚
幼发拉底河防线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	2	XII Fulminata	Melitene	马拉蒂亚 / 土耳其
			XV Apollinaris	Satala	萨达库 / 土耳其
	Syria（叙利亚）	3	X IV Flavia	Samosata	萨姆萨特 / 土耳其
			IV Scythica	Zeugma	巴尔奇斯 / 土耳其
			III Gallica	Raphaneae	沙玛 / 叙利亚
	Palestina（巴勒斯坦）	2	VI Ferrata	Scythopolis	贝特谢安 / 以色列
			X Fretensis	Aelia Capitolina	耶路撒冷 / 以色列
幼发拉底河防线	Arabia（阿拉伯）	1	III Cyrenaica	Bostra	布斯拉 / 叙利亚
	Aegyptus（埃及）	1	II Traiana	Nicopolis	亚历山大东北部 / 埃及
	Numidia（努米底亚）	1	III Augusta	Lambaesis	龙柏斯 / 阿尔及利亚
	Hispania（西班牙）	1	VII Gemina	Legio	莱昂 / 西班牙

合计28个军团　Legionaris（军团兵）——16.8万人（主力）
Augiliaris（辅助兵）——约14万人（包括特殊技能兵种）
　Numerus（季节兵）——3万—4万人
另外还有海军——除在米塞诺、拉韦纳和弗雷瑞斯等军港以外，在多佛尔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等处也有配备。其由水兵、划桨手、操舵手，当然还需加上医

生，构成类似陆上军团的战斗力量。

然而，这种情况在西方就截然不同。西方人倾向于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作出价值判断，然后再决定是否结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每每给予罗马以重创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错误，就在于他在西方的意大利也因袭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略。尽管汉尼拔所向披靡，其战绩甚至可以作为现代军事院校的教材，但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归附于他。在罗马和迦太基正面冲突的布匿战争中，这才是罗马人取得最终胜利的真正原因。

因为在东边防线常年配置着8个军团，可见公元2世纪的罗马领导人也谙知东方人这种特殊的习性。而在公元161年所受到的打击，其危险性也远超一个军团的覆灭。罗马必须抓紧时间，专心开展应对策略。

帕提亚战争

形势紧迫，可是马可和路奇乌斯都没有丝毫军事经验。他们既不曾到访过守卫边境的军团基地，更没有接见过军团士兵。如果说两位皇帝接触过的军事人员，恐怕只有驻扎在首都罗马近郊的近卫军将士。至于他们认识的将军级人物，往往都是经皇帝推荐当选为执政官的边疆行省总督或军团长。这些人在执政官的一年任期结束后，仍旧返回边疆行省。进行人事安排不能缺少基本资料，可是偏偏在这一点上，先帝安敦尼没能使马可拥有足够的经验。如果以往出现过类似情况，那么当时的对策也可以作为现在的判断依据，然而先帝治下的23年间，连编年史的作者都叹息无事可记，所以这种判断资料也同样是白纸一张。

结果，马可和路奇乌斯任命斯塔提乌斯· 普利斯克斯继任战败自杀的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因为这位将军是两年以前即公元159年的执政官，两位皇帝认识他。不过，这样的人事安排并不是单纯

因为面熟。此人出身于元老院阶级之下的骑士阶级，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前，已经先后担任过达契亚、米西亚和多瑙河前线行省的总督。这种人在军中百炼成钢，从能力考虑的确是最佳人选，45到50岁之间的年龄也是一个积极因素。但是，决定将其派往卡帕多西亚的时候，普利斯克斯正在不列颠行省总督任上。从不列颠前往卡帕多西亚，是从帝国的西端到东端的漫长旅行，相当于从今天的英国前往土耳其，并且他还无法利用飞机、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只能靠船只和马挨过这艰难的行程。

如果是我来决策，那么我会找身在附近的人才接替战败自杀的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暂且填补上总督这个空缺。战败的军队士气低落，司令官也已自尽，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少数侥幸突围逃脱的士兵惊魂未定，就连驻守在卡帕多西亚行省的另一军事基地里的士兵肯定同样心惊胆战。而且，在卡帕多西亚以南，是帝国东部的防卫要冲叙利亚行省，与帕提亚之间已经40多年未曾开战，刚一交手就大败，对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3个军团不可能没有影响。

而暂时填补空缺，也不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哈德良皇帝任用人才一贯重视能力，安敦尼· 庇护则萧规曹随，那个时代的武将仍旧占据着各行省总督的职位，他们的手下也是人才辈出。马可在今后不得不面对的战争中，依靠的还是这些与自己同时代的年轻将领，不过，要认识这些离获选为执政官还有一段年龄差距的军官，只能到远离罗马的军团基地。

在罗马军队，普通的军团士兵几乎堪比终身雇用，在20年的兵役期间，都在隶属同一军团的同一基地服役。但是到了大队长以上的职位，所属的军团和基地发生变更则比较常见。马可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内阁成员，肯定了解这些年轻将领的姓名和经历，只不过没有和他们见面说话的机会。

既然决定让不列颠行省总督普利斯克斯前往卡帕多西亚，那么也应该尽快填补普利斯克斯离任形成的空缺。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行省，相当

于今天的英格兰与威尔士，以哈德良长城为界，北面是广阔的苏格兰，当时称为喀里多尼亚，位于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他们每年的重要活动，就是骚扰罗马，因此罗马只好派出3个军团，常年驻守不列颠。皇帝马可任命卡尔普尼斯· 阿格里科拉为总督，指挥驻军，承担保卫不列颠行省安全的任务。同时，马可还更换了莱茵河防线上两个行省之一的高地日耳曼的总督。前往美因茨赴任的新总督是马可的同窗，也是恩师弗龙托的女婿，名叫奥菲狄乌斯· 维克托利努斯。不过，这与其说是新皇帝的改弦更张，不如说是先帝时代的防卫负责人因年龄关系的正常轮替。

正当马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东方的第三封战报到达了。攻陷亚美尼亚、歼灭罗马一个军团的帕提亚军队这次改变了进军路线，挥师叙利亚行省。

总督科内利安努斯虽以老迈之躯奋勇出击，依然不幸败北。罗马军队虽然免遭覆没，却不得不全线后退。因罗马的败绩，东方的一些小君主已经蠢蠢欲动，意欲断绝与罗马的同盟关系，改同帕提亚结盟。如果这种倾向表面化，那么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就有可能全面崩溃。

御驾亲征

马可· 奥勒留知道，目前除了真正与帕提亚展开较量，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而罗马所谓的真正的较量，指的就是皇帝御驾亲征。自图拉真皇帝东征以来，罗马已经半个世纪不曾做出这样的举动了。这半个世纪中，哈德良、安敦尼· 庇护两位皇帝任上都没有战事，而现在居然要由气质上距离战争最为遥远的马可· 奥勒留来打破困境，并且还是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对哲学家皇帝而言，这应该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不过，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正如“Imperator”（凯旋将军，元首，皇帝）字面上的含义，就是指挥军队保卫帝国。正因为他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

官，所以才被称呼为“皇帝”（Imperator）。

最后出征东方的，是31岁的皇帝路奇乌斯· 维鲁斯。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记载，当时人们认为路奇乌斯比马可“年轻力壮，更适合于前线指挥”。虽然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严重的失算，但在当时都觉得这是非常稳妥的选择。马可则留在首都，在后方做总指挥。如果两位皇帝一前一后各司其职的战略体系能够发挥作用的话，也可以从实践方面证明马可· 奥勒留所推行的两帝并立制的有效性。

然而，路奇乌斯和马可一样，既没有在行省任职的经历，也不具备相应的军事经验。所以马可安排了很多能力卓越、经验丰富的人，随伺在路奇乌斯左右。这些人并不直接指挥军团，官职叫“comes Augustorum”，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奥古斯都的随从”，用现在时尚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智囊”。

在这个智囊团中有一个人，名叫弗利乌斯· 维克托利努斯，他除了曾经常年担任包括卡帕多西亚在内的小亚细亚全境的财务官，而且还有埃及长官的任职经历，非常了解帝国东方的具体情况。此人的军事经验也很丰富，曾在不列颠、多瑙河防线以及西班牙有过长期的军旅生活。一般“皇帝的随从”都是元老院议员，而之所以把本属于骑士阶级的这个弗利乌斯· 维克托利努斯提拔成智囊团的领导，首先就是因为他具备的经验。在元老院议员中挑选出来的随行人员，也都是以经验的多寡作为评判标准的。比如庞提乌斯· 雷利亚努斯虽已老迈，但历任不列颠、日耳曼、潘诺尼亚、叙利亚等重要行省的总督，通晓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帝国三大防线的所有情况。马可的恩师弗龙托曾经称赞他“是踏实正派的人，罗马传统军纪的奉行者”。我想马可或许期望此人发扬传统，为东方军团“纠偏”。因为在罗马出现了一种专断的声音，认为时隔44年连败两阵的原因就在于东方军团的软弱化。

尽管马可如此贯彻实力主义，可是在考虑力不从心的叙利亚总督的替代人选时，却任命了自己的表兄阿尼乌斯· 里布，这个人与马可年龄

相仿，也是四十出头，承担重任虽无不妥，但同样没有行省与军团的任职经历。

在罗马，与马可· 奥勒留同辈甚至小一辈的元老院阶层，很多人既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也全然不知边境地带的军团生活。这与其说是因为和平持续得太久，还不如说是当年在位的皇帝安敦尼· 庇护根本不重视实地经验的风气起了主导作用。连皇帝本人都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两地之间往来，良家子弟间自然不会流行积极进取的精神。背景深厚的里布就任叙利亚总督，最后果然事与愿违。不过，依靠自身实力奋斗出来的骑士阶级还是支撑住了大局，从这个时代起，出身于罗马社会骑士阶级的人纷纷走上了军团长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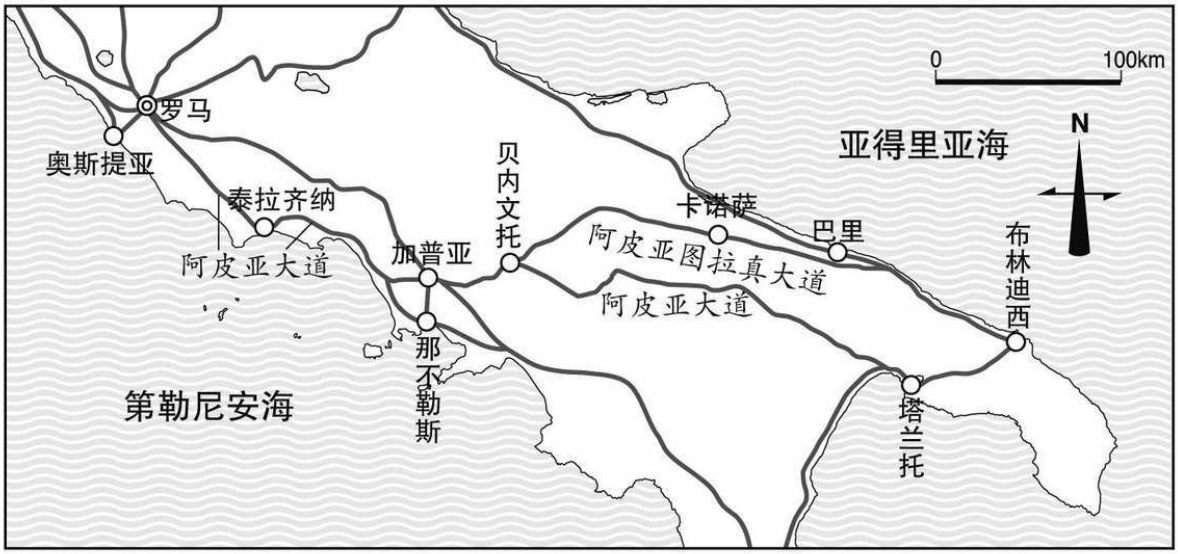
既然是由皇帝路奇乌斯· 维鲁斯担任最高司令官的罗马军队，更需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得到绝对保证。或许马可对负责幼发拉底河防线的8个军团仍旧不太放心，决定再从西方抽调3个军团和分团规模的军队。即从莱茵河防线的军团中抽调驻守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从多瑙河防线的军团中抽调驻守布达佩斯的第二亚狄托里库斯军团，以及驻守在依格里扎的第五玛肯多尼加军团。这3个军团都以银鹫旗为先导，由军团长亲自率领。另外以维也纳为基地的第十杰米纳军团也派出了几个分团规模的大队，由军团长带队向东挺进。

如前所述，军团里的6000人不可能悉数离开基地，所以虽然是以军团为单位的抽调，可是前往东方的，也不过是三分之二的兵力。在通常情况下本来只能派出二分之一，可是这个罗马皇帝给各基地的军团长发出了命令，如果驻地发生意外，不要去刺激境外的蛮族，而是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毫无疑问，虽然3个军团明知后方空虚，可还是尽最大努力抽调兵力前往东方。这样，来自西方的援军就达到了1.5万人左右，加上东方的8个军团可以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即3.2万人，计划于公元163年开始大反攻的罗马军团，主力军团兵已经达到了4.7万人。这个数字虽不是多得令人瞠目，却也没有少得令人可怜。

路奇乌斯· 维鲁斯离开罗马向东进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即公元162年的初夏。从罗马先沿阿皮亚大道南下，到终点布林迪西港换乘等在那里的舰队继续向东，马可送行到了半路上的加普亚。可是，当马可回到罗马后接到的，却不是部队已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的消息，而是路奇乌斯在阿皮亚图拉真大道旁的小镇卡诺萨病倒的紧急报告。惊讶不已的马可于是策马赶往卡诺萨。路奇乌斯的症状并不严重，主要是登基以来首次外出，欣喜若狂，而沿途城镇也一再举行欢迎宴会，令他疲于应对。经过三天修养之后，路奇乌斯再度踏上征程，从布林迪西港开始，在舰队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向东进发。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直航行，直接前往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顺风时10天左右，假如风向不稳必须击桨而行，也不会超过40天。这就是“有桨战舰”的海上速度。皇帝路奇乌斯所乘坐的，是罗马帝国设备最先进的米塞诺舰队。只要路奇乌斯下达命令，舰队完全可以不做任何停靠，横穿东地中海，直接抵达安条克。40年前的哈德良皇帝不但曾数次穿越东地中海，甚至还曾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出发，主要海港城市都没停留，从海路直抵安条克。虽然行程是路奇乌斯的两倍，但却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所以只要有激昂的意志，完成这一半航程绝对不在话下。可问题是路奇乌斯没有这种意志，因为如果只在海上航行的话，就无法享受到陆上举办的迎宾大典和美味珍馐。

即便路奇乌斯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普通的人，这种心态也不难理解。自年幼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在务实耿直的“父亲”安敦尼· 庇护和顺从的“兄长”马可身边长大，家庭教师也都是有名的学者，在这方面他和马可并没有区别。但30年的生活中如果只有这些的话显然很无聊，如今路奇乌斯· 维鲁斯已经过了30岁，终于可以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了。



从罗马到布林迪西的主要道路

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经海路到达希腊，在科林斯上岸，然后沿陆路前往雅典。或许在路奇乌斯看来，皇帝就应该这样出行，一路上歌手和乐师随伺左右，十分排场风光。

在雅典，名师中的名师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已经安排了豪华的欢迎仪式，迎接昔日的弟子、如今的皇帝路奇乌斯。所谓“阿提库斯”本是个诨名，指的是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克地区的人”，此人真名为提比略· 克劳狄乌斯· 赫罗狄亚斯。从姓名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家族是在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不过，真正使他成为公元2世纪文化圈代表人物的，不只是学问，更是因为弗龙托等人都望尘莫及的富有，而且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极善花钱”。罗马帝国的公共事业有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和个人捐赠三大支柱，因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的存在，第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是他所属的地方自治体雅典市。同时，对雅典的学术中心地位不惜大手笔投入的罗马中央政府，也知道对这种热心支持公益的人进行回报。安敦尼时代的公元143年，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获得了皇帝的推荐，被选为执政官。虽然同为皇位继承人家庭教师的弗龙托在这一年也荣任执政官，可是和阿提库斯的正式职位

相比，弗龙托只是替补。尽管是捐款，但在罗马时代，对国家的贡献最受重视。

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的父亲也做过执政官，那时他们家就属于元老院阶级了。虽然出身希腊人，是被征服者，但阿提库斯早已被征服者所同化，对整个体制没有丝毫抵触。他大张旗鼓地批判罗马鼎盛时期流行的辩论术，说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在玩弄辞藻而缺乏直面内心的热情。他指出，由于过分追求冷静客观的论断，对欲望、苦恼、愤怒和欢喜等情感却一概加以抑制，结果塑造出来的就是忧郁、怠惰和麻木的人生与社会。我对这个人的观点也很认同。适当的自我控制还好，可当时很多教师却主张皇位继承人应当自重，即使在欣赏四马战车比赛时也不该为心仪的赛手加油助威。所以在我看来，阿提库斯不但是位教师，更是一个理智的人。顺便说一下，马可· 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表示谢意的“恩师”，几乎都是教他“自重”的人，因而马可对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只字未提。

啰嗦一下。在我所参观过的罗马时代的别墅遗址中，比较令人惊叹的有4处：卡普里岛的提比略皇帝别墅、奇尔切奥的图密善皇帝别墅、蒂沃利的哈德良皇帝别墅，以及紧邻阿皮亚大道的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别墅。这个公元2世纪的“享乐主义者”不仅热心于公共事业，在个人消费方面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

当路奇乌斯途经雅典时，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正好60岁。这个生活充满情趣、万事顺遂的人一掷万金，为皇帝举行了极为奢华的欢迎大典。年龄只有他一半的路奇乌斯当然乐不思蜀，结果停留在雅典的时间一再拖延。直到32岁的生日都快临近的时候，路奇乌斯才依依不舍地登船。尽管离开了雅典，但他也没有直航安条克，而是尽情享受爱琴海上的美丽风光，还在连接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和米利都等海港城市靠岸。皇帝一行终于到达安条克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年的冬天了。

反攻开始

幸运的是，与优哉游哉的皇帝截然不同，斯塔提乌斯· 普利斯克斯正在策马扬鞭，日夜兼程，从不列颠赶往卡帕多西亚。他先渡过了多佛尔海峡，横穿高卢，然后乘上巡弋在多瑙河上的船只直达黑海，再经由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海峡）踏上小亚细亚，最后到达了卡帕多西亚。从罗马帝国的西端直到东端，真可谓一鼓作气。并且赶到之后，他仍旧马不停蹄，每天都努力鼓舞败军的士气。

而同一时期，远在罗马的马可也是日夜操劳，身心俱疲。不但帝国的西方需要他统领，而且在路奇乌斯已经前往的东方，当地官员也依旧把紧急信件送至罗马。马可写信给无话不谈的恩师弗龙托，说自己因繁忙与焦虑造成身体极度不适，可是就连在别墅疗养的四天里也同样不得休息。弗龙托给弟子回信，提醒他至少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我推测，马可· 奥勒留或许在精神方面的承受力比较薄弱，当然，皇帝有一位那样的搭档，产生焦虑也不足为奇。

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为东地中海的最大都市，然而每当战云覆盖帝国东方，这座城市总逃不掉前线参谋总部的命运。东方前线最高司令官路奇乌斯皇帝好不容易到达安条克，可是他主持的作战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争执，令满怀期待的将军们大失所望。由于编年史和史书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猜测其具体内容。可能是战略构想存在差异，也可能是单纯的个人恩怨。总之，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在路奇乌斯皇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而是发生在皇帝与先期到达的叙利亚新任总督里布之间。

路奇乌斯与里布二人，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年龄虽然相差10岁，但属于同代人；第二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属于罗马社会里的最高层，一个是皇帝，另一个则是皇帝马可的表兄；第三个共同点是两人虽然都担任过执政官，可至今没经历过边境的军旅生活，也不曾在其他行省担任过公

职。据说，虽然同住在总督官邸，可是除了出席作战会议之外，这两个人互不理睬，形同陌路。

罗马帝国的东方

最后使事态得以平息的，是马可为路奇乌斯配备的“皇帝的随从”。然而说是平息，却并不意味着对帕提亚战争的最高司令官和副司令官之

间关系的改善，而是众人在作战会议上干脆无视他们二人的存在。皇帝路奇乌斯很快就发现了心仪的女人，而总督里布则不适应东方的气候，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所以这两个人事实上都相当于脱离了战线。

不久以后，总督里布病死在安条克。这个消息对路奇乌斯是个打击，据说他开始后悔自己从前的言行。如此看来，路奇乌斯皇帝虽然缺乏责任感，但人还算不坏。

在对帕提亚展开正式反攻前夕，绝不能让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职位出现空缺。虽然路奇乌斯也是皇帝，同样拥有人事权，可是选择继任者的工作还是只能由马可来完成。或许是已经领教过了上流社会名门子弟的把式，马可这一次任命的是老辣的尤里乌斯· 维鲁斯。这个人在公元151年做过执政官，所以年龄可能也就是50岁出头。他也来自行省的骑士阶级，在首都罗马担任过执政官以后又返回到行省任职，曾连续6年做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总督。在后来危急关头的叙利亚，这个人担任过4年叙利亚总督。他在公元179年离世，尽管一生几乎都在行省任职，但在当时看，70来岁的人生应该是很长寿的了。

我为撰写《罗马人的故事》这部系列图书而暂住在罗马，好处之一就是考察罗马帝国的任何防线，都可以乘飞机在两小时以内到达。因为罗马处于古罗马帝国的中心位置，往来十分便捷。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罗马帝国不但在各个种族、民族和文化上多姿多彩，而且在地理气候上也同样差异巨大。

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中部国家的首都，当年却是罗马人沿“北方前线”莱茵河和多瑙河设立的基地。在这里的古代遗迹中流连，还能发现房屋地面下的暖炉构造。当我冬季在多瑙河流域中部旅行，以为可以追寻马可· 奥勒留之死时，不禁想起在罗马久违的“严冬”一词。而在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我也看到了当年人们为躲避酷暑，在地下修建的住宅遗迹。在灼热的沙漠里，罗马人甚至学会了制作类似水果冰激凌一样的食物。他们了解水分蒸发会带走周围热量的原

理，故而在热带也生活得十分惬意。

我之所以关注罗马领导层的行省经历，是因为他们这样不仅可以增长见闻，还能使身体习惯于各种不同的气候。普通的士兵在20年时间里，都会在同一军团同一地点服役，退役后大多同当地女子结婚，然后住在基地附近。罗马军团士兵的这种“土著化”是罗马防卫战略的组成部分，因而逐渐得到接受和巩固。但是百人队队长以上的职位就不同了，尤其是大队长和军团长，任职地点变化频繁，这也同样是防卫战略的一环，他们不但强健了体魄，而且适应了各种各样的气候。

在那个时代，具备这些经历以后即位做皇帝的，是图拉真和哈德良。然而时间仅过去20年，像马可·奥勒留和路奇乌斯·维鲁斯这样的上层人物，在走向统领国家的过程中，都与这种生活体验无缘。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安敦尼· 庇护的示范作用，人们都对行省经历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认为不出本国也同样可以统治整个帝国。这就好比一个跨国公司，如果在总公司里就能顺利经营的话，谁还会忍耐着时差的困扰，跑到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辛辛苦苦地接触不同种族的客户呢？我认为安敦尼· 庇护这个皇帝至多是个擅长处理眼前问题的优秀官员，怎么也算不上是未雨绸缪的政治家。

可是，尽管经过了安敦尼· 庇护治下的23年，哈德良皇帝重建的帝国防卫体系却依然充分地发挥着功能。公元163年开始的帕提亚战争一直是总督和军团长们大显身手的舞台。路奇乌斯皇帝令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对亲自带兵不感兴趣，而且也从未对带兵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拟定的战略战术指手画脚，因而到了真正反击的时刻，罗马军队依然所向披靡。

因公元161年帕提亚国王进攻亚美尼亚引起的“帕提亚战争”历时5年，至公元166年结束。战线的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161年到163年，战场在亚美尼亚境内。

第二阶段从公元163年到165年，在这两年间，战场越过了幼发拉底河，进入了帕提亚境内。

第三阶段从公元165年到166年，这一年战火继续向东蔓延，越过底格里斯河深入东方腹地。

仅看战场的移动变化，罗马军队的反击状况也可一目了然。而且，罗马国内还有一大批前线那样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家。

公元163年春，罗马开始在亚美尼亚战线展开反攻，战争的主角就是奉诏从不列颠紧急赶来重整旗鼓的斯塔提乌斯· 普利斯克斯。卡帕多西亚总督麾下本有两个军团的武装力量，其中的一个在战争伊始就遭歼灭，现在有了援军的加入，又重新凑够了两个军团。另一个任务就是消除军中蔓延的失败情绪，鼓舞士气。不过这对军中老将而言简直轻而易举。士兵们甚至开玩笑说，只需我们的将军在阵前一声断喝，敌军就如同中箭一样纷纷倒地。从这种玩笑话可以看出，军中的失败情绪已经一扫而光了。

在亚美尼亚战场，在小亚细亚出身的军团长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的率领下，驻守在波恩基地的第一密涅瓦军团参战。驻在维也纳的第十杰米纳军团派出的虽然是分队，却是由军团长亲自带领，这个军团长名叫喀米尼乌斯· 马尔奇亚努斯，是来自北非的武将。并且只要有需要，在叙利亚行省伺机而动的两个军团随时可以挥师北上，指挥他们的是第三高卢加军团的军团长、叙利亚出身的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总之，当时罗马军中高手如林，骁将荟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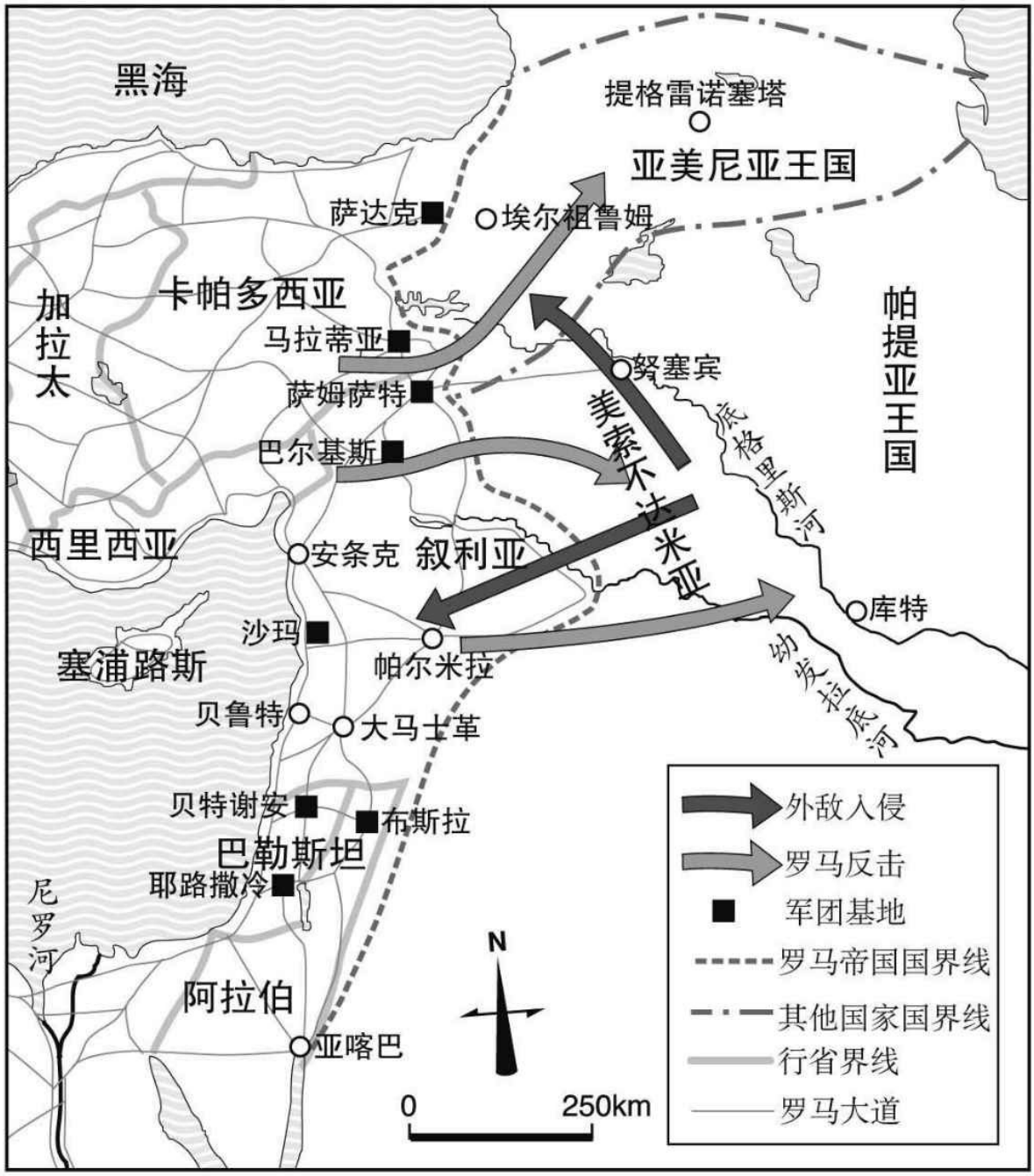
罗马军队有个传统，如果初战失利，他们一般不会匆忙反击，而是假以时日，为反攻作充分准备。一旦准备妥当，他们会迅速出击，一蹴而就。这次的帕提亚战争也充分体现了罗马军队的这一特点。

尤其是率领卡帕多西亚军团的普利斯克斯的行动更是疾如闪电。他

们自攻入亚美尼亚境内就挥师东指，春天尚未结束时，就对阿拉伯海以西300公里的首都阿尔塔库萨塔展开了攻城战。从西方赶来的援军在弗龙托和马尔奇亚努斯的率领下，积极发挥了侧翼的牵制掩护作用，所以进军首都变得顺利，也能专注于攻城。

在罗马军队的猛烈进攻下，帕提亚控制的阿尔塔库萨塔终于陷落。由帕提亚国王扶上王位的帕科鲁斯王子遭到驱逐，亲罗马派的索菲埃姆斯登上了王位。这个人既是帕提亚的王室成员，同时也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罗马从实际出兵到夺取亚美尼亚，实现初步战略目标，前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在年底之前，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已经被全部驱逐了出去。

在共和政体时代，取得胜利后的罗马军队士兵，都会面向率队征战的司令官高呼“Imperator”，我们翻译成“皇帝”，实际上这个词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进入帝政时代以后，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开始兼任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因此胜利后的士兵也不再向直接指挥作战的总督或军团长欢呼，而是向皇帝欢呼了。公元163年取得胜利后的场面也是如此，士兵们欢呼的对象既不是普利斯克斯，也不是弗龙托和马尔奇亚努斯，而是不在前线的皇帝马可和路奇乌斯。马可· 奥勒留每天在罗马埋头处理政务，路奇乌斯· 维鲁斯则无法忍受安条克夏日的炎热，跑到西风轻拂的地中海沿岸避暑去了。据说路奇乌斯还十分关注罗马大竞技场举行的四马战车比赛结果。在红、白、蓝、绿四支队伍中，他是绿队的狂热支持者。马可的家庭教师曾反复强调皇位继承人与庶民不同，应该“自重”，不要在这种比赛中倾向于任何一方。马可遵从告诫，而接受同一批老师教育的路奇乌斯则把这些话当成了耳旁风。不久前，路奇乌斯还勾搭上了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美女潘提亚。人们传说这个美女简直就是普拉克西特里斯雕塑的维纳斯，头脑睿智，举止优雅，仅仅是说话就令人倾倒。对马可而言，这个女人的存在又给自己增添了新的焦虑。



帕提亚战争中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路奇乌斯不但是马可的“弟弟”，同时也是一起治理国家的搭档。他对政务军务的不闻不问已经使马可头痛不已，现在又被这个东方女子搞得神魂颠倒就更糟糕了。路奇乌斯的独身状态也使事情变得复杂。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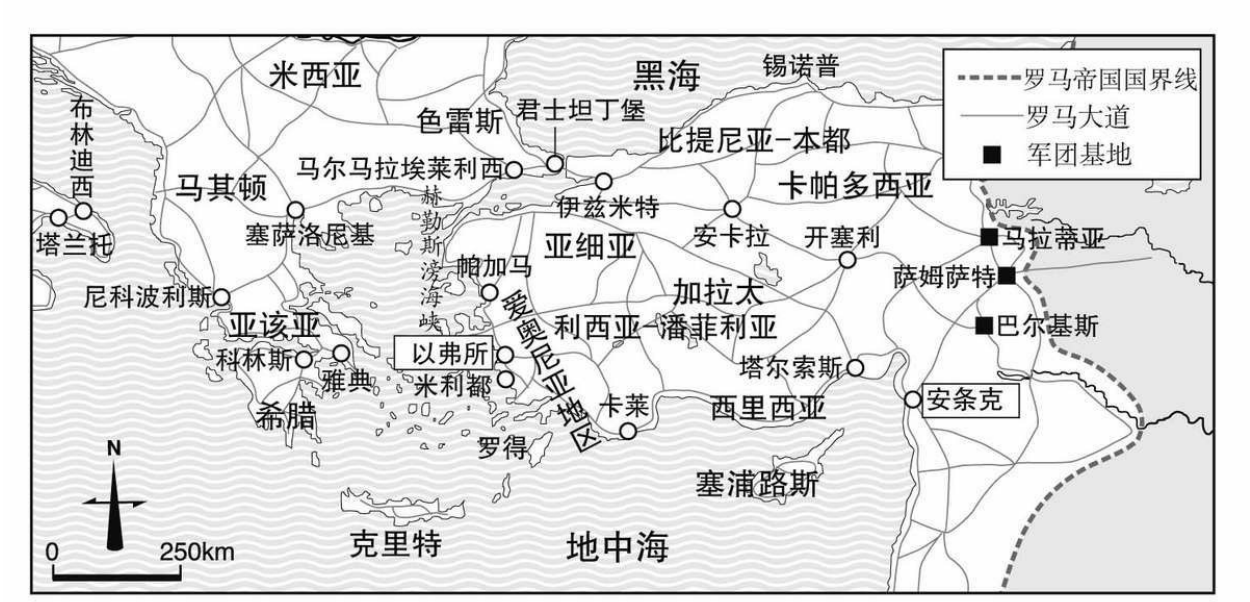
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可居然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露西拉嫁给他。法律名义上两个人是叔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当时路奇乌斯33岁，露西拉13岁。第二年，即公元164年，露西拉前往东方，结婚时刚好14岁。马可为路奇乌斯安排婚事的消息当然很快传到了路奇乌斯的耳朵里，有趣的是他竟欣然应允。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路奇乌斯在前往东方以前，和露西拉两人就订有婚约，马可只不过是把婚礼提前了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帕提亚战争和这些宫闱之事并无关联，而是很快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战争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稍有些重叠，因为参加第一阶段战斗的将士并没有返回基地，而是直接向南推进，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战场。而在第一阶段一直待命的叙利亚军团，也向东长驱直入。从北西两面突入帕提亚腹地，是罗马在帕提亚战争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

在第二阶段大显身手的将军有两位：一位是率领莱茵河驻军精锐参战的希腊武将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另一位是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他率领着一直摩拳擦掌急于复仇的叙利亚军团。此外，被马可和路奇乌斯赋予“智囊”头衔的庞提乌斯·　　雷利亚努斯也带领着一个军团向前线进发。除了北非，这个老练的武将亲临过帝国的所有防线，现在虽然老迈，但他没有在舒适的避暑胜地侍奉皇帝，而是选择了向沙漠进军。年轻时代的他曾在图拉真皇帝麾下同帕提亚战斗，或许他现在急切地盼望和同样的敌人再次交锋。无论如何，皇帝“智囊”的参战使前线的将军们更便于行动，因为不必再向不断变化驻地的皇帝派出传令兵请求指示了。

帕提亚战争第二阶段也进入到了第二年，即公元164年，路奇乌斯离开叙利亚，经海路前往以弗所。以弗所是一座美丽的都市，被人们誉为“爱奥尼亚地区（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

尔那索斯以北，此外还包括希奥岛和萨摩斯岛。——译者注）的珍珠”。路奇乌斯将在这里迎接露西拉并举行结婚典礼。露西拉离开罗马时，父亲马可把14岁的女儿一直送到阿皮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港，并授予了露西拉“奥古斯塔”的尊称。在罗马，嫁给皇帝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奥古斯塔”的称号，皇帝没有授予的话，是不能自称皇后的。当年图拉真皇帝讨厌繁文缛节，至死都没有给妻子普洛蒂娜颁发“奥古斯塔”称号，普洛蒂娜之所以拥有该称号，还是哈德良即位以后才授予她的。“奥古斯塔”的尊称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虽然表达了马可对女儿的深切关怀，可是到了20年以后，这个称号却成为宫廷内斗的导火索。



希腊、小亚细亚地区

在以弗所举行过婚礼的路奇乌斯，带着皇后露西拉返回了安条克。至于那个希腊美女，早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虽然是一场政治婚姻，但路奇乌斯和露西拉的婚姻生活一直比较美满。身为皇帝的路奇乌斯诚实正直，光明磊落，是个善于交际的美男子。

帕提亚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十分顺利。面对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境内

的罗马军队，帕提亚军队只能一再后退，不但无法有效迎击，甚至全线濒临崩溃。罗马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成功夺回了被帕提亚侵占的土地。第二阶段的战争就要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了。

可是这时候，皇帝路奇乌斯“似乎”对战略问题开始插嘴了。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没有可资证明的史料。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眼下正是议和的好时机。时至今日，我们无法获知作战会议的具体经过，总之路奇乌斯收回了自己的提议。因为将军们反对此时讲和，战争继续进行。史书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职业军人反对讲和的原因，但是从战争第三阶段的进展我们可以略知一二。第三阶段的目的和第一、第二阶段的夺回被占领土不同，而是跨过了底格里斯河，深入帕提亚的腹地，彻底打击对方之后再行撤退。

第三阶段的战斗是叙利亚出身的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一个人的舞台。他对中近东的情况烂熟于心，手下的罗马骑兵神出鬼没，因此当罗马的重装步兵挺进的时候，面前一个帕提亚士兵都没有。进行过如此彻底的打击之后，罗马军队才向西方回撤。

这场战争使东方人再次认识到，一旦罗马军队出手，将会是怎样的后果。也正是因为这次战争，帕提亚王国走向衰落，成为60年后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年，是波斯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亦是波斯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当时萨珊王朝与中亚的印度贵霜王朝及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三国雄霸欧亚。萨珊王朝在最强盛之时，曾多次威胁比邻的贵霜王朝及东罗马帝国。——译者注）兴起的原因之一。

罗马当时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让整个中近东再次领教了罗马的力量，保证了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后来30年的和平。那时帕提亚国王再也没有向罗马境内出兵。通过帕提亚战争，罗马展示了自己即便在东

方也能充分施展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说这是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不如说是罗马一国独霸。更不用说，在两个大国之间起缓冲作用的那些小王国和部族，又再次倒向罗马一边。

公元166年10月，战争结束了。为庆祝帕提亚战争的胜利，欢迎路奇乌斯回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实际上，距上次举办凯旋仪式已时隔49年之久。上一次凯旋仪式的主角，是图拉真的骨灰坛。他在完成对帕提亚的战役后，死在了回国路上。而这一次凯旋仪式的主人则是45岁的马可和36岁的路奇乌斯。这两人身着军装，大红斗篷随风飘摆，民众当然为之疯狂。

不过，公元166年的凯旋仪式与罗马传统的凯旋仪式还有一点不同。即马可和路奇乌斯都是带着自己的妻子一同乘坐凯旋将军的黄金战车。以往都是由将军亲自驾驭4匹白马拉的战车，头上还戴着月桂树枝叶形状的黄金王冠。战车后面只载着一个奴隶，在仪式的过程中不断提醒他："不要忘记你终将难逃一死。"可是现在，胜利者的一家老小都挤上战车，后面那个起警醒作用的奴隶也不知被打发到哪里去了。总之，长期以来被罗马男子视为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以后，变成了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车上的胜利者也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大家子"。

马可 • 奥勒留凯旋的浮雕

哲学家皇帝的政治

发生变化的，还不仅仅是凡事都携带家眷的作风。正当东方的帕提亚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身处西方的皇帝马可也在为国务忙得不可开交。这里所说的国务，指的是修改罗马旧时的法律，使之与现实相契合，以及根据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律。今天我们追寻这些变化，就可以了解当时罗马社会的整体要求。其中的大多数可谓日常政务，比如确保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改善奴隶的待遇，向各行省推广救济穷人的福利政策，加快法庭的审判速度，每年开庭320天等等，虽然都是贤明皇帝应该大力推行的政策，但其中有一些的确是由马可制定实施的新法律。

其中的一条法律，就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生小孩时，必须在婴儿降生后的30天之内进行登记。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但只限于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占绝大多数的意大利本土，而且也包括了居住在其他各行省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至于该法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对军团兵的后备力量有个大致的估计。我想这里也不必重复，负责保障帝国安全的军团兵必须具备拥有罗马公民权。如果军团兵的数量得不到保证，那么自然也不能奢谈帝国的安全。虽然罗马推行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但为有效发挥哈德良建立的防卫体系的功能，必须大致了解具备应募资格的人数。有的学者认为，马可此时的政策是希望增加税收，可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负责保卫帝国，本来就免除了直接税，只有不承担防卫义务的行省居民才缴纳同时也是安全保障税的行省税。这样罗马公民权拥有者需要缴纳的就只有遗产税，而且直系亲属之间还免税，非直系亲属之间的税率只有5%，所以很难想象马可此举是为了增加税收。我还是坚持认为，马可的目的是为了预测将来能服兵役的罗马公民人数。

可是，既然马可强烈地意识到了预测人数的必要，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疑问，在马可时代，志愿当军团兵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是不是减少了呢？罗马当然能够保证16.8万名军团兵用做主要作战力量，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志愿者的选拔还像哈德良皇帝时代那么严格的话，这种保证会

不会出现一定困难呢？和平年代军人往往遭到忽视，虽然开展了帕提亚战争，但那是在遥远的东方进行的，并且以胜利告终，帝国西方的居民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另外，世上祥和而繁荣，除了从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尽管当时服兵役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退役金，但只怕其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这也可算“和平的代价”之一吧。

其次，马可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用来遏制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的议员候选人减少的倾向。这也很引人注目。

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帝制，罗马都能保证事务官员和办事人员的薪水，但以执政官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地方自治体官员都是没有工资的。因为参与公务尤其是出任高级职位，不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荣誉。正如庞贝遗迹中残留的那些涂鸦所示，当时地方议会的选举竞争激烈，因为候选人数量众多。这些职位不但没有报酬，而且如果有人胆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话，等待他的也只有遭到揭发一途，所以在这方面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不仅如此，由于皇帝的率先垂范，人们还往往期待地方上的强势人物能对公共事业有所贡献。正是因为重视这种贵族义务，罗马才完成了那么大范围的公共建设，如果地方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减少，有可能关系到地方自治体本身功能的降低。

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把候选者减少的原因用“apatia”一词来表达，意为“缺乏朝气”。以前罗马人一说到代表共同体或国家的“共和”往往热血沸腾，或许此时个人主义已经开始蔓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的国家意识在暴君尼禄时代尚且强烈，到了贤君马可时代却开始衰退了。

毫无疑问，制定这些法律的马可肯定发现了上述问题。时代正在变化，而且是在向坏的方向变化。在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时代，罗马人充分享受了史无前例的安定与繁荣。和“父亲”相比，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需要面对以往历任皇帝都没有面对过的深刻问题，而在这一时期，他又失去了可以推心置腹的恩师弗龙托。

瘟疫

战败的帕提亚采用了另一种形式对胜利者罗马实施报复，那就是在凯旋仪式上的士兵们中间流行着瘟疫。返回到莱茵河与多瑙河基地的士兵，也有因同样症状而倒下的。瘟疫的源头显然就在东方。

在拉丁语中，“瘟疫”一词写为“pestilentia”，虽然用“pest”（虫害）做词源，但其症状、传染程度、死亡率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了。古埃及人已经知道，瘟疫的传播媒介是老鼠。

西欧史上有名的瘟疫，最早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希腊雅典。由于希腊与斯巴达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始时间正好和瘟疫的流行时间相重合，城邦国家雅典遭受了莫大的打击。打造雅典黄金时代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也死在这一时期。

第二有名的例子，就是公元166年至167年袭击罗马帝国的这场瘟疫。

从现有的记录看，上述两次瘟疫都远不如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述的黑死病，那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一年之内整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到公元167年年末，瘟疫的高峰已经过去，不过即使在一年以前的公元166年，也并没有出现过一天死亡几十人或上百人的情况，并没有人逃往郊外，两位皇帝及其家属仍旧居住在罗马市中心。

可是，就好像止不住血的伤口一样，还是有人陆陆续续因瘟疫而死。尤其在帝国最重要防线上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军团基地，接二连三的死亡令罗马不胜其痛。发现罗马守备虚弱的北方蛮族又开始蠢蠢欲动。而在这一时期，罗马还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基督教徒

瘟疫的蔓延造成社会生活停滞，再加上来自北方蛮族的威胁，使罗马人的内心变得忧郁沉重，人们甚至已经逐渐淡忘了凯旋仪式时的那种祝福与欢欣了。

皇帝马可为了改变人们这种沉重的心情，决定面对诸神举行一次隆重的祈愿祭典。皇帝虽然有两个，但大祭司只由他一人担任。举行祭典时，他身着白色的托加，遮住头部，带领队伍，依次前往罗马市内各主要神殿祭拜，附近居民老幼咸集，共同参加。

但是，罗马人对诸神的祈愿，并不是祈求诸神把自己从不幸之中拯救出来，而是人们决心为脱离不幸而付出艰苦努力，祈求诸神给予帮助。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会为人们的生存指明道路，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不会向诸神提出这些要求。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应该由人类自己思考决定，诸神的任务只是为人类的努力提供帮助而已。

为了使众人都能参加，并且还要动用火，因此祭典在室外举行。在残留到今天的遗迹中，可以看到神殿正面的台阶中央有一个平台，这就是设置祭坛的场所。所谓祭典，就是在上面烘烤牺牲时进行祈祷。如果只烘烤动物的话，只能称为烤肉大会，而祭典活动则需将阿拉伯香料投入火中，同时必须在香烟缭绕中祈愿。活动结束后，烤熟的肉会被切开，分配给参加祭典的人们。罗马人的宗教里根本就没有祭司阶级的存在，所以这个过程既没有冗长的说教，也无须吟唱赞美诗。在国家级别的典礼上，大祭司由皇帝充任，而家庭规模的祭祀则由一家之主来主持。不过，因为到处都举行这种万众欢聚的祭典，一些不肯参加的人就显得过于特立独行了。

在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社区，有基督教徒们独自开辟的聚居点。第

十二、十三区位于罗马南部，第十四区在台伯河以西，都远离市中心。基督徒们遵从着圣保罗（生卒年不详，基督教最初期的传教者之一。公元1世纪时人，一生致力于在异教地区传播基督教，在各地建立教会，后在罗马殉教。——译者注）的教诲，安静地生活着。圣保罗这样教诲信徒：

> 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得相互诽谤和不满，也不得争斗，切勿引人注目。虽说任何神的子民都是完美无缺且洁净的，但你们不能给这邪恶堕落的社会留下指责的口实。即使生活在这邪恶堕落的社会里，你们也必须如同在黑夜中捧着明灯一样，恪守神的教诲。

基督教徒不肯参加皇帝主持的祈愿，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邪恶堕落的社会”显然指的是罗马，而罗马帝国崩溃的话，到来的将是神的国度即基督教徒们的时代。并且，一神教是排斥其他诸神的宗教，信徒们自然不会参加面向诸神的祈愿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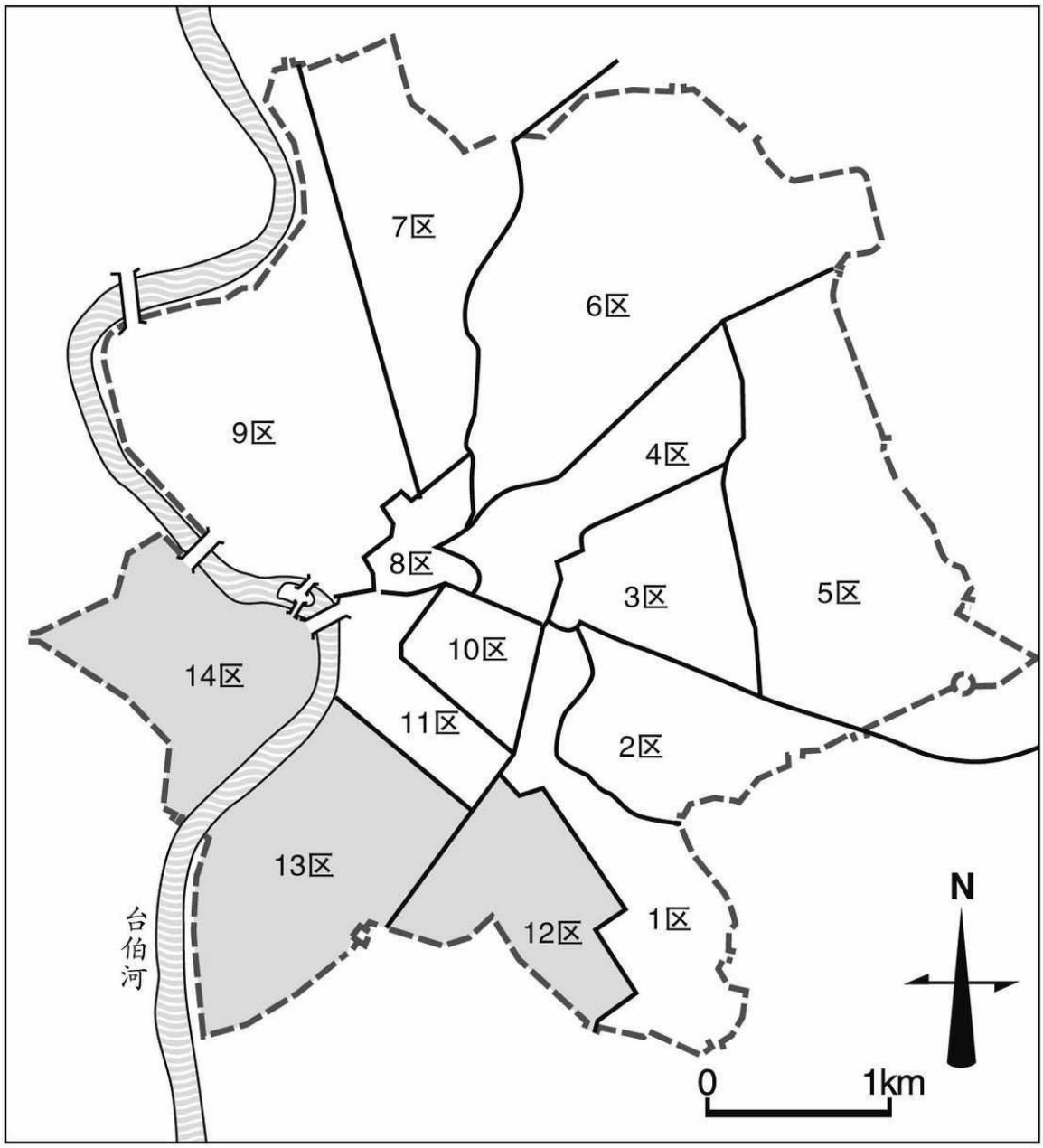
不久以后，这些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不过这些内容我们还是安排在下一卷里讲述，至少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基督教徒们依然能够忠实地遵循着圣保罗的教诲。也就是说，即便身处同一座城市，他们的生活却和其他罗马人保持着距离。

可是，危机也能唤起人们心目中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罗马人重新认识了传统诸神，对拒绝保持同步的基督教徒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罗马人指责基督教徒为“ateo”，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现在翻译成“无神论者”，但是在罗马时代，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信仰者”。

古代是多神教的世界。所谓多神教，就是对自己所信奉的神和他人所信奉的神都同样予以认可，结果就是共存的神明与日俱增。在罗马，神明的数量高达30万，既然人们在信仰中认同众神共存，那么对众神共存不予认可的信仰就不能称其为信仰。所以基督教徒被人们斥为“无信

仰者”。

罗马公民们对基督教徒的责难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拒绝参与公共生活。基督教徒们之间热情互助，却对所在城市或地方自治体的公共事业和福利建设漠然处之。当时人们视公共生活为公民义务的观念尚未衰颓，基督教徒的做法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非难的理由。不过，从基督教徒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淡漠简直是理所当然。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是为了等到神的国度的到来，如果对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有所贡献，那么只能导致神的国度的姗姗来迟。



罗马的14个行政区，阴影部分为有基督教徒聚居的地区

不过，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马可· 奥勒留的时代，二者的对立还不是很强烈。首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仍旧是少数派，力量薄弱。而基督教徒数量和势力的发展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罗马人仍然信赖自己的领袖，对自己的生活充满自信。

下面，我想介绍这一时代关于基督教的三段“现场录音”：

第一段是皇帝马可眼中的首都罗马长官拉斯蒂克斯的形象。

第二段是这个拉斯蒂克斯对基督教传教士尤斯提努斯的审问全文。

第三段是皇帝马可对基督教的感受。

第一段“现场录音”：昆托斯· 尤尼乌斯· 拉斯蒂克斯这个人不但是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而且积极承担罗马时代精英分子的义务，充分参与公共生活，曾两次就任执政官，并出任罗马政府的要职之一首都罗马长官（Praefectus Urbi）。首都长官这一职务涵盖司法工作。

皇帝马可在《沉思录》的开头部分，写到了这个人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原文如下：

> 从拉斯蒂克斯那里，我领悟到我的品格需要改进和训练，知道不迷误于诡辩的竞赛，不写作投机的东西，不进行繁琐的劝诫，不显示自己训练有素，或者做仁慈的行为以图炫耀；学会避免辞藻华丽、构思精巧的写作；不穿出门用的托加在室内行走，或者做出类似的夸张举动；学会以朴素的风格写信，就像拉斯蒂克斯在锡纽埃瑟给我的母亲写的信一样；对于那些以言词冒犯我，或者对我做了错事的人，一旦他们表现出和解的意愿，我就乐意地与他们和解；从他，我也学会了仔细地阅读，不满足于表面的理解，不轻率地同意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我亦感谢他使我熟悉了爱比克泰德的言论，那是他从自己的收藏中传授给我的。（本段译文参考了《沉思录》，何怀宏译。——译者注）

爱比克泰德是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间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是服侍皇帝尼禄的解放奴隶艾帕弗罗狄托斯的奴隶。所谓解放奴隶，原本也是奴隶，但在罗马时代，解放奴隶与社会上的普通市民无异，所以

他们也可以拥有服侍自己的奴隶。但是，艾帕弗罗狄托斯深感自己的这个奴隶思想深邃，于是也给予了他自由。成为解放奴隶的爱比克泰德在首都罗马成功开办了讲授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一个阿里安，后来受到哈德良皇帝的重用，成为作家，撰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

后世学者把曾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和皇帝马可· 奥勒留并列，一起作为代表罗马帝制鼎盛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是拉斯蒂克斯使马可对爱比克泰德深邃的理性产生了兴趣，下面介绍的第二段“现场录音”就是这个拉斯蒂克斯对前来罗马传教的希腊人尤斯提努斯的审问记录。作为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也是首都警察的首脑。罗马法律规定，对于实名检举，司法机构有进行调查和审判的义务。检举尤斯提努斯的，是犬儒学派的哲学家克雷辛斯。

传教士尤斯提努斯的思想也是以希腊哲学为起点，首先学习斯多葛学派，接着是亚里士多德学派，但他还是不满足，又加入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进而学习柏拉图学派，最后找到了基督教。这个人一直四处奔波，追求真理，最后从哲学转到了基督教，是当时帝国东方知识分子的典型。

拉斯蒂克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尤斯提努斯：“我过的是任何人都会赞同的纯洁的生活。”

“你实践什么样的教理？”

“我学习了所有教理，结果基督教的教理最为真实。这是我在学习了被教会斥为虚假和异端的东西后，得到的信念。”

“那么你是怎样获得这种信念的？”

“我通过自己接受的东西。”

“何谓接受？”

“我们信徒对基督的崇拜，来自世界唯一的神的创造。而神之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给予人类以真正的知识，由神派到地上，也就是派到我们人类中间。

“但是在耶稣的神性面前，我的这些说明毫无意义。因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理解而是信仰。我们相信预言者的话，他们预言神之子即将降临。正如你所知，历史上的预言者，好几次都预言到了救世主的到来。”

拉斯蒂克斯改变了话题，但尤斯提努斯委婉地躲开了他的矛锋。

“你们在哪里相会呢？”

“在大家想相会又能相会的地方。你难道以为全体基督教信徒都在事先约定好的地方相会？”

“我想知道的是，你和你的同伙在罗马的什么地方会面？”

“这是我第二次来罗马，我住在罗马的米尔提努斯浴场楼上（罗马为数众多的小浴场之一）。他们只到这里拜访我，没有其他地方。我欢迎任何人来，我们谈论真理。”

“你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教徒。”

在尤斯提努斯房间里一起被逮捕的基督教徒，还有另外四男一女。其中一名男子是出身于卡帕多西亚的奴隶，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里做奴仆，其他四人的职业不详。不过从姓名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被人从

东方带来，或者是在罗马工作的希腊人。当时罗马的基督教仍然是住在首都的异邦人所信奉的宗教，在罗马人之间并不流行。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对尤斯提努斯说：

“罗马帝国供奉诸神，使帝国得以统一，根据帝国法律，拒绝信仰罗马诸神的基督教徒所实施的是反国家行为。放弃目前的信仰可以无罪释放，拒绝放弃的人将处以鞭刑然后斩首。如果你遭受鞭刑之后被斩首的话，你相信自己死后会升往天堂吗？”

“只要我始终保持信仰坚定，我想自己应该能升往天堂。不过只有遵循基督教的正义生活的人才会得到这种恩宠（基督教中神特意给予人的爱）。”

“这么说你确信自己能升入天堂？”

“不，我虽然希望自己能够升往天堂，但并无把握。”

“我劝你放弃自己的宗教，你知道，如果你拒绝的话，等待你的就只有死刑。”

“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死后等待我的必定是救赎。”

首都长官拉斯蒂克斯宣布了判决：

“对拒绝向我们罗马的诸神供奉牺牲的人，根据罗马的法律（图拉真法），我宣判，鞭挞之后处以斩首。”

五人均被处以死刑。不过他们并非像后世传说的那样，被弄到竞技场喂野兽，而是在监狱内像其他死刑犯一样被斩首。真正把犯人送到名为“Arena”

的圆形竞技场公开处死的场面，发生在10年后的里昂，那是自皇帝尼禄处死基督教徒一百年过后，罗马再次开始公开处死基督教徒。

这一时代最后一段“现场录音”，是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唯一提及基督教徒的语句。

> 当灵魂不得不离开肉体时，如果能安详地接受，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心理准备，必须是人依据自由的理性而达成的，而不是像基督教徒那样顽固地自以为是。（本段译文参考了《沉思录》，何怀宏译。——译者注）

无论如何，马可· 奥勒留毕竟是皇帝，以守卫罗马帝国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正因为如此，罗马皇帝才被赋予强大的权力。他还有很多必须处理的其他事务，例如面对迫近北方防线的蛮族，就无法依靠信仰去缓解。公元168年1月6日，年届47岁的马可视察罗马近郊的近卫军团军营，对士兵们说：“北方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年春天，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位皇帝决定向多瑙河进发。

日耳曼战争

有一位名叫阿庇安的希腊人，在罗马时代撰写了《罗马史》。也就是说，他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此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具体生年不详，只知道当时处于图拉真皇帝治下（公元98—117年）。当时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图拉真皇帝专注于帕提亚战争时，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乘机暴动，突袭罗马的后方，仅以罗马人所建为由，毁坏了埃及人供奉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者注）的神殿。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16年，由此可以推断阿庇安的生年应该在公元110年或那之前的两三年，这样的话他比皇帝马可· 奥勒留年长10岁左右，可以算同代

人。

行省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积极向上，即便不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的后代，也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

第一是从军，在军队中积攒资历。因为不具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不能做军团兵，但辅助兵的大门一直朝行省出身的人敞开着。根据才能的不同，一两年之内完全可以升到50人小队的队长，当能指挥500人的时候，就获得了列席总督或军团长作战会议的资格。这时如果他还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话就显得很不合适，因此一般都会得到。实际上很多人在领导150名士兵时就已经获颁罗马公民权，然后的生存就全凭实力了。顺便说一下，即便始终是一名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离队时，也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这和退役金一样，都是在入伍时就约定好的条件。

第二种选择，是到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在那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有不少人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志向，十几岁时就到首都去接受高等教育。不管怎样，只要到了罗马，可以做医生，或者接受教育后做教师，还可以出任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总之获得公民权的办法一点都不缺。因为《尤里乌斯· 恺撒法》依然适用，规定向医生和教师颁发罗马公民权，行政人员所做的也是“公共服务”，也必须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阿庇安在哈德良皇帝时代就来到了罗马，在安敦尼· 庇护时代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个人的最终资历，是马可· 奥勒留皇帝时代类似首都国税厅的机构官员。所以，人们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出任公务人员，就能够获得罗马公民权，或者也可以先从事教职，取得罗马公民权后再出任公务人员，两条路都没问题。罗马时代的公务员制度并不严格，从教师到公务人员，然后又当作家的例子也并不稀奇。

我们不知道阿庇安的创作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其他人的做法去推测，有可能是从公共生活中引退返回故乡亚历山大之后才开始的。这个人留下来的主要著作，是从罗马建国时期到帝政时期的罗马

史，以及记录同一时期事件的其他文章。下面介绍的是他著作中的一种。根据阿庇安的记述，该事件发生于皇帝安敦尼· 庇护治下的公元160年，也就是说，当时身在罗马的阿庇安是现场目击证人。

> 蛮族的首领来到首都，他们向皇帝提出请求，要与并入帝国版图的其他行省的人享有同等地位。但是皇帝回答说，罗马帝国不能接受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这正是时代变化的预兆。公元160年是安敦尼· 庇护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个“慈悲”的皇帝在第二年就过世了，马可· 奥勒留接替了他。不过安敦尼· 庇护虽然高龄，但直到离世前几天仍很精神，接见外国代表又是皇帝的事务，所以说皇帝很可能亲自接见了这些蛮族首领。而安敦尼一直让下任皇帝马可积极参与国政，当年39岁的马可极有可能参加了接见。

蛮族提出了向帝国境内移居的请求，我们暂且不讨论罗马是否应该接受请求，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皇帝是否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安敦尼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可见他还是对该事件缺乏认识。不过，即使马可当时没有参加接见，但据说安敦尼凡事都找马可商量，所以马可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马可· 奥勒留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一事件预示着时代的变化。

对今天的西欧人而言，德国人蒙森和英国人吉本一样，也是罗马史的权威。但是，蒙森对马可· 奥勒留的评论，却与吉本截然不同。蒙森十分明确地作出马可“不是伟大的智者”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尤里乌斯· 恺撒一人堪称“伟大的智者”，是天才。而所谓的天才，并不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是在众多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人当中，唯一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的人。

这一问题安敦尼· 庇护草率地应付了事，却造成了马可· 奥勒留的终

生困扰。

公元168年新年不久，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位皇帝就离开了首都，前往多瑙河前线。47岁的马可和38岁的路奇乌斯都身披红色的军用斗篷，骑着高头大马，只要一看就知道，他们绝不是去前线视察，而显然是出征。实际上，这是自图拉真皇帝进行达契亚战争以来，时隔60年之久，罗马第一次向国内外宣示，决心要在多瑙河防线展开真正的战争。

对马可· 奥勒留而言，这不仅是47岁的他第一次到前线去，而且是他第一次离开意大利本土，甚至是第一次踏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以北的土地。这种经历不但不能同17岁就积累了边境军团经验的图拉真皇帝相提并论，而且在经验上也无法和行省任职的军团长们一较高下。皇帝之所以亲临前线，是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把所有军团长都置于直接指挥之下。即使具体的战斗委派给军团长们指挥，但在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和在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当然差异巨大。这一时期，马可· 奥勒留总算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实地经验的欠缺，即便从跟随皇帝的“comes”即智囊团的人选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以帕提亚战争时被派到路奇乌斯皇帝身边的庞提乌斯· 雷利亚努斯为首，还包括熟知多瑙河战场周围情况的潘诺尼亚、米西亚各行省的历任总督。这些人虽已隐退，但仍然应邀与马可同行。帕提亚战争时，因为路奇乌斯皇帝只是一味地在避暑胜地逍遥，对政治军事不闻不问，所以这些“智囊团”的作用是代替最高司令官推动战争的进展，但是在这次日耳曼战争中，“智囊团”的作用是弥补皇帝马可经验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现自己存在缺点就立刻努力弥补，这一点也是马可· 奥勒留被当做贤君的原因。

皇帝一行从罗马出发，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亚得里亚海，然后沿亚得里亚海到达阿奎莱亚，再从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阿奎莱亚取道东北方向，最后到达多瑙河防线。所有的行军都只需沿着遍布整个帝国的罗马道路网前进即可。

对罗马人而言，皇帝御驾亲征是60年来的盛举，而对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而言，事情同样如此。既然两位皇帝亲自出马，那其麾下的罗马大军肯定也是所向披靡。日耳曼各部族以前经常乘坐小舟或木筏渡过多瑙河，频繁袭扰南岸的罗马军队基地和居民区，此时他们都闻风而逃，再也找不到踪影了。

从春到秋都是适于开战的季节，此时皇帝却能毫无顾虑地在前线驻留，正是进行视察的绝好机会。在这一时期，皇帝马可在饱受蛮族侵犯的多瑙河中游各基地反复巡视。罗马的防卫体系由“点”和“线”构成。“线”指的是罗马大道，“点”指的则是军团基地。仅在这一带，沿河流布防的“点”相互联结，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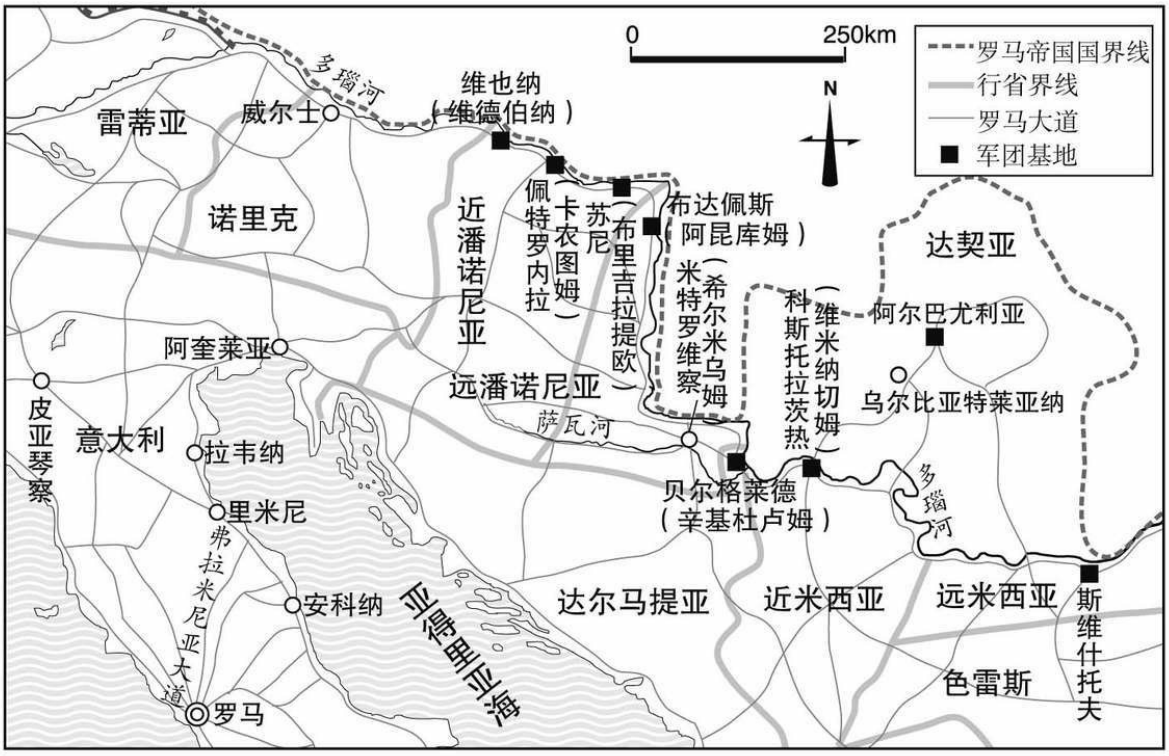
第十杰米纳军团基地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第十四杰米纳军团驻地卡农图姆（今奥地利佩特罗内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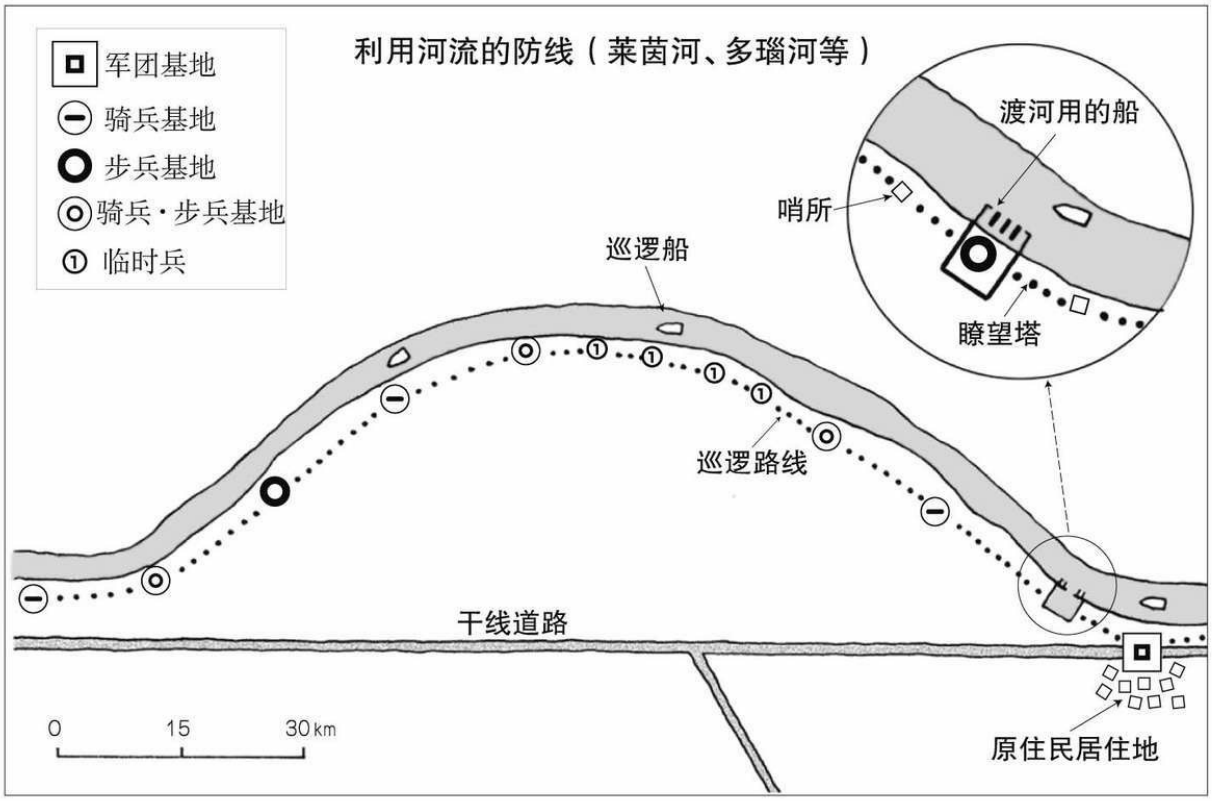
第一亚狄托里库斯军团守卫的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

第二亚狄托里库斯军团基地阿昆库姆（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第四弗拉维军团基地辛基杜卢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从罗马到多瑙河防线的主要道路



（摘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上述这些军团基地之间也并非荒无人烟，不但有辅助部队的骑兵驻地、步兵基地，而且更有当地临时征召的雇佣兵建起的要塞，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防守设施都像珠子一样连成了一串。而且在多瑙河防线上，还有执行巡逻任务的带桨帆船基地。

马可·奥勒留就这样在拉丁语称为“Limes”（边界）的防线上巡视，同时听取着智囊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他直到47岁才开始体验哈德良皇帝当年的部分征程。不过，当年哈德良皇帝视察此地的结果是确立了和平，而现在轮到马可，视察则是战争的前奏，这种差异对后者而言就是不幸。

两位皇帝决定把阿奎莱亚作为公元168年到169年的过冬地点。蛮族方面仍旧暗流涌动，阿奎莱亚处于意大利本土的东北端，同时又位于从多瑙河返回罗马的半路上。有一种说法，即多瑙河基地的瘟疫仍在流行，御医加雷努斯担心皇帝遭到传染，于是提出忠告，劝两名皇帝回到阿奎莱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皇帝路奇乌斯强烈地希望返回罗马，马可则苦苦挽留。此时前线比较平静，两位皇帝相互妥协，最后采取折中办法，到了靠近罗马的阿奎莱亚。也许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不管怎么说，两位皇帝已经决定，在阿奎莱亚的过冬营区内，对公元169年的活动作出计划。

路奇乌斯之死

史书没有记载两位皇帝对公元169年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可以确定的是，新年伊始，路奇乌斯就出发返回罗马。但是，当他到达距离首都约100公里的亚尔提诺时，突然病倒，接着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两天之后停止了呼吸。后世学者推测他死于脑溢血。因为路奇乌斯虽然只

有39岁，但生活奢华，饮食起居极不规律。两帝并立本是马可· 奥勒留公平精神的产物，8年来对方却始终没能为他分忧，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状态下，现在总算了结了。

我们虽然不了解两位皇帝起初的计划，但知道马可伴随着皇帝搭档兼女婿的路奇乌斯的遗体一起返回了罗马，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骨灰安放在今天称为“圣天使堡”的哈德良神殿。元老院顺利地通过了马可提出的神格化申请，不过供奉前任皇帝的神殿却没有修建。马可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可以用万神殿暂时代替。

路奇乌斯· 维鲁斯的国葬结束后，马可在首都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因为对前线之行有所犹豫，他毕竟是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出现在前线肯定对整个日耳曼战争都有积极意义，所以他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不过在离开之前，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处理，就是路奇乌斯皇帝过世，自己的女儿露西拉成了寡妇，应该对她作出安排。

一些人可能会疑惑，露西拉丧期未满，至于这么着急吗？不过从马可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刻不容缓。因为自己马上要赶到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前线去，万一出什么闪失怎么办？以前有两位皇帝，一个出了意外还有一个，可是现在只剩马可孤身一人了，而自己的儿子康茂德刚刚8岁。所以此时马可· 奥勒留需要的是一个能在紧急关头扶助康茂德，并避免帝国陷入内乱的人选。而且既然这个人负担如此沉重的任务，为了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必须事先保证他的地位。

被选为露西拉再婚对象的人，名叫提比略· 克劳狄乌斯· 庞培亚努斯。虽然从姓名上看他很像意大利本土人，其实是出生在安条克的叙利亚人。据说在他父亲那一代才刚刚取得罗马公民权，在罗马社会里处于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equitus）的行省人民。被选为皇帝女婿时，他正在远潘诺尼亚行省任总督，而且是驻扎在布达佩斯基地的第二亚狄托里库斯军团的军团长。在帕提亚战场骁勇善战的将军名册中，这个人并没有出现过，看样子，罗马东征帕提亚时，他当时可能驻守在多

瑙河防线。此人生年不详，不过从他后来的履历推测，应该同皇帝的年龄不相上下。顺便说一句，前任皇帝路奇乌斯的遗孀露西拉这时才19岁。

马可为什么放弃了其他目标偏偏选中庞培亚努斯呢？显然不是出于这个来自叙利亚的武将所取得的业绩。当时的庞培亚努斯不过是最前线的军团司令官，负责的区域以防守为主，因而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战功。此人作为武将的才能，直到后来的日耳曼战争中才得以发挥，而在公元169年的选拔考试上，这一点还不能为他加分。他就任执政官也是在4年以后，公元169年时他连“前执政官”的荣誉头衔都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抓住了皇帝马可的心。我想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一年前马可前往多瑙河防线视察时，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庞培亚努斯全程陪同，他对形势作出了正确、恰当、扎实的判断，并为毫无军事经验的马可提供了热情实用的建议。

第二，优秀的领导不会忽视对部下的能力培养，而庞培亚努斯率领的第二亚狄托里库斯军团的年轻将士的确表现得训练有素。

第三，人格正直，无比朴实。

第四，恐怕这一点最能抓住马可· 奥勒留的心，即这个叙利亚出身的“罗马公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罗马精神，这也是西班牙出身的图拉真皇帝和哈德良皇帝所拥有的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和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相比，反倒是拥有强烈自觉的行省人在支撑着罗马精神。庞培亚努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可· 奥勒留上溯四代也来自西班牙。

事实证明，马可在政治上完全取得了成功。在此后持续了10年的日

耳曼战争中，马可虽身在前线，但实际指挥全靠庞培亚努斯。再放眼后来20年，肩负守卫帝国重任的武将绝大多数都出自庞培亚努斯的帐下。他为人诚实，从没有背叛过马可。当马可死后，年幼的康茂德即位，深感孤立的康茂德当时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这个庞培亚努斯。

可是，庞培亚努斯与露西拉的婚姻在政治上固然很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却比较失败。夫妻间的年龄差异还不是主要原因，问题是前任皇帝的皇后、现任皇帝的女儿露西拉不满庞培亚努斯卑微的出身。据说她母亲芙斯汀娜起初也站在不愿屈尊下嫁的女儿一边。这个问题双方以露西拉继续保持“奥古斯塔”尊称为条件相互妥协。后来两人也有了小孩，可见露西拉并没有拒绝与丈夫同床共枕，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的婚姻生活从始至终都是冰冷的。

既然连喜爱哲学的皇帝马可· 奥勒留都无法回避家庭问题的困扰，那么我们现在就索性谈谈这位哲学家皇帝的婚姻生活。

皇帝搭档路奇乌斯的突然死亡以及随后举行的国葬，女儿露西拉的再婚，接着7岁的次子又夭折，公元169年发生了很多事，马可为此忙得焦头烂额。等到他再次离开首都，赶赴多瑙河前线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而第二年，他最后的孩子萨宾娜出生。

从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公元147年算起，加上中间两对双胞胎，马可夫妇在23年中共生下了14个孩子，虽然长大成人的只有一男五女共六人，但我想这23年里14个孩子的纪录不仅表示高产，也表现了性生活的和谐。而且马可· 奥勒留是忠诚的丈夫，从不拈花惹草。还有一个理由可以推测他们家庭生活的幸福。马可离开4年以后，皇后芙斯汀娜追随马可来到了多瑙河沿岸，此后终生陪伴在丈夫身边。另外芙斯汀娜也没有像一般皇后那样沉迷于豪华舒适的生活，而是居住在混杂不堪的基地内，慰问伤兵，关注军团兵们基地外事实上的家属的生活。士兵们赠予了这位皇后以“基地之母”（matercastrorum）的尊称。

可是，同时代的人对芙斯汀娜的评价却非常差。这其实是受了儿子康茂德皇帝口碑不佳的连累。女人们都知道，贤妻与良母未必总能集于一身。芙斯汀娜或许不是一个良母，但应该算是个贤妻。丈夫马可在《沉思录》中也曾言及自己死去的妻子，他这样写道：“我幸而有一个贤妻，如此的柔顺，如此的亲爱，如此的朴素。”（本段译文参考了《沉思录》，梁实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了30年。

在马可· 奥勒留长达19年的在位期间，所有的灾难竟然像烈焰一样同时喷发，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而马可深得自己人生伴侣的助益。《沉思录》虽然是马可在哲学思辨方面的遗作，但我认为在这部著作中，他的贤淑妻子拥有充分的资格得到体现。如果没有芙斯汀娜，马可纵然是贤君，也会因沉重的精神压力患上胃溃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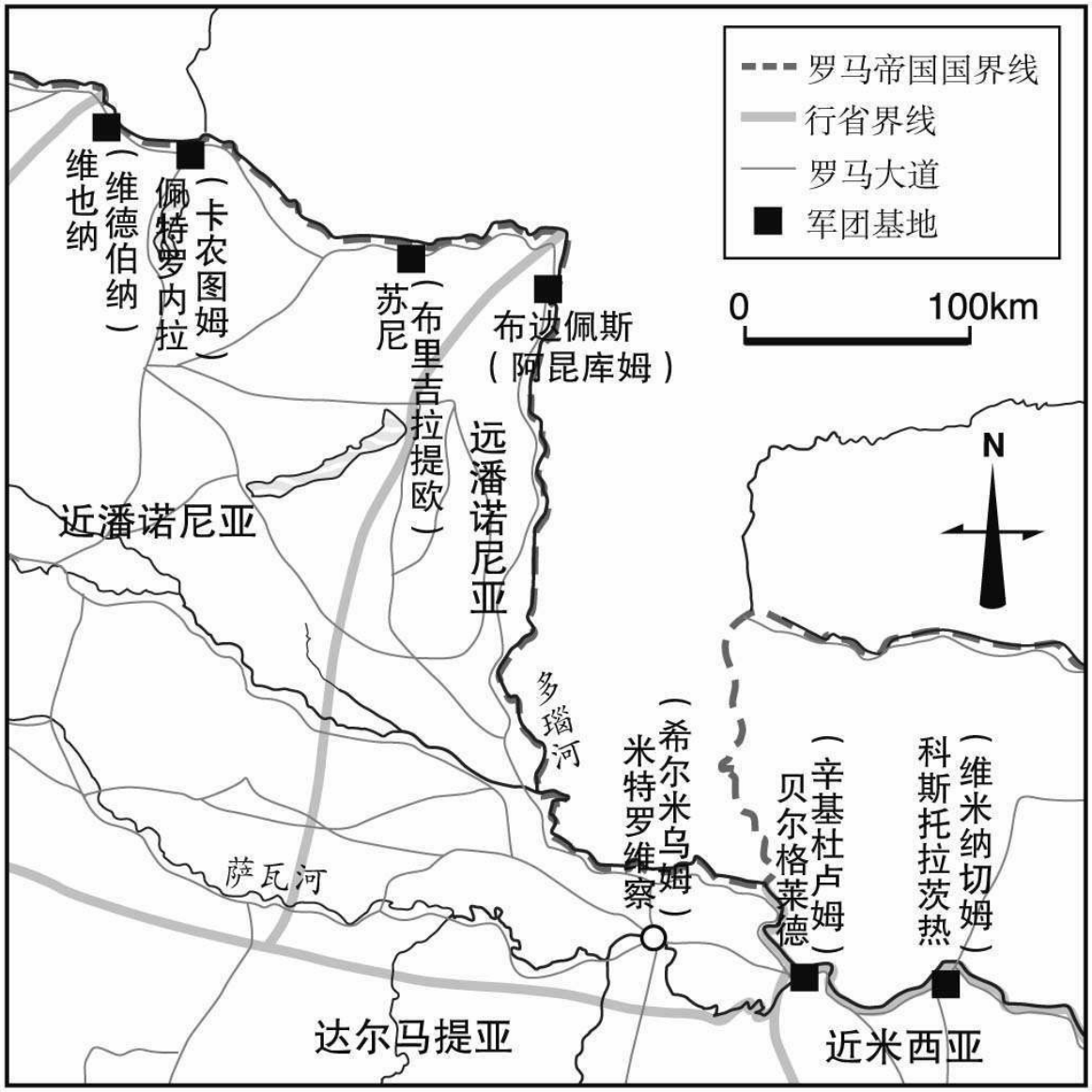
战争开始

我们把话题回到公元169年，再次回到多瑙河前线的皇帝马可决定，公元169年到170年的冬天在远潘诺尼亚的补给基地之一希尔米乌姆（今塞尔维亚的米特罗维察）度过。皇帝的驻地自然就是参谋总部。

罗马时代的希尔米乌姆，是重要性仅次于军团驻地的补给基地之一。巴尔干半岛上的萨瓦河向东奔流，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希尔米乌姆就位于萨瓦河沿岸，从这里向北20公里就能到达多瑙河，距离近米西亚行省首府、第四弗拉维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60公里。五条罗马大道都会聚到了这里，是哈德良防卫体系中，军团基地附近设置大规模补给基地的现实演示。在城镇建设方面也不亚于军团基地和行省首府，配备有罗马人都市中的必要设施。只要是补给基地，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交通便利。顺便说一下，在不列颠，前线是分隔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哈德良长城后方是约克、切斯特、卡莱奥恩三个军团基

地。向这些防卫组织提供物资供应的补给基地就是今天的伦敦，在罗马时代称为“伦底纽姆”（Londinium），因为从高卢出发渡过多佛尔海峡的运输船可以直接上溯进泰晤士河。罗马帝国的防卫体系是由“点”和“线”构成的，伦敦和希尔米乌姆虽然不是军团基地，但也是重要的“点”。罗马军队的确是“后勤制胜”。

之所以选择希尔米乌姆作为公元169年到170年间的越冬地，除了因为这里适合于召集多瑙河中游流域的防卫负责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由图拉真皇帝开辟为帝国行省的达契亚，是越过了多瑙河突出到北岸的一片地域，达契亚成为行省，的确减少了北方蛮族对多瑙河下游的袭扰，不过，达契亚这面“盾牌”本身却处于多瑙河北岸，就如同突出到蛮族之海中的半岛一样。可是罗马在达契亚却只配备了一个军团，因为这里和北方蛮族之间还横亘着一座喀尔巴阡山。山岳地带人烟稀少。



远潘诺尼亚及其周边地区

可是，到了公元2世纪后半期，自然条件严酷的山岳地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居民。因为更北的蛮族开始南下，这些人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挤到山地居住。这种现象正是时代出现变化的证据，但当时罗马的统治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皇帝马可之所以把参谋总部设置到希尔米乌姆，是因为他想把不稳定的达契亚行省北方开辟为第二年的战场，

在这一地区击退来敌非常方便。

公元170年春，罗马军队渡过了多瑙河，北上达契亚，展开了大规模攻势。我们不知道当时军队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但是却知道指挥这次进攻的人。他就是曾经活跃在帕提亚战场上的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从东方回来以后，他兼任近米西亚行省和达契亚行省的总督。因此开展本次攻势的，应该就是他麾下的三个军团。考虑到瘟疫造成的减员以及必须留守基地的力量，或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军团。就大规模的攻势而言，这些兵力简直微不足道。不知道主持作战会议的马可为什么竟然同意了这次行动。

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是智勇双全的武将，因为没有完整的战记留存至今，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记录，推测他似乎是乘胜追击才进入的山岳地带。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在平原上当然所向披靡，但到了狭窄的战场却难以发挥以往的战斗力。而亲自渡过多瑙河来到达契亚行省等待捷报的皇帝，最终盼来的却是坏消息。激战后虽然敌军败逃，可是司令官弗龙托战死，敌人掠走的俘虏和平民多达2万人。

出生在阳光普照的北非，却殒身于春雪尚未消融的欧洲腹地，一代名将的墓碑上，镌刻着下面这样的文字：

> 激战群蛮无往不胜的马尔库斯· 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为共和国家罗马鞠躬尽瘁，长眠于此。

在同代人撰写的史书中，将公元170年称为“最糟的一年”，而这一年并不会因总督的阵亡就宣告结束。当罗马大军都集中在达契亚北部的时候，有两支日耳曼部族乘机从侧翼南渡多瑙河，做出了大胆的举动。

“防线失守啦！”

马尔科曼尼人回避了维也纳军团基地，从遥远的上游渡过了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后大举南下，袭击了阿奎莱亚。尽管阿奎莱亚位于东北角，却属于意大利本土。另一方面，科斯特波奇人也在达契亚行省的东面南渡多瑙河，疾风骤雨一般，深入了希腊的腹地。他们这一路的目标是财宝，希腊各地的神殿成了掠夺的对象。

军团基地
外敌入侵
罗马反击
罗马帝国国界线
日耳曼长城
罗马大道
北海
撒克逊
萨尔马提亚
高其
哥特
莱茵河
勃克提利
伦巴底
勃肯特
克桑腾
凯尔斯基
塞姆诺内斯
汪达尔
科隆
波恩
卡提
赫尔敏托利
禄吉
兰斯
美因茨
比尔吉亚
马尔科曼尼
布里
纳利斯提
科提尼
科斯特波奇
斯特拉斯堡
奥格斯堡
夸地
奥西
阿纳尔提
雷蒂亚
威尔士
维也纳
佩特罗内拉
苏尼
布达佩斯
雅兹盖斯
达契亚
日内瓦
阿尔卑斯山脉
伦克索拉尼
里昂
埃姆
米兰
诺里克
潘诺尼亚
阿尔巴尤利亚
苏萨
都灵
阿奎莱亚
乌尔比亚
依格里扎
贝尔格莱德
科斯托拉茨热
锡利斯特拉
马赛
塞米亚兹
达尔马提亚
意大利
斯普利特
萨洛那
特莱亚纳
多瑙河
斯维什托夫
君士坦丁堡
科西嘉
米西亚
色雷斯
罗马
布林迪西
加普亚
马尔马拉埃莱利西
撒丁
那不勒斯
马其顿
塞萨洛尼基
塔兰托
亚该亚
N
尼科波利斯
帕加马
巴勒莫
科林斯
雅典
以弗所
西西里
迦太基
希腊
米利都
锡拉库萨
龙柏斯
地中海
加贝斯
克里特
0
250
500km

公元2世纪后半期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

“防线失守啦！”这个消息就如同不断扩大的涟漪，传遍了帝国的西部。

拉丁语所谓的防线（Limes），意指屏障、防卫体制，还有安全保障的意思。现在意大利最权威的国防杂志的名字就叫“Limes”。这次的“Limes”已经维持了270年，结果现在被攻陷，罗马人当然深受打击。那么，防线为什么会被如此轻易地突破呢？

第一，在多数情况下，日耳曼民族入侵时都拖家带口，但公元170年全员都是战斗人员，也就是说是一群男人，且全体都是骑兵。

第二，罗马军队的骑兵只善于在保养完善的罗马大道上行进，而未开化的蛮族则习惯于在山野里疾驰。结果是他们突破了罗马方面的监视网。

阿米阿努斯· 马尔塞利努斯是公元4世纪末的历史学家，这次事变比他生活的年代早了200年，他参考着当年的记录，写下了如下文字：

> 日耳曼民族的暴行使阿奎莱亚整个城市遭到损害，他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展开，阿奎莱亚的居民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蛮族们似乎所向无敌，烧杀劫掠，只要是好东西什么都抢，把女人和年轻人都绑走。现在不但帝国北方的防线失守，就连北阿尔卑斯山防线都遭攻克。马可皇帝只能组建新的部队，用来防卫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半岛。

但是，入侵者也犯了错误。他们闹得太过分了。与南下时的快如疾风不同，掠夺来的物资和人口延误了他们的北上，而庞培亚努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已经恭候多时。这一次，是日耳曼人被追杀得七零八落。

尽管是暂时的，可防线毕竟失守过，这件事给罗马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300年来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相信蛮族会被阻挡在多瑙河以北，罗马帝国内部所有地方都是安全的。都市街道和村庄虽有“城墙”，但也不过是起到区分市区与郊区的作用。至于首都罗马则连城墙都没有。尤里乌斯· 恺撒认为，国境上的防线应该也必须守护住罗马国家的安全，因而首都罗马的城墙毫无必要。恺撒拆除了首都罗马的城墙。以后的220年间，罗马的居民们是在没有城墙的状态中度过的，大家也都对国境的防线无比信赖。并且对罗马人而言，漫长的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都不仅仅是河流，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防线”。

公元170年发生的这次事变，最初的影响就是都市村镇的居民开始加固城墙。以往的敌人是盗贼，今后的敌人则可能是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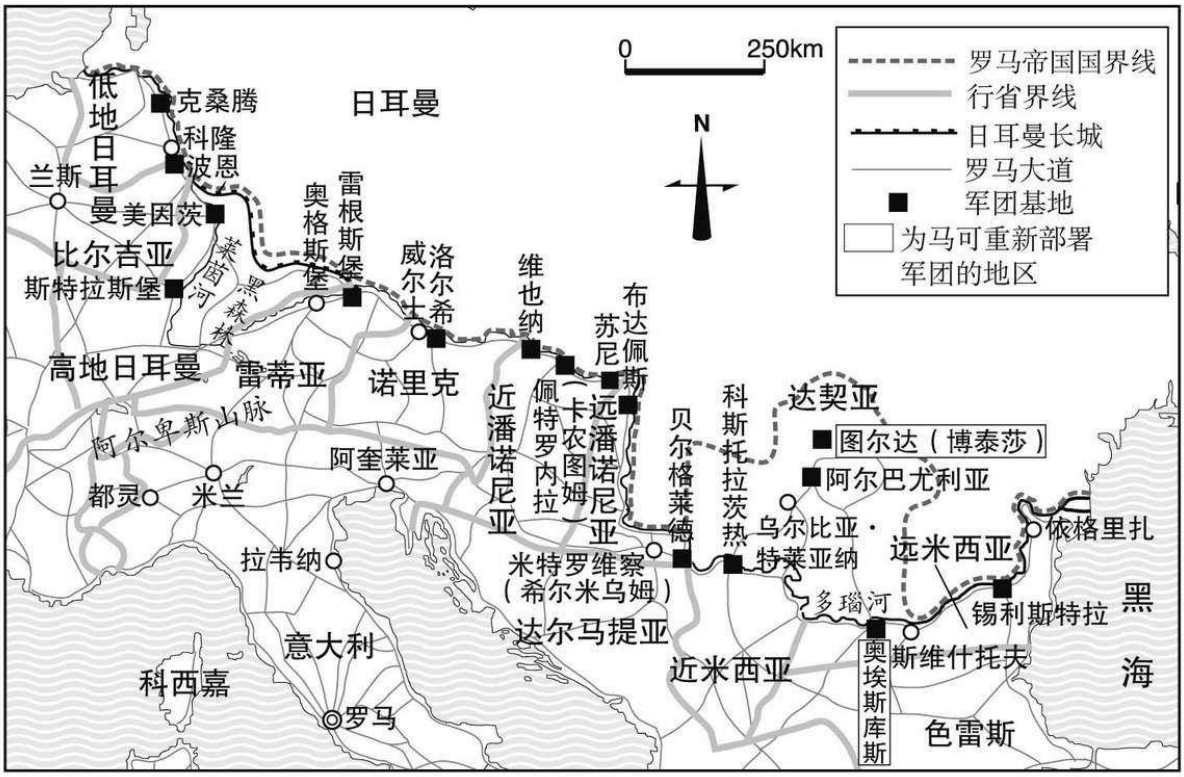
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负责人马可，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尽管200年后的历史学家批评这不过是亡羊补牢。

第一项措施，就是新设“意大利和阿尔卑斯防卫部队”（Praetentura Italiaeet Alpium）。对罗马人而言，这一措施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新增一支部队。因为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罗马的军事力量都只配备在罗马国家的防线上，而现在居然需要在国内设置防卫力量了。

第二项措施，是新增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都在意大利本土招募和训练，名为第二意大利军团和第三意大利军团，常驻基地分别在今天奥地利的洛尔希和德国的雷根斯堡。这两个地方都是日耳曼长城附近的战略基地。当年图密善皇帝为把莱茵河与多瑙河连接成一条防线，着手兴建日耳曼长城，以后图拉真和哈德良又不断强化。也就是说，皇帝马可意图进一步加强日耳曼长城与多瑙河防线的作用。

第三项措施，就是重新调整多瑙河从中游到下游地区的防卫力量。具体就是改换远米西亚行省和达契亚行省驻守军团的布置。

首先是驻扎在远米西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其中以多洛斯特姆（今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为基地的第十一克劳狄军团原地不动，负责多瑙河下游到黑海的防卫。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防线（马可 ·奥勒留强化后）

行省名称	军团数	军团名称	基地（当时地名）	基地（现在地名及所在国家）
Raetia（雷蒂亚）	1	Ⅲ Italica	Castra Regina	雷根斯堡 / 德国
Noricum（诺利库姆）	1	Ⅱ Italica	Lauriacum	洛尔希 / 奥地利
Pannonia Superior（近潘诺尼亚）	3	Ⅹ Gemina	Vindobona	维也纳 / 奥地利
		ⅩⅣ Gemina	Carnuntum	佩特罗内拉 / 奥地利
		Ⅰ Adiutrix	Brigetio	苏尼 / 匈牙利
Pannonia Inferior（远潘诺尼亚）	1	Ⅱ Adiutrix	Aquincum	布达佩斯 / 匈牙利
Moesia Superior（近米西亚）	2	Ⅳ Flavia	Singidunum	贝尔格莱德 / 塞尔维亚
		Ⅶ Claudia	Viminacium	科斯托拉茨热 / 塞尔维亚
Moesia Inferior（远米西亚）	2	Ⅰ Italica	Oescus	吉根 / 保加利亚
		Ⅺ Claudia	Durostorum	锡利斯特拉 / 保加利亚
Dacia（达契亚）	2	Ⅷ Gemina	Apulum	阿尔巴尤利亚 / 罗马尼亚
		Ⅴ Macedonica	Potaissa	图尔达 / 罗马尼亚

马可·奥勒留强化后的多瑙河防线

说明：阴影部分为新配置的军团。

另一方面，以诺瓦埃（今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为基地的第一意大利军团向上游转移100公里，到奥埃斯库斯（今斯维什托夫）驻防。因为奥埃斯库斯和达契亚将多瑙河夹在中间，北岸是达契亚行省，南岸是奥埃斯库斯，这种安排相当于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双重防卫体制。

马可• 奥勒留

而以特罗埃斯密斯（ 今罗马尼亚的依格里扎）为基地的第五玛肯多尼加军团转移到达契亚行省的博泰莎（今罗马尼亚的图尔达）。这样远米西亚行省内的3个军团就减少成为2个，而达契亚行省的常驻军团由2个增加到3个。这种安排表现了马可的防守战略，即在防守多瑙河之前，应先防守达契亚。

多瑙河的防卫体制，自哈德良皇帝确定下来以后，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不曾出现过丝毫变动，现在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投入的军团数量，也从10个军团增加到了12个军团。而帝国其他防线上的军团数量和位置都没有变化。话说回来，仅仅变动这个多瑙河防线就已经殊为不易了。我在触及地名时，都标注了“今罗马尼亚”或“今德国”等，为的就让大家理解进行所谓的“国境防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罗马时代的多瑙河防线，意味着包含了今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庞大复杂的防卫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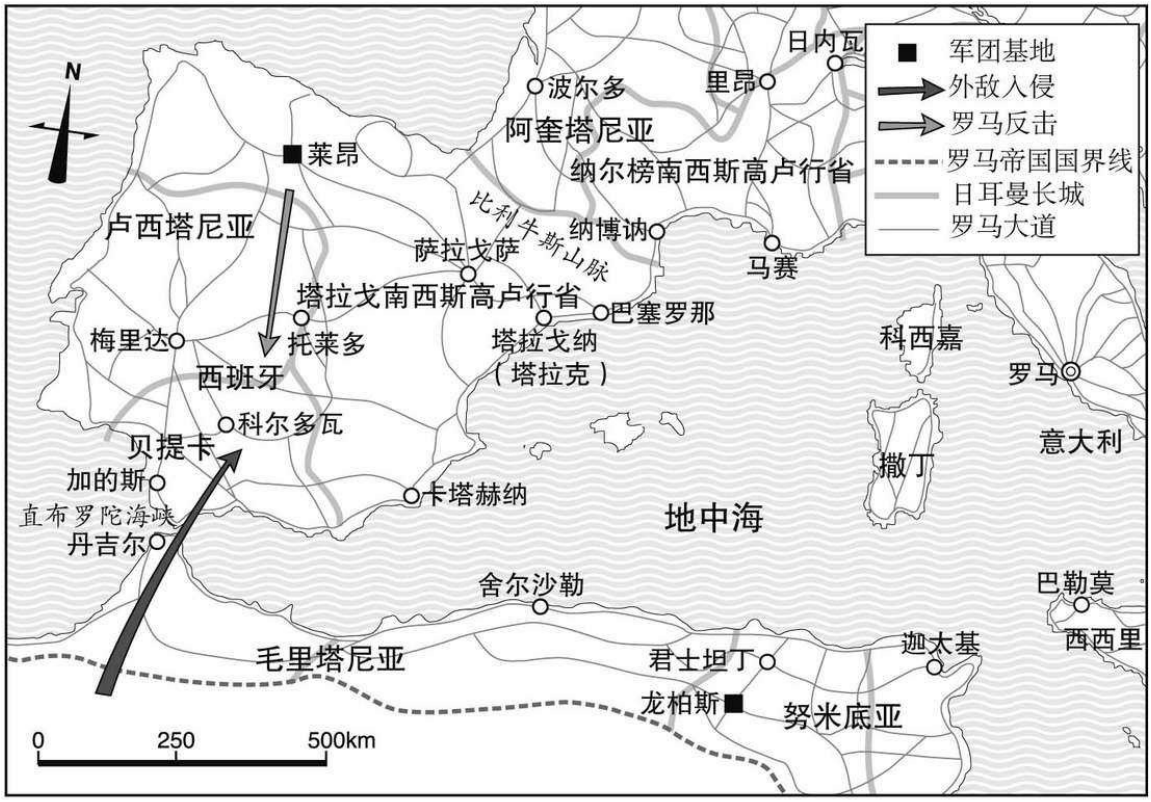
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在距马可时代半个世纪之后担任潘诺尼亚行省总督。他在著作中写道：

> 多瑙河防线是测量帝国身体状态的仪器。罗马帝国的存亡是和多瑙河沿岸各行省（包括潘诺尼亚）的安全紧密联系的。

到了马可· 奥勒留的时代，的确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公元170年，尽管是暂时的，但罗马人的确是眼睁睁地看着日耳曼的两个部族突破了多瑙河防线。第二年，马可以维也纳下游50公里的卡农图姆为基地，精心策划来年展开的大反攻。然而这时，从西班牙传来了坏消息。住在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人的一部分渡过了古称“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伊比利亚半岛登陆，他们烧杀抢掠，赶走原住民，占据了贝提卡行省一带。行省总督发来了十万火急的求援文书。

毛里塔尼亚行省以北非西端的丹吉尔为首府，它的存在阻止了当地异族入侵靠近地中海的富饶地区。结果异族把目光转向了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对岸，转而把入侵并占据的目标变更为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入侵者们都拖家带口。看来不但在帝国的北方，连西方的“Limes”都出现了破绽。而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罗马仅以西北部的莱昂为基地驻扎了一个军团。并且在这一时期，第七杰米纳军团的军团长出缺，由身在首府塔拉克（塔拉戈纳）的行省总督兼任，毕竟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有200多年不曾发生过战事了。



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防线

皇帝马可连忙派出了在帕提亚战争中大显身手的猛将奥菲狄乌斯·维克托利努斯。实战经验丰富的他一出马，情况就为之一变。罗马军团以训练严格认真而闻名，据说他们训练与实战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流血而已。自不待言，非洲来的入侵者犹如落叶一般，果然被一扫而光。然而

这次入侵的蛮族，也显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征兆。马可· 奥勒留与先人截然不同，将不得不面对新的艰难时局。当然时隔不久，马可自己就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和以前不同的疑难问题，也在帝国北方出现了。

罗马人和蛮族

如果一定采用“蛮族入侵”这个词，不免太过于偏重罗马人的史观了。实际上，这种应称为“民族大迁移”的历史现象是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导火线。不过，这种现象绝不是公元5世纪才突如其来的，蛮族入侵的历史几乎覆盖了罗马的整个历史。换句话说，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人的力量与财富就吸引了周围居民的瞩目，到公元5世纪灭亡的700年间，罗马人始终要剑拔弩张地应对周边的蛮族。

那么，为什么蛮族只从帝国的北方入侵，却不从东方袭扰呢？

古代欧洲东北部一带，首先气候很恶劣，再加上是狩猎民族，所以当地人都很贫穷。先进国家的人们可能以为，既然他们生活贫穷，粮食不足，人口应该会减少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蛮族除了物资贫乏，文明程度也比较低。一般的家庭只有一间房子，狩猎归来之后往往无所事事，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仅有的房子里进行，其中当然包括性生活。所以他们从无聊的幼年时代起就对此司空见惯，多产是当然的结果。如果在繁衍后代时多考虑一下孩子的养育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叫“蛮族”了。

因此，在欧洲的东北一带，即今天的德国东部与北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原苏联境内多国，蛮族南侵就像一次次的水位上涨然后溃堤一样，这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并无干系。溃堤之后河水向西南方向奔流，因为西南部是农耕地带，物产丰富，贸易兴盛。在生产效率上，农耕社会的确比以狩猎为生的人们要高得多。而蛮族也并不是因为生性勇猛才发动侵略，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生产水平低

下，所以才南侵。

而在罗马帝国的东方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因为有帕提亚王国像一面盾牌一样挡在那里。

亚洲同样有蛮族，他们向西南进攻也是经常的。但是相比于欧洲蛮族以罗马为目标，亚洲蛮族瞄准的则是中近东最富裕的帕提亚。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以来对帕提亚的政策完全正确，他们以帕提亚为假想敌，长年不懈地坚持防备，时而动用军事力量出击牵制，却始终保持在帕提亚王国不至崩溃的限度上。对罗马而言，只要不向自己境内进攻，帕提亚王国的存在利大于弊。

至于帝国南部北非地区的防卫，原住民没有能力组织大军越过沙漠进击，因而不成问题。所以，罗马帝国的蛮族政策，重点都是如何抵御来自欧洲北部的侵袭。而实际承受这些压力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罗马常驻不列颠的三个军团也不仅仅是防备哈德良长城以北的喀里多尼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也有很多蛮族会渡过海峡，侵入苏格兰，进而南下袭扰罗马帝国。

公元前102年，罗马在马赛以北20公里处展开了有名的“埃奎亚· 塞克斯提亚战役”。这是罗马首次采取真正的对抗措施。执政官马略率领的罗马军队将10万多日耳曼人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面对当时入侵的30万蛮族，仅靠这一次胜利还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如果把从法国南部入侵意大利的10万日耳曼人算做第一阵营的话，那么还有20万人的第二阵营经由瑞士南下，一直推进到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战争持续到第二年，即公元前101年，直到彻底战胜了这支敌军之后，意大利才终于从蛮族入侵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关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蛮族入侵，我们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已经有详细讲述，这里我们只作简要的说明。

讲述罗马与蛮族的关系，绝不能遗漏尤里乌斯· 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

中期进行的高卢战役。

这次战役不但没有像马略那样仅是击退来敌，而且也没有单纯停留在未受侵犯却主动出击，最后征服高卢使之成为罗马的行省的高度上。蒙森曾评价恺撒，说他是“罗马唯一的创造性天才”。我也同样认为，详谈恺撒需要贯穿整个罗马的历史，因为他为罗马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指引，而后来的罗马统治者也都基本遵循着他的理念。

他认为河流比山脉更适于防卫，用远征显示了对不列颠的占领是高卢甚而整个帝国西部安全所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并且他还用具体事例说明，在蛮族的应对策略方面，不应该只是击退，还应该注意同化对方。

恺撒把莱茵河确定为防线，西侧是归顺罗马的高卢民族，东侧则是持敌对态度的日耳曼民族。然而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有很多日耳曼人侵入莱茵河以西并定居下来。当时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希望恺撒能帮他们把敌对已久的日耳曼人赶回莱茵河东岸去，可是这种希望最终落空，恺撒允许已经移居西岸的日耳曼人继续存在下去。

到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将整个高卢划分为六个行省时，之所以把靠近莱茵河的两个行省分别命名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也是因为这两个行省的居民属于日耳曼民族。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就已经在莱茵河两岸定居了。从民族性的角度讲，现代德国的领土跨越着莱茵河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当然，在罗马时代，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和非罗马化的日耳曼人是截然不同的。例如是罗马人移植了葡萄，因而摩泽尔葡萄酒的产地也位于莱茵河西岸的罗马境内。

当然，尤里乌斯· 恺撒的功绩不止于此。乌比人是日耳曼的部族之一，虽然居住在莱茵河东岸，但是和那些大张旗鼓地反对罗马的其他部族相疏离，结果遭到其他部族的攻击，失去了居住地。恺撒允许他们移居到现在的科隆一带。乌比人不但亲罗马，而且是日耳曼民族中的强大

部族，这更使恺撒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现在的波恩和美因茨等大都市都是从罗马的军团基地发展而来的，只有科隆不是这样。这里最初只是日耳曼的一个部族聚居地，幸亏战略位置重要，在奥古斯都时代由皇帝的得力干将阿格里帕安排退役的军团兵迁入开垦，最终变成莱茵河沿岸的大城市。开垦地的拉丁语为“科洛尼亚”，按德语发音就是“科隆”。

恺撒的这项政策不但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遵循，而且被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所继承。阿格里帕死后，提比略代之以成为奥古斯都的左右手，而现在多瑙河南岸的大城市，绝大部分是他开始建设的。当时他也没有用种族作为亲罗马和反罗马的划分标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人只要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就属于亲罗马一方，当时尚未定居，但也愿意服从罗马命令的，也可以移居到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境内。故而多瑙河的南北两岸和莱茵河的东西两岸情形相同，即用河流把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和非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区分开来。

在整个地区推行同化政策的，是图拉真皇帝。他征服了达契亚并将其列为行省。总之对罗马人而言，只要接受帝国统治，在帝国境内生活，种族差别根本就不是问题。

马可· 奥勒留无疑也继承了这种思维。不过到了他的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蛮族入侵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元5世纪灭亡罗马的伦巴底、哥特、汪达尔等蛮族的名称，已经犹如远方的雷声，滚滚而来了。

时代的变化

公元171年，在多瑙河前线，马可· 奥勒留迎来了他50岁生日。从登上帝位开始计算，10年过去了，但马可对人的态度没有发生丝毫改变。

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皇帝传》中这样描写马可：

> 在作出决定前，无论是军务还是政务，他都注意倾听相关专家的意见。这是皇帝的风格。对于那些抱怨他拖泥带水的人，他经常这样说：“相比于让朋友们简单地服从我个人的意见，先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再作决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
> 并且，由于倾向于自己的哲学（斯多葛学派），无论身处军旅还是日常生活，他都严格自律。这种严格甚至经常招致部下的批评。心怀意见的人可以当面堂堂正正地展开批评，而皇帝也有条有理地进行反驳。

在《沉思录》中，马可也讲述了别人批评他像位教师。

不过有一件事，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对将军们给他的“前线太危险，应该返回首都”的忠告，他坚决给予拒绝。

公元171年，马可50岁，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开始亲自接见蛮族的代表。很多部族使节会渡过多瑙河，拜访驻留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中的马可。这些人向马可提出了如下愿望，按照来源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蛮族提出的。

停止侵略，准备与罗马皇帝讲和。将来如果能与罗马结盟，他们愿意今后站在罗马一边，阻止经常觊觎罗马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可以成为帝国防线的最前沿。不过这需要罗马提供资金帮助。如果罗马不接受这种建议，那么他们恐怕只能继续开展敌对行动。

第二种——在多瑙河中游北岸居住着马尔科曼尼、雅兹盖斯和夸地三大部族，这种方案是由夸地人提出的。

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成功，（夸地人）愿意解除与马尔科曼尼人的联盟，自己的马匹和家畜只卖给罗马军队，遣返所有逃兵，先返还1.3万名成为俘虏的平民，其余的将逐渐返还。希望罗马保持开放集市的习惯做法，他们可以渡过多瑙河卖出土产，购买其他必需品。

第三种——这不是大部族的建议，而是中小部族提出的方案，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请求。在多瑙河北岸，即使只计算罗马防线正面的部族，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就已经超过了10个。

他们同样遭受来自北方的侵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只能逃往罗马境内。如果罗马能保证他们维持生活的土地，他们愿意终止迫不得已的暴力入侵。

那么，和顾问及部下商讨之后的马可是怎样对待这些提议的呢？

首先第一种，同意媾和，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资金援助。用昨天的敌人去阻挡今天的敌人，如果顺利的话对防卫力量是一种增强。马可虽然对希腊哲学很狂热，但面对这种情况却保持着罗马式的理性。不过具体到这个建议，资金援助的数额只能增不能减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对待第二种提议，因为对方是强大的部族，必须态度谨慎。

皇帝同意购买对方的马匹和家畜，当然也接受逃兵的遣返和平民俘虏的归还，但是不许夸地人进入罗马境内参与集市贸易。无论是想讲和的夸地人，还是明目张胆反罗马的马尔科曼尼人，同样都属于日耳曼民族。对罗马的军团兵而言，他们从外貌到语言都相同，无法区别，绝不能让马尔科曼尼人冒充夸地人混杂在集市的人群中，乘机刺探罗马方面的防卫设施和军粮补给状况。

话虽如此，不过如果终止贸易关系的话双方的经济都难以维持。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自不待言，就是在与经济落后的日耳曼民族相对峙的防

线上，罗马帝国也没有让内外完全隔绝，而是利用共同的经济关系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外交流。这也是罗马帝国的基本国策，因为只要存在着有利因素，对方就不至于做出过激举动。而既然罗马与缔结了友好条约的蛮族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往来，此时也不能只把夸地人排除在外。用小船载着一家老小渡过多瑙河，到罗马境内赶集，除了货物的买卖以外，还是一种近乎娱乐的活动。如果连这都加以禁止的话，对方有可能认为自己遭受了侮辱。

同样，罗马军队正在准备在来年春天展开大规模攻势，对象就是马尔科曼尼人，此时绝不能让他们的密探靠近罗马领地。

皇帝马可告诉夸地人的代表，接受议和请求，不过在对方和马尔科曼尼人断绝关系的行动得到确认之前，对议和条件之一的开放集市，还暂时不能答应。言外之意，这项内容以后可以修正。

和谈成功了。对这一时期的罗马而言，与夸地人的议和意义非凡。

粗略地分析，公元2世纪后半期多瑙河中游一带的形势如下：

沿着多瑙河，右岸依次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原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这些城市起源于罗马的军团基地，在罗马时代都是前线。而日耳曼民族则居住在多瑙河左岸，维也纳对面的是马尔科曼尼人，布达佩斯对面的是夸地人，贝尔格莱德对面的是雅兹盖斯人。与夸地人媾和的实现，就等于将蛮族的共同阵线从中间腰斩。实际上，到了次年，即公元172年，罗马军队大举进攻，一路从维也纳出发，另一路从贝尔格莱德出发，两路人马同时越过了多瑙河。

那么，现在还剩下第三种提议。马可如何处理蛮族提出的向罗马境内移居的请求呢？尤里乌斯· 恺撒已有先例，允许日耳曼人的乌比人移居，最终发展起了科隆，马可· 奥勒留也同样允许了这些人移居到罗马帝国境内。因为都是些中小部族，不但可以在达契亚、米西亚、潘诺尼

亚等各个行省内分别划拨土地，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前往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定居。不管怎么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这些行省，居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原本就属于日耳曼民族。皇帝预计他们会像已经罗马化了的当地居民一样，也实现罗马化，而在这种情况下的罗马化，其实是“农耕化”。

虽然向这些地方的移居行动取得了成功，但马可还考虑了一处移居地。那就是意大利本土的拉韦纳。蛮族虽然移居到了拉韦纳提供的近郊土地上，但整个行动却完全失败了。拉韦纳和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诺一样，是罗马帝国的两大海军基地之一。这就如同把吴或佐世保（吴位于日本广岛湾东岸，二战前为重要军港。佐世保位于日本长崎县北部，二战结束前以海军城闻名。——译者注）近郊的土地拿出去供别人耕种一样。无论在哪一方面，移民和附近居民的差距都太大了，这绝不仅仅是民族、语言或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而是在生活水准上有巨大差距。我们不明白马可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决定。可能只是出于单纯的善意，或者也想让蛮族生活在意大利人中间，以使习惯了和平的本国人有所警醒。

总之结果是狼狈不堪，连一年都没到就已见分晓。移民们成群结队袭击了拉韦纳城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直到镇守阿尔卑斯和意大利本土的部队赶到，才好不容易将他们镇压下去。然而此时，拉韦纳居民们的不满已经转向了作出这一决策的皇帝。马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移居到拉韦纳近郊的日耳曼人全部赶出了意大利半岛。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罗马大概是提供了和其他移民相类似的土地，让他们第二次移居。

有那么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喜欢批判马可此时的政策，认为这是罗马帝国蛮族化的发端。可是，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概没有想过，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尤里乌斯· 恺撒就已经开创了这种“蛮族化”的先例。纵然我们不去争论什么罗马的蛮族化和蛮族的罗马化，只要击退入侵蛮族就算万事大吉的时代也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处于时代变化中的马可本人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吧？

或者他还没有意识到？

又或是他在公元172年真正开始第一次日耳曼战争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到6年之后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时就已经意识到了？

罗马皇帝是罗马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如果此人身在前线，那么整个战线的战略都由皇帝亲自决定。可战略并不是只靠正确把握现状就能够确立的，而需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纳入视野，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否则即使取得胜利，也难以有效利用胜利成果。如果没能有效利用胜利成果，那么战争虽胜犹败。这种意识上的“自觉”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正好可以作为一贯战略的支柱，如果这种“自觉”的战略支柱没能确立，那么战争就很容易陷入长期化。

不但是遭受攻击的一方，对进攻的一方，战争也是一种“恶”。因为是“恶”，所以尽早地结束战争的确就是“善”。

马可· 奥勒留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为尽早结束战争，罗马军队的传统就是投入大军一蹴而就。为此，马可的准备工作在三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罗马军队的主力是军团兵。即便在平时，一个军团的6000名士兵中，也需要保持250名左右的补充兵员，因为随时都会有20年服役期满的人脱离队伍。不过在公元170年的时候，补充兵员是平时的两倍。因为在帕提亚战争时，罗马军队远征东方，带回的瘟疫造成了减员，一年前克劳狄乌斯· 弗龙托战死时也造成了兵力折损。罗马实行募兵制，需要花费时间等待志愿者的到来，所以不能保证及时补足缺额。为达到目的，马可也只好开始不择手段。

首先，他在军团兵的辅助力量辅助兵中选择出色的人，提拔为军团

兵。因为成为军团兵的条件之一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来自行省人民的辅助兵在编入军团时，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

这样一来，又需要补充辅助部队的空缺了。这时马可甚至接受了奴隶之中的志愿者。出身于行省的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后就能得到罗马公民权，马可承诺奴隶们也享有同等待遇。

这一点在普通公民中间也议论纷纷。把奴隶编入罗马军队是布匿战争时候的事，当时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派上了全由奴隶组成的两个军团。那时罗马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是380年之后，历史在重演，也难怪平民们大为震惊。

可是，纵然奴隶们愿意去服兵役，也只能在获得他们主人的允许之后才可实现。这样这项政策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于是马可接下来又为角斗士开辟了应募的道路，可他们又都是舞枪弄棒的高手，从事着当时的热门职业，收入相当不错，很少有人愿意抛家舍业投身军旅。结果，屈指可数的应募者都是被兵役期满即给予解放奴隶资格的待遇所吸引，即奴隶之中的角斗士，而且是二流水准。我总觉得，马可的这些措施都是在隔靴搔痒，可能他也是病急乱投医吧。

不过，在马可这一时期的政策中，倒是有两项效果斐然：

第一，新设了由山贼组成的部队。皇帝贴出布告，凡有山贼肯投降去服兵役，即可不问前罪。山贼们纷纷响应。其实这未必是山贼们愿意以后生活在阳光之下，所以痛改前非了，而是因为在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盗贼的营生也很艰难。

第二，把因各种缘由脱离自己部族的日耳曼人组织起来形成部队，他们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作为雇佣兵编入罗马军队。

尽管如此，和当年与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统治者一样，马可

· 奥勒留也没有接受17岁以下的少年志愿者。很久以来罗马人就坚信不疑，未来的罗马公民的成长，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环境，因此罗马军队中没有童兵。

组织军队并使其发挥作用，还需要庞大的资金。先帝安敦尼临终时留下了富足充实的国库，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治国有方，还因为在他任上不曾发生过战争。无论结局胜败如何，只要开战就要花钱。

因此马可需要大笔的军费，可是他还不想提高税率或者临时征收特别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列举出了下面这些理由：

第一，避免招致纳税人的批评。

第二，增税阻碍社会生产。

第三，皇帝应该率先垂范。

于是马可决定拍卖皇宫中的收藏品。这并不是出售皇帝的私人物品。在皇帝的周围，自然会积攒着其他国家的王侯或部族首领赠送的礼物。即使到今天，各国王室或总统、首相之间也仍旧保持着相互赠送礼物的习惯，这些赠品的所有权往往很模糊。在罗马帝国，这些物品属于皇帝，也就是属于国家。马可决定出售的就是这些东西。《罗马皇帝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 在首都罗马最宽阔的神君图拉真广场上，展示出了众多的皇宫物品。黄金和水晶制作的摆件、填充着阿拉伯香料的大壶，还有很多装饰皇宫的美丽花瓶，以及无疑是赠与皇后的丝绸和布满刺绣的布匹。其中最大放异彩的，是在最近偶然找到的，是当年哈德良皇帝的珠宝首饰收藏品。
>
> 将这些收藏品全都拍卖完毕，竟然花费了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罗马境外的买家也加入进来，买走了很多豪华收藏品。皇帝与

众人约定，当与马尔科曼尼人的战争结束后，只要买家提出要求，皇帝可以把藏品赎回。不过，似乎没有人有此意愿。

另外，编年史的作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曾注意，皇帝马可还施展了另一种调动资金的办法。那就是虽然幅度微小，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都被削减了。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削减的分量的确微乎其微。如果削减过多，货币的价值就会下跌。

直到盛行研究罗马货币的现代，人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对货币这种反映时代的一级史料抱有强烈的兴趣，终于注意到了五贤帝时代唯一的一次货币缩水。不过，考虑到马可· 奥勒留的名誉，我们必须强调，这次货币缩水是暂时现象，并非通货膨胀的征兆，4年以后，货币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分量。

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Columna Marci Aurelii）

公元172年，万事俱备之后，第一次日耳曼战争终于开始了。有关这次战争的过程，说实话，我真的无法追寻。不但是我，别人也同样不明就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虽然留有一些记述，却也只不过是战争进程中的片断集成，而不是前后连贯的战记。

可是，如果说恺撒留下的《高卢战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那么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也和马可的日耳曼战争一样面临着史料上的不利。然而后代的历史学家们仍旧能够追寻出达契亚战争的过程，因为只要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依次研究图拉真记功柱上面的浮雕就可以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9 · 贤君的世纪》中就逐一解读纪念柱上雕刻的场景，用这种方法叙述了达契亚战争进程。

马可· 奥勒留也采用了和图拉真记功柱同样的形式，雕刻了一根记

录日耳曼战争的圆柱，并且这根纪念柱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罗马市中心，即首相官邸前面。但在这个地方是先有纪念柱，只不过到了17世纪，红衣主教琴奇有意借助纪念柱作景，于是在旁边建起宫殿，今天作为首相官邸使用。顺便说一下，在意大利，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不称这里为首相官邸，而称为“琴奇宫”。

和马可的纪念柱相对照，图拉真记功柱所在的地区现在只剩下了一片遗址，从位置上看，还是“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更容易吸引众人的目光。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图拉真记功柱的研究著作为数众多，而正式名称为“Columna MarciAurelii”的马可纪念柱却有些落寞。

研究人员解释说，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看，马可纪念柱比不上图拉真记功柱。

我们必须承认，艺术价值的确有所不如。一级的艺术品都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才能成立，而马可纪念柱上的浮雕场面过于拥挤了。其实如果真能把所有内容都体现在上面也不乏历史价值，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又不尽如人意。和图拉真记功柱相对照，即使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探求马可纪念柱的浮雕的内容，我们对战争全貌也还是一头雾水。因为那上面全都是关系不明的战斗场面，即战争片断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从其他角度观察，可以找出以下原因：

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左边的建筑物为琴奇宫）

·在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中，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101年开始，第二阶段从公元105年开始。但这两个阶段都是拉开战端一年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在第一阶段的公元102年和第二阶段的公元106年，图拉真皇帝在首都两次举行凯旋仪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正好只用一年时间就达到了战争目的。投入重兵的两个阶段加在一起，也仅有两年时间而已。

可是在马可· 奥勒留进行的日耳曼战争中，我们观察其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从公元172年到174年年末是第一阶段，接下来因为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一种变故，不得不在公元175年到177年的三年间暂时中止军事行动。公元178年烽烟再起，到179年第二阶段的战争宣告结束。前后合计一共进行了5年，随后马可离世而去。虽然目标近在咫尺，他却只能抱恨而终。如果把尽早结束战争作为对战争这种“恶行”所能做的唯一的“善行”，那么在这一点上马可· 奥勒留是很失败的。

有些研究者认为，敌方日耳曼各部族受到从东北方向南下的其他部族的压迫，也就是说，他们前有罗马军队，后有日耳曼其他部族，遭到两面夹击，只能殊死抵抗，这才造成了马可的“迟缓”。可是，在图拉真东征的时候，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破釜沉舟，拼死作战，他们也的确到了生死关头，对图拉真指挥下的罗马军队而言，对方绝不是束手待毙的敌人。

还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负责具体指挥的军团长等一干武将素质低下，造成了战争的拖延。其实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帕提亚战争就发生在10年以前，罗马军队实际上只用了3年时间，不但横扫了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还攻入了帕提亚境内，一直把对方打得元气大伤，完全达到了当初的作战目的。当时无奈在前线做总指挥的皇帝路奇乌斯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而是军团长等一班指挥官根据自己的谋划将战争向前推进。即便过了50年之后，卡西乌斯· 狄奥还指明，镇守前线的罗马军队仍在哈德良皇帝重新构筑的国防体制下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机能。这位

历史学家本人曾任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亲自指挥过3个军团，所以他的话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而且，各军团的指挥官都遵从着最高司令官认可的战略采取行动，尤其在战时，更加强调这种指挥系统的统一。

日耳曼战争时，马可一直身在前线，而没有像路奇乌斯那样，到别处去避暑或享受温泉。这么看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出皇帝马可作为最高司令官，其实欠缺相应能力的结论。历史学家蒙森谈到这一点时，也相当苛刻：

> 就本来的气质而言，马可· 奥勒留的思考重于行动。

所谓思考，按照词典里的解释，指的是反复琢磨。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气质，可是到了需要随机应变和雷厉风行的战时，却容易成为一种缺点。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是瞬息万变的世界，所以在战场上一切都要果断勇敢。"对马可而言，应变与果敢是最为无缘的两种气质。

但是，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解释日耳曼战争的"迟缓"，因为在挑起战端之前必须先拟定战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因素都置于脑海，经过反复思考才能确立。这时"思考"不但不是缺点，反而应该加分了。我认为，这种"迟缓"的真正原因，或许是马可· 奥勒留这个人一直没能真正弄懂战争为何物。

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雕刻上所表现出来的"日耳曼战记"之所以和图拉真记功柱不同，而只是片断的集合，就是因为日耳曼战争本身就是由一些片断构成的。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并没有遵循着一个灵活机动的基本战略加以展开，而是由战线上各处发生的战斗组成的。这是一场没有战略、只靠战术蛮干的战争。除了方法拙劣，别无其他。这个问题和马可本人的诚实担当毫无关系，我们一言难尽的只能是无限的遗憾，或者只能对人性的复杂发出叹息。而马可自身苦恼的产物《沉思录》，也是

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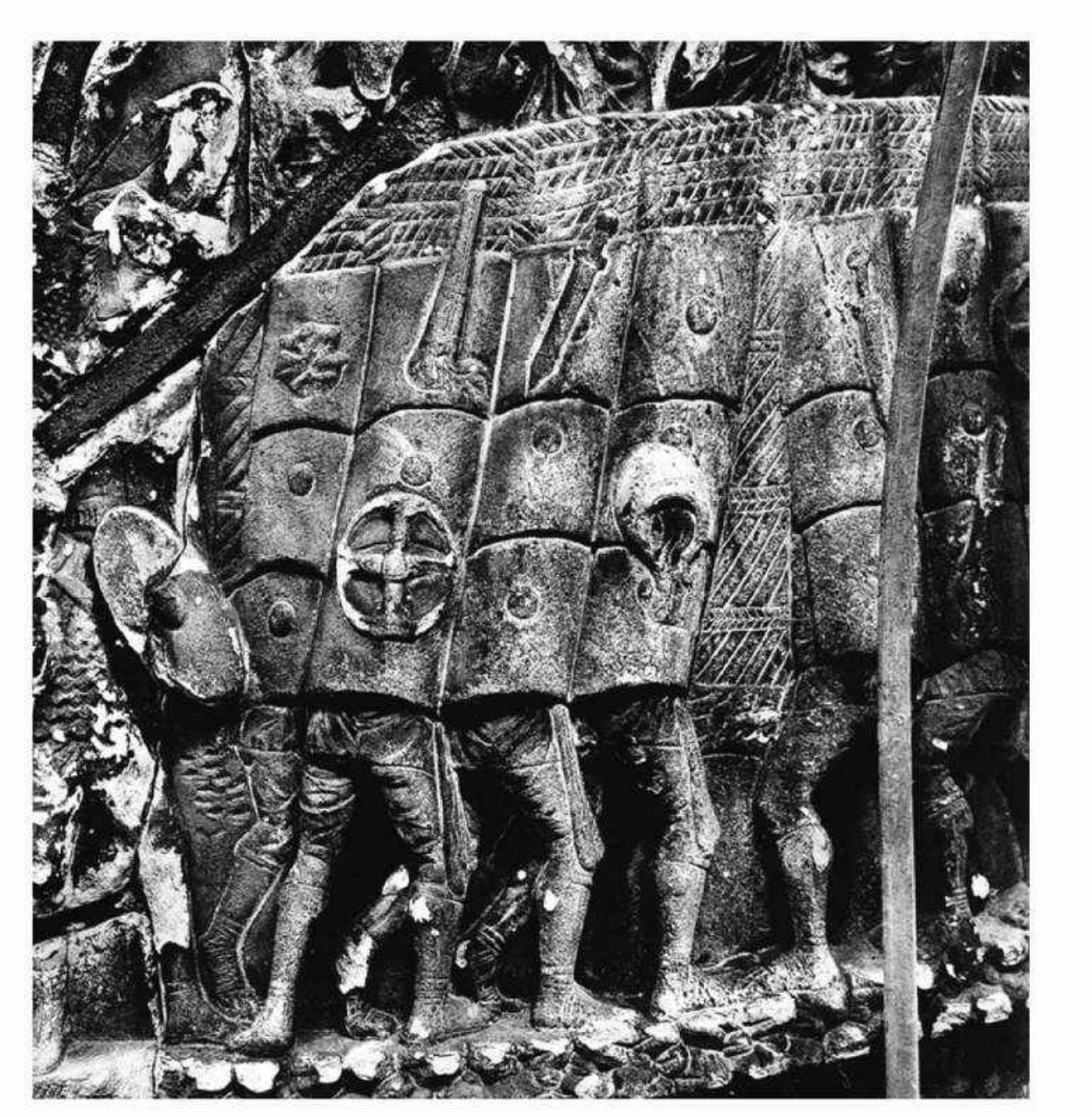
我总觉得，应该先从宏观角度去观察日耳曼战争。很多历史学家想只靠具体史料就展开说明，可是那些东西无论读多少都很难把握战争的全貌。这就好比端着望远镜，一圈一圈地围绕着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观察上面的螺旋状浮雕，最后只能绝望地叹息："这究竟表现了什么啊？"当年我用这种姿势望到第三天的时候，招来了首相官邸警卫的盘问。总之我认为，对于马可任统帅的日耳曼战争，最好还是先了解这种战争的性质，然后再去接触具体史料，这样更有利于认识它的全貌。

有一件事情忘了说明，现在可以补充，就是我们能不能分别用一个词来表现图拉真记功柱和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这也是我围绕着纪念柱漫步时想到的，图拉真记功柱的浮雕是"realistic"（现实），而与此相对，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则是"pathetic"（感伤）。情感的过剩，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缺点，在艺术上也会形成不足。

多瑙河战线

公元172年，罗马军队渡过了多瑙河，向北进攻。本来罗马方面是展开攻势的一方，可实际上却吃了个败仗。我们不知道当时罗马军队采取的是什么策略，但既然皇帝亲征，近卫军团肯定也加入了战线。结果他们与敌人发生激战，近卫军团长官维狄克斯阵亡。马尔科曼尼人满足于既有战果，撤退而去。罗马军队要职一定会安排离职代理，指挥官的阵亡并不意味着全面溃败，但失败就是失败，并且军事上的失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颓势。在前一年刚刚议和的夸地人看到马尔科曼尼人取得了胜利，就立刻毁弃和约，重回日耳曼阵营。罗马本来已经把日耳曼各部族形成的同盟战线拦腰斩断，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这条同盟战线又重新连接了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年罗马军队始终焦头烂额。下面介绍的，是卡西乌斯· 狄奥曾写下的一个片段。当时雷雨的出现被视为奇迹，也表现在了纪念柱上：



龟甲队形（马可 · 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

这是罗马军队在一次转战中陷入的危机。最后之所以柳暗花明，只能说是承蒙诸神的恩典。精于骑术的夸地人把罗马军队逼到

了对他们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罗马士兵于是把盾牌排得密不透风，勇猛地抵挡着来自侧面和上方的攻击（这是罗马军团的典型战斗队形之一，叫龟甲队形）。

蛮族见状，索性停止进攻。他们以为，平原上无情的烈日和酷暑造成的干渴会消耗罗马士兵，只要耐心等待，对方只有投降一途。而罗马军队完全陷入包围，无法向附近的河流转移，更何况蛮族还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罗马军队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疲劳与伤痛几乎无法忍受，再加上炽烈的太阳和无声的焦渴，既不能进攻，也无法后退，只能在太阳的炙烤下，保持原地不动。

可是就在这时，天边出现了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不期而至。罗马士兵都打开盾牌，面向天空，让雨水打在脸上，流进口中。然后他们用头盔和盾牌内侧承接雨水，供给伤员和马匹饮用。

看到形势突变，蛮族冒着暴雨再次展开进攻。罗马士兵一边喝着雨水，一边迎击，就连伤员也都吞咽着头盔上流下的雨水和额头上流下的血水投入了战斗。

暴雨和雷电也同样笼罩着敌人，可是此时阵脚大乱的，却不是罗马士兵，而是蛮族。……

恪守军规的习惯和终日训练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显现出了真正的价值。改换了阵型的罗马军队成功扭转了战局，最终取得了这一天的胜利。

在这一年年底，罗马军队终于战胜了马尔科曼尼人。罗马元老院授予前线的皇帝“日耳曼尼库斯”的尊称，意为“打败日耳曼的人”，这个尊称同时也颁发给了马可11岁的儿子康茂德。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国外经验的欠缺，皇帝马可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带到了多瑙河前线。然而，元老院的决定还是有些过早，公元172年的罗马军队苦战恶斗，实际上是因

为好不容易战胜了日耳曼民族中的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终于挽回了一些颜面。

而在这一年，帝国的东方也在暗流涌动。

埃及实质上由居住在亚历山大等城市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管理，而罗马则支配着这些人。也就是说，原来的埃及人被这些受罗马掌控的希腊人和犹太人所统治。在主导埃及传统宗教的祭司们的煽动下，这些埃及原住民举行了暴动。虽然暴动针对的是住在埃及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但命中注定，事态的发展还是会指向掌控经济的这两个民族背后的罗马。不管怎么说，埃及是罗马的行省，因而维持此地的治安是罗马的责任。

于是为了镇压暴动，罗马决定出动驻扎在东方的军团。然而，从当初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向罗马军队投降时起，埃及就并不归以元老院和公民为主权者的罗马帝国所领有，而是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有着特殊的状况。在号称“神之子”的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后，如果改由元老院和公民这些“人之子”来管理，那么对习惯于“神治”的埃及人的刺激就过于强烈了。刺激过度是领有和统治的大敌。所以，由神君恺撒的养子即“神之子”奥古斯都来做主权者，比较适合于对埃及实施统治，元老院也同意了这一点。

由于这种特殊状况，唯独埃及成了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导致了驻扎在其他罗马领地内的军团无法向那里派遣。埃及没有行省总督，而是由长官带领一个军团常驻，足以维持一般的治安，直到公元172年发生了这次暴动。

多瑙河畔的马可接获报告后，决定一举解决此事。他命令在帕提亚战争中大显身手并在战后升任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率领属下的两个军团向埃及进发。但是，“神治”下的埃及还是很特殊。在埃及出任要职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可以说元老院议员也只是一般官吏，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他们连入境都不可以。而对于出身于仅次

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的人而言，如果能够成为埃及的长官，应该就是从政的顶峰了。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已经是行省总督，在元老院也拥有一席。

在不触犯既有法则的情况下，派遣卡西乌斯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从叙利亚行省总督升任为帝国东方全区的总司令官。这一职位和帕提亚战争时皇帝路奇乌斯的地位相当，尽管只限于东方，但地位仅次于皇帝。

罗马人是“法之民”，在作出决策时，无论如何都要追求法律的正当性。如果不能保证法律上的正当性，那么他们就制定新法来保证这种正当性。毫无疑问，为卡西乌斯升职既不需要制定新法，也不必拿到元老院去请求通过，只需要把以往的法律扩大解释就可以了。

被任命为东方全区总司令官的卡西乌斯十分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但迅速镇压了埃及的暴动，而且没有招致当地居民的愤恨。埃及境内的希腊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亦或是原住民也好，都对卡西乌斯评价极高。而在镇压了暴动之后，皇帝马可也没有变更返回叙利亚行省的卡西乌斯的职位。结果这个问题在三年之后引起了灾难。

公元172年东方的另一次变故，发生在亚美尼亚境内。罗马和帕提亚一直争相拉拢亚美尼亚王国，罗马有帕提亚战争的成功，亚美尼亚的王位还是由帕提亚王室的亲罗马人士担任，可亲帕提亚派在宫廷内部依然存在。这些人瞄准了罗马大军都集中在多瑙河前线的可乘之机，企图发动政变。但这件事能在尚未发生之前就得以迅速解决，全赖临近亚美尼亚的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马尔提乌斯· 维尔斯高超的外交手腕。罗马的武将中不乏文武双全的人，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这样描写他：

> 马尔提乌斯不是一个只会利用军事力量压制敌人的人。的确，他的快速进攻和出其不意总是让自己占据主动，这些武将的看家本领是他力量的基础，不过，他还非常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能敏锐地看穿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然后用真挚的言语商谈条件。他生活简朴，但对别人的馈赠常令东方人都瞠目结舌。最重要的是，他的话总是让人对罗马抱有希望而不是绝望。

接触到他的人，很难把眼前这位言语热情、态度温和的人和战场上那位叱咤风云激励士兵的武将联系起来。他的言语和态度充满魅力，即使对面的东方人暴跳如雷，他也能使其平息怒火。他深知什么时候该对谁循循善诱，什么时候该对谁一掷千金。

但即便他万般低调，对方也无法忘记战场上的他活力四射、行动积极。因此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放弃敌对，开展合作。

转眼到了公元173年，如上所述，东方的局势逐渐稳定，但西方的日耳曼战争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依照握有铸币权的皇帝马可的命令，罗马铸造发行刻有“征服了日耳曼”（Germania subacta）字样的货币，再加上罗马元老院作出决定，将“日耳曼尼库斯”尊称授予马可，两件事都是有着确切证据的历史事实。因此，如果只根据确凿的史实去阐述历史的话，公元172年的日耳曼战争是以罗马方面的胜利宣告完结的，可是无论史实多么真实可信，我们仍旧不能忽略对其背后内容的探究。

刻有“征服了日耳曼”字样的铜币

也就是说，盲目相信容易使自己走进牛角尖。如果不想自掘坟墓，那就应该进行跟踪调查，参考调查结果去发现材料背后的内容。另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我通过阅读史料，发现元老院的决议是当时罗马屡次出现的对皇帝的谄媚行为，而货币的发行则是深谙事实的马可在提振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依据史实所表现的那样，公元172年的

战争以胜利而告结束，那么第二年即173年就没有必要改变作战方针。然而罗马却改变了策略，从前一年的全线作战变成了各个击破。

尤里乌斯· 恺撒早就看透了蛮族的特性，后来的罗马皇帝们也因袭了这种思维，就是蛮族不善团结协作。故而后世有名的“divide et imperi”（分而治之）就逐渐被确定为罗马的对外政策。公元172年日耳曼各部族虽然结成了共同战线，但他们并没有团结在同一个领袖周围共同对抗罗马。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采取的战略应该是先各个击破，然后再全面进攻，可是当初罗马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罗马在宽阔的平原上拉出大军展开会战，能够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因为这种方式的战斗可以充分运用战略战术，与敌军面对面的大会战也能发挥出军令严明和日常训练的效果。相反，罗马军队很不擅长同蛮族战斗，因为蛮族本来就没有什么一贯战略，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的有效办法，就是恺撒曾经施展过的策略，即先迫使敌军集结，然后予以打击，最后取得巧妙绝伦的战果。这样一来，敌方叹服，连未曾加入战端的人都会在胜利者面前低下头来。一次这样的会战，能在尽量减少敌我双方牺牲者数量的情况下达到战争目的，是非常合理的手段。之所以也要减少敌方的牺牲，是从胜利后统治管理的角度加以考虑的结果。不过即便是恺撒，在阿莱夏战役之前采用的也都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但话又说回来，能在一年里就发现战略方面的失误，对马可和罗马二者而言都是很幸运的事。公元173年的战役，首先限定在了雷根斯堡到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北岸，敌人仍旧是马尔科曼尼和夸地两大部族，不过发生变化的是，这次罗马军队并没有直接进攻这两大部族，而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旗下的中小部落。马尔科曼尼和夸地两大部族的专横跋扈也是因为有下面这些中小部落为之张目。如果能将他们各个击破，大部族也就无所谓大了。毋庸置疑，罗马的战略就是要先砍掉敌

人的爪牙，然后再集中力量一举击溃。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毋庸置疑，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连贯的战记和记述战略的史书，而仅是凭借想象，根据前后的战况，推测出173年罗马军队的战略就是如此，并且也已经取得了成功。

以往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是由重装的军团兵、轻装的辅助兵，以及机动部队骑兵组成6000人的军团，在军团长的率领下冲锋陷阵。可是这一年罗马改变了做法。各军团分成不同兵种的几支部队，任凭他们分别进击各个中小部落。在公元173年的一整年里，由皇帝担任议长的总参谋部可能都在指挥这种作战。

还是因为缺乏战记，从纪念柱上也难以找出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无法获知这种新战略的具体成果。不过倒是有一份历史学家遗留下来的资料。率领骑兵团的瓦莱利乌斯· 马克西米亚努斯，和敌方纳利斯提部落的酋长单打独斗，最后杀死了对方。蛮族失去了首领，四处溃逃。纳利斯提部落是马尔科曼尼人的一支，他们脱离战线是对马尔科曼尼人势力的削弱。皇帝马可特地把全军召集到一起，在众人面前高度赞扬了骑兵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立下的军功。

这时的马库斯· 瓦莱利乌斯· 马克西米亚努斯应该在40岁左右，出身于潘诺尼亚行省，本来是个行省民，应该属于罗马军队中那种身经百战苦熬出头的人物。在帕提亚战争中，他崭露头角，表现突出，于是在日耳曼战争中负责指挥骑兵团。他的第一乌尔庇亚骑兵团驻扎在阿拉波那，正好位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两大军团基地之间。今天这个地方是匈牙利的杰尔，当然也濒临着多瑙河。

此人就是电影《角斗士》中主人公的原型。因为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名字过于拗口，电影将其改为马西墨斯。不过此人后来成为角斗士的情节则是虚构的。尽管是虚构，但我们分析他被虚构的原因也同样大有裨益。关于他以后的故事，我们还将在皇帝康茂德的篇章里继续讲述。

关于公元173年的战果，我们只知道这些，但各个击破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无论是马尔科曼尼人还是夸地人，或是没有和罗马军队发生激烈冲突的雅兹盖斯人，都纷纷来向皇帝马可求和。有着夸地人不到一年就反目的前车之鉴，马可认为蛮族无法信守和约，一度严厉拒绝。当然，皇帝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请求，讲和了。

和谈的第一项条件，双方交换俘虏。

第二项条件，是在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milia一词是后代“mile”（英里）的词源，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　宽的无人区。早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罗马就已经领有了莱茵河流域的西岸，在对面的东岸，罗马就设置了5罗马里宽的无人地带。不过，无论是莱茵河还是多瑙河，所谓无人地带指的都是“无蛮族人地带”，在每个要地都耸立着罗马军队的监视塔。在科隆那种城市的对岸，不但有监视塔，而且还建设了军事要塞。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及时掌握蛮族的动向。多瑙河流域设立无人地带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

和谈的第三项条件，是罗马帝国和境外的蛮族讲和或签署友好条约时的必须条款，即对方可以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交易。皇帝马可当然也认可了这一条款。然而出于对蛮族强烈的不信任感，皇帝要求在条款上明确，罗马方面拥有集市日对蛮族开放的区域和时间作出规定的权力。

尽管如此，蛮族方面还是获得了出入罗马集市的好处。在当时罗马统治无法到达的中欧腹地，今天仍能发掘出罗马货币。不过，和向罗马输出宝石、丝绢和香料的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出土的高额货币不同，中欧发现的多数是低面值货币。我们可以据此推测罗马人向日耳曼人购买的货物水平。

尽管如此，和谈终于成功了。

罗马帝政时代的科隆（想象图，右侧为莱茵河）

或许这只是罗马方面的权宜之计。可是这一时期的罗马也的确需要议和，因为第二年，即公元174年，罗马军队又将面对其他敌人。在布达佩斯附近转弯南流的多瑙河与达契亚行省之间，居住着雅兹盖斯人，他们受到从北方南下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压迫，和罗马军队发生了冲突。罗马人将发生在公元174年的战争称为“萨尔马提亚战争”，其实敌人是雅兹盖斯人。对于驻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的皇帝马可而言，这真令人心神不宁，而这一年的他已经50岁出头了。

因为罗马公民拥有向皇帝提起上诉的权利，所以皇帝的职位也有点接近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这样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可· 奥勒留：

> 一从战争方面的诸多事务中脱出身来，皇帝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到了司法问题的处理上。这时他总要准备一个罗马法庭也使用的计时漏壶，所不同的是，他的计时漏壶总是灌了更多的水，因为皇帝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下达判决就万事大吉了。他自己

口述需要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同时用漏壶计算时间。因为他考虑到即便是在遥远的基地所书写的判决，也都要送到首都的法庭上去宣读。皇帝不但精心控制法庭宣读判决的时间，而且在内容上也做到充分透彻。他在检查以往的判决时，控辩双方的证词都无一遗漏。结果一个判决他就有可能花上十一二天时间，并且经常熬到深夜。

皇帝的工作态度已经不是“勤勉”一词所能形容，因为他坚信，自己所下达的判决应该在任何人眼中都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包括被告在内都要认为判决无可指摘，所以他必须事无巨细毫不疏忽。然而，这种性格也使皇帝总是字斟句酌，连遣词造句都要花上一天时间。力求公正的责任感，以及洁癖一般的完美主义，都促使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繁重的工作。

在身体方面，皇帝远远谈不上健康。据说他最初来到多瑙河前线时，就难以忍受当地的寒冷气候。当士兵们队列严整地等待他出现时，他不止一次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他食量极小，不到日落不肯吃饭，白天则什么都不碰，只是把一种叫“提瑞阿克”的药物溶在水里喝下去。而且这种药物他也绝不多用，可能是担心成为习惯。他一直有着胃痛和胸口痛的老毛病，药物可以缓解那些疼痛。据说只要一喝下这种药物，胃痛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不适就都可以忍耐了。

卡西乌斯· 狄奥是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的著作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是这种名为“提瑞阿克”的药物用拉丁语表示也是“theriac”。皇帝马可的御医加雷努斯是罗马时代最有名的医学家，这是他为皇帝特别配制的药物，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

据说马可曾一度停止该药物的服用，因为会嗜睡，可是停止服用之后，马可又发现自己变得失眠了，只好恢复服用。而加雷努斯也十分谨慎，既要使皇帝不致染上毒瘾，又要通过含有微量鸦片的药物缓解皇帝的疼痛以保证睡眠。由此看来，不但是整个日耳曼战争，就连马可· 奥

勒留本人，也都充满了悲壮感。

同样是在军事基地中生活，尤里乌斯· 恺撒就截然不同。在高卢战争中的恺撒营区，每当冬季来临，偃旗息鼓，恺撒就宴请周围蛮族的首领和豪强，让他们观看士兵们表演的希腊悲剧。尚未开化的高卢人竟然要看古代文化精华的希腊悲剧，只要想象一下就令人不由得发笑。高卢人是因为受到了军事力量的钳制在勉为其难地坐在那里吧？或者他们真的是被未知的文化精粹所吸引，尽管一头雾水却还是愿意陪伴在自得其乐的恺撒身边？

《高卢战记》里没有丝毫悲怆感，全书洋溢着的是作者兼主人公恺撒那压倒一切的自信。恺撒坚信，对罗马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而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益的，能够做到这些的也只有他自己。这是一种如果再向前一步就变成了盲目自大的强大自信。尤里乌斯· 恺撒和马可· 奥勒留是罗马仅有的两位留下完整著作的最高统治者，这也让人不由得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不同。是作者性格使然，还是时代的差别？

如果恺撒没有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而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那么日耳曼战争的结果会发生变化吗？后世的孟德斯鸠评论恺撒："无论率领什么军队都能获胜，无论诞生在哪个国家都能成为领袖。"如果由恺撒统领，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军队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压倒性胜利吗？或者即便是恺撒，也改变不了当时多瑙河前线的形势？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2世纪还有一点不同。在恺撒时代，即便是总司令官也不能拖家带口地前往战地。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只不过是大家都没有家人陪伴，然而公元1世纪这种现象开始出现，到了公元2世纪就几乎成为常态了。

公元173年到174年的冬天，可能是担心丈夫的身体健康，皇后芙斯汀娜造访多瑙河畔的军营，嫁给潘诺尼亚总督庞培亚努斯的露西拉也与母亲同行。庞培亚努斯一直是皇帝的左右手。两个女人就这样留在了丈

夫身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留在丈夫马可身边的皇后被士兵们尊称为“基地之母”。阔别5年后，马可和皇后又重新开始了共同生活，他此时并不驻扎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而是在多瑙河更下游的希尔米乌姆（今塞尔维亚的米特罗维察），因为战线已经从近潘诺尼亚移动到了远潘诺尼亚，相当于从今天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推进到了前南斯拉夫。希尔米乌姆并不是军团的常驻基地，但是相比于80公里以东的军团基地贝尔格莱德（前面“战争开始”一节说二者距离是60公里，原文如此。——译者注），这里北距多瑙河20公里，离前线更近。罗马人在第二年，即公元174年，展开了萨尔马提亚战争，总参谋部就设在这里。虽然儿子康茂德为了学业返回了首都，但妻子和女儿都在希尔米乌姆住了下来，也算是一家团圆景象。这就是和纯属男人世界的恺撒时代基地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到了帝政时代，就基地的规模和设施而言，已经完善到了足以接待妇女和儿童的水平了。

前线基地

军团基地的稳定化支撑起了帝政时代的防卫政策，实际上是将防线上一个个的据点罗马都市化。因此，以罗马时代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根本不能作参考，那些电影中的基地简直和西部片里骑兵队的基地毫无二致。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即便是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部队的驻地也比电影里的规模更大，并且里面还建造了很多永久性设施。如果说条件像电影里那么艰苦的，恐怕只有转战高卢各地，无奈在当地过冬那年的恺撒冬季营地。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军队基地，甚至连辅助部队的基地，医院、剧场以及罗马式的浴场都相当完善。

而在军团基地，规模和设施则更为充实。和附近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一样，皇帝马可长期驻留的卡农图姆也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创立的基地。但与后世的都市都建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样的罗马城市之上不同，卡农图姆距离现在奥地利的佩特罗内拉大约一公里远。随着发掘工

作的进展，我们发现第十四杰米纳军团常驻的卡农图姆尽管是军团基地，但包含着如下要素：

长500米、宽400米（精确数据可能比此略小）的坚固城墙围绕着军营，除了面向河流的一面外，其他三面都是军团相关人员的居住区，称为“卡纳巴埃”。营区和“卡纳巴埃”形成了卡农图姆的一大支柱。穿过这一区域，沿着两边排有墓地的道路，可以通往原住民和退役军团兵家庭杂居的街区（地方共同体），这是卡农图姆的另一个支柱。以这两大支柱为两端构成一个圆形区域，因多瑙河流过，实际上是个半圆形区域，这就是军团基地卡农图姆。居住区“卡纳巴埃”和杂居区地方共同体分别建有供居民在紧急时刻集合的广场，还各有一个罗马式的大浴场，两个区域也分别都有斗兽场式的竞技场。只有一所医院，但比我们在《罗马人的故事9 · 贤君的世纪》里介绍过的克桑腾军医院规模还要大，设在军营附近的“卡纳巴埃”地区。地方共同体常年开设贸易集市。也就是说，在防线上的每个战略要地建立的军团基地完全不是只有士兵，而是包括普通民众生活区在内的居民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这些军团基地才孕育出了后世的都市。古希腊人追求的是“真”与“美”，而古罗马人则追求“美”和“舒适”。追求舒适的结果，就是成就了街道、港口和上下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如果后世又一次发现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也随时可以重建。总之，罗马人选择建设地域时，连地势因素都考虑了进去。顺便说一下，卡农图姆在罗马时代的重要性也能从圆形竞技场的规模上判断出来，虽然比不上维罗纳的竞技场，但比庞贝的要大。维罗纳和庞贝虽然是小城市，却位于意大利本土内，而卡农图姆则只是边境上的防卫据点而已。

希尔米乌姆并不是军团基地，所以没有城墙环绕着的军营，附近也没有宽阔的“卡纳巴埃”。然而，即使在平时，这里也是常驻在贝尔格莱德的第四弗拉维军团的补给基地。凡是罗马人认为的城市必要设施在这里都很完善，当然，在发掘多瑙河畔城市遗址时总能发现的地下火炕和

火墙在这里也一应俱全。纵然是女性，只要能忍耐住苛酷的气候和社交上的寂寞，游刃有余地生活还是没问题的。不过，公元174年的希尔米乌姆毕竟是距离多瑙河畔只有20公里的前线基地，不管怎么推进城市化，和首都罗马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在这种环境里，芙斯汀娜还能获得“基地之母”的尊称，难道还不能说马可·　奥勒留有一个贤妻吗？并且，这一年芙斯汀娜把4岁的小女儿留在罗马赶往前线时，才44岁。

和以前一样，因为缺乏连贯的战记，我们无从得知公元174年进行的萨尔马提亚战争的具体过程。纪念柱上的浮雕也没有留下可供探寻的故事。不过，从一些场景片段中我们可以推断，尽管战斗激烈，互有攻守，但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罗马军队手里。这表明罗马方面占据着优势，因而经过恶战的雅兹盖斯人只好求和。马可接受了对方的请求，双方议和。

但是，对于雅兹盖斯人而言，和罗马的议和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接下来他们必须回头向北，与南下侵占了自己过半居住地的萨尔马提亚人一决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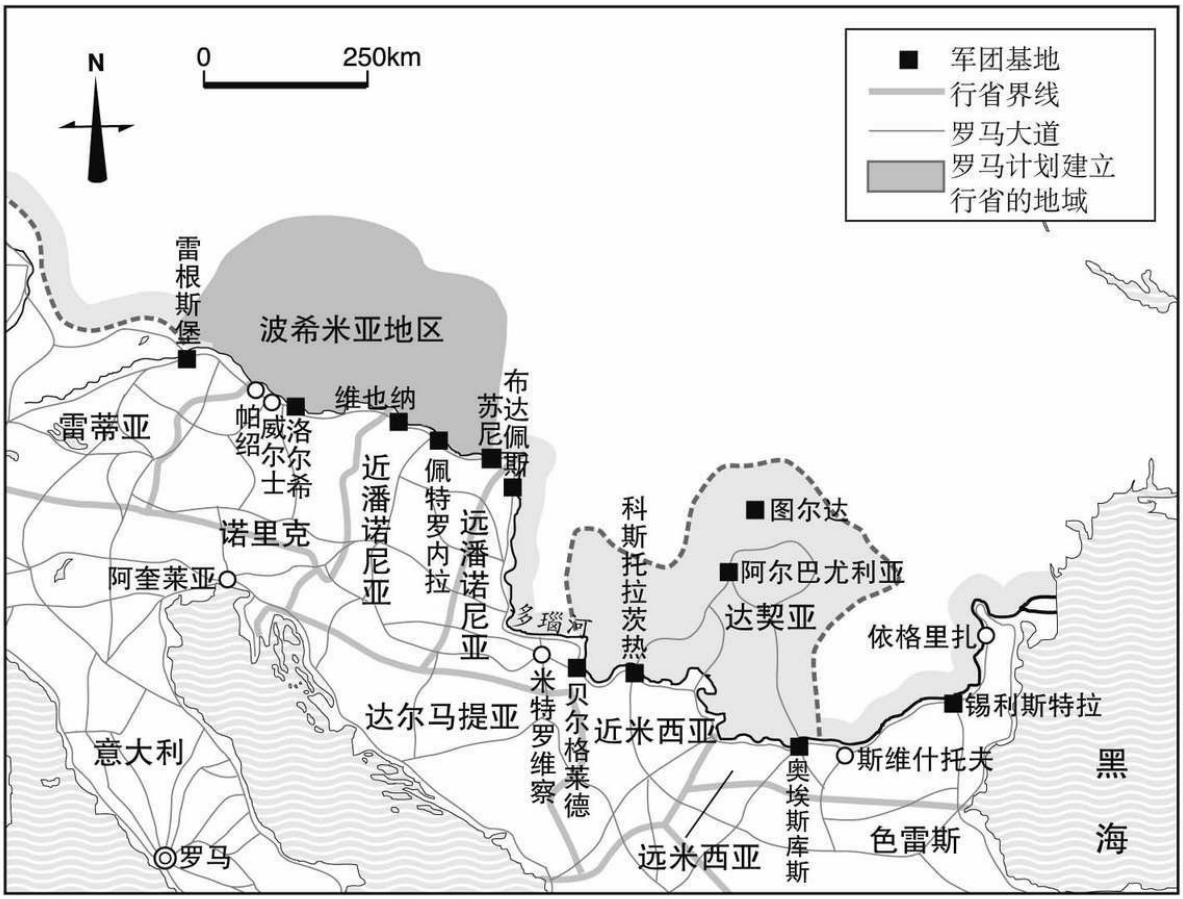
蛮族的多米诺现象

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皇帝马可才发现，蛮族问题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予以击退就能够解决的了。浮现在他头脑中的办法，是图拉真皇帝曾在达契亚推行的“行省化”。不是击退蛮族，而是战胜并纳编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居住的地区北部就成了前线，正好构成了一道对付南下蛮族的防波堤。图拉真在70多年前就实行过这一方法，把达契亚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

如果推行这一政策，那么第二年，即公元175年，倒是不错的时机。罗马已经与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媾和，雅兹盖斯人虽然是后来讲

和的，但应该重视的对手仍旧是强大的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这两个部族居住在多瑙河中游的北岸一带，即今天的维也纳以西直到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北部流域，古称波希米亚。如果马可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么后世的捷克会被整个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也是与图拉真皇帝建立达契亚行省相比肩的壮举。

而且这一构想在战略上也相当有效。从地图上看，新构想的行省和达契亚行省都往多瑙河北岸大为凸出，看上去似乎难以防守，但如果筑起了城墙则未必被动。相比于一条直来直去的防线，在每个战略要地前面都构建前凸的桥头堡，那么投入同样的兵力就能策应更长的防线。



多瑙河防线（马可· 奥勒留设想的波希米亚“桥头堡”）

马可· 奥勒留的气质比其他皇帝更疏远军事，他比较喜欢进行哲学思考。在埋头解决眼前的问题5年之后，他终于领悟到了表象之下真正的问题所在。

也许他最后的结论是，只有运用军事力量努力扩大帝国版图，才能最终解决蛮族问题。

然而，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虽然求和了，但他们并未要求行省化。以受到北方蛮族的压迫而无处可去为理由，请求罗马提供境内土地定居的，都是比较弱小、人口也很少的中小部族。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虽然同样感受到了北方蛮族南侵的多米诺现象带来的危机感，但他们

毕竟是能和罗马军队鏖战两年的强大部族，所以比较现实的推断，是他们肯定会拒绝行省化的要求。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军事施压一途，再以后就只能行省化了。然而走这条路的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明的总司令官二者缺一不可。距图拉真皇帝进行达契亚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罗马的军事力量仍旧强大，可是总司令官嘛……

马可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当然知道自己逊于图拉真。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指望自己的左膀右臂庞培亚努斯或者骑兵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些人了。顺便说一下，这个阶层的司令官尽管出身于行省，但都洋溢着罗马精神。马可不仅为自己再婚的女儿露西拉选择了庞培亚努斯，而且五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有三个都嫁给了这个阶层的武将。为了让军人也能积累行政经验，马可还推荐他们去做执政官。不过，他们仍旧只是军团长级别的司令官，并不是总司令官。总司令官的职责无论如何也都要由皇帝来承担。

在这一时期成文的《沉思录》中，尽管我们努力寻找涉及波希米亚行省化的只言片语，但最后得到的也都是失望。马可· 奥勒留完全不提政务，只管埋头表达自己的思绪。后世的研究人员也都认为，在战争前线撰写，却完全找不到任何战争内容，这绝对是《沉思录》的一大特色。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马可认为，发动对蛮族的战争是自己的责任，属于自己内心以外的问题。而《沉思录》的内容即便易名为“我同内心的对话”亦无不可，所以他决定只写和自己内心有关的问题。

可是，无论多么喜欢哲学思考，马可毕竟成不了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也没有人可以像第欧根尼那样彻底地嘲讽人生。曾有这样一个

故事，第欧根尼衣衫褴褛地住在一个大桶里，东征路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前去礼节性地拜访他。“请问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年轻的大帝问道。第欧根尼回答：“麻烦你帮忙让开一下，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第欧根尼当然可以衣衫褴褛地住在大桶里，不论他做什么，都不会过于影响别人的生活。然而马可是个皇帝，帝国境内的民众安全，以及有了安全保障才得以继续维持的民众生活，都是他肩负的责任。

哈德良也仰慕希腊文化，也喜欢美貌少年，可是尽管同行的诗人弗罗鲁斯揶揄说：“我可不想当什么皇帝，混迹在不列颠人中间，在边陲之地往来，还要忍受斯科提亚那刺骨的寒风。”但哈德良还是坚持在帝国全境视察，同时成功地重建了帝国的制度。在哈德良这里，哲学和现实密不可分，两个方面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哈德良。

可是，现在轮到了马可，哲学和现实却似乎无法结合。不，或许在马可的内心，正在将二者暗暗分裂开来。尽管没有直接言及战争，但在《沉思录》中，还是有些内容使人联想到了战场：

> 如果你曾见过一只手被切断，或一只脚、一个头，如果你看见离开了身体的其他部分躺在那儿……
>
> 一只蜘蛛抓住一只苍蝇时是骄傲的；而当另一种动物抓住一只可怜的野兔时，在网里抓住一点鱼时，捕获一头野猪或者熊时，俘虏萨尔马提亚人时，也是骄傲的。如果你考察他们的意见，这些人不是强盗吗？
>
> 马亚历山大大帝、庞培和恺撒在粉碎数十万计的骑兵和步兵，频繁地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之后，他们最后也告别了人世。（本段译文散见于《沉思录》的卷八、卷十和卷六，参考了《沉思录》，何怀宏译。——译者注）

书写了这样文字的人，在位期间却连年烽火，屠戮不止，真是令人

无限感慨。而尽管《沉思录》中没有一处哪怕是只言片语讲述战略和战争，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战场经历，他不可能成就这样的著作。

> 当人们要彻底思考时，往往躲到远离人群的地方，田园、海边、山中…… 以前也常常梦想着这种生活，然而这是个愚昧的解决方法。如果真的感到要直面内心，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逃到自己的心中。
>
> 你现在置身于充满苦恼的地方，是全天下最适于修习哲学的环境。

《沉思录》全书都用希腊文写就，罗马时代的社会精英全都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双语人才，但马可大概认为，皇帝处理行政事务时要用拉丁语，进行哲学思考时要用希腊语。虽然他完全能够像西塞罗那样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但语言毕竟存在着形式与感觉的问题，身为罗马人的马可在阐述哲学思想时应该更愿意用希腊语。

在《沉思录》中丝毫找不到波希米亚行省化的字样，虽然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这一时期的马可无疑正在考虑这项计划。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该计划难产，叙利亚行省总督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谋反称帝了。

叛乱

这场叛乱起因于一次信息方面的错误。卡西乌斯接到了皇帝马可病殁的消息，认为自己比马可13岁的儿子康茂德更适合于继位，于是迅速宣布登基为帝，并得到了叙利亚行省三个军团驻军的拥护。没有确定情报的真伪就仓促动手只能说明他处事草率，而马可已经到了54岁的年纪，考虑到他平时的身体状况，如果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却也不是太出人

意料。

还不到一个月，大家就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可叙利亚总督已经采取行动，当然无法回头，只能将错就错地在东方集结，确立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说，明知皇帝还在人世，卡西乌斯的行为就是对马可本人的背叛。

公元175年，正是马可决定利用雅兹盖斯人为前导，与萨尔马提亚人进行决战的一年。马可亲自渡过多瑙河督阵，却接到了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维尔斯的紧急报告，得知叙利亚总督发动叛乱。马尔提乌斯· 维尔斯拒绝了卡西乌斯的引诱，是整个东方唯一没有叛变的总督。

马可立即采取行动。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在帕提亚战争时代军功显赫，声名远播，西方的军团兵也都知道他。马可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不能让西方的军队发生动摇。他召集将士，面对着他们，讲了下面这样的话：

> 我有一位非常信赖的朋友，现在我知道他背叛了我。如果以后的危机都只针对我个人的话，我愿意听凭军团和元老院在我和卡西乌斯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卡西乌斯获选，我也不诉诸战斗，只会心平气和地把帝国交给他。因为这是对国家和公民危害最小的解决办法。
>
> 可是，东方的形势极为紧迫，以至于我不得不作出判断，那就是如果这样讨论下去的话，对国家和公民都是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了国家和公民，我应该勇敢地面对这种与身处战斗前线同样的危险。我已老迈，状况不佳，吃饭和入睡都很困难。可是，我仍然愿意等待你们的支持，然后以毫不动摇的决心，处理这一问题。

这番讲话情真意切，多瑙河前线的将士也都注视着深受疾病折磨但仍不离前线的皇帝。支持马可的声音不但响彻多瑙河前线，而且成了帝

国西方的共同声音。在驻守西方的军队中，非但没有响应卡西乌斯的军团，连思想动摇的人都没有。

面对危机时，需要寻求多种解决措施，按照重要程度排出先后顺序，然后依次实施，这才是最安全有效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决定先后顺序，这样就不得不同时推进多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速度和果断。马可在气质上就喜欢深思熟虑，只有和别人商议才能下达决定，可是在公元175年春天，他却表现得干脆利落。下面列举了他当时的决断。

一、确定帝国西方的军事力量全都支持自己。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述过了。

二、要求罗马元老院判决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为“国家公敌”，并对外宣布。

在致罗马元老院的请求信中，马可这样写道：

>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我认为丝毫不存善念的人是没有的。纵然卡西乌斯辜负了我们的希望，可是在我的内心，仍无意使用尖刻的言辞去侮辱他的人格。

马可这封书信的风格和他对将士们的演讲如出一辙。我们说这个皇帝如果不是正直纯粹、光明磊落的人，那么就只能是巧舌如簧、城府极深的人。

这种高风亮节的做法面对士兵取得了成功，元老院也全票通过了对卡西乌斯“国家公敌”的宣判。尽管只是一时的轻举妄动，但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的罪行是一目了然的。

三、把在首都读书的儿子康茂德召回多瑙河前线基地。

马可想要表明，如果自己出现意外，那就由儿子继位。即使在帝政时期的罗马，人们依旧不认为皇位的世袭，即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要世袭，就应该公开宣布。皇帝一般采用收为养子的方式明确继承人的地位，或者行皇太子礼。

康茂德在5月末离开首都，6月初就到了多瑙河畔的父母身边。马可有14个子女，但活到成年的只有五女一男，所以康茂德实际上等于独生子。他出生于公元161年8月31日，当时只是13岁的少年，还没行过成人礼。

传说7月7日是罗马建国的初代国王罗穆路斯死后升天的日子，马可选择了这一天，在多瑙河畔举行了面向诸神供奉牺牲的典礼，以此作为康茂德的成人礼。在罗马时代，用拉丁语表述成人礼为“toga virilis”，直译过来就是“壮年男子的托加”，在那之前，人只能穿短衣，举行过成人礼之后，人们就可以在隆重场合穿托加了。不过，在康茂德这里，成人礼之后又举行了一个仪式，皇帝向康茂德授予了“预备第一公民”的称号，相当于后世英国的“prince of Wales”（威尔士亲王）。举行了成人礼的康茂德还差两个月才到14岁，很明显是提前了。

还有一项措施，虽然按顺序排在了最后，但马可针对卡西乌斯叛乱采取的重要措施几乎都是同时推进的，所以这项措施也同样迅速实行，即是和正处于交战状态的萨尔马提亚人议和。马可告知军团和元老院，自己要亲自前往东方去镇压叛乱。对此时的他而言，最担心的就是多瑙河防线。

战端虽然才拉开两三个月，然而士兵们已经开始向马可欢呼带有胜利者意味的“皇帝”（Imperator）了。所以说萨尔马提亚战争是在罗马方面占据优势的状态下展开的，遭到痛击的萨尔马提亚人对罗马提出的议和要求当然求之不得。尽管叫做议和，但对罗马而言只是暂时的休战，在罗马无须作出让步的条件下，很顺利地实现了。

媾和当然并不只针对萨尔马提亚人，在此之前，罗马已经和马尔科曼尼、夸地、雅兹盖斯等多瑙河北岸的诸多蛮族缔结了和约，因此马可前往东方时不必过于顾虑。只不过，罗马军队占尽优势的战争只能被迫中断，作为最高司令官，马可心中肯定无限遗憾。

当时日耳曼各部族的首领表示愿意派兵帮助平叛，然而马可冷漠地拒绝了。“罗马人之间的问题，和罗马以外的人不相干。”

实际上，在马可前往东方之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被属下的一名百人队队长所杀，其首级已经被送了过来。

三个月时间一枕黄粱，马可甚至没有检视卡西乌斯的首级，就直接命人下葬了。

当众人都以为马可无须再去东方的时候，马可却执意前往。发生叛乱的东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就完全没有威胁了，卡西乌斯曾经参与过的东方防卫也需要重新安排。在将要事托付给庞培亚努斯之后，马可带着儿子康茂德和皇后芙斯汀娜向东方进发。而前锋部队为了和卡帕多西亚的两个军团会师，已经先行开拔。

沿多瑙河顺流而下，不久就进入了巴尔干，然后弃船登岸，经由色雷斯、马其顿取陆路，到拜占庭（今伊斯兰堡）渡过海峡前往亚洲。

跟随皇帝的武将有佩提纳克斯、马克西米亚努斯、昆提里乌斯兄弟等。只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帝国前线三分之一的老将都随侍皇帝左右。马克西米亚努斯出身于潘诺尼亚，昆提里乌斯兄弟则来自小亚细亚，只有佩提纳克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不过此人是热那亚解放奴隶的儿子。帝政时代的特点就是无论籍贯和阶级，都只凭借实力录用人才。随侍马可身边的这些武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卡西乌斯比上述的武将待遇更优厚，他还要起兵叛乱

呢？为什么他一听说马可病逝，连确认情报真伪的时间都等不及了呢？

将军卡西乌斯

盖乌斯· 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出身于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今土耳其安塔基亚）东北约100公里的丘洛斯。今天的丘洛斯只不过是土耳其的南部边境小镇，土耳其语称为“基利斯”，可是在古代，这里却处于联结首府与军团基地的干线道路上，守卫边境的部队兵士以及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人频繁经过，是个非常繁荣的所在。卡西乌斯的父亲名叫盖乌斯· 亚维狄乌斯· 赫琉多尔斯，从赫琉多尔斯这个姓氏判断，他们是希腊裔的叙利亚人。据说卡西乌斯生于公元130年前后，比皇帝马可年轻10来岁。

其父赫琉多尔斯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被哈德良皇帝所重用，长期担任皇帝的秘书官。到了安敦尼· 庇护的时代，他升任埃及长官。这堪称是行省人担任行政官员的事业顶峰了。卡西乌斯在父亲官邸所在的亚历山大度过了少年时代，然后前往首都罗马接受高等教育。

出身于重视教养的官宦之家，卡西乌斯和当时尚是下任皇位继承人的马可一样，都在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与科尔涅利乌斯· 弗龙托门下学习。卡西乌斯可以说是马可的“学弟”。

公元175年，当阿提库斯得知卡西乌斯发动叛乱，给这位曾经的弟子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你疯了吗？”

而弗龙托在9年前就已死去，最终没有目睹爱徒的轻狂。

和终身文官的父亲不同，卡西乌斯选择了从军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也是在这一时期，把自己明显是希腊人姓氏的赫琉多尔斯改为卡西乌斯这种罗马传统姓氏。在罗马世界实行双语制，帝国的东方连皇帝的文

告都采用希腊语公布，但唯有军队通行拉丁语。

作为武将，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声名最为显赫的时期，是在公元162年开始到165年进行的帕提亚战争过程中，尤其是在渡过幼发拉底河长驱直入帕提亚境内的战争后期，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舞台。我们甚至可以从弗龙托致爱徒的书信上，看出35岁前后的卡西乌斯的活跃程度。当时的军团长卡西乌斯派遣手下的一个大队长前往罗马传送捷报，同时令他顺路去探望弗龙托，因为这个大队长也是弗龙托的弟子。下面我们所介绍的书信，就是此时弗龙托写给卡西乌斯的：

> 你的大队长尤尼乌斯· 马克西姆斯将你用月桂树叶装饰的捷报送到罗马，公务完成后立刻就到我这里来了。据说这是你的命令，这种情意令我深感欣慰。
>
> 他不知疲倦地向我诉说了你的表现。你在战争中不分昼夜地操劳，以及你为了自己种种战略战术的推行所付出的思虑和牺牲。
>
> 说实在话，他到访的那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因而到罗马近郊的别墅来静养。当尤尼乌斯来访时，起初他还很顾虑我的身体，后来说起你的消息后，他好像忘记了我身体的不适，一直聊到深夜方才罢休。可是，我听他说话始终没有感到厌烦。你计划并实施的远征；你所成功确立的种种军规，古代的武将也不过如此；在战场上要如何激起士兵的斗志；你决定要何时何地进行战斗时的敏锐的眼光与胆识。
>
> 向我诉说这些时的尤尼乌斯，对你的热爱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样的年轻武将同样值得他的上级给予关爱和帮助。我的确认为，给予一个崇敬自己的年轻人以获得荣誉的机会，等于为你自己增加更多的荣誉。

不知为什么，到了五贤帝时代，像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这样才华横溢的武将就越来越少了。因帕提亚战争中的功绩，他在而立之年从一

名军团长上升成为叙利亚行省总督，统率3个军团。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获选执政官，5年后的公元172年为镇压埃及暴动，被马可任命为东方全军的司令官，而在此要职上的卡西乌斯也完美地报答了皇帝的期待。

那么，对卡西乌斯如此崇拜的尤尼乌斯· 马克西姆斯是否也参与了叛乱呢？我曾用心调查，发现事发之前，尤尼乌斯已经被调往西方的军团任职了，同公元175年发生的叛乱毫无关系。不知他得知老上级叛乱的消息时，内心都想了些什么。

获知叛乱的马可实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确认西方军团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正确的。受士兵拥护的司令官，第一要能打胜仗，第二是能打令人瞠目结舌的胜仗。作为优秀的武将，卡西乌斯不但在帝国的东方，而且在西方的军团兵中间也都拥有崇高的声望。

既然已经如此声名显赫，他为什么还要如此轻举妄动呢？

如果皇帝马可的死不是误报而是事实的话，那么在大多数人看来，康茂德即位是顺理成章的。在整个五贤帝时期，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 庇护四位皇帝都没有亲生儿子，这个儿子尽管才13岁，还没举行成人礼，却是马可亲生的。10多岁的皇帝当然需要有人摄政，而距离摄政位置最近的，就是马可在多瑙河战线上的左膀右臂庞培亚努斯。因为是露西拉的丈夫，所以此人也是康茂德的姐夫。

庞培亚努斯与卡西乌斯一样来自叙利亚，但和高官儿子的卡西乌斯不同，庞培亚努斯是从军团中苦熬出来的，所接受过的教育也不能和“马可的学弟”卡西乌斯同日而语。而二者最大的差异，则在于卡西乌斯一直引以为傲的“武将的资质”。

优秀的庞培亚努斯也深受士兵的尊敬与信赖，对待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无限忠诚，是典型的罗马式武将。可凡是他所指挥的战斗，虽能获胜，却不是那种令敌方心惊胆寒的胜利。在多瑙河前线和蛮族之间的

战争之所以如此拖泥带水，不能不说是马可与庞培亚努斯两人的气质作风使然。而卡西乌斯和那两人的类型完全相反，他肯定在想，自己何苦一定要屈居庸才庞培亚努斯之下呢？

我认为，这或许才是他连情报真伪都不曾确认就急于起事的真正原因。才华横溢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屈居庸人之下，何况那人还是自己的同乡！卡西乌斯于公元175年起兵称帝，时年大约45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代。

不过另一方面，卡西乌斯也并不只是因为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才兴兵发难的，心中肯定对皇帝马可也不无牢骚。《罗马皇帝传》中，记录了卡西乌斯起兵后写给自己女婿的一封书信：

> 可怜的罗马帝国啊！你深受故步自封和苦心钻营的人所拖累；可怜的马可啊！你虽具备高尚的品德，却妄享宽容的虚名，结果令贪婪的人横行。
>
> 都哪里去了？先祖们恪守律例的生活！我知道，律例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宽松，可是现在人们连追求律法的心思都消失殆尽了。
>
> 沉迷于哲学的马可·奥勒留虽热衷于探求人类的善念、正直与公平，可是却对国家为何物、怎样发挥其功能等问题漠然置之。非常遗憾，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却是剑与法，正如先祖示范给我们的一样。
>
> 难道我们只能对利欲熏心的高官们满怀崇敬，交口称颂？你知道吗？我们的哲学家所倚重的一位近卫军军团长官，接到任命的三天前还很贫穷，可就任之后立刻就变成了富翁。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真想问问他，怎么才能在不损公肥私、不敲诈勒索的条件下发财致富？
>
> 我们罗马帝国的公民，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普通人家，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可是人们也不得不叹息国库的空虚。为打破这散漫的

现状，只能依靠诸神把真正优秀的资质和能力赋予人们。我，卡西乌斯，愿成为找回罗马从前威严的带头人！

善后处理

既然叛乱的首犯已经人头落地，那么皇帝似乎也不必为善后而亲自出马了。但马可还是执意亲自前往东方，因为不但是军团兵，即使在行省的行政官员中，赞同卡西乌斯的也大有人在，并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条克这两大东方都市中，居民普遍对身为罗马统治者的卡西乌斯抱有亲近感。亚历山大是卡西乌斯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的仁政依然被人们广为传诵，更重要的是，三年前他迅速镇压了埃及原住民的暴动，其雷厉风行的手段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

在叙利亚的安条克，人们也把卡西乌斯当成自己人。和当地人一样，卡西乌斯也是希腊裔的叙利亚人，入主安条克的总督官邸9年来政绩斐然。在此期间的帕提亚战争中，他更是纵横沙场的武将，帕提亚方面无一人敢与之对垒。

多年来帕提亚人正像一只老猫眼皮底下的耗子，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一动也不敢动。对马可而言，即便是卡西乌斯的善后处理，也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然而，如果卡西乌斯黄泉有知，只怕又会对马可的善后方式大加指责。

军团先行开拔后，皇帝、皇后和皇太子一行经由小亚细亚取道向东，首先前往安基拉（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然后转而向南，计划渡过地中海之后进入叙利亚。然而在只要翻越托罗斯山脉就可到达地中海的地方，皇后芙斯汀娜却倒下了。此时已是冬季，尽管石板铺就的罗马大道在当时已经相当于高速公路，但对一个45岁的女人来讲，秋季以来的漫长旅行还是过于严苛了。皇后并没有缠绵于病榻而是很快撒手人

寰，30年的婚姻生活，虽只有6名子女长大成人，但她产过两次双胞胎，前后共有14名子女。

得知皇后死讯的罗马元老院不等皇帝提出请求，就全票通过决议，将皇后神格化。丈夫马可随即将妻子最后的安息之地赫拉拉改名为芙斯汀娜堡，并下令在当地建造纪念亡妻的神殿。

火化后的骨灰将被埋葬在罗马台伯河畔的哈德良陵园。望着火葬遗体的烈焰，马可的思绪是怎样的呢？在目送骨灰坛远去之后，马可又重新踏上了向东的旅程。虽然还有儿子康茂德，但《沉思录》中那位“如此的柔顺，如此的亲爱，如此的朴素”的妻子已经永远不会再陪伴他左右了。

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的皇帝一行直接沿地中海东岸前往埃及，中途没有进入安条克。这是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卡西乌斯派的老巢，还是暂时规避。当时的记载，是说皇帝在用忽略的方式惩罚安条克人。在埃及，只有带头响应卡西乌斯叛乱的长官斯坦提亚努斯被召回本国，处以流放的轻微刑罚，长官的部下全部释放，对拥护卡西乌斯称帝的亚历山大居民也没有施加任何惩罚。马可在埃及的驻留分成两部分，其一是作为皇帝完成工作，其二是作为哲学家享受思想的愉悦。皇帝的工作是多次接见包括帕提亚在内的中近东多位君主、王侯和首领，相互重申和平的主张。工作闲暇时，皇帝会拜访和雅典齐名的帝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研究机构的“博学园”（Mouseion）。但是，马可· 奥勒留并没有像哈德良皇帝那样和众多学者展开论战并驳倒对方。

两位皇帝的差异不在学识而在气质。

马可从亚历山大经海路折回叙利亚，这次才进入了安条克。在安条克的总督官邸，皇帝公布了对叙利亚相关人员的处罚。

卡西乌斯的妻子已经亡故，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已经和

父亲一起被杀，次子被处以流放，女儿、女婿被交给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伯父管束。至于通常的没收财产则没有施行。马可将这种宽大的处理报告给了元老院，也得到了元老院的多数赞成。

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流血。只有支持卡西乌斯的城市拜占庭面对先行到达的军团拒开城门，引发了攻城战斗，这是武力镇压的唯一事例。不过，皇帝马可之所以能用如此宽容的态度去处理善后，和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维尔斯的敏捷果断是分不开的。

归纳卡西乌斯叛乱的过程如下：

公元175年4月，得到皇帝马可病殁的消息，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起兵称帝，同时向卡帕多西亚总督马尔提乌斯· 维尔斯寻求支持。维尔斯不但予以拒绝，还将卡西乌斯起兵发难的消息紧急报告给了多瑙河防线上的马可。在后来的3个月里，维尔斯始终拒绝卡西乌斯的引诱。

同年7月，得知皇帝之死是谣传的一位百人队队长开始动摇，杀死了卡西乌斯。维尔斯接获消息，连忙离开卡帕多西亚进入叙利亚，首先将叙利亚行省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以及以约旦为基地的1个军团都纳入自己麾下。他打出的旗号是，面对假想敌帕提亚，前线绝不能没有司令官。

完成这一切的维尔斯这才前往安条克的总督官邸，但到达之后立即烧毁了所有的文件证据。叛乱首犯已经死亡，如今为避免事后的肃清扩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文件证据。在马可离开多瑙河防线向东方进发之前，他已经将这些处理干净。

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因忧国而起兵，马尔提乌斯· 维尔斯所想的也同样是国家，而马可· 奥勒留理解维尔斯的做法，并依此处理善后。针对反叛事件，这次的宽大处理堪称史无前例。

将维尔斯任命为叙利亚的新总督之后，马可就返回了首都罗马。这次返程兼有观光性质，他们先到达了以壮美而闻名的小亚细亚西岸都市以弗所，然后在斯敏诺再次会见了著名哲学家艾利斯泰迪斯，最后经海路前往雅典。

马可· 奥勒留这个人，直到47岁才离开意大利本土，目力所及的行省也都是多瑙河防线所在的北方地区，到了50多岁，才首次踏上帝国的东方和南方地区。无论是埃及还是叙利亚，或者还是小亚细亚，这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而从小亚细亚扬帆前往希腊的航程，更使他饱览了遍布着珍珠般岛屿的爱琴海风光。当一座岛屿尚未消失在海天之际，又有一个新的岛屿逐渐浮现在眼前，初次体验这种爱琴海上的旅行，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希腊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的形成过程，比如气候和地形是怎样影响着文化和文明的形成。

如果说意大利的罗马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那么希腊的雅典则是帝国智慧的故乡。哲学在这里绽放出最灿烂的花朵。早在马可到访的500年前，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就已经在雅典开始了他的“哲学家事业”。当时他开展教学的场所在雅典的“壁画回廊”（stoà poikìle），所以人称该学派为斯多葛学派（画廊学派）。对崇尚斯多葛学派的马可而言，这次雅典之旅无异于朝圣。并且，在雅典迎接皇帝的不是别人，正是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他是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富有的人，积极履行公民的公职义务，出任执政官，是深孚众望的希腊人。身为学者的同时，他目光长远，为公共建设捐献巨额款项，用以响应众人的期待，是个善于处世的智者。对马可而言，阿提库斯还是和弗龙托并重的恩师。

能作为赫罗狄亚斯· 阿提库斯的客人住在雅典，每天的款待谈不上奢华却也无微不至，马可当然心情舒畅。不过这次在雅典，马可并没有新建任何文化设施，因为没有这种必要。哈德良皇帝所重建的文化中心雅典，半个世纪之后仍处于完美的状态。

马可所做的，是将带有雅典特色的哲学学府重新划分成四个学科，并为负责授课的教授们确定了固定薪酬制度。四个学科分别为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斯多葛哲学以及其他诸派哲学。至于教授们的薪酬，虽然只相当于帝国的事务官吏，但马可少年时代就曾模仿哲学家身披粗布睡在地板上，也许他认为哲学家们无须高薪酬。

哈德良和马可都是醉心于希腊文化的皇帝，比较他们关注对象的差异也很有趣。哈德良的注意力在造型艺术方面，而马可· 奥勒留只关心哲学。前者注重“美”，后者注重“真”，虽然“美”和“真”都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

这一年，即公元176年秋，皇帝一行回到了首都罗马。这是55岁的马可7年以来的首次归乡。为庆祝针对日耳曼诸部族所取得的胜利，11月27日，罗马举行了欢迎皇帝和皇太子凯旋的盛大庆典，首都的民众为之狂热。

世袭确立

转眼到了公元177年1月1日，这一天，15岁的康茂德开始第一次就任执政官。在新执政官的就职演说结束后，马可面对列席的元老院议员，发布了一个对今后帝国无比重要的决定，即他任命儿子康茂德为自己共同统治的伙伴。

马可在15年前就任皇帝时，就宣布和“弟弟”路奇乌斯共享帝位，现在康茂德得到和当年路奇乌斯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马可将和儿子一起分享皇帝的下列权力：

全军最高司令权（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罗马整个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才可行使的最高指挥权。

护民官特权（Tribunica potestas），保护一般公民的权利。

接受士兵们“皇帝”（Imperator）欢呼的资格。

康茂德唯一没能得到的，是“大祭司”这一宗教最高负责人的地位。传统上这个职位只能由一人出任，无法分享。除此以外，父子二人在所有方面都具有相同的级别。就这样，随着康茂德首次就任执政官，共治体制也开始实施了。从前以最小的年龄登基的是尼禄，即位时16岁又10个月，现在康茂德比尼禄还年轻，15岁又4个月就成了“共治皇帝”。

马可一生守正不阿，父子亲情肯定不是这一决定的主导因素。在儿子康茂德就任执政官的同时，马可也让女婿昆提里乌斯担任另一位执政官。马可的另外四个女婿都有执政官的任职经验。这5个女婿都是老辣的武将，其中至少有3人来自行省。马可希望自己死后，年轻的皇帝能在姐夫们的辅佐下治理国家。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避免因争夺帝位而出现的内战。马可也从卡西乌斯叛乱中得到教训，内战就如同人体流血一样，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避免内战的发生。而元老院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通过了马可的决定。看来内战的危害也深深印刻进元老院议员们的心里。

当所有这一切都处理完毕，可能是操劳过度，马可终于病倒了，由御医加雷努斯随侍左右。

就这样，马可一直在首都和罗马近郊的别墅之间往来，在静养中度过了公元177年。然而虽说有两位皇帝，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马可一人承担。不论身在何处，无尽的政务都会找上门来。事务中绝大多数都是平常内容，不过其中倒是有一项意味深长的判决，就是针对一个疯子的犯罪，应该给予怎样的惩罚才适当。我们已经讲过多次，罗马皇帝还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次判决成了罗马法的判例。不过皇帝发表的意见未必都作为判决在法庭上宣读。一般情况下，作为法庭主审官的“首都警察长官”遇到疑难案件时会向皇帝请示，皇帝不在首都时就以书信

作答，然后长官再根据皇帝的意见下达判决。因而这封马可书信的对象，是坐在法庭主审法官席上的首都警察长官：

> 我仔细阅读了你送过来的搜查和讯问结果，觉得被告艾利乌斯·普利斯克斯连最低限度的自我控制能力都很欠缺，我只能说，他在杀害自己的母亲时，对这种行为的善恶没有判断能力。我也不认为他是伪装的疯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问罪。因为发疯本身就是诸神对人施加的一种惩罚。
>
> 不过，即便是无罪判决，也不意味着将其立刻释放，而是通过严密的监视保护他，并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考虑是否给他带上镣铐。这不是对他施加惩罚，而是为了保护他附近的其他人。我们在下达判决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
>
> 就算是一个疯子，也常有头脑恢复理性的时候。所以你绝不能放松监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判明他在杀害母亲时究竟是否神志清醒。如果当时他是清醒的，那么就不能以精神问题判他无罪。
>
> 话虽如此，但是在你的报告中已经表明，这名被告在犯下暴行时已经被隔离于家中，处于家人和朋友的监视和保护之下。所以你应该从上述角度出发，重新讯问所有照顾被告的人。这是和被告的无罪判决不同的问题，即被告的暴行是否是因这些人疏于监管才导致的。如果经调查这是事实，那么必须以履行义务不力的罪名惩罚这些人。我要再次重申，我们这些掌管司法的人所必须关注的，不仅在于如何处罚犯下重罪的疯子，还应该预防更多的其他人成为这种犯罪的牺牲品。

这一年，有5名基督教徒在高卢行省的里昂被处以死刑，这是马可·奥勒留治下第二次处死基督徒。

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发生在里昂呢？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可为处理卡西乌斯叛乱而前往东方时，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乘机突破了莱茵河防线

南侵，使得高卢人心惶惶。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享受和平，蛮族的入侵就如同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为防守莱茵河，高卢人都奋不顾身地提供后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还在期待堕落颓废的罗马帝国灭亡，祈祷神国降临，终于导致了人们对其不满的爆发。另外，基督徒形成自己的封闭型社区，对罗马帝国的公务及军务态度消极，也是引起他人反感的重要原因。还有，到高卢传教的人大多来自遥远的东方，同样为人们的排外情绪提供了温床。后世以两个希腊语词组成一个词，称为“克塞诺弗比亚”，意为“厌恶外国人”、“外国人恐惧症”、排斥外国人”。

自从图拉真法推行以来，只有被实名检举的基督教徒才成为逮捕和审讯的对象，如果他们放弃原有信仰的话则被无罪释放，否则将被处以死刑。其罪名为抵制罗马宗教罪。罗马的宗教属于多神教，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实现统一的构成要素之一，从这一点来讲，抵制罗马宗教当然是一种罪名。而罗马的统治者在基督教徒的问题上，也并没有将其作为宗教问题对待，而是当成反社会行为加以制裁。因而尽管基督教徒将这种赴死视为殉教，但在其他罗马人看来，信奉基督教本身就是犯罪，也应该处以和其他罪犯同样的刑罚，即鞭笞之后斩首。

然而，在公元177年的里昂，因为诸多因素叠加在了一起，被处死的5个人中，除一人因具有罗马公民权而被斩首外，其余4人则是被拉到圆形竞技场公开处刑。

在里昂对基督教徒的死刑判决和皇帝马可并无关联，和驻在里昂的高卢行省总督也没有瓜葛，下达死刑判决的是一个名为“高卢部族长自治协议会”的组织，其成员全部由高卢行省民组成，就是尤里乌斯· 恺撒征服高卢以前的高卢部族长会议。在高卢成为行省之后，这个组织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恺撒认为适当程度的自治更有利于罗马对高卢的管理，而恺撒这种思维也被后来的皇帝们所继承。因而，尽管当初的目的已经模糊，但这个由高卢豪强组成的会议机构依然存留了下来。每当总

督想要找人做些事情，往往会由这个组织代办，而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圆形竞技场组织角斗比赛。

然而马可· 奥勒留在位期间，很多角斗士都是被送往前线，导致竞技场里角斗士的出场费用暴涨。皇帝马可甚至发出布告，说举办角斗比赛的目的是欣赏角斗士们的高超武艺，而不是为了目睹某一方的死亡。可见这时角斗士的绝对数量已经出现了不足。既然不足，价格自然上涨。结果除了首都罗马还承担得起，行省的首府就捉襟见肘了。走投无路的组织者们于是想出了一个利用死囚代替的主意，得到了议会的批准。

里昂位于索恩河与罗讷河的汇合处，圆形竞技场隔着索恩河与市中心相对，四名基督教徒在这里与猛兽搏斗，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搏斗就被咬死了。这是将基督教徒拉到圆形竞技场处死的最早事例。而罗马斗兽场则一次也没能成为基督教徒的殉教之地，因为在皇帝担任组织者的首都，人们能够用高额的出场费吸引角斗士们的到来。

直到公元178年上半年，马可的生活都在平静中度过。唯一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儿子康茂德总算到了17岁，与克丽丝庇娜结婚了。

马可为四个女儿挑选夫婿，丝毫不问籍贯和出身，他们都是实力强大的武将，但是轮到选择儿媳妇时，他却瞄准了元老院阶层的女儿。克丽丝庇娜的祖父布尔提乌斯· 普勒赞斯深得哈德良皇帝的重用，也是安敦尼· 庇护的心腹。马可通过迎娶元老院豪门的女儿做将来的皇后，希望康茂德将来即位之后，还能和元老院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一年，马可也57岁了。如此高龄，加上经常出问题的健康状态，是不是不愿再去多瑙河了呢？建设新行省是自图拉真以来的宏伟计划，可是，将军们连击败蛮族的前期计划都没能实现。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这样写道：

尽管昆提里乌斯兄弟勇敢谨慎，经验丰富，但他们兄弟俩好像欠缺一些终结战争所必需的东西。

马可· 奥勒留决定再度亲临战场。他认为自己即便只是接近前线，对罗马的将士也能产生积极影响。他决定在8月3日出征。

第二次日耳曼战争

面对始终威胁北方防线的日耳曼诸部族，罗马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明确而大胆的军事行动了。其实早在11年前，公元167年开始，多瑙河防线上的蛮族侵略就已经表面化了。从公元175年到177年的3年间，罗马不得不处理卡西乌斯叛乱，而其余的8年时间则付之东流了。既然尽早达到目标结束战争是战争唯一的“善行”，那么罗马的战争却一直未能终止，我们只能感叹8年时光都白白虚度了，而拖延战争的责任似乎只能在马可身上寻找。

早在多瑙河问题表面化阶段，就尽早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有哪些解决方案以及凭借罗马的力量可以将哪些方案付诸实施，然后全力以赴，尽早解决事态，这才是一个最高负责人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政策。战争拖延本身就是“罪恶”，本来在开始阶段只要采取小范围行动就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拖延得越久，解决起来所需要的鲜血和费用就越多。

而且，由此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弊端是，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非当事者，都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捉襟见肘十分窘迫，那么与其自身努力，不如牺牲他人更能消愁解闷。在里昂的圆形竞技场围观基督教徒处刑场面并拍手喝彩的人们，就是其中的一例。罗马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同时也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的作用，就是将所有的人心动向都体察入微之后并作出决策。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人们未必需要领袖，但到了急需打开局面时，领袖就不可或缺了。

罗马军队计划在公元179年春天发动巨大攻势。首先，从两位皇帝都亲临前线就可以想见罗马的投入程度，而且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也加入了进来。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警察长官和负责首都的司法官员留在了首都罗马，其他高官都倾巢而出，拥往前线。而直接统领大军的总督以下的指挥官，都是此后20年间站在帝国防卫最前线的悍将。

毫无疑问，两位皇帝亲临前线，士兵们当然奋勇向前。仅仅是一睹皇帝的容颜，他们就已经士气百倍了。而且，马可身在前线对将士的具体行动也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发挥出来的呢？请看马可自己的解释：

> 指挥官们无一例外都是军事专家，所以他们当然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但是战争是集体行动，不能完全听凭各自的愿望行事，我的用心之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然后决定由什么人在哪一领域执行任务。这时作为最高司令官，我必须注意为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努力创造条件。

简单概括这番话的要点，就是“调整”，然而这种调整也不是那种技术上的指导。这时马可是以皇帝的权威而不是以最高司令官的职责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说到权威，他是57岁的皇帝，治理国家17年，完全当之无愧。

而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也终于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所有的北方蛮族都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在当时的历史记录里，也开始把蛮族分为“近蛮族”和“远蛮族”两种。所谓“近蛮族”，就是在罗马防线附近地区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和罗马常有交战，也时而谈判和通商，马尔科曼尼人、夸地人以及雅兹盖斯人，都属于这一种。而“远蛮族”则住在更北方，和罗马没有直接接触，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听说他们部族的名称，如萨尔马提亚、伦巴底、汪达尔、哥特、法兰克、撒克逊等。这些远蛮族向西南方向迁移，压迫着近蛮族不断侵略罗马。

马可· 奥勒留的宏伟计划，是兼并这些近蛮族，建立行省，在和远蛮族发生直接接触时，新的行省将成为前沿要塞。

这个计划本身很不错。可以说，罗马帝国版图扩大的历史就是防卫强化的产物。尤里乌斯· 恺撒将北部意大利划入本国就是对卢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半岛的保卫策略，恺撒把高卢划为行省也是如此，是为了加强防守包括北部意大利在内的意大利本土，继承恺撒的衣钵，克劳狄乌斯皇帝完成了对不列颠的征服，也是为了高卢的安全。庞培将叙利亚列为行省，也是在强化对大国帕提亚的防卫。

如果说，罗马人最初并没有建立大帝国的企图，只是随着防卫加强，他们不断开展军事行动，征服地域不断扩展，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帝国。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出于防卫而建立新的行省是罗马人的传统政策，而图拉真皇帝建立达契亚行省则是最近的例子。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有充足的军事力量去推行这一政策，马可的时代还好，只要避免因用人失误而出现的浪费，罗马军队还是具备压倒性优势的。

而第二个问题则是，作为最高负责人的皇帝，是否具备始终坚持推行这一政策的坚强意志。公元178年的马可· 奥勒留的确具备这种意志。

因为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罗马大军在公元179年连战连胜也是理所当然的。最高司令官的坚强意志都贯彻到了每一名士兵身上，使他们都有着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气势。

坐镇卡农图姆军团基地的皇帝陆续接到了整个多瑙河中游流域战场传来的捷报，无论是马尔科曼尼人还是夸地人、雅兹盖斯人，都是一触即溃，四散奔逃。

在这场正式名称为“expedition Germania secunda”的第二次日耳曼战

争中，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声名鹊起，而其中率领骑兵团的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表现最为出色。出身于潘诺尼亚的他充分利用了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扰乱敌阵，不给对方丝毫喘息之机。他的活动范围甚至深入多瑙河以北120公里。因为马可计划中的行省把后世的捷克都包括了进去，所以可以说马克西米亚努斯几乎踏遍了整个战场。皇帝为表彰他的战功，任命他为驻扎在布达佩斯的第二亚狄托里库斯军团的军团长。也就是说，把面对敌军的最前线交给了他。不过，军团长必须有担任执政官或法务官的经历，总之要有元老院议员的资格。从行省一步一步磨炼出来的马克西米亚努斯不具备这种条件。马可丝毫没有犹豫，当场提名他为议员，并请求元老院予以通过。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方面没有牺牲。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尤里乌斯·维鲁斯就阵亡了。连司令官都有阵亡的，那么其手下牺牲的士兵肯定为数不少。不过，罗马方面一直占据着压倒性优势。既然已经胜利在望，将士们当然个个奋勇争先。

马可决定在卡农图姆以西50公里的维德伯纳（今维也纳）过冬。这里同样是军团基地，距离卡农图姆也不远，但这里比较安静。既然皇帝迁移驻地，那么整个作战指挥部也都跟着转移。从公元179年到180年，维也纳人来车往，人们都在为春季开始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的第二年精心准备着。

逝世

如果是在濒临地中海的南国，战争3月份就可以展开，但是到了北方多瑙河流域，这个时间就来得迟一些。皇帝马可正是在这时候病倒的，即公元180年3月初，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刻。

可以说马可·奥勒留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即使御医不说，他自

己也知道这一次是气数将尽了。

他将儿子康茂德和军队的重要将领都召到了房间里，面对在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总督和将军们，嘱托了两件事：

第一，请他们辅佐康茂德尽力维护帝国的安全，绝不能发生内战。

第二，继续日耳曼战争。估计到秋季，行省化进程中军事制霸的第一阶段目标就有望达成。

宣布遗言后，皇帝开始拒绝服药，也拒绝食物，甚至连水都不喝。对罗马的男人们而言，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是一种耻辱。而且马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门徒，从容就死是自己终止人生的应有方式。

得知皇帝病危的消息，士兵们也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们不仅为最高司令官走向死亡而哀伤，还因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直在前线督战的皇帝。他们看到马可的生命正在走向尽头，就如同身边的战友永远离去一样苦恼和悲伤，而将领们的心情也同样如此。

马可 • 奥勒留

4天过后的3月17日，马可离开了人世。再过一个月他就59岁了。作为治理国家的皇帝，他在位19年，尽管个人气质不适合于军事征战，但在这19年里战争从未停息。

军团基地中央的广场上，在整装列队的将士们面前，跃动的火焰逐渐包裹了皇帝的遗体。皇帝的骨灰将入葬台伯河畔的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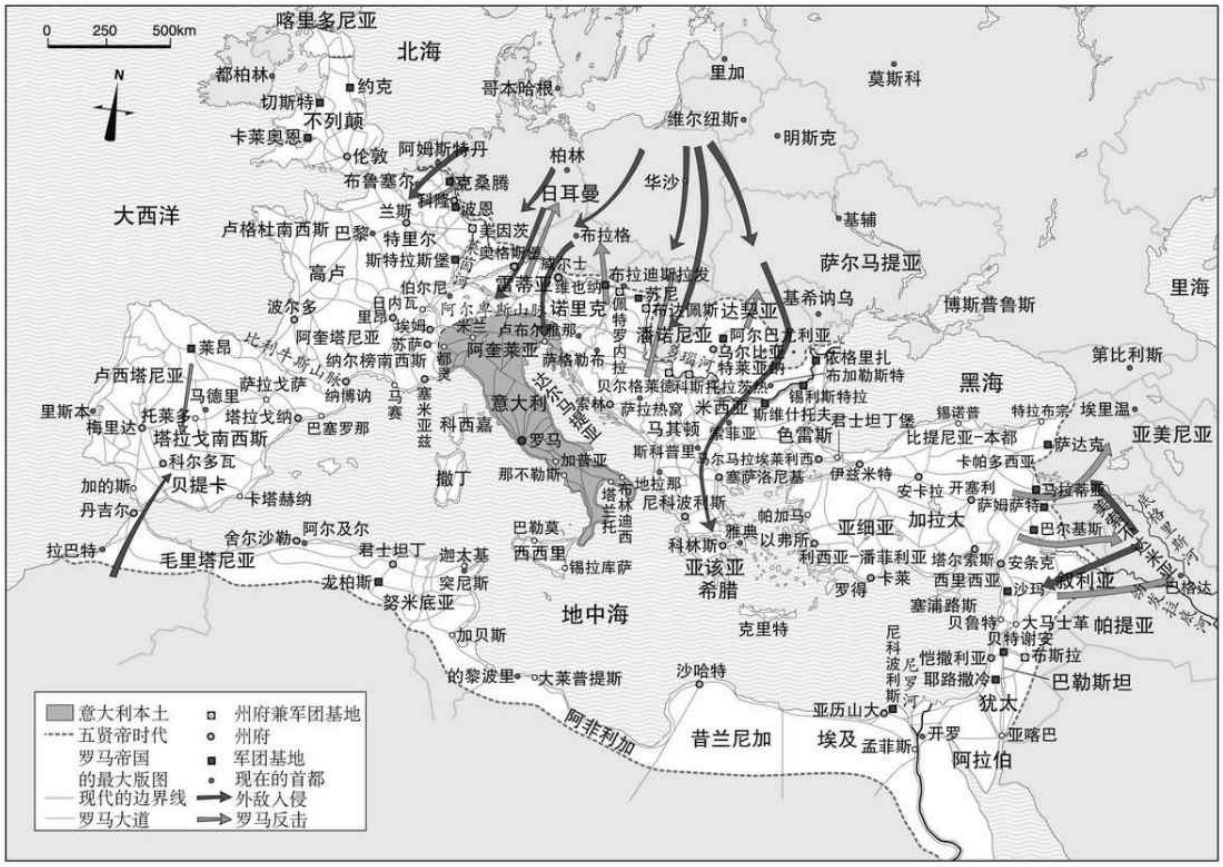
在北方，遥远的多瑙河畔，这个写下“我热爱绿影婆娑的西里欧山，我热爱罗马”的人，在夹杂着细雪的冷雨中告别了人间。马可· 奥勒留是第一个逝于前线的皇帝。

随着皇帝的逝世，出现了皇位继承的问题。而康茂德已经是共治皇帝，虽然他只有18岁又5个月，但还是平稳地接管了权力，继承了大祭司职位。康茂德从此成了唯一的皇帝。

马可的第一项遗言，要求众人辅佐年轻的皇帝，维持帝国的安全，避免内战。这第一点被完美地实现了。然而第二项遗言，在坚持战争上则非常不尽如人意。

这一年，卡西乌斯· 狄奥25岁，不久他移居罗马。他在后来撰写的史书中，这样评价马可· 奥勒留：

> 以这个人真挚的生活方式，以及贯彻一生的强烈的责任感，如果能遇上幸运的太平盛世就太好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首先身体健康状况极为不佳，其次则是在位期间饱尝了各种苦难。
>
> 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对他抱有更深厚的敬意，何况还有他那深邃的思想。作为皇帝，他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陌生而艰难的。尽管如此，马可· 奥勒留还是以病弱之躯坚持活到了59岁，成功地延续了罗马帝国的生命。



马可• 奥勒留时代蛮族的入侵与罗马军队的反击

第二章

皇帝康茂德

（公元180—192年在位）

电影与历史

马可·　奥勒留在“声音”上，留有表达自己哲学思考的著作《沉思录》，在“形象”上，他的骑马像可谓罗马帝政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而他的儿子康茂德留给后世的“形象”，则是头披狮子皮，手持短棒模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一尊眼神空洞的半身像。康茂德自己没有留下“声音”，但有一个同代人替他留下了，此人就是比康茂德年长6岁，当时居住在罗马的卡西乌斯·狄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毫不留情地称康茂德的统治是“帝国的灾难”。

以上的种种不利，当然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用前三章总结了到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帝国历史，从康茂德开始正式进入主题。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从康茂德时代开始的。自吉本以来直到当代，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看法一直没有变化。

在罗马历史上，被人们视为昏君的，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图密善等人，自从伏尔泰开始为提比略辩护以来，人们不再纠缠于克劳狄乌斯和图密善的个人品质，而是重新评价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历史作用。在吉本的时代，研究历史只能依据仅有的文献资料，但是后来通过对各种遗址、碑文、货币等的实证研究，使这些“昏君”有了恢复名誉的可能。就连尼禄，人们也认为他在金融、外交以及大火灾之后的罗马规划方面成绩斐然。唯独没有得到救赎的昏君是卡利古拉，但卡利古拉的在位时间只有短短4年。而另一个尚未得救的就是康茂德，在位时间12年。

并且，后世评价皇帝康茂德时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那就是贤明的马可· 奥勒留明知儿子不能胜任，为什么还把帝位交给他

呢？马可这样一个热烈追求正确人生方向的人，不可能仅仅出于溺爱就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来。迄今为止，共有两部电影涉及康茂德，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一部电影是1964年上映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我们忠实地把片名直译为《罗马帝国衰亡史》，实际上对一部电影来讲，这种译法显然有些夸张了，由此可见，吉本的影响力依然很强大。电影导演是安敦尼· 曼，亚力克· 吉尼斯饰演马可· 奥勒留，克里斯托弗· 普卢默饰演儿子康茂德，而女儿露西拉公主的扮演者是索菲亚· 罗兰，老皇帝马可暗中属意的托付帝国的将军则由在电影《宾虚》中饰演反派角色的史蒂芬· 博伊德扮演。

第二部电影《角斗士》（Gladiator）拍摄于2000年，这个词是由“角斗士”的拉丁语“gladiātor”翻译成英语而来的。导演是雷德利· 斯科特（RidleyScott），老皇帝马可由理查德· 哈里斯（Richard Harris）扮演，康茂德由杰昆· 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扮演，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在剧中是女一号，但剧中真正的主角还是马西墨斯，老皇帝马可想把帝国托付给他，由罗素· 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

这两部电影的剧情，都是讲述马可认为儿子康茂德不能胜任皇位而想把一位部将立为继承人。发现了这一点的康茂德先发制人，杀死了父亲。虽然第一部电影中是御医揣摩到了康茂德的心思，为了讨好代为动手的，但是在这两部电影中，马可都不是病逝而是遭人杀害的。

电影与书籍不同，无法对复杂的背景关系进行解释。虽然很多用文章难以表达的事情用图像瞬间就能表达出来，但从传送信息的质与量上看，文章还是比电影要有力得多。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可以接受如此信息的头脑和情感，因此书籍的读者与电影观众相比数量悬殊。而我写的既然不是电影剧本，就总希望自己能详细铺陈事件复杂的背景关系。

那么，马可明知儿子不合格，为什么还一定要让他继承皇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所阐述了，就是马可别无选择。

五贤帝时代的皇位传承有个特点，即皇帝选择合适的人将其收为养子，然后指定其为继承人。涅尔瓦皇帝挑选了图拉真为养子，图拉真皇帝挑选了哈德良，哈德良皇帝挑选了安敦尼·庇护，而皇帝安敦尼·庇护则将马可·　奥勒留收为养子。皇帝以个人能力为标准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收为养子则赋予了对方继承皇位的正当性。只凭自己的实力主义标准选择继承人的话，其他有实力的人未必接受，所以用收为养子的办法使其具备正统性。这种皇位传承体系之所以能持续近一个世纪，就是因为五贤帝之中有4个人本来就没有儿子，即哈德良皇帝所谓的“我无法选择儿子，但我能选择继承人”的状态。可是，现在马可却有儿子。

如果马可继续贯彻以往的实力主义，放弃康茂德做继承人，那么帝国的将来会怎么样呢？

答案很明显，帝国无疑会陷入内战。不管怎样广施仁政，反对派却总是存在的。因为能使所有人同样满意的统治肯定就不是统治了。不论是出于公义还是私愤，对最高统治者不满的人迟早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合适的人，反对派就会拥戴他，内乱由此而生。一个人如果是老皇帝的亲生儿子，却又没能继承皇位，那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拥戴人选了。康茂德是父亲登基那一年出生的，是皇帝事实上的独生子，如今长大成人，如果被剥夺了皇位继承权，一来他自己心有不甘，二来肯定也有人会利用他这种落寞情绪。

皇帝马可正是要对这种事态防患于未然，并且马可为了使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早早地就让儿子当上了共治皇帝。当时的康茂德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丝毫不能断定他将来一定不称职。的确，康茂德不喜欢学习，而是对竞技与格斗感兴趣，不过这是和他那好学的父亲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总是喜欢拿儿子和父亲相比。其实总体说来，19岁的康茂德还没有什么缺点能让父亲马可非要下定决心把帝国托付给别人。我们以

后会讲到，造成康茂德性格骤变的，是父亲离世两年后的一场阴谋。

我们还可以作个假设，即马可发现19岁的儿子无法承担整个国家的责任，转而想让手下一位40来岁的将军继位。且不说这种假设能不能成立，就算马可有此打算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现代人或许以为，古代的皇帝都能够为所欲为，但至少在罗马帝国并非如此。在罗马，绝不能忽视法律。如果皇帝想有什么新举动，那他必须先让相关法律通过之后才可施行。

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罗马国家的主权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手中。当时人们常用S. P. Q. R来表示罗马，这是“元老院及罗马公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在这里，既没有“第一公民”（Princeps）的P，也没有“皇帝”（Imperator）的I。罗马皇帝只不过是接受掌握着主权的罗马公民和元老院的委托实施统治的。因此，一个人只凭老皇帝的指派并不足以成为皇位继承人，他还必须取得元老院的承认和罗马公民们的拥护。元老院的表决，就如同现代社会里首相就职必须有国会多数通过一样。而公民们是否拥护则要观察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里的情形。在当时这就是舆论调查，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广泛分布于帝国全境，所以只能在罗马的民众中取样。如果皇帝入场时观众席上发出一片嘘声，就意味着皇帝的支持率在急速下降。

没有比马可· 奥勒留更尊重法律和追求公正的皇帝了。既然康茂德已经得到了元老院承认，也在圆形竞技场接受过公民的欢呼，那么马可就绝不会再轻易把儿子从共治皇帝的位置上赶走。除非康茂德死了，他才不再担任共治皇帝，可是康茂德一直活蹦乱跳。在这种情况下，马可不可能对某一个部下说：“我觉得康茂德不行，下任皇帝我看好你了……”

罗马的法律不会允许他有类似的言行，他也绝不能无视罗马国家正式的主权拥有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那不是马可· 奥勒留的风格。也就

是说，康茂德丝毫没有弑父的动机。总之，不论有多少人竞争，只要康茂德活着，他共治皇帝的地位就固若金汤，而这也正是马可· 奥勒留所期待的结果。

这么看的话，《罗马帝国衰亡史》也好，《角斗士》也好，剧情都失去了成立的基础。当然电影可以虚构，但如果在一开始就这么虚构的话，那接下来的故事就只能继续虚构下去了。接下来让我们比较历史事实，讨论一下《角斗士》的虚构情节，以及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马西墨斯和他在史实中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之间的差异。

一、罗马时代的史书和编年史都不曾提到过马可· 奥勒留死于他杀。这里边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卡西乌斯· 狄奥的著作。不过即使在这唯一的资料中，作者也只是陈述了人们谣传御医为迎合康茂德而毒死了皇帝。而且这个谣言并不是在马可死后就立刻散布开的，而是在康茂德的弊政暴露无遗，即马可离世10年后才开始流传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纳了这个御医下毒说，毕竟电影可以虚构。实际上马可在最后几年里，身体的衰弱是常年侍奉在他身边的家臣和将军们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皇帝马可也像其他战死沙场的将领一样立一块墓碑，那么碑文恐怕也是“一个为国家安全奉献了一切的人永垂不朽”之类的话。他勉强以老迈之躯一直奋斗到59岁，人生的最后迎来的就是死亡。没有一册史书指出康茂德和马可的死有瓜葛，至于后世的历史书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同样没有一册认为是康茂德杀死了父亲。

二、在电影《角斗士》中有一个场面，皇帝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为当天获胜立下功劳的将军马西墨斯。马可最后表示想让对方取代康茂德，成为皇位继承人。不过在说这番话之前，皇帝询问将军有什么愿望。当时马西墨斯回答，说自己想回到家人身边。尽管这个情节是为了强调主人公的个人性格而安排的，不过在马可· 奥勒留看来，这种回答已经足以说明马西墨斯不适合做皇帝。

在电影中，马西墨斯指挥的是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混编部队，说明这

是个军团。既然是军团，那么光是主力的军团兵就有6000人，再加上辅助兵就可达1万到1.2万人之多。激战之后盼望与家人团聚，这是大家都可能产生的想法。

在罗马军中，军团兵20年、辅助兵25年期满可以退伍，但是将官没有这种制度。虽然可以告老还乡，但罗马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的，并且由于无人接替等原因，一直留在前线的老将也为数不少。至于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更是不能以任何理由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最早本来在希腊人中间兴起，之所以能被罗马时代的精英阶层广泛接受，就是因为这种哲学为罗马的男人们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第一，这种哲理被罗马人接受后形成了法律规范，但对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都各有不同的其他众多民族而言，这种哲理也可以成为一种综合文明。第二，让这种哲理在各个民族间广泛传播是对这种哲理的效用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的任务。罗马的精英认为，这些“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正是自己。

“Stoic”（禁欲的）这个词本来是形容推广斯多葛（Stoa）学派哲学时所追求的一种态度，所以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公务的态度也是“Stoic”。不，至少他们认为这时应该“Stoic”。因而除了事务性人员，罗马的所有国家要职都没有薪酬，人们称这些职位为“光荣的职务”。

但是，以希腊为滥觞的地中海文明却认为“中庸”最重要。所谓中庸，就是指“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禁欲，那么人们就不必为生活如此操劳了。只要直面人性，就能发现那种伟大的“道”不可能存在，所以古希腊人思考的是在两个相反的“道”之间取得平衡。相对于重视公务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则侧重“私务”和内心，认为人“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我们常把伊壁鸠鲁学派翻译为“享乐派”，这恐怕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翻译为“私生活派”比较合适。因为不管怎么

说，这个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认为私生活比公共生活更重要。

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既有坚持斯多葛学派生活方式的人，也的确有少数对立的伊壁鸠鲁学派。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始终反对尤里乌斯· 恺撒的小加图，不过真正贯彻禁欲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其结果难免是思维衰竭。对小加图这种政治家而言，其影响力会下跌，支持者也随之减少。

后者的代表，应该是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阿提库斯（Attica，古希腊以雅典为统治中心的地区，在今希腊东南部。——译者注）是个诨名，此人热爱希腊文化，故而得名。他不分党派，和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终生不曾染指过公务。也可能因为他本身极其富有，所以才能做到这些吧。享乐主义生活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拥有和所有人都保持同等距离的经济能力。

可是罗马人仍旧属于奉行中庸的地中海文明。那么他们是怎样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取得平衡的呢？罗马人把一天的时间分成“工作”（negotium）和“闲暇”（otium）两部分，从黎明到正午是工作，工作结束后到公共浴场去消磨时光，直到晚餐时间，都是闲暇。尽管到了精英阶层，时间很难这么一分为二了，但在他们的意识里，二者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恺撒既是斯多葛派又是伊壁鸠鲁派，因为在面对军事和政治事务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与西塞罗谈论希腊诗歌，或者勾引女人时，他又变成享乐派了。哈德良皇帝也是如此，当他远涉帝国的边境地区视察防卫设施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欣赏希腊文化或者迷恋美貌少年时，他又是享乐派了。马可· 奥勒留也同样把公共生活和私生活截然分开。当他是马可皇帝时，在公务方面坚持斯多葛学派的立场，把哲学思考当成休息，而这个禁欲的皇帝的另一面，我想就是他在

和妻子芙斯汀娜团聚的时候。对罗马的领导者而言，“工作”是他们在响应时代的要求，与此相对，“闲暇”则是他们在满足个人要求，所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既然罗马的领导者在生活上都如此自律，那么在战争就要看见胜利的曙光时，就绝不会允许一位不可多得的武将说出“我要回家”的话来。这对坚持奋战的士兵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马可· 奥勒留也绝对不会指定这样的人为皇位继承人。这时他多半会一声断喝：“你把任务看成什么了？！”即使到了个人主义昂扬的现代，我想这种认识也依然不会改变。

三、在电影《角斗士》中，康茂德用力将父亲按到自己的胸前，结果使皇帝窒息而死。得知皇帝死讯的马西墨斯赶到皇帝的大帐里，只见康茂德站在马可的遗体前，向他伸出了手。亲吻那只手就意味着向新皇帝宣誓效忠，然而马西墨斯看都没看一眼就走出了大帐。

很明显，这种行为就是部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马西墨斯立刻就遭到逮捕，差点被斩首。因为拒绝效忠等于反叛，这并非康茂德无视法律，擅自越权。可是，杀害马西墨斯全家则完全是越权，这也成了沦为角斗士的马西墨斯誓死复仇的理由。罗马人区分暴君与贤君的标准，就看处罚当事人时是否株连其家属。就连马可· 奥勒留处分煽动军团叛乱的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时，对其家属也只是重者流放，轻者只需闭门思过而已。

至于马西墨斯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人物在公元186年当选为执政官。当时康茂德已经在位6年了。一个在边境任职的军团长能够当选为执政官，通常是得到了皇帝的推荐，然后才能在评选中占据优势。

也就是说，在马可· 奥勒留离世6年以后，马克西米亚努斯仍旧担任着前线的司令官。由此可见，当皇帝马可死后，新皇帝康茂德伸出手

时，马克西米亚努斯绝对亲吻过那只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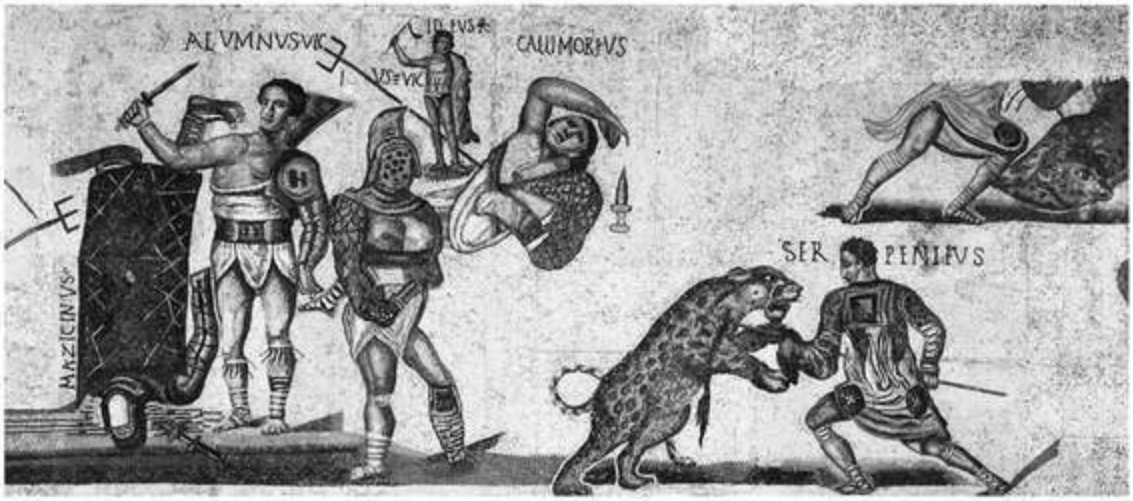
四、大家对马可放弃康茂德的期待之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没有女主人公，那么虚构的电影和小说都会变得很不好办。应这种需求而出场的女主角就是皇帝马可的女儿露西拉。但在历史上，这个女人在父亲离世两年后即公元182年也撒手人寰，故而在公元192年弟弟康茂德遭暗杀时，她早已不在人世。也就是说，她和康茂德的死没有丝毫关联。

五、《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角斗士》这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即皇帝康茂德是在角斗中被杀的。当时人所共知，康茂德的爱好就是和专业角斗士一比高低。然而他最后却不是死于角斗，因为他武艺高超，不论是徒手肉搏还是使用武器，对方都拿他无可奈何。实际上康茂德是在皇宫的浴室里遇害的。

当然，影像也有文章不可比拟的优势，最能发挥这种优势的，就是对战争场面的表现了。因为时代考证做得到位，电影《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相当逼真，这也引起了我很多思考。

首先，片中日耳曼的蛮族和罗马军队都是背对森林，在中间一块好似开辟出来的狭长地带上展开对垒。当时的阵势是蛮族从高处向下冲锋，罗马军队在低处进行迎击。这种战斗方式对罗马方面非常不利。

正如尤里乌斯· 恺撒早就看出的那样，蛮族的强悍之处在于，战斗初期他们能利用人数优势大举进击。而罗马军队的优势则是运用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以及骑兵这三大要素，就像在棋盘上排兵布阵一样，相互配合，充分施展战略战术。罗马军队之所以在开阔的战场上所向无敌，甚至投入敌方数分之一的兵力就可大获全胜，就是因为罗马士兵训练有素，号令统一，司令官也善于施展各种战略战术。


CALUMORIVS
SER
PENIFVS
MAZICINVS

BELLIREFONVS
CVPIDO
AVRIVS
PAM
PINE
IACER

ASTACIVS
ASTACIVS
IACVLATOR
PVRPVREVS
ENTINVS
BACCIBVS
RODAN
ASTIVVS

描绘角斗场面的镶嵌画

既然这样，罗马军队要想发挥自身优势的话，战场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最好是能找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开战，让敌人从高处向下冲锋绝对是大忌。当然很多时候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不得已只好就地迎战。然而从电影中的场景看，双方似乎都是排好战阵进行会战的模样。

我在电影院第一次观赏这部电影时，以为导演、编剧以及历史顾问都没能理解罗马军队的战法。可是后来，我为撰写本书买来DVD在家里反复观看之后，我又改变了看法。我甚至推测，由马可· 奥勒留所领导的日耳曼战争，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所进行的恐怕都是类似这种阵势的战斗。

从地势上看，战场的选择就很糟糕，而战斗方式也是混战，并且不是部分战场在混战，而是整个战场都在进行混战。对罗马军队而言，混战是最不利于发挥自身力量的状态。因为在混战中，指挥官发出的命令无法及时下达。

如果在战场的某一区域发生混战或者肉搏战，那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通常的战斗状态肯定就是那样的。“gladiator”（角斗士、剑士）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gladi.tor”，意思是手执一种叫做“gladius”的双刃短剑进行格斗的人。这种武器最早在西班牙的原住民中间使用，因为适合于步兵的近战，所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要人物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将其作为“剑”引入罗马军队。中世纪骑士的剑是长剑，适合“砍杀”，而古罗马的这种“gladius”则是一种“刺杀”剑。既然罗马军队指定这种剑为常用兵器，可见近战也是罗马军团很擅长的战法。

可是近战并不是混战。近战指以小队、中队或大队为单位进行战斗，而混战则容易变成与敌军一对一的搏斗。日耳曼人身材高大，膂力惊人，就连恺撒麾下的士兵都对他们望而生畏。罗马的将军们不得不在战略战术上刻苦钻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弥补本军士兵在这一点上的缺陷。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如果一场战斗以混战为开端简直是荒谬绝伦。

而名将所指挥的战斗，从始至终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并不是这些司令官在寻求自我满足，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即揣摩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于是战斗自然而然地就如同画卷一样漂亮地展开。这种战斗比较常见的是围歼战，因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尽早结束战争。

与此相对，一旦整个战场都陷入混战，那么即使最后获胜，充其量也只是击退敌军，却不能给其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败退的敌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始终存在。蛮族有一个特点和罗马军团截然不同。在罗马军中，如果指挥官阵亡，马上会有副官代为指挥，可是蛮族的首领一旦被杀，他的部下立刻四散奔逃。这时如果死去的是部族首领，那么整个部族并不会投降，而是同时逃得不见踪影。结果一场战斗的胜利根本影响不到整个战争，战争状态还是无法终结。

我想，不论电影的制作方是否有此意图，《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或许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不也正是一些没有内在联系的混战吗？日耳曼战争的目的是征服后世的捷克地区，将其划为行省，可是后来战争变得拖沓冗长，而其始终无法结束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

图拉真皇帝征服比这大两倍的达契亚地区，战争分两个阶段进行，耗时合计两年，最终大功告成。尤里乌斯· 恺撒发动高卢战争，历时7年，但如果把划入意大利本土的卢比孔河以北地区也算进去的话，恺撒的战场面积要比日耳曼战争大10倍。这就是“恺撒创建欧洲”一说的由来。而且到第8年，整个高卢战争的善后处理工作就都已完毕，因此可以说，恺撒用了8年时间把一个行省化完备的高卢送给了罗马。而马可·奥勒留即使减去平定卡西乌斯叛乱的中断时间，他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持续了10年，并且直到他离世，这场战争仍旧没有终结。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同时也是最高负责人，我们只能指责他欠缺军事战略方面的能力。如果领导者能力欠佳，他所领导的组织肯定会发生力量损耗。

即便像我这样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不曾指挥过他人，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的人，都能想到这些。在这两部电影中都有康茂德从罗马赶往前线的场面，实际上，他从公元178年开始就一直和父亲马可一起处于多瑙河前线了。尽管从18岁到19岁还不够两年时间，但作为共治皇帝，他的确曾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日耳曼战争。

如果说，这个康茂德看到了父亲马可的战略思想以及罗马军队真实的战斗场面，内心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并且纵然他内心不以为然，可他是否有能力改变或者怎样改变，就又是另外的问题了。如果康茂德知道父亲的做法不妥而他自己又和父亲一样无能为力的话，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战争结束

焚烧皇帝马可·奥勒留遗体的火焰渐渐熄灭，“expedition Germaniasecunda”（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是因为继位的皇帝康茂德宣布战争结束了。但是将军们，尤其以先帝马可的左膀右臂、年轻皇帝的姐夫庞培亚努斯等人为首，似乎极力主张把战争进行下去。他们认为，再有一年，至多两年，战争的预期目标就可以达成。

因为在火葬结束两天后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如果新皇帝结束战争的主张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话，那么康茂德4月就可以回到首都，最迟也不会超过6月。然而实际上，当康茂德回到首都时，已经是10月下旬了。康茂德当然想尽快回到首都，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是有人拖住了他的脚步。

将军们看到新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于是转而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如果保持目前的攻势，然后在此基础上讲和，罗马就可以抛出类

似城下之盟那样的和约。这种和约条款肯定会把各项苛刻条件都罗列进去，比如提供人质担保、支付战争赔偿、解散武装，以及在没有得到罗马允许的条件下，即使是自卫也不能行使交战权等等。“军人”是战争专家，军人主张既然开战就要坚持到底，如果开战却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那还不如当初就不开战。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战争却是“文官”在主导。文官并非战争专家，却往往受到舆论的压力，匆忙开战，或者无法承受舆论的打击，草率停战。也就是说，多数文官都对“拖延”这种战争最大的“恶”缺乏理解。从这个角度讲，康茂德就是这种文官，而且在他这个“文官”的头脑里，唯有停止战争的想法，没有其他。

毫无疑问，在这个年轻的皇帝面前，将军们都面临着一种矛盾。

他们在马可临终的时候，都曾发誓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同时他们也发誓要协助康茂德，避免内战的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违逆新皇帝的旨意继续战争的话，就违背了协助新皇帝的誓言。可是，对罗马的男人们而言，违背誓言，哪怕没有誓约书仅仅是对口头发誓的违背，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行为。

罗马人是“法之民”，而且他们认为，如果指望用法律来规范人类社会的话，那必须从法律关照不到的地方开始做起，这样才能成为法治民族。即只有把不合理的地方也纳入视野，合理的追求才会成为可能。他们讲求法治的同时，却又重视人情和裙带关系，原因也在这里。到了战场上，这种思考方式就变成了利用辅助兵力协助主力、后勤补给的兵站必不可少等指导思想。这些罗马人认为，纵然是口头誓约，也和书面契约拥有同样的效力，因为二者的基础“信义”都是一致的。

罗马人是能将任何东西都神化的民族。他们供奉的神明，不仅包括逝去的皇帝和败者的神明，而且还把道德这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也予以神化。例如调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协和女神”（Concordia），还有“信义之神”（Fides），都在此列。

临终的马可并没有要求将军们签署书面誓约，而是要求将军们以“信义”为基础遵守誓言，而将军们也都答应了。

可是，将军们立下辅佐康茂德的第一项誓约，是熟知罗马法的马可和将军们个人之间的约定，而把战争进行下去的第二项誓约，则是一位皇帝和他的部下之间的约定，这二者是不一样的。总之，第一项誓约即使某一方死去也仍然有效，而第二项誓约，既然皇帝已经更换，那么誓言是否履行则要看新皇帝本人的意见了。

罗马将士效忠的对象，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作为一种礼仪每年都要举行。在罗马帝国，每年1月1日，所有的军团基地都举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

将军们当然也有向新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的义务，而康茂德又执意结束战争，于是将军们为了恪守面对马可立下的第一项誓言，不得不违背第二项誓言。

有的学者批评说，此时将军们已经开始向新的掌权者卑躬屈膝了。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康茂德在位时间达12年，如果观察各路将军们在此期间的行动，也不能说他们紧随马可离世而发生的“转变”只是单纯地服从新皇帝。并且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作战会议有个特色，即皇帝和部下之间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想必在马可死后，这种特色还是会继续延续。然而从结果看，将军们还是没有拗过皇帝。非常可惜，没有一部史书记载了当时4个多月的时间里作战会议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什么人都说了什么话。

面对着一个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战争为何物的年轻“文官”，将军们只能服从。唯一值得众人庆幸的是，康茂德在和蛮族草草媾和之后，把多瑙河防线完全委托给了将军们，而他自己则匆匆赶回罗马。防守还在将军们的权限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防守环境却比以前恶化了。造成恶化的原因，还在于与蛮族的媾和条款。

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各蛮族已经走投无路，也是命不该绝，这时罗马方面突然释放出讲和的消息。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根据长年与罗马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能略微探察出罗马此时讲和的原因，结果被抓住弱点的反而是罗马方面。

罗马同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签署了和约，蛮族方面的义务条款为：

一、立即遣返逃兵与俘虏。

二、每年向罗马方面提供小麦，代替进贡。

三、有权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贸易，但是每月仅限一次，而且地点仅限于罗马方面允许的都市，在百人队队长和属下士兵的监视下进行。

四、对于从后面威胁“近蛮族”的“远蛮族”，允许他们移居1.2万人到达契亚行省内。各族不许与这些移民发生争斗。

五、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担负向罗马军队提供1.3万名士兵的义务。

六、沿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宽的无人地带。罗马方面设置于此的要塞及监视塔予以拆除，而蛮族的牧人和家畜也严禁进入该区域。

这的确不像城下之盟。由于罗马比较着急，没能仔细考虑如何能对己方更加有利就签署了。这与以往罗马为暂时休战而与蛮族签署的协定并无二致。

并且，和约的第二条一次都没实施过就已经化成了泡影。这项要求原本代替战争赔偿，或许可以为罗马保住些颜面。康茂德甚至没有要求明确小麦的数量、提供时间、持续时期等。蛮族还没有愚蠢到那种地

步，竟然去履行连对方都不坚持的要求。

至于第五条，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向罗马提供1.3万名士兵，合计2.6万名日耳曼士兵，很多现代罗马史学者批判这一条款，认为这开创了罗马军队混编蛮族的先例。

我对这种观点还是不能同意。无论称他们为蛮族也好，还是称他们为异族也好，罗马军队收编他们的做法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如果当时未把努米底亚的骑兵纳入，罗马军队就不可能在扎马会战中获胜。尤里乌斯· 恺撒也毫不犹豫地在刚刚征服的地区募兵，就连进行高卢战争时，恺撒军中的骑兵也有很多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图拉真记功柱堪称达契亚战争的战记，遍布其上的浮雕也表现出了罗马军队的多民族性。其中有身着及踝长裙的东方弓弩兵，有轻装上阵的毛里塔尼亚骑兵，有上身赤裸的日耳曼步兵，还有全身包裹着鱼鳞状铠甲的萨尔马提亚骑兵，他们和罗马军队的主力军团兵、辅助战力的行省兵一起参加战斗。

而电影《角斗士》主角的原型瓦莱利乌斯· 马克西米亚努斯出身于潘诺尼亚行省，很明显是日耳曼后裔。这名罗马武将体内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却在对日耳曼人的作战中战果累累，功勋卓著，后来一直升至执政官。

问题不在于罗马军队是否可以收编异族，而在于这些被收编的异族是否认为自己是留在罗马的异类，或者他们已经融入罗马社会，认为整个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自己已经是罗马公民中的一员。至于前线的基地，问题就在于他们能否作为罗马军中的一员服从军规，并与同一民族的敌人作战。

公元2世纪末的这一时期，罗马军队还是具有这种风纪和吸引力

的。第一，以叙利亚行省出身的庞培亚努斯为首，多瑙河防线上的异族将军为数不少。不，甚至可以说他们比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人还多。第二，基地附近的居民本来就以日耳曼裔为主。第三，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田地荒芜，无论是耕种还是放牧，都很难取得从前那么多收获了。也就是说，蛮族的男子及其家庭失去了赖以维生的手段。而这次媾和，这些男人可以在罗马军中服役，也得到了一个获取收入的门路。总之，罗马通过提供职业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糊口，使2.6万名随时可能入侵罗马的危险分子变成了稳健派。

“60年的和平”

其实我们不必等待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康茂德非常糟糕了，他们指出，对帝国而言，康茂德这个皇帝简直就是灾难。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比康茂德年长6岁，可谓同代人，他也早就开始谴责康茂德了。

其主要理由，就是康茂德在父亲马可死后立即与蛮族议和，后来与皇帝关系恶化的元老院认为，这是一次屈辱的媾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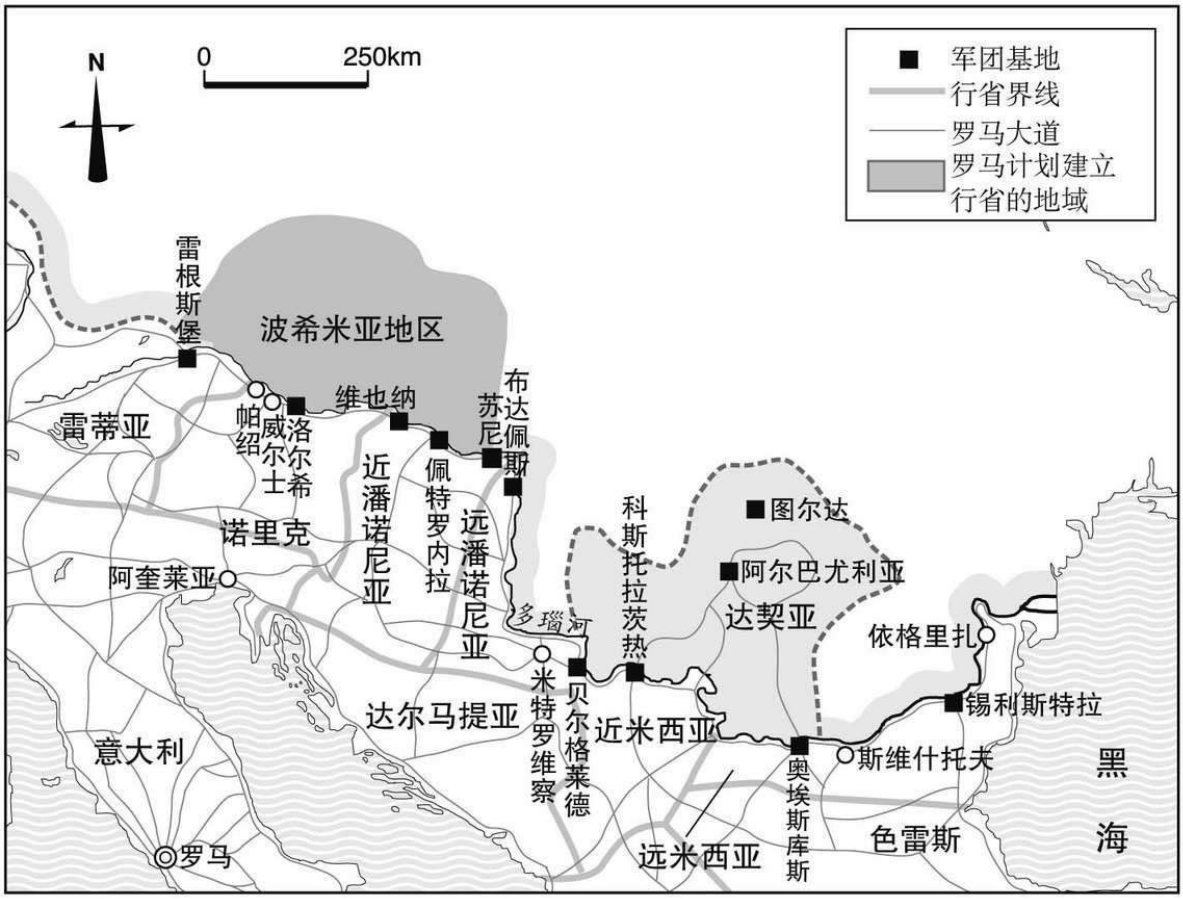
康茂德名声不佳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媾和使得波希米亚地区行省化的流产。

然而，康茂德难道真的错了吗？

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建立行省，为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发挥了长久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达契亚即后世的罗马尼亚地区即使成为了行省，也并不意味着部署在多瑙河下游的军团可以撤防。在辛基杜卢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维米纳切姆（今科斯托拉茨热）和今天保加利亚的奥埃斯库斯（斯维什托夫）三地仍然分别驻扎着一个军团，这种布防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达契亚地区充其量只是从多

瑙河天险凸显出去的桥头堡，而罗马帝国真正的北方防线仍然是多瑙河。当北方蛮族南侵时，第一道防线是达契亚，达契亚被突破后还有多瑙河，这是一个双重的防御体系。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罗马在多瑙河下游南岸部署了3个军团，加上驻扎在达契亚行省内的2个军团，共计5个军团。其主力军团兵就达到了3万人，如果把辅助兵也计算进来的话，就接近了6万人。由此可见，即使达契亚并入了罗马版图，可是在防卫上仍然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资金。

即使像马可· 奥勒留当初计划的那样，罗马真的把覆盖了现在奥地利北部、从捷克到斯洛伐克地区的波希米亚全部征服，悉数划为行省，那么在多瑙河中游流域，由这些行省（马可当初计划建立两个行省）和南流的多瑙河构成的双重防御体系，也仍旧不会脱离达契亚的窠臼。也就是说，在多瑙河沿岸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农图姆（今佩特罗内拉）、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阿昆库姆（布达佩斯）部署的4个军团依然保持不变，而在两个新行省还要各部署一个军团。这样，为建立双重防御体系而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就由4个军团变为6个军团。如果多瑙河中游的军备也要这么增加的话，罗马能够承受这种负担吗？何况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御力量已经从28个军团增加到了30个军团，而现在还要继续增加2个新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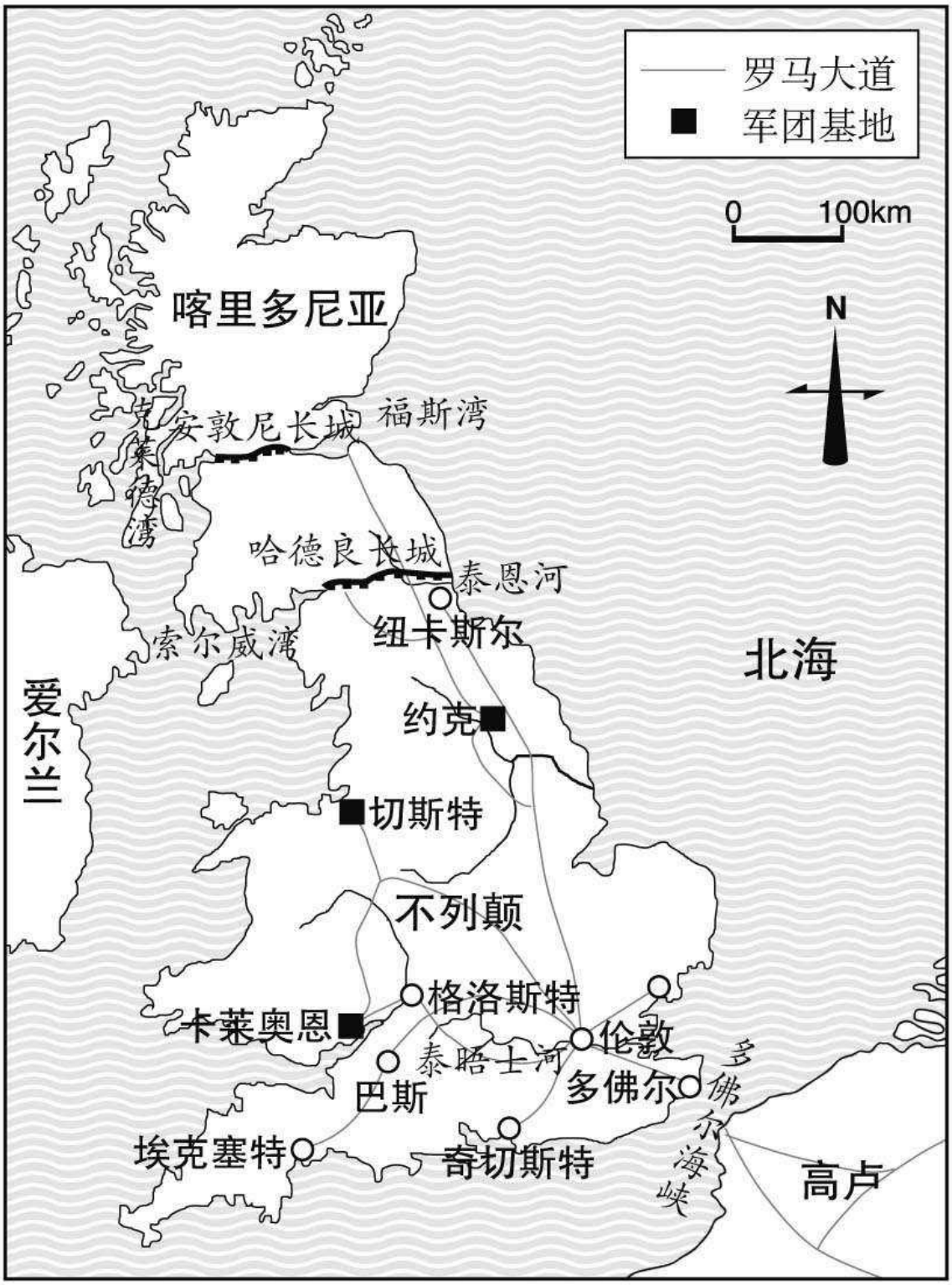


多瑙河防线

进行军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费资金。虽然当地人愿意为此纳税，但罗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桥，建设城镇，此外加上军团基地的消耗，的确对国库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不列颠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地除了盛产锡以外以农牧业为主，属于帝国的贫困地区。尽管当地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罗马还是在这里驻有3个军团，就是为了高卢的稳定。尤里乌斯·恺撒是最早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大员，他在《高卢战记》中写道，自己之所以远征不列颠，就是为了切断高卢的反罗马分子的后路。到了帝政时代，高卢变得非常稳定，是学习罗马的模范学生。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丝毫下降。因为罗马不再试图征服苏格兰（罗马时

代称为喀里多尼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渡过北海的入侵者绵绵不绝，喀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弱肉强食之地，为了防止这些人南侵，罗马只好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分别在卡莱奥恩、约克和切斯特各驻扎一个军团。


罗马大道
军团基地
0
100km
N
喀里多尼亚
克莱德湾
安敦尼长城
福斯湾
哈德良长城
泰恩河
纽卡斯尔
索尔威湾
北海
爱尔兰
约克
切斯特
不列颠
格洛斯特
卡莱奥恩
伦敦
泰晤士河
巴斯
多佛尔
多佛尔海峡
埃克塞特
奇切斯特
高卢

2世纪后半期的不列颠

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以恺撒渡过多佛尔海峡为开端。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是很遗憾，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只不过是一个稳定高卢的存在而已。《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同化被征服者，在人才选拔方面，罗马一直敞开着大门。可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没有出过一个元老院议员，也没有一个行省总督或军团长。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培养人才的基础，当然不可能人才辈出。

行省化的达契亚也没有出现过以帝国兴盛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亚成为行省，可以想象结果会大抵如此。虽然此地十分辽阔，但对罗马而言，至多也不过是桥头堡而已。既然这样，战略的制订实施就不能被征服欲所左右，而是应该在冷静的分析之后作出判断。我认为，在公元2世纪末期，终结持续了10年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的时候，康茂德没有把蛮族逼迫成困兽，而是以温和的条件达成和解，放弃了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行省的计划，对罗马而言，他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支持率下跌，而罗马皇帝居然从正在进攻的地方撤退，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壮志，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时代，帝国的防线则退回到了莱茵河。不知元老院给予了提比略怎样的谴责。而图拉真皇帝曾征服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攻到了底格里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弃了上述地区，将罗马的防线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为此除掉了意见相左的图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于常年出巡在外的哈德良皇帝始终态度冷淡。

直到公元19世纪，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绝大多数是提比略皇帝所修建，才开始重新评价这位皇帝。现在我们知道，提比略从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多瑙河防线夯实防卫基础。

哈德良皇帝在整个帝国四处巡视，这种功绩更早地为人所理解。自从帝国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人们才开始理解为罗马防卫奉献终身的哈德良皇帝。马可· 奥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同时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于哈德良一百余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非常赞赏哈德良的功绩。

尽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安敦尼· 庇护以及年轻的马可都没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广施仁政，那么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边境去视察军事基地。

本来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态度冷淡，连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还一意孤行，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这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负面评价具有免疫力，两个人都四五十岁，正是不易为他人所左右的成熟年龄。

而这时康茂德才19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强韧的精神。他之所以放弃行省化，结束战争，当然只是因为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其实如果他内心愿意遵从父亲继续战争的遗言，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实施，然后自己返回罗马。是否亲自参战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事情，而并不是法律有所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仍然固执地结束战争，可能就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已经厌烦。总之，与敌对的马尔科曼尼和夸地两个部族媾和以后，罗马军队从多瑙河北岸7.5公里宽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次成为最前沿的基地。这就是罗马人所说的“屈辱的媾和”的结局。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康茂德此举的出发点，只是单纯观察他这一决定给罗马带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出人意料的。

吉本对哲学家皇帝马可赞赏有加，也因此对康茂德评价很低。而与

此相反，德国至今仍然享有盛誉的罗马史作者、学者蒙森却认为康茂德此时的决定为罗马换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修养身心。的确，从公元180年到240年，罗马在多瑙河流域没有进行过激烈战争，在这60年里之所以实现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几个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一、虽然被指责为“屈辱的媾和”，但公元180年所缔结的和约却使罗马和被称为“近蛮族”的马尔科曼尼等部族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

二、马可· 奥勒留通过10多年的战争，使多瑙河北岸的马尔科曼尼人元气大伤，一时难以重新发起挑衅。虽然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看，还是某一方占据优势时更容易达成妥协。

三、驻守在多瑙河畔的武将们对马可· 奥勒留深怀崇敬之情，他们愿意恪守对先帝的誓约。连后来成为潘诺尼亚行省总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都为马可所倾倒。

四、马可· 奥勒留在位期间几乎全都在和帕提亚以及日耳曼人作战，可以说是个很不幸运的皇帝。然而，20年征战的结果，使罗马军队恢复了实战能力。不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能力，只要不去磨炼，很快就会退化，只是这一特性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罗马军队，尤其是驻扎在多瑙河畔的将士极为强悍，这也使得蛮族不敢轻举妄动。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20年的实战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威慑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康茂德其人

可是，我为康茂德也只能辩护这些了，在其后的11年中，即从20岁到31岁之间，身为帝国统治者的他尸位素餐，一事无成。

如果他能抽出几年时间学学哈德良皇帝就好了。父亲马可在成为皇帝之前，不但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甚至连意大利北部都没去过，但是康茂德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父亲，踏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希腊，还曾以共治皇帝的身份巡访多瑙河防线。就帝国的行省经历而言，康茂德在登基以前就已相当丰富。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帝国的最高负责人在行省和边境“露脸”的重要性，仅从这一点上看，他就无法成为哈德良。不过，就算他理解视察的重要性，就当时的罗马形势而言，他也很难具体施行。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哈德良皇帝为什么在同代人中间声誉不高。这就像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可是皇帝却总是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洪水作准备。他离开首都，到帝国各地去加强堤防。当时无论是沉溺于观赏角斗士比赛和四马战车比赛的平民，还是忙于主持会议的元老院议员，当皇帝始终缺席的时候，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而安敦尼· 庇护皇帝的形象就相当不错，因为他和哈德良的施政方式恰好相反。如同塔西佗和卡西乌斯· 狄奥一样，生活在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们都用“记录历史”这种方式对各位皇帝加以评价，这就是当时的“媒体”，而拥挤在罗马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里的公民们，则代表着当时的“舆论”。

康茂德年纪尚轻，谈不上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又不具备面对非议毫不动摇的坚强性格，所以他选择留在首都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今天，很多总统和首相不也在电视或报刊上频频露面以提升人气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媒体的好感，提高支持率。另外，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线经常被蛮族攻破，以至于马可不得不赶往战场，可是在他的儿子康茂德主政的12年里，边境上却没有发生过能令皇帝亲自出马的战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的不公，然而如果考虑到安敦尼· 庇护时代23年间都在和平中度过，那么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帕提亚军以及北方蛮族的入侵显然就是一种反弹。不过，在康茂德时代，台伯河水

也不曾泛滥，风调雨顺，没有出现过饥荒，更没有远征东方带回瘟疫，我们只能说，康茂德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屈辱的媾和”后的康茂德还都罗马，民众的情绪出人意料地平稳，可以说不冷不热。罗马公民们毕竟已经承受了20年的战争压力，国库的负担也已经到了极限。虽然被动防守也要出人出钱，但战争一起花费会更大。康茂德主政期间，虽然没有实施过什么像样的政策，但国家财政得以维持，原因就在于没有战争。

一旦恢复和平，罗马帝国的经济依然强劲，人们也能安心享受富裕的生活。当罗马终止了举国战争，就连远离边境的安全地带的人们也都变得心态平和了。尽管康茂德被认为是昏君，但和口碑良好的图拉真以及马可· 奥勒留相比，当时罗马竟然没有发生过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甚至在盛行反基督教的里昂，都有基督教徒说：“近来能安心生活了。”这是因为民心日趋安定，再加上康茂德与父亲马可不同，没有把基督教徒视为罗马社会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的哲理有所领悟，而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而已。据说，康茂不喜欢他的妻子克丽丝庇娜，因此身边时常会有情妇，但在他的情妇之中却有一个是基督徒。

康茂德的统治就是在这种和平的气氛中展开的。父亲马可给儿子留下了一班忠诚且拥有责任感的将军，同时还留下了一大群富有才能的行政官员。

不管康茂德有没有意识到巡察边境激励士兵的重要性，或者就算他意识到了却不肯付诸行动，这些都无所谓，反正他已经作为帝国的最高负责人开始实施统治了。虽然他爱好竞技胜过爱好学习，但对罗马的平民而言，这并不是负面因素。要知道，曾经有人批评过马可· 奥勒留伪善，而热衷于竞技的年轻皇帝自然与这种批评沾不上边。

然而，到了公元182年，也就是康茂德即位刚刚两年的时候，发生

了一起令他性格大变的事件。有人阴谋暗杀皇帝，而且还是一桩家庭伦理悲剧，其主谋就是皇帝的姐姐。

姐姐露西拉

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共生有14个子女，但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儿子康茂德和5个女儿。在5个女儿之中，露西拉实际上相当于长女。她出生于公元150年，比康茂德大1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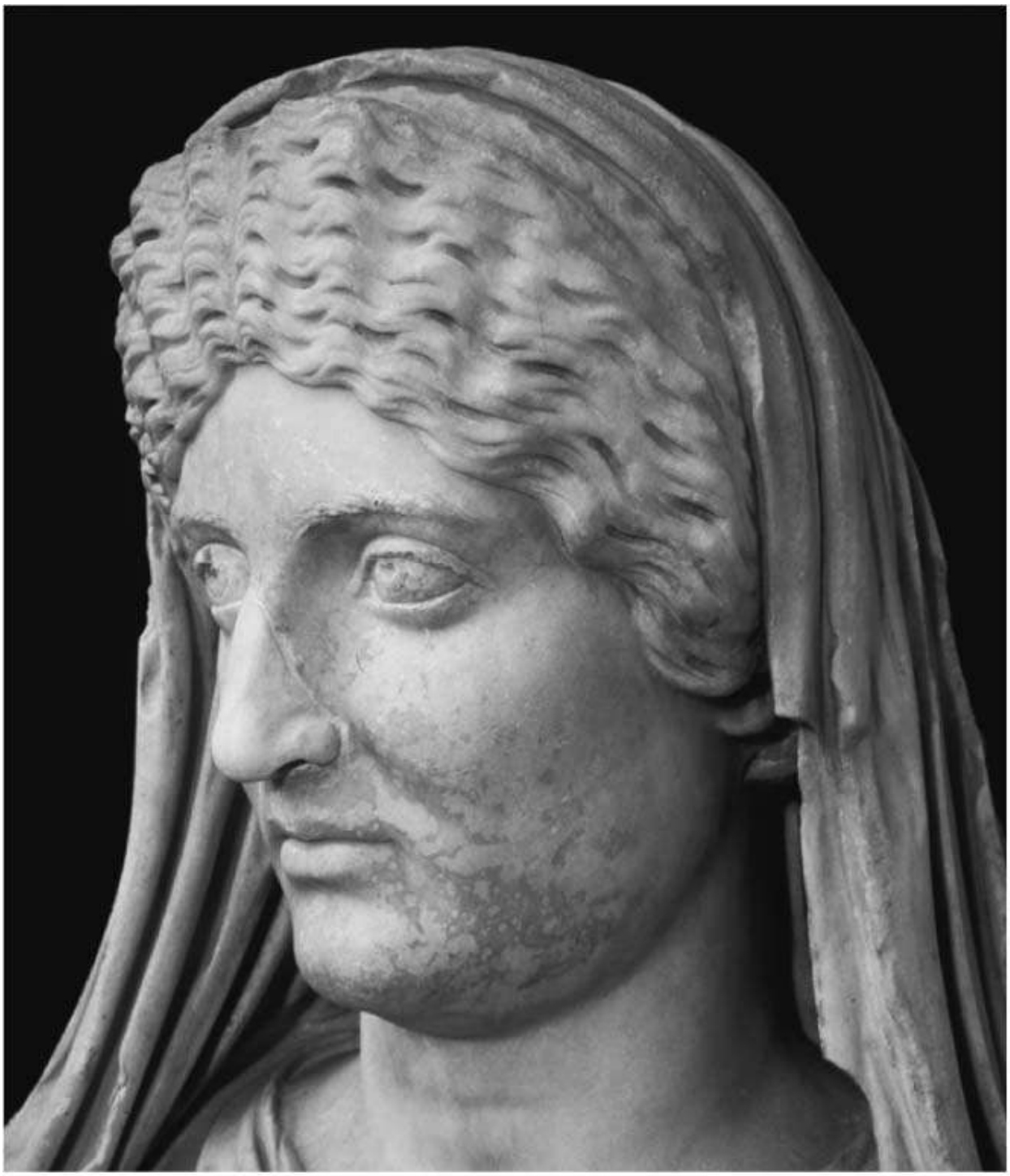
康茂德生于马可登基那一年，而露西拉则是父亲成为安敦尼· 庇护事实上的共治皇帝3年后出生的，露西拉11岁时，马可即位，露西拉自然成了公主。也就是说，自从出生之日开始，露西拉就一直生活在皇宫里。到了14岁，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路奇乌斯· 维鲁斯。因为路奇乌斯也是共治皇帝，露西拉实际上成了皇妃。不仅如此，父亲马可为了庆祝他们结婚，赋予了露西拉“奥古斯塔”（皇后）的尊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马可· 奥勒留之后，将由年轻10岁的路奇乌斯继位，而他的妻子露西拉当然是下任皇后了，因此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5年之后，路奇乌斯· 维鲁斯竟然死了。露西拉和他前后共生有3个孩子，其中两个降生不久即告夭折，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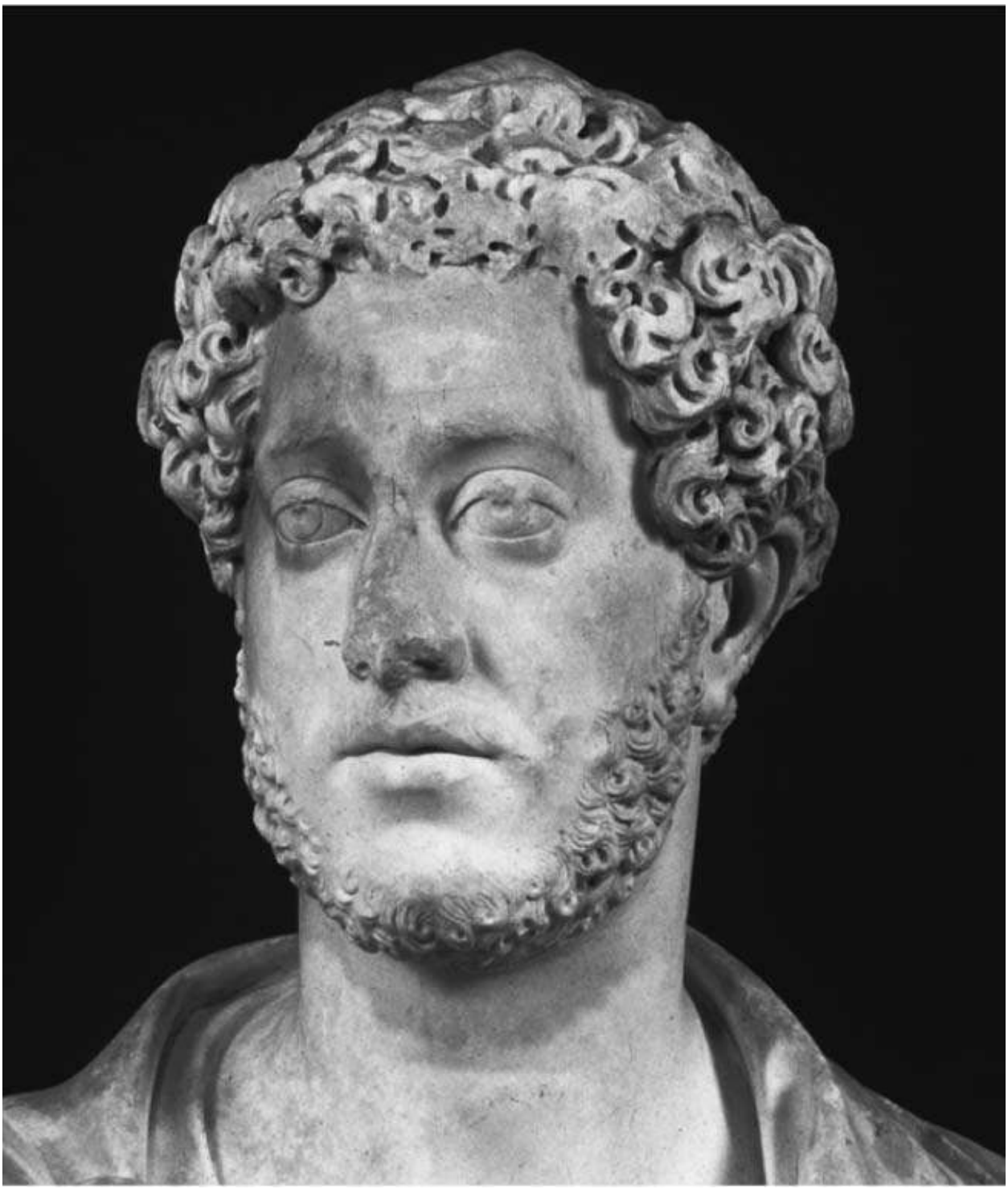
露西拉就这样成了寡妇，当时她还不到19岁，而半年以后，父亲马可在她丧期未满时就急急忙忙地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爱将庞培亚努斯。露西拉虽然遵从了父命，然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庞培亚努斯这个人虽然是极其优秀忠诚的武将，是马可的左膀右臂，却来自行省，出身卑微，自己贵为公主，并且还是共治皇帝的妃子，为什么一定要做低微的行省总督的妻子呢？开始时母亲芙斯汀娜也站在女儿一边，所以哲学

家皇帝要说服母女二人绝非易事。最后的结果是，露西拉以后仍旧保持“奥古斯塔”（皇后）的地位和称号，才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尽管如此，露西拉还是对丈夫庞培亚努斯抱有轻蔑的态度。而自从母亲在小亚细亚去世以后，露西拉成了罗马唯一的“奥古斯塔”，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夫人，因为后来和弟弟康茂德结婚的克丽丝庇娜虽然是共治皇帝的皇妃，却还没有获颁“奥古斯塔”的尊称。在电影《角斗士》中，主人公马西墨斯称呼虽然年长却同为将军的庞培亚努斯的妻子为“Your Majesty”（皇后陛下），古罗马人此时居然说出英语来，多少令人有些哭笑不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应该使用拉丁语“Augusta”（奥古斯塔）这个词。

自从父亲马可离世，弟弟康茂德成了唯一的皇帝以后，露西拉虽然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变化，可她仍旧是唯一的“奥古斯塔”。然而两年后，即公元182年，坊间出现了皇妃克丽丝庇娜怀孕的传闻。尽管这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但在露西拉听来十分刺耳。



露西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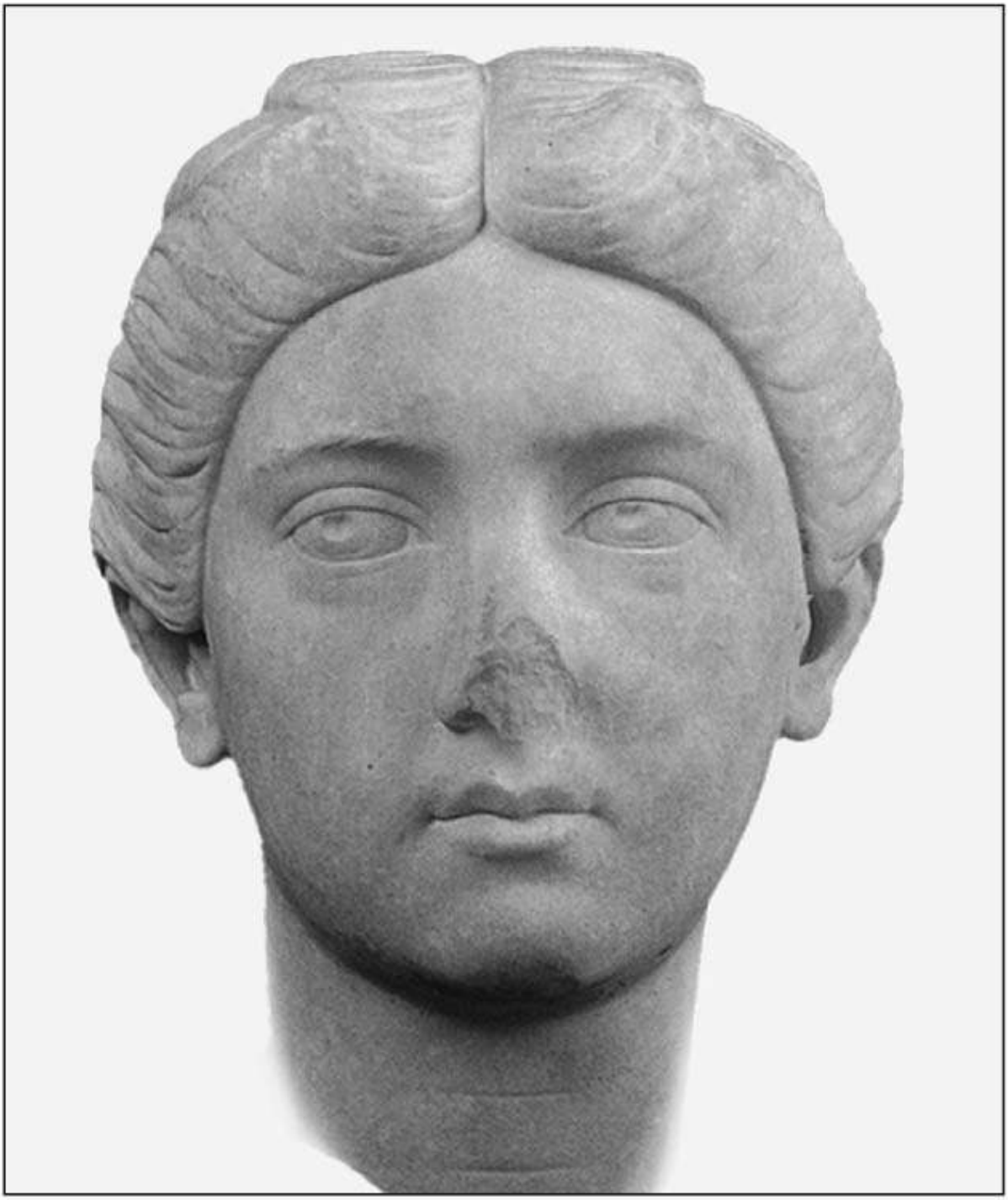


康茂德

相比于元老院大员的女儿克丽丝庇娜，露西拉的外祖父则是先帝的先帝安敦尼·庇护，父亲是上任皇帝马可·奥勒留，并且她的前夫路奇乌

斯· 维鲁斯的亲生父亲埃里乌斯· 恺撒曾被哈德良皇帝指定为继承人，也和马可一起同为安敦尼· 庇护的养子，后来又是马可的共治皇帝。很多富贵人家的女子极其重视这些东西，因为除了血统之外她们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可以说露西拉也是这种执著女性的代表，在她看来，克丽丝庇娜只是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女儿，如果也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是不可接受的。就像露西拉的母亲芙斯汀娜一样，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往往就是获颁这一称号的契机。克丽丝庇娜还不到20岁，如果真的生了小孩，她也很可能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只是皇帝部下的妻子，皇帝的姐姐之一，却头罩“奥古斯塔”的光环，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力量，怎么看都有些夸张。32岁的露西拉恼怒之下，想出了一个愚蠢的办法，就是杀掉能够颁发“奥古斯塔”尊称的皇帝。



克丽丝庇娜

马可·　奥勒留临终时，曾经要求手下的将军们协助康茂德治理国家，其实他更应该要求露西拉发誓像母亲一样协助弟弟。在《沉思录》

中，马可曾写到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这位哲学家皇帝从不拈花惹草，坚持一夫一妻，相信多子多福，毫无疑问，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姐姐会去杀害弟弟。他所深深迷恋的哲学或许能教导他应该怎样正确地生活，却没有告诉他在人类社会里，不但有崇高的行为，也有卑劣的暗算。只有历史才会讲述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如此看来，马可· 奥勒留所热衷的学问是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历史。

如果一个人始终在追求正确的人生，可是其子女之间上演着家庭内部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阴谋

暗杀皇帝的阴谋，或许因为是露西拉所主导，计划显得相当毛糙。

既然要杀死皇帝，那么必须事先考虑好由谁来继位。庞培亚努斯是露西拉的丈夫，因而算是比较恰当的人选，但露西拉讨厌自己的丈夫。并且在康茂德返回首都以后，庞培亚努斯成为多瑙河防线的最高负责人，此时他正在前线忙于保卫国家，培养新人。其实就算他身在首都，也不可能违背对先帝马可立下的誓约。庞培亚努斯从始至终都和暗杀计划毫无关系。

最后，露西拉选择了马库斯· 渥米狄乌斯· 库瓦特拉托斯。这个人是马可过世的妹妹安妮亚的儿子，和露西拉算是表兄妹关系。虽然生年不详，可是此人在公元167年曾就任执政官，所以在酝酿阴谋的这一年大概在四十五六岁。然而他的军旅经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只不过是一位享受着罗马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

我们不知道露西拉究竟是怎样说服此人的。或许露西拉可能用暗杀成功后自己与庞培亚努斯离婚然后嫁给他为诱饵。露西拉虽然面容坚毅，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女。

具体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昆提亚努斯，他是丈夫庞培亚努斯的外甥，身体强健，武艺高强，年轻而不善思考。

行动地点的选择也很草率。他们计划埋伏在希腊音乐剧的剧场出口，等康茂德散场出来时动手。可是皇帝当然不会独自出行，何况年轻的康茂德身边总是簇拥着很多和他年龄相仿的追随者。

尽管如此，刺客还是成功地接近了皇帝。那一时期的康茂德还以为自己深受民众爱戴，又是在演出刚刚散场的时候，因而没有过多防备。事情坏在刺客拔出剑后喊了一句多余的口号："以元老院的名义！"实际上元老院和这起暗杀阴谋没什么关系，但元老院和公民一样，都是罗马帝国的主权拥有者。在罗马，"以元老院的名义"这句话是人们打倒暴君时的经常性用语，然而这句口号也等于向康茂德发出预警，还没等刺客挥剑，人们就已经将其拿下。

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而言，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靶心当然会恐惧，可是审讯刺客之后呈现出来的事实更令人心惊肉跳。主谋居然是露西拉，五姐妹中年龄最长，头脑聪慧，性格坚强，母亲在世时就获得了"奥古斯塔"的尊称，而其本人的言行也与此尊称完全相称。而且在康茂德看来，露西拉还不仅仅只是五姐妹中的一个。康茂德似乎总是对性格坚强的女子很倾心，自从14岁时母亲过世以后，年长11岁的姐姐就成了她最为信赖的亲人。

刺客昆提亚努斯很快被处以斩首，阴谋计划中的继任者库瓦特拉托斯也被判死刑。服侍这两人的两个奴隶也被当做同谋处死。

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地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通往穆尔维大桥

露西拉被判流放卡普里岛，不久之后就被杀害在岛上，遗体也不许

葬在皇家墓地哈德良陵园。

这起失败的阴谋使21岁的康茂德皇帝彻底成了猜忌的俘虏，他本与“暴君”一词无缘，可是从此却变成了真正的暴君。

实行帝政之后的罗马，创设了近卫军团，大约有1万兵力，驻扎在距离首都不远的近卫军团基地。这个地方与现在的罗马大学相邻，不知为什么，到了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座军营。因为皇帝有自己的贴身卫队，所以近卫军团的任务就是维持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的治安。出于近卫军的性质，在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他们也跟随皇帝到前线作战。这支部队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一直部署在前线，到了康茂德时代才返回首都。

根据传统，这个近卫军团的“长官”由两个人担任。其中一人名叫帕提鲁诺，他早在先帝马可时代末期就担任此职，是希腊裔的罗马人，长期跟随在皇帝马可身边，深受信赖，才能卓越，起着办公厅主任的作用。和蛮族所进行外交谈判也由他一手负责。后来这个帕提鲁诺被皇帝马可任命为近卫军团长官，直到皇帝离世他依然担任此职，也是马可·奥勒留临终托付的武将之一。在康茂德继位后，他仍旧信守曾经的誓约，辅佐新主，恪尽职守，保卫国家。

疑神疑鬼的康茂德把目光停留在了帕提鲁诺身上。他认定对方了解暗杀阴谋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本来是毫无根据的猜忌，但帕提鲁诺的命运却因此而改变。他首先被撤职，不久以后就在一次伪装的事故中遭到杀害。

受到怀疑的不只帕提鲁诺一人。从公元182年开始到183年的一年时间里，因知情不举的罪名而受到处罚的人达6名之多。他们都是元老院的议员，而且全都是担任过执政官的要员。其中4人被判死刑，其余2人被判流放。

另外，还有2名元老院议员受到牵连。他们就是先帝马可帐下的军团长昆提里乌斯兄弟。哥哥娶了马可的一个女儿，也因此成为康茂德的姐夫。千钧一发之际，驻扎在叙利亚的弟弟成功逃脱，哥哥因为身在首都，不幸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

现在离开罗马，沿古代阿皮亚大道前行，不久就能看到一处壮观的别墅遗迹。这家别墅的主人虽然可以从高架水道桥引水，可是又自费另修了高架桥到自家院内，以保持充足的水量。直到今天，这里仍被称为“昆提里乌斯别墅”。

这里的主人正是当年康茂德的姐夫，两人在公元177年时还一起出任过执政官。其实昆提里乌斯兄弟参与暗杀阴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连平民们都传言，说是康茂德看上了这处别墅，于是才罗织罪名，害死了兄弟俩。

哈德良皇帝生前曾不无讥讽地说，元老院就是平时只考虑自己的议员集团，可一旦灾难临头，他们却又能团结一致。因为这一连串事件，元老院的议员们对皇帝康茂德的感情为之一变，而普通平民对皇帝的印象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平民而言，元老院议员都是富有的上流阶层，当这些人被皇帝处死，财产被没收时，大家只会感到痛快，而不会产生丝毫的同情之心。如果现在去形容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可以说很像美国总统与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上下两院的博弈。所以说，皇帝和元老院不和才是常态，二者关系良好的时期仅限于图拉真、安敦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时代，首都的平民们都喜欢围观元老院议员的失势和覆灭。

然而有一种情况却令平民心灵震颤，那就是骨肉相残。传统的罗马人极为重视家庭，平民们本能地认为不修身齐家则无以治国平天下。可是从公元182年开始，一年间的疯狂报复中，皇帝的亲姐姐和另一位姐姐的丈夫都死于非命。

直到公元183年后半，这场风暴才逐渐平息。不可思议的是，露西拉的丈夫庞培亚努斯却始终没有受到怀疑。父亲马可极其信赖这位出身于叙利亚的武将，儿子康茂德也继承了这一点。帕提鲁诺死后，近卫军团的长官只剩下佩雷尼斯一人，据说庞培亚努斯曾奉劝皇帝要信任佩雷尼斯。其实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近卫军团长官，本来就是因为老上级庞培亚努斯的极力举荐。

开始的5年

姐姐策划的暗杀阴谋，彻底改变了22岁的皇帝的性格。当然，只有近臣才了解这些变化。可康茂德不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而是皇帝，他本来就对帝国统治漠不关心，而佩雷尼斯在这一时期恰好弥补了这种致命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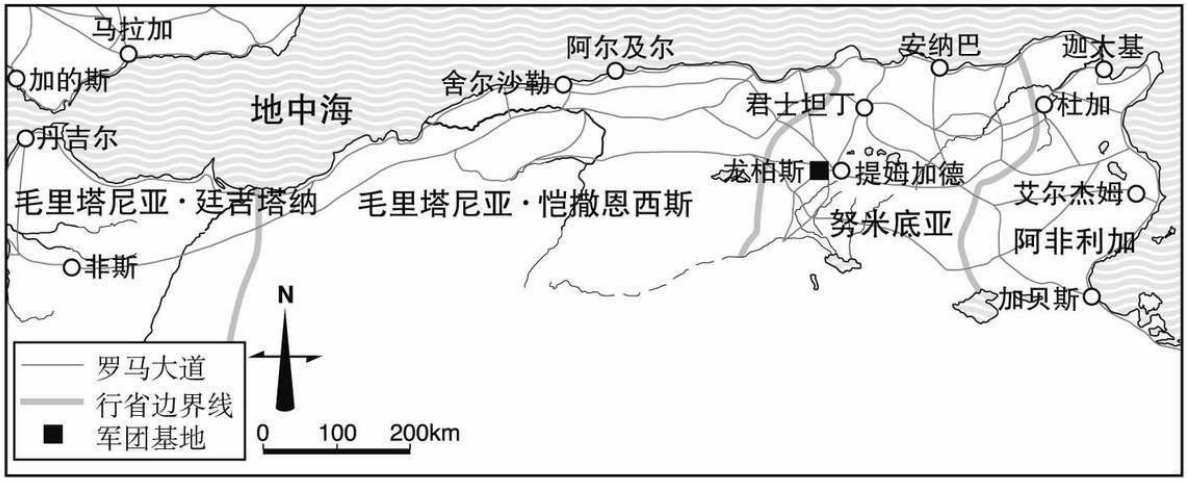
在公元2世纪前后，军队中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将领已经为数不多，塞克斯托斯·提吉狄乌斯·佩雷尼斯就来自意大利本土。此前他一直身在前线，是庞培亚努斯帐下的得力干将，不仅曾在多瑙河前线任职，而且踏遍了帝国边境各地，最后才受命担任近卫军团长官。不过这个人也有缺点，就是常年征战，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首都那些追求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们的鄙视，而元老院也把佩雷尼斯视为政治暴发户。此人应该在50岁上下，当康茂德对统治失去兴趣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一手承担起了帝国的政务。

马可· 奥勒留治下20年的战争状态结束后，罗马得以享受和平。不过这种和平和安敦尼· 庇护时代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和平已经截然不同。帝国的边境防线必须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否则就有遭到攻击的危险。

只有马可· 奥勒留征战过的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两个地区比较安全，其他地方要么出现了危险的征兆，要么就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

状态。佩雷尼斯的边境经验使他能够快速应对这些情况，而这一时期的帝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

据史书记载，罗马帝国曾于公元183年和185年两次强化北非毛里塔尼亚地区的边境防线，其具体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在罗马时代，这里分别是以廷吉（今丹吉尔）为首府的“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行省”和以恺撒利亚（今舍尔沙勒）为首府的“毛里塔尼亚·恺撒恩西斯行省”。从这两个行省向东，依次为“努米底亚”、“阿非利加”、“昔兰尼加”以及“埃及”等罗马诸行省。除了皇帝私人领有的埃及，其他5个行省总共只部署了一个罗马军团，即驻扎在努米底亚行省兰帕西斯（今龙柏斯）基地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该军团的军团兵和辅助兵合计6000人，是罗马常驻北非的正规部队。



北非主要的罗马大道

之所以如此单薄，是因为北非的情况和与帕提亚王国对峙的中近东地区有所不同。这里的主要敌人是越过沙漠发动袭击的原住民部族。罗马方面认为，对方并不是正规部队，只是一群强盗而已，派驻一个军团已经绰绰有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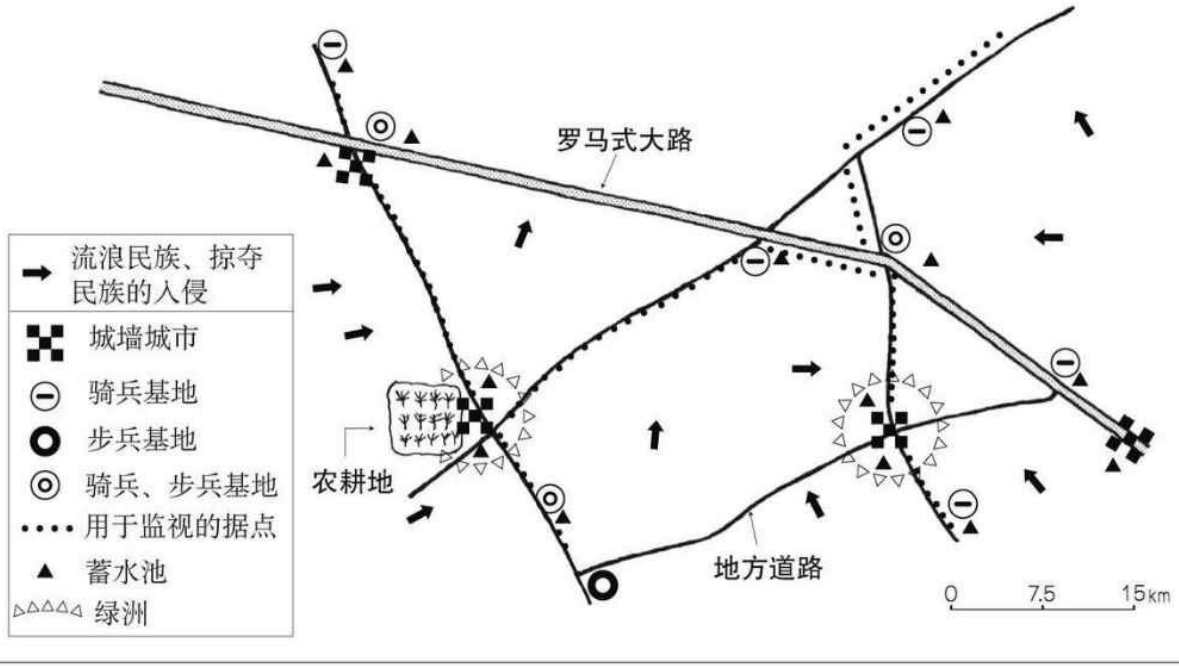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敌。如果把强盗的劫掠仅仅视为暂时性的灾

害而不加以防范的话，当地居民就会放弃土地，逃到安全的沿海城市去。无人耕种的土地不仅将荒芜，而且会被流沙逐渐掩埋，最后导致气候发生变化。田野有绿意才会下雨，雨水可以储存起来用于灌溉，然后才可能有下一次的降雨。人类的定居是防治荒漠的最好办法。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居民的定居。不过，为了不给帝国的其他地区增添防卫负担，还是有加强防卫措施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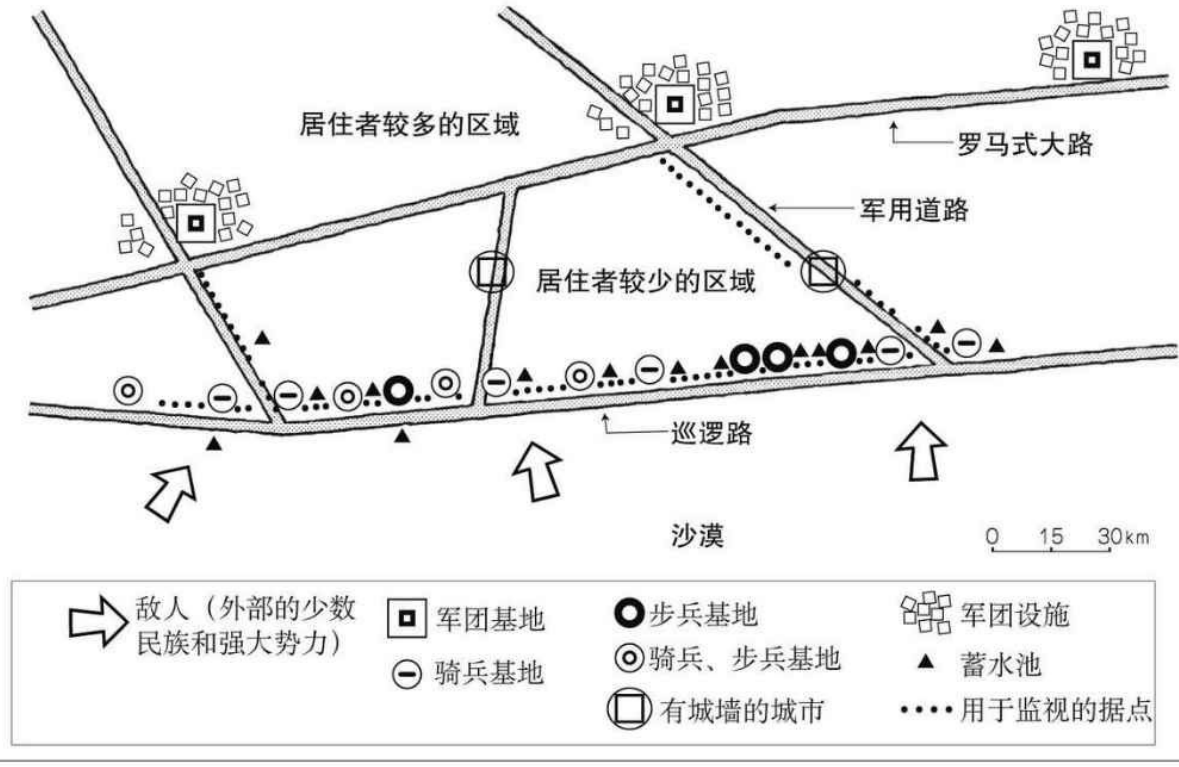
第一项措施是，充分利用由原住民组成的辅助兵。军团基地只有龙柏斯一处，辅助兵在这里接受过训练之后，被分派到各个战略要地去守卫要塞，各要塞之间还修筑了用于监视的据点，守在里面的也是行省出身的辅助兵。

第二项是，把未服兵役的居民也发动起来。罗马将每个绿洲中的部落都建成堡垒，把各个行省的居民也容纳到帝国的防卫体系中来。第三项措施则不仅限于北非的沙漠地带，在帝国的其他边境地带也同样实施，即把服役期满退役的军团兵组织起来，让他们建设聚居的城镇。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昔兰尼加、非洲、毛里塔尼亚行省等）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高的地方（北非的一部分以及叙利亚行省等防线）



（上下图都摘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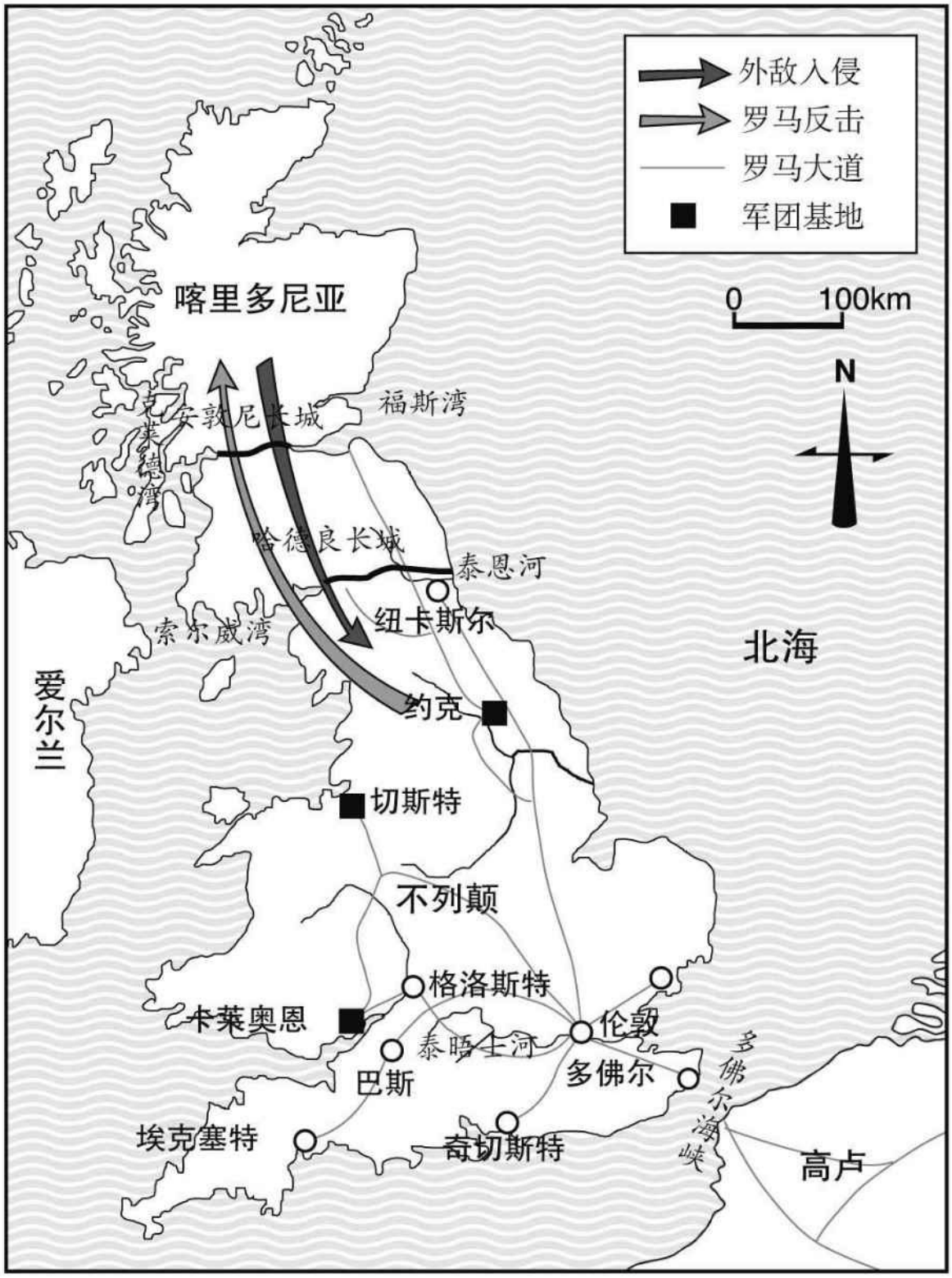
提姆加德遗址

提姆加德是发掘进展最为顺利的遗址，也因成果丰硕而著名。这座城镇就在龙柏斯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基地附近，是由图拉真时代的军团兵为自己退役后的生活建设起来的。很多罗马人建设的城镇都很像大型

的军团基地。在罗马时代，这里被称为塔姆加狄，的确处处都显现出军团基地的痕迹。也可以说它是边长为400米的四方形小镇，两条中央大街呈十字形交叉。虽说这座小镇出自退役的军团兵之手，但仍令人感到好笑。不过罗马人头脑中的都市机能在这里都很完备，既有神殿，也有广场，还有公共图书馆和剧场。大大小小的公共浴场共有14家。这里发掘出来的公厕更是典型的罗马式公厕，在建筑史专业的书籍中经常对其样式有所介绍。当然，道路也都是经过铺装的，上下水道也当然齐备。今天这里已经无人居住，周围也都是沙漠，而以前有人居住的时候，附近还有宽阔的耕地和果园。

在罗马时代，类似提姆加德这种起源的城镇不在少数。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要塞、监视据点、退役兵的聚居地，以及原住民城镇形成的地方自治体等作为“点”，罗马式的大道等作为“线”，“点与线”二者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防线。因此所谓的强化北非防线，就是进一步加强各“点与线”的规划与构成。如果这项工作得不到重视，那么不但北方地中海沿岸城市会受到威胁，就连直布罗陀海峡对岸西班牙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了。

代替皇帝处理帝国政务的佩雷尼斯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公元184年发生的蛮族对不列颠的入侵。不列颠地区就是后世的英国，而喀里多尼亚相当于现在的苏格兰，前者似乎命中注定永远要承受后者的袭扰。因为尽管罗马军队能征善战，但是喀里多尼亚有隔着北海相望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源源不断地给自己“输血”，人口总不见减少。因而面对不列颠的边境防线就不能只依靠“点与线”了，而是建起了绵延不断的城墙哈德良长城，此外常驻的军团也增加到3个。公元184年罗马收到紧急战报，迎击喀里多尼亚来敌的一个军团遭到了重创，被迫撤退，负责指挥的军团长已经阵亡。


外敌入侵
罗马反击
罗马大道
军团基地
0
100km
N
喀里多尼亚
克莱德湾
安敦尼长城
福斯湾
哈德良长城
泰恩河
纽卡斯尔
索尔威湾
北海
爱尔兰
约克
切斯特
不列颠
格洛斯特
卡莱奥恩
伦敦
泰晤士河
巴斯
多佛尔
多佛尔海峡
埃克塞特
奇切斯特
高卢

蛮族入侵不列颠

获此消息，元老院极为震动，认为应该从莱茵河防线或伊比利亚半岛抽调至少一个军团前去救援。然而近卫军团长官佩雷尼斯拒绝了这项建议。因为罗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供委派，并且从时间上看也来不及。那么如何是好呢？佩雷尼斯以康茂德的名义，命令身在莱茵河防线的乌尔庇乌斯· 马萨鲁斯火速赶往不列颠，顶替阵亡的军团长。前线经验丰富的佩雷尼斯知道，军团即便吃了败仗，但只要新的指挥官赶到，士气肯定为之一变。最后的结果是，马萨鲁斯率领下的军团在没有获得其他两个军团策应的情况下，成功雪耻。不过，元老院直到获得捷报才得知对马萨鲁斯的调遣，事前佩雷尼斯完全没有报告过此事。

但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反感根本没有时间发酵，第二年年初，同样在不列颠，发生了对帝国来讲不亚于异族入侵的重大事件。卡莱奥恩是距离哈德良长城最远的军团基地，按照惯例，每年的1月1日，驻扎在基地的军团兵都要举行向皇帝效忠的宣誓仪式。可是这一年，该军团的士兵拒绝向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反而拥戴自己的军团长为皇帝。军团长普利斯库斯虽然拒绝了士兵们的拥戴，可士兵们依然蠢蠢欲动。

这是关系到帝国防卫的重大事件。士兵们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意味着罗马防卫体系濒临崩溃，而且士兵们不仅仅是拒绝效忠，居然还推举另外的人替代皇帝。佩雷尼斯意识到，必须尽早提出对策，了结此事。这一次，他同样没有向元老院寻求建议，而是派出了自己在庞培亚努斯帐下时的同僚柏提那克斯赶往不列颠。

我们无从得知柏提那克斯是怎样说服军团兵的，总之任务完成得比较圆满，军团兵们重新举行了向康茂德皇帝效忠的宣誓仪式。不过，佩雷尼斯仍旧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为了防止不列颠驻军的不满情绪向其他防线的士兵们蔓延，应该大力宣传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在罗马帝国，大力宣传的方式就是发行刻有文字和图像的货币。当时铸造了两种银币，正面都有皇帝康茂德的侧脸，一种上面刻着“Concordia exercitum”的字样，另一种刻着“Fides exercitum”。这两句都是歌颂将士

和谐以及效忠皇帝的话语。

歌颂军团将士和谐的货币

佩雷尼斯的担忧是有根据的。驻扎在达契亚的军团兵，甚至多瑙河防线上的守军发出呼声，认为自己在边境上辛辛苦苦保卫国家，可是却遭到了皇帝的抛弃。这是因为士兵们还对坚守前线的先帝马可· 奥勒留念念不忘。如果康茂德还惦记着前线的士兵，那么他就应该向哈德良皇帝学习。即使当年没有战事，可是哈德良皇帝仍旧到不列颠和多瑙河视

察，慰问前线的将士。

士兵的薪酬是用第纳尔银币支付的，银币上面刻的宣传语句是否奏效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发生在不列颠的这次事件没有扩散到其他防线上去。然而与这种安定相反，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排斥却开始表面化了。这使24岁的康茂德深感不安。

无论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元老院都是人才储备机构，因此这个组织才得以存留下来。“元老院”这种译法往往使我们误以为这里充斥着一群功成名就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对在职官员鸡蛋里挑骨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经常把元老院比做现代国家里的议会，罗马公民只要满30岁就有资格取得议席，担任国家要职的人选都来自元老院，任职期满后也要回到这里。元老院与现代议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议员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任期也是终身制。不过，如果某些议员被认为不合格，最后也会失去议席。

这样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才能卓越，经验丰富，而且在学识和教养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在罗马时代，撰写哲学和历史著作的人没有元老院议席者屈指可数。这些议员之所以能够形成罗马时代的“媒体”，也是因为一旦进入元老院这个机构就能更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并且善于用文字来表现社会现象和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当然，不管是什么组织，都存在着鱼目混珠的现象。

公元2世纪末期的罗马元老院仍然保持着这些传统，对国家政治怀有责任感的议员仍旧占多数。这些人虽然不满佩雷尼斯轻视元老院的态度，却也没有将他的态度与实施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只是议员们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表面化，而且佩雷尼斯代理政务已有5年，5年的时间对于评价功绩而言还是有些匆忙，但对于忽略不满而言则又太漫长了。

逃脱姐姐谋害后的康茂德变得性格内向，但也没有孤僻到缩在皇宫里不见任何人。年轻的皇帝依然出现在斗兽场和大竞技场，和民众保持

接触，还常到各地的皇帝别墅去小住，骑马狩猎。每当这时，他总是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簇拥。所以他并非不跟外人接触，而是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罢了。而且，就如同一个儿子对父亲总是存在逆反心理，康茂德始终热衷于体力和武艺方面的竞技。

不过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却是一种自闭。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但他生活的世界是狭窄的。相比之下，把终生都奉献给政务、学问以及家庭的马可· 奥勒留的世界显然更为广阔。活在自我享受的世界里是老年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人生勋章，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早地被局限在自我的世界里，明显就是病态。而面对这样的患者，恶魔的耳语往往最容易奏效。

利用元老院对佩雷尼斯不满的，是皇帝寝宫里的一个侍臣库雷安德罗斯。他本是奴隶的儿子，进宫以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很快就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了“解放奴隶”。从名字上推测，他是希腊人的后裔，由于专门在寝宫做事，接触皇帝的机会当然不少。

这个人把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不满添油加醋地说给了康茂德。而康茂德虽然身在首都，却总是缺席元老院的会议，因此自己无法确定库雷安德罗斯话语的真伪。并且，如果他能认识到有核实的必要，那也不能说他是病态了。偏听偏信之余，康茂德又担忧起来，他担心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毕竟是自己提拔重用了佩雷尼斯。

这时，寝宫的奴隶再次发出一击。他告诉康茂德，说佩雷尼斯企图指使手下1万名士兵除掉皇帝。佩雷尼斯是名武将，前往皇宫汇报政务时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重视繁文缛节，其态度有点像马可· 奥勒留时代在作战会议上发言的百人队队长，开门见山，畅所欲言，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时也并不注意字斟句酌。此时的康茂德于是认为佩雷尼斯轻视自己，曾遭暗算的他以为危险再次降临了。

可是，这次的对手是近卫军团的首领，有1万名部下就驻扎在首都罗马附近。如果要除掉此人，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既成事实。

杀手似乎来自皇帝的贴身卫队。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伙人离开帕拉蒂尼山袭击了佩雷尼斯官邸。不但佩雷尼斯本人，他的妻子、妹妹以及两个孩子全都死于非命。

到第二天清晨，这个消息就传遍了罗马，连元老院都难掩震惊之情。而康茂德为了证明自己幸运地挫败了暗杀阴谋，宣布在自己的官方正式名称中，加上“菲利克斯”一词，意为“幸运的人”。

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应该在这起事件不久前获得了元老院议席。虽说是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但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西里西亚和达尔马齐亚两个行省的总督，是元老院的资深议员，这样他的儿子在30岁的时候也成为元老院议员肯定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新晋议员当然只能敬陪末座，可正因为如此，卡西乌斯·　狄奥才不至于沾染上元老院那种权威主义，能够比较客观地评判当时的气氛。他对佩雷尼斯评价如下：

> 他是个野心家，但清廉公正，无法收买。在政策方面较为稳健，从不意气用事，虽然对元老院态度强硬，但仍不失为一个有才能的公务人员，他本应获得更好的结局，而不是以这种方式死去，他有这种资格。

随着佩雷尼斯的遇害，康茂德的统治也就彻底不可救药了。代替佩雷尼斯掌舵的，是解放奴隶库雷安德罗斯。

亲信政治

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但是人生却有贵贱之分。

即便是奴隶，也有人保持着纯粹的人生。例如与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同生共死的奴隶。当尤里乌斯· 恺撒遭到布鲁图一伙杀害，连恺撒帐下最强的武将、同为执政官的马克· 安东尼都因恐惧而不敢上前，这时是恺撒的三个奴隶在无人指示的情况下，在手持带血利剑的嚣张凶手面前穿过，将恺撒的遗体搬回家中。克劳狄乌斯皇帝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并且说话结巴，但他的奴隶纳尔奇索斯在皇帝遭毒杀时最后和主人一起殉难。即使在奴隶社会，超越阶级的人际关系也依然存在。

可是，这种超越的人际关系也存在弊端。无论是奴隶还是解放奴隶，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缺乏用以自律的“过去”，所以只能重视“现在”。当他们所服侍的主人是最高权力者皇帝时，对“将来”的安全感就更谈不上了。在他们看来，唯一能够保证自己将来的就是“现在”，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金钱。奴隶出身的人一旦有了影响上层的机会，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敛财。库雷安德罗斯就是这样，为了敛财他可谓只争朝夕。

从一个寝宫里的奴隶一跃成为皇帝的亲信，库雷安德罗斯很快就开始半公开地卖官鬻爵。罗马把远离边境、不必派驻军团的安全行省称为“元老院行省”，成为这种行省的总督，就意味着站在了仕途上升的起点上，并且这种职位也更容易获取利益。而要想成为行省总督，则首先要具备执政官的履历，因此所有的元老院议员，不论是谁，都挖空心思地想当执政官。买卖这种职位，获利空间巨大。既然康茂德热衷于竞技，那么库雷安德罗斯就忙于存钱。这种情况不但引起了元老院正直人士的愤慨，而且帝国边境的将士也开始不满。

能够制约库雷安德罗斯的，除了皇帝，还有近卫军团的长官。可能是近卫军长官真的有所行动，因为这一时期近卫军团长官的人事更迭十分频繁。有人在职期间只有5天，最短的记录则只有6个小时。

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公元187年第二次出现了针对皇帝的暗杀。我们至今仍旧不能肯定这种阴谋计划是否真的存在，也不排除是库雷安德

罗斯一门心思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向被害妄想狂康茂德煽风点火的结果。总之，主谋马梅尔提努斯和布鲁斯未经审判就被处死。

这两个人都是皇帝康茂德的亲戚。马梅尔提努斯是马可· 奥勒留五女儿科尔尼切亚的丈夫，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曾于公元182年担任过执政官。布鲁斯则是出身于北非的武将，娶了先帝的小女儿萨宾娜，也曾于公元181年担任过执政官。如果加上四年前被处死的昆提里乌斯，哲学家皇帝的5个女婿中已经有3人死在了小舅子手上。这就是马可一直珍视的家庭，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姐夫妹夫虽遭处决，但有史书记载他们的妻子又再婚了，可见康茂德还没有对自己的其他姐妹下手。

只要有感情存在，那么人和人还是骨肉至亲，如果没有感情了，这种关系就与路人无异。康茂德对自己的妻子很冷漠，本来克丽丝庇娜与暗杀阴谋毫无关系，只是因为皇帝另有新欢，她比较碍事，于是就被扣上通奸罪的帽子流放卡普里岛，不久之后也惨遭杀害。

此时的康茂德已经完全失控，只有一个人还能阻止他，那就是先帝马可留下的忠臣、一直深得皇帝康茂德信赖的庞培亚努斯。这个人把多瑙河防务安排妥当之后回到了首都，可是自从自己的旧部佩雷尼斯于公元185年遇害，他就彻底隐退，不再露面了。可能是对康茂德过于绝望，但他并没有加入反康茂德的阵营，也没有理会社会上的不满声音，而是实实在在地恪守着自己曾经立下的誓约。

恪守誓约的不只是庞培亚努斯一人，先帝马可临终时那些不在场的军队将领也没有人起来反对康茂德。马可· 奥勒留那高洁的人格与强烈的责任感始终警醒着众人，直到今天，罗马男人对契约的认真态度仍然令人惊叹。康茂德在位的11年里，恶政接连不断，但先帝马可起用的武将没有一个兴兵发难的。

那么，在这段时期，公认的皇权监督机构元老院又在做什么呢？

我们说元老院里鱼目混珠，其实如果“鱼目”和“明珠”都很明确的话，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可实际上能够确定为“明珠”或“鱼目”的只是极少数，剩下的大多数往往相时而动，他们时而是“明珠”，时而又成了“鱼目”。也许是因为看到皇帝处死姐夫们而噤若寒蝉，感到害怕，或者是看到了近卫军团长官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总之从公元187年以后，元老院里“鱼目”占了上风，到了公元190年，一年里就任执政官的竟然高达25人，原来的执政官每年只有2人，至多也不过4人，现在居然有25人。就算库雷安德罗斯愿意经销官职，但元老院里如果没有人付款，这种交易也不可能成立。

所以，当奴隶出身的库雷安德罗斯就任近卫军团长官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元老院甚至还弄了一个“Pater Senatus”（元老院之父）的肉麻称号赠送给他。我们只能说此时的帝国政治已经走向荒谬，而被共和主义者视为“罗马帝国的良心”的元老院竟也堕落到如此地步！佩雷尼斯生前对元老院极端鄙视，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态度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其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种对元老院的轻蔑态度也影响到了康茂德。

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帝国仍旧维持着运转。这除了要感谢驻守边疆的武将，基层行政机关发挥的作用也令人赞叹。中央政府已经是一团乱麻，但乡村还平静如常，帝国的运转就好像一辆飞驰的列车，即便拉下制动也不可能立刻停车。不过这种状态只持续了4年。

用今天的概念看，共和时代的罗马已经开始推行社会福利事业了，贫穷的人每个月能免费领到约30公斤小麦。将军凯旋或皇帝举行庆典时分发的礼金至多不过是一种礼物，而每个月的小麦配给则是公民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的拥有者只局限于罗马公民，即拥有罗马公民权的17岁以上的男子。如果一家有夫妻二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30公斤小麦当然无法糊口，只是国家保证不饿死人而已。

罗马法对私有权加以保护，而与此呼应就出现了自由市场。免费领

取的小麦质量低劣，优质小麦都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只要个人经济条件允许，人们可以把免费领取的小麦给奴隶食用，自己则出钱到自由市场上购买优质小麦做成的面包。

库雷安德罗斯专心敛财，对这些事项本不关注，也可能是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总之原本不该在市场上出现的劣质小麦也拿来买卖了，这样用于免费供应的小麦自然会大量减少。

平民被激怒了。既然罗马公民权包含这项权利，大家当然会愤慨。阵容庞大的抗议游行队伍以女性为主、男性为辅，一直逼向康茂德的住处。

皇宫就在帕拉蒂尼山上，可是这时皇帝并不在皇宫，而是住在阿皮亚大道旁的昆提里乌斯别墅里。这一带都是平原，别墅周围虽有高墙环绕，但面对着愤怒的平民越逼越近，28岁的康茂德不由得心惊胆战。

皇帝的贴身卫队看到这种架势也不敢轻举妄动，而近卫军团驻在罗马的北部，距离别墅的位置还很远，不胜惶恐的康茂德只好丢卒保帅，他把库雷安德罗斯推出别墅大门，然后在后面关上了大门。

库雷安德罗斯被呐喊的平民拖回了罗马，很快被杀，他所储存的金银财宝也尽归国库，但康茂德并没有用这些钱重建小麦市场，而是用来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角斗表演。他不但主持比赛，而且为了取悦观众，还亲自下场和职业选手进行较量。以前康茂德总是在角斗士学校或皇宫内和人一比高低，还从未在观众面前亮相过。从此，康茂德有了一个别名，“角斗士皇帝”，相比于他父亲“哲学家皇帝”的称号，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罗马的赫拉克勒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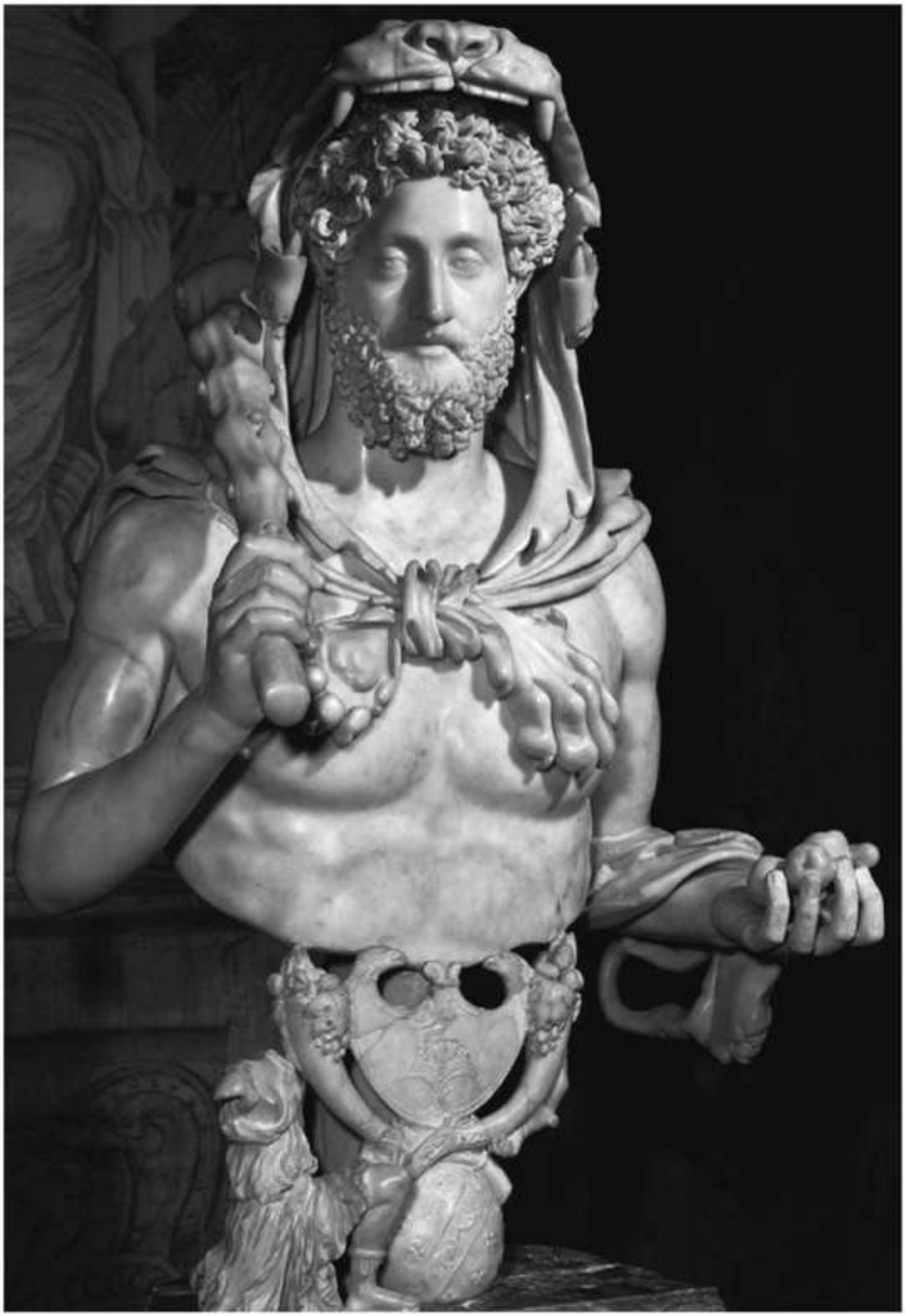
康茂德执政从公元180年开始，到192年为止，最初的5年有佩雷尼斯代劳，接下来的4年被库雷安德罗斯把持，本来最后3年他怎么也应该亲自出马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直到28岁还没能独立，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独立了。康茂德执政的最后3年，受以下3个人影响最大：

马尔奇亚——康茂德的新欢。这个女人本来是库瓦特拉托斯的奴隶，公元182年，库瓦特拉托斯追随露西拉谋刺皇帝，失败被处死以后，他的个人财产包括奴隶都被皇帝接收了。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但她没有四处张扬。只要没人揭发检举，保持一种信仰其实没那么难。而康茂德不但对国家政务不感兴趣，对基督教的危害也同样漠然置之。

艾克雷科图斯——库雷安德罗斯之后，他成为皇帝寝宫内的侍臣，是希腊的解放奴隶，马尔奇亚在成为皇帝的情妇之前和之后，都和他保持着夫妻关系。

埃米里乌斯· 雷特——近卫军团长官。库雷安德罗斯被杀后，他是唯一的近卫军团长官。

连这种人都能围绕在皇帝周围，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自然知难而退。他们要么遭到排挤，要么主动辞职，到最后连给行省总督和军团长撰写行政文书的人都找不到了。当然康茂德可以自己署名，但文书的内容不得不找他人代笔。一旦这种秘书出现紧缺，那么皇帝发出的书信往往就只有一个词“vale”。这个“vale”本是一句客气话，意义很宽泛，类似于请保重、拜托、再见等等，是书信结尾时的习惯用语。当信使带着皇帝的文书，沿着罗马大道策马飞奔，日夜兼程抵达目的地之后，收信人展开文书，雪白的纸莎草纸上面赫然只有一个“vale”。当边境的军团长们手捧这种文书，内心会有什么感想呢？而元老院也开始醒悟，意识到自己是康茂德恶政的帮凶。



扮成赫拉克勒斯的康茂德雕像

这时的皇帝已经无所顾忌，终日沉溺于竞技场内。实际上，年轻的康茂德身体强健，力大无穷，武艺堪与职业角斗士相匹敌。并且，父亲马可生前的体弱多病也成了他藐视的对象，称自己真正的父亲是朱庇特，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再世，让大家今后称呼他为“罗马的赫拉克勒斯”。

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命人给自己制作了头披狮子皮、手持狼牙棒的雕像。以致后世人们传说，康茂德的父亲并不是马可· 奥勒留，而是皇后芙斯汀娜和一个角斗士通奸造就的孽种。在现代电影《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采用了这个传说，其实招致这样的谣言也只能怪康茂德自己了。

不过到今天这种说法已经被否定了。康茂德出生前后，正是芙斯汀娜每年都生小孩的时期，很难想象她还有时间去和角斗士情人幽会，并且从雕像和钱币上看，马可和康茂德父子二人的容貌极为相像。况且角斗士虽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拳击冠军，但仍属社会底层。角斗士在应募军团兵时往往遭到拒绝，虽然马可· 奥勒留曾因兵源短缺征召角斗士入伍，但那也是命令角斗士自己形成一队，不能和罗马的正规军团并肩作战。

在公元2世纪末期，尤里乌斯· 恺撒颁布实施的《地方自治法》仍然有效。该法针对地方议会的选举，规定了下列人等拥有选举权却没有被选举权：有犯罪前科的人（包括作伪证者）、军团逃兵、被军团开除的人、戏子、色情业者，最后是角斗士。

所以康茂德肯定了解这些情况，他不可能四处吹嘘自己的父亲是角斗士。他所谓的“父亲”是希腊罗马宗教中的最高神朱庇特（希腊为宙斯）。不过这也是一种心理变态。现代人对马可· 奥勒留评价甚高，不相信他会把帝位传给这个愚蠢的儿子康茂德。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心态下也促成了两部电影和多部小说的问世。马可· 奥勒留是后人最为喜欢的罗马皇帝，可惜康茂德虽然继承了血统和皇位，但人生截

然不同。这就是世界，既有龙兄鼠弟，也有虎父犬子。

皇帝康茂德人生的最后3年，正是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从35岁到37岁的时期，并且他也和康茂德一样住在首都，还是元老院的议员，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现场证人。不过，我们在参考这个人的著作时，有些地方需要加以注意。

首先，卡西乌斯· 狄奥的文笔固然优美，但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喜欢把别人的现场演说换成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倾向在我们只能依靠文献获知过去史实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连以简洁明快为特色的尤里乌斯· 恺撒的演讲，到了他笔下也都换成了缓慢冗长的叙述。幸好我们还有恺撒自己的著作做旁证，可是当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对照时，我们就要注意了。卡西乌斯· 狄奥之所以有这种毛病，可能因为他是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还没能强烈地意识到言语鼓动是胜过千军万马的武器。如果恺撒生于今天，那么当他在议会、支持者集会、电视辩论，以及同其他国家首脑围着圆桌举行高峰会谈等各种场合发言时，肯定都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经常改变说话的方式。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恺撒和一心只惦记着读者的卡西乌斯· 狄奥之间的区别。

当然，重视读者也有好处，就是愿意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网罗进著作里。因而在他的巨著《罗马史》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不但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关于他的感想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处介绍过了，下面介绍的则是他的亲眼所见。公元192年皇帝康茂德31岁，出现在了斗兽场。

> 那天在竞技场，我们元老院议员都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欣赏皇帝的武艺。当时康茂德的对手是一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鸵鸟。面对冲过来的鸵鸟，康茂德只一挥刀，立刻就把鸟头斩落。随后他以骄傲的表情转向元老院议员们，将手中的利剑从左向右一挥，好像在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人头也会像这只鸵鸟一样，瞬间落

地。”

这真是可怕的一幕，同时也有些滑稽。议员们反而笑了起来，笑声从元老院议员专用席的一边传到了另一边。

这时卡西乌斯·狄奥（作者和恺撒一样，在著作中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本能地感觉到这样下去会有麻烦。于是他从头上的月桂冠上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咀嚼，同时让其他议员也这么做。

康茂德见此情景，只好在内心安慰自己，元老院议员因为咀嚼月桂树叶而蠕动嘴巴，并非是对他发出的威胁报以嘲讽。于是，他为自己的残酷内心寻求满足的借口也就没有了。

暗杀

几个月以后，公元192年12月31日夜晚，针对康茂德的暗杀终于成功了。

谋划此事的，是皇帝的情妇马尔奇亚以及寝宫内的侍臣艾克雷科图斯，而真正的刺客则是纳尔奇索斯，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康茂德的摔跤教练。正在入浴中的皇帝是被扼住脖子绞杀的，31岁的人生，12年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谋杀的动机不明。马尔奇亚和艾克雷科图斯正是假借康茂德的威势才得以飞扬跋扈，康茂德的死使他们失去得最多，并且史书中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元老院在暗中穿针引线，甚至连令人怀疑的迹象都没有。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皇帝近臣的个人行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外人有所不知的龃龉，最后凶手狗急跳墙。杀人动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客观标准。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拿到另外的人那里就有可能变成杀人的动机。

不管怎么说，干掉康茂德之后，三个人采取的行动倒是非常干练。

他们立即以康茂德的名义召见近卫军团长官埃米里乌斯· 雷特，雷特到达后，三个人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雷特的行动也十分迅速，当天夜里就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商议妥当，决定了皇帝的后继人选。

在此期间，皇宫内也在静悄悄地处理善后。原本放置在浴室内的尸体被用床单简单地裹好，悄悄地抬到外面掩埋了。对多数罗马人来讲，传统的做法是火葬，但当时只能将尸体草草掩埋，5年之后，经过塞维鲁皇帝最后拍板，康茂德才得以火葬，骨灰安放于哈德良神殿。

马尔奇亚、艾克雷科图斯和纳尔奇索斯当天夜里就从皇宫消失了，以后也再没有他们三人的消息。是近卫军团长官雷特把他们灭口了吗？或者长官为他们办理了通行许可，三个人隐姓埋名回故乡希腊去了？总之，他们此后就从罗马历史中消失了。

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为了能让人接受，只依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正统性。尽管康茂德昏庸无能，是个不合格的皇帝，但他在正统性方面无可挑剔。他是先帝马可指定的继承人，又有三年共治皇帝的经历，登基时获得了元老院的承认，执政伊始还受到了罗马公民的欢迎。当康茂德被杀后，罗马自然变成了只靠武力说话的时代。而凭借武力得以幸存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也还是寻求正统性。没有正统性，权力的行使会变得十分困难。正统性和武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二者相互调和的结果，就形成了后世的君主立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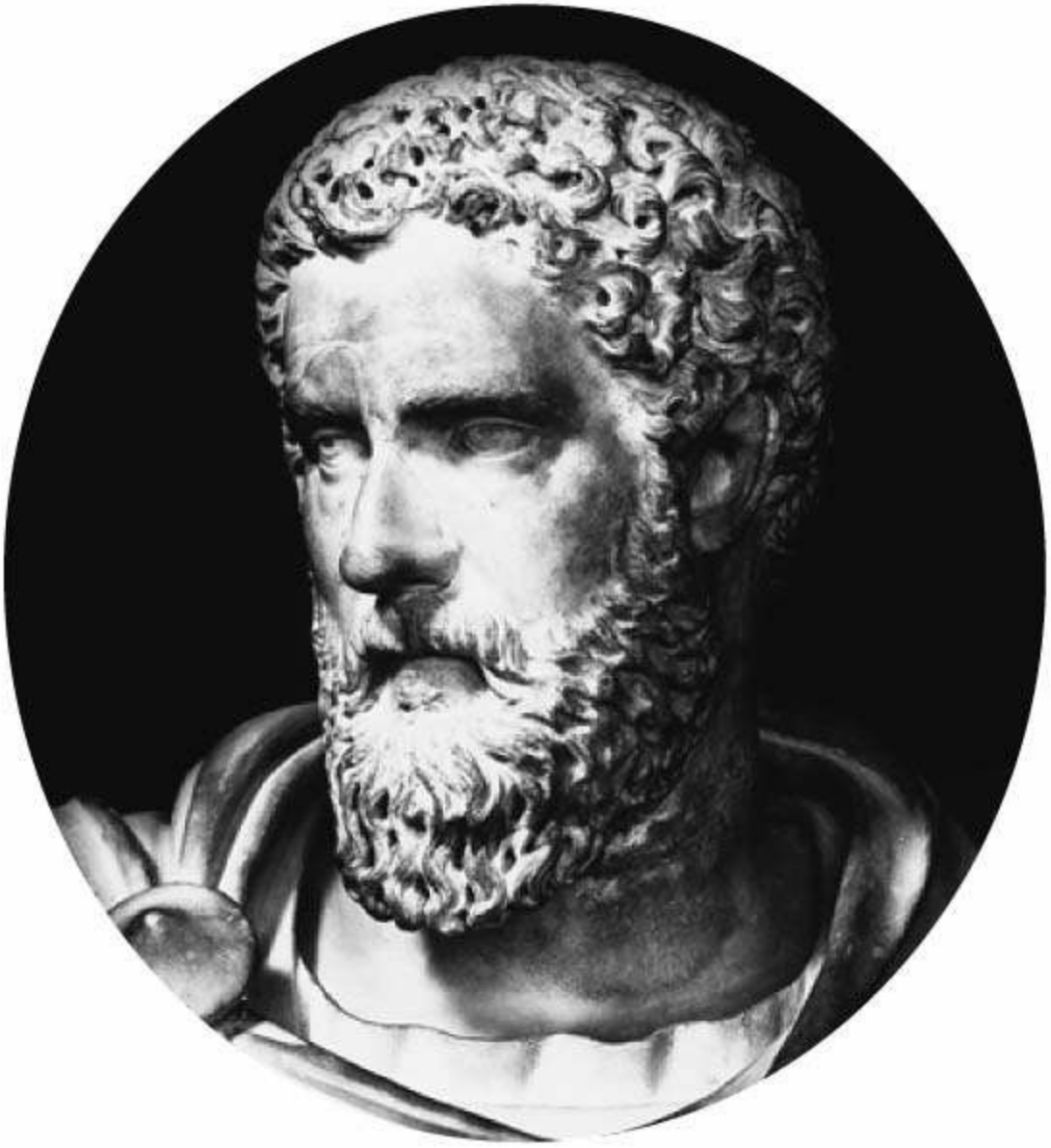
因为只依靠武力行事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对国家而言就是内乱频仍。随着康茂德的被杀，公元192年也结束了，将军们为马可· 奥勒留坚守的誓约也随之解除。12年来，面对这样一个昏聩的皇帝，将军们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坊间开始传说，自从佩雷尼斯遇害后，在乡间隐居了7年的老将庞培亚努斯，已经决定接受自己的旧部、新任皇帝柏提那克斯的邀请，即将前往首都罗马。这是军人时代到来的前兆。另外，元老院全场一致通过处以前任皇帝康茂德以“记录抹杀刑”

（Damnatio memoriae）。康茂德是继皇帝尼禄、皇帝图密善之后，第三个被处以这种刑罚的皇帝。一旦死后遭受如此耻辱的刑罚，当事人的肖像会被破坏，刻有功绩的石碑也会被除去姓名。不过，与尼禄和图密善相比，康茂德几乎没有任何功绩，也没有兴建或修复过任何公共建筑，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抹杀。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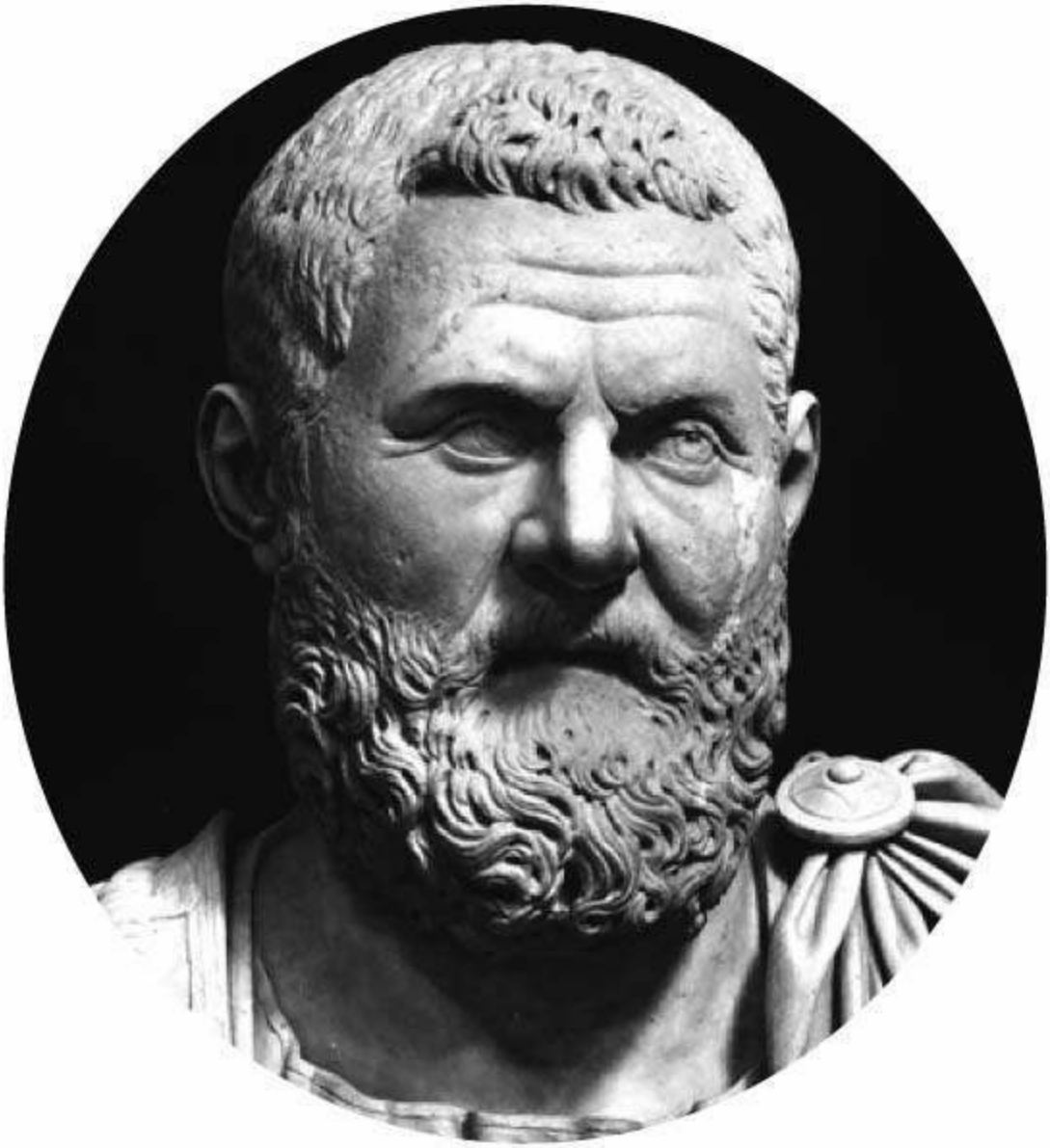
内乱时代

（公元193—1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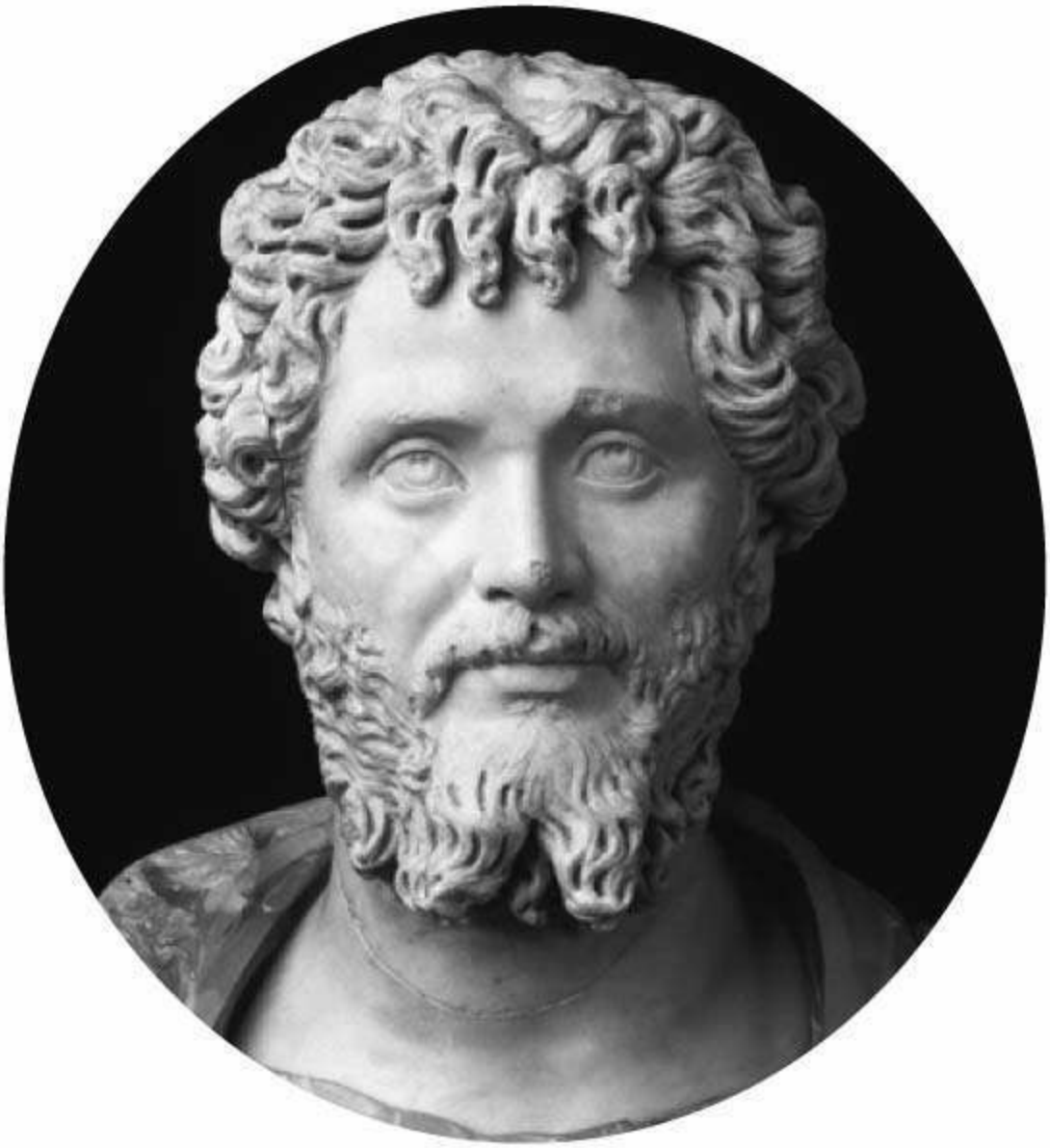
狄第乌斯· 尤利安
（Didius Julianus）

培辛尼乌斯· 尼戈
（ Pescennius Niger）



柏提那克斯
（ Pertinax）

克劳狄乌斯· 亚尔比努斯
（ Clodius Albinus）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
（Septimius Severus）

我们把皇帝康茂德之后争夺帝位的5个人并列起来看，会发现他们全都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负责保卫帝国的人。这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在他们的实力之中，兵权当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军队这种组织，不管是在罗马时代还是在其他民族的什么时代，都面对社会底层敞开着大门，而在其中一言九鼎的，则是少数实力人物。什么叫乱世呢？就是以下犯上的世道。这时元老院议员世家或者权贵姻亲等因素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就如同野生动物的世界一样，最重要的是依靠武力和智慧，胜者为王！

军团里的实力派

柏提那克斯最初并没有称帝的野心，更没有称帝的举动。他从5年前开始担任首都罗马的长官，结果率先得知康茂德已死的近卫军团长官雷特说服了他。雷特的理由是元老院属意柏提那克斯，所以说柏提那克斯的登基是基于他个人的爱国热情。

当时柏提那克斯已经66岁，即使宣布隐退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他意识到，在康茂德死后，如果政治生活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话，罗马帝国就会像尼禄死后那样陷入内乱状态。年纪尚轻就死去的皇帝还有图密善，但是元老院马上推举了涅尔瓦继位，成功地控制住了事态的恶化。古稀之年的涅尔瓦即位一年后，迅速指定了继承人图拉真。柏提那克斯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做第二个涅尔瓦。

康茂德死后的第二天是1月1日，在罗马时代，这一天是工作开始的日子，元老院将召开新年的第一次会议，执政官也将在这一天就任。公元193年的1月1日，元老院议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柏提那克斯登基。

据说年逾七旬的庞培亚努斯也出现在会场。这位马可· 奥勒留的老臣，军事方面的左膀右臂，兢兢业业把一生都奉献给帝国前线的武将，

利用自己对元老院一贯的尊重姿态，为元老院议员们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而柏提那克斯也向这位老上级发出就任“共治皇帝”的邀请。结果身为先帝马可女婿的这位老将拒绝了，他认为应该由更年轻的人出任此职。

带着柏提那克斯登基文告的信使们迅速奔赴帝国各地。1月1日也是边境军团基地的将士向最高司令官，也就是皇帝举行效忠宣誓仪式的日子。帝国如此广阔，即使是紧急文告，送到遥远的边疆也要费时一个月。防止混乱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把新皇帝登基的消息通知给边境军团，让已经向康茂德宣誓过的将士重新向新皇帝宣誓效忠。

事实证明，有些担忧是多余的。所有的军团基地都传回了消息，他们宣誓效忠新皇帝。这完全是因为柏提那克斯从前的经历博得了将士们的好感。

公元126年，普布利乌斯· 赫尔维斯· 柏提那克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父亲是贩卖毛料的解放奴隶。柏提那克斯只比马可· 奥勒留小5岁，可是二者的家世和成长经历却有着天壤之别。

少年时代的柏提那克斯就头脑聪颖，他知道，要想在罗马帝国出人头地，首要条件是必须取得罗马公民权，而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捷径则是从事医疗或教育。根据尤里乌斯· 恺撒制定的法律，不论民族、出身、肤色，只要是医生和教师，都授予罗马公民权。因为做医生需要一定的经验，这个解放奴隶的儿子选择了教师。他很快就开设了私塾，教室曾设在广场的一角，也曾设在称做“茵斯拉”的四五楼公寓的檐下。他似乎只接受过中等教育，就开始担任“grammaticus”中等教育的教师，可见其胆识过人。这样过了五六年以后，他认为还是在军队能更快地出人头地。加入军团必须具有罗马公民权，但他是教师，已经获得了这种资格。于是他得以加入罗马军团。

在罗马的军团中，应募者一旦合格，并不都是从普通士兵干起，有

前途的年轻人有可能被任命为30人小队的指挥官。以柏提那克斯的条件，即便加入防卫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军团，当个小队长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个解放奴隶的儿子却更加巧妙。

他回避了著名的西方精锐部队，志愿加入叙利亚军团。驻扎在多瑙河的军团兵往往不无轻蔑地称呼叙利亚军团为“东边的”，因为自从安敦尼· 庇护时代起，尽管边境防线享受了很长时间的和平，但西方还是和蛮族经常发生小摩擦，而与此相对照，面对帕提亚王国的形势则是高枕无忧，以至于士兵都变得软弱了。这个军团驻扎在叙利亚，应募而来的自然都是当地希腊人或塞姆人（Semu，亦称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相传挪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译者注）的后裔。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意大利本土出身的年轻人，不但成绩优异，而且看上去颇具胆识，这无疑会引起上级军官的注意。结果柏提那克斯的军旅经历，是以百人队队长为起点的。

但是，百人队队长这种称呼是从前沿袭下来的官名，到了帝政时代，百人队队长手下只有80名士兵。百人队队长必须和手下士兵同吃同住，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士官。不过自从尤里乌斯· 恺撒充分运用百人队队长制度以来，军中就流传一种说法：“百人队队长是罗马军团的脊梁。”在罗马军团中，资深的百人队队长可以参加司令官召集的作战会议。

柏提那克斯就这样一直做着百人队队长，而且逐渐从普通的百人队队长晋升到了顶级百人队队长。一般来讲，百人队队长自下而上分四个等级：

一、指挥80名士兵的百人队队长。

二、同样是指挥80名士兵，但有参加作战会议的资格，手下的“百人队”是所属大队6个百人队里最强的。

三、隶属10个大队里最强的大队，指挥着160名士兵，具有参加作战会议的资格。

四、一个军团里唯一的顶级百人队队长，成为军团里最强大队中最强百人队的领袖，称为“首席百人队队长”。

一旦成为首席百人队队长，尽管地位仍相当于士官，却比那些入伍不久就担任大队长的元老院议员子弟资格还老。这就如同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比刚毕业的见习医生更懂得手术一样。

在和平年代，仅用几年时间就升到这么高的职位，可见柏提那克斯的确表现优异，并且这些升迁都是在叙利亚行省一地完成的，百人队队长以下的职位极少换防。

35岁的时候，柏提那克斯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就任皇帝的马可· 奥勒留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出现了。和平终于结束，战争年代到来了。

不过，柏提那克斯没有任何裙带关系，即使当上了首席百人队队长，也并不意味着下一步就是大队长。指挥6个百人队共480人的大队长都是军官，柏提那克斯想到达那种位置还必须先登一个台阶，而这个台阶就是一个大队中的“长官”职位。大队里军事指挥方面的任务由大队长负责，除此之外的所有事项都是大队长官的业务范围，比如宿营地的选择，军粮的调运与分配等等，相当于总务长。就在柏提那克斯担任这种长官期间，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战争爆发了。结果被调派来参战的西方军团发现了柏提那克斯，立刻就非常重视他。在这种微妙时刻，或许是商人父亲遗传给他的处事的灵活性发挥了作用。

总之罗马的将军们极为赞赏柏提那克斯在这一时期的表现，甚至将

此事汇报给了皇帝马可，由此可见柏提那克斯是多么的突出。罗马军队极其重视后勤补给，兵站管理专家和战场上的将领拥有同等地位。有了这一时期的成绩，柏提那克斯顺利地晋升为大队长。

一旦成为指挥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任职地点往往频繁转换。从守卫幼发拉底河的叙利亚行省，到多瑙河防线上的米西亚行省，到处都留下了柏提那克斯的足迹。不久以后，他又被任命为驻扎在米西亚的骑兵队的负责人。骑兵队的基地和军团基地不在同一处，因此柏提那克斯是一处独立基地的首脑。

然而他此后的工作突然变化，其实在罗马时代这种变化也很平常，他被任命为行省的“财务长官”。总督是行省政治、军事和司法的负责人，而财务长官则负责行省的财政，其业务既要管理以公共基础建设为主的支出，也要管理行省税等其他收入，属于行省的“财政厅长”。柏提那克斯好像先后在好几个行省担任过这一官职。

后来柏提那克斯又负责管理艾米利亚大道。这条大道的起点在里米尼，途经皮亚琴察，最后到达米兰，是由东南向西北贯穿意大利北部的主要交通干线。柏提那克斯负责这条大道的维护管理。

完成这些工作的柏提那克斯获得了广泛赞誉，最后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精锐部队。在莱茵河防线像佛珠一样排列着一串基地，柏提那克斯被任命为一个辅助部队的基地长官。由于部下都不是罗马公民而是行省出身的士兵，这种任务并不简单。接着又有达契亚行省财务长官的职位在前面等待着他，然后是多瑙河防线上的分队指挥官。

应该就在这一时期，柏提那克斯在将军庞培亚努斯的领导下，与入侵意大利本土阿奎利亚的日耳曼部族作战。柏提那克斯战功卓越，元老院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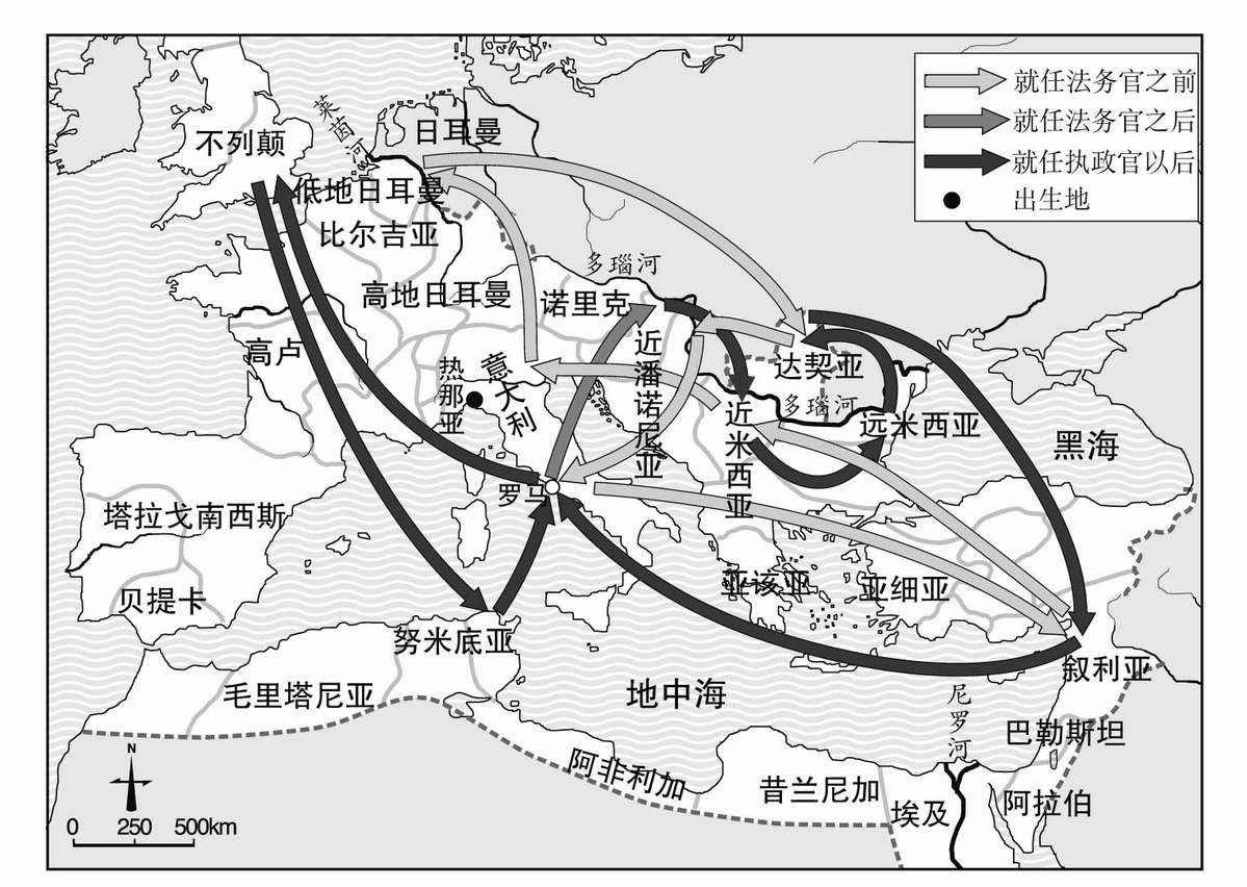
成为元老院议员的柏提那克斯后来取得了法务官的职位，然后他前

往近潘诺尼亚行省的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担任驻扎在那里的第一亚狄托里库斯军团的军团长，直接面对自多瑙河北岸南侵的蛮族，是最前沿军团基地的首脑。当时庞培亚努斯是多瑙河防线事实上的指挥官，柏提那克斯在庞培亚努斯麾下，与日耳曼民族战斗了好几年。

因军功，柏提那克斯被选为“候补执政官”，顾名思义，相对于每年1月1日就任的正式执政官，这个候补执政官实际上是板凳队员，一般在一年中的最后两个月走一下过场。不过，这个职位在“执政官经历”上的意义显然要大于“候补”的字面含义，因为不管怎样，要想成为行省总督，有执政官的经历是必需的。既然如此，就有不少人当选了候补执政官之后却并不前往首都就职。柏提那克斯也是这样，他没有回首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前线。

既然柏提那克斯获得了“执政官经历”，帝国也就立刻利用了这个头衔。皇帝马可任命50岁的柏提那克斯为近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任职地点就在这个行省的首府辛基杜卢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这样柏提那克斯就成了最前线的将军，指挥两个军团。他接下来的职位是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这一地区在多瑙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保加利亚，柏提那克斯的任务是率领两个军团死守边境防线。后来他又前往达契亚行省担任总督。达契亚位于多瑙河北岸，是一个凸出的桥头堡，与其他防线相比，这里的任务无比危险艰巨。

马可· 奥勒留于公元180年离世，在那之前，即公元179年，也可能是178年，皇帝任命柏提那克斯为叙利亚行省的总督。叙利亚是东方防线上最重要的行省，柏提那克斯当年入伍就在这里，年过半百之后，他成了这里的总督，并且是指挥着三个军团的司令官。皇帝马可离世后，他仍在这个职位上，直到公元183年有人来接替，柏提那克斯才回到首都。



柏提那克斯任职地点的变化

然而首都的舒适生活还没过两年，公元185年就发生了士兵拒绝向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的事件，柏提那克斯又被派往不列颠。骚乱平息后他回到首都，很快就前往阿非利加行省首府迦太基，负责当地的福利政策。这项工作需要他和行省总督相配合才可能成功，柏提那克斯仅用两年就做得很圆满。回到首都的他得到了“首都长官”的职位，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市长，也兼任首都警察首脑。柏提那克斯从公元187年到192年一直担任此职，并且在公元192年的一整年时间里，他还和皇帝康茂德一起共同担任了执政官。这一次可不是候补，而是正式的执政官。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罗马帝国的核心权力圈，甚至有资格接替康茂德。

可是不久以后，接替康茂德这件事居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92年12

月31日，康茂德被杀，第二天，公元193年1月1日，柏提那克斯登基。

柏提那克斯的经历是罗马时代布衣卿相的典型，也说明罗马社会是流动着的社会。一个解放奴隶的儿子，最后竟然做到了皇帝，而且这也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逐步高升，不仅为自己，也为他所属的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结果。

皇帝柏提那克斯

在公元193年1月1日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柏提那克斯的即位获得了承认，66岁的他随后发表了演讲，明确提出自己的施政方针将效仿马可· 奥勒留。这意味着他将和元老院合作，共同治理国家。柏提那克斯还表示，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不得处罚元老院议员。这种政策简直就像回到五贤帝时代一样，元老院议员们内心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都对柏提那克斯的施政演讲表示满意。

军事经验丰富的柏提那克斯明白，自己在施政之初，必须要像在战场上一样，采取迅速行动。于是，一条又一条新政策相继出笼，元老院也都抓紧时间，审议处理。在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元老院的通过，政策是不可能成为法规的。当然皇帝有发布暂行措施的权力，但既然柏提那克斯已经表明要与元老院相互配合，所以他不想只依靠那些暂行措施，而是要想方设法地取得议会的首肯。

柏提那克斯最优先的政策是健全国家财政。这并不是说康茂德时代因挥霍无度已经入不敷出。在康茂德主政的12年里，罗马因为没有发生战争，财政方面意外地健全。后世的历史学家总是想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康茂德身上，结果把马可· 奥勒留时代对货币的偷工减料都安到了康茂德头上。柏提那克斯所说的健全国家财政，指的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降低花费。像罗马帝国这样庞大的组织，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其

自身就会不断膨胀。柏提那克斯在元老院表示，由于作出机构精简重组的计划案需要花费时间，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其具体内容将不得不等到4月21日罗马建城日才能公布。

除此之外，他有条不紊地推进着相对容易的行政举措。例如着手平反康茂德时代的冤案，为遭到处刑的人恢复名誉，返还被没收的财产等。当然，柏提那克斯也没有忘记改善边境防线上将士们的待遇。还有，对于罗马时代舆论调查的样本首都居民，新皇帝在上任之际也发放了礼金，每个居住在罗马的公民权拥有者都得到了大约100第纳尔的“赏金”。

新皇帝还明确表示不搞皇位世袭。柏提那克斯和妻子拥有一对儿女，但他并没有向妻子颁发“奥古斯塔”的称号，至于儿子和女儿，更是连皇宫都不许进。他虽然发行了刻有自己侧脸的钱币，但上面的文字却是“公民的自由”。

似乎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实力的世界正如同野生动物的世界，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在下面这件事上，柏提那克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柏提那克斯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近卫军团长官雷特立下了莫大的功劳，而雷特也正在等待柏提那克斯报答自己。具体地说，就是他想让新皇帝任命自己为埃及的长官。

刻有“公民的自由”的银币

近卫军团的长官手下有1万名士兵，在首都罗马的权力仅次于皇帝。但是，如果能代替皇帝去做埃及的长官，不但能成为这块皇帝私人领地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还能享受到权力带来的财富。官员如果在首都收受贿赂，一旦遭到揭发就有可能性命不保，而在行省，民告官的行为也已正常化。但埃及和其他行省不一样，这里是皇帝的私人领地，在这里受贿损害的只是皇帝的利益，而不是以罗马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拥有者的帝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只要皇帝自己睁一眼闭一眼，这种行为简

直算不上犯罪。很多过去的文献都有记载，某个前行省总督遭到行省人民的告发，坐在被告席上，元老院议员分成两方，一方接受原告委托提出控诉，另一方则为被告辩护。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文人小普林尼，以及公元2世纪到3世纪间的卡西乌斯· 狄奥，都经常做这种审判的辩护律师。也就是说，这种审判在罗马并不少见。可是在文献记录中，行省埃及这种民告官的审判则一例也没有。因为在帝国的其他行省由罗马公民和元老院共同拥有主权，只有埃及是皇帝的私人领地。

在罗马帝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由元老院阶级负责，经济和行政方面则是骑士阶级做主，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前两个阶层。而一般认为骑士阶级仕途的顶点就是埃及的长官，其理由之一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可以大发横财。雷特在权力方面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下一步的愿望是出任埃及长官，原因也正在这里。

柏提那克斯当然是了解这些内情的，他肯定也想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满足雷特的愿望。但是柏提那克斯同样知道自己缺乏皇帝的正统性，所以他既然已经当上了皇帝，那么下一步就只能去提升政绩，来为自己树立正统性。在柏提那克斯心里，对正统性的渴望占了上风，压倒了他本来拥有的灵活性。

新皇帝为争取敌视气氛浓厚的元老院的支持，专心致志地推行各种正当的行政措施，暂时把雷特的愿望向后推迟。大概新皇帝也有一些顾虑，如果登基后立刻把雷特派往埃及，无疑会招致元老院方面的指责。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康茂德时代的统治进行矫正是“大事”，对促成登基的功臣进行报答不过是“小事”，然而，如果皇帝不愿在“小事”上忍耐批判的话，“大事”肯定也无法实现。即使到今天，大胆改革的人也都需要具有“水至清则无鱼”的意识。

转眼3个月过去，望眼欲穿的雷特终于等不及了，开始煽动属下的近卫军。他说新皇帝柏提那克斯成了元老院的傀儡，对皇帝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大加指责。至于自己的愿望，雷特则只字未提。似乎柏提那克斯

并没有像马可· 奥勒留那样登基后立刻前往近卫军团发放特别奖金，他也把这件事向后推迟了。

现在雷特也把这一条拎了出来，指责皇帝忽略近卫军团。如果从加强权力基础的角度看，急速上升中的柏提那克斯的确是在这一点上疏忽了。

讲明道理，当面说服10个人可能算不上难事，可是当对面站了100人的时候，说服对方就很困难了，当对方达到1000人时，这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近卫军团有1万人。这也正是谣言得以惑众的原因。如果想在1万人中间掌握主动，就需要其他一些因素，人们称这种东西为人格魅力。不过，一旦错过恰当的时机，就算有什么人格魅力也无力回天。

公元193年3月28日，近卫军团士兵在雷特的煽动下，袭击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他们来势汹汹，皇帝的贴身卫队和侍从只能逃命，最后柏提那克斯只剩下孤身一人。近卫军团的一个队长一剑就刺死了在位仅仅87天的皇帝。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皇帝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总算没有卷进这起灾难。

成功除掉柏提那克斯的雷特安排的下一个皇帝，是刚从北非卸任回到首都的狄第乌斯· 尤利安。

政变的成败全都系于能否迅速造成既成事实。然而，狄第乌斯· 尤利安虽然承诺继位，但这时出现了一个竞争者。他就是柏提那克斯的岳父，元老院议员弗拉维斯· 斯皮切努斯。那么到底由谁来出任皇帝呢？这个问题只能由雷特煽动起来的近卫军团士兵来回答。

元老院认为近卫军团夺走了主导权，根据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不无嘲讽的记录，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的气氛。两位皇帝候选人站在近卫军营地的围墙下，士兵们则站在围墙上，睁大了眼睛做

见证人。帝位竞标就这样开始了。到了约定的时间，斯皮切努斯只能给每名近卫军士兵5000第纳尔，而尤利安则付出了6250第纳尔。元老院尽管愤愤不平，但最后也只能承认竞标成功的尤利安就任皇帝。

然而，皇帝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却没能得到边境将士们的承认。柏提那克斯登基时没有异议的军团面对狄第乌斯· 尤利安时，很快就有了不服的表示。其实军团兵对尤利安本人倒是并不反感，这个人完全不是那种只在首都享受舒适生活、温文尔雅、有气无力的元老院议员，在军团兵看来，尤利安和他们的总督以及军团长都是一样的。然而此时，这种“一样”却成了狄第乌斯· 尤利安的负面因素。

柏提那克斯是罗马帝国布衣卿相的典型，而尤利安的经历，则是世家子弟一路升迁的代表。

公元133年已经是哈德良皇帝主政末期，狄第乌斯· 尤利安在这一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梅狄兰姆，即今天的米兰。尤利安家是当地有名的财阀，代代都是元老院议员。

15岁举行成年礼之后，尤利安离开父母前往首都求学。作为地方豪绅的儿子，他的寄宿地点也很排场，住在马可· 奥勒留的母亲家。

在当时的罗马，这算不上稀罕的事情。上流社会的家庭有收留行省或地方豪绅子弟的传统，不但支持他们求学，而且安排他们与上层人物交流，习惯首都生活。而寄宿在皇宫的，当然都是盟国的王侯子弟。由于这是一种传统，所以寄宿的人往往不仅一两个，结果罗马很多上流家庭都弄得像学生宿舍一样。

少年时代的尤利安就这样在首都开始了求学生活。但马可比他大12岁，已经离开了家在皇宫生活，所以尤利安并不曾和当时的下任皇帝住在一起。不过马可很惦记母亲，在妹妹出嫁以后，他经常回家看望独居的母亲，所以少年的尤利安很有可能见过马可。

在罗马，只要是元老院议员的子弟，一般都会出任那种“光荣的职务”的官职，尤利安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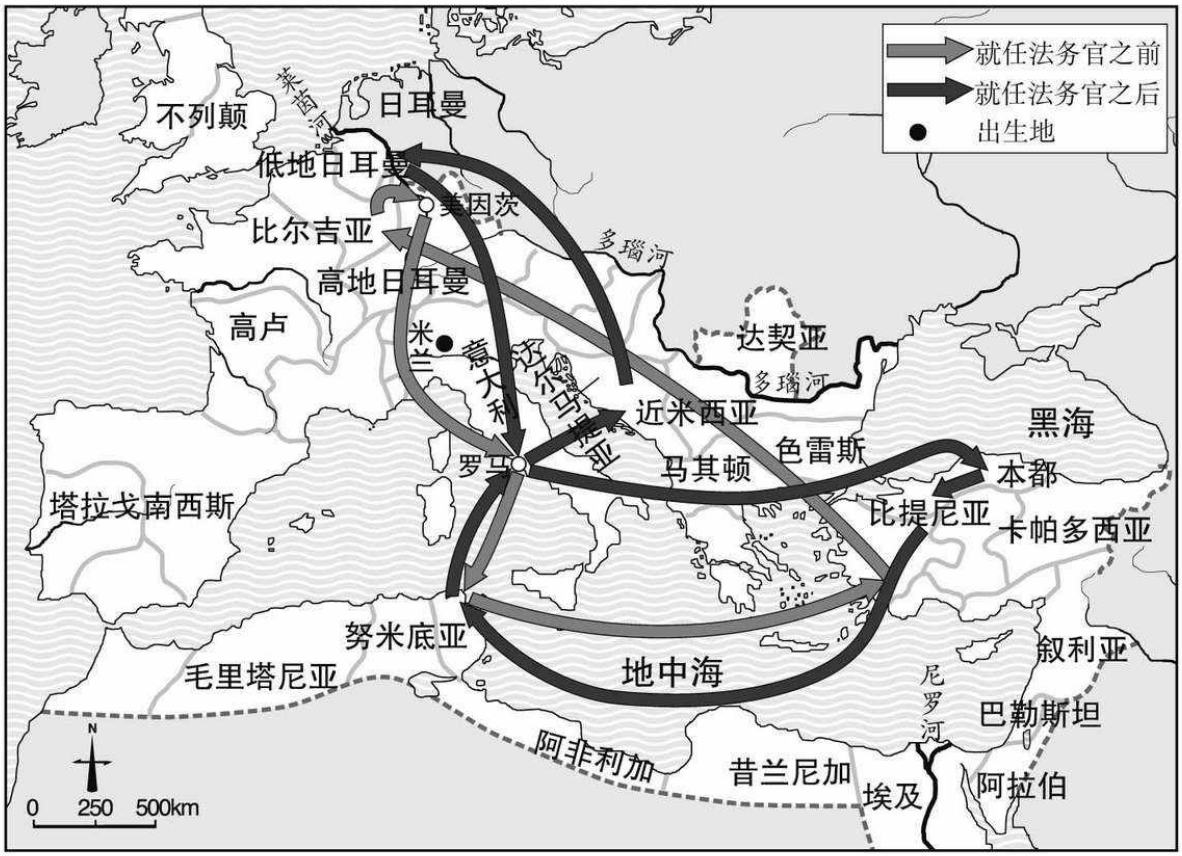
他第一个“光荣的职务”是财务检察官。任职地点在首都罗马和各行省的军团基地之间。这种官职经常调动。

然后他做了按察官。这一次是在首都，从角斗表演和四马战车比赛的策划，到食品市场的管理、取缔青楼等，都是他的业务范围。这种工作需要充分接触社会基层，虽不乏乐趣，但深奥而艰巨。

当这项工作完成时，尤利安也到了30岁，获得了进入元老院的资格。议员的子弟，只要个人品行没什么问题，一般都能获得元老院的议席。他以议员资格参选法务官并顺利当选。法务官的经历是践行下一阶段“光荣的职务”的必要条件，而这时的罗马已经进入了马可· 奥勒留时代。

有了“前法务官”的头衔，狄第乌斯· 尤利安先是被派往北非，接着是小亚细亚，后来是高卢的一个行省比尔吉亚。比尔吉亚的首府是兰斯，在今天法国的北部。尤利安在此地任职期间，日耳曼民族的一支迦提族越过了莱茵河南侵。在比尔吉亚行省本没有军团驻守，之所以能坚持到莱茵河基地援军的到来，完全是因为尤利安组织当地居民奋勇抵抗的结果。

尤利安这段时期的表现得到了肯定，旋即被任命为第二十二普利米捷亚军团的军团长。该军团驻扎在莱茵河防线上的要地莫根提亚肯，即今天德国的美因茨。狄第乌斯· 尤利安在进入政界之前就好像做过军团的大队长，现在总算升到了军团负责人的位置，手下的军团兵和辅助兵加在一起有1.2万人。



尤利安任职地点的变化

这一阶段结束后，尤利安当选为执政官。不是候补，而是正式的执政官。“前执政官”的头衔把他助推到达尔马提亚总督的位置上。这个行省虽然没有军团驻守，但隔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本土相望，也是重要的行省之一。尤利安在这里的任务应该完成得非常圆满，因为他下一个职位是低地日耳曼行省的总督。

罗马时代，帝国把重要防线莱茵河分为上游和下游两部分。上游叫高地日耳曼，下游叫低地日耳曼，行政上也分为两个行省。尤利安的赴任地点在莱茵河下游，在波恩和克桑腾分别驻有一个军团。尤利安到达首府科隆后，就成了指挥两个军团的司令官了。

此后尤利安又回到了意大利。这并不是说他作为武将的军事才能不

高，而是因为罗马帝国的人事本来就经常在军团和行政机构之间频繁调动，就如同柏提那克斯的经历一样。尤利安这一次负责管理意大利本土的粮食来源。在意大利人们以小麦为主食，基本依赖从埃及和北非进口，为了保证粮食供应，“粮食局长”责任重大。

到了康茂德时代，狄第乌斯· 尤利安的人生仍旧没有什么变化。他被任命为小亚细亚北部本都的总督，在这个濒临黑海的行省埋头于行政事务。在这种没有派驻军团的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任期往往只有一年，所以尤利安又很快平调到了西边相邻的比提尼亚行省任总督。虽然这两个行省都是元老院行省，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生活的轻松。在小亚细亚的最东边是卡帕多西亚行省，驻有两个军团，因为那里是与亚美尼亚王国相邻的边境。大国帕提亚和罗马发生龃龉的时候，往往拿亚美尼亚的王位说事。一旦帕提亚和罗马两国之间战云笼罩，小亚细亚所有的行省都将成为后勤基地。

历任如此要职的尤利安终于在公元192年，自己年近花甲的时候，获得了一份轻松的行省工作，就是在包含今天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阿非利加行省任总督。当他结束任期回到首都时，皇帝柏提那克斯遇害。于是，名门子弟、一直在“光荣的职务”上勤勤恳恳的狄第乌斯· 尤利安，在他60岁的时候，又面临着重大的人生转折。

皇位争夺战的序幕

既然帝国边境的军团开始动作，那么不是只靠政变更换首脑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军人之间针尖对麦芒，内战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193年1月1日，柏提那克斯接替了被杀的康茂德，继任皇帝，获得了元老院的承认。

同年3月28日，柏提那克斯遇害。

同日，狄第乌斯·尤利安即位，元老院也承认了。

4月9日，近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军团兵的拥戴下称帝。

几天之后，不列颠行省总督克劳狄乌斯· 亚尔比努斯同样为部下所推举，宣布加入帝位争夺战。

并且在帝国的东方，叙利亚行省总督培辛尼乌斯· 尼戈也在属下士兵的欢呼声中称帝，同时派出信使将这一消息紧急报告给元老院。

以上的顺序是依照消息到达罗马的时间排列的。维也纳的塞维鲁炮制出来的“新闻”显然比伦敦和安条克的消息更早地传到了罗马。

那么，边境军团在柏提那克斯登基时表现淡定，为什么一听说尤利安就任皇帝就立刻揭竿而起了呢？

解答这个问题的要点有好几个：

第一，军团兵对近卫军很反感。

当皇帝身在前线时，近卫军团随行保护，也承担作战任务。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近卫军团面对日耳曼诸部族作战骁勇，甚至指挥战斗的长官都阵亡数人，可见他们经常身处最前线，其勇猛甚至连军团兵都自叹弗如。

与多数来自行省的边境军团士兵相比，近卫军团是罗马军队的精锐，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薪酬和退役金也比军团兵高出三成。服役期限军团兵是20年，而近卫军团则是16年。因为是军队最高司令官皇帝的“近卫”，所以军装也非常华丽夺目。

如果军团兵看到近卫军勇敢地杀入令人望而却步的战阵，待遇方面

的差距也就不难接受了。可是在康茂德治下的12年间，却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必须由皇帝亲自督战的重要战争更是一次也没有。既然皇帝身在首都，那么近卫军团士兵自然也都驻扎在首都近郊的军营里。然而12年里，戍边的军团兵所承担的防线上的压力却丝毫没有改变。在边境军团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与蛮族的一纸和约就能保证高枕无忧。

康茂德被杀后，柏提那克斯成了皇帝，他曾与军团兵同生共死，对近卫军团并没有采取特别的优待政策。虽然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他不到三个月就死于非命，但在军团兵看来，柏提那克斯是对边境情况了如指掌的皇帝。而后来由近卫军团推举出来的尤利安则恰好和柏提那克斯相反，军团兵拒绝向他效忠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执掌军团兵的各行省总督也反对尤利安。

总督们倒不是不认同尤利安的资历，问题在于尤利安的辈分。

庞培亚努斯曾是先帝马可的左膀右臂，如果把他算做第一代的话，那么从年龄和资历上看，柏提那克斯就是第二代，因为长年以来他都是庞培亚努斯的副将。至于尤利安、亚尔比努斯、尼戈三人都出生于公元130年代中期，塞维鲁虽然还要年轻10岁，但职位级别已经到了，所以都算第三代。也就是说，第三代的四位武将都是在第一代、第二代手下积攒资历的。

在这四人中，柏提那克斯之所以没有引起反感，是因为他的上级、众人所敬仰的老将庞培亚努斯在后面支持他。

而现在柏提那克斯被杀，接下来登基的竟是和自己“一样”的尤利安！如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其他三人此时的心情，那就是：“他算什么东西？胆敢骑在我们头上！”

和人类社会的其他事物一样，实力主义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所谓

实力主义，就是问题最后仅能依靠实力去解决。

第三，就是军团兵究竟有没有资格和权利，通过推举一个人做皇帝这种方式来参与国家政治呢？

答案是当然有！

我们不要忘记，罗马国家是由城邦国家发展而来的，这也是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所谓城邦国家，就是由城市居民构成的市民共同体，由市民来掌握主权。在王政时代，负责统治的国王也是由市民选举产生的，不过罗马还创建了一套独特的体制，就是在委托“国王”治理国家的同时，又组织士绅和学者成立“元老院”，这个机构负责对国王提出建议，同时把国王的政策确定为法律。

进入共和时代以后，以前委派给国王的任务转而由执政官操办，元老院和市民的地位和职能不变。进入帝政时代以后，三者依然共存，只是以前每年选举的执政官由终身制的皇帝取代了。罗马人总是信不过帝位世袭，也是因为有着上述传统。

所以，无论是在王政时代还是共和时代，或者是帝政时代，公民权拥有者也都拥有国家主权，从形式上讲，皇帝只不过是接受元老院和公民的委托，代为实施统治的存在而已。

第二任皇帝提比略说得好，“罗马皇帝的定义不只有一个”。因为身兼最高司令官，所以士兵称之为“皇帝”，到了普通公民那里，这种称呼就变成了“第一公民”。在历代皇帝的正式名称中，都有“奥古斯都”和“恺撒”两个词，“奥古斯都”的意思是“尊贵的人”，用于平时的称谓难免有些夸张，通常人们都称“恺撒”。可是，就像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喜欢的称谓，罗马皇帝至多也就是“第一公民”。虽然皇帝不再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但公民不仅还是主权拥有者，而且仍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手段。

首先，当皇帝进入斗兽场或大竞技场时，普通公民可能会鼓掌喝彩，但也有可能发出嘘声。公民还可能游行示威，这些都是表达民意的方式。

并且，和普通公民一样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在每年1月1日举行效忠皇帝的宣誓仪式。这也是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不单纯是对最高司令官宣誓效忠，因为如果仅仅是宣誓，就没有必要每年都重复。每年的宣誓意味着皇帝和士兵之间已经缔结契约，士兵对皇帝投了信任票。因此在军团基地，每年年初都要举行这种仪式。

虽然理论上讲这种宣誓是每名军团兵根据自己的态度，由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仪式，然而就像前面讲过的近卫军团一样，煽风点火的人还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具体地说，如果军团长授意几个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那么军团的整体意愿很容易就受到左右。公元193年各地军团内部肯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最后的决定仍旧是军团整体的意志。

当得知尤利安就任皇帝的消息并需对他效忠宣誓时，军团兵们就拒绝进行这种信任投票，不仅拒绝，而且推举出了自己的司令官。这就说明皇帝狄第乌斯· 尤利安没有得到信任。即使元老院表示信任，那也是在元老院和公民这两大主权拥有者之中，只取得了单方面的支持。

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动武一条路了。从公元193年春开始，帝位争夺战拉开了序幕。我们也能从四位主角的出身地区观察出时代的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狄第乌斯· 尤利安出身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就是在叙利亚称帝的培辛尼乌斯· 尼戈。我们不知道尼戈出身于意大利的什么地方，但与元老院议员子弟的尤利安不同，尼戈属于骑士阶级。他虽然不像解放奴隶的儿子柏提那克斯那样艰难，但也绝对是在军团中经过千锤百炼才崭露头角的。这个人一直没做过什么名震天下的大事，据说元老院得知他称帝的

消息时都瞠目结舌。

不列颠行省总督克劳狄乌斯· 亚尔比努斯出身于北非的哈德尔米托姆。哈德尔米托姆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境内，追寻历史，当后来被罗马全力击溃的迦太基还是一个强大国家时，这里就已经是个港口城市了。

而近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来自港口城市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莱波蒂斯· 玛尼），位于现在利比亚境内，古代也属于迦太基，到了罗马时代被划为“阿非利加行省”。

四位主角中，有两位出身于意大利本土，两位出身于北非。在罗马帝国，出身于行省而担当要职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来自除不列颠和埃及以外的各个行省，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行省出身的人也会形成势力。学者们认为，罗马帝国的人有个共同点，即无论是出身于希腊还是出身于中近东，或者无论是出身于高卢还是西班牙，或是出身于北非，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无论是北海道人还是九州人，尽管都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但有时也的确会发生同乡结党现象。例如在五贤帝时代，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可· 奥勒留都出身于西班牙，可见当时是来自西班牙的人大显身手的时代。到了公元2世纪末，这种地域优势转移到了北非。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皇帝的5位女婿中就有2人来自北非。马可的恩师弗龙托也来自阿非利加行省的城市锡尔塔（今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在当时定员600人的元老院中，出身于北非的议员就占了两成。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情况的确会出现，不过究竟能不能抓住机会，就全靠个人能力了。

到了依靠实力争夺帝位的时代，由前任皇帝指定或者就是前任皇帝的血脉等显示出来的正统性已经没有了，在罗马帝国就是靠兵权说话。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争夺帝位的4个人的拳头大小。

尤利安——明确的支持者只有1万名近卫军团士兵，并且这1万人仅仅是支持他，并不是他直接指挥的士兵。

尼戈——负责幼发拉底河防线，手里有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叙利亚的3个军团、驻扎在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还有驻扎在阿拉伯行省即今天约旦境内的1个军团，共计8个军团，光是主力军团兵就达4.8万人。

亚尔比努斯——直属兵力为常驻不列颠的3个军团，他称帝以后对他表示拥护的还有莱茵河防线上的4个军团，共计7个军团，这样支持他的士兵就有4.2万人。

塞维鲁——其他三位竞争者都已是花甲之年，但这个人却只有47岁，是出身于北非的最年轻的总督。帝国规模最大、最骁勇善战的多瑙河防线上的军团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是驻守在日耳曼长城的2个军团、潘诺尼亚的4个军团，米西亚的4个军团，达契亚的2个军团，共计12个军团，仅军团兵就达7.2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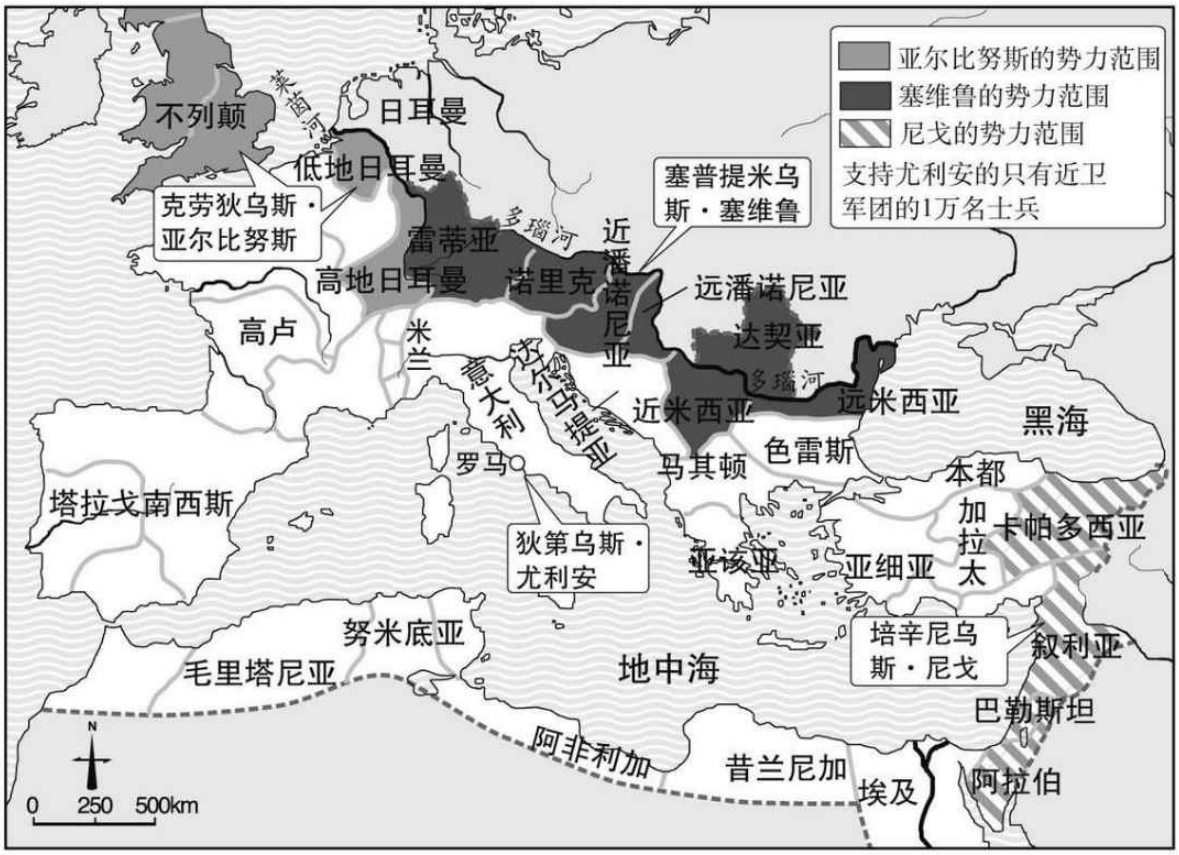
当然，这些总督都深知守卫边境防线的重要性，没有人会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内战中去。不过，就算他们不得不把半数兵力留在防线上，那么对原本兵力占优势的人依然有利。

最先展开敌对行动的是塞维鲁，这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得知了尤利安就任皇帝的消息，并且他手下的兵力也占据着压倒性优势。

不过塞维鲁并没有直接冲向首都，而是先拉拢同样称帝的亚尔比努斯。此时亚尔比努斯已经渡过了多佛尔海峡进入高卢，开始在当地扩大影响，巩固势力。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北非。塞维鲁派遣心腹赶到里昂，向亚尔比努斯提出建议，即塞维鲁愿意把“恺撒”的称号送给对方，然后两个人联手战斗。

塞维鲁的意思并不是要亚尔比努斯做下任皇帝。在罗马皇帝的正式名称中，都必然含有“奥古斯都”和“恺撒”两个称号，塞维鲁把“奥古斯都”的称号留给自己，把“恺撒”的称号送给对方，意思是要和亚尔比努

斯共同实施统治。



柏提那克斯遇害时四将的任职地和势力范围

亚尔比努斯接受了这个建议。毫无疑问，这种选择也是考虑到自己与塞维鲁之间的兵力差距。而如此一来，塞维鲁进军罗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塞维鲁知道，要想做皇帝，不但需要取得主导帝国“舆论”的首都公民的支持，而且还要获得元老院的承认。罗马过去的历史表明，控制了首都的人也就能控制整个帝国。

这位47岁的武将认为，从整个多瑙河防线集中兵力太浪费时间了，既然自己已经取得了他们的支持，那么只要率领自己近潘诺尼亚行省的2个军团开赴罗马就可以了。这两个军团分别为驻扎在维也纳的第十杰

米纳军团和驻扎在苏尼的第一亚狄托里库斯军团，加在一起有1万兵力。这个数量虽然与罗马的近卫军团旗鼓相当，但塞维鲁认为，自己在实战经验上占据上风。

进军罗马

5月，塞维鲁率领2个军团开始南下。他们从多瑙河中游流域出发，取道西南，直指首都。行军路线就是沿着渔网般铺装良好的罗马式道路前进。

一般情况下，罗马军团行军时，总有满载军粮的牛车队随行。但这一次为了加快进军速度，塞维鲁没有带军粮车，而是只让每个军团兵按惯例背负15天的粮食。如果这些给养消耗完毕，塞维鲁就从当地征调。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立刻就理解了塞维鲁的做法。从帝国边境的多瑙河到意大利本土西北部所用的时间，和从意大利西北部到罗马所用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这么说也还是不能真切地表达多瑙河防线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只要看看塞维鲁率领的2个军团，当士兵们随身背负的粮食将尽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意大利本土。

皇帝尤利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不过他手里没有直属的军团，因而手段有限。他首先要求元老院表决，宣判塞维鲁为“国家公敌”。在近卫军团方面，他通过长官雷特在那不勒斯近郊米塞诺军港征召海军和划桨手，确立起迎击态势。

可是，元老院议员们已经掩饰不住他们的动摇态度，近卫军团内部也并未就迎击一事达成一致，不管是议员还是近卫军团士兵，都对塞维鲁的进军神速感到不知所措。

面对迅速进入意大利本土的塞维鲁，拉韦纳基地的海军首先背叛了

尤利安。

同处意大利半岛，面向第勒尼安海的是米塞诺军港，其驻军管辖地中海的西半部分，是西地中海的警备总管；而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则是拉韦纳军港，其驻军负责管辖地中海的东半部分。仅拉韦纳的海军投靠塞维鲁就已经令人心惊胆战，而这一叛变也等于为敌军打开了通往首都的大门。难怪尤利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吓得面色苍白。并且，塞维鲁在进军的同时，还向罗马派出密使，企图分化近卫军团。

深感焦虑的尤利安认为，自己至少要取得民众的支持，于是就将人们深恶痛绝的近卫军团长官雷特抓住斩首了。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只是令近卫军团更加疏远自己。首都的市民们深谙内战状态下的生存之道，他们把贵重物品都隐藏了起来，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静观其变。

最后尤利安只剩一条路了。他派遣几名元老院议员做使节，带着任命塞维鲁为共治皇帝的信函，前往敌方。可是塞维鲁没有对这一信函作出回应，只是继续进军。招安的办法最终落空。

皇帝狄第乌斯· 尤利安已经众叛亲离，即便在皇宫里也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公元193年6月1日，当尤利安独处一室的时候，几名后悔与他走得太近的近卫军团士兵杀害了他。尤利安在位时间只有64天。

而此时塞维鲁已经走过弗拉米尼亚大道三分之二的路程。

得知尤利安已死的元老院立即撤销了对塞维鲁“国家公敌”的宣判，决定重新写一封邀请其登基的文件，让100名元老院议员一起送达塞维鲁。既然塞维鲁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那么议员们只需沿这条干线道路北上，就可找到他。

双方终于在小镇特鲁尼相遇。虽然这100名元老院议员仅身披白色

托加，可还是遭到了士兵的严格搜身，以防他们暗藏匕首之类的武器。当所有人都被检查过后，全副武装的塞维鲁才带着卫队姗姗来迟。这一幕预示着罗马直到公元211年，都是皇帝塞维鲁的时代。

说到被宣判为公敌却又率领军队突入本国的人，人们的头脑中立刻就回想起科尔涅利乌斯· 苏拉（《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和尤里乌斯· 恺撒（《罗马人的故事· 恺撒时代》），这两个人虽然都对同胞罗马人刀兵相向，但取胜后的态度截然相反。苏拉毫不留情地整肃了从前的对手，而恺撒则宽恕了公开反对自己的人，将他们无条件释放。现在塞维鲁效仿的是苏拉，不过他的方式又和苏拉有所不同。他认为根据具体情况，作为一种战术人也可以说谎。而苏拉则完全不能容忍谎言，如果自己的言论与事实不符，那他宁愿去改变事实。

公元164年4月11日，路奇乌斯·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出生在莱波蒂斯· 玛尼，这是一座濒临地中海的城市，位于今天的利比亚境内。

向上追溯，他们家是早在罗马战胜迦太基时就移居到北非的意大利人，不过移居来的罗马人基本都和当地人通婚，所以我们还是说塞维鲁是混血的北非人比较准确。据说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说当地的腓尼基语，不太懂拉丁语。

塞维鲁一家属于骑士阶级，虽然在罗马社会是第二阶层，但在地方城市负责行政事务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有很多都属于这一阶层。塞维鲁家似乎很富有，因为他18岁时就离开了故乡，前往首都罗马求学。当时正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

在首都接受高等教育的5年时间里，好像皇帝马可· 奥勒留发现了他。尽管这个青年出身于骑士阶级，但热衷学问的马可还是让他像元老院阶级的年轻人一样，踏上了“光荣的职务”的道路。

24岁时，他做了财务检察官。

26岁时，他被派往西班牙南部的行省贝提卡，一年里仍旧是财务检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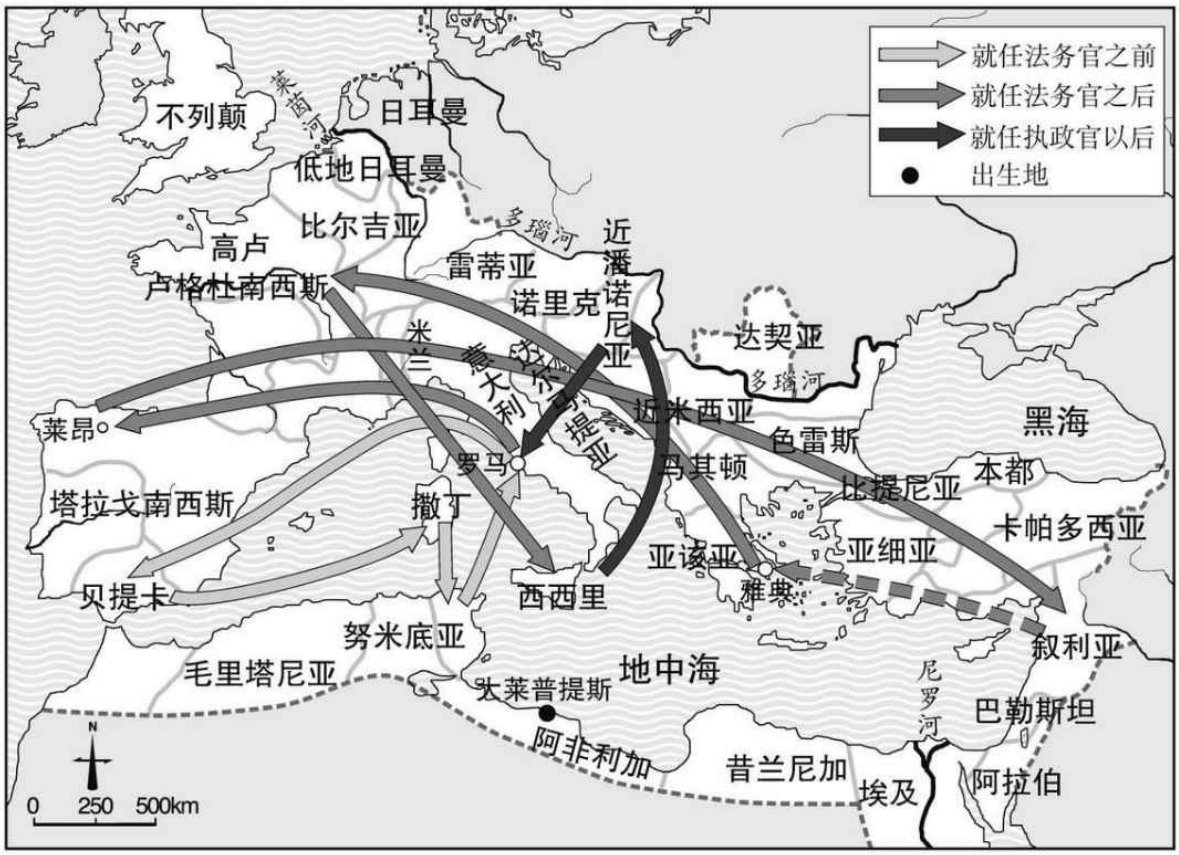
27岁时，他被派往撒丁岛工作了一年。

次年他改换任职地点，来到北非，任职地点大概在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迦太基。

公元176年，30岁的塞维鲁被选为护民官。这一官职是专门为平民设置的，可见塞维鲁的资历虽然可与元老院阶级的子弟相媲美，但仍旧被视为“骑士阶级”的人。不过在罗马社会，担任过护民官的人下一步肯定能进元老院。塞维鲁当然也不例外，有了护民官经历的他很快获得了元老院的议席。虽然他只是新来的，但毕竟是元老院阶级的人了。

应该是在进入元老院的第二年，他被选为法务官，因为从那以后他就增添了一个“前法务官”的头衔。戴着这顶官帽，32岁的他被派往西班牙。不过和上一次不同，这次他的任职地点在西班牙北部莱昂的军团基地。在西班牙卸任之后，塞维鲁第一次前往帝国的东方叙利亚行省任职。他被任命为第四西提卡军团的军团长。该军团驻扎在安条克东北方向200公里处的巴尔奇斯，是面对幼发拉底河的前线基地之一。塞维鲁在这里神经紧张地监视了大国帕提亚整整两年。恐怕连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死讯，他也是在幼发拉底河前线获知的。

康茂德继位后，不知为什么，塞维鲁没有获得年轻皇帝的赏识，逐渐偏离了帝国的仕途轨道。也有可能凡是父亲马可重视的东西，儿子康茂德都看不上眼。不过塞维鲁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赋闲之中的他尽管已经30多岁，但仍旧前往希腊的雅典求学。在雅典，有一座和埃及“博学园”（Mouseion）相媲美的帝国最高学府“希腊学园”（Akademeia），当年连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都梦想着有朝一日到这里深造，而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则亲身体验了这种生活。以前的历任罗马皇帝没有一个有“大学文凭”，塞维鲁是第一个修习了“硕士”课程的皇帝。



塞维鲁任职地的变化

到了康茂德时代后期，可能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推荐，41岁的塞维鲁重新回到了“光荣的职务”的轨道上。他被派往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任总督。这里是高卢四个行省（前面“罗马人与蛮族”一节谈到恺撒将高卢划分为6个行省，这里的4个行省应该指以高卢人为主体的行省，排除了低地日耳曼和高低日耳曼。——译者注）中最为重要的行省，首府在里昂。塞维鲁在任上待了两年，其间第二次结婚，对象是叙利亚神职人员的女儿尤利亚· 多姆娜。在里昂，他们的长子降生，即后来继承父位的皇帝卡拉卡拉。

从高卢卸任后，等待着他的职位是帝国的另一个行省西西里岛的总督。和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一样，西西里岛也没有驻扎军团。公元190年，塞维鲁当选为“候补执政官”，这时他已经44岁了。

第二年，即公元191年，获得“前执政官”头衔的塞维鲁被任命为近潘诺尼亚行省总督。这一带是多瑙河防线的最前沿，仅军团基地就有维德伯纳、卡农图姆和布里吉提欧三处，基地和基地之间还有辅助部队基地、骑兵队基地、监视据点等，沿多瑙河200公里的范围内几乎全都是防卫设施。45岁的塞维鲁的任务，就是率领3个军团死守防线。

在任上两年之后，公元192年年底，皇帝康茂德被暗杀。

康茂德之后，柏提那克斯即位，塞维鲁没有行动，当柏提那克斯也被杀，尤利安即位，塞维鲁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后来的言行，远远超出了“渡过卢比孔河”的限度。

在首都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进入首都的过程极为平和，兵不血刃，流尽鲜血的只有狄第乌斯· 尤利安。面对兵贵神速的塞维鲁，近卫军团没有经过战斗便投降了。塞维鲁要求近卫军团的士兵们放下武器，身着礼服，全部走出营区，向自己表示臣服。于是近卫军团身着华丽的甲胄，手持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来到塞维鲁及其部下面前。

突然，他们发现自己被全副武装的军团兵包围了。军团兵命令惊慌失措的近卫军团士兵脱下礼仪用的甲胄。当近卫军团士兵卸下盔甲，只剩短衣时，塞维鲁高声宣布：

“我命令你们离开首都，如果我在首都100罗马里的范围内发现你们，格杀勿论！”

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立、220年来一直都是罗马军队的精锐、光荣的近卫军团就这样解散了。塞维鲁随即将自己部下的军团兵升为近卫军。在多瑙河防线上，即便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军团兵，退役后也都

和当地女子结婚，并且辅助兵在服役期满后也都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这种权利可以世袭，所以在罗马军团的正式士兵中也有不少日耳曼血统的人。在军团兵混血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近卫军团是唯一意大利本土出身者占多数的部队。现在这支部队出现了这种变化，就和其他军团毫无二致了。意大利本土的空洞化于此可见一斑。

这场政权更替的大戏从始至终只有尤利安一人牺牲，为了强调这一点，塞维鲁在举行罗马入城仪式时，虽然有军队前呼后拥，但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却只穿着托加。尽管是便装，但为了表明他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在托加上镶有一条红色条纹，并且第二天参加元老院会议时，他仍旧是这身打扮。也就是说，虽然塞维鲁身穿和其他元老院议员一样的服装，但是他的背后总是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近卫军士兵。当元老院举行会议时，他们就守在门口。元老院议员在武装卫兵的包围下，倾听着塞维鲁的讲话。

塞维鲁的态度丝毫没有威胁的意思，他只是以极端克制的语气，简明扼要地诉说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他强调自己的行为是为帝国着想，其次，他说自己这是为柏提那克斯复仇，最后表明自己的统治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延续。接着，他请求元老院承认身在高卢的亚尔比努斯为共治皇帝。

元老院一致通过了决议。塞维鲁随后表示衷心感谢。接着塞维鲁又要求第二年即公元194年的执政官由他和亚尔比努斯两人担任。对这一要求，元老院也作了肯定的答复。

获得元老院的承认后，下一步就要争取公民的承认了。塞维鲁来到首都规模最大的图拉真广场，在上万名观众面前，高声发表演说。他还是那么举止从容，态度坚毅。他知道，民众或许对自己这样的领袖感到亲近，但是并不会为自己所倾倒。尤其是在危机到来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塞维鲁在图拉真广场上的演讲有几个要点。因为面对公众也是一种需要，相比于发表政见，更要抓住机会自我宣传。而公民也知道，无论是谁做皇帝，其职责都是一样的，用不着喋喋不休地重复。重要的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这就要看每个皇帝的个性了。

塞维鲁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一个谨慎的人所作的谨慎演讲。换句话说，他只是对一些很不具体的事情作了保证。因为到现在他只击败了一名对手，还剩下一名，不，在他的头脑中还剩下两名对手。

塞维鲁并非出身于元老院世家，对首都罗马居民而言，他完全是个陌生人。当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公众，这位47岁的新皇帝说：

> 在战场上需要刚毅果敢，但是我保证，在政治上我将严谨慎重。
>
> 我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打击敌人和反叛者，但是对于公民我要公正而温和。
>
> 在私生活方面，我要严格自律，而在公共场合，我绝不骄傲自满。
>
> 虽然不必刻意炫耀，但我是罗马公民的代表，我要保持与之相称的坦荡与坚忍，庄重而不严厉，亲切而不谄媚，与人为善，深谋远虑，真诚而公正。
>
> 通过努力，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代表各位公民的“第一公民”！

这时在旁倾听的几位元老院议员有些不满意了，批评道：“他不是说自己在雅典留学过吗？怎么还改不掉非洲口音？”然而，公众对这次演讲却很满意，甚至很热情，因为罗马公民早已厌烦了领导层那些冗长乏味的讲话。就这样，塞维鲁成功获得了普通公民的支持。

一千三百年后，马基雅弗利提出，所谓民众，就是更容易接受具体事物而不是抽象议论的人群。现在看来，塞维鲁早就谙知这种人性特点。那么，要说民众要求的具体事物，无外乎就是安全与食品。安全分为抵御外敌和维持治安两个方面，外敌已经有500年不曾入侵过首都了，罗马的居民都生活在祥和之中，所以他们所谓的安全，指的就是治安。塞维鲁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蒂斯特罗斯为“首都长官”，全权负责治安，严令他“连一个小偷都不得放过”。

据推算，首都有120万居民，作为粮食方面的具体措施，塞维鲁要求确保主食小麦7年的供应。平时这个期限是2年。塞维鲁还要求重新安排仅次于埃及的北非、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小麦收储体系。意大利本土的小麦主要来自埃及，约占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现在这个埃及似乎倾向于塞维鲁的头号敌人、叙利亚总督尼戈。如果从埃及进口粮食这条路走不通了，必将导致小麦价格飞涨，引起民众恐慌。因此维持7年的粮食储备是防患于未然的策略。

当然，塞维鲁也没有忘记军事行动。他命令驻扎在努米底亚龙柏斯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向东方进军，同时，命令驻扎在米西亚防守多瑙河下游防线的4个军团各选拔出一个分队，也前往东方。策略已经相当明确，即塞维鲁要从北非和欧洲出发，双管齐下，撼动以帝国东方为根基的尼戈。另外，尽管只是做表面文章，但是也能产生其效果，塞维鲁请求元老院宣判尼戈为“国家公敌”，元老院很快就通过了。

塞维鲁进入首都仅10多天，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速战速决不仅在战场上，在其他方面也十分有效。随后，他只带领一队全员换血之后的近卫军团士兵，离开了首都，向尼戈所在的东方进发。

通常情况下，人们沿阿皮亚大道南下，到终点布林迪西港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在希腊登陆，然后一路向东。然而塞维鲁没有选择传统路线，他从罗马沿卡萨亚大道北上，到达佛罗伦萨后翻越亚平宁山脉，然后经博诺尼亚，沿艾米利亚大道到达摩德纳。后来他就一路向北，经

维罗纳、特伦托，翻越阿尔卑斯山，直到多瑙河畔的军团基地雷根斯堡。这条道路艰难而曲折。然后，塞维鲁又沿多瑙河东进。这样他在巡视多瑙河防线各军团基地的过程中，可以亲自进行精锐部队的选拔。面对在东方拥有8个军团的尼戈，塞维鲁虽然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可以实施精兵战略。他也可以发动大军，但那样需要时间。对他而言，时间的确太宝贵了。离开首都一个月之后，塞维鲁已经到达了欧洲与亚洲的分界处——达达尼尔海峡。

对手亚尔比努斯

我还是弄不明白，当塞维鲁向东方进军的时候，为什么亚尔比努斯不抄他的后路呢？既然塞维鲁命人预备7年的粮食，就说明他认为打垮东方的尼戈需要好几年时间。虽然实际上他只用了3年，但至少在这3年里，亚尔比努斯的天地是宽阔的。明确站在亚尔比努斯一边的，有不列颠、高卢、莱茵河防线地区，现在西班牙也开始支持他。并且在公元194年的这一年里，亚尔比努斯和塞维鲁同为执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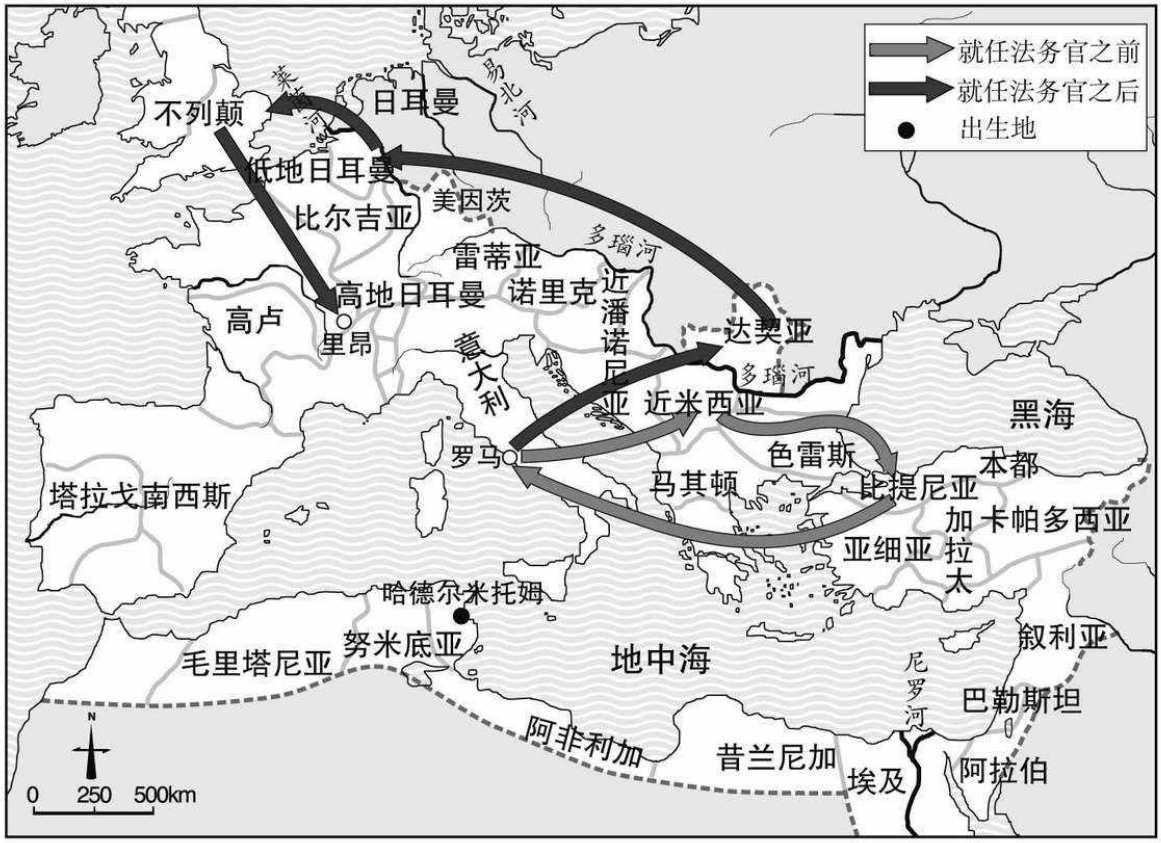
如果以执政官的名分挺进首都罗马，再加上不列颠的3个军团、莱茵河防线上的4个军团、西班牙的1个军团，共计有8个军团，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嘛！

但是这个人在部下的拥戴下，“渡过卢比孔河”称帝，接着却又踟蹰不前了。这是为什么呢？

提吉姆斯· 克劳狄乌斯· 亚尔比努斯，从姓名上看，他好像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然而实际上他出生在自迦太基时代一直繁荣至今的港口城市哈德尔米托姆，是个行省人。但是他家里世代经商，相当富有，长辈很早就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虽然不及其他元老院议员那般显赫，但也绝对算系出名门。

他30岁前后开始从军，相对较晚，有的学者认为他在那以前的时间都用于继承和打理家业了。或许是从前的经历引人注意，他入伍后只用了几年时间，就从一个行省出身的士兵做到了辅助部队的指挥官。

就在这一时期，亚尔比努斯吸引了马可的目光。在皇帝的推荐下，他也开始了“光荣的职务”，先后担任财务监察官、按察官，最后顺利进入元老院。然后又经历法务官一职，获得了指挥军团的资格。



亚尔比努斯任职地点的变化

年近40岁的他出任多瑙河防线近米西亚行省总督，这是个要职，指挥着2个随时保持临战状态的军团。3年之后，他又成了濒临黑海的比提尼亚行省总督。

公元175年，在亚尔比努斯任比提尼亚总督期间，发生了亚维狄乌

斯· 卡西乌斯叛乱。这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发生的唯一一起部将叛乱，当时比提尼亚行省和东邻的卡帕多西亚行省一起拒绝了卡西乌斯的诱惑，始终对皇帝马可非常忠诚。为表彰他的表现，在皇帝的推荐下，亚尔比努斯于公元176年就任执政官，并不是“候补执政官”，而是任期从1月1日开始的“正式执政官”。

康茂德继位皇帝后，亚尔比努斯在前线的职务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而是一直在达契亚和莱茵河防线等与蛮族对峙的地区任职。康茂德时代罗马处于和平状态，但这仅指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实际上和蛮族之间的小摩擦从未间断过。亚尔比努斯胜任职务的证据，就是在莱茵河卸任后，不列颠总督的位置在等待着他。因为有蛮族经常从喀里多尼亚（今苏格兰）越过哈德良长城入侵，所以不列颠驻有3个军团，同样时刻不能松懈。

亚尔比努斯在不列颠任职期间，康茂德遭到暗杀，之后即位的柏提那克斯也被杀，罗马陷入了内乱，于是亚尔比努斯也登上了这场历史剧的舞台。

如果从个人经历上看，亚尔比努斯绝非泛泛之辈，然而手握一把好牌的他却迟迟没有动手。如果说控制了首都就能控制整个帝国的话，那么从公元194年开始的3年间，他只要当机立断，肯定能碰到终点线。难道亚尔比努斯认为自己年近六旬，已经到了应该考虑隐退的年龄，因此而犹豫不决了吗？

或者他把塞维鲁关于共治皇帝的话当真了？或者年届花甲的他真的满足于“共治皇帝”，只要塞维鲁将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划归自己统治，他就停止脚步吗？不管怎么说，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在里昂按兵不动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人一旦“渡过卢比孔河”，那他就只能继续前进。

又一个“实力派”

我们看亚尔比努斯，尽管没有像元老院议员世家的子弟那样一帆风顺，但也不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晋升上来的。但是，现在和塞维鲁正面对垒的尼戈，虽然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却在军中千锤百炼，是个典型的实力派。

我们只知道培辛尼乌斯· 尼戈出身于意大利半岛，却不知具体在什么地方。不过他既然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就应该拥有罗马公民权，有可能属于骑士阶级。

或许是因为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可能也有骑士阶级的因素，尼戈的军旅经历是从百人队队长开始的。我们在讲述柏提那克斯时已经说过，百人队队长分四个等级，尼戈经历过所有等级，甚至两次被任命为百人队队长里的顶级“首席百人队队长”。

接着他升任大队长，先后3次任大队长一职，我们不知这些职务分别处于哪个防线，不过此后关于尼戈的记录就比较详细了，因为他成了众多重要职业军人中的一个。从这一时期开始，尼戈逐渐崭露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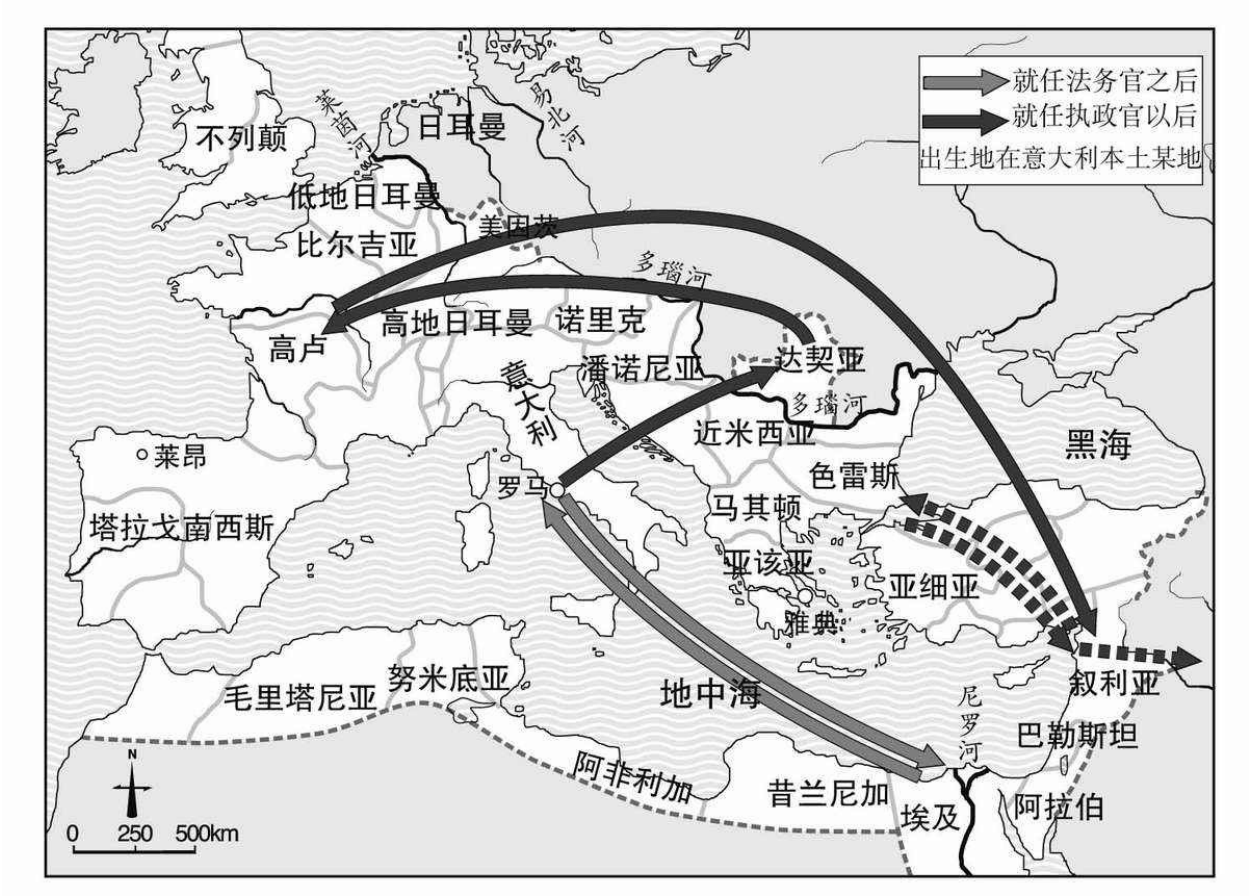
40岁时，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当时他被任命为驻守埃及的罗马军团中的“长官”，也就是说，除了军事指挥以外，他是其他所有事务的负责人。在任职过程中，终结亚维狄乌斯· 卡西乌斯叛乱的马可到访埃及，从此尼戈幸运地进入了皇帝的视野。

虽然尼戈进入元老院是由于皇帝马可的推荐，但在后面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皇帝的干将庞培亚努斯。因为从以后的经历看，尼戈之所以能进入领导层，边境上军团长和总督的职位锻炼显然比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更为重要。并且尼戈真正受到重用是在马可死后，庞培亚努斯辅佐康茂德的时期。康茂德相当尊重亡父的部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是庞培亚努斯向新皇帝进言，因为尼戈以后的工作地点都是皇帝有任命权的地

方。

而尼戈被重用为边疆要员也有着充分理由。边境的防卫不能只依靠以军团为代表的军事力量。一个人被军团兵所接受固然是必要条件，但在边疆行省并不是只有军队。罗马在每个战略要地都建立军团基地和辅助部队基地，在这些基地周围逐渐会有人群聚居，慢慢形成城市。而在边疆行省的非战略要地，也有原住民居住，有时他们和罗马军队有往来，也有的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对他们这些人都有所掌握，整个防卫体系才能固若金汤。因此在帝国防线上任职的行省总督，也要求有政务处理能力。

尼戈在这方面可谓最佳人选。当皇帝马可到访埃及时，尼戈并不是负责埃及防卫的尼克波利斯军团基地的军团长，而是其属下的军团长官，但却是埃及防卫的主导者。庞培亚努斯一生从事边境保卫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



尼戈任职地点的变化

在这种情形之下，尼戈最终进入元老院。因为年龄快50岁了，所以两年之后就获选“候补执政官”，这样才得到指挥军团的资格。皇帝康茂德于是很快任命他为达契亚行省总督。

达契亚是罗马帝国伸向日耳曼民族之海的桥头堡，此地的防卫当然不简单。除了在军事方面要坚持不懈，同时面对那些希望移居罗马境内的北方蛮族，还必须予以一定程度的满足。所以当地的居民中日耳曼裔占了压倒性多数。尼戈在如此复杂的行省担任了5年总督。

公元188年，新的任务又来了。罗马军队逃兵组成的强盗团伙袭扰高卢，而当地没有常驻军团，尼戈的任务就是恢复高卢的治安。虽然耗时两年，但尼戈将强盗全部肃清。因此得到赏识的尼戈接着被派往帝国东方。仅在叙利亚行省就有3个军团驻扎，尼戈是指挥3个军团的行省总

督。

如果把总督分为鹰派和鸽派，那么尼戈无疑属于鸽派。在叙利亚，他同样很成功。

罗马帝国总是把帕提亚王国作为假想敌，但同时认为一个稳定的帕提亚对自己也有好处。由于该王国苦于境内波斯势力明显增强，尼戈的两大国共存路线等于在侧面缓解了它的压力，因此在帕提亚王室内部甚至出现了“亲尼戈派”。

在帕提亚和罗马两大国中间，还有很多小国和小部落，为双方起缓冲作用，尼戈也和他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获益最大的，当然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在罗马帝国的东方，经济界基本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天下，在常年纷争的两个大国之间维持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状态，有助于帝国东方的社会安定。

总督尼戈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望，这同时也是他的治理成果。军团兵也拥护尼戈，主要因为两个理由：其一，尼戈并不仅仅在安条克总督官邸发号施令，而是经常巡视军团基地，和士兵们保持密切交流。其二，尼戈坐镇东方最重要的行省，为人清廉正直。这一点不但对普通士兵，就是对一般居民也同样有意义。

在尼戈担任叙利亚总督期间，康茂德和柏提那克斯相继被杀，罗马帝国陷入了内乱时代。我认为尼戈称帝，似乎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安条克军团兵的推举，而不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因为他称帝以后的所有行动，都是模棱两可的。

乍一看，能受如此拥护的人肯定非常不错，然而在乱世之中，只有那些自身有着强烈意愿的人成功率最高。因为有着强烈的意愿，目的才会明确，才会认真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相反，如果只是应周围人的要

求，那么目的就很模糊，选择手段时也会犹豫不决，所有的事情都容易半途而废。既然已经“渡过卢比孔河”，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肯定就是最糟糕的。实际上，称帝以后的尼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迟缓，即便有所行动，也往往虎头蛇尾。此时的尼戈和亚尔比努斯一样，都已年过花甲。

伊索斯平原

在帝国的西方，举事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占领首都罗马，而在帝国的东方，则看能够占领大城市安条克。塞维鲁进军罗马时虽然兵不血刃，但通往安条克的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

现在尼戈手握重兵，卡帕多西亚2个军团，叙利亚3个军团，约旦和巴勒斯坦合计3个军团，再加上埃及的1个军团，共计9个军团，只要他下定决心，这些兵马随时可以倾巢出动。因为帕提亚王国已经表示保持中立，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亚美尼亚王国甚至愿意为他提供兵力援助。也就是说，尼戈只要愿意，可以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与塞维鲁的战斗中去。

但是，尼戈采用的战略，却不是寻找时机一决胜负，而是把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尼戈决定抢在塞维鲁的军队到达亚细亚之前，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以西200公里处的培林托斯进行迎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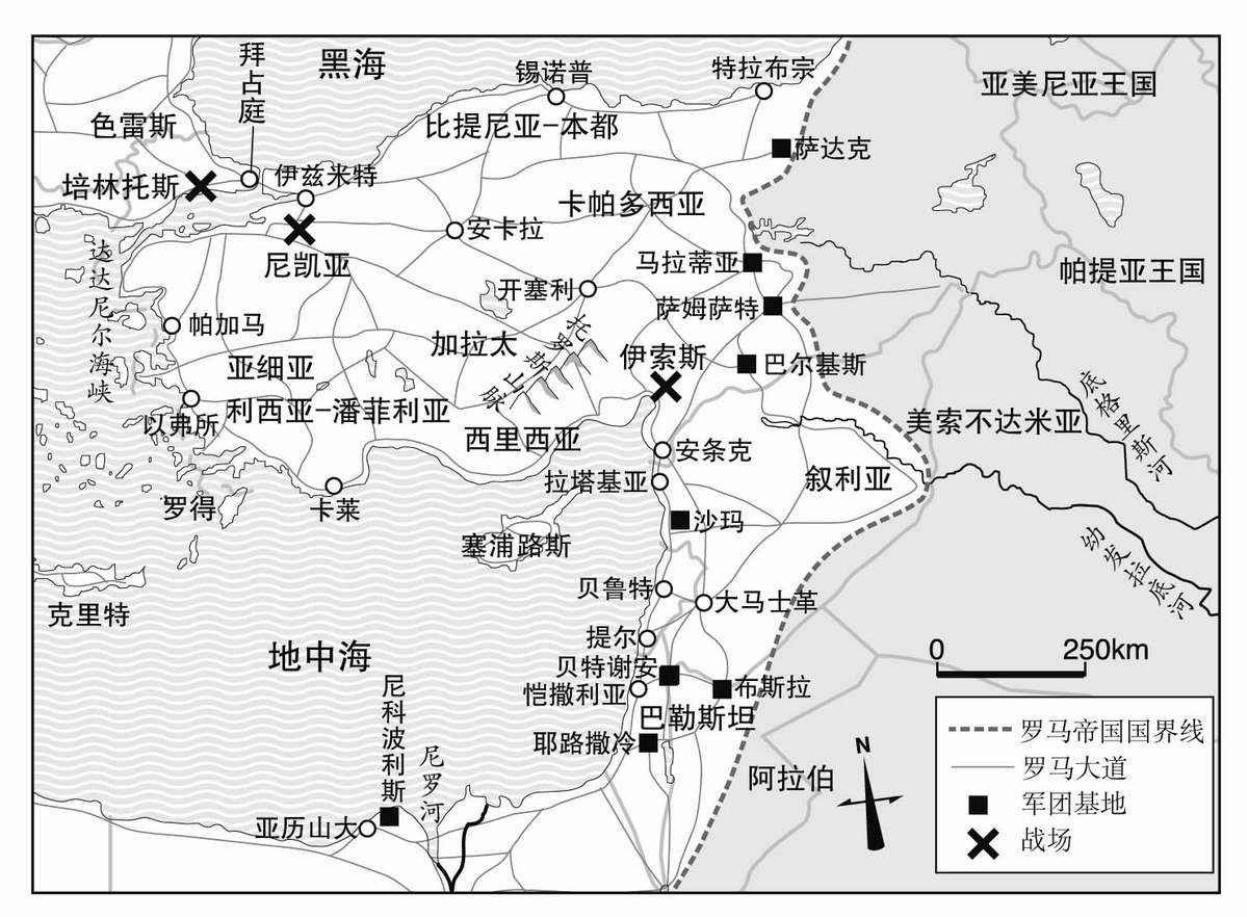
如果迎击失败就进入第二阶段——拜占庭保卫战。

如果在拜占庭再次失败，就等对方越过小亚细亚东南部的托罗斯山脉，在他们进入叙利亚行省之前迎击。这是第三阶段。

公元193年年末，双方在培林托斯展开激战，尼戈获胜。获胜后的尼戈随即给塞维鲁修书一封，提出担任共治皇帝的要求。然而，塞维鲁没有回复。

尼戈本来打算第二阶段进行拜占庭保卫战，但是他也知道这并非良策。如果敌军回避重兵守卫的城垣绕道进军亚细亚，尼戈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于是尼戈把第二阶段的战场转移到了亚细亚一侧尼凯亚附近的平原。双方于公元194年1月展开第二次战斗，结果塞维鲁方面获胜。

虽然在小亚细亚最初并不是败退而只是转移战场，但第二阶段败北的影响远超一次战斗的失利，因为这表示整个小亚细亚都落入了塞维鲁手中。这也使原本站在尼戈方面的各个军团发生扎在约旦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和驻扎在巴勒斯坦的第六菲拉塔军团就脱离了尼戈，并且叙利亚的两个城市拉塔基亚和巴勒斯坦的提尔也从支持尼戈转为支持塞维鲁。在这两个城市，本来相互对立的希腊裔和犹太裔此时却取得了一致，甚至在尼戈派面前紧闭城门。尼戈依靠个人声望打造的势力圈早早地破裂了。



塞维鲁和尼戈的对阵

事态紧急。公元194年10月，塞维鲁大军已经越过托罗斯山脉进入叙利亚，双方在伊索斯平原展开了决战。

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不知为什么，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交战双方总能选择相同的战场。在500年前，伊索斯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进行正面激战的战场。这是一片面朝地中海的平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在此往来的人们几乎不知道这里是古战场。现在对垒的双方都是罗马人，起初是尼戈方面占了上风，但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塞维鲁。

众所周知，塞维鲁和恺撒不同，战后对投降的士兵决不轻饶，并且

西方军团的士兵一直很鄙视东方军团。这样一来，对方只要没有取胜的把握就只有逃命一途了。尼戈方面的士兵作战时也当然时刻注意逃跑的时机，一旦露出破绽，马上逃之夭夭。这才是尼戈在伊索斯决战中败北的真正原因。

而且尼戈自己也在逃跑。他首先逃回了安条克，安排妻子和孩子逃往埃及，然后自己率领少数士兵继续向东。他打算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帕提亚国王寻求保护。

结果尼戈在距离幼发拉底河还很远的地方，就被塞维鲁派出的追兵赶上了。总督心想，与其被捕，还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他转过身来冲向追兵，最后被杀。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都被捕获。但塞维鲁只是在形式上判处他们流放。因为尼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同样以清廉闻名，人们转而开始同情他们的遭遇。就这样，塞维鲁顺利地清除了一个对手。

尼戈垮台后，塞维鲁继续挥军东指，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只是对倾向尼戈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进行警告，防止他们得寸进尺。在帕提亚组织反击之前，塞维鲁已经撤回罗马境内。可以说这不过是一次示威而已，加深帕提亚方面尼戈战败的印象。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塞维鲁重新组织了帝国东方的防卫体系。公元196年夏，塞维鲁离开了安条克。他沿着来时的路线，自多瑙河下游走向上游，逐一视察防线上的所有基地，然后瞄准了西方。

只有到这个时候，身在里昂的亚尔比努斯可能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掌握了东方军团的塞维鲁兵力比三年前增加了一倍，而亚尔比努斯方面的力量则减少了二分之一。当帝国在西方得知尼戈败北的消息，莱茵河防线上的4个军团脱离了他的阵营。结果亚尔比努斯手里只剩下自己总督时代直属的不列颠3个军团以及西班牙的1个军团。塞维鲁当然不

会放过这个机会。

尽管塞维鲁给人的感觉是顺势一刀，但双方于公元197年2月19日在里昂附近平原展开的战斗却始终异常激烈。这是罗马军队主力的军团兵之间进行的正面作战，而且一方是多瑙河的边防部队，另一方也毫不逊色，驻守不列颠的军团兵以实战经验丰富为傲。军团里虽然指挥官调动频繁，但百人队队长以下的军团兵直至服役期满，20年里往往都在一地度过。因此罗马军队对当地出身的人并不抵触，具体到多瑙河边防部队多为日耳曼血统，而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兵体内则多流着不列颠人的血。他们同样都是经过严酷训练的罗马战士，塞维鲁和亚尔比努斯也都亲自指挥战斗，因此战斗当然从始至终都很激烈。

可是，战斗结束时，获胜的却是塞维鲁。亚尔比努斯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选择自尽。据说塞维鲁还驱马践踏亚尔比努斯的遗体。尽管两人都出身于北非，但塞维鲁依然毫不留情。

将不列颠的3个军团完成改编后，当年6月，塞维鲁返回首都罗马。51岁的他成了唯一的胜利者，也是唯一的皇帝。

不管怎么说，内战毕竟是悲剧。对死去的人而言当然是悲剧，对国家（共同体）而言也同样是悲剧。如果没有内战，那么多能为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就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场战斗的失败而沦为冤魂。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了马可· 奥勒留，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内战是最大的危害，为此他宁愿采取罗马人所难以接受的帝位世袭制度。

内战就如同一个人伤害自己的身体，然后让鲜血流淌。出血即使不会造成死亡，但肯定会造成体力的衰退。当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以后，采取了宽容（clementia）的态度，这是与他敌对的元老院顽固派都知道的事实。小加图和布鲁图认为，一个罗马公民对其他众多罗马公民行使宽容正是对共和精神的背叛，因此他们都批评恺撒只不过是在寻求自我满足罢了。然而这是他们没有理解恺撒的内心。恺撒想的是因自己渡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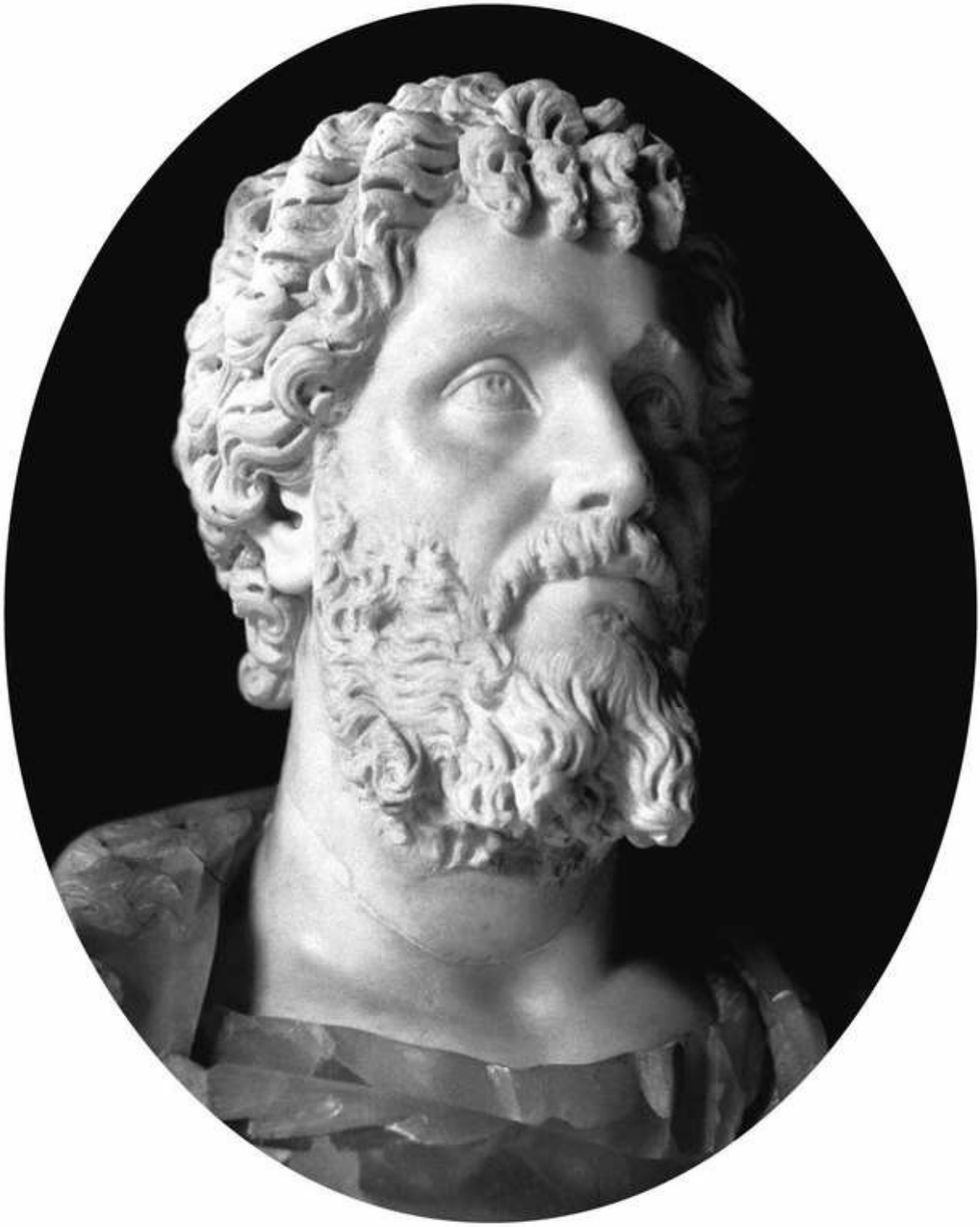
卢比孔河引发的内战，损失了很多优秀人才，只要有可能，恺撒就要尽量挽救一些生命，让流血也尽量少一些。这并非是多愁善感，而是冷静观察事实就能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塞维鲁当然也理解内战的危害，不过，理解是一回事，至于如何贯彻则需看个人资质了。

第四章

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

（公元193—211年在位）

.



皇帝尤利安被杀后，路奇乌斯·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于公元193年6月进入首都称帝，随即获得了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承认，所以说他是从公元193年开始执政的。但是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却不得不和对手尼戈以及亚尔比努斯进行战斗，所以我认为还是把他的主政时间从公元197年6月开始算比较恰当。这并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公元197年之前，塞维鲁因为受到两个对手的牵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见实施统治。可是，当他于公元197年在元老院发表演讲时，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都比公元193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塞维鲁直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然后一丝不苟地加以推行。不过他的做法却吓坏了元老院。

据当天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记载，皇帝塞维鲁讲演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他自命为马可· 奥勒留的继承人，所以要求在正式名称中加入“马可”和“奥勒留”两个词，以及皇帝马可的家门名“安敦尼”。

元老院并未觉得皇帝塞维鲁的做法有何不妥。尽管塞维鲁就如同其他三个帝位竞争者从未存在过一样，不但没有提到他们，甚至连柏提那克斯都没有言及。可在元老院议员们看来，塞维鲁的意思也许要让持续了4年的内乱全部成为过去，一切都从现在重新开始。因为马可· 奥勒留时代是皇帝和元老院相互配合管理帝国的时代，元老院当然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然而，塞维鲁接下来的话却像对议员泼了一头冷水。

塞维鲁要求元老院撤销在康茂德遭暗杀次日，由元老院对其作出的“记录抹杀刑”。

这等于让元老院否定一项已经生效的决议，是明显损害元老院威信的要求。可是当元老院面对手握重兵、接连击溃所有竞争对手、取得丰功伟绩的最高统治者，既没有抗争的意志，更缺乏制约的手段。并且，

在康茂德被杀后，元老院对接二连三出现在皇位上的人都予以承认，这种事实早已令元老院的权威摇摇欲坠。

塞维鲁当然不是欣赏康茂德，也不是对其英年早逝怀有同情之心。相反，早在17年前，康茂德对年长于自己15岁的塞维鲁相当冷淡。塞维鲁之所以要求为康茂德恢复名誉，是因为塞维鲁已经自称为马可· 奥勒留的继承人，那么康茂德又是哲学家皇帝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就不能一直接受对罗马精英来说最为屈辱的“记录抹杀刑”的处罚。如果对这一情况视而不见的话，那就等于说自己和康茂德都是一路货色。

元老院之后撤销四年前的宣判。草草埋葬的康茂德的遗体也重新得到了罗马式的火葬，然后与哈德良以后的历任皇帝一样，被置放于今天名为“圣天使堡”的哈德良陵园。不过，康茂德并没有被神格化。如果将其神格化，元老院就真的威严扫地了。塞维鲁没有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康茂德根本就不具备那种资格。在这一点上，皇帝和元老院倒是维持了一致意见。

不过，当塞维鲁又提出下面的要求时，元老院才领悟到他自称马可· 奥勒留继承人的用意所在。塞维鲁要求元老院承认他的儿子卡拉卡拉为“ImperatorDisignatus”。如果把这句拉丁语直译过来的话，只能是“既定皇帝事务参与者”，而不是“共治皇帝”的意思。因为不管怎么说，卡拉卡拉才8岁，距离成人礼还有四五年时间，无论怎么提拔也不能指定为皇位继承人。

在共和时代的罗马，传统上是在夏天进行下任执政官选举。当选的人获得“Consul Disignatus”称号，距离实际进入任期还有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每当元老院举行会议，发言权首先在现任执政官手里，现任执政官发言过后，接下来发表意见的就是这个“Consul Disignatus”。塞维鲁为了表明他让当时年仅8岁的儿子世袭皇位的意愿，重新挖出了这个共和时代的官名。既然卡拉卡拉获得“Imperator Disignatus”的称号，尽管还没有到举行成人礼的时候，在元老院的会议

上也拥有了发言权。

从那以后，不论是壁画还是浮雕，或者是钱币，塞维鲁都把自己和夫人尤利亚· 多姆娜以及两个孩子卡拉卡拉和盖塔的形象体现在上面。他还设计了很多包含有家人在内的全家福肖像，总让人觉得其不无英王室官方照片的做派。

元老院议员们当然感觉到了塞维鲁帝位世袭的意图，然而却无可奈何，因为塞维鲁当天演讲的第二个主旨，已经直接冲击到他们个人。

塞维鲁身材中等，但体格强健，经常是一副严肃的表情，甚至人们几乎记不起他的笑容。这一天他依旧是那副严厉的面孔：

> 帝国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改革的时候，否则将积重难返。我们需要像马略（公元前157—前86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在朱古达战争及其他击退外敌的战斗中屡立战功，7次就任执政官。完成军事改革，创建募兵制。与苏拉对立，肃清苏拉派，但不久病死。——译者注）、苏拉以及奥古斯都那样，扯下反对派的假面具，对他们进行严厉处罚。

塞维鲁说完后，提交了第一批26名元老院议员的处罚名单。

马略和苏拉相互整肃，每当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占了上风，都会导致其反对派人头落地。但是后人往往不解，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 恺撒一样被人称为“神君”，为什么塞维鲁此时也把奥古斯都拿来说事呢？

实际上，奥古斯都在屋大维时代，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整肃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安敦尼以及暗杀恺撒的布鲁图一派，正是他将西塞罗列为清洗名单中的首要分子，其实后者仅为反恺撒派的精神支柱。从这一点上看，把奥古斯都与马略以及苏拉相提并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生怕漏

掉塞维鲁讲话一个字的元老院议员们当然也谙知个中曲直。

但是，称列入名单的26位元老院议员反对皇帝，或者说他们反对罗马帝国，则完全是冤枉的。他们被塞维鲁指责为亚尔比努斯派。

这个理由相当牵强。因为亚尔比努斯直到受到塞维鲁进攻之前，一直接受着后者赠送的“恺撒”名称，说起来还和塞维鲁一样，都是共治皇帝。以与此人过从甚密为由就判为反皇帝罪，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据说在这26人中，出身于北非的占了大多数。和塞维鲁一样，亚尔比努斯也来自北非，北非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当然拥护同乡做皇帝，和他们两人中的某一个密切往来也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对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而言，只有存在利用价值时，同乡才是同乡，如果一个人没有利用价值甚至成为一种障碍，那塞维鲁肯定翻脸来攻打他。塞维鲁只需要绝对服从自己的人，并且如果一个人非要等塞维鲁提出“绝对服从”要求时才绝对服从他的话，就已经太迟了。这使包括卡西乌斯· 狄奥在内的众多元老院议员心情极为沉重。他们总觉得塞维鲁和以往的罗马皇帝们有些不一样。

尤里乌斯· 恺撒曾经给自己政治上的反对派西塞罗写信，其中有下面这样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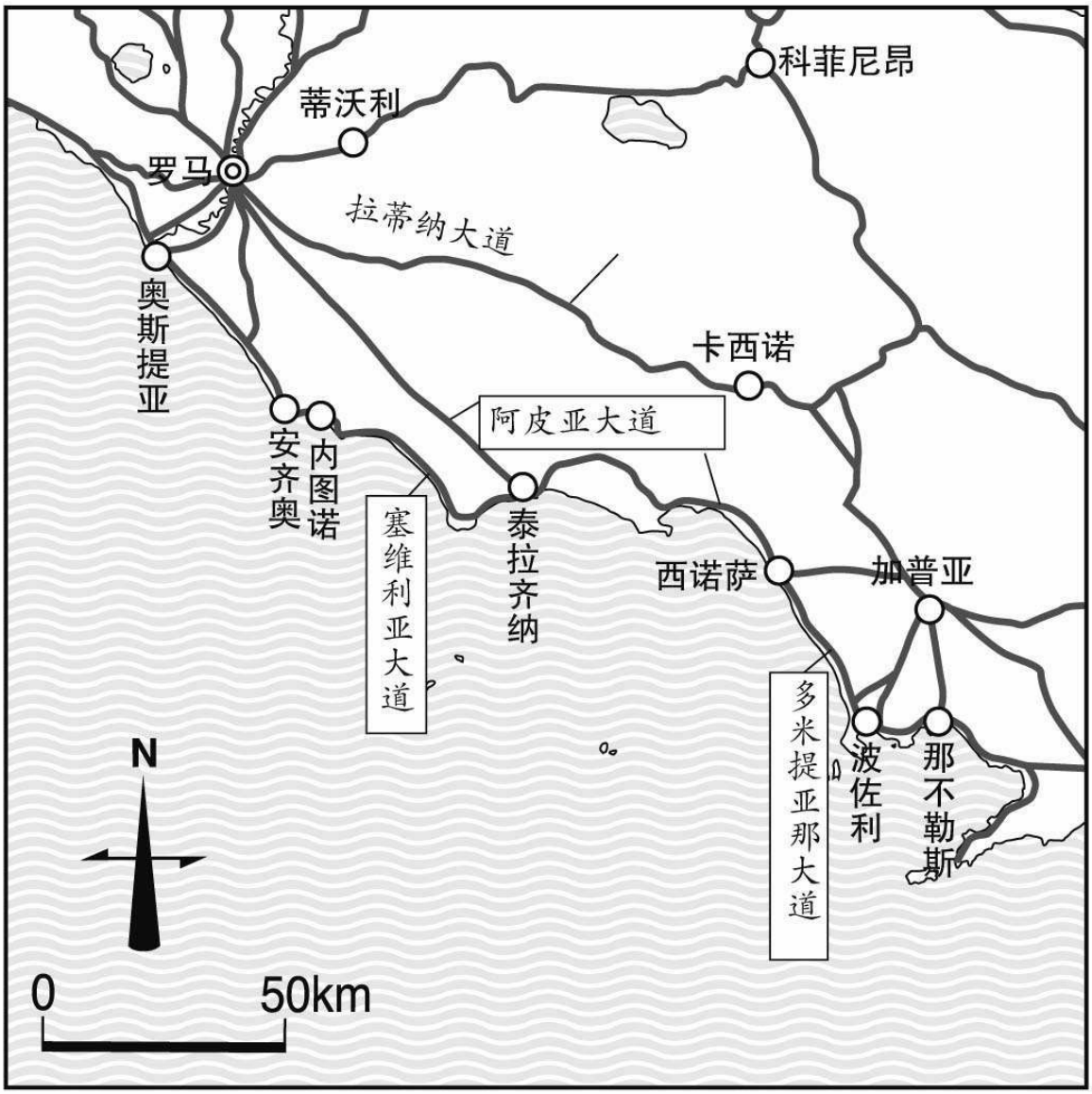
>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人生要忠诚于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认为别人也都是这样的。

奥古斯都虽然整肃了西塞罗，但没有阻止西塞罗全集的刊行。这套著作集由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与西塞罗的助手两人共同编辑，其中对恺撒遭到暗杀后的权力斗争，以及年仅20岁的奥古斯都如何巧妙地刺激西塞罗的虚荣心等都作了生动描写。尽管如此，奥古斯都仍未禁止其刊行。如果奥古斯都将其列为禁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可能读不到西塞罗的著作了。附带一提，日本也终于翻译了西塞罗全集，由岩波书店

出版发行。

即使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人之间的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证。当年马可·　奥勒留也曾写到自己遭受过批评，说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伪善”、“好为人师”。

皇帝是唯一的最高掌权者，罗马是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同时这个社会却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通融。但是现在，这种状态却恶化了。对反对派的宽容态度本是强大自信的证据，难道塞维鲁不具备这种宽容吗？还是他认为如果允许这种宽容存在，社会将变得不可收拾？



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主要道路

不过，塞维鲁仍旧坚信自己是个忠实于传统的罗马人。

为了和广大罗马公民一起共同庆祝卡拉卡拉地位的明确，他不惜花费，在斗兽场和大竞技场举行了盛大的角斗表演和四马战车比赛。并且他还热衷于公共事业。罗马人不称公共事业为“城市基础设施”，而是称为“能使人生更美好的伟大事业”。虽然安敦尼· 庇护和马可· 奥勒留两位

皇帝曾经搞过一些维修工程，但罗马的确有30年之久没有上马新的建设项目了。塞维鲁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沿着海岸修建了一条通往泰拉奇纳的“塞维利亚大道”。

从罗马到泰拉奇纳早已经有了一条阿皮亚大道，因此铺设塞维利亚大道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在沿海一带拥有别墅的权贵们往来。并且在这一带，有着安齐奥、内图诺以及奥斯提亚等适合于船只避风的良港。如果满载小麦前往奥斯提亚的船只遭遇风暴，可以在这些避风港靠岸，如果道路完善可以就地卸货，然后经由陆路运走。

这样，沿罗马以南的海岸线就都有这种石板铺就的罗马式“高速公路”了。从奥斯提亚到泰拉奇纳的是“塞维利亚大道”，从泰拉奇纳到西诺萨的是“阿皮亚大道”，从西诺萨到与奥斯塔亚齐名的商港波佐利，再到那不勒斯的是“多米提亚那大道”。既可以运送物资，也有利于人员往来。这条塞维利亚大道是罗马铺设的最后的道路工程。

两年以后，塞维鲁又在罗马广场的中央修建了一座凯旋门。罗马广场是市中心，这座凯旋门也是皇帝在此地修建的最后的建筑。另外，塞维鲁还修建了大浴场，因为直到他儿子卡拉卡拉当政时期才完工，所以叫“卡拉卡拉浴场”。该浴场极尽奢华，甚至附设有图书馆，罗马南部的居民都亲切地称之为“平民的宫殿”。这的确是塞维鲁送给平民的礼物。但在塞维鲁看来，公共建设是罗马皇帝的职责，自己既然身为罗马皇帝，这也只不过是履行职责而已。

卡拉卡拉浴场（复原模型）

当然，皇帝的另一个职责，或者说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保障帝国的安全。塞维鲁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且他的措施非常彻底，与其他历任皇帝的做法迥异，甚至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进程。

军人皇帝

看下页表可以得知，塞维鲁强化军事力量并没有采用增加军团数量的方法，而是提高所有作为主要军事力量的军团兵的待遇。首先就是上调年薪。尽管通货膨胀已经一点一点缓慢出现，但到公元2世纪末的这一时期，仍旧没有到必须采取应对策略的地步。因此塞维鲁给保障罗马安全的军团兵提高薪酬，可以视为和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图密善一样，是一种提高军团兵地位和待遇的政策。不过，从图密善皇帝时开始，提高的那一部分都存在军团内，等士兵服役期满时再一起支付给他们。但

塞维鲁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即直接将提高的部分反映到每个月的薪酬数额中。不言而喻，士兵们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当然更加满意。

提高地位和待遇的第二个办法，是赋予全体军团兵戴黄金戒指的权利。以前只有百人队队长以上的军官和骑兵才拥有这种权利。在罗马时代，戒指这种东西不仅是装饰品，更是一种印鉴。因此，戴上黄金戒指或金镶玉戒指，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地位的确立。

第三，即使是普通士兵，只要有能力或取得了某项成绩，就可以打开通往百人队队长或骑兵的道路。正如同塞维鲁的那些帝位争夺者所经历过的那样，在罗马军团里通过努力可以做到步步高升。不过这种情况虽然不少见，但只有出类拔萃或鸿运当头的人才有望获得这种机会，并没有制度化。现在塞维鲁将其形成制度，编入罗马的军事管理体系里。

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及部署变化（单位：军团）

	行省名	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公元14年）	提比略—尼禄时代（至公元70年）	韦斯帕芗—图拉真时代（至公元117年）	哈德良时代（至公元138年）	奥勒留时代（至公元180年）	塞维鲁时代（至公元211年）
莱茵河防线	Britannia（不列颠）	0	3	3	3	3	3
	Germania Inferior（低地日耳曼）	4	4	2	2	2	2
	Germania Superior（高地日耳曼）	4	4	2	2	2	2
	Limes Germanicus（日耳曼长城）	0	0	0	0	2	2
	小计	8	8	4	4	6	6
多瑙河防线	Pannonia Superior（近潘诺尼亚）	3	3	4	3	3	3
	Pannonia Inferior（远潘诺尼亚）	0	1	2	1	1	1
	Dalmatia（达尔马提亚）	2	0	0	0	0	0
	Moesia Superior（近米西亚）	0	3	2	2	2	2
	Moesia Inferior（远米西亚）	0	3	2	3	2	2
	Dacia（达契亚）	2	2	1	1	2	2
	小计	7	12	11	10	10	10
幼发拉底河防线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	0	0	2	2	2	2
	Syria（叙利亚）	4	4	3	3	3	3
	Palestina（犹太·巴勒斯坦）	0	0	1	2	2	2
	Arabia（阿拉伯）	0	0	1	1	1	1
	小计	4	4	7	8	8	8

	行省名	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公元14年）	提比略—尼禄时代（至公元70年）	韦斯帕芗—图拉真时代（至公元117年）	哈德良时代（至公元138年）	奥勒留时代（至公元180年）	塞维鲁时代（至公元211年）
	Aegyptus（埃及）	1	1	1	1	1	1
	Africa（阿非利加）	1	1	1	1	1	1
	Hispania（伊比利亚半岛）	1	1	1	1	1	1
	合计	22个军团（加入机动部队为25个）	30个军团	28个军团	28个军团	30个军团	30个军团

每个军团包括：
Legionaris（军团兵）——主力（6000人）
Augiliaris（辅助兵）——辅助战斗力（人数与军团兵大致相同）
Numerus（不定期服役兵）——监视敌人（1000人）
另外，还有海军部署于地中海、多瑙河、莱茵河、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地。

罗马军团兵（人）年薪的增长

	第纳尔银币	塞斯特斯铜币
共和时代	70	280
尤里乌斯·恺撒提薪后（公元前45—）	140	560
奥古斯都提薪后（公元前30—）	225	900
图密善提薪后（公元82—）	300	1200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提薪后（公元197—）	375	1500

·第四，军团兵可以结婚。

公元前2世纪末，马略实施军事体制改革，以往罗马军队实行征兵制，因此已婚士兵甚至有子女的士兵并不罕见。当时的战争往往从春天开始，持续到秋天，到了休战期，有的军团兵就回家了。不过，随着罗马统治版图的扩大，战争地点也越来越远，军团兵秋季回家春季再来的做法开始行不通。另外，流进城市的下层贫民也需要实施救济，于是马略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

可是对军团而言，募兵制意味着职业军人的出现，军团士兵由年满17岁并通过了种种考试的人组成，直到服役期满的20年间保持未婚状态成为从事这项职业的一种义务。

这项义务对军团兵而言并不算苛刻。一个人如果17岁入伍，退役时也不过37岁，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之所以比较短，主要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很高，实际上在罗马时代，40岁以前都是开创第二段人生的绝佳年龄。此时退役，和以前就暗暗往来的相好正式结婚，以退役金做本钱，老兵由此进入第二段人生。即使在服役期间，罗马军队也承认士兵的女人，所以她们都在军团基地附近的“卡纳巴埃”地区居住，每到休息日都等待着自己的男人到来，甚至还有不少人生了孩子。

不过塞维鲁尽管允许军团兵正式结婚，但还是不许百人队队长以下的军团兵和妻子同居。士兵们必须像以前一样，和战友们在基地内共同作息。当每天训练作战之余的几个小时，或者到了祭典等节假日，士兵才可以回家与妻儿团聚。所以说，塞维鲁这种允许士兵结婚的改革，只限于法律层面。尽管如此，士兵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和军官平起平坐了。不，实际上比军官的地位更高。在帝政时代，带家属随军的都是军团长或总督，大队长级别的人就会被频繁地调来调去，基本都是单身赴任。正因为这种情况，塞维鲁的改革自然会受到军团兵们的欢迎。

意外的结局

毫无疑问，皇帝塞维鲁是为了强化罗马的军事力量才推行这些措施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措施非常人性化，提高了保障帝国安全的士兵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受到了广泛拥护。塞维鲁的出发点当然是善意的，不过早在25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说过：

> 很多事情尽管结果很糟糕，但是当初的意图都是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

塞维鲁的改革，使军团生活过于舒适了。薪酬上调，提升有望，还给了以前暗中往来的女子以正式的名分，所有这些都不必等到20年服役期满就可以得到，因此军团兵也就不必苦苦等待退伍。以前边境形势紧张，上级一旦要求士兵延期服役，往往引发可能导致哗变的抵制行为。而现在这些危险都烟消云散了。士兵延期服役当然也都有报酬，并且随着服役期的延长，退役金也会增加。换句话说，只要体力允许，永远在基地里生活都没什么不合适的。

这就是罗马政权军事化的开端。士兵们满足于军人的身份，退伍开创第二段人生的意愿出现衰退，造成罗马的军人与社会脱节。

尤里乌斯· 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以后，推行过很多国家改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地方城市议会议员的选举。当时规定了下列条件：

一、未曾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才可参选

二、在军团中做过步兵的——23岁以上即可参选

三、做过骑兵或者百人队队长的——20岁即可参选

这是为那些在服役期间因伤病而不得不退伍的军人安排的救济政策，而对于那些服役期满回归社会的人，这种规定也是一种奖励。天才的尤里乌斯· 恺撒认为，罗马军团是从土木工程到医疗机构等各项事业

都积极参与的集团，在军团中获得技术和经验的人在民间社会也同样大有用武之地，而这种政策也能使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自治体”提高效能。

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萧规曹随，把服役期定为20年，创立了古代世界史无前例的退役金制度，使军人回归社会的道路更加顺畅。如果军人和社会脱节，不但对军人自身不利，而且还会使社会出现扭曲。因为孤立的人更容易相互勾结到一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打破社会平衡，使形势失去控制。

但是现在塞维鲁只重视两方面中的一个，这就打破了自恺撒以来军民维持了250年的均衡关系。我们相信塞维鲁是为了罗马帝国才推行这些措施的，但是从塞维鲁死后的现实看，其效果完全和皇帝的意图背道而驰。

军人和社会脱节造成自身的孤立，不难想象，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致力于强化自己的组织，具体而言就是增加军费。这当然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这种倾向本来是所有组织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因为军方拥有武力，一旦偏离正轨就很难纠正。

塞维鲁对军团兵的优待政策，也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十分常见的情况，即善意的出发点其实未必导致圆满的结果。不，或许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由不乏恶意的冷静促成的成功和充满善意的盲动导致的失败相互弥合而成的。善意且有效的措施往往只限于那些立竿见影的举动，比如慈善事业。我有时认为，如果我们都只能直面人性的现实，那么越熟悉历史就越容易陷入悲观。

总之，历史学家们对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的评价是“非罗马式的专制君主”，是罗马政权军事化的始作俑者。

罗马皇帝被评判为昏君的不在少数，可是说一个皇帝“非罗马式”，

塞维鲁则是第一个。罗马人所谓的“非罗马式”，指的就是“东方式”，但元老院提出的这种批评无疑是因为塞维鲁的妻子也即当时的“奥古斯塔”尤利亚· 多姆娜是叙利亚神职人员的女儿。实际上她是第一个登上罗马帝国皇后宝座的东方人。

尤利亚 • 多姆娜

尤利亚· 多姆娜面容姣好，富有教养。她可能是在塞维鲁驻在叙利亚时期嫁给他的，不过这肯定不是一桩政治婚姻。如果说塞维鲁在高卢总督时代就觊觎帝位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娶一个可能招致元老院和首都公民疑虑的东方女子。然而塞维鲁即位之后，马上毫不犹豫地明确了妻子的皇后资格。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塞维鲁都不曾有过绯闻，就如同马可· 奥勒留一样恪守着一夫一妻制。和恺撒、苏拉或奥古斯都相比，200年后的罗马统治者在生活方面似乎更加循规蹈矩。

尤利亚· 多姆娜的父亲所信奉的宗教崇拜太阳，这种宗教从远古时起就在中近东流行，是一神教的一种，但又不排斥其他诸神，所以和犹太教或基督教那种一神教又有所不同。尤利亚· 多姆娜出身在一个世代都是神职人员的家庭，她自己则精通希腊文学和哲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和“硕士”出身的塞维鲁琴瑟和谐。

元老院中潜伏着一种反塞维鲁的情绪，议员们指责皇帝受了东方皇后的影响，可是，元老院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尤利亚· 多姆娜并没有在帝国的首都建造供奉太阳神的神殿，甚至连这种愿望都没有。在罗马人的宗教意识里，只要不怠慢诸神，那么个人信仰则是自由的。在这一点上，皇后简直无懈可击。

并且，尤利亚· 多姆娜成为第一夫人以后，并没有和那些喜欢传闲话耍阴谋的上流名媛贵妇混在一起，而是加入到法学家和文人们组成的圈子。可能她希望通过自己去淡化丈夫甩不掉的军事色彩。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在皇宫沙龙里的常客，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声名远扬的大学教授，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里面没有一个是野心勃勃寻找机会的新锐。所以我们说尤利亚绝对是生活中的“VIP”伴侣，是皇帝的贤内助。

尽管人们喜欢津津乐道尤利亚对丈夫的影响力，但塞维鲁自身的性格相当坚定，绝不会轻易被女性所左右。另外，罗马人所谓的“对男人的影响”指的绝不是正面影响。据说后来尤利亚妹妹的女儿，即尤利亚的外甥女们触碰了这一禁忌，当然也有可能是元老院反感这些女人，有

意识地把她们说成是影响帝国高层的叙利亚势力。在丈夫塞维鲁在世的时候，尤利亚的生活还比较幸福，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自杀，所以也是悲剧性人物。而悲剧的起因，则在于她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法上。

无论是倾向于罗马的学者还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专家，在塞维鲁的宗教方面，尤其是他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都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罗马派史学家指责他受了妻子崇拜太阳神的影响，打开了一神教的大门。而基督教方面则认为，在塞维鲁主政前半期，他容忍基督教徒组成自治体，即使身边的人信奉基督教也没有被看成是问题，可是到了他主政后期，他的态度出现了倒退，和以前的皇帝们一样，即使人们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但禁止传教，以至于使人不由得怀念康茂德时代。因为康茂德不理朝政，也就没有出现过针对基督教徒的检举和宣判。而随着塞维鲁本人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各行省总督的态度自然也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埃及和北非，又出现了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但这些不过是塞维鲁担任罗马皇帝的必然结果。罗马对基督教的官方意见是，信仰自由但不能有反罗马倾向，之所以禁止其传教，是因为基督教与罗马人的思考方式背道而驰。

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们不说“信奉我主可使你的灵魂安宁，请改信我教”，而是说“只有信奉我主才是正途，抛弃你所信奉的邪神吧”。这与希腊、罗马容忍他人信奉自己神明的观念完全对立，并且罗马人把以朱庇特为代表的诸神视为统治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罗马帝国的纽带，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维却对宗教的这种功用表示怀疑。塞维鲁皇帝在宗教信仰这一点上倒是比较“罗马式”，也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

东征及其后果

公元197年夏，塞维鲁作为唯一的胜利者返回首都，还不到两年，公元199年秋，他又不得不匆匆离开罗马。虽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行，但他的目的却是把帕提亚王国不稳定的苗头封堵在罗马帝国之外。至少他是这么对外宣称的。

然而帕提亚方面并没有侵入过罗马境内，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过冲突。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历史学家认为，塞维鲁成为皇帝以后，尽管成功铲除了争夺帝位的对手，但是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平平。现在塞维鲁需要这种战绩了。总之，这场战争并不是自身受到侵犯而展开的迎击，而是在对方发动可能的进攻之前就主动出击。尽管如此，在待遇得到改善的罗马军队中，却没有人反对这种“预防战争”。或许因为只是一种预防策略，在这一年对帕提亚的战争中，帝国西方的军队并没有东移，而只是由东方军团完成了这次任务。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帝国内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卓越才能，但即位以后在政治军事方面就乏善可陈了。这是众多历史学家的基本论断，我也持类似看法。塞维鲁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帝国。帝位世袭是这样，提高军队待遇也是这样，这次战争还是这样。

公元195年，塞维鲁打垮帝位竞争者之一、叙利亚总督尼戈以后，为了宣示胜利，曾攻入过支持尼戈的帕提亚王国境内。罗马军队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一直打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几乎逼近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当时大军刚刚战胜尼戈，士气正盛。现在塞维鲁卷土重来，帕提亚方面却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迎击罗马军队，因为其境内波斯势力高涨，帕提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

早在罗马进入帝政时代的100多年前，与帕提亚的关系就是罗马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按照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只有受到压力时才肯坐到谈判桌旁。而在罗马方面，苏拉、卢库鲁斯、庞培、恺撒等都贯彻“军事优先外交在后”的方针。就连侧重外交的奥古斯都也没有改变

军事行动优先的做法。不过，这项策略之所以能成功维持，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是一个有着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

因为指挥系统明确，军事方面的成果就能在外交方面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知道用哪些筹码和谁去讨价还价，这样更容易达成妥协。相反，在面对尚未形成国家的蛮族时，即使在战场上取胜也无法立即反映在谈判桌上。不知向谁施压，也不知和谁谈判，是罗马和由众多部族构成的蛮族集团作战时相当大的不利。

300年来，帕提亚的确一直是罗马最大的假想敌。不过，300年间的假想敌这件事本身也证明了对罗马而言，帕提亚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敌人。通俗地说，就是因为帕提亚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弱点的对手。即便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尼禄、哈德良以及安敦尼· 庇护等与帕提亚交战的皇帝，也都命令军团在东方坚持不懈地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经常找到帕提亚的破绽。尼禄虽然为进攻帕提亚作了精心准备，但因将军科尔布罗坚持自己的帕提亚政策，尼禄最后没有一意孤行。事实证明尼禄的改变是恰当的，从此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此外我已经讲述过好几次，就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还有着与其他防线的不同之处。以安条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帕尔米拉为代表的帝国东方城市是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的。正因为商队能安全自由地在延展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叙利亚沙漠里往来，帝国东方的经济才得以发展。相比于让强盗般的沙漠暴民横行，不如使帕提亚维持存在更方便。

根据常年的较量可知，无论是罗马还是帕提亚，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可以进攻对方，却不足以长期占领。由于这种共同点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罗马和帕提亚都成了善于寻找对方破绽的高手。

而现在帕提亚受到波斯势力的威胁，整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新兴势力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叙利亚总督尼戈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即罗马绝不采取任何使帕提亚走向衰败的行动。然而和尼戈

相反，塞维鲁分别在公元195年和199年两次采取行动。当年马可· 奥勒留当政时期的帕提亚战争，是为了迎击帕提亚方面的挑衅行为，而塞维鲁的远征却不是应对挑衅，因为帕提亚王国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

当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王国的时候，已经是塞维鲁死后15年的事了。虽不是本意，但塞维鲁的确为帕提亚内部的新兴势力助了一臂之力。

帕提亚是绝对专制的国家，其生命力可能会比罗马短暂。然而，罗马在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谓的“3世纪危机”。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一时期，罗马开始面对上升中的敌人波斯萨珊王朝。在这个问题上，罗马自身的确也有部分责任。对罗马而言，被萨珊王朝所支配的东方再也不是假想敌，而是真正的敌人了。

既然帕提亚王国已经这般窘迫，皇帝塞维鲁的远征也就当然如同探囊取物。罗马军队一直攻到底格里斯河畔，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划为罗马的行省，然后班师西去。对于这场战争，随军同行的卡拉卡拉似乎比父亲塞维鲁还要自豪。

尽管树立了新的敌人，但胜利就是胜利。塞维鲁在呈送给元老院的报告中，要求后者允许修建凯旋门。皇帝的要求，尤其是来自塞维鲁的意见，元老院只有唯命是从。但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元老院还是平民，都为皇帝的捷报而兴奋不已，凯旋门的建设计划也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不管对谁来讲，为胜利感到喜悦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正因为如此，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考虑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往凯旋的将军都是驾着四马战车通过“神圣大道”前往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这次甚至等不及塞维鲁归国，人们就开始在“神圣大道”前方着手兴建凯旋门。自从图密善建造胜利纪念柱以来，罗马广场的中央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曾兴

建新的建筑了，而凯旋门也一直存留到了今天。

在埃及短暂停留之后，公元202年春，塞维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罗马。两个孩子也亲身参与了盛大的凯旋仪式。雄伟壮观的队伍通过竣工不久的凯旋门，登上卡匹托尔山。据说队列的前排到山顶的时候，队列的末尾才刚刚进入罗马广场。毫无疑问，对56岁的塞维鲁而言，这是人生最荣耀的时刻。

塞维鲁的凯旋门

不久以后，尚且14岁却已举行过成人礼的卡拉卡拉又举行了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是近卫军团长官、皇帝不在首都时耀武扬威的普劳提亚

努斯。这个人也出身于北非，与塞维鲁同辈，二人过从甚密。塞维鲁让他和次子盖塔一起就任第二年，即公元203年的执政官，而盖塔到公元203年时也才刚满14岁。

总之，在最高统治者塞维鲁身边，北非出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虽然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可· 奥勒留都是以起用行省人而闻名的皇帝，可是得到重用的人才都来自帝国各地，而不是只偏重于皇帝的同乡。

光耀门楣

从公元202年开始到208年的7年里，皇帝塞维鲁一直留在意大利本土。不过，从公元204年开始的5年间，他经常到自己出生的故乡莱波蒂斯· 玛尼（大莱普提斯）小住。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出发向南，首先在左舷望着西西里岛西端，然后在左舷望着马耳他岛一路航行即可到达。

大莱普提斯是濒临地中海的港口，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方。尤其在哈德良皇帝视察过后，城市的功能有了飞快的进步。不过，在塞维鲁看来，这些仍旧不够。依照他的指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大莱普提斯的面貌为之一变。从保存至今的遗迹中，我们仍能想象出这座被誉为“地中海珍珠”的港口城市当初的繁华景象。可以说，这是塞维鲁在装点门楣，其他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不曾这样做过。

我们和西班牙的意大利卡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在意大利卡出过图拉真和哈德良两位强势有为的皇帝，然而当我们眺望这座城市时肯定会感到意外，因为这里和罗马帝国境内的其他城市毫无二致。历史遗迹虽然也有，但多数都是两位皇帝死后，当地出于宣传而修建的。就算加上这些后修的古迹，意大利卡也赶不上同为地方小城市的庞贝。

莱波蒂斯· 玛尼（Leptis Magna）的希腊剧院遗迹

图拉真也好，哈德良也好，成为皇帝以后，都不曾回过故乡。他们并非忘却了故土，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是整个国家的皇帝，那就不能只对故乡一地施与特殊照顾。

反倒是一些元老院议员，甚至一些事业有成的解放奴隶，喜欢捐赠公共建筑，或者出资维修家乡道路，将其作为光宗耀祖的义举。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个人的捐赠行为，很多著名的罗马公共设施甚至无法出现。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行为叫“位高责重”，罗马人认为，因为社会提供了机会而获得利益的成功人士应该回馈社会。为表彰这种慈善行为，人们会在受到捐赠的项目上冠以捐赠者的名字。比如“尤里乌斯公会堂”、“图拉真大浴场”等。

假如塞维鲁得知人们不满他这种装点门楣的行为，他大概会反驳

说，自己已经主持铺设了塞维利亚大道，并且自己下令开工的大浴场，竣工时采用的是已成皇帝的卡拉卡拉的名字，所以自己已经充分履行了罗马皇帝的职责。

这话不无道理。可连奥古斯都都没有改造过自己的故乡韦莱特里（Velletri）小镇。尽管是开国皇帝的出生地，但韦莱特里始终是阿皮亚大道旁的一个小镇。韦斯帕芗和提图斯虽然喜欢经常回故乡列阿特，但列阿特和其他地方城市也没有丝毫不同。有些事情即便元老院议员或其他成功人士能够无所谓，可是到了皇帝这里反而有所顾忌了。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矜持，看来罗马的这种感觉已经日渐迟钝。在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看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人生的顶点是在登基时刻，后来就开始逐渐下滑，最后沦为一位“非罗马式”的皇帝。卡西乌斯· 狄奥出身于小亚细亚，坚信自己是罗马的一分子，他不仅是元老院议员，而且还身为前线上的行省总督。可能是距离塞维鲁比较近，因而他得出这种观感。掌握着权力的人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但正因为他们能够忍耐这种“不自由”，人们才愿意把权力托付给他。

皇帝塞维鲁的权力基础已经无比稳固。帕提亚已经奄奄一息，多瑙河防线仍旧保持着相持状态，元老院对皇帝的意愿除了赞同就是沉默，首都罗马的平民也都满足于饮食和娱乐。虽然针对军团的优待政策和无谓的帕提亚战争使国家财政出现了本质的恶化，银币中的银含量在慢慢减少，但在供应充足、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塞维鲁所充分享受着的权力已经从他身边开始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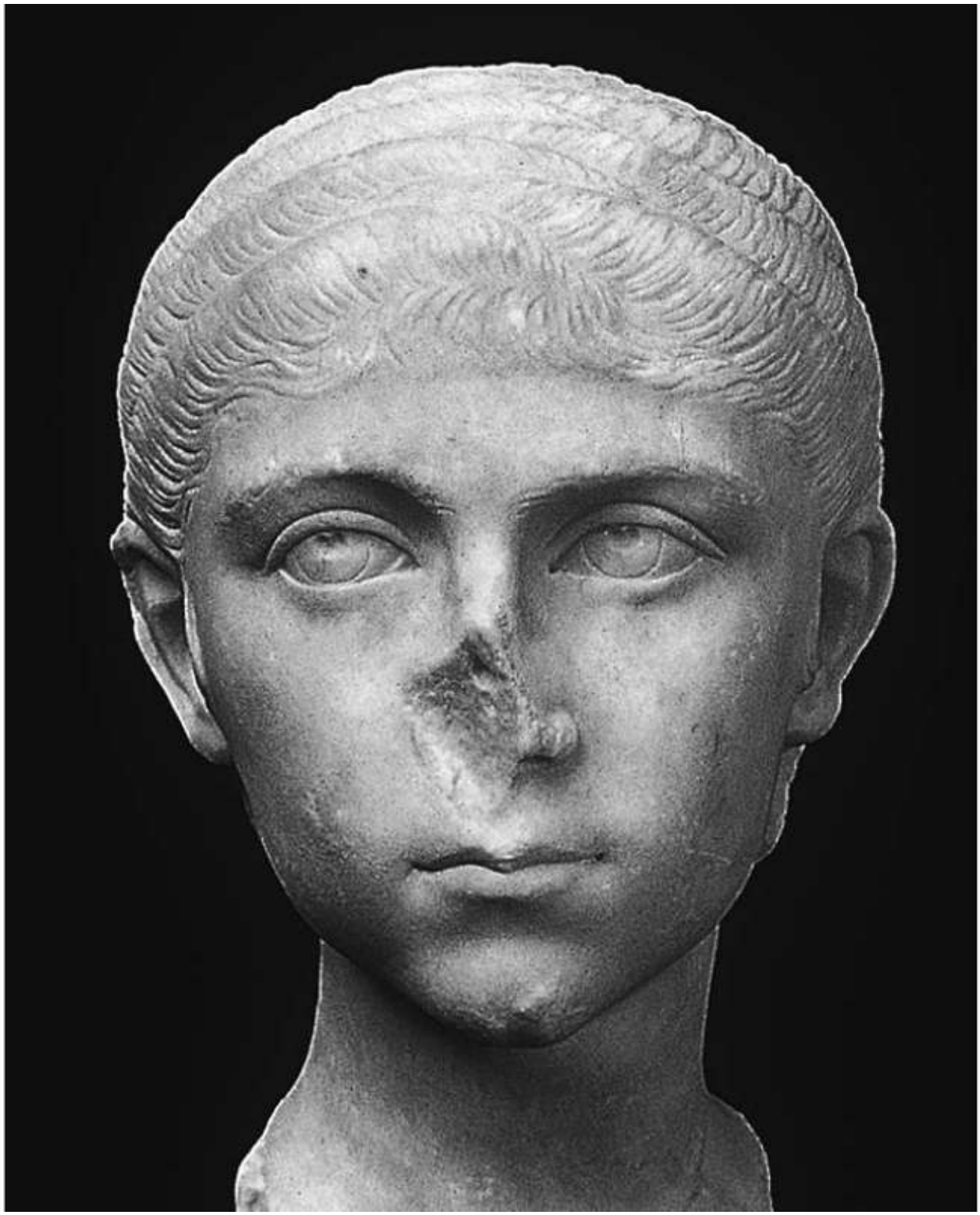
首先，公元205年，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卡拉卡拉和近卫军团长官普劳提亚努斯的矛盾公开化了。这位长官是皇帝塞维鲁的同乡好友，手握1万名近卫军重兵，为人傲慢专横，自然引起倔强好胜的卡拉卡拉的排斥。或许，与妻子普劳提拉之间的感情淡漠也加深了他对岳父的反感。面对儿子与亲信之间的冲突，皇帝塞维鲁左右为难，皇后尤利亚· 多姆

娜也同样束手无策，因为在这场冲突里，还牵扯到了第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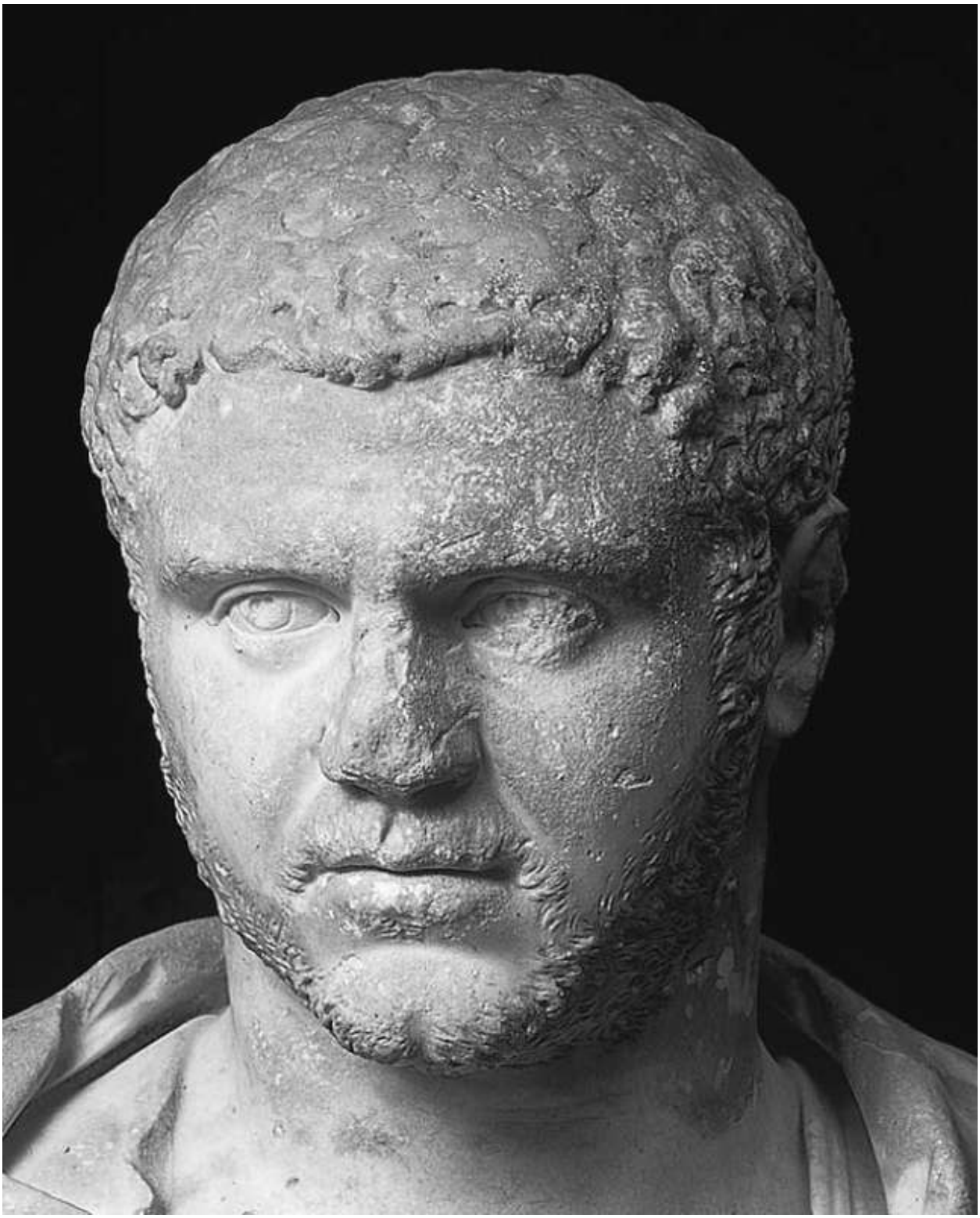
他就是小卡拉卡拉1岁的弟弟盖塔。如果两兄弟因四马战车比赛而意见相左的话倒还没什么，然而一旦接近帝位，事情就不仅仅是兄弟间的不和了。兄弟二人年少时经常和父母一起出现在全家福肖像上，不过现在看来，所谓的全家福只是其父母的一厢情愿罢了。

公元205年的1月1日，在父亲塞维鲁的安排下，17岁的卡拉卡拉和16岁的盖塔一起就任了执政官。然而，兄弟不睦的解决办法似乎也仅此而已了。

1月22日，不知普劳提亚努斯的什么话一下子点燃了卡拉卡拉的怒火。17岁的下任皇帝在父亲面前，拔出腰间的佩剑，杀死了普劳提亚努斯。接下来的第二天，在元老院举行的会议上，卡拉卡拉行使执政官首先发言的权力，毫不留情地指责近卫军团长官企图谋害皇帝一家然后自己取而代之，因此死有余辜。同为执政官列席会议的盖塔从始至终没有发言。最后，元老院议员们只好用沉默认可了卡拉卡拉对近卫军团长官的女儿普劳提拉及其弟弟的流放决定。具体的流放地点是西西里岛附近的利帕里岛。以往皇族的流放地，或者说隔离地都在蓬扎岛或文托特内岛，这两座岛屿距离那不勒斯都很近，岛上从罗马式的蓄水池到鱼池都很完备，可是利帕里岛却是火山岛，仅有一个小渔村。普劳提拉和弟弟被流放到这里，6年以后，卡拉卡拉即位，两人被新皇帝派来的士兵杀死。



普劳提拉



卡拉卡拉

兄弟间的不和一直持续着没有任何改善，两年过去了。塞维鲁虽然

不是毫无作为，但此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不过是既往方针的延续而已。尽管塞维鲁以自己身体强健而自豪，但毕竟已年过六旬。正如壮年期身体健硕的人常常遇到的那样，他也难逃痛风的折磨。虽然罗马人的主要食物是鱼类、谷物、蔬菜和乳酪，但塞维鲁可能是肉类等动物性蛋白质摄取过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痛风日渐严重，但他仍旧不失以往的霸气。好像要重塑病体一样，他决定远征不列颠。

不列颠

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属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行省。再向北就是罗马版图以外了，罗马人称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在不列颠和喀里多尼亚之间，罗马人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不再向北继续进攻了。这是因为当初占领不列颠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守卫多佛尔海峡对面的高卢。既然已经达到目的，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向寒冷多雨、物产贫乏的喀里多尼亚展开进攻的积极性了。冬季游览哈德良长城的人都会认同这种做法。站在城墙上向北眺望，阴沉沉的天空里是厚重的云层，下面则是一望无际的萧瑟荒野。地中海沿岸的人恐怕都不会对这蛮荒之地感兴趣吧？然而在古代，这片荒原的对面，则是凶悍好斗的喀里多尼亚民族。

罗马人并没有把喀里多尼亚人和居住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各蛮族等同，特别是丝毫不掩饰厌恶之情，将喀里多尼亚民族中的一支命名为“布里坎提斯”，拉丁语意为“盗贼”。可笑的是，英语也采用了指代自身某一部族的这个词作为“brigand”的词源。也就是说，部分喀里多尼亚人，尤其是接近罗马领地的居民，为了从荒野上的贫乏生活中解脱，专以盗抢为生。因为不管怎么说，哈德良长城以南就是遍布着城镇的肥沃土地。

皇帝塞维鲁之所以远征不列颠，是因为有一件事令他很生气。“布里坎提斯”们将一大批物资连同押运的军团兵一并劫掠而去，当时的不

列颠总督无奈之下，只好用金钱赎回了人马。堂堂的罗马总督竟然屈从于盗贼的恐吓，这岂能置之不理？

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将军在图密善时代曾经试图征服整个喀里多尼亚，现在塞维鲁认为，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就应该把前人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只要苏格兰还处于罗马的管辖范围之外，盗贼的横行和喀里多尼亚人的南下就不会止息。就这样，塞维鲁把公元208年都耗费在战争准备上了。

第二年，即公元209年，塞维鲁等到了春天，于是和皇后及两个儿子离开了罗马。正式的作战应该是公元210年春开始的。既然要征服整个苏格兰，罗马军队一开始就积极出击。他们越过了哈德良长城，向苏格兰腹地挺进，前卫部队甚至一直深入到了苏格兰高地的山岳地带。

不过，率领士兵打前锋的却是年轻的卡拉卡拉。深知兄弟不睦的父亲有意识地将盖塔留在后方的伦底纽姆（今伦敦），任命他为不列颠行省的总督。而塞维鲁本人，天不遂人愿，已经无法冲锋陷阵了。

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服从意志了，不但不能骑马，连马车的颠簸都难以接受。战争的第一年，他尚能乘轿接近战场观战，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10年，连乘轿都不行了。最后塞维鲁只好在最接近前线的埃布拉库姆（今约克）军团基地里一动不动。

滞留在约克的皇帝一直心情忧郁，然而病痛的折磨还在其次。要想征服喀里多尼亚全境，除了缜密的计划，还需要过人的果敢，但是，这副重担对22岁的卡拉卡拉而言却有些勉强。显然，除年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军事才能问题。塞维鲁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说，真正折磨64岁的皇帝的，不仅是病痛，更是现实。面对丈夫的苦恼，任凭皇后尤利亚·多姆娜有多么高深的教养，到这时也都无济于事了。

逝世

转过年来的公元211年2月4日，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约克停止了呼吸。驰骋疆场的卡拉卡拉、接到病危消息稍早赶到的盖塔、始终紧紧追随丈夫的妻子尤利亚· 多姆娜，以及不列颠战争中的主要将领们都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有两个月他就65岁了，在位18年，安静地死去后就万事皆空了。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记载，塞维鲁在气息奄奄的时候对卡拉卡拉和盖塔两兄弟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 统治国家时，兄弟之间要和睦，互相为对方着想。不要忘记优待士兵，这是最应该优先的事情。

然后塞维鲁又像是自言自语，接着说道：

> 我做到了一切。做过元老院议员，做过律师，也做过执政官，还做过大队长，做过将军，然后做到了皇帝。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要职，并且我认为自己勤勉称职。
>
> 可是现在回过头看，好像一切都是徒劳啊……

罗马的史学家知道卡拉卡拉和盖塔之间关系的发展，于是对皇帝塞维鲁最后的遗言作了解释，认为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创立的皇统行将结束，因而发出感叹。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则了解罗马帝国的整个衰亡过程，于是认定塞维鲁在人生的最后终于明白日暮途穷的罗马已经不可挽回了。或许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吧。不过我却因另一件事对这位皇帝心生同情。

了解北英格兰严冬的人如果也去过北非这个季节的大莱普提斯，我想肯定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铅灰色的天空下阴雨连绵，只要没有特殊需要大家都不会外出，焕发生气的只有那些常绿树木和青草。可是，在塞维鲁的出生地大莱普提斯，即便在冬天也是阳光普照，光影分明，极目远眺，蔚蓝的地中海，风景如画，一望无边。

在纪念柱矗立的大厅或回廊下，斜披托加的男人们在高谈阔论。不远处的广场上，出来购物的女人们身上的各色长衣，花团锦簇。而身穿麻色短装应对客人的，则是无处不在的商人。还有跑来跑去给店主帮忙的奴隶，如果仅从短衣上看，他们与平民阶层的罗马公民并无区别，然而脖子上皮绳吊挂的铜牌却表明了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的肤色也多种多样。广场一角的私塾里，吵吵嚷嚷的孩子们与奴隶一样也是短打扮，脸和手脚都晒得黝黑。

塞维鲁一家的肖像
（左下方盖塔的面部后来被卡拉卡拉削去了）

塞维鲁一边回忆着故乡温暖的太阳，一边在阴冷潮湿的北英格兰等待死神把自己带走。纵然不为两个儿子以及帝国的将来而苦恼，这种气候的差异就足以令人备感忧郁了。马可· 奥勒留在人生的最后，面对着维也纳冬季的萧瑟，写下了“我热爱绿影婆娑的西里欧山，我热爱罗

马”的语句。现在已经到了连罗马皇帝都要死在前线的时代了。尽管后来皇帝殁于前线的事例越来越多，但在这一点上，塞维鲁的确是马可·奥勒留之后的第一人。

两位皇帝死后发生的事情也很相似。父亲塞维鲁死后，23岁的卡拉卡拉成了新皇帝，很快就和喀里多尼亚人缔结了和约。然后以护送先帝骨灰为名，返回罗马。全面征服苏格兰的计划从此不了了之。

果不出所料，塞维鲁死后仅一年，即公元212年2月12日，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里发生了惨剧。卡拉卡拉不顾母亲在场，拔剑刺向弟弟盖塔。年仅22岁的盖塔最终死在了母亲的怀里，鲜血浸透了母亲的衣衫。

卡拉卡拉随后下达命令，将罗马所有“全家福”肖像中弟弟的形象尽数除去。后来，这一命令被严格执行。

马可· 奥勒留之后是姐弟之争，而在塞维鲁之后则是兄弟相残。马可和塞维鲁一直致力于打造甜蜜和谐的大家庭，但最后的结果完全一致，都酿成了家庭悲剧。无论是《沉思录》的结语还是塞维鲁的遗言，如果说其中散发出的人生感伤，哲学家皇帝和军人皇帝并没有什么不同。马可· 奥勒留也曾写过，人难免一死，皇帝和奴隶都一样。（相关内容见《沉思录》卷六。——译者注）

罗马从前的领导者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每个人生前却都是不一样的。然而，那样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以责任感作为人生支柱的人以后仍会出现，不过由他们主导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的罗马帝国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谓的“3世纪危机”。据说鱼都是从头部开始腐烂的，其实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大事年表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21	4 月 26 日，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日后的马可·奥勒留）生于西里欧山	哈德良皇帝前往不列颠，下令修建“哈德良长城”（122）		（日本）弥生时代
126	柏提那克斯于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生于解放奴隶之家			
127	马可名列骑士阶级			
128	马可成为Salius Palatinus(战神马尔斯的祭祀会）成员			
130	12 月，路奇乌斯·维鲁斯出生		耶路撒冷爆发犹太教徒叛乱事件（131—134）	（中国）东汉的张衡制作浑天仪与候风地动仪
133	狄第乌斯·尤利安出生于米兰社会上层人士家中			
136	哈德良皇帝任命路奇乌斯的父亲凯奥尼乌斯·康茂德为继承人。凯奥尼乌斯更名为埃里乌斯·恺撒。马可与凯奥尼乌斯的女儿凯奥尼娜订婚。马可被任命为拉丁节期间的罗马“特别长官”			
138	元旦，埃里乌斯·恺撒殁。2 月 25 日，哈德良指名安敦尼为继承人。应哈德良的要求，安敦尼收马可与路奇乌斯为养子。哈德良聘任弗龙托为马可的教师。7 月 10 日，哈德良皇帝离世，享年 62 岁。**安敦尼登基继位**。安敦尼将女儿芙斯汀娜许配给马可。为哈德良神化问题，安敦尼与元老院意见对立。为哈德良辩护的安敦尼日后获得“庇护”的称呼。马可获选为财务检察官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39	马可获颁“恺撒”称号，移居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神君哈德良神殿”竣工	不列颠原住民引发叛乱事件		
140	马可初次就任执政官			
142		镇压不列颠叛乱。安敦尼·庇护于哈德良长城北方建设安敦尼长城		
143	安敦尼·庇护聘弗龙托为路奇乌斯的老师			（印度）此时，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一世即位
145	马可第二次就任执政官。与芙斯汀娜成婚			
146		4月11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诞生于北非莱波蒂斯·玛尼		
147	11月30日，马可的长女多米提亚出生。12月1日，安敦尼·庇护将护民官特权分与马可，并赠芙斯汀娜“奥古斯塔”的称号			
153	路奇乌斯担任财务检察官			
154	路奇乌斯担任执政官			
161	马可与路奇乌斯担任执政官。3月6日，安敦尼·庇护于罗马近郊拉鲁芬别墅逝世，享年75岁。**马可·奥勒留与路奇乌斯·维鲁斯即位为共同皇帝**。8月31日，马可之子康茂德出生。气候失调造成罗马饥荒，台伯河泛滥成灾。马可决定派路奇乌斯亲临叙利亚		帕提亚军入侵亚美尼亚，废黜亲罗马派的国王，将亲帕提亚的帕科鲁斯送上王位。马可命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达狄乌斯·塞维利安努斯进攻（帕提亚战争开始）。卡帕多西亚一个军团溃败，塞维利安努斯自尽。马可命令不列颠总督斯塔提乌斯·普利斯克斯为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帕提亚军由亚美尼亚向叙利亚进军。倾向罗马的边境小国开始动摇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62	夏，路奇乌斯前往东方。途因病倒、长期滞留希腊等原因，冬季才抵达安条克			
163	马可将女儿露西拉许配给路奇乌斯		春，普利斯克斯率罗马军于亚美尼亚战线获胜。普利斯克斯攻陷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库萨塔	
164			驱逐帕科鲁斯，扶植亲罗马的索菲埃姆斯上台。路奇乌斯与露西拉于以弗所完婚。露西拉获颁“奥古斯塔”称号。罗马军越过幼发拉底河追击帕提亚军	
165			叙利亚驻军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指挥罗马军彻底击败帕提亚军队	
166	10月，马可与路奇乌斯返回罗马，举行凯旋仪式。帕提亚战争带回的瘟疫开始蔓延		帕提亚战争以罗马获胜告终	
167			日耳曼部族开始侵略多瑙河防线	
168	马可与路奇乌斯离开罗马亲临多瑙河前线视察，后回到阿奎莱亚冬营地			
169	路奇乌斯离开阿奎莱亚返回罗马途中，病逝亚尔提诺。享年39岁。马可护送路奇乌斯骨灰返回罗马并举行国葬。马可将路奇乌斯遗孀露西拉改嫁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庞培亚努斯。秋，马可再度前往多瑙河		马可于远潘诺尼亚行省希尔米乌姆（今塞尔维亚的米特罗维察）过冬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70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就任财务检察官。马可小女儿萨宾娜出生		近米西亚、达契亚两行省总督克劳狄乌斯·弗龙托指挥罗马军越过多瑙河，于山地落败。弗龙托阵亡，2万人遇俘。其间，马尔科曼尼、科斯特波奇两日耳曼部族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地。270年来防线第一次失守。马尔科曼尼人袭击阿奎莱亚。科斯特波奇人入侵希腊中央地带。庞培亚努斯率罗马军歼灭两部族。“Praetentura Italiae et Alpium”（意大利与阿尔卑斯防卫部队）设立。于洛尔希、雷根斯堡新设两个军团。罗马军调整多瑙河畔配置。以诺瓦埃（今保加利亚的斯维西托弗）为基地的第一意大利军团向上游转移100公里，到奥埃斯库斯驻防。特罗埃斯密斯（今罗马尼亚的伊古利茨）为基地的第五玛肯多尼加军团转移到达契亚行省的博泰莎（今罗马尼亚的图尔达）	
171		毛里塔尼亚人之一部越直布罗陀海峡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占据贝提卡行省一带。罗马派遣奥菲狄乌斯·维克托利努斯驱逐	马库斯驻军卡农图姆与日耳曼夸地人和谈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72	元老院授予马可与康茂德“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		第一次日耳曼战役开始。罗马由维也纳与贝尔格莱德渡过多瑙河进军。与马尔科曼尼人初期作战失利，近卫军团长官维狄克斯阵亡。与罗马言和的夸地人再次回到日耳曼阵营。苦战后击垮夸地人。年底罗马击败马尔科曼尼人。埃及发生暴动。命叙利亚行省总督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为东方全区总司令，率两军团镇压。亚美尼亚发生政变，卡帕多西亚总督马尔提乌斯·维尔斯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印度）此时，贵霜王朝的胡维什卡一世即位
173			继续日耳曼战争。罗马军策略由大会战改为各个击破策略并获得成功。骑兵团长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与纳利斯提部落酋长决斗获胜。与马尔科曼尼、夸地、雅兹盖斯等部族和谈。冬，由芙斯汀娜、露西拉陪伴，马可前往多瑙河畔希尔米乌姆基地	
174	柏提那克斯就任候补执政官		受萨尔马提亚人压力，雅兹盖斯人再度南下与罗马冲突（萨尔马提亚战争）。罗马于优势下与雅兹盖斯人和谈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75	卡西乌斯叛乱，元老院宣判其为“国家公敌”	西方行省各军团一致支持马可	培辛尼乌斯·尼戈被任命为埃及军团长官。4月，叙利亚总督亚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误信马可死去的消息，起兵称帝。卡帕多西亚总督马尔提乌斯·维尔斯拒绝卡西乌斯引诱，派人报告多瑙河前线的马可。马可与交战中的萨尔马提亚人和谈。马可将康茂德召往多瑙河前线。7月7日，康茂德举行成人礼，获“预备第一公民”称号，相当于“皇太子”。卡西乌斯被部下所杀，马尔提乌斯·维尔斯迅速进入叙利亚掌握支持卡西乌斯的军团。马可将前线交给庞培亚努斯处理，带康茂德、芙斯汀娜前往东方。冬，路过安卡拉到赫拉拉时，芙斯汀娜病逝（享年45岁）。赫拉拉更名为芙斯汀娜堡，建纪念神殿	
176	亚尔比努斯获选执政官。塞维鲁获选护民官。11月27日，马可于罗马举办凯旋仪式		马可经埃及进入安条克，宽容处置叛乱人员。任命马尔提乌斯·维尔斯为叙利亚总督。经由小亚细亚、希腊后返回罗马。柏提那克斯获任近米西亚行省总督	
177	康茂德出任执政官。**马可将康茂德列为共治皇帝**	高卢部族长会议在里昂公开处死基督教徒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78	康茂德与克丽丝庇娜成婚。马可与康茂德再度前往多瑙河前线		罗马计划于多瑙河北岸建立新行省，但与日耳曼诸部族作战受挫。第二次日耳曼战争开始。约此时，柏提那克斯获派叙利亚总督	
179			罗马军击溃马尔科曼尼、夸地、雅兹盖斯各部族。骑兵团长马克西米亚努斯进军多瑙河北方120公里处。执政官尤里乌斯·维鲁斯阵亡	
180	佩雷尼斯获任近卫军团长官。塞维鲁受命为叙利亚行省军团长。10月，康茂德回到首都		马可于维也纳冬季营地离世，享年58岁，**康茂德成为唯一皇帝**。康茂德决定结束战争，与日耳曼诸部族和谈	
182	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暗杀康茂德未遂，遭流放卡普里岛，不久遇害。近卫军团长官帕提鲁诺以暗杀康茂德嫌疑遭解任，不久遇害。至翌年为止，另有8名元老院议员遭清洗。佩雷尼斯掌握帝国统治实权			
183		于北非毛里塔尼亚地方加强防线（公元185年再次强化防线）		
184		不列颠一个军团迎击由北入侵的喀里多尼亚人失败，军团长阵亡。佩雷尼斯由莱茵河防线急调乌尔庇乌斯·马萨鲁斯前往，成功雪耻		（中国）黄巾起义爆发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85	佩雷尼斯遭康茂德侍臣库雷安德罗斯谋害。库雷安德罗斯成为近卫军团长官并掌握实权	元旦，驻不列颠行省卡莱奥恩基地军团拒绝向康茂德效忠，推军团长为皇帝。佩雷尼斯派遣柏提那克斯成功说服		
187	康茂德以谋害皇帝罪处死亲属马梅尔提努斯、布鲁斯。柏提那克斯受命为首都长官	塞维鲁受命为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总督。约此时，塞维鲁与叙利亚神职人员的女儿尤利亚·多姆娜成婚		
188		4月4日，卡拉卡拉出生于里昂		
189	库雷安德罗斯遭示威平民杀死。其后，由康茂德情妇马尔奇亚、侍臣艾克雷科图斯、近卫军团长官埃米里乌斯·雷特掌握实权	3月7日，盖塔出生于米兰		
190	塞维鲁就任候补执政官		尼戈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	
191		亚尔比努斯任不列颠总督	塞维鲁任近潘诺尼亚总督	
192	柏提那克斯与康茂德共同就任执政官。康茂德于斗兽场斩杀鸵鸟。12月31日，康茂德被情妇马尔奇亚、侍臣艾克雷科图斯、摔跤教练纳尔奇索斯三人暗杀，享年31岁			（中国）曹操起兵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93	**元旦，柏提那克斯登基，获元老院承认**。元老院决定判处康茂德“记录抹杀刑”。3月28日，柏提那克斯遭雷特率领的近卫军刺杀，享年66岁。**前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狄第乌斯·尤利安获元老院承认登基**。尤利安要求元老院宣判塞维鲁为“国家公敌”。6月1日，尤利安遭近卫军杀害，享年60岁。元老院取消塞维鲁“国家公敌”的宣判，并请求其登基。塞维鲁进入罗马，命近卫军团解散。**元老院承认塞维鲁与亚尔比努斯登基为共治皇帝**。塞维鲁为征讨尼戈向东行军	4月中旬，不列颠行省总督克劳狄乌斯·亚尔比努斯受麾下军团兵推举称帝，前往里昂。塞维鲁向亚尔比努斯赠送“恺撒”称号，相约为共治皇帝。亚尔比努斯驻留里昂	4月9日，近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受军团兵推举起兵称帝。叙利亚行省总督培辛尼乌斯·尼戈受军团兵推举起兵称帝。5月，塞维鲁率军团南下，前往首都。尼戈于培林托斯迎击塞维鲁，获胜	
194			1月，尼戈于小亚细亚尼凯亚附近的平原迎击塞维鲁，失败。东方行省各军团多数投向塞维鲁阵营。10月，塞维鲁于伊索斯平原战胜尼戈。尼戈逃亡时被追兵杀死	
195			塞维鲁攻击支持尼戈的帕提亚王国。塞维鲁重新部署东方防卫体系	
196			夏，塞维鲁离开安条克前往多瑙河防线，并西行	（中国）曹操挟帝迁都许
197	6月，塞维鲁回首都。元老院应其要求撤销康茂德的“记录抹杀刑”。塞维鲁以亚尔比努斯派名义肃清26名元老院议员	2月19日，塞维鲁于里昂近郊同亚尔比努斯决战，后者战败自杀。**塞维鲁成为唯一皇帝**		

（续）

年份（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99	秋，塞维鲁带妻子尤利亚与两个儿子卡拉卡拉、盖塔离开首都。塞维鲁凯旋门于罗马广场开工		塞维鲁远征帕提亚，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行省化	
201	塞维鲁开始铺设由奥斯提亚通往泰拉奇纳的塞维利亚大道			
202	卡拉卡拉就任执政官。春，塞维鲁一家回到罗马，举行凯旋仪式。卡拉卡拉与近卫军团长官普劳提亚努斯的女儿普劳提拉成婚			
204	盖塔就任执政官		塞维鲁在故乡莱波蒂斯·玛尼小住（～205），大兴土木	
205	卡拉卡拉与盖塔共同担任执政官。卡拉卡拉、盖塔、普劳提亚努斯三人冲突公开化。1月22日，普劳提亚努斯遭卡拉卡拉杀害。卡拉卡拉将妻子普劳提拉流放西西里岛附近的利帕里岛			（中国）诸葛亮辅佐刘备（207）刘备、孙权击破曹操军（赤壁之战，208）
209	塞维鲁带妻子与两个儿子远征不列颠	春，罗马军于不列颠越过哈德良长城向北进攻		
210		塞维鲁在约克病倒		
211	普劳提拉在利帕里岛上遭卡拉卡拉派遣的士兵杀害		2月4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约克离世，享年64岁。**卡拉卡拉与盖塔登基**。卡拉卡拉与喀里多尼亚人和谈后回到罗马	
212	2月12日，卡拉卡拉于帕拉蒂尼山的皇宫中杀死了盖塔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

Cassius Dio "Historiae Romanae"
Cornelius Fronto "Epistulae"
Fasti Ostienses (Inscriptiones Italiae)

二、后世的研究著作

AFRICA, T.W., *The opium addiction of Marcus Aureliu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HI)》22, 1961.

ALFÖLDY, G., *Fasti Hispanienses. Senatorische Reichesbeamte und Offiziere in den spanischen Provinzen des römischen Reiches von Augustus bis Diockletian*, Wiesbaden, 1969; *Der Friedenschluss des Kaisers Commodus mit den Germanen*, 《Historia》20, 1971; *Herodian über den Tod Mark Aurel's*, 《Latomus》 32, 1973; *P. Helvius Pertinax und M. Valerius Maximianus*, 《Situla》14/15, Ljubljana, 1974; *Konsulat und Senatorenstand unter den Antoninen. Prosop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senatorischen Führungsschicht*, Bonn, 1977; *Bellum Mauricum*, 《Chiron》15, 1985.

ALFÖLDY, G. & HALFMANN, H., *Iunius Maximus und die Victoria Parthica*,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ZPE)》35, 1979.

AMELING. W., *Herodes Atticus. I. Biographie. II. Inschriftenkatalog*, Subsidia Epigraphica 11, Hildesheim, 1983.

ANDREOTTI, R., *Commodo*, Roma, 1942.

ASTARITA, M.L., *Avidio Cassio*, Roma, 1983.

AURIGEMMA, S., *Villa Adriana*, Roma, 1961.

BANNERT, H., *Der Tod des Kaisers Marcus, Latinität und alte Kirche. Festschrift R. Hanslik*, 《Wiener Studien (WS)》Beih. 8, Vienna, 1977.

BARNES, T.D., *Hadrian and Lucius Ver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57, 1967; *A note on Polycarp*,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JTS)》18, 1967; *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s*, 《JRS》58, 1968; *Pre-Decian Acta Martyrum*, 《JTS》19, 1968; *The chronology of Montanism*, 《JTS》21, 1970; *The embassy of Athenagoras*, 《JTS》26, 1975; *The Sources of the Historia Augusta*, Collection Latomus 155, Brussels, 1978; *Eusebius and the date of the martyrdoms*, Les martyrs de Lyon, 1978;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Cambridge (Mass.) & London, 1981.

BARTA, G., *Lucius Verus and the Marcomannic Wars*, 〈Acta Classica Universitatis Scientiarum Debreceniensis (ACD)〉7, 1971.

BÉRANGER, J., *L'hérédité du Principat*,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REL)〉17, 1939.

BIRLEY, A.R., *Two name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Historia〉15, 1966; *The invasion of Italy in the reign of Marcus Aurelius*, Provincialia. Festschrift R. Laur-Belart, Basel, 1968; *Some teachers of Marcus Aurelius*, 〈Historia-Augusta-Colloquium (HAC)〉1966/67, 1968;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London, 1971; *Roman frontier policy under Marcus Aurelius*, 〈Roman Frontier Studies〉1967, Tel Aviv, 1971; *Roman frontiers and Roman frontier policy: some reflections on Roman imperialism*, 〈Transa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Durham & Northumberland〉3, 1974; *Die Aussen- und Grenzpolitik unter der Regierung Marc Aurels, Marc Aurel* (ed. by R. Klein), 1979; *The Fasti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1981.

BIRLEY, E.,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

London, 1952; *A note on Cornelius Repentinus*, 〈HAC〉 1982/83, 1985.

BLOCH, R., *The Origins of Rome*, 1960.

BÖHME, H.W., *Archäologische Zeugnisse zur Geschichte der Markomannenkriege*, 〈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 Mainz〉 22, 1975.

BOL, R., *Das Statuenprogramm des Herodes-Atticus-Nymphäums*, Olympische Forschungen 15, Berlin, 1984.

BOWERSOCK, G.W., *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69.

BOWMAN, A.K., *A letter of Avidius Cassius?* 〈JRS〉 60, 1970.

BRUNT, P.A., *Marcus Aurelius in his Meditations*, 〈JRS〉 64, 1974;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Christians*,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I, Collection Latomus 164 (ed. by C. Deroux), Brussels, 1979.

CALDERINI, A., *Settimio Severo*, Roma, 1942; *La donne dei Severi*, Roma, 1945.

CANTARELLI, L., *La famiglia e il Cursus honorum dell'imperatore Didio Giuliano*, Roma, 1884.

CAPRINO, C., *La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Roma, 1955.

CARCOPINO, J., *L'hérédité dynastique chez les Antonins*,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REA)〉 51, 1949; *Encore la succession d'Hadrien*, 〈REA〉 67, 1965.

CARRATA THOMES, F., *Il regno di Marco Aurelio*, Torino, 1953.

CHADWICK, H., *Origenes Contra Celsum*, Cambridge, 1953.

CHAMPLIN, E., *The Chronology of Fronto*, 〈JRS〉 64, 1974; *Hadrian's heir*, 〈ZPE〉 21, 1976; *Fronto and Antonine Rome*, Cambridge (Mass.) & London, 1980; *The glass ball game*, 〈ZPE〉 60, 1985.

CHATELAIN, L., *Le Maroc des Romains*, Paris, 1944.

DAILLY, R. & VAN EFFENTERRE, M.H., *Le cas Marc-Aurèle: essai de psychosomatique historique*, 〈REA〉 56, 1954.

DALFEN, J., *Form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 den Selbstbetrachtungen Marc Aurels*, Monaco, 1967.

De FRANCISCI, P., *La politica imperiale di Settimio Severo*, Roma, 1937.

DEGRASSI, A., *Il confine nord-orientale dell'Italia romana*, Bern, 1954.

De REGIBUS, L., *Antonio Pio*, Roma, 1946.

DOBIÁŠ, J., *Rom und die Völker jenseits der mittleren Donau*, Corolla Memoriae E.

Swoboda Dedicata, Graz & Colonia, 1966.

ECK, W., *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 in der hohen Kaiserzeit*, Monaco, 1979; *Die Statthalter der germanischen Provinzen vom 1.-3. Jahrhundert*, Epigraphische Studien 14, Cologne & Bonn, 1985.

FARQUHARSON, A.S.L.,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ntoninus I-II*, Oxford, 1944; *Marcus Aurelius, His Life and His World*, Oxford, 1951.

FITTSCHEN, K., *Die Bildnistypen der Faustina minor und die Fecunditas Augustae*, Göttingen, 1982.

FITZ, J., *Der markomannische-quadische Angriff gegen Aquileia und Opitergium*, 《Historia》 15, 1966; *Claudius Pompeianus, gener Marci*, 《Alba Regia》 19, 1981; *Ti. Claudius Pompeianus und die geplante Provinz Sarmatia*, Lebendige Altertumswissenschaft. Festgabe H. Vetters, Vienna, 1985.

FREND, W.H.C., *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1965.

FUNAIOLI, G., *La conquista dell'individuo nel mondo antico*, Milano, 1951.

GABBA, E., *Esercito e società nella tarda repubblica romana*, Firenze, 1973.

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ondadori, Milano, 1986).

GILLIAM, J.F., *The plague under Marcus Aureli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AJP)》 82, 1961.

GNECCHI, F., *I Medaglioni Romani descritti e illustrati I-III*, Milano, 1912.

GOERLITZ, W., *Marc Aurel, Kaiser und Philosoph*, Stuttgart, 1954.

GRENADE, P., *Le réglement successoral d'Hadrien*, 《REA》 52, 1950.

GROSSO, F., *La lotta politica al tempo di Commodo*, 《Mem. Accademia Scienze Torino》, Torino, 1964.

GUEY, J., *La date de la "pluie miraculeuse" (172 après J-C) et la Colonne Aurélienne*, 《MEFR》 60, 1948; 61, 1949; *Encore la "pluie miraculeuse": mage et dieu*, 《Revue de Philologie》 22, 1948.

HAINES, C.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houghts of Marcus Aurelius*, 《Journal of Philology》 33, 1914; *The Communings with Himself of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Emperor of Rome*, (Loeb ed.), London & New York, 1916; *The Correspondence of Marcus Cornelius Fronto I-II*, (Loeb ed.), London & New York, 1919-

20.

HALFMANN, H., *Die Senatoren aus dem östlichen Teil des Imperium Romanum bis zum Ende des 2. Jh. n. Chr.*, Hypomnemata 58, Göttingen, 1979.

HAMBERG, P.G., *Studies in Roman Imperial Ar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 Reliefs of the Second Century*, Copenhagen & Uppsala, 1945.

HAMMOND, M., *Imperial Elements in the Formula of the Roman Emperors during the First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the Empire*, Roma, 1957; *The Antonine Monarchy*, Roma, 1959.

HAMPL, F., *Kaiser Marc Aurel und die Völker jenseits der Donaugrenze. Fine quellenkritische Studie*, Festschrift R. Heuberger, Innsbruck, 1960.

HASEBROECK, J.,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Kaisers Septimius Severus*, Heiderberg, 1921.

HOUT, M.P.J. van den, *M. Comelii Frontonis Epistulae. I., Prolegomena, text, index*, Leida, 1954.

HOWE, L.L., *The Pretorian Prefect from Commodus to Diocletian*, Chicago, 1942.

HÜTTL, W., *Antoninus Pius. I. Historisch-politische Darstellung*, Prague, 1936; *II Pomisch Reichsheamte und Offiziere unter Antoninus Pius. Antoninus Pius in den Inschriften seiner Zeit*, Prague, 1933.

JOBST, W., *11, Juni 172 n. Chr. Der Tag des Blitz- und Regenwunders im Quaden-*

MORRIS, J., *The dating of the Column of Marcus Aurelius*, 《J. Warburg and Courtald Institutes》 15, 1952.

MUSURILLO, H.,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Oxford, 1972.

NESSELHAUF, H., *Hadrians Reskript and Minicius Fundanus*, 《Hermes》 104, 1976.

NOYEN, P., *Divus Marcus princeps prudentissimus et iuris religiosissimu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1, 1954; *Marcus Aurelius the greatest practician of Stoicism*, 《AC》 24, 1955.

NUTTON, V., *Galen on Prognosis. Edi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 5.8.1, Berlin, 1979.

OLIVA, P., *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Crisis in the Roman Empire*, Prague, 1962.

OLIVER, J.H., *The Ruling Power. A stud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second century*

after Christ through the Roman Oration of Aelius Aristid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43, 1953; *Marcus Aurelius: Aspects of Civic and Cultural Policy*, 〈Hesperia〉 supp. 13, Princeton, 1970; *A New letter of Antonius Pius*, 〈AJP〉 79, 1958.

OLIVER, J.H. & PALMER, R.E.A., *Minutes of an Act of the Roman Senate*, 〈Hesperia〉 24, 1955.

OMODEO, A., *Saggi sul Cristianesimo antico*, Napoli, 1958.

PETZL, G., *T. Statilius Maximus Prokonsul von Asia*, 〈Chiron〉 13, 1983.

PFLAUM, H.G., *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Paris, 1950; *Les carrières procuratoriennes équestres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I-III*, Paris, 1960-61; *Les gendres de Marc-Aurèle*, 〈JS〉, 1961; *Le réglement successoral d'Hadrien*, 〈HAC〉 1963, 1964; *Les sodales Antoniniani de l'époque de Marc-Aurèle*, 〈Memoires pr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 Des Inscr.〉 15, Paris, 1966; *La valeur de la source inspiratrice de la Vita Hadriani et de la Vita Marci Antonini à la lumière des personnalités contemporaines nommément citées*, 〈HAC〉 1968/69, 1970.

PRICE, S.R.F.,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i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Cambridge, 1984.

RIST, J.M., *Stoic Philosophy*, Cambridge, 1969; *Are you a Stoic? The case of Marcus Aurelius*, Jewish and Christian Self-Definition III: Self-Definition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ed. by B.F. Meyer & E.P. Sanders), London, 1982.

ROBERTSON, S., *The Antonine Wall*, Th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ROMANELLI, P., *Leptis Magna*, Roma, 1925; *La colonna Antonina, Rilievi fotografici eseguiti in occasione dei lavori di protezione antiaerea*, Roma, 1942.

ROMANELLI, P. & others, *La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Roma, 1955.

ROSSI, L., *Sull'iconografia e storiografia celebrativa di Marco Aurelio dall'epigrafe di M. Valerio Massimiano*, 〈Quaderni ticinesi di numismatica e antichità classica〉 6, 1977.

ŠAŠEL, J., *Über Umfang und Dauer der Militärzone Praetentura Italiae et Alpium zur Zeit Marc Aurels*, 〈Museum Helveticum〉 31, 1974.

SCHENKL, H., *Zum ersten Buche der Selbstbetrachtungen des Kaisers Marcus Antoninus*, ⟨WS⟩ 34, 1912.

SCHMID, W., *Ein Inversionsphänomen und seine Bedeutung im Text der Apologie des Justin*, Forma Futuri. Studi in onore di Card. M. Pellegrino, Torino, 1975.

SCHUMACHER, L., *Prosop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Besetzung der vier hohen römischen Priesterkollegien im Zeitalter der Antoninen und Severer (96-235n. Chr.)*, Mainz, 1973.

SCHWENDEMANN, J., *Der historische Wert der Vita Marci bei den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Heidelberg, 1923.

SORDI, M., *I "nuovi decreti" di Marco Aurelio contro i Cristiani*, ⟨Studi Romani⟩ 9, 1961.

STANTON, G.R., *Marcus Aurelius, emperor and philosopher*, ⟨Historia⟩ 18, 1969; *Marcus Aurelius, Lucius Verus, and Commodus: 1962-1972*,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2, 1975.

SWOBODA, E., *Carnuntum.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Denkmäler* (4th ed.), Graz & Colonia, 1964.

SYME, R., *Antonine relatives: Ceionii and Vettuleni*, ⟨Athenaeum⟩ 35, 1957; *Tacitus I-II*, Oxford, 1958; *Pliny's less successful friends*, ⟨Historia⟩ 9, 1960; *Hadrian the intellectual, L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olloques du CNRS⟩, Paris, 1965; *The Ummidii*, ⟨Historia⟩ 17, 1968; *Roman Papers I-II*, Oxford 1979; *Ummidius Quadratus, capax imperii*,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83, 1979; *The proconsuls of Asia under Antoninus Pius*, ⟨ZPE⟩ 51, 1983; *Roman Papers III*, Oxford, 1984; *P. Calvisius Ruso, one person or two?* ⟨ZPE⟩ 56, 1984; *The Testamentum Dasumii: some novelties*, ⟨Chiron⟩ 15, 1985; *Avidius Cassius, His rank, age and quality*, ⟨HAC⟩ 1984; *Roman Papers IV-V*, Oxford.

THOMAS, J.D., *An imperial constitution on papyru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 1982.

TRAUPMAN, J.Ch., *The Life and Reign of Commodus*, Princeton, 1956.

VIDMAN, L., *Fasti Ostienses* (2nd ed.), Prague, 1982.

WALKER, D.R., *The Metrology of the Roman Silver Coinage III*, 1978.

WILLIAMS, W., *Form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two new documents of Marcus Aurelius*, 〈ZPE〉 17, 1975; *Individuality in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s. Hadrian and the Antonines*, 〈JRS〉 66, 1976.

WITKE, E.C., *Marcus Aurelius and mandragora*, 〈Classical Philology〉 60, 1965.

ZWIKKER, W., *Studien zur Markussäule I*, Amsterdam, 1941.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II

迷途帝国

[日] 盐野七生◎著　朱悦玮◎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短短73年经历22位皇帝
嗅不出帝王雍容大度，也没有器宇轩昂的风采

这是个不再需要全人的时代
有军队、有功勋，就可能成为罗马的主人
罗马帝国逐步衰老
巨大的变动考验他的韧性

12

王石王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日）盐野七生著；朱悦玮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086–3883–6
I. ① 罗…II. ① 盐…② 朱…III. ① 古罗马－历史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4764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II: Meisou Suru Teikoku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3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朱悦玮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

[日] 盐野七生 著
朱悦玮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铜币故事
银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危机”性质的区别
第一部分 3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公元211—218年
第二章 公元218—235年
第三章 公元235—260年
第二部分 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公元260—270年
第二章 公元270—284年
第三章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铜币故事

在我创作这一卷的时候，曾经前往卡拉卡拉浴场遗迹参观。当我亲眼见到那宏伟壮观的遗迹，并且查阅了将这座浴场充分利用起来的那个时代的相关资料之后，不由得被当时罗马人民所拥有的高超技术水平所震撼。但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也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惋惜之情。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无比清晰的事实，那就是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不一定和其所拥有的国力成正比。

就连当时的硬币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虽然强大的铸造技术使其至今仍然保持完整，但是，在雕工精美的罗马帝国皇帝像的下方，能够看到虽然微小却十分明显的金属劣化的痕迹。

在雕像之上的卡拉卡拉皇帝，不知为何看上去给人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难道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急于要为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帝国做些什么而无意中露出的焦急之情吗？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铜币故事

在古董收藏市场之中，硬币的价值是由以下两个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硬币不仅要做工精美，保存状态还要良好。

第二，稀有。也就是说硬币本身被制作出来的就少，流通到市场上的更少。

因此，那些当了很多年皇帝，或者赶上罗马帝国经济腾飞时代的皇帝的硬币，反倒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

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奥古斯都，而素以暴君闻名的尼禄的硬币也可以轻松搞定，就是因为他统治时期正好是罗马经济的繁荣期，市场上需要大量的硬币。

综上所述，在古董收藏市场中，价值最高的硬币当属“3世纪危机”时期的罗马帝国皇帝硬币。因为随着帝国陷入危机之中，皇帝在位

的时间也非常短，因此这些短期在位的皇帝硬币就变得非常稀有。在这些皇帝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谋杀身亡，不过他们的硬币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变得如此价值不菲，或许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慰藉吧。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银币故事

因为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大部分都继位不久便惨遭杀害，所以在位5年对当时的皇帝来说也算是比较长的时间了。不过，奥勒良的价值并非在于他统治时间的长短。关于这位皇帝，我没能找到像样的雕像，而硬币上面的肖像，则完全无法令我满意。

虽然奥勒良称不上是什么美男子，但是从硬币上的模样来看，铸造技术实在是退化得惨不忍睹。人常说国力的衰退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上，这么说来，也难怪历史学家们都将当时称为“3世纪危机”。

奥勒良在短暂的统治时期一直为了帝国的重建而东奔西走，甚至连给自己建造雕像的时间都没有，一想到这里，难免为他感到有些难过。

尤里乌斯· 恺撒以罗马的防线在边境之上为由，拆除了首都罗马的城墙。而时隔325年之后，奥勒良又将城墙重新建造了起来。其中的缘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盐野七生

2008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 卡列尼娜》的开头处这样写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这个说法在历史中也适用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这么说：每个民族在兴盛时期都是一样的，而衰败的时期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模样。

但实际上，作为家庭集合体的民族以及民族集合体的帝国，并不适用于以上的公式。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到《罗马人的故事5 · 恺撒时代（下）》之中所描写的罗马帝国兴盛期，是具有罗马特色的兴盛。而《罗马人的故事6 ·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到《罗马人的故事10 · 条条大路通罗马》之中所描写的稳定期，其治理方式也非常具有罗马的独特风格。

就连《罗马人的故事11 · 结局的开始》到最后的《罗马人的故事15 · 罗马世界的终曲》之中所描写的从衰败到灭亡的时代，其产生的原因也和导致其他民族衰败与灭亡的原因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但最主要的因素具有十分明显的“罗马特色”。

因此，在我们阅读从《罗马人的故事11 · 结局的开始》开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时，与其寻找罗马帝国与其他民族衰亡的共同点，不如将目光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人衰亡这个问题上。毕竟作为历史上生命周期最长的帝国，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的衰亡原因，那么在研究其他国家的衰亡原因之时，应该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盐野七生

2003年夏于罗马

“危机”性质的区别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罗马帝国从公元211—284年这73年间的历史。这段时期在罗马历史上专门被称为“3世纪危机”而大书特书，在这段时期甚至发生了罗马帝国皇帝被敌人生擒这样前所未闻的惨剧。但造成3世纪危机的原因却并非仅仅于此。虽然和罗马帝国以前所遇到的众多危机一样，3世纪危机也被冠以“危机”（crisis）之名，但实际上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能够克服的危机，后者则是只能疲于应对并终将导致灭亡的危机。从前的罗马人只要坚持发扬自己的特点就能够克服出现的危机，而这段时期的罗马人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结果只能导致危机愈发严重。从本卷开始，罗马帝国便很明显地走上了后者的道路。

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都将3世纪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统治阶级的昏庸

蛮族的频繁入侵

经济的衰退

知识分子的愚钝

基督教势力的崛起

以上的分析都没有错。但是在罗马人漫长的历史之中，绝对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除了基督教势力的崛起之外，其他的那些问题他们

多少都经历过。可是为什么之前都能够克服的问题，到了3世纪就变成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呢？在本卷中，我将按照年代顺序依次为大家详细地解开这个疑问。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到3世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代，请参照下表。通过这张表格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造成3世纪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政局的不稳定。

政局不稳定，即便在通信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也会对政策的连续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更何况从广阔疆域的边缘向首都罗马传达信息，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时间的两千多年以前了。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来说，由于帝位频繁更迭所导致的政策无法延续，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公元1世纪的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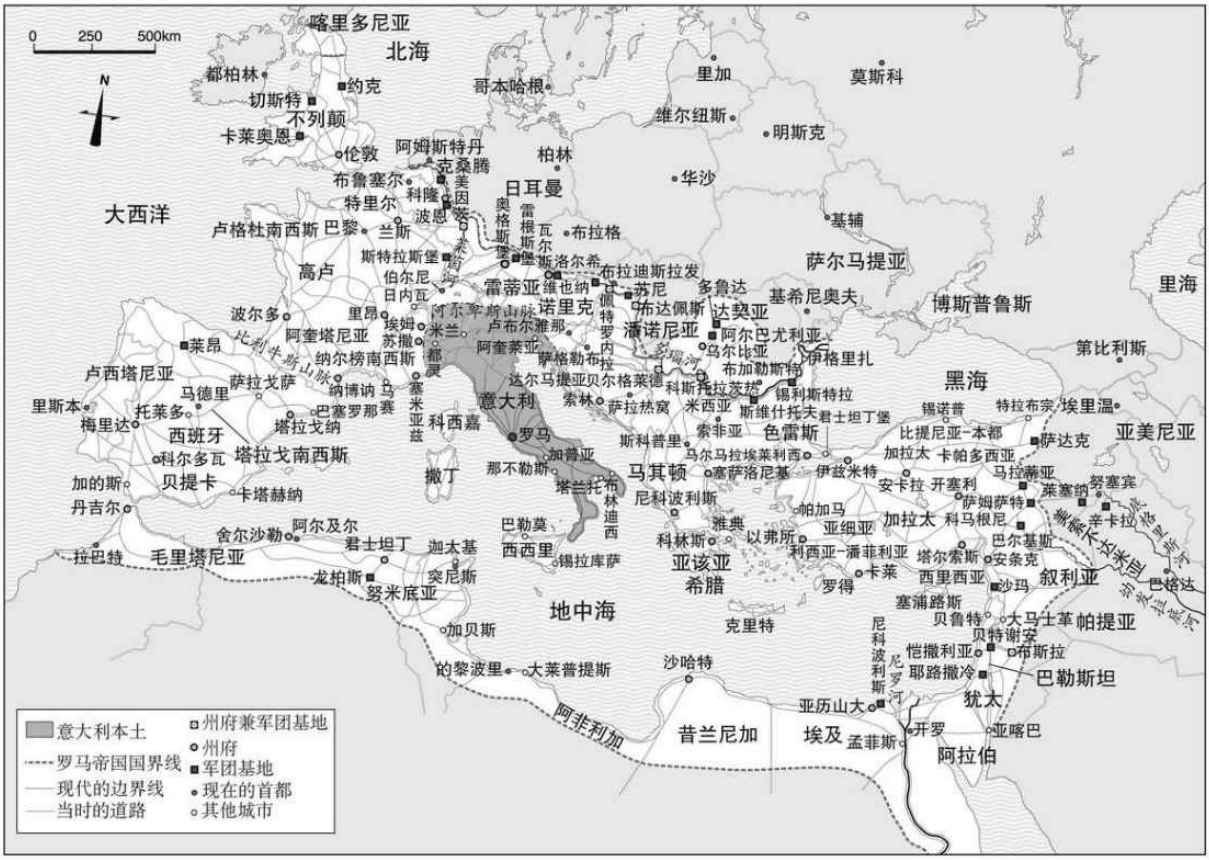
	在位时间	皇帝（在位时间·死因）	所在丛书卷数
共128年，9位皇帝+内乱	公元前30年—公元14年	奥古斯都（44年·病死）	第六卷
	14—37年	提比略（23年·病死）	第七卷
	37—41年	卡利古拉（4年·谋杀）	
	41—54年	克劳狄乌斯一世（13年·谋杀）	
	54—68年	尼禄（14年·自杀）	
	68年	内乱期	第八卷
	69—79年	韦斯帕芗（10年·病死）	
	79—81年	提图斯（2年·病死）	
	81—96年	图密善（15年·谋杀）	
	96—98年	涅尔瓦（2年·病死）	

公元2世纪的皇帝

	在位时间	皇帝（在位时间·死因）	所在丛书卷数
共 113 年，6 位皇帝 + 内乱	98—117 年	图拉真（19 年·病死）	第九卷
	117—138 年	哈德良（21 年·病死）	
	138—161 年	安敦尼·庇护（23 年·病死）	
	161—180 年	马可·奥勒留（19 年·病死）	第十一卷
	180—192 年	康茂德（12 年·谋杀）	
	193 年	内乱期	
	193—211 年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8 年·病死）	

公元3世纪的皇帝

	在位时间	皇帝（在位时间·死因）	所在丛书卷数
共 73 年，22 位皇帝	211—217 年	卡拉卡拉（6 年·谋杀）	第十二卷
	218—218 年	马克里努斯（1 年·谋杀）	
	218—222 年	埃拉伽巴路斯（4 年·谋杀）	
	222—235 年	亚历山大·塞维鲁（13 年·谋杀）	
	235—238 年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库斯（3 年·谋杀）	
	238 年	戈尔迪安一世（半个月·自杀）	
		戈尔迪安二世（半个月·战死）	
		普皮恩努斯（3 个月·谋杀）	
		巴尔比努斯（3 个月·谋杀）	
	238—244 年	戈尔迪安三世（6 年·谋杀）	
	244—249 年	阿拉伯人菲利普（5 年·自杀）	
	249—251 年	德基乌斯（2 年·死于与蛮族的战斗）	
	251—253 年	加卢斯（2 年·谋杀）	
	253—260 年	瓦勒良（7 年·被俘，死于狱中）	
	253—268 年	加里恩努斯（15 年·谋杀）	
	268—270 年	克劳狄乌斯二世（2 年·病死）	
	270—275 年	奥勒良（5 年·谋杀）	
	275—276 年	克劳狄乌斯·塔西佗（8 个月·病死）	
	276—282 年	普罗布斯（6 年·谋杀）	
	282—283 年	卡鲁斯（1 年·意外）	
	282—283 年	努梅里安（1 年·谋杀）	
	282—284 年	卡里努斯（2 年·谋杀）	



公元3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版图

第一部分

3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公元211—218年

皇帝卡拉卡拉（公元211—217年在位）

每到夏天甚至会在其中上演歌剧的卡拉卡拉浴场（意大利文为Terme diCaracalla），大概可以称为罗马遗迹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虽然这座浴场因为其建造者卡拉卡拉大帝而得名，但实际上卡拉卡拉并非这位皇帝的本名。据说按照罗马皇帝的命名公式，他的全名是“皇帝· 恺撒· 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安敦尼· 庇护· 奥古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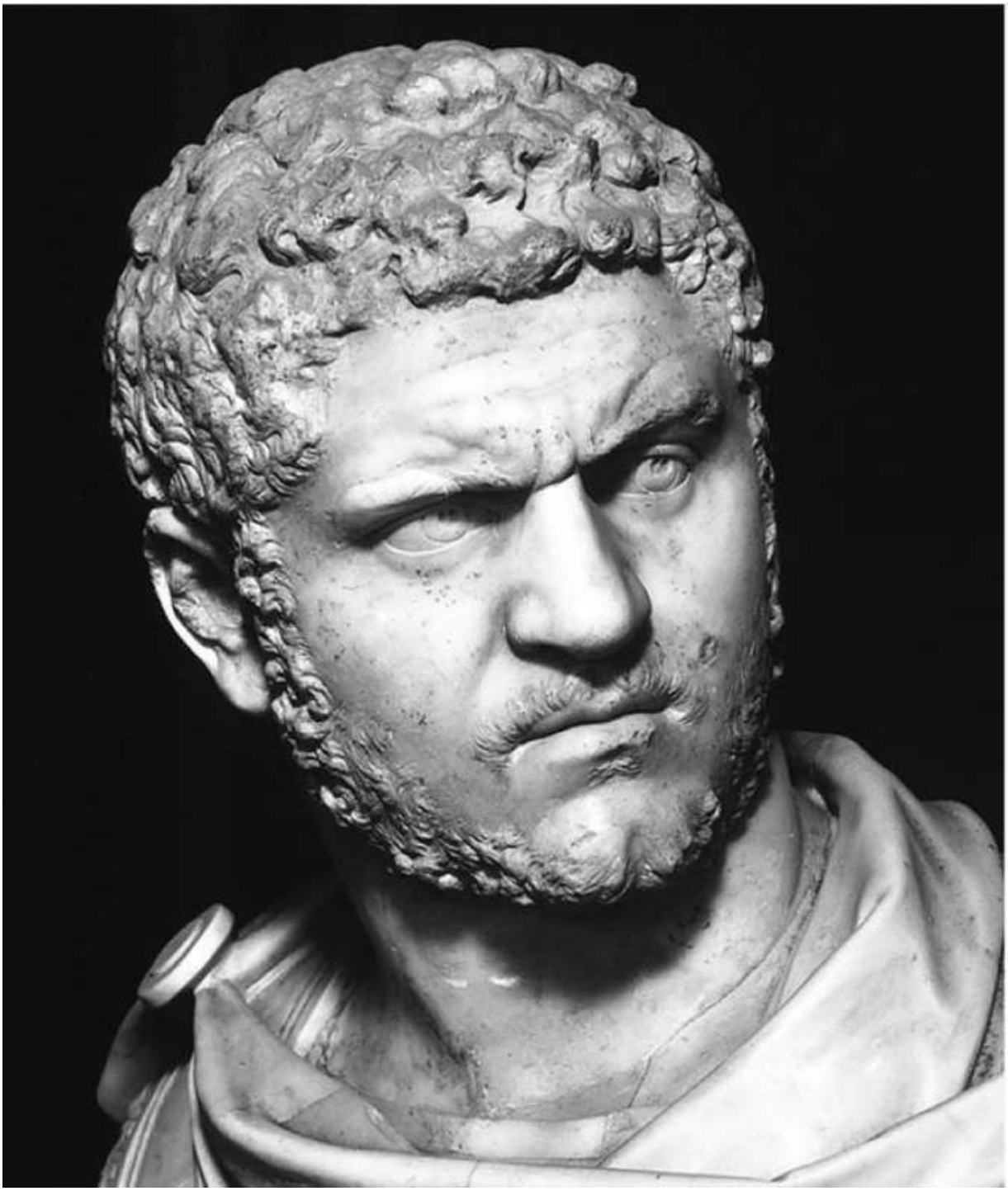
皇帝、恺撒和奥古斯都是每一位罗马皇帝都可以使用的敬称。塞维鲁是他的父亲即前任皇帝的姓氏，儿子继承这个姓名在古代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他的问题在于将安敦尼· 庇护和马可· 奥勒留这两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皇帝的姓名加在自己的名字之中。不过这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前任皇帝塞维鲁的安排。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出身于北非的行省莱普提斯，身份属于在罗马社会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自图拉真与哈德良之后，还接连出现过安敦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等人，因此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并不少见。虽然北非地区在450年前一直属于罗马帝国的死对头迦太基人的领地，但是对于一贯实行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来说，行省出身也算不上什么负面因素。不过即便如此，军团长和行省总督与皇帝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正如图拉真作为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而始终被后世所铭记一样，塞维鲁作为第一位北非出身的皇帝也不会被后世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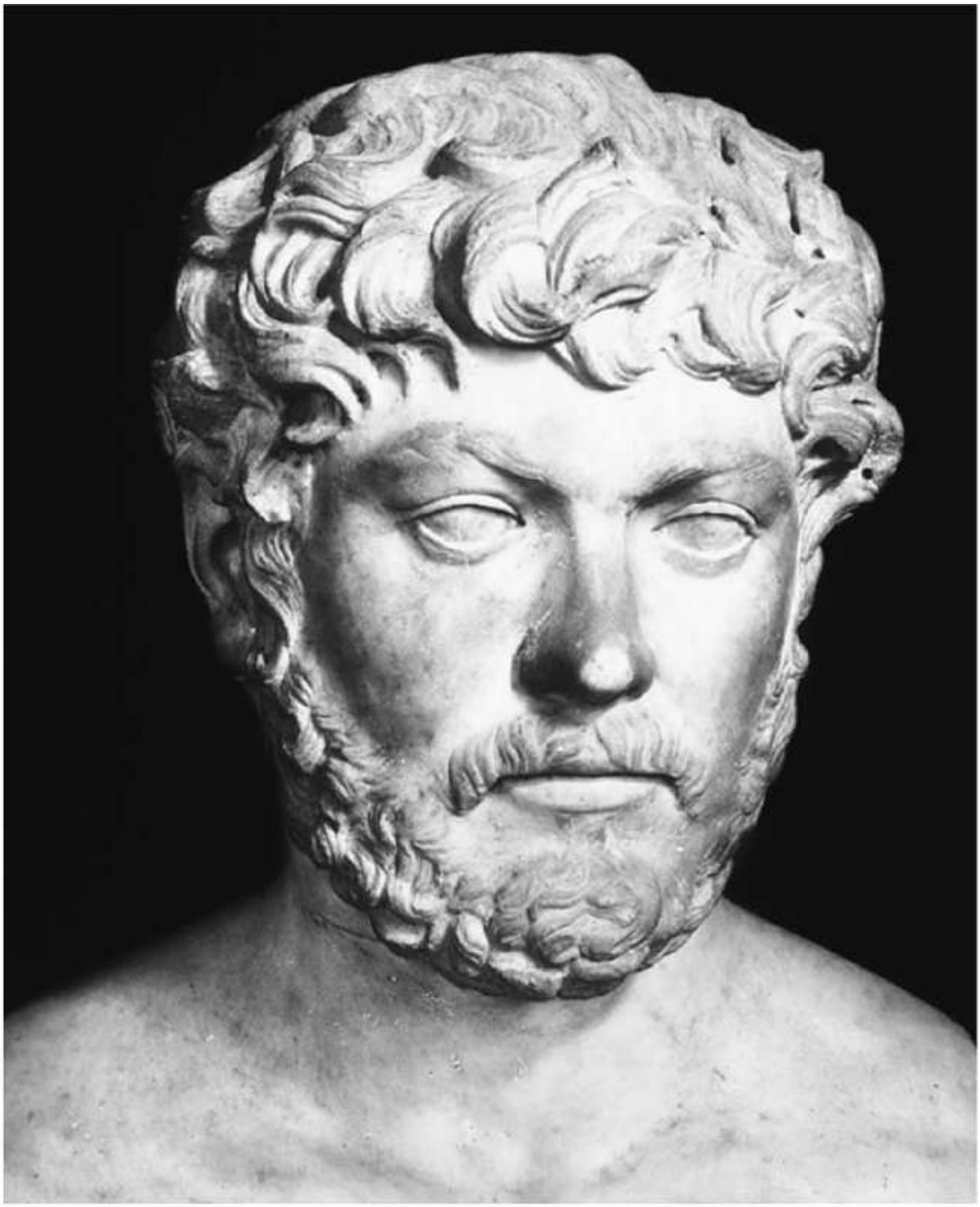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塞维鲁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行省出身的人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这些被罗马人称为“新贵”（Homo novus）的新兴精英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之内身居要职，大部分都是因为迎娶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但是塞维鲁的妻子尤利亚· 多姆娜却只是一位叙利亚祭司的女儿。因此，她和塞维鲁生下的儿子卡拉卡拉，身上基本没有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血统。

当塞维鲁决定将这个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时，感觉到有必要为他增加一些特别的权威。所以他才将两位德高望重的皇帝——安敦尼· 庇护和马可· 奥勒留的名字加进儿子的全名之中，为的是使儿子能够像这两位明君一样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为年纪轻轻就将继承皇位的儿子镀了一层金。因为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是安敦尼· 庇护的养子，因此“安敦尼”是这两位皇帝共同的姓氏。卡拉卡拉继承的也是这个姓氏。当卡拉卡拉登基之后，他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安敦尼，所以大浴场的正式名称也是“安敦尼浴场”（Thermae Antoninianae）。至于卡拉卡拉这个名字，只是别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在成为皇帝之后依然经常穿着高卢人传统的长袖大衣。虽然在天气寒冷的不列颠和高卢地区这种服饰十分常见，但是在气候温和的意大利，这种装扮却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或许是因为他从小跟随父亲在驻地高卢生活，所以对孩提时代的服装情有独钟。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23岁便继承皇位的卡拉卡拉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展示欲望。

不管是后世还是当时都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塞维鲁和马可· 奥勒留，都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如果将继承皇位的这两个人相比，康茂德和卡拉卡拉则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身为皇帝的康茂德显得非常消极，而卡拉卡拉则明显十分激进。也就是说，卡拉卡拉在继承皇位的时候干劲十足地想要闯出一番伟业。这位23岁的年轻皇帝的理想是能够成为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伟人。



卡拉卡拉



盖塔

公元211年2月4日，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远征途中病逝于不

列颠的罗马军团基地约克，享年64岁。皇帝的位置立刻被塞维鲁的两个儿子——23岁的卡拉卡拉和22岁的盖塔共同继承。因为塞维鲁很早便安排好他们兄弟二人共治，因此皇位继承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卡拉卡拉无法忍受和性格温厚的弟弟共同分享权力，甚至不顾当时母亲也在场就将自己的弟弟杀害了。公元212年2月12日，距离他的父亲去世仅一年时间，卡拉卡拉终于如愿以偿地独揽大权。因为元老院一直对盖塔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也没有追究卡拉卡拉谋杀弟弟的行为，并且承认了他的独裁统治。而就在此后不久，一项法令便贴满了罗马帝国的大街小巷和广场回廊。

在开始讲解卡拉卡拉皇帝的“公民权法”之前，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将自己的认识从现在的21世纪退回到2000年以前的古罗马帝国。虽然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在2000多年以前的古代社会，这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毕竟在1600年之后才出现人权宣言，在1800年之后才出现普通选举法。尤其是相比于因为“血缘”不同而没有公民权的雅典而言，不分人种与民族全部授予其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大进步。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

每个人都是罗马公民！

罗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的。这个被称为“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法令规定，凡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的自由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至于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身为颁布者的卡拉卡拉在公告之中是这样解释的：

> 我不应该只让我的臣民们分担守护帝国的责任，也同样应该与他们分享帝国的荣誉。通过这项法令，曾经那些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够享受的荣誉，现在将平等地沐浴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

从此之后，罗马帝国的特色之一——“罗马公民”（romanus）与“行省居民”（provincialis）之间的区别被彻底废除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在公元212年，即罗马帝国建立250年之后，终于完全消失了。不仅仅是曾经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在人种、民族、宗教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的罗马帝国之中的所有居民，将全都享有和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完完全全是一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法令，甚至可以说自从尤里乌斯· 恺撒以来一直坚持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至此终于宣告完成。就连对公元4世纪之前的罗马帝国的政策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会，都对这项法令从人道的角度给予了肯定。

可是，这样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却很少被那些研究罗马历史的专家和学者所提及。首先，关于这项法令的描述就非常少，也基本没有人正面提及此事。就算偶尔有人提到，对此也没有一个正面或者是负面的评价，最终使这项法令变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鲜有留下关于这项法令的评价和文献史料，导致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无从着手；二是为了尊重当时的学者对这项法令的看法。当时唯一对这项法令作出评价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认为，卡拉卡拉扩大公民权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税收罢了。而就是他的这个评价，对后世的历史学家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卡拉卡拉制定这项法令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当然他们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罗马帝国的税制是由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根据他所制定的税制，像营业税和关税这样的间接税种，不管是罗马公民还是行省居民都要缴纳相同税率的税。但是在直接税种上，拥有保卫帝国义务的罗马公民不必缴纳税金，而没有这种义务的行省居民却要缴纳收入的10% 作为行省税。哲学家西塞罗将行省税称为“被保护者向提供和平与安全保障的一方缴纳的税金”。

但是，并非所有的罗马公民都拥有进入军团服役20年的机会。奥古斯都时期军团兵的数量大概在16万人左右，但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数在当时帝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就超过500万人。也就是说，在30个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履行保卫帝国的义务。

奥古斯都认为这种现象非常不公平，于是他决定向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追加两种直接税，分别是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税率都是5%。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税款，对于胜者通吃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人，尤其是身为胜利者一方的古罗马人来说，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奥古斯都巧妙地将这两种直接税设计成目的税，那就是将其作为军团兵满期退役之后的退役金。这样一来，那些同样拥有保卫帝国义务的罗马公民就无法对此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了。

而就是这种延续了200多年的罗马帝国税制，在卡拉卡拉统治时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由于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行省居民获得了和罗马公民一样的权利，从此他们不再需要缴纳行省税。但是，在他们从“行省居民”变成“罗马公民”的同时，需要承担缴纳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的义务。不仅如此，卡拉卡拉还将这200年来被看做是“罗马公民税”而稳定在5% 的税率一下子提升到了10% 。这也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将“安东尼努斯敕令”看做是增加税收政策的原因。

罗马帝国历代的皇帝，对税收政策都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首先，罗马的税收制度一向简单明了。因为税制越复杂，需要从事这方面的人员也就越多，这样不仅会增加人工费用的支出，还会给税务相关的从业人员留下钻空子的机会。不管对此的惩罚多么严厉，仍然无法杜绝贪腐行为的发生。想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税制环境，就必须将税制本身简化到无须专门安排人员管理的程度。

只有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的基础，所谓善政，除了要使社会中善良的民众得到公正的对待之外，将税率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内并且不再提升，也是实现善政的重要条件。人们对直接关系到自己利益的政策都

会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反应，由此引发的暴动和叛乱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手段进行镇压。对于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来说，配置在国境附近的军团数量尚且不足，如果维持国内秩序还要出动军团的话，那么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势必需要增加军费，而如此一来就要继续增加税收，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就要将税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使纳税人不会感觉税率太重。

实际上，罗马帝国已经成功地将这一税制保持了200多年。行省居民缴纳的行省税为“十分之一”（decina）。关税除了从东洋舶来的奢侈品之外一律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营业税为“百分之一”（centesima）。只面向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征收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从以上这些通称之中就可以看出，古罗马帝国的税制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后世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罗马帝国所实行的广范围和低税率征收税金制度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因为确立了帝国税制的奥古斯都以及其后的众位皇帝，并不仅仅将税制看成经济问题，而是将其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正如前文所说，与卡拉卡拉法令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批判这项法令只是为了增加税收的政策，如果他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通过将行省居民全部纳入罗马公民范畴，应该会成功地增加大量税收。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历史资料上完全看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记载，就连卡西乌斯· 狄奥都没有提到最后的结果。因此我个人认为，“安东尼努斯敕令”的颁布，虽然使卡拉卡拉改变了自奥古斯都以来延续了200多年的税制，但是非但没有为他增加税收，反而还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首先，因为马可· 奥勒留与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坚持不懈的努力，入侵的北方蛮族终于在公元212年被成功击退，帝国的防线（limes）依旧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帝国还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状态

之中。在防线保护之下的行省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非常完美地诠释了罗马帝国广阔的疆域，就算你住在多瑙河沿岸，也一样能够买到北非的产品。行省税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一个行省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占收益10% 的行省税在帝国税收之中占据的重要位置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卡拉卡拉将其完全废除了。而且，将行省居民全部升级为罗马公民所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有行省税的损失。因为行省税是每年都会缴纳的稳定收入来源，而即便将原有的行省居民全部转变为罗马公民增加了课税对象，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所带来的收入却只是一次性的。就算将税率从5%　提高到10%，也无法弥补完全废除行省税之后所造成的损失。

在卡拉卡拉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其前任塞维鲁皇帝的军事强化政策，导致在防卫上的支出大幅增长。军团数量也因为新编成了3个军团而增加到33个。同时，军团兵的年薪也在不断增长，到了塞维鲁时期已经从最初延续了百余年的300第纳尔增加到375第纳尔。总之，在这种状况下所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对帝国的财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那些原本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看来，一直稳定在5%　的遗产税与奴隶解放税突然增加了一倍。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对突然增加的税赋感到开心。而且就算征税对象扩大为全体民众，并且税率也增加了一倍，但是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与行省税之间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稳定性。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向这两种行为征收税金，主要是由于罗马人具有下列特质：

首先，这和罗马人的性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将遗产的一部分赠送给那些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或者自己一直以来尊敬的人。这种习惯曾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罗马人的性格之中。奴隶解放税也是如此，使奴隶获得自由身的行为本身就是主人对奴隶的最大馈赠，就相当于给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奴隶发放一笔退役金。所以在奴隶获得自由的时候，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

金。这个钱既可以是奴隶自己支付，也可以是主人支付，或者别人垫付。在罗马有一种被称为“解放奴隶”（libertus）的阶级存在，这在古代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标榜自由与民主的雅典都是没有的。当然，如果没有一定数量被解放的奴隶，肯定无法形成一个社会阶级，由此可见解放奴隶在当时的罗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但是，罗马社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罗马人逐渐地变得更加内向，而这种改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主义的产生。根据史料记载，早在马可· 奥勒留的时代，志愿成为地方自治体议员的民众数量就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并非因为议员是不会获得报酬的公职，而是因为在罗马社会，担任地方自治体公职的人为了充实当地的社会资本，需要向政府进行捐赠。因此在遗产的继承上，人们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财产赠送给毫无关系的人。而需要说明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获得遗产是不需要缴税的。

另外，奴隶解放税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提高财政收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与其说奴隶主不愿意给予奴隶自由身，不如说在罗马社会之中的奴隶数量大幅减少。自从罗马帝国成立以来，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局面下，基本上不再发动用于增加奴隶的侵略战争。从五贤帝时代制定的奴隶保护法案就可以看出，当时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另外，鼓励奴隶之间的婚姻，对奴隶生育下一代给予奖励的行为，更使得奴隶主不愿解放自己的奴隶。当时的人们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奴隶罗马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奴隶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逐渐显现出来。因为奴隶如此重要，所以奴隶主们自然也没有像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那样好像支付退役金一样给予奴隶自由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作为税收的主要支柱，只能说卡拉卡拉不但对经济一无所知，身为一名统治者也过于缺乏经验。

事实上，被认为是增加税收政策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恶评如潮，在卡拉卡拉死后不到两年便被废除，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回到了5% 的

水平。但是赋予所有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恢复原状的只有税率，而“行省居民”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被废除的还有行省税。由此可见，所谓的权利，一旦赋予之后再想要剥夺回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给罗马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废除了作为国税支柱的行省税，导致帝国的财政恶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法令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罗马公民”存在的意义。

“既得权”与“期待权”

作为最早的城邦，罗马和希腊的雅典都属于同一类别。不管是宗教、风俗还是文化，后世都将这段时期称为“希腊罗马时代”，给人一种先有雅典再有罗马，就好像两个民族直接连续下来的感觉。但是在公民权这个问题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公民权看成现代的国籍。

雅典的“公民权”，只有在父母双亲都是雅典公民的前提下，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才会被承认为雅典公民。就算母亲同属于希腊民族，但只要出生在雅典以外的城邦，那么仅凭这一点她的孩子便永远无法取得雅典的公民资格。更不用说双亲都出生在希腊北部地区的情况了，还有在意大利南部众多由希腊人建设的殖民城市出生的人，不管这个人对雅典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他的身份都永远是外国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雅典人，尽管亚里士多德创办了闻名于世的吕克昂学园，为雅典文化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雅典依然没有授予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雅典公民的身份。不，应该说在雅典人的头脑之中，根本就没有将公民权授予外国人的想法。因为对雅典人来说，“公民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另外，雅典社会的构成方式，也加强了这种封闭的倾向。雅典城邦经历了从王权到贵族制最后到民主制的转变，是被后世称为“伯里克利

时代”的民主制时代之中最为繁荣的国家。民主主义最早就是由这个时代的雅典人所创立的政治体制，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常识。

但是，民主政体需要拥有权力的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因为虽然每个人的能力不尽相同，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不管拿在谁手里的选票，所具有的功能都是一致的。

对于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来说，那些外来者即外国人很难融入其中。就好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家伙，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你的家人，这种事情想必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吧！所以说全民平等是外来者融入雅典的最大障碍。甚至就连帮助他们打败了宿敌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雅典都没有授予其公民权。

反观罗马，自从在台伯河沿岸建国开始，罗马人对于“公民权”的认识就和雅典人完全不同。

罗马在建国初期与周边各部族战争不断，但是就算罗马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将对方作为自己的奴隶，更不会像斯巴达那样将战败者当做农奴使用。只要对方承认罗马的胜利并且缔结和平协议，那么这些战败者从领袖到平民都可以移居罗马，并获得罗马公民权，其中有能力的人甚至还会获得罗马元老院的席位。罗马最初将其作为一种增加人口的政策，虽然在共和政体成形之后不再强制人民向首都迁徙，但这种同化政策仍然保留了下来。如果没有同化政策，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尤里乌斯· 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克劳狄乌斯一世。追溯他们的家谱，可以发现这些人的祖先都是曾经的战败者。事实上不仅上述的这些皇帝，就连组成罗马领导阶级的大部分人，其祖先也都是曾经的战败者。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罗马人毫不在意。这一点实在是非常有趣。

罗马人的“公民权”并不像雅典人那样以“血缘”为基础，而是由“志同道合”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就算是那些曾经被打败的人，只要愿意

为守护罗马这个“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便可以和其他的罗马公民一样，拥有同等的资格和权利。

尤里乌斯· 恺撒在他担任军团总指挥的时候，就以高卢战役需要帮助为由，赋予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所有人以及居住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之中的有能力者罗马公民权。而且，当他打败高卢之后，不仅赋予高卢的有能力者罗马公民权，还向强大部族的族长提供了元老院的席位。当恺撒成为帝国全境的实际领导人之后，他还向教师和医生这些从事教育和医疗行业的人，不分人种、民族与肤色，全部授予罗马公民权。如果亚里士多德出生于罗马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是最早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吧。

作为罗马第一位皇帝的奥古斯都，不但忠实地延续了恺撒的这种开放路线，甚至还确立了一种更大规模提供罗马公民权的系统。这个决定就是行省出身的人如果作为预备兵加入罗马军队，那么在25年服役期满之后，就算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晋升也一样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和教师以及医生获得的罗马公民权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拥有可以继承的权利。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拥有罗马公民权。就算他们的孩子身上没有一丁点罗马人的血统，也可以和在本土意大利出生的罗马公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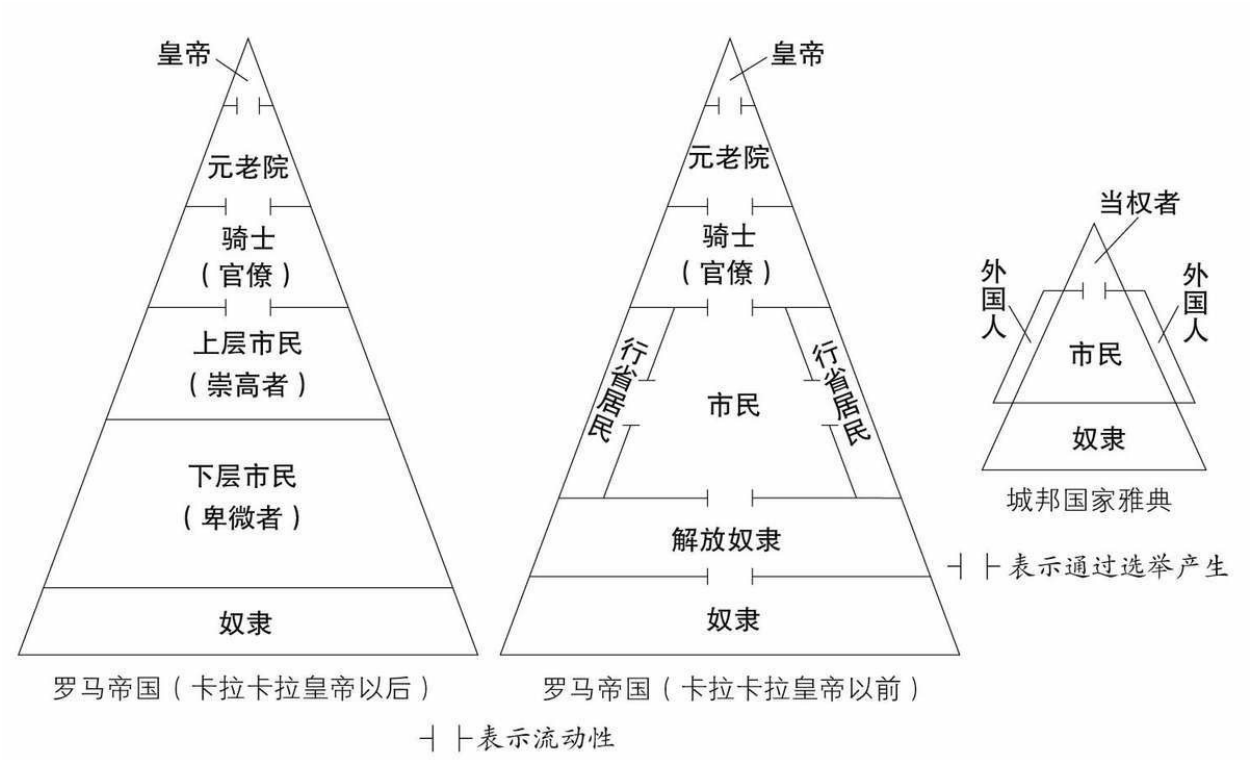
虽然前面只列举了几个例子，但实际上罗马人对“公民权”的看法如此开放，并非出于人道主义之类的感情。应该说同化政策对于罗马人来说，相当于帝国运营上的“政略”。在帝国创建初期恺撒和奥古斯都制订的这条开放式路线，之所以会被随后的皇帝们沿用下来，是因为这是最适合罗马帝国统治广阔疆域的政治系统。甚至可以说从罗马建国初期便实行的开放路线，正因为符合罗马人自身的特点，所以才会被贯彻下来。因为人类只有在进行基于自己本质的行为之时，成功率才是最高的。

因为创作了《希腊罗马名人传》而闻名于世的普鲁塔克，将罗马强大的原因归结于同化政策。这位生于五贤帝时期的希腊人，深知希腊之前连同盟都市的居民都不会获得公民权的历史，所以从他口中说出的这句话显得更有一番深意。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民权是一出生就享有的“既得权”。而对于罗马人来说，公民权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意愿和努力而获得的“期待权”。因此罗马自然更容易对外人敞开门户。虽然“血缘”自己无法改变，但“意愿”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从罗马社会的构成上来看，更容易使外来者融入他的社会体系之中。

希腊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邦雅典，自上而下分为领导者、市民、奴隶三个阶级，而罗马帝国的社会各阶层则更为细致地分为以下几个阶级：皇帝、元老院、骑士、一般市民、解放奴隶、奴隶。之所以能够划分得如此细致，是因为罗马并没有采用民主政体，因此不必特意去维持全体公民的平等性。同时，这种阶级的细化，也更加方便外来者融入罗马社会之中。因为只要社会各阶级之间保持良好的流动性，那么对于不同种类社会之间的融合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外国人这样的不同种类社会分子，想要融入罗马社会的话，首先就将其排在社会最底层，至于接下来的发展就要看其个人的能力和奋斗了。



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0 ·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将罗马帝国纵横交错的道路设施比做人类的血管一样，罗马公民权也和罗马的交通网一样在帝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涌现的人才就像是罗马帝国的新鲜血液，通过同化政策的公民权系统提供给罗马帝国。只要肯努力便有机会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对于行省居民们来说充满无穷的诱惑，这也是使罗马帝国长期保持活力的奥秘。

但是这长久以来的政策在卡拉卡拉的法令下被彻底改变。行省居民不管贡献如何，都将获得罗马公民权，这样一来，原本作为“期待权”的罗马公民权就变成了和雅典一样的“既得权”。

“期待权”变成“既得权”带来的影响

这项改变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那些从前便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失去了自己身为帝国支柱

的自豪感。因为既然全国所有人都一样了，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像以前那样身先士卒、鞠躬尽瘁。

第二，成为罗马公民的行省居民，也失去了曾经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既然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身份，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努力奋斗呢？

第三，这也是完全违背了卡拉卡拉皇帝颁布这项法令的最初意愿的一点，那就是升格为罗马公民的旧行省居民，并没有积极地承担起帝国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对于很容易便得到的东西都不会感到珍惜，比如现代社会的投票选举中极高的弃权率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这和自己的实际利益有什么关系。旧行省居民不再需要缴纳行省税，使收入增加了一成的喜悦只是暂时的。成为罗马公民之后新增加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也是暂时的，而且对这两种税比较敏感的资产家，一般来说早已经获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因此，摆在那些刚刚得到罗马公民身份的旧行省居民面前的问题是因为取消了行省税而产生的国家财政缺口。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他们需要缴纳大量的临时税。所谓临时税，是皇帝以向前线调拨军费为由临时征收的税种，但是在当时社会，这种临时税频繁出现。卡拉卡拉不仅彻底改变了公民权的意义，还将罗马一直以来沿用的简单明快的税制，发展为临时税频繁出现的复杂奇怪的形式。就算后来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恢复到了从前的税率，但是关于临时税频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第四，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区别消失之后，罗马社会最具特色的流动性也随之消失。由此导致的社会僵化就如同人类的动脉硬化一样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

最后，虽然没有了罗马公民与行省居民之分，但是在这两者共存的一般市民阶级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局面。这两极分别是“崇高者”和“卑微者”。也许人类本就无法忍受全员平等的状况，必须人为地制造出一些差别才能够生存下去。而那些出身于奴隶和“卑微者”阶级的

人，在罗马社会将一辈子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罗马也变成了永远没有希望出人头地的绝望之地。

由此可见，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对罗马帝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罗马帝国的一角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便宣告崩塌，就好像帝国损失了一座坚固的要塞。而造成这种损失的人并非敌人，恰恰是罗马人自己。

也许正如敕令上所写的那样，卡拉卡拉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实现罗马国民的地位平等，因此才会实施“行省居民全部罗马公民化”的政策。这位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年轻人，在登基数年后甚至谋求罗马与帕提亚王国之间的合并。连自古以来的宿敌都能够想要合并，那么他作出废除罗马帝国阶级的举措也不足为奇。所以，我认为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并非是为了增加税收而颁布的法令。毕竟只要从常识的角度考虑一下就会发现，通过这项法令想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煞费苦心地从深层含义去理解“安东尼努斯敕令”，不如单纯地从字面上理解更加贴近事实。也就是说，这项法令只是24岁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而他之所以会作出如此草率而肤浅的决定，想必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尤里乌斯· 恺撒的那句名言吧：

> 每一个导致糟糕结果的决定，其出发点都是好的。

我之所以会对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个疑问和一个碑文。

如果“安东尼努斯敕令”真的如基督教的评价那样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法令，那么为什么被称为优秀政治家的五贤帝们没有颁布这项法令呢？特别是其中坚信尊重人权是皇帝的责任与义务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就连自己的女儿选择行省出身的人作为丈夫，他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和阻挠，如此开明的贤君，别说颁布这项法令，甚至连诸如此类

的想法都从来没有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罗马时代的墓碑背面的碑文，会将这个人一生的履历都雕刻在上面。就连那些默默无名的普通市民，都会在墓碑上明确地表明其“罗马公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从这个人的家族名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祖先并不是拉丁系的罗马人，而是希腊，或者高卢人，由此可见，他生前是一名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而在这些墓碑之中，还有几个特别标明自己是在“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之前的罗马公民。也就是说，他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罗马公民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

卡拉卡拉使罗马公民权失去了其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的魅力。而失去了魅力之后，附加在罗马公民权之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也随之消失。这对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融合在一起的罗马帝国而言，无异于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就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品牌的消亡。

帝国防卫

虽然坚信废除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区别，就能够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想法过于浅薄，但是卡拉卡拉对于皇帝的最大责任和义务就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一点上的认识，却非常有罗马先贤的风范。而这个时候他才只有24岁。因为讨厌虽然性格稳健但做事消极的弟弟盖塔，卡拉卡拉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年纪轻轻便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他，毫不留恋首都罗马奢华安逸的生活，在他杀害盖塔成为独裁者的第二年，即公元213年，立刻亲自奔赴北方的前线。就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感受阿尔卑斯北部那充满活力的春季一样，他只带了非常少的近卫兵便动身出发了。

他不在首都之时的内政，全权交由一个叫做“Concilium”的机构负责。如果说元老院相当于国会的话，那么这个Concilium就相当于“内阁”。这一时期在暗中支持内阁的是一位处事相当周全的女性——尤利

亚· 多姆娜。可以说正因为有这位贤明的母后，卡拉卡拉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出征。虽然尤利亚· 多姆娜对于自己的儿子杀害了自己另一个儿子的事实感到非常难过，但出于母亲的本能，她还是不遗余力地为卡拉卡拉的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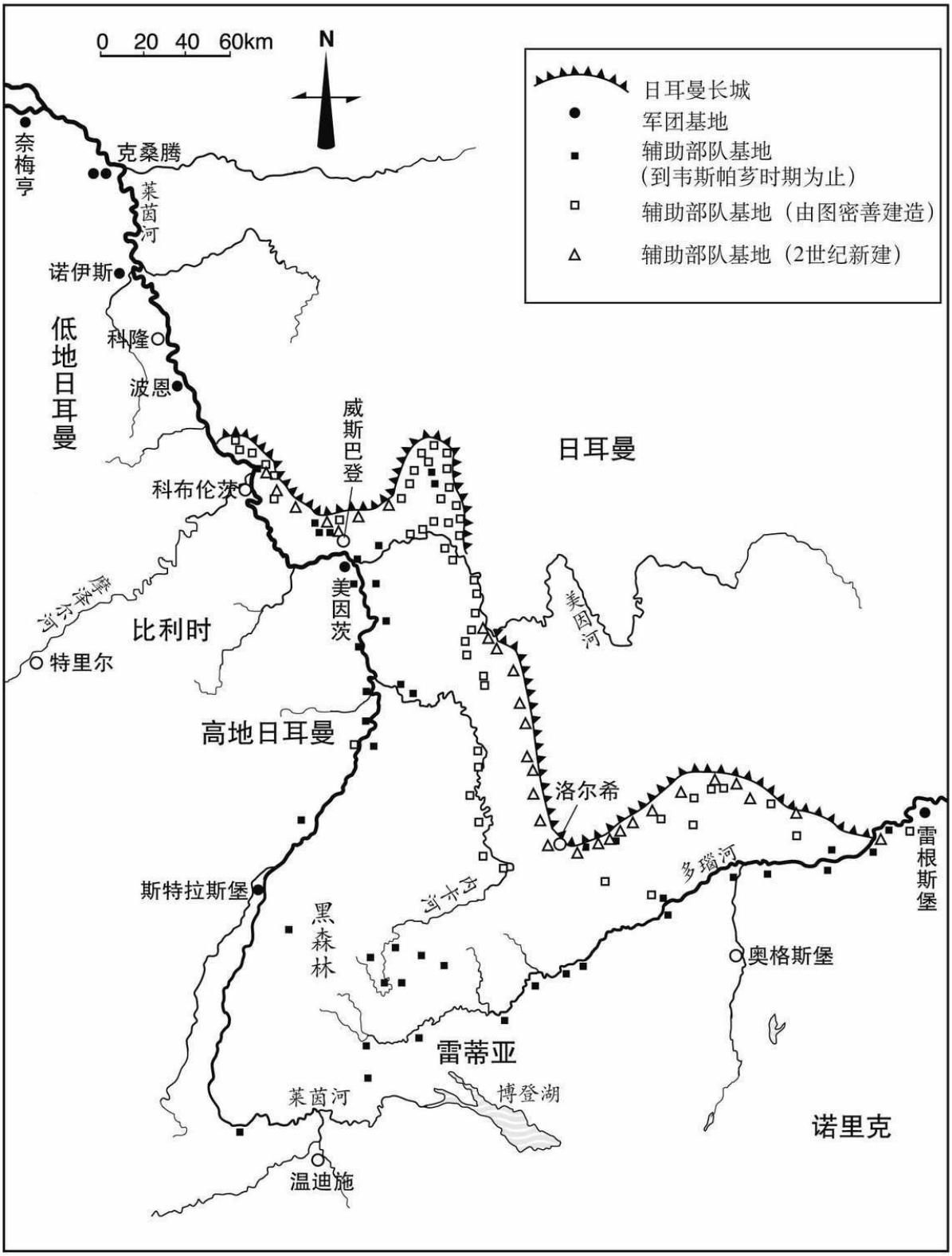
虽然关于卡拉卡拉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都去了哪些地方，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从他包括视察和战斗在内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其活动范围应该仅限于莱茵河防线和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a）周边地区。不过他既然视察了防线，那么用于向防卫基地输送“血液”的帝国交通网络也自然不容忽视。事实上，卡拉卡拉也确实下令将从高卢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所有道路全部整修一新。罗马的交通网络在3世纪时仅主干道便超过8万公里，即便没有必要全部重新铺设，但要想使其完美地发挥作用，定期的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罗马的历代皇帝都不曾忘记这项重要的工作，卡拉卡拉下令进行的却是比之前更加认真的整修工程，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还被刻在石碑上流传于世。

在单纯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上，日耳曼长城也在卡拉卡拉的整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就连曾经只有壕沟加木栅栏的地方，现在也用岩石和砖块武装了起来。

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上游的地带，是罗马人征收十分之一农耕税的重要产粮区。这个被称为“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的地区位于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的中间，从安全保障的意义上讲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软肋。这片地区布满连绵起伏的山脉，导致在河流沿岸建立防线十分困难，周围溪流众多，使得军队难以驻扎，加之覆盖了这片区域大半面积的黑森林（Schwarzwald），都让罗马帝国对这片地区的防卫问题挠头不已。更重要的是，日耳曼民族一向将森林看成日耳曼人的母亲，每当进入森林作战的时候都会变得英勇无比，难以阻挡。

最早考虑保护这道“软肋”的人是提比略皇帝，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

岸建立罗马帝国北方防线的人也是他。真正将包括黑森林一带的全部地区都包围在防线之中，却是图密善继位之后的事了。从此以后，在莱茵河沿岸的波恩和科布伦茨中部以南、美因茨以北30公里处直到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出现了一道守卫罗马帝国北方边境的重要防线。这道将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连为一体的日耳曼长城，使罗马帝国的防御体系更加合理化。所谓合理化，就是将经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同时还能够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


0 20 40 60km
N
日耳曼长城
军团基地
辅助部队基地
(到韦斯帕芗时期为止)
辅助部队基地（由图密善建造）
辅助部队基地（2世纪新建）
奈梅亨
克桑腾
莱茵河
诺伊斯
低地日耳曼
科隆
波恩
威斯巴登
日耳曼
科布伦茨
美因茨
比利时
特里尔
美因河
高地日耳曼
洛尔希
雷根斯堡
多瑙河
斯特拉斯堡
黑森林
奥格斯堡
雷蒂亚
莱茵河
博登湖
诺里克
温迪施

完成时的日耳曼长城（引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但是，这片区域如果稍有疏忽便会再次回归到曾经的“软肋”局面，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忘对这里的防线加以强化。特别是哈德良与马可· 奥勒留两位皇帝对此进行的强化非常正规，卡拉卡拉皇帝在前人的基础上于40年之后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巩固。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揣摩人民心理的政治家，但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才能却是有目共睹的。

帝国成立后军费的演变

	皇帝	军团数	军团兵人数	年薪（第纳尔）	辅助兵人数
公元前 23 年	奥古斯都	25	15 万强	225	15 万弱
公元 90 年	图密善	25	15 万强	300	15 万弱
公元 106 年	图拉真	30	18 万强	300	18 万弱
公元 138 年	哈德良	28	16.8 万强	300	16.8 万弱
公元 170 年	马可·奥勒留	30	18 万强	300	18 万弱
公元 197 年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33	19.8 万强	375	19.8 万弱
公元 213 年	卡拉卡拉	33	39.6 万左右（包括原辅助兵）	375	—

在对“软肋”的强化和保护问题上，卡拉卡拉也非常具有自己的特点。他既没像哈德良那样只是一味地强化防御工事，也没有像马可· 奥勒留一样在击退蛮族的入侵之后便置破损的日耳曼长城于不顾。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所采取的策略是越过防线主动出击，将迎战的日耳曼军队彻底打垮，最后凯旋。这种在修整防御工事之前先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在士兵之中大受好评。因为没有什么比积极出战并且大获全胜更能提振军队的士气了。卡拉卡拉在这一年的秋天回到首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战胜日耳曼蛮族的凯旋仪式。元老院授予这位年轻的皇帝“pacator orbis”的尊称，直译过来就是“为帝国带来和平的人”。但是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段时期军费的猛增。

罗马的通货膨胀

卡拉卡拉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增加军团的数量，也没有提高军团兵的年薪。但是因为他实施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赋予所有的行省居民以罗马公民权，因此之前只招收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和允许招收行省居民的辅助兵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从法律上来讲，这些人全都属于军团兵。结果罗马军团的士兵数量，在卡拉卡拉颁布法令以后猛增为之前军团兵与辅助兵的总和。而这样一来对于之前的辅助兵也要按照军团兵的标准在期满退役的时候给予退役金。

因为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所以关于卡拉卡拉以前的罗马军队辅助兵的年薪究竟是多少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与军团兵相比，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少的。

第一，辅助兵都出身于被罗马军队征服的行省，也就是说他们处于罗马人的支配下。在古代，支配者拥有被支配者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行省士兵的任务仅仅是帮助军团主力作战的辅助战斗力。

第三，军团兵的服役期为20年，而辅助兵的服役期则是25年。

第四，虽然奥古斯都为军团兵确立了退役金制度，但是对于辅助兵的奖励则是服役期满后赋予其罗马公民权，至于其他的物质奖励想必是没有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史料对此有所提及。

通过以上几点不难看出，军团兵与辅助兵之间的收入应该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在“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的时候，不可能立即将原先辅助兵的待遇提高到军团兵的水平。但是既然行省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那么在军队的待遇上也无法继续区别对待。就算是分阶段性地提高，但最后辅助兵的收入一定会逐渐接近甚至达到军团兵的水平。

卡拉卡拉实行的“安东尼努斯敕令”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无法

对其进行批判，但实际上对罗马帝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将行省居民提升为罗马公民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将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恢复到5%　就能够简单解决的。就连军队内部也因为这项赋予所有人公民权的法令而产生了和罗马社会一样两极分化的现象。尤其在正规辅助兵和被称为“numerus”的临时兵之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因为完全取消阶级之间的区别，反倒切断了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性。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发行的第纳尔银币

因为父皇塞维鲁不断增加军费，以及为辅助兵提供与军团兵相同的待遇，仅这两条就足以使卡拉卡拉的帝国财政状况相当吃紧。再加上过去30年来一直平静地持续着货币贬值，更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支撑罗马帝国经济的基础货币大体上可以分为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和塞斯特斯铜币三种。其中流通最广的当属第纳尔银币，甚至可以称之为银本位也不为过。不管是派往行省的官僚还是军团兵，都用第纳尔银币为计算单位发放工资。

对货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认为，硬币的信用度在于其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统一。同时他还认为货币和税制一样，要想被大众广泛接受，就应该越简单明快越好。

就这样，在公元前23年实施的货币改革中，奥古斯都确立了1枚奥里斯金币= 25枚第纳尔银币=100枚塞斯特斯铜币的货币系统。这个系统一共维持了87年，直到公元64年才被皇帝尼禄作了少许的改动。

虽然历史学家普遍将尼禄进行货币改革的原因归结为他的铺张浪费，但我不这么认为。尼禄将奥里斯金币的重量从7.8克下调到7.3克，第纳尔银币的重量从3.9克下调到3.4克，而且将银币的材质从纯银调整为含银率92% 的合金。如果说尼禄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是为了填补其建造黄金宫殿所造成的财政漏洞，那么在尼禄死后继位的皇帝们，为什么谁也没有将这一改革调整回来呢？而且从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来看，罗马帝国完全有能力重新恢复奥古斯都时代的金币和银币重量。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进行这样的尝试。就算韦斯帕芗将尼禄想要建造广阔人工湖的土地改建成了竞技场，提图斯和图拉真也在黄金宫殿被毁坏的废墟上分别建造了大众浴场，使得皇帝尼禄曾经的都市计划都变为一张白纸，但是尼禄制定的货币系统仍然被后来的皇帝所沿用，而且这一用就是120多年。由此可见，尼禄皇帝的货币改革，

对于1世纪中期到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最为兴盛的时代，当然经济实力也处于鼎盛的时期。而经济的活跃自然会带来货币流通量的提升，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需要的货币数量超出了现有的货币供应量。但是如果为了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加大矿山之中金银的开采数量的话，那么用不了多久矿脉就将枯竭。所以皇帝尼禄需要的是一个不用增加矿山的开采量，也可以解决货币流通量不足的办法。也就是说，尼禄的改革并非单纯地降低货币的价值，而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局面下，为了应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不得不采取的金融缓和手段。

但是，在距离尼禄时代150年之后的卡拉卡拉时期所进行的货币改革完完全全是为了填补军费增加而造成的财政缺口。下表是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罗马帝国的货币演变情况。通过这个表格我们不难看出，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在经济上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

帝国成立后罗马货币的演变

金属	名称	换算值	重量（g）	含量
皇帝奥古斯都的货币改革（公元前23—公元64年）				
金	奥里斯	25第纳尔	7.80	金100%
银	第纳尔	4塞斯特斯	3.90	银100%
铜	塞斯特斯	4阿斯	28	铜80%　锌20%
皇帝尼禄的货币改革（公元64—214年）				
金	奥里斯	25第纳尔	7.30	金100%
银	第纳尔	4塞斯特斯	3.41	银92%
铜	塞斯特斯	与奥古斯都时期的铜币相同		
皇帝卡拉卡拉的货币改革（214—260年左右）				
金	奥里斯		6.50	金100%
银	第纳尔		3	银70%
	安东尼	2第纳尔	5.5	银50%　铜50%
铜	塞斯特斯	与之前的铜币相同，但是铸造量减少		
皇帝加里恩努斯时代（253—268年）				
金	奥里斯		5.5	金100%
银	安东尼		3	银5%　铜95%（镀银）
铜	基本不再铸造			
皇帝奥勒良的货币改革（274—294年）				
金	奥里斯		6.5	金100%
银	安东尼	5第纳尔	3.9	银5%　铜95%
铜	由于铜币的制作材料价格不断下跌，铜币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停止铸造			

帕提亚战役

对26岁的卡拉卡拉来说，经济改革显得非常枯燥乏味，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像一年前那样驰骋沙场的生活之中。公元214年春季，他将刚刚制定不久的货币改革政策全权交由内阁负责，随后便向北方进军。这次他的母亲尤利亚· 多姆娜也和他同行。虽然卡拉卡拉最初的目的地是多瑙河前线，但如果他想要与帕提亚开战，那么便不得不踏入叙利亚

的土地。而叙利亚正是尤利亚· 多姆娜的故乡。因为这次的对手是强大的帕提亚，所以卡拉卡拉带上了他全部的近卫军团。近卫军团的长官马克里努斯也借助这次机会加入随行幕僚的队伍中。

正如生活在当时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在他记载的罗马史中所描述的那样，多瑙河的防卫状况直接反映出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体制是否在正常地运行。这条从维也纳连接布达佩斯，穿过贝尔格莱德直达黑海的多瑙河防线，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生命线。皇帝巡视如此重要的防线，巩固这一带的防御体系，对罗马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卡拉卡拉的此次进军作好了战和两手准备。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他使同为日耳曼人的马尔科曼尼人和汪达尔人关系破裂。同时，他又与达契亚人结盟。紧接着当场逮捕并处死了拒绝自己结盟要求的夸地人族长。随后，他将能够在短期内打败的各个小型部族一网打尽，使其无法对罗马境内构成威胁。总之，他成功地沿用了罗马人“分而治之”的传统对外政策。就这样，通过他父亲塞维鲁时代的不列颠战役，他统治时期对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巩固，加之现在对多瑙河防线的巩固完成，卡拉卡拉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向东方进军。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虽然他算不上一位贤明的政治家，但在军事方面拥有不俗的能力。

同巩固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时候一样，成功巩固多瑙河防线的巡查过程，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士兵之中的威望进一步提升。对于经常要和敌人以命相搏的士兵们来说，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而且他们也深知由胜利所带来的自信比兵器更加强大。就连首都居民因为对高卢风格的服饰感到好奇而流传开来的绰号“卡拉卡拉”，也成为前线士兵们对这位皇帝的爱称。不管这位皇帝穿着怎样的奇装异服，只要他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便足以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受人敬仰。曾经只被看做是先帝塞维鲁儿子的卡拉卡拉，逐渐地以皇帝卡拉卡拉的身份被士兵们所接受。士兵们对卡拉卡拉的这种感情，即便在这位皇帝死

后也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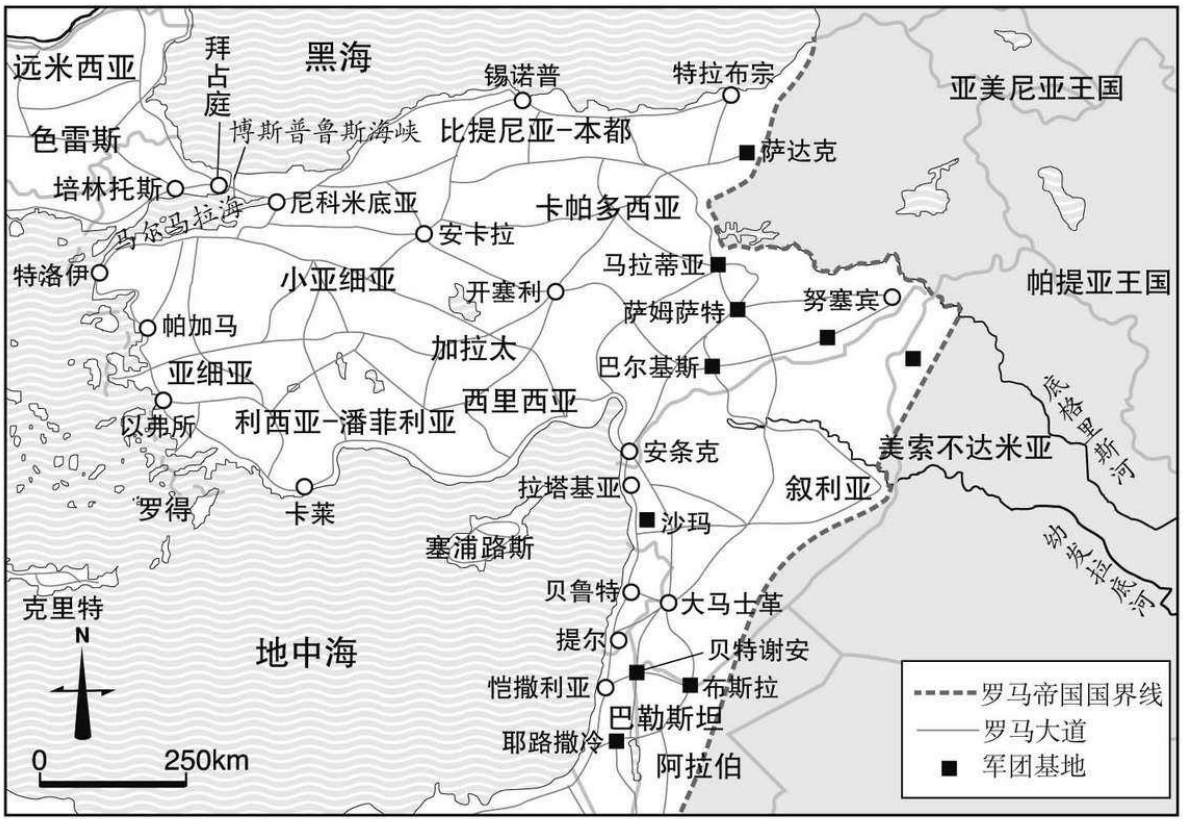
成功巩固了多瑙河防线的卡拉卡拉，并没有继续沿河向黑海进发，而是顺着东南方向的道路来到下游的远米西亚行省。这条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的道路，当然也属于罗马那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

跨过赫勒斯滂那狭窄的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之后，卡拉卡拉也没有率先进入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处于非常重要地位的尼科米底亚（今土耳其的伊兹米特），而是径直奔向荷马长篇战争叙事诗《伊利亚特》发生的舞台，以古战场闻名于世的特洛伊。与其说卡拉卡拉喜欢读《伊利亚特》，不如说他崇拜的亚历山大大帝喜欢读《伊利亚特》，因此，卡拉卡拉造访特洛伊的举动完全是效仿那位年轻的帝王在远征波斯之前的所作所为。当年亚历山大大帝造访特洛伊的时候只有22岁，而现在的卡拉卡拉也不过26岁而已。

效仿自己的偶像造访古代英雄遗迹的卡拉卡拉，在参拜《伊利亚特》的主人公之一、英年早逝的阿喀琉斯的坟墓时，为了祭奠这位英雄而和麾下的年轻武将们在运动会上同场竞技。希腊和罗马时期的运动会不单是为了强身健体，主要是为了祭祀神灵而举办。据说卡拉卡拉在访问特洛伊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忧伤，似乎是在吊唁不久前去世的好友法斯托斯。也许他这个时候也体会到了因为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战死而悲痛不已的阿喀琉斯的心情吧。

离开特洛伊古战场，卡拉卡拉沿着海岸线南下来到帕加马。因为罗马时代的帕加马是仅次于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文化中心，所以这也被看做是他送给同行的母亲尤利亚· 多姆娜的一个礼物。作为一个多神教信仰国家的皇帝，他也非常称职地参加了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祀活动。在访问完帕加马之后，卡拉卡拉转向东北，为了度过这一年的冬天而前往尼科米底亚。

位于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尼科米底亚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因为其为比提尼亚行省的首府。这里是从欧洲前往亚细亚时最先抵达的城市，同时因为其毗邻博斯普鲁斯海峡，拥有对黑海的制海权和防卫优势，可以说是从欧洲进军亚洲的后方基地。卡拉卡拉之所以特地选择在尼科米底亚越冬，也是为了顺便视察在黑海巡航的舰队。对于联结帝国“西方”与“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来说，不仅要重视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息息相关的南侧地中海海域，用来时刻抵御北方蛮族入侵的黑海制海权也同样至关重要。



3世纪初期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公元215年，离开了尼科米底亚的卡拉卡拉一行从小亚细亚西北部直接向东南部的叙利亚进发，不到5月他便抵达了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安条克。在与帕提亚王国交战的时候，罗马军队都会习惯性地将这个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帝国东方最大都市的安条克作为后方基地。卡拉

卡拉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个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开始着手编组与帕提亚王国交战的部队。

虽然不知道卡拉卡拉与帕提亚王国交战时所率领的军队阵容，但是因为史料上并没有关于其调用多瑙河沿岸防卫军团的记载，由此可见，这次进行作战的部队是由驻扎在东方的各个罗马军团整编而成。

负责帝国东方的防卫任务，同时也肩负着幼发拉底河防线防守重任的罗马军队共计10个军团。由北向南分别是驻扎在小亚细亚东侧卡帕多西亚行省的2个军团、驻扎在叙利亚的3个军团、以巴勒斯坦为基地的2个军团、驻扎在被罗马人称为阿拉伯的现约旦附近的1个军团以及被先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之后成为罗马行省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基地的2个军团。军团兵数量多达6万人，如果加上辅助兵的话更是超过10万人，可以说拥有非常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只给这些军团留下防守的基础兵力，将其余的士兵全部动员起来的话，就可以编成一支即便与强大的帕提亚王国交战也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大军队。虽然历代的罗马皇帝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战斗方式，但是卡拉卡拉打破了一直以来的传统，他开创性地设立了在此以后逐渐成为罗马军队战斗主力的机动部队。

机动部队

在拉丁语中被称为“vexillationes”的机动部队并非卡拉卡拉的原创。图拉真和马可· 奥勒留两位皇帝也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卡拉卡拉只是沿用了这个名称，实际上部队的成员和用途与之前完全不同，简直可以说是重新设计。

以前的“机动部队”，顾名思义只是从其他军团临时调派出来的军队，在完成当前任务之后还会回到其所属的军团中。但是卡拉卡拉的“机动部队”是由从各个军团中选拔出来的士兵所组建的独立于军团之外的部队，并且在完成任务之后这个部队也仍然会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卡拉卡拉的改造下，罗马军队除了原先拥有的33个军团之外，又

多出了一个“机动部队”。

从前的机动部队只以“精锐老练”作为选拔基准而不问年龄，但是卡拉卡拉要求机动部队的成员必须年轻。他认为只有那些还没有成家的单身士兵才能够承受长期离开驻地前往各处作战的艰苦，所以他手下的机动部队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

虽然从没有研究者留下过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记载，但是我觉得卡拉卡拉之所以会颁布授予所有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或许也是出于下列的考虑：

罗马军团原本是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以及属于行省居民的辅助兵组成的。虽然自从三年前的法令颁布之后，军团兵和辅助兵之间的区别也随之消失，但是军团兵与辅助兵之间战斗力的差距依然存在。军团兵长期作为主要战斗力接受训练，对于重装步兵常用的各种武器也掌握得十分熟练。而行省士兵不管在训练上还是使用的武器上，都只不过是辅助战斗力而已。因此这两者的一体化进程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而且既然会有民众特别在墓碑上刻着“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前的罗马公民”，军团兵所拥有的罗马公民荣誉感也不容忽视。即便在敕令颁布之后，军团兵与辅助兵之间的区别依旧延续了下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年轻的皇帝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卡拉卡拉希望通过不分军团兵还是辅助兵，只要年龄合适便可以加入机动部队的方式来实现两者的平等。同时，他还将已经成家立业的士兵以及中层以上的干部都留在军团之中。这种让老兵留守基地、年轻人冲锋陷阵的新系统，得到了双方的一致好评。因为没有在任何史料上发现对这一举措的批判性言论。顺便说一下，罗马人所谓的“现役”可以持续到45岁，而新兵志愿入伍的年龄只有17岁。另外，自从帝国成立以来便一直不允许士兵在服役期间结婚的罗马军队，在卡拉卡拉的父亲塞维鲁皇帝时期得到了“解禁”。也就是说，军团兵能够在退役前正式结婚只是短短10年前的事情，到了卡拉卡拉统治时期的军团兵则正在充分地享

受塞维鲁皇帝馈赠的这份礼品。

但是卡拉卡拉的这项政策也和“安东尼努斯敕令”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由正面因素向负面因素转变。或者说只取得了短期的积极效果，而之后却给帝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罗马帝国边境的和平从没有超过20年，在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要再次面对四方蛮族的大举入侵，而到了那个时候，防线上就不得不面对战斗力量老龄化的问题，因为防卫基地的军团兵与机动部队的年龄差距已经成为罗马军队的常态。

卡拉卡拉以前的皇帝之所以在组建机动部队完成任务之后，又让其回归到所属部队，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确保防线的稳固性，在抽调其中的士兵之后必须再次补充回去。虽然体力旺盛的年轻人对机动作战非常重要，但如果因此使留在防线的战斗力老龄化却是得不偿失。当所有人都认识到这种将军团和机动部队两极分化的举措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时，却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图拉真和马可·　奥勒留时期曾经的做法了。因为基地防守力量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连蛮族都非常清楚的事实。结果蛮族的入侵一下子频繁起来，面对这些不知何时会从什么地方攻来的敌人，却只有机动部队能够与之抗衡。

每一项政策在实施之前都应该考虑是否会给将来带来不好的影响。缺乏深谋远虑就会导致目光短浅，虽然不能将蛮族入侵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卡拉卡拉的机动部队政策，但至少是导致蛮族频繁入侵的原因之一。

前往美索不达米亚

不过，回到公元215年的那个时期，27岁的皇帝在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士兵们的簇拥下一定充满了自信吧。而且能够被选拔进“机动部队”，士兵们的士气也一定十分高昂。毕竟他们直属的司令官正是虽然年纪轻轻却未尝败绩的卡拉卡拉。没有什么比对胜利的自信更能够使士兵们斗

志昂扬，而在卡拉卡拉身为总指挥的军队之中，就充满了这种胜利的信心。

虽然年轻气盛，但是他仍然忠实地遵循罗马的传统，在进军之前派遣外交使节前往帕提亚。特使向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五世传达了罗马皇帝和平解决战争问题的条件。那就是将明显对罗马帝国持有敌意的提利达特斯和他的支持者全部交出来。如果帕提亚接受这个条件，那么罗马将和帕提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开战。

沃洛吉斯五世

卡拉卡拉认为对方一定会拒绝自己的要求。因为提利达特斯是沃洛吉斯五世的伯父，就算为了媾和，对方也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人物交给罗马帝国。派遣外交使节只不过是为了遵循罗马帝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但实际上他是渴望开战的。

可是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五世的回答却是同意。他之所以会作出如

此出人意料的回复，或许是因为自从卡拉卡拉进入小亚细亚以来，驻扎在帝国东方的罗马军队的活动一下子变得异常频繁，而这些情况全都传到了帕提亚王国。

本就为宫廷内的势力斗争烦恼不已的帕提亚国王，根本不希望与罗马之间再发生什么争执。结果这样一来，卡拉卡拉就失去了开战的理由，只好与帕提亚签订停战协议。利用这段时间，卡拉卡拉访问了埃及。他将与帕提亚使节交涉停战协议的任务全权交给大臣们，自己则沿着地中海穿过巴勒斯坦地区南下进入埃及。

虽然他在参拜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园以及参观金字塔和尼罗河沿岸的古建筑群时心情都非常不错，但是当他在亚历山大港遭到年轻人的责备时忽然大发雷霆。究竟这些年轻人对他说了些什么，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无从考证。但是这场因为卡拉卡拉的一时冲动而引发的惨案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据说当时很多年轻人聚集在体育场中向卡拉卡拉提出抗议，但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大量的士兵所包围，随后这些年轻人便全都被杀害了。这场惨无人道的虐杀引起当地市民的强烈愤慨，而卡拉卡拉甚至等不及调动驻扎在亚历山大港附近基地的军团兵，便指挥近卫军团镇压了市民们的暴动。在这场骚乱中数千名亚历山大港的市民被杀。也许对卡拉卡拉来说，这些被自己赋予罗马公民权的行省居民，根本不应该对自己提出任何抗议。不过即便如此，他的做法也确实过于残暴。就连一直对卡拉卡拉没有什么特别意见的罗马元老院，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对这位年轻的皇帝产生了其他的看法。从元老院议员到普通市民，卡拉卡拉曾经杀害了自己的岳父、妻子以及弟弟的行为，又重新浮现在他们的记忆中。

在这次惨剧发生后不久，卡拉卡拉便急急忙忙地从埃及返回叙利亚，因为他听说帕提亚王国内部发生了政变，阿尔达班打败了他的皇兄自立为王，并且成功控制了除巴比伦尼亚以及王国南部地区的全部国

土。

这对于一直盼望与帕提亚开战的卡拉卡拉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在停战中不能够向对方发动攻击，但因为停战协议是与先王签署的，既然现在帕提亚王国的政权发生了变化，那么曾经签订的一切协议就全都变成了废纸。于是卡拉卡拉命令手下的全部军队作好向东方进军的准备。

于公元216年春季打响的帕提亚战役，前期完全由罗马军队占据着优势。从北美索不达米亚南下的罗马军队和从叙利亚向东部进发的罗马军队对帕提亚军队形成夹击之势，迫使对方节节败退。但是，伴随着夏季的到来，战况也发生了转变。与北部的攻势全由军团组成不同，从叙利亚方向进军的罗马军队是由卡拉卡拉最引以为傲的“机动部队”为主。伴随着战斗的不断深入，这支新编成的队伍逐渐显露出其经验不足的弱点。老兵的优势在于即便陷入困境之中，也能够凭借自身的经验重整旗鼓，并且找出解决的办法。但是当经验不足的新兵陷入苦战之时很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变得只想逃跑。另外，这些新编成的队伍中指挥官也能力不足，卡拉卡拉在选拔人才时所犯下的错误一下子全都显露了出来。

不过，这毕竟是一支被先帝塞维鲁强化过的罗马军队，在老兵的帮助下并没有那么容易崩溃。两国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深入敌境的罗马军队迫切需要打破这种胶着状态。于是卡拉卡拉向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提出要迎娶对方的女儿为妻。据说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希望通过这次联姻使罗马和帕提亚这两大强国联合起来，将罗马的步兵和帕提亚的骑兵组成拥有最强战斗力的军团。也许因为他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经迎娶了波斯国王的女儿，而帕提亚正好和古代波斯处于同一地理位置之上，所以他才产生这种想法吧。亚历山大大帝确实拥有将希腊与波斯这两个民族融为一体的梦想，但他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会战并且都大获全胜，而且在将波斯帝

国灭亡之后，才迎娶了幸存下来的公主。也就是说以胜利者的姿态与对方融合。反观卡拉卡拉提出请求的对象帕提亚王国，不但没有被打败，甚至还将罗马军队牢牢地钉死在两河流域动弹不得。对罗马人来说，从来都是在战胜之后才会讲和，战败的时候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而且罗马人对皇帝迎娶其他国家的公主这件事，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阿尔达班

虽然军团兵在驻扎地与当地的原住民女性结婚，生下来的混血儿都

会获得罗马公民权，但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不能够迎娶外国的女性为妻。因为军团兵和原住民女性之间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对国家未来的方向产生影响，但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其他国家的公主之间生下的孩子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这个孩子将来继承了皇位的话，那么罗马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甚至还有可能产生被拥有他另一半血统的国家吞并的危险。不过对于罗马公民来说，拥有防患于未然的权利。因为元老院和公民才是罗马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皇帝只不过是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真正的主人所委托的统治者而已。皇帝在被授予至高无上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尤里乌斯·恺撒所说过的一样，“越是身居高位者越没有个人的自由”。因此有些事情普通的市民可以做，但是位高权重的人不能做。这就是普通市民观念的依据。

恺撒虽然深爱着克娄巴特拉，却不能娶她为妻，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安东尼敢于和这位埃及女王结婚，但是他的这一举动使罗马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在清除了暗杀恺撒的布鲁图一派之后，同为恺撒派的安东尼与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在军事才能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的安东尼之所以败给后者，就是因为当时一大半的罗马人都已经不再支持他而转投屋大维的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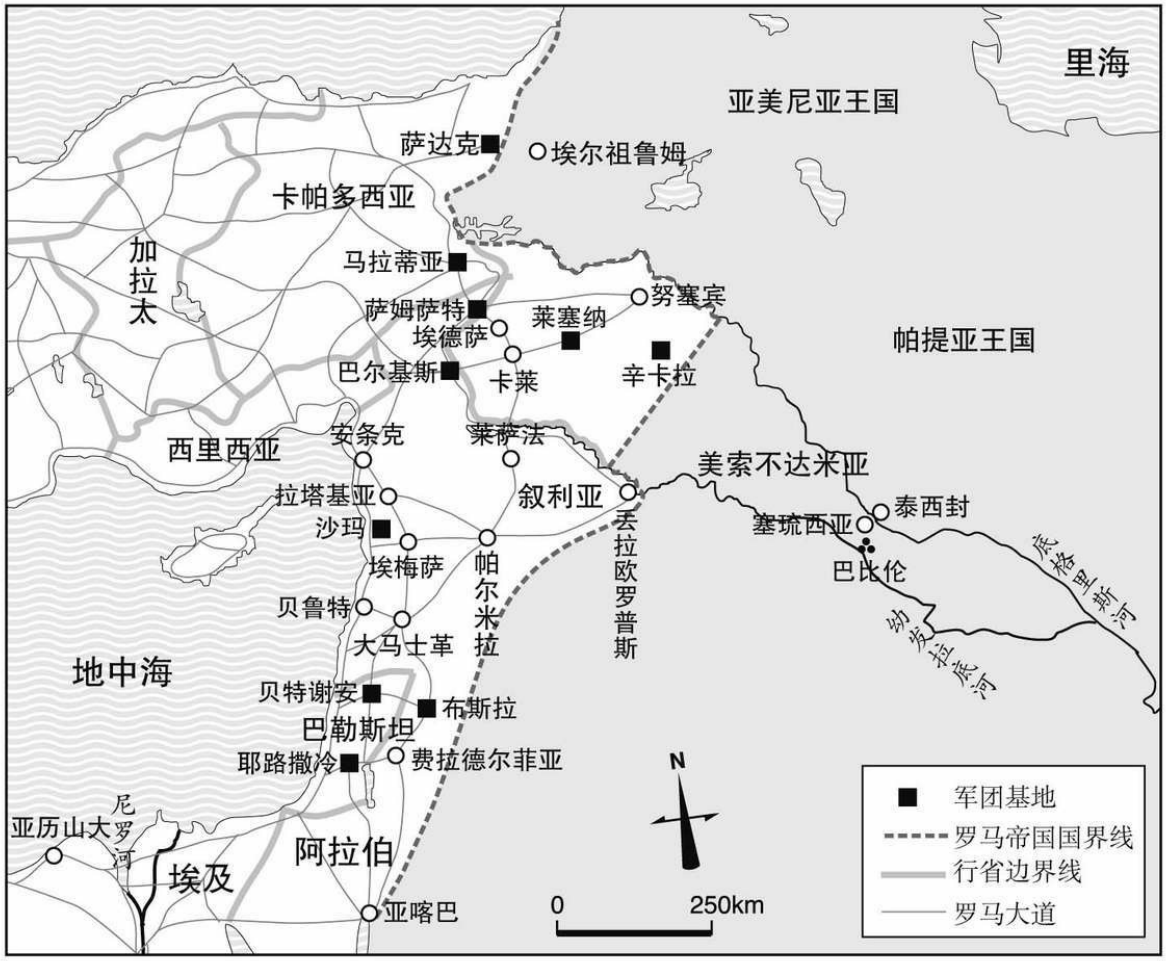
公元1世纪时，皇帝提图斯曾经想要迎娶当时与罗马帝国处于同盟关系的犹太的一位公主。但是，得知这一消息的罗马民众甚至顾不上观看精彩的角斗表演，纷纷向坐在圆形竞技场特别席之上的提图斯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嘘声。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皇帝不得不放弃与这位女性结婚的打算。罗马民众之所以反对皇帝迎娶这位公主并不是因为她的犹太人身份，只是因为皇帝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女性结婚。不过出身于行省的女性并不在被禁止的范围之内，因为在罗马人看来行省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同盟国就完全不行了。

罗马人就算在内乱的时候也只是自己人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一个

人会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尽管在罗马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以内乱为名的势力斗争，但是其中完全没有出现过借助外国势力来击败同胞的情况。这应该也算是罗马人的特点之一吧。而之所以没有人这么做，恐怕是因为这种行为会彻底失去同胞的支持。

实际上，当卡拉卡拉提出要与帕提亚的公主结婚时，就已经遭到了罗马元老院的一致反对。而这种情绪在首都居民之间扩散开来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不惜付出失去自己国民支持的高昂代价（或者说，卡拉卡拉虽然深知这一点却又不得不这样做），罗马皇帝仍然提出要与帕提亚公主结婚的请求。虽然这一完全违背罗马人民意愿的行为最终遭到对方的拒绝，但是帕提亚国王的拒绝也无法拯救卡拉卡拉所犯下的过错。罗马元老院将这一事件评判为伤害罗马皇帝权威的草率之举，也是理所当然的。



3世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对于求婚与媾和的请求都被拒绝的卡拉卡拉来说，秋季的到来成为他撤退的最佳理由。因为他不能让士兵们在战场上过冬。但是不管是士兵还是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都没有撤退到作为后方基地的安条克。这位年轻的皇帝将军队驻扎在距离幼发拉底河以东50公里处的埃德萨（今土耳其的乌尔法）越冬，这里也是当时罗马军队与帕提亚王国交战的前线基地。军团兵们纷纷在附近的城镇之中驻扎下来，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兵都没有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场。这也意味着等到来年也就是公元217年的春天，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战争还会重新开始。

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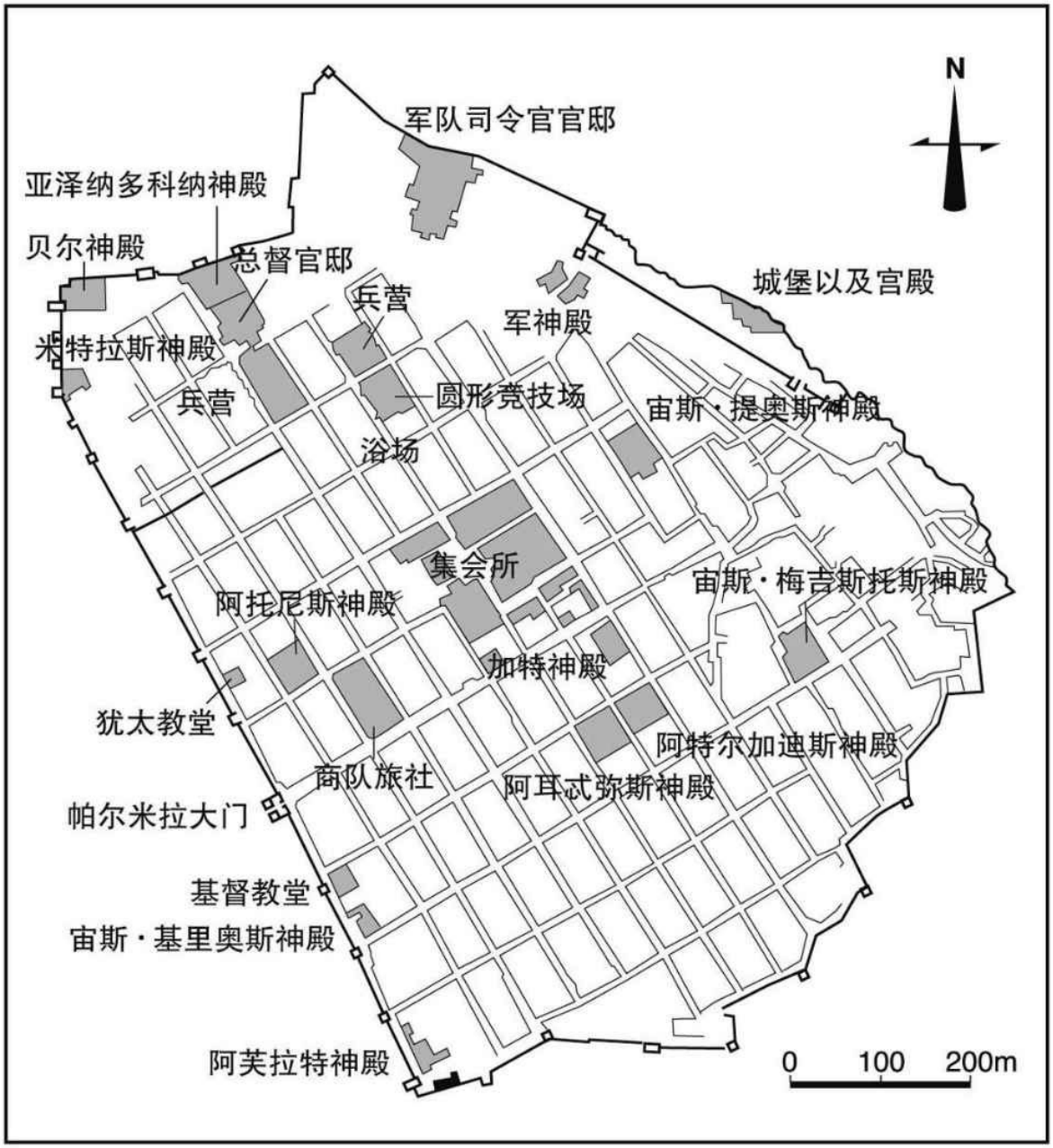
与忙于战事的士兵相比，在冬季的军营中无所事事的士兵们更加难以管束。在公元216年到217年的冬天临近尾声之时，一些犯了错误的士兵遭到皇帝卡拉卡拉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批评也是一种艺术，属于人际关系之中比较难以掌握的技巧，会使对方感到屈辱的批评方法显然不是好方法。而卡拉卡拉所施加的惩罚，对于士兵们来说就有些过于严厉了。

士兵们将内心中的不满向他们的长官马克里努斯倾诉，并且还对他说："卡拉卡拉陷入与帕提亚的苦战，如果您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我们全都会支持您。"

身为两位近卫军团长官之一的马克里努斯，出身于北非的努米底亚行省（今阿尔及利亚）。他的父亲是摩尔人解放奴隶，所以他是一个从最底层一步步爬到现如今位置的人。与那些虽然出身低贱却因才能出众而一路飞黄腾达的人不同，马克里努斯在成功的道路上一直默默无闻。他深知自己能否维持如今的地位，完全要看任命自己的卡拉卡拉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士兵们对他的倾诉时，心中首先感到的只有惶恐和不安。

更糟糕的是，本应该秘密进行的这场会谈，却传到了卡拉卡拉一位朋友的耳朵里。这件事如果被皇帝知道，那么他就彻底完蛋了。忧心忡忡的马克里努斯于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他的一名直属部下提拔为皇帝的警卫队队长。据说这个人因为卡拉卡拉向帕提亚公主求婚而感到非常的愤慨。

公元217年4月，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度过冬天的罗马军队重新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攻击目标也早已确定，就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中部的帕提亚首都及主要都市。卡拉卡拉带着志在必得的决心，仅仅8天便将作为越冬营地的埃德萨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丢拉欧罗普斯

从各越冬营地赶来的罗马军队，如同千万道溪流汇聚成一条大河。军队计划首先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某处军事基地中集结，随后沿着河岸向东南方向进发，目标直指帕提亚首都泰西封。据说罗马军队的集结地是丢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us），这座由罗马人一手建造起来的要塞

城市，早在马可· 奥勒留时期便因为与帕提亚交战之时的重要地理位置而被作为罗马帝国的前线基地之一，距离当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卡拉卡拉连这个地方都没能走到。

从军团驻地萨摩萨塔出发来到埃德萨，然后经由卡莱南下前往幼发拉底河的旅途，全都有罗马铺设的大道。从埃德萨到卡莱只有不到30公里的路程，就在这段大道的中间，与城市相隔很远的平原之中有一座神殿。虽然这只是一座用来祭祀太阳神的小庙堂，但卡拉卡拉还是决定顺路参拜一下。在皇帝和他的警卫们离开大道向平原进发的过程中，从萨摩萨塔军团基地出发奔赴前线的第十四军团的士兵们已经超越他们走到了前面。

当卡拉卡拉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小庙堂中祈祷的时候，警卫队的队长将手中的短剑刺入了他的后背。等候在外面的士兵们听到里面的叫声纷纷冲了进去，假意查看皇帝的伤势，脱下他的胸甲，随后大家一起用手中的武器向卡拉卡拉的胸膛刺去。

警卫队的士兵们抬着浑身沾满鲜血的皇帝遗体，在警卫队长的带领下返回大道之上。而近卫军团的长官马克里努斯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不知道他对皇帝的突然死亡给出了怎样的解释，但是如果说皇帝是被隐藏在神殿之中的疯子所杀，那么身为皇帝警卫队的士兵们却没有受到惩罚，一定会让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吧。总之，卡拉卡拉就这样在刚刚迎来自己29岁生日之后不久便被杀害了。而得知罗马军出征的帕提亚国王及其军队，此时正在为了迎击而北上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途中。

卡拉卡拉被谋杀与马克里努斯继任皇帝只相隔了三天。在这三天中，军团长与将军之间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考证。总之，三天后，11日，不管怎样，马克里努斯还是在士兵们一致的推举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身为罗马公民的士兵们是真真正正的选民。由这些选民举

手表决推举出来的皇帝，可以说是一种直接民主制的选举方式。但是直接民主制的弊端在于，只要有几个煽动者及其同党，便很容易决定最终选举的结果。虽然士兵们对于卡拉卡拉的突然死亡也难免心存疑虑，但是他们毕竟是士兵，面对不断逼近的敌方大军，最高司令官的位置绝对不能够空缺。

卡拉卡拉的遗体被当场以罗马的方式火化，只有骨灰被送往安条克。留在安条克的尤利亚· 多姆娜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新任皇帝马克里努斯并没有派人前来迫害。这位塞维鲁皇帝的妻子，就算能够承受盖塔被杀的悲痛，但是在失去另一个儿子卡拉卡拉之后终于崩溃了。母子二人的骨灰都经海路被送回罗马，埋葬在耸立于台伯河岸边的“哈德良陵园”之中。马克里努斯向元老院申请将卡拉卡拉神格化，元老院通过了他的这一请求，将卡拉卡拉追封为神明。罗马人就是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神格化的民族。

就这样，摩尔人的儿子，连元老院议员身份都没有的马克里努斯在53岁的时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士兵们因为大敌当前而推举他作为全军统帅的行为可以理解，而连罗马元老院也如此痛快地承认了他的皇帝身份，想必是因为他们也对卡拉卡拉感到厌烦了吧。马克里努斯在从美索不达米亚送往罗马的书信中要求罗马帝国以马可· 奥勒留时期的统治为标准，并且将卡拉卡拉提高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的税率从10% 重新调整回之前的5% 。受到这两种税率倍增影响的大部分都是富裕阶级，而元老院议员们正属于这一范畴。对于出身贫贱的皇帝来说，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元老院，元老院方面一定也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这位皇帝。但是对面对帕提亚大军的马克里努斯来说，帝王之路却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皇帝马克里努斯（公元217—218年在位）

将卡拉卡拉的死亡伪装成一场意外，又在其死后请求元老院将其神格化的马克里努斯，不管他内心是怎么想的，都不得不继续面对由卡拉卡拉所挑起的帕提亚战争。但是，因为从先帝的突然死亡到新皇帝的继位之间耗费了三天的时间，加之将各个军团的司令官召集到新皇帝的身边进行协议又花费了不少时间，导致罗马军队失去了进攻敌人大本营的最佳时机。

面对趁这段时间不断逼近的帕提亚军，罗马军从原来的进攻方迫不得已变成防守方。为了在会战开始前争取时间集结军队，马克里努斯向帕提亚军中派遣使节媾和。但是已经得知罗马方面发生变故的帕提亚国王给出的答复完全超出马克里努斯的预期。

对方开出的条件是要求罗马军队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全境。美索不达米亚指的是被夹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大片区域。从美索不达米亚撤军意味着要将军队全部退回到幼发拉底河以西。这实际上就退回到80年前哈德良皇帝所划定的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之间的国界线。如果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放弃了马可· 奥勒留以及塞维鲁付出巨大牺牲才获得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为马克里努斯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像卡拉卡拉那样身为先帝继承人的正统性，如果他接受对方的这个条件，那么毫无疑问会引起士兵们的不满，甚至还会导致叛乱。

结果，在临近夏季的时候，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第一场战斗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东北方的努塞宾（今土耳其南部的努塞宾）打响，这里也是先帝塞维鲁所划定的罗马与帕提亚的国界线。不知为何，当时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国界线，与现代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国界线完全一致。

虽然这场发生在古代两大强国之间的第一场会战以双方不分胜负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于罗马方面的指挥无法统一，使得帕提亚方面略占上风。等到秋季进行第二场会战之时，虽然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不分胜负，但是这次自始至终占据优势地位的却变成了罗马军队。

在古代的时候一到秋天，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都会自然地进入休战期。敌我双方都会偃旗息鼓，转向越冬营地进发。这一年帕提亚国王已经返回首都，但是罗马皇帝马克里努斯没有像卡拉卡拉那样为了在来年春天立刻开战选择附近的越冬营地，而是将军队全部撤回了安条克。或许成为皇帝的他希望在比前线基地更加舒适的大城市越冬，不过他之所以选择在罗马境内安全舒适的都市越冬，并非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因为他连士兵们的越冬营地都安排在了叙利亚各处，而非美索不达米亚。由此可见，他并不打算明年春天继续与对方开战。

撤退

事实上，这场战斗也确实没有在公元218年的春天再次展开。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双方进行了极其秘密的和谈。

马克里努斯希望能够尽早回到首都罗马，凭借对自己表示出友好态度的元老院议员们的帮助巩固帝位。

帕提亚国王也为了稳固自己杀害皇兄夺来的王位，而希望能够专心于政事。

本来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是马克里努斯所采取的并不是外交手段。所谓外交，是要通过尽可能少的“付出”换来尽可能多的“回报”。但马克里努斯为了尽快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将对方的条件全盘接受了下来，以此缔结了和约。

他首先将被卡拉卡拉抓为人质的帕提亚国王的母亲送还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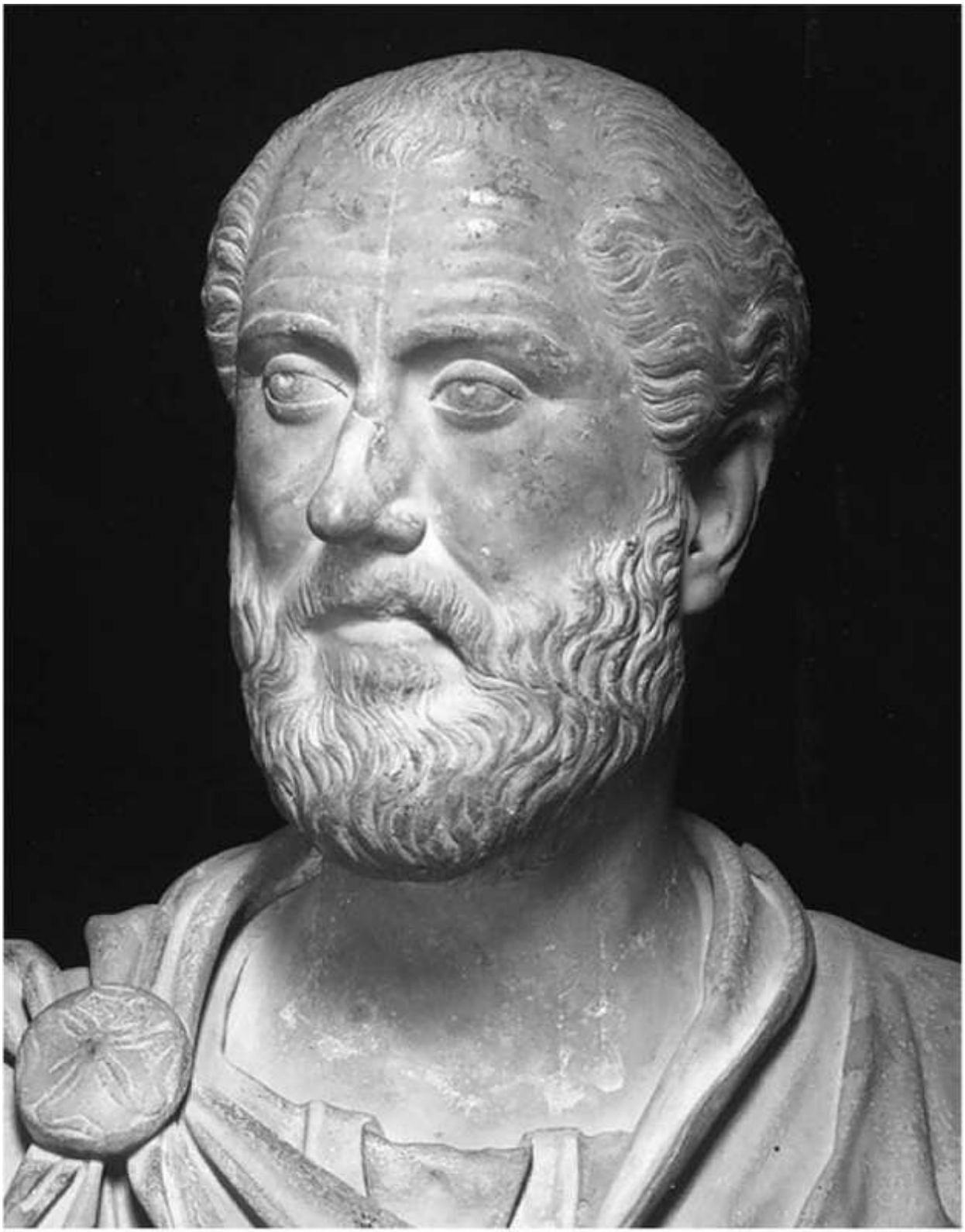
随后还支付了数额不明的赔偿金。

就连之前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也如数归还给帕提亚王国。

他还应对方国王的要求，向对方赠送了一顶雕工精致的黄金王冠。

在此之前，只有“西方人”接受东方赠送的黄金王冠，比如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以及随后的罗马诸位皇帝。因为向曾经的敌人赠送黄金王冠的行为，被看做是表示恭顺和降服的意思。而这次赠送黄金王冠的人却换成了罗马皇帝。

至于帕提亚国王提出的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全部撤军的要求，因为对方的态度十分强硬，一步也不肯退让，马克里努斯自然也只能接受。从北部美索不达米亚被塞维鲁皇帝正式划为罗马行省开始仅仅过了20年的时间，便重新回到了帕提亚的支配之下。之前驻扎在当地的2个军团也撤回了叙利亚地区，分别派往其他的驻扎地。



马克里努斯

就这样，位于罗马帝国行省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所有城市，也在时隔40年后再次回归到帕提亚的统治之下。在这些城市中，不管埃德萨、卡莱还是努塞宾，其中的上层阶级基本都是希腊人。追溯到其起源的话，这些城市都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时，由那些从西方移民过来的希腊人建造的。因为这些希腊人在东方生活了很久，并且经常与东方人进行通商等贸易往来，所以不管统治者是罗马人还是帕提亚人，对他们来说影响都不大。他们只希望战斗不要发生在自己家门前。

不过话虽如此，当地的居民还是比较欢迎罗马人的统治，也许是因为罗马人的统治方式更加有利于贸易的发展。罗马皇帝基本不会征用行省居民作为劳动力，但是对于东方的专制君主们来说，被统治阶级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被征用作为劳动力。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经常成为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以及随后的萨珊王朝之间的战场，只要罗马帝国不抛弃他们，他们就会站在罗马的一边参与战斗。但是，在公元218年，他们被罗马抛弃了。

“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的史书，在希腊语中指的是被夹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阔区域。现在除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西北部地区之外，其余地区全部位于伊拉克境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东方”与“西方”两股势力经常发生激烈碰撞的地方。从波斯到帕提亚，东方帝国的主要城市全都集中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罗马帝国从这个地方撤军，在东方看来，意味着西方势力的衰退。

皇帝马克里努斯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他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想要尽快与对方媾和，希望能够早日返回首都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惜事与愿违，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因为即便皇帝能够接受失去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士兵们却无法接受。那些帮助马克里努斯继承皇位的士兵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而这些士兵的心理变化全都被一位女性看在眼里。

叙利亚的女人

出身于地方的人一旦登上高位，必然会将他的势力全部转移到中央，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公元193年继位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自然也不例外。塞维鲁皇帝的妻子尤利亚· 多姆娜有一个叫做尤利亚· 梅萨的妹妹，她也和姐姐一起离开了故乡叙利亚，住进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宏伟宫殿。这位叙利亚祭司的女儿由此便成为了皇帝的妻妹，她的丈夫也是元老院的议员。姐姐多姆娜生下了盖塔和卡拉卡拉两个儿子，而妹妹梅萨则生下了两个女儿。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和两位罗马人结婚，并且各自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她的这两个女儿在结婚后不久便跟随前往叙利亚执行勤务命令的丈夫回到了她们的故乡。孩子们也都是在叙利亚出生并长大。当然，她们所享受的待遇和其他的叙利亚女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毕竟是皇帝的亲属。

就这样，原本位于叙利亚都市埃梅萨（今叙利亚的霍姆斯）的一个祭司家庭，因为有女性亲属嫁入皇室而爬上了帝国统治阶级的位置。其中对此感到最为满意的人当属皇后尤利亚· 多姆娜的妹妹尤利亚· 梅萨。但是她在帝国首都罗马的奢华生活，却随着外甥卡拉卡拉的突然死亡戛然而止。皇帝马克里努斯向元老院提出申请，要将与先帝有关的所有人都赶出首都，本就对卡拉卡拉心怀不满的元老院自然满心欢喜地执行了这一请求。因为卡拉卡拉没有后代，他的母亲尤利亚· 多姆娜又已经自杀，所以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已经不复存在。剩下与卡拉卡拉有亲属关系的人，尤利亚· 梅萨便首当其冲，无法继续留在首都罗马的她只好回到故乡埃梅萨。

尤利亚· 梅萨

埃梅萨自古以来便作为太阳神信仰的中心而广为人知。太阳神信仰是东方从古代开始流传下来的宗教之一，正如其他的东方宗教一样，太

阳神信仰拥有世袭且独立的祭司阶级。当尤利亚· 梅萨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之时，迎接她的是双双失去丈夫成为寡妇的两个女儿和成长为少年的两个外孙。两个外孙中比较年长的埃拉伽巴路斯，虽然只有13岁，却已经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祭司职位，而另一个外孙亚历山大当时则只有9岁。虽然常年居住在叙利亚的两个女儿以及只知道叙利亚的两个外孙，对于当前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满，但是习惯了首都罗马生活的尤利亚· 梅萨，却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打倒马克里努斯，将自己被夺走的一切重新夺回来。而这个机会却比她预想中来得还要早。虽然自己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但尤利亚· 梅萨制订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正如之前所说，埃梅萨作为东方传统的宗教发源地，太阳神信仰的中心，是在被罗马征服之前便已经存在的大都市。不仅如此，从埃梅萨往西70公里便可抵达地中海，向北140公里便可抵达安条克。穿过东方的沙漠经由帕尔米拉来到丢拉欧罗普斯便可以抵达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南部经过大马士革和费拉德尔菲亚（今约旦首都安曼）就可以从亚喀巴进入红海。在地理位置上四通八达的埃梅萨，在战略上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当然不会逃过罗马人的眼睛。实际上，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的道路网正是以埃梅萨为中心所展开的。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罗马人却没有将其作为军团基地，是因为埃梅萨自古以来便是东方人的都市。

在罗马时代的都市之中，凡是军团基地与居民住宅区相距较近的，比如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斯特拉斯堡，都是先有军团基地，随后才在其附近建造居民区。也就是说因为有军团基地的存在，才吸引了其他人纷纷移居过来。与此相反的是，在被罗马军队征服之前便已经有当地居民生活的城市，不管那里在战略上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罗马人都不会强迫当地居民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将那里作为军团基地。他们会选择距离这个城市稍远一些的地方重新建造军团基地。这样一来不但可以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而且因为相互间只有半天的行军路程，就算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也可以及时赶到，另外，军团基地的存在本身也可以起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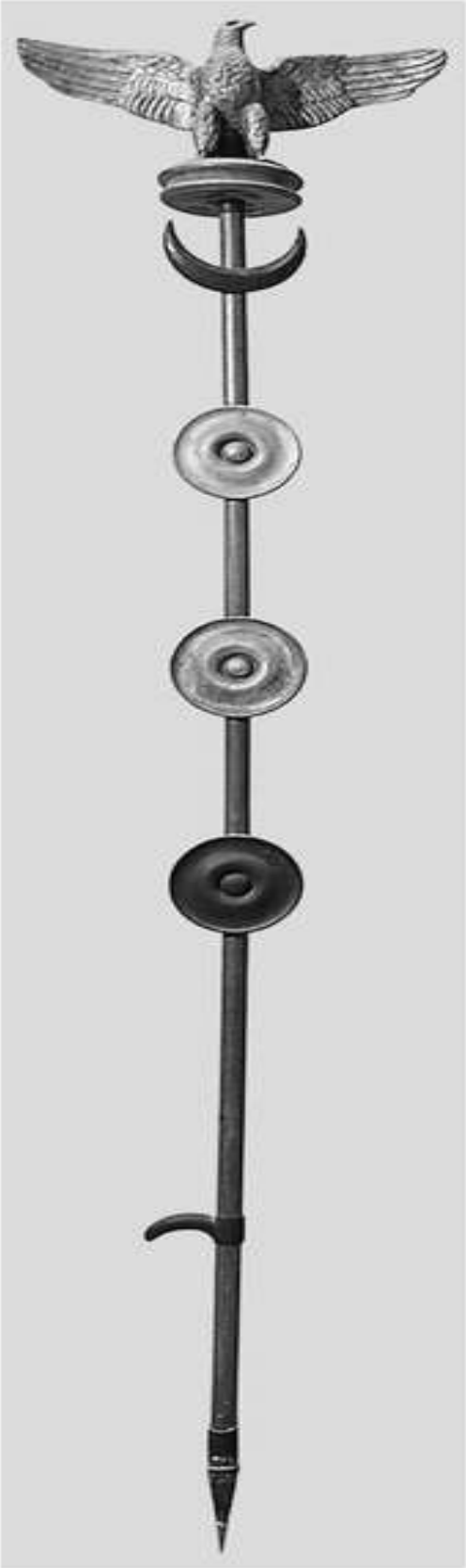
震慑作用。所以位于近东地区交通要地的埃梅萨，也在距离其40公里左右的拉法内埃有第三高卢军团常驻于此。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当然也是守护帝国整体的安全，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各人守护自己生长的地方。而且除了战争时期的调动之外，基本上各个军团都常驻在自己的军团基地。军团兵与当地女性结婚的行为完全得到国家认可，并且鼓励两人所生的孩子也加入罗马军队。在罗马人看来，与防卫整个帝国的抽象概念相比，守护自己生长的土地这种具体的行为更容易被人所接受。罗马的安全保障系统就是在这样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建立的25个军团，一直到250年后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虽然军团本地化是基本方针，但是因为各个防线重要性的转变，有时候军团也不得不进行转移。到塞维鲁皇帝统治时期军团数扩增为33个，其中大部分军团在过去这250年间都进行过三四次的迁移。其中从来没有迁移过、一直在同一个基地驻扎的只有2个军团，一个是位于莱茵河北部，为了防范日耳曼民族入侵而驻扎在美因茨的第二十二初创军团，另一个就是为了时刻监视幼发拉底河对面帕提亚王国动态而驻扎在拉法内埃的第三高卢军团。虽然叙利亚行省总共驻扎有3个军团，但是在这250年来一直都没有进行过迁徙的只有第三高卢军团。

银鹫旗

正如军团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这个军团当初是由高卢出身的士兵组成的。但是经过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在当地补充兵源以及与当地居民的混血，现在这个军团中叙利亚出身的士兵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不过像这样的组织都非常注重他们的传统，而且当士兵身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军团之中，每当通报军团名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荣耀感，更有利于激发士兵对其所属组织的忠诚。不仅如此，罗马军队还统一使用一种在顶端装饰有银鹫的军旗，银鹫下方的军旗上印有各军团的标志动物。



在军旗下战斗的士兵自然就是属于这个军团，而且不管军团中的士兵出身于什么地方，只要站在银鹫旗的下方战斗就都是罗马帝国的战士。

从这种背景上考虑，第三高卢军团的士兵们与驻扎在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军团兵相比，对帕提亚的抵抗意识更加强烈，认为守护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而皇帝马克里努斯对帕提亚所表现出来的懦弱外交政策使他们难以容忍也是理所当然的。心中一直渴望打倒马克里努斯的尤利亚·梅萨利用的正是第三高卢军团。

重夺皇位

军团基地拉法内埃与埃梅萨之间如果骑马的话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埃梅萨也是这座军团基地周围唯一的都市。因此第三高卢军团的士兵们经常会为了放松心情前往埃梅萨消遣。而自从尤利亚·梅萨回到埃梅萨之后，因为她是先帝卡拉卡拉的姨母，所以不管是军团长还是将军们，出于对先帝的尊敬，也经常会去拜访她。

尤利亚·梅萨趁此机会将当时已经14岁的外孙埃拉伽巴路斯引荐给众人，并且声称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并非她的女婿，而是外甥卡拉卡拉。虽然这只是一个谎言，但是人类并不只因为事实而相信，还会因为希望而相信。生前的卡拉卡拉原本在士兵之中就拥有极高的声誉，这样一来，第三高卢军团的士兵们更拥有了打倒马克里努斯的理由。

当成功地将第三高卢军团拉拢过来之后，剩下的事情就顺利得多了。从埃梅萨沿着罗马大道北上前往安条克的途中有一个叫做阿帕美亚的城镇。皇帝马克里努斯与帕提亚缔结和约之后，从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撤军的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的士兵们在确定屯驻地之前被安置在这里。因为两个军团不可能被安排在同一个基地之中，所以这很明显只是临时的安排。而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也和第三高卢军团一样对马克里努斯非常不满，当然理由也更加直接，他们在这20年来一直拼命守护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竟然因为马克里努斯的一纸和约便轻而易举地交到了帕提亚的手中。这对于为此贡献了一生的士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此他们被第三高卢军团说服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之所以说尤利亚· 梅萨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是因为她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拉拢到大量的支持者。公元218年5月15日太阳落山之后，她带着外孙埃拉伽巴路斯秘密地离开埃梅萨，前往40公里之外的拉法内埃军团基地。第三高卢军团的军团长亲自迎接他们的到来，并在第二天一早就将这位14岁的少年引荐给手下的将士们。因为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伴随着大队长的一声令下，百人队队长纷纷齐声相应，最后士兵也全都发出推举新皇帝的欢呼，自始至终都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

身处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的马克里努斯很快便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组织讨伐的军队花费了他不少时间。趁着这个空当，尤利亚· 梅萨带着第三高卢军团进驻阿帕美亚基地，与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会合。

马克里努斯任命一位近卫军团的长官带领着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军

团从安条克出发南下向阿帕美亚进军，结果半路便与埃拉伽巴路斯的三个军团相遇。眼看就要演变成罗马军队内战的局面，实际上却并没有发生。在两军对垒都摆好阵势之后，马克里努斯手下的士兵们发现在不远处的山丘之上耸立着一个卡拉卡拉的全身像，而旁边站着身着军装、威风凛凛的埃拉伽巴路斯。马克里努斯手下的士兵们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纷纷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兵器。双方的士兵们都拥抱在一起，庆祝避免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当天只有近卫军团的长官被杀，原因是他是由马克里努斯任命的。

被士兵们抛弃的马克里努斯就算继续留在安条克也是十分危险的。于是他果断地逃了出来，而逃亡的目的地则是遥远的罗马。也许他认为只要能够回到罗马，那么对自己抱有好感的元老院一定会想出办法。但是他不能从海上逃跑，因为一旦在船上被发现，那么自己就彻底无处可逃了。于是只能选择陆路的马克里努斯化装成邮政马车的警卫兵逃出了安条克。帝国东方的所有士兵现在已经全都成为了他的敌人。统治者就算被憎恨也不能被蔑视，而马克里努斯却因为对帕提亚的外交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懦弱而遭到了所有人的蔑视。

马克里努斯的逃亡之路在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画上了句号。当地警卫队认出了马克里努斯，他正打算从邮政马车上逃跑，被追上来的士兵当场杀死，因为对他的厌恶，在将其杀死后才想起来应该事先通报上级。皇帝马克里努斯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便宣告终结。这位悲惨的皇帝甚至在自己统治时期一直到死都没有踏入过帝国的首都罗马半步。

第二章
公元218—235年

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公元218—222年在位）

横跨东西的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出身于“东方”的皇帝。在过去的那120年中罗马人对于行省出身的皇帝已经司空见惯，从西班牙人图拉真与哈德良，到北非的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这些行省出身的皇帝都是出身于帝国的西方。就连仅仅做了一年皇帝的马克里努斯也是北非人。而埃拉伽巴路斯则是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东方太阳神信仰宗教的祭司。

因为卡拉卡拉在位时还那么年轻，所以埃拉伽巴路斯的母亲索艾美亚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会继承皇位，于是从小对他的教育都是为了将来继承祭司的职位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埃拉伽巴路斯完全没有接受过帝国统治者的相关教育，而且他没有时间与环境满足对其他方面的好奇心，14岁就当上了皇帝。我们自然不能期望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图拉真、哈德良以及塞维鲁甚至卡拉卡拉都有的气魄，认为自己不属于西班牙或北非地方，而属于全罗马。埃拉伽巴路斯彻头彻尾是个叙利亚人，本人也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疑惑。在他心中，也从来没有成为罗马皇帝就应该更像一个罗马人的自觉。

当他将自己作为皇帝的全名改为“马可· 奥勒留· 安敦尼· 恺撒· 奥古斯都”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名字与他不搭调。结果大家虽然当面都称他为“恺撒”，但是背地里全都叫他“埃拉伽巴路斯”。不过他自己也很喜欢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因为“埃拉伽巴路斯”在叙利亚语中是“太阳神的虔诚侍奉者”的意思。由此可见，他即便在成为罗马皇帝之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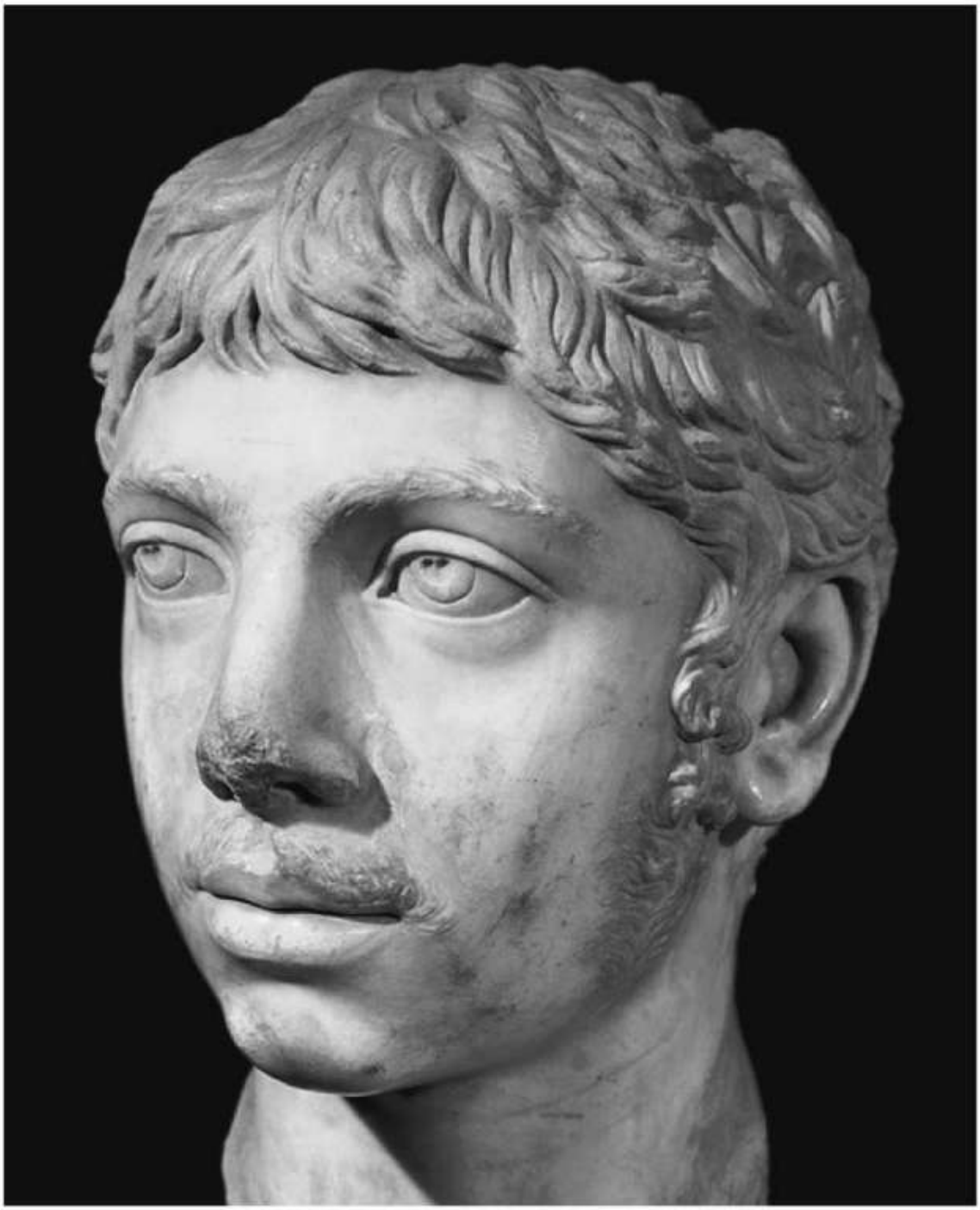
不愿放弃祭司的身份。

这位14岁的罗马皇帝不只有一个东方人的名字，而且在行动上也更像一位东方的君主。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表现得漫不经心，在准备行动前就慢吞吞的，开始行动之后更是磨磨蹭蹭。再加上他的队伍里拥有许多随从、祭司和乐师，使得他的行进速度变得更加缓慢。虽然在公元218年4月他就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实际上的皇帝，但是为了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他必须亲自前往罗马。结果他从叙利亚出发之后，在这一路的旅程上花费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公元219年的秋天抵达罗马。

公元219年9月29日，沐浴在早秋和煦阳光之中的首都罗马迎来了皇帝一行。时年15岁的新皇帝身着罗马式的军服骑着马进入首都，跟在他身后的是一顶由6名健壮的奴隶抬着的轿子。从轿子那豪华的装饰来看，大家都猜测坐在其中的应该是皇帝的祖母尤利亚· 梅萨，但是当一阵风将帘子吹起来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只是一块圆锥形的黑色石头。据说这块石头是太阳神的象征，原本被安置在埃梅萨的神殿之中，但埃拉伽巴路斯执意要将其搬到罗马来。

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对于这位新神灵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只不过他们从来参拜的都是神殿中的神像，而从来没有参拜过一块单纯的石头。

顺便说一句，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人类的裸体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而只有神灵才配得上这种美丽，所以他们的神灵全都以裸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就连死后被神格化的皇帝也是一丝不挂。当然裸体的皇帝像一定是在其死后才能制作，给活着的人塑像是必须为其穿上衣服的。



埃拉伽巴路斯

所以，对于习惯了赤裸裸的全身像或者半身像的罗马人来说，真是第一次见识到把眼前这个圆锥形的黑色石头当神明的。就这样，在大家

目瞪口呆的场面之中，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始了。

很久以前便在中近东一带影响广泛的太阳神信仰，是种一神教。不过与基督教、犹太教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奉自己的神明为唯一真神，把其他宗教打为邪教。因此从信奉天地诸神的罗马人的想法来看，这个宗教一点问题没有，理所当然地是罗马帝国内的宗教之一，可以不受任何迫害，自由发展信徒。因此，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个人信仰。

问题在于，埃拉伽巴路斯现在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而罗马皇帝往往兼任大祭司。除了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主神之外还敬奉其他众多神明的罗马人，甚至连象征着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融合”都神格化。罗马人坚信这些神明守护着他们的国家，因此在祭祀的日子里，往往由身为大祭司的皇帝率先垂范。不过因为罗马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也没有祭祀用的特别服装，一般都是将平时穿着的托加一端遮住头部表示尊敬。遇到国家祭典时，只要皇帝没有出征就必须出席。

但是皇帝埃拉伽巴路斯极力主张，他可以履行皇帝的义务，但是必须将对太阳神的祭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他还建造了一个专门用来安置那块石头的太阳神殿，位于能够将竞技场尽收眼底的帕拉蒂尼山上一角。

尽管埃拉伽巴路斯十分沉迷于他的太阳神信仰，但仍然没有将太阳神作为唯一的真神，将其他的信仰打成邪教排斥，他只是希望罗马人能够承认太阳神信仰在朱庇特和密涅瓦之上。不过仅仅这一点，在罗马人看来都属于无视他们的传统精神和文化的独断专行。

虽然罗马人民最初对这种异国风情表现出好奇，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给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印象。

埃拉伽巴路斯强行占有了一位居住在罗马广场深处的女祭司，随后又很快将其抛弃。这些被严格挑选出来的女祭司在任职期间必须保持纯

洁的处女之身，而祭祀的时候她们甚至享受比皇后都要高的待遇。但是埃拉伽巴路斯以为这些女祭司就相当于东方神殿中的巫女。因为在东方，这样的女性会经常与前来神殿参拜的信徒们进行性交易。但是罗马的女祭司别说与异性接触，就连产生恋爱关系都会遭到活埋的严厉惩罚。

尽管皇帝埃拉伽巴路斯所犯下的错误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但是如果要将其逐一列举的话恐怕我们的故事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因此接下来就再举一个例子作罢。

罗马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不赞成也不批判。虽然没有像希腊社会那样严格地不给予同性恋“公民权”，但是也认为同性恋从事公职是不太合适的。毕竟这种人际关系在某些场合不太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是埃拉伽巴路斯在公众面前肆无忌惮地与自己的男伴牵手，并且大抛媚眼，一直到仪式结束都将对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由于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元老院只是表面上做出不愉快的表情，但是民众们难掩自己内心之中的愤怒。他们向这位轻浮的皇帝发出猛烈的嘘声和嘲笑，不过沉浸在自己东方思想之中的埃拉伽巴路斯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即便如此，这位荒淫无道的皇帝还是维持了4年的统治，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在背后控制着一切。这应该也算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认为帝国周边地区的平静，才是埃拉伽巴路斯能够维持帝位的真正原因。

当时的帕提亚王国因为国内形势严峻，根本无暇对罗马境内发动攻击。

北方的蛮族在这个时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突破被卡拉卡拉强化过的防线。毕竟当时卡拉卡拉不仅强化了国境的防卫设施，还深入敌境给予日耳曼各部族以彻底的痛击。只能说埃拉伽巴路斯继位的时期实在是太幸运了。

但是这位最高统治者轻率的言行和举止，终于导致了他的灭亡。在埃拉伽巴路斯进入首都正式开始皇帝统治的两年后，即公元221年，连他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也决定放弃这个东方风格的罗马皇帝。她怂恿皇帝将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亚历山大立为“恺撒”。而被赋予恺撒称号也就意味着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梅萨的理由是，将亚历山大提升为恺撒之后，政事和公务就可以都交给他去做，埃拉伽巴路斯则可以专心于自己侍奉太阳神的祭司职责。当时17岁的皇帝对此深以为然。就这样，尤利亚· 梅萨将自己的另一个外孙子——13岁的亚历山大——以“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亚历山大”的名字，通过皇帝正式地介绍给元老院。

不过埃拉伽巴路斯很快便后悔了。亚历山大成为正式的继承者之后，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和当权者越来越多，得知这件事的埃拉伽巴路斯认为自己不应该如此草率地早早决定继承人。于是他向祖母提出想要撤回“恺撒”的封号，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埃拉伽巴路斯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要说暗杀的话本来应该派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秘密进行，可是他却命令自己的军团长官去执行这个任务，由此可见他这个时候已经疯了。但是军团长官让自己手下的近卫兵去谋杀的目标并非亚历山大，而是埃拉伽巴路斯。

公元222年3月11日，18岁的皇帝在士兵们的嘲笑声中被杀害了。他的尸体被从皇宫一直拖到罗马广场，在遭到全城市民的唾弃之后，又被拖到台伯河岸边从桥上扔进河里。皇帝的母亲索艾美亚迪也同时被杀。

在埃拉伽巴路斯死后，首都罗马的太阳神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东方文化都被一扫而光。就连建造在帕拉蒂尼山一角的太阳神殿也被愤怒的罗马人改建成了供奉朱庇特的神殿。不过，那块圆锥形的黑石头还是被归还给了叙利亚的埃梅萨神殿。因为太阳神信仰在叙利亚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允许多神教信仰的罗马人来说，破坏这个神像就相当于对其他宗教的不尊重。所以从罗马人的思维方式上来看，将其送

回原来的地方才是最好的选择。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公元222—235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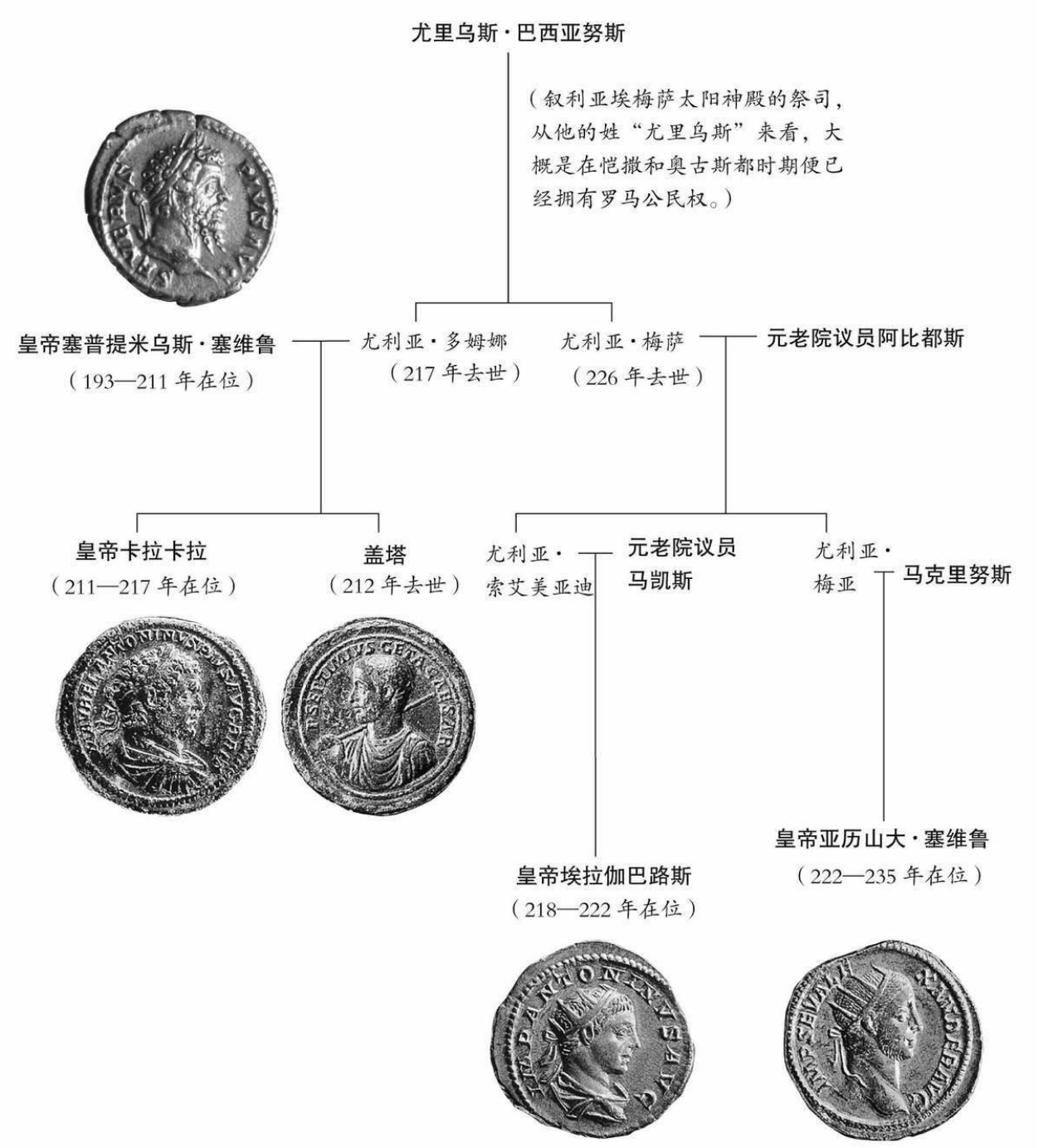
要想继续稳坐在帕拉蒂尼的皇宫之中，尤利亚· 梅萨就不能够再有任何的闪失。外孙埃拉伽巴路斯和女儿索艾美亚迪那悲惨的结局对这位叙利亚的女人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为两年前便已经将亚历山大立为“恺撒”，所以皇位的继承十分顺利。问题在于从此以后，新皇帝的外祖母和母亲这两位女性不得不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了避免重蹈埃拉伽巴路斯的覆辙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再次失败，恐怕不止皇帝的母亲被杀，就连她这个做外祖母的也无法幸免。

公元208年10月1日出生于叙利亚小城市阿卡恺撒利亚（Arca Caesarea）的亚历山大，终于在公元222年3月11日得到元老院的承认而正式继承皇位。从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开始到亚历山大为止的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塞维鲁王朝”，但是在这个王朝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活跃在其中的叙利亚女性。阿卡恺撒利亚毗邻埃梅萨，距地中海也只有5公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希腊人建造的，当地居民中的上层阶级由希腊人和犹太人占据。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文化交融气氛很强的东方都市。

亚历山大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所受的教育与埃拉伽巴路斯不同，完全是希腊——罗马式的教育。因为在罗马社会中一般都是母亲负责教育子女的任务，因此这也可以看做是他母亲尤利亚· 梅亚的意向。总之，亚历山大虽然出身于太阳神的祭司家庭，但是并没有接受祭司的教育。因为他生于皇帝塞维鲁统治时期，也许他的母亲梅亚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统治的罗马帝国之中担任重要的公职并且充分地发挥能力，所以才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吧。虽然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还只是一个还差半年才满14岁的少年，但他已经是那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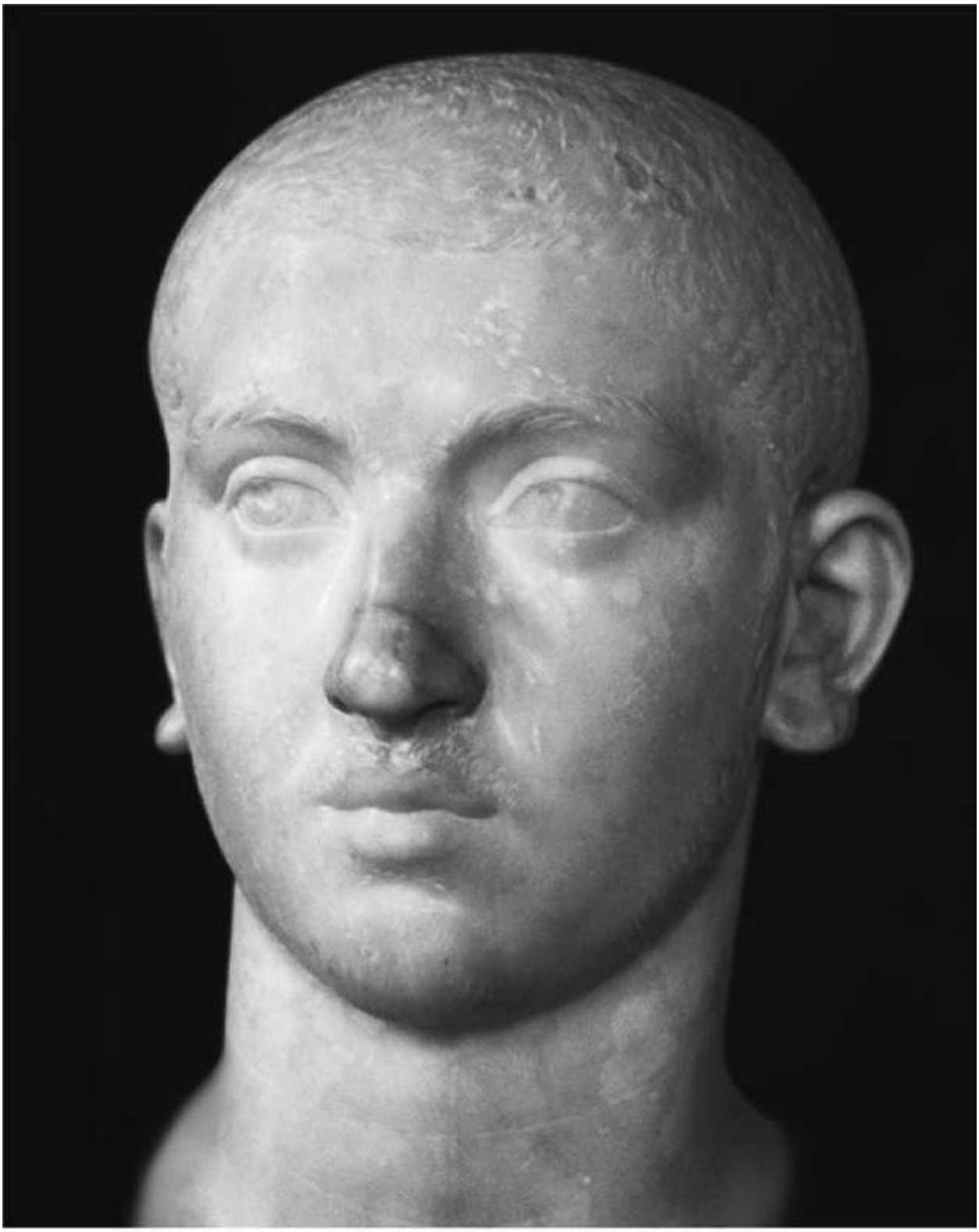
叙利亚女性手中最后的王牌了。

塞维鲁王朝家谱



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将正式名字改为“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亚历山大”。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有两个目的：第一，强调他和塞维鲁以及卡拉卡拉的血缘关系；第二，表示自己向那位备受当时的罗马人尊敬的哲

学家皇帝学习善政的决心。同时，因为塞维鲁很受军队的支持，强调他的血统有利于博得帝国士兵们的好感。而强调学习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统治方法，是为了获得元老院的认可。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

元老院立刻承认了亚历山大的皇位继承。不仅如此，还将皇帝可以得到的一切权力，全都授予了这位还不足14岁的少年：

奥古斯都称号

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称号

内政最高统治者“终身护民官”的称号

罗马帝国“国父”的尊称

在元老院议会一天提请5个议案的权力

元老院之所以匆忙地授予他这些权力，并不是因为相信他学习哲学家皇帝的宣言，而是为了在军队采取行动之前使皇位成为既成事实。因为之前的两位皇帝马克里努斯和埃拉伽巴路斯都非常不受士兵们的欢迎，当得知埃拉伽巴路斯死亡的消息之后，负责国境警备任务的各个军团的士兵们都想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拥立自己的总督或军团长夺取皇帝的宝座。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迟早会演变成内战。元老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守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如此匆忙地赋予亚历山大所有的皇帝权力，不过这个办法也非常有效地阻止了军队的行动。

皇帝亚历山大虽然并不是什么美少年，但也是一个性格认真稳重的人，而且他还会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要保护他的欲望。另外，亚历山大还将从马可· 奥勒留之后便被废除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不管是元老院议员还是总督，只要是比亚历山大年长的人，都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虽然在皇帝面前下跪是“东方”的传统，属于“西方”的罗马人对此看不习惯，但是最开始罗马人在皇帝面前是要站着的。亚历山大则规定，既然身为元老院议员，就算到了皇帝面前也有资格坐下。

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功成名就的老人们养老的地方，除了不需要通

过选举这一点之外，和现代国家的国会没什么两样。另外，只有经过元老院认可的决议才能够法制化，因此元老院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立法机关。虽然罗马的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皇帝提案的法律也需要经过元老院的认可，才能够成为拥有恒久性保证的国家政策。皇帝单独决定的法律只是暂时性的，在这位皇帝死后便会自动废除。如果想要将自己的想法反映在帝国政策上，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从这一点来看，与元老院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身为帝国最高执政者的皇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亚历山大谦虚的态度，使他很快赢得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好感。另外，少年皇帝提出的合理政策，也使得议员们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法学家乌尔比安

决定这次小心行事的尤利亚· 梅萨，为自己的外孙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量对象，这个人就是在罗马法律界大名鼎鼎的法学家乌尔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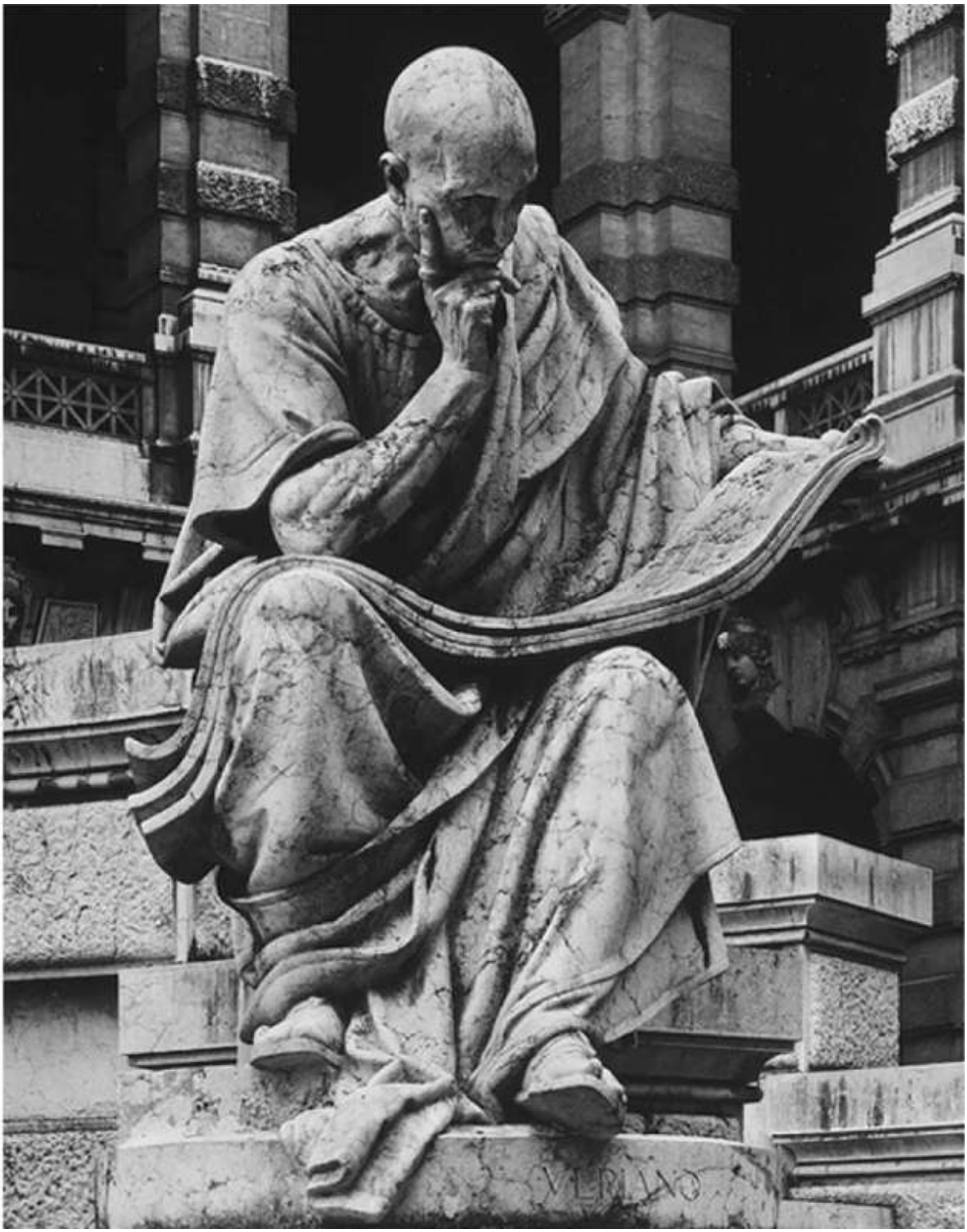
图密善· 乌尔比安出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提罗斯，位于现在的黎巴嫩境内，应该属于希腊系的东方人。从他的姓氏乌尔比安来看，大概是在图拉真统治时代便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家族后代，并由皇帝赐姓。既非罗马人，又不是出身于意大利，却能成为罗马的法律专家，这一点令人觉得有趣。正因为即使出身于行省，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就能在各个领域施展才能，罗马帝国才会成为国际化的“res publica”（国家）。

罗马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特点是，罗马人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是没有让法律成为脱离社会的桌上空谈。在子弟素养教育的科目中包括修辞学、伦理学、几何学、历史和地理等，但是唯独没有法律。因为在罗马人看来，所谓法律（lex），是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人，为了在同一个“共同体”之中一起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对罗马人来说，法律只有亲身体验学习的份儿：在家中是餐桌的话

题，在外则是到广场上公会堂旁听几乎天天都有的法庭审判。

因为这些背景，罗马人口中的法律专家没有学者的意味，而是成为法务官担任审判，或者为人进行辩护的人，再不然就是与公务相关的实务专家。

不过，仍然有一种被后世称为“法学著述家”（jurist）的存在，指的是那些创作了法律相关著作的人。乌尔比安凭借其在首都罗马丰富的工作经验，创作了上百部法律相关著作。尤利亚·　梅萨为她外孙子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法律了如指掌的实务专家。正如从总统助理到国防长官的现代升迁路线一样，乌尔比安也经历了皇帝助理（magister libellorum）、粮食厅长官（praefectus annonae）等职位，最后才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近卫军团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这个位置。近卫军团长官共有两名，就相当于皇帝的左膀和右臂一样。



乌尔比安像（现在罗马最高法院前与西塞罗等法学家并列在一起）

尤利亚· 梅萨要求乌尔比安不只在公事上，就连在私下里也要时刻陪伴在亚历山大身旁，换句话说就是形影不离。特别是最初的几年，不管皇帝走到哪里，在他的旁边必然有乌尔比安的身影。尽管不久后乌尔比安当上了公共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到了罗马人风俗中每天最悠闲的晚餐时分，皇帝的餐桌旁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乌尔比安的位置。

但是，这个人物对少年皇帝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重新恢复了皇帝和元老院“二人三脚”的统治体系。

为了帮助皇帝进行统治，在罗马帝国开国皇帝时期便有“Concilium”组织存在，相当于现代的内阁。但是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又增设了一个类似于摄政团的机关。摄政团共由16名成员组成，全部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Concilium”决定的法案只有在经过这个机关同意的前提下，才会被提交到元老院。这项改革很明显是为了表明其对元老院的尊重。因为以前的元老院在接到法案之前，并不知道这项法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而现在元老院则可以完全地参与到立案的过程之中。尤其是亚历山大还明确表示欢迎大家进行讨论，对于那些经历了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独断统治时代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就好像重新回到了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一样感到非常欣喜。不过在身为辅佐官的乌尔比安看来，年轻的皇帝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元老院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因为在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公正”（jusitia）。如果通过内政的公正能够消除元老院的不信任感，那么这个方法对于军队应该也是适用的。

为了统治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罗马的当权者习惯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其中的大部分记录都已经消失，只有从4世纪末到5世纪的Notitia Dignitatum存留了下来。这是一个可以称为“官员名簿”的文书记录，上面按照地区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当时所有的文职与军队官员的名称、官职和地区。4世纪末到5世纪这段时间已经属于罗马帝国的末期，在如此动荡的年代还能够留下这样详细的记录，由此可

见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帝国初期和中期，这种记录更是确实存在的。根据《罗马皇帝传》的记载，亚历山大就经常会随身携带这样一本厚厚的文书记录，时不时地打开来看一看。这位少年皇帝最为用心的部分，就是与罗马全军相关的记录。

在关于罗马军队的记录中，按照勤务地和军团分别记载了所有将官的全部信息，包括经历、军功、年龄、曾经获得几次褒奖等。因为其中所记录的信息还会不时地发生变动，因此要将这些东西全部记住绝非易事。但是据说亚历山大将这些内容全部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每次他和将军们谈话的时候，都会立刻说出这位将军麾下大队长的名字。也许这只是出于他做事过于认真的性格，却使军队的将士们产生一种皇帝对他们非常关心的感觉。这样一来不管是升迁还是调任，都会因为皇帝给人留下的公正印象而使将士们更容易接受。

在尤利亚· 梅萨的支持以及乌尔比安的辅佐下，年轻的皇帝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赖，使得其统治非常顺利地进行下去。

先帝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耀武扬威的宦官们以及妖里妖气的占卜师和戏子，全都被从皇宫中赶了出去。其中被埃拉伽巴路斯任命官职的人，也都被从首都流放。同时亚历山大还大幅减少了皇宫中的用人数量，一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开支，二是因为他和自己的“老师”乌尔比安一样不喜欢喧闹的排场。奢华的宴会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

亚历山大虽然年轻，但是私生活非常俭朴。他迎娶了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据说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女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善于与人交往，他有很多同龄的好友经常在一起运动。另外他也喜欢自己一个人读书，他经常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西塞罗的《论责任》，同时他也喜欢那些讴歌男女爱情的诗歌，由此可见，他和普通的年轻人并没什么两样。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自己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位英雄时而显露出来的醉态，也不赞同其非常残

忍地对待自己多年好友的做法。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位少年皇帝也不过是一位普通人而已。

据说在他的寝室中装饰着自己尊敬之人的画像，分别是生于小亚细亚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阿波罗尼、传说中的诗人与竖琴手奥菲斯、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基督耶稣这四位伟人。这并不是因为亚历山大脑子有问题，而是意味着罗马帝国是一个能够包容众多民族和文化的帝国。正因为如此，在涅尔瓦长方形议会厅的两旁并列摆放着死后被神格化的罗马皇帝也不会显得突兀，而且正如之前所说过的那样，被神格化的皇帝雕像全部是裸体像。

6年和平

亚历山大皇帝的统治，在乌尔比安的指导下以及由他本身的性格使然，公正而稳健地进行着。

在公共事业领域，经过历代皇帝的不断完善，建筑物和道路基本没有需要新建的工程，但是适当的修复和保养还是必要的。虽然有些只要稍作修缮即可，但也有一些必须重新建造才能够继续使用的情况。

首都罗马规模第二大的公众浴场是由皇帝尼禄在16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位于万神殿附近的浴场虽然经过历代皇帝的不断维护保养，但是毕竟年代久远，到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建。改建完毕的浴场被以最初的建设者尼禄与重建者亚历山大的名字共同命名，叫做“Thermae NeronianaeAlexandrinae”（尼禄亚历山大浴场）。

另外，还有一个对于历代的皇帝来说都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证居住在首都的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对此进行调整，乌尔比安亲自上阵指挥。罗马居住着上百万的人口，为了保证这些人的粮食供应，必须使与之相关的所有组织之间保持十分紧密的联系，使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另外，因为罗马帝国并没有将运输业并入国营范畴，所以负责运

送粮食的都是私营企业，而对于商人来说利润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所以罗马帝国对于运输业的从业者给予各种优惠待遇。首先是完善各种港湾设施，减免关税和其他税赋，还给因为海难沉没的船只补偿。不过享受这种优惠政策的只限于主食小麦的运输，对于小麦以外的其他食物，罗马帝国采取的是相当于现如今市场经济的控制手段。因此，所谓的保证粮食供应，实际上就是保证主食的供应。在粮食厅长官乌尔比安的努力下，亚历山大统治的13年间，首都罗马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紧张的问题。

平稳的治安与公正的税制同为善政的根本，皇帝亚历山大也明确宣称扰乱治安的人就是“国家公敌”。如果治安混乱，普通市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当权者有国家军队作为保护，有钱人可以雇用保镖破财消灾，但是普通市民则没有任何办法。因此普通市民的安全问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

实际上罗马帝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开始便在城市中设立了警察组织，提比略更是在联结都市与都市之间的大道上设立了治安亭。因为如果无法保障国内的安全，那么人们便不愿意出门经商和耕作。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证明，在古罗马时代，当权者和有钱人全都集中在首都以及行省的都市之中，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高高的围墙，门口也没有全副武装的守卫24小时站岗放哨，由此可见当时罗马的治安状况相当稳定。

要实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仅要成功抵御外敌的入侵，同时还要保证国内的治安稳定，这两者缺一不可。对于扰乱国内治安的人，罗马当局一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亚历山大也继承了传统的做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责任会更轻松，因为他需要强大的自制力和艰苦的努力去将传统维持下去。在他的统治时期，对于强盗的惩罚力度比杀人犯更加严厉。因此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除了锁门之外，只要在玄关门口的墙上描绘一个正在狂吠的狗并且写上“注意猛犬”的字样即可。

写有“注意猛犬”字样的镶嵌画

说到治安政策，就不得不提一提皇帝亚历山大留下的一条法律。那就是将在此之前一直属于皇帝和元老院的司法最终决定权，移交给各个行省的总督。

罗马史专家认为，这项法律的实施对于20年后镇压基督教徒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这项法令的影响并非仅仅如此，甚至和卡拉

卡拉当初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一样，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不管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只要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同时拥有上诉权。

居住在行省的居民即便被行省总督判为有罪，也可以向执政官（共和时期）或者皇帝（帝政时期）提请上诉。所谓上诉，就是指在不服从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向上级审判机构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由行省总督进行一审，皇帝和元老院作为上级审判机构，这就是罗马时代的“司法”。

皇帝尼禄时代出现的圣保罗案件，可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圣保罗和圣彼得并称为基督教两大支柱人物，在罗马帝国东方进行传教活动的时候被捕。当时的罗马帝国认为基督教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宗教，因此以传播邪教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判其有罪。但因为他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行使了自己上诉的权利，于是他在罗马军队的护送下被带往首都罗马。罗马的法律规定，在最终的判决结果出来之前，被捕者都不是罪人。而从帝国东部经地中海前往罗马的旅程十分漫长，圣保罗搭乘的船只在路上需要停靠很多港口，在船只进港的时候，圣保罗也不会被送进监狱，而是可以居住在当地基督教信徒的家中直至船只重新出海为止。这种待遇即便在他进入意大利本土之后也没有改变。对于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享受法律保护，这正是罗马公民权最吸引人的一点。

但是这种状态被皇帝亚历山大彻底改变了，从此之后上诉权基本不复存在。因为这是在重视公正的法学家乌尔比安辅佐时期所作出的决定，所以其目的绝对不是单纯地为了减轻皇帝的工作负担。当然也不可能是为了镇压20年后才抬头的基督教势力。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皇帝当时已经无法处理众多的上诉请求。

因为卡拉卡拉的一道法令，使得居住在广阔的罗马帝国之中的所有自由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甚至北方蛮族的后代，都可以拥有罗马公民权。拥有公民权的人增加，也就意味着上诉的数量随之增加。在卡拉卡拉之前的皇帝，在处理上诉问题时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虽然皇帝会将这些任务交给位于首都罗马的高级法院审判长，但是仍然需要很多时间。请想象一下，当年在多瑙河前线作战的马可· 奥勒留，结束白天战场最高司令官的任务之后，晚上还要进行司法相关的工作。而在统治时期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视察帝国全境的哈德良，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司法”如影随形。

上述那些情况还是在只有少数人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时代发生的，而在卡拉卡拉使所有人都拥有罗马公民权之后，这种情况更会如同井喷一般出现。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距离卡拉卡拉颁布法令已经过去了15年，因此根本完全无法处理那堆积如山的上诉请求。

总之，从此以后罗马人就失去了上诉的权利。这也可以看做全都有就是全都没有的典型例子。或许会有人认为只让一部分人享受的权利，还不如将其完全剥夺使之成为人人平等的状态。但是罗马的特色就在于公民权并非既得权，而是只给予那些希望得到它的人的期待权。在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之后，“期待权”变成了“既得权”，罗马也逐渐失去其作为罗马的特点。

所以说废除上诉权的责任，其实并不在亚历山大身上。这一切都是卡拉卡拉颁布法令之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亚历山大来说，面对明显已经无法处理的工作，只有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即便他明知这会给行省总督以可乘之机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身为皇帝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和努力。虽然他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上流着叙利亚人的血而感到羞愧，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叙利亚人。每当有人开玩笑地这样称呼，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所有为了建设罗马帝国而努力的人都是罗马人，自己也是其

中的一员。而且，他在慰劳臣下的时候也不说“谢谢”（gratia），而是说“国家感谢你”（gratias tibi agitrespublica）。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或者说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年代，他一定会在皇帝的宝座上直到天寿之年吧。但是，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在他继位之后的第四年，即公元226年，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的死给他的统治带来了一层阴影。这位叙利亚的女人属于寿终正寝，她的遗体在盛大的送葬队伍簇拥下经过哈德良皇帝兴建的阿耶利斯桥被送往耸立在台伯河岸边的哈德良陵园下葬，据说当时的罗马下起了非常罕见的大雨。

忠臣失足

代替尤利亚· 梅萨成为青年皇帝监护人的是太后尤利亚· 梅亚。梅萨是个邪恶但精明的女人，她的女儿梅亚却是个邪恶但愚蠢的货色，也就是说，梅亚没有大奸大恶的才能。对于工作需要后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推动工作的环境。其中因为尤利亚· 梅萨的死受到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地位有如帝国宰相的乌尔比安。

虽然就连普通的市民都感觉到皇帝处于他母亲的阴影之下，但是尤利亚· 梅亚对于这件事的危险性毫不在意，而且她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界展示身为皇帝母亲的她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用一句俗语说，太后开始抢风头了。她的高调作风很快就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这个人就是皇后塞丝蒂安。不过因为塞丝蒂安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这成为了梅亚攻击她的借口。最终梅亚迫使亚历山大与塞丝蒂安离婚，并将她流放到了北非。

皇宫中的气氛变得如此紧张，波及号称皇帝身边第一忠臣的乌尔比安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因为帝国的统治非常顺利，他作为实干派官员的能力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不过作为尤利亚· 梅萨时期皇帝身边的红人，乌尔比安自然拥有很多政敌。而梅萨死后他与梅亚之间保持距离的态度，则使得他的政敌们找到了可乘之机。

对于乌尔比安来说无比艰难的这段时期，同样也是使亚历山大感到左右为难的时期，这位皇帝从18岁成长到了20岁，已经不能够再被称为“少年”了。如果他能够表现出坚决果断的态度，或许还能够避免未来一系列的悲剧发生。但是，这个年轻人在面对困难事态的时候缺乏圆滑的处理能力，没有当断则断的气魄。仅仅凭借善良和责任感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领袖。公元228年，尤利亚· 梅萨去世之后两年，在得到皇帝母后默许的反对派煽动下，忠臣乌尔比安被他下属的近卫军团兵杀害了。

尤利亚• 梅亚

4年后，皇帝亚历山大24岁。在这4年里他没有再婚，而是专心于国

家的管理。似乎是为了回报他的艰苦付出，帝国的秩序也是一片祥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赫罗提安这样写道：“没有一位元老院议员以叛国罪受到控告，不管是在议会厅还是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在所有意义上来说都是和谐稳定的。”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看上去安静祥和的水面，下方却是暗流汹涌。罗马帝国已经再也无法回到乌尔比安辅政的那个时候了，至于亚历山大向往的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则更加不可能。所以一名统治者要想将盛世尽可能地维持下去，需要非常仔细小心地为国家这条大船掌舵。因为等到改变之后再想回到过去，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学家狄奥

说起从2世纪后半期到3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帝国历史，首先提到的必然是卡西乌斯· 狄奥的《罗马史》。这部用希腊文写成的著作共有80卷，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断断续续的25卷。从历史书的价值来说，其中关于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描述还值得信赖，但是对之前时代的描写则明显有很多修饰和值得怀疑的部分。不过即便如此，作为一名生于帝国后期的典型才子，他的一生仍然非常耐人寻味。

卡西乌斯· 狄奥，公元165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尼科米底亚，他的家庭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他是希腊人，但拥有罗马公民权，因为他的祖父从当时的皇帝涅尔瓦那里得到科塞乌斯的名字作为家族的姓氏，所以他的全名应该是卡西乌斯· 科塞乌斯· 狄奥。由此可见，从他的祖父辈开始便是罗马化但出身于罗马行省的希腊人。

他的父亲被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任用，从而成功跻身于帝国上层社会，担任元老院议员的职务，后来又被哲学家皇帝推荐当选执政官，随后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赴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行省西里西亚出任总督。身为其儿子的卡西乌斯也按照当时的惯例跟随父亲来到这里，度过

了整个少年时期，不过当他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之时就被父亲送回首都罗马接受学校的教育。在这段时期，他的父亲被调任到与意大利本土隔着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行省赴任。他身为希腊人的后代，却没有前往雅典、帕加马或者亚历山大接受大学教育这一点实在是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发展路线吧。

这也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非常典型的发展路线，说明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同化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不管罗马多么渴望同化对方，如果对方没有这种意愿，那么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断言罗马帝国强大的原因就是实行了同化政策的普鲁塔克，其本人就是和卡西乌斯·狄奥的祖父同时代的希腊人。

与他父亲期待的一样，后来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在帝国的任职经历也以元老院议员儿子的身份顺利开始。公元180年，即马可·奥勒留去世的这一年，他也成为了元老院议员，似乎是接替死去的父亲担任元老院的职位。

康茂德统治时期的卡西乌斯· 狄奥只不过是元老院议员中的晚辈，但是与生俱来的敏锐观察力为他后来的著述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他对于康茂德那不稳定的言行的描写，就好像是将这位皇帝的内心世界全都挖掘出来了一样，或许是他和这位皇帝年纪相仿的缘故吧。

康茂德被谋杀之后柏提纳克斯继位，卡西乌斯被提拔为法务官。但是他在这个“光荣职务”上并没有坐多久。很快柏提纳克斯也被谋杀，帝国陷入三位将军的内战状态。这段时期的卡西乌斯早早地便加入塞维鲁派，或许是因为他看出虽然年轻但拥有冷静性格的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是最有可能取得这场内战胜利的人。身为爱国者的卡西乌斯· 狄奥非常重视罗马帝国的兴亡。

内战结束后，卡西乌斯首次在塞维鲁皇帝的身旁获得执政官的职位。虽然只是辅助执政官，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以“前执政官”这个头衔被

派往行省进行统治的资格。

卡拉卡拉继承皇位之后，虽然他也跟随这位皇帝参加了帕提亚战争，但和其父亲塞维鲁统治时期不同，他和卡拉卡拉的关系仅仅维持在皇帝与元老院议员之间。卡拉卡拉被谋杀后继位的马克里努斯任命卡西乌斯· 狄奥为小亚细亚主要都市士麦拿（今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和帕加马的行政负责人。即便在马克里努斯被杀、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他也仍然被继续留任在这个职位上。

卡西乌斯· 狄奥的从政生涯在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首先，他被任命为父亲也曾经担任过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总督。任期结束后，他又穿过地中海前往北非行省担任总督，在北非行省的首府迦太基（今突尼斯）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两个行省的统治能力得到了一致肯定。而从北非行省卸任之后，卡西乌斯· 狄奥内心最希望的是能够前往不管在地理上还是在气候上都与北非完全不同的多瑙河防线执行勤务。虽然在多瑙河执行勤务就相当于在如今的克罗地亚、突尼斯、奥地利等地不断地来回巡视，但是对于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卡西乌斯· 狄奥来说，根本感觉不到其中的辛苦。

虽然他的新勤务地近潘诺尼亚行省的首府长久以来一直是卡农图姆，但是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行省总督的官邸便被设在了维德伯纳（今奥地利的维也纳）。不过，他并没有为了舒适的居住环境而移居维也纳。这两个城市都是军团基地，而且都是多瑙河上的军事要地，与位于东方的以布达佩斯为首府的远潘诺尼亚行省共同构成了多瑙河中部一带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总督卡西乌斯· 狄奥除了负责整个行省地区的行政和司法等工作之外，还要负责统率下属的两个军团。这也是距离国境较远因此没有军队驻扎的行省和位于国境附近拥有军团基地的行省之间最大的区别。前者被称为“元老院行省”，后者被称为“皇帝行省”。从防御层面上来说，后者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担任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人

能够被任命为皇帝行省总督，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而卡西乌斯· 狄奥在这个如此重要的前线位置上，从公元224年一直到227年总共任职了3年的时间。当他卸任的时候已经62岁了。也正是这3年的经历，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多瑙河防线称为显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体制是否健康运转的测量仪。同时，他也是在这段时间，得知了在背后支持乌尔比安的尤利亚· 梅萨的死讯。

在他卸任回到首都之后的两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乌尔比安的死一定对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虽然并没有史料记载他和乌尔比安之间有多么深厚的友谊，但是同为爱国者，并且为了亚历山大的统治殚精竭虑的两个人，总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对于相当于亚历山大左膀右臂的乌尔比安的死，卡西乌斯· 狄奥一定会在心中暗自神伤吧。

公元229年，卡西乌斯· 狄奥再次被推举为执政官。这次他并非候补而是正式的执政官，而且与他共同执政的还是身为皇帝的亚历山大，可以说这是一个名誉和地位双丰收的职位。64岁的卡西乌斯· 狄奥终于登上了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生涯的顶点。

但是首都的气氛在乌尔比安死后完全发生了改变。卡西乌斯· 狄奥以旧病复发并且持续恶化为由，放弃了与皇帝共同执政的机会，返回位于那不勒斯的家中闭门不出。甚至连在罗马召开的元老院会议都一次也没有出席。他做出一副虽然拥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但是在面临死亡恐怖的时候还是难免退缩的样子。或许是因为他冷静地判断自己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当第二个乌尔比安”是不切实际的行为。

关于他究竟何时离开了舒适的意大利南部，返回自己的故乡比提尼亚并隐居起来，在史料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式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除了80卷的《罗马史》之外他还留下了许多其他的著作，可见他也是比较长寿的人。原本恶化的旧病或许也因为悠闲的生活而逐渐减轻，至于他去世的具体年份则无从知晓。在

他开始隐居生活的第二年，皇帝亚历山大东征时正好经过卡西乌斯隐居的地方，不知道他会不会和皇帝去打声招呼。而当3年后他得知皇帝死讯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表面上看起来一直维持着相当良好状态的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实际上即将面对的危机并非来自内部，而是由于帝国以外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危机之一，就是在遥远的东方，罗马的宿敌帕提亚王国被波斯萨珊王朝所取代。

波斯萨珊王朝

在我的工作室中有两张托斯卡纳风格的木桌子，比较小的一张被我当做书桌，稍大点的那个用来摆放词典和地图。现在这张大桌子上被两张中近东地区的地图所占据，一张是古地图，另一张则是现代地图。在每天面对这两张地图的过程中，我终于逐渐地意识到，为什么自古以来“西方”便一直将“东方”看做一种威胁。

说起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就算不追溯到特洛伊战争那么久远的年代，公元前5世纪波斯和希腊之间发生的波斯战争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其中的萨拉米海战以及马拉松战役，更是因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述而流传后世。

虽然自从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波斯便退出了地中海世界的舞台，但是因为波斯帝国人才辈出，丝毫不见衰弱的迹象，所以对于希腊的各个城邦来说波斯的威胁一直存在。

直到公元前334年到前323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为止，波斯的威胁才被彻底解除。希腊的宿敌波斯，在其至高无上的王者大流士被消灭之后，终于屈服在西方的统治之下。不过这种臣服实际上也仅仅维持了不到10年而已，因为这位身为军事天才的年轻征服者，在33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而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继承了他领地的下属将军们只关心地

中海附近的区域，至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

身为游牧民族的帕提亚人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占领了曾经是波斯帝国的心脏部位——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中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247年，帕提亚王国诞生。

这段时期的罗马才刚刚征服意大利半岛，与强敌迦太基人正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打得难解难分。在经过导致一代名将汉尼拔盘踞在意大利16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及最终灭亡了迦太基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百余年。而以帕提亚民族为主融合了众多部落民族的君主专制国家帕提亚，则靠着东方两大财源——农耕和通商——成为了一个富强的国家。

消灭了迦太基之后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开始接连征服希腊诸国，势力范围也逐渐向地中海东部扩张。马其顿、希腊、叙利亚、埃及全都陆续归入罗马的版图之内。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彻底成为了罗马人的“内海”。在这一时期罗马那些著名的武将，比如苏拉、鲁库卢斯、庞培等全都有远征东方的经验。恺撒也计划直接与帕提亚交锋取胜，借以确立罗马的东方防线，但因恺撒被暗杀而没有机会实现。

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完全继承了恺撒的政略，在帝国东方的防卫问题上也是一样。但是在帕提亚问题上他选择了外交方式而非军事手段。一是因为自从恺撒被暗杀之后，罗马帝国经历了14年的内战，因此奥古斯都首先希望能够恢复国计民生。二是因为他并不像恺撒那样拥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对于战斗非常不擅长。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需要非常敏锐和迅速的判断力，但是奥古斯都却是一个做事喜欢深思熟虑的人。大概上天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只给了恺撒不到两年的统治时间，却给了奥古斯都40年。顺便说一句，亚历山大大帝成就霸业之后的统治时间是零。

恺撒和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虽然希望稳固幼发拉底河附

近国界线的目的相同，但是在做法上分为恺撒派和奥古斯都派。前者主张进攻敌方的根据地彻底摧毁敌人侵略的意图，后者主张通过确立防御体制和强化防御设施来防止敌人侵略。恺撒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图拉真，奥古斯都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哈德良。

图拉真的东征曾经攻陷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泰西封，甚至顺着底格里斯河直达波斯湾一带，但是他的足迹仅仅到此为止，没有继续向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方向前进。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图拉真之所以没有继续进军是因为当时他年事已高，但是对于一路长驱直入未尝败绩的图拉真来说，我认为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古代的帕提亚王国拥有包括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勒斯坦的广阔土地。当时的罗马人所谓的“东征”，实际上只是越过作为国界的幼发拉底河攻至底格里斯河的岸边而已。因为帕提亚王国的主要都市大多集中在这里，相当于现在的伊朗以东，伊拉克境内，也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腹地。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来说，只要占领了这里就相当于征服了帕提亚王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向东前进。

伊拉克现在的首都巴格达，是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化之后于7世纪建设的都市，距离帕提亚的首都泰西封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路程。因为这两个都市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都是位于两河流域一带，所以从古代的泰西封到现在的巴格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现代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在13世纪遭受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只是一个小村庄，19世纪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进入20世纪后，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都保留了各自的独立，如果这些国家重新合并起来，想必“西方”人一定会再次感觉到来自“东方”的威胁吧。毕竟就算没有石油问题，仅仅居住在这里的人数就足以对西方构成足够的威胁。这也是罗马帝国不得不时刻提防“东方”国家的原因。

话又说回来，对罗马帝国来说，帕提亚王国在很多方面是个好对付的“敌人”。

第一，虽然帕提亚拥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罗马境内的军事实力，但是并没有将罗马帝国东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实力，更别说征服整个罗马帝国了。

当然对于罗马来说也不可能允许帕提亚控制帝国的东部地区。如果位于幼发拉底河防线西侧的叙利亚行省落入帕提亚手中，那么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就将完全暴露在对方的面前。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小亚细亚、南部的约旦和巴勒斯坦，甚至被称为罗马粮仓的埃及都将面临沦陷的危险。军事防线（limes）的重要程度，是由其被破坏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决定的。因此罗马人认为幼发拉底河防线的重要性甚至与被称为北方生命线的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相比也不遑多让。为了保证这条东方防线的安全，罗马帝国专门建立了行省总督负责制的防御系统，只要叙利亚行省的总督们发令召集，就可以立刻集结10个军团共计6万人的战斗力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东方的君主们常常喜欢通过统率的士兵数量来显示自己的实力。拥有广阔的疆域、并且下属的封建诸侯都拥有大量直属士兵的帕提亚国王则更是如此。

这样一来，两大强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形成了某种意义上军事平衡的状态，由此产生两国之间“共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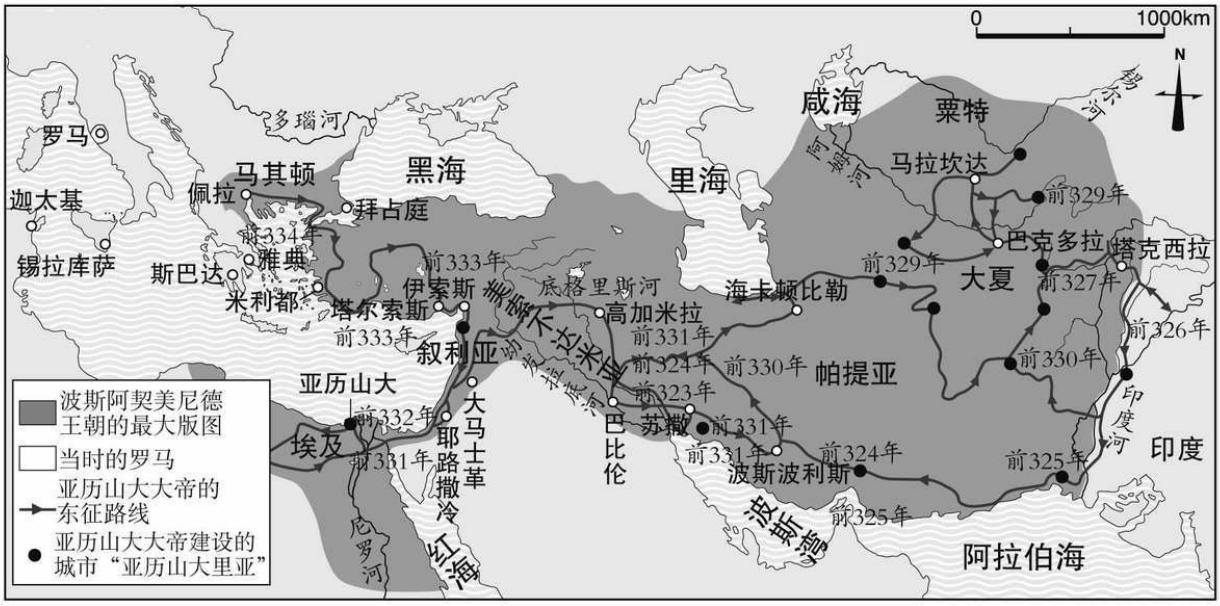
第二，不管是罗马还是帕提亚，都拥有明确的最高统治者，两国都拥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这样就给两国提供了通过高层会谈商议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点和同为罗马帝国宿敌的北欧日耳曼民族就完全不同。罗马和帕提亚进行高层会谈和签订协议的地点一般选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这也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象征。

第三，两国的统治者都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考虑双方之间的问题。罗马帝国的东方都市，不管是安条克、大马士革还是帕尔米拉，都是因为与亚洲之间的通商而繁荣发展起来的。而用于交易的商品和原料则全都需要经由帕提亚国内流通过来。凡是从亚洲来的商品虽然另外还经由黑海、红海进入罗马，然而大多数的商品无论是走陆路经过大草原，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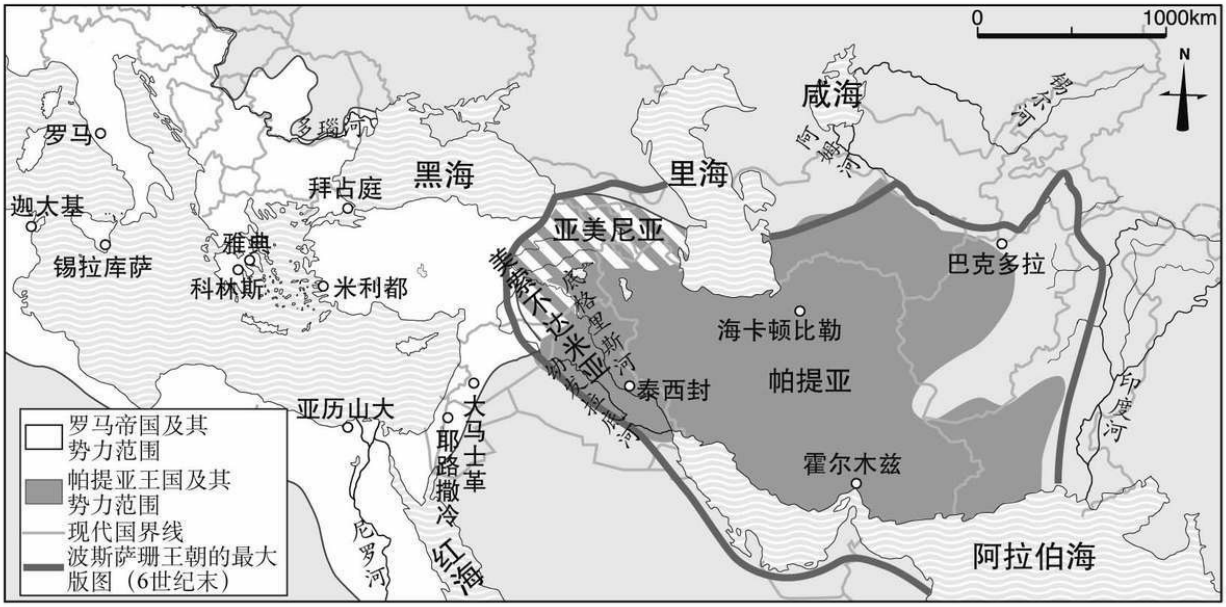
是走海路至波斯湾上岸，全都需要通过帕提亚的领地运往西方。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帕提亚虽是敌国，但手里握有罗马人想要的东西，而同为敌人的日耳曼人手中则没有罗马人想要的东西。

反过来说对帕提亚王国也是如此。从东洋传过来的奢侈品仅仅放在那里是无法产生利润的。如果能够将这些奢侈品转手卖出去，那么他们的经济繁荣便指日可待。而帕提亚王国最大的客户就是罗马帝国。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便移居于此的希腊人和只要有利可图就一定会出现的犹太人，将这个被夹在两国中间的市场发展得有声有色。在经商头脑和流散风俗上，希腊人与犹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大版图（公元前500年左右）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路线



2世纪中期的罗马与帕提亚

可以说，分别居住在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与犹太人，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上层社会群体。这样一来，不管是罗马也好还是帕提亚也罢，都没有封锁国境的理由。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打算封锁国境，也因为当地多河流与沙漠的自然条件而无法实施。罗马和帕提亚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双方之间的这种状态。虽然两国间经常会因为各自国内的种种原因而纠纷不断，但是军事冲突从来都不会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境地。这也是两大强国之间“敌对”了300余年仍然能够共存的最大因素。

但是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终于在公元3世纪走到了尽头。终结帕提亚王国500余年的历史，并且取代其“东方”霸主地位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提到的波斯萨珊王朝，同时也是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所不得不面对的强大敌人。

虽然“东方”更换了统治者，但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通商活动仍然保留了下来，波斯萨珊王朝没有将首都定为波斯波利斯，而是沿用了帕提亚时代的泰西封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会有人认为波斯萨珊王朝和“西

方”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和帕提亚王国时一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复兴的旗帜

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在公元224年将长久以来对波斯民族进行统治的帕提亚国王从统治者的宝座上推了下去。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统一了帕提亚全境，终于在226年登上王位。而阿尔达希尔的目标则是复兴居鲁士与大流士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

阿尔达希尔

请大家参照前面的两幅地图，我们不难发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土地和古代波斯帝国的领地几乎一致。这是因为当初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征服了波斯帝国。

而且将这两幅地图作对比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在希腊时代之后，被帕提亚王国与罗马帝国东半部正好从中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波斯萨珊王朝的目标与帕提亚王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波斯萨珊王朝的目的在于复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的波斯帝国。而罗马对于这种诉求当然不可能保持沉默。所以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之前同帕提亚王国的关系了。

复兴曾经的波斯帝国，重新恢复500年前的荣耀，虽然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付出无比的艰辛，但是人类这种生物就是拥有这样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被哈德良皇帝瓦解的犹太民族，历经1800余年的颠沛流离，仍然固执地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与之相比，波斯人的500年也并不漫长。在帕提亚人的统治下度过500年，已经充分地点燃了波斯民族的抗争热情。因此波斯萨珊王朝将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重新定为国教。

生于现代的我们都知道，波斯萨珊王朝最终也没能够实现他们复兴波斯帝国的理想。直到400多年以后的穆斯林才算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但是，对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人来说，复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的波斯帝国，重振波斯民族的荣耀，并非无法实现的梦想。因此他们才会结成统一战线，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也是同为东方民族的帕提亚人所没有的气概。

另外，还有一个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社会的原理。那就是现实主义者往往会将对方也看做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认为对方如果站在现实的角度上看问题，就一定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但身为现实主义者的罗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波斯萨珊王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当年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即便双方交战也仅仅限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带来这种变化的并不是历史上那个波斯帝国统治者的后代，虽然同为波斯民族，但是新兴的萨珊王朝与500年前统治波斯的皇族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对于罗马人来说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正如其在历史上被称为“波斯萨珊王朝”一样，3世纪时候的罗马人所面对的敌

人，并不是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摧毁的那个波斯帝国，甚至都不是那个帝国的直系子孙。准确地说，波斯萨珊王朝并非是曾经波斯帝国的复兴，而是由新兴的波斯民族所组成的。像这样的新兴民族往往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位于“西方”的罗马似乎对于公元227年“东方”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这段时期对罗马来说也是多灾多难。一年前，皇帝亚历山大的幕后支持者尤利亚· 梅萨去世。而就在阿尔达希尔于波斯民族的大本营波斯波利斯举行了盛大而华丽的加冕仪式，并且入主首都泰西封之后不到一年，失去了靠山尤利亚· 梅萨从而地位不保的乌尔比安也死于其政敌之手。刚刚20岁的亚历山大，因为其母亲梅亚并没有继承外祖母梅萨的气度，导致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失去了所有值得信赖和能够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在当时的“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东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就这样，开始逐渐衰退的罗马帝国，与燃烧着旺盛斗志的波斯萨珊王朝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顺便说一句，罗马皇帝并没有加冕仪式。因为在加冕仪式上必须有“某个人”为皇帝戴上皇冠，表示正式授予其统治国家的权力。而罗马帝国之中的“某个人”则是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但是因为主权者的数量过于庞大，如果将所有人都集合起来举办加冕仪式不仅场面过于庞大，甚至也会失去加冕本身的意义。不过对于东方人来说，皇帝的权力并非委托而是授予，所以需要通过举办盛大的仪式来给平民百姓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刻有皇帝两种头冠的硬币：太阳冠

刻有皇帝两种头冠的硬币：公民冠

在罗马帝国甚至都不存在皇冠这个概念。在硬币和雕像上最常见的是用树枝编织出来的头冠，这种被称为“公民冠”的头冠在共和国时代便已经存在，经常被授予那些在战场上拯救同胞的士兵。一个大男人却在头上戴着树枝编成的公民冠，象征着守护公民的安全是罗马皇帝的首要任务。

除了公民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展现罗马皇帝权威的皇冠。这种皇冠被设计成类似太阳光芒集中在一起的造型，与公民冠在“西方”普及所不同的是，太阳冠是专门面向帝国“东方”使用的。对于没有公民传统的东方人来说，公民冠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太阳冠显然更加有利于他们对皇权的理解。入乡随俗是统治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法则，罗马人就连皇冠也坚定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因为加冕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负责授予皇冠的人不能是普通的人类，而必须是某种超越注定一死的人类的存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而神是无法亲自为人类加冕的，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那些传达神意的大祭司、祭司以及神职人员身上。这样，掌权者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

通过加冕仪式，皇帝与神之间被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也是“东方”比“西方”更加重视加冕仪式的原因。由此可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全都源于“东方”也并非偶然。“加冕”一词被解释为“证明欧洲皇帝即位而为其戴上皇冠的仪式”，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应该是进入基督教时代之后的“欧洲皇帝”。

让我们回到还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罗马帝国时代，没有加冕仪式的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对手，是被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亲自授予皇冠的阿尔达希尔。当然阿尔达希尔对罗马帝国的威胁，并非因为波斯萨珊王朝与之前的帕提亚相比宗教色彩更加强烈，而在于其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新兴国家甚至能够置国内的反对派于不顾而坚决对外采取攻击的态势。所以从阿尔达希尔加冕开始到向西北方出兵为止，甚至都不到4年的时间。

北上越过幼发拉底河的波斯大军在征服了罗马的盟友亚美尼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攻入卡帕多西亚行省。而越

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发的波斯大军则将叙利亚行省带入了恐怖的深渊。商人们停止了一切交易活动，躲在戒备森严的城墙下面瑟瑟发抖。曾经在罗马街道上活跃的商队也被全副武装的波斯骑兵所取代。屯驻在叙利亚行省的诸多军团，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也失去了应对的能力。自从马克里努斯屈辱地媾和撤退之后，经过埃拉伽巴路斯治下的4年以及亚历山大统治的10年，这里一直被中央所忽视，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任凭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居住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人民将全部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于是皇帝亚历山大决定亲自出征解决这场危机。公元232年，24岁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在继承皇位10年后，终于要亲自证明其作为皇帝的价值。

罗马人对皇帝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能否保证帝国和居民的安全。也就是说，罗马人需要自己的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其强大的军事能力。“皇帝”的语源“Imperator”原本在拉丁语之中是士兵对取得战斗胜利的指挥官的尊称。早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前，“Imperator”就一直是胜利者的意思。

这个对率领军队取得胜利的指挥官的尊称，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直接变成了“皇帝”的称号，因为罗马的皇帝同时也是全军的最高司令官。

由此可见，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有上阵杀敌的军人使命。维持了10年的和平统治之后才初次踏上战场的亚历山大，可以说算是比较幸运的。唯一不幸的是，他的对手是一个斗志旺盛的新兴民族。

波斯战争（一）

在作出亲征的决定之后，亚历山大的动作非常迅速。虽然他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行军速度的重要性，但是仍然非常谨慎地选择随行人员并妥善地准备辎重，并没有草率地贸然出兵。离开首都罗马之后，皇帝一

行首先花费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到多瑙河沿岸。之所以先来到这里，是为了整编东征的军团。因为在波斯军队进攻的初期，屯驻在叙利亚的军团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根本靠不住。

据说亚历山大召集了6个军团以及辅助部队，参加这次波斯战争的罗马兵力应该在5万人左右。但是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只有3万人左右，这是因为他原计划在抵达叙利亚行省之后与驻扎在叙利亚周边的军团会合，并将其吸收进来。

就这样，庞大的罗马军团浩浩荡荡地向东方进发，只能用“壮观”一词来形容。

从多瑙河南下来到色雷斯，继而沿着通往东南方的道路越过作为欧洲与亚洲分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记载，罗马军队的全体士兵都穿着正规的军装，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责手持不同的武器，整齐划一地在罗马的大道上行进。行军的秩序直到太阳下山以后也没有丝毫的紊乱。在行军的过程中，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兵全都需要在野外搭帐篷宿营。罗马军队非常重视传统的兵站建设，而野营正是兵站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满足了战士们最基本的物质层面需求之后，才能够使他们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士气。与军队一起行军的皇帝亚历山大，在维持罗马传统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相当到位。

亚历山大没有选择使用四周有帷幕遮挡、可以安心躺卧的轿子，也没有选择比较节省体力的马车，而是和军团长与大队长一样骑在马上与军队同行，偶尔还会和百人队队长与士兵们一起徒步前进。

吃饭的时候他也和士兵们吃一样的食物。唯一不同的是士兵们自己做饭，而皇帝有随行的厨师负责料理。他在吃饭的时候会将帐篷四面全都高高掀起，让士兵们能够看到皇帝吃的是什么。如果在行军过程中发现有开小差跑到附近农家偷东西的士兵，会被押往皇帝面前接受严厉的鞭打。因为亚历山大虽然并没有亲历过战场，但是他深知军规必须严格

遵守，只有严格遵守秩序的军队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得到罗马帝国之前无数次的战役证实。而对此深信不疑的亚历山大，在经历了漫长的行军之后所见到的一幕，却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

士兵们的罢战

作为防守幼发拉底河防线的主力而常驻于叙利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分别以三个战略要地作为其军团基地。其中两个军团分别位于现在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萨塔和泽乌玛，另外一个军团位于之前提到过的埃梅萨附近的拉法内埃。但是在公元232年的时候，叙利亚行省之中还有从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撤军回来尚未安排屯驻基地的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不能够在城市内设置军团基地是罗马一直以来的传统，因此一时间没有地方驻扎的这两个军团就在安条克以南10公里处的达芙妮驻扎下来。达芙妮是以祭祀希腊诸神的神殿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小镇，所以即便驻扎大量的士兵也不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什么不便。当皇帝亚历山大进入安条克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就是这两个军团的士兵。

接下来将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迎接皇帝的时候所发生的小故事。所谓历史，就是由无数的细节组合起来的，这次的小故事也是其中之一。这些细节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能够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很多的参考。身为领袖的亚历山大·塞维鲁，究竟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呢？

小故事共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部分。“过去”指的是亚历山大曾经阅读过无数次的历史，虽然不知道普通的士兵是否了解，但是将官级别的人应该都知道。同时这也是被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无数次提到过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过去”的主人公是尤里乌斯·恺撒，“现在”的主人公是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虽然“过去”的这段历史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中描述过，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重新回顾一

次：

公元前47年的小故事

解决完西塞罗的事情后，恺撒沿着阿皮亚大道奔向首都的期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安东尼从罗马发来的急报。罢战又发生了，精锐军团中的部分士兵集体要求退役。而且此次的主谋第十军团的士兵们已经手持武器，齐聚城外的马尔斯广场。大法务官撒路斯提乌斯（后来的历史学家）带着奖赏方案前去交涉，结果被士兵们赶了回来。

说起这个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第十军团，在地中海世界可谓家喻户晓。英雄团如今举起了罢战的大旗，这事非同小可。况且，对恺撒而言，现在正是需要他们前往北非肃清庞培余党的关键时刻。

从阿皮亚大道进入首都的正南方向，正好与马尔斯广场所在方位相对。恺撒对近侍们的劝阻置若罔闻，连日耳曼骑兵担任的侍卫们都没带，策马横穿罗马城，单骑出现在闹事的士兵们面前。时隔一年，再次与第十军团兵们相见的恺撒，没有任何寒暄，而是突然开口道："说！想要什么？"士兵们纷纷叫嚷着要求退役。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在即将开始的北非战场上恺撒是非常需要自己的。因此这个退役的要求不过是希望恺撒能答应增加军饷提高奖励而已，原本他们就没想过要真正退役，还是希望能跟随恺撒继续征战。然而恺撒只说了一句话："我准了。"

闹事的士兵们没料到恺撒会这样回答，挥舞剑的手顿时停在空中，叫嚷声也瞬间停止了，广场上陷入一片沉寂。面对哑然的士兵，恺撒接着说："公民们，我恺撒一言九鼎，在我及我的士兵们得胜凯旋之后，各位的饷银及其余奖赏定会如数给付。在此之前，请乡亲们到安全的地方静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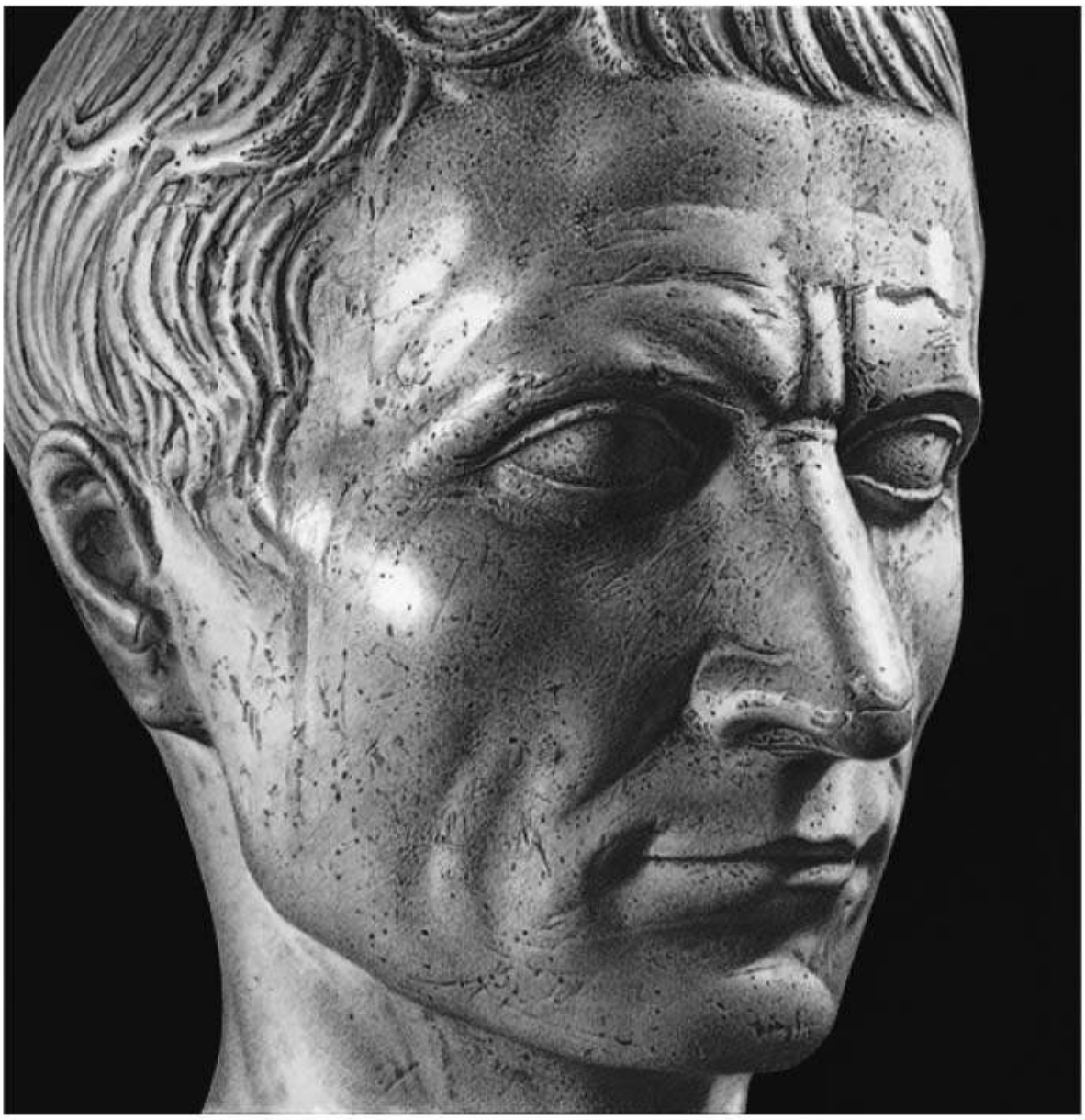
恺撒的这一声"公民们"，在以精锐自居的第十军团兵们听来，无异于晴空霹雳。这下他们真是成为了退伍士兵，成为了和恺撒无情无缘的普通老百姓。多少年来，一直被恺撒热切对待的"战

友们”，现如今却成了“公民们”。这种被恺撒当成陌生人的感觉，让第十军团的士兵们深受打击，再没心情要求罢战、要求加军饷。士兵们一边流泪一边高喊道：

“我们要重回军队！”

“我们要追随恺撒继续战斗！”

不过对于这一切，恺撒不再应答。曾经意气风发的第十军团此刻显得无比消沉。在随后北非战役的备战过程中，恺撒下令麾下军队在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集合，却唯独没有通知第十军团。被冷落的第十军团像只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默默跟在前往西西里岛集结的大部队后面。等他们再度接到恺撒的参战命令时，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这一次恺撒又赢了，既没有发奖金也没有提高薪水就收拾了第十军团，而且最后还让他们乖乖地主动要求作战。后来有位学者这么评价：



尤里乌斯· 恺撒

“恺撒简直是个演技一流的幽默剧大师。”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在介绍这一幕时，异口同声地称赞恺撒“仅出一言，便已扭转乾坤”。

这一幕里的恺撒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语言才能，正如他所说：“文章好坏，取决于言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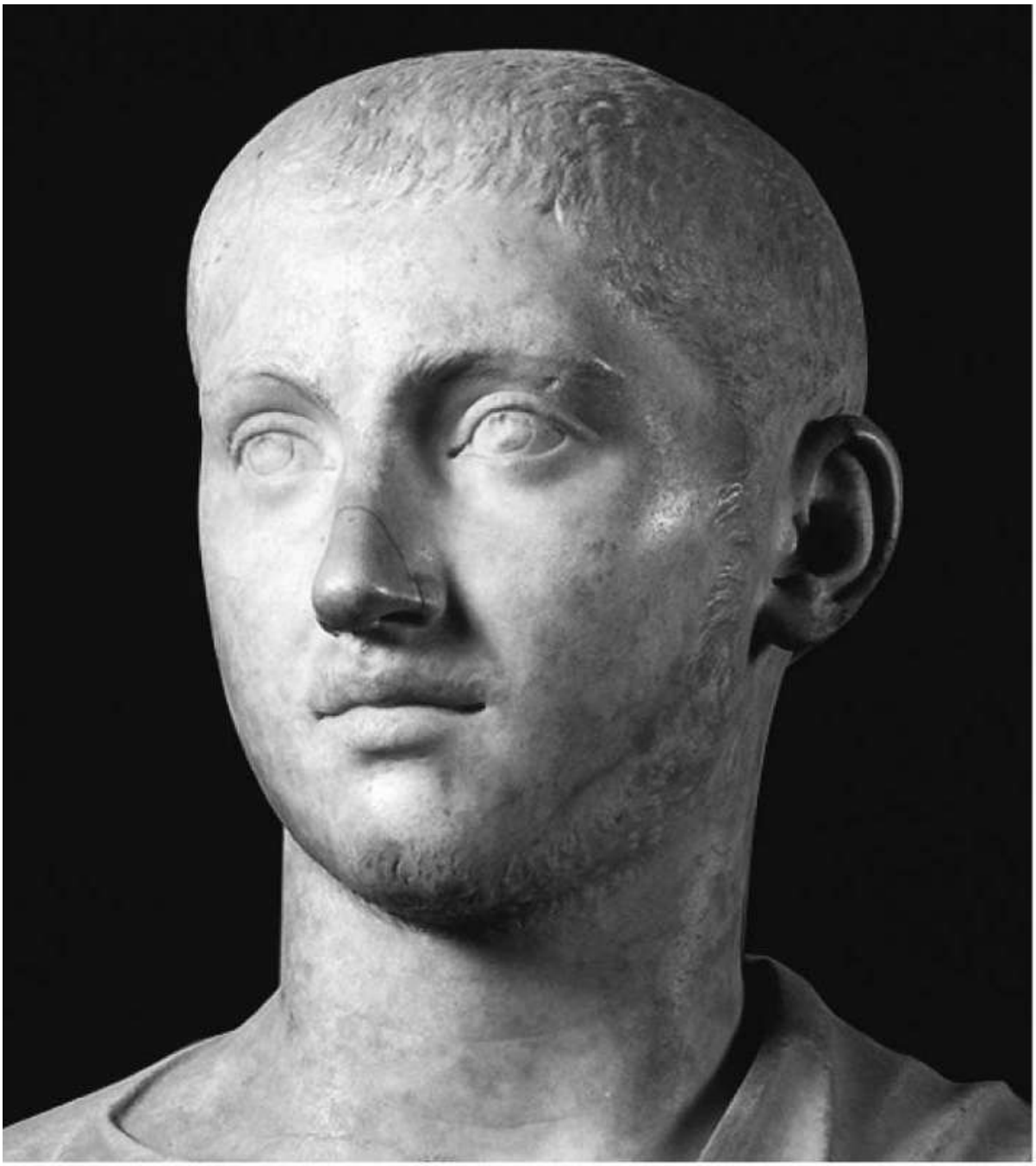
公元232年的小故事

当皇帝亚历山大来到安条克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是队伍散乱、衣衫不整而且还有很多缺席者的军团。经询问，那些缺席者基本都没有回到位于达芙妮的屯驻地，而是在安条克的公共浴场、竞技场以及妓院中逍遥自在。甚至在明知皇帝驾到的情况下，仍然流连在那些地方以至于错过了集合时间。

愤怒的亚历山大下令将所有缺席的士兵都抓起来扔进监狱。这一命令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执行。

但是，当其他士兵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表示对同伴遭到处罚的抗议，将皇帝居住的行省总督官邸围了个水泄不通。当然，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武器。接到报告的亚历山大命令将被逮捕的士兵用铁链锁着带到官邸前的广场，并且亲自来到总督官邸的阳台之上。前来抗议的士兵在阳台下方围成一个半圆形，虽然看到皇帝出现而停止了愤怒的呐喊，但周围紧张的气氛丝毫也没有减退。皇帝的声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响了起来：

> 战友们，如果你们前来抗议，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同伴处罚过轻，那么说明我们的祖先所定下的军规还没有被忘记，我们的罗马帝国还依然拥有希望。但是，如果你们的抗议是认为我对你们的同伴处罚过重，那么罗马帝国的未来就非常令人担心了。也许在先帝（暗指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违反军规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在我的统治下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种过度的散漫，与肩负着帝国防卫任务的士兵是完全不相符的。



亚历山大· 塞维鲁

肩负着守卫帝国重要任务的士兵，绝对不能像普通市民那样贪图享乐。这一点对于身为诸位最高司令官的我，以及直接指挥诸位的将官们也是同样的。连我都有这样的觉悟，难道诸位还坚持认为违反军规的人不应该接受处罚吗？况且我并没有对他们处以死刑，仅仅只是鞭打而已，难道这样的惩罚也过于严厉了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士兵们，听到这里忽然爆发出愤怒的抗议。24岁的亚历山大为了压过士兵们的怒吼，进一步提高了声音说道：

> 为什么你们的情绪如此激动？与其将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不如将其留给你们战场上的敌人。日耳曼和波斯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而我则是发给你们军饷、保证你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分发给你们战利品与土地的皇帝。快停下你们威胁的怒吼吧。
>
> 虽然你们的怒火应该留在战场之上，但是恐怕无法实现了。因为你们现在的行为不但与军人的身份不符，甚至违反了罗马公民所应该遵守的法律，我只好命你们退伍了。

士兵们听到这段话，认为皇帝搬出退伍当武器，情绪顿时更加激动起来，不但没有停止愤怒的呐喊，甚至还将手中的武器指向皇帝。亚历山大再次大声说道：

>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如果你们的身上还残留一丁点战士的灵魂，就应该将你们的右手指向敌人。
>
> 你们的威胁对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算你们现在杀了我，我也是身为一个男人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你们，则将遭到元老院和罗马全体公民的唾弃和报复。

士兵们的愤怒依然没有消减，24岁的皇帝高声说道：

> 公民们，放下武器，马上离开！

士兵们终于安静下来。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被称为公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恨之情，甚至为了证明自己从“士兵”变成“公民”，不仅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还脱掉了身上的军装，随后所有人都从广场上散去。不

过，他们并没有回到达芙妮的宿营地，而是直接在安条克的众多旅馆中住了下来。

放下武器离开，也就意味着军团的解散。直到一个月之后这些士兵才重新回到位于达芙妮的驻地，恢复军团的编制。关于双方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妥协与让步，以及这场闹剧对士兵的情绪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煽动抗议集会的几个人被处以死刑，以及这些士兵全都参加了第二年，即公元233年爆发的波斯战争。

这两个小故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虽然当时的恺撒已经53岁，而皇帝亚历山大只有24岁，两人之间的年纪差就像父子一样悬殊，但是这也并不能被看做是后者失败的借口。毕竟亚历山大大帝率领数万大军进行东征的时候，也只不过20多岁而已。

比年纪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洞察人类心理的能力。“公民”这个词，只有对那些习惯了“战友”称呼的人才有作用。恺撒与第十军团的士兵们，自从高卢战役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的内战，并肩战斗长达13年之久，可以说是相互间有着深厚感情的“战友”。即便在那个小故事发生的时期，他们也已经与恺撒在一起共同度过了10年的艰苦岁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在明知触犯国法的前提下，依然义无反顾地跟随恺撒越过了卢比孔河。就是这样一支跟随恺撒多年的军队，竟然被曾经的统帅称为“公民”，并且像对待普通公民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会受到非常强烈的打击。恺撒正是看准了他们的这一心理，才会故意做出那样的表现。

而皇帝亚历山大与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兵之间的关系却正好相反。这些士兵之前甚至连这位最高司令官的样子都没见过。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亚历山大就好像是突然空降到前线士兵面前的最高司令官一样。而且这位最高司令官面对即将开始的波斯战争，不但没有对将士们进行任何的鼓励和奖赏，反倒还将很多人逮捕入狱。虽然“道理”在皇帝

这边，毕竟无视长官的集合命令确实应该遭受惩罚，但是有“道理”不见得就一定要这么做。正所谓匹夫不可夺志，对于前线作战的士兵们来说更是如此。

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当时并没有常驻基地。一般来说罗马军团的常驻基地，除了兵营以外，浴场、剧院以及竞技场等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只要在军团基地内部就可以满足士兵们一定程度上的放松需求，这也是为了使士兵们不至于频繁出入附近城镇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屯驻在达芙妮临时基地的士兵们并没有这样的休闲环境。所以前往10公里之外的安条克进行放松，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不过即便如此，他们放松的次数也确实有些过于频繁。

皇帝亚历山大在叱责这些士兵的时候，以“战友们”为开头。因为同伴受到严厉的处罚而前来抗议的士兵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感到非常刺耳吧。毕竟在这位皇帝统治的10年里，都没有为他们安排一个正式的军团基地。这样的家伙在见面的第一天就大言不惭地称呼大家为战友，士兵们肯定不会感到满意。身为一位领导者需要具备非常强大的说服力，措辞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而亚历山大的失误之处正在于他的措辞。

虽然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但是在每次重复的过程中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尽相同。为了掌握这些心理，敏锐的洞察力和换位思考的想象力缺一不可。否则即便是历史上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导致失败。皇帝亚历山大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一个问题是战术问题。投机取巧的战术必须在一瞬间解决战斗。对于那些长篇大论搞不定的问题，在进行投机取巧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浪费时间。亚历山大的演讲就显得过于冗长了，而且这件事在当场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直到一个月后士兵们的不满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即便骚乱平息了下来，皇帝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解决问题失败的例子。

第一战

罗马帝国与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冲突，在公元233年的春天正式打响。罗马与帕提亚曾经交战过无数次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今换个对象，又成了战场。因为两国军队全都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亲自率领，所以双方应该都是大军。据说罗马方面有六七万人，波斯方面则超过10万人，但是因为并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所以具体数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波斯萨珊王朝建国7年才出动了10万军队，恐怕是其身后的国土过于广阔的缘故吧。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试图将西方势力赶回地中海沿岸，重铸波斯民族的辉煌。

发生在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对于罗马方面来说本是一场防卫战争，但是罗马帝国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战略，将全军分成三路，分别是从幼发拉底河上游进攻的左翼、从叙利亚沙漠东部越过幼发拉底河中游进攻的主力部队以及从西南方向朝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动攻势的右翼。这种三方同时夹击的战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想充分发挥三军协同作战的效力，需要整齐划一的战术体系。而根据不同的战况对全军进行及时的调整，则是全军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的工作。

罗马帝国因为将整个地中海（Mediterraneus）区域全都纳入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所以拥有将其称为“内海”（mare internum）的资格。而将罗马帝国赶回西方，重新将罗马人的内海变成地中海的，就是波斯萨珊王朝。曾经紧紧围绕着亚美尼亚王国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争夺，随着帕提亚王国的灭亡成为了过去，从此以后罗马帝国在东方最大的敌人变成了波斯萨珊王朝。但是双方之间在公元233年展开的这第一场战争，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波斯方面没有留下记录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专制君主国家一般来说只会记录那些取得胜利的战争。而罗马方面也仅仅留下少量记录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至少皇帝亚历山大就没有认识到，如果他认识到的话，断然不会以那样的形式结束这场战争。

于是，关于公元233年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最初的战争，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只有如下几点：

一、两军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到最后也没有分出胜负，双方都退回到各自的出发地停止战斗。没有媾和，也没有签署任何停战协议。

二、罗马方面并没有公布自己详细的损失情况，从总体上来看，恐怕至少损失了1000人到2000人，相当于一个大队规模的部队。

三、即便如此，罗马帝国还是将15年前马克里努斯割让给帕提亚王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今叙利亚境内，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重新夺了回来。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再次回到自己原来的常驻基地。

四、因为罗马方面公布了战争结果，那么就说明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处于优势地位。既然如此，他们应该趁此机会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部地区，波斯萨珊王朝的主要都市大多集中于此。因为占领最接近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两条大河的地区，等待波斯萨珊王朝攻回来，才是对罗马帝国来说最完美的选择。战争在夏初的时候便宣告结束，由此可见罗马人拥有足够继续进攻的时间。但是皇帝亚历山大以越冬为由作出撤军的决定。如果他打算明年春天继续战斗的话，就应该像卡拉卡拉那样将军队驻扎在前线附近，但是他只将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其他军队则全部撤回幼发拉底河以西。他自己也为了举行凯旋仪式而回到首都罗马。同年9月25日，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提交了关于这次战争的报告。考虑到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罗马的距离，可以认为是西方主动停止了这场战争。

根据《皇帝传》的记载，在9月25日这一天，25岁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面对挤满了整个会场的元老院议员，作了如下的演讲：

诸位元老院议员，我们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想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作说明，只要列举几个事例，你们立刻便会知道。

冲在敌阵最前方的是700头大象。为了方便作战，这些大象的背上都用皮带固定着高高的塔楼，上面站着许多弓箭手，一边突击一边射箭。我们的士兵毫不畏惧，采取积极果敢的攻势，成功击杀了200头大象，并且捕获了30头，其中的18头被我们带了回来。

敌人在象群身后，还投入了1800辆战车。这些战车都是东方式的设计，在战车的四个轮子外侧都固定有镰刀和利刃。我们通过击杀拉车的战马，成功地使其中的200辆战车失去战斗力。虽然这200辆战车我们也打算作为战利品带回来，但是因为很多已经严重破损，剩下那些粗制滥造的，没有带回来的价值，所以就扔在战场上了。

波斯军队大概有12万人，我们成功地击败了他们作为主要战斗力的1万名重装骑兵。其余的波斯步兵大多被我们当场歼灭或者俘虏，因为俘虏数量太多，除了分给士兵们做奴隶以外，剩下的那些人都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了，获得的收入将归于国库。

另外，我们的军队将失去多年的两河流域重新收复，也是值得夸耀的战果。

我们击败了波斯军队，迫使他们的国王阿尔达希尔撤退。虽然这位国王独揽大权于一身，在国内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但是，他手下的臣民们全都看到了他畏惧臣服而不顾一切落荒而逃的狼狈模样。当时他疯狂地抽打着胯下的坐骑，沿着大道一心只想逃回自己的首都泰西封。他们曾经在那条路上将我们的军旗作为战利品拖曳而行，带回波斯（暗指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军队全军覆没）。而今天，我们却将波斯的军旗拖回了罗马。

诸位元老院议员，这就是我们军队的战绩。其余的想必不用我再多说。接下来就由诸位来决定，这场胜利有没有感谢神灵的价值，是否应该举办一场能够使神灵满意的凯旋仪式。

元老院议员们纷纷起身向汇报完战况的皇帝恭贺道：

“亚历山大·塞维鲁！愿神灵永远保护你！”

当亚历山大从元老院会场走出来时，聚集在罗马广场上的民众立刻对他发出热情的欢呼：

“期待你带领我们取得对日耳曼人的胜利！”

“只要有你在，不管同多么强大的敌人战斗也会取得胜利！”

“只有胜利者，才能随心所欲地统率军队！”

《皇帝传》中记录皇帝亚历山事迹的主要作者，是生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人，在他创作这部作品之时距离这个小故事的发生已经过去了百余年。每一个记述历史的人都必须尊重史实，这个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他忠实地记录了皇帝亚历山大的波斯战争之后，又添加了如下的感想：

> 虽然这些都是笔者从罗马公文书库中收藏的官方记录和编年史中搜集到的资料，但是也难免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之前就曾经有人认为罗马与波斯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实际上是皇帝亚历山大为了避免最终落败而提前作出的撤退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众多官方以及非官方的资料就可以发现，这只是当时极少数人的意见。就连当时以发表反对派言论著称的艾罗迪亚鲁斯也非常客观地这样写道：

> 跟随皇帝亚历山大参与波斯战争的士兵们，大多死于饥寒交迫和疾病。

艾罗迪亚鲁斯是生于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叙利亚行省的希腊人，从公元192年开始他在首都罗马生活了12年。虽然他前往罗马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在那之后他究竟从事了什么工作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总之，在公元204年的时候他返回了叙利亚，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他出生的故乡安条克定居下来。这个人之所以会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是因为他著述了一部名为《马可· 奥勒留死后的罗马帝国史》的史书，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从公元180年到238年的历史。全书只有8卷，算不上长篇大作，而且内容也因为过于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对人物的深刻描写而使其读起来索然无味，成为很快被后世遗忘的作品。不过因为书中记述的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所以对于现在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即便他生于那个时代并且描述的就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也不见得就完全是事实。有句话叫做眼见为实，人类往往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在公元233年发生的波斯战争中是罗马军队的后方基地。他在安条克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对战争整体的客观认识，不如说是参战士兵们的感受。仅仅通过一场战斗根本无法判断战争胜负的走向，而且明明正值战斗的好时节，皇帝却草草下令撤军，这对于士兵们来说一定非常难以理解，心中也自然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但是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对罗马方面来说即便没有失败，也算不上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大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现场的目击证人，只要从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作出的报告就可以分析出来。

首先，700头大象之中的200头被杀，30头被捕获，那么波斯方面应该还剩下470头。迦太基人与波斯人自古以来使用的战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而波斯人在这场战役中也只不过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而已。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东方”军队常用的战车，1800辆战车损失200辆，只是区区九分之一。

虽然罗马人成功地击败了10万名波斯步兵，并且俘虏了其中绝大部分，但是东方的步兵和罗马的重装步兵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对于罗马人来说，重装步兵是主要战斗力，但是东方的君主制国家的步兵中充斥着大量被强行征用的农民，仅仅作为辅助作战的力量。所以不管击败多少波斯步兵都不会对战斗的结果造成影响。事实上，曾经征服了东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来都没有将这些步兵放在眼里，他身先士卒进行突击的目标，只有敌军的主要战斗力量。

波斯方面的主要战斗力量是骑士和战马都披挂重甲的重装骑兵。因为骑士和战马都需要装备，所以武装一个重装骑兵需要一大笔开销，同时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使骑士在身披重甲的情况下熟练地进行战斗，就算是喜欢在战场上投入大军的东方君主，也无法一下子纠集起几万名重装骑兵。皇帝亚历山大声称其击败了1万名重装骑兵，可以说相当于摧毁了波斯方面几乎一半的重装骑兵。由此可见，发生在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罗马军队彻底摧毁了波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罗马人之所以认为自己取得了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波斯国王也许就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主力部队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才那么仓皇地逃回首都去了吧。

罗马军队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战役之中大获全胜，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军团兵还依然发挥着主要战斗力的功能，而且能让战局发展到使重装步兵与重装骑兵冲突，让双方主要战斗力相互对决。

骑兵，尤其是重装骑兵，要想发挥其令人恐惧的冲击力，必须保持一段相当长的突击距离。如果没有这段加速距离，尽管波斯骑兵的重装备有如中世纪的骑士，那么骑兵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威力，甚至有可能彻底失去攻击力。一旦失去灵活机动的性能，那么骑兵也就失去了作为骑兵的价值。另外，因为重装骑兵身披重甲，一旦陷入步兵的包围之

中，更加难以躲避对方的攻击。

这就是恺撒在公元前48年于法萨卢斯会战中击败庞培的战术。在公元233年与波斯的战斗中，罗马再次将其复制过来，通过将敌人侧翼的骑兵分割包围，使其从友军之中孤立出来，然后趁其移动不便之时将其消灭。重装步兵之所以在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第一次战役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发挥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作战方式。人类在坚持自己习惯之时，往往会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的报告，虽然没有将所有的事实都阐述出来，但是也并没有说谎。

首先，他击退了入侵的波斯军队，完全实现了当初的出兵目标。其次，他还彻底摧毁了敌军的主要战斗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波斯萨珊王朝在此后的20年间都没有能力再向罗马的领地发起进攻。最后，他将沦陷于敌人之手长达15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重新收复回来。这样罗马帝国今后就可以在西北与西侧两个方向同时对波斯萨珊王朝进行牵制。

总之，皇帝亚历山大在波斯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他的不幸之处在于，大家高估了他的胜利。从元老院到普通公民，全都认为他拥有率领军队战胜波斯人和日耳曼人的能力，这给25岁的皇帝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结果，公元234年，即波斯战争刚刚结束一年，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一致同意将亚历山大·塞维鲁送上莱茵河前线。而正是这个决定，夺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性命。

日耳曼对策

很多人认为蛮族的罗马化是造成罗马帝国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所谓蛮族的罗马化，是指生活在罗马帝国防线外侧的蛮族，经常与罗马境内的居民进行方方面面的接触。这是由于当时的罗

马属于高度文明的国家，拥有先进文化的同时物产也十分丰富，境内的市场上可以买到种类繁多的商品，吸引境外的蛮族们频繁前来进行贸易活动。对于此种现象，历代的罗马皇帝都采取鼓励的态度，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罗马与蛮族之间的矛盾。罗马的统治者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些罗马化的蛮族是否团结起来采取统一的行动。罗马人将这些蛮族称为“近蛮族”，虽然时常提防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并不将他们看做是真正的敌人。因为这些“近蛮族”与罗马帝国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

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1 · 结局的开始》所描述的那样，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的时代罗马所面对的“时代变化”，是指一直以来被他们称为“蛮族”的外国人，在那个时代环境下，逐渐分成“远蛮族”和“近蛮族”两种类型。与居住在罗马防线附近的“近蛮族”相比，“远蛮族”指的是居住在现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德国东北部、波兰以及俄罗斯的民族和部落。这些民族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就好像暴涨的河水往低处流一样，开始向南部以及西南部发展扩张。当然，他们不会去那些无人的地区。既然是无人区，肯定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物产丰富的地方早就有人居住在那里了。而且如果能够开垦无人区并将其变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还叫什么蛮族。

既然叫做蛮族，那一定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还会选择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所以蛮族的扩张方式无非就是将原先居住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打败，或者将其作为奴隶，或者使其臣服于自己。而从2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帝国的防线之外就逐渐地发生着这种变化。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之所以一直因为北方蛮族的问题而疲于奔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刚好在那个时期显现出来。被“远蛮族”打败吞并的“近蛮族”不断地入侵罗马领地，其中比较弱小的部族甚至向罗马帝国提出移居的请求。虽然罗马的历史就是不断抗击蛮族入侵的历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因为皇帝卡拉卡拉采取的积极攻势，罗马帝国北部的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才得以维持了15年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这并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段时间中，防线之外的“近蛮族”正遭到“远蛮族”的不断进攻。

蛮族的入侵之所以在15年后才卷土重来，也是因为这时候“远蛮族”已经将“近蛮族”吞并，开始觊觎起罗马帝国的领地来。想要一夜致富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发动侵略战争，而对蛮族来说，罗马帝国无疑是最值得侵略的地方。

基于上述原因，罗马帝国到了公元3世纪同样要为入侵的蛮族伤脑筋。而有趣的是，3世纪的罗马人已经不再称呼“近蛮族”和“远蛮族”，重新被统一为马可· 奥勒留时代前的“蛮族”这个称呼。可是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不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前在某些方面罗马化、与罗马人共存的“蛮族”。“近蛮族”已经完全被与罗马从未接触因此没有罗马化的“远蛮族”所取代，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北部地区也都成为了这些人的地盘。由此可见，导致罗马在这一时期急速衰落的，并非罗马化的蛮族，而恰恰是这些没有被罗马化的蛮族。25岁的皇帝亚历山大所不得不面对的，也是这些更加凶狠残暴的蛮族中的蛮族。

当皇帝出征的时候，元老院议员和公民代表们从首都罗马送行了长达100罗马里，折合成现代的公里，相当于150多公里。由此可见，举国上下都对皇帝亚历山大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位年轻的皇帝必须取得辉煌的胜利。

莱茵河畔

现在德国的美因茨，在罗马时期被称为莫根提亚肯，原本是一个凯尔特人的聚居区。因为位于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河口，罗马人发现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在这里建设了军团基地，从此使原本的小村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城镇。现在美因茨附近仍然存留有大量的罗马遗迹，

证明这里从很早以前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地。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开始的150年间，美因茨一直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常驻有2个军团。但是因为2世纪中期多瑙河防线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美因茨的常驻军团数量减少为1个，不过如果战况紧急，立刻会从莱茵河下游的波恩以及上游的斯特拉斯堡调遣军团前来支援。顺便说一句，在罗马灭亡1000多年以后，发明了活字印刷的谷登堡就出生于这里。

美因茨作为罗马帝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基地，和科隆一样都是沿河而建的要塞，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还会在河对面修建一座稍小一些的防御堡垒用于侦察和监视。这座建在河对面的小要塞通过一架浮桥与正式的要塞相连，因为这架浮桥在敌人来袭的时候必须及时切断，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将小船并排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组成临时的通道。只有少量的步兵和骑兵可以在上面通行，只有罗马军方在大军渡河时，才会像恺撒那样修筑具有规模的木桥，或平行铺设多道舟桥。虽没有残存的史料记录，不过可以肯定，亚历山大到达美因茨时，曾下令修筑上述两种桥梁之一。莱茵河防线迎来皇帝的亲临，士兵们重新沸腾起久违了的战争气氛。而罗马军队之所以在莱茵河上架设能供大军通过的桥梁，大概也是为了渡过莱茵河直接向敌人的领地发起进攻。

常驻于美因茨的第二十二初创军团与从波恩赶来的第一密涅瓦军团以及从斯特拉斯堡赶来的第八奥古斯都军团齐聚在银鹫旗下，就连当时还只是一座要塞的法兰克福也挤满了罗马军团的士兵。甚至唯一在意大利本土拥有军团基地的第二帕提亚军团都接到命令正在北上赶来的途中。从总督到军团长再到每一位士兵，所有人都因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投入而对这次全面开战深信不疑。不过身为他们总司令的皇帝亚历山大心中却开始产生另外一种想法。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或许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是对于这位年仅26岁尚未经历过人生真正苦难的皇帝来说，所谓的不择手段，只不过是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选择，但是他没搞清楚

如何选择有效达成目的的方法。

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每当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说好听点是慎重，说难听点就是优柔寡断和胆小怕事。波斯战争的时候就是如此，当初就算追着逃跑的波斯国王一直逼近他们的首都泰西封实际上也并非难事，可是他就是无法下定决心。结果在一年后的日耳曼战争中，他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集结在美因茨前线基地的罗马军队，在公元234年冬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战斗准备。剩下的只需在罗马境内等待北欧严寒的冬天过去，来年春天便越过莱茵河向日耳曼发动总攻。但是，皇帝亚历山大在这个冬天和日耳曼人开始了交涉。目的当然是使日耳曼各部族停止对罗马帝国境内的入侵。也许皇帝认为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比动用武力更加稳妥，于是他提出向日耳曼人提供经济援助，希望能够以此来解决日耳曼问题。

这个方法对于罗马的皇帝们来说并不算什么新手段。从五贤帝时代开始，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惯用伎俩。但是，在那个时代罗马人所面对的是能够理解罗马化优点的“近蛮族”。

罗马方面的经济援助分为现金援助、技术援助以及市场开放三种。但是罗马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将“近蛮族”的生活基础从狩猎转变为农耕。一旦社会进入农耕阶段，就需要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不再迁徙。与不断移动的敌人相比，固定的敌人更容易应对。另外，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类也会趋向于更加保守。当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将当地的居民从狩猎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物质生活不断富裕起来的高卢人，逐渐失去了进攻意大利的热情和理由，所以说高卢是罗马化的典型代表就是这个原因。与狩猎相比，农耕更能够稳定而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个道理即便在古代也是一样。

与恺撒时代的高速成长不同，罗马帝国在五贤帝的统治下迎来了鼎

盛时期，而处于鼎盛时期的帝国已经不再将扩张领土作为其基本政略。除了图拉真征服达契亚人（现在的罗马尼亚）之外，帝国一直处于稳定的发展之中。但是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居住在防线以北的蛮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于是罗马的皇帝们决定对蛮族实施“经济援助”，真正的目的却是希望让这些敌人也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以此巩固罗马帝国的防线。事实证明这一举措非常成功，“近蛮族”的罗马化成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举措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的和平政策必然会被对方所接受。同样对于接受罗马帝国“经济援助”的蛮族们来说，也深知这绝对不是罗马帝国示弱的表现。

亚历山大· 塞维鲁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再次采取了同样的举措。大概一向喜好读书的他是在从前的文书记录中看到了这些记载，于是也想效仿吧。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与100年前那个深刻认识到罗马帝国的防线如铜墙铁壁般不可侵犯的蛮族相比，现在的蛮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3世纪的蛮族没有多少与罗马帝国接触的经验，也对成为农耕民族没有多大的热情，是一群只想着掠夺的日耳曼人。所以他们认为罗马方面提出的经济援助，只不过是为了阻止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境内而作出的让步。与只懂得参考文书记录的亚历山大不同，驻扎在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们拥有丰富的对敌经验，他们立刻意识到现在的蛮族已经和从前不同。向他们提供援助，无异于帮助其加快吞并其他弱小部族的脚步。就在亚历山大与日耳曼人进行交涉的时候，集结在美因茨一带的军团兵开始对一心只想媾和的皇帝产生不信任感。并非有人煽动这种情绪，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开始看不起皇帝的所作所为，这种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最终，驻守在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士兵发生了暴动。

公元235年3月，驻跸在美因茨附近村落之中的皇帝亚历山大，被冲进他帐篷的士兵杀害。据说士兵在杀害他的同时，口中还大喊着：“没有断奶的家伙，去死吧！”本次战役与皇帝同行的皇帝母亲尤利亚· 梅亚也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虽然亚历山大· 塞维鲁与他的母亲都死于叛

乱，但是他们的遗体还是被送回首都罗马，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之后，被埋在历代皇帝长眠的哈德良陵园之中。这位还不到27岁便英年早逝的皇帝，共在位13年。

这次导致皇帝被害的叛乱并非一场计划严密的阴谋，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士兵参与其中。但是因为皇帝亚历山大的被害，驻扎在美因茨及其附近的罗马军团还是陷入混乱之中。士兵们立刻与在科隆指导新兵的马克西米努斯将军取得联系，并且一致推举他就任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叫做马克西米努斯的人，与谋杀皇帝亚历山大之间有任何的联系。

接下来的50年，在罗马历史上被称为军人皇帝时代。因为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各个军团完全不顾元老院的意见，纷纷擅自推举自己的司令官做皇帝。而罗马帝国的衰退，与这些军人皇帝的层出不穷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后世之所以对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统治予以高度评价，也是因为他并非一名军人皇帝。

诚然，由此开始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真正地步入了迷途之中，但是责任不能单纯地推到军人出身的皇帝上。不管是卡拉卡拉还是亚历山大· 塞维鲁，都不是军人出身，但正是他们种下了导致罗马帝国衰退的种子。我之所以在前文之中如此详细地描写了卡拉卡拉与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事迹，就是为了向大家表明，3世纪军人皇帝层出不穷的原因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世之所以对军人皇帝提出如此多的质疑，实际上是用现代文明统治的观念批评古人，简直像是一种过敏反应。

当然，当时的军人皇帝是应时代需求而出现的，但也确实带有一定的缺点，这也成为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退的重要原因。不过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用现代的观念去评价古人，是对历史的误读。在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不应该用先入为主的观点草率地否定任何事。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官”指的是元老院出身的人，而“武将”则是指那

些军团中历练出来的人。

当然罗马帝国历史上也不乏文武双全的人物。尤里乌斯· 恺撒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直到帝国中期，虽然没有恺撒那么强大的实力，但是也有不少深知军事的重要性并且精于此道的皇帝。而3世纪的罗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类型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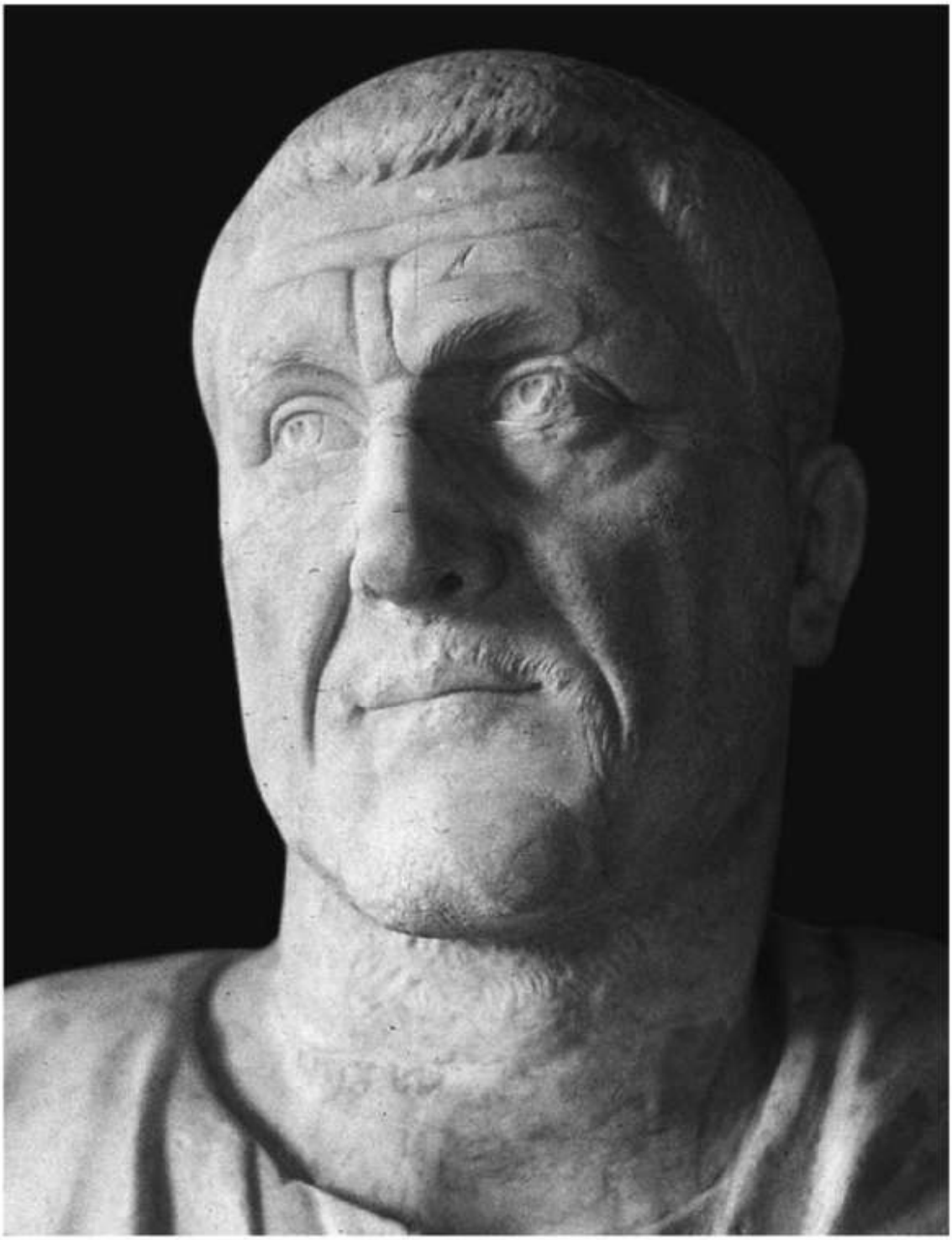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公元235—260年

皇帝马克西米努斯· 色雷库斯（公元235—238年在位）

虽然他希望后世能够将他看做尤里乌斯· 恺撒和马可· 奥勒留这两位伟大皇帝的传人，但这位全名盖乌斯· 尤里乌斯· 维鲁斯· 马克西米努斯的人并没有那么幸运。在罗马史上，他最广为人知的称号是“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Tracus）。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出身于古罗马的行省色雷斯。

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早在100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并不少见。比如同为西班牙出身的图拉真和哈德良，但是并没有人将他们称为“西班牙人图拉真”和“西班牙人哈德良”。这是因为在距离当时300多年前于意大利出身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全都驻扎在一个统称“科洛尼亚”的殖民都市之中，而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人，就出生于其中一个叫做意大利卡的地方，早在他们上台之前，就已经在帝国的元老院之中占据了席位，而且他们还属于行省的精英阶级。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当地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并且作为罗马的皇帝统治整个帝国。

马克西米努斯虽然也和这两位前辈一样同为行省出身，但是他非但不是罗马血统，甚至连行省的精英阶级都算不上。不仅如此，他和首都的统治阶级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父亲只是一个羊倌。



马克西米努斯 • 色雷库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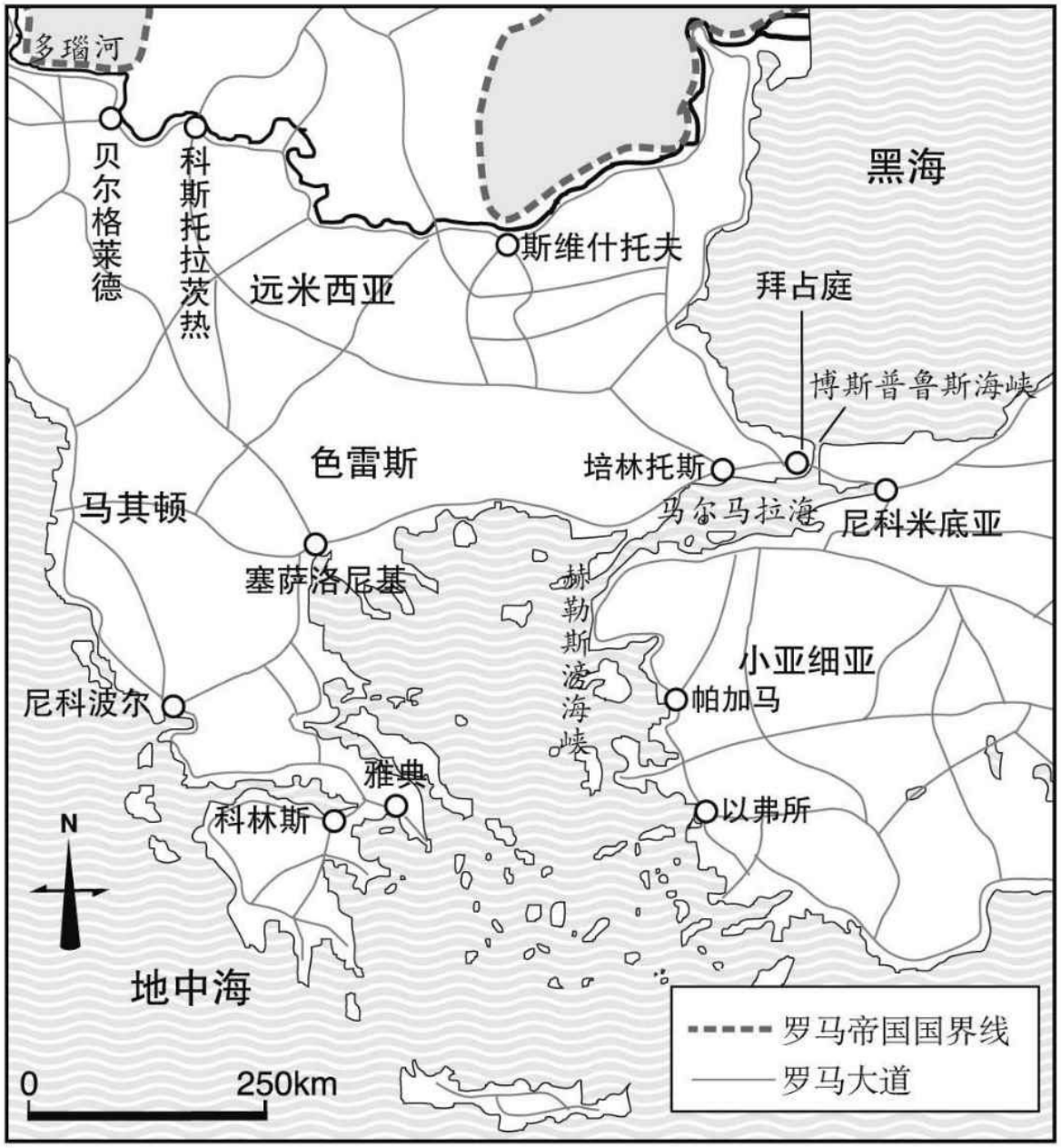
色雷斯位于多瑙河下游南岸远米西亚行省（今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

地区）南部，是从多瑙河防线通往小亚细亚的交通要道，西邻马其顿。除了毗邻地中海的南部地区之外，整体地形以山地为主，自古以来便以出产良马闻名。亚历山大大帝被认为是最早活用骑兵的将军，在他的率领下远征东方的，就是色雷斯的骑兵。

虽然色雷斯很多人都是羊倌，但并不意味着羊倌只养羊，还养牛和马，特别是马的饲养非常盛行。即便在地中海地区改由罗马人统治，对色雷斯出产的骏马的需求也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少年时代的马克西米努斯一直跟随父亲放羊，但是在那时候的色雷斯，羊倌并非拿着手杖，带着牧羊犬，能够边走边唱的悠闲工作，而是像牛仔一样，需要随身带着武器骑在马上随时准备防范强盗的袭击。虽然从小便帮助父亲放羊，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只想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他的愿望是加入罗马军团。因为色雷斯没有军团基地，所以他就打算前往米西亚。在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前，行省居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而没有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连成为军团兵的资格都没有。

走投无路的马克西米努斯只好选择加入允许接纳行省居民的辅助部队。据说他当时只有16岁，而辅助部队要求年满17周岁才拥有入队资格，但是因为他健硕的体格给负责选拔人员的队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才破格让他进入队伍。罗马军中的通用语是拉丁语，而他却因为浓重的色雷斯口音给人留下一种毫无教养并且不懂礼貌的印象，好在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使得自己重新取得了周围人的信任。他在加入军队不久，就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后来的皇帝塞维鲁，因此他的军旅生涯可以说非常愉快。

公元189年，当时还不是皇帝的塞维鲁的小儿子盖塔刚刚出生。心情大好的塞维鲁在视察军队的时候便组织士兵们进行搏击和体育比赛。虽然马克西米努斯干劲十足地跃跃欲试，但因为他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辅助兵，根本没有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只能专心于竞技之中。但是很快他便击败了自己所有的对手，脱颖而出。



色雷斯及其周边

于是马克西米努斯来到塞维鲁的近前，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拉丁语向长官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因为新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希望能够和老兵们过过招。

塞维鲁虽然不愿扫他的兴，但是也没办法答应他这个请求。因为在罗马军团当中，不管是比赛还是演习，都绝对不允许老兵与新兵交手。罗马军队素以训练严格著称，甚至可以说演习与实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会流血牺牲。在有些训练中，士兵们都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为了防止对老兵心怀怨恨的新兵趁此机会杀伤对方，所以罗马的军规规定，不管是演习还是比赛，都只能够在同级的士兵之间进行。

但是塞维鲁知道如果不违反军规的话，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年轻人的愿望。于是他允许这名色雷斯的年轻人可以和军团的酒保，也就是负责保管葡萄酒的士兵们进行比赛。虽然只是酒保，但毕竟也是在前线基地服役的士兵，所以对武器的使用都十分精通。

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将这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打败了，到最后总共击败了16个人，之后再也没有人敢上来挑战。这位色雷斯的新兵将塞维鲁为辅助兵准备的奖赏全都揽入自己的怀中，包括银质的护腕和斗篷的纽扣，以及带银质扣环的腰带等。

连续击败16名对手取得胜利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这位色雷斯的年轻人顿时成为了军营中的名人。而且他不仅体格健壮，性格也非常忠厚朴实，因此深得大家的喜爱。

两天后，在塞维鲁骑马巡视军团基地的时候，发现马克西米努斯在辅助部队的营帐外与其他士兵发生了争执。于是塞维鲁命令随行的大队长让那个野蛮的年轻人明白罗马军队的规矩。

关于大队长究竟对其作出了怎样的训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这名色雷斯的年轻人被带到塞维鲁面前的时候，认错的态度显然并不诚恳。塞维鲁对此并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只是对他说道：“接下来我要策马前行了，你能跟上来吗？”说完，塞维鲁真的开始策马向前方疾驰。

因为这里是军团的常驻基地，所以到处都是用来进行骑兵训练的马场。塞维鲁沿着马场飞速地奔驰了好几圈，但是始终无法甩掉跟在身后奔跑的少年。于是塞维鲁停下来对这个新兵说道：

“色雷斯人，在跑了这么多圈之后你还能进行格斗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摔跤。）”

当然，大气都没喘一下的年轻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是没有武器的较量，所以塞维鲁为这个年轻人挑选的对手都是罗马军队的主力军团兵。结果这名16岁的年轻人仍旧连续击败了7名对手。塞维鲁破格提拔这名新兵为自己帐篷的警卫兵，色雷斯羊倌的儿子从此走上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之路。

公元211年，皇帝塞维鲁在远征途中病死于不列颠的约克，罗马帝国进入其子卡拉卡拉统治时期。这一年马克西米努斯38岁，并且已经升任为百人队队长，手下统率着80名士兵，由此推断他应该在此之前就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而不是在212年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之后才得到的罗马公民资格。在卡拉卡拉统治的6年时间里，正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候，因为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深受士兵们的爱戴，他的百人队队长的地位也稳如泰山。即便他出身低微，只是一个色雷斯羊倌的儿子，但是有些权力对他来说也是唾手可得。不过马克西米努斯对塞维鲁一家的忠心却丝毫不为这些外界的诱惑所动。

公元217年，卡拉卡拉被害，皇帝的近卫军团长官马克里努斯继位。虽然士兵们也猜测马克里努斯就是幕后策划杀害卡拉卡拉的凶手，但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正在与帕提亚王国交战，所以他们只能在新皇帝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只有马克西米努斯例外。他以马克里努斯杀害了自己恩人的儿子为由，拒绝向新皇帝效忠，并且返回了故乡色雷斯。他的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军纪，显然难逃军法的处置，但是马克里努斯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的惩罚。因为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中的声望极高，对军队的统率小心谨慎的新皇帝大概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害怕在军中造成不好的

影响吧。

马克西米努斯回到色雷斯之后，用兵役期间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块耕地，开始自己的农耕生活。他的母亲据说出身于哥特人的分支阿拉尼族，因此从事农牧业的马克西米努斯便将收获的农作物通过这层关系卖给哥特人。哥特人是居住在帝国北方防线多瑙河对岸的民族，他们对待马克西米努斯就像同胞一样，由此可见，多瑙河沿岸的蛮族与罗马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实际上非常顺畅。不过马克西米努斯的农耕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便因为马克里努斯的被杀而结束了。卡拉卡拉的外甥埃拉伽巴路斯继承皇位。

45岁的“色雷斯人”在新皇帝前往首都罗马的途中请求拜见，并且对新皇帝提出希望自己能够像塞维鲁时代一样重新回到皇帝身边负责警卫工作。因为他一直认为如果自己不去担任百人队队长，而能够一直留在皇帝身边的话，那么卡拉卡拉或许就不会被杀。但是新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却这样说道：

> 听说你以前可以跟10个、20个，甚至30个士兵打斗，都能够大气不喘。那么，要是和一个女人连续玩上30次，你行吗？

马克西米努斯难掩失望的神情，一言不发地从皇帝面前退了出去。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跟在这样的皇帝身边担任护卫，甚至产生了回到色雷斯去继续种地的打算。不过，皇帝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却对埃拉伽巴路斯提出了忠告。因为马克西米努斯是在罗马军团中非常有名的人物，就这样将他置之不理并非上策。新皇帝接受了外祖母的忠告，任命马克西米努斯担任大队长的职务。于是马克西米努斯将自己的耕地交给别人，带领着1000多名部下以大队长的身份重回前线战场。不过在这名色雷斯人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升迁大队长之后的喜悦和感恩之情。在埃拉伽巴路斯统治的4年间，马克西米努斯一直尽力避免出现在皇帝面前与其见面。一般来说，大队长级别的将官们为了升任军团长或行省总

督，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与皇帝见面的机会，只有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即便如此，马克西米努斯还是得到了升迁的机会，可是他屡次以工作繁忙或者身体不适等理由推脱，绝对不肯前往首都罗马半步。

公元222年，埃拉伽巴路斯也被害身亡，亚历山大· 塞维鲁继位。已经50岁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得知这件事之后立刻起身前往首都罗马。少年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将这位已经拥有大队长资格的色雷斯人任命为新兵训练负责人。

这个安排大概是皇帝身旁第一红人乌尔比安出的主意，不过也算得上是人尽其才。自从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以后，行省居民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加入罗马军团，因为罗马军团的惯例是在驻扎地直接招收兵源，所以在3世纪的罗马军团中就充斥着大量拥有蛮族血统的士兵。因为在国境附近，不管是国境之内还是国境之外，基本都处于民族混居的状态，所以当地的居民也大多都是和蛮族之间的混血。负责训练这些新兵的马克西米努斯本人就拥有哥特人的血统。他高大的身躯和魁梧的体格非常具有北方人的特征，加之被太阳晒过之后会变成红色的皮肤，更证明了他的北方血统。经常被新兵们称为“色雷库斯”（色雷斯人）的马克西米努斯，对他们来说非常具有亲近感。而马克西米努斯自己对于训练新兵这个任务也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十分认真。

罗马军队的新兵训练就相当于现代海军陆战队的入队前训练，但是马克西米努斯的训练虽然严格但并不残酷。不管是每四天进行一次的实战训练，还是每天都会进行的装备检查，马克西米努斯都非常严格，但是这种严格并不是长官对下属的严格，更像是父亲对孩子的管教，整个训练都在这样的气氛之中进行着。当新兵们赤裸上身进行摔跤比赛的时候，马克西米努斯也会同样光着膀子加入进来。虽然他当时已经60岁了，但是仍然能够连续击败7名新兵。他在每次胜利之后大喊“下一个”的声音也丝毫不见苍老。

某天，一位大队长对他说道：

“马克西米努斯，你整天在训练中欺负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算赢了他们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吧。”

马克西米努斯答道：“那我和你比试比试如何？”

大队长欣然应允，随即摆开架势。结果马克西米努斯只是用手向对方的胸口一推，对方便被他重重地推倒在地。紧接着马克西米努斯大声地叫道：“下一个还有谁想挑战，站出来。但是仅限大队长级别！”

由此可见，他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也是理所当然的。对皇帝亚历山大的懦弱感到不满的士兵们，在将其推翻之后第一个就想到了马克西米努斯。当时这个“色雷斯人”已经62岁了，没当过军团长，也没当过行省总督，当然，在元老院中也没有席位。

实力与正统性

面对眼前的既成事实，元老院只能承认他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马克西米努斯虽然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身为罗马帝国权力集团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在背地里称呼他为“半蛮族”。实际上他们心里都非常不愿意这位新皇帝来到首都罗马。

马克西米努斯不是既有的权贵阶层，也不是“新贵”，亦即新的权贵阶层，心中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他下令从官方记录中删去他父亲那一听就知道既非拉丁人，也非希腊人，而是巴尔干半岛贱民的姓名，同时也删去了他母亲那令罗马人更听不习惯的姓名。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就算罗马是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的首都，他也不愿意前往。

虽然他拥有声望和实力，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使其拥有的地位正当化。为了使地位正当化，除了实力之外还需要正统性。世袭制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就是因为在实力不明的情况下，只要拥有正统性就可以使其他人理解和接受。身为叙利亚太阳神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之所以

能够继承皇位，就是因为他是先帝卡拉卡拉的外甥。除了马可· 奥勒留以外的贤帝们，在决定让有能力的人继承皇位之前也要将其收为养子，就是为了使其成为皇帝的“儿子”，从而拥有正统性。

因为罗马是多神教的国家而非一神教，如果是一神教的国家，可以通过神的承认来获得正统性，但是对于多神教的国家来说，只有获得国民的认可才行。即便拥有正统性的人，在成为统治者之后也要证明自己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实力。而通过实力占据了统治者宝座的人，也要时刻证明自己拥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正统性。此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稍有懈怠，就算是先帝的亲儿子也会被杀害。因为皇帝是终生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被杀意味着人民对皇帝的不信任。

“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深知自己既没有功绩也没有正统性，很难将继承皇位这件事正当化。他仅有的功绩，只是在新兵训练上小有成效，却没有抵御外敌的显赫战功。

于是马克西米努斯决定在回到首都之前先给自己积累一些战功。对他来说，这称不上是牺牲。元老院的议员们比日耳曼的蛮族难对付得多。不管前方的战况多么惨烈，只要有支持他的士兵们在身边，他就对自己充满信心。

从皇帝亚历山大被杀之后的公元235年开始，罗马帝国在背水一战的皇帝带领下，与日耳曼民族之间展开了全面的战争。马克西米努斯率军越过莱茵河前进了50公里，直达现在的威斯特法伦，与迎击的日耳曼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随后他又赶走了入侵高卢的蛮族，还一路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了蛮族的大本营，使其不得不从高卢境内彻底撤军。罗马军队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大获全胜，马克西米努斯立刻趁此机会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书：

诸位元老院议员，我很想向你们传达我们罗马士兵们英勇战斗的功绩，但是不知该如何说起。我们越过防线，深入敌境四五十罗

马里（相当于60—75公里），摧毁了沿途所有的日耳曼人村落，掠夺了他们的家畜，杀掉了他们的士兵，俘虏了他们的女人和小孩。最后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并非日耳曼人，而是一大片沼泽。如果能够越过这片沼泽地，那么我们的士兵甚至可以攻陷日耳曼人著名的黑森林。

在这种积极的进攻战术之下，罗马军队从莱茵河畔一直到日耳曼长城都一路高歌猛进，没有打过一场败仗。春风得意的皇帝再次向元老院发出书信：

诸位元老院议员，从我继位至今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是我敢说目前为止的战绩不输于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而且，我还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通过这些胜利，我缴获了无数的战利品，绝对能够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被我们的士兵所俘虏的日耳曼战俘数量，如果全都带回去的话，想必就算是首都罗马也装不下。

在发出了这些战报之后，皇帝向元老院提出在首都中心的回廊上设立一幅描绘罗马军队胜利场面的版画。

听说罗马军队取得了久违的辉煌战果，元老院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但是那些元老院议员们在聆听皇帝报告的时候都是一副苦涩的表情。被他们蔑称为“半蛮族”的家伙竟然取得了如此出人意料的战果，他们当然高兴不起来。但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容忍的是马克西米努斯在报告中暴露出来的低劣的文学素养。身为传统贵族阶级的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自己被这样一个男人统治。

简洁是优点，坦率也不坏，但是既简洁又坦率就会拉低一个人的品位。同样一件事或一句话，有品位的人做出来或说出来就会显得特别有分量，使人更加容易接受。也许马克西米努斯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所以他不喜欢自己的身边出现有教养的人。皇帝身边一般都有秘书

官和负责记录皇帝口述的书记员，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将皇帝亚历山大时期擅长这些工作的官员们全都赶了出去。也许他觉得身边的人只要能够将自己所说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就足够了。但是他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和出口成章的尤里乌斯·恺撒相比还差得很远。

元老院议员们连续听了三年皇帝发来的战报，也就是说，这个“色雷斯人”连续打了三年的胜仗。在继位第三年的公元238年，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将前线大本营迁移到希尔米乌姆。通过积极进攻的战术重新恢复了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防御功能之后，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多瑙河中游。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艾罗迪亚鲁斯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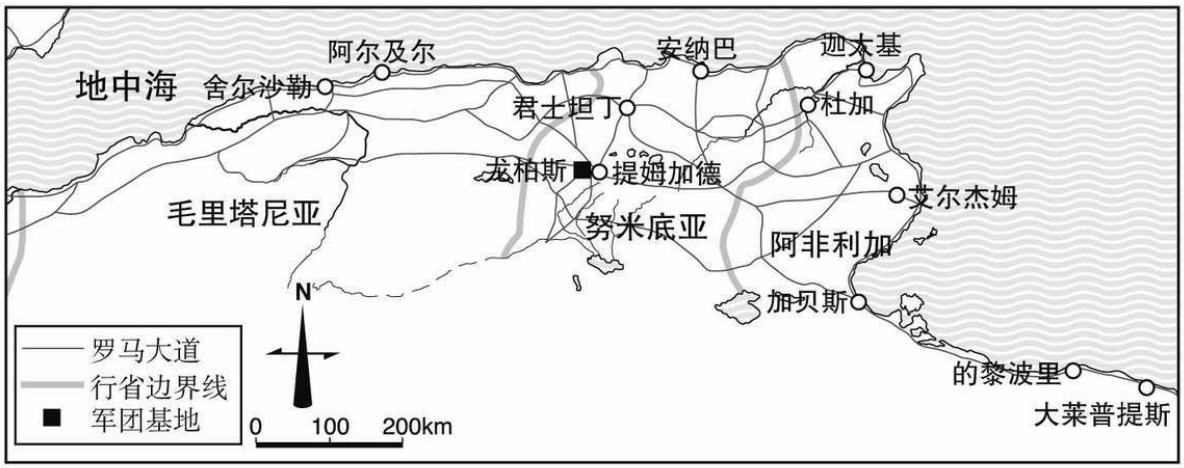
> 如果上天能够多赐给他一些时间的话，那么莱茵河、日耳曼长城以及多瑙河等罗马帝国北方的生命线大概就会平稳下来吧。

罗马人所说的平稳，指的是自己所在的国家罗马处于和平状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pacificatio”。但是罗马人想要享受和平，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需要通过武力征服高卢人，公元2世纪开始需要用武力征服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所谓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只是对罗马人来说的和平。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和平”（Pax）的受益者仍然遍及居住在欧洲、中近东以及北非等地的所有人。

虽然马克西米努斯希望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稳定下来，但是本应与他站在统一战线上的罗马人扯了他的后腿。事件的起因是北非行省爆发的抗议运动。

在尤里乌斯· 恺撒还是执政官的时代确立的《农地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保护中小规模自耕农的政策。这一法令在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在意大利本土，中小规模的农场比大规模的农场更加受到重视。对于像格拉古兄弟以及尤里乌斯· 恺撒这样以民众支持为基础的政治家们来说，保护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中小农民

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虽然皇帝的权威同时也要受到来自元老院方面的限制，但是自耕农的支持基础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后来的皇帝在意大利本土实行了仅限于自耕农的利息优待政策。



罗马时代的北非

但是，上述情况在被罗马人征服的行省中完全不同。这些地方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使用许多奴隶进行劳作的大规模农场形式。而且这一形式在他们加入罗马帝国之后也仍然保留了下来。因为罗马人统治外族的方式一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加上行省的农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对皇帝来说没有投票权，所以罗马方面对此也没有作出什么改变。

大规模农场形式在北非地区普遍存在，基于两个原因：

一、与满是山丘的意大利半岛相比，在布匿战争前一直处于迦太基人统治之下的北非属于平原地势，加之迦太基人自古以来便以高效的农耕技术著称，因此与中小农场相比，大农场更加符合他们的生产模式。

二、虽然在现在看来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北非地区和埃及是罗马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向意大利本土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资源。除了小

麦以外，还出口大量的其他农产品。既然意大利本土这样一个具有大量需求的市场就在旁边，提供货源的北非的粮食生产效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现在依然残留在北非一代的壮丽遗迹，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当时罗马帝国在北非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正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作出积极的发展，从而留下这些遗迹。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老师就是生于北非的弗龙托，他的女婿和手下优秀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北非出身的人。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也是出身于北非行省的皇帝。可以说北非的大农场就是向帝国输入这么多人才的基础。所以公元238年爆发的抗议活动，虽然从帝国整体来看只是一个发生在地方的事件，但实际上对整个帝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罗马时期“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位于迦太基，就是现在的突尼斯。从迦太基向东南方向前行200公里就是蒂斯德鲁斯（现在的艾尔迪约姆）。在这里拥有众多罗马时代的遗迹，其中以圆形竞技场最为著名，由此可见这里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繁荣的都市，周围都是广阔的耕地。

当负责征收税金的皇帝财务官从行省首府迦太基前来这里收税的时候，农场主们对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位看上去丝毫不懂通融的财务官，宣称在北方作战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下令征收战时特别税，并且不接受任何的协商。这件事引起大农场主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些年轻的农场主表现尤为激动，甚至在与财务官发生争执的时候错手杀了对方。结果，原本对于税收不满而产生的抗议因为民众的激昂情绪而演变成一场暴动。年轻的农场主们将自己手下的农民武装起来，率领这些民兵向行省首府迦太基进发。他们打算向行省总督投诉财务官过于苛刻的税收要求，因为当时的总督戈尔迪安是一位非常体谅民众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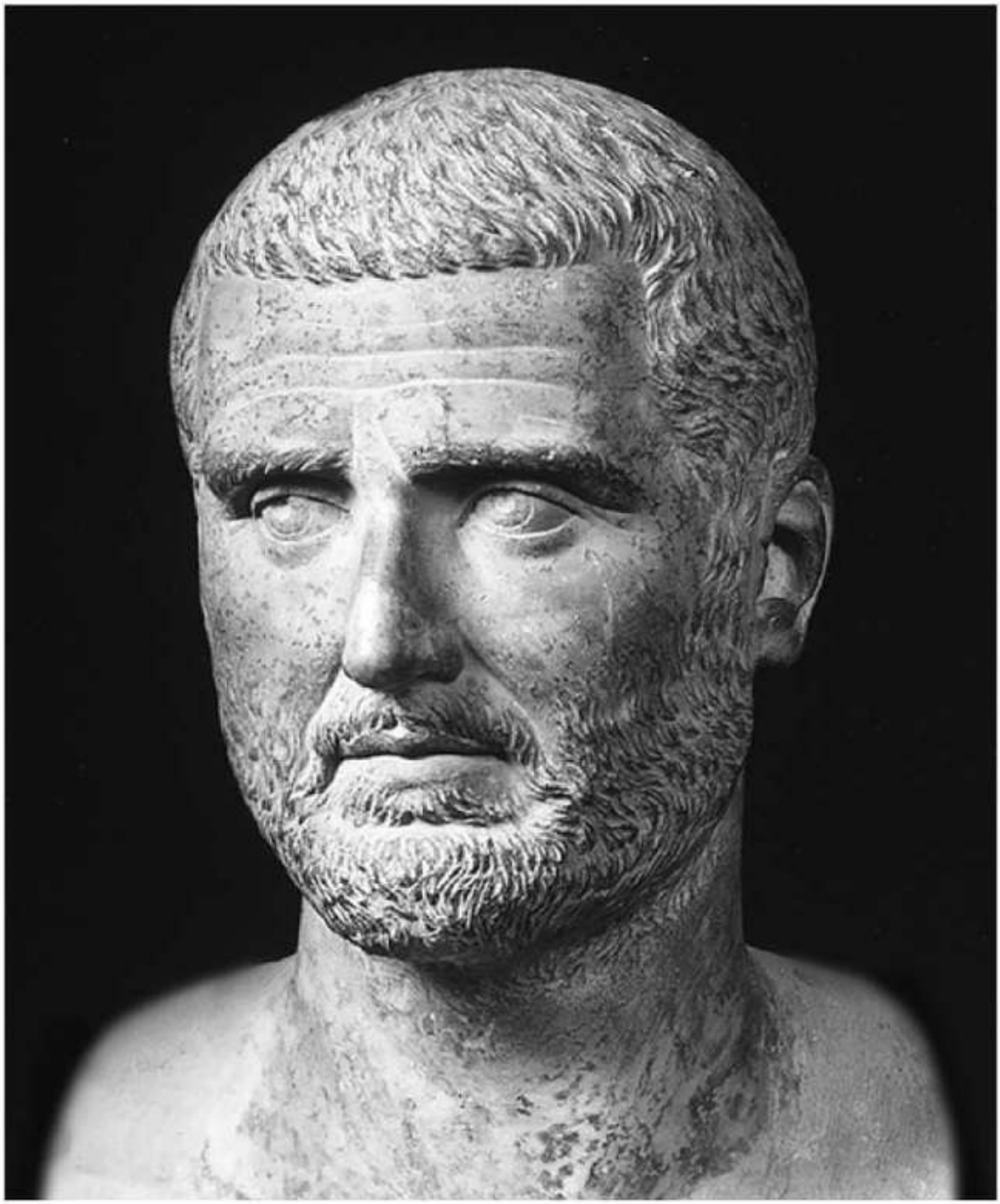
但是当他们在迦太基的总督府进行会谈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年轻的农场主们决定推举他们的总督作为罗马帝国的

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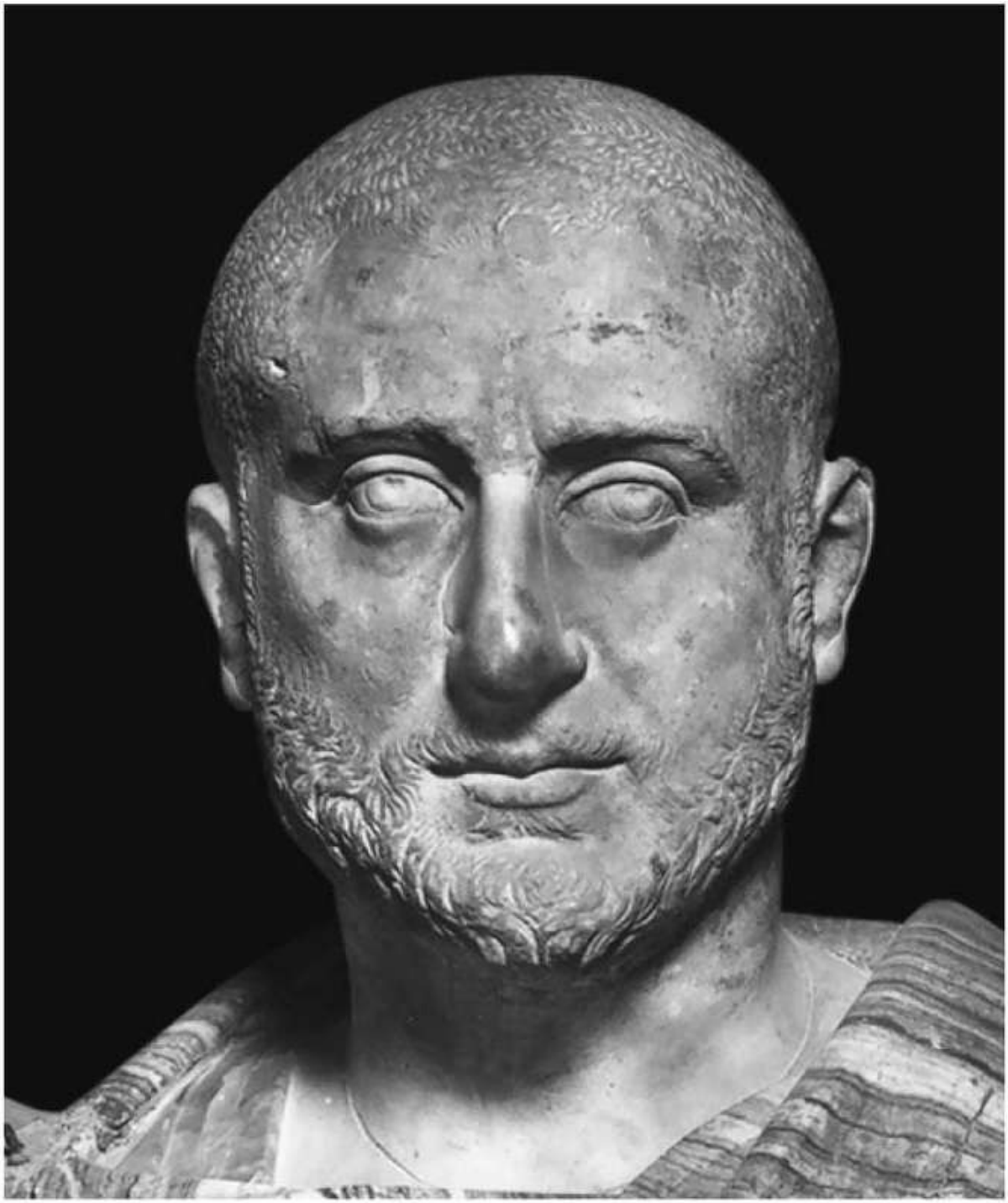
元老院的反击

在5年前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因为深受皇帝的信任（有留传下来的书信证明）而被任命为北非行省总督的戈尔迪安，当时已经80岁高龄。但是这个人在所有层面上都能够代表3世纪罗马社会的传统统治阶级。

首先，戈尔迪安的家世显赫。他父亲的家族从共和国时期就是名门望族，400年以来一直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他母亲的家族有图拉真的血统，也常年在元老院中拥有一席之地。他的妻子是安东尼· 庇护的曾孙女，为他生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一直没有结婚，随他一同前往迦太基赴任。他的女儿则嫁给了一位元老院议员——这位议员的家族自尤里乌斯· 恺撒时期便是名门——并且育有一名现年13岁的男孩。



戈尔迪安一世



戈尔迪安二世

其次，作为传统统治阶级的另外一个条件——财力，戈尔迪安家族也远超其他同僚。他位于罗马七丘之一西里欧山上的宅邸，原本是“伟大的庞培”所建。因为庞培的家族是意大利中部的大地主，所以他的宅

邸在当时就以豪华而闻名。在庞培被恺撒打败之后，恺撒的副将马可·安东尼将庞培的这个豪宅买下作为自己的宅邸。很快安东尼也在与克娄巴特拉联手对抗屋大维的斗争中失败，死于埃及，他的产业被后代继承。后来这座宅邸又屡次辗转多人之手，最后在五贤帝时期被戈尔迪安家族买下。因为经过历代所有者的改建和装修，加之当时正是罗马帝国鼎盛的时期，这座被称为罗马市内最豪华的宅邸在整个2世纪都十分著名，就连建在其旁边的马可· 奥勒留的老宅，在华丽程度上也无法与之相比。

但是，真正象征着戈尔迪安家族大量财富的并非这座宅邸，而是建立在罗马市中心以东5公里之外、位于帕雷斯蒂纳大道和卡西利纳大道交叉口附近的郊外别墅。

建于郊外的别墅因为可以不受土地限制，所以与市中心的宅邸相比更加气派，可以说豪华程度完全取决于建造者的财力。其中最能够表现出豪宅华丽程度的，莫过于庭院中被无数立柱围成的四方形回廊了。戈尔迪安别墅庭院中的回廊共由200根大理石圆柱组成。这200根圆柱分为产自希腊的白色和绿色花纹圆柱、产自埃及的红色圆柱、产自努米底亚的黄色圆柱以及产自小亚细亚的白色和灰色斑点圆柱四种。这四种圆柱交互穿插，矗立在中庭周围的回廊上。

在那个时代，大理石圆柱可以被看做一种资产的证明。这200根圆柱全都是比意大利产的大理石更加昂贵的进口货，同时运费也价格不菲。这些彩色的大理石之所以比纯白色的大理石昂贵，是因为白色的大理石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同时境内开采的运费相对也比较低廉。甚至可以说，帝国时代初期1世纪与帝国时代中期2世纪的建筑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使用的是纯白色的大理石还是彩色的大理石。由此可见，戈尔迪安别墅的回廊是罗马帝国富豪的象征。

顺便说一句，戈尔迪安别墅中那些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美丽圆柱，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被红衣主教拿去用于建造自己的宫殿，结果

现在那里已经一根都找不到了。不过戈尔迪安别墅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便在1700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被称为“波尔加达· 戈尔迪安”。在意大利语中，“波尔加达”是新开垦地区的意思，一般很容易成为低收入阶级的聚居区，这里也不例外。曾经遍及罗马帝国首都郊外的豪华庄园，现在基本上都落得与“波尔加达· 戈尔迪安”相同的境地。

相信戈尔迪安一定想象不到自己家族的名字能够流传到1700多年以后的今天，但是出乎意料地被推举为皇帝的他，也确实算得上3世纪罗马帝国元老院议员的典型代表。3世纪罗马的上流社会渐渐不重视后代的军事经验，戈尔迪安也从没有前线的战斗经验。不过身为元老院议员，他也与其他议员一样都要经历许多被称为“光荣职务”的职业生涯。戈尔迪安也同样经历了会计检察官、法务官、执政官等公职，并且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往行省出任总督，可以说人生之路一直都十分顺畅。

生活在顺境之中的人往往也喜欢回报社会，戈尔迪安将自己收藏了6万卷读物的私人图书馆向大众开放，并且热心于赞助艺术家和诗人。他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并且还创作了描写安东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叙事诗共30卷，可惜这些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他的言行举止都非常稳健，虽然其生在3世纪，但精神状态和2世纪时期的罗马人十分相似。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戈尔迪安就是3世纪前期罗马帝国传统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

但即便是如此合适的皇帝人选，还是需要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于是在公元238年6月26日，议员们齐聚在元老院会场，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尤里乌斯· 希拉努斯宣读了非洲行省总督戈尔迪安提交的书简：

> 诸位元老院议员，代表着非洲行省未来的年轻人们，推举我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自己年事已高，我本打算拒绝，但是考虑到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我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过，决定权还是在诸位的手上，至于我是否继承皇位，希望遵循元老院

的决定。

对“色雷斯人”一直心存不满的元老院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戈尔迪安的书简被宣读完毕之后，议员们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激昂的议员们纷纷站起身，嘴里大声地叫道：

“戈尔迪安· 奥古斯都！愿众神保佑你。你一定能够给帝国带来美好的明天。”

“我们终于解放了。戈尔迪安一定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让我们向将帝国从野蛮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新皇帝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身为议长的执政官让众人安静下来之后说道：

“诸位议员，现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解决马克西米努斯的问题。”

“敌人，他是公敌，应该宣布他为国家的公敌。”

“悬赏通缉他，杀掉他的人将得到褒奖。”

执政官继续问道：

“留在马克西米努斯身边的人要如何处置？”

“他们也是公敌。杀掉他们的人同样将会得到奖赏。”

元老院一致达成以下的处理意见：

“国家公敌将被处以和奴隶一样的刑罚。元老院的敌人不管逃到哪里都会遭到通缉，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一个不留。”

第二天一早，使节们便将元老院的通告发布到全国各地：

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向行省总督、军团长、军团所属的将士们以及各地方都市的议会等政府机关发表如下通告：为了将帝国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所有国民都必须紧密团结在戈尔迪安皇帝的周围。

在众神的祝福下就任皇帝的戈尔迪安是我们完美的楷模，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元老院决定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同时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为了避免帝国的统治出现空白期，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共治皇帝的地位。

现在将由你们决定，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回归到其真正合适的统治者之手。为了不给野蛮的敌人反击的余地，我们必须立刻团结在戈尔迪安父子的身边。元老院一致认定马克西米努斯及其追随者为国家公敌，必须将其彻底消灭。

罗马元老院向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下达了战书，可以说是元老院打开了内战的大门。驻扎在多瑙河附近的马克西米努斯得知这一消息顿时火冒三丈，将手边能抓到的东西全都用力地扔了出去，拔出佩剑疯狂地挥舞，身边人谁也拦不住他。在他发完脾气之后，吩咐人拿酒过来，这个平时不管喝多少都不会醉的男人，那一天却醉成一摊烂泥。然后，就好像忘了所有的烦恼一样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在召集起来的将士们面前，被元老院称为野蛮人和国家公敌而遭到弹劾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开口说道：

我的战友们，想必你们也早有耳闻。阿非利加行省和元老院，全都违背了在我就任皇帝时对我效忠的誓言。甚至还将那个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里的戈尔迪安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贵为罗马社会第一阶级的元老院，实际上是经常不遵守誓言的惯犯。罗慕路斯和尤里乌斯· 恺撒的死，都是这些家伙干的好事。

我为了这个国家与蛮族交战，而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可

是元老院那些家伙却将我看做国家的敌人。他们不仅弹劾了我，还将为了这个国家与我共同浴血奋战了3年的诸位战友也称为国家公敌。元老院将奥古斯都的称号授予戈尔迪安父子，这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将我推举为皇帝的诸位最大的侮辱。

如果你们还是男人的话，如果你们还有身为男人的尊严的话，就和我一起向首都进军，打倒元老院和那些非洲人。如果我们能够战胜他们，那么打倒他们之后所得到的财产将全都属于你们！

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将与居住在多瑙河对岸的蛮族之间的战争放到一边，率军向首都罗马进发。罗马帝国3世纪的内战正式开始。

一年之中的五位皇帝

反观戈尔迪安皇帝那边，事情也进展得不太顺利。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根本来不及作准备。

阿非利加行省西邻努米底亚行省，而努米底亚拥有除埃及之外北非唯一的军团基地。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在这300年来一直保护着北非的居民，使其免受穿越撒哈拉沙漠而来的敌人袭击。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士兵们都具有非常强的军人荣誉感，即便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也依旧居住在军团基地附近不肯离去。位于龙柏斯军团基地不远处的提姆加德就是这些退伍兵为了开始他们的第二人生而自己建成的城镇。因为考虑到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军团基地的预备力量，所以历代皇帝对于这种退伍兵继续居住在军团基地附近的做法都非常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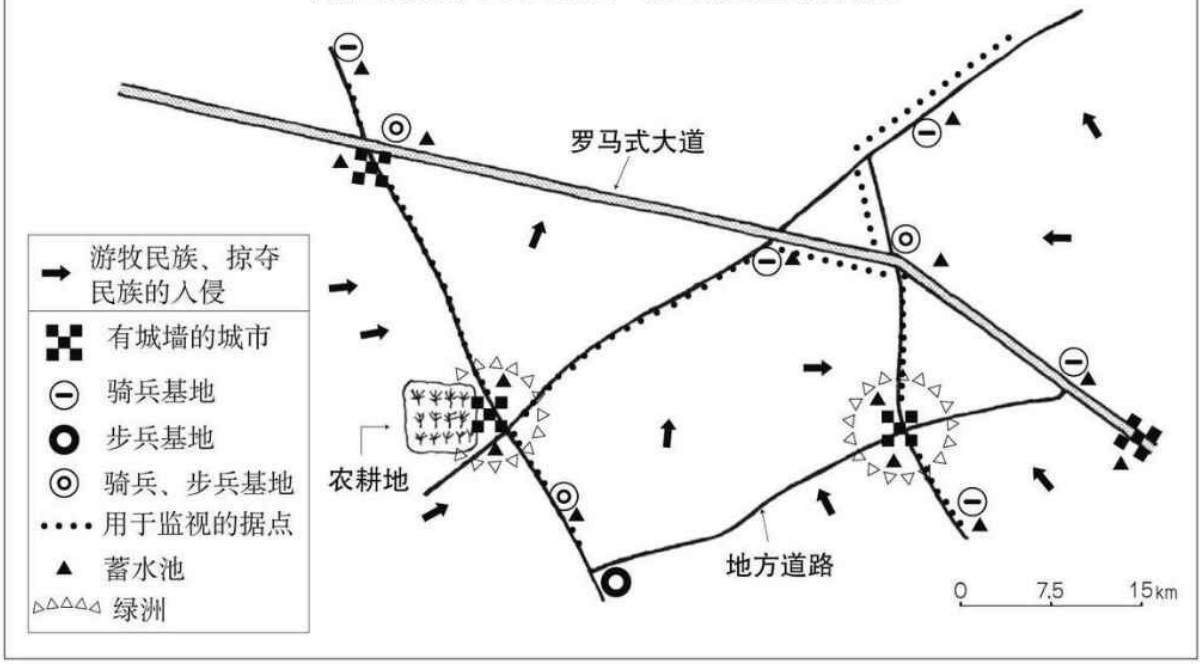
但是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对东侧的阿非利加行省的居民与首都罗马元老院共同拥立的皇帝戈尔迪安持反对态度。他们并不是对戈尔迪安父子有什么不满，也不是讨厌阿非利加的那些农场主，更不是对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因为元老院否定了军队拥立的皇帝，所

以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难以接受。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过的那样，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优待军队的政策，将罗马军队所代表的“士兵”与元老院所代表的“公民”一分为二，并且军队高高在上。因此第三奥古斯都军团才会对元老院的决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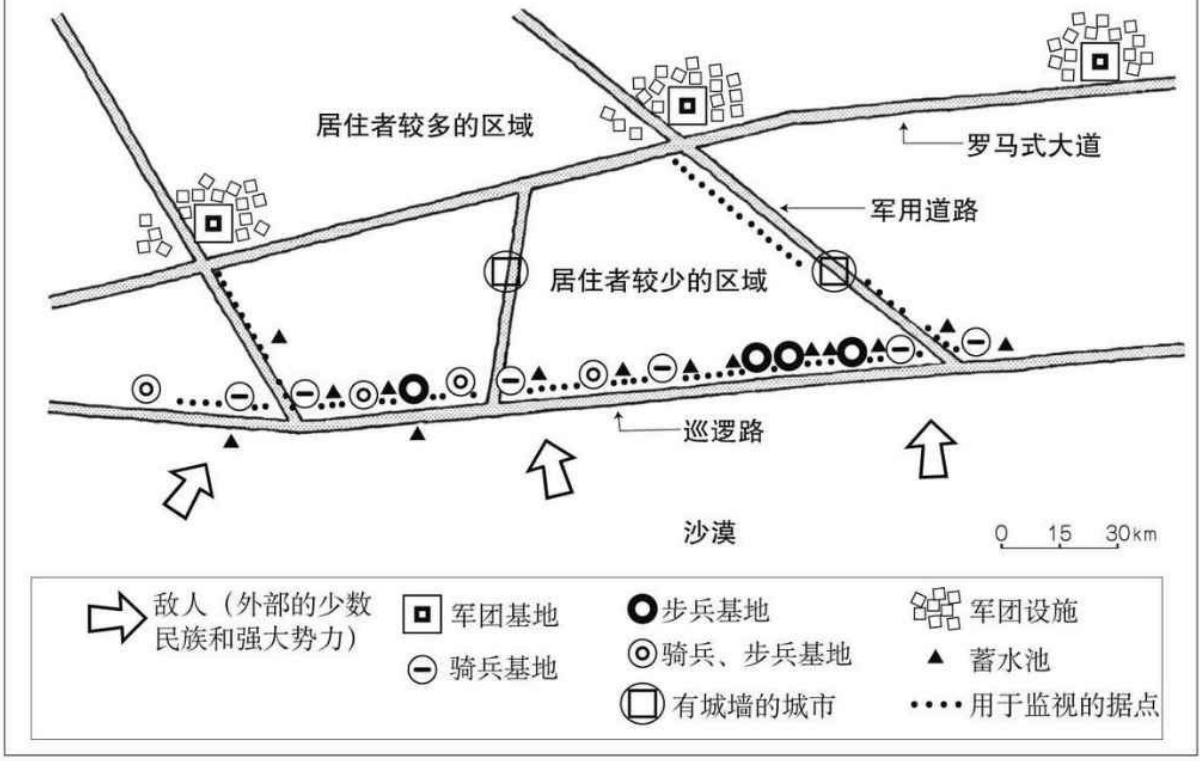
军团的士兵们高高举起象征自己军团的银鹫旗，向戈尔迪安父子所在的迦太基进军。一般来说军团不会扔下军团基地倾巢而出，但是在北非另当别论。越过沙漠前来袭击的游牧民族，并不会组成像日耳曼人那样的大军。也就是说，龙柏斯军团基地所负责的防线主要面对的是不知何时出现的小规模敌人。在这里罗马人再次体现出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点，就算同为面向沙漠的防线，他们在这里的做法也和面对帕提亚以及波斯的防线不同。而且正如之前所说，北非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基地附近有许多退伍兵，当得知防守基地的任务落在他们肩上的时候，这些人都感到十分欣喜并且干劲十足。

迦太基作为北非的中心城市，在罗马统治时期一直是物产资源的集散地，这一点已经在20世纪后半期进行的海中考古学调查中得到证明。在迦太基与罗马之间航线下的海底深处，发现了很多古代运输船的残骸。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都市，却没有自己的军团基地。就像高卢最重要的都市里昂一样，只有一个由1000余名士兵组成的守备队。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
（昔兰尼加、阿非利加、毛里塔尼亚等行省）



沙漠地带的防线——威胁程度相对较高的地方
（北非的一部分以及叙利亚行省等防线）



（上下图都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而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所以面对多达6000人的军团兵的进攻，1000多名守备兵完全不是对手。虽然戈尔迪安的儿子身先士卒带领手下的士兵奋勇抵抗，但是胜负在一开始就已经显而易见。1000名守备兵很快便被消灭，皇帝戈尔迪安二世也战败身亡。得知这一消息的皇帝戈尔迪安一世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从他继承皇位到自杀身亡，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接到报告的罗马元老院，因为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而惊慌失措。但是，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无法取消宣称马克西米努斯为国家公敌的通告。于是他们在彻夜的讨论之后，决定拥立两位新皇帝，并且以这二人为中心迎击不断向首都逼近的马克西米努斯。元老院拥立的这两个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其中普皮恩努斯拥有丰富的指挥经验，而巴尔比努斯则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于是巴尔比努斯留在首都负责内政，普皮恩努斯则率军北上抗敌。

但是这两个人与戈尔迪安父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虽然戈尔迪安父子二人刚刚继位就宣告死亡，但毕竟也是元老院拥立的皇帝，因此元老院有必要向世人证明他们的选择并没有失误。于是元老院便向居住在首都罗马的戈尔迪安的孙子授予恺撒的称号，这样也就意味着戈尔迪安的孙子将是未来的皇帝。当时戈尔迪安三世还只是一名13岁的少年，元老院匆忙地为他提前举行了成人礼，并将其介绍给罗马帝国的另一大主权者“罗马公民”。

马克西米努斯在离开多瑙河南下途中也得知了戈尔迪安父子死亡的消息。但是这个“色雷斯人”仅仅高兴了一会儿，便发现元老院又拥立了另外两位新皇帝。这件事使得原本就对元老院深恶痛绝的马克西米努斯感到更加的无法忍受。同时他也认识到要想打败元老院，只有通过武力

解决问题。曾经他还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能够击败蛮族，承担起罗马皇帝的责任就可以保住皇位，现在他终于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不过，他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太晚了。

因为这3年来他率领手下的士兵与蛮族交战大获全胜，保护帝国的边境平安稳定。所以马克西米努斯认为，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必定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盛情款待。但是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元老院宣判马克西米努斯为国家公敌的通告，早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越接近意大利本土，通告的效力就越强。皇帝马克西米努斯的军队也由此陷入了粮草不足的困境之中。

居民们会有这种反应也不难理解。毕竟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别说没见过皇帝的样子，甚至连马克西米努斯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也就是说，马克西米努斯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皇帝，而元老院的布告他们却是司空见惯。

对于元老院来说，这次也是背水一战。元老院中主张积极防御的20个议员组成了防御委员会，尝试一切可能打败这个“色雷斯人”的办法。

最终决定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命运的，还是当地居民们的反抗。沿着多瑙河的大道进入意大利本土之后抵达的第一个都市，就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阿奎莱亚。这里的居民在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到来之前便紧紧地关闭了自己的城门。而在这个时候，从首都赶来的皇帝普皮恩努斯甚至还没有进入阿奎莱亚。

如果是以前的马克西米努斯，一定会使用自己最擅长的速攻战术，绕过阿奎莱亚直取首都。虽然途中会遇到皇帝普皮恩努斯率领的军队，但是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军团在与蛮族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些生活在首都的近卫军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一旦在与普皮恩努斯的交战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马克西米努斯或许能够趁机打破僵局，形势也会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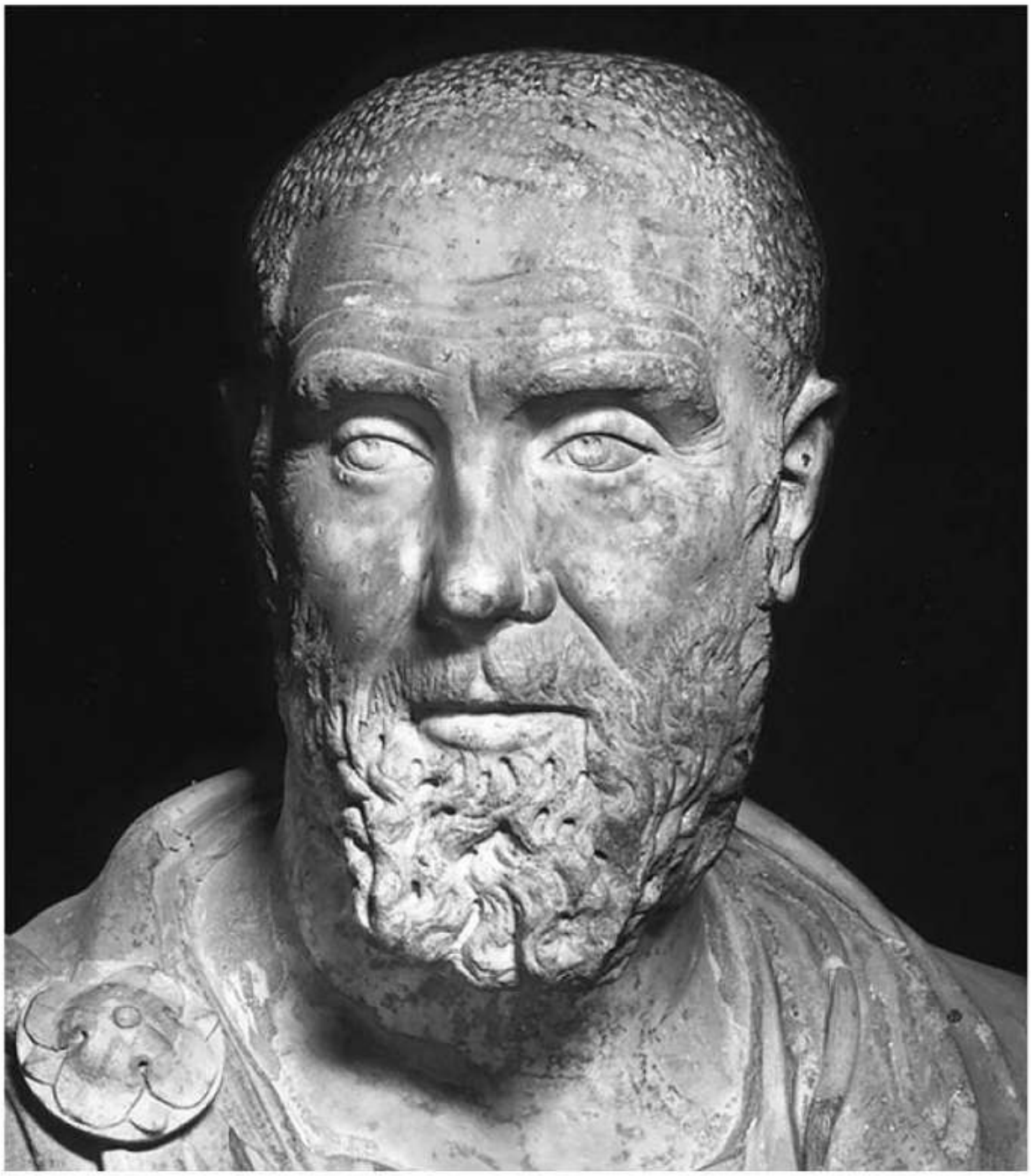
但是遭到居民们抗拒的马克西米努斯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信心满满的他了。于是他在阿奎莱亚城前布下阵势，准备进行攻城战。阿奎莱亚城里只有几百名警卫兵，而进攻方则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看上去似乎很容易被攻陷的城池，却迟迟未能攻陷。一方面是因为居民们众志成城地顽强抵御对方的进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方的粮食补给也所剩不多。而且冬天即将到来，虽然与多瑙河沿岸相比地中海附近的气候还算比较温暖，但是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冬天依然十分寒冷。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士兵们内心之中开始产生动摇的情绪。尤其是在首都附近的阿尔巴诺拥有自己的军团基地，并且老婆孩子全都留在那里的第二帕提亚军团的士兵们心中的动摇最为严重。因为他们跟随被元老院弹劾的马克西米努斯一起战斗，所以害怕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会被对方抓去当做人质。

于是第二帕提亚军团的士兵们决定趁晚上皇帝睡觉的时候袭击他的帐篷。这就是以“色雷斯人”的称呼而广为人知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最后的下场。“色雷斯人”的首级在4天后被送到罗马的元老院接受检查，之后他的尸首被扔进台伯河，没有一位议员对此提出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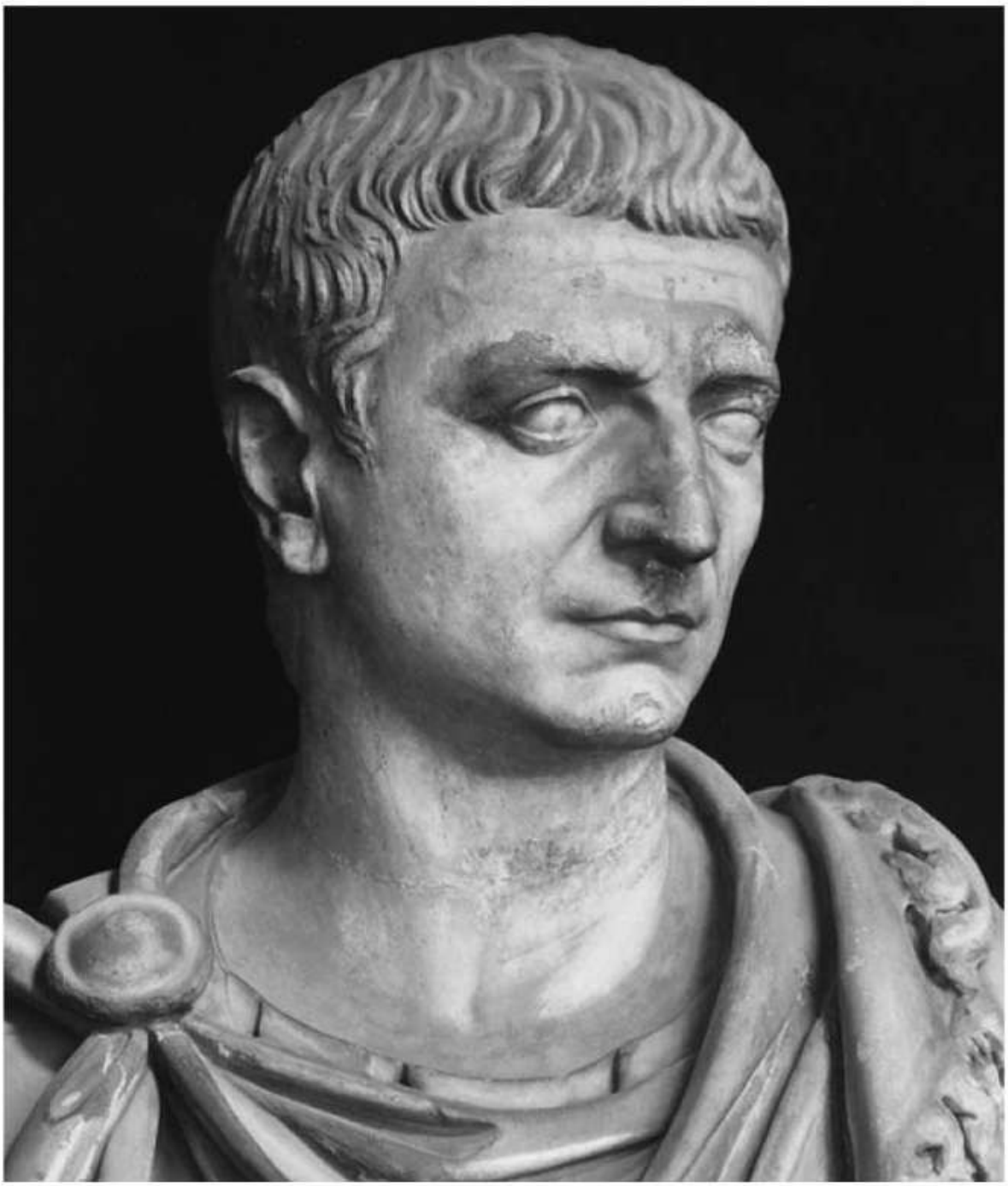
在马克西米努斯被杀之后，围攻阿奎莱亚的士兵们立刻解除了包围。阿奎莱亚的居民也热情地打开城门，为他们提供温暖的住宿和食物。就这样，当皇帝普皮恩努斯抵达阿奎莱亚之时，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士兵们以及当地居民全都向新皇帝宣誓效忠。成功避免了内战的罗马帝国，在元老院的主导下，似乎恢复了曾经以两名皇帝为中心的一体化统治模式。但是“色雷斯人”才刚刚退出历史舞台，两位新皇帝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

当时已经70岁的普皮恩努斯，身为元老院议员，他的席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获得的，用罗马人的话来说，他属于“新贵”。虽然他生于意大利本土，但属于“平民”。像他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想要往上爬，加入军团是最快的途径。他在皇帝康茂德统治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并且一路顺风顺水。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士兵会得到皇帝的赏识，从而得到机会被推荐进入元老院，即便是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在元老院拥有一席之地。普皮恩努斯曾先后在多个前线和行省中服役，范围西至高卢，东抵小亚细亚，直到被任命为首都长官才终于安顿下来。他在首都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元老院之所以拥立他为皇帝，就是因为他在首都居民中的声望极高，而且他已经70岁高龄，就算做了皇帝在心境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年纪了。



普皮恩努斯



巴尔比努斯

另一位皇帝巴尔比努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生来便属于元老院阶级。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味地在首都罗马享受奢华的生活。当时已经60岁的巴尔比努斯几乎管理过帝国境内所有的行省，拥有非常丰富的

统治经验。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无能的“贵族”。

巴尔比努斯的魅力，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十分高大，而且是一个美男子。他平时的打扮很有品位，还擅长辩论，所以当他出庭为人辩护时，可以说在视觉上和听觉上给人以双重的享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喜欢钻研到底的人，这一点在葡萄酒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罗马人自古以来就对“酒”（vinum）的产地和酿造年份十分挑剔，3世纪的罗马人最重视的是用来调制葡萄酒的水，他们会在水中加入各种香料来调制葡萄酒。据说巴尔比努斯就曾经发现了好几种新型的香料，并且使之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调制方式，在当时他就以这方面的造诣而闻名于世。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得紧张起来，虽然也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元老院没想到马克西米努斯会如此轻易地被打败，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导致其内部逐渐产生分歧。元老院逐渐分为两派，各自支持其中一位皇帝独揽大权。而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说明不管是普皮恩努斯还是巴尔比努斯，都没有掌控大局的能力和气概。这两个人虽然在身为元老院议员之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能力和责任感，但是再往上就不行了。

当元老院内部出现混乱的时候，最先对此感到失望的，正是那些追随马克西米努斯向首都进军，但是在马克西米努斯被杀之后向两位新皇帝宣誓效忠的士兵。身为军人的他们现在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竟然因为这些虽然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缺乏统治能力的元老院议员们，杀害了自己的司令官。对他们来说，马克西米努斯与这些人相比简直要强上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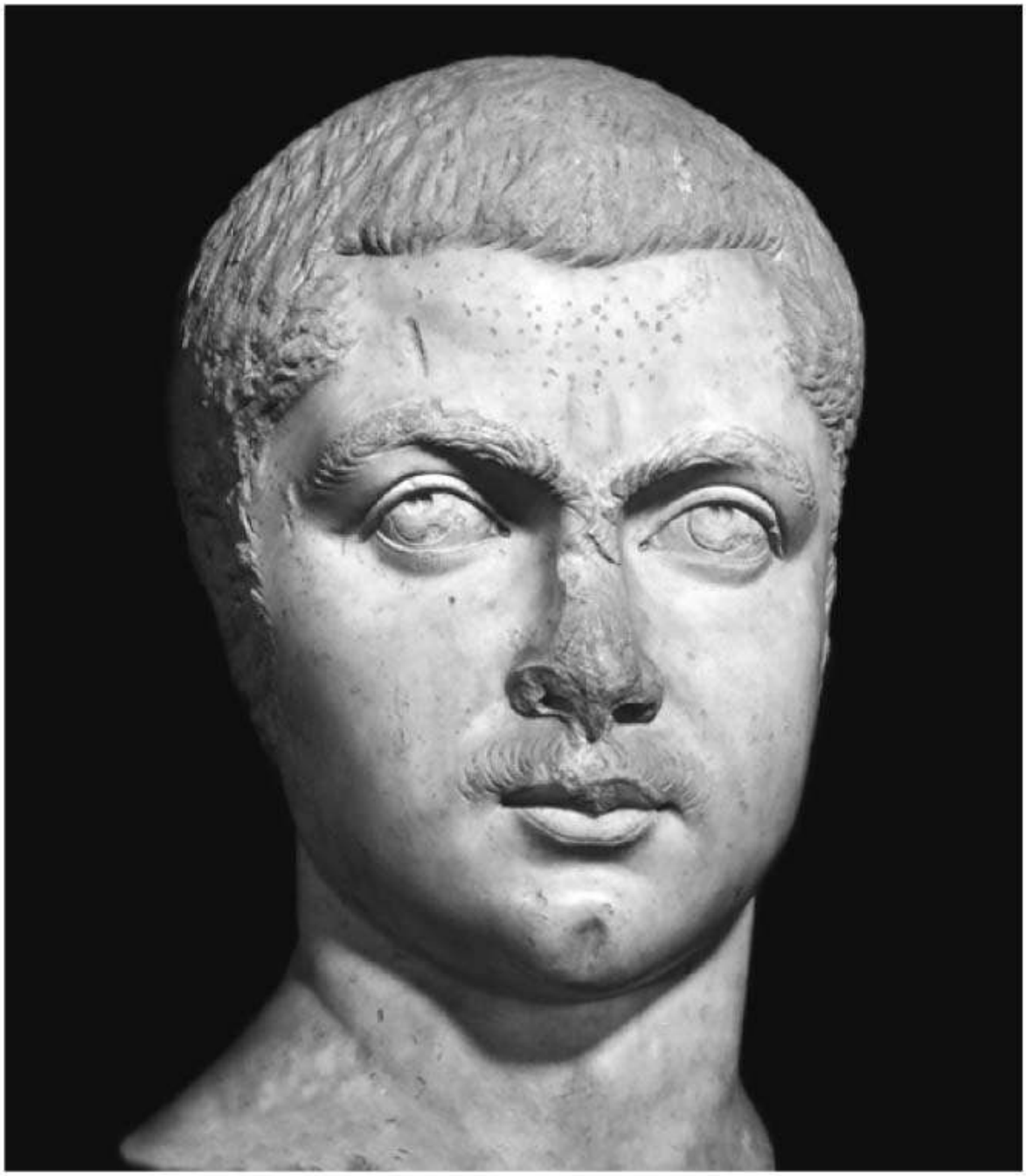
被失望和悔恨支配了所有情感的士兵们决定推翻两位新皇帝的统治。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甚至都来不及反抗便被群情激昂的士兵们杀死了，而元老院直到这两位皇帝的尸体被扔在他们的面前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

在公元238年这一年之中，包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以及在当年出任皇帝的戈尔迪安一世和他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还有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在内共有5位皇帝先后出现并死去。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位13岁的少年。

皇帝哈德良曾经这样讽刺道：“元老院虽然总是各持己见，但是一旦面临危害到其自身利益的问题就会立刻团结起来。”

元老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拥立了戈尔迪安父子以及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但是这些人都相继被杀。被拥立为皇帝的人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因为元老院的判断失误。罗马的元老院，并非像其名字“元老”那样是功成名就之人的养老院，而是为国家的重要职位提供人才储备的机构，每一位罗马公民只要年满30岁便可以拥有议员的资格。即便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之后，元老院的性质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之所以说元老院相当于现代的国会，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因为其中充满了人才，所以如果能够活用这些资源的话，元老院就能够发挥出相应的力量，而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眼前的危机使元老院议员们再次团结起来。因为当时年仅13岁的戈尔迪安三世已经被授予了“恺撒”的称号。所以元老院一致决定授予这位继承人“恺撒· 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就意味着元老院承认了其皇帝的地位。



戈尔迪安三世

在拥立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为皇帝之时成立的“20人委员会”，顺理成章地作为少年皇帝的“政府”保留下来。同时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也在当前的紧急事态下答应帮助其迅速地制订相关法案。幸运的是，

因为“色雷斯人”所采取的积极战术，防线外侧的蛮族在短期内无法轻易地越过防线入侵罗马境内。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这位少年皇帝的祖母与母亲和对塞维鲁王朝造成巨大影响的叙利亚的女人们不同，因为她们都出身于罗马元老院阶级，所以对政治这种男人的事情完全不闻不问。

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出现女性把持政权的局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位女性生来便为女王，另一种是拥有强烈后宫政治传统的国家。所以说只有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才会出现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情形。而“东方”国家绝大多数都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所以对于叙利亚的女人们来说，凭借自己的儿子登上政治舞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会有意为之。但是对于君主专制传统薄弱，甚至在基督教支配以前就非常反感世袭制度的“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一个母亲对她成为皇帝的儿子处处指手画脚，势必会引起人民的不满。皇帝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下场如此凄惨，也没有得到罗马人民的丝毫同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实务专家提梅吉提乌斯

在少年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出人意料地平稳度过了6年。虽然上述的那些幸运之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统治方法本身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20人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充分地发挥功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某个擅长实务工作的人物的判断与组织才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提梅吉提乌斯，全名叫做盖乌斯· 弗里乌斯· 萨比尼乌斯· 阿奎拉· 提梅吉提乌斯，这个听起来非常夸张的拉丁风格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建国以来的贵族阶级，但实际上用这些罗马历史上的名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姓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圈里的“新贵”。提梅吉提乌斯的出生地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有人说他生于意大

利本土，也有人说他生于一个叫做“普罗维尼亚”的地方，位于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但不管怎样，他毕竟不是“东方”人，并且深知不管在什么领域要想出人头地，必需具备一定的教养。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从事的都是行政类工作。虽然他也拥有在军团中服役的经历，但是并没有率军作战的经验。因此如果要将这个人的履历列举出来的话，那么你一定能够看到一长串罗马帝国行政官职的名称。

提梅吉提乌斯似乎从一出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并且在西班牙行省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比利亚半岛常驻有一个军团，在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附近，往往会有一个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辅助部队与之一同行动。辅助兵们常驻的基地，为了与军团兵们的基地之间保持及时有效的联系，所以与军团兵的基地相隔并不太远。因为当时还是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前，所以辅助部队全部由行省居民组成。年轻的提梅吉提乌斯所担任的职务，就是由这些辅助兵所组成的大队的“praefectus”。一般将这个词翻译为“长官”，实际上就是除了战斗指挥之外一切相关问题的总负责人。

军队因为经常要深入敌境进行作战，所以必须是完全自给自足性质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自己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组织。因此每当出现自然灾害和难民救援等问题时，往往都会派遣军队出面解决。在军队的组织中，管理各种事务的“长官”是仅次于指挥战斗的“军团长”的第二重要的职位。人们常说“罗马的军队赢在兵站上”，而“长官”的任务就是负责军团和辅助部队与兵站当地居民之间的协调，时刻保证部队的供给。军队在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长官就坐在军团长与大队长的旁边，由此可见其作用非常关键。

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他分别转任各个军团的兵站负责人。但是后来，提梅吉提乌斯所擅长的领域转变为行省的财务方面。正如这个职位的名称叫做“皇帝财务官”一样，担任这一职务

的人需要掌管整个行省的财务状况，其主要业务就是征收税金。因为被夹在征税方与缴税方的中间，所以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他偶尔会不得不面对那些对课税抱有不满的民众，搞不好的话就会像之前那个前往阿非利加行省收税的财务官一样有性命之虞。而且自从进入3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税率大幅提高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之战争临时税以及名目繁多的特别税也频繁出现，所以对于财务官来说征税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做。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步履艰难的时代，提梅吉提乌斯担任财务官的行省并没有发生一起民众因为对税收不满而抗议的事件。大概是元老院也发现了他的业绩，于是他以“皇帝财务官”的身份任职的行省，也几乎遍及广大帝国的一半以上。

他先后任职于高卢北部的比利时行省、莱茵河沿岸的高地日耳曼行省与低地日耳曼行省，相当于现代的约旦的罗马时代的阿拉伯行省；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西部的比提尼亚行省与亚细亚行省。随后他又返回西方，在高卢的卢格杜南西斯行省和阿奎塔尼亚行省任职。财务官是仅次于行省总督的职位，如果总督因为某种原因不在，财务官也可以兼任行省的最高统治者。

直到皇帝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期，提梅吉提乌斯才终于等到在首都罗马任职的机会。他在首都的职务是遗产税总负责人。随后，他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着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20人委员会”。通过这个职务，提梅吉提乌斯的能力得到元老院和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一致认可。公元241年，也就是少年皇帝统治的第三年，提梅吉提乌斯被皇帝任命为近卫军团的长官。

“近卫军团长官”是统领1万人近卫军团的总负责人，历代皇帝都会将这个职位任命给自己最信赖的人，提梅吉提乌斯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从皇帝戈尔迪安三世与提梅吉提乌斯遗留下来的信件我们不难看

出，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超出了普通的信赖之情。提梅吉提乌斯在给皇帝的亲笔信中温和地叮嘱这位年轻的最高统治者要明确自己身为皇帝的责任和义务。皇帝16岁的时候迎娶了提梅吉提乌斯的女儿为妻。但是皇帝重用提梅吉提乌斯并非因为他是自己妻子的父亲，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那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的女儿，所以皇帝才会娶她。不管怎样，年轻的皇帝与脚踏实地一步步爬上这个相当于宰相位置的男人，以非常理想的合作关系共同走过了后来的三年时间。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罗马帝国最为深刻的问题，因为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远征东方

公元241年，也就是提梅吉提乌斯被任命为近卫军团长官的那一年，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始人阿尔达希尔去世。按理说王位应该由他的长子继承，结果却被他的二儿子取而代之。于是在罗马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沙普尔一世登场了。

通过武装政变迅速稳定了王室内部的局面之后，新登基的国王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将这种危机转嫁出去。也就是说发动对外战争。因为波斯萨珊王朝的理想就是重建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的波斯帝国，所以他们进攻的对象也自然是与其国境接壤的罗马帝国。

虽然他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战争的想法是认真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攻占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实力。不过毕竟距离上次与罗马军队交手已经过去了8年，在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波斯军队主力重装骑兵也已经基本完成了重新组建。于是越过幼发拉底河向西方进军的波斯军队，很快便逼近了罗马帝国在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安条克。

沙普尔一世

沙普尔与他的父亲阿尔达希尔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为波斯萨珊王朝第二位国王的沙普尔，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他派遣自己宫廷中一名生于安条克的希腊人偷偷潜进城内。这个叛徒在城内的煽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号称中近东最具魅力的城市安条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沙普尔手中。

但是沙普尔并没有打算长期占领这里，他知道配置在罗马帝国东方防线附近的罗马军团很快就会赶来，于是这位波斯国王在进入安条克之后立刻进行了彻底的搜刮。安条克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集散地，许多商人将这里作为他们的根据地，希腊系与犹太系的商人们也普遍比其他的商人更加富有。这些有钱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要用钱能够搞定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当他们面对波斯军队的掳掠时，毫不犹豫地交出了自己的财产以求活命。而那些普通百姓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全都在波斯军队的掠夺下家破人亡。不过波斯军队的暴行并没有持续多久，沙普尔将那个叛徒任命为安条克的市长，然后就带着抢来的金银财宝越过幼发拉底河返回了首都。至于留在安条克的那个“市长”最后的命运如何，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是想必他一定会有一个很符合其叛徒身份的结局。

在西方得知此事的提梅吉提乌斯，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次偶然性的袭击，而是意味着波斯对罗马的攻势再次“开始”。而且作为叙利亚行省首府的安条克竟然如此轻易地被敌人攻陷，对居住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居民们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帝国之所以被称为帝国，就是因为其能够保证在其霸权统治下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了这种安全的保障，在其统治下的人民才会向其缴纳税金。曾经在帝国的各个行省之中负责税收的提梅吉提乌斯深知这件事关系重大，于是他说服了认为这只是一次性袭击而不打算进行东征的元老院。于是皇帝和元老院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对波斯展开全面战争。

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完全以提梅吉提乌斯为主角。而且他的做法又非常具有罗马特色。或者说是他将被后世淡忘了的罗马传统战术重新发扬光大更合适一些。

罗马人自古以来就以严谨慎重著称。就连在清除地中海上的海盗之时，罗马人也没有与海盗在海上硬碰硬，而是将海盗在陆地上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一个不落地全部摧毁，最终实现了地中海上的“和平”。对于战

争，罗马人习惯于在上战场之前便确立自己的绝对优势，而且即便面对数量很少的敌人，他们也不惜出动大军与之交战。进入帝国时期之后，罗马再也没有像苏拉、鲁库鲁斯以及尤里乌斯· 恺撒那样的战术大师，而这种战术恰恰最适合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实际上，即便是将帝国领土扩张到最大范围的图拉真，也配不上“战术大师”这个称号。

图拉真在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之前，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战前准备，因此当战争正式开始之后，图拉真的军队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在140多年以后，提梅吉提乌斯也决定模仿图拉真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图拉真的目的是彻底征服达契亚，而提梅吉提乌斯则只是想让波斯无法轻易向罗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点实际上也和罗马在东方战略上的传统做法不谋而合。

远征波斯的罗马军队主力，依然是驻扎在多瑙河沿岸的军团兵。因为他们经常与防线之外的强敌交手，所以都是罗马帝国最精锐的战士。关于东征军队的编成和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无法在首都罗马遥控，而必须在多瑙河沿岸的前线基地进行。因为士兵们在准备东征的同时，还要不时地应对日耳曼蛮族的袭击。在大军出发前往东方之前，首先将背后的威胁彻底清除。这对于罗马方面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提梅吉提乌斯在这个时候充分地发挥出他强大的组织才能，使得皇帝率领的东征军在这一年的冬季到来之前便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安条克。

虽然皇帝当时年仅16岁，但是御驾亲征还是表明了罗马帝国此番出战的决心。虽然安条克还到处残留着被波斯军队烧杀抢掠的痕迹，但仍然不失其被称为东方“首都”的气派和繁华。当地的居民也对罗马军队的到来表示出踊跃的支持态度。

曾经有一位英国学者说，罗马帝国有如英国人主导、于二战后实现的“联邦国家”。也许对于安条克的居民们来说，与强调中央集权的波斯人相比，更加倾向于对地方自治给予充分认可的罗马人的统治吧。同时，他们也对罗马帝国将被支配者与支配者同化作为基本政策的统治哲

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作为波斯战争补给基地的安条克所进行的一切准备，全都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战争，即将在公元243年的春天拉开帷幕。

古代的地缘政治学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将中东地区南北一分为二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但是在众多支流汇聚成大河的过程中，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分别向东西两边迂回，在两条大河中间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在这两条大河附近，自古以来就有巴比伦、塞琉西亚、泰西封以及公元7世纪由伊斯兰教势力在泰西封以北40公里处兴建的巴格达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的存在表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都是一个集民族或者国家主要机能于一身的地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并行500公里之后，再次汇聚在一起注入波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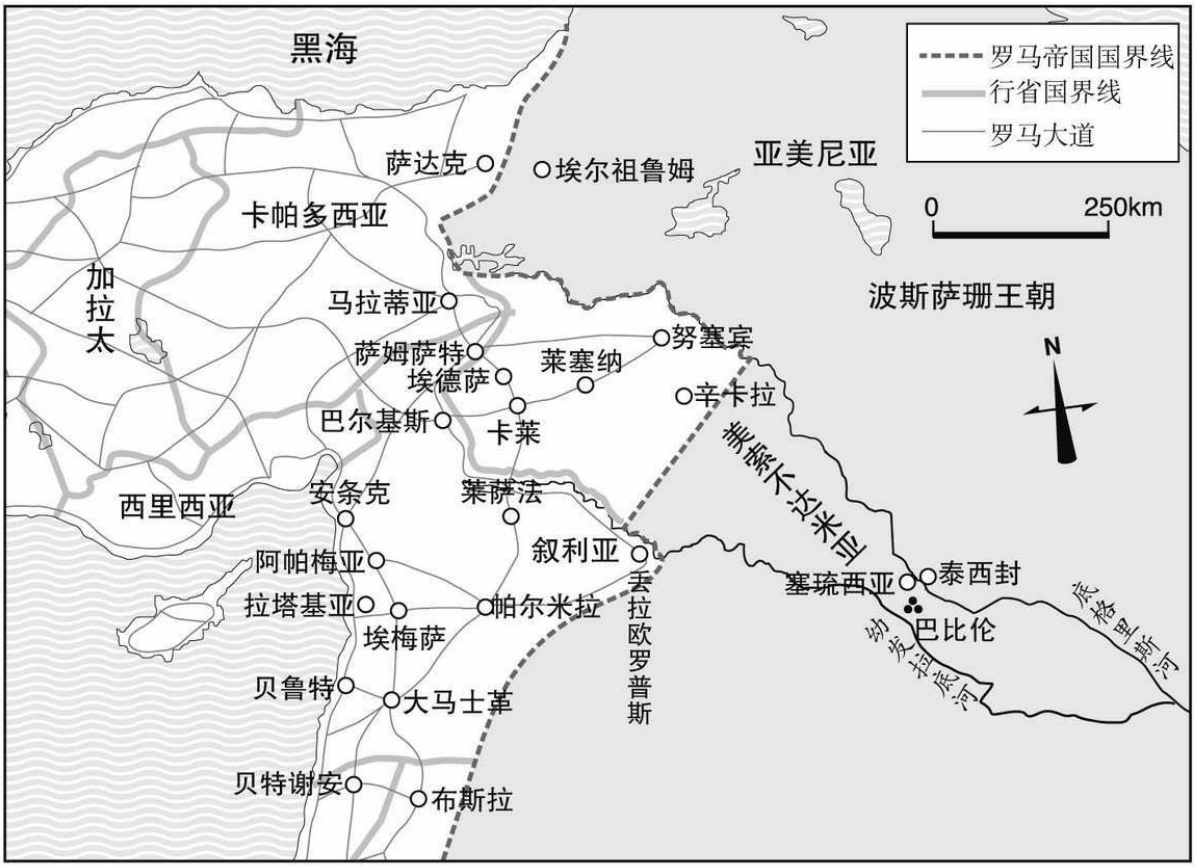
从帕提亚王国开始，一直到波斯萨珊王朝取而代之之后，东方国家与罗马帝国之间一直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展开非常激烈的争夺。但这并非因为罗马帝国永无止境的扩张欲望，而是因为“地缘政治”问题。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是后世将两个希腊单词拼在一起组成的新词，但是即便没有这个词语，罗马人也非常清楚其重要性。罗马人对于防线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一直都尽可能地采取友好的政略。这一政略在东方最具代表性的对象就是亚美尼亚王国。罗马将亚美尼亚视为自己的同盟国，并且为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和技术两方面的援助。但是亚美尼亚的文化和文明仍然具有浓重的“东方”色彩。因此，帕提亚王国才会一直声称他们拥有介入亚美尼亚的权利。即便东方的主人变成了波斯，在这一点上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从之前的帕提亚到后来的波斯之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染指亚美尼亚，就是因为在前两者与后者之间隔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也就是说，

如果这片地区落入波斯手中，那么亚美尼亚对其来说也是唾手可得。用现代的地理位置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并且主要城市全部集中在伊拉克附近的大国，从东部向土耳其发动袭击。如果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那么罗马帝国从黑海一直到红海的东方防线，将与同样实力强大的波斯发生直接接触。我们都知道，罗马人的对敌方针一向是“分而治之”（divide etimpera）。而对敌人的统一置之不理，明显与罗马的传统政略是不相符的。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对于罗马的统治者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领土的扩张，更关系到地缘政治。

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现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直到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才被重视起来。而在此之前，罗马帝国的防线只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也就是说那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确保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必要。这是因为从奥古斯都到安敦尼· 庇护时期，罗马一直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而且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军事力量上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3世纪中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历代的帕提亚国王都尝试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亚美尼亚，但是就算其成功地占领了亚美尼亚，也无法与随后赶来的罗马军队相抗衡。虽然哈德良重新将幼发拉底河作为两国之间的边界，并且承认拥有帕提亚血统的人继承亚美尼亚王位，还表示罗马不会向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动一兵一卒，但是他的这种政略也是建立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之上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幼发拉底河防线在此期间没有遭到一次入侵，而且亚美尼亚的国王明显倾向于罗马方面，当地的居民也主要由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后裔组成，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城市虽然在统治上属于帕提亚王国，但实际上仍然是罗马的盟友。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对于哈德良以及罗马方面来说，都没有任何坏处。而且这一举措保全了帕提亚国王的颜面，成功阻止了对方的入侵，在政略层面上可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罗马帝国的敌人性质发生了改变。而且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消耗的过程中失去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这种局面下，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直接控制权，也就是将亚美尼亚从波斯的地缘政治之中剥离出来，对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来说变成了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正因为罗马军队失去了压倒性的强大力量，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才变得尤为重要。不管是马可·奥勒留还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率军东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当卡拉卡拉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被杀之后，这里就一直是罗马帝国同东方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就连罗马皇帝变成基督教徒之后，这里的局势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由此可见，地缘政治上的问题，与信仰无关。

由于上述原因，罗马的东征军在离开安条克以后便一路向东进发，越过幼发拉底河向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发起进攻。首先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随后再向波斯首都进军，这是罗马军队不得不遵循的基本战略。

公元243年，名义上是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率领，实际上却完全由提梅吉提乌斯指挥的罗马军队，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越过了幼发拉底河。沙普尔对罗马军队的这个战略可以说了如指掌，既然已经掌握了对方的行动，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派间谍刺探情报，只要将自己放在罗马军总司令的位置上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大概了解对方接下来会采取怎样的战略。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拥有出人意料手段的战术天才来说并不适用，但是在3世纪的罗马帝国早已没有那样的将领。所以即便在战术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沙普尔，也可以安心地与罗马帝国交手。于是，当得知罗马军队开始向东部进发的消息之后，波斯国王也毫不犹豫地下令挥军北上。

不出所料，战斗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展开。罗马军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优势，人数超过5万的罗马军团主要由驻守在多瑙河沿岸的士兵

组成，虽然中近东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其常驻地完全不同，但是由于罗马军队的补给十分充足，所以士兵的战斗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常驻于叙利亚与约旦的军团兵的协助下，罗马军团顺利地收复了埃德萨和卡莱，并且继续向东部进军，逐渐逼近底格里斯河。因为这里大部分是希腊裔的居民，所以当罗马军队抵达时，当地居民纷纷开城迎接，使得罗马军队兵不血刃地就收复了大量失地。与罗马军团遭遇的波斯军队，刚一交手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很快罗马人便将波斯势力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彻底地赶了出去。

成功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之后，罗马军队就将开始进行战役的第二阶段——向波斯首都泰西封进军。士兵们全都士气高涨，因为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所以每个人都对今年内结束波斯战争深信不疑。罗马军团如雪崩般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下，却不知不幸也在这个时候向他们袭来。

提梅吉提乌斯的突然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看做是正常现象，而且在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被谋杀和毒害的记载。他在一次作战会议中忽然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并且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从他这3年来不辞辛劳、废寝忘食的工作状态来看，他的死因很有可能是过度劳累。这位从平民百姓一步一步走到职业生涯顶峰的“人民公仆”，在去世时刚刚50岁。

提梅吉提乌斯死后，完全凭借他一己之力组织起来的罗马东征军顿时陷入瘫痪的状态，攻打波斯首都、将沙普尔赶回东方去的目标也无法实现。更糟糕的是，军队的补给系统也随着提梅吉提乌斯的死而混乱起来，罗马军队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提梅吉提乌斯的副手菲利普临时顶替了他的位置，但是对改善当前状况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罗马军队只能依靠储备的粮草度日。

在敌人的领地陷入如此困境，对军队来说有覆灭的危险，深知这一点的士兵难免会发生骚乱。本来对皇帝戈尔迪安三世来说，这是一个显

示他个人能力的大好机会，但是当时已经19岁的皇帝，仍然没有摆脱他继位时的那种青涩。

戈尔迪安三世当着士兵的面倾诉了罗马军队当前面临的窘境。虽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样做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对象。士兵们在这种局面下听到皇帝无能为力的叹息，必然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士兵们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呼吁身为近卫军团长官的菲利普帮皇帝想想办法。但是菲利普以自己没有权力为由，眼看着皇帝的处境一步步陷入绝境而袖手旁观。

即便处境如此艰难，皇帝仍然在作战会议上决定于明年春天继续向波斯的首都泰西封进军。于是，为了来年春天能够立即展开军事行动，皇帝决定全军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越冬。皇帝也没有返回舒适的大都市安条克，而是和士兵们一起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等待明年春天的到来。这个被罗马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地区，即便在冬季也不会出现补给困难的情况。

士兵们在战时压抑于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旦闲暇下来就会突然爆发，而且与绝对的资源匮乏相比，相对的资源匮乏更容易诱使这种情绪产生。虽然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罗马军队不必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但是一想到距离他们不远处的皇帝帐篷中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也难免会出现不平衡的心理。按理说身为统治者必须及时地遏制住这种苗头，但是当时年仅19岁的皇帝完全没有这种意识。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不知为何整整持续了整个越冬期，直到越冬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爆发出来。

公元244年2月末的一天，9名士兵悄悄潜入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帐篷，将其杀害。据说这9个人都是被菲利普重金所收买。近卫军团长官菲利普在皇帝死后立刻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皇帝在东征途中病死。随后这位近卫军团长官立刻召集军中全体士兵，以战争中不能没有最高司令官为由，迫使士兵们推举自己继任新的皇帝。

所谓推举，也不过是有几个带头支持的，然后其他人随声附和的过程而已。正如前文所说，这种直接民主制很容易被煽动者所控制。军官们之所以同意推举菲利普做皇帝，是为了避免在战争时期出现最高司令官空缺的局面。毕竟在这个时候提出继承皇位的人，只有菲利普一个人而已，虽然这个人并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经历和功绩，但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也已经别无选择。

面对戈尔迪安三世意料之外的突然死亡，以及既成事实的局面，元老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菲利普就任皇帝。同时，他们还根据菲利普的要求，决定将已故的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神格化。

但是，在幼发拉底河边失去皇帝的罗马军队的士兵们，却自发地为他们的皇帝举行了吊唁仪式。他们临时收集石材、筹措石灰，在皇帝的帐篷处面向幼发拉底河修建了一座雄伟的罗马式墓碑。因为皇帝的骨灰已经被送回首都罗马，所以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墓碑。但是士兵们仍然在这座墓碑的四面刻下罗马帝国皇帝戈尔迪安三世被授予的所有称号，并且明确地写下皇帝在此去世的记录。

墓碑上的文字分别用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以及希伯来文写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以及路过的旅行者都能够看懂上面的内容。

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普（公元244—249年在位）

虽然菲利普这个名字非常具有希腊人的特点，但是正如他经常被人在名字前面加上“阿拉伯人”的称号一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伯人。菲利普出生于叙利亚行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当他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便立刻将自己的故乡命名为“菲利普波利斯”（现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他的家族是久居于此的阿拉伯贵族，这位一心想要出人

头地的阿拉伯年轻人，选择罗马军团作为自己将来发展的道路。但是关于他取代突然死亡的提梅吉提乌斯出任近卫军团长官之前的履历，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也许对于不问民族出身的罗马军队来说，他之前的业绩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地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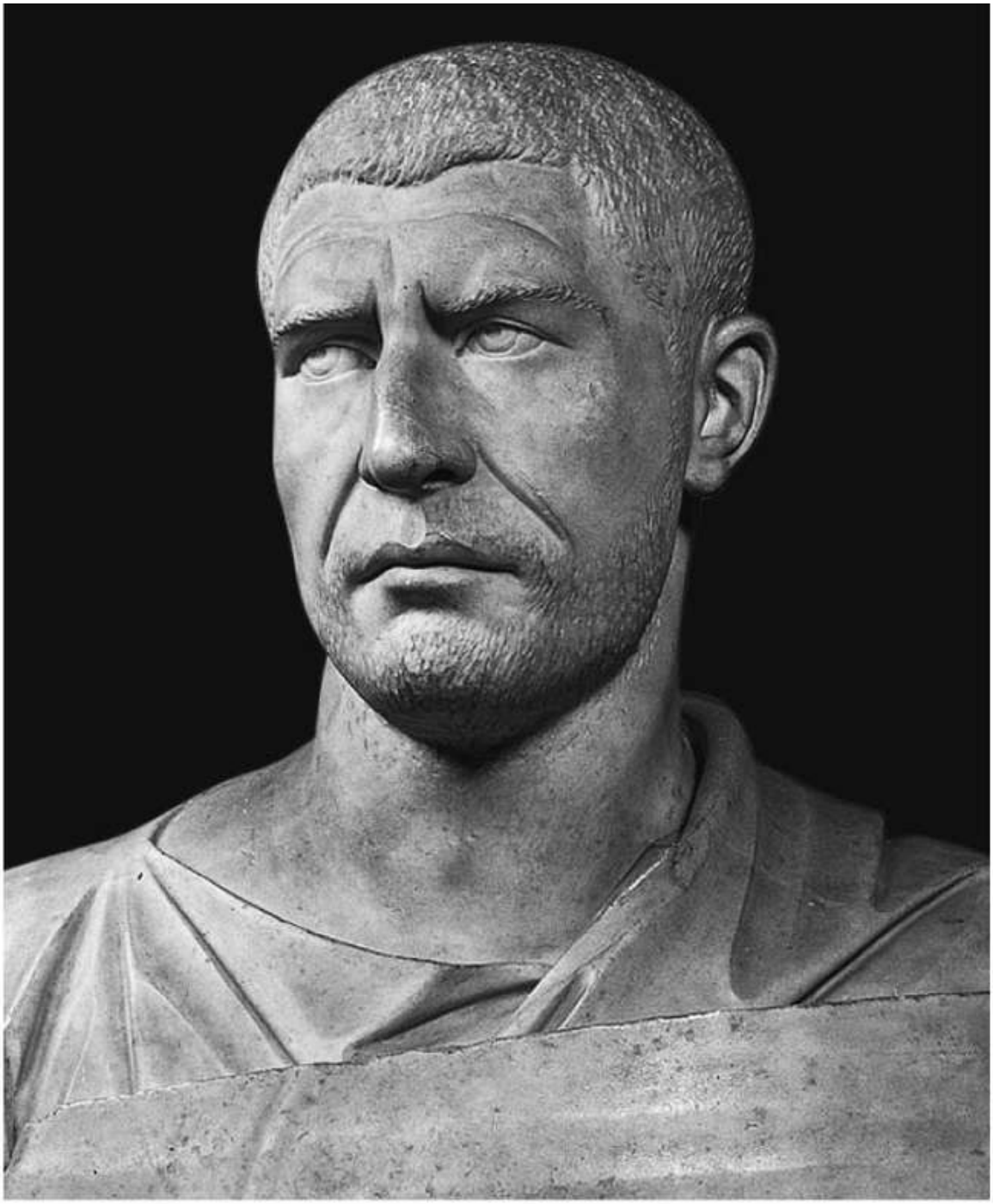
行省出身的人成为皇帝，自从图拉真开始已经有150余年的历史。而且在3世纪的时候，以“色雷斯人”的称号而为众人所熟知的马克西米努斯，其母亲出身于多瑙河防线外的哥特人分支。至于母亲出身于叙利亚的皇帝也有卡拉卡拉、埃拉伽巴路斯以及亚历山大· 塞维鲁三位。所以要想成为皇帝，血统并不是问题。不管你体内的拉丁血统多么稀少，甚至一点都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你拥有身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自觉，就可以出任这个职位。至少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皇帝的血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其有没有身为皇帝的责任心。

“阿拉伯人”菲利普在继承皇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波斯国王沙普尔派遣使节商议媾和。皇帝菲利普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他只是不想犯下和“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一样企图以战胜蛮族来获取元老院认可的错误罢了。

萨珊波斯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沙普尔一世，虽然在军事才能上和他的父王相比差了许多，但是在其他方面则都明显优于他的父亲。特别是把握时机并最大限度加以利用的能力尤为突出。在罗马方面的领导者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公元3世纪，东方却出现了像沙普尔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罗马帝国最大的不幸。

在公元244年时，波斯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沙普尔的命运就好像处于强风之中的蜡烛一样岌岌可危。虽然他在打败兄长继承皇位的第三年就成功掠夺了安条克，但是随后便不得不面对罗马帝国的大军压境。波斯宫廷内的反对派趁机活跃起来，说不定在被罗马军队攻入首都把他赶出东方之前，沙普尔有可能被宫廷内的反对派所杀。而向沙普尔伸出援手的人，正是阿拉伯人菲利普。而且自认为拥有

东方民族之中最高文明的波斯人，对于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所可能采取的做法可谓是心知肚明。



阿拉伯人菲利普

沙普尔接受了皇帝菲利普的媾和提议。但是作为媾和的条件，罗马人必须完全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不仅如此，沙普尔还要求罗马皇帝默许亚美尼亚王国成为波斯的附属。

虽然这个要求对于罗马帝国来说会留下诸多后患，但是渴望尽快以皇帝的身份回到首都罗马的菲利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沙普尔提出的所有条件。罗马与波斯之间最终达成了媾和协议。

3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其在政略层面上的连续性。这一点与皇帝统治的时间长短无关。从前的罗马帝国，即便是被后世称为暴君的皇帝，如果他的继任者认为他的政策是良策的话，不但会彻底地继承下来，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发扬光大。因此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才会得以延续。罗马的皇帝们深知，继承和发扬前人留传下来的政策才是防止资源浪费的最好方法。而3世纪的罗马帝国，却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资源。这也是罗马人逐渐失去罗马人特点的征兆。

拉丁民族在哲学和艺术方面不如希腊人，在体力上不如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在经济能力上不如迦太基人和犹太人，就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依靠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来的技术完成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长处的民族，却将其他所有民族都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起庞大的罗马帝国，并且将其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罗马人执着于彻底且合理地活用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在3世纪的罗马帝国中，几十位皇帝相继登场又逐一退场，甚至多到要列表才能搞清楚的程度。伴随着皇帝的不断改变，罗马帝国的政策也随之被打断。在活用力量这点来说，“持续即力量”的确是真理。

而对这种浪费力量的情况最为敏感的莫过于发挥这些力量的当事人——战斗在罗马帝国最前线的军团兵。由于同波斯的媾和而返回多瑙河基地的士兵们心中难免会有不满的情绪，而从海路匆忙赶回罗马的新皇帝菲利普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当皇帝菲利普回到首都罗马时，发现大家对他的评价并没有他担心的那么糟糕。这和他对元老院毕恭毕敬的态度不无关系。在元老院议员们的心中，一直因为这位新皇帝的贝都因人出身而对其持轻蔑的态度。在过去，位于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沙漠地带，一直是骑着阿拉伯马袭击沙漠商队的贝都因盗贼的天下。后来执着于在境内确立“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罗马帝国，将这些沙漠之中的盗贼团伙收编为辅助部队。位于叙利亚沙漠中心的帕尔米拉之所以在罗马时期达到繁荣的顶峰，就是因为在沙漠地区也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被吸收进罗马军队的贝都因人，在这200年来从游牧民族逐渐转变为定居民族。因此，他们认为皇帝菲利普出身于贝都因人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管怎样，皇帝菲利普在首都罗马的这两年间，并没有遭到元老院的弹劾，普通市民也没有对其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平稳的局面，一是因为东方的波斯王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北方的日耳曼人也一直老老实实，二是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对元老院从始至终都表现出非常谦虚谨慎的态度，三是因为菲利普在政策层面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皇帝菲利普提案征求元老院通过实现法制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根据元老院的意见提出的。阿拉伯人菲利普在位期间共通过了以下几项法案：

一、没有皇帝辅佐机构“内阁”的同意，皇帝就无法提出法案。

二、被从首都流放的人全部回归。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被流放，所以实际上因为这项法令而回到首都的人数为零。这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元老院议员不会被从首都流放而制定的法案。

三、将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法制化的、赋予各行省总督的控诉权重新收归皇帝和元老院所有。

但是这项法案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切都是因为卡拉卡拉所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因为“安东尼努斯敕令”使所有的行省居民（除了罪犯之外）都变成了罗马公民，导致司法层面上的问题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曾经控诉权是只有罗马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而现在拥有这个权利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位于首都罗马的高级法院每天都人满为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才将控诉权下放到各行省总督的手中，而20年后菲利普又想要将其恢复过来。但是，在卡拉卡拉颁布的公民权法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不过是为了帮助元老院维持他们的既得权而做出的一种姿态。

四、地方自治体议员的后代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和父亲一样承担议员的责任和义务。

这项法案在历史层面上的意义远大于其政策层面的意义。罗马帝国地方议会的议员和元老院议员一样都是没有薪水的公职。因此这些职务被看做是在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条件上都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用以回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这些职务不仅没有薪水，甚至还需要任职者自己承担公共支出的费用。就算是“光荣职务”，也是需要凭借自己的财产来回报社会的“光荣职务”。但即便是这样的职务，仍然有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必须经过激烈的选举竞争才能够最后胜出。这只能说那时的罗马人拥有极强的奉献精神。

但罗马人对“光荣职务”的热情在进入3世纪之后逐渐冷淡下来。举世闻名的庞贝古城原本是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地方都市。时隔1800多年考古学家把它发掘出来后，至今在这些遗迹的墙壁上，还能够看到许多关于地方议会议员选举用的宣传画。但是，如果公元3世纪的地方城市也能够像庞贝古城一样完整保留至今的话，我们一定很难在那个遗迹的墙壁上找到类似的东西吧。就连当时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都尽可能地回避参与公职。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人正在逐渐失去其身为罗马人的

特质。

罗马庆祝建国1000周年

关于阿拉伯出身的罗马皇帝菲利普，在史书中最广为人知的记载，是他成功举办了罗马建国1000周年的纪念活动。自从罗慕路斯在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到公元248年刚好是建国1000周年。这个由拉丁人组成的国家却由一个阿拉伯人举办建国庆典，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奉行“败者同化”政策的罗马人来说，这恰恰是他们基本哲学路线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事实上，在从公元248年4月21日开始连续进行了3天的建国1000周年庆典中，这位阿拉伯人一直身着罗马式的托加，并且用托加的一角包住脑袋。而参加庆典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市民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罗马帝国所应有的样子吧。

白天和煦的阳光映照在人们的身上，夜晚熊熊的篝火照亮人们的脸庞，建国10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台伯河边庄严而隆重地进行着。伴随着庆典举办了各种竞技类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战车比赛和角斗比赛一应俱全。皇帝菲利普因为自己能够举办罗马建国100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打从心底里感到无上的荣幸，不惜自掏腰包花费重金将庆典打造得盛况空前。

这位出身于阿拉伯的罗马皇帝，对首都罗马的赞叹是发自真心的。当他来到这个被称为“世界之都”的大都市之后，曾经许多次在城里游览驻足，仍然百看不厌。而且每次他游览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自言自语，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就是拥有如此宏伟首都的国家的皇帝。

在叙利亚也遗留有数量众多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可见罗马时期的建筑物数量极其庞大。仅仅一个行省的城市都有如此规模，那么位于意大利本土的首都罗马，必然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要更上一层楼。公元1世纪时建造的公共建筑即便进入4世纪之后仍然保存完好而且一样能够

正常使用，除了鬼斧神工的建造工艺之外，历代皇帝坚持不懈的改造和修复工作也不容忽视。

所以在公元3世纪举办建国1000周年庆祝活动时的首都罗马，如果算上公元前的共和国时期的话，实际上是历经400余年不断建设而成的结果。罗马与其他地方的区别，不仅仅限于叙利亚，位于帝国西方的伦敦、里昂、科隆、维也纳以及布达佩斯等，在城市的规模和壮观程度上都完全无法与罗马相提并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文物，不管从品质上还是数量上都和现在罗马任意一个美术馆之中展示的古罗马文物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是在不列颠本土发掘出来的，而在古罗马时期不列颠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罢了。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地方行省与首都罗马之间可谓有天壤之别。因为皇帝菲利普在就任皇帝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首都，所以当他亲眼见到“世界之都”的时候，才会被其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罗马建国1000周年纪念硬币

但是，就在罗马人庆祝建国1000周年的同时，北方的日耳曼人也如潮水般南下涌入，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举入侵。这大概是历史对罗马人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吧。

很多研究者习惯将蛮族的大举入侵称做是民族的大迁徙。但从我个

人的观点来看，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的蛮族入侵，才称得上是民族的大迁徙。因为5世纪时入侵的蛮族，直接在侵入地居住下来。而公元3世纪时的蛮族入侵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时入侵的日耳曼人，在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之后只是进行了大肆的掠夺，紧接着便返回他们位于防线之外的领地。换句话来说，完全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

但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特别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对于这些蛮族的劫掠行径束手无策呢？

启蒙主义学说将其原因归结为罗马人喜欢在城市中安逸地生活，而不愿驻留在前线基地，长久以来这一观点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罗马帝国早在3世纪就应该已经崩溃了。可实际上罗马帝国却在随后的200年间一直在北方蛮族的骚扰中存续了下来。由此可见，罗马人完全能够忍受在前线的危险生活。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居住地的耕地面积无法满足他们的粮食需求，所以只能向罗马帝国境内入侵。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日耳曼民族所在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地，当时不管在地势上还是在气候上，都是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就连现在欧洲的主要粮食产区法国，在恺撒统治时期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罗马帝国在征服了高卢之后，为了保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让居民能够定居在那里，才进行了开垦荒地的作业，使曾经的狩猎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

但是日耳曼人与高卢人不同，直到3世纪他们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灵活地利用土地进行耕种。因此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地区的生活可以说是饥寒交迫，一直无法摆脱贫穷与饥饿的状态。但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他们的体格变得更为强健，远超当时的罗马人。而且有一句老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光脚的”日耳曼人在作战时也表现得异常勇猛。

当然，3世纪的蛮族已经不再像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期那样，身上只披着一件兽皮。而且从哈德良统治时期之后的罗马人也开始留胡须，所以也不能再以是否有胡须来进行分辨。但是蛮族一直以来留长发的传统仍然没有改变。因为罗马军队的士兵在战斗时需要戴头盔，所以只能留短发，而没有戴头盔进行战斗习惯的蛮族则全都是一头长发。到了2世纪初期图拉真统治时期，“图拉真记功柱”上刻着日耳曼人加入罗马军队作为辅助战斗力，但是他们在战斗时只穿着一个兜裆布。罗马军队对于其他民族的辅助兵在军装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允许他们穿着适合自己作战的任何服装参战，所以这种几乎全裸的服装应该是日耳曼人的活动服。

公元3世纪中期距离图拉真时代已经有150年，日耳曼人的外观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其内在的本质很难改变，亦即他们在提高生活水准时，不是以“汗水”而是以“鲜血”为代价。

2世纪的罗马人将居住在防线以外经常与自己发生接触的蛮族称为“近蛮族”，而将居住在更北方鲜有接触机会的蛮族称为“远蛮族”，但是进入3世纪之后，蛮族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远蛮族”南下向“近蛮族”发起了攻击，并且将“近蛮族”打败吞并，最终取代了“近蛮族”的位置。当这些只知武力掠夺的蛮族逼近罗马帝国边境的时候，给罗马帝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罗马帝国在2世纪五贤帝时期，就已经对“近蛮族”实施经济援助。罗马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那些居住在防线以外的居民的生活水平，防止他们入侵罗马境内。但是所谓的经济援助并非只在金钱方面，罗马开放了边境的市场，并且在军团采购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优先选择从对方购买，为的是帮助其实现经济独立。罗马人还特意向对方的部落族长赠送华丽且价值不菲的军装、武器以及马具，但是这些东西并不适用于实战。罗马方面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使蛮族罗马化。而这个从综合安全保障角度出发的政略，对“近蛮族”取得了非常成功的

效果。

但是，当进入3世纪，“近蛮族”被“远蛮族”吸收之后，这个政略的效果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而且与罗马式的经济援助相比，“远蛮族”更喜欢罗马帝国直接支付金钱。简单地说，就是要想不遭到蛮族的入侵，便老老实实地拿出钱来买平安。最恶劣的是，在罗马皇帝之中竟然出现了同意这一条件的人。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付出多少金钱的代价，都比遭到蛮族侵略要好得多吧。

就这样，曾经的经济援助，逐渐演变成弱小而富有的一方，向强大而贫穷的一方每年支付年贡性质的金钱。公元248年，在罗马帝国建国1000周年那庄严而华丽的庆典活动结束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多瑙河下游与罗马对峙的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哥特人，就对米西亚行省总督抗议年贡迟迟未缴。其实抗议也只是形式罢了，消息还没传到总督耳里，哥特人就已经大举渡河了。

虽然罗马方面立刻对此作出了反应，但因为敌人的目标只是掠夺，所以前来袭击的都是以骑兵组成的机动部队。而且他们还专门避开了屯驻有重兵的军团基地，专挑那些居民区大肆抢掠。罗马军队所能做的只有埋伏在蛮族抢掠之后的返回途中将对方击退，解救被蛮族掳获的平民并夺回战利品。但是即便如此，被蛮族破坏的城镇和耕地却无法恢复原样，当人们重返住地的时候，眼前所见的只有深深的绝望。

驻扎在多瑙河帝国前线的士兵以及当地居民，全都希望位于首都的皇帝菲利普能够亲临前线，带领罗马军队向蛮族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袭击。可是菲利普的做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阿拉伯人皇帝仅仅派遣了当时任首都长官的德基乌斯前往多瑙河前线。这不仅使因为没能及时阻止哥特人的来袭而深感悔恨的士兵们大失所望，甚至还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之情。

士兵们对菲利普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们远赴东方，实现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光复，结果却因为皇帝与波斯之间的媾和而将这一地区再次拱手让人。

第二，皇帝在首都罗马的政策完全是为了讨好元老院而制定的。而在前线奋战的士兵们对于那些整天在首都享受舒适生活和高高在上的元老院议员们，常常抱有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

第三，皇帝身为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自从就任以来便从没有在战场上出现过。而且，在这种众人翘首期盼的情况下，他都不肯御驾亲征，而仅仅派遣一个代理人了事。

士兵们对于被派来的德基乌斯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深深地感觉到菲利普果然只是一个“阿拉伯人”，根本不配做罗马帝国的皇帝。

德基乌斯在面对哥特人的战争中发挥出远超士兵们期待的能力。在他的指挥下，多瑙河防线得到了再次的巩固。随后一年间，哥特人的再度入侵也被其成功阻止。但是他的成功，却成为了士兵们发泄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公元249年的某一天，士兵们来到德基乌斯的住处，表达了想要推举其就任皇帝的意愿。

德基乌斯担心如果自己拒绝，驻扎在多瑙河沿岸基地的10个军团不一定会发生怎样的变故。于是他暗地里给位于首都的菲利普送去一封密信，在信中他说自己表面上接受士兵的要求出任皇帝，但是等回到罗马之后就会将皇帝的位置交出来还给菲利普。可是皇帝菲利普根本不相信德基乌斯在信中所说的话，于是他集结手下一切可用的力量，甚至连米塞诺军港的乘务员都被编入近卫军团。皇帝菲利普率领着这支临时编成的讨伐德基乌斯的部队开始北上。虽然菲利普对元老院表现出那样诚挚的敬意，但是元老院中都是一些十分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因此当菲利普出阵之时，元老院议员们全都谎称抱病逃回了自己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

不但被扣上了谋权篡位的罪名，而且讨伐军也在逐渐向自己逼近，别无选择的德基乌斯只能挥军南下，双方部队在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遭遇。但是这场内战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战斗便宣告结束。被自己手下的士兵抛弃的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普，在被对方俘虏之前选择了自杀。元老院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作出对菲利普进行“记录抹杀刑”（Damnatio Memoriae）的决定。将名字和业绩从帝国一切的官方记录中抹除，这对于极其看重个人荣誉的罗马人来说，是最为严重的惩罚。阿拉伯出身的皇帝菲利普，在这方面倒是得到了和尼禄相同的待遇。

皇帝德基乌斯（公元249—251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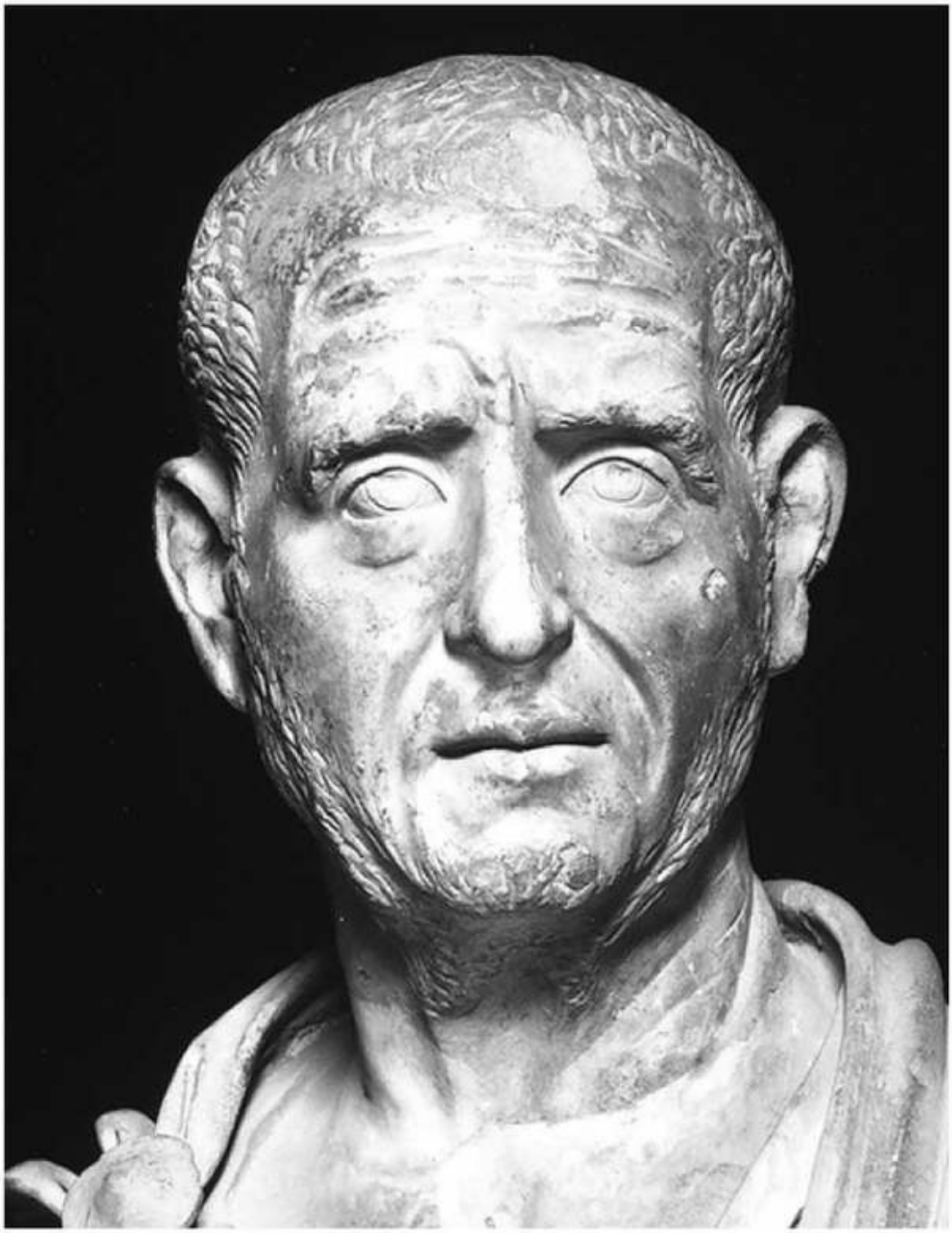
德基乌斯也是一位行省出身并且最终爬上皇帝宝座的人。他出生于远潘诺尼亚行省的希尔米乌姆（今米特罗维察），毗邻近西米亚行省的首府，现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同时也是第四弗拉维军团的军团基地。另外，远潘诺尼亚行省的首府，现在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当时是第二辅助军团的军团基地。因此，虽然希尔米乌姆不是军团基地，但是全权负责军团基地的补给任务，换句话说，德基乌斯出生于罗马帝国的最前线地区。

他和图拉真与哈德良一样，都是出身在意大利本土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与当地的女子结婚所生的后代。当他成为皇帝之后，曾经申请元老院承认他在名字前面加上“图拉真”的姓氏，由此可见德基乌斯的祖先大概是在150年前随图拉真进行达契亚战争的军团兵。以希尔米乌姆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出现了许多最终坐上罗马皇帝宝座的人，德基乌斯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但是，他和后来的皇帝不同，据说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家。他之所以加入军团，完全是因为在前线地区每天都接触军团士兵和行军打仗的场面，由此习惯性地选择了当兵而已。

他从17岁开始的军团生涯似乎十分顺利，最终在45岁的时候成功进入元老院。虽然如果是元老院阶级出身的人，只要30岁就可以在元老院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对于出身于行省的德基乌斯来说，即便晚了15年仍然算是非常成功的。他结婚很晚，妻子是首都罗马上流阶层人家的女儿。两个儿子都在首都罗马接受教育。在皇帝菲利普统治时期，他担任相当于现在首都市长的首都长官，表现出极强的行政能力，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因为他有丰富的军队任职经验，所以当哥特人入侵之时，皇帝菲利普派他前往远米西亚行省，实际上也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身为皇帝的德基乌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非常出众的能力，可以说正是罗马帝国最为需要的人才。但是他的不幸之处在于，当时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刚好在这个时候将积攒多年的力量一股脑地爆发出来。

在一个男人堪称黄金年龄的40多岁登上皇帝宝座的德基乌斯，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多瑙河防线。眼下多瑙河防线已经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因此在首都享受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们对皇帝的这一决定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沿线总共布置了10个军团，相当于罗马帝国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问题是这10个军团相互之间缺乏联动，如何灵活运用这作为主要战斗力的6万军团兵，成为摆在德基乌斯面前的一大难题。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多瑙河，沿途流经现在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最后注入黑海。虽然罗马军团设置在多瑙河沿线的基地都发展成为现在的重要城市，比如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贝尔格莱德，但是仅仅凭借这10个军团基地无法彻底封锁漫长的多瑙河。在相邻的两个军团基地之间，平均每隔10公里左右就会配有辅助部队、骑兵以及监视用的要塞等警戒措施，因此才称之为“防线”。



德基乌斯

将全部防线重新整顿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皇帝德基乌斯首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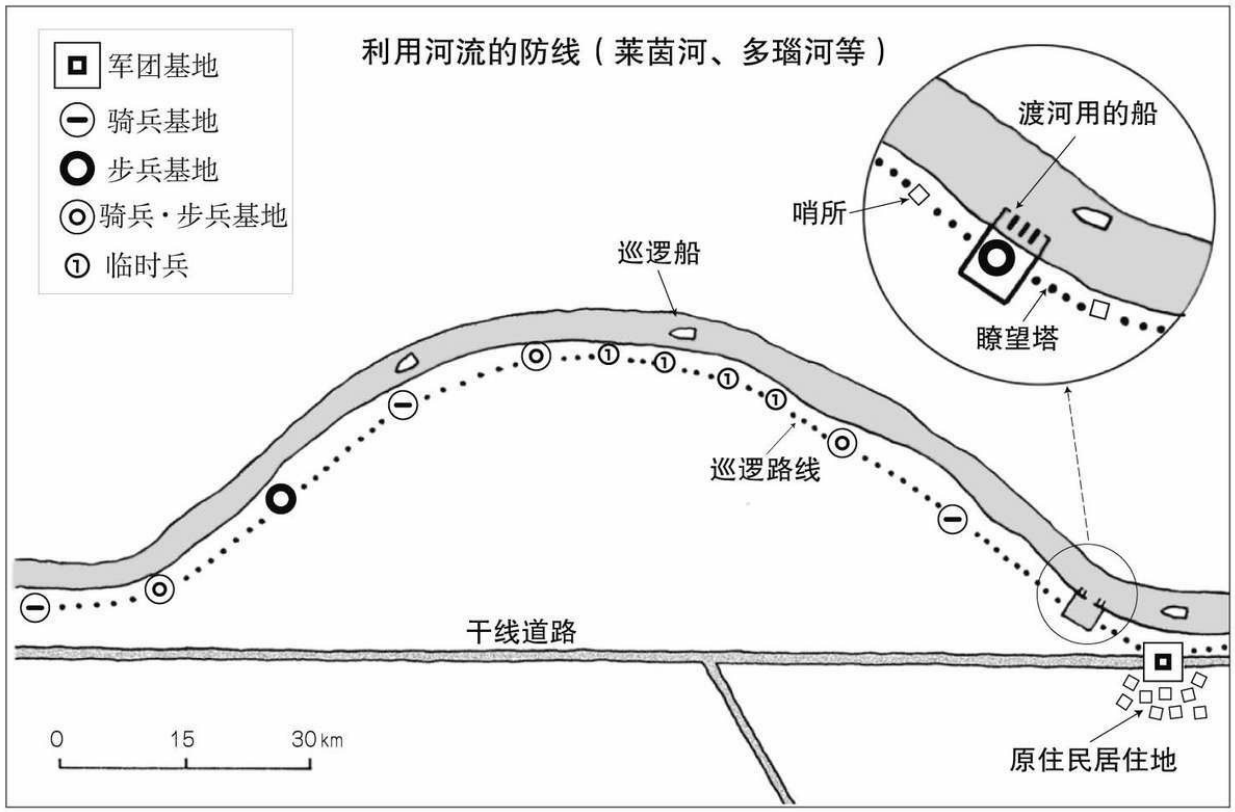
的，是将联结军团基地、城堡和要塞之间的军用交通网作了一次彻底的修复。眼看着多瑙河的对面逐渐被蛮族所占据，士兵们最怕的就是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交通网的修复则会使他们彻底摆脱后顾之忧。在修复了交通网之后，德基乌斯开始着手整顿军纪，重新制定军规。特别是对于那些驻守哨站的士兵来说，他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会影响到其附近整个区域的罗马军团。当德基乌斯死后，士兵们提议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reparator disciplinaemilitaris."（重整军规的人。）

皇帝德基乌斯不仅重新整顿了军团的纪律，他还尝试恢复社会纪律，并且真的付诸行动。于是德基乌斯也成为了对基督教实行迫害的皇帝之一。

镇压基督教（一）

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镇压，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与他们不同的神灵。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而多神教，与其说信仰的神灵数量多，不如说他们认可别人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不管你信仰什么神灵，都不会因此而获罪。但是如果信仰某宗教的信徒组建孤立的小团体，并且通过这个团体进行一些反社会的行动，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在现代法律上有一项条款叫做"破坏公共安全罪"，罗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就相当于将其看做"破坏公共安全"的团伙。

所以说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并不是为了压制他们的信仰，而是为了阻止他们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因为贤明的统治而被后世称为"五贤帝时代"的这段时期，同样出现了镇压基督教的情况。不过镇压的对象并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而是认定以传教布道为己任、并不断宣扬教义的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



（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除了皇帝尼禄为了转嫁民众对罗马大火的不满情绪而大量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之外，从公元64年开始直到公元250年的186年间，共有如下数量的基督教徒殉教：

图拉真统治时期，分别处以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2名主教极刑。

安敦尼·庇护统治时期，在首都罗马处以5人极刑。

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高卢的里昂有5人殉教。

从皇帝尼禄时期大量基督教徒殉教之后，直到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的34年间，有许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被流放，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因为其基督教徒的身份被处以极刑。随后直到五贤帝时代，因为信仰而殉教的基督教徒只有如前文所述的12人。

虽然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自己统治的后半段一改从前的宽容政策，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镇压，但也只是为了阻止基督教徒“秘密结社”进行反社会的活动，因为严禁秘密结社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起便留传下来的帝国方针。塞维鲁仅仅关闭了各地的基督教会，而并没有对基督教徒作出任何惩罚。而且那些被关闭的教会也在后来不知何时重新恢复了。

皇帝塞维鲁死后又过去了24年，在被称为“色雷斯人”的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期，偶尔会有教会的主教被人起诉。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对这些主教的惩罚也仅仅是流放而已。

上述的那些数字并非出自罗马帝国的记录，而是基督教会的记录。虽然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的罗马皇帝，无一不被基督教会看做暴君，但是在公元250年之前殉教的基督教徒仅有12人而已。

1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12人殉教，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即便对基督教进行镇压，殉教者的人数也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因为镇压的对象只是那些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个人。但是，将打击面首次扩大到一般信教群众身上的，就是皇帝德基乌斯。

因为他决定颁发一份证明持有者不是基督教徒身份的证明书。所以他的打击对象已经不再仅限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自从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以来，就连行省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因此他也能够趁此机会将那些广泛存在于行省之中的基督教徒一网打尽。

颁布于公元250年的这个法令，是皇帝在某一时期临时决定的暂时性措施。之所以颁布这项法令，是因为皇帝认为想要实现帝国的彻底和平和长治久安，仅仅依靠前线的士兵们抵御外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帝国全体国民在后方的大力支持。而基督教徒却将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罗马帝国比喻为堕落而邪恶的帝国，在面对北方蛮族和东方波斯王国威

胁的罗马皇帝看来，基督教完全是存在于罗马帝国之内的敌对势力。

这份证明书被称为“Libellus”。在帝国的每一个城镇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发放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被叫到委员会的市民，要在委员们的监视下参拜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然后将自己带来的香料点燃，在香料燃起的烟雾中发誓自己不是基督教徒。没有任何其他的确认和调查，只要经过这样的仪式就可以得到证明书。

但是，即便如此简单的仪式，也在基督教徒之间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围绕这件事，基督教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宁死守护自己的信仰，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程度的仪式只要装装样子骗取证明书，随后再继续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一样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当然在这种时候后者的做法明显是比较明智的，但德基乌斯的政策还是导致大量的基督教信徒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然而，即便普通的信徒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身兼传教任务的神职人员却并不那么想。于是那些神职人员便在被叫去进行祈祷前纷纷选择了逃跑。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就在这个时候躲了起来，不过他在公元251年的复活节，即第二年春天，便再次出现在迦太基。他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重返迦太基，是因为皇帝德基乌斯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国内的基督教势力了。

蛮族全面入侵

当时的哥特人，就如同即将决堤的大坝一样充满了危险。对罗马方面来说另一个不幸的消息是，哥特人居住的地区，正是多瑙河防线自古以来最薄弱的地区——多瑙河下游北岸。这一地区被分为近米西亚行省和远米西亚行省。德基乌斯在就任皇帝之前便曾经在这里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一带罗马防线的弱点十分清楚。

他不仅授予自己两个年轻的儿子以“恺撒”的称号，还在得知哥特人

的动向之后，又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使其成为自己的共治皇帝。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世袭皇位，倒不如说是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所作的准备。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必须使帝国能够顺利地运转下去。

元老院或许也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对于这两位尚无公职经验的年轻人成为共治皇帝一事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幸的是，事情果然按照皇帝德基乌斯预料的那样发展。

与作为新兴民族并且统一在国王领导之下的波斯相比，由众多部族不断地聚散离合所组成的日耳曼民族对于罗马来说更加难以应对。这并非因为日耳曼人与波斯人相比作战更加勇猛，而是因为想要搞清楚日耳曼人的动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1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多瑙河的南岸向北眺望，或许想象不到1800多年前的情景，但是只要你走出城市到郊外看看，就能够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一望无际的黑森林一直绵延至多瑙河岸边，在广阔河面的另一边向对岸眺望，根本无法发现对面的森林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罗马帝国经常安排船队在多瑙河上进行巡逻，但是即便在河中央向北岸眺望也很难看清森林深处的情况。所以罗马帝国在多瑙河防线的关键地区都建有军团基地，并且在相应的北岸修建要塞，在河面上用浮舟将基地与要塞相连。即便蛮族向北岸的要塞发动袭击，罗马方面也可以凭借完善的防御体系将对方击退。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交手，日耳曼人也不会再做出这样的自杀举动。而且他们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以另外一个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来看，日耳曼人偏偏又对人力损害不在意。

当罗马人意识到对岸的森林变得比平时更加茂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不知隐藏在何处的船只一下子全都涌上河面，中间载有战马、两侧排满水手的大量船只就好像要将河流截断一样向对岸飞速

前行。船底碰到岸边的岩石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出发的号令，从船上将战马牵下来的水手们也在此时摇身一变成为骑兵。

河边的防线和陆地上的哈德良长城与日耳曼长城不同，无法修建壕沟、栅栏以及城墙。即便罗马帝国在岸边像串珠一样修建了大大小小许多要塞和城堡，但是相互之间仍然有10公里到15公里左右的距离。而蛮族所挑选的登陆地点，就在这些没有防守的空白区域。当他们成功登陆之后，就会立即奔向有掠夺价值的城镇或是村庄，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那里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而等当地的士兵快马赶到军团基地通报有蛮族入侵的消息时，他们早已经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罗马军队之所以对蛮族的入侵束手无策，就是因为对方的袭击经常像这样突然而且又无法判断。

当日耳曼各部族之间逐渐合并起来，聚集在一个自称国王的人旗下之后，这位国王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势必要扩大掠夺的规模。于是蛮族的入侵开始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袭来，而且又一再发生。这成为3世纪中期的特色之一。但是即便蛮族入侵的规模不断扩大，想要判断他们的行动仍然十分困难。

对岸那茂密的森林之中，埋伏敌船（上面载着敌人以及他们的战马）的流域范围变得更广了。虽然各部族之间进行了合并，但是日耳曼人仍然没有组织化的军队，君王也不见得成了全军的指挥。各个部队仍然像从前一样，以部族为单位单独行动。这反倒使得他们的行动更加难以捉摸，甚至可以说正好点中了组织严密、行动统一的罗马军团的死穴。

不仅如此，北方蛮族的主要战斗力量由骑兵组成。相对的，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则由传统的步兵组成。像希腊和罗马这样的城邦国家，其城邦的公民，同时也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构成上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日耳曼人则没有“公民”这个概念，他们的军队是由各部族中最强壮的男人组成的战斗集团。这些战士与战马组合在一起，突击力更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且他们身为狩猎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战马在他们平时的生活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于马匹的饲养也颇有心得。

与一天只能行军25—30公里的步兵相比，骑兵一天可以行军75公里。同时，3世纪的蛮族与2世纪后期的蛮族相比，在规模上也要庞大许多。

虽然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但蛮族仍然没有转变为文明人，所以自然也没有兵站的概念。如果他们有这种逻辑上的概念，那么至少可以根据他们的补给点来判断他们的行动。但实际上这些蛮族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可言。面对这样一群不按常理出牌的敌人，罗马军队的士兵们没有一点办法。

哥特人

公元250年的夏天，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趁着多瑙河下游水量减少的机会，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虽然哥特人的国王尼瓦名义上是这次侵略行动的总指挥，但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依然以部族为单位各自单独行动。

蛮族的渡河地点选择在第一意大利卡军团基地的原所在地诺瓦埃（现在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附近，但是在公元2世纪末期，罗马帝国为了保证达契亚行省的安全，而将这个军团迁移到了上游60公里处的奥埃斯库斯。虽然在下游远米西亚行省的特洛斯特姆（现在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之中还有第十一克劳狄军团的军团基地，但是蛮族选择的登陆地点是在这两个军团基地的中间地带。

时任远米西亚行省总督的特雷波尼安努斯· 加卢斯在奥埃斯库斯得

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率军向蛮族的渡河地点进发。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丝毫不见大举入侵的蛮族踪影。因为这时候的蛮族主力部队早已经沿着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一路南下扬长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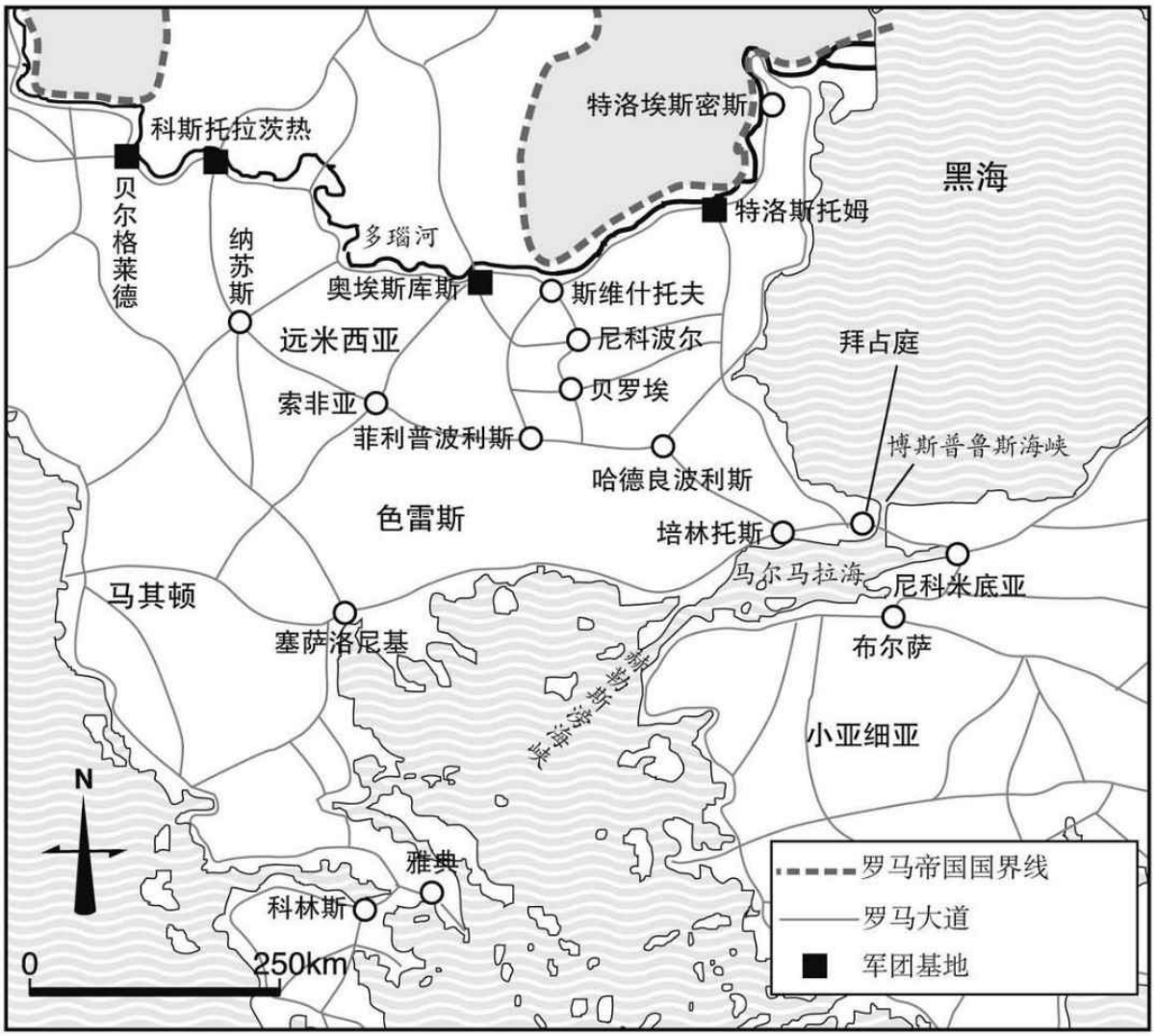
蛮族南下的路上，有对罗马军队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基地尼可波尔。如果这个补给基地遭到蛮族的劫掠，那么负责远米西亚行省防卫任务的两个军团将陷入彻底的瘫痪。但是，当年的蛮族并没有向尼可波尔发动攻击，而是一路南下径直朝着巴尔干地区的腹地——色雷斯行省进发。

虽然色雷斯行省并不是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但是距离多瑙河前线也并没有多远的距离。从西北到东南分别有纳苏斯、塞尔迪卡（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建设的菲利普波利斯、图拉真建设的贝罗埃以及哈德良建设的哈德良波利斯等罗马时代非常重要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个色雷斯地区是联结罗马帝国东方与西方的交通要冲。日耳曼人进攻的目标正是这里。虽然蛮族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就曾经攻打到了西班牙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是那时候的蛮族入侵规模很小，所以很快就被击败了，而这次却比以往的规模都要大很多。身在首都罗马的皇帝德基乌斯，因为曾经担任过米西亚行省的总督，所以对这一事态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决定御驾亲征，同时还带上了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的长子赫伦尼乌斯。小儿子奥斯特良因为身体不佳留在首都负责内政。对罗马帝国来说，还是头一次出现蛮族如此深入境内的情况。

名将之所以被称为名将，是因为他们能够指挥自己的士兵用他们最擅长的方法来进行战斗。而对于罗马军队来说，在平原上布阵进行会战就是他们的绝对强项。因为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在平原作战的罗马军队能够通过最小限度的牺牲取得胜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但是要想将这一战略应用在巴尔干地区，就必须将分散于各处忙于掠夺的蛮族引诱到一起，然后一网打尽。皇帝德基乌斯大概就是想要采取这

种战术，于是他和自己的儿子分别率领第一和第二部队从西方进军，同时命令色雷斯行省的总督普利斯库斯率领第三部队从南方进军，米西亚行省的总督加卢斯则率领第四部队从北方进军，意图将敌人赶到色雷斯的平原地区。

这个战术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将主动权从敌人手中抢过来。但是因为蛮族拥有速度优势，罗马军队只能不停地在后面追赶敌人的脚步，这样一来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对方的手中。名将如果在战斗初期被敌方占据了主动，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重新夺取主动权。因为只有掌握了主动权，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但是发生在公元250年夏季到251年春季的这场战争，完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罗马军队一直被在速度上占据优势的蛮族玩弄于股掌之间。



巴尔干地区与小亚细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军队会就此一败涂地。因为不管是哥特人还是汪达尔人，当他们与罗马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之时，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以罗马军队的胜利告终。就算无法取胜，但至少在场面上也是罗马军队占优。当德基乌斯得知尼可波尔和菲利普波利斯被蛮族包围的消息之后，立刻率军前去救援，结果敌军见到援军前来纷纷放弃了围攻，四散而逃。蛮族甚至都没机会接近哈德良波利斯。另外，在贝罗埃近郊处展开的大战，最后以罗马军队的大胜收场，战败的哥特军队甚至顾不上

带走掠夺来的战利品，一心只想着尽快渡过多瑙河逃回自己的领地。

但是，对于骑马的北方蛮族来说，石板铺成的罗马大道并不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的罗马大道主要是为了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重装步兵方便行军，以及运送重型攻城器械而设计的。而蛮族的骑兵即便在山野之中也可以不受影响地疾驰，巴尔干地区的山脉恰恰成为了他们的地形优势。

结果，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而罗马军队一直都没能够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罗马方面将全军分成了四路，并且每路都在努力地奋战，但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导致其迟迟无法彻底结束这场战争。虽然在场面上罗马军队始终保持着优势，但是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在四路部队中，最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皇帝之子赫伦尼乌斯所率领的第二部队就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

从森林之中突然出现的蛮族向第二部队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虽然赫伦尼乌斯在被动的局面下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儿子战死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正在不远处行军的德基乌斯那里。

皇帝德基乌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发誓要为儿子复仇的他立即率军向事发地赶去。当他与杀害自己儿子的敌军遭遇时，其他得知罗马皇帝动向的蛮族军队也如同发现猎物的鬣狗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敌军的数量顿时增加了两三倍。即便如此，皇帝德基乌斯依然没有丝毫的退缩。但是被复仇冲昏了头脑的他只顾着追击敌军，却没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沼泽地带。陷入沼泽之中的罗马士兵遭到蛮族的围歼，死伤大半，皇帝德基乌斯也在力战之后不幸身亡。他的遗体在战乱中沉入深深的沼泽之中，最终也没有找到。在混战中被杀的赫伦尼乌斯的遗体也同样不知去向。

石棺

罗马市内有很多美术馆，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尔忒弥斯的美术馆，以专门展示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刻作品而闻名。在这个美术馆最大的展厅内，有一具占据了整面墙壁那么大的石棺，这具石棺因为其最初被红衣主教路德维希收藏而得名“格兰第·路德维希石棺”（Grande Ludovisi）。石棺全长2.73米，高1.55米，宽1.37米。整体是一块完整的大理石，从正面到两边全都刻有精致的浮雕，浮雕最深处可达18厘米。虽然是公元3世纪的作品，但是保存至今依然完好无损，非常完美地体现了罗马雕刻技术的鬼斧神工。

这具石棺正面雕刻有长将近3米、宽1.5米的战斗场面。从双方武装可以立即判别，这是罗马军队与蛮族作战的场景。而这幅杰作的主角，正是公元251年与哥特人的战争中牺牲的皇帝德基乌斯的儿子赫伦尼乌斯。如果仅仅欣赏这幅雕刻作品，会使人感觉罗马是获胜的一方。因为在雕刻中央骑在马上的赫伦尼乌斯，怎么看都像是一副胜利者的模样。但实际上，在这场战斗中，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年轻的皇帝赫伦尼乌斯也战败身亡。

据说这具巨大的大理石石棺，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下令制作的。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死者的遗体，所以在这座石棺之中并没有遗体。而且在基督教统治罗马之前，罗马人一般都采用火葬的方式，大型的石棺更像是一种用来悼念死者的纪念碑，只能供活着的人寄托哀思罢了。如此巨大而精美的石棺，想必不管是材料费还是雕刻费都相当惊人，虽然赫伦尼乌斯的母亲出身于伊特鲁里亚的名门，但是肯不惜重金建造这样的石棺，足以证明这位母亲对自己英年早逝的儿子怀有怎样的悲痛之情。

据说这具石棺最早在17世纪于罗马与蒂沃利之间的提布尔提那大道旁挖掘得来的。一般来说，城市周围、大道附近都是有钱人的住宅区，罗马时期的首都郊外则分布着大量上层阶级的别墅。或许皇帝德基乌斯的妻子，赫伦尼乌斯的母亲就居住在这一带吧。要安置如此巨大的石棺，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别墅，或许在圆柱环绕的回廊一角，这座石棺一

面贴着墙壁，另一面正对着种满了鲜花、装饰有喷泉的美丽庭院，因为在这座石棺的正面和两旁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只有背面是空白的。

皇帝德基乌斯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在与蛮族的战争中阵亡的皇帝。但是，罗马帝国即便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仍然没能将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从巴尔干地区驱逐出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与蛮族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且，不仅皇帝德基乌斯，与他共治的儿子赫伦尼乌斯也一同阵亡。虽然在首都还有与德基乌斯共治的另一位儿子，但是正在作战的前线一刻也不能没有最高司令官。

路德维希巨石

于是以远米西亚行省总督的身份参加对蛮族作战的加卢斯被士兵们一致推举为皇帝。虽然大家希望他能够继续作战，将蛮族彻底赶出罗马帝国，但是这位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并且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新皇帝，却选择了与蛮族媾和。

与蛮族的媾和

罗马帝国所选择的媾和对象，是在蛮族之中实力最强的哥特人。

罗马方面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蛮族撤出罗马境内，返回多瑙河对面他们自己的领地。代价则是接受哥特人的全部要求。哥特人不仅可以得到掠夺来的全部物品，甚至还可以将俘虏带回他们的领地。而且从今往后每年罗马还会向哥特人缴纳贡金。

在这样的条件下，哥特人自然非常痛快地签订了和约。顺利实现媾和之后，加卢斯将埃米利安努斯任命为远米西亚行省的总督，自己则立即返回了首都罗马。

但是，这个时期袭击罗马帝国的并非只有北方的蛮族。一场非常严重的疫病也同时笼罩在罗马帝国的天空，就连首都罗马也难逃疫病的侵袭。德基乌斯的儿子霍斯蒂利安在这场疫病中不幸身亡，加卢斯也因此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不过他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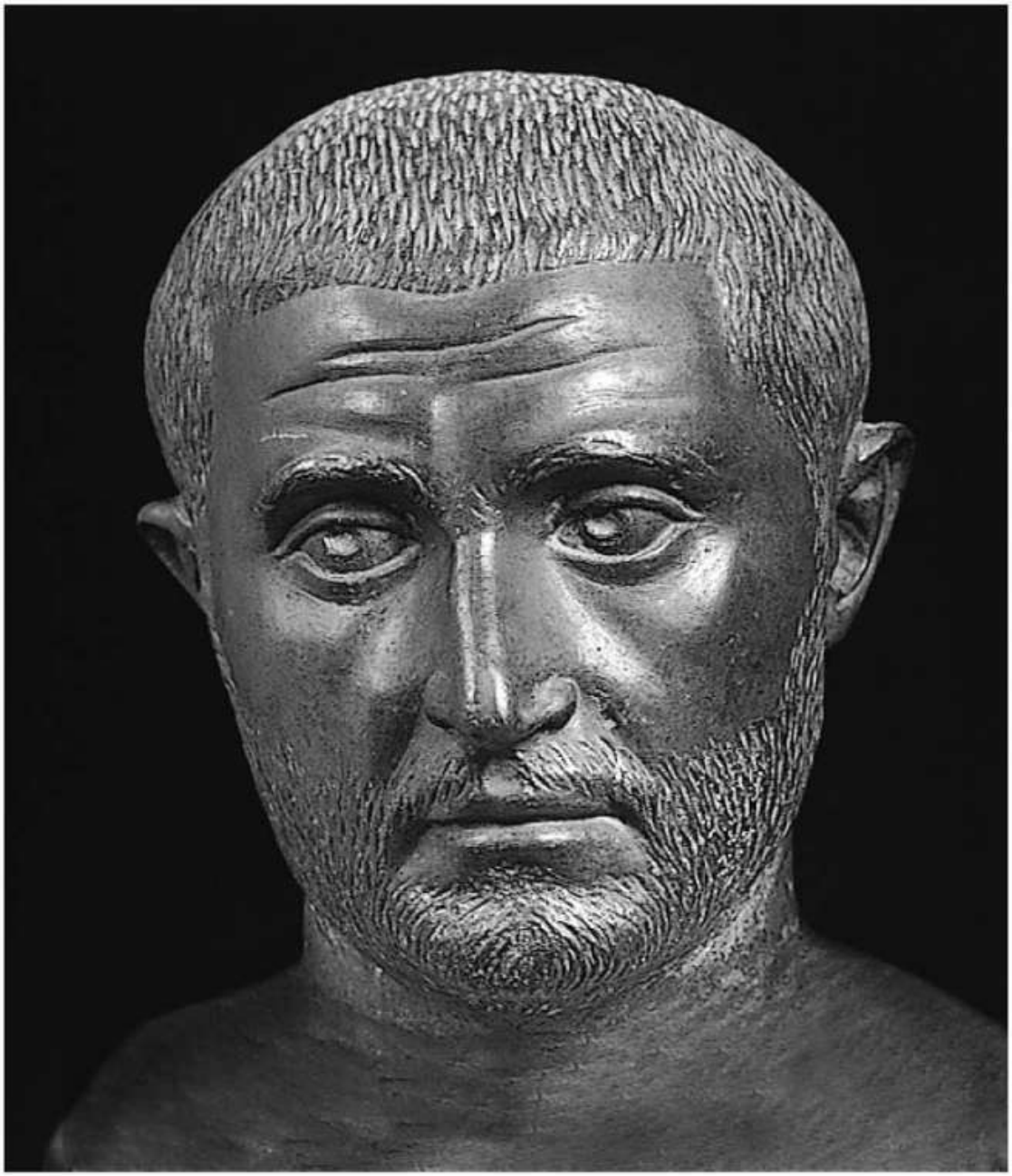
在多瑙河附近的远米西亚行省（现在的保加利亚）担任总督的埃米利安努斯，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行省（现在的摩洛哥）。他对于皇帝加卢斯在面对蛮族之时的懦弱表现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慨。当对皇帝的媾和做法十分不满的士兵们发现自己的司令官也怀有同样的心情时，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总督埃米利安努斯不承认皇帝加卢斯与哥特人之间的媾和条款。那些被蛮族掠夺了财产并俘虏了家人的罗马士兵，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再次看到了复仇的希望。愤怒的罗马军队越过多瑙河突袭了哥特人的居住地。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有准备的攻击，而且罗马方面仅仅出动了1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即便如此，仍然达到了他们复仇的目的。他们成功地将被哥特人俘虏的亲人重新抢了回来。终于发泄了心中的怨愤而心情

大好的士兵们在返回基地之后立刻拥立他们的司令官埃米利安努斯为皇帝。不过埃米利安努斯在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哥特人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因为罗马的皇帝加卢斯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和约，所以给哥特人留下了罗马帝国非常软弱的印象。于是他们甚至不顾与罗马方面签订的和约，立刻着手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了居住在日耳曼长城之外的阿拉曼人。阿拉曼人也是日耳曼民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现如今居住在德国西南部的德国人仍然还保留有“阿拉曼人”这个称呼。阿拉曼人不断地向罗马行省总督索要贡金，并且提出增加贡金数额的要求。而且交涉过程中，他们已经不使用“经济支援”一词。身为行省总督的瓦勒良也因为不满皇帝加卢斯的做法，而果断地拒绝了阿拉曼人的无理要求。结果日耳曼长城立刻遭到阿拉曼人的全面入侵。而与此同时，因为上一次的入侵而尝到甜头的哥特人也在此挥军南下，侵入罗马境内巴尔干地区。



加卢斯

日耳曼民族第一次来到地中海

从公元252年到公元253年，共有30万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而且，蛮族在越过多瑙河之后已经不仅从陆地上发动攻势，从这一年开

始，北方的蛮族甚至开始出现在海上。

这一点，显示出蛮族在战略层面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因为蛮族意识到正面进攻罗马帝国的防线，只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且不会获得多少收益，所以他们开始选择军团基地之间的空虚地带突破。但是即便如此，当蛮族带着战利品返回自己领地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等待多时的罗马军团的伏击。运气好的话，他们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要是运气不好，他们全都得客死异乡。毕竟以蛮族的战斗力还无法与罗马的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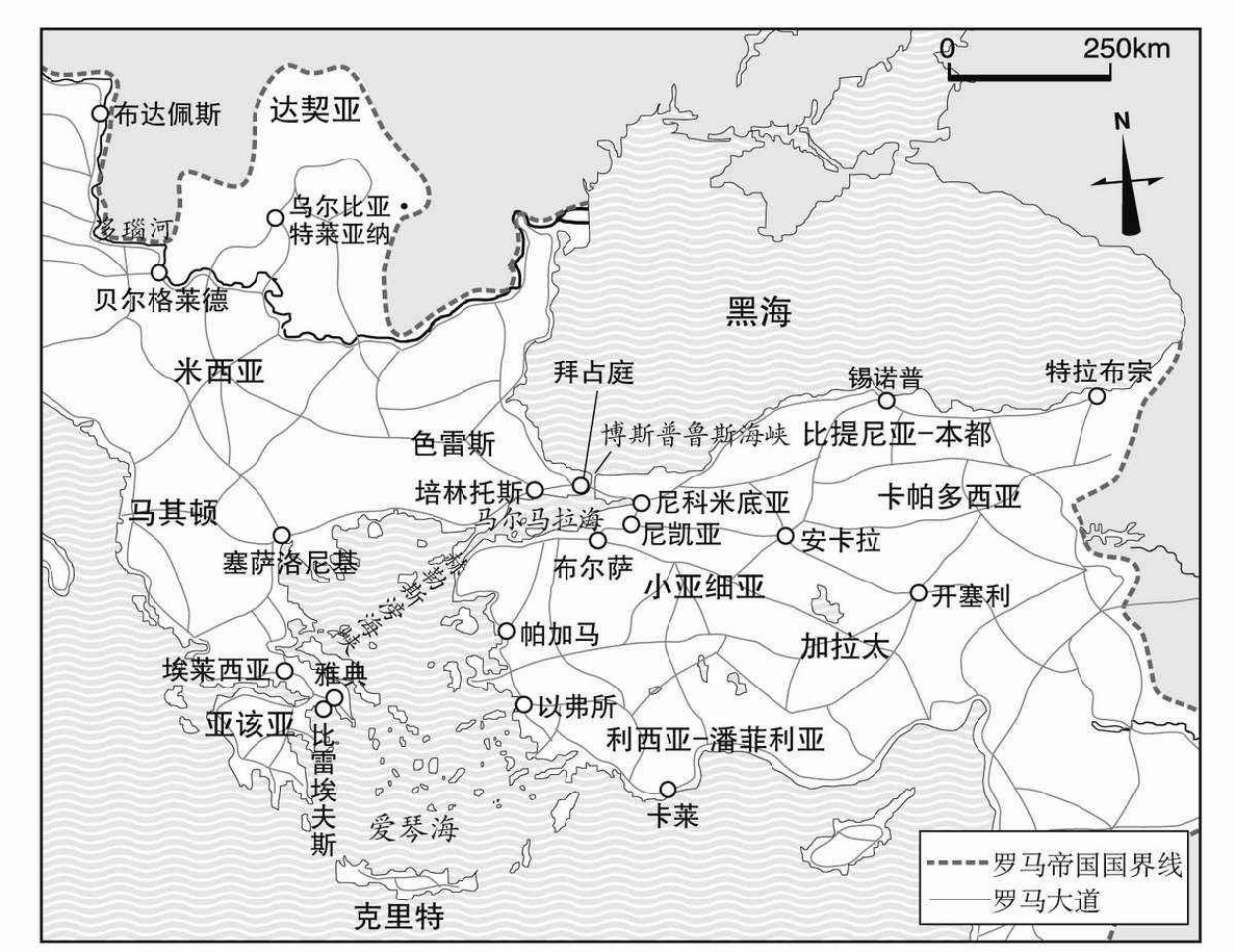
于是蛮族想出了一个新主意，那就是不与防线发生正面接触，绕过防线从背部进入罗马境内。于是他们突破多瑙河防线，经由黑海抵达爱琴海，向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富裕城市发动袭击。

这个战术是非常正确的。虽然黑海之上有罗马帝国的巡航舰队，但是舰队基地都设在马尔马拉海深处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作为海军基地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因为黑海地区自从罗马帝国开始统治的300年间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也就是说，在黑海之上的商船和渔船在这300年间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的侵扰。但是黑海之中的和平被哥特人彻底打破了，他们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和渔船据为己有，并且强迫船上的水手为他们效力，就这样，原本与大海无缘的哥特人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海上通行的能力。要想容纳30万大军至少需要1500艘以上的船只，虽然黑海之中的船只无法达到这个数量，但是在哥特人经过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的南下途中，又陆续在沿岸的港口抢夺了不少的船只，所以掠夺1500艘船只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说起海盗，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他们会袭击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对其进行烧杀抢掠，但实际上这只是海盗的一面。海盗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会出其不意地从海上来到陆地进行烧杀抢掠，得手之后又乘船扬长而去。即便是在地面上防守严密的大城市，在面对海的一面的防守

一般来说都比较薄弱，又加上当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渗透海上300多年。而原本是一群山贼的日耳曼人之所以会这么容易地变成海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3世纪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和平的生活。

虽然和平是无价之宝，但如果醉心于和平，那么便会很容易失去它。也许大家曾经在好莱坞的影片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群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将聚集在广场上的市民赶到一旁，然后大摇大摆地横穿过去，实际上这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场面。健全的国家与不健全的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究竟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而罗马帝国的军团基地就几乎全部位于国界线附近。即便是位于国内的军团基地，可以拿斯特拉斯堡基地为例。国内基地设在莱茵河或穿过黑森林的日耳曼长城附近，一接到敌人入侵的消息，马上可以派兵驰援。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都是为了防守罗马人称之为“Limes”的防线而准备的。因此，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很多行省中都没有军团基地。而在城市之中常驻有1000人守备队的也只有西欧的重要城市里昂以及北非的重要城市迦太基。其他的城市只有负责行省总督官邸安全的100余名士兵而已。



黑海 • 爱琴海周边

罗马帝国是由罗马公民统治的国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既是每一位罗马公民的愿望，也是通过每一位罗马公民来实现的和平。所以，罗马帝国才能够凭借其不足20万人的兵力，守护帝国长达300余年的和平。因此，在他们看来不会受到外敌入侵的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地区一个军团基地都没有。而哥特人从海上发动袭击的，正是这个地区。

从黑海通往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而产生巨大的激流，而且航路还非常曲折。虽然很多船只在这里触礁搁浅，但因为哥特人船队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还是有大量的船只顺利抵达马尔马拉海。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的拜占庭虽然在半个

世纪之后便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而成为东罗马帝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但在公元3世纪中期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而已。虽然哥特人并不将这个小城市放在眼里，但对强盗来说任何一个能够被称为城市的地方都不能够放过。

尼科米底亚首先沦陷，紧接着尼西亚也没能免于劫难，随后就是布尔萨。而以物产丰饶著称的比提尼亚行省就连都市附近的郊区都惨遭蹂躏。满载而归的哥特人的船队沿着马尔马拉海穿过赫勒斯滂海峡，继续向爱琴海进发。

虽然爱琴海分布着大大小小众多岛屿，但是哥特人绕过这些岛屿直接向雅典发动了袭击。位于雅典外港的比雷埃夫斯，面对从海平面上大举进攻的敌军毫无还手之力。城内几乎没有像样守备队的雅典，彻底落入哥特人的手中。而位于雅典北部不远处的埃莱西亚也同样落入了日耳曼民族的魔掌。

在顺利地实现了他们掠夺的目的之后，心满意足的哥特人满载着他们掠夺来的战利品北上凯旋。

不仅地面上的防线被突破，现在就连海上的和平也宣告结束，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公民们首次感到无比的震惊。对蛮族的恐惧，以及因为不断蔓延的疫病而产生的绝望，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守护罗马的众神身上。神殿之内挤满了前来祈祷的人群，神殿前的祭坛上摆满了献祭的牲畜，用于祭祀的香火源源不绝。国难当头，罗马市民全都虔诚地为国家祈祷，唯有基督教徒对此反应冷漠，于是人们将积压在心头的不满情绪全都向基督教徒发泄出来。

虽然被起诉的基督教徒并没有被处以死刑，但是罗马国内对基督教徒的厌恶和迫害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因为皇帝加卢斯对蛮族的懦弱政策而感到不满的，也不

仅仅限于防守多瑙河防线的士兵，位于日耳曼长城附近的士兵同样对皇帝充满了愤慨之情。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直到阿拉曼人被击退为止，皇帝都未曾在前线出现过一次的时候，对皇帝这种消极态度的责备声更是日益高涨。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米西亚行省的士兵那样拥立埃米利安努斯为皇帝。或许是因为埃米利安努斯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行省，而且身上还有当地原住民的血统。于是他们决定拥立自己的司令官瓦勒良为皇帝。

当年与尤里乌斯· 恺撒共同创立了“三头政治同盟”的另外两名是庞培和克拉苏，瓦勒良正是出身于克拉苏所属的李锡尼乌斯家门。因为其家族从共和国时期就是名门望族，所以他的家族历代都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一员，如果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是罗马帝国中最上等的人。而对于人类来说，越是在乱世，越期待有这样的“贵人”来拯救他们。

当瓦勒良也被他手下的士兵们推举为皇帝之后，原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罗马帝国，又陷入了同时出现3位皇帝的混乱状态。

但是，在皇帝由军团兵推举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最终演变成内战，实际上也不会出现罗马士兵自相残杀的局面。内战的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士兵更加支持哪一方。发生在公元253年的这场内战也是如此，首先，加卢斯与埃米利安努斯的军队遭遇，因为加卢斯手下的士兵全都倒向了埃米利安努斯一边，于是后者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埃米利安努斯又与瓦勒良发生了交战，但是这一次埃米利安努斯手下的士兵则投靠了瓦勒良那一边，最后剩下的瓦勒良成为唯一的皇帝。虽然内战仅仅从6月持续到10月便宣告结束，瓦勒良也在当年秋天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还是因为这场骚乱浪费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经常发生这样的骚乱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帝国实力不断消耗的一个典型事例。

皇帝瓦勒良（公元253—260年在位）

普布里乌斯·李锡尼乌斯·瓦勒良在就任皇帝的时候已经63岁了。在罗马人看来，63岁已经是应该退休的年纪了。瓦勒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授予自己37岁的儿子加里恩努斯“奥古斯都”的称号，元老院也承认他的儿子作为共治皇帝与他一同统治罗马帝国。由此可见，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单独一位皇帝无法应对的境地。

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共和国时期被称为“Imperator”。所谓“Imperator”指的就是带兵打仗的凯旋将军。因此，保卫国家的安全就是一个皇帝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前线发生战事，身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自然要身先士卒御驾亲征。但是对于3世纪的罗马帝国来说，因为前线多处战事频发，仅仅依靠一位皇帝无法面面俱到，这也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会出现这么多共治皇帝的原因。可以说都是因为外敌频繁入侵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瓦勒良就任皇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罗马全军的指挥官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整顿。皇帝亲自选拔人才，将那些怀才不遇的年轻将官破格提拔为军团的指挥官。不问出身与阶级，唯一被看重的只有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瓦勒良

这些完全靠实力说话的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多瑙河南部的潘诺尼亚以及米西亚这两个地区。因为这里临近罗马帝国的最前线，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有亲人在军团中服役。而且这里与意大利本土、希腊、高卢以及西班牙等先进地区相比，属于不发达地区。生于这个地方的人，如果家里没能力供他去首都罗马留学，那么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加入军团这一条路。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军人皇帝层出不穷，那些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军人，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瓦勒良破格提拔上来的人才。

镇压基督教（二）

似乎每一位认识到帝国面临的困境，并且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的皇帝，都会对基督教进行非常严厉的镇压。就连被公认为是贤帝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里昂也发生了基督教徒的殉教事件，而等到他的儿子康茂德继位之时，基督教徒不但没有继续遭到镇压，甚至连流放的情况都没发生过。与做皇帝相比更热衷于做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基督教徒遭到迫害的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说明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与一致性，也证明了每个皇帝对帝国统治的关心度各不相同。

罗马帝国长期以来对基督教徒一直沿用皇帝图拉真制定的政策，即只处理被起诉的教徒，而且处理基准和普通的罪犯一样。但是事隔150年，即在3世纪后半期，皇帝德基乌斯将这一规定更改为不管是否遭到起诉都可以对基督教徒实施镇压。也就是说，罗马社会开始正式将镇压基督教徒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方法之一。

虽然德基乌斯的这个政策由于蛮族入侵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但仍然使许多人被迫退出了基督教，还有1000余人因为誓死不肯退出基督教而殉教，另外还产生了一部分像居普良一样的逃亡者。

两年后，瓦勒良将德基乌斯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重新推广开来。他要求所有的罗马公民都必须拥有一份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证明书”。颁发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也被重新组建，开始继续运作。不过，发生在罗马社会内部的这场运动，并非仅仅出自皇帝一人的想法。

当时的罗马公民都对基督教徒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基督教徒却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逃避罗马公职，拒绝服兵役，而这些都是每一名罗马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自古以来就对一神教持否定态度的罗马人，终于因为3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天灾人祸而将积压已久的愤怒之情爆发出来，并且发泄在基督教徒的身上。

距离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使行省居民也获得罗马公民权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往行省人民可以免除罗马公民才应当负担的公务与兵役，如今却人人都是罗马公民。原本行省人民里的基督教徒比例较罗马公民高，如今这些教徒也要承担罗马公民的义务，使得3世纪的基督教徒政策更趋复杂。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说，如今教徒也是罗马公民了，却不愿意承担公民的义务。而教徒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他们承担帝国的政务。

历史学有个专有名词叫“护教论者”，这些人曾试着从基督教徒的角度为当时的行为辩护。护教论者反讽说，蛮族入侵怪罪到基督教徒头上，疫病爆发也怪到基督教徒头上，反正有什么事情都把责任丢到基督教徒头上就是了。

而在这个时期的人物，于公元253年过世的护教论者奥理杰内曾经向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表示：

> 信仰基督教的人，比罗马帝国的皇帝更加强大，比皇帝的所有行政官更加强大，甚至比罗马的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更加强大。罗马人信仰的神灵总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以及在皇帝像前的所作所为都将烟消云散。
>
> 因为蛮族的入侵而引发的这些惨剧，并不像罗马人所说的那样绝望。那些蛮族总有一天也会领悟到我们基督教的真谛，到那时，他们自然会抛弃那些野蛮而残酷的思想。所以，现在的惨剧，只是在蛮族皈依我们基督教之前，上帝对我们的考验。

我并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对其中那句“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非常感兴趣。或许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因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人也会皈依基督教。但是据基督教方面所说，他们所谓的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罗马皇帝。我认为这或许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吧。

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会拒绝效忠罗马皇帝，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罗马皇帝就是神。不过，只有死后被神格化的罗马皇帝才是神。而且罗马人所说的这种神，与基督教所信仰的神并不相同。因为皇帝在生前对罗马帝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罗马人希望他们死后也能够化为神灵继续保佑帝国的和平。虽然在罗马帝国境内到处都能见到皇帝的雕像，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将香料供奉在皇帝雕像的面前，意味着祝愿皇帝身体健康。而在皇帝雕像之前敬礼，就像我们现代人对国旗敬礼一样。也就是说，罗马皇帝的雕像，与其说是神像，更像是罗马帝国的象征。

对于这一点，基督教徒们应该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拒绝参拜皇帝的雕像，并且在将罗马帝国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开始积极地而且有意识地将这些皇帝雕像全部破坏。

所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抗争。

但是，瓦勒良和德基乌斯一样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基督教彻底镇压下去。因为对于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与镇压基督教相比，抵御外敌的入侵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在基督教方面的记录中，仍然将瓦勒良特别称为“基督教的公敌”，由此可见，虽然瓦勒良的镇压时间很短，但仍然是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公元257年，在将原本列为第一优先的帝国防卫体制彻底重整完毕之后，瓦勒良在继位的第4年颁布了一项针对基督教的临时措施法。不过这项法令仍然只是针对基督教会神职人员而不涉及一般信众，这项法令规定，基督教的一切祭祀活动以及基督教徒的捐款都被明令禁止。违反这项法令的人，将被直接逮捕并且处以流放或者死刑。

虽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因为这项法令而牺牲，不过神职人员阶级的殉教者却留下了明确的记录。

首都罗马的主教斯提法努斯在当年8月2日殉教身亡。8月30日，前面提到过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被行省总督逮捕并接受讯问。其实他这次也逃了出去，但是因为与教会有关的人受到了牵连，所以他才返回为其他人辩护，并且最后从容地选择死亡。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58年，皇帝瓦勒良好像乘胜追击似的，又颁布了第二项临时措施法。法令中重新规定，凡是拒绝参加祭祀罗马诸神活动的神职人员，都将被判处流放或死刑。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项法令初次将普通的信教群众也列入处罚的范围之内，而且导入了没收财产的概念。

第二项临时措施法不仅以神职人员为对象，还把对象扩大到信徒，尤其富有的信徒身上。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想阻止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继续扩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截断基督教会的资金来源。

罗马社会原本并没有独立且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教典，也没有教理，而没有教典和教理自然就不必向普通信徒进行传教，也就不需要专门负责传教的神职人员。在罗马社会中，维护神殿和举办祭祀活动等事宜，都是由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来负责，费用也由其承担。正因为罗马社会之前并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来负责这些运营活动，所以他们也一直不能理解由信徒捐赠资金，用于营运教会、培养教会相关人员、举办弥撒等教会事务的概念。直到因为外敌的频繁入侵而导致国库空虚，罗马帝国无力维持神殿的日常运作时，唯独基督教会的活动依然丝毫不受影响，罗马人才终于发现宗教可聚财的现象。

虽然罗马人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聚敛钱财，但身为当事人的教会内部对此清楚得很，而且基督教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派系纷争非常激烈。围绕教理所展开的争论，即便在被镇压的时代仍然火爆异常。关于教理的详细内容在这里就不予赘述。简单地说，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主教的位置

分出一个高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成功占据上位的主教，能够掌控信徒更多的捐款。

虽然从动机上来看教理论争非常令人不齿，但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一个宗教仅仅依靠信仰是无法存活下来的。教会要想保持宗教信仰的大旗，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而要想充分地发挥组织的机能，纯粹的信仰和强大的组织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维持一个组织的正常运转，金钱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说在罗马帝国晚期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恰恰反映出了这个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不变的真理。

虽然皇帝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已经做得相当彻底，但是因为波斯国王沙普尔再次向罗马帝国发动了攻击，迫使他无法继续对基督教进行镇压。对基督教徒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而直到公元303年皇帝戴克里先再次开始对基督教徒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止，居住在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徒得以享受45年的和平生活。

在这45年里有许多皇帝上台又下台，光是重要人物就有6人。并非因为德基乌斯与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感到后悔，所以才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在内忧外患面前根本无暇顾及基督教的问题。公元260年，在罗马帝国的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第二部分

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公元260—270年

波斯国王沙普尔

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外号为“阿拉伯努斯”（阿拉伯人）的菲利普与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签订的和约，罗马帝国失去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而且罗马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撤军，导致波斯势力得以渗透进入亚美尼亚王国。在随后的15年间，罗马帝国因为北方蛮族的不断入侵而一直疲于应对，波斯国王则趁此机会为向西方的进军作好了充足的准备。

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撤军之后，曾经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国界线——幼发拉底河——又再次成为了罗马与波斯之间的国界线。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帕提亚王国相安无事，现在的对手却换成了一心想要重振波斯雄风的萨珊王朝。因此波斯国王越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叙利亚，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情况。毕竟距离上次大战已经过去了15年，曾经被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近卫军团长官提梅吉提乌斯重创的波斯军队主要战斗力重装骑兵得到了充分的重整和再建，同时，在波斯人看来如果再不向西方发动攻击，恐怕复兴波斯帝国的理想就将失去号召力。

波斯国王沙普尔在首都泰西封整编大军的情报，通过叙利亚行省总督传到首都罗马皇帝耳中。

皇帝瓦勒良在继位当初便将儿子加里恩努斯设为自己的共治皇帝。在这6年间，瓦勒良一直在首都统治帝国全域，加里恩努斯则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日耳曼长城负责北方最前线的防卫任务。也就是说，两

位皇帝分别在首都和前线两地维持着帝国西方的和平。但是，当波斯军队大举入侵帝国东方之时，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前往东方进行抵抗。当时的瓦勒良已经70岁高龄，但是不知为何，他仍然执意亲自前往遥远的东方。或许在瓦勒良看来，相对于无法预知侵略规模与时间的北方蛮族，波斯国王率领的大军更加容易对付一些。于是他将帝国的西方交给儿子，而自己则亲自踏上了东征的道路。这样做元老院也同意。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是瓦勒良在与波斯的战争中依然一上来就占据着主动。这是因为他来到叙利亚之后，在当地又选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将官。之所以在当地选用人才，为的是更好地调动起当地士兵的斗志。在这些被瓦勒良选中的将官中，就有后来成立了帕尔米拉独立王国的奥迪纳图斯。

虽然皇帝瓦勒良号称统领7万大军，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当时因为罗马境内疫病流行，很多士兵都被从军团基地派遣出去帮助稳定疫情。但即便如此，在双方的交手中罗马军队仍然始终占据着主动，瓦勒良不仅将占领安条克的波斯军队赶了出去，随后还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就连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也是指日可待。

波斯军队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并不是因为波斯士兵的战斗力有多低下，而是因为他们的总司令沙普尔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带兵打仗的人。

在波斯萨珊王朝的历史中，沙普尔一世堪称最为著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给东方带来启蒙的君主。他不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拥有非凡的造诣，同时还深知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希腊与东方的学者都召集到一起，建立了一座科学与医学的研究中心，这就是在后世非常著名的“贡德沙普尔”（Gundeshapur）。不过他虽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只能用“无能”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人担任总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打了败仗。当然罗马方面也有不擅长战斗的优秀皇帝，比如奥古斯都和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都属于此类。毫无疑问，沙普尔一世也是这种类型。

但问题在于沙普尔是东方的君主，他的臣民们认为自己的统治者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拥有首屈一指的能力。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只有胜利才能够使他的臣民们得到满足。即便奥古斯都和马可· 奥勒留因为手段过于卑劣并且效果不甚明显而放弃的方法，沙普尔却不得不去尝试。

皇帝被俘

公元260年年初，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世界。罗马帝国上下尽皆骇然，就连居住在罗马帝国周边的人都因为这个消息而感到极度的震惊——罗马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俘虏。关于这个消息，波斯方面的记录如下：

> 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率7万大军朝我国进犯，敌我双方之间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我军成功俘虏瓦勒良。我军得此重大战果，趁势进攻叙利亚、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烧杀抢掠，将敌方居民俘虏为奴。岂知此地，原本就是我波斯帝国之领土。

沙普尔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而自己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自然要想方设法地流传下去。位于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位于现代伊拉克与伊朗国界线附近）以北不远处的纳卡西· 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的岩壁上，就留有记载这一内容的浮雕。

沙普尔一世骑在马上，罗马皇帝瓦勒良则跪在马前。站在旁边的另一位皇帝，则是在15年前为了缔结和约而答应了沙普尔全部要求的阿拉伯人菲利普。波斯国王征服了两位罗马皇帝，这既是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渴望向世人夸耀的辉煌，同时也非常直白地表现出3世纪的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的“关系”。

雕刻在纳卡西 • 鲁斯塔姆岩壁上的沙普尔一世与两位罗马皇帝

但是，关于罗马皇帝究竟是如何落入波斯国王手中的，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总之，瓦勒良率领的罗马军队与沙普尔指挥的波斯军队之间肯定是发生了战斗。在得知罗马方面正式出阵迎敌的消息之后，15年间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城市埃德萨与卡莱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斯的统治。沙普尔对此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波斯军队向这两个城市发起了攻击。而罗马帝国——15年前统治此地的统治者——自然也不能眼看着这两座城市遭到波斯的围攻而袖手旁观。于是皇帝瓦勒良与“7万”罗马大军赶去救援这两座城市，并且在当地与沙普尔率领的波斯军队遭遇。战斗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

但是关于这场战斗，最后的结果似乎是不分胜负。关于皇帝瓦勒良

落入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手中的原因，自古以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并非因为罗马军队战败，而是中了沙普尔的某种计谋。总之，如果胜利的天平明显倒向波斯一边的话，那么沙普尔也不用如此冒险玩弄策略了。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沙普尔所采用的计谋是假借双方首脑会谈的机会诱骗瓦勒良前来约定的地点，随后趁机将罗马皇帝与为数不多的随从一网打尽。

面对因为皇帝御驾亲征而士气高昂并且始终占据着优势的罗马军队，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的波斯军总司令官沙普尔，为了一举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而采取的这种方式，也确实符合波斯萨珊王朝一代枭雄沙普尔一世的作风。毕竟，他就是这样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皇帝瓦勒良被敌人生擒是千真万确的。在此之前的罗马皇帝，像马可·奥勒留以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是在与外敌交战的前线基地中去世的。还有德基乌斯父子，是在与哥特人的战斗中阵亡的。但是，被敌人生擒的罗马皇帝，瓦勒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个。

罗马军队以前也曾经出现过一位差点被敌军俘虏的最高司令官。这个人就是公元前53年率军远征帕提亚结果全军覆没的克拉苏。这位与恺撒和庞培共同组成三头政治同盟的巨头之一，在东方战败即将被捕之时，被身边的侍卫及时地用短剑结果了性命。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罗马的统治者被敌人生擒，从而避开了政治层面上的不利影响。但是公元260年的瓦勒良就没有这么幸运。难道是因为300年后皇帝身边的侍卫们失去了关键时刻弑君以保全大局的气概吗？还是说他们连做出这种举动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立即与皇帝分隔开了呢？

得知皇帝瓦勒良被捕的消息，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他们感到的并不是愤怒和绝望，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茫然和失落。发生在公元260年的这一事件，对罗马人精神层面所

造成的打击远远比物质层面要大得多。

因为这一消息而感到高兴的，只有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当时年仅10岁、后来成为基督教史学家的拉克唐提乌斯在其著作《论迫害者之死》中这样写道：

> 瓦勒良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位对上帝大不敬的皇帝。因为他的镇压政策，造成许多善良的人无辜身亡。但是上帝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给予这个迫害者以最为严厉的惩罚。这个令人欣喜的事例表明，上帝必将对基督教的敌人施以相应惩罚的佐证之一。
>
> 被波斯人俘虏的瓦勒良，不仅失去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也失去了他从我们手中夺取的自由。曾经的罗马皇帝现在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据说每当沙普尔要骑马的时候，都会命令罗马皇帝跪在他的面前，将他作为自己上马的垫脚石。瓦勒良的名字既是罗马帝国的耻辱，也是波斯人嘲笑和愚弄的对象。囚犯的身份使他生不如死。

这篇文章，是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写成的，属于基督教的官方记录。但是后世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内容并不都是事实。尤其是关于沙普尔侮辱瓦勒良的这段描述，多半是因为公元3世纪基督教徒出于对瓦勒良的憎恨，因此希望这个基督之敌落个悲惨下场，而到最后转化成文字叙述。

实际上瓦勒良在被捕后不到一年便因病去世了。毕竟他当时已经70岁高龄，而且作为共和国时期的名门之后，在元老院中也占有一席之位的上层阶级，仅仅成为敌人阶下囚的这件事就足以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吧。而且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被人称为东方第一位启蒙君主，可见也不是会做出那种野蛮行径的人。甚至那些与皇帝一并被俘的罗马官兵，都没有被他单纯地贬为奴隶。

波斯的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遭俘虏的官兵，让波斯人押解到首都泰西封，又往东渡过底格里斯河，最后到了现代的伊朗西南部一带。被波斯俘虏的罗马官兵实际数量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7万那么多。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既然是因为沙普尔的计谋而被一网打尽，那么这个数字大概在1万上下。沙普尔命令他们在波斯民族自古以来的发源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沙普尔深知罗马军团是号称“用丁字镐获取胜利”的战斗兵团，自古以来就以善于建造工事著称。而且波斯人在入侵叙利亚之时，也亲身体验到了罗马军团兵们所铺设的道路交通网络。所以波斯国王沙普尔决定利用一下这些罗马士兵的能力。

在得知竟然要为俘虏自己的敌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这些罗马士兵心中究竟会是怎样的滋味呢？但是不管建造什么样的工程，对于这些罗马士兵来说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他们身为俘虏，如果不听从波斯人的命令，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要不然就是被送到环境更加恶劣的矿山劳作，或者被送到奴隶市场变卖为奴。虽然他们建造的设施都将为敌国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但是既然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决定认认真真地建好每一座建筑，不负罗马人能工巧匠的称号。当时的那些罗马士兵，想必都是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才能够在波斯国内建造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吧。

即便敌人能够夺走他们肉体的自由，但是精神上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限制的。而精神上的自由之所以不受任何人的限制，是因为有自尊心的支撑。那些被波斯国王俘虏的罗马士兵，就是在自尊心的支撑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建筑。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波斯都建造了哪些建筑吧。

首先，他们建造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被沙普尔命名为“贡德沙普尔”，在波斯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沙普尔的武器”。这座城市与罗马帝国内的城市一样，都是模仿军团基地的正方形模样建造而成的。

在建成了这座城市之后，沙普尔将每一位罗马军团兵都单独作为技术指导，又给他们安排了很多工作。有人负责道路，有人负责桥梁，但所有这些都是公共设施。其中有三座兼具大坝功能的桥梁，历经1700余年的历史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三座桥梁全都位于舒什塔尔（Shushtar）近郊，除了作为桥梁之外，还具有蓄水以及向周围耕地供水的作用。

过去的Band-i-Kaisar（现已经崩塌，只剩遗迹）

其中被称为“Band-i-Gurgar”和“Band-i-Miyan”的两座桥梁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有三座桥梁中规模最大的“Band-i-Kaisar”，意为“皇帝桥”，一直到近代仍然发挥着作用。我并没有亲眼见过这座桥，但是从研究人员拍下来的照片上来看，与其说是桥梁，不如说其水坝的功能更为重要。

“皇帝桥”全长550米，或许是因为河床的原因，其形状并非直线，而是以弯曲的蛇形与两岸相连。支撑桥梁的拱形桥墩共有41根，其中35根都是建筑当初保留至今的，另外6根被近年来的大洪水冲毁，后又被重新修建。

这座桥梁不仅具有桥梁和水坝的功能，同时还是将河水引到舒什塔尔的水道。

支撑这座桥梁的41根桥墩都是正方形，长4.5米。夹在两根桥墩之间的拱顶高度受河床岩石的高度影响，从8米到10米不等。

最令专家们叹为观止的是，这座桥梁完全根据河床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一种最为坚固的建造方法。而且桥墩底部通过十分巧妙的设计将水流所造成的影响减轻到了最低。想必在这1700多年之中，这座桥梁也承受了无数次洪水的袭击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被俘的罗马士兵用他们的聪明才智，顽强地维护了罗马人的尊严。如果沙普尔命令他们到附近砍树赶工搭桥的话，也许他们会顶嘴说，要建这样的破桥宁愿去死。

皇帝加里恩努斯（公元253—268年在位）

罗马皇帝落入波斯国王手中的消息，在罗马军中，尤其是在军官群体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些将官几乎都是被瓦勒良破格提拔起来的，所以他们极其盼望另一位皇帝加里恩努斯能够率军东征，将被俘虏的父皇以及其他官兵营救回来，而且他们也都自告奋勇地想要随军前往。可是，加里恩努斯并没有那样做。应该说，局势不允许他那样做。

西方当前的局势不允许皇帝东征。罗马皇帝被波斯生擒的消息也同样传到了北方蛮族的耳中，因此日耳曼人的袭击必将愈演愈烈。要想进行东征，必须保证西方处于安全的状态之下。即便是五贤帝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展开大规模战役的实力，所以五贤

帝全都通过非常巧妙的方法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在公元3世纪，西方与东方的敌人全都变得异常强大。就算加里恩努斯也想进行复仇，却并没有多余的兵力让他这样做。

所以，42岁的皇帝加里恩努斯迫不得已放弃了他的父亲。在瓦勒良被捕的前一年，罗马帝国还在发行以他的头像为装饰的银币，但是在他被捕之后，这种硬币便彻底停止了铸造，甚至连官方的记录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当皇帝被波斯人俘虏的那一瞬间，他的存在本身就被从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彻底地抹消掉了。既然身为罗马皇帝的瓦勒良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即便这个人被波斯俘虏也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虽然这对于加里恩努斯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为了帝国的未来，他别无选择。罗马帝国从公元260年开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即便罗马帝国就此彻底崩溃恐怕也不足为奇。

前所未有的国难

罗马作为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皇帝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竟然被敌人所俘虏，如此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事件，对罗马帝国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首先，这件事对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对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在前线带领士兵守卫帝国的总督和军团长们。虽然这些人在刚刚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但是在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他们非但没有团结一致，反而变得四分五裂。人类社会每当权威扫地，不知为何，剩下的人四分五裂的概率总是要比团结一致大得多。也许是因为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消失了，结果一直以来被这股力量约束在一起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散乱了吧。总之，从此以后，罗马帝国进入了被后世称为“30位皇帝”的时代。

在北方的蛮族看来，罗马皇帝成为敌方的俘虏这件事，意味着罗马帝国的衰退。原本由于加里恩努斯在北方前线的英勇表现，蛮族在这7年中一直无法逾越防线半步。但是东方发生的变革，却给这些蛮族带来了继续入侵罗马帝国的勇气。

首先是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然后是阿拉曼人突破对罗马帝国来说相当于“要害”的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交汇处的日耳曼长城，翻过阿尔卑斯山直逼意大利北部。紧接着，哥特人也顺着多瑙河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在不久前曾经穿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西部与希腊进行掠夺。即便这次他们故技重施，罗马方面也束手无策。300年来守护帝国西方的“防线”，现在几乎处于全线崩溃的状态。

相比之下帝国东方的状况更加令人感到绝望，就连幼发拉底河防线甚至都已经不复存在。

波斯军队虽然不善于会战，但是在入侵掠夺方面却能够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威力。这是因为波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是重装骑兵。重装骑兵直到中世纪还是军队的主力，到了近代又拿起了火枪，转型为龙骑兵（Dragoon）。龙骑兵到了现代就转变成所谓的战车了。不管是重装骑兵还是战车，都是依靠速度和突击力取胜。也就是说，在公元26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东方遭到了波斯“战车”的无情蹂躏。

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并不是没有迎击波斯军队的战斗力量，而是没有将这些残存的罗马兵力集结在一起，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领导者。不仅如此，分散在各地的军团长还梦想着借此机会一战成名从而登上皇帝的宝座。结果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反倒被波斯军队所利用。在这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唯一积极果断、始终如一地与波斯军队抗衡的，只有一直被罗马人看做商人的帕尔米拉人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奥迪纳图斯。

公元261年，罗马帝国还遭到了疫病的袭击。不知为何，疫病总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继而扩散开来。这种被罗马人称为“黑死病”（鼠疫）的

疫病，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并不是在公元3世纪突然出现的。但是，因为这种疫病的流行而造成的危害，会因为国家陷入战争状态而变得更大。这是因为战争时期粮食不足而导致人民体质普遍偏弱，同时卫生状况也得不到保障。总之，这时候爆发的疫病比之前任何一次的情况都更加严重。

像这种持续性的灾害，与地震造成的危害一样。因为罗马帝国的领土幅员辽阔，其中很多地区都处于火山地震带上，因此自古以来罗马帝国就建立了应对地震灾害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基本分为三个部分，在灾害发生的同时，这三个部分同时发挥作用，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皇帝从国库中拿出援助金，作为向受灾地区民众发放的应急款项。

二、从距离受灾地区最近的军团基地中派遣军团兵，帮助受灾地区恢复基础设施建设。

三、从设置在元老院内的特别委员会中派遣调查团前往受灾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减免当地3—5年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

这个由罗马的第二位皇帝提比略制定的政策，被后来历代皇帝作为罗马帝国的国策沿用，即便到了3世纪仍然存在。但是3世纪后期的现实，使得罗马帝国的这个政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为了迎击不断入侵的敌人，导致罗马帝国的军费激增，皇帝的国库中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赈济灾民。

二、军团兵不是在抵御外敌的入侵，就是被将军们动员起来发动内战，根本无暇顾及受灾地区的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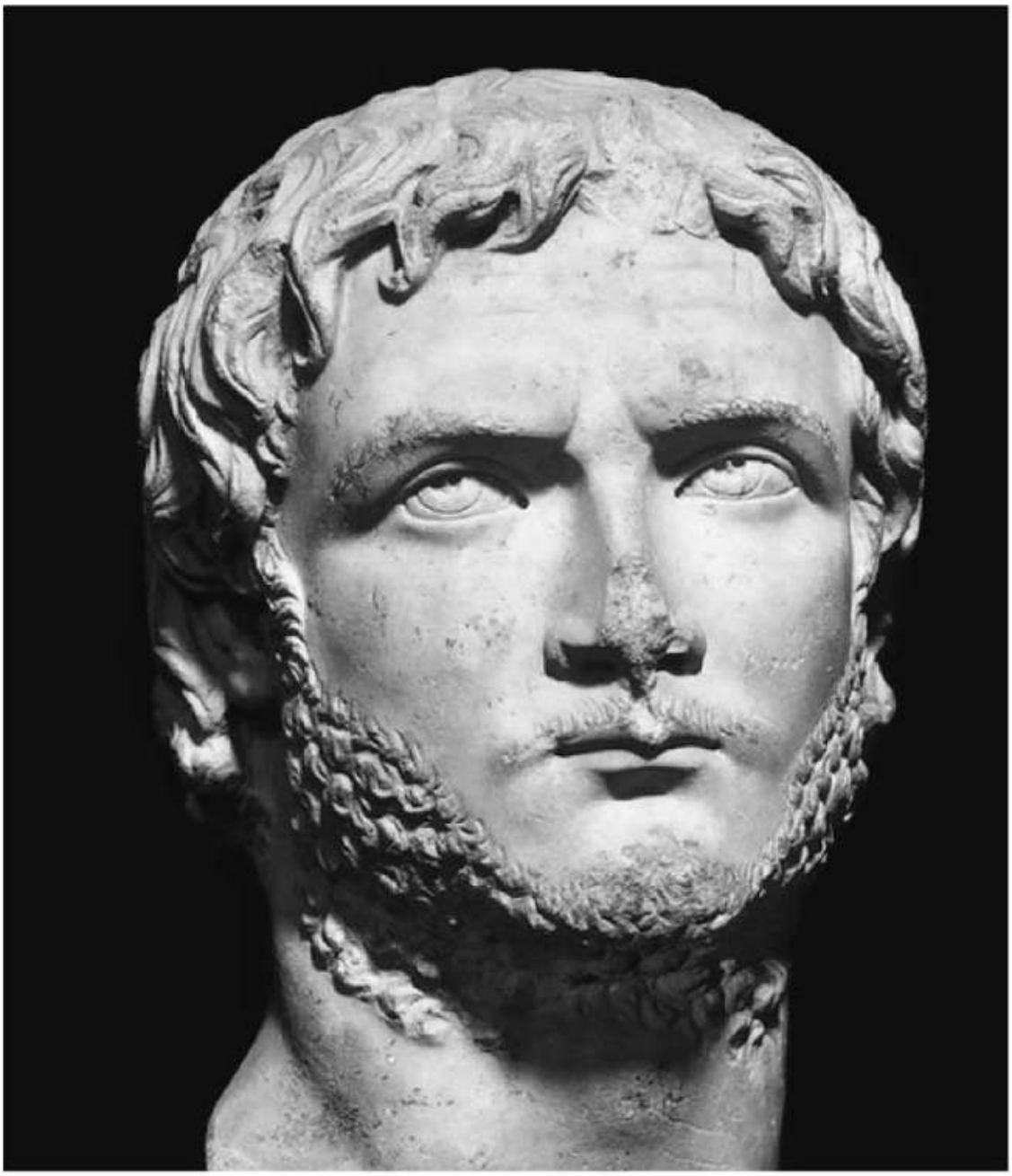
三、因为卡拉卡拉的敕令，行省居民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罗

马公民，因此行省税也不复存在。所以曾经的免税政策也随着这个税金的消失而变得名存实亡。至于其他的间接税以及营业税等，因为本身的税率就很低，即便免除，对灾民们的帮助也不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帝国的国库还要依靠战时特别税等临时税的征收来勉强维持，所以对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根本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

结果，受灾地区迟迟得不到重建，灾民们复兴家园的希望也变得渺茫起来。于是人们纷纷抛弃了毁坏的家园、抛弃了因为灌溉设施遭到破坏而无法耕种的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之中。

而且这种现象还不仅仅发生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那些因为蛮族的入侵而遭到破坏的地区，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因为接近前线而反复遭到蛮族蹂躏的地区。

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不只依靠配置在防线之上的军团基地。作为纯战斗集团的罗马军团，只有在周围居民的支持下，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其作为纯战斗集团的力量。深知这一点的罗马政府，特别鼓励那些服役期满退役的士兵继续居住在军团基地的周围，同时给予当地一般民众优惠税率，让军团向他们采购物资时可享受特别待遇，力图建造一个以军团基地为中心的城市生活圈。



加里恩努斯

在人们逐渐定居下来的同时，这片区域的周围环境也会变得更加适宜人类生活和居住。这就是罗马时期的军团基地和补给基地，即便经过中世纪漫长的荒废期，到了近代之后仍然能够以大都市的姿态复活的重

要原因。人类定居过的土地，会在无形之中留下生命的力量。即便会经历暂时的荒废，但是这个深埋在土地之中的种子总有一天还会生根发芽。由此可见，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就是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而其他地区广阔的国土变得愈发荒芜。

失去父皇之后成为唯一皇帝的加里恩努斯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现状。

这位全名叫做普布里乌斯· 李锡尼乌斯· 加里恩努斯的人，不管好坏，都是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人中精英的代表。

他不仅是3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从共和国时期便存留下来的名门之后，还具有非常好的教养。他十分热爱希腊文化，甚至迎娶了一位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他在希腊哲学上的造诣很深，最崇拜的哲学家是新柏拉图学派的普罗提诺。他还和哈德良与马可· 奥勒留一样，进行过依洛西斯秘密仪式。如果他出生在五贤帝时期的话，他一定会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保护和振兴文化都市雅典之上，并且在这个他无比憧憬和向往的地方充实而安稳地度过一生吧。可惜他生活在3世纪后期，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

不过加里恩努斯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只要他肩负着皇帝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责任，那么他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只不过，对于他的统治方法，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和后世的历史学家毁誉参半，因为他和在帝国兴盛期的1世纪与稳定期的2世纪进行统治的皇帝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自从公元260年瓦勒良被波斯俘虏这一前所未有的国难之后，一直到公元268年，皇帝加里恩努斯总共统治了罗马帝国8年时间。如果将他统治时期的所有事件全都逐一记录下来的话，不但身为作者的我会写花眼，身为读者的诸位也一定会看花眼。总之，在这8年中加里恩努斯几乎就没怎么回过首都罗马，而是一直奔波在帝国的西方不断地修补着已

经千疮百孔的帝国防线。而且他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防线外侧的北方蛮族，还有防线内侧觊觎皇位的军团长和总督们。

面对如此繁重的事务，皇帝加里恩努斯竟然还能够坚持得住，完全得益于他当时正处于42岁到50岁之间这段男人的黄金时期。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这个年龄正是男人肉体和精神都最充实的时候。

当听到皇帝被俘的消息之后，那些被瓦勒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以及罗马史上最大的危机，感到的只有茫然失措。而加里恩努斯却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并没有慌慌张张地去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而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这个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危机不会继续恶化下去。可是他的这个做法，遭到了前线的将官以及元老院议员们的一致反对。

高卢帝国

公元260年，当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的消息传到罗马帝国西方的时候，直接引起了一场事件，那就是名字听起来很威风的高卢帝国的创建。虽然这一事件导致高卢行省从罗马帝国之中独立出去，但实际上这件事的起因既不是叛乱也不是独立运动。

波斯图穆斯

这件事的起因源于负责莱茵河防线安全的两位将军之间的争论。在成功击退进犯的蛮族之后，这两位将军围绕着从蛮族手中抢回的战利品的处理问题产生了争论。波斯图穆斯主张将战利品分配给参加战斗的士兵，而希尔瓦努斯则主张先将战利品收归国库，然后再返还给那些遭到蛮族掠夺的人。双方各不相让，最后甚至升级到武装冲突。波斯图穆斯向希尔瓦努斯驻扎的科隆发起攻击。但是科隆的居民们一致认为不值得

为这样的事情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于是他们将总督希尔瓦努斯以及他的手下全都抓了起来献给波斯图穆斯。波斯图穆斯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全部处决。

可是在这些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是皇帝加里恩努斯的长子。当波斯图穆斯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晚了，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宣布高卢从罗马帝国中脱离出来。

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就这样诞生了，实际上并不是高卢的居民希望从罗马帝国之中独立出来而建立的国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独立之后的高卢不管在统治形式上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与罗马毫无二致。皇帝当然非波斯图穆斯莫属，同时每年还有两个人被选为执政官负责内政，作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也必不可少。高卢帝国的首都位于莱茵河附近的托利亚。虽然这个地方现在只是德国境内临近卢森堡的一个小城，在罗马时期却是比利时高卢行省的首府，与附近的亚眠与兰斯联系在一起形成一道坚实的屏障。将首都设立在托利亚，就是为了将包括比利时高卢行省的整个高卢地区都挡在其后面。

对于罗马皇帝来说，当然不能坐视高卢帝国的创建而置之不理。如果允许高卢地区从帝国之中分离出去，那么就意味着帝国将失去与高卢只有一山之隔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甚至连多佛尔海峡对面的不列颠也难以保全。

加里恩努斯首先尝试使用武力夺回高卢。但是波斯图穆斯手下拥有负责莱茵河防卫任务的4个军团，基地分别位于波恩、克桑腾、斯特拉斯堡以及美因茨。这4个军团都是常年与法兰克人交战的精锐力量，共4万人。加里恩努斯与波斯图穆斯率领的这4万大军总共交手了两次，结果是一胜一负。由此可见，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高卢帝国都没有一击制胜的能力，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双方都是同等规模的罗马军队。

于是加里恩努斯对高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知道波斯图穆斯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与当地居民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高卢人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每当高卢遭到蛮族入侵的时候，波斯图穆斯都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最前线。既然如此，只要在波斯图穆斯成立高卢帝国之后，拜托他和从前一样继续抵御法兰克人的入侵就可以了。就算波斯图穆斯的地位从曾经的罗马帝国总督变成了高卢帝国皇帝，但是他所肩负着的保护高卢地区不受蛮族入侵的责任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高卢帝国就这样被默许下来，直到公元274年重回罗马帝国版图，保持独立14年的时间。不过在这十几年间，高卢地区也得以免遭蛮族的入侵和掠夺。在国家利益面前，加里恩努斯不仅舍弃了他的父亲，就连杀害自己长子的深仇大恨也忍受了下来。

高卢帝国（公元263年）

但是，对于加里恩努斯放弃高卢地区的决定，从前线的官兵到首都的元老院全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因为高卢自从被尤里乌斯· 恺撒征服之后，一直是罗马化的代表性地区。同时高卢也是罗马帝国境内最安全的地区，就连货币的铸造厂都被安排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的贵金属资源。罗马帝国的金币与银币，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就一直在里昂铸造。现在分别属于法国与比利时的高卢地区中部与北部的广阔地区，

在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负责里昂铸币厂警戒任务的1000名士兵之外，甚至连军团基地都没有。高卢人很久以前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即便高卢帝国成立之后，他们仍然没把自己当做高卢人，而是依然将高卢看做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至于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就因为其自古以来便被罗马人称为“pr.vincia”（行省）而得名，其罗马化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被恺撒征服以前。皇帝安敦尼·庇护就出身于高卢南部的这个地区。

另外，罗马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后世把此地区分为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个地区也是通过罗马化的南法地区与意大利本土相连，如果包括南法地区的高卢地区全部独立出去，那么也就意味着图拉真与哈德良两位皇帝的故乡，也将被从罗马帝国中分离出去。

与高卢和伊比利亚相比，虽然位于边境地区的不列颠并没有为帝国提供任何一位统治者，但这一地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就连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经说过，大英帝国的历史是从尤里乌斯· 恺撒越过多佛尔海峡之后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将不列颠全岛都看做是罗马帝国的“防线”，因此当克劳狄乌斯皇帝征服不列颠之后，特意安排了3个军团常驻于此。哈德良皇帝在公元2世纪初期修建的哈德良长城（Vallum Hadriani）更成为后来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分界线。而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就是在这里抵御敌人入侵的时候，病死于约克的军团基地。

高卢、伊比利亚以及不列颠，早已经超出了罗马帝国行省的范畴，成为罗马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罗马帝国从前的这些历史，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罗马人无法接受这些地区从帝国之中被分离出去的现实。

加里恩努斯制定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将北方蛮族的部族之一阿拉曼人引入日耳曼长城以内。阿拉曼人经常突破这道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上

游的日耳曼长城入侵罗马帝国境内，现在加里恩努斯允许他们居住在防线内，但同时也将防卫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当时的罗马人认为这是因为加里恩努斯无法阻止阿拉曼人的袭击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甚至还有人传言说加里恩努斯爱上了阿拉曼人族长的女儿。但是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加里恩努斯之所以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因为他将守护帝国的重任寄托在蛮族的身上。但是，至少在当时，他的决定使这一带成功地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不过，阿拉曼人还是以建筑居住地的名义向罗马方面索要援助金，从蛮族的立场上来说，或许是将其当做不进行掠夺行为的贡金了吧。

不管怎样，这条由提比略提议、图拉真开始建设、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进一步强化、守护了罗马帝国250年的日耳曼长城，在进入3世纪后期不久便失去了它的作用。内卡河与黑森林再次成为任由日耳曼民族纵横驰骋的地区。

将莱茵河防线交给高卢帝国，将日耳曼长城交给蛮族之后，皇帝加里恩努斯得以将罗马方面残余的军事力量全都集中起来专心整顿多瑙河防线。不过他的这一举措只能够起到暂时性的作用，因为多瑙河一带的哥特人早已经拥有了抵达爱琴海的经验，并且还尝到了从海上进行掠夺的甜头。而要想阻止他们前往爱琴海，仅仅依靠多瑙河防线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将小亚细亚西部全都划入防御范围。小亚细亚地区与罗马帝国的东方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对于皇帝加里恩努斯来说，与在帝国东方凭借一己之力同波斯国王相抗衡的帕尔米拉的统治者奥迪纳图斯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帕尔米拉

帕尔米拉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刚好正中的位置，是叙利亚沙漠中首屈一指的绿洲。虽然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队的中转站，但被称为“叙利亚沙漠中的珍珠”而繁荣发展起来，却是在其被纳入罗马帝国统

治之后的事。

罗马人深知帝国东方以安条克为中心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东西方的贸易交流之上，于是罗马人将经常在沙漠中袭击往来商队的贝都因人吸收为帝国军队的辅助战斗力，从而实现了沙漠中的和平，帕尔米拉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地繁荣起来。分散在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城市都由罗马大道联结在一起，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同样存在于这一沙漠地区的最有力证明，帕尔米拉也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产物，因为商业贸易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通过这一地区众多遗留至今的文物遗迹不难想象出这里曾经的繁荣景象，而这些全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产物。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成为过去的时候，帕尔米拉也只能随之消逝。

据说奥迪纳图斯生于帕尔米拉的贵族家庭。不过帕尔米拉是以通商起家的城市，奥迪纳图斯想必也是出身于靠东西贸易发财的仕绅家庭，因为保卫帕尔米拉是罗马的责任，所以帕尔米拉人没有武将的血统，也没有身为武将的必要。

因此奥迪纳图斯的出现，意味着进入3世纪之后帕尔米拉周围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原本没有自卫必要的帕尔米拉，也出现了拥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并且还编成了自己的军队，肩负起自我防卫的任务。

帕尔米拉的遗迹

虽然在罗马军中有不少行省出身最后出人头地的例子，但是像奥迪纳图斯这样一开始就自己组建军队参战的人却是史无前例。当皇帝瓦勒良为了迎战波斯军队而来到东方时，奥迪纳图斯率领着自己组建的以弓箭为武器的波斯式轻骑兵团出现在皇帝的面前，瓦勒良当即任命他为罗马军队的正规司令官，并且同时授予他“vir consularis”（前执政官）的称号，能够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必须是元老院议员，而奥迪纳图斯并非元老院议员，由此可见，皇帝给他的待遇甚至比一般的司令官还要高。可以说这位帕尔米拉出身的武将，在罗马军中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站在非常高的起点之上。

两年后，皇帝瓦勒良被俘的消息传来，面对这前所未有的灾难，众多罗马高官不是茫然失措就是互相斗争，唯有奥迪纳图斯依旧保持着冷静。当波斯国王以为俘虏了罗马皇帝就等于征服了罗马帝国，趁势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叙利亚地区之时，正是奥迪纳图斯的英勇抵抗，才使得

沙普尔不得不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想法，返回幼发拉底河以东。而每当波斯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进犯之时，这种情形都会重复上演，使波斯军队每次都无功而返。

皇帝瓦勒良被俘，加里恩努斯又一直忙于帝国西方的事务而分身乏术，导致帝国东方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奥迪纳图斯自然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人看来，既然罗马帝国已经无力保护他们，那么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够保护他们的人身上。于是原本只是商业城市帕尔米拉一介武将的奥迪纳图斯，一下子成为了整个帝国东方唯一能够与波斯抗衡的人。

于是，皇帝加里恩努斯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奥迪纳图斯的力量。加里恩努斯任命这个帕尔米拉人为“Dux Orientis”，直译过来就是“东方总司令”，负责从分隔小亚细亚、叙利亚的托罗斯山脉起，到阿拉伯边界为止的帝国东方的防卫任务，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中近东整个地区。小亚细亚与埃及并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小亚细亚与多瑙河防线紧密相连，所以属于西方防卫体系，而埃及则是皇帝私人的领地，并不属于“帝国东方”的概念。

一般来说，保护罗马帝国东方的安全是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责。而东方总司令在罗马军队中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身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如此重要的职位竟然任命给一个帕尔米拉人，说明在公元260年时，罗马的东方防御体系已经形同虚设。

对于罗马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厚爱，奥迪纳图斯也用实际行动作出十分令人满意的回报。在公元260年到267年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帕尔米拉人对罗马皇帝一直都贯彻着被罗马人看做是最高道德准则的“信义”二字。虽然小亚细亚不属于奥迪纳图斯的防卫范畴，但是当他得知哥特人入侵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时候，仍然亲自率兵击退了蛮族的入侵。如果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也许加里恩努斯会和奥迪纳图斯建立同盟关系，并且授予他一直以来渴望的帕尔米拉国王的称号

吧。

但是皇帝加里恩努斯与奥迪纳图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却在公元267年的时候戛然而止。在一次庆祝战胜哥特人的宴会上，奥迪纳图斯被他的一个外甥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奥迪纳图斯的长子。

这次事件似乎完全是由于个人的恩怨所导致，最后以杀人者当场被杀的结果告终。奥迪纳图斯的妻子芝诺比阿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则表现得十分冷静。芝诺比阿是奥迪纳图斯的第二任妻子，她在丈夫被杀之后立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立为奥迪纳图斯的继承人，并且作为国王的监护人将实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帕尔米拉的女王芝诺比阿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帝国三分

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所以每当想到这里都会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一旦权力落入女人之手，就好像越过了不可跨越的界线一样。而且当女人执掌大权的时候往往喜欢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奥迪纳图斯不会做的事，芝诺比阿却毫不顾忌。为此感到苦恼的自然是皇帝加里恩努斯。因为从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帕多西亚到埃及的大片领土全都被帕尔米拉所侵占。

卡帕多西亚行省是帝国东方防线的北半部，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埃及行省则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领地，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粮仓，负责向意大利本土提供其所需小麦数量的三分之一。深陷帝国西方事务之中无法自拔的加里恩努斯眼看着芝诺比阿的嚣张气焰却无可奈何，而芝诺比阿则将此看做是罗马帝国承认了自己的统治权。

或许她认为罗马皇帝就算摆脱了西方的困境，也无暇顾及东方的重建，甚至她根本就认为罗马帝国已经无力改变现在的局面。不过即便如此，芝诺比阿还是宣布埃及地区仍然会像从前那样向罗马出口小麦。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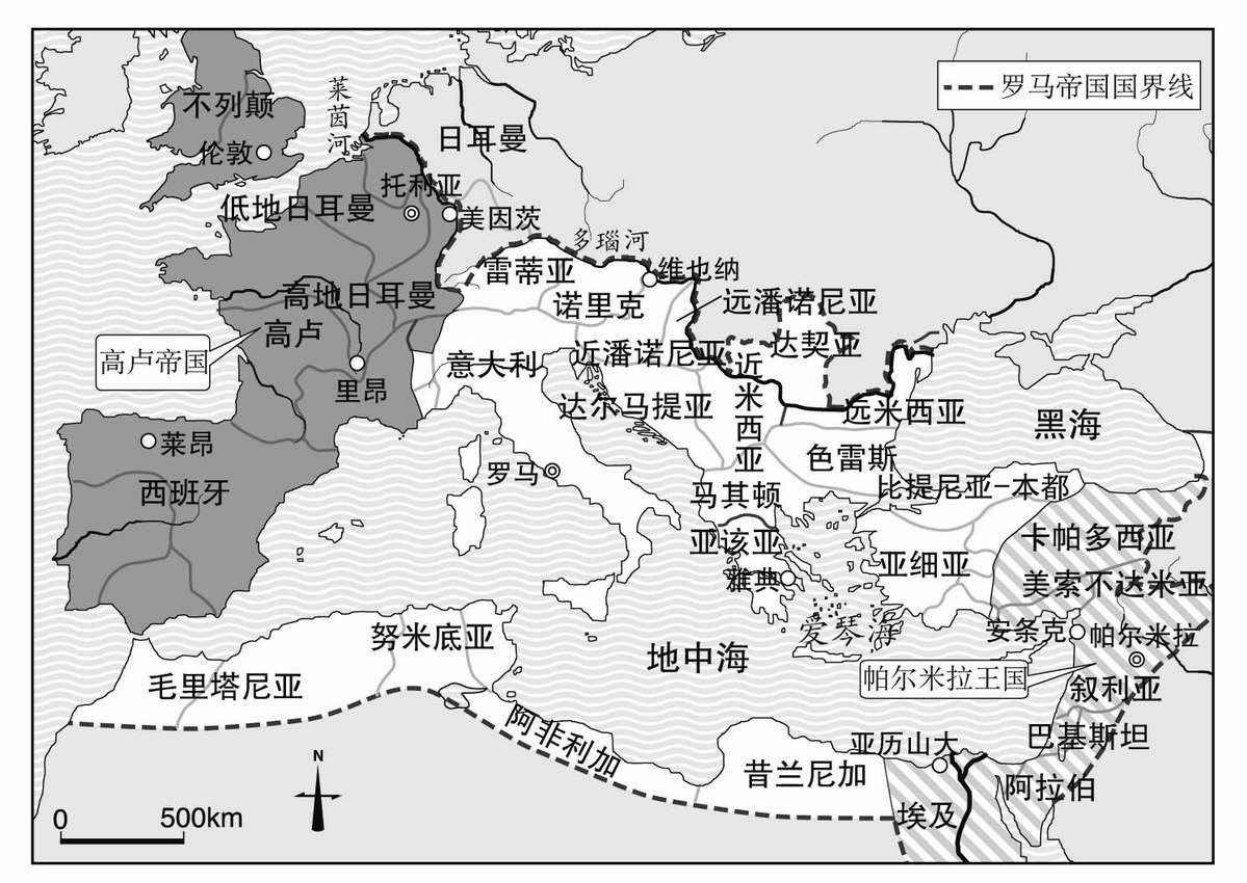
是对于已经习惯了将埃及作为自己粮仓300多年的罗马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纸宣言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为芝诺比阿对埃及的占领，导致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地位进一步动摇。自从公元260年父皇瓦勒良被俘以后，他一直将保持现有状况不会继续恶化作为自己统治的基本方针，但是卡帕多西亚以及埃及全都落入芝诺比阿的手中，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他并没能够阻止情况的恶化。

一条法令

在加里恩努斯所制定的法令中，或者说由他构思并实施的政策中，遭到后世一致否定的，就是将“元老院”（senatus）与“军队”（exercitus）完全分离的法令。这条法令将元老院议员从罗马军队的将官级别中彻底排除了出去。

加里恩努斯的家族从共和时期便属于元老院阶级，他本人也可以说是元老院阶级的宠儿，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何会提出这项政策。有人说，他是因为元老院在他为了解决困境而苦苦奔走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所以才恼羞成怒。还有人说，他认为蛮族的入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只会躲在安全的首都罗马撰写演讲稿的元老院在战场上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只需要军事专家来迎击敌人。在我看来，恐怕这两种说法都没错。毕竟这条法令并不是皇帝只要经“内阁”同意就能颁发的临时措施法，而是在皇帝提案后得到元老院多数赞成并最终得以法制化而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法令。



三分的罗马帝国（公元270年左右）

元老院议员们对这项将他们从军务之中解放出来的法令全都投了赞成票。虽然加里恩努斯之后的罗马帝国军人出身的皇帝层出不穷，但拥立这些军人皇帝的实际上并不是军人，而恰恰是那些军队之外的文人。这就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越来越失去其自身特点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一条对后来的罗马帝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法令。

罗马不管在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元老院都是向国家源源不断输送高级人才的人才库，而那些在元老院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人，都有进入军团服役的责任和义务。

从17岁成年开始，每一个想要进入帝国统治阶级的人都必须拥有至少10年以上的军事经验。即使中间允许有断层期，也一直是领导者应该经历的课程。即便进入帝国时期，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确立使得

对军事经验的年限要求稍微有些放宽，但是观念上依旧认为，对于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的人来说，在军团中服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因为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必须拥有元老院议员的资格，所以那些出身低微但通过自身的努力终于在军团内升任为军团长的人，都会通过皇帝的推荐而直接获得元老院的席位。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希腊的雅典或者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接受过大学教育，就是因为这些人的青年时期基本都在军团中积累实战经验，而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些理论知识。

一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的中队队长，即便完全不知政治为何物，也可以很好地完成他的战斗任务。但是一个完全没有军事经验的人，却绝对搞不好政治。在罗马人看来，军人可以不懂政治，但是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

罗马人自古以来理解这个人性现实，所以不在军务和政务之间设限，重视于两者间自由往来所培育起的拥有广阔视野的人才。

综合由爱德华· 吉本至现代的诸位罗马史专家对加里恩努斯法令的批评，结论是不再参与力量者终将失去统治力。以罗马帝国而言，力量就是军队，因此这个批评相当正确。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将军务与政务完全分离对人才培养方面造成的损失，也对今后的罗马帝国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加里恩努斯之后出现的那些军人皇帝，虽然在军事才能上十分出众，但没有一位称得上是政治家。而罗马帝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精通军事的政治家以及深谙政治的军人，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罗马从此变得越来越不像罗马了。

皇帝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使行省居民全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使得罗马公民权从期待权变成了既得权。在五贤帝时代小普林尼曾说，罗马公民权是“最有魅力的权利”。可是当其成为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时，魅力也随之消失。不分人种与宗教，只要对国家作出卓越贡献人人都可以获得的罗马公民权，自从皇帝卡拉卡拉的敕令颁布之后就

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

皇帝加里恩努斯所制定的这条将军务与政务完全分离的法令，在使罗马失去自身特色这一点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相比也不遑多让。卡拉卡拉的法令使普通公民失去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加里恩努斯的这条法令则连统治阶级的干劲都给抹杀了。

不过，考虑到当时那段历史时期罗马所面对的巨大变革，加里恩努斯的这条法令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在颁布这条法令的同时，他还将以重装步兵为主体所构成的罗马军队传统体系，转变成了以骑兵为主的日耳曼式军队。

防线的历史变迁

绝大多数情况下，图解只是为了对文字叙述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但是，有些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文字来进行表达，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直接用“图”来进行说明。接下来的这4幅图就是如此：

图（1）、（2）和（3）表示的是位于河流附近的防线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情况。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沿河修筑的防线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地区。

图（1）显示的是罗马军队通过主动攻击，使北方蛮族一时间无力向帝国境内发动侵略时期的国境图。从共和末期的公元前1世纪正式开始实施的这项战略，一直持续到进入帝国时期的公元1世纪和2世纪。正所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当时的罗马帝国采取的正是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

这一时期的帝国防线，即便称之为铜墙铁壁也毫不为过。位于防线内侧的城市和乡镇全都没有城墙。就算有也仅仅是木栅栏之类的围墙，甚至都挡不住强盗的袭击，也就是一个摆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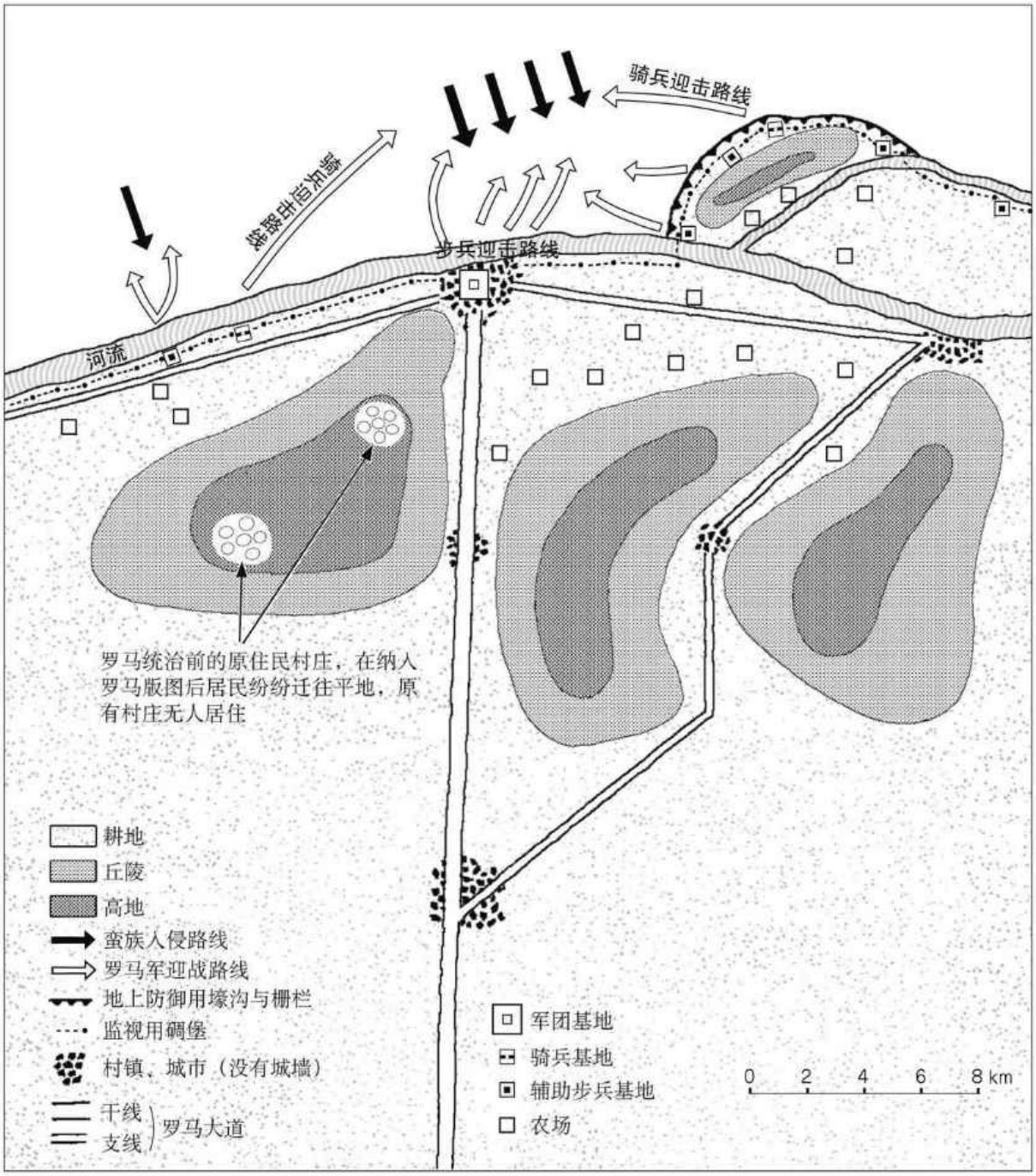
由于帝国的防线完全集中在国境附近，因此首都罗马的城墙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于是尤里乌斯· 恺撒以妨碍首都罗马发展扩张为由，拆除了从王国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塞尔维乌斯城墙。恺撒的这种想法不仅影响了首都罗马，还发展到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正如图（1）所示的那样，即便在防线附近的地区，被石头围墙保护起来的也只有军团宿营地和武器库等军事设施而已。

能够反映社会安全程度的，除了当地人民居住区周围是否有城墙保护之外，还有另外三点。这三点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健全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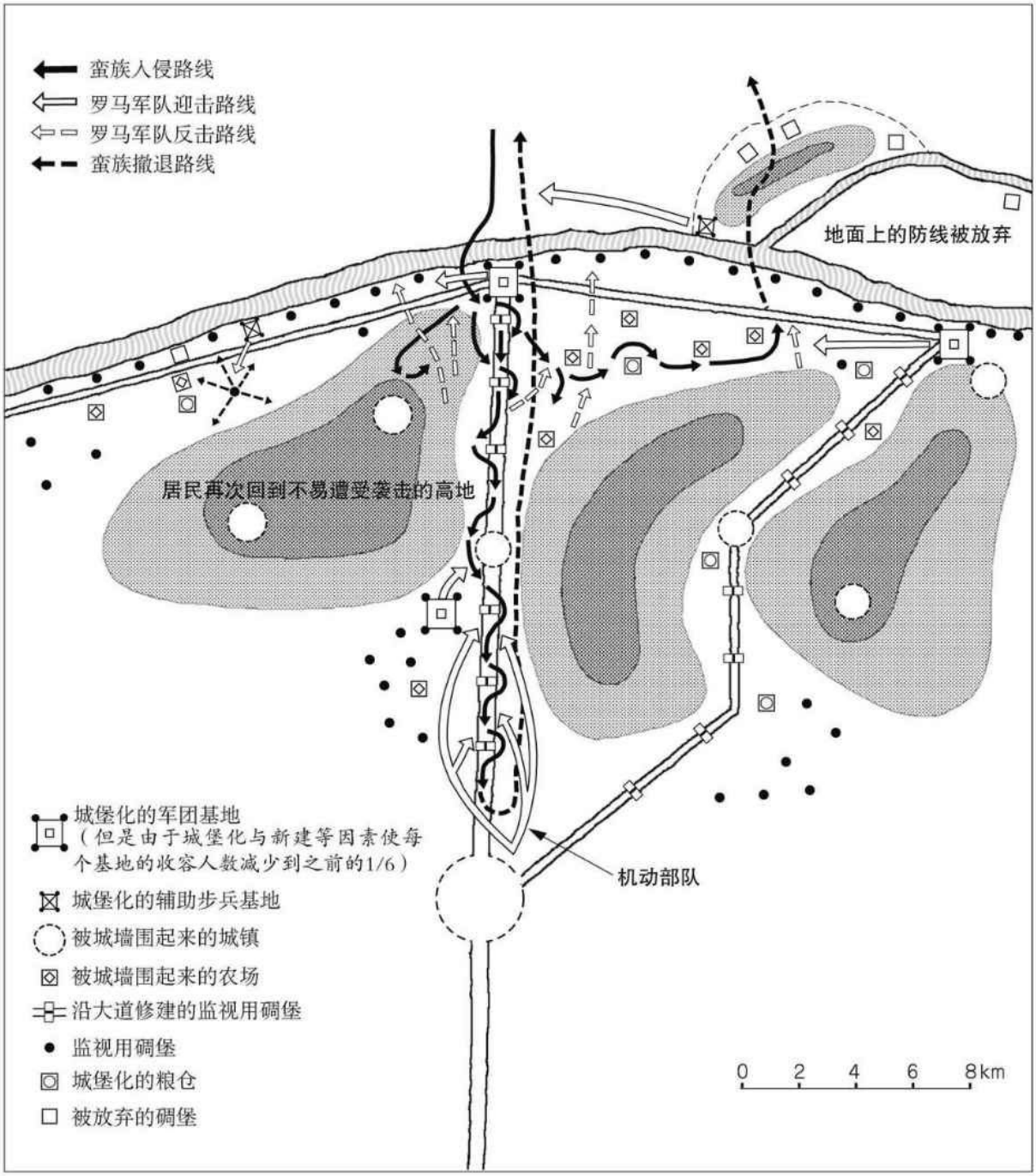
第一，人民不居住在易守难攻的高地，而是分散居住在平原之上。这能够反映出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度。

第二，主要产业并非能够随时带着逃跑的畜牧业，而是固定在一处的农业。农耕盛行说明社会处于和平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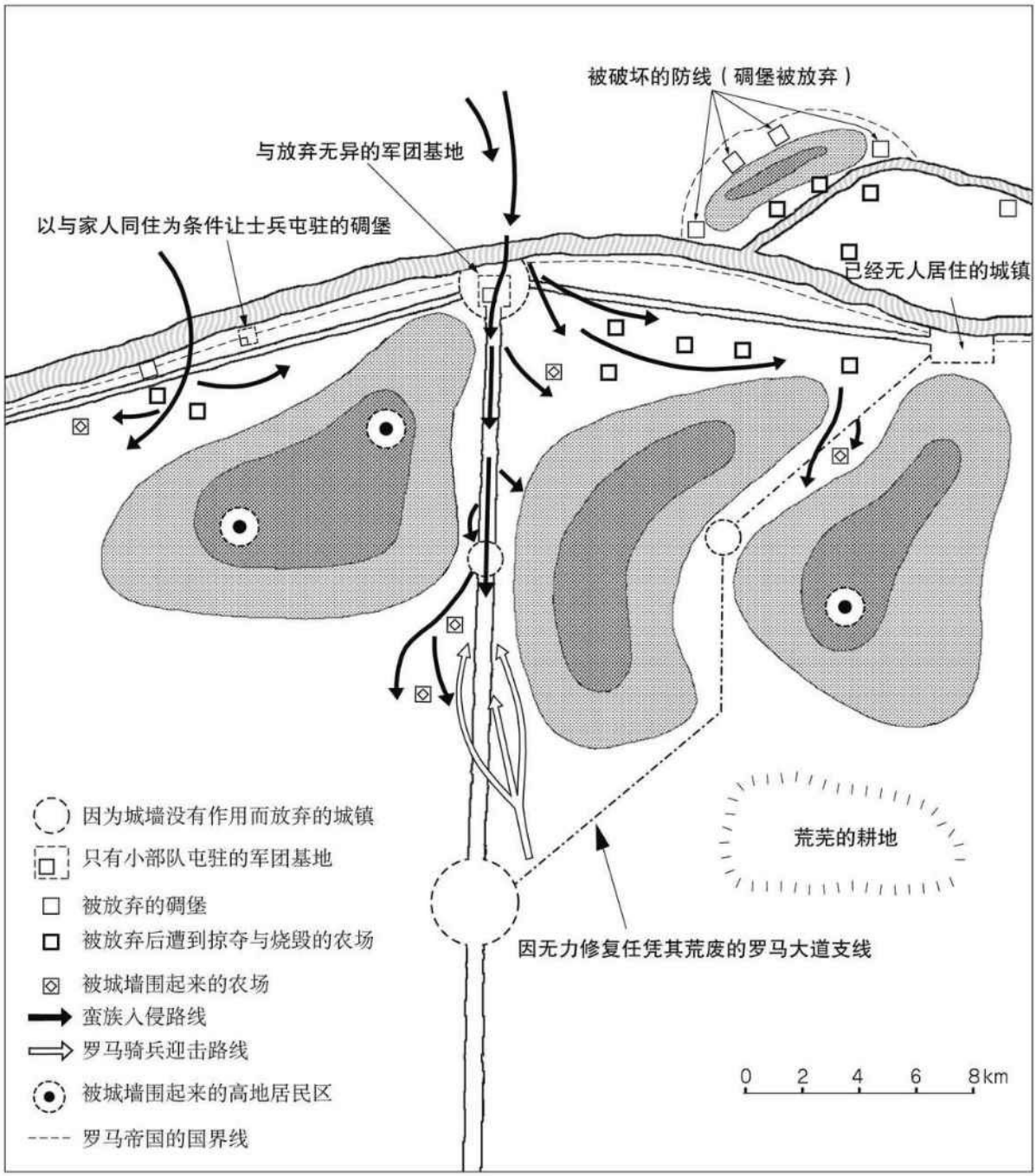
第三，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安全的交通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打破各地区居民相互之间的封闭状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实现了“经济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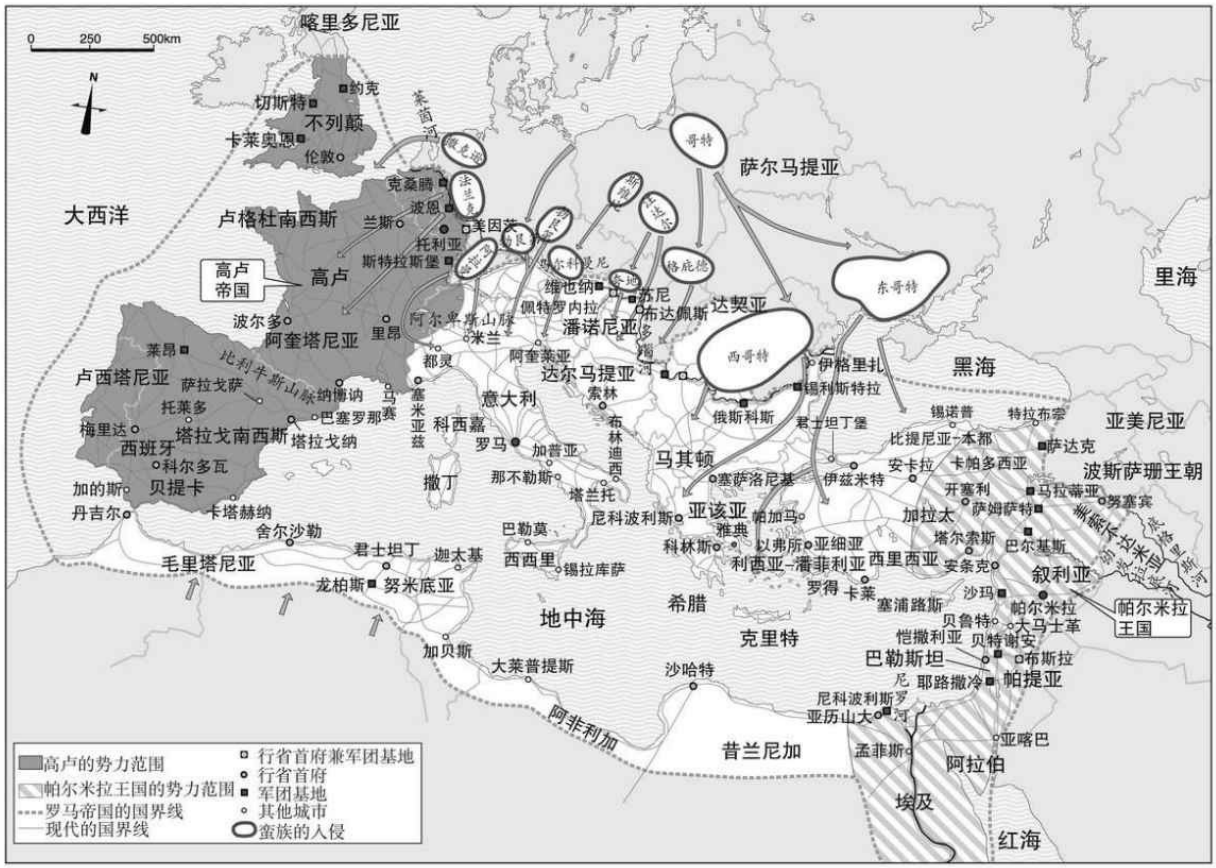
（1）罗马的防线：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的公元1世纪和2世纪
（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2）罗马的“防线”：3世纪中期（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3）罗马的防线：3世纪后期（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4）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的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从公元260年到270年的状况（选自意大利高中的历史教科书）

这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实面貌。罗马帝国甚至将这种和平的状态一直扩展到边境附近，并且这种和平并非10年20年的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300余年的现实。即便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蛮族一度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也很快就被罗马军团击退，随后的战斗全都是在国境之外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地发挥着其自身作用的时代，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是将战场转移到帝国的防线之外。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被破坏的时代，帝国边境的情况如图（2）所示。图（3）则是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之时的状态。

各地的“防线”都被蛮族突破，而且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一次。所有的都市和城镇甚至乡村都被高高的围墙保护起来。就连军团

基地也在周围修建了高耸的塔楼和坚固的城墙，更有甚者还在城墙外挖了深深的壕沟，时不时地引河水过来充当护城河。就连在当地居民移居平原之后由于交通不便而被当做羊圈的高地小屋，也因为蛮族的频繁入侵而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又纷纷回到高地定居下来。

平原上的农业，不但在安全上缺乏保障，同时在经济上也失去了有利条件。耕地荒废的主要原因，不能单纯归结于耕地成为罗马军队迎击蛮族入侵的战场，而是因为像街道和运河等用于灌溉的基础设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的罗马帝国却没有能力及时地进行修复。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够充分地进行。

军队组织的改革

皇帝加里恩努斯深知，要想改变现状，只有恢复和平这唯一的办法。于是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将希望寄托在改变军队的组织结构上。他将罗马传统的以重装步兵为主的军团系统，改编为以轻骑兵为主的日耳曼式结构。实际上这一系统早在40多年前皇帝卡拉卡拉在位时期就已经提出“机动部队”（vexillationis），但是因为3世纪的罗马帝国政策缺乏连续性，导致后来没有被保留下来，加里恩努斯只是将曾经的“机动部队”重新建立起来。唯一的区别在于，卡拉卡拉时期的机动部队由步兵与骑兵共同组成，而加里恩努斯组建的则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真正的“机动部队”。

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变得越来越不像罗马的一种表现。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罗马逐渐变得“中世纪化”。罗马的军队体制反映的是罗马的社会构成，同时军队体制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构成的改变。重装步兵不再是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量，意味着城邦时期以公民为主的公民兵退出主角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当时社会中仍然属于少数派的骑兵。

骑兵军团与以步兵为主力的军团相比规模变得更小。动辄出动几万

骑兵这样的事情首先就是不可能的，在战术上也起不到积极的效果，而且率领5000人和率领5万人，对总司令的能力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素质参差不齐的大规模集团军的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全才，而少数精锐部队的领导者，只要挑其中最优秀的专才即可胜任。

而且加里恩努斯将元老院与军队完全分离的政策，也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罗马元老院自古以来就以为国家培养全才为己任。即便是军团出身的精英分子，也会在升迁途中给予其元老院的席位，逐渐将其培养成一个全才。结果这一过程却由于加里恩努斯的政策而彻底中断。不仅如此，因为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量从步兵转变为骑兵，罗马军队的主力指挥官也从军团长变为骑兵队长。在加里恩努斯死后继位的罗马皇帝几乎都是军人，而且清一色都是骑兵队长，充分地说明了在这一时期罗马军队的实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通过军队组织上的改变，使罗马帝国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在速度上不再处于劣势，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就能够成功击退蛮族的入侵。但是蛮族在罗马帝国境内肆意掠夺的情况，以及战场完全位于罗马帝国境内的状态依然没有得到改善。也就是说，现在的罗马帝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至于“以攻为守”的时代，早已经成为了过去。

滞胀

想必在各位读者看到前面那四幅图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3世纪的罗马帝国，在经济方面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实际上，3世纪的罗马帝国之所以在经济方面持续衰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税收入的不断减少。而且在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还在不断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支出都在军费方面。

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并非军事机构过于庞大。因为自从进入3世纪以来，罗马军团的数量就一直维持在33个，没有进一步增加，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次数的增多。与驻扎在军团基地之中相比，前往战

场作战自然会消耗更多的费用。

那么，对于由此产生的“赤字”，罗马皇帝究竟要如何应对呢？在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后，罗马帝国就失去了行省居民缴纳的10% 行省税这一稳定的收入来源。仅仅依靠5% 的关税和1% 的营业税远远不够填补军费激增所带来的财政赤字。

于是以战时特别税为名的临时税就成为了皇帝们的救命稻草。这些临时税由于战争的频发而变成了固定税，结果遭到罗马人的一致反对，甚至还因此爆发了人民起义。

所以皇帝们最终只能采取降低银币之中的含银量这个下下之策。最早采用这种办法的，是以重视军事力量著称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他因为新编成了3个军团导致军费激增，于是只能通过降低银币之中的含银量来维持军费。

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别增大，相当于促使通货膨胀的产生。对于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过失。

于是在塞维鲁之后继位的卡拉卡拉，在将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降低到50%的同时，发行了另外一种含银量相同但重量高达5.5克的安东尼银币，希望以此来阻止银币价值的下跌。罗马帝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总是围绕着银币展开，是因为罗马社会当时采取的是银本位制，银币自古以来就是罗马帝国的基准货币。因此，银币价值的变动，往往反映出罗马经济实力的变动。

皇帝卡拉卡拉在公元215年发行的安东尼银币以及罗马帝国自古以来代表性的第纳尔银币，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加里恩努斯统治时期究竟变成怎样了呢？

重约3克左右的第纳尔银币已经消失不见。当时成为唯一流通银币的安东尼银币不仅重量从5.5克降低到3克左右，含银量更是降低到了5%。与其说是银币，不如说是镀银的铜币。至于曾经的塞斯特斯铜币则因为价值过低而从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

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期重达3.5克、100%　的纯银、沿用了200年的第纳尔银币相比，3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由此可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消失，对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罗马帝国主要流通货币银币的价值变迁

奥古斯都至克劳狄时期（公元前 23—公元 64 年）		
第纳尔银币	3.8—3.9 克	100% 纯银
尼禄至马可·奥勒留时期（公元 64—180 年）		
第纳尔银币	3.2—3.8 克	含银量 92%
康茂德至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公元 180—211 年）		
第纳尔银币	3.2—3.8 克	含银量 70%
卡拉卡拉至瓦勒良时期（公元 214—253 年）		
第纳尔银币	3—3.2 克	含银量 50%
安东尼银币	5.5 克	含银量 50%
瓦勒良被俘至加里恩努斯时期（公元 260—268 年）		
安东尼银币	3—3.2 克	含银量 5%

在纯银货币的时代，不仅印度，连远方的中国都能找到罗马货币的踪迹。可悲的是，镀银硬币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我手中有一枚皇帝加里恩努斯的银币，虽然在重量上与马可·　奥勒留、康茂德、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以及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的银币相同，但是因为加里恩努斯的银币比上述那些皇帝的银币都要大上一圈，所以厚度就相对薄一

些。而且银币上面的浮雕也没有以前的那些银币凹凸有致，给人一种稍微用点力就能够将这枚硬币掰成两半的感觉。另外加里恩努斯银币之中的含银量只有5%，使人不免担心如果将附着在表面的那层镀银擦掉，是不是就会露出里面的铜芯。手中拿着这枚硬币，能够使人真正地感受到3世纪的罗马帝国处于怎样的经济困境之中。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3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货币贬值问题。

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安东尼银币（原大）

但是在我看来，给3世纪、特别是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带来巨大冲击的，是由于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紧随其后发生的通货紧缩。

但是这种通货紧缩并不是因为市场商品极大丰富所引发的通货紧缩，而是因为当时罗马境内成为迎击蛮族的战场，因而耕地荒废，生产力大幅下降，物产不可能充斥市场。

由于耕地变成了战场，土地荒废、农村人口流失，使投资者失去投

资农业的意愿，最终导致通货紧缩的产生。

从3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帝国的存款利率就开始不断下调。“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罗马的存款利率为12%，但是到了3世纪后期，存款利率仅为4%。这正是投资者缺乏投资热情的一种表现。

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那么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滞胀”（stagflation）——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对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社会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满目疮痍的国家状态。

“藏在家里的存款”？

说起罗马帝国的银币第纳尔，正好借此机会和诸位读者共同探讨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问题。

因为我渴望亲手触摸到罗马的历史，于是开始收集古罗马时期的硬币，这些用在封面上的硬币，都是在伦敦召开的古董硬币拍卖会上买来的。也就是说，罗马货币虽然是古董，但还是有市场的。在帝国初期1世纪以及鼎盛时期2世纪流通的纯银第纳尔银币的拍卖价格并不高，就连我都买得起。也就是说，这些银币的数量很多。

拍卖会上拍卖的罗马时期第纳尔银币数量很多，如果是在罗马时代的遗迹中零散发现的话，那么绝对不可能在2000年后的古币市场上出现这么多。由此可见，这些银币肯定是装在坛子里或者其他的什么容器之中，被一次性地大量挖掘出来的。

而且，在伦敦的硬币拍卖市场上，到公元2世纪为止，含银量100%的第纳尔银币的数量比公元3世纪后半期含银量5% 的银币数量要多出很多。于是在2000年之后的古董硬币市场上，当年的“精品”和“次品”卖出了同样的价格。因为那些硬币收藏家和渴望通过硬币触摸历史的我不

同，在他们眼中，古董硬币的价值只在于其稀有程度以及保存是否完好。

因此，每当我手中拿起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硬币时，都会对自己也能买得起这些硬币感到十分的庆幸。可是当我把玩这些硬币时，心中却产生了疑问：

这些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之时一直保持着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一致的“精品”，却在公元3世纪后期便从市场上销声匿迹的第纳尔银币，为什么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会保存下来如此之多的数量呢？

这个疑问困扰了我许多年，直到某天我看到皇帝瓦勒良的货币政策才终于有了灵感。虽说是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是政府允许公民用从前的第纳尔银币兑换等值的安东尼银币（含银量5%）。

不过据说愿意拿第纳尔银币兑换安东尼银币的人寥寥无几，这项货币政策自然也以失败告终。

当时罗马人的心情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即便是皇帝的命令，这样的赔本买卖想必也是没人愿意去做的吧。于是这些钱被罗马人藏在家里，幸运地躲过蛮族的掠夺，在地下埋藏了千百年之后最终被发掘出来陈列在博物馆中，甚至还出现在古董硬币的拍卖市场上。我猜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失去信任

将话题重新回到1700多年前，在我手中这枚薄到几乎能够被掰断的银币被铸造出来还不到一年时间的公元268年秋天，皇帝加里恩努斯在军队的武装政变中被杀害。事情的起因是骑兵队长奥莱欧鲁斯在米兰谋反，虽然皇帝加里恩努斯率军将其逼入米兰城内，但是皇帝身边的其他骑兵队长纷纷发动政变将皇帝杀害，当时加里恩努斯才刚刚50岁。

杀害加里恩努斯的骑兵队长们并没有归顺与他们属于同一级别的奥莱欧鲁斯，而奥莱欧鲁斯也在随后不久遭到杀害。骑兵队长们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他们认为加里恩努斯身为皇帝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能力。不过政变的主谋者克劳狄乌斯以及其他骑兵队长，实际上全都是被皇帝加里恩努斯一手提拔上来的军事专家。也就是说，在这些专家的眼中，加里恩努斯的军事能力遭到了质疑。

罗马的皇帝是终身制的，而身为终身制的最高统治者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那么等待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加里恩努斯的死，就是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实际上正如前文图（4）显示的那样，自从皇帝瓦勒良落入波斯国王之手以后，罗马帝国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直持续了8年时间仍然得不到任何的改善。高卢帝国仍然存在，被允许居住在罗马境内的阿拉曼人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侵略，哥特人的入侵成为家常便饭，帕尔米拉的女王芝诺比阿在罗马帝国的东方为所欲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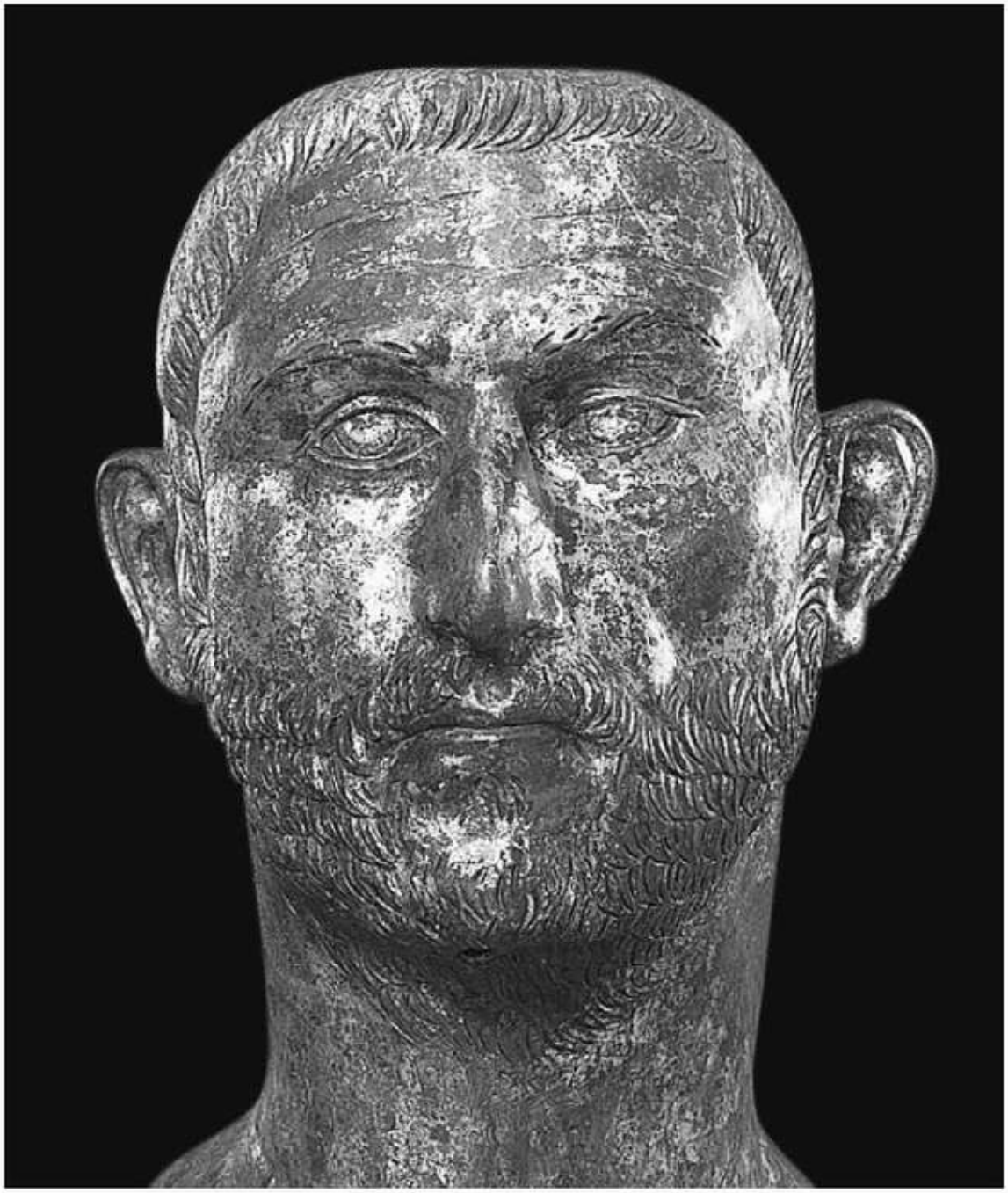
后世有很多为加里恩努斯辩护的研究者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努力地尝试着使罗马帝国重新振作起来的办法。实际上，加里恩努斯也确实为了使罗马帝国摆脱危机而一直东奔西走。但政治要的是结果，经过8年的时间仍然交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他自然难免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另外，身为罗马帝国精英代表的皇帝加里恩努斯在统治时期所显示出来的无能，也证明了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能力开始下降。从此以后，在罗马帝国中频繁出现原本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人进入统治阶级的事例，这种被称为“以下犯上”的现象，说明罗马人民已经对传统的帝国精英们失去信任。由此可见，权威的崩溃是不仅仅体现在银币之上的。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公元268—270年在位）

在失去人民信任的加里恩努斯被杀之后，克劳狄乌斯二世继承皇位。克劳狄乌斯二世作为皇帝的全名是马可· 奥勒留· 克劳狄乌斯· 奥古

斯都·　哥特库斯。虽然33年前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名字中有“色雷库斯”而被称为“色雷斯人”，24年前的菲利普在名字中有“阿拉伯努斯”而被称为“阿拉伯人”，但克劳狄乌斯与他们完全不同，他名字中的“哥特库斯”并不是“哥特人”的意思。与当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因为击败了战无不胜的汉尼拔而获得非洲征服者“阿非利加努斯”称号的西庇阿一样，“哥特库斯”是在克劳狄乌斯击败哥特人之后所获得的称号，意思是“哥特征服者”。因为公元1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位名叫克劳狄乌斯的皇帝，所以当时的罗马人习惯将克劳狄乌斯二世称为“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来加以区分。

当然，克劳狄乌斯二世和公元1世纪的克劳狄乌斯一世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他和公元1世纪的皇帝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所属的那个从共和时期便堪称名门中的名门的克劳狄乌斯家族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他又是如何获得克劳狄乌斯这个家族名的呢？



克劳狄乌斯二世

罗马人的姓名正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代表性的名字一样，由个人名、家门名以及家族名三部分组成。而行省出身的人，绝大多数

的家族名都是尤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这是因为尤里乌斯· 恺撒最早提出向行省出身的居民开放门户的政策，而克劳狄乌斯则是随后的几位皇帝之中最为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的人。所谓开放门户政策，就是指为行省出身的居民打开一条通往罗马上层社会的道路，具体来说包括授予罗马公民权，为强大的部族族长以及能力出众的人才提供元老院的席位等。在这些行省出身的人才被国家录用的时候，往往会赋予他们尤里乌斯或者克劳狄乌斯的家门名，以示对这些人的身份保证。

关于尤里乌斯· 恺撒的这个开放政策，我在《罗马人的故事· 恺撒时代》中已经多有提及，至于克劳狄乌斯，则留有一篇专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稿。我在《罗马人的故事7 ·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经说过，这是对罗马帝国同化政策的统治哲学最简洁明快的解读。

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那样，在行省中有很多人自称属于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但实际上这些人并非都是被赋予恺撒以及皇帝克劳狄乌斯家族名之人的后代子孙。即便是一些与这两个家族毫无关系的行省出身者，在军团中得到晋升机会的时候，都会虚报尤里乌斯或者克劳狄乌斯作为自己的家族名。因为这两个家族都非常庞大，因此就算深究也不怕被人拆穿。公元268年继承皇位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也和那些人一样。

被罗马人称为伊利里亚的地方，大体上来说就是指位于多瑙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那一片区域。不过这片区域却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而被分为两部分，山脉众多却有着天然港口优势的南部地区早早地便被罗马帝国建设起来，都市化程度较高，北部地区虽然有大量适宜耕种的平原，却因为毗邻罗马帝国的边境防线而发展缓慢。发展到后来，南部地区被重新命名为达尔马提亚，伊利里亚成为仅仅针对北部地区的名字。如果说位于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本土之间的达尔马提亚属于都市经济体系，那么位于帝国国境附近面向多瑙河的伊利里亚地区则属于农村经济体系。

正是这个属于农村经济体系的伊利里亚地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从步兵转变为骑兵后，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摇篮，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变迁

时代	主要战斗力	辅助战斗力
到公元 212 年为止 近 500 年的时间	重装步兵（罗马公民） 骑兵 军团（罗马公民）	轻装步兵（行省民） 骑兵 辅助部队（同盟国与行省民）
公元 212 年卡拉卡拉 颁布敕令以后	重装步兵（老兵） 轻装步兵（新兵） 骑兵 全体都是罗马公民	
公元 257 年开始步兵 向骑兵转变	骑兵 步兵 全体都是罗马公民	

克劳狄乌斯二世就出身于伊利里亚的一户农家。虽然克劳狄乌斯二世日后成为了罗马帝国家喻户晓的皇帝，但是他父母的名字早已经无从考证。因为他生于公元214年以后，由于卡拉卡拉颁布的敕令，他一出生就拥有了罗马公民权，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加入骑兵队。克劳狄乌斯二世的军旅生涯一直都是骑兵，在35岁的时候他被当时的皇帝德基乌斯任命为骑兵队长，紧急派往希腊的温泉关抵御南下入侵的蛮族。随后他率领骑兵队又取得了大量骄人的战绩，可以说皇帝加里恩努斯之所以将罗马军队的主力从步兵转变为骑兵，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影响。

军队主力从重装步兵转变为骑兵之后，主要战斗力的屯驻基地也必须随之改变。因为罗马人无法预知蛮族究竟会从防线的什么地方入侵，所以如果将基地设置在防线上，那么当蛮族入侵时必然无法及时进行迎

击。于是罗马军队将骑兵基地后撤到远离防线的国境内，这样不管蛮族从哪个地方入侵，都可以及时地前往当地防线进行迎击。目前被确定有罗马时期骑兵军团基地的只有希尔米乌姆和米兰两处。希尔米乌姆距离多瑙河防线不到20公里的距离，而米兰却是位于意大利本土。考古学家之所以仅仅确定了这两个基地，是因为当时的骑兵部队根本没有优哉游哉地等在基地的空闲，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地往来于被蛮族入侵的各个地区之间。

由此可见，即便将军队的主要战斗力转变为骑兵，罗马帝国在防卫战略上仍然没有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因为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将战场推到国界线以外，所以不管骑兵部队多么神勇，对于阻止耕地荒废以及居民迁徙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哥特人来袭

继位皇帝之后甚至没时间回到首都罗马的克劳狄乌斯二世，在一次迎击哥特人的入侵之前向位于首都的元老院送去一封书信。从文体来说，与其说是皇帝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个戎马一生的骑兵、至今50岁过半的男人单纯率直的表白：

> 诸位元老院议员，听了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但是我所说的事情并非噩梦，而是现实。现在有32万名全副武装的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并且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接近意大利北部。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的大军，那么罗马帝国一定会陷入极其悲惨的处境之中，但是我们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不只精神上如此，就连我们的武器也已经残破不堪。
>
> 这既是自从皇帝瓦勒良被俘以后征战连年不断的结果，也说明我们的武器，无论盾牌、剑，还是标枪，早就过了使用年限却仍然被继续使用。此外，长年向帝国提供活力的高卢与西班牙现在也已经落入泰特里库斯（高卢帝国当时的皇帝）手中。还有一点，虽然

我觉得丢脸，不太愿意提起，但是我们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弓箭手，全都被那个东方的女人芝诺比阿据为己有了。

这就是我们罗马帝国现在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仅仅取得一丁点的成绩恐怕都是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吧。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在发出这封书信之后不久便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附近与入侵的哥特人发生了激战，并且成功将对方击败。惨败的哥特人丢下掠夺来的战利品和俘虏仓皇逃回多瑙河北岸。

拯救了意大利本土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从此被冠以“哥特征服者”的称号，用以纪念他在抵抗哥特人时的英勇表现。

不过，哥特人在第二年改变了入侵的路线，沿着多瑙河下游涌入巴尔干半岛。克劳狄乌斯二世立刻率领骑兵部队前往迎敌，双方的战场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罗马时期的米西亚行省之内。这一次交战也以克劳狄乌斯二世大获全胜告终，使得他“哥特征服者”的称号愈发地名副其实。

经过这两次战役之后，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对哥特人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他挑选年轻力壮的哥特人俘虏加入罗马军队，其他人则以放下武器为条件，允许他们在米西亚行省进行农耕作业。自愿成为农民的人还可以从故乡把他们的妻儿接过来，并且获得相应的耕地。

米西亚行省属于罗马帝国多瑙河下游的防线之一。“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二世之所以将哥特人安置在这片区域，是希望以此来阻止耕地的继续荒废和人口密度大幅降低的问题。

他的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加入罗马军队的哥特人即便在面对自己同胞的入侵时也毫不手软、英勇战斗。成为农民的哥特人也顺利地在安置地定居下来。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的统治似乎一直都十分顺利，但是他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夺走他性命的既不是蛮族的入侵也不是士兵的叛乱，而是疫病的爆发。

在帝国全境都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中的时代，即便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但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普遍都身体健康，也没有营养不良，加之罗马人喜欢入浴的生活习惯，使得旅途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好，所以就算发生疫病也不会大规模流行。但是进入3世纪后期，帝国境内的人员流动主要以因为蛮族的入侵而逃离家园的难民为主，同时罗马帝国在各个方面都捉襟见肘，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建设更是无能为力。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后期疫病频发，就是因为连年的战火导致难民不断增加，难民又将疫病散播到帝国各处。公元270年1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的主要城市希尔米乌姆的骑兵基地越冬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仅仅统治了罗马帝国一年半之后，便死于当时爆发的疫病。在出身罗马名门的加里恩努斯死后拒绝承认其神格化的元老院，对克劳狄乌斯二世却毫不犹豫地追封了他的神格。这位生于帝国边境伊利里亚地区的农民的儿子，终于在死后加入了“神君”的行列。

克劳狄乌斯二世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弟弟。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昆提卢斯正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莱亚。在当时那个蛮族入侵意大利本土也不足为奇的年代，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米兰和东北部阿奎莱亚的这两个军团基地，肩负着守护意大利本土的重要任务。而负责指挥屯驻在阿奎莱亚的军团的人正是昆提卢斯。

当首都罗马的元老院得知克劳狄乌斯二世去世的消息时，立即承认身在阿奎莱亚的昆提卢斯为继任皇帝，并且将这一决定通告全国。因为克劳狄乌斯二世得到军队的一致推崇，所以元老院认为他的弟弟也一定会得到同样的支持。

实际上这也是元老院尊重军队意见的一种表现。虽然昆提卢斯在军事方面的才能非常一般，但是在选定罗马帝国皇帝这个问题上，元老院

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才如此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

但是元老院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现在的状态，必须有一位十分优秀的武将来担任身为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虽然元老院也知道士兵们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元老院已经宣布的任命是无法撤销的。皇帝加里恩努斯颁布的使元老院与军队完全分离的法令，很快便显露出其中的弊端。军队一致推举奥勒良继任皇帝，元老院也只能承认军队的这一决定。昆提卢斯发现手下的士兵们全都站在奥勒良那一边，就连元老院也背叛了自己，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

在克劳狄乌斯二世继位皇帝之前，曾经担任罗马全军骑兵总司令的职务。而在克劳狄乌斯二世统治期间，罗马全军骑兵总司令的职务落在奥勒良的肩上。从前军人出身成为皇帝的都是军团长，而现在则都变成了骑兵团团长。另外，不管出生地还是出身阶级也脱离了过去的常态，这也是当时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证明。

如今，公元3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及其后的奥勒良、普罗布斯、卡鲁斯、戴克里先等都出身于一个被称为伊利里亚的地方。他们的出身阶级也无一例外都属于下层阶级，而且这种出身低微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现象，在当时那段时期从曾经的特例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在公元270年就任皇帝的奥勒良，堪称这种类型皇帝之中的佼佼者，并且留下了令后世赞叹不已的成绩。

第二章
公元270—284年

皇帝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位）

路奇乌斯· 图密善· 奥勒良，从姓名上来看很像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他出身于位于多瑙河附近的边境地区。当时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都被称为“罗马化的蛮族”，奥勒良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出生地位于现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外30公里处，距离多瑙河不到20公里的一处边境城市。在罗马时期，这个地方以希尔米乌姆的名字为人所熟知。这个城市之所以频繁地出现在罗马帝国末期的历史中，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多瑙河防线在帝国末期的时候重要度逐渐提升。虽然自3世纪后期开始，以希尔米乌姆为中心的附近地区出现了众多皇帝，但是希尔米乌姆的兴盛并非因为这些皇帝。因为这些军人出身的皇帝，对于建设故乡之类的事情没有多少兴趣。

奥勒良父亲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据说他的父亲从军团退役之后主要依靠农耕生活，并且娶了一个太阳神殿的女巫为妻。由此可见，奥勒良的出身也十分低微。对那些出生于帝国不发达地区的人来说，要想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加入军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也许奥勒良在刚满17岁获得参军资格的同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吧。

奥勒良

他和自己的前任克劳狄乌斯二世算得上是同辈。所以他在继位皇帝的时候应该在56岁左右。古罗马将40多岁看做是男人的黄金期，奥勒良成为皇帝的时候正好比这个基准晚了10年。但是奥勒良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他也是被皇帝瓦勒良破格提拔上来的行省出身的人才之一。

瓦勒良生前不仅破格提拔优秀人才出任军中要职，而且不只是升迁

而已。当他发现在军中扶摇直上却对发财不关心的人员时，也会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瓦勒良曾下旨赠与下列财物给当时年约45岁的奥勒良：

按照官职给予一定数量的金币、银币以及铜币。墨林斯产的男用短衣10件。埃及产的粗麻上衣20件。塞浦路斯产的宴会用餐巾2打。阿非利加行省产的地毯10张。毛里塔尼亚产的宴会用垫子10张。还有几头用来举办宴会招待客人的羊和猪。因为在罗马时期人们都是用手抓取食物就餐，所以餐巾是宴会上的必需品，而宴会时罗马人的正规姿势是一只胳膊肘支撑身体侧躺，如果坐在椅子上吃就好像我们现在快餐店或者路边摊随便吃一口或者站着用餐。礼品的最后则是数头食用猪、羊。

通过这份清单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对于自己下属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同时这些产地各异的奖赏品也反映出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其广阔的贸易范围。

虽然生活上的关怀也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这些被破格提拔上来的人来说，能够在战场上得到重用才是最使他们感到开心的事情。皇帝瓦勒良也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对奥勒良可以说是委以重任，在皇帝发给军团基地负责人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奥勒良是难得一见的人才，我委任他视察各个基地，并且有权对他认为有必要改善的地方进行修正。

通过这项任务，奥勒良对堪称帝国最重要防线的多瑙河防线全域都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把握。在《罗马皇帝传》中，也有关于奥勒良这次视察的记载。

奥勒良在视察途中，对各自手下拥有1000名士兵的大队长这样说道：

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大队长的位置，或者说你们想要在战场上保住性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刻将你们手下的士兵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随后，他又向士兵说道：

你们身为罗马军团的士兵，绝对不允许抢夺平民的任何东西，就连一枚鸡蛋也不行。哪怕是橄榄油、盐，甚至是一根柴火都绝对不允许随意从平民那里夺取。你们必须满足于军队分配给你们的粮饷。如果你们抢夺了平民的东西，使他们没有东西拿去贩卖，他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罗马士兵的财富，应该建立在打败蛮族所获得的战利品上，而不应该建立在行省居民的泪水上。

你们应该时刻保养好自己的武器，磨尖你们的刀刃，不要让你们的皮靴有任何破损，及时更换你们的武装。因为我们不知道敌人究竟会在何时攻来，必须随时作好充分的准备。

你们的军饷都存在基地内的银行中。勤俭节约是每一位罗马战士所应有的美德。不过，希望带着金链子、手镯和金戒指上战场的人，我也不会阻止。

他实际上并不是在鼓励罗马士兵一身珠光宝气地上战场，而是希望这些士兵能够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更加奋勇地进行战斗。

在骑兵面前，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养好自己的马匹。当然需要保养的不仅仅是战马，拉货车用的马和牛也同样不容忽视。偶尔会有人将喂马的饲料偷运出去卖给别人，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绝对不会轻饶。另外要时刻牢记，这些牲畜不是你的个人财产，而是整个部队的财产，所以在保养它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

紧接着，他将全体士兵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说道：

在军队中，因为军官与士兵所处的立场不同，因此难免会在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做法。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军队内部的纪律，并不涉及个人的人格问题。军官不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手下的士兵，士兵也没有服侍军官的义务。因为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军队组织中的一员。

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军医治疗的权利。那些通过支付金钱来获得更为优越治疗条件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

最后，他这样说道：

不管你们信仰什么宗教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不能因为你们的信仰影响到军团的行动。对平民必须时刻保持彬彬有礼的亲切态度，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在外面惹是生非，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奥勒良非常严格地执行军规，因此士兵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拉丁语写作“Aurelianus manu ad ferrum”，翻译过来就是“手执宝剑的奥勒良”。

一手将奥勒良提拔上来的皇帝瓦勒良，还派遣他到各个前线积累经验。其中关于奥勒良在拜占庭负责防卫任务时的记载，因为他将手下的士兵按照民族区分而令人印象深刻。

出身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弓兵300人。亚美尼亚士兵600人。阿拉伯士兵350人。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士兵400人。多瑙河地区赶来的骑兵800人。还有4名大队长，全都出身于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

上述的军队构成，也反映出罗马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特

点。虽然在罗马帝国的东方希腊语比拉丁语更为普及，而且罗马几乎人人通晓这两种语言，就连皇帝的布告都是用双语写成，但是在军队中统一使用拉丁语。因为只有统一语言才能够使士兵之间的交流不会出现任何障碍。奥勒良的任务就是在皇帝瓦勒良前往东方与波斯国王交战的这段时间里，率领这支由2450人组成的多民族军队保障罗马军队大后方的安全。拜占庭（在70年后改名叫君士坦丁堡）的防卫任务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一个城镇，而是意味着这条联结欧洲与亚洲通道的整体安全保障。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年，进入了令罗马帝国举国上下一片震惊的公元260年。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的消息，使每一位罗马士兵都陷入茫然失措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对于备受瓦勒良器重的奥勒良来说，一定是他46年人生中所遭受到的最大冲击。而且这件前所未有的惨剧，还发生在距离他镇守的拜占庭极其遥远的幼发拉底河东岸。即便他想要赶去营救也完全来不及，更何况当时的奥勒良不但没有擅自带兵救援的权力，就连手下士兵的数量也不到2500人。

公元260年的10年后，即公元270年，奥勒良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他继承的这个罗马帝国，和10年前的状态相比没有丝毫的改善。

奥勒良虽然身材魁梧，但是与身体相比头部不成比例地显得很小，而且在狭窄的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完全没有皇帝威武霸气的形象。但是在3世纪的罗马皇帝当中，他是唯一在继位初期便拥有明确统治方针的皇帝。而且他不仅拥有远大的理想，同时还拥有为了使其实现而必不可少的沉着与冷静。对于被罗马人看做国耻的瓦勒良，他一直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感恩之情，同时他也能够平静地接受恩人之子加里恩努斯由于失去人民的信任而遭到杀害的事实，当时的历史学家将奥勒良称为“真正拥有罗马人灵魂的皇帝”。毕竟奥勒良在继位初期便明确了应该优先处理的问题，为罗马帝国争取到许多宝贵的时间。

反击开始

奥勒良继承的罗马帝国，和1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一个被分成三份的帝国。

西方的高卢帝国和东方的帕尔米拉王国基本上与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罗马皇帝的统治范围只有被这两方势力夹在中间的一片区域。

奥勒良决定先将高卢帝国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这个在政体上几乎可以称为小罗马的帝国，虽然拥有高卢全境、西班牙以及不列颠等地，但是从来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本土做出过任何有威胁的举动。所以这个从来没对罗马帝国采取过任何敌对行动的帝国，可以暂时先不必考虑。

同样，对于在帝国东方拥有广阔势力范围的帕尔米拉王国，奥勒良也没有急于动手。

自称女王的芝诺比阿对扩张势力范围的执着，即便与她崇拜的对象克娄巴特拉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她也和克娄巴特拉一样，从没有组织军队主动向罗马帝国发出过挑战。而罗马帝国之所以在这10年间一直没有向帕尔米拉派遣军队，是因为虽然女王芝诺比阿一直在蚕食着罗马帝国东方的领土，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宣称帕尔米拉脱离罗马帝国而独立。

关于这一情况，从帕尔米拉发行的货币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奥勒良继承皇位之后罗马帝国发行了刻有他肖像的银币，在芝诺比阿统治下的帝国东方也同样发行了背面刻有奥勒良肖像，正面刻有芝诺比阿的儿子、帕尔米拉国王瓦巴拉图斯肖像的硬币。从硬币正反两面的安排上来看，似乎瓦巴拉图斯比奥勒良的地位要高，但是从雕刻在硬币边缘的文字上来看，非常清楚地表明处于上位的是皇帝奥勒良，而不是身为“Dux Romanorum”（罗马东方司令）的帕尔米拉国王。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在芝诺比阿的统治中随处可见。也许皇帝奥勒良正是看准了芝诺比阿的这个特点，所以才没有将帕尔米拉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最终，奥勒良将帝国北方边境的防卫问题即对蛮族的政策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由先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应该继续沿用先帝的方法，将之前取得的战果善加利用，就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奥勒良在这个时候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在蛮族入侵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迎击，而准备等对方带着掠夺来的战利品而行动缓慢时，在对方返回的路上进行伏击。

可是当时入侵的汪达尔人似乎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得知了罗马军队的伏击计划，于是他们将掠夺来的战利品和俘虏全都集中存放在意大利北部的某处，然后留下一部分人防守，其余的全部军队则继续沿着意大利半岛南下。

正反面都刻有肖像的帕尔米拉硬币
左（正面）瓦巴拉图斯
右（反面）奥勒良

从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到中部的里米尼，汪达尔人的大军势如破竹般穿过埃米利亚大道，一路上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以及埃米利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一路上的所有城市都没有逃过蛮族的烧杀抢掠。这一惨剧又继续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持续到法诺。而从法诺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就可以直达首都罗马。

感觉到后院起火的奥勒良，终于在法诺进入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入口处附近追上了蛮族的部队。双方的骑兵以梅托罗河注入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附近为战场展开激战。

奥勒良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虽然罗马军队大获全胜，但因为敌人全都是骑兵部队，所以也让他们逃掉了不少。不过这时的蛮族已经无心恋战，只想着尽早逃回多瑙河北部。而奥勒良的脑海里也只有将敌人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这唯一的想法。最终双方在米兰以南30公里处的帕维亚展开决战。在这场战斗中失败的汪达尔人被奥勒良全部歼灭，没有一个人活着逃回他们的故乡。

虽然奥勒良击败了入侵的汪达尔人，但是之前在描写罗马帝国与蛮族之间的交战时从来都不用打开意大利的地图，结果到了3世纪后期的时候，意大利的地图也不得不被打开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3世纪危机”的真实体现。

身在首都的元老院议员也被这次事件所震惊，他们不由得想起500年前汉尼拔兵临城下的往事，甚至祈求西比拉的预言来拯救自己。但是，当他们得知入侵的蛮族已经被击败的消息之后，前一秒还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的元老院议员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对让蛮族侵入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皇帝奥勒良的批评声一下子甚嚣尘上。

这件事一直持续了很久也没有平息下来，因为皇帝加里恩努斯的法令而被从军务中彻底赶出来的元老院议员们，对于军人出身的皇帝一直都抱有成见。从此与军事无缘的议员们，一方面十分享受在首都罗马舒

适而安全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对从他们手中夺走实权的军队持有某种难以名状的想法。这些曾经代表着罗马社会统治者阶级的元老院议员，现在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权力，而成为了一群批评家。在这些批评家的眼里，皇帝就相当于他们雇用来的佣兵部队的队长。所以，让蛮族侵入意大利本土的中部地区，就是这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佣兵的失职，对奥勒良的批评之声也是由此而来。

因为元老院的这种态度，军人皇帝们自然对元老院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先帝克劳狄乌斯二世还有写给元老院的报告遗留下来，到了奥勒良这里却连一份报告都找不到。实际上奥勒良应该也写过报告，只不过是否会在史料上留下记载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了。不过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奥勒良没有像先帝克劳狄乌斯二世那样经常性地向元老院提交报告，而且在奥勒留成功地彻底击败蛮族之后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回到首都罗马时，立刻强行颁布了两项十分刺激元老院议员神经的政策：

第一，货币改革政策。

第二，决定在首都罗马周围建设一道新的城墙。

但是，这在当时看上去必须尽快解决的两件事，为什么会刺激到元老院议员们的神经呢？

首先我们来看货币改革，这并不是一项从头开始的彻底改革，换句话说，这只是一项针对铸币的违法行为所进行的改革。

货币的发行权

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他将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以及塞斯特斯铜币作为罗马帝国的基本货币，其中金币与银币的发行权属于皇帝，元老院则拥有铜币的发行权。在随后的290年间，金币和银币一直在高卢的里昂进行铸造，铜币则在首都罗马进行

铸造。

公元260年，因为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导致帝国陷入一片混乱，高卢帝国趁机崛起，从罗马帝国中分离出去，位于高卢境内的里昂也脱离了罗马帝国的控制。无法继续在里昂进行货币铸造的罗马帝国，只好将金币和银币的铸造也放在首都罗马进行。当时，身为金银币铸造最高负责人的皇帝加里恩努斯因为忙于抵御蛮族的入侵而没有时间回到首都罗马，在加里恩努斯之后继位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也同样专心于击退蛮族，还没来得及回到首都便结束了他短短一年半的统治。结果在公元260年到270年这10年间，金币、银币以及铜币全都在首都罗马进行铸造，而货币铸造的管理权实际上全都掌握在执政官的手中。至于每年的执政官，则都是由元老院议员互相选举产生的。

虽说让敌人入侵到弗拉米尼亚大道的入口，奥勒良皇帝还是成功地击退了敌人，迫使其退回多瑙河以北。当奥勒良回到首都罗马之后，首先开始着手处理货币铸造人员的违法行为。当时金币的重量大幅减少，银币之中的含银量也降低到5%，皇帝声称这些问题都与铸造者的违法行为有关。不过这些铸造厂的负责人从姓名上来看都属于希腊系，因此他们应该是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隶阶级。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在铸造货币的过程中私自克扣金银含量。所以皇帝改革的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那些在背后支持这些铸造者做出违法行为的元老院。但是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奥勒良只能惩罚那些货币铸造厂负责人以下的工人。

工人们为了表示抗议而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甚至还占领了罗马七丘之一的阿文庭山。

皇帝奥勒良用自己的权力对此作出了回应。据说有7000人牺牲于罗马骑兵的铁蹄之下。

货币铸造厂的工人们远远没有7000人这么多。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

抗议群众，恐怕是因为那些唆使他们罢工的元老院议员把自己家里的用人也派遣过去以壮声势了吧。

虽然正如我前文所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件事和元老院有关。但是银币从纯银变成镀银的现状，真实地反映出罗马帝国当时国家经济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即便是对罢工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的奥勒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对帝国的货币政策只进行了些许的改变。因为他知道，要想恢复从前含银量100% 的货币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罗马帝国境内耕地大量荒废的问题。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只有将蛮族彻底赶出国境之外才行。

奥勒良属于那种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十分严格的统治者。所以即便没有证据，他也仍然不会就这样放弃对元老院的惩罚。因为这才是奥勒良提出货币改革的真正目的。

第一，金币的重量恢复到公元260年以前的6.5克。

第二，作为银本位制的罗马帝国最重要货币的银币，含银量维持现状5%不变。但是银币的重量要恢复到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规定的3.9克。

第三，由于银币的价值大幅下跌，铜币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塞斯特斯铜币从此以后全面停止发行。

这在金融方面可以说得上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毕竟当年银币重3.9克，含银量是100%。也只有在纯银的状态下，1枚银币兑换4枚铜币的等值关系才得以成立。而当银币的含银量降低到5% 之后，想要维持1枚金币兑换25枚银币的等值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虽然奥勒良的货币改革政策，在金融角度上来说属于唯一的办法，不过在政治角度上来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塞斯特斯铜币的正面，一般都雕刻有当时皇帝的侧脸。背面则雕刻着那位皇帝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比如哈德良铜币的背面雕刻的就是他在多瑙河两岸修建的大桥的落成纪念。另外在硬币的背面还刻有S和C的字样。这是“Senatus Consulto”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元老院发行”的意思。

曾经有位英国学者将罗马帝国称为联邦制国家，因为罗马承认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地方自治。罗马不仅承认各地在内政层面上的自治，像雅典那样对人类历史作出卓越贡献的城市，罗马人甚至还赋予他们发行自己货币的权力，以此来延续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其他同盟国和附属国，罗马帝国也承认他们的货币发行权。身为盟主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将其控制下的所有国家货币全部统一为罗马货币，而是保存了他们各自的货币，仅仅将罗马货币作为基准货币稳定相互之间的兑换价值。这就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确立罗马帝国货币制度时的想法。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货币兑换站，就是这个原因。

元老院发行的铜币（哈德良时期）

综上所述，货币的发行权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彻底取消铜币的发行，也就意味着奥勒良从元老院手中夺走了从皇帝奥古斯都以来保持了300年的铜币发行权。从此以后，雕刻着S和C字样的货币便彻底从罗马帝国消失了。不知道元老院的议员们在为这项政策投赞成票的时候，究竟心里是何滋味。

奥勒良城墙

在首都罗马周围建设一道新的城墙，使每个人都切身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曾经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罗马王国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修建的“Murus Servii”（塞尔维乌斯城墙），曾经保护了罗马城区500余年。在其建成500年后的公元前1世纪中期，被尤里乌斯· 恺撒拆除。恺撒之所以想要拆除这道城墙，是因为其影响到他对首都罗马的扩建工程，但是对于这座保存了500余年并且已经深入人心的历史文物，想要将其拆除必须有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恺撒以罗马帝国的“防线”已经很好地起到了保护首都罗马的作用为由，声称首都罗马周围已经不再需要城墙的保护。而随后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也切实地证明了恺撒的说法并非谎言。不过恺撒并没有将塞尔维乌斯城墙全部破坏。虽然他只摧毁了妨碍扩建的地方，但遭到破坏后的城墙实际上就已经失去防御的意义，于是在随后的建设中城墙被不断地拆除，现在只有在“终点站”前的广场和其他几个地方还留有遗迹。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市民们，享受了整整300年没有城墙的和平生活。

但是，到了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境内的其他城市和街道全都被城墙保护起来，首都罗马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在没有城墙的这300年间，首都罗马已经比之前扩大了许多倍。所以新建的城墙也必须将整个罗马都包围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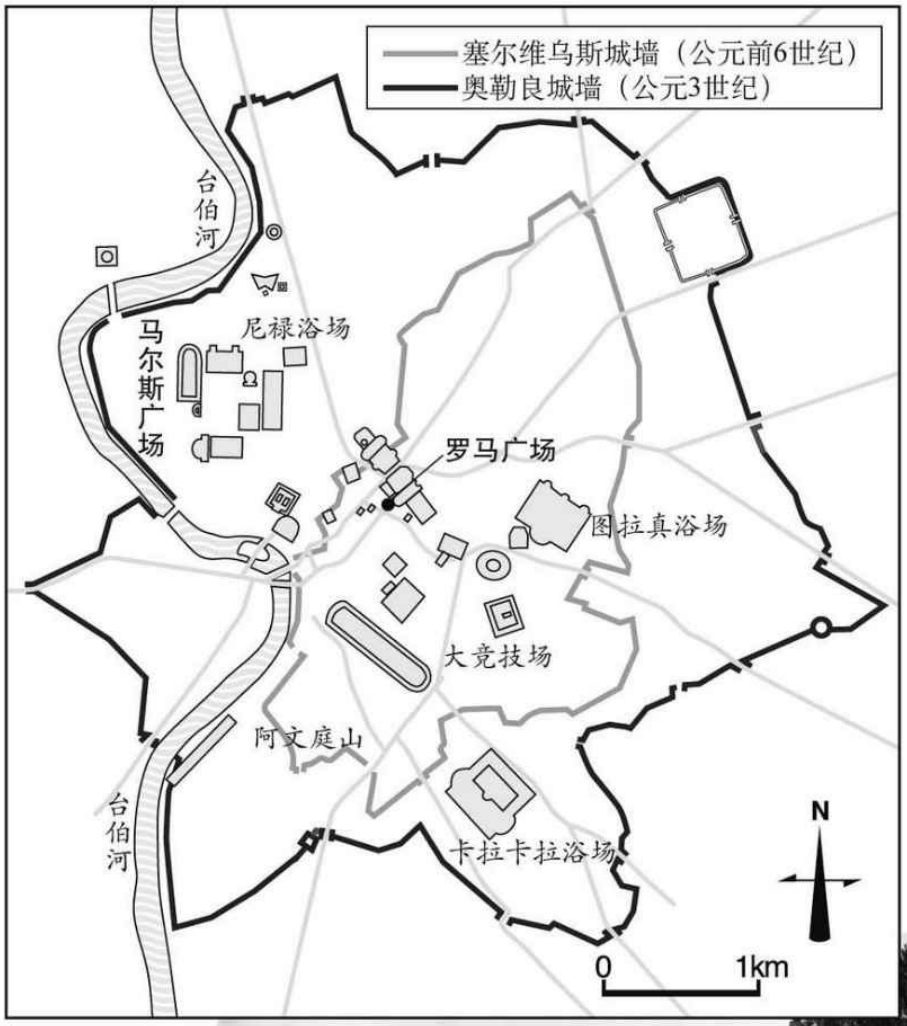
这座始建于公元271年，总共用了6年时间才完工的城墙，按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公共建设发起者的名字命名为“Murus Aureliani”（奥勒良城墙）。城墙全长19公里，平均高达6米，厚3.5米，总共拥有18座城门，并且在各个重要位置设有碉堡，具有典型的防御性城墙特征。因为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帝国一直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所以罗马人民也丝毫不敢怠慢对这座城墙的修复工作，于是在时隔1700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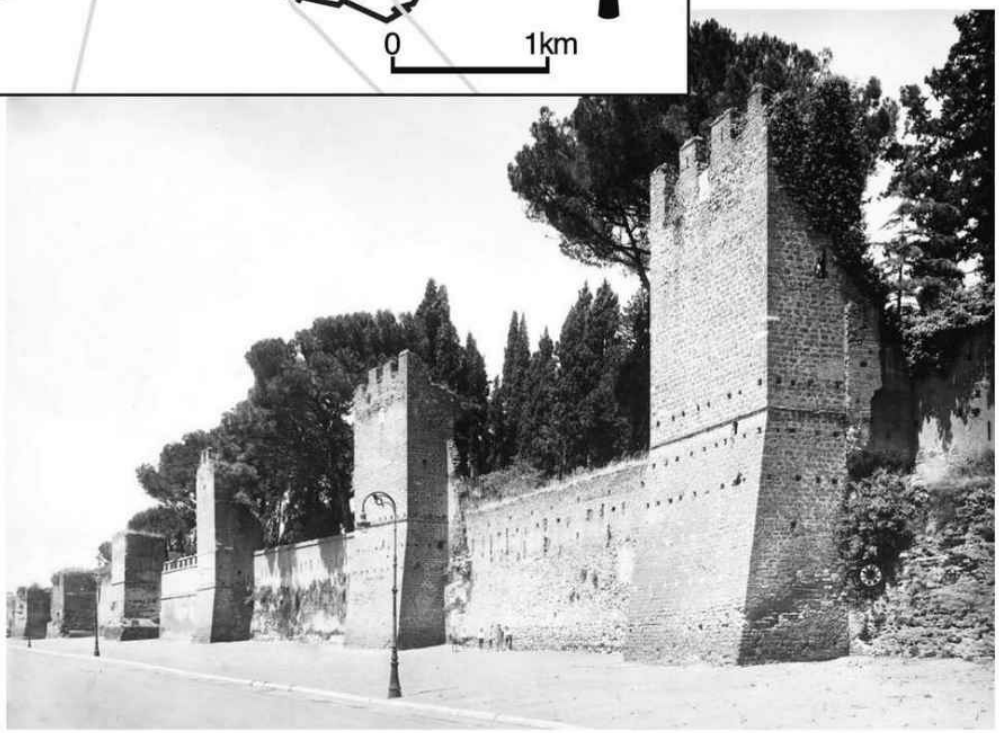
年以后，这座早已成为历史遗迹的城墙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即便如此，在地理位置上位于罗马帝国中心点的首都罗马，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外部环境的改变对每一个罗马人的内心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每一个看到城墙的人都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曾经可以自由向外扩张的罗马市居住区域，现在也被奥勒良城墙分为内外两部分。分散于罗马郊外的富人区别墅，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开放，而不得不建立一些防御措施。经济条件允许的富裕阶级纷纷选择移居城内，而这个现象在那些比较容易遭到蛮族袭击的行省城市中早已出现。就连农民也纷纷转移到有城墙保护的城镇之内，每天早晨出门耕作，傍晚的时候回到城里休息。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成为过去之后，罗马帝国全境都开始出现郊外人口过于稀少而城市人口过于稠密的现象。这一现象，成为助长基督教势力扩大的温床。

但是对于皇帝奥勒良来说，他只能优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至于元老院对此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他根本就毫不在意。在城墙的建造开始之后，奥勒良便从首都出发前往帝国的北方边境。在他的脑海里只有接下来该做的第二件事——解决帕尔米拉问题。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将多瑙河防线附近的问题彻底解决。

罗马的两座城墙


塞尔维乌斯城墙（公元前6世纪）
奥勒良城墙（公元3世纪）
台伯河
马尔斯广场
尼禄浴场
罗马广场
图拉真浴场
大竞技场
阿文庭山
台伯河
卡拉卡拉浴场
N
0
1km



现在仍然随处可见的奥勒良城墙

放弃达契亚

皇帝奥勒良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其他皇帝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以“速攻”见长。之前所说的国内政治问题，他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基本搞定，至于接下来要说的多瑙河防线问题，他也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确立下来。当然，与蛮族之间的策略和国内政治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针对于此，奥勒良的战略基本上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

一、首先采取积极的进攻，给蛮族以彻底的打击。

二、在对蛮族造成沉重打击之后，等待陷入劣势的蛮族提出媾和。

三、用非常威严的舞台场面来迎接那些前来提出媾和的部族族长。具体来说，就是奥勒留身着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式军装伫立在舞台中央，在他的身后，与蛮族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代皇帝的大理石雕像呈半圆形排列开来。雕像左右站满全副武装的将军，身后是他麾下的重装步兵和骑兵，每个士兵的手中都高举着代表他们军团的银鹫旗。总之，这场面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和谈会场。

四、在前来媾和的蛮族代表被如此威严的场面压倒之时，以尽可能对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来达成和约。

不过奥勒良也没有忘记给蛮族留面子。这就是罗马人最擅长的“胜而让步”政策。

在与蛮族签订和约之后，奥勒良决定从达契亚行省撤军，将这一地区让给哥特人。罗马帝国在图拉真征服达契亚建立行省165年之后，再次失去了对达契亚的统治。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达契亚，就像是一个

巨大的桥头堡一样深入蛮族腹地。奥勒良深知以罗马帝国的现状无法继续统治这一地区，进入公元3世纪中期之后的事实已经证明，仅仅依靠常驻达契亚的2个军团根本无法完成他们的防卫任务。之前的皇帝之所以不敢放弃达契亚行省，是害怕因此失去公民的信任，一不小心还会丢了小命。但是奥勒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一决定。

驻扎在达契亚行省各处的罗马军队以及市政负责人全部撤出达契亚，返回多瑙河南岸。当地居民可以自由选择是继续留在达契亚，还是移居到罗马境内。虽然有很多人都移居到了多瑙河南岸，但是据说决定留下来的罗马人也不少。毕竟刚刚从罗马帝国手中接过达契亚地区的哥特人缺乏对这里的统治经验，所以当地居民对于哥特人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虽然我们不知道皇帝奥勒良与哥特人之间围绕着达契亚问题究竟签订了怎样的协议，但是因为事件发生当时没有出现任何的混乱局面，由此可见罗马从达契亚的撤退并没有引发什么深刻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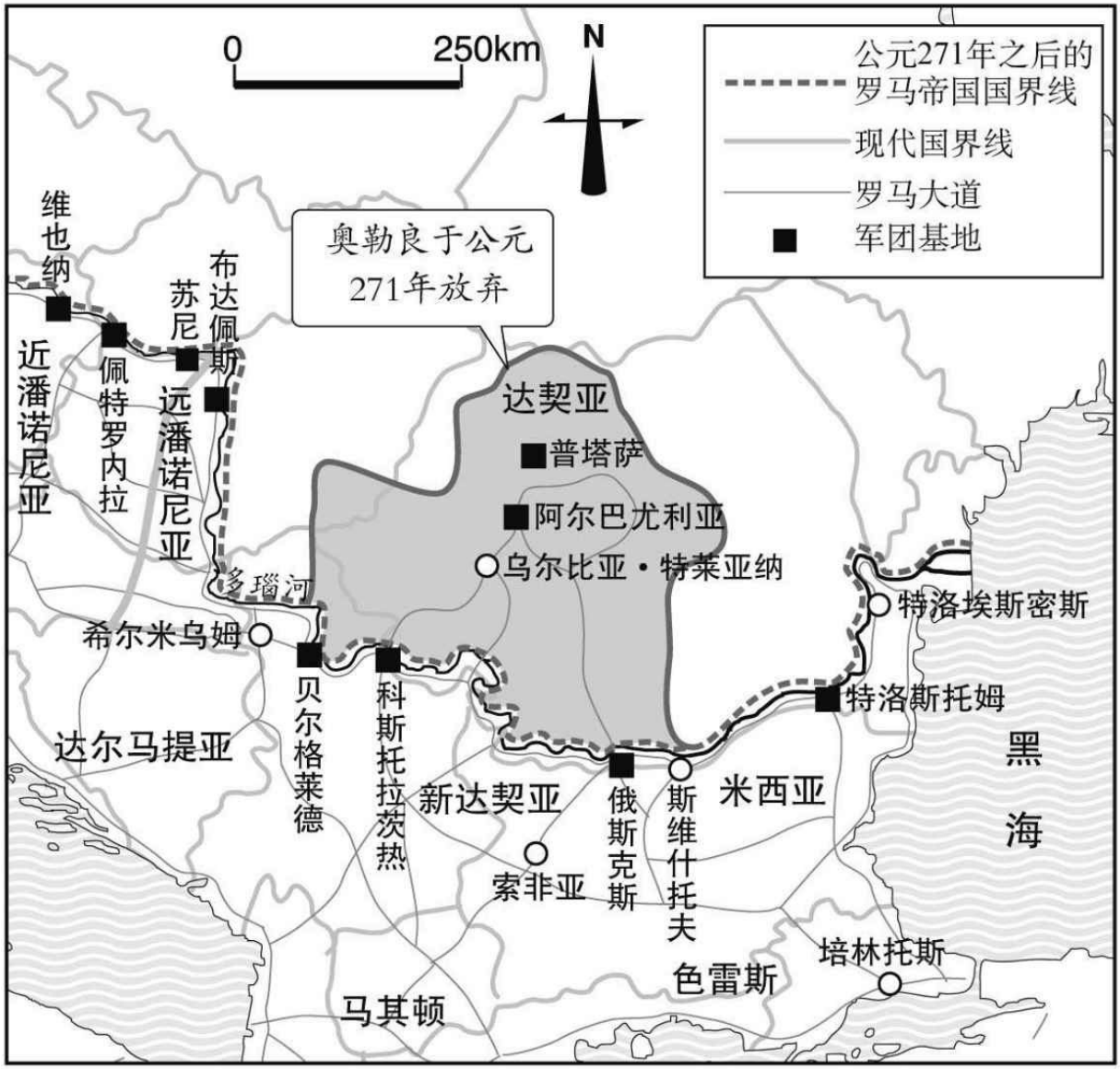
但是奥勒良并没有单纯地从这里撤军。他从多瑙河下游南岸广阔的米西亚行省、西部的达尔马提亚行省以及南部的色雷斯行省各自分出一部分，建立了一个新的达契亚行省。将从达契亚撤退出来的2个军团安置在这里。新达契亚行省的首府塞迪卡就是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这样一来，奥勒良就在多瑙河的下游用米西亚与新达契亚组成了防线上的双保险。

从达契亚撤军的罗马帝国，与进入达契亚的哥特人之间仅仅一河之隔，但是这两股势力之间并非敌对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在200年后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大入侵时代，只有达契亚的蛮族没有南下进攻。

第二，古代达契亚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而罗马尼亚语和意大利

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一样都同属拉丁语系。但是意大利属于罗马帝国本土，法国及西班牙则直到罗马帝国终结都是一直属于罗马帝国的行省，罗马尼亚显然与上述情况都不相符。罗马尼亚成为罗马帝国行省的时间要比法国和西班牙都晚，脱离罗马帝国的时间却比法国和西班牙都早。但是即便如此，罗马尼亚语仍然属于拉丁语系。如果你懂得意大利语的话，那么就能够理解一大半的罗马尼亚语。



达契亚及其周边

从公元106年皇帝图拉真征服达契亚开始，直到公元271年奥勒良放弃达契亚的短短165年时间里，达契亚能够和罗马帝国建立如此根深蒂固的联系吗？因此我认为在罗马帝国撤出达契亚的时候，选择继续留在当地的罗马公民一定为数不少，而从此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一定也十分密切。毕竟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习惯。

既然皇帝奥勒良从达契亚行省撤退的决定在政策层面上取得了成功，那么将其作为长久性的政策又将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日耳曼民族中并不只有哥特人，而且在哥特人中也有不满足于农耕生活、渴望其他生活模式的部族。

总之，在解决了帝国北方多瑙河防线的问题之后，奥勒良终于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帝国的东部。公元271年夏季还没结束的时候，皇帝已经率军向东方进发，速攻特色一如既往。

女王芝诺比阿

自从公元260年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以后，就再没有一位罗马皇帝越过赫勒斯滂海峡踏足亚细亚的土地。加里恩努斯和克劳狄乌斯二世都忙于应对西方的蛮族，根本无暇顾及原本只是一个商业都市的帕尔米拉在帝国东方的势力扩张。从公元260年到270年的这10年间，帝国东方基本处于搁置的状态。逐渐地，帕尔米拉的女王芝诺比阿开始对罗马帝国产生轻蔑的心理，认为即便在军事上也能够战胜对方。

与奥勒良一同前往东方的军队，被认为是他从多瑙河防线选拔出来的精锐骑兵，因为他们在行军速度上非常迅速。

进入小亚细亚之后，奥勒良所率领的军队立即向被帕尔米拉统治了10年的地区进发。罗马军队首先一路向东，直到抵达安基拉（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为止，都没有遇到任何帕尔米拉的军队。不仅如此，当地的居民还纷纷打开城门欢迎罗马皇帝与军队的到来。一路畅通无阻的奥勒良率军从安卡拉转道向东南方前进，来到位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交界处的托罗斯山脉，结果罗马军队却出人意料地在迪亚纳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抵抗。

奥勒良当机立断包围了迪亚纳，开始进行攻城战。迪亚纳仅仅是当地的一座小城，帕尔米拉甚至没有派遣援军前来支援。结果不出数日，

因为自己的冲动之举而感到后悔的居民们便打开城门宣布投降。不过奥勒良并没有对迪亚纳进行任何的掠夺和破坏，也没有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任何惩罚。这实际上是奥勒良向其他处于帕尔米拉统治下的地区居民所发出的一个信息，他对迪亚纳的宽大处理，也比罗马军队更早越过托罗斯山脉，传遍了10年来帕尔米拉统治下的帝国东方地区。本应在这个时候改变战略却没有那么做的芝诺比阿，大概是唯一没有理解这个信息含义的人。

女性执掌国政的事例，在历史上来看大多出现于东方。因为东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拥有非常悠久的君主专制传统。不过同样是女性执掌政权，也分为在傀儡统治者身后垂帘听政的类型，以及亲自出面执掌大权的类型。克娄巴特拉可以说是后者的典型，而以克娄巴特拉为自己榜样的芝诺比阿也同样属于后者之中的一员。

芝诺比阿在方方面面的表现都和男人毫无二致。她热衷于骑马狩猎，战斗时亲自披甲上阵，从不缺席任何一次政治场合，还经常和招聘来的希腊教师探讨关于希腊哲学与希腊悲剧的问题。除了喜爱珠宝饰品这个东方女性共通的特点之外，芝诺比阿在各个方面都与男性的君主毫无二致。虽然帕尔米拉名义上的统治者是她的儿子瓦巴拉图斯，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芝诺比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她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

支持芝诺比阿统治的，是他的亡夫奥迪纳图斯生前所培养出来的帕尔米拉军队。帕尔米拉原本只是一座商业都市，并没有组建军队的传统。所谓的帕尔米拉军队，最开始只是通过经商积累下来大量财富的帕尔米拉花钱招来的雇佣兵而已。不过因为奥迪纳图斯的英勇战斗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吸引了很多罗马帝国屯驻在东方的军团兵加入帕尔米拉军队。

芝诺比阿手下拥有的就是这样一批军队。在她控制了帝国东方的全部区域之后，就相当于掌握了帝国东方的经济力量，而罗马帝国东方的

经济实力一直凌驾于西方之上。她之所以不畏惧皇帝奥勒良的进攻，就是因为她清楚自己在经济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她坚信只要有钱，就有源源不断的士兵。同时芝诺比阿的自信也并非毫无根据。帕尔米拉军队的主力是和波斯军队一样的重装骑兵，装饰着黄金盔甲的战马和骑士，仅仅从军装的华丽程度上就足以压倒对手。

另外，芝诺比阿在战略层面上也表现出非常强大的控制欲望。虽然指挥实战的将军是希腊人，但在何时、何地开始战斗，却完全要由她的判断来决定。

在越过托罗斯山脉之后，奥勒良给芝诺比阿送去一封书信：

> 刚刚继位罗马帝国皇帝不久，决心光复帝国东方领土的奥勒良，致书芝诺比阿以及她身边的军事同盟者：
>
> 吾向汝等下达的这项命令，本应由汝等主动提出，因汝等没有那样做，所以只好由吾亲自下令。
>
> 吾命令汝等即刻解除武装，开城投降。若汝等遵从，吾可保汝等性命无虞。尤其是芝诺比阿，吾与罗马元老院将为其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保证她和她的家人及亲友以及用人们都能安度余生。但是芝诺比阿所拥有的金银珠宝及其他一切财物都将收归罗马帝国所有。此外，帕尔米拉的市民们从今往后仍然享有一切罗马帝国到目前为止对汝等提供的权利。

对于这封书信，芝诺比阿的回信如下：

> 东方女王芝诺比阿，致书罗马皇帝奥勒良：
>
> 至今为止，尚无人敢于像阁下一样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若阁下身为一名战士，应知此事非由书信决定，而应于战场之上一较高下，胜者为王。你劝我不战而降，岂不知宁死不肯使自己名誉受辱

的克娄巴特拉之往事乎？

我已得波斯援军，不日即可抵达。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皆已与我结盟。从叙利亚沙漠中赶来的贝都因人，想必也正令贵军烦恼不已吧。

阁下尚需何等情报？若知我方援军正从三方赶来，阁下必然不会如此傲慢，仿佛已经将胜利收入囊中一般劝我投降了吧。

公元272年，双方之间的战斗不可避免地展开。因为帕尔米拉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是重装骑兵，所以芝诺比阿将战场选择在安条克北部不远处的欧罗登斯河平原之上。

第一战

虽然现在被土耳其人称为安塔基亚的这个地方，只是叙利亚与土耳其国境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在古罗马时期，这个被称为安条克的地方是帝国东方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地中海世界代表性的大都市。安条克的城区位于欧罗登斯河的东南部，这条全长20公里最终注入地中海的河流，在当时具有充分的航运条件。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物产集散地的安条克，在中世纪以后逐渐衰落下去的原因，就是欧罗登斯河的河道变浅，不再适宜货船航行所致。

芝诺比阿之所以没有在大都市安条克进行防守，而是与罗马军队在郊外的平原地带进行会战，从某种原因上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得知奥勒良对迪亚纳居民的宽大政策之后，安条克的居民们顿时对自己这10年来屈服于帕尔米拉统治之下的做法感到十分后悔。他们对芝诺比阿以及帕尔米拉军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冷漠起来。芝诺比阿知道安条克现在已经靠不住了，而且她热切盼望的波斯援军也迟迟没有出现。不仅如此，约定好的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都没有赶来。唯一出兵支援的贝都因人仅仅对罗马军队发动了一次袭击，结果却以失败收场。

几乎与此同时，曾经活捉了罗马皇帝瓦勒良的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也与世长辞。对于这个连奥勒良都知道的情报，如果芝诺比阿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位“东方女王”在战斗方面的信息就未免太闭塞了。因为援军不知何时才能到来，芝诺比阿只能在安条克郊外与罗马军队一决胜负，而她唯一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重装骑兵。

双方在欧罗登斯河的两岸拉开阵势。位于帕尔米拉军队正中央位置的中枢主力重装骑兵军团，即便在河对面看上去仍然显得威风凛凛。骑兵出身的奥勒良亲自出现在罗马军队的最前方。战斗在罗马骑兵越过欧罗登斯河的同时展开。

但是越过欧罗登斯河的罗马骑兵只有十几人。而且当他们看到帕尔米拉的骑兵迎面冲来之后，这十几名罗马骑兵就好像被帕尔米拉骑兵的气势所压倒一般，仓皇地掉转马头向回逃去。

帕尔米拉骑兵在逃跑的罗马骑兵身后紧追不舍。对于身为罗马全军总指挥的皇帝奥勒良来说，能否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战机就是这场战役取胜的关键。而他所等待的时机，就是帕尔米拉的重装骑兵在追赶罗马轻骑兵的过程中，骑士和战马都显露出疲态的时候。

奥勒良一声令下，罗马的骑兵部队转身向一直穷追不舍的帕尔米拉骑兵发动了反击。与此同时，一直在附近高地待命的罗马步兵部队也出现在帕尔米拉骑兵部队的左右两侧。面对突然被敌人三方包围的情况，正在追击中的帕尔米拉重装骑兵无法及时掉转方向，转眼间便遭到罗马军队的围剿。只有位于队伍后方的骑兵在唯一没有被围住的出口逃出，并且一路向欧罗登斯河对面的己方阵地逃去。

虽然并没有全歼帕尔米拉军队，但罗马军队已经很明显地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作为帕尔米拉军队主要战斗力的从波斯雇用来的重装骑兵，被罗马军队消灭了三分之二。在得知这场战斗的结果之后，那些被雇用来的步兵都因为恐惧而不顾佣兵的约定，纷纷四散而逃。不得不承

认失败的芝诺比阿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安条克居民的支持，只能率领残余的部队退回位于安条克以南200公里的埃梅萨，并且打算将这里作为她与奥勒良交手的第二战场。

获得第一战胜利的奥勒良，率领全军进驻安条克。当地居民对时隔12年之久的皇帝再次驾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对于安条克这12年来对罗马帝国的背叛，皇帝以他们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为由，并没有作出任何的惩罚。从此以后，安条克便不是帕尔米拉王国的主要都市，而是以罗马帝国东方代表性城市的身份重新华美地绽放。

这座堪称国际性都市的大城市，由希腊人、犹太人以及其他的东方各个民族的居民所组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许多在当时不断增加的基督教徒。虽然奥勒良在安条克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有很多事情有待他来作出裁决。其中之一，就有居住在安条克的基督教徒们恳请他来帮助解决的一个争论。

罗马皇帝奥勒良将产生纠纷的两派代表叫到自己的面前。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基督教之中，罗马主教和安条克主教哪一个的地位更高。基督教徒非常热心于向将他们统一起来的教会组织捐款，并且以此作为自己与拥有其他宗教信仰之人的不同之处。因此，决定谁是组织中最高级别的主教，就相当于决定一个拥有分配捐款权力的主教。只怕在公元3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这个时候，安条克主教的信徒数以及捐款数量都要远远高出罗马主教。

但是被请求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皇帝奥勒良，不知是根据何种判断基准，作出罗马主教是基督教最高主教的裁决。虽然这个问题成为后世基督教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话题，但是根据奥勒良当时的裁决，罗马主教拥有比安条克、亚历山大港以及迦太基的主教都高的地位。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决定并不是由基督教徒作出的，而是由被基督教视为异教徒的罗马皇帝作出的。顺便说一句，现代的罗马教皇，也必须以罗马的主教为最优先人选。

奥勒良本身大概是受母亲的影响，信奉太阳神。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支持多神教的古代人。古代人大多认为信仰是个人的自由，而且对于别人的信仰一向持宽容的态度。

第二战

皇帝奥勒良与女王芝诺比阿之间的第二战，在埃梅萨的郊外展开。芝诺比阿仍然以重装骑兵为主。但是奥勒良并没有使用和上次同样的战术。这次他派出罗马步兵与帕尔米拉的重装骑兵相抗衡。不过这些罗马步兵的手中并没有他们传统的长枪和罗马短剑，取而代之的却是又粗又长的棍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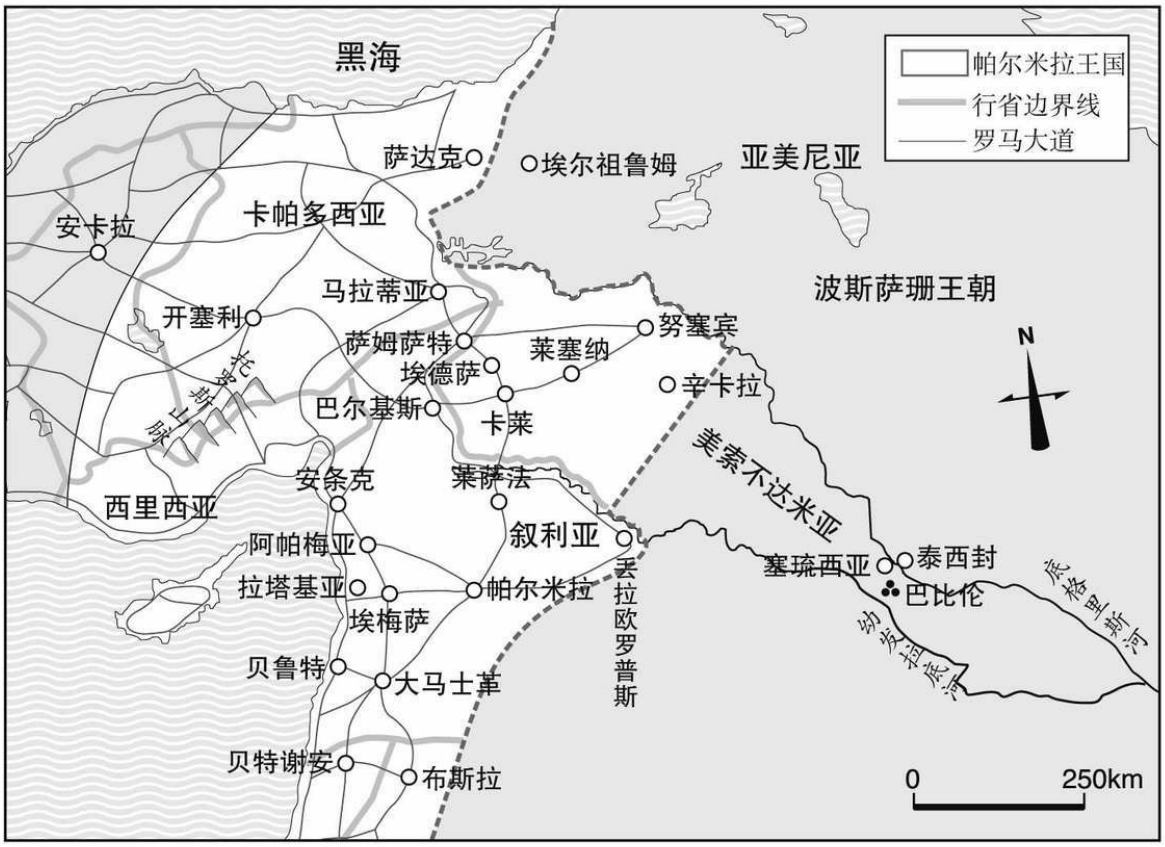
轻骑兵一般用弓箭来作为武器，重装骑兵则多以长枪和长剑来作为武器。也就是说，重装骑兵只有在接近对手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战斗力。而罗马的步兵们则遵照奥勒良的命令，一直等待敌军的骑兵来到非常近的距离之后才开始行动。步兵队长看准时机一声令下，罗马步兵一齐用棍棒向重装骑兵的马腿打去。马匹被打翻在地以后，因为浑身披满沉重的铠甲，不管是战马还是上面的骑士都难以起身。趁此机会，罗马步兵将手中的棍棒换成长枪和短剑，向倒在地上的帕尔米拉骑兵发起攻击。这次，没有一人幸免于难，就连芝诺比阿的儿子，帕尔米拉王国的国王瓦巴拉图斯都在这场战役中身亡。毫无疑问，罗马军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连续遭遇两次惨败的芝诺比阿，只有逃回故乡帕尔米拉这唯一的选择。

帕尔米拉攻防

芝诺比阿以及她手下由希腊人组成的重臣们，对在叙利亚沙漠正中央的帕尔米拉进行攻防战，具有很强的信心。位于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帕尔米拉，与安条克和埃梅萨相比，距离波斯的领土更为接近。他们坚信曾经成功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的波斯人，在面对10年后攻打

帕尔米拉的罗马皇帝之时，一定会派遣军队前来支援。况且罗马军队也不可能不忌惮波斯方面的动向，所以只要帕尔米拉能够抵挡住对方的围攻，那么罗马军队早晚会撤军。

对于芝诺比阿来说，坚守帕尔米拉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帕尔米拉在地理位置上被沙漠所包围。罗马军队要想围攻帕尔米拉，只能依靠安条克的补给。但是这条补给线太长，而且补给线越长，其效率就越低。最终，补给难以为继的罗马军队只能放弃包围，无奈撤军。总之，帕尔米拉能够在罗马军队的围攻中坚持多久就是问题的关键。而当时的帕尔米拉城中储备了大量物资，足以应对长时间的包围。



公元27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准备对帕尔米拉发动攻击的奥勒良，也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安条克的后方支援问题上，他在写给自己最信赖的秘书官姆卡波勒斯的信中向对方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 在首都的那群家伙，似乎在嘲笑我身为罗马皇帝竟然向一个女人宣战。看样子，他们以为这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赤手空拳的肉搏。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在和女人战斗。我的对手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只不过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勇气不输于男人的女人。但是这种情况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很多人一听说对方是个女人都会产生同情的心理。
>
> 帕尔米拉军队所使用的弓箭、投石器、标枪性能之精良，我几

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他们的城墙上，满满地排列着数不清的大型投石器，这些投石器连续不断地向我们投出巨石。有时这些大型投石器还会投出燃烧着的炮弹，一旦落地，周围全都化作一片火海。

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即便芝诺比阿的内心深处仍然拥有女性的恐惧，但是当她站在阵前的时候，却比任何一个男人都更加勇猛。在给予她惩罚之时，应该也考虑到这一点吧。

我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诸神总是赐予我们罗马人以无穷的力量。这次也一定会帮助罗马帝国再次复兴！

当然奥勒良不会将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诸神的身上，同时他也深知仅仅依靠安条克的补给，会使补给线过于狭长。于是他在围攻帕尔米拉之前，首先将补给基地分散到战场附近的许多地方。以帕尔米拉为中心，罗马的大道联结着西南的大马士革、西方的埃梅萨、北方的莱萨法以及东方的丢拉欧罗普斯。位于幼发拉底河防线附近的这些罗马帝国东方城市，和帕尔米拉一样都属于通商城市，奥勒良就在这里建立起罗马军队的补给网络。这些城市的居民主要由希腊人组成，因为罗马帝国之前就给予他们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因此即便在失去控制10年以后，罗马帝国仍然很容易地重新接管了这些地方。而这些城市的居民们，对于自己能够向罗马军队提供补给都感到十分荣幸。这一点也是芝诺比阿始料不及的。

这样一来，即便在沙漠中央，罗马军队“以兵站取胜”的传统战斗模式仍然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奥勒良所率领的罗马军队的攻势丝毫不见减弱的迹象。结果帕尔米拉的居民们纷纷开始动摇起来。他们原本就是一群商人，而商人都是非常现实的。支持芝诺比阿的市民一天比一天减少。

面对如此情景，这位“东方女王”也开始绝望起来。眼见坚守无望，

她只能带着重臣连夜逃出城去。从她向东逃跑的线路来看，大概是打算请求波斯国王的帮助吧。但是她还没逃出多远，就被追来的罗马骑兵所包围。得知芝诺比阿被捕的帕尔米拉居民，主动打开城门迎接罗马军队的到来。

芝诺比阿的亡夫和她的儿子，都曾经被皇帝加里恩努斯授予“罗马帝国东方司令”（Dux Orientis）的称号。也就是说，他们是负责罗马帝国东方防御任务的总负责人。而身为东方长官的他们对罗马皇帝刀剑相向，是很明显的反叛之罪。于是被逮捕的芝诺比阿及其手下重臣们，都被带到皇帝奥勒良的面前接受审判。

在接受审判之时，芝诺比阿的行为暴露了她到底不是克娄巴特拉。她将反叛的责任全部转嫁到重臣们的身上。她坚持声称自己是被大臣们欺骗了，只是被那些大臣们的野心所利用的牺牲品。

奥勒良当然不可能相信芝诺比阿的狡辩。不过罗马自古以来就对那些不会对罗马造成威胁的人给予宽大处理，即便这个人是敌国的君主也不会处以死刑。因此奥勒良仅仅处死了帕尔米拉的重臣们，而将芝诺比阿活着带回意大利。

时隔10余年终于解决了帕尔米拉问题的奥勒良，为了能够尽快去处理其他事务，不愿意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于是他在重新恢复了帝国对埃及的统治权之后，便将东方的防御任务交给他的副将普罗布斯，自己率军向西方进发。他没有对帕尔米拉的居民作出任何的惩罚，仅仅以防御部队的名义，命令600名士兵屯驻下来。

但是帕尔米拉人错误地理解了奥勒良的宽大政策。他们在皇帝的军队离开之后，杀害了屯驻于此的600名士兵，并且宣布从罗马帝国中独立。

已经翻越了托罗斯山脉的奥勒良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刻不分昼

夜地赶回帕尔米拉。罗马人将“信义”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甚至将“信义”神格化，将其供奉在神殿之中。所以对罗马人来说，不遵守约定是最为严重的罪行。

在罗马军队的猛攻之下，帕尔米拉很快便被攻陷。在此之前对投靠芝诺比阿的东方城市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惩罚的奥勒良允许罗马军队将帕尔米拉洗劫一空。帕尔米拉在此之后虽然仍然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高卢光复

若要将三分天下的罗马帝国恢复到公元260年前的模样，那么现在只剩下高卢帝国这一个问题。奥勒良之所以不愿意在东方浪费太多时间，就是希望能够趁着收复帕尔米拉的气势，一口气解决帝国西方的问题。而转向西方的奥勒良及其罗马军队的行军速度，也丝毫不愧于他“速攻奥勒良”的称号。在他沿着多瑙河防线向西进军的路上，一旦发现防线外围的蛮族有可疑的举动，便立刻毫不犹豫地投入兵力进行打击。品尝到胜利滋味的官兵们，变得愈发强大起来。而连战连胜的态势，给罗马军队带来前所未有的士气和信心。这样一来，即便在放弃了达契亚行省之后，若用多瑙河防线作为衡量帝国安全指数的仪器时，恐怕指针会一路往合格的方向跑。随着珍惜光阴、办事有头有尾的奥勒良从多瑙河下游往上游移动，指针的高度也随之节节攀升。

对于奥勒良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高卢帝国的皇帝泰特里库斯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虽然这个人身为从罗马帝国分离出去的高卢帝国的皇帝，但是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属于罗马的元老院阶级，他本人也在罗马元老院中拥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这个人有着非常传统的罗马人的思维方式。

泰特里库斯一定深切地感觉到皇帝奥勒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高卢帝国。同时，他也对高卢帝国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出身于罗马

元老院阶级，因此认为罗马帝国理所应当地应该拥有西至西班牙、东至叙利亚、北至北海、南至撒哈拉的广阔领土。而且，高卢帝国的诞生并非出于当地居民的独立愿望，只是发生在公元260年的那件震撼帝国全境的瓦勒良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大事件所引发的余震之一。也就是说，高卢帝国只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偶然结果罢了。

公元273年秋，奥勒良率领的罗马帝国军队与泰特里库斯率领的高卢帝国军队，在高卢北部后来被称为香槟地区的塞纳河上游平原展开对峙。但是，就在双方决定开战的前一夜，泰特里库斯秘密造访奥勒良的营帐。双方似乎早已对这次访问作好了准备，不过两人全都保守了这一秘密。

关于他们二人会谈的内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会谈的结果，以高卢帝国皇帝泰特里库斯向罗马帝国皇帝奥勒良宣布投降告终。第二天一早，双方军队都按照预定计划出现在战场上，但是随后两军并没有发生交战，只有士兵们的欢呼声响彻战场。仔细想来，他们其实原本都是罗马军队中的战友。就这样，存在了14年的高卢帝国宣告终结。高卢、西班牙以及不列颠，全都兵不血刃地重新回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就在奥勒良处理完这一切准备返回首都罗马之际，收到了元老院答应为他举办凯旋仪式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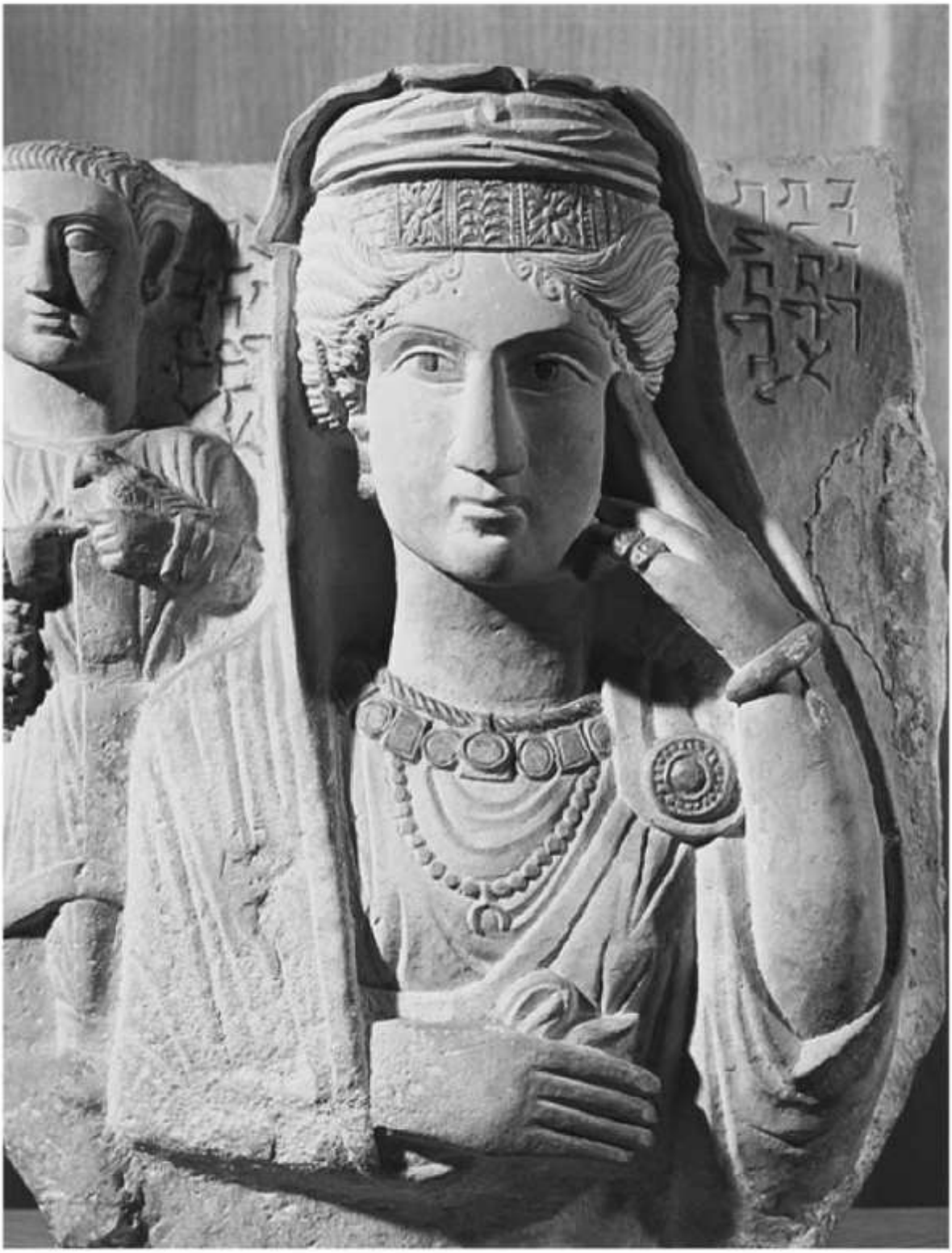
凯旋仪式

公元274年春，首都罗马的居民们久违了的盛大凯旋仪式，伴随着和煦的春光沐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庆祝的队伍中，俘虏们多姿多彩的服装样式，显示出奥勒良在面对众多民族之时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俘虏中包括北方的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拉曼人，东方的大夏人、阿拉伯人、萨拉森人、帕尔米拉人以及埃及人。高卢帝国最后的皇帝泰特里库斯和他的儿子也都穿着高卢特色的民族服装，坐在敞篷马车上作为整个庆祝队伍的点缀而出现在凯旋仪式上。出

席凯旋仪式的元老院议员们，有不少人对与他们同样在罗马元老院拥有席位的泰特里库斯现在的模样，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与不满。

在凯旋仪式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帕尔米拉曾经的女王芝诺比阿。她身着具有浓重东方色彩的帕尔米拉民族服装，被用黄金锁链囚禁在她最喜欢的金色敞篷马车上，而且身上还挂满了她所拥有的全部首饰，因为首饰太过沉重，使得她保持身体的平衡都显得十分困难。

凯旋仪式的主人公，当然是凯旋的将军。罗马的传统做法是将军身披大红斗篷，坐在4匹白马拉的战车上。但是奥勒良所驾驶的战车前方并非白马，而是4头雄鹿。用雄鹿牵引战车原本是北方蛮族的首领在祭祀时所采用的方法。但是奥勒良这样做并非为了模仿北方的蛮族，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凯旋仪式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收复了帕尔米拉和高卢帝国，而在于他击败了多瑙河以北频繁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本意，只是为这很少见的4头威风凛凛的雄鹿一个劲地拍手喝彩。最后这4头雄鹿在凯旋仪式最后的祭祀典礼中，被作为向卡匹托尔山的最高神朱庇特神殿供奉的祭品而“牺牲”了。



帕尔米拉墓地出土的浮雕

在这些被强迫参加凯旋仪式的俘虏中，唯一牺牲的只有那4头雄鹿。而其他的俘虏甚至连牢狱之灾都得以幸免。高卢帝国最后的皇帝泰特里库斯被允许继续保有他原本就拥有的元老院席位。不仅如此，他还被任命为意大利本土某地的行政长官。他的儿子也被授予了一个与其元老院议员儿子的身份相符的国家要职。泰特里库斯回到他加入高卢帝国之前所拥有的宅邸中，并且举办了一场晚宴，皇帝奥勒良也出席了这场宴会。

奥勒良在距离首都罗马20公里之外的提沃利为芝诺比阿提供了一座别墅供其安度余生。虽然无法与皇帝哈德良那豪华的别墅相比，但是与首都罗马距离适中的提沃利，仍然是一个环境优雅山清水秀的地方。居住在这样一座开放式的罗马别墅之中，想必芝诺比阿的生活一定也是非常舒适的。关于她去世的日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因为她自从被带到罗马之后便一直没有做出任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举动，所以也没有引起那些编年史作者的注意吧。每年从帝国国库中发放给她的生活费，非常充分地保全了她曾经身为帕尔米拉女王的颜面。与她一同被带到罗马的两个女儿，也在不久后分别嫁给了两位元老院议员为妻。由此可见，帕尔米拉王国寿命只有从公元260年的那场动荡局势中起算的10年。

凯旋仪式上使用的战车（复制模型）

帝国再次统一

正如一向对皇帝奥勒良没有什么好感的元老院都不得不为他在公元274年举行凯旋仪式一样，奥勒良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有足够的资格来要求这一切。

自从皇帝瓦勒良在公元260年被波斯国王俘虏以来，皇帝加里恩努斯统治的8年再加上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统治的2年，共计10年的时间都没能完成的任务，奥勒良只用了短短4年的时间便宣告完成。元老院经过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授予其“Restitutor Orbis”的称号，意为“重建帝国的人”。

政治的世界并非座谈会会场，当权者必须用具体的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他的能力。对罗马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保护罗马帝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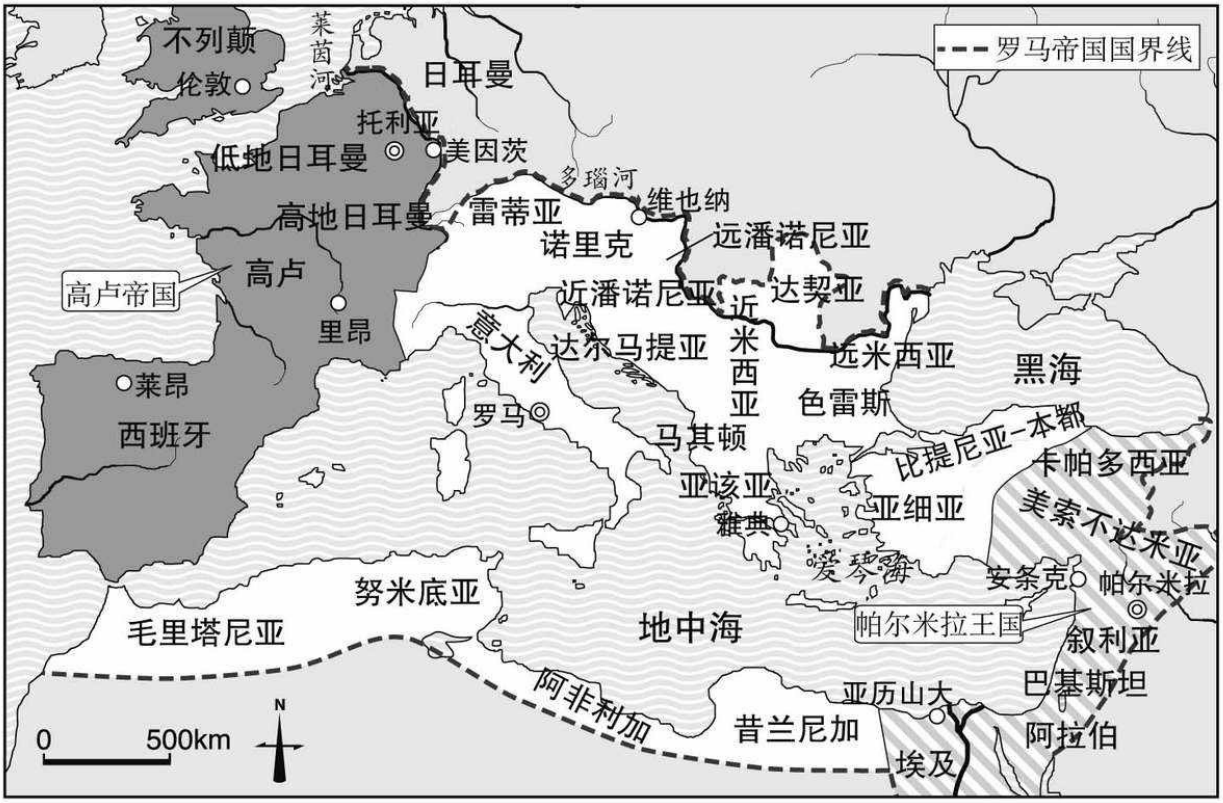
受外敌的侵扰。但是，如果罗马帝国各部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么帝国就无法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特质。

所以皇帝奥勒良花费了4年时间所实现的帝国再次统一，不仅仅意味着领土的回归，更意味着帝国功能的再次恢复。罗马帝国是个巨大的共同体，无论为恶为善，如果不强大，就无法发挥力量。想象一下那些遍布帝国全境的交通网络彻底瘫痪的情景，就不难理解这一点。60岁的奥勒良虽然出生在边境的小城，或许还有蛮族的血统，但是在看透罗马帝国本质这一点上，以及为了实现具体的目标而不浪费一点时间这一点上，都堪称是一位真正的罗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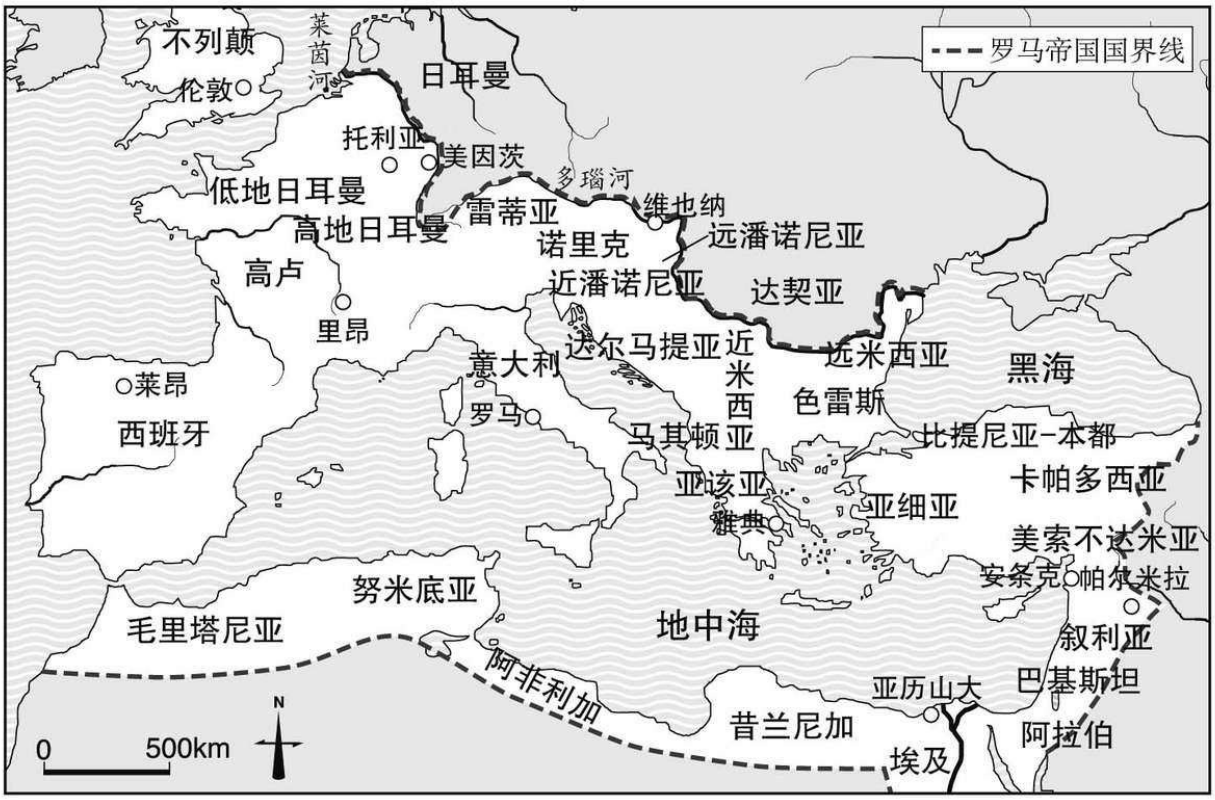
在举行完凯旋仪式的第二年，即公元275年，皇帝奥勒良甚至等不及春季到来，便离开了首都罗马来到帝国的北方边境。他一边视察多瑙河防线一边沿着河流向东方进发，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就是他接下来的目标。

或许在奥勒良的心中一直没有忘记为他的恩人皇帝瓦勒良复仇这件事情。不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曾经战胜过罗马帝国的波斯萨珊王朝，对帝国东方的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被夹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北部，是否被掌握在罗马帝国的手中，也是关系到罗马帝国确立东方防线所不可忽视的问题。不仅如此，波斯萨珊王朝的著名君主沙普尔一世在3年前去世，随后围绕着继承人问题波斯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对于罗马方面来说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大好时机。

4月，奥勒良在视察完多瑙河防线之后转道朝东南方向进发。他的目标毫无疑问正是东方的波斯。他穿过色雷斯，来到正对马尔马拉海的皮林塔斯。虽然这里仍然属于欧洲，但越过马尔马拉海之后的对岸便是亚洲的土地。只要穿过小亚细亚抵达位于叙利亚的安条克，奥勒良就可以与驻扎在当地的军队会合，开始远征波斯的战争。



三分的罗马帝国（公元270年左右）



公元274年的罗马帝国

当罗马军队进驻皮林塔斯之后，奥勒良似乎因为某事而训斥了他的秘书艾洛斯。奥勒良是一个对人对己都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不知事情的起因，但艾洛斯确实因为皇帝严厉的态度而感到非常的恐慌。恐慌之下，他开始害怕起自己或许会因此而失去性命。虽然这个人从名字上来看像是个希腊人，但实际上大概以前属于奴隶阶级吧。于是这个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的秘书伪造了一份文书。这份文书上写有皇帝身边的警卫以及几名军官的名字，声称皇帝将下令处死他们，文书的最后艾洛斯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因为秘书经常替皇帝撰写文书稿件，而且可以轻易地拿到皇帝的印章，所以他伪造的文书完全能够以假乱真。秘书艾洛斯将这份假文书拿给上面写有名字的将军们看，结果将军们全都感到异常震惊。被恐惧冲昏了头脑的将军们，甚至一时间都没想到去确认这件事的真伪。

在秘书艾洛斯的带领下，将军们悄悄潜入皇帝的房间将其杀害。皇

帝奥勒良在经历了短短4年零9个月的统治时期后便遇刺身亡。当时的编年史作者这样写道：“奥勒良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非常幸福，人民爱戴他，士兵尊敬他，敌人惧怕他。”但就是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最后竟然落得一个如此荒诞的结局。

皇位空缺

因为整个过程都被一位用人看在眼里，所以这次谋杀事件很快便败露。被逮捕的将军们在得知这一切全都是艾洛斯的阴谋之后痛心不已，甚至有人因此选择了自杀。艾洛斯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亲手杀害皇帝的将军们也被处以死刑。

当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军队因为这场比悲剧更加凄惨的事件而陷入茫然失措的状态之中，甚至失去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选择何种对策的判断力。奥勒良的死对官兵们所造成的打击十分巨大，使他们连推举继任者这件事都做不到。于是军队的高层只能向元老院送去一封书信：

> 罗马全军将士致罗马元老院与全体罗马公民：
>
> 我们的皇帝奥勒良，因为一个人的背叛和其他人的误解而惨遭杀害。恳请元老院批准将已经去世的皇帝神格化，以此来微微宽慰我们悲痛的心情。另外拜托罗马元老院的诸位议员，为我们推举出一位足以胜任罗马帝国皇帝的人选。只要是你们认为合适的皇帝，我们都会对他宣誓效忠。

这对于元老院阶级来说，是一个夺回国政主导权并且展示自己统治能力的大好机会。因为奥勒良既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所以不管对他个人的评价有多高，也无法利用他的名声来扶持继承人。只要推举出一位能够赢得士兵们信任的继承人，那么罗马军方就会对罗马元老院的统治

能力刮目相看。

但是元老院仅仅承认了奥勒良的神格化，至于继承人的选择权又再次推给军队方面。皇位空缺的状态一直持续了5个月，据说在此期间，罗马军队与元老院相互推让的书信总共往来了3次。而且在这5个月里，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称帝，士兵们也没有爆发出任何不满的情绪，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凝神静气地等待着奥勒良继任者的出现。至于蛮族也在这5个月中风平浪静的原因，完全是奥勒良对防线强化的成果使然。

终于，在奥勒良死后过了5个月的9月12日，罗马帝国的又一位新皇帝登场了。这个人就是75岁的塔西佗，他时常因为自己是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裔而引以为傲，虽然他既没有在行省从政的经验，也没有从军的经验，但却是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

实际上，他在接到元老院提名的时候，也和这5个月以来被提名继位的其他元老院议员一样首先选择了拒绝。他在申请元老院重新考虑的时候这样说道：

> 诸位元老院议员，坦白地说，你们能够推举我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拥有如此雄才伟略的皇帝奥勒良之后，诸位竟然选举我这样一个老头子来继承皇位吗？看看我的样子吧，我这把老骨头，既不能拉弓射箭，又不能骑马投枪，就连拿起盾牌翻山越岭都十分吃力，更别说带兵打仗了。实际上，我就连出席元老院会议都十分艰难，每次发言后都感到十分疲惫。我想很快就会有年轻人来顶替我的位置。
>
> 那些为了保护帝国而赌上性命的官兵，会接受一个像我这么衰老的皇帝去做他们的最高司令官吗？诸位心目中的理想皇帝，和现状所需要的皇帝或许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诸位面对现实。即便在场的诸位全都同意这一决定，也请考虑到这一决定在现状下有可能导致的不幸结果，三思而后行。

但是皇位空缺的现状不能继续持续下去，而除了塔西佗之外，元老院中已经再也没有能够就任皇帝的合适人选，于是其中一位议员站起来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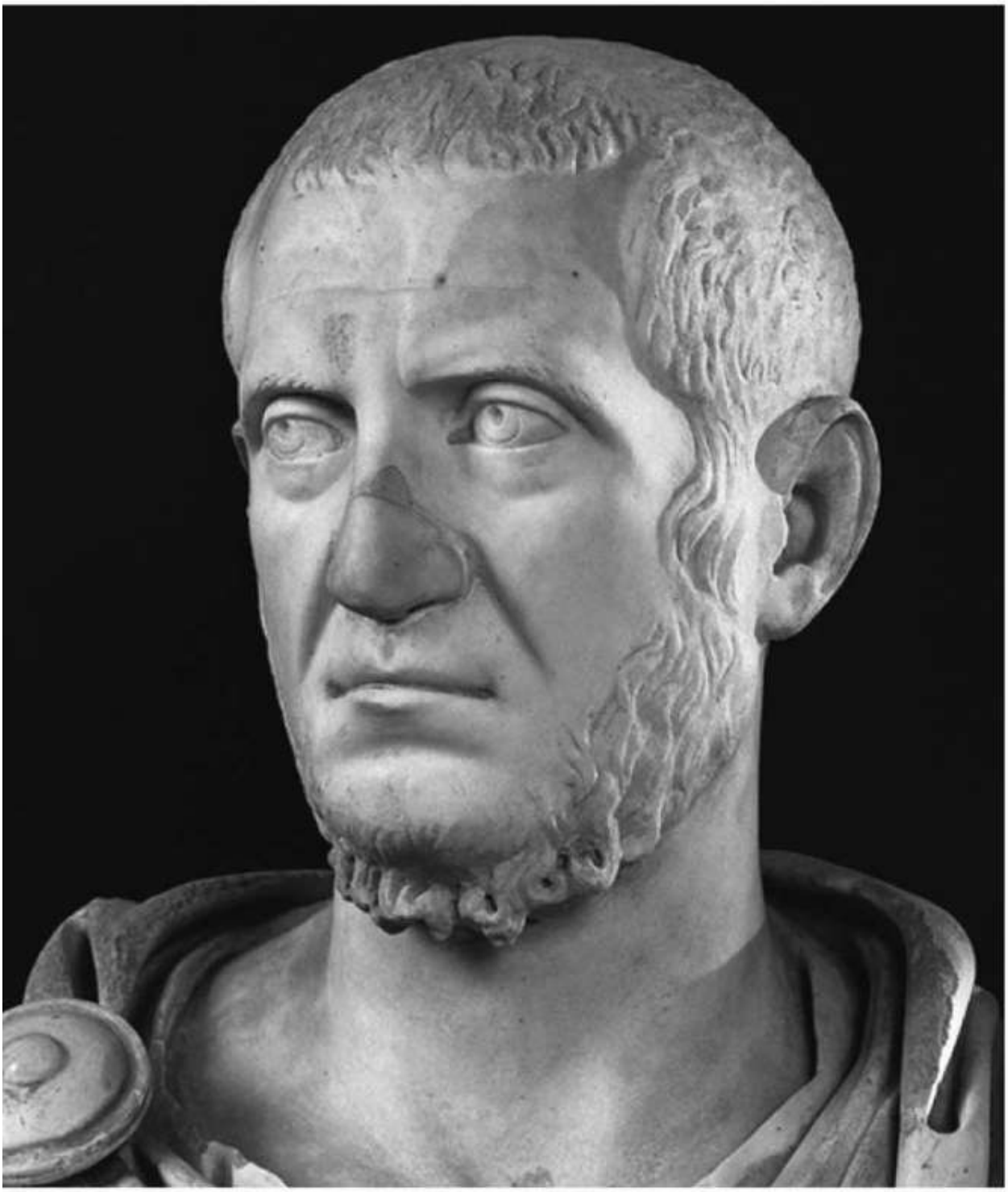
> 我们之所以推举高龄的皇帝，是因为年长者更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而且年长者能够像父亲一样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另外，因为皇帝年事已高，我们就不必勉强他去四处征战履行其身为最高统治者的义务，也不必为整天担心皇帝的失败而寝食难安。不仅如此，年长者作为皇帝，在政策上也会经过深思熟虑小心谨慎地执行，罗马帝国将会重新回到曾经那个不是由军事而是由法律支配的国家。

这番话反映出当时的元老院议员们保守的政治态度。显然元老院议员们都在强词夺理地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过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塔西佗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提名。元老院向军队发出的官方通告中这样写道："元老院根据诸位的要求，推举塔西佗继承皇位。"就这样，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长达5个月的皇位空缺终于宣告结束。

皇帝塔西佗（公元275—276年在位）

虽然塔西佗对继任皇帝百般推辞，在继位后却表现出非常认真的态度。他变卖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将得到的收益全部捐献给国库作为士兵们的军饷。并且他还将自己在市中心的宅邸拆除，将包括大理石圆柱在内的建材都捐献出来，作为建造公共浴场的材料。他十分节俭，连皇帝专用的紫色托加都没有特别制作，而是仍旧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这位新皇帝唯一提出的个人要求，就是罗马帝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中都必须收藏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全部著作。公元276年，将继承先帝奥勒良的遗志作为自己责任和义务的塔西佗，率领罗马军队向东方进发。

但是与军队一同行军，对于从没有过军务经验并且已经75岁高龄的塔西佗来说实在是太过煎熬。他几乎无法骑在马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躺在车里跟随部队前进。终于在公元276年6月的一天，皇帝塔西佗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去世，并非因为谋杀，而是自然死亡。



塔西佗

得知皇帝塔西佗去世消息的元老院，立刻指名塔西佗的亲弟弟弗洛

里安努斯为继任皇帝。这个人也和他的哥哥一样，属于在皇帝加里恩努斯颁布将元老院与军队完全分离的法令之前，就没有任何军务经验的元老院议员。但是这一次，军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接受元老院推举弗洛里安努斯作为皇帝的决定。

首先，屯驻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军团，推举他们的总司令普罗布斯为皇帝。随后，驻扎在其他地区的军团也纷纷宣布支持普罗布斯。

元老院在看到军团的动向之后立刻产生了动摇。得知此事的弗洛里安努斯因为深感自己失去支持而陷入孤立无援的恐惧中无法自拔。皇帝的这种心情也传染到他身边的警卫队身上。他们预感如果普罗布斯率军攻打过来，那么自己只会成为弗洛里安努斯的陪葬。要想活命，只有将失去元老院支持的弗洛里安努斯杀掉这唯一的办法。于是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样一来也避免了一场罗马士兵自相残杀的内战。

在公元276年到282年这6年间担任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普罗布斯，和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及奥勒良一样，都出生于多瑙河附近潘诺尼亚行省的希尔米乌姆。而且他也和那两位前辈一样，都是由皇帝瓦勒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才。

不过和那两位前辈相比，普罗布斯的成长经历却截然不同。普罗布斯的父亲原本是多瑙河防线附近军团基地的百人队队长，后来被调往埃及升任驻屯在当地军团的大队长，结果却扔下远在故乡的妻子和儿子客死他乡。于是，普罗布斯在成人后以大队长儿子的身份理所当然地进入军团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加之他本人也具有非常出众的才能，所以在参军不久便被提拔为百人队队长。

当时还只有20多岁的普罗布斯，得到皇帝瓦勒良的青睐。瓦勒良在写给身为他共治皇帝的儿子加里恩努斯的信中这样说道：

父亲致信儿子，不，皇帝致信另一位皇帝：

我最近发现了一名叫做普罗布斯的年轻士兵。据我观察，这个人虽然年轻，但能力出众。我想任命他为大队长，指挥主要由高卢人和阿拉伯人的辅助兵所组成的6个大队（大概3000人）。我亲爱的儿子，希望身为皇帝的你，也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年轻人的能力。虽然现在说是为了帝国还为时尚早，不过他至少可以作为其他年轻将官们的楷模。

皇帝瓦勒良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普罗布斯：

大概你也对我任命这样一个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年轻人为大队长而感到十分惊讶吧。但是现在和神君哈德良统治时期那个帝国全境人才济济的时代不同了，我必须亲自寻找可用之才。另外，既然连你都听说过普罗布斯，至少也说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吧。

这位年轻人，正如他的名字普罗布斯一样（在拉丁语中代表着积极的意思，大概是从他父亲那一代留下来的绰号，被他作为家族名），果断的作风和勇敢的胆识远超与他同辈的其他人。不过，他虽然能力出众，资产却并不富裕。所以即便是辅助部队的大队长，希望多少可以增加他的收入，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还要拜托你帮我考虑一下。以下是我个人赠送给他的财物。

红色的上衣2件。带雕金纽扣的高卢短披风2件。丝绸镶边的睡衣2件。雕有花纹的10罗马磅（1罗马磅约合300克）银盆一个。

另外，既然他升任为大队长，那就必须有一些私房钱用于帮助那些一时间用光了军饷的部下（罗马军团每半个月发一次军饷）。因此我决定赠予他金币100枚、银币1000枚、铜币1万枚。而且，还应该给他提供一个符合罗马军队军官身份的住所。这就全权交给你来安排了。

当时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普罗布斯得到皇帝的如此厚爱，自然更加奋勇作战。他所指挥的辅助大队，连续取得比由正规军组成的大队更加辉

煌的战果。

于是在公元260年，皇帝瓦勒良任命还未年满30岁的普罗布斯为正规军团的军团长。这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瓦勒良还借此机会赠送给他3套军装。

但是随后不久，皇帝瓦勒良便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俘虏。罗马军中的高官们全都陷入了茫然失措的状态，普罗布斯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同为被瓦勒良提拔起来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及奥勒良在遭遇这一不幸的时候已经46岁，而普罗布斯当年还不满28岁。

随后普罗布斯为自己恩人的儿子加里恩努斯尽职尽责，加里恩努斯也任命普罗布斯为最前线区域的总督。在皇帝加里恩努斯统治的8年时间里，就连克劳狄乌斯二世与奥勒良以刺杀皇帝的方式表示对皇帝不信任时，普罗布斯都没有参与。即便后来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及奥勒良登上了皇位，普罗布斯也对他身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尽忠职守。当时的皇帝奥勒良在写给普罗布斯的亲笔信中这样说道：

皇帝奥勒良致信普罗布斯：

虽然我看重你的能力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我还是决定任命你为第十骑兵团的总指挥。这个第十军团是由罗马军中最强的精锐骑兵组成的，也是克劳狄乌斯二世在继承皇位时，将总指挥的位置转让给我的军团。现在，我将这个位置转让给你。

皇帝奥勒良在位的5年间，率领着第十军团的普罗布斯也在这位皇帝积极的战略指导下四处征战。就在奥勒良同帕尔米拉军队交战的时候，正是普罗布斯重新收复了埃及地区。因为他非常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甚至在随后还有时间赶去参与帕尔米拉的攻防战。在解决了芝诺比阿并收复帝国东方的领土之后，奥勒良在赶回西方解决高卢帝国问题之时，就将普罗布斯留在当地负责整个东方的防卫任务。当时普罗布

斯才刚满40岁。三年后，皇帝奥勒良被害。又过了一年，在奥勒良之后继位的塔西佗于东征途中病死。普罗布斯在44岁的时候继位罗马帝国皇帝。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就任要职的黄金年龄。

皇帝普罗布斯（公元276—282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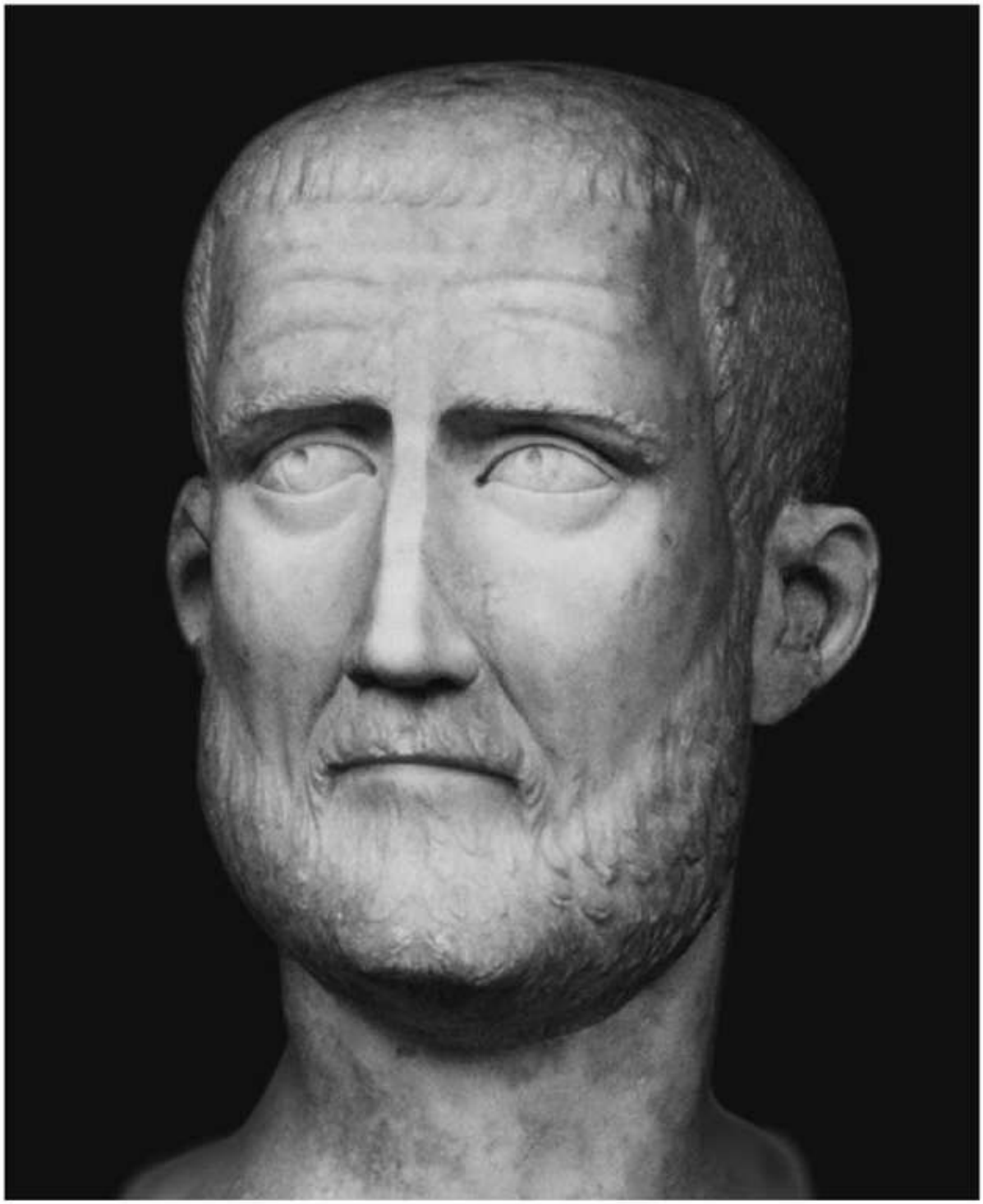
普罗布斯在继位皇帝之后，改名为马可· 奥勒留· 普罗布斯。以此表明他要将那位不仅在统治方面实行善政，并且在帝国防卫上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作为学习楷模的决心。普罗布斯继承皇位，并非因为他自己的精心谋划，完全是他手下士兵们自发推举的结果，而且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其他防线将士们的赞成，最后成为罗马全军的一致决定。在得到元老院承认之后，普罗布斯成为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皇帝。

普罗布斯拥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也许这就是他将自己比作那位哲学家皇帝的原因吧。而且他从继位之初便和那位哲学家皇帝一样，表现出对元老院传统的尊重，在统治上与元老院共同合作。与独断专行的奥勒良相比，普罗布斯的这种态度也算是对元老院被军方夺走推举皇帝的主导权之后的一种慰藉吧。

罗马皇帝在即位之时，分为改名和不改名两种，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那些改名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学习前辈，而不改名的人则认为自己的做法就足以统治帝国。奥勒良在继承皇位的时候，就一直保持着自己路奇乌斯· 图密善· 奥勒良的名字。而普罗布斯登上皇帝宝座的3世纪末期，与哲学家皇帝统治时期的2世纪末期相比，罗马帝国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

不过，能够以先贤作为自己的榜样励精图治，可见普罗布斯也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我想这也是他能够在罗马帝国如此危急的状态下仍然

统治了6年时间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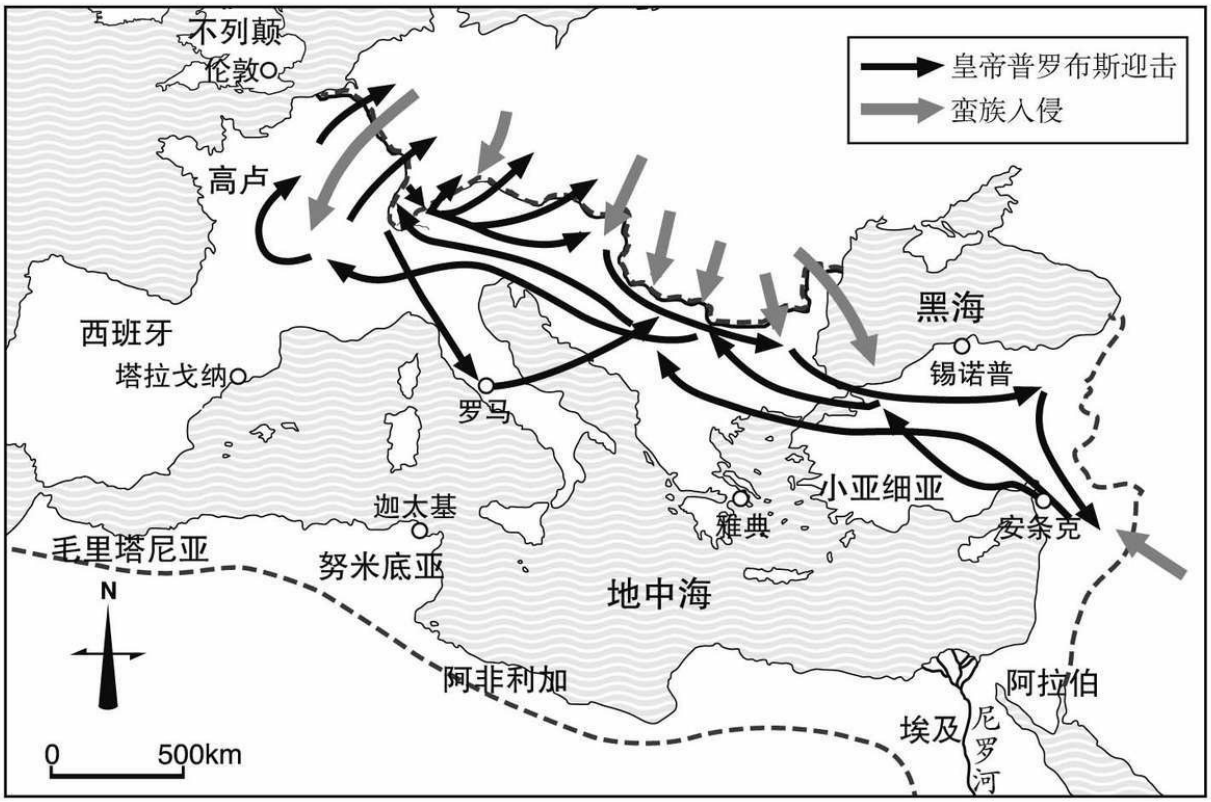


普罗布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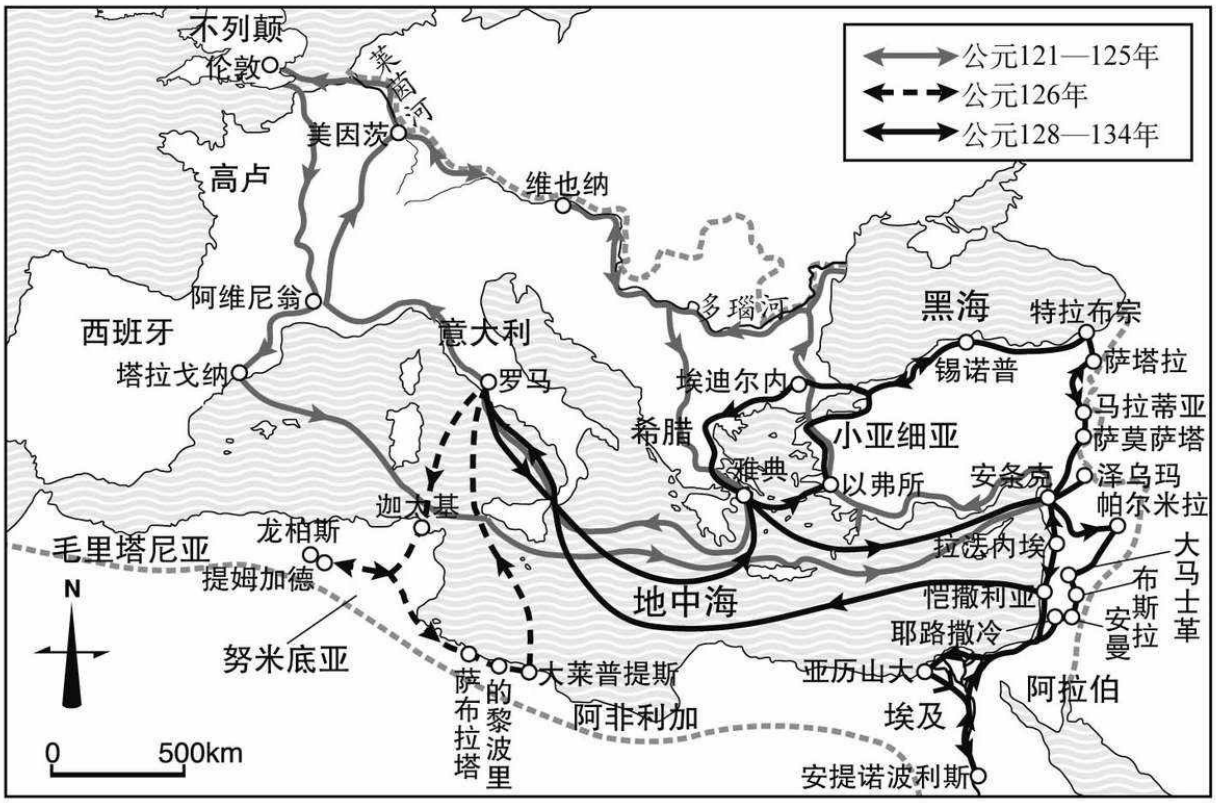
普罗布斯也是在成为皇帝之后没有立刻回到首都罗马的皇帝之一。那些继位之后便急急忙忙地返回首都，在元老院中毕恭毕敬地接受元老院承认其身份的皇帝已经成为了过去。对于3世纪后半期的皇帝们来说，首都罗马的存在意义，仅仅是他们同蛮族和波斯战斗胜利之后举行凯旋仪式的场所而已。元老院只能承认军方选举出来的皇帝，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专程前往首都罗马的必要。况且，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在皇宫之中悠闲享受的时间。要是这个时候的罗马皇帝有机会看到好莱坞拍摄的那些关于罗马历史的电影的话，一定会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早知会遭到这样的误会，不如当初真的这么来一下试试”吧。

这就是3世纪后期罗马皇帝的实际情况。在叙利亚的安条克被推举为皇帝的普罗布斯，继承皇位后甚至没等元老院的承认便立刻动身开始履行皇帝的首要职责——帝国防卫。他成为皇帝之后的第一个战场便是遭到哥特人袭击的小亚细亚西部。只要有一位优秀的将领，罗马军队就能够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力量，罗马军队将前来进犯的哥特人一直赶到黑海北部，被哥特人掠走的财物和俘虏也全都被抢了回来。普罗布斯继任皇帝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当年冬天，他一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监视北方的动向。公元277年春，蛮族大举入侵高卢境内，得知此消息的普罗布斯立刻动身前往多瑙河防线选调精锐组成对抗蛮族的军队。

入侵高卢的蛮族没有像往常那样烧杀抢掠一番后逃之夭夭，而是在60多个城镇和乡村驻扎下来。在罗马帝国传统的方针中，高卢地区并没有常驻军团。因为高卢地区的防卫任务完全由莱茵河防线上的军团基地负责。具体说来，就是在莱茵河沿线的伯恩、克桑腾、斯特拉斯堡以及美因茨。而犹如大坝一样的莱茵河防线一旦被攻破，那么整个蛮族的入侵就如同泛滥的洪水肆虐高卢全境，一发而不可收。面临如此严重的事态，身为皇帝的普罗布斯之所以亲赴前线也是理所当然的。



公元3世纪的皇帝普罗布斯统治时期（6年间）的路线



公元2世纪的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20年间）的路线公元121—125年

对于以骑兵为主的蛮族军队，罗马方面也必须以骑兵应对。但是罗马军队拥有优秀的步兵传统。针对几乎占据了高卢一半区域的蛮族，普罗布斯采取先用罗马骑兵击败蛮族部队，然后派出步兵团消灭敌方残余力量的战术。这样一来，在击退蛮族之后就可以立即让人民安心地在当地居住和生活。将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立即在民事方面反映出来，这就是皇帝普罗布斯所特有的做法。

到公元278年夏季的时候，蛮族被彻底赶出高卢。但是普罗布斯也没有丝毫的懈怠，立刻命人搭桥越过莱茵河攻入对岸的蛮族领地。普罗布斯这种打出去的积极战术不仅限于莱茵河流域，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附近的日耳曼长城以及多瑙河中游地区都处于他这种战术的影响之下。在普罗布斯的领导下，罗马军队终于重新实现了久违的“以攻为守”。即便是在日耳曼民族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人、阿拉曼人以及汪达尔人，在面对普罗布斯的时候都只能逃回森林和沼泽之中，遭到烧杀抢

掠的变成了蛮族的村落。普罗布斯继任皇帝的第二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蛮族同化政策

但是皇帝普罗布斯并不满足于仅仅将敌人击败便就此撤军。罗马之所以如此强大，并且能够保持其长期霸权统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罗马帝国坚持“胜而让步”的统治政策。

被俘虏的1.6万名日耳曼男性并没有被当做奴隶，而是被编入罗马军队。但是让他们单独组成一支军队的话显然过于危险，于是这些俘虏被分成许多由十几人组成的小队，分散安排在帝国边境的防线上。这样就不会出现危险。

但是，罗马军中的蛮族士兵没有引发的问题，却被那些罗马将军自己引发了。这种不幸事件也可以称得上是3世纪的特色之一，普罗布斯也不得不为镇压各地将军的叛乱而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叛乱主要集中在包括埃及在内的帝国东部，共有5处地方，虽然镇压这些叛乱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5处地方相互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普罗布斯这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浪费在来回的行军之上。

这些人的叛乱最后之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是因为总结起来他们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虽然在叛乱初期，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手下官兵的支持，但是没有将这种支持保持下去。结果他们还没等被皇帝的军队镇压，就已经被反悔的部下推翻了。

第二，被妻子或者亲信唆使而叛变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多。这些人因为不够坚定，在军事行动上也会畏首畏尾，最终导致失败。

因为叛军要面对的是当权的皇帝，所以没有相当强的信心和行动力是很难成功的。像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仅仅受人怂恿便轻易叛乱，这就是国家开始衰退的征兆。而经常因为这样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精力，也是国家衰退的证明之一。

通过积极进攻的战术在对抗蛮族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皇帝普罗布斯，却在镇压国内叛乱上浪费了两年时间，这对他来说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就在普罗布斯为了确立东方防线而准备远征波斯的时候，已经从之前的战斗中恢复过来的北方蛮族又再次进犯帝国西部，结果普罗布斯只能放弃东征计划奔赴西方战场。

公元280年以及281年，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全线都展开了与入侵蛮族的战役。普罗布斯在战胜蛮族之后，允许他们移居到罗马帝国境内。蛮族也纷纷放弃了从前依靠袭击进行掠夺的方式，选择移居到帝国境内的土地之上。普罗布斯决定将10万人以上的蛮族安置在多瑙河南岸的广阔地区。关于皇帝普罗布斯对蛮族的同化政策，在当今史学界已经有了定论。但当时的人们有如下的看法：

> 蛮族是早晨刚和你签订合约、到晚上就能反悔的人。

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时期更加重视对帝国的防卫，而当时与罗马帝国签订合约的国家与民族之所以能够遵守约定，是因为罗马在军事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3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拥有使对方完全遵守约定的军事力量了。

公元281年秋，普罗布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踏上首都罗马的土地。他这次回到首都也是为了举行凯旋仪式，虽然他击败了入侵的蛮族，但是没有像奥勒良将帝国再次统一那样明显的丰功伟绩，而且也没有像芝诺比阿女王那样引人注目的“战利品”。所以他的这次凯旋仪式可以说并没有太多的华丽场面便结束了。

而普罗布斯在举行了对于罗马男人来说相当于最高荣誉的凯旋仪式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身为皇帝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打算将因为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下而荒废的土地重新变成耕地，并将其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责任之一。在他停留在首都罗马的这段时间里，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为凯旋仪式作准备，可实际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安排埃及的行政长官修建灌溉工程，以及与高卢行省的总督们商讨河川利用的问题上。耕地的大量荒废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已经发展到不得不进行处理的程度。

公元282年春，普罗布斯离开首都向北进发。虽然继续进行东征攻打波斯仍然是他的主要目的，不过在那之前，他希望将故乡希尔米乌姆恢复为曾经产出率极高的农耕地区。不过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故乡，而是希望将这里作为一个榜样，为帝国的其他地区起一个带头作用。

不过这就需要士兵们放下武器拿起锄头，不情愿地投入农耕作业之中。而对于那些曾经深入敌境主动作战的士兵来说，如此繁重的农活使他们难以忍受。

同年8月末的一天，为了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皇帝普罗布斯登上专为视察而建造的高塔之上。因为工程动员了大量士兵，所以其中有几名士兵来到高塔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接下来的一瞬间，视察用的高塔忽然倒塌下来。随后，装做赶去帮助皇帝的士兵用短剑将普罗布斯杀害了。

这次事件与将官没有任何的关系，一切都是士兵们自己的主意。皇帝马可·奥勒留·普罗布斯遇刺身亡时年仅50岁，在不辞辛劳地为罗马帝国奔波忙碌了6年之后，最终迎接他的竟然是如此悲惨的结局，实在是令人惋惜。

同时代的人，对于之前的奥勒良以及随后的普罗布斯的死，这样感

慨道：

这两位皇帝的死，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完全陷入命运捉弄的最好例证。

皇帝奥勒良的死与皇帝普罗布斯的死都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已经被极大地缩短。这些军人出身的皇帝，实际上就是实力至上主义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精英教育的人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因为对传统的统治阶级感到绝望的民众需要真正拥有实力的人出现。

但是实力至上主义的政策与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一样，既有利也有弊。实力至上主义会使昨天还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今天就变成对自己发号施令的人。要想接受这个现实需要拥有相当宽广的胸襟，不幸的是具备这种合理精神的人并不多见。同时，下层民众对于王侯将相这些一生下来就高高在上的阶级却拥有莫名的敬意。或许对于人类来说，更容易接受不合理的感性而不是合理的理性吧。

那么通过实力取得地位的人，面对习惯了不合理的感性的普通民众，要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人民群众保持距离。但是这个方法需要必不可少的时间。奥勒良的统治时期只有不到5年，普罗布斯也仅仅统治了6年时间，他们都没有树立威信的时间。如果他们能够像五贤帝那样，或者像后来拯救帝国于危难之中的戴克里先那样有20年的统治时间的话，结果又将如何呢？身为一名统治者，当面对一群容易被感性所左右的民众时是最困难的。因为他既要给民众以亲近感，又要保持距离感。

皇帝卡鲁斯（公元282—283年在位）

皇帝普罗布斯死后，军队对于皇帝的推举不再征求元老院的意见，因为普罗布斯的死并非因为军队对他的不信任。在杀害皇帝的士兵全都被判处死刑之后，这场不幸的事件便宣告结束。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决定皇帝的继任人选。

在如同作战会议一样的气氛中，高官们一致决定推举皇帝的得力助手近卫军团长官卡鲁斯继承皇位。当时正在莱茵河附近的科隆训练新兵的卡鲁斯，在接到通知之后即刻赶到位于多瑙河岸边的希尔米乌姆接受皇位。

卡鲁斯在继承皇位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可· 奥勒留· 卡鲁斯。不过他改为这个名字的原因和普罗布斯不尽相同，后者是为了表明自己以著名的哲学家皇帝为榜样，而卡鲁斯则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在军队中声望极高的先帝普罗布斯的继承人。因为前任皇帝普罗布斯的官方全名为马可· 奥勒留· 普罗布斯。不过，卡鲁斯唯一真正继承的只有姓名而已。

公元282年秋，军方的高官们为了决定继任皇帝的人选而聚集在希尔米乌姆，我想他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也在讨论关于改变政策的话题。而他们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围绕着与派遣士兵开垦荒地相比，是否更应该让他们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普罗布斯原本正在进行东征波斯的准备，与此同时又动员士兵参与到开垦荒地的土木工程中来。虽然因为对此感到不满而杀害了普罗布斯的士兵只是极少数，但这也足以说明目前所存在的问题。高官们害怕这种情绪会蔓延到罗马全军，而新皇帝卡鲁斯也深有同感。

卡鲁斯

波斯战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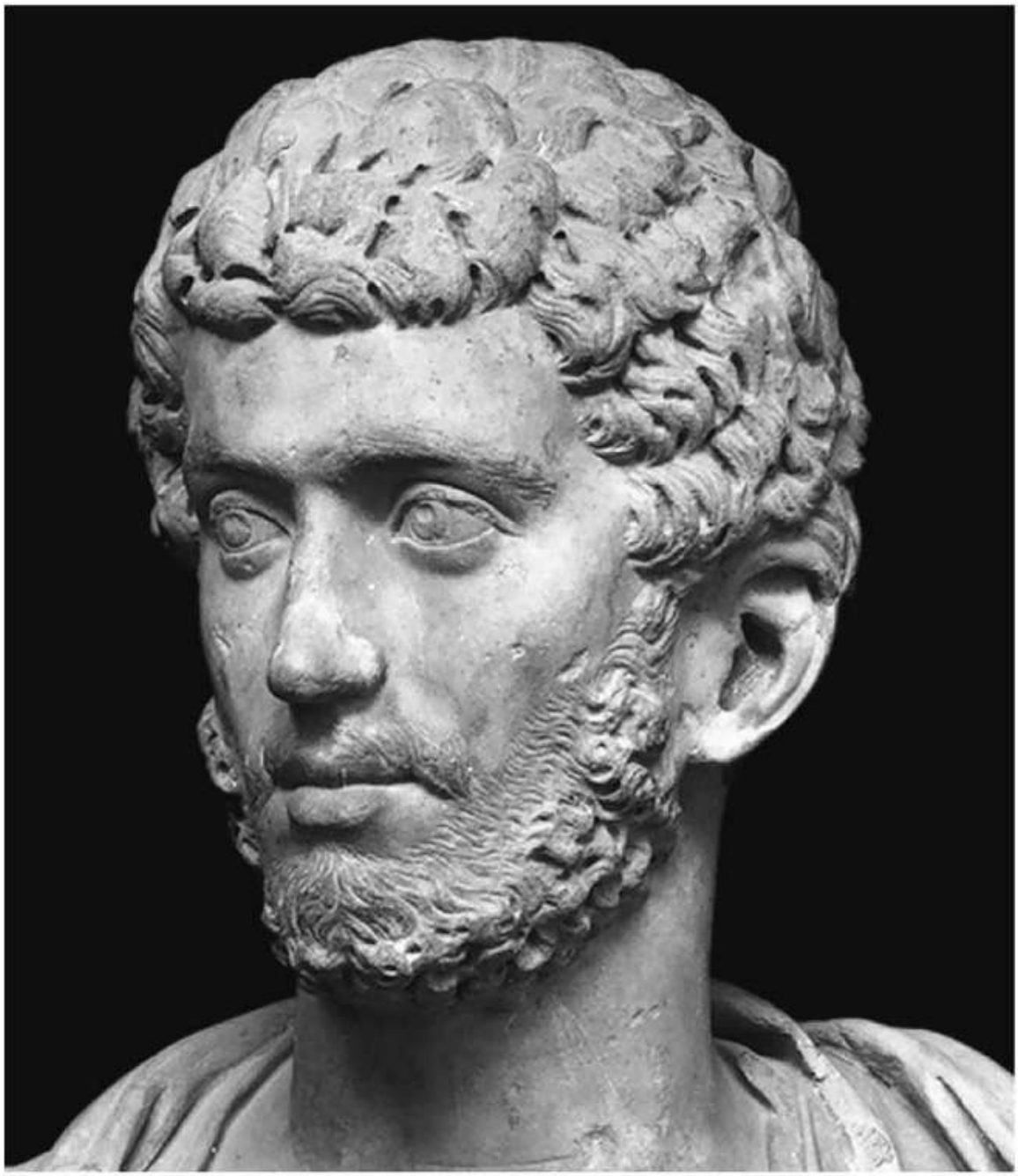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要与波斯萨珊王朝开战的第一个理由是先帝普罗布斯已经对此开始了准备。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波斯曾经俘虏皇帝瓦勒良，所以罗马军队要为曾经的屈辱一雪前耻。第三个理由是因为当时的波斯王国已经处于无法对罗马军队造成任何威胁的状态。

如果说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是一只凶猛的狮子，那么

他的继承人以俘虏罗马皇帝瓦勒良这一伟大战果而名留青史的枭雄沙普尔一世则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但是在这两人之后继位的波斯国王全都是一些泛泛之辈，统治者力量的衰退加之王朝内部的斗争，导致整个王国的实力一落千丈。幼发拉底河防线甚至与经过大幅强化之后的莱茵河防线和多瑙河防线相比都更为安全，这完全是因为位于防线对面的波斯王国战斗力低下所致。

士兵们在得知罗马帝国即将再次进行波斯战争之后，全都欢欣鼓舞起来。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能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东方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遍地黄金的富裕之地。就好像日耳曼的蛮族每当听到意大利与高卢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只会联想到堆积如山的金币银币一样。3世纪末期的罗马士兵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和蛮族毫无二致……

为了尽快转移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公元282年秋天，新皇帝卡鲁斯在继位不久便率领着罗马大军从多瑙河的前线基地出发朝东方进发。当时58岁的卡鲁斯将他35岁的长子卡里努斯立为共治皇帝，任命他负责西方的防守。同时将31岁的次子努梅里安也立为共治皇帝，与他一同东征波斯，父亲卡鲁斯率领第一军，次子努梅里安则率领第二军。



卡里努斯

在公元283年春天开始的波斯战争中，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军队一直连战连胜。与其说罗马军队强大，不如说波斯方面的防御体系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不过胜利就是胜利。一鼓作气的罗马军队首先将罗马帝

国与波斯之间争夺的焦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重新光复。随后战火蔓延到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逼波斯王国的首都泰西封。不过罗马军队在占领泰西封上并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因为波斯的王室和高官们早已弃城逃跑了。结果罗马军队只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相当于现代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全部地区。

在占领泰西封之后夏季才刚刚结束，距离冬季的休战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罗马军队越过底格里斯河继续进军，打算将波斯势力彻底赶出美索不达米亚，赶回他们的发源地波斯，即现代伊朗西南部地区。

落雷

即便在沙漠地区也有落雷的情况发生，或者应该说发生在沙漠之中的落雷更加恐怖。这年夏末，就在罗马军队进入沙漠之后的某天夜里，落雷袭击了他们的营地。

一道非常骇人的落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划破夜空，照亮了整个地平线。当时的士兵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正身处险境之中，全都惊讶地望向天空那耀眼的雷光。

事故就在此时发生了。因为皇帝的帐篷比其他的帐篷都更大更高，结果遭到落雷的直击。皇帝卡鲁斯当场毙命。

罗马军队一下子失去了全军最高司令官，本来应该由与卡鲁斯同行的次子努梅里安接替这个位置，但是这位年轻的将军完全无法胜任，于是罗马军队只能撤军。当时他们本打算先暂时撤回收复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但是在罗马军队北上的途中，又一件意外袭击了罗马军队。

当罗马军队抵达宿营地点的时候，一路上都坐在马车中的努梅里安却没有从车中走出来。周围的人满心狐疑地打开车门，却发现这位刚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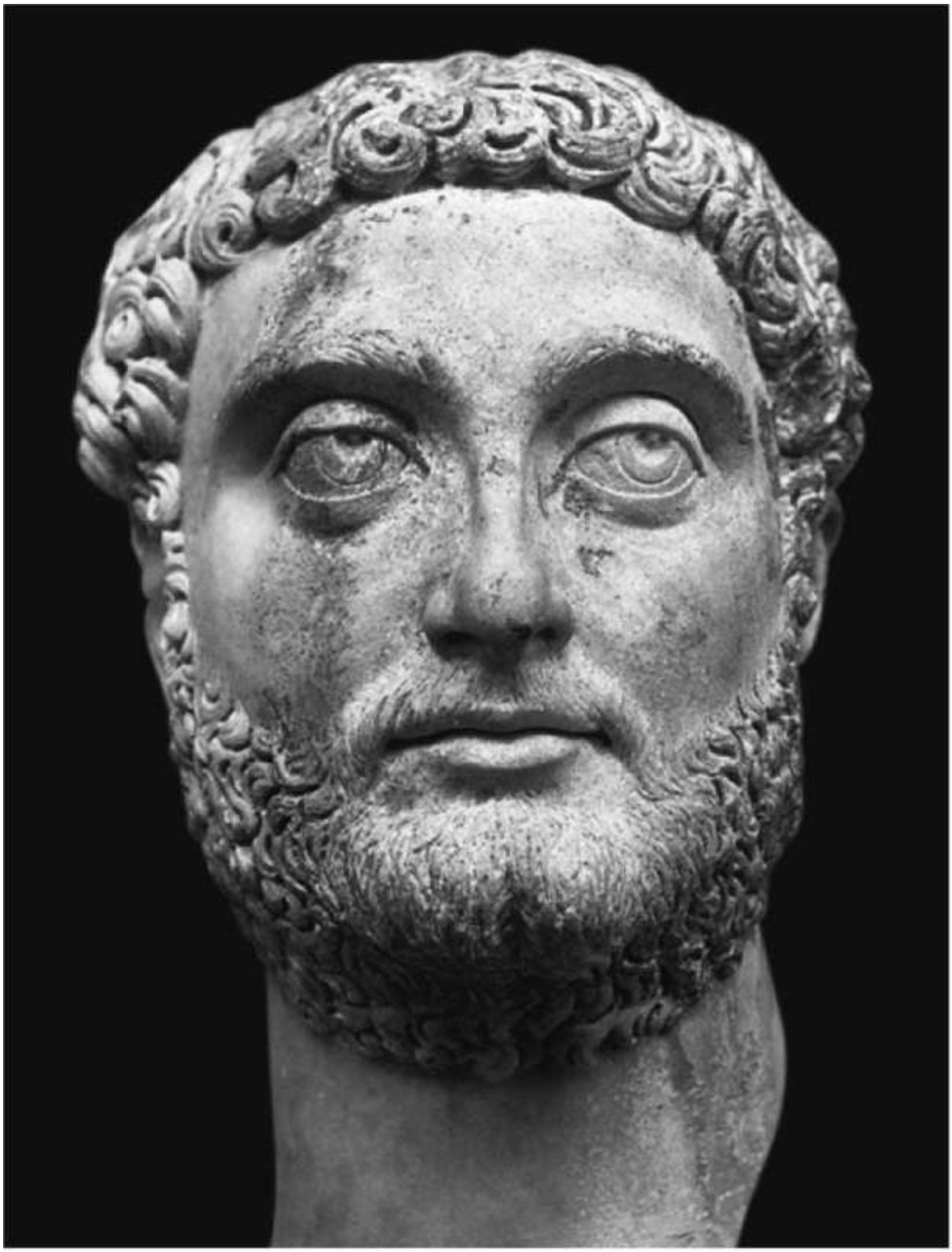
继位不久的皇帝死在了车里。

军方立刻开始追查皇帝离奇死亡的原因。人们怀疑的目光逐渐集中在努梅里安的岳父，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皇帝马车的阿普尔斯身上。但是阿普尔斯说有人以皇帝生病为由，不允许他接近皇帝的马车。结果这件事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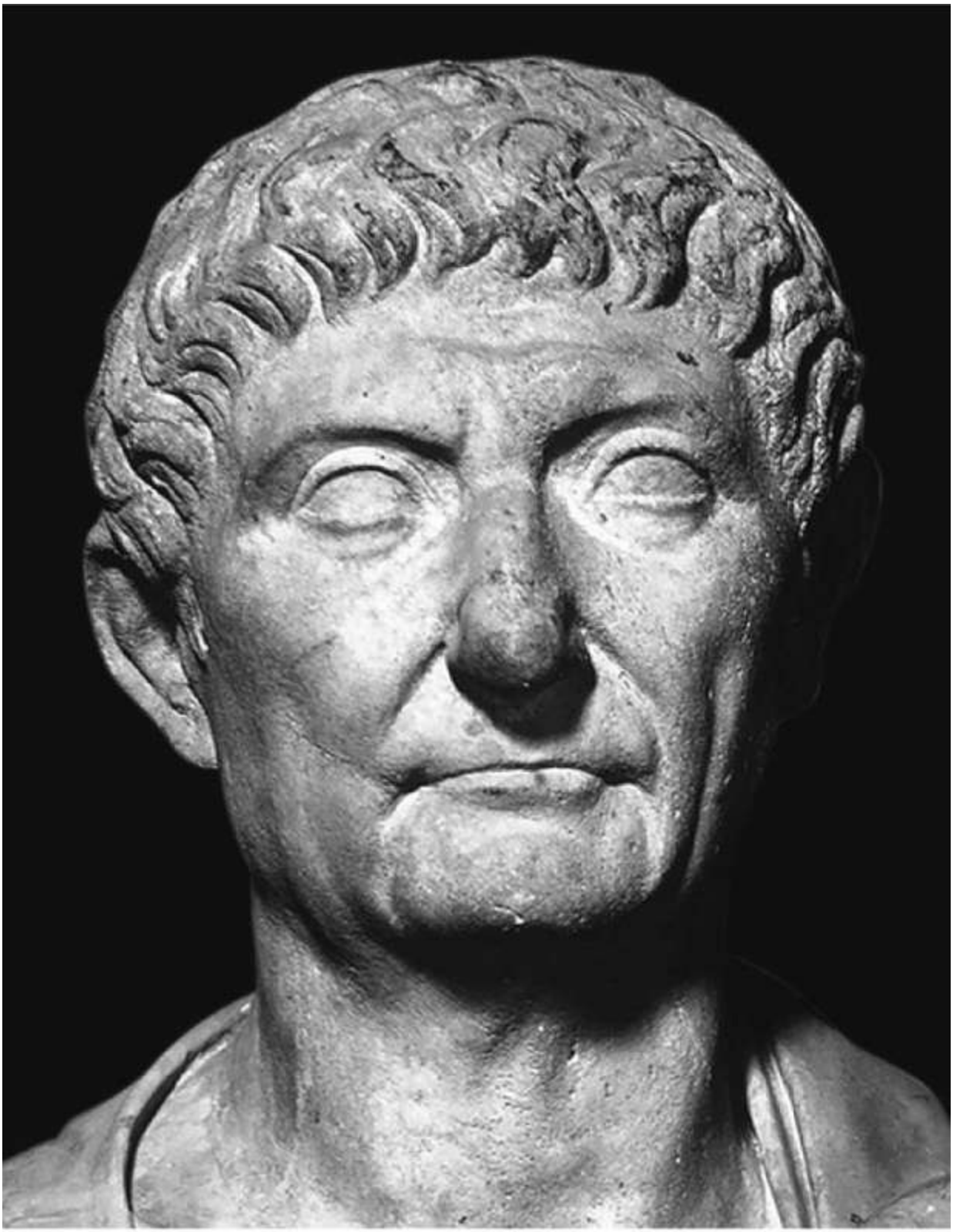
在皇帝努梅里安身边负责护卫任务的，是一名38岁的名叫狄奥克莱斯的队长。当时狄奥克莱斯忽然抽出腰间的宝剑将阿普尔斯刺死，为这起奇怪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这个叫做狄奥克莱斯的男人深知自己一旦渡过卢比孔河，随后的事情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进行波斯战争而被动员起来的罗马军队被迫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追随西方的卡里努斯，另一个就是追随眼前的狄奥克莱斯。结果与其说军队认可狄奥克莱斯的能力，不如说卡里努斯在这一年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但是如果军队选择狄奥克莱斯，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同位于西方的皇帝卡里努斯之间展开内战。于是，狄奥克莱斯带领着罗马军队向西方进军。

不过公元284年并没有发生罗马军队之间自相残杀的悲惨事件。皇帝卡里努斯因为被自己的部下背叛而惨遭杀害，结果狄奥克莱斯就成为了唯一的皇帝。随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更有罗马风格的“戴克里先”。罗马帝国又迎来了一位出生于多瑙河附近的皇帝。



努梅里安



戴克里先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努梅里安的死与戴克里先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与此毫无关系。

但是不管怎样，正是这位叫做戴克里先的皇帝带领着罗马帝国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关于这段历史，我将在下一卷中为大家详细地加以介绍。先不管他所带来的变化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戴克里先很幸运地做到了他想做的事。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长达21年的统治时间，这么长的统治时间对于3世纪的皇帝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3世纪初到4世纪中期在位的皇帝

	在位时间	皇帝（在位时间·死因）	所在丛书卷数
73年间共22位皇帝在位	211—217年	卡拉卡拉（6年·谋杀）	第十二卷
	218—218年	马克里努斯（1年·谋杀）	
	218—222年	埃拉伽巴路斯（4年·谋杀）	
	222—235年	亚历山大·塞维鲁（13年·谋杀）	
	235—238年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库斯（3年·谋杀）	
	238年	戈尔迪安一世（半个月·自杀）	
		戈尔迪安二世（半个月·战死）	
		普皮恩努斯（3个月·谋杀）	
		巴尔比努斯（3个月·谋杀）	
	238—244年	戈尔迪安三世（6年·谋杀）	
	244—249年	阿拉伯人菲利普（5年·自杀）	
	249—251年	德基乌斯（2年·死于与蛮族的战斗）	
	251—253年	加卢斯（2年·谋杀）	
	253—260年	瓦勒良（7年·被俘，死于狱中）	
	253—268年	加里恩努斯（15年·谋杀）	
	268—270年	克劳狄乌斯二世（2年·病死）	
	270—275年	奥勒良（5年·谋杀）	
	275—276年	克劳狄乌斯·塔西佗（8个月·病死）	
	276—282年	普罗布斯（6年·谋杀）	
	282—283年	卡鲁斯（1年·意外）	
	282—283年	努梅里安（1年·谋杀）	
	282—284年	卡里努斯（2年·谋杀）	
21年	284—305年	戴克里先	第十三卷
30年	307—337年	君士坦丁	

第三章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

从我在大学攻读西洋哲学的时候起，心中就一直抱持一个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的“抱持”，意大利文是accarezzare，意思是“爱抚”。这个修辞法颇为有趣，总之，我长年“爱抚”的这个问题如下：

为什么基督教从耶稣基督之死开始直到被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为止，也就是说从创教开始到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为止，经历了300年那么漫长的时间呢？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发生在公元33年左右，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时已经是公元313年。

这个疑问并不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自己产生的，而是因为某件事情使我引发的联想。

16世纪时，有一位日本人向当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你所说的基督福音是唯一能够拯救世人灵魂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这个真理竟然过了这么多年才传到日本呢？

因为不知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传教士只好将其写进送给总部的报告中。当我看到这段记载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传教士只要这样说即可：因为信仰无法生出翅膀，所以只能通过对其深信不疑的人来亲口进行传教，而要这些人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外一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想必这位传教士一定和我不同，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信仰问题，而我却将宗教作为人类现象、社会

现象以及历史现象来看待。

但是，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无法仅仅用信仰问题来简单地解释。而且，即便是当时那个时代，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多远，即便没有翅膀也可以很容易抵达。虽然罗马帝国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但从帝国的最西边到最东边，也远远没有达到横跨地球的程度。更何况在罗马帝国中还有遍及全国的道路网络。耶稣死后不到30年，基督教便已经传入了首都罗马，由此可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是十分迅速的。公元64年发生在罗马的那场大火，当时的皇帝尼禄将责任全都转嫁到基督教徒的身上，导致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徒都在那场浩劫中殉教。实际上那场大火最初只是有人不小心所引发的火灾，结果因为风势猛烈，最后才演变成波及罗马全城的大灾难。受灾民众都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当时的皇帝身上，感觉到必须将民众的仇恨转移给其他目标的尼禄，选择将基督教徒作为自己的替罪羊。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被当做牺牲品的，必须是平时就在首都罗马的社会中比较孤立，而且经常被其他民众投以不信任目光的群体。而符合上述条件的群体，如果其中所包含的人数太多的话也无法作为牺牲品。所以在当时就已经数以万计的居住在首都的犹太人，并不适合被作为牺牲的对象。根据史学家对当时处刑情景的描写，刑场似乎就是位于台伯河西岸的大竞技场，由此可见，牺牲者的人数不是数千人，也不是数十人，应该是几百人。公元1世纪时期首都罗马的居民数大概接近100万，其中有几百人因为这场火灾而被处刑，应该也算是足以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了吧，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比较真实的。

不过在当时的首都罗马，还有耶稣生前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圣彼得，以及虽然没有与耶稣见过面，但确立了基督教初期基础的圣保罗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全都因为尼禄对基督教的迫害而在首都罗马殉教身亡。后来基督教在圣彼得殉教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大教堂，命名为“圣彼得大教堂”，以此实现了耶稣当年对圣彼得的预言：“在你殉教的地方会建起一

座教堂。”也就是说，仅仅在耶稣死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已经从巴勒斯坦传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并且还拥有了几百位信徒。就连当时身为教会头两把交椅的人物也出现在这里，不用说肯定是为了传教而来。当时圣保罗拥有罗马公民权，他是在行使了自己的上诉权之后被带往首都罗马的，但是在上诉中他仍然可以拥有自由，所以这一路上他都可以居住在信徒的家中，并且拥有与信徒们任意接触的自由。如果基督教的发展势头就这样保持下去的话，那么罗马帝国恐怕早就被基督教所侵占了吧。

但实际上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那么迅猛。像皇帝尼禄那样对基督教的迫害基本上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次发生针对基督教的镇压行动。不过基督教徒一直以来都迫切希望从犹太教中独立出去，而当时正是他们脱离犹太教的大好时机。犹太教徒对罗马帝国的叛乱因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而宣告失败，但是这时的基督教会和几乎可以称为其宗主的犹太教会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关于这一点也被后世的众多学者所证实。就连他们基督教徒在首都罗马的居住地，都从传统犹太人聚集的位于台伯河西岸的第14区，搬到了位于台伯河东岸、距离市中心比较远但相对地价也比较便宜的第12区和第13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已经被清楚地画出了一道界线。同时这也说明基督教徒在罗马社会之中，已经成为比较引人注目的存在。

在罗马史上第一次出现“Christianus”（信仰基督的人）这个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关于皇帝尼禄虐杀基督教徒的记载，而这个词第二次出现，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皇帝图拉真统治时期。公元111年，被派往小亚细亚西北部比提尼亚行省出任总督的小普林尼向位于首都的皇帝图拉真请示应该如何解决基督教问题，皇帝图拉真专门为此回信则用上了这个词。

关于这封著名的书信，虽然我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作过介绍，但还是让我们在这里重新作一简单的回顾。毕竟，图

拉真所作出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政策，甚至从2世纪初直到3世纪末这接近200年的时间里，都是历代罗马皇帝解决基督教问题时的“基准”。

> 即便基督教徒是有罪之人，我们也不能像当年迫害基督教徒那样强行对其进行惩罚。只有遭到正式起诉并且承认自己身份的人才可以进行处罚。但是对于自愿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对罗马诸神表示出明确的敬意，并且表现出足够的悔改之情，我们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过去，免除他们的罪行。
>
> 另外，匿名的告发不具备法律效应。因为匿名告发这种行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不符。

因为历史上的这些“记录”，都是写给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了解的同时代的人看的，而并非专门面向我们这些后人的。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些记录的时候，必须了解一些当时的相关情况。

在罗马人看来，因为基督教徒心中没有对罗马帝国的责任感，也没有尽到其身为国民的义务，所以并不属于他们国家的一员。而对基督教徒来说，正如圣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所写的那样，他们认为罗马帝国是邪恶和堕落的社会，因此自己没有为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的义务。只有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出现的“神之国”才是属于他们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恐怖行动来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只是通过逃避公职和兵役来消极地抵抗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

但是对于将罗马帝国全体看做是一个大家庭，并且将居住在国境之内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命运共同体的历代罗马皇帝来说，基督教徒的这种做法是明显的叛国行为。所以说基督教徒的“罪”并不是他们的信仰，而在于他们通过这种信仰组成了一个反对国家的组织。图拉真所说的“有罪之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犹太教徒也因为逃避公职和兵役而在罗马社会中遭到孤立，但是除了建立以犹太教为主的神权国家之外，罗马人承认这些犹太教徒的其他一切权利。就算他们不肯参加公职也不肯参军都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在公元70年犹太教徒的叛乱被镇压以后，罗马帝国开始向犹太人课以重税。原本全世界的犹太教徒都要向位于耶路撒冷的大神殿供奉金钱，但是在公元70年以后，罗马人以大神殿被火烧毁为由，将供奉金的收纳地点更改为位于首都罗马的朱庇特神殿。所以虽然犹太人从不参与罗马帝国的公职和兵役，但是至少他们缴纳的税金能够作为相应的代价被罗马人所接受。与之相比，基督教徒却是既没有履行公民的职责，也没有缴纳相应的税金。

从图拉真能够说出“不强行进行惩罚”这一点上来看，说明这位皇帝虽然是行省出身，却拥有罗马人传统的宗教观。虽然罗马人不干涉每个人信仰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希望国民能够参加象征着罗马精神的“罗马诸神”的祭祀活动。不过信仰毕竟只是个人的问题，即便有人的信仰与国家的信仰正好相反，但只要不做出任何反对国家的行动，那么也不会对其强行进行惩罚。因此所谓的“弃教者”，与其说是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不如说是建立起罗马的宗教观，并且站在这个立场上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信仰。

古代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多神教世界，因此对于其他神灵一概不予承认的犹太教，在古代人眼中看来属于异端分子。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的评价是：“并非信仰，实为迷信。”基督教正是脱胎于被如此评价的犹太教，同样属于一神教。所以，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上来看，完全无法接受罗马的宗教观，自然也不可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排列在一起。

关于基督教徒必须有正式的起诉这一点，对现在的国家来说，只要接到起诉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查已经成为司法的义务，至于能否立案则是之后的问题。因此图拉真的态度体现的是创立法律体系的罗马人的法律

观念。其中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当属“匿名的告发不具备法律效应”这一条。正因为如此，图拉真的这条规定才能够被罗马帝国作为对待基督教徒的法律沿用了200年之久。

但是，在图拉真去世100多年之后的公元3世纪，却有一位基督教的神甫对他的这条法令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出身于北非行省首府迦太基的特土良。特土良是一位百人队队长的儿子，青年时便已经皈依基督教，他在其著作《护教学》（Apologeticum）中这样写道：

> 这（指图拉真的法令）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表现方式。一边说不要迫害基督教徒，一边鼓励查明有罪就进行惩罚。一边说不要强行进行惩罚，一边鼓励对他们进行迫害。一边说不要在意基督教徒的存在，一边鼓励将其杀害。这是法律吗？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
> 如果他真的认为基督教徒是反社会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将我们全都抓起来呢，根本不用理会什么匿名不匿名的起诉？反之，如果他认为没有那种必要的话，又为什么不肯承认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无罪的呢？
>
> 至于在罪名之中最严重的叛国罪，罗马帝国特意在各个行省都配置了专门的审判官，不仅审讯犯人，还要找到他的同犯和证人。只有对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主动去审讯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起诉的话，接受起诉对基督教徒进行审讯却变成了合法的。也就是说，关于基督教徒是否有罪，完全凭借起诉的那个人来进行判断吗？

从道理上来说，特土良是正确的。图拉真的法令在道理上说不通。

但是人类社会不管在道理上还是在法制上，有时候就是无法面面俱到。为了约束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人群，罗马人创造了法律。同时他们也认为虽然信仰何种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在大家都在一起的时

候，还是应该共同祭拜大多数人都信仰的那个神灵。所以才采用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方法。

换句话说，法律就好像是齿轮。而像这样模棱两可、能够随机应变的方法，就像是使许多齿轮在一起共同转动时必不可少的润滑油。更何况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的五贤帝时代，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数量十分稀少，所以这条针对基督教徒的法律也没有过于严谨的必要。

而且，对于如此复杂的人类世界来说，就算真的按照一神教的思维模式将神所赐予的法律作为整个世界的法律，那样就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的信仰自由了吗？在这一点上，我和特土良之间一定会产生分歧吧。所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问题，在于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就是文明的差异所导致的问题，绝对不是能够通过起诉与审判得到解决的问题。

到了公元3世纪，就在双方针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基督教徒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正如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在3世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镇压并没有形成多大的规模，而且镇压的政策也由于皇帝的不断更换而缺乏连续性，导致无法彻底地进行下去。

那么，这是导致基督教徒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吗？

或者说，不管罗马帝国是否对基督教徒进行镇压，基督教徒都会持续增加，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罗马皇帝中，对基督教镇压最为彻底的当属公元4世纪初期的皇帝戴克里先。关于这位皇帝的事迹我将在下一卷为大家作详细的讲解，不过他之所以对基督教进行如此彻底的镇压，是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为仅仅依靠“模棱两可”的法规完全无法抑制的强大势力。为了更好地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基督教变得如此强大，我们

首先要将本书中关于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的背景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接着，我们需要研究两位罗马史权威对此的意见。这两个人就是吉本和多兹，他们分别著有以下两本著作：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

Eric R. Doddos, Pagan and Ch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65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都同为英国人，更加方便我们进行比较，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崛起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者。

为了表示对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吉本的敬意，让我们先从他开始，作为启蒙主义时代史学家的著名代表，他举出了以下5条主要原因：

（一）坚持一神教。基督教徒对于这件事的执着程度可以用“固执”来形容。虽然他们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但也是犹太教徒不接受基督教徒的原因之一，因为过于强硬的态度最终会导致其群体与社会产生脱节。

（二）相信灵魂不灭，宣扬有来生的教理。这一教理之所以会成为增加信徒的强力武器，与罗马帝国（公元3世纪）摇摇欲坠的状况有关，当时的罗马人全都处于茫然和恐慌的状态之中。

（三）基督教初期的领导者所创造的众多奇迹。

（四）人们皈依基督教之后极端禁欲的生活方式。

（五）以团结和有组织著称的基督教徒之间的联系，随着时代的不

断进步而逐渐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基督教徒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国中国。

在200年之后同样提出这一问题的多兹教授，将基督教势力崛起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四项：

（1）基督教特有的绝对的排他性。

基督教宣称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任何使灵魂得到救赎的可能，虽然这一理论在现在看来或许并不是无懈可击，但在当时那个充满了动荡和不安的年代，给人们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希腊罗马时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多神教观点，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许多获得救赎的办法。诸多神灵共存于罗马世界，无数祭祀活动泛滥成灾。过于自由的选择，也是使很多人产生不安的原因。

但是基督教将这种不安一扫而光，将人们从为数众多的选择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得到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么人们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自然也不会再有不安和困惑。

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批判大多集中在其强烈的排他性上。但是对于生活在充满不安的时代的人们来说，与宽容自由的信仰相比，一个不宽容的全体主义信仰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2）基督教的大门面向任何人敞开。

基督教对于社会各阶层全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农民、奴隶还是被流放者，甚至罪犯，基督教全都毫不排斥地接受下来。即便在进入3世纪之后教会逐渐组织化，形成了专门的神职人员阶层，但是晋升主要看重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出身。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基督教世界在最初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

世界完全不同，并不重视学历与教养的高低。从2世纪到3世纪末期，构成基督教群体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3）成功给予信徒以希望。对于生活在3世纪的罗马人来说，现世就像是含银量一路下跌的银币一样，生为罗马人的魅力也在不断地减少。而与这个不甚如意的现世相比，基督教的来生说就显示出非常动人的光辉。

当时的罗马人中也有不赞成这种逃避现实思想的人，他们称基督教徒为行尸走肉。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行尸走肉”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罗马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对死亡感觉到无法抗拒的魅力。这也是导致他们加入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4）皈依基督教，也会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利益。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组织相比，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基督教徒们不只在进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才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说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全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正如坚决反对基督教的凯尔西斯所说的那样，对罗马帝国来说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最危险的地方。

当基督教徒遭遇不幸的时候，其他教徒会毫不犹豫地对其提供物质上的援助。相互扶持正是这个集团最为重要的职责，而罗马方面也承认基督教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运营模式。

当然，对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其实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美德。但是在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罗马人的社会奉献精神日趋淡薄，这时出现的基督教，刚好比其他宗教在这方面的表现都更加积极，于是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基督教会可以为信徒们提供一切生存上的基本保障。他们帮助生活贫困的寡妇，照顾无人认养的孤儿，并且向老人和失业者以及其他各种

与社会脱节的人伸出援手。他们会为潦倒而死的人举办葬礼，甚至在疫病爆发的时候肩负起医院的职责。

基督教会对3世纪的罗马人所造成的影响最成功的一点在于，他使很多罗马人对其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甚至达到离开了基督教便很难继续活下去的程度。

人类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无依无靠的孤独感。

被入侵的蛮族破坏了家园，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城市中难民。

因为与蛮族的战争导致耕地荒废，无法继续耕种只能前往城市寻找其他出路的农民。

服役期满退役之后却因为蛮族的肆虐而无法像从前那样在军团基地附近进行耕种，同时又没有朋友和家人，只能到城市里流浪的老兵。

因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投资的小资产者。

获得自由之后，却没有任何生活基础的奴隶。

这些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后，立刻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今生与来世全都有人关心和照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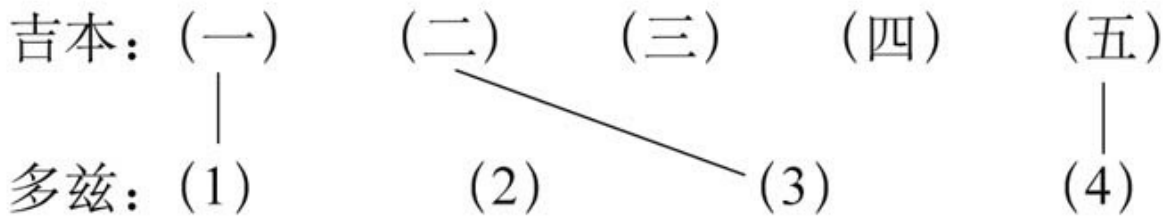
这就是基督教徒在城市中比在乡村中增加更为迅猛的主要原因。同时，在那些大城市之中，比如首都罗马、安条克以及亚历山大港，基督教徒的数量增加得更为迅速。

以上就是这两位专家各自的见解。我之所以用了更多的篇幅去介绍多兹教授的见解，是因为吉本的见解已经在其著作的第15章与第16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这里仅仅是作了总结。另外，吉本的著作在很久

以前便有日文译本，而且直到如今仍然在持续出版，所以关于这两章的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横亘在这两人之间长达200年的时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之所以在现代为数众多的研究学者中选择多兹，是因为在他所列举的事例中，我对（4）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且，他生活的时代与现在也已经相隔了半个世纪。因为失去归属心而烦恼的人，现在一定还在不断地增加。至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吉本的时代想必是不用考虑的吧。

不过即便相隔了200余年，这两个人的见解中仍然有诸多共同点。我将他们两人的共同点简单归纳为一张图例。



通过这张图例我们可以看出，吉本没提到的只有多兹的（2），即基督教的大门面向任何人敞开，并且在组织内部没有阶级差异。吉本之所以没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当时正身处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而且因为其本人也是属于当时的精英阶级，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份拥有绝对的自信。他一定也将自己看做在罗马时代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精英阶级，因此才将向全体行省居民授予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批判为过度开放的政治路线。

不过，被多兹完全忽视的吉本见解之中的（三）和（四），我认为恰恰说到了关键之处。

首先是关于奇迹的（三），奇迹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因为

他能够使人产生期待，即便现在没有出现，将来总有一天一定会出现。而且奇迹能为基督教灵魂救赎的教义增添神秘的色彩。正因为有许多对奇迹的描写，耶稣的故事才能够吸引世界上那么多并非基督教徒的人去阅读，否则的话，《圣经》恐怕只会是基督教徒们自己的读物吧。虽然我个人完全不相信什么奇迹之类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理解奇迹会给人的心灵带来温暖和希望的力量。这就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奇迹的原因。

至于吉本提到的（四），关于基督教徒极端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指责。与单纯的思想相比，端正的品行更能够影响别人与他的思想产生共鸣。一个人格高尚、品行端正的人所说出的话，更容易使别人信服。即便是同样的思想，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同，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由此可见，吉本列举出的五点与多兹列举出的四点，全都是导致基督教势力在罗马帝国崛起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承认以上观点的同时，算不上什么专家的我也想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拥有绝对的排他性的宗教更能够显示出强大实力的话，那么除了基督教之外不承认其他一切信仰的一神教还有犹太教。可是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崛起的不是犹太教而是基督教呢？

我认为基督教虽然坚决不承认其他的信仰，在一神教的立场上毫不让步，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还是对罗马帝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妥协。或许是因为看到在各个方面都毫不让步，与罗马帝国进行正面对抗并最终被消灭的犹太国家的下场，才使得基督教采取了如此灵活的态度。于是在犹太教与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基督教却在罗马帝国内部缓慢地进行渗透。那么，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认为基督教势力崛起的原因，并不是罗马帝国主动接近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主动接近罗马帝国。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推论，是因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偶像崇拜。

（二）割礼。

（三）帝国的公职和军务。

（四）灰色地带。

首先，关于偶像崇拜，这在犹太教中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基督教承认这种行为。不过，就像圣保罗禁止的那样，古代的基督教也不允许偶像崇拜，只是到了中世纪时期才得到教会的承认。罗马时代基督教徒的集会场所墙壁上偶尔会看到拙劣的耶稣画像，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大多为犹太人，所以偶像崇拜的行为无法得到公认吧。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这种行为还是得到了教会方面的默许。因为圣保罗只是禁止“人类使用金、银以及大理石等雕刻神像”，所以在墙上画像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虽然这是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行为，但是其所产生的效果非常巨大。因为人类非常渴望见到自己崇拜之人的样子，而且早期的基督教徒所生活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希腊罗马健美的神像。常年接触这些的信徒，当然也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耶稣的样子。我认为对基督教的胜利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对神和圣人的偶像崇拜。如果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严禁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基督教恐怕无法为后世留下如此灿烂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将庄严而神圣的教义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出来，将神与人类非常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项是割礼，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切除男子阴茎包皮的宗教惯例。

这是犹太教徒与神结成契约的证明，一般在出生以后的第28天行割礼。不过对婴儿还好说，如果是对成年男子进行割礼，那么一定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大量的流血。因为犹太教徒不热衷于向其他民族传道布教，所以接受割礼的对象一般都是犹太人自己的婴儿。但是对于不问民族与人种，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基督教来说，接受割礼的对象则无法限定在婴儿的范畴。

在《使徒行传》中，有关于罗马军中一位叫做科尔尼的百人队队长皈依基督教的记载。但是这位在公元1世纪中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男人并没有接受割礼。也就是说，虽然早期的基督教会的使徒们都是割礼主义者，但是这件事要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基督教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割礼习惯的人仍然敞开大门。当然，后来加入基督教的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割礼的习惯实际上已经等同于消失。

对于生活在罗马时代的人们来说，不必进行割礼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罗马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厌恶割礼这种习俗。他们之所以讨厌犹太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赞成他们的割礼。皇帝哈德良甚至在政治上推出了一项政策，在严禁犹太教徒进行割礼的同时，还将割礼作为一种对犯罪者的惩罚措施，为的是将割礼所代表的意义贬低下去。

因此，当罗马人得知这种本来就不被他们所接受，而且还伴随着剧烈痛苦的割礼习俗，基督教并不强行要求的时候，心里一定长出了一口气吧。

割礼虽然可以免除，但是入教仪式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希腊罗马的宗教都没有入教仪式，因此基督教更加需要一个独具特色的入教仪式，而且对于人类来说，在免除一项内容的同时，往往会寻找另外一项内容来取代它。

于是基督教在免除了割礼之后，将洗礼作为自己的入教仪式。不得

不说，想出这个办法的人真是个天才。洗礼不必像割礼那样伤害自己，也不必像其他一神教那样，通过宰杀牲畜来举行入教仪式。基督教的入教仪式只要在头上点一滴清水，给人一种朴素无邪的庄严感觉，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方法。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基督教的门槛变得更低，更加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关于第三点，基督教对帝国的公职和军务的看法，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 正如组成人类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一样，我们基督教徒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所以擅长行政的人可以做行政官，擅长授课的人可以做教师，擅长辩论的人可以做律师。

这就好比说基督教徒也可以从事罗马帝国的公职。另外，在人类社会之中，如果没有统治阶级就无法充分地运作。针对于此，圣保罗这样说道：

> 每个人都应服从上级的领导。虽然我们除了神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的权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统治者，都是因为神的旨意才成为统治者的。我们服从他们的统治，实际上就是服从凌驾于现世所有统治者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旨意。

这样一来，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与完全不承认罗马帝国权威的犹太教相比，基督教的这种灵活性实在是令人惊叹。另外，基督教在承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还能够接受权力世袭，我想这才是统治阶级能够容忍基督教的最主要因素吧。

那么基督教对于军务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我调查史料之后发现，

基督教从确立起，就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与军务势不两立的声明。不仅如此，当士兵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时候，施洗者约翰对这些身为犹太国王士兵的基督教徒这样说道：

> 满足于国王支付给你们的军饷。即便在军事行动中也不要过于残暴，更不能通过伤害同伴来实现自己升迁的目的。

不管是《新约圣经》还是《使徒行传》，都没有专门针对罗马士兵的批判。不仅如此，罗马士兵规律的生活习惯还成为基督教徒学习的榜样。

总之，在基督教看来，公元1世纪时基督教的教义与在罗马军团服役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但是之所以基督教势力没能渗透进罗马军团之中，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处于兴盛期，士兵们都以自己身为罗马公民而骄傲，对其他的信仰没有丝毫的兴趣。同时，他们都将保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作为自己的使命。

即便在罗马帝国进入安定期的公元2世纪，基督教势力依然没有渗透进帝国公职和军务之中的迹象。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出在教会方面。

公元1世纪，准确地说是自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便开始与犹太教划清界限的基督教，也从内部开始产生了分裂。围绕着这次的分裂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但一般来说一个组织之所以会产生分裂，都是满足于现状的稳健派与主张快速发展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公元2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也不例外。

稳健派主张遵守圣保罗制定的方针，而激进派则主张积极加入罗马帝国的公职和军务。这些激进派大肆扩张的时期，正是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连这位以治世贤明著称的哲学家皇帝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

镇压，就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势力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与罗马帝国对立的姿态。前文中出现过的对皇帝图拉真的法令提出异议的特土良，就是激进派的一员。

即便在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罗马军中大概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不过这些人数量一定不多，并且和同样身为一神教并且在罗马军中拥有大量信徒的密特拉教的教徒一样，在作为帝国国教的罗马诸神与自己信仰的基督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因为罗马人认为个人的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五贤帝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非常典型的罗马统治者的特点。

密特拉教在罗马大竞技场南部圣克莱门特教堂地下遗留有一个集会所，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结社。虽然不是秘密结社，但是仍然选择在地下狭小的地方进行集会，由此可见他们非常重视相互之间的团结。他们使用被宰杀的牛流出的鲜血来进行入教仪式，这种凶残的表现形式使得密特拉教在士兵群体中很受欢迎。不过反过来说，这种血腥的做法也妨碍了密特拉教在女人和小孩之间广泛传播。之所以选择在地下深处进行集会，大概是为了掩盖杀牛之后所流出的大量鲜血吧。在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地下遗迹中，至今依然能够听到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排水系统所发出的声音。

基督教会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的斗争，终于在公元3世纪后期以稳健派的全面胜利告终。据说由于德基乌斯与瓦勒良这两位皇帝对基督教进行的镇压，导致激进派的指导者阶级全军覆没，是稳健派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便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镇压仍然没有对军团内部进行任何的处理。从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公元260年开始，直到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镇压为止的43年间，由于罗马皇帝们一直忙于应对蛮族的入侵，使得基督教徒们得以安稳地度过这段岁月。

密特拉教的集会所（圣克莱门特教堂地下）

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镇压，首先从罗马军队开始。他流放了罗马军队中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这位将罗马帝国从3世纪的迷途中拯救出来的皇帝，不可能做出将罗马军队彻底瓦解的举动。由此可见，即便他将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全部流放，罗马军队仍然保持着原本的作用。

但是表面上的数字不能完全代表一切。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认基督教之前，即便在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条克，基督教徒的数量也只有当地居民的5% 。虽然5% 这个比例并不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另外的那95%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况且即便2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那么要是这些人全都团结起来的话会产生多么强大的力量呢？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数字。

关于基督教势力崛起的第四点原因“灰色地带”，可以看做是我前三点推论的总结。我认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界线，而是中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宽广的灰色地带。

当人类从白一下子转向黑的时候，会因为踌躇的心理而犹豫不前。因为要想跨过这道明确的界线，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不过如果从白色转移到无限接近于白色的浅灰色则没有那么困难，随着这个浅灰色不断地加深，终于在连自己都没感觉到的时候完全变成了黑色。于是从白到黑的转变所具有的抵触感也会变得非常微弱。

3世纪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就和上述这种情况十分相似。相反，罗马帝国与犹太教之间，却没有这个灰色地带，而是完全的白与黑的对立关系。

正是由于初期基督教的指导者所拥有的令人惊叹的灵活性，才使得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这样在产生变化的时候才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就算变化也是潜移默化的。一般来说，一神教在否认其他宗教的同时也否认了信仰该宗教的人，这在以多神教为主的古代世界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且无法想象的。但有趣的是，这一点直到基督教统治整个欧洲长达千年之后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被西欧人发现。

每当我读到罗马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基督教的著作时都会产生一种异常沉痛的感觉，那就是这些人谁也没有理解基督教属于一神教的本质。没有一个人提出关于一神教与多神教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任何信仰的神灵都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但是这种观念，对于对抗基督教势力崛起的罗马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却等于剥夺了他们进行论战的武器。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围绕着灵魂救赎的问题展开讨论，换句话说，就相当于站在敌人的主场上与对方

进行战斗。于是，因为希腊罗马诸神没有拯救人类灵魂的责任，他们只能求助于哲学来解释这些问题。

在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著作《沉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 当灵魂即将离开肉体的那一刻，如果我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的话，那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只有凭借我们人类自由的理智才能够实现。而不像基督教徒那样，通过僵硬的信仰来寻求救赎。

这就是被称为哲学家的皇帝，毫无保留的真情流露。我也十分赞成他的这一观点，只要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那么对于一切都无所畏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其强韧的精神力量。对于生活在3世纪那个充满动荡不安年代的普通人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多少呢？况且就连这位哲学家皇帝自己，也对他所信仰的斯多葛哲学不够坚定，甚至还进行过依洛西斯秘密仪式。

所谓依洛西斯秘密仪式，是在多神教的希腊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祭祀活动。因为祭祀的地点在距离雅典西北部20公里处的依洛西斯，所以被称为依洛西斯秘密仪式。这项仪式所祭祀的主神是宙斯的妹妹大地女神德墨忒尔。关于这项秘密仪式如何举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据说信仰这个仪式的人将会得到死后的平安和灵魂的救赎。虽然皇帝哈德良参加过这个秘密仪式，但是他仅仅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而并非为了追求死后灵魂的平安。至于马可· 奥勒留的动机就很明显了。毕竟，他不是那种会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依洛西斯秘密仪式一般在夜晚的神秘气氛中举行，与3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广泛传播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一样，都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我认为正是这种倾向，使得马可· 奥勒留之后的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全都陷入了认知危机。

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拥有非常坚定的现实主义世界观。

出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贺拉斯曾经在一次聚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在文化上却被希腊所征服。"当时在座的所有人都纷纷表示赞同，就连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也对此深表同感地说道："确实如此。"因此，罗马人将哲学、艺术和科学全都交给擅长这些的希腊人去做，自己则专心搞好现实生活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法律、政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粮食问题。著有《博物学大全》（Naturalis Historia）的老普林尼曾经自豪地说道，虽然金字塔的雄伟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但那毕竟只是为了一位逝去的法老所建造的。而我们罗马人，却要为尽可能多的活着的人创造这样的奇迹。

那个时代的罗马人根本没有什么认知危机。要问他们为什么而活着，他们一定会非常自豪而且毫不犹豫地对此作出回答。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人却无法回答了。即便为了寻求答案而投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怀抱，也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能够从中得到解脱，至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则仍然陷于迷茫之中。对于这些普通民众来说，眼前的贫穷和不安才是最为关键的。至于死后世界和未来将会怎样，这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

蛮族的不断入侵，导致当地居民频繁遭到屠杀和劫掠。

农耕地区由于上述原因而逐渐荒废。

生产力低下的同时，由于防御经费的不断增加而频繁出现的临时税也变得愈发沉重。

为了谋生而背井离乡流亡到城市中的民众，却发现在城市中挤满了四面八方来的难民，导致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家庭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政策也无法正常运转，曾经免费发放的粮食和面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的教育经费等福利政策，也只有在首都罗马才能够勉强维持。至于完全依靠当地富裕阶级私人捐赠来维持社会福利的地方自治体，则由于富裕阶级公共意识的下降而使得当地的福利措施形同虚设。

上述这些事件最终只会导致民众丧失希望。

罗马鼎盛时期的哲学家塞内加曾经说过，对于那些身处不幸和逆境中的人来说，只有希望是他们最后的救赎。但是在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不但无法保证帝国居民的“和平”，甚至还使他们失去了“希望”。对于这样一群深陷绝望之中的人，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所提出的那种需要自由的理性以及强韧精神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基督教崛起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虚弱与疲惫。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就连维持自身活力最重要的气概都已经荡然无存。

每当我看到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肖像时，都会感觉这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感觉他有些软弱。与之相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封面上所用的创立共和国的朱尤尼乌斯· 布鲁特斯的肖像充满了刚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所用的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的肖像看上去甚至比名将汉尼拔更加充满活力。《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也是一位毅然决然并充满理想的年轻统治者。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 恺撒时代》之中使用的尤里乌斯· 恺撒可以说是罗马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政治上有令必行，在用演讲和著作等言论作为武器的情况下，甚至能够令政敌都对其心悦诚服。在他的身上，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布鲁特斯的影子。

在恺撒之后实现了其壮大理想的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堪称古代

世界三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那让人过目不忘的冷峻表情，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封面的皇帝提比略，正如世人的评判那样，是一位十分具有贵族气质的统治者。而到了《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的韦斯帕芗，则使人感觉到一种地方出身者的朴素，以及脚踏实地的安定感。《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的图拉真和哈德良，堪称五贤帝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人的肖像充满了对自己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自信，以及对此深信不疑的昂然之情。

与上述这些罗马统治者相比，3世纪时期皇帝们的肖像又如何呢？出身名门的皇帝，虽然面相俊美，但略显柔弱，而出身低微的皇帝，则全是一副有勇无谋的样子。与追求理想美的希腊造型艺术相比，罗马造型艺术的特点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状态。因此这些罗马统治者的雕像，也反映出他们所统治的这个时代的气息。

在意大利语中有一种说法叫做“colpo di grazia”，翻译过来就是“致命的一击”。我认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斗争的致命一击在于罗马诸神与基督教诸神之间性质上的区别。

我举一个可能不太贴切的例子——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分别如何对待吵架的夫妇。

基督教夫妇会分别前往不同的教会，将夫妻之间吵架的事情向上帝忏悔告白。告解神甫会教导前来忏悔的教徒，夫妇关系是在神面前发誓的神圣关系，所以不但不能离婚，就连吵架都是不应该的。然后让前来忏悔的教徒念诵10次“我们的主啊”，就这样结束。

那么罗马宗教对于夫妻吵架应该如何处理呢？罗马社会是个多神教的社会，据说数量之多高达30万尊。因此，在多神教的罗马社会中，有专门针对夫妻关系的守护女神，叫做维里普拉卡。关于这位女神我已经

在《罗马人的故事1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作过介绍，这里再次摘抄如下：

> 一对夫妻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吃狗肉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在争吵中声音也越来越大。因为一旦沉默下来就会让人感觉自己输了，而且为了压过对方的声音也只能不停地争辩。结果两个人越说越来气，要是继续下去非动起手来不可。为了不至于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以两人决定到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殿去寻求答案。
>
> 但是在神殿中除了女神像之外一无所有，连祭司的人影都没看到。因为罗马的神灵太多，如果每座神殿中都安排祭司的话，那么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而且罗马本身就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在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殿之中，除了这对吵架的夫妻之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因为罗马人与诸神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所以根本不需要派人值守神殿。而在维里普拉卡女神像前的倾诉，只能一次一个人进行。
>
> 于是，在一个人向女神倾诉的时候，另一个人即便不情愿也只能默默地倾听。而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一方会发现另一方的话语中也含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在双方轮流倾诉的过程中，声音也逐渐变得平和下来，最后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重归于好。但是如果这样也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只有离婚这唯一的选择，罗马人也将其看做是女神维里普拉卡的裁决。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基督教的神是能够给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神，而罗马诸神则是帮助人找到前进方向的神。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做是绝对神与守护神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对那些生活在动荡年代失去了自己寻找前进方向的信心的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将军在凯旋仪式的最后都会前往位于卡匹

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汇报自己的胜利，对保佑他取得胜利的诸神表示感谢一样，罗马诸神的主要职责是守护那些不懈努力的人。而在罗马持续获胜、繁荣发展的时代，这是非常适合其国情的宗教。

但是，3世纪的罗马经常失败，即便胜利也是击退入侵的敌人。结果在繁华背后开始出现阴暗的黑影。这个时候的罗马人心中又是怎样的想法呢，会不会认为他们的神灵已经抛弃他们了呢？感觉自己被神灵抛弃的罗马人内心产生无比的绝望。不要忘记，与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认为神灵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神灵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基督教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蛮族的入侵、家园遭到破坏、疫病的流行、贫穷的烦恼，甚至连死亡都是神的旨意。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神对人类进行的考验。

基督教认为这些苦恼能够使人类得到净化。在基督教创立初期，这一思想使信徒们相信悲惨的现状是神给予他们的考验，而苦恼能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以此来获得死后的平安。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有来世，但是至少保证灵魂的平安可以使人在死后不会遭遇危险。

基督教之所以在随后的这么多年一直流传下来，就是因为人类世界总是难免有悲惨与绝望的情况发生。而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地发挥着作用的时代，罗马人根本不需要基督教的这种信仰。所以，在耶稣死后200多年，认识到基督教魅力的罗马人才一下子增多起来。就连一向坚持多神教的罗马人，都被基督教的魅力所吸引。是因为当时罗马诸神的立场逐渐衰弱，人们感觉到诸神守护自己的力量也在逐渐地消失。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神灵却展现出强大的可靠性。在人类与神灵之间距离很近的古代社会，神灵力量的强弱，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越是积极解决帝国危机的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越是严厉。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人民失去了对罗马诸神的信仰，那么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罗马帝国的信仰。

基督教徒并不想打倒罗马帝国，相反他们想要取代罗马帝国。相比之下，一心只想实现犹太独立的犹太教徒就显得太可怜了。而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的行动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毕竟，罗马帝国正在逐渐呈现出衰弱和疲惫的状态。

最后，让我用因为殉教而被追封为圣人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写给他不肯加入基督教的朋友德梅特良的信来作为这一卷的结尾吧：

> 你说导致这个世界陷入动荡不安，遭遇众多不幸的原因，是我们基督教徒。因为我们基督教徒不肯祭拜你们的神灵。
>
> 虽然你从来都没有阅读过我们神圣的教典，而且一直生活在远离真理的环境之中，但是有一件事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罗马已经非常衰老了。曾经稳健地伫立在大地之上的双脚，现在也已经衰老到几乎无法支撑其自身庞大的重量。
>
> 即便基督教的《圣经》之中没有明确地指明这一点，帝国日益衰亡的现实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冬天播下的种子却得不到充足的雨露。夏季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充足的阳光，使小麦无法变成金黄色。春季和煦的阳光成为人们的奢望。秋季也很难见到硕果累累的果树。
>
> 石料场已经找不到从前那样优质的大理石。矿脉几近断绝，金银的产量全都大幅减少。水源中涌出的清水也越来越少。农田中看不到农民的身影，海面上难寻过往的商船。军团基地中鲜有士兵出现，法院里也不再有旁听的民众。
>
> 不仅如此，朋友间的亲密氛围、艺术上的高深造诣、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秩序，一切的一切都和从前不再一样。

帝国已经十分衰老。你还期盼着这个帝国能够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活力，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吗？

在临近终结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会变得衰弱。就像傍晚的太阳，光线不再那么耀眼，而黎明时的月光也变得十分微弱。

这就是世界的真理，也是神的旨意。一切活着的事物都难逃死亡的命运。成熟后必然会老化，老化后就只有死亡。再强大的国家也有衰弱的一天，再巨大的东西也有缩小的时候。衰弱、缩小，最终消失灭亡。

我们不知道这位叫做德梅特良的朋友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否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写出这封信的居普良坚持着基督教的信念直到死亡。他是否坚信，对于罗马帝国这个已经衰老的国家，如果将其中的血液全都换成基督教这个新鲜血液的话，就一定能够重新获得年轻的活力呢？

公元3世纪末期的罗马帝国

大事年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193	3 月，皇帝柏提纳克斯被近卫军团杀害，包括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内的 5 位皇帝同时出现，随后 4 年罗马帝国陷入内乱期			（日本）弥生时代
197	2 月，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与亚尔比努斯的对抗中取得胜利，亚尔比努斯自杀，塞维鲁成为 5 位皇帝之中唯一活下来的人，**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			
199			塞维鲁远征帕提亚，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列为罗马行省	
202	塞维鲁的长子卡拉卡拉就任执政官			
204	塞维鲁的次子盖塔就任执政官		塞维鲁在故乡莱波蒂斯·玛尼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中国）刘备与孙权在赤壁击败曹操（赤壁之战，208）
209	塞维鲁偕妻子与两个儿子远征不列颠			
211		2 月，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不列颠的约克去世。**卡拉卡拉与盖塔共同继位皇帝**		
212	2 月 12 日，卡拉卡拉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中将盖塔杀害。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赋予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			
213	春，卡拉卡拉前往莱茵河防线。秋，卡拉卡拉返回罗马举行凯旋仪式。被元老院授予“pacator orbis”的称号	卡拉卡拉整顿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		
214	春，卡拉卡拉前往帕提亚	卡拉卡拉在东征途中视察多瑙河防线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15	卡拉卡拉发行“安东尼银币”		5月，卡拉卡拉抵达叙利亚的首府安条克。卡拉卡拉与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五世媾和后前往埃及，在亚历山大港虐杀当地居民数千人。帕提亚发生政变，沃洛吉斯五世的弟弟阿尔达班登上王位。卡拉卡拉再次率领军团向帕提亚进军	（日本）弥生时代
216			帕提亚战役开始。卡拉卡拉提出与帕提亚公主结婚为条件媾和，遭到帕提亚王国的拒绝	
217			4月，罗马军队再次向帕提亚进军。4月8日，在前往卡莱的路上，卡拉卡拉被皇帝警卫队的士兵暗杀，享年29岁。4月11日，**近卫军团长官马克里努斯被军团推举为皇帝**。卡拉卡拉的母亲尤利亚·多姆娜在安条克自杀身亡。罗马军队与帕提亚军队在努塞宾交战，结果不分胜负	
218			马克里努斯与帕提亚媾和，放弃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尤利亚·多姆娜的妹妹尤利亚·梅萨集结位于东方的军团反抗马克里努斯。马克里努斯在逃亡途中于比提尼亚行省被捕处死，享年53岁。6月8日，尤利亚·梅萨的外孙**埃拉伽巴路斯继承皇位**	
219	9月29日，埃拉伽巴路斯带着太阳神的神体进入首都罗马			（中国）曹丕篡东汉建立魏王朝（220）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21	埃拉伽巴路斯授予弟弟亚历山大恺撒的称号			
222	3月11日，埃拉伽巴路斯在皇宫内被杀，享年18岁。**亚历山大·塞维鲁继承皇位**。尤利亚·梅萨启用乌尔比安担任皇帝的辅佐官			刘备建立蜀汉（221） 孙权建立吴国（222）
224			阿尔达希尔击败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	（日本）弥生时代
226	尤利亚·梅萨去世，皇帝的母亲尤利亚·梅亚执掌大权		阿尔达希尔继承王位，建立波斯萨珊王朝	
227			阿尔达希尔占领泰西封（帕提亚王国灭亡）	
228	乌尔比安被暗杀		波斯入侵卡帕多西亚行省，直逼叙利亚	
232	亚历山大·塞维鲁亲自率军东征			
233			春，罗马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波斯军交战，双方不分胜负	
234	亚历山大·塞维鲁向北方进军	亚历山大·塞维鲁在莱茵河沿岸与蛮族没有进行交战便进行媾和		
235		3月，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军团起义，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被杀，享年26岁。他的母亲尤利亚·梅亚也同时遇害。负责训练新兵的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库斯被推举为皇帝**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38	北非的农场主推举北非行省的戈尔迪安为皇帝。元老院承认这一决定。**戈尔迪安以及他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共同继位皇帝**。戈尔迪安父子遭到驻屯在努米底亚行省的军团攻击，即位后仅仅一个月便被杀。马克西米努斯被罗马附近的守卫军团杀害。元老院议员**普皮恩努斯与巴尔比努斯共同继承皇位**。普皮恩努斯与巴尔比努斯双双被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军团兵杀害。戈尔迪安一世的孙子**戈尔迪安三世继位**	马克西米努斯率领多瑙河防线的军团向罗马进发		（日本）弥生时代
241	提梅吉提乌斯被任命为近卫军团长官。戈尔迪安三世迎娶提梅吉提乌斯的女儿为妻		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率军侵入罗马帝国东方，逼近安条克	（日本）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难升米前往带方郡。魏国授予卑弥呼金印与铜镜（239，《魏志·倭人传》）
242	提梅吉提乌斯率领多瑙河军团与皇帝一同东征。在冬季之前进驻安条克			
243			罗马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击败波斯军队，恢复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提梅吉提乌斯在罗马军中死去。副官菲利普升任为近卫军团长官	（日本）倭王派遣使节前往魏国（243）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44			2月，戈尔迪安三世在军营中被军团兵暗杀，享年19岁。**阿拉伯人菲利普继承皇位**。阿拉伯人菲利普与沙普尔一世媾和，再次放弃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阿拉伯人菲利普在与波斯媾和之后返回罗马	
248	4月11日至13日，罗马举行建国1000周年庆典。阿拉伯人菲利普派遣首都长官德基乌斯前往多瑙河前线	哥特人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境内		（日本）卑弥呼殁。台与继任女王
249	阿拉伯人菲利普从罗马出发讨伐德基乌斯。阿拉伯人菲利普在维罗纳与德基乌斯的军队遭遇，因为自己手下的士兵叛变，他自杀身亡。**德基乌斯继承皇位**	德基乌斯成功阻止了哥特人的入侵，被多瑙河防线的军团推举为皇帝。德基乌斯向罗马进军		
250	德基乌斯要求市民随身携带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文书。德基乌斯率军迎击蛮族	夏，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大举入侵罗马境内，抵达色雷斯行省		
251	罗马爆发疫病，德基乌斯的次子霍斯蒂利安在这场疫病中病死	德基乌斯与长子赫伦尼乌斯双双在与蛮族的战斗中牺牲。远米西亚行省总督**加卢斯被推举为皇帝**。加卢斯与哥特人媾和，返回罗马。远米西亚行省总督埃米利安努斯越过多瑙河进攻哥特人，取得胜利		
252		阿拉曼人越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帝国境内。北方的蛮族从黑海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地中海，劫掠了小亚细亚与希腊的诸多城市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53	瓦勒良再次面向非基督教徒发放证明文书	埃米利安努斯被米西亚的军团推举为皇帝。同时守卫日耳曼长城的军团司令瓦勒良也宣布继位皇帝。6月，加卢斯在与埃米利安努斯的军队交战时死亡。10月，埃米利安努斯在与瓦勒良的军队交战时死亡。**瓦勒良继承皇位**		
257	瓦勒良颁布临时措施法，禁止基督教徒进行祭祀和集会活动			
258	镇压基督教的第二部临时措施法颁布，规定将没收违反者的财产			
259	瓦勒良率领罗马军队迎击波斯	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率领大军入侵罗马帝国，占领安条克		
260	瓦勒良的儿子**共治皇帝加里恩努斯继承皇位**。秋，远日耳曼行省总督波斯图穆斯宣布建立高卢帝国，自封为高卢帝国皇帝	瓦勒良被波斯军队俘虏（死在狱中，去世年不详）。加里恩努斯任命帕尔米拉的贵族奥迪纳图斯为东方担任司令官		
261	罗马帝国遭遇严重的疫病和地震灾害。加里恩努斯颁布将元老院与军队彻底分离的法令			
267			奥迪纳图斯被外甥所杀。他的妻子芝诺比阿取而代之，成为东方的统治者	（中国）魏灭蜀（263）。司马炎（武帝）建立西晋，取代魏（265）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68	加里恩努斯被武装政变的骑兵队长杀害。武装政变的发动者**克劳狄乌斯继位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击败侵略意大利北部的哥特人，获得“哥特征服者”的称号			
269		哥特人侵略巴尔干半岛。克劳狄乌斯二世将哥特人击败		
270	元老院指名克劳狄乌斯二世的弟弟昆提卢斯继承皇位。士兵们推举骑兵部队司令官**奥勒良继承皇位**，昆提卢斯自杀。汪达尔人入侵意大利中部，被奥勒良击败	1月，克劳狄乌斯在潘诺尼亚行省因感染疫病去世		
271	奥勒良取消了元老院的货币发行权。奥勒良开始在罗马郊外着手修建奥勒良城墙（公元276年完成）	放弃达契亚行省，转让给哥特人，在多瑙河南岸建立“新达契亚行省”	奥勒良前往帕尔米拉征服“东方”的女王芝诺比阿	
272			罗马军队供献帕尔米拉，俘虏芝诺比阿	
273	奥勒良率军平定高卢帝国	秋，高卢帝国皇帝泰特里库斯臣服于奥勒良		
274	春，奥勒良返回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			
275	奥勒良开始东征。9月25日，元老院指名**塔西佗继位皇帝**		4月，奥勒良在小亚细亚因为秘书的阴谋而遭到杀害	

（续）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意大利本土	西方行省	东方行省	
276	塔西佗开始东征。元老院指名塔西佗的弟弟弗洛里安努斯继位皇帝。弗洛里安努斯被身边的警卫士兵杀害	6月，塔西佗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去世。军队推举东方军团的司令官**普罗布斯继承皇位**。普罗布斯击败入侵小亚细亚的哥特人		
277		普罗布斯击败入侵高卢的蛮族，随后继续与蛮族交战		
278		普罗布斯将蛮族彻底赶出高卢		
279			从东方到埃及都出现了将军叛乱的情况。普罗布斯平定了这些叛乱	
280		普罗布斯花费整整一年时间击败了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的蛮族		（中国）西晋灭吴，中国统一（280）
281	秋，普罗布斯回到罗马举行凯旋仪式			
282	普罗布斯开始东征	普罗布斯在多瑙河沿岸的希尔米乌姆被士兵杀害，享年50岁。近卫军团长官**卡鲁斯被推举为皇帝**	秋，卡鲁斯指名**长子卡里努斯与次子努梅里安为共治皇帝**，带着努梅里安一起向东方进军	
283			春，波斯战役再次展开。罗马帝国成功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夏，卡鲁斯因为落雷意外身亡。努梅里安被暗杀。皇帝警卫队长狄奥克莱斯向罗马进军	
284	卡里努斯被暗杀。**狄奥克莱斯改名为戴克里先，继位皇帝**			

参考文献

一、原始史料

Historia Augusta [由公元4世纪的6位作者合著的《罗马皇帝传》，包括了从哈德良到努梅里安（公元117—284年）这段时间的所有皇帝]

Cassius Dio Cocceianus（卡西乌斯· 狄奥）

PΩMAIKH IΣTOPIA（《罗马史》，建国至229年）

Herodianus（艾罗迪亚鲁斯）

Storia dell’Impero dalla morte di Marco Aurelio （《从马可· 奥勒留时代开始的帝国史》，公元180—238年，意大利语翻译）

Caecilius Cyprianus（居普良：迦太基主教，公元257年左右殉教）

Ad Donatum

De habitu virginum

Testimonia ad Quirinum

De lapsis

De 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

Ad Demetrianum

Κ.λσοζ （克理索）

ΑΛΗΘΗΣ ΛΟΓΟΣ （驳基督教）

Ωριγ.νηζ（俄利根）

“Κατ. Κ.λσου 生僻字见原文”（驳克理索）

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君士坦丁大帝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Eusebius（欧瑟比：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据说就是他为临终的君士坦丁

大帝进行洗礼）

Εκκλησιαστικ. Ιστορ.α（基督教会史）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

Apologeticam（ 护教学）

Iscrizioni funerarie sortilegi e pronostici di Roma antica

Notitia dignitatum

二、后世撰写的历史书、研究专著

AA.VV.（著者多数）, *La fine dell'impero romano d'Occidente*,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1978.

ABBOTT, Fr. & JOHNSON, A.Ch.,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1926.

ADCOCK, F.E.,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XIII, Cambridge (Mass.), 1940.

ALFÖLDI, A., *La Grande Crise du monde romain au IIIe siècle*, 《L'Antiquite classique》 7, 1938; *Daci e Romani in Transilvania*, Budapest,1940; *The Moral Barrier on Rhine and Danub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CRFS)》, 1949; *Die Hilfstruppen der römischen Provinz Germania Inferior*, 《Epigraphische Studien (ES)》 6, 1968.

ALLARD, P., *Storia critica delle persecuzioni*, Firenze, 1924.

AMIT, M., *L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et la défense de l'empire romain*, 《La Parola del Passato》 20, 1965.

ANCONA, M., *Claudio il Gotico e gli usurpatori*, Messina, 1901.

APPLEBAUM, S. & GICHON, M.,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Tel Aviv, 1967.

BACHRACH, P. & BARATZ, M.S.,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 56, 1962;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PSR》 57, 1963.

BADIAN, E., *Foreign Clientelae (264-70 B.C.)*, Oxford, 1958.

BARADEZ, J.L., *Vue-Aerienne de l'organisation romaine dans le Sud-Algérien, Fossatum Africae*, Paris, 1949; *Organisation militaire romaine de l'Algérie antique et l'evolution du concept défensif de ses frontièr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ilitaire》 13, 1953; *L'Enceinte de Tipasa: Base d'opérations des troupes venues de Pannonie sous Antonin Le Pieux*,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QCILRS)》; *Les Thermes légionnaires de Gemellae*,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Graz, 1966; *L'Enceinte de Tipasa et ses portes*,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編) II, Paris, 1966; *Compléments inédits au 'Fossatum Africae,'*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én Roms (SMR)》 I, Cologne, 1967.

BARTOCCINI, R., *Il Porto di Leptis Magna nella sua vita economica e sociale*, Hommages á Albert Grenier (Renard編) I, Brussels, 1962.

BAYNES, N.H., *The effect of the Edict of Gallien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 15, 1925; *The Early Church and Social Life: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London, 1926.

BECKER, A., *Imperatore L. Domitius Aurelianus, restitutor urbis*, Monasterii, 1866.

BELL, R., EDWARD, D.V. & WAGNER, H.R.,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1969.

BERCHEM, D. van, *L'Annone militaire dans l'empire romain au IIIème siècl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80, Paris, 1937; *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6, 1955; *Conquête et organisation par Rome des districts alpines*,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REL)》 11, 1962.

BERSANETTI, G.M., *Gordiano I e II; Gordiano III; Timesteo; Valeriano; Gallieno* 以上全て Enciclopedia Italiana, 1933; *Massimino il Trace*, Roma, 1940.

BETZ A., *Zur Dislokation der Legionen in der Zeit vom Tode des Augustus bis zum Ende der Prinzipatsepoche*, Carnuntina (Swoboda編).

BIRLEY, A.R., *Hadrian's Wall: An Illustrated Guide, Ministry of Public Building and Works*, London, 1963;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66; *Excavations at Carpow*, 《SMR》 I, Cologne, 1967;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London, 1971.

BIRLEY, E.B., *A Note on the title 'Gemina,'* 《JRS》 18, 1928;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 1952;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Collected Papers*, Kendal, 1953; *Hadrianic Frontier Policy*, Carnuntina (Swoboda編), 1956; *Research on Hadrian's Wall*, Kendal, 1961;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Graz, 1966; *Hadrian's Wall and its Neighbourhood*, 《SMR》 I, Cologne, 1967 ;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ES》 8, 1969; *The Fate of the Ninth Legio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Roman Yorkshire* (Butler編), Leicester, 1971.

BLAU, P.,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1964.

BOWERSOCK, G.W.,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 1965; *A Report on Arabia Provincia*, 《JRS》 61, 1971.

BRAND, C.E., *Roman Military Law*, Austin, 1968.

BREEZE, D.J.,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egion: The First Cohort and the Equites Legionis*, 《JRS》 59, 1969.

BREEZE, D.J. & DOBSON, B., *Hadrian's Wall: Some Problems*, 《Britannia》 3, 1972.

BREZZI, P., *Cristianesimo e impero Romano*, Roma, 1942.

BRISSON, J-P.編,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 Rome*, Paris, 1969.

BROGAN, O., *The Roman Limes in Germany*, 《Archaeological Journal (AJ)》 92, 1935.

BROWN, P., *Il mondo tardo antico. Da Marco Aurelio*, Einaudi, 1974.

BRUCE, J.C., *Handbook to the Roman Wall* (Sir I.A. Richmond編), Newcastle, 1966.

BRUSIN, G., *Le Difese della romana Aquileia e la loro cronologia*,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Graz, 1966.

BURY, J.B.,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1963.

BUTLER, R.M., *The Roman Walls of Le Mans*, 〈JRS〉 48, 1958;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AJ〉 116, 1959.

CAGNAT, R., *Les Frontières militaires de l'empire romain*, 〈Journal des savants〉, 1901; *L'Armée romaine d'Afrique et l'occupation militaire de l'Afrique sous les empereurs*, Paris, 1913.

CALDERINI, A., *I Severi: La crisi dell'impero nel III secolo*,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1949.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J.B.BURY編代表) X, XI, XII, Cambridge, 1934-39.

CARAMELLA, S., *La filosofia di Plotino e il Neoplatonismo*, Catania, 1940.

CARCOPINO, J., *Les étapes de l'impérialisme romain*, Paris, 1961.

CARETTONI, A., *Banchieri ed operazioni bancarie*, Roma, 1938.

CARY, M.,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1949.

CASSON, 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1971.

CAVAIGNAC, E., *Les Effectifs de l'armée d'Auguste*, 〈REL〉 30, 1952.

CECCHELLI, C., *Cristianesimo e Impero*, Roma, 1938.

CHAPOT, V., *La Frontière de l'Euphrate: De Pompée á la conquête arabe*, Paris, 1907.

CHARLESWORTH, M.P., *Trade Routes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26; *Five Men: Character Studies from the Roman Empire*,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VI, Cambridge (Mass.), 1936; *The Lost Province, or the Worth of Britain*, Cardiff, 1949.

CHEESMAN, G.L.,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Hildesheim, 1971.

CHEVALLIER, R., *Rome et la Germanie au Ier siècle: Problèmes de colonisation*, Brussels, 1961; *Les Voies romaines*, Paris, 1972.

CHILVER, G.E.F., *Cisalpine Gau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49 B.C. to the Death of Trajan*, Oxford, 1941; *The Army in Politics, A.D.68-70*, 〈JRS〉 47, 1957.

CHRISTENSEN, A.,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Copenhagen, 1944.

CHRISTESCU, V., *Istoria militară a Daciei Romane*, Bucarest, 1937.

CICCOTTI, E., *Lineamenti della evoluzione tributaria del mondo antico*, Udine, 1921.

CLEMENTE, G., *La 'Notitia Dignitatum,'* Cagliari, 1968.

COLLINGWOOD, R.G., *The Purpose of the Roman Wall,* 〈Vasculum〉 8, 1920.

CONDURACHI, E., *Neue Probleme und Ergebnisse der Limesforschung in Scythia Minor,* 〈SMR〉 I, Cologne, 1967.

COSTA, G.,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23.

COURCELLE, P.P.,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gues,* Paris, 1964.

COUSSIN, P., *Les Armes romaines: Essai sur les origins et l'evolution des armes individualles du légionnaire romain,* Paris, 1926.

CREES, J.H.E.,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Probus,* London, 1911.

CRUMP, G.A., *Ammianus and the Late Roman Army,* 〈Historia〉 23, 1973.

CURZON, G.N., Lord Kedleston, *Frontiers,* Romanes Lecture Series, Oxford, 1907.

DAHL, R.A.,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3.

DAICOVICIU, C., *La Transylvanie dans l'antiquité,* Bucharest, 1945; *Dacica,*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Renard編) I, Brussels, 1962.

DAICOVICIU, C. & DAICOVICIU, H., *Columna lui Traian,* Bucharest, 1968.

DAVIES, R.W., *The 'Abortive Invasion' of Britain by Gaius,* 〈Historia〉 15, 1966; *A Note on a Recent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in Carrawburgh,* Appendix, 〈ES〉 4, 1967; *Joining the Roman Army,* 〈Bonner Jahrbücher (BJ)〉 169, 1969; *The Medici of the Roman Armed Forces,* 〈ES〉 8, 1969; *Cohortes Equitatae,* 〈Historia〉 20, 1971; *The Romans at Burnswark,* 〈Historia〉 21, 1972;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ANRW)〉 (Temporini編) II-1, 1974.

DEGRASSI, A., *Il Confine nord-orientale dell'Italia romana: Ricerche storico-topografiche,* Dissertationes Bernenses I-6. Bern, 1954.

DEMOUGEOT, É.,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es germaniques à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Paris, 1969.

DODDS, E.R.,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1965.

DOISE, J., *Le Commandement de l'armée romaine sous Theodose et les débuts des régnes d'Arcadius et d'Honoriu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61, 1949.

DONINI, A., *Storia del cristianesimo dalle origini a Giustiniano*, Milano, 1975.

DURRY, M., *Les Cohortes Prétoriennes*,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BEFAR)〉146, Paris, 1938.

DYSON, L., *Native Revolts in the Roman Empire*, 〈Historia〉20, 1971.

EADIE, J.W.,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JRS〉57, 1967.

EMMET, D., *Function, Purpose and Powers*, London, 1958.

EUZENNAT, M., *Le Limes de Volubilis*, 〈SMR〉I, Cologne, 1967.

FINK, R.O., *Roman Military Records on Papyrus*, 〈Phil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26, Cleveland, 1971.

FINLEY, M.I., *Recensione di 'Manpower Shortage' di A.E.R. Boak*, 〈JRS〉48, 1958.

FISHWICK, D., *The Annexation of Mauretania*, 〈Historia〉20, 1971.

FITZ J., *A Military History of Pannonia from the Marcomann War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Severus (180-235)*,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AArchASH)〉14, 1962; *Réorganization militaire au début des guerres marcomannes, Hommages à Marcel Renard* (Bibaw編) I.

FLORESCU, R., *Les Phases de construction du castrum Drobeta (Turnu Severin)*, 〈SMR〉I, Cologne, 1967.

FORNI, G.,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Pubbicazioni della facoltà di filosofia e lettere della Università di Pavia〉5, Milano & Roma, 1953;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Athenaeum〉36, 1958-59; *Limes*, Dizionario Epigrafico Ⅳ;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NRW〉(Temporini編) II-1, 1974.

FRANK, R.I., *Scholae Palatinae: The Palace Guard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PMAAR)〉23, Roma, 1969.

FRANK, 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Baltimore, 1927.

FRERE, S.S.,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67.

FROVA, A., *The Danubian Limes in Bulgaria and Excavations at Oescus*, 〈CRFS〉, 1949.

GALDERINI, A., *Le associazioni professionali in Roma antica*, Milano, 1933.

GALLIAZZO, V., *I Ponti Romani*, Treviso, 1994.

GARBSCH, J.G., *Der Spätrömische Donau-Iller Rhein Limes*, Stuttgart, 1970.

GARZETTI, A.,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6, Bologna, 1960; *Problemi dell'età traianea: Sommario e testi*, Genova, 1971.

GEWEKE, L.K., & WINSPEAR, A.D., *Augustu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m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4, Madison, 1935.

GHIRSHMAN, R., *Les Chionites-Hephtalites*,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13, Cairo, 1948.

GIANNELLI, G., *Trattato di storia romana* (Santo Mazzarino編), Roma, 1953-56.

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88,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ondadori, Milano, 1986)

GICHON, M., *Rom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Negev*, 〈QCILRS〉; *The Negev Frontier, In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Applebaum編);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Palestinae and the Major Phases of its Development*, 〈SMR〉 I, Cologne, 1967.

GIGLI, G., *Forme di reclutamento militare durante il basso impero*, 〈Rendiconti della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8, 1947.

GITTI, A., *Ricerche sui rapporti tra i vandali e l'impero romano*, Bari, 1953.

GONELLA, G., *Pace romana e pace cartaginese*, Quaderni di studi romani II-1, Roma, 1947.

GOODCHILD, R.G.,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I*, 〈JRS〉 40, 1950;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Limes in Cyrenaica*, 〈JRS〉 43, 1953.

GOODCHILD, R.G. & WARD-PERKINS, J.B.,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RS〉 39, 1949.

GORDON, C.D., *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48.

GRAY, W.D., *A Political Ideal of the Emperor Hadria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14〉 1.

GREGG, J.A., *The Decian Persecution*, London & Edinburgh, 1898.

HAMMOND, M., *The Antonine Monarchy*, 〈PMAAR〉 19, Roma, 1959; *The Augustan Princip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Julio-Claudian Period*, New York, 1968.

HARDY, E.G.,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London, 1909; *Augustus and his Legionnaires*, 〈Classical Quarterly (CQ)〉 14, 1921.

HARKNESS, A.,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Romans*, New York, 1887.

HARMAND, J., *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otre ére)*, Paris, 1967; *La Guerre antique, de Sumer à Rome*, Paris, 1973; *Les Origines de l'armée impériale: Un Témoignage sur le réalité du pseudo-principat et sur l'évolution militaire de l'Occident*, 〈ANRW〉 (Temporini編) II-1, 1974.

HARMAND, L.,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C. à 235 ap. J.C)*, Paris, 1960.

HARMATTA, 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armatians*, Budapest, 1950.

HATT, J-J., *Histoire de la Gaule romaine (120 avant J.C. 451 après J.C.): Colonisation ou colonialisme*, Paris, 1966.

HAVERFIELD, F., *Some Roman Conceptions of Empire*, 〈Occasional Publications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Cambridge〉 4, 1916頃.

HEALI, P.J., *The Valerian Persecution*, London, 1905.

HOLMES, T. R.,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27 B.C.-A.D.14*, Oxford, 1928-31.

HOLSTI, K.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1972.

HOMO, L., *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Aurélien (270-275)*, 〈BEFAR〉 89, Paris, 1904; *Les privileges administratifs du Sénat romain sons l'Empire et leur disparition graduelle au cours du 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RH)〉, 1921; *Le Siècle d'or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1947; *Vespasien l'empereur du bon sens (69-79 ap. J.C.)*, Paris, 1949.

HOPKINS, R.V.N., *The life of Alexander Severus*, Cambridge, 1907.

HOWARD, M. (編),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Essays Presented to Captain B. H. Liddell Hart*, London, 1965.

HUSSEY, J.M., OBOLENSKY, D & RUNCIMAN. S. (共編), *Proceedings of the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Oxford, 1967.

JARRETT, M.G., *The Roman Frontier in Wales*, 〈SMR〉 I, Cologne, 1967.

JARRETT, M.G. & MANN, J.C.,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BJ〉 170, 1970; *The Frontiers of the Principate*, 〈ANRW〉 (Temporini編) II-1, 1974.

JONES, A.H.M.,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JRS〉 26, 1936;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編), New York, 1970; *Il tramonto del mondo antico*, Laterza, 1972.

JOUVENEL, B. de, *Power: Its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Growth*, Boston, 1967.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IV*, Paris, 1929.

KALTENBACH, P.E., *Non-Citizen Troops in the Roman Ar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48.

KATZ, S., *The Decline of Rome and the Rise of Mediaeval Europe*, Ithaca, 1955.

KEYES, W.C., *The Rise of the Equites in the Third Century of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1935.

LA PENNA, A., *Orazio e l'ideologia del principato*, Torino, 1963.

LAUR-BELART, R.,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CRFS〉, 1949.

LEMOSSE, M., *Le Régime des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 haut-empire romain*, 〈Pub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droit romain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23, Paris, 1967.

LESQUIER, J., *L'Armée romaine d'Égypte d'Auguste à Dioclètien*, Cairo, 1918.

LEVA, C. & MERTENS, J., *Le Fortin de Braives et le Limes Belgicus*,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編) II, Paris, 1966.

LEVI, M.A. (Canavesi, M.), *La Politica estera di Roma antica*, 〈Manual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34, Milano, 1942.

LEVICK, B.M., *Roman Colonies in Southern Asia Minor*, Oxford, 1967.

LOT, F., *L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La pénétration mutuelle du monde barbare et du monde romain*, Paris, 1939.

LUTTWAK, E.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 Press, 1976.

LYKES, P.,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1921.

MacMULLEN, R.,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52, Cambridge (Mass.), 1963.

McLEOD, W., *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Phoenix〉 19, 1965.

MACURDY, Gr.H., *Vassal-Queens and some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Roman Empi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7.

MAGIE, D.,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fter Christ*, Princeton, 1950.

MANN, J.C.,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The Raising of New Legions during the Principate*, 〈Hermes〉 91, 1963;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Zone in Army Recruitment*, 〈QCILRS〉.

MANNI, E., *L'Impero di Gallien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 III secolo*, Roma, 1949.

MARIN, A., *Hippagogi*,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greques et romaines, Daremberg-Saglio.

MARIN & PEÑA, M., *Instituciones militares romanas*, Enciclopedia Clasica II, Madrid, 1956.

MARQUARDT, J.,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chez les Romains*, Paris, 1891.

MARSDEN, E.W.,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 1969.

MARSH, F.B., *The Reign of Tiberius*, London, 1931.

MARUCCHI, O., *Le Catacombe Romane*, Roma, 1933.

MAZZA, M., *Lotte sociali e restaurazione autoritaria nel III secolo d.c*, Laterza, 1973.

MAZZARINO, S., *La fine del mondo antico*, Garzanti, 1959.

Mélanges Marcel Durry, 〈REL〉 47, Paris, 1969.

MERTENS, J., *Oudenburg, camp du Litus Saxonicum en Belgique?* 〈QCILRS〉.

MILLAR, F., *P. Herennius Dexippus: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Third-Century Invasions*, 〈JRS〉 59, 1969.

MILLAR, F., BERCIU, D., FRYE, R.N., KOSSACK, G. & TALBOT, R.T.,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Neighbours*, London, 1967.

MINOR, C.E., *Brigand, Insurrectionist and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1.

MOMIGLIANO, A.,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a, 1955; *Terz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a, 1966; *Ricerche sull'organizzazione della Giudea sotto il dominio romano (63 a.C.-70 d.C.)*, Amsterdam, 1967; *Quar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a, 1969.

MORESCHINI, C., *Cristianesimo e impero*, Sansoni, 1973.

MORGENTHAU, H.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1962.

MORICCA, U.,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Cristiana*, Torino, 1923.

MORRIS, J., *The Vallum Again*,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TCWAAS)〉 50, 1951.

MOSCOVICH, M.J., *The Role of Hostages in Roman Foreign Policy*,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1972.

MOSS, J.R.,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ies of Aeti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toria〉 23, 1973.

MUSSET, L., *Les Invasions: Les vagues germaniques*, 〈Nouvelle Clio (NC)〉 12, Paris, 1965.

NOCK, A.D., *The Roman Army and the Roman Religious Yea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5, 1952; *La conversione. Societa e religione nell'mondo antico*, Laterza, 1985.

OATES, D.,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London, 1968.

OELMANN, F., *The Rhine Limes in Late Roman Times*, 〈CRFS〉, 1949.

OLIVA, P., *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in the Roman Empire*, Prague, 1962.

OMAN, C.,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Denarius in the Third Century A.D.*, 〈Numismatic Chronicle〉, 1916.

ONDROUCH, V., *Limes Romanus na Slovensku (il limes romano in Slovacchia)*, Bratislava, 1938.

O'NEIL, R.J., *Doctrine and Training in the German Army 1919-193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Howard編).

OSGOOD, R.E. & TUCKER, R.W.,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Baltimore, 1967.

PARKER, H.M.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1928; *The Antiqua Legio of Vegetius*, 〈CQ〉 26, 1932.

PARSONS, T.,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1967.

PASCHOUD, F., *Roma aeterna: Études sur le patriotisme romain dans l'occident*

latin à l'époque des grandes invasions, 〈Bibliotheca Helvetica Romana〉 7, Roma, 1967.

PAOLI, U.E., *Vita romana. Usi, costumi, istituzioni, tradizioni*, Milano, 1997.

PASSERINI, A., *Gli aumenti del soldo militare da Commodo a Massimino*, 〈Athenaeum〉 24, 1946; *Legio*, Dizionario Epigrafico Ⅳ; *Le Coorti Pretorie*, Roma, 1969. *Linee di storia romana in età imperiale* (Nicola Criniti編), Milano, 1972.

PEKÁRY, Th., *Studien zur römischen Währungs und Finanzgeschichte von 161 bis 235 n. Ch*, 〈Historia〉 8, 1959.

PELHAM, H.F., *Essays*, (F. Haverfield編), Oxford, 1911.

PETERSEN, H.E., *Governorship and Military Command in the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1953.

PETRIKOVITS, H. von,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D.*, 〈JRS〉 61, 1971.

PFLAUM, H-C.,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armée romaine du Haut-Empire*,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 Rome, Brisson.

PICCOLO, L., *L'ascesa politica di Palmira dalla conquista romana all'epoca di Zenobia*, Rivista di Storia Antica, 1905.

PIGANIOL, A., *La Notion de Limes*, 〈QCILRS〉.

POIDEBARD, A., *La Trace de Rome dans le désert de Syrie: Le limes de Trajan à la conquête arabe, recherches aériennes*, (*1925-1934*), Paris, 1934.

PUECH, H.C., *Storia del cristianesimo*, Laterza, 1983.

PUGLIESE, C., *L'età di Valeriano e Gallieno: Appunti di storia romana*, Pisa, 1950.

RACHET, M., *Rome et les Berbè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ollection Latomus CX, Brussels, 1970.

RAMSAY, A.M., *The Speed of the Roman Imperial Post*, 〈JRS〉 15, 1925.

RAPPAPORT, B., *Die Einfälle der Goten in das röm*, Leipzig, 1899.

REGIBUS, L. de., *Problemi d'impero nella storia romana del III secolo*, Torino, 1936; *La Monarchia militare di Gallieno*, Recco, 1939.

RÉMONDON, R., *Problèmes militaires en Egypte et dans l'empire à la fin du IV siècle*, 〈RH〉 213, 1955; *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 de Marc Aurele a Anastase*, 〈NC〉 11, Paris, 1964; *La crisi dell'mondo romano*, Mursia, 1975.

REYNOLDS, P.K.B., *The Vigile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30.

RICHMOND, Sir I.A., *The City Wall of Imperial Rome: An Account of its Architec-*

tural Development from Aurelian to Narses, Oxford, 1930; *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3, 1935; *The Romans in Redesdale*, 《History of Northumberland》 15, 1940; *Hadrian's Wall 1939-1949*, 《JRS》 40, 1950; *A Roman Arterial Signalling System in the Stainmore Pass*, Aspects of Archaeology (Grimes編); *The Roman Frontier Land*, 《History, U.K.》 44, 1959; *Palmyra under the Aegis of Rome*, 《JRS》 53, 1963.

ROBERTI, M., *Le associazioni funerarie cristiane e la proprietà ecclesiastica nei primi tre secoli*, Milano, 1927.

ROBERTSON, A.S., *The Antonine Wall*, 《CRFS》, 1949.

ROBINSON, H.R., *Problems in Reconstructing Roman Armour*, 《BJ》 172, 1972.

ROMANELLI, P., *La Cirenaica Romana 96 A.C.-642 D.C.*, Verbania, 1943.

ROSTOVTZEFF, M.,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 impero romano*, Firenze, 1933; *Città carovaniere*, Bari, 1934.

ROUGÉ, J., *Les Institutions romaines: De la Rome royale à la Rome chrétienne*, Paris, 1969.

ROWELL, H.T., *The Honesta Missio from the Numeri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Yale Classical Studies》 6, 1939.

SADDINGTON, D.B., *Roman Attitudes to the Externae Gentes of the North*, 《Acta Classica, S.A.》 4, 1961;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ANRW》 (Temporini編) II-3, 1975.

SAINT-DENIS, E. de, *Mare Clausum*, 《REL》 25, 1947.

SAITTA, A., *2000 anni di Storia. I Cristiani e barbari. Dall'impero di Roma a Bisanzio*, Laterza, 1978-79.

SALAMA, P., *Occupation de la Maurétanie césarienne occidentale sous les Bas-Empire romain*,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編) III, Paris, 1966.

SALMON, E.T., *The Roman Arm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III-52, 1958.

SALVIOLI, G., *Il capitalismo antico*, Bari, 1929.

SALWAY, P., *The Frontier People of Roman Britain*, Cambridge, 1965.

SAXER, R., *Untersuchungen zu den vexillation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von Augustus bis Diokletian*, 《ES》 1, Cologne & Graz, 1967.

SCHLEIERMACHER, W., *Der römische Limes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67.

SCHÖNBERGER, H.,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JRS⟩ 59, 1969.

SEGRE, A., *Circolazione monetaria e potere d'aquisto della moneta nel mondo antico*, Firenze, 1920.

SHAW, R.C. & SIMPSON, F.G., *The Purpose and Date of the Vallum and its Crossings*, ⟨TCWAAS⟩ 27, 1922;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Roman Algeria*, ⟨JRS⟩ 34, 1944; *The Letters of Pliny: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mmentary*, Oxford, 1966;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1973.

SIMPSON, G., *The Roman Forts in Wales: A Reassessment*, ⟨SMR⟩ I, Cologne, 1967; *Britons and the Roman Army: A Study of Wales and the Southern Pennines in the 1st-3rd Centuries*, London, 1964.

SINISCALCO, C., *Il cammino di Cristo nell' impero romano*, Laterza, 1987.

SMITH, R.E.,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Manchester, 1958; *The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Historia⟩ 12, 1972.

SOLARI, A., *La Crisi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33; *Il Rinnovamento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38.

SORDI, M., *Il cristianesimo e Roma*, Cappelli, 1965.

STARR, C.G., J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Cornell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26, Ithaca, 1941.

STEER, K.A., *The Antonine Wall: A Reconsideration*, ⟨SMR⟩ I, Cologne, 1967.

STEVENS, C.E., *The British Section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AJ⟩ 97, 1940.

STEVENSON, G.H.,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ill the Age of the Severi*, Oxford, 1930.

SWOBODA, E., *Traian und der Pannonische Lim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SYME, R., *Rhine and Danube Legions under Domitian*, ⟨JRS⟩ 18, 1928;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RS⟩ 23, 1933;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Tacitus*, Oxford, 1958; *The Lower Danube under Trajan*, ⟨JRS⟩ 49, 1959; *Hadrian the Intellectual*,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SZILÁGYI, J., *Roman Garrisons Stationed at the Northern Pannonia-Quad Frontier-Sectors of the Empire*, ⟨AArchASH⟩ 2, 1952; *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épondér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ères de l'émpire roma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AAntASH)⟩ 2, 1953.

TEMPORINI, H. (編),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m Welt: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n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ANRW), Berlin & New York, 1974.

THOMPSON, E.A., *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Being a New Text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 with 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xford, 1952; *The Settlement of the Barbarians in Southern Gaul*, 〈JRS〉 46, 1956;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65;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 Oxford, 1966; *Una cultura barbarica, I Germani*, Laterza, 1976.

THOMPSON, H.A., *Athenian Twilight: A.D. 267-600*, 〈JRS〉 49, 1959.

TORRI, A.P., *Le corporazioni romane*, Roma, 1940.

TOVEY, L-C. H., *Elements of Strategy*, London, 1887.

VANNÉRUS, J., *Le Limes et le fortifications gallo-romaines de Belgique: Enquête toponymique*, Brussels, 1943.

VÁRADY, L., *New Evidences on Some Problems of Late Ro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AAntASH〉 9, 1961;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Late-Roman Dalmatian Cunei*, 〈AAntASH〉 11, 1963.

VEYNE, P., *La società romana*, Laterza, 1995.

VIGNERON, P., *Le Cheval dans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de guerres médiques aux grandes invasions*, Nancy, 1968.

VITA, A.Di., *Il Limes romano di Tripolitania nella sua concretezza archeologica e nella sua realtà storica*, 〈Libya Antiqua〉 1, 1964.

VOGT, J., *Il declino di Roma*, Saggiatore, 1966.

WADE, D.W., *The Roman Auxiliary Units and Camps in Daci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69.

WALTER, E.V., *Terror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1969.

WATERS, K.H., *The Reign of Trajan and its Place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RW〉 (Temporini編) II-2, 1975.

WATSON, G.R.,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8, 1959;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1969.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London, 1969.

WELLS, C.M.,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1972.

WHEELER, R.E.M., *The Roman Frontier in Mesopotamia*, 《CRFS》, 1949;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WHITE, L.T.（編）,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s after Two Centuries*, Berkeley, 1966.

WILKES, J.J., *A Note on the Mutiny of the Pannonian Legions in A.D. 14*, 《CQ》 13-2, 1963; *Dalmatia: Histor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69.

WILL, E., *Les Enceintes du bas-empire à Bavay*, 《QCILRS》.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III

最后一搏

[日] 盐野七生◎著　麋玲◎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走出三世纪危机的迷雾，罗马该何去何从？
东、西罗马帝国分而治之
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内战中脱颖而出

罗马帝国该如何面对日渐壮大的基督教
消灭它？忽略它？
还是接受它？

13

王　石　王　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日）盐野七生著；麋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86–3948–2
I.① 罗… II.① 盐… ② 麋… III.① 古罗马－历史IV.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8219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III: Saigo No Doryoku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4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麋玲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

[日] 盐野七生 著
麋玲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铜币故事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公元284—305年）
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公元306—377年）
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在我写作过程中，实在无法想象其笑脸的，就是这位戴克里先皇帝

了。当然，本身我们在雕像或银币上看到的人物，一般都是一副严肃的神态。可是在写作这些皇帝事迹的时候，通常还是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笑脸的。比如，恺撒大帝会哈哈大笑，奥古斯都则是微笑中带一点无可奈何的样子，而个性阴沉的提比略，想必会是一脸的冷笑吧。

遇事时连当事者的表情都可以想象得到的话，意味着可以近距离地审视他们。但是这位戴克里先皇帝，给人的感觉很模糊，好像站在很远的地方遥望他。

但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我都不喜欢以后世的眼光进行评判。我只想在本书里将戴克里先为重振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而作出的所有努力，一一道来。即使这样，我还是会在写作时忍不住感叹：站在他的立场，能做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

铜币故事

在写作罗马通史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深切的感受：第一，一个人的幸与不幸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资质、才能、努力程度，在时代面

前都不值得一提。因此，我不想将这本书当成总结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的读物来写。在我看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第二，无论何种改革，只要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都只能以失败收场。

戴克里先也好，君士坦丁也罢，为了重振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无论是增强军事力量还是承认基督教，都与传统“罗马式的政策”相背离。也许这种转变，反而正好说明帝国已经穷途末路。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货币的图案上，皇帝的头像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斜向上的构图设计。据货币专家表示，这是为了表达皇帝仰望神灵的含义。

的确，以前的罗马帝国皇帝，视线总是采用平视设计，取注视众人的寓意，而非仰视神灵。

一边是注视人的领袖，一边是仰望神的统治者，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史到君士坦丁就该画上句号了。

不过，我倒认为，与其获知死亡即将来临就趁早离开病房，倒不如守护她到最后，目送她走向死亡更显敬意。所以《罗马人的故事》不是在第十三卷收尾，而是一直写到了第十五卷。但无论如何，看着自己的心头至爱走向灭亡，终归还是哀伤不已。

盐野七生

2009年初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如果把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段时期的史实称为罗马史的话，整个罗马历史按照时间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王政时期 → 共和时期 → 前期•中期帝政时期（元首制）→ 后期帝政时期（绝对君主制）→ 帝国末期

本书要讲的故事，史学上命名为“后期帝政时期”，也就是罗马帝国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时期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此时罗马帝国会过渡到君主制？

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它和元首制有什么区别？

这种转变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面对这些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我无法简洁、快速地给出答案，也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史实一一叙述开来，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

在罗马帝国，任何事都具有大规模、多样化的特点。繁荣期、鼎盛期是如此，进入不可抑制的衰退期以后，也唯有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

盐野七生

2004年夏于罗马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3世纪末期）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

（公元284—305年）

走出迷雾

我们都十分了解公元284年登基称帝后、按罗马风格改名为“戴克里先”的这个人，但是在他登基之前，即他被称为“狄奥克莱斯”时，有关他的事情，史料记载很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是暴毙的努梅里安皇帝的警卫队长。除此之外，只知道他于公元245年前后出生于亚得里亚海的东海岸，现在克罗地亚（Croatia）境内的斯普利特附近，生身父母姓名不详。有说他是农场被释放奴隶的儿子，出身卑微。在罗马时代，17岁意味着成年。到了这个年纪，如果立志参军，那就意味着今后20年会以士兵的身份在罗马军队度过。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他凭战功而扬名的一丝痕迹。从士兵升到百人队队长，即指挥百来人的中队长，平均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就算扣除这个时间段，还有15年的时间。这15年正是罗马帝国刚刚摆脱公元260年时任皇帝被波斯俘虏的空前危机之后。这一时期的皇帝奥勒良、普罗布斯、卡鲁斯都是军人出身，奉行的是积极作战的方针。换句话说，这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在战场上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期。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听说过“狄奥克莱斯”这个名字，而且，这个时期正是他20岁出头40岁不到的年纪，是建功立业的最佳年龄段。

由此看来，我也似乎有些倾向于认同一部分研究人员的看法，即戴克里先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这个时期他虽然隶属军队，却不是一线上阵的士兵，而是以军团里某类小官的身份在累积经历。军队是一个凡事均需自行处理的地方，这一点在罗马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已成为一项传统。军队里不但有军医、建筑工，还有厨师、裁缝。当年，为了使手下士兵退伍后的生活有着落，尤里乌斯·恺撒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地方建设多个殖民城市的武将。一座殖民城市正好迁入一个军团。由于军团已经具有了居民共同体

的特征，所以迁入后，能够马上发挥城市的功能。到了帝国时期，这项传统也没有改变。比如，北非城市提姆加德就是一座著名的殖民城市。它由当时的图拉真皇帝下令建设，目的是为了让手下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士兵在退役后有安顿之地。这座城市由士兵自己在服役期间建设完成。

由此可见，待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不只是要拿刀拿枪上战场，也有其他很多忙不完的事情。从戴克里先登基以后一系列的举措来看，他在军队担任官员时，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后来他能登基做皇帝也是源于军团士兵的拥护。士兵的目光通常都会放在带领大家冲锋陷阵的司令员或者指挥官身上。可是，在皇帝暴毙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士兵推举的却是后方的官员。可见，平时戴克里先的工作成绩应该是非常突出，因而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吧。而且，士兵选择的，不是适合过渡时期的稳重年长者，而是戴克里先。要知道，当时的戴克里先还非常年轻。

而且，这位军队官员，不是所谓的小公务员那一类型的人。很多人讨厌别人干涉自己负责的事情，戴克里先却不一样。“知人善用”是皇帝戴克里先的基本国策。如果冷静而透彻地评估帝国当时的现状和他自身的资质，我们会很自然地认同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时，这位罗马皇帝要处理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多。其中，戴克里先最为重视的，是以下两件事：

第一是安全保障；第二是帝国内部的结构改革。

具体来说，第一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东方大国波斯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前皇帝卡鲁斯时，曾经跨过幼发拉底河攻入波斯境内。但因为卡鲁斯后来遭雷击死亡，使战争无法再继续进行，罗马大军只好向西撤军，在没有与波斯签订休战条约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因此，战争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不过，由于卡鲁斯率领的罗马大军在他去世

前已经给波斯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波斯王应该无法轻易举行反攻。根据目前的状态，戴克里先判断这个问题可以暂缓处理。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对付居住在罗马帝国北方防线莱茵河、多瑙河对面的蛮族。当罗马军队主力集中在东面与波斯作战时，北欧各部族蠢蠢欲动，认为再次大举进攻罗马的时机到了。远征东方的罗马军，是由皇帝卡鲁斯率领的。既然是皇帝亲征，那罗马精锐肯定随行。蛮族判断当下帝国西面防守最为薄弱，是入侵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马上付诸实践，开始进攻。

此外，在帝国边境防线上，需要严密坚守的已经不仅仅是北方防线。在帝国南部北非一带，面对不时出现的沙漠游民的袭击，也有必要进行认真对待。南方的危机和北方蛮族的袭击一样危险。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演变成外敌进攻后占领该地并长期盘踞于此的程度，对方仅仅是采取掠夺人口、家畜和财产，然后带回领地这样一种模式，即盗匪似的抢劫模式。但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边境将无人敢继续居住。恐慌的居民为了逃避危险纷纷涌入城市，这样一来，地方人口越来越稀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如此将带来帝国内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布失衡的后果。原先人口适度分散的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生产力低下、失业者增多的恶果。要阻止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保障边境安全，即大力做好防卫工作，维护地方和平。公元3世纪初，帝国北方防线，即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开始出现农村人口流失严重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现象，随后这种现象逐渐蔓延，到3世纪末已扩散至帝国南部的北非沿线一带。

当时，在辽阔的北方，犹如源源不断涌现的云雾一样的蛮族，不断向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罗马境内入侵。对此，罗马帝国总计投入了16个军团的力量进行防卫。与此相对，南方的北非防线长度与北方防线不相上下，却只配备了1个军团的防卫力量。这个军团以现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龙柏斯为基地，被称为第三奥古斯都军团。从名称来推测，这个

军团应该是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的。北非防线蜿蜒绵长，以现在的摩洛哥为起点，经过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最后至利比亚。如此绵长的防线，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仅仅依靠6000人的主力军团兵在守卫。他们能够完成守卫任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沙漠游民的数量比北方森林蛮族要少得多，另一个原因要归功于地区的防卫布局。整个地区以主力军团驻扎基地为轴心，周围辅以退役士兵以集团形式移居组建的殖民城市，再加上原住民的城镇，它们之间通过大道连成网状。大家在各险要处设置战略据点，据点上建设城池和碉堡进行防卫。如此由点及面，构成整个地区的防卫体系。这个体系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防卫功能。但是，300年后的3世纪末期，这个功能逐渐失效了。

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受到越过莱茵河、多瑙河入侵的北方蛮族的强烈威胁，已经没有余力来增强防卫力量抵抗实力较弱的北非沙漠游民。话虽如此，形势也不允许帝国对此弃之不理。在罗马时代，北非一带绿草如茵，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大型产业区。其中，埃及是小麦的主要产地，埃及以西的北非各类商品更是丰富，从小麦、橄榄油、水果到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因此，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连接意大利半岛和北非的航线上，商船更是常年络绎不绝。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根据地——意大利半岛是一大消费区，那么北非则是一大生产地。双方的关系比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关系还要密切。现在北非一带也开始受到威胁。对罗马帝国而言，事情已经不是派遣增援部队赶走盗匪就可以了结那么简单的了。

而且，对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而言，即使击退外敌也无法恢复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状态了。换句话说，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敌人”。帝国内的敌人，并不是指行省叛变反抗罗马中央政府，而是指罗马境内盗匪横行，让政府苦于应对。特别是在高卢行省，盗匪不仅组成了大规模的集团到处作乱，甚至就连多佛尔海峡的警备军舰也被他们夺下，使得暴力范围波及不列颠行省。

这种流氓集团的实力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大，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因为盗贼的“素质”提高了。原先的盗贼主要是威胁农民、拦路抢劫的流氓，如今却是罗马正规军队中退役原因不一的士兵和蛮族中激进分子的联合。简单地说，这些人不久前还是隔着防线对峙的敌人，现在却轻易地为了财物而互相勾结，组成暴力集团到处横行霸道。这伙人原本就熟悉武器使用和攻击技巧，而且他们的首领，就是不久前还在担任多佛尔海峡警备任务的罗马军队指挥官。这个人从军官改行做强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蛮族作战后的战利品分配不公。也许我们可以说，盗贼集团素质的提升起因于罗马军品质的下降。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代，恐怕就连处理盗贼问题，也要皇帝亲自出马率领正规军来解决了。

该如何对付上面这些“敌人”，是登基后的戴克里先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都还算不上攸关生死的大问题。要知道，20年前罗马帝国刚经历过时任皇帝被敌所俘、帝国一分为三的空前危机。后来通过前线出身的军人皇帝们的奋力作战，虽说没有完全克服危机，脱离惨状，至少使国家大势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危险度要低得多。在挽回帝国颓势上，功劳最大的要数奥勒良皇帝。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将事情按照轻重缓急排序，然后毫不拖延地跑遍每一条战线，亲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奥勒良与戴克里先都出身于社会底层，都来自巴尔干地区，但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一方面来源于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和才能上的区别，另一方面与两人面临的危机严重程度不同有关。

“两帝共治制”

早在称帝之前，戴克里先就有一位亲密好友，此人与奥勒良皇帝一样，出生在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现在的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也就是说他同样出身于占据公元3—4世纪罗马皇位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出身于社会底层，也是通过参军走上仕途的，也同样具备称帝

的资格。他的名字叫做马克西米安，据说他的年龄比戴克里先小5岁左右。

不过，这两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与内敛、不轻易将内心想法示人的戴克里先相比，马克西米安不仅会把内心所想表现在脸上，而且还会马上付诸行动。

假如两人同时听到屋外有异常声响，戴克里先的表现是不动声色，先设法探知声音的起因，而马克西米安则会立马拿着武器冲出去。这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原因不得而知。不过，马克西米安内心极为钦佩戴克里先是毋庸置疑的，而戴克里先则是最了解马克西米安才华的人。他的才华，就是身为武将的战斗才能，战无不胜。因此，他很受士兵拥护。对马克西米安，士兵不仅是尊敬，更多的是对他的爱戴。战场上，大多数司令官是站在后方发号施令，而马克西米安的身影永远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

公元283年夏天，皇帝卡鲁斯在对波斯的战争途中遭雷击死亡。

同一年秋天，卡鲁斯之子努梅里安皇帝在从美索不达米亚撤军至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现在的土耳其西部城市伊兹米特）时，被发现暴毙在行军的马车中。随后，士兵们拥立戴克里先为皇帝。

第二年，即公元284年夏天，卡鲁斯的另一个儿子卡里努斯也在战争中死去。至此，卡鲁斯家族灭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戴克里先刚满40岁，就登上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宝座，而且当时无一人可以威胁到他的地位。

对于刚刚到手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般人是绝对不会马上分给他人共享的。但是，戴克里先这样做了。同年秋天，他就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开始了“两帝共治制”。

长期以来，“恺撒·奥古斯都”的称号代表皇帝，“恺撒”的意思是皇位继承人。不过这种情况下，通常双方要有20岁左右的年龄差。恺撒作为次任皇帝，有一定的年龄差是必要的。但是，戴克里先需要的，并不是继承人，而是在位期间能辅佐自己的得力干将。戴克里先实际上将与皇帝同等的权力分给了小自己5岁的朋友。他的这一举动也意味着马克西米安被委以解决帝国西方各项问题的重任，而戴克里先自己则专注于帝国东方的治理。这一时期，帝国的东西分界线大致在埃及和意大利之间。如此一来，多瑙河防线属于戴克里先的责任范围，马克西米安则要负责高卢、不列颠、西班牙以及北非一带。将天下一分为二进行治理，是因为戴克里先认为，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故而作出这样的决定。戴克里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奥勒良皇帝那样卓越的军事才能，可以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将分成三块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这个时期，他的这一判断之准确，令人赞赏。顺带说一下，奥勒良皇帝一马平川、纵横四海的时候，戴克里先的年龄在25—30岁之间，正是人生当中学习的黄金期。虽然当时的戴克里先还是无名小卒，但已经具有了相当敏锐的观察力。

象征“两帝共治制”的纪念币

即使有洞察自我极限的能力，并能够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相应的方针策略，但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能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还是需要果敢和魄力的。戴克里先正是这样一位极具魄力的男子汉。

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委托他全权处理帝国西边的问题，即使保留一段时间作为观察期，看看这位“左右手”能否作出成就，也一定不会遭人异议，马克西米安本人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毕竟他受托

整顿恢复帝国西边秩序才半年不到的时间。虽然这期间，马克西米安的军事行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取得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半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换句话说，被封为“恺撒”后的马克西米安，还在建功立业的表现阶段。尽管如此，戴克里先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行动。现在看来，应该说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公元286年4月1日，他升任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奥古斯都”，即皇帝。要知道，此时戴克里先自己登基称帝还不满两年。马克西米安升任皇帝并不是士兵推举的结果，而是皇帝戴克里先个人的决定。至此，41岁和36岁的两位皇帝同时治理帝国东方和西方的统治体系形成。当然，戴克里先并没有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块的意思。

同样，虽然两人都被称为“奥古斯都”（皇帝），但戴克里先的称谓前加上了“约维乌斯”（Iovius），意为最高神朱庇特，而马克西米安称谓前加上的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是半人半神，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名字。当前，在自己的名字上添加神灵或者半神的名字并不表示大众就要把这个人当成神灵来崇拜。

对戴克里先来说，要维持帝国统一的局面，就不能给民众造成两位皇帝并列执政的印象。古代人一听到这些名称马上就能理解，冠上神灵与半神的名字只是为了显示两人地位上的差别。当时的罗马人也喜欢给自己的别墅冠上神灵的名字。可是即使这套别墅被称为“维纳斯”，并不表示这就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的住处。提比略皇帝虽然将卡普里岛上的别墅命名为“朱庇特”，但他是历代罗马皇帝中唯一死后拒绝被神化的人。不过，罗马人这种多神教传统以及神灵的亲民化风格，的确会刺激到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的神经。因为即使是为别墅命名，也不会有基督教徒取宙斯、耶稣基督或者马利亚之类的名字。

言归正传，一直以来，赫拉克勒斯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气势雄壮的大力士，得了这个称号的马克西米安也备受鼓舞，表现异常突出，成绩斐然。原本他只是一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表现不俗的武将，加上出身

又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家，可是现在一跃成了万人之上的两位皇帝之一。志得意满的马克西米安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帝国西方秩序所需的军力重整工作。看来，与“次任皇帝”相比，“现任皇帝”这一称号促动力更强，效果更明显。之后，马克西米安挥师进入莱茵河流域。

从现代角度来看，莱茵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之后穿越瑞士、法国、德国、荷兰，最后注入北海。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定莱茵河为国界后，350年来这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在2000年后的今天，沿这条大河而建的重要城市，大都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军团驻地。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在当时都是罗马军团的驻地。

2000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可以供人居住。原因在于：一方面，建设之初，罗马人在地势的选择上判断精准；另一方面，建设城镇时，罗马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完善、彻底。即使在帝国末期到中世纪期间，因蛮族的多次侵略而遭到破坏，有些设施已经完全不能使用，但坚固的石壁依然能够为幸存的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石壁内，无论是原先的广场、竞技场，还是水道、桥梁，都逐渐被划分为小块，成了一般民众的住家。这些居住下来的人逐渐发展，规模扩大，慢慢地也就演变成了现代的城市。不过，这种现象只有在气候宜人的欧洲才能产生，北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里无人居住的城镇，包括其周边在内，因为无人整顿，最后唯一的下场就是等着沙漠化。但是，从现代考古学界来看，欧洲的城镇被深埋在现代都市之下，想要挖掘难如登天。而北非的城镇，只要挖开那些沙土就可以重见天日，倒是更适合作研究。

同样，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这些东欧国家的首都，也是由2000年前的罗马军团驻地发展起来的。莱茵河、多瑙河对罗马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河流，也是守卫帝国的“城墙”。顺带说

一句，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莱茵河（Rhein）叫做莱姆斯河（Rhemus），多瑙河（Donau）则叫做多努布河（Danubu）或多努维乌斯河（Danuvius）。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中已经谈论过陷入“3世纪危机”中的罗马帝国。虽然莱茵河防线对罗马帝国来说非常重要，但当时这条防线已经残破不堪。这种残破不堪的情况，并非仅仅体现在4个军团守卫的莱茵河防线一处，就连投入了10到12个军团的多瑙河防线，也是不堪一击。老实说，3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上岌岌可危，情况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不是投入一员猛将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程度。

但是，既然承担了解决问题的责任，那么当务之急是要消除眼前的恐慌，然后再慢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边的一号皇帝戴克里先，西边的二号皇帝马克西米安，在公元286年至293年的7年时间里，便忙于处理这些危机。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西米安负责的帝国西方，他本来就是一位在战场上极其活跃的人物，在战线推移过程中也自始至终保持着积极的作战方针。

他打败了渡过莱茵河向西入侵的法兰克人，并乘胜追击，渡过莱茵河向东进攻，将北方蛮族一个主要部落的根据地化为灰烬。

如此在确保大后方稳定的前提下，他再掉头专心对付横行高卢地区的盗匪集团。盗匪集团的成员复杂：有被罗马军队开除或直接逃离的士兵，有脱离原属部落的蛮族，有因社会动荡而无法进行耕种因而舍弃耕地的农民，有因帝国经济恶化导致公费、私费资助的公共娱乐活动减少从而失业的角斗士，甚至还有因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丧失谋生手段的城市居民。这就是3世纪末盗匪集团的成员结构。也因此，他们的组织更为严密，袭击方法也更加巧妙。此外，政府长期忙于对付蛮族和波斯等强敌的入侵，无暇顾及国内治安状况，也是盗匪集团猖獗的原因之

一。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固然代表着由罗马帝国确立起来的和平，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体制之所以能得到那些被帝国征服的行省民众的支持，是因为政府不但能抵御外敌的入侵，也能成功维持国内的治安。

当年哈德良皇帝在位期间，大半时间都用于巡视帝国全境，尤其是边境地带，他也因此而享有盛名。而哈德良皇帝在巡视期间，并不带军团随行。既然是皇帝，肯定至少要带个警卫队，但人数绝对不会多到让受访地区疲于接待的程度。显而易见，到包括哈德良在内的五贤帝时代，“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还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原因在于，当时的罗马统治者长期将治安和防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现在即使治安败坏，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有办法自保。因为他们有财力去组织私人警卫或者雇用保镖，但普通民众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如果放任这种状态不管，首先就会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减少。即使生产出东西也会被夺走，还有谁愿意劳动呢？其次，旅途安全不能保障的话，就会导致人员、物资交流不畅。长期以来，最终带来经济活力下降、失业者增多的恶果。正因如此，维护治安和保障国家安全，都是“公家”的职责所在。哈德良皇帝在世的公元2世纪，和戴克里先统治的公元3世纪末期，两者差别在于以前击退盗匪根本不需要皇帝出马，而现在则很有必要。所以，当马克西米安皇帝将蛮族赶到莱茵河对岸后，就立刻回头积极准备对付盗匪。这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当时的盗匪集团不仅人员素质有所提升，而且数量庞大。该如何消灭他们，这似乎比将蛮族赶到莱茵河对面还要耗费时间。高卢土地广袤，按现代国别来说，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的西半部、德国西部的四分之一以及荷兰的南部，另外，高卢北部、莱茵河最终流入的北海沿岸，也亟须派兵讨伐。因为这一带近年出现了一个名叫撒克逊的部落。无论出现哪个部落，对罗马帝国来说都必须要出兵严防，以阻止蛮族和盗匪相勾结。

好不容易处理完高卢剿匪工作的马克西米安，又开始将战线移向北非。虽然有几个盗匪团伙渡过多佛尔海峡逃到了不列颠，不过对罗马帝国统治者来说，恢复北非的秩序要远比恢复不列颠的秩序重要得多。因为北非距离帝国中心的距离要比不列颠近。

北非虽然是罗马帝国的南方边境，却没有一位皇帝率领军团来过这个地区。

当地人只是听说有一位哈德良皇帝来这里巡视过。北非出身的塞维鲁皇帝衣锦还乡的模样，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一位与北非渊源甚深的皇帝戈尔迪安一世，只可惜这位皇帝仅仅在位半个月。虽说北非是帝国的重要地带，但自从打败迦太基之后，450年来，这里的民众一次也没有见过率领军团行军的皇帝。也就是说，常年只需要一个军团就可以守卫的北非，现在也必须要皇帝亲自率军支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不过，由皇帝亲自带兵介入事态，的确取得了不一般的效果。将沙漠游民驱赶到沙漠另一端的战斗，所花时间上要比扫清高卢境内盗匪短得多。如此一来，负责罗马帝国西边事务的马克西米安皇帝，将初期任务暂时完成了。

与此同时，负责帝国东方事务的皇帝戴克里先也是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不，也许应该说他比小他5岁的同事更忙，因为他还要往来于气候、地势都截然不同的各个地区巡视。在东方事务中，首要任务是要击退突破多瑙河防线入侵至境内的蛮族。在各项史料中都找不到戴克里先亲自指挥作战的记录。由此可见，他应该是在后方坐镇、将实际指挥的权力交给了属下的将领。话说回来，御驾亲征，哪怕只是在战场的一角，这一消息也会给战斗中的士兵以莫大的鼓舞。多瑙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横贯中欧、东欧，最后注入黑海。就防线来说，的确蜿蜒绵长。将越境南下、大举入侵的蛮族赶回多瑙河北边，花了戴克里先两年的时间。

解决这一问题之后，戴克里先又马不停蹄地向东部挺进。当然，除了留下必要的守备军外，其余兵力全部带走。在他的规划中，除了使用战争打击敌人，还包括依赖军事力量向敌人施压谋求谈判的策略。不管采用哪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逼迫波斯国王交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广袤地区）的北部。他的目的倒不是为了扩张罗马的领土，而是要进一步强化与莱茵河防线、多瑙河防线并称罗马三大防线的幼发拉底河防线。

这一计划算是成功了一半。虽然没能让波斯国王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让给罗马，但是迫使他默认了罗马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此外，罗马成功扶持亲罗马派的提里达特斯三世登上了亚美尼亚王国的王位。

亚美尼亚王国的立场是偏向东边的波斯还是西边的罗马，是东边的统治者还是帕提亚王国时，对罗马帝国来说，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外交问题。如果有了亚美尼亚的协助，罗马除了能从西侧的幼发拉底河监视之外，还能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更深处的山岳地带监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且，如此一来，罗马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挥军南下，进入曾经的帕提亚王国，现在的波斯王国首都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战略角度来说，意义极其重大。顺带说一下，曾经的亚美尼亚王国，大约相当于2000年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地区。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是极力拉拢土耳其，力促他们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原因就在于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土耳其西部，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苏联解体前，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现在则相对减弱了许多。不过，土耳其东部还衔接着伊拉克。

到公元288年，戴克里先成功地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卫。首都元老院也在这一年通过表决，决定颁赠意为“波斯征服者”的“Persicus Maximus”称号给戴克里先。虽然这场军事外交没有经过任何战争就取

得成功，但是元老院之中还是有人能正确理解其重要意义的。但是，戴克里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返回首都。登基4年来，戴克里先一次也没有来过罗马。这一年，戴克里先率军从叙利亚的安条克向西返回，前往多瑙河和莱茵河上游的雷蒂安地区。他的目的是要屯兵莱茵河上游，确保正在高卢和盗匪作战的马克西米安的后方安全。

公元290年，高卢剿匪结束以后，戴克里先和他的军队再次移师东进。这次的东方之行，是为了消灭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内开始出现的萨拉森人强盗。当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主角正是撒克逊、法兰克、伦巴底、萨拉森等部族，如今这些部族的名字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

对萨拉森人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即公元291年，戴克里先已身在埃及。他的目的既不是观光，也不是考察旅游，而是要率领罗马的正规军击退从尼罗河上游袭来的土著。埃及，作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有一个军团的常驻兵力。但是现在，就连在埃及地区，仅凭常驻兵力也已经无法对抗以前被视为“零星威胁”的敌人了。

在埃及的任务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二年，即公元292年，戴克里先又返回到多瑙河防线。这次的目的是要击退跨河南下的北方蛮族之一萨尔马提亚人。

以上记载就是从公元286年开始到292年结束的7年时间里两位皇帝的转战经历。在这7年的时间里，两位皇帝只见过一次面。当时正值公元289年到290年间的冬天，两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梅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的米兰一起度过了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当时，正值马克西米安准备转战北非、戴克里先准备前往叙利亚对付萨拉森人之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

总而言之，在这7年时间里，如果从戴克里先登基那年算起，该是8年时间里，帝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算是暂时都解决了。这足以证明，帝国

东、西方由两位皇帝共同管理的“两帝共治制”，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发挥功效，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这时，47岁的戴克里先又在构思一个更加缜密的政治制度了。

“四帝共治制”

公元293年5月1日，戴克里先在他的根据地，小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马克西米安在其驻地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同时发表声明，开始了历史上叫做“四帝共治制”（tetrarchia），即四个人分担统治的体系。

即在两位“奥古斯都”之下，再各自任命一位“恺撒”。

帝国西方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的“恺撒”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这两个人之间没有年龄差距。

帝国东方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任命的“恺撒”是伽列里乌斯。这个人出生在公元260年前后，和戴克里先有15岁的年龄差。

不过，得到“恺撒”称号的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似乎都是由戴克里先一人挑选决定的。因为这两个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作为皇帝次任者选出来安定政局那么简单。

首先，这四个人都来自罗马军队，是身经百战的“武将”。其次，这四个人均出身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之间，即现在的巴尔干地区，在当时这个地区因良将辈出而闻名于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农民的儿子。

总的来说，这四个人既是容易沟通的老乡，又有能力，特别是在战场上，都是响当当的武将，而且他们的出身，与个人主义、消极情绪浓厚的经济利益既得阶层无缘。从年龄上来看，四个人都处于体力、精力

旺盛的壮年期，再加上丰富的经验，从各方面看都比较理想。相信这也正是戴克里先选人的基准吧。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把“奥古斯都”理解为“皇帝”，“恺撒”理解为“次任皇帝”，但是实施“四帝共治制”之后，称之为“正帝”、“副帝”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解，在当时的记录资料上，依然还是和以前一样，记为“奥古斯都”（Augustus）和“恺撒”（Caesar）。戴克里先保留了旧的称号，但实质内容已经变了。“恺撒”不再是等待继位的皇储，而是和“奥古斯都”一样，具备了相同的职责。这一内情，可以从四个人的年龄上看出端倪。“四帝共治制”的实施开始于公元293年，现将四个人的年龄罗列如下。由于资料记录不详，所以这里所列数字后面得加上“左右”两个字。

帝国东方　“正帝”戴克里先，4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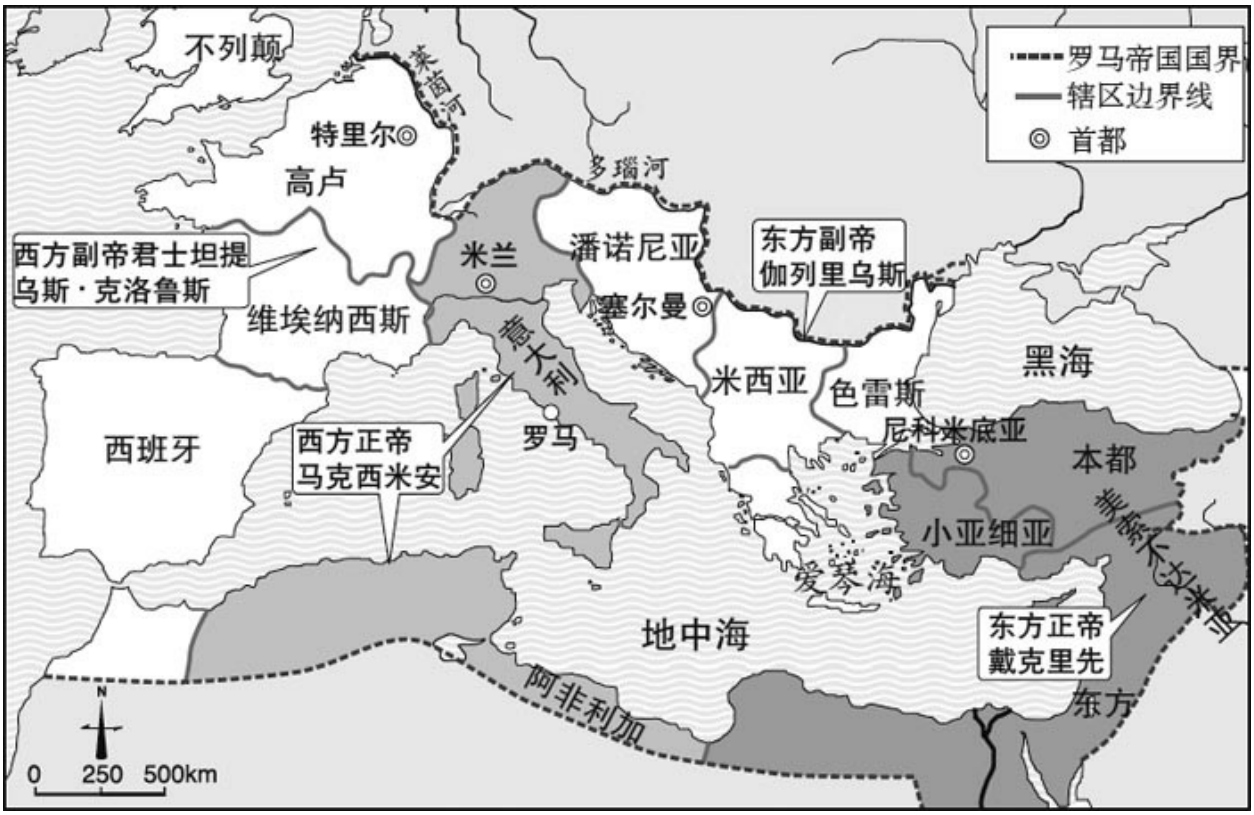
“副帝”伽列里乌斯，33岁。

帝国西方　“正帝”马克西米安，43岁。

“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43岁。

这时，不仅“正帝”，东、西方两位“副帝”也有明确的防卫区域划分。按照地图显示，帝国由西向东划分如下：

“副帝”君士坦提乌斯所辖区域，包括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隔着古代被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相对的非洲西北部。首都设在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德国和比利时的国界线附近。



“四帝共治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略图

“正帝”马克西米安所辖区域，以现在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一带为起点，跨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本土，又经过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群岛，以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非地区为终点。首都定在米兰。据说选择米兰是因为从这里出发，无论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北上，还是前往帝国的首都罗马，交通都极为便利。

有趣的是，在古代人眼中，地中海不是交通的障碍，而是连接目的地的道路。在2000年后的今天，还抱有同样想法的，只有出身北非、将生命依托给小船和橡皮艇的难民了。

再把话题转到帝国东方，“副帝”伽列里乌斯所辖区域，包括多瑙河防线以南全境。这个地区当时又细分为潘诺尼亚、米西亚、色雷斯三地。整个地区以多瑙河为北界，以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为南界，囊括了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从地图上看，这个区域是四

个人当中最小的，却担负着多瑙河防线这一号称“罗马帝国安全保障指数测量器”的最重要防线的维护重任。戴克里先将四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伽列里乌斯安排在这里，正是出于这一用意。首都是塞尔曼，距离多瑙河20公里不到，意味着总司令可以随时前往前线。

虽然实行了“四帝共治制”，但是“大奥古斯都”（senior Augustus）戴克里先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变。“四帝共治制”并不是把帝国分裂成四块，而只是分配给四个人去承担整个帝国的防卫任务。而且，四位皇帝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等级划分得很清楚。“大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居最高位，其下为“小奥古斯都”（iunior Augustus），接下来才是两名“副帝”，呈金字塔形。由于在军事上，两位副帝被赋予了与正帝同等的权力，所以如果等级不划分清楚，帝国马上就会真的分裂成四块了。

四个人当中居首位的正帝戴克里先所辖范围，是以“奥利恩斯”（Oriëns）为总称的东方地区。以小亚细亚为起点，跨过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直到埃及的整个区域。这片区域最强大的敌人当属波斯。在罗马历史上，东方防线的边防长官通常都把官邸设在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条克，但戴克里先并没有把这里设为首都，而是把都城设在了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科米底亚。因为尼科米底亚作为海港城市，即可以由此向西渡海，向多瑙河防线输送援军，又可以借由海路通往东方的叙利亚、南方的埃及，交通极为便利。

四位皇帝都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接近帝国防线的位置，或者容易驰援防线的地方。由此可见，“四帝共治制”设立的最大目的是出于帝国防卫安全的考虑。亦即，明确划分四个人的责任区域，使四个人可以同时肩负罗马帝国的国防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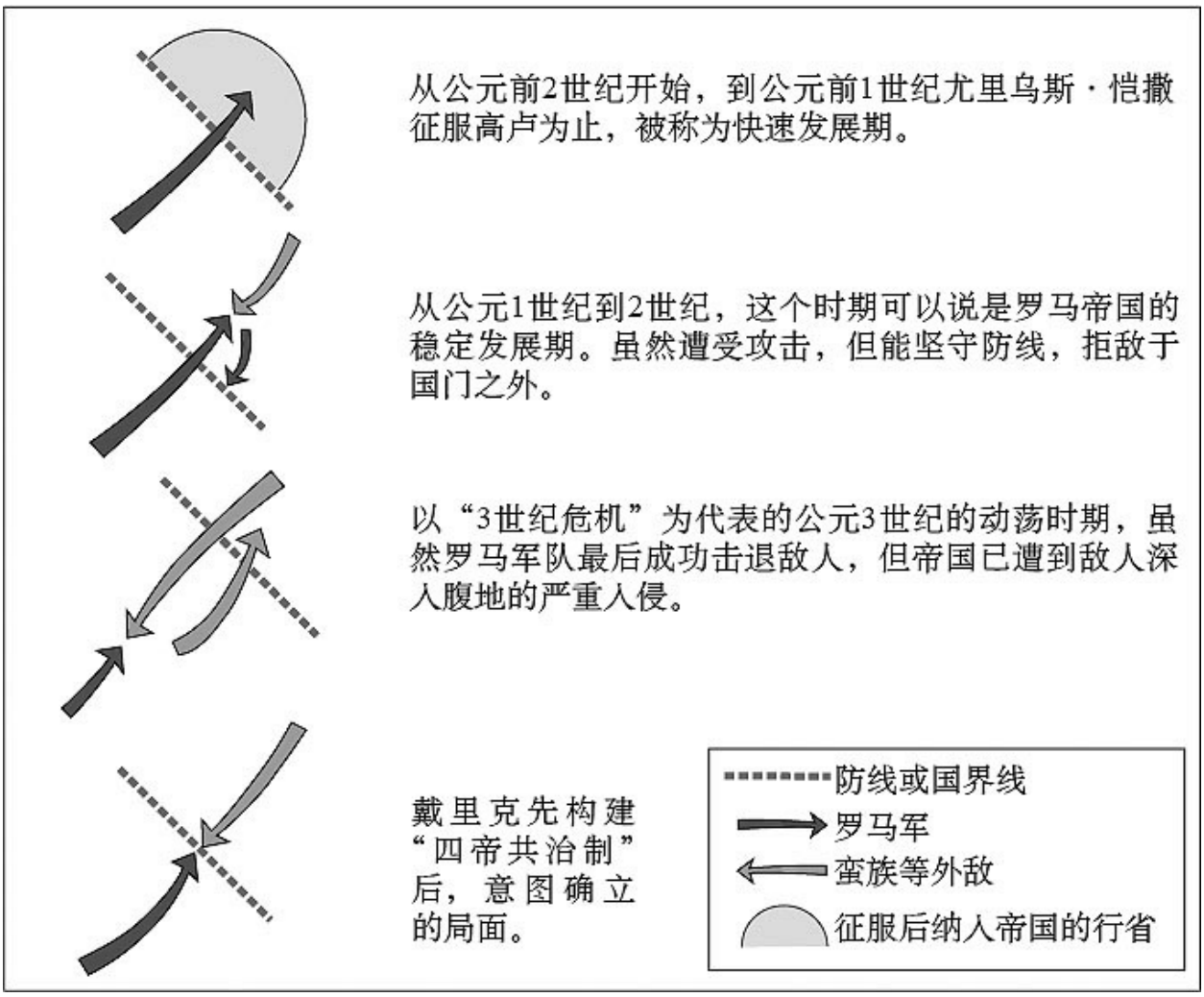
因此，四个人当中的戴克里先的地位，和“两帝共治制”时又有了区别。他不再是“约维乌斯”，而是“大奥古斯都”，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大，而是说，在帝国军事方面，四个人共同分担，但在统治处理帝国事务方面，仍然由戴克里先一个人说了算。这也

是“四帝共治制”的构成实质。

在戴克里先的思想里，他应该是坚信，帝国防卫只能采用“四帝共治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两帝共治制”只能应付一时的蛮族入侵，维持短暂的和平。这一点，从罗马的国防安全体制演变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其实，帝国和皇帝统治的国家并不能画等号。“帝国”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ium”，这个词是由含有“支配”、“统治”、“命令”等含义的动词“imperare”派生出来的。一个国家，共和制也好，王政也好，不管政体如何，只要是把其他国家或民族纳入自己支配下的霸权国家，它就成了“帝国”。因此，当古代的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打败大国迦太基，并趁势收下地中海周边，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内海”时，虽然当时罗马还是共和时期，罗马人已经开始自称“帝国”，并留下了书面记录。因为他们已经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周边国家和民族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到戴克里先实施“四帝共治制”的公元4世纪初，罗马的防卫体系的演变，大体上按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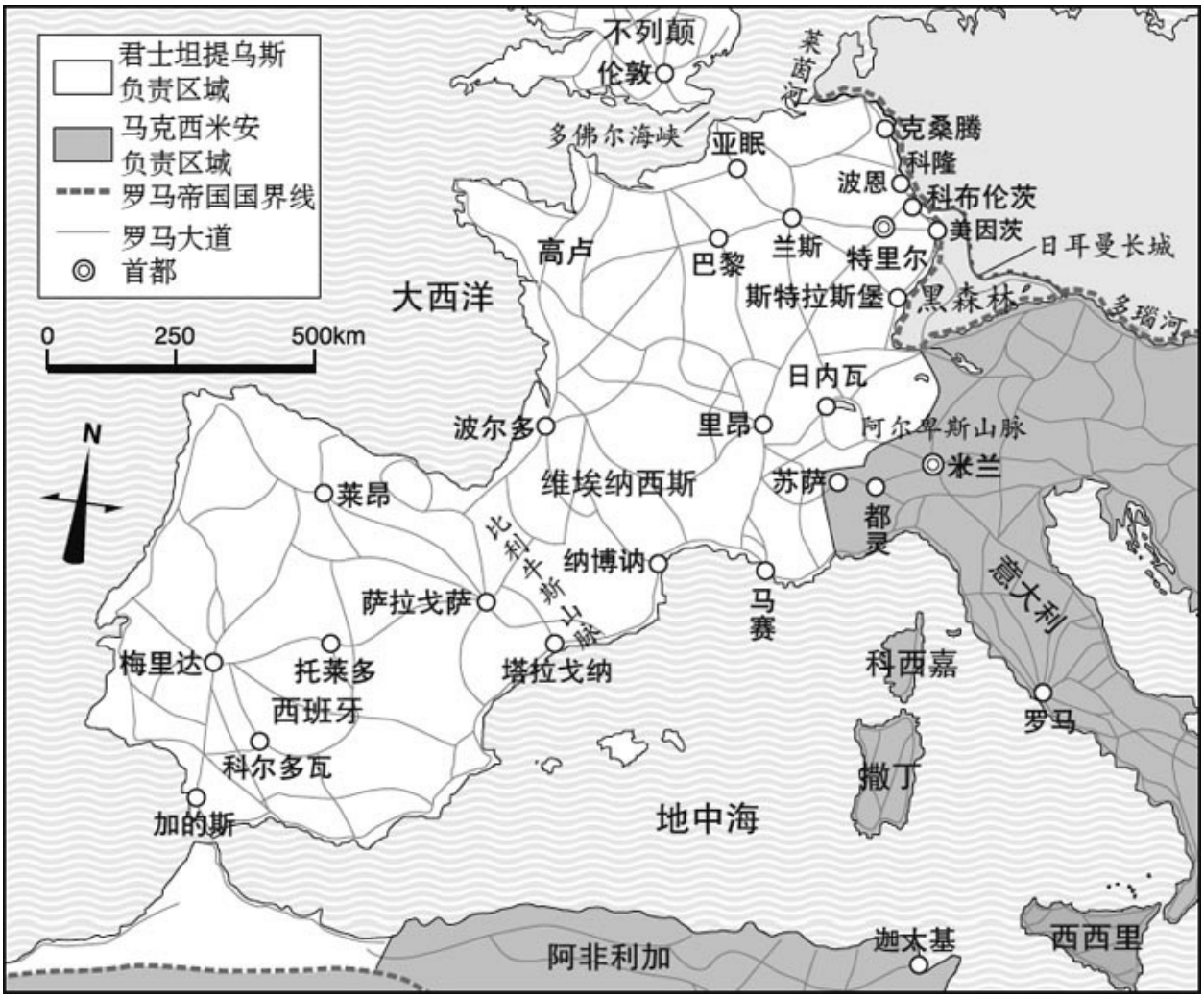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防卫体系的演变

为什么戴克里先如此看重帝国的防卫工作呢？因为他虽然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做了皇帝以后，想法也就和历代罗马皇帝一样了。那就是，身为帝国之首，一国之君，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帝国内所有子民的人身安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还谈什么国家，做什么皇帝呢？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太过理所当然，甚至没有说明的必要。但是，当一个国家深陷危机之中，要想摆脱，就必须立足于最根本的问题来制订方针、政策。这种立足根本的做法，在处理问题时，不容易偏离方向，有助于优先解决眼前的当务之急。不过，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一个度，如果过分专注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忽略长远的目标。“四帝共治制”就是戴克里先针对眼前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构建的政治体系。

在解决这一最重要问题上，“四帝共治制”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四帝共治制”的特点是，四位皇帝都将据点设在靠近防线的地方压制敌人，这一战略效果有目共睹。公元3世纪，蛮族大举入侵，攻入帝国腹地，使当时的罗马人陷入绝望之中，这样悲惨的情景，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虽然防卫形势没有恢复到公元1、2世纪那样，可以越过防线攻入对方阵地的程度，但是至少3世纪那种任由蛮族跨过莱茵河、多瑙河大举入侵，攻入帝国腹地烧杀劫掠后，才反击成功的境况已经成为过去。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戴克里先的出现，以及之后他推行的“四帝共治制”，使罗马帝国进入了伟大的复兴时期。

如果单就国防来说，的确如此。不是敌人消失不见了，而是局势逆转了。罗马帝国从被敌人压制的一方，变成了压制敌人的一方。这一点可以从蛮族再也不能侵入帝国内地清晰地反映出来。这也意味着国内恢复了安全、和平的状态。戴克里先登基后一个人治国的时间为一年多，然后他推行的“二帝共治制”维持了7年时间，再加上“四帝共治制”存在的12年，一共是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里，百姓不用担心蛮族或者盗匪侵入自己家中，也不用担心自家的院子沦为罗马军队驱逐敌人的战场。可以想象，当时的罗马人是多么放心。和平，对人类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无所作为，它很快就会溜走。



罗马帝国西部

从罗马时代称为“特雷维鲁姆”（Treverorum）的特里尔，沿着摩泽拉（Mosella）河即现在的摩泽尔河顺流而下约100公里，即可到达莱茵河防线。摩泽尔河入莱茵河，两河合流之处叫做科布伦茨，这个名字也是从罗马时代的名称，意为“合流处”的“科富伦特”（Confluentes）一词转变而来。另外，城中的罗马大道，使这里和莱茵河防线上的各主要基地之间的往来变得极其便利。

由此北上，可以到达罗马时代的“波恩纳”（Bonna），即现在的波恩。向东，可以到达罗马时代被称为“摩根提亚肯”（Mogontiacum）的美因茨。东南方，与罗马时代被称为“阿根图拉特”（Argentorate）的斯

特拉斯堡相连接，顺着罗马大道向西行，通过兰斯、亚眠，就可以到达多佛尔海峡。无论是兰斯还是亚眠，都是罗马大道的交会点，因此，在罗马时代，是比巴黎还重要的城市。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只是横贯德国、比利时、法国的一条路线。时代不同，地理感觉也会变化。也就是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想必在罗马人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放着一幅罗马帝国的全境图。即使在现代有汽车可开的年代，也会觉得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往来很费事。但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而且，他甚至还要渡过多佛尔海峡到达不列颠，在那里征讨蛮族和盗匪。可以想象，对君士坦提乌斯来说，在担任副帝的这12年，恐怕就是不断奔波于东、北、西三方的日子吧。但也正因为如此，高卢和西班牙才能享受和平。

实行“四帝共治制”之后的12年里，有副帝君士坦提乌斯横刀立马，纵横沙场，身为西方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相对过得比较安稳、平和。

罗马时代的梅迪奥拉努姆，即现在的米兰，这里既不是罗马军团基地，也不是退役兵的殖民城市，却被西方正帝选为根据地，这本身就体现了罗马帝国后期军事状况的变化。因为这里有罗马大道通过，容易派兵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莱茵河上游或者多瑙河上游地区。假如守护犹如腹部要害般重要地带的日耳曼长城没有弃守，还能发挥作用；亦或，3世纪后半期没有经历过蛮族侵入意大利本土的惨痛经历，米兰也不会成为身兼总司令的皇帝的根据地。时代的变迁，也连带使中心地带发生了变化。

北非地区在500年后将属于伊斯兰文明圈，而意大利半岛现在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实际上，在这两个地区染上这两大一神教色彩之前，其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当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危险度下降之后，身在米兰的皇帝马克西米安的注意力很自然就会移到北非上。而且他在任期间，也的确花了很大的气力，重整责任区内的北非防卫体系。因此，北非地区民众的支持，几乎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过，对于首都罗

马，尽管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但是他从不轻易涉足。马克西米安曾让人质疑，是否因为虚荣心作祟，才跑到北非去让有钱的农场主奉承。但这一点正体现出他对年长的好友戴克里先的尊重、守礼，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诚、守规矩的人。如果没有戴克里先在场，他绝不会踏入帝国首都罗马一步，也因此，虽然罗马和米兰之间的距离，按现在快速列车计算，只有5个小时的车程，但首都罗马的居民长年过着看不见皇帝的日子。

帝国东方的副帝伽列里乌斯是四位皇帝之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也正因如此，他被赋予了守护帝国生命线难度最大的多瑙河防线的防卫重任。在他担任副帝之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整顿防务。光是防线长度就有西方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往来的莱茵河、多佛尔海峡、不列颠之间距离的两倍多。而且，多瑙河防线以北居住的蛮族，无论数量还是彪悍程度都是其他防线不能比的。但是他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修复了如此漫长、难以防御的多瑙河防线，成功阻止了蛮族的入侵。由此可见，伽列里乌斯的军事才能的确非同凡响。他甚至还在正帝马克西米安的责任区，成功阻止了多瑙河上游地区蛮族的入侵，帮助马克西米安减轻了工作负担。同样的，正帝戴克里先原本待在尼科米底亚，随时准备派兵支援马克西米安，而伽列里乌斯的行为也减轻了他的负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戴克里先自觉军事才华不足，但在选拔优秀军事人才方面，还是很有眼光的。

话说回来，副帝表现不俗，正帝戴克里先也没有借机躲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里享乐。他不仅去了叙利亚、埃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着手推动仅有他握有实权的帝国结构改革的工作。关于改革详情，容待后叙。也正因此，戴克里先要尽早处理好各类事情，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因为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更多烦心事。而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与波斯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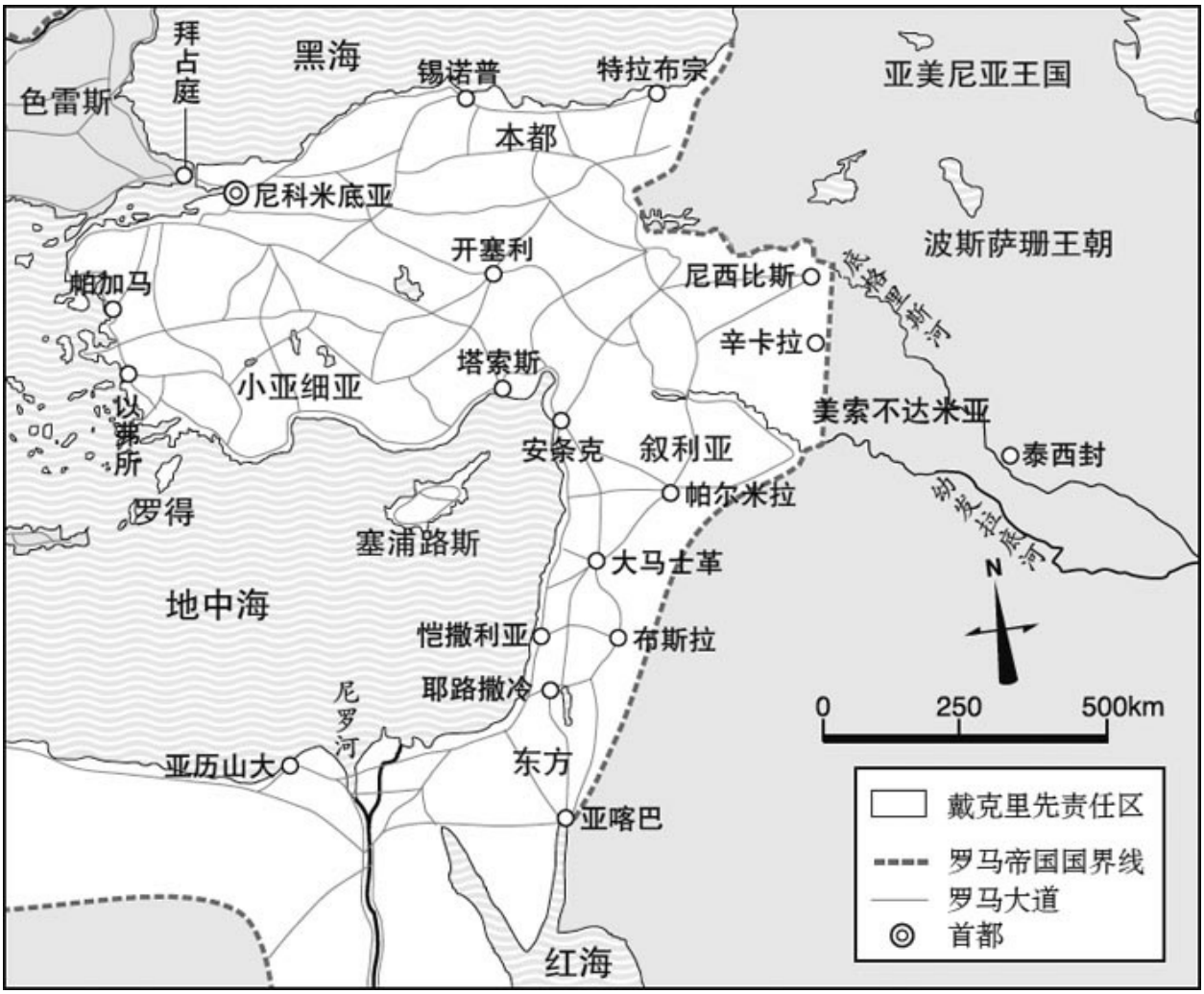
三年前，波斯王位交替，新换了国王。在君主专制国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当新王继位时，即使过渡平稳，也必然会产生反对派。新任国王为了压制国内反对势力，必然要对外表现强硬。自古以来，对外作战都是调和国内矛盾的特效药。即使幼发拉底河对岸的主人从帕提亚换成了波斯，但他们展现强硬的对象依旧还是罗马。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波斯，背负着8年前受戴克里先军事胁迫、心有不甘地默认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归于罗马旗下的旧恨，这一地区对波斯来说，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罗马取得该地区因而获利，就代表波斯方面失手陷于不利的境地。古往今来有许多兵家必争之地的存在，对罗马和波斯来说，必争之地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以及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

公元296年，波斯国王亲自率领大军北上美索不达米亚，攻入属于罗马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而且，还趁势将亲罗马派的亚美尼亚国王拉下王位。

帝国的东方，现在称为中东地区，是正帝戴克里先直接负责防卫的区域。一旦这个地区受到敌人侵袭，率军迎战的正是他本人。但是戴克里先把手下作战的主力军迁移到了叙利亚的安条克，而把迎敌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从多瑙河防线调来的副帝伽列里乌斯。

这一年的伽列里乌斯36岁。从军以来，他所熟悉的地区，除了既是出生地又是作为副帝全权负责的多瑙河南部巴尔干地区以外，就是在“两帝共治制”时期跟随戴克里先南征北战的中东地区。戴克里先将击退波斯军的重任交给伽列里乌斯，一方面是看到了他在整顿多瑙河防线这两年里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他在东方累积的经验。选择对波斯作战的武将，伽列里乌斯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偏偏这个时候，伽列里乌斯的年轻气盛给他惹了祸。军情固然危急，但并不代表大胆行事就是好事。当伽列里乌斯赶到安条克与等待的戴克里先会合以后，在未作任何周密部署的情况下，仅仅带着当地的驻军，就匆忙上阵杀敌去了。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行军速度也丝毫未减，直接朝着波斯军占领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行进。而就在这里，他们遇上了波斯国王率领的军队。



罗马帝国东方

副帝伽列里乌斯，倒是没有忘记罗马军队里多国军队联合作战的传统模式，他马上与刚从亚美尼亚流亡出来的国王提里达特斯进行了会合。但是，在战场的选择上，则没有动太多的脑筋。他居然选择了幼发

拉底河东面的一片沙漠地带，作为与波斯国王作战的战场。这样一来，局势对于习惯在沙漠作战的波斯军来说，变得非常有利。

在第一场、第二场战役中，双方还处于胜负未分的状态。不过若要归功于罗马军队的勇敢善战，还不如说是跟随国王出征的亚美尼亚士兵，习惯在烈日炎炎的平地上作战。但是，因为这些士兵都是跟随国王匆匆出逃而来，所以人数并不多。在第三次战役中，伽列里乌斯率领的罗马军也就一败涂地了。

唯一幸运的是，战场靠近幼发拉底河。被波斯骑兵围困而与自己士兵离散的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斯，急中生智，连人带马跳进河里，拼尽全力游到对岸，再策马飞奔至安条克，才捡回一条命。伽列里乌斯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惊险，但是败军之将的身份是逃不掉了。在安条克等候的戴克里先，对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隆重欢迎，热情款待，对伽列里乌斯则十分冷淡。正帝乘车出行时，按照惯例，副帝应该在旁边骑马随行，但伽列里乌斯被要求徒步跟随。也就是说，伽列里乌斯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地接受了败军之将的惩罚。不过，51岁的正帝后来还是给了36岁的副帝一次雪耻的机会。这个雪耻的机会，定在第二年，即公元297年的春天。

这一次，伽列里乌斯格外慎重。首先，他调来了多瑙河防线上受他指挥过的3个军团，并且，还调用了战败后被收编的哥特人骑兵团。即使现在的敌人从北方蛮族换成了东方的波斯大军，但是，这2.5万人的将战斗当成日常生活的精锐部队，还是堪当一雪前耻的主力军的。

其次，伽列里乌斯对战略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上次他是选择渡过幼发拉底河后向东直行，在沙漠地带进行作战。这次他要从上游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沿着山路迂回地接近敌人。地势越复杂，对于习惯了多瑙河边复杂作战地形的士兵来说，越容易发挥战斗力。问题是，该如何诱使波斯大军前来呢？一年前大败罗马大军，波斯国王正志得意满。这时，对于罗马骑兵的挑衅行为，并没有深究其真实的意图就贸然出兵

了。这样，在公元297年，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战斗，虽然战场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上一年是在接近幼发拉底河附近地区，而这次则相反，跑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去了。

与此同时，伽列里乌斯还增添了另一种作战方法，那就是日落后夜袭波斯军。与没有夜间作战经验的波斯军相比，罗马军队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方法。当然，就在不久前这还是敌人针对罗马军的袭击手法，只不过现在善于夜袭的高手——哥特人骑兵团，却在罗马军队的阵营里了。

但是，利用夜间袭击敌人的策略，需要有赌徒的冒险精神才能制胜。因为一旦夜袭开始，中途就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变。伽列里乌斯强悍的性格，这次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波斯阵营先是受到哥特骑兵的奇袭，之后又遭到罗马精锐部队的攻击，早已乱成一团，根本无力组织还击。士兵只顾自保，就连国王的警卫队也只能勉强将受伤的国王带离战场，而无力顾及其他。现场一片混乱。按照东方的习惯，国王御驾亲征时都会带着妻妾和子女同行，在国王营帐和附近的华丽帐篷里，现在这些惨遭遗弃的人，也只能缩在那里惊恐地发抖。

在明亮的火把映照下，看着眼前被士兵带上来的妇女和孩子，那一瞬间，也许伽列里乌斯想起了600年前战胜波斯国王的亚历山大大帝吧。他当众宣布，以王妃为首的女眷，以及诸位王子和公主，虽然身为俘虏，但是人身安全将得到保障，并且可以得到与身份相符的待遇。随后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些承诺。

当然，伽列里乌斯没有忘记一早派快马向身在安条克的戴克里先传去捷报。战争获胜以后，就该轮到正帝出面解决善后事宜了。捷报上也明确要求正帝移驾尼西比斯。尼西比斯（Nisibis）位于土耳其东部边境，邻近叙利亚国界，现代名叫努塞宾（Nusaybin）。这个地方是亚历

山大大帝当年远征波斯时，由希腊人建设的城市。600多年来，虽然统治者由原来的帕提亚人换成了波斯人，但这个地方依然是东西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在东方有不少拥有同样历史的希腊裔城市存在，尼西比斯就是其中之一。基于防卫上的需求，罗马人在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之后，就把这里作为军事基地，修筑要塞设施，当地居民对此也并不抵触。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希腊后裔，觉得与其被东方君主使唤，还不如归在罗马人旗下。既然尼西比斯有这样好的条件，安全方面也就无须顾虑，作为罗马帝国东方正帝和副帝会面的地方，自然颇为合适，而且，这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北部，用来接见波斯特使，无论距离还是时间上都比较合适。

伽列里乌斯身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战场上，从这里出发，只要南下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尼西比斯，距离很近。而戴克里先从安条克出发，要先取道向东，渡过幼发拉底河，绕过大半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此一来，自然是伽列里乌斯比戴克里先先到达。而且，在戴克里先到达会面地点之前，波斯国王已经一早派特使来到了尼西比斯，想必是非常担心被俘的嫔妃、儿女。此外，对东方男人来说，女人、孩子为敌所虏而不夺回是一种耻辱。但是，很显然，波斯军队现在已濒临崩溃，短期内无法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特使前来尼西比斯，目的在于代替波斯国王向罗马皇帝提出议和的请求。

由于戴克里先尚未到达，伽列里乌斯只能一个人接见了波斯特使。特使首先代表波斯国王，感谢罗马方面对本国王妃及其他王室成员的优待。但是，特使接下来的话，证明他也只不过是个东方君主专制国家的内廷文人：

> 罗马和波斯这两大帝国，就好像世界的两只眼睛，不管缺少了哪一方，世界都会残疾，失去其完美的面孔。

伽列里乌斯听了这段话之后立刻火冒三丈。他毕竟还年轻，才37

岁，刚刚经历过一年前的大败，手下将领、士兵死伤大半。他听了这话自然也就不客气了。

> 我们还轮不到你们波斯人来教导什么是宽容的美德。你们对不幸的瓦勒良皇帝（罗马帝国第一位被波斯俘虏的皇帝。——译者注）的态度，真不知该如何评价。罗马皇帝并非在战场上战败被俘，而是被阴谋诡计欺骗才沦为俘虏，可是你们一再地羞辱他，给予他与身份完全不符的待遇。而且这期间，波斯国王完全无视周遭各国君主劝告释放的声音，依然我行我素，直至瓦勒良皇帝不堪羞辱而逝世。最后将他的遗体弃置于民众的嘲笑声中的，又是谁？

然后，副帝伽列里乌斯又接着说：

> 罗马人对失败者绝对不会落井下石，这并非我们顾虑到失败者的心情，而是因为这违背了罗马人的自尊心。
>
> 等皇帝驾到以后，我会跟他商讨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维持两国间长久的和平。一旦条件确定下来，会马上通知你们。

波斯国王的特使只好空手而归。几天后，戴克里先也到达了尼西比斯。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一样，不喜欢浪费时间。到了以后，很快定下了和波斯之间议和的条件。

当然，准许先前遭波斯王驱逐的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斯复位，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下面两个条件：

一、以尼西比斯及其南边的辛卡拉为前线，由此延伸至幼发拉底河为界，波斯要正式将这个范围内涵盖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割让给罗马。

9年前，戴克里先不费一兵一卒，即以军力为支撑，在谈判中迫使

波斯“默认”了罗马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北部的支配权，但并不是“割让”。“默认”的效果就如同设置一个缓冲地带，所以罗马并不能在这一带设置连绵的防卫要塞，使其“防线化”，但是“割让”的话就可以，因为这里已经成了罗马帝国正式的领土了。

二、将位于底格里斯河东面的五个地区的统治权转让给罗马。

这意味着，流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大河流的整个上游地区，将全数落入罗马人手中。按现代国别来说，就是占领了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三国。如此一来，就可以同时从西、北两个方向监视伊拉克。从防卫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享有史上空前的、绝对的优势。

波斯国王别无选择，只得答应。被俘虏的王妃、公主们，也在财物、人身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安然返回波斯。

这一次，即公元297年缔结的和平条约，维持了这两个大国之间40多年的和平，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末期才被打破。原因有两个：一是罗马帝国本身在防卫上占尽优势；二是戴克里先不是那种因为一时胜利而得意忘形的人，他一直没有忘记在所得地区加强防卫措施。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加上幼发拉底河，实际上有四道防线可守：

第一道，经过辛卡拉到幼发拉底河为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是经过尼西比斯，流入幼发拉底河的支流沿线。

第三道，也是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起点是叙利亚的罗马军团基地萨莫萨塔，经过埃德萨、加列，到达幼发拉底河这一条线。

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沿着以托罗斯山脉为源头、向东南方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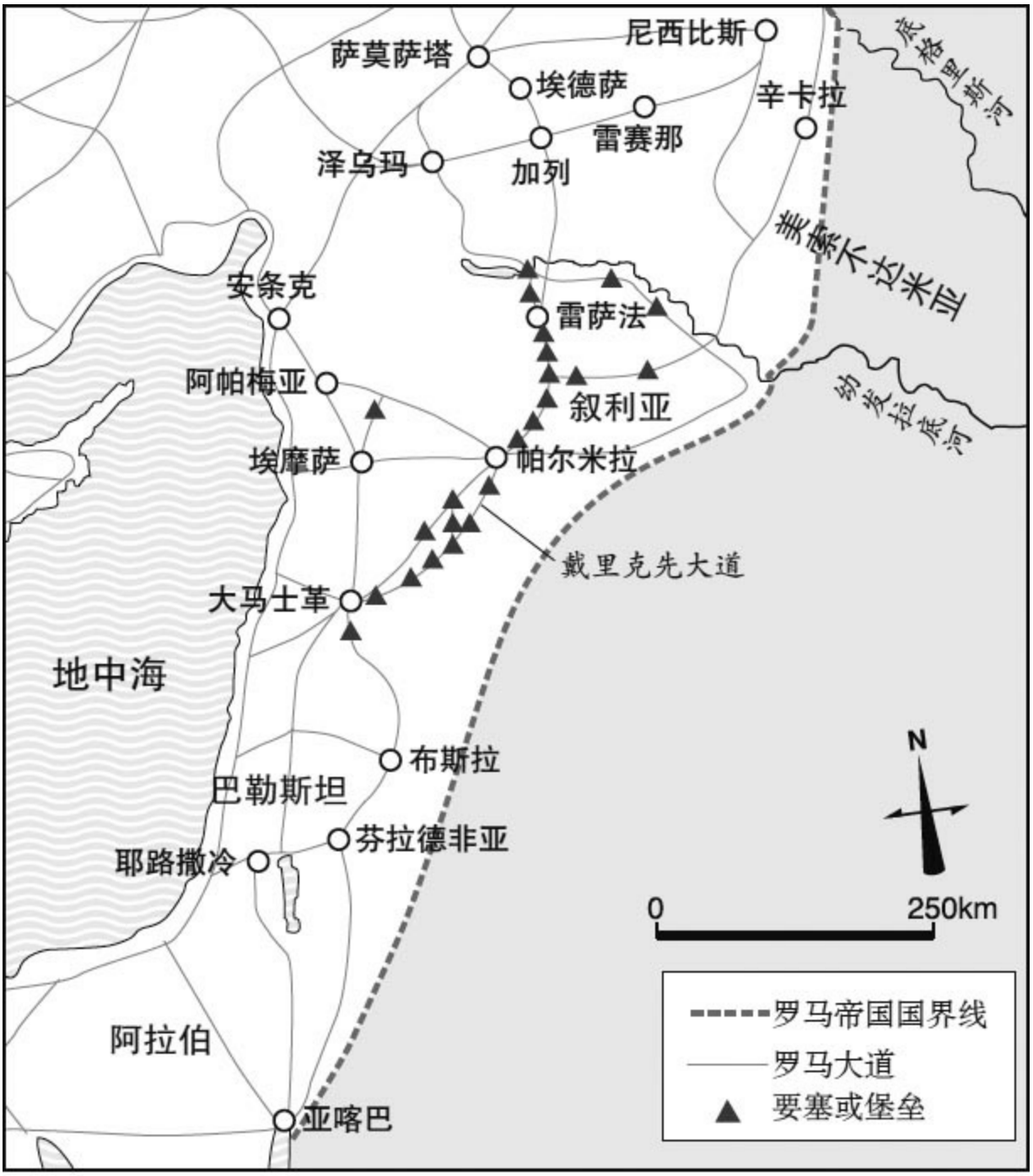
的幼发拉底河主流。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以泽乌玛为开端的诸多城市，几乎都是希腊人后裔所建，将这些城市连成一线以后就成了第四道防线。

如果敌人想攻打帝国东方的关键城市安条克，就必须攻破这四道防线。

此外，戴克里先实施的帝国东方防卫体系重整工作，还不仅仅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

比如，现在的叙利亚和约旦，过去一直是罗马帝国的领土，这里也铺设了罗马式的防卫路网。这样的防卫路网涵盖了帝国东方所有通往波斯的大道，换句话说，朝东通往波斯的全部道路都变成了防线。都市的城墙改建得更加坚固，连接城市的大道上建设了无数的要塞、监视塔和堡垒。

不过，罗马人不能修筑连续的石墙来阻断波斯和罗马的国界。因为罗马帝国东方的居民以及波斯人，都要依靠东西方的贸易为生。堡垒和监视塔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阻止敌人进攻，而是在允许商人往来的同时，设法尽早探知敌人来袭，通知后方的军事基地。



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的帝国东方道路网

在这之前，拉丁语中，表示大道、道路含义的词，只有“via”一词。从大马士革开始，穿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帕尔米拉，再由此向幼发拉底河延伸的道路，之前一直被称作“Via Hadrianus”（哈德良大道）。但是，

从这个时期开始，称呼改成了“Strata Diocletiana”（戴克里先大道）。拉丁文“strata”，是意大利文“strada”以及英文“street”的语源。研究人员认为，这个词出自罗马帝国后期的拉丁文。我认为，当时传统的四层石板道路应该还是跟以前一样，叫做“via”。只不过同样的道路结构上，如果沿线按一定距离设置要塞、堡垒的话，就改称为“strata”，以示区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大马士革开始，到罗马军团基地所在的布斯拉，再经由罗马时代的芬拉德非亚（现在的约旦首都安曼），到达红海小镇亚喀巴这一条大道，由当时的图拉真皇帝修建而成，一直叫做“Via Trajana Nova”（新图拉真大道），而且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关于其改称“strata”的记录。这条大道沿线也建有要塞，但是数量没有大马士革以北的地方多。由此推断，戴克里先主导的帝国东方防卫体系重整计划的主要地点，应该是从大马士革向北的广大地区。因为帝国东方防线幼发拉底河在这个地区向西迂回。也就是说，一旦敌人从这里越过幼发拉底河，到达帝国第一城市安条克，只有仅仅500公里的路程了。

五贤帝时代，“从黑海到红海”连绵不断、贯穿整个帝国东方的防线，在150年后的戴克里先时代，可以说还是能够维持下来的。至少，罗马人作过努力。此外，罗马人观念中的“防线”（limes），是在防线主轴外侧，每隔一定的距离，修筑一座单纯以监视外敌动向为目的的石质碉堡，碉堡之间相互以狼烟或火把传递消息。因此，在罗马帝国的东方，即现在的叙利亚和约旦境内，即使到了现代，依然可以见到这些碉堡矗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如果乘直升机沿着防线飞，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座又一座半掩在沙漠中的石壁残骸。只要见过这一景象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感叹，要维持一个帝国竟然这么困难，要付出这么大的艰辛。

正因如此，罗马帝国境内深处，再也不用担心遭受波斯大军或者北方蛮族的侵略和蹂躏。而因皇帝一再被杀导致的政局动荡现象，也成为了过去。即使写史书的人不是爱德华·吉本（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译者注），恐怕也会发出以下的感叹：

要拯救因无能的领袖和蛮族的侵略而陷入绝境的帝国，是一件莫大的难事。可是伊利里亚出身的农民办到了。

只不过，由人类决定并实施的任何事情，当然，即使是天神决定的事情也一样，都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必然具备消极的一面，即利弊共存。到这里为止，我叙述的都是有利的地方，后面就要来说说弊端所在了。

兵力倍增

在戴克里先设立的“四帝共治制”当中，虽然有“正帝”和“副帝”之分，但实际上，在军事上由于四位皇帝各自有明确的责任区域划分，他们就共同承担了整个帝国的体系防卫工作。以前是一位皇帝，现在则变成了四位。而且，按照以前的制度，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是皇帝，下设行省总督。其中邻近边界线的行省总督，一般会指挥2个军团负责防卫事务。2个军团的兵力，包括以拥有罗马公民权为应征条件的正规兵，即军团兵，数量为1.2万人。同时还包括行省居民可以应征的辅助兵，数量与军团兵相等，有时略少。这样，2个军团的整体兵力约为2万人。另外，在过去的时代，皇帝如果御驾亲征，一般带5个军团以上的兵力，但这仅限于紧急事态。一般军事活动中，常常只有别名为“战略军团”的2个军团进行活动。

这一军事体系使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200年间，成功实现了罗马主导下的“和平”。但是，到了被称为“危机世纪”的公元3世纪，这一体系已经失去作用。“四帝共治制”正是为了克服上述危机，而计划并实施的新制度。

但是，其结果是使皇帝增加到了四个人。既然是皇帝亲自领军，当然不能跟行省总督等同，只率领2个军团。此外，经历过3世纪惨状之

后，新兵老兵混编的2万兵力，连击退蛮族的一个部落都很困难。虽然没有正确的史料可供参考，但四位皇帝手上应该都握有8万人左右的兵力。这里有数据为证，据研究人员表示，自实行“四帝共治制”之后，罗马帝国的总兵力，从以前的30万人增长到了60万人，翻了一倍。军团兵与辅助兵混编的30万人兵力，依旧紧盯着帝国的边境防线。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帝国边境防卫能力是依靠新的兵力投入增强的。既然如此，那60万人兵力，扣除这30万人，剩下的就是四位皇帝的直属部队了。

西方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大本营是特里尔，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皇宫在米兰；东方副帝伽列里乌斯选择的根据地是塞尔曼，正帝戴克里先的皇宫则在尼科米底亚。这四位皇帝的根据地，显然也是由戴克里先一人决定的。四个地方都处在可作为前线基地的位置。常年驻有七八万兵力，也是合情合理的。要知道，以前的紧急状态现在已经变成了常态。罗马帝国国防力量复苏，既能阻止北方蛮族大规模的入侵，还能压制东方大国波斯，首要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增强。

但这里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到底是兵力倍增保证了“四帝共治制”机能的发挥，还是四人分担帝国的防卫任务导致了兵力倍增的结果呢？从戴克里先对国家经济的关心（详见后述）来推测，我认为应该是属于后者。

分担任务时，有些事情并不是将现有的东西分割完毕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分担任务后，各自的责任归属被划分得很清楚，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成员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四个人都想要提高自己所辖区域的治理业绩。在这里，军事战果是最明显的业绩表现。因此，他们自然都会尽量提高旗下部队，尤其是直属兵力的质与量。从“3世纪危机”的经验来看，作战主力，很明显，已经由传统的重装步兵转为罗马军历史上长期为特殊技能兵的骑兵。

那么，优秀的骑兵要从哪里征调？这是一个还没有发明马镫的时代。由于在古代，还没有任何设备可以支撑垂在马鞍两侧的双脚，所以

只有善于骑裸马的人才能成为骑兵。这样一来，骑兵成员仅限于出身于上流社会、从小习惯骑马的人，以及一出生就与马为伍的人。也因此，出产良马的地方，同时也会是产生优秀骑兵的地方。

罗马军的作战主力由步兵转变成骑兵，最大的原因，在于实际作战中，需要在机动能力上与大举入侵的蛮族骑兵团对抗。即使步兵利用全线铺设石板、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在机动能力上，也要五比一才能与骑兵打个平手。对于那些热心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指挥官来说，将前不久进攻罗马失败而投降的蛮族骑兵纳入自己旗下为己所用，自然是毫不犹豫的事。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罗马军队的主力正逐渐蛮族化，而且未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蛮族是否成为罗马军队作战主力的问题。我们回顾罗马历史，不难发现，将战败者纳入旗下、引入异族分子为我所用的先例，一直都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一项传统。

比如，尤里乌斯·恺撒在进行高卢战役时，不仅将战败归降的高卢骑兵纳入旗下，甚至连战败后拒不合作的日耳曼人也引入军中，以强化骑兵的战斗力。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引进异族分子”成为帝国的基本国策。这已经不再像共和时期那样，全凭皇帝个人的性格决定，必须仰赖出现像恺撒这样思想开放、头脑灵活的领导人才会实行。现在成了国策以后，则不管谁做皇帝，都必须遵照执行。当然，这一点，也要归功于恺撒的继任者奥古斯都，他认为养父恺撒的行事方针有助于罗马的国家发展。

此外，奥古斯都还进一步设立了辅助兵制度。这项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行省居民，即被罗马征服归属的人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军，且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只要想想不久前这些人还被罗马人称为“蛮族”，就可以知道罗马人思想有多么开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多强。这种情况下取得的罗马公民权具有世袭的性质，因此辅助兵的下一

代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未来他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报名参加正规军团，并且在军团中也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完全凭个人资历和才干来升迁。此外，行省出身、才能特别出众的人，不用等到服役满25年，就可以和真正的罗马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在行省兵组成的军队中当上辅助兵大队队长，就可以马上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且还有出席作战会议的资格。即使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的理由，是因为总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不能出现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物。

当然，这样开放的结果必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在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行省出身且熟悉罗马军队战略、战术的辅助兵大队队长起兵叛乱，使罗马方面焦头烂额、难以镇压的例子。但综观整个罗马史，这种在现代社会可能被记者作为新闻争相报道、在罗马时代会被编年史作者留意的案例，一共也就出现了两次。300年里，竟然只有两件案例！正是因为深信这一政策的效益，即使在经历了条顿堡森林战役之后，罗马也没有改变这一政策。条顿堡森林战役中，设计进行伏击的就是在罗马大军中当上将军的阿米尼乌斯（日耳曼名字叫赫尔曼）。这次战役，罗马方面损失了3个军团、3个骑兵队以及6个辅助兵大队，共计3.5万名士兵。整个战役，罗马方面全军覆没，损失极为惨重。对整个罗马帝国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且，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元9年。从公元前30年开始的帝国政治，好不容易刚刚走上轨道开始前进。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在军队中引入异族分子。在推行这项政策的途中发生了这样的惨事，恐怕身兼全军最高司令的奥古斯都皇帝，也会有很多个夜晚睡不安稳。尽管如此，71岁的奥古斯都却没有对这项政策作任何改变。如果，因为忌讳这次事变而改变罗马军队引进异族分子的策略，以后的罗马帝国也就不会走全面开放的路线，最终形成一大特色吧。因为接下来300年的罗马帝国，继承了大部分由开国皇帝制定的政策。

既然是以保障霸权下人民安全为第一要务的霸权国家，对罗马帝国

来说，军队是国家的一大支柱。也就是说，在罗马军队里实行的事务，普及到罗马社会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大。比如说，以军团快速移动为首要目的而铺设的军用道路，形成了罗马道路网。这一点同时也为民间、物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罗马军队引入异族分子的策略，又衍生出异族移居罗马境内，或者以居住地区为单位整个编入罗马帝国的政策。

这一开放路线的首创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他发现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当中，有一个叫乌比的部族对罗马没有敌意，于是将乌比人迁移到刚征服到手的莱茵河西岸。今天德国的主要城市之一科隆，就是从移居后的乌比人根据地发展而来。在这之后，科隆一直是罗马帝国莱茵河防线上的重要城市，从没有发生过居民起兵叛变罗马的事件。

将异族所居住的地区整个纳入本国版图的先例，是意大利北部地区。从卢比孔河到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这一片地区，原先是高卢人的地盘。当时居住在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人，把这带叫做“阿尔卑斯的这一边”（Cisalpina）。米兰和特里诺都是从高卢人的村落发展而来。罗马人在这些地方附近建筑大道，兴建了皮亚琴察、克雷莫纳等殖民城市。这些都属于北意大利行省，与被称为“阿尔卑斯的那一边”（Transalpina）的南意大利行省地位相同。恺撒在进行高卢战役时，作为北意大利行省总督，为了褒扬北意大利行省居民在高卢战役期间提供后方支援，战后恺撒将此地编入意大利本土中。

如果没有这项政策，曼图亚出身的维吉尔、科莫出身的卡图卢斯，也就不会在拉丁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了。除此之外，恺撒的开放政策还涉及很多领域。录用行省居民担任秘书官的职务算是家常便饭，投降的高卢较大部落的首领，不仅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还可以获得元老院的席位。恺撒的所为遭到布鲁图及其一派的不满，因而遭到暗杀。恺撒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在恺撒身故百年之后，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已遍布帝国的全境。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就像罗马大道的铺设一

样，正是罗马的工程师们在一开始就选用四层结构来铺设罗马大道，所以他们敢夸下海口，这些大道即使过100年也不需要改修。

也就是说，不管是异己还是蛮族，引入机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被引入一方有无罗马化的意愿。

公元260年，罗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3世纪危机”之中。当时的皇帝加里恩努斯试图将一再突破日耳曼长城入侵的阿勒曼尼人移居长城内侧，借此将他们纳入罗马旗下。

如果罗马还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想必原本属于日耳曼民族一支的阿勒曼尼人，会很乐意成为罗马的“盾牌”，进而全力守护莱茵河、多瑙河上游的罗马帝国国防要害——日耳曼长城。因为他们确信，这是成为“罗马公民”的最佳捷径。

但是，在公元3世纪，这种现象就没有发生。阿勒曼尼人迁移到这一带以后，当罗马的军事力量增强时，他们就依附罗马。反之，当罗马势力衰落时，就和其他日耳曼人一样，再次展开侵略。

投靠罗马有利的一面在于能得到罗马军事力量的保护。一旦罗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信任，也就难怪他们要背叛罗马了。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罗马帝国北方防线的最重要地带，在这场迁徙之后，形同弃守了。这也就难怪在官方资料上再也看不到“Limes Germanicus”（日耳曼长城）这个专有名词。可见，这件事情给帝国北方防线工作造成的伤害实在是无法估量。

同理，逐渐渗透到罗马军队内部、蛮族出身的官兵们也是同样的情况。

自从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使得罗马公民权变成“既得权利”之后，罗马公民权就丧失了“取得权”时代的魅力和优点。

此外，曾经被行省居民视为最高荣誉的元老院席位，不但不再是憧憬的对象，反而会成为以后职业生涯的绊脚石。这是因为加里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担任军队司令官。而且30年之后，戴克里先皇帝又实施了改革，将文官和武将的职业生涯完全分离。在公元2世纪之前，军团出身的人，可以在皇帝的推举下担任元老院议员，获得政治上的历练，然后再以军团长身份回到军中发展。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因此，通过军务、政务交叉体验培养通才的罗马精英教育体系，就和罗马社会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已经成为了历史。

以上这些话题，从戴克里先重整罗马军事体系这个主题来看，似乎绕远了。但是，要弄清楚罗马帝国为什么从这个时期开始被人们称为帝国“后期”的话，上述事实是无法避开的知识。研究人员中的多数，用“罗马军队的蛮族化”、“罗马帝国的蛮族化”来评价这个时期以后的罗马帝国。但是，如果我们光看这几个字，就认为理解了当时的情况的话，那就可能会看不到真正的内情。罗马军队以骑兵为战斗主力，的确蛮族化了。罗马帝国将文官和武将相分离，也的确蛮族化了。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蛮族不再想被罗马化。罗马帝国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不像罗马，这才是关键所在。确实以前实行同化战败者的政策，使得罗马走上了兴盛的道路。但是，同样的路线放在300年后的3世纪末期，却成为罗马帝国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战败者会喜滋滋地融入罗马，但现在不会了。世事无常，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现在回到戴克里先重整罗马军队的话题上来。军队是一个联合作战组织，不管单兵个人战斗力有多强，光有骑兵还是无法完成所有任务。大家可以把古代的骑兵当成现代的空军来看。成功击破敌人之后的占领工作——对这个时代的罗马来说就是重新恢复被侵略的领土，还是绝对需要派遣地面部队来进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的战斗主力全部转变为骑兵。这是因为战争的规模，已经沦为隔着山谷对峙、根据地设在山丘上的封建领主间的相互冲突。因此，军队纯粹是以获取战斗

胜利为目的。那时候，统管庞大土地的方法，主要是将属地的大小领主尽可能多地聚集在自己手下。欧洲在中世纪推动的十字军远征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将在欧洲熟知的战斗方法，照原样搬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就连在罗马帝国后期，骑兵抢回土地之后，还是需要步兵去维持领土。

那么，优秀的步兵从哪里抽调呢？其实，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历代皇帝为了维持边境防线质量而苦心经营的各军团基地。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来源可供选择了。

“四帝共治制”下的四位皇帝，各自的责任区域中都含有重要的防线在内。君士坦提乌斯有莱茵河，马克西米安有莱茵河、多瑙河上游一带，伽列里乌斯有多瑙河，而戴克里先则是幼发拉底河。皇帝要从军团基地抽调精锐部队，自然不需要其他人的批准。

如此下来，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就已经发现的“防线战斗力老龄化和衰弱化”现象，现在也就变得更为严重。罗马军团兵的服役年龄为17到45岁。皇帝抽调的精锐，想必是以30多岁的青壮年为主，且素质也要高于平均水平。罗马军团士兵总数从30万扩增到了60万，然而这是以边境防线守卫战力的衰竭为代价换取的“增强”。

而且战斗力衰竭，因为另一个因素而更加恶化，那就是因为竞争关系而导致的各位皇帝之间的地盘意识。戴克里先委派伽列里乌斯进行波斯战役，算是一个例外。“四帝共治制”体系下的12年里，两位皇帝并肩作战的例子，除了这场波斯战役之外，就再也没有了。就像皇帝只有一个人的时代一样，从多瑙河防线抽调部队前往不列颠、北非支援作战的现象，也已经完全消失了。四位皇帝之间好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干涉自己的地盘，相对的，自己也不会插手别人的管辖区域。

但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由于各地间的兵力可以根据需要弹性抽

调，所以才能以较少的兵力守卫如此绵长的防线，如此广阔的领土。罗马人不分本土、行省都铺设了纵横交错的罗马式道路网。其存在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便于设置在各防线的军团能够根据需要快速移动。“四帝共治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筑墙一般阻断了军队之间的流通。而且，既然军队之间不再可以弹性流通，那么各位皇帝也就唯有增强手头兵力一条路可走。罗马的总兵力30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却在短短的10年间，增加了一倍。这种由于责任分割带来的现象，套用现代的说法，可以叫做“官僚体系化”带来的副作用。

军事力量的增强必然带来军费的增加，接下来也就会造成增税。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容许我留待后叙。在这里，想先提供给各位读者一个事例，用来理解安全保障和税收的关系，以及安全保障和土地大小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向国家租借土地耕作的农民，依法每年向国家缴纳收成的10%作为地租。但是，尤里乌斯·恺撒颁布了《农地法》以后，土地租借权实际上就被无限延长，佃农实质上已经犹如自耕农。

而到了中世纪，农民向土地所有者——领主，缴纳的地租，如果只占收成的50%就算是活在天堂了。大部分要缴纳收成的70%—80%才算完事。这是因为除了土地租种费之外，其中还包括安全保障费。因为领主们认为，既然他们要保护农民不受敌人暴力威胁，那么也就有权向农民征收相关的费用。

罗马皇帝曾经向行省居民征收占收入十分之一的行省税。按照西塞罗（罗马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译者注）的说法，这是一种“安全保障费”。当时的行省居民也是认可的。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罗马军队镇守边关，所以农民才能安心耕种。而且，“安全保障费”也仅占收入的一成。当然，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低的税率，因为罗马帝国国土辽阔，而且当时军团能够根据需要移动作战，这种弹性的调兵体制大大节约了军费开销。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负担就小。

反之，国土狭小，人均负担自然也就会加重。中世纪的领主，手头能够持有的武装力量应该并不庞大。但是，如果没有武装在手，也就无法继续担任领主。换句话说，就算没有必要，也必须要花钱维持一支武装力量。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变。即使“四帝共治制”仅仅是在军事防卫上将帝国分割，分摊了各自的责任区域，但这必然会带来国防费用的暴涨。在这里重新强调一下，分担责任，并不是将现有的事物分配完毕就可以了结的。

戴克里先这个人，一向视野开阔、遇事冷静，而且个性务实，他会看不出这些问题吗？也许他也知道会产生这些弊端，但是他认为这是帝国目前所能走的唯一一条路。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守住帝国的边境。因为在四位皇帝当中，只有戴克里先一个人有权处理政事。他甚至将必然会带来人员增加的分割政策定为国策。而这可以说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全国性的大改革。

帝国改造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王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文中叫做“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中并不含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罗马人常用“SPQR”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它是“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两种人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制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确实，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和帝国时期的皇帝，名义上都是受主权者

委托治国，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执政官是经由选举产生，而皇帝却是经由前一任指定。最大的差异还在于，执政官任期为一年，而皇帝却是终身制。但是我认为，这是因为领土日益扩大，罗马公民也逐渐分散发展之后，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对策。在共和制末期，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有投票权的人，数量已经逼近500万。如何让这500万人每年聚集在首都投一次票？如果按照旧制，在首都举行公民大会投票，根本无法反映真正的民意，顶多只能反映出首都地区3万多公民的意愿而已。代议制从英国发展起来，已经是一千九百年以后的事情了。直接民主制能够发挥作用，势必要受到拥有选举权的人员数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大小的影响。

“第一公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皇帝”？那是他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缘故。

因此，“皇帝”（Imperator）其实是军方的称呼。这个词起源于战斗胜利后，士兵对司令欢呼的赞词。“凯旋将军”在进入帝国时期以后，也就演变成身兼政治上最高负责人的“皇帝”了。

刻有两种皇冠的硬币（左：阳光冠，右：公民冠）

但是，无论称呼是“第一公民”，还是“凯旋将军”，亦或“奥古斯都”，在公元1、2世纪时，译词都可以统一为“皇帝”。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的性质，依旧是受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委托治理国家的人物。

要成为皇帝，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以及罗马公民的同意。新皇帝必须在罗马广场上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登上元老院议场附近通称“Rostrum”的演讲台，向市民作就职演说。这两个程序顺利结束以后，还要从罗马广场爬上坡道前往卡匹托尔山的神殿，向诸神参拜祈求庇佑。这样才算完成整个就职过程。这期间，新皇帝和其他元老院议员一样，穿着镶红边的白色托加，目的是为了强调自己身为“第一公民”的身份。

这里，希望读者注意，在罗马皇帝的登基仪式中，没有中世纪以后的皇帝或者国王即位时必有的加冕仪式。这一点，是最能体现罗马皇帝特质的地方。

没有加冕仪式，是因为罗马没有皇冠，也没有给皇帝加冕的对象存在。雕像或者硬币上刻着的罗马皇帝头上，一般会戴着东西。这一般是军团士兵战后赠送给拯救友军有功人员的“公民冠”，多用橡树叶编织而成。纪念战争胜利的场合，也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给冠军赠送头冠一样，都是用月桂树的叶子制成的。即使制作头冠的材料由绿叶换成金、银，但代表的意思还是一样的。由于“公民冠”的制作和花冠是一样的，有时还会在脑门后面看见连接树叶用的缎带打的结。偶尔我们会看到仿光线照射的黄金皇冠，脑后也有金质的连接线，但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当皇帝名义上还是“第一公民”，即罗马帝国还在“元首政治”时代时，并没有我们现代人印象中的那种镶嵌着大量珠宝的奢华皇冠。

没有人能给皇帝戴上皇冠，为他加冕的原因，在于罗马是由“人”来决定和承认谁做皇帝，而不是“神”。罗马诸神也是帮助、鼓励人类奋斗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命令人类做事的神。也就是说，神灵不会插手人

间的人事问题。皇帝人选由人类自己选出，只要这个人自己愿意奉献力量，履行责任，那么诸神也会全力支持。

在罗马帝国，主权人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在神灵问题上也是如此。以侍奉神灵为工作的祭司并非专职人员，而是由公民轮值或选举产生。而神职人员的最高职位“大祭司”，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一直是皇帝兼任。这样说来，也许唯一能帮皇帝戴上皇冠的人，就只有皇帝自己了。以上就是罗马皇帝登基时的背景。罗马帝国和人类史上其他帝国有诸多差异，没有加冕仪式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某天哈德良皇帝正前往神殿准备举行祭典，途中被一名女子拦住。这名女子为了向皇帝请愿，特意等在通往神殿的路上。但是，哈德良皇帝表示他正在赶路没有时间，便打算离去。女子朝着他的背影，喊道：“你没有资格统治国家！”这句话逼着哈德良只好回过头来倾听这位女子的陈述。

在这位哈德良皇帝离世150多年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形象，在戴克里先的主导下发生了新的改变。罗马依旧没有加冕仪式，但是一直被罗马人鄙视、认为是东方专制君主特色的镶着宝石的皇冠，开始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头上。据说，第一个戴上这种皇冠的就是戴克里先皇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抛弃了历代皇帝戴的、在后脑勺打结的那种头冠。无论是用于雕像还是货币图案，大多数皇冠依旧保持着旧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时期以后的皇冠变化，在于以往的皇冠都是用金、银打造成橡树、月桂树的叶子外型制作完成，之后的皇冠又镶嵌了很多珠宝作装饰，显得更加金碧辉煌。

戴克里先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不，或许他觉得，不当“第一公民”反而更有助于政局的稳定。

这个人在罗马军队度过青年时期时，正是军人出身的皇帝辈出的时

代。其中奥勒良、普罗布斯两位皇帝更是采用积极作战的方法，将帝国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这两位皇帝不仅得到军人的支持，更受到一般市民的爱戴。但是，奥勒良仅仅在位5年，普罗布斯也只在位6年，两人都因为不起眼的小事遭到部下的刺杀。凭这两位皇帝的声望，他们完全无须担忧部下的阴谋，但事实是他们都丧命于亲信之手，而下手的人在事后都感到后悔不已。戴克里先在30到37岁这段时间里，两次经历这样的惨事，也难怪他在39岁登基之后，一直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这样，罗马帝国踏上了从元首制到“绝对君主制”的第一步。皇帝的形象，也从“第一公民”转变为“远离公民的统治者”。当然，这并非戴克里先为了防止自己被杀而采取的对策。只因为戴克里先生活在3世纪的后半期，他深知，要维持帝国存续，稳定的政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罗马帝国政局稳定的前提，在于皇帝地位的稳固。戴克里先试图换掉身居公民中的皇帝，改以远离公民的皇帝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让士兵认识到，皇帝不是和自己同样的公民，而是与自己迥异的高不可攀的存在。这条路线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理由也正出于此。

但是，戴克里先并没有像厌恶群众的提比略皇帝、晚年的哈德良皇帝那样，与人民形成两条平行线，而是在一条线上，与群众垂直拉开距离，使皇帝成为一般人仰头遥望的对象。对于元首制时期的提比略皇帝而言，只有自己家里的仆人才会称呼他“主人”（dominus）。但到了戴克里先时代，这个名词成为公民称呼皇帝的用语。“第一公民”（princeps）变身为“统治者”（dominus）之后，“公民”（civis）也就成了“臣民”（servus)。

既然皇冠变得越来越豪华，服装自然也要搭配起来，不能寒酸。除了祭典以外，皇帝再也不会穿一般公民常穿的白色托加了。在古代，染色成本最低的蓝色、茶色布料已经是高价商品，如果染成皇帝常穿的紫色或者红色，且布料用量相当大的话，价格更是天文数字。更别提整面的金银丝刺绣，以及点缀用的珍珠、宝石了。最后甚至连皇帝用的靴子

都要刺绣，镶珠宝。这一路下来，使得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的罗马皇帝形象变为现实。在元首制时期，只有卡拉卡拉、尼禄这种将奇装异服当成自我个性展示的年轻皇帝才会定做的服装，如今却成为四名壮年皇帝的日常打扮。与其说他们爱好奢华，不如说是戴克里先想要拉开君臣之间的距离。而其他三位皇帝也认同并仿效了他的做法。

罗马人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良好习惯，对他们来说，“清晨请安”（salutatio matutina）是一种生活习惯。在稍有身份的家庭里，都有一个叫做“Tabularium”的会客区，相当于现在的客厅。对罗马人来说，每天清晨就从被保护人“clientes”（client的语源）与保护人“patronus”（patron的语源）的会谈开始。罗马人向来注重人际交往。在元首制时期，有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后来登上了皇位。但当他们还是元老院议员时接待的访客，往往在即位之后依旧会保持天天来请安的习惯。

但对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的戴克里先来说，自然要废除这个习惯。即使难得批准一次，性质也已经不是“请安”，而是“觐见”，由“dominus”（统治者）接见那些获批觐见的“servus”（臣民）。在端坐王位的皇帝面前，不管是谁，无论是年老者或者官居高位者，都必须站着请安，不准坐下。应对的言辞、态度自然也要变得恭敬。以前只要到场就可以见到皇帝，而现在却必须通过皇宫内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申请。也就是说，与皇帝见面交谈本身也已经是一项“特权”。

戴克里先即位后的19年时间里，身为皇帝，却从未造访过帝国的首都罗马。因为他要转战各地，忙于公务，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在到访米兰时，只要经过埃米利亚大道，再转道弗拉米尼亚大道就可以到达罗马，可是他并没有去。我想他并不是讨厌罗马或者罗马市民，而是因为在首都罗马，存在着罗马帝国两大传统的主权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名不符实。

元老院议员应该会称呼皇帝为“主人”吧，但心中会怎么想，就不得

而知了。

当戴克里先出现在罗马斗兽场的贵宾席上时，罗马居民应该会鼓掌迎接戴克里先。不过，与其说是迎接公民领袖，倒不如说是对皇帝的好奇心使然。

在800年的历史中，元老院一直是为国家提供栋梁人才的机构。罗马公民也以在斗兽场、圆形竞技场拍手或喝倒彩来发挥舆论指向标的功能。虽然现在皇帝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但这种长年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所以，戴克里先打算延后访问帝都的日期，直到元老院、罗马公民都不得不对他拍手喝彩的时机来临。这个时机就是向元老院汇报胜利成果、和市民一起庆祝、向神灵表达感谢的凯旋仪式举行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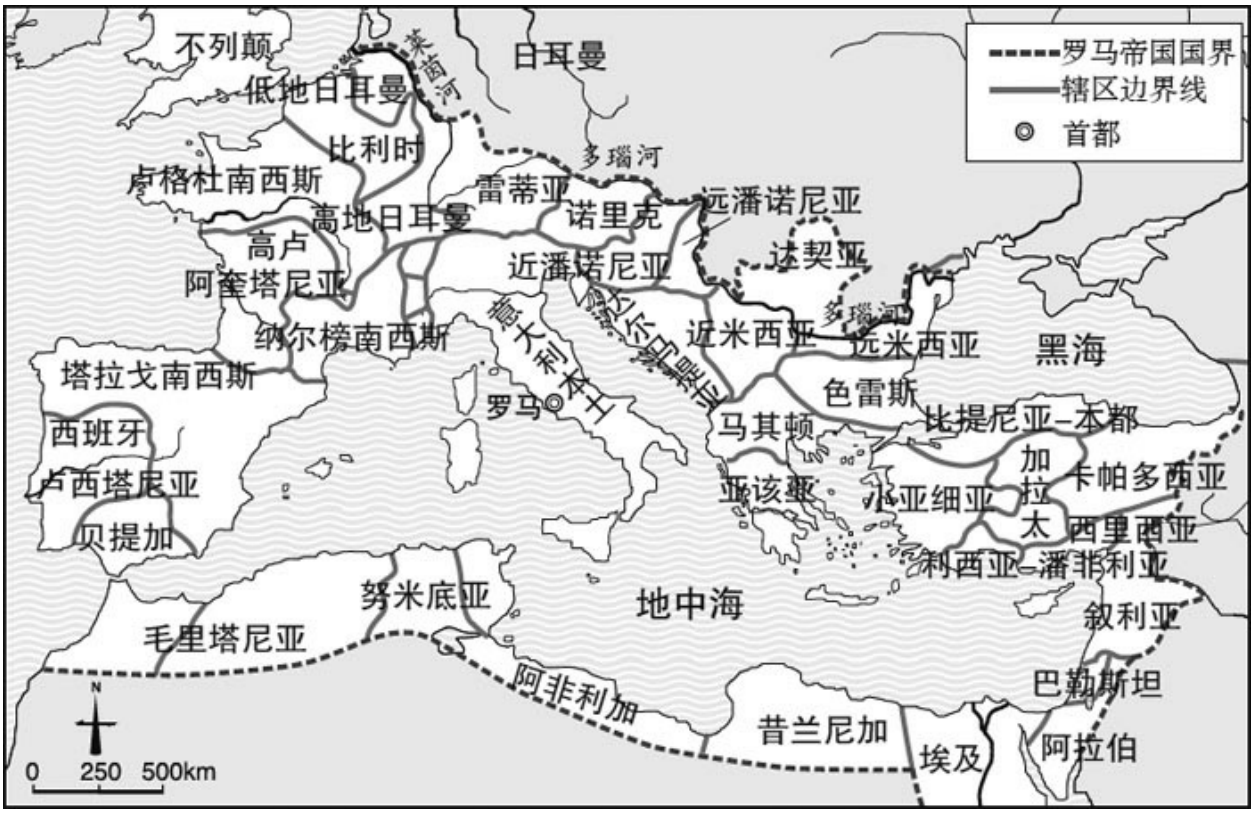
公元303年11月20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位正帝，在罗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不过，并不是因为罗马又攻占了新的土地。这场凯旋仪式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北非、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各条防线守卫成功。不过，这也是以首都罗马为舞台举办的最后一场凯旋仪式。之后，罗马的皇帝渐渐都与胜利无缘。而且，似乎迎合这种趋势一般，此后罗马也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了。

罗马的地位沦落到与叙利亚的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同等的级别。帝国的根据地意大利本土也开始与其他行省平起平坐。这也是戴克里先实行帝国大改造，即“最后一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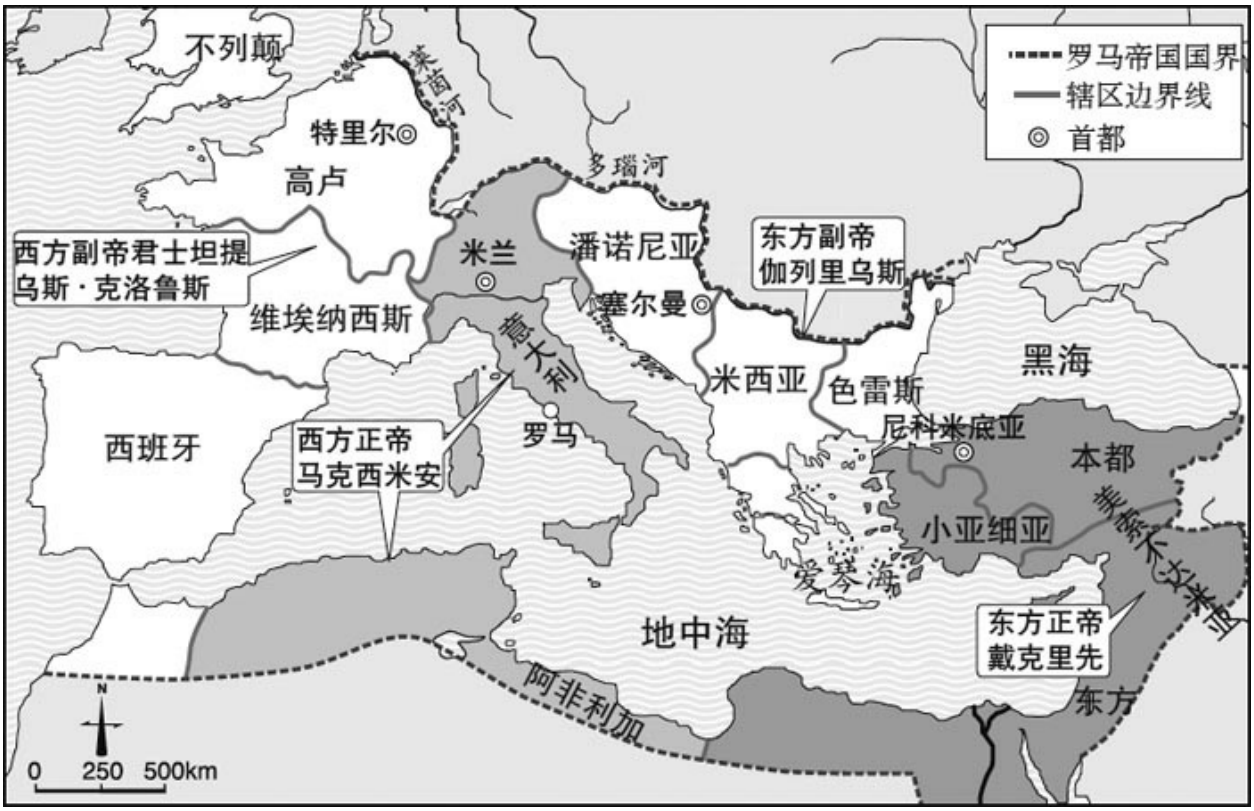
下一页的两张地图可以清楚地说明情势的变化。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虽然实行寡头政治，但依然由“第一公民”进行统治。而实行“四帝共治制”以后，罗马帝国就变成了“绝对君主制”国家。

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再稍作一些说明。

一、“四帝共治制”，说到底，指的是四个人共同承担国防上的防卫责任，帝国整体的政治依然由四巨头之首的戴克里先负责，决定权也掌握在他手里。“tetrarchia”中的“tetra”在希腊语当中，除了有“四”的含义，还有“军事指挥官”的意思。因此，“四帝共治制”如果按意译，可以译成“四名防卫指挥官”。而且，戴克里先也完全没有将帝国一分为四的意愿。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戴里克先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

二、在公元2世纪初的图拉真皇帝时代，即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有本土和行省之分。但是，到了4世纪初的戴克里先时代，这种划分被取消。

不过，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元3世纪初，“卡拉卡拉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赐予全体行省公民之后，就废除了罗马公民和行省民之间的差别。原本意大利本土并未禁止行省公民居住，行省里也并不是只有行省公民。实际上，这两种阶层的公民一直处于混居状态，只是本土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较高，而行省里，行省居民比较多而已。随着这种差异的消失，两者也就同化为一体了。戴克里先只是通过立法，将这一既成事实转化成官方见解而已。

三、现在消失的分类还有一项，即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差异。前者指的是由皇帝亲自任命总督的行省。因为这些行省连接帝国边境防

线，所以这里的总督除了是行省统治工作的负责人之外，还是边境防卫工作的负责人，还要经常担任率领军团作战的司令官之职。由于帝国的皇帝身兼罗马全军最高总司令，这些总督自然也就被视为皇帝的直属部下。

后者，元老院行省，是指那些成为罗马行省的历史已相当悠久，且与边境防线相隔甚远，没有驻军必要的行省。这些行省的总督任命权属于元老院。元老院议员要想担任这一职位，必须具有执政官的经历，顶着“前执政官”的头衔才能赴任。此外，以军事才能作为第一考虑要件的皇帝行省总督，也需要具备元老院议员的资格才能担任，这一点和元老院行省总督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一政治制度也体现出罗马帝国一直培育精英人员文武双向经历的传统方针。因此，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并非两种不同路线的政治生涯。很多精英都是在壮年期被任命为皇帝行省总督职务承担边防重任，而到了老年以后，则转任没有外族入侵隐忧、生活环境舒适优越的元老院行省总督，为自己漂亮的公职生涯画上句号。当然，前提是在担任皇帝行省总督期间，没有战死沙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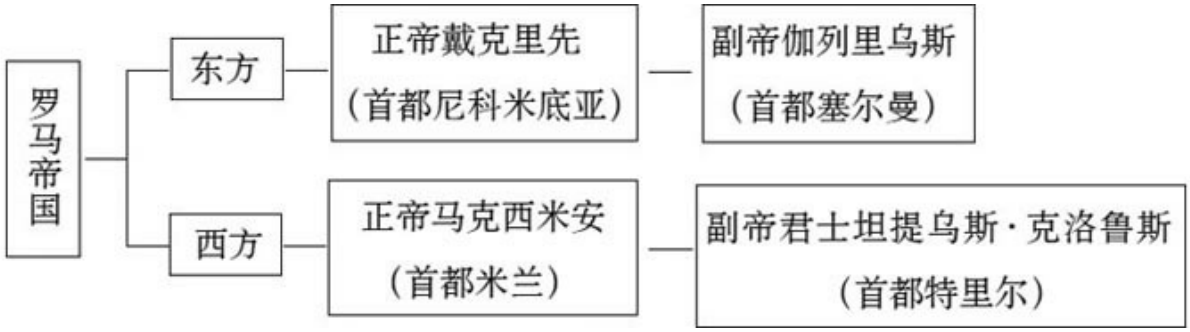
在元首制时期，文官和武将的职业生涯是可以弹性流通的。但是在3世纪后半期，这项特色也成了过去。因为当时的加里恩努斯皇帝立法禁止元老院议员担任军团指挥官。即把镇守“防线”的皇帝行省总督资格调整为只要具备军事才能即可。这是为了对抗蛮族的不断入侵而采取的不得已政策。只是这项政策的结果，却使元老院失去了储备国家要职人才的功能，而且这项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与罗马帝国的首要政务“国防安全”问题绝缘，连带使得元老院议员渐渐丧失治国者不可或缺的公共安全意识。权力固然会使人“堕落”，但没有权力也同样会使人“堕落”。

更糟糕的是，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的边境防线经常被蛮族突破，帝国深处也深受其害。就连元首制时期公认为安全舒适地区的元老院行省也不再安全。也就是说，元老院行省也需要派出军事人才担任防卫任务了。这意味着经历了重重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罗马帝国

已经奠定了戴克里先体系的基础。

官僚大国

“四帝共治制”并不意味着帝国被一分为四，所以四位皇帝之间也有地位高低之分。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每位皇帝选择根据地定为首都的位置可以看出，“四帝共治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帝国的边境防线。这四个“首都”都位于能够快速驰援帝国“防线”的地点。四位皇帝，包括总理政务的戴克里先在内，都是名副其实的“Imperator”（古罗马的凯旋将军，元首），以率领军队作战为主要任务。

如此一来，自然就有必要另外安排专门的行政人员。戴克里先对帝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新的划分。他把每位皇帝的管辖区域又细分为新辖区，叫“diocesi”。然后在各“辖区”里重新安排“vicarious”，意为皇帝的代理人，进行治理。尽管1700多年前的人口和现在相比少得可怜，但是每位皇帝代理人所要负责的区域还是太广阔了。所以戴克里先在各辖区之下又细分了“provincial”。

这里要说明一下，戴克里先后来划分的“provincial”，虽然与元首制时期的行省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无法再翻译成行省。拉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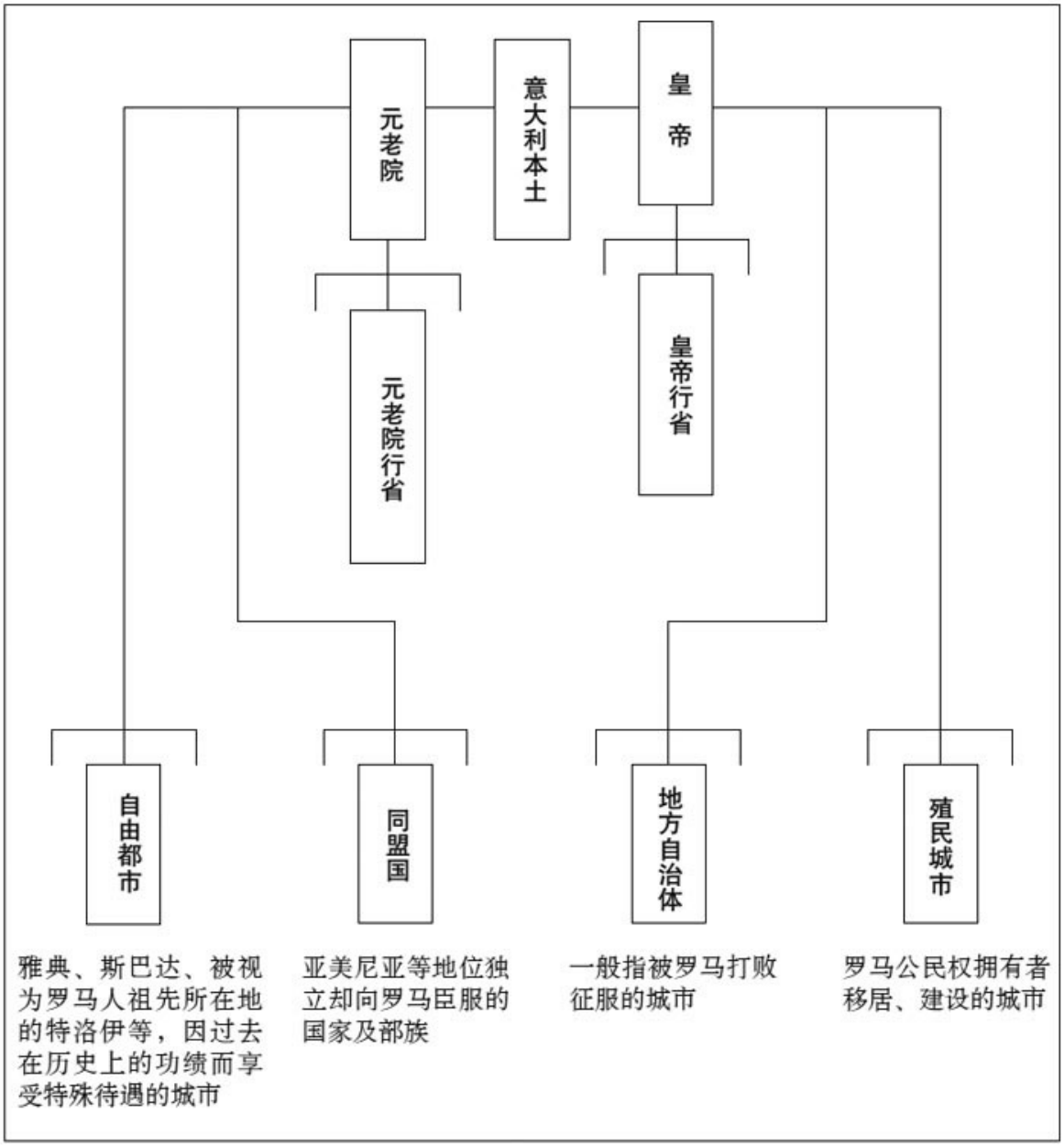
语“provincial”后来直接成为意大利语。从现代意大利的制度来看，这个名词应该相当于现代日本的“县”。而将行政区划进一步细分的背后真正目的，在于方便征收税金。

如果将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和“四帝共治制”以后的罗马帝国在行政区划上进行比较的话，则如下页图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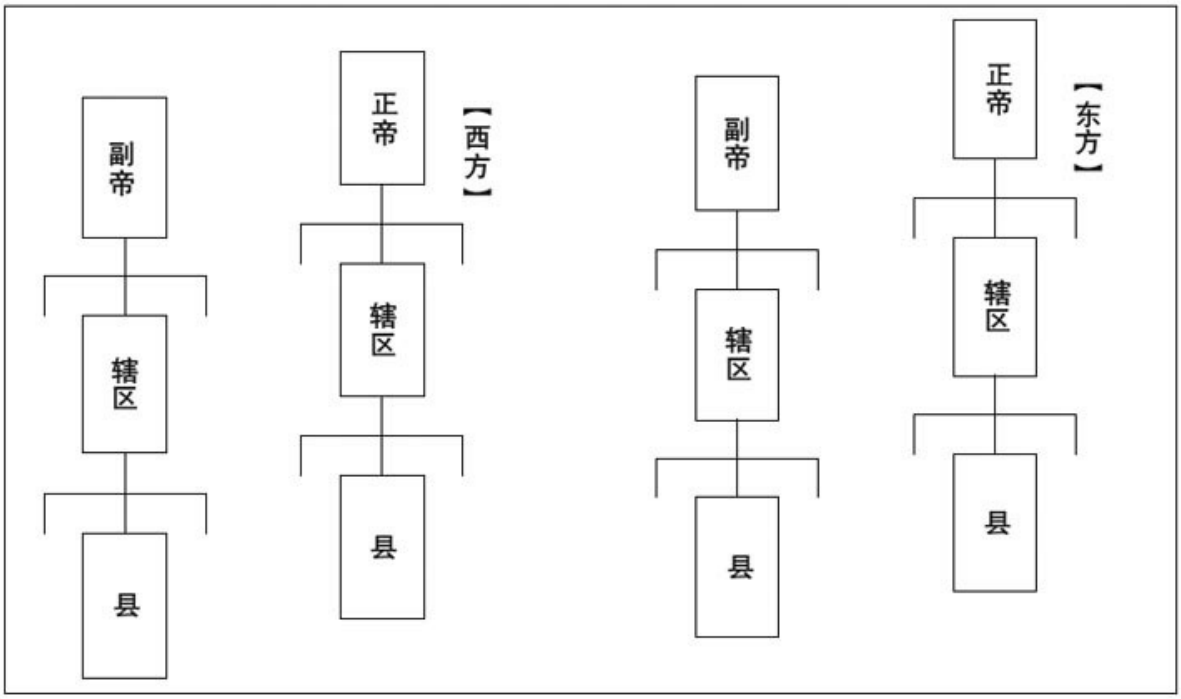
乍看之下，经过戴克里先重组的后期罗马帝国，似乎比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在组织上更为完善，因此也更为合理。既然如此，那么在政府功能上也应该有所进步才对。但实际上，反而是公元1、2世纪混杂了各类不同的居民共同体的帝国结构，更能保障罗马人的安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就是那时的产物。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罗马帝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各个阶层都享受到了繁荣的成果。这是为什么？

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有着戴克里先设置的明显更为先进的组织结构，为什么却无法挽回150年后灭亡的命运？

如果将巨大的组织进行分割细化，的确会使功能得到提高。但是，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果说分割重整提升功能是正面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反面弊端又在哪里呢？



罗马帝国前期和中期元首制（公元1、2世纪）



罗马帝国后期的“四帝共治制”（公元4世纪以后）

第一项弊端，分割细化组织结构，必然会使各个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相应所需的经费随之激增。

之前已经提过，由四位皇帝分担帝国安全保障责任的“四帝共治制”，已经造成从事国防防卫工作的士兵人数翻了一倍，从30万增加到了60万。除了既有的防线兵力外，又增加了由各皇帝直接率领的直属部队，所以兵力增加到60万人也并不稀奇。顺便提一句，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帝国边境防御即在防线守卫的各军团基地的士兵，开始被称为“limitanei”，这个名词的含义，既可以指守卫防线的士兵，也可以说是将守卫防线限定为唯一任务的士兵。在元首制时期，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到了4世纪也已经沦落至此。

另外，由皇帝亲自率领、任务是跟随皇帝随时驰援外敌入侵地区的官兵，现在则被称为“palatini”。因为这些兵要随时紧跟在皇帝身边，这个名词应该有“御林军”的意思吧。在元首制时期，这本来是近卫军团兵

的工作，但所有的近卫军团兵加起来也只有1万人左右。到了“四帝共治制”时代，每位皇帝手下都有7万多人。四位皇帝的兵力加起来就有4倍的人数，共计30万人。

此外，由于四位皇帝各有自己的根据地，因此称为“首都”的地方就增加到了四个。这四个“首都”——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以前就是帝国的重要城市，因此，不仅有现成的大道、市区及郊区道路以及上下水道，而且罗马人公认为城市必须具有的公共广场、公会堂、体育场、圆形竞技场、半圆形剧场、公共浴场等诸多设备也都一个不少。唯一欠缺的，就是一座皇宫。

但是，四位皇帝之中，没有人仅仅满足于盖一座公私两用的普通皇宫。也许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所以他们那种要以有形的事物夸示自己称帝的意识更为强烈。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经过大幅度的城市改造，足以让人们忘记这些地方原本是前线基地。不但新建了很多原先缺乏的设施，而且也对旧有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向帝国首都罗马看齐。

代表四位皇帝的“四巨头像”

公元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军队从君士坦丁堡抢回来的战利品之一，之

后长期放置在圣马可广场的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的入口处至今。
注意：皇冠、佩剑的风格已经偏离古罗马，比较接近中世纪的欧洲。

首都可不是那么容易建设的城市。并不是光把硬件设备整顿得很完备，就可以宣称为首都。米兰现在已是国际大都市，自然难以找出1700多年前的首都痕迹。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城市相比，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科米底亚，罗马时代的痕迹，即古代的遗址之少，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以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首都特里尔为例，其都市化程度还比不上受他管辖的里昂、亚眠、纳博讷、波尔多这些城市。毕竟，城市要发展成首都，需要经过长时间岁月的洗礼，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不断的建设和发展。

也就是说，在公元293—305年这段“四帝共治制”能发挥较好功效的时期里，四位皇帝煞费苦心将根据地首都化的费用，恐怕还没有昂贵到让帝国财政吃紧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修建城市的“外壳”虽然花费不多，但是里面的人事费用可就惊人了。

首先，作为中央政府的皇宫，里面得有人工作。从现代角度来说，这些人就相当于总统或首相官邸或者公馆里的工作人员。既然是“四帝共治制”，那么这些人的数量、所需费用自然也会变成四倍。而且，皇帝的任务除了做好自己负责区域的安全保障工作外，还包括整个责任区的内政。但实际上，皇帝身在前线的时间比较多。

为此，戴克里先建立了相对于中央政府，类似地方政府的“辖区”，任命“皇帝代理”担任行政工作的新的行政体系。而且，在“辖区”之下，又细分了很多的“县”。在这项体系之下，行政机构的所有官员任命权，均掌握在皇帝手里。历史研究人员将戴克里先开启的罗马帝国后期认定为“绝对君主政治”或者“专制君主政治”，原因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不能忽略的，是戴克里先是将文官和武将的职业生涯由上至下完全分离的皇帝。40年前加里恩努斯皇帝立法，只是禁

止元老院议员出任军队司令官的职务，这还只是限制上层人员的流通。但是，以后40年的岁月足以使民众麻痹，对军事、行政人员从上至下完全分离的政策无动于衷。因为从同时代的史学家的叙述中，完全看不到大家对戴克里先这一变革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戴克里先皇帝构建的“四帝共治制”时代的罗马帝国

但是，这项改革使罗马出现了一个和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列的庞大官僚机构。而且，由于两者是完全分离的状态，所以这两大机构之间没有任何人员的流通性。这样必然带来一大结果，那就是两大机构人员的不断增长。

戴克里先可能是认为，专职有助于培养人员的责任感和完成任务的能力，所以设计了这套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特色的制度。问题是，人一旦

习惯于归属某个组织，担任某个任务之后，就会产生不希望其他领域人员干涉的心态。而且，不希望别人干涉自己的心态，也就衍生出不去管他人事务的作风。此即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这种思想，必然会带来所属组织的膨胀化结果。为了不被干涉，不必向外求援，即使现在没有存在必要的单位或个人，也会继续保留，以备不时之需。戴克里先构思创立的罗马帝国后期的官僚结构，比他预想的还要庞大得多，原因可能也在于这种组织所隐含的性质上。若从效率方面来考虑，“专职专责”似乎是一个合理的体系，但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陷阱。

在元首制时期，政府组织没有这样细分、整合，也没有直线领导、纵向统合的观念。那时候遗留下来的大道、水道等产物的维修情况，如今又变得如何呢？

打个比方，假如有以河流为界的两个县存在，自然，河流这边的大道由这个县负责，河流那边的大道由那个县负责。而桥梁也只能以正中间为界。如此一来，需要同样材料、统一技术的维修工程，岂不是无法推动了？关于当时基础设施的维护情况，史书上并没有介绍。

但史实告诉我们，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一直苦于应付蛮族的不断入侵，根本没有余力从事维修工作。一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也没有推动过像样的维修工程。戴克里先本人倒是关心基础设施的整顿工作，只是仅限于防线附近，那些元首制时期被定位为纯军事设施的工程。阿皮亚大道的石板之间曾经是紧密贴合，连风沙都吹不进去，如今石板已经磨损不堪，变成了圆石面的道路。这还不仅仅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1500年来无人过问的结果，而是从距离亡国还有300年的公元3世纪开始追溯，整整1800年来弃之不管的结果。

研究人员热衷于研究罗马帝国知名的军事力量，以及帝国后期暴增的军人数量。最后，不同的学派得出的数字也各有不同。像我这样的作家，只有取大多数专家认可的数字，即60万兵力。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专家对行政官僚数量的暴增，就没有对军人数量的研究那么热心，让我连个推测数据都提不出来。但据我估计，行政官僚的数量应该不是像军人这样仅仅是倍增而已。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社会，在政治体系上，横向、纵向都可以自由流动，有能力的人才可以不分军事、民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使得社会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利用，也符合奥古斯都巧妙搭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统治哲学。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用现在的政治词语形容，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一个地地道道的霸权国家，也因此发展成一个庞大帝国的罗马帝国居然是“小政府”，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正因为是“小政府”，罗马帝国才有办法高唱“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但罗马帝国到了后期，转变成了“大政府”。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军事、行政两

大机构的膨胀。

我的这一假设，是根据4世纪时的罗马人留下的一句话：

> 如今的社会，收税的人比纳税的人还多。

由一名增加到四名的皇帝、翻倍的兵力、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都必须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存续。而戴克里先推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帝国改革，却是发生在公元3、4世纪之交不满1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刚刚脱离“3世纪危机”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迷途时代。帝国的轴心货币第纳尔银币的含银比例，在公元3世纪初期的卡拉卡拉皇帝时代，还能勉强维持50%，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却暴跌至5%。这时的罗马帝国的经济正处在令人绝望的疲惫状态之下。重整帝国带来的大量支出，不可能仰赖日益减少的收入来维持。在戴克里先推动的帝国改造计划中，不可避免地要对税收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样一来，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对税收的观念，即所谓的税收哲学，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税收大国

如果我们将归纳出来的、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建立、其后300年由历代皇帝继承的元首制时期的税赋哲学，与戴克里先实施的、制约公元4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后期的税赋哲学进行比较，则总结如下：

奥古斯都税制——先纳税人再国家。国家仅承担税收可以维持的事务。

戴克里先税制——先国家再国民。国家所需的经费，以税收形式向纳税人征收。

对于税收的态度，可以说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当中已经详细叙述过，由奥古斯都创设的元首制时期的税制，可以归纳如下：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会乐意交税。不仅如此，如果遭受重税压迫，还会因民怨引起暴动或者叛乱。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收税。个人无法承担的事务，比如国防、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等，必须由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来实施。如果忽略了这些事务，有能力有资产能自给自足的个人，就会和其他人分离，形成社会不安的源头。

那么，政府如何拟定让民众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税率，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当罗马帝国还处在共和时期、正在朝着将地中海纳为“内海”的霸权国家发展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个前例可供参考：

东方君主制国家——税率不定，因此无法判断轻或重。不过这种税制使民众要多负担被征召劳役或战争的风险。

迦太基——最高可达25%的重税国家。不过据说迦太基向其治下的所有领地提供农业技术指导以振兴经济。

锡拉库萨——属于僭主专制政体，但这个地方社会安定，连造访的柏拉图都感到惊讶。这个国家的税率一直保持在10%的程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不同，不会把原理或原则当金科玉律死守不放。正如尤里乌斯·恺撒所言，只要是好的，就要毫不犹豫地引进，哪怕它是敌人的东西也无妨。罗马也正因为这项政策路线而不断强大。当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实行帝政时，税收制度也必然要求随之发生变化。此时，罗马人同样遵循了这一路线。因此，上述的三个例子，视情况不同，可以成为仿效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反面教材。顺带提一下，创设新税收制

度的奥古斯都，正是尤里乌斯·恺撒指定的皇位继承人。

这位开国皇帝创立的罗马帝国税制，实际上遵循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方针。那就是，尽量压低税率，但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缴税，而且税率要维持不变，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方针，现代的税收专家听了可能会笑掉大牙。然而罗马帝国的税制就是从这个外行、胆识符合常识的想法开始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评述罗马帝国的税制时，是这么说的：

>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将“广征收、轻税赋”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在讨论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国新税制的细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在这之前的古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古代社会，胜者和败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在当时，只有战败者才必须纳税。此外，罗马是由城邦发展而来，因此是以其公民为国家之主。公民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同时负有持武器护卫国家的义务。所以，当时的兵役又被称为“血税”。也正因此，只要不沦为战败者，古代人就没有缴纳直接税的必要。换句话说，古代本质上属于间接税社会。现在要在社会上推行“广征收、轻税赋”的税制，就有必要构建一个体系，把胜利者罗马人也纳入缴税的行列。在当时，能实现这一点，奥古斯都所创设的新税制，在古代就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建立和长期维持，除了要归功于绝对强大且高机动性的罗马国防力量外，新税制也是功不可没。因为税制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也是衡量政治优劣的计量器。

接下来要讨论奥古斯都设置的罗马帝国税收的种类。帝国的税制不但方针简明扼要，项目分类也简单明了。我在写作《罗马人的故事6 ·罗

马统治下的和平》内容时，就一直深深觉得罗马用不着什么税务人员。

以下是被罗马征服，即属于败者的行省居民要缴纳的税：

行省税——收入的10%。因此在帝国向来以“什一税”（decima）通称。行省居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西塞罗说，这是行省居民支付给肩负防卫义务的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税。既然这个税种的由来是安全保障，那么志愿加入罗马军队充当辅助兵的行省居民，自然也就免除了这项税赋。

下面是征服者一方，即属于胜者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要缴纳的税。

古代社会首创的遗产税——仅限于六等亲以外的人继承财产的场合。税率为5%。

罗马人常会把遗产馈赠他人。首先，他们有馈赠部分财产给非亲非故但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的习惯。其次是赠与有事能为自己出力的律师。罗马人是创立法律制度的民族，自己一旦遇到争执也就喜欢对簿公堂，能交到一个能言善道的律师朋友，可以说是受益终身。第三类馈赠对象是平时自己尊敬的人。希望自己的遗产能让这些人物尽其用。总之，罗马人把馈赠遗产当成教育基金、感谢金或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出身于地方、后来就职于中央法庭的西塞罗，他能够成为富翁，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压得很低的律师费，而大多是来自委托人的遗产赠与。

罗马人向来极为重视私有财产的赠与权利，仿佛要拥有这项权利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在改善士兵待遇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这项权利。而终身未婚的女性则以失去这项权利的方式，接受其未对国家作出贡献的惩罚。因为罗马社会有这样的风气，所以“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继承税”，已经足够成为税收的一大支柱。

奴隶解放税——这项税收能够成为税赋支柱的原因，在于罗马人有

为了感谢奴隶的多年侍奉，而以恢复奴隶自由身作为报酬或者退休金的习俗。在古代欧洲，各国都是奴隶制社会，只有罗马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在公民和奴隶之间都有“解放奴隶”这样一个阶级存在。话说回来，奴隶等同于劳动力，罗马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劳动力的存在才构成了奴隶制社会。不过，奴隶解放税，与奥古斯都开创的遗产继承税不同，它是共和时期开始的。如果政府强烈禁止民众表达温情，政治上说不过去。但是为这一方式增加一些阻力还是可以的。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税率，是获得自由奴隶市场价格的5%。因此，这项税收也叫“二十分之一奴隶解放税”。

无论是胜者罗马人还是败者行省居民，只要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就必须缴纳的赋税，即间接税如下：

关税——原文“portorium”，直译“港湾税”，即在大海、河流的港口设施处设置海关，对经过的船只征收税金。税率在1.5%到5%之间。对从东方进口的珍珠、丝绸等奢侈品，则征收25%的关税。税率并非全国一致，主要是考虑到帝国各地经济实力有差异。经济实力雄厚的意大利，虽为帝国本土，税率却要达到5%。而接近莱茵河、多瑙河的边境行省，税率只有1.5%。不过，如果这些地方依靠税收减免的好处，经济力量慢慢提升之后，也会和发达地区一样，征收5%的税收。

营业税——针对所有流通的物产、服务征收的税金，相当于现代日本的消费税。不论何时何地，税率一律为1%。在罗马帝国境内，如果没有任何辅助说明，只是说“百分之一”，就是指营业税。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不光是税率的低廉，而是这么低廉的税率却能维持200年不变的事实。这不得不让人佩服创立这套税收体系，并将之定为国策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有着多么深刻的政治思维，多么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另外，在推行这项税制的同时，罗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

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打败了政敌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军。胜利的奥古斯都手上握有包括降军在内的50万兵力。为了不刺激反对派，奥古斯都用自己惯用的方式，花费多年时间逐步削减，最终将军队人数裁减到16.8万人。

这16.8万人作为正规兵，分配之后组成28个军团。想必奥古斯都判断，这些兵力加上由行省居民组成的辅助兵，总人数可以达到30万，足以担任帝国漫长的边境防线的守卫任务了。在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晚年的时候，发生了条顿堡森林战役，一夕之间罗马损失了3个兵团，加上辅助兵在内死伤总人数达到3.5万人。28个军团从此变成了25个，但奥古斯都并没有想法填补空缺。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奥古斯都年老体衰，加上精神打击，已没有精力补充损失。但是如果国家有补充兵力的需要，奥古斯都却怠忽职守没有补充的话，那5年后继位的提比略皇帝应该会马上补充才对，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人力、物力都很充足。

但是，在整个公元1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斗力，军团数量一直维持在25个，军团兵力保持在15万人左右。进入公元2世纪，才扩增到28个军团，到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则扩增到30个。200年的时间只增加了5个军团，3万兵力，这个事实足够令人惊叹不已。因为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没有必要派兵镇压行省叛乱，罗马士兵只要专心对付外敌就可以了。这表明奥古斯都税制重整以后，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不会膨胀到超乎国家经济能力所承受的程度。奥古斯都向来是一位依靠社会常理进行事务判断的统治者，因此我推断他的税制应该是立足于以下想法：

重税往往是叛乱的导火线。一旦发生叛乱，政府就要派兵镇压。对外御敌的防卫力量不能削减，国家要随时准备部队镇压国内势力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充整体兵力。扩军又必然引发加税问题。加税则易引发叛乱。要阻止国家陷入上述的恶性循环当中，只有实行以“广征薄赋”为基本方针的税制。我认为，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统治下的和

平”之所以能稳定持续下来，就是因为有军制、税制两大支柱作支撑。可见，军务、税务都是国政。对于税金的看法，也就是国政的根本。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心里都会产生疑问：“广征薄赋”固然很好，但是这样的财政规模能够担负起整个帝国运营的需要吗？另外，“小政府”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国家只承担税收能够维持的事务，怎么能够满足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民众需求呢？

在税收当中，每年可以预期征收的只有行省税。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要缴纳的直接税，不论是遗产税还是奴隶解放税，并不是每年固定的税收。而恒定的间接税，包括关税和营业税，能够用“二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来代称，可见这200年来，税率一直都没有变化，而且非常低廉。也许低廉的税收可以使地方不再发生叛乱，但是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居民共同体，罗马帝国能够推动国家该推行的政策吗？

答案也很简单，不能。但是，只有东方的君主专制国家才能以一句“不能”打发。罗马帝国是个典型的西方国家，政府在很多方面不得不迁就身为当权者的公民的意向。更何况罗马还是从城邦发展而来的。那么罗马帝国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没有其义父恺撒那样的创意天才。可是他善于寻找符合常理却又不让众人觉得突兀的症结点，从中入手，在民众不知不觉中已造成既成事实，这方面他能力突出，称得上是个天才。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他决定利用罗马人在共和时期就耳熟能详的两件事来解决。这两件事按现代说法，可以形容为“地方分权”和“利益回馈社会”。

翻译为“地方自治体”的“muicipia”，起源于被罗马征服的战败者城市或部落根据地。因此，无论是意大利本土还是行省都有这种性质的地方。作为胜利方的罗马，将这些地方分类为地方自治体或者自由都市，内部赋予其完全的自治权。因此，公元前1世纪，除了意大利本土的地方自治体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以外，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地方自治体”居

民，主要还是由行省居民构成。

另一方面，翻译成“殖民城市”的“colonia”，起源于民间募集而来的军团兵退役后安排的迁移地，由士兵在服役期间建成。因此，居民的主体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建设之初，这个城市就享有完全的自治权。

虽说自治权仅限于共同体内部，但是真正行使起来，还需要政府财政作基础。我试图寻找相关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体”、“殖民城市”以及“自由都市”在财政上的基础，可惜一无所获。可能是因为相关资料已经遗失，研究者们也无从下手研究。不过我们可以试着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来寻找蛛丝马迹。

那就是由图拉真皇帝确立的育英资金制度，即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资金援助的制度。其财政来源于缴纳给地方自治体的国有土地使用租金。

早在共和时期，罗马政府就开始在各地持有“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原本是战争获胜后，战败者割让部分土地给罗马作为赔偿款，后来又由罗马政府租借给农民耕种。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颁布《农地法》之后，确立了包括转让权在内的租种权。农民只要上缴收成的10%给政府就可租种，实际上就等于永久租借。我认为，这是恺撒眼看当时的社会局势，觉得如果置之不管，会因为生产效率因素而走向大型农庄化，因而立法提出了“中小企业振兴方案”。因为在古代，农业是社会之本。

虽说没有足够的研究来证明，仅仅是我的推测，不过国有土地的租金很可能就是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基础，或者至少会是财政基础的一部分。因为地方自治体和中央政府一样，具有罗马人传统的强烈公德心。

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罗马绝大多数的公共建筑都是以

某人的家族名来命名的。罗马人并不会像肯尼迪机场、戴高乐机场那样，以纪念某个特定人物来命名公共建筑。唯一的例外，是由尤里乌斯·恺撒开工，但他遇刺身亡后，由奥古斯都来完工的马萨鲁斯剧场。这是奥古斯都为纪念自己有意提拔为继承人却不幸英年早逝的外甥马萨鲁斯而命名。其他公共建筑都是以建设者的家族名来称呼的，比如“埃米尼亚会堂”、“尤里乌斯会堂”、“庞培剧院”等等。以“Colosseum”之名闻名于世的罗马圆形竞技场，官方名称是“弗拉维乌斯圆形竞技场”。这是因为开工修筑的韦斯帕芗皇帝属于弗拉维乌斯家族。

罗马人这一独特的习惯，不失为一项利益回馈社会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埃米尼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庞培都是由罗马公民选出并获得元老院认可的执政官，凭着“前执政官”的头衔获得军团指挥权，之后立下累累战功确实是他们的才能。但是给他们立功机会的确是罗马公民。当时社会认为，投入私人财产建造公共建筑，并捐赠给居民共同体，是这些成功人士理应负担的责任。受赠人给予捐赠人的唯一权利，就是让他们有权以家族名为建筑命名。所以在罗马时代，人们住在其他国家没有的、街头建筑冠满人名的城市中。而且，这一习俗在进入帝政时期以后，没有任何衰减的迹象。不仅如此，还应该说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亲自示范并积极鼓励背景下，更加兴盛了才对。对身为“政治人物”的奥古斯都而言，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行为。

罗马圆形竞技场、通称为“thermae”的公共浴场、码头的仓库群等，都可以看到历任皇帝的家族名称。这是因为在元首制时期，皇帝的性质依然是罗马公民和元老院委托治国的存在。因此皇帝将利益回馈给有权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浴场中陈列了很多杰出的雕刻、壁画，被人们称为“平民的宫殿”。顺带提一下，2000多年前陈列在公共浴场、供人们一边洗澡一边观赏的、以雕像为首的造型美术品，现在正被人们毕恭毕敬地供奉在美术馆里。

但是，历代皇帝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金额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呢？

因为皇帝已经比共和时期的任何富豪都要有钱。不是皇帝把国家税收当成私有财产来花费，而是因为皇帝手头持有巨大面积的耕地。

公元前30年，女王克娄巴特拉自杀之后，统治埃及300年的托勒密王朝画上了句号。率领军队完成这一任务的奥古斯都，并没有按照古代惯例，将战败者的一切划归为胜利者所有。罗马军队征服的所有地方，按官方说法都应纳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归国家的两大主权者——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所有。尽管如此，埃及却是例外，它不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而是皇帝的“私人领地”。

因为到克娄巴特拉女王为止，埃及一直处在“神之子”的特殊统治习惯下。征服了新土地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统治问题。统治的成败，关键看如何将被征服者的排斥感降至最低。罗马人向来擅长随机应变。他们判断，对埃及人来说，以“神之子”的名义要比以“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名义统治，更容易接受。义父恺撒遭到布鲁图一派的暗杀之后被神化，成了“神”，身为养子的奥古斯都自然也就是“神之子”。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任皇帝，也同样都以“神之子”的身份君临埃及。因此，整个罗马帝国中，只有埃及不是由行省总督治理，而是由皇帝代理人（vicarius）进行统治。

对于埃及人来说，只是统治者由希腊裔的“神之子”换成了拉丁裔的“神之子”而已。对罗马皇帝来说，则是获得了巨大的收入来源。在当时，光是埃及产的主食小麦便占有意大利市场三分之一的需求。

善用巨款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才能。奥古斯都把到手的巨款投入社会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基础建设上。关于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回头看看《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我把书名定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想告诉各位读者，“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绝非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达成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主角奥古斯都可是将50万大军裁减为16.8万人的改革高手。

而且当时的奥古斯都是帝国唯一的最高权力者，是领袖中的领袖。“利益回馈社会”的风气在他的积极带动下，横向传播到各个行省，纵向影响到元老院议员，甚至在罗马社会出人头地的解放奴隶也积极效仿。到了帝国时代，这种罗马式的贵族义务观念比以往更为盛行。好比说假如皇帝新建了一所公共图书馆，那么就会有元老院议员捐赠不动产作为育英资金的财源；某个公民会在修复大道时，承担某个路段的相应费用；事业有成、经济富裕的解放奴隶，会为家乡的神殿修缮提供资金等等。不过罗马人并未让这些“利益回馈社会”的义举成为不欲人知的善行，反而认可事成后在建筑物上冠上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在大道修缮后，准许负担经费者在路旁竖立记载事迹的石碑。此外，罗马人的墓碑背面，往往有如当事人的履历表，除了刻有死者在世时担任过的文官武职外，还会记载与其身份、财力相吻合的为公共事业付出的事迹，有些看了令人感动不已。但是这些事情在公元3世纪以后都消失不见了。

广阔的罗马帝国，由国家、地方、个人“三大支柱”支撑，以一个基本信念相统一，因此才有办法发挥功能，维持营运。从最能代表罗马的罗马道路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主干道路——总计8万公里。由国家负责铺设和维修，全线四层结构，石板面。

支线道路——总计7万公里。地方自治体或殖民城市握有决定权，并负责维修。大多是碎石路面。

私人道路——总长度15万公里。由个人负责铺设、维修。虽说为私人道路，但并不禁止外人进入，允许任何人自由通行。在罗马帝国，地位等同于公共道路。

研究人员表示，这“三大支柱”负责下的道路总长度达到30万公里。如果把国家比做人体的话，这30万公里的道路囊括了人体从动脉到毛细血管的各类输送管道，及时为帝国输送新鲜血液。如果所有的道路工程

都由国家来负担，那么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税率才能实现。罗马帝国能长期维持低税率，在于采用了“三大支柱”并存的体系。尤其是成功地让富裕阶层参与到公共事业上来，这一点最为重要。

各位读者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是间接税时代。一来还没有发展出累进税制，二来间接税的税率很低。如果放任这种状态不管，富人会变得更富有，而穷人将变得更穷。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让富人把钱吐出来。不过，财富税这类的点子，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行不通。罗马社会的富人阶层与胜利者的身份是重叠的。如果要实施这样的税制，即使奥古斯都的用意在于设立与帝国政治相符合的新税制，也会因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失势，甚至下台。因此，凡事谨慎的开国皇帝没有追逐这个危险而又不现实的梦想。

首先，他以身作则，亲作典范。由他的两位忠实助手阿格里帕、梅塞纳斯动员实施“利益回馈社会”行动。成果可以借用奥古斯都一句略带夸张的话来概括：“我接手的是砖瓦修建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大理石的城市。”顺带提一句，阿格里帕、梅塞纳斯在“协助”奥古斯都鼓励回馈社会的同时，也成为在埃及拥有大片耕地的地主。

其次，除了诉诸富裕阶层的公德心之外，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刺激他们的虚荣心。修筑公共建筑的事迹可以立碑歌颂，成立财团用以资助贫困女子的嫁妆时，可以给财团冠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能留下有形的事迹，人们做事的热情会更加高涨。

罗马的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没有像现代国家一样留下详细的数字记载，因此后人只能进行推测。不过我认为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社会非常仰赖个人积极地参与。从大家公认的罗马至高无上的纪念碑——罗马大道，它的网络分布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即使充当的是毛细血管的作用，30万公里的罗马大道有一半是私人道路。由奥古斯都创立、随后持续200年的元首制时期的税制，正因为能深刻洞察人的心理，才能成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要因之一。暴政和仁政的区别，可以说就看

税制如何定夺。

这项可以称为奥古斯都税制的制度，在进入公元3世纪之后崩溃了。引发税制崩溃的导火线，是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由于提案及实施的皇帝又名卡拉卡拉，所以这道法令通称“卡拉卡拉敕令”。这道法令公布以后，居住在罗马境内除奴隶以外所有拥有自由身的人民，一律都可以享有罗马公民权。这样，罗马公民（romanus）和行省居民（provincialis）的差别就完全废除了。只要是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不分人种、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差异，一律平等地成为“罗马公民”。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道无可批评的好法令。

可是这道法令使奥古斯都税制走上了绝路。既然行省居民的身份没有了，那么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也就消失了。没有了行省税这一罗马帝国的税收支柱，国家行政如何维持？卡拉卡拉皇帝似乎认为，将原本对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征缴的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的税率从5%提高到10%，就足以弥补行省税消失带来的财政漏洞。如果他真的认为行省居民变成罗马公民后，全国百姓都会乖乖缴纳这两项税金的话，那只能说这位年轻皇帝太肤浅了。毕竟，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税种。

第一，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都不是年年持续缴纳的税金。

第二，把遗产留给血亲以外的对象，或者给予奴隶自由当做退休金，这是罗马人特有的情感。不能对行省居民抱有同样的期待。

第三，这项敕令引起所有罗马公民的不满。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不但失去了所有特权，而且还要缴纳翻倍的税金。

这两项税收的税率，在卡拉卡拉遭到刺杀之后，由继位的马克里努斯调回原税率。但是撤除罗马公民与行省居民差异的法令并没有被废止。其后帝国一直处在没有行省税收入的状态。而如果不采用其他税收

来代替行省税，国家财政就要崩溃了。走投无路之下，国家只好开始征收与奥古斯都税制思想完全相反的特别税和临时税，而且渐渐变成一种常态。

整个公元3世纪，人们再也听不到象征税率稳定不变的“二十分之一税”、“百分之一税”这一类名词，在史学家的记述中也不再出现。公元3世纪的罗马帝国，局势紊乱，国家前途迷茫，可以用“3世纪危机”一词来代表。当时，蛮族入侵不断，换皇帝跟换衣服似的，政治上缺乏连贯性，就连税制也陷入无政府状态。在3世纪末期登基的戴克里先当然也想解除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只是他推行的税制和元首制时期的税制，完全背道而驰。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我已经详细讲述奥古斯都的税制，刚才又重新提出来论述，是因为只要知道帝国后期的税制和奥古斯都的税制是完全相反的，就能轻易理解后期这项税制的内涵了。而且，税制的变化，也是学者把公元1、2世纪的罗马帝国分类为元首制，4世纪以后划为“绝对君主制”的原因之一。

戴克里先皇帝实施的新税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皇帝每年决定一次国家财政所需的金额。无论该年度收益如何，纳税人都必须按照规定额度缴纳税款。

二、所有税务一律统合，纳入中央政府旗下管理。

如此一来，地方分权成为历史。因为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自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现如今“地方自治体”已经名存实亡。

三、税收分为以生产基础“耕地”为对象征收的“地租”（iugatio）和以生产手段“人”为对象征收的“人头税”（capitatio）两类。每五年审查一次决定金额。

罗马帝国的税制从此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此外，对于税金审查结

果，若有异议，只能向皇帝申诉。

这样一来，事实上由税务官审查得出的税务金额，民众只能乖乖地缴纳到下次审查为止。

这样，长久以来支撑罗马国家体制的“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个人回馈社会”这三大支柱体系，也就彻底崩溃瓦解了。除了地方自治体失去自治能力之外，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给人民带来重税，个人回馈社会的意愿也消失了。从“三大支柱”变成“一柱擎天”，从税制这一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罗马已经从元首制转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

而且戴克里先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讲究规范化、系统化，从之前已经叙述过的“四帝共治制”到接下来马上要讨论的“物价管制”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他也的确有这个能力。问题是，政治制度如果连细节都一一规范，反而会变成缺点。一旦遭遇意外，反而不知如何应对。罗马帝国地域辽阔，罗马人爱泡温泉，可见火山、地震等意外也不少。气候是不会按照人的意愿行事的。但偏偏戴克里先的税制制定得精密细致，滴水不漏，而负责推行的税务官又一板一眼地严格依法行事。

这里顺便举一个税务“审查”的案例。下面所列的各地租对象，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同等价值：

5公顷的肥沃耕地。

10公顷的二级耕地。

15公顷的三级耕地。

1.25公顷的葡萄园。

超过3米高、预计可获丰收的橄榄树220棵。

种植在坡地上、每年收获尚可的橄榄树450棵。

至于以生产手段为对象征收的劳力税，则以14岁到65岁的国民为对象。在那个时代，到65岁，也就等同于到死亡为止了。女性也同样被列为征税对象，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地区间存在着差异，比如叙利亚是男女同等缴税，埃及的女性却是免税的，而小亚细亚的女性税金为男性的二分之一。而且，一旦被审定为劳动力，则无论是生病还是死亡，都要乖乖纳税到下次审查为止（而且君士坦丁时代又把审查改为15年一次）。另外，奴隶也被当成与一般民众同等的劳力来计算。

这是农村的情况，城市又是怎样的呢？新税制的宗旨就是要以税收满足国家所需要的金额。那么找容易征收的地方或个人抽税肯定是必然趋势。戴克里先推动的税制改革，受打击最大的是农村，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城市居民也别想躲得开。

虽然城市居民没有地租可收，但是店面、工厂等生产基础还是可以作为征税对象的。至于具体如何审定，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史料留下，所以详情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劳动力征收的人头税是肯定跑不掉的。尽管如此，戴克里先的新税制，还是对农村的打击更为严重。地方人口流失严重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的罗马帝国，农业是基础产业，国之根本，情况跟现在以工业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因此受到的打击也要沉重得多。

公元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农民，是为了逃避如波浪般接连不断的蛮族侵略而舍弃耕地，同时也为谋求人生安全和新的生活手段涌入城市。而4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农民，则是为了逃避重税而舍弃耕地涌入城市。

皇帝戴克里先通过扩增兵力，成功阻止了蛮族的入侵。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当时的人们感叹，收税的人比纳税的人还要多。由此可见，在官僚机构的扩增上，他也“成功”了。这表示，士兵、官僚

这些仰赖国库发工资的人增多了。其结果导致国家需要的经费至少增加两倍，严重的话说不定四倍都有可能。随着戴克里先的上台，农民们不再需要逃避蛮族的入侵，相对的，多了逃税的必要。

虽说情况没有农民严重，但是商人、手工业者也因新税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些人本身住在城市，所以不像农民可以逃离家乡。但是，儿女们开始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职业。此外，创业的人也急剧减少。金融利率也从元首制时期年12%，降低至4%。在货币价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利率却一再滑落。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市场投资意愿低落的反应。而与税制改革几乎同时，戴克里先又推出了货币改革。

戴克里先推动的货币改革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为300年来身为罗马帝国轴心货币的第纳尔银币，作最后一场保卫战。

当时银币的实际价值，已经跌落至含银量仅为5%。而戴克里先打算把货币价值恢复到当年尼禄皇帝为适应流通量扩大，推行货币改革之后的样子。当时，1罗马磅（libra，约327克）可以铸造96枚第纳尔银币。而公元4世纪初，市场上流通的第纳尔银币，则是1罗马磅纯银可以铸造6000枚的劣币。

所谓劣币，指面额价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的货币。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货币越劣质。在没有纸币的年代，面额价值与实际价值是否一致，是货币唯一的信用基准。顺带说一句，现代国家发行的纸币，其实际价值不过是一张纸，要靠发行纸币的国家来保证实际价值和额面价值的一致。一旦这项保证出现危机，纸币价值也会随之下跌。在古代，货币是由金、银、铜铸造，国家保证货币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上述金属的含量，使其实际价值不至于下跌。

因此，戴克里先当然会认为，要让帝国的轴心货币第纳尔银币恢复价值，就必须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第一，把每一枚第纳尔银币的重量，恢复到尼禄皇帝改革后150年没变的3.4克这一定量。

第二，含银量不变回尼禄皇帝时期的92%，而是改回到奥古斯都皇帝发行时的100%，即重新发行纯银的第纳尔银币。

顺带一提，从奥古斯都起，到戴克里先为止的第纳尔银币含银率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第纳尔银币含银率的变迁

奥古斯都皇帝的改革（公元前23年）	3.9克	纯银100%
尼禄皇帝的改革（公元64年）	3.4克	含银92%
卡拉卡拉皇帝的改革（公元215年）	3克	含银50%
3世纪后半期（公元260—300年）	3克	含银5%
戴克里先皇帝的改革（公元295年）	3.4克	纯银100%

戴克里先这一大胆的货币改革方案，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付诸实践。新发行的银币质、量兼具，被命名为“阿根图斯”（Argenteus）。戴克里先皇帝应该是认为：只要这种面额价值和实际价值一致的银币在市场上流通，罗马帝国的轴心货币银币的信用也会跟着恢复，货币信用不足造成的通货膨胀现象也会渐渐消失不见。含银率跌至5%的第纳尔银币就此废止，改为含银量依然为5%，但重量将近三倍的“富利”（Follis）铜币。

理论上，事情应该照着戴克里先的想法发展。但实际上，新发行的银币很快从市场上消失，留下来的旧银币和新铜币，根本无法阻止价值的下跌。因为拿到新银币的人不愿意脱手，而持有旧银币的人又想尽早换成新银币，使得旧银币的价值进一步下跌。在新银币发行后，大多数

的货物价格依旧以第纳尔银币的价值为准，就足以证明上述观点。这说明，发行纯银的良币依然无法抑制通货膨胀。

顺带说一下，名为奥里斯（Aureus）的金币价格则没有波动。原因是罗马帝国虽然以货币的形式发行金币，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非货币。奥里斯金币的性质，如同现代的金条、克鲁格金币（Krugerrand，著名的南非金币。——译者注），因为是纯金打造，主要持有目的在于资产保值。当然，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只是因为其价格太高，一般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货币。罗马帝国以银币为轴心货币的理由也正在此。但是，正因为金币的性质犹如金条，所以才能一直维持100%的含金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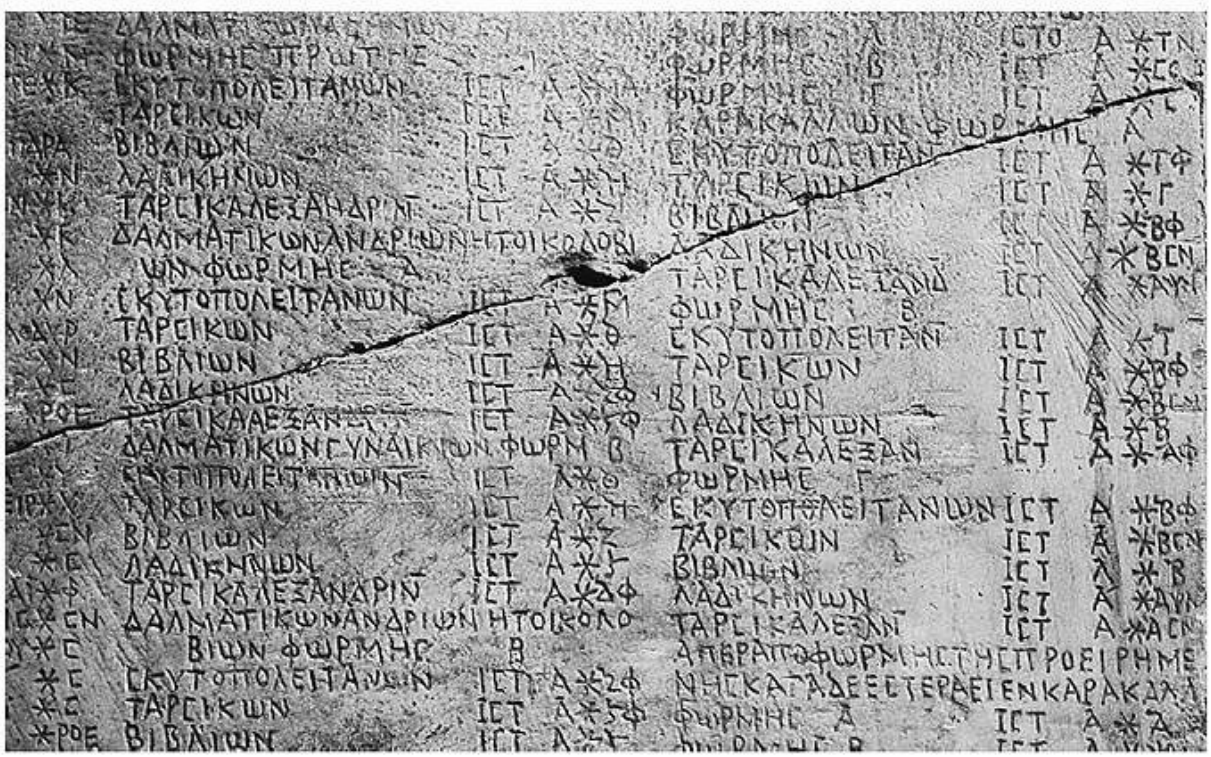
经济管制国家

也许是戴克里先对通货膨胀的无法抑制感到绝望，在货币改革6年后，即公元301年，他开始着手实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物价管制政策。他把罗马帝国境内流通的所有物产、服务均设定了上限价格，并规定，如果有人以超过上限价格进行交易，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当然，所有价格都是以旧第纳尔银币规定的。像小麦、葡萄这样的农产品，有质量高低之分，价格自然也有区别。而教师、律师这类专业人士在酬劳上则没有区分。能力差异与报酬不相干，也是经济管制的一项特色。

> 市场与日常交易之所见价格无限攀升，即使在农产品丰收的年份也无法抑制。归根结底还是缘于人们对金钱的无限贪婪。

戴克里先皇帝的敕令以上述内容为开头，其后列举了庞大的职业分类和管制价格。即使到了现代，其中大部分内容还是可以调查到。因为敕令颁布到了帝国全境，只要将帝国境内挖掘出来的大理石碑、铜牌拼

凑起来，将上面雕刻的敕令内容进行整理，要掌握政策的整个内容并不难。



刻有戴克里先皇帝价格管制敕令的石板（部分）

这项敕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如下：

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经济管制的实例。

二、这项资料庞大且有系统，是最适合了解罗马时代职业分类的史料。

换句话说，这项资料对于历史学家研究当时的平民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从怀疑经济管制效果的立场来看，大家首先会被如此细致的分类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会对这种徒然的努力感到黯然。这种强硬、严密的经济管制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会以失败收场。至于个中缘由只能留待专家解说。戴克里先的敕令，给罗马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下：

一、经济活动地下化。

二、以物易物型经济活动时隔500年后再次复苏。

三、所有领域劳动质量下降。

这项敕令的最大目的是消除通货膨胀，但结果自不待说，自然是一败涂地。

对戴克里先来说，眼前还有一件难题必须要马上解决，那就是农民脱离农业致使耕地荒芜以及青年脱离商店、工厂的现状。如果放置这个问题不闻不问，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这类罗马社会的中坚阶层将逐渐走向凋敝。以强硬手段应对通货膨胀的戴克里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职业被列为世袭制。也就是说，子承父业，成为一项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儿子还必须住在父亲工作的地区。

在当时，边境防卫兵大都一边屯田一边担任边界警卫工作，这已成为一项常态。现在这些士兵的儿子从此以后，也只能从事跟父亲一样的职业。元首制时期的士兵役满退伍时，可以领到一笔现金或者相当面积的土地作为退休金。而到了戴克里先时代，退休金大幅缩水，变成当事人家中身为劳动力的妻小可以免征人头税的政策。这样，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国家变得越来越小气，另一方面，当时的官兵第二代也渐渐丧失子承父业的意愿。防线也面临着人口流失的问题。在如此现状背景下，军人也成为“人员——土地——职业”捆绑政策的一分子。当然，各位皇帝的直属部队成员也在子承父业政策的范围内。在这一法令的推动下，持续了400多年的罗马帝国募兵制，也转为实质上的征兵制了。

至于商人、手工业者的第二代，自然也不能例外。皇帝鼓励这些人按职业组成社团并给予奖励。名义上是为了有益于社员间的相互扶持，

实际上是为了稳固世袭制度。这也是构成中世纪社会结构支柱的工会制度的雏形。

在元首制时期，罗马社会分为皇帝、元老院议员、骑士阶级（官僚和商人）、平民、解放奴隶、奴隶等阶层，属于阶级社会。而且，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进行住家迁徙，这些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各阶层之间才能保持流动性，为成熟社会容易产生的僵化现象提供预防效果。其最大的功效，在于为社会挖掘人才，输送新鲜的血液。

但是这种效益，首先在文官武将职业分离的政策之下土崩瓦解。其后，国民又失去了职业选择和居住地任意迁徙的自由。有位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以现代社会打比方的话，当时的罗马简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戴克里先与基督教

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之下，罗马的政治体系已变成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尤其是站在政府顶端的皇帝手中。在此背景下，国家的权威自然也要发生变化。皇帝要行使绝对的权力，就必须让大众认同其绝对的权威。而元首制时期那种由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权威形式，已经不够充分了。

既然人类赋予的权力不够充分，那就只有求助神灵了。戴克里先推动绝对君主制后，把自己逼进脱离罗马传统风气的立场中，陷入背后必须要有神灵做后盾维护权威的局面。戴克里先皇帝大力提倡复兴对罗马诸神的信仰，其政策背后其实隐藏着上面的苦衷。当然，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都可以拿来做后盾。既然要赋予当权皇帝绝对的权威性，唯一的选择就只有30万众神的领袖——最高神朱庇特。早在“四帝共治制”之前的“两帝共治制”时，戴克里先就把意为朱庇特的约维乌斯当成称号，把

同事皇帝马克西米安别号改为半神半人的赫拉克勒斯。也许在即位不到两年的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加强皇帝权威的必要性了。

问题是，希腊语称为宙斯、拉丁语称为朱庇特的最高神，要成为行使绝对权力的后盾依然行不通。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一节中提到的，希腊罗马诸神与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希腊人、罗马人心中的神，是帮助人类摆脱困境的神，而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则是对人类下命令的神。希腊罗马诸神完全没有管理人类的想法，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名义上是指引人类走上真实信仰的道路，而实际上则是管理人类生活方式的神。

希腊罗马宗教神灵众多，起因于每个人希望得到帮助的领域都不一样。而犹太教、基督教之所以是一神教，原因在于其性质特点既然要把人类纳入其管理之下，那么就需要有绝对的权威，而只有在“一神”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力也好，还是权威也罢，如果分给很多的人和神，是不可能有绝对的权威的。

简而言之，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中的最高神，也无法成为能给绝对权力赋予正统性的绝对权威。

可是，戴克里先似乎认为，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也能称为绝对的权威。当然，前提是先把障碍对象清除干净。所谓的障碍，自然就是宁死也不肯承认罗马诸神的基督教徒了。

这就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持续、坚决、有组织地大规模镇压基督教徒运动的开始。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是在过了40年平稳日子之后，再度遭遇到的晴天霹雳。

公元303年2月，戴克里先发布了有关镇压政策的第一道敕令。这一

年，也是戴克里先在位的第19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戴克里先经历了“两帝共治制”、“四帝共治制”，一直都是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如果想要镇压基督教，随时都有充分的地位和权力来实行。但是，他选择了在位的最后一段时期开始实行。

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对这个问题很多的研究人员也深感困惑。但是当事人戴克里先不但没有留下答案，连让人接近答案的言辞都没有留下。基督教方面身为受害人，然而教会提出的史料也只是写着老皇帝脾气发作了，或者受到邪恶的副帝伽列里乌斯的怂恿。

戴克里先是个城府极深、不轻易向他人透露心事的人，而且，就连在行动上，也不会暴露其内心想法。由于他性格强韧，善于自我控制，是最不可能因一时愤怒推动重大政策，或者轻易受他人怂恿的政治人物。尽管如此，他却推动了镇压基督教的政策。罗马帝国的重建是戴克里先在位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那么会不会对他来说，在诸多重建政策中，镇压基督教是用来收尾的吗？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中，我也提到过，在公元3世纪不停上台又下台的诸位皇帝中，越是热衷于重建帝国的人，就越是热衷于镇压基督教。也许是皇帝们的危机意识在作祟，认为人民不信仰传统的罗马诸神，也就是不信任罗马帝国。也许戴克里先在担任皇帝多年之后，也越来越有这种危机意识。不管如何，毕竟距离上次镇压已经过了40年了，除非有相当的把握，否则当权者是不会推动镇压政策的。

有本史书原名叫*Acta Martyrum*，翻译名为《殉教者行传》，专门记录殉教的基督教徒事迹。在这本书中，从图拉真皇帝治下的公元115年开始，到公元320年为止的200年间，仅仅列举了殉教的12个事例。即使书中只记录著名的殉教事例，但200年只有12个例子还是太少了。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但却是在他尚未发起镇压政策之前的“殉教”事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95年，也就是戴克里先主政的第11年，距离大镇压还有8年。事情发生在北非努米底亚行省的主

要城市之一的提威苏特。

事件的主角马克西米里阿努斯当时22岁。他的父亲现在是国家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因为曾经在军营里当过兵，所以马克西米里阿努斯也不得不受命前往兼做考场的军营报到。毕竟军人也在世袭制之列，当时兵役的制度实质已经转变成了征兵制。主考官是迪奥总督，似乎还身兼军团长。以下是两人之间的对话。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当时罗马军队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看法。

主考官："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你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我不能服兵役，因为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继续说："脱掉衣服做体检。"

年轻人一边脱衣服一边重复："我不能服兵役。我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接着说："帮他量身高。"

军官："5佩蒂斯又10温奇亚（约150厘米）。"

主考官迪奥向另一位军官下令："合格了。给他罗马士兵的身份牌。"

但是，年轻人拒绝了。

"我不能接受这种东西。因为我不能服兵役。"

主考官到这时才看着一再抗议的马克西米里阿努斯的脸说：

"乖乖入伍，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年轻人："办不到！你想砍我的头就砍吧。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军队，我是隶属于神的军队。"

主考官迪奥问年轻人："是谁这么告诉你，让你有这种想法的？"

年轻人："是我的灵魂，还有召唤我的那位尊者。"

迪奥向列席的那位父亲说："你能不能劝劝你儿子？"

父亲："没有用的。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迪奥再次面朝年轻人，说："加入军队，领取士兵身份牌。"

年轻人："我不能收。我已经领到基督士兵的身份牌了。"

迪奥："如果你一再抗拒，我只能送你去见你那个基督。"

年轻人："要送的话，请尽快。越快对我来说越光荣。"

迪奥向军官下令："押着他把身份牌戴上去。"

年轻人："不管你们做什么我都不会佩戴这个身份牌。你们强制我的话，我只好把它砸烂。我是基督教徒，身受耶稣救赎的我不能在脖子下吊着铜片走路。你所不知道的神之子，天神为救赎世人脱罪而派来地上的耶稣基督，只有顺从引领人生的这位尊者，才是我的工作。"

迪奥："我不管你说什么，给我把身份牌收下，开始服役。如果你继续拒绝，只有死刑在等着你。"

年轻人："虽然我的肉体死了，但灵魂将永存世间。既然身为我主军中的一员，就不能成为其他军队的士兵。"

迪奥："想想你还那么年轻。别这么顽固。现在赶紧服兵役。这是身为帝国一员的青年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君士坦提乌斯、伽列里乌斯这几位皇帝的直属军中同样有基督教徒士兵。可是他们并没有舍弃保卫国家的义务。"

年轻人："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吧。但是既然身为基督教徒，我就不能染上恶行。"

迪奥："服兵役保卫国家，难道是恶行吗？"

年轻人："你应该知道士兵实际都是干什么的吧？"

迪奥："乖乖入伍。如果你继续冥顽不灵，我只有将你的言行

视为不屑为共同体服务的证据判处你死刑。”

年轻人：“我是不会死的。即便失去了现世的生命，我也会与吾主基督同在。”

主考官迪奥总督写下判决书，并当众宣读：“马克西米里阿努斯，因缺乏令人信服之理由，单以反抗心拒绝兵役之罪名，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将给予相应的处分。”

总督判决马克西米里阿努斯承担叛国者应受的斩首刑。这名青年听了判决后高兴地大喊：“哦，神啊！我打从心底感谢您。”

到公元303年开始镇压基督教徒为止，戴克里先主政的19年里，留下记录的殉教事件只有这一件。另外，在《殉教者行传》里面，这次事件的上一位殉教者，也是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末尾引用的信件作者，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us）。这个人殉教的时间是公元258年。也就是说，就连出自基督教徒笔下的《殉教者行传》在叙述殉教者时，讲完公元258年之后就一下子跳到公元295年。对基督教徒来说，当然是列出的殉教者越多越好。可是就连他们提出的史料，也只有居普良殉教37年后才发生的这起年轻人拒绝兵役的事例。而若将时间跨度延长到戴克里先镇压基督教为止，则时间长达45年。

不过，总督迪奥在判决时，是以拒绝兵役为理由，而不是以基督教徒为判刑依据。这是当然的，因为总督表示过，基督教徒也有服兵役的。不久前，推行征兵制的现代国家意大利，才接受因宗教理由回避兵役的人。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依法承担社会福利工作，且服务时间要略长于兵役。这种制度，在罗马帝国时代当然不会有。大家不要忘了，要到20世纪，社会才会承认“良心兵役拒绝”方式的存在。

话说回来，如果1700年前的古代就有这种制度的存在，也很难保证这个除了基督教之外任何指示都不遵从的年轻人，会不会愿意顺从国家制定的社会福利体系。正是由于这份不确定，才使身为主考官的迪奥总

督作出如此严厉的判决吧。因为判决书中清楚地写着“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这一句话。

实际上，在所有职业都沦为世袭制的当时，服过兵役的人其子嗣也只有服兵役一条路可走。虽说如此，但人在本质上都会厌恶被强迫。但在当时兵力倍增的年代，补充兵力的新兵招募网，自然也要比原来密集得多。

在殉教事件中，主考官迪奥对新兵的合格要求放得很低，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身体检查中，不管体格和视力，只要身高达到150厘米，就可以通过新兵测试，拿到象征士兵身份的身份牌。

同样是在罗马帝国，一个世纪之前的新兵考试可没有这么简单。那个时候还是募兵制，士兵的人数也只有现在的一半。也因此能够考虑到维持士兵的质量，募兵时会严格遵守哈德良皇帝定下的新兵标准。

当时规定，新兵入伍身高必须在165厘米以上，体格匀称，视力良好，并具有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罗马帝国一直在全国推行希腊语、拉丁语的双语政策，唯有军中以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为官方语言。所以条件中要求的“读写”能力，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叙利亚都是代表拉丁文的读写能力。而且，即使这些参军青年通过以上条件也不等于可以马上入伍。一般情况下，还要经过4个月的“试用期”（probatio）。这段期间测试当事人是否适应军队生活，具体活动包括持武器参加演习，以及一些军中实习。只有通过“试用期”的人，才能允许入伍。脖子上挂着刻有所属军团、个人姓名的铜质身份牌（signaculum），向身兼最高司令的皇帝表示效忠，之后才正式成为罗马士兵。

相隔百年之后，新兵入伍标准的差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只要身高达到150厘米就能入伍。其他考试也一律简化取消，就连“试用期”也没有了。虽然罗马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世纪危机，但100多年的时间也不可能让罗马男人的身高缩减15厘米吧？新兵测试的简化，以及合格标

准的降低，看来只能归结为罗马帝国的兵力从30万扩增至60万的影响。而且，在这一扩兵时期，如果有人试图以宗教理由逃避兵役，那么将会“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施以严重的刑罚。

这名基督教青年拒绝服兵役的事情，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传入戴克里先的耳朵里。但身为主考官的迪奥，既然被称做总督，那应该属于罗马军队指挥官一级的人物。部下应该不会做出忤逆上司的行为。尤其是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已经在戴克里先领导下逐渐充满君主专制色彩。如果这件事传入戴克里先的耳朵里，恐怕他也会担心“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吧。因为让罗马帝国军力倍增的，就是戴克里先本人。

不过这件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似乎并不严重，而且这件事发生在帝国南部，事发地点又是新兵测试场所，帝国机构的最下层，所以影响并不大。但是三年后，又发生了一件跟基督教徒有关的事情，这一次却是发生在戴克里先眼皮底下。

在有皇帝出席的一场祭典中，出席的皇宫官员里有人在胸前划十字。既然是皇帝出席的祭典，那自然是献给罗马传统诸神的仪式。在仪式进行中划十字，想必是祈祷借由划十字来消除自己参加异教仪式造成的罪孽。基督教是一神教，向来不承认其他神灵的存在。在认同其他神灵从而形成多神教的罗马人看来，这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就好像开工破土、拈香拜神时，列席的基督教徒突然划十字，而穆斯林开始向安拉乞求忏悔一样。总而言之，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据说戴克里先看到之后大为震怒，但并没有处罚相关人员。在向罗马诸神祈祷时划十字的人，似乎也认为这只是皇帝一时的愤怒，而没有人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未雨绸缪。可是，戴克里先没有忘记。

在这件事发生5年之后，即公元303年，戴克里先开始镇压基督教徒。而公元303年这一年，对戴克里先来说也有着不同以往的特别意义。这一年的秋天，戴克里先登基后首次造访罗马，他和同事马克西米安一起为登基后19年的战斗作了胜利总结，并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

对戴克里先来说，如果抵御外敌入侵，守卫边境平安是其一系列治国举措的开始，那么镇压基督教徒就是之前诸般努力的总结和收尾。换句话说，镇压基督教，不是戴克里先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执政19年来逐步酝酿的决断。

但是，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毕竟在遭此横祸之前，他们已经过了40多年平稳的生活。这40年里，教会内部还发生过罗马主教和安条克主教的权位之争，当时基督教徒还特别延请皇帝奥勒良出面裁决。尤其在帝国东方，基督教势力发展迅猛，尼科米底亚的主教官邸，就隔着广场盖在戴克里先皇宫对面。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日来一直晴空万里，却一下子雷电交加，狂风暴雨。

由戴克里先实施的、日后被基督教徒形容为“大镇压”的政策，第一道敕令在公元303年2月24日向全国发布。这道敕令的原文，无论铜版或书信都没有留下。我们现在参考的，是研究人员拿出考古学家复原古代陶瓷碎片的毅力，将基督教徒留下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记录，重新进行整理归类后复原的内容。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也和戴克里先的其他改革政策一样，不但系统而且彻底。

一、所有基督教教堂，皆从地基开始彻底破坏。即使教堂使用的是私人住宅，也不得例外。

二、不问理由，严禁基督信徒集会。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皆适用本禁令。

三、《圣经》及一切类似书籍、弥撒所用的器具、十字架、基督像等，全部没收并销毁。

四、基督教徒中属于上流社会者，以往在讯问时享有免于拷问等诸多特权，如今依法剥夺其全部特权。

五、承认身为基督教徒者，将丧失包括法庭辩护权在内的、受罗马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力。

六、没收由信徒捐赠累积的所有教会资产，交由拍卖行进行拍卖，所得资金分配给教会资产所在地的地方自治体，或与基督教徒无关的职业社团。

七、所有承认身为基督教徒者，开除一切公职。

这等于是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发出的宣战通告，而且，所有的政策都由皇帝派遣军队严格执行。

这道敕令在其他地方的推广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在戴克里先直接管理的帝国东方，遭到了基督教徒的激烈反抗。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出，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普及率要比西方高得多。在戴克里先定为首都的尼科米底亚，有一位基督教徒撕毁敕令，然后绕着广场边跑边喊“基督教必然胜利”之类的话。这名男子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处以死刑，成为敕令发布后的第一个殉教者。

而且，这件事发生不久，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就两次失火，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第二次火灾的起火点，就在皇帝寝室附近。不用说，皇宫里的所有人，从上到下都受到了严密的讯问。到底火灾的原因是意外还是恶意纵火，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讯问之下，发现皇宫内有大量基督教徒存在。下层的用人只是被逐出皇宫，而上层人员则被处以死刑。可见，戴克里先没有忘记五年前在祭典中划十字的人。

罗马帝国基督教徒分布推测图（公元3世纪末期）

根据记录，由这道敕令引发的基督教徒暴动，除了小亚细亚之外，范围还波及叙利亚。不过戴克里先毫不犹豫地派了大军前往镇压，使得这些暴动在扩散前就消弭了。军方可是完全站在戴克里先这一边的。一旦迈出步子就绝不回头的戴克里先，很快就公布了第二道敕令，只不过，第一道敕令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第二道敕令则是给各“县”长官的指令。

第二道敕令的扫荡对象，针对的是构成基督教教会组织的中枢——主教、牧师、副牧师等神职人员。各“县”长官受命，必须将这些人逮捕入狱。

紧接着，戴克里先又棒打落水狗般地发布了第三道敕令。这道敕令仍然是发给各“县”长官的指令，里面强制要求在押的神职人员举行对罗马诸神的献祭仪式，并规定，接受者马上释放，抗拒者即刻处死。

这道敕令的实施结果，只有四人被处死，其他全部被释放，只是不能确定这个数字是否包括罗马全境的神职人员。

据研究人员表示，戴克里先在访问罗马并举行凯旋仪式之后，回到尼科米底亚，也就是公元303年年末，才颁布第四道，即最后一道敕令。这道敕令依旧是给各“县”长官的指令，只是在四道敕令中，这条敕令最残酷，也最不符合罗马人的性格。

以前图拉真皇帝对基督教徒制定的政策，但凡非正式的控告、匿名控告皆不予受理。如今这项传统政策也成了过去式。现在即使无人控诉，只要传闻某人是基督教徒，当事人就会遭到政府的逮捕、讯问。这些教徒，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强制向罗马诸神行礼，抗拒者依令处以死刑或判处劳改。

不过，比起基督教徒来说，第四道敕令对于信仰罗马传统诸神的人，即基督教徒口中的“异教徒”（paganus），造成的影响更大。神职人员以传教为工作，另当别论，而一般的教徒只是信仰基督，并未对罗马社会造成任何损害。仅仅因为信仰基督教就要被处死或劳改，让肯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多神教教徒看在眼里，觉得无法认同。很多的“异教徒”宁愿冒着违背皇帝及“县”长官意愿的风险，协助基督教徒藏匿。不过这种行为，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毕竟这种善行往往是私底下的，而且是个人进行的活动，所以外人无从正确把握全貌。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公元303年和304年这两年时间里，帝国内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东方，都在刮着迫害基督教徒的风暴。虽然其后态势有所减弱，但直到公元309年，以基督教徒为打击对象的敕令依然有效。不过有很多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把这称为“大迫害”的话，判处死刑的人未免也太少了。而且，基督教留下的记载显示，当公元309年禁令被解除后，社会情势如下：

一、大量的基督教徒从监狱或劳改中被释放出来，返回家中。

二、神职人员也被释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场所（重建的教堂，或以其为中心建立的基督教徒社区）。

三、弃教者痛改前非，乞求重新被社区接纳。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皇帝戴克里先的“大迫害”，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一、处死的人仅占总体的少数，其他大部分人，包括神职人员在内，被送进监狱或者在矿山、建筑工地劳改。

二、有很多改宗弃教的人存在。

在日本反基督教时期，有一个特有名词叫做“转向”，后来成为日本文学中一个深刻的主题。有趣的是，古代正宗的基督教社会反倒从人性的角度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基督教徒也是人，自然也会“转向”。因此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当转向的教徒申请回来时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实际上，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政府也零星地推出过镇压基督教的政策。当时的教会已经把允许弃教者回归的程序制成既定程序。比如，首先要在冬季穿着粗陋的短衣，跪在教会门口苦苦哀求，然后还必须一一经历一系列艰辛苛刻的体验。但至少地区教会允许弃教者回到社区之中。虽然我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也非常佩服古代基督教教会的弹性，允许弃教者回归就是我佩服的弹性制度之一。不过，也有许多人觉得不该原谅曾经抛宗弃教的人，是否允许弃教者回归，成了基督教教会内部鹰派和鸽派对立的主要原因。

戴克里先浴场

现在的罗马有着短时间内参观不完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不久之前，在罗马中央车站附近的国立特鲁美博物馆举办的希腊罗马艺术展上，展品的质量和数量甚至超过了梵蒂冈博物馆。之所以说“不久之前”，是因为这几年他们将展品分成了四部分，分别放在玛西莫宫、阿尔腾普斯

宫、八角大厅及特鲁美博物馆展示。这真让人怀疑他们将馆藏分成四份，是不是为了赚取四倍的门票收入呢？因为国立特鲁美博物馆面积宽阔，空间足以展示庞大的历史遗物和美术品。当年戴克里先皇帝为纪念凯旋仪式的举办以及自己在位20年，特向罗马公民致赠了一所大型公共浴场。后世意大利人在原浴场遗址上建立了这座博物馆。这座浴场建成后按照罗马传统的习惯，取建设者戴克里先的名讳来命名，叫做“戴克里先浴场”（Thermae Diocletianae）。而戴克里先修建这座建筑的动机也是依照罗马传统，感谢社会给予自己发挥才干的机会，因此特别将利益回馈社会。自然，意大利语中的特鲁美（terme），也是从拉丁语的浴场（thermae）衍生而来。因此罗马特鲁美博物馆也叫做浴池博物馆。

这座戴克里先浴场于公元295年开工建设，公元305年完工，以罗马时代的建筑而言，花费10年时间来修建的，算是很少见，可能是由于这一建筑实在过于庞大了吧。在戴克里先动工之前，最大的浴场是卡拉卡拉浴场，能够容纳1600人同时进场。而戴克里先浴场的规模则为3000人。当然，这个数据并不仅仅包括享受热水浴（calidarium）、温水浴（tepidarium）、冷水浴（frigidarium）等三温暖的人，应该还包括享受浴场内各项其他设施的人。因为罗马式浴场，特别是皇帝捐赠的浴场，必定会附带体育场、图书馆、画廊、音乐厅、游戏室、散步长廊等各项设施。

此外，冷水浴也代表使用者可以在中央的宽阔泳池里自由地泅水。在罗马式浴场中，冷水浴池的周围必定配有大理石雕刻的诸神裸像立在那里供人欣赏。如果在不满百年后发生的异教徒迫害风暴中，罗马的浴场没有遭到破坏，光是一座浴场就可以成为一座博物馆。难怪这座浴场，在当时被罗马人称为“平民的宫殿”。

到了一千八百年后的现代，卡拉卡拉浴场由于长年成为建材挖掘场，雕像、大理石板遭人洗劫一空，成了一片废墟，但遗址的规模还

在。这是因为罗马的市中心随时代的变迁而向北迁移，卡拉卡拉浴场所处的南区未被时代的潮流波及。而反观戴克里先浴场，到了引进铁路的20世纪之后，成为罗马的市中心。现在的浴场周边，三面被中央车站、财政厅，以及罗马最高级的饭店包围。因此，戴克里先浴场没有像卡拉卡拉浴场一样，留下完整的遗址供后人凭吊。现在专用为博物馆的，只是整体中的一个区域而已。不过，如果我们发挥想象力，还是可以感受到其曾经的宏伟和壮丽。

现在的特鲁美博物馆正门面朝中央车站方向，里面陈列着之前被分成四份后的四分之一的美术品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物。当我们买票进入之后，在馆内环绕一圈，会觉得步行距离相当长，其实这只是大浴场的一个区而已。

逛完一圈离开博物馆，沿着遗迹步行片刻，就到了一个叫做“共和广场”的地方。当地人习惯称之为“Piazza Esedra”（半圆形广场）。广场中央有一道喷泉，叫做娜雅蒂仙女喷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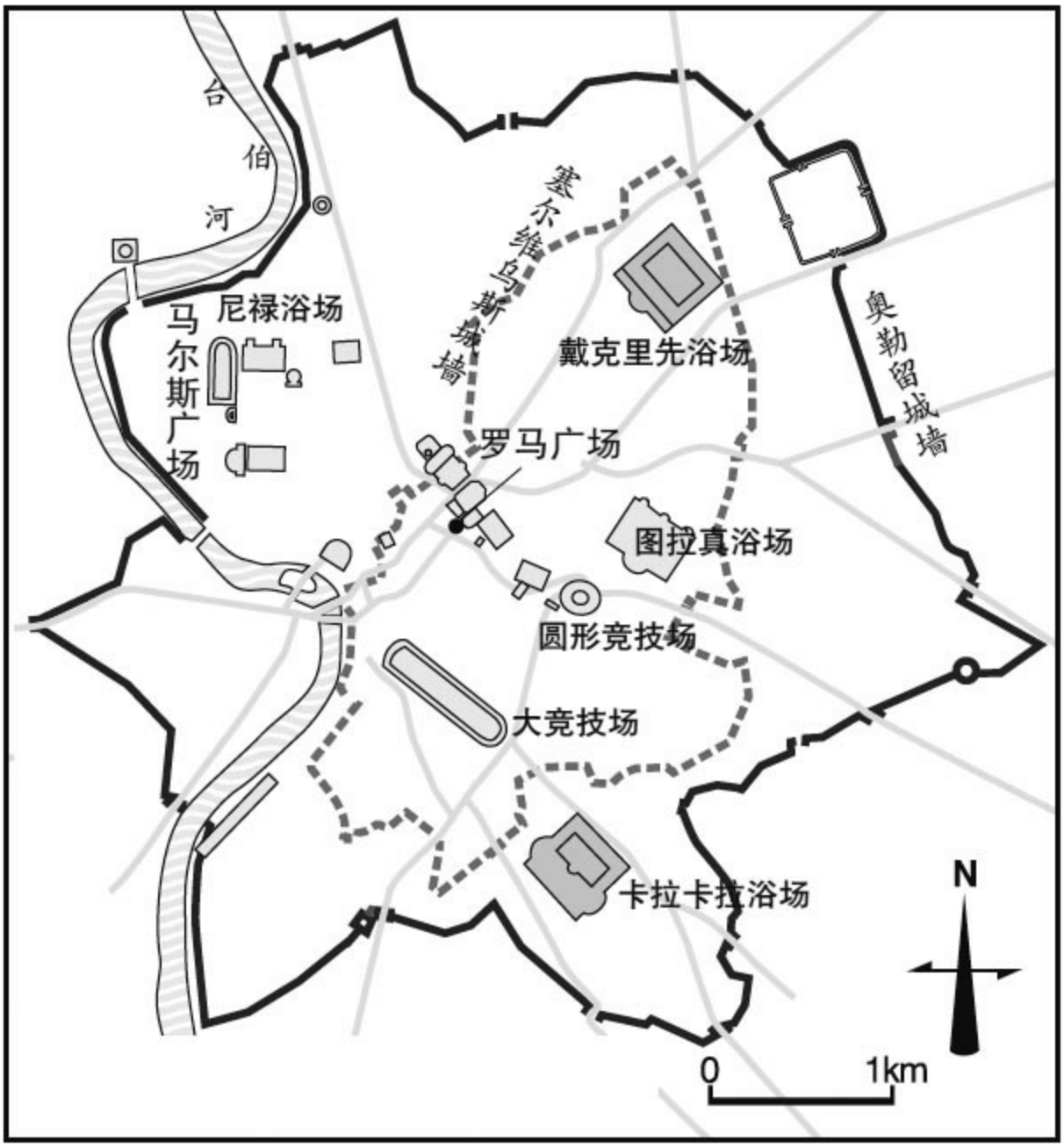
在广场的一角有一座教堂。一般教堂的正面多为平面，但这座教堂的正面是凹进去的，呈弧形。因为这座教堂的墙面直接沿用了戴克里先浴场的“热水浴室”和“冷水浴室”的间隔墙，所以才有这么奇特的外形。

进入教堂内，就是原先的“温水浴室”。穿过这里往里走，会看到一片广阔的空间。教堂主体部分，可以说占据了昔日的整个“冷水浴室”。也正因为沿用原建筑，这座教堂并不像一般教堂那样呈纵向的十字，而是呈横向的十字形。建筑内的8根圆柱，从完工到现在也经历了1700多年的岁月。这座教堂如此奇特的原因，在于米开朗基罗被当时的罗马教皇委任教堂建设任务后，打算尽可能将原有建筑的风貌保存下来。而教皇想在这里建筑教堂，是因为传说建设戴克里先浴场时，曾经强迫4万名基督教徒在这里做劳工。这座浴场于公元295年开工，而镇压基督教徒的敕令却是在公元303年才开始颁布，所以这座巨大的浴场并非完全由基督教徒所建。不过在施工的10年中，最后两年的确是遇上了强制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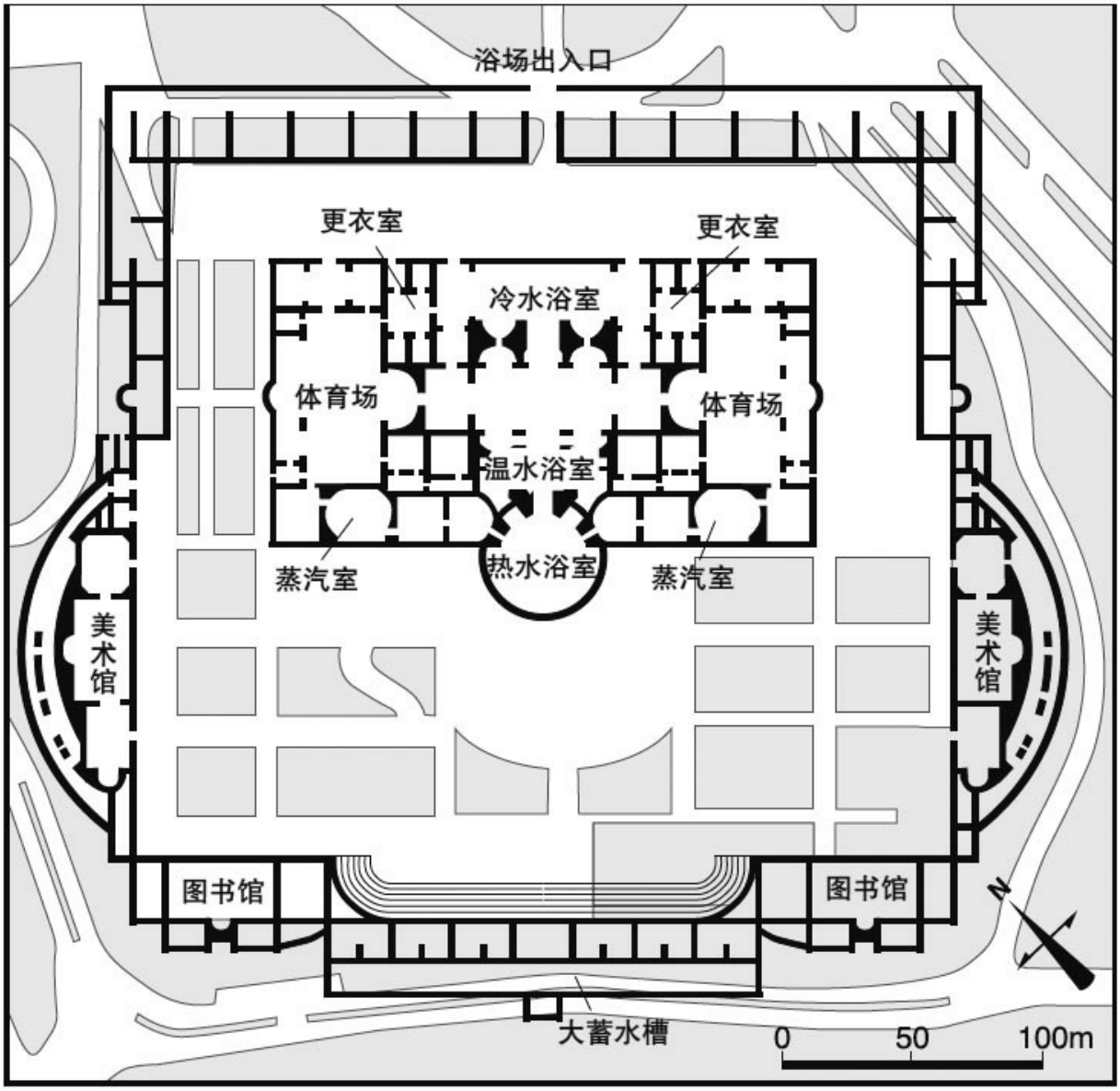
督教徒劳动的时期，所以教堂的名字才会称为“安杰利圣母堂”（Santa Maria Degli Angelli）。不过当时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艺术家之一，米开朗基罗想要在修建基督教堂时，保留罗马的异教色彩，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

戴克里先浴场平面图

安杰利圣母堂入口


台伯河
塞尔维乌斯城墙
奥勒留城墙
尼禄浴场
马尔斯广场
戴克里先浴场
罗马广场
图拉真浴场
圆形竞技场
大竞技场
卡拉卡拉浴场
N
0
1km

当时的罗马市区简略图



卡拉卡拉浴场平面图

但是多亏了他的这一行为，使我们这些后人又多了一处可以体验罗马人空间感觉的地方。另一处，自然就是哈德良皇帝修建的万神殿。也许还是有屋顶的建筑，更适合人们去感受它的内部空间吧。

当我们蒙米开朗基罗的恩惠，体验过大浴场内部的空间感觉之后，就该走到外面去感受一下整个浴场的宏大规模了。出了教堂，穿过广场，走到在呈半圆形环绕广场的长廊里。在18世纪重新开发此地为广场

时，为了修筑国家大道，半圆形长廊的中央部分曾经被拆除。现在我们必须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络绎不绝的汽车统统扫除，才能进入历史的时光隧道。而半圆形的长廊曾经遭受拆除的事实，也要在大脑中自动忽略。因为这个半圆形的长廊，正是广阔的戴克里先浴场的外围。

意大利语“esedra”源于罗马时代通用的希腊语“exedra”，意思是采用圆柱绕成半圆形走廊的建筑形态。在罗马时代，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住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建筑形态。可能是罗马人觉得一条直线到头显得过于单调，而在墙上多了半圆形的曲线可以增加变化吧。

但是，罗马人是极其务实的民族。从沦为废墟的卡拉卡拉浴场遗址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家推测，戴克里先浴场的半圆长廊地下部分，应该同样是提供浴场用水的巨大储水槽。当时的浴场工作人员，应该是先取水烧成热水，然后按照温度要求，分别送到“热水浴室”输水管道，凉却至三四十度之后送至“温水浴室”输水管道，以及将未曾加温的水输送至“冷水浴室”管道。在今天的广场上，喷泉周围满是来来往往的汽车，而广场的地底下，想必环绕着这三种输水管道。

“大浴场”和“神殿”、“大礼堂”不同，完工后如果不勤加维护，就无法持续发挥功能。比如，一般浴场需要预备30天的常规用水，这就要求有足够大的储水设备；还要储备作为燃料用的木柴等等，另外，还要配备固定的人员来保证设备的运作。这些准备工作虽然入浴者看不见，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甚至还很烦琐。就以其中的燃料为例，不是凑齐所需的用量就可以的。有些树木即使在充分燃烧之后还是会冒出浓烟。如果使用那些会冒浓浓黑烟的木柴，不仅浴室地下预留给热气流通的管道会积下烟灰，造成功能不畅，浓烟甚至会进入浴室，造成沐浴者呼吸困难，甚至发生窒息的危险。因此，浴室中严禁使用橄榄木，燃料以针叶木为佳，其中最高级的燃料是冷杉木。光是沐浴场的燃料准备，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巨大的财力、高水平的技术，以及有效发挥功能所需的组织能力，也就无法成就古罗马时代的大浴场。10年后，君士坦丁皇帝又建了一座浴场，不过规模很小，连戴克里先浴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样说来，公元305年建成的戴克里先浴场，算是由皇帝修筑、馈赠给公民社会的最后一座大型公共浴场。

从大浴场修建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直到公元4世纪初期，罗马还是具备财力、技术和组织三方面的能力的。但是仅仅在百年后，罗马却被连这三种能力之一都不具备的蛮族任意践踏，肆意掠夺。站在半圆形长廊里，任由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不仅让人感受着当年大浴场的广阔空间，同时也让人感叹历史的不可思议。

退位

在五贤帝时代，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里虽然设有完善的沐浴设施，但是为了展示民主皇帝的形象，皇帝经常出现在公共浴场，和一般的民众裸裎相对。可是对确立绝对君主制的戴克里先来说，和一般民众保持距离才是重点，因为绝不可能光着身子和一般民众混在一起。另外，在公元303年凯旋仪式办完之后，他就立刻回到了尼科米底亚，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大浴场落成时他也并不在场。不仅如此，他还在大浴场完工的公元305年宣布退位。这在罗马帝国史无前例，不仅由皇帝自己主动要求退位，连同事皇帝马克西米安也被连带拖着下台。

尽管戴克里先是帝国绝对君主制的创始人，但是在有些方面依然积极效法五贤帝时代的做法。比如，在他结束自己20年主政生涯后，将皇位传给既定的继承人。还有，把女儿嫁给继承人，构建一个让大众容易接受的局面。这些方面，都与五贤帝时代相同。

到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在位已经掌权20年。与五贤帝不同的是，

他们是因为过世才结束自己20年的统治生涯，而戴克里先退位之后还活在人间。也许从他的角度来说，帝国重建的所有改革已经实施完毕，自己已经尽到了所有职责。罗马皇帝是一个劳心费力、杂务庞多的职位，就连身体强健的图拉真、哈德良皇帝，也在20年操劳之下油尽灯枯。戴克里先虽然还留有一条命，但应该也是疲惫不堪了。毕竟，他这时已是年逾六旬了。

由戴克里先创立的“四帝共治制”，除了分别设立四位皇帝分担国防守卫重任外，另一个目的是，通过事先设立“副帝”，避免因皇位继承问题引发内战。当然，戴克里先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从第一轮“四帝共治制”转变为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如果权力能够平稳地实现过渡，也就成功避免了内战问题。

只是不知道戴克里先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能享受空前的和平和繁荣，原因之一是五人当中有四人都没有亲生儿子。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皇帝曾经说过：儿子不能选择，但继承人可以挑选。那是因为他没有亲生儿子才这么说。五贤帝时代在马可·奥勒留身上终结，就因为这位“哲学家皇帝”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名叫康茂德，皇位就只能让他来继承。姑且不论这个康茂德适不适合做皇帝，被剔除于皇位继承名单之外的皇室嫡子，无论当事人作何感想，都会是现任皇帝反对阵营最适合扛出来作乱的招牌。也就是说，这会是内乱、内战的导火线。在这个皇权过渡平稳等于政局稳定的时代里，如果皇帝有亲生儿子却选择以实力为先的继位方式，就必然要承担政局动荡的风险。

第一轮“四帝共治制”

“正帝”戴克里先膝下只有一个叫做瓦莱里娅的女儿，没有儿子。

另一位“正帝”马克西米安膝下，按长幼顺序来说，首先是妻子再嫁时带过来的女儿狄奥多拉，以及亲生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女儿法乌斯塔。

在第一轮“四帝共治制”时，正帝戴克里先将女儿瓦莱里娅嫁给了伽列里乌斯，将其收为养子并任命为“副帝”。另一位正帝马克西米安将女

儿狄奥多拉嫁给了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同样将其收为养子，立为“副帝”。如此构成了整个“四帝共治制”的框架体系。天下闻名的猛将伽列里乌斯当时33岁，正当壮年，在迎娶正帝的女儿时没有离婚的必要。但是，另一位副帝候选人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当时已43岁，他在担任百人队队长期间就已迎娶了小酒馆老板的女儿海伦娜，并生有一子。在“四帝共治制”成立时，其子君士坦丁已经18岁。而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后来还是与海伦娜离婚，与狄奥多拉再婚，获得了副帝的职位。在我看来，第一轮“四帝共治制”只是个勉强构建的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22年，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姑且不论将政体转变为凡事高压专制是否值得，至少这20年里，无论是北方蛮族还是东方大国波斯都无法再入侵罗马帝国。

第二，马克西米安的亲生儿子，最有帝位继承资格的马克森提乌斯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少年。

但是到了公元305年，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时，虽然为前妻所生，但身为正帝嫡子的君士坦丁已经年满30岁，而前任正帝的亲生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也已经27岁了。

据说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体系的人事任命，依然是由“四帝共治制”的创始人戴克里先主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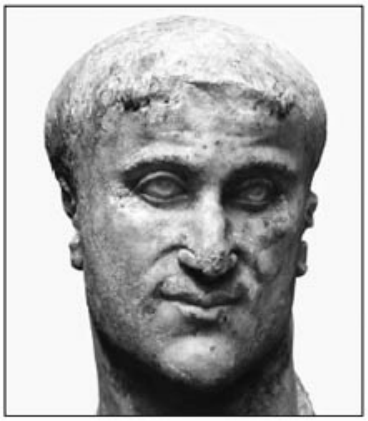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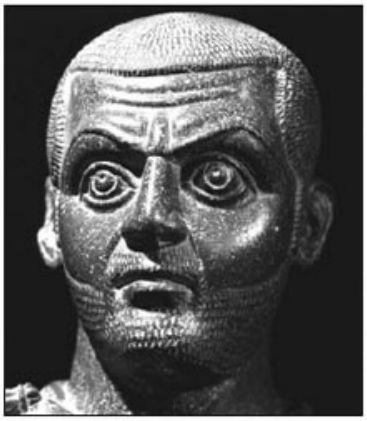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两人退位后，“正帝”由东西方两位“副帝”直接升任补位。问题是，现在又需要补充两位新的“副帝”人选，戴克里先任命西方由塞维鲁、东方由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接手升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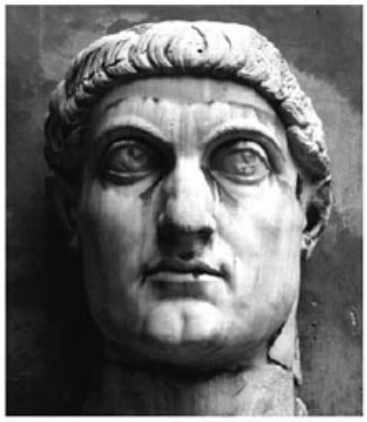
第一轮“四帝共治制”中的四人，加上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被任命为“副帝”的两人，这六位皇帝身上有很多的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于被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称为“罗马帝国国防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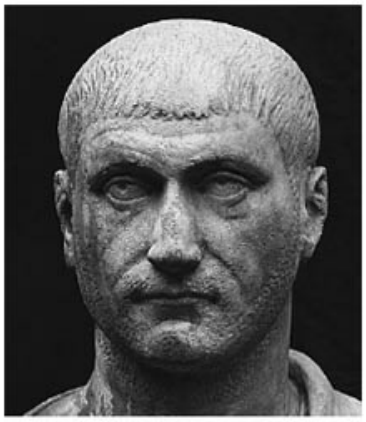
力检测器”的多瑙河防线附近，相当于现在的巴尔干地区。

二、六个人都出身于罗马社会底层。

西方	东方
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不列颠·高卢·西班牙  意大利·北非 副帝塞维鲁	正帝伽列里乌斯 巴尔干·希腊  东方全境 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



君士坦丁



马克森提乌斯

第二轮“四帝共治制”

三、六个人同样都是年纪轻轻就入伍，在军队中苦熬出头。在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被任命为副帝的两个人，塞维鲁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任副帝时的得力下属，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是戴克里先在正帝任内的将领，在正帝西行时镇守东方有功。

		293 年	305 年	306 年	307 年	308 年	310 年	311 年	312 年	313 年	325 年	337 年
↑第一轮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	48 岁	60 岁	61 岁	62 岁	63 岁	65 岁	66 岁	67 岁	去世		
	马克西米安	43 岁	55 岁	56 岁	57 岁	58 岁	去世					
	伽列里乌斯	33 岁	45 岁	46 岁	47 岁	48 岁	50 岁	去世				
↑第二轮四帝共治↓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43 岁	55 岁	去世								
	塞维鲁	不详	不详	不详	去世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	23 岁	35 岁	36 岁	37 岁	38 岁	40 岁	41 岁	42 岁	去世		
	李锡尼	28 岁	40 岁	41 岁	42 岁	43 岁	45 岁	46 岁	47 岁	48 岁	去世	
	君士坦丁	18 岁	30 岁	31 岁	32 岁	33 岁	35 岁	36 岁	37 岁	38 岁	50 岁	去世
	马克森提乌斯	15 岁	27 岁	28 岁	29 岁	30 岁	32 岁	33 岁	去世			

说明：

以上人员均出身于社会底层，因此生年不详。表中数字误差在5岁以内。
293年——第一轮“四帝共治制”开始。
305年——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四帝共治制”崩溃，六位皇帝并立。
308年——为消除混乱，在卡农图姆举行“首脑会谈”。
310年——马克西米安被君士坦丁逼迫自杀。
311年——伽列里乌斯病故。
312年——君士坦丁打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败亡。
313年——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共同发表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
325年——李锡尼在与君士坦丁的对抗中兵败被处死。
337年——君士坦丁作为唯一的皇帝在位12年后去世。

从这两位人选的背景可知，无论是正帝还是副帝，戴克里先的选择标准还是以军事能力和经验为重。如此一来，获选人的年龄自然要比罗

马社会规定的担任国家要职的最低年龄30岁超出许多。也正因此，现任正帝之子君士坦丁和前任正帝之子马克森提乌斯两人，就被排除在了帝位继承者的行列之外。因为，这两人的年龄和军事功绩都不满足条件。另外，戴克里先也不认同将帝位传给儿子的世袭制。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新任的两位副帝，又没有像第一轮“四帝共治制”成立时那样迎娶正帝的女儿为妻，再由正帝收为养子，赋予其政治权威。实际上，当时即使想这样做也做不了。当时的正帝伽列里乌斯没有女儿可嫁，而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女儿还是个幼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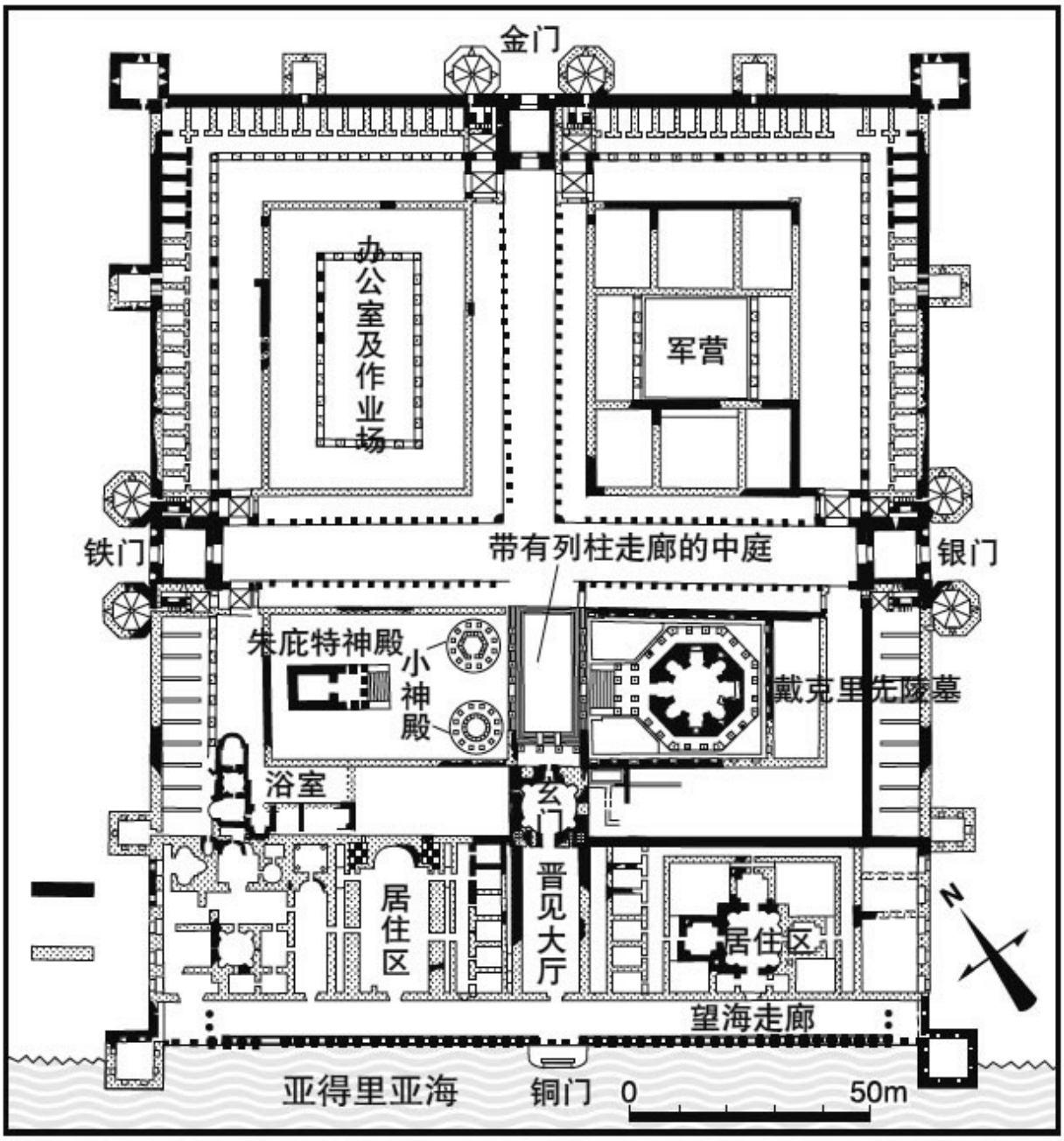
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在比第一轮更为牵强的情况下起步。但是戴克里先似乎倒是相信，第二轮会和第一轮一样，能保持帝国20年的安全和稳定。他退位禅让时，走得干净利落。在那些认为当权者就是紧抓权力死不放手的人看来，戴克里先绝对值得赞扬。宣布退位之后，戴克里先就离开了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回到故乡养老去了。当时是公元305年的春天，距离5月1日两位正帝分别在尼科米底亚和米兰发布正式退位宣言不久。

从住宅可以看出屋主的个性。特别是这个人为养老送终修筑的房子，更能看出其个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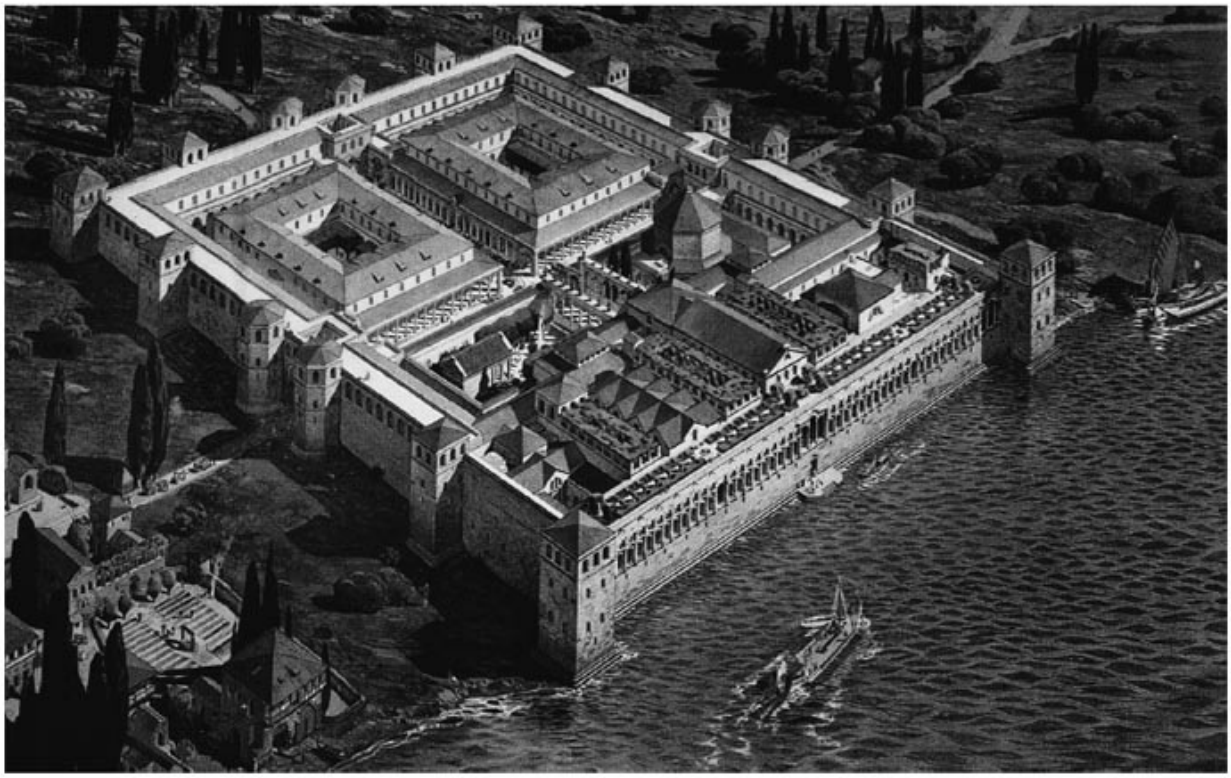
戴克里先出生在达尔马提亚地区，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小城市索罗那。而他选中养老的地方就在索罗那附近、远离尘嚣的阿斯帕拉托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曾以此为军事基地，因此按照意大利语改称为斯帕拉托。现在这个地区属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名字也照斯拉夫语系发音改称为斯普利特。

在当地的海岸边建有一座边长100米以上的方形建筑，这一庞大的建筑物，既不能称为“别墅”，又不像“宫殿”，看来只能叫“城堡”了。这里也就是将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的男子养老送终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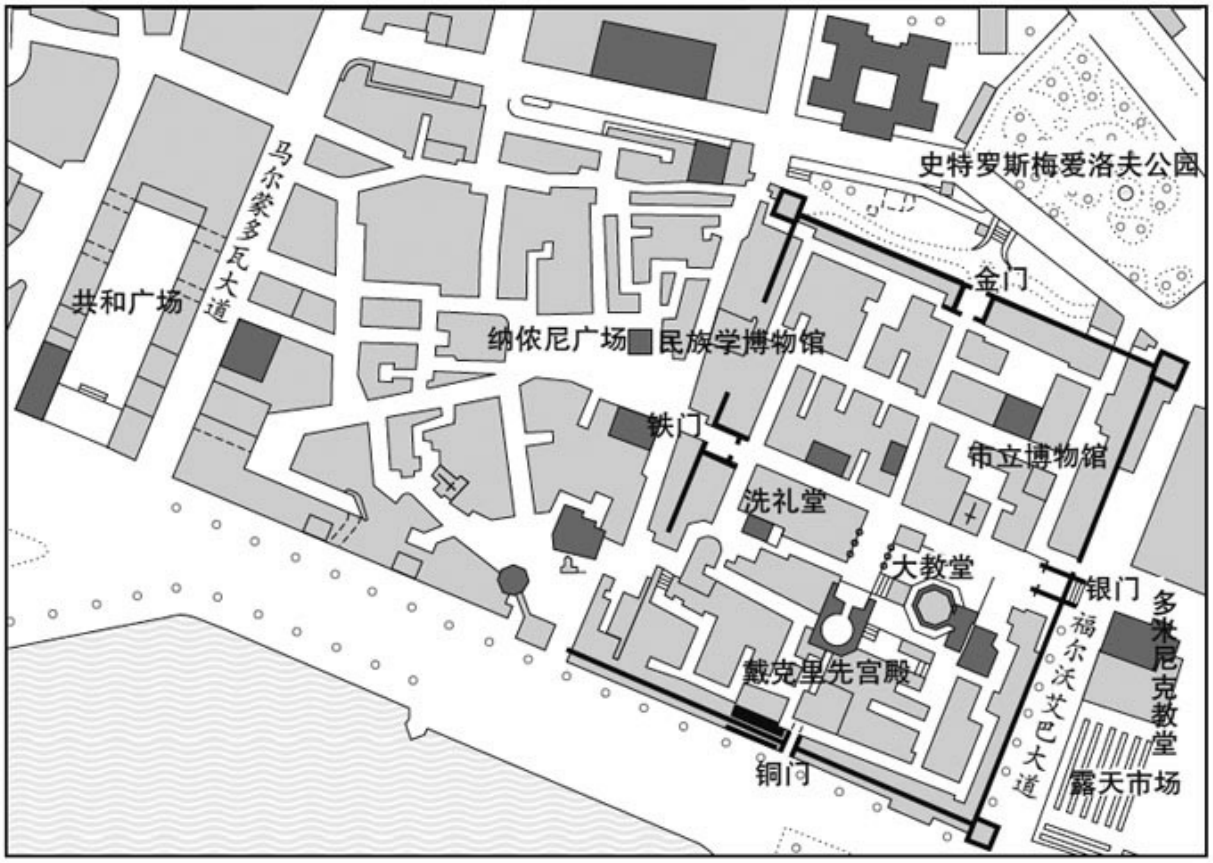
仅从平面图来看，这里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的军团基地，但这里的建筑比军团基地还要坚固。即使到了1700年后的今天，这栋建筑物还留下了一部分。可以想见，在罗马帝国末期这里还是能够充分发挥建筑物的功能的，这也难怪当时每当蛮族入侵，附近的居民会选择逃到这里避难。前任皇帝选来养老的斯普利特，原本连乡镇都算不上，后来渐渐发展成城镇，也是因为逃入此地的居民在这里定居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现在斯普利特老街，有一半左右都是以前戴克里先宫殿遗址。这里已经不是古迹，而是一座城镇了。


金门
办公室及作业场
军营
铁门
带有列柱走廊的中庭
银门
朱庇特神殿
小神殿
戴克里先陵墓
浴室
玄门
居住区
晋见大厅
居住区
望海走廊
亚得里亚海
铜门
0
50m
N

戴克里先宫殿平面图



戴克里先宫殿复原图



现在的斯普利特市区图

到现在还能遗留下这么多遗迹，可能是因为整个建筑都用石头修建。这与罗马传统的修建方式——用砖瓦砌墙，外贴大理石板——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如此，这栋建筑给人的感觉，说好听点是稳重，说难听点就是沉闷。宫殿占地宽广，尤其是西南角皇帝个人私用的部分面朝大海，想必光线充足，通风良好。临海的一面有一条100米长的直线走廊，就连散步也没有外出的必要了。

可是，参观完这座建筑让人忍不住怀疑，住在这里是不是会感觉非常苦闷？毕竟，这里没有一件让人觉得优美的事物。和提比略皇帝在卡普里岛的别墅、哈德良皇帝在蒂沃利的别墅比起来，真让人怀疑以前在罗马帝国连皇帝都具有的审美意识，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整个城的气氛令人感到压迫、苦闷，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是戴克里先改造成绝对君

主制后的后期罗马帝国的真实写照。在这座城的内部，与最高神朱庇特相对的位置，盖有戴克里先生前为自己修好的坟墓，这也证明了戴克里先将这座城堡式的宫殿当成送终的地方。只不过百年后，这里也跟其他所有“异教”建筑一样，被基督教当成教堂使用了。

和戴克里先同时退位的马克西米安，在引退后并没有回家乡，而是去了意大利南部一个小镇，住在很早以前购入的别墅里。这并不代表马克西米安与戴克里先个性上的差异，不会像戴克里先那样事先作好完善的计划，盖好房子搬进去养老，而是因为马克西米安根本没有退休的打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被年长5岁的戴克里先在不知不觉中说服，也许是他为人憨厚吧。而当他被说服、宣布退位之后，不但没办法享受退休生活，反而觉得55岁的身体精力过度旺盛，无法在意大利南部度日。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也就提不起兴趣修建养老用的房子。但是，公元305年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之后，仅仅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公元306—377年）

“四帝共治制”崩溃

公元306年7月，在不列颠指挥对北方蛮族防卫战的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驾崩。具体死因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他既非战死，也非遭到暗杀，更不是长期卧病之后身故。据推测，可能是五十有六的皇帝，突然发生了脑部或者心脏方面的急性疾病。

这一发生在帝国最西北边境的突发事件，要传遍全帝国可是要花费些时间的。而且实行“四帝共治制”之后，首都罗马也不再像元首制时期那样，集大脑和心脏的功能于一身。如果功能集中于一处，信息自然也朝一处集中。以此为依据制定的政策，也就能从罗马传布到全国各地去。当时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快马还是狼烟，全都仰赖罗马式的石板大道。因此条条大道通罗马，也就意味着条条大道起于罗马，这一体系对于信息和指令的传达，极有助益。

但是，“四帝共治制”剥夺了首都罗马的这一功能。随着皇帝增加到4名，首都也增加到了4处，罗马丧失了权威地位。当然，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这4座城市，也同样铺设了道路网，但是，并没有达到罗马那种四通八达的程度。遍布罗马帝国全境的罗马道路网，是罗马人历经500多年的努力的成果，不是短短十来年就可以模仿得来的。而且，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也没有像第一轮时那样，存在戴克里先这样权力、威望都凌驾在另三位之上的皇帝。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的四帝之间的差距，要比第一轮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信息传过了多佛尔海峡，传播速度依然缓慢。而获得信息之后身处异地的诸位皇帝又必须相互协商。经过这一系列程序，将最终协商的政令再传回发出信息的人的手边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较过去要漫长得多。而且，以亲生儿子身份为父亲送终，并将噩耗传给列位皇帝的君士坦丁，可不是那种会坐着等消息的人物。

后来被尊为“大帝”（拉丁语是Magnus，英语是the Great）的君士坦丁，在父亲猝死那年31岁。虽然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亲生子，而且在兄弟间年纪最大，但他当时的立场很微妙。因为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前妻所生，他的生母海伦娜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出身低微。与前正帝的女儿狄奥多拉所生的两个儿子，即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相比，立场较为不利。而实际上，当公元293年他的父亲与狄奥多拉结婚当上副帝时，就把他与母亲一起送回东方，免得留在身边会有麻烦。

但是，对君士坦丁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他因此得到机会，在以尼科米底亚为中心的戴克里先皇帝帐下，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从18岁到30岁，君士坦丁利用这一学习的最佳时期，积累了作为一位皇帝所必需的军事经验。至于他具体在哪里，担任何种职务，指挥过多少士兵，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在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升格为正帝的那一年，他回到父亲身边。而成为正帝之后责任更为重大的父亲，愿意将他视为武将予以重任，证明他在东方的军事经历得到肯定，也给他带来了机会。另一件幸运的事情，在于他能在父亲过世的前一年回到他的身边。

对于战争中的司令官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得到有才能的武将更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名武将还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当然再好不过，这样也就可以更放心地予以重任。而君士坦丁也没有辜负身为总司令的父亲的殷殷期待。在士兵当中，这名年轻武将的威望与日俱增。不仅如此，而且他还长得牛高马大，威风凛凛，外表上也颇具领袖气质。

只要是参战的官兵都心知肚明，那就是战争进行到一半失去总司令是一件多么不利的事情。当知道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去世的消息后，官兵们自然也就把寻求继任者的目光投在了年轻的君士坦丁身上。毕竟，他是正帝所有儿子中年纪最大的，再者他已经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而且，君士坦丁本身也不是那种静待周边舆论成熟的人物。

在聚会的场合，要操控与会者的意见并非难事。只要事先安排好煽动者以及几个随声附和的人就可以办到。当带着正帝死讯的特使还在多佛尔海峡一带时，聚集在不列颠北部军团基地的官兵已经共同拥立君士坦丁为皇帝。而且，不是“副帝”，是“正帝”。也许他们认为既然过世的是正帝，那么继位的自然也该是正帝。但是，这样一来，在帝国最西北边境的官兵，就破坏了戴克里先制定的“四帝共治制”。

以往由士兵推举皇帝的恶习，容易造成政局动荡。“四帝共治制”创立的目的，也包括排除这个恶习。但是，在这项制度创设13年后，即在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仅仅一年之后，已经有一角开始崩溃。同时，也为未来18年的动荡和内乱拉开了序幕。

现任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的消息和官兵们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的消息传到他耳边，究竟相隔多长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够他为正帝去世立下合适的应对政策。伽列里乌斯一直很尊重老长官戴克里先，因此他也希望能维持戴克里先创立的“四帝共治制”。问题是，这一既成事实也难以抹杀。因为经过戴克里先改革之后，罗马的军队性质已经不同以往。军队的精锐不再是元首制时期防守在帝国边境的军团，而是变成了皇帝的直属部队，即由皇帝亲自率领、四处打击敌军的游击军团兵。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的就是这样的精锐士兵，且人数不下5万。现在要想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不可能的。如果胆敢宣布他们拥立的皇帝无效，马上就会掀起一场内乱。

正帝伽列里乌斯决定采用妥协方案来维护“四帝共治制”。空缺的帝国西方正帝的职位由副帝塞维鲁升格担任，君士坦丁填补西方副帝的职位。君士坦丁也接受了这一妥协方案。毕竟这一大胆且懂得等待的年轻人才30岁出头。乍看之下，“四帝共治制”似乎得以成功维持存续，但实际上，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六位皇帝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名正帝同时退位，拉开了第二轮“四帝共治制”的序幕。当时，身为皇帝之子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体系之外的，有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两人。但在短短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却成为副帝，回到帝位继承的轨道上来。依然被排除在外的，只剩下马克森提乌斯一个人。而且他不但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嫡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女儿。而相对的，新任副帝君士坦丁的妻子并非皇室出身。此外，这两个人的年龄只差3岁。

公元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于不列颠。

随后，君士坦丁宣布继承父亲的正帝职位。

正帝伽列里乌斯以向君士坦丁妥协的方案，暂时维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三个月后，即公元306年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宣布登基称帝。

这并不表示马克森提乌斯对于自己一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人选之外的愤怒，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引爆，而是他个人的不满，与他所在的首都罗马以及常年作为帝国核心的意大利人民对“四帝共治制”长期累积的不满相互融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罗马，在国家（res publica）性质上，与希腊的雅典一样，是城邦。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城邦是先有首都，然后再渐渐向外发展领土。而领土国家则是先有领土存在，然后再决定首都所在。换句话说，城邦是以首都为先的。无论政体如何变化，君主制、共和制，哪怕是皇帝专政，对罗马帝国来说，首都罗马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她不仅是孕育国家的母体，也是这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建国的

过程奠定了她无与伦比的地位。

但是，戴克里先设立的“四帝共治制”，却把这项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打破了。

作为一国之首脑的皇帝，大本营却另在他方，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时才会回到罗马。

元老院的作用也随之淡化。原本的元老院，不仅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也承担着为国家各重要部门储备人才的任务，具有心脏般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法律改成了以“敕令”的方式，由皇帝的意志来决定。而且戴克里先严厉禁止元老院议员进入军队任职。如此一来，文官和武官完全分离。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的地位就如当时的讽刺诗里说的那样：“只需要在战车赛的竞技场上挥挥手帕宣布开始的指令就可以了。”

而在首都罗马，虽然已不再像元首制时期那样数以万计，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近卫军团驻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建立的兵营依然矗立在首都的东北角。但现在这些人也同样无事可干。原先他们的任务是随皇帝御驾亲征，但现在的皇帝都带着自己的直属军队。加入近卫军团的士兵，大多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年轻人，但是老家在巴尔干的皇帝们所率领的士兵当然以巴尔干人居多。这样，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只能无所事事地等待退伍，心中自然会累积起诸多的不满。

普通民众对现状也同样怨声载道。以前，历代皇帝都坐镇首都罗马，总归要寻些名目给下面的人一些赏金，现在皇帝很少来，赏金自然也就没指望了。此外，罗马大角斗场举办角斗士竞技的次数也必然随之减少。要知道，角斗士竞技就跟战车赛一样，是一项花费不菲的竞技项目，以前大多是由皇帝举办的。现在就算修建了大型浴场，也无法洗刷人们心中的遗憾。

没有了这些好处不说，取而代之的却是重税。这些税收从戴克里先时开始征收，在以后的时间里只增不减。新税已经改成由国家制定税收数额，且不问收益一律依法课征。以前作为帝国发源地的意大利本土和尊为首都的罗马，长期以来一直免缴直接税，现在也不再享受这种优待，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全部都要严格按规定缴税。

总而言之，现在时代变了，意大利和罗马的民众再也无法享受以前的优待了。而民众要从心理上接受这种转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实权，当然也就称不上首都、本土。但是罗马作为首都，意大利半岛身为本土发源地的岁月，已经超过1000年了。

即使在充满迷茫的公元3世纪，皇帝更换最频繁的时期，由士兵推举的帝位继承人，哪怕是事后追认，至少都会寻求元老院的承认。此外，将国家政策转化为法律时，皇帝也不可以跨过元老院决议的程序。但凡战事中取得的战果，也都要首先向元老院汇报。

虽然近卫军团的官兵多次卷入刺杀皇帝的行动中，但是也并未剥夺他们身为军人的固有职责。

对普通市民来说，首要的不满还是税收问题。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税制，以广征薄税为方针，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元首制时期持续了200多年。如今的税收，却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经费而征收。国家机构一旦制定了税赋，就不大可能废除，所以关税、营业税也不可能消失。但是，这两种税赋，已经不再以“二十分之一税”、“百分之一税”来代称。这就意味着，其税率也已经不再是往年的5%和1%。而且，在戴克里先推动的新税制下，又要征收以往不需要缴纳的直接税了。

民众第二个不满的地方，在于戴克里先立法剥夺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还不至于像18世纪的人权主义者那样，认为这是侵害人权。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这种被约束的不自在。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失带来的城市人口过度密集，想必百姓周围的陌生面

孔天天都在增加。

到公元4世纪初期，首都罗马的人口依然维持在百万以上，即使经历了险象环生的3世纪危机之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有所减少，但是内情已大不相同。以前的人虽然抱怨大城市太喧嚣，但依然选择住在首都，是因为都市生活有其优点。但如今，迁徙和择业受到限制，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想迁徙也无处可去，只好继续住在原地。而且，当时的治安状况也是日益恶化。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私人警卫，那么随时可能遭到残兵败将或者失业农民组成的强盗团伙的侵扰，根本无法悠闲地享受田园生活。这个时期首都罗马的百万人口，几乎都是对“四帝共治制”不满的人。支持马克森提乌斯的也就是这些人。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被时代抛弃的阶级所作的最后一次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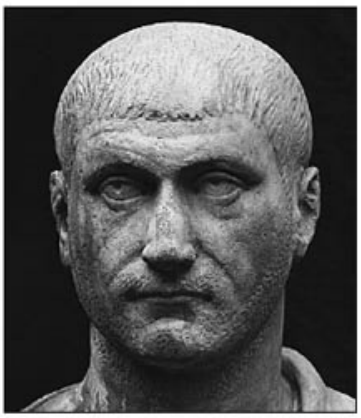
在“四帝共治制”体制下，意大利和罗马都归正帝塞维鲁管辖。首都罗马设有塞维鲁任命的“首都长官”。在这名长官及其几个部下被杀害之后，政变也就结束了。随后，马克森提乌斯向元老院请求正式承认其称帝即位。元老院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般表示过敬意了，很快就全票通过了这名28岁皇帝的任命案。近卫军团也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当然，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大表欢迎。事情能进展得如此顺利，要归功于事前所作的周密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将马克森提乌斯的生父，前正帝马克西米安，重新推上了政治舞台。马克西米安虽然让戴克里先拖着一起退了位，但精力依然充沛，充沛的精力不知到何处发泄。与其说他这时出马是协助儿子，不如说他早就在等待发挥才干的机会了。

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积极参与，在元老院、近卫军团乃至一般民众眼中，都无疑是一个重量级的砝码。毕竟，这个人可不仅仅是一年前的“正帝”这么简单，他还曾经担任帝国西方负责人19年，并且有12年直接负责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事务。比起长期待在不列颠和高卢的现任正帝塞维鲁，更受大众亲近。公元303年，让首都人民为之疯狂的凯旋仪式，就是由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人共同举办。“戴克里先大浴场”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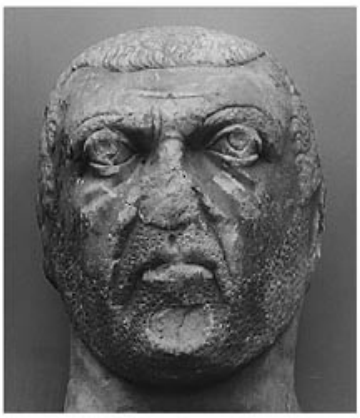
然是由戴克里先决意修建，但实际负责具体建造事宜的，还是以米兰为根据地的马克西米安。想必在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看来，感觉只是一年前的皇帝又回到了身边。

而且，从战功来看，马克西米安也同样胜过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的任何一位皇帝。因此，马克西米安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多了一名56岁的武将这么简单。相信马克森提乌斯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在这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他已经辞掉公职，所以无法带兵。马克森提乌斯把紫袍献给父亲，请求他重新披上，意即复辟帝位。这件事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承认。但是，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刚刚开始一年，就变成了“六帝”。尤其是帝国西方，更是一片混乱。本该只有两位皇帝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四位。

西方	东方
正帝塞维鲁 意大利·北非 	正帝伽列里乌斯 巴尔干·希腊
 不列颠· 高卢· 西班牙 副帝君士坦丁	 东方全境 副帝马克西米努斯



马克森提乌斯



前正帝马克西米安

公元306年时的罗马帝国皇帝

要收拾这么混乱的局面，只有西方正帝塞维鲁亲自出马了。毕竟事情发生在他直接管辖的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收拾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篡位的罪名讨伐马克森提乌斯。“四帝共治制”毁于公元306年。20年来，在戴克里先治下从未发生过的内战，在这一年又重新拉开了序幕。

正帝塞维鲁行事倒也是雷厉风行。虽然，当时正处于不适合作战的严冬季节，但他还是即刻率军离开根据地米兰，向南方的首都罗马挺进。不过，在这里要替他辩解几句，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实在很不利。

当时，各位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都随时保有数万兵力。每当御驾亲征时都优先动用这些精锐部队。

但是，塞维鲁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任副帝时麾下的战将。也正因为如此，在公元305年，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升任正帝之后，推举这位值得信赖的部下为副帝，并获得了戴克里先的首肯。因此，塞维鲁才得以成为管辖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副帝。

成为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皇帝的塞维鲁，在前往首都米兰上任时，肯定只能带少数的心腹手下。因为与他在不列颠、高卢同甘共苦十几年的官兵们，必须留在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身边。而另一方面，他在米兰接手的，是在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手下作战了近20年的部队。

仅仅在一年之后，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随后，去世的正帝之子君士坦丁被士兵们拥立为皇帝。面对既成事实，四巨头只好将塞维鲁升任为正帝，承认君士坦丁即位为副帝，以保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在一连串的意外局势之下，仅仅担任副帝一年的塞维鲁就升格成了

正帝。但是，他手下没有嫡系部队的不利条件依然存在。要将接手的部队转化为个人的手下，一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而且武将要想把接手的部下转化成自己的手下，就必须率领部队外出作战，通过战场指挥让部下认可自己的能力。偏偏这一年当中，既没有蛮族的入侵，也没有需要皇帝亲自出马的大规模剿匪行动。基于以上事由，当塞维鲁带兵南下讨伐篡位的马克森提乌斯时，手下全是一年前还在前任正帝指挥下、与当时的总司令亲近的官兵。而如今，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却在敌方阵营。再加上行军途中经过的意大利中部城市，都和首都罗马一样，对“四帝共治制”充满敌意。

塞维鲁的作战计划似乎是准备沿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由此转向弗拉米尼亚大道进攻罗马。不过，他的先锋部队是否逼近罗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已知的有两件事：一是行军途中，各城市在食宿方面都很不配合；二是主力部队走过埃米利亚大道后，并未进入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逃到了里米尼北边的拉文纳。塞维鲁逃入拉文纳之后并没有继续行军，甚至才刚刚准备防御作战就沦为俘虏。这是因为率领马克森提乌斯军北上迎击塞维鲁大军的，正是马克森提乌斯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塞维鲁率领的士兵一看到以前的老司令出现在战场上，就立刻丧失了斗志。正帝塞维鲁遭麾下官兵抛弃后沦为俘虏，被押送至罗马，以强迫自裁的方式遭到杀害。增加到六名的皇帝，很快就少了一名。据记载，当时是公元307年2月。

知道正帝塞维鲁的悲惨下场之后，另一位正帝伽列里乌斯也无法袖手旁观。这次轮到伽列里乌斯亲自出马讨伐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帝国西方正帝的失败，原本大可委任西方的副帝来善后。但是，一旦身为帝国西方副帝的君士坦丁雪耻成功，那么整个帝国西方都会落入这位年轻的副帝手中。伽列里乌斯害怕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选择了亲自率军出击。

伽列里乌斯有获胜的自信，且这份自信也有相当的根据。他的直接

管辖范围是巴尔干和希腊。巴尔干地区包含多瑙河，这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边境防线。也正因如此，守卫多瑙河防线的士兵，早在元首制时期就以罗马军队中的精锐著称。正帝伽列里乌斯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部队。“四帝共治制”体制下的罗马皇帝全数出生在这里，也足以证明上述说法不假。当伽列里乌斯身为副帝时，率领叙利亚驻军与波斯作战，大败而归，而第二场作战却胸有成竹，胜利而归。当时之所以能“胸有成竹”，就在于伽列里乌斯调来了多瑙河防线的官兵，率领他们作战。

而且，伽列里乌斯有足够的时间将接手的士兵转化为自己的部队。在“四帝共治制”发挥功能的13年里，无论是担任副帝还是升格正帝，他的驻地都没有变更过。对伽列里乌斯而言，手下的官兵都是自己最忠实的亲兵。不过，弱点隐藏在伽列里乌斯自己身上。

公元307年，伽列里乌斯大约47岁。在元首制时期，这正是获得皇帝推举、取得元老院席位的年纪。出身贫贱而在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都必须前往首都罗马。这些新晋议员基于工作需要，都必须在罗马先学习一年政务，待一年以后再返回边境工作。因为当时文官生涯和武将生涯并未分离，罗马社会的精英阶层通常要交叉经历这两个领域的事务，累积经验。当时，军事领域的人事任命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政务领域的人事权则大多属于元老院。而且，皇帝在罗马，元老院也在罗马。因此，每当职务有所变更，多的是造访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的机会。

但这种情况仍让戴克里先打破了。恐怕伽列里乌斯直到47岁也没有踏足过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他成为正帝以后也没有举办过凯旋仪式，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前往除了举办凯旋仪式而没有其他用处的首都罗马。可是，这方面的无知却让伽列里乌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一个霸权国家的公民来说，当失去行使霸权的权力，也随之失去跟随霸权的特权之后，唯一仅剩的就是“尊严”。只有“尊严”是外人想抢却抢不走的东西。如果连“尊严”也丧失了，那就真的没有未来了。不

过，至少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还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偏偏伽列里乌斯却用对待帝国边境作乱部族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

所有不协助塞维鲁作战的城市，全数遭到伽列里乌斯军队的烧杀劫掠。其行为已与入侵的北方蛮族的行径无异。偏偏这些暴行却是以击退蛮族为己任的正帝率领的罗马正规军所为，使得旁人已经没有为伽列里乌斯辩解的余地。这件事情使得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开始反对伽列里乌斯。而且，反对伽列里乌斯的气势还伴随着商船传到了北非，真可谓是坏事传千里。局势演变成这样，不管是多么精锐的部队也无法继续行军了。伽列里乌斯率领的部队面前因而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城墙。

曾经就连外国人都认为“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光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并不一定就能取得军事成果。“后勤”，在字典上解释为战场后方的粮草及其他军需用品的供给、补充和运输工作。不过这是狭义的含义。过去的罗马人对“后勤”的定义更为广泛，就连如何拉拢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也是后勤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可以从“logisticus”一词的由来得到证明。拉丁语中表示狭义“后勤”的“logisticus”，其实是在帝国后期借用的希腊语。在罗马军队天下无敌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使用过“logisticus”这个词。“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的年代里，表示“后勤”含义的拉丁语是“ars”。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art”，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仅跟艺术有关的技能。但实际上，这个词本来是指所有由人类发挥的“技术”。罗马军队真正强悍的地方，除了战斗行为以外，还有将人类所有发明的“技术”全数投入到作战中。

早期的希腊语比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更为成熟，因此有适当的用语时，罗马人会直接引用希腊语。如果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找不到对应的希腊语，罗马人则会另行造字。对罗马人来说，后勤不只是希腊人观念里的“logisticus”，还具备更宽广的含义。因此，适于用“ars”来表达。

试想一下，能够不经过战斗就引为同盟，已经算是政治手腕了。在

希腊人当中，即使不算斯巴达人，其他国家在战斗方面的能力也不差。但是，和专精于战斗的斯巴达相比，雅典的综合国力要强盛得多，但就连雅典也不擅长这类外事政治。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势鼎盛之后急速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连同盟国都得罪光了。也许正因为希腊人天性如此，所以他们观念中的后勤才会是狭义的。

简单来说，现在伽列里乌斯在进攻意大利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ars”所代表的后勤意义。首都罗马听说正帝率领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前来进攻后，整修城墙准备打一场硬仗，结果却是，空等一场。伽列里乌斯的部队根本没能接近首都，只在意大利北部兴风作浪一阵子，就返回了巴尔干地区。对伽列里乌斯来说，真是颜面扫地。他本人正是因为军事能力受肯定，才获得皇帝的位置。现如今这场在意大利战场的失利，已不仅仅是面子的折损，也连带着威胁到他目前的地位。

首脑会谈

根据记载，在公元308年秋天，正帝伽列里乌斯曾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位前任正帝请到卡农图姆（现在的佩特罗内拉）的军团基地开会。说是前任正帝，其实这两人也不过才下台三年，这次会谈应该算得上是首脑间的会谈吧。议题，不难想象，自然是关于如何处理塞维鲁殉职后的现状。

据说，58岁的马克西米安一开始就极力劝说戴克里先回到皇位上来。他主张凭着两位正帝的权威，可以轻易地打破目前的局面。

但是，63岁的戴克里先坚决反对这样做。不仅如此，他更要求昔日的同僚马克西米安也脱掉紫袍。既然他本人保持退位元首的身份，那么马克西米安也应该遵守退位时发表的公告行事。而且，他强烈主张继续维持“四帝共治制”。

戴克里先对“四帝共治制”的执着，倒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个性变得固执。召开会谈的地点卡农图姆位于多瑙河边，夹在同样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城市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这一带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帝国的前线要地，首脑们能聚在这里举行会谈，说明连前线基地也是绝对安全的。戴克里先在位时，向来以不惜一切代价守卫防线阻止外敌入侵为优先事项。“四帝共治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构思、推动的。3世纪危机距今不过50年，在国难空前的当时，卡农图姆被大举入侵的蛮族淹没，如同陆地上的孤岛。想必戴克里先认为，光是卡农图姆能够安全地让首脑们聚在这里召开会议，就足以证明“四帝共治制”的效果。他会强烈主张维持“四帝共治制”，也是因为有这些背景的支持。

一如往常，马克西米安再次让多年的好友、年长自己5岁的戴克里先说服。他脱下两年前重新披上的皇帝紫袍，并发誓以后不再插手国事。之后，两名前任正帝接受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提议，决定由李锡尼填补由塞维鲁殉职后空缺出来的西方正帝的职位。卡农图姆的首脑会谈，成为一场重新推动“四帝共治制”的会议。

李锡尼比伽列里乌斯小5岁，是伽列里乌斯的亲密好友。对于在意大利用兵失败而威信受损的伽列里乌斯来说，将多年的好友安插到西方做同事，想必心里放心很多。李锡尼也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社会底层，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野心不小。

公元308年秋天，卡农图姆首脑会谈确定人选之后，开始了第四轮的“四帝共治制”。与延续了12年的第一轮“四帝共治制”相比，之后的“四帝共治制”都难以长久。公元305年开始的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只维持了一年。以四帝之一的猝死，填补空缺之后开始的第三轮“四帝共治制”，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就宣告结束。制度无法长期维持，说明设计有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每次都把自认为有权利继位的人排除在外。

公元308年，第四轮“四帝共治制”开始后，有两个人极为不满：

一个是帝国东方的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他的不满在于，自己在副帝的位置上努力表现了三年却无人过问，而全无副帝经验的李锡尼却一下子坐上了帝国西方正帝的职位。不过马克西米努斯当时还年轻，才38岁，而且他具备副帝身份，还在帝位继承的轨道上。因此马克西米努斯决心压下心中的不满，将精力放在自己直接负责的东方区域上以强化个人的权势。只是这么一来，“四帝共治制”已经不像当初戴克里先规划的，由四名将领分担帝国国防任务的制度，而是变成四位皇帝各据帝国一方，将国土划为私人领地的“四帝共治制”。

另一个则是再次被排除在“四帝共治制”之外的马克森提乌斯，他比马克西米努斯更加愤懑怨恨。

如今他已经达到在罗马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下限30岁。

而且，他的身份不仅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亲生儿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女儿。在卡农图姆的首脑会谈上，三名与会首脑中，他的生父与岳父就占了两席。结果这两人都没有试图将他的身份合法化，使他依旧被排除在领袖地位之外。这让马克森提乌斯感到极度愤恨难平。马克森提乌斯的不满和愤怒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马克森提乌斯被摈除在外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战功，那李锡尼的登基又该如何解释呢？据说他的父亲从卡农图姆回到罗马后，父子两人成天因此争闹不息。

尽管如此，30岁的马克森提乌斯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时机来临。虽然他的官方立场是篡位者，但至少意大利和北非实质上是由他掌控的。他决定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统治，把目前的立场转变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开始效仿元首制时期的皇帝，大力推动公共事业。

做父亲的马克西米安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父子争吵。本来他应该和戴克里先一样，戴克里先已经回到面朝亚得里亚海的城堡式宫殿里养老了，他也应该回到位于意大利半岛鞋尖位置的卢卡尼亚的别墅里，

重新开始自己的隐居生活。但是，他的精力实在过于旺盛，这让他难以安于隐居生活。而他也算是当时最不擅长控制自我活力的人，这也代表他极容易冲动行事。

要从意大利半岛南端向北前进，必须要走罗马大道，这样一来，儿子马克森提乌斯自然就会察觉自己的行踪。马克西米安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高卢地区，应该是走海路，搭船往西北航行，斜跨地中海。不管真相如何，总之，马克西米安突然出现在了帝国西方副帝的根据地特里尔。并且，马克西米安对前来迎接的副帝君士坦丁提议，要把女儿法乌斯塔许配给他。

至此，对33岁的君士坦丁来说，通往正帝宝座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备。首先，虽然仅在位一年，但他的生父是帝国正帝；其次，手下有效忠于他的、质与量兼备的军事力量；再者，他本人在军事方面的成绩也不落人后。而且，他三年前就已担任副帝，卡农图姆会谈又再次确认了他的地位。对君士坦丁而言，唯一欠缺的就是没有迎娶皇帝的女儿为妻。

君士坦丁爽快地答应了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提议。虽然他膝下已有一子，但依然决定和妻子米纳维娜离婚，与法乌斯塔公主结合。婚礼、婚宴设在罗马时期的阿拉特，即现今的法国南部城市阿尔勒，并大举宴请全体市民观礼，极尽奢华隆重。一来君士坦丁个人爱讲排场，再者对身处他这种立场的人来说，结婚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因此必须办得豪华热闹，达到让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效果。当然，年届六旬的马克西米安列席婚礼，但新娘的哥哥马克森提乌斯则没有受到邀请。戴克里先也曾将女儿嫁给后来的皇帝伽列里乌斯，在这场婚礼之后，马克西米安的姻亲条件也和戴克里先相同了。

如果说“冲动”一词是说不计后果、莽撞行事，那么用来形容马克西米安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以副帝老丈人的身份游历高卢地区，不到一年就腻烦了。就在这个时候，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蛮族又开始大举入侵帝

国境内。莱茵河防线正是西方副帝君士坦丁的责任区域。君士坦丁接到消息后，立即率军北上御敌。

马克西米安得知副帝的直属部队已倾巢而出，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政变。但做女婿的很快就知道了岳父的这一动向。

君士坦丁以接受对方所有条件的形式，与隔着莱茵河对阵的蛮族酋长达成休战协议。协议一成，即刻率领部队向南折回。

由于君士坦丁超出预料提早返回，马克西米安功败垂成。走投无路的前正帝，只好仓皇逃到当时叫做马西利亚的马赛，准备在那里打一场防卫站，但女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君士坦丁沿着陆地上的城墙将马赛团团包围，逼迫当地居民交出前任正帝。马赛居民别无选择，只好照办。不久，副帝君士坦丁公开宣布，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自杀身亡。

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在亚得里亚海对面宫殿里接到这项消息后会作何感想。从公元286年“两帝共治制”以来，马克西米安与他共事了25年。无论是“两帝共治制”时期，还是第一轮“四帝共治制”时期，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放心送上战场的人才。而且，马克西米安这辈子也从没有辜负过戴克里先的信赖。

也许要到得知多年同僚凄惨下场之后，戴克里先才能领悟到退位的真正含义吧。前任正帝只是一个称号，一旦没有了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对其他人也就再没有影响力可言了。失去地位，也就代表失去了权力。在斯普利特的宫殿内的确有宽广的兵营，但那里派驻的是保卫卸任皇帝的警卫兵，而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如果对付强盗之类的敌人，倒是绰绰有余，但还称不上军事力量。

公元310年开始，随着马克西米安的退场，有关戴克里先的记载也

就很少看到了。不管正帝还是副帝，甚至被定为篡位者的马克森提乌斯，在公元310年之后，所有掌权者都开始恣意行事，不再理会戴克里先的意见。

再加上一年后，公元311年，帝国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也去世了。当时他才51岁，据说是得了不治之症。

自戴克里先创设“四帝共治制”以来，东方正帝向来是四位皇帝中地位最高的，现在占有这个位置的伽列里乌斯也仓促地退出了舞台。再加上戴克里先已经失去影响力，“四帝共治制”今后的存续更加困难。

伽列里乌斯去世留下的帝国东方正帝的空缺，由西方正帝李锡尼横向填补。他与手下所有的宫廷人员一起迁入了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但是，原本由他占有的帝国西方正帝的位置，并没有让西方副帝君士坦丁升任。此外，帝国东方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也依然处于副帝的地位。

曾经有人表示，如果李锡尼将君士坦丁升格为帝国西方的正帝，把由此造成的西方副帝的空缺，交给五年来一直被排除在“四帝共治制”体系之外、由此背负篡位者污名的马克森提乌斯，那么“四帝共治制”就可以继续存续下去。但这也只是理论上有一定的可行性。

问题是，“四帝共治制”并非由四名掌权者讨论后创设的体制，而是当初登基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戴克里先，在掌握绝对权力之后，决定把过半的权力，即军事力量分给其他三个人，并且利用他个人的权威和权力，换句话说在强制之下，才得以实现的体制。这不是合议的结果，而是专制的产物。在戴克里先失去影响力，而继承“四帝共治制”，并具有继承体制不可或缺的军事才能的伽列里乌斯也去世之后，“四帝共治制”走向完结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公元311年5月，伽列里乌斯去世之后，情势演变成一名正帝、两名副帝的“三帝”和此时被判为“国家公敌”（hostis publicus）的马克森提乌

斯四人逐鹿的状况。在这种局势下，除非当事人具备出类拔萃的才干，否则没有官方立场就很不利。而陷入不利的人自然容易招致其他对手的联合攻击。在正帝李锡尼的根据地塞尔曼和副帝君士坦丁的大本营特里尔之间，背着皮筒的信使策马往来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正帝李锡尼和副帝君士坦丁之间的同盟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军事上毫无建树的李锡尼，打算利用君士坦丁消灭马克森提乌斯。又或者是现已年逾35岁的君士坦丁认为此刻是实现野心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动接近李锡尼。不管怎么说，分别是46岁和36岁的两位掌权者决定联手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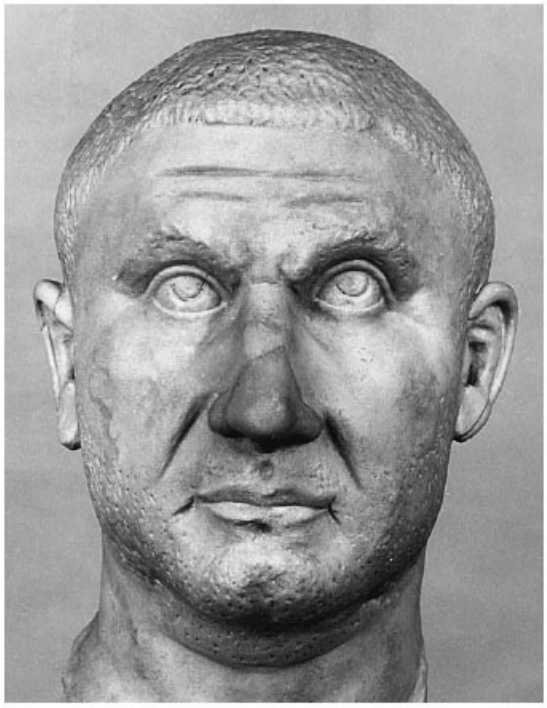
两人之间具体达成了哪些同盟协议，现已不详，仅知有下列内容：君士坦丁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李锡尼，而李锡尼则默许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动兵。婚礼的时间定在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结束之后。

乍一看，这一同盟条件明显对李锡尼有利。因为缔结同盟时，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尚未开始，结果还未可知。而李锡尼既不需要公开表示支持君士坦丁的行动，也不需要派遣任何兵力作支援，只要信守“按兵不动”的承诺即可。而这点承诺的回报，却是获得正帝副帝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迎娶公主为妻的机会。

君士坦提娅的母亲狄奥多拉是前任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因此有皇家血统。君士坦丁这是以一年前在马赛逼死的政敌的外孙女作为同盟的政治筹码。不过他的妻子法乌斯塔也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想必对于这类政治联姻手段，他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会产生任何的感伤吧。

婚礼定在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结束之后举行，这是同盟的当事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一项条件。从李锡尼的角度来看，如果君士坦丁一败涂地，他也方便否认同盟的存在。相对的，从君士坦丁的立场上来说，至少可以确保李锡尼会保持沉默到战争结束之后。

当然，君士坦丁一方承担的风险的确偏高。但要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必定要承担风险。而风险越高，成功后的回报也越大。要知道，事成之后，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区域都会在他统治之下。



李锡尼

“国家公敌”马克森提乌斯

由于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公开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自然也高于其他任何皇帝。但因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其他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过低评价，甚至可以说是责难。就连戴克里先也因为镇压基督教徒一事而饱受诟病，直到近几年才对其政绩进行客观的评价。

从史料角度来说，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这段时期也颇令人悲观。基督教教会留下了相当多的史料，而与其持相反意见的“异教”一方留下的资料则相当稀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偏偏历史研究者们明知史料之中已经添油加醋，往往还是仅以残存的资料为依据下结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当时乃至其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学界一直保持着除君士坦丁以外，其他人都是暴君的评价。在这些遭到批判的人物当中，最受指责的当属马克森提乌斯。因为他是君士坦丁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敌。

在展开对决的公元312年，马克森提乌斯34岁，他虽然算不上明君，但也绝非基督教徒所形容的暴君。他实际上担任皇帝的时间约为6年。在这6年里，他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罗马皇帝的形象来统治由他控制的意大利本土和北非地区。

在施政时，马克森提乌斯特别注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只不过，现存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共建筑物，只有圆形竞技场附近的“马克森提乌斯会堂”。其实他不仅新建了很多建筑，对于旧的建筑物修复工程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大量的公共建筑物修建和维修过程中，并没有将基督教徒入罪，强制他们劳动。戴克里先颁发的基督教徒镇压敕令集中在公元303年和304年，与马克森提乌斯宣布称帝仅仅相隔两三年。换句话说，在公元306年马克森提乌斯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时，这些政令还发挥着作用。而且，当时正处于戴克里先刚刚退位的时期，向来做事彻底且不留情的戴克里先虽然退位了，但影响力还在。事实上，戴克里先主导修建的大浴场到公元305年才完工。有传言说，这项工程的后半期是强制基督教徒劳动兴建的。所谓传言，即没有史料依据的口头传说。然而在戴克里先大浴场完工之后，由马克森提乌斯修建的各项建筑，却没有留下任何类似的传言。既然马克森提乌斯是受到基督教徒全力诋毁、极力批判的人物，如果他也像戴克里先一样，强制基督教徒劳动的话，基督教教会一方自然不会保持缄默。想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刨根究底也要挖出来作为给马克森提乌斯定罪的材料。既然没有任何材料留下，这说明马克森提乌斯这方面是“清白”的。不管怎么说，镇压基督教徒敕令迫使罗马主教殉教的时期，实际上是在马克森提乌斯掌权之前，而且在他统治罗马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殉教的例子。

话虽如此，也不是说马克森提乌斯对待基督教徒特别和善，他只是遵守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实际上，他也没有对犹太教徒作任何处置。

不过，忠于罗马人的传统，意味着他在公共场合信仰传统的罗马诸神。在马克森提乌斯的主导下，神殿得以修复，恢复往日的光彩。在祭坛上燃烧牲畜之类供品的烟雾也多了起来。但是，他也并未以不参加罗马诸神的供奉仪式的名义，镇压宗教思想不同的人。

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并非如此前基督教徒所传播的，是因基督教诲觉醒的人与活在黑暗异教下的人之间的决战。这场对决，仅仅是领袖之间的较量。而在这场对决中，也终于出现了一位罗马史上睽违已久的、不将“后勤”当成狭义的“logisticus”而是广义的“ars”的领袖人物。

决战

与帝国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本土的经济实力依然首屈一指。马克森提乌斯除了拥有意大利本土，还控制着土地肥沃的北非地区。当君士坦丁预期南下入侵时，马克森提乌斯组建的兵力之多，超过罗马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一说有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其中，重装步兵主力是罗马传统的近卫军团兵。轻装的骑兵主力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早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就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除此之外，还包括以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为基地的驻港海军。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战斗力，都不落人后。剩下的，就看马克森提乌斯能否灵活指挥运用了。

相对的，作为进攻一方的君士坦丁，其麾下拥有9万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数量上，只有马克森提乌斯的一半。而且，还要留出部分守卫莱茵河防线来防止蛮族入侵。高卢海军肩负着莱茵河和多佛尔海峡的警备任务，自然也不可能调来地中海作战。

不过，君士坦丁手下的官兵，虽然在人数上要落后，但在战斗力上略胜一筹。首先，司令官君士坦丁和麾下士兵一起同生共死过7年时光。而且，这些年君士坦丁率军对抗北方蛮族，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从未有过败绩。如此一来，君士坦丁和其麾下的士兵自然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也许君士坦丁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第一次与同胞罗马人开战时，决定仅率领4万名步兵和骑兵前往。当然，这4万人是绝对的精锐。

君士坦丁身为副帝，具有保卫高卢、不列颠及西班牙的责任，不能把派驻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调离。即使形势允许，恐怕他也不会这么做。率领大军进攻自然会给迎击方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己方后勤补给方面的难度也会增加。君士坦丁要进攻的意大利本土地区，固然现在由马克森提乌斯掌控，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由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直接统治。而这名前任正帝，两年前才在马赛死于君士坦丁之手。对于君士坦丁来说，进攻意大利本土虽然名义上有讨伐篡位者的优势，但实际上与进攻敌人领地处境相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最好别指望当地的居民会乐于提供粮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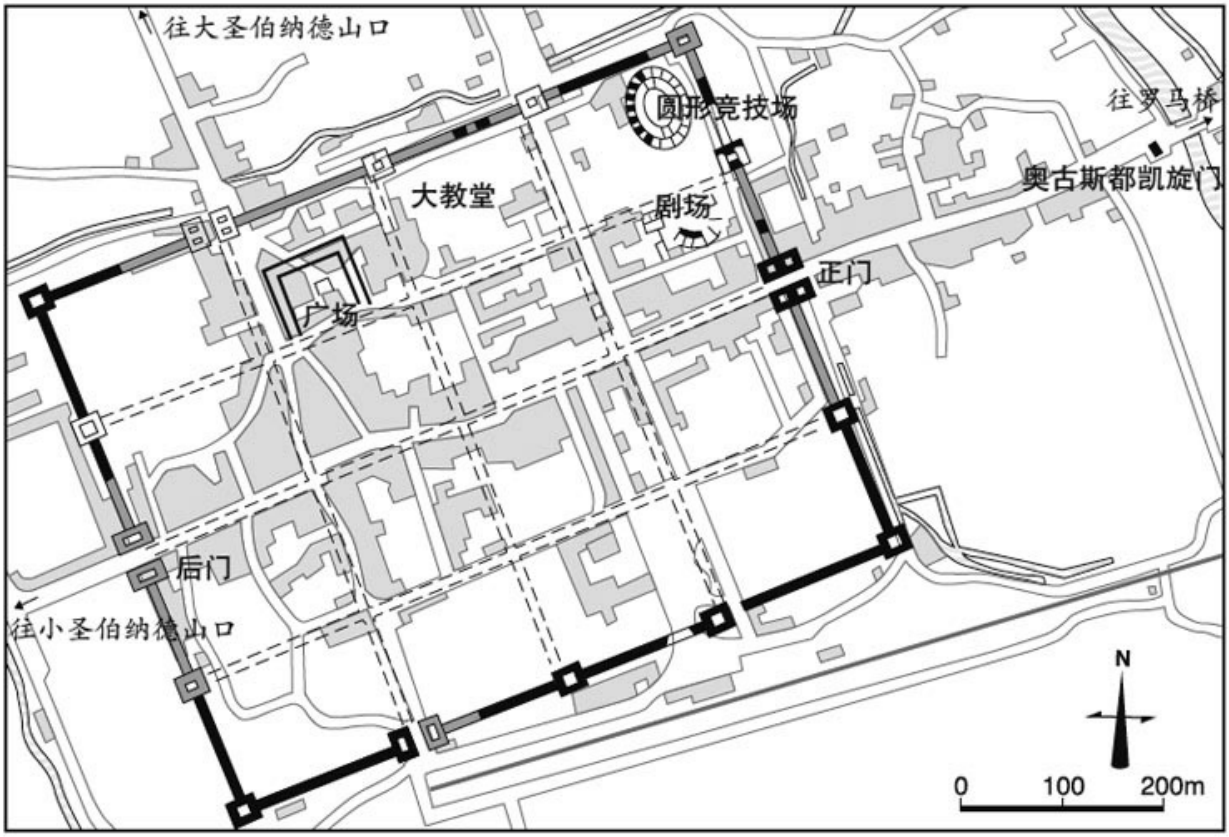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和高卢之间横贯着阿尔卑斯山脉，共有四条道路可以穿越其中。这四条道路早在帝国初期就已铺设成罗马式的石板面大道，大家可以将其看成现在的高速公路。

第一条路径，即最北边的路径，由意大利的奥斯塔北上，穿过名为大圣伯纳德的山口进入莱蒙湖，经由日内瓦进入里昂。

第二条路径，同样以奥斯塔为起点，但不是北上，而是向西穿过小圣伯纳德山口，最后到达格勒诺布尔。

位于第二条路径南部的第三条路径，是由都灵出发后向西行，穿过苏萨峡谷后跨越阿尔卑斯山脉。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之后，向北可以到达里昂，向西可以到达罗讷河河畔的瓦朗斯。

第四条路径，以热内亚为起点，经过尼斯进入法国南部，该路线主要沿着海岸挺进。



罗马时代的奥斯塔（与现代大道图重叠）

上述路径说明中以现代地名标注的所有城市，均起源于罗马时代，这一事实也证明这四条路径是罗马帝国统治高卢地区的关键道路。罗马人不仅将道路全线铺上石板，而且还沿路挑选适当的地点建设城镇。这些城镇不仅供往来旅客休憩，打算向旅客做生意的人也渐渐迁入、定居。比如，有法国南珍珠美誉的尼斯，在罗马时代名叫尼卡亚（Nicaea）。尼斯是这个名称转为法语发音之后的新词。

在这四条路径中，当年尤里乌斯 · 恺撒在高卢战役中最常利用的是第三条。因为即使在冬天，这条路上的积雪也不多，而且直通高卢地区的中心。时隔370年之后，对从反方向行军而来的君士坦丁来说，还有另一个优势。只要军队到达苏萨峡谷，之后沿着横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周边平原进军即可。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的作战计划中，在进攻首都罗马之前，必须先拿下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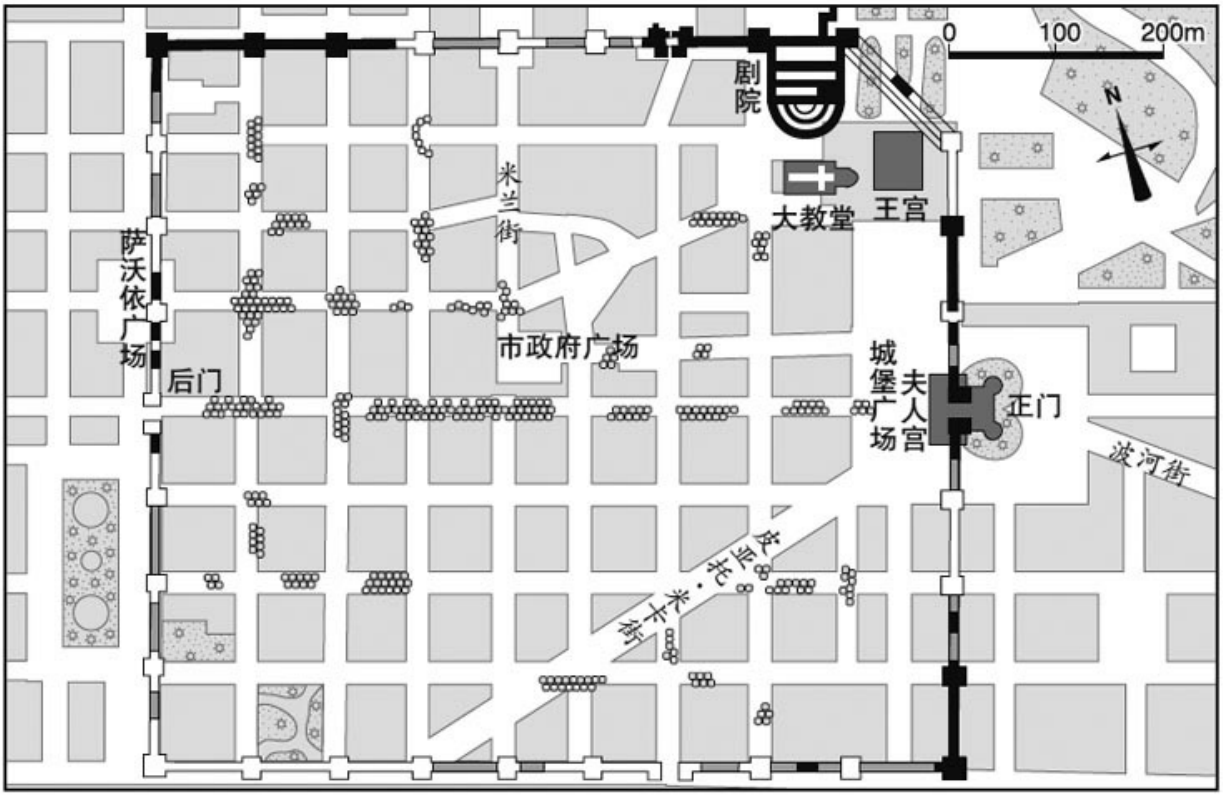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是在公元312年的何时，率军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但从其后的战况来推测，他应该是一等春季来临，就立刻率军前往阿尔卑斯山脉，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进入了苏萨谷。马克森提乌斯一方自然也在这里安排了迎击的部队。既然君士坦丁的来袭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想必没有必要把部队分散到四条路径上。苏萨峡谷原本就建有巨大而坚固的城堡，马克森提乌斯也计划在此阻挡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南下的君士坦丁大军。

君士坦丁显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不，应该说他比预料中还要更加清楚这一场战斗的重要性。

这座城堡是基于防守需要，特意挑选狭窄的山谷所建立。就算驻军有死守到底的打算，城堡内能容纳的士兵毕竟有限。当然，如果驻军防守有术，可以有效拖延准备进攻罗马的敌军，为后面的防守争取时间。只不过，君士坦丁没有给对手这个机会。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是否将4万兵力全数投入，总之在这场攻坚战中，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手头大部分的兵力。而且，不知是不是运用了火箭之类的武器，逼得守城的士兵不得不出外作战。当双方作战条件相同时，兵力的多寡也就决定战斗的胜负。其结果不言而喻。但君士坦丁并没有全歼所有守军，有少数士兵逃离了战场。因为让败逃的士兵将第一场战斗的结果告知都灵、米兰的居民，对君士坦丁反而更有利。

从苏萨往东50公里，就是罗马时代被称作“奥古斯塔多灵”（Augusta Taurinorum）的都灵。由此地再往东，可以到达米兰、皮亚琴察、维罗纳。这些是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应该都有重兵把守。要攻打这些地方，哪怕是很小的城市，也必定要花费时间，而且，战争一定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损害。君士坦丁避免攻城战的原因想必在此。遗憾的是，马克森提乌斯阵营里看出这一点的将领并不多。



罗马时代的都灵（与现代大道图重叠）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世时就将奥斯塔建为军事基地，预防敌人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经第一、第二条路径进攻意大利本土。2000年的今天，当地依然随处可见如同军团基地形态的古城遗迹。而意大利境内针对第三条路径修建的防守基地都灵，如今已经是意大利北部仅次于米兰的第二大城市，没有留下多少罗马时代的遗物。但罗马时代的都灵，特别是在历经不断遭受蛮族侵略的公元3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一座经得起长期攻防战的坚固城池。只要固守城池，就能将敌军长期钳制在此；如果事先战略方针明确，可以在守城期间等待周边基地的驰援。当年汉尼拔放弃攻击首都罗马的行动，就是担心在攻城时腹背受敌。只怕躲在首都罗马而未出现在前线的马克森提乌斯心中，并不具备布匿战争时罗马领袖们所拥有的基本战略。因为马克森提乌斯派驻在都灵的将领居然带着部队出城，自行与君士坦丁的部队对决。

在平原列阵会战之中，由于敌我双方条件对等，因此胜败多取决于士兵个人战斗经验的多寡。君士坦丁率领的官兵，长期与北方蛮族作战，经验丰富。而马克森提乌斯麾下的官兵，由于由他人代劳击退北方蛮族，因此20多年没有上过战场。这样战斗很快就见了分晓。

战场就在都灵郊外，被追杀的士兵试图逃进都灵城中避难。但是，城中居民对于残存部队人数过少感到绝望，所以选择紧闭城门，拒绝残兵进入。而后他们屏气凝神，听候胜利者发落。当然，他们对胜利者敞开了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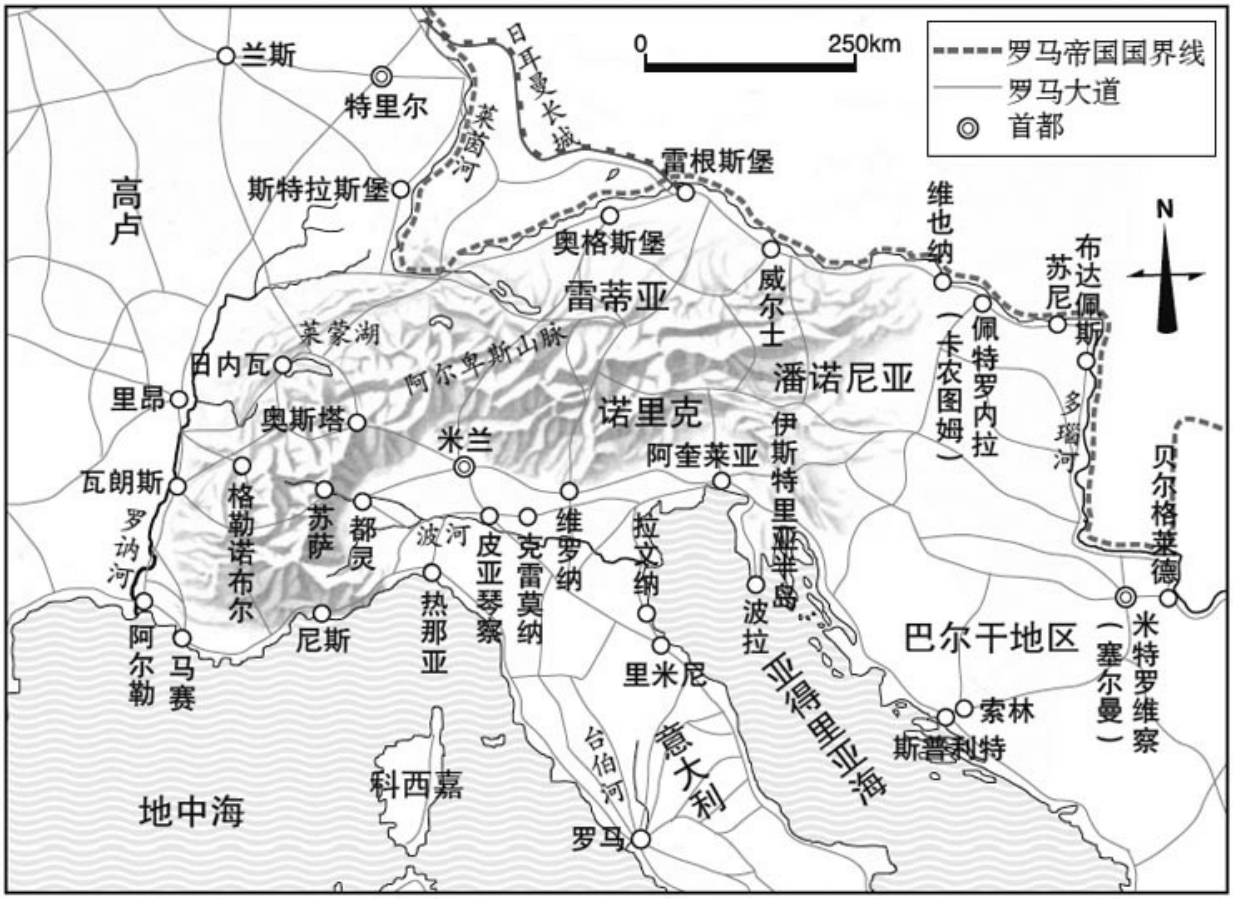
率军进入都灵的君士坦丁，向前来迎接的居民代表表示，居民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在城里也没有发生任何烧杀劫掠的暴行。

君士坦丁在都灵的行为，犹如波河向东流进亚得里亚海那样，迅速传遍整个意大利北部。米兰、皮亚琴察、克雷莫纳，甚至海军基地所在的拉文纳居民都知道，只要对君士坦丁敞开大门，就能确保平安无事。即使马克森提乌斯一方的官兵还有旺盛的斗志，但能够坚守在城池中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因为，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部诸城市，都在开战之前就站到了君士坦丁一边。不过，只有维罗纳例外。

维罗纳这座城市直到今天一直沿用着古罗马时代的名字。除了因每年夏天上演歌剧而为世人所知的圆形竞技场之外，还留有数量惊人的罗马时代的其他遗迹。罗马时代的奥斯塔和都灵，是固守西阿尔卑斯路径的要地。相对的，罗马时代的维罗纳，则是意大利境内守卫跨越北阿尔卑斯地区通往多瑙河防线路径的重要据点。阿尔卑斯山脉由西向东呈半圆形环绕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北部，维罗纳正处在山脉要道的中心位置。如果从维罗纳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就可以到达多瑙河上游，进而直达现今的雷根斯堡。雷根斯堡在当时被罗马人称为“雷根河畔的兵营”（Castra Regina），是雷蒂安行省最主要的军事基地。

长年以来，维罗纳是派往多瑙河防卫的官兵必经之地。即使在公元

260年，罗马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难时，加里恩努斯皇帝也没有忘记将维罗纳的城墙进行加固维修。而在公元312年负责维罗纳防卫任务的是“冥顽不灵”、让人觉得好像生错时代的庞培。这名武将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具有很高的威望。现在，维罗纳是唯一敢在君士坦丁面前紧闭城门的城市。



北意大利及其周边

对君士坦丁来说，这是进入意大利之后，第一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但如今他也不可能退却或弃之不理。防守严密的维罗纳固然不易攻陷，可是如果不把维罗纳拿下，就算率军直接南下向首都罗马逼近，背后也随时要面对威胁。因为维罗纳的交通直接与多瑙河沿岸相连，一旦正帝李锡尼知道维罗纳的勇猛抵抗之后改变主意，君士坦丁有可能陷入正帝和马克森提乌斯军队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中。基于这样的情况，即

使君士坦丁急于结束战争，也不可能放弃对维罗纳的进攻。

相对的，困守在维罗纳指挥作战的庞培，要面对更为现实的烦恼。无论维罗纳的居民和士兵多么英勇善战，意大利北部已经没有任何城市或者部队会前来支援。攻城战固然旷日持久，但没有后援迟早要走到终点。而攻城战的终点，往往是城池失陷，以及其后的血腥屠城。庞培决定带领麾下官兵单独出城迎战。被告知这一决定的居民代表们，只能面色凝重地保持沉默。

一旦抱了必死的决心，缺乏战斗经验的士兵也会变得勇不可当。庞培麾下的士兵虽然人数不多，且训练不足，他本人却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第一场战斗打到入夜，依然胜负难分。第二天进行的战斗，同样打得难分难解。但君士坦丁方面在人数和战斗经验上都占优势，因此能渐渐掌握战局。当夕阳照在战场上时，平原上躺满了马克森提乌斯阵营的官兵，其中还可以找到全身扎满标枪的庞培的尸体。

维罗纳的城门终于打开了。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为维罗纳的未来捏着一把汗，然而胜利方君士坦丁却碰都没碰居民代表一下。当然，激烈战斗后常常发生的血腥暴行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不仅在意大利北部传开，也传遍了意大利中部。如今君士坦丁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由着兴致，随时向罗马进军。这时已是公元312年的夏末。而君士坦丁也不是那种看到战况好转后，就松口气躲在刚占领的维罗纳放松休息的人。

创造历史的战役

战争和战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争可能长达数年，而且发生于不同的地点。而战役则发生在一个地方，其结果一般很快就能揭晓。通常人们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战役集合在一起构成战争，将战役视

为战争的一个部分。所以才会有“胜利的战役，失败的战争”这种说法存在。

但在历史上，有些战役不仅影响战争的局势，甚至改变了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改变历史的战役”。比如，发生在古代的以下战役：

“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发生在希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30万大军进攻希腊，在希腊城邦联军陆战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这场海战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场形势。指挥者是雅典杰出的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利。

波斯在这场海战大败之后撤军，之后不得不放弃侵略希腊本土的构想。如果这场战争的胜利方是波斯，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雅典“黄金时代”，也不会产生对当时，乃至现代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希腊文明。说不定连爱琴海的名字都会改成波斯海。

“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秋，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在可以瞭望东地中海的伊苏斯平原进行的会战。亚历山大以3万兵力对抗波斯15万大军，却以战死200人的微小代价取得完胜。不久后，希腊与波斯再次展开会战，但大流士未能挽回败局，波斯帝国因此灭亡。希腊人原本就有向海外扩张的强烈愿望，此后更是大举向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各地移民。其移民范围不仅涉及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波斯帝国的心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也建设了不少希腊裔的城镇。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帝国被其手下将领瓜分，统治范围也止步于中东地区。尽管如此，由希腊经中东，最后延伸至埃及的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形成了被后世称为“希腊文化”（Hellenism）的希腊文明圈。后人常说的希腊罗马文明，代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在希腊文化时代之后，被罗马人原封继承了下来。如果没有形成希腊文化圈，罗马人要在地中海世界扩张霸权，想必会更加

困难。不过，罗马人也并非不劳而获地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他们是凭自己的本事获得的。好比说，接下来要谈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进行的布匿战争。

“扎马会战”——发生于公元前202年北非的扎马平原上的会战。当时，那里属于迦太基境内。罗马军队的将领是年轻的西庇阿，而迦太基方面，则是由之前对罗马的作战中百战百胜的名将汉尼拔担任总指挥。战斗的结果，罗马大获全胜。布匿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发生了三次战役。不过左右这场战争最后趋势的，还是第二次战役最后进行的“扎马会战”。在这场战役50年后发生的第三次战役，只是将预料中的结果化为现实而已。

“布匿战争”，由当时的罗马人命名，意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争”。迦太基是由中东的腓尼基人移民开创的国家，因此向来被视为东方国度。打败迦太基，意味着将东方势力逐出地中海西部。因此，对罗马而言，“扎马会战”也是将地中海世界转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决定性战役。

“**阿莱夏攻防战**”——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前52年，地点在现在的法国，当时的高卢中央地带阿莱夏。由尤里乌斯·恺撒率领5万罗马军，对阵30万高卢各部族组成的联军。这也是恺撒在高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这场战役，决定的可不仅仅是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的胜败。长年来，罗马人称霸的范围，仅以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为界。高卢战争让罗马人的视野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延伸到了更远的北方。高卢战争让罗马人认识到了向北发展势力的可能性。“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是欧洲北部列入罗马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由恺撒创造”的由来。如果“阿莱夏攻防战”由高卢一方获胜的话，后世的法国、英国，想必与现在大为不同。

不管是“改变历史”还是“创造历史”，总之，这些战役的影响力大得惊人。而在公元312年发生的“米里维桥战役”，也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这场战役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向跨越中世纪及至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虽然“米里维桥战役”意义重大，但并没有在战争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原因如下：

第一，在战争史研究专家当中，以本书观点看待这场战争的人仅占极少数。

第二，这场战役中没有出现可以用如日月般璀璨之类华丽的辞藻来形容的半个名将。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虽然都是史上留名的人物，但还称不上战略战术上的高手。

第三，在“米里维桥战役”中，双方并未施展出让战争史专家感兴趣的或巧妙或高明的战略战术，整场作战表现笨拙。简单来说，根本就是一场混战。甚至让人觉得，这样的一场战斗都能改变历史，真是难以接受。

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10月，进攻方君士坦丁37岁，防守方马克森提乌斯34岁。年龄上，两人相差不大，可以说同属年轻一代。但作为总司令官，在带领部队作战的能力上来说，可就是老手和新兵的差距了。

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君士坦丁，心中最担心的莫过于遭遇马克森提乌斯坚守不出的布局，即敌军依靠35年前完工、又经马克森提乌斯整修后更加坚固的城墙为盾牌，坚守罗马不外出作战的局面。这座城墙由奥勒留皇帝修建，全长31.5公里，将整个首都环绕在内。墙高6米，厚3.5米，城墙上每隔30米处都建有一座四方形的护城塔。城墙开有18道城门，每一道城门都采用双重门设计。仅靠4万兵力，要攻破一

座防守如此严密的城市是不可能的。作为防守一方，虽然要承担城内百万人口的供给压力，但是仅凭4万兵力不可能长期将如此规模的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因此这一点不是致命的缺点。君士坦丁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诱敌于城外进行决战。

君士坦丁担心的另一点是，马克森提乌斯将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以何种形式，派驻在何处。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不可能全部驻扎的首都，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派驻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可是君士坦丁一方完全不知道这些部队派驻在哪里，每个据点有多少兵力。如此一来，在攻打城池的时候，随时有可能背后遭到攻击，风险很大。

此外，对君士坦丁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隐忧，那就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城市的动向。这些城市的居民迫于君士坦丁的军事压力才表示恭顺，一旦他的军事力量遭到减弱，那么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有180度的转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时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半岛恐怕要成为瓮中之鳖了。而且假如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讨伐之战稍有不顺，在多瑙河畔观望的正帝李锡尼，也极有可能改变当前偏向君士坦丁的政策。

要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早结束战争。没想到的是，这个机会竟然是马克森提乌斯主动提供的。

当君士坦丁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首都挺进的途中，接到斥候之类的侦察兵报告，说马克森提乌斯率领大军离开首都前来迎战时，想必心中要欢呼道："我赢了！"

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保持长期作战是最有利的战略。至于他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正面出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想象，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对君士坦丁来说，尽早决战是打开局面的唯一方法。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还有其他退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一旦在首都罗马作战失利，还可以退到北非，在那里卷土重来。在罗马史上，当然有

放弃罗马又重新反攻的成功例子，比如马略和苏拉。但是，失败的例子占了绝大多数。比如被恺撒追击、逃到希腊的庞培；或者被奥古斯都追击、同样逃到希腊的布鲁图。离开首都罗马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放弃都灵或者维罗纳。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因为有机会选择而带来的失误，最终酿成了致命伤。

二、马克森提乌斯年龄上仅比君士坦丁小3岁。两个人都有身为皇帝之子的条件，但是君士坦丁在仕途上总是领先于马克森提乌斯。换句话说，马克森提乌斯总是被君士坦丁踩在脚底下。当长期愤恨的对象攻打进来，也难怪会引发他激烈的对抗意识。

但是，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时，如果被感情左右，就不可能冷静思考，制定有利的战略。这个时候的马克森提乌斯甚至应该把杀父之仇都要忘得干干净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马克森提乌斯虽然已经34岁，但还不够成熟。

三、马克森提乌斯没有选择在城内防守，而是决定出外迎敌，也有可能是出于他心中对“世界首都”罗马的深厚感情。每当探访过去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时，我都忍不住感叹，有些地方虽然已经成为一国首都，规模远超以前的罗马，但是在罗马时代，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要远逊于首都罗马。在探访这些地方的遗迹时，我总是一边在脑海里还原当时的风貌，一边想着：也许当时伦敦出生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罗马时，心中的震撼就跟现在俄亥俄州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一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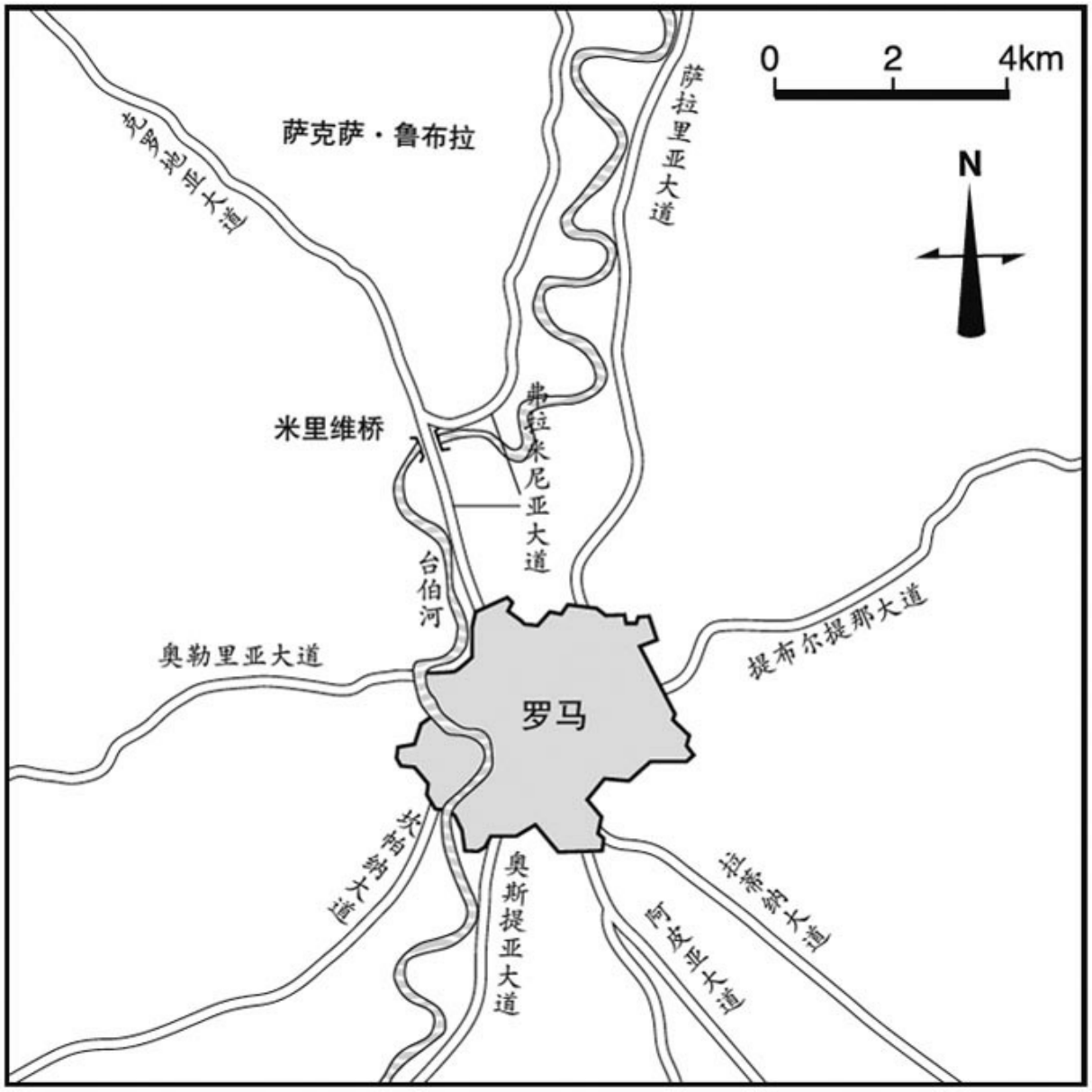
如果长期居住在首都罗马，这种感动就会转变成热爱。也许马克森提乌斯并不希望看到罗马沦为战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应该重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

“米里维桥战役”

历史上著名的“米里维桥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10月27日。马克森提乌斯所率领的军队人数不详，但想必要比君士坦丁率领的4万人多得多。马克森提乌斯应该还没有愚蠢到将步兵骑兵合计将近19万人的部队全数出动的地步。但是，他大脑中缺乏战略概念，没有下令将剩余部队以军团为单位派驻各战略要地待命，这就是无可救药的愚蠢了。

由北进入首都罗马的道路中，作为首都大动脉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可以说是干道中的干道。君士坦丁及其所率军队就是沿着这条大道挺进罗马的。马克森提乌斯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也选择这条道路作为迎击敌人的路径。马克森提乌斯率领部队从现在依然被称为“弗拉米尼亚门”的城门出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3公里之后，利用米里维桥渡过横亘在面前的台伯河，之后继续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挺进10公里，以该地的平原作为战场。双方军队犹如南北相向开来的两辆大型卡车，就在战场中央正面对撞。

这一带如今依然叫做萨克萨·鲁布拉（Saxa Rubra），是一片相当宽阔的平地，东边是蜿蜒如蛇形的台伯河。也许马克森提乌斯认为，既然率领大军前来，自然该挑选这种宽阔的地方作战。不过，向来个性冷静、而且心中决意一战定乾坤的君士坦丁，可不打算顺着马克森提乌斯的意愿行事。



罗马及其近郊

可能君士坦丁一获知战场会是这块平地，就早早下令手下的官兵，尽量把敌军往台伯河方向驱赶。战场越宽阔越有利于大军作战，但反过来，一旦战场缩小，军队规模越大反而越不利。老手和新兵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化不利为有利的能力。马克森提乌斯手下的军队就缺乏这种规模作战的经验，尤其是身为统帅的马克森提乌斯，军事经验更是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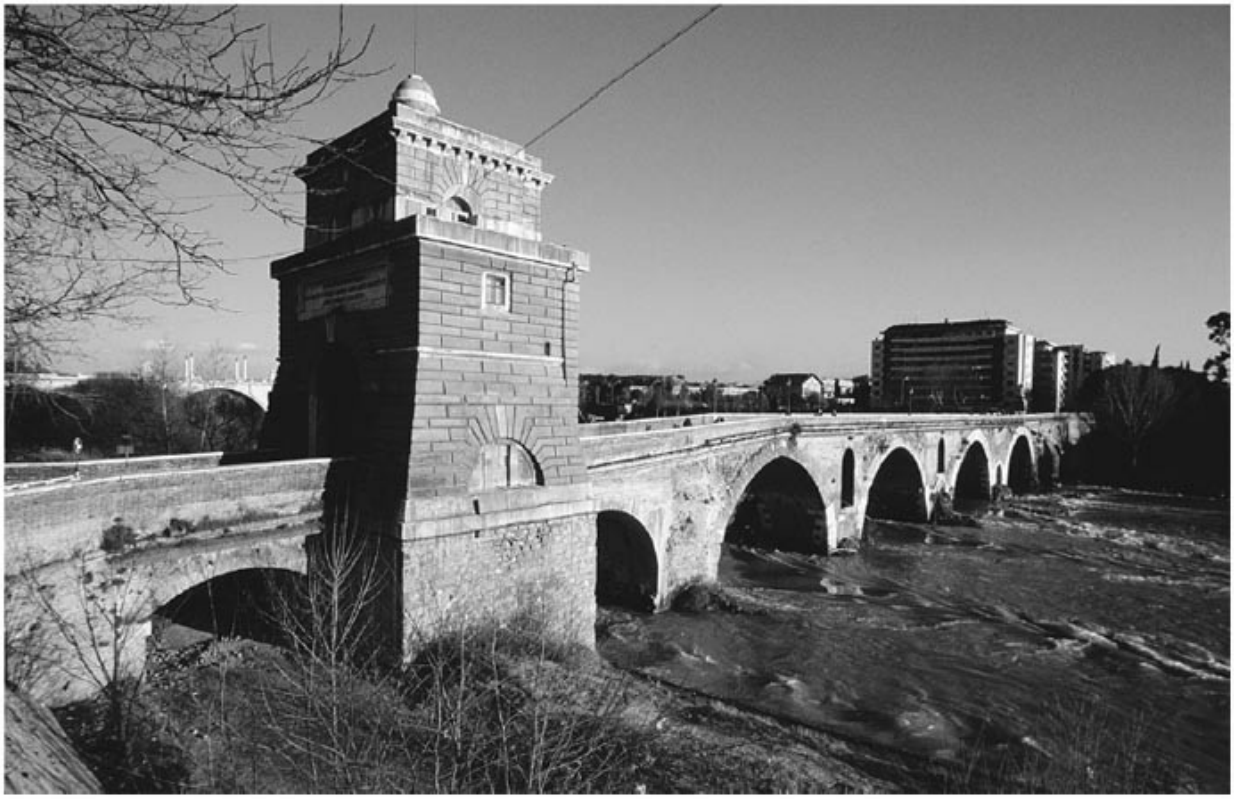
尽管战场所在地属于首都范围，但毕竟是郊外。台伯河河岸并未建设河堤工程。蜿蜒蛇行的河岸湿地长满了芦苇，让人难以行走。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驱赶到这里之后，乱成一团，根本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地战斗。混乱中很多士兵被杀害，其他士兵看到惨状之后都开始争相逃亡。而唯一的逃亡路径就是沿着道路向南跑，只要渡过南边的米里维桥，继续跑3公里，就可以到达弗拉米尼亚门。只要过了这道门，就可以躲进罗马坚固的城墙之中。

即使在混战中，君士坦丁也是一马当先，站在队伍的最前方指挥作战。而马克森提乌斯却是躲在队伍的后方发号施令，也因此才会被卷入溃败的官兵人潮当中。

现在我们乘坐直升机俯瞰下来，具有“干道中的干道”之称的弗拉米尼亚大道，由北向南几乎呈直线延伸，而且越接近罗马，车道、人行道也在逐渐加宽。不难想象，当时整个大道被败退的士兵人潮淹没会是怎样一幅情景。罗马时代的桥梁，无论是修筑理念还是施工方法，都视为道路的延伸。向南延伸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在借由米里维桥渡过横贯的台伯河后，更是一马平川，直达罗马市中心，因此，“米里维桥”（意大利语：Ponte Milvio）的设计和结构都是和弗拉米尼亚大道一体的。桥梁长度接近130米，车道加上人行道的宽度合计8米。桥面也是比照大道，纯石板铺设。别说是整队的重装步兵团，就是载有沉重攻城器械的大车通过，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下子涌过来数量如此众多的溃败士兵就要出问题了。要知道，即使是有秩序地撤退，大军要全体安全地通过一座桥梁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事情，更何况现在要过桥的是四散逃命的残兵败将呢？不考虑周全就贸然选择萨克萨·鲁布拉作为战场，马克森提乌斯本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是打算切断退路、背水一战的话，就应该趁早抢得战场的主动权。遗憾的是，主动权却始终掌握在君士坦丁的手里。

大部分的溃逃士兵都涌向了8米宽的米里维桥。这已经不能称为战

斗，而是一场大混乱。即使成功抵达桥头，也不见得就能活命。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旁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们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挤人的混乱中，根本没有办法脱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河里后，大多都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葬身于河底了。而在岸边徘徊犹豫的士兵，则被后面追击而来的君士坦丁的部队全数杀死。



米里维桥的现代遗址

骑马的指挥官们处境比步兵更为不堪。河底的淤泥会绊住马匹的腿脚，再加上身上沉重的盔甲和披风，使他们只有溺死的结局。马克森提乌斯也是因此结束了34岁的生命，遗体在第二天让人打捞上岸，斩首之后将首级挂在枪头上，成为君士坦丁率军进城时示众的警告。

战争史的研究专家认为不值一提的“米里维桥战役”，在基督教教会眼中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战”。在君士坦丁过世后，甚至开始出现

下面一段传闻：

在“米里维桥战役”的前夜，君士坦丁在营帐中做了个梦。梦里，耶稣基督告诉他，只要愿意遵循唯一真神的教诲，第二天就能胜利。同时建议他把希腊文中代表基督教徒的X、P两个字母合成“☧”的标记刻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按其吩咐一一照做，因而取得了第二天战斗的胜利。

不过，就算没有基督教神灵的庇佑，君士坦丁也照样能取得米里维桥战役的胜利。

罗马作为帝国首都，也是帝国境内唯一名副其实的首府。君士坦丁麾下的官兵们长年在高卢和不列颠值勤，想必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亲眼见到首都的威容，就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是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不过，传说中阿拉伯裔皇帝菲利普斯·阿拉波斯第一次造访罗马时，就为她的壮丽而感动，忍不住感叹自己居然能在有如此雄伟之都的帝国担任领袖。相形之下，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君士坦丁，则不会有这样的感叹，而且，他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首都的。在这位征服者面前，元老院和罗马市民就好像从没有支持过马克森提乌斯一样，抢着卑躬屈膝。

元老院不仅接受这位征服者下达的每一道命令，甚至还主动作出没有受命的措施。

他们决议将君士坦丁由副帝升任为正帝。

尽管“米里维桥战役”属于罗马人之间的内战，但元老院依然决议要修建凯旋门赠送给获胜的君士坦丁。

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在君士坦丁入城后，被下令处死。而有马克森提乌斯下令建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共建筑，自然也要改名，如“马克森提乌斯会堂”，以后要改名为“君士坦丁会堂”，而且在会堂内

部还要摆设君士坦丁的巨大坐像。

近卫军团遭到解散，在“米里维桥战役”中，这些人大都阵亡了，所以没有人跳出来反对这项措施。不过这项措施使得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拥有300年历史的精英军团，从此完全消失。

元老院还答应每年向君士坦丁缴纳一项特别税，实质上相当于战争赔款。

君士坦丁将定员600人的元老院议员，按照富裕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每一等级缴纳的税金如下：

第一等级——8罗马磅（libra）金块（约合2616克）

第二等级——4罗马磅金块（约合1380克）

第三等级——2罗马磅金块（约合654克）

第四等级——每年7枚金币（其中每枚金币中的含金量为38克）

自罗马帝国建国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元老院一直是社会的最高阶层，可悲的是，到了公元4世纪，已经沦落至此。

在占领罗马期间，君士坦丁对手下官兵的统御能力值得特别一提。包括元老院议员在内的所有首都罗马居民，没有遇到任何暴力相向的事件。而居民一方，也很现实地面对现状，接受了必须服从征服者的事实。

而君士坦丁也没有长时间逗留在气候温暖的罗马准备过冬，在处理完该处理的事情之后，他就离开罗马，前往米兰。因为他与正帝李锡尼的会谈地点就定在米兰。米兰是君士坦丁的根据地，能够让年长10岁的正帝李锡尼亲自跑来谈判，可以想象，打败马克森提乌斯这件事，对增

强君士坦丁的威望有着多大的贡献。如今37岁的君士坦丁，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帝国西方的第一人，是名义和实质上的正帝。

拼凑的凯旋门

君士坦丁凯旋门建在圆形竞技场旁边，意大利语为“Arco di Constantino”，而古罗马人用的拉丁语则称为“Arcus Constantini”。这是公元312年元老院决议赠送给胜利者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道门直到今天依然完好如初，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时，还被选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

元老院决议赠送凯旋门给获胜的君士坦丁，是在公元312年的秋末。不过现在他们要赶在公元315年时完工。因为这一年恰逢君士坦丁在位10周年，预定要在罗马举办庆祝典礼。凯旋门的馈赠仪式，正是一连串活动的焦点。

这样一来，实际施工的时间只剩下两年。罗马人的工程向来以短期集中进行为特色，圆形竞技场、水道桥这样的工程也不过五六年就能完工。因此，仅建造一座凯旋门，有两年的施工时间已足够。不足的，是当前拥有的实力。

君士坦丁凯旋门迄今依然是罗马名胜古迹中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可是这座建筑的敷衍粗糙，也最能反映公元4世纪首都罗马实力的衰落。

首先，既然修筑、馈赠这道门的目的，在于请求君士坦丁原谅他们6年来支持马克森提乌斯的罪过，那么修筑的地点必然应该是上好的位置。凯旋门的地点定在由阿皮亚大道进入市中心后，向右转前往帕拉蒂尼山和西里欧山之间的圆形竞技场的路口。然而，这个施工地点并不是经过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一道现成的凯旋门。

最新的研究显示，这个地方最初所建的凯旋门是献给哈德良皇帝的。科学调查的结果也证明，建设这道凯旋门的基础石材，并非成于公元4世纪初，而是公元2世纪前半期。

罗马人将拱形的建筑式样统称为“门”，这既是他们的发明，也是他们最喜爱的一种建筑形式。在罗马人眼中，门不仅仅是建筑的出入口，不单单是献给胜利者的凯旋门，还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修建的装饰品。门，可以建在桥梁的两侧作修饰，也可以修在院子的中央，爬满爬山虎，甚至有时候还会突然出现在笔直的大道上，目的是为了给单调的风景增加一点变化。

顺带提一句，拉丁语“Arcus”仅有“门”的意思，“凯旋门”是后人的意译。因此，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哈德良皇帝在位时，即便没有打过值得获赠凯旋门的胜仗，还是能够得到“门”以资纪念，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在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决定之后，是否要将现有的哈德良皇帝门拆除，再在原地重新修建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他们将哈德良门上不符合目的的装饰品拆掉，重新刻上献给君士坦丁的颂词，以及展示这位皇帝在意大利各地战斗场景的浮雕。不过，光这些还不足以装饰整个一道门，于是，只好又从罗马其他公共建筑物上拆下一些东西拼凑上去。

结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项建筑杰作——“君士坦丁凯旋门”，本来应该是公元4世纪初期的作品，现在无论是主体还是装饰，都是由以前的作品集合起来的拼凑品。

图拉真皇帝时代——公元98—117年。

哈德良皇帝时代——公元117—138年。

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公元161—180年。

上述三个时代的作品，再加上公元313年到315年上半年完成的工程，就构成了“君士坦丁凯旋门”。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雕像——排列在凯旋门正面和背面的最上层，共计8座俘虏达契亚人的雕像。这些雕像想必是从图拉真广场周边的回廊上拆下来再利用的。征服达契亚人的是图拉真皇帝，跟君士坦丁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作品——门的主体，以及凯旋门正面和背面第二层上8片圆形的浮雕。这些浮雕的来源还没有定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这些浮雕是原先立在此处的哈德良凯旋门上的装饰品；另一种说法，这些浮雕来自弗拉米尼亚大道通过弗拉米尼亚门之后通往市中心的路上。这条路现在称为“科索大道”，在路中央有一道纪念哈德良皇帝功绩的“门”，8片浮雕就是从门上拆下来的。

不管这些浮雕来自哪里，总之，跟君士坦丁没有半点关系。在浮雕中，哈德良皇帝或驱马追赶猎物，或为狩猎女神戴安娜举行献祭仪式，还有他将刚猎得的狮子置于脚旁、被一起狩猎的大臣环绕的情景，这些浮雕如同拍摄下来的纪念照片，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哈德良皇帝的形象。哈德良皇帝不仅是一位冷静的统治者，也是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人。这一点与君士坦丁正好相反。

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的浮雕——门的正面4片，背面4片，合计也是8片。每一片都刻画了有“哲学家皇帝”美称的马可·奥勒留的生前形象。有他站在讲坛上鼓励士兵的情景，也有他坐在罗马式折叠椅上接见投降的蛮族使者的样子。在这8片浮雕中，马可·奥勒留身边总是环绕着罗马军团的旗帜。因为他在与北方蛮族作战期间，病死于帝国前线的基地维也纳，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罗马。这些浮雕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这位哲学家皇帝的深切缅怀。只不过，这些情况同样与120年后的君士坦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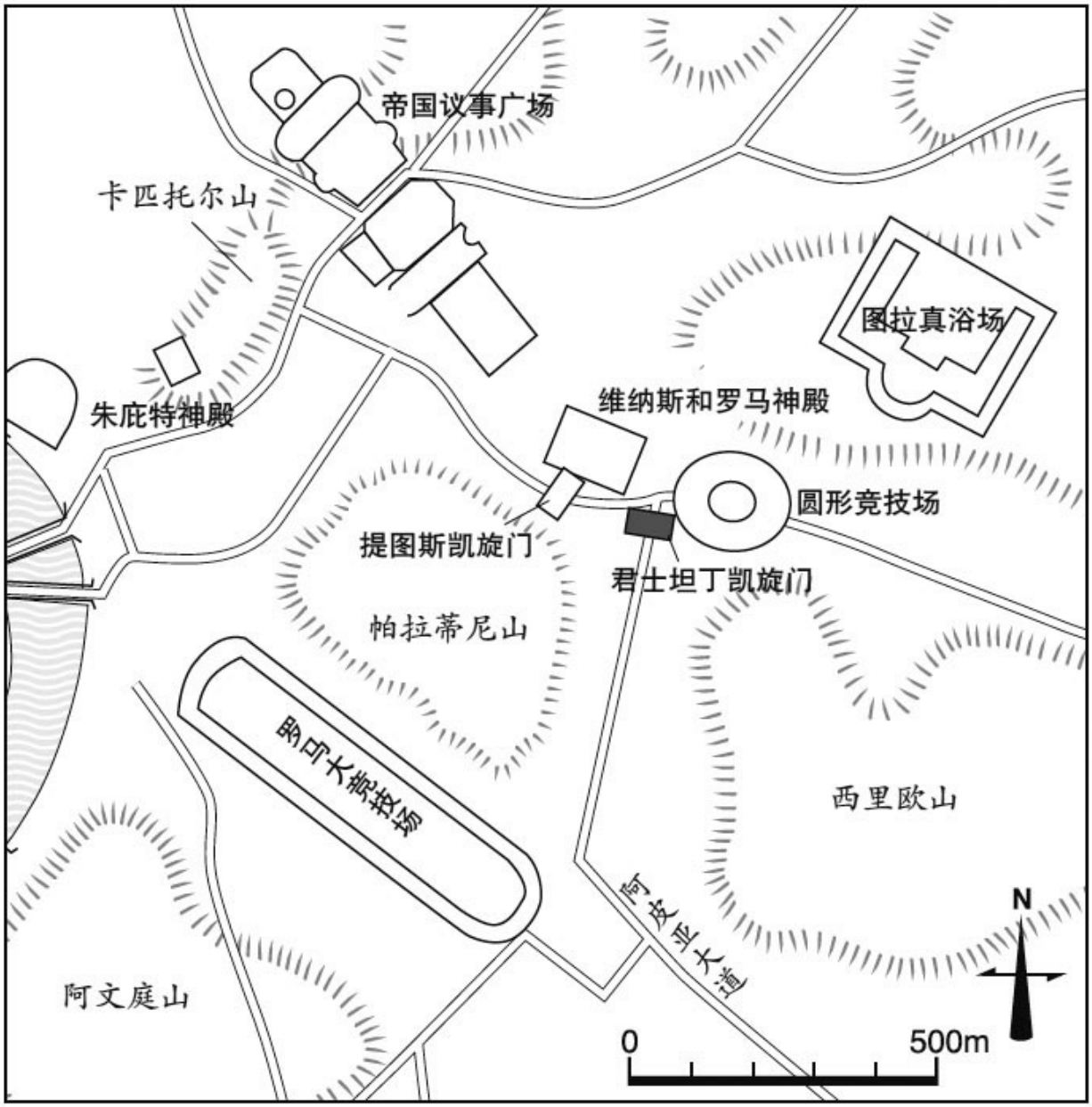
既然“门”是献给君士坦丁的，只是东拼西凑的作品未免太过失礼，因此，当时又另外制作了展现君士坦丁功绩的浮雕。这些4世纪初期制作的浮雕，设置于中央和左右两侧拱门入口的上端。其中刻画的有维罗纳攻防战中驱马向前的君士坦丁，有君士坦丁乘坐四驾马车进入罗马市区时的场面，还有罗马市民前来归顺时获得君士坦丁宽容接受的场景。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君士坦丁麾下士兵攻敌作战的描绘。只有这些浮雕才是这次施工时重新制作的作品。

虽说君士坦丁凯旋门是这样草草修建起来的，但还是有足够的资本使其直到今天依然名闻遐迩。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很美。凯旋门位于帕拉蒂尼山和西里欧山两侧中间的空地上，向前可以眺望圆形竞技场。其造型完美，与周边融为一体，仿佛要在这个地点修建建筑物，也就只有这种造型才能符合条件。可以说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元素之一，也是和谐与匀称美的化身。

不过，当我们走近跟前仔细观察，只怕一定会产生下面的想法，那就是公元2世纪，即五贤帝时代的浮雕和4世纪的作品相比，在造型能力上差距悬殊。五贤帝时代的作品类似于希腊雕刻，相对的，4世纪时期的浮雕风格，却接近于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作品。后者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幼稚、笨拙。明明时代进步了，为什么造型能力反而退步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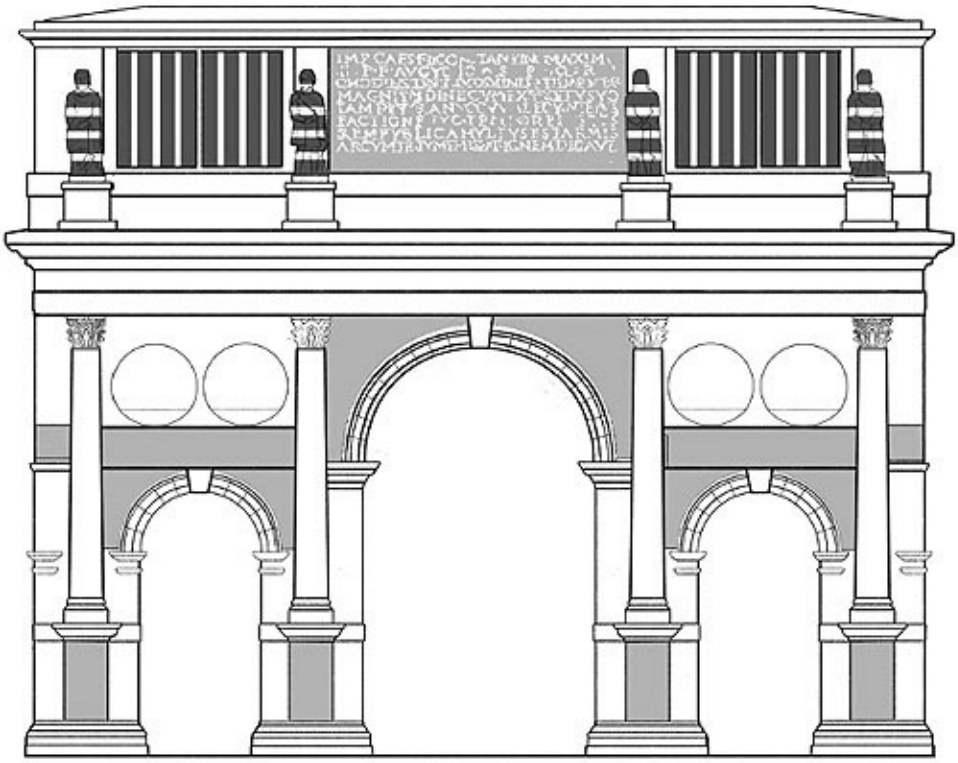
因为，这种“能力”会受到国力的影响。公元2世纪，可以说是贤君辈出的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和平、最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创造的作品，无论造型美术还是建筑艺术，都能达到最高水平，是因为国力也正处在巅峰时期。而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已经不具备这种“实力”。这么看来，君士坦丁凯旋门也是能让人联想到国家兴衰的名胜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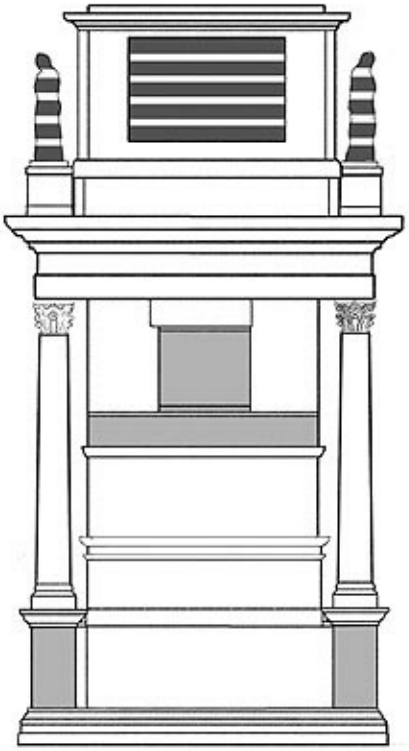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凯旋门（从南侧看到的凯旋门）


帝国议事广场
卡匹托尔山
图拉真浴场
朱庇特神殿
维纳斯和罗马神殿
圆形竞技场
提图斯凯旋门
君士坦丁凯旋门
帕拉蒂尼山
马戏大竞技场
西里欧山
阿文庭山
阿皮亚大道
N
0
500m

从北侧看到的凯旋门

从西侧看到的凯旋门





图拉真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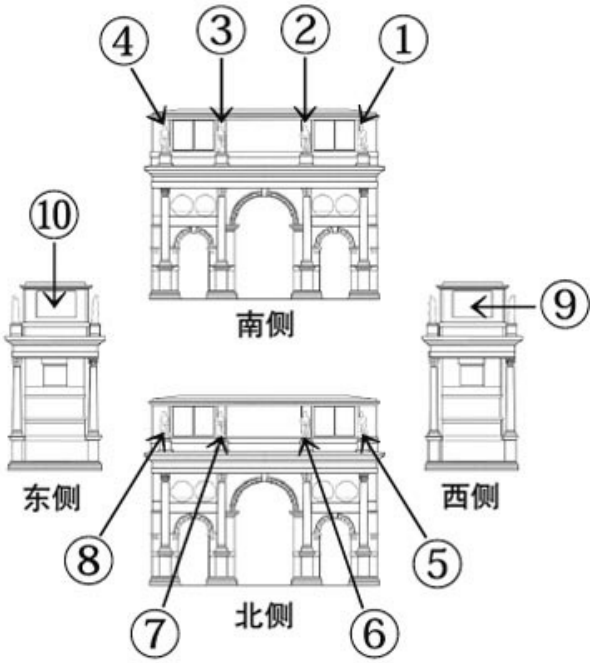
哈德良时代
（凯旋门的主体就属于这个时代）

马可·奥勒留时代

君士坦丁时代

拼凑的凯旋门（不同时期的雕刻)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雕刻（达契亚俘虏群像）

① 南面



② 南面

③ 南面

④ 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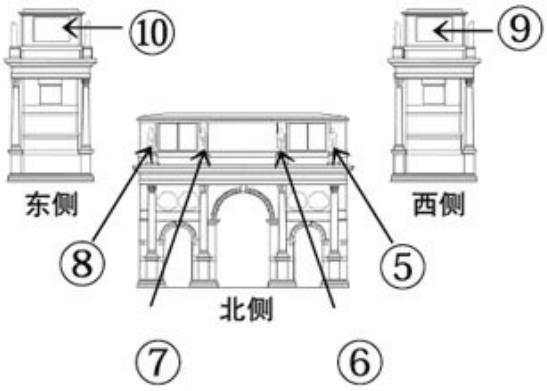
⑤ 北面

⑥ 北面

⑦ 北面

⑧ 北面

⑨ 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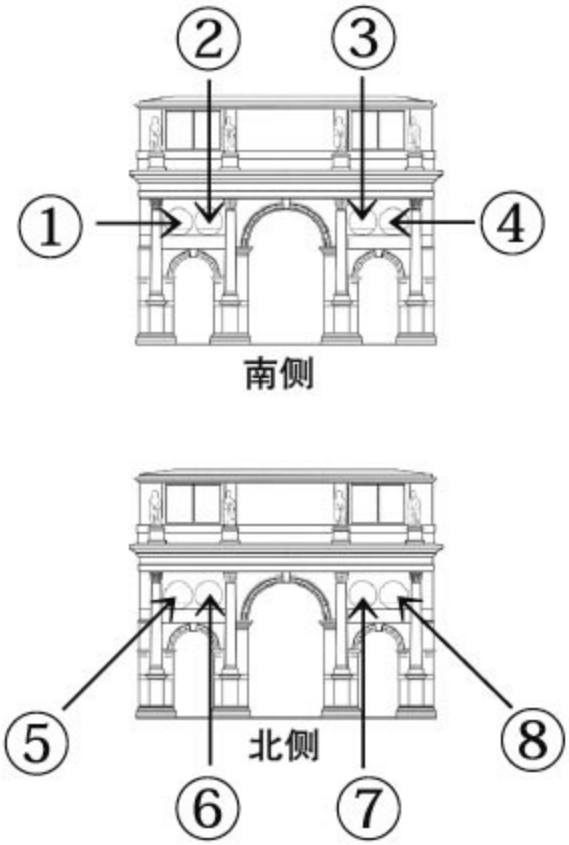
南面右上部

⑩ 东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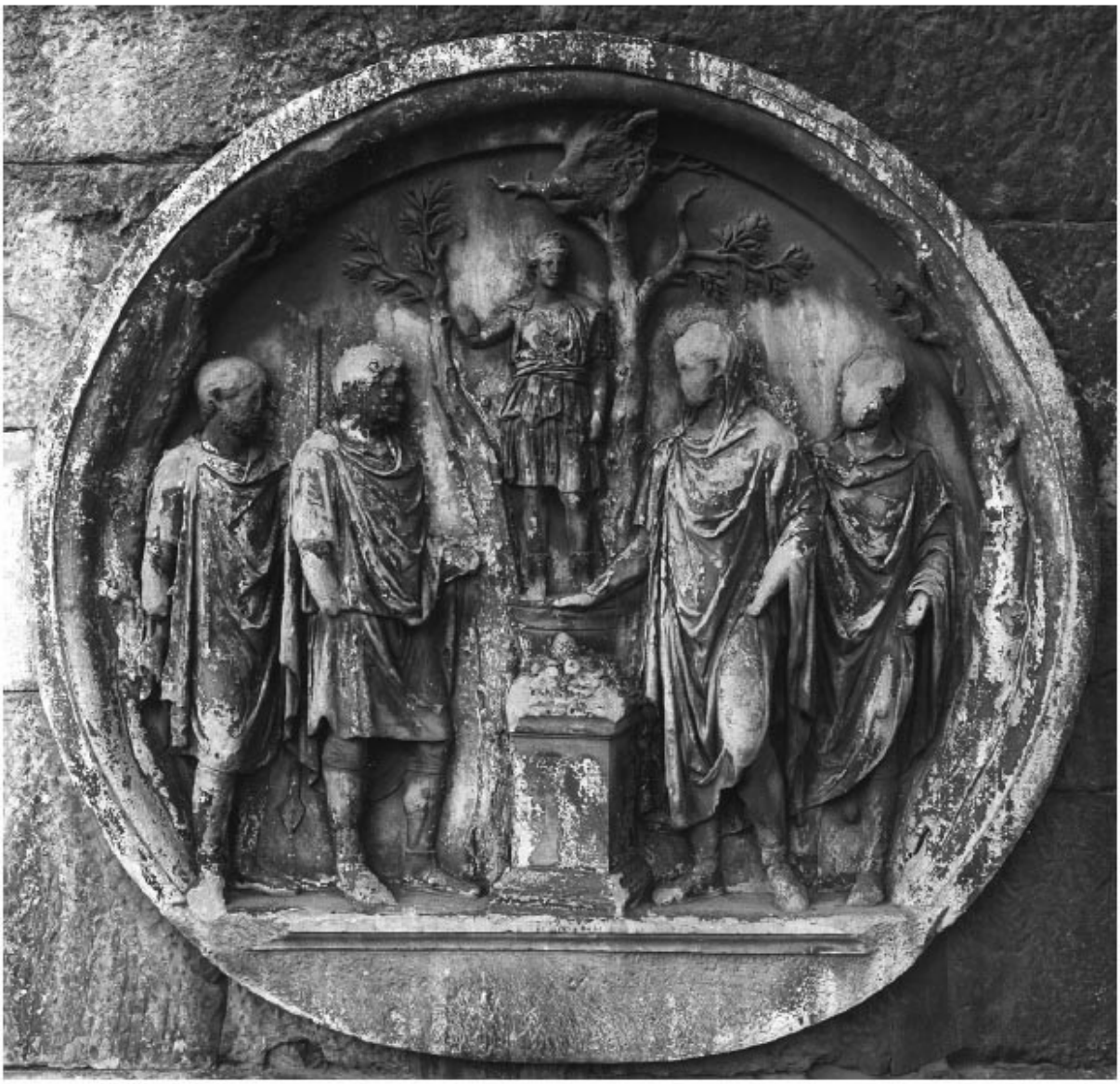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浮雕

① 出发去打猎的皇帝（南面）② 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献祭仪式（南面）

③ 皇帝猎熊的情景（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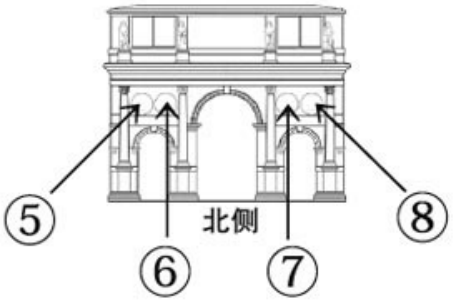
①——⑧ 依次构成皇帝远征时发生的狩猎和献祭仪式的故事



④ 向狩猎女神戴安娜献祭仪式（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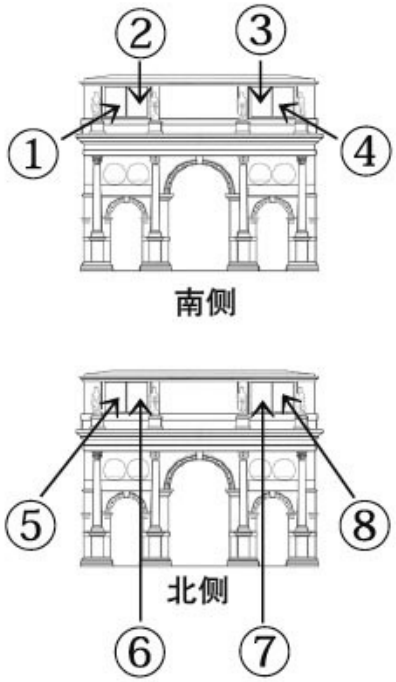
⑤ 皇帝追猎野猪的景象（北面）

⑥ 向太阳神阿波罗献祭仪式（北面）⑦ 皇帝及其脚下猎获的狮子（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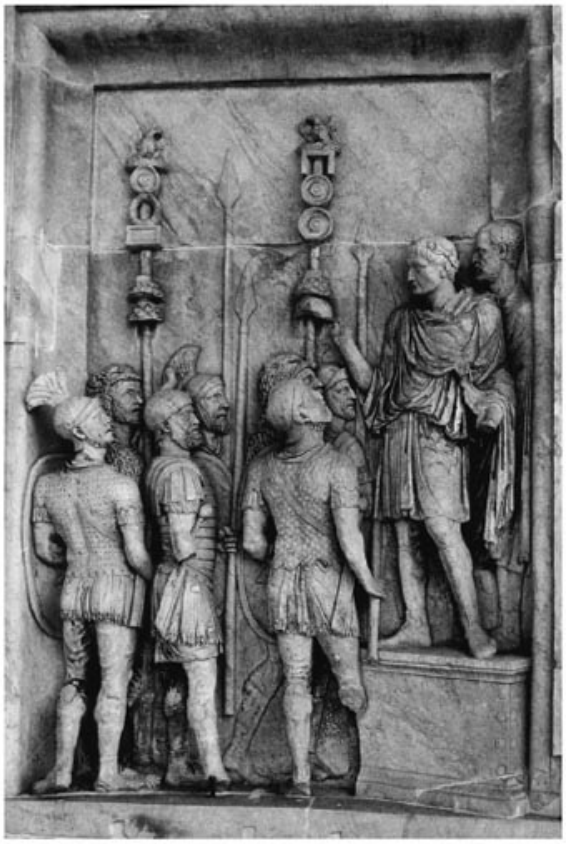


⑧ 向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献祭仪式（北面）

马可• 奥勒留皇帝时代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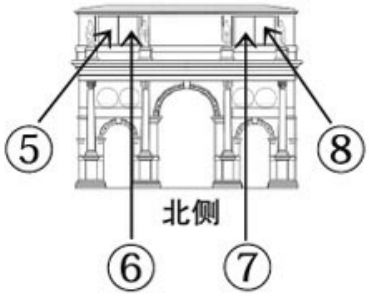
① 皇帝接见蛮族使者的皇帝（南面）



② 皇帝检视蛮族俘虏的皇帝（南面）③ 演说中的皇帝（南面）

④ 献祭场景（南面）

⑤ 皇帝驾到（北面）



⑥ 皇帝出巡（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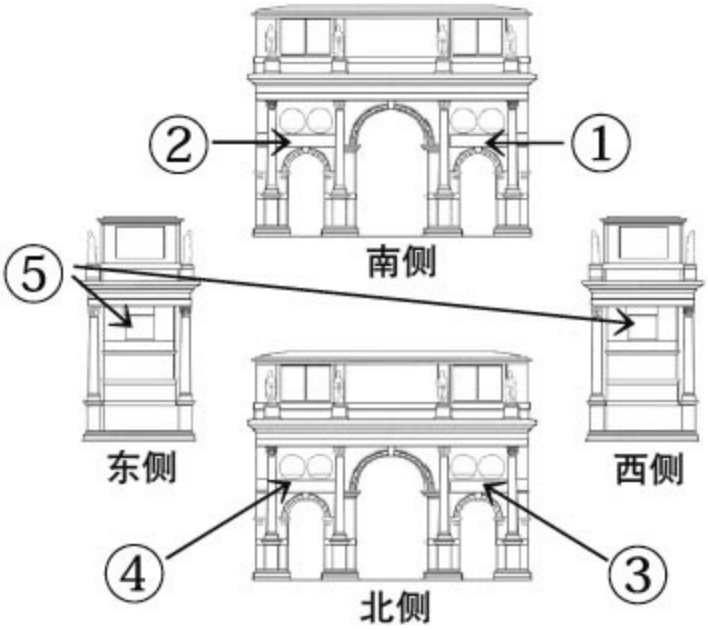
⑦ 宽容的皇帝（北面）⑧ 投降的战败者（北面）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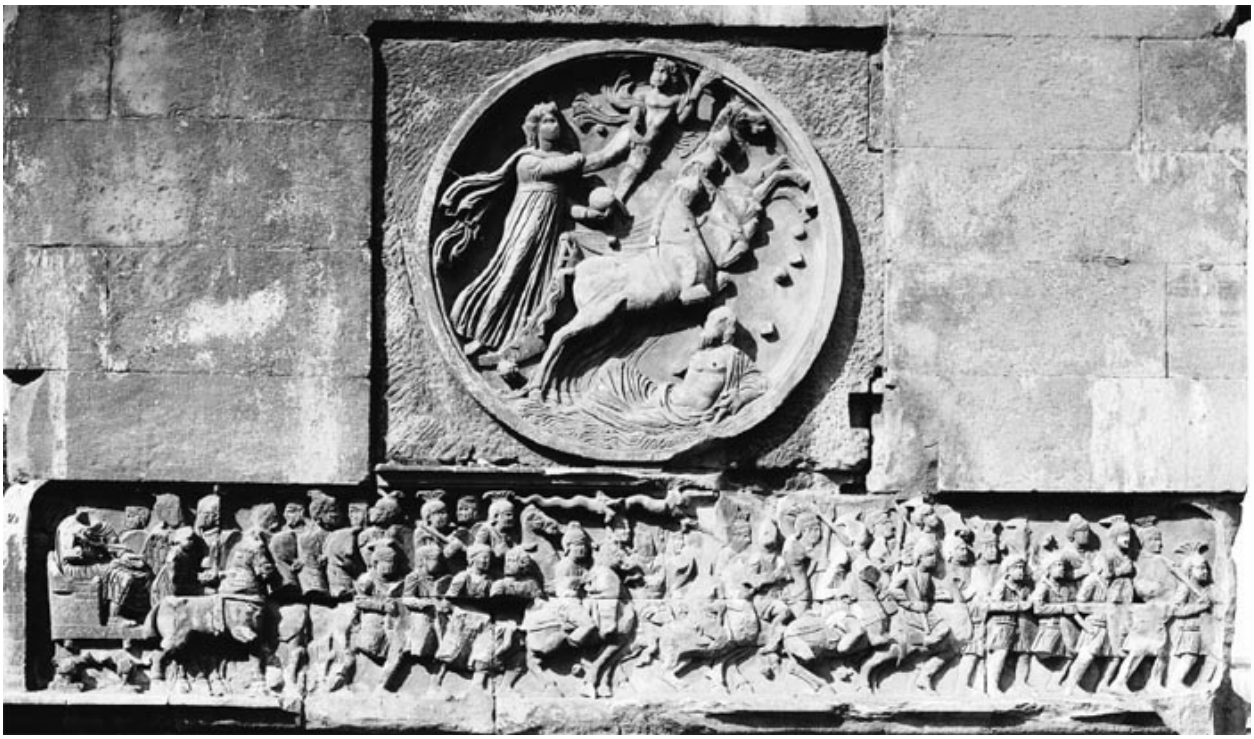
① 米里维桥战役（南面右）

② 维罗纳攻城战（南面左）

③ 在广场演说的君士坦丁（北面右）



④ 领取免费小麦的罗马公民（北面左）



⑤ 东面

⑤ 西面

君士坦丁时代的浮雕和过去浮雕的对比

和平祭坛南面部分（公元前9年）

图拉真记功柱（公元113年）

格兰第• 路德维希（Grande Ludovisi) 石棺（公元251年)

君士坦丁凯旋门（公元315年)

在这座凯旋门上，留有献赠者刻下的赞词。赞词位于正面上端，夹在从图拉真广场拆下来的两座达契亚俘虏雕像之间，用拉丁语这样写道：

> 罗马元老院暨罗马市民，为庆祝胜利，特将此门呈献于皇帝·恺撒·弗拉维·君士坦丁·马克西穆斯（伟大的）·帕亚斯（慈悲为怀的）·腓力克斯（幸运的）·奥古斯都。并特此记录该皇帝以如同神灵般的敏锐感觉和伟大的意志力，率领军队展开正义之战，消灭了暴君。

这段话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败者为寇”。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暴君”。

承认基督教

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有些“年份”是非记不可的，公元313年就是这样的年份之一。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名义上和实质上皆为西方正帝的君士坦丁，与帝国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进行了会谈；也不是因为这一年李锡尼遵守密约，在马克森提乌斯战败后，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举行了婚礼；而是因为，这一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开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不过，公元313年，并非罗马皇帝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两年前的公元311年，帝国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已经承认过了。尽管如此，罗马帝国皇帝承认基督教的时间，还是被认定为发布“米兰敕令”的公元313年6月。

这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徒想把功绩归到至今依然被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身上呢？

亦或是，虽然伽列里乌斯的承认和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之间只有两年的间隔，但是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这一点，我想将两道敕令翻译出来进行一番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两巨头在米兰会谈的过程。因为这场会谈带来了承认基督教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果。每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而且，这一年的米兰会谈，也提供了很多线索材料，为研究日后的罗马史主角君士坦丁提供了依据。

马克森提乌斯败亡于公元312年的10月末。之后，君士坦丁以征服者而非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罗马。据说他在罗马滞留的时间不足两个月，那么，想必在公元313年初，就已经到达了米兰。2月上旬，李锡尼也到了米兰。想必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婚礼也在不久之后很快就举行了。因为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共同签署的“米兰敕令”是在6月15日发布的，而在这份赦令发布的三个月之前，李锡尼就匆匆返回了东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不是一位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贪图享受的人。换句话说，他懂得趁热打铁。君士坦丁在战场上擅长快攻，想必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具有等待时机成熟的慎重心态。

公元306年时多达六名的皇帝，在7年后的313年只剩下了三名，他们分别是君士坦丁、李锡尼，以及守卫帝国最东边的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罗马帝国处于一分为三的统治状态。不过，想必君士坦丁不会满足于现状。但是，现在趁着打败马克森提乌斯的气势去攻打李锡尼，并非良策。原因有两点：

第一，李锡尼麾下拥有罗马军中最负盛名的多瑙河防线守卫部队，这些人现在都只服从李锡尼的调遣。

第二，虽然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向来不合，但如果选择此时攻打李锡尼，很可能会迫使这两位帝国东方的正、副帝联手合作。

公元313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在米兰结婚后，李锡尼获益的不仅是迎娶了皇室成员，还为自身的势力镀了金。新娘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年应该刚满18岁。新郎虽然已经48岁左右，但在当时这种年龄差不算什么。不过，身为公主，到这个年纪还未出嫁的倒是少见。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君士坦丁，长期留着妹妹作为政治筹码。因为对巴尔干地区出身的贫民皇帝来说，与公主结婚，是将自身地位合法化的重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先后都获得这项优势条件之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着急了。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慌乱之下，看上了两年前去世的伽列里乌斯皇帝留下的寡妇瓦莱里娅。她是“四帝共治制”的开创者戴克里先的独生女。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认为，只要能与她结婚，就可以和李锡尼、君士坦丁处在同等的政治条件下。但瓦莱里娅拒绝了他的求婚。恼羞成怒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立刻派兵，不仅将这位先帝遗孀，还有恰巧在这个时期来探望女儿的戴克里先夫人一起逮捕，关进了大牢。

当时戴克里先身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滨宫殿中，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来到副帝跟前。除了对妻女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外，还要求副帝把两名女性交出来。副帝虽然将两人释放，却没收了一切财产，并流放东方。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05年退位时提拔为副帝的人，这样的行为真是恩将仇报。戴克里先退位释出权力，也才过了8年的时间。在公元308年第四轮“四帝共治制”开始时，戴克里先还能在人事方面发挥影响，事隔5年，权势却衰落至此。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已68岁的戴克里先，是如何承受这种明知妻女在外过着流浪生活却无计可施的日子。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理会退位老皇帝的意见了。

李锡尼仓促办完与公主的婚事后就急忙离开米兰的原因，在于马克

西米努斯·代亚因为对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结盟感到紧张，所以率军侵占了本属于李锡尼势力范围的小亚细亚。李锡尼一路向东行军，沿途不断与紧急召集的各路军团会合，身边还带着新婚的妻子。也许李锡尼的这一举动，是打算以公主为人质，阻止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动作。不过君士坦丁可不会在这个大好时机轻举妄动。这一次轮到君士坦丁隔山观虎斗了。

匆忙离开米兰的李锡尼，一边与沿途召集的部队会合，一边向东疾行。当他进入小亚细亚时，已经是公元313年的3月末。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所率领的军队人数有7万，相形之下，李锡尼的官兵人数只有3万。不过，最后获胜的是李锡尼。这并不是双方指挥官的水平有差异，而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士兵和东方长大的士兵实力差距太大造成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战败之后，逃到了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方的塔尔苏斯。同年8月，不知是自杀，还是被手下官兵暗杀，总之马克西米努斯·代亚退出了人生舞台。曾经多达6人的皇帝，就这样一个个退出了政治舞台，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两帝共治制”状态会延续下去。不，应该说，两位皇帝自身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帝国东方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退场，在历史上虽然不是大事，却牵连出一场悲剧。当时遭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流放的瓦莱里娅和母亲普里斯卡认为，帝国东方由正帝李锡尼统一以后，自己的命运也会跟着好转。对前皇后瓦莱里娅来说，李锡尼是获得瓦莱里娅的丈夫伽列里乌斯、父亲戴克里先的同意，才在缺乏副帝经历的情况下，一举登上西方正帝的人。李锡尼至今继位才5年，与伽列里乌斯又交情甚笃。这两名女子期待李锡尼能将她们遭没收的财产返回来，并护送她们回到戴克里先的身边。当时李锡尼正趁着战胜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气势向东行军，计划将整个东方国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这两名女子也前去参见李锡尼。

结果李锡尼根本就不打算接见这两名应该算是旧识的女人。无奈之

下，这对母女只好继续流亡。为了尽可能地接近戴克里先，两人来到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而李锡尼派了一队军人在此，手里拿着死刑判决书在等她们。统领罗马帝国20年、创立“四帝共治制”的戴克里先的妻子和独生女，就在面对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中央广场被处死，尸体直接让人丢进了大海。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在亚得里亚海海滨的斯普利特宫殿中接获消息时，心中会作何感想。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记录戴克里先晚年心境的资料留存下来。在历任罗马皇帝中，戴克里先是唯一亲眼看着自己多年构建的政策陆续崩溃的人物。仅就基督教问题而言，从最初的强制镇压和迫害，10年后政策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至于“四帝共治制”，帝国中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好处。唯一幸运的是，这些年帝国内部没有遭到北方蛮族以及东方大国波斯的入侵。然而掌权者却借此大肆争斗。至于戴克里先究竟在公元313年的何时过世，专家们迄今依然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公元313年6月15日公布的“米兰敕令”的内容。不过，即便他没有活到6月15日，但是两年前伽列里乌斯公布敕令时，他应该已经察觉到帝国对基督教政策转变的征兆了。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推动的基督教政策即将崩溃。这一年公布的“米兰敕令”，只是彻底毁掉原有政策的最后一击。

公元311年4月，正帝伽列里乌斯颁布的敕令全文如下：

> 朕订立政策时，向来以帝国及居民之利益为基准。实施政策时，以恢复罗马传统与秩序为期望。基于上述观点，面对抛弃传统信仰的基督教徒时，朕尝试各种方法，以期他们能够再度回到我等身边。然而这些人并未停下固执愚蠢的行为，不但未予继承罗马伟大祖先之行止，反而自行订立社会规范，于帝国各地游说，成功聚集很多徒众。
>
> 因此，我等（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为了让这些人回归祖先的传统，决意采取强硬措施（此处指公元303年戴克里先颁布的一系

列镇压基督教徒的敕令），使许多基督教徒改宗弃教。

尽管如此，却依然有很多固执己见、拒不弃教者存在。而弃教者当中，亦有相当多的人是为政策所逼，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心悦诚服地放弃基督教。结果，他们虽然不再信仰基督教神灵，但也未因此回复信仰罗马传统诸神。而此等现状，与我等罗马人传统中，认同所有人生活方式的宽容精神不相符。

朕之期望，在于恢复罗马人的传统与规律。经再三思考，朕得出结论，应将罗马人之宽容精神推广至基督教徒身上。

因此，从今日起，朕允许基督教徒重建其共同体（亦即允许信仰）。但在此要明文规定，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

从基督教徒的角度来看，伽列里乌斯皇帝认可的信仰自由，简而言之，根本就是语焉而不详。在罗马社会中，传统的罗马诸神依然占优势。而所谓的信仰自由，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还追加了“不违背国法”的条件限制。

不过，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众多皇帝中，有些镇压过基督教徒，有些则没有。即使那些没有镇压、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他们心中对基督教徒的想法只怕也跟伽列里乌斯相同。

早在共和制时期，罗马就是一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即便在军队这样一个理应着装统一的地方也不例外。上了战场，罗马军中也常常能看到打着赤膊上阵的日耳曼士兵身旁，站着身穿长衫的东方士兵。这是因为罗马人尊重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罗马人思想中的“宽容”（clementia）是，身为强者，也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者，尊重弱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时有时无，即使进行也不彻底，原因就出在这种思想上。唯一彻底镇压的例子，就是戴克里先发起的镇压政

策。但这项政策真正严格执行，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连这些罗马的行政人员，心中也不认同仅针对基督教徒信仰发起的镇压和迫害。

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是一种互相认同不同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认同其他神灵，唯独不认可基督教的想法，违反了多神教的精神。即单独排斥基督教徒的想法，违反了罗马人“宽容”的思想，因此不符合罗马人的性格。这是那些即使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也无法彻底镇压基督教徒的原因所在。而反过来，罗马人承认基督教时，也会语带含糊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仅仅在这道敕令颁布两年之后，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不过，这道被公认为史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其内容恐怕也无法让基督教徒觉得十分满意吧。因为就连这道敕令，也是立足于罗马的“宽容”思想上的。

由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签署，于公元313年6月发布的“米兰敕令”，全文如下：

>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
>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
>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

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从下文开始，敕令的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们：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读完“米兰敕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发布命令的这两位皇帝中，君士坦丁并未表示要改信基督教。此外，这道敕令也没有给予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特别优待。这只是一道全面认可罗马帝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公之于众的法令。

尽管如此，“米兰敕令”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被人们认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在公元313年，这道法令颁布后，罗马人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宗教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在这之前，罗马要求属于“共同体”（Res Publica）的公民，不论个人信仰何种神灵，都必须对“共同体”的守护神——传统的罗马诸神，保持一定的敬意。在罗马军中，无论信奉基督教、密特拉教，还是太阳神，那都是官兵的个人信仰自由。但每年的1月1日，官兵必须聚集在军团基地的中央广场上，在举行给罗马诸神的献祭仪式之后，对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忠诚。这时就要求大家暂时将个人信仰放在一边，全体行动一致。

而在“米兰敕令”颁布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敕令”中，承认个人有完全的信教自由，却完全没有提到国家“共同体”的宗教。也不像伽列里乌斯敕令那样，在认同基督教徒信教自由的同时，也注明“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一条。因此，“米兰敕令”是“无条件地完全认同”宗教信仰自由。

纵观从“米兰敕令”到今日的历史，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是尊重人权的重要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道敕令为18世纪传遍欧洲的启蒙主义开辟了先河。特别是“米兰敕令”的前半段，让人觉得好像在听伏尔泰或狄德罗的言论。

罗马帝国要比启蒙思潮早1400年，即便到了后期，依然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帝国。在这个繁杂多样的大帝国内部，依靠着“罗马法”、“罗马皇帝”以及“罗马宗教”这个宽松的框框，才能保持统一。曾有英国学者评价，罗马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联邦国家很相似。

“米兰敕令”一颁布，就把“罗马宗教”这个框框给去除了。这道敕令从内容上来说合情合理，无可批判，就连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也必定会

赞不绝口。问题是，提倡这项思想的君士坦丁本人，是否真的认为没有了宗教约束后照样有办法统治整个帝国呢？

而且，既然“米兰敕令”已经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1400年后的启蒙主义学者，又要跳出来大力主张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相当长的岁月里，宗教自由根本没有得到保障。

而让社会走上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这条路的，就是君士坦丁本人。

虽然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在“米兰敕令”上署名，但两人的同盟关系在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败亡后，很快就面临危机。整个帝国版图出现了西方由君士坦丁、东方由李锡尼统治的“两帝共治制”局面。虽然形式上都为“两帝共治制”，但实际上与公元285年的“两帝共治制”差了很多。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的“两帝共治制”能够维持8年，是因为两位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并不对等。负责西方事务的马克西米安，虽然形式上是戴克里先的同事，但帝国统治的主导权一直在戴克里先手里。这种状态下，帝国能够发挥统治机制，在于武夫型的马克西米安对比自己年长5岁、政治判断精准的戴克里先心悦诚服，毫无二心。

相形之下，公元313年的“两帝共治制”，内情完全不同。公元313年，李锡尼48岁，君士坦丁38岁，两人相差10岁。两人之间，可不像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那样，经常有人情味浓厚的感情交流。尽管李锡尼年长许多，在政治、军事才能上却无法获得君士坦丁的尊重。这样的两人关系，仅仅是双方势力的对峙。因此两人形成的“两帝共治制”局面，维持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出现裂缝，也就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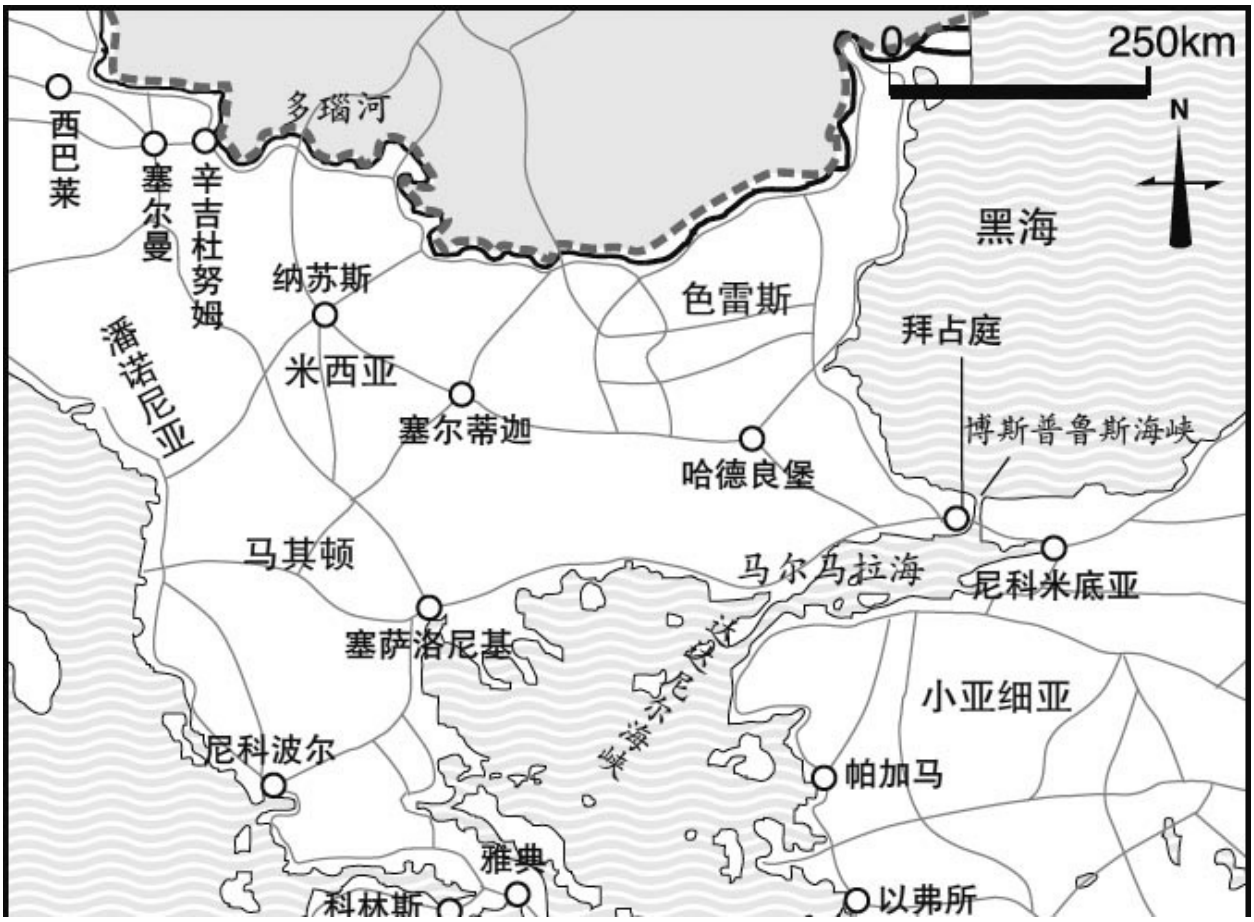
事情的导火索，是君士坦丁的亲戚惹祸以后逃到李锡尼之下，而李

锡尼拒绝了君士坦丁的引渡要求。据说李锡尼的拒绝并非针对引渡，而是因为君士坦丁提出要求的方式太过傲慢。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因此获得了对李锡尼作战的正当理由。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虽然成功阻止了外敌入侵，但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三场内战，致使大片国土荒废，经济也一再衰退。而且公元315年的内战，是君士坦丁手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高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巴尔干部队。这可是两支罗马军队中数一数二的精锐部队的正面冲突。当然，短期内还无法看出战斗的结果。

公元315年初秋发生的第一场战斗，地点在多瑙河附近，潘诺尼亚地区的小镇西巴莱。潘诺尼亚地区属于李锡尼的管辖区域，而西巴莱位于李锡尼的宫殿所在地塞尔曼西北70公里处，很明显是君士坦丁主动发起的攻击。当时李锡尼能动员的兵力有3.5万人，而君士坦丁只有2万人兵力。

君士坦丁要想以少胜多，尽早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君士坦丁亲自率领骑兵军团冲进敌军阵营，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如何率领大军冲向5倍于自己的波斯大军的情景。不过，罗马士兵的战斗力可不是波斯军所能比的。这场激战一直持续到日落。君士坦丁能始终占据战场优势，倒不是因为官兵个人战斗力特别强，主要还是指挥者能力存在差距。



色雷斯及其周边

到了夜晚，李锡尼及其军队拔营向东逃走，当时李锡尼对士兵宣称是撤退而非败逃，可他甚至连首都塞尔曼都弃之不顾，就直接一溜烟地逃到了色雷斯地区。底下的士兵对局势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途中部队人数从3.5万人减少到2万人，倒不是部下背叛，而是官兵抛弃了他们的首领。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色雷斯与其南边的马其顿交界的山区。

据说这一仗打得比第一场还要激烈。只不过，要想让有逃跑之意的官兵回心转意，并带来战斗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万中选一的高级将领才行。敌军光是占据追击的立场，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一如所料，第二场战斗李锡尼又落败了。

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以当时妇女少见的意志和胆识，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调停有效吧，两位皇帝在这一年的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虽然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但罗马人之间的内战至少算是暂时平息了。

不过，君士坦丁不忍拒绝妹妹的恳求而选择和谈，这只是表面上的姿态，实际上，应该是君士坦丁盘算这次谈和对自己绝对有利才作出的决定。一旦李锡尼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就意味着他退出了多瑙河防线的守卫工作。不负责多瑙河防卫工作，也就代表他放弃了多瑙河部队的作战指挥权。

如此一来，君士坦丁麾下就拥有了莱茵河防卫部队和多瑙河防卫部队这两支罗马军中最强的军事力量。相对的，因为讲和而捡回一条命的李锡尼手下，只剩下向来因软弱而被轻视的东方部队。现在李锡尼已经算不上是危险的竞争对手了。

君士坦丁的性格不是那种喜欢趁势一鼓作气爬到楼层最顶端的人，他具有每到楼梯口就停下脚步，回顾确认成果，之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的特质。这时他才40岁，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可能他也认为不必急于成事。恐怕君士坦丁这个人，是与“躁进”一词最没有缘分的人。

而不躁进，意味着这个人在不适宜仓促行事时，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为日后作准备。君士坦丁在公元306年刚刚登上权力舞台时，根据地位于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现在德国的最西边。在公元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他把根据地迁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在公元315年战胜李锡尼之后，他的根据地又移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多瑙河防线的关键要地、靠近多瑙河的塞尔曼，现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米特罗维察。这些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他一步步将棋子向东方移动。也许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推测出君士坦丁脑海中是如何勾画罗马帝国的形态的。但是，君士坦丁优秀的地方在于，树立大目标之后能将完成这一目标的路径分成很多小步骤，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认真执行完毕。

在与李锡尼暂时讲和之后，公元316年到322年这7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忙于击退北方蛮族的进攻。这段时间里，莱茵河东岸的法兰克和阿拉曼两个部族，以及多瑙河北岸的哥特人，时隔多年后再次突破了防线，攻入罗马境内。如果此时君士坦丁继续专注于对李锡尼的围剿，继续不断地向东进军，只怕蛮族会深入欧洲大陆内部，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就算君士坦丁真这么做，把李锡尼逼上绝路，登上唯一最高权力者的宝座，人民也不会忘记以排除异己为优先、容许蛮族入侵掠夺的事实。

身为罗马皇帝，首要职责是保障帝国及其边境居民的安全。正因为如此，皇帝才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并享有凯旋将军含义的“Imperator”称号。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不管内政多么出色，任由外敌入侵的人是称不上“皇帝”的。

直到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才作好反击的准备。虽然北方蛮族突破防线的事情发生在前一年，但是要集合符合皇帝御驾亲征规模的大军，不是三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一直到五贤帝时代为止，帝国的安全保障政策都是以强化防线牢固为核心，努力构建一旦某处防线遭到突破，立刻会有其他防线兵力驰援的体系。但是，自从戴克里先即位之后，帝国安全保障的主力不再是沿着防线密集布置的军团驻军，而是由每位皇帝直接率领的游击部队。而且既然是皇帝亲自率领，部队规模自然也要高达数万。就算在现代，大批兵力会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在古代也是一样。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反击战直到公元317年才正式开始。君士坦丁把战线分为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处，并将莱茵河交由长子克里斯普斯负责，自己则负责多瑙河地区。这是因为突破莱茵河防线的敌军入侵了高卢地区，而突破多瑙河防线南下的敌军闯入了巴尔干地区。

克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长子，后来为了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结婚，而与克里斯普斯的生母离婚。克里斯普斯作

为君士坦丁与离婚的前妻之间所生的长子这一点，与君士坦丁年轻时相同。不过，君士坦丁将重责大任交给年轻的克里斯普斯，并非因为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遭遇，对儿子产生同情。这纯粹是因为当时在皇室中，只有克里斯普斯能够协助承担御驾亲征的任务需求。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儿子，这时都还是幼儿。

此外，这个时期，克里斯普斯已经从父亲君士坦丁手中接下了“恺撒”的称号。这个时候的“恺撒”，不能像“四帝共治制”时期那样，译为“副帝”。“副帝”具有独立判断、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而君士坦丁可没有给克里斯普斯这样的权力。因此，在“四帝共治制”之后的“恺撒”，应该回复到公元2世纪元首制时期，是“帝位继承者”或者“皇太子”的含义，并依此进行翻译。君士坦丁会将克里斯普斯定为继承人，是因为与前妻所生的克里斯普斯已经年满20岁，而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孩子，长子才1岁，次子刚出生。

不过，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相似的地方，还不只是出生和生长环境。虽然他才20岁出头，但领兵打仗已经颇有其父之风。

不过，这名年轻人和父亲不一样，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一上战场就像猛虎出笼，显得特别威猛。克里斯普斯不但擅长快攻，还懂得运用谋略来有效推动战场形势。仅就战场上的才华来讲，也许还在其父之上。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遭到克里斯普斯的反击，马上就兵败如山倒。

不过，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特别是哈德良皇帝，会坚持以强化防线来扼制蛮族入侵，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因为一旦让蛮族侵入帝国内部，再要赶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这些蛮族并不像罗马军队那样，有组织和有纪律。他们一旦突破防线入侵之后，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而四处活动。如果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军队，只要击破其集团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对象是蛮族的话，这

种作战方法就不管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搜寻分散在各地的蛮族小集团，逐一进行击破。而在完成各个击破任务之后，又轮到罗马军渡过莱茵河攻进对方的根据地。为了让蛮族刻骨铭心地记得入侵罗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有时还必须做些残酷野蛮的行为。而在罗马的政策中，如果有任何部族愿意对罗马表示恭顺，愿意提供兵力构筑友好关系的话，罗马方面也会欣然接受。这也就难怪克里斯普斯要恢复高卢地区的和平，将不愿停止敌对行为的蛮族赶入莱茵河东岸远处，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父亲君士坦丁出兵支援的情况。作为年轻将领，第一次领兵打仗，可以说打得极为漂亮。

多亏有了克里斯普斯的英勇善战，君士坦丁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瑙河地区。至于这条战线上的战斗究竟是何时开始的，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这条战线上的敌人，是北方蛮族中最为庞大、彪悍的哥特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不同，军队是有组织的行动。说不定哥特人和君士坦丁率领的罗马军队作战时，会采用两军在平原布阵会战的方式。

虽然说开战的年份不详，但结束战争的年份却留下了记录。据说一直到公元322年的夏天为止，君士坦丁及其大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反击战中始终占据优势，而到了11月时，虽然要面临不利于战斗的季节，他们还是着手准备进攻多瑙河北岸。

所谓的准备，就是要让200多年前图拉真皇帝在多瑙河上修建的、长达1公里以上的石桥恢复通行。这座“图拉真桥”的20个桥墩是用坚固的石材建造的，但由石墩支撑的供应人马车辆通行的桥面，则是木结构。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放弃达契亚行省时，木造部分已被拆毁。由于罗马帝国撤出由图拉真皇帝征服并行省化的达契亚地区（现在的罗马尼亚），这一地段的多瑙河再次恢复边界最前线的地位。因此，军方出于防卫需求，将河流上的桥梁拆除。

君士坦丁计划的攻打多瑙河以北的方案，必须要让大军渡河才能实现。因此，必须要建造桥梁。公元322年的准备工作就是征集大量的木材，投入大量官兵，将图拉真桥恢复到公元103年完工时的模样。不过工程本身肯定要比200多年前简单随意得多。毕竟，现在只要求这座桥能通行就行。等到在对岸击败哥特人、渡桥回来后，这座桥还是要当场放火烧掉的。

攻打多瑙河北岸的战斗最后胜利结束，被击败的哥特人，只得向罗马求和。君士坦丁以将4万名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军队为条件，答应了对方的和谈。这样，到公元322年，君士坦丁总算脱离了7年来纠缠不休的北方蛮族问题。这也意味着，对君士坦丁来说，从最后一个楼梯口一跃登上楼层最顶端的机会来了。

公元324年，李锡尼59岁，君士坦丁49岁。年轻10岁的君士坦丁再向李锡尼开战时，再也不需要打着什么幌子或者寻找借口了。这时他已经不需要隐瞒为争夺皇位而发动战争的事实。

李锡尼也早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他趁着君士坦丁集中精力与北方蛮族作战时，集结好大军严阵以待。

李锡尼在陆地上的兵力，包括15万名步兵，1.5万名骑兵。海上的军力，包括从埃及调来的130艘，塞浦路斯岛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各110艘，共计350艘的三层桨帆船。

相对的，君士坦丁这边的兵力，骑兵步兵合计有12万人。数量上虽然不占优势，但这些都是刚刚与蛮族作战过的士兵，可谓是久经沙场，战斗力非比寻常。除了这些陆上兵力，还从意大利和希腊召集了200艘三层桨帆船。

攻防双方都准备了军用桨帆船，是因为李锡尼的势力范围在小亚细亚以东，而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在巴尔干以西。双方势力的分界线，正

好是分隔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南可以看到的爱琴海。由于地势因素的影响，这场争夺帝国霸权的战斗，成为了一场海路联合的大型作战。君士坦丁决定亲自指挥陆上作战，海上作战的指挥权，则交给儿子克里斯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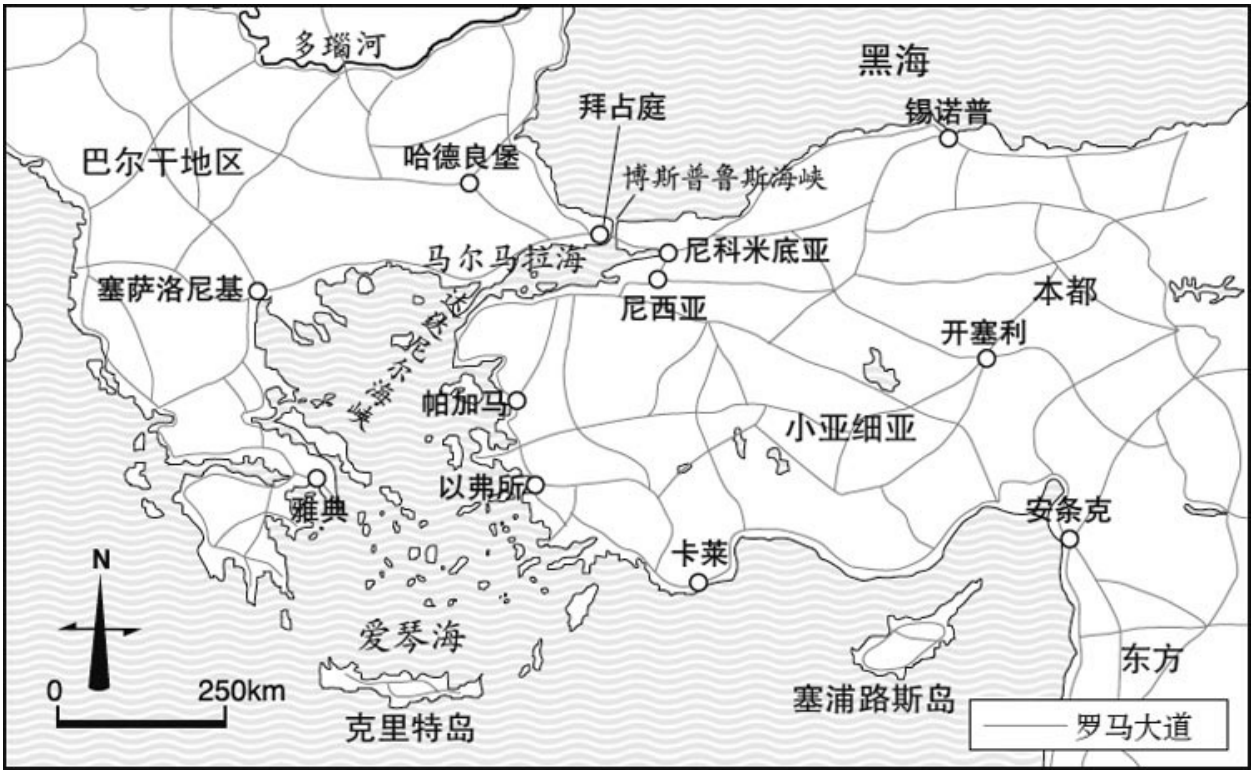
公元324年7月3日清早，双方部队在现代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之一的埃迪尔内附近相遇。这座城市是由哈德良皇帝兴建，所以在古代称为哈德良堡。埃迪尔内是这个名字转成土耳其发音之后的称呼。虽然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最东边，但这个城市还在欧洲境内。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埃迪尔内附近，这说明是李锡尼一方攻入了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锡尼没有让部队从哈德良堡继续向西前进。这一点，使得君士坦丁有时间在希腊的海港塞萨洛尼基将陆上与海上兵力集结完毕。当部队集结完毕、接受君士坦丁的命令后，陆上部队取道东北，向哈德良堡进发。海上军队则从爱琴海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马尔马拉海。

虽然敌我双方在广阔的平原上布好了阵型准备开打，但双方分别投入16.5万人和12万人的大军，这么宏大的规模不可能布阵完毕马上就进入全面冲突阶段。最初几天，双方都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观察局势。后来君士坦丁领先对手一步，率先将试探性的交战转换成了全面的决战。

君士坦丁在这次作战中，依然采用亲自率领骑兵团冲散敌军阵型的粉碎式战法。他虽然大腿中箭，但依然毫不退缩。官兵们看着总司令亲自在战场的正中央冲锋陷阵，士气也变得更为高昂。

不过，君士坦丁虽然是一位勇敢的武将，但不是能在求取胜利的同时，将敌我损失减至最小的战略好手。这天他虽然获胜，但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尸横遍野。李锡尼一方阵亡人数达到3.4万人。君士坦丁这方的损耗虽然要少一点，但是也已经无法立刻追击败逃的李锡尼大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大获全胜，只能说李锡尼的战略战术实在太差劲。

在战斗前制订战略战术时，应该只订立几项基本的行动纲领，其他细节问题要等到上了战场，根据战况的发展随机应变。如果事先将细节都规定好，那么真正作战时就会缩手缩脚，无法应对战场上常常发生的突发意外。李锡尼可能是没有担任副帝的经历就直接升任正帝的缘故，缺乏战场经验。即使担任正帝以后，也是一再回避武力冲突。在生死攸关的决战之前，他应该也制订了细致的作战计划，但毕竟只是纸上谈兵。他率领的是多达16.5万人的大型军队，而且他还要求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必须按照事先制订的详细作战要求行事。在容易陷入混战的战场上，官兵们自然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一旦行动被限制，战士的直觉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数量上的优势，反而会变成缺点。眼看败局已定，士兵们纷纷逃离战场，躲进附近的山里。后来他们没有追随李锡尼逃往拜占庭，而是选择了毫无反抗地投降。这次，李锡尼又被部下抛弃了。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位置的三角形城市，最初名叫“拜占庭”，后来改称“君士坦丁堡”，现在叫做“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两侧靠海，只有一侧是陆地，可以说是天然的要塞。李锡尼逃进拜占庭之后，一开始君士坦丁似乎打算采用海陆夹击的方式进攻。但后来实际战斗的地点却是在海上，因此，第二场战斗的主角是克里斯普斯。

这场350艘对200艘桨帆船的海战结果，将决定拜占庭外围两侧的海洋制海权的归属。李锡尼手下的350艘战船以小亚细亚一侧的港口为基地，而克里斯普斯率领的200艘战船则以欧洲一侧的港口为基地。双方犹如隔着海洋，一左一右地摆阵对峙。而且，两军的战舰在日出时分同时离开基地，朝对方疾驰而去，在海的正中央展开激战。

与帆船比，桨帆船作为军用船只的历史更为悠久。这是因为帆船只能依靠风吹动，而桨帆船除了帆以外，还配备了作用犹如马达的桨，能够按照人的意愿移动。而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无论有风没风，都会把帆降下，仅依靠人力划桨控制船只进行移动作战。另外，桨犹如现代的马达，所以没有风的时候也能驱动船只。如果遇上顺风，则可以同时使用帆和桨两种动力，进一步增加船速，增强对敌船的冲击力。

在拜占庭南部海面进行的第一场海战，敌我双方都没有遇到顺风。由于双方都靠桨驱动船只，因此局势一直对船只数量占优势的李锡尼军有利。不过虽然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第一场战斗并没有分出胜负。

等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场战斗开始时，克里斯普斯似乎发现拜占庭附近海域的风向有两种：靠近欧洲一侧的海域主要刮东南风，而进入亚细亚一侧的海域，则主要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西北风占主导。

于是，克里斯普斯命令麾下的战船比前一天提早出港，天还没亮就出发。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海战的战场推到接近亚细亚一侧的海域。一切都如计划中想的那样，当双方开始战斗时，克里斯普斯的战船不仅顺

风满帆，而且全力划桨，其冲击力比起在逆风中只能依靠摇桨移动的李锡尼军的战船要强数倍之多。从正面承受这股冲击力的敌军战船招架不住，只有被撞沉的份儿。最后，李锡尼军的沉船数量超过130艘。加上前一天损耗的船只，不知道李锡尼方面到底损失了多少船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了君士坦丁的手中。

丧失制海权，对于两面环海的拜占庭来说，也就意味着补给通路被切断。李锡尼悄悄地离开处于孤立状态下的拜占庭，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小亚细亚。不过，这也没有争取到多少时间，君士坦丁率领的陆上部队很快就渡海来到了亚细亚。李锡尼手上最后一张牌，就是在亚细亚地区展开陆战。可惜，这场战斗又是由君士坦丁获胜。这场战斗李锡尼损失了2.5万人的兵力。

尽管局势恶化至此，李锡尼还是逃到了尼科米底亚。尼科米底亚位于马尔马拉海的小亚细亚一侧，是戴克里先皇帝长年视为首都的地方，也是李锡尼8年来的根据地。李锡尼逃入这座城市，打算争取作战时间。不过，君士坦丁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将所有问题作个了结。

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至于胜利者和战败者这一次在哪里举行了会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说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必须正式退位，进入自己的引退生活。这是饶李锡尼一命的条件。不过，李锡尼不得自行选择引退地点，君士坦丁规定他必须在塞萨洛尼基与妻子一起过着引退生活。这就是当年60岁的李锡尼的余生。

只不过，这个余生连一年都没能维持。第二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隐居地，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处以死刑。还是少年的儿子也遭到杀害。据说，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娅后来

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但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在“米兰敕令”发布以后，男性皇族成员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还难以接纳基督教，而女子则没有这个问题。至于改信基督教后的前皇后，在何处如何度日，后人无从知晓。

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很多历史学家在叙述罗马史的时候，到君士坦丁时代就戛然而止，其理由是，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的确，经过共和、帝政时期而形成的很多罗马“特征”，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后，可以说是“彻底地”丧失了。但是，这些特征早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崩溃，经过戴克里先改革之后，最终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而君士坦丁的举措，只是将罗马“特征”彻底葬送而已。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继续叙述罗马史的确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即使在罗马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罗马”的时代里，罗马人当中依然有很多崇尚罗马“特征”的人存在。而我要写的，正是这些“罗马人”的历史，而非罗马的历史。因此，只要有这类罗马人存在，我就有理由继续写下去。

此外，在君士坦丁时代，信仰基督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人，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依然属于尊重罗马传统诸神的人。正因为这部分人占了大多数，君士坦丁才有必要巧妙而坚决地将这部分人变得非罗马化。

君士坦丁是个知道需求不仅会自然产生，也可通过人为唤起的“战略家”。而“strategy”（战略）一词的词源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

君士坦丁

公元324年，是君士坦丁历经18年权力斗争后取胜的一年，也是他开启未来13年专制统治的第一年。如果从公元284年，即戴克里先即位那一年算起，是帝国重隔40年之后，再一次回到由一位皇帝进行统治的时代。

君士坦丁在历经千辛万苦得到最高权力之后，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呢？

那就是一个由新首都、新政体、新宗教构成的新罗马帝国。这称得上是一场革命，而他完成的方式，主要分以下三种：

第一，在既有事物中，能够利用的事物或体系保留原样，继续使用。

第二，遇到不方便继续沿用的事物或者体系，则按照君士坦丁的构想进行改造，再继续使用。

第三，对于不方便继续使用而又无法改造的，则另创新的事物或体系。只不过，这种情况下，既有的不会遭到破坏，而是让其与“新生”体系并存，待到“既有”事物的人才或能量被“新生”体系吸收殆尽后，让其自然衰竭。

以下要叙述的君士坦丁的各项政治举措，很多实在难以按照年代顺序一一叙述。因为这些政治举措，大部分都是并行推动的。不过，在细细推敲其中的详细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举措都可以归类到上述三种革命方法中去。

建设新首都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为什么会选择无论在希腊史还是罗马史上都籍籍无名的拜占庭（希腊语称为拜占提欧）作为帝国的新首都。由于君士坦丁本人并未留下任何言论，同时代的人也未留下任何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只能通过后世的罗马史专家进行推测。而后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地理上的优势。

拜占庭是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三角形的一边面向马尔马拉海，另一边对面是被后世称为金角湾的海湾，只有剩下的最后一边连接陆地。在那个时代没有防止空中袭击的顾虑，两面都对着难以发起大军进攻的大海，是个很大的优势。金角湾受到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的潮流守护，只要用铁链连到对岸封锁港湾，受敌船袭击的风险也就接近为零。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只要将主力投向连接陆地的一边即可。

只不过，防御再怎么完美，如果让人围得水泄不通，来个瓮中捉鳖可就惨了。但幸好拜占庭不是伸入大海中的孤岛。拜占庭与小亚细亚的距离较近，足以趁夜摸黑以小船往来，不大容易让人切断补给，落入瓮中捉鳖的困局。

而一旦脱离了以防御为重的战时状态，在平时，可以充分发挥海港城市的优势。拜占庭北通黑海沿岸一带，西往色雷斯地区，东面有小亚细亚，向南可以通过爱琴海诸岛直达埃及。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旦将周边海陆地区纳入掌中，就可以形成四面八方海陆物产和通商贸易的一大集散地。

不过，如果拜占庭的优势只有这些的话，也就无法解释君士坦丁在选择首都时，为什么会看中这样一座历史上从来没有作为重要城市出现过的地方。想必除了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之外，拜占庭还有其他在君士坦丁看来特别重要的优势存在吧。

这项优点，只怕是因为罗马帝国原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存的双语帝国，而拜占庭属于希腊语圈。首都罗马，不用说，自然是拉丁语圈的中心。《新约圣经》在一般民众中普及，也是在翻译成希腊语之后。而基督教徒也大多身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希腊语圈之内。在十二使徒时代，神职人员还都是犹太人，现在则是希腊人占了大多数。而且，拜占庭不像叙利亚的安条克那样完全属于东方，而是位于古代人心目中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点上。这样，在君士坦丁看来，拜占庭正是最适合做新生罗马帝国首都的城市。

只不过，当君士坦丁将首都定在拜占庭之后，随之产生了一项让他烦恼、有时甚至要发发牢骚的问题，那就是帝国的中枢机构，开始由喜好议论的希腊人掌控。如果说罗马人是“多做少说”的话，希腊人则是典型的“先说再做”的民族。

君士坦丁看上拜占庭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以前不是罗马世界中的重要城市。帝国的每一个重要城市，其城市结构都极力模仿罗马，让人觉得好像是缩小版的罗马市。比如在城市内部构造上，各个城市除了都建有称为“forum”的大型公共广场、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半圆形剧院、大浴场等公共建筑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类神殿。由于罗马人属于多神教民族，每一个神灵都要修建神殿，所以在城里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马上就是多得手指都不够数的神殿。由于当时还是非基督教徒占多数，如果胆敢拆除这些神殿修建教堂的话，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抗。按照君士坦丁的个性，他在言行举止上会尽可能避免刺激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派系。从他的眼光来看，拜占庭只是一个小型的地方都市，神殿数量不多，即使拆除也不会引起大的反对，实在是一个上好的定都地点。

一个原先就没有传统建筑可言的地方，正适合用来重新建设。这些建设，不仅包括神殿，也涵盖其他公共建筑。换句话说，拜占庭实质上就是一大片空地，君士坦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拜占庭建设成一座

新首都。在罗马市，罗马传统诸神的存在感毕竟太过强烈。在君士坦丁施政后期，也曾经在“异教”圣地罗马市建设教堂。不过，这些教堂都位于市郊。因为“异教”的神殿占满了市区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时代，拆除神殿在政治上还是不明智的做法。

据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工程，开始于公元324年。如果这项记载属实，那么开工时间应该是在打败最后一名对手李锡尼前后。建设新首都的计划，恐怕老早就在君士坦丁脑海中成形。而且，君士坦丁严命部下，必须突击赶工，尽快完成。最终，庆祝新首都落成仪式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举办。如此算来，新首都的建设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

为了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从帝国各地征调建筑师、建筑工以及雕刻匠等必需人员。不过，他并没有采取强制征召的方式，而是利用提供工作、报酬，甚至提供可供全家居住的大房子这样优惠的条件来招贤纳士。一座新城市能否发展，与这座城市能吸引多少人才定居息息相关。正因为有优惠的政策，与帝国其他城市公共建设日益衰减的情况相反，新首都及其周边反而引发了一场小型的建筑潮。只因为君士坦丁要建设一座不输给首都罗马的新城市。永远的首都罗马，是建国千年以来人们一点一点建设而成的。几年的突击赶工不可能赶得上千年的成果。而拜占庭之所以能建设出一个及格的模样，在于专制君主强韧的意志，以及无上限的资金投入。

现存的一份记录记载着新首都之中存在哪些建筑物。不过，这份记录的记载时间是新首都竣工百年后的公元5世纪初期，因此，不能拿来说明君士坦丁时代的城市模样。不过，还是可以窥探出下面几点结论：

第一，君士坦丁将这座新首都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的首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罗马是罗马人的首都。相反，君士坦丁堡（英语Constantinople），则纯粹是皇帝君士坦丁个人的首都。

在罗马，皇帝公私两用的住处占满了整座帕拉蒂尼山丘。在共和时期，那里只是高级住宅区，进入帝国时期之后，皇家又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并购改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而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的第一座建筑就是皇宫。皇宫位置设在离陆地一面的城墙最远的地方，也许是认为面海的一带最为安全吧。实际上，这座城市在公元1453年落入伊斯兰势力手中之后，这一带就改建成了土耳其苏丹的宫殿。虽说新首都建设于罗马国力日渐衰落的公元4世纪，不过依旧按照以基础设施为重的罗马风格进行修建，从上下水道到市区道路，都规划得井井有条。现在可以追溯到的君士坦丁堡的市区地图，同样出自公元5世纪。而君士坦丁当时建设的首都，只有公元5世纪一半的规模。

尽管如此，新首都还是和罗马一样，将市区划分为14个行政区。内部既有元老院，也有带长廊、被称为“forum”的广场，更有叫做“thermae”的公共浴场。当然，也少不了买卖日常生活品的大型市场。

要说罗马有而君士坦丁堡内没有建设的建筑物，自然首推神殿。其次就是通称为“Colosseum”的圆形竞技场和长方形的大竞技场。还有就是半圆形的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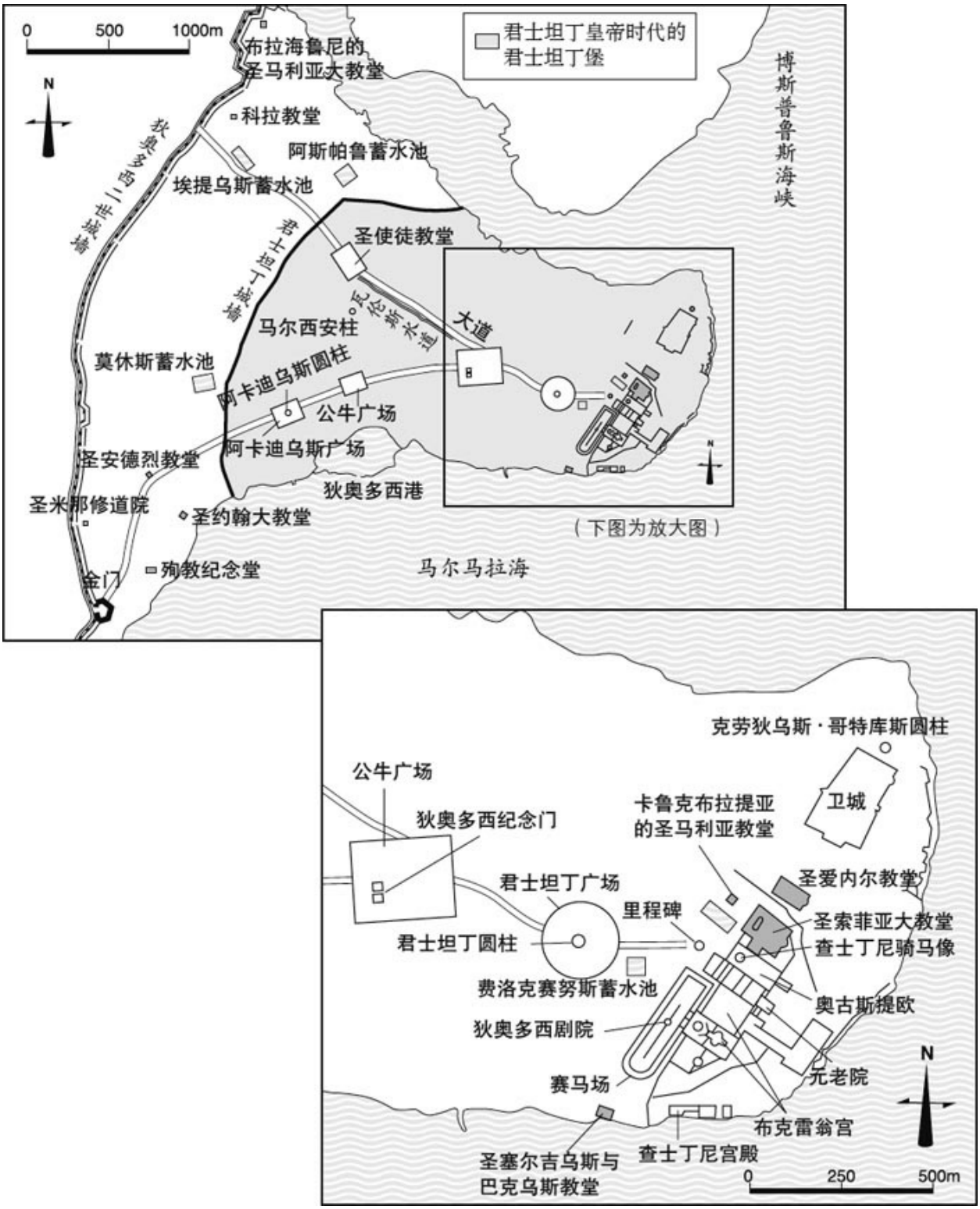
没有神殿的原因，在于每一座神殿都是市民个人献给多神教诸神的建筑物。“米兰敕令”颁布以后，虽然给予所有宗教同等的地位，然而，这只是为了避免急剧变化而试图先营造一段灰色地带的策略。君士坦丁当时的真正意图在于振兴基督教。就算他允许以罗马为首的各大城市维持神殿的现状，但由他自己兴建、并冠以他个人名号的新首都，自然不允许修建献给希腊、罗马、叙利亚以及埃及诸神的神殿。一神教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不承认其他神灵的存在。

包括罗马在内，帝国各主要城市都必定建有圆形竞技场、竞技场和半圆形剧场，而这些设施在君士坦丁堡也是看不见的。倒不是因为君士坦丁厌恶角斗士比赛、体育竞赛以及音乐剧之类的活动，而是这些娱乐活动虽然为大众所喜爱，但同时也是献给诸神、与诸神同乐的活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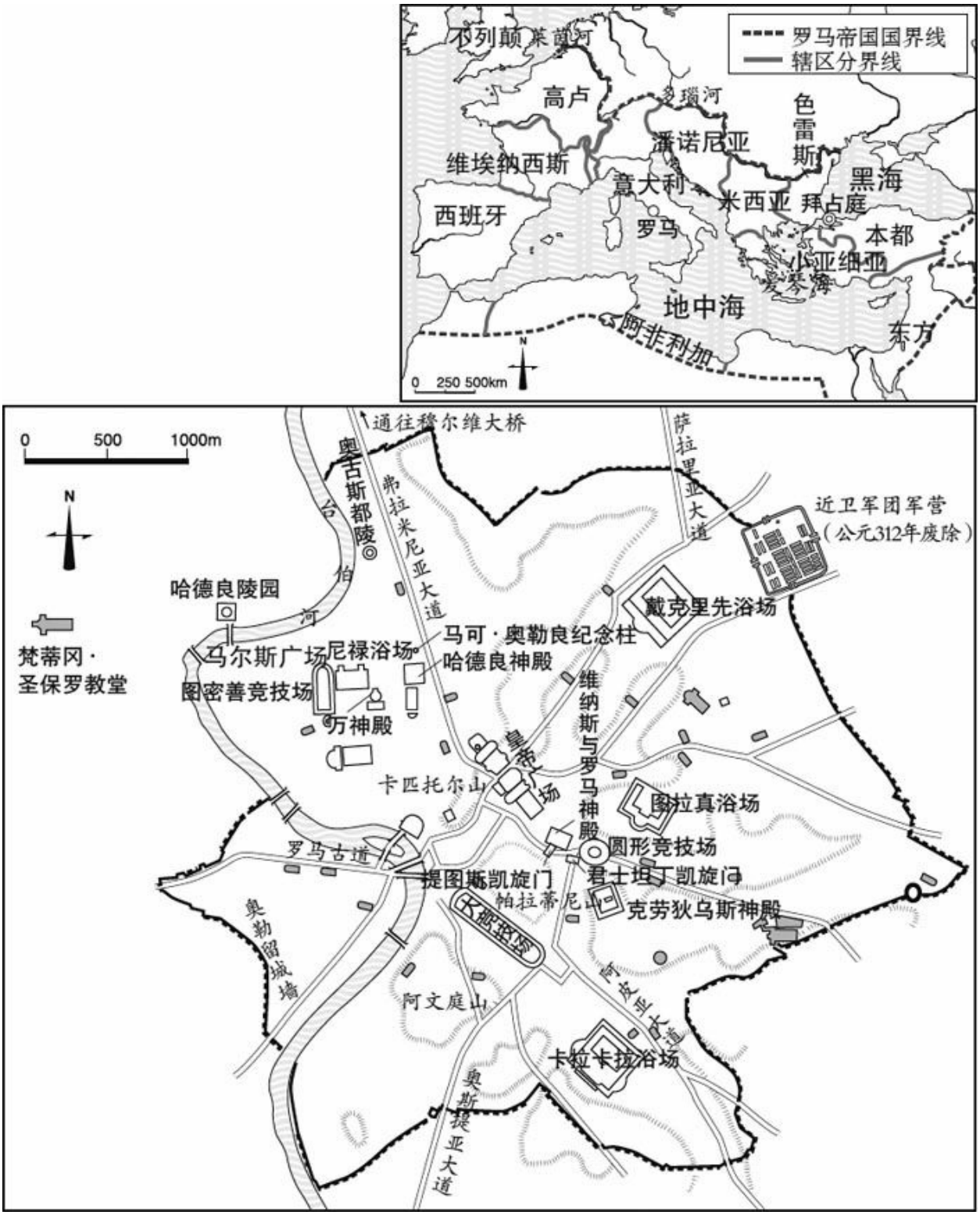
此在君士坦丁看来，这些活动与多神教、特别是希腊罗马诸神的关联性实在太强了。就好比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献给天神宙斯的活动。

君士坦丁堡虽然没有罗马市内战车竞速比赛用的“竞技场”（circus）、田径比赛用的“运动场”（stadium），但建有构造与“竞技场”完全相同的“hippodromus”。“hippodromus”是希腊语“赛马场”的意思。这座建筑不用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来命名，想必是建在希腊语圈内的缘故吧。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座建筑是真的仅仅作为赛马场来使用，还是兼做罗马时代最受欢迎的双驾马车、四驾马车的赛场。不过，这一类竞赛，因为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所以也算是一种献给多神教神灵的活动。可能因为娱乐性比较强，也就不予计较了。在这座急速成形的新首都当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模棱两可、不予计较的现象。

在搭建好公共建筑这个“外壳”之后，还需要一些装饰品来点缀。罗马人最喜爱的建筑装饰，就是在两侧立着圆柱，中间竖着雕像。由于新首都是突击赶工建设起来的，没有时间去雕刻数量如此庞大的雕像，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一声令下，官员们开始在罗马境内征集现有的雕像。而这些征集的雕像，大多来自对这种征调行为抵触较小的东方地区。尽管如此，这些从神殿、公会堂和竞技场征集来得雕像中，并不包括罗马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的执政官、皇帝、名将的雕像。既然新生的罗马帝国要以基督教为支柱，这些人物的雕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500
1000m
N
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
君士坦丁堡
布拉海鲁尼的
圣马利亚大教堂
科拉教堂
阿斯帕鲁蓄水池
埃提乌斯蓄水池
博斯普鲁斯海峡
君士坦丁城墙
圣使徒教堂
马尔西安柱
大道
莫休斯蓄水池
阿卡迪乌斯圆柱
公牛广场
阿卡迪乌斯广场
圣安德烈教堂
狄奥多西港
圣米那修道院
圣约翰大教堂
（下图为放大图）
金门
殉教纪念堂
马尔马拉海
克劳狄乌斯·哥特库斯圆柱
公牛广场
卫城
狄奥多西纪念门
卡鲁克布拉提亚
的圣马利亚教堂
君士坦丁广场
圣爱内尔教堂
里程碑
圣索菲亚大教堂
君士坦丁圆柱
查士丁尼骑马像
费洛克赛努斯蓄水池
奥古斯提欧
狄奥多西剧院
元老院
赛马场
布克雷翁宫
查士丁尼宫殿
圣塞尔吉乌斯与
巴克乌斯教堂
0
250
500m

帝政末期的君士坦丁堡



帝政末期的罗马（与前页君士坦丁堡地图同比例尺）

如此一来，能够利用的就只剩下诸神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裸体、半裸体雕像。如今这些雕像也已经不再是信仰或者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是建筑物的装饰品。这些雕像如今依然被人视为艺术品，君士坦丁可以说是开创这种观念的第一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人连基督教的信仰对象也当成艺术品看待。

君士坦丁的这一做法或许还有这样一个作用，那就是淡化了人们对教会取代神殿这一时代变化的感觉。毕竟在新首都当中，除了与工程相关的建筑师和工人以外，还要有发挥首都功能所不可或缺的其他职业人士定居。想必乍看之下，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给人的感觉跟旧首都罗马很相似。就连皇帝君士坦丁本人都声称，这是“新罗马”。新首都之中甚至连元老院都设置齐备，只不过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领导层的变化

“元老院”（senatus），和罗马大道一样，其最初的形态均出自其他民族，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罗马特有的事物。比如说，在波斯帝国老早就有一条石板铺设的大道，但却是罗马人将它发展成道路网，变为向帝国各处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在斯巴达和犹太，也有长老会议，只不过罗马的元老院后来发展的方向与它们截然不同。

在王政时期，罗马还是数量众多的部族联合体。当时的政府聚集了多达300人的部族酋长，设置了对国王提议或者劝谏的机构，这就是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因此，元老院的历史要从罗马建国的公元前753年开始起算。

但是，到了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制时期后，元老院的作用也就完全不同了。带头废除王政的正是元老院的权威议员，因此在新的共和政体下，元老院也就必须担任主角。

此时的元老院已经不是聚集不同部族代表的长老机关，而是转变成有如现代国会的组织。只不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人选组成，而是来自权贵之后或者士绅家族。这些人只要年满30岁，无论身为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取得元老院的席位。以维护平民权力为职务的护民官，在任期结束之后，也可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席位。这是因为罗马不希望像雅典那样，形成平民和贵族两大政党对立的体系，因此，以通过吸收反对派系来维持政局稳定为优先政策。

如此一来，罗马元老院又多了一项储备人才之机构的含义。在共和时期，无论军政民政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全都是元老院议员。这种情况类似于现代国会议员组成政府的政体。

除了上述功能，元老院还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法案提出之后，要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定为国家法律。

另外，元老院议员是没有薪水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在出身、财产和才能上享有优势的人，有义务借此为“共同体”奉献。所以，担任要职为国家无偿工作的行为，被视为一项“光荣职务”。在罗马与迦太基展开殊死搏斗的布匿战争中，与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汉尼拔对阵还能获胜，就是因为，即使一般士兵只需轮班服役一年，但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出身的将领们，始终坚持战斗在最前线。而且，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机会活着看到战争获胜。结果，司令官一级的折损率，反而比士兵一级的战死率还要大，着实令人惊讶不已。但是，最重要的是，元老院把这个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共和时期的罗马，在任何方面，无论政治、军事还是伦理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精英荟萃的“元老院”主导。

不过，任何组织都难免僵化变质。罗马在布匿战争获胜之后，走上地中海世界霸主的道路。这时，元老院作为即得权力阶层的性质进一步强化。想必布匿战争的成功经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而且在这个时期，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的人数开始激增，每年在首都聚会一

次，选举产生国家要职的共和制根基，开始出现松动迹象。毕竟选举制度要受到选民阶层规模的影响。

此外，在统治能力方面，600人（前不久已从300人扩充到600人）合议的统治体系，也开始不适于治理日益庞大的领土。元老院主导体制适合于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却不适合统治将领土扩大至整个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

局势发展至此，罗马人决意跨越“卢比孔河”，从共和制转为帝政，即罗马开始从元老院主导的时代，逐渐转型为皇帝主导的时代。

只不过，罗马继承了“共同体”的观念，转型成帝政并不代表国家成为皇帝的私人物品。罗马依旧是以罗马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国家”，皇帝只是主权者委托治理国家的领袖而已。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贯穿公元1、2、3世纪的罗马帝国政体——元首制（principatus），就是由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主权者当中的“第一人”（princeps，亦称“第一公民”）承担统治的最高责任。“第一公民”也称为“皇帝”，是因为其身兼军队最高司令一职。

政体转换成由元首或者皇帝立于统治体系顶端之后，在寡头政治这种金字塔式统治体系下，元老院的角色也不得不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到了王政时期那种对统治的最高责任人提出建议或者忠告的机构。

不过，元老院在长达500年的共和时期里发展出来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转变为帝政体制就完全废止。尽管现在政体由元老院主导转换成了皇帝主导，但如果因此将“元老院”化为乌有，那就是在否定整个罗马史。当初尤里乌斯·恺撒打着反对元老院主导体系的旗号渡过卢比孔河时，反对的是“主导”而不是“元老院”。如果一项事务没有非变不可的必要，罗马人是不会去改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罗马人可以说是个保守的民族。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元老院的作用如下所示：

第一，为国家培育、储备足以担当国家要职的人才。

第二，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皇帝可以自由地制定法律，但这只能作为临时措施法。如果要让法令成为长期的国策，则必须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而元老院通过的法律，即国策，最终将以“senatus consultum”，直译为“元老院劝告”的名义发布。元老院还具有货币铸造权，市场上流通量最大的塞斯特斯铜币的背面，刻有S和C两个字母，也就是“senatus consultum”的首字母。

皇帝要治理国家，少不得有才华之人的辅佐，因此，必然要大力利用具有人才培育、储备功能机构的元老院。这并不表示皇帝在选派行省总督、军团长、救灾委员会负责人时，会仅止于利用出身于元老院世家、30岁就能获得元老院议席的议员。在罗马社会中，因出身于社会底层，因而进入讲求实力的军团，在那里出人头地后获得皇帝推荐，进入元老院积累政治经验后，再回到前线工作的军人，比比皆是。这些苦熬出头的人，在经历元老院议员的工作之后，回到前线必然会进一步升职。

如此，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在文武官职之间来回调动。换句话说，这是在培养“全能人才”。元老院作为培育这类人员的“场所”是最合适不过了。正是有这样的运用目的存在，使得帝政时期的元老院存在理由更为充足。

当然，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关系恶化的时候也不少。但这并不表示元老院是帝政体系的反对者，相反，这正好说明元老院肩负着帝政监督机构的功能。就连向来仰慕共和制的史学家塔西佗也表示，要统治广大的帝国，还是帝政最为合适。元老院内的演讲和讨论，向来以“patres conscripti”为开头，这一惯例也象征了元老院的存在意义。“patres”，意为建国的前辈，是对出身元老院世家议员的称呼。相对

的，“conscripti”则是指新取得元老院议席的人士，罗马人将这些人称为“Homo novicius”，即“新贵”。元老院常常借由这种吸纳新议员的方式，来为自己输入新的血液。这样一来，既可以维持组织的稳定，又可以避免僵化，一举两得。

经历共和制、存续到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失去其固有功能的第一步，是公元260年加里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调任军团司令官。

当时罗马面临现任皇帝遭波斯俘虏的空前国难，帝国随即陷入一分为三的局面。当时加里恩努斯皇帝为应对困境而焦头烂额，也难怪他会认为军事专家要比全能人才更重要。不过这项法律只是禁止外调司令官一级的人员，并非全面禁止议员转调军职。但实际上，元老院议员外调军职时的职务，往往是在接近帝国边境、具有重要军事地位的边界行省担任总督兼军团司令。因此，加里恩努斯的法律，实际上就剥夺了文官精英累积军事经验的机会。

同时，在军团苦熬出头的人员，从此也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积累政务经验的机会。在前途茫然的公元3世纪，那些上台又下台的军人皇帝，之所以在位时间都不长，原因只怕是他们虽是军事人才，却不懂得政务这一点吧。“全能人才”如果没有培育的机会，也就无从培养起。

比加里恩努斯皇帝的法律更彻底的，是戴克里先的帝国改造政策。由此规定的军务和政务完全分离的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就此与安全保障这一国家头号事务完全搭不上边。当然，也就再也看不到在军中一路发展起来的人员进入元老院的事情。

此外，元老院作为立法机构的功能，也形同虚设。皇帝的想法不再通过元老院表决形成国策，而是以“敕令”的形式直接作为国策。拉丁语的用词虽然一样，但在元首制时期翻译为“临时措施法”的政令，现在则要译为“敕令”才符合实际。而且既然皇帝一个人能够决定国法，那么当

皇帝觉得不合适时也可以自由地废除。从法治国家这个角度来说，罗马正在逐渐走向中世化，即非法治国家化。

在戴克里先的改革事项中，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君士坦丁也都沿袭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元老院政策。就好像虽然建设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依然保持罗马首都般的地位一样，君士坦丁在新首都也任命了元老院议员，为他们修建了名为“Curia”的议事厅，不过却没有拆除罗马的“Curia”。

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已经没有必要使出强硬的手段。只要剥夺了权力，其功能以及伴随这种功能而产生的自豪感，都会自然地消失。而现在只剩下“在战车竞速赛场上挥动白手帕宣布比赛开始”这项功能的元老院，只要放置不管就可以应对了。

此外，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虽然也称为“元老院”，但实质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元老院议员只是君士坦丁皇帝任命的、毫无实权的名誉称号而已。而元老院的情况也是最能象征后期罗马帝国的实例。要知道，罗马的元老院，不仅在共和时期，就连帝政时期，也能按照罗马人的理念建构并发挥功能，在这一点上，等同于罗马这个国家本身。因此，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们认为，从戴克里先开始，到君士坦丁奠定基础之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罗马的理由也正在此。

军队的变化

安全保障体系的变化，也是另外一项“罗马不再是罗马”的例子。

早在与北方蛮族斗争激烈的公元3世纪，罗马军方为了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蛮族，不得不将军队主力由传统的重装步兵改为骑兵。这是因为虽然罗马军团兵在平原对阵展开会战时，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面对神出鬼没的蛮族，难以预料对方何时、何地来袭，相较之下，机动性要

差很多。步兵一天的行进距离是30公里，而骑兵的速度却是步兵的3到5倍。

如上所述，为了应对时代的需求，罗马军内骑兵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一直到戴克里先时代为止，只要一说到“防线”（limes），罗马人马上就会想到边境的防卫力量，可见罗马人对其的重视程度。虽然戴克里先时期，皇帝直属的机动军团的重要程度日益攀升，但是守卫防线的各个基地，其功能依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戴克里先也从未放松过连接各基地的军用道路的修整工作。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边境军事力量和皇帝直属军力的比例才完全逆转。

这时，被称为“limes”的国境边防兵，已经完全沦为农民农闲时的兼职。在公元2世纪的哈德良皇帝时代，也有叫做“numerus”的兼职兵存在。但这些士兵的任务仅仅是在防线外修建的碉堡或要塞中监视敌军动态，并非冲锋陷阵的战斗人员。当时的战斗人员依旧是构成罗马军主力的军团兵。除了军团兵，军队里也有协同作战的辅助兵。这些辅助兵，在农闲时由基地附近的农民兼职，对当地农民来说不失为一个赚外快的好机会。哈德良皇帝将这一习惯定为政策，也有助于稳定周边农民的生活。要知道，国防安全不是仅靠军事力量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士坦丁登基之后，边境警卫部队的兼职化，显示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兼职化，必然带来边境守卫部队素质的下降。这一点，说明作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最高责任人的罗马皇帝，已经放弃了由元首制时期的皇帝们建立的、在帝国边境上阻止敌人入侵的安全保障理念。换句话说，现在的安全保障思路，是要在敌人突破边境防线之后，才由皇帝率领军队击退入侵的敌人。

在这个时期，得益于君士坦丁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他麾下英勇善战的皇家直属部队的战斗能力，这种新观念下的帝国国防，基本也能取

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只不过，即使在军力强大的君士坦丁时代，击退敌人的时机也要等到敌人突破边境防线大肆劫掠，当地居民，主要是农民遭受重创之后。

肩负边境防卫重任的人，大多兼职农耕和兵役两项工作的话，那么首先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士兵的高龄化。实际上，关于服役期满20年即退伍的记载，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消失。当然，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的、在古代史无前例的退休金制度，也找不到记载了，估计这时也中断了。人员高龄化，再加上待遇下降，必然带来士兵素质低下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与守卫边境的驻军相比，犹如机动部队的皇帝直属军，则因为待遇良好，聚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士兵。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机动精锐部队中的人员在年满45岁退休时，虽然不再领取退休金，但取而代之可以获得耕地作为补偿，这样他们就转型成了半农半军的国防守卫兵。不管怎么说，在公元4世纪时，这些兼营农耕和军务的落魄男人，就是曾经被视为帝国国防安全的脊梁、将死守防线视为对“共同体”之职责、拥有无上荣誉的军团兵。虽然帝国要在百年之后，才因蛮族入侵而灭亡，但在边界线就击退敌人进攻、象征国防安全的“防线”，早在百年前的这个时期，就实质处于弃守状态了。在这个时期以后，元首制时期人们心目中的“limes”也就消失了。

对“国防”的理解，与对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的理解，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防是在个人能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由国家代为负起责任的头等大事。罗马人即使在帝政时期，依然对代表共同体含义的“res publica”这一概念情有独钟。整个帝国是一个大家庭，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罗马帝国这一大家庭（familia）中的一员。我倒觉得用“命运共同体”来代表罗马帝国更贴切，可惜罗马人的拉丁语中没有这个词，他们只是以“familia”来称呼。

如今，帝国对防线的弃守，意味着去除了守护家门外围的栅栏。在君士坦丁皇帝眼中，对于跨过围墙侵入家中的敌人，将从房屋中央戒备

森严的高塔中派出士兵，进行剿灭。至于这个过程要花多长时间，以及这段时间内将产生多大的损失，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样一来，“res publica”的理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原先是一个大家庭的罗马帝国，换句话说，属于公共财产的罗马帝国，现在让皇帝转为私人物品了。如今国家保卫的对象不再是帝国的国民，而是掌握帝国的皇帝。从这个层面来讲，中世纪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

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不仅军事人员专业化，就连行政人员也跟着专业化。换句话说，罗马帝国正在走向官僚大国的道路。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协助治国的人，只要对君主唯命是从即可。在帝国后期，教授法律的私塾数量急剧增多，大家不是要学习法律当律师，而是因为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具备法律知识对以后的升迁比较有利。在皇帝的敕令等同于国法的时代里，以前用于各类审判的公会堂，现在顶多当成商业会谈的场所使用。

在戴克里先推行的改革当中，君士坦丁几乎照搬了其中关于行政和税制的改革方案。因为当时的行政改革适合于现在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而税制方面，不是按照税有多少就做多少事的观念，而是反过来，根据国家有多大需求就征多少税的理念来征收。显然，后一种理念对专制君主君士坦丁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这个时期以后的税制详情，后人完全不得而知。也许是税制没有像元首制时期那样维持固定的税率，国家随需求金额征税，税率本身也随之一再变动的缘故。现存的资料中，偶尔会发现非全国性的而仅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征税记录，而税率之高让人禁不住怀疑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虽然如此，但目前关于帝国后期税制的研究还没有确切的成果呈现，因此这些资料的真伪还有待商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元首制时期的税收，绝对比较低。

不过，在货币政策上，君士坦丁可就完全与戴克里先分道扬镳了。

在当时，银币的价值正在无限度地向下探底，政府必须要拿出一套根本性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面，君士坦丁可以说是发起了强势的革命。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将银本位制换成了金本位制。

贫富差距

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制以后，罗马帝国的货币300多年以来一直维持银本位制。这是一项以第纳尔银币为轴心货币的制度。帝国内所有的物产和服务，都是以“第纳尔银币”或者“塞斯特斯铜币”来标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被称为奥里斯的金币，并非市场上常见的流通货币。因为是纯金打造，意义相当于现代的金条。而奥古斯都在确立帝国的货币制度时，也将各类货币之间的汇率固定为1奥里斯金币= 25第纳尔银币= 100塞斯特斯铜币= 400阿斯小铜币，并由国家负责监督，维持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一致，以使汇率能够保持稳定。而在元首制时期的帝国，也有这个经济实力来维持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一致。然而，这股经济力量只能维持到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200年间，到了公元3世纪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其结果就是造成货币的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差距日益扩大。

从公元前2世纪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开始，到公元2世纪这400年的漫长岁月中，说到罗马的货币，首先想到的就是第纳尔银币，而且，这种银币的信用度，要比古代其他国家发行的银币高得多。对罗马来说，东方出产的香料向来是大量进口的商品，而从原产地印度起，罗马以东挖掘出来的货币，大多数是第纳尔银币。这一点足以证明上述观点。到了公元2世纪末的五贤帝时代末期，银币的信用开始下滑，即面额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开始产生差距。总而言之，货币价值开始下滑。而下滑速度进一步加快则是发生在称为“迷途帝国”的公元3世纪。作为罗马帝国轴心货币的第纳尔银币的实际价值，含银量低至5%。所谓的银币，已

经沦为仅是镀银的货币。

此时的皇帝并未置之不理，只是他们大多数忙于应对蛮族入侵的燃眉之急，分身乏术。不过，各位皇帝还是再三设法来改善货币问题，只是，高含银量的优良货币铸造出来后，一投向市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含金量100%的奥里斯金币一样，被民众当成宝物收藏了。在现代的古币市场上出现的奥里斯金币或第纳尔银币，大多数看不出有使用过的痕迹。即使是最新的，距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可是看上去就好像昨天刚从铸造厂拿出来一样。每当拿起这些古币，给人感觉就好像拿着公元3、4世纪的罗马人的“私房钱”一样。

不过，这些明明是流通的货币，罗马人却藏在家中不拿到市场上去使用，这说明罗马人不再信任自己国家的货币。如果放任这种现象不管，就等于是放任帝国经济衰退。因此，从卡拉卡拉皇帝开始，到戴克里先皇帝为止，百年来历任皇帝都努力尝试恢复第纳尔银币的信用，遗憾的是通通都失败了。这些历史让君士坦丁认识到，如果继续执着于银币，就无法重建一套强势的轴心货币体系。

于是，君士坦丁皇帝舍弃了罗马传统的“银本位制”，转换成了今日所谓的“金本位制”。他决定将之前因为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含金量能维持在100%的金币作为帝国货币制度的轴心。对于试图建设新帝国、新首都、新宗教的君士坦丁来说，想必新的轴心货币也是一项听起来极为悦耳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新金币也从含义为光辉的“奥里斯”（aureus），改为“苏勒德斯”（solidus）。“苏勒德斯”的含义为稳固或者安定。

君士坦丁的货币改革，特色在于以苏勒德斯金币来代替以往第纳尔银币强势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虽然金币取代了曾经的银币，但至少成功复兴了强势的轴心货币，为稳定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罗马帝国金币、银币汇率变动

	奥古斯都（公元前23—）	尼禄（公元64—）	卡拉卡拉（公元215—）	加里恩努斯（公元265—）	戴克里先（公元295—）	君士坦丁（公元325—）
金币	奥里斯7.8克（纯金）	奥里斯7.3克（纯金）	奥里斯6.5克（纯金）	奥里斯6克（纯金）	奥里斯5.4克（纯金）	苏勒德斯4.5克→4.0克（纯金）
银币	第纳尔3.9克（纯银)	第纳尔3.4克（银93%铜7%）	安东尼5.5克（银50%铜50%）	安东尼3克（银5%铜95%）	阿根图斯3.4克（纯银，因投入市场即消失而闻名）	阿根图斯3.4克（银，日益减少）
汇率	1金币= 25银币		因处于危机四伏的3世纪而汇率不稳		1奥里斯金币= 1200银币	1苏勒德斯金币= 4500银币（4世纪前半期）= 3000万银币（4世纪后半期，据某派说法）

只不过，既然金币要作为广泛流通的首要“货币”，如果面额太高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尽量小型化。如上表所示，金币的重量削减至4.5克，之后又进一步减至4克。这就是说，苏勒德斯金币稳定后，重量约相当于奥古斯都时期的奥里斯金币的一半，而且含金量也没能维持

100%。现在的黄金制品有24K金和18K金之分，当时的苏勒德斯金币似乎也掺入了这个比例的杂质。一来掺入少量杂质可以增加金币的硬度，再者当时的金币已经不是保值用的金条，而是以市场流通为目的的货币。

拿起元首制时期的奥里斯金币、君士坦丁以后的苏勒德斯金币以及千年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弗罗林金币、威尼斯共和国的杜卡特金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重量上，苏勒德斯金币比较接近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弗罗林金币，威尼斯的金币反而不像古罗马货币。研究硬币的专家表示："由君士坦丁皇帝转换的金本位制，要比奥古斯都皇帝确立的银本位制更长寿。"而我们从货币的触感上也可以感觉出这一点。在纸币出现以前，金币一直是欧洲的轴心货币。即便现在，人们依然还会购买金条来保值，而除了加工用途外，恐怕没有人会购买银条。从这一点上来说，君士坦丁成功确立了在稳定货币制度上不可或缺的"强势货币"。

不过，君士坦丁将货币制度转为金本位制，却给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诸多弊害。虽然君士坦丁成功将金币定为强势货币，但对于对金币以外的银币、铜币的换算汇率，却放任为"变动制"，这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比如，有一部分人领取的薪水是金币，这些人在购买日常必需品时，就需要把金币兑换成银币或铜币。而相对的，一些销售商和提供服务的人，获得的报酬却是银币或者铜币。这部分人在缴纳规定必须以金币支付的税金时，就必须前往兑换所将手头的银币或铜币换成金币。这种经济机制使得前者与后者的经济力量产生大幅差距。而且，时间越长，差距越大。这也是君士坦丁转型为"金本位制"带来的最大弊端。研究人员也表示，君士坦丁的改革直接冲击到社会中下层阶级。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薪水以价值稳定的金币给付的人，首推军事人员，尤其是皇帝直属部队里的官兵。如今守卫边界的虽然都是兼营农业的士兵，但领导这些

农民兵的将领一级，还必须是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的薪水，想必也是用金币支付。

与军人相同，行政官员应该也属于领取金币当薪水的阶级。也就是说，军队和行政官员这类国家公务员，是领取价值下滑风险低的金币做薪水，属于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阶层。

除了这些人以外，为军方或政府输送物资的生产者，也属于条件优渥阶层。因为他们可以用实物来缴纳税金。特别是在军队里，如果军粮等军需用品供给不稳定，影响重大。因此早在银币沦为镀银铜币的公元3世纪后半期，军需用品生产者就已经获准可以拿生产的货物来缴纳税赋。

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银币、铜币价值不断下跌的罗马社会中，形成富裕阶层。相对的，那些没有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人，则变得日益穷困。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官僚，生产非军需品的业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则形成了社会的贫困阶层。这些人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到手的银币或铜币的价值还是在不断地萎缩。

于是农田被弃置，未遭弃置的则被大庄园吸收，商店陆续倒闭，手工业者纷纷转行生产军需用品。如今已经不需要蛮族袭击掠夺，金本位制已经代替蛮族将一切搜刮殆尽。在经济层面上，“共同体”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只有苏勒德斯金币还在闪闪发光。就像帝国大多数民众贫困不堪，只有皇帝一个人富有一样。

家庭悲剧

看上去光芒耀眼的君士坦丁，却与家庭内部众多流血事件关系紧密。

首先，公元310年，他害死了岳父、前正帝马克西米安。两年后的公元312年，又逼使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败亡。而在公元325年，他在打败异母妹夫、正帝李锡尼之后，以密谋通敌的罪名将其处死。只是这三次事件中，虽然致死的对象分别是岳父、大舅子和妹夫，但同时这三个人也是和他争权夺利的对手。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即使对手是亲人，也要一一铲除。

然而，公元326年发生的这起事件并不属于这一类别。不知道是否因为如此，君士坦丁这边并未千方百计找出密谋通敌或图谋篡位之类可以名正言顺诉诸武力的理由。君士坦丁对于这起事件的态度只是沉默。

公元326年，副帝克里斯普斯突然遭到逮捕，并被秘密投入大牢。牢房位于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里亚半岛前端的波拉镇。在这间牢房里，日夜进行残酷至极的拷问，但被告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公元326年，是君士坦丁将最后一名对手李锡尼处死、自己成为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唯一一名正帝的第二年，因此，这个时期的副帝克里斯普斯，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在元首制时期，他是不可能遭到拷问的。因为那个时候，不仅皇位继承人和元老院议员，法律规定只要是非奴隶身份的公民，在审案时都不得采用拷问手段逼其坦白。但是，到了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下，除了专制君主以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他所有人算是一律平等了。所谓的君主专制政体，就是“皇帝和其他人等”构成的社会。因此，就算身为副帝，而且是正帝的亲生儿子，只要正帝不干涉，就要接受比元首制时期的奴隶还要残酷的拷问。

克里斯普斯的罪名，是与皇后法乌斯塔私通。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当克里斯普斯遭到逮捕、在波拉的监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时，皇后在皇宫内的生活却一点变化也没有呢？既没有被打入牢房，也没有软禁在宫中，只是，当克里斯普斯在波拉的监狱中喊叫着冤枉、结束29岁的生命时，对皇后的处置也定案了。

皇宫内的浴室是为皇帝及其家人修建的，因此，规模不会像卡拉卡拉浴场里的公共浴池那么大。而这个时期，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还在修建当中，因此行刑的地点应该是在塞尔曼或者尼科米底亚的皇宫。这样一来，皇帝用的浴室，应该和元首制时期富翁别墅里的设备差不多。将浴池里的温水烧成冒着蒸汽的热水，再让蒸汽充满整间浴室，应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当皇后发觉情况不对，平时在浴室内伺候的女奴也不见踪影时，打算走出浴室。可是浴室的大门已被反锁。不久政府发出公告，表示君士坦丁的皇后法乌斯塔于入浴时身亡。

也许皇后与继子之间真有不伦的情事发生也说不定。从兄长马克森提乌斯的年龄来推测，皇后法乌斯塔当时应该在40岁左右。她与政治婚姻的对象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只是，与她生有三个儿子的丈夫，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杀死了她的生身父亲与哥哥。法乌斯塔将一切痛苦深埋心底，以君士坦丁妻子的身份过了近20年。如果年轻10岁的克里斯普斯同情法乌斯塔皇后、温柔相待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中年女人的恋情，不像年轻女孩那样充满幻想，而是多数源自绝望。即使当事人知道，如果事情曝光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克里斯普斯应该深知自己微妙的立场。虽然是君士坦丁的儿子，但生身母亲身份低微。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打败马克森提乌斯，成为西方首脑没多久，即任命克里斯普斯为副帝。因为当时克里斯普斯年满20岁，而君士坦丁与克里斯普斯的母亲离婚，迎娶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后所生的长子此时才1岁。在当时，幼儿的死亡率很高，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说，具有充足的理由任命年满20岁的克里斯普斯担任具有皇位继承人意味的副帝。此外，一时间多达6人的正副帝权力抗争，在这时尚未结束。实力最强的竞争对手李锡尼，当时正统治着帝国的东半部。而且，当时的局势，还不允许君士坦丁疏忽身为皇帝的最大职责——派兵对付入侵的蛮族。

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军事才华又深受官兵爱戴的克里斯普斯，对君士坦丁而言，是个极为方便使用的人才。实际上，当任命克里斯普斯为副帝之后，君士坦丁就将自己在副帝任内肩负的以莱茵河为前线的高卢地区的防卫责任，交给了克里斯普斯。而这个年轻人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克里斯普斯不仅在防卫作战时发挥出色，在公元324年与正帝李锡尼的决战中，指挥海军的克里斯普斯虽然年仅27岁，却能在关键性海战中获胜，为父亲君士坦丁东征作出贡献。而他因私通后母的罪行被处死，却是在短短两年后。

的确，从立功到处死，仅仅两年。可是由皇家出身的法乌斯塔所生，即由血统高贵的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这一年分别是10岁、9岁及6岁。这个时代虽然幼儿死亡率很高，但社会普遍认为，脱离了幼儿期以后就可以顺利成长。而作为父亲的君士坦丁此时才50岁出头，身体健康，估计再活20年也没有问题。

虽说只有短短两年，但这两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最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权力斗争，君士坦丁终于打败所有对手，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想象，在长年权力斗争后存活下来的人，对于可能成为新的竞争对手的潜在威胁，神经会特别敏感。而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之间的年龄差只有22岁。

第二，对君士坦丁而言，此时的“副帝”已经不再是左右手，而是象征着继承自己帝位的人选。既然如此，10岁的少年也没有什么不好。

第三，在让人加上私通罪名时，皇后法乌斯塔只怕已经过了能替君士坦丁继续生孩子的年纪。而且，通过她而获得的具有皇家血统的三个儿子，又已过了幼儿夭折率较高的危险年龄。对君士坦丁来说，法乌斯塔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克里斯普斯一样，都是失去利用价值的棋子。

这对母子是否真的产生恋情？还是两人都只是君士坦丁残酷阴谋下

的牺牲品？真相已经无从得知。当时的记录均出自基督教徒之手。这些人正忙着感激，给君士坦丁加上“大帝”的称号。这些人面对有损大帝形象的事物时，即使是事实，也会选择忽略不计，更别提去追根究底了。因此，这一事件直到今天依然是悬案。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克里斯普斯在大牢惨死，法乌斯塔在浴室遇害后不久，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三个儿子中，较年长的两个，10岁和9岁的儿子，被父亲任命为“恺撒”。而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君士坦丁二世，以10岁的幼龄，获得高卢司令官的职位。君士坦丁打造的新王朝，正在一步步成形当中。

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说，也许克里斯普斯那段幼年生活和自己如出一辙的、生母遭父亲遗弃的悲惨经历，也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传说君士坦丁皇帝牛高马大，身材魁梧。与手下官兵在一起时，身高上也要高出众人一头，再加上他讨厌朴素的着装，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穿着华丽衣服的机会。这让他无论身处何地，总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存在。在元首制时期，只有东方王侯们才会穿戴的华丽服装和镶满宝石的皇冠，自戴克里先皇帝引入罗马后，现在成了君士坦丁的最爱。

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雕像或者货币上刻画的君士坦丁头像，没有一幅是描写他年老时的样子。这个人登上历史舞台是30岁出头，去世时应该是65岁左右。这样在雕像或货币上刻画肖像的年龄层，按理应该贯穿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但是，不仅我们后人，就连当时的人们也只能看到君士坦丁三十五六岁时的模样。当然，他身边的人自然可以看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变老的样子。我这里想说的，是他的“官方样貌”。另外，自哈德良皇帝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肖像上都留有胡须。但到了君士坦丁登基之后，好像又回到了开国罗马皇帝时代那样，恢复了刮胡子的习惯。顺带说一句，把胡子刮干净的男人看起来显得年轻。

这让我想起了不到35岁就在罗马成功建立帝政、直到77岁去世、一个人统治罗马帝国40多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也只给我们留下了青年时期的面容。

只是奥古斯都这么做，有着明确的理由，他是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当初尤里乌斯·恺撒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比较晚，雕像或货币上的肖像都是50多岁的模样。而奥古斯都想要用一切方法向世人展示他是恺撒的养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奥古斯都在恺撒遭暗杀后，能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胜出，首要原因就在于他是让深受民众爱戴的尤里乌斯·恺撒收为养子并定为继承人的青年。奥古斯都尤其注重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银币、铜币上，宣传自己是神君恺撒的儿子。

但是，君士坦丁应该有自己的理由。他同样只留下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容貌，似乎是在强调自己与只留下壮年时期蓄须面容的戴克里先皇帝不同。因为，对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20年前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戴克里先，要比公元1世纪时的奥古斯都皇帝印象更为深刻。人们看到雕像或货币上年轻的君士坦丁之后，与奥古斯都比较之前，应该会先想到当时依旧四处流通，因而经常有机会看到刻有戴克里先肖像的货币。相形之下，若是人们对君士坦丁的年轻印象深刻，那也意味着君士坦丁的形象作战成功了。

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献给圣母马利亚和幼儿耶稣的君士坦丁皇帝（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

君士坦丁被视为罗马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伟人，首要原因就在于他为振兴基督教作出了巨大贡献。提到中文译为“大帝”、英语称为“the Great”的历史人物，我们马上可以举出三个人来：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

除了生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名字为亚历山大的年轻英雄之外，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和公元9世纪初期的查理曼，都与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联。君士坦丁是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人物。查理曼是法兰克人的国王，法兰克人是罗马帝国存续时期，北方蛮族的一支。公元800年，查理曼从罗马教皇手里接过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皇冠。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无法摆脱的黑暗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创设意图，是要建设一个高举基督教旗帜的强大帝国。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之所以会让人加上“大帝”的称号，是因为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会来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希望。现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楼也叫查理曼，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没有形成帝国就瓦解了，如果查理曼仅仅因为创始人的身份就可以尊为“大帝”，那么君士坦丁就更有资格被封为“大帝”了。试问，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大力扶持基督教教会，基督教还会有后来的蓬勃发展吗？对于这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史学家的回答是，基督教教会因为内部无休无止的教理争论而萧条衰败，最终沦为一种地方性宗教。

这里我想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君士坦丁和基督教的关系。这个方式也许不能马上得出结论。但是，探讨历史时，论述的问题越重大，越适合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接近中心。

潜伏期

实际上，君士坦丁确切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从考证，后世有很多说法可供参考，但至今并无定论。在本书中采用的公元275年出生的说法，只是随机采纳的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这一点还请读者见谅。毕竟，当年君士坦提乌斯只是巴尔干地区贫民出身的众多百人队队长之一，妻子又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海伦娜。两个人所生的小孩，便取“小君士坦提乌斯”之意，命名为“君士坦丁”。这个时期包括戴克里先在内的各位皇帝都出生年月不详，即使后来被尊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也不例外。

据说君士坦丁出生于现代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境内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尼什。在罗马时代，这是一个叫做耐苏的小镇，因为位于罗马大道主干道沿线而获得发展。这条主干道起于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穿过辛吉杜努姆（现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蒂迦（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哈德良堡，经由拜占庭（后改为君士坦丁堡，自公元1453年起成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到达小亚细亚，是连接帝国东西方的要道。由于这里也是行军必经之路，所以某位百人队队长和小酒馆老板的女儿谈起恋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君士坦丁出生于耐苏，想必是因为父亲的驻地调动频繁，母亲只好在娘家生产。幼年期也可能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在耐苏度过的。不过作为父亲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是个正直的人，没有到处拈花惹草给家里增加人口。幼年的君士坦丁就在父母的呵护关爱之下成长，是个标准的独生子。

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不仅个性正直，而且富有军事才华。随着独生子的成长，父亲的仕途也是步步高升。

自公元285年开始，帝国内开始实行“两帝共治制”，戴克里先负责东方，马克西米安负责西方的防卫事务。君士坦提乌斯作为马克西米安的手下将领，从这一年起驻地也固定为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方。由于马克西米安皇帝的根据地位于可以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按理皇帝手下将领们的妻小也应该被召集到那里同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君士

坦丁应该从10岁开始，就移居到了摩泽尔河上游，现在德国的西部，开始了每天听着军马嘶鸣、看着官兵往来的少年生活。只不过，这种生活到了18岁，就发生重大的变化。

“四帝共治制”开始于公元293年。所谓“四帝共治制”，是在帝国东西方正帝之下各设一名副帝，由四个人分担帝国国防安全体系。恰巧，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被任命为“副帝”，协助“正帝”马克西米安处理帝国西方国防事务。只不过，“四帝共治制”的创始人戴克里先针对副帝开列了一项条件，就是必须与正帝的女儿结婚。

被任命为帝国东方“副帝”的伽列里乌斯，依照计划与“正帝”戴克里先的女儿瓦莱里娅结婚。而已经成婚的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迎娶马克西米安的继女狄奥多拉，只能与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离婚。

由于正帝马克西米安将首都移到了意大利的米兰，于是改由升为副帝的君士坦提乌斯继续留守特里尔。既然将根据地设在交通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罗马时代名为奥古斯都·特里尔罗姆），显然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首要任务，就是守卫整个高卢地区不受蛮族侵略。此时，君士坦丁虽然年龄已经超过可以服兵役的最小年龄17岁，却不能留在特里尔，在父亲手下积累军事经验。由于迎娶了正帝的女儿、具有皇家血统的狄奥多拉为妻，特里尔已经没有离婚后的海伦娜的栖身之地。而新的婚姻连带会造成添丁的机会，前妻的小孩君士坦丁也同样没有在特里尔栖身的机会。

这对母子走投无路时，是东方正帝戴克里先伸出援手收留了他们。也有可能是无法将前妻和儿子留在身边的君士坦提乌斯，委托上司代为照料。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这位父亲在离婚后就忘记了妻子和儿子。

戴克里先的首都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海港城市尼科米底亚。从18岁到30岁，君士坦丁在尼科米底亚度过了12年的时光。不过，既然他已经达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肩负帝国东方防卫重任的戴克里先，不可能让这

个年轻人游手好闲。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不过君士坦丁似乎参加过在埃及的战斗。特别是由副帝伽列里乌斯担任总指挥的两次对波斯的战斗，他是肯定参加过的。这样，君士坦丁的军事经验，不是在父亲跟前，而是在戴克里先手下积累起来的。18到30岁，正是一个人为将来打基础的黄金学习期。顺带说一句，这个年轻人与收留他的皇帝之间，有30岁的年龄差。

罗马帝国基督教徒分布推测图（公元3世纪末期）

青年时期的君士坦丁待在戴克里先身边，还积累了另外一项经验，那就是亲眼看到这位最高统治者接连不断地发布敕令，一反罗马传统，系统而彻底地镇压基督教。公元303年起连续发布的敕令，使得基督教教会及其所属的信徒陷入迫害的风暴中。尼科米底亚位于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基督教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有人甚至说，这一带的基督教势力已经构成了国家中的国家。这一带，即戴克里先的脚底下，镇压和迫害工作也进行得最为严格，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的新兴宗教势力比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大。要知道，尼科米底亚的主教官邸，就隔着广场盖在皇宫的

正对面。话虽如此，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当时28岁的君士坦丁是如何看待这些镇压和迫害基督教的政策的。

浮出水面

在12年的潜伏期之后，戴克里先再一次间接决定了君士坦丁的命运。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以在位届满20年为由表达了退位的意图。不仅如此，还马上付诸了实践。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也同时退位，由此进入了第二轮“四帝共治制”时期。在两名正帝退位之后，两名副帝随之升格为正帝。当时西方副帝，君士坦丁的父亲，就登上了西方正帝的位置。得知消息的君士坦丁，向戴克里先申请前往身为正帝的父亲身边任职，并获得了准许。据说当时做父亲的满心喜悦地迎接长大成人的儿子。

公元305年这一年，君士坦丁离开长期居住的东方前往欧洲投靠父亲的这一决定，不仅正确，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幸运的选择。虽然没有人预料到君士坦提乌斯会在一年后去世，但正是这一年在父亲手下出色的表现，使他能够在君士坦提乌斯驾崩后，获得其手下官兵们的拥戴。官兵们都知道，无能的指挥官只会让手下白白送命。30岁那年回到父亲身边的君士坦丁，在保卫帝国西方安全的官兵们眼中，不仅是正帝之子，也是获得官兵一致认可的优秀指挥官。

正因如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猝死之后，官兵们立刻毫不犹豫地推举君士坦丁即位。如果君士坦丁继续留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任职，想必也不会有日后飞黄腾达的生涯。各位读者不要忘记，君士坦丁的父亲虽然是帝国正帝，但他的母亲没有贵族血统。在无法忽略血统优势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凭实力获胜。而在这比拼实力的过程中，君士坦丁也一直以冷静巧妙的方式进行。他在30岁出头的年纪，就获得了帝国西方“副帝”的地位。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付逼迫西方“正

帝”塞维鲁自杀从而控制意大利和北非的马克森提乌斯。

公元308年秋天，三年前退位的前任正帝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与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三巨头在位于多瑙河沿岸的前线基地之一卡农图姆（现在的佩特罗内拉）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正式承认了君士坦丁“副帝”的合法地位。在父亲去世后，官兵们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而非“副帝”。“君士坦丁，奥古斯都！”的欢呼声仍在耳边回响。因此，君士坦丁完全可以借此对卡农图姆“峰会”的决定提出抗议。但君士坦丁接受了这项降职任命。当初戴克里先构思设置“四帝共治制”，就是为了避免公元3世纪时官兵肆意拥立上司，导致短命皇帝频现的弊端。如今戴克里先虽然已退位，对政治却依旧有影响力，想必不会轻易承认君士坦丁没有“副帝”的经历就由官兵直接拥立为“正帝”。因此，年仅33岁的未来“大帝”，决定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而不是一鼓作气登顶。话说回来，既然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那么为了达到最终目标，眼下就必须用上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

从公元308年正式担任“副帝”起算，到与通往“正帝”宝座上的最大障碍马克森提乌斯进行决战的公元312年为止，中间隔着4年的时间。这4年里，君士坦丁尝试了许多在基督教徒眼中无法理解但对我这个非基督教徒而言很容易明白的措施。

尝试之一，声称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克劳狄乌斯皇帝，公元268年至270年在位，当时正值公元3世纪后半期，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迷茫状态。克劳狄乌斯皇帝因为征服北方蛮族之一的哥特人有功，获得元老院授予的“Gothicus”（哥特库斯，“哥特征服者”之意）称号。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有相当多的皇帝出身于古代称为伊利里亚、后来叫做巴尔干的北部地区。而“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正是其中的领头羊，他是第一位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军人皇帝。他与其他军人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仅仅在位一年半的时间，但并非因为手下官兵发起政变，也不是遭到亲信暗杀，而是得了当时流行的瘟疫。就

连这最后一点，都适合君士坦丁拿来冒充自己的祖先。

尝试之二，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众所周知，继承克劳狄乌斯之位的皇帝，遭到亲信暗杀的奥勒良，信仰的就是太阳神。这位皇帝虽然仅在位5年，但他将因为时任皇帝沦为波斯俘虏的巨变而一分为三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由于他的军功卓越，谢世之后依然长久得到官兵的尊敬。在罗马帝国，皇帝个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因为同时要身兼国家大祭司的职务，所以在国家官方祭典上，履行向罗马传统诸神献祭的义务。不仅奥勒良，就连君士坦丁也没有放弃“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职务。

刻有“不败的太阳”的硬币

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想要复兴奥勒良皇帝以来的太阳神信仰的意图非常明显。首先，他发行了刻有“不败的太阳”（soli invictus）的货币。其后又规定，在太阳神的祭日，也就是后来的星期日，法院停止审理案件。站在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的立场上来看，罗马人和罗马皇帝这种对个人信仰和国家宗教存在差异也不以为然的态度，叫做“诸神混乱主义”，应该大力批判。而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恐怕完全算得上是个诸神混乱主义信徒。

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无论是将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列为祖先，还是推广奥勒良皇帝信仰的太阳神，真正的意图恐怕都是为了拢聚麾下官兵的人心。4世纪的罗马帝国，军队主力的位置由巴尔干地区出身的人占据，而克劳狄乌斯、奥勒良都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军人皇帝中的杰出人物。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君士坦丁，为了实现成为帝国唯一皇帝的终极目标，正在实行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副帝”升级为“正

帝”。对他来说，完成目标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部队官兵的支持。为了确实地取得支持，就算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祖先，或者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都不是什么难事。在决战前的4年里，想必君士坦丁一直都在准备和发展手头的军事力量，而且，这种“准备”还不仅是武器和训练方面。

“米兰敕令”

历史性的时刻，公元312年终于来临了。这一年，无论对君士坦丁，还是罗马帝国，都是决定未来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君士坦丁经过名为“米里维桥战役”的决战，取得胜利。

第二年，即公元313年，登上帝国西方正帝宝座的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在两位首脑会谈之后以类似联合公报发布的，就是有名的“米兰敕令”。这道敕令发布以后，虽然当时社会还处于诸神混乱的状态，但基督教已经能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只是，在“米兰敕令”中也明确标识了以下内容：

>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这段内容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18世纪启蒙主义人权宣言的先声。即使身处过了启蒙主义时代300多年的21世纪，读了这段话还是令人感慨万分。真想让那些打着宗教旗帜争斗不休的人好好看看这篇文章。而

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贯彻这项主旨，在“米兰敕令”后半篇，向身处帝国各地担任地方行政的长官下达指示的段落中，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 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灵之国民。只因我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判断，这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而且我等认为，不论何等神灵、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可侵犯。

这简直就是自由精神的升华，无懈可击的理论。如果这种精神能够维持到现在，虽然民族间、国家间还是会有纷争，但至少不会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如果没有宗教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那么所有的纷争将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利益冲突。而当双方发现争斗本身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害时，自然就会停手。但如果以宗教为旗号，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

总而言之，如果“米兰敕令”的含义仅限于字面上的内容，还不至于让罗马帝国大幅转向。毕竟这道敕令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而不是把它定为国教。问题是公布这道敕令之后，君士坦丁的言行举止却让人觉得“米兰敕令”只是表象，其实他另有居心。君士坦丁的真正目的隐藏在敕令的最后部分，即规定归还由戴克里先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教会资产这一段当中。内容如下：

> 若资产在没收后被拍卖，于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给予原收购者正当价位之补偿。

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皇帝当中，有镇压基督教的皇帝，但没有镇压的占多数。在后者登基亲政之后，经常会将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资产归还给基督教相关人员。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没有对竞标拍卖时买到这些资产的人作过补偿。但“米兰敕令”不

同，皇帝，即国家，保证会作补偿。这样通过竞拍获得这些资产的人，自然乐意遵从归还命令。

同时，基督教的教会人员想必也能发觉这条法令中隐藏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样的政策，只有真正理解教会资产对基督教教会的重要性的人，才会颁布。

在一神教的宗教里，教祖的言行就是最重要的教理。但是这些教理必须通过专人解释说明，才能传达给一般的信徒。没有教理存在的多神教中，没有专业的祭司或神职人员。而一神教中，这类神职人员不可或缺，原因就在这里。

教会资产的必要性之一，在于培养维持这些神职人员的存续。第二项必要性，当然就是为困难人群提供帮助。早在基督教渗透到社会之前，罗马人就有对他人提供帮助的慈善行为，他们称之为“卡里塔斯”（caritas）。直到现在，基督教相关人员依旧称呼这种非营利事业为“卡里塔斯”。

总而言之，对教会而言，资产是左右教会活动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这些资产，君士坦丁不仅提出归还命令，还明文规定国家将作出补偿。如此一来，基督教徒的内心自然偏向了君士坦丁。

“米兰敕令”是由西方正帝君士坦丁和东方正帝李锡尼共同签名发布的。但是无论是基督教史还是世界史上，似乎都将这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敕令归到了君士坦丁一个人名下。这是因为在施政时，君士坦丁比李锡尼做得更为热心和彻底。原因可能是在他势力范围下的帝国西方，基督教势力渗透度不高，因此需要进行国家补偿的金额也不多。在公元4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势力的分布，东方较强，西方较弱。在西方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是以北非迦太基为中心的一带。君士坦丁发出的国家补偿也集中在这个地区。

因此，如果李锡尼也以同样的态度来执行这项政策，那么帝国东方的国家补偿金额会比西方高出很多倍。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锡尼乐于执行基督教资产归还的政策。也许李锡尼与热心于教会资产归还的君士坦丁的差异，就在于他把基督教问题当成宗教问题看待，而君士坦丁却把它凌驾于宗教问题之上。说白了，他是作为统治问题来看的。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在朝着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这一目标一步步前进时，在处理基督教问题上，也是稳扎稳打，以争取人心的方式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在为将来的政治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他在遥远的帝国西方，向尚未进入自己统治范围下的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招手。也正因为如此，他等不及在公元324年将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打败，成为罗马帝国内唯一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

基督教扶持政策

君士坦丁在“米兰敕令”颁布后不久，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与基督教相关的政策。这套政策对于提振帝国内基督教势力，同样具有莫大的助益。那就是，君士坦丁将皇帝的私有财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这里说明一下，在推行帝政300多年后的当时，伴随着自耕农的衰败，皇帝手中所吸纳的农耕地已经广袤无边。换句话说，罗马皇帝已经是帝国内最大的地主。

但是，皇帝将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彻底违背了“米兰敕令”的宗旨。敕令之中只是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并未将它列为国教。而皇帝的私有财产，是在其登上罗马帝国皇位之后才被赋予使用之权力的，而不是个人可以随便处理的私人财产。正因为如此，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皇帝的资产都是由下一任皇帝继承。换句话说，资产是与罗马皇帝这一地位捆绑在一起的，而不是皇帝个人的财产。在3世纪前半期，曾经出现过一位利用皇帝资

产热心扶植特定宗教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人们纷纷抨击其滥用职权的行为，不仅如此，最后埃拉伽巴路斯还惨遭谋杀。

因此，君士坦丁将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不仅违反“米兰敕令”，也违反了罗马皇帝身为公共人物应有的行为准则。问题是，他现在已经是事实上的最高掌权人。即使明知这个人玩起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公元4世纪的非基督教徒也已经没有力量和气魄来指责了。

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虽然教堂是向天神祈祷时用的场地，但是要让教堂运作起来，可不是光靠祈祷就能办到的。姑且不论祈祷与否，光是弥撒之类的宗教仪式，还有救济贫民的各项活动，就需要一大笔钱。当然，获取金钱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般信徒的捐赠。不过，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大型的经济基础作为后援，对于创造良好的信仰环境是再好不过的。这些经济基础，可以是教会周边广阔的农耕地、农地里饲养的家畜家禽、生产商品的工厂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面等等。

总而言之，即便是宗教组织，不，也许正因为是宗教组织，资产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当君士坦丁将皇帝的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时，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人员为什么不仅感恩戴德，还永世不忘。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君士坦丁会获得了“大帝”的尊称。

有一项绝好的证据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捐赠行为是如何长期停留在基督教教会人员的记忆中的，这就是《君士坦丁捐赠书》。这份文书在漫长的中世纪，长期束缚着欧洲君主王侯们的行动。因为这里面明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已将整个欧洲捐献给了罗马教宗。天主教会举着这面金牌对王侯们表示：“你们所谓的领土，实际上都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捐赠、由基督教教会持有的资产。你们只是受教会委托统治的人员而已。如果你们有任何忤逆土地真正所有人基督教教会的行为，罗马教宗将有权立即收回委托权。”

一直到公元1440年，这份文书才被证明是彻底的伪造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被成为“人文主义者”。意大利出身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在一字一句对行文整体进行严密的考查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份捐赠书并非出自君士坦丁在世的公元4世纪，而是10、11世纪基督教教会内部人员伪造的赝品。这项发现使得世俗君主摆脱了束缚在身上一千多年的枷锁。而这件象征文艺复兴精神的实例也告诉我们另一项事实，那就是有这样一件伪造文件出现，说明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意义是多么重大。顺带说一句，这份伪造品，《君士坦丁捐赠书》的原版，现在就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

“米兰敕令”以后，君士坦丁将表里不一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由国家补偿没收的资产、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外，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政策，那就是皇帝极力支持神职阶层的独立。

这一项政策也是以敕令的形式实施的。具体来说，就是承认决意将一生献给基督教神灵的人，有权不承担任何公务，包括国家公职、地方自治体政务，以及军队中的军务。换句话说，“神职人员”今后只要专心从事宗教事务即可。这意味着，罗马皇帝这一最高权力人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神职阶层的独立。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意大利语叫“clero”，来源于拉丁语“clerus”。不过“clerus”一词直到帝国后期才出现，语言学上也把它归入了“后期拉丁语”之列。要知道，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进入帝政之后，在罗马人使用拉丁语的一千多年历史里，都只有“祭司”（sacerdos）一词，而没有“神职人员”（clerus）一词。因为罗马虽然有主持宗教仪式的人，但没有以传达神意给人民为职业的神职人员。既然没有实体存在，自然也就没有表达的名词。从“神职人员”一词开始出现在罗马社会中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帝国，和以前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

对于免除神职人员一切公务的施政理由，君士坦丁自己是这么表示

的：

> 神职人员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专注于神圣之事业，方能对国家提供无法衡量之贡献。

4世纪的基督教徒自然对这项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在君士坦丁时代，虽然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承认，但其他的宗教依然存在，特别是罗马诸神依旧作为国家宗教而存在。在这个时代，从就任公职的立场上来说，必须常常参加官方祭典。对于决心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祷的信徒来说，参加献给罗马传统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尤其在场的，不是被比喻为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导羊群为己任的牧羊人，即神职人员，那就更痛苦了。因为基督教的神与其前身犹太教神灵一样，是“一”而非“多”。作为一神教，拒绝承认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灵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

而君士坦丁所谓的“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等同于“应该不受其他诸多神灵烦扰”。这些“牧羊人”自然会欢天喜地地接受这项政策。

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为罗马皇帝，也就身兼罗马宗教的领头人——“大祭司”。在官方祭典中，不仅要参加，还有领头率领众人举行仪礼的义务。姑且不论其内心作何感想，至少他并非基督教徒，也没有接受过洗礼。

政策也好，施政也罢，常常会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效果。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务的敕令，产生了一个恐怕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效果，那就是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文化层次较高的那一类人，开始纷纷涌进基督教教会。

公元4世纪的罗马社会，列位皇帝相继推出的一连串政策，直接冲

击了在元首制时期作为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没落至崩溃的边缘。

戴克里先皇帝推出的税制改革，将一直以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变成了以直接税为主，结果最受重税之苦的就是中产阶级。

君士坦丁直接继承了上述的税制，而且他还把传统的银本位制改成了金本位制。在这项改革之后，罗马社会分成了以价值稳定的金币为收入来源和以汇率不断变动的银币为收入的两类人。除了能以金币给薪的国家公务员和军方人员以外，其他划到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则被划为了后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自然想到去从事国家行政事务或者去服兵役。但是，虽然伴随行政机构扩大而增加不少公务员，但既然是可以领取金币的热门职业，门槛自然很高。至于服兵役，由于当时是由巴尔干地区出身的人掌握大权，想必有人不愿意入门受欺凌。

也许有人会说，要成为神职人员，不是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吗？这里向大家说明两个现状：

第一，面对国势、威望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悲叹他们已经被罗马诸神的抛弃。在这个时代，即使对基督教没有皈依想法的人，罗马传统诸神的信仰也淡化了。而一神教的危害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多神教思想下的古罗马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对这些人来说，要应征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心理上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抵触。

第二，现实生活的困窘。人们一旦迫于需要而无计可施时，信仰问题就会摆在其次。实际上，为了挣一口饭吃而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少。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力振兴基督教之下，这些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多。

而且这种现象还蔓延到罗马社会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地方议员阶

层“decuriones”。只是，这些人转行为神职人员，并非纯因经济需要。由于所有的职业都转变成了世袭制，这些人也被绑在了地方议会的议席上。而在后期的罗马帝国，这项工作不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而且还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罗马帝国后期，地方自治体以前所能享受的诸多权力均被剥夺。元首制时期被誉为帝国“细胞”的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如今都沦为单纯的地方行政区。身为地方议员之子，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只能继承家业，而且被视为富裕阶层，课以重税。这些税还必须兑换成金币缴纳。而每兑换一次，资产就要减少一分。

一旦成了神职人员，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消失。最大的好处，在于君士坦丁免除了神职人员纳税的义务。不仅如此，生活费用上也会得到教会的资助。这也是教会需要资产的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禁止结婚的规定不会阻碍一般民众转变成神职人员吗？这里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必须履行单身义务的规定，是进入中世以后才开始的。耶稣基督之下的十二使徒，大多有家室。初期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也大多有婚姻关系。也就是说，这一点不会成为人们专心基督的阻碍因素。

就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皇帝颁布敕令，将古代对单身人士不利的制度作了改正。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扶持神职人员阶层的政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会不会是在给民间日益增多的转业神职人员的热潮踩刹车呢？因为在君士坦丁在位早期，就颁布了神职人员数量限制措施。无论主教或祭司，除非有空缺，否则不允许添加新人。

优西比乌主教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中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现状。不过，基督教教会一方，却因为这一世俗的现象而获益，那就是神职人员素质因此大幅提高。以前的主教或祭司大多由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担当，现在这个阶层文化层次提高很多。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得到君士坦丁这个难得的支持者，

正在向罗马帝国中枢渗透。这个现象又使得教会获得操纵语言的有效才能，成为一项有力武器。《圣经》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起初，先有语言。”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之后，从这一年到公元337年的13年间，一直是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独揽大权。这意味着他之前在帝国西方实行的基督教振兴政策，从此也开始适用于帝国东方。基督教势力原本在东方就很强大。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整个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教会，自然会把君士坦丁看成十二使徒一样的存在崇拜。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越来越像基督教国家了。而君士坦丁发出的第一弹，就是在打败李锡尼之后马上开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

君士坦丁为了吸引人口，在新首都除了实行很多之前叙述过的振兴措施外，还要加上一项在他独揽大权后才能实行的新政策，那就是将埃及产的小麦全部转运到新首都。以前埃及产的小麦都是首先确保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的需求，载着埃及产小麦的运输船，大多数由地中海向西航行。如今虽然同样经由地中海运输，只不过航行的方向改成了向北。君士坦丁为了保障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社会底层阶级的福利，决定在此恢复以前在罗马和其他城市实施过的小麦免费配给政策。据说在君士坦丁堡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有8万人。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这个人数为20万。据此推断，新首都的规模大约是原首都罗马的四成。埃及产小麦与帝国全境小麦产量的比例，也是四成左右。不管怎么说，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对于新首都付出的极大热情。而热情越大，与付出对象之间关系也越深厚。如此，对基督教振兴付出极大热情和心血的君士坦丁，与基督教教义关系密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尼西亚公会议

在尼西亚召开的公会议中，主教们如众星捧月般地将君士坦丁大帝围在中间的画面，正是中世纪已经开始的最佳象征。

这句话引自一位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英国学者的著作。众主教聚集在小亚细亚最西边的尼西亚召开公会议的时间，是公元325年，距离罗马帝国灭亡还有150年。

之前主教们也经常聚会，但并非由皇帝召集。尼西亚公会议是第一次由罗马皇帝正式召开的公会议。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做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行为呢？在这里要再重复一次，当时的基督教，虽然有最高统治者在背后大力支持，但依然只是诸多宗教之一。

一提到霸权国家，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超级大国任意欺压其权下小国的场景。然而，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霸权皇帝，拥有霸权的同时，也伴随着责任和义务：第一，身负保卫霸权下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第二，具有调解霸权下国家、民族间矛盾的义务。因为世间的很多纷争，往往当事双方因为争执不下而迟迟无法解决，这时就需要一个拥有足够权力或权威、且双方都信服的第三者来调停，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

那么，对君士坦丁而言，非要在尼西亚召集主教来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起源于七八年前的阿里乌斯派与亚达纳西派的教理之争。君士坦丁曾派心腹何西乌主教前往调停，可惜徒劳无功。

如果仅仅只是神职人员围绕教理展开争论，那问题不需要皇帝介入，大可听之任之。可为什么君士坦丁要插手这件事情呢？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君士坦丁曾经大力扶持、现在依然努力协助的基督教教会，有可能会走上分裂的道路。如果允许一次分裂，就会产生更多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基督教最终走上凋敝没落的结局。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君士坦丁位于世俗权力的顶端，他与宗教世界的分裂或灭亡，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当事人并不这么想。

为什么君士坦丁不这么想呢？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热心地扶持基督教的问题答案相同。

尼西亚公会议在历史上意义重大。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就不用说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次会议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的基督教“形式”，一直延伸到现代，形成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也正因如此，光是近现代，研究这次公会议的文献就数不胜数。不过我要写的是罗马史，而非基督教教会史，所以在此仅作简略叙述。总之，君士坦丁因为偏袒基督教，而卷入了历代皇帝都不会介入的“教理”争端。

多神教就是人们去祭祀诸神以得到神灵的守护，因此没有“天神教诲的真理”，即“教理”（dogma）的存在，也不足为奇。然而以指导人类生存方式为目的的一神教，“教理”本身的存在正是宗教存在的理由。教理如此重要，因而对教理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如果放任解释的差异而不进行调整，宗教组织就会冰消瓦解。而召集主教召开公会议，目的就在于调整解释内容之差异，避免组织崩溃。

那么谁拥有公会议的召集权呢？

由于罗马皇帝身兼大祭司职务，自然拥有这项权力。后来这项权力就落在了主教中有威望的人士身上，即由罗马教区主教接手，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公会议的召集权在罗马教皇手中。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公会议在教会史上的重要性从未减少过。毕竟“教理”是由活着的人来解

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释，因人而异再自然不过。而且，“教理”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的特点，那就是解释还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话题转回到尼西亚公会议上，逼着君士坦丁必须亲自召开公会议来处理的“教理”争议，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与其子耶稣是同质还是不同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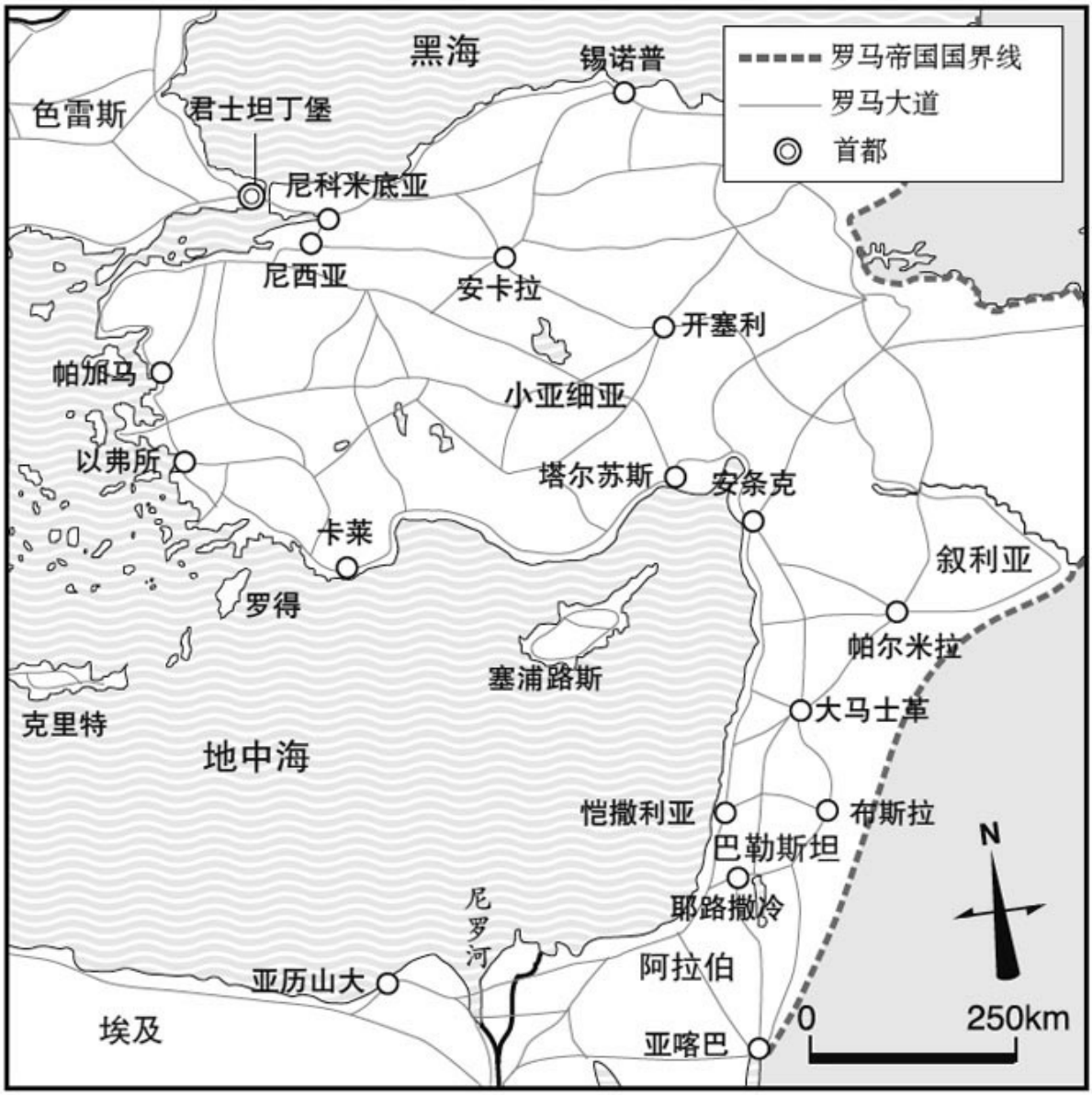
事情的开端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做牧师的阿里乌斯，主张不同质的说法。阿里乌斯认为，上帝相当于哲学上的“单子”，是构成实体的最高心理的物理因素，是不可知的存在。而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不与人同质，也不与神同质。也就是说，相对于上帝这一崇高、不可知的永恒存在，有着出生、成长、在十字架上死亡这一系列经历的耶稣，就不是神灵。

在我看来，这个学说很有意思，但是基督教教会向来主张“三位一体”理论，即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三者同质，因此属于一体。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阿里乌斯的学说属于异端邪说。因此，阿里乌斯的上司，三位一体派的亚达纳西主教，开除了阿里乌斯，并将他驱逐出了亚历山大教区。

可是阿里乌斯在流亡途中，陆续获得了许多支持者。比如说，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城市恺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人后来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虽然他后来又转变成三位一体派，但一开始他是阿里乌斯派的支持者。

不过，阿里乌斯派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另一位同名主教——当时在信徒中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帝国东方主教区中，势力最大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这里的尼科米底亚三大教区。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尼科米底亚的主教意见相左，意味着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势力分成了阿里乌斯派和亚达纳西派两个派系。情况演变至此，已经不是争论教理的问题，而是升级为教会分裂的危机。召集

两派人物前往尼西亚，试图消除因教理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局面，已经成为君士坦丁无法回避的责任。



罗马帝国的东方

据说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城市尼西亚聚集的主教人数接近300人，其中帝国西方的主教仅有10人不到，其他均来自帝国东方教区。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帝国东西方基督教势力差距有多大。而且，正因为

如此，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主教们，大半是希腊人后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主教们在皇帝面前大发议论，争执不休，迟迟无法得出最终结论。因为希腊人一直都有好辩论的习惯，常常让罗马人觉得受不了。

最终，作为会议主席的君士坦丁，不知是以某种回馈为条件，还是仅凭皇帝的权势施压，总之，他让会议达成了发表“联合公报”的共识。公报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位一体”理论的正确性。从后来君士坦丁的言行推测，他本人似乎更认同阿里乌斯的观点。只不过若推翻一直被视为基督教教会正统思想的“三位一体”学说，必然会在基督教内部引发地震狂潮，动摇基督徒的信念。君士坦丁当时最为重视的，应该是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一。

不过，一直到最后，阿里乌斯与追随他的两名神职人员都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名。于是，君士坦丁将这三人流放至远离东方的莱茵河畔。但几年后，又取消了这个处分。这一事实说明，在公元325年举行的尼西亚公会议中，基督教教会并非全部支持“三位一体”理论。其后，又经过了多番波折，特别是后来阿里乌斯派在北方蛮族中传教成功，使得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从理论上来说，宣称上帝与耶稣基督不同质的阿里乌斯学说更有说服力。就算最终死于十字架上，一个爱护人类、追求真理的耶稣，形象不也很完美吗？

话虽如此，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可以体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选择三位一体学说时的心态。因为人活着，并不满足于追求真理，他们更希望通过外力获得心灵的救赎。说到追求真理的人，历史上已经有一位苏格拉底。如果说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就宣告一切的终结，那么在为真理献身这一点上，喝毒酒而亡的苏格拉底和耶稣没有区别。但是，死于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后来又复活升天，成为救赎的象征。耶稣要复活升天，成为“不可知”的存在，才能成为救赎的象征，即为那些希望获得救赎的人点燃希望。相反，苏格拉底则没有达到救赎的境界。因为他自始

至终都是个“可知”的人。

由柏拉图所著、介绍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篇》和《新约圣经》同样都是畅销书。但在2000年的历史里，其销售数量有着无法估量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也体现了对一般善男信女而言，追求真理的大道和期望获得救赎的需求之间的差距。

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组织而言，人们信奉与否的重要性要远高于真实与否。因此，公元4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会，摒弃阿里乌斯的观点，选择“三位一体”论，是一个贴切的选择。不，应该说，正因为基督教采用了“三位一体”说，才打开了通往世界宗教的大门。而这一决断的形成，也要归功于君士坦丁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

具体是谁不记得了，但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军事力量和罗马法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基督教也在罗马人经手之后，才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都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受罗马人统治的行省民。但是，自卡拉卡拉皇帝废除了罗马公民和行省民的差别后，曾经的“行省民”也就成了“罗马公民”。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君士坦丁与诸位主教，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都是“罗马人”。罗马人采用了圣子耶稣与上帝同质的“三位一体”说，因而确立了死后救赎的观念。也就是把基督教改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即使这与当初耶稣基督的理念不同。

那么，君士坦丁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扶持基督教教会呢？

基督教方面经常以“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说法，来形容入信基督教的人。如果套用这种说法，根据目前专家的推论，在遭受戴克里先皇帝

彻底镇压、后又由君士坦丁转而大力扶持的公元4世纪初期，“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仅占帝国全部人口的5%左右。不过，也有学者表示，这个比例应该仅限于大城市，如果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比例肯定会大幅度下滑。而且这里所谓的大城市，只是指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类帝国东方城市。同时是大城市，在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圣地罗马，是难以达到5%的成绩的。

基督教方面，以一神教徒惯有的看法，将与自己持不同信仰的人统称为“异教徒”。中文“异教徒”一词，在原文拉丁文中称为“paganus”。研究人员称，是住在意为“村庄”的“pagus”里的人，也就是“村民”的意思。这也可以证明，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徒还是城市里多，乡下则比较少。

为什么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多，而乡下比较少呢？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城市里容易形成追求新事物的潮流，而相对的，农村地区比较保守，这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相通的现象。其次，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产生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由于蛮族入侵而导致的乡下人口流失，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至于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跟基督教势力扩增产生关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最后一章“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不管怎么说，本书中所提及的公元3、4世纪中，“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占罗马帝国人口的比例仅为“绝对少数”，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既然基督教徒只占“绝对少数”，为什么戴克里先还要这样彻底进行镇压呢？

在戴克里先心目中，帝国的安全防卫是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实现复兴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阻止蛮族突破帝国防线，严防其深入帝国内部进行烧杀抢掠，将帝国居民从担惊受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达成这一目标，设立帝位，保证领导层同心协力的体制固然重要，帝国内一般民众一起保卫“共同体”的心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坚决认

定蛮族是敌人的思想，才是真正能稳固国家安全的“基础”。

可是在一神教当中，尤其在热心于对异族传教的基督教当中，有一股认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徒，更胜于认同住在同一社会的同胞的倾向。换句话说，比起幼时一起长大的朋友，基督教徒更注重临时拜访，信仰相同的信徒，类似于这样一种心境。

如此一来，对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比起同住在帝国内的同胞，如果蛮族信仰基督教的话，这些人反而会是更加亲近的同胞。“同胞”一词，除了“同一国家的人民”之意以外，还可以表示兄弟姐妹的意思。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谓的兄弟和姐妹，代表的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共同的信仰的人，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关系。

戴克里先害怕的，并非基督教徒的实际数量，而是担心基督教普及之后，帝国的“防线”会被侵蚀。如果敌我不分，防卫对象也就不再明确，“防卫”的功能也就无法发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克里先继承了元首制时期的列位皇帝对基督教的观念。很多研究人员将戴克里先定位为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从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虽然中间隔着一段争权夺势的时期，但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实际上还是应该视为君士坦丁。只是，君士坦丁不仅转而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更成为第一位大力扶植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话说回来，在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内基督教势力依旧是“绝对少数”的状态。不仅如此，在戴克里先大力镇压之后，数量比以前还要稀少。尽管如此，君士坦丁还是把前任皇帝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为什么？

研究人员努力地、一字一句地研究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文件和书信，试图探寻这个人在“米兰敕令”之前是否对基督教信仰持有亲近的态度。另外还举出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发布的数次敕令发挥效力的时期里，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帝国西方，几乎没有镇压基督教的史实为证，说明从其父亲开始，君士坦丁家族一直对基督教保

持宽容的态度。进而研究人员认为，受此影响，君士坦丁在政治上偏袒基督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偏袒，最终还是归结于他自身的信仰。

确实，在公元324年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之后，君士坦丁就建设了一个只有基督教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就连在多神教圣地罗马，君士坦丁也修建了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留存到现代的很多重要教堂。不仅如此，他还在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修建了对基督教徒而言无比重要的圣墓教堂。

可是，君士坦丁虽然如此公然地表露出亲基督教的行为，但同时也是按照传统罗马皇帝的风格行事的人。他发行的货币正面是他本人的侧脸雕刻，背面则跟历代罗马皇帝一样，刻着罗马诸神图案。而且，他也没有禁止举办官方祭典。后来他的儿子继位，颁布禁止官方祭典的敕令时，声称这是父亲的遗志。问题是，这种没有任何佐证的“遗志”，是最靠不住的史料。总之，君士坦丁虽然偏袒基督教，但至少表面上还是遵守着“米兰敕令”中宣称的宗教平等。这个人在位期间，帝国依然是“诸神混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依然是当初的罗马帝国。

阅读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书信后，我发现，就连反对派也很难从字里行间挑出毛病。

虽然是书信，但用词造句都极为小心谨慎，颇有政治文章的文体特征，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儿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蛛丝马迹。可见，君士坦丁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双面人。

至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在镇压基督教徒时态度消极一说，也只是因为帝国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并不强盛。既然力量薄弱，数量也不多，镇压和迫害的程度自然也会随之减弱。

至于君士坦丁个人是否对基督教有信仰之心，这个问题实在很难一口咬定是或否，因为有无信仰之心完全是个人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绝无恶感。

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个有名的基督教徒。当然，在戴克里先在位时，这件事肯定不能对外声张。海伦娜公开表示信仰基督教，恐怕要等到儿子的皇位稳固、发布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之后。特别是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功扫除所有对手之后，身为皇太后的海伦娜备受尊崇，甚至完成了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

海伦娜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出身卑微。在“四帝共治制”下，由于副帝必须迎娶正帝的女儿，迫使她与结婚多年的丈夫离婚。身为儿子的君士坦丁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自然深厚。儿子总会同情母亲，尤其是遭遇不幸的母亲。如果儿子对母亲给予的同情与亲情，爱屋及乌地扩及母亲信仰的宗教，这也是为人子的常有心态，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那就是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偏袒仅占绝对少数的基督教？因为君士坦丁既然身为政治人物，就该清楚如果硬行推动只有少量支持者的政策，会成为政治人物的致命伤。

有很多人认为，身为领导者或者统治者，应该了解其治下的人民内心所求，生活所需，并以满足人民所求、所需为己任。不过，这只是一种未经深入思考就囫囵吞枣地理解民主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很多政治家都以上述“任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确实，这是从政人员的任务，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非全部。因为所谓需求，除了现有的，还有的需要通过人力去唤起。

如果君士坦丁只是一位认为统治者应该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并给予满足的领袖人物，他就不会大力推广只有5%支持者的新政。所以说，他是个理解需求可以借由人为唤起的领袖。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君士坦丁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辛劳地唤起人民的需求？这种将“少数”人的需求变成“多数”人需求的行为，无论其背后动机是什么，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如此扶持基督教，能得到什么好处？

统治工具（Instrumentum regni）

罗马人历经了王政、共和、帝政等政体变迁，然而整个民族对世袭制度一直不太认同，或者说疑虑甚深。当初在王政时期，也是采用选举制。到了共和时期就更不用说了，类似于现代首相的执政官，也是经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即便到了帝政时期，罗马帝国的官方主权者也不是皇帝，而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和罗马元老院。皇帝只是受主权者委托行使权力的存在。因此，一旦皇帝让人觉得不值得托付权力，就会遭到暗杀。因为皇帝和一年一任的执政官不同，是终身制，所以要换掉皇帝，只有将他的肉体消灭。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会深陷危机的首要原因，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皇帝撤换太频繁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戴克里先构思实施了“四帝共治制”。遗憾的是，这一政策也很快夭折了。导致这一政策快速崩盘的人物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想必早就看穿“四帝共治制”并不能消除政局动荡的现状。他野心勃勃，试图与元首制时期的皇帝一样，一个人统治整个帝国。

但是，如果要一个人统治国家，就必须另外构思一套不但有效而且能长期维持效力的新施政体系。这既不是已经证明无法发挥效力的“四帝共治制”体系，也不是随时可以通过暗杀方式撤换皇帝的元首制体系。

君士坦丁也知道，政局稳定是维持帝国存续的关键。可是在他任

内，军事力量分配上，不是以帝国边境防线为重点，而是注重强化他个人领导的兵力。因为他视个人家族存续优于政局稳定、帝国利益，所以他才会被称为第一个中世纪君主。

如果托付权力给掌权者的是“人类”，那么拥有剥夺掌权者手中权力、罢黜掌权者权力的，自然也是“人类”。但是，如果这项权力不是为“人类”所有，而改由其他存在掌控，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罗马传统诸神并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多神教的神灵只是护佑人类，并不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神灵，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样，能够满足君士坦丁需要的神灵，就只能从一神教当中去找。因为犹太教一直维持着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地位，在公元4世纪时，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一神教，只有以跨越民族差异为传教方针的基督教。而且在270年前，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时，圣保罗就计划将基督教从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 每个人都必须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我们只认同上帝的权威。现实世界的权威，都是受上帝指示形成。遵从他们，也就是遵从君临于现世权威之上的上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君士坦丁身边多了一位宗教顾问，名叫何西乌。关于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是西班牙南部城市柯都伐主教，比君士坦丁年长，但具体年龄不详。目前没有任何文章或著作确定出自这个人之手，因此我们后人也无从得知，这个人曾经以何种方式向皇帝提出过哪些建议。

话说回来，顾问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有限。顾问的建议如果不能获得采纳，那也只是纸上谈兵。建议能否实现，全凭掌权者的态度。如此一来，由谁提出何种建议，并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掌权者能否接受这些意见。而在历史上，最终作出类似“渡过卢比孔河”这样重大决断、

将古代和中世纪分隔开来的，还是君士坦丁本人。

君士坦丁的政治敏锐度令人惊叹，他能意识到在现实世界，即俗世之中，把赋予君主统治和领导权力的对象由“人类”转为“神灵”的有效价值。如此一来，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再也不是“可知”的人类所有，而是属于唯一“不可知”的上帝。

这种制度实际上等于把政权交给没有任何意志的神来决定。这样，就需要某些有资格听取神意的人，将神意传达给人类。在基督教制度里，神意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的。而且，传达崇高神意的神职人员，不是日常与信徒接触的牧师，也不是在孤独环境中探究信仰的修道士，而是在召开以解释、整理、统合教理为目的的公会议时，有资格出席的主教。这样，在基督教制度上，只有主教可以向人类传达“神意”，表示天神是否决定赋予俗世君主以统治权力。如此一来，这要主教站在自己一边，“神意”自然也会维护自己。如此一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就看怎么把主教拉拢过来即可。

“主教”一词，在后期拉丁语中叫做“episcopus”，后期希腊语称之为“episkopos”。在基督教逐渐渗透到社会的罗马帝国后期，这是最受世人瞩目的阶层。

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不像现在的天主教会那样，官僚制度高度组织化，因此，主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主教被视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受托拥有传达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旨意、教育引导信徒、统领信徒等权力。而且，除了上述权力，还具有对有助于传播基督教，或在传播基督教上作出贡献的人物，赋予其神圣正统性的权力。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国王，大多是割据一方的领主们协商之后，共同拥立其中一位领主为王。身兼主教的教皇与其他主教的关系，与封

建时代的国王立场颇为相似。直到现代，罗马教皇依然是以引导身居罗马的信徒为第一要务的罗马主教。俗世中，与主教地位相似的职务，大概是州长吧。

简而言之，教区内的信徒要归主教管辖，因为主教是传达神意的人。现代的罗马教皇，是由主教之上的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理论上，枢机主教投的票，是由“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告知“神意”后，投给符合神意的人选。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与枢机主教本人的意愿无关。在基督教教会中，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因此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交给获得神意的人掌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听取神意、传达给世人的，就是主教。

那么君士坦丁为了拉拢主教，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身为组织的领袖，最重视的是巩固组织并维持其存续。对主教来说，就是如何确保人力和资产，以便在教区开展宗教活动、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君士坦丁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并增加数量即可。

修建教堂赠送给教会。

捐赠资产作为教会活动的资金来源。

免除教会活动中在一线工作的神职人员的公务及赋税

解除对单身者不利的法令。因为那些不进入教会、以信徒身份积极参与福利活动的单身人士，对教会来说，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优惠措施。除此之外，君士坦丁还赋予主教在教区内的司法权。罗马帝国再也不是法治国家了。原本司法应该与宗教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就连在司法圈子里，基督教徒也占有有利地位。

而且除了上述项目，主教还成为不堪重赋的纳税人在请求皇帝的征税官手下留情时，唯一能请求斡旋的对象。这可不是君士坦丁制定的政策，只是既然主教的权力如此之大，想必人们都会认为，说不定主教有办法让税金减少一点。

除了与自然相处的时间多过与人相处的农村外，基督教渗透速度最慢的就数军队了。在罗马军中，原本信仰太阳神或密特拉神的官兵就不少，而罗马军团已经习惯在统一行动时，将个人信仰置于一边，大家一起参加为守护罗马帝国的罗马诸神举办的祭典仪式。

公元324年，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兰敕令”发布后的第11个年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的内战，以君士坦丁的胜利告终。在这场战斗中，失败被俘的李锡尼一方的官兵，对着战胜者君士坦丁这样高喊道：

“君士坦丁皇帝，愿您获得诸神护佑！”

诸神，也就是传统的罗马诸神。这表示，即使在基督教被承认之后，对官兵而言，“诸神”还是比较亲近的存在。

在面对官兵时，君士坦丁没有表露出任何亲基督教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因为君士坦丁知道，军队是维护皇帝权力的基础。如果做出有损军队支持的行为，会成为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的致命伤。

不过，君士坦丁还是做了个小动作，他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上帝祈祷为由，在星期日放假。至于异教徒官兵，星期天也要和其他日子一样接受训练。

在这里重复一下，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未将它列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正因为如此，对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之一。换句话说，即

使有人因为星期天可以休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改教，也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没有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看得这么严重。

因第一个书写《基督教教会史》而声名远播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曾经很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但是，如果等待个人自然提升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想必要把信教者从“少数”发展为“多数”，又要花去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光是从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上，到基督教得到承认，就花了300年的时间。如果在其中，随个人和行业掺杂些“利益”存在，不就可以让“少数”变为“多数”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吗？这些政策与笼络主教的政策相同，都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巧妙战术。这样卓越的政治手腕，说明君士坦丁满足了从政者最重要的条件，即对政治现实的敏锐。

自从统治和领导的权力，不是由“人类”赋予而是由“神灵”赋予之后，让历代罗马皇帝头痛不已的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

身为皇权监督机构的元老院，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为掌管监督者的功能必须要有赋予掌权者权力的资格才能拥有。

过去罗马公民作为权力人用来表达意见的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从此以后也只是单纯的娱乐设施。

尽管罗马人一直对皇位世袭持怀疑态度，如今就算让多无能的儿子继承，也不需要费尽心思找理由了。

所有这一切，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打发。“你们会受我和我儿子的统治，并非因为你们的意愿，这是你们所信仰的至高天神的意愿。”换句话说，只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就好。

在绝对君主制盛行的17世纪，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都大力提倡“君权神授”理论。如果将其换成“现世统治权神授说”，那么

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由比17世纪早了1300年的君士坦丁播下的种子。

如果说这个思想的运用，仅从有血缘关系的子嗣继承来说，君士坦丁花费如此心力巩固的统治权神授说，在他儿子这一代就走到了尽头。然而这种“观念”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法国大革命为止。这种“观念”能够如此长寿，归根结底，因为对统治者来说，决定统治权力的不是人类而是天神的理论，于掌权极为有利。

加冕仪式（图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仪式油画）

加冕仪式是最能体现国王特质的地方。国王屈膝跪在传达神意的主教面前，作为神灵代理人的主教，把经由神灵正统化的象征权力的皇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国王头上。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并不认同统治权由神灵授予的思想，所以

既没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仪式。

公元330年5月11日，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全力兼程赶工之下，短短6年时间，至少这座城市初步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形。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的罗马帝国首都，那么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君士坦丁认为，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必须依靠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来完成。当然，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权力的转移也会带来权力周边人口的转移。罗马的权力人士和富裕阶层纷纷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在新首都完工的第二年发生的惨变，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移居的进程。

这一年，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突破了被称为“帝国安全保障能力检测器”的多瑙河防线。皇帝坐镇后方指挥罗马军队击破敌军，将投降的敌军编入罗马军中结束战争，这个过程共花了两年的时间。虽然获得最终的胜利，但这也表示君士坦丁无法阻止敌人突破国界侵入帝国内部的事实。

公元337年开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帝共治制”时期被罗马军队彻底击败而被迫讲和的波斯帝国，在事隔40年后再一次展开了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虽然君士坦丁已经62岁，但对手是波斯国王的话，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马。君士坦丁与以私通罪名被处死的皇后法乌斯塔之间生有三个儿子，现在分别是21岁、20岁和17岁。这个年纪还不足以承担与波斯作战的重责大任。除了儿子以外，君士坦丁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几个侄子。然而君士坦丁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的话，就不可能让这些人有建功立威的机会。

但是，这时君士坦丁已经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来忙于争夺皇位和专制统治，将心力全数投入权力的取得和维持中，因而积劳成疾。结果

一到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就卧床不起了。在病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于5月22日过世，享年62岁。

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埋葬在他身前修建的“圣十二使徒教堂”。原本罗马是历代皇帝的埋骨之处，如今连这项功能也没有了。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君士坦丁临终时，接受了原先反对三位一体论的阿里乌斯派成员、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洗礼。不过留下这段记载的，不是为皇帝洗礼的当事人，即最佳目击证人——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而是同名但不在场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这只是传闻。不过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是否真的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只怕没有那么重要。现代人也许会理解为，这是君士坦丁皇帝想在临终前对以前罪过进行忏悔的表现。不过，关于临终洗礼一事，还有其他的解释。1964年，由牛津出版的*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书的作者、研究后期罗马帝国历史的世界级权威A.H.M.Jones这样写道：

>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着大多数虔诚的基督教徒惯例罢了，即他在现世既然必须沾染在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恶行，那么干脆把成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也干不了的时候举行。

读了这段文字，我心里感到很愉快。原以为我已经充分理解古代基督教顺应时代的能力，以及在对应罗马人观念时表现出的弹性，在作品中也陆续提及，可是没想到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本人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用非宗教观点叙述历史，那如果我想得到基督的救赎，说不定也可以选择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了。不过话说回来，一生忠实于基督教的人，与临终前补票上车的人，最后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平等的吗？

虽然说君士坦丁到最后才补票上车，但他生前大力扶持基督教发

展，其成果不是颁赠“大帝”的称号就可以形容的。关于这一点，查理曼是远远不及他的。有一位研究人员曾经表示：

> 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教会在教理解释问题上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结果就是一再分裂，最后与古代大多数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人员，不仅针对君士坦丁，而且统括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时期，即正好我本书所论述的年代，发表这样的观点：

> 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吗？

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生。可是，这两个人是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另一个帝国，才维持了罗马帝国的名义。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也许帝国早在3世纪末就走到了尽头。

然而，他们兴起的帝国，也仅维持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如果这百年，是与五贤帝时代相似的百年，那么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值得。换句话说，如果这百年里，帝国边界防线如铜墙铁壁，蛮族无法入侵；就连农民也能安心耕作，农业兴隆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道路上的行人、车辆不用担心遭到盗贼袭击，治安良好；人员、物资在帝国境内自由流通；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高；选用人才的机制能发挥作用；政府广征薄赋等等，那也无话可说。换句话说，就是享受百年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是，这之后的百年，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很多了解罗马从诞生到灭亡这段历史的人，心里都会浮现这样的疑问：“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

个程度吗？”尤其是在知道之后的中世纪是个怎样的时代之后，这种想法更甚。

大事年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245	这一年，狄奥克莱斯（后来的戴克里先）出生在斯普利特附近的索罗那		（日本）弥生时代
260	瓦勒良皇帝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俘虏		
275	君士坦丁在现今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耐苏出生		
283	夏季，卡鲁斯皇帝在对波斯作战中遭雷击身亡。秋季，卡鲁斯的儿子努梅里安在尼科米底亚身亡。皇帝警卫队队长狄奥克莱斯由麾下军团拥立为帝		（中国）西晋灭吴，统一中国（280）
284	夏季，努梅里安的弟弟卡里努斯战死。狄奥克莱斯登基称帝，改名戴克里先。秋季，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开始“两帝共治制”		
286	戴克里先在多瑙河防线击退蛮族后，转向东方强化防线	马克西米安着手强化北非防线	
288		元老院授予强化东方防线有功的戴克里先“Persicus Maximus”（波斯征服者）的称号。戴克里先赶往雷蒂安	
290	戴克里先再次赶往东方，在叙利亚征讨萨拉森人强盗		
291	戴克里先造访埃及，击退从尼罗河上游袭来的土著		（中国）“八王之乱”
292	戴克里先返回多瑙河防线，击退萨尔马提亚人		（日本）从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初，从畿内到濑户内海沿岸出现古坟

（续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293	5 月 1 日，展开第一轮“四帝共治制”：东方由正帝戴克里先和副帝伽列里乌斯负责；西方由正帝马克西米安和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负责。君士坦丁被送往东方，在戴克里先皇帝手下就军职		
295	戴克里先大浴场开工。努米底亚青年马克西米里阿努斯因拒绝服兵役殉教		（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叙事诗完成。（印度）帕拉瓦王朝兴起（295）
296	波斯大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东方副帝伽列里乌斯率兵迎击，大败		
297	伽列里乌斯大败波斯大军，与波斯讲和，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纳入控制之中		
301	戴克里先发布价格管制敕令		（中国）赵王司马伦篡位
303	2 月 24 日，戴克里先发布镇压基督教政令	11 月 20 日，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共同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	
305	5 月 1 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同时退位。戴克里先前往斯普利特，马克西米安前往南意大利隐居。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西方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副帝塞维鲁	戴克里先大浴场完工。君士坦丁前往西方，投靠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日本）古坟时代
306		7 月，西方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病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麾下官兵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伽列里乌斯将塞维鲁推为正帝，君士坦丁被任命为副帝来平息事态。10 月 28 日，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称帝	

（续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07		2月，西方正帝塞维鲁为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挥军罗马，遭前正帝马克西米安俘虏后自杀	
308	秋季，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邀请戴克里和马克西米安在卡农图姆会谈，达成让李锡尼担任西方正帝的协议。第三轮“四帝共治制”开始	君士坦丁与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法乌斯塔结婚	（中国）汉王刘渊即位称帝
309	戴克里先颁布的镇压基督教的敕令被取消	蛮族越过莱茵河防线大举入侵，马克西米安借机发动政变，企图打倒君士坦丁	
310		君士坦丁与蛮族和谈后发动反击，马克西米安自杀	
311	4月，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发布敕令，认同宗教自由。5月，伽列里乌斯去世，东方正帝李锡尼继位，西方正帝职位空缺		
312		君士坦丁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军意大利，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10月27日，君士坦丁在罗马近郊米里维桥作战获胜，马克森提乌斯战死。元老院决议将进入罗马的君士坦丁升格为正帝。“君士坦丁凯旋门”动工。近卫军团被解散	
313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将戴克里先之女、伽列里乌斯的遗孀瓦莱里娅及其母亲普里斯卡流放东方。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率军入侵李锡尼管辖下的小亚细亚。3月底，李锡尼击败马克西米努斯·代亚。马克西米努斯·代亚逃亡。6月15日，“米兰敕令”颁布，基督教得到承认。8月，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去世。同年，戴克里先去世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会谈。同意发布“米兰敕令”。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结婚	（朝鲜）高句丽灭乐浪、带方郡
315	“君士坦丁凯旋门”完工。秋季，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作战获胜。紧接的第二场战斗再次获胜。12月，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讲和。李锡尼的势力范围被限制在小亚细亚以东		

（续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16	君士坦丁展开击退北方蛮族的战争		（中国）西晋灭亡
317	君士坦丁正式开始迎击跨越防线入侵的蛮族。多瑙河防线由君士坦丁指挥，莱茵河防线由其子克里斯普斯指挥		（中国）司马睿即位晋王。（东晋，318）。刘曜以长安为都建立前赵（319）。（印度）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笈多王朝（320）
322	君士坦丁率军渡过多瑙河，击败北方蛮族，与蛮族讲和，成功确保帝国北方安全		
324	7 月 3 日，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土耳其的埃迪尔内作战获胜。君士坦丁军在拜占庭再度战胜李锡尼军队。李锡尼投降，退出正帝职位，隐居于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正帝。君士坦丁将首都移至拜占庭，着手建设新首都		
325	李锡尼以勾结蛮族、密谋反叛罪被处死。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集基督教主教召开公会议。确立“三位一体”论为正统，将阿里乌斯派斥为异端		
326		克里斯普斯以与继母法乌斯塔私通罪被逮捕，在伊斯特里亚半岛的波拉监狱里死去。法乌斯塔亦被谋杀	
330	5 月 11 日，举行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竣工典礼		
337	为对抗波斯入侵之军事行动，君士坦丁率军前往东方。5 月 22 日，君士坦丁病逝于尼科米底亚		

参考文献

ALFOLDI, A., *Costantino tra paganesimo e cristianesimo*, Bari, 1976.

ARIÈS, P. & DUBY, G., *La vita privata. Dall'impero romano all'anno mille*, Bari, 1990.

BARNES, T.D.,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the New Empire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Cambridge, 1981.

BARROW, R.E., *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28.

BLECKMANN, B., *Konstantin der Grosse*, Hamburg, 1996.

BROWN, P., *Società romana e impero tardo-antico*, Roma-Bari, 1986.

BRUUN, P.M., *Studies in Constantinian Chronology*, New York, 1961.

BUGNER, L. (ed.),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vol. I: 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BUONAIUTI, E., *Il Cristianesimo nell'Africa Romana*, Bari, 1928.

BURCKHARDT, J., *L'età di Costantino* (1853), Firenze, 1957.

BURY, J.,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London, 1928.

CALDERONE, S., *Costantino e il cattolicesimo*, Firenze, 1962.

CAMERON, A.,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RLESWORTH, M.P.,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in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24.

CORCORAN, S., *The Empire of the Tetrarchs: Imperial Pronouncement and Government, A.D. 284-324*, Oxford, 1996.

COSTA, G., *L'Opposizione sotto i Costantini*, Milano, 1925.

CRIVELLUCCI, A., *Storia delle relazioni tra lo stato e la chiesa*, Bologna, 1885.

DAGRON, G., *Naissance d'une capitale: Constantinopole et ses institutions de 330 à 451*, Paris, 1974.

DALLE SPADE, G., *Immunità ecclesiastiche nel diritto romano imperiale*, Venezia, 1940.

DANIELE, I., *I documenti costantini della Vita Costantini di Eusebio di Cesarea*, Roma, 1938.

De BROGLIE, A., *L'eglise et l'empire romain au IVe siècle.*

De GIOVANNI, L., *Costantino e il mondo pagano*, Napoli, 1977.

De MARTINO, F., *Storia economica di Roma antica*, Firenze, 1980.

De ROBERTIS, F.M., *Il diritto associativo romano. Dai collegi della Repubblica alle corporazioni del Basso Impero*, Bari, 1938.

DIEHL, Ch., *Constantinopole*, Paris, 1924.

DOWNEY, G.,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Princeton, 1961.

DUNCAN-JONES, R., *Money and Government in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USEB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 Vita Constantini*, Berlin, 1909.

FISCHER-FABIAN, S., *I germani*, Bologna, 1985.

FRASCHETTI, A., *La conversione. Da Roma pagana a Roma cristiana*, Bari, 1999.

GARDNER, I. & LIEU, S.N.C. (eds.), *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ith introduction of J. Bury, London, 1890-1900;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92.

GIOBBO, A., *Chiesa e Stato nei primi secoli del cristianesimo*, Milano, 1914.

GWATKIN, H.M. & WHITNEY, J.P. (eds.),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vol. I: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 Cambridge, 1936.

JACQUES, F. & SCHEID, J., *Roma e il suo impero. Istituzioni, economia, religione*, Roma-Bari, 1992.

JONES, A.H.M., *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 1964; *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71;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84.

KIDD, A.,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461*, Oxford, 1922.

LEVI, A., *Itineraria Picta.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lla Tabula Peutingeriana*, Roma, 1967.

LOT, F., *L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Paris, 1935.

MacMULLEN, R.,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Constantine*, London, 1987.

MATTINGLY, H., ENSSLIN, W., BAYNES, N.H. & other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Cambridge Unirersity Press, 1939.

MAZZA, M., *Lotte sociali e restaurazione autoritaria nel III secolo dopo Cristo*, Roma-Bari, 1973.

MAZZARINO, S., *Antico, Tardo-antico ed era costantina*, Bari, 1980; *L'Impero Romano*, Bari, 1984; *La fine del mondo antico*, Milano, 1988.

MILLER, E., POSTAN, C. & POSTAN, M.M.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OMIGLIANO, A., *Il conflitto tra paganesimo e cristianesimo nel IV secolo*, Torino, 1971.

MONTI, G.M., *Le corporazioni nell'evo antico e nell'alto medioevo*, Bari, 1934.

NORWICH, J. J., *Bisanzio. Splendore e decadenza di un impero 330-1453*, Milano, 2000.

ORTIZ De URBINA, J., *La politica di Costantino nella controversia ariana*, Roma, 1939.

OSTROGORSKY, G., *Storia dell'impero bizantino*, Torino, 1968.

PARIBENI, R., *L'Italia imperiale. Da Ottaviano a Teodosio*, Milano, 1939; *Storia di Roma vol. III: Da Diocleziano alla caduta dell'Impero d'occidente*, Roma, 1941.

PARATORE, E., *La letteratura latina dell'età imperiale*, Milano, 1992.

POHLSANDER, H.A., *Crispus: Brilliant Career and Tragic End*, London, 1984;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London, 1996.

POSTAN, M.M.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RÉMONDON, R., *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 de Marc Aurelè à Anastase*, Paris, 1964.

ROMANO, G., *Le dominazioni barbariche*, Milano, 1940.

SALVATORELLI, L., *La politica religiosa e la religiosità di Costantino*, Roma, 1928.

SALZMAN, M.R., *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Aristocracy: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CHREIBER, H., *I goti*, Bologna, 1981; *I vandali*, Milano, 1984.

SEGRE, G., *Osservazione sulla costituzione dell'impero da Diocleziano a Giustiniano*, Roma, 1934.

STEIN, E., *Histoire du Bas-Empire*, Amsterdam, 1959.

TENNEY, F.,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1930.

VEYNE, P., *The Roman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WELLS, C., *The Roman Empire* (2n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ILLIAMS, S., *Diocleziano. Un autocrate riformatore*, Milano, 1995.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IV

基督的胜利

[日] 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君士坦丁大帝的罗马帝国
逐渐趋向东方国家专治的君主制

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
蛮族入侵即在眼前
基督教的光芒成为罗马人的唯一希望
帝国的末日　是基督教的大获全胜

14

王石　王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日）盐野七生著；徐越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86–3975–8
I. ① 罗… II. ① 盐… ② 徐… III. ① 古罗马－历史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4031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IV: Christ No Shour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5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徐越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

[日] 盐野七生 著
徐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银币故事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公元337—361年在位）
第二章 皇帝尤里安 （公元361—363年在位）
第三章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公元374—397年在任）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银币故事

自从罗马帝国变为基督徒的国度之后，帝国的执政者也从为民众治世变成为上帝服务。

理所当然，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他的权力并不是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赋予的。无论是谁，总是对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言听计从。

成了基督徒的罗马人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圆形竞技场里，向入场的皇帝发出嘘声，以示不满，彰显民意。

理所当然，民众可以向某个人发出抗议，却不能向一个接受了上帝旨意的人抗议。因为向他抗议，就等于向上帝抗议。

正因为如此，钱币上执政者的脸都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帝国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前的钱币。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尤里安被称为“叛教者”，时至今日，他仍然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个罪人。在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形势下，他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少数罗马人之一。

然而，他的抵抗，在19个月之后就分崩瓦解了。即便是皇帝，也无回天之力。

不过，必须承认，正因为他年轻，才有这份英雄气概。倘若这枚奥里斯金币上的侧面头像，能有助于大家去理解这位在1700年前匆匆走过一生的年轻人，实属幸事。

现在，我一手拿着金币，一手描写着仲夏夜之梦一般飘逝的尤里安的生涯……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无论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还是在此之前，金、银、铜币至少在形状上是相同的，始终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流通货币。然而，在帝国即将走向终结之际，我深深感悟到一点，那就是宗教并没有挽救经济的能力。

罗马帝国从多神教转变为一神教之后，衰退的经济状况依然毫无起

色。尽管货币表面的颜色仍然呈金、银、铜色，但其内在，即代表货币真正价值的材质却日益劣化。

在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极少有这个时代的货币，这证明品质低劣的货币，大家都想赶紧用掉。而那些纯度高的货币就成了民众“压箱底”的宝贝。能在钱币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通常都是那些藏在罐子里长眠多年的硬通货。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从罗马市区前往郊外，只要3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看到许多古罗马时代留下的别墅。有一些像“哈德良别墅”（Hadrian’s Villa）那样，经过细致的考古研究之后，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还有一部分则由于特别的理由，比如原屋主赫赫有名、建筑规模宏大壮丽，或者是因为地板的花纹图案极其罕见、大理石圆柱的材料非常珍贵等，因而被列为考古学的重要遗迹。这些地方由意大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考古队负责挖掘、整理，一般人既无法靠近一探究竟，更别想随意地倚靠在旧石柱上缅怀一下往昔。

不过，名不见经传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古罗马人对郊外的别墅与市内的住宅同样重视，应该说更偏重于后者。别墅是一个环绕大自然而建的农庄，Villa（别墅）这个词语原本就带有“田园之家”的含义。

由于数量过多，纵使欧美所有大学的考古学者倾巢而出，也不可能逐一理清。因此，有不少遗址委托给地方政府负责观光的部门管理。然而，他们除了对遗迹做一些例行的灌木修剪以及清扫之外，并没有进一步的维修管理。这些地方通常人烟稀少、寂寥幽静。近几年，我养成一个习惯，专门去看这些无人问津的遗址，并不是为了学术调查，仅仅是在这些历史废墟中作独自的冥思。

《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写到第12卷《迷途帝国》时，我的视线和脚步伸展到古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土，它们涵括了欧洲、中东、北非等辽阔的地区。如今，从罗马去那些地方，坐飞机不过60多分钟，即使是边境地区，时间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每次前往这些地方，总让我不解：为何那些古罗马的精英能够抛弃首都罗马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地奔赴这

些条件恶劣的地区，担当起防卫和治理的任务？举例来说，寒冬腊月时我曾经前往多瑙河一带，被俗称匈牙利落山风的寒风冻得几乎全身麻木；相反，当我去参观古代要塞、眺望撒哈拉沙漠时，又被灼热的烈日晒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再思考什么帝国边界线问题，一心只想仿效古罗马人做一盆清凉的冰沙来消暑解渴。

如今，我一边游走于帝国首都罗马附近的别墅遗迹之中，一边猜测着公元4世纪时住在这里的主人的心情。我仿佛跟随着古罗马人共同思考、一起走过了1000多年，眼看着即将落幕的帝国结局。

眼前这所别墅的主人年龄在40多岁，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世家子弟，他本人也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会场，与议员们的交往仅仅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接触。他在罗马市内的宅邸，卖给了因经营基督教教会而发了财的新贵，房价由着对方，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恋恋不舍的意思。他单身，无儿无女。像他这样的状况并非特例，在那个对帝国未来不抱希望的时代，许多人选择了终身独身。

原本度假用的别墅如今成了他的日常居所（casa）。别墅的规模不算很大，但还是有足够的面积将主人的居住区和仆人的活动场所隔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别墅忠实地按照古罗马传统的设计，周边种着橄榄树以及其他果树，有专人悉心打理；边上是饲养家畜的牧场以及保证自家用的小麦田。农田附近有涓涓的清溪流过，再往后是茂密的森林，可享受打猎和采蘑菇的乐趣。顺便提一句，罗马人特别爱吃蘑菇。总之，只要不像公元1世纪的美食家卢库勒斯（Lucullus）那般追求奢侈的盛宴，别墅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主人有足够的心思和财力，想模仿早年的富豪们的做派，不远千里地寻来山珍海味，让宾客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在那个时代也没了这个可能。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结束，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圈已走向终结，曾经遍布帝国全境的交通网

络，变得支离破碎，蛮族以及强盗的频频袭击，使得运输成本节节上涨，对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就算不想去刻意追求素朴的生活，现实也迫使大家不得不尽量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罗马式的别墅原本就是按照自给自足的理念建造的。别墅中有小型加工厂，除了一些需要特别高等技术的东西，一般的产品以及加工用的工具都可以在此制作。

仆人是维持别墅正常运转的关键。他们虽然是奴隶，但都是在主人家出生、成长的家奴，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第二、第三代的世袭奴隶，已经成了家族的一员。但奴隶们不会过度地涉入主人的生活，主仆之间谨守礼仪，在和谐、温暖的气氛中，共度郊外别墅的时光。

尽管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主人家却不认为他是弃世隐居或者逃避现实，他只是选择了离开而已。他也不打算奋起反抗，因为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尽管已远离政治的旋涡，毕竟是来自世代担任国政的上层家庭，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关注时代潮流的变迁，即世间的动态。虽然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已徒有虚名，自幼接受的领导阶层必不可缺的“教养科目”造就了其敏感的政治触觉。

他如果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或许会跟随着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如果是公元1世纪的话，也许会成为奥古斯都的秘书官之一，为各项制度的改革及巩固而劳心劳神，无暇回到别墅享受悠闲的田园生活。或者再晚一点，身处公元2世纪，那么他可能会陪伴着哈德良皇帝在帝国的各个边境视察，重新探讨和部署辽阔的罗马帝国的国防安全以及统治制度，在年富力强时，为国家作出贡献。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

即使有满腔的热情愿意为国防安全尽一己之力，元老院也没有资格涉入军事。当时罗马皇帝的统治手段，已逐渐趋向于东方国家专制的君主制，对于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来自罗马传统的元老院阶层的人而

言，面前似乎立着一座无形的高墙，就算选择在皇帝手下做一名官员，也是前途莫测。这就是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的现状。不过，像他这样知识渊博、精力充沛的男子，只要有心，即使在不尽如人意的形势下，仍然有一条光明之路可走。

他可以成为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是否曾经接受过洗礼并不重要，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在担任了神职之后，才接受洗礼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来自上层社会、具有良好的教养和渊博学识的人，甚至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直接就可以担任主教。

但是，他不愿意向现实再三妥协。这倒并不意味着他对罗马传统的多神教有强烈的信仰，只是不想皈依基督教而已。在那个时代，和他有着类似想法的人，大多会醉心于希腊哲学的某一神秘的教派。然而在他看来，那些东西不具备宣导、说服人民的力量，完全属于知识人小圈子里的自我满足。他不喜欢与这类人物打交道，就算是聚餐闲聊，也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

他作出了选择。既然现实如此，索性就做一个被基督教徒所蔑视的“异教徒”，度过余生。无论世间如何变化，只要有这个别墅得以安身就好。

生活在时代变迁期间的人们，有以下三种生存方式可以选择：

一、顺势而为。

二、逆流而上。

三、全身而退。

接下来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就是选择了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男人们的故事。我会站在别墅主人的立场，即选择了全身而退的人的视角来展开论述。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帝国即将终结的命运，刻意采

用这个角度切入主题，而是与其他两种生存方式相比，我对第三种选择更有共鸣。

最后，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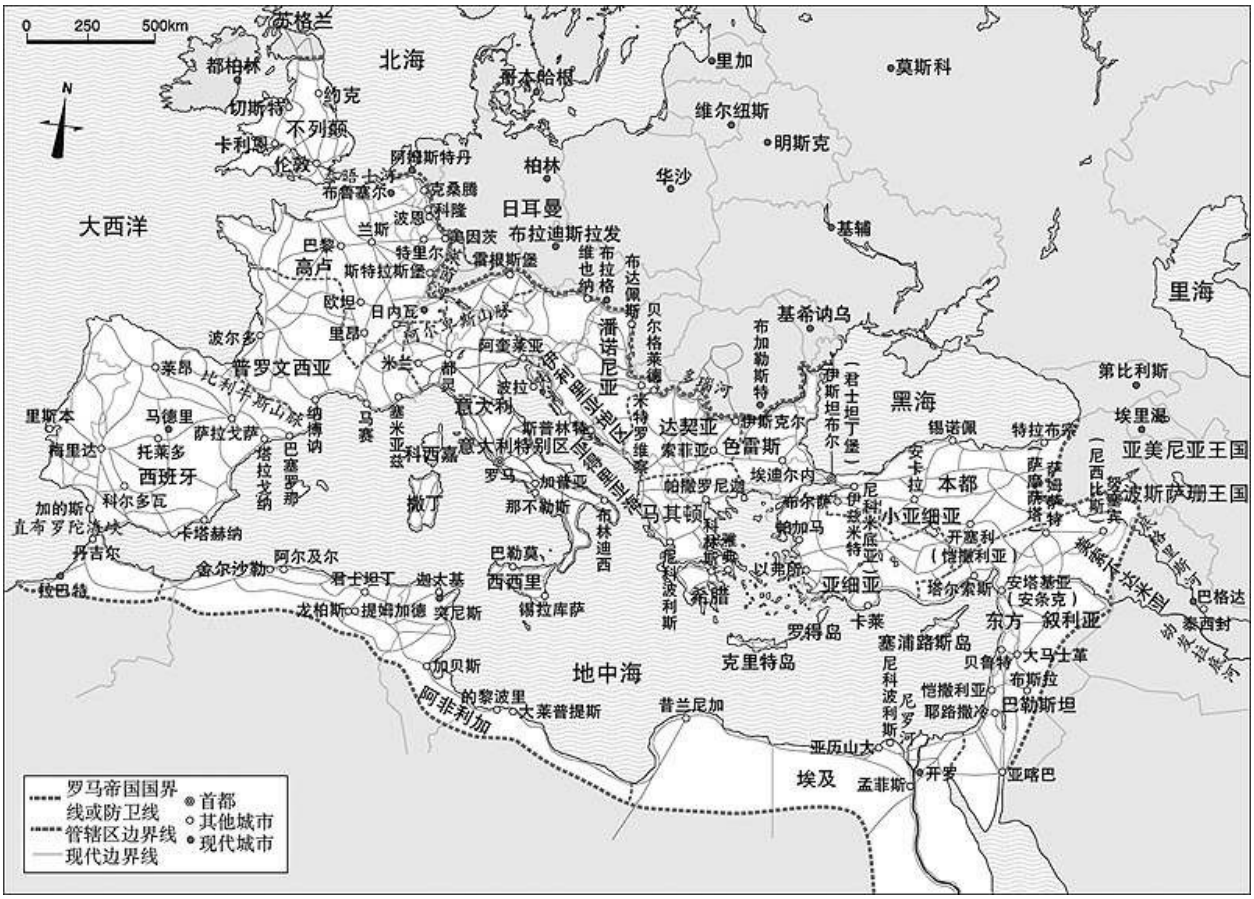
在迄今为止《罗马人的故事》系列的各册中，我都尽量地多向大家介绍一些“罗马人的脸”，希望大家先观察一下古人的脸，再进入故事。本书中介绍的罗马人，与以往出现的各种面孔非常之不同。大家看了或许会有所怀疑：这真是罗马人的长相吗？本书封面挑选的是享有圣人之誉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又译安布罗斯）。在公元4世纪的历史名人中，安布罗西乌斯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首都罗马的罗马人。与他出身背景相似的，还有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的尤尼乌斯·布鲁图、《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中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以及《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中的主人公尤里乌斯·恺撒。如果各位对安布罗西乌斯的容貌感到不可思议，不妨请参考一下我以下的论述。

在描绘人物的相貌，尤其是统治者的相貌时，除了忠实于事实，作者更想传达的是他对笔下人物的观感。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达官贵人或一朝天子，往往都是创作者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的人物形象。即使是最接近于事实的照片，它所反映的内容，也会因为摄影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背离现实的现象。手工制作的雕像或者镶嵌画之类的作品，就更容易掺入创作者主观的诠释。

我在作品中向大家推荐的，都是领导时代的风云人物的脸，它们都是艺术家们根据那个时代人民理想中的领袖形象制作而成。因此，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罗马人的脸”，是主人公实际的长相和人民所期望的形象的混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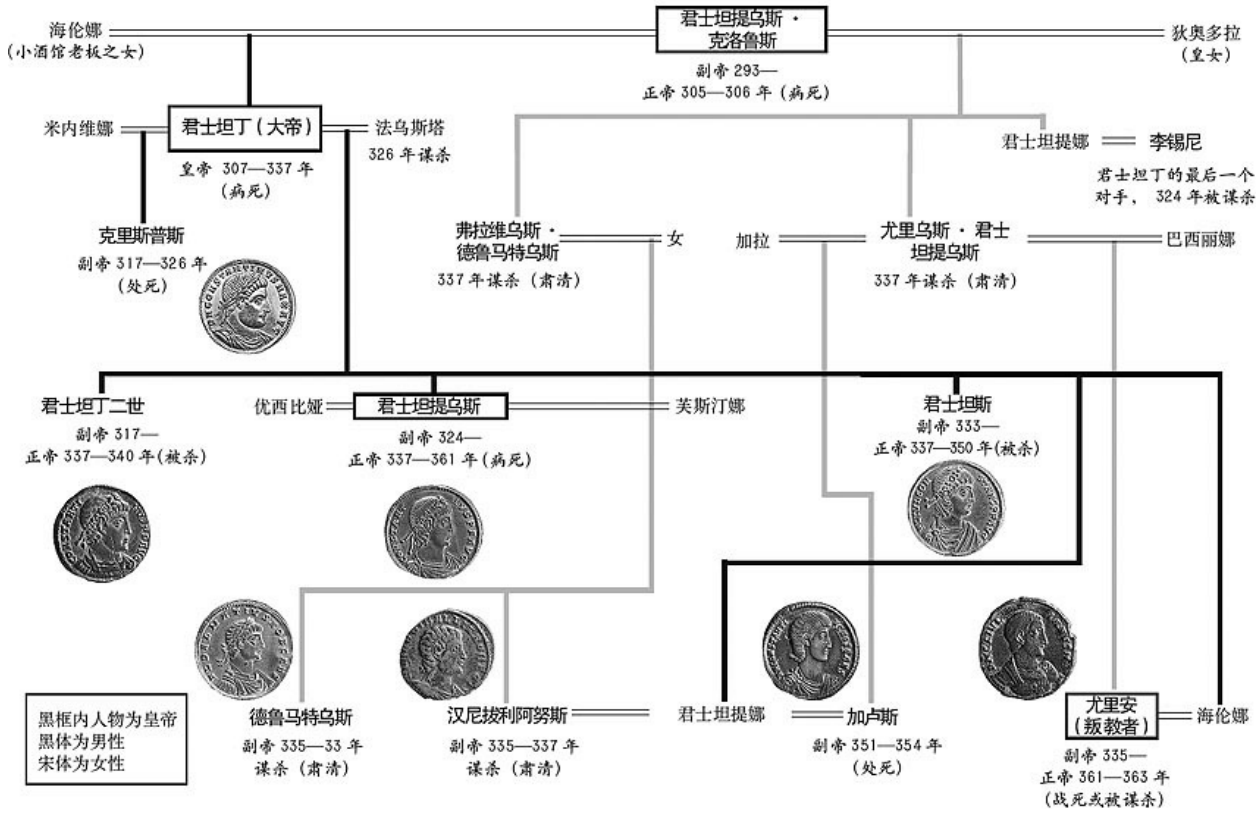
鉴于以上理由，安布罗西乌斯的面容，才会和与他同样出身于首都罗马的西庇阿、恺撒在观感上有如此悬殊的差异。同样，出身于行省的

图拉真、哈德良的风貌，也与出身于首都的公元4世纪的这位圣人千差万别。即使是君临天下的领袖，其容貌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公元4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版图

君士坦丁王朝族系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副帝 293—
正帝 305—306 年（病死）
海伦娜
（小酒馆老板之女）
狄奥多拉
（皇女）
米内维娜
君士坦丁（大帝）
皇帝 307—337 年
（病死）
法乌斯塔
326 年谋杀
君士坦提娜
李锡尼
君士坦丁的最后一个对手，324 年被谋杀
克里斯普斯
副帝 317—326 年
（处死）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337 年谋杀（肃清）
女
加拉
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337 年谋杀（肃清）
巴西丽娜
君士坦丁二世
副帝 317—
正帝 337—340 年（被杀）
优西比娅
君士坦提乌斯
副帝 324—
正帝 337—361 年（病死）
芙斯汀娜
君士坦斯
副帝 333—
正帝 337—350 年（被杀）
黑框内人物为皇帝
黑体为男性
宋体为女性
德鲁马特乌斯
副帝 335—33 年
谋杀（肃清）
汉尼拔利阿努斯
副帝 335—337 年
谋杀（肃清）
君士坦提娜
加卢斯
副帝 351—354 年
（处死）
尤里安
（叛教者）
海伦娜
副帝 335—
正帝 361—363 年
（战死或被谋杀）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公元337—361年在位）

铲除异己

第一位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大帝”（magnus）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Ⅰ Magnus）死于公元337年5月22日。当时，他亲自率军参加波斯战争，离开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渡海到达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之后不久，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享年62岁。君士坦丁的在位时间，如果从他早年争夺皇位时期算起，长达30年；从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统治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开始计算，也有25年。而他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Licinius），成为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则有13年。可以说君士坦丁是在实现了他一生所有的野心之后离开了人世。因此，世间对他的死亡没有产生疑问，更没有阴谋、暗杀之类的传闻。

不算他最初负责军务的“恺撒”（副帝）时代，从他一手掌握了帝国军政两大权力，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正帝）的公元312年开始，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超过了以政权稳固而著名的五贤帝。在历代的罗马皇帝中，他的在位时间仅次于在位40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间的长久，意味着其制定的政策大多都能在其生前得到贯彻落实，想来君士坦丁应该是死而无憾。至于同大国波斯的战争，由于还没有正式开战，可以随时中止。当时的形势并非因受到波斯国王的攻击而不得不战，中止战争并不会给罗马带来不利。换言之，波斯王国对公元337年的罗马帝国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是期望开战的罗马因为最高司令官的死亡，将战争延期罢了。

虽然君士坦丁在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死亡，却没有给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印象。罗马帝国西起泰晤士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沿莱茵河、多瑙河，南到撒哈拉大沙漠的辽阔疆土，在他生前始终维

君士坦丁大帝

持着统一的局面。即便不是基督徒，罗马市民大概也不会反对授予他“大帝”的尊称。依照传统，他应该被授予“神君”（divus）的称号，然而一神教的基督教，非但不承认其他神灵，甚至就连近似神的存在也不认同，因此君士坦丁的尊称只能改为与英文great同义的magnus（大帝）。顺便提一笔，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遗体没有以罗马传统的方式火葬，而是遵照基督教的习惯进行了土葬。

对于最高执政者而言，其任期中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决定接班人，以及为权力平稳交接铺平道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对此也作了详细的部署。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已经将广阔的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域，选定了各个区域负责防卫与治理的统治者，并将此决定公之于世。这是君士坦丁为了避免在自己身后发生继承权之争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他自己为了铲除对手，消耗了大半的壮年时期，个人的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内乱必须掐灭在萌芽期。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当年点燃内乱之火的，正是青年时期就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本人。

凭借着过人的本领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君士坦丁，膝下有四个亲生的儿子。不过，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虽然获得了“恺撒”（副帝）的地位，却因为与继母、皇后法乌斯塔（Fausta）乱伦私通，被君士坦丁处死。同时被处死的法乌斯塔皇后生前与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年龄顺序，依次是君士坦丁二世（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nus）、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Iulius Constantius）、君士坦斯（Flavius Julius Constans）。君士坦丁去世时，

他们分别是20岁、19岁和17岁，当时都已经拥有“恺撒”的称号。如果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交给自己的儿子们，似乎也很合乎常理，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ne Chlorus）在成为“副帝”之后，与第一任妻子、小酒馆老板之女海伦娜离婚，与时任“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狄奥多拉再婚。对于君士坦丁而言，继母狄奥多拉所生的孩子，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君士坦丁去世时，他的两位异母弟弟还健在，并且各自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这四个儿子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属于堂兄弟关系。

按照年龄的长幼，这四位堂兄弟分别是德鲁马特乌斯（Dalmatius）、汉尼拔利阿努斯（Hannibalianus）、加卢斯（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us Gallus）和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两位年长兄弟的具体年龄不详，似乎比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稍大一些，年幼的加卢斯和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去世时，分别是12岁和6岁。

君士坦丁在去世前两年的公元335年，授予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这意味着他指定的治理以及保卫帝国的继承人，除了三个亲生儿子，还加上了两个侄子，一共五个人。引发内乱的原因，并非一定是继承人本人的野心所致，很多情况下，是被那些反对现有势力或对现状心存不满的人当成了煽动的幌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两人的“皇室血统”，比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更加纯正，君士坦丁大帝将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想必是想借此消灭内讧的可能性。在君士坦丁去世的前两年，他们已经在各自的地区，履行起统治者的职责。五位继承人各自所拥有的地域见下：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高卢、西班牙、不列颠。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三子君士坦斯——意大利本土、潘诺尼亚、北非。

侄子德鲁马特乌斯——达契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

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王国。

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位人事图

当时的亚美尼亚是由亲罗马派的国王所统治的独立王国。君士坦丁大帝远征波斯的真正用意，除了要战胜波斯王国，强化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之外，或许还希望彻底掌控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因为波斯王国对这个地区觊觎已久，这里经常成为罗马与波斯战争的导火线。

如果能够实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背后的亚美尼亚王国一体化，那么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地区就尽在罗马掌控之下。按照现代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是约旦、叙利亚以及土耳其三国，从地图上看，正好是从西、北两面包围住伊拉克的地形。君士坦丁

大帝打算在这项战略目标实现之后，将这个地区交给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为了加深与这位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尼拔利阿努斯。这样，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不仅是罗马皇帝的侄子，还是他的女婿。

以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安排的继位者人事。这项计划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大帝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皇位可以和平地转交到继承人儿子以及侄子们的手里。

大帝的遗体运回到帝都，大约是在5月底6月初前后。他是在5月22日去世的，从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因此，运送过程应该不需要花费太久的时间。尼科米底亚和君士坦丁堡都是临海城市，走海路似乎也很合情合理。不过，皇帝死后依然是光环人物，既然生前出行都要威风凛凛地率领着大批的军队，那么死后的葬礼势必也会声势浩大。所以，我觉得，运送大帝的遗体不太会选择便利但不引人注目的海路，而是选择陆路，穿越街道、村镇，行进在川流不息的大路上，引来众人的注目。如果是用牛车陆路运送，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

据史料推测，君士坦丁的葬礼是在6月初举行的，自然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除了从安条克赶回来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其他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出席。那时，长子君士坦丁二世正在莱茵河附近的特里尔，小儿子君士坦斯在多瑙河一带，由于距离君士坦丁堡路途遥远，又时值夏季，不宜拖得太久，最终，只有以下五位亲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大帝壮观的葬礼上：

三位拥有“恺撒”称号、身兼副帝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年经人——大帝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侄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

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生父，即已故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的胞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他是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的父亲。两个孩子可能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出席葬礼。

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没有能够凭借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而获得显要的公职或者担当过重要的国务，似乎是一直待在皇宫里虚度人生。

按照惯例，先帝的葬礼结束之后，元老院就应该立即作出决议，将“恺撒”升格为“奥古斯都”，即副帝晋升为正帝。然而，不知何故，元老院没有在公元337年6月通过这个决议。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正帝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就在这个时候，帝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惨案。由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所以无法确定惨案发生的具体时间，根据推测大约在7月的某一天。

除了君士坦提乌斯之外，出席葬礼的皇室成员全部遇害。大帝的其他亲属中活下来的只有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或许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让凶手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这场惨案的幕后凶手下令要保全两个孩子的性命。两位少年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躲过一劫，其中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除了大帝的血亲，他生前的亲信也成了这场惨案的牺牲者，近卫军团长官阿布拉维乌斯便是其中一人。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近卫军团长官虽属军职，实际却担任着首相的职务，权力次于皇帝。与阿布拉维乌斯同时遇难的，还有他手下的不少高官。

众多的位高权重者一夜之间死于非命，按常理判断，凶手必定在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挥系统，皇宫内的屠杀行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然而，这场发生在帝国首都的皇宫内、死亡人数据说超过50人的血

案，最终能够确认身份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已。事情究竟发生在何月何日，直接行凶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概不明。既然连这些基本的情况都不明不白，当然就更别想了解谁是真正的幕后主谋。即使众人心中存疑，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噤声不语，更不敢留下只字片语。

包括两位副帝在内的大帝的四位亲属以及众多的重臣遭到了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终究不能够装聋作哑。毕竟，案发当日他人在现场的事实，众所周知。于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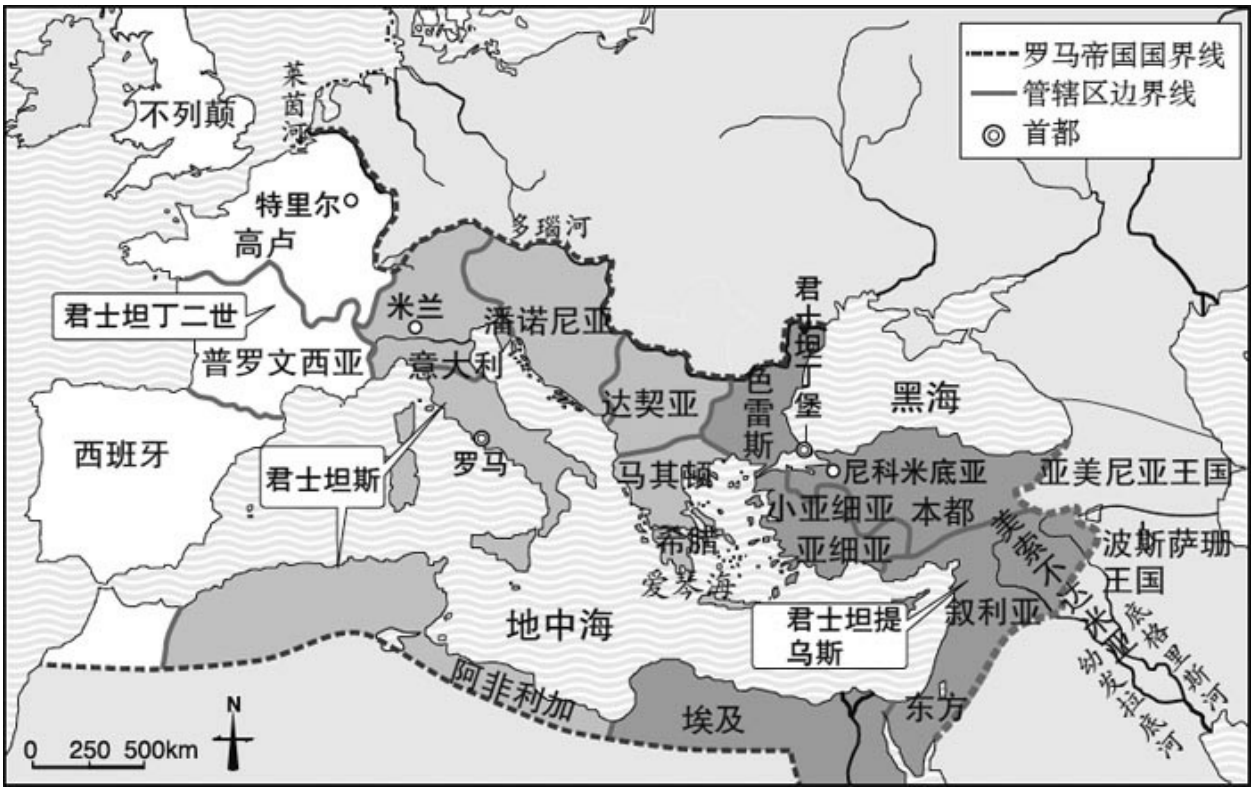
声明表示，虽然他本人案发时在皇宫，但与此次事件毫无关系。凶手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发动了这场暗杀，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皇位应该由先帝的三个亲生儿子来继承。

自打一开始，大家就认定大屠杀的行凶者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但是这些人的姓名从未被公开，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灾难中幸免的12岁和6岁的两位少年，托付给了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晋升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优西比乌（Eusebius），正是他为临终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受洗仪式。优西比乌是与三位一体派对立的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将两位王子交给他，并不是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而是要他监视这两位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优西比乌日后对于两位王子的管教异常严格，这种执着似乎不像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而是来自他个人对基督上帝虔诚的信仰。

尽管皇室半数的成员以及众多的高官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世间的反应却表现得异常迟缓，准确地说是沉默。仿佛巨大的岩石落入湖中，却没有溅起半点水花，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事件之后需要一段冷静期，让那些双手沾满了鲜血、处于异常亢奋状态的刽子手逐渐恢复平静。尤其是这些人原本就以杀人为业，为了避免他们激烈的情绪进一步上扬而导致局势失控，必须加以严格管制。这对幕后主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事后处理。

血案的善后具体用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估计在一个月左右。因为9月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了帝都，前往潘诺尼亚行省，他的胞弟君士坦斯在那里等候他。同时，长兄君士坦丁二世也从高卢出发，来到这个濒临多瑙河中游的地区，这里军事基地的官兵人数远远超过了驻守帝都的部队人数。三位亲兄弟在大帝死后，首次展开了会谈。

被官方认定为由士官们自作主张杀死的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三兄弟经过磋商之后重新将它们分割。原本属于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防线，处于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如上图所示，被称为达契亚的多瑙河南岸以及南方的马其顿、希腊，划分到三弟君士坦斯的管辖之下；多瑙河汇入黑海的一带区域则归次子君士坦提乌斯所有。而原本属于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理所当然地被君士坦提乌斯所吞并。



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分别所属的帝国领土

三兄弟在领土分割问题上达成协议之后，立即派人携带文书，前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要求元老院承认他们从“恺撒”晋升为“奥古斯都”，即从副帝升为正帝的资格。两帝都的元老院毫无悬念地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

就这样，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位嫡子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是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他的儿子们治国的开始。

帝国三分

卓越不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皇位。在经历了君士坦丁30年的统治之后，国家交给了年龄分别为20岁、19岁以及17岁的三个年轻人，自然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到忐忑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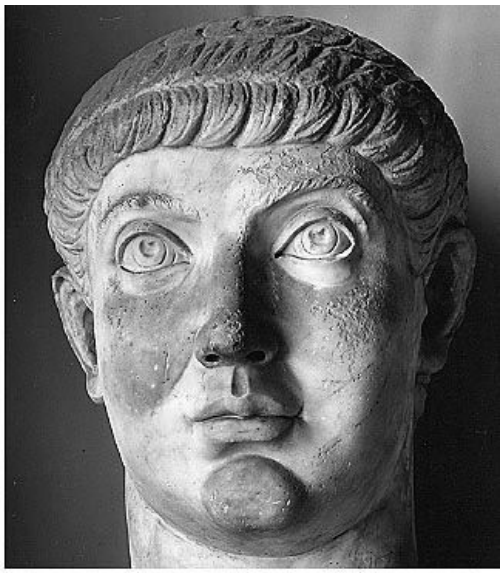
“皇帝”一词来源于军事用语“凯旋将军”（Imperator）。由此可见，罗马皇帝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言之，就是抵御外敌，以防国土遭受侵略。然而，继承了皇位、正式成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三兄弟都没有上过战场。对此或许可以解释说，他们刚到入伍的年龄，或者是在父皇君士坦丁大帝强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发生过足以威胁帝国安全的战争。

话说回来，将军的战绩通常取决于他在率兵打仗前建立起的人际关系。而探究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往往有助于了解其成年后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儿子，他们的私生活却完全不为人所知。不知道这是不是帝国末期的一个特征：对神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对人的兴趣却日益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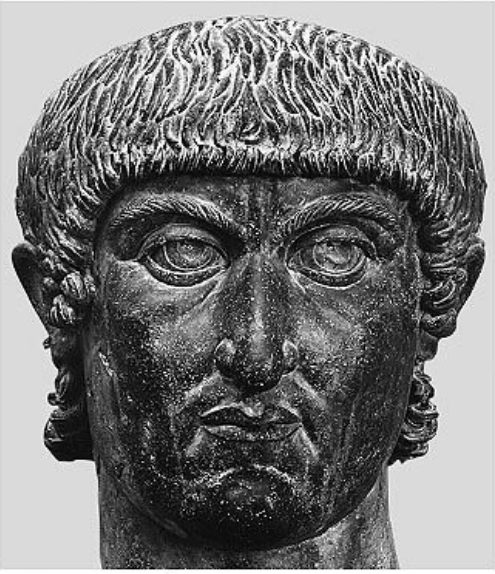
这三位同胞兄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非常之不同。长兄君士坦丁二世，在这方面完全不用心思，相反，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又用心过度，他甚至偏执地认为一旦做了皇帝，就是与最亲近的人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

离。他的性格谨慎但阴郁。而小儿子君士坦斯，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子弟的做派，一起打猎、吃喝聚会的玩伴，就是这位17岁阳光少年的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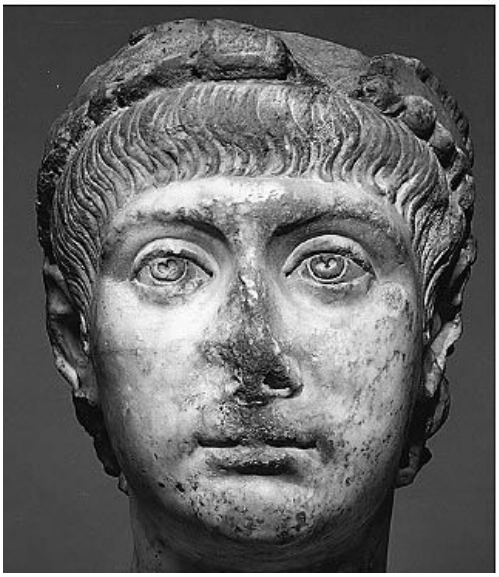
要说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没有军事上的实际成绩之外，还有另外两点：首先，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其次，他们都是在宦官把持的宫廷中成长的。“宦官”希腊语称为Eunuchus，他们不仅是用来伺候统治者的妻妾，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被认为没有正常男人的野心，所以还是放在统治者身边的理想人选。重用宦官原本是东方专制君主国家的习俗，西方的罗马国家，不消说共和时代，就是进入了元首制时代，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



三子君士坦斯

然而，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代开始，皇帝的作风趋向于东方君主，皇宫内开始出现了宦官。不过，当时宦官的职权还仅限于类似官邸内的管家，直到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他们的权力才开始变大。从戴克里先皇帝开始的后期帝国，皇帝刻意与臣子拉开距离。而能够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为数不多的人物就是宦官，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得到提升。

宦官们并没有放弃之前作为管家的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越是接近权力者，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集团和组织机构。这意味着，于公于私原本都应该属于皇帝的皇宫内，如今却布满了宦官的势力。

这股宦官势力，较之其他的小圈子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喜怒不言于表，但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健全男人的仇恨。这种情绪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与憎恨互为表里的嫉妒情绪。嫉妒容易演变为阴谋，为了自保而建立起的排他性组织，最终往往会变成间谍组织。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如果对士兵的不满掉以轻心，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在公元4世纪，皇帝们则要时常提防着宦官们的嫉妒之心。日趋东方化的皇宫，没有宦官会陷入瘫痪，但过度听信他们的谗言，又可能会将国家的栋梁之才送上刑场。

一人退场

公元337年9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由三位“奥古斯都”（正帝）决定了分治帝国的方针。由于这是亲兄弟之间的协议，所以大家都认为能够持续长久。何况，当初会谈的气氛平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可是在议席上爽快答应的一个人，不久之后就开始起了疑心，感觉自己吃了

亏。这种事后反悔型的人，身边如果有人能及时地给予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被害妄想，那么事情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惜，君士坦丁二世的身边没有这样能够作出冷静判断的亲信，或者是因为这位才20岁出头、政治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过度听信了宦官们的谗言。

兄弟三人的会谈结束了，从多瑙河中游一带回到莱茵河地区没过多久，长兄君士坦丁二世满脑子全是受骗上当的想法。二弟君士坦提乌斯不仅全盘收获了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而且还将德鲁马特乌斯所管辖的色雷斯也占为己有。三弟君士坦斯则接收了包括达契亚、马其顿以及希腊在内的德鲁马特乌斯所属的半数以上的区域，扩大了原本的势力范围。而君士坦丁二世作为长兄，却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让他深感不满。按理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应该在事情决定之前提出。不过，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位长子的性格似乎爱事后反悔。他向三弟提出了割让北非的要求，被君士坦斯一口拒绝。此刻，唯一能够介入兄弟之争的君士坦提乌斯又远在东方，波斯王国利用大帝死亡之际，正频频地发起挑衅，形势不容他返回西方调解兄弟间的纠纷。

于是，大哥与小弟之间就北非归属权问题争吵不断，小弟对大哥的要求好像没有完全当真，态度上有些敷衍了事，大哥终于忍耐不住了。

君士坦丁二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入了意大利北部。这场军事行动尽管利用了君士坦斯前往达契亚、人不在军营的好机会，却没有在事前作好周密的部署。最初军队轻松地穿越了北意大利，但在前往君

士坦斯的大本营潘诺尼亚的途中，遭到了君士坦斯部队的阻击。

这场发生在阿奎莱亚（Aquileia）附近的战斗，很快就决出了胜负。打了败仗的士兵四处逃散，无人护驾成了光杆司令的君士坦丁二世被俘，像一名小卒般地遭到杀害，遗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人在达契亚的君士坦斯，是在事后才从手下那里得知了长兄率兵袭击以及战败身亡的消息。君士坦丁大帝一世的长子，就这样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年仅23岁。由于没有找到遗体，所以身后连墓碑都没有一块。他没有接受过洗礼，基督教教会对他的死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君士坦丁二世死于公元340年，与他父皇的辞世仅隔了三年。

兄弟二人分治帝国

君士坦丁二世死后，有关他所属区域的分割，剩下的两兄弟竟然没有经过协商，三弟君士坦斯名正言顺般地接收了曾经属于长兄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这位20岁的年轻人，如上图所示，占有了罗马帝

国三分之二的疆域。作为二哥的君士坦提乌斯容忍了弟弟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甚至没有作出口头上的抗议。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全力以赴对付步步紧逼的波斯国王，没有余暇去处理帝国西部疆土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避免亲兄弟之间的纷争。虽然不是出于单纯的亲情，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维持父亲留下的帝国的稳定，不断重复上演手足相残的惨剧，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轻率地挑起战争的长兄，在没有将整个帝国的西部卷入长期内战之前就离开人世，站在维持帝国安定的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而失去了统领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的全体军政要员，也非常不可思议地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新主子君士坦斯。

自此，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归属于君士坦斯，余下的三分之一由君士坦提乌斯管辖。这种局面从公元340年至公元350年，维持了10年，继位时年仅20岁的君士坦斯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

归属君士坦斯的帝国领土，按照现代地理位置，涵盖了西欧、中欧以至北非。一个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竟然能够统治以及保卫着如此广大的地域，何况其中还包括了经常会遭受北方蛮族侵略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这一点不得不让人钦佩。

君士坦斯并不像那些古代名将才华横溢，但在与入侵的蛮族的对抗中，他还是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其父皇君士坦丁大帝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三兄弟中继承了父亲这份才华的，似乎只有君士坦斯。

包括了属于危险地带的莱茵河以及多瑙河在内的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一位非军事天才的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土安全之所以能维持10年之久，其实另有原因。君士坦斯的手下有一批优秀的将领，这些人都是先帝君士坦丁留下的遗产。大帝在选拔军事人才上，彻底贯彻了实力主义。不仅对罗马人不问社会阶层，即便来自蛮族，同样也有晋升将军的机会。

这项政策的执行，使得罗马军团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那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蛮族出身的将领所占。当时的罗马军队，延续了元首制时代的政策，异族出身的军人，只要晋升为大队长，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若是掌握了罗马军的公用语拉丁语，这些异族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将军了。

但是，与公元1、2世纪时罗马军中那些行省出身的将领相比，公元4世纪的这些蛮族出身的军官，没有强烈的归属罗马帝国的意识。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仍然心系故乡。莱茵河以及多瑙河的对岸，住着他们少年时的伙伴，阻击这些时常渡河入侵的同胞，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往往要比那些纯正的罗马人更加勇猛善战。

如果将这些蛮族出身的官兵算做一类的话，那么投入罗马皇帝麾下的蛮族军人还有另外一类。前者属于独狼般的独行侠，后者则是由族长率领整个部落，成了罗马军团的雇佣军。他们与罗马皇帝签下契约，在罗马军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对罗马军团而言，这些人增强了军队的实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这些人在为罗马军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由于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集体行动，如果不以明确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加入罗马军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一旦他们集体投向敌营，十有八九会导致罗马军失利。

也许有人会不解，在元首制时代，除了行省出身的将官，罗马军中不是同样也有来自蛮族的士兵吗？他们的情况与当下有何不同呢？其实，在那个时代，罗马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向投诚的异族人，提供各种他们乐于接受的条件。

第一，罗马军实力强大。虽然不能说百战百胜，但获胜的几率很高，这意味着军人活着服完25年兵役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主力军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担任。行省以及蛮族出身的军人，只作为辅助兵力。所以，即使这些异族人叛变投靠敌方，也不会

给罗马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作为保卫帝国的报酬，向异族军人颁发的罗马公民权，在当时有着相当的魅力。

军团规定，由行省民组成的辅助部队的大队长可以列席作战会议。或许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需要相应的身份，所以，在晋升大队长的同时，立刻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就算是一名下等士兵，在服完25年的兵役退伍之后，同样也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尽管后来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修改了政策，向除奴隶之外的帝国全境所有的自由民颁发了罗马公民权，不过，这项唯独军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一直延续到公元212年。对于行省或蛮族出身的人而言，仅仅是不用再缴纳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这一项优惠，罗马公民权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罗马在共和时代，已经是“公民法”与“外国人法”并立的国家。公民权相当于现代人的国籍，因此外国人一旦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与世代拥有罗马国籍的本地人拥有平等的地位。倘若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可以敲开元老院的大门，成为其中的一员。

至于第四点好处，是退伍军人回归平民之后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这个保障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在古代历史上唯有罗马帝国实施的军人退役金制度。即便只是一介士卒，退伍时一样可以以现金或土地的方式获得退伍费，这项制度既解决了退伍军人可能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人道问题，又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然而，元首制时代充分发挥了功效的以上四大优势，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完全适得其反。

其一，罗马军队获胜的机会很少。换句话说，打败仗已成为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士兵战死或被俘的风险增大。

其二，行省或蛮族出身的军人成了主力军。

其三，罗马公民权不再限于有特定资格的人，帝国境内的出生者人人皆有，因此很少会有人为了获取公民权而冒死参军。

其四，由于退役金制度的瓦解，军人只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军中以获取俸禄。正规军20年的兵役期，已经成为历史旧话。当然，还是会出现一部分被淘汰、不得不退役的军人，这些人最终的出路就是作奸犯科，成为社会的败类。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罗马军的状况。率领这样的军队作战，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只要稍有闪失，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人的退场

公元350年，君士坦丁大帝留下的帝国在长子死后，由次子和小儿子分治的局面，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此时，负责管辖帝国东部的二哥君士坦提乌斯32岁，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小弟君士坦斯也已经30岁。这10年，君士坦提乌斯是在应付波斯王国不断的攻击中匆匆度过的。而统治西方的君士坦斯，为击退北方蛮族周而复始的挑衅，几乎消耗了所有的精力。君士坦斯将这10年的战果归功于他个人的军事才华，得意忘形之际，犯下了把内政交给他人管理的大错。所谓的他人，就是由宦官们结成的黑暗势力，他们像蜘蛛网一般布满皇宫。在君士坦斯统治的地区，征税者的利益不断膨胀，纳税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个地区可不是什么弹丸之地，而是占据了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土。

留意到民众不满和绝望情绪的，是这10年来在君士坦斯皇帝麾下与蛮族人打仗、同样也是来自异族的将领。在罗马军中服役的异族军人中，他们属于第一类，即很早就与自己的部落断绝了关系，天涯孤独，

无牵无挂。他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同胞厮杀，但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官完全无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虽然无法考证这些蛮族将官对皇帝的不满，是在何时爆发、又是如何酝酿而成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君士坦斯手下蛮族出身的将领，同时也是主谋者的马格嫩提乌斯（Flavius Magnus Magnentius）在决定起兵造反时，得到了手下的支持。谋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由谁来接替皇位。马格嫩提乌斯似乎预料到，如果由蛮族出身的他本人继位，会伤害罗马民众的感情，因此他挑选了意大利出身、一直在君士坦斯手下担任行政官僚的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作为接位人。这个人好像世代都是罗马公民。

君士坦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击退来袭的蛮族，因此不会长久地驻扎在一地。一旦发现敌情，必须立即开拔。所以，军队长年累月不停地在转换战场。公元350年，君士坦斯率领的队伍由里昂前往巴黎，向北行进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中途在欧坦宿营休息。

那一夜，不知是由哪一位出面招待，皇帝手下的所有将官都收到了宴会的邀请。然而，宴席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的长官——君士坦斯皇帝的身影。大帝的这位30岁的小儿子喜爱打猎，每当部队换防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去营地附近的山中寻找猎物。众人同食共饮的宴会原本是与手下进行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君士坦斯优先选择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继承父位13年，屡屡击败蛮族发起的大规模侵略，也许是这些功绩让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放松了警惕。

废除君士坦斯、拥立马塞利努斯继位，好像就是在那晚的宴会上决定的。宴会侍应的一个小奴隶听到将领们的对话，偷偷溜出会场，向君士坦斯作了通报。

得知消息的君士坦斯连夜逃跑。莱茵河附近的基地有其他的军团宿营，按理说他应该往东北方向逃，可不知为何他却选择了朝西南走。或

许他打算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沿着西班牙行省一路南下，渡过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北非，然后以富饶的北非作为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

可是，君士坦斯在逃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脚下时，被一队骑兵追上，骑兵队长大概接到了格杀勿论的指令，君士坦斯在被俘的同时遭到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山野中，成了野狗的食饵，这就是统治了帝国三分之二领土10年之久的罗马皇帝的最终命运。

10年前兄长被杀，10年后小弟重蹈覆辙。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如今只有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还在人世。罗马历史上大多时期是由一位皇帝统治整个帝国，所以目前的状况也可以看做是恢复了常态。君士坦提乌斯的父皇，在位最后的13年，也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奥古斯都（正帝）。

刚开始，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也打算独自一人担当起治理及保卫整个帝国的大任。可是，形势又不允许他在中东和西欧同时树敌。一面与波斯王国开战，一面又要歼灭欧洲的皇位篡权者，这绝对是无能为力。就算是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都尽量避免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同时开战，何况公元4世纪的罗马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君士坦提乌斯决定向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or）提出休战，先解决大权被蛮族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所操控的帝国西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蛮族人的叛乱，帝国西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毫无疑问地会被日耳曼人占领。那么，大帝留下的罗马帝国在他儿子这一代就不得不失去西方的版图，只能屈尊为东罗马帝国。

我认为君士坦提乌斯优先解决西方问题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就像考试，先从那些易解的题目开始答起。对于公元350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言，虽然同时面临东、西两面的敌人，但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君士坦斯

首先，东方之敌波斯王国虽然不断挑衅，却没有进一步侵略到罗马境内。两国开战的战场，不是在长久以来作为罗马帝国与波斯王国疆界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而是在位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附近。

相反，西方的敌人则是皇帝的手下，大多是蛮族出身的将领，因此是渗透在帝国内部的敌人，铲除他们是首要的任务。

其次是战场的所在地。仗是在对方的地盘上打，还是在本国境内，情况大不相同。如果想解决波斯问题，势必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向位于其中部的首都发起进攻，这意味着战场在敌方境内。与之相比，欧洲本土有着完整的后勤供给系统，在国内打仗拥有相对的优势。

沙普尔二世

还有一点是君士坦提乌斯作为皇帝拥有的优势，那就是皇帝有权以叛国罪惩处杀害正统皇帝君士坦斯的谋权篡位者，加上叛乱者是军队的将官，所以还可以对他们再追加一条反叛最高司令官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时触犯了帝国法律的刑事法和军事法。因此，皇帝作为帝国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执行者，率军西进讨伐叛逆者的行为名正言顺，足以获得帝国民众的认可。民众认可等同于支持。这代表战争期间皇帝的军队在军粮补给等各方面都不会有后顾之忧。

出乎意料的是，波斯国王沙普尔爽快地答应了君士坦提乌斯提出的停战协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波斯军队向罗马最东端的城塞尼西比斯（Nisibis）发起的进攻接连失败，让亲自指挥战斗的沙普尔颜面扫地。古罗马时代的尼西比斯，现今是与叙利亚国境接壤的土耳其的努塞宾（Nusaybin）。公元338年，波斯军队曾经对这个城市发起了连续60天的进攻，之后在公元346年用了80天的时间以及眼下的公元350年消耗了百日以上，每每以失败告终。这主要归功于罗马军的顽强抵抗，然而，在波斯方面看来，12年间发起三次进攻，都无法攻破尼西比斯这样一个小城塞，实属无能，沙普尔在宫廷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战场失利的同时，波斯王国的东北部又遭到蛮族的入境。这个地区如今位于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如果罗马的边境多瑙河流域遭到蛮族的大举侵略，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人在罗马还是在君士坦丁堡，都不能坐视不理。同样，波斯国王沙普尔也无法对设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在今伊拉克境内）的首都的危机袖手旁观。特别是像波斯王国那种君主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心怀不满的臣子们经常会利用外敌入侵的机会推翻现有的政权。因此对于波斯国王而言，对付侵略国土的北方蛮族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皇帝提出的停战协议，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停战协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签署，正因为双方利害关系一致。这样，罗马皇帝无须担心东方的战情，集中精力对付西方的敌人，而波斯国王也可以心无旁骛地迎战来自北方的蛮族。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军西进的消息，也传到了高卢的僭主马格嫩提乌斯那里。最初他考虑到自己是蛮族出身，恐怕引发民众的不满，推举了罗马的行政官僚马塞利努斯继位。可不久之后，这位傀儡皇帝便销声匿迹，最终还是由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登基称帝。马格嫩提乌斯称帝之后，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驻守在伊利里亚防卫多瑙河中部流域的军团，得知蛮族人称帝大为不满，进而也拥立了自己的司令官维特

拉尼奥（Vetranio）为王。原本君士坦斯一人独占的地区，因此出现了两帝并立的情形。对形势深感不安的马格嫩提乌斯，向正朝西压进的君士坦提乌斯提出了和谈的建议。

马格嫩提乌斯提出的条件是，任命他本人为“恺撒”（副帝），负责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行省的统治和防卫。作为交换，他的军队绝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扩张。

君士坦提乌斯将马格嫩提乌斯派来谈判的使节团成员统统关进了大牢，只留下一个人，叫他把拒绝谈判的答复带回给马格嫩提乌斯。第二天，君士坦提乌斯召集重臣，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表示拒绝谈判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君士坦提乌斯的这种手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托梦”曾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最擅长的伎俩。

32岁的皇帝是这样说的：

> 昨晚就寝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双手抱着我惨遭杀害的弟弟君士坦斯，用他那熟悉的声音要求我，向杀害他儿子的人复仇，不得向任何人割让帝国的领土。他说，只要我听从父皇的忠告，他就会保佑我获得最后的胜利和不朽的荣光，戴上正义的冠冕。

在场的重臣们无人表示异议。既然是君士坦丁大帝托梦传达旨意，自然无法抗拒。君士坦丁大帝辞世13年，其荣威依然不减，而他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君士坦提乌斯虽然不打算与叛军妥协，但也没有立即出兵反击。他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盘踞在多瑙河中游地带，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巴尔干的地区。这里在罗马时代盛产精兵猛将，君士坦丁大帝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另一个敌人尽管有着蛮族血统，但他目前所拥有的资源

足够弥补他先天的不足。这位马格嫩提乌斯占据了高卢、不列颠、西班牙，这些是帝国疆域中罗马化历史进程最长、最富裕的行省。再加上拥护他的官兵大多也来自蛮族，很容易吸引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原蛮族人，或者边境附近的异族部落加入，在兵源上也占有优势。可以说，马格嫩提乌斯手中握有的兵力，完全不输给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马格嫩提乌斯的部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公元4世纪的高卢已经成为一个饱受蛮族蹂躏的地区，既有渡过莱茵河从东而来的敌人，也有从北面的北海口逆流而上的。因此，负责这个地区防守的军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拥有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在遭到君士坦提乌斯拒绝和谈之后，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开战。他一声令下，军队即刻投入了备战状态，只等第二年，即公元351年开春之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发起进攻。

如果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与在伊利里亚称帝的维特拉尼奥联手的话，君士坦提乌斯几乎没有胜算。因此，他决定先解决掉其中一个。他避开军事冲突，选择了外交谈判的方式。他准备谈判的对象是维特拉尼奥，此人具体年龄不详，能确定的是当时他已是一位年迈的老将。维特拉尼奥大半的军旅生涯似乎是在君士坦丁大帝麾下度过，因此，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再一次利用了父皇的影响力。

君士坦提乌斯向维特拉尼奥提出了直接见面的请求。两人会谈的场所选在古罗马时代称为撒尔底迦（Sardic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phia）。老将维特拉尼奥率领2万名骑兵以及数量超过2万人的步兵，总计4万多人的军队出现在索非亚。另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也带着直系部队抵达会场。然而，庞大的军队不过是壮大声势的表面形式，首脑间真正的会谈，通常都是在桌面下展开。不知道私下的交涉中，君士坦提乌斯是否又言及了大帝托梦的内容，总之，老将很快就表明了态度，只要保证他引退后安全地生活，他愿意将军队完整地交还给君士坦提乌斯。

第二天早上，双方的军队聚集于索非亚的郊外，象征性地上演了一场集会仪式。首先由年轻的皇帝向老将喊话，要求他停止反抗皇帝的行为。紧接着，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们不停地欢呼、鼓掌，以示支持。受到气氛的感染，维特拉尼奥一方的士兵也开始加入呐喊的行列。见此情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几个士兵高呼口号，带动全场同声高呼：

“誓死打倒篡位逆贼！祝大帝之子胜利、万岁！我们愿在他的旗帜之下，奋勇杀敌！”

等到场面到达最高潮时，老将维特拉尼奥这才走到前方，取下头戴的王冠，放在了君士坦提乌斯的脚下。

集会前还拥戴维特拉尼奥皇帝的伊利里亚的4万名驻军，仪式一结束就并入了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从那以后，维特拉尼奥隐居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镇普鲁萨（Prusa），在享受了6年的安逸生活之后离开了人世。

君士坦提乌斯解决了一个敌人，还剩下另一个更强势的对手，这个人也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马格嫩提乌斯似乎下定了决心，要与君士坦提乌斯死战到底。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德森提乌斯（Decentius）为“恺撒”（副帝），自封为“奥古斯都”（正帝）。另外，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也与这位蛮族出身的篡位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君士坦提娜在丈夫被杀之后，移居罗马，她可能是利用君士坦提乌斯远在巴尔干地区的机会，与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频频接触。

君士坦提娜的丈夫是原本要成为亚美尼亚国王的汉尼拔利阿努斯，在13年前的皇宫血案中遭到杀害。丈夫死后，君士坦提娜一直过着寡居的生活。她对杀害了丈夫、让她失去了亚美尼亚王后宝座的兄长，一直

充满了仇恨。可能她认为嫁给称帝的马格嫩提乌斯，就可以成为帝国西部统治者的妻子，得到作为大帝之女原本应有的地位。至于她准备再嫁的这个男人，是不是杀害她另一位兄长君士坦斯的凶手，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对于君士坦提娜的示好，马格嫩提乌斯的态度显得十分积极。他非常清楚，自己即便称帝，毕竟出身不佳。若能与君士坦丁大帝的亲生女儿结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利益。而对于君士坦提乌斯而言，他必须在妹妹的计谋得逞之前，歼灭马格嫩提乌斯。但是，这时候的君士坦提乌斯，又面临着另一个让他烦恼的问题。

没人能够保证波斯国王沙普尔会坚守停战协议。按照以往的经验，一旦波斯国王成功地击退了从东北方入侵的蛮族，他的注意力势必又会转回西方。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那么驻守东部的罗马军，在最高司令官缺席的情况下，很难说能抵抗得住波斯军队的攻击。而西部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又气焰高涨，不知何时才能决出胜负。东部的安全问题让君士坦提乌斯始终放心不下。

终于，君士坦提乌斯决定要任命“恺撒”。他打算派副帝驻守叙利亚的安条克，负责监视波斯王国的动向，治理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土。如果东部有副帝把持，那么他这个正帝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西部的敌人。

可这个决定又让另一个新的问题浮上台面：帝国目前没有适当的副帝人选。

副帝加卢斯

公元35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中，唯一在世的就剩下年届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这位人物给我的印象，用一句

话来形容，就是让人啼笑皆非。他的确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不过，这似乎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性格。他做事毛毛糙糙，顾头不顾尾。偏偏这又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所以才会让人啼笑皆非。在付诸行动之前，他通常会考虑再三，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有违初衷。到头来，他不得不为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而不停地补救。追溯此人的一生，真是苦笑连连。

由于没有确凿的历史资料，研究人员通常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从历史研究，而是从犯罪调查的角度分析，大帝死后不久，血洗皇宫的幕后凶手，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大帝的这位当时20岁的次子，可能以为只要除掉两位堂兄弟，帝国就可以属于自己亲兄弟三人，所以才会大开杀戒。但结果又如何呢？兄弟三人坐拥天下的局势维持了不到三年，长兄便死于非命，10年之后小弟又遭杀身之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留在人世。

如果父亲死后，他没有杀害两位堂兄弟的话，他们中的一人汉尼拔利阿努斯就会成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那么当他在西部讨伐马格嫩提乌斯时，汉尼拔利阿努斯势必会代替他，担当起统治东部领土的职责。汉尼拔利阿努斯管辖下的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美尼亚王国直接面临波斯王国的威胁，因此，击败波斯的最大获利者不是管辖整个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而是汉尼拔利阿努斯。

同样，如果德鲁马特乌斯没有成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处理效仿马格嫩提乌斯称帝的维特拉尼奥，或许就不需要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马。因为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分给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就在维特拉尼奥的军事基地的边上。

君士坦提乌斯杀了这两位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格来与他分担治国大业的堂兄弟。结果，他为了全力对付西方的敌人，不得不与波斯国王缔结休战协议。其实当时的战况有利于罗马，对于士气高涨的罗马军和当地民众而言，中途停战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决定。

但是，放弃了胜利在望的战果，并不等于波斯王国就一定会信守协议。如果皇帝及其军队长期滞留西部，免不了会造成无视东部的印象。杀了两位堂兄弟，又失去了两位亲兄弟的君士坦提乌斯左右为难，偏偏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膝下无子，就算是选一位挂名的“恺撒”，也找不到一位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一筹莫展的君士坦提乌斯终于想到了他要找的人。在他父亲死后遭到肃清的君士坦丁家族中，有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两位“恺撒”，以及他们的父亲和叔父。叔父的两位年幼的儿子在那场灾难中侥幸存活，他们后来被送往邻近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山区，在基督教主教的严格看管下，过着实为囚禁的生活。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关心过这两位少年，看来他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才想起了他们的存在。他杀了他们的父亲，现在却不得不提拔他们中的一人为自己的副手，君士坦提乌斯作出这个决定时，心情一定是百般纠结。

公元351年，被擢升为副帝的加卢斯在帝国东部最大的城市安条克，开始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生活。父亲被杀时年仅12岁的他，此时已经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加卢斯成为“恺撒”的同时，也奉命娶了皇帝的胞妹为妻。此女子就是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的未亡人君士坦提娜，她因为与马格嫩提乌斯关系密切而让其兄焦虑不安。君士坦提乌斯大概是在决定代替他本人负责帝国东部的人选时，就想好要将这位惹是生非的妹妹一并打发。加卢斯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年届20岁的尤里安。加卢斯荣升副帝，让他也摆脱了禁闭的生活，获准在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附近做一名哲学门徒。

也许是因为放下了东部这块心中的大石头，君士坦提乌斯重新恢复了与马格嫩提乌斯决战到底的信心。总司令的态度感染了官兵们的情绪，春夏两季与敌方对峙相持不下、陷入胶着状态的军队，又重新燃起了跃跃欲试的斗志。

叛将马格嫩提乌斯

公元351年，在巴尔干地区与君士坦提乌斯对决的马格嫩提乌斯及其军队，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可谓久经沙场。士兵的人数虽然不到4万人，但是除了高卢人、西班牙人这些罗马军团中传统的异族军人之外，还有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这些人对于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是国境对面的野蛮民族。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由罗马公民担任，如今则是由高卢、西班牙以及法兰克和撒克逊等异族所组成。原本罗马人组成的军队清一色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发碧眼。率领这支罗马人与蛮族人混合军团的，正是蛮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尽管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实力却足以和数量在2倍以上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抗衡。对于这个事实，就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也不得不承认。

两军对决，战场选在了由德拉瓦（Drave）河与多瑙河冲积而成的一块辽阔的平原，这里位于现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交界处。君士坦提乌斯之所以执意挑选此地作为战场，是因为24年前，他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这里击败了其生命中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水量充沛的德拉瓦河从这里注入宽阔的多瑙河，流域附近的平原正适合打仗。不愧是君士坦丁大帝，挑选战场的眼光也是一流。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与他擅长快攻的父皇不同，做事小心谨慎。尽管手中拥有着超过敌人2倍以上的兵力，却迟迟不发出进攻的命令。两军在按兵不动、互相对峙的情况下，度过了春夏两季。直到秋天，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是因为副帝加卢斯接手东部，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位才30岁出头的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像是一位年轻人，心里稍有一点事，行动就会受到影响。他本质上是一位胆小怯懦的人。

所幸的是，他父亲去世14年，余威犹在。具体来说，就是军中还有

不少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老兵。其中一位法兰克人出身的骑兵团团长西尔瓦（Sylvanus）带着他的手下，抛弃马格嫩提乌斯，投奔了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的兵力因此减至3.6万人，相反，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超过了8万人。

发生在公元351年9月28日的会战，没有如君士坦提乌斯所愿，在他父亲赢得最终胜利的幸运之地西巴莱（Cibalae）展开，而是在距离西巴莱以北30公里的穆尔萨（Mursa）平原上。马格嫩提乌斯的阵营，从左面可以望到德拉瓦河，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部署在相反的一侧。

按照惯例，总司令君士坦提乌斯向蓄势待发的士兵发表了一通激励军心的演讲，然后离开战场，退到后方的教堂，一边祈祷，一边等候战报。而他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则自始至终站在前沿阵地。

清晨太阳升起时，双方就开始列阵，但直到阳光照到头顶，仍然没有动静，两军就这么互相对峙着。

正午之后，按兵不动的局面终于结束，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发起了进攻，会战这才正式开始。以往罗马军会战时，既能坚守一贯的战略，同时又有多种随机应变的战术。然而，这场会战却毫无组织性，士兵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乱冲乱撞。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罗马军的战斗风格似乎也偏离了传统，日趋蛮族化，仅依靠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不讲求战斗技术和用兵法则。正因为如此，这场穆尔萨会战打到日落之后，依然不分胜负，直到君士坦提乌斯的骑兵团打垮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步兵部队，这才彻底地扭转了局势，输赢终于定局。

由于长时间的正面冲突，双方死伤惨重。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手下有2.4万人战死，胜利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8.5万人的军队也有3万人横尸沙场。两军合计总共损失了5.4万人。这是一场内战，死去的官兵都属于罗马军团，根据仅有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他们大多是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这就是为何一场内战，却让后世视为导致罗马帝国军事力

量根本衰退的原因。

尽管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马格嫩提乌斯还是成功地率领着残余的部队逃离了战场。他们一路沿着德拉瓦河上游，翻越古今都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拉丁语：Alpes Iuliae，意大利语：Alpi Giulie）的山脉，进入意大利境内，一直逃到意大利半岛最北端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如果以现代地理位置来说，马格嫩提乌斯一行，等于是沿着匈牙利边境，横穿克罗地亚，经过斯洛文尼亚，最后抵达意大利。或许不能说马格嫩提乌斯是逃亡，而应该称之为撤退。他虽然出身蛮族，但无疑是一位具有军事才华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打算以这个意大利北部城市作为基地，准备东山再起。

而另一方，生性小心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没有乘胜追击。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立即攻打马格嫩提乌斯盘踞的意大利北部，而是优先选择了夺回属于敌人势力范围的西班牙和北非。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马格嫩提乌斯在意大利苦候一年，却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的军队在夺回北非之后，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收复了西班牙。

如果伊比利亚半岛再落入皇帝的手中，他势必会攻打到比利牛斯山脉一带。原计划在意大利北部迎击君士坦提乌斯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明知自己的老巢高卢已岌岌可危，还是决定返回，将根据地设在了里昂。

400年前的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将它划归罗马版图。他对高卢采用了罗马式的统治，允许被征服的各个部落（包括零星的小部落在内，数量超过了100个）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地继续生活。之后，继承了恺撒遗志的奥古斯都，又在那里建设了类似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将这些部落的根据地连接在一起。因此罗马时

代的高卢地区即现代法国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在被恺撒征服之后，从原本的部落村庄发展成罗马式的城市。唯有里昂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是由罗马人兴建而成。最初这里似乎也有一些零散的部落，但规模很小，不能与占据高卢各地的其他族群相比。总之，里昂是按照罗马人的思路，从无到有打造出的一个新型城市。

吕格杜努姆复原模型图

打开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吕格杜努姆”（Lugdunum）的里昂地图，我们马上就能明白，罗马人为何会决定在此地建造新的城市。这里位于索恩河（Saone）与罗讷河（Rhone）的交汇处，两河之间的半岛面积超过了巴黎。在军事上具有防卫的意义，同时又能作为都市而发展。罗马人最喜爱这种概念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能同时达到目的的地理环境。所以，罗马帝国时代的里昂，不仅是里昂行省的省会，还被视做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

在元首制时代被称做“防线”的莱茵河流域，沿线都设有军团基地，因此，在高卢内部的城市几乎看不到罗马士兵的踪影。只有里昂始终保持了一个大队的驻兵，人数在1000人。在帝国西部的领地上，有军团大队常驻的城市，除了里昂之外，就是迦太基。迦太基是丰富的北非物产

的集散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里昂，则早在开国皇帝时代，就建有钱币铸造厂，专门铸造管辖权属于皇帝的金币和银币。

元首制时代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驻守莱茵河沿线的军队总司令官，如果冬季休战期间不返回罗马，就会回到里昂的总司令官的官邸过冬。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就是在其父德鲁苏斯担任总司令期间，于里昂出生的。公元1—2世纪时期的里昂，重要性远远超过巴黎西（Parisii）人的根据地巴黎，也就是现在法国的首都。正因为如此，出身蛮族但极其熟悉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才会决定坚守住里昂这个大本营，准备与皇帝的军队决一死战，只不过他的英勇气概没等到真正发挥的那天，就已灰飞烟灭了。

尽管高卢一些城市的人民，曾经一度追随马格嫩提乌斯，但他们对局势变化非常敏感。首先是特里尔（Trier）变节，向被马格嫩提乌斯立为共同皇帝的德森提乌斯关上了城门，接着其他城市纷纷效仿，他们对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的态度也不同以往。公元353年8月11日，回到高卢一年的马格嫩提乌斯，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深感绝望，在里昂自杀。德森提乌斯闻讯后，在第二天的早晨，步兄长之后尘上吊自尽。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弟弟君士坦斯被杀后引发的内战，在35岁时像其父皇那样，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他最后的对手是自杀身亡，可以说是不战而胜。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地处死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所有部下，连将这些人关进大牢似乎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整个行刑的过程残酷无情、完全彻底，其他一些非军职人员，虽然幸免一死，却没有能够逃脱流放以及没收家产的命运。像君士坦提乌斯这种生性怯懦的人，反而会有比常人更暴虐的一面。

经过这一场彻底的肃清，高卢实质上变成了不设防地区。军队仅靠士兵的人数，并不足以构成军事力量，必须要有指挥的将领。公元351年发生的穆尔萨会战以及公元353年进行的这场屠杀，使得驻守莱茵河

以及在北海防线抵御北方蛮族侵略的罗马军团丧失了几乎所有中上级的将领。此时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一兵未发就成功地击败了敌人，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高卢的形势还是和造成了5.4万人死亡的穆尔萨会战结束后一样，非常之糟糕。接下来让他烦恼的，当然就是如何处理无防卫状态下的高卢的安全问题。

所谓的组织，规模无论大如帝国，还是小至数名工匠组成的手工作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要有协助者。因此，如何找到优秀的协助者，对于组织的领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追溯罗马的历史，可以发现统治者们在使用协助者时，通常会有以下两种不同方法：

一、如果第一次失败，还会再给第二次机会，并且发现对方的所长，给予发挥的机会。

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下一次。做不好即刻换人。尤其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统治手段趋向东方君主专制国家，失败者通常都会遭处死。

君士坦提乌斯自公元337年继承皇位到公元361年死去，在位24年。虽然最初的3年是兄弟三人分治，之后的10年与弟弟分担帝国的东西两部，但他始终是正帝“奥古斯都”。因此作为皇帝，他统治国家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他的父亲，享有大帝尊称的君士坦丁，在成为“奥古斯都”之后，治国时间也有25年，罗马帝国有半个世纪掌握在他们父子的手里。

父子二人统治国家的手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不同，可能就是对于协助者的态度。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最擅长的就是使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公元353年夏天，出身蛮族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自杀身亡，这对君士坦提乌斯而言，既报了杀弟之仇，又收回了被占领的西方领土，性格

阴郁的他，也因为喜悦和安心而变得开朗。虽然花了3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篡位者，但他毕竟没有对帝国西部的混乱局势置之不理，当初决定与波斯国王休战，优先解决西部问题，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虽然只有35岁，但他的精神年龄并不年轻。他思想僵化，不懂得随机应变，在他看来，所有的麻烦都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处理。

这种性格的人，通常会将心中的不安隐藏起来。尽管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但他身边的人可以察觉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比他父皇所教导的更加遵守礼仪规范。他父亲生前始终与臣子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属下之间沟通，唯一的渠道就是高等宦官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臣子们要向君士坦提乌斯通报，都必须通过优西比乌。

由于宦官没有子嗣这类血亲，因此在视忠心高于才能的专制宫廷中被委以重任。同为权力者的手下，他们依附于主子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正常的男子。

正因为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宦官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最关键的就是操控主子的情绪，使之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主子始终心怀不安。只要烦恼不断，主子就会不断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宦官优西比乌尤其擅长此道。他虽然长得肥头大耳，却心思缜密，手段巧妙，或许这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兄弟之间

加卢斯是在公元351年3月25日就任“恺撒”（副帝）的，因此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两年之前。当时帝国的东部缺少负责军事安全的统领，长年被强行幽禁的加卢斯，突然收到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唤，不出几

日，就被正式任命为“恺撒”。

君士坦提乌斯任用的加卢斯是14年前被他杀掉的叔叔之子。君士坦提乌斯将这位堂弟提拔到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副帝，完全是因为要全力以赴地对付马格嫩提乌斯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君士坦丁大帝的血亲中还在世的只剩下当时26岁的加卢斯和他20岁的弟弟尤里安，所以这个任命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能力。当然，临危受命的一方如果能够善用机会，有所发挥，也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是，加卢斯似乎缺乏这种志向。

作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加卢斯的父亲已经去世14年，而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不在人世了。母亲死后，他父亲再婚，生下的孩子就是尤里安。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虐杀，兄弟俩虽然侥幸逃生，但是他们的父亲、伯父以及两位堂兄弟都死于非命。这对12岁和6岁的兄弟成了孤儿，而他们的监护人正是杀害他们父亲的凶手君士坦提乌斯。

父亲死后最初的六七年，他们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某处生活，之后迁居尼科米底亚的外祖母家中。他们过着毫无自由的生活，不得做出任何违反监护人君士坦提乌斯意志的事情，甚至连读书的课本，都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按照君士坦提乌斯的指示，兄弟俩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这位皇帝虽然没有受过洗礼，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幸的是，在尼科米底亚生活期间，两兄弟的教师除了严格的阿里乌斯派的圣教徒，还有一位名叫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的去势奴隶。马多尼乌斯是斯基泰（Scyths，Skythai）人，曾经是尤里安亡母幼时的家庭教师。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神父，这位奴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

古代被称为斯基泰的地区，位处现在乌克兰的南部。出身于斯基泰的马多尼乌斯怎么变成了去势奴隶，无从查考，他是在何时何地学习了

希腊文化也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就是这位老奴隶尽心尽力将他热爱的希腊古典哲学和文学，传授给了两位少年。马多尼乌斯向兄弟俩朗读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作品，解释其中的含义，并且要求他们阅读和背诵荷马、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us）的作品。马多尼乌斯不仅要求他们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希望通过背诵，让孩子们完全沉浸到文学的世界里，充分享受文学带来的乐趣。两个学生中，像海绵吸水般吸取知识的，是弟弟尤里安。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没有成为一个跪拜在至高无上的基督脚下的教徒，而是在充满人性的希腊诸神的围绕下快乐成长。

在哥哥加卢斯十八九岁、弟弟尤里安十二三岁时，两人的生活发生了突变。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只能说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年龄，从帝国东部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尼科米底亚，被转移到小亚细亚的山中古堡生活，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受皇帝之命监视兄弟俩的主教的去世，也有人认为是收养他们的外祖母的亡故。更有甚者指出，这是宦官优西比乌向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进言，让这对兄弟留在人多口杂的尼科米底亚是一种危险。总而言之，从这个时期开始兄弟俩的生活环境一落千丈。

他们被遣送之地是卡帕多西亚的马塞鲁（Macellum）。不过，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巴灵顿希腊罗马世界地图集》。——译者注）中并未记载此地。卡帕多西亚附近的恺撒利亚（Caesaria）是一个拥有四条罗马大道的都市，但位于近郊的马塞鲁则是个王孙贵族们外出狩猎时才会去的地方，充其量算做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马塞鲁被认定是卡帕多西亚国王狩猎时所用的城池，它在卡帕多西亚成为罗马行省之前应该就已经存在，有300余年的历史。这里在成为罗马行省之后，归属于罗马皇帝，但从没有一位罗马皇帝在这座古城堡中滞留，享受狩猎的乐趣。当年哈德良皇帝曾经前往邻接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的卡帕多西亚行省，巡视边境防卫线。热爱打猎的哈德良皇帝，也没有挪步前往这个矗立在荒野中的马塞鲁古堡。虽然说这里四周没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打猎并非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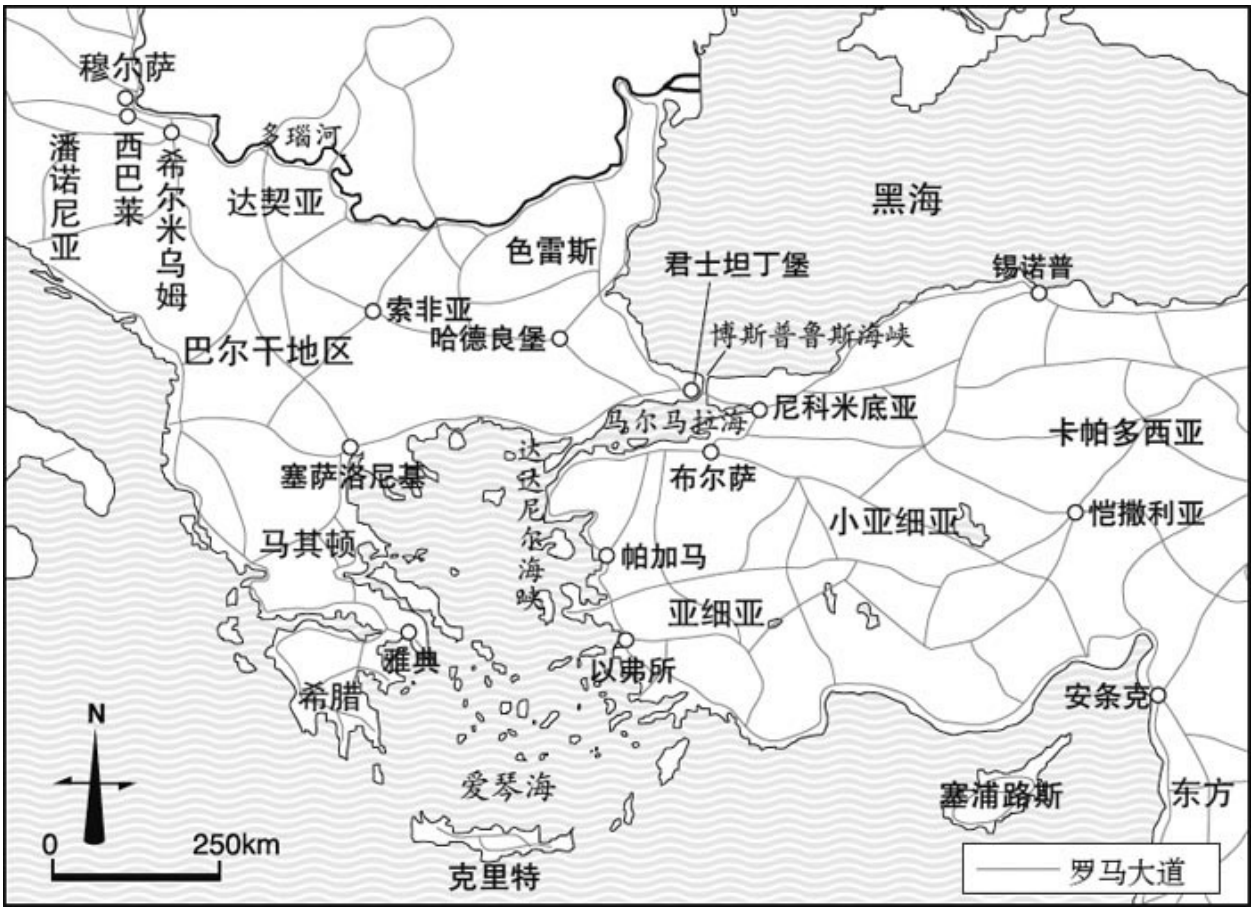
要选个鸟鸣水清的地方。譬如说，在非洲的草原上，以猎杀猛兽为乐；而在古代中东人的定义中，打猎就是打老虎和狮子。

话说回到两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来到的古堡，周围是荒山野岭，城堡内鲜有人烟，想必也是一片荒芜。负责监管他们的人，这次换成了卡帕多西亚的主教格奥尔吉乌斯，没有他的许可，少年们甚至不能前往邻近的城市恺撒利亚。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兄弟俩能够接触的就是负责警卫的一队士兵，以及打理家务的奴隶一家。原来的家庭教师马多尼乌斯没有获准与兄弟俩同行。多年之后，尤里安曾写下在马塞鲁的这段经历，他说那是一段被监禁、隔离的岁月，远离学问，就连运动和竞技，也只有奴隶的孩子陪伴而已。

这就是当朝皇帝的血亲们所遭遇的囚禁生活的实况。7年时间，哥哥加卢斯从18岁长到25岁，弟弟尤里安则是从12岁长到19岁。兄弟俩一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度过的。即便是一个神经非常健全的人，也免不了会精神崩溃。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是否能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的世界。弟弟尤里安有幸受到马多尼乌斯的启蒙，能够沉浸于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世界之中。哪怕身边没有人指导，曾经背诵过的那些早已铭记于心的作品，像一个收满藏书的图书馆，占据了他的脑海。卡帕多西亚的主教虽然是一个比已故的尼科米底亚主教更为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古书收藏的爱好者，偶尔也会拿出少许的书籍借给尤里安阅读。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在那个时代可以称做“古籍”的，自然不是有关新兴基督教的书籍，而是流传了几百年的古希腊的作品。尤里安因为拥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才避免了现实对精神的摧残。

然而，哥哥加卢斯却无法做到。当初身边有老奴隶悉心教导的那段时期，他对哲理、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一旦生活环境发生剧变，面临严酷的现实，他完全失去了得以支撑的精神世界。他喜欢带着士兵和年轻的奴隶们在荒野上策马奔驰，从而练得一副健美的身体。可是在遭遇那些无形的压力时，他的心还是会受伤，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长期地留在了身体里。在父亲被杀之前，他是属于君士坦丁大帝一族的王子。与只做了6年王子的尤里安相比，享受过12年皇族待遇的加卢斯，对于过去，有着更多的眷恋和回忆。在被任命为副帝的时

候，加卢斯的性格已经扭曲。

不过话说回来，担任副帝时加卢斯才26岁。如果他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发挥所长，结果又会如何呢？比方说，波斯国王撕毁了停战协议，大举进攻欲抢夺北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奔赴前线、率兵迎击、保卫半个世纪都属于罗马领土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定是握有帝国东部罗马军总指挥权的加卢斯。

虽然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东方西行，但大半的将领仍然留在原地。原本群龙无首的军队，如今有了加卢斯。这位年轻人尽管缺乏哲学和文学上的造诣，但是在山野中骑马打猎的技能毫不逊色。当然打猎与打仗不能混为一谈，不过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动态的行为。

如果加卢斯是在战场上开始他的“恺撒”生涯，想必不爱静坐思考的他，会很快地适应这种生活。军旅生活，无论是对他追回失去的14年的光阴，还是提升个人的修养，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他所管辖下的帝国东部的领土安全，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如果在担任副帝、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他不是居住在安条克豪华的皇宫中，而是生活在野外的军营，那么他心中那些曾经遭受的无形的创伤或许能够痊愈，扭曲的性格也会逐渐趋向平和，这些转变如果最终能促成他创下良好的战绩，势必可以让他重拾信心。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对他人保持公平。

然而，不知是否由于疲于应付入侵的蛮族，波斯国王始终信守着与罗马皇帝的休战协定，这反而使得加卢斯的生活越来越远离野外军营。

当然，远离战场并不等于无所事事。作为副帝，加卢斯的地位仅次于正帝，是统治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导者。以他如今的身份，只要有心，大可利用波斯国王偃旗息鼓之际，前往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前线基地寻访、视察，为国防安全尽心尽力。

可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城中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禁锢着加卢斯的那堵无形的高墙并没有就此消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原本就生性多疑，加上加卢斯又是被他杀害的叔叔之子。虽然迫于形势，擢升加卢斯为副帝，但他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副帝与其手下的官兵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君士坦提乌斯害怕加卢斯掌握军权后，会举兵造反。作为皇帝近臣的宦官优西比乌，与掌握安条克皇宫大权的宦官们暗中联手，变本加厉地隔断加卢斯与外界的联系。而加卢斯偏偏又不是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打破这座无形高墙的人。

在哥哥荣升副帝、移居安条克不久，弟弟尤里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位20岁的青年并没有得到任何公职，他被获准作为一名哲学研究的门徒，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岸称做爱奥尼亚（Ionia）的地区。这一带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有很多像以弗所（Ephesos）那样由希腊人建造的城市。这对尤里安来说真是万幸。哥哥加卢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堡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实际却仍然过着受监禁的生活，而尤里安则是名副其实地获得了自由。兄弟俩就这样天各一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

处死副帝

为击败篡位的马格嫩提乌斯而返回帝国西部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断听到从东部的安条克传来的坏消息。

副帝加卢斯与安条克皇宫的那些老臣们，事事针锋相对，关系十分恶劣。对于臣子们的进言，加卢斯一律当它们是假借皇帝之威，向他发出的警告。刚开始，君士坦提乌斯对东部宫廷内的这种状况还装聋作哑，渐渐地就变得忍无可忍。副帝与大臣的不和，不再是皇宫内部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安条克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

男人之间的矛盾，哪怕只要有一个女人介入，马上就会从权力斗争演变为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八卦。加卢斯在被任命为副帝的同时，娶了君士坦提娜为妻。这位女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朝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她的前一任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在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血案中惨遭杀害，之后她又与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暗中勾结，给其兄君士坦提乌斯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哥哥把这位妹妹嫁给了加卢斯。君士坦提娜好像比加卢斯年长几岁，她对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甚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稳定年轻丈夫的情绪上，她没有给予过正面的帮助。上任后来到安条克的加卢斯，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尽管加卢斯处境不佳，但毕竟身居高位，属于发号施令的人物。下达指令的人与执行指令的人交恶，绝对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安条克是一个大都市，由于各种原因，市场上经常会发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卢斯担任副帝的时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陷入绝望的民众发起了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加卢斯制定的政策不得要领，而具体负责实施的部下疏忽怠慢，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决策者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人在欧洲的正帝收到的呈报，统统是暗指副帝治国无能的内容。

随着皇宫生活日趋煎熬，加卢斯性格中残忍的一面逐渐地显露出来。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东部的犹太教徒而言，目前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生活环境，反而不如以前信仰多神教的元首制时代。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都属于排他的一神教，但是基督教与其前身的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基督教徒十分憎恨害死耶稣的犹太人，这种敌视情绪让犹太教徒深感不安，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偏偏副帝加卢斯又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偏袒基督教一方。

引发事端的是犹太人集中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某个城镇，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暴乱。维持帝国东部内部局势稳定，是副帝职责所在。在加

卢斯的指挥下，军队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暴乱。问题是事后对叛乱者的处罚过于残酷。

加卢斯下令处死了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暴乱。整个城镇变成了尸骨累累的坟场，宛如死城。

君士坦提乌斯比其副帝加卢斯更倾向于基督教。有关他继承父亲的意志、不遗余力振兴基督教的事迹，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展开论述。不过他在位的公元4世纪中叶，公元312年颁布的“米兰敕令”依然有着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不管皇帝们多么厚待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人民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者其他的多神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宗教一律被视做邪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公元4世纪末期之后的事情。因此，在公元4世纪中期，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成为剥夺其生命的理由。即使为政者心中有所偏袒，但在这个时期，加卢斯下令大量屠杀了犹太教信徒，站在官方的角度，无论如何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完全有足够的法律根据予以惩处。罗马帝国的后期，敕令形同国法，对副帝同样有效。加卢斯再一次在政治上失了分。

安条克皇宫的生活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加卢斯心中蓄积的仇恨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克制的程度。宫廷中有两位官员最令他痛恨，其中一人是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加卢斯派一队士兵逮捕了这两位官员，在安条克市中心游街示众后将他们杀害，尸体扔进了城镇边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这已经不是可以用行为不当就能搪塞过去的事情。而加卢斯做出这个没有任何狡辩余地的疯狂举动之时，正是在西部三年的君士坦提乌斯彻底解决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时期。29岁的加卢斯的命运因此而定，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已经下定决心更换副帝，但在具体实施时，他采取了与他36岁年龄很不符合的异常谨慎的步骤。

首先，为了缓解加卢斯的不安，君士坦提乌斯以兄长的身份，给堂弟写了一封充满手足之情的信。同时，他又在暗中布局，设法调离这三年来直属于加卢斯的军队。就在加卢斯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又无计可施之际，他收到了来自米兰的邀请信。重新收回西部失地的君士坦提乌斯，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元354年这一年，在米兰的罗马帝国的正帝向其副帝发出了邀请。

事至如此，加卢斯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邀请的真正用意是要遣送他回国。因此他让妻子先行一步，希望她能以妹妹的身份，为他向皇兄求情。可是，君士坦提娜在从叙利亚前往意大利的长途跋涉中病倒，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加卢斯在妻子启程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安条克，斜穿过小亚细亚，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不仅带着军队随行，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还主办了一场运动会，在他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当日，元老院全体议员为他送行，可以说这一路上充分享受了作为罗马帝国副帝的待遇。不过，在他到达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现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时，等待他的是一封来自皇帝的命令。

正帝命令加卢斯跟随着10辆国营邮政马车前往米兰。当时的政府要员公务远行时，通常会把国营邮政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加卢斯清楚，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从副帝降格为一介官员。他成了被押送的罪犯，而且押送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时作了变更，不再是米兰，而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的波拉城堡。

时至21世纪的今日，波拉城中依然随处可以看到以圆形竞技场为代表的各种古罗马时代的遗迹。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这里以皇帝处置内亲的行刑地而闻名。28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波拉，以通奸罪之名，对时任副帝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执行了死刑。副帝加卢斯一到波拉，就被摘下副帝的徽章，强行脱去披风，身上只剩下一袭短袍。他被带进一间房间，在那里等着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而是宦官优西比乌。宦

官没有按照罗马法规定的程序对加卢斯进行审讯，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中世纪异端裁判所那样的拷问形式。加卢斯在刑讯逼供之下，承认了自己图谋杀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这场非法的审判过程，一字不落地被记录下来，送到了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手里。从米兰方面传来的回信是皇帝批准了审判官的裁决。

加卢斯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腿跪地，被处以斩首之刑。当年同样遭到斩首的克里斯普斯，至死都在为自己的清白大声辩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加卢斯却在沉默中迎接了死亡。他死于公元354年12月，年仅29岁。

对于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加卢斯既是自己的副帝，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堂弟，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态，下令处死加卢斯，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出于单纯的政治考虑，能力欠缺的人必须淘汰，哪怕是自己的左右手。按照人之常情，加卢斯无论如何都是他还在世的仅有的几位亲人之一。不过，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位习惯了失去亲人和杀害亲人的人物。

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虐杀了大批的亲属，其中包括当时的副帝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这两位都膝下无子。

公元340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兄、年仅23岁的君士坦丁二世遭到杀害，他生前也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公元350年，弟弟君士坦斯被蛮族出身的叛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所杀，死时30岁，没有后裔。

公元354年，29岁的加卢斯被处以死刑，无后。

最后是这位君士坦丁大帝唯一健在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也没有

孩子。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经历了两次婚姻，却从未诞下一男半女。哪怕贵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生子这件事上，似乎也是身不由己。

“恺撒”这个称号，除了代表是皇位继承者，即皇太子之外，还有副帝的意义。副帝的意义，是罗马帝国晚期、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所认定的。

然而，身为“奥古斯都”（正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没有将“恺撒”视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是将之诠释为不遗余力执行自己意志的协助者。因此，协助者一旦不能为己所用，立即排除；若稍有违抗之心，马上消灭，绝不手软。其实，这正是君士坦提乌斯失算之处，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他既找不到继承人，也没有协助者。要说继承人，还可以期待两年前迎娶的第二任妻子优西比娅（Eusebia）皇后为他生产，可是治国的协助者一刻不能等待。

加卢斯是在公元354年12月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55年年初，其弟尤里安收到了来自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见令。以哲学研究为业的尤里安此时23岁，他已听到兄长不幸的消息。这个时候，接到君士坦提乌斯要他去米兰的指令，尤里安惶恐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

哥哥加卢斯是以企图谋害正帝主凶之罪遭斩首的。身为弟弟，他不得不作好被当做共犯的心理准备。对于从监禁生活中释放出来、刚做了三年学者的尤里安而言，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及其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需要一个新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打算。何况，那时的皇帝还没有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立一位副帝。

从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前往米兰，必须走与兄长生前所走的路相同的路径。不清楚皇帝是派来了专车，还是让他乘坐国营邮政的马车，总之，对这位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沉重无比。在即将进入意大利境内时，马车如果此刻转道向左，那就意味着目的地将是位于伊斯特里

亚半岛尖端的波拉。所以，当尤里安发现马车没有左转，而是继续往西的时候，一定是如释重负。至少这证明他的目的地是米兰。

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抵达米兰的尤里安，过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到当初令他进宫的皇帝。被扔在皇宫一角的他，见到的是以深受皇帝宠信而出名的宦官优西比乌。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似乎是想通过他来试探尤里安。其实，想要清楚地了解兄弟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办法还是皇帝本人亲自出马。何况对尤里安而言，再也没有比接受优西比乌的审查更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位宦官正是将他的兄长加卢斯送上刑场的“法官”。

困在米兰两个多月动弹不得的尤里安，究竟是会遭遇与兄长相同的命运，还是能够无罪释放，可谓命悬一线。只要宦官向皇帝报告，说他怀有为兄长复仇之心，那么他立即就会被送往波拉城，步兄长之后尘。

最终，是皇后优西比娅救尤里安脱离了危机。优西比娅出身于希腊贵族之家，年轻、貌美又有着极好的教养。虽然没有能够为求子心切的皇帝生下一男半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皇帝对她的宠爱及尊重。生性胆怯、阴沉内向又残忍的君士坦提乌斯，唯有对优西比娅，表现出难得的一份真情实意。

也许是优西比娅同情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尤里安所遭遇的不幸，向皇帝说了什么，在米兰皇宫内望眼欲穿等了两个多月的尤里安，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召见。他在皇帝面前尽力为自己辩护，表示除了学问别无所求。又强调自己与兄长性格迥异，并非同母所生，兄弟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无论尤里安的表白是否言不由衷，谁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这位23岁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残杀亲人的冷血动物，他不得不尽其所能让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打消对自己的猜疑。何况，唯有这一天，他不用通过宦官优西比乌这层过滤网，直接向掌握着自己生杀大权的人辩白。

面对面的对话，似乎真的产生了效果。那次会见以后，皇帝虽然没有和尤里安作进一步的接触，却同意他去希腊的雅典学习哲学。这个恩准足以让尤里安感到心满意足。可惜，在哲学圣地雅典尽情享受自由的日子，只有从春到秋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在秋天即将结束之时，他再一次收到了皇帝的召见令。

在尤里安去雅典的这半年中，君士坦提乌斯始终举棋不定，局势的变化使得设立副帝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

目前还算太平无事的，只有与波斯军队相互对峙、按兵不动的东部防线。而以多瑙河为防线的欧洲中部地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河北岸的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的威胁。形势比多瑙河地区更令人绝望的是莱茵河一带，在那里被称做“防线”或“防卫墙”的Limens已不复存在。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防线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高卢之后，至今已经400多年。几百年以来，作为军事意义上的防线，莱茵河一直守护着广阔的高卢地区。这些地区按照现代地理位置划分，分别是荷兰的南部、比利时、德国西部、瑞士和法国。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非常清楚，莱茵河作为“防波堤”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历史只延续至公元2世纪。进入史称“3世纪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莱茵河防线就不断地遭到蛮族的破坏。不过，尽管如此，一直到3世纪末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罗马还是尽力以莱茵河为防线，阻击外敌的侵略。

罗马彻底放弃固守莱茵防线的战略，是在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后。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大帝在军事上采取了新的策略，对来袭的敌人采用“请君入瓮”、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是在经历了整个3世纪之后，帝国已经丧失了固若金汤的防卫能力，只有在遭到敌人入侵之后，才会出手反击。君士坦丁大帝不过是将这个不争的事实，制定成罗

马军的常规战略而已。这个军事战略上的改变，使得那些在元首制时代星罗棋布般集结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大多变成了无人之地。而那些还有士兵防守、不至于完全人去楼空的基地，也降格成了农军兼用的简陋要塞。如今的莱茵河沿岸，已经沦落到不能再称之为“防线”的境地。

话说回来，君士坦丁大帝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军事防卫，而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事实上，与军力逐渐减弱的基地成反比的，是直属皇帝的游击军团日益增强。原蛮族出身的罗马军人成为这支实力雄厚的游击军团的主力，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的。尽管这些军人来自蛮族，但与其出身的部落几乎断绝了关系。因此，深得大帝的信任。

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是一种领导才能。然而，这种才能延续到第二代的例子少之又少。公元350年发生的原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杀害大帝三子君士坦斯的事件，就是异族军人向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泄不满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罗马放弃了军事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防线”的同时，军团内部的局势也日益动荡不安。

异族官兵的叛乱，虽然在三年后因主帅马格嫩提乌斯的自杀而最终失败，但这三年的内战让罗马军损失了大量优秀的军人。这些阵亡的军人大多像马格嫩提乌斯那样来自蛮族，担当着罗马军的主力。他们的牺牲是导致罗马军力急速衰退的直接原因。

军力衰退最严重的，当属莱茵河以西、曾经作为马格嫩提乌斯根据地的高卢地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高卢地区在三年内战中，至少损失了3万人的兵力。要填补这3万精兵强将的空缺，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正因如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衰退。不过，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是盘踞在莱茵河以东、虎视眈眈地对着西岸的蛮族部落。

353年8月，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身亡，内战终结。

354年12月，副帝加卢斯遭斩首。

355年2月，尤里安应召前往米兰。5月起，在雅典求学。

355年11月，再次被召回米兰的尤里安，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正式任命为“恺撒”（副帝）。

尤里安成为副帝

公元355年11月6日，这一天是尤里安24岁的生日。可是，没有人为他庆贺，甚至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通常出身于罗马上流家庭的孩子，幼年时会有陪读的奴仆，成年后，这些下人会继续陪伴左右，照顾其日常起居。可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经历了长期隔离的尤里安，连这样的贴身奴隶都没有。

这一天，从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的尤里安，作为副帝被介绍给了应皇帝之令而集结的罗马官兵。就在前一天，他还留着属于希腊哲学家招牌形象的长胡子，而此刻，已经被剃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就像一只刚被剪了毛的山羊。他的打扮也从平民百姓穿的天然色的托加和皮凉鞋，换成了罗马将军的正装——白色的短袍外穿戴着皮质的盔甲，外披大红色的斗篷。可能是因为紫色的染料比较昂贵，紫色的斗篷只有正帝才能使用。而副帝和其他将军们按规定只能穿红色。

一身正装出现在罗马官兵面前的尤里安，既没有伟岸的身材，也没有堂堂的气势，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再加上他首次穿上军装，将士们对他的观感，与其说是觉得滑稽可笑，还不如说是惊讶万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任命，士兵还是按照罗马军传统的方式，用持剑的右手敲打左手拿着的盾牌，以示拥戴。

尤里安就任副帝的同时，奉命

完婚。他妻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今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海伦娜。她似乎比24岁的尤里安年长许多。同年11月3日，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副帝，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

身着军装的皇帝

对于尤里安的副帝身份，以及就任后即刻被派往高卢一事，小说家通常描绘成是皇后优西比娅对皇帝的影响。顺便提一下，由于尤里安的一生充满了叛逆和戏剧性，因此有许多以他为主角的历史小说问世。日本作家辻帮生曾经写过一本《叛教者尤里安》，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著的《朱里安》（Julian）的内容更为精彩，不愧是畅销全球的作品。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描写了皇后优西比娅对尤里安的深切关怀，或者是对他怀有爱慕之心。

小说家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在不得不作出决定时，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往往会表现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爱妻的建言，或许推动他朝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话说回来，即便没有爱妻的推举，君士坦提乌斯也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找回尤里安，擢升这位唯一在世的血亲为副帝，并派往高卢。

所幸的是，帝国东部目前还安然无恙，无须担心波斯国王的进攻。让人担忧的是，日耳曼人的多个部落，正从多瑙河的北面向南、莱茵河由西往东，不断地压进。

以君士坦提乌斯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多瑙河与莱茵河两条防线的任务。用现代地理位置来说明的话，就好像是一面在法国对抗肆虐的蛮族，同时又要在巴尔干地区击退入侵的敌人。很明显，君士坦提乌斯如果不借助他力，那么多瑙河、莱茵河两条防线都无法保全。君士坦提乌斯在是否选择尤里安做副帝这个问题上，犹豫再三，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作出决定。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踌躇不定，作为保卫帝国的最高责任者，他已别无选择。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将多瑙河防线交给尤里安，而是让他负责莱茵河。这个决定很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他把最困难的地区交给了副帝。所谓困难，并不是指敌人的数量庞大，而是自家军队的素质及数量都极其薄弱。尤里安被派去的地方正是因三年内战而损失了大批精兵强将的高卢。他不得不率领着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部队，迎战企图渡过莱茵河的蛮族，以及那些已经入侵到境内的蛮族。

按照小说家们的见解，这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成功，故意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兵力。我个人觉得这似乎对君士坦提乌斯有欠公平。君士坦提乌斯指挥下的多瑙河防卫军，尽管没有高卢损失严重，毕竟也因为三年内战而丧失了大量优秀的官兵。在对抗大举进攻的蛮族的同时，君士坦提乌斯还必须时刻关注着东部的局势，只要波斯国王那边稍有风吹草动，他必须立刻赶往东部应对。罗马帝国皇帝的首要责任在于保卫帝国全境的安全，与担当区域防卫的副帝不同，身兼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正帝，负有保卫整个帝国安全之责任。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必须对帝国东西的形势作全盘的考虑，他手中需要握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

另一方面，尤里安是一位新手，从未上过战场，也没有学过任何的战争理论，更没有接触过士兵，年仅24岁就成为高卢地区的罗马军总司令。如果要赌尤里安未来的前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赌他失败。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应该是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将尤里安送上了战场，

自然也不会提供足够的兵力，更何况公元355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确实也没有充裕的兵力可以调配。

当时的高卢地区，蛮族横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而罗马军则东躲西藏，尽量避免直接与敌人遭遇。尤里安可谓是单枪匹马来到了这里。不受期待通常也意味着自由无羁。但是，成了副帝的他，仍然需要避开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怀疑的眼光，小心翼翼地行使他的自由。

君士坦提乌斯与基督教

军事才能无法与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比拟的君士坦提乌斯，在对新兴宗教基督教的贡献上，称得上是优秀的接班人。他不仅忠实地沿着父亲既定的路线，而且将其发扬光大。

君士坦提乌斯

在具体叙述这条“路线”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回顾一下它的起跑点“米兰敕令”。“米兰敕令”于公元313年6月，由君士坦丁大帝与当时还在世的李锡尼联署，颁发帝国全域。尽管“米兰敕令”的全文，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我仍然不想省略，再完整地复述一遍。这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它的始作俑者的动机和思想。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

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从下文开始，敕令的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们：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

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这道敕令有以下两个关键点：

一、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有同等地位。

二、归还基督教遭受迫害时被没收的财产，必要时国家给予补偿。

总之，这是罗马帝国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敕令颁布10年以后，李锡尼战败身亡，敕令的主导人君士坦丁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保证了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仔细推敲，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其真正的用意，即赋予基督教官方的地位。事实上，君士坦丁掌权之后，执行的就是以基督教为上的宗教路线。

君士坦丁拿出一部分所谓的皇帝财产，其实就是国库的资金，建造了教堂捐赠给教会。君士坦丁不仅在他所建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了教堂，帝国主要城市中的许多教堂，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等都是由他兴建的。这意味着基督徒聚会、向天神祈祷的场所，是由皇帝亲自提供的。

教会需要的不仅是场所，举办各种活动还需要经费。经济问题依靠教徒们的捐赠，是一种不错的运作方式。不过，如果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就更为理想了。在古代，最好的经济基础是农地，其次是原材料加工的手工业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铺。君士坦丁将这些产业也捐赠给了教会。

有关这些产业对振兴基督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作了详细说明，就不再赘言。这里我只想提醒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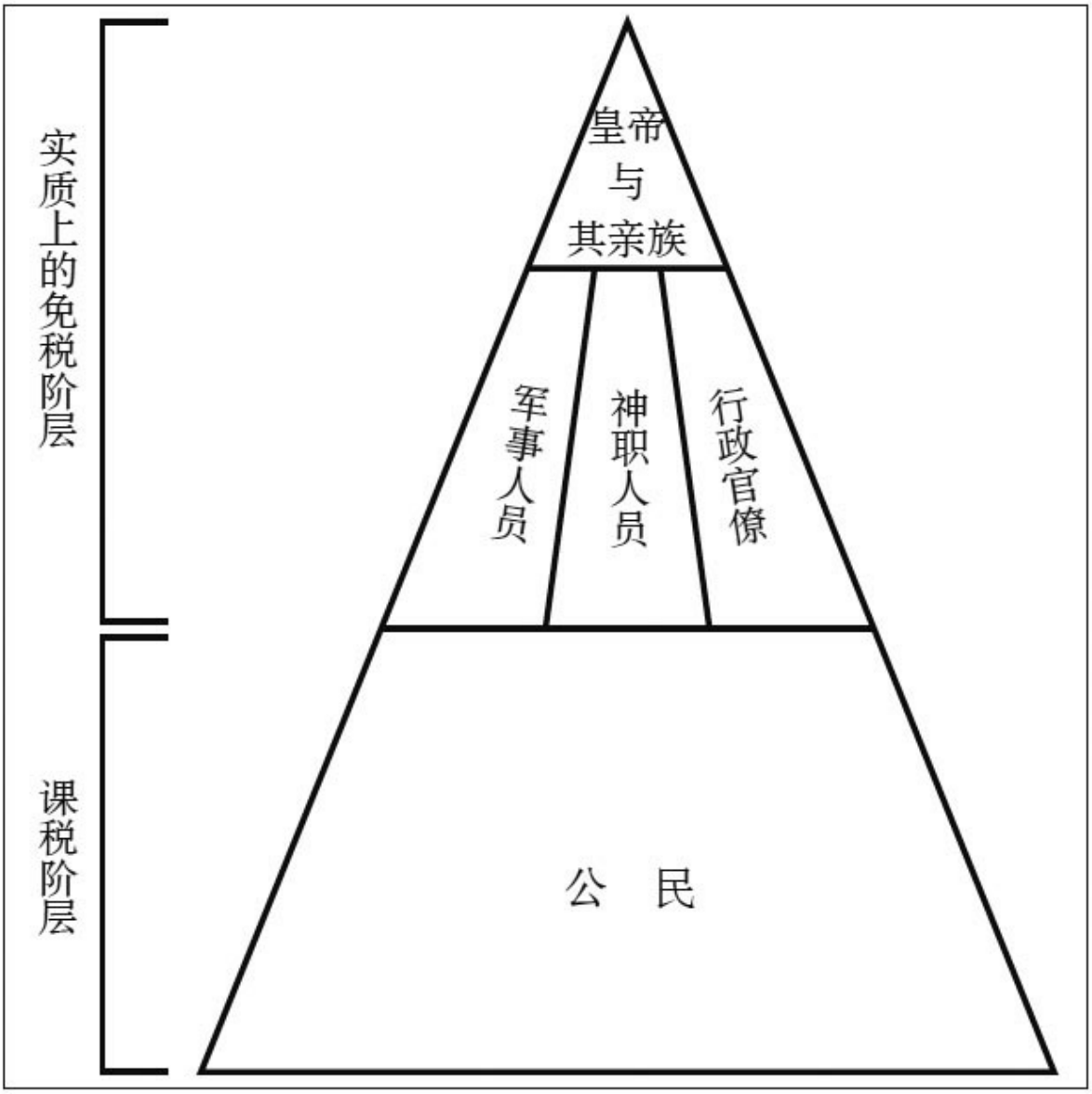
家注意一点：与传统的罗马宗教不同，基督教拥有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所以提供保证他们生活来源的赞助者，对教会是极其宝贵的。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还立法，免除了基督教神职人员担任公职的义务。其依据是："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其光荣职务。这将会为国家带来莫大的贡献。"

既然"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光荣职务"，接下来的动作，自然就是给予神职人员免除税金的权利。"光荣职务"没有报酬可言，因此也不会产生什么纳税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优惠政策，从免除公职和税金开始，最终发展到废除了元首制时代针对独身者所制定的不利条款。君士坦丁力图通过扶植基督教，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instrumentum regni），因此扶持政策上不断升级的趋势，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上述一系列政策得到落实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治国大任交到了儿子的手里。君士坦提乌斯处处喜爱效仿父亲，就连临终前受洗也与父亲如出一辙。权力交接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所制定的国策路线，正如某学者所言，"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

公元346年，继位9年多的君士坦提乌斯，修改了其父制定的针对基督教的免税政策，免税对象从原本教会的主教、祭司、执事，扩大到为教会服务的农场、工厂以及商店等的周边人员。他们的名字从"纳税人名单"（census）中消失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主要税赋包括人头税和地租税两项，新政策决定免征教会相关人员的人头税。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图

皇帝日益加剧的偏袒行为，让教会的态度变得趾高气扬。在里米尼（Rimini）召开的公会上，有不少主教提出，应该一并免除地租。皇帝没有立即予以采纳，还是坚持了仅免除人头税的原则。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就颁布了新法令，实现了主教们的愿望。

尽管现代社会把政教分离看做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但同样存在着宗

教法人免税的制度。纵观人类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光荣职务”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了非“光荣职务”。尽管如此，人类对于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总会不由自主地妥协、让步。有关这个议题，我们暂且不深入探讨。还是回头看一下公元4世纪的罗马，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正如上图所示呈金字塔般的构造。这是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推行的不断深化基督教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以往的神职人员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按照规定，一旦担任神职，之前所持有的财产要么捐赠给教会，要么转让给亲属。从君士坦提乌斯时代开始，神职人员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一法令，对那些富有的神职人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真是难以估计。

首先，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对其的占有欲就会愈发地强烈。其次，财产原本属于课税的对象，但是只要持有人成为神职人员，根据有关法律，便可享受免税的权益。

基督教教会不仅是穷人们避难的场所，也成了富裕者们的“救赎”之地。

瞄准目标

由于君士坦提乌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先父的路线，因此他的亲基督教的政策，势必会发展为排除其他宗教，尤其是敌视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米兰敕令”推出的当初，并不反对迄今为止的传统宗教，然而，随着皇帝们扶持基督教的政策风向日益明朗，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夜间的献祭仪式被禁止。传统宗教中屠宰并烧烤珍贵的家畜，在烟火中向天神祈祷的仪式，等同于基督教徒点燃蜡烛做祷告。如

今，夜间不能再举行这种传统的宗教仪式。

紧接着，通常在白天举行的官方祭典及其相关的献祭仪式也遭到了禁止。

不过，这两项禁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三年之后，国家不得不再次发布禁令。第二次禁令明确规定，违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在同一时期，还颁布了一项禁止偶像崇拜的新法令。“偶像”是由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想象”一词派生而来，根据词典的解释，偶像崇拜的定义如下：

一、尊崇象征宗教信仰的某具体物像。

二、尊敬象征绝对权威的某特定人物。

偶像崇拜的禁令将天神之王宙斯、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神君恺撒、神君奥古斯都等都视做偶像，禁止崇拜。不过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或者圣彼得以及天使们似乎就不在其列。顺便提一下，英语的“idol”（偶像）和“idiot”（笨蛋）都是源自意大利语的“idolo”。

偶像崇拜禁令颁布之后，紧接着皇帝又推出了关闭神殿的法令。除了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必须关闭之外，叙利亚的太阳神殿、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殿都在禁止之列。为反对关闭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曾经发起过暴动，但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罗马国内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基督教徒口中所谓的“异教”，指的就是传统的希腊罗马的多神教。

遭到关闭的神殿，毫无疑问地很快便面临新的厄运，那就是破坏。尽管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明确下令拆毁异教神殿，却允许建筑用的材料可以从神殿中获取。很明显，这个许可令是为摧毁神殿而采取的第一步策略。试想一下，神殿的圆柱被拆走了，神殿还能存在吗？

不过，在公元4世纪中叶，虽然禁止偶像崇拜，但还未发展到损坏象征偶像的雕像的地步。

雕像没有立即被拆除是另有原因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一手打造的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充斥着数以万计的“偶像”。在建都之初，君士坦丁就打算把这里建成基督教的首都，因此，没有建造一座奉献给希腊罗马天神的神殿。可是，在古代，尤其是古罗马人的观念中，没有雕像林立的地方，称不上是城市。欲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最终也从以希腊为中心的帝国东部境内，征集了大批的大理石雕像，用来装饰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的首都，在建都的当初，应该是一个基督教教会与希腊罗马天神共存的城市。希腊人相信裸体是世上最美的形象，这个最美的形象首先应该奉献给天神，因此希腊神像大多是以全裸或半裸的姿态出现。虽然对基督教而言，教堂与裸体的雕像比肩而立，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其实站在人性客观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景象。可惜，这些裸体神像只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代皇帝相继推动的以振兴基督教为目标的各项政策，依照时间顺序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

第二阶段，推出有利于基督教的措施，政策走向发生明显的改变。

第三阶段，目标明确，排挤打击罗马传统的宗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

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实质的部分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余下的部分以及第三阶段则是君士坦提乌斯继位后实施的。这个儿子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父亲，但是在推行基督教的政策上倒是坚定不移、贯穿始终。

凡界的君主态度如此坚定，按理说，圣界一方应该对此深表感激，不遗余力地支持君主。可事实并非如此。在遭到迫害的公元3世纪后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已经出现了相互争斗的局面，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之后，内斗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就在这个时期，以贤德而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圣）安东尼在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的修道院，走完了他超过百年的漫长的人生。安东尼出生于埃及中部的埃拉克雷奥波利斯（Herakleopolis），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创始者。或许是沙漠地区比较容易找到天然洞穴的缘故，在埃及以及叙利亚，修道主义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住在山洞里祷告、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如果基督教教会提供的历史资料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安东尼这位沙漠隐士应该生于公元250年，在公元356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基督教惨遭迫害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以及鼓励扶持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可是，在记录他一生言行的《圣安东尼传》中，他对于罗马皇帝，不管是反基督教的还是支持基督教的，总共只提到过一次。安东尼在红海附近建了修道院之后，前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不会孤陋寡闻、不清楚世间的局势。从《圣安东尼传》一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东方的基督教的发展形势有着相当的了解。

然而，这位沙漠隐士大声抨击的，并不是镇压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异端”。

圣人安东尼憎恶的，不是外敌，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敌人。相对于异教徒，更让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身为基督教徒却谬解教义的同门兄弟。有一次，安东尼离开他生活的沙漠地区，专程前往亚历山大城，当面斥责了掌管当地教会的阿里乌斯派的高级主教，称他们是最坏的异端，是反基督（Anti- Christ）的先锋。紧接着，他又告诫那些慕名而来见他的信徒，不要和阿里乌斯派的人来往，阿里乌斯派的思想完全违背了十二使徒所宣导的教义，是恶魔的理论，是毫无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

东西。在其他场合，一向宣导提倡和平安详的信仰生活的安东尼，只要话题涉及异端，立即会变得暴跳如雷，他痛骂阿里乌斯派“连说出名字都嫌脏了嘴！”阿里乌斯派也不甘示弱，他们袭击、破坏了阿塔纳西乌斯派（Athanasius，主张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天主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在当时，各教派之间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这种相互敌视的情绪逐渐上升，最终演变为暴力的事件层出不穷。问题的关键是无论阿里乌斯派还是阿塔纳西乌斯派，每一个教派都对自己的教义坚信不疑，而把对方的解释看成是谬论。

我们翻译成“异端”的这一词语，词典的解释是：偏离了正统的宗教、思想、学说；“视为异端”，是指作为异端被排斥的事物。如果要追根求源，“异端”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之后发展为拉丁语的“haeresis”。

然而，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使用这个词语时，都意指“选择”。这代表着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端”是指“深思熟虑之后所选择的宗教、思想、学说”，而不是“偏离了正统”。既然“异端”只是一种选择，那么就不应该遭到排斥和打击。但是，随着一神教成为主流宗教，就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异端成了不堪入目的东西。如果异端意味着“选择”，那么大家就有共生的可能，承认对方有其一定的道理，作出让步。可是当“异端”代表了错误，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共生、让步，只能在被排斥之前，先排斥对方。

互相视为异端，不仅发生在神职人员之间，平民百姓同样如此。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中两大宗教的诞生地（尽管公元4世纪时伊斯兰教还未诞生）。在那里，就连市井小民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难得有一位不受这种气氛感染的人，曾经就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了以下的描述：

> 无论是在街角还是在广场，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热心地讨论着我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卖布料的、卖食品的、兑换钱的，人人参与其中。如果你想问商品的价格，那么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在得到答案之前，你得先听一番他们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观点。“这位客人，您认为子的地位次于父吗？”

如果你在浴室，问那里的下人水温如何，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您认为圣子是怎么诞生的？”如果你去买面包，店主会先高呼一声“啊!全能的天父”，再告诉你面包的价钱。

阿塔纳西乌斯派与阿里乌斯派的争论在于，前者主张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本体，即三位一体，而后者则认为圣父与圣子二者有别。以上是街头版的教派争论。

教会内部各派别之间相互敌视的状况，让一心想让基督教取代罗马传统多神教的皇帝伤透了脑筋。基督教只有全体一致、上下统一，才能成为帝国的支柱。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不过，在教义争论的问题上，大帝的威信似乎只限于他在世期间，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之后，就不得不经常召开大公会议，试图调解各派之间的矛盾。如果仔细推敲这些大公会议上的论战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传达上帝旨意的高贵的主教们和那些平民信徒有一个共同之处——不肯倾听他人诉求的排他性。其实无论是三位一体派占了上风，还是阿里乌斯派最终获胜，其结果都是一样，因为一神教的本质就是排他。基督教势力不断壮大的罗马帝国也因此逐渐走向排他化。

以上就是“米兰敕令”颁布半世纪之后的基督教教会的现状。尤里安就是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政治舞台。

高卢的尤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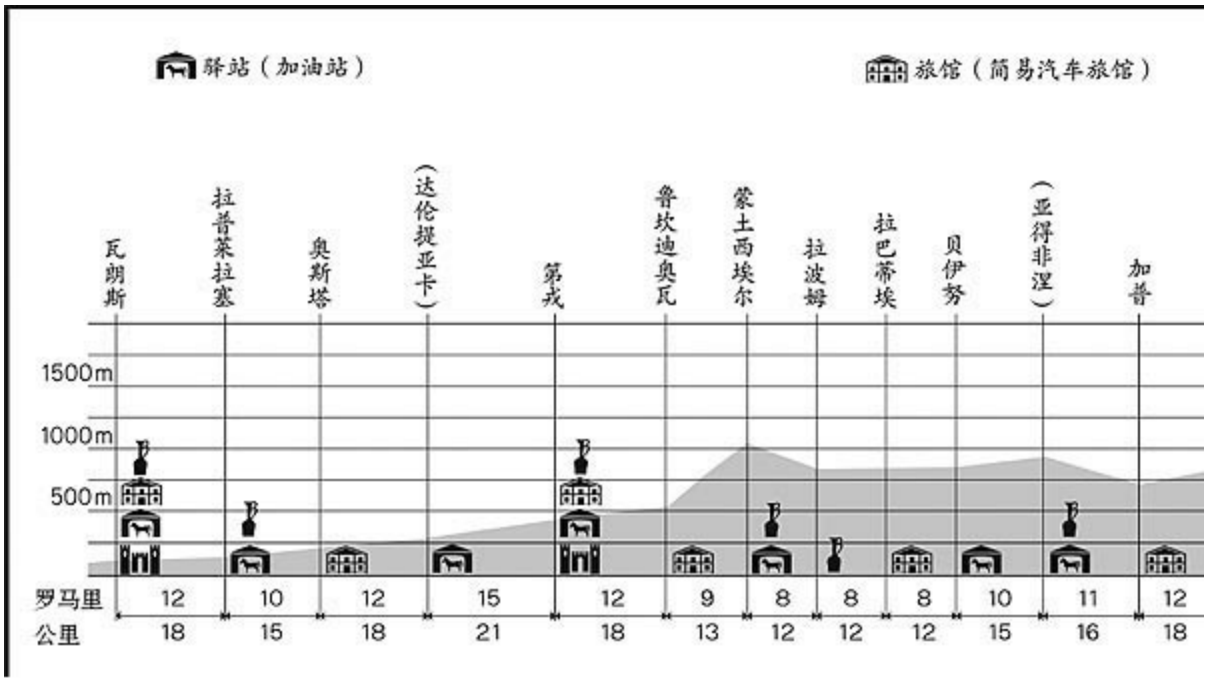
即便是平民，也会尽量避免在寒冬腊月时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至于军人，正如“冬令营”一词所示，冬季可以在营地休息，不用打仗。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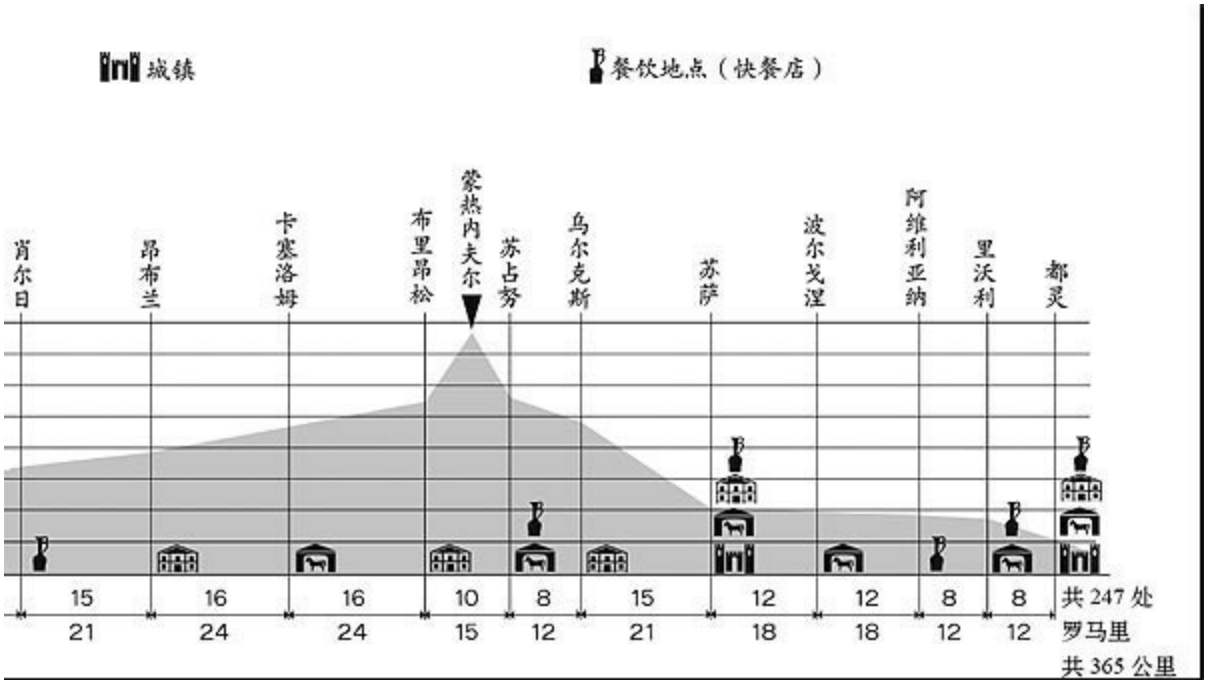
安是地位仅次于“正帝”的罗马帝国的“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在米兰任命这位年轻的堂弟为副帝的日子是公元355年11月6日。按照常理，尤里安可以等到第二年开春之后，再去高卢赴任。何况他刚娶了正帝的妹妹海伦娜。虽然说这场婚姻是奉皇帝之命，但毕竟还在新婚期。可是，尤里安在11月30日就离开了米兰，并且没有带上新婚的妻子随行。当时的他没有行动上的自由，副帝上任未满一个月就前往高卢，可以说完全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决定。与刚满24岁的尤里安同行的，只有360人的卫队。

这是因为高卢形势已经迫在眉睫，还是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心里多少有些置尤里安于死地的想法？

如果以上两种假设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尤里安严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理由或许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为了开春后的战斗，利用冬季休战期进行军队的整编。

尤里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长大。20岁之后获得了一些行动的自由，不过活动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希腊这些帝国的东部地区。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的欧洲，就是乌云笼罩的米兰的冬天，以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





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罗马大道沿线的各种设施（瓦朗斯至都灵）

从米兰出发，翻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前往罗讷河沿岸的维埃纳（Vienne），有两条路可走。

之一，从米兰往西到奥斯塔（Aosta），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从格勒诺布尔去维埃纳，一路上基本都是平坦的大道。

之二，首先从米兰到达都灵（Torino），经过苏萨（Susa）山谷的山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下山后向前走，就是罗马时代称做格拉提亚诺波利斯（Gratianopolis）的格勒诺布尔。

想必在公元355年的冬天，奔赴高卢的尤里安走的就是其中一条路径。这两条道都是罗马式道路，相当于那个年代的高速公路。

Infrastructure在日语里被翻译为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下部结构等。它指的是规模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须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施行的事业。用罗马人的话说，是“为了让人过上人一般的生活所必需的重大事业”。所以，它不是铺了路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罗马人概念中的社会基础，还包括了提供路上行人安全和舒适的保证。从上图可见，即使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这样艰险的路线，沿途相关设施的齐全程度，也足以和现代高速公路相媲美。

然而，只有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这些设施才充分地发挥了效能。我们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可以发现，罗马道路能够维持定期维修的最后时期，正好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终结的年代相重叠。之后，虽然对部分道路进行了数次维修，但仅持续到公元375年。以后，道路就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既然道路的状况每况愈下，那些依靠道路为生的，像旅馆、驿站、马车修理厂等周边设施，势必也是日渐凋零。换言之，与元首制时代相比，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度都大幅度地下降。

基础建设有一个特性。如果在建造当初，基础打得扎实的话，就算是之后无人打理，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能够自主地发挥功效。罗马时代

的那些负责公共建设的工程师曾经留下豪言壮语，说他们建造的道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翻修，也能保证百年的品质。虽然罗马大道以及道路周边设施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功能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前面附图就是根据公元333年，一位从高卢南部的波尔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的勇敢的朝圣者留下的记录制作而成。

由此可见，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结束150年之后，当初建造的公共设施，尽管质量有所下降，但依旧能够正常运转。公元333年，不过就比尤里安首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早了22年。当然，历史上的现象，仅凭一些数字往往是无法追究其实质意义的。公元333年前后，大约是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前的4年，这位皇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在抵御蛮族侵略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尽管无法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相比拟，至少还是维持了“和平”（Pax）的局势。正因为如此，像上述朝圣者那样的平民百姓，才可能只身完成从西欧到中东的长途旅行。

可是，这种“和平”局势在公元350年发生了巨变。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叛乱，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紧接着马格嫩提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打了三年的内战。马格嫩提乌斯死后的两年中，罗马帝国因军事力量的削弱，遭到了蛮族大规模的侵略。在帝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高卢被蛮族把持，东面的意大利则由罗马军防守。自此，阿尔卑斯山脉不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道屏障。自然而然地，人和物资的流通停滞，常驻的人口以及马匹也随之削减，最终导致沿途的各种服务水平发生明显的下降。而尤里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在20年前，一般人翻山通常只需要10天左右，如今，就算副帝一行一路受到特别的礼遇，估计也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翻过高山。而他下山后到达的高卢，也不再像20年前那样，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朝圣者安全便利地旅行。

所幸的是，尤里安很年轻，因此他把这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

卢的旅程，当做是了解帝国西部的绝好机会，在此之前，他只到过帝国的东部地区。

掌管高卢全域的副帝的目的地是维埃纳，而不是由此北上沿着罗讷河20公里之外的里昂。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高卢的局势有多么糟糕。里昂在元首制时代曾经是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金币、银币的铸造厂就设在此地，可见它有着极高的安全性。但是5年前，马格嫩提乌斯在这里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挑起内战，之后始终混乱不断，以至于罗马帝国的副帝也不敢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公元355年年末前后，尤里安到达了维埃纳。维埃纳在罗马时代称做维娜（Vienna），是从格勒诺布尔前往里昂途中的一个小镇。谁也没有料到，它竟然会取代里昂成为副帝的所在地。副帝所谓的皇宫徒有虚名，不过是一间较大的宅子，但对于只被允许带四个下人的他而言，这样的居所反而更符合目前的处境。

与尤里安随行的四个下人，包括两名侍从、一名御医和一名书童。御医与尤里安是知心好友，有他陪伴左右，至少不会太寂寞。尤里安离开米兰时，携带了大量瞒过了检查的书籍（当时的书籍是卷轴装），负责管理这些书籍的就是书童。除此之外，书记员和秘书的工作也由书童兼任。在那个年代，皇帝出巡通常都会带着大批的随从，尤里安副帝那简陋的宫廷，势必让那些来迎接他的人感觉到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宫廷中，能让尤里安相信的就是他带来的四个随从。后来他又召了两名哲学家入宫，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跟着尤里安来高卢的还有数名宫廷里的人，对尤里安而言，得将他们视做皇帝的密探，时刻提防着为好。在高卢，同样布满了宦官的人马，所以在维埃纳恭候副帝的那些大臣大多也是一丘之貉，尤里安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西尔瓦（Sylvanus）的悲惨下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原本是马格嫩提乌斯手下的一名大队长，穆尔萨会战前夕，

他背弃了马格嫩提乌斯，带着手下投奔了君士坦提乌斯，因此，被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高卢地区的骑兵团团长。可是，这个骑兵团团长做了还不到四年，皇帝接到通报，说西尔瓦欲拥兵谋反，夺取皇位。君士坦提乌斯刚扳倒了一个蛮族出身的叛将，所以一听说又有异族将领谋反，顿时变得怒不可遏，对那些宦官的谗言深信不疑。被皇帝当成了第二个马格嫩提乌斯的西尔瓦别无选择，只有据守科隆举兵反抗。为了对付这位在帝国西部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皇帝不得不从东部调来同为罗马名将的乌尔希西努斯。就在尤里安到达高卢的三个月之前，西尔瓦被处决了。

西尔瓦的死亡，使得罗马军队又损失了一名大将。不过对于生性多疑、封闭又绝对专制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证皇位的安泰，因此，无论真实与否，一旦发觉端倪，立即将它掐灭。兄弟三人中，唯有君士坦提乌斯能够长期在位，正是因为他不断地肃清任何可能成为他对手的人。父兄都遭此毒手的尤里安，最需要防备的就是不要落入这位年长他13岁的堂哥所设的陷阱。

尤里安在周遭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开始了他在高卢的生活。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凡事能够相谈、商量、不遗余力协助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Flavius Sallustius，又译萨路斯特），是一位高级军官，如果尤里安算高卢军队总司令的话，他就相当于实际担任军事指挥的副总司令。塞孔杜斯一向远离宫廷政治，是一位生性秉直的武将。就是他教导了尤里安如何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战场上。据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尤里安，因为要来高卢，特地学习了尤里乌斯·恺撒写的《高卢战记》。多亏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塞孔杜斯的帮助，24岁的副帝不仅在军事上，对高卢的内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副帝尤里安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高卢、不列颠（Britannia）以及西班牙（Hispania）三个行省。从军事防卫的角度来看，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安全完全取决于高卢地区是否能够恢复安定。而威胁帝国这些行省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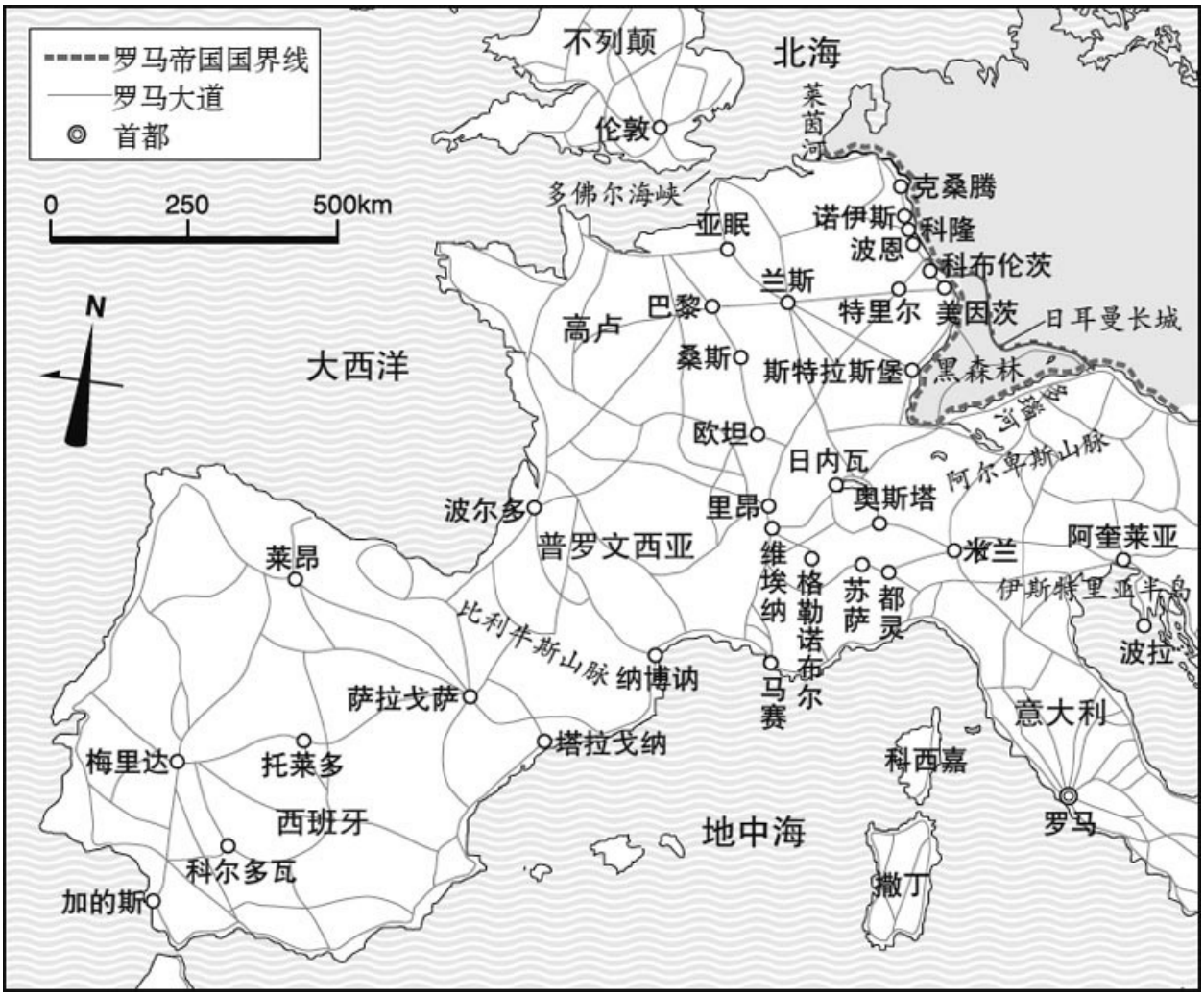
全的，就是越过高卢东部国界线莱茵河的北方蛮族。

事情轻重有别，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问题可以暂且搁置，首先需要集中精力恢复高卢的安全。而源自阿尔卑斯山脉、注入北海的大河莱茵河两岸则是重中之重。

最初将莱茵河定为“防线”的人，是征服了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之后，在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引导下，走向元首制的罗马，将莱茵河的西侧，以摩泽尔河（Moselle）为界，分成上、下游两部分。上游地区称为“高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Superior），下游地区叫“低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Inferior）。两行省都冠以“日耳曼”之名，是因为在恺撒征服高卢时，莱茵河的西岸已经有不少入侵的日耳曼人定居在此。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在公元1世纪进入元首制最初的时期，将莱茵河定为国境。罗马军团的基地通常都会沿着国界线建立。以莱茵河为例，低地日耳曼行省的基地设在克桑腾（Xanten）、诺伊斯（Neuss）、科隆以及波恩；而高地日耳曼行省则设在美因茨（Mainz）、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军团基地几乎是沿着国界线连成了一串。

到了公元2世纪时，黑森林（Schwarzwald）一带也划入了莱茵河与多瑙河的上游地区。罗马人在此建起了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以抵御蛮族的入侵，因此，古代称为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的美因茨以及叫做阿真托拉特（Argentorate）的斯特拉斯堡，就不再是国界线上的军事重地。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演变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之后，以前的军营并没有消失。活用历史遗产，也是城市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手段之一。城中不仅仍然有军队驻守，而且还建起了连接日耳曼长城的道路网，一旦发现敌情，军队可以迅速到达战场。这些罗马式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奔赴前线的军队能够顺利地通过终不见天日的黑森林地带。这就是罗马人对基础建设的要求：要做就要做得有效、彻底。



罗马帝国西部

日耳曼长城曾经在150年间发挥了完美的功效，直到后来发生了罗马当朝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前所未闻的大事件，本土处于危急状态，没有能力再去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问题。受此影响，这个铜墙铁壁才被放弃。在放弃了日耳曼长城之后，公元260年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再次成了军事重地，这意味着当地的居民又不得不再一次面临敌人的直接威胁。

然而，这里的防线也只维持到公元350年。公元355年的年末，尤里安来到高卢时，这里的局势更加恶化。民众以前只是担心外敌的侵略，而如今蛮族早已闯入家园，烧杀掠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公元350年发

生的杀死君士坦斯皇帝及其主谋者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军事叛变。为了抵抗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领的讨伐部队，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军队损失了2.4万人，这些人原本都是防守莱茵河的官兵。这个时期，蛮族越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境内尤其严重的原因，主要是高卢的防守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二。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叛乱，在公元353年以他自杀而告终。然而，平息战乱之后的高卢并没有能够恢复到战前的形势。这场罗马军队自相残杀的内战，造成了高卢的防守军力严重削弱。

尤里安被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下的高卢，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以多瑙河的战事需要兵力为由，没有给他支援的兵力。虽然有一些招兵买马的军费，不过，皇帝批准的金额与实际的需要相差甚远。按常理判断，无论他如何努力，高卢地区最多也就是维持现状了。如果尤里安满足于身上那件副帝的斗篷，那么他只需小心谨慎，不引起正帝的猜疑，就能保住这个挂名总司令的位子，太平无事地坐守“政府”所在地维埃纳。万一发生不测，维埃纳地理位置良好，能确保他能成功逃离。他可以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东部，也可以沿着罗讷河南下，到达古称“普罗文西亚”（Provinciàe），即现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那里当时还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

积极作战

24岁的尤里安放弃了所有可以让他安身保命的选择。第二年一开春，人和马匹刚开始有了精神，他就即刻离开了维埃纳，既不向东也不向南，而是直奔北边。

公元356年是尤里安就任副帝的第一个年头。这年他接获的第一个报告是：欧坦城（Autun）遭蛮族大举侵犯。所幸的是，居住在当地的退役军人重新拿起武器，支援守备部队，避免了全城陷落的危机。当时尤里安手里只有一队弓箭手和一队重装骑兵，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带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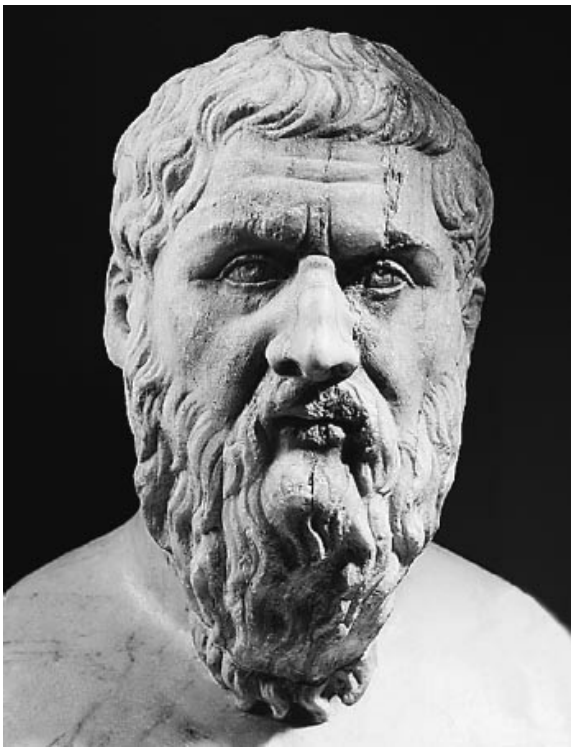
军队开赴欧坦。

从维埃纳到里昂，如果走大路，只需要沿着罗讷河往北，从罗讷河与塞纳河交汇处的里昂继续北上就是欧坦。不过，大路行军容易暴露，总共才千余人的军队，要是遇上万人以上的敌人，必死无疑。尤里安决定放弃平地，改走直线距离较短但道路艰险的山路。势单力薄的小部队也有着机动灵活的便利之处。

欧坦在罗马时代称为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四周城墙高筑，城防要塞处还建有监视塔。城内不但有模仿罗马斗兽场而建的圆形竞技场，还有两座半圆形的剧场。两条主干道在市中心广场交接，从这里经过四方形的城门，就是城外。欧坦的民宅，按照罗马式的都市结构均匀地分布在城内的各处，街道垂直交错，犹如围棋盘上的直线，一旦敌人来袭，军队可以毫无障碍地迅速集中，投入战斗。整个欧坦似乎就像一座罗马军团基地。虽然蛮族人多势众、勇猛顽强，但是他们缺乏战略，也就是说不懂得有效地运用兵力，而且在当时又尚未掌握多方进攻的战术，因此像欧坦这样一个兵力不多的中等规模城市，也能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成功地击退敌人。尤里安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遭到频频的进攻，像欧坦这种小地方也可能靠仅有的兵力自保安全。既然如此，与其坐等敌人来袭，不如主动出击。尤里安决定一路向北追击敌人。他下令除了普罗文西亚之外，所有散布在高卢全境内，准确地说，是躲在高卢境内的残余部队，在兰斯（Reims）集合，他本人也离开欧坦前往兰斯。

兰斯古称杜罗科托鲁姆（Durocortorum）。古罗马时代，这里是七条罗马大道的交会处，在北高卢地区属于数一数二的重要城镇。散落在各地的军人来这里集合不仅便利，军队由此向东，经过连接着的罗马大道，就可以抵达目的地高地日耳曼行省。莱茵河上游以西的广大地区盘踞着大量的阿勒曼尼人（Alemanni），尤里安将他们定为第一个扫荡的目标。

据称，最终有2万名左右的罗马士兵在兰斯集结，这批人即将挑战的是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阿勒曼尼人。按照正常的思维，尤里安的这种行为属于有勇无谋。然而年轻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过，年轻人也容易动摇，上一刻还自信十足，下一刻就可能变得忐忑不安。这个时候，尤里安都会放声大喊，宣泄一下压力："啊！柏拉图！柏拉图！我这一介哲学门徒怎么能做这样的大事！"



柏拉图

在统称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中，尤里安要面对的阿勒曼尼人属于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一支。当时活动在莱茵河流域的蛮族，下游一带主要以法兰克人（Franken）为主，而中、上游地区就是阿勒曼尼人。而从北向南侵入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人主要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夸地人（Quadi）以及强大的哥特人（Goth）。如果将他们视为威胁多瑙河防线的敌人的话，那么莱茵河一带要对付的日耳曼人就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

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将法国占为己有，法兰西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同一个时期阿勒曼尼人也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这里之后成了德国与法国的兵家必争之地。"阿勒曼尼"这个名称带着浓厚的德意志色彩，而法兰克人则被视做法兰西人的祖先。不过追本溯源，这两个民族都是来自日耳曼的同胞兄弟。因此，对于试图恢复高卢安全稳定的罗马帝国副帝的尤里安而言，不管是阿勒曼尼人还是法兰克人，都是北方蛮族。

这两个部族一个从下游入侵，另一个从中上游入侵，虽然入侵的地点不同，但他们最后都越过了莱茵河，一路烧杀掠夺，沿岸的城市科隆、波恩、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以及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无一幸免，至于那些防卫能力无法和城市相比的乡村，最终只剩下一片无人的废墟。

因此，尤里安以古代称为鲁特西亚（Lutetian）的巴黎为界，将高卢分为东、西两块，把击退蛮族的战场选在界线以东的东高卢。他的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准确地说，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于是，24岁的副帝率领着在兰斯集结的几乎全部的人马，向东搜寻敌人。然而，阿勒曼尼人长年出没于这一带，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神出鬼没，难见踪影，而年轻、经验不足的尤里安，又没有出奇制胜的战术。那一天，他们行走在乌云密布的丘陵上，队形拉得又细又长，仿佛在没有敌人出没的后方行军。

尤里安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列，不断地给身边的士兵打气。而此时后面的队伍已经遭到了大批悄然而来的敌人的猛烈袭击。当他发现情况时，大部分的殿后官兵已经倒在了阿勒曼尼人的弓箭、标枪之下。根据记载，尤里安损失了2个军团。公元4世纪时一个罗马军团的规模，既不是共和时期的4000人，更没有元首制时代的6000人，最多也就在千人左右。即便如此，2000兵力的损失，对尤里安而言仍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次的教训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战场上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谨慎和警戒才是关键。

尤里安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因首次的出击不利而畏缩，而是坚持了以攻为主的战略方针。任何人都难免失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早地挽回失败。他率领的部队没有撤退到安全的兰斯，而是继续往东前行。与此同时，尝到了胜利滋味的阿勒曼尼人，决定与罗马军展开正面交锋。

第二次战斗完全在罗马人的意料之中，因此采用了他们传统的会战方式，获得了胜利。尽管没能将敌人一举歼灭，但这次胜利让尤里安在军队中树立起了威信。当这位年轻的副帝下令继续朝莱茵河方向前进时，没有人提出反对。

历经6年左右的时间，罗马军终于重新回到了莱茵河沿岸。但是映入他们眼帘的科隆，是被敌人蹂躏之后倒塌在凄风苦雨中的一片废墟。不仅当地的罗马人逃离了这里，蛮族人在烧杀抢劫之后，也弃之而去。科隆破落不堪的景象，让来到这里的罗马军人无言以对。

当时科隆正式名字叫“科洛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后人将拉丁语中意为“殖民都市”的Colonia转译成德文，才有了如今科隆这个名字。与前身是军团基地的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不同，科隆的兴起与恺撒有关。当年恺撒在征服高卢之后，发现居住在莱茵河东侧的日耳曼人中的乌必耳（Ubier）一族倾向于罗马，于是令他们一族集体迁移到莱茵河西岸，渐渐形成了科隆这一城市。科隆是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才升格为“科洛尼亚”，即殖民都市。不过在此之前，它已经属于莱茵河防线的重地，经常成为在前线越冬的司令官及其部队的冬令营。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就是在其父的科隆军营中长大的。这里顺便提一句，与科隆相似的城市还有伦迪尼乌姆（Londiniensium，伦敦），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取代了由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约克、切斯特，成了不列颠行省的首府。

寒冬不断逼近，冷雨潇潇中的科隆如死一般地沉寂。可就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车水马龙、人和物产交流频繁的热闹城市。科隆沦为废墟，意味着莱茵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站在废墟之上、亲眼目睹惨状的尤里安，恐怕到这个时候才真正下决心，他要重建莱茵河防线，恢复周边惨遭破坏的地区。尤里安命令部队掉头向西，前往桑斯（Sens）越冬。可是，当部队平安抵达桑斯、士兵刚被送到冬令营不久，又遇到了阿勒曼尼人的袭击。

桑斯位于巴黎东南100公里、兰斯西南150公里处。这里也建有城墙，但城镇整体规模不及兰斯，因此冬令营只能建在附近的村镇。桑斯不像里昂或巴黎，有可以退守的沙洲，一旦敌人围城，很难坚守得住。当阿勒曼尼人袭击桑斯时，尤里安向在附近冬令营的骑兵团长官发出了紧急救援命令，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援兵，他只能依靠手中仅有的兵力以及当地居民的协助，来打这场凶多吉少的仗了。

所幸的是，蛮族围攻30天未果，悻悻然退兵离去。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习惯了寒冷的气候，但是寒冬腊月在毫无遮掩的平原上安营扎寨，毕竟还是太严酷了。30天的保卫战，再一次让尤里安赢得了声誉。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的无所畏惧、坚持到底的精神，受到了官兵的赞赏。想来年轻的副帝也通过这次教训，学到了冬令营选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日耳曼民族

公元357年，春天来临之际，尤里安迎来了他在高卢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他25岁。

在率军开拔之前，尤里安已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解除了原来的“骑兵团长官”（magister equitum）马塞勒斯的职务，由经验丰富又勇敢擅战的老兵塞维鲁斯（Severus）取而代之。桑斯告急之际，尤里安给马塞勒斯发出了求援令，马塞勒斯百般搪塞，最终没有执行命令。因此，作为高卢地区总司令的尤里安，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马塞勒斯的官职。为了有效地击退频频来犯的北方蛮族，当时罗马军的主力，已经从传统的重装步兵转为骑兵，骑兵团长官的角色可谓是重中之重。尤里安对马塞勒斯的处置，相当于总司令革了副总司令的职。

这种事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引发震动，何况尤里安的这一举动

势必会触怒宫廷。但他还是冒死作出了决定。高卢地区绝大多数的高官都是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钦定的，尽管作为副帝，尤里安握有高卢的人事权，解任手下合情合理，但他自己的脑袋能否保住，完全要看正帝乐不乐意了。

尤里安的兄长加卢斯，在担任副帝派驻叙利亚期间，曾经以过激的手段除掉正帝派来的两位官员。他将这两个人像祭品般地丢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情绪失控的民众活活地将他们杀死。加卢斯的行为，正好给那些希望他倒霉的人制造了机会，而他的结局也证明了一点：胆敢违背正帝意志的人，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里安是加卢斯的弟弟。加卢斯最终是被斩首处死的，而下令杀死他哥哥的正是当下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君士坦提乌斯。所以，尤里安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作出了以上人事决定的。

在维埃纳的时候，尤里安发现那些主管内政事务的官员虽然没有露骨的反抗，但对他始终是阳奉阴违。不仅是文官，在这一年的军事行动中，那些高级武官的行为多半也是消极怠慢。因此，尤里安拼死也要向所有的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让这种消极的态度在军中继续蔓延，击退蛮族的目标就会化做泡影。尤里安杀鸡儆猴，解除马塞勒斯的官职，向全军显示了他的决心。

与兄长加卢斯不同，尤里安是以总司令的身份解除了骑兵长官的职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当初任命马塞勒斯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但那是尤里安做副帝之前的事情。尤里安上任之后，高卢的人事权就属于他的权力范围。尤里安的行动证明，想从阴谋的旋涡中脱身而出，选择堂堂正正地从正面突破，大多要比察言观色、步步为营来得更有效。结果，尤里安曾经再三请求也没求到的援兵，这一次皇帝竟然欣然点头答应。

尤里安决定延续前一年的做法，公元357年的军事行动也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不过，鉴于去年的失败教训，他在部署上做得更为谨慎。

首先是兵力。尤里安的军队，精确的人数是1.3万人。在元首制时代，除指挥官之外，现役（Juniors）军人的年龄定为17岁到45岁。帝国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20年兵役期的规定已形同虚设。“老兵”（veteranus）在元首制时代，是退役军人的代名词，到了后帝国时代，兵役期限模糊不清，“老兵”的意思变成了现役军人中超龄的老战士。另一方面，利用非敌对的蛮族作为雇佣军，已成了军队的常态。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兵，退伍之后恢复平民生活，这种罗马军人传统的生活形态，这些蛮族人几乎完全没有共鸣，因此也不存在退不退役的问题。

尤里安掌握的1.3万人的兵力，之所以说数字精确、不含水分，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元首制时代“现役”军人的概念挑选的。换言之，这1.3万人是实打实的精兵强将。

话说回来，就算是精兵强将，1.3万人也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2个军团。这种规模的军队，交给军团长指挥即可，根本不需要总司令亲自出马。即便是局势最为稳定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如果皇帝亲自出征，至少要带5万人以上的军队。

不幸，主导世界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成为历史，进入了一个混乱不堪、无秩序的年代。罗马帝国的副帝不得不率领区区1万余人的军队亲自出征。5年前，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率军对抗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他手下都有3.6万人。这些人最终有2.4万人战死沙场，他们大多都来自高卢。当下的罗马帝国，即使面临外敌的严重威胁，也没有能力再去补充因内战而损失的兵力。而阿勒曼尼人族长克诺多马（Chnodomar）此时正率领着3.5万人的大军，等候着尤里安这1.3万人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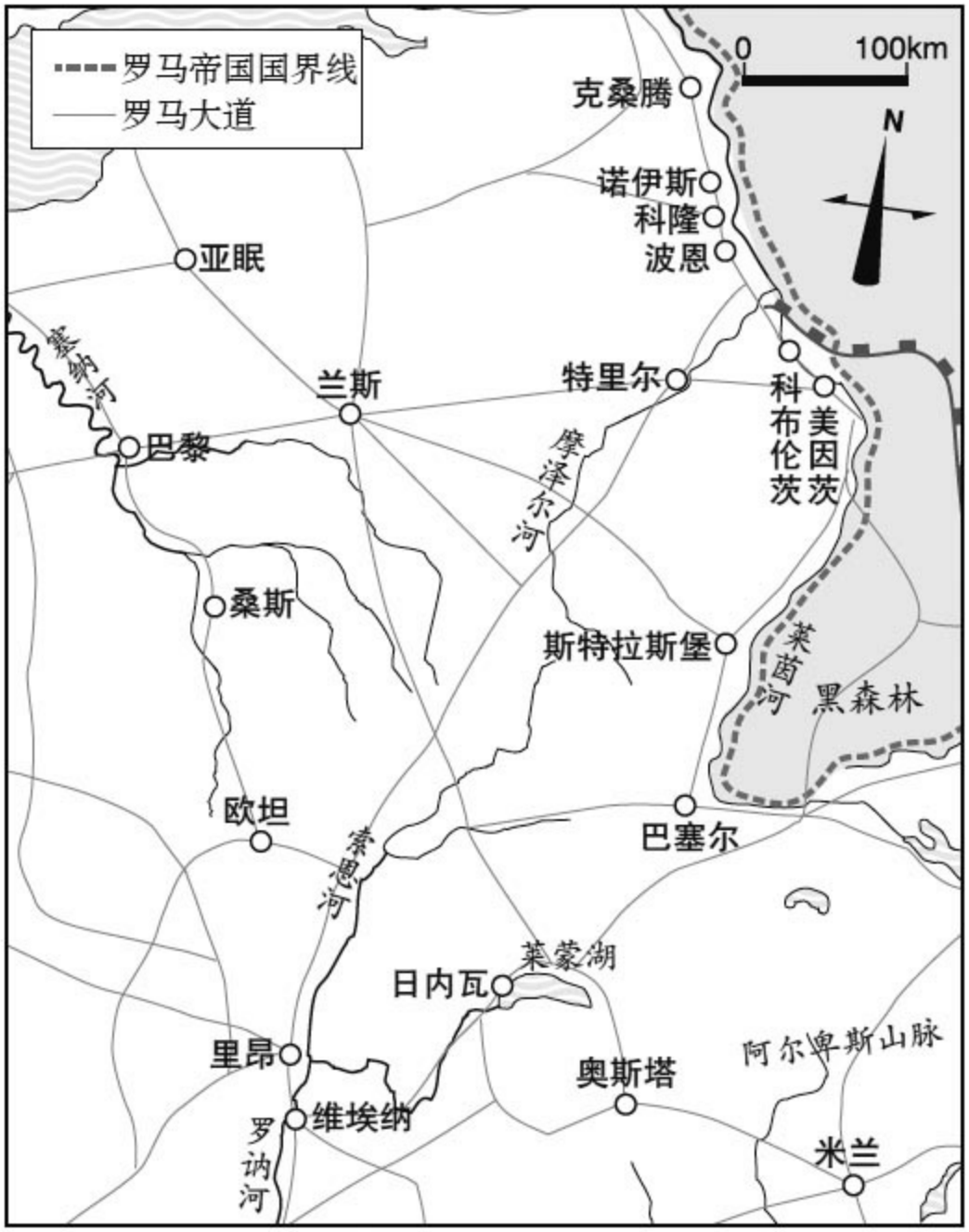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的战役尤里安得到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支

援，巴尔巴提奥（Barbatio）将军带着3万人马，已经从米兰开拔，往北行进。

尤里安与巴尔巴提奥联合作战的计划原本是这样的：

首先是尤里安率领1.3万人的军队，从桑斯出发，向东直抵斯特拉斯堡。阿勒曼尼人在这两三年中，以攻占邻接莱茵河西岸的斯特拉斯堡为目标，将这里作为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前线基地。

另一边，巴尔巴提奥率领的3万大军，从米兰出发，渡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大小湖泊，穿越险境，到达斯特拉斯堡以北的莱茵河沿岸城市巴塞尔[Basil，罗马时代称为巴塞利亚（Basilea）]，从巴塞尔附近渡过莱茵河，向北进军。这一带原本属于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如今已经成了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



高卢东部

如果大本营失守，盘踞在斯特拉斯堡周边的阿勒曼尼人为了保卫后方家园，势必会渡过莱茵河往东撤退。这个时候，尤里安就可以伺机领兵追击。虽然只有1.3万人，但足够用以追击节节败退的敌军。这次联

合作战的目的就是通过南、西两面夹攻，一举歼灭渡过了莱茵河、在高卢内部肆虐的阿勒曼尼人，直捣他们的老巢。

可是，在行军前往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尤里安接到报告，说巴尔巴提奥的军队攻打到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附近，突然停了下来。部队在原地待命了数日之后，掉头回米兰去了。而且他们在待命期间，曾遇到阿勒曼尼人的一支分队，却完全没有行动，任由敌人扬长而去。

巴尔巴提奥为何做出这般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其理由无人可知。根据后世的历史学家推论，可能是巴尔巴提奥猜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建功，所以在他成为战争英雄之前，以“久候不至无奈撤兵”为由，撤回了米兰。所谓的猜测，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诠释他人的内心。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个从不肯暴露自己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绝对专制的弊害之一，就是臣子需要去猜测主子的心思。总而言之，原本至少可以解决一半问题的联合作战，还没开始就灰飞烟灭了。

如果说这次事件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尤里安深刻地体会到，依靠他人的力量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25岁的副帝下定了决心，以1.3万人的兵力去迎战3.5万人的敌军。

斯特拉斯堡大捷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弱势的一方就越不利。有一种战略是如果不能一战定乾坤，大获全胜，可以通过每一次的局部胜利累积战果，最终达到目的。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伴随着牺牲，结果是捷报连连，死伤惨重。这个现象欧洲人称为“皮洛士的胜利”（Pyrrhic victory）。这句话的典故起源于希腊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公元前3世纪，罗马正在争夺意大利半岛的霸主之位，皮洛

士是他们的强敌之一。尽管战场上皮洛士不断地打败了罗马人，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不得不撤兵逃回伊庇鲁斯。罗马最终能够打败皮洛士这位军事天才，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发挥了功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战争中的损失。

然而，所谓尽快挽回损失的是最后赢家的理论，并不适合在敌占区作战的场合。在兵站不能充分发挥功效，即后勤供给不足的敌方打仗，将军们通常会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平原布阵，在士兵雄壮的呐喊声中拉开序幕的会战方式，就有这样的优点。

被后人推崇为名将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以及恺撒都喜欢通过会战的方式一决雌雄。这并非他们天性喜好壮观的场面，而是因为都在敌方的根据地打仗。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非常明白小隙沉舟、滴水穿石的道理。即使少量的损失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虽然说尤里安的仗是在国内打，但就各种实际情况而言，形同在敌方作战。这位25岁的总司令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仗决胜负。

斯特拉斯堡古称阿根图拉特（Argentorate）。由此向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做“托雷斯·达维那”（意为路边小饭馆）的小镇。它是罗马大道沿线提供旅人落脚住宿的村镇之一。莱茵河的支流从这里经过，地势平坦，适合作为野战的战场。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从后续的行动推测，应该是在春末初夏，气候上也有利于战情。

为了迎战罗马军，阿勒曼尼人的族长克诺多马带着1.5万人的兵力，从大本营出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渡过莱茵河，到达斯特拉斯堡。当初他们从罗马人手中夺得这里，将之作为罗马境内的前线基地，因此势必会安排自己人在此驻守，加上这些人，克诺多马在战场上投入的实际兵力应该超过了4万人。

斯特拉斯堡作为罗马军团的基地已经有350年的历史，高墙四起的

军营占了半个城市，犹如城中之城。这里的军营建立于元首制时代，一个军团编制为6000人。由于经济力量强大，军营造得坚固扎实，设施完备。因此，不管是哪一方拿下这座城镇，都会将此地作为前线基地。阿勒曼尼人自然亦是如此。由于阿勒曼尼人在人数上占了优势，所以，当老当益壮的族长克诺多马建议出城打野战时，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这对尤里安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要他1.3万人的军队去攻破那牢不可破的军营，可以说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罗马军编成两路密集的纵队，向着对面横向排列、人数在他们3倍以上的浩浩荡荡的阿勒曼尼大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尽管队形狭窄，罗马军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排成左翼、中央、右翼的阵势。左翼由塞维鲁斯指挥，总司令按照惯例负责中央，由辅助兵打头阵，主力军紧接在后。尤里安和他率领的200人的近卫队，站在前卫与后卫之间的位置。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被敌人包围。“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先发制人的是罗马军团右翼的骑兵团，位于中央的步兵团紧跟其后往前冲锋，而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却按兵不动。他们必须等到躲藏在丘陵后面的敌人现出原形，才能发起攻击。

蛮族人的战术到了公元4世纪仍然非常原始，就是骑兵团冲锋在前，步兵大批人马紧跟在后，一鼓作气冲进敌阵。这种单纯的作战方式，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也相当奏效，眼看着胜利在望。

双方骑兵的厮杀，一开始蛮族人明显占了上风。罗马骑兵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不敌，放弃了战场，逃回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敌军的中间部队也突破了罗马军前卫的防线。

此刻的尤里安，从总司令变身为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勇猛的战将，他带着200名骑兵策马扬鞭，一边呵斥着逃跑的骑兵，一边激励着乱了阵脚的前线步兵，及时地扭转了几乎败北的战局。所幸的是，骑兵团迅速地重整了队伍，作为主力军的后卫，面对大批压上的敌人，没有

丝毫的退缩。而躲在丘陵后面的敌军右翼部队，终于按捺不住纷纷现身，正好被等候多时的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部队逮个正着。

形势至此，就是罗马军控制战局了。战场上的输赢，往往不是哪一方人多，而是看谁能掌控主导权。当1.3万人的罗马军发起全线进攻时，3.5万人的阿勒曼尼军队节节败退，仓皇逃命。他们企图越过莱茵河逃回对岸，罗马军则紧追不放，一直追到莱茵河边。

阿勒曼尼人包括族长克诺多马在内的大批官兵被俘；6000余人战死沙场，还有很多人被莱茵河的激流卷走。罗马军方面，牺牲了4名队长以及243名士兵。这次“斯特拉斯堡会战”是罗马帝国后期战史上，少有的一次大获全胜的战役。

会战结束后，尤里安接见了被俘的克诺多马。年轻的副帝对这位老族长，一直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将克诺多马与胜利的战报一起送给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诺多马后来被转送到罗马，在西里欧（Celio）山丘上的军营度过了余生。

尤里安

“斯特拉斯堡会战”为尤里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威望。在官兵们的眼里，他是无上荣光的大英雄。尤里安觉得士气可用，趁着冬天未到，领兵渡过了莱茵河攻入敌境。所谓的敌境，原来是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地带，就在百年前，这里还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当年罗马军留下的军营、要塞随处可见，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一次由于时间和兵力上的限制，尤里安的军队没能彻底捣毁敌军的老巢。然而，年轻的副帝能够目睹帝国昔日的荣光，已不虚此行。打败蛮族、获得斯特拉斯堡大捷的尤里安，眼下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帝国

的“凯旋将军”。

副帝及其军队用比蛮族人更野蛮的方式，破坏了阿勒曼尼人的根据地之后，随着秋天的到来，渡河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准备在鲁特西亚（Lutece，今巴黎）的冬营地度过公元357年年末到358年年初的休战期。

公元356年以及357年，当副帝尤里安以莱茵河畔为舞台，勇敢对抗阿勒曼尼人的同时，在多瑙河沿线，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也在积极应战，履行着罗马帝国皇帝保家卫国之职责。他的对手是萨尔马提亚人和夸地人，早在元首制时代就不断地骚扰、威胁着帝国国境。同为指挥官，君士坦提乌斯与始终战斗在前线的尤里安不同，他几乎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大后方米兰。

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异，不仅是因为正帝与副帝的地位不同，更主要的是尤里安只有1.3万人的兵力，而君士坦提乌斯手里掌握着10万大军。因此，皇帝可以放心地将战场的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将军。不过，敌情吃紧的时候，他也会在战场露个脸，给战士们打打气。这个事事效仿父亲的人，与他身先士卒的父亲不同，通常都是在战斗打到尾声才会出现。当侵入多瑙河以南大片土地的蛮族被击退之后，他才亲自出马，率军渡过多瑙河北上追击。

或许是因为多瑙河沿线的战役胜利在望，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357年的春天首次造访了罗马，此行公开的目的是举行凯旋仪式。他的这个举动，似乎也是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提乌斯及其随行，从米兰出发，穿过埃米利亚大道到达亚得里亚海。渡海之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行，在4月28日到达罗马。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生平第一次目睹了这座不朽的城市。

罗马最后的凯旋仪式

帝国首都罗马的人民，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仪式之后，45年来首次看到了皇帝的身影。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已有1110年的历史。但是，当70年前帝国走向君主专制化之后，罗马这个“国家大脑”的角色也被他城取代。曾经被世人憧憬的“世界之都”，如今却沦为专制的君主为举行凯旋仪式，心血来潮过来看看的地方。

有关君士坦提乌斯在罗马的情形，我将引用一位军人的文章来代叙，从他当时所处的立场来看，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在场证人。

这位军人的名字叫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于叙利亚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他的出生年月不详，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元330年。若真如此，那么他与尤里安同龄。在商业城市安条克，那些社会地位高贵、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流社会出身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经商。但阿米阿努斯选择了从军之路，他好像是刚成年就加入了罗马军团。

由于出身高贵，阿米阿努斯一入伍，就获得了将官级的待遇，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著名的战将乌尔希西努斯将军的幕僚。他跟随这位将军，打过西面的多瑙河战役，也奔赴过东面的幼发拉底河战场……历经了几十年东征西战的戎马生涯，在45岁左右离开了军队。他引退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之后，他游历帝国各地，也曾经在罗马小住。

做回一介平民的阿米阿努斯开始写作。他雄心壮志要续写塔西佗记述到公元69年的《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如果读希腊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接力赛式的记述方式，对古代的历史学家而言，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与塔西佗的作品一样，阿米阿努斯所著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亦译作《晚期罗马帝国史》。——译者注）也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最初的13卷不知下落，所幸的是，从公元353年的加卢斯副帝时代到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大败25年间的文卷还在。这个

时期，对阿米阿努斯而言，是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史”，他留下的这段记录，正可谓是“同时代人的证言”。

尽管罗马帝国是一个双语国家，但对希腊裔的阿米阿努斯而言，希腊语才是他真正的母语。不过他著书时却使用了拉丁语。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出身贵族，罗马上层社会的教育，向来是要求同时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二，他要续写的是塔西佗的作品。塔西佗被称为拉丁散文第一人，既然是接力，那么就应该按照前者的语言续写历史。其三是阿米阿努斯曾经历过长年的军团生活，习惯了使用拉丁语。当时帝国皇帝颁布正式公告，采用了多种语言，帝国东部是希腊语，帝国西部则是拉丁和希腊双语。唯有罗马军团内一律采用拉丁语。

这位武将出身的历史学家文笔不错。文体虽然不是精心雕琢，但文字简洁明了，很符合其军人的气质。所以，后人将他视做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史学家。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访问罗马时，如果阿米阿努斯是随行之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段叙述，就是当年这位27岁的武将的亲身感受：

> 西部和东部的问题尚未解决。然而，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好像已经关闭；敌人似乎已经彻底被消灭，君士坦提乌斯打算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所谓的凯旋，其实是马格嫩提乌斯之乱引发的罗马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依照罗马的传统，根本就没有资格举行这个凯旋仪式。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外敌，就算获胜，那也是他手下将军们的功绩。没有任何人在危险的战场上见到过他的身影。即便如此，他还是要举行凯旋仪式。……
>
> 为了这场凯旋仪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从北而来的行列，距离罗马城墙还有130公里，却已经整好了随时可以冲锋的队形。全副武装的士兵延绵不断，占据了整个街道。看到这久违的景

象，沿途的百姓不禁欢呼、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战车上的皇帝。

尽管皇帝的队伍还远在天边，元老院议员和罗马的贵族们全体出动，早早恭候在罗马城门前。这些只剩下昔日光环的人，对皇帝恭敬的态度和不遗余力的赞美，让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当他看到这些人后面的大批民众时，他没有掩饰住惊愕的表情。他终于明白，帝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像罗马这样，容纳如此众多的民族和人种。

皇帝的战车穿过人群，一路前行。镶满了宝石的黄金战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绣着金龙的紫色皇帝旗，伴随在战车左右，迎风吹起的旗帜像一条不停扭动的长蛇。战车的两侧有两个纵队的士兵护驾，他们的头盔、胸甲和盾牌为了今天的凯旋仪式，特地磨得锃亮。穿着波斯式全身铁甲的骑兵队，看上去不像真人，宛如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制作的铜像。

被士兵簇拥着的君士坦提乌斯，无视民众的欢呼，纹丝不动地站在战车上，由始至终维持着君主在臣民面前的威严形象。战车造得实在太高，穿过拱门时，连小个子的他也不得不低下头才能通过。罗马人喜欢用拱门来装饰街道，所以一路上他得不停地低下头去。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动作，战车上的皇帝始终眼望前方，目不斜视，似乎脖子得了不能转动的毛病。如果此时有谁说那不是真人，是座雕像，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深信不疑。

途中，有一根车轴出了故障，车身突然倾斜，但这也没让君士坦提乌斯改变姿态，甚至脸上的表情。这一路上，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摸过鼻子，没有动过嘴巴，连手指也没有动过一下。

这是性格封闭的他用来炫耀的方式。他相信这种伫立不动的姿态，是显示他至高无上地位的最直接、最佳的表现方式。在位期间，他从不与人同坐一辆马车，也绝不和任何人分享他所占有的公权力。这些之前的皇帝都能做到的事情，他却因为那近乎病态的虚荣心而无法办到。

皇帝的队伍终于开进了罗马城，这个竭尽人类之能创造的帝国

圣地。

队伍笔直地向城中心前行，通过街道，进入了罗马广场。密密麻麻矗立在广场上的那些象征着罗马曾经辉煌和荣光的纪念碑，到底还是让君士坦提乌斯震撼得目瞪口呆。他的视线所到之处，都是承载着罗马历史的建筑物。注视着这些建筑，回顾成就它们的那些光辉时代，势必会让后人备感压力。

君士坦提乌斯先在位于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场，对议员与权贵们发表了演说，又在会场外的讲坛上，面对聚集的民众再次演讲。当他到达历代皇帝居住的帕拉蒂尼山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君士坦提乌斯面无表情的脸部，终于因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快乐而变得有些松弛。

接下来的数日，按照历代皇帝的惯例，君士坦提乌斯主办了竞技大会，颁布了几条利民的政策。这些利民政策事先作过周全的考虑，既取悦于民却又没有过度放纵，以免百姓陷入毫无节制的生活。话说回来，皇帝对其他城市的人民的一些限制，并没有强加给罗马市民，想来是考虑到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和现状所作出的决定。

皇帝在罗马逗留期间，连日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由七座山丘所组成的城市，不仅是城中，就连远离市区的郊外城墙都不落下。他似乎有一种今天不看，明天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美好景象的紧迫感。不过，他的这种不安，到了次日必定会被再次出现在眼前的壮观场面所拭去。

矗立于帕拉蒂尼山之上、奉献给众神之神朱庇特的壮丽的神殿，令人深感天神之永恒和人类之有限；巨大的公共大浴场，仿佛可以容纳整整一个行省的人民；使用蒂沃利（Tivoli）产的巨石所建造的圆形竞技场（Colosseum），规模之雄伟使人为之目眩神驰，献给天地诸神的万神殿（Pantheon）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穹顶以及柱身环绕浮雕，柱体内有螺旋楼梯直通柱顶的图拉真记功柱（Trajan’s Column）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纪念柱，还有众多的神殿、广场、半圆形剧场、音乐厅和竞技场……点缀“永恒之

都”（urbis aeternae）的所有的景象，皇帝无一错过。

某一天，皇帝造访了图拉真皇帝广场（Forum Traiani），这个由人类创造、足以让诸神也赞叹不已的气势恢弘、独一无二的地方。君士坦提乌斯惊叹得哑口无言。他似乎觉得贵为皇帝只会赞叹有失身份，提出要效仿位于广场中心的图拉真皇帝的骑马像，为自己也建造一尊雕像。此时，站在他身边的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Ormisda）回答说：“皇帝，在雕塑骑马像之前，何不建造一个不亚于这个广场的马厩？好让您骑的御马，有足够的空间昂首阔步。”

奥米斯达的揶揄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闭上嘴巴。但他似乎又不肯服输，便反问奥米斯达这几日对罗马的观感。于是这位波斯的贵族说了下面这段话：

“当我想到创造出如此宏伟大业的人们，最终也不免一死，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

遍布于“永恒之都”的各种壮观的建筑物，在共和时期由凯旋将军、在帝制时代则是由皇帝兴建，献给人民，即献给国家。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既然举行了凯旋仪式，也应该依循前例做些什么，但他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罗马城中已应有尽有。他那个仿照矗立在巨型图拉真广场中央的图拉真皇帝骑马像的想法，不过是黄粱一梦，然而身为凯旋将军，不留下点什么纪念有违传统，就连他父皇君士坦丁大帝，也曾经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公共浴场。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决定在大竞技场边上建造一座方尖碑（obelisk）。这座方尖碑原本是君士坦丁大帝令人从埃及内陆找来，打算建在君士坦丁堡的，因大帝病故而被一直放置在亚历山大港，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将它运到了罗马。大竞技场边上其实已经有一座方尖碑，那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打败了安东尼——克娄巴特拉联军后，从埃及带回的战利品。能够容纳15万人的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是为了战

车竞赛而建，罗马人除了热衷于勇士斗剑之外，同样也热爱赛车。跑道的中央有一段横向延伸的、被称为背骨的带状区域，君士坦提乌斯所赠送的方尖碑就被安放在这里，与奥古斯都所建的方尖碑并列而立。顺便提一下，奥古斯都的方尖碑后来被移到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保留至今，而君士坦提乌斯的那座，目前竖立在罗马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乔万尼大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广场前。

在罗马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动身前往北方。多瑙河前线再次告急，若放任不管，之前刚举行的凯旋仪式就变得像一纸空文。幸好手下的将官们成功地阻击了来犯的蛮族，君士坦提乌斯得以回到米兰越冬。

另一方，在巴黎越冬的尤里安决定在下一年，即公元358年，将战线移至莱茵河的下游。从公元356年到357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狠狠打击了盘踞在中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人，接下来的目标是法兰克人。这一次的准备，已经不像最初时那般辛苦，在高卢第三次越冬的尤里安与他手下的官兵，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同心协力的良好关系，对他们而言，下一场仗不过是之前战役的延续而已。这时候的副帝总算有了余力，将心思转到高卢内部的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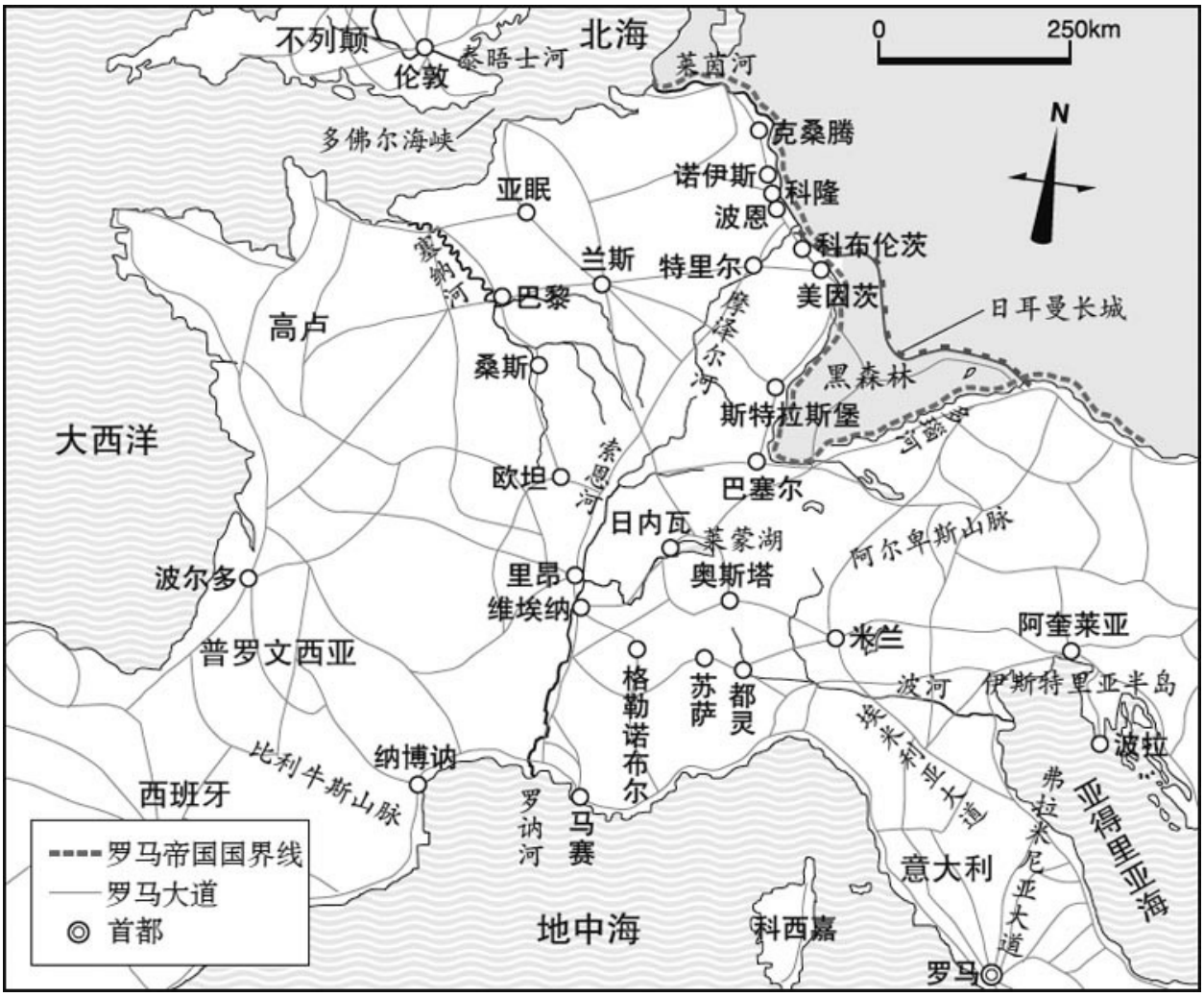
高卢的复兴

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公职体系，始终是担任行政的文官（civilian）与担任军事的武官（military）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遵循了元首制时代的做法，同时身兼文武两职。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成立。即使是在现代，军队的最高负责人，通常都是由总统或总理兼任。在古罗马，无论是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还是帝制之后的皇帝，向来都是统揽军事和民事。

尤里安是副帝，所以，他也不能将高卢的内政管理与军事防卫两项职责完全分开。当然，他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春秋两季把精力放在对付蛮族的战役上，秋末到第二年的开春之前这段不适合打仗的时期，则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政事务上。这种机动性的调整，也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安排，对于统领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地区的尤里安而言，他仍然需要同时关注着军事和内政的发展形势，否则会有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危险。

在公元356年到357年最初的两年间，他集中精力歼灭了侵入莱茵河西岸的阿勒曼尼人；然后，从公元358年起，将战线转移到莱茵河的下游地区。我们从他选择的越冬地点，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策略，第一年在维埃纳，第二年北上前往桑斯，第三年继续往北，将冬营地定在巴黎。

尤里安选择巴黎越冬的目的，可能是他在彻底打败阿勒曼尼人、获得斯特拉斯堡之战胜利之后，想去解决不列颠的问题。不管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带着军队和行政官员们，不断地将政府的根据地向北迁移，想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手下明示自己的政策——先剿外保障安全，然后着手整顿安全地区的内政，最终使高卢地区，乃至整个帝国西部得到复兴。如此大业，也只有身兼军、政两职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能胜任。



高卢及其周边

尤里安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重建遭到蛮族破坏的主要城市。包括里昂、欧坦、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诺伊斯和克桑腾。除了里昂和欧坦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城市。因此，重建这些城市，也就等于再次巩固了“防线”。除了上述的城市之外，尤里安还修建了十几处城防要塞，重新派驻军队进行把守。

消除了蛮族的威胁，民众的生活开始好转。虽然环境不比从前，但日常生活还是在一定程度得到了保证。统治者要做的就是提振人民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尤里安决定从公正执法和公平征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革。由于裁判制度已彻底瓦解，所以对公正执法的

成效，不能有过分的期待。好在皇帝同时也是最高裁判长，他可以通过监督，进行逐步的改善，而对税赋制度，就必须推出十分明确的政策方针。

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我已提及，帝国后期的税制结构，是与元首制时代背道而驰的。

如果把税制的认知看做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的税收哲学就是，“国家”根据税收金额，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体”尽地方政府之责，这两个“公家机关”不曾涉及的领域，则交由私人打理。这个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国各地的罗马道路网。国家建设的道路有8万公里，地方自治体建设了15万公里，由私人铺设的对外开放的道路则达7万公里，它们共同组成了罗马道路网。此外，道路的运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维护，这方面也是根据上述的三种形式进行的。打个比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身作则捐出私财，全面改建了通往北方的主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某个由奴隶翻身成为新贵的人就会效仿皇帝，捐出一部分钱来，作为通往南方的阿皮亚大道的某个路段的维修费。

正因为施行了“国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私人”（privatus）三足鼎立的制度，罗马国家才能长期保持直接税10%、关税5%、消费税或者说营业税1%的稳定税率。奥古斯都的税收哲学是制度简单明了、征收范围广，但税赋轻，因此才能贯彻落实。

然而，从历史学家们称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有的税种都由国家统管，税额也作了相关规定。地方自治体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向纳税人征税，再将所征收到的税金上缴国家机关而已。不仅如此，如果税金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地方议会的议员们还必须承担自掏腰包填补缺口的义务。因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这个制度给社会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罗马帝国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出身的有志之士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元老院议员，而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则是希望能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开放的人才政策，为那些退伍军人以及解放奴隶开辟了担任地方公职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帝国后期，这些公职却让人们敬而远之。于是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后继者君士坦丁大帝施行了职业世袭制，规定必须子承父业，不得抗拒。这一政策从而衍生出一种帝国后期特有的逃税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为了逃税而转行担任神职。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位皇帝，对基督教实施了免税的优惠政策。地方上的权贵们，像雪崩一般纷纷加入基督教的真正原因正出于此。

帝国后期，士兵以及行政官僚的人数倍增，国家开支原本就庞大，如今又多了教会这样一个非课税的特殊阶层。农业是古代国家的主要产业，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一带，由于常年遭受蛮族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降低，最终结果就是税收不足。

但是，糟糕的现状并没有让皇帝改变税收制度。官员们在皇帝要求弥补税收不足的压力下，自然地就会巧立名目，以特别税、附加税等名义另外征税。

所以，罗马帝国后期的税收制度非但不是简单明了，反而日趋复杂，从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在这种税制下，个人还怎么可能积极地去参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昔日之所以是国家经济三大支柱之一，那是因为那些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源自社会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才会以捐赠的方式来作为报答。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回馈社会。无论是凯旋将军还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隶，曾经都有着同样的回馈社会的理念。

尤里安为政时，元首制时代的三大支柱体系已不复存在。他手上拿着的是官员呈报上来的增税提案，内容充满了官僚味，实质上就是一个名称好听的特别税。报告指出高卢的局势不稳，连带影响了不列颠地区

的税收，要改善现状，除了增税别无他法。官员们试图逼迫副帝接受提案。

尤里安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增税案，并立即施行了以下几项政策：

第一，杜绝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目前的经费。政府机构中到处存在着浪费的现象。无论是军方还是行政部门，一旦机构扩张，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门和费用。尤里安下令大幅度地精简人员和费用，他本人以身作则，坚持素朴的生活方式，他以适应高卢的冬天为由，拒绝在家中使用暖气。

第二，公正的征税。在征收的过程中，执行者往往会对有钱有势的人网开一面，却对低收入群体严厉苛责。尤里安以严惩的方式让执行人员不敢厚此薄彼。

第三，非但不增加特别税，还减轻现有的税赋。尤里安认为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高卢东部地区遭受蛮族的破坏使生产力降低。如果继续推行新的特别税政策，那么即便是击退了蛮族恢复了和平，也无法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相反，采取减税的政策，会刺激当地人民积极劳作的意愿，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看到税收增加的实际成果。这就是尤里安的税收哲学。

副帝的减税政策，最先从“人头税”开始实施，从原本的25苏勒德斯（Solidus）减至7苏勒德斯，这可谓是一项大胆、创新的税制改革。相信它对激励民众的劳动意愿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在大胆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尤里安又下令整顿高卢东部的农耕地。土地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必须配以相关的灌溉渠道、防洪堤坝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于蛮族的侵略和内战，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有5年以上无人问津。莱茵河西岸一带土壤肥沃，只要这些土地重新变回农耕地，就会出现丰硕的成果。在尤里安看来，振兴高卢的关键

是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

元首制时代的繁荣，归功于罗马帝国广大的经济商圈的形成。然而它的先决条件在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如今的高卢，北方的蛮族不仅越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更有部落从北海登陆。这些人拥有高超的行船技术，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了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多佛尔海峡。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交流受阻，就是因为有这些蛮族海盗的出没。

尤里安下令建造了600艘新的船只，一半属于军用船，用来打击海盗，剩下的则作为运输船，将不列颠的物产重新运来高卢。歼灭横行在多佛尔海峡的蛮族，就等于连带铲除了从北海威胁高卢北部的敌人；不列颠的物产运往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通路，除了横贯高卢的陆上公路之外，如今又重新开启了北海——莱茵河的水路；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重建，意味着莱茵河航线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尤里安的这一系列措施，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

生活安定了，民心也随之安定。要重新恢复安全保障系统的功效，除了军事防卫之外，民心安定这股软实力也必不可缺。时隔150年，尤里安在高卢，恢复了这个罗马人传统的综合安全保障的哲学。

当时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对副帝的功绩颇为认可。作为援助，给他送去了2000罗马磅（libra，相当于650千克）的白银。尤里安用这些白银支付了拖欠士兵的薪饷。

另一方面，那些对尤里安拒绝征收特别税、干涉内政而深感不满的官员，不时地向君士坦提乌斯打小报告，搬弄是非，而君士坦提乌斯也愿意听取他们的谗言。

不久，塞孔杜斯的长官职务遭到解除，调回米兰。他是尤里安在军事和内政上最好的顾问，也是副帝在皇宫中能够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尤里安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失去了左右手。这无疑是宦官们在背后

操作，他们的手段一向阴险毒辣。对于这一股黑暗的宦官势力，是放任还是制止，完全取决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可偏偏他又不是一个独立自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世上有一类人，对别人作出的成绩总喜欢半褒半贬，他们借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没有勇气的人，而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其中之一。

幸好尤里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失去了塞孔杜斯这位得力的助手，但他并没有退缩。公元358年到359年的尤里安又一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胜利之师永远不缺志愿者，他的军队从一年前的1.3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这一次他们痛击了盘踞在莱茵河下游、频繁侵入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将他们逐出高卢，退回到河对岸。不仅如此，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东面的根据地也遭到了尤里安率领的罗马军团的致命性破坏，几乎尽毁。曾经称雄莱茵河东岸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这两大部落，经历了罗马军团的大扫荡之后，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从此再也不敢靠近莱茵河。

尤里安的战略是先将侵入国内的敌人赶出国境，紧接着进攻到敌方，摧毁他们的根据地。从公元356年开始，他用了4年的时间，达到了目的。莱茵河沿岸仿佛回到了元首制时代，再次成了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防线”。元首制时代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防线”，并不是单纯地仅靠士兵守住基地、击退来敌，罗马军在防守的同时，频频越过防线，攻入敌区，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才形成了所谓的铜墙铁壁。尤里安在公元357年、358年、359年的三年里，三度跨过莱茵河捣毁敌人的老巢，元首制时代的军事战略，多年之后再次得以重现。

这位年轻副帝的作为，不仅在军中赢得了声誉，在民间同样深得人心。或许是人民对未来重新产生了希望，高卢地区甚至连出生率也节节上升。

24岁来到高卢的尤里安，在这里迎来了28岁的生日。他在20岁之前一直过着实为囚徒的生活，虽然兄长加卢斯成为副帝使他获得了自由，

但只是做一名哲学门徒，不要说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就连带少量士兵的经验都没有。在政治方面他同样也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获得成功？这个问题让很多史学家百思不解。为何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突然被擢升为副帝之后，能够作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成就。对此，大多数人的观点是认为他潜藏的才华得到了发挥。通常，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才能引发深藏在体内的能量。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成就了他呢？

我个人认为，是对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亢奋。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学生时代的友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 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我还能做别的事情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保证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人在这里，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
> 难道我不应该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让他们免遭皇宫内那些除了横征暴敛一无是处的强盗的伤害吗？战场上，一个放弃战斗的大队长会被处以死刑，剥夺为其举行葬礼的荣誉。拥有更神圣高贵的地位和更为重要的责任的我，如果放弃了职责，应当受到如何的惩罚？如果是诸神赐予了我这个机会，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引导我、守护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我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
>
> 失去塞孔杜斯这样的顾问，的确让我苦不堪言。我现在只有一边尽责一边祈祷能有机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我连是否会有人来接替他都不清楚。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我很愿意与他同心协力。我也想尽可能地利用这段凡事必须亲力亲为的特殊时期，多做些好事。现在我只身一人，可以自由地推动有益于民的政策。虽然这只是长年笼罩着的乌云，露出一小块缺口的短暂之时。

尤里安的责任感以及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感受的亢奋，可能是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成为副帝之前，只是一个学习哲学的门徒。因为喜爱哲学，才选择了这条路。24岁之前，他肯定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副帝。

因为喜爱而作出的选择，只是忠实于个人的意愿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并没有包含他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尤里安选择哲学，纯粹是为己，而不是为他人。但是，在成为副帝之后，他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他人所依托的存在。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个人发现别人需要自己时，会感到十分欣喜。24岁的尤里安首次尝到了这种喜悦。

亢奋感会给年轻人带来力量，做出那些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一介哲学门徒竟然可以打赢战争，曾经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当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所获得喜悦和自信是无与伦比的。亢奋就是情绪高昂，这多发生在人生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时这些事情又为他人带来了幸福，他们将会视之为使命。我想大概就是这杯责任感与亢奋感混合的鸡尾酒，让尤里安醉心于此。

原本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尤里安奇迹，因为某个事件，延伸到了山的东面。事情发生在他赴任高卢第五年，即公元360年，24岁成为副帝的尤里安，此时29岁。

第二章

皇帝尤里安

（公元361—363年在位）

古代的东方

古罗马人概念中的“orient”（东方）是现代称为“中东”的地区。在共和及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东部的国界线与称霸东方的大国帕提亚邻接。这意味着，那个时期罗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是帕提亚王国。

这种状态从公元227年起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击败了帕提亚，从此罗马的敌人不再是帕提亚，而变成了夺得中东霸主地位的波斯。这个大国的主要机构都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波斯，都把首都设立在这个被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围绕的地区，也就是说，这里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古代“东方”的中心，就是当今的伊拉克。

然而，帕提亚和波斯先后被罗马当做头号假想敌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肥沃，而是因为这里作为首都集聚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其东面还有着相当于现代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个国家面积总和的广阔的腹地。古罗马人视为强敌的大国，等同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顺便提一下，如今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耶路撒冷、约旦以及埃及，当时都在罗马帝国的境内，构成罗马帝国的东部。如今位于土耳其东端的地区，那时是罗马帝国的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而现在的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线，几乎就是罗马帝国东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边界线。这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总而言之，在古代的确存在过一个相对于现代四个独立国家总和的东方大国。虽然它的统一性不如罗马帝国，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就不能理解古希腊人以及古罗马人对“东方”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在东方的一系列举动。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这位马其顿出身的年轻人立下了打倒大流士王、征服波斯的志向，因此在击败大流士王之后，为了彻底征服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他必须不断地东进，一直打到印度边界的印度河为止。

不过，罗马与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关系，同亚历山大所属的希腊城邦与它们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亚历山大之前的200年前，希腊就饱受波斯的侵略。正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波斯战争》中所述，就连城邦的首都雅典，都曾经一度被波斯军队占领，招致毁灭性的破坏。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对希腊人而言，是对波斯的反击战。尽管亚历山大手下的士兵大多来自马其顿，但他出征时军队用的还是希腊城邦联合军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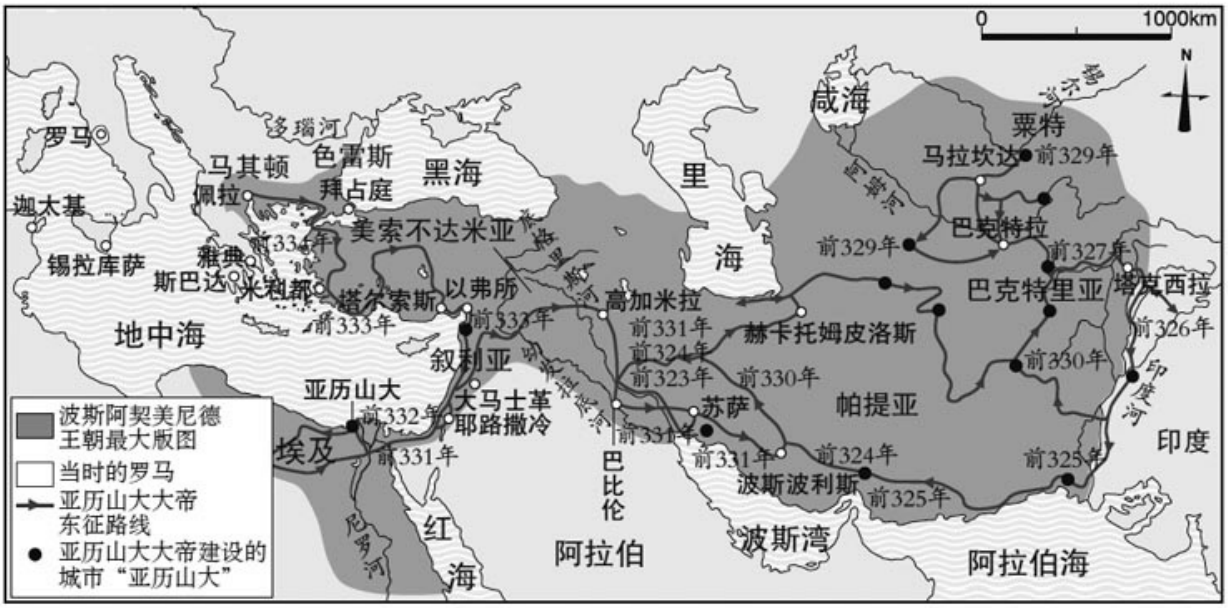
而罗马对“东方”的战争，并不存在反击或防卫的意义。在亚历山大登场前的半个世纪，罗马的首都也曾被敌人攻破，侵略者是来自北方的蛮族高卢人。罗马人没有退缩，犯我者必歼，最终由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罗马不同于希腊，对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并不抱有恐惧以及复仇的感情。而且，罗马人从本质上来说是“occident”（西方）民族。虽然“东方”人也制定了法律，建设了道路，但是将其功能网络化、系统化、扩大化以及长期化的，却是罗马人的独创。是否追求事物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是“东方”与“西方”的一个分水岭。罗马之所以没有占领印度的企图，有两个理由：一、罗马已称霸西方，拥有了辽阔的疆土。二、罗马人在计划领土扩张时，始终将是否能固守防线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当时罗马市内出售给旅行者的地图上所标示的帝国疆土，西起不列颠，东至亚历山大也未曾涉足过的恒河、锡兰岛（Ceylon）。实际上那时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是叙利亚（现叙利亚）和阿拉伯（现约旦），地图上不仅包括了波斯，甚至延伸至东印度。带着这种地图出门，大概是会走入迷途的。美索不达米亚对大多数的古罗马人而言，恐怕是一

个“只闻其名，不知其地”的存在。

到了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内海”的年代，这两个东、西大国变成了邻国，国界线的划分自然就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吞并这个强大的邻国的意图，他们采取的邻邦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像奥古斯都、尼禄以及哈德良等皇帝那样，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首先，把国界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以此作为帝国的“防线”并加以强化。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美尼亚王国的亲罗马派，帮助他们稳固王权，从而达到从西到北，紧紧包围东方大国的首都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大版图（公元前500年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

4世纪中叶的罗马与波斯

第二种是像图拉真、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戴克里先等皇帝，依靠军事手段强行占领，在有利的地形上建立起防线。恺撒当年如果没有遭到暗杀，如期出发远征帕提亚的话，他应该就是这条路线的开创者。除此之外，在远征途中病故而导致战争中止的君士坦丁大帝也属于战争派，他原本讨伐波斯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先帝戴克里先建立起的防线。喜好这种对外政策的皇帝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擅长打仗。

采用武力征服时的战略战术，主要是与亚美尼亚组成联合军，从西和北两个方向，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在攻陷其首都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之后，要求战败者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地区，将此地锁定为针对东方的最前线。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比邻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区，在上游分流，沿着不同的路径，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在中部的泰西封一带拉近距离，之后再次分道扬镳，最终汇入波斯湾。两条大河在上游一条向东、一条向西分流的中间地带，就是北美索不达米亚。罗马之所以要将这里收为领地，是因为不管敌人是帕提亚还是波斯萨珊王朝，就在

眼皮底下，一览无余。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这里的确是绝佳的位置。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如果控制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王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会随之降低。亚美尼亚王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接近于波斯。为了维持同盟国的关系，长年以来，罗马对亚美尼亚在各方面都是煞费苦心。一旦北美索不达米亚握在罗马手中，形势就会改变，罗马可以从西向北建立起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防卫系统。换言之，罗马可以从西和北两面包围住敌人的中枢地带。

相反，站在波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局势。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作为波斯王国的国王，对先王所受到的耻辱，绝不能视若无睹，无论如何他也要打破这个对国家安全极其不利的局势。

鉴于以上理由，北美索不达米亚注定要成为东西两大国的必争之地。罗马方面把它看做是保卫帝国东部安全的关键，而首都功能集中于中部的波斯，当然也不能将这里置于随时遭受敌人侵袭的危险之中。总而言之，两国都是基于各自安全保障上的考虑。因此这个地区难以建立起国际秩序意义上的“和平”。

波斯萨珊王朝

如果将年代设定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是罗马占了上风。因为在公元297年，时任罗马帝国副帝的伽列里乌斯（Galerius）战胜了波斯国王，两国之间签署了至今仍然生效的和平条约。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项：

一、以尼西比斯及其东南的辛格拉（Singara）为最前沿，由此往西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即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波斯割让给罗马帝国。古代的尼西比斯，现称为努塞宾，位于土耳其境内，紧邻叙利亚，而辛格拉如今是伊拉克的瑟奈尔（Senjar）。现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

界线就是从这两个小镇之间穿过。

这项割让条款，即使在古代也是意义非同一般。在和平条约签署的9年之前，戴克里先皇帝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波斯谈判，在没动一刀一枪的情况下，迫使波斯默认了罗马对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然而，默认与割让的性质还是不同，默认只是将北美索不达米亚当做缓冲地带，罗马不能在此设立一系列的要塞，建立帝国的防线。但一旦割让给了罗马，那就是由罗马人自己说了算了。

二、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地区的统治权，由波斯转交给罗马。

这意味着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河的上游流域完全控制在罗马手中。按照现代地理位置，这个流域包括了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国，可以从西和北两面监控伊拉克。在防卫战略意义上，罗马帝国首次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波斯国王不得不签下如此屈辱的合约，是因为他惨败给伽列里乌斯。自公元297年条约签订，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末期为止，两大国之间的非战状态保持了40年，始终未被打破。这要归功于戴克里先皇帝，他不是那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不仅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甚至重新加固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南，即原本就属于罗马领地的叙利亚以及约旦的边防线。古罗马人非常清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是凭空而来的。

不过，面对这种状况，波斯不会就这么一直忍气吞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年过60岁还需要亲自率军前往波斯，说明40年之后的波斯显示出反攻的姿态。那时的波斯国王已经换成了性格强悍、手段高明的沙普尔二世。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罗马帝国交由他的三个儿子分治。负责帝国东

部的是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一继位，就必须面对波斯咄咄逼人的反攻之势。

在大帝死后的第二年年初，沙普尔率领波斯军队，集中兵力攻打尼西比斯。尼西比斯位于底格里斯河以西，行军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属于罗马领地最前沿的要塞。四周建有三层城墙，墙外有深水护城河。数万人的波斯军队包围尼西比斯，猛攻强打了60天，终究没有攻下这座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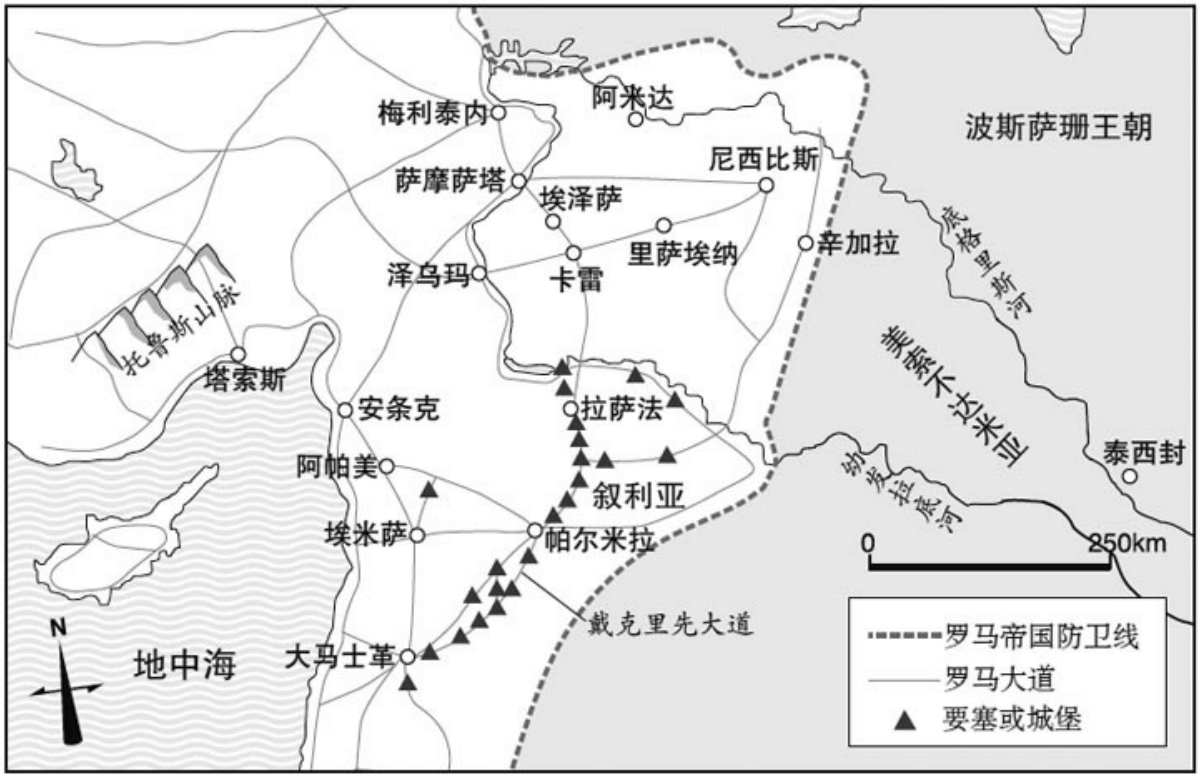
6年后，公元344年，沙普尔的军队对辛格拉发起攻击。辛格拉也是罗马的前沿要塞城镇，距离尼西比斯东南方100公里左右。这一年的战争，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征，在前线指挥了两天的战役。波斯军队听说罗马皇帝亲自参战，攻势愈发猛烈，前半场战役打得非常漂亮，可是之后遭到了罗马军顽强的抵抗，结果波斯国王不得不撤兵放弃。

在这场辛格拉攻防战中，发生了一件罗马军团罕有的不光彩的事情。波斯一位年少的王子在激战中被俘，遭到一队罗马士兵严刑拷打，最终被杀。据说这些士兵是基督教徒，他们把波斯国王子视为邪教徒而凌虐至死。

两年之后，沙普尔率军再次攻打尼西比斯。这一次的攻城战长达80天，最终撤兵的还是波斯国王。

四年后的公元350年，波斯第三次攻打尼西比斯，甚至带来了印度的大象兵团。这一次的战役持续了100多天。尼西比斯坚固的城墙被打得千疮百孔，守城的罗马士兵被猛烈的炮火轰击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攻城的波斯一方也不能幸免，牺牲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这位勇猛的40岁的波斯国王沙普尔，最后还是偃旗息鼓、罢战休兵。就在他率军在尼西比斯与罗马军决一死战的时候，来自亚洲的蛮族乘机大举进攻，侵入了波斯的东部边境。这让沙普尔深感不安。

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也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其弟君士坦斯遭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杀害，高卢落入了叛军之手，他必须率兵讨伐叛军。公元350年，波斯国王能够与罗马皇帝很爽快地签署休战决议，是因为这两位在国内都有更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当然，这也意味着等他们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后，会再度回到对决的战场。这个对决的时间发生在公元359年，从阿米达（Amida）战役开始。



美索不达米亚与周边

罗马与波斯，都是由多人种、多民族所构成的庞大帝国，但是两国的制度不同，军队的组织也不同。相对于拥有常备军的罗马，波斯的常备军数量甚少，大多数军人是从地方领主的军队招来的雇佣兵以及农奴。因此，一旦波斯招兵买马投入备战，立刻就会成为众人皆知的事情。罗马根本不需要派遣间谍打入敌人内部，只要向那些在东方做买卖的商人打听一下，基本上就能了解敌情。时隔9年，波斯国王沙普尔集

结兵力，准备再次大战，一雪前耻，这情报早就被罗马人获知。那时候的沙普尔即将50岁。在那个年代，50岁的人如果还没有什么成就，就意味着此生一事无成。按理说，君士坦提乌斯是应该预想到波斯国王誓死一战的决心，可是，这位比波斯国王年轻10岁的罗马皇帝不仅没有积极准备迎战，就连原本正常运作的帝国东部的基础防御系统，也像滚动的车轮下塞进一根木棒，被迫停了下来。主要问题有二：

一、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臣子们因遭中伤、毁谤而丧命的现象，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种状况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依然持续。不少有才能的将领被指控图谋暗杀皇帝，招致处死。将军们的命运势必会影响到其手下的中层军官。缺少了中坚力量的组织，是无法充分发挥功效的，这比缺少士兵更严重。这意味着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因将官大批被处死而逐渐减弱。

二、实战中不能没有指挥官。被处死的将官的空缺需要有人代替。然而，挑选军官的标准并不是以能力而定，而是取决于宫廷里一些人的喜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重用宦官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与国王亲自率军的波斯军队不同，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巴尔干地区。派往东方担任总司令的，是颇受官员们好评的萨比尼阿努斯（Sabinianus），熟知东方情况、又有实战经验的乌尔希西努斯则屈居副手。副手对总司令必须唯命是从，战场上瞬息万变，需要及时地调整战略和战术，如果正副长官的意见不合，势必不利于战事。

另一方的波斯沙普尔国王，在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大量收集情报。他将一位投靠了波斯的安条克商人安排在身边，从此人那里详细地了解到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西靠幼发拉底河、东临底格里斯河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城市，被罗马人改建成了要塞，它们最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由希腊人所建，是东西贸易往来的频繁之地。居住在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商人，对这一带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

掌。

沙普尔放弃了三次攻城未遂的尼西比斯，将目标改为其北面的阿米达。这是否与那位安条克人的建议有关，不得而知，想必是有其原因的。

阿米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现代称做迪亚巴克尔（土耳其语：Diyarbakir）。它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之后历经长时期的衰败，直到近代才恢复了其重要地位。一些虽已没落但曾经是历史重镇的城市，即便现在归属伊斯兰文化圈，通常都还会延续古代的地名，不会作太大的改变。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古城安条克，如今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Antakya），两者只是发音上稍有不同而已。阿米达虽然战略地位不如尼西比斯，但仍有着特殊的价值。

君士坦提乌斯在他十几岁还担任副帝的时期，就将阿米达彻底改建成军事重镇。他甚至考虑过要更改地名，冠以自己的名字。阿米达位于山脚下，背靠险峻的山岩，流经城东的底格里斯河处于上游，水流湍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障壁，因此只要牢牢守住西、南以及北面三处，这里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防御之地。

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攻下阿米达城相当于给罗马皇帝一个狠狠的教训。沙普尔率领10万大军经过尼西比斯，没作任何停留，直奔北面的阿米达。显然，这一次他很有信心赢得胜利。

但是罗马方面没有看出沙普尔的用心。他们或许认为既然尼西比斯可以承受住波斯三度的猛攻，比尼西比斯防守更坚固的阿米达应该没有问题。军队最高司令官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附近的希尔米乌姆，派往东方的总司令萨比尼阿努斯，虽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到了埃德萨（Edessa）之后，再也不肯往东多移一步。而成为敌人攻击目标的阿米达，就在距离埃德萨东北方150公里处。战斗的双方，一方是国王亲自出征，另一方不仅皇帝本人留在西方，连他任命的司令官也远离

战场150公里。不过，萨比尼阿努斯以前线司令官的名义，向部队下达了以下两项指示：

第一，阿米达一带实行焦土化战术，断绝敌人的粮草。强制转移附近的农民，让他们带上家畜到后方避难。

第二，派副司令乌尔希西努斯前往阿米达，不过，只有一支小分队同行。总司令的用意似乎不是让他们去支援前方，而是去侦察敌情。

从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副帝的年代开始，阿米达地区一直驻守着第五军团1000人左右的兵力。在接到波斯军逼近的消息之后，又另外调来了6个军团总共6000人左右的援军。这些人既不出身于中东，也没有在这一带打过仗，他们是原来在高卢执勤的罗马士兵，因为协助马格嫩提乌斯叛乱而受到惩处，执勤地从莱茵河沿线调至幼发拉底河，实际上就是流放。所幸的是，这些剽悍的日耳曼人的男子汉，并没有因完全陌生的东方气候、地形以及风俗习惯而丧失了勇猛的天性。

加上骑兵团，罗马军在阿米达的军力有7000人左右。如果再算上那些既有勇气也有能力上战场的当地居民，人数达2万左右。与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妇女和孩子早在听说敌人可能来袭时，就已撤退到安全的后方城市，埃德萨也是避难场所之一。这意味着，留守阿米达的2万人都是真正的战士。这2万人将要抵抗人数超过10万的波斯大军。

阿米达攻防战

一旦开战，敌人不仅会出现在前沿阵地，至少战场的方圆50公里左右，都会有侦察兵或调集粮草的军队出没。受命前往阿米达的乌尔希西努斯一行，在途中就遭遇了敌军。他们虽然成功地脱身，却彻底地暴露了行踪。乌尔希西努斯判断，整个部队不可能进入已经被波斯军包围的

阿米达城，他将队伍一分为二，一支由年轻的军官带领，继续向阿米达前进；他自己则带着剩余的部队，暂时先退回后方。

我想那时的乌尔希西努斯大概已经感觉到阿米达城难保。他是一位非常熟悉东方的将军，只要从远处眺望一下波斯军的阵势，看看有多少诸侯、豪绅的旗帜，就能估算出敌情。如果那些实力雄厚的地方霸主都参与其中，说明波斯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敌罗马。这些旗帜的多寡，既可显示波斯国王作战的决心，又能预测守城的战势。所谓保卫战，是要敌人彻底放弃攻击、撤兵走人，才算赢得真正的胜利。

接下来的这部分属于我个人的想象。乌尔希西努斯可能想让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放弃消极守卫的战略，派出一部分军队绕到敌军的后方，打一场夹击战。否则，那位听从命令、率军前往阿米达的青年军官，起码有那么一瞬间，会认为副司令是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但是，从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年轻的军官毫不迟疑地执行了副司令的命令，后来他在攻防战中担当了防守的任务。

这里插一句，我们后人之所以能清楚地了解阿米达攻防战的整个经过，正是因为这位青年军官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位军官就是在前文介绍君士坦提乌斯访问罗马时，我引用的文章的作者——出生于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阿米达之战时，他大约29岁。

对阿米阿努斯而言，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波斯军。入伍之后，他一直跟着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四处征战。乌尔希西努斯是当时的罗马名将之一，除了一次被派往欧洲之外，戎马生涯几乎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度过的。

看到波斯国王亲自率领的庞大的军队时，就连跟随乌尔希西努斯多年久经考验的阿米阿努斯也深感震惊。沙普尔大概是打算凭借强大的阵容，压垮守城的罗马军的气势，在阿米达城的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波

斯军。整个平原延伸至地平线，所见之处全是波斯的士兵、战马、印度的大象以及各家诸侯的旗号。国王率领众诸侯从建在平原正中的金碧辉煌的大帐篷出发，扬鞭策马向城墙进发。走向阿米达城门的沙普尔，头戴雄羊模样的黄金头盔，头盔上镶满了宝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波斯国王及其近卫队，还有那些诸侯组成的大队人马非常之大胆，他们靠近到弓箭射程的位置。从城墙上，甚至可以看到雄羊头盔下沙普尔脸上的皱纹。不过波斯人的示威行动未能得逞，守城的罗马军万箭齐发，逼得波斯国王无功而返，把决战延后到次日。

攻防城墙的首日之战，从一开始就激战连连，直打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才鸣金收兵。两军都死伤惨重，而波斯一方因损失了一名诸侯之子，气氛更是乌云笼罩。这位刚成年的年轻武将，是波斯数一数二的名门之后。为了满足丧子之痛的父亲的心愿，沙普尔以举行葬礼、服丧为由提出了休战七天的请求，守城的罗马军接受了这个请求。

休战期结束之后，攻防战再次打响。对罗马军威胁最大的就是波斯军的攻城器械。这些器械都是波斯人以前从罗马的要塞、城市中掠夺而来，罗马军等于面对自家武器的攻击。尽管如此，守卫的官兵和市民们依然斗志昂扬，城墙外的波斯军陈尸累累。

这个时候，乌尔希西努斯正在努力地说服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将驻守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队，调往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阿米达，从背后包围波斯军。但是，萨比尼阿努斯认为行动过于危险，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乌尔希西努斯还是不肯放弃，萨比尼阿努斯拿出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手谕，上面清楚地写着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调动军队。谕旨在此，乌尔希西努斯只能俯首听命。他被派往美利提尼（Melitene）的军团基地。萨比尼阿努斯还特别指示，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不许调动驻军。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都在亚美尼亚的山岳，越往上

游，两条大河就越接近。美利提尼基地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而阿米达则在底格里斯河附近，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但乌尔希西努斯无法向阿米达派去一兵一卒。

无论在共和时代还是帝制时代，罗马军的前线司令官都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权。一是因为战情千变万化，需要随时作出调整；二是那个年代因交通等原因，向后方请示所需时间过久。对罗马军的这项传统，后世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曾经赞赏不已。然而到了4世纪中期，这条规定被废止。在元首制时代，即使皇帝也不会对前线统帅的调兵遣将指手画脚，但进入4世纪之后，前线不能做出超越后方命令的任何事情。后方对前线自主权的限制，倒是给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极好的借口，他们不用主动去作决定。阿米阿努斯或许在进入阿米达之前，就知道了乌尔希西努斯的夹击战计划，可是他在前方左等右等，也不见乌尔希西努斯率领的援军。

那些在阿米达拼死抵抗的防卫军，似乎深信援军不久将至，面对数量超过自己5倍以上的敌人，顽强不屈，抗争到底。其间，有一名逃兵被波斯人抓获，供出了通向城门的地下通道的秘密。70名波斯士兵突然出现在城墙内，其中一人不停地挥舞着红披风。看到这潜入成功的信号，城外的波斯军队发起了猛攻。不过他们期待中的城门并没有被打开，那70名士兵，还没有靠近城门，就倒在了罗马军的刀剑之下。

罗马军并没有被动地守在城中。那些天下无敌的高卢士兵，经常乘着夜黑溜出城外，发动突然袭击，给波斯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然而，攻防战的时间拖得越长，牺牲越多，形势对兵力不足的一方就愈发不利。当波斯军建造了高过城墙的攻城工事、从上至下压过来时，战斗就变成了肉搏战。城内既没有安置阵亡者的场所，也没有人手处理这些事情。城中尸体遍野，从而引发了疫情，战斗力一路衰退。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城墙倒塌了。虽然倒塌的城墙只是一小片，但这好似堤坝决口，波斯军犹如狼入羊圈般地攻进城内，罗马军几乎全军覆

没。

阿米阿努斯决定逃出城外，与他同行的只有两名士兵。三人在没有马匹的情况下，靠着双脚幸运地逃脱了。他们一直跑到阿米达城外15公里处，靠近罗马大道边上的国营邮局，才算松了一口气。邮局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所幸水井还在。由于汲水的工具也遭破坏，其中的一名士兵只好撕开绑在头盔下的布条，垂入井中，三人轮流吸吮着布条上的水解渴。

阿米阿努斯等三人沿着山岳地带一路逃跑，最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附近。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队巡逻的罗马骑兵，被带回美利提尼基地，阿米阿努斯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

经过波斯军73天的攻击，阿米达终于陷落。根据沙普尔的命令，城中一半人被杀，剩余的做了俘虏，被押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部地区。他们将作为修建苏珊城的劳役。除此之外，好像还有部分士兵也像阿米阿努斯一样成功地逃离了阿米达，但都下落不明。

当初阿米阿努斯在前往阿米达的途中，曾经遇见过一名退役的罗马兵。他是鲁特西亚（巴黎）出身的高卢人，之前被派到叙利亚执勤。他自称是在沙漠行军中与大队走散，实际上可能是逃兵。罗马士兵在无法归队的情况下，大多会与在当地结识的波斯女子结婚，就此落户生根。那些参加阿米达攻防战、侥幸脱身的高卢士兵，有些人最终的命运可能会与这位巴黎出身的士兵相似。

阿米达城在2万名勇士的顽强奋战之下，终究不敌。作为胜利一方的波斯军，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3天的攻城战，波斯军的阵亡人数据说达3万人之多，这意味着，参战的每3名士兵中就有1人阵亡。不过话说回来，沙普尔国王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阿米达城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占领阿米达，意味着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罗马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所谓的“防线”，要完整连接才能发挥其功效，哪怕只出现一个缺口，就不复存在。如果任由事态继续恶化，那么北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戴克里先皇帝强迫波斯默许、君士坦丁大帝不顾高龄依然御驾亲征的军事战略重地，将在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手上再次易主。此刻的君士坦提乌斯，再也无法悠然地待在米兰或多瑙河畔的城市享清福了。

尤里安奋起

君士坦提乌斯听闻阿米达城陷落，决定亲自率军远征波斯。既然是皇帝亲征，又遭受了阿米达之战败北的奇耻大辱，那么这次战争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收复失地。纵观以往的战争，皇帝们亲自率军的战役，在攻下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大肆破坏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会主动撤军，最终目的是再度巩固以北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最前沿的帝国东部的“防线”。打这种大规模的战役，首先要投入能够与敌军10万人马相匹敌的军力，再者，由于攻击的目标，即敌人的首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因此事先必须安排好后勤供给线，这是在敌方作战必不可缺的条件。对于来自欧洲的罗马军队而言，在环境陌生的中东沙漠地带作战，有着先天不足的劣势。因此，准备10万大军，并非为了满足总司令官皇帝的虚荣心，的确是形势所迫。

如果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仍旧延续了由戴克里先皇帝创立、君士坦丁大帝继承的增兵政策，那么当时罗马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0万人左右。就算除去防守各地所需的兵力，聚集10万大军远征东方，并非一件难事。

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史学家才会将君士坦提乌斯向尤里安借兵一事，看成是正帝故意打压副帝。事实上，公元359年抵达高卢的一纸谕令，的确让副帝错愕不已。皇帝要求他派往东方战场的兵力见下：

一、4支辅助皇家卫队（auxilia palatina）。所谓的辅助皇家卫队，是与罗马签约、以部落为单位的蛮族雇佣军。

二、其他部队每个单位选拔出300名士兵。

三、从专属副帝称为scholae的近卫骑兵团中抽出两队。

皇帝要求的4支蛮族雇佣军，都明确地注明了部落名以及所属部队，他们以勇猛著称。除此之外，所谓的“选拔”，其实就是各部队中的精兵强将。最终被派往东方的人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我这里也只能作一个估算。估算的基准有二：其一，当时尤里安实际拥有2.3万人的兵力。其二，每一个部队在1000人左右。根据这两个条件，正帝要的兵力大概在9700人到1万人上下。

尤里安总共才2.3万人的军队，要被调走1万人，而且都是精锐，剩下的1.3万人虽然不能说都是无用之才，但也不是最优秀的官兵。刚满28岁的尤里安面对如此状况，的确是要手足无措的。

这道下给罗马帝国第二号人物副帝的命令，并不是皇帝亲笔书写，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皇帝只派了一位低阶位的公证人前往高卢，由他向尤里安传达旨意。仅凭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把尤里安看做副帝，只当他一介下臣。尤里安心中再不满，以他的身份也只能服从命令。

但是，被选出派往东方的士兵，却不打算从命。特别是4支蛮族部队，反应异常激烈。他们强调，当时与罗马军签订的契约中，明文规定了勤务地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侧，他们绝不会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地远赴东方。除了这些蛮族兵，其他的官兵也不乐意离开副帝，去听任正帝的指挥。4年前，当时24岁的尤里安生平第一次穿上司令官的正装、出现在这些战士面前时，他们极力克制发出嘲笑之声，而如今，他们真心愿意在尤里安的麾下效忠尽职。战士们相信，皇帝这次的命令，是他欺

压副帝采用的一贯手段，大家对副帝充满了同情。

这局面让尤里安陷入困境。如果顺从了士兵的心愿，就等于抗旨。可要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又可能引发蛮族士兵的叛乱。每当尤里安举棋不定时，以往总能够帮忙商议对策的塞孔杜斯，此时已遭解任，现在他身边只有一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希腊哲学家。

就在尤里安左右为难之时，那些蛮族士兵成群结队地在副帝的皇宫前，静坐示威。所谓的皇宫，不过是尤里安在巴黎临时安置的大本营，既没有防止过激的士兵闯入宫内的设施，也没有充足的保安人员。

这种胶着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其间，尤里安曾经数次出宫，企图说服那些静坐的士兵。他向士兵提议，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家人分离，可以用国营邮政马车将家属运往东方。不过士兵的抗议另有原因，面对这些习惯了野营的战士，尤里安几度交涉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月就这样虚耗过去了。公元360年2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士兵面前的尤里安，冷不防地被一队士兵抱上了盾牌，他们大叫着："尤里安·奥古斯都！"

士兵扛着坐在盾牌上的副帝，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尤里安·奥古斯都！"呐喊声传遍了各个角落，随即全体战士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其中有一位士兵，从脖子上摘下立功所得的金锁，仿佛给国王加冕似的，戴在了坐在盾牌上摇晃不定的尤里安的头上。就在这个瞬间，万众高呼"正帝尤里安"，震天动地的声音一直传到古罗马称为塞广纳（Sequana）的塞纳河的对岸。

将自己的首领举在盾牌上游行，是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前当地人的习俗。历经了400年的罗马统治，高卢已经完全被罗马同化，连高卢人都不觉得自己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对那些来到高卢时日尚浅、驻扎在罗马行政当局称为"日耳曼"的莱茵河西岸一带的日耳曼人士兵而

言，尤里安是他们这4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可能他们认为用这种高卢传统的方式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总而言之，尤里安是第一位以蛮族人的方式被拥戴登基的罗马皇帝。不过，他那天显得异常惊慌，被人从盾牌上放下之后，直接逃进了皇宫，第二天也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事发当日六神无主的尤里安，事后却作了冷静思考。如果他接受官兵们的拥戴称帝，毋庸置疑，会被另一位正帝定为反叛罪。他仿佛看见了宦官优西比乌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耳边悄悄地说着什么，那双陷在一脸横肉里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尤里安清楚，这是要让他步其兄之后尘。就在5年前，正是这位优西比乌将叛国的罪名套在了时任副帝的加卢斯的头上，而且他本人还亲自前往波拉城的监狱，对加卢斯进行了严刑拷问，最后将其斩首。宦官身上那股独特的阴气，似乎漂到了塞纳河。曾经保护尤里安躲过宦官中伤的优西比娅皇后已不在人世，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尤里安的妻子海伦娜也因两次流产，健康严重受损，在高卢病故。尤里安虽然不爱妻子，但对她还是十分尊重。他遵照妻子的生前愿望，将她的遗体送回罗马下葬。这两位女性的辞世，使得正帝与副帝之间的关系益发疏远。

终于，尤里安作出了决定。他出现在士兵面前，向大家宣告，他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时逢公元360年2月，24岁之前只是一介哲学门徒的尤里安已经29岁。依照传统，为纪念登基，尤里安向官兵们发放了临时奖金。尽管具体金额不详，但无疑是罗马皇帝的登基方式。

同一天，尤里安提笔写信给君士坦提乌斯，开始了书面谈判。他试图通过辩解以及寻找折中之道，来取得君士坦提乌斯的认可。在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自己登基实属迫不得已。他恳求君士坦提乌斯，能承认他为帝国西部的“正帝”。戴克里先皇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曾经有过帝国东西两帝并立的先例，尤里安希望能够遵循旧例，在帝国东部的“正帝”为上的前提下，维持两帝并立的“二帝共治制”。每次在信尾的署名，他都按照以往的习惯，谦称“恺撒”（副

帝）。

说“每次”，是因为尤里安与君士坦提乌斯的书面谈判，持续到了第二年。那时的君士坦提乌斯正在波斯战争的后方基地安条克。地处叙利亚的安条克与高卢距离遥远，就是快马加鞭，来回一趟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君士坦提乌斯是否看过这些信，反正，人在巴黎的尤里安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他曾经一度将信交给君士坦提乌斯所信仰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主教代转，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不过也是白费了心思。

尤里安的书面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没有打算同他谈判，而是把他视为篡位者，决定像对付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那样，出兵讨伐。这一年，为了西征尤里安，他同波斯国王沙普尔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于休战协定，沙普尔究竟提出哪些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最终表示同意，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罗马皇帝之间的内斗是波斯国王求之不得的好事；其二，波斯需要时间去巩固刚占领的阿米达以及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势力。再者，罗马大军离开东方的休战期间，正是威胁利诱亚美尼亚王国的最佳时机。

公元361年春天到来之际，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及其军队已经作好了返回西方、歼灭尤里安的战斗准备。

尤里安也并非把时间全用在给君士坦提乌斯写信、等待回音上。这一年，他不仅扫除了高卢境内的入侵蛮族，而且两次渡过莱茵河，袭击了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的根据地。赢得胜利回到高卢之后，他又立即召集各地的行政官，积极地推动税制以及司法公正性的改革。就在一年快结束时，他接到消息，君士坦提乌斯的先遣部队已经离开安条克，正奔西而来。

准备内战

尤里安再次陷入了抉择的困境。这一次不再是要不要接受士兵对他的拥戴登基称帝，而在于是否应该为保住皇位，不惜打一场内战。根据他之后的行动表现，我估计那时候的尤里安是这样想的：既然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派出少数部队采用快攻的方式西征，那么就算没有将集结于东方的10万大军全部带上，规模也不会小。这批人马再与多瑙河的守卫军会合，那么总共才2.3万人的高卢军队绝对没有胜算的可能。尤里安能够做的，就是乘多瑙河守军还未与大部队会合之前，将他们争取过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速战速决。

尤里安的想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事实上，他很快地作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

一、与以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为首的日耳曼蛮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对于5年来遭受尤里安军队沉重打击的蛮族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二、从2.3万人中，挑选1.3万人向东进军，准备在途中与君士坦提乌斯的大军作战。这1.3万人就是一年前以合约规定为由，不肯离开阿尔卑斯山脉西侧，离开家人远赴东方战场，在皇宫前静坐示威的蛮族部队。当他们得知这次东行牵系着尤里安未来的命运，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他们“罢工”的起因，欣然受命。

1.3万人又分成两军，其中1万人由在罗马军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法兰克人出身的内维塔（Nevitta）率领，从南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穿越北意大利向东。这条路线虽长但安全，途中不会遭遇蛮族人的袭击。剩下的3000人由尤里安亲自率领，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黑森林，以最短的距离抵达多瑙河的上游，在当地调集船只，沿河经过文多波纳（Vindobona，维也纳的古称）、阿昆库姆（Aquincum，布达佩斯的古

称）等城市，一路顺流而下。

两军会合的地点定在多瑙河中游的城市希尔米乌姆。希尔米乌姆是帝国后期的一个重要城市，地处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五六十公里，现在称为米特罗维察（Mitrovica）。

由此可见，尤里安的目的是在君士坦提乌斯大军到达之前，抢先控制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基地米特罗维察，阻止皇帝的大军与这里的守军会合。无论对君士坦提乌斯还是尤里安，成败的关键，就是看谁先到达希尔米乌姆。

尤里安的军队赢得了时间上的比赛。当1.3万人到达希尔米乌姆时，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多瑙河的守军，表示愿意加入尤里安的阵营。预想中的内战不但没有发生，甚至没有流一滴血。

尤里安（发行于希尔米乌姆的金币）

驻守多瑙河防线的官兵已经得知尤里安被拥戴称帝，但让他们作出决定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尤里安这5年来创下的辉煌战绩。他成功地打击了莱茵河沿岸的蛮族，也为东面的多瑙河防线战事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以往多次渡过莱茵河入侵的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在遭到打击势力衰减之后，那些以多瑙河为目标、从南而来的萨尔马提亚人、夸地人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胆大妄为。多瑙河的守军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投诚哗变，是因为他们敬佩尤里安现场指挥的能力。当然，要获得人心，前提是行动必须快于敌方。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说客气些是慎重。他在判断以及行动上往往

都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从安条克出发，在抵达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时，得知尤里安已经到达希尔米乌姆，他并没有及时地采取对策，紧接而来的就是多瑙河守军全军哗变，以及尤里安率军离开希尔米乌姆，沿着东南主干道向东行进的消息。显而易见，尤里安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他要占领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提乌斯维持了24年的皇位，如今岌岌可危。

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病倒了，御医们对他的病情深表绝望，束手无策。君士坦提乌斯和父亲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在死前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逝。

君士坦提乌斯究竟死于何种疾病，至今没有结论。不过，一直以来，都定调为因病自然死亡。尽管43岁的人生过于短暂，但他在位时间长达24年。罗马皇帝长年累月身负国家重任，积劳成疾，即使身逢太平盛世，在位时间最长也就是20年，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君士坦提乌斯临终前不仅接受了洗礼，据说他还留下遗言，指定尤里安为继承人。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一定不是因为尤里安的才华，而是出于血缘上的考虑。无论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不乐意，他也只有尤里安这一位血亲。另一个理由，是他需要尤里安来照顾他即将诞生的孩子。一直为膝下无子而烦恼的君士坦提乌斯，直到最近，他的第三任妻子才刚为他怀上了孩子。这对于登基伊始便大肆屠杀血亲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人生结局。君士坦提乌斯这位在父亲死后诞生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格拉提安（Gratianus）皇帝。

尤里安在率军前往首都的途中，接到快马送来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这简直是上天赐给他的好运，他手上不用沾一滴血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尤里安命令部队继续向首都前进。另一方，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

体也从东方运回首都。

公元361年12月1日，成为合法皇帝，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尤里安，在民众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数日后，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运回首都。前去迎接灵柩的尤里安，以皇帝的身份亲自为他举行了基督教的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圣使徒教堂内，其父君士坦丁大帝也长眠于此。

虽然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不过，民众在最初对统治者都会给予欢呼和掌声。相对于留下失误的前任，继任者的最强之处，就是还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因此，新官上任之初的好评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宫廷的官员，对新主子向来都是先表示拥护，再静观其行。他们往往被简单地当做是一群“被统治者”，殊不知，这些人也有其高明的求生之道。

针对这些被统治者，新上任的统治者的应对策略大抵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在不刺激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加强和巩固自己刚到手的权力。这种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妥协。因此，之后也较难展开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获得权力后即刻实施改革，趁着既得利益者以及无利益者都还没搞清状况的时候，推出各种政策并立即付诸行动。

改革的困难之处是，当既得利益者发现改革对他们不利时，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而因改革最终会受益的非既得利益阶级，却一时半刻不清楚新政策好在哪里，因此会采取观望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为了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当政者要像表演障眼法那样，迅速并且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尤里安皇帝就是采用了这第二种手段，想来他也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说喜爱哲学的尤里安没有权力欲。我个人觉得这种讨论一点意义没有。他在21岁之前过着幽禁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其后4年学习哲学的生活，同样也过得战战兢兢，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一句话，他的脑袋随时不保。担任副帝的5年，他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又要忍受皇帝的百般刁难。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尤里安，怎么会不懂得掌握权力的意义。

所谓的权力，是以自己的意志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在众人共存的社会中，为了防止无秩序状态的发生，这种力量是必不可缺的。问题是善用还是滥用权力。30岁成为皇帝，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尤里安认为，不应该消极地去排斥权力，而应积极地予以善用，这并不违背希腊哲学的教理。

裁员大战

皇帝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随即展开的宫廷改革，起因于下面这段小故事：

尤里安发现头发和胡子长了，于是他命令皇宫中的理发师来为他修剪。结果，仿佛高官云集般的，一群穿着华服的人出现在他房门口。尤里安以为自己的意思没有被正确传达，再次强调，他只需要一位理发师。这时，花团锦簇中最前列的衣着尤为显眼的人走出来禀报说，他就是理发师。尤里安问："那其他这些人是谁？"这位皇宫的理发师非常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们是我的助手。"

如果放任自流，官僚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对官僚而言，没有比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并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换言之，就是通过增加"寄生虫"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进行内部

改革完全是一种妄想。官僚机构的改革，只有能够实施“强制服从”的人才能办到。

尤里安决心对宫廷内部进行改革。不仅是理发师，甚至裁缝、厨子以及马夫，宫廷内各部门繁琐的分工，简直到了令人哑口无言的程度。他对宫廷所有的部门都进行了精减。

以上文提到的那位理发师为例，他不仅能获得价值坚挺的金币的年薪，另外还有每天的补贴、维持20位助手的经费，甚至还拥有类似交通补贴的20匹马。在职务繁琐复杂的宫廷内，像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明却凡事都要插一手的宦官集团。这个集团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金字塔，站在塔尖的人物就是将加卢斯逼上死路并且始终与尤里安唱反调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宠宦优西比乌。这个以优西比乌为首、在宫廷内兴风作浪的宦官集团一年的花费，相当于那些在高卢浴血奋战的士兵年俸的总和。见此状况，尤里安已经不是目瞪口呆，而是勃然大怒。

宦官集团遭到解散，全员被赶出宫廷。皇宫内各部门所需的人手，被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那位理发师虽然没有失业，但他的助手全都被扫地出门。因此，坊间盛传，巨大的皇宫变得空空如也。

皇宫原本是罗马皇帝执行任务的指挥本部，使它变成这样一个臃肿不堪、错综复杂机构的始作俑者，是戴克里先皇帝。他主张皇帝应该与被统治的国民拉开距离。从他开始罗马皇帝的作风趋于东方的专治政体，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继续了父皇的治国路线，罗马皇宫东方化的历史长达77年之久。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享受了77年特权的那些人。要推翻这个特权阶级并非易事，那些与权力无缘的市井小民，会为冷冷清清的皇宫感到有趣，而与皇宫密切相关的人就笑不出来了。

“叛教者”尤里安

历史上通常称尤里安为“Julianus Apostata”，我们翻译为“叛教者尤里安”。Apostata是由希腊文衍生出的一个拉丁词，它出现于基督教势力日益强大的罗马帝国后期，意为“抛弃信仰者”。所以，译成“叛教者”应该是准确的。

不过，如果说抛弃，那么之前他必须信仰过基督教。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死，而后登上国家最高权力高峰的尤里安，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基督教扩张的措施。如果他以前不是一位基督徒，应该不会背上一个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Apostata（叛教者）之污名。那么，尤里安在30岁之前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时值公元4世纪中期，希腊罗马多神教尚未被当做邪教遭到排挤。公元313年颁布的正式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文字：

>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信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
>
> 给予基督徒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帝）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及尊严都不应遭到诋毁。

说服正帝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的另一位皇帝，就是执政30年之久、身后被尊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之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继承皇位，统治国家的时间也长达24年。大帝的这位儿子将执行父皇路线当做头等大事，因此，“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半个世纪，至少在官方场合，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保护的。事实上，军队以及政府官员的选拔没有仅限于

基督徒的类似规定，不少高官都是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

不过，基督教教会尊称君士坦丁为“大帝”，并非因为他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米兰敕令”中所谓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君士坦丁真正的用意在于振兴基督教。敕令颁布之后，他推出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教会的政策，这才是基督教教会赠与他“大帝”称号的真正原因。

君士坦丁死后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沿着“大帝”的路线继续前进，而尤里安也是大帝的亲属之一。尽管宗教信仰自由在公开场合得到承认，但从尤里安生长的环境来看，假扮成一名基督徒应该会对他的安全比较有利。他是皇族的一员，6岁时因父亲被杀，过了14年实为囚禁的生活。在获得自由后的10年里，仍处于君士坦提乌斯的淫威之下。在副帝时代，如果他表现出任何一点反基督教的态度，恐怕早就落进了盼着他倒霉的优西比乌的圈套里。尤里安30年来，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隐藏住真实的宗教信仰。如果知道自己被定义为“叛教者”，他一定会感到愤愤不平。

公元4世纪时，幼儿洗礼尚未普及。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在临终前才接受了洗礼。主教及神父们也都是在成年后接受洗礼成了神职人员。在《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中我曾提及，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废除了犹太教的割礼。如果基督教像犹太教一样，规定在出生后的第28天要行割礼，勉强还能忍受，要是在成年之后再举行这样的仪式，那种疼痛是无法想象的。基督教将仪式改为朝头上洒水，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贤明之举。无论44岁时接受洗礼的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还是32岁受洗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神父，如果入教时必须行割礼的话，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成为基督徒。正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临终前受洗才不会被当成特例。所以，尤里安在登基前很有可能没有接受洗礼。

然而，从基督教教会的立场来看，尤里安之所以能成为皇帝，是因

为他是亲近教会的大帝的血亲。如今，他推出反对基督教的政策，就是对教会的背叛。所以，才会愤怒地骂他是“叛教者”。

日本作家辻帮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叛教者尤里安”的历史小说，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小说名，则用了尤里安的英文发音“朱里安”（Julian）。除了小说，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也多以“尤里安”、“皇帝尤里安”为题，以“叛教者尤里安”为书名的作品为数甚少。因为“叛教者”是基督教对异己的蔑称，如果从不同于基督教的角度去描述尤里安的话，自然就不会使用“叛教者”这样的字眼。辻帮生的小说，书名虽然用了“叛教者”，但内容并没有偏袒基督教的倾向。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学造诣的辻帮生，或许只是沿袭了基督教为主流的欧洲人通常的习惯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翻译为“异教徒”的paganus一词，原本是基督徒对希腊罗马多神教教徒的称呼，词意中含有“仍然相信迷信的乡巴佬”的贬义。因为相对于都市，基督教当时在乡村的普及率较低。paganus会成为历史学上的固有名词，与后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有着一定的关联。“异教徒”一词虽然已经成为惯例无法改变，但追究其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尤里安是被后世学者称为“基督教与异教抗争的最后一个世纪”即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的一位人物，准确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主人翁之一。

被污蔑为“叛教者”的尤里安所推出的反基督教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罗马帝国国民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到“米兰敕令”颁布时的状态之下。

尤里安再次承认了所有信仰的存在，无论是希腊罗马多神教，还是埃及的伊希斯神以及起源于叙利亚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犹太教，甚至是基督教内部因对教义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的三位一体说的阿塔纳

西乌斯派及其反对派的阿里乌斯派等教派。总而言之，信什么都可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完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所谓的“叛教者”的蔑称、排斥异己的“异端”思想都全盘遭到否定。尤里安皇帝颁布的这条敕令，直译为“全面宽容”。

英文的tolerant以及意大利文的toleranta源自拉丁语tolerantia。我们只能一概翻译为“宽容”，词意指包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一神教的不同。

以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之后诞生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一神教的特征，是只承认一神存在。“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而对多神教，词典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为“相信众神存在，并对其崇拜的宗教”。这样的说明其实很容易引起误会。古代的多神教并非相信所有的神灵。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哲学家西塞罗、历史学家塔西佗等，他们崇拜的是希腊罗马诸神以及家族保护神，并不信仰犹太教或者高卢、日耳曼的神灵。不过他们尊重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这好比是经过寺庙，可以不进去烧香拜佛，但不会做出失敬的行为。这种宽容，是在多元化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智慧（另一个是法律）。正因为眼看着这种智慧逐渐消失，尤里安才颁布了“全面宽容”的敕令。

尤里安不仅下令重新修建了遭基督徒破坏的多座希腊罗马多神教的神殿，而且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神殿也进行了整修，这座供犹太教徒寄托灵魂的神殿，在300年前遭到了罗马帝国的破坏。当年反对罗马的犹太教徒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镇压叛乱的提图斯（Titus）皇帝下令摧毁了神殿，之后，神殿一直被禁止重建。尤里安的这道敕令，让那些因基督教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排挤的犹太教徒，欣喜不已。

尤里安认为，既然承认所有宗教信仰同等的地位，那么国家就有义务为信仰迥异的人民提供平等生存的环境。“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这半

个世纪，唯有基督教享受了特别的优惠，现在这些政策都必须废止。

30岁的皇帝，决心扭转这50年来迅速成长、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局势。

对于尤里安为何要反对基督教一教独大的理由，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是如何做到的，则是另一个议题。简单地说，尤里安无所畏惧，他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企图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理由，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章节中，我曾经作出过假设。单纯地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信教可以作为“找到真正的信仰”来理解，但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力图将基督教国教化，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者说，没有原因反而倒是问题。仅因为个人的信仰而改变共同体未来的命运，这是共同体的其他人不能接受的。因此，一定有其背后的动机。

我认为，君士坦丁决定基督教国教化，是他觉得，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良策。

从公的角度考虑，可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君士坦丁出生于公元275年前后，他经历了被我称为“迷途帝国”的公元3世纪后期的乱世。那个时代死于非命的皇帝，远远多于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统治者的更替都会引发局势的动荡，因此戴克里先皇帝试图找到摆脱迷失的途径，其继承人君士坦丁同样也认为，政局稳定才是维持罗马帝国持续的关键。

对君士坦丁大帝而言，私利就是保证日后自己三个儿子的皇位安泰。与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帝位的他本人不同，他儿子们的继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因此，他需要获得世袭正当化的权力。但是，从表面上握有国家主导权的罗马公民（包括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和元老院这样的“世俗之人”那里获得此权，似乎不利于罗马皇帝的形象。因为“世俗

之人”在赋予皇帝权力的同时，也拥有杀死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资格。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势力还相当弱小时，引导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转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上帝以外的权威。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服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

这意味着赋予现实世界，即凡界支配权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够从基督教的教诲中发现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灵敏的政治嗅觉，真是令人惊叹。按照这种思想，无论是赋予权力，还是剥夺权力，决定者并非“可知”的人类，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

既然统治权是由在现实中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天神所决定，那就必须要有某一个能够接受天意的人，将它的指示传达给人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的指示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给普罗大众。而神职人员中充当这个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与信徒有频繁接触的神父，也不是孤独修炼的修道士，而是有资格出席大公会议，解释、整理及统一教义的主教。换言之，根据基督教教会的制度，上帝是否赐予凡间君主统治权的意志，是由主教向人类传达的。因此，只要将主教拉入自己的阵营，就等于是让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考虑如何拉拢主教即可。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中，实施了一系列基督教优惠政策。如建设教堂、不向教会资产及其服务人员私产课税、赋予主教在其教区的司法权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过拉拢“上帝”来取得皇位世袭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叛乱、谋杀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稳

定。

尤里安继位时，基督教优惠政策已经推行了50年。而他本人又是在通过实施恐怖政策，从而维持统治地位24年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下成长的。因此，他自然会对为了安定政局而不顾社会现状的国家政策深感怀疑，毕竟他只有30岁，还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

这位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妻子病故后没有再婚，身边甚至见不到女人的影子。尤里安没有孩子，在这一点上，与为了传宗接代而结了三次婚的君士坦提乌斯又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德良皇帝曾经说过，儿子不能选，但继承人可以选。想来尤里安也认同这个观点。

也许尤里安根本不相信政治世界中存在什么“上帝的旨意”。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借由“上帝的旨意”确保了世袭的正统性，然而他的长子因为一时的冲动，轻易地就死在了一介大队长的手里，小儿子则因为手下蛮族出身的军人叛乱而死于非命。二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最后是死于病榻之上，但倒在了讨伐反叛的副帝的路途之中。纵观这一切，自然是很难让尤里安相信“上帝的旨意”存在的合理性。何况，他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仰者，而是一个以怀疑为上的哲学门徒。

总而言之，尤里安不需要讨好传达上帝旨意的主教们，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持续50年的基督教优惠政策，而且贯彻落实得非常之彻底。

向基督教宣战的诏书

根据尤里安的政策，迄今为止利用国家财产资助教会活动的一切行为，遭到全面废止。如建造教堂以及向教会捐赠资产（包括附带农奴的耕地、配备工匠的手工业以及配备店员的商铺等），等等。

除此之外，教会财产及其从业人员的个人财产免税的特别优惠，也毫无例外地一律废除。从此以后，主教大人将与一般平民一样成为纳税人，原来以教会活动经费为名目而免税的教会财产，和其他的农工商行业一样，必须向国家缴纳税金。

不过，尤里安并没有下令没收这50年来由国家出资建造的教堂，也没有向教会及其人员追缴之前被免除的税金。虽然这让教会占了“先来先得”的便宜，不过尤里安的企图似乎只在于阻止基督教教会继续扩张，而废除优惠政策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基督教教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4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人因为私利私欲而改变信仰，成了基督徒。

正如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的真正动机在于振兴基督教教会，尤里安皇帝的“全面宽容”也有着表面和实质的两面性。他的真正目的，当然就是复兴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尤其是被基督教认定为“异教”的希腊罗马多神教。

尤里安决定重建那些长年废弃、濒临崩溃边缘的神殿，并归还原属于神殿的土地。罗马人习惯把神殿建在市井之中，它不仅是参拜的场所，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希腊人喜欢将神殿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即便是在大海上，也能眺望到崇高的神灵。或者是将神殿建在溪水潺潺、绿树丛林的大自然中。而神殿周边的土地，与其说是维持神殿所需的财源，不如说是奉献给天神的居所来得更有意义。

罗马帝国的东部，在受到罗马人统治之后，通用语言仍然是希腊语，由此可见，这里始终属于希腊文化圈。要在帝国东部重建神殿，必须一并归还其周边的土地，否则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同时，尤里安还制定了国策，恢复了在神殿举办官方祭拜的仪式。

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颁布法令即敕令，无须等待元老院的审议、核准。因此，将恢复“异教”定为国家政策，并非一件难事，真正困难的

是如何具体实施。尤里安颁布的几项法令就面临着贯彻落实的困境。

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让一部分政治神经敏锐的人首先觉察到了形势的变化，而到了公元324年，击败宿敌李锡尼，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的君士坦丁大举兴建基督教堂的行为，使得平民百姓都能够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的公元337年之前，优待基督教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得到全面完善，原本对宗教并不热衷的人们，也能从中体会到顺应时代的好处。加入基督教有益，就意味着坚持做异教徒会非常之不利。

大帝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分治天下。长子因被杀，很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从公元340年开始，帝国由二儿子和小儿子两人共同统治。管辖帝国西部的小儿子君士坦斯，在341年就颁布了禁止异教祭祀活动的敕令，可是到了第二年的342年，他又发布了以下禁止首都罗马市民破坏神殿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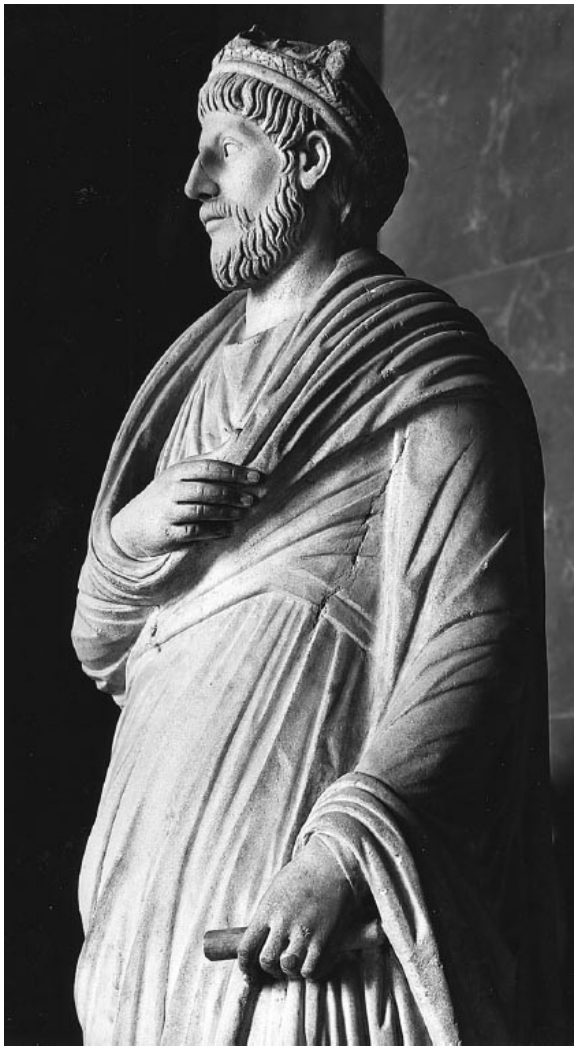
> 尽管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必须遭到排除，但城外的神殿应该保留其现状。虽然战车竞赛以及田径运动起源于奉献神灵的仪式，但是破坏举行这些仪式的竞技场及其附属的神殿，就等于剥夺了人民长年以来所享受的娱乐之权利。

比拳击运动更残酷的角斗士决斗、堪比现代F1赛车的四轮或两轮战车的竞赛，以及在近代以奥林匹克方式恢复的田径比赛，最初的出现都是以奉献给希腊罗马诸神为目的。因此，在比赛之前，选手们照例要先去附属于竞技场的神殿参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神殿附属于竞技场，而是竞技场附属于神殿。所以，破坏神殿很可能会影响到竞技场，君士坦斯皇帝之所以提出保护神殿，是不想因娱乐场遭到破坏而得罪了天下百姓。

这段逸事发生在基督教渗透速度低于东部、狂热的基督徒数量极少

的帝国西部，而且是在被称为异教圣地的首都罗马。相比之下，帝国东部不仅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三位一体派与阿里乌斯派因对教义的诠释不同而纷争不断，异教神殿所面临的形势，势必要比西部来得更为严峻。

事实上，若干年之后，因弟弟君士坦斯遇刺而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统治者的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颁布了夜间进行祭祀的禁止令，紧接着白天的祭祀活动也遭到了全面禁止。由于“米兰敕令”规定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君士坦提乌斯禁止异教公开祭祀所用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善良的人民因崇拜偶像而犯罪。”



尤里安

在尤里安实施宗教改革之前，如果违反禁令，举行或参加祭拜仪式的人将被处以死刑。除此之外，国家虽然不允许拆毁神殿，但默许民众将破损的神殿中的圆柱等材料拿去建造私宅。民众为了获取石材，往往会存心去破坏神殿。

总而言之，尤里安的宗教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根本无法实现。

先说重建神殿，由于神殿内部材料大多被人拿走，必须开山取石从头开始做起。

再讲那些神殿周围的土地。如果对神灵不存敬畏，那么这些地方就无异于其他土地。由于神殿多远离人烟，因此适合作为农田或墓

地。既然不相信神灵的存在，那么土地转为它用，对使用者而言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就算是恢复祭拜仪式，实际上也没有想得那么容易。首先是因为长年以来的法律规定举办祭祀活动为死罪，加上希腊罗马多神教没有专门的祭司阶级，祭祀活动在久遭禁绝的情况下，以前那些兼任祭司的市民也因年事已高而陆续死去，人数不断减少。

尤里安还是哲学门徒时，就有人对他的说话方式有所非议。说得客气一点，叫滔滔不绝，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修辞速度赶不上脑海中不断冒出的想法，口不择言。当了皇帝之后，他的这种习惯也没有改变。凡是这种说话方式的人，做事也容易急躁。

尽管年仅30岁就成了帝国最高统治者，但是尤里安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或许是使命感让他觉得，如果不好好地利用现在的时机，就无法掌控未来的局势。他的焦虑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何况他所推行的改革，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即使在一些没有遭到正面冲击的地方，也层出不穷地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况。但是，尤里安并没有退缩。他在赶走了大批下人而变得空空荡荡的皇宫中，取消了登基庆典以及各种属于皇帝的奢华享受，接二连三地推出并实施了多项法律政策。

有一本古籍叫《狄奥多西法典》（Codex）。它是在公元431年，由时任皇帝的狄奥多西二世制定的法令大全。这部法典汇集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狄奥多西二世百余年来历任皇帝所签署的宪令。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一部正式名称为《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狄奥多西法典》成书的公元431年，基督教获得全面胜利，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已经30年。《狄奥多西法典》中所汇集的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的法律，因此，都是与基督教国家化相关的内容。

鉴于以上原因，尤里安制定的有关全面废除优惠基督教的法令，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法典中。尤里安死后，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实施的基督教优惠政策陆续恢复。我们后人就是通过这本《狄奥多西法典》，才能了解到优惠基督教的具体措施。

尤里安制定并实施的反基督教的政策，在他死后立即遭到了废止，因此这些相关法令自然是不会记载在案的。

不过，《狄奥多西法典》中也包括了52项由尤里安签署的条令。被视为“叛教者”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之所以还能出现在法典中，按照研究人员的见解，主要是因为内容都是与基督教无关的行政法。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滞留了三四个月的尤里安，除了反基督教的相关政策，还制定了52项其他的法令，可见他是埋首于国家大事，心无旁骛，这也让人感觉到他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在尤里安死后被废止因而没有收入《狄奥多西法典》的宪令中，有一条驱除信仰基督教的教师的规定。尤里安对此作了以下的注解：

> 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而书本教材都是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作品。这些希腊以及罗马的作者，对天神怀有敬爱和崇拜之心，其作品正是这种精神的结晶。然而，基督教将这些天神看成魔鬼，对此笃信不疑的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去领会作品中所蕴含的希腊罗马精神的真谛？

言下之意，将宙斯、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视为邪神的人，怎么能教群神登场的荷马的作品？据说他曾经讲过：“信仰基督的教师可以去教会教书，用他们深信不疑的《圣经》当教材。”

对于尤里安的上述言论，就连现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也认为“理论上相当正确”。对此，我倒是有点按捺不住，不禁想问问这些专家，作为

热心的基督徒，你们是否又能体会罗马精神的真谛呢？

话说回来，尤里安驱逐基督徒教师的政策，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传出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竟然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教师。他们不赞成的理由是，基督徒大多热心于孩子的教育，如果赶走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家长们就不会再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时的学校以私塾为主，对教师而言，学生的学费是他们的生活来源。结果证明，这些教师的担心不过是虚惊一场，法律公布之后，基督徒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减弱。

根据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在完成了读书写字算盘等初等教育之后，就要进入现代称为liberal arts的“artes liberals”，即教养学科的学习阶段。学生就读的年龄从八九岁开始一直到十六七岁，这段期间他们会接受以下科目的教育：

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准确且优美的叙述能力所不可欠缺的基础。

修辞学——加强言辞或语句效果，恰当地表达思想所需的技能。

辩证学——说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所需的论理性。

其他科目还有：数学、几何学、历史、地理。

以上这些科目所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前人的著作。在当时被认为是“classics”（古典）的著作，大约是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到公元2世纪的塔西佗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适用于做课本，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完整性。

中上层社会的基督徒，大多属于新兴阶级。这些人热衷于对孩子们的教育。在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帝国还有一个现象，多数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政府高官或律师。要达成这个愿望，首先必须接受artes

liberals（教养学科）的教育。因此，不管教师是不是基督徒，家长们仍然愿意将孩子送到私塾学习。

被踢出校门的基督徒教师们，也曾试图作出一些反击。他们修改了教材，将原本出现在《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苏格拉底对话录》中的诸神和人物，改为《圣经》或《使徒行传》里的人物。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化背景下的神和人，与严格遵守教义、一丝不苟的基督教徒，实在是无法互换角色。

这件事情最终也就是一场闹剧。基督徒们指责的所谓的异教徒，是即使自己不信也不会反对他人信仰的多神教的民众。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就要被迫离开教坛这件事本身，就脱离了“宽容”的精神。因此，即使在基督徒的学生数量没有减少的状态下，仍然有一些“异教徒”坚持反对尤里安的这项政策。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不过，尤里安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希望通过异教徒教师的教育，让那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了解到，这个世界除了基督教的理念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存在。

尤里安为阻止基督教势力的扩张，连续推出的一系列法规条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将帝国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时代。比如说，禁止使用国家资源建造教堂，撤销教会财产以及神职人员私人财产免税的特惠等。

第二，在元首制时代完全不曾涉及的一些新政策。因为那时的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不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予以治理。像上述禁止基督徒担任教师的法令，就属于这一类型。接下来我要论述的另一项政策，性质也是如此，即这些法律都是尤里安独创的。

在尤里安看来，希腊罗马多神教陷于劣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没

有一个专门的祭司阶级。与之相反，基督教的势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大，正是由于它有一个金字塔般的组织结构，各教区的主教位于塔尖，下面依次是祭司、副祭司。

身为皇帝的尤里安，同时也是大祭司。因此，他在各地任命了专职的祭司，祭司之下还配有专门的祭司。这样，罗马的传统宗教也能形成一个抗衡基督教教会的类似的组织机构。

这些专职祭司的开支由国家承担，所以他们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并信仰希腊罗马多神教。与以往民间人士兼职的祭司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大祭司和祭司不得前往剧场、竞技场观赏戏剧、战车竞赛和角斗士角斗表演，禁止与深受百姓喜欢的演员、竞赛选手等人物交往，也不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对罗马人而言，这等于禁止过正常的市民生活。

尤里安推出的这些法令，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罗马文明。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神教，要求人们按照唯一真神的教诲去生活。然而，所谓神的教诲，就像占星术或者是抽签卜卦那样，充满了随个人感受去自我诠释的内容。占星术、卜卦的内容可以随便说，但宗教不能放任信徒“随个人感受”去理解。放任意味着失去秩序，没有秩序就不能形成组织。

一神教之所以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祭司阶级，就是因为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员，去调整、统一神的教诲，并将之传达给民众，避免教义“随个人感受”被任意诠释。

另一方面，多神教中的诸神并不具有引领人类生活的意义。他们充当的是帮助人类分忧解难的角色，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神的教诲。因此，

既没有解释教义的必要，更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整合，并传达给信徒。罗马自建国以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专业的祭司阶层，正体现了忠实于多神教的罗马人的精神，也是罗马文明的精髓所在。即便是以抗衡基督教为目的，强行建立专业的祭司组织，终究是与罗马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政策自然是不可能深入人心、维系长久的。

不过，话说回来，尤里安这项政策的失败，并非源于这些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在实际中遭受到了以下的阻力：

第一，即使成了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大祭司或祭司，这些人也不能享受私有财产免税的优惠待遇。尤里安废除基督教相关人员私产免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须接受同等的社会待遇。既然皇帝大张旗鼓地推行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也就无法对希腊罗马多神教另眼相看。

第二，几乎与基督教的修道士的清规戒律相同，大祭司以及祭司必须远离尘世。他们既不能去剧场看戏、出入赛车或竞走的竞技场，也不能举行或出席宴会，与亲朋好友大快朵颐。这在世俗的罗马人观念中，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尤里安自己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就认为别人亦可如此，这位年轻皇帝对人性几乎是一无所知。

尤里安推行的对抗基督教教会的各种法律中，还包括了与福祉有关的条令。他发现，基督教教会主导的救济贫民以及孤儿寡母的活动，对于扩张势力有明显的帮助。

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会之所以可以做这些慈善，主要是因为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实施的用国家经费援助教会的政策。当然，教徒也会有个人捐赠，但是真正让教会确保慈善事业财源的，还是前朝皇帝们捐出的大笔钱财和大量耕地。尽管国家资助教会的禁令已经推出，但并未没收之前捐赠的资产。因此，基督教教会依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慈善事业。为了打破教会独占的局面，尤里安决定以

国家名义开展福祉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和教会争相救济贫民。不过，这项法律，除了尤里安亲自落实了两三条具体的措施，就再也没有后续的跟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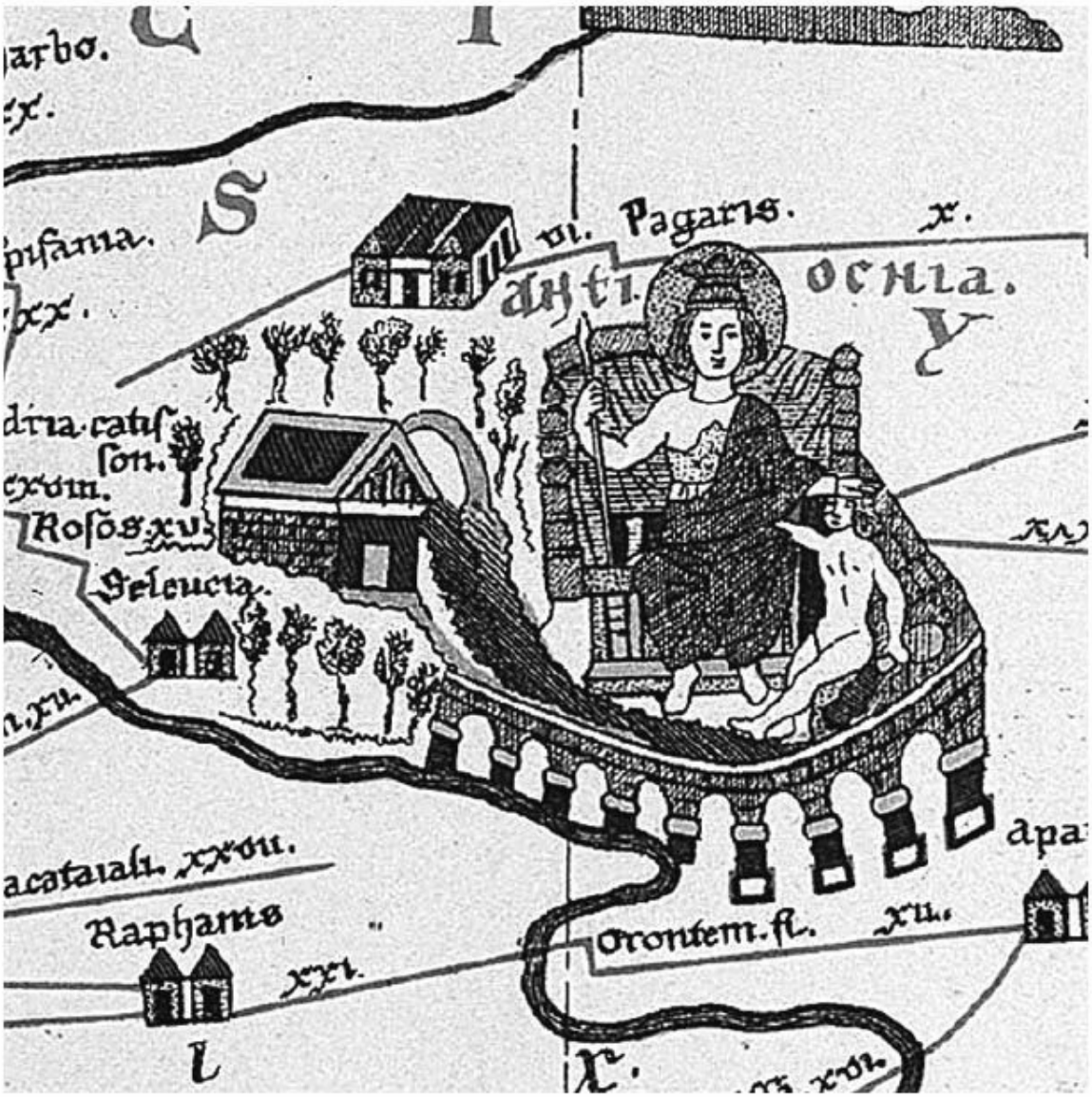
导致尤里安的慈善事业最终失败的另一个要因，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组织架构。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地方自治体”以及“个人”的支持。社会福利之所以能在元首制时代持续发挥功效，是因为它名为皇帝主导，实际上是由地方自治体进行实施。除此之外，公共事业还受到了愿意回馈社会的私人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架构是一个“小政府”，它巧妙地协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关系，所以“小政府”才能掌控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以罗马道路为例，正是由于“中央”、“地方”、“个人”三足鼎立的体系，交通网络才能建设得如此完善，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正常的运作。

然而，到了帝国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地方自治早已是明日黄花。税制的改变，也让个人捐赠财产、回馈社会的观念消失殆尽。

尤里安死后，由国家推动实施的社会福利法案遭到废除，统称为“caritas”的慈善事业，再次被基督教教会独占，这种状况在之后维持了很多年。

安条克

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死亡，让尤里安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和平登基，以帝国唯一的最高权力者的身份，于同年12月1日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生活了多久，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专家认为是到公元362年4月左右，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晚一些，大概到初夏前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证明尤里安前往东方之前，在首都的生活没有超过一年。



他离开首都向东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与波斯王国再打一仗。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形势非常稳定，辽阔的疆土既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也没发生内战，正是皇帝亲自出征、歼灭宿敌、除去心头大患的好时机。

有一份以最初的所有者名字命名的古代地图，叫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如今保存的是11世纪制作的复制品，原图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即尤里安生活的那个时代制作而成。在这幅地图

上，用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记号，标注了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

在这三大都市中，罗马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世界大都市的地位；君士坦丁堡（英文：Constantinople）在公元1453年遭到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攻陷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以后作为土耳其的首都，一直是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东方风情的城市。

与这两个古代大城相比，安条克的生命未免过于短暂。现在，这里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是一个距离叙利亚国界不到30公里的边境小镇。那些怀着对古城安条克朝拜之心来到这里的人，想必是无一例外地失望而归。

无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所形成的城市结构，还是长达几公里的中央大道，昔日的风貌荡然无存。街道两侧圆柱林立的中央大道，曾经赫赫有名，甚至成为波伊廷格古地图的记号，当安条克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竞相争做东方第一都市的时代，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条中央大道。

安条克的城市规模不如罗马，但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堡。它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帝国的武将之一塞琉古（Seleukos）所建。因此，相比公元前753年建城的罗马，历史较短，却比公元330年建都的君士坦丁堡悠久许多。塞琉古王朝遭罗马灭亡之后，安条克失去了其首都的地位，但在罗马的统治下仍然继续保持着经济的繁荣，因为这里是东方贸易的中心。

首先，这里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经过幼发拉底河从东方运送来的货物的最佳集散地。城附近由东北向西南流淌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适于航运，往下游行驶20公里，就是地中海的入口。因此，这里具备了作为贸易城市的所有条件。

其次，安条克的居民结构非常国际化，很符合贸易城市的气氛。上

层以及中产阶级主要是希腊裔，而那些比其他民族更善于寻找商机的犹太人，很早之前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经济圈。市民地位处于中下层的，是可以算做原住民的闪米特人（Semites）。城市的东方风情其实并不太浓厚，这主要是因为城中到处都建有罗马人和希腊人喜好的圆柱，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圆柱的数量竟然成了课税的基准。而象征着安条克雄厚的经济实力的长达几公里的圆柱大街，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更是家喻户晓。如果加上奴隶的数量，安条克的人口有百万之多，这一点上，它同样也是劣于罗马，胜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擅长巧妙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因此也赋予这所东方大城市自治的权力。所有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方针等事项，全部由200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安条克议会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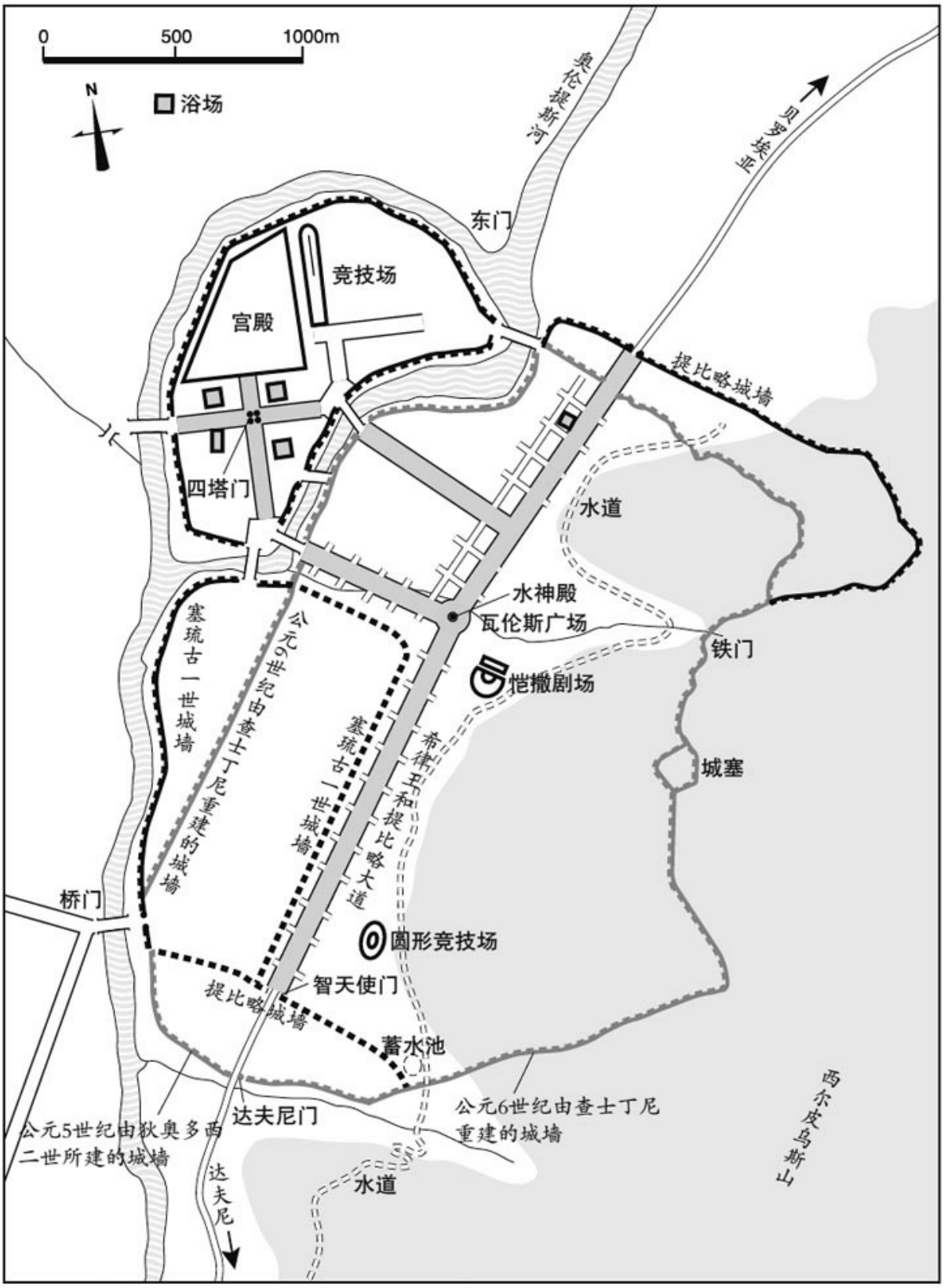
顺便提一下，那位武将出身的文人，因不向基督教妥协终身为异教徒而被称为“罗马最后的历史学家”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是在这所国际都市出生、成长的希腊裔安条克人。

繁荣的安条克出现明显的阴影，是在尤里安时代过去百年之后。当时它遭遇了波斯军队的侵略以及地震的重大伤害。但是，波斯军的烧杀抢劫以及地震所带来的破坏并非都集中于公元5世纪。真正的问题，是当地的人民已经失去了重建城市的信心和资金。虽然皇帝推出了修复城市的支援措施，不过，按照罗马人的思考方式，皇帝的作为并非万能，不过是为努力自救的地方自治体及其个人，提供一些帮助而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城市要克服过去的不幸重新崛起，最重要的是靠当地居民的意志力和财力。5世纪以后的安条克，已经没有了这些必备的条件。

逐渐走向没落的安条克，在公元638年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彻底丧失了城市的机制。这里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代世界连接地中海的内海城市。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文明圈中的“内海”，反而成了两大文明世界的分

界线。安条克作为城市的生命，自然也随着古代一同消失。

话说回来，尤里安身处的公元4世纪，安条克还是罗马帝国引以为自豪的一个繁荣的东方城市，没有人会想到它在百年之后将走向没落。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居民，尤其是上层阶级的人们，天生就是商人。他们相信无论是谁统治，自己都有生活的能力。这种自信心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统治者所作的努力不屑一顾。安条克人的性格说得好听些，是务实清醒，不客气地说就是老奸巨猾。因此，年轻气盛又是理想家的尤里安注定与他们格格不入。


0
500
1000m
N
浴场
奥伦提斯河
贝罗埃亚
东门
竞技场
宫殿
提比略城墙
四塔门
水道
水神殿
瓦伦斯广场
铁门
塞琉古一世城墙
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重建的城墙
塞琉古一世城墙
希律王和提比略大道
拦撒剧场
城塞
桥门
圆形竞技场
智天使门
提比略城墙
蓄水池
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重建的城墙
西尔皮乌斯山
达夫尼门
公元5世纪由狄奥多西二世所建的城墙
水道
达夫尼

古代安条克

尤里安在安条克的生活，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幸事件。安条克的东北地区是当地的粮仓地带，就算在收成不佳的年份，也不会像其他城市那样陷入粮食危机。不过，安条克毕竟是一个大都市，而且与行使公权力管理粮食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不同，确保民众粮源这种政治工作，在这里也是交由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尤里安来到这里的一年，正好遇上了周边地带发生小麦歉收的问题。

收成不足的消息一传出，市场上的小麦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背后无疑有着投机的行为。

英文speculation的词源来自拉丁语speculatio，可见投机的行为自古存在。speculatio原本是一个哲学用语，意为思索。思索人生的真理是哲学，而思索赚钱的真谛，就成了投机。

希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Thals）出生于当时称为爱奥尼亚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Miletus）。这位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的哲学家，曾经有过一段既有现实意义又很反映地中海民风的愉快经历。

话说有一天，边走边思考的泰勒斯，不小心掉进了水沟里。路人见此情景，不禁捧腹大笑，说哲学家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泰勒斯决定用行动来反驳众人的偏见。我忘了他是用哪一种计算方式，反正他是以某个事物为基准，预测出这一年的橄榄将大获丰收。他事先租下了米利都周边所有的榨油场，业者想销售橄榄油，就必须到泰勒斯的工场榨油，否则就无法成品上市。也就是说，泰勒斯采用了垄断的手法，获得了莫大的利益。

哲学通常会被认为是一门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其实，哲学的精髓并不在于知识，而是思索。如同做体操活络筋骨一般，思索锻炼人的头脑。换言之，哲学就是让人们习惯于思考。泰勒斯用他的行动证明，只要习惯于思考，不管对象是哲学还是投机买卖，都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哲学是一个多面手。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泰勒斯真正关注的仍然是哲学，他只是在那一年关注了投机的生意。之后，他思索的对象再次回到哲学上。他不是一位投机高手，他是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巅峰人物的希腊哲学的开山鼻祖。

罗马皇帝尤里安也无时无刻不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然而，哲学对于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他而言，并非像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所追求的那种傲然独立、目空一切的思想，而是变成了灵魂的救赎，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尤里安身边围绕的都是他喜欢的哲学家，这些人是以利巴尼乌斯（Libanius）为首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不过，这些著名的研究人员给人的印象，是站在讲坛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像现在大学里的哲学系教授。当时的教授依靠学生缴纳的“礼金”为生，皇帝之友的身份，对广招弟子是很有帮助的。阅读利巴尼乌斯等这些尤里安的友人留下的有关他的文章，无法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尤里安怀有亲爱之情，甚至在尤里安死后，他们写的那些为其辩护之文，也因为对他的理解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当时就有人刻薄地指出这些人是寄生虫，看来并非言过其实。成天与这些人在一起的尤里安，所想的自然都是与哲学有关的内容，他应该是从未思索过投机之类的事情。

私底下尤里安以哲学会友无可非议，不过作为皇帝，市场上小麦骤然消失、面包店无货可售的事态，他不能坐视不理。

尤里安向安条克的市民喊话，希望大家尽量节约，在事态缓和之前暂时忍受一下贫乏的生活。他的这类呼吁以前在高卢遭受蛮族围城时，曾经振奋过人心，然而对和平形势下的安条克人民完全不起作用。于是，尤里安派遣特使前往小亚细亚和埃及购买了大量小麦，全部投入了市场，并且设定了最高售价的限制。

但是，现状并没有因此改善。那些紧急进口的小麦，在安条克的外港换船装货时，就已经被一些巨贾全部买了下来。这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几乎全都是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

尤里安这才知道，原来掌握情报是获取暴利的关键。年轻的31岁的皇帝盛怒之下，将200名元老院议员统统关进了大牢，不过当天就释放了他们。无论如何，皇帝强硬的态度总算有了效果，那些商人终于愿意将囤积的小麦投放市场。市民的不满虽然得到了消解，但安条克的上层阶级从此与皇帝结下了怨仇。而因为另一起事件的发生，让中下层人民也对皇帝表示出了敌意和反感。

安条克以南不到10公里处，有一个森林葱郁、泉水潺潺叫做达夫尼（Daphne）的小镇，当地有一座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雄伟的阿波罗神殿。达夫尼就是以神殿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事情发生的起端是尤里安来这里参拜神殿。

要追溯被史学家称为“希腊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个世纪”的公元4世纪的世事变幻，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尤里安在位时期，“米兰敕令”已经颁布了半个多世纪。这意味着，表面上所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承认，实际上皇帝偏向于基督教的政治路线，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另一面，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建造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主要出资人又是皇帝。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多神教，由于没有所谓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向信众传播、解释教义的神职阶级，因此也没有必要去建立财源，用以维持相关人员的生活以及举行弥撒、做慈善等。

以上状态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时代发生了变化。失去了皇帝以及地方自治体资助的希腊罗马多神教状况凄凉，原本还可以依靠一些私人援助，但帝国当时接连遭遇危机，人们心中充满了天神离他们而去的不安。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像基督教，没有什么“不幸是神赐予人类的试炼”这类应变的解释。

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谁还会去关心天神不在的神殿，还有谁愿意主动充当祭司，自己花钱购买献祭用的家畜，来举行出席人数寥寥的献祭仪式。来到达夫尼的尤里安，看到的阿波罗神殿也是一片荒凉，迎接他的是听到皇帝御驾光临，急急放下手中的农活、从田里慌张赶来的祭司。

阿波罗和达夫尼雕像（贝尔尼尼作品，

在古代，阿波罗神殿一直人头攒动，参拜者络绎不绝。人们来此，倒不是因为这位天神对达夫尼的一片痴情。实在要说的话，大家倒是可能会对为了摆脱阿波罗紧追不舍，毅然化身为月桂树的达夫尼予以同情。阿波罗神殿之所以能聚集众多的信徒，正如德尔斐阿波罗神殿（Delphi Temple of Apollo）闻名于世的理由，是人们希望听到由巫女传达的神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自古有名的原因同样如此。可是，来到这里的尤里安听说神殿已经听不到神谕的传达，这也是导致参拜者日益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神谕断绝的时间，似乎与附近森林中建造基督教殉道者墓地的时期相重合，由于前往墓地巡礼的信徒多

17世纪）

于去神殿参拜的人，因而惹得阿波罗神不高兴，“罢工”不再发神谕。

上一次那些冠冕堂皇坐在议席上、背后却大搞内部交易获取暴利的安条克元老院议员激怒了皇帝，这一次因无法聆听神谕再次让皇帝勃然大怒。尤里安下令迁走基督教殉道者的墓地，大兴土木重新修建阿波罗神殿，并且要求立即行动。

殉道者的遗骨在唱着赞美歌的信徒们的护送下，平安地移到异地。可是，达夫尼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当阿波罗神殿的修建工程结束，第二天就可以开门接待参拜者，甚至可以迎接皇帝的前夜，发生了火灾，大火吞噬了整个阿波罗神殿。石造建筑通常会被认为耐火性较强，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尽管柱子、墙壁使用的是大理石或其他石材，但梁架等许多地方还是会用到木材。一旦支撑部分被火烧毁，即便是石造的建筑物一样也会坍塌。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最终变成一堆废墟。

就在同一时期，正在顺利复建中的犹太教圣地的耶路撒冷神殿，也在夜间突然发生了火灾。这里是尤里安以保障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令重新修建的。根据当时的记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神殿发生火灾的原因，同样是“原因不明”。要说是偶然巧合，未免也太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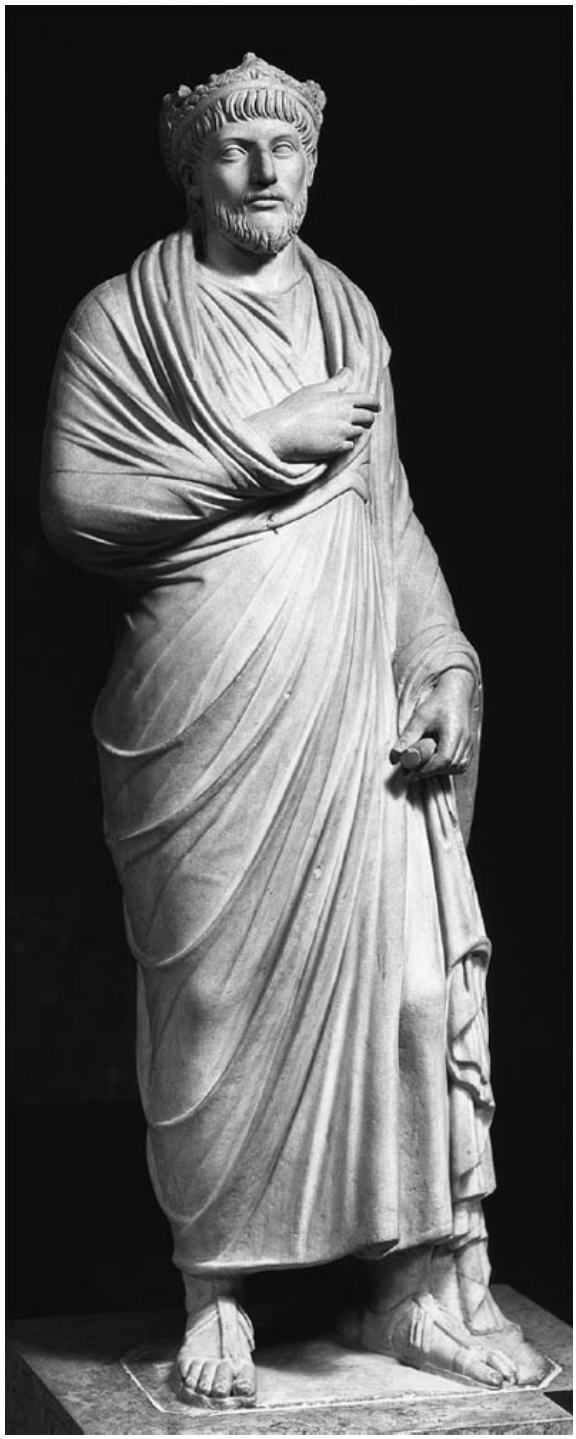
尤里安认定，这一连串火灾事故背后的嫌犯就是基督教徒。他大概是想用大城市作示范来杀一儆百，下令关闭了安条克市内的所有基督教堂，皇帝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中下层阶级。

人们把皇帝叫做山羊，嘲笑他体格瘦弱、头脑欠佳。尤里安登基之后，无须再顾忌别人的眼光，恢复了以前当哲学门徒时的习惯，留起了当时可算做哲学家招牌形象的络腮胡子。他的体型普普通通，没有希腊

雕塑般刚健有力的骨骼，百姓把他形容成当地随处可见的山羊，也不算太过分。总之，尤里安移居安条克之后，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的友人写过以下这封信：

> 我想以皇帝的身份去证明，那些加利利人（Galilean，基督教徒）所祈求的事情，在人间也能达成。他们所赞赏的教义属于穷人，而且认为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让我正在推动的公正的统治以及无关宗教的福利事业，在我在位期间得到确切的落实，实现那些德行和幸福。
>
> 所以，任何人胆敢阻碍，我都会迎头反击，任何人胆敢捣乱，我都会将其绳之以法。不仅要没收他们的财产，还必须让他们承受铁与火的刑罚。



尤里安

那个时期的帝国东部灾祸不断，上文提到的权贵们的投机造成安条克的粮食不足，以及达夫尼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大神殿的火灾，不过是其中的三例而已。尤里安来到安条克之后，中东各地的形势，就像这个地区时常发生的地震，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首先，借着尤里安登基的势头，“异教徒”向基督教势力频频发起反击。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执政的50年中，被打压的反基督教的情绪终于得到爆发。尤里安只有31岁，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想当然地相信，他会像前两位皇帝一样，统治天下20年以上。

其次，那些原本隶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如今却被剥夺了利益的基督教教会和教徒对皇帝产生敌意。另外，他们对犹太教的仇恨甚于对罗马皇帝的憎恶。

引发中东地区骚乱的第三个原因，来自基督教内部长久以来对教义的争议。自3世纪以来的有关教义的论争，大体分为两派：

主张神、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到了公元4世纪时，已经称为天主教。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然而，现实并非那么单纯。

主张基督不同于人也不等同于神的阿里乌斯派，在尼西亚公会议败北之后，一直努力在挽回局势。给临终的君士坦丁大帝施洗的就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主教，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24年间，也始终偏袒阿里乌斯教派。

接下来就是尤里安继位。他从尊重所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继而进一步认同了基督教内部各宗派的信仰自由。君士坦丁大帝视教会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教会的统一非常关键，而尤里安却毫无此意，对于希望打破基督教优势的他而言，教会内部的分裂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皇帝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在中东地区原本就占了上风的阿里乌斯教派愈发强势。各种类型的仇恨中，近亲之间的仇恨最容易激化。各教派不仅相互谩骂对方是“异教徒”，而且还频频发生暴力攻击对方主教的事件。名为教理的论争，实际上是为争夺主教的地位。

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中，主教有自由使用其所属教区的教会财产的权力，并且掌握着教区的司法权。也就是说，主教是统治世间的权力者。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派与阿里乌斯教派的争斗，在一方没有彻底败下阵之前，注定是不会停止的。

中东地区的面积不算大，但经济实力相当于半个帝国。统治帝国的尤里安皇帝，在这里亲手点燃了纷乱之火。这种局势下，安条克这个中东的中心城市，成为波斯战争坚强后盾的可能性也就成了泡影。尤里安继位之后，早早迁居安条克，就是期待能在准备充分之后，展开对波斯的战争，而现实让他满怀失望和愤怒。

尤里安在安条克期间留下了许多书信和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厌胡者》（Misopogon）的小品文，按照现代的排版方式，大约不到40页。文章特地使用了希腊文，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感发胸怀，而是专门写给安条克市民看的。一贯坚持双语制的罗马帝国，西部的通用语为拉丁语，在东部则是希腊语。这篇文章完成之后之所以能立即公之于世，正是因为安条克的市民完全理解其内容。当然，这原本就是尤里安著文的目的。

历代罗马皇帝亲自撰写的著作如下：

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奥古斯都去世前写下的《神君奥古斯都功业录》。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尤里安所著的、包括上述《厌胡者》在内的作品集。

恺撒把自己亲自指挥的战役刻画得栩栩如生；奥古斯都则轻描淡写地叙述了40年统治期间完成的业绩；马可·奥勒留在与北方蛮族作战期间，写下了自己的心情感受，却对战争只字未提。而尤里安的《厌胡

者》从头至尾充满了冷嘲热讽。

从以上这几位最高统治者的文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特质。堪称拉丁散文之巅峰的恺撒的文采，姑且不谈，其他几位皇帝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文采。即便是犹如目录般的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也充满了不轻忽现世中微小的幸福，脚踏实地、一步步成功达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自信。

同样是皇帝的著作，唯独尤里安的《厌胡者》被归类于讽刺文学。对此，我有异议。因为在这篇文章中缺乏了讽刺文学所必需的两大要素：强烈的批评性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

《厌胡者》的确体现了尤里安视觉敏锐、擅长辩论以及对《圣经》的深刻理解力，但它充其量是一篇在长期压抑之下的泄愤之作。皇帝在文中，对着其读者即安条克的市民们，大声呵斥：“忘恩负义!”他愤愤不平地表白自己登基后一直致力于公平的统治，不但没有增加税赋，还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可他得到的回报统统是不满和怨言。只会嘲笑皇帝是长着山羊脸的哲学家的安条克，不配接待皇帝。市民的不满，本应该归咎于那些掌控这个城市的富人的无所作为，而大家却为了一吐怨气而迁怒皇帝。尽管怒气冲天，尤里安还是没有忘记强调，他尊重言论的自由，所有对他的非难或嘲笑，都不会受到压制或处罚。

文章里还出现了他怀念副帝时代的段落：“亲爱的鲁特西亚，这个属于巴黎士人的土地，高卢人如此称呼它。”这一段挺有趣，现在的法国人喜欢尤里安的原因说不定就源于此。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尤里安在文章中除了表现出他的愤怒与失望之外，并没有更深层的意义。当然，这也有好处，因为文章没有经过任何修饰，读者反而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他的情绪。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除了感觉到尤里安的痛苦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共鸣。其实，最高权力者应该很清楚，他从来都是批判的对象。对于

无权者而言，批判是他们能够反击的唯一手段。然而，要让尤里安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者是尤里乌斯·恺撒那样，对这些非议一笑了之，恐怕是做不到的。毕竟与壮年时期的古希腊政治家以及古罗马将军的人生历练相比，尤里安才30岁出头。

当我阅读尤里安留下的书信和著作时，并不会联想到同为异教徒的伯里克利或者恺撒，反而是基督耶稣。当年年轻的耶稣对那些身处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仍然一心只想着生意的同胞深感愤怒，一气之下将神殿中的摊位砸个精光。被犹太商人激怒的耶稣，与猛烈抨击安条克的市民的尤里安，正好是差不多的年龄。

《厌胡者》的结尾处，留下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文字：

> 提笔至此，我想说的话都已说完。这些不过是我本人的期待而已。
>
> 对于我的责难，理应由我承担。因为这些有利于你们的政策，正是由我本人立意推行。即使无法获得感谢，我也无权强制于民。我只能将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归结于我的思考不周，我保证今后会更加谨慎行事。你们对我的“敬意”，诸神将会代我讨回。

尤里安不仅写下了《厌胡者》，而且将之公之于世，因此他离开这座城市出征波斯时，的确如文中所述，带着“不再踏上安条克土地”的决意。他相信，诸神会为他从忘恩负义的安条克人那里讨回公道，在神的庇佑之下，一定能战胜波斯国王，令安条克的人民对他刮目相看。

波斯战争

公元363年3月5日，31岁的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

中部，那里是波斯王国的中枢之地。临行当日，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们恭送皇帝至城门外，皇帝向这些安条克的权贵发表了感谢之言，但语气相当冷淡。既然他已经公开言明不再踏上安条克的土地，自然是不会有好态度的。而那些权贵尽管表现得恭恭敬敬，却很明显的是在应付场面。麻烦的人物离开了这里，想来他们心中甚感欢喜。

这里提一下，有关尤里安的波斯战争，我们后世之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要归功于那位出生于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留下的详细记录。这个人在罗马军团经历了戎马生涯之后，改行成为历史学家。他和尤里安属于同一个时代，当时32岁。阿米阿努斯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并没有参加这次波斯战争，这位一人挑起帝国东部军队重任的罗马大将，没有出现在参战的名单上，估计已经自然死亡，因为事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波斯战争中，阿米阿努斯所属的部队及其军阶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应该位居高位，或者接近于军中高层。

皇帝御驾亲征的仪式看似太平无事地结束了，但安条克的权贵们以及在远处观望的民众，一定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不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带有“☧”符号的军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顶端装饰着银制老鹰的军团旗。由X和P组成的“☧”符号代表了基督徒，如果是这面军旗引领队伍，意味着这是一支基督教的军队。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符号放到军旗上之后，它一直作为罗马军的领军旗帜。尤里安把军旗改回从前的银鹫旗，是要向世人表明，他率领的是传统的罗马帝国军团，而不是基督教国教化后的罗马军。

据称，尤里安的军队超过了6.5万人。军队中包括了当年以契约规定勤务地仅限阿尔卑斯山脉西侧为由，拒绝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出征东方之令，继而促成尤里安登基的关键角色高卢士兵。他们应该属于内维塔指挥的右翼部队。这些士兵曾经拒绝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征东方，结果却跟着反君士坦提乌斯的尤里安，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现在又一次在

尤里安的率领下，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尤里安如今成了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紧要关头能够依靠的，还是他们这些曾经在高卢为驱逐蛮族并肩奋战了5年的战友。

罗马军离开安条克之后，向东行军100公里左右，首先进入了贝罗埃亚城（Beroea）。贝罗埃亚后来改名为阿勒颇（Aleppo），与如今只是土耳其边境的小镇安条克不同，阿勒颇在后世逐渐发展为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不过在古代，这里只是连接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商路的一个中转站，属于安条克周边的卫星城市之一。据说军队用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勒颇，按此推算，一天的行军距离大约50公里。通常罗马军一天的行军距离在20—30公里，因为每天都有宿营歇脚的时间，两天行走100公里，可以说是急行军了。中东地区铺设的罗马式道路网，越是靠近地中海一带越是密集，道路的宽度及路况也更好。前往波斯的军队正好是逆向而行，逐渐远离地中海。开拔的最初几日实行急行军，想必不是因为形势紧迫，而是要把握机会，在路况较好的地区多走一些。

在阿勒颇迎接皇帝的是一位年老的豪绅，他是这个城镇实质的统领。此人是基督徒，因此整个阿勒颇属于基督教的城市。有意思的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却十分崇拜尤里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父子对立的情况，在公元3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

离开阿勒颇之后，部队朝着东北方向，前往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亦译海拉波利斯）。这里正好与阿勒颇相反，是著名的异教徒都市。可能是这个缘故，尤里安及其军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在尤里安率领的军队中，估计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基督徒，这也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特征之一。

罗马军从希拉波利斯渡过幼发拉底河，渡河之后直到底格里斯河一带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及其身后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名本身就是希腊

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带。不过，这些希腊裔的城镇中也存在着基督教社区，同样基督教的都市也生活着异教徒。即使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优惠政策执行了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宗教形态，也没有变成清一色的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不同宗教混杂的现状。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人唯一没有建过永久性石桥的一条大河。罗马人可以在多瑙河上建桥，证明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幼发拉底河长年以来担当着罗马帝国国界之河的角色，而北美索不达米亚被罗马占据之后，为夺回失去的土地，波斯频频发起攻击，这里成了双方争夺之地。所以，尤里安的军队渡河时，将小船并列连接，再在上面铺上木板，搭成舟桥，等全军渡河完成之后即刻拆除。这并非代表罗马军准备决一死战、自断后路，而是因为在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基地正在建造大型的船队，留下舟桥，以后大船顺流而下时，它反而会成为障碍。

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的军队，先后经过了巴托纳耶、卡雷（Carrhae）等地，按现代地理位

置，相当于由现在的叙利亚北端向土耳其的南端行军。

卡雷，就算是过了400年，罗马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及其部下就葬身于卡雷的近郊。当时有2万名罗马士兵战死，1万人做了俘虏，他们被押送到遥远的里海东部的山岳地带梅尔夫（Merv），服终身兵役，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形同终身流放。另外一件惨痛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0年，大约在尤里安统治时代的百年之前。时任罗马皇帝的瓦勒良（Valerianus）战败被俘，波斯人将俘虏送往波斯东北部服苦役，负责修建兼有桥梁功能的水坝，也没有罗马人能活着离开波斯。在那个时代，不管对手是东方的大国，还是北方的蛮族，一旦打输了仗，等待军人的就是残酷的命运，就算是一名小卒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国破家亡的滋味。

卡雷的近郊也是卡拉卡拉皇帝远征东方途中遭到卫兵杀害的地方，这里似乎是罗马皇帝的鬼门关。然而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避开不幸。何况，也不是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败走美索不达米亚，图拉真、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以及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帝伽列里乌斯都在这里获得过胜利。因此，尤里安皇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也能打赢这场战争。

无论哪一个年代，军人都比较迷信。为了消除士兵的不安，军中常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占卜问卦，通常最后出现的结果都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事前早已有人动了手脚。比方说，用动物内脏占卜时，会特地去挑选健康的动物，这样内脏的色泽看上去会比较鲜艳；用鸡占卜时，事前会让它饿着肚子，那么占卜时，鸡就会不停地啄食。如果是一名头脑清醒的司令官，他一定不会疏忽这些有助于提振军心的把戏。但是尤里安很当真，会跟着忧心忡忡的士兵一起，为出现的结果忐忑不安。或许是因为他信仰神秘哲学，对超自然的现象深信不疑。话说回来，那时在卡雷的罗马官兵士气高涨，因为皇帝发放了临时奖金。

罗马军在卡雷兵分两路：

尤里安与内维塔率领的第一军，从卡雷南下至幼发拉底河，之后沿着河流向东南前进，最终目标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敌人的首都泰西封。第一军总共1.5万人，在萨摩萨塔建造完成的大型船队顺幼发拉底河南下时的护卫，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这只大型的船队由50艘军用船、64艘搭建舟桥用的小船、1403艘运输船编制而成。运输船装载了多种的军粮和武器，以及攻城用的重兵器。

由3万人组成的第二军从卡雷向东前进，首要目标是边防城市尼西比斯。第二军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将波斯的势力赶出北美索不达米亚，保证正向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行军的尤里安及其军队不会腹背受敌。第二，等待从北边过来的亚美尼亚王的支援部队，两军会合后渡过底格里斯河，继续南下，在泰西封附近与尤里安的第一军会合，攻打波斯的首都。第二军的指挥官，一位是尤里安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另一位是长期驻守埃及、熟知东方情况、经验丰富的武将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罗马军的规模以及战前的准备，都符合攻打大国波斯的作战标准。亚美尼亚国王答应派出2万名步兵和4000人的骑兵团，加上这些人，参加战役的士兵总人数有8.9万。由此可见，尤里安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的未来命运来打这场仗的。其实，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从东南方向沿幼发拉底河而下的第一军，与从北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南的第二军，是否能够成功地会合。在尤里安率领的第一军中，出现了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的身影，当年，先帝君士坦提乌斯造访罗马时他曾同行。

第一军与向东的第二军分道之后，向南行进，当他们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岸边时，自萨摩萨塔顺流而下的大船队，已经布满了河面，整装待发。

有关第一军到达幼发拉底河的具体时间，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不过，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行军大约用了20多天。陆军以及船队顺河而下，在4月7日进入了与波斯为邻的奇尔切西乌姆（Circesium）。军队从安条克出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边境，可谓是开局顺利。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段期间尤里安已经犯下了以下几点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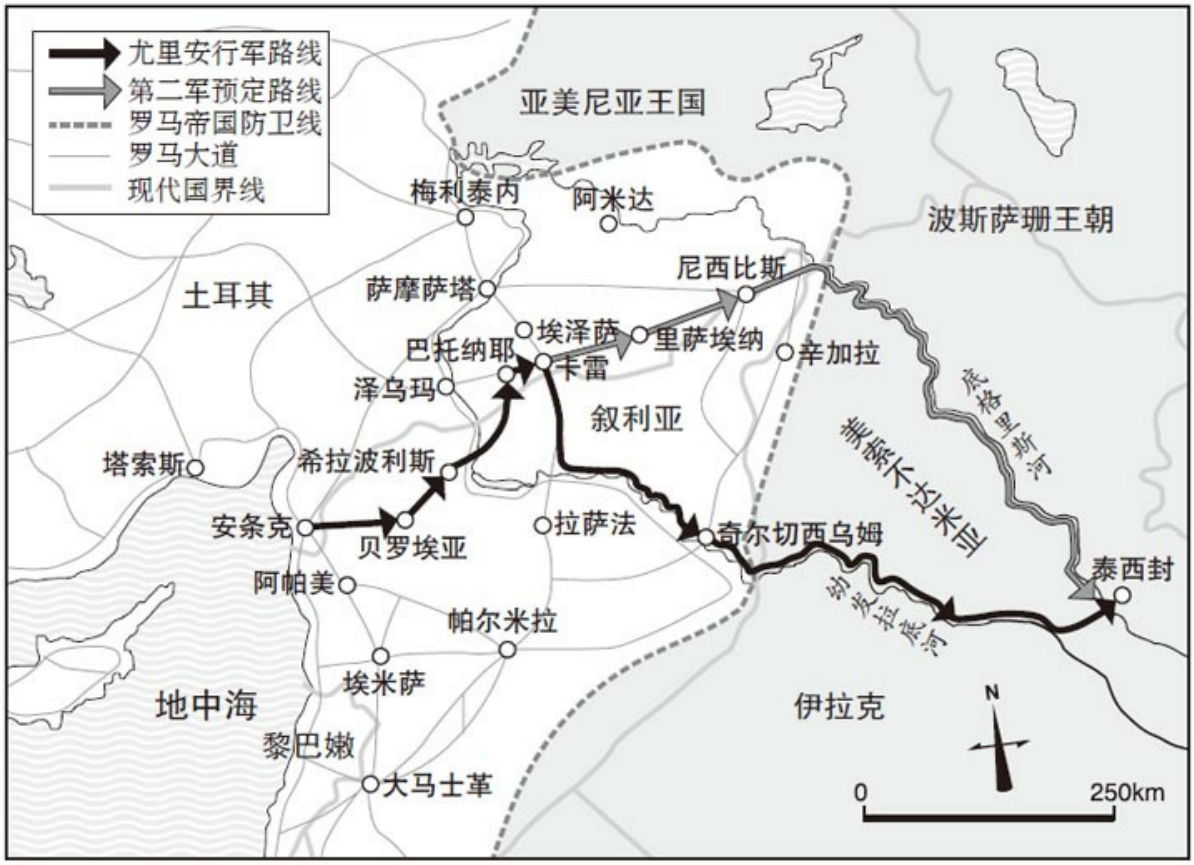
一、事前对亚美尼亚国王的怀柔政策不足。

二、兵站即后勤补给完全依赖船队。

三、高估了波斯流亡王子的利用价值。

现在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古代亚美尼亚王国，是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最东面的一个邻国。因此，它在帝国东部的防卫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纵使罗马的敌对国从帕提亚变成了波斯王国，亚美尼亚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依然不变。当年尼禄皇帝为了与帕提亚改善关系，曾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认为建立防卫体制是保证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积极地与帕提亚邻国的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亚美尼亚国王造访罗马时，所受到的礼遇如同大国的国君，又因为年龄相近，尼禄皇帝把他看做知己。

尼禄之后的历任皇帝，延续了对亚美尼亚的特别优待政策。亚美尼亚是一个完全属于东方文明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的罗马而言，必须提供有别于他国的特殊待遇，才能笼络住这个东方之国。正因为历代罗马皇帝的努力，亚美尼亚王国长久以来一直与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尤里安的行军路线以及第二军的预定路线

罗马帝国进入基督教国教化时代之后，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亚美尼亚仍然是另眼相看。君士坦丁大帝甚至打算让侄子，即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儿子汉尼拔利阿努斯成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大帝死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屠杀皇族，汉尼拔利阿努斯遭受其害，大帝吞并亚美尼亚王国的计划才未能实现。不过，君士坦提乌斯也深知这个东方小国的重要性，他将原本要嫁给他本人的一位高官的女儿，嫁给了因汉尼拔利阿努斯之死侥幸保住王位的亚美尼亚国王，借此增强两国的关系。

为感谢罗马皇帝，亚美尼亚国王决定改宗信仰基督教，而且还选择了君士坦提乌斯笃信的阿里乌斯派。由于尼西亚大公会将三位一体派定为正统教派，鉴于皇帝之立场，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亚美尼亚的国王对他的善意可见一斑。两国君主的这种亲密关系也

因此持续了30年以上。

而尤里安对于亚美尼亚国王而言，首先，他是举兵造反，最终导致君士坦提乌斯死亡的罪人。

其次，他推行的一系列反基督教教会的政策，在基督徒的国王看来，完全是“叛教者”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径。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国王也把尤里安视为“基督教之敌”。

第三则是出于一国之主的考虑。亚美尼亚王的确允诺尤里安，他会亲自率领2.4万人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然而，正如后世的马基雅弗利所言，人与人之间，能否信守约定是道义问题，国与国之间，能否遵守协定则取决于国家利益。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米达，在波斯军队猛攻之下沦陷，这使得亚美尼亚国王不得不重新考虑迄今为止的亲罗马的外交政策。因为阿米达紧贴着亚美尼亚，而波斯的沙普尔王誓死夺回亚美尼亚以南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决心，又是众所周知的。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亚美尼亚会去投靠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波斯吗？其实琐罗亚斯德教并不排他，不会强迫他人去改变信仰。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尤里安尽管不反对其他宗教，但明显地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亚美尼亚国王和出身于希腊的王妃据说都是虔诚的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想来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尤里安曾在邻近亚美尼亚的安条克待了半年以上，但在对亚美尼亚政策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用心，尽管这比他写《厌胡者》此类的文章远为重要。

我认为尤里安的第二项过失是在军队的后勤问题上。他认为1500艘以上的大船装载物资，足以应付全军的供给。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些装备的确是够了。然而，只有一种选择，犹如危险的赌博，凡事本应多留些余地。罗马人不满足只有一条路的现状，才会建设起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始终保持多种选择，是罗马人的生活哲学。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也正是因为既确保了后勤补给路线的充足，又将士兵情绪等

不确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

图拉真皇帝时代是罗马军团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图拉真皇帝也曾经攻打过美索不达米亚，成功地占领了泰西封。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作战的罗马军团，不仅利用水上的船只运送物资，中东一带的整个罗马道路网都配备了完善的兵站即后勤补给系统，成为军队的强大后盾。连他们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军是靠兵站取胜的。"尤里安难道没有考虑过补给路线水陆并用吗？当时中东地区的罗马式道路网依然存在，如果他真有此打算的话，无疑可以分散补给方面的危险。

尤里安带着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随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攻下泰西封、赶走沙普尔之后，让奥米斯达坐上皇位。奥米斯达不知何故与沙普尔结下了怨恨，最后只能抛弃祖国远走罗马。他受到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热情欢迎，之后的20余年一直在罗马皇帝的身边，享受着国宾级的待遇。奥米斯达气质高贵，言语机智风趣，然而他之所以能赢得罗马皇帝的喜爱，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对收容国而言，流亡人物在其祖国的地位越高，可利用的政治筹码就越大。只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始终没有机会利用这张政治王牌，让奥米斯达在罗马皇宫中虚度了年华。

终于尤里安皇帝决定利用这张王牌。不过，奥米斯达并非被沙普尔抢了王位才流亡，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正当的理由。何况他离开祖国20余年，要扶持这样的人物登基，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当朝国王沙普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只有出现这个结果，波斯的统治阶层才会同意将王位传给他人。然而，沙普尔二世因少年丧父而早早登基，并且成功地持续了50多年的统治。论战场上的才华，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战术，但却是一位内政的高手，始终能够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对外方面，自公元279年北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罗马领地之后，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欲夺回失地，陆续攻下阿米达以及辛格拉，正朝着最终目标一步步地前进。难道波斯的民众会赶走这样的君王，而将王位拱手让给一位在敌国生活了多年的流亡贵族吗？

罗马帝国早在元首制时代，就曾经有依靠军事武力攻占他国、让流亡在外的王子登上皇位的经验，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因为维持王位的长期安稳，需要派出相当规模的军队驻守当地。之后，罗马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修正了外交政策，尝试着与新继位者建立友好关系。尤里安难道是对这些先例一无所知吗？还是说，他虽然知道，但未觉察到其重要性？

我认为，尤里安在波斯战争前的第三个过失，是没有带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这位忠臣同行。

与尤里安共赴波斯战场的高官中，有一位负责帝国东部的长官叫萨鲁斯特·塞孔杜斯（Salutius Secundus）。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塞孔杜斯，是尤里安当年在高卢担任副帝时，给予他最多帮助的那位。尤里安登基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立刻将他无法亲自掌管的西部交给了塞孔杜斯管理。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部，在这位贤能、公正的长官的治理之下，经历了一段安全、繁荣的时期。然而，这项人事决定，却让尤里安在拿生涯当赌注、不惜与波斯一战的重要关头，身边少了一位能够全面信赖又富有军事和政治才华、敢于向皇帝直言不讳的忠臣。

参战的另一位塞孔杜斯，与尤里安有些相似，也是一位颇有哲学造诣的“异教徒”。大家一致公认他为人公道，做事深思熟虑，即使是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也相当不错。不过，像塞孔杜斯这样性格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和谨慎的态度，通常都不太会吐露心声、直抒己见。面对皇帝，他同样也是采取了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态度，结果就是说了等于没说。对于随时都必须作出决定的人而言，这样的部下算不上是得力助手。

对自高卢时期就一同出生入死的内维塔将军，在军事指挥上，尤里安完全可以放心。不过，战场上同样需要对人的心理有高度的洞察力，而出身于法兰克人的内维塔缺乏这种才能。

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先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官或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如今尤里安是皇帝，忠于皇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这些基督徒的高官也愿意履行职责。

尤里安的一些哲学家朋友也跟随他参加了战役。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在饭桌上陪皇帝聊聊天。

可以说，尤里安是在身边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部下的状况下，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不像一个稳如泰山的皇帝，而是骑着马四处奔跑，不断地给士兵打气，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拭去心中的不安。或许他是不想一个人安静地思考，生怕自己会越想越不安，掉进恐惧的迷宫中，找不到出口。

“直言”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然而，直言并非只有以书面或口述，即用语言的方式才能表达。领袖注定是孤独的，但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无须言表就能心领神会的伙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的伙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皇帝也有这样的挚友。如果塞孔杜斯不是身处莱茵河畔，而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想必他会对军队进入波斯境内之后一路无阻的异常状况产生怀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尤里安。因为这位忠臣曾经特意从高卢写信给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进发的皇帝，希望他暂缓远征波斯的计划。

波斯首都泰西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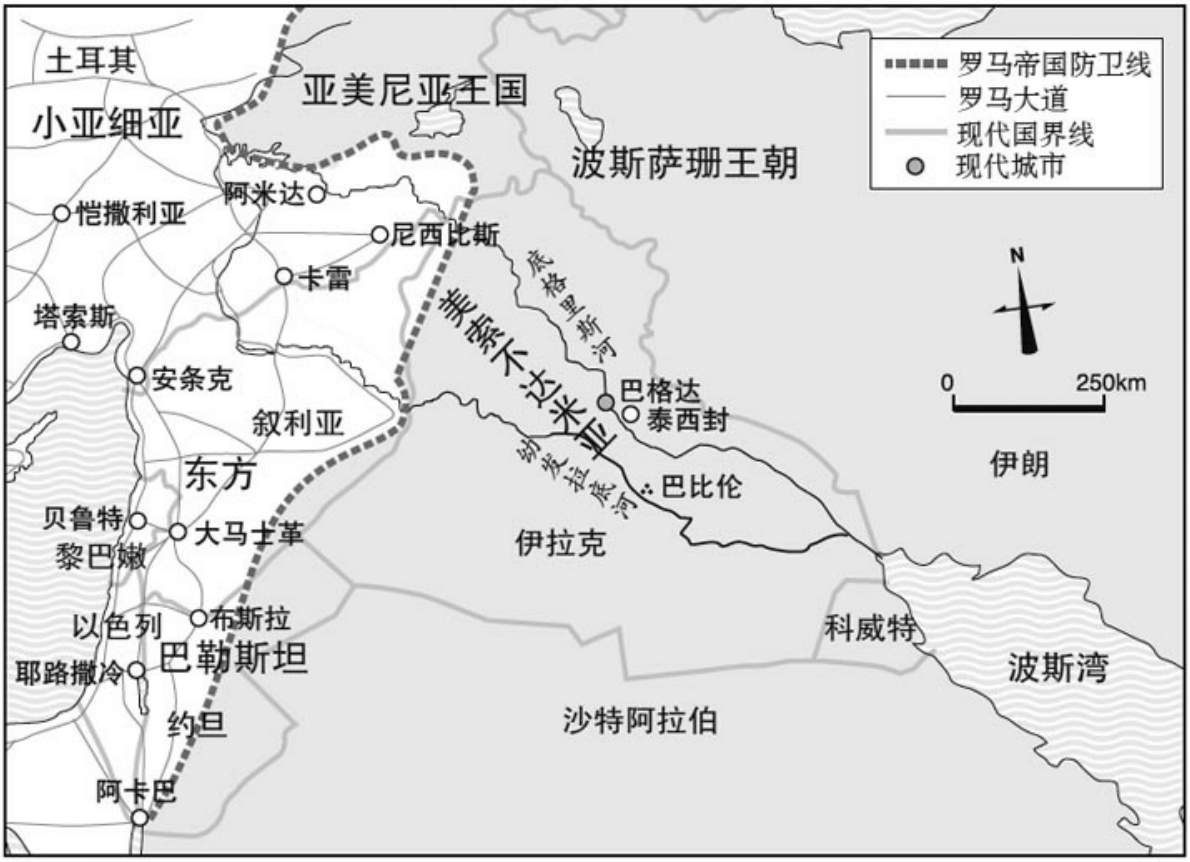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虽然在上游一带相隔甚远，但随后逐渐靠近，首都泰西封附近是两河之间距离最短之处。进入下游之后两河再度分流，最终合流注入波斯湾。无论国家、统治者或是宗教如何变化，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一带，作为国家首都的

地位从来没有改变。顺便提一下，300年后的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的都市巴格达，距离原来帕提亚以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往北不到40公里。攻打美索不达米亚，就意味着要占领这一带，因为由此向南至波斯湾的下游流域并非重要的战略之地。图拉真皇帝曾经到过下游的河口，不过那只是他在成功占领泰西封后的一时兴起。

罗马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之后的帝制时代，似乎从来都没有动过真格要彻底征服东方大国。其理由一如前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之后的波斯萨珊王朝，其领土面积相当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如果要彻底征服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并将之纳为行省，罗马就必须征服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地区。能够成就如此宏伟大业的，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他人。因此罗马统治者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时不时地出兵东方打击一下，以挫败对方企图蚕食西方的野心。然而，古代男人们痴迷亚历山大大帝的神话，尤里安也是其中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无数次提及亚历山大大帝。

尤里安指挥的波斯战争，进入5月之后，仍然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虽然有一些躲在沙丘之中的盗匪会搞一些突然袭击，但遇害的仅是一些因疏忽大意而走散的小分队，整体而言，罗马军没有什么损失。军队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时，尽管沿途的城镇大多建有防护城墙，但这些地方，要么立刻就缴械投降，要么是作一些轻度的抵抗，波斯国王似乎完全没有派兵来保卫的意图。

行军途中所经过的各个城镇以及要塞，尤里安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武力攻击。他会先让波斯的流亡王子奥米斯达和平喊话，希望当地人能够自己打开城门。可是，不管是一见到罗马军就举手投降的城镇民众，还是抵抗之后遭降服的要塞士兵，见到这位与国王有血亲关系的王子，都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坚决将他拒之于门外。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

如上所述，波斯的首都泰西封是两大河相距最近的地带，毗邻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早在久远的年代，就开凿出无数的运河以及沟渠。罗马军要攻打波斯首都，就得设法让装载着攻城器械、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的船队，尽量地靠近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首都一带。可是大型的船只根本无法通过那些运河和河渠。正当尤里安一筹莫展之际，军团的技师前来报告，说发现了当年图拉真皇帝远征时挖掘的运河的遗迹，只要稍作整修，船队就能通行。250年前的旧址依然在，再次证明了古罗马人基础建设的完善和彻底。图拉真皇帝时代，又是罗马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事隔250年的运河，只要稍作整修就能重新使用，由此可见，当年罗马军撤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帕提亚以及波斯人都利用过这条运河。总而言之，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罗马军团士兵放下武器，转行为工

兵，全力整修河道。终于，尤里安的大型船队可以通过图拉真运河，将大型武器运送到了波斯首都附近的岸边。

5月27日，在首都泰西封城门前，罗马军与波斯军正式展开了首次会战。攻城的罗马军总指挥是31岁的尤里安，而站在波斯军后方观望的是年龄长他一倍的沙普尔二世。1.5万人的罗马军团将对决波斯10万大军。沙普尔似乎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将尤里安引到首都附近，在波斯军最熟悉的地方，与罗马军一决胜负。之前完全不见踪影的波斯军人，此刻正守在首都的城墙后等待着罗马军的到来。

会战自始至终都打得异常激烈，但罗马军从头至尾占据了上风。尽管波斯军在人数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每一位士兵的战斗力以及整个军队的组织能力劣于罗马军团。这样的军队往往会因某一处的失利而造成全线崩溃。事实上，罗马军的确有过绝好的机会。眼看着敌人一步步往城门撤退，此刻原本该乘胜追击直捣城内。然而有一位将领担心入城后会遭到敌军的围剿，发出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这等于是应该踩油门，却踩了刹车。如果尤里安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一般的天才武将，他会很快地察觉到部下的失误，快马扬鞭亲自赶到第一线，激励军心，命令全军强行冲进城内。

战场上瞬息万变，胜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当机立断。哪怕是5分钟的犹豫，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这天的战斗，最终以罗马军目送着波斯军撤入城内的形式而告终。尤里安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大好机会。

这一天双方阵亡的士兵人数，分别是罗马军75人，波斯军2.5万人。

看到这个数字，让人不得不相信，沙普尔在当天深夜派了密使向罗马求和的传说。同样，对于尤里安拒绝接见、赶走密使的说法也能够理解。然而，尤里安这天的大胜，却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罗马军在首场会战中失去了绝好的机会，接下来只有展开攻城战了。不过，要攻下有数道坚固城墙的大城市，必须作好打长期战的准备。罗马当年攻打迦太基时，在后无敌情的形势之下，也用了3年的时间。如果面临敌军从背后袭击的危险，除非有着充足的兵力，可以同时应付两面夹攻，否则，再会打仗的军队，也很难成功地攻下城池。汉尼拔当年打到罗马城下却放弃了攻城，就是因为担心罗马会从意大利各地的殖民城市调来援兵，而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城外和城内两边的敌人。

因此，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恺撒都会极力避免攻城战，而是将敌人引出城外进行会战。这两位名将所指挥过的战役，几乎都是在敌区展开，而且兵力远远劣于对方。尤里安目前面临同样的局面，他没有在敌人阵脚大乱时，乘势攻进泰西封城内，实在是太可惜了。

阿米阿努斯记述了当日的战况，指出了这个失误。然而一介武官的阿米阿努斯能够发现的事实，在罗马军的作战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高官或将军看到此事的严重性。话说回来，即使清楚也是木已成舟。以尤里安为中心的作战会议，也只能围绕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话题展开了。

普罗科皮乌斯指挥的第二军，原本应该与亚美尼亚军会合之后一起南下，却至今不见踪影。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重大的事情，直到如今才第一次成为军中讨论的议题。

兵分两路的军队，相互之间应该时刻掌握着对方的行踪。否则，就会失去分头行动的意义，只留下兵力分散的不利。很明显，那位除了是皇帝远亲一无所长的普罗科皮乌斯怠忽职守，没有及时地报告军情。不过，尤里安之前似乎也没有积极地去追踪第二军的行迹。两军自卡雷分开之后，已经超过了50天。难道在这50天里，尤里安从来没有对两军在泰西封附近会合的约定产生过任何的怀疑？

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仅靠第一军的1.5万人不可能攻下泰

西封。其实，攻城不行，但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将敌军逼出城外，展开罗马军擅长的会战，与此同时寻找第二军，尽量拖延时间的战略还是可行的。奇怪的是，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出类似的建议。或许是皇帝在场，官员们俯首听命，不敢多言。总而言之，会议达成了以下的结论：

仅凭第一军1.5万人的军力无法攻城。

与第二军的3万人会合是攻打泰西封的先决条件。

问题是第二军行踪不明。

就算派遣侦察小队去寻找第二军，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何时能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中部。

会议最终决定，以两军会师为先决条件，第一军暂时先撤离泰西封，全军1.5万人北上寻找第二军。

这个决定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总数超过1000艘的大小船只？由于图拉真运河的重新启用，船队已经集结于底格里斯河上。虽说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都是大河，但船下行容易，可逆流而上，除非是特别走运能够一路顺风，否则需要依靠众多的人手相助。当初建船的目的并非为航海之用，配备的船桨数量只够用于靠岸，船桨的功效相当于现代船只的马达，因此，逆水而行就必须在河的两岸用水牛以及人力来牵引。如果让大批的士兵去拉船，那么行军中的队伍肯定会遭遇敌人的袭击。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留下30艘当舟桥用的小船，其余的全部烧毁。船上所装载的物资也几乎全数焚烧。武器、攻城器械以及粮食的数量过于庞大，靠人工携带以及牛车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将各种物资尽可能地分发给士兵之后，烧船行动开始。1000多艘

船冒出的熊熊火焰，遮掩了夏日炽烈的阳光，笼罩着整个底格里斯河的河面。

面对如此景象，士兵目瞪口呆。那些基督徒出身的士兵喃喃地发出怨语，说尤里安疯了，这是上帝给他的惩罚。如果不想让武器和粮草落到敌人的手里，除此之外别无对策。那些非基督徒的士兵，虽然理智上能够理解，但感情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于在敌境作战的士兵而言，他们所需的物资都在这些船上。底格里斯河上漂满的船只，是他们心灵的保障，是与祖国相连的命脉。如今，这一切都在眼前化为灰烬。烧毁船队给士兵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如果尤里安能够像图拉真皇帝那样，水陆两路都配置了后勤补给的话，那么水上兵站被毁，最多让士兵感觉物资供给可能会吃紧，但不会影响到精神层面。保持多种选择，即有效地分散风险的意义正在于此。

北上底格里斯河

相较于不知手下队伍行踪的尤里安，波斯国王沙普尔掌握情报的能力似乎略胜一筹。他不仅对罗马军销毁船队、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北上的动态了如指掌，而且不错过任何机会及时发起攻击。罗马军不得不边走边打，所幸每一次都能够成功脱身。

不过，沙普尔并不在乎他手下人的性命。对他而言，如果牺牲1000名波斯军人能换来100名罗马兵的死，就是莫大的战绩。因此，罗马军的成功突围实属“皮洛士的胜利”。行军过程中，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整个军团充斥着厌战的情绪。

随着罗马军逐渐向北撤退，波斯军轮番进攻的次数越来越密集。甚至在搭帐篷准备宿营时，听到敌军来袭，罗马军人也不得不扔下手中的锯子，拿起长剑迎敌，连睡一个安稳觉的时间都没有。

话说回来，沙普尔除了懂得收集情报的重要之外，作为武将他并没有太多的才华。如果他能持续地发动轮番攻击，让对手不得安宁，阻止他们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那么陷入绝境的罗马军，迟早会坐以待毙。沙普尔下令对底格里斯河左岸一带实施焦土化战术，这里是罗马军北上的必经之地。目的自然是断敌粮草。时逢夏季，又是中东地区，而罗马军的主力部队大多是来自北欧的士兵。

按理说，沙普尔占尽了天时地利。但是，他更希望立即看到辉煌的战果，而不是循序渐进地获取最终的胜利。不久前，他在泰西封城门前输给了罗马军，在人民面前失了颜面，他要一雪前耻，决心与罗马军打一场正规的会战。与前一次相同，波斯国王亲自率军，众多的王室成员参战，还特地从印度调来了战象。

尤里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罗马军从皇帝到士兵，上下一心，既然已无路可退，不如拼死一搏。

两军对决发生在6月16日。战斗形式一旦变成了会战，就是罗马军的天下。连续激战的结果，波斯军陈尸累累，最终不得不撤兵离去。据说在大量阵亡的波斯军人中，包括了代替国王担任前线指挥的司令官，以及沙普尔众多子嗣中的两个儿子。横死沙场的除了士兵，还有战象，它们巨大的身躯像小山一般矗立在战场上。

描绘沙普尔二世的银盘

两次的败北，给沙普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又重新打回游击战，继续搞轮番袭击。这对罗马军而言，简直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苦行。原本以为只要渡过幼发拉底河，就能回到罗马领地，如今别说是幼发拉底河，连眼前的底格里斯河都过不去。

官兵们对皇帝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那些基督徒的态度尤为明显。如果设想一下他们信仰的教义，便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在基督教的教诲中，皇帝的威信和权力是上帝所赐予。而上帝已经用烧毁船队、阵前撤兵、烈日之下不断遭受敌军侵袭等方式，惩罚了皇帝，因此臣子们没有义务再服从皇帝。士兵的情绪变化，对尤里安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带着3万多人马集体撤退，困难度远远高于正常的行军。

英年早逝

公元363年6月26日，这一天，盛夏灼热的阳光依然无情地照在遥望着底格里斯河西岸继续北上的罗马官兵的身上。这一天，波斯军照例在战象的引领下，向罗马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还在主帅帐篷中的尤里安接到的第一个情报，是后卫遭到了敌军的突然袭击。皇帝连甲胄都没有穿，拿起骑兵用的圆盾和长剑，跳上战马，直奔队尾而去。跟随他的只有平日负责保护的近卫队。

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皇帝没有穿甲胄是因为事情发生得紧急。不过，这让人有些难以释怀。毕竟，尤里安不是一介士卒，他既是最高司令官，又是皇帝。在戈尔·维达尔的小说里，将其原因归咎于信仰基督的侍从，是他故意破坏了皇帝甲胄上的扣环，又存心拖延着不去修理，无奈之下皇帝才铤而走险。尤里安不可思议的举动，让人不由得感觉小说家的这个假想似乎能够成立。

在罗马军团中，别说是皇帝，就连大队长级别的将官，身边都配有侍从或奴隶，负责照料日常起居。为主人准备武器以及平时的保养，是他们不能懈怠的工作。出战前，只要主人站直身体，侍从们立即就会替他戴上甲胄和护脚套。所以，尤里安在没有护甲的状况下出战，一定另有隐情。

罗马军人的甲胄，是穿在短袍外面的，不佩戴甲胄出战就等于是穿着一件汗衫打仗，这有违军人上战场的仪容规范。如果尤里安只穿着短袍就跳上马背，那说明他身边所有的侍从都消极怠工，联手反抗皇帝。不管怎么说，事情的真相已成了千古之谜，我们无从知晓。

话说回来，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乱了阵脚的后卫部队，在尤里安的激励之下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成功地击退了来敌。就在此刻，传来了第二封报告，前卫部队又遭遇敌人袭击。

尤里安立即掉转马头，带着近卫队，直奔队伍的前方。与后卫部队一样，前卫也打得异常激烈，眼看着就要决出胜负了。

这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根标枪，深深地刺中了骑在马上的尤里安的腹部。他想用右手拔出标枪，手掌却被锋利的矛头割伤。可能是伤到了重要的部位，血不停地往外流。身上两处伤口造成了大量失血，失去知觉的尤里安从马背上摔下倒在了地上。顷刻间，白色的短袍被鲜血染得通红。

侍卫们抬起躺在血泊中的皇帝，回到帐篷，让他平躺在折叠式的行军床上。闻讯赶来的御医奥里巴西尔斯（Oribasius）查看皇帝伤势，这才发现已伤及内脏。在尤里安还是一介哲学门徒时，奥里巴西尔斯就与他相识相交，之后在高卢的5年始终陪伴左右，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对伤势严重的皇帝，这位医术高明的希腊医生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一些紧急止血的措施，用绷带包扎住伤口。

外面的喧嚣声传到了躺在床上的尤里安以及帐篷内其他人的耳中。大汗淋漓的传令兵进来报告，说战况有了转机，波斯军遭到重创，2名司令官以及50位以上的贵族阵亡。听到捷报，尤里安想起身下床，刚包扎好的伤口再度被撕开，又开始流血不止。

尤里安在半昏迷之中，得到了罗马军取得最终胜利的消息。尤其是

听到战斗结束后赶来的将军报告说，这次的战果远远超过了之前，忍受着流血和高烧双重痛苦的皇帝，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皇帝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他发现站在他病榻前的高官和将军中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便问安纳托里乌斯（Anatolius）人在哪里，萨鲁斯特回答，他阵亡了。听闻此言，尤里安的脸上流下了一行眼泪。安纳托里乌斯的地位类似于现代的内阁长官，在尤里安因下令烧毁船队而陷入孤立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对皇帝忠心耿耿的高官之一。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经过了一日激战的罗马军，决定就地宿营。几乎全体高官都来到皇帝的面前。尤里安睡在床上，向臣子们交代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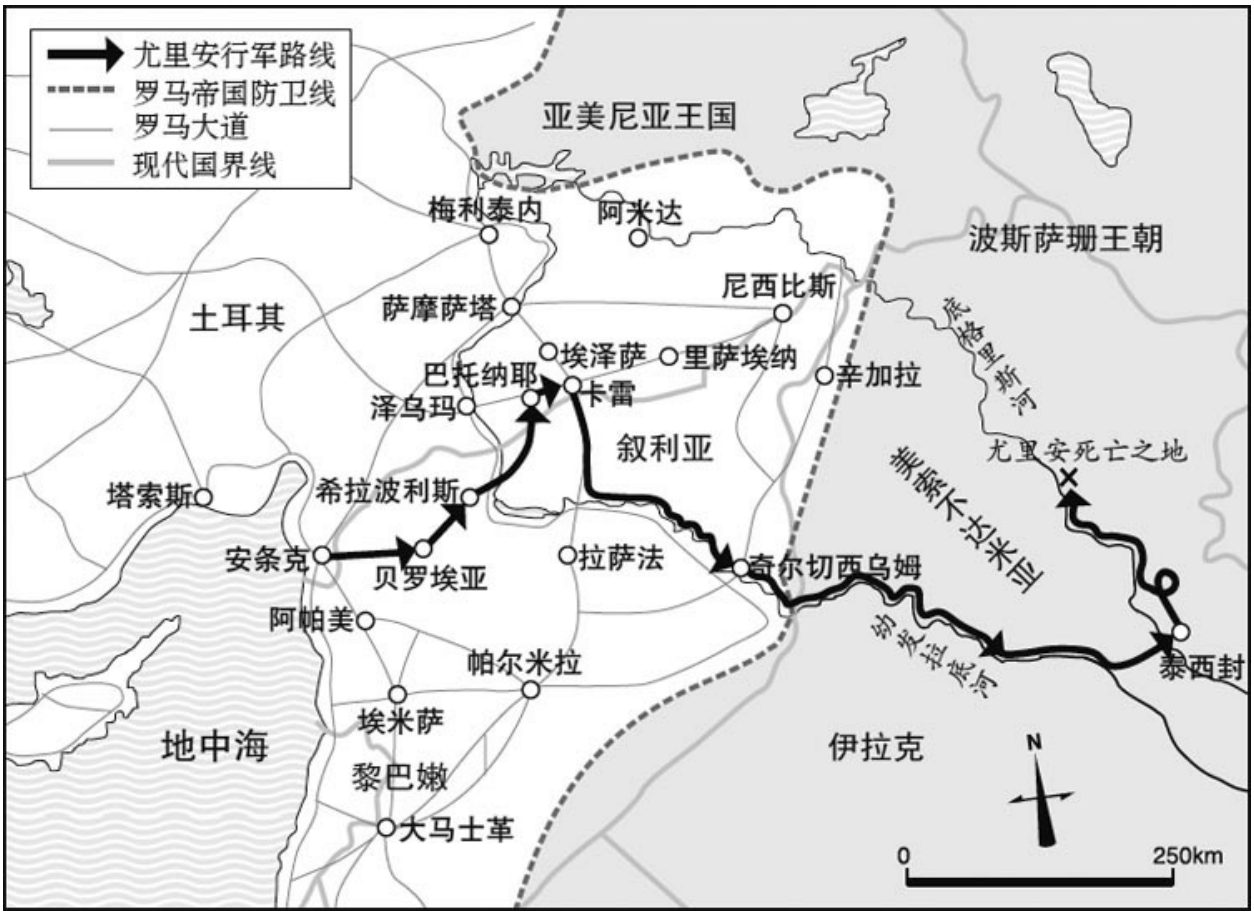
> 告别人生的时刻好像到了。我一直希望能回报养育我的大自然，现在我做到了，备感欣慰。哲学说，生为苦，死为解脱，因此是快乐。哲学还告诉我，死是神明赐给在现世建下功德之人的最后的奖励。
>
> 对于迄今为止的所为，我没有任何后悔。我从未有过谋杀及其他卑劣之举，这让我感到欣慰。
>
> 无论是与世隔绝的时期，还是日后集大权于一身，我始终忠实于自己，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我尽力顺应神明之期待而活，施善政兴利安民。遇战争，事前必深思熟虑，不得已才为之。尽管如此，结果未必尽如人意。像人间诸事，结果良善是神明之援助，欠佳则归咎于人之过失。
>
> 我坚信帝国存在之意义，在于保证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并为之付出努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断言，为政后我所推行的一切政策，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说到这里，尤里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

> 不能再多说了，我精力不济，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唯有一事须作最后的交代。关于继任皇帝的人选，我不作提名。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周延，或不够明智。若无法获得军队的支持，我的推荐会危及他的性命。人选委由诸位决定。我仅祝福罗马帝国的百姓，能在贤明的君主的统治下，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

尤里安留下皇帝的遗言之后，将哲学家利巴尼乌斯和普里斯库斯（Priscus）叫到床前，倾听着两位友人讲论生死之议题。午夜时分，他感到口渴，要饮冷水。侍从端着淡紫色的玻璃器皿到他面前，尤里安喝下一口水之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31岁零7个月，在位1年零9个月。

他去世的这一天，波斯战争开战3个月零20天，是罗马军烧毁船队向北撤退的第25天。



尤里安行军路线

尤里安之后

尤里安过世之后，将领们立刻举行了会议，商议继位人选。会议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前朝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时代的人马，另一派则是尤里安登基后提拔的官员。前者大多是基督徒，后者则多为异教徒。

两派势力相当，难分高下，最终焦点落到了两派都能接受，虽是异教徒但也不遭基督徒疏离的萨鲁斯特身上。他正好在这一年，与尤里安共同担任着执政官。尤里安去世之后，由另一名执政官递补空缺，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位稳重又极富良知的高官，以年迈为由婉言拒绝了继位。

一旦陷入僵局，浮出水面的往往是最为平庸但最不具破坏性的一类人物。结果，虽有强健体格却毫无建树、在军中默默无闻的约维安（Jovian），成了尤里安的后任。第二天，6月27日，新任的罗马皇帝约维安出现在全体官兵的面前。可能是将领们事先作了指示，士兵步调一致地用长剑敲打盾牌，向新帝宣誓效忠。这里提一句，约维安是基督徒。

约维安登基之后，军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像被大水彻底浇灭了的火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说中，插进尤里安腹部的那根标枪，不是来自波斯兵，而是皇帝近卫队中的一个队员，从近距离射出的。说此话的士兵表示，那根标枪不是波斯军的武器，他从地上捡起时，发现上面刻着罗马骑兵团的标志。约维安之前的职务，正是近卫队队长，他登基之后，这个传言自然就消失殆尽。

不知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第二军的3万人南下赶来会师。对于他们的延误，尤里安任命的两位长官普罗科皮乌斯和塞巴斯蒂安给出的解释是，为说服亚美尼亚国王参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三个月中音讯全无，理当死罪，何况亚美尼亚国王最终还是拒绝参战，选择了中立，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事到如今，已无人再去追究两位将官的责任。无能的普罗科皮乌斯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护送尤里安的遗体回罗马领地，而身为基督徒的塞巴斯蒂安，因战场经验丰富，则继续留在军中。

尤里安不是基督徒。他的遗体不需要土葬，更不用在入土前作任何保全的措施。想来应该是按照罗马传统的习俗，举行了火葬，所以，普罗科皮乌斯护送的是先帝的骨灰盒。尤里安墓地的选择，让众人颇费了一番苦心。作为基督教首都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可异教徒色彩浓厚的罗马又过于遥远，而距离较近的安条克，他生前曾发誓从此不来，自然也不合适。

最后，位于小亚细亚东南的塔尔索斯（Tarsus）成了尤里安长眠之

地。这个城镇的人民对尤里安一直心怀善意。不过，在波斯军连日袭击的状况下，即使有护卫队保驾，还是无法让先帝的骨灰先行一步，早于大部队回到罗马的领地。结果，已经化为灰烬的尤里安，与军队同行，和他们一起回到了罗马的土地。尤里安在塔尔索斯下葬后没多久，他的坟墓就不知去向。塔尔索斯是基督教圣人保罗的诞生地，在基督教教会中，他与另一位圣人彼得拥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路线日益推进的形势下，塔尔索斯终究不能成为“叛教者”尤里安的长眠之地。

我很纳闷，竟然会没有人提议将尤里安安葬于希腊。他是那么热爱希腊，生前总是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不过，公元4世纪的当时，宗教势力不断强大，而哲学却日渐式微，那些高官大概对他的话从来没有认真过吧。

缔结和约

两军会合后，罗马军团的总人数达到了6万以上。可是，在新帝约维安接任最高司令官以后，依然手足无措，钉死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动弹不得。

仅第一军1.5万人的撤退，已饱受粮草不足的苦境，6万人集体撤退，的确会带来诸多问题。不过，6万人的军队，大可分成几个纵队，声东击西，迫使波斯军分散兵力，再进行各个击破。迄今为止，罗马军尽管频频遭受波斯军的袭击，但每一次都能成功退敌。由此可见，他们的战斗力绝对超过了对手。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够承受多少牺牲。一旦下了决心，就必须以有限的兵力来获取最大的胜利。而如何充分地利用兵力，或者说能否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需要意志坚强、足智多谋和当机立断。难道是因为尤里安死后，整个罗马军团彻底丧失了应敌的能力？还是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要脱身回国，没有余力考虑其他对策？

事情的真相似乎属于后者。尤里安死后的第5天，即约维安继位的第4天，在新帝以及全体将官出席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派遣使者，向波斯国王沙普尔求和。

萨鲁斯特被任命为皇帝特使。当初推辞了皇位的他，这一次没有拒绝。受命后的第二天，即7月1日，萨鲁斯特立刻与沙普尔派来的使节展开了交涉。

事实上，这根本称不上是谈判，因为罗马一方全盘地接受了波斯国王提出的条件。

不过，沙普尔似乎是一位公平游戏的爱好者。他除了要求罗马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底格里斯河东岸的5个行省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条件。66年前，即公元297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副帝伽列里乌斯赢得战争后，强迫波斯国王割让了这些土地。对罗马而言，这个地区属于军事防卫的重地，对波斯亦是如此，更何况这里原本就属于他们。

其实，这次战争是在波斯境内进行的，沙普尔完全可以以战争损失为由，向罗马索取赔款。此外，被俘的罗马兵一直对波斯国内的基础建设贡献甚大，他也可以要求罗马提供相关人员。然而，这位波斯国王除了提出归还失地之外，并无他求。也就是说，归还66年前抢去的土地，罗马军即可平安无事地回国。对于这次和谈的结果，波斯方面大肆宣扬，称之为“沙普尔的宽容”。讲到宽容，立刻令人联想到“恺撒的宽容”。宽容曾是罗马人的专利品，而如今他们却要被波斯人宽容。

罗马军中仍然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与波斯的和谈是奇耻大辱，其中包括记录下整个战役经过的阿米阿努斯。然而，以约维安皇帝为首的罗马高层一致决定接受波斯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结果，波斯方面派出特使来到罗马的阵营，迅速地举行了签字仪式。新帝随后派出急使，前往第二天就要变成波斯领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个城市，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的5个行省，向那里的驻军及其相关人员传达撤军的命令。而

当地的居民则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迁往罗马领地，或原地不动接受波斯的统治。曾经多次成功地抵御住波斯军猛烈攻击的尼西比斯的居民，主张抗争到底，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缔结和约之后，罗马军终于能够渡过底格里斯河，抵达西岸。6万人马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后，究竟是在何时渡过幼发拉底河回到罗马领地，具体情况不详。撤退中的罗马军虽然不再遭遇波斯军队的袭击，但仍然会时不时地受到阿拉伯强盗团伙的骚扰。这些强盗既不隶属于波斯国王，也不接近罗马一方，夹在两大势力之间自谋生路。罗马军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似乎在初秋时节才到达安条克。安条克人不喜欢尤里安，就连非基督徒的居民也把他的死讯看做好事，因此对于新皇帝的到来，全城上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约维安皇帝在安条克一直住到年底，看来这地方让他感觉不错。他滞留期间，前来陈情的人络绎不绝，为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尤里安当政期间，自动隐身修道院的阿塔纳西乌斯，特地从埃及的沙漠地区长途跋涉来到叙利亚的安条克觐见新帝。他对约维安皇帝说了这样一句预言："您对正统的宗教信仰虔诚，上天必定会赐予您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

尤里安的前任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倾向于阿里乌斯派，而他的后任皇帝约维安正好相反，属于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即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因此，阿塔纳西乌斯所谓"正统的宗教"指的就是主张三位一体说的教派，不过，这位"正统宗教"的代表者的预言，完全落了空。

约维安在安条克期间，积极地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所有内容都是用于废除先帝尤里安所推行的政策。在尤里安颁布的各项法令中，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后来收录进了《狄奥多西法典》，因为这些法令对基督教国教化不断深入的罗马帝国，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然而，能延续的都属于行政法，而其他那些以抑制基督教势力为目的的法律，都遭到了废除。

废除的法令中还包括了减税法。事实上，尤里安通过大幅度的减税从而搞活经济的政策，已经在高卢地区成功地得到了证明，但这项政策似乎仍然被视做不利于基督教国教化的路线，遭到了废止。

经过了一连串的修法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尤里安执政之前的状态。这位年轻皇帝生前所作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于流水。

约维安完成了上述的各项改革之后，于公元363年的年末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小亚细亚的南岸，迎来了公元364年的元旦。随后，他按照尤里安之前的皇帝们的豪华排场，率领着大批人马，一路畅游。2月17日的早晨，在他留宿的某地方豪绅的公馆的一角，发现了他的尸体。官方公布的皇帝死因是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暴饮暴食。

虽然在朝只有短短的7个月，但约维安完成了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是与波斯国王沙普尔缔结和约，给罗马帝国东部的安全保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要在罗马史上留下一笔的。

其次，废除了尤里安颁布的几乎所有的政策和法规。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约维安之死。这位前近卫队队长已经完成了他被赋予的任务，失去了利用价值，不能以皇帝的身份进入首都。

跟随约维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高官们随即举行会议，决定继位的人选。这一次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由于约维安的亲基督教政策，异教徒一派元气大伤，势力不比上一次决定新帝的会议。

新选出来的皇帝叫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是一位武将，曾在多瑙河防线作战，建立了骁勇剽悍的名声。他出身于北方蛮族，也就是说日耳曼人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如当时的记录所述，迄今为止的罗马皇帝中，虽然有人混杂着蛮族的血统，但像瓦伦提尼安这样纯种的

异族人皇帝，还是史上第一位。

当年马格嫩提乌斯举兵造反，野心勃勃地欲称帝登基时，他的蛮族血统给他带来了诸多不利。不过才过去14年，与马格嫩提乌斯同样来自日耳曼的瓦伦提尼安，毫无障碍地当选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高官们一致认为，新任的皇帝只要信仰基督，哪怕来自蛮族也不是问题。

日耳曼出身的新帝瓦伦提尼安，在尤里安当政时期没有受到冷遇，但也没得到特别的重用。所以他才被反尤里安一派看中，视做自己人。

自此，这位在当时被称为“近乎纯蛮族”的瓦伦提尼安皇帝长达11年的统治时代正式开始。而所有的人似乎都希望尤里安治世的那19个月是一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梦幻。

尤里安皇帝的生与死

在还没有认真研究尤里安之前，我以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Anachronism）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似乎都那么不合时宜，一心逆时代潮流而行，思想简单。

现在，我不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甚至会想，如果尤里安在位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的话，之后的罗马帝国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

在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并不像后世所认定的那样，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即使在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帝国东半部，异教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有关这一点，从尤里安登基之后，各地频频发生的异教徒攻击基督教区的事件中，已经得到证明。何况，当时基督教教会的内部矛盾也十分激烈，阿里乌斯派与阿塔纳西乌斯派之间的恶斗，让人不得不承认近亲相恶这个事实。甚至在同一教派内，也因为对教义的解释不同等一些小问题，不断地发生同仁之间的抗争。令人玩味的是，这种现象在君

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后，反而愈发严重。总而言之，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势，基督教或者异教都有着独占鳌头的可能性。当时的基督教著作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情况。这些著作中充满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既来自异教，同时也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

尤里安就是向这样一个乱世投下了一颗探路石。如果他的统治时期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那时他也不过才50岁，因此我的这个假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假若他能做19年的皇帝，他应该会不断地丢出各种的探路石，历史的走向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罗马人或许不再认为做基督徒可以从中得益，而宗教也可能脱离现世的利益，重新回到拯救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尤里安强烈反对宗教支配现实世界，他可能是唯一一位发现一神教弊病的古人。

尤里安

古代的有识之士之所以没能看出一神教的问题，是因为古代信仰多神教，大家即使彼此信仰不同，也可以相互包容。没有经历过唯我独尊的宗教世界，当然也无法知道它的症结所在。在信仰多神教的古代社会中，唯有犹太教属于一神教。不过犹太教徒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不会

强行要求他人入教。那个时候，只有基督教才热衷于向观念不同的人传教布道。

而这些连罗马元首制时代的精英都没有看清的问题，却被尤里安发现了。这是因为他是致力于振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又在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执政时期成长，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堂兄的所作所为。正因为是近亲，所以才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里安所背负的，如今已成为通称的“叛教者”之蔑称，其实背后含藏了许多的意义。对于这位只活了31年的反叛者而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光彩的称呼。

第三章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公元374—397年在任）

10年过去了。

这是从公元364年到374年的10年。

尤里安死后，继位的约维安也在7个月后猝死。紧接着瓦伦提尼安替补，成为罗马皇帝。公元374年，瓦伦提尼安迎来了在位的第10个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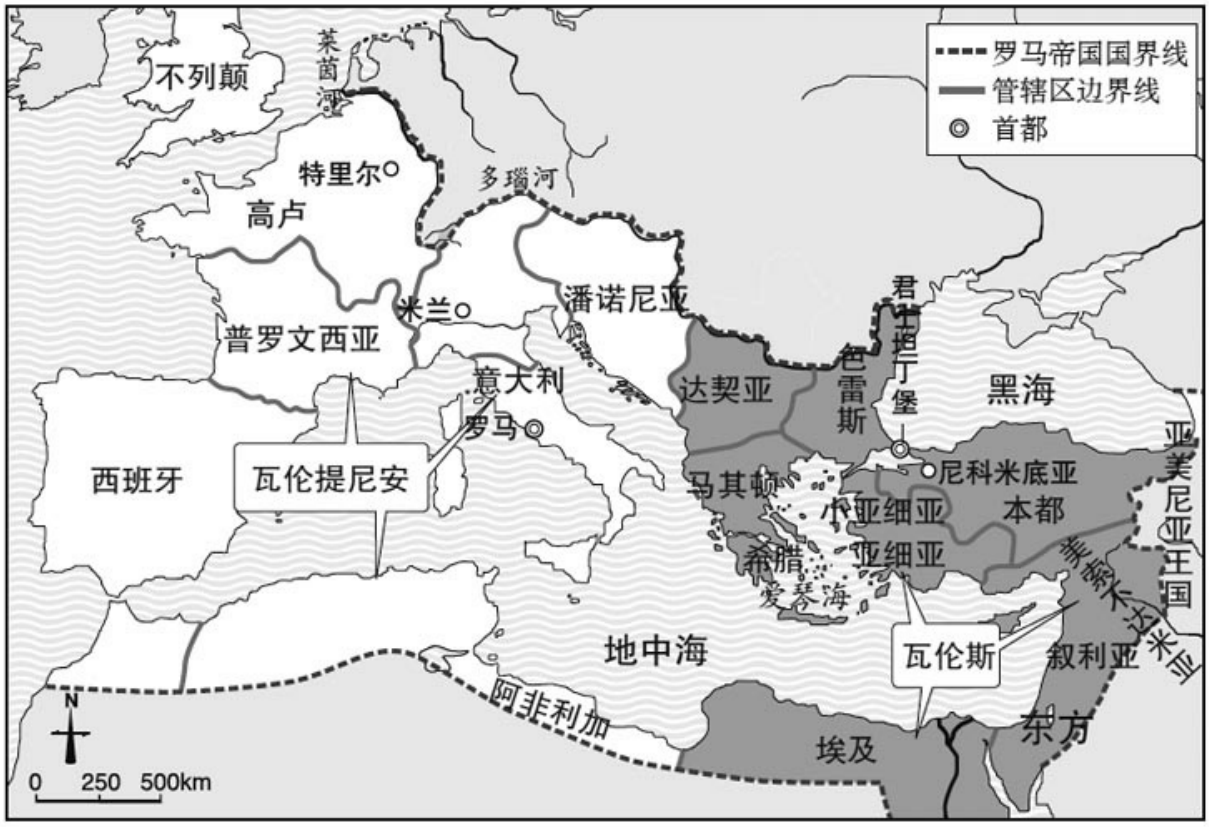
这10年，罗马帝国的局势其实并不平静。一些在元首制时代少有发生、被视为非常的状态，如今已成为常态。社会问题严重，积重难返。整个国家好像一条衰朽不堪的堤坝，哪里破了补哪里，刚补完这里抵御了洪流，别的地方又出现了裂口。帝国在这种状态下，之所以还能撑过10年，一是由于强敌波斯的沙普尔国王年事已高，二是因为瓦伦提尼安皇帝是一位颇具才华的武将。

蛮族出身的皇帝

瓦伦提尼安虽然身上流着日耳曼人的血液，却是在罗马领地潘诺尼亚行省出生长大。他出生于公元321年前后，出生地点位于现在匈牙利或塞尔维亚和黑山一带的多瑙河流域。他父亲是驻守多瑙河的罗马军人，作为长子，他在成年后很自然地就加入了军队。同时代的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24年，正好与他的从军时间相重叠。瓦伦提尼安42岁时，跟随尤里安皇帝远征波斯，经历了那一场充满荣光也饱受屈辱的战争。在当时的武将中，他应该是属于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之一。瓦伦提尼安非常清楚，光凭战场上的经验，无法独自承担起整个帝国的重任。所以，登基刚满一个月，他就任命自己的弟弟瓦伦斯（Valens）与他共治皇帝，而不是副帝。

比瓦伦提尼安小7岁的瓦伦斯，在36岁当上皇帝之前的经历不详，

即使也是军人，也不能与曾经担任过北非以及不列颠司令官的长兄相比。对于瓦伦提尼安而言，只要这个弟弟能忠心不二就足够了。



兄弟俩统治下的帝国版图

如上图所示，帝国一分为二，由兄弟俩分治。兄长掌管帝国西部，东部则由弟弟负责。兄长分管西部的理由，纯粹是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这一边。对罗马皇帝而言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防御外敌的侵略。

弟弟瓦伦斯为人厚道，但才华平平。他之所以能够担当起保卫帝国东部的重任，理由只有一个：波斯国王沙普尔的斗志日渐衰退。

沙普尔的气势不断减弱，说来也是自然的结果。他已经实现了继位以来最大的心愿——从罗马人的手里夺回了被强占70年之久的美索不达

米亚北部地区。不仅如此，他趁着尤里安战死，继位的约维安的精力集中于复兴基督教之际，攻击了长年成为罗马与波斯争端的亚美尼亚，杀死国王，使之成了事实上的波斯附属国。亚美尼亚国王的王妃也被贬为奴隶，赐给了一位将军。她来自君士坦丁堡高贵的家族，曾经是君士坦提乌斯的未婚妻，后来嫁给了亚美尼亚国王。当初不肯听从尤里安皇帝的劝说，拒绝参加波斯战争，而选择了中立的亚美尼亚国王，最终还是没有保住他的皇位和国家。

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是一位令罗马人难忘的人物。他的出生年月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如果公元309年他继位时还是一个少年的说法无误的话，那么，他利用拖延战术，视尤里安如掌中之物时，应该已年近70岁。在他完成此生最大心愿，从罗马手中夺回失地时，已经过了70岁。在接下来的这10年中，他的战斗力不断削减，的确属于正常的现象。

瓦伦提尼安

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美尼亚王国被波斯占领之后，罗马帝国东部的防卫机制变得支离破碎，正是由于波斯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侵略举动，罗马帝国的东部才能因此幸免。公元379年沙普尔二世去世，波斯王国就像一棵被掏空的大树，静静地倒了下来。要在统治国家70年之久的明君之后继位，对哪一个新主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沙普尔二世死后的波斯王国，王位争夺战不断，局势动荡，这对防卫机制濒临瓦解的帝国东部而言，的确是一件幸事。

与平静的帝国东部相反，这10年来西部纷扰不断。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不是瓦伦提尼安皇帝治国的能力问题，而是对手的素质不同。

与东部的对手波斯不同，西部的敌人是来自北方的蛮族。无论罗马出手反击还是利诱拉拢，敌人的数量始终有增无减。贫穷的人向往富裕之地，属人之常情。北方气候严峻，当地人又不懂得土地的利用，生产力低下。与之相反，西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利用完善，物产富饶，因此，北方民族向南迁移，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简单地说，人是会移动的。不仅如此，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暴力。公元4世纪人们向往的移居地，东方是波斯王国，西方则是罗马帝国。

这种人口移动现象，往往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背后遭到后来者的推挤，那些原本早已定居在罗马边境附近的蛮族人，就不得不进一步向罗马国内移动。罗马帝国曾经成功地与居住在边境附近的蛮族维持着良好关系，却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北方蛮族的入侵问题。其理由就是因为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这种多米诺骨牌现象愈演愈烈。

瓦伦提尼安皇帝这10年来对付过的蛮族，按地域划分见下：

越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s）、汪达尔人（Vandal）、阿勒曼尼人。

从北海入侵不列颠行省的：皮克特人（Picts）、苏格兰人（Scot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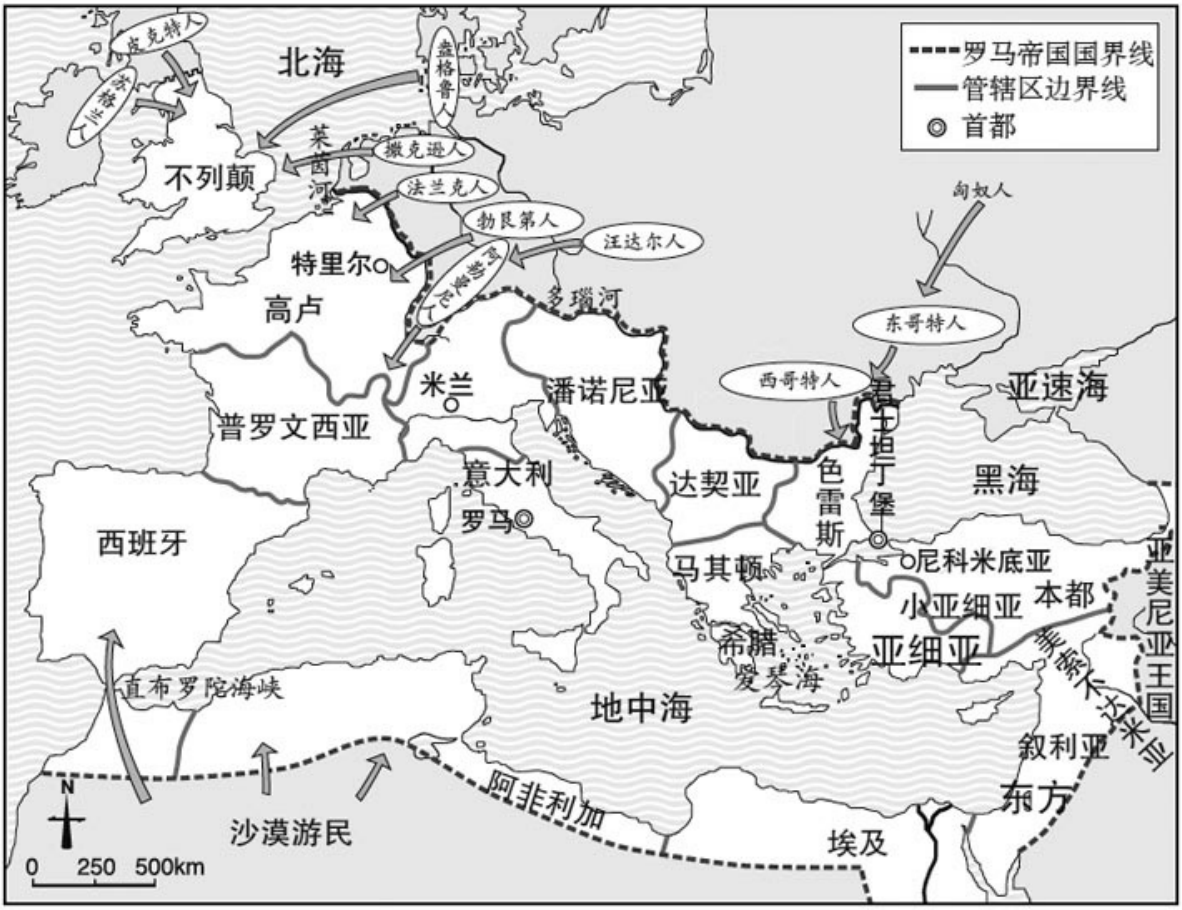
越过多瑙河入侵的：哥特人。有时，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各自行动，有时候则是东、西两大族联手。在这条战线上，又新添了一个从亚洲迁移而来的匈奴人（Hun）。

入侵北非的：沙漠游民。这些人有时候会乘势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不能视之为散兵游勇而掉以轻心。

百年之后，帝国遭受蛮族大举侵略。而此时，各路角色已经纷纷登场。两个世纪唯一不同的是，4世纪的蛮族属于盗匪，突然发动袭击，

烧杀抢掠之后，扬长而去，而5世纪的蛮族，不仅杀人放火、巧取豪夺，而且占地为王。

尽管帝国西部的全境都遭遇了蛮族的侵略，但瓦伦提尼安皇帝还是成功地击退了来敌。他马不停蹄地转战各地前线，亲自指挥战役。一旦发现有用之才，不问出身立即提拔重用，将一些他本人无法亲赴的地区交给他们。由于皇帝本人出身于北方蛮族，因此这10年来，罗马军中蛮族将官的数量不断增加。这里必须郑重说明，即使对手来自故乡，这些蛮族出身的将领和士兵，仍然忠实地履行着保卫罗马帝国的职责，极少有人做叛军。



4世纪后期蛮族的分布及其入侵路线

罗马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居民热衷于罗马化。而到了帝国后期，蛮族血统的人则希望成为真正的罗马人。瓦伦提尼安也是其中之一。罗马帝国的魅力究竟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由于瓦伦提尼安长年驰骋于战场，有关他政治方面的记录少之又少。当初约维安推翻尤里安的改革政策，恢复了旧制度，之后，帝国的体制始终维持不变，即一切回到了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不过，瓦伦提尼安日理万机，无暇待在皇宫内搞什么阴谋诡计，皇帝及其周遭在这方面还是干干净净、稳重行事。皇宫内宦官们既没有横行霸道的机会，皇帝也没有时间去享受东方君主一般的奢侈生活。虽然瓦伦提尼安是一位基督教徒，不过，正如恺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悲叹的那样，他入教的动机，似乎也是出于利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教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愿卷入阿里乌斯派与阿塔纳西乌斯派之间的争斗。教会屡次恳请他召集各地的主教，举行大公会议，他一概拒绝，吩咐他们自行其是。瓦伦提尼安重新颁布了承认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米兰敕令”，托这位蛮族出身的皇帝之福，异教徒们过上了一段神殿不遭破坏、祭祀活动不受禁止的安宁日子。

不过，瓦伦提尼安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他对接受过教育，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其厌恶。在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半都不是基督徒，而是所谓的“异教徒”，这些人心目中的“圣城麦加”就是罗马元老院。多位来自元老院世家的议员被控反叛罪，瓦伦提尼安皇帝用物理的方式让他们彻底消失。据称，罗马元老院的人数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这些人也并非统统都被处死，其中的大多数人眼看形势不利，便辞去代代相传的议员席位，做回一介平民。瓦伦提尼安的行为，从结果而言，对削减异教徒的势力，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出身蛮族，一旦成了皇帝，似乎也会考虑血统继位的问题。瓦伦提尼安与亡妻玛利亚·赛维拉之间育有一子格拉提安（Gratianus）。瓦伦提尼安在位第10年时，这个男孩已经15岁。这位皇帝的长子很早就

获得了“皇帝”（奥古斯都）的称号。为了淡化蛮族出身的印象，强调其正统性，瓦伦提尼安皇帝还让儿子迎娶了君士坦提乌斯的遗腹女。这位在父亲死后出生的公主，虽然只有12岁，但她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女——大帝唯一一位在世的血亲。

尽管没有教养的瓦伦提尼安厌恶知识阶层，其周边鲜有此类人物出现，但他找来了帝国西部屈指可数的专家当家庭教师，指导日后准备继位的儿子学习罗马人传统的教养学科。

然而，教育的成果往往取决于被教导的一方。格拉提安虽然热衷于罗马化，却倾心于基督教。这也难怪，对一个不知道共和时代以及元首制时代的蛮族人而言，他所认知的罗马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倡导之下，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罗马，要做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就是成为基督徒。

与只会说拉丁语的父亲不同，格拉提安还学习了希腊文，这一点算是意外的收获。当初瓦伦提尼安与胞弟瓦伦斯分治帝国，之所以将富饶的帝国东部交给弟弟，据说就是因为他不擅长东部通用的希腊语。

瓦伦提尼安与后妻之间还有一子，因为孩子是在他登基之后出生，所以与父亲同名，叫瓦伦提尼安二世。这个孩子在其父登基第10年，即公元374年，只有3岁。瓦伦提尼安二世深受母亲的影响，其母贾斯蒂娜（Justina）是一位狂热的基督徒，而且笃信阿里乌斯派。

除了以上两个儿子之外，瓦伦提尼安皇帝还有一个女儿，叫加拉（Galla）。

瓦伦提尼安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下走过了10年。然而，到了第11年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巨变。

公元375年11月17日，瓦伦提尼安皇帝猝死。这一年在与北方蛮族

战斗中，皇帝率领的罗马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事情发生在冬季休战期皇帝接见蛮族代表的时候。近年来蛮族人屡战屡败，除了向罗马投降别无生路。尽管如此，蛮族族长的态度依然十分桀骜不驯。也许是他觉得，眼前的这位罗马皇帝和自己一样都是日耳曼人。

不知道是不是看穿了族长的心思，瓦伦提尼安皇帝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站着的腿不停地发抖，突然间整个人倒了下去。昏迷不醒的瓦伦提尼安在当晚就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

如果说但凡继位多有纷争，那么这次皇位的继承不仅非常顺利，甚至可以称为光明正大。

47岁的瓦伦斯，依旧维持其帝国东部皇帝的地位。

帝国西部则理所当然地由拥有“皇帝”称号的格拉提安继承。这位16岁的新帝又把“皇帝”的称号赐予了只有4岁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并且将意大利本土从帝国西部分割出来，作为这位4岁的皇帝的领地。4岁的孩子自然需要监护人，当瓦伦提尼安二世前往大本营米兰时，他的刚成为未亡人的母亲阿里乌斯派狂热信徒的贾斯蒂娜也随之同行。

瓦伦斯皇帝及其两位侄子帝国分治图

帝国西部的和平局势就这样又维持了两年。在国内，没有争夺皇位的内斗，对外，因先帝瓦伦提尼安10年奋战的结果，北方蛮族似乎也偃旗息鼓，不再发起攻击。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正酝酿着即将爆发的凶事。

匈奴登场

一切都始于匈奴人的崛起。匈奴人来自中亚草原，他们与罗马帝国迄今为止交往过的所有北方蛮族迥然不同。从此之后的百年内，他们的名字会频频出现在罗马史上，而他们的首次亮相，是在公元4世纪只剩下四分之一时间的这个时期。当时的人对这个不仅让罗马人，甚至连北

方蛮族都深感恐惧的民族，曾留下这样一段记述：

> 匈奴人是蛮族中的蛮族。他们不懂得用火烹煮食物，也不知道佐以其他食材。他们骑马时，将肉夹在两腿之间，捂热后生吃。
>
> 他们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动作敏捷。他们的脸，与其说是人类的面孔，不如说更像一块平坦的肉块。只有两个会动的黑点，才让人知道是一双眼睛。他们几乎没有胡须，大概是因为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经常被短剑刮脸，习惯了受伤和流血。
>
> 他们像祭拜神灵一般，祭拜插在地上的剑。无论如何，他们是一群长成人样的动物，是从前住在森林中的恶魔与被赶出哥特人的魔女媾和而生。
>
> 匈奴人的恶魔父亲教导他们，如何去攻击哥特人。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
> 几个匈奴男子去附近的山上打猎山猪。他们追赶着一头母猪，母猪一步步往后退，仿佛在诱惑这些男人。在追逐的过程中，男人们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周围的地形，他们知道要袭击对岸的哥特人，该从哪里渡过麦奥提克沼泽（黑海北面的亚速海）而不至于溺死。看到男人们已经学会了本领，母猪便消失了身影。这头神秘的猪，就是哥特人的敌人——恶魔。

公元4世纪时，黑海西北部居住着哥特人的分支东哥特人。以上这段文字就是当时某位东哥特人留下的，可以称之为蛮族人的蛮族评论。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匈奴人刚出现，就给其他族群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东哥特人遭到匈奴人袭击后，往西南方向逃离。当然，他们不是和平撤退，而是随身携带着武器。这使得那些原本居住在多瑙河注入黑海流域的西哥特人失去了土地。

丧失了家园的西哥特人，派遣特使去罗马，恳请罗马皇帝将属于罗马领地的多瑙河南岸划给他们居住。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愿意放下武器，适龄的男子加入罗马军队，其他人以及妇孺则会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辛勤耕作。

多瑙河下游地区属于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管辖。西哥特人提出的条件对他极有吸引力。其理由见下：

第一，可以扩充防守多瑙河的罗马军的兵力。

第二，因长年遭受蛮族袭击等原因而日益凋零的国界线一带，可以重新恢复为富饶的农耕地带。

被以上两大魅力吸引住的瓦伦斯皇帝，从叙利亚的安条克皇宫，向色雷斯的行政长官发出公文，批准西哥特人迁居罗马境内。这些蛮族人的迁居地，就定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行省内。

政治与行政不同。一些事情，即使在行政实施上难度极高，有时候也不得不服从政治。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作决定的不应该是行政长官，而是掌管政治的领袖，也就是说，这属于政治上的决定。而当政策具体实施时，作出决定的一方必须始终留意着政策执行的情况。可是，瓦伦斯皇帝向色雷斯的行政长官发了公文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事实上，大量的移民势必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往往超出了一介地方长官所能掌控的范围。

公元376年深秋之际，大批的西哥特人从北而下，渡过多瑙河，向南方迁移。多瑙河原本就是一条大河，到了下游，河床尤为宽阔。蛮族人乘坐的小船和木筏，布满了河面，多达数公里。由于数量过于密集，造成小船、木筏相互间碰撞，不少船因此沉没。然而，蛮族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之一，就是重视生命的程度。对于北方蛮族而言，少许的牺牲算不上什么。尽管有同胞葬身于河底，蛮族人使用小船以及木筏渡河

的行动却没有因此而中断。

那时候哥特人的迁移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当初他们请求瓦伦斯皇帝批准他们移居罗马境内时，答应提供1万名成年男子参加罗马军，而当迁移结束之后，人数增加到3万人。蛮族人通常多产，如果说部落十分之一的人口符合参军条件，那么就有30万人左右的蛮族人进入了罗马境内。而最初估计的移民数量只在1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一些没有得到罗马皇帝移居许可的哥特人部落也混入其中。想来这也在情理之中，以前这些蛮族人只要接近多瑙河南岸，就会遭到阻击，现在罗马同意开放，周遭的部落自然不会错过机会。然而，大批蛮族人的到来，却使得色雷斯行省的收容机制彻底崩溃。

鉴于以上理由，北方蛮族向罗马帝国境内合法性的迁居行动，当然不会出现一个良好的趋势。

首先，蛮族人大规模的迁移发生在秋季。秋天是收割的季节，然而事前没有播种，自然是颗粒无收。因此，国家必须为这些移民提供整整一年的口粮，直到第二年开春播种再到秋季收割为止。不仅是口粮，政府还需要为这些生活水平低下的蛮族人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品。不知为何，移民们似乎总是希望能够与移居地的居民获得同等的待遇。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离开祖国的难民吧。被匈奴人赶出家园的哥特人，的确称得上是难民，只不过他们是一群携带着武器的难民。

解除蛮族人武装的问题，始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是因为罗马帝国当初答应的生活保障，迟迟不能到位。特别是入冬之后，生活条件愈发恶化，眼看着妻儿们吃苦受难，男人们更不愿意交出武器。有研究者指出，问题在于实际操作的行政官员办事不力，我则认为，主要是因为移民的人口超出了预期的数量，当地政府应付意外状况的措施不够完善。而对此要负起责任的，就是当初轻率答应了蛮族移民的瓦伦斯皇帝。要接受大批移民，政府必须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应对机制，然而，色雷斯管辖区既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所需的特别经

费。再加上那些中介移民生活物资的不良商人乘机敛财，使得事态不断地恶化，影响不断地扩大。提供给移民的物资不仅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上也比当初承诺的少了很多。

哥特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渐渐地，他们又恢复了原本打算放弃的蛮族精神。所谓蛮族精神，就是相对于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生活方式，宁愿选择抢夺他人的财产，占为己有。哥特移民回归蛮族精神的现象，首先从袭击周边的村落开始。紧接着，这股掠夺浪潮，从色雷斯席卷到西面的达契亚，直至南部的马其顿。此时此刻，罗马帝国的敌人，不再是从北方越境入侵，而是已经在罗马境内向西及向南一路烧杀抢劫。当哥特人袭击色雷斯地区的主要城市马奇亚诺波利斯（Marcianopolis），突破了罗马军防线之时，这股掠夺潮的速度与气势达到了最高点。形势至此，罗马皇帝再也无法不闻不问、袖手旁观了。

哈德良堡战役大败

第二年，公元378年开春之后，瓦伦斯皇帝终于有了动静。他动身离开叙利亚的安条克，在5月底，抵达了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行军速度实在称不上快捷，估计是一路在沿途招兵买马，消耗了时间。就在罗马军以缓慢的速度向着色雷斯进军之际，哥特人也向留在多瑙河北岸的同胞喊话，增强战斗力。

即使自己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也可以袭击敌方的薄弱之处，这是速攻的长处。而瓦伦斯皇帝在做好了万全之策的同时，也给敌人提供了充足的备战时间。

不过，仍然还有取胜之道，就是采用从东、西两面夹击的战术。哥特人想渡过多瑙河向北逃离，其实非常困难。因此罗马军把守住东、西两方，夹击战必定有效。如果这个战术能在实战中得到运用，那么，瓦

伦斯皇帝迄今为止所犯下的任凭形势恶化而无所作为以及行军速度迟缓浪费了宝贵时间等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而实施这个战术，必须要有帝国西部格拉提安皇帝的协助。

瓦伦斯皇帝的侄子格拉提安，虽然只有19岁，但在抗击越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蛮族人的战斗中，获得了不菲的战绩。而且，他为人善良，不会对叔父的请求置若罔闻。问题出在做叔叔的瓦伦斯身上。

瓦伦斯似乎不了解北方蛮族的情况，也不懂打仗。这个50岁的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在做皇帝之前，说不定连参战的经验都没有。对他个人来说，这样的经历是幸运，但作为最高司令官，就是一个悲剧。

经常是在这种时候，有害无益的虚荣心往往会跑出来作祟。色雷斯地区属于瓦伦斯的管辖范围，解决那里发生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所在。恐怕就是这个想法促使瓦伦斯没有向年轻的侄子提出协助的请求。

不过，无论瓦伦斯皇帝是否开口求援，人在高卢的格拉提安皇帝还是会知道他的行动。帝国东部编组大军，连退伍军人都重新召回的消息自然会传到阿尔卑斯山脉的西侧。格拉提安火速向叔叔派去了信使。他在信中表示，一旦击退了阿勒曼尼人，他会立即赶去支援，在此之前，千万不要挑起战事。收到信件的瓦伦斯皇帝，紧接着听到的消息，是比自己年轻30岁的侄子击退了蛮族的捷报。

就在罗马一方拖延之际，哥特人开始行动，从色雷斯南下。不管双方是否有心一战，向东行军的罗马军与南下的哥特军，注定要在哈德良堡的近郊遭遇。

瓦伦斯皇帝召集军中将领和高官，举行作战会议。他询问手下，是该等待格拉提安皇帝的援军，还是自己先发起攻击。众人的意见分成两派，皇帝本人也没有当机立断。就在瓦伦斯犹豫不决的当口，接到了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情报。

一份是来自侦察兵的报告，附近的敌军不超过1万人。

另一份，哥特人大王派来一位哥特基督徒，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事端，并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瓦伦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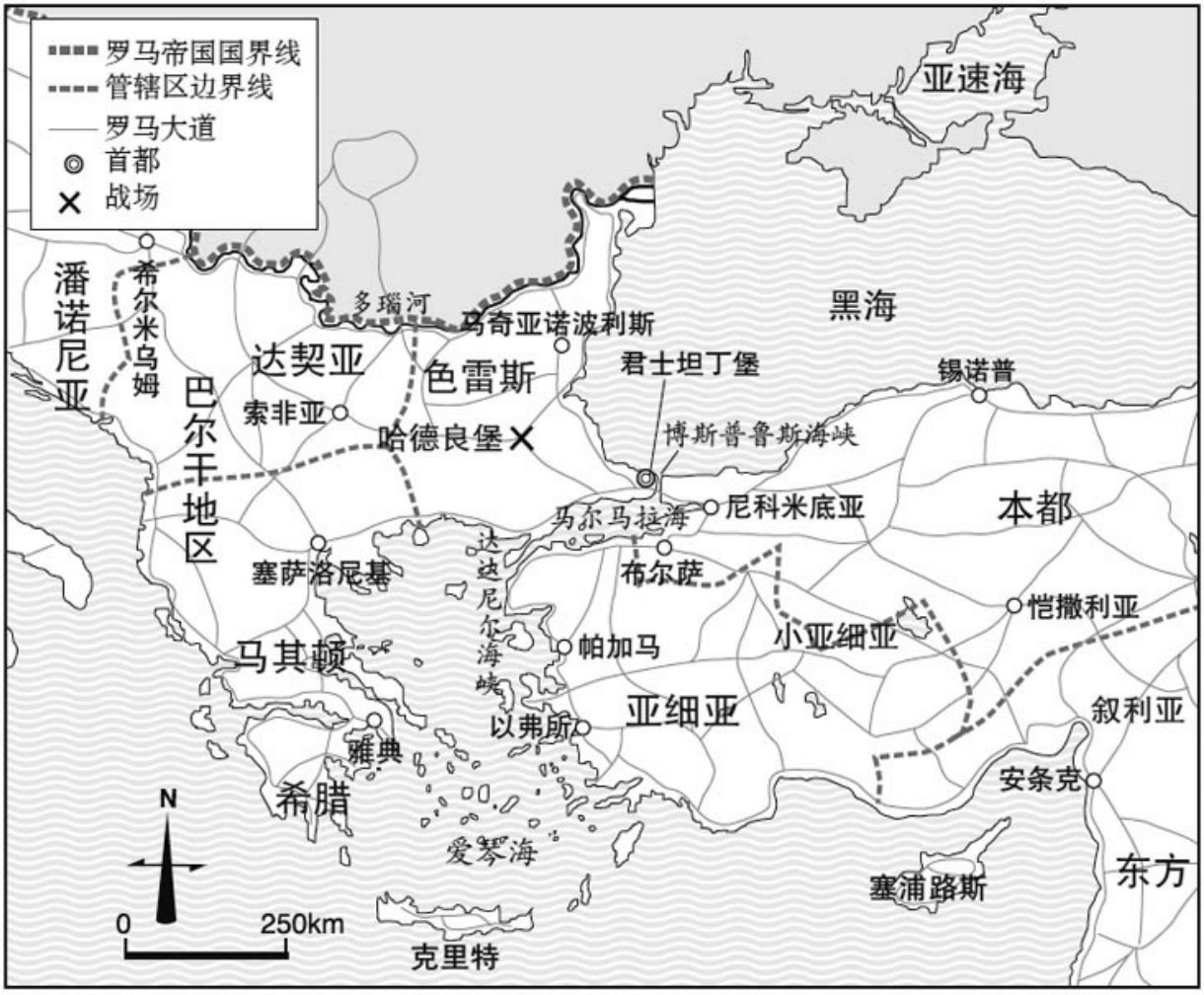
这让作为阿里乌斯派虔诚信徒的瓦伦斯皇帝，再次犹豫不决。或许一方面他觉得解决1万人的敌军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又被哥特人提出全体改宗信仰基督教的条件深深地吸引。不过，瓦伦斯皇帝与基督徒特使的会谈并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因为后来发现，派来特使的这位大王，并不能代表全体哥特人，他只是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首领而已。虽然谈判未果，但瓦伦斯皇帝至少应该从中了解到，哥特人只是一个族群的总称，族群全体并非在某一个人的指挥下统一行动的。如果他真能学有所得，就会采取相应的战术。可是，瓦伦斯皇帝决定不再等待侄子的援兵，先发起进攻。而且，连作战方案都还没有制订，就向哥特人开战。

公元378年8月9日的早上，瓦伦斯及其麾下的军队，离开哈德良堡（现土耳其的埃迪尔内），朝着西北方向一路寻找从色雷斯南下的敌军。就在太阳高照、气温不断上升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敌人。哥特人使用他们的标准防御战术，用四轮车围成一个圆阵，等待着罗马军。这些人只是哥特的一个部落，而罗马军打头阵的右翼部队，却在中央以及左翼部队到达之前，就率先发起了攻击。

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很少会出现统率全族的强势的领袖人物，大多情况下都是散沙一盘。各个部落倾向独自行动，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与多部落组成的哥特人打仗时，只有两

个办法：一是从四面八方压进，将他们逼到一处，一举歼灭；二是把大部队分散成几支，采取各个歼灭的方式。然而，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哈德良堡战役”中的罗马军，依然按照右翼、中央、左翼以及轻骑兵的传统的会战方式，而其对手哥特人则分散四处，伺机从不同的方向发起攻击。

光看两军的阵型就能预见胜负，何况，罗马军没有充分地调动起各部门的机制。虽然不乏英勇作战的官兵，可是仗还没打到太阳落山，输赢已成定局。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这场战役中，罗马军损失了2位高官、35个大队长，以及占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人数的官兵。

瓦伦斯皇帝与几位大臣也葬身于火海。当时，他受了伤，被人搀扶着逃进了附近的小屋，紧追而来的哥特士兵不知屋里藏着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因多次破门未果，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小屋。瓦伦斯皇帝享年50岁，在位14年。

出门作战时习惯带上全副身家的哥特人，以为罗马人也同样如此。当他们发现那些战败的罗马官兵身上除了武器，没有任何钱财时，大失所望。他们只好先从阵亡的罗马官兵身上剥下头盔和胸甲穿在身上，拿着缴获的枪和剑，准备攻打哈德良堡，他们相信罗马军把金银财宝都留在了那里。

站在第一线誓死保卫哈德良堡的，是侥幸脱身的剩余的三分之一罗马军。哥特人即便在野战获胜，但对于重新恢复了强盗本性的他们而言，这些罗马军人是一群很难对付的对手。蛮族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擅长打持久战。最终，哥特人放弃了攻打哈德良堡，沿着罗马大道，朝着东南方向行进，目标转向君士坦丁堡。然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东部的首都，无论在防御力量上还是地形上，罗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很快哥特人就放弃了攻城的计划，不过，他们原地不动地留在了多瑙河以南的帝国的中部。这就是说，由于中部地区盘踞着北方蛮族，罗马帝国被分割成东、西两块。

哈德良堡战役的惨败，给许多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是出生于安条克的希腊人，不信仰基督教。他在军中度过了前半生，后半生则专心于写作。由他所著的涅尔瓦皇帝时代之后的罗马帝国通史，就是以哈德良堡战役作为最后的篇章。仿佛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员，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值得叙述的历史。

除了阿米阿努斯，罗马哲学家、尤里安皇帝的老师利巴尼乌斯，得知哈德良堡战役战败的消息之后，写了以下这段文字：

> 请不要再抱怨罗马官兵胆怯、意志薄弱或者是偷懒。也不想听到蛮族人更像优秀的士兵之类的言语。
>
>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战术以及精心备战上，敌人都达到了与我们同等的水准。而且，他们比我们更重视名誉，更渴望荣耀。他们能够忍受酷暑和饥渴，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熊熊烈火，都不能让他们放弃战斗。仿佛战死沙场比侥幸逃离是一件更美妙的事情。
>
> 这样的敌人，总有一天会超越我们。他们不可一世的气焰，让我不由得想到，是不是那些被我们疏离、排挤的古代诸神中的某位天神，站在了蛮族一边，以示愤怒之意。

哈德良堡战役并非罗马人第一次被蛮族人打败。然而，总司令同时又是皇帝死于战场的惨败，还是首例。而且，皇帝的阵亡之地不是在敌国他乡，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

百年前的德基乌斯皇帝，同样输给了哥特人。这场让皇帝及其儿子都丧命的战场，也在巴尔干地区。但是，迄今为止的罗马人，在遭到重创之后，一定会将敌人赶出境外，成功雪耻。然而，哈德良堡战役之后，情况有变。公元378年发生的这场战役，充分显示了罗马帝国日耳曼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武力威胁下日耳曼化，还是和平地走向日耳曼化。无论如何，要将日耳曼人驱除出境，已经不可能了。

狄奥多西皇帝

作为知识人，可以冷静地分析现状，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观察世间的动态。这是因为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大。在元首制时代，“言”“行”为一体，而到了帝国后期，“言”与“行”就分离了。发表意见的和实际做事的，是不同的人，“热爱知识的人”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然而，掌握着他人命运的统治者却不能只会空发感叹。得知哈德良堡战役失败的格拉提安皇帝，必须承担起收拾残局的责任。

帝国东部的皇位，因瓦伦斯皇帝之死而空缺。而曾经在瓦伦斯皇帝统治之下的西部地区巴尔干，如今被以哥特人为主的蛮族占据，连罗马皇帝也插不上手，几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时候，应该站在政治与军事前沿阵地的皇帝，除了19岁的格拉提安，就只有刚满7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

格拉提安秘密派人去西班牙，命令他们把狄奥多西（Theodosius）带回罗马。

格拉提安与当时31岁的狄奥多西并非素不相识。狄奥多西的父亲是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手下的武将，曾经多次立下赫赫战功。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10年间，每当高卢、不列颠、北非等地区发生问题，能够临危受命，并且在短时间内击退来敌、胜利完成任务的将官，只有他一人。因此，当他晋升到地位仅次于最高司令官的“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时，军中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可是，当他被派到北非去执行任务时，虽然军事上获得了成功，却在政治上中了当地行政长官的奸计。这位行政长官控告他通敌，时间又不巧，正好碰上瓦伦提尼安一世猝死，刚满16岁的格拉提安继位。年轻的新帝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就给这位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定了死罪。北非地方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执行了死刑。那是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

跟随父亲一同征战的狄奥多西，积累下丰富的军事经验。在29岁那年，他失去了守护他的父亲以及靠自己实力得来的地位。一无所有的狄奥多西，只好返回位于西班牙北部的故乡考卡（Cauca），他没有因父亲之罪而受到牵连，已经算不幸中的万幸。

两年之后，狄奥多西受到了当初判他父亲死刑的那个人的召见。当然，格拉提安也没有忘记两年前的事情。他召回罪人之子的做法就够奇特，这位19岁的皇帝，面对应召而来的31岁的狄奥多西所说的话更有意思。

瓦伦提尼安皇帝家族图

瓦伦斯

皇帝，负责帝国东部
364—378 年（哈德良
堡大败时战死）

贾斯蒂娜（后妻）

瓦伦提尼安

皇帝，负责帝国西部
364—375 年（病死）

玛利亚·赛维拉（原配）

瓦伦提尼安二世

傀儡皇帝，负责意大利本土
375—392（被杀）

格拉提安

皇帝，负责帝国西部
375—383 年（被杀）

狄奥多西皇帝家族图

（数字为在位年）

加拉（后妻）

拉·普拉西提阿

最初嫁给哥特人族长为妻。
之后与弗拉维乌斯·君士
坦提乌斯结婚

狄奥多西

皇帝 379—395 年
（病死）

艾丽娅（原配）

阿卡狄乌斯

东罗马帝国皇帝
395—408 年

霍诺里乌斯

西罗马帝国皇帝
395—423 年

不知道年轻的皇帝有没有对狄奥多西讲了两年前的事情付诸流水之类的话，但他很直率地提出，准备任命狄奥多西为与他地位同等的皇帝，将瓦伦斯先帝管辖的帝国东部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协助重建因哈德良堡战役而受到重创的帝国大业。当时狄奥多西已经结婚，皇帝甚至没有提出让他与妻子艾丽娅（Aelia）离婚，改娶自己的妹妹加拉。狄奥多西是在艾丽娅死后，才续弦娶了加拉。从他的第二个孩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诞生的时间推算，他再婚至少是7年之后的事情。总而言之，哈德良堡战役大败的这一年，格拉提安皇帝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把帝国的东半部交给了失业的前军官狄奥多西。何况这个人比自己年长12岁。这是普通人很难有勇气作出的决定，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至于狄奥多西，同样也没有异议地接受了皇帝的请托。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为他含冤而死的父亲恢复名誉。格拉提安皇帝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立即作了公开的声明。

罗马帝国不存在什么皇帝的加冕、登基等仪式。那个时期，基督教尚未全面国教化，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并非上帝所赐，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来自帝国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的全体公民的授权。皇帝的治世，也就是从“受托人”介绍给“委托人”的那一刻开始。

狄奥多西也是从他在多瑙河防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希尔米乌姆与官兵们见面的那一刻开始，正式成为东部皇帝。因为军人也是罗马公民、国家的主人。这一天是公元379年1月19日，中欧地区特有的冷风夹杂着冬雨的天气，刺得人皮肤一阵阵地发痛。这一天距离哈德良堡战役的战败5个月。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另一位被基督教教会奉为“大帝”的罗马皇帝正式登场。

由于狄奥多西皇帝曾经是罪人之子，因此他没有所谓的嫡系。这位最高司令官仿佛坐着降落伞，空降到官兵面前。而且他出身于西班牙行省，这个地区罗马化的历史与帝国的帝政时期同样久远。相比之下，整

齐列队站在他面前的士兵，情况好一点的是罗马化的蛮族的第三代，差一些的是刚罗马化的蛮族人。他不得不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打仗抗敌，而且还是一支彻底被哥特人打败了的军队。要让这些尚未走出阴影的士兵，再次去和打赢自己的哥特人打仗，仅仅这一点，就极度困难。

所幸的是，狄奥多西才30岁出头，还很年轻，而且从他被格拉提安钦点之前的生活状况来看，不管今后他怎么做，都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不仅如此，格拉提安也向他保证，无论他怎么决定，都会毫无条件地给予全面的支持。这三项条件，让他成了一个果断的男人。换言之，他在行使强权时，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哈德良堡战役”后的罗马帝国

狄奥多西在他受托管辖的帝国东部全境张贴布告，募集现役士兵以及退伍老兵的儿子。子承父业，职业世袭制的法令虽然已经出台很久，

但一直没有贯彻到社会基层。不过，这次是皇帝亲自下令，形同征兵。

另外，他所管辖的地区还包括了多瑙河南岸一带。这里因为哈德良堡战役失去了大量的士兵，军队因人手不足而处于贫血状态。因此，当地的募兵对象分成两类：

第一，以没有服过兵役的罗马公民为对象，保证每年发放一次赏金。由于条件丰厚，应征者源源不断，从厨师、面包师到店铺伙计，来自各行各业。不过大多数愿意入伍的，还是因蛮族的侵害以及重税的负担，不得不放弃农耕的农民，以及那些由于主人家的经济状况难以维持而被解放的奴隶。

狄奥多西

第二，以北方蛮族日耳曼人为对象。狄奥多西也向他们提供了一项相当不错的条件。只要他们能够找到接替自己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退伍，返回部落。

在优惠条件的吸引下，募兵的目的是达到了，不过遵守军纪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养成。这些人对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既没有太多的忠诚心，也不怎么服从直属长官的命令，因此，军团内外常有问题产生。

狄奥多西发现，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训练来解决问题。因此，他打破以往的惯例，强制性地将在东部招募的士兵调往西部，同时把集结于西部的士兵派去东部。

士兵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派遣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但他们已经宣誓效忠皇帝，如果拒绝命令，立即会以反叛罪被处死。因此，军人们尽管

心怀不满，还是开始了调防的行动。东西两拨人马在小亚细亚相遇时，曾经发生激烈的冲突，虽然事件很快得到了平息，但还是有人因此丧生。

狄奥多西管理军队，如果只有强行换防这一招，他不过就是一个暴君。然而，事实证明他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一支情绪不稳定的军队，是不可能频频赢得胜利的。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我认为，狄奥多西作为最高司令官，最终还是采用了最单纯也是最正当的手法，消减了士兵的不满情绪。那就是奖罚分明、公平以及打胜仗。战场上生死在一瞬之间，因此士兵对司令官的评价，要比外人想象的更为严格。哪怕是侥幸存活，但如果被俘，不管对方是波斯人还是日耳曼人，都逃脱不了一生为奴、过猪狗不如的生活的悲惨命运。

公元379年，狄奥多西率领的军队创下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罗马军不仅攻打了哥特人盘踞的色雷斯和达契亚等位于多瑙河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且一路追击，一直打到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不属于狄奥多西的管辖范围，但他没有一丝放弃的意思。按照这个势头，罗马军完全有能力彻底地将哥特人赶回多瑙河北岸。

然而，这时的狄奥多西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就在这一年，历经50年统治、创下辉煌业绩的波斯国王沙普尔去世。沙普尔死后的波斯王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期，不过这情况要到之后才有所显示，当时狄奥多西则担心波斯王国会再出现一位与沙普尔同样强悍的国王，那么波斯军极有可能会越过幼发拉底河，侵入罗马境内。如果形势发展果真如此，狄奥多西就不能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多瑙河地区了。

公认蛮族迁移

狄奥多西皇帝作出了决定，不是把哥特人赶回多瑙河的北岸，而是

为他们在南岸提供居住地。这个决定得到了格拉提安皇帝的许可，所以这项措施是以两位皇帝的名义颁布的。

西哥特人获得了临近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北部的地区，现在这里相当于保加利亚。

东哥特人虽然进入罗马境内的时间稍迟，但他们与西哥特人共同参与了哈德良堡战役。他们的定居地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行省东部一带，相当于如今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塞黑联邦已于2006年6月3日正式解体。——译者注）。

作为交换条件，两部落保证会在指定地区居住，专心务农。同时，罗马帝国也作出承诺，在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之前，会提供足够的粮食。

以上的条件与瓦伦斯先帝和哥特人缔结的条约内容一致，接下来是不同之处：

首先，哥特人的居住地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拉丁语称之为foedus，意为“同盟”。这些同盟部落在居住区内拥有完全的自治权。

由于只是同盟，并非帝国的子民，因此这些哥特人不必像其他居民那样，承担纳税的义务。但是如果从军，可以获得与其他士兵同等的俸禄。

罗马皇帝与哥特人签署的这份协定，无论是在短时期内还是长期，都给帝国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短时期来讲，由于哥特人大量入伍，加速了罗马军蛮族化即日耳曼化的进程。在此之前，蛮族人加入罗马军，意味着彻底与其部落断绝关系。而从今以后，他们既可以保留部落一员的身份，同时又可以作为罗马士兵，享受军人才拥有的多种待遇。如此丰厚的条件，难怪哥特人会蜂拥而至地进入军队。

然而，这种状况对罗马皇帝而言，是喜忧参半。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的确是件好事，但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则是忧心忡忡。

哥特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在罗马人眼里，日耳曼民族是未开化的蛮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差别，不仅仅是前者身着布衣、住石头建造的房子，而后者披毛戴角、住木屋那么单纯。就算穿上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子，但在希腊人的定义里，不会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就是“蛮族”（希腊语：barbaros，拉丁语：barbarus）。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衡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标准，不是会不会说拉丁语，而是看是否能接受多民族共存共荣所必需的规则，即接受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换句话说，如果与邻人发生冲突，是依据法律还是凭借武力来解决问题。若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文明人靠辛勤劳作为生，而野蛮人则是强取掠夺。

现在，哥特人也穿上了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不过，按上述标准衡量的话，他们仍然是蛮族。哥特人的文明化历史尚浅，因此，如果同时有务农和从军两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从手持武器这个行为上来看，掠夺和从军的确有相似之处。

正因为如此，留在那些皇帝特别赐予的土地上的，全都是没有资格服兵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罗马方面原本希望通过哥特人的迁入，让国界线多瑙河附近地区荒芜已久的农耕地，重新恢复生产力，如今这希望成了泡影。

除此之外，农地有所收获，这些境内的哥特人的经济就可以独立，罗马也就无须再向他们提供援助。现在看来，罗马人的这个如意算盘也落了空。罗马当初承诺的粮食保障时间，是到农作物收获为止，结果却变成了年年都得援助的情形。罗马提供粮食援助的时间究竟维持了多久，由于缺乏详细的史料，没有精确的结论，只能依靠推理。从以后频频出现在协定书中的“保证会根据情况，提供相应的数量”的字眼推断，经济援助恐怕是变成了恒久性的。若真如此，那罗马帝国不仅是允许日

耳曼人迁入罗马境内，而且还负担了他们生活所需的费用。由于这种状况的持续，哥特人迁居给罗马带来的原本属于短时期的影响，就变成了长期的影响。

说到长期影响，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而且它不是靠金钱就能解决的。

罗马在元首制时代，就很积极地去建立与蛮族的友好关系，而且将它定为帝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因此，上述的经济援助并非史无前例。然而，这种友好的态度，仅限于“防线”以外的蛮族人，并不是同意他们集体移民至“防线”以内。这好比是同围墙隔壁的邻居交好，但不会把邻人带回家里来住。何况，就算把邻人领进自家围墙内，墙外也不会就此变得冷冷清清，紧接着会有新的邻居搬迁而来，而且这墙内墙外的邻人都是日耳曼人。这种现象，后世的学者称为“和平下的蛮族化”，不过，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大概会发出“多瑙河不再是国界线”的唏嘘。事实上，已经久未提及的“防线”（limes）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个时期之后彻底消失的。

那么，蛮族移民政策是否给帝国境内其他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安定呢？回答是完全没有。虽然哥特人的袭击暂时告一段落，但多瑙河以北仍然居住着大批的日耳曼人，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侵略行径。边境附近居民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不管怎么辛苦劳作，收获的成果总是被蛮族人抢走，父母兄弟乃至帮工的奴隶还是不断地遭到绑架。

另一方面，无论换成哪一位皇帝，国家支出始终不减。当年尤里安皇帝实施的“裁员”政策犹如昙花一现，军事与行政这两大国家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情况完全又回到了前文所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时代。

在蛮族入侵和国家重税的双重压迫之下，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之身，选择做一个被保护者，从农民变为农奴。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农业是古代的基础产业，农民形成了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不管是格拉古（Gracchus）兄弟，还是尤里乌斯·恺撒，都会如此地重视《农地法》。《农地法》的被重视，意味着农民的权益受到保护，罗马社会健全的状态得以维持。一个没有形成中产阶层的人类社会，不但不健全，而且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然而，当下的罗马社会，agricultor即“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colonus，即“耕种他人土地的人”。他们既不算农民，也不是奴隶，是农奴。这个翻译真是绝妙。以前从事耕作的是奴隶，现在大多变成了自由民。他们从事的工作内容、法律上的地位一如奴隶。地主在出售农地时通常都会附带农奴一起变卖。

提笔至此，我渐渐地发现，罗马帝国灭亡，或者说罗马帝国崩溃等表现方式似乎并不贴切。如果要说灭亡或者崩溃，那么在此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罗马帝国存在。如果没有存在过，也就没有什么灭亡或者崩溃一说了。不过，我也不能接受分化、解体之类的表现方式。因为整体分解成个别物体之后，变小的只是规模，本质是应该不变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用溶解来形容呢？罗马帝国溶解了。

我认为，至少在宗教方面，“溶解”一词是妥当的。因为罗马人不是输给了基督徒，而是变成了基督徒。

不知是因为敌视罗马的波斯国王离世，还是引入蛮族移民措施有了效果，罗马帝国东西部人民都能维持着小康的生活。或许是政局比较稳定的缘故，格拉提安皇帝重新恢复了曾经因尤里安皇帝而一度中止的亲基督教、反异教的宗教路线。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是一位形式上的基督徒，而他则完全不同。紧随其后的是分管帝国东部的另一位皇帝狄奥多西。这两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受一位人物的影响，这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亲基督教路线的恢复

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演出季节的开幕式，定在每年的12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米兰的守护神——圣安布罗吉奥的纪念日。安布罗吉奥（Ambrogio）是意大利语的叫法，在原文拉丁语中称安布罗西乌斯。

意大利语里有一句常用语："Uono di tutte le stagioni."按照字面翻译是："适合任何季节的男子。"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可以在任何时代和环境下生存，并且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每当我听到"安布罗西乌斯"这个名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这句话。

安布罗西乌斯的全名叫什么，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罗马人的名字由个人名（praenomen）、家门名（nomen）、家族名（cognomen）三个部分组成，虽然他是一个出生在罗马的罗马公民，但被基督教教会奉为圣人之后，只称呼其家族名。因此，历史上称他为圣安布罗西乌斯。他出生于公元330年，与尤里安皇帝属于同一时代。

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罗马名门，祖上代代都是元老院议员。他的父亲曾经历任各地方长官，之后晋升为"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一生都是帝国的高级官僚。

在元首制时代，首都长官的地位类似于警察局局长，到了帝国后期，由于皇帝经常不在首都，其职责逐渐转向皇帝的代理，这就是说，在首都罗马处于最高权威和权力的地位。作为首都长官长子的安布罗西乌斯，在接受了名门之后所必需的教养科目（拉丁语：artes liberals，英语：liberal arts）的教育之后，很自然地走上了与父亲同样的仕途。

在他43岁那年，命运发生了转变。这一年，他担任意大利西北部的利古里亚（Liguria）和埃米利亚（Emilia）两行省的长官，米兰属于他的管辖区。在那里，阿里乌斯派与其敌对的三位一体派，爆发了武装冲

突。这样的冲突在当时并非罕见，不过，长年在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压制之下遭受冷遇的三位一体派，乘主教去世之际借机泄愤，发起了激烈的反击，整个米兰的中心部陷入一片混乱。

安布罗西乌斯地位犹如州长，解决动乱是其职责所在。他按规矩办事，解决了问题，却不料受到了三位一体派的青睐。信徒们一致认为，唯有这个头脑清晰、擅长言辞，又有执行力的人，才能保护他们的权益。为了不让阿里乌斯派横刀夺爱，三位一体派迅速召开了信徒大会，在众人的掌声中，“州长”被推选为主教。

安布罗西乌斯对此深感惊讶。最初他以不是基督徒为由，婉言谢绝了主教的职位，基督教教会是禁止俗人担任主教的。不过，三位一体派并没有轻易放弃，如果再让阿里乌斯派的人担任主教，他们将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表示，只要立即接受洗礼，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当时的安布罗西乌斯40多岁，对古罗马的男人来说，正处于黄金时期。他对自己受到基督徒拥戴的真实感受，我们完全不知。比他晚一代的圣奥古斯丁曾经写下他在壮年时期改宗的动机，但这位圣安布罗西乌斯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奥古斯丁被称为教会之父，是解释教义的第一权威。以现代语言来说，属于学者型的宗教家。而给奥古斯丁带来深远影响的安布罗西乌斯，或许应该称为政治型的宗教家。因为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思想的人，大多情况下是不会吐露心声的。

那时，力图阻止基督教势力扩大的尤里安皇帝已经去世10年，基督教的普及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何况安布罗西乌斯所在的高级官僚圈子中，由于皇帝倾心于基督教，做基督徒确实有助于仕途。不过，尽管异教徒再次处于社会劣势的状态，但安布罗西乌斯一直到42岁之前，都没有改变信仰。可是，当他得到主教的职位之后，立即成了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何不能如实地坦白改宗的动机。

总而言之，安布罗西乌斯最终答应了三位一体派信徒们的要求。根

据教会的规定，在成为主教之前，必须积累一些基层的经验，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安布罗西乌斯接受洗礼之后，从副祭司开始做起，以飞快的速度通过了各个阶段，一口气登上了主教的位置，据说整个过程前后时间不到一周。公元374年12月7日，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的仪式在米兰举行。意大利虽属南国，但北方城市米兰此时依然寒风凛冽。斯卡拉歌剧院演出季节的开幕式，定在12月7日的由来，正是为了庆祝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

成为主教后的安布罗西乌斯，拥有了呼风唤雨的影响力。不过，他认为，在使用影响力之前，自己必须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罗马名门，又曾经担任过至少20年的高级官僚，祖上的财产加上20年的薪酬，他应该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社会名流。根据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颁布的法令，神职人员有权拥有私人财产，但安布罗西乌斯担任主教之后，立即宣布，将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教会。

据说，当时最富有的教区是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为了在这个异教徒的首都振兴基督教，用足了心思。除了兴建圣彼得大教堂等诸多教堂送给教会之外，他还捐赠了农田、其他不动产以及服务人员，作为教区各种活动的经济来源。人一旦有了钱，就会想花钱。在这一点上，凡夫俗子与神职人员没有什么差异。事实上，罗马主教以奢侈生活而闻名。有一次，罗马当时最有钱的富豪对罗马主教说："如果能让我当罗马的主教，明天我就改信基督教。"

而就在距离罗马不远的米兰，新任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把所有的私产都捐给了教会，没留下一分一毫。他的这个举动，让米兰的基督徒不分阿里乌斯派和三位一体派，全体都站在了他的一边。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何米兰的主教可以对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这个疑问实属正常。因为论信徒的人数，当属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论财力，帝国西部的首都罗马居首。无论在信徒的人数还是经济实力上，米兰教区

都排在这些城市之后。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米兰教区的主教比那些大教区的主教，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

埃及在历史上属于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由皇帝的代理人负责治理，因此罗马皇帝几乎没有前往首都亚历山大的必要。此外，亚历山大教区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ius）始终主张三位一体，该派在当地势力强大，这让倾向于阿里乌斯派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和瓦伦斯皇帝根本不想到那里去。

叙利亚的安条克，罗马皇帝不会在此停留，除了与波斯关系恶化的时期。因为一旦与波斯开战，这里会成为后方基地。

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东部的首都，当然是皇帝的大本营。不过，帝国东部所管辖的地域，还包括了多瑙河以南广大的巴尔干地区。这一带是直接遭受北方蛮族侵略最严重的地区。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首要任务是保卫国民的安全，必须经常奔赴前线，没有闲暇留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享清福。

至于首都罗马，其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早已有名无实。长期以来，只有举行凯旋仪式时，才能在这里见到皇帝的身影，而罗马军长期以来与胜利也失去了缘分。

话说回来，即使以上这些城市皇帝少有光顾，也不意味着米兰就是他们的常住地。帝国西部的皇帝在高卢特里尔的时间较长，而帝国东部的皇帝更多时候会留在希尔米乌姆。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生前住在米兰的时间的确比较久。不过，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位忠实继承了父皇亲基督教路线的大帝之子，曾经受到过米兰主教的影响。当然，那时的米兰主教还不是安布罗西乌斯。

这就是说，米兰教区并不存在与皇帝保持亲密关系的绝对性，而是安布罗西乌斯个人拥有这个绝对的条件。

我们来观察一下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后的帝国动态。

公元374年：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

公元375年：瓦伦提尼安皇帝猝死。同年，瓦伦提尼安之子格拉提安继位，出任帝国西部的皇帝。帝国东部继续由瓦伦斯皇帝统治。

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罗马军惨败在哥特人手下，瓦伦斯皇帝战死。

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代替战死的瓦伦斯皇帝，担任帝国东部的皇帝。帝国西部仍然由格拉提安统治。格拉提安同父异母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虽然是意大利地区的皇帝，但因年纪尚幼，实际由其生母贾斯蒂娜摄政。这位前皇妃除了是阿里乌斯派狂热的信徒之外，别无所长，因此，年幼的皇帝并不具备政治上的意义。

因此，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而言，关键人物只有两位——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这两位皇帝排挤异教徒的态度趋向明朗化，是从公元380年开始的。以这一年为基准，主要政治人物的年龄分别是：

格拉提安皇帝：21岁。

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9岁。

狄奥多西皇帝：32岁。

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50岁。

此外，还需要附加以下的条件：

格拉提安皇帝：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帝，是罗马化蛮族的第三代，生长在罗马皇帝理当皈依基督教的时代。在当时，通常成人后才接受洗礼，因此不清楚他是否受过洗礼。他在年幼时就对基督教怀有好感，成为皇帝之后，更倾向于三位一体派。据说这也是因为三位一体派的安布罗西乌斯的影响。

狄奥多西皇帝：这一位原本并非基督徒，他登基后的第一年，在与蛮族作战时，可能是辛劳过度，入冬后得了重病。他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过冬时，塞萨洛尼基的主教前来探望，就在他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主教紧握着他的手，为他施了洗。

我本人是一个不会被什么真神的教诲所打动的顽固的无神论者。即便是被威胁说死后会下地狱，也不为所动，因为没有人见过地狱，又何以证明它的存在。不过，这对古代人来说，可能行不通。希腊人相信有一个阴暗冷寂的冥府存在，罗马人则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被两位天使抬着，升向天堂。对于习惯于这种思维的古人而言，下地狱受难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正因为以前没听说过，才会更有恐惧感。尽管在战场上狄奥多西是一位勇敢的总司令，但他毕竟还不到33岁，也许是死后下地狱的不安和恐惧，让他接受了主教巧妙的宣导。

总之，狄奥多西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即成了上帝的“羔羊”。他必须听从主教这个“牧羊人”的引导，因为上帝赋予主教向信徒传达他的指示的资格。

此外，皇帝与主教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信徒。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皇帝的权威和权力，并非人类赋予，而是上帝所赐。而传达天意的资格，又掌握在主教的手中。换言之，只要主教愿意，可以以上帝的名义更换皇帝。如果想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就得像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那样，临终前才接受洗礼。

可是，狄奥多西在33岁之前，就接受了洗礼。不知真是上帝保佑，

还是因为年轻体质好，他的身体没过多久就痊愈了。第二年又精神抖擞地投入治国大业的狄奥多西，深信这是因为受洗而蒙受了上帝的恩宠。

虽说形势良好，有利于安布罗西乌斯同帝国两位最高权力者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但如果他只是坐享其成，就不会对两位皇帝产生太大的影响。安布罗西乌斯曾经担任高级官僚20年，他非常清楚，应该从哪里下手才能深深地影响权力者，那就是找出权力者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有着其他主教无法比拟的高超技艺。

在那个年代，即使贵为主教，也有不少人出身贫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教养。在这些人中间，安布罗西乌斯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他不是凭借容貌，而是靠着良好的教养、清晰的头脑以及使用精妙的语言说服众人的能力。那个时代的皇帝们，除了尤里安之外，全都是不靠书记官连一篇文章都写不了的人物。

这样的皇帝需要优秀的外交官。不管是向其他皇帝派遣使节，还是与反叛的军团长交涉，或者是和蛮族人的首领谈判，都需要优秀的人才，能让对方折服，从心底发出“不愧是罗马皇帝的特使”的感叹。而安布罗西乌斯在世俗之人的眼中，是立场中立的神职人员，再加上他20年的官僚经验，无论是作为使节出访，还是书面交涉，对他而言，不过是以前工作的延续，驾轻就熟。因此，他首先以担任外交使节的方式，向皇帝卖了个人情。

除此之外，统治者经常会面临定夺决断的情况。在决策前，最好能有一位既能给出意见，但又不是家臣的人物。作为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立场脱离了世俗上的利害关系，是最适合的顾问人选。这项顾问工作，他同样做得得心应手。

从特里尔沿着摩泽尔河顺流而下，就可到达莱茵河。因此，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莱茵河防线的后方基地。安布罗西乌斯有时候会去特里尔，拜访在那里的格拉提安皇帝，有时候又会前往希尔米乌姆，晋见狄

奥多西皇帝。如果两位皇帝中的一位去米兰，安布罗西乌斯一定会亲自迎接大驾。只要皇帝开口，他会毫不迟疑地接下外交使节的任务。这就是两位皇帝与米兰主教之间的关系。不过，安布罗西乌斯与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之间，没有形成如此紧密的关系。因为少年皇帝被信仰阿里乌斯派的母亲所操控，对于一心想排除阿里乌斯派的安布罗西乌斯而言，见面也是白费工夫。

“异教”和“异端”

公元380年到395年的15年，是基督教获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拉开这场胜利序幕的，就是被安布罗西乌斯操纵的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皇帝，向“异教”和“异端”同时全面宣战。

有关“异教”，想来无须再作说明，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宗教。希腊罗马的传统宗教、诞生于叙利亚的太阳神以及同样起源于叙利亚的密特拉神（Mithras）、来自埃及的诸神、迦太基的塔尼特（Tanit）女神等，毫无疑问,都属于“异教”。除了这些多神教之外，一神教的犹太教，在基督教眼中也属“异教”。

而“异端”则是指除了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以外的基督教内部的其他宗派。一神教的教义（Dogma）就是神的旨意。然而，有多少人解释教义，就会出现多少种教派。聚集主教召开大公会议，目的就在于统一对教义的解释。然而，大公会议的决定并不能消除纷争，因为这不仅是信仰的问题，还涉及对教区支配权这种世俗权力的争斗。

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宗派数量众多，仅目前了解的就超过10个派系。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属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斯派。

三位一体派从这个时期开始，改称天主教。它主张圣父及其儿子耶稣同质，再加上圣灵，合为三位一体。在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

议上，君士坦丁大帝将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

另一派的阿里乌斯派，由阿里乌斯主教所提出，认为耶稣接近于神的存在，但不是一个完全的神。在尼西亚公会议上，阿里乌斯教派一败涂地，阿里乌斯及其同志遭到流放，但教派的势力并没有从此衰退，因为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以及瓦伦斯等统治帝国东部的皇帝，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

但之后在帝国西部崭露头角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属于三位一体派，而且当朝的两位皇帝——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都深受他的影响。对这三位而言，首先要除去的“异端”，非阿里乌斯派莫属。

我个人认为，安布罗西乌斯加入三位一体派，并非出于他本人对教义的理解，认定三位一体说正确，阿里乌斯教派是谬论。这位原本是高级官僚的主教，试图以“牧羊人”的身份，引导帝国走向基督教国教化。要达到目的，必须壮大基督教教会的势力，而强化教会的关键就是内部的统一。他的这个想法，与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的态度相似。安布罗西乌斯选择三位一体教派，恐怕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而是以政治家的角度作出的决定。从此人一贯的言行来看，无论怎么分析，都找不到任何对宗教的狂热性。

基于上述原因，在阿里乌斯教派占上风、当朝皇帝狄奥多西却是天主教徒的帝国东部，爆发了排除异端的行动。事件的导火线是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阿里乌斯派独占了半个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席位。

首先，狄奥多西皇帝逼迫这位阿里乌斯派的主教，改宗信仰三位一体。拒绝改宗的主教遭到流放。

可是，虽然如愿地赶走了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却找不到三位一体派的人来接替位置。帝国东部传统上一直属于阿里乌斯派的阵营，三位一体派的信徒甚少，要找到一位适合担任帝国东部首都的主教人选，并非

易事。结果一位元老院议员被选中，他匆忙接受洗礼后，像安布罗西乌斯一样，从教会金字塔的底部迅速登上顶端，坐上了主教的位子。

君士坦丁堡主教易主，意味着天主教在阿里乌斯派长期占有优势的帝国东部，重重地打下一根桩子。这也使得帝国东部不得不颠倒行动顺序，先排除“异端”，再对付“异教”。

排斥“异端”

狄奥多西皇帝视“异端”为破坏基督教教会团结的罪魁祸首。从公元380年到395年的15年间，仅是针对排除“异端”，就颁布了15道法令。根据研究人员的讲法，实际颁布的法令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见，他铲除“异端”的意志有多么坚定。

首先，他要求“异端”者改宗，当然是要求他们改信正统的天主教。但他面对的，是一批对自己的信仰确信无疑的信徒，很少有人屈服于强权而改变信仰。狄奥多西皇帝不得不连发几道敕令，严厉惩罚违反者。

敕令中严令禁止的“罪状”，有以下几条：

传播异端教诲。

聆听异端教诲。

聚众聆听异端教诲。

向聆听异端教诲的信徒提供场地。

得知异端者聚会，却知情不报（司法相关人员）。

除以上几条之外，无论是“异端”还是“异教”，场合不分公开或私

下，所有相关的弥撒或祭拜活动，一律禁止。违反者将没收所有的财产，上缴国库。敕令公布之后，在实际中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违法者不仅财产充公，而且还会遭到流放。不过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的处罚形式有所不同。

对神职人员，主要是剥夺其免税等优惠待遇，以及流放远疆。针对一般的信徒，以罚金为主。一个人犯规一次，必须缴纳10罗马磅的黄金。但如果屡次违法，无论神职人员还是一般信徒，都会被处以死刑。随着法令的出台以及实施，渐渐地出现了基督徒遭受同门迫害甚至产生殉教的现象。

仅以上这些现象，就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中世纪，而实际情况更为严重。

敕令规定：不服法规者，禁止与他人交往。用日语来形容，就是断六亲。之后在中世纪横行猖獗的“破门令”，正是源自这条敕令。

另外一项，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搜寻、告发和审判异端者。这个叫“圣公所”的机构，就是在中世纪兴风作浪的异端审判和女巫审判的前身。与中世纪唯一不同的，就是当时的法官还不是神职人员。

这就是在狄奥多西统治下的帝国东部对“异端”打压和迫害的事实真相。阿里乌斯教派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彻底丧失了支配教会的势力。

另一方面，在格拉提安统治的帝国西部，基督教的渗透速度原本就比较缓慢，势力相对于东部较弱。在教会内部，各宗派围绕教义的抗争，始终是三位一体派处于优势。因此，帝国西部打压异己的行动，矛头直指“异教”。

这一切是从格拉提安拒绝出任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开始

的。

排斥“异教”

罗马人以及人民共同体罗马的三大守护神分别是：最高神朱庇特、朱庇特之妻朱诺和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在主持罗马国家宗教活动的大祭司、祭司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大祭司。这个官职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罗马建国时期。进入共和时期之后，唯有经历过所有其他公职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个唯一的终身职务。共和时期的官职是复数制。即便是执政官也必须由两人担任。唯有大祭司是一个人担任的特殊职务，而且通常都是由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老人担任。当年，刚满37岁的尤里乌斯·恺撒竞选此职并且当选时，元老院上下一片惊讶。大家惊讶，说明没有发现其中的特别之处。恺撒之所以要做大祭司，是他看到了它是唯一的终身职位，没有同僚，同时又站在管理罗马公民宗教意识的立场，非常有利于他在政治上的推进。

格拉提安

恺撒的政治谋略，不折不扣地被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继承。从他开始，罗马皇帝兼任大祭司成了传统。就连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被教会尊奉为“大帝”的君士坦丁，在担任一国之君的同时也兼任大祭司。不仅如此，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等亲基督教的皇帝们，无一例外，都出任这个负责拜祭异教神的最高长官。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那些亲教会的皇帝，至少在公开场合，还遵照“米兰敕令”的原则，承认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格拉提安皇帝拒绝出任大祭司的决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首先，在信奉多神教的古代世界，个人的信仰与个体组成的国家信仰是同时存在的。换言之，在古代没有不信仰神灵的个人，也不存在没有国家宗教的国家。

作为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拒绝出任掌管国家宗教的大祭司，意味着这个宗教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宗教。同时，也代表皇帝要用其他宗教取而代之的决心。皇帝的这一举动，推动社会向否定信仰自由的时代迈出了明确且关键性的一步。

虽然那时的格拉提安皇帝尚未发表宣言，将主张三位一体的天主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他只是用行动向世间表明，罗马传统的宗教不再是国教。不过，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基督教成为国教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紧接着，格拉提安皇帝废除了自罗马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女祭司制度。从此之后，维持女祭司体系所需的经费，不再从国库中支出。这些将处子之身奉献给天神、备受人民尊重的女祭司，除了消失别无他选。与她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另外一件东西，那就是在古罗马广场中央一座圆形的小神殿中燃烧的“圣火”。它在经历了1 135年的岁月之后，终于熄灭。

格拉提安皇帝针对“异教”的宣战，没有就此收手。他又没收了“异教”神殿的经济来源。罗马的传统宗教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大祭司、祭司都是由市民兼职，因此，它不像拥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的基督教教会那样，需要庞大的经费。传统宗教的基本经济来源，主要是一些果园和葡萄园，就连这些不起眼的财产，也统统遭到没收。

形势发展至此，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显而易见。所有的神殿，不管祭

拜的是哪一方天神，一律关闭，就连街头巷尾的寺庙也无一幸免。那时，举办祭祀仪式将被处以死刑的对象，还仅限于官方，即国家、地方自治体以及各行业工会等，尚未涉及私人，也就是说，允许个人在家中举办祭祀，不过，这个许可也没能维持多久。

格拉提安皇帝以排除“异教”为目的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最后一项，是拆除胜利女神像。自共和时代开始，女神像就放置在元老院议事厅的正前方。当初，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就想撤了这尊雕像，结果没有行动，就这样又过了30年。

根据史料的描述，女神站在圆形的地球上，伸展双翅，左手拿笏，右手握着长枪。每当元老院举行会议时，议员们先在这座象征罗马胜利的女神像前面，焚香祈祷，祭拜之后，才正式开始会议。这项保持了至少500年的传统，如今要遭格拉提安皇帝的废除。元老院议员上书请愿，请求皇帝撤销这个命令，可信并没有传到皇帝的手中。

公元383年，驻守不列颠的军团司令官马克西穆斯（Maximus）举兵造反，那时正好在巴黎的格拉提安皇帝逃跑时，遭遇叛军围攻，被杀身亡，年仅24岁。

帝国西部的皇位，因格拉提安的死亡出现空缺，而有资格的继承人瓦伦提尼安二世只有12岁，帝国东西两部，事实上变成了由36岁的狄奥多西一个人统治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帝国不分东西，全境都如安布罗西乌斯所愿，继续向基督教国教化的目标迈进。

公元383年，西部皇帝格拉提安被杀时，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36岁。12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皇位，成了形式上的西部皇帝。这位少年皇帝一向软弱无能，最终被人赶出了意大利。他向东逃跑，打算向狄奥多西求救，在抵达希腊的塞萨洛尼基时，却因为一点小事，结果被家臣杀害。据传，与家臣激烈地争吵之后，皇帝进入卧室就寝。第二天早晨，他被发现时已经是冰冷的尸体。瓦伦提尼安二世死于公元392年，

年仅21岁。这位4岁就坐上皇位的儿皇帝，一直在其母贾斯蒂娜的操控之下。而阿里乌斯派的狂热信徒贾斯蒂娜，也因阿里乌斯派遭到打压和迫害，在几年前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人世。

不少研究者认为，狄奥多西一人统管帝国全境的时期，应该从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杀的公元392年开始，到他去世的395年，总共3年时间。

而我则认为，应该是从格拉提安被杀的公元383年到公元395年的12年。在不列颠发动叛乱并杀死了格拉提安皇帝的马克西穆斯将军及其手下势力，要到5年后，即公元388年才被歼灭，马克西穆斯被杀，叛乱事件正式告一段落。而当时率领军队去镇压叛军的，是狄奥多西，而不是瓦伦提尼安二世。

狄奥多西尊重遇害的格拉提安的意志，没有夺取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皇位，一直到公元392年，这位傀儡皇帝被杀之后，他才收获了西部皇帝的位子。话说回来，在这9年里，罗马帝国实际上掌握在狄奥多西一个人的手里。这也意味着，格拉提安皇帝生前实施的基督教国教化的政策，并没有因他的死亡而中断，在狄奥多西的统治之下，继续贯彻落实。前文所提到的拆除元老院议会厅前的胜利女神像，就是一个例子。围绕这个问题，公元4世纪末期，罗马帝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位知识精英，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其中一位站在异教徒的立场，而另一位则站在基督教一边。

论战

昆图斯·奥勒里乌斯·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公元340年出身于首都罗马。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公职经历，与比他年长10岁的安布罗西乌斯极其相似。不过，我们知道他的全名，即个人名加家门名和家族名，这说明他与安布罗西乌斯不同，在任职期间没有被基督

教教会“挖角”，变成基督徒。

他们两人有一点不同，安布罗西乌斯是在他担任高官的父亲的赴任地特里尔出生的。而西马库斯虽然出生在首都罗马，父亲却是高卢出身的高级官僚，用罗马人的说法，属于“高卢裔罗马人”。

不过，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歧视之意。被同代人称为“黄金世纪”（Saeculum Auureum）、被后世称做“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的5位皇帝当中，有4人出身于行省。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是“西班牙裔罗马人”，安敦尼·庇护则是“高卢裔罗马人”。所以，在罗马帝国，行省出身并不算什么大的缺陷。

与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首都的父亲一样，西马库斯的父亲最后也成了“首都长官”，这个位子在当时是高级官僚中的最高阶位。由于皇帝不常在首都，“首都长官”就成了皇帝的“代理人”，也就是说，西马库斯和安布罗西乌斯都是皇帝“代理人”（vicarius）的儿子。

当然，西马库斯也接受了被后世称为“教养科目”的全套教育，之后走上公职之路。这是出身于统治阶层的年轻人的必由之路。因为是良家子弟回馈社会，不取俸禄，所以，在共和时期以及元首制时期，都被称做“光荣职务”（cursus honorum）。到了帝国后期，整个情况有所改变，以下是4世纪时，“光荣职务”的一个过程：

首先，在20多岁时，从财务检察官（quaestor）开始，期满后进入元老院，成为元老院议员（senator），之后竞选法务官（praetor），当选后去地方上工作。在经历了意大利半岛内的总督（governatore）职务之后，升任执政官（consul）。尽管执政官这个位子如今已有名无实，不过，帝国的各个行省是由总督（proconsul）统治的，而担任总督需要有当过执政官的经验，即获得“前执政官”的身份。经历了以上这一系列的公职之后，最后攀升至官僚阶位的最高峰——首都长官。

安布罗西乌斯就是在意大利半岛内担任州长时，被基督教教会看中，“光荣职务”生涯因此中断。而没有被基督教看上的西马库斯，在他44岁时抵达了“光荣职务”生涯的终点站，就任“首都长官”。不过，他还在20多岁担任财务检察官、尚未有资格进入元老院时，就被皇帝看中了。如果只对比“光荣职务”，西马库斯的起步要比安布罗西乌斯来得光鲜亮丽。

被皇帝选中的西马库斯所担任的官职，拉丁语称为“comes tertii ordinis”。“comes”，原意是皇帝的友人，不过那时已经是一个类似“内阁幕僚”机构的代名词，所以他的职位大概相当于“内阁幕僚直属秘书”。尽管阶位不高，但随时能见到皇帝，皇帝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当年提拔年轻的西马库斯的，是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将帝国东部交给弟弟瓦伦斯，自己负责动乱的西部，10年的在位时间，都是在与蛮族作战中度过。西马库斯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在位最后的6年担任秘书的，因此，他经历过与蛮族对决的战争场面。不过，那时文官与武官职务分离的制度，已经实施了80年，即便是上战场，他也是以文官的身份，因此没有率军打仗的经验。尽管如此，西马库斯还是和从来没有见过战场的安布罗西乌斯不同，他在很年轻时，就目睹了总称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起兵获胜、失败投降，乃至于愿意与罗马人和平共生的光景。

西马库斯与皇帝如影相伴的生活，最终也是由瓦伦提尼安一世给画上了句号。公元373年，33岁的西马库斯被任命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赴任。当时的北非，正处于沙漠游民侵袭和居民叛乱的困难时期。军事上的问题，需要被派来的狄奥多西的父亲去解决，而民政则是担任总督的西马库斯负责。

西马库斯在北非没多久，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猝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轻有为的他在卸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之后，再也没受到重用。目前唯一清楚的，是他之后担任了卢卡尼亚·布鲁蒂姆（Lucania

Bruttium）州的州长，这个地区位于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的鞋尖。除此之外，他还担当过“祭司长”（Pontifice Maiore）的宗教职务。格拉提安皇帝拒绝出任大祭司，导致祭司们的威信扫地。而西马库斯不仅没有扔掉异教徒这件日渐破旧的外衣，而且堂堂正正地把它穿在了身上。难怪他会被后人称为“罗马古老异教最后的荣耀之火”。

公元384年，44岁的西马库斯被任命为首都长官。由于委任者是皇帝，相信狄奥多西只打算让西马库斯做一个自己的“代理人”而已。不过，首都长官同时也是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他必须顺应民意，实施政务。从西马库斯上任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是努力去做一个行政官，而不是“代理人”。

首都长官西马库斯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论战，并不是两人同时站在狄奥多西皇帝的面前，唇枪舌剑地直接辩论，而是西马库斯上书请愿，恳请皇帝将从元老院议事厅拆走的胜利女神像，重新搬回原地。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对此反对，也写信给皇帝。就这样，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安布罗西乌斯在信中，针对西马库斯的陈述内容，一条一条地进行了反驳，可见，他通过某些渠道，事先得知了西马库斯信的内容。

总之，这是一场公元4世纪罗马两位知识精英的论战。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受的教育以及前半生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一位代表即将消失的文明，另一位代表正在蓬勃升起的文明，以言论为武器，开辟战场。我用“战场”而不是用“法庭”来形容，是因为在这次论战中，没有保持中立的裁判官。双方诉诸的对象都是皇帝，而这位皇帝，又与类似检察官角色的安布罗西乌斯关系密切。

对两人的书信，我将省略开头的寒暄部分，全文介绍给大家。虽然内容冗长，但仅作简要介绍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对两人的论点以及修辞技巧，作一个忠实的回顾，才能了解罗马帝国末期思想发展的状况。

以下是首都长官西马库斯上书皇帝的信件内容：

除了对荣光的强烈追求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对我们祖先所创立的法律、以法律为基准的卫国行为有所帮助？只要您不违背我们父辈们所理解的事情，相信荣光将继续与您同在。

我们（罗马元老院）在此向您（皇帝）郑重请求，宗教是祖国长享荣光的重要原因之一，请您务必慎重考虑。

历代所有的皇帝都明确公开自己的宗教之心。从前的皇帝，像他们前任一样，尊敬传统之神。而近年的皇帝，即使没有敬意，也不排斥。如果您不愿承袭过去的传统，那么依照近来的惯例行事，应该不是难事。

不尊重胜利女神所象征的思想之人，如同蛮族。即使您不承认它的神性，也应该体恤我们长年以来对女神之敬意。恳请您归还神像，让其回归原本之地。

皇位安泰之根本，是对敌的胜利。这个事实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看到胜利女神的微笑，相信也是您心中所盼。每一个人都希望胜利女神保佑自己，如果有机会向它祈求，谁都不会拒绝。既然是众人所望，那么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力去妨碍和排斥。坚持拆除胜利女神像，会成为打击众人希望的挑衅之举。女神像作为元老院的象征，历史久远。无论您信奉与否，至少应该对长久以来慰藉我们祖祖辈辈心灵的神像，心存敬意。

我们上书，不仅是请求您撤销拆除神像的命令，也希望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将幼年时父亲教导我们的事情，继续教给我们的孩子。对于期望终生行善者而言，没有比热爱传统更伟大的事情。我们虔诚地祝福您流芳百世，对于您作出的有伤名誉的决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高声疾呼敬请改正。

胜利女神不在的元老院，我们如何发誓忠于国法？以何等权威来震慑伪善之辈？如果人人都私自滥用权威，权威本身将毁于一旦，虚伪的誓言将充斥于世。解救我们脱离这种毫无权威的无政府

状态的，就是胜利女神像。

即使在首都以外的帝国各地，人们也在奉献给这座神像的祭坛前，相互承认各自的存在，个人向国家宣誓效忠，统治者为其政策赋予权威。没有比在祭拜前宣誓，更有助于帝国的完整。

缺少了象征的元老院会场，迟早会变成虚伪与不正的巢穴。集臣民敬意于一身的皇帝势必不愿见此情形。臣民对您的忠诚，要有所本才能有效。

根据传闻，最初考虑撤走神像的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然而，不是所有的前例都需要遵循。君士坦提乌斯创下的业绩中，还有很多可以依循的政策，您不妨斟酌考虑。

例如，他没有取消女祭司享有的特惠。他视祭司为诸多公职中最高贵的职位，予以尊重。对罗马国宗教所需的费用，从不拒绝支付。当他访问首都罗马时，走遍了这永恒之都的每一个角落。出席元老院会议，四处拜访神殿，朗诵神殿正面墙上刻着的天神的名字。当他拜访那些朝拜者络绎不绝的圣殿时，会问其渊源，对建造这些神殿捐赠给民众的先人，赞不绝口。他个人的信仰已经不是秘密。但他仍然决定，为了帝国的民众，有必要留下这些记载帝国荣光的纪念碑。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相应的信仰对象。每个城市也有各自的守护神。正如每个人在出生时就具有独自的精神，各个民族都存在着不同的“神灵”（拉丁语：genius），掌控着民族的命运。而国家宗教，就是统合个人精神和各民族的神灵，引导它们通向至高无上的天神。

人的理性存在极限。除了回顾自己的历史，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弥补理性的不足？要建立未来的繁荣，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顾以往的成就。而这些光荣的过去，都是在我们的祖先敬仰的诸神的庇护之下功成名就的。

现在，所有的罗马人都希望您能深思熟虑，恳求您这位出类拔萃的皇帝、国家之父，尊重古往的历史。

这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奉行古老的仪式，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毫无遗憾和羞耻地走完人生。

罗马自古以来的宗教促进了帝国的统合。我们在信仰的支配下奉献牺牲，让汉尼拔远离罗马的城墙，将高卢人赶出卡匹托尔山（Campidoglio）。我在这样的教诲下长大成人，为何要在鬓白如霜的年纪否认自己的过去？即使这些想法不合时宜，但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如今改宗为时已晚，更不能忍受的是有损自尊心。

我向您乞求，让长年以来成为我们精神食粮的罗马诸神保留原样。我认为，把一尊神作为所有人的精神食粮，不符合自然的人性。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星空之下，受到同一个苍天的庇护，被同一个宇宙包围。生活在此之下的每一个人，即使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有所不同，又能造成多大的问题呢？我以为，光凭一条通道，不能解开如此巨大的生命秘密。

如果在天上的君士坦丁大帝，看到祭司们掉下的眼泪，不知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违背了他曾经的宣言，一切宗教信仰平等的宽容精神受到了侮辱？如果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真的是第一个提出拆除胜利女神像的人，那么他一定是轻信了近臣的谗言，那些人不懂得女神像对元老院之意义。修正轻率的决断，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不会损害先帝之名誉。因为倾听公民的心声，修正以往的政策，是皇帝责任所在，也是我帝国优良的传统。

以上就是被称为“罗马古老异教最后的荣耀之火”的44岁的男人的心声。以后世的眼光来评判，他反对拆除胜利女神像的这番言论，似乎是陈词滥调，与公元4世纪罗马的现状格格不入。当时的罗马与胜利的缘分愈来愈少，而元老院已很久不问国政。让胜利女神一如元首制时代那样，继续站在元老院议事厅前，等着议员们祭拜，然后这些人再去讨论一些毫无实质性的话题，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难道说西马库斯不知道这是时代错误吗？其实他是知道的。但他明知如此，还是做了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情，给皇帝写了信。因为他对拆除女神像的行径，如果置之不理，就等于是在最后一道堤防面临崩溃时袖手旁观。一旦决堤，滚滚的洪水就会汹涌而来，所有的东西都将付诸东流。这是他奋笔疾书的动机。而他的这番心思，被安布罗西乌斯彻底看透。

米兰主教的信是呈给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的。这位高官出身的人，是不会不知道国家的大权实际掌握在谁的手里。因此，这封信名义上写给12岁的傀儡皇帝，实际上是给当时掌权的36岁的狄奥多西皇帝看的。事实上，12岁的皇帝收到信后只字未读，而36岁的皇帝倒是真的看了全文。4年前，狄奥多西接受洗礼，正式成了基督徒。当他听说身为引领教徒的“牧羊人”、传达天意的主教有书信呈上，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当时54岁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写给皇帝的信件，是这样开始的：

> 听闻声名显赫的首都长官阁下，以永远之都的名义向您请愿，哭诉着要坚守古代宗教，我也禁不住提笔。
>
> 首先，我想问他，当年是依靠什么神技，守住了被汉尼拔围攻的罗马城？又是如何将高卢人赶出了卡匹托尔山？
>
> 再者，他列举了所谓的优秀宗教的有效性，却不言及其弱点。倘若真是那些天神与汉尼拔战斗，那么他们怎么会容忍汉尼拔攻打至首都罗马的城下？高卢人放弃卡匹托尔山，不是因为在他们准备进攻时，鹅的鸣叫声让罗马人发现了敌情吗？那时候守护神朱庇特在哪儿？难道说是朱庇特化身为鹅，保护了罗马？
>
>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长年信仰的诸神帮助了罗马军团。可是，汉尼拔也信仰诸神中的一尊天神。这就是说，天神应该平等地保佑罗马和迦太基，为什么最终是罗马获胜，而迦太基失败了？
>
> 另外，他强调的所谓收到民众含泪请愿，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他完全不了解民众的心声。民众常问，为何每逢祭拜日，都要将贵

重的家畜，用在那些毫无效力的牺牲仪式上？

胜利不是藏在那些成为祭品的家畜的内脏中，是战士们奋勇作战赢得的。它靠的不是诸神的保佑，而是坚强的意志。

把攻打卡匹托尔山的高卢人踢下悬崖，拔下他们插在卡匹托尔山上旗帜的，不是献祭仪式，而是当年罗马人的勇气。战胜汉尼拔，同样不是祈求诸神保佑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胆果断地进攻了汉尼拔的故国。

还有，西马库斯的话题为何总是围绕着以往罗马如何的伟大？我可不想和尼禄皇帝信仰同一个神明。

此外，蛮族问题并非一日之寒。那些苦于蛮族入侵的皇帝，难道是他们藐视传统，才因此受苦受难？其中一位瓦勒良皇帝成了敌国波斯的俘虏，另一位皇帝伽列里乌斯让帝国支离破碎。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伫立在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又做了些什么？

我为自己的祖先犯下的过错感到羞耻。但更感羞耻的是不愿改变的心情。从失败中学习教训，永远不晚。然而，勇气有年龄之限制。一旦老化，就再也没有勇气去纠正错误。

他们举办的牺牲仪式，不过是在祭坛上屠宰家畜，喷洒热血。似乎只有牺牲的家畜，才能传达神的声音。

探求世界的秘密，应该交给创造世界的唯一真神，不能依靠对自身都一无所知的人类。

西马库斯说，仅一条通道不足以探索世界的秘密。然而，他所谓的秘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通过神的声音已知晓答案，不再是什么秘密。他们试图寻求的事实真相，我们在神的智慧和真理的赐教下已经明晰。他们异教徒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向皇帝祈求，给予他们的神明以安宁，我们则向基督祈祷，赐福和平于皇帝。这些人有资格谴责抛弃旧习的我们吗？

一日之始，不是立即就能获得阳光的恩惠，等到太阳渐渐升起，光芒灿烂，才备感温暖。四季之初，大地荒芜尚未播种，但只

要我们沉住心神努力耕种，必有丰硕的收获。非难我们基督徒的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不已，破灭的日子即将到来，因为太阳终会驱赶黑暗。

对基督教教会而言，收获是满怀喜悦的希望，是圣人们所讴歌的春天时代的开始。这般喜悦将传遍整个世界。

基督教信仰不能救赎无知的灵魂。相信法律代表真理的那个文明已走向没落，光明属于勇于改过自新的人们。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对安布罗西乌斯的书信不作评判。只是有一个愉快的感觉，当初基督教教会选中这位没有受洗过的高级官僚当领袖，的确是慧眼识人。不过，他这种强硬的论调，也只有在事物刚起步、尚未暴露缺点时，才会有效。

至于这场“论战”的结果，相信不用说大家也清楚。狄奥多西采纳了安布罗西乌斯的意见，胜利女神像再也没有回到元老院。

这尊女神像至今下落不明，想必是在之后席卷整个帝国的破坏神像、雕像的风暴中，与其他物品一起遇难。不过，模仿地球制作的圆形雕像体积巨大，一个成年男子也很难抱起，它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坏的，何况球形的物体非常坚固。说不定这个大圆球被遗弃在什么地方，至今还发挥着意义完全不同的功效。

从大竞技场（Circo Massimo，又译马西莫竞技场）的遗址前往台伯河的途中，会经过柯斯梅丁圣母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in Cosmedin，又译希腊圣母堂）。这座教堂和其他教堂一样是在公元4世纪末，由原来的公共建筑改为教堂的。教堂入口处的前廊墙上，有一个称为“真理之口”的浮雕，据说撒谎的人把手伸进去，会被咬住不放。这个传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排着长队跃跃欲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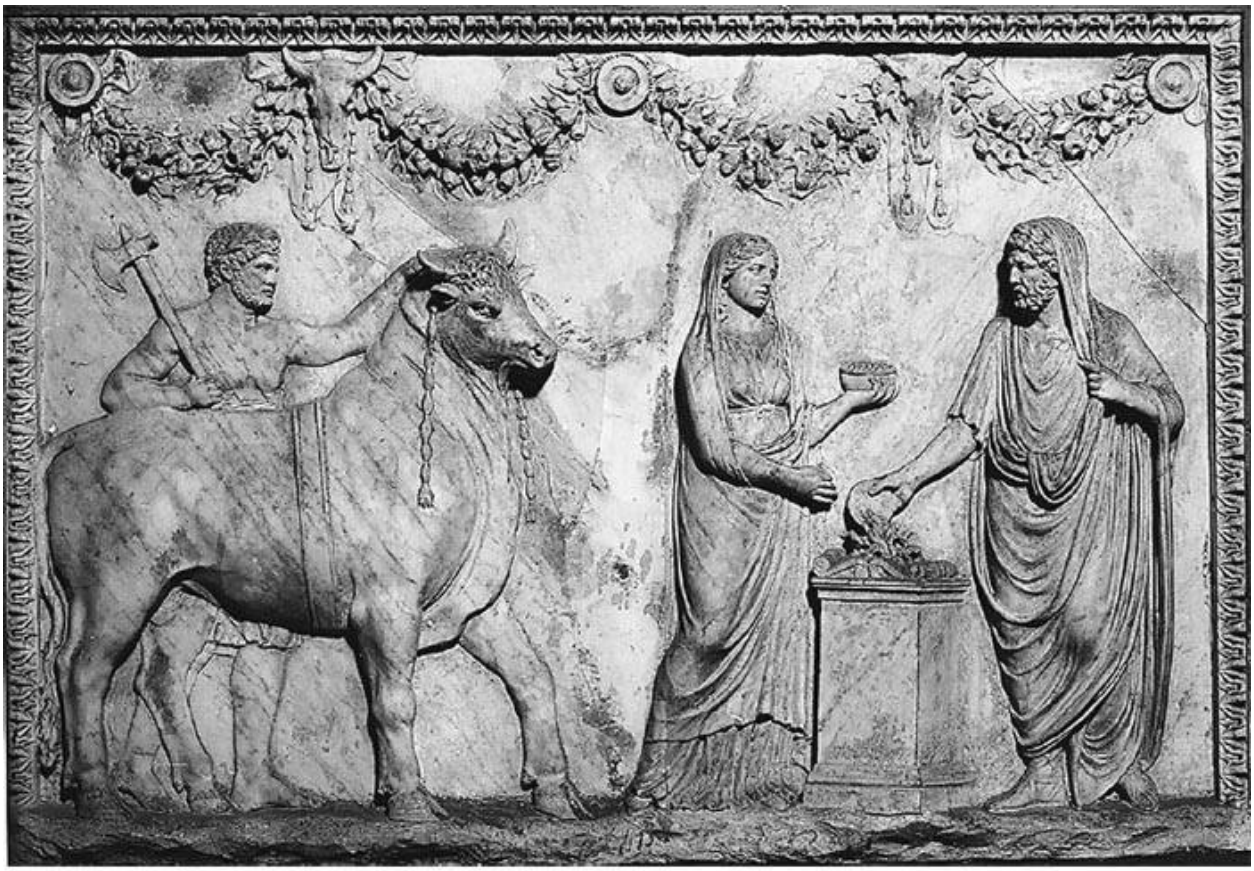
其实，这原本是古罗马时代把积在青石板路面上的雨水引入下水道

的水沟上的盖子，在这个大圆盘上雕刻着河神的头像，而河神的嘴巴在2000年后就变成了“真理之口”。元老院门前胜利女神站着的那个圆球，说不定如今也在哪个广场或教会前，默默无闻地度着漫漫岁月。在现代的罗马寻找古时代的踪影，是一个不错的休闲方式。

基督（对异教）的胜利

接下来的话题要回到公元384年。这一年发生的西马库斯与安布罗西乌斯“论战”的最终结果，果真如西马库斯担忧的那样发生了。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像被拆掉，这意味着异教罗马的最后一道堤防决堤。米兰主教的言论促使狄奥多西皇帝作出了违反君士坦丁大帝“米兰敕令”的决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反异教、反异端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首先，原本被禁止的官方祭典，对象扩大到个人，从此，私人也不得举行祭祀活动。罗马人聚集家族各分支，祭拜家族保护神、共同缅怀祖先的传统活动，在信仰一神教的基督教看来，是崇拜异教的集会。另外，罗马人的家中一定会在面对中庭的一角，搭建一个祭拜家族守护神以及祖先的场所，类似于我们的供台。它也被视为偶像崇拜，强行拆除。如果有人敢于违抗，等待他们的是死刑。后人在庞贝古城遗址中，挖掘出数量庞大的各种小神像，如果火山爆发的时间不是在公元1世纪，而是4世纪，肯定是找不到神像的。



装饰花环的浮雕（献祭的场面）

以排除异教的名义所颁布的各种敕令中，还包括以下禁令：

在祭坛前点灯、焚香。

在墙面装饰鲜花。

向诸神以及先祖们敬酒。

罗马人特别喜欢花饰，他们用树叶和鲜花编织成花环，不是圆形的那种，而是长长地呈带状，色彩斑斓的花环放在白色的大理石或灰色的墙壁上，显得异常耀眼。只要有机会，罗马人就会把花环装饰在各种地方，它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祭坛，但从希腊时代开始，祭拜活动必有花环。

违反了以上这些禁令的人，虽然罪不及死，但会被处以罚金，而且必须用不受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的黄金支付。

当年基督教教会因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而向他奉献了“大帝”的尊称，他们又将此称号献给狄奥多西，因为他是首位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即所谓的“异教”定义为“邪教”的皇帝。“异教”不过是与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宗教，而“邪教”则是不当的、有害的、有违国家制度和道德必须铲除的宗教。

尽管基督教日益盛行，但罗马人仍然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狄奥多西颁布的反异教、反异端的敕令，在半个世纪后被收录进狄奥多西二世编撰的《狄奥多西法典》。由此可见，这些敕令是作为国法制定的。对于法律民族的罗马人而言，“违法”比“邪教”的概念更容易理解。因此，公元4世纪之后，那些曾经频繁出现于文学、美术作品上的希腊或罗马诸神，全体都变成了“不法者”（outlaw）。既然是“不法者”，那么警察就完全有理由抓他们。

祭拜的神明成了不法分子，神殿的命运也就有了定局。根据狄奥多西的敕令，所有的神殿一律变成教堂。围绕内堂的圆柱间的空隙部分，用墙堵上，改造成封闭的空间。由于改造的部分只限于圆柱间的部分，因此原本意为“会堂”的basilica一词，一字不改地变成了教堂的意思。以往开庭审判的basilica，从此就是向上帝祈祷之地。

不过，在神殿改为教堂的事情上产生了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供过于求。

罗马时代的诸神数，在鼎盛时期多达30万尊左右。供奉这些神明的神殿数不胜数，再加上街头巷尾的那些小祠堂，数量更是惊人。

而另一方的基督教，由于信奉的是一神教，而且当时尚未发展到像以后那样全体公民皆是基督徒的程度，所以，神殿改建成教堂之后，却

没有足够的信徒，出现空有建筑不见人影的情况。因此，狄奥多西皇帝同意拆毁那些无用的神殿。既然要打击非法分子，那么破坏他们的住所，就是理所当然了。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神殿内的材料就被允许挪作他用。然而，狄奥多西的这道敕令，为这些事实上的破坏冠上了宗教正义的大名。那些遍及罗马帝国全域、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的神殿，要么彻底消失了踪影，要么就是留下一个破落不堪的遗址。除了用来祭拜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之外，那些埃及、叙利亚的神殿同样也难逃厄运。

能够侥幸保存下来的，是那些变成了基督教堂的神殿。其中，万神殿就是最好的一例。这座雄伟的神殿，堪称是公元2世纪罗马建筑的顶峰之作。因为它是奉献给天地间所有的神灵，所以命名为“万神殿”。公元4世纪末之后，它也化身为献给一位天神的教堂。

神殿的命运如此，神像自然也是落得同样下场。在比公元4世纪末早60年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希腊罗马的各类神像，虽然已经渐渐地不再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但作为艺术品的价值还是得到认可的。

君士坦丁大帝建设了君士坦丁堡，将之打造成基督教的首都。因此在那里只有教堂，没有神殿。然而，大帝在建设这座冠以自己名字的城市时，始终以罗马作为参照，甚至把它叫做“新罗马”。他希望君士坦丁堡能够像充满了神像雕塑的罗马城那样，到处装饰着“古典之美”。根据当时的记录，他在整个帝国的东部搜罗了数以万计的雕像。原本安放在雅典帕特农（Parthenon）神庙中的雅典女神像，据说那时也被搬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女神像由菲狄亚斯（Phidias）制作，堪称希腊雕像的巅峰之作。可见，雕像即使不再是神的像，艺术价值还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但是，到了狄奥多西时代，一切都发生了转变。神像成了当时基督教教会严禁的偶像崇拜的代表、邪教的象征，更是“不法者”的具体形

象。

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禁止公共场合出现裸体，而绝大多数的神像又都是裸体。在希腊人及其继承者罗马人的美学定义中，裸体是人体美的极致，所以，这个至高之美，首先是奉献给诸神。除了神之外，也有裸体的罗马皇帝像，不过这要等他死后才会制作。过世的皇帝被神格化，所以与诸神拥有同等的资格。

基于上述原因，希腊罗马的雕像大多以全裸或半裸的形象出现，大街小巷简直就是裸体的长列，要将它们全数拆除，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削去神像的鼻子，算是比较温和的做法，大多雕像被打断了头颅和手腕，分解了四肢。连这样的作业都嫌麻烦时，人们会直接将雕像从山上往山下的岩石上摔，或从桥上扔进河里，增大销毁的数量和速度。罗马人喜欢到处摆放雕像，只要是两侧竖着圆柱，中间呈拱形的场所，一定会放上雕塑。如果没有雕像，那就说明此地是供人通行的过道，或者拉上薄纱，享受着吹来的西风，乘凉休息。

除神像之外，罗马人重视历史，向来有纪念国家有功之臣的习惯。对于罗马男人而言，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公共场合，是人生最高荣誉。因此，这类雕塑的需求量也不少，不仅首都，在帝国其他主要城市也随处可见。它们属于安布罗西乌斯所谓的“应该纠正的过去”，对于正在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帝国而言，同样是必须排除、销毁的对象。一旦抱有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东西就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了。

罗马依仗着军事武力征服了希腊，将之归为属下的行省。然而，他们从心里赞赏希腊伟大的文化和文明，甚至留下了“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出自贺拉斯。——译者注）之名言。然而，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为止的古典希腊的优秀作品，由于当时希腊的版图及其人口有限，无法满足罗马人的大量

需求。

因此，罗马人除了模仿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利西波斯（Lysippos）等天才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尽量忠实地复制了那些并非出名的希腊艺术品。虽然是复制品，却也不是谁都能制作。想得到最高级的复制品，就得依靠一流的艺术家。尽管进入公元之后，希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逐渐衰退，不过在制作复制品这个领域，希腊人始终独占鳌头。

罗马时代的复制技术极其高超，作品的质量已经超越了模仿的层次。这主要源自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以及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的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宽容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古典希腊作品的真迹出世两千四五百年之后，我们现代人还能够有机会见识与欣赏。即使这些作品标着“罗马时代的仿作”，它们还是有充分的艺术价值，摆放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中，向世人展示。

罗马复制艺术品的技术，据说在哈德良时代达到了最高峰。然而，才过了200年，到了公元4世纪，同样是罗马人，却要将以往花费了大量金钱购买的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扔进河里，破坏殆尽。“宽容”（clementia）一词，词典解释为胸襟开阔，能够接受他人的想法。曾经是罗马人心目中德行之一的“宽容”，如今也随着艺术品一起，被丢弃、被毁灭。

在罗马列车的终点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马西莫宫（Museo Nazionale Romano Palazzo Massimo alle Terme）的国立古代罗马美术馆，其中最精美的一件收藏品，就是哈德良时代复制的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阿波罗神像。这尊神像虽然精美，但全身布满了现代技术也无法除去的暗斑。它在1891年从台伯河中打捞起来时，已经在河底的泥塘里沉睡了1500年。全身的斑点就是这千年来的污垢所造成的。

馆中其他的雕像，大多是在以复古为旗帜的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

与阿波罗神像相比，它们苏醒的时间早了不少，但也在地下长眠了1000多年。而我们现代人专门去美术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观赏这些从长眠中苏醒的艺术品。至少现在，这些雕像就算不再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也可以作为美的对象被大家欣赏。而且，我们不会因为有这种想法，就被异教异端审判所判以死刑。

长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在这些沉睡千年后被挖掘的艺术品之中，有一部分作品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它们毫发无损、没有瑕疵、四肢健全地留存至今。而大多的雕像不是断了手臂，就是少了一条腿，都需要在后世修补复原。

罗马卡皮托利尼美术馆（Musei Capitolini）中展示的“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雕像就是最好的一例，而且维纳斯像并非唯一的特例。尽管大多数展品都有明显的破损痕迹，但还是有少量的作品保存完好，只要将各个部位组装起来，就能恢复原状，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它们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

卡匹托尔山上的维纳斯

阿波罗（马西莫宫收藏）

每次看到这些作品，我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个假想，假想在公元4世纪末，有一些人将这些艺术品藏在石棺内，深深地埋入地下。

作为邪教的象征，成了不法分子的神像，根据皇帝的命令必须全部废弃。违令者将被没收财产并处以死刑。但持有人又不忍破坏或丢弃这些精美的作品，于是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深挖一个大洞，用布将它们包好，或者是放在上流家庭用来作为装饰的石棺中，然后放进洞内，盖上土，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心中暗暗期待，这股宗教狂潮能够早日过去，杰作重见天日的时代能够到来。

不过，要举例证明我的这个假设非常困难。虽然说对古代遗迹的挖掘，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挖掘工作都不是以学术性的态度、在严谨的操作下进行的，所以没有留下古迹出土时的有关资料。一直要到20世纪之后，才对挖掘经过作详细的记录。要证明这个假设，只有留待将来，等到现代的考古学家幸运地挖掘到近乎完整的神像的那一天。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只能眺望着完好无损或者说鲜有瑕疵的雕刻，猜想它们为何能在近乎完整的状态下，度过千百年的时光。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公元388年，是西马库斯和安布罗西乌斯以上书狄奥多西皇帝的形式，展开论战的4年之后。这一年，狄奥多西终于镇压了挑起内战、害死格拉提安皇帝的不列颠驻军司令马克西穆斯的叛军，结束了耗时5年的战争。自此，帝国东西两方，完全掌握在狄奥多西一个人的手里。虽然当时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还在世，不过，当名义上属于他管辖的不列颠和高卢发生动乱时，他还是不得不向负责帝国东部的狄奥多西讨救兵。因此，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实质上都属于狄奥多西一个人的天下。

这一年，41岁的狄奥多西带着镇压叛乱、处死叛军将领马克西穆斯的功绩，首次造访了首都罗马。不过，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同，狄奥多西对观赏名胜古迹完全没有兴趣。抵达罗马后他直奔元老院，面对聚集一堂的议员们，以提问的形式，逼迫他们作出选择：

诸位认为，罗马人的宗教，应该是信仰朱庇特神，还是基督？

西马库斯似乎当时不在现场。自4年前书信论战之后，尽管只有44岁，未到引退的年龄，但他依然辞去了所有的公职，全身而退。不过，那些与他出身背景、教育以及公职经历相似的高贵的元老院议员，全体出席了皇帝的接见。

当天讨论的过程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元首制时代，元老院会议的详细内容，会记录在《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中，并公之于世，然而这项制度已经废除了很多年。总而言之，无论议员们如何讨论，最终不得不给出一个让皇帝满意的答案，结果，议员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选择了“基督”。

1000多年以来被罗马人奉为最高神的朱庇特，仿佛真人一般，被宣判有罪。从此以后，基督代替朱庇特坐上了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宝座，宣告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这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多神教最后一座城堡的元老院，彻底被基督教教会攻陷。从建国初期以来，与罗马人民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元老院，历经1411年的岁月之后，在基督教面前缴械投降。既然认输，那么掌控失败者命运的，就是赢的那一方。投票结束之后，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按照皇帝的要求，抛弃了罗马传统的诸神，转身变为基督徒。

在那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出现了一位牺牲者，他的地位类似于元老院议长，是一位备受大家尊敬的人物。据说他选择了自杀。不清楚他是死

在投票前，还是投票之后。如果在投票之前，那么他是以死抗议，如果是在之后，是不堪屈辱，两者性质不同。不过，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详情。

仅一名元老院议员自杀的这个事实，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当基督徒被胁迫要求他们放弃信仰时，很多人誓死不从，宁可选择殉教。相比之下，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却很少出现殉教者，这是为什么？

有关这个答案，不少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异教徒对信仰不够虔诚。我个人觉得原因不仅于此。关键问题似乎不在信仰是否坚定，而是信仰的对象，即宗教的性质不同。

有关宗教的差异，简单来说，有以下几个不同：

一神教深信自己信仰的是正确的教义，所有人都应该信从。

相反，多神教则认为，尽管自己不信某类宗教，但只要有人相信，那么就应该承认它的存在。

“殉教”一词，正如字面所示，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殉道行为，以示誓死捍卫宗教的决心。

综观两者的不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殉教只会发生在一神教信徒的身上，而多神教则很难接受这种行为。希腊、罗马人在面临不得不放弃信仰时，他们最多就是选择脱身而出，远离时代的旋涡。

公元19世纪有一位叫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历史学家，写过许多有关古希腊、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以及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脍炙人口的著作。对于希腊罗马宗教的性质，他曾经说过：

>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等历代皇帝，没有立法承认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将其他宗教视为邪教的话，或许希腊罗马多神教可

以延续至今。

说到布克哈特，又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因基督教的胜利而成了“牺牲者”的不仅有美术，还有文艺。罗马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陆续遭到关闭，其中包括首都罗马的28所公共图书馆。罗马时代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充分体现了帝国双语文化的社会状况，按照希腊文和拉丁文分门别类，公开展示。这些书籍的内容，几乎全部是对异教世界的叙述，伴随着图书馆的关闭，藏书不断流失，古代文化遗产就这样消失殆尽。这些散落的书籍，同样也是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被发现。

在异教与基督教抗争的历史上，公元393年除了发生了元老院判决朱庇特神有罪的事件之外，另外还颁布了一条象征性的法律，那就是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禁止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四年一次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的目的，是奉献给众神之王宙斯（拉丁语称做朱庇特）的。希腊城邦之间平素纷争不断，只有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家相聚奥林匹亚，不论战场上的输赢，以体育竞技的方式一比高下，这是古代奥林匹克的意义所在。据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举行的。这项历史悠久的体育竞赛，也在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后落下了帷幕。因此，西洋史上称公元393年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顺便提一句，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排斥战争中的国家以及战败国的选手，我认为这种行径完全违背了古代奥林匹克的精神。

基督（对皇帝）的胜利

形势的发展，一切如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所愿。受洗后的狄奥多西皇帝，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在牧羊人安布罗西乌斯的引导下，利用皇帝特别的权力立法成章，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但这还不能让安布罗西乌斯满足。在信徒面前，明确上帝与皇帝从属关系的议题，尚未解决。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基督教教会高于皇帝权力之上的优势。为达到目的，安布罗西乌斯不惜超越了米兰教区主教的权限。

公元392年，21岁的傀儡皇帝瓦伦提安尼二世被杀，自此，狄奥多西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人主宰帝国的罗马皇帝。那个时候的他，似乎还心怀抱负，希望做一个对帝国公民公正无私的皇帝。一次事件的发生，让他有机会表现出公正执法的态度。

在帝国东部的叙利亚东北部，天主教徒借着狄奥多西皇帝排除异教徒的势头，乘机放火烧毁了犹太教的犹太教堂（Synagogue）。狄奥多西命令当地的行政官严惩罪犯，同时，他要求当地的主教用教会的费用，重建犹太教堂，捐赠给犹太教徒。

得知此事的米兰主教，立即向皇帝递上了严厉的抗议信。他在文中指出，使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兴建异教设施的行为，是对基督教的冒犯，是对教会全体的侮辱。

然而，狄奥多西确信自己作出的是公正的裁决，不予理会。不久，他因事必须前往米兰，这下给米兰主教逮着了机会。

等狄奥多西在贵宾席上坐稳之后，米兰主教开始向挤满教堂的信徒们，发表了猛烈抨击犹太教的演说。他说，因基督牺牲而获得救赎的不包括犹太教徒，因为他们是一群盲目的教徒。然后，他又用坚定的语气向狄奥多西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换句话说，就是“你靠谁才坐上了这个皇位”。

狄奥多西不得不撤回了严惩犯人以及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重建犹太教堂的命令，而且在撤回命令的公文中，还特地注明，这是听从了米兰主教忠告后所作的决定。这等于是宣告，从今以后，罗马帝国的法律，

对非基督徒的保障是有限制的。换言之，非基督徒的罗马公民，不能再期待与基督徒公民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不问宗教信仰保护全体公民的罗马法，已成为过去的历史。

主教对皇帝的威慑力，日后在其他场合也有所表现。发生在希腊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又给安布罗西乌斯提供了机会。

狄奥多西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赛车手，因一些小事而被捕入狱。大批的粉丝涌向警局，要求释放他们的偶像。在要求遭到拒绝之后，民众怒火冲天，情绪失控之下，杀害了包括塞萨洛尼基长官在内的多名行政官。

狄奥多西接到报告后，认定是民众的暴动，下令出兵武装镇压。暴动虽然成功地被压制下去，但许多人因此丧生。

安布罗西乌斯再一次给皇帝写了严厉的抗议信。他指出，军事行动超出了限度，手段残酷，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下达命令的皇帝理应为此负责。为了补偿所犯下的过失，皇帝必须在公开场合表明赎罪的诚意，在此之前，不得接近祭坛。这就是说，如果不公开认罪，就禁止皇帝进入作为上帝居所的教堂。

狄奥多西皇帝接到信后，抵抗了8个月。不过，8个月过去之后，他主动提出了和解。

犯错的人公开承认有罪，请求宽恕，基督教称为“公开忏悔”。必须经过这一关，才能得到宽恕，重新有机会朝拜圣体。普通的信徒通常要

用很久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忏悔，过程中必须做很多事情来证明赎罪之心。

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除去了身上所有象征皇帝的饰物，比如绣着皇印的衣服、头上的皇冠、镶嵌着宝石的长剑等，一身素衣出现在教会前，请求得到宽恕。他在门口等了一阵子之后，门才被打开，主教走了出来。安布罗西乌斯头戴镶满宝石的主教高冠，披着用金银丝线织成的豪华披风，一级大礼服的装束。主教走到跪着的罪人前面，问他是否有悔改之心，罪人用谦卑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仪式结束后，罪人再次得以进入上帝之家，在祭坛前，由主教赐给一小片面包，即朝拜圣体。

教会内外挤满了民众，观看着这场罗马皇帝与米兰主教之间上演的戏码。此时此刻，这里成了向世人展示上帝威力的最好舞台。

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发生的著名的事件“卡诺莎的屈辱”（Umiliazione di Canossa，又译卡诺莎之行）。公元1077年，为了得到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的宽恕，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在雪中站立了三天三夜。这场史上称为“卡诺莎的屈辱”的前奏，原来早在七百年前就开始了。

正因为皇帝可能会面临诸如此类的威胁，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等到临死前才接受洗礼。可是狄奥多西在病魔缠身、意志薄弱的时候，受到塞萨洛尼基主教的劝诱，30岁刚出头就接受了洗礼。一旦成为基督徒，即使贵为皇帝，也还是上帝的一只羔羊。而“羔羊”是无论如何战胜不了“牧羊人”的。

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势必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基督教与世俗皇权之间的关系。皇帝的地位及其权力，都是拜上帝所赐，而向人间传达上帝意志的则是主教。因此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背主教的意志。40岁之

后才受洗，从高级官僚变身为主教的安布罗西乌斯，能够透彻地看到两者间关系的真相，实属难得。或许正因为前半生的经历，才让他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公元395年，48岁的狄奥多西一世因病去世。即使在那个年代，48岁死亡也算不上是享受天年。比皇帝年长17岁的安布罗西乌斯，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祭文，大力赞颂了狄奥多西为基督教所作的贡献。阅读此文，让我禁不住苦笑。

当被自己操纵的玩偶死去之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将所有的功绩都归功于死者，不惜美誉，安布罗西乌斯的这篇祭文可谓是背后操纵者的最佳范文。这篇祭文也成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身份证明书”，因为是米兰主教，这位公元4世纪末期基督教教会的实际掌门人出面担保，所以教会毫不犹豫地将原本只赠予君士坦丁一个人的“大帝”称号，又送给了狄奥多西。

安布罗西乌斯

在狄奥多西皇帝去世后两年，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在大批含着伤心泪水的信徒的目送之下，在他生活了20多年的大本营米兰，以67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从他44岁被

基督教教会选中成为主教之后，坐拥了当时任何一个主教都无法保持的长达23年的至高地位。这位卓越的实干家，在这23年中，不仅对皇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许多成为基督教教会基础的教规，也是由他一手奠定的。

虽然安布罗西乌斯促成了教会中的很多事情，但这一切并非他的原创，他不过是将原本就单独存在的东西重新整理、统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架构。不过，必须承认，经过他改造之后，基督教教会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组织机构。以下是他的主要事迹：

一、针对异端者，以及尚未成为异端但思想有异于基督教的人，制订了论争与斗争的方法。

这就像一本理论武装用的教战手册。无论古今中外，使用手册永远是一件便利的工具。曾经有位主教对圣母玛利亚的处女之身表示怀疑，安布罗西乌斯就是根据这本手册，狠狠驳倒了对方，印证了手册的实效性。

二、制订了修行的方法，提高神职人员伦理道德标准。

三、确立制度，将修道士和隐士编入教会组织。

四、针对普通民众，制订了宗教教育的方式。

五、汇总教会中各种形式的祭拜，确立了教会仪式制度。

六、重新调整了以无业人员以及孤儿为对象的教会慈善事业的架构。

七、确立了殉教者信仰的理论。

除上述内容外，最具独创性而且有助于基督教普及的，是安布罗西

乌斯创立的圣人信仰。

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于宗教。不过希望得到唯一真神帮助的，大多又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以前，连夫妻吵架都有专门的保护神，只要向它祈求帮助就足够了。在一神教当道的眼下，负责调解夫妻矛盾的维里普拉卡女神也成了不法分子，民众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祈求至高无上的天父及其儿子基督，似乎有些难以启齿，难道就没有更轻松开口求助的神明吗？

针对民众这个单纯合理的愿望，安布罗西乌斯想出了一套因应的方法。

基督教只承认一位神明，因此不可能让以前的诸神复活，所以必须找到新的保护神。虽然基督教被迫害时期殉教者的信仰开始得到承认，但过去历任罗马皇帝打压基督教的政策并没有持续性，而且也不彻底。唯一例外的是戴克里先皇帝。即使如此，也不过持续了三四年而已。因此，就算把所有的殉教者集中起来，也无法满足民众的各种愿望。

于是，安布罗西乌斯想出了一个方法：大量制造圣人。不过，升格为圣人，需要得到教会的认可，认可的标准当然是看此人是否能成为信徒们的表率。

由于这些人物是一神教世界所崇敬的对象，因此不能像多神教时代那样，称为“保护神”，所以叫“守护圣人”（拉丁语：patronus，又译主保圣人）。不管怎样，安布罗西乌斯通过这个手段，既成功地坚守住了一神教的信仰，又满足了民众的淳朴愿望。

随着时代的推进，圣人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近代，甚至连老婆通奸的丈夫都有专门的守护圣人。由于圣人数量不断上升，就是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定为一位圣人的纪念日也不够。于是，教会定了一个专门的日子，纪念所有没能单独享受纪念日的圣人，那就是我们叫做“万圣

节”的11月1日。

为教会打下良好基础之后，安布罗西乌斯离开了人世，想必他应该是走得非常安详。这位创建了圣人体系的非凡的实干家，身后不久便成了自创体系中的一员。鉴于他对教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教会奉他为圣人。因此，他的名字史称“圣安布罗西乌斯”。

因为与至尊的圣人展开论战而留名史上的西马库斯，据说在他的对手安布罗西乌斯去世的5年之后死去。从他辞去公职到离世，已经有整整14年的时间。

西马库斯生前，应该知道元老院宣判最高神朱庇特有罪的决定，更清楚基督教成了帝国国教。至于罗马皇帝向一介主教屈膝下跪之事，势必也有所耳闻。而且，他还目睹了罗马帝国在狄奥多西死后，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

尽管最后一败涂地，但西马库斯终究是捍卫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后一位旗手。

他是怎样看待这一时代潮流的变迁，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虽然说信仰只能藏在心底，不过，即使说出来，那个时代也不会有人去在意一个异教徒男人的感受。

与西马库斯有关的东西，只留下了一座墓碑，是在罗马七丘山之一的西里欧山（Celio）中被发现的。石碑是西马库斯去世后，他的儿子为纪念亡父所建。研究人员认为，西马库斯的住宅可能就在西里欧山上。他长年远离政坛，又曾经给皇帝写过充满异教色彩的书信，他的纪念碑确实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这块墓碑如今被转移到了卡匹托尔山，放在卡匹托尔美术馆的地下。博物馆被罗马市政厅一分为二，市政厅的地下、联结两馆的通道之

处，有一个由古罗马时代的“古文书库”（Tabularium，又译罗马国家档案馆）改建的画廊，展示着大量的古石碑，西马库斯的石碑也在其中。不过，除了一些特别喜欢罗马史的人之外，一般人不会知道西马库斯是何许人。因此，他的石碑被放置在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从这里登梯往上走，最高处就是眺望罗马广场的大平台。当我的手触碰到那些冰冷的石碑时，似乎瞬间从现代回到了古代。寂静地竖立在一角的西马库斯石碑，让人愈发感到恍如隔世。尤其是在秋天将尽，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即将开幕的季节，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西马库斯墓碑

东西分裂

在公元395年去世的狄奥多西皇帝，死前将帝国一分为二，分给了两个儿子。18岁的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继承了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则归年仅10岁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所有。

这一次是罗马帝国真正的分裂。以往的皇帝们虽然分管东、西两地，但只是职务分工的不同，帝国还是完整的一个。因此，我不得不在文中反复强调“负责帝国东部的皇帝”、“负责帝国西部的皇帝”等。不过，在叙述公元395年之后的历史时，我只需要直接写“东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皇帝”。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虽然不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国家，但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衔接性，实质上成了两个独立的

国家。就在帝国分裂的状态之下，时代来到了公元5世纪。对罗马帝国而言，这是最后一个世纪，同时也是皇帝的女儿嫁给蛮族首领的一个世纪。

为纪念狄奥多西登基10周年制作的银盘（自狄奥多西以后，罗马皇帝们的形象犹如圣人，头顶光环）

大事年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24	7 月 3 日，在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君士坦丁的军队打败了李锡尼的军队，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军再次获胜，李锡尼投降，退出正帝的职位，隐居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正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着手进行新首都的建设		（日本）弥生时代
325	李锡尼以勾结蛮族、密谋反叛罪被处死。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召集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举行大公会议，将“三位一体”论定为正统，阿里乌斯派则被视为异端		
326		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因与继母法乌斯塔私通之罪遭逮捕，死于伊斯特里亚半岛的波拉城堡。法乌斯塔也遭谋杀	
330	5 月 11 日，举行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落成典礼。安布罗西乌斯于罗马出生		
335	君士坦丁授予侄子德鲁马特乌斯与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		
337	5 月 22 日，君士坦丁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在尼科米底亚病逝。君士坦丁堡皇宫发生血案，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其儿子被杀。同父异母兄弟之一的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加卢斯和尤里安侥幸逃脱。9 月，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在潘诺尼亚举行会谈。**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斯分别就任“奥古斯都”**。元老院追认了这个人事决定		（中国）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前燕）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40		君士坦丁二世与君士坦斯就北非归属权产生对立。君士坦丁二世率军前往潘诺尼亚，途中遭遇君士坦斯军队的阻击，战败身亡	（中国）东晋，首度实施土断法(341)。（朝鲜）高句丽遭受前燕的攻击，丸都城陷落
346	君士坦提乌斯将优待基督教教会的免税范围，扩大至所有教会相关人员		
350	君士坦提乌斯与波斯签订休战协议，率军向西部进军。伊利里亚驻军司令官维特拉尼奥被手下拥立称帝。君士坦提乌斯与维特拉尼奥在撒尔底迦（现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会谈。维特拉尼奥作出退让，其军队并入君士坦提乌斯的旗下	君士坦斯手下的将官马格嫩提乌斯反叛，拥立马塞利努斯为皇帝。君士坦斯在逃往西班牙的途中被捕遭到杀害。不久，**马格嫩提乌斯自封皇帝**	（日本）这个时期，在奈良盆地一带，兴建樱井茶臼山古坟、钵卷山古坟、景行陵古坟等大型前方后圆坟
351	3 月，君士坦提乌斯任命堂弟加卢斯为“恺撒”，令其负责帝国东部的治理。9 月 28 日，君士坦提乌斯及其军队在多瑙河畔的穆尔萨，与马格嫩提乌斯的军队展开会战。马格嫩提乌斯战败，逃往意大利本土。君士坦提乌斯重新夺回了西班牙及北非		
353		8 月 11 日，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君士坦提乌斯对马格嫩提乌斯派进行血腥清洗。	
354		12 月，君士坦提乌斯召加卢斯回米兰。加卢斯在前往米兰的途中，被转送到波拉城堡，以图谋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被处死	
355	5 月，尤里安在雅典开始了学者生活	2 月，君士坦提乌斯命令加卢斯的弟弟尤里安，来米兰接受召见。君士坦提乌斯平定了驻高卢的骑兵团长西尔瓦的叛乱，西尔瓦被处死。11 月，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召回尤里安，任命其为“恺撒”。尤里安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胞妹海伦娜成婚。尤里安前往高卢的维埃纳赴任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56	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流域，击退萨尔马提亚人、夸地人等日耳曼民族（～357年）	尤里安从高卢北上，迎击跨过莱茵河侵入境内的蛮族	（日本）古坟时代
357		春天，尤里安在阿勒曼尼人的根据地斯特拉斯堡，与阿勒曼尼人决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赢得胜利。阿勒曼尼人族长克诺多马被俘。4月28日，君士坦提乌斯为举行凯旋仪式，进入罗马	
358		尤里安在莱茵河下游一带，战胜法兰克人。（～359年）	
359	波斯军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阿米达。罗马军顽强抵抗，终不敌，阿米达城失守。君士坦提乌斯命令尤里安派遣军团前往东部。尤里安遭军团反对，拒绝执行命令		
360		2月，尤里安被其麾下的军团拥立为“奥古斯都”，尤里安接受了众人的拥立	
361	君士坦提乌斯离开安条克，率军向西部进军，讨伐尤里安。尤里安向东部挺进，成功地召集整编了多瑙河防线的驻军。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死去，临终前指定尤里安为其继承人。12月11日，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废除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的政策，力图复兴希腊罗马传统宗教		
362	为准备与波斯开战，尤里安离开君士坦丁堡，向东移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63	尤里安进入安条克，著有《厌胡者》并公开发行。3 月 5 日，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尤里安二度击退了波斯军，但因后勤补给不足，被迫撤军。6 月 26 日，尤里安在行军途中，遭遇波斯军的袭击而受伤，于当夜去世。在将军和高官出席的会议上，**近卫队队长约维安被推举为皇帝**。约维安皇帝与波斯缔结和约，割让北美索不达米亚给波斯。秋天，约维安进入安条克，废除了尤里安制定的政策		
364	约维安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日耳曼人出身的瓦伦提尼安将军当选为皇帝**。瓦伦提尼安任命胞弟瓦伦斯为共治皇帝		（日本）倭国的斯摩宿祢到卓淳国，派遣使者去百济
367	瓦伦提尼安授予长子格拉提安“奥古斯都”的称号		
373		瓦伦提尼安任命西马库斯为北非总督。	（朝鲜）高句丽初定律令
374		12 月 7 日，安布罗西乌斯当选为米兰主教	
375	11 月 17 日，瓦伦提尼安在接见蛮族代表时猝死。自此，**帝国东部由瓦伦斯、西部由格拉提安统治**。格拉提安的胞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分管意大利本土地区		（印度）这个时期，旃陀罗·笈多二世继位。笈多王朝迎来鼎盛时期
376	瓦伦斯皇帝同意西哥特人移居多瑙河南岸	格拉提安怀疑狄奥多西的父亲通敌，下令处死	
377	西哥特人对移居后的生活深感不满，发起暴动		
378	瓦伦斯为镇压暴乱的西哥特人，离开安条克。8 月 9 日，瓦伦斯在哈德良堡与哥特人的战争中大败，瓦伦斯被杀。**西部皇帝格拉提安召见狄奥多西，任命他为东部帝国的正帝**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79	狄奥多西平定哥特人叛乱，与哥特人重新签订了移居多瑙河南岸的协议。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去世。冬天，病中的狄奥多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380	格拉提安与狄奥多西正式启动了打压基督教以外的异教的政策		
383	从这一年开始，狄奥多西成为帝国全境实质上的统治者	格拉提安遭叛乱的不列颠驻军司令官马克西穆斯杀害	（日本）古坟时代
384		西马库斯担任首都罗马长官。围绕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像”的议题，西马库斯与安布罗西乌斯通过各自向皇帝上书的形式，展开论战	
388		狄奥多西平定马克西穆斯的叛乱，前往罗马。狄奥多西向元老院提出废除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建议，元老院投票表示赞同	
390	4 月，因军方镇压塞萨洛尼基暴乱时，滥杀无辜，安布罗西乌斯要求狄奥多西公开谢罪。在完成赎罪前，禁止其进入教堂	12 月，狄奥多西在米兰教会前公开向安布罗西乌斯谢罪。	
392	瓦伦提尼安二世逃离意大利，前往东部投奔狄奥多西。途中，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遭家臣杀害		
393	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除		
395	狄奥多西病逝。**其长子阿卡狄乌斯继承了帝国东方，小儿子霍诺里乌斯继承了帝国西方。之后，帝国东西两部正式分裂**		（日本、朝鲜）百济、倭国联手攻打新罗。新罗请求高句丽救援（399）
397		安布罗西乌斯去世	
402		西马库斯去世	（日本、朝鲜）高句丽向新罗派出援兵，击退了倭国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

同时代人的证言

圣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米兰主教。

De obitu Thecodosii，悼念狄奥多西皇帝的祭文以及Epistulae书信集，收录于Patrologia Latina vol. XVI。

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出生于安条克的罗马人。从军队退役后，着手撰写历史。与尤里安生于同一时代，是一位稳健的异教徒。

Rerum gestraum（Res Cestae）96—378，《罗马史，公元96—378年》。但现存的只有公元353—378年的第11卷（Berlin，1910和Bologna，1974）。

奥勒里乌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北非出身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公元389年担任首都长官。

Liber de Caesaribus，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提乌斯为止的皇帝传记（Leipzig，1970）。

Epitome de Caesaribus，作者不详，估计写于公元4世纪末期（Leipzig，1970）。

尤纳皮乌斯（Eunapius）：历史学家。

Historiae Fragmenta，目前仅有残篇留存。文章中引用了曾是尤里安御医的奥里巴西尔斯的回忆录（失传），因而具有历史价值。收录于Historicorum Gracecorum vol. IV（Paris，1885）和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I & II（Liverpool 1983）。

Vitae Sophistarum（被叫做“哲学家”们的生活实况写照）。

优西比乌（Eusebius）：叙利亚恺撒利亚的主教。从阿里乌斯派转为三位一体派。

Historia Ecclesiastica，从基督死去到4世纪为止的教会史（Berlin，1909），译为《教会史》1—3（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86—1988）。

Vita Costantini（Napoli，1985），译为《君士坦丁的生涯》（秦刚平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历史学家。

Breviarium ad Urbe condita，为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所撰写的从建国到4世纪的罗马简史（Stuttgart，1985）。

斐洛斯托杰乌斯（Philostorgius）：阿里乌斯派主教。

Historia Ecclesiastical，基督教教会史。后因遭到查禁，仅有残篇留存。收录于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Berlin，1972）。

格列高利（Gregorius）：纳西昂出生的主教。与尤里安同辈。在雅典修行时与尤里安是同窗。

Oratio IV&V，攻击、毁谤尤里安皇帝的文章。收录于Sources Chrétiennes（Paris，1983）。

利巴尼乌斯（Libanius）：出生于安条克的哲学家。尤里安的亲信和支持者。

Oratio XII，XIII，XV-XVIII，XXIV，写给尤里安的信件（Cambridge，Mass，1967）

马梅提努斯（Mamertinus）：公元362年的执政官。

《当选的执政官按惯例向皇帝致谢辞》，因为对象是尤里安，因此这份致谢辞具有历史价值。收录于Panegyrici Latini（Oxford，1964）。

奥勒里乌斯·西马库斯（Aurelius Symmachus）：异教的最后一位旗手。因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论战而留名青史。

Relationes（Berlin，1880）。

克劳狄乌斯·克劳狄安（Claudius Claudianus）：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拉丁诗人。

现今留存的都是公元395年以后的作品。是在异教变成非法化后，依旧保持着自由的个人灵魂的一例。但是以外表伪装成基督徒，实际是异教徒的形式。与本书中的主角之一斯提利科关系密切，与这位将军同生共死。

圣哲罗姆（Hieronymus）：出生于北意大利（公元347年前后），死于伯利恒（公元420年）。以在中东沙漠地带创建修道院以及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而闻名。另外，他也是罗马上流社会贵妇们的偶像。

Epistolae，154封书信（Wien，1918）。

与冷酷的圣安布罗西乌斯相比，圣哲罗姆比较能够激起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画家们的创作欲望，因此留下许多肖像画。曾经画过圣哲罗姆肖像的画家有：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洛伦佐·洛托、列奥纳多·达·芬奇、吉兰达约、提香、卡拉瓦乔等。肖像中的圣哲罗姆都是以半裸体的姿态出现在洞穴里。

为基督徒所著的圣人传（公元3、4、5世纪各一位代表人物）

Pontii，Vita Cypriani，《奚普里安传》（Milano，1975）。

Paulini，Vita Ambrosii，《安布罗西乌斯传》（Milano，1975）。

Possidii，Vita Augustini，《奥古斯丁传》（Milano，1975）。

尤里安皇帝（Iulianus）

著作选集，Jacques Fontaine注解，收录有《给哲学家泰米斯丢斯的信》、《大地母神的赞诗》、《太阳神》、《厌胡者》（Milano，1990）。

《政治·哲学相关著作集》（Genova，1988）。

《书简集》（Napoli，1991）。

泰米斯丢斯（Themistius）：从君士坦丁皇帝到狄奥多西皇帝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属于当权者喜欢的学者。

《皇帝赞辞集》（Torino，1995）。

苏格拉底（Socrates）：君士坦丁堡出生的基督教学者。

《基督教教会史，306—439年》（Berlin，1960）。

法律・行政関係の原史料

『Codex Theodosianus』テオドシウス二世によって438年発行。Mommsen, Th. & Meyer, P.M. 編纂版（Berlin, 1905）とKrueger, P. 編纂版（Berlin, 1923）：英訳は『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Princeton, 1952）

『Imp. Caesaris Flavii Claudii Juliani Epistulae Leges Poematia Fragmenta Varia』（Paris-Oxford, 1922）

『Corpus Iuris civilis』Mommsen, Krueger, Schoell 編纂（Berlin, 1922）

『Fontes iuris anteiustiniani』Riccobono他編纂（Firenze, 1900）

『Notitia Dignitatum』Seeck, O. 編纂（Berlin, 1876）

『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pste』Seeck, O.（Stuttgart, 1919）

碑文史料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Berlin, 1863）

『Inscriptiones Graecae』（Berlin, 1873）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Roma, 1861）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Leipzig, 1924）
『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Leipzig, 1905）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Berlin, 1916）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latinae』（Berlin, 1922）
『Epigraphica』（Milano, 1939）

パピルス史料

『Manuale di Papirologia』Calderini, A.（Milano, 1938）

地理史料

『Grande atlante geografico, storico, fisico, politico, economico』Baratta, M.他編集（Novara, 1939）
『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Tabula Peutingeriana』（Bologna, 1978）

通貨史料

『Description historique des monnaies frappées sous l'Empire Romain』Cohen, H.（Paris, 1892）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Wroth, W.（London, 1908）
『I medaglioni romani』Gnecchi, F.（Milano, 1912）
『Roman Coinage』Crawford, M.H.（London, 1974～）
『Roma e la moneta』イタリア中央銀行発行（Roma, 1993）

二、后世研究资料

Andreotti, R., *Il regno dell'imperatore Giuliano*, Bologna, 1946.

Bidez, J., *La Vie de L'Empereur Julien*, Paris, 1930.

Bouffaritigue, J., *L'Empereur Julien et la culture de son temps*, Paris, 1992.

Bowder, D. (ed.), *Who Wa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0.

Bowersock, G.W., *Julian the Apostate*, Cambridge (Mass.), 1978.

Braun, R. & Richer, J. (eds.), *L'Empereur Julien vol. I: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331-1715)*, Paris, 1978.

Browning, R., *The Emperor Julian*, London, 1975.

Burckhardt, J., *L'età di Costantino (1853)*, Firenze, 1957 (伊訳).

Demandt, A., *Die Spätantike. 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 284-565*, München, 1989.

Dodds, E.R.,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Oxford, 1950.

Dodgeon, M.H. & Lieu, N.C.,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226-363)*, London-New York, 1991.

Étienne, R., *Flavius Sallustius et Secundus Salutius*,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65, 1963.

Fraschetti, A., *La conversione. Da Roma pagana a Roma cristiana*, Roma-Bari, 1999.

Geffcken, J., *Kaiser Julianus*, Leipzig, 1914.

Giardina, A. (ed.), *Società romana e impero tardoantico*, Roma-Bari, 1986.

Gibbon, E.,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92 (伊訳).

Jones, A.H.M., *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 1964; *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71;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84.

Lane Fox, R., *Pagans and Christians*, London, 1986.

Liebeschuetz, J.W.H.G., *Antiochia. City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 1972.

Lieu, N.C., *The Emperor Julian. Panegyric and Polemic*, Liverpool, 1982.

MacMullen, R., *Paganism in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London, 1981.

Marrou, H.I., *Histoire de l'e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65.

Matthews, J.E.,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1989.

Mazzarino, S., *Aspetti sociali del IV secolo. Ricerche di storia tardo-romano*, Roma, 1951; *L'impero romano* (3 vols.), Roma-Bari, 1984.

Momigliano, A. (ed.), *Il conflitto fra paganesimo e cristianesimo nel IV secolo*, Torino, 1971.

Monteserrat, D., *From Constantine to Julian*, London, 1996.

Murdoch, A., *The Last Pagan*, Stroud, 2003.

Paribeni, R., *Da Diocleziano alla caduta dell'Impero d'occidente.* 《Storia di Roma》 8, Bologna, 1941.

Piganiol, A., *L'Empire Chrétien*, Paris, 1972.

Pighi, G.B., *Studia Ammianea,* Milano, 1935; *Nuovi Studi Ammianei,* Milano, 1936; *I discorsi nelle storie di Ammiano Marcellino,* Milano, 1936.

Rochefort, G. & Lacombrade, C., *L'Empereur Julian*, Paris, 1963.

Smith, R., *Julian's God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New York, 1995.

Stallknecht, B., *Untersuchungen zur römischen Aussenpolitik in der Spätantike (306-395)*, Bonn, 1969.

Stein, E., *Histoire du Bas-Empire*, Paris, 1949.

Tantillo, I., *La prima orazionedi Giuliano a Costanzo*, Roma, 1997; *L'imperatore Giuliano*, Bari, 2001.

著者多数,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XIII: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

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V

罗马世界的终曲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再灿烂夺目的太阳，也有日落之时
罗马帝国轰轰烈烈地出现
会以何种方式落下幕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然也不会一天结束

15

王　石　王　巍　|作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华，田建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5086–4049–5
I. ① 罗… II. ① 盐… ② 田… ③田… III. ① 古罗马－历史IV. ①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6285号
Roma Jin No Monogatari XV: Roma Sekai No Shuen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2006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华　田建国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罗马人的故事15

——罗马世界的终曲

[日] 盐野七生 著
田建华　田建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金币故事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给中国读者的序
前言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395—410年）
第二章 罗马帝国的灭亡 （公元410—476年）
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公元476年——）
结语
附录一 罗马人用以自律的“基本道德”一览表
附录二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盛衰（公元395—1453年）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金币故事

一个民族的兴亡好似一个人从生至死。在写完一个民族的兴亡史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亡国的悲剧并非由于人才的匮乏，而是缘于用人机制的失灵。

人才不只出现于鼎盛期，也出现于衰退期。人才也并非鼎盛期的就优秀，衰退期的就拙劣。在用人方面，鼎盛期和衰退期唯一的不同只是鼎盛期能够用好人，而衰退期却用不好人。

所以我认为，亡国的悲剧可以说就是那些至死未能用好的人才之悲剧。

写一个民族从诞生到死亡，在历史学上称为写“通史”。写着写着有件事情我不会做了——我无法批判、裁决那些失败者。对那些生在空有一身力量而不知如何发挥的时代里的人，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批判他们，而只能将他们的故事如此这般地娓娓道来。这早已成为我面对历史人物的做法了。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出版社不会向人气很高的流行作家约稿写通史。因为通史是从诞生写到死亡，漫长的时间里既有时势好的时代，也有时势不好的时代。可是，读者中有人不愿看到时势衰退时代的到来，往往导致书的销量下跌。

福兮祸兮，我不曾做过人气高的流行作家。对于我这样的作家，不论你写什么，写多长，也不论因为载入许多地图等使书价昂贵，出版社

都未予干预。这只是他们觉得销量尚差强人意，没有说什么而已。结果我便能写我之所想写，尽写我之所想写，地图和照片等得以大量载入书中。

从现在开始，您将阅读的是悲惨时代的罗马人的故事。当您并未放弃而读完故事时，我敢说，您会看懂罗马人之死。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在出版本丛书的时候，我希望让读者通过封面所刊人物面容的变迁来通观罗马史。而丛书封面上，我决定不用人物的面容，而使用硬币。

我在这里想让读者关注的并不是货币质地的价值，这很难通过照片了解。我想让读者关注的是货币铸造技术的演变，这通过照片即可一目了然。读者一览本书卷末的硬币图谱就会了解到，铸造技术并非随着时代的逝去而发展。这一点实证了人类不一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进化这一

事实。

在历史的长河中，既有进化的时代，也有退步的时代。如果没有面对这一切的思想准备，就不能玩味历史。我相信，没有“玩味”也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教训”。

盐野七生

2011年初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

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

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

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

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前言

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圣乔万尼大教堂坐落在罗马市区南端的拉特拉诺。公元312年，君士坦丁打败政敌马克森提乌斯，作为胜利者进入了罗马城。他最先建造的就是这座教堂。君士坦丁还建造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不过那已是在此12年之后的公元324年，在击败了残留的政敌李锡尼之后的事了。顺便提一下，君士坦丁是基督教得到承认后的第一位罗马皇帝，因此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位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圣乔万尼大教堂的建造比颁布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仅早一年。

据说，基督教教堂是建在誓死守教的殉教者墓地之上的，在被称为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更是如此。圣彼得大教堂就建在被认为是使徒彼得殉教之所的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与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乔万尼大教堂同为罗马四大教堂之一，它也如其名——“城外的（Fuori le Mura）圣保罗大教堂”——所示的那样，是建在相传为保罗殉教处的城墙外大道旁。

然而，圣乔万尼大教堂却不一样。与城墙相接的拉特拉诺一角，曾是马克森提乌斯皇帝麾下骑兵军团的军营。马克森提乌斯在与君士坦丁的权力斗争中失败。摧毁反基督教仇敌的势力地盘，并在其上建造基督教教堂，这是无与伦比的政治人物君士坦丁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向马克森提乌斯派的罗马市民示威，也像是一年后颁布“米兰敕令”的前奏曲。

现在的拉特拉诺的圣乔万尼大教堂

这样一来，圣乔万尼大教堂就不是一座普通的教堂了，它是皇帝君士坦丁送给罗马主教的主教教堂，是指引“羊群”（信徒）的“牧羊人”的官邸和公邸。当时的罗马教皇于公元314年墙壁未干就早早地住了进去。此后一千年间，圣乔万尼大教堂一直都是罗马教皇的居所，直到14世纪初发生以“阿维尼翁之囚”闻名的法国国王绑架教皇事件为止。

“阿维尼翁之囚”事件结束以后，教皇的居所迁到了圣保罗大教堂，但圣乔万尼大教堂作为罗马主教教堂的地位至今未变。罗马教皇同时也是罗马的主教，这个兼职至今仍在延续。事实上，教皇当选后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圣乔万尼大教堂。

圣乔万尼大教堂已经历了近一千七百年的沧桑岁月。在它的漫长岁

月中几经改造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教堂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部，满眼都是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威容。既然是教堂，那就是祈祷的场所，弥撒的场所，也是举行洗礼、葬礼、婚礼等各种仪式的场所。如今，由于教堂正殿过大，朝拜者和观光客络绎不绝，往日教皇公邸的一部分好像也用于私人仪式了。在一次出席朋友女儿的婚礼时，我看到了一段文字。

对与新郎、新娘没有亲近关系的人来说，婚礼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慨之处。举行仪式的小型礼拜堂不常对参观者开放，一任好奇心的驱使，我将视线投在了墙面上。这时，面对祭坛的右侧墙壁上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

CHRISTUS VINCUT

CHRISTUS REGNAT

CHRISTUS IMPERAT

就我这拉丁语翻译的水平，老师是一定会打红杠杠订正的。不过这些文字的意思是：

基督胜利了

基督君临了

基督统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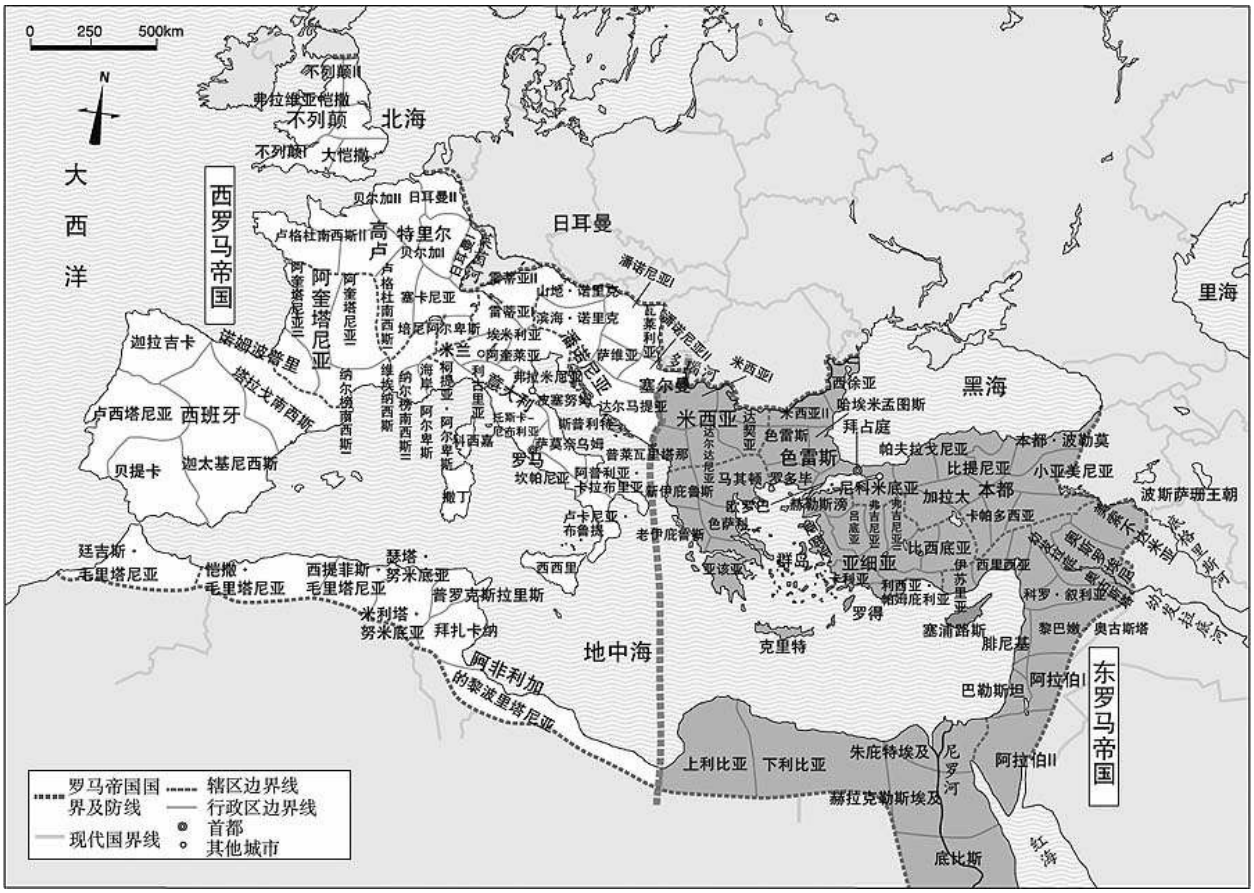
我听不进祭司的说教了，脑子被某种思绪所占据：如果把“CHRISTUS”替换成“ROMANUS”，那意思就变成了：

罗马人胜利了

罗马人君临了

罗马人统治了

主语改变了，战胜了谁、如何君临、用什么方法统治，当然也就改变了。我想，这些不同点不正是划分古代与中世纪的分水岭吗？


0 250 500km
N
大西洋
西罗马帝国
北海
不列颠
不列颠I
不列颠II
弗拉维亚恺撒
大恺撒
贝尔加II
日耳曼II
高卢
特里尔
贝尔加I
日耳曼
卢格杜南西斯II
阿奎塔尼亚
阿奎塔尼亚I
阿奎塔尼亚II
阿奎塔尼亚III
塞卡尼亚
雷蒂亚II
山地·诺里克
滨海·诺里克
雷蒂亚
埃米利亚
阿奎莱亚
萨维亚
潘诺尼亚I
潘诺尼亚II
比莱利亚
多瑙河
米西亚I
米西亚II
迦拉吉卡
诺姆波普里
塔拉戈南西斯
卢西塔尼亚
西班牙
贝提卡
迦太基尼西斯
纳尔绍南西斯I
纳尔绍南西斯II
纳尔绍南西斯III
维埃纳西斯
培尼阿尔卑斯
米兰
海岸阿尔卑斯
柯提亚·阿尔卑斯
利古里亚
意大利
托斯卡尼西利亚
西嘉
撒丁
弗拉米尼亚
波塞努姆
斯普利特
达尔马提亚
萨莫奈乌姆
罗马
坎帕尼亚
普莱瓦里塔那
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
卢卡尼亚·布鲁提
老伊庇鲁斯
新伊庇鲁斯
西西里
普罗克斯拉里斯
廷吉斯·毛里塔尼亚
恺撒·毛里塔尼亚
西提非斯·毛里塔尼亚
瑟塔·努米底亚
米利塔·努米底亚
拜扎卡纳
阿非利加的黎波里塔尼亚
地中海
塞尔曼
米西亚
达尔达尼亚
达奥亚
马其顿
罗多毕
欧罗巴
色萨利
色雷斯
西徐亚
帕埃米孟图斯
拜占庭
帕夫拉戈尼亚
黑海
本都·波勒莫
比提尼亚
小亚美尼亚
加拉太
本都
卡帕多西亚
波斯萨珊王朝
尼科米底亚
赫勒斯滨
弗吉尼亚I
弗吉尼亚II
吕底亚
比西底亚
伊西里西亚
亚该亚
群岛
亚细亚
卡利亚
利西亚·帕姆庇利亚
苏里亚
罗得
塞浦路斯
科罗·叙利亚
黎巴嫩
奥古斯塔
腓尼基
巴勒斯坦
阿拉伯I
阿拉伯II
东罗马帝国
克里特
上利比亚
下利比亚
朱庇特埃及
尼罗河
赫拉克勒斯埃及
底比斯
红海
里海
罗马帝国国界及防线
现代国界线
辖区边界线
行政区边界线
首都
其他城市

东西分离后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395—410年）

斯提利科

东西分裂

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享年48岁，在当时也算是早逝。他不是战死，也不是被刺杀，而是病逝。在位的最初4年，他和格拉提安皇帝分治帝国东西，而接下来的12年，实际上由他一人统治。他的早逝是累积长达16年繁重公务的结果。“皇帝”（Imperator）原本是授予承担率军保卫国土的“凯旋将军”的尊称。狄奥多西是最后一位不愧于这一称号的罗马皇帝。这16年来，广袤的罗马帝国从东到西，一旦有敌来袭，他就要率军驰骋征战。他死在米兰，是因为直到前一年的秋天，他都一直在指挥讨伐高卢皇位篡夺者的战争。他死在1月，则可能是他进入冬令营后突发劳疾的结果。

但是，为保国安民不惜亲自率军征战，这实在是十分罗马式的想法。在君士坦丁因承认基督教而获得“大帝”尊称之后，狄奥多西也被称为“大帝”，理由是他也为基督教的振兴尽了力。

君士坦丁是4世纪初的人，因至少在原则上像对其他宗教一样承认了基督教的信仰而被尊为“大帝”。而狄奥多西是4世纪末的人，他不承认并彻底排斥、镇压一切异端异教，是强行推行一神教思想的“大帝”。影响巨大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实在是一位有能力的“牧羊人”。他在狄奥多西的葬礼上如是说教：

> 皇帝狄奥多西没有死！他附体在两个儿子身上。即使在天上，父亲的眼睛也会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地上的儿子，并保护着他们！将士们、公民们都要像对待先帝那样为两位年轻的继承者竭尽忠诚！

继承狄奥多西皇帝的是长子阿卡狄乌斯和次子霍诺里乌斯。阿卡狄乌斯18岁，霍诺里乌斯只有10岁。除了这两人之外，狄奥多西与和他一

起当了4年皇帝的格拉提安皇帝的异母妹妹加拉之间还生有一个女儿。父亲去世时这位皇女才五六岁。

公元395年，伴随着狄奥多西之死，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是历史上的定论，但这只是结果。我认为，狄奥多西起初并没有把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传给长子和次子的想法。

分治东西是从3世纪末“四帝共治制”时代就已开始的统治方法，这是在周边各蛮族一同入侵的时代用以应对外敌的苦肉计。所以，可以说狄奥多西把阿卡狄乌斯放在东部、把霍诺里乌斯放在西部的本意并不在于把帝国一分为二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在于延续东西分工负责的传统做法。也许他认为，亲兄弟之间的分工应该比外人更能发挥作用。

事实上，狄奥多西皇帝临终时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将军斯提利科一个人。如果他真有意分割帝国的话，就应该把两个儿子分别托付给不同的武将。这不正是狄奥多西生前并没有想过自己死后要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证据吗？

但狄奥多西的遗志最终并未得到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未变成分工制，而是走向了分裂。个中原因：第一，即使是兄弟，关系也未见得就好；第二，西征前受托统治东部的长子阿卡狄乌斯的心腹之中，有很多高官希望从西部分离出来。但是，臣子必须首先遵从先帝的遗志。所以帝国并不是在狄奥多西死后立即分裂的。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起初是在暗中进行，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然而，这给当事人带来了许多不幸，其原因是在混沌不清的状态下行动时，双方极易发生误解。

狄奥多西虽然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但他也是当了16年皇帝的人。他一定认为，死后仅仅通过主教之口给两个儿子带来神的恩宠，或是仅靠自己在天之眼的监督是不够的。于是他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既有才干又忠心耿耿的右臂斯提利科。

意大利罗马史研究者帕里贝尼这样评论18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仅有10岁的霍诺里乌斯：

> 他们常年生活在宫廷里，远离民众，与民众没有任何接触。士兵们从未见过自己的最高司令官驱马统军。兄弟两人能即皇位，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先帝之子。

狄奥多西皇统谱系图（主要人物）

男
赛妮娜
斯提利科
加拉
狄奥多西
皇帝
379—395 年在位
艾丽娅（原配）
阿道法斯
西哥特人族长
410—415 年在位
加拉·普拉西提阿
君士坦提乌斯三世
西罗马帝国皇帝
421 年在位
女
霍诺里乌斯
西罗马帝国皇帝
395—423 年在位
玛丽亚
尤多克西娅
阿卡狄乌斯
东罗马帝国皇帝
395—408 年在位
尤多克西娅
狄奥多西二世
东罗马帝国皇帝
408—450 年在位
马利基安
东罗马帝国皇帝
450—457 年在位
普尔喀丽娅
瓦伦提尼安三世
西罗马帝国皇帝
425—455 年在位
霍诺丽娅
尤多克西娅
根西里克 — 乌内里克
汪达尔人族长
428—477 年在位
汪达尔人族长
477—484 年在位
女
普拉西提阿
奥利布里乌斯
西罗马帝国皇帝
472 年在位
黑框里的人物为皇帝
黑体为男性
宋体为女性

狄奥多西银盘上描绘的父子肖像

阿卡狄乌斯担任东罗马帝国皇帝13年，而霍诺里乌斯稳坐西罗马帝国皇位长达28年。可以想象，现世的最高权力者因神愿而能占据皇位，这种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说对统治者是多么有利。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由精英荟萃的机构元老院（senatus）和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populus）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时代了。

狄奥多西在位16年，几乎都是在统军作战。他也许生前就看透了两个儿子的天资并不适合领军打仗，这才在死前把他们托付给了斯提利科将军。可是斯提利科的门第在罗马史上并无来头。他是汪达尔人，在当时的罗马人眼中是蛮族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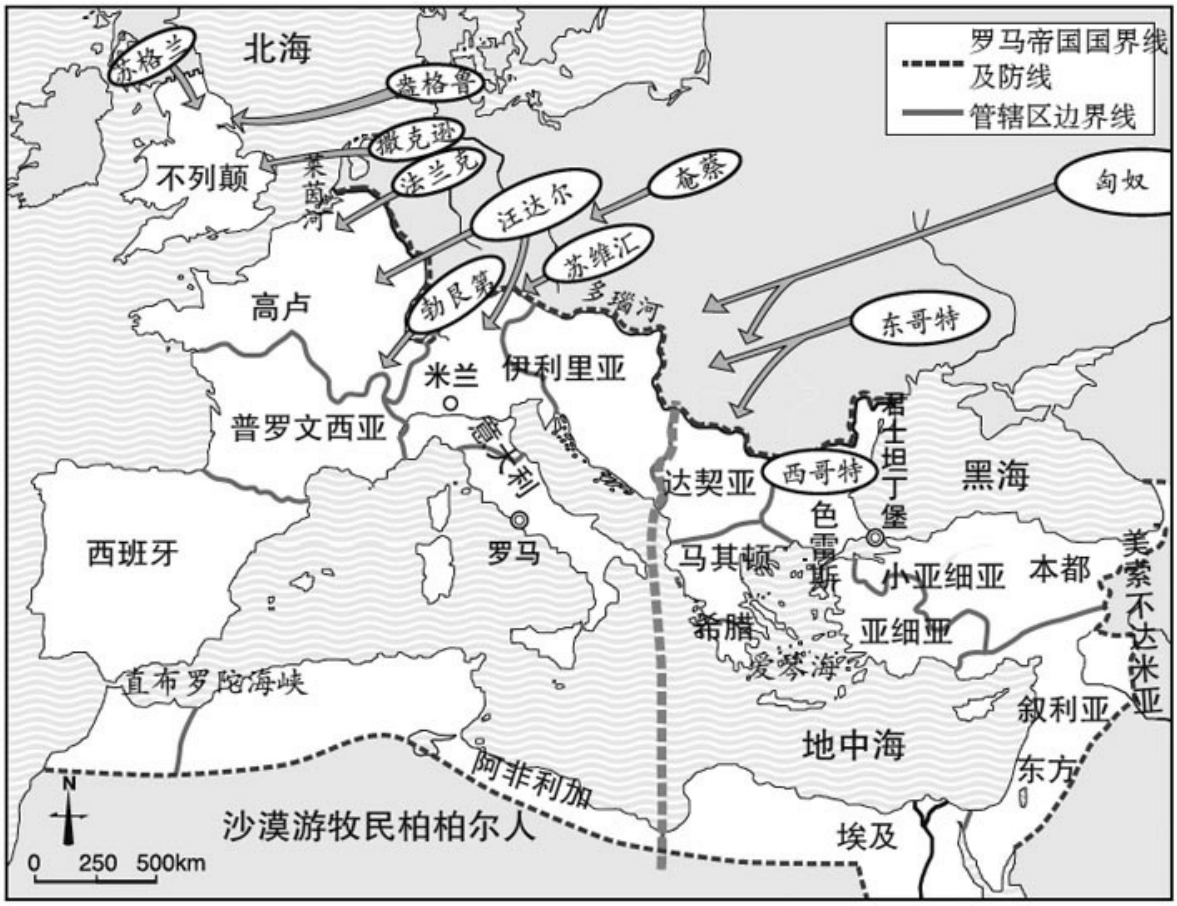
罗马人与蛮族

公元5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末世纪。这是一个“蛮族”（barbarus）的重要性剧增的时代，不论这蛮族是不是日耳曼系。被统称为“barbarus”的蛮族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人出身于蛮族，至少从在罗马军队中从军的父亲一代就开始了与帝国的关系，可能还利用父亲的罗马公民权以及通过父亲获得的人际关系，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了丰富的经历。模仿第二代移民的说法来说，他们该是第二代蛮族吧。

第二种类型的人从未离开自己出身的部族而一直担任统率同胞的部族长，但本部族与罗马帝国结成了“友好同盟”关系。所谓“友好同盟”，是指当时盛行的拉丁语“foederatus”的直译。

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下面这种约定之上的：罗马在帝国领域内给蛮族居住地，而蛮族要与罗马军队共同战斗，击退来犯的其他蛮族。因为是一种佣兵关系，所以罗马方面要付军饷。蛮族则因居住地和军饷得到保障而不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



4世纪末的蛮族分布

在势压周边的时代，罗马帝国经常可以看见蛮族人在皇帝亲任总指挥的军中从军。不过，那个时代不需要给予与罗马兵一同作战的蛮族集体聚居地，何况他们又约定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压根儿不会多虑。3世纪前的罗马和4世纪后的罗马，虽都称为罗马帝国，内在实质却有非常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在4世纪以后的罗马史中，罗马人和蛮族的地位已经攻守互易了。

这最后的第三类蛮族，对他们而言，罗马帝国只是侵略和掠夺的对象，所以与罗马的关系实在是很淡薄。他们来犯、掠夺财物，然后撤退。可是后来，他们来犯、蹂躏之后却久待不去，这对罗马来说就很难对付了。罗马人曾经遭到远自亚细亚西进而来的匈奴人的驱赶。匈奴人

就属于这第三类非日耳曼系蛮族。

到了这样的时代，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就具有了重大意义。

在属于第一类的蛮族中，很多人是天主教派的基督徒。这一教派亦称“三位一体教派”，在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公会议上被定为正统。

第二类蛮族是由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抱团而成。大概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该教派被打成“异端”，其宗教活动受到阻碍。不仅如此，很多阿里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遭到驱逐。他们热衷于向居住于帝国之外的蛮族布教，才形成了这样的情形。

而第三类蛮族，无论是日耳曼系还是亚细亚系，“异教徒”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异教徒并不信奉希腊和罗马的诸神。日耳曼系的蛮族继续信仰自古以来的日耳曼诸神。在北方蛮族的异教徒之间，仍然流行用活人当祭品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因罗马人的厌恶，700年前即已在罗马绝迹。

我们把4世纪以后的蛮族分成了这三种类型，但这三种类型后来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属于第二类蛮族的部族长，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心怀不满，就会摇身一变而为第三类蛮族。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此外，原来的第三类蛮族被赶出家园后，因无家可归而转为第二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所谓亡国，并不是默默地过日子、静静面对国家末日的现象。正像被狂风掀起的巨浪，前后左右相互碰撞，扬起泡沫一样，亡国就是社会不受控制地汹涌流动的结果。尽管可能意识到这三类蛮族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这个帝国最后的主角大多都有“蛮族”的共同特征。

斯提利科将军

斯提利科属于被称为“罗马化的蛮族”的第一类蛮族。他的父亲是汪达尔人，但母亲是罗马人。说不定斯提利科的母亲还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来到帝国边境附近定居的罗马人农庄主的子孙。罗马人自古并不反感与异族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不过，昔日多是像图拉真皇帝那样的由罗马人官兵与异族女子结婚生下的混血儿。而4世纪以后，蛮族男子与罗马女子的结合占了绝大多数。这方面也是“攻守互易”了。

可是，罗马社会是父系社会。即使母亲是蛮族人，只要父亲是罗马人，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罗马人。但如果母亲是罗马人，而父亲是蛮族人，他们的子女最终还是蛮族人。所以即使给他冠以弗拉维乌斯·斯提利科这样一个罗马式的名字，也没有人把他视为罗马人。圣哲罗姆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罗马人，长年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留下了拉丁语《圣经》译本和众多研究著作。他虽然没有把斯提利科定为“蛮族”，却把他写成了“半蛮族”（semi-barbarus）。这两人虽然栖身于不同的世界，却是同时代人。

然而这个“半蛮族”却被后世的史学家们称为“最后的罗马人”，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话虽如此，如果尤里乌斯·恺撒以及其后的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又会作何评论呢？他们可都是毫不犹豫地起用、用好异族人才的皇帝。也许他们会说，帝国虽已日薄西山，唯有这样称呼，才与多民族国家的罗马相称。

然而，斯提利科对帝国末期的罗马人而言终究是“蛮族”，所以并未留下他出生在哪里的记录，只知道他的生年是公元360年前后。父母亲的名字也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的父亲从瓦伦斯皇帝时代起就在罗马军中率领骑兵团了，还有就是他的母亲是罗马人。尽管斯提利科不是军团司令的儿子，母亲也不是罗马名门之女，他这个“半蛮族”却早早地崭露头角。他不是从军团中摔打锻炼出来的，军团出身的人在处于他那种

环境而崭露头角的人物当中比较多见。他也没有在宫廷内部积累起行政官僚的丰厚履历。实际上，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位“半蛮族”在23岁前的这段时间里究竟人在哪里、做过何事。不过，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认可，这可是事实。他并不缺少机会认识很多时间都与部队在一起的狄奥多西和他麾下将军的子弟。

只闻其名就可知道，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年轻人并不是罗马人。他在公元383年，即23岁那年走到了前台。这位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派往与波斯交涉互不侵犯协约的使团里。有研究者认为，他是狄奥多西亲自任命的。如此年龄，大约不会位居首席吧。然而，正是这位23岁的年轻人，率领了全是由年长高官组成的使团，完成了这次困难的交涉。

在外交交涉中，需要在与对手之间寻找妥协点的灵活性。但是，一旦到了不可退让的底线，决不退让的毅然决然的态度也不可或缺。从那次出使以后，灵活和毅然就成了同时代人提到斯提利科时所用的形容词。未作多大让步就与东邻的大国波斯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约定，即使在问题较少的时期，这对罗马帝国而言也属难能可贵。这一年正是负责帝国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被杀的年头，整个帝国的防御都落到了狄奥多西一人身上。难怪皇帝会喜形于色地迎接缔结协约后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斯提利科。

斯提利科一回来，狄奥多西皇帝就任命他为近卫军（comes domesticorum）长官，作为对他功劳的回报。这已是格外提拔了。狄奥多西又把斯提利科迎进了皇帝家族。

狄奥多西有一个弟弟，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皇帝便把这个姑娘赛妮娜接到身边抚养。赛妮娜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宛如皇帝的女儿一般成长起来。那时，狄奥多西亲生的女儿加拉·普拉西提阿还没有出生。

狄奥多西皇帝正式收赛妮娜为养女，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了斯提利科。蛮族出身的年轻人就这样成了现任皇帝的家庭成员之一。

罗马时代管这种关系叫“parens”（亲戚）。这个词是意大利语“parente”和英语“parent”的词源。在已经变成绝对君主政体的罗马帝国后期，成为君主的亲戚是超越私人意义而具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皇帝与这位蛮族出身的年轻人之间在年龄上有13岁的差距。从心心相印的心态看，他们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更像年轻的伯父与侄子的关系。狄奥多西把侄女收为养女，又把她嫁给了斯提利科为妻，所以两人之间实际上也是伯父与侄子的关系。不光在“血缘”上，在“心态”上也成为“亲戚”了。当时狄奥多西36岁，斯提利科23岁。

被皇帝嫁给蛮族人为妻的赛妮娜和伯父一样出身于西班牙。她是一位苗条的美女，知书达理，直言不讳。在东方色彩浓厚的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她是一位特异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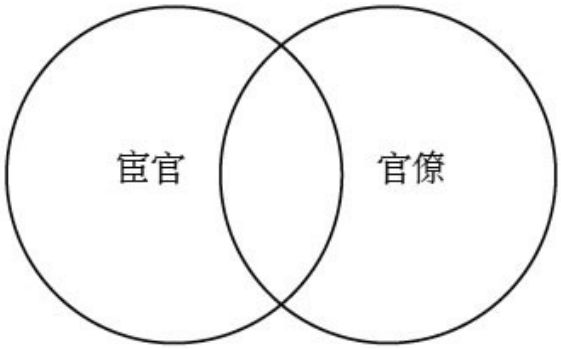
在中近东、埃及和希腊出身的男子中间，斯提利科也独具异彩。他从父亲一方的日耳曼民族血统中继承了高大结实的体格，从母亲一方的拉丁民族血统中继承了品格高尚、气质开放和举止大方的风格。从斯提利科和赛妮娜后来的生活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政治的男女之爱。这次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儿子希拉克略跟狄奥多西皇帝的次子霍诺里乌斯年龄相仿，感觉上就像是皇子的同学。霍诺里乌斯出席的庆典他也会出席。霍诺里乌斯的母亲早逝，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似乎还代为照管过他。

当上近卫军长官以后，斯提利科便跟随狄奥多西四处奔波。跟在长期征战沙场的狄奥多西身边年头久了，没有从军经验的斯提利科也必不会缺少学习一般军事的机会。他积极参加实际战斗。28岁那年，在与杀害格拉提安、篡夺皇位后统治高卢的马克西穆斯的战斗中，他受嘱率领的一支部队，成为那天取胜的主要力量。罗马在迎击再次大举进犯的西哥特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斯提利科居功至伟，那年他31岁。

狄奥多西皇帝提升斯提利科为“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之一。“大元帅”可以位列罗马帝国末期的“主角”行列，不仅可在最高司令官皇帝担任总指挥的战役中独率一翼，很多时候都会担任皇帝派遣军的总指挥。以他的地位可以统率万人规模的兵士，是主力军的最高长官。给年方30岁且出身蛮族的年轻人如此待遇，只能说是破格拔擢。

谁都看得出，如此的晋升靠的是实力，但即便如此也会树敌。在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越来越多的高官对斯提利科心怀反感。如果用图来示意，我想大概会如下图那样。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受到东方专制君主宫廷的强烈影响。宫廷中的很多部门可以说就是官邸。很多官僚在那里负责行政工作。其中宦官（Eunuchus）为数不少。作为公邸的皇宫“深处”是皇帝一家的私人专用区域，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是男性，可以说全都是宦官。



本来，行政人员对军事人员就有成见。如果行政人员是宦官，这种倾向就会更加明显。所谓宦官，就是被阉割的人，使其失去生殖能力，在宫廷内侍奉帝王，这与同性恋还不同。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不是宦官憧憬的对象，而是嫉妒的对象。嫉妒就是对比自己优越的人心怀憎恶。

皇帝狄奥多西不论是从征战的需要还是从他的本性来看，都不会被深宫旋涡般的阴谋所耍弄。斯提利科也是跟随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多。他没有直接暴露于宫人们的反感和嫉妒之中，是因为在宫中的妻子赛妮娜利用自己是皇帝的养女以及代行皇位继承人母亲的角色，起到了“盾牌”的作用。

监护人

12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到了公元395年，这是决定斯提利科命运的一年。

狄奥多西进入冬令营区时，似乎悟到自己的死期已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斯提利科为“联军总司令”（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大元帅”有数人，可联军总司令整个帝国只有两人，另一人负责与波斯接壤的帝国东方的防御。接着，狄奥多西把两个儿子和他们即将肩负的罗马帝国托付给了将要迎来35岁的“半蛮族”。

这两件事是狄奥多西在围满将军和高官的病榻上办的。这样做既是为了向他们显示这是正式决定，是遗言，同时也是为了让将军和高官们为他给斯提利科的遗言当证人。

我认为狄奥多西对斯提利科是真心信任和期待的。不过，狄奥多西也有心计：就凭蛮族出身，斯提利科再守信义、再有能力，恐怕也不会去觊觎罗马帝国的皇位。

事实上，出身蛮族在罗马军队里得到擢升的武将发动叛乱、杀害上司皇帝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时他们往往也不是自己登上皇位，而是转入幕后，让“罗马人”自己去登皇位。那个时代，蛮族想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统治者还是有强大阻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斯提利科是托付两位皇子的理想人物。

其实，在公元395年1月17日狄奥多西去世前嘱托后事时，斯提利科已经把罗马全军中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在皇帝狄奥多西决心一扫帝国西部之敌而整编部队时，趁着与波斯关系良好，选拔驻扎在帝国东方将士中的优良人员，掺入驻扎在西方的将士中，让他们一同作战。这些军队就这样被就任“联军总司令”的斯提利科接收了。

这样，斯提利科在公元395年掌握了当时罗马帝国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式的最高司令官是两位皇帝，一位18岁，另一位才10岁。只要斯提利科有心踢开18岁和10岁的皇帝，攫取皇位也有可能。至少把10岁皇帝分治的帝国西方弄到手，是确乎无疑能够办到的。这一年，斯提利科35岁，他还握有在这种情形下行之有效的王牌——先皇的养女赛妮娜是他的妻子。但斯提利科没有这样做，就连试探性的微细动作都没有。

这种男人不可能没有对他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感到不快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多有仰慕者相助。总之，他是一个能让其他男人敬佩的男人的典型。生于埃及的诗人克劳狄安就对这位斯提利科敬佩之至。

“现场证人”

提到“诗”（poema），会有许多现代人认为，那就是主观叙述作者自身感动和情绪的韵文文学作品。于是，“诗人”（poeta）就是耍弄用韵抒情诗的人。不过，所谓“诗”，原本是由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构成的文学样式，不是仅有抒情诗才叫做“诗”。在古代，在剧场里表演的悲剧、喜剧也被视为“诗”的正统领域。换言之，所谓诗人可以说就是选择以文章作为表现手段的人。克劳狄安尽管出生在埃及，热爱的却是希腊人荷马和罗马人维吉尔，而他们都是叙事诗人。

克劳狄安的生年不详，但他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公元395年到404年之间。可以想象，他与斯提利科是同时代人，或是介于狄奥多西与斯提利科之间的一代人。他的作品几乎全是讲述斯提利科的，但读不出年少男人讲述年长者的味道，也看不出所谓宫廷诗人为谄媚主人而写作的文笔。斯提利科对这位诗人而言，是一位与蛮族出身等等无关的英雄。对出身于埃及却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公民的克劳狄安来说，斯提利科是保卫自己国家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盾牌”。

钟情于作品主人公的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缺乏客观性，这种评论应有几分正确。不过，如果诗人克劳狄安没有写给我们什么东西的话，背负逆贼的污名去世的斯提利科在历史上的评价，就只能有反对者一方的说法了。在给后世留下己方的而不仅仅是敌方的信息方面，克劳狄安的著作起到了中和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从公元395年到404年这9年间，诗人的确一直跟随在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斯提利科身边，是这位蛮族出身的将军所作所为的现场见证人。

狄奥多西皇帝死在米兰。4世纪的皇帝们把罗马帝国西方的大本营放在米兰，而不是罗马，其理由有二：

第一，蛮族的入侵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率军赶赴延伸到两河中游的帝国防线，驻扎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要比驻扎在位于南部的罗马更加有利。

第二，4世纪以后的皇帝们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对他们而言，无论怎么说，罗马城的异教色彩都过于浓厚。

总之，他们全都出生成长在帝国的“行省”。尽管伦敦、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后世都发展成为一国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但在罗马时代只不过是下属行省的地方城市。我有时会琢磨，如果只认识这些城市的人造访罗马，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在现代，这些城市都在精心地注意发掘保存那些罗马时代的遗迹。每当我看到这些遗迹总是感到，被称为“世界之都”的罗马与帝国的那些行省城市之间，在城市的规模和水准方面有巨大落差。这就类似于美国人从蒙大拿和俄亥俄的乡下走出来站在纽约曼哈顿时所怀有的那种感慨。

按照常理，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大可去厌恶、蔑视过去基督教徒的敌人罗马了，可是人们做不到。罗马实质上已不再是首都，但它的存在感

依然是压倒性的。到了帝国末期，罗马城年久失修，曾经的壮丽在依旧强烈的阳光下暗淡下来。可是自建造当初开始，罗马就是那样的罗马，建城就要漂漂亮亮、一丝不苟。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皇帝驾临罗马后也无话可说。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罗马仍是异教文明首屈一指的都市。作为基督教徒，皇帝们也许都感到了罗马文明的强大压迫感。这些皇帝只是在举行非基督教式的凯旋仪式时才会移足罗马。

与罗马不同，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就没有这种压迫感。帝国末期的米兰在才情横溢的领袖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脚下，已经成为热情的基督教徒们的城市。对身为基督教徒的皇帝们而言，难道这里不是一座远比罗马更亲切的城市吗？

10岁丧父登上皇位的霍诺里乌斯也把皇宫安在了米兰。少年皇帝监护人斯提利科自然也把大本营放在了米兰。妻子赛妮娜也从这时开始离开君士坦丁堡，住到了米兰。可是，这也使得再也无人可以制止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反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了。失去了皇帝狄奥多西这位镇国之主，18岁的新皇帝又不问国事，从官僚层爬上来的宰相鲁菲努斯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肆意弄权。

西哥特人

有实力的皇帝死后，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业绩和任何作为的新皇帝，这对企图入侵的人来说是个好机会。公元395年春，先皇死后不到三个月，西哥特人便早早行动了。

进入4世纪以来，哥特人屡屡侵犯罗马帝国的领土。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哥特人一分为二为西哥特人（Visigoto）与东哥特人（Ostrogoto），分别由两位领袖率领。西哥特人是罗马帝国的“友好同盟”，率领西哥特人的是阿拉里克，他曾在罗马军队里打过仗。既然有

同盟关系，照理是不该侵犯同盟方的，但蛮族就是蛮族，一有机会就轻易撕毁协约。他们不在指定居住地色雷斯地区从事农业，而选择了掠夺这种快捷的赚钱方式。奸诈狡猾的阿拉里克避开斯提利科统率的罗马军驻扎的西部，把目标集中在已将精锐派至西部而防御薄弱的东部。他们离开多瑙河下游沿岸的色雷斯北部，大举南下。

南下宛如雪崩海啸。城寨、堡垒连准备迎战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打垮摧毁。历史研究者中有人主张，这种现象不是蛮族侵犯，而是民族大迁徙。但有如此暴戾的“迁徙”吗？

蛮族很少只以战斗人员——士兵来犯，几乎是以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拖家带口的家庭集团形式来犯。这不同于只用战斗人员前来迎战的罗马军。当然，在战场上只有男人相向而战，家属则在后方，把货车摆成圆形，人在中间等待。

但是，家属只有两军布阵会战的时候才在后方待命，刚开始袭击或是会战胜利后，妇孺老人也都积极参与杀戮和掠夺。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羸弱人群的杀戮行为造成的牺牲和掠夺造成的损失都很小，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经常是妇孺的残酷狠于大男人。再者，士兵要听从指挥官命令，只要指挥官愿意，局面仍可控制。但女人、孩子不受这种束缚。这帮人在族长统领之下，其暴虐行为很难控制。

话虽如此，既然有妇女儿童，牺牲于罗马军队迎击之下的人中，他们的比例就会更多。不过，文明之人才会敏感于人的牺牲，而非文明之人常常对此无动于衷。这是蛮族的特质之一，也是他们强悍的原因之一。所谓罗马帝国末期的“民族大迁徙”，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地进行的。

考虑到他们携家带口的情形，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南下的速度是相当快的。需要什么就抢什么，迁徙未携带家当和牲畜。很快，位于现在保加利亚一带的色雷斯和达契亚全境遭到蹂躏，连现今土耳其西部的重

要城市哈德良堡也被占领。罗马时代，哈德良堡这个取自建城皇帝之名的城市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沿古代“高速公路”罗马大道只有不到200公里。通往东罗马帝国首都的大门洞开。

同一时期在西部，斯提利科为使新老皇帝的更迭不被蛮族利用，正在奔赴莱茵河上游地带，建立防御体系。在这里，斯提利科收到了巴尔干地区的重镇哈德良堡落入西哥特人之手的消息。他立刻把部队一分为二，让第一军留下继续建立高卢的防御体系，自己则只率领狄奥多西从东部所带士兵组成的第二军奔巴尔干地区而去。

斯提利科已经被狄奥多西皇帝任命为“联军总司令”。这位35岁的武将认为，不仅帝国西部，东部的防御责任也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与西部邻接的巴尔干地区就更是如此。他不等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发号施令就奔赴了巴尔干地区，因为他坚信这是自己当然的职责。

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并非互不相识。这不是斯提利科的血管里流着汪达尔人的血、而阿拉里克是西哥特人出身的缘故，而是因为阿拉里克曾率领过“友好同盟”西哥特的汉子们在狄奥多西手下从军。这位西哥特人头领的生年不详，但从死亡年份倒推，我想他与斯提利科应为同一代人。

这年初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萨洛内附近的平原，这两个男人展开了正面对决。斯提利科始终占据优势，推进战斗，最终获胜。阿拉里克在战场上弃尸3000后逃入山区。

斯提利科追击并包围敌人，打算在第二次战斗中彻底解决敌人，然而手头部队不够。他一直在等待事先就命令从莱茵河前来的部队，可这些部队直到盛夏过后才抵达。

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来自高卢的部队也已到达，在让他们进行必要的休整之后马上就要打响第二仗的时候，斯提利科接到了来自皇帝

的命令，命令他前往希腊东北部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把这里作为集结地，是因为部队要取道水路自高卢而来。诗人克劳狄安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 ……骑兵紧拉缰绳，战马斗志高昂；号手最后擦拭着将在战场上嘹亮响起的军号，等待着总司令下达出击的命令。就在这时，急使手持皇帝的命令飞驰而来。斯提利科立即读了皇帝的敕令，当即目瞪口呆。然后抑制不住的愤怒从他嘴里迸出："一定是那个胆小鬼混蛋搞的鬼！"
>
> 那人是谁，就是不说全体将士也都知道。他就是以辅佐皇帝为名、独揽大权的宰相鲁菲努斯。回到充做营寨的宫殿，斯提利科的脸因爆发愤怒后感到屈辱而扭曲……

阿卡狄乌斯皇帝的敕令是命令总司令斯提利科把狄奥多西皇帝带到东部去的部队，径直送到君士坦丁堡，自己则率西部的部队向西折返。

斯提利科通过副官告诉即将发起进攻的士兵停止进攻。斯提利科进了宫殿谁都不见，过了好一阵才单把将军盖纳斯叫进来。盖纳斯虽出身哥特人，但长期在罗马军队中从军，在军内的升迁完全靠的是自己的才能。斯提利科委派他指挥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士兵。

已经完成进攻准备的部队突然被命令停止进攻，各回基地。万人规模的部队是不可能立即就掉转方向的。而且，军队有个特点，若不能基本自给自足，在军事方面就不能发挥作用。不要说进攻，哪怕是行军，也不是只要战士服从就办得到的。军队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新进行适应行军的准备。

这些准备用了多少天无人知道。总之，此次取道陆路回西部去的斯提利科和他的部队进入意大利时已是冬天；盖纳斯率领的东去部队到达君士坦丁堡郊外时也已是11月末了。

迎接归来的将士是军队最高司令皇帝的义务。阿卡狄乌斯皇帝要在离君士坦丁堡市区1罗马里（约1.5公里）的练兵场检阅归来的士兵。宰相鲁菲努斯当然也要出席。公元395年11月27日，在满脸对国事不在乎的18岁皇帝面前，指挥官盖纳斯一声令下，阅兵开始了。

仪式进行到将近一半时，队列行进到皇帝面前。突然一队士兵离开队列，冲向站在皇帝右边的鲁菲努斯。飞剑出鞘，边上的人还未及叫出声来，一切都已结束。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夸耀权势的鲁菲努斯，在满脸苍白、全身颤抖的皇帝脚下，倒在血泊之中。

东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被杀，却完全没有引起混乱，因为立即就有别的当权者取而代之了。这个人就是皇宫的侍卫长尤特罗庇乌斯。这个宦官平安无事地收拾了一切。

刺杀鲁菲努斯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

皇宫内的敌人是皇后和以与皇后狼狈为奸的侍卫长尤特罗庇乌斯为首的宦官们。皇宫外的敌人是民众，他们对严苛的重税感到绝望，而一有抗议就会被派来的军队无情镇压，痛苦不堪。总而言之，没有人为鲁菲努斯被杀而感到悲伤遗憾。人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与刺杀鲁菲努斯有关。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里面是有关系的。

罗马帝国内部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给了在夏季战斗中败给斯提利科而逃进山区的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充分时间。

阿拉里克

第二年，即公元396年的春天，阿拉里克再度率西哥特人行动起来。斯提利科去了西部，巴尔干地区已无障碍。

君士坦丁堡有盖纳斯指挥的东部军队，但阿拉里克并不是要避开这支军队，而是要避开进攻大城市，因为攻城必然会导致持久战。

蛮族的入侵就这样自北向南席卷了希腊。祸害了马其顿之后进入亚该亚地区的西哥特人攻占了雅典，攻陷了科林斯。埃莱夫西纳这个以哈德良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在此参加厄琉西斯秘仪而闻名的地方也遭到掠夺。蛮族的铁蹄甚至踏进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城市阿戈斯。

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素有“斯巴达式的严酷”之称，却自古与有钱人无缘，这样的穷地方也没有逃过蛮族的蹂躏。蛮族的目的是劫掳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和孩子。富人们受到威胁后可以交出藏起来的金钱。不那么富有的人一想到要把自己的孩子卖身为奴，就会不惜一切手段筹钱赎身。父母筹不到钱的孩子就只有被卖身为奴的命运了。

就这样，在那一年之中，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希腊全境如入无人之境，横行霸道，极尽暴戾。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明明知道，却只作壁上观。阿卡狄乌斯皇帝给盖纳斯将军下的命令只有一个：巩固首都防御！

刻在印章上的阿拉里克肖像（印章上是反刻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别人，也想大大利用一下这种机会，更何况是阿拉里克。只要想做，很快就能控制住希腊中南部。可是希腊的这一地区多山，耕地贫乏。正因为如此，古时希腊人才会在贸易和迁徙海外方面气运旺盛。哥特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在无物可抢、无人可掳的地方留着也是白留。于是，到了公元397年春天，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为寻找有物可掠的

地方向北开拔了。

他们北进的步伐恐怕和先前怒涛一般南下时不同，速度一定会慢下来，因为要带着抢来的财物和人口，何况这也不是和平形势下的迁徙。这次，希腊西岸地带从南向北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我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收到了阿卡狄乌斯皇帝的命令或是要求，他开始出兵了。他亲自率军直奔希腊。他们从意大利半岛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港口出港，南下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爱奥尼亚海，在希腊西北部登陆，将一路向北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挡在了眼皮底下。

不过并没有立即开战。士兵们建起了一道长长的围栏，打算把包括女人孩子在内的西哥特人赶进去。这次的作战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按我的想象，斯提利科似乎是等他所欣赏的盖纳斯指挥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到达后再开战。如果从北面和东面两面夹击，就有充分把握给西哥特人致命一击。

罗马军队传统上偏好一举投入大军迅速解决战斗的战法。共和政体时代是这样，进入帝政时代以后仍然一成不变。他们淡然无视那些“对微弱之敌不须投入大军”的批评。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战争中，拒绝投降、坚守马萨达要塞的犹太人只有区区500人。尽管马萨达要塞建在高耸的悬崖之上，易守难攻，但罗马军队竟对坚守这里的500人投入了6000人的兵力。罗马人对渐次投入兵力，即间断性投入兵力的做法非常厌恶。那样做结果会演变成为持久战，要付出原本可以不用付出的牺牲。但是，这种作战方法与帝国衰落的程度相一致地被人忘却。公元397年春天，君士坦丁堡的部队终未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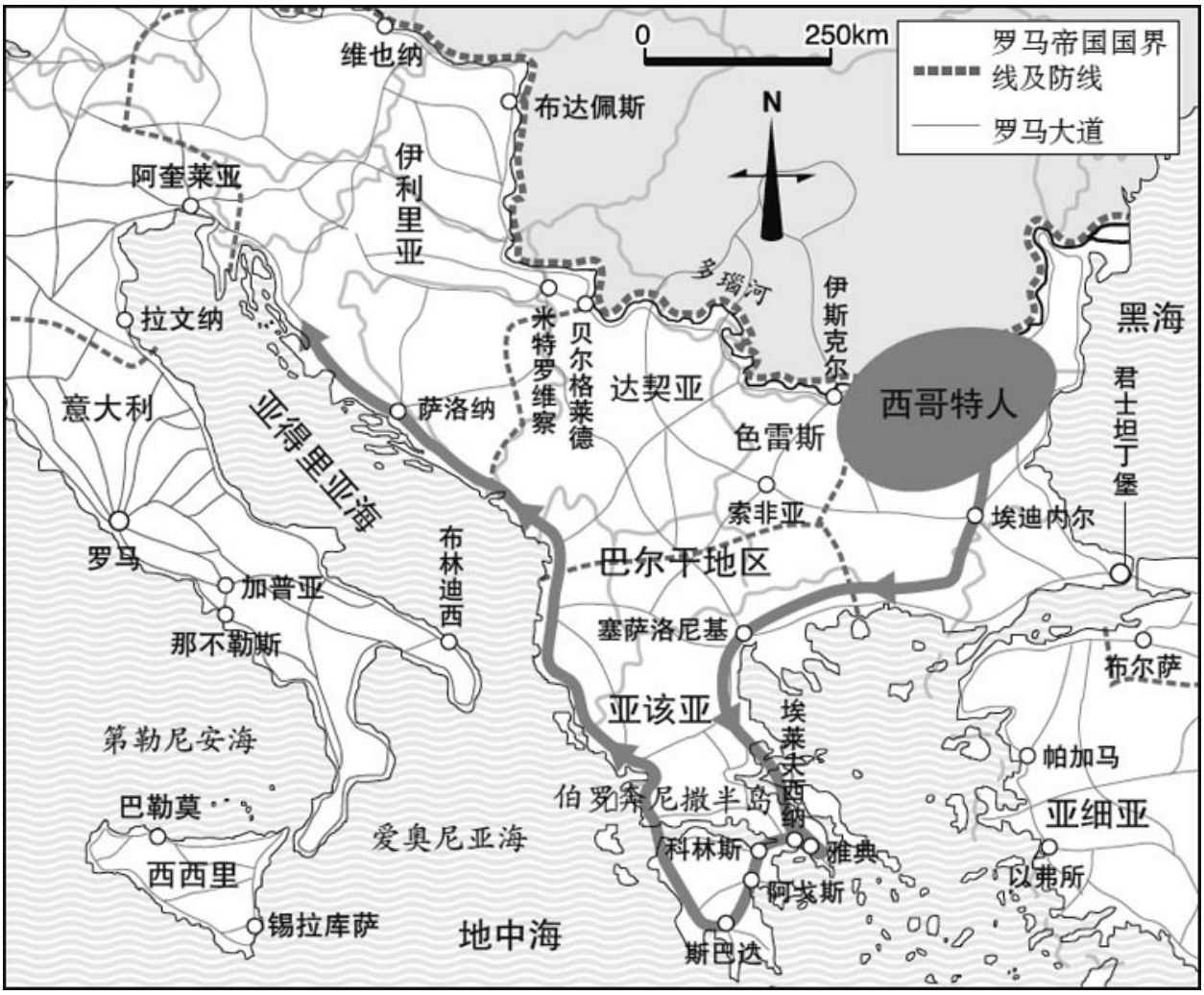
相传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的士兵总数为60万。但在其后的百年间，兵力逐渐减少。有研究者说，进入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5世纪时，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了三分之一，弄不好甚至到了四分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连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能够率领出征

的兵力顶多一两万人。这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一个军团，这样的战斗力，终究是不可能包围并消灭西哥特人的。

结果，斯提利科只能靠从意大利带来的兵力对付阿拉里克。不过这次战斗的胜利者依旧是斯提利科。阿拉里克再次败北，只得丢弃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逃进了山区。

然而，君士坦丁堡对斯提利科的责难之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斯提利科也是蛮族出身，阿拉里克也是蛮族出身，同是蛮族，斯提利科在战斗中手下留情了。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中甚至有人发出了应该把斯提利科定为“国家公敌”的声音。斯提利科心情大坏，他停止追击，直接率军返回了意大利本土。这又给了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将暴行的舞台转移到了希腊西北部一带。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离开后，位于希腊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就安全了呢？完全不是那样。横穿希腊北部的埃格那提亚大道直接连接着曾经叫做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这座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很快就会因为看到大道对面的西哥特人而恐惧得夜不能寐。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

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阿卡狄乌斯皇帝手中，而在皇妃优多克西娅和积极帮助她当上皇妃的宦官尤特罗庇乌斯手中。优多克西娅是法兰克人出身的一位将军的女儿。这两个人在商量如何消除阿拉里克的威胁，结果想到一个计策，21岁的皇帝只是在提交上来的文件上签了个名。

西哥特人的族长阿拉里克被正式任命为罗马帝国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还是“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 per Ilyricum）。伊利里亚是指北起多瑙河南至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域。这块地域公元2世纪以前被分为近潘诺尼亚、远潘诺尼亚、诺

里克、达尔马提亚四个行省，是作为铁壁来守卫的保卫多瑙河中游的“防线”。这条防线被称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能否发挥作用的晴雨表，备受重视。因罗马军团基地驻扎而成为城市的文多博纳（今维也纳）、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都面向多瑙河，罗马一直严密监视着河对面的蛮族。

这一区域对4世纪末的帝国防卫而言，地位极其重要。昨天还在掠夺帝国子民、焚烧破坏城市的人物，居然被任命为统领这一带的大元帅。而且，族长既已正式获封，其属下自然成为皇帝承认的“友好同盟”。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袭击掠夺了。只要下令，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儿子被杀也好，妻子被奸也罢，现在都必须服从“大元帅”阿拉里克的命令，这是皇帝的旨意。

给阿拉里克的待遇并非特例。但是，过去都是在罗马方面战胜后，与被打得穷途末路的蛮族缔结同盟关系，蛮族向罗马军队提供兵力才能成为自己人，才能被任命为“大元帅”，成为“友好同盟”。对阿拉里克做法的不同在于，这样做把罗马帝国一受到威胁就屈服的事实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风潮蔓延到其他蛮族只是时间问题。

罗马帝国不但处于蛮族的袭击之中，还会处于蛮族的胁迫之下。

阿拉里克出任“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又面临了别的问题。

伊利里亚地区在众多史书所载东西分离后的罗马地图上，明确属于西罗马帝国，但那是东西罗马帝国明确分裂之后的状况。眼下，狄奥多西皇帝死后尚不到3年，东西界线还没有那么明确。当初也只不过是狄奥多西皇帝给两个儿子分工，由长子负责东部，次子负责西部而已。狄奥多西遗言的本意是兄弟二人友好地统治帝国，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要用一条明确的界线把东西罗马帝国完全分开。

狄奥多西皇帝在负责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死后一个人统治、保卫帝国长达12年。他是出身于西班牙的拉丁系罗马人，并没有同时代希腊系罗马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轻视西部的倾向。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没有谁考虑和实施过把帝国分成东西两部，狄奥多西也不可能强行分割帝国。元首制时代的皇帝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等人自是当然，就连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的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也都是让人分担防御，并没有把国土分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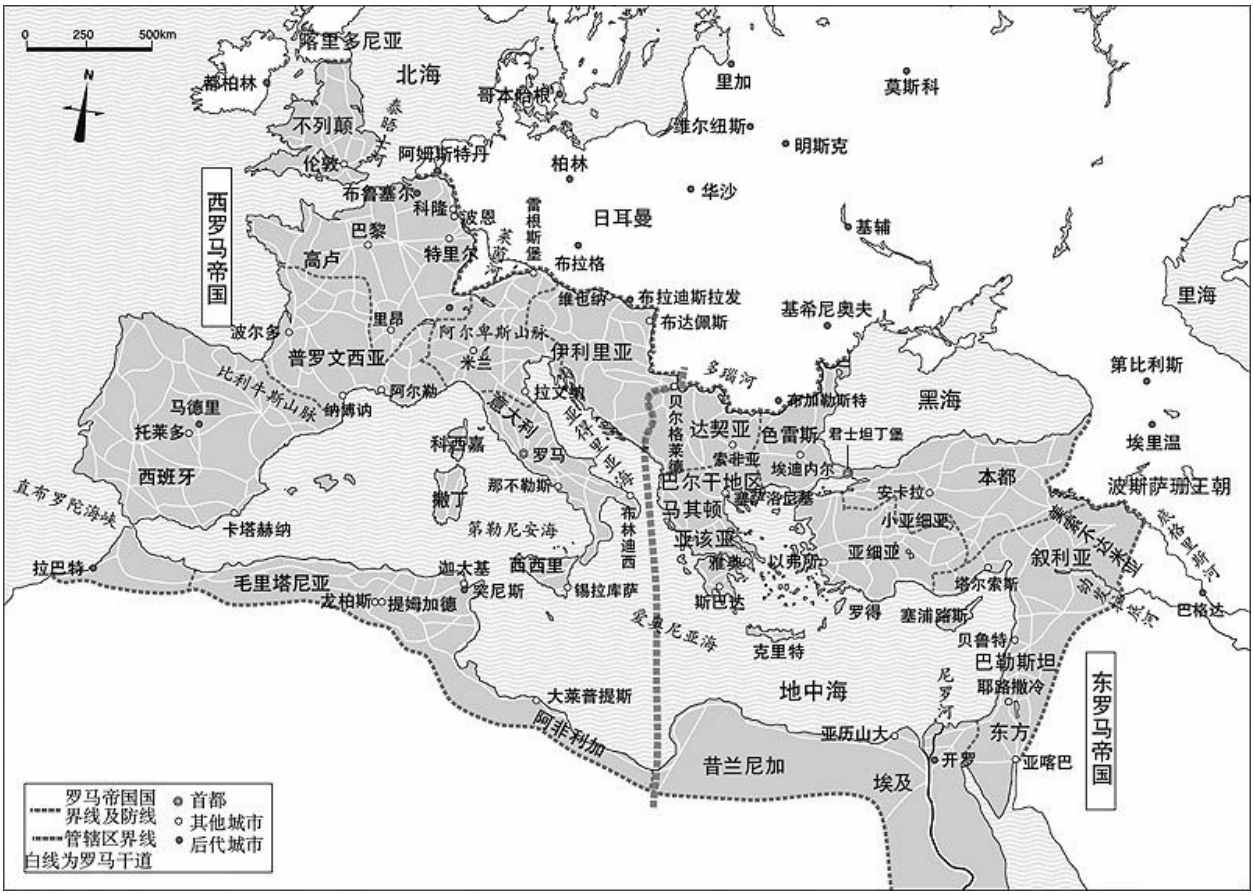
狄奥多西被称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亲自带兵的皇帝，他不会破坏罗马皇帝的传统。但他死后罗马帝国东西分离了。主要原因是与西部分离的想法在东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段时期正好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由拉丁系罗马人变为希腊系罗马人的时期，君士坦丁堡可被看做东罗马帝国政府所在地。

任命阿拉里克为“大元帅”，也是这种想法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渐占上风的具体表现。他们的真意是把麻烦制造者从自家庭院中体面地赶出去。被赶走的人去了别家院子，与赶走他的人并无关系。

但是，即使狄奥多西皇帝没有明确定下分界线，即使同样都与多瑙河相接，看看地图就能明了，达契亚、色雷斯属于东部，而伊利里亚属于西部。多瑙河被视为帝国最重要的防线。起自边界，沿着上游和中游沿岸的道路几乎全都朝向本土意大利，也就是帝国西部。而起自多瑙河下游边界的道路则朝向君士坦丁堡，即东部帝国。

这在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之前就是这样。从叙利亚安条克出发去意大利罗马的皇帝，顺便视察多瑙河防线，再前往意大利的例子不在少数。当然，当时从东部行省叙利亚直通帝国本土意大利的道路，不论陆路还是海路都很畅通。从东部出发绕道多瑙河，再从那里前往本土意大利，走这一路径可能出于军事需要。皇帝可以因军事原因绕道，而行政官、商人则没有必要绕远路。

这样，起于多瑙河的罗马大道可以大致分为东南向和西向两种。而起于伊利里亚的道路几乎都是通往西部的。这个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由昨天还暴戾恣睢的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心情自然不能平静。



公元5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古代的罗马世界不可理解。伊利里亚地区相当于现代的“中欧”南部。而意大利属于南欧。古代的罗马世界不但包罗了从中欧南部到西欧的地区，还包罗了从北非到中近东的地区。从伊利里亚地区北边的维也纳到意大利半岛东北入口的阿奎莱亚，其距离与从阿奎莱亚到罗马的距离相当。而且，伊利里亚地区南临亚得里亚海。出海到意大利半岛只需一天行程，现代的非法入境者用橡皮艇都能渡过。也许换成现代非法入境者的心境会更容易感受古代的罗马世界。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确实“搞不懂”西罗马帝国的防御。而且，不论是出于地理上还是出于防御上的理由，伊利里亚都当然地归属于西罗马帝国。把它送给蛮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心术不正的做法。

罗马帝国的东西分离，是“东部”分了出去。东罗马帝国被希腊人建成了单一基督教帝国，而西罗马帝国虽说也是拉丁人的基督教帝国，但异教时代的罗马色彩依然浓重。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许并没有视西罗马帝国与自己性质相同。这样一来，罗马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半就成定论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应忘记。尽管罗马世界东西分离了，但南北并未分离。用现代的观点看，这又是一个古代罗马帝国不可理解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也换成非法入境者的观点去考虑，就非常便于理解。同时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形：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甚至侵入了与亚得里亚海隔海相望的现今的克罗地亚，这时实质上独自管理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暂且放下阿拉里克，去认真处理风云突变的北非问题。

地中海为“内海”的时代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攻破迦太基，把霸权扩张到了北非。已经被打败的迦太基人及其他许多民族久已定居在北非，其中，摩尔人就是一个主要居住在现今摩洛哥一带的民族。这个地方在罗马时代开始被称为毛里塔尼亚，因为那里居住着罗马人称之为“毛鲁”的毛里塔尼亚人。从拉丁语的“毛鲁”派生出了“摩尔”、“摩洛”这样的称呼。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和威尔第作曲的歌剧《奥赛罗》的主人公就是摩尔人。

摩尔人与同为北非民族但居住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不同，他们肤色浅亮，身材并不威猛。摩尔人是通商民族，不论陆路海路都颇

具行动能力。

罗马人尽管是征服者，但总是会把被征服者当成自己的命运共同体，用罗马人的说法叫做“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将此作为自己帝国的基本政治方略。其实，罗马人所认为的“帝国”本身就是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共存”不过是再当然不过的观点。在罗马人看来，连百年以来反复死斗的迦太基人都已被吸收，把摩尔人吸收到自己的社会中来也应理所当然。

古代北非还盛产良马，毛鲁人在罗马军队中多为骑兵。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图拉真皇帝指挥的达契亚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卢修斯·昆图斯。“图拉真记功柱”至今仍矗立在罗马市内，通过浮雕“讲述”着那场战争。他是纯种的摩尔人，后来被选为执政官，姓名也改成了罗马式的。雕刻在这根圆柱上的战场人物图景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除图拉真以外，就数他了。这位摩尔人当时率领毛里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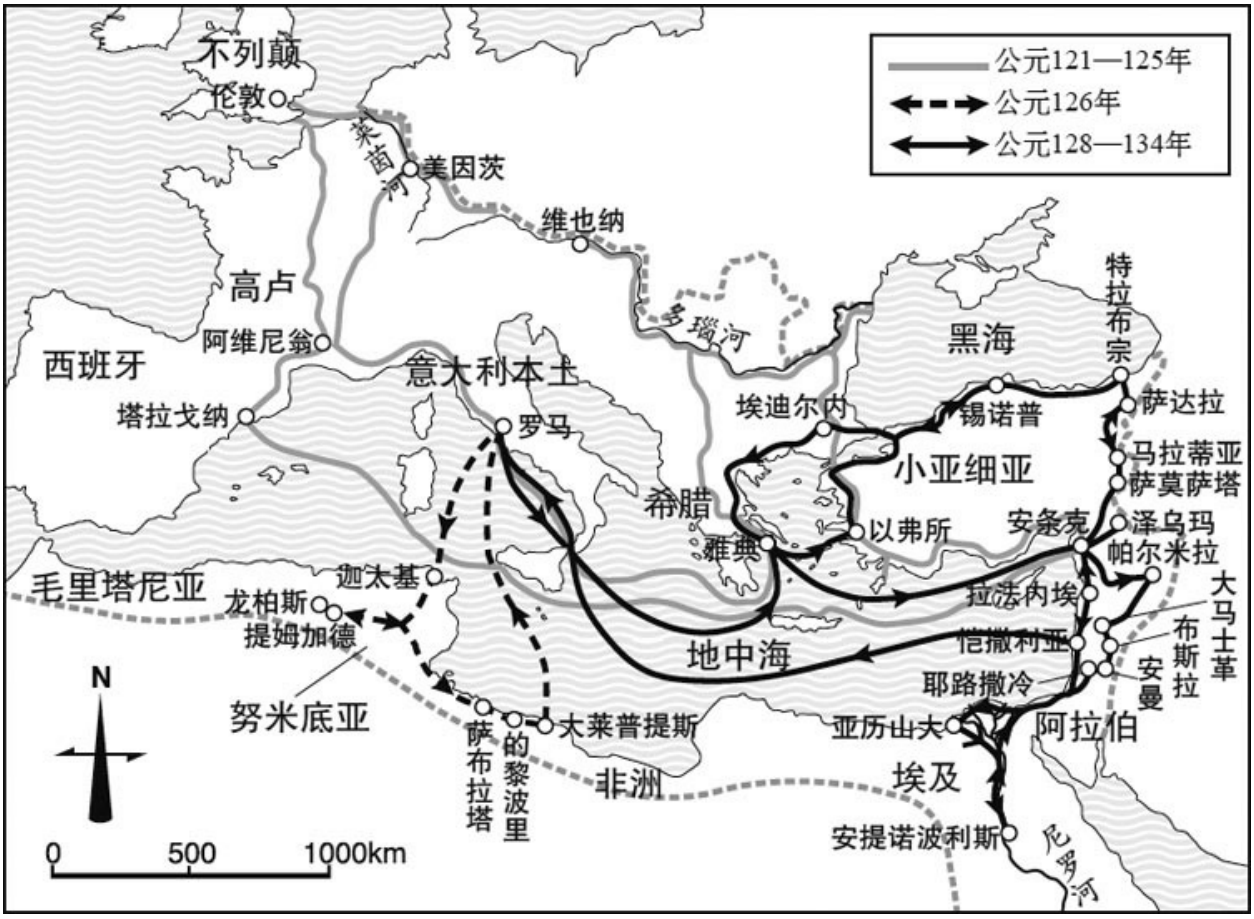
在罗马的威势行遍帝国全境的元首制时代，帝国内部的异民族也接受了与罗马人共存的状态。除了犹太民族，几乎没有发生过叛乱。这也证明了共存路线的作用。然而，如果在共存过程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异民族也会向离反的方向转向。在北非，这种“共存”的时间很长，已经超过了500年。不过，再怎么是“大家庭”的一员，假如火车开始狂奔暴走，自己想要跳下去逃命也是人之常情。

在罗马帝国时代，“行省”的状态如实地反映了国家是否在发挥作用。在罗马，历代皇帝多有被授予“国父”尊称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不过与流着相同血液的人组成的家庭不同，光坐着当不成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家长。

在《罗马人的故事10 ·贤君的世纪》中，我曾讲述过图拉真皇帝的故事。我把他比做规规矩矩地回复每位职员电子邮件的总经理。这位皇

帝不仅过目受任统治行省的总督们发来的报告，还不惜时间认真而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同一卷中叙述的哈德良皇帝，更是不坐等报告，亲自到各行省去巡察，在现场当即解决行省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有这样的跨国企业老总，他会在任职期间挨个儿视察分散在各国的海外企业。哈德良皇帝就很像这样的老总。这对被委以重任的人来说是一种责任，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尽管有几个例外，但都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可是，这样的“家长”在2世纪末以后消失了。3世纪，“家庭”在蛮族的大举入侵下风雨飘摇。4世纪，“大家庭”这个共同体自身的含义也因基督教而改变。这两个世纪以后，“家长”已无余力照顾到所有的家庭成

员了。行省的总督们成了断线的风筝。这种弊害在北非的表现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

非洲叛乱

罗马人说到“非洲”，是指除埃及之外的非洲北部。罗马时代，从东向西排列着昔兰尼加、的黎波里、阿非利加直属领地（前执政官统治的阿非利加）、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恺撒利亚、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等六个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这北非的行政长官们比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像“断了线的风筝”。因为在北非，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基督教教会势力强盛，这些行政长官的统治也变得随心所欲。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东部强而有力的教区的时代，帝国西部强有力的教区是罗马和迦太基。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因影响巨大而闻名于世，但那靠的是他个人的才干，并非因为米兰教区很强大。所谓教区强大，是指信徒众多，教会资产雄厚，与当时的当权人物关系密切。当然，取得并维持这样的特权，没有主教的才具发挥影响是办不到的。

尊敬、敬意和崇拜这些无形的感情有时也会转化为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既然宗教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就不会与这一现象无关。这极端类似于在金钱是绝对主角的金融世界里，信用所起的重要作用。以迦太基教区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教会的强大，受惠于这里卓越的神职人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热心于宗教活动。

这样的神职人员中，就有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最后总结的那句话便是他说的。他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想逃避4世纪后半叶时常发生的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那他一

定可以逃脱。事实上，他曾经逃过一次。但想到自己是主教，他便自首而殉教了。

虽然自己最终殉教了，但他很宽容那些因受到镇压而离教的信徒重新皈依。也许他认为“牧羊人”有自身的责任，但向“羊”要求那么多则有悖于人性。我觉得，即使自己与他生于同一时代，听了他的说教，我也不会成为基督教徒。但我大概仍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时代的良心”。不过，他那些想法一旦传布开来，必定有人反对。同为北非主教的多纳图就谴责居普良和他的支持者们太温和。于是，人们把不同于居普良宽容派的强硬派称为“多纳图主义者”。

北非及其周边

多纳图主义者认为，教会应该纯粹是由无罪的人组成的信仰组织。这里的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信仰上的罪。犯了这种罪，光靠忏悔不行，必须重新洗礼，从头来过。现实生活中的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的区别，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天主教承认世俗机构——罗马帝国，而多纳图主义者不承认现有的组织，不论是罗马还是其他。

在基督教获得承认，尼西亚公会议决定三位一体教派即天主教派为正统后，多纳图主义者在罗马帝国自然就成为“异端”而受到排斥了。

可是，当时北非纯情的基督教徒断比罗马要多，多纳图主义者的数量也多于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其他地方。这两派为寻求妥协点而召开了正式会议，双方出席的主教人数不分伯仲。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旗鼓相当。这种状态之下，被打成“异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体制派，多纳图主义者就是反体制派，抗议行省政府的恶政，就成了他们的特色。于是，在北非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出现利用形势的野心家。摩尔人吉尔多就是这样的人。

多民族国家的罗马帝国，对败给罗马接受罗马统治并融入罗马社会的人，即使是异民族出身，也是敞开门户的；也认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为罗马帝国“大家庭”一员的部族。完全被罗马社会同化并产生过皇帝的旧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而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鲁”的摩尔人则较倾向于后者。现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里塔尼亚，也是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摩尔人。

吉尔多出身于摩尔人的望族人家。在行省，实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罗马军团中积累资历。吉尔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当过罗马军队的将官，他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长兄菲尔穆斯不知何故对迦太基总督发起叛乱。行省政府一时未能采取措施断然镇压，叛乱的烈火瞬间蔓延。那时狄奥多西皇帝还在世，对北非叛乱不容放任。他从欧洲调军极力镇压，吉尔多则加入其中，箭射亲兄。

镇压行动以主谋菲尔穆斯被杀而告终。狄奥多西任命吉尔多为以后北非防御的负责人。罗马皇帝授予这位摩尔人的官位是“负责非洲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e）。在行省总督不能充分尽职的4世

纪末，这实质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尔多觊觎的是有名有实的北非最高地位。

狄奥多西皇帝之死给他带来了机会。继位的是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年龄都小，而继承北非所在的帝国西部皇位的霍诺里乌斯还只是个10岁的少年。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当时，吉尔多还没有明确态度。两年后他迈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担任大元帅的北非不向身在米兰的皇帝霍诺里乌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断，“主人”在远方自己更能随心所欲。

紧接着他又迈出了第二步。如果吉尔多出生于公元330年的说法正确，那他当时已经67岁。也许他觉得不能再耗时间了，于是迈出了这一步：北非向意大利禁运粮食，禁止满载小麦的所有商船从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自从罗马战胜公元前3世纪以前一直绝对强于自己的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来，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尤其是首都罗马的主食小麦就开始依赖海外进口，这已经成为持续了550年的传统。其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半岛缺少大面积耕地，出产的小麦在价格上竞争不过拥有大片耕地的西西里和北非等地。于是罗马就把进口小麦变成了一种统治其霸权之下各国的政治策略。

人们往往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屈服于人，而一旦自己对霸主有用，对霸权的抵触感就会淡化。大概胜利者罗马觉得应该容忍失败者长年积累的某些东西，尊重失败者的心情，这样统治起来会更容易。

于是，对拥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学府的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做法，不是将其教育机构迁到罗马，而是让罗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学。

而且，布匿战争开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农耕的书籍，准确地说是农作手册。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样也是高效的农场经营者。罗马攻破了迦太基，将他们的特点——通商与农耕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北非变成了罗马的粮仓，迦太基人的船只将以小麦为主的农产品运往意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驻有分公司。征服者罗马也是通过购买尼罗河流域出产的小麦，使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从而统治了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自己独占一切，是统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过，主食依赖进口以后，保障粮食供应便成为历代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皇帝们为储备小麦、维持其品质付出了心血，而把这些只作为内幕历史去讲述未免可惜。

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这种关系已历时550年。吉尔多似乎认为，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小麦是手中的强大武器。他使用这一武器的目的，当然是要把北非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

把西罗马帝国置于军粮攻势之下，这种战略的着眼点确实高明。事实上，罗马民众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市场。

仅此一点，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就是值得忧虑的事态。北非民众有近一半支持吉尔多，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吉尔多拥有“大元帅”的正式地位，但他把一个世纪以来反抗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纳入了自己一方。

这些被称为“多纳图主义者”的人被天主教打成异端，长期受到排斥和镇压。粗略分类，我们可以说居住在被罗马同化较快的城市里的旧迦太基系居民信奉天主教，而在同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则更多的是多纳图主义者。可见，多纳图主义者们一直被排斥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北非号称罗马帝国的粮仓，与意大利半岛的生意兴隆，但更多的利益落在了中间商而非生产者手里，这一点古今东西概莫能外。

这样来看，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变得不可小觑，是有着宗教

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诸多原因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被奉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教父”，列为圣人。但不论他多么真心地说教，对多纳图主义者也未见效果。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一旦宗教介入进来，就不可能会有妥协。对北非的多纳图主义者而言，天主教徒只能是信仰错误教义的可憎敌人。同一个宗教内部的异端排斥比异教排斥更加阴险、更加残忍。这是一种历史事实，并非只表现为席卷中世纪的异端裁判。狂热的反体制反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吉尔多身上，因为他是摩尔人，与现有统治阶层有着距离。

这是即将进入5世纪时的北非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名为霍诺里乌斯皇帝的辅佐，实际上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当然要思考解决办法。最终，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联军总司令”选择了果敢而慎重的解决办法，与他37岁的年龄十分相称。

他首先发出紧急命令，从高卢和西班牙大量进口小麦，以图平息市场风波。然后，估摸这些小麦将要上市，他前往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要求作出决议，认定大元帅吉尔多为“公敌”（hostis publicus）。面对远比自己年长的元老院议员们，年方37岁的他侃侃而谈：

> 我们的食物被一个摩尔人随心所欲地掌控着。这个人恣意妄为，他不是供应者，却是胁迫者。

仰慕斯提利科的诗人克劳狄安这样写道：

> ……没有元老院的决议，军队不能进军。这是罗马人自古以来的做法。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斯提利科恢复了罗马的这个好传统。元老院议员向将军下令，军队才能开始军事行动。这一做法使得罗马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打心里说，看到罗穆路斯以来的法度权威复活，武器服从元老院的决定，这多么令人喜悦……

所谓仰慕者，有用却也有麻烦。首先，与生活在4世纪的这位埃及出身的罗马仰慕者所认定的不同，政体已经历经了王政、共和政体和元首制的变化，而历史上，元老院却没有一次仅由文官组成。在罗马这个国家，文官和武官从来没有区别。直到进入4世纪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而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元首制，它已经变成了绝对君主政体的帝国。

最高权力者不再是“元首”或“第一公民”，而变成了“绝对君主”。最高权力者的辅佐机构、具有控制其权力作用的“元老院”地位下降也就理所当然。进入4世纪后，元老院的权威和权力急速下降，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文官与武官有了明确分离。

没有实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威。诗人怀念的昔日元老院是文官的，同时也是武官的。传统的罗马元老院是由通晓军事的政治家组成。正因为如此，元老院对是否宣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能作出在军事上合适的判断，打胜仗的概率很高。

斯提利科在以往的战斗中显示出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不可能一味地怀古，去向百年来从未上过战场的元老院议员征询是否能远征北非。他向元老院要的是自己这个“联军总司令”对原本是同僚的“大元帅”吉尔多开战的大义，要的是名分。尤其是他在罗马人眼里是蛮族出身，大义、名分就更为必要。不管怎样，对手是比汪达尔人早数百年就开始与罗马人共同战斗的摩尔人。

元老院颁布的“公敌”宣言将从侧面支持军事行动。如果战争的对象是公敌，军队就可以招募在大农庄干活的农奴充军打仗。如果农庄主不愿意，就会被课以每个农奴25枚苏勒德斯金币作为代偿。当然，这个代

偿金会被作为佣兵费，用来雇用对在罗马军中服兵役感兴趣的蛮族人。这也是罗马帝国军队中蛮族兵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对斯提利科的请求，大农庄主占主流的元老院出于这一原因不肯发布“公敌”宣言。大农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来自北非的进口断绝，也不会像老百姓那样受到影响。当然，一旦粮食从市场上消失，就会发生民众暴动，大农庄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但斯提利科的紧急进口已使市场平静了下来。

面对目光狭隘、只知利己的元老院议员，斯提利科不得不诉诸强硬手段。他请皇帝霍诺里乌斯从米兰来到罗马，在元老院的议会厅发表演说，陈述讨伐吉尔多的必要性。十二三岁的少年只是念念斯提利科写好的文章而已。这样就成功地使得远征北非成为皇帝、元老院也共同参与的举国军事行动，而不是斯提利科的个人想法。在皇帝在场的情况下，元老院一致通过了把吉尔多定为“国家公敌”的宣言。

远征北非并非斯提利科亲往。应该说他不能亲往更正确。现在，阿拉里克这个甚至合法取得了大元帅地位的人正带着西哥特人属下盘踞在意大利半岛附近。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大利不能没人。他把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最适合代他讨伐吉尔多的武将。

这个人是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他在与哥哥吉尔多的争斗中败北，逃到了意大利。传说兄弟阋墙的原因是吉尔多为了实现野心，不惜与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联手，而热情的天主信徒马西泽尔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宗教的掺和，争端愈发激烈，马西泽尔的两个儿子被吉尔多杀死。马西泽尔不得不亡命意大利。弟弟对哥哥吉尔多的憎恶，又加上两个儿子的被杀之恨，狂热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支撑着马西泽尔，要打倒异端多纳图主义者！斯提利科选择他的理由也在于此。

马西泽尔率领的讨伐军规模称不上军团，士兵只有5000人。但这5000人不单是作战高手，还全部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斯提利科选拔这

些士兵的意图很明确。敌方除了天主教士兵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多纳图主义者士兵参战。派坚信自己是正统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去，就可以达到分裂敌军的目的。

这次作战完美成功。马西泽尔率领5000兵马在北非登陆。与之对峙的吉尔多军人数近乎他的15倍，达7万人之众。两军在平原上布阵完毕，马西泽尔独自一人挺出中军，大声喝道："这是一场正统基督教与异端的战斗！"真是一声定胜负。吉尔多方的天主教徒士兵们扔掉武器，无心恋战。并非狂热基督教徒的摩尔人士兵们见状也脚下不稳，只想逃跑。全线崩溃了，吉尔多也望风而逃。他不久被抓住，在马西泽尔面前被斩首。就这样，公元398年夏，讨伐军从比萨港出发不到半年，北非便再度回归西罗马帝国。

马西泽尔却未能作为胜利者进入迦太基城。传说他在去迦太基城的途中，过桥时坠入河中，因身着沉重盔甲而溺亡。他也是摩尔人，但他反吉尔多，反多纳图主义者。马西泽尔死后，立即就有别人继任指挥官。这人不是摩尔人，他事先被斯提利科派去讨伐吉尔多。斯提利科还委托他重新整顿吉尔多统治多年的北非。

北非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不仅老百姓因为不用再担心主食小麦紧缺而欢喜，以前总是不配合的元老院也决定在古罗马广场建造斯提利科立像，承认他的功绩。在罗马中心立像，从这里成为帝国的大脑和心脏时起，就是罗马男人的无上荣耀。

不过，斯提利科未被允许模仿共和时代罗马的领袖们，建造公共建筑赠送给市民。帝政之后，沐浴胜利荣誉的是皇帝，建造公共建筑还礼的权力也在皇帝。

吉尔多的财产被悉数罚没，成为胜利者皇帝的所有。由于吉尔多擅权已久，财产数额巨大。斯提利科决定以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和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名义，将吉尔多的财产统统用于全面修复

向罗马城输送新鲜水水渠的工程。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当然都要镶嵌镌刻下令建设者名字的石板，明确记载下令修缮修复者的名字也属惯例。罗马人非常了解维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形成了特有的惯例。公元398年，罗马人也遵从了这一惯例。镶嵌于耸立的水渠桥壁面上的大理石板上，有如下记载：

> 皇帝阿卡狄乌斯和皇帝霍诺里乌斯接纳尊敬的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的进言，投入皇资，完成了此水渠的修复工程。特记于此。

但是，年已38岁的斯提利科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得意忘形。他没有忘记元老院至今还在执拗地反对他。蛮族的出身背景经常困扰着他，他感到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时代，很多父母给女儿起名玛丽亚。斯提利科决定把女儿玛丽亚嫁给皇帝霍诺里乌斯。霍诺里乌斯14岁，玛丽亚似乎年纪略小。还是少男少女，不能指望他们马上生儿育女。但至少斯提利科成了皇妃的生父，同时也是皇帝的岳父。斯提利科认为，先帝狄奥多西托付自己辅佐少年皇帝，如果自己又成了皇帝的岳父，反对派就难以反对他了。

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个地位，在公元398年迅速解决了北非问题之后，斯提利科的威势也是不断上升的。但是，权力和威势也会因为细小的原因而急转直下。38岁的联军总司令希望在威势下滑之前更加巩固自己的地盘。从以后他要干的事情来看，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地盘不稳。对他这位做任何事都有“蛮族出身”困扰的人来说，这更不能容许。

随着罗马历史走近尾声，我感到有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慢慢地却是实实在在地膨胀着。人的走运与否不是与他自身的才干，而是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斯提利科的后半生不就是一个典型吗？生活在高速发展时期——共和时代和稳定发展时期——帝政即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人，不会去直面某些难题，而生活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去面对。

在罗马人眼中，斯提利科身上确实流着蛮族汪达尔人的血。如果他生活在坦然包容异民族的开放的罗马帝国，他的军事才能一定会得到认可，一定会被委以重任，保卫帝国的重要防线，一生都会生活在赞扬和名誉之中。可是，人类社会也会随着活力的劣化变得封闭起来。这与时代的进步完全无关。虽然在5世纪许多事情做起来比在2世纪以前方便得多。

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表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成为体现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绝对君主”。人事神定，人类不可随意加以改变。这个后人所谓“君权神授说”的体制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创的。此后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体制稳固运行。即使5世纪上半叶的皇帝们平庸无能，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证实了这个体制的有效性。

除了皇权神授的天条以外，对斯提利科来说，还有一条保护霍诺里乌斯皇位的义务，那就是他在皇帝狄奥多西临死前当面的誓约。罗马人是崇尚法治的民族。这样的法治民族不仅认为签了名的誓约书具有效力，他们认为口头誓约也充分有效。用现代的说法，这是“君子协约”。这是双方相互信赖而立下的约定，在日本叫做“男人的约定”。毁坏这种誓约而不感到羞耻，正是罗马人所认为的蛮族做法。要做到比罗马人还罗马人的斯提利科根本不可能破坏誓约。

不过，尽管拥立了少年皇帝，斯提利科实际上仍得事必躬亲。这就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这时，罗马帝国的一切都与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了。

不论是否称为国家，人类社会大体由生产者和非生产者这两种人构成。二者很难严格区分，但如果要划分一下，应该是下述的情况：

所谓生产者，用汉字表达就是从事农、工、商的人们。有人会说“商”自己不生产。但出于流通连接着下一个生产环节的理由，我将其

列为生产者。

所谓非生产者，就是负责政治、行政和军事的人们。他们自己不生产，其职务是建设能够让生产者专心于生产的环境。他们与农、工、商三者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这两个阶层对人类社会而言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非生产者阶层的责任更重，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硬件、软件两个方面完善社会基础建设。我认为，基础建设依靠个人努力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应由社会来做。尽管个人可以做到每夜锁好自家房门，但外敌侵袭靠个人却是防不胜防的。

从农民到农奴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农民是生产者的代表。罗马帝国从3世纪到5世纪逐渐走进了衰退。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期间农民的情况。

3世纪：农民面对频仍的蛮族入侵束手无策，卖掉或抛弃耕地，离开自己的土地，流入城墙包围的城市。于是出现了农村过疏化和城市过密化的状况。基督教把拯救的希望带给了对未来绝望的人们，遂在城市里普及开来，城市过密化是其温床。

4世纪：为这个世纪上半叶添彩的两位专制君主戴克里先皇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职业世袭制度。生为农民就必须以农民终其一生。这个政策的强制实施，成功地降低了迅猛发展的农村过疏化的速度。然而，尽管迎击入侵蛮族的战斗成功击退了敌人，罗马帝国的领土沦为战场却成为常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得到恢复，被土地束缚的农民并没有再次得到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5世纪：4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农民回归地方的现象。但回归的内涵与字面意义不同。参与军事、承担帝国防御的人数增加到了元首制时代的两倍之多，但未能保障帝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使农民专心农耕。农民们尽管回归耕地，却不是以前的“自耕农”（agricultor）了。他们被大农庄包去干活儿，成为“农奴”（colonus）。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制定了《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后，曾经努力培育和确立这项法律的罗马社会中坚力量已是明日黄花。这样，以自耕农为支柱的罗马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式微便无可救药了。

然而，在批评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是罗马人活力的衰微之前，我们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又会怎样看呢？

蛮族入侵频仍，不仅掠光了他们辛苦收获的农作物，人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那种恐怖令农民日夜心惊肉跳。

曾经保障罗马帝国全境和平安全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终结以后，不仅蛮族来袭，强盗也结伙肆虐。农民把农作物运往城里的途中被抢也成为家常便饭。

农民一向被视为最容易课税的职业，税种名目繁多。如果农民租公有地耕种，实质上相当于一种永久性的借款。过去，租金为收入的10%。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远远不够。据研究者计算，耕作自有农田的自耕农也得缴纳收入的25%到30%，而租种公有地或他人农田耕种的农民，这一比例则要高达50%。税金必须用不受币值变动影响的金币支付。这可能得卖掉全部收成才能勉强做到。可见对农民的保障一直在降低。

如果去当农奴，压在自耕农肩上的这些重压几乎都会卸去。大农庄为了自卫组织了自卫团，即使不能抵抗大规模蛮族入侵，但可抵御小股蛮族或强盗团伙。农奴还不用担心销售，纳税和与官方机构的交道均由主人处理。自己和家属是农庄主的劳动力，对皇上征兵也不用像以前那

样胆战心惊。大农庄的主人很多都是元老院议员或是高官。个体农民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总会有逃避之道。

当然，农奴也会失去相应的自由和独立。不过，他们也并非只被视为“工具”的奴隶。农庄被转卖时，在那里劳作的农奴通常也会一同被转卖。在职业世袭制度下，农民只能当农民。在那样的时代，安全和食物的保障比自由和独立更为优先。国力衰微给这些人带来的损害最多，他们不应再受到责备。

如果担心主人因遗产继承而更换，可以到属于基督教教会教产的农庄去当农奴，那里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教会与时下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寄身于教堂和修道院所拥有的农庄以保障安全和食物，这在当时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支撑中世纪农业的地方豪族和教会大农庄就这样产生了。

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的现象，一句话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国家”（res publica）不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个人就只有靠自己寻找活路了。

对国家而言，农民即使变为农奴，只要能够维持生产力就还有救。可是生产力也在不断地下降，原因与前述自耕农生产力下降的道理一样，与“工”、“商”的生产力低下相互影响，是与整个罗马帝国经济生产力低下相互关联的。

经济实力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首先结不起婚的人增加了，这等同于出生率下降。营养不良会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病。此外，基督教不喜欢洗澡沐浴，基督教的普及导致保持身体洁净的生活习惯式微。即便未被蛮族和强盗杀死，因生病而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即使考虑到农民回归农村的情况，从4世纪末到5世纪，大城市也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人口减少过程。

有研究者推测，传说2世纪有150万人口的首都罗马，进入4世纪时人口已经减少一半，到世纪末又进一步减少，只剩约30万人。“世界之都”在人口方面也是日薄西山了。

非生产性人群的增加

公元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非生产者的人数增加，而生产者人数减少、生产力下降。这两者成反比例关系。罗马国家必须养活军人和官僚这两大非生产者群体，还要养活基督教教会人员，这些人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势力上都不差于前两者。因为基督教已完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新国教与传统罗马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而在于有无专业的神职阶级。

既然侍奉神是主要任务，就得有其他人来建设侍奉神的环境。有人会说修道院有田产。但在那里，生产不是目的，劳动本身才是目的。重体力劳动可能会给侍奉神带来不好影响，所以这样的活儿交给农奴去做。此外，教会各项活动所需的费用能靠捐赠和教会资产运作维持最为理想，可是，现实中的教会组织已经庞大到仅靠这些无法维持的地步。

当然，国家并没有保证像给军人和官僚支付工资一样，向以主教为首的所有神职人员支付工资。神职人员的工资都是所属教区以教会活动经费的名目支付的。不过，教会的活动不仅包括弥撒和祈祷，还包括慈善、福祉、医疗、教育等等。元首制时代以前的罗马，福祉由国家、地方自治体及富人们分担，医疗和教育则通过给从业人员免征直接税的特别待遇让民间承担，如果从业人员是行省之民，就会给他罗马公民权，从而免缴行省税。但是，帝国的衰退破坏了这些由“公”与“私”之间绝妙组合形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受到破坏形成了空洞，基督教便乘虚而入，形成了教会在

原本擅长的慈善领域之外，又垄断了福祉、医疗和教育的局面。这样一来，作为世俗组织的国家也不得不以某种形式出来赞助或支持。罗马史研究者认为，有四类非生产人员给末期的罗马帝国带来重压，基督教神职人员位列军人和官僚之后的第三位。这就是其背景情况。

公德心的衰退

欧美的罗马史研究者及继承他们观点的学者中，有很多人把大农庄主占很大比例的元老院阶级列为四大非生产者的第四位。这个阶级获得莫大收入却只将其用于个人奢侈和豪华的观赏节目。他们以此为例，认为这体现了帝国末期公德心的阙如并加以谴责。他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和行省的大农庄主，而是西罗马的元老院阶级。后者比前者富裕却更缺少公德心，理应遭到谴责。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想法，怀有同样的愤怒，认为是额头从不出汗的有钱阶级的利己主义毁掉了罗马帝国。

然而，现在我却对这种想法抱有巨大疑问。

首先，他们这些大农庄主是非生产者吗？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在国外开始拥有行省。从那时起，大农庄支撑起了行省的农业。只有本土意大利半岛继承了共和政体时代的传统，农业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主力。城邦的农民也是公民，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从那个时代开始，元老院就已经被视为大农庄主的堡垒。相对于这个富裕者阶级，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则被视为民众派。他们格外热心于确立自耕农的权利，在培育罗马国家的中坚阶层这个大目的之外，这也是为支持自己的人谋利益。

即使是为某些人的利益，好政策就是好政策。因为有了这个优惠自耕农的政策，自耕农阶层在帝国本土意大利生存到了最后。不过，到了

帝国末期，意大利的自耕农也都变成了农奴，为大农庄所吸收。

这种社会现象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垄断。罗马帝国末期的农业也不能幸免于垄断带来的弊害，整个农业生产力下降。不过，并不是农产品上不了市。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农产品的流通能够得到保障，自耕农仍然健在，生产力也很高，所以上市的农产品数量充沛。不过，即使“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和自耕农在4世纪末都已式微，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饥馑经常袭击罗马帝国的记载，甚至没有记载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的饥馑。即使价格高于以前，农产品仍然流通于市。我认为，这主要是大农庄在起作用。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应把同时也是大农庄所有者的元老院阶级断定为非生产者。从本源上看，罗马人的“别墅”（villa）是田园之家的意思，是种田、饲养家畜、生产葡萄酒（vinum）等农产品的基地。只是到了帝国末期，本土意大利也与行省一样，小规模别墅变成了大规模农庄而已。到了自耕农消失而农奴令人注目的时代，大农庄开始成为主力，承担为整个国家提供“食”的重任。事实上，一旦连大农庄也深受亡国之害，食物也就会立即从市场上消失。

不过，随着历史渐渐走进5世纪，罗马元老院阶级也确实渐渐失去了公德心。斯提利科在派遣军队去北非时强烈希望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就是因为，只有宣布这是非常事态，才能把大农庄的自卫团和在大农庄劳作的农奴征召为士兵。昔日的元老院议员中也有很多大土地所有者，但在那个时代，农庄主都亲率在自己农庄干活的男人驰骋疆场。而在今天，如果不提供农奴则必须为每人缴25枚苏勒德斯金币，即使这样，农庄主也舍不得出钱。正如许多罗马史研究者所说，帝国末期元老院阶级的利己主义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可以看做末期症候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一千五百年之后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以5世纪的眼光来看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大农庄主们抵制对自卫团和农奴的征兵令。他们知道，只有这些人守在农庄，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换言之，他们已不再相信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

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大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他知道当时围着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妨碍扩建，但他没有改变设计，而是拆除了城墙。要拆掉城墙这一公共建筑物，需要有相应的大义名分。恺撒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仅有一个目的。他宣布，罗马的国家安全保障应由“防线”即国界线来构筑，而不是依赖首都的城墙。城墙拆掉后便被放置在了那里。他的这个想法决定了罗马国家未来的走向，被后来的皇帝所继承。因而，保护了共和政体时代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便在各地被截断，现今剩下存几处残垣断壁。

帝国首都罗马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情况下走过了320年。“防线”把广袤的罗马帝国坚固地围起，抵御了外敌，保卫了帝国。这期间不光是首都，帝国的其他城市也都只有仅用于夜间防盗的城墙。“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抵御国外敌人，还打击国内敌人来保障安全。如果前者是国土防御，后者就是公众安全保障。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特别关心治安，因为有他，人们不论上街行走，还是居住在乡间，都非常安全。

我们看看罗马时代的别墅和后来中世纪时代领主房屋的形式和格局，便可感到这两者明显的不同。罗马时代的别墅缺少防御上的考虑。虽然有低矮的石墙围绕，我不禁要想，那种围墙，夜里防防森林里野兽出来骚扰村庄大概有点用处，但怎么能阻止强盗团伙的袭击呢？不过，提比略皇帝是会把强盗团伙首领绑在竞技场中央矗立的原木柱上活活地喂给猛兽，这是当时的极刑。

用罗马人的话说，就是国内外的“securitas”（安全，security的语源）有了保障，才会有“pax”（和平，peace的语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正价值即在于此。而生活在其后时代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

保障“安全”与“和平”了。

我还认为，“共同体”（per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不能一致，也是末期症候之一。所谓公德心应该在个人的利害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利害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发挥作用。

罗马帝国行将步入最后一个世纪。这时的帝国，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元老院阶级，把国家防御置于脑后，生活依旧骄奢淫逸。这个事实，为后世研究者所批判。

不过，如果站在当时而不是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事，我们仍可为之辩护。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为同样遭受蛮族入侵，而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却得以幸存的情况作了下述假设：

西罗马帝国内的富裕阶级看到东罗马帝国更安全，便纷纷前去避难，导致西罗马帝国经济实力衰退，而经济实力衰退又导致防御费用减少，从而不能抵御蛮族入侵。这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靠把从西部迁徙而来的人和把钱投入防御工作而得以幸存。

然而，我现在完全抛弃了这一假设。我认识到，西罗马帝国富裕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于广袤的农田。土地是不能带走的。他们明知蛮族入侵的危险，仍然留在了西部。根据学者们的说法，西部首都罗马元老院阶级的财力远大于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阶级，但他们只能留在罗马，留在意大利。

尽管他们留下了，但手中的金钱用在了召开竞技大会、角斗士比赛和斗兽这些观赏节目上。这遭到了后世的谴责，认为这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

不过，这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吗？

英国乡村绅士爱好狩猎，我这个日本人就不能理解。我认为众多猎犬、人和马一起追逐一只狐狸，这不公平。但他们大概也有自己的说法，第一是保护自然环境，第二是保护就业，第三是保护祖先传下来的文化。

对罗马帝国末期的元老院议员来说也同样如此。为了庆祝儿子担任公职，搞些战车比赛、斗兽来招待市民，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继承了自古以来罗马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已。严格区分文官和武官，参与国政的权利也被剥夺之后，元老院议员已经不允许参与国家的防御。找些名目办些娱乐节目招待市民，也许就是留给他们作为元老院议员仅有的荣耀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尾声时曾经介绍过，西马库斯曾经以异教的身份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进行过最后的论战。他在私信中也曾谈到为庆祝儿子就任公职举行比赛的事，担心所需的猛兽是否能从北非安全到达。读了这封私信，人们尽可以叹息帝国末期精英的堕落，但是，我们对留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生存理由”是否可以容忍一下呢？虽然这确实是一个时代错误，蛮族渐渐迫近，而他们却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狂热于战车比赛。

前面所述的情况就是斯提利科一边拥着少年皇帝，一边却不得不面对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状态。恕我不够清高，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抛弃麻烦的罗马人而站到蛮族一边，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吗？以斯提利科的武将之才和日耳曼民族的骁勇，打垮西罗马帝国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然而，他也有他的“生存理由”。即使别人不能理解，对他而言，一旦失去了某种东西，他的生存价值就会随之消失。

从公元398年到401年这3年间，西罗马帝国享受了短暂的平安。发生粮食危机的北非问题没有加重西罗马帝国的衰微。在不到6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只派了5000人的小部队，就成功地完成了对摩尔人首领吉尔多的讨伐。这样，暂时不用担心南方之敌了。这一期间，斯提利科仍驻

留在意大利北部，警惕着西部的高卢、北部的日耳曼和东部的巴尔干，阻止了经常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来犯的北方蛮族的入侵行动。不过，西哥特人的统帅阿拉里克也推迟了入侵，利用这段期间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阿拉里克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为负责巴尔干地区的“大元帅”。他十二分地利用了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力——可以自由使用储备在罗马帝国军用仓库里的武器、军服和粮食。这样，西哥特人的士兵就与其他蛮族士兵大不相同了。他们学会了使用高精武器，身着防护功能强大的军服，营养充足。斯提利科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阿拉里克现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的“大元帅”，尽管地位在“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之下，但在军事上成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

公元401年，对斯提利科来说流年不利。位居东罗马帝国大元帅的盖纳斯失宠被杀。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将军在先皇狄奥多西手下资历雄厚。当初，斯提利科遵从了皇帝阿卡狄乌斯把从东罗马帝国带去的士兵带回东部的命令。斯提利科把这一任务托付给了盖纳斯。刺杀擅权宰相菲尔穆斯，没有盖纳斯的参与也是实现不了的。这在当时就传是斯提利科的谋略。

盖纳斯的失宠，是因为受到席卷东罗马帝国的排蛮运动的牵连。虽然现在站在罗马帝国一边，但盖纳斯是哥特人出身，而哥特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则都是信奉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国家，信仰的热度东部要高于西部。东罗马帝国排斥蛮族，就是借民族歧视之名排斥异端。

盖纳斯之死对斯提利科而言不只是切断了连接东罗马帝国的脆弱纽带。在东部，以天主教的主教为先锋，排斥蛮族的气焰高涨。在他们眼里看来，纯粹的哥特人且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盖纳斯和体内流着一半汪达尔人血液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一样，都是“蛮族”。东罗马帝国主教们的说教狂热而激烈：

解放西部！要把帝国西部从蛮族和阿里乌斯教派的专横之下解放出来！

东罗马帝国非但没有帮助被北方蛮族觊觎的西罗马帝国，相反，似乎想要亲手摧毁本该是同胞的西部。

再度入侵

公元401年秋天，随着盖纳斯之死，东西关系的冷却接踵而至。居住在多瑙河上游一带北边的蛮族，再度大举进犯今天位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行省雷蒂亚。蛮族的入侵已不像从前那样，活不下去就侵入罗马帝国大肆劫掠，然后带着抢夺的东西退回自己的领地。他们转而采取占领的形式，入侵之后就地盘踞。蛮族遭到其他蛮族侵袭，为寻找新的定居地而侵入罗马帝国，这一现象在2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那个时代还属于同一个日耳曼民族部族之间“被赶来赶去”的形态。到了4世纪末，由于亚细亚民族匈奴人的出现，情况彻底地改变了。匈奴人凶猛剽悍，连日耳曼系的蛮族也为之恐惧，也称他们为“蛮族”，不想被杀就只能逃跑。进入5世纪后，蛮族也是大举入侵，但打仗更动真格。因此，迎战的一方就需要多用心计。

接到北方蛮族占领雷蒂亚的报告后，“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好似恭候多时一般，迅即率军北上。那里已拥满了蛮族，与意大利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从西向东呈弓形挡在意大利半岛北边。罗马人有好几条铺好的大道直通这一山脉。通往西面高卢方向有4条，通向北面多瑙河上游一带有3条，连接多瑙河中游的东部有2条，罗马人共计铺设了9条干线道路，即使冬天到阿尔卑斯山脉也可以畅通无阻。

不消说基础设施，不论是公路、桥梁、公共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法律、金融制度、医疗、教育这样的软件，没有维护保养这样的后期服

务，就不会持续发挥功效。元首制时代并不缺乏维护。但自帝国进入迷茫的3世纪起，罗马用在这方面的心思和财力便一路衰减。

根据专门研究罗马大道的学者的说法，最后一次修缮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道路，不论是新建还是修缮，实际上都是由士兵来完成。罗马大道原本就是为加快军团的行军速度而修建，军团兵放下手中之剑而携镐劳作早已成为传统。因此，只要使用士兵，就意味着这是真正的工程，哪怕只是铺路。如果这真正的维护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401年，罗马道路网还在发挥着相当的作用。这样，即使在平原上仍是秋天而山区却已是冬天的季节，前往迎战的罗马军队也可以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同样，全家出动、直奔南方的蛮族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虽比军队行军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不要忘记，蛮族对人员的损失并不神经质，这是蛮族之所以为蛮族的理由。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不管是渡河时有人溺水，还是翻山时有人踩空跌落悬崖，他们都会继续前进。

没有人知道赶往多瑙河上游地方的斯提利科是如何击退蜂拥而来的蛮族的，但他似乎成功地击退了蛮族。因为他并未像钉子一样扎在雷蒂亚，而是得以回师了意大利。这时，不只是德意志南部，意大利也陷入了危险。阿拉里克得知斯提利科去了多瑙河上游，便动员了全部西哥特人，从东面翻过阿尔卑斯山脉，直奔意大利北部而来。

到意大利去

作为大元帅，阿拉里克负责的区域是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地区，后来被称为巴尔干地区，位置紧挨在东西罗马帝国分割线的西侧。不管靠得多么紧，这里还是属于西罗马帝国的领土。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大元帅以后，阿拉里克便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高官。由于“东”、“西”分割不明确，这里成了一个所谓“巴尔干式的”，即双方想法叠合的例子。

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西哥特人，在东罗马方面看来是蛮族，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这在天主教眼里是异端。在得知排斥蛮族、排斥异端的狂潮正席卷东罗马帝国之后，阿拉里克认为与其把自己及部族的未来寄托于东部，不如寄托于西部。这也无可厚非。北方蛮族因被匈奴人赶出家园，遂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而西哥特人则是为躲避同为基督教却狂热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而前来掠地。

理应以巴尔干防御为己任的阿拉里克侵占意大利，不仅是越境行为，身为东罗马帝国的大元帅，这还是越权行为。阿卡狄乌斯皇帝应该禁止这种行为。但东西关系因前述原因已至冰点，而且对东罗马帝国而言，阿拉里克及其麾下的西哥特人既是蛮族，又是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他们自行出“东”入“西”正求之不得。

恐怕阿拉里克也预想到“东出”才会去攻占意大利。他们翻过古代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Alpes Iuliae）的山脉大举入侵。这座山现在仍与古代同名，只是在意大利用意大利语去发音，在斯洛文尼亚用斯拉夫语去发音。阿拉里克随后立即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这是公元401年11月下旬的事。

斯提利科同时两面受敌：一面是在多瑙河上游的雷蒂亚，一面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家门口。那年他41岁，既是“联军总司令”，也是执政官，军事和统治的双重责任压在他的肩上。

阿拉里克是位了不得的战略家。进攻次数再多，攻占围着城墙的城市也绝非轻而易举。于是他不断进攻，直到意大利北部居民无人不晓的阿奎莱亚遭到进攻的消息传遍整个意大利北部。但他并未执意要拿下这座城市，而是改变战略，首先横扫因阿奎莱亚危如累卵而风声鹤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北方的冬天虽然寒冷，但不用担心大军的粮草，那可以靠抢夺得来。在波河横贯的意大利北部，农田丰饶，入冬时粮食已经收获进仓。

斯提利科在多瑙河上游收到了阿拉里克进攻意大利的报告。他没有立即返回意大利。他与阿拉里克5年前就已刀剑相交，而且两度获胜，当然知道如何作战可以取胜。但是，当他得知身在米兰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已经吓得灵魂出窍时，便急忙带着少量骑兵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到米兰。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霍诺里乌斯即位已经6年，年龄也到了16岁。他一想到阿拉里克马上就要开门现身，就夜不能寐。这位霍诺里乌斯只能说出一句话，就是逃往高卢南部（现在的法国南部）去。

见斯提利科回来，霍诺里乌斯又重复了那句话。面对这位不像皇帝的16岁孺子，41岁的斯提利科严厉地说道：

对罗马帝国来说，没有比皇帝出逃行省更大的耻辱了！

话虽如此，霍诺里乌斯生性懦弱，但对他认定的事往往会莽撞行事，把他继续留在米兰也很危险。斯提利科任命了一位心腹为“首都长官”，把避难去罗马的皇帝皇后的安全托付给他。皇后就是斯提利科的女儿玛丽亚，一直是总督之母的妻子赛妮娜也同行罗马。他还命令首都长官搞好城墙的加固工程。

从罗马时代被称为梅蒂兰姆的米兰到罗马，通常的途径是首先走埃米利亚大道到亚得里亚海岸的里米尼，再从这里走弗拉米尼亚大道到达罗马。可是，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出没于此，如果他们向南横切意大利，埃米利亚大道就不能通行了。皇帝一行先从米兰到热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再从那里走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奥雷里亚大道去罗马。罗马人认为应该有多种选择，大道也建成了复线。这种做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斯提利科没有为皇帝一行送行，在此之前就早早地动身北上了。隆

冬的阿尔卑斯山脉不日往返，多瑙河方面的问题正等着他去处理。

渡过多瑙河上游侵占雷蒂亚的是苏维汇和奄蔡，两个部族同属日耳曼系，都被匈奴人驱逐，同病相怜。对斯提利科来说幸运的是，率领这两个部族的是苏维汇人的君王。如果交涉对手握有实权，谈判、订约就都好办。斯提利科回到雷蒂亚后，直接与这位君王进行了谈判。苏维汇人君王遭到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的凌厉反击，他积极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建议。

所谓谈判，就是缔结“同盟”（foedelatus）协约，蛮族得到居住的土地并承担相应的防御。这是一种佣兵合同。没有关于这次佣兵费用的记录。可以想象，因为以往的战斗都是罗马方面占绝对优势，这次不用付钱即可搞定。总之，斯提利科可以不用再去操心两面敌人中的一面了。率领去多瑙河上游的部队几乎全军回到意大利，下面要做的只是率领这些士兵与阿拉里克决战了。

往返于米兰和多瑙河上游地区时总要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山区分布着以科莫湖为主的许多湖泊，湖上经常停泊着渡船。穿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就从米兰到科莫，再从那里上船。罗马人在山区也并非全走大道，如有湖泊，便会把船队停泊在湖上，用船只运兵。遇到壁立的悬崖时并不勉强开凿道路。用这种方法，不仅利用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科莫湖，也充分利用了阿尔卑斯山脉里为数众多的小湖泊。最初想到这个办法并予实施的是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尤里乌斯·恺撒。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以后五百年间，罗马人的“防线”不是阿尔卑斯山脉，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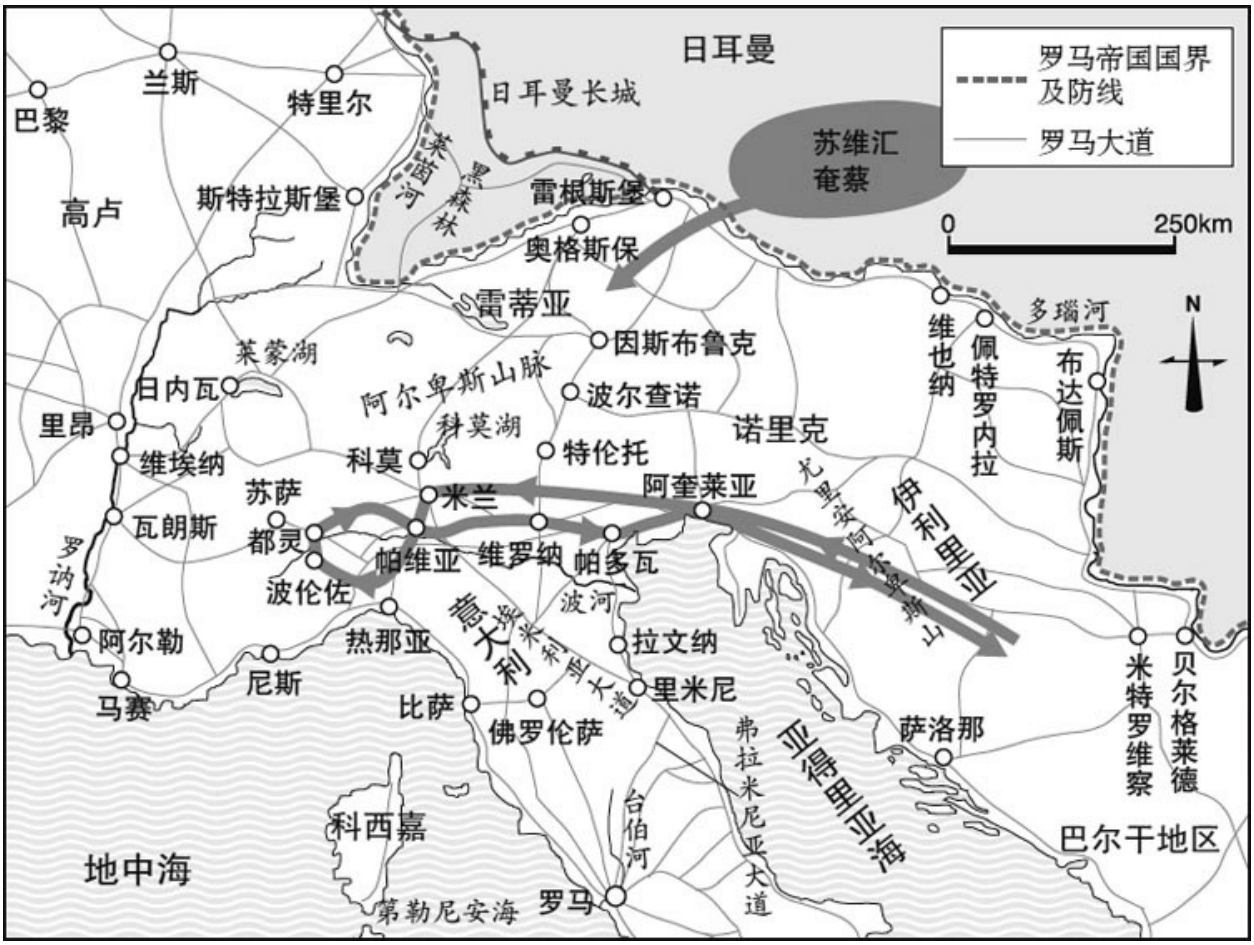
不过，从意大利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不止这些。公元402年2月，斯提利科率兵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意大利的也不是这条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奥古斯都当上了帝政后的开国皇帝。在他决心征服日耳曼的时代敷设了一条大道。斯提利科选择的路线就是位于东侧的这条大道。从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中，这条路比其他三

条路况更好。一千八百年之后，以歌德为代表的憧憬着“君知啊，南国”意大利的德国人仍行走在这条大道上。罗马时代，因斯布鲁克被称为威尔第德纳。从这里南下，在布伦纳罗山口越过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国境，直下波尔查诺、特伦托，就可以到达维罗纳。在现代，走高速公路感觉只是一个跨步，但在罗马时代那可是北去的干线。

斯提利科选择这条路并非因为它是干线，而是因为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指望开春进攻米兰，眼下正在米兰周边过冬。如果沿科莫湖南下，就必须分散兵力，各个击破冬令营中的敌人。与其如此，不如下到维罗纳之后转而西指米兰，这样就可以从阿拉里克所在的敌人大本营背后发起进攻。而且，阿拉里克的根据地位于东面的巴尔干地区，从东面进攻还可以断其退路。

决战

一切按照斯提利科的设想在推进。2月还是冬天。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压根儿没有料到斯提利科敢于在冬季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前来反击，他们失去了让妇女儿童躲避而由男人重新布阵的时间。米兰周边也没有妇女儿童避难的安全地方。米兰遭到了进攻，但未被占领。这样，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极有可能受到东面逼来的斯提利科和坚守米兰的守军两面夹击。



公元401—402年阿拉里克及北方蛮族入侵

阿拉里克决定逃跑。可是，北面阿尔卑斯山脉高耸壁立，阻断了去路，东面斯提利科步步紧逼。南面的热那亚也不能作为逃跑的去处。当时的热那亚只是一个小港，无法养活数万规模的蛮族。结果，阿拉里克认为只有西面可退，尽管同样也有阿尔卑斯山脉横亘面前。他决定先攻陷都灵，乘势翻过阿尔卑斯山脉，逃往高卢。

解除米兰的包围之后，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首先南下，直驱帕维亚，从那里取道向西，直指都灵。听着米兰居民摆脱困境的欢呼声在身后消失，拉着满载掠夺而来的财物的货车踏上了路途，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从此转为颓势。

斯提利科没有听到米兰满城响起的欢呼声。他和他的士兵们连米兰

城都没进，就转而追击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去了。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也没有全军追击，而是分成多股队伍分头追击。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携妇将雏，拉着货车，不可能全员统一行动。

就像渔网广撒慢收，渐渐地把海里的鱼儿拢到一处一样，必须通过各部队的追击把西哥特人收拢起来。以劣势兵力打击数量占优势的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敌人集中到一处一举歼灭。阿拉里克中了斯提利科这一计。他们本来应该向西直取都灵，却在途中大大改变了方向，偏向了西南方向。

波伦佐，今天不过是一个村落，人们只知道那里有19世纪意大利君王狩猎用的别墅。罗马时代，这里被称做波勒提亚，是一个手工业繁荣的小城市。直到今天，这个连地图上都不标的地方还残存着罗马时代的水道桥、神殿等遗迹，与小村庄极不相称。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决战的战场就在这波勒提亚附近的平原上。

公元402年4月6日，在波勒提亚的原野上两军对阵。西哥特人方面把女人、孩子和货车撤到后方，男人们在阿拉里克的指挥下准备战斗。斯提利科方面则采取了传统的罗马式布阵形式，步兵在中间，骑兵布在两翼。

不过，能看到两军全貌的人大概会说，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比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更像罗马军。斯提利科军的左翼是刚刚成为“同盟者”的奄蔡骑兵团，正半裸着身体待命，远远一望便知是日耳曼人。而敌方西哥特军却是用从罗马帝国军用仓库中拿出来的武器和厚重的军服武装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阿拉里克在哪里指挥战斗。但斯提利科在中军阵后，一如既往地身板挺直地催马扬鞭，英姿飒爽。

人们并不清楚战况进展的细节，可能是记录战况的诗人克劳狄安对此并不关心。好像是斯提利科方面的骑兵团先发制人，迅速从两翼开始行动的。西哥特人的士兵被追杀到狭窄的平地，背靠溪流，无法腾挪，遂致大败。崩溃，被追，被杀，连阿拉里克的妻子儿女也被俘虏，可见身处后方的士兵家属也并不安全。不过，阿拉里克和一半的军队还是成功地逃脱了。所以，这场战斗还不是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最后决战。

斯提利科追击向东逃窜的阿拉里克，战场移到了维罗纳。在维罗纳附近的战斗又是斯提利科获胜。西哥特人这次没能逃过彻底失败的命运。

但这次阿拉里克又成功逃脱了。不过，这次不像波勒提亚战役，既不是撤退，也不是退却，那状态只能是溃逃，只能逃回半年前刚刚离开的巴尔干地区。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的确遭到了一时半会儿无法重振的打击，阿拉里克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意大利的威胁。

不仅是直接受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全境都因驱逐蛮族的喜悦而沸腾。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老百姓，都松了一口气，沉浸在喜悦之中。这段时期再无人怀疑斯提利科会第二次故意放走阿拉里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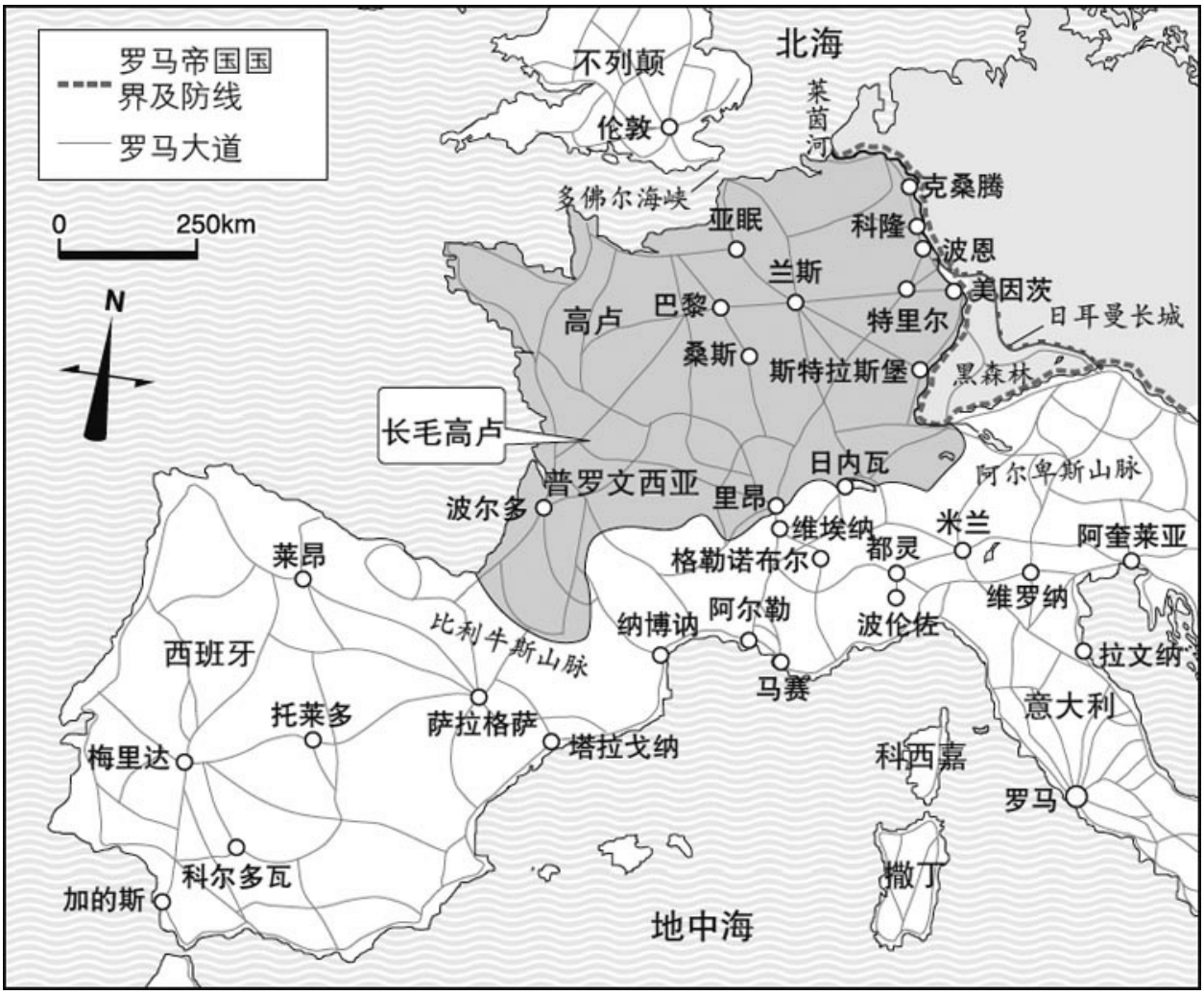
抛弃高卢

多半人都因摆脱了蛮族的威胁而松了一口气，只有功臣斯提利科依旧清醒。他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制定了平时人们并不欢迎的各项法律。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施行君主专制以后，罗马人习惯了“敕令”的形式。但斯提利科却采用了元首制时代的立法程序，由立法机构元老院通过形成国法。在他看来，眼下有望获得人们支持，这正是通过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好时机。

从公元402年秋天到403年秋天的一年中，斯提利科制定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两类：首先是意大利的防御，其次是行省尤其是与意大利安全休戚相关的高卢南部的防御。这两类法律都是为了整顿完善防御体系。

最先制定的法律规定，征兵权完全交给意大利半岛的“长官”，其次承认长官的运作机构。法律还加强了对入伍后无故离队者的惩罚。后来法律中的罚则更为严厉，甚至规定开小差者被抓回后将当场处死。

这些法律在当时的情况下甚为需要，但遭到了社会上下的恶评。一百多年以来意大利半岛上就没有招过兵。本土男人被视为软弱，以可以耐受严酷条件和恶劣环境为理由，从高卢东部和巴尔干地区招募志愿兵已成常态。共和政体时代和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如果知道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男人逃避兵役，一定会感到愤慨。不断发生老百姓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情况。大农庄主不愿意交出自己农庄的警卫和农奴。公德心一旦丧失再想恢复，实在是件难事。



高卢与西班牙

人们不知道整顿完善高卢防御体系是在何时，根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也许到了末期，罗马帝国记载历史的热情也已衰退。且不说关于意大利的，就连行省的相关记载，量与质也都明显下降。今人还能知道的是，斯提利科将高卢全境罗马势力的根据地从过去的特里尔移到了阿尔勒。

特里尔过去是最重要的基地，它位于注入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的中游。不仅有摩泽尔河，还有3条大道从这里连接着罗马帝国的“防线”。这里被以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名冠名为“奥古斯都特来佛里”。斯提利科放弃了这个基地，把根据地转移到了靠近地中海、罗马时代称

为“阿瑞拉特”即今日的阿尔勒地方。从现在来说，就是把在高卢的根据地从德国西端移到了法国南端。这足以使我们想象到斯提利科设想的高卢防线是怎么回事了。

这意味着斯提利科放弃了罗马人长期以来称为“长发高卢”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的高卢在四百五十年后被抛弃了。放弃“长发高卢”意味着放弃了高卢防御不可或缺的、值得驻扎3个军团的不列颠地区。那他为什么留下了高卢南部呢？

今法国南部被统称为普罗旺斯，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为“provincia”（普罗文西亚），是行省的意思，只不过法语念成普罗旺斯。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胜汉尼拔后，使这里成为行省。自推行元首制前的一个世纪开始，罗马道路网已自本土意大利向外大大扩张。横跨法国南部的道路在元首制前一百年就已铺就，是连接意大利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获得的西班牙之间的通道。高卢北部和中部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恺撒纳为行省，而高卢南部则在此一百五十年前即已成为行省。

所以，普罗文西亚对罗马人而言不单纯是行省，它已与罗马融为一体。“长发高卢”和不列颠出身的人没人登上过罗马帝国的皇位，法国南部却有这样的人。如五贤帝中的安敦尼·庇护。图拉真皇帝和哈德良皇帝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有着殖民者罗马公民的血统。与他们不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之一安敦尼·庇护是被罗马征服的部族的后裔。元首制时代，像他这样罗马化的高卢人在帝国高级官员中比比皆是。

古代的普罗旺斯并非像我们这些后人想象的那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对古代罗马人而言，法国南部、西班牙和北非比法国北部、中部和英国更为亲近。我们不应忘记，不管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罗马都是一个地中海帝国。

斯提利科虽然身为日耳曼族系的蛮族汪达尔人，但在这点上看，他

也还是罗马人。舍弃不列颠和“长发高卢”而留下普罗文西亚，对他来说无疑是自然的选择。

然而，这次他又遭到恶评。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老百姓来说，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高卢很遥远。他们对此没有像严厉的征兵制那样的切肤之感，因而并未引起什么反对。但是，斯提利科没能蒙住元老院议员。他们看清了把在高卢的罗马势力根据地从特里尔移到阿尔勒的真实意图。斯提利科当然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要放弃高卢中部和北部的话，也没有撤回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但仅凭把根据地从莱茵河中游迁至地中海这一点，就足以看透斯提利科的本意。

在“元老院阶级”这个词所包括的、地位财力上都属于罗马社会上层的人中间，开始萌生反斯提利科的倾向。他们对强使自己把自家大农庄里的警卫和农奴送去服兵役的斯提利科感到窝火。“长发高卢”事实上的放弃，让这些人感到自己祖先辛苦得来的荣耀被糟蹋，从而心生愤懑。何况做这事的居然是蛮族出身的人，这更使他们怒火中烧。

这种感情带有怀古情调，而正视严酷现实，要有勇气与过去一刀两断。但如此去说服他们，只怕是白搭。公元5世纪的上层罗马人也懂得这个“理”。但是，在国家瓦解过程中，强烈支配人们心灵的，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情”。

斯提利科也知道社会上下开始对他起了反感。他试图通过举行久违的凯旋仪式去化解这种反感。

举行凯旋仪式也师出有名，那就是两年前的胜仗。斯提利科在波勒提亚和维罗纳两度打败阿拉里克率领的进犯意大利北部的西哥特人，使阿拉里克狼狈逃回巴尔干地区。如果目的是与民同庆，凯旋仪式就应该在胜利的公元402年当年的秋天举行。斯提利科在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是要拿庆祝胜利做幌子，其真实意图在于消解反对自己的呼声。

凯旋仪式

进入帝政时代以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上，主角都是皇帝，即使胜利功臣另有人在。皇帝毕竟是罗马全军的最高统帅。公元404年秋天举行的凯旋仪式上，坐在侍者驾驭的双驾战车上接受群众夹道欢呼的也是皇帝霍诺里乌斯。

凯旋仪式是罗马特有的祭典，与罗马人的传统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在基督教来看，其异教色彩过于强烈。凯旋仪式原本就与基督教国家相矛盾，民众也会因凯旋仪式而狂热。所以，罗马变身为基督教国家后虽然还保留着凯旋仪式，但色彩已与从前不同。

首先，由凯旋将军驾驭4匹白马的形式完全消失了。马匹好像仍为白色，但已由4匹改为2匹，这2匹马也由侍者驾驭，这已成了惯例。

其次，凯旋将军用红色颜料涂面的做法也消失了。把脸抹红在罗马是神的表示。这样做的意思是，凯旋将军因打败敌人保卫了大家的安全，因为这样的功绩可以在凯旋仪式这天当一天的“神”。然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不允许唯一的神以外还有其他神的存在，哪怕只是一天。不过，因废止了“一日之神”，也就没有奴隶像以前那样站在接受民众欢呼的凯旋将军身后不断轻声重复“肉身当死，不可忘却”的情况了。即使一日为“神”，也不可忘记自己是“人”身，这种巧妙的平衡感正是基督教化以前罗马人的特质。可是罗马国家性质已变，不能再把这种平衡感视为必需。

作为胜利者象征的月桂树枝编的月桂冠也销声匿迹了。月桂冠曾经戴在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和罗马皇帝的头上而光耀过，从而被看做异教的象征。实际上，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罗马的钱币上再也看不到头戴月桂冠的皇帝雕像了。

公元404年秋天，在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是这种极力排斥异教色

彩的仪式。在队伍最后压阵的胜利者乘坐的双驾战车上，除了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有斯提利科。当然，在前面接受民众欢呼的是霍诺里乌斯皇帝。可是，不论军装多么华丽，19岁的霍诺里乌斯身材矮小，腿短肥胖，毫无表情的脸上根本看不到击败入侵蛮族的男人的霸气。

相反，紧挨在他身后的斯提利科40来岁，正值壮年，有着男人的镇定和力量。他比霍诺里乌斯高出一头，肌肉健硕，目光锐利，远比主角皇帝更能吸引人们的视线。民众也都知道，3年前霍诺里乌斯刚举办过成年礼，敌人袭来时即从米兰避难来到罗马，而前去迎敌的是斯提利科。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两人一同站在凯旋将军用的双驾战车上与民同庆，游行似乎取得了成功。

之后斯提利科又进一步利用了这个大好机会，他让皇帝霍诺里乌斯出席元老院会议，请他说明元老院议员先前阻挠制定的那些法律的必要性。霍诺里乌斯年纪轻轻却无精打采。他念的演讲稿一定是斯提利科所写。通过皇帝的说服而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除以“国家公敌”宣言的形式宣布紧急状态的时期以外，大农庄主也有如下义务：如果不交出指定数量的农奴服兵役，则每个人头须支付25枚苏勒德斯金币。这样一来，斯提利科整编新军的财源便有了保证，身为大农庄主的元老院议员几乎都选择支付金币而不愿提供卫士和农奴。

迁都拉文纳

这个时期，斯提利科把皇帝的居所从米兰迁到了拉文纳。霍诺里乌斯不听劝解，坚决不愿意再回危险的米兰，他甚至不愿意继续住在罗马。斯提利科遵从了他的意思，迁都拉文纳。

罗马太大，居民都很开放，习惯于在熟人簇拥下生活的霍诺里乌斯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拉文纳城市小，且位于波河河口，水路成网，屏

障四周。流经拉文纳南边的卢比孔河在共和时代是本土意大利与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分界线。当时意大利北部行省的总督官邸就在这个城市。进入帝政以后，拉文纳城市也得到扩建，有了两个港口，四百年前开始成为帝国的两大军港之一，另一个军港是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

把皇宫安在拉文纳，还可以让胆小的霍诺里乌斯放心，遇到危险时也可以取海路逃跑。迁都拉文纳就这样实现了。顺便一提，拉文纳与罗马和维罗纳一样，从古到今城市的名称从未变过。

斯提利科至此并未完成重整意大利半岛防御体系的工作。没有充分取得罗马人从上到下的合作是其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国力的衰微。

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行使强权，使罗马全军的兵力倍增，发展到了60万人。其后的百年之间兵员逐渐减少。据研究者的推测，到了5世纪初，兵力或已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随着帝国接近末期，历史记录的质量下降，甚至已无法弄清“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所率将士的数量。不过，他恐怕一次也没有统率过10万人以上的军队，人数顶多也就一两万。可是，来犯的蛮族动辄超过10万人！

与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相比，东罗马帝国虽然兵力也在减少，但程度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

这并不是说东罗马帝国国力强于西部，也不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士兵比西部同辈更勇敢。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敌人是大国波斯。波斯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犯，并不是波斯活不下去的掠夺行为。波斯军队曾经进攻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那是在七百年前败给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是七百年前梦想复兴大波斯帝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的波斯物产丰富，如果打败波斯军队，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就可以缴获丰盛的战利品。

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士兵们打仗的对手是活不下去或被新来的蛮

族驱赶而不得已入侵的蛮族。打败他们所能够缴获的战利品少得可怜。

这样的差别表现在东西罗马帝国志愿当兵的人数上和每个士兵的战斗意志上。这或许也是衰退期“国家”与“个人”的利害关系趋于不一致的现象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期，尽管那时打仗的对手同样是蛮族，也不能指望战利品，但当时军队在使用严格标准筛选优秀士兵方面并不困难。

不过，全盛时期的帝国政府为此也是出过几招的：

第一，保证罗马社会的平均收入与中产阶级相当。这在收入不固定的时代实在是极富魅力。

第二，保障期满退役时的退役金。这在那一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是做不到的。这使士兵在退役后开始第二人生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虽然有人想要耕地，而有人想要现金。皇帝奥古斯都为了保障这项财源，还新开征了前所未闻的遗产税。而且，对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课以5%的遗产税，让没有服兵役的公民也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出贡献，这在培育公德心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这个待遇是给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主力军团兵的。行省出身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也能在25年期满退役时领到“退役金”——罗马公民权。行省居民只要为罗马帝国的防御作出了贡献，就有资格被授予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实在是一项出于罗马式思维的政策。授予医生、教师的公民权只限于一代人，而授予行省出身士兵的公民权却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不再是行省居民，而是在所有方面都与祖辈为罗马公民的人等同。

第三，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的士兵退役后回归公民社会的政策也与此相当。我想正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配合，才使得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皇帝不是选举产生，但在“地

方自治体”却盛行选举。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行使强权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搞活地方议会。他确定了可当选议员的三种年龄资格：

一、未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

二、服兵役当过军团兵者23岁以上；

三、服兵役当过骑兵或百人队队长者20岁以上。

在罗马，年满17岁方被视为成人，志愿兵也不接受更年轻的人。下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军团兵入伍后20年才能期满退役。这样一来，军团兵期满退役应该在37岁至40岁之间，士兵如果在23岁或20岁退役，原因只能是服兵役期间负伤或生病。尤里乌斯·恺撒作为最高司令官，没有忘记给因在战斗中负伤或在服兵役期间生病而不能享受期满退役待遇的士兵提供后续服务。

考虑到个体差异，公德心也好，战斗积极性也罢，都是不能量化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连这种不确定因素都想充分利用的话，保障军饷和退役金、回归社会等确定因素就更不可或缺了。人，大多是只有生活安心才会有干劲。只有这样，“国家”（res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才会趋于一致。

然而，根据卡拉卡拉皇帝著名的“安托尼努斯敕令”，罗马在公元212年决定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除奴隶外的居住在帝国领土内的全体人民。乍看这实在是一条人道的法律，但使罗马公民权的魅力丧失殆尽。这使得只有为国出力才会被授予的“取得权”变成了什么都不做只要出生在帝国领土内就能得到的“既得权”，也使兵役期、军饷、退役金等都变得模糊而不明确。武官和文官的分离又使得服过兵役者转职地方议会也化为梦想。

纵令有可能，又有没有人愿意担任地方自治体的要职呢？从4世纪起，罗马帝国变成了与以前元首制不同的专制君主型帝国，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议会只是中央的征税机构，议员们不得不在完不成规定税额时去填补空额，因此无人愿意当议员。但根据职业世袭法，议员的儿子生来就被绑在议席上。处于这种状态，国家与个人的利害也自然不相一致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给士兵的种种优厚待遇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又被后来的皇帝所承袭，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原因在于罗马是军事国家。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在现代，文官控制国家已成金科玉律，但若从现代的情况出发去评判古代，就容易妨碍我们对古代的真正理解。

对出身于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是抵御外敌，保卫自己的国家。尽此义务所获得的权利是参与国家政治。所以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们都是自己持剑冲向敌人的，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夫克勒斯、作家色诺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罗马也是城邦。“公民”（civis）的义务是保卫国家，通过选举参与国政是他们的权利，这一点与希腊毫无二致。强调这种类似性，历史上才会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称呼。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保卫“国家”。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出于救济失业者的需要推行了志愿兵制，但在那以前一直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即使在推行志愿兵制以后，是否服过兵役也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必要条件，对此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在共和时代罗马重要人物中，我们只能找到哲学家、律师并且曾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未被确认有过从军经验。皇帝们也几乎都有从军经验。交叉获得行省军事经历和本土文官经历是成为罗马国家精英的途径。

在罗马，文官与武官长期不分，无法产生文官主持军事这种概念。正因为文武的合二而一，发展出文武兼备的人才，产生了有利于罗马国

家整体利益的结果。

进入4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变化，禁止元老院议员干预军事的相关法律成为国策。后来文官与武官完全分离，但二者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看看后来两者的实际成绩，认为其质量不升反降也许更加妥当。由于纵向的分割，人们得不到只有经历不同领域才能得到的刺激。即使军队总兵力增加到元首制时代的两倍，长期效果自然也要与期待相去甚远。4世纪初叶，罗马军队总兵力虽然从以前的30万人增加到60万人，但靠国家财政维持越来越难，兵力也逐渐减少，再次陷入北方蛮族随意入侵的境地。我认为，卡拉卡拉皇帝3世纪初叶实施的将罗马公民权变为既得权的政策和4世纪初叶强行推行的文官与武官的完全分离政策，是导致罗马军事实力衰退的两大要因。

经历了这样的200年，罗马迎来了5世纪。在斯提利科承担防御全责的5世纪初叶，这种倾向经过200年已逐渐稳定，不可能再回头了。我不禁在想，如果元首制时代的领袖们看到现在的罗马帝国，一定会同情以一人之躯肩负起帝国的斯提利科。

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后的小康状态只持续了一年。翌年，即公元405年即将入冬时，传来了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消息。这消息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皇帝霍诺里乌斯已年满20岁，却不愿意走出拉文纳一步。斯提利科只得再次一个人替他扛起意大利防御的重任。

巨浪袭来

公元260年，当时的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在这个前所未闻的不幸事件中，罗马放弃了在保障帝国安全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日耳曼长城”，后来也未能恢复。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早已注意到这座长城的重要性，大体搭建了框架。图密善皇帝围起了真正的墙壁。通过图拉

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等五贤帝时代皇帝们的努力，日耳曼长城成为铜墙铁壁。付出如此之努力自有其道理。北去的莱茵河和东去的多瑙河，都发源于此。注入这两条大河的支流为数众多，如罗马时代称之为尼克尔的内卡河等。这一带西南部的“黑森林”被罗马人称为“未开垦的森林”（silva），即使罗马人修通了罗马式的石板大道，这里的森林依然遮天蔽日，白昼阴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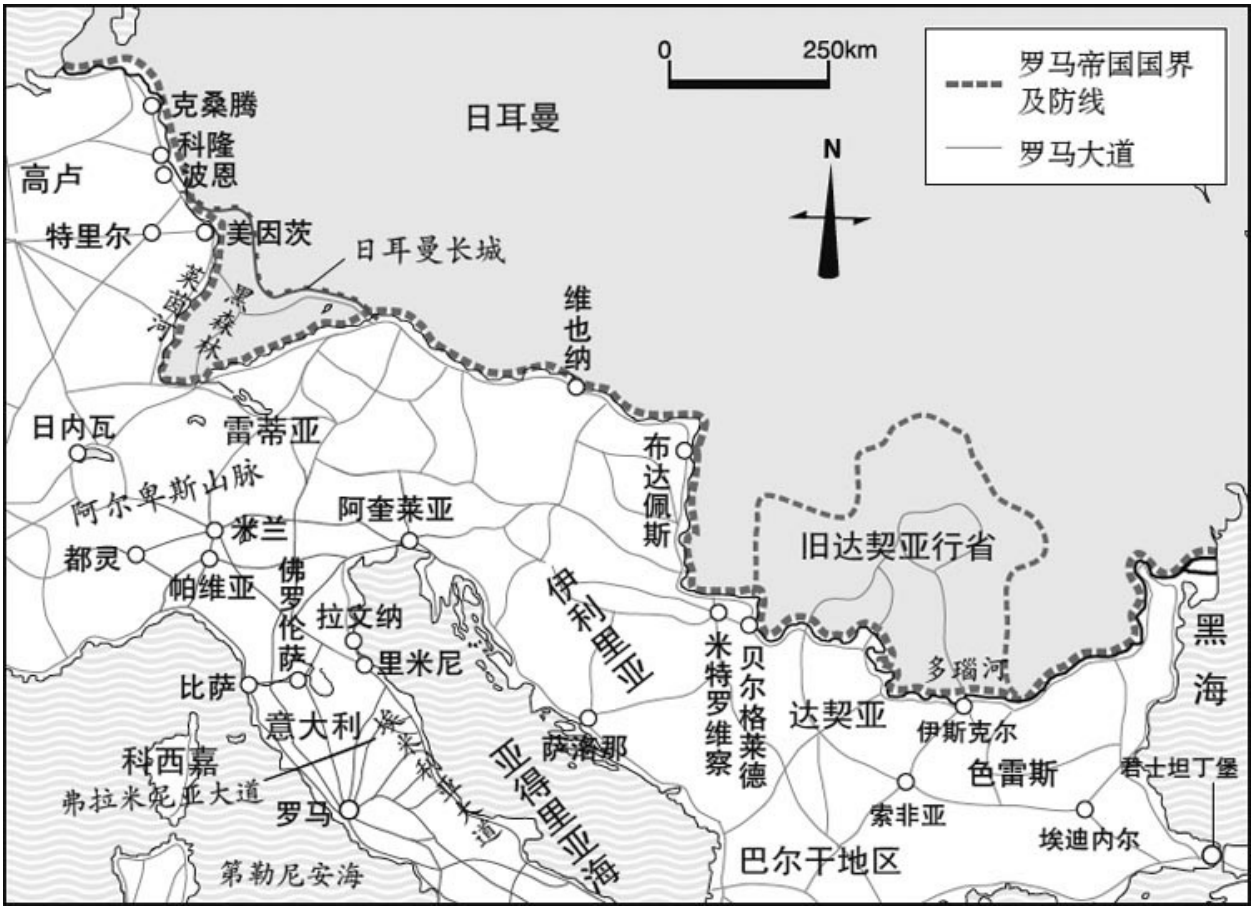
这里被罗马人称为“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受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上游的两面包夹，又地处山区，难以防御。拉丁语“阿格里·戴可美特”，直译是“什一税耕地”，意思是罗马帝国承认居住在这一带的日耳曼人为行省居民，他们的安全由帝国保障，相应地，他们要向帝国缴纳收益的十分之一。罗马人承认他们的居住权，与他们缔结同盟协议，为他们去打仗，为此他们要向帝国支付佣兵费用。这是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力量对比的体现。与此相比，罗马鼎盛时期的元首制时代，帝国与蛮族力量的悬殊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也是罗马人借以击退近逼两河上游、山岳地带及黑森林地区之敌的日耳曼长城早于150年前即已消失的结果。

罗马放弃这一带以后，入侵的蛮族蜂拥而至。这个事实证明了日耳曼长城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公元405年秋的蛮族入侵不过是其中一例，但这次入侵的人数之多史无前例。

这次蛮族入侵帝国境内的原因也是被匈奴人所驱赶。这是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半叶蛮族入侵的特点。站在入侵者的立场上看，他们是“难民”。匈奴人当初从遥远的亚细亚向西进犯，首先赶走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北侧的蛮族，接着转移到中游地区故伎重演。到了5世纪初叶，匈奴打到了多瑙河上游。亚细亚系蛮族凶猛至极，日耳曼系蛮族亦不能敌。老的蛮族经常被这个新来的匈奴人驱赶出去。匈奴人凶猛剽悍，所向披靡，名震遐迩。

“什一税耕地”听上去只是一个讽刺。这里为罗马帝国的势力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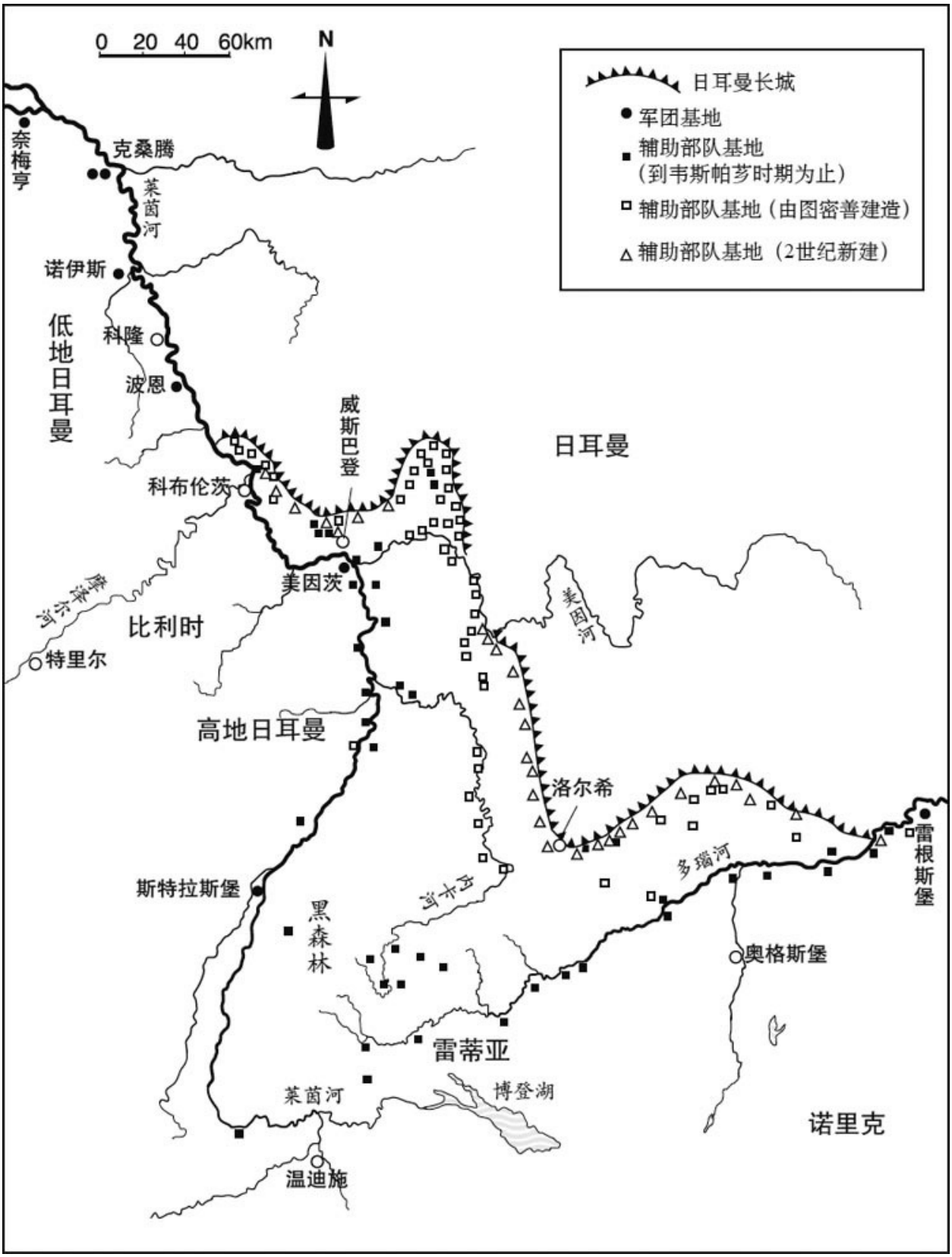
及，蛮族被赶出去后，蜂拥进入位于莱茵河南边的行省雷蒂亚。他们并不是预谋入侵并在部族长统率下有组织的集团。东哥特人君王拉达盖苏斯是他们的领袖。但这时拉达盖苏斯也只是入侵而来的日耳曼系各部族联盟的代表。公元405年秋天，涌入西罗马帝国境内的除了拉达盖苏斯属下的东哥特人，还有苏维汇人、奄蔡人、勃艮第人等。他们都属日耳曼系，都是因匈奴人入侵而失去家园，不想被杀也不想当奴隶，逃亡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尽管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他们与被天主教打成异端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有所不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东哥特人”是异教徒。与东哥特人共同行动的苏维汇、奄蔡、勃艮第各部族也和东哥特一样，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诸神，相信森林是日耳曼之

母，都生活在罗马文明圈之外。罗马人也称这些人为“蛮族”。这次他们涌来的人数，包括妇女孩子在内，有40万人之众。


0 20 40 60km
N
日耳曼长城
军团基地
辅助部队基地
（到韦斯帕芗时期为止）
辅助部队基地（由图密善建造）
辅助部队基地（2世纪新建）
奈梅亨
克桑腾
莱茵河
诺伊斯
低地日耳曼
科隆
波恩
威斯巴登
日耳曼
科布伦茨
美因茨
美因河
比利时
特里尔
高地日耳曼
洛尔希
雷根斯堡
多瑙河
斯特拉斯堡
巴本尼
黑森林
奥格斯堡
雷蒂亚
博登湖
莱茵河
诺里克
温迪施

完成后的日耳曼长城（引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反观迎战的罗马方面，如果瓦格纳生活在当时，也许他的感觉会像是在聆听雄壮而充满野性的乐曲。多说一句，瓦格纳的代表作《尼布隆根的指环》由《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菲》和《诸神的黄昏》四部曲组成，其中的人物就是在罗马帝国末期一再入侵罗马的蛮族勃艮第人。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古代时属于罗马帝国，瓦格纳的出生地莱比锡诞生于中世纪，位于日耳曼纵深处。罗马帝国曾想征服日耳曼，而后又放弃了这一想法。顺便一提，按照日耳曼与罗马这样的古代分类法，生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和生于波恩的贝多芬都属于罗马一方。瓦格纳的音乐让人产生日耳曼式的感觉，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如果伴着瓦格纳的乐曲行进，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一定会雄壮整齐。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人和家畜数量庞大，哪有什么队列，既无纪律，也不知目的地何在，只是一个劲地南下。

南下沿途所经之地，生灵涂炭。蛮族并非前来挑战，只是潮水般地涌来，抢夺劫掠，杀死反抗者，再一路走下去。所到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过境。

迎战

这次来犯之敌在各个方面都出乎斯提利科的意料。在罗马军队中从过军的蛮族族长已经越来越多，但拉达盖苏斯并不在其中。他从未与罗马军交过手，罗马方面无从预测他在战场上的打法。罗马人甚至还不知道人数庞大的蛮族目标何在，也根本不清楚他们的路线。起初似乎他们去往高卢方向，直到406年春天，拉达盖苏斯和他那40万人马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北意大利，罗马人才知道意大利是其矛头所向。

斯提利科要迎战的就是这样完全不知底细的敌人。对他而言，集结士兵是最切实的课题。他于公元405年冬收到拉达盖苏斯率领日耳曼各部族从多瑙河上游入侵而来的报告。当时，他已向西罗马帝国所有行省发出命令，要求集结士兵。然而，没有一个行省集结兵力，应召前来。这不是因为行省要抛弃本土意大利。没有送兵的理由有二：其一，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北非都忙于自身防御而派不出兵；其二，即使派兵，士兵在去意大利途中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我确信只有“和平”才是终极的基础建设。“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影响了帝国抵御外敌、防御国内之敌及维护治安的功能。响应斯提利科的号召来到意大利的，只有高卢作为“同盟”在罗马一方从军的蛮族士兵，其中有原阿拉里克的部下萨罗率领的西哥特人的一支队伍和乌尔丁指挥的一支匈奴人队伍。

更为糟糕的是，在意大利半岛内的征兵也因大农庄主的消极抵抗而毫无进展。公元406年5月，斯提利科终于采取了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通过了可以征召奴隶的法律。这一时期的法律并不是国法，国法需要大农庄主占大多数的元老院通过。法律似乎是敕令，只要皇帝下令就能立刻生效。这就是临时措施法。不过，大敌当前，迅速应对高于一切。

给奴隶志愿兵的报酬是战斗结束后解除奴隶身份，并发给两枚苏勒德斯金币。既有奴隶，就该有主人，但给奴隶的主人什么报偿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公元406年入夏以后，斯提利科总算有3万人的军队可以调遣了。

罗马帝国的实战能力

如果把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那时常驻西部的兵力是10个军团6万人的主力（军团兵拥有罗马公民权）和与之数量相当的辅助兵力（行省士兵），共计12万人。这个数字经过3世纪的危机，

到4世纪初叶增长了一倍，增员到25万人。4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帝国能够避免大规模的蛮族入侵，更多依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兵力倍增政策。可是，军事上的坚定政策不能不压迫到国家财政，到了4世纪后半叶，弊害便渐渐显现出来，造成了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防御力量不断衰退，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国力都已不敷供给。

西罗马帝国的联军总司令甚至把手伸向了奴隶，才征召到3万人的兵力，这真令人惊愕。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之下有10名司令官、军团长，3万人只相当于其中一位率领的作战单位的人数。

优秀的司令官会思考尽可能减少手下士兵牺牲的战术，但他也知道不可能没有牺牲。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尤里乌斯·恺撒，他们都取得了战争的完胜，但也有自己的士兵牺牲在战场上，尽管数量较少。然而，公元406年的斯提利科却连这点牺牲都不允许有了，他没有任何补充的途径。斯提利科还面临一个不利的情况，把手伸向征召而来的3万奴隶，没时间经过充分训练就得面对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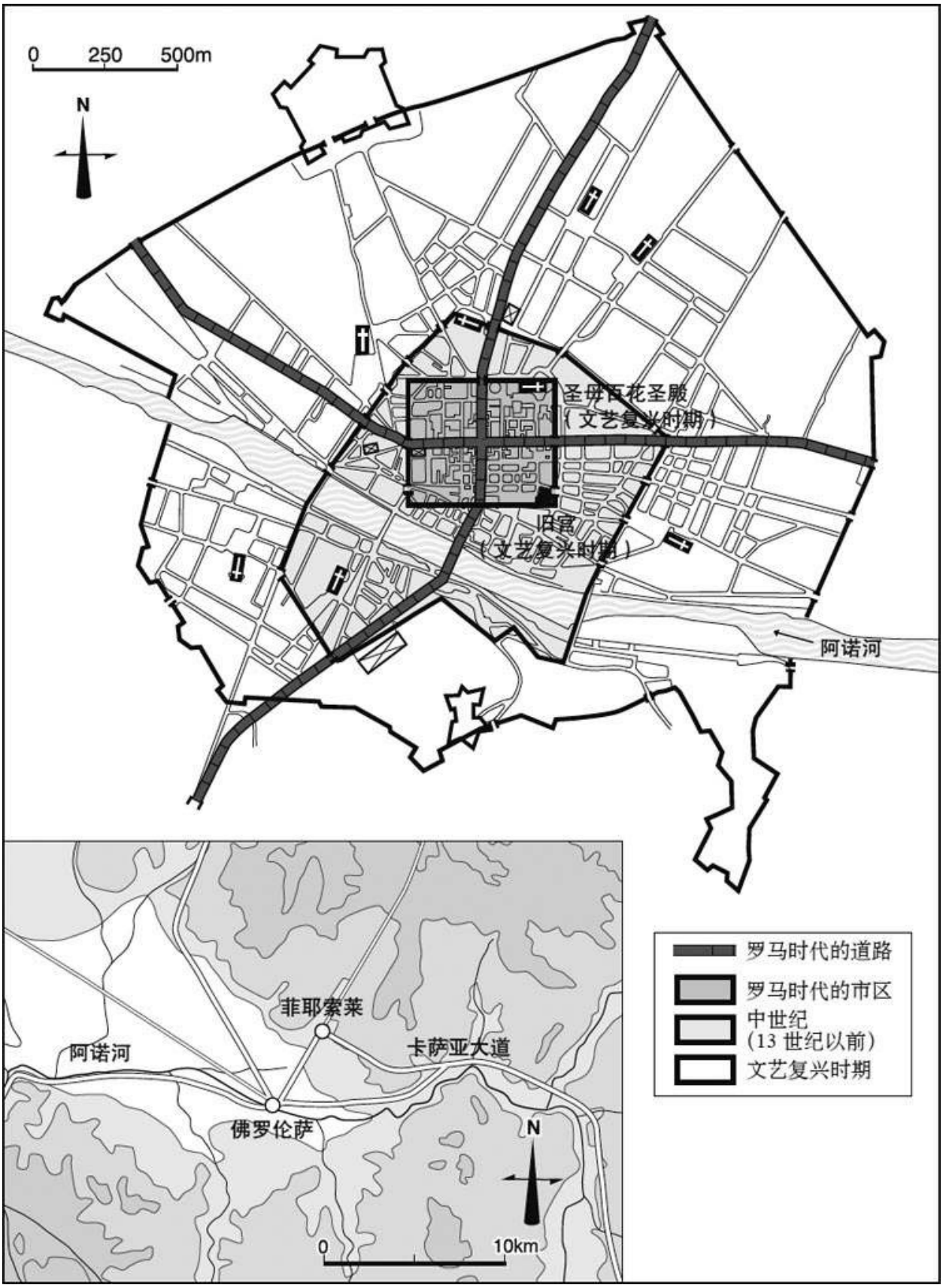
在这种状态下，留给总司令的就只有一条路。不允许损失士兵，就不能积小胜而后决战。这样，就只有待敌人集中一处时一举决战这一条战略了。

46岁的斯提利科在等待这个“时机”。为此，他眼睁睁地看着拉达盖苏斯和他身后的40万人像大片蝗虫过境一般把意大利北部啃食一空。

菲耶索莱之战

6月，拉达盖苏斯和他的40万人抛下了吸干榨净的意大利北部，转向意大利中部。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罗马，经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是最快最容易的路径。但拉达盖苏斯以前没有接触过罗马帝国，也许并不很了解首都罗马的富庶和走罗马式

大道的便捷。他们就像墨汁滴在纸上扩散一样从意大利北部逐渐渗到意大利中部。而且，在进入意大利中部后刚遇到第一个城市，就陷入了佛罗伦萨攻防战。他们刚刚翻过亚平宁山脉而来，粮草怕也已告罄。


0 250 500m
N
圣母百花圣殿
（文艺复兴时期）
旧宫
（文艺复兴时期）
阿诺河
菲耶索莱
阿诺河
卡萨亚大道
佛罗伦萨
N
0 10km
罗马时代的道路
罗马时代的市区
中世纪
(13 世纪以前)
文艺复兴时期

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图）及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和菲耶索莱（小图）

古罗马时代，佛罗伦萨称为佛罗伦提亚（Florentia），是罗马人在起源于亚平宁山脉而注入第勒尼安海的阿诺河北岸建起的城市。此前居住在此地的是伊特鲁里亚民族。伊特鲁里亚人生性喜在不太高的山丘上建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就是菲耶索莱山丘，这座山丘现在盖满了别墅。征服并同化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罗马人喜欢在平地上建城。沿阿诺河而建的佛罗伦萨起源于罗马时代。公元前1世纪，苏拉首先把这里选做手下兵士退役后的落脚点。可是，这位勇将的前下属非但没有落下脚，反而因参与“喀提林阴谋”而全军覆没。后来尤里乌斯·恺撒让自己手下的退役兵士到这个眼看就要成为无人之城的地方定居。据说从这时起，“花都”之意的佛罗伦提亚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后来以“文艺复兴之都”驰名的佛罗伦萨，其实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存在。卡萨亚大道（Via Cassia）现在是国道2号线，至今仍发挥着作用，这条大道连接着首都罗马和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扩展到了阿诺河南侧。但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只在河的北侧，是夹在阿诺河河岸和“圣母百花圣殿”之间的一个四边形地方。现在出了市区直接走上缓坡就能到达菲耶索莱山丘。可是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相距甚远，其间广阔的平原都是耕地。两者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比在文艺复兴时代要遥远得多。拉达盖苏斯率领40万人翻过亚平宁山脉之后，开始进攻佛罗伦萨，这片广阔的耕地就成了他们的“野营地”。

斯提利科放出了侦察兵，他知道“时机”已到。他的军营在北意大利的帕维亚，他一边瞄着拉达盖苏斯的动向，一边保持着距离，将3万人部队选择别的大道，从意大利北部插到了意大利中部。他们知道，敌人终于为进攻佛罗伦萨而集结在了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这块平原。

斯提利科来到菲耶索莱背后，先与全力以赴进行防御的佛罗伦萨取得了联系。蛮族原本不善于进攻围着城墙的城市。佛罗伦萨又面对阿诺河，蛮族的包围也是漏洞百出，与市内取得联系并非难事。

斯提利科向佛罗伦萨的居民要求提供食物和人手。“食物”是供给他带来的3万名兵士，“人手”是用于他构思的土木工程。佛罗伦萨的居民意识到靠自己的力量无望抵御蛮族，所以高兴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要求。菲耶索莱居民的食物已经被蛮族抢劫一空，只剩下了一条命，但他们仍然高兴地响应了提供人手的要求。这样，用栅栏和壕沟把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开阔地全部围起，把蛮族赶进去，宏伟的战略态势便告形成。

当然，罗马人经常需要派兵击退那些看到这个工事而来进攻的蛮族，但因此损失的士兵数量与和10倍之敌正面作战的损失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对那些看到了工事而逃跑的蛮族也不用派兵拦截。人看到危险就会朝自己人所在的方向逃去。用栅栏和壕沟包围敌人，断绝其供水与食物的战斗，就在这盛夏的骄阳之下同时进行。

佛罗伦萨四周被丘陵包围，夏天不仅炎热，湿度也大。它位于罗马北面，但夏天比罗马炎热，冬天比罗马寒冷。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平原是典型的盆地，夏季尤其闷热，到了8月实在无法忍受。住在平原的佛罗伦萨人在周边丘陵地带建有别墅，也是为了躲避夏天的这份炎热。在盛夏的阳光下，这40万人已经断水绝粮，宛如被赶进围栏里的羊群，不断有人倒下、死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斯提利科并不着急。那些刚从高卢过来成为他属下却并不了解意大利的蛮族士兵，那些一下从奴隶变成士兵的各族人等，没有一个人随意行动，简直就像斯提利科从小培养并在他手下作战多年的士兵，完全膺服于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罗马武将，这情形令人不可思议。

即使坐视对手因饥渴而倒毙，40万众也不知何时才能死完。于是8月过半，斯提利科把西侧包围圈撕开一角，故意让还能移动的蛮族朝阿

诺河方向逃跑，然后派兵从背后压向疯狂求水冲向阿诺河的蛮族。这个计谋逼使饥渴的蛮族人不是倒在剑下，就是被水淹死。

然而，这个暑天断水断食的战役只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置20万人于死地，这并没有任何现场记录做根据。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相当忠实地记录这位蛮族出身武将言行的克劳狄安，从两年前开始就什么也不写了。这位比斯提利科年长几岁出身于埃及的诗人，在公元404年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无人知晓他是亡故还是患病回乡。后来成为圣人的奥古斯丁曾经提到过以“菲耶索莱战役”之名著称的这场战役。他当时在北非做主教，通过传闻知道了发生在意大利中部的这场战役。

由此可见，这场“菲耶索莱战役”虽然没有丰富的史料记载，但显然是历史事实。

8月23日，栅栏壕沟的围歼战开始尚不到两个月，战役就以生者投降而告结束。活下来的人数不详。不过，有人说沿阿诺河到比萨，有10万人逃往法国南部。当初率领40万人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在逃亡途中被捕，押解到斯提利科面前被迅即斩首。投降的人当中年轻力壮的1.2万人被编入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均被出卖为奴。由于数量过多，奴隶价格下跌，据说3个月前还是奴隶的士兵有生以来第一次买得起奴隶了。

从公元405年到406年，蹂躏意大利半岛北半部、使首都罗马颤抖的拉达盖苏斯及40万蛮族，在夏日的太阳下来到菲耶索莱丘陵之麓便似蒸发了一般，踪影全无。

这是斯提利科的完美胜利。等待战机一举定乾坤，这个做法让人想起四百五十年前尤里乌斯·恺撒的“阿莱夏攻防战”。元老院得知“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登上卡匹托尔的山冈，感谢以朱庇特为首的诸神。而在四百五十年后的罗马，长久以来一直保佑罗马人的诸神已然成为邪

神。但是，如此巨大的欣喜怎么能不向谁表示感谢呢？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公元5世纪初叶的善男信女们倾巢出动，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乔万尼大教堂，把感谢奉献给了基督教之神。北非教区得知胜利消息后，圣奥古斯丁也说，这是神的恩宠创造的奇迹。

然而，意大利的人心完全没有因此倒向斯提利科一边。由于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元老院议员中，不少人表面上装做基督教徒，内心却依旧对罗马传统诸神感到亲近。但这些“隐性异教徒”倒也并未在自己家里偷偷地感谢诸神。有句谚语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早忘记了整整半年的恐惧。同样忘记恐惧的还有21岁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他身兼执政官却不知道身先士卒、冲向敌人是执政官之责任。这帮人不但忘却了刚刚过去的恐惧，甚至开始责难斯提利科。他们以斯提利科让10万蛮族逃往高卢为口实，谴责他靠牺牲高卢来解救意大利。

只有46岁的斯提利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因这些非难而动摇。他虽然成功地捕捉到战机，一举获胜，但这一胜利毕竟不似恺撒那样，是在远离意大利的敌土之上取得，而是在蛮族入侵深入意大利半岛之后才取得的。他深知二者之间的不同。这还不能说作为与皇帝霍诺里乌斯共同担任的执政官，自己已完成了职责。现在已不可能完全阻止蛮族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侵犯，但至少得阻止蛮族对本土意大利半岛的入侵。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忘记与意大利接壤的高卢的防卫，尤其是高卢南部的防卫。这个想法逐渐占据了斯提利科的大脑。对高卢的担心在菲耶索莱战役胜利之后不到4个月即成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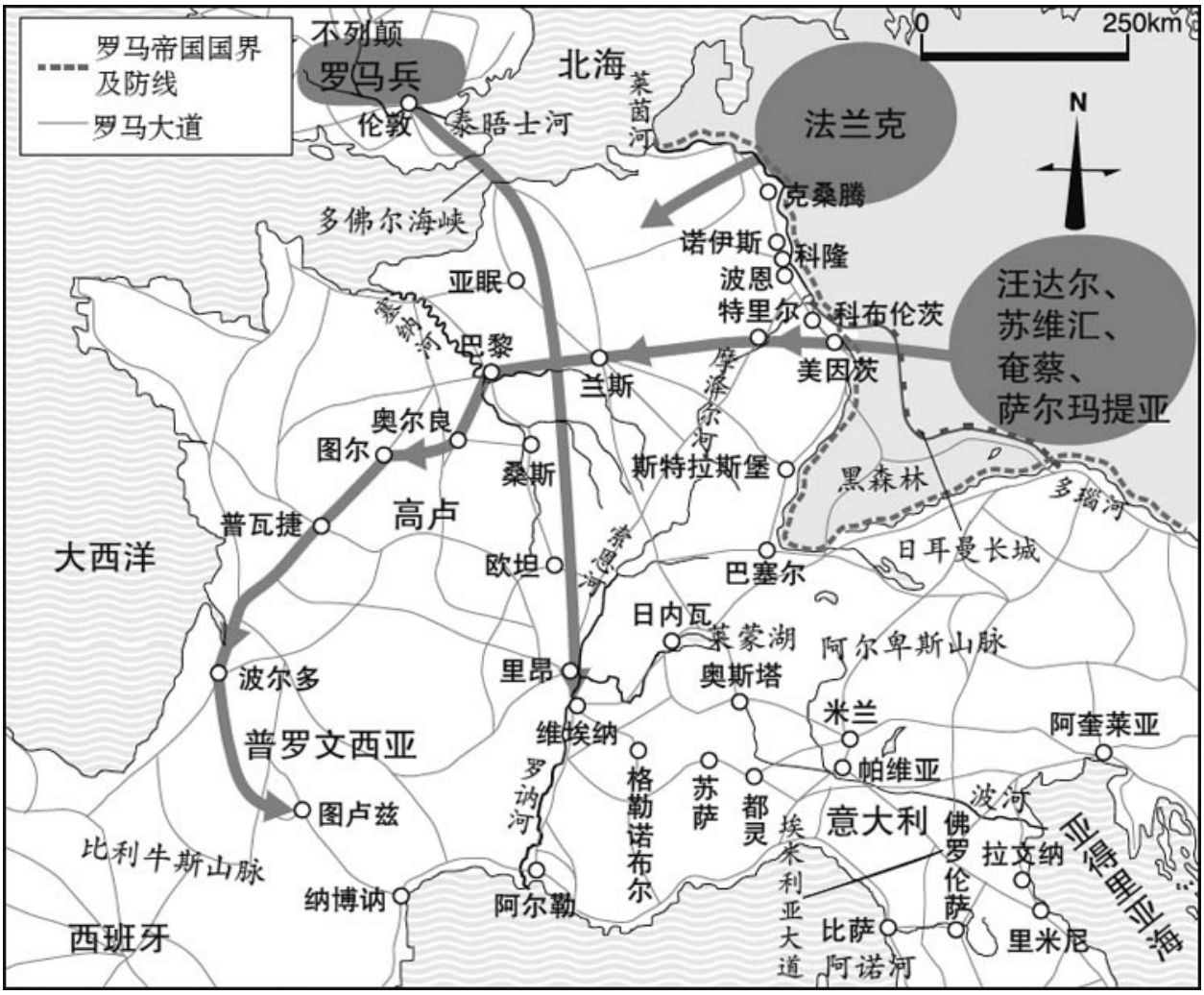
高卢的现实

公元406年12月，日耳曼系蛮族再次群起渡过莱茵河涌入高卢。这次也是由汪达尔、苏维汇、奄蔡、萨尔马提亚等各部族遭到匈奴人驱赶，大队人马侵入罗马境内。这与一年前拉达盖苏斯的情形相似。由于

莱茵河下游已被法兰克人占领，为回避与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但更为强大的法兰克人正面冲突，他们选择在莱茵河中游渡河。

15万被匈奴人驱赶无家可归的大群难民手执武器奔袭而来。过去的军团基地现在已无力防御，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了。这次的蛮族集团由各部族组成，其中强大的部族有4个，但没有像拉达盖苏斯那样的统帅。

莱茵河畔的美因茨陷落了，特里尔被占领了，敌人转眼逼近兰斯。兰斯陷落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巴黎，随后是奥尔良。图尔、普瓦捷被攻占后，轮到了波尔多。蛮族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图卢兹，比利牛斯山脉挡住了去路，他们这才停下脚来。蛮族如同狂暴的飓风从东北向西南横扫高卢全境，给高卢造成了重大损失。与飓风所不同的是，横扫之后蛮族并未离开，而是到处落脚。这个时代，蛮族来犯已经不是抢劫之后再回到莱茵河对岸，而是就地盘踞。给高卢居民造成灾难的还不仅是北方蛮族。



5世纪初叶的高卢

自元首制时代起，罗马就在不列颠长期驻有3个军团。随着时代的推移驻军逐渐减少，进入5世纪时已只能勉强维持一半的兵力。这一半的兵力北边要抵御越过哈德良长城入侵的斯科特人，东边要面对渡过北海入侵的盎格鲁和撒克逊蛮族。4世纪末，罗马帝国东西分治之后也没有正式放弃不列颠，但事实上，来自帝国的关照几乎让驻扎在那里的士兵感到自己已被皇帝遗忘。帝国已经腾不出手照料位于边境的不列颠了。

思想上感到被遗忘，军饷也经常停发，敌人却一刻不停地袭来。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中有人号召“到高卢去”。此人不过一介兵士，却

能言善辩，士兵们拥他为皇帝，似乎是在向遗忘了自己的皇帝泄愤。这人被拥立为皇帝之后改名与君士坦丁大帝同名，号称君士坦丁三世。在他的率领下，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士兵全体渡过多佛尔海峡，攻占了高卢。

君士坦丁三世

高卢居民从东北到西南遭到蛮族蹂躏，家园也遭侵占，正处绝望之时。他们像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地迎接君士坦丁和他的不列颠士兵。擅自称帝的君士坦丁是篡皇位之贼人，但人们已顾不上这些了。

5世纪初叶，高卢的情况不可能用图准确地表示。日耳曼系各部族渡过莱茵河到达这里，他们所盘踞的地带从东北到西南呈带状延伸。君士坦丁及其士兵渡过多佛尔海峡从不列颠来到这里，一边击溃遭遇到的蛮族，一边向东南挺进。拉达盖苏斯残部也逃进了高卢南部。如此混战状态，图示只能表示概貌。高卢唯一安静的地方是已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北部。斯提利科认为，意大利半岛防御的必要条件是高卢南部的防御。但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无法一蹴而就。这就是公元407年的高卢现状。

然而，对支撑霍诺里乌斯皇帝的斯提利科而言，危险与其说是盘踞在高卢的北方蛮族，不如说是僭称皇帝的君士坦丁。

第一，既然霍诺里乌斯是皇帝，那么另一个皇帝就是皇位篡夺者，不可对此人置之不管。

第二，这个皇位篡夺者得到了高卢人的支持，所以隐含着高卢全境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的危险。

第三，从西北向东南进攻高卢的君士坦丁决定以维埃纳为根据地。维埃纳位于里昂稍南，从那里沿罗讷河的大道南下，可以直插斯提利科确定的罗马军队在高卢的根据地阿尔勒，取道向东则可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

公元407年秋，斯提利科要求元老院宣布皇位篡夺者君士坦丁为“国家公敌”。罗马元老院议员也反对两皇并立，这点得以顺利通过。紧接着，斯提利科让在手下参加过菲耶索莱战役的萨罗率领一队人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高卢。萨罗出身于哥特人，英勇善战，击毙了两个号称君士坦丁左右手的将军。萨罗未能攻陷维埃纳，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了意大利。尽管如此，他让君士坦丁领悟到觊觎意大利绝无好下场。

然而，高卢的现状并未得到改善。斯提利科手下包括蛮族和奴隶出身的人在内也只有3万人。靠这样的战斗力能不能完成意大利半岛的防御尚且是个疑问，根本没有余力再出兵高卢。

蛮族、奴隶在当时罗马社会均是虎狼之辈，他们在菲耶索莱战役之后仍能留在斯提利科麾下，这点非常不可思议。同时代人从下面的情形中找到了原因，这些同时代人大半在后来都反对斯提利科的政略。连反对派也赞赏，这原因也许就更可相信。

这个原因就是，斯提利科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公正。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不论是罗马公民、蛮族出身，还是原来的奴隶，完全一视同仁。他奖罚分明，不仅是获得赏罚的当事人，连没有受到奖惩的人也都心悦诚服。他虽然是西罗马帝国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却没有一次中饱私囊的行为。

皇帝及其身边的人模仿东方专制君主一味奢华，高级官僚们滥用职权聚敛财富，就连基督教的主教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心存良知的人们为之侧目。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称颂斯提利科的清白廉洁，连反对他的人

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美德。他给部下分配战利品不仅宽松，甚至不会忘记考虑每一个士兵的情况。他对士兵们的伙食比对自己的更加上心。也许，斯提利科这种一贯的作风吸引了前来投奔的无亲无故的蛮族和原奴隶出身的士兵们。总之，斯提利科是能得到属下将士全部信赖和忠诚的将军。然而，仅有3万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以毒攻毒

根据史学家吉本的说法，斯提利科与西哥特人君王阿拉里克的秘密交涉从公元404年就已开始。果若如此，时间应该是第二次打败阿拉里克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之后不久。

那年夏天，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以意大利北部为舞台展开战斗。在战斗中，阿拉里克的妻儿被俘。敌将的妻儿在凯旋仪式上是不能缺少的角色，否则民众不答应。一直期盼的示众节目不能因此而减少。俘虏在罗马人的凯旋仪式上示众之后一般不会被杀。只有被视为极危险的人物、被认为活着将对罗马造成严重危险的人才会被杀。敌将的妻儿不是敌将，并不在此列。

说不定在凯旋仪式结束之后，斯提利科就指示将阿拉里克的妻儿秘密地送还给他。败给斯提利科逃回来的阿拉里克藏身于亚得里亚海对岸达尔马提亚的某处，离意大利是一昼夜的海路距离。狂热的凯旋仪式之后不久，斯提利科便冒险做了如此举动。阿拉里克对落入敌手的妻儿已经绝望，又忽然重逢，他的心情也许起了变化。无条件放还妻儿，开启了极端秘密的交涉。

假设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接触从公元404年即已开始，那么公开这一交涉就花了4年的时间。大概斯提利科并不急于求成。在此期间，斯提利科致力于强化防御体系，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一举击败了拉达

盖苏斯的40万蛮族入侵。斯提利科的立场也不断强硬起来。在自己力量不断增强的时期不急于妥协，这是铁定的法则。但这也有到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就是公元407年到408年这段时期吗？

而阿拉里克方面想要与斯提利科在平等立场上交涉，4年是绝对需要的。阿拉里克两次与斯提利科对决都被彻底打败，只得仓皇逃回伊利里亚。收拾残兵，东山再起，4年时间并不嫌多。

为什么斯提利科选择的交涉对手是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而不是其他北方蛮族的族长呢？法兰克人反复从莱茵河下游地区入侵高卢并已在高卢北部定居。罗马帝国与之虽然不是同盟关系，但也不是敌对关系。那么为何选择连达尔马提亚之战在内已有4次交锋的阿拉里克呢？

因为阿拉里克是曾经交手且次次被打败过的对手。斯提利科确信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其击败，所以选择了阿拉里克。阿拉里克虽然每每被斯提利科灌以苦酒，但作为凝聚、指挥属下的蛮族领袖非常能干。斯提利科打算让阿拉里克去收拾混战中的高卢，让同为日耳曼系的蛮族前去镇压正在祸害整个高卢的蛮族。

“以毒攻毒”的战略在罗马绝非这时才第一次使用。对罗马国家而言，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这都是长年惯用的政略和战略，实例不胜枚举。

公元前3世纪接近尾声时，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盘踞意大利半岛达16年之久，罗马每战必败。年轻的西庇阿看破了汉尼拔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骑兵的战力，从而使战局逆转。使用重装步兵作为主战力已是罗马军队的传统，罗马军团没有强大的骑兵。所谓传统，就是只要能支撑下去就不可以改变的事物，非传统就是纵令改变也无法期望获得多大效果的事物。西庇阿没有要求自己手下的步兵骑马，而是把迦太基的邻国、同处北非且有骑兵传统的努米底亚收编过来。汉尼拔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扎马会战”是他的唯一败绩。在这场战役中，西庇阿与努米底亚

国王马西尼萨并肩作战，取得了完胜。

事实上的帝政创始人尤里乌斯·恺撒在所有领域里都是玩弄“以毒攻毒”的高手，无论是政治、军事，甚至在个人举债方面。我们看他8年征服高卢的战后处理，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一千八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蒙森赞誉为罗马史上唯一的独创性天才。

恺撒不但承认了昨天还是敌人的高卢部族长们以前的地位和权力，还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甚至煞有介事地给予他们罗马元老院议席。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罗马的行省，支付行省税，而高卢的防御则由罗马军队承担。战后处理完毕，他离开了高卢。但这随即引发了与元老院的对立，罗马陷入内战。内战持续了4年，其间高卢没有参战。恺撒与元老院派的战斗是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北非和西班牙展开的。

当时的高卢人有足够的时间向罗马举起反旗。这4年是高卢人恢复独立的绝好时期，可是，高卢没有发生过一起叛乱。相反，他们甚至响应正在西班牙作战的恺撒之命为他送去了军粮。元老院派能从希腊、埃及筹集军费，恺撒却经常军费不足。而高卢却能一直按照恺撒确定的数额送来税款，令人不可思议。这也许是因为恺撒确定的“罗马宽松的统治”对高卢人并无不妥。高卢被誉为罗马化的典范并非没有道理。

恺撒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在利用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都是他的忠实继承者。

后世史学家把这种关系名之为“缓冲”，罗马人自己却称之为“朋友”（amicus）。罗马人的“防线”就是罗马帝国的国界。罗马帝国一贯重视与居住在国界线外侧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其对象，在帝国的东边以王国居多，在帝国的西边以蛮族居多，但罗马把它们都变成了“朋友”，由朋友进而形成“缓冲”。

这是一种紧密环绕罗马帝国的大的战略关系。要长期维持这种关

系，就必须平等受授。帝国“授予”东方“同盟者”的是，在其受到周边强大国家进攻时，罗马承担防御责任；“授予”西方蛮族的是，向他们开放罗马境内的市场，购买他们的特产皮革和裘皮。毋庸赘言，罗马方面“接受”的是综合安全保障。平日里常与罗马人接触的蛮族一变而为手执武器的入侵之敌，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直到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的国境因为上述原因成为“开放的国境”，就连围着栅栏、开着壕沟的日耳曼长城都开了为数众多的城门，不光有罗马巡逻兵出入，近郊蛮族也可以进来逛市场。

“以毒攻毒”的战略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罗马因为自身的强大能够一直赌赢，也没有多少必要害怕被“毒”，受到侵犯。斯提利科选择阿拉里克不也是为了规避这种危险吗？

进入最后一个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对士兵的渴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让蛮族加入同盟。用蛮族抵御蛮族，这即使是一种奇谈怪论，也只能如此。

转年到了公元408年入春时节，斯提利科首次公开了与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的同盟交涉。他召集元老院开会，在会上提请承认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任命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承担防御之一翼，使阿拉里克及其部下的西哥特人都担当起帝国的防御责任。作为报酬，按照阿拉里克的要求支付给他4000罗马磅金条。

元老院议员们摇摆不定。自古以来，罗马的元老院就以其讨论混乱而闻名。往好里说是活跃，往坏里说就像被捅的马蜂窝。这次的讨论也是一样。只不过高声发言者都是反对的议员，赞成的议员都神色凝重，沉默不语。

阿拉里克为什么不要苏勒德斯金币而要求用黄金支付呢？一个世纪前，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基本货币由元首制时代的第纳尔银币改成了苏勒德斯金币，希望通过把银本位变成金本位来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剧烈贬值。尽管苏勒德斯金币的重量只有元首制时代奥勒留金币的一半，但没有改变百分之百足赤的纯金质地。日常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因浮动制而被弃置不用，作为帝国基本货币的信用都押在了苏勒德斯金币上。

此后过了还不到100年，蛮族就索要佣兵费4000罗马磅，即1500公斤金条，而不要相应的37.5万枚苏勒德斯金币。是理应纯金的苏勒德斯金币中掺有杂质吗？阿拉里克20年前曾在狄奥多西皇帝麾下从军，并领取以苏勒德斯金币支付的俸禄，他为什么会特意提出要求，指定用金条支付呢？这也许是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想多了。但我仍然不禁想到，假如产油国不要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而是要求以黄金支付石油货款的话……

阿拉里克索要4000罗马磅黄金，根据残缺不全的片断史料推测，似乎大大超过其他“同盟者”的要求。不过也可以想象，这个要求已经考虑到了对方的支付能力。

西罗马帝国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呢？连征召3万名士兵尚且千辛万苦，我们可以说国家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个人呢？关于西罗马帝国的富裕阶级，研究者们提出了以下推测值，同样用以罗马磅为单位的金条数量来衡量。

大规模农庄主几乎都是元老院议员。假定元老院议员维持在元首制时代的数量，应该是300人。研究者们定为“大富豪”的人都是年收益总额超过4000罗马磅金条，定为“中富豪”的人年收益在1000到1500罗马磅金条。

这些“大富豪”、“中富豪”究竟有多少人呢？参考元老院议员长年在

这方面的比例来看，300人中有3到5人是“大富豪”，20人左右是“中富豪”。此外的大半元老院议员可称为“富裕者”，至少也是“过着充裕生活的人”。代代相承的元老院议员很多，所以元老院议员不一定都是富人。

研究者们又说：仅就大中富豪而言，罗马元老院议员的财力就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的两倍。我想，这原因恐怕在于财富积累程度上的差异。从推行王政开始，罗马元老院也已延续了400年以上，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只有100年的历史，而且议员完全是专制君主下的名誉职务，“积累程度”产生差距亦属理所当然。

因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整体财力高于帝国的任何一处。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属于“中富豪”的议员的生活。此人名为西马库斯，是《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末尾时叙述过的、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展开论战的西马库斯的儿子。西马库斯家族是名门，家族中曾有人被誉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簇火焰”。虽然富裕程度处在中游水平，西马库斯在罗马元老院中却是备受尊敬的议员之一。

我们再看看这位西马库斯家中的资产。他在首都罗马市内拥有3处宅邸，在整个意大利拥有15处别墅。每处别墅都附属有大片农庄，都是作为农业基地极为适合的典型罗马式别墅。这15处别墅产生的年收入相当于1500罗马磅黄金。

西马库斯家在意大利半岛脚尖前方的西西里岛上也拥有别墅。被认为属于他家的这座别墅，位于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中心的恩纳附近，现在仍在发掘调查中。人们已经知道，这座别墅建于4世纪初叶，一直使用到6世纪末。

这是一座田园别墅，占地甚广，有30个房间。家人生活空间“内庭”长36米，宽30米，周围排列着圆柱。东侧走廊宽5米，长60米。浴场宽敞明亮，温水浴室中配备有热浴室和冷浴室，显示出沐浴在罗马式生

活中不可或缺。接待客人用的大客厅有12米宽，24米长。此外还有一间大厅，是一个21米见方的客厅。从里面辟有3处半圆形空间看，墙面上肯定装饰着很多雕像，堪称“雕塑厅”。

残留在各个房间地面和墙壁上的镶嵌画美观漂亮，反映出了主人的情趣。这些镶嵌画中看不到基督教方面的主题，描绘的都是田园收获和狩猎生活。通向浴场的走廊长21米，里面的镶嵌画描绘了罗马“大竞技场”最有人气的战车比赛的场面。

别墅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越了罗马鼎盛时代，生活在其中的却是基督教时代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浓厚的异教色彩呢？在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被打成邪教的时代，如果还悄悄对其心怀亲近，就会成为“隐异教徒”。但既是出自名门的元老院议员，又是“中富豪”，也许没有必要刻意隐藏，何况此处地处西西里岛深处，远离基督教天下的米兰和罗马。

另外我还想到，为了维持这座别墅，需要数十个用人；为了耕种别墅周围广阔的农田，需要数百个农奴。如果这是“中富豪”，那么“大富豪”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的确，这个被认为属于西马库斯家族的别墅位于意大利南部，尚未遭到北方蛮族的进攻。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帝国进入最后一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也是财富雄厚，不过感觉上是国穷民富，与帝国鼎盛期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但罗马并不缺少财力雇用阿拉里克及其属下的10万名士兵。

面对斯提利科要求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元老院一片混乱。也许元老院议员的本意是不想出钱。以前，斯提利科在做道路修缮工程时，曾经要求在工程附近拥有农庄的元老院议员捐出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许他们厌恶重复这种事情。

但是以钱说事，事关他们自认为是帝国精英的名誉。于是他们把罗

马帝国的传统推到正面进行反驳。一个名叫兰帕迪乌斯的议员说道：

> 与阿拉里克的协约不是带来和平的协约，而是导致奴隶化的协约。

很多议员对这个发言表示赞成，但斯提利科并未退却。他解释道，给阿拉里克及其属下西哥特人的4000罗马磅黄金，并非是作为年贡金来换取阿拉里克不再入侵意大利，而是给他们的从军报酬。也许有不少议员虽不是出自真心也不得不赞成斯提利科，元老院以多数赞成，承认了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但是，人们常常会憎恶那些把自己不想看到的现实摆在自己面前的人，憎恶的原因只在于这人这样做了。投反对票的议员自是当然，那些不得已投了赞成票的议员看斯提利科的眼神也与以前不一样了。那看着自己联军总司令的眼神，好像是现在刚刚想起斯提利科也是蛮族出身一般。而且，他们为自己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另一个蛮族人的说服下，同意与一个曾经企图入侵意大利的蛮族结为同盟。

狄奥多西皇帝也曾不但给昨天还是敌人的蛮族居住的土地，还支付了佣兵费。但是狄奥多西是皇帝，父母又都是罗马人。如果斯提利科是罗马人的皇帝则情况不得而知。然而，斯提利科虽是联军总司令，但他出身蛮族。由他说教只有与蛮族共同奋斗才能拯救罗马帝国，而议员们却不得不同意，这种现实也是苦涩的。这个现实把议员们推向憎恨斯提利科的一面去了。议员们的感觉是，你一个蛮族，怎么知道罗马精英的心情？

可是，只要稍稍一想就可以知道，这点根据也相当薄弱。5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中没有一个出身于元首制时代传承下来的门第。西马库斯家族被认为是4世纪到5世纪间的名门贵族，在100年前的3世纪也并不出名。这位称协约将导致奴隶化而反对到底的兰帕迪乌斯，也是这时首

次登上罗马史的舞台，也许是最近刚刚进入元老院。

在罗马，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在元老院的发言并不是以“各位议员”开头的，惯例是以“各位父老，各位新人”开始的。相当于现代国会的元老院不会由被王政时代尊为建国之父的300个家族的后代所独占，是向“各位新人”敞开门户的。这样可以经常给容易僵化的统治阶级注入新鲜血液。5世纪的元老院议员中加入新人的概率也相当高。

元老院议员和斯提利科都是帝国统治阶层的新加入者，这一点他们之间没有不同。他们与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体内流淌的血液或许有一半是蛮族的，但元老院议员们的父亲是罗马人血统，而斯提利科虽然母亲是罗马人，但父亲是汪达尔人。这是他们元老院议员与斯提利科之间仅有的不同。这就像即使是与用人所生的孩子，只要父亲是君王，他就是王子的情况一样。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圣哲罗姆那样的有识之士把斯提利科称为“半蛮族”（semi-barbarus），以区别于其他蛮族。但在普通人看来，这个“半蛮族”，也是“蛮族”。如今，元老院议员们第一次苦涩地体会到，自己已经被这个“蛮族”事实上统治了长达13年之久。

孤立

投向斯提利科的敌意不只充斥在元老院的会场之内。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这个时期也逗留在罗马。近来，这位赛妮娜也开始反对丈夫。赛妮娜是先帝狄奥多西的侄女，被狄奥多西收为养女后嫁给斯提利科。夫妻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因嫉妒而起的反斯提利科的阴谋犹如家常便饭，但都被赛妮娜用稳健的手段收拾在了萌芽状态之中。这看上去很理想的一对，也在婚后第25个年头出现了分歧。也许作为皇室的一员，赛妮娜认为，丈夫试图把蛮族纳为伙伴的政策就是蔑视帝国的政策。与身为天主教徒却一次都不曾镇压过异教异端的斯提利科不同，赛妮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而丈夫试

图与之结盟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却是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这一教派被天主教派定为异端。这也许就是赛妮娜突然变心的真正原因。

较之于罗马，明确反对斯提利科、主张免谈与异端联手一事的是比任何地方都狂热的天主教城市米兰。也许是安布罗西乌斯生前的说教在这里起了作用吧。更糟糕的是，米兰居民的反斯提利科情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内心想法上。

斯提利科（右）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左）

“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指挥的罗马军队在意大利的营地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从帕维亚到北面紧挨着的米兰，距离不过30公里。给帕维亚驻军基地运送军粮的是米兰商人，士兵们在假日欢娱的去处也是米兰。认为与可憎的蛮族结盟就是反对基督教义的气氛在整个米兰弥漫开来。这种气氛侵袭到帕维亚只是时间问题。

斯提利科受到元老院阶级的敌视，又被妻子反对，还被占下属士兵半数的罗马兵说成是卖国贼。但那些蛮族和奴隶出身的士兵一如既往地对他奉献着忠诚。他们的营地在博洛尼亚。公元408年春天，留在斯提利科身边的自己人就是宿营在博洛尼亚的这些士兵和帕维亚军营的将官。身为军队高官平常却都在最前线，从他们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的极限。

可是，在公元408年春天的这段时期，皇帝霍诺里乌斯究竟怎么看斯提利科还不明了。霍诺里乌斯已经23岁，但一直待在拉文纳闭门不出。他即位已经13年，事事按照斯提利科所说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找遍了当时的记录，人们没有发现一句接近于他的想法的记载。也许他原本就没有什么想法。

霍诺里乌斯

不过，对斯提利科不利的状况已经出现。斯提利科的长女玛丽亚嫁给了霍诺里乌斯，但没有生子就去世了。之后，次女晋为妃子。玛丽亚是公元408年去世的，长女与次女的交替也一定是在这年春天完成的。霍诺里乌斯皇帝根本不愿与这位新妃同床。不过他并没有疏远新妃的父亲斯提利科。终于，有件事使霍诺里乌斯表明了态度。

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于5月初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西罗马帝

国。霍诺里乌斯和斯提利科在7月份得知了这一消息。

阿卡狄乌斯肉体上、精神上都很孱弱，身为皇帝却不能治人，反而受治于皇后及宫廷里的官僚。他也和弟弟霍诺里乌斯一样，只是一位坐在虚位上的皇帝，31岁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优多克西娅是一位干练的女性。她不单是个妃子，还正式取得了皇后的称号，并早早地确立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自己则决定成为7岁的狄奥多西二世的摄政者。一切落实之后，这才把东罗马帝国皇帝去世的消息通知西罗马帝国。

接到消息，霍诺里乌斯难得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主张去君士坦丁堡，帮助年幼的外甥进行统治。不过这只是表象，真实的意图是趁皇帝年幼，把东罗马帝国的皇位据为己有。

斯提利科反对这样做。反对的理由是，西罗马帝国正遇时艰，关键时刻皇帝不可不在。这个主张合情合理。但这也是表象，其本意在于当今反斯提利科的气氛甚嚣尘上，唯有霍诺里乌斯具有使斯提利科得到承认的力量。

皇帝能够维持皇位而与其能力无关，靠的是皇权神授说。正如君士坦丁大帝所洞察的那样，让谁即皇位乃神的意志而非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才承认并竭力振兴基督教。由于皇帝对凡人而言是“不可接触者”，无能的皇帝也能维持皇位的理由才会成立。不过，因此规避了皇帝更迭带来的政局不稳也是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谁当皇帝都能成为“关键”人物，而与其能力如何并无关系。

然而，互相不说出本意而只靠面上的理由去应付对方，这样的人际关系即使能够解决问题，却不能不留下隔阂。斯提利科以理来驳，霍诺里乌斯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说法。但他开始憎恨从10岁起就一直保护着自己的斯提利科。他原本懦弱，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主张遭到反对后反倒强硬起来。这13年来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的皇帝与联军总司令的关系，突

然冷却了下来。而这个变化，把机会和能量赐给了皇帝身边的宫廷官僚们，他们开始进攻长年难以对付的斯提利科。

计谋

单凭奥林庇乌斯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有可能出身于希腊，是奴隶出身的宦官。这人以前的经历全然不为人知，不知何时成了霍诺里乌斯宠幸有加的心腹。为了彰显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还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受到被天主教徒尊为“教父”、后来被列为圣人的圣奥古斯丁的热情赞誉。这个奥林庇乌斯向皇帝的耳朵里吹风说，斯提利科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并不是为了保卫霍诺里乌斯，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23岁的皇帝想起了前几日的事情，斯提利科请求为自己的儿子迎娶皇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依稀的疑惑已经变得肯定。数日后霍诺里乌斯离开罗马北上，经博洛尼亚去帕维亚。皇帝出发时公布的此行目的是前去激励博洛尼亚和帕维亚两个罗马军团基地的士兵们。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与皇帝同行到了博洛尼亚。奥林庇乌斯主张，其后的帕维亚之行皇帝可以单独前往，霍诺里乌斯也表同意，斯提利科便留在了博洛尼亚。

皇帝霍诺里乌斯虽然意志薄弱，但不是坏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在帕维亚等待他的是什么，也不像是他知道一切后才去的帕维亚。这些一定都是以奥林庇乌斯为首的宫廷官僚们设下的计谋。

5世纪初叶那个时期，意大利中部主要城市之一博洛尼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博诺尼亚）是非正规军的宿营地。从那里沿埃米利亚大道向西北走，就能到达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提契努姆），这里是正规军的宿营地。这样的配置源自斯提利科首先在意大利

北部迎战北边入侵的蛮族，接着在意大利中部将其完全击破的战略。所以，博洛尼亚的军队由斯提利科指挥，帕维亚的军队则由深得斯提利科信任的将军指挥。

这是霍诺里乌斯即位13年来首次访问军营。在帕维亚，从司令官到每个士兵都已万事俱备，整装以待。

兼任军队最高司令官的罗马皇帝访问军营，都要有高官随从左右，各部队将士以分列式行进，走过皇帝面前接受检阅。检阅完毕后，皇帝要向列队的将士训话，进行鼓励。这已成为惯例。霍诺里乌斯坐在高坛上的御座里，左边站着宫廷高级官僚，右边站着军营的司令官和大队长。

士兵们很快开始行进受阅。检阅到中间时，正在一边敬礼一边行进的一队士兵突然混乱起来，单手持剑，向并排站在皇帝右侧的司令官和大队长们袭来。

军队高官们身上穿的不是实战用的防御功能完美的甲胄，而是更加重视美观的仪式用甲胄。在这场众多士兵发起的出乎意料的袭击中，军官们受到利剑突袭，无人能够护住自己的身体。骑兵总司令倒下了，步兵总司令也横在了血泊之中。军营的兵站最高首领也成为血祭者，甚至连基地的财务官也遭到杀戮。帕维亚军营的高级军官全部被杀。这些人可个个都是斯提利科从小培养起来的。在其他士兵目瞪口呆根本无法出手的瞬间，在面色惨白、跌坐在御座上发抖的霍诺里乌斯面前，清洗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便已大功告成。然后，奥林庇乌斯面对士兵，替因恐惧而发不出声的皇帝传达了圣旨，他表示，被肃清的高官们正在策划暗杀皇帝的阴谋，打倒这些重罪犯的士兵受到赞赏。士兵们近来一直耳闻天主教徒非难斯提利科，听了奥林庇乌斯转达的圣旨，心里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一事变立即被报告到了相距200公里的博洛尼亚。这一定是斯提

利科派的某位队长成功逃脱，快马加鞭前去报告的。斯提利科越晚知道事变的情况，对奥林庇乌斯及其同党就会越有利。

我们完全不知道斯提利科得知这一消息后有怎样的感慨。以记录斯提利科言行为己任的诗人克劳狄安已经不在，斯提利科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仅从反斯提利科派留下的片断记载推测，事情进展是这样的：

博洛尼亚军营的非正规军将士是蛮族出身的雇佣兵和奴隶出身的士兵。这些将士一致决定站在斯提利科一边。他们派出代表去见斯提利科，在难掩悲痛表情的斯提利科面前明确表示，如果与帕维亚军队作战，哪怕对手是皇帝的军队，他们也将在斯提利科手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斯提利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回去。这位年届48岁、蛮族出身的罗马将军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重大问题。

帕维亚的部队清除了斯提利科派以后，已经群龙无首。如果斯提利科亲率博洛尼亚的军队前往，是很容易取胜的。但是，如果他贸然行事，那他就不是罗马人了。

底线

13年前，斯提利科被悟到死期即至的狄奥多西皇帝叫到床边，受托保护身后17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不满10岁的霍诺里乌斯。斯提利科向弥留之际的皇帝发下誓愿。如果现在向皇帝霍诺里乌斯进军，就将违背当时的誓约。对属于领导层的罗马男人而言，遵守誓约是超越法律的“道德”（moral，词源是拉丁语“mores”）问题。当时，道德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下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斯提利科视为楷模的不是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而是昔日的罗马人。

而且，作为部下，向自己曾起誓效忠的皇帝引弓，他就不成其为罗马武将了。罗马人最重视遵守誓约，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地位有高低之差，武将之间严守誓约是罗马军队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军队的特质。尽管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斯提利科而言，这一点儿也没有过时。

紧跟其后的第三个问题对斯提利科而言尤感强烈，因其父亲是北方蛮族汪达尔人。

在身为罗马人母亲的身边接受罗马式教养，刚刚20岁出头，年纪轻轻就得到狄奥多西皇帝的提拔，此后25年如一日，他一直都是作为“罗马人”（romanus）度过的。在狄奥多西死后的13年中，他一面守护着幼小的皇帝，一面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他认为，自己比同时代任何罗马人还要“罗马人”，一直守护着他的罗马帝国。如果他现在举兵，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这意味着他不再是“罗马人”，这是“蛮族”的所作所为。这一点他不能容忍，他不能忍受在做了48年“罗马人”之后再回去做“蛮族”。

可是，如果不就此奋起，自己就将毁灭。是不奋起而灭亡，还是奋起而作为蛮族活下去呢？

人总有一条绝对不可让步的底线。底线因人而异，没有客观性可言，既不能用法律去约束，也不能通过宗教去说教。这是每个人自认为好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探求普遍真理的哲学。用拉丁语说，这是“stilus”（范儿），也就是意大利语的“stile”、英语的“style”。有些东西在他人看来并不重要，但在自己看来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一旦他想改变这些东西，那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命运之日的3月15日以前一个多月，就已经知道自己已处于一种阴谋之中，只是不知道这个要推翻自己的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在参加由他召集、定于3月15日开会的元老院会议时，没

有采取任何自我防卫措施。元老院议员参加会议不佩短剑，在罗马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在自己身边配备卫士，或对每位前来元老院的议员一一搜身，这些都是怀疑承担罗马国家职责的元老院议员人格的行为。况且，自己是绅士，就要把别人也当做绅士对待。与此相反的行为，即便是保护自己，尤里乌斯·恺撒也是绝对不会做的。

然而，就是在那一天，布鲁图和他那一派的14位元老院议员在镶有表示元老院议员身份的红边白色托加下暗藏了短剑。这14个人用短剑袭击了恪守罗马元老院传统而毫无防备的恺撒。据说14人中，有人因兴奋而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也在恺撒身上留下了多达23处的伤口，但其中只有一刀是致命的。

作为武将，恺撒当即就意识到那是一刀致命伤。倒下之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托加下摆裹起自己的身体，他不愿在倒下时露出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也不忘保持体面、保全自身品格之人的行为。

恺撒指定的继承人是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的统治时间是恺撒的10倍，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次数数不胜数，但他没有一次是单独到会的。他没有让“SP”（警卫）跟随左右，也没有让人对到会的议员进行搜身检查。他尊重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只是没有数位对自己绝对忠诚且身强力壮的元老院议员的簇拥环绕，他绝对不到会。

恺撒在为数众多的人才中选定奥古斯都为接班人，是因为恺撒在尚未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中见出了奥古斯都所具有而他人所没有的天资。而且，奥古斯都也实际证实了自己是恺撒最好的接班人，证明了恺撒对自己的提拔不谬。说他们二人创立了罗马帝国是不会有错的。

这二人天赋相同，但“范儿”有所不同。我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其说在于天资，不如说在于范儿，在于“如何生活下去的姿态”。正因为如此，“姿态”才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好似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就在于他短暂却充实的活法。

死亡

是作为罗马人而死，还是回到蛮族而生？斯提利科难以抉择，苦恼不已。在得知皇帝霍诺里乌斯已经离开帕维亚回到了拉文纳后，他决定赌上一回。斯提利科自皇帝幼小时就十分了解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霍诺里乌斯参与了在帕维亚清除斯提利科派的行动。斯提利科决定去拉文纳见霍诺里乌斯。

从博洛尼亚到拉文纳距离上虽然很远，但沿埃米利亚大道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是用时最短的道路。斯提利科打算只带平时的卫兵前去，但将军们不同意，执意一同前往。这样，进入拉文纳就会引人注目。也许是担心刺激宫廷，斯提利科抵达拉文纳后没有回家，乞宿在教堂附属的主教馆舍，并派出了请求许可面见皇帝的使者。

使者带回的答复让人迷惑，究竟是许可面见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是单单许可进入皇宫。总之，似乎得到了许可，但条件是只允许斯提利科一个人进宫。

斯提利科来到皇宫，自己解下佩剑交给宫中仆人，这是以前13年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然而，那天在他的面前，皇帝房间的大门紧闭。

23岁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打算接见48岁的忠臣。奥林庇乌斯出现在斯提利科面前。这位宫廷官僚冷冰冰地宣读了皇帝下达的死刑诏书，理由是斯提利科犯有与蛮族共谋推翻罗马帝国罪。叛国罪在元首制时代会有辩护人参加审判，但到了帝政时代后期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一律判为立

即执行的死刑。公元408年8月23日那天，斯提利科被执行了斩首刑。

斯提利科的一生就这样终结了。他的遗体去向不明，也没有坟墓。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在霍诺里乌斯长达28年的治世生涯中，这位皇帝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处死斯提利科。

空白

奥林庇乌斯被任命担任因斯提利科死去而成为空缺的“联军总司令”。得知这一消息，斯提利科派的将士们认为，在罗马军队中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便集体离开军营。斯提利科的长子如果还在的话大概会相伴而行。然而，霍诺里乌斯皇帝在对他的岳父斯提利科执行死刑后，便早早派人杀掉了这位与自己一道成长又是学友的年轻人。

斯提利科组建并与他共同作战的由蛮族和原奴隶组成的非正规军团，在斯提利科死后烟消云散。跟随斯提利科来到拉文纳的人，以及在博洛尼亚待命的士兵，在那天早晨全作鸟兽散，一人不剩地全部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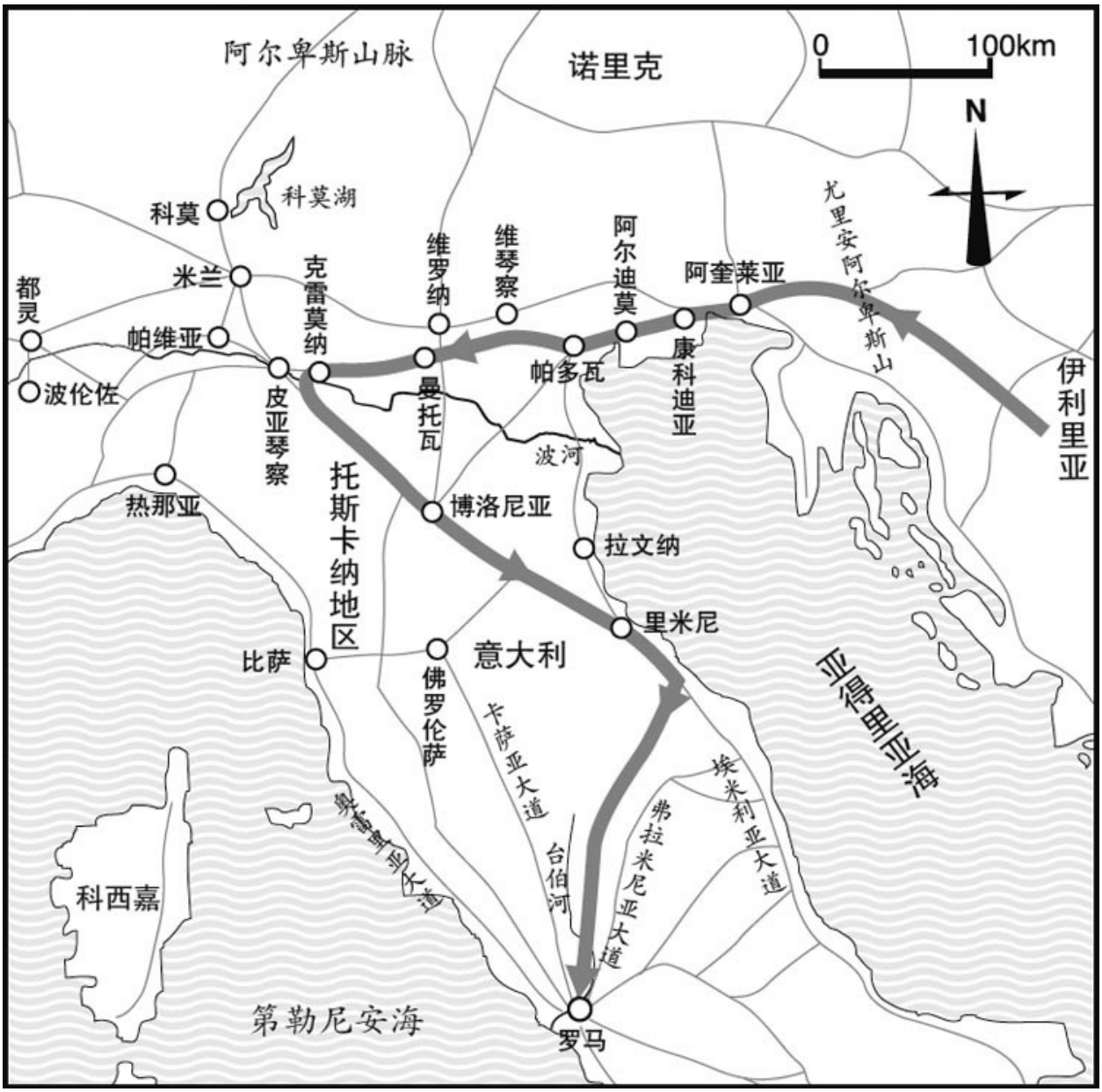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自然是到欢迎接受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投奔了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也许，他们不能让步的底线就是不能为杀害自己仰慕的斯提利科一方而战。

斯提利科死后一个月，阿拉里克开始行动。加上前来投靠的原斯提利科的将士，他不过拥兵3万，作为蛮族入侵，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人已经不复存在。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和其他士兵构成的混合军队翻过隔开意大利和巴尔干的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由于有在斯提利科手下积累了作战经验的老手参战，阿拉里克军队的战法也更加合理。他们首先进攻意大利东北部的重镇阿奎莱亚。他们并不想完全占领城

市，如果那样就不得不打持久战，他们抢得必需品后便移向下一个目标。阿拉里克的目的在于威慑，而不在于占领。

实际上，在攻陷阿奎莱亚之后，他们又一举攻克了康科迪亚，再过阿尔迪莫到达帕多瓦（罗马时代名为Patavium），从这里沿泼比利亚大道再往南便可到达拉文纳，但因为无事需要找皇帝，他们甚至没有向拉文纳派出先头部队。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而向西，在克雷莫纳（罗马时代也叫此名）渡过了波河。



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

阿拉里克在克雷莫纳派出使者给罗马的元老院送去一封信。信中要求履行元老院半年前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结盟的协约，即要求罗马按协约规定支付4000罗马磅金条。元老院通过这一协约后拖了半年还未履行，其原因是这半年的时间里，提议与阿拉里克结盟的斯提利科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老院认为斯提利科被处死，这份同盟协约就成为一张白纸。可是，既经元老院通过，那就是国策，就不能为提议者之生死所左右。

要想推翻协约，必须在元老院重新表决。这时，道理在蛮族阿拉里克一方。

阿拉里克和他的军队渡过了波河，似乎是在附近等待元老院的答复。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宿营在离帕维亚的罗马军营不到70公里的地方。可是，帕维亚的罗马军队明知此事却并未行动。顶替斯提利科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和身在拉文纳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也同样屏息不动。而阿拉里克因答复不至而不耐烦，便再次开始行动。阿拉里克仿佛根本未把帕维亚的罗马军队当回事，抛开他们朝里米尼进发，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直指罗马。已经没有任何罗马人可以挡住他们的去路。

恐吓（一）

罗马曾被敌人直逼城下。那是在六百二十年前第二次布匿战役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兵临城下，宿营在距城墙只有四五公里的地方。但这种经历仅此一例。汉尼拔后来也打消了进攻罗马的念头。占领城市非经持久的包围战不能成功，但打包围战他又兵力不足。

仅被阿拉里克和他的3万兵马近逼，罗马没有必要动摇。但这次罗马恐慌起来。靠3万兵力不可能合围近20公里的城墙。阿拉里克实施的不是围攻，而是封锁。他在比较重要的12处城门重点布兵，使城里人不能出城。同时，他还派兵到周边之地，让他们抢夺运往首都途中的物资。他还在南北两头封锁住流经市内的台伯河。不过，围绕着罗马全城的城墙上总共开有18座城门，此外还有不少因内外地势形成的不难通行的地方。

与帝国鼎盛时期的2世纪相比，罗马城的人口已经锐减，但进入5世纪后人口仍不少于30万。况且，元首制时代建造的仓库群仍在发挥作

用，罗马城有很高的粮食储备能力。这样，只要预测到最坏事态，作好相应的准备，建立相应的组织，罗马城是经得住持久守城战的。所以，有无抵抗力不在物质方面，而在于居民的精神方面。

罗马人在城墙上扎堆儿观看逐渐挤满城下的蛮族。他们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面对未曾预料的事态所感到的“惊愕”。不过惊愕过后，随之而来的不是“精神上的准备”，而是“愤慨”，觉得小小蛮族，竟敢封锁永恒的罗马，简直是胆大妄为！

然而，惊愕之余，发生了粮食不足的情况。上市的粮食减少，价格暴涨，穷人最先受到冲击。

历史上没有留下封锁始于何时的史料。但从时间推移想象，阿拉里克的封锁战最短一个多月，最长也不过两个月。因为曾几何时的“世界之都”没有坚持到两个月。

元老院终于决定派两位议员去见阿拉里克，请求解除封锁，并愿意为此支付4000罗马磅黄金，亦即1500公斤黄金，这个数量与元老院通过斯提利科提议的同盟协约时相同。这回阿拉里克可不答应了，也许他认为，作为“永恒之都”，罗马的赎金太便宜了。实际上，蛮族族长阿拉里克与两位元老院议员谈判的已经不是支付给同盟者的佣兵费，而是给恐吓者的赎金。

阿拉里克说道：“罗马城内的所有金银，不管是国库中的还是在私人家中的都要统统交出来。金银以外的所有贵重品也必须拿出来。并且要解放在城市公共机构和私人家中劳作的所有日耳曼裔奴隶。”

两位议员哑然，并回答说：“如果这是您的要求的话，那您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西哥特人族长若无其事地答道：“给你们留一条命！”

不过，这两位元老院议员赢得了到元老院讨论通过为止这段时间的休战。台伯河和12座城门都解除了封锁。罗马居民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期间，难掩忧虑表情的元老院议员不断讨论并反复派人去阿拉里克营地交涉。但那都不过是讨价还价而已。

接近年底时双方达成协议，阿拉里克终于作出承诺。交换条件如下：

5000罗马磅（1875公斤）黄金；

30000罗马磅（11250公斤）白银；

4000件用从东方进口的丝绸做的长袍；

3000匹绯红色手织薄外衣料；

3000罗马磅（1125公斤）印度进口香料。

当然，日耳曼裔奴隶也成为自由之身。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全部抛弃罗马投奔阿拉里克。

罗马人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换来解除封锁。阿拉里克并没有同意成为罗马人的“同盟”，来担任罗马防御之一翼。这让人不禁想起阿拉里克向斯提利科索要的只是4000罗马磅黄金而已。

阿拉里克虽然在战斗中打不赢斯提利科，但在统率士兵方面强而有力。也只有斯提利科能想到利用阿拉里克。为了等待“赎金”，西哥特人拔寨而起，出发北去，整个过程真可以说有条不紊。罗马居民甚至感到惊讶，这时往往会发生零星的暴力行为，而他们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暴力的损害。但是，阿拉里克及其3万人的军队并非是撤退到阿尔卑斯山脉那边去，只是退到托斯卡纳地区，从那里可沿卡萨亚大道直逼罗马。他们要在那里过冬。

在阿拉里克撤退后的罗马，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一般市民，都受到了难以名状的屈辱感的重击。这让他们想到若是斯提利科还活着的话……人们还不禁联想到，罗马被封锁，皇帝霍诺里乌斯竟一直龟缩在拉文纳作壁上观！这使人们将不满对着了皇帝。直到这时，拉文纳的皇宫才第一次发表了处死斯提利科的正式理由。想把死刑正当化，自然应该在行刑之后的8月末将原因公之于众。过了4个多月才公布，其本意遭到猜疑也无可奈何了。

皇帝主张把斯提利科作为“国家公敌”处以死刑，定罪依据是以下理由：

一、违背君士坦丁堡皇帝之意，反复采取行动，恶化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

二、身任西罗马帝国公职却与敌人阿拉里克秘密勾结出卖国家。斯提利科生前享受之权力和财富均为与蛮族共谋所获得。

三、秘密策划使其子篡夺皇位。

既然是体现神意的皇帝明确所说，基督教教会便不遗余力予以支持。皇帝的诏书刚刚发布，天主教会就发出了弹劾斯提利科的布告，将斯提利科定为无信仰之徒，说他身为天主教徒却袒护信仰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阿拉里克，图谋灭亡天主教国家罗马帝国。

斯提利科被世俗的权威皇帝弹劾为卖国贼，又被宗教的权威教会弹劾为无信仰之徒。但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记录抹杀刑”还在等着他。这是罗马的一种抹消相关人等所有记录的刑罚。公文自不必说，刻有此人功绩的碑文、为颂扬此人功绩而建于古罗马广场上的立像也都会被破坏。总之，关于此人的一切记录和记载都将被抹去。这就是“记录抹杀刑”。这个刑罚一直被珍视名誉的罗马人视为比斩首还要不名誉的惩罚。元首制时代被处以此刑的有卡拉卡拉、尼禄、图密善诸位皇帝。他

们被打成恶帝。斯提利科也被处以与他们同样的刑罚。

历史的救赎就在于同时代人和我们后世的人中都会有人抱有怀疑，他们会问：为什么对这些人的恶评竟至于此？这些人也会留在历史中，但被破坏了的雕像则是无法复原了。由于这个原因，印有斯提利科面容的物件，存世的只有一块刻有他头像的小象牙板，收藏于米兰以北10公里的小镇莫迪查（现蒙扎）的教堂里。这物件看起来就像立在书桌上的照片架一样，制作时代是5世纪，很可能为同时代的某人所拥有，说不定还是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的藏品呢。

不过，赛妮娜做遗孀的时间也很短。赛妮娜离弃斯提利科后移居罗马皇宫，在公布丈夫斯提利科为“国家公敌”而处以死刑的理由之后不久，她也被打成“公敌”处以死刑。赛妮娜是皇帝的义妹，在丈夫被处死后并未被立即问罪，但现在也只能把头伸给了侩子手。

斯提利科的次女已是皇妃，但以未与霍诺里乌斯结婚为由，被迫隐居修道院。基督教不承认离婚，只能以未婚处理。

恐吓（二）

只要屈服一次，恐吓就会变本加厉。阿拉里克因恐吓罗马元老院得到了丰厚的资金而名声大振，蛮族闻讯纷纷从各地而来。在公元408年到409年短短的时间内，阿拉里克的兵力就从3万人激增到了10万人。阿拉里克非常懂得如何使用暴增的军队。

公元409年春天，阿拉里克的使者造访罗马元老院，捎来了阿拉里克的话，称去年同意的是解除封锁的代偿金，而不是和平的代偿金。使者还带来阿拉里克的意向。怎样才能使之也成为和平的代偿金呢？阿拉里克希望自己被认做是罗马的朋友，是和平的朋友。

西哥特人族长的意向实在具体，他甚至规劝元老院将此方案拿到拉文纳去，请霍诺里乌斯皇帝批准：

一、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

二、约定每年提供固定数量的金条和小麦作为阿拉里克及其士兵为罗马从事军务的报酬。

三、割让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克两个行省给阿拉里克，作为属下士兵和家属的定居地；把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威尼托地区分让给阿拉里克，作为其根据地。

四、把作为战略要地建在意大利北部到多瑙河地域的城寨要塞全部划归大元帅阿拉里克管辖。

这足以使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在从北意大利到多瑙河一带建立独立王国了。

与蛮族头目一同前往拉文纳说服皇帝与蛮族结盟的，不仅有元老院议员，还有一位主教。霍诺里乌斯虽然与元老院关系淡薄，却是一位信仰笃深的天主教徒。

可是，这位主教担心去拉文纳途中的安全，拒绝同行。元老院为了让主教能够安心前往，请求阿拉里克负责途中安全。罗马人在自家意大利旅行，却需要哥特人士兵来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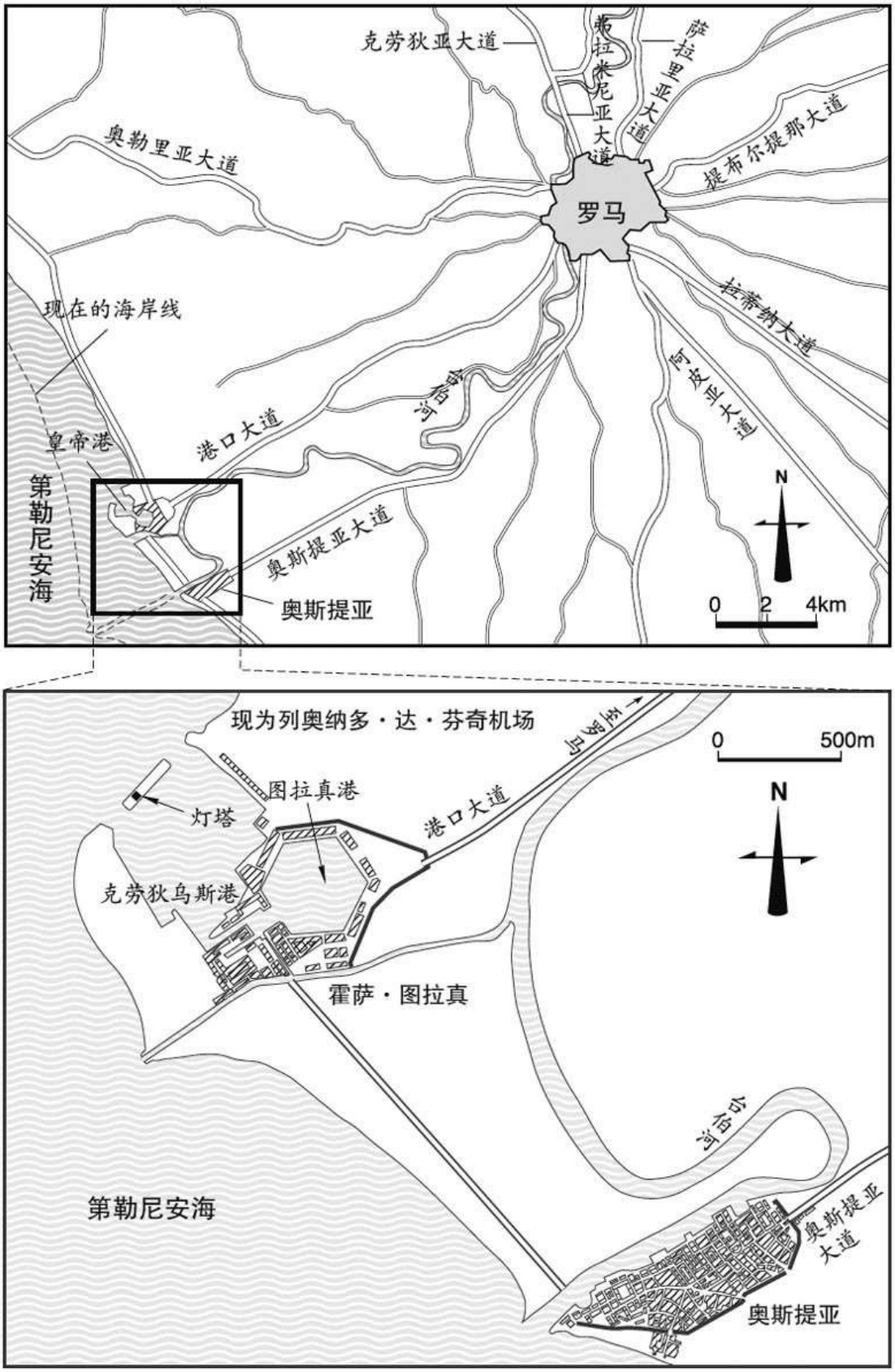
迎接元老院议员和主教的拉文纳皇宫上下一片混乱，旁观者都觉得可怜。宰相兼联军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认为阿拉里克的要求过分，主张全面拒绝。可是阿拉里克在托斯卡纳地区陈兵10万。霍诺里乌斯皇帝虽已24岁，但仍无主见。他所能想的，只是如何从拉文纳取海路逃往君士坦丁堡。遭到反对后，他居然说要雇用1万名匈奴兵，使人愕然不已。

对阿拉里克的要求不知所措也在情理之中。这厢刚公布斯提利科犯有与阿拉里克共谋罪，不到3个月，那厢就要把阿拉里克迎进门来，这无论多么厚颜无耻也不能轻易办到。霍诺里乌斯皇帝为此而狂乱发飙，处死奥林庇乌斯后才好不容易把心绪稳定下来。处死奥林庇乌斯的原因没有公布。然而，就在拉文纳持续混乱期间，阿拉里克发起了行动。

公元409年夏天，阿拉里克第二次围攻罗马。与第一次不同，这次他改变了封锁的方式。阿拉里克没有像去年那样去封锁12座城门，而是改变方针，占领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沿卡萨亚大道南下而来的西哥特人没有围攻罗马，而是绕城一圈后，直扑奥斯提亚。

这样的战法就不是封锁了。罗马居民也许以为从北边和东边都能得到粮食补给。但那只是生鲜食品，对主食小麦一直依赖进口的罗马却不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长年致力于完善奥斯提亚港的原因所在。他们非常重视来自罗马世界的两大小麦产地——埃及和北非的小麦船队能够安全进港，高效卸货。虽然从君士坦丁大帝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一百年前开始，埃及产小麦就转而运往君士坦丁堡，但罗马至今仍是北非产小麦的主要出口地。北非运来的小麦在奥斯提亚卸货，阿拉里克把奥斯提亚握在了手中。他即使不在每个城门布兵，也能卡住首都罗马的脖子。

满载粮食的船只不断驶入港口。阿拉里克把港口捏在手里，兵员增加到10万人，也不用担心食物。阿拉里克盘踞了下来，他甚至没有沿连接奥斯提亚和罗马之间的两条大道派兵威胁首都居民，而是做出了更加嘲弄罗马的行为。


克劳狄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萨拉里亚大道
奥勒里亚大道
提布尔提那大道
罗马
拉蒂纳大道
现在的海岸线
河台河
阿皮亚大道
港口大道
皇帝港
第勒尼安海
奥斯提亚大道
奥斯提亚
N
0 2 4km
现为列奥纳多·达·芬奇机场
纳税区
0 500m
图拉真港
灯塔
港口大道
N
克劳狄乌斯港
霍萨·图拉真
河台河
第勒尼安海
奥斯提亚大道
奥斯提亚

罗马及周边道路网（上图）以及经图拉真皇帝大规模改造后的奥斯提亚港（下图）

管理奥斯提亚港的长官由一个名为阿塔卢斯的人担任。阿拉里克任命阿塔卢斯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阿塔卢斯被拉到士兵面前，蛮族士兵以剑击盾，以这种罗马的方式表示赞同他即位。然后，阿拉里克为阿塔卢斯配备了西哥特兵卫队，把他送进了罗马。阿拉里克甚至还让他给元老院带去了推荐信，称希望元老院与这位皇帝合作，统治首都罗马。

阿塔卢斯随着哥特兵卫队穿过古罗马广场，走进矗立在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厅，议员们起立迎接他的到来。这真是一出拙劣的闹剧。民众没有让他身陷咒骂声之中，而是用不可名状的表情看着这一切。

拙劣的闹剧不会有结果。阿拉里克试图通过阿塔卢斯间接统治罗马的企图彻底落空。这位西哥特人的头目十分恼火，他把阿塔卢斯抓来，附上一份书状，说他篡夺皇位，请随意处置。然后把他送往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那里。可怜的奥斯提亚长官从此不知所踪。公元409年在闹剧中结束了，阿拉里克和手下10万之众一直盘踞在离罗马只有20公里的奥斯提亚。

转眼到了公元410年上半年，应当有相当多的人从罗马逃逸。朝北的大道自不用说，就连朝南的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也都畅通无阻，不会遇上敌人。即使不属于富裕阶层，没有大片农庄围绕的别墅，罗马人自古以来有着第二居所的置业习惯，这第二居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可以想象，这些罗马人每月两次离开都市去享受田园生活，对离开罗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抵触感。

但是也有很多人与第二居所无缘。此外，还有很多人虽然有地方可去，却根本不会想到罗马会被占领。奥勒良城墙建于公元275年，从那时计算，135年间罗马从未遭到敌人的践踏。大概很多人会想，过去没有的事，今后也不会发生。虽然从奥斯提亚运不进粮食，但食物并没有

断绝。敌人已经近逼眼前，但还是有很多人留在了首都罗马。这些人不是无处可去，就是仍在做梦。

“罗马浩劫”

首都罗马落入敌手已经是时隔八百年的事了。我真以为敌人围城激战后方能入城，敌人占领全市也是壮烈巷战以后的事。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公元401年8月24日清晨，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先头部队通过自罗马向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上的城门潜入了罗马。这很可能是市内有内应的结果。很快，萨拉里亚门左右6座城门都被打开。蛮族潜入了这座永恒之都的北部和东部，而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并未发现他们。

罗马建国于公元前753年，至今已经度过了1163年。自古以来罗马人不能忘却的不幸事件是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占领。

凯尔特是希腊人起的名字，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公元前390年，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高卢部族入侵罗马，那时共和政体尚未确立。

罗马的抵抗失败，传说由7座山丘组成的罗马只剩下一座卡匹托尔山，其余全部被高卢人占领。所幸当时的敌人在抢掠后即撤离退去，罗马并未成为高卢的首都。这次“凯尔特入侵”成为罗马人不可忘却的不幸事件，被记入了罗马历史。王政时代构筑的“塞尔维乌斯城墙”自然也因此得到了加固。

然而，公元前390年以后一直守护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在公元前45年遭到破坏。这不是因为敌人的入侵，而是罗马人自己破坏的。这个时期的最高当权者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建罗马的大脑和心脏——古

罗马广场，并付诸实施。城墙的一部分阻碍了这项工程。是改变计划，还是拆去城墙，这一问题摆在了恺撒面前。他自然选择了后者，而且也没有在外围构筑新的城墙。

他毁弃了王政时代塞尔维乌斯王建造的城墙，这座城墙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罗马。他明确说明了他的理由：首都罗马的安全应由“防线”（国界）来保卫，而不该用围绕首都的城墙来保卫。这条理由后来逐渐演变为罗马帝国的基本防御战略。

后来在公元275年，奥勒良皇帝建造了一直留存至今的“奥勒良城墙”。这样，罗马有310年时间一直生存在没有城墙的环境中。如果有人问“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起于何时终于何时，我会这样回答：那就是首都罗马没有城墙护卫的那段岁月。

公元275年奥勒良城墙建成后，罗马也有很长时间未遭兵燹。奥勒良皇帝知道帝国防御力量的现实，帝国已无余力向多瑙河以北布防，甚至撤出了达契亚（现罗马尼亚）。修筑保卫首都的长城，一定是他未雨绸缪的慎重对策。实际上，在后来长达135年的时间内并无敌人兵临城下。

敌人一旦迫近，城池瞬间陷落。这只能让人想起恺撒的观点，防御敌人靠的不是城墙。帝国首都罗马刚想着城墙防卫，瞬间便陷落了。

无论如何，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是历史上著名的“大事件”。阿拉里克事先向属下士兵发布过这样的命令：

一、不杀不抵抗者。

二、不碰基督教教堂。

这样，就占领军众达10万人这点而言，其暴虐的程度还是相对较低的。这也是因为城内根本没有防守兵力。四处逃散的人群得知教堂安

全，纷纷逃入教堂。尽管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属于被天主教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的阿里乌斯教派，但毕竟也是基督教。而罗马的很多教堂和为数众多的信徒也都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一教派被尼西亚公会议定为正统基督教，主张三位一体说。不过，一般认为阿里乌斯教派要比天主教派对“异端”更宽容。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把罗马的天主教堂及其教徒都视为基督教徒，没有向他们动手。

然而，阿拉里克率领的并不仅是西哥特人。这短时间内由3万人激增到10万人的士兵当中，也有很多人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宗教，还混有亚细亚人种的匈奴人。这些人根本不问什么基督教，只要是建筑物和人，一概都是掠夺的对象。

蛮族都知道仅仅恐吓一下，罗马就拿出了5000罗马磅黄金。他们断定，只要是罗马人，无论谁家都藏有金条。蛮族会闯入并非豪宅的一般市民的公寓，抓住什么人就逼他交代藏匿财宝的地方。很多人根本没有财宝，威胁、拷问也无从交代，因而被发怒的蛮族杀害。称410年为“罗马浩劫”之年绝不会有错。的确发生了蛮族的暴行、掠夺和杀戮，还发生了很多强奸妇女的事件，甚至修女也被侮辱。当时任北非主教的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写道，被强制而未经同意的性关系不构成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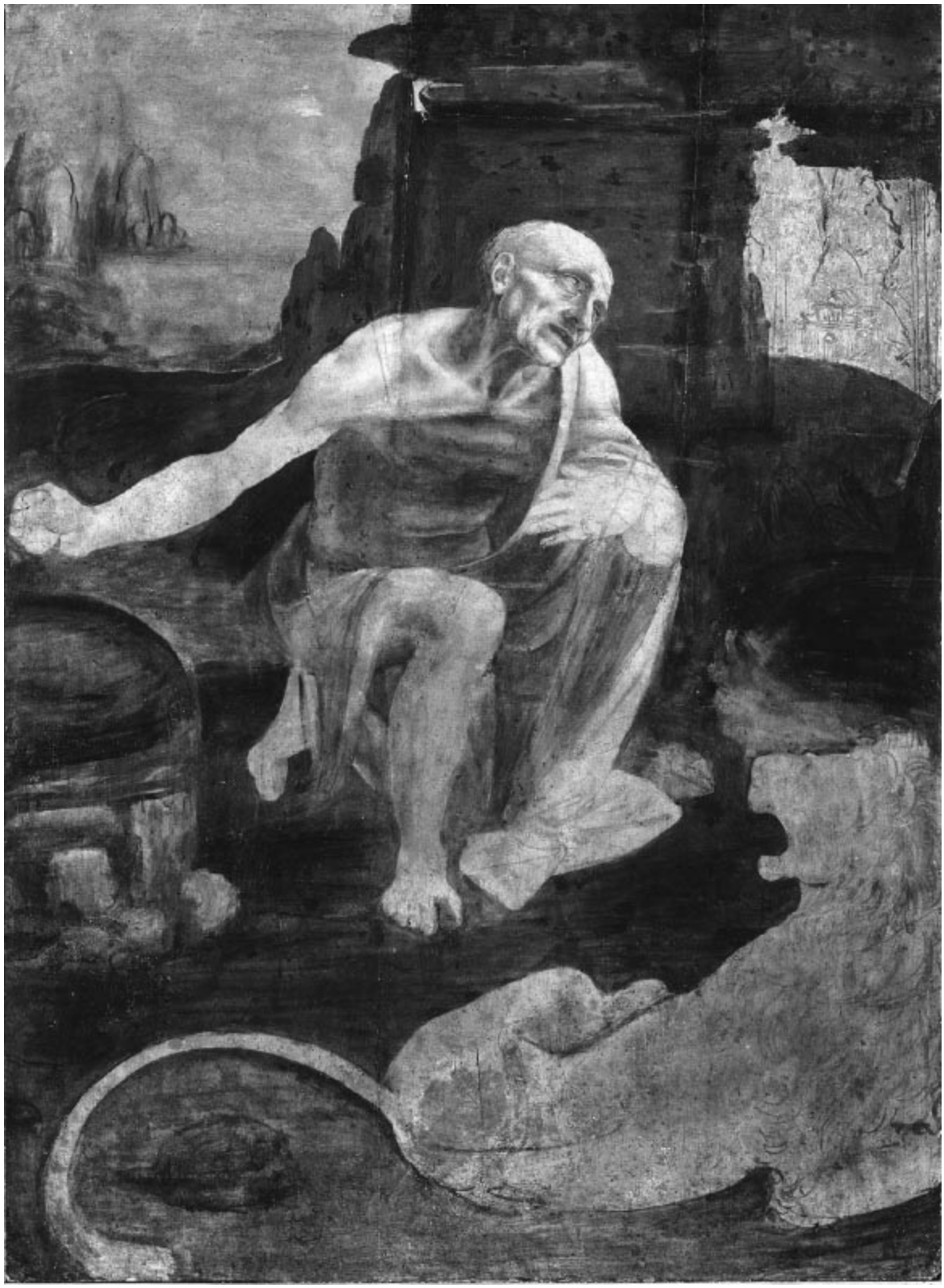
公元410年的浩劫历时5天。这场浩劫时间如此之短，可能是因为这10万之众干得干净利落，而无人抵抗恐怕也是这场掠夺得以高效进行的重要原因。潜入罗马城后的第6天早晨，阿拉里克和他的10万名士兵裹挟着所有能拿的东西，南下而去。货车和无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

离弃罗马的不光是蛮族。蛮族还裹走了他们认为可获得高额赎金的有身份之人和富有之人，其中元老院议员也不在少数。捕囚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的身影。

八百年未曾陷落的、长久以来被赞颂为“世界之都”的罗马遭到浩劫，这在当时也是世界性的新闻。“罗马浩劫”对远在巴勒斯坦致力于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的圣哲罗姆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凭着在修道院的虔诚行为和翻译《圣经》的功劳被奉为圣人。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 西方传来了令世间恐怖的消息。罗马被围，人们被迫交出黄金以换取生命。被浩劫后再遭进攻，不光一无所有，甚至丧失生命。现在我正在口述此信，声音因悲痛而颤抖，泪如泉涌，咽喉哽咽，出声不得。
>
> 这座称霸世界、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城市，如今却屈膝在蛮族面前。啊，上帝啊！无信仰的暴徒把手伸向了您的遗产，冒渎了您建设的神殿！

没人知道阿拉里克离开罗马后会去何处。蛮族沿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沿途不断抢掠。在加普亚离开阿皮亚大道，去了诺拉。也许他们打算沿第勒尼安海到意大利南部，渡海前去盛产农产品的北非。



圣哲罗姆（列昂纳多•达•芬奇画）

然而，时间已经不允许阿拉里克这样做了。他与斯提利科同辈，公元410年也应有五十开外。他一路南下，沿途观赏着呈现在右边的第勒尼安海，却在途中突然病倒，死神降临。据说他的埋葬是按照对待日耳曼民族酋长的方式进行的：截断河流，在河床上挖坑，安放装有遗体的棺材，埋葬后再使河水复流。当然，截流和挖河的俘虏们在下葬后统统被杀，这是北方蛮族的风俗。

阿拉里克死后他的一位叫阿道法斯的亲戚继承了他的位置。这位阿道法斯似乎与罗马元老院之间有秘密交涉，制定了“打开僵局的政策”。也许罗马方面又付了钱。西哥特人的新头目阿道法斯停止向意大利南部挺进，带着属下人马掉头去了法国南部。在折回的路上，许多捕囚交付赎金后恢复了自由。但阿道法斯唯独没有放走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进入高卢南部之后，他与这位公主结婚。不知何故，这位哥特人新郎是穿着罗马托加出席的婚礼。

离开罗马的人们

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也使幸存的人下决心离弃罗马。纳马提安努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高卢去。

后世只知道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是位诗人，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回故乡”（*De reditu suo*）的长篇诗歌。他是行省出身的高卢人，来到罗马后曾任重要公职，是一位“公共人物”。他甚至出任过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他的情况并不算例外。行省出身者来到首都，历任公职，进而形成国家新的领导层，这在罗马帝国是自元首制时代以来的传统。

实际上，5世纪前半叶西罗马帝国的权势人物艾妮希亚家族和西马库斯家族都是“新贵”（homo novus），在此前一百年的罗马史中尚未登

上历史舞台。艾妮希亚家族被认为是5世纪罗马首屈一指的富豪。传说只要他把储藏的小麦和葡萄酒卖掉，就会每年得到6000罗马磅的金条。只要他愿意，在斯提利科提议时，以此收入可以全部雇用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与艾妮希亚家族相比，认为年收入约1500罗马磅黄金的西马库斯家族属于中等富豪也大体不错。而西马库斯家族在教养方面堪可代表罗马。这两个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当过“首都长官”的纳马提安努斯理应也是元老院议员。说到财力，人们只知道他在高卢拥有大庄园；说到年龄，人们也只知道他40岁上下。

长篇诗歌《回故乡》如今只留下一些残篇，一读之下就知道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异教徒”。此诗创作于公元416年，在确定基督教为唯一宗教、其他均为邪教之后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回故乡》不惜笔墨讴歌了对罗马帝国的爱，却看不到基督教的一丝影子。这位高卢出身的精英，对自己是罗马人坚信不疑，并以此为荣。

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留下的长诗*De reditu suo*具有“异教拉丁文学绝唱”的价值。诗歌名定为“回故乡”，是因为这首长诗是作者在回故乡的船上，怀想着消失在身后的罗马和意大利而创作的。还未到引退年龄的鲁提利乌斯回故乡去，是为了重振他因西哥特人入侵而遭受巨大灾难的农庄。此时此刻，他对再见罗马只会感到绝望。《回故乡》成为罗马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诀别之歌。让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残留的片段吧：

> 啊，罗马哟！你长久以来就是世界的女王。你是诸神之母，是众多优秀罗马男儿的母亲！
>
> 你崇高伟岸的身影，永远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就像太阳永不消失一样。你赐予人们的文明，遍及罗马世界的每个角落，就像阳光普照大地一般。灼热的沙漠，冰冻的北海，不能遮挡你的光芒。无论何方，只要有人居住，罗马都会浸润其邦。
>
> 罗马哟！你统合了众多民族和部落，形成一个国家；你教会他

们享受法律带来的公正。的确，当初我们被征服，可不久我们就切实感到生活在罗马的好处。你军力强大却不穷兵黩武，你更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军力。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人们，在罗马的法度之下，保持着自己的固有风俗，同时学会了与不同文化的其他民族共存共存。罗马帝国是汇集多民族的联合国。

古往今来，几多帝国诞生灭亡。只有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伟大卓尔不群。罗马带来的和平，不是忘乎所以的自信所赐。罗马的荣耀不仅源于个人，而且源于整个帝国的才智。罗马成为统治者，是因为她具有统治的资质。

罗马在不久以前已无法从苦恼中站起。然而，有朝一日，罗马必将伤愈，力量必将重回四肢。逆境是兴盛的前奏，废墟是复兴的前夜。

罗马的敌人已然在高奏凯歌，但他们落魄的一天终将到来。连那汉尼拔，终究也只能叹息自己的成功不再。

敌人也许想使罗马永为废墟，但终有一日罗马会涅槃般地获得重生。曾经丰饶而今荒芜的莱茵河畔哟，总有一天人们将回到你的身旁。尼罗河沿岸出产的小麦终将重新运往西方。那时节，意大利甚至全欧洲都会盛产葡萄美酒，质优而量多。

公元416年秋，诗人从奥斯提亚上船，一路经停奇维塔韦基亚、比萨和热亚那，驶向高卢南部。在航行的旅途中，这位四旬壮年汉子胸中思绪无限。诗人在高卢登陆后便不知所踪，杳无音讯。

第二章

罗马帝国的灭亡

（公元410—476年）

进入罗马的11条水道桥之一的克劳狄亚水道桥

进入罗马的11条水道桥之一的克劳狄亚水道桥

发生于公元410年夏天的“罗马浩劫”，震惊了西起不列颠、东至巴勒斯坦的整个罗马世界。当时的人们把这个事件感知为罗马帝国事实上的崩溃。“浩劫”过后，霍诺里乌斯皇帝立即向驻扎在西罗马帝国全境的全体总督、军队指挥官和法务官送去了如下内容的诏书：

> 阿拉里克及其属下的蛮族不仅烧毁了首都罗马辉煌的纪念碑，还实施暴行，抢走了居住在罗马的人们手中的一切。
>
> 因此，帝国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力量回应行省的请求。从今以后，各行省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朕相信，你们自有力量完成使命。

“罗马浩劫”刚过皇帝便立即发诏，这只是一种说法，至今没有发现史料可以确证此事。这也许是当时流布的一种传闻。但是，如果在当时那个时期确实发出了这份诏书，那问题将非常严重。果若如此，从公元410年开始，西罗马帝国就已经不复为帝国了。

霸权国家的职责

帝国并不是因为拥有可以统治其保护伞下各民族的军事力量才成其为帝国的。只有尽到保卫伞下人民的职责，人民才会接受帝国的统治。无兵无钱，国家不能再尽保卫人民的职责，今后让人民自己保卫自己而抛弃人民，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帝国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在公元476年，但在公元410年时实际上就已经崩溃了，生活在公元410年的人们大概已经感觉到了。正因为如此，即使离罗马很远的边远行省的人们也感同身受，为这“永恒之都”的不幸而悲叹。

在800年的漫长岁月里，敌人未曾踏入罗马城一步，而这正是罗马帝国强大的象征。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再发挥作用，帝国范围内的主要城市，不论是叙利亚的安条克，还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帝国西部则不论是不列颠的伦敦，还是高卢的巴黎、里昂，亦或是日耳曼西部的波恩、科隆，都有过敌人侵袭市内、百姓涂炭的经历。东部被波斯和沙漠游牧民、西部被北方蛮族践踏暴虐的例子不一而足。在帝国本土的意大利，阿奎莱亚、米兰、维罗纳也无不受到伤害。建都不足百年的君士坦丁堡也曾受到因撕毁佣兵合同而暴怒的蛮族短暂侵略。只有罗马在公元410年之前的800年间一路走来，未受伤害。

进入帝国的最后世纪5世纪以后，罗马的人口也减少到2世纪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帝国的国境“防线”已是千疮百孔，几乎全被消灭，只有“世界的首都”还在延续着安全神话。

公元410年浩劫之后不久，不少外出逃难的人回到罗马。大概他们认为，震惊世界的“罗马浩劫”只是单独偶发的事件。可是，不论是北方蛮族，还是本该是同胞的东罗马帝国，都成为敌人，一次次打来掠夺。到了这种时代，罗马城市的人口开始锐减，终于减少到了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这时，“罗马浩劫”已经不再是世界新闻，而成为地方性新闻。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公元410年后不久的罗马人，还似乎认为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对“永恒之都”的暴行是不幸的偶然事件。阿拉里克死后接班的阿道法斯和西哥特人已经离开意大利到法国南部去了，至今还未见到他们之后有蛮族南下的影子。

从处死斯提利科到“罗马浩劫”的两年中，皇帝霍诺里乌斯明知蛮族的洪流滚滚而下，直指罗马，却躲在拉文纳作壁上观，这时他也积极行

动起来，要重建浩劫后的首都。

他首先决定紧急从北非进口小麦，供应给住在自己的城市却已成为难民的人，并立即付诸实施。

其次，在城内各处开始重建被破坏的公共建筑。但现在全体市民都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公共建筑重建工程，除了修补直接影响市民安全的城墙和城门之外，优先重建的是教堂及其附属宗教设施。

首都罗马采取了针对公元410年损害的复兴措施，这些做法也扩大到了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经过的意大利中部和南部。

帝国决定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5年内免征特别税。尽管帝国末期税制混乱，无从明确何为特别税，但毕竟免税了。地租税和人头税等一般税种则在5年内税率减至五分之一。

此外，还允许邻近的农民耕种因主人未归而被闲置的耕地。这件事表明，蛮族所经之处有不少人失踪。

另外还决定，不再追究与阿拉里克军队合作而遭到谴责的人的罪责。这大概是受到武力胁迫不得已而与蛮族合作的人数量太多的缘故。

霍诺里乌斯皇帝本人在“浩劫”的两年之后，于公元412年访问了罗马。但他的访问不是为重建打头阵，而是为了接受元老院议员和市民对皇帝关心重建的感谢。

据说至少花了7年时间，罗马才从阿拉里克留下的惨状中重新站立起来。从公元410年到417年的7年间，霍诺里乌斯的皇位得以安泰，并不是因为霍诺里乌斯从26岁成长到32岁，改变了心态，尽到了皇帝的职责。一句话，这是因为比其他蛮族对意大利半岛安全威胁更大的高卢与入侵的蛮族之间形成了自相残杀的局面。

不断发展的蛮族化

高卢于四百六十年前的公元前1世纪被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以后长期被称为罗马化的优等生，文明不断发展。可是进入公元5世纪以来，高卢一再被蛮族入侵，事实上帝国的统治鞭长莫及。莱茵河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帝国“防线”的作用，现在却没有一个能够迎战蛮族入侵的军团基地。在波恩、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曾经挤满罗马兵的兵舍现在杂草丛生。入侵的蛮族对这些帝国边境城市不屑一顾。与其说是“不屑一顾”，还不如说是“无法一顾”更合适。他们也是被匈奴人这个新来蛮族逐出后才向西入侵的，如果渡过莱茵河就在附近落脚，就有再次被匈奴人轰赶之虞。于是，他们入侵高卢，把所有障碍全部毁掉，把一切能抢的东西全部抢走，然后向高卢纵深挺进。日耳曼民族系各部族都是如此。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渡过莱茵河后，便在高卢内部发生了冲突。

从莱茵河下游入侵高卢的法兰克人把势力扩张到了整个高卢北部。

汪达尔人从莱茵河中游入侵高卢后，在广袤的高卢大地，从东北向西南横扫，边抢边走，终于翻过了高卢和西班牙分界线的比利牛斯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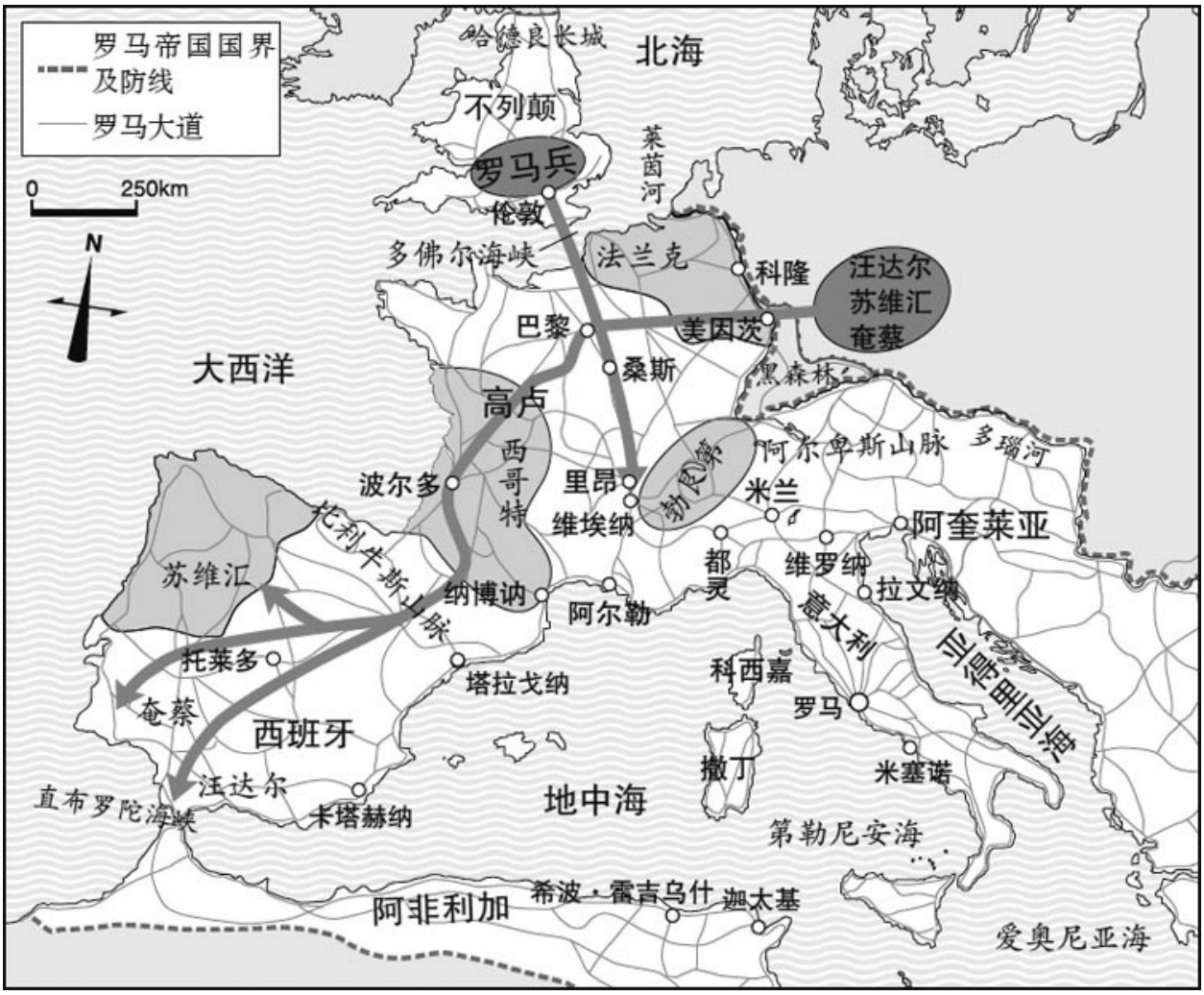
只有同样从莱茵河中游入侵的勃艮第人自知人数有限，在高卢东部落脚，就此定居下来。勃艮第地区的地名也许来源于此。

苏维汇人居住在日耳曼，自元首制时代就以蛮族而闻名。他们在5世纪的蛮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也不甘落后。这个部族从莱茵河上游入侵罗马帝国境内，斜穿高卢，烧杀抢掠，与先到的蛮族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他们打败就逃，翻过比利牛斯山脉，来到了西班牙西北部。

稍稍一看便知，5世纪初叶的高卢充斥着蛮族，南部还遭到西哥特人的入侵，这个部族因“罗马浩劫”而名声大噪。阿拉里克死后的族长阿

道法斯在纳博讷与罗马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举行了婚礼。纳博讷在罗马时代称为纳博。高卢南部被后代称为普罗旺斯，西哥特人是那时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在普罗旺斯落脚并不轻松。丰饶的法国南部对从气候严酷的德意志入侵而来的北方蛮族而言，就像意大利一样充满着诱惑。

阿道法斯想要比其他蛮族占据优势，请求霍诺里乌斯皇帝承认他与公主加拉·普拉西提阿的婚姻。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断然拒绝。他担心皇统通过西罗马帝国的皇妹转移到蛮族。与蛮族结婚的公主生了一个男孩。可这位拥有皇统的男孩夭折了，这让霍诺里乌斯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年届三十却无子嗣。霍诺里乌斯先后把斯提利科的两个女儿纳为妃子，却无福得子。他在斯提利科死后便一直单身。



公元410年的西罗马帝国及蛮族分布

在帝国末期的高卢，罗马皇帝已力不从心。混杂于此并拥有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蛮族部族却有5个：法兰克、汪达尔、勃艮第、苏维汇、西哥特。所谓的混杂，不是混杂定居，而是指不断变动位置、相互争霸的混战局面。

此外，来自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也掺和进来，情况愈加复杂。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兵面对渡过北海入侵而来的日耳曼系蛮族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已力不能支，便打着把高卢从蛮族入侵中解救出来的旗号，在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未曾下达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渡过多佛尔海峡，进犯高卢。这些罗马军的一兵一卒都由僭越称帝的君士坦丁所率领。而对

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而言，这位君士坦丁是个篡夺皇位者。尽管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在蛮族混杂的高卢格外善战，这些兵仍是贼军。

不过，还有方法使他们不再为贼军。归还皇位就是这个与大帝同名的僭越者的一条出路，但是他的条件是霍诺里乌斯正式承认其高卢方面罗马军队大元帅的地位。跟随他离开不列颠的士兵中也有不少人不满皇位篡夺者的统率，只要霍诺里乌斯愿意，这样做还是有可能的。

可是，占据霍诺里乌斯大脑的只有自己这个正统皇帝被无视的屈辱感。于是，罗马军队中唯一在高卢与蛮族真刀真枪战斗的来自不列颠的士兵们，便作为贼军一直留在了高卢。帝国方面错过了利用他们的机会。如此这般，君士坦丁终于被爆发出不满的部将所杀。这是“罗马浩劫”一年之后的公元411年冬天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期，蛮族各部族相互混战，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又插上一脚，高卢已然变为战场。这种状态之下，“罗马浩劫”后的意大利自然会享受到哪怕是短暂的和平。蛮族自相残杀，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要进攻意大利。由于霍诺里乌斯根本不关心重建军队，意大利半岛等于没有设防。如果这个时期进攻意大利，就可以轻易称霸。

然而，这一惨状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得救。这个人与不列颠的皇位篡夺者一样，是从一介士兵熬出头的武将。

此人名叫君士坦提乌斯，与因承认基督教而名垂青史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出生于塞尔维亚境内的尼什。从尼什出境后往东南方向便是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罗马时代尼什叫做纳伊苏斯，地处斜穿从多瑙河到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中心的交通干线上。君士坦提乌斯出身低微，可能带有那个地方并不罕见的蛮族血统。不过，尽管他的母系情况不详，但至少父系是罗马人。斯提利科事件以来，霍诺里乌斯一直对任命带有蛮族血统的人担任罗马军队大元帅极度神经过敏，这次却毫不犹豫地把罗马军队交给他，把他送到了高卢。霍诺里乌斯大概是想用由正统皇帝

从意大利派来的罗马军队填补皇位篡夺者被杀后的空白。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君士坦丁从不列颠带来的士兵吸收到正统罗马军队中来。

我们不知道西罗马帝国把君士坦提乌斯派到高卢托付了多少兵力给他。意大利依然如同没有设防。即使真想托付，也无兵可托。但这位熬出头的巴尔干人仍然行动积极。不列颠来的罗马兵多数都被吸收到了这位将军的麾下。但君士坦提乌斯的兵力似乎并没多少，起初的两三年没见什么效果。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高卢内部蛮族的自相残杀是罗马的运气。西哥特人在“罗马浩劫”以后掉头北上，把进攻方向改为法国南部，此时所受的打击比其他部落更重。君士坦提乌斯盯上了他们。他采用了从海上封锁其根据地纳博讷及其周边地区、断绝粮食来源的战略。

北面受到其他蛮族的攻击，南面受到海上封锁，西哥特人站不住脚了。不要忘记，他们要关心数万人的粮食供应。族长阿道法斯为娶到西罗马帝国的皇妹为妻而得意，却无法缓和手下士兵的不满。身在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非但不承认他与皇妹的婚姻，甚至对阿道法斯请求与西罗马帝国缔结“同盟”一事也不予理睬。阿道法斯进退维谷，终于翻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转移到西班牙。然而，汪达尔、苏维汇、奄蔡等部族已经渗透到了伊比利亚半岛。

最终，西哥特人杀掉了族长阿道法斯，谋求与罗马改善关系。

西哥特人的族长成功换人。阿道法斯被手下杀死，瓦里亚取而代之。罗马方面是否参与其事人们不得而知，这位瓦里亚提出了条件，把丈夫已死的加拉·普拉西提阿还给意大利，作为交换，罗马帝国向西哥特人援助粮食。从北非运来大量小麦到达的同时，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妹妹出发去了意大利。公主在“罗马浩劫”后一直生活在蛮族中间，睽别意大利已达5年之久。

西哥特人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成为罗马帝国在高卢的“同盟”。协约规定，他们在帝国境内受赐土地得以定居，而他们要追随罗马与蛮族作战。这个协约没有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受赐的定居地是罗马帝国行政区划中的阿奎塔尼亚II，这里位于高卢西部，西临大西洋。所谓“同盟”协约，换个说法就是佣兵关系，照理也应该有佣兵费的协议内容。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全然不详。

这样，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与蛮族的共存体制——“三分之一体制”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根据这个体制以往曾在高卢实施的记录，我认为还可能做这样的想象：此次西罗马帝国与西哥特人之间的协约就是其中的一例。

“三分之一体制”

所谓“三分之一体制”，只是我为了方便叙述而起的名称。这原来是斯提利科每次从高卢北部和中部撤军时使用的烟幕。尽管说给蛮族定居的地方，但既然在罗马境内，那里就已经住有罗马人。不可能把罗马人赶出去让蛮族住进来。如果强行这样做，必然招致帝国上下的反对。

不要忘记，公元212年颁布通称为“卡拉卡拉敕令”，正式名称为“安托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敕令以后，住在行省的所有人，只要不是奴隶，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无论是高卢还是北非，住在那里的都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于是斯提利科想出了一个体制：凡居住于被定为罗马“同盟者”的蛮族居住地的罗马人，一律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实际就是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新来的蛮族居民。一旦这个体制推广开来，仅凭被统治者支付给统治者的地租，罗马人就不必支付大家所反对的“佣兵费”了。拿出资产的三分之一以后，罗马人得到了抗击蛮族反复入侵的防御力量。当然，这

所谓的防御力量也是蛮族。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做法，其目的是通过让蛮族定居、稳定其生活基础来淡化这个“毒”。

可是，斯提利科不仅被处以死刑，还被处以“记录抹杀刑”，关于他的记录多被抹消，无法证实这个体制的真假。不过，如果与西哥特人的“同盟”协约是基于“三分之一体制”的话，协约中没有关于佣兵费的规定也就好理解了。称呼新成为邻人的蛮族为“客人”（hospitalis）的习惯，似乎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这明显是伪善，但有时人也是需要伪善的。

公元415年达成的这个协约中还有一点令人深思。罗马并不认可把后世称为法国南方的高卢南部划给西哥特人作为定居地，而是指定了高卢西部。划给西哥特人的定居地是分布在罗马时代称为波图斯、南奈图斯和波尔蒂加拉，即今南特和波尔多之间的地域。

君士坦提乌斯

罗马人不想放手的只是高卢南部。西班牙也同高卢一样为蛮族所渗透，但罗马势力还在其东部坚持着。北非还留在帝国境内。这样，意大利半岛和法国南部、西班牙东部和北非等地区仍在罗马势力范围内，这些地区包围着地中海的西半边。不列颠、高卢大部和西班牙西半部已被日耳曼系蛮族占领。但这些地方都在大西洋一侧。罗马人仍是地中海的子民。

回到罗马人身边不久，皇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与将军君士坦提乌斯举行了婚礼。霍诺里乌斯皇帝不仅承认这桩婚姻，还利用这个机会让出身低微的将军变成了贵族。公元419年，加拉·普拉西提阿生下了一个男孩，并取祖父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的名字为名。霍诺里乌斯皇帝没有子

嗣，这个孩子迟早会当上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从贫农发迹，并迎娶了皇妹，还有了一个将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儿子。他的身份大变，的确是社会成功人士。但人们无法衡量他究竟具有多少军事才能。蛮族在高卢和西班牙忙于巩固各自的地位，腾不出手来染指意大利，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机会发挥军事才能。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享受着和平。这可以归功于经常征战于高卢和西班牙、牵制了蛮族势力的君士坦提乌斯。猫在拉文纳从不出来的霍诺里乌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这位生于巴尔干地区的贫农之子在公元421年出人头地，成为共治皇帝，地位与霍诺里乌斯相同，取得了所谓“奥古斯都”的身份。然而，共治皇帝只当了8个月，当年秋天，君士坦提乌斯突然死亡。并非死于暗杀或谋杀，他是自然亡故。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却也忠诚，野心不大，领导着原本须由皇帝担负责任的军事行动。他的死，似乎使年已36岁的霍诺里乌斯失去了平静。意志薄弱的人这时会变得焦躁，听不进周围人的劝说而失去正常判断力。皇帝的这种情绪就要影响到已故将军的2岁幼子瓦伦提尼安。曾为蛮人之妻、积累了人生经验的妹妹原本就不信任这位异母兄长。自己身为蛮族俘虏期间，这位兄长只是用信函要求蛮族归还妹妹，此外再未做任何事情。她对这位兄长并无多好的感情。加拉·普拉西提阿担心2岁的儿子，抱着他逃往君士坦丁堡，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求救去了。

皇妹和她的儿子没能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长住。不到两年，公元423年初秋，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去世的消息传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享年38岁，属于自然死亡。他10岁登基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尽管几乎未做任何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却也在位28年。

新皇帝的继位应该没有问题。对死去的霍诺里乌斯而言，血缘最近的人就是外甥，其父亲君士坦提乌斯还当过“共治皇帝”，尽管在位仅有

8个月时间。

但问题是新皇帝只是个4岁的幼童。霍诺里乌斯不能像父亲狄奥多西把自己托付给斯提利科那样，无人可以托付幼年登基的新皇帝，他甚至没有想到托付的事。

如果没有监护人，替新皇帝摄政的角色就是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霍诺里乌斯身边的宫廷官僚中似乎有不少人对此事有抵触，以至于东罗马帝国甚至需要动用军队把新皇帝和他的母亲护送回西罗马帝国。但这也是在两年之后才好不容易实现的。

这样，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统治并非从先皇霍诺里乌斯去世的公元423年，而是从两年以后的425年开始的。即使这样，新皇帝才6岁，母亲的监护必不可少。据传，加拉·普拉西提阿生于公元390年，儿子当上皇帝的那一年，她才35岁上下。虽说西罗马帝国只领有环西地中海的带状地方，但毕竟成了女人统治的国家。不过，由女人统治国家却是始于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自狄奥多西去世的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事实上就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尽管日益变为天主教国家，但更像其东方的专制君主国家。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认为，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奢华胜过波斯王的王宫。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之职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写下了如下的话语，较之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人们会想，这是同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吗？

皇帝出现的时候，头上总是戴着嵌满昂贵珍珠和宝石的皇冠。这顶皇冠和裹在身上的紫色皇袍，只有坐在神意所授的圣位上的皇

帝才有权力穿戴，其他人不论再富裕，也禁止享用。披在衣服外面的大斗篷也是真丝织成，紫色质料上用金丝绣着巨龙。皇帝的御座由黄金制成，中间灌满了金子，想要挪动它，一个人是绝对拿不起那重量的。

皇帝绝少出现在民众面前，一旦出现，总是有大群的大臣、宫廷仆人和侍卫随从。大臣和宫廷仆人的服装争华斗艳，就连在外围簇拥着他们的卫兵，也不输豪华。士兵们手持的枪和盾，他们身上穿的盔甲和护胸，一色地金光闪耀。就看那只盾牌，中央雕刻着漂亮的浮雕，周围一圈打着人眼形状的装饰钉。

牵引皇帝御辇的是没有一点杂色的纯白大马，两匹马都裹着金色的马衣。御者的衣服也是金色的，垂在马车左右随风飘动的帘子是薄薄的黄金色面料制成。民众惊叹，探出身子想一睹薄薄帘子后面身着紫衣的皇帝的尊容。随着御辇的晃动，黄金、各色宝石以及鲜艳的丝衣反射着阳光，更增辉煌。

这是皇帝的真身。与肖像画上描绘的皇帝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蓝色的背景前，端坐在金色御座上的皇帝，面容与出现在民众面前时一样苍白而毫无表情。所不同的只是皇帝由骑在马上的一队卫兵簇拥，皇帝脚下跪着一群打了败仗被铁链锁在一起的波斯兵。

如此讽刺地描写皇帝的主教克里索斯托出身于安条克的上流社会，年轻时学习希腊哲学，是当时从“异教徒”变身为“基督教徒”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学识精深，是一位在信徒中人望很高的神职人员。但是几年以后，他被赶下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宝座。东地中海世界非常“宗教化”，老百姓热衷于基督教的教理论争。这位知识分子主教下台的原因，除教理论争以外，还有宫廷内的阴谋。东罗马帝国的宫廷，不仅外观酷似东方专制君主的宫殿，内容也越来越相似。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没有伊斯兰王室的后宫。拥有特权的人们会更加封闭，这是人性的宿命。在封闭的空间里，没有公权资格的人只要接近有公权的人便可以拥有权力。封闭状态对皇帝的近亲，尤其对女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女人与权力

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亲哥哥阿卡狄乌斯连续做了13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于公元408年去世。事实上，他的当政时期止于法兰克人出身的将军女儿尤多克西娅成为皇后之时。继承阿卡狄乌斯皇位的是他们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这位皇帝一直统治到公元450年，长达42年。在此期间，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是皇帝的姐姐普尔喀丽娅。到后期，狄奥多西二世的妃子也参与其事。

一生独身的普尔喀丽娅似乎是一位相当有智慧的女人，她没有排斥新登场的“情敌”皇后，相反把她变成了自己人。据说，受到狂热天主教徒普尔喀丽娅的影响，皇后平常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每天都在祈祷中开始，又在祈祷中结束。皇帝穿戴得奢华无比，皇后却日日过着低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的两极分化，对他们似乎并不是什么矛盾。

公元395年，帝国东西分裂以来，可以说是女人和辅佐她们的宫廷官僚一直统治着东罗马帝国。到了公元425年，西罗马帝国也成此状况。加拉·普拉西提阿以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年纪尚幼需要辅佐为由登上了政治舞台。

普尔喀丽娅

狄奥多西二世

至此，东西罗马帝国都成为女人统治的国家。不知何故，在女人掌握实权的国家，男人都软弱无力。狄奥多西二世的统治从公元408年到450年，长达42年。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统治从公元425年到455年，长达30年。这两人都是六七岁登基，但统治都很长久。可是要问他们在位期间做了什么，回答是什么都没做。实际统治国家的是姐姐、妻子或母亲。在位达28年的霍诺里乌斯没有子嗣，狄奥多西二世去世时也没有儿子。真不知是因为女人意欲强烈使得男人软弱无力，还是因为男人无能使得女人活跃。但在罗马史上，这种现象无论是在鼎盛期的共和政体时代，还是在稳定发展期的元首制时代，都不曾见过。这一点明白无疑。

女人掌握权力没有任何不好，只是这女人必须具有行使权力的正当资格。皇帝的生母或监护人等并无此资格。不具资格的情况会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

罗马的皇帝，其名称“imperator”的本义是指率领军队承担保卫“国家”（res publica）职责的人。如字面所示，这个职责首先在于国家的防御。马可·奥勒留是一位知识分子，被称为哲人皇帝。他连续驻留多瑙河前线达10年之久，最终死在那里。他准确地理解了罗马皇帝存在的理由。

但是，罗马皇帝名副其实的时代，在狄奥多西一世时已经结束。他的儿子阿卡狄乌斯和霍诺里乌斯到了可以率兵作战的年龄也不上战场。皇权为神意所授，应该让这神圣的存在身居安全的深宫之中，而把危险的战场指挥交给将军，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史学家们称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个世纪为“大元帅们的世纪”，因为“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代替皇帝征战沙场。这种情况源于斯提利科。

于是，皇帝就没有上战场的义务了，女人以皇帝的名义行使权力也无不便了。不过，不论是否上战场，罗马皇帝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这点丝毫未变。这就是说，统率手下众多的大元帅也是皇帝的职责。

女人行使权力的问题即出于此。她们被要求具备才能去统率这些大元帅，为了帝国防御的大目标而善于调遣他们。身为女人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女人不能为皇帝，也就成不了最高司令官，不具有统率大元帅的公权资格。正因为如此，她们被要求具备相应的才能。

东罗马帝国先有阿卡狄乌斯的女儿，后有登上皇位的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狄奥多西二世未留子嗣去世之后，则由姐姐普尔喀丽娅继任。她先把自己嫁给马利基安，再把他放上皇位。她们似乎在这方面都颇具才能。她们不仅实质上统治东罗马帝国长达40年以上，而且在此期间成功地防御了东方大国波斯的入侵。如此难事，不能调遣好众多的大元帅是不可能办到的。

加拉·普拉西提阿从公元425年开始统治西罗马帝国，直到450年去世，她真的有这样的才能吗？

大元帅们

加拉·普拉西提阿在这个时期可调遣的两位将军是波尼法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这两人都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而不是靠躲过宫廷阴谋而出人头地的。如果以加拉·普拉西提阿掌握实权的公元425年计算，两位武将都是35岁。35岁左右的女人能否驾驭同龄的两个男人，这本身就饶有兴味。这是关系到能否抵抗住潮水般入侵而来的蛮族，保卫好西罗马帝国的大事。

人们不知道波尼法提乌斯出生何处，父母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他大约生于公元390年。在公元414年与进攻马赛的西哥特人的战斗中，他是迫使阿道法斯率领的西哥特人放弃马赛、改攻纳博讷的功臣。年方24岁他便脱颖而出。后来，他似乎在守卫法国南部的罗马军队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于32岁那年在西班牙与汪达尔人作战。此后不久，他渡过古代被

称做“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北非。在这片土地上，他与向罗马举起反旗的毛里塔尼亚人战斗。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后来被奉为圣人的天主教会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奥古斯丁。这次邂逅似乎给以前一直驰骋沙场的波尼法提乌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本来就是天主教徒，这时甚至想扔掉武器遁入修道院。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次邂逅。那位女性也是基督教徒，但却是一位被天主教派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徒。波尼法提乌斯与她结婚，把新生女儿的洗礼托付给了阿里乌斯教派的祭司。他似乎对宗教上的正统与异端并不敏感，大概天主教教理的旗手圣奥古斯丁一定会对此失望吧。

他也在这时认识了加拉·普拉西提阿。她与哥哥霍诺里乌斯关系恶化后，带着孩子逃往君士坦丁堡，波尼法提乌斯给了她资金援助。对在罗马军队从军的波尼法提乌斯而言，霍诺里乌斯不仅是皇帝，还是他的最高上司。即使如此，他还是毫不掩饰地公开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汉子。

皇帝霍诺里乌斯去世后，他当然积极出力帮助加拉·普拉西提阿返回拉文纳。不少宫廷官僚和军队高官反对她辅佐年幼的新皇帝，从而掌握实权。加拉·普拉西提阿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些反对意见打压下去，返回拉文纳。仅此一点，波尼法提乌斯对加拉·普拉西提阿而言意义重大。

加拉·普拉西提阿成为皇宫的主人之后，立即任命波尼法提乌斯担任“近卫队队长”（Comes Domesticorum）的重要职务。同时还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这样，波尼法提乌斯的活动舞台仍在北非，与霍诺里乌斯时代一样。

波尼法提乌斯被认为是加拉·普拉西提阿派。与此相反，执掌西罗马帝国实权的母后与大元帅埃提乌斯的关系则属于敌对关系。

埃提乌斯出生在位于后来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下游。他是罗马人称之为“罗马化的蛮族”，父亲是率领罗马军队骑兵军团的武将，名字叫高登提乌斯，母亲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这点与汪达尔人出身的父亲和罗马人出身的母亲所生的斯提利科相似。单听姓氏就知道斯提利科是蛮族，而埃提乌斯有着罗马式的姓氏。较之斯提利科的父亲是“罗马化”的第一代，埃提乌斯的父亲也许是“罗马化”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不过，斯提利科年纪轻轻就得到皇帝的拔擢，其一生生活在帝国上层。而埃提乌斯则不同，他的人生从小就波澜迭起。

守卫帝国边境的罗马军队高官，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因职务关系有很多接触蛮族的机会。而且，媾和与休战时，双方都要互换“人质”。这在与蛮族的力量对比逆转后的5世纪，也还司空见惯。骑兵团长的儿子埃提乌斯作为“人质”再适合不过。一开始，他被送到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身边，接着在连日耳曼系蛮族都害怕并称之为“蛮族”的匈奴人那里，作为“人质”生活了10年之久。

乍听“人质”，往往会想到在严酷的环境中被迫过着悲惨生活的捕囚。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人质”对将其作为人质的一方来说，在种种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起着保证对方遵守协约的作用，对增加自己的同情者也很重要。被认为是领导人后备队的上层出身的青少年“人质”最受欢迎。一旦“人质”被解放，回到祖国，还可通过他们构筑良好关系。罗马帝国是利用“人质”方面的高手，蛮族大概也是向他们学来的。

埃提乌斯成人时已对罗马的敌人蛮族的实态了然于胸。他在匈奴人那里做“人质”的岁月漫长，与匈奴人尤其亲近。匈奴的语言自不待言，传说他还与阿提拉相识，此人不久以后就令罗马人恐惧，提到他甚至连孩子都会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加拉·普拉西提阿（右）和她的孩子

埃提乌斯从“人质”解放出来以后，一直没有断绝与长期做“人质”的地方的联系。他成人后在罗马军队中从军，并未断绝与蛮族中的蛮族匈奴人之间的关系。成人后的埃提乌斯一直在与被匈奴人驱赶入侵高卢的日耳曼系蛮族作战，年过三十才被委以一个军团的指挥重任。

不独32岁的埃提乌斯，罗马军队的所有指挥官都没有料到霍诺里乌

斯皇帝会在公元423年去世。霍诺里乌斯才38岁，在拉文纳闭门不出，很多军官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继承皇位的新皇帝只有4岁，就是不说，人们也知道何人在统治。那些不愿意被女人统治的男人试图推举某个自己人当皇帝，以此阻止儿皇帝登基。埃提乌斯也参与了这种事。为了帮助某人登基，埃提乌斯去匈奴借兵。但是当他率领借到的匈奴兵回来时，被推上皇位的人已经死去。起来反对新皇帝的高官也借此机会全部倒向幼帝和母后。看来埃提乌斯也不得不与他们一样，在加拉·普拉西提阿面前低头悔过了。可是，埃提乌斯不是那种人。

埃提乌斯以带来的匈奴兵力为后盾，通过宣示武力进行要挟，要求得到“大元帅”（comes）的地位。加拉·普拉西提阿也知道不能使高卢成为真空状态，并且，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将领可以托付高卢防线。35岁的埃提乌斯并未低头却也获得了正式的罗马军大元帅的地位。接受埃提乌斯要求的条件是解散由匈奴兵组成的军团，埃提乌斯同意了。当上正式的大元帅之后就不再需要这些匈奴兵了。他给即将回多瑙河北边去的匈奴士兵足够的报酬，为的是以后也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

经历了两年不安定状态之后，加拉·普拉西提阿终于立起了6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也总算在良好的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在关系到意大利半岛防御的高卢有埃提乌斯，在意大利半岛粮食来源的北非有波尼法提乌斯。他们都30多岁，年富力强，又都是打仗高手。加拉·普拉西提阿的摄政可圈可点。

有一句俗话叫“一山难容二虎”，是否能使不能并立的两员勇将并立建功，正是是否具有领导才具的试金石。然而，两年以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暴露出了女人经常会有的缺陷。

“大元帅”波尼法提乌斯

现在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罗马时代叫做“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突尼斯和利比亚西部称为“阿非利加”（Africa）。整个北非西部地方，在罗马帝国东西分离之后属于西罗马帝国管辖。基本上与布匿战争之前的迦太基领土重叠。现在的利比亚东部和埃及由东罗马帝国管辖，也就是罗马时代的“利比亚”（Libya）和“埃及”（Aegyptus）。拥有辉煌历史的埃及以及利比亚，再加上塞浦路斯岛，这些地方属于东罗马帝国管辖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毛里塔尼亚和阿非利加划归了西罗马帝国。这一带，旧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已完全同化，全然没有必要再去担心旧迦太基人还会成为霸权者罗马的敌对势力。布匿战争的殊死搏斗距今已有350年，旧迦太基人中曾经出过罗马皇帝，还有很多旧迦太基人成为帝国要人。罗马帝国时代称呼“迦太基人”就像现代意大利人称呼米兰人。这样的“迦太基人”中有一位弗龙托，是五贤帝时代罗马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他是元老院议员，同时还是马可·奥勒留皇帝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他曾经在元老院作过演说，题目是“对元老院迦太基人政策的谢词”。

于是，除埃及以外，北非全境的防御只需要一个罗马军团（6000人），加上数量相当的辅助兵。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这个军团取创始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名，叫做“第三奥古斯都军团”。仅此一个军团就保障了北非安全长达200多年！这个军团的基地位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龙柏斯。基地面南而建，以防御敌人来袭。他们的敌人不是国内之敌，而是外敌，在北非就是沙漠游牧民。

公元3、4世纪，随着帝国国力的衰退，北非的安全保障也发生了变化，频繁亮起红灯。基督教的普及使这一切变得更加致命。城市型宗教基督教从北非的行政、经济中心迦太基市向地方扩展。在当时的阿非利加基督教中，很多主教既有坚强信仰又富于智慧，其势力之盛甚至不输于君士坦丁大帝下气力抓振兴的罗马。但这反倒成为境内抗争的导火索。

在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上，主张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被确定为正统基督教。此外的各教派均被打成异端，一概受到排斥。阿里乌斯派被打成异端，以倡导者多纳图的名字称呼的“多纳图主义者”也被打成异端。在北非，这个“多纳图派”的势力却十分强大。

基督教普及以前，北非的罗马行省社会也与其他行省一样，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不过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社会差别并不固定。然而，基督教普及之后，社会被分成了正统天主教派和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并且固定下来。这样一来就丧失了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动力——自由竞争的精神，社会差别的原因已经不再是能力和运气，而是信仰的不同。

而且，信仰与阶层的关系在感觉上变成了天主教徒为上中层，多纳图主义者为下层。由于阶层的固化，反体制运动也必然抬头。阿非利加的多纳图派不仅成了基督教内部的起爆剂，而且也成为北非社会的起爆剂。圣奥古斯丁将其热情更多地奉献给了反对多纳图主义者的运动，但靠这位被誉为“教父”的人的学识和热情，并不能轻易说服在宗教和生活方面有着诸多不满的北非多纳图主义者。

在公元5世纪，仅靠一个常驻军团就能保障安全的时代早已过去，北非的统治由于上述原因变得非常艰难。而波尼法提乌斯却巧妙地统治着这样的北非。坦率地说，他对宗教的灵活态度，不过就是“不往心里去”。但他的这种态度，在情绪激昂的天主教派与多纳图派之间也许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此外，他用兵巧妙，兵力在他指挥下形成的阵势颇有震慑效果。波尼法提乌斯30多岁，精力旺盛，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快刀斩乱麻，从不浪费时间。

总之，在他统治下的北非，不需要身在拉文纳的8岁皇帝和他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有任何担心。然而，能够巧妙地统治这件事本身，在专制君主之下会引起嫉妒和猜疑。

波尼法提乌斯图谋让阿非利加分裂独立的谣言开始充斥幼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及其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居住的拉文纳皇宫。位于波河河口的拉文纳被纵横交错的运河网阻隔，完全可以防御来自陆地的进攻。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军港装备完善。进攻拉文纳，不仅要突破陆地上的运河网，不施行海上封锁也不可能成功。姑且不论如何突破运河网，要封锁海港，海上战斗力不可或缺。而北方蛮族还不具备海上战斗力。所以，与米兰和罗马相比，拉文纳最适合防御缺乏海上战斗力的北方蛮族的攻击。

然而，完善的防御容易导致社会的封闭。西罗马帝国拥有从元首制时代起就有的军港，照理这军港也会发挥与外部的“出入口”的作用，可是西罗马帝国却与东罗马帝国一味疏远。而且，港口仅是港口而已，并无商业港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也并未从商人这种情报转接手那里得到情报方面的益处。拉文纳由皇帝居住的宫殿、皇帝身边宫廷官僚的住宅和支撑他们日常生活的用人们的集体公寓所构成，作为罗马时代的城市，一直是中等规模。这样，即使原本容易封闭的皇宫不那么封闭，城市本身也只会成为封闭的社会。

而且，事实上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即使了解共同生活了5年的西哥特人，也不了解居住在北非的罗马人；即使了解君士坦丁堡和法国南部，也不了解北非。

只凭自己的经验思考的人，即使做上官，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需要用知识和想象力去“把握和理解”——用罗马人喜欢说的话，就是“comprehendere”——自己不曾经验过的事物。为此，情报也不可或缺。情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对情报的硬性要求。可是，拉文纳比意大利半岛的任何地方都不适合于满足这个要求。

人常常会对厚待他人而他人并不领情的事情感到失望和愤怒。随着这种情绪越发严重，许多正常的考虑便会被挤出大脑。加拉·普拉西提阿对厚待波尼法提乌斯并且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的懊悔和委

屈，使自己成为了瞎子。

母后以8岁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名义向波尼法提乌斯发出了召回命令。召回令是报到的命令，召回只是命令受遣在外的人回来而已。并没有解除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的记录，这也许只是命令波尼法提乌斯回到本土而已。但是，这次倒是波尼法提乌斯起了猜疑。

不管是自己主动还是应召返回，去拉文纳的皇宫而不带军队就可能遭遇危险，这不用想斯提利科的先例便能知晓。波尼法提乌斯似乎编造了一个什么理由，没有响应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召回令。

加拉·普拉西提阿更为愤怒。她既未花时间去冷处理，也未尝试从其他方面打开僵局，就突然向阿非利加派出了讨伐军。

面对两股军队的进攻，波尼法提乌斯遍布北非的防御网岿然不动。讨伐军被轻松击溃，逃回了意大利。加拉·普拉西提阿仍不改做法，再次派出了讨伐军。这次派出的是哥特人出身的将军率领的以蛮族兵为主体的罗马军队。

要成大事光有热情和精力是不够的，更要有冷静的态度。但是热情与冷静更多时候往往不能兼顾。波尼法提乌斯似乎也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缺乏冷静性格的人常常会行动不稳。

对哥特人出身的将领率领的第二次讨伐军，波尼法提乌斯选择了怀柔而不是击溃的方针，并获得成功。但加拉·普拉西提阿并不想善罢甘休。波尼法提乌斯考虑加强自己在北非的力量，便请求在西班牙的对手汪达尔人派来士兵。波尼法提乌斯的意图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想像埃提乌斯向匈奴人借兵一样，借用一支部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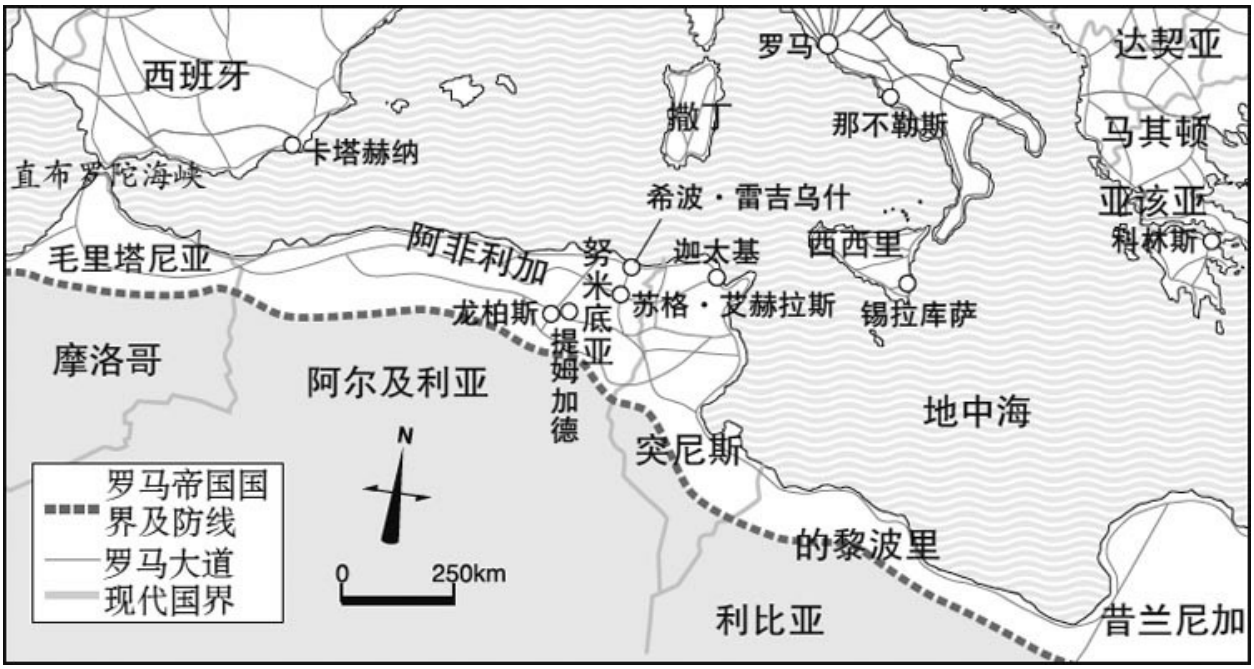
可是，汪达尔人接到请求后，却表现出了在与其他蛮族争夺中受到压制时的相反心态。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以整个部族，而不是一支部

队，来响应西罗马帝国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波尼法提乌斯的借兵请求。他把这看成了汪达尔人放弃形势不利的伊比利亚半岛，在北非寻求定居之地的绝好机会。

汪达尔人

距离再短，要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且是带领全体部族成员渡海，也需要相当数量的船只。但是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并无海运能力，没有罗马方面提供船只就无法渡海。波尼法提乌斯似乎未能提供船只，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罗马人向汪达尔人提供了船只。在他们看来，侵犯自己长期居住之地西班牙的蛮族，哪怕只是一部分去到其他地方，也都是再好不过的。既然帝国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就只能自己保卫自己。

在公元5世纪的罗马帝国，大型船停泊在港口的情形已难得一见。但在临海之地，小船却是要多少有多少。把号称10万人的汪达尔人全部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去，花些时日并不是办不到。



北非及其周边

居住在欧洲北部草莽深处的日耳曼民族之一汪达尔人，曾经渡过莱茵河，横穿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公元429年春天，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对西罗马帝国来说，这就等于允许北方蛮族入侵与意大利关系密切而无比重要的“阿非利加”。

不愧是波尼法提乌斯，他注意到此事事关重大。于是他率领麾下部队，会合曾经讨伐他却被他怀柔的哥特人出身的将领和属下蛮族兵，全体出动前去迎击刚刚登陆的汪达尔人。但是，这时发生了波尼法提乌斯不曾料想到的事态。

被天主教打成异端而遭歧视和排斥的多纳图教派的基督教徒决定加入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军队。汪达尔人也是基督教徒，但信奉的是被天主教派打成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在多纳图主义者看来，汪达尔人的入侵是异端抗击天主教徒的好机会。

这样就形成了反体制运动。这种气氛扩散开来，因不是基督教徒而受到二等公民待遇的毛里塔尼亚人，即摩尔人以及近来在临海城市常见到的沙漠游牧民柏柏尔人等都投奔了汪达尔人。

从这个时期西罗马帝国军队的规模推测，波尼法提乌斯可用之兵至多也只有1万人上下。靠这点兵力，波尼法提乌斯即使再英勇善战，也无法战胜异端异教的联合军队。居住在北非的罗马人也没有带头志愿承担防御的力量和意愿。与遭到北方蛮族入侵的欧洲不同，北非过去没有遭受过蛮族入侵，因而不适应与蛮族作战，没有悟到尽早奋起迎击蛮族的重要性。

根西里克的汪达尔人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立即控制了毛里塔尼亚，接着迅速东进，转眼间逼近希波·雷吉乌什（Hippo Regius）。

希波·雷吉乌什又叫伊波纳，是座濒临地中海的海港城市，与北非最大城市迦太基相距150公里，有一条罗马式大道相连接。波尼法提乌斯决定以希波·雷吉乌什为后盾，阻止汪达尔人军队前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14个月之久的攻防战。

现今阿尔及利亚城市博纳（Bona）西南2公里左右的地方留存了古代希波·雷吉乌什的遗迹。公元430年，那里是居住着很多人口的城市。持续了14个月的攻防战期间，很多人一直待在城里。他们中间就有后来被奉为圣人的奥古斯丁，他是这座城市的主教。40岁的波尼法提乌斯统率士兵，指挥防御战。76岁的主教曾在几年前鼓励他保卫北非，现在又在安慰恐惧绝望的信徒们。他这样说教：入侵的北方蛮族破坏和杀害的是地上的国家，我们基督教徒的安住之地是死后去的神的国度。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在基督天主教中非常重要，是被称为“教会之父”、被赞颂为“教父”的人物。他也是出身于北非的罗马人，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特别著名的作品是《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这两部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出版。

用一句话来说，《忏悔录》是一部真实坦白自己在觉悟到真正的信仰之前是如何任性游乐，真实描写自己何时受到谁的启发而觉悟，后来生活又是如何改变的作品。

《上帝之城》据说是受到公元410年“罗马浩劫”的冲击而写的作品，告诉人们现实直面的地上国度的惨状不过是通往上帝之城途中的过程而已。异教徒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沦落如此，是罗马人抛弃传统宗教改信基督教的缘故。《上帝之城》就是针对这种责难的反驳。我在读后感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让对“地上国度”的惨状感到绝望、对基督

教的信仰有所动摇的人们着眼于“上帝之城”，从而使这些善男信女坚定信仰。很多关于信仰的书籍往往使没有共享这种信仰的人感到枯燥。然而，这些书籍在一千六百年之后的今天仍在刊行，这不仅是因为这是天主教最伟大的理论家所写，还因为奥古斯丁的文章卓越。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接受了曾为罗马精英必备条件的素质教育（artes liberales，英文为liberal arts）。

他于公元354年生于北非地方自治体之一的塔加斯特，这种自治体受中央政府派遣的行省总督统治。这座城市如今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名为苏格·艾赫拉斯。罗马时代的“municipia”，指被罗马征服而成为行省的地方城市，因此，奥古斯丁很有可能有迦太基人的血统。他的父亲是这座城市的地方议会议员，据说直到死前几年还在信仰罗马传统诸神，是一位异教徒。虽然那时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但还远未到离狄奥多西确定基督教为唯一宗教而其他均为邪教的4世纪末期。所以，奥古斯丁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基督教得到承认但也可以自由信仰其他诸教的时代度过的。

奥古斯丁按照良家惯例，在父母身边接受初等教育后，自中等教育开始便早早离家，去了2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学习。少年时代，奥古斯丁的兴趣在拉丁文学，尤其喜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叙事诗人维吉尔。后来，奥古斯丁去迦太基留学，学习雄辩术这种说服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的技能。可是在这座大都市里，他没有投身于学问，而是将时光抛掷于享受人生，不满18岁便成为未婚父亲。这可是使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莫妮卡深深哀叹的不吉之事。

不过，他并未荒废学业，在完成了迦太基留学的3年学业以后，他于20岁时返回了故乡塔加斯特。在故乡教授文法，并开设了相当于中等教育的私塾。但对这位刚满20岁、多愁善感、又体验过大都市迦太基生活的年轻人而言，内陆小城市的生活太过枯燥。作为未婚父亲，他与女伴的关系并未断绝，两年之后又回到迦太基。此后连续7年的岁月中，

他在迦太基靠教授雄辩术为生。

他决定放弃在迦太基的生活去罗马的理由也很有趣，并不是为了究求学问，而是因为讨厌学生。迦太基的学生闹哄哄的，根本不听年轻老师的话。于是他想，在传统悠久的罗马接受素质教育的学生肯定要强些，便决定去了罗马。

可是，罗马的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不但不集中精力学习，还会在支付月钱之前跑到别的“私塾”去，这对靠月钱生活的老师来说真是令人绝望。他虽然来到了曾经的“世界之都”，却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当时的首都长官西马库斯向年轻的奥古斯丁伸出了援手。

西马库斯是元老院有实力的议员，还担任着“首都长官”。他亲自为奥古斯丁当推荐人，劝奥古斯丁参加“讲座资格”考试。

“讲座”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kathédra”，原意为“椅子”，转为拉丁文后写作“cathedra”，意思是具有教授学生的教席资格。这个词直到现代仍在使用。奥古斯丁顺利通过这个“讲座资格”考试，首都长官甚至要为他在米兰觅到一个职位。

西马库斯这年44岁，正是他在公元384年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展开了史上留名的争论。他以一直处于攻势的基督教势力为对手，阐述罗马传统宗教存在的理由，被称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火焰”。他也许见出了30岁的奥古斯丁是这把“火”的继承人。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的奥古斯丁，这时不过是一位失业的年轻古典学者。

前往米兰，为奥古斯丁的人生带来了一大转机。这个时期的米兰正处在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绝对影响之下，我一直认为，这位主教是天主教会首推第一的实干家。一直以希腊罗马经典为教材教授雄辩术的奥古斯丁竟为将希腊罗马文明打成异教文明的基督教所痴迷。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说教给了32岁的奥古斯丁以雷击一般的冲击。

他放弃了教师职业，断绝了与带着儿子的情人的长期关系，拒绝了母亲安排的婚姻，决心把以后的人生奉献给神。翌年，即公元387年4月，32岁这年的春天，奥古斯丁接受了洗礼，好像主教安布罗西乌斯也参加了他的洗礼。

圣奥古斯丁（波提切利画）

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塔加斯特，当起了一介修道僧。这位学识丰富的年轻修道僧无法不对周边产生影响。弟子们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修道院。这个时期，他的私生子去世了。

奥古斯丁的修道院生活持续了9年。公元397年，已经43岁的奥古斯丁被选为希波·雷吉乌什主教。他原想一辈子做一名修道僧，但想到这也是神的意旨，便从修道院搬进了主教宅邸。

奥古斯丁当上主教以后，开始在成为天主教教理旗手的路上突飞猛进。在希波·雷吉乌什，曾经召开过几次公开会议来调整教理解释方面的差异。奥古斯丁当上主教后在教理方面极富战斗性，集中攻击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以前，北非基督教徒中多纳图主义者占多数，但在天主教派的攻势面前一落千丈而成为少数派。这应归功于主教奥古斯丁。正因为如此，信奉多纳图派基督教的人们对他更加憎恨。公元430年，多纳图派基督教徒与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共同行动，逼近希波·雷吉乌什。也许，奥古斯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必要相信，真正的安居之地不在地上，而只能在“上帝之城”。

波尼法提乌斯放弃了希波·雷吉乌什城的防御。载着他和手下士兵的船队从港口出发去了意大利。这座城市的命运由此决定。在城墙倒塌的轰隆声中，奥古斯丁76年的人生落下了帷幕。这天是公元430年8月28日。

尽管如此，这也比活着落入一直被视做异端的阿里乌斯教派和多纳图派人手中幸运。过去曾经有些天主教徒为与奥古斯丁的说教保持一致而有过过激行为，杀死过主教，焚毁过教堂。如果奥古斯丁活着落入多纳图派之手，必定会被大卸八块。

大概是害怕发生这种情况，信徒们悄悄把奥古斯丁的遗骸装上船，

运到撒丁岛上去避难。到了中世纪，遗骨被袭击该岛的撒拉森海盗抢走，得花“赎金”才能要回。有人付了赎金，遗骨回到了信徒手中，后被作为圣物保存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的教堂中，直到今天。

波尼法提乌斯抛弃了北非，也抛弃了以前所仰慕的奥古斯丁，回到了意大利。可是，身在拉文纳皇宫的加拉·普拉西提阿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责备这位阿非利加方面大元帅。她打算利用这位年届四十的武将，打掉活跃在高卢却与拉文纳皇宫保持距离的埃提乌斯。令人不解的是，北非正在不断失去，皇宫为什么却还要削弱高卢的罗马势力。40岁的母后只是因为埃提乌斯经常不服从自己的命令便认定他图谋把高卢从西罗马分裂出去。这与当初怀疑波尼法提乌斯图谋把北非分裂出去而派兵讨伐一样，只是对手从波尼法提乌斯换成了埃提乌斯。

且不说他们实际上是否图谋分裂，没有力量图谋分裂的人也没有能力防御，这在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不论北非还是高卢都是一样。只有能够操纵具有这种力量的人，才配当最高司令。可是，代11岁皇帝掌控西罗马帝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不具备这种能力。

人们不知道波尼法提乌斯个人是否有意与同辈埃提乌斯竞争。总之，回到本土的波尼法提乌斯不仅没有被问放弃北非之罪，而且再次被任命为“大元帅”，还被授予“贵族”（patricius）之位。但是这次没有明确记载是负责哪方面的大元帅。也许加拉·普拉西提阿与波尼法提乌斯两人之间已经有了默契，战胜埃提乌斯后任命波尼法提乌斯担任高卢方面大元帅。

就这样，西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军队已经撤出的不列颠，失去了高卢北部和中部，失去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西班牙大部，又失去了北非，目前仅有迦太基城及其周边一带还在罗马人手里。在这样的状态下，西罗马帝国又要开始浪费所剩无几的力量。被浪费的不光是人和钱，还有时间。埃提乌斯与波尼法提乌斯这两位罗马军队“大元帅”之间的这场内战，直到两年之后才结束。

公元432年，埃提乌斯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与正等着他们的波尼法提乌斯的军队在里米尼附近的平原相遇。里米尼离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和母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所在的拉文纳不到50公里，其近郊成为罗马军队内战的战场。

虽说是罗马军队，但实质上蛮族兵居多。指挥他们的人都在42岁左右，年富力强。他们二人的军事才能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激战一场接着一场。不过，战况的进展却常常是波尼法提乌斯占据优势。波尼法提乌斯是优秀的战略家，也是优秀的战术家。

另一方面，埃提乌斯与其说是战术家，毋宁说是战略家，看到战况进展如此，便看准波尼法提乌斯的脾性改变了方针。

埃提乌斯提议两位大将进行决斗，以此决定战斗的胜负。

波尼法提乌斯瞥了一眼使者送来的提议当即决断——同意。当晚，双方在各自的营寨里准备明天的决斗。侍者们忙于为主人加工武器。埃提乌斯的随从遵照主人的密令，对决斗的武器进行改良，加长了长矛。

决斗开始，两军士兵定睛注视着，大气不敢出。两位将军驱马飞奔，胜负已在激烈对冲的瞬间决定。波尼法提乌斯左腹部被长矛刺穿，倒栽葱跌下马来，动弹不得，5天之后死于枪伤。埃提乌斯获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尼法提乌斯属下的将士编入自己的军队。哥特人出身的将军桑吉巴努斯趁此机会投向埃提乌斯。他原先被派去北非讨伐波尼法提乌斯，后来在波尼法提乌斯的怀柔下一直与其共同行动。在里米尼战斗中，他是波尼法提乌斯的副将。这样，除了死去的波尼法提乌斯，埃提乌斯收编了所有波尼法提乌斯的军队。完成这一切之后，埃提乌斯开始向加拉·普拉西提阿摊牌。

这实在是巧妙的“摊牌”。埃提乌斯率领军队来到拉文纳，让部队在拉文纳郊外待命，自己只带少数的几个将军进入皇宫，向由母亲陪伴着

接见他的少年皇帝乞求原谅。

罗马人打败了罗马军队，埃提乌斯为此乞求原谅，这实在是荒唐可笑之事。但加拉·普拉西提阿并没有笑。皇帝拉住埃提乌斯的手让他站起身来，原谅了他，并正式任命他为“联军总司令”。

这个时期的埃提乌斯要想取代少年皇帝大约是很轻松的事，他一定会从陆上和海上两面夹攻拉文纳。但他连试也没试。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野心。埃提乌斯自己是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徒，但娶了阿里乌斯教派的哥特人女人为妻，并且坦然生子。废掉被视为奉基督教的神意而坐上宝座的皇帝，并由自己取而代之，在埃提乌斯看来并不会刺伤他的宗教信仰。他之所以打消了实现野心的念头，是因为吃不准东罗马帝国会如何行动。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是狄奥多西二世，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却仍不热心于亲政，由姐姐普尔喀丽娅独揽大权，统治着东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均由女人统治，但统治才能有明显差距。东罗马帝国在普尔喀丽娅的领导下，与大国波斯维系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同时把北方蛮族入侵的祸水引向西罗马帝国，成功避免了两面受敌的事态。只要能够阻止外敌入侵，国内和平就能得到保障，自然国力也会增强。埃提乌斯害怕东罗马帝国把正规军派到西罗马帝国。那样他就会受到蛮族和罗马军队的两面夹击。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他打了胜仗却向战败的一方乞求原谅，以换取皇帝正式承认他作为事实上的西罗马帝国全军最高司令官的地位。

“联军总司令”埃提乌斯

公元432年开始了持续22年的埃提乌斯时代。这意味着加拉·普拉西提阿走下了政治主角的宝座。

加拉·普拉西提阿是东西统一时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狄奥多西的女儿，是帝国东西分裂后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曾经是蛮族族长的妻子，后来又是从一介士兵当上共治皇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的妃子。她是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统治西罗马帝国达7年之久，42岁时被迫隐退。她仍跟从前一样继续住在拉文纳的皇宫里，为刚满13岁的皇帝摄政的地位也没有变，但埃提乌斯的力量超出了她所能掌控的水平。

加拉·普拉西提阿后来又活了18年。这期间她做了两件事：完成了自己的儿子——西罗马帝国皇帝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之间的婚事以及把对埃提乌斯的憎恨灌输给儿子，挑起他复仇的念头。婚事在瓦伦提尼安三世成年的公元437年完成，复仇也将在她死后4年实现。但让这位只有母后身份的加拉·普拉西提阿担心的不是皇帝儿子，而是女儿霍诺丽娅。霍诺丽娅是皇帝的姐姐，这位公主胆大妄为，给西罗马帝国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也许在西罗马帝国的宫廷里，女人的血质比男人更富不安分的性质，尽管这从未有过好结果。

不少人拿西罗马帝国天字第一号的实力派人物埃提乌斯与30年前的头号实力派人物斯提利科相比较。这二位都认为不吸收蛮族就不能保卫西罗马帝国。然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人本质上是不同的。乍一看两个人似乎都采用了“以毒攻毒”之法，但其内容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斯提利科虽是蛮族出身，但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淌的是母方罗马人的血。在他看来，必须保卫的毕竟是西罗马帝国，而蛮族之“毒”无论再有用，终归是“毒”。“以毒攻毒”只是达到保卫西罗马帝国这个目的的手段。于是，好用便是最重要的条件。正因为好用，是否抛弃不用也就取决于自己的需要。

斯提利科把目光盯在统率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身上，也是因为自己曾4次打败过他，而且可以说放就放，收放自如。

这种心理作用不仅经常使阿拉里克感到压力，对其手下的西哥特人也是一种持续的压力。这种情况对与西哥特人并肩作战的罗马士兵也产生了一种良好影响。即便是并肩作战，罗马与西哥特人的关系也并不对等，罗马方面是强者，西哥特人方面是弱者。这样，“毒”的作用只局限于进攻其他的“毒”，而不用害怕它“毒”害母体。

埃提乌斯所用之“毒”是匈奴人。他选择匈奴人是基于个人的亲近感，他在匈奴人中间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存关系，有事相求即可借兵。

但从结果上看，事实是在公元432年以后埃提乌斯大权在握的20年间，他的确守住了西罗马帝国。不过，在他的做法中看不出一以贯之的政略，只是权宜之计。比如，这次与这个蛮族联合打击别的蛮族，下次却又与被打的蛮族联手攻击上次的盟友。推测一下埃提乌斯的想法，我想他大概是想让从北方侵袭而来的蛮族在高卢和西班牙自相残杀的现状长久持续下去。

可是，埃提乌斯的战略蕴藏着巨大危险。在依靠大将埃提乌斯对情况的判断而不断变更敌我，集中精力玩走钢丝一般的游戏时，罗马军队自身的力量却发生了决定性的衰退。人一旦习惯于依赖别人，自己也就站立不住了。那已不仅是“以毒攻毒”，连母体也为毒所攻了。自以为掌握着主动权，而主动权却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蛮族一方。

然而，埃提乌斯还是暂时延长了西罗马帝国的寿命。埃提乌斯时代在西罗马帝国持续20年之久的原因有三：

第一，尽管后来成为敌人，但在此之前一直被埃提乌斯引为盟友的匈奴人，是所有北方蛮族都害怕的蛮族中的蛮族。

第二，北方蛮族各部族都在高卢、西班牙和北非为确保自己的领土而腾不出手来，没有余力入侵意大利。

第三，拉文纳的宫廷和罗马的元老院都无力威胁埃提乌斯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藏起自己的无能而把天下许给埃提乌斯的理由只有一个，与父亲是蛮族出身、母亲是罗马人的斯提利科不同，埃提乌斯父母都是罗马人。

可是，后世史学家都把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写成“最后的罗马人”，却未把罗马人的埃提乌斯评价为“最后的罗马人”。也许他们认为，是不是罗马人不光要看结果，在导致结果的过程中的姿态也必须是“罗马人的”。“以毒攻毒”的方法本质上就是持续掌握主导权，这实在是一种罗马式的战略战术。

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公元5世纪接近中叶时，东西罗马帝国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使人觉得，仅仅半个世纪前还属同一帝国的事实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在东罗马帝国，持续了42年之久的狄奥多西二世的统治行将结束。皇帝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甚至传说他要把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改成修道院。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谈资来谈论这位皇帝。不过，取而代之掌控帝国的皇姐普尔喀丽娅的操舵水平却差强人意，东罗马帝国的内外安泰得以保障。

东罗马帝国也并非没有受到蛮族的威胁。在5世纪接近中叶的时期，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匈奴人。稍早前匈奴人的族长去世，与稳健的兄长性格相反的弟弟阿提拉取而代之成为头领。

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统治西罗马帝国也长达30年。虽然皇帝的宝座还算稳定，但实情大不一样。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形同虚设。不过，在西部辅佐皇帝的母后加拉·普拉西提阿早早地退出了前台，实权转到埃提乌斯手中之后也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埃提乌斯酷似走钢丝的做法，使蛮族从北方入侵的威胁有所减弱。这使得埃提乌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欧洲。罗马时代，意大利半岛与北非的关系较其与高卢和西班牙所

代表的欧洲之间的关系要深厚得多。可是，北非在埃提乌斯的关心之外。真相也许是不去关心和无力关心各占一半。波尼法提乌斯如果还活着也许能有点作为，但他被西罗马帝国自己葬送了。

瓦解

即使10万人的部族倾巢出动去侵略，人数也绝对不会超过被侵略地的居民人数。现代人无法想象罗马时代的北非是何等地绿色盈野。正如“罗马粮仓”所表示的那样，那里是一片人口众多的鱼米之乡。北非最大的港口是迦太基港。这个港口与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航线，可能是地中海上交通最为繁忙的海上干线。即便是在现代，两地之间的海底因海难而沉没的船只遗骸也是鳞次栉比，排列成一条海底大道。近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的海底考古，也因为这一带海洋太深而离目标尚远。人们在2000多年后还能发现海底泥沙中露出身影的众多的海难沉船遗骸，可以想象出罗马时代北非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

罗马与迦太基，这两个西地中海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之间的物产往来盛极一时，人员交流也十分频繁。特别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天主教派在西方的中心就是罗马和迦太基。教会资产丰厚，靠着这些资源，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主教中优秀人才辈出，仰慕他们的信徒人数日众。

中心城市的繁荣离不开附近强有力的“卫星城市”的支持。这个卫星城市对罗马而言，就是米兰，圣安布罗西乌斯任此地主教长达23年；对迦太基而言，就是希波·雷吉乌什，圣奥古斯丁在这里的主教宝座上也坐了33年。

事实上，罗马人称霸北非，也只限于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而没有涉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这是事实。与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罗

马起源于城市国家，转变为领土型的帝国之后，仍旧喜爱居住在他们称之为“内海”（mare internum）的地中海附近地方。罗马大道的网络在北非的分布情况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点。罗马大道所到之处，就是罗马人的罗马世界。

罗马人的传统做法是并非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去做。他们可能认为，如果想要沙漠南面出产的物产，与其征服那些地区纳为行省，不如坐等当地人运来更有效率。征服也是需要人和钱的，征服后的行省化则需要更多的人和钱。因此，即使在自己成为最强民族的时代，刺激罗马人征服欲的也只限于他们认为防御上的必需之地。

这样的历史过程使得罗马时代的北非，居民和财富都集中在接近地中海的带状地域。其中，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迦太基一直起着“中枢”的作用。公元429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的汪达尔人也是一路东进，穿过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一年后便逼近迦太基。波尼法提乌斯离开希波·雷吉乌什后，北非就可说是处在无防御状态中了。汪达尔人的兵力加上摩尔人和多那图派的基督教徒人数不过5万，但北非引以为豪的丰沛财力和能干的人才并不能形成防御力量。蛮族征服北非完全就像是刀切面包的感觉。

汪达尔人入侵北非

公元439年，在蛮族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北非的第10个年头，北非中枢迦太基终于陷落了。

在高卢和西班牙，进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意大利，少数征服者统治多数被征服者时，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寻找相互共存的妥协点。胜利者少说也要统治数量10倍于己的失败者。蛮族的入侵也不再是打过来抢了东西就走，而是抢掠后就地定居。但汪达尔人入侵北非有所不同。多那图派的基督教徒加入了征服大军可能是这不同的主要原因。

多纳图派虽然同为基督教徒却被打成异端，一直受到镇压。对他们而言，天主教徒是不共戴天之敌。天主教徒社会及经济地位优越，他们对多纳图派的鄙视不只是在宗教方面。如今，天主教徒成为失败者。汪达尔人在北非的入侵和征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残酷，其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化之后的北非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情况。

多纳图派在北非广为普及，也一直是被北非天主教徒敌视和镇压的对象。汪达尔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在天主教徒看来也

是“异端”。不过，从阅读众多史料中得到的感觉是，严厉对待“异端”的是天主教徒，而阿里乌斯教派则宽容得多。所以，如果征服北非的只是汪达尔人的话，我想，就没有必要将圣奥古斯丁的遗体移到撒丁岛避难去了。圣奥古斯丁生前是著名的弹劾多纳图派的旗手，转移他遗体的天主教徒很明白这一点。他们一定会预料到，一旦自己敬爱的人的遗骸落到多纳图派教徒之手，其下场将会如何。

这种情况使得汪达尔人对北非的占领比在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加残酷，出现大量难民就是具体的表现。

迦太基港与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之间的航线可说是运输干线，航行其间的船只越多，熟知这条海路的乘客也就越多。从迦太基到那不勒斯附近的商港波佐利的路程，顺风是两天；即使因为地中海风向多变不能经常遇到顺风，也就5天；根本不走顺风运，全靠橹手划船，也只需10天。如果不登陆意大利半岛，到西西里仅需一昼夜的路程。这时的汪达尔人还不具海上战斗力，没有掌握制海权，他们的威胁尚未达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撒丁岛。

刚才提到的大量难民都是北非罗马社会的上层人士。处在社会中层的匠人、店主、自耕农等则无力远走他乡。而下层的农奴在老主人逃亡意大利后，只能在取而代之的新主人手下，过着比过去更加艰辛的劳作生活。留下来的这些人，连坚持天主教信仰都成为奢侈。

天主教会的中下层神职人员留了下来。他们只能在彻底变为多纳图派天下的社会里，过着忍受镇压、屈辱和欺凌的日子。不光是圣奥古斯丁的遗体，连这位著名主教的著作——当时还是手抄本——也被制成卷轴，随同难民逃难去了。北非的天主教事实上已经崩溃。

汪达尔人最近30年一直居住在北欧的草莽深处，与罗马帝国的接触只限于像斯提利科的父亲那样在罗马军队服役的少数人。他们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以后步伐迅速，从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如

今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北非。尽管他们初到北非，但对北非的统治颇成体系。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因为接受了多纳图派人士的进言。迦太基等城市周边的大规模农场无一例外全被接收。居住在城市房屋里的人也被悉数赶出，动辄沦为奴隶。基督教不允许把信仰共同的“兄弟”变成奴隶，但信仰不同的人则不为“兄弟”。这样，不仅异教，就连异端也都成为信仰不同的人了。

被允许生存下去的不同信仰的人有士兵和中下级行政官僚。当然，士兵要接受汪达尔人的指挥，官僚也要对新主子唯命是从。此外，匠人、店主也被允许生存下去。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们的职业总是需要的。

也有一些大农庄主没有背井离乡。他们的农庄都位于远离地中海沿岸的内陆深处。但无论如何，加上多纳图派，胜利者也是少数，不可能把居住在北非全境的所有人统统换掉。不过，内陆农庄出产的农产品已经不再运往意大利。汪达尔人不是农耕民族，霸占了大城市周边的耕地以后，产量远不及以前。在北非这个罗马时代丰饶的农耕地带，被征服者仅能养活征服者。

汪达尔人还把地中海南岸沿岸成串的海港城市几乎全部攫取到手，尽管它们并非“罗马粮仓”。北方蛮族汪达尔人控制海洋运力只是时间问题。蛮族控制海洋运力之后，会百分之百地用于海盗业。这样的海盗不只会袭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他们每到一处，就纷纷下船，摇身一变成为陆地强盗。他们乘船溯河而上，袭击沿河城市和乡镇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居住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人们，开始因遭受化为海盗的汪达尔人的袭击而发出哀鸣。拉文纳对此不能不闻不问，便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东罗马帝国闻讯派来了一支称不上是部队的队伍，表现出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疏远。这支部队与汪达尔人稍一遭遇，便在被杀或被俘之前早早撤回了君士坦丁堡。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终于向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派去了请求媾和交涉的使节。这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正式承认自己身上的一块重要部分被人切走。媾和于公元442年达成协议，离汪达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阿非利加只过了13年。

罗马在布匿战争中降服大国迦太基占领北非以来经过了600年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罗马曾有过战败，但他们以胜利者罗马的身份去同化曾经是迦太基领土的这片地方，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超越迦太基统治时代的繁荣昌盛。现在，这个时代也终于结束了。从此开始的世界，不论统治者的人种和民族如何变换，再也不会有胜利者与失败者同化的事情了。

匈奴人

一切不幸，都源于匈奴人所播下的种子。

尤里安努斯皇帝被基督教教会弹劾为“叛教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将军在这位皇帝的治下，转战南北。皇帝去世后，他便隐退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在100多年前的4世纪中叶就注意到了匈奴人的威胁。他是出身于叙利亚大城市安条克上流阶层的希腊裔罗马人。这个阶层的人们都从事祖上传下来的工商业，而他却选择了在罗马军队中从军，这实属罕例。也许这种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征战的经历把他从一个善于抽象思维的希腊人变成了一个具象思维不在任何人之下的罗马人。重复这种具象思维，就能洞见以后的事物。在刚刚进入4世纪后叶的时期，罗马帝国不但没有与匈奴人有过直接接触，甚至鲜有人见过匈奴人。匈奴人还在离罗马帝国“防线”即国界十分遥远的彼方。

阿米阿努斯也和其他许多罗马人一样并没有亲眼见过匈奴人。但是只有他注意到了与匈奴人有直接接触的日耳曼系蛮族的动荡，他看到了

他们背后受到匈奴人挤压的实情。所谓情报，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会以某种感觉作为头绪，将诸多信息像磁石一般地吸引过来。正因为阿米阿努斯没有亲眼见过匈奴人，他才会热心于通过已经认识的北方蛮族收集有关匈奴人的情报。

他这样描绘匈奴人：

与其说他们是用两脚走路的人，不如说他们是野兽。他们骑在马上，用马背和两腿夹运生肉，不烧就吃。扁平的面孔上嵌着两只小黑点一样的眼睛，胡须稀少，个子矮小但体格健壮。他们栖息于森林，身上裹着用麻绳把多张鼠皮连在一起的衣服。这衣服从来不洗，一穿到烂，总是散发着恶臭。鞋子也是用麻绳缝合起来的未经鞣制的羊皮做成，难以行走，不适合长时间步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管去哪里，干什么都是骑马。在战场上他们也极度讨厌下马作战。不过，骑在马上的匈奴人人马一体，就像钉在马上一样，可以发挥出惊人的突击力。

他们住在两轮牛车里，在车棚里吃喝、交媾、生子，做所有的事情。也许因为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游牧民族，土地再肥沃，他们对耕作也完全没有兴趣。

连蛮族都害怕这样的匈奴人，而称之为“蛮族”。他们不但具有出类拔萃的骑马能力，还有在马背上一箭中的的高超技能。不过，在我看来，下面五项“无”字将他们区别于其他蛮族，这也是匈奴人强悍的原因：

一、无目的，无目的地。这就允许他们采用随机应变的战法。

二、对拥有房屋无兴趣。这显示出他们对财产和积累财富不感兴趣。但他们嗜好黄金和黄金制品。不仅是黄金，只要是发亮的，都喜欢。

三、无法律。因此，上面人的命令就是圣旨。

四、无家族守护神。这表现出他们没有家族观念，因而人质这

种担保形式对他们不适用。

五、无确保未来食物的观念。只要有机会，不论何时何物，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抢夺。

阿米阿努斯的警告没有被当时的当政者听进去。半个世纪后的5世纪，罗马帝国终于也与匈奴人有了直接接触。被匈奴人驱赶的日耳曼系蛮族入侵罗马境内，就地盘踞。匈奴人出现在作为罗马边境的多瑙河也就顺理成章。这里几乎与现在的匈牙利相重叠，成为匈奴人的新根据地。

与匈奴人的正式接触是东罗马帝国先开始的。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后，多瑙河中下游归入了东罗马帝国，而匈奴人的新根据地正位于多瑙河中游。这就使得当时的东罗马帝国拥有的关于匈奴人、尤其是关于其头目阿提拉的情报绝对多于西罗马帝国。不过，西罗马帝国“大元帅”埃提乌斯曾在匈奴人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纵观匈奴人对东西罗马帝国的做法，我们可以知道，以公元444年为界，其前后截然不同。以前，阿提拉一直推兄长为族长，自己居于其次。公元444年，他替代了遭雷劈（传闻如此）而死的兄长，开始一个人统率匈奴人。公元444年以前的匈奴人对被其驱赶的日耳曼系蛮族而言非常可怖，但对东西罗马帝国而言，还是容易抵御的对手。

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的兄长贝里达之间缔结了“同盟”协约，东罗马帝国每年向匈奴人支付700罗马磅（合263公斤）金条。名目上是佣兵费，实质上是不再渡过多瑙河入侵东罗马帝国的“代偿金”。

西罗马帝国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则完全建立在埃提乌斯与匈奴人的个人关系上，匈奴人可以响应埃提乌斯的请求借兵给他。由于没有正式的“同盟”协约，人们不知道埃提乌斯为此支付了多少报酬。

一般人认为，匈奴人对报酬还是基本满意的。因为根据留存的记录，到公元444年为止，匈奴人曾4次借兵给埃提乌斯：公元429年与竞争对手费利克斯作战、公元432年与波尼法提乌斯及其背后的加拉·普拉西提阿决战、公元437年对勃艮第人作战、公元439年对西哥特人作战。可见，决定埃提乌斯在西罗马帝国国内地位和权力的战斗几乎次次都有匈奴人参与其中。不过，与埃提乌斯个人亲近的是匈奴人重要人物之一，名叫阿斯帕尔。他与现在匈奴人族长的阿提拉似乎关系不特别密切。

阿提拉

在组织不成熟、又没有法律约束的匈奴人社会里，族长的命令具有绝对的权威。阿提拉是最适合于这种组织的领袖。

匈奴人在相当于今天匈牙利的多瑙河中游一带立足下来，阿提拉登上前台，再次开始行动，矛头直指南面广阔的东罗马帝国领土。阿提拉统率的匈奴人首先占领了罗马时代称为维纳契姆，即今天的科斯托拉茨热。在这附近，有征服达契亚时图拉真皇帝让人建造的全长超过一公里的石桥连接多瑙河南北两岸。

石桥其实只有桥墩是石头建造的，上面的桥梁却是木造的。3世纪后叶，罗马帝国从多瑙河北的达契亚撤退时，桥梁遭到破坏。不过，排列在河里的20根桥墩却依旧屹立，显示着罗马人的高超技术。只要在桥墩上铺上木板变成临时桥梁，人马通行便绰绰有余。阿提拉把科斯托拉茨热作为第一个目标，也是因为匈奴人修复了这座桥梁，从这里渡过了多瑙河。无论造多少筏子，把人马全部渡过大河多瑙河，风险既大，费时也多。

阿提拉和匈奴人占领了科斯托拉茨热后，接着占领了距此向西不到

100公里的辛吉杜努姆（现在的贝尔格莱德），然后又占领了锡尔米乌姆（现在的米特罗维察）。阿提拉的想法是，渡过多瑙河后迅疾占领这一带的重要据点，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度南下。

多瑙河在被称为“罗马帝国防御力量测量表”的时代，沿河军团基地、城寨和要塞以及用于监视的碉堡连绵不断，形成了罗马帝国的北面“防线”。其中，从上游顺流而下，后世称为雷根斯堡、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这四个地方被视为重要基地，得到巩固强化。这四地中间有三处后来成了“中欧”国家的首都。古代罗马人在城市建设中的布局感之灵敏令人惊叹。这四大重要基地与帝国各地之间自然都有大道连通。四地之中位于重要“防线”多瑙河最下游的贝尔格莱德，有通往帝国东部的干线大道。这条大道一路向东南，经过君士坦丁大帝出生的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塞尔迪卡（现在的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菲利波波利、哈德良皇帝建设的哈德良堡（现在的土耳其埃迪尔内），到达曾经被称为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斜贯巴尔干地区。阿提拉现在就挺进在这条大道上。

阿提拉（16世纪制作的浮雕）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不光是行军挺进。他们就像狂怒之神一样袭击、掠夺、破坏、焚毁，然后离去。给他们起的绰号“上帝之鞭”很快便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徒中传开。传说在匈奴人退去之后，已听不见狗吠。不便带走的人已经悉数被杀，离去的匈奴人后面拖着长长的俘虏队伍，也是常见的景象。

匈奴人一路狂飙，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不足100公里了。从那里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送去了他们的要

求：

一、把根据以前的“同盟”协约支付的每年700罗马磅金条提高两倍，每年支付2000罗马磅（合787.5公斤），另付临时金6000罗马磅（合2.25吨）金条。

二、归还匈奴人军队的开小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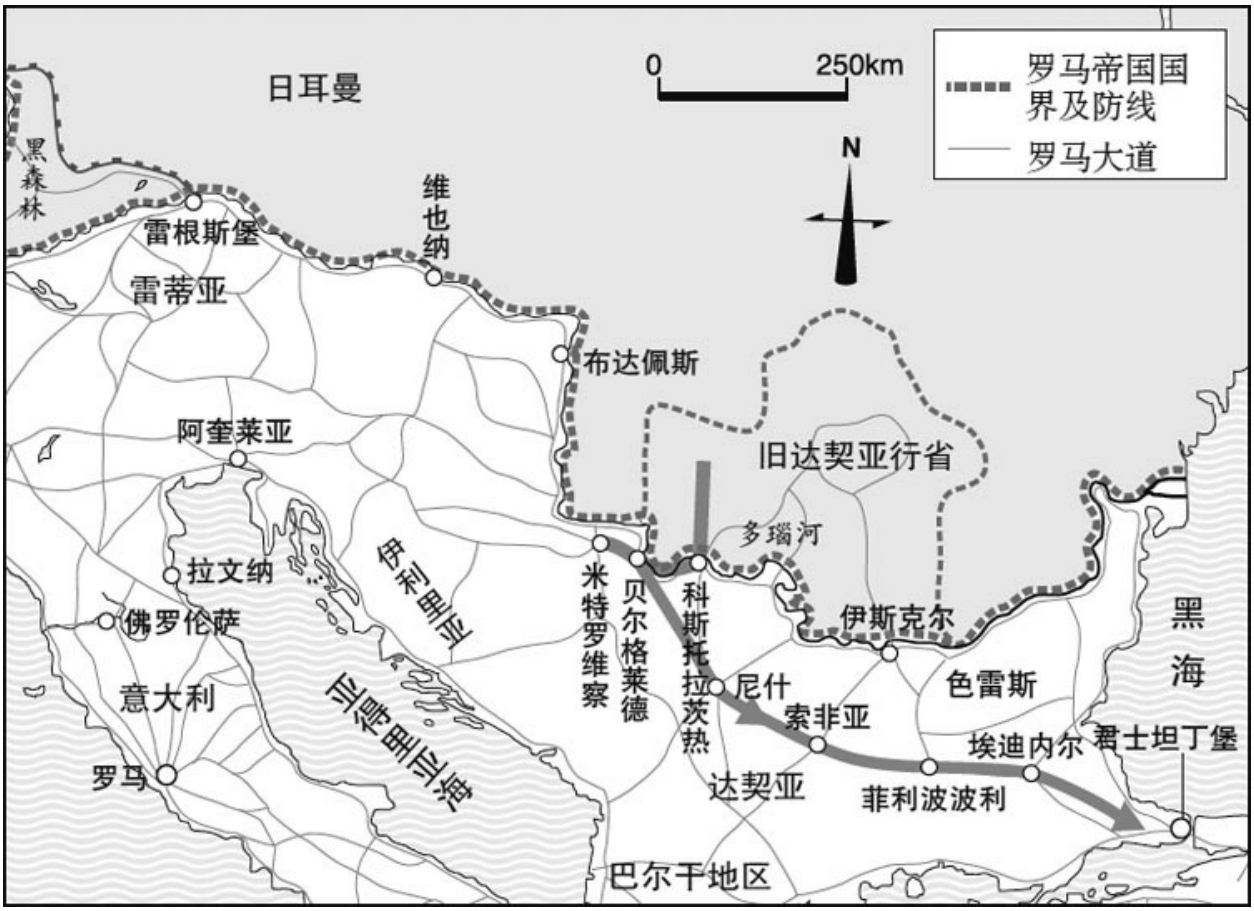
三、如果希望恢复被匈奴人俘虏的罗马人的自由，每个人头支付12枚苏勒德斯金币。

面对这些要求，年已46岁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只是全身颤抖。东罗马帝国实际统治者皇帝的姐姐普尔喀丽娅起初只想接受第二个条件——归还逃兵。

可这些逃兵却不是匈奴人。匈奴人把败给自己的日耳曼系蛮族男人也编进自己的军队。这些人不习惯匈奴人的生活，也不习惯匈奴人的残虐行为，纷纷投降了东罗马军队。阿提拉要求归还他们。东罗马帝国接受了这个要求，他们便成群地跟着东罗马将士回到了匈奴人的阵营。

阿提拉迎接他们的行动也很迅速。他命令这些人全体趴在地上，在他们身上盖上帐篷布，让匈奴人士兵骑着马一边欢呼一边在帐篷布上跑了好几个来回，把他们全部踩死，让目睹这一行径的东罗马将士哑然失色。

面对这一暴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吓得发抖，但也激起了敌意。与西罗马帝国军队一样，东罗马帝国军队中也有很多日耳曼系的蛮族。被匈奴人的马蹄残杀的士兵也是他们的同胞。这时，主战派终于占了上风，向阿提拉派出了部队。然而，日耳曼骑兵哪里是匈奴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东罗马帝国只得与阿提拉缔结“同盟”协约，接受了他的全部条件。



匈奴人入侵巴尔干

可以说这是对亚细亚系蛮族匈奴人的无条件投降。送些豪华纺织品就能软化匈奴人的乐观看法被击得粉碎。君士坦丁堡派往阿提拉方面的使节任务已经不是交涉，他们成了忠实履行协约的单纯行政官员。

阿提拉竟然对使节的人选挑三拣四。其理由是，自己拥有统合罗马人以外所有民族和部族创立帝国的意志，与罗马帝国的皇帝平等，东罗马帝国派遣的使节也应具有相应地位，以便与和皇帝具有同等资格的人交涉。君士坦丁堡连这一条都接受了。元老院议员和基督教教会主教等在东罗马帝国具有崇高地位的人成了派往阿提拉的使节。

这样做产生了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作用。过去关于匈奴人及其酋长阿提拉的情报都只是通过第三者的传闻，现在自己成了当事人，所说之

言成为现场证人的证言。既然使节都是地位崇高的人，肯定会有见多识广的秘书官与他们同行。

有一位人物，名字叫普里斯库斯，不知是使节之一还是使节的秘书官，他以教授修辞学为业，文章也写得好，著有《拜占庭帝国史》一书。该书有部分片断残留下来。他是公元449年被派往阿提拉处的。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的“同盟”协约缔结于公元447年，他的派遣表明协约的履行并非易事。阿提拉的要求没完没了，甚至要求东罗马帝国承认从纳伊苏斯到北多瑙河的整个地区为匈奴人的领土，这意味着要吞并达契亚和色雷斯两个行省。

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被派往阿提拉处，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 我们一行进了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城。这座城市是君士坦丁大帝出生的地方，也是干线大道经过的地方，现在已为匈奴人的侵袭破坏殆尽，除了几个人在已是废墟的教堂聊避雨水霜露外，全城已是无人之境。纳伊苏斯附近流淌着摩拉瓦河，大道也沿着这条河通向西北。我们一行沿着摩拉瓦河，行进在大道上。
>
> 大道周边尽是无人地带，许多被匈奴人杀死的人已成白骨，死者无人掩埋，被弃置在被害之处。
>
> 行走在大道的途中，伊利里亚军团的大元帅在等着我们，把5个逃兵托付给我们。这5个人将按皇帝在协约里约定的那样引渡给阿提拉。带着这5个人，我们一行渡过多瑙河，进入了阿提拉的根据地。
>
> 从渡过多瑙河开始，匈奴人的卫队就一直跟着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走了大约13公里，来到了阿提拉的大本营。在交割了5名逃兵后，我们得到许可会见阿提拉。
>
> 很多蛮族人麇集在阿提拉的帐篷周围。我们进入帐篷后马上认出了坐在木凳上的阿提拉。因为其他人都站着，只有他坐着。
>
> 我们站在离那张粗糙御座老远的地方，只有马克西米努斯走上

前去，向阿提拉致意，转达了皇帝祝阿提拉和匈奴人更加繁荣的话，递上了皇帝的亲笔信。蛮族头领也祝愿皇帝和罗马人繁荣。

阿提拉在帐篷里被几名高官和武将围在中间。坦率地说，我对阿提拉本人衣着之朴素感到很震惊。与他不同，高官和武将们个个都穿着质地优良、色彩丰富的华丽服装，上面绣着大片花鸟，一定是从中国人和波斯人那里抢来的。

在这位把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大片土地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部族酋长的帐篷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有艺术价值的摆设。帐篷里也没有床，只有可能还值点钱的毛皮扔在地上，另有几张粗糙的木制椅子。阿提拉把弓和斧立在身旁，此外就再没有别的武器了。

阿提拉个头虽矮，但体格强壮。他面色暗黄，几乎没有胡须，脸型扁平得近乎奇妙。他两眼斜视，凹陷的黑眼睛像看稀罕物件似的盯着我们。

好像他吃饭、睡觉、见人都在这顶帐篷里。虽然没有餐桌，但有餐具，都是用金银做成，无疑也都是抢来的。

阿提拉是一个不停行动的人。我们尽管跟他保持着一定距离，也还是得骑马跟他各处行走。渡过几条河之后，终于到了他定为首都的城镇。与其叫城镇，不如说这只是个村庄。阿提拉木造的房子周围只围了一道根本起不到防卫作用的木栅栏。匈奴人二把手奥涅格西姆斯的略小一点的房子建在阿提拉的房子附近，周围也围着木栅栏。

阿提拉刚一进村，一群姑娘就唱着歌迎了出来。有几个人戴着白色面纱，其他人捧着面纱跟在后头。这时，奥涅格西姆斯的妻子带领着大群女奴出现了，向阿提拉奉上了食物和酒。这是匈奴人最高敬意的表示。

阿提拉从臣下们献上的银盘中捏起食物来吃，喝下了女人们献上的酒杯里的酒。整个过程他都骑在马上。

这就是公元449年时阿提拉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这离阿提拉在兄长死后成为匈奴人的头领以来只不过5年时间。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东罗马帝国也许要比西罗马帝国先被阿提拉统率的蛮族联军所灭。可是，这种情况在第二年的公元450年因下面的两个原因发生了骤变。

公元450年7月28日，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去世，享年50岁。他没有做一件皇帝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如此，在罗马帝国变为基督教国家以后，皇帝是依神意而定的。靠着这个对统治权世袭非常有利的规矩，狄奥多西二世仅因为是先帝之子就享受了长达42年的统治。也许是因为心里明白这一点，这位皇帝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甚至传说他要把皇宫变成修道院。在没有留下男孩的皇妃死后，他对传宗接代也毫不热心。一直替弟弟掌管国家的姐姐普尔喀丽娅还得决定由谁来当下任皇帝。

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虔诚程度不亚于弟弟，甚至被传为是住在皇宫里的修女。在目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对自己的权力不会形成障碍的无能之辈充任下任皇帝。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长年统治帝国的经验似乎没有白费。

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马利基安即位东罗马帝国皇帝。4世纪后，罗马元老院议员已不再看其是否具有军事经历了。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则不同，议员是授予退役将军的，具有很强的名誉职务的色彩。元老院在罗马建国当初即已存在，到这时已有1300年的历史。君士坦丁大帝130年前建都于君士坦丁堡。这位大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首都，并要有像罗马一样的“元老院”（senatus）。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即按此意而创设。时间一长，便会产生祖辈皆为元老院议员这种意义上的元老院阶层。但君士坦丁堡没有这个阶层。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是武将和高级官僚退役后的一种名誉职务。

新即皇位的元老院议员马利基安也在东罗马军队中积累了资历。他出身于多瑙河下游色雷斯地区（现保加利亚）。这一带历来以盛产良马

和优秀士兵而为世人所知。他非名门出身，也未受过高等教育，且已年过六旬，但惯于征战。

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凭此即能当上皇帝。而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能否做皇帝不凭“人意”而凭“神意”，“神意”成了比什么都重要的必要条件。于是，已故皇帝的姐姐、先帝阿卡狄乌斯的女儿普尔喀丽娅这位与“神意”有缘的人便嫁给马利基安，从而使他得以即位。普尔喀丽娅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因为自己是向神起誓的贞洁之身，所以不能同床。她已是年过五旬的女人，马利基安一定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合适。

马利基安

不愧是军人出身，马利基安万事积极。他登基后立即断然地全面毁弃与阿提拉的协约。根据与这个匈奴人头领的“同盟”协约，阿提拉的领土南起巴尔干地区的要地之一纳伊苏斯。这样，不仅一直被作为东罗马帝国领土的达契亚，就连连绵到其东面的色雷斯的大部分都成了匈奴人的领土。对色雷斯出身的马利基安来说，仅此一点就是一种屈辱。

新皇帝老当益壮，通知阿提拉毁弃协约的决定，同时着手加强东罗马军备，而且宣布自己统率军队。东罗马帝国皇帝连续两代连出君士坦丁堡都很罕见，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也换成了征战沙场的皇帝。即使足不出首都，罗马皇帝也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马利基安宣布自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司令官，并付诸行动。

马利基安皇帝把强化后的东罗马军队几乎全部投入到西面的多瑙河流域。那时与波斯王国的关系大体处于良好状态，东面的幼发拉底河靠常规的防卫军即已足够。

阿提拉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就在这时，对阿提拉来说，好消息从天而降。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霍诺丽娅，她的父亲是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三世，母亲是先帝狄奥多西一世的女儿加拉·普拉西提阿。霍诺丽娅公主皇统正宗，然而，自从罗马立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公主在罗马帝国并不自由。既是先皇的女儿，又是现皇帝的姐姐，她就不能与“神意”无缘。她不能随便与人结婚。虽然不是现代的“核扩散”，但任何事物一旦“扩散”，其所具有的力量就会弱化。所以，公主结婚只能是政治婚姻。可是，帝国认为可以让公主出嫁的对象并不常有。

霍诺丽娅

接受“神意”者的女儿结婚生的孩子也能继承“神意”。皇女所生子女的“神意”继承分量与皇子所生子女并无多大差别，这很容易成为皇室内部纠纷即家庭纷争的原因。罗马帝国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皇帝的女儿也被用于政治婚姻。但因为没有“神意”干涉，并不存在没有合适的政治婚姻对象就不能结婚的情况。实际上，皇女可以很轻松地嫁给父亲属下的将军等。这一切在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完全改变了。先皇的女儿、现皇帝的姐妹没有合适的政治婚姻对象就终身不能结婚。最适合至死不婚的职业是把一生奉献给神的修女。没有政治婚姻对象的公主最终的去处只有修道院。

霍诺丽娅也是如此，30岁还未能结婚，她也不想进修道院。恰巧就在此时，压制她内心不满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去世了。霍诺丽娅有了自作主张的条件。

公主霍诺丽娅把身边一个颇得信赖的宦官偷偷地派到阿提拉那里，让他带着书信和一看便知是属于公主所有的昂贵戒指。信中写道，如果娶她，作为嫁妆阿提拉将得到西罗马帝国领土的一半。

阿提拉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东罗马帝国皇帝换成了马利基安，他采取了强硬路线，先头部队早已接近多瑙河，只等马利基安亲率的大军一到，决战即在眼前。

阿提拉派使节去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那里，请求与皇姐霍诺丽娅结婚。瓦伦提尼安大惊失色，对姐姐处以监禁处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与身在高卢的联军总司令埃提乌斯讨论后，皇帝拒绝了阿提拉的请求。可是，阿提拉的目光已从东罗马帝国转向了西罗马帝国。匈奴士兵也开始从根据地多瑙河中游地区向莱茵河移动。

西罗马帝国就这样成了阿提拉的目标。埃提乌斯这位西罗马帝国军队事实上的统帅不得不开始把以往长期处于亲密关系的匈奴人当做敌人。

香槟会战

阿提拉仅仅恣意横行了10年便留名于古代末期的西方历史上。他胆大妄为，一旦决定便毫不犹豫。他有卓越的统率能力，而且无论属下的将军如何沉迷于奢侈生活，他个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欲望，是最适合做蛮族头领的人物。但要如他自己所说，要统合日耳曼系蛮族在北欧创建一个大帝国，他还缺乏冷静透彻的合理战略。换句话说，他走哪算哪，并无规划。我甚至认为，这样的人能够青史留名，或许是因为基督教徒恐惧他，说他是“上帝之鞭”。

阿提拉不时做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姿态来威胁东罗马帝国，从而攫取了巴尔干地区的大半地区。尽管3年后被新上台的强硬派马利基安皇

帝打得措手不及，但证明了以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巧取豪夺的战略行之有效。如果这种方法也适用于西罗马帝国，就应该首先把军队从多瑙河中游移驻到上游，在那里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领土，然后一路南下，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意大利半岛北部，迅速包围皇帝所在的拉文纳。

拉文纳并非易守难攻，城市规模很小，只要实施海陆封锁，稳扎稳打，必可攻陷。因为蛮族不擅长海陆持续封锁的持久战，所以只有对手是蛮族，拉文纳才易守难攻。

阿提拉并无必要攻陷拉文纳。如果攻击皇帝所在的拉文纳，瓦伦提尼安三世必然会命令身在高卢的埃提乌斯返回。西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埃提乌斯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充耳不闻。虽然并非得已，他也得回来救驾。

埃提乌斯在高卢不败，并不是因为他统率着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他的胜利靠的是向少年时代就亲密交往的匈奴人借兵，或是因为成功地将某个在高卢自相残杀的北方蛮族化敌为友。可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在意大利发生。

首先，匈奴人如今已成敌人而不能依靠。其次，不可能从高卢带某个蛮族来。他们正在高卢为保卫领土而针锋相对，对意大利并无兴趣，如果接受埃提乌斯的邀请去了意大利，就等于允许其他蛮族在他们不在时占领自己的领地。最终埃提乌斯只能率领自己直接指挥的士兵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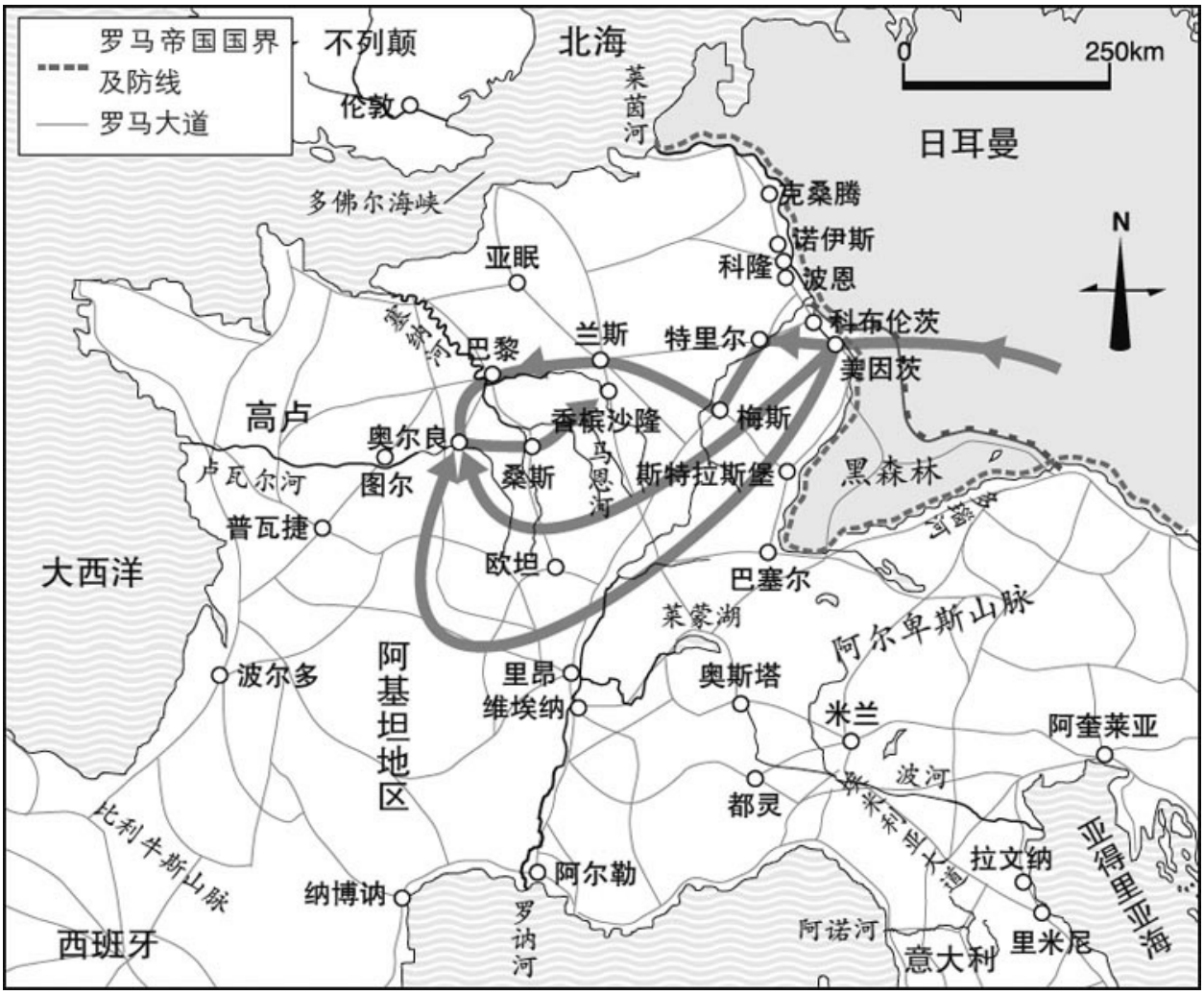
罗马军队也只是个名分，实质上不过是蛮族佣兵的乌合之众，有着佣兵固有的弱点。他们并不是在战场上会被迅速打垮，而是一见形势不利就逃之夭夭。与手下尽是这些士兵的埃提乌斯不同，阿提拉的匈奴士兵只要能抢到值钱的东西，就是挨刀劈也不会倒下。司令官个人的战术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大效力。因而，进攻拉文纳时，即使埃提乌斯回来，阿提拉也稳操胜券。况且，身在拉文纳的皇帝并没有面对不利形势坚持下去的坚强意志，惊慌之余，会轻易地把从多瑙河到意大利北部

之间的土地拱手相让。

然而，阿提拉并没有渡过多瑙河剑指意大利，而是渡过莱茵河进入了高卢。据说这起因于下面这件事，真令人无语。法兰克人族长死后，其长子和次子兄弟阋墙，兄弟二人分别向阿提拉和埃提乌斯求援。阿提拉为此去了高卢。这不仅让拉文纳的皇帝松了一口气，也使身在高卢的埃提乌斯立场变得强硬起来。

原本日耳曼系蛮族是因为遭到匈奴人驱赶才入侵高卢并在那里建立自己领地的。他们在高卢寻求定居之地，也是因为匈奴人统治了日耳曼，自己已经回不去了。他们自然会把匈奴人入侵高卢看做关系到自己存亡的危机。阿提拉入侵高卢并无确定的愿景，他居然允许埃提乌斯的罗马军队与日耳曼系的众多蛮族结成了统一战线。

公元451年4月初，阿提拉率领匈奴人从莱茵河中游的美因茨附近渡过莱茵河涌进高卢。匈奴人士兵号称有3万人，但其中有他们带去的被打败的其他蛮族，因而实际战斗人员总数不得而知。他们渡过莱茵河就与法兰克人汇合在一起，战斗人员总数也许有10万。



匈奴人入侵高卢

他们进入高卢后兵分三路，使人感到军势浩大：

第一路军由阿提拉率领从美因茨向特里尔进发，经梅斯到兰斯，再经巴黎逼近奥尔良。他们沿罗马大道一路挺进，不到两个月就迅速突入了高卢中心部位。

第二路军沿着第一路军行军路线南边的大道行进，直指奥尔良。第三路军往南绕道，插向高卢中部，然后向奥尔良迂回包抄而去。他们没有伤害高卢北部，那里是法兰克人的领地。三路军队边走边烧杀抢掠，沿途所过，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一概不能幸免。这是名副其实的“侵

略”（invasion），英语这个词语的词源是拉丁语“invāsio”。顺便说一句，拉丁文的这个词据说产生于帝国后期。这大概是因为不论是在可称为高度成长期的共和政体时代，还是在可称为稳定发展期的元首制时代，罗马人都不需要靠这个词生存。

埃提乌斯是一位生活在“侵略”已是家常便饭的时代的罗马人。他这时在高卢南部的阿尔勒，那里是他的根据地。他得知阿提拉入侵高卢后，便马上向西哥特人的族长提出共同作战的请求。西哥特人正在西邻法国南部的阿奎塔尼亚地区（现在的阿基坦）不断扩张势力，这里尚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年迈的西哥特人族长狄奥多里克送来了同意的答复。埃提乌斯同时还请求其他日耳曼系蛮族也一同参战。公元451年6月，埃提乌斯实现了这个反阿提拉联军的构想。

反阿提拉联军从南面和西面奔赴阿提拉正在进攻的奥尔良。蛮族并不擅长必须打持久战的城市攻坚。在罗马时代，奥尔良被称为凯纳布姆（Cenabum），是高卢中部的重镇，地处卢瓦尔河沿岸，围有坚固的城墙。我们不清楚阿提拉为什么会瞄上进攻起来明显棘手的奥尔良。阿提拉包围奥尔良果然久攻不下，这给了埃提乌斯准备反击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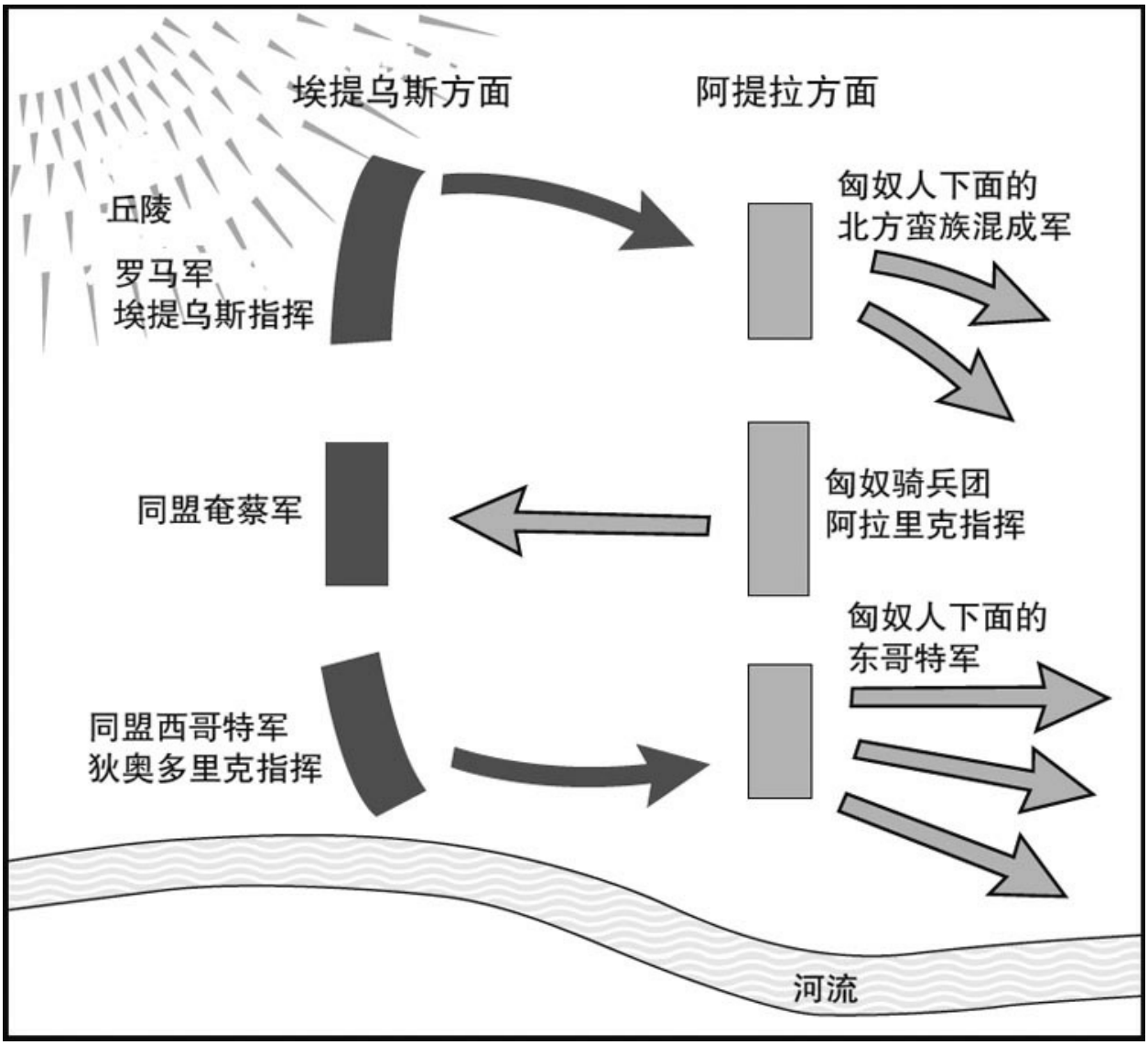
阿提拉在得知埃提乌斯已经逼近，决定解除对奥尔良的围攻后撤退。为何会考虑撤退也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阿提拉似乎打算再次渡过莱茵河回日耳曼去。但这样在半道上就会被埃提乌斯追上。我们知道他们从奥尔良到了桑斯。之后他们大概想走两个月前来时的路回到兰斯、特里尔，然后在美因茨渡过莱茵河。可是，他们在到达兰斯之前就被埃提乌斯追上。

这一带在罗马时代被称为“坎帕尼亚”（Compania），后世称为“香槟”（Champagne），是沿马恩河两岸展开的平原地带，位于罗马时代汇集了7条大道的大都市兰斯以南40公里左右的地方。

阿提拉被追上后在这里掉转方向，准备会战。他相信自己的骑兵天

下无敌，只要以平原为战场，就能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斗力。

公元451年6月24日，是阿提拉与埃提乌斯以香槟平原为舞台展开会战的日子。这场会战在历史上留下了“卡塔洛尼平原（Campi Catalaunici）会战”之名。“卡塔洛尼”是高卢未被罗马化之前居住在这一带的凯尔特民族中一个部落的名字，用这个名字命名的“卡塔洛尼”城就是现在的香槟沙隆。所以，后世也把这次会战称为“沙隆会战”。



卡塔洛尼会战

埃提乌斯大概想降低匈奴人骑兵的速攻力，在山丘和河流之间的地带布下阵势。

老狄奥多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布在可以眺望到河流的右翼，中军集中了其他蛮族兵，埃提乌斯亲自率领的左翼则在山脚下布阵。全军呈弓形阵势。

阿提拉的军队左中右翼成直线排列，左翼的是东哥特人，他们可以望见河流。与埃提乌斯对阵的右翼是与东哥特人一样投靠阿提拉的蛮族兵。中军是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骑兵团。

从这个阵形可以看出，埃提乌斯的战术是即使中军被压制，僵持时左翼和右翼可以击退敌人的左右两翼，孤立中军的骑兵团。

而阿提拉的战法是用最具攻击力的骑兵击破罗马方面的中军，把敌人一分为二，再由自己军队的左翼和右翼分别收拾。但是，这个战术要想成功，阿提拉的左翼和右翼必须敢打敢拼，骑兵的猛攻也必须压制住埃提乌斯的中军。

只看布阵，那简直就是共和政体时代罗马军队战术的翻版，使人觉得这场会战打得宛如图上画的那样合理完美。然而，两军都为布阵耗费了太多工夫，时间流逝，战斗直到下午3点才终于打响。这哪里是什么玩弄战略战术的会战，简直就是一场比拼力气的混战。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战术都未能奏效。

担任罗马军队右翼的西哥特人英勇善战，敢打敢拼，甚至拼到老族长狄奥多里克战死沙场。埃提乌斯指挥的左翼也把山丘围得铁桶一般，从敌人侧翼发起进攻，消灭了敌人的右翼。可是，埃提乌斯的中军没有经得住匈奴骑兵团的猛攻。很明显，阿提拉方面也只有配置在中军的骑兵团打得如愿，左右两翼都已彻底崩溃。

战斗变成了混战，变成了白刃战。两军都未能按自己的战术作战，最终成为一场伤亡惊人的会战。太阳落山时分，阿提拉分割罗马军队的意图失败，他完全被压制住了。阿提拉回到自己阵地时神情沮丧，脱口说出干脆一把火烧掉阵地，跳进火里死了算了的话来。

想起来，如此令人畏惧的匈奴人也在正规战斗打响的瞬间败北，直让人觉得蛮族只是在袭击手无寸铁的民间百姓时才能逞强。

如果埃提乌斯愿意，让“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在这场会战中化做香槟平原上的露水无影无踪。西哥特人因老族长战死反倒燃起了战斗意志，老族长狄奥多里克之子托里斯蒙扬言，要马上攻进敌人阵地，不待明日。

埃提乌斯阻止了他，他劝这位西哥特年轻人说，要先回领地，重整老族长死后的西哥特人。战死的老狄奥多里克有4个儿子，托里斯蒙是其中之一。他担心父亲死后会有哪个兄弟出来独领全族，便听从了埃提乌斯的忠告，带着西哥特的士兵回阿基坦去了。他们走后，埃提乌斯光靠自己手下的士兵便无力追击阿提拉。

一度想自杀的阿提拉就这样安然渡过莱茵河，回到了日耳曼，看上去像是埃提乌斯救了他。

为什么要放走阿提拉？当时就有许多人抱有疑问，是不愿意毁灭从少年时代起就亲密以待的匈奴人，还是怕消灭了匈奴人，西哥特人在高卢的力量过强？

没有人知道这时埃提乌斯的内心想法。但阿提拉和匈奴人受到重创、逃脱覆灭则是事实。令人恐惧的阿提拉在正规战斗打响时即告败北，入侵高卢不足3月就再次渡过莱茵河，逃往东方。一般想来，不可一世的阿提拉会老实一阵了。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第二年他们就又来进犯意大利了。上次入侵高卢的理由是应法兰克人请求，而此次来犯的理

由是为了与公主霍诺丽娅结婚。既然送来了戒指，那就是婚约，他要求实现这个约定——结婚。

要从多瑙河中游地区进军意大利，最妥当的路线是从自西向东环抱北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最东端进入。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就从这条路线进入了意大利。他们首先进攻了像绊脚石一样挡在路上的阿奎莱亚。但是，和其他蛮族一样毫不例外，匈奴人也不善于打攻城战。香槟平原的会战结果也传到了意大利。从现在残留的遗迹根本无法想象，罗马时代的阿奎莱亚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意大利东北部首屈一指的海港城市。这里有防御力量常驻，居民的自我防御意识强烈。这已够阿提拉为难了。比攻占阿奎莱亚更优先的是如何保障数万士兵的粮食和满足他们掠夺的欲望。

阿提拉只分出部分兵力参加阿奎莱亚的攻防战，而把剩下的大半兵力放出去掠夺整个意大利北部。匈奴人在意大利北部充分表现出了他们恣睢暴戾、狂暴无度的特点。康科迪亚陷落了，帕多瓦、维琴察，继而是维罗纳、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维亚、米兰……惨剧上演了，可以说所有城市都被匈奴人的马蹄蹂躏，无一幸免。

每座城市都有高高的城墙围绕，但还是一个个地陷入敌手。其原因是居民没有选择抵抗，而是开门揖敌。帝国末期的罗马人，已经不再指望只要顽强抵抗，皇帝的部队就会马上赶来救援。

威尼斯诞生

阿提拉向身在拉文纳的皇帝要求实现与公主霍诺丽娅的婚约，但未向拉文纳派兵。这也许是优先采用了他的惯用伎俩，首先让意大利北部全境陷入恐怖之中。但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人们认为这正是上帝挥来的无情之鞭，直接导致了后来中世纪时代以海洋通商国家闻名于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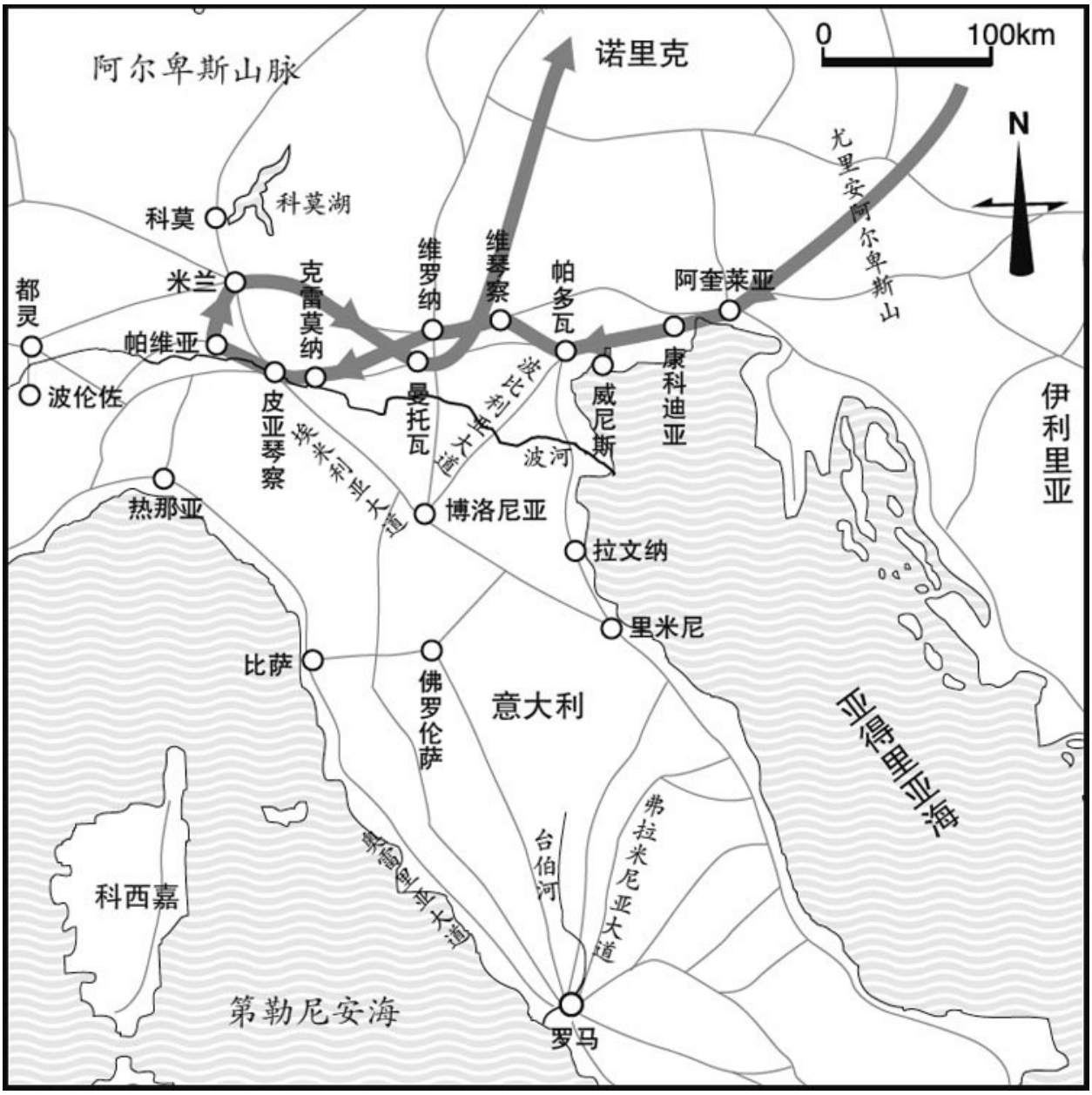
威尼斯共和国的诞生。在25年前出版的《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中，我这样起笔道：

> ……
>
> 阿提拉要打过来啦！
>
> 匈奴人要冲过来啦！
>
> 阿奎莱亚遭到火攻。
>
> 听说连女人孩子也全都被杀光！

蛮族可怕，抵抗与否统统被杀，献出财宝也不能幸免。匈奴人扫荡之后，寸草不留，满目疮痍。消息如旋风般传播开去。

这已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这是蛮族反复入侵、人们已坠入恐怖深渊的时代。阿提拉的匈奴人暴戾无比，较之其他任何蛮族都更加令人恐怖。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地区的人们，听说他们的主教教堂所在地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匈奴人袭击，大为惊慌。

“逃到哪里去呢？”



匈奴人入侵意大利

没有一个人想逃往山区。这一带是由多条流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如果要逃到对面很远的山里，恐怕还没跑到就会被追杀。这谁都看得见。那么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南下，逃到帕多瓦，或者更南面的拉文纳行不行呢？

可是，说这话的人马上就把话咽了回去。蛮族一定是冲着拉文纳或

者罗马去的。在他们行进路线的前方想逃脱是不可能的。被人请示的牧师也说不出任何话来。牧师仰天举起双手，与其说是在向神祷告，不如说是在诉说无可奈何的绝望。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登上塔去，从那里看大海！你们的所见之处，便是你们今后的家园！”

人们登上教堂的钟楼，从上面可以看到正好在退朝时现出的一片片沼泽地带。潮浸的土地上长满了繁茂的芦苇，却不见树木的影子。

神有启示啦。不论穷富，不论男女老幼，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移去。其他地方的人都带着财物和家具逃难，而这些人却得带去建造住屋用的木材。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之外一无所有，但至少命保住了。

上面所说的其实是威尼斯早期编年史中的所谓传说。实际上神大概什么都没说。不过，传说也许对研究历史科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取的价值，但想象当时民众的心情，对那些希望在身边感受到神的人来说，却是不能轻易无视的史料。

现代的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定有许多外国人也认为可以在那里落户。但是，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古代，那些拥有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的子民不得不迁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对他们而言，即使是为了躲避匈奴人的暴行，也需要非常之决心。如果不用神的启示这种想法让自己心悦诚服，大概是无法决然行事的。只有在种种不适合人居条件的土地上，他们才能保全性命。

根据编年史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之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

从公元452年春天一直到秋天，整整半年时间，阿提拉的匈奴人在意大利北部极尽暴虐。这期间，埃提乌斯一直在高卢南部，没有任何行动。他是无法行动。高卢的蛮族对去意大利没有兴趣。结果，他并未能“以毒攻毒”，只是证实了他玩“毒”于股掌之间的巧妙技能。

罗马行动了。由两位元老院议员和罗马主教利奥三人组成了一个交涉团，去见身在曼托瓦的阿提拉。所谓交涉，实际上就是请求“付钱给你，请你回去”。交涉的中心也只是所付钱款的金额。大概是因为交涉太不体面而未留下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妥协金额为何。于是阿提拉按照承诺，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多瑙河对岸去了。

按我的想象，阿提拉这次轻易同意，可能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他需要一大笔钱来满足部下；第二，他自己也已在肉体上疲惫不堪；第三，他在精神上也已厌倦。阿提拉已经完全丧失了坚持下去的意志。

这时一个传说流传起来。这与其说是民间传承下来的传说，不如说是基督教教会一开始就有意散布的宣传。传说主教利奥得到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神助，鼓起勇气，当面谴责阿提拉的暴虐，说教此后超脱和慈悲的重要。阿提拉被利奥的热情雄辩说服，离开了意大利。这个故事中没有一字提到付钱之事，只是强烈而深刻的信仰把基督教社会从蛮族的暴虐中拯救出来。西方天主教势力的两大领袖之一迦太基主教现已不复存在，罗马的基督教教会需要强调幸存的罗马主教。从这时起，罗马主教开始被称为罗马教皇，成为全体西方基督教徒的支柱。

顺便一提，至今仍能在罗马梵蒂冈名为“拉斐尔画室”（Stanze di Raffaello）的一室中看到拉斐尔的壁画,描绘着教皇利奥一世说服阿提拉的情景。

半年以来使北意大利全境陷入恐怖深渊的阿提拉和匈奴人终于撤退而去。公元452年是以阿提拉的袭击开始，又以阿提拉的退去结束的一年。这一年，33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蛰伏于拉文纳，而罗马帝国军队实际的最高负责人埃提乌斯也未曾离开法国南部一步。居住于意大利半岛的人们看此二人的目光自然逐渐冷淡下去。

公元453年，阿提拉的死讯与春天一起到来。听说这位匈奴人的王者——不仅他自称为王，其他蛮族的族长也都开始纷纷称王（rēx）——在一次宴会上突然大量吐血而亡。葬礼非常壮观，归入匈奴人旗下的日耳曼系蛮族的族长们都参加了葬礼。埋葬也按照匈奴人的传统方式进行，挖掘墓穴的奴隶随后立即被全部杀掉。

接班人之争旋即开始，匈奴人四分五裂。以前因抗不住阿提拉不得已接受其统治的其他蛮族见状纷纷借机离去。匈奴人将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辽阔地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逞强一时，这时也随着阿提拉之死灰飞烟灭。回想起来，匈奴人称雄尚不满10年。

教皇（左边头戴三重冠骑马者）说服阿提拉从罗马撤兵（拉斐尔画）

不只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因阿提拉的死讯而欢欣鼓舞，这对正在高卢建立自己领地的其他蛮族也是喜报。阿提拉死后，在高卢全境以及与高卢只有比利牛斯山脉一山之隔的西班牙，北方蛮族各部族的势力更加发展。对他们而言，除去匈奴人的威胁，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可怕的了。罗马帝国已经不值得害怕了。

自毁

第二年，即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大概认为因阿提拉之死和匈奴人的消散已天下太平，便访问了首都罗马。这时，埃提乌斯也从高卢南部赶来，他有求于皇帝。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西罗马帝国的联军总司令，在皇宫的一个厅里见面了。这座皇宫建在帕拉蒂尼山上，是元首制时代皇帝们的办公场所和住宅。那天也跟往常一样，皇帝有宫廷官僚跟随左右，而埃提乌斯只带了随从。与皇帝进行的是私人会晤，埃提乌斯并未身着戎装，而是一身托加打扮，连短剑都未佩带。皇帝因为地位关系佩带了一把剑，但那只是一把一次都不曾使用过的装饰着宝石的剑。

皇帝一定认为，联军总司令此次前来是为两年前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恣意施暴时自己置之不顾之罪祈求饶恕的。在那半年里，皇帝自己也躲在拉文纳，大气都不敢出。在不履行职责这一点上，皇帝与总司令同罪。在阿提拉于意大利北部极尽暴虐的半年里，更强烈地感受到恐怖的人，不是身在阿尔卑斯山脉彼侧法国南部的埃提乌斯，而是身处北意大利拉文纳的瓦伦提尼安。后世史学家吉本称他为“肉体成熟而头脑不成熟”的皇帝。尽管他完全没有尽到皇帝的职责，但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是皇帝，埃提乌斯只是臣下。所谓“神意”就是这样，让接受了它的人比

其他任何人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为“神意”所钟，绝不等同于自己任命的臣子。所以，臣下不仅要向神祈求饶恕自己的罪过，还要向受了“神意”的皇帝祈求饶恕。这样说也有它的道理。

可是，60岁的埃提乌斯并没有这么做。也许埃提乌斯认为，当时就已经解释清楚了，根本没有考虑组建一支军队派往意大利，自己已经尽到了职责。于是，他并没有谢罪，而是请求皇帝把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

正因为胆小，反倒容易翻脸。神经总是紧张，只要稍加外力，极易绷断。而4年前才去世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曾长年向瓦伦提尼安灌输对埃提乌斯的仇恨。这时，皇帝下意识地从腰间拔出了短剑，发出异样的叫声扑向埃提乌斯。虽说是装饰用剑，剑锋仍很锋利。剑深深刺入身着托加的埃提乌斯的胸部，鲜血很快浸湿了雪白的托加。埃提乌斯一句话也没能说出就瘫倒下去。

是皇帝个人的想法引发了惨剧，还是哪个宦官设下的阴谋，当时众说纷纭。无论如何，22年中基本阻止了蛮族入侵的埃提乌斯被刺身亡。

翌日，皇帝来到元老院，说明这次杀人是为了匡扶正义不得已而为之。一位元老院议员听后对瓦伦提尼安说道：

陛下，我不知道陛下的想法。但连我都懂得，您这是用左手砍下了右手。

新年来到，公元455年3月16日，正在圣乔万尼大教堂前广场上

瓦伦提尼安三世

检阅军队的瓦伦提尼安皇帝，被突然离开队列冲过来的两名士兵刺杀。这两个人是蛮族出身的士兵，长年在半年前被杀的埃提乌斯手下从军。

公元408年，斯提利科被霍诺里乌斯皇帝处以死刑，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导致了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皇帝亲手杀害了埃提乌斯，又导致了公元455年6月汪达尔人发动的又一次“罗马浩劫”。蛮族似乎比罗马人更了解西罗马帝国失去得力左右臂的意义。

瓦伦提尼安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下一任皇帝的人选便任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以多数赞成选出了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他是一位元老院议员，出身于贵族阶层，属于号称罗马首富的艾妮希亚家族。年龄适中，不年轻也不太老，看上去是完美的罗马精英。他曾有两度担任执政官、三度担任首都长官的公职经历，尽管每一次的任期都是一年。他行事认真，便携式计时用滴漏不离手，以确定时间，开展工作，让人联想起五贤帝之一的安敦尼·庇护。如果是在罗马帝国运行良好的时代，他一定能够作为一个好皇帝而终其一生。可是，5世纪后半叶已然不是2世纪后半叶了。

罗马时代的西班牙（现在的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现在的摩洛哥）之间，仅仅隔着一道罗马时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相距14公里，只要有船就是一步之遥。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败给罗马，放弃了因战败而被罗马接收的西西里，把西班牙变为自己的领土，并建设了一座城市（现在的卡塔赫纳）作为中心，取名为“迦太基·诺瓦”（新迦太基）。在后来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历经苦战才最终战胜名将汉尼拔，得到了整个西班牙。于是，罗马把目光投向北非。这是地缘政治学的当然归结。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终于灭了迦太基，使古代人的梦想成真，让古希腊神话英雄赫

丘利的左脚踏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右脚踏在了北非。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

在古代人的头脑中，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是连为一体的。乍一听到后人所起的名字“直布罗陀海峡”，就给人一种强烈的两地隔离的印象，而且现今两岸的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仍在对峙。不过，在那尚未有这种对立关系的时代，人们航行在地中海上，头脑中会驰骋着这样的想象，左脚立在南欧、右脚立在北非的赫丘利正在保佑着他们。

生于古代终结之时的日耳曼系蛮族继承了古代地中海人的这种感觉。当初他们从生养自己的面临北海的日耳曼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时候，日耳曼与高卢的差别令人印象深刻。可是，自从南下高卢、西班牙，渡过“赫丘利之柱”，直到登陆北非，他们一定再也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了。两根“赫丘利之柱”中的任何一根都属于罗马世界这一共同的文明圈。

汪达尔人渡来北非是公元429年春天的事情。到了第二年，即公元430年的夏天，希波·雷吉乌什陷落，汪达尔人再有一口气就能直逼迦太基了。可是，蛮族不擅打包围城市的攻坚战。结果，汪达尔人在现在的摩洛哥到利比亚一带称霸10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拿下这里的最大城市迦太基。

这10年给北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罗马的色彩在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非被一扫而光。首先，以农庄主为主体形成的“罗马时代的北非”的上层都逃难去往西西里和意大利了。正因为农庄过去有机高效的经营，北非才得以成为罗马帝国的粮仓。现在，尽管耕地和气候与以前相同，即

自然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北非也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出口农作物的农业地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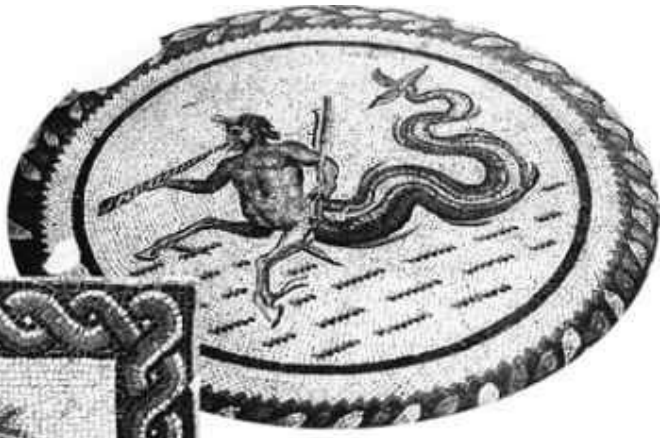
剧场（大莱普提斯，现利比亚）

北非遗迹

朱庇特神殿（斯贝特拉，现突尼斯）

圆形竞技场（艾尔迪约姆，现突尼斯）

北非出土的罗马鼎盛时期的镶嵌画



吹角笛的海神特里同

狩鹿的女神戴安娜

诗人维吉尔与两位缪斯

从船上卸货的人们

第二是天主教派基督教的衰退。汪达尔人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在排斥北非天主教方面，同为异端的多纳图派基督教徒更加热心。作为异端，他们长年遭受天主教迫害，心怀仇恨。

但是，北非天主教会的衰退不仅仅是宗教界的问题，与这里知识分子的衰退也有关系。一直影响到后代的基督教天主派论客几乎都出身于北非，更不用说《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卷末介绍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和本卷介绍的希波·雷吉乌什主教奥古斯丁了。这些高级神职人员中的许多人在被汪达尔人抓住之前就逃到意大利去了。这也导致了北非知识分子阶层的衰退。地中海对岸传来的声音，又一次影响不到欧洲的天主教徒了。丧失了拥有经济实力的人和拥有智慧的人，是北非没有发生罗马人反对新统治者汪达尔人的抵抗运动的真正原因。

社会的上层人士可以逃走，但没有避难地的中下层人群无从逃跑。他们要么放弃天主教，要么作为隐蔽的天主教徒活下去。他们中间不能忽视的是造船的匠人们。

这里一天到晚面对大海。迦太基曾经是西地中海第一号的海运国家。到了后来的罗马时代，又一直受到罗马的奖励，北非居民的造船技术也就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这使得刚脱离森林、不知利用大海的汪达尔人开始亲近大海。和渡过北海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一样，汪达尔人也了解乘船出海的作用了，尽管航行操纵要交给其统治之下的迦太基系罗马人船员。

出海也有两种方式：从事渔业或贸易，或者选择海盗业。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前者，而汪达尔人却选择了后者。他们渡过莱茵河之后在高卢、西班牙一直过着袭扰掠夺的生活，登陆北非后仍旧掠夺原住民。也许出海并不能改变他们袭扰掠夺的生活习惯。

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刚刚因为阿提拉之死摆脱了北方匈奴人的威胁，马上又受到南来的汪达尔人的威胁。海盗不仅袭击在海上遇到的船只，抢人掠货，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海盗的主要工作是乘船沿海岸或溯河而上，袭击城镇村庄，杀人越货。袭击动态中的目标不如打击不动的目标更有效率。他们与山贼和盗贼的区别只是在于来自陆地还是来自大海，在袭击破坏、杀人越货方面毫无二致。

丧失制海权就是没有海军力量来压制海上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行为，就意味着只能处于坐视的状态。听到制海权，往往会以为这仅限于军事方面。然而，失去制海权后最先受害且受害最深的通常都是一般人群。丧失制海权表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地中海也已完全成为陈迹。

然而，汪达尔人如果没有一位能力很强且长期掌权的领袖，他们就不会在登陆北非后25年、统治北非全境后15年这样短的时间里，使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如此程度，也许已经像其他蛮族一样难免内讧，四分五裂，最终被北非的罗马社会所吸收。

汪达尔人的族长根西里克是一位有能力、很强势，而且长寿的领袖。光是动员10万之众放弃西班牙并把他们带到北非，就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领袖。在北非登陆后，他通过反对北非罗马势力，把多纳图派基督教徒、非基督教徒的摩尔人、甚至未被罗马同化的沙漠游牧民柏柏尔人都成功地召到了自己的麾下，与之共同战斗。而且他还成功地大体抑制了多纳图派的疯狂信仰、摩尔人独立擅行的倾向和柏柏尔人的狂暴个性。说“大体抑制”，是因为完全抑制这些情况对汪达尔人垄断统治权并非有利。

他还致力于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这完全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是为了避免不遗余力排斥阿里乌斯派的东罗马帝国派兵打到北非来。北非自汪达尔人入侵以来已逐渐变成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国家。不过根西里克未能成功地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缺

乏外交技能，而是东罗马帝国对北非动向的兴趣现已大为淡薄。

汪达尔人的王者根西里克虽然强势，却也是一个无道之人。汪达尔人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去了北非之后，西哥特人便在伊比利亚半岛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虽然只是一海之隔，身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对直布罗陀海峡彼岸的北非并不感兴趣，这点对正在北非建立势力的根西里克极其重要。

根西里克请求西哥特人国王把女儿嫁给自己的一个儿子为妻。这样，汪达尔与西哥特两族便结成了姻亲关系。然而，自从与先王关系极差的人成为西哥特人国王以来，这种关系却变得十分不利。于是，根西里克把儿媳妇退回了娘家。在送回时还不是单纯的遣返，而是事前把她的鼻子割掉才送走。结果，西哥特与汪达尔两族之间的关系更胜从前。这个时期，西哥特人正与苏维汇、奄蔡等蛮族抗争，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权。这样，才未发生直布罗陀海峡被大量运送蛮族的船只所挤满的情况。

第二次“罗马浩劫”

到了公元455年，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并未突如其来地出现在罗马城下。对从北非要地迦太基出港的船只而言，最近的陆地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当然还有其他小岛。但不管是潘泰莱里亚、马耳他，还是兰佩杜萨，都不过只要一天便能抢完。与这些小岛相比，西西里和撒丁才是地中海数一数二的大岛,不愧岛的称呼。汪达尔人的海盗就专门祸害这两座岛，但也没能入侵到岛的深处。汪达尔人已经把北非置于统治之下，没有更多的领土欲望，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入侵到岛的内部。在地中海世界里，财富都集中在临海城市。军事力量有限的海盗集团，通常只打那些袭击效率高的地方。

因此，汪达尔人一直挨家挨户地袭击西西里和撒丁的临海城市和村镇。然而不久以后，海盗们扩大“战场”的意识高涨起来。罗马，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从居住在西西里的人们那里传来的情报显示了汪达尔人的这个动向。居住在罗马的人们，尤其是在西西里拥有农庄的元老院议员们不会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人总有一种倾向，只愿意看自己希望看到的事物。这个时期罗马人的眼睛只看着阿提拉和匈奴人。看北面的时间长了，视线都不愿往南面转一下。这种情况使得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在奥斯提亚登陆，形成了对罗马人的突然袭击。印在罗马人脑海里的蛮族，是策马驰骋从陆上袭来的野蛮人，他们不会乘船渡海而来。

三年前阿提拉亡故，两年前匈奴人灰飞烟灭。西罗马帝国方面，一年前皇帝亲手杀死了“右臂”埃提乌斯。到了今年，皇帝也被埃提乌斯的两个旧部刺杀，马克西穆斯继位才两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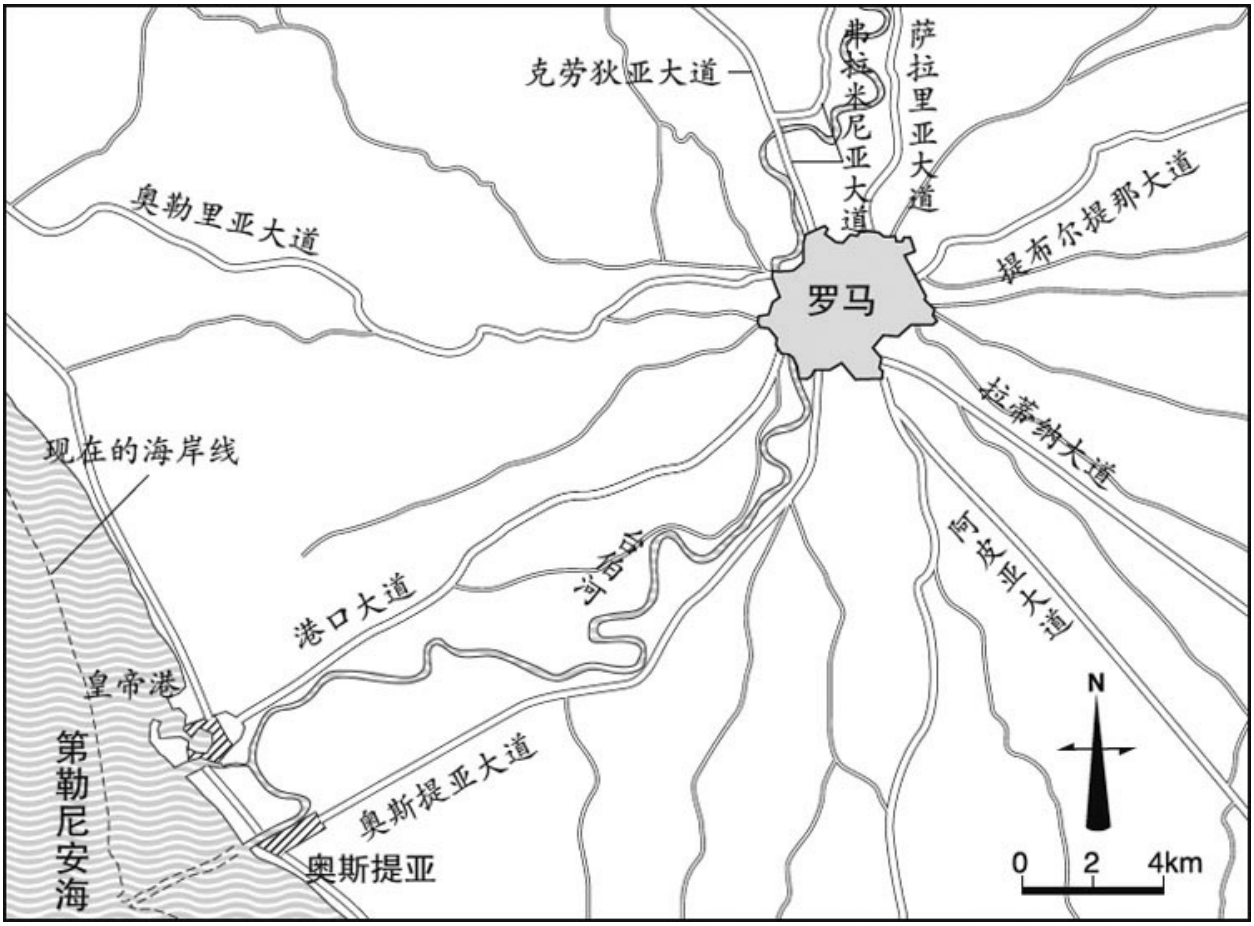
根西里克肯定对这些了如指掌，尤其了解西罗马帝国失去了“右臂”。把蛮族摆布于股掌之间的埃提乌斯在高卢活动的时间长达20年，不仅会匈奴人的语言，也懂其他蛮族的语言，在蛮族中赫赫有名。总之，公元455年由汪达尔人发动的“罗马浩劫”，并不是偶然因素积累造成的不幸。

有段时期，我对把“浩劫”这个词用于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发动的“罗马浩劫”是否恰当感到疑惑。词典里对“浩劫”的解释是，威胁掠夺、并不惜杀戮的行为。于是我想，被袭击的一方大概是作了抵抗的。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时，将罗马包围了三次。所以，罗马是作了抵抗的。而公元455年根西里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发动“罗马浩劫”时，罗马未作任何抵抗。可是人员物资照样被抢，杀戮也照样发生，尽管情况没有上次浩劫那么厉害。从离罗马市内20公里的外港奥斯提亚登陆，溯台伯河而上进入罗马，或者经由奥斯提亚大

道（Via Ostiensis）和港口大道（Via Portuensis）逼近罗马都很容易。即使看不见敌兵的影子，这种威胁也是存在的。

公元455年5月，根西里克在奥斯提亚登陆，立即占领了这座港口城市。但他并不着急。他把乘来的许多船停泊在皇帝港（Portus Augustii）里以免遭风暴。这个港口因克劳狄乌斯皇帝建设、图拉真皇帝扩建而得此名。根西里克带来的士兵以汪达尔人为核心，顶多也只有1万人。尽管第一次“罗马浩劫”以来人口外迁加剧，罗马市内的人口少说也有20万之众。可是他们知道蛮族在奥斯提亚登陆后大为惊恐，纷纷准备外逃。



从罗马到奥斯提亚

两个月前当上皇帝的马克西穆斯企图让动摇的人们镇定下来。可

是，民众也清楚，没有军事力量的皇帝起不到任何作用。马克西穆斯徒劳了一个月之后，被过于恐惧而激愤的民众所杀，在位尚不足三个月。此后皇位虚空达两个月之久。蛮族只是在外港登陆，罗马市内便激烈动荡，甚至无法考虑谁来继位。这何止是没有危机管理，指挥系统也都完全瘫痪了。

这时仍在行动的是罗马的主教利奥，他已被称为罗马教皇了。在天主教徒的传说中，利奥于3年前的公元452年前往阿提拉的营地，让无信仰的蛮族阿提拉放弃了进一步侵略意大利的意图。这位利奥教皇在公元455年的这个时候，又前往奥斯提亚去见根西里克了。于是，罗马教皇利奥与蛮族族长根西里克之间就如何进行“罗马浩劫”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不把基督教教堂及其相关设施作为掠夺对象。

二、不杀不抵抗者。

三、不拷打俘虏。

公元455年6月15日到29日的两星期内，“世界之都”罗马实际上遭到了有系统的掠夺。溯台伯河而来的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靠上码头，装满预先运来集中于此的各种物品之后，成行成队地回到皇帝港。在那里，再把货物从内河船倒到海船上。汪达尔士兵甚至没有必要监视市民。主教传达了神意，主教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市民们都是基督教徒，他们遵从利奥教皇的命令。

装上船的不仅仅是金币和珠宝首饰。青铜像自不必说，就连镂空雕刻的铜制桥栏杆、大门、门扇，也都统统被卸下运走。矗立在卡匹托尔山上的主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也被拆下装船运走。

这些拆、卸、运、装的工作都是罗马市民自己做的。汪达尔人士兵只是在罗马市内转悠，时不时闯进房屋，喝三吆四，发号施令。

就这样，罗马被劫夺一空，但很少有人被杀。而不幸被杀的，不是想阻止掳走儿女的人，就是被误认为抵抗的人。与公元410年阿提拉率领西哥特人发动“罗马浩劫”时5天里牺牲的人数相比，在公元454年根西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发动的长达14天的“罗马浩劫”中牺牲的人数则少得惊人。

教皇利奥通过献出与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罗马，包括个人的住宅和集体公寓，拯救了居民的生命。但他没能阻止住汪达尔人对地位高的人或有钱人的绑架，这些人被认为能换取赎金而被拉上了船。教皇为了神职人员和修女不被带走已经精疲力竭。汪达尔人尽管属于阿里乌斯派基督徒，与天主教徒是宿敌关系，但没有对天主教堂动手，遵守了与利奥教皇的约定。

以索要赎金为目的被带走的人中，还有先皇瓦伦提尼安的妃子和两个女儿。根西里克让两个公主中的一个与自己的儿子乌内里克结了婚。罗马帝国的公主与蛮族的族长或其儿子结婚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是一个大新闻，甚至惊动了地中海的东岸。与之相比，公元455年的“罗马浩劫”甚至连新闻都不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中，竟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强烈打击，留下文字，哀悯“永恒之都”罗马的命运。难道因为这是第二次“浩劫”吗？因为这次是掠夺与被掠夺双方合作完成的“浩劫”吗？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被掀掉顶瓦的朱庇特神殿在半个世纪以前便已经空空如也了。

最后20年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经常更迭，就像一个病痛难忍在床上不断翻身的病人。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仍能继续存在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尽在下面的表中。不是东罗马帝国没有问题，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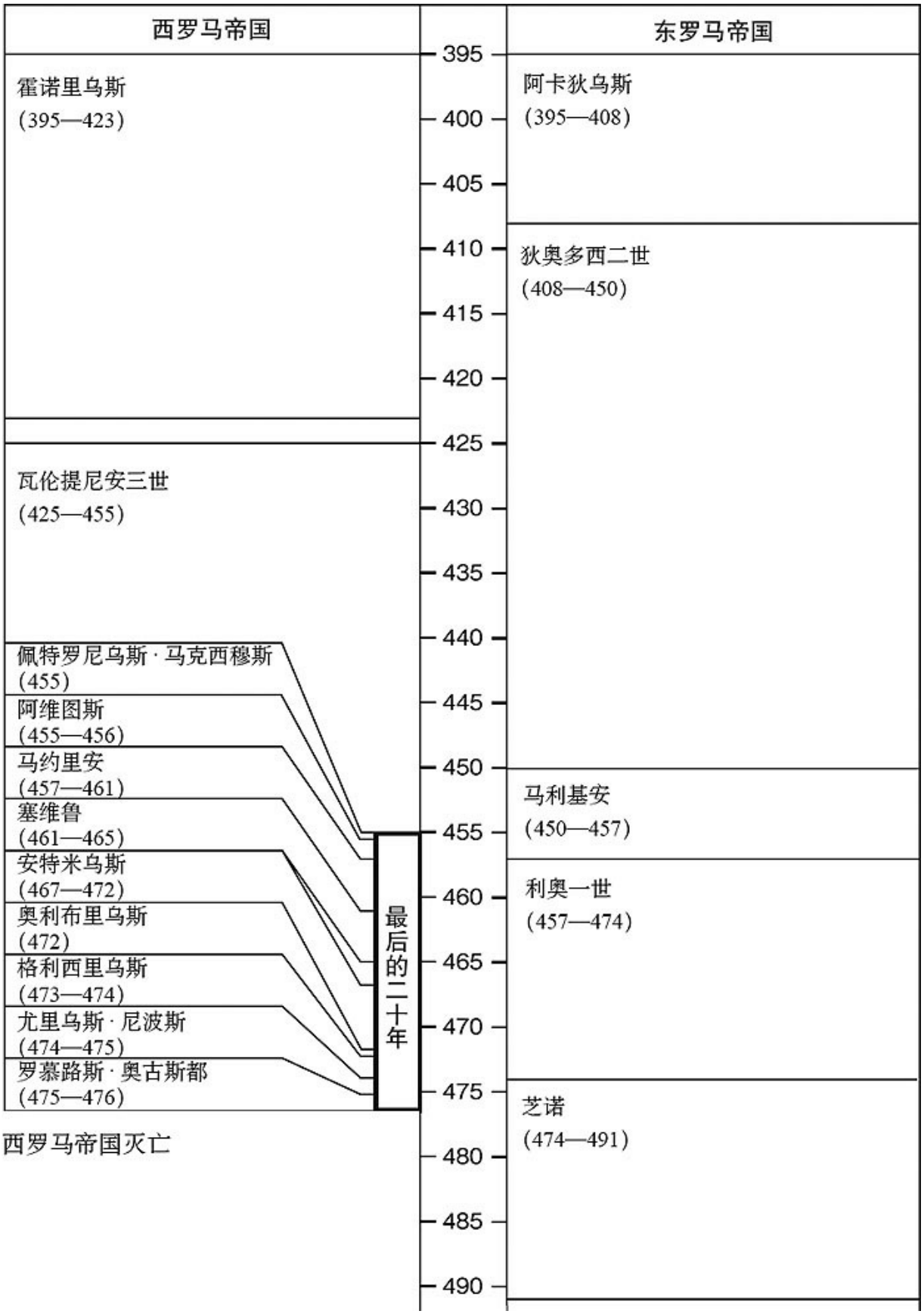
与西部一样多，但处理问题的人能够冷静对待，这点益处颇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局稳定。在现代，保障在选举中选出的总统和总理有5年到7年的任期，大约就是为了这一点。

掠夺来的财物多得把船都压得东倒西歪。汪达尔人带着这些财物回到了北非。一个月后，下任皇帝终于确定。他是一个罗马时代称为“高卢系罗马人”的人，出身于高卢，在埃提乌斯手下积累了从军的资历。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在奥弗涅地区拥有广阔的农庄，说起来是行省高卢的实力派人物。

如今的高卢事实上已经处在蛮族的统治之下。在高卢，可以根据蛮族如何对待逐渐握有统治权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即罗马帝国的既有阶级，将其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把上层人士也和社会中下层一样当做被征服者对待，就像北非汪达尔人那样。第二种则是把那些既有阶级当成合作者，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予以保留。当时的高卢，法兰克人正在北部逐步确立势力；西哥特人正在西部努力打拼，同时入侵西班牙。两个蛮族相互争霸。西哥特人属于第二种情况。为建立针对阿提拉匈奴人的共同战线，阿维图斯也曾在西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自己的上司埃提乌斯与西哥特人族长狄奥多里克之间积极活动。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一览表


西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395
400
405
410
415
420
425
430
435
440
445
450
455
460
465
470
475
480
485
490
霍诺里乌斯
(395—423)
阿卡狄乌斯
(395—408)
狄奥多西二世
(408—450)
瓦伦提尼安三世
(425—455)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
(455)
阿维图斯
(455—456)
马约里安
(457—461)
塞维鲁
(461—465)
安特米乌斯
(467—472)
奥利布里乌斯
(472)
格利西里乌斯
(473—474)
尤里乌斯·尼波斯
(474—475)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475—476)
最后的二十年
马利基安
(450—457)
利奥一世
(457—474)
芝诺
(474—491)

西罗马帝国灭亡

当地实力派人物是逃出还是留在蛮族统治之下的地方，体现了第一种做法和第二种做法之间的区别。汪达尔人征服后的北非有很多上层难民，而在西哥特人统治的高卢西部却看不到同样的现象。

阿维图斯

阿维图斯在公元455年“罗马浩劫”后当上了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高卢被拥立为皇帝的，并且不是由罗马军队士兵，而是西哥特人的国王推举为皇帝的。所以，阿维图斯皇帝在即位后过了半年多的第二年——公元456年才进入意大利。

皇帝一旦成为绝对专制的君王，在他的官邸、公邸，即皇宫工作的名为宫廷人员的官僚阶层便拥有了权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欢迎在高卢由蛮族推举当上皇帝的阿维图斯。阿维图斯到达意大利时，悲惨的结局也就到来了。起初他只是被强迫退位，最终却被杀死。蛮族推荐的皇帝就这样被除掉了。

拉文纳的宫廷官员们推选的下一任皇帝是位名叫马约里安的蛮族出身的军人。他也曾有过在埃提乌斯手下从军的经历。与阿维图斯不同的是，他是纯粹的军人，而且出身蛮族，宫廷官僚可能以为他容易操纵。可是，这位新皇帝刚一即位就表现出了主动积极的性格。这可违背了宫廷官僚的初衷。宫中的官僚们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而新皇帝马约里安开始实施的所有政策都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项政策是大赦。其实这是一项关于税收的政策，要一笔勾销未缴纳的税金，并承诺今后将公正地进行征税业务。没有什么比征税业务

更能让官僚从中捞取好处的事情了。

第二项政策是恢复地方自治体。具体来说就是，原先的地方自治体（Municipia）在征税额不足中央规定的额度时，议会议员有义务自掏腰包填满不足额度，而今后将免除这一义务。因为这项义务的存在，越来越没有人想当地方自治体的议员。在罗马时代，地方自治体的要职按规定是由在议会中拥有议席的人兼任。

马约里安皇帝甚至还设立了一个直译叫做“都市护卫”的新机构。

城市，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称作“civitas”，对起源于城邦的罗马帝国来说，一直是重要的核心。即使施行帝政之后，向主要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居住的“城市”和被罗马征服的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授予权力，是历代皇帝的重要政策。换言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和谐才是元首制时代民心安定的真正原因。马约里安皇帝的地方分权政策就是纠正戴克里先皇帝以来过于偏向中央集权的帝国之“轴”，使之回归到城市和地方自治体，从而恢复平衡。在这一点上，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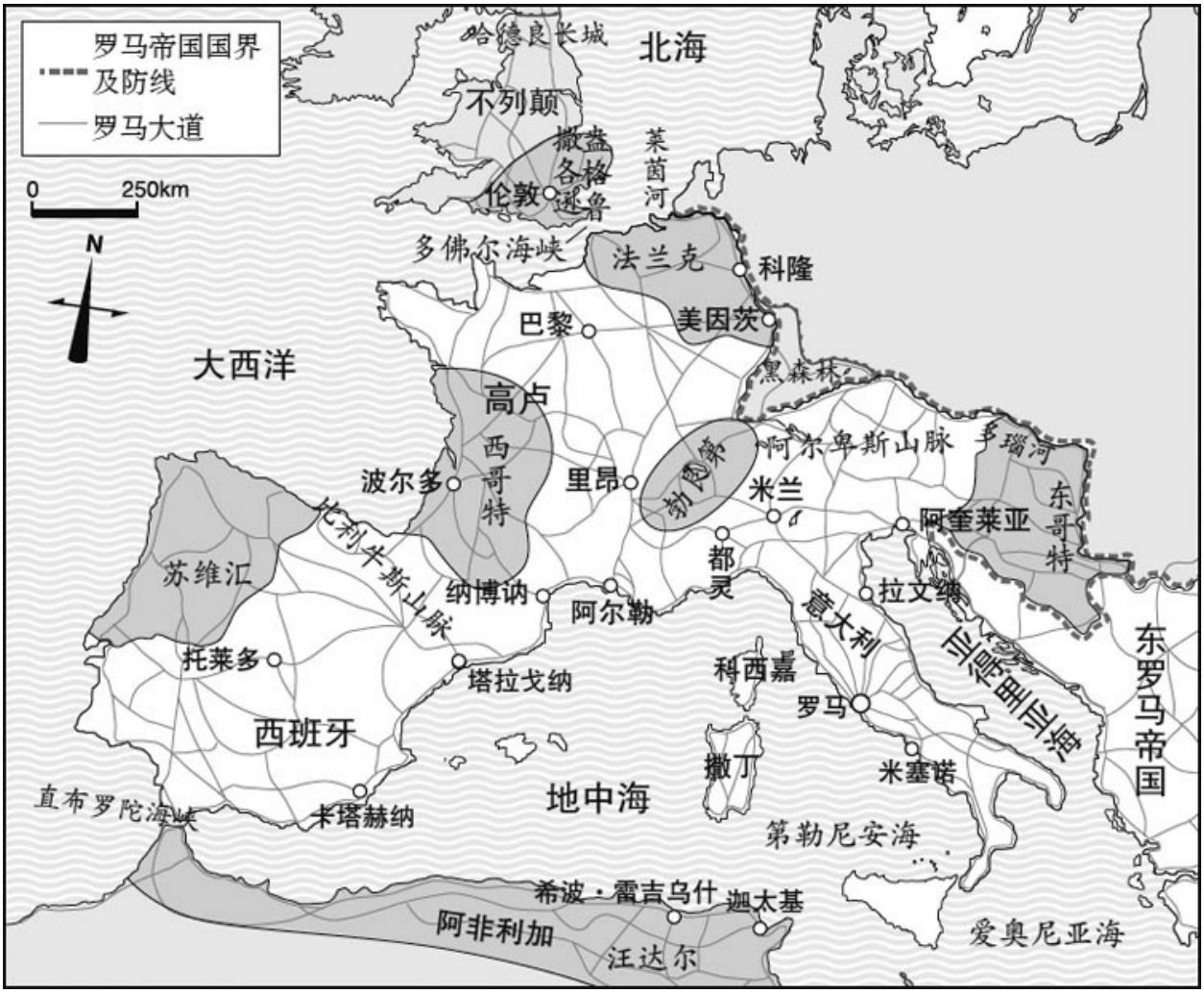
然而，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把方向舵扳到中央集权路线上来以后，已经过去了200年。即使政策正确，时代也不再接受。纵令没有皇宫官僚的反对，也不能指望收到什么效果。

皇帝也许为此着了急，宣布要远征北非。作为政策，这也是正确的。汪达尔人海盗暴行日益严重，就连濒临亚得里亚海的遥远的意大利南部，受到来自北非危害的城市也在不断增加。进攻这些海盗的根据地北非，把人们从对海盗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有着充分的道义名分。

但是，这个政策并不符合时代要求。远征所需的费用如何筹措？高卢、西班牙和北非已经不向西罗马帝国纳税。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行远征，不可能没有重大困难。

马约里安皇帝决定即便有“重大困难”也要远征。他以意大利南部的米塞卢姆（现在的米塞诺）军港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海港迦太基·诺瓦（现在的卡塔赫纳）两地为中心，开始造船，数量多达300艘。一俟完成，将从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西部两个方向进攻北非。

马约里安是公元457年当上皇帝的，同年开始在这两个港口建造船舶。进攻北非是马约里安皇帝悲壮的宏愿。他自己也经常前往卡塔赫纳，甚至到造船工程一线亲自指挥。



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及其周边

根西里克身在北非，以往所了解的西罗马帝国总是行动迟缓，因此

对这次的变化似乎很震惊。根西里克向拉文纳派出了使节，请求北非汪达尔王国与西罗马帝国缔结建立友好关系的协约，理由是儿子乌内里克将要成为汪达尔人的下任国王，而他的妻子是瓦伦提尼安的女儿，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顺理成章。拉文纳的宫廷官僚都劝谏接受这个请求，但马约里安皇帝断然拒绝了。

遭到拒绝后，根西里克改变了策略。他统率多达10万人之众的蛮族长达35年之久，率领他们完成了渡海到达北非的艰苦卓绝之大业。他还在和平状态下完成了被称为“罗马浩劫”的大掠夺，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说，领袖需要兼具狮子和狐狸的资质。这位汪达尔人的国王在这点上一定是合格的。知道敌人建造了为数众多的船舶，他却没有加强防御，严阵以待，而是想出了与此完全迥异的对策，并付诸实施。他也一定掌握了卡塔赫纳比米赛诺造船更多的情况。

夏季的地中海，微风轻抚，海面平静。公元461年7月的一个夜晚，海面风平浪静，即使小船也可渡海。暗夜无月，没有人注意到几叶小舟像小黑点一样前行。小舟组成的船队潜入卡塔赫纳港后迅疾向四面八方散开，朝停泊在那里的每一艘船上射出了点着了火的箭矢。

哨兵发现时，所有的船上都已火舌缭绕。正在那里逗留的马约里安皇帝也只能当一个茫然的看客。3年的努力化做泡影。为此勉强凑出的经费也无半分回报。西罗马帝国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令人绝望。

灰心沮丧地返回了意大利的皇帝甚至没能回到拉文纳的皇宫。一贯反对他的势力——宫廷官僚派来的士兵，正在由西班牙经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的路上等着他，并且抓住了他，杀害了他。事情发生在公元461年8月初。

一个名叫塞维鲁的人被立即推上皇位取而代之。他完全是宫廷官僚领袖里西默的傀儡，在位4年，我们却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也许

他什么都没做。他于公元465年去世，据说也是被里西默下的毒。

里西默这个人物，父亲是苏维汇人，母亲是西哥特人，自己在埃提乌斯手下的罗马军队中崭露头角。公元454年埃提乌斯被瓦伦提尼安皇帝杀死之后，他仍然留在罗马军队中，却不知道何时巧妙进入了拉文纳的宫廷之中，通过保护宫廷官僚的既得利益而获得了权力。据传马约里安之所以当上了皇帝，就是因为里西默看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蛮族出身因而当不上皇帝，便满足于自己执宫廷之牛耳，让自己的朋友登上了皇位。

然而，“皇帝”却尽干些与“皇帝制造者”意愿背道而驰的事情。这种时候，既得利益阶级并不跳出来公开反击。他们一边暗中对皇帝的政策消极怠工，一边等待对手的失误。既得利益者有着等待所需要的“体力”。

马约里安

塞维鲁

船队在卡塔赫纳遭到火攻，给了皇帝制造者更换皇帝的绝好机会。于是马约里安被杀害，塞维鲁取而代之。可是这个塞维鲁，4年后也变得碍手碍脚。西罗马帝国要向东罗马帝国求援，“西”的皇位就得由“东”所希望的人来坐。蛮族出身、如今已然成为西罗马帝国第一实力

派人物的里西默领悟到，西罗马帝国仅靠自己已经做不了任何事情，只有与东罗马帝国共同奋斗才是生存之道。尽管里西默是北方蛮族出身，在中饱私囊方面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洞察时代潮流也许还是有点眼光的。

东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并肩战斗

西罗马帝国转变方针，东罗马帝国也予以响应。但那不是因为希望西罗马帝国恢复元气。对“东”而言，“西”到底不过是比自己实力弱小的弟弟，罗马不可以超过君士坦丁堡。然而，让“西”作为一个实力略逊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对“东”来说是件好事。

第一是军事上的理由。对“东”而言，“西”位于其与北方蛮族之间，起了缓冲器或吸收器的作用。第二是宗教上的理由。因为“东”、“西”同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国家，而“西”与信奉日耳曼原始传统宗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蛮族接壤，这对“东”而言比什么都好。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利基安于公元457年自然死亡，由利奥接任皇帝。“东”、“西”之间的共同奋斗在这位色雷斯出身的军人皇帝即位后顺利开始。

不受东罗马帝国承认的塞维鲁皇帝被毒杀之后，西罗马皇位虚空。西罗马请东罗马利奥皇帝安排他自己希望的人担任皇帝，利奥便让安特米乌斯去做了西罗马皇帝。安特米乌斯是君士坦丁堡宫廷高官的儿子，也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娶了先皇马利基安的女儿为妻，是皇室的一员。

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给安特米乌斯配备了军队。安特米乌斯于公元467年初夏带着军队进入罗马。罗马教皇为他举行了加冕礼，他也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承认。他经过正统途径做了基督教国家西罗马帝国的皇

帝。

当然，西罗马帝国实权者里西默不会白白地献上这顿大餐。作为合作的报酬，他被授予“贵族”称号，还当上了执政官，尽管已步入老年却迎娶了新皇帝的女儿为妻。这样，第二年，即公元468年，成为东西两帝国正式共同承担西罗马帝国防御的第一个年头。

被视为敌人的是统治北非的汪达尔人。东西并肩战斗伊始便把这个蛮族视为敌人，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是为了把濒临地中海的城镇村落从汪达尔海盗的掠夺中解放出来。汪达尔人的海盗船甚至已经在希腊的爱奥尼亚海出没，其活动已不仅限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和东侧的亚得里亚海。

第二是出于宗教的理由。他们要攻击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汪达尔人——这一教派在尼西亚公会议以后一直被视为异端——从而把正统天主教徒从异端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汪达尔人不是异教徒，但虽同为基督教徒，却是比异教徒更需要排斥的异端。明确标明“十字军”的军事行动发生在600多年之后的中世纪，但其精神早在5世纪中叶就已萌生。十字军敌视、排斥信仰不同的人，或者信仰相同但信奉方式不同的人。只有一神教徒才会产生这种思想。

安特米乌斯

利奥

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北非的军队规模十分庞大，尽管尚未打上十字军的标签，但事实上已经是十字军了。希腊人留下的数字经常夸张，不能盲信，但因为没有反证史料，权且记录如下：

总费用：黄金13万罗马磅（约合48750公斤）。

军船、运输船总数：1113艘。

士兵总数：10万人。

光靠西罗马帝国，能不能筹到五分之一都成问题，一定是东罗马帝国负担了其中的大半。东罗马帝国还制定了下面的战略：

首先，希拉克略将军率部从东埃及向西进军，经昔兰尼加逼近迦太基。

另一方面，马尔塞利努斯将军率部从北面达尔马提亚乘船南下亚得里亚海，迫近迦太基。

安特米乌斯皇帝则率军进攻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部，从汪达尔人手

中夺回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同时切断他们的退路。

然后，远征军大部队的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除最小限度地停靠其他地方之外，一路直奔汪达尔人的根据地迦太基，迅疾占领港口。

如此一来，兼具狮子勇气和狐狸智慧的根西里克也该觉悟到自己已经是口袋里的老鼠了吧。

然而，对这支庞大的远征军来说，致命伤是总司令的人选。瓦西里斯科斯被任命为总司令。他只是利奥皇帝妃子的亲弟弟，年纪轻轻，又无战场经验，且虚荣心极强，最喜欢别人觉得他好。

汪达尔人国王根西里克自公元428年兄长死后当上族长以来，已经统治了40年，是个老手。他的生年不详，无人知道公元486年时他年龄几何，但可以肯定当年他已年近70岁，因为他已在战场上出生入死40年了。

半岛在迦太基港口东面的广阔海面上伸向大海。半岛的顶端，从罗马时代起就建有锚地。瓦西里斯科斯率领的大舰队进入海湾前也在这里停泊，等待从亚得里亚海南下的马尔塞利努斯军队。有来报说，马尔塞利努斯的军队已经离开了亚得里亚海，正在接近西西里。

根西里克向瓦西里斯科斯派出使者，带着自己的亲笔信。信的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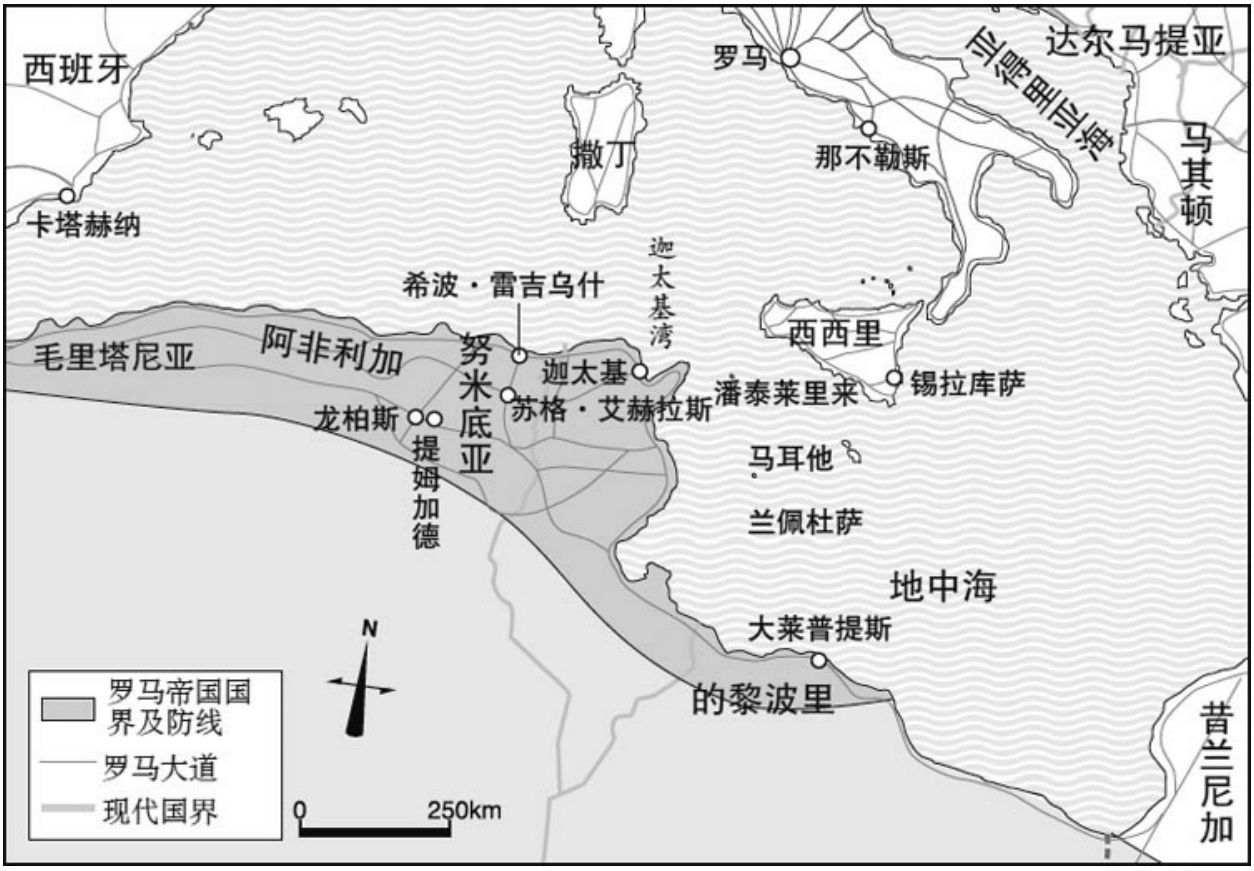
> 我有充分意愿通过和平谈判满足阁下远征阿非利加之目的，但需要时间说服部下，因而请允准休战5天。其间阁下船队可停泊在迦太基湾（现在的突尼斯湾）内。

总司令瓦西里斯科斯上当了。他没有战场经验，不战而达目的比什么都有吸引力。而且，不用麻烦从东面陆路逼近的希拉克略和从海路迫

近的马尔塞利努斯即可获胜的想法刺激了他的虚荣心。瓦西里斯科斯同意休战5天，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让舰队航行到迦太基湾内，停泊之后也未设特别警戒。

万事俱备，老狐狸根西里克逆转绝境便易如反掌。而且这次的舞台是在一切了然于心的自家院子里。于是，7年前在卡塔赫纳港上演的火烧船队的大戏，这次在迦太基湾又重演了一遍。

但这次船只数量更多，不过这毕竟是在自家院子里。罗马士兵见左右船只着火便抱头鼠窜，汪达尔士兵见势登上罗马船，把罗马士兵扔进大海，捕获殆尽。他们不光点火，摇身一变成了轻车熟路的海盗。



迦太基及其周边

船队仍有将近一半未被烧毁。但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总司令满脑子

只想着如何逃回君士坦丁堡。听说他逃回君士坦丁堡后，一直躲在教堂，直到做皇后的姐姐消解了利奥皇帝的怒气。

马尔塞利努斯将军率领的军队在从西西里向迦太基进发的途中遭到变为海盗的敌人的攻击，只能逃回西西里。如前所述，登陆作战的也是海盗。火烧大船队后斗志正旺的汪达尔人登陆发起地面战。激战中将军也成为刀下鬼。马尔塞利努斯的部队全军覆没。

希拉克略率领部队从西面陆路进攻迦太基，也被迅疾出击的汪达尔人挡住去路。得知火烧船队的消息之后，希拉克略选择了撤退，而不是战斗。

如此这般，东西罗马帝国的联合作战，完败于北方的蕞尔蛮族汪达尔人。西罗马帝国皇帝安特米乌斯虽然全须全尾，但他是东罗马过来的人。公元468年，东罗马放弃了西罗马。因此，他在西罗马帝国国内处境恶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年年底，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与汪达尔人国王根西里克缔结了媾和协约。虽然其内容不详，但有一点很清楚，汪达尔人在希腊海域的海盗行为并没有任何收敛。

西罗马帝国比东罗马帝国受到更多的掠夺。除了内陆地区的罗马人还能以罗马方式生活以外，西西里、撒丁等近海地区全部处在了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失去了对确保制海权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岛，意味着伊比利亚半岛西侧以及高卢南部已经不再是罗马人的领土了。

汪达尔人的君王根西里克于9年后的公元477年去世。此前一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帝国的灭亡

被东罗马帝国放弃后，西罗马帝国最先发生的是皇帝安特米乌斯与蛮族出身的实力派人物里西默之间的关系恶化。东西联手收复北非的战役失败后的第4年，两人的对立发展到了武力冲突的地步。我们用列大事记的方式来看看公元472年这一年的情况：

公元472年3月，里西默为对抗安特米乌斯，立部下奥利布里乌斯为新皇帝。

7月，奥利布里乌斯和里西默联军在罗马市内与安特米乌斯的军队沿台伯河开战。在长达40多天的时间里，罗马城成了西罗马帝国士兵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的战场。拿着武器战斗的几乎全是蛮族出身的士兵，而四处逃散的则是罗马市民。

7月11日，安特米乌斯战死。

8月20日，里西默病死。

10月23日，奥利布里乌斯被暗杀。

此后，一个名叫格利西里乌斯的人当上了皇帝，但西罗马帝国远未脱离苦海。东罗马帝国不能弃置不顾，传过话来要让一位名叫尤里乌斯·尼波斯的将军当皇帝。

尼波斯将军当时是与意大利半岛仅有亚得里亚海一海之隔的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大元帅。但是，地方长官不可能注意不到本国政府已放弃了西罗马帝国。也许是不乐意，尼波斯虽然当了皇帝，却根本不想到意大利来。

这就助长了里西默死后依然残存的意大利国内反东罗马帝国派的势力。奥列斯特就是这派中的一员。

如果只听奥列斯特的名字，就会想到他会不会是希腊人。其实他是

生于罗马时代潘诺尼亚（即后世的匈牙利）的罗马人。长期以来，潘诺尼亚一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进入5世纪时被亚细亚系蛮族匈奴人占领。阿提拉上台后，这里便成为被惧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人的根据地了。奥列斯特的父亲是宁愿侍奉侵略者阿提拉也不愿当难民的罗马人之一。父亲死后，儿子也走了与父亲一样的道路。虽然是罗马人，奥列斯特却跟随阿提拉与罗马军队作战，进攻意大利，祸害意大利北部。

奥利布里乌斯

阿提拉死后，匈奴人灰飞烟灭。奥列斯特也失业了。失业后的奥列斯特自巴尔干南下，来到位于东罗马帝国的达尔马提亚，加入了罗马军队。不久便与在拉文纳侍奉西罗马帝国皇帝的高官的女儿结了婚，在西罗马帝国架起了一个向上爬的阶梯。可见他实在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处世高手。靠着这个婚姻，他迁到了拉文纳。又过了不久，他获得了“贵族”（Patricius）称号，那可是事实上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格利西里乌斯

奥列斯特当上西罗马内部反东罗马派的头目，完全不是因为他有恢复西罗马帝国的意欲，而不过是

因为他看透了自己与在达尔马提亚时的上司尼波斯将军之间关系恶化，只要尼波斯一直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自己就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出头当上了对根本不来意大利的尼波斯皇帝心怀不满的西罗马帝国高官们的领袖。

尤里乌斯 · 尼波斯

不过他没有自己觊觎皇位，而是企图把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罗穆路斯扶上皇位，自己掌握实权。

这位少年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代皇帝。他与罗马开国国王同名，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奥列斯特不过是给儿子起了一个与亡父相同的名字而已。越是住在边境的罗马人，越是喜好使用罗马史上名人的名字。不过，奥列斯特在把儿子罗穆路斯扶上皇位时，还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由此，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便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同名了，叫做罗穆路斯·奥古斯都。

罗穆路斯 · 奥古斯都

公元475年10月31日，罗穆路斯·奥古斯都即位。罗马的元老院也承认了这位15岁的少年皇帝。尽管在与亚得里亚海一海之隔的达尔马提亚另有一位皇帝尼波斯。

反对的声音既不是来自尼波斯所在的达尔马提亚，也不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皇帝所在的君士坦丁堡，而是来自附近的意大利北部。

这个反对的声音和改善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以及恢复西罗马帝国全然无关。反对源于在西罗马军队服役的蛮族出身的将军，他们要求得到可以自由处置的土地，但遭到了奥列斯特的拒绝。说起来这就像工会要求经营者改善劳动条件，而经营者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被拒绝的蛮族将军拥立奥多亚克为领袖，开始武力争斗。战斗打了两场，均以奥列斯特的失败而告终。在公元公元476年夏天的第二场战斗中，吃了败仗的奥列斯特被捕后当场被杀。当年9月，奥多亚克进入少年皇帝所在的拉文纳。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被迫退位。奥多亚克虽然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奥列斯特，却对他的儿子很宽容。少年皇帝得到了每年6000枚苏勒德斯金币的保障，隐居于那不勒斯近郊的别墅，似乎是在那里结束的一生。

罗马帝国就这样灭亡了。没有蛮族攻来和随后激烈的防御战，自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死。既没有火焰，也没有惨叫，无声无息，无人注意到她的消失。少年皇帝退位后，奥多亚克既没有取而代之登上皇位，也没有把其他什么人扶上皇位。只是没了皇帝而已。半个世纪前的公元410年，发生“罗马浩劫”时整个帝国发出了悲叹痛惜之声，而在公元476年却是一片寂静。

今天全世界的教科书都把公元476年明确地记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但是，不论哪本教科书，也不论哪位罗马史权威，即使记下了灭亡之“年”，却未记下“月”与“日”。原因很简单，无人知晓这“月”与“日”，充分发挥想象力，能说出9月也是极限了。

从被视为建国年份的公元前735年算起，1229年后罗马帝国灭亡了。相比于622年前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的灭亡，这种终结方式是多么令人兴味索然啊！

《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是以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叙述灭亡迦太基的罗马军队总司令小西庇阿（即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的文章结束的，在此我想再度回忆一下：

小西庇阿的目光久久没有离开展现在他眼帘中的迦太基城。这座城市开国以来经历了700年的沧桑岁月，长期极尽繁华。他望着这座城市陷落，望着她正在化为瓦砾之山。

700年的漫长岁月，迦太基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岛屿和辽阔的大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迦太基拥有了庞大的武器、战舰、大象和财富，与人类迄今创造的任何强大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迦太基因自己的勇气和气概而高于过去任何国家。她虽然屈于罗马的要求交出了所有的武器和战舰，但她经受住了罗马军队长达3年的进攻，直到现在。然而，现在她陷落了，毁灭了，行将从大地上消失。

小西庇阿因想到敌人的命运而流泪。

尽管他胜利了，他却不能不让思绪驰骋起来。他不能不想到，不仅是人，就是城市、国家乃至帝国，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特洛伊、亚述、波斯、马其顿……历史展示给人类的是盛极必衰的图景。

不知是有意识地还是下意识地，这位罗马的胜将口中吟出了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这句话应该是特洛伊总司令赫克托尔所说：

“特洛伊终将也会随着普里阿摩斯国王以及他的战士一道灭亡！”

站在身后的波利比乌斯问罗马的胜将为何吟出这样一句，小西庇阿回头看着波利比乌斯，拉着这位希腊好友的手回答道：

“波利比乌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荣极一时的帝国灭亡的伟大瞬间。可是现在充满我心中的不是胜者的喜悦，而是终有一天我们的罗马也将迎来同样时刻的悲哀！”

罗马在长达两倍于迦太基的漫长岁月中，对迦太基所无法相比的广大地域，对生活在那里的无以计数的众多人民，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但没有这个“伟大瞬间”。

燃烧了，但不是火焰引起的。

灭亡了，但没有惨叫声相伴。

罗马无声无息地灭亡了，没有人注意到。

我甚至想，如果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公元476年秋天的罗马，把麦克风对着过往的行人问：罗马帝国灭亡了，您有什么感想？我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

也许有人会表情惊讶地说：

“灭亡了？什么时候？”

也许有人会嘴角挂着讽刺的笑容回答说：

“她不是还活着吗？”

历史学家也许会说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在公元476年，而是在公元1453年。但我要说，公元476年时的罗马人理所当然不会注意到帝国的灭亡。的确，东罗马帝国也好，西罗马帝国也罢，这些名称都是后世史学家为了方便而起的名字。现在，东罗马帝国仍在维系，这也是事实。

然而，没有了罗马这座城市，就没有了罗马帝国。不论罗马遭到怎样毁灭性的破坏，罗马人都会坚决反对迁都。罗马国家起源于城邦。首都对于城邦和对于领土型国家，其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源于城市，而后者是先有领土，然后在适合统治的地方建设首都。

没有雅典城就没有雅典城邦。同理，没有罗马城，也就没有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那已经不是罗马帝国了，更何况那里的语言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

这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灭亡于公元476年。盛极必衰，我想，罗马

在众多“盛者”中别具一格，没有“伟大瞬间”的灭亡会更好些，这种“必衰”的方式至少与众不同。

罗马与后来历史中出现的其他帝国在另一点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其他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引起，只有罗马不是因为行省离反而崩溃的。在怒涛般袭来的北方蛮族面前，行省一直与本土命运与共。后代的帝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被严格区分为统治方与被统治方。与此不同，罗马人认为本土人民和行省人民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罗马人把这种关系称为“familĭa”，这个词语把他们的帝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罗马人认为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大家庭。

这个意义上的帝国灭亡了，说不出准确的时间，也没有“伟大瞬间”。

第三章

“后帝国”时代

（公元476年——）

查士丁尼和臣子们

西哥特人的族长奥多亚克作为降下罗马帝国历史帷幕的人物而名垂青史。罗马史结束于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非公元476年这一主张也因他而起。他逼迫少年皇帝退位后，既没有让任何人哪怕是傀儡登上皇位，也没有自己登基，而是要求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正式承认他的地位。

具体说来，他要求得到“patricius”的称号。这个词按文字直译是“贵族”的意思。在罗马帝国末期，这个词大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纯粹的名誉职务；第二个意味着宰相或代理，因此具有官方地位与实权。奥多亚克想要的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贵族”称号。他要求正式任命他为“意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他这样做是承认东罗马帝国的权威。

不论是逐渐称霸高卢的法兰克人族长，还是在西班牙形成一大势力的西哥特人族长，亦或是已经领有北非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都没有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各自称“王”。他们没有像奥多亚克那样逼迫西罗马帝国皇帝退位，也没有奥多亚克特有的弱点。

奥多亚克

活跃在帝政末期的蛮族出身的领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从父辈起就在罗马军队中从军，然后子承父业，在罗马军中获得晋升的人。最好的例子是斯提利科。他的父亲是蛮族出身，母亲是罗马人。这种人与出身的部族基本没有关系。“罗马化的蛮族”是这类人的总称。

元首制时代也是如此称呼，但那时没有歧视的意思。即使是“蛮族”（barbarus），一旦获得罗马公民权，立即就被认为是“罗马

人”（romanus）。然而，到了帝国末期，歧视的意味越来越浓。丧失自信的人常常会感到强调差别可以找回自信。

奥多亚克

第二种，出身于部族的族长。公元410年发动“罗马浩劫”的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法兰克人族长克劳德维克、率领汪达尔人称霸北非的根西里克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出身于部族长家庭，成为族长不费什么事。

这些人都有率领部族突破罗马帝国“防线”、侵犯罗马领土的“前科”，但帝国作为善后对策，亦即作为仅仅保住体面的策略，更多的是让他们与帝国之间缔结“同盟”协约。所以，他们只是由侵略者变成同盟者，相对于皇帝，独立程度很高。总之，这些人的强势之处只有一点——统率着自己的部族。

第三种，蛮族出身的领袖，一言以蔽之，就像是一匹狼，在现代来说，就像是外国雇佣军的士兵。他们与第二种人同样是蛮族出身，但第二种人都是大部族的族长。相比之下，他们是小部族的族长，或是因某种原因离开部族，志愿参加罗马军队，并获得晋升。奥多亚克是这类人的典型，公元476年，他42岁那年，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此前20多年，他一直在西罗马帝国军队里积累着他的从军资历。既是一匹狼，又得到了晋升，实力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可以指望跟随自己到底的部下。他没有这个福分。他靠自己的才能吸引忠诚的部下，而不是靠来自家族或父辈的继承。

我们甚至无法确认奥多亚克出身的部族，也许他只是蛮族出身的狼队的领袖。在他的立场上，他希望得到皇帝承认的正式地位并非过分要

求。

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对奥多亚克的请求态度暧昧，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拒绝。既然我们派去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尼波斯在达尔马提亚，应该向他请求授予“贵族”称号才是。芝诺皇帝没有责备他逼迫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退位，没有把罪魁祸首奥多亚克当做帝国的敌人来定罪。

芝诺

采取这种暧昧态度的原因，不是芝诺皇帝同情尼波斯，在被派去当西罗马帝国皇帝却无勇气踏入意大利，因而未能巩固西罗马的皇位。原因实在很简单，芝诺因受国内争端影响于一年前被赶下台，在公元476年这一年刚刚重登皇位，目前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时期。他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顾不上去管西罗马帝国。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的态度。“东”对“西”的关心只限于可能殃及自己的事情。

见君士坦丁堡态度暧昧，奥多亚克也作出了决定，与其抬出尼波斯，不如自己干。不过，他并没有除掉尼波斯自己来做“西边”的皇帝。他想象得出，如果强行其事，“东边”将如何出手。既然不能指望改善与尼波斯的关系，现实的做法是放弃意为“尼波斯代理人”的“贵族”称号。奥多亚克决定自己称“王”。“贵族”这个拉丁语词是与罗马帝国皇帝联系在一起的尊称。但“王”是源于日耳曼的尊称。他决定不当“意大利地区皇帝代理官”，而是称“意大利王”。

这样一来，与日耳曼系的“王”统治高卢、西班牙和北非一样，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半岛也开始由日耳曼“王”统治了。东罗马帝国皇帝自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日耳曼的“王”要使东罗马帝

国皇帝承认自己对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就会很困难。没有正式的承认，就容易被视为敌人。这一点也是奥多亚克相比其他日耳曼系国王的弱点。

共存路线

少数胜者统治多数败者的法则是保存已有的统治阶层。即使想改造现有的统治阶层，也应该从长计议，眼下必须做的首要之事是使现有统治阶层安下心来。败者知道自己败在军事力量上，因而对胜者的到来心里会有更强更深的恐惧感。

进驻这一瞬间很重要。因为这一瞬间将决定少数胜者对多数败者的统治是否成功。如果胜者强制推行增加败者恐惧感的政策，绝望的败者就会疯狂奋起，拼死抵抗。这样一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就将成为梦想，剩下的只是败者对胜者的顽强抵抗，胜者为镇压抵抗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深陷泥沼。罗马史上有着防止这种状况的世所罕见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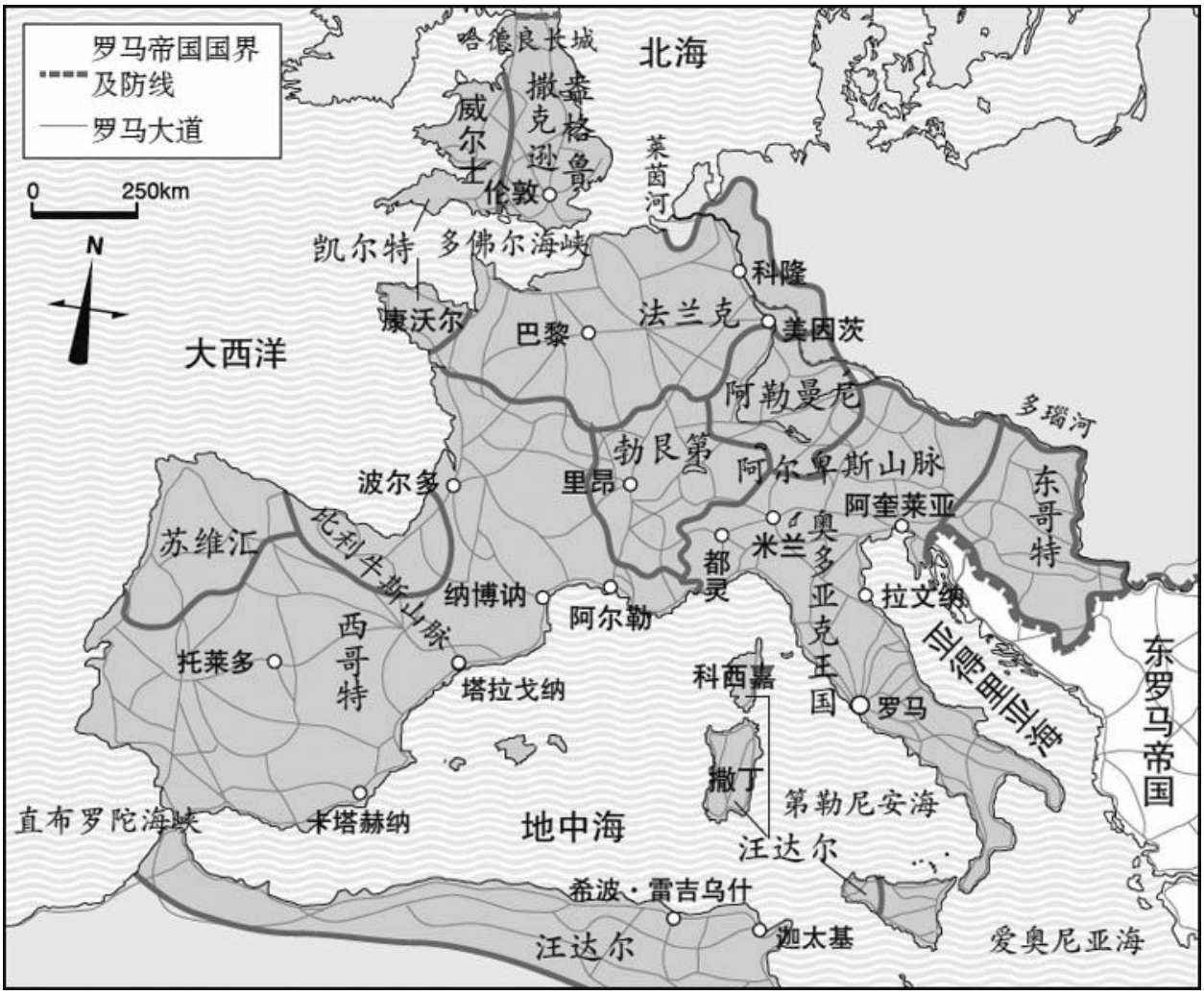
尤里乌斯·恺撒耗时8年征服了高卢全境，征服之后，却把保留现有各部族作为战后处理的基本方针。正是这些部族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抵抗了恺撒率领的5万罗马军队，失败后又再举反旗。而恺撒却不但完全原谅了他们，保留了他们，并且还承认了他们部族内部的自治，甚至同意他们像原来一样留在自己的根据地。同意保留根据地，意味着承认他们在那块地盘上长年培植起来的部族内部统治体系。更有甚者，恺撒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刚刚投降罗马的昨日之敌的族长，还把自己家族的门第称号“尤里乌斯”授予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家族的一员，并把罗马元老院的议席授予其中有实力的部族族长。回顾罗穆路斯以来的罗马史，恐怕是史无前例。

高卢战役刚刚结束，恺撒与力挺庞培的元老院派的对立表面化。他

渡过卢比孔河，罗马进入内战状态。结束这场内战花了4年时间。这期间，高卢没有罗马的一兵一卒。恺撒自己则转战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埃及和北非等地。这对刚刚被恺撒征服的高卢各部族摆脱罗马统治，是不可多得的好时机。然而，高卢各部族非但没有起事，还应正在西班牙与庞培派军队作战的恺撒之请，给他送去了军粮。我们只能认为，这里的原因是连同小部族在内的数以百计的高卢各部族族长们都接受了恺撒的统治哲学。

恺撒说服他们道：众多部族相互攻击的高卢迟早会投降日耳曼民族。你们是选择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严格区分开来的日耳曼式统治呢，还是选择以胜者与败者共存为目标的罗马式统治呢？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统治。他把用石板敷设的罗马道路网扩大到了行省。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网也铺到了高卢，把各部族的根据地相互连接起来。迄今为止的法国重要城市，几乎都是从恺撒在两千年前的古代征服的各部族根据地发展而来。罗马人建设的城市可能只有里昂。高卢有充分理由被称为罗马化的典范。



蛮族统治后的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奥多亚克不是尤里乌斯 ·恺撒。对恺撒而言，征服高卢是为了罗马的防御，而不是为了确保罗马人的居住地。而对奥多亚克而言，占领意大利是为了给跟随自己而来的北方蛮族以定居之地。然而，奥多亚克却模仿了历史上以“恺撒的宽容”（Clementia Caesaris）而闻名的罗马帝国对外政策，并把它作为日耳曼人统治罗马人的政策。

当时，意大利的罗马人闻知了蛮族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等地的统治方法，他们担心、惧怕在奥多亚克的统治下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精神已被压垮。

“后帝国”（Post imperium）时代的不列颠

罗马帝国自公元410年起就从不列颠撤了兵。那一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向常驻那里达360年之久的3个军团发去了诏书，命令他们撤退。诏书内容为：

> 罗马帝国皇帝致所有总督、所有大元帅、所有司法官：
>
> 蛮族阿拉里克发动罗马浩劫，不仅实施破坏、杀人放火，给首都带来极大灾难，还将帝国国库洗劫一空。帝国已无经济力量负担行省的防御和统治。因此，今后只能请诸位各自管好自己的事情。

所谓霸权国家，正是因为能够保障处于其霸权之下的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人民的安全才成其为霸权国家的。然而在不列颠，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半个世纪的公元410年，罗马帝国就已放弃了霸权国家的职责和义务。

不列颠在做了三个多世纪的帝国行省之后被抛弃了。罗马军团撤走以后，除了以前就跃跃欲试的北部苏格兰人之外，不列颠还受到了来自后来的德意志北部渡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以及来自后来的丹麦渡海而来的盎格鲁人的更大威胁。罗马军团撤走以后，仅靠剩下的罗马化凯尔特系不列颠人已经抵抗不住外族入侵。他们只能逃往山地较多的威尔士和康沃尔。位于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原罗马帝国行省不列颠被日耳曼系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占领。不久，日耳曼系蛮族威胁到了康沃尔。失去居住地的凯尔特系不列颠人渡过大海，移居到高卢西北部。这个地方被称为布列塔尼，也是不列颠人定居于此的缘故。

继续称呼罗马时代的名称不列颠已经没有意义，历史进入了“英格兰”时代，“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居住之地。传说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也都是罗马军团撤出不列颠后的乱世所造就的英雄。也有说法认为，亚

瑟王是在罗马驻不列颠军队中积累了军人资历的当地人，即罗马化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甚至没有人尝试一下胜者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与败者凯尔特系罗马人之间能否共存。

“后帝国”时代的高卢

高卢行省与不列颠只隔着多佛尔海峡。土地广阔的高卢，在公元454年瓦伦提尼安三世斩杀埃提乌斯之后，事实上也已与罗马帝国分离。马赛以东的普罗旺斯地区总算留在了罗马一方，除此之外的高卢全境则处于日耳曼系蛮族自相残杀的状态之中。其中一支蛮族法兰克人以高卢北部为基盘，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法兰克人虽然与顽强留在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时而并肩作战，时而相互争战，反复无常，但却成功地把一度在高卢西部颇成气候的西哥特人赶到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南。高卢进入了“法兰西”时代，“法兰西”意为法兰克人的居住地。

法兰克人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东侧即罗马帝国“防线”之外的日耳曼。它不是拉丁民族，属于日耳曼民族。在日耳曼系北方蛮族大多抛弃祖传的日耳曼诸神、改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之后，只有他们还在信仰日耳曼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诸神。在成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近200年的罗马人看来，他们不是“异端”，而是“异教”之徒。

在信仰一神教的人中常见的现象是，他们最憎恨的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之徒。因为异教徒是尚未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的人，因而还有觉悟的可能。但是异端则已对基督的教诲有所觉悟但误解了基督的教诲，并且不承认误解，从而不信基督。既然坚信不疑，让他们对基督的真正教诲有所觉悟的可能便微乎其微了。

在高卢，胜者法兰克人是异教徒，而败者罗马化的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当然，在高卢也是胜者人少，败者人众。与不列颠不同，

高卢地势变化小，必须向东或向西远行才有山地，败者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原地。面对这样的高卢人，法兰克人在相当程度上行使了“胜者的权利”。抢夺败者的财物被认为是胜者的正当权利，所以尽管史料极度匮乏而脱不出想象的范畴，我们也可以认为，高卢人的财产遭受到了相当惨重的损失。

不过，对败者而言，也不是毫无有利之处。第一个有利之处就是，胜者毕竟人少，败者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即使胜者想把败者全部抢光，这点人也办不到；即使想把败者全部变成奴隶，如果监视者人数不足，也只能作罢。

第二个有利之处是，对蛮族而言，抢了就走的时代已经终结，盘踞扎根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统治者需要向被统治者传达大量的命令。这时就产生了统治的必要。这种时候法兰克人只能使用拉丁语，于是也就需要能写拉丁语文章的人。即使是收税，也需要有人决定，也需要完善征收系统，否则税金收不上来。法兰克人完全不具备这种行政方面的技能，也只能依靠败者。法兰克人不得不认识到掠夺与统治是不同的，他们只能延续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机构，只能继承罗马帝国人的语言拉丁语，在这方面也只能依靠专业化的败者。

第三个有利之处我认为在于宗教。法兰克人是日耳曼教徒，而高卢人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各自信奉不同的神祇，而不是对同一神祇的教诲解释不同。高卢受法兰克人统治之后，记录中也没有任何对天主教派基督教徒的迫害和镇压的记载。处于异教徒而不是异端的统治之下，反倒使宗教得以共存，尽管这个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虽说成为败者，却仍有有利之处，这其中的最后一点，不消说就是“安全”。高卢不必再为北方蛮族的入侵担惊受怕了。反复入侵的这个蛮族如今已换位到防守一方了。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总体上进展顺利，我想这里的原因在于，败

者一方认为安全是最令人欢欣的事。有谁能责备他们呢？对统治者而言，没有比保障“和平”更大的职责了。帝国的灭亡，是统治者已经丧失尽此义务能力的结果。

20年后，对居住在法兰克人所统治的高卢的罗马人来说，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法兰克人自己改信了天主教。克劳德维克自公元481年至511年一直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他于公元493年迎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女儿为妻。这个女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兰克国王同意她所生的两个儿子接受洗礼。改信宗教的环境具备了，最后突破却花了3年时间。根据图勒主教的记载，奇迹发生在与阿勒曼尼人的战斗中。这个奇迹与发生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的奇迹莫名地相似，令人苦笑。但奇迹毕竟出现。法兰克国王感激于这个奇迹，与手下3000人一起接受了洗礼。

从异教徒一变而为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是蛮族最早的基督教皈依。这使得东罗马帝国欣喜异常。因为这一事件，东罗马帝国与法兰西的关系便与其他北方蛮族国家不同了，具有了同一个信仰，变成了“兄弟之情”（fraternitae）。然而，统治者的这个变化对被统治者——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来说是一件更加令人欣喜的事情。在胜者和败者的身份渐渐远去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件事也给胜者与败者的共存带来了看不见的效用。顺便一提，克劳德维克是法兰克人最早的，也是北方蛮族最早的天主教国王。他还是最早把自己王国的首都定在巴黎的人。

“后帝国”时代的西班牙

除了居于西北部的苏维汇人、猫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巴斯克人之外，在罗马时代，伊比利亚半岛大部被称为西班牙，处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下。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行省的时间比高卢还要早200年。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统治帝国的五贤帝中，西班牙就出了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三位贤帝。战胜迦太基后，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这里的

罗马化历史，比不列颠和高卢还要长。与罗马帝国命运与共的时代如此之长，与其称那里的人为西班牙人，不如把他们当做西班牙的罗马人更为贴切。

日耳曼系的西哥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后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也是基督教徒，却是被天主派当做异端排斥的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

公元430年，蛮族已经开始统治这个地方，但几乎没有留下如何进行统治的记录。以面对地中海的西部为中心，罗马人奋起抵抗蛮族统治的次数不在少数。然而，直到灭亡，西罗马帝国也无力援助那里的同胞。

伊比利亚半岛地势复杂，与法兰西不同。法兰西一马平川，连滑雪都得去阿尔卑斯山脉。个人生活中都能实际感觉到在那里较易建立中央集权。可是比利牛斯山脉南边却做不到。可以想象，西哥特人的统治也不顺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还有信仰上的不同，关系一定持续紧张。

不过，在这里统治者也是少数，被统治者是多数。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在法兰克人统治下所有的有利之处，居住在西班牙的罗马人也同样具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安全”，不用再苦于蛮族的反复入侵了。尤其是在知道了胜者汪达尔人正在直布罗陀海峡一海之隔的北非把败者置于绝对统治之下的强硬做法之后，感觉更是如此。

“后帝国”时代的北非

如前所述，汪达尔人在北非根本不想搞胜者与败者共存的统治。胜者如果仅是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汪达尔人，情况可能不会糟于西哥特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状况。可是在北非，胜者中还有遭受天主派迫害镇压长达100多年的多纳图派基督教徒。这使得成为败者的北非罗马

人陷入了绝望的状态。他们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现在转变为被镇压、被迫害的一方。

高卢、西班牙基本没有出现难民，北非却有很多难民。在资产只限于耕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时代，舍弃资产逃亡的人都在逃亡地拥有另外的耕地和房屋，在那里自然还是社会上层。即使没有耕地房屋的社会“中层”，但若有可靠的地方和人可以投靠，在能力上也属于“上层”。

一般常识认为，如果让这种人逃走，社会就会瘫痪，生产力也难免降低。但对某种一意孤行的人来说，这个常识行不通。因为有比阻止社会功能和生产力下降更优先的事要做。这件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民族净化”。在汪达尔人统治的北非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蛮族奥多亚克这位新统治者到来时，旧西罗马帝国的状态。奥多亚克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对他屏息以待自有道理。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Pax barbarica）

奥多亚克并非出身于部族族长家族，所以自己没有部下。尽管如此，他却聚集了众多的蛮族狼，居然组建了一大集团，可见他拥有相当的政治能力。

公元476年，他为西罗马帝国历史落下帷幕。当时他手下聚集的蛮族号称10万之众。这是连妇女儿童都合计在内的数字，打起仗来，战斗人员只有2万人，最多也不会超过3万人。罗马帝国也只是受到这充其量两三万人蛮族军队的威胁而已，并未在战斗中败北，但走上了灭亡之路。真是情何以堪！

然而，摆在胜者奥多亚克面前的是要以10万人之力统治20倍以上的

败者。

奥多亚克把这个根本性的完全与败者共存的方针确定为基本政略。这个政略是统治高卢、西班牙，自然还有不列颠、北非的蛮族所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并且，奥多亚克没有止于提出问题，而是把这个政略化做具体政策付诸实施。

首先，他没有把蛮族与罗马人的关系定位为“蛮族”与“罗马人”，没有定位为日耳曼人与拉丁人，没有定位为胜者与败者，也没有定位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规定为“客人”与“主人”。主人热情款待来访的客人，还把客人留宿在家中。从胜者与败者的实际情况看，也算是伪善到家了。这样的情况在拉丁语中叫做“hospitalitas”（好客，款待客人），说的是对客人的待遇。定位为主客关系，还有多少缓释败者一方屈辱感的效用吧。尽管如今破落了，但毕竟意大利半岛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本土。

但奥多亚克还有部下，他必须保障他们的生计之道。于是他决定，把“主人”的资产拿出三分之一赠与“客人”。这个主意可以名之为“三分之一政策”，却并非奥多亚克首创。从前，斯提利科曾经决定拿出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财产的三分之一给蛮族，以此作为利用蛮族保卫高卢的手段。这两个政策何其相似。但是，斯提利科被冠以逆贼的污名而处死，还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他生前的业绩多被抹消，无法确认这一政策的情况。但是，奥多亚克实施了这个“三分之一政策”却是事实。

乍看上去，这个“三分之一政策”像是胜者加给败者的严厉处置。无论如何，败者要被强行夺走三分之一的财产。但在实施阶段，这种严厉程度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因为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主人”并非全部都得向“客人”提供三分之一的财产。首先，如果只拥有一间房屋或不很大的农庄，即使提供三分之一，得到这些资产的一方实际上也无法使用。手工作坊和街上的商店情况也一样。这样，拥有资产，但只是小规模生产手段的人就被排除在这“三分之一政策”的对象之外了。

如果“上层”是火车头，“中层”和“下层”所起的就是火车头赖以牵引车厢的车轮作用，是使社会发挥功能不可或缺的要素。保留社会中下层的政策确实是一项明智的占领政策。

但是，要保存社会“上层”的现有统治阶级，在意大利半岛就是要保留元老院阶级和天主教派基督教教会。这两者都是大规模农庄的所有者。前者是从祖先继承而来，后者是由信徒贡献和赠与而来，都是“三分之一政策”的绝好对象。不过这时，“胜者权利”的意味已大为缓和了。

奥多亚克以防御完善为由也住进了西罗马帝国皇宫所在地拉文纳。对他而言，最理想的就是部下也住在附近。而且，对他们这些日耳曼民族而言，希望在异国意大利扎堆居住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意大利半岛名副其实地实施“三分之一政策”的地方都集中在北部。

如此一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都会被排除在“三分之一政策”的对象之外，从而有失公平。不公在道义上固然不好，作为统治方法也很拙劣。于是，胜者采取了实际上以“地租”形式支付三分之一资产的方法。败者同样必须向胜者提供三分之一的资产，但实际上成为借用这部分资产的形式，败者可以通过支付“地租”后继续经营整个农庄。

由于没有记载，地租金额不详。这些租金似乎都付给了“意大利王”奥多亚克，成为他定期支付给属下士兵工资的财源。

可能有人会想，要支付以前不曾支付的“地租”，对大农庄主来说应该是经济上的打击。

请回想一下，以前由于西罗马帝国无力保护居民不受蛮族侵略，农庄主们只好自行组织自卫团自卫的事实。

如今，他们的安全由“客人”保障。虽然“地租”几何不详，但已无必

要继续保留自卫团。即使保留自卫团，也并非针对大举来袭的大群蛮族，规模只要有能够应付人类社会时时处处都存在的盗贼就足够了。从目前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同样是大农庄主的元老院议员和基督教教会人士，没有一个反对“三分之一政策”。

再说说税制。奥多亚克统治以来，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税制原封未动。然而，西罗马帝国时代常常听到悲叹重税的声音，这在奥多亚克统治下却听不到了。这也许是被蛮族统治之后税负再重也不许发出悲叹之声，也许是征税的蛮族文明程度尚低，离奢侈尚远，尚未横征暴敛。总之，在奥多亚克及以后的狄奥多里克蛮族统治时期没有听到重税的悲叹声，而在后来收复意大利后的东罗马帝国时代却再度响起了这种声音。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意味深长。

这样看，日耳曼人奥多亚克成为“意大利王”之后对现存体制的保留是相当彻底的。

首先，他本人和部下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没有对信仰天主派基督教的意大利人进行任何镇压和迫害。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天主教徒与北非的兄弟不同，没有必要为了守教而当难民。意大利全境的教堂自然和以前一样照样举行天主派的祭祀，天主派教堂并没有因为建设阿里乌斯派教堂而遭到破坏。

而且，奥多亚克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拉文纳的皇宫即现今王宫里的组织体系。以前的皇宫官僚改称王宫官僚便已足够。头目更迭，内部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官职名称也原封不动地使用拉丁语，甚至没有更换的必要。

首都罗马的行政仍由“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负责处理，没有变化。“首都长官”以下各行政方面的公务员，直到下级官员，也都和从前一样继续着同样的工作。

至于元老院，岂止是得到保留，连长期被剥夺的铜币铸造权也得到了承认。帝政以后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规定，金币和银币的铸造权归皇帝，铜币的铸造权留给元老院。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元首制时代终结。

货币铸造权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货币发行权也是权力独立的象征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把与“防线”接壤的国家称为“amicis”（朋友）。这些国家在罗马帝国与位于外侧的敌对势力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在罗马帝国看来，他们不只是“朋友”，还是属国。但光嘴上叫“amicis”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成为事实上的属国之后，其货币铸造权也得到承认。此外，雅典和斯巴达由于过去的辉煌历史，并入罗马帝国之后被称为“自由城市”，享受着特别待遇，她们也一直保持着独自的货币铸造权。货币发行权是自治权的象征。

因此，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的基本货币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和塞斯特斯铜币都是材料价值与面额价值完美统一的优质货币，在罗马帝国全境有着为数众多的货币兑换店。这证明了罗马帝国不论自己的货币如何优质，也没有向其霸权之下的国家、城市和人民强制推行自己的货币。这与其说是尊重霸权之下的国家、城市和人民，不如说是因为尊重了这种自由会更加易于自己的统治。

但是，这样的罗马帝国在4世纪初叶以后彻底改变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开始强化中央集权，元首制时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平衡已然成为过去。罗马帝国也与以前的元首制时代划清了界线，成为绝对君主专制国家。世道变了，货币兑换店也只能失业了。

又过去了250年，到5世纪后半叶，铜币的铸造权又回到了罗马元老院。铜币的背面明确铸有字母SC，证明是元老院发行的货币。很容易想象，元老院议员手拿刚从铸造厂运来的这些铜币会沉浸在怎样的感慨之中？

奥多亚克保留了农庄这个元老院阶级的经济基础，又给予元老院铜

币铸造权，紧紧地抓住了败者中两大势力之一元老院阶级的心。同样，他通过保留农庄和手工业，保障信仰自由，笼络住了另一大势力天主教会。他还通过社会自上而下在全体败者中扫除对蛮族入侵的恐怖，抓住了败者的心。他把“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带给了因失去“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痛苦的人们。

也许是因为奥多亚克对现存势力的保留太过彻底，罗马居民中甚至流传出一则笑话，说连贿赂官员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

分栖共存

奥多亚克毕竟不是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他实施的少数胜者统治多数败者的政策不可谓不明智。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是考虑与败者的“共存”，而并未想到“同化”败者。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胜者日耳曼人与败者罗马人所承担的工作方面。

这一点简单说来，就是军事由蛮族负责，行政和经济等其他各领域都由罗马人负责。日耳曼系蛮族即使拿到土地也不会专司农业，而是领取固定金额的工资，处于随召随到的待命状态。胜者为了保障被统治者的安全，保持常备军事力量是绝对需要的。他们靠武力取胜，并不想放弃武力，也不打算与败者罗马人分享武力。

对这种分工败者一方也无不满。反正罗马帝国军队有名无实，实际上士兵都出身于蛮族，这样的时代已持续很久。在罗马人中，避讳军务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胜者决定军事由自己管理，这在罗马人看来，就等于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别人。但5世纪的罗马人忘记了这个决定所意味的重要性，奥多亚克的决定反倒受到罗马人的欢迎。

在司法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有不同的法律。蛮族之间使用日耳曼法，罗马人之间使用罗马法。只是法律上罗马法相当完备，实际上极

少案例用日耳曼法裁判。

如前所述，行政完全交给败者负责。因为蛮族没有这种组织，不得不全部交出行政权。胜者在行政方面并不插嘴，一定起到了使罗马人忘记自己是败者的作用。

以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胜者与败者“分栖共存”的实际情况。果若如此，共存就有可能。

可是，如果想起罗马人过去在共和政体时代实行的“同化败者”的路线，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会令人印象深刻。罗马人让被征服者以辅助兵的名义，与正规军的军团兵一道参与军事，承担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任务。辅助兵如果服役期满，退役时可以拿到罗马公民权。公民权是世袭权利，他们的儿子就可以报名参加只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才有资格加入的军团兵。如果不选择从军，也可以享受与世代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完全同等的权利。

而且，如果出身于部族长家族或有优秀才能，不必要等到服役期满退伍时才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如果当上辅助部队队长，立即就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可以出席大元帅和军团长主持的作战会议。即使昨天还是敌人，只要敌对关系结束，就会被视为自己人，对其中的优秀人才，还会被给予与本国优秀人才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样，仅在军事方面，同化败者做得就很彻底。罗马人在使用人才方面不分胜者败者。正因如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以《列传》作者而闻名的普鲁塔克断言，罗马之所以强大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对败者的同化政策。

奥多亚克并非不懂利用败者的人才。在很多领域，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组织和官员得到保留，亦即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罗马人也在配合奥多亚克的统治。这与战败后日本当政者配合胜者美国的军政当局对日本进行统治的情况相类似。尽管双方为了在尽可能好的状态下“共存”而合作，但这并不是两者的“同化”。

这种不同似乎并不能归咎于奥多亚克一人。正如尤里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日耳曼民族的统治方式就是在自己与被征服的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之间设置荒地隔离带，除最小限度的需求之外不进行交流。所以，他们原本就不适应罗马人所偏好的“同化”政策。话虽如此，我们很难一成不变地看待日耳曼民族，毕竟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代和与罗马人接触已成家常便饭的公元5世纪情形已经大不相同。

但是，一个民族的本性不会轻易改变也是事实。我们权且认为不变的部分有一半吧。那改变了的另一半大约就是在公元5世纪时日耳曼民族大多改信基督教这一点了。胜者奥多亚克及其部下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败者罗马人信奉的是天主教派基督教，两者都同为基督教这个一神教的信徒。

天主教派信奉神、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说。阿里乌斯教派则认为耶稣无限接近神性但不是神。两派之间的相互责难不是针对“异教”，而是针对“异端”。换言之，这不是信奉的神不同，而是对神的解释不同，是追随同一个神的方式不同。在200多年前的尼西亚公会议上，天主教派被定为正统，阿里乌斯教派被确定为异端。因为都相信自己的主张方为正统，形成了两派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

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同化”。所谓信仰是各人内心的问题，或许只有多神教才有可能把信仰放在一边，在别的方面共同做点大家都能做的事。可以指望一神教徒的，也许“共存”就是极限了。在靠开放政策发展的时代，罗马人是多神教徒。普鲁塔克也是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他积极地认可这种政策的效果。我在考虑，莫非“蛮族统治下的和平”远比“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短命也是因为这种差别？

尽管如此，“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接力的第一棒奥多亚克对意大利的统治持续了17年。奥多亚克自己没有兵力，只能召集蛮族出身的士兵。蛮族集中居住在拉文纳及其附近的意大利东北部，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

连蛮族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在这样的状态下，奥多亚克的统治居然持续了17年。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帝国其他行省常有的被统治者的叛乱，也没有关于难民从意大利东部逃入东罗马帝国的实例记录。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共存”成功了。历史学家给这个时期起了一个名字：“日耳曼——罗马王国时代”。对奥多亚克而言，敌人不在国内，他的敌人正在意大利半岛之外逐渐形成。

狄奥多里克

狄奥多里克于公元454年生于东哥特人族长之家。他与奥多亚克的不同不仅在于年龄相差20岁，还在于他生来就拥有自己的兵力。

东哥特人当时居住于现在的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地区，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缔结了“同盟”协约。所谓“同盟”就是认可其居住地，但需承担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防御作为交换条件的制度。缔结这种协约时，作为惯例需要交出人质以为守约的保证。从前，埃提乌斯作为人质在匈奴人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狄奥多里克从8岁到18岁的10年间，也是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度过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虽是人质，却与大英帝国时代殖民地实力人士的儿子到英国留学没有什么两样。狄奥多里克也是这样，他学文习武，磨砺政治感觉，了解东罗马帝国内情，度过了8岁到18岁这段对人格形成有最重要影响的时光。不仅如此，他还学到了东罗马帝国政策的本质，这就是，尽管与西罗马帝国是同胞关系，但对西罗马帝国命运的关切也只限于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一旦发现这种关切将成为弊害，就会立即舍弃西罗马帝国。

他18岁那年回到故乡，并非因为东罗马帝国与东哥特人之间的“同盟”破裂，而是因为他的族长父亲以自己年迈为由向皇帝提出请求，让

儿子回到身边。两年之后父亲去世。日耳曼系蛮族东哥特人便有了一位20岁的年轻领袖。

东哥特人的年轻族长在东罗马帝国的地位和以前一样，保持了与皇帝的“同盟”关系。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始终是东罗马帝国的忠实“同盟者”，而狄奥多里克却不同。他在与邻近蛮族的战斗中不断取胜，一点点地扩大地盘。他首先入侵多瑙河中游，再把手伸向下游，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也不能小觑的“同盟者”。芝诺皇帝一度被放逐，但仅用一年就得以复位。狄奥多里克为芝诺皇帝夺回皇位助过一臂之力。从此，狄奥多里克的地位便更加巩固。芝诺皇帝因此功绩把“贵族”称号授予了年仅23岁的狄奥多里克。蛮族的年轻族长当上了东罗马帝国的“贵族”。听说皇帝还准许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建造狄奥多里克骑马雕像。

虽然年轻的族长对芝诺皇帝而言是优秀而忠实的同盟者，但也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狄奥多里克甚至曾经率兵从居住地多瑙河下游斜贯巴尔干地区，威逼首都君士坦丁堡。对芝诺皇帝而言，他一步步地转变为一种麻烦。狄奥多里克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现状。

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属下的一个家臣。公元487年前后，狄奥多里克心中萌生了独立的念头，他在33岁时便早早看透了自己在东罗马帝国的前途。

进攻意大利

狄奥多里克想进攻意大利，打倒奥多亚克。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了芝诺皇帝。他一直没有给予奥多亚克正式地位。虽然奥多亚克自称意大利王，但在东罗马帝国看来，他不过是没有得到帝国正式承认而僭坐王位之人。而狄奥多里克则是东罗马帝国的“贵族”，30岁就当上了“执政官”，还是负责后世称为巴尔干地区的东罗马帝国西部“大元帅”。狄奥

多里克进攻意大利，是为了把西罗马帝国从蛮族统治中解放出来，是东罗马帝国承认的军事行动。说真心话，这件事的实质不过是狄奥多里克的“独立欲望”与芝诺皇帝要“赶走麻烦”的两相结合而已。但在表面上，这是把西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从蛮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

在日耳曼民族，最终的决定需要在部族集会上获得同意。公元488年，34岁的狄奥多里克得到了同意。东哥特人连同妇女儿童号称30万人，他们舍弃了房屋，牵着家畜，把眼下的必需品装上货车，一齐离开多瑙河，一路向西。30万的总人数中能打仗的成年男子大概有五分之一吧。即使这样，与奥多亚克的兵力相比也多出一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蛮族有很高的生育率，在统治意大利的15年间，奥多亚克的士兵数量也有增加。双方兵力在数量上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进攻意大利定在第二年，即公元489年。进攻方狄奥多里克35岁，迎战方奥多亚克55岁。

狄奥多里克知道，只要打败了奥多亚克，整个意大利半岛就是他的。他还知道，奥多亚克的根据地在意大利北部。所以，他采取直捣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打法。这种打法类似于只实施局部麻醉，并在麻醉的地方动刀的外科手术。这种战略显然也考虑到了将来胜利之后的情况。

两者之间最初的战斗发生于公元489年4月28日。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巴尔干与意大利之间，索查河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东面流过。战斗在索查河两岸打响。获胜的是狄奥多里克一方。此战并不是决战，奥多亚克和他的大部分军队逃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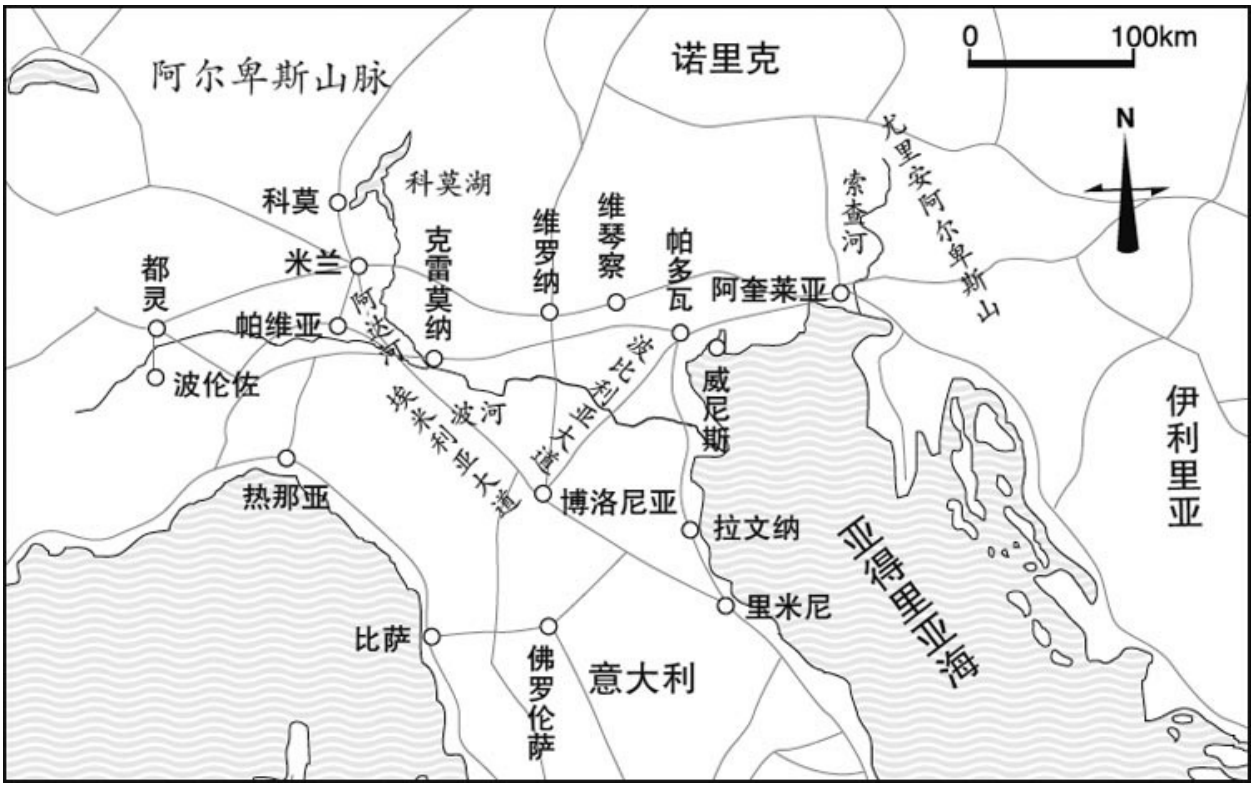
奥多亚克与其说是败逃不如说是撤退，他寄希望于在以维罗纳近郊为战场的第二场战斗中一雪前耻。可是，在一个月之后的第二场战斗中，奥多亚克又打了败仗。但他仍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剩余兵力还很充足。

第二年，即490年8月11日，进行了第三场战斗，战场进一步西移。双方在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经米兰注入波河的阿达河附近展开了激战。奥多亚克又一次败北。这样，狄奥多里克应该已经控制了从西向东横贯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以北的地区。奥多亚克只能逃回离波河的亚得里亚海入海口南方50公里左右的拉文纳。他打算在防御完备的拉文纳坚守不出，继续对狄奥多里克作战。

说起来像是一种悖论，奥多亚克比来犯的狄奥多里克战斗力略处劣势，但在这时却有诸多有利条件。

首先，狄奥多里克是在敌人地盘上作战，奥多亚克却是在自己的领地内作战，不仅占有粮食等物资补给之便，还因统治时间长达15年之久而占有熟稔意大利北部全境地势之地利。

此外，奥多亚克不必担心罗马人会把狄奥多里克和东哥特人的入侵看做摆脱统治的好机会而在各地一齐暴动。罗马人已经满足于“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在“蛮族”之间发生这场战争时，既不会在奥多亚克手下参战，也不会对奥多亚克举起反旗做有利于狄奥多里克的事。不仅居住在已沦为蛮族斗争战场的意大利北部的罗马人抱有这种态度，在风闻战争已经打响的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罗马人也抱这种态度。总之，如今即便是被统治者，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人数也占绝对多数，他们的态度是静观其变。



意大利北部

拉文纳被沼泽和运河所包围，固若金汤。狄奥多里克攻进意大利后不到一年，便称霸意大利北部的北半部分。然而，狄奥多里克凭一己之力要在短时间内占领拉文纳希望渺茫。蛮族不擅长打包围后再行攻城的持久战。这种战斗必须从保障补给线开始，而蛮族重视兵站的思想尚不发达，如果包围战久拖不决，不利的是攻城方，而不是守城方。尽管如此，东哥特人仍然紧跟狄奥多里克。他20岁就成为首领，此后又不断证明了自己的领袖能力。

拉文纳的攻防战实际上超过了两年。现实不允许狄奥多里克只考虑攻占拉文纳。他还必须保障30万东哥特人每日的吃住。将满39岁的狄奥多里克改变了战略。

双方于公元493年3月开始媾和，充当中间人的是拉文纳的主教。奥多亚克与狄奥多里克的媾和达成如下协议：

由奥多亚克和狄奥多里克共同统治意大利全境。

狄奥多里克发誓结束过去4年的敌对关系，不动奥多亚克及其家属以及手下人一个手指头。作为交换，奥多亚克将狄奥多里克及其手下高官迎入拉文纳。

媾和成功！两个月后的5月5日，狄奥多里克只带了一队人马通过左右敞开的大门进入拉文纳市内。从第二天开始连日举行盛宴，庆祝双方的融合。然而，到了第10天，60岁的奥多亚克突然被杀。他的妻子、儿子、手下重要人物在一夜之间悉数被杀。正式公布的理由是奥多亚克阴谋杀害狄奥多里克。但奥多亚克他们是被当即处死的，连逮捕入狱的过程都省略了。奥多亚克的手下知道这个消息后，很少有人离去，几乎全部编入了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也许是他们多为蛮族出身的狼、无家可归的缘故吧。

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说，这只是统治者变换。由于是“局部手术”，战场也只局限在意大利北部的东部地区，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沦为战场的灾难。拉文纳被狄奥多里克原封不动地继续作为根据地，只不过是王宫的主人易人而已。

东哥特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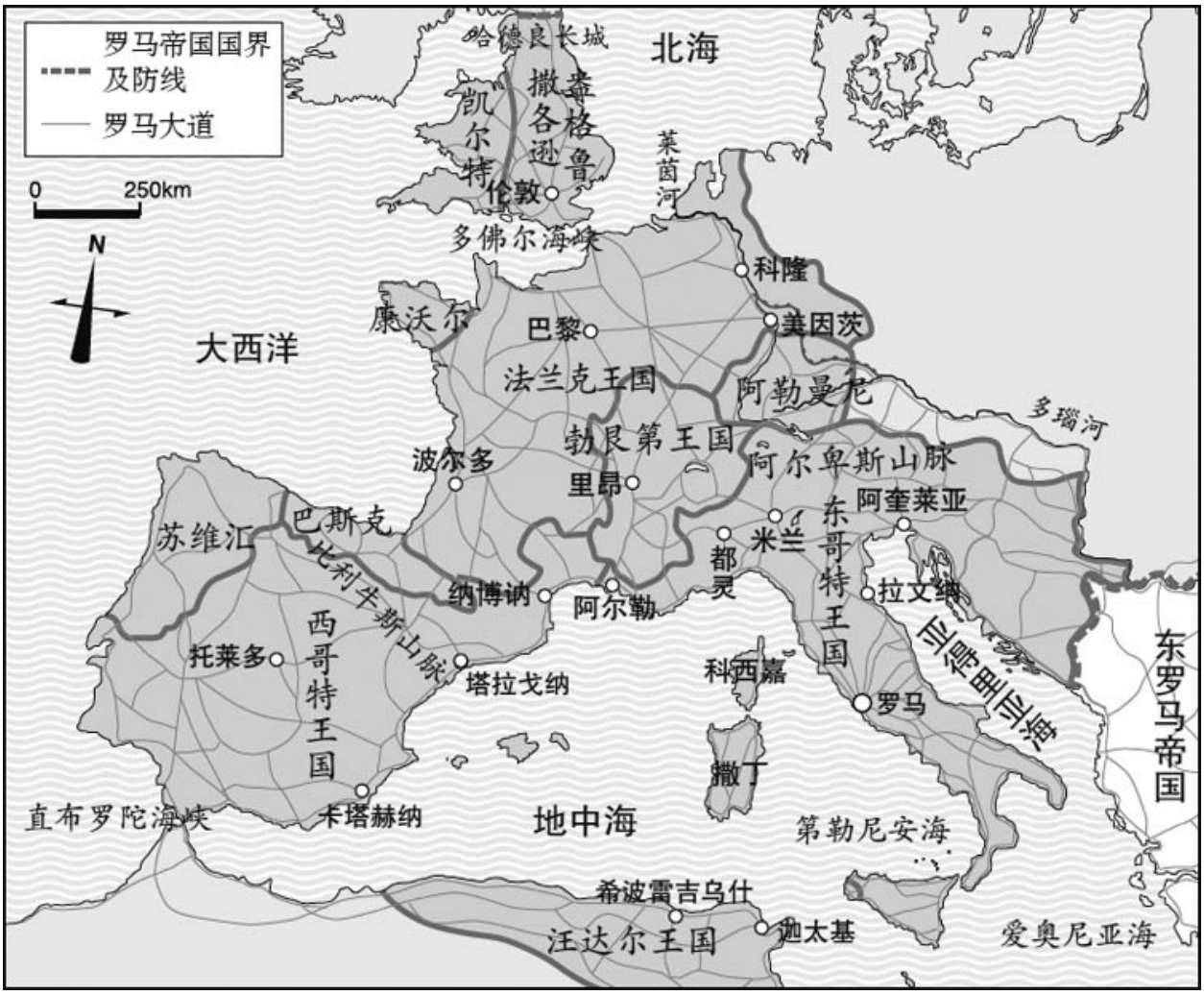
从公元493年39岁除掉奥多亚克开始，到公元526年72岁去世为止，狄奥多里克的实际统治长达33年之久。他能够持续如此长的统治，是因为他虽然消灭了奥多亚克，却没有取消奥多亚克实施了10年以上的政策，而是予以全盘继承。这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罗马人来说，意味着仍然会继续生活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之中。

狄奥多里克全盘继承了奥多亚克的政治，但是人变了，政治色彩也会随之变化。用一句话点评，也许就是政治手段更加精炼。

“客人”与迎进客人的“主人”，这种用“hospitalitas”一词来表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客人”们围绕自己的头目狄奥多里克居住的拉文纳周围，扎堆居住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被统治者来说，统治者仍旧是远方地主，与自己的交集只是向其支付三分之一耕地的地租而已。难道还有比不与胜者频繁接触更能减轻败者罗马人心理负担的事情吗？

狄奥多里克比奥多亚克更严厉地禁止被统治者拥有武器，连护身用的剑也禁止携带，只允许保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刀具之类。作为交换，狄奥多里克及其部下则要彻底保障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安全。狄奥多里克重新整编军队，抛弃了纯东哥特人血统主义，大力接纳日耳曼系民族中其他部族出身的人。但与各部族出身士兵混杂的奥多亚克的军队不同，狄奥多里克军队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东哥特人。所以，狄奥多里克会经常称手下人为“哥特人”，即使他不是哥特人出身。

一般情况下，“哥特人”士兵居住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从事畜牧和耕种。但因狄奥多里克平时也照常发饷，所以一旦发生情况，士兵有义务迅速参战。由于狄奥多里克保障了士兵的定居地和固定薪饷，且不采取纯东哥特人血统主义，当初不足6万人的兵力，10余年间就增加到了20万人。这可不是在无所事事之间的自然增长，出于巩固意大利半岛防御的需要，狄奥多里克把军队扩充到了西部、北部和东部。这20万的数字是已除去了在西至法国南部、北至瑞士、东起布达佩斯直到克罗地亚一线扩张霸权损失后又增长的人数。仅就军事力量和凭此力量得到的地盘看，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王国已经拥有比末期西罗马帝国更大的力量，将更广阔的领土置于自己的霸权之下。问题在于靠什么去维持凭武力获得的领土。在这方面，狄奥多里克也显示出了相当的才能。



公元500年前后的旧西罗马帝国

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半岛的地位与奥多亚克一样，并未得到东罗马帝国的承认。除掉奥多亚克后不久，狄奥多里克也曾向取代芝诺登上皇位的阿纳斯塔修斯皇帝请求正式承认自己的地位。然而，东罗马帝国不希望意大利与自己分离而成为独立王国，但也没有拒绝狄奥多里克的请求。也许是看到了狄奥多里克是东罗马帝国的“贵族”，比奥多亚克温顺。但是，东罗马帝国依然没有承认狄奥多里克，所以他也只能和奥多亚克一样，僭称“意大利王”。

奥多亚克与东罗马帝国之间感觉上始终是相互无视，而狄奥多里克则一直对东罗马帝国皇帝采取尊重的态度。狄奥多里克在做人质期间就

透彻地了解了东罗马帝国，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小觑“东”的军事力量，不能给“东”以行使武力的口实。东罗马帝国人民的天主教信仰，由于热烈而易转为狂热，一旦爆发连皇帝也莫能相逆。如果逆潮流而动，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狄奥多里克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规避这种风险，以防危机被转嫁到自己统治的意大利来。

也是这个缘故，狄奥多里克对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尤为费心。他在长达33年的统治期间发行过多种货币，尽管都是由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发行，但几乎所有货币正面铸刻的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头像。只有看了背面的文字才知道，这是狄奥多里克下令铸造的。铸有狄奥多里克自己头像的货币至今只有一种得到确认。

此外，在与天主教派共存方面，狄奥多里克比奥多亚克花费了更多的心思。他自己一直是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却迎娶了改信天主教的法兰克国王的妹妹为妻。当然，他没有要求妻子改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此外，狄奥多里克的亲生母亲也跟着儿子住在拉文纳，并在那里受到主教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对此，儿子也未加任何干涉。位于王宫的拉文纳主教宝座一直由天主教派占据。

狄奥多里克

表面做派一直像一个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王国，对天主教派基督教徒也很宽容，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为了避免刺激东罗马帝国而采取的策略。这与奥多亚克没有得到承认后始终无视东罗马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哥特人国王还注意建立与不断在旧西罗马帝国各地构筑独立王国的

日耳曼系其他蛮族国王们的关系。他自己娶了法兰克国王的妹妹为妻，他的妹妹和女儿中的两个，甚至还有侄女，都嫁给了这些蛮族王国的国王或王子等为妻。这样，狄奥多里克筑就了与高卢的法兰克和勃艮第、西班牙的西哥特、北非的汪达尔之间的姻亲关系。换成现代话语，这就等于与各蛮族王国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每当这些蛮族王国之间发生龃龉，他都自告奋勇地承担协调的角色，而且协调大多成功。

狄奥多里克一边努力维持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一边试图在西部集结日耳曼民族，形成可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王国联盟的强大势力。为此，狄奥多里克甚至以放弃决定西地中海制海权的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三岛中撒丁、科西嘉两岛的领有权为代价，与汪达尔王国缔结了和平协约。由于这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些居住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及意大利沿海、长期饱受汪达尔海盗之苦的人们，也享受到了“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的恩惠。

利用败者

如前所述，奥多亚克统治的成功，是因为保留了既有势力。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所以长命，原因就在于他不仅原样继承了原有政策，而且执行起来更加彻底。

如果把王宫比做现代国家的首相官邸，那么，用现代话说，负责王宫内部组织的首脑就是日本的官房长官（相当于政府秘书长的官职。——译者注）。在狄奥多里克的整个统治过程中，这个首脑以及这个组织内部各部门的长官，都是由被征服者罗马人担任的。

意大利全境的行政首脑都由执政官担任，而执政官也一直由罗马人担任。于是，15个行省的长官都由罗马人担任，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当时已经允许地方自治，负责自治事务的从上到下全部是罗马

人。总之，军事以外的所有领域，全都让被征服者罗马人去管理。这就是说，进入狄奥多里克统治时代以后，担任军事的日耳曼人和负责行政的罗马人并未混杂在一起，而是分离并存的。

但这既不是混合，也不是同化。其证据如下：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士兵与日耳曼、高卢或西班牙的女子结婚并非罕见，他们之间生下的混血儿作为罗马人养育成人。但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下，听不到哥特人男子与罗马女子通婚的事。哥特人与罗马人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

也许这就是日耳曼人所认为的“共存”。在教育后代方面，狄奥多里克的态度与狂热的天主教徒毫无二致。

要提高解读能力、写作能力和理论能力，无论如何得用开发并完善了这些能力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写的文章作为教材。但是，基督教徒中有很多人认为，孩子通过读这些异教精神产物的书籍学习有受到“污染”的危险。

但身为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的狄奥多里克并没有感到这种危险。狄奥多里克所感到的危险，可能是因接触希腊罗马的书籍，日耳曼的民族精神会受到污染。他可能认为，为了规避这种污染，有必要扬“武”，因而牺牲“文”，这也是不得已之事。

狄奥多里克曾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哥特人希望被当成罗马人，却没有罗马人希望被当成哥特人。”

罗马人如今虽然成了被统治者，但他们从心底里蔑视统治者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担心的是，如果哥特人子弟和罗马人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就会变得罗马化，而非日耳曼化了。

就这样，东哥特人的子弟可以不用上学了。结果不难想象，连自己

的名字都不会写的“统治者”越来越多。于是，为了不签名也能办事，狄奥多里克开始允许各用其“印”。他亲自示范，在公文上不签名只盖印，甚至让人误解他也是文盲。

可是，因为这条禁令，统治者东哥特人变得更加需要被统治者罗马人了。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离开能写文章的罗马人，哥特人什么事都办不成。历史的变化有时起因于只能付之以苦笑的无聊琐事。这里就是一例。

可见，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环境里的重要性，由于他们是败者而越发饶有兴味。卡西多里乌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忠臣卡西多里乌斯

卡西多里乌斯，生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时间是西罗马帝国悄无声息地灭亡3年之后的公元479年。他的家族属于元老院阶级，是地方上的大农庄主，也是逼迫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奥多亚克决定保留的既有势力中的一员。从父辈开始，这个家族就已经接受奥多亚克的旨意，为其统治提供合作。卡西多里乌斯的父亲在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王宫供职，长期没有回过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家。

公元493年统治者变为狄奥多里克之后，卡西多里乌斯的父亲也没有改变与哥特王国合作的态度。他在狄奥多里克打退汪达尔人，确立在西西里岛的统治地位时开进西西里，全面重组了行政组织。以后，他继续配合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甚至担任了意大利南部的官选长官。

卡西多里乌斯出生时，西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他有着那样的父亲，所受教育与罗马帝国时代的精英一样，学的是使用希腊罗马教材的“素质教育”。也许和当时许多青少年一样，他在首都罗马接受了成为精英所必需的教养。

对如此成长起来的卡西多里乌斯来说，蛮族统治的现实从降生起就司空见惯，而且父亲又是一位与蛮族合作的人。因此，从年轻时起，卡西多里乌斯对蛮族统治就完全没有偏见。不仅是他，可以认为当时很多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人也都一样。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由谁统治，而在于如何统治。

公元500年，卡西多里乌斯20来岁，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也进入了第7个年头。这年，狄奥多里克首次访问了首都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们来到城门，迎接这位哥特人国王，市民们夹道欢迎，就像他们以前欢迎皇帝一样。

年已45岁的狄奥多里克也像是皇帝的做派。他向聚集在古罗马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厅的议员们发表演讲，然后来到外面，站在讲坛上对聚集而来的市民发表演说。他使用的是拉丁语，尽管也许不如希腊语那样擅长。而且，在长达6个月的逗留期间，他住在建在帕拉蒂尼山上、当时还足可使用的皇宫里，精力充沛地遍游了曾经的“世界之都”。

狄奥多里克不仅游览了古罗马广场，还游览了皇帝们的讲坛、图拉真记功柱、庞培剧场、罗马竞技场等。尽管自己是基督教徒，他还参拜了建于卡匹托尔山上的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当然，与其说是参拜，不如说是参观。他甚至远足郊外，参观水道桥。就像后世造访罗马的德国、英国的观光客一样，他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究心。

这些巡视不单单是走马观花，发表些感叹言论，在他认为有必要修复的地方，他便当场决定拨付所需经费。这些地方不是基督教的教堂，而主要是过去罗马皇帝都很重视的上下水道、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年轻的卡西多里乌斯受到感动。随着狄奥多里克在罗马逗留时间的流逝，一个地道罗马人当初对他的好奇变成了赞叹。

不过，过去的皇帝受到市民欢迎之后，要向市民提供以角斗士比赛、战车比赛等为主的娱乐节目。狄奥多里克十分想继承这些传统，但

自一百年前基督教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来，通常在罗马竞技场进行的角斗士比赛因过于残酷而不再进行。于是，他决定进行同样受老百姓欢迎的战车比赛。

但战车比赛也已经不似往日那样，是由豪华快速的四匹马拉战车赛跑定胜负的竞技了。到眼下这个时代，最好的也只是两匹马拉的战车了。地点也许像往日一样在大竞技场，也许在久已停止角斗士比赛的罗马斗兽场。卡西多里乌斯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人们不知道确切的地点。但战车比赛确实是在这二者中的一处举行的。这样一来，罗马老百姓对哥特国王的亲近感变得无以复加。

就在这一年，或是第二年，还只不过是年轻学子的卡西多里乌斯写了一篇赞美狄奥多里克的诗篇，赠给了这位国王。说白了，这就是一封“粉丝”写的信。狄奥多里克也许看到了这封信。狄奥多里克一打听，这人的父亲还是不遗余力与自己合作的人。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卡西多里乌斯30岁那年，狄奥多里克授予这位年轻人“贵族”的称号。形式上卡西多里乌斯位列“贵族”，但这强烈地意味着他被授予担任国家要职的资格。于是，从这时起到狄奥多里克去世的17年间，卡西多里乌斯将自己30岁到47岁这一段男人最可宝贵的年华交给了大他25岁的狄奥多里克，为他的统治提供合作。在这17年中，卡西多里乌斯历任所有要职，包括担任执政官。

我们后世能够追溯卡西多里乌斯的任职经历，是因为他一直在狄奥多里克的身边担任秘书官。这个时期卡西多里乌斯的工作是记录哥特国王发出的种种口头指令并予公布。这些口头指令的日耳曼色彩太浓，需要通过改写，使之富于罗马色彩才能发布。卡西多里乌斯引退之后以“杂记”（*Variae*）为名把这些指令汇编成册，这才使我们在一千五百年后的现代得以追忆往事。阅读此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统治者的命令往往语气严厉生硬，而在卡西多里乌斯的笔下，这些布告会变得如此稳重温和。

这不过是一条让人把亚得里亚海深处伊斯特拉半岛的农产品送到狄奥多里克所在的拉文纳的命令，经卡西多里乌斯之手后成为下面所引的样子。顺便一提，当时接受命令的一方是威尼斯共和国。他们一百年前从侵占意大利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手中逃亡出来，不得不在浅滩上建起了自己的城市，后来却成了海洋国家之雄。

如所周知，今年伊斯特拉半岛获得了丰收。请考虑将那里出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运到拉文纳来。你们拥有众多船只，一定能够安全运送伊斯特拉居民交来的农产品。你们可与他们对半平分这件工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只有双方合作，这件事才能做好。

请你们马上开始这次短程航行吧。你们惯于远航，这次航行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度，来往于各家各户之间。你们不一定要走海路。如果海里风大浪高，还有河川可走。根据你们的判断，选择你们认为更加安全的航路。

想到你们的家园是如何建成的，对我而言是多么美好的一种享受。威尼托地区过去（指罗马帝国时代。——作者注）曾以涌现出许多才华横溢、品行高尚的人才而闻名。这里南接拉文纳和波河，东接亚得里亚海沿岸美丽的海滨。大海潮涨潮落，陆地时开时合。你们的家园就像水鸟，时而漂浮在海面，时而休憩于岩石之上。这些并非自然使然，而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所拥有的丰富食粮只有鱼儿，不分贫富，平等分食。你们的房子几乎都是同样的规模和造型。这些使你们远离羡慕邻居这样的世间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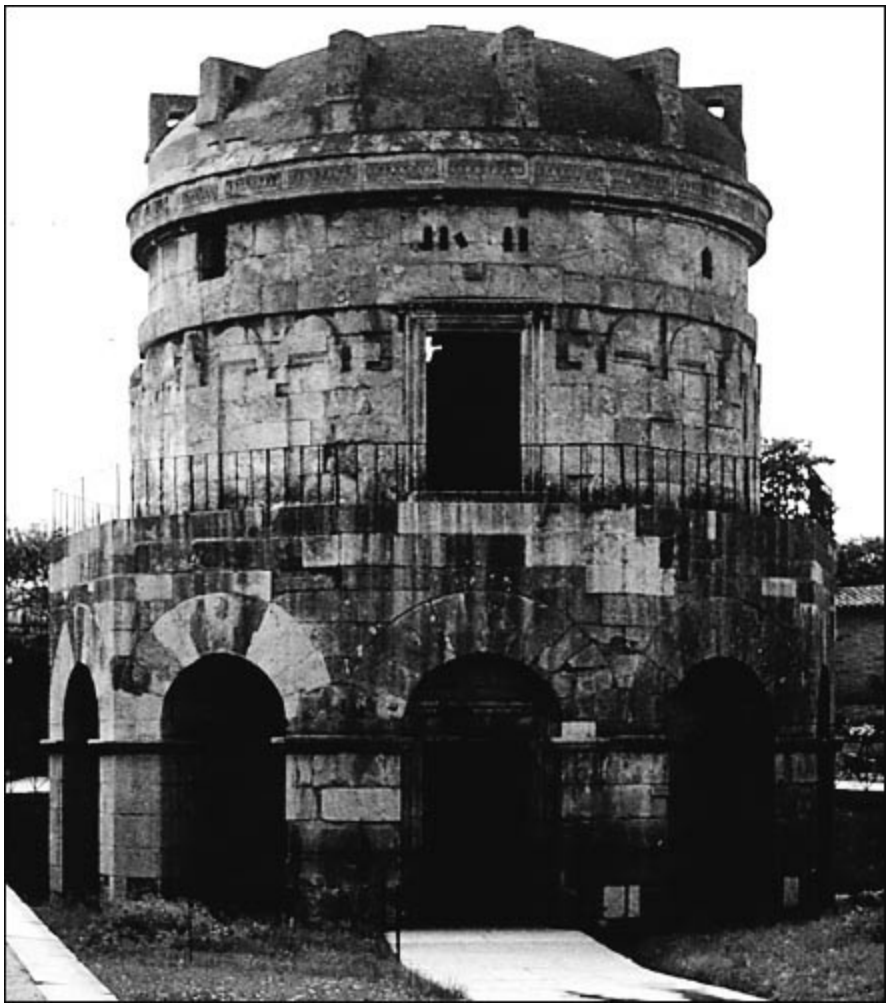
你们居住在威尼提亚（现在的威尼斯），开发盐田是你们的主业。别处的人们在田间挥锄舞镰，你们却是舂臼磨盐。没有黄金你们也能活下去。可是，谁都需要可以保存食物并使之鲜美的食盐。正因为如此，你们能够靠卖盐而换取其他必需品。

来吧，准备好你们的船只。把船拴在你们的家门口，就像把家畜拴在屋边一样。我已经派遣精于此事的劳伦提乌斯去了伊斯特

拉。他收集好农产品后，就请你们开始运输，希望不会因为什么障碍和经费等原因而有延误。希望全体人员共同努力，把农产品早日运到拉文纳。

不论政治、军事还是行政，人世间许多事情都与“苦”字如影随形。所以，要求民众做事的为政者所必需的资质，不是把“苦”花言巧语地说成“乐”，而是要设法让民众在虽“苦”尤乐的心情中做事。我认为，卡西多里乌斯是狄奥多里克统治的最高发言人。相对少数的日耳曼民族的统治得以持续，而相对多数的罗马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叛乱。这里不仅仅因为统治的内容好，还因为统治的表达也好。不仅是录用人才，使用人才的能力也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资质。这种资质是一个人的美德（virtus），与他所属的人种、民族和宗教无关。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在奥多亚克统治下持续了17年，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下又持续了30年，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加起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50年来，意大利半岛不再担心蛮族入侵，还能享受到令人满意的善政，自然在各个方面恢复了生气。虽说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资产，但支付租金就能继续使用。因为要付地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荒废土地。人口是减少了，但正因为如此，才会想着用好现有的人。这样就搞活了意大利半岛全境的人和耕地这两个要素，自然提高了生产率，靠着“蛮族统治下的和平”，农产品的流通也得到了恢复，意大利的经济再度上升。就连不断减少的人口，也恢复到两个世纪前的情形，呈上升趋势了。这证明了“和平”才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基础。



位于拉文纳的狄奥多里克陵寝遗址

有一位名叫普罗科皮乌斯的人，与狄奥多里克是同时代人，但年龄要小50岁左右。他是希腊人，出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希腊人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国民。从普罗科皮乌斯的角度看来，始终与东罗马帝国保持着微妙关系的狄奥多里克是“敌人”。普罗科皮乌斯是东罗马帝国的官僚，还是天主教徒，对他而言，狄奥多里克不放弃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信仰，在这层意义上他也是“敌人”。普罗科皮乌斯对狄奥多里克有下面的评价。

普罗科皮乌斯仰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自身也是一位重视历史叙述客观性的史学家。与其说他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

家，不如说他是古代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他留下了《哥特战记》等众多著作。普罗科皮乌斯在狄奥多里克去世时这样写道：

> 东罗马帝国给他的名称只是专制君主，但实际上他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他是一位比帝国后期登上皇位的任何人都有资格称为“皇帝”的领袖。他的统治富有人情味，不仅获得了同胞哥特人的信赖，而且获得了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的信赖。狄奥多里克去世时，不分统治者被统治者，也不分哥特人罗马人，大家都流下了哀伤的泪水。

狄奥多里克于公元526年8月30日在拉文纳去世，享年72岁，死后埋葬在事先建造的陵寝中，至今仍能供人瞻仰。

但是，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并非始终一帆风顺。晚年的数年中，没有预料到的不顺事件让年老的国王烦恼不已。所谓不顺，固然有狄奥多里克自身变得过度焦虑的原因，但更多的原因是连具有他那样德行的人也无可奈何的历史背景。

“东边”的长手

西罗马帝国存在的时候，和东罗马帝国一样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国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者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是阿里乌斯派，而被统治者是天主教派，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从信仰正统与否的意义方面来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打成“异端”而一直受到排斥的人一直统治着这里。

要把自己信仰以外的所有宗教都打成“异端”予以排斥的想法，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要比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更为强烈。阿里乌斯教派的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对其统治下的意大利天主教徒的信仰未进行任何干

涉。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虽然同为基督教徒，但阿里乌斯教派有肚量承认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北非属于例外。天主教国度北非在被阿里乌斯教派的汪达尔人征服以后，一直受到天主教徒迫害的“异端”多纳图主义者加入到了统治者一边，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西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因为彻底贯彻了米兰主教圣安布罗西乌斯的振兴措施，居民成了清一色的天主教派基督教徒。意大利半岛在帝国灭亡后成为“异端”统治的国家。不过，在意大利，身为天主教徒的罗马人却不遗余力地配合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蛮族进行统治。卡西多里乌斯也是一位身为天主教徒却一直与狄奥多里克合作的人。50年过去了，上至元老院议员、国家公务员，下至老百姓，并没有对这种“正统”与“异端”的共存感到任何不便，甚至有过这样的事情：在选举罗马主教（现已是教皇）时，候选人之间发生纷争无法收场，天主教派的罗马教廷请求狄奥多里克出面协调。于是，决定天主教主教的选举由于狄奥多里克的协调而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半个世纪里，意大利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尽管这是为了不刺激天主教派势力强大的东罗马帝国而采用的策略，但天主教派与阿里乌斯教派的共存是成功的。

然而，既然宗教、信仰之类是不属于理性范畴的事物，就必定会出现一些人，他们会认为仅仅“没有什么不便”的共存是违反神意的背信行为，必须予以弹劾。对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接受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就是背信行为，只有排除这种统治，回归到坚持基督教真正教义的天主教派的立场，才是接受神意的生活。

这种人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0年间一直存在，但没有一次成为多数派，在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统治的天主教会中一直处于孤立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不听他们的主张，而只是因为东罗马帝国优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余力考虑打着打倒阿里乌斯教派的旗号进攻意大利。可是，到了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接近尾声的公元525年前后，东

罗马帝国的情况开始改变。现任皇帝查士丁的外甥、被视为下任皇帝的查士丁尼在东罗马帝国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大。

有一位名叫波伊西乌斯的罗马人，和卡西多里乌斯一样不遗余力地配合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两人年龄也相差无几。但无论是出身还是资产，他都优于卡西多里乌斯。他属于罗马第一富豪艾妮希亚家族，与堪称罗马元老院阶级“门面”的西马库斯家族关系深厚。他早年丧父后一直由西马库斯家抚养，后来又娶了西马库斯的女儿。总之，在成为被统治者的罗马人中，他是一位“代表选手”。

此外，他还是一位拥有符合其身份的学识和教养之人。虽然身为天主教徒，却有着穷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强烈欲望，在这方面著述颇丰。他也和卡西多里乌斯一样，被狄奥多里克封为“贵族”以后历任国家要职，一直是狄奥多里克信赖的有能力的家臣之一。

自称“意大利王”的狄奥多里克重视在与自称“法兰克王”、“西班牙王”的日耳曼系蛮族出身的国王之间构筑友好关系。他听从波伊西乌斯的进言，选拔优秀的竖琴演奏家作为礼物送给法兰克国王，又挑选日晷和滴漏赠送给勃艮第国王。对狄奥多里克而言，波伊西乌斯是可胜任官房长官的重臣，同时也是负责外交的辅佐官。波伊西乌斯一方面协助这位蛮族出身的国王统治意大利，另一方面也花精力投入古典研究。卡西多里乌斯留有赞赏波伊西乌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对日耳曼系的国王狄奥多里克而言，罗马人卡西多里乌斯和波伊西乌斯是不可多得的优秀而值得信赖的合作者。

可是，延续了20年之久的良好关系到了公元525年突然瓦解。那年，有一位名叫亚尔比努斯的元老院议员被告发，说他密通东罗马帝国皇帝，策划为把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从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进攻意大利。秘密调查者称发现了确凿证据。但证据及其真伪不详，甚至搞不清究竟亚尔比努斯只是在脑子里想过让东罗马帝国解放意大利的天主教会，还是已经与东罗马帝国有实际行动。

但是，由于事关元老院议员，就不能草草了事。狄奥多里克在统治意大利时把保留既有势力作为第一政略，而且坚信这一政略已获成功。对他而言，这个问题尤为重大。于是，全体重臣被召集到正在帕维亚的狄奥多里克身边，似乎要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重大问题，而不像是要诉诸审判。事件就发生在这时。

当时有一个官名，叫“magister officiorum”，地位类似内阁官房长官。担任这个官职的是波伊西乌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对这件事了解到什么程度，总之，这位波伊西乌斯在狄奥多里克面前为亚尔比努斯进行了大胆的辩护。他说：

> 如果亚尔比努斯有罪，那我也是同罪，全体元老院议员也都是同罪。而如果亚尔比努斯无罪，我和其他元老院议员也都无罪。

但是，波伊西乌斯接着说出了这样的话：

> 不过，就算我知道亚尔比努斯策划了这个所谓的阴谋，我可能也不会报告。

这句话激怒了年过七旬的狄奥多里克。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年老焦虑，还是因为被所信赖的人背叛，或是因为对过去30年一直避免刺激东罗马帝国的努力就要因为一小撮狂热分子前功尽弃而感到愤怒，也许这些原因兼而有之。尽管这只是一个名叫基普里安的间谍带来的消息而已，这时却被当成了可信度极高的情报。

然而，结果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不仅亚尔比努斯获罪，波伊西乌斯也被定为同罪，被幽禁在帕维亚的一座高塔中，既未审判，也没有立即处决。幽禁持续了一年。在幽禁中，波伊西乌斯撰写了题为“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的作品。在他为数众多的作

品中，这部著作最为读者所喜爱。

第二年，即公元526年，波伊西乌斯被处以斩首刑。这年8月末狄奥多里克就已去世，没有人知道对波伊西乌斯的死刑执行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

45岁的波伊西乌斯思考着哲学的慰藉赴死，而狄奥多里克则是在33年的统治之后才走完了自己72岁的人生。可是，他死得安心吗？他步入老年还在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态度。自己后继无人，这也在行将就木的狄奥多里克心中投下阴影。

狄奥多里克有女儿，却没有儿子。他把一个女儿阿玛拉桑夏嫁给一位同为东哥特人的男子，想把这个男子立为接班人。但这个名叫尤塔里克的男子偏好纯日耳曼血统主义，厌恶罗马人，且毫不掩饰。对靠与罗马人共存而生存的东哥特王国来说，他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继承者。这在一段时期里成了狄奥多里克的心病。幸而这位纯日耳曼血统主义者很早过世。可是，他与阿玛拉桑夏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继承狄奥多里克，但他年纪尚幼，实际统治只能由母亲阿玛拉桑夏代劳。然而，哥特人非常厌恶女人的统治。

继承人的重要性在于，他决定了以往成就的业绩今后是会发扬光大，还是会损失殆尽。可以想象到72岁去世时狄奥多里克内心的抑郁。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做了10年的人质，尽管那时年纪尚幼，但已对东罗马帝国的一切了如指掌。正是这样，他也许早已看到了这只从东边渐渐伸过来的长手，尽管眼下还影影绰绰。这时，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还只是一位对皇帝有影响的人。然而，狄奥多里克死后仅一年，他就正式登上了皇位。

“蛮族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

卡西多里乌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协助狄奥多里克进行统治。随着狄奥多里克的故去，这一切也结束了。但卡西多里乌斯没有回意大利南部的故乡，而是继续留在了北部的拉文纳，为的是帮助继承王位的狄奥多里克10岁的外孙子阿萨拉里克及其母亲阿玛拉桑夏进行统治。这个决断在因狄奥多里克的死而声势日隆的天主教徒中，也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作为回报，少年国王和他的监护人母亲也把王国最具实权的地位给了卡西多里乌斯。这个地位就是我意译为“内阁官房长官”的“magister officiorum”。波伊西乌斯被处死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狄奥多里克临死前在病榻上向东哥特人重臣们表明了要让10岁的阿萨拉里克继位的意愿，并让他们宣誓效忠。新国王在狄奥多里克去世的8月30日即位。这件事通报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及西方各蛮族王国的国王，并得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承认，条件是要臣服于东罗马帝国。这样，尽管阿萨拉里克只有10岁，但他的王位在公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发生在私的方面。但在哥特人的实力派看来，国王的事根本不是私事。

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桑夏是新国王的母亲，她想让儿子接受罗马式教育。所谓罗马式教育，就是以希腊罗马的经典为教材的素质教育，是成为精英所必需的教养。然而，哥特人的重臣以狄奥多里克生前认为哥特人弟子没有必要上学为由，断然反对她这样做。他们认为哥特人国王只要习武就已足够，把孩子与母亲分开。10岁的少年国王被抛入了日耳曼式的蛮猛生活之中。也许是对这种生活的不适应和对母亲的依恋侵蚀了少年的心，不久，阿萨拉里克就得了心病，8年后便像被遗忘一般地死去。

阿萨拉里克

狄奥达图斯

尽管阿萨拉里克只是形式上的国王，可他一旦亡故，以他的监护人资格进行统治的阿玛拉桑夏便处境微妙。她成功地让哥特人的家臣们承认了她的女王地位。可以想象，她所依靠的也许就是卡西多里乌斯这种政权内部尽心尽力的罗马人。不过，在厌恶女人掌权的社会中，仅仅这样还不能让人放心。于是，阿玛拉桑夏与哥特人实力家族出身的狄奥达图斯再婚。

狄奥达图斯喜欢别人用罗马式的发音念自己的名字。在哥特人重臣当中，他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喜好希腊哲学的罕见人物。据传，这就是38岁的女王阿玛拉桑夏选他为夫的原因。当时，38岁的年龄已不能指望生儿育女。也许出于这个原因，阿玛拉桑夏不能完全信任这位丈夫而心怀不安，于是她便去接近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阿玛拉桑夏说不定也是从阿里乌斯教改信天主教的。狄奥多里克连自己亲生母亲改信天主教都没有当回事，对女儿改教可能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自己的女王接近东罗马帝国招来了哥特人重臣的愤慨。狄奥达图斯对他们的愤怒再不能熟视无睹，便将东哥特王国的正式女王、自己的妻子幽禁在湖心的岛上，并指使人杀害了她。

很明显，这给已经即位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提供了进攻意大利再好不过的借口。事前似乎未被告知的卡西多里乌斯赶紧忙于应对紧急事态。他说服了狄奥达图斯，让他派出急使，带去信函，发誓绝对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卡西多里乌斯脑子里想的只是制止战争这一件事。为了使意大利半岛免遭兵燹之灾，他就像先前帮助阿玛拉桑夏一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杀害了阿玛拉桑夏的狄奥达图斯。

可是，哥特人内部对狄奥达图斯的非难四起。重臣们也都责难他腰杆不硬，士兵清一色地认为东罗马帝国不足畏惧。狄奥达图斯被逼退位，维提吉斯被选为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维提吉斯一直并不怎么出色，但在士兵中拥有极高的人气。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536年秋天，狄奥多里克已去世10年。

学园

此后，卡西多里乌斯似乎退出了与拉文纳皇宫直接有关的公务活动。自从开始协助狄奥多里克统治的生涯以来，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的罗马人精英一直生活在意大利北部。他好像已经参透皇帝不会再让自己做什么事了，于是回到了意大利南端，那里的太阳慷慨地把自己的光热洒向大地。他即将年届六旬。

他原本出身于一个拥有广阔领地的家庭，罗马时代的庄园也是农牧业的生产基地。他有足够的财力在田园农庄里欢度自己的余生。可是，卡西多里乌斯没有选择像一位同僚在西西里拥有的那种奢华的田园生活。引退后，卡西多里乌斯只是让人在领地斯奎拉切的山丘上建造了一座面积仅够自己和志趣相投的几个人生活之用的小修道院，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又建造了一所取名为“Vivarium”的学园。

“Vivarium”的词义为苗圃或鱼塘，但里面培养的并不是草木和鱼，

而是人。大家同食共寝，学习的内容涉及以希腊罗马经典为教材的素质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领会自由精神所必需的学问。城邦鼎盛时期的希腊人最早领悟到开办这种学园的必要性。拉丁语中的“schola”、意大利语中的“scuola”和英语中的“school”都来源于希腊语的“schole”。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原义，就是提高充分发挥每个人精神力量所需要的技能。

卡西多里乌斯设立“鱼塘”，其目的也是成为这个意义上的“学园”。所以，这里的学习重点是文学、哲学和音乐，而不是其他学校所重视的修辞学。也许是这里并未把培养能在公职社会中获得成功的人才作为目的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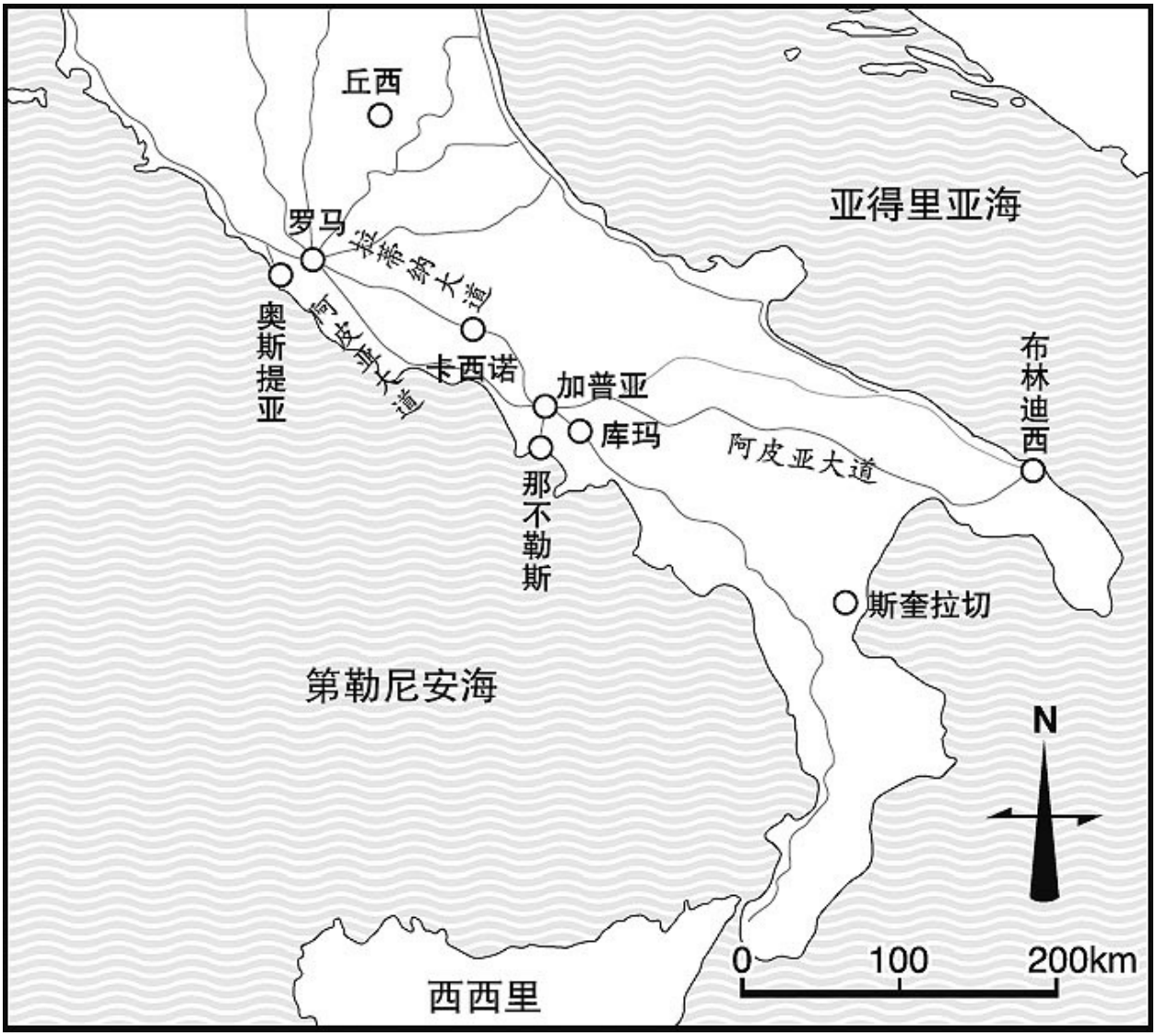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为什么医学会受到重视，要从希波克拉底学到盖伦、塞尔苏斯，就像一所培养有深厚教养的医生的学校。我甚至认为，这里是“universitas”（大学）发达以前，欧洲最早设立的医学院——“萨莱诺医学院”（Schola Medica Salernitana）的先声。顺便说一下，萨莱诺医学院里使用的语言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教师学生均无宗教与民族之别。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其光芒也会照耀到每个角落。

既然是“学校”，在卡西多里乌斯设立的“鱼塘”里也有收藏卷轴的图书馆。在那个时代，只要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就足够了。卡西多里乌斯投入了全部私人财产，创立了发挥这些设施的功能所不可或缺的财团组织。这也是度过了大半人生的一位实干家的创见。

修道院

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位出身于丘西乡下贵族家庭的人，名叫本笃，与卡西多里乌斯完全是同时代人。在历史上，他以“圣本笃”的名字广为

人知。他年轻时就进了修道院。这意味着，即使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他也可以不受妨碍地信奉天主教。在卡西多里乌斯设立“学园”的同时，本笃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上设立了修道院。不过，与卡西多里乌斯的“鱼塘”不同，这里是纯粹的修道院，在绝对服从的前提下，修道士们每天祈祷和劳动，过着集体生活。



意大利南部

本笃是革命的，他颠覆了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整日冥想、与世隔绝的东方修道士形象，创造了积极与世俗接触的修道士形象。本笃认为，耶

稣的十二门徒也重视劳动，各司其职，例如就有人以打鱼为业。他的这一认识也体现在修道院建于何处这件事上。

连接罗马与那不勒斯的大道有两条：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卡西诺山位于拉蒂纳大道沿线。如今，罗马至那不勒斯的普通列车仍然停靠卡西诺站。本笃把修道院建在沿干线公路的山丘上。后来，只要说到卡西诺山，意思就是本笃修道院。说是“山”，其实就是略高些的山丘，那里原来建有供奉罗马诸神的神殿。罗马人从来不在与人界隔绝的地方建造神殿。他们认为，只有人们方便参拜才是神殿。本笃在神殿的废墟上建修道院意图很明显，在与人界接触的地方，神殿成为修道院的教堂，仅此而已。此外，要出售农产品这些劳动成果，也需要与人界接触。

本笃（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普列斯科画）

本笃不仅描绘了修道院应有的样子，还确定了修道院的全天作息时间。黎明起到上午10点是劳动时间。10点开始到中午是扬声祈祷的时间。其后便是简单的午餐，休息到下午3点。在这段时间里也允许祈祷，但只可默祷。下午3点到日落时分又是劳动时间。日落之后是晚餐时间，然后就寝。在点灯很昂贵的时代，日落而息在宗教界和世俗界都是一样的。

“学园”和“本笃修道院”的日常生活都是禁欲主义的。但两处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是劳动。卡西多里乌斯学园的学生不靠劳动挣取自己的伙食费。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建立了财团组织。

第二是祈祷。在卡西多里乌斯的学园里，读书是名副其实的阅读书籍，而在本笃规定的修道院作息时间表上的“读书”，则是阅读以《圣经》为主的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必须出声朗诵。这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祈祷”，就像高声诵读《古兰经》的少年，他们并不是在读书，而是在祈祷。

第三个不同是，本笃修道院集体生活的大前提是“绝对服从”，这与卡西多里乌斯“鱼塘”里的自由精神和在此基础上活跃的思想交流恰恰相反。

不过，本笃的这座修道院因有这些情况而特色明显，后来又把抄写希腊罗马的著作列为“劳动”，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榜样。不仅在意大利，在欧洲各地也建了很多这样的修道院，成为中世纪时代精神的一大堡垒。

很多修道院一直延续到现代。与此相反，卡西多里乌斯的“鱼塘”却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这是因为本笃的修道院与时代契合，而卡西多里乌斯的学园却与时代不相吻合。

就在卡西多里乌斯建立“学园”、本笃建立“修道院”的同一个时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29年宣布废除位于希腊雅典的学园（Academia）。

这座由柏拉图创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最高殿堂，在罗马时代已成为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名声显赫，地位从未动摇过。就连罗马统治者的子弟也要去留学。现在，这座雅典学园也结束了它长达900年的历史。那种认为怀疑是人类“美德”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服从的时代。被查士丁尼大帝废除的学园不得不等到一千年后的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由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再次复兴。

查士丁尼大帝

假设伯父没有当上皇帝，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会不会成为被人称为“大帝”的历史人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可是，如果要问他是否充分利用了伯父成为皇帝这个幸运机会，答案却很简单。查士丁尼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农民家庭，但他不必像出身于同样环境中的其他许多年轻人那样，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从军或者当官。他只要为当上皇帝的伯父帮帮忙就行了。

伯父查士丁似乎是因在军队里勤奋尽职，结果皇位从天而降。这位并未建立辉煌功勋的人能够当上皇帝，是因为前任皇帝去世后候选人众多，这些高官之间的争斗不可调和。于是查士丁把皇位搞到了手，让人觉得他是钻了空子。称帝后，他立即把竞争者赶尽杀绝。

那年，侄子查士丁尼已经34岁。没有人知道他34岁之前的经历，很可能碌碌无为。他被刚刚称帝的伯父任命为可说是秘书官的“随员”（comes），从此，他在伯父身边如鱼得水。尽管查士丁的统治始于残酷杀戮全体竞争者，但他9年的统治安稳得出乎意料。据信这也有赖于侄子的谨慎照料。

查士丁尼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没有从军经验，也毫无从政经验。他极不好动，可以说一步也不曾离开过首都君士坦丁堡。尽管如此，在必须对重要事件下决断时，他却能作出相当恰当的判断。伯父查士丁的统治从查士丁尼34岁开始到他45岁，一共9年时间。且不说前几年，据说后面6年的实际统治都是皇帝的侄子所为。

此外，查士丁尼身上还有不拘传统习惯的一面。他爱上一个名叫狄奥多拉的舞女。东罗马帝国禁止元老院议员与下层出身的女人结婚。查士丁尼也是元老院议员，但他竟为娶到美丽好强、魅力四射的女子而修改帝国法律。当上皇帝之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仅把狄奥多拉当做妻

子，还强行将她立为几乎与皇帝同等资格的皇后，使重臣们瞠目结舌。

尽管这样，皇宫里的重臣和元老院议员对查士丁尼评价颇好。公元527年春，查士丁皇帝病倒。元老院和皇宫联合向卧病的皇帝请求，让他的侄子查士丁尼担任共治皇帝。4月4日，查士丁尼成为共治皇帝。8月1日，查士丁皇帝去世，查士丁尼成为独立皇帝，这年他已经45岁。皇帝生涯的开始似乎晚了些，但查士丁尼活到83岁，其长寿在当时的领袖中实属罕见，他的统治长达38年。

查士丁尼看上去不爱好学艺，但对罗马的历史抱有强烈的兴趣，不过那是“查士丁尼式的罗马史”。伟大可以引起他的兴趣，但他对这种伟大构筑在什么社会结构之上毫不关心，这一点他不像元首制时代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出生在欧洲与亚洲交会的巴尔干地区，以后也只知道君士坦丁堡，是一位东方式的皇帝。他脑子里的罗马帝国，终究是一个信奉天主教派基督教的所在。

罗马帝国的皇帝被后世尊称为“大帝”的只有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三人。由于后世已是清一色的基督教时代，所以是基督教教会给了他们“大帝”的尊称。这意味着这三位皇帝都得到了基督教教会的喜爱和认可。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所述，君士坦丁是最早正式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没有他所施行的众多优惠政策，就没有后来基督教的飞速发展。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所述，狄奥多西皇帝只把天主教派基督教当做正统，而把其他宗教统统列在“异教”名下加以排斥。他不仅把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斯教派和多那图主义者的信仰作为“异端”，还要作为邪教加以排斥。在被认定为唯一正统基督教的天主教徒看来，狄奥多西有足够的资格被授予“大帝”的尊称。

查士丁尼好像对这二人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们是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前的帝国皇帝。而查士丁尼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西边被割给日耳曼系蛮族的王国之后，于公元6世纪当上皇帝的，统治的不过只是帝国的东部而已。

查士丁尼

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提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功绩时，一般举出下面三项：

一、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

二、编纂《罗马法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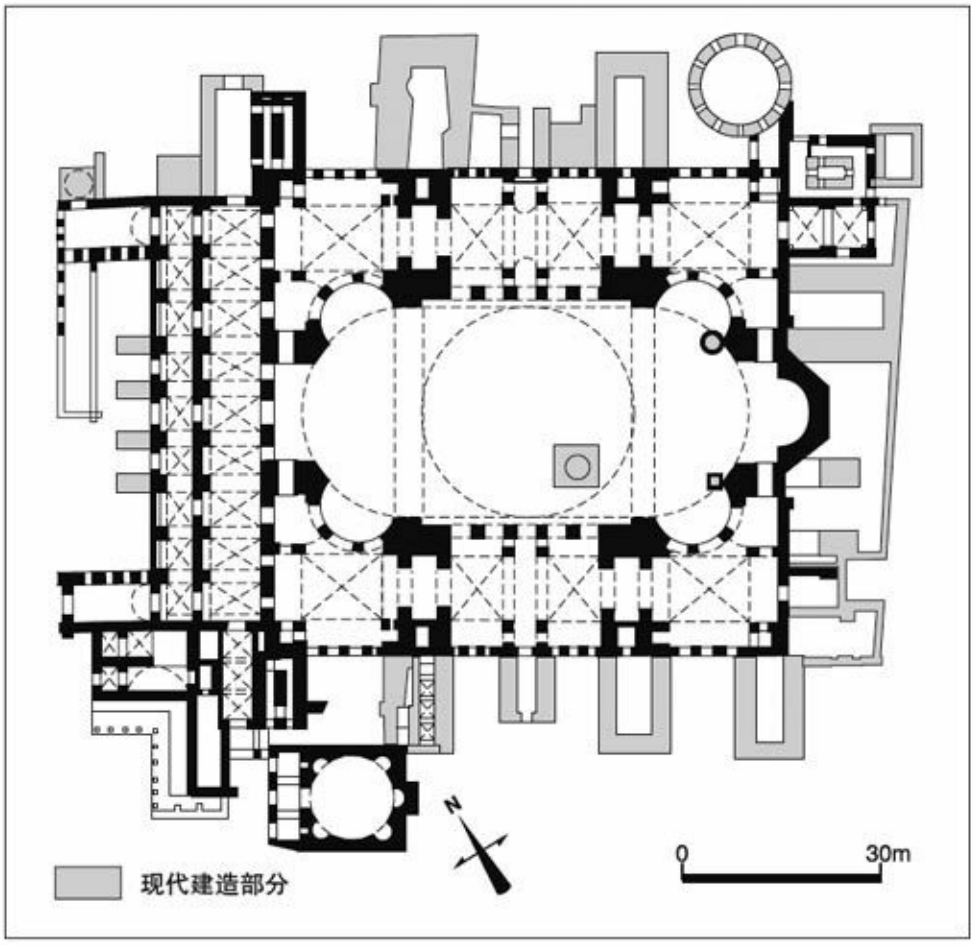
三、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建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献给圣母圣子的，其雄伟壮观为以往任何基督教教堂所不能比拟。据说其规模宏大、美轮美奂，就连君士坦丁大帝建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大为逊色。15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成了清真寺。如今，它所在的城市已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里既非清真寺也非基督教教堂，而是历史遗迹，成为来到这座伊斯兰城市的访客必游之景。

在还是基督教教堂的时代，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上镶满了金光闪耀的壁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两位皇帝分别向圣母玛利亚和圣婴基督奉献的情景。站在右边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奉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站在左边的是查士丁尼，他奉献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两位皇帝都与圣母圣子一样头上画有光环。君主对基督教徒而言是世俗的，是受神的旨意统治人类世界的人。他们不像基督教化以前时代的罗马皇帝那样

是第一号的肉身人，而是介于非肉身的神与肉身的人之间，却离神更近。所以，即使皇帝是肉身的，也可以用光环来表现。

圣索菲亚大教堂墙面的镶嵌画



圣索菲亚大教堂平面图

《罗马法典》

查士丁尼的功绩之二是编纂《罗马法典》。即使不是基督教徒，对他的编纂者身份恐怕也不会有异议。我认为，这项伟大事业是他留名后世的最大原因，他只有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罗马皇帝身份才能成就这项事业。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编纂对基督教帝国所需且有效的《罗马法典》的同时，查士丁尼下令废除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也许他认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需要法律，而不需要哲学。

《罗马法典》的正式名称是Corpus iuris civilis，很容易被认为是民法（iuris civilis）的总汇。但是，这部法典却是一部包罗了从刑法到所有法律的法律大全。关于编撰这部法典的意图，查士丁尼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我恺撒·弗拉维·查士丁尼·奥古斯都皇帝，愿对希望学习法律的年轻后世有所作为，决心着手编纂法典的伟大事业。仅诉诸战争不足以拓广皇帝的权力，和平时期的善政不可或缺。罗马皇帝不仅是战时的胜者，还应该是平时的统治者，而没有法律实现不了正确良好的统治。

查士丁尼就这样宣布了汇集迄今罗马人制定的法律的决定。从论述公法与民法意义的法律概论到实际审判的案例，他汇集了数量庞大的罗马法律。有趣的是，其中基督教化之前的罗马法律占据了大半。根据罗马法专家的说法，6世纪编纂的这部《罗马法典》的内容多为公元2世纪制定的法律。如果是这样，四百年前，也就是昔日五贤帝时代，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法律就是此时制定的。

《罗马法典》又称《查士丁尼法典》，实际编纂者是4位当时大名鼎鼎的法学家。但仅仅4人在6年的短时间里便完成了编纂工作，想必有助手协助。如果一一搜罗四百年来散失的法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大概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恐怕以前就有了汇总的法律集，编纂工作则以这些集子为中心展开。

首先，有一部名为《狄奥多西法典》的法律集，是5世纪前半叶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让人编纂的。这部集子汇集了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亦即基督教化之后罗马帝国的法律。

还有收集基督教化以前罗马帝国法律的集子。这部集子是公元2世纪中叶哈德良皇帝让人编撰的，网罗了从共和时代到元首制时代的法律。

《罗马法典》的编纂仅靠4位法学家在短短6年时间里得以完成，大约是已有这两部相当完备的法律集的缘故吧。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对法律专家自然有其作用，但像我这样与法律无关的人也不由得生出某种感慨。

第一，编撰法典的目的是汇集基督教化国家所需的法律，结果却是基督教化以前时代制定的罗马法居多。这个事实表明，社会由人集合而成，只要重视充分发挥社会的功能，罗马人制定的许多法律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都是有效的，这与社会成员信仰什么宗教无关。我进而认为，只有这点可以成为“法的精神”。如果所想不谬，我们可以说，法律是罗马人创造的。

第二，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就像在他自己所写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是在迄今存在的众多罗马法中选出的仅为统治基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所需法律编纂而成。这就是说，不适合基督教国家的罗马法已被排除在这部《罗马法典》之外了。

如果是这样，按理就会有一些罗马法由于未被收入《罗马法典》而灭失，这里面说不定有除国教以外，承认个人信教自由的法律。至少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后世近代国家制定法律时，受到了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的影响。罗马人已经有过后来近代国家制定的若干法律也未可知，只是未被《查士丁尼法典》收录而已。所谓历史记录，往往有很多经过了记录者的过滤。罗马人制定的法律也不例外。

无论如何，单凭编纂《罗马法典》这一条，查士丁尼就有足够资格被授予“大帝”的尊称。没有迹象表明他修习过学问，很难想象他有什么教养，只能说是不可思议，成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奇迹之一例。

可是，《罗马法典》本身并未用于查士丁尼统治的东方，它是用拉丁语写就的。因为法律为罗马人所写，自然使用他们的语言拉丁语。参加编纂的4位法律专家是希腊人。他们的专业既是法律，拉丁语水平应该也很高超。然而，在称为拜占庭帝国已更加合适的东罗马帝国，普及的却是希腊语。由于语言障碍，《罗马法典》在查士丁尼企图诉诸的对象那里却行不通。

除了这个不幸之外，还有时代剧变的不幸。在《罗马法典》完成后不满百年的7世纪，阿拉伯人打败了波斯人，将大半个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化。对基督教国家行之有效的罗马法，对伊斯兰教各国是否仍然有效，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伊斯兰专家了。

《罗马法典》用拉丁语写就，纵令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其威力仍在西方得到重新认识。贯穿整个中世纪，拉丁语一直是欧洲的共通语，而且欧洲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因为这一点，时至今日，欧洲人仍在赞颂查士丁尼，赞颂他复活了古代罗马法。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国大学都有研究罗马法的学科，这显示了《罗马法典》对人类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只是历史陈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战思想

《罗马法典》尚在编纂期间，有一位主教一直反复力促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是热情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神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每逢有机会接近皇帝，这位主教就会重复这样的话：

> 把天主教徒从异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神赋予您的使命。神会亲自走在您的军队前头。士兵们将在神的带领下，打倒敌人，让皇帝的旗帜再次飘扬在曾经处在异端统治下的土地上。您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

查士丁尼动了心，但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决心。这个时期，拜占庭正与波斯萨珊王朝战斗。这种战斗已经成为无须特别着笔的常态。照例，这仍是一场波斯进攻、拜占庭迎战的战斗。查士丁尼投入了2.5万名士兵，让自己手下最优秀的将军率领。

战况是,拜占庭方面因英勇善战而占有利形势，但还处于僵持阶段，未能决战。

东罗马帝国在家门口迎战，却只能投入2.5万人，着实使人吃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连自卫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剩下。这样看来，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很孱弱。罗马帝国直到元首制时代，一直是在东方防线投入8个军团的4.8万军团兵和几乎同样数量的辅助兵，共计近10万人的军事力量。而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只有当时数量四分之一的兵力，无力在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同时作战。但对查士丁尼而言，他难以拒绝像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那样成为一统东西的帝国主人的诱惑。要进攻西方，就必须结束与波斯的战争。

查士丁尼向波斯国王库思老求和。库思老对受制于拜占庭军队的作战感到厌倦，放出话来说，如果用5250公斤的金条作为交换，就接受求

和。查士丁尼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从而停止了东方的战争。对波斯作战的功臣贝利撒留也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就这样，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开始准备进攻北非汪达尔王国。

贝利撒留将军

贝利撒留和查士丁尼一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但年龄要小18岁。他年轻时从军，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崭露头角。查士丁尼即位后，立即任命他为负责东部军队的大元帅。

贝利撒留年仅27岁便成为一位将军。他能运用新颖大胆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武将会比贝利撒留更优秀。查士丁尼要把战线改向西方，也只能把贝利撒留从东方召回，派往西方。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夺回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战争，率领军队的总司令年方33岁。

皇后狄奥多拉和女官们

查士丁尼皇帝深爱着出身低微但漂亮好强、心直口快的狄奥多拉。贝利撒留将军也爱着具有同样性格的安东尼娅，与这位有孩子的孀妇结婚，并终身相伴。狄奥多拉是舞女出身，安东尼娅是战车比赛的御者之女，同为下层出身。而且，两个人都是天生丽质、争强好胜、行为大胆。这样的两个人照理应该关系良好。然而，她们两人虽不敌对，但关系紧张。这可能是因为每次碰面，她们都觉得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

进攻北非的前一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以“尼卡（Nika）之乱”而闻名的暴动。战车比赛的蓝派粉丝和绿派粉丝之间起了争斗，市民也卷入其中，酿成暴动。3万名暴徒近逼皇宫。年已50岁的查士丁尼吓得不知所措，听信了宫廷官僚们的进言，决定逃离皇宫。这时，狄奥多拉挡在他的面前。皇后训斥查士丁尼说，逃跑不是皇帝的做派，并让他命令贝利撒留镇压暴动，一步不退。贝利撒留果断应对，在暴动升级

前将其镇压下去。

没有记录表明安东尼娅训斥过丈夫。但她非同小可，丈夫所到之处都有这位妻子的身影。她不单跟着丈夫，而是经常率领人马参战，支援丈夫作战。但她对丈夫手下的人事安排从不插嘴。而狄奥多拉却似乎多少要插插嘴。

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是查士丁尼，最有名的将军是贝利撒留。在东方色彩愈发浓重的东罗马帝国，女人大多血统纯正却性格暧昧，温柔而生育能力强，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迷上的却是狄奥多拉和安东尼娅这样的女人。

进攻阿非利加

公元533年6月，军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了，目标是打倒北非汪达尔王国。载着1.5万名士兵的500多艘大船队出征了。皇帝和皇后祝贺出征，大主教承诺请天神祝福。尽管旗子上没有像后来的十字军那样印有十字，士兵的胸甲上也没有十字，进攻的对象也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圣战”。

在进攻远离祖国的敌方地盘时，因为补给问题，经常是使用少量的精兵比较有利。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西庇阿、苏拉、李锡尼、恺撒……这些古代名将的经历都证实了这一点。然而，1.5万名士兵要在有号称20万兵力严阵以待的北非登陆，兵力也太少了。也许凭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只能派出这点兵力，而这1.5万人的兵力也是不惜重金与波斯媾和后才得以派往西方的。这就要求只有这点兵力的贝利撒留采用比以往更新更大胆的战略。

普罗科皮乌斯写下了《哥特战记》，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使我们后世得以了解贝利撒留如何根据查士丁尼的筹谋，收复了旧西罗马帝国

的领土。普罗科皮乌斯这位希腊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与贝利撒留同时代。据说从贝利撒留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时起，他就开始担任贝利撒留的秘书官。公元533年起西进时他当然同行。对贝利撒留来说，就像是一位合适的随行记录者，而且不是一般的记录者。普罗科皮乌斯具备历史学家的素质，不仅有卓越的观察力，文章也写得好。贝利撒留也希望由他的妙笔来记录自己的业绩。

查士丁尼虽是政治家，却没有军事经验，也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不能说他很了解帝国各地的地形和人情现状。为此，贝利撒留不得不经常因这位上司的无理命令而抗争，有时甚至得冒着被撤换的风险去抗议。士兵们绝对支持贝利撒留。这也许也是因为他们尊敬和同情这位有义务在困难情况下取得战果的年轻将军。身为秘书官又兼随军记者的普罗科皮乌斯的心情也是如此。

满载拜占庭帝国将士的500艘大船队从君士坦丁堡港出发，要渡过马尔马拉海，穿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然后南下，绕过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经西西里，再到汪达尔王国所在的北非登陆。即使经常停靠港口，这全部航程也要航行半个地中海。定在初夏出发，就是因为以多变闻名的地中海海风在夏季会平静一些。可未曾想，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就遇到了不幸。

船上的面包变质，食用后倒下的士兵和船员竟超过500人。长期航海用的面包必须是干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饼干。两道烤制后，水分尽去，食用时得用水或葡萄酒浸泡才能吃。这次的面包是在君士坦丁堡烤制的，但略去了第二道烤制的过程，而且用烧公共浴室热水的温度来烤制，这些面包在航行中很快就变质腐败。

贝利撒留只得延长原定的靠港时间，动员附近的全部面包店，重新烤制长途航行用的面包。他把此事详细报告给了身在首都的查士丁尼，要求惩罚负责安排军粮的大臣。调查查明，那位大臣只用低温烤制了一道，并将省下的费用据为己有。

查士丁尼撤掉了那位大臣，却没有给予更重的惩罚。“粮草”可以说是前线士兵打仗的基本保障。没有带过兵的查士丁尼即使脑子能理解，也不会有切身体会。

500艘大船队的航行，除补给生鲜食粮和水以外，还需要经常靠港。要不断等待每一支掉队的小船队，等船到齐形成大船队后再次起航。如果不耐心重复这种等待，就会有很多船只迷航。因而，船队只能沿海岸可以航行的水面前进。但也有些海域不能沿岸航行。贝利撒留的远征军要从希腊南端向西西里方向横渡爱奥尼亚海，如果顺风航程5天足矣。

可是，进入爱奥尼亚海后的几天，没了一点风，只能靠划桨来横渡这片海域，耗时达16天之久。虽然面包还有，但饮水告罄。这时，总司令妻子的远见起了作用。安东尼娅让人在船底藏了大量盛满水的罐子，这件事甚至没有让丈夫知道。士兵船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没有一个士兵不满贝利撒留让其妻子同行。

当时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一样，处在东哥特王国的统治之下，由哥特人士兵守卫。贝利撒留抵达西西里南部以后，立即向哥特人长官申请采购粮食和马匹的许可。由于统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东哥特王国国王花费心思要与东罗马帝国保持良好关系，驻西西里长官也非常合作，顺利完成了粮食和马匹的采购任务。贝利撒留考虑，单靠一份情报不足以正确把握形势。于是他一边采购粮食马匹，一边派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去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锡拉库萨，打探东哥特王国的内情，并由此了解到，批评狄奥多里克之后继位的国王——懦弱的维提吉斯的势力，已经比在君士坦丁堡传闻的更加强大。

贝利撒留被迫改变战略。他需要考虑一旦西西里不能用做进攻北非的后方基地将如何应对。这时，更安全的方法应该是，假设这里不能用做后方基地而重新制定战略。大军必须尽早离开西西里向北非进发，并在可能补给军粮的地方断然登陆。

不知道是读过尤里乌斯·恺撒《内战记》的缘故，还是机缘巧合，贝利撒留选择的登陆地点不是敌方势力集中的迦太基，而是位于东南偏南方向远离迦太基的地方。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地区，与统治者汪达尔人集中居住的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不同，这一带允许经营农庄的罗马人长期居住。贝利撒留把登陆地点选在了敌方防御薄弱的地带。

汪达尔人的守备队在这一带形同虚设。9月初断然实施的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时正值秋收，登陆的士兵开始掠夺附近的农庄。这不过是沿用了在东方与波斯作战时的做法，但与贝利撒留的战略背道而驰。总司令集合全体士兵，开始训话：

> 在决定受命远征阿非利加、收复长期以来一直被蛮族统治的这片土地时，我就在想，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带军队的规模和士兵的熟练程度，而是要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居民——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利用他们长年埋藏在心底的对汪达尔人的敌意。
>
> 然而，你们却想让我的这个想法泡汤。只要和气交涉就会廉价卖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费力去抢夺呢？如果你们不停止暴行，他们绝望后就只能投靠旺达尔人。我们就会变成侵略者，不要说真正的敌人，就连我们要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也会跑到敌人一边去！

士兵们被33岁的总司令说服，人人羞愧，从此以后抢夺行为绝迹。其间，贝利撒留派往各地的部下也与农庄主们谈好了购粮事宜，贝利撒留解除了这方面的后顾之忧。贝利撒留还向各城市的行政官派出使节，告诉他们，大军将保证他们的地位和人身安全，请他们像以前一样继续办理行政事务，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以前以汪达尔国王名义做的事情，以后要以查士丁尼皇帝的名义去做。贝利撒留的做法转眼之间在周边一带传开，北上的

贝利撒留军队所到之处，城镇村庄统统敞开了大门。贝利撒留向敌人的根据地进军，兵不血刃。部队走陆路北上，船队在他们右方的海上向敌人的根据地迦太基湾驶去。

汪达尔王国的覆灭

老练的国王根西里克死后，北非汪达尔王国陷入了长期的内部纷争。为争夺王位六亲不认，一旦失败，囚入大牢已是最好的下场。这样的状态不断持续。他们不是不知道贝利撒留率领的拜占庭军队正在步步逼近，可他们缺少一位强有力的统帅，来集结所有的力量，形成迎战态势。他们的军力并不差，日耳曼系蛮族有很高的出生率，仅直接战斗兵力就能集结到十五六万人。

可是，支撑军力的经济力量，却在一味衰弱。在汪达尔人所征服的北非，没有实现“蛮族统治下的和平”，没有形成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共存的状态。罗马人文明程度高，才能卓越，却成为败者，纷纷选择成为难民的道路，离开了阿非利加。

北非在罗马时代基础设施完备，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文明程度高，人才济济。汪达尔人虽然把这样的北非弄到了手里，但这个曾经居住在日耳曼荒蛮之地的北方蛮族，自身却没有丝毫改变。

汪达尔人于公元430年征服北非。公元533年贝利撒留率领东罗马军队前来攻打。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比高卢更繁荣、文明程度更高的北非，已在汪达尔人的统治下度过了百年时光。汪达尔王国只与贝利撒留打了两仗，两仗皆败，便被轻而易举地灭亡掉了。

贝利撒留6月初离开君士坦丁堡，9月初登陆北非，9月15日进入迦太基城。他仅用了两周时间，就在相当于现在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域上把统治长达100年之久的汪达尔王国消灭得无影无

踪。尽管贝利撒留战略巧妙，真正的原因却是汪达尔人毫无作为地虚度了这100年。

北非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尽管这次是东罗马帝国。但如果要问，这里是否又恢复到罗马时代那样丰饶的景况，答案却是否定的。土地和气候不能成为复兴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才，条件再好的土地和气候也无法利用。被汪达尔人征服以后，北非开始了沙漠化的进程。查士丁尼夺回北非之后，沙漠化仍旧一如既往地发展着。

不要说与败者同化，汪达尔人的统治甚至拒绝与败者共存。但东罗马帝国派来负责行政的那些希腊人与汪达尔人并无两样，也把北非居民视为被统治者。不流血地进入迦太基城后，贝利撒留曾立即发布告示说，汪达尔人作为统治者来到这里，而我们是解放者。现在，这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后又在北非逗留了8个月。不过这段时间都被耗在纯粹的军事行动上，如把汪达尔人余党赶出北非，允许难以消灭的毛里塔尼亚人（摩尔人）继续定居在现在的摩洛哥等地。贝利撒留还挟北非胜利之余威，威胁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成功地把直到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地带都纳入查士丁尼的统治之下。随着汪达尔王国的灭亡，撒丁岛被自动“收复”，西地中海也和东罗马帝国保持制海权的东地中海一样，被纳入了东罗马帝国圈。可以说，查士丁尼皇帝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宏愿至此已完美实现。

然而，贝利撒留只被允许进行这些军事行动，而未被允许进行周密的战后处理来巩固军事行动的成果。拜占庭帝国承继了始于4世纪的帝政后期的政策，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文官与武官的职务完全分离，战后处理属于行政官僚的文官职责范围。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更加合理而进步的体系。但是，赢得战争也是战前的大量情报收集工作和基于这些情报正确深刻地洞察民情的成

果。战斗打响后打仗的是士兵，但在此之前，总司令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于是乎，很多打了胜仗的统帅往往对敌人的心理理解颇深。

通观从共和政体到元首制的全部历史，罗马一以贯之的方针是，不仅把战斗的指挥权，还把战后与败者的媾和交涉以及对所征服之地的战后处理事务，全部交给受命出征的司令官去处理。正因为这样，罗马的司令官习惯于亲自审问俘虏，而不是交给手下办理。如果只想了解事实，通过拷问，让俘虏交代就能办到。若要了解事实背后的情况，只有让关心此事的人去审问才能指望有效果。然而，罗马人长期坚持的这个习惯，4世纪以后也被忘却了。

知道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后，查士丁尼立即派来了以宦官为首的4位高级官僚。

被阉割的男人并非无能。相反，他们都是在阴谋旋涡的皇宫里出人头地的，这方面有足够的能力。但是，重用被阉割的男人，并不是为了像东方君主国家那样让他们去管理后宫，而是认为他们无法拥有家庭，便会把这份忠诚拿来孝敬主人。但这样也很容易使他们在处理行政时只看主人脸色而罔顾国民意愿。

因为这个缘故，人们都说，宦官的统治严厉而高压，征税毫不留情，而且行贿受贿成为家常便饭。一旦由人构筑的防范网薄弱了，人们就会热衷于中饱私囊。

贝利撒留成功地在短短两周时间内就结束了势必为“恶”的战争。但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的行政官僚花了20年时间，也没能做好战后处理，将战后统治做到应该达到的“善政”的程度。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北非，在东罗马帝国成功收复的所有地方都是一样。自然与人类的疲弊在北非表现为土地沙漠化。我甚至认为，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疲弊，并没有因为查士丁尼对土地的“夺回”或“收复”而得到改善，相反加快了恶化的速度。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534年秋天，贝利撒留凯旋，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听说查士丁尼皇帝和狄奥多拉皇后专程到港口迎接，在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举行的弥撒仪式上，为把基督教徒从“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感谢神灵。凯旋仪式只允许为皇帝举行，但贝利撒留成为例外。虽然凯旋将军骑马行进，而不是按照古制乘着4匹白马战车，但市民们的狂热仍是真挚的。由皇帝推荐，贝利撒留被选为第二年公元535年的执政官。对34岁的贝利撒留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可是，查士丁尼皇帝丝毫没有打算让他干执政官的工作。

公元535年秋，享受久违的首都生活尚不满一年，贝利撒留再度被派往西方。查士丁尼下一个“收复”的目标是东哥特王国统治的意大利半岛。为此目的，仅仅考虑补给基地，也必须先制伏西西里。

进攻意大利

此次进攻意大利，只拨给贝利撒留7500人的兵力。我甚至想这个数字是不是中世纪的笔误！即使加上贝利撒留的私家兵力1000人马，也才8500人，这只是收复北非兵力的一半。靠这点兵力，居然要去收复有20万东哥特士兵严阵以待的意大利半岛！

况且，意大利半岛和北非的情况完全不同。意大利半岛在“蛮族统治下的和平”之下，统治者哥特人与被统治者罗马人的共存已经延续了60年。在汪达尔人统治之下，上层罗马人逃离了北非；而在哥特人统治之下，意大利半岛却没有出现难民。在阿里乌斯教派的统治之下，天主教会也依然存在。

罗马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大概与信奉阿里乌派基督教的哥特人一样，不会把天主教国家拜占庭的军队当做敌人。但也不能指望他们会帮助拜占庭军队，积极奋起，打倒哥特人。意大利的情况与北非截然不

同。在北非，虽然已过去百年，居民的心中仍怀有反汪达尔的感情。要用攻打北非一半的兵力进攻意大利，我在想，究竟是什么把这种想法灌进查士丁尼大脑的。

用少量兵力进行战争表面上看合理。但只投入少量兵力容易带来战争长期化的危险。在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打仗要准备10万人规模的军队，一次性投入战斗，这已经成为惯例。一次性投入10万军队，一年便能结束战争。战争不容置辩就是“恶行”，不得不行此“恶行”的军事人员必须植根于大脑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结束战争。

由于东哥特人几乎未在西西里配置守军，贝利撒留轻松收复了西西里。要使西西里发挥后方基地的作用，他就必须安排守军驻守。留下守军后，剩下的兵力是5000人。贝利撒留得靠这5000人完成收复意大利半岛的作战。

贝利撒留在君士坦丁堡时就已明白，夺回东哥特王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半岛与夺回汪达尔王国统治下的北非，不能采用同样的打法。他考虑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完成收复意大利的作战。第一军以西西里为补给基地，在意大利半岛南端登陆后直接北上。另外一面，第二军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作为补给基地，从那里横渡亚得里亚海，向东哥特王国王宫所在地拉文纳发起进攻。这样作战的目的，是要把号称20万的敌方兵力一分为二。

查士丁尼也同意这个战略，甚至答应组建应在达尔马提亚集结的第二军。不过，这个允诺根本没有兑现。贝利撒留一开始就不得不以5000对付20万。不懂战争的人当最高统帅，难免空费人力和时间。

普罗科皮乌斯的《哥特战记》中记载，这场战争，从轻松收复西西里，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公元536年起，到公元553年哥特人国王最后战死为止，实际打了17年之久。这种长期战争受害最大的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他们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也不是战争的参与者。

收复西西里后不久，贝利撒留一边为进攻意大利作准备，一边尝试通过交涉解决问题。

考虑到只有5000人的兵力，能通过交涉解决问题最好不过。

而且，狄奥达图斯虽然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却是一个喜欢用拉丁语写自己的名字、仰慕希腊哲学、喜欢讲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贝利撒留向在罗马的狄奥达图斯派去了和平解决的使者。

拜占庭的部队威逼西西里，狄奥达图斯惊慌失措，对交涉非常积极。媾和条约的谈判极其顺利，连协约文本都已拟好：

一、东哥特王国国王承认罗马帝国皇帝（实际上是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主权，正式表明其臣服地位。

二、作为象征，国王每年向皇帝赠送用300罗马磅（合120公斤）黄金打造的皇冠。

三、国王承诺，皇帝凡有要求，将派遣3000名士兵供其调遣，并承担全部费用。

四、未经请示皇帝旨意，国王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和元老院议员处以死刑或没收财产。

五、未经皇帝许可国王不得任命元老院议员和“贵族”。

六、在公告和公文上，必须把皇帝的名字写在国王的前面；国王雕塑的右边必须立有皇帝的雕塑。

从没有课税及没有收回自卫权来看，只能说这个协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东哥特王国的独立性。狄奥达图斯担心这个文本遭到拒绝，派出急使追上了携协约文本沿阿皮亚大道南下的东罗马帝国使节。接受

邀请再次回到罗马的使节与哥特国王之间有下面一段对话：

“您认为皇帝会签署这个媾和协约吗？”

“我想大概会的。”

“如果拒绝了会怎样呢？”

“应该是战争吧。”

“那么这场战争是正确而合理的吗？”

“当然是。不过，这要从双方各自所站的立场来看。”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您是哲学家，可查士丁尼是皇帝。对自诩为柏拉图弟子的人来说，一定会反对使众多百姓流血的战争。可是，对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来说，收回赋予他的正当权利比什么都重要。对查士丁尼来说，这意味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收复被夺走的昔日领土。”

这段逸事的真实性并未在学术上得到证明。不过，这也许会像马基雅弗利所说，真实也会成为合理的谎言。我以为，以这种条件和平解决，贝利撒留会同意，查士丁尼皇帝也会批准。

可是，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是因为拜占庭方面，而是因为东哥特方面的拒绝。狄奥达图斯被全体家臣斥为软弱，被迫退位。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不久他竟被杀害。主张对拜占庭强硬的维提吉斯，在哥特人的欢呼声中登上东哥特王国的王位。事到如此，贝利撒留只能以5000兵力进攻意大利半岛了。

哥特战争

公元536年春天，贝利撒留开始行动。从西西里登陆意大利半岛只需渡过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区区5000人渡海，不需要征集大量船只，只从附近搞了一些渔船就跨过了海峡。登陆之后，就像征服西西里一样，从意大利南部一路轻松地推进到那不勒斯。哥特人把兵力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南部是军事力量的真空地带。

普罗科皮乌斯写道，登陆之后，意大利南部居民用欢呼声迎接沿罗马大道北上的贝利撒留军队。对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们而言，权且表示欢迎也是一种处世之术。他们是天主教徒，贝利撒留的军队应该是救星，但普罗科皮乌斯的笔下没有提及义勇兵来投奔继续北上的贝利撒留军队，也没有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记录。这与登陆北非时有所不同。

那不勒斯从这个时代起已渐渐成为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这时只有800名哥特兵驻屯。当时的那不勒斯住着很多犹太人，其社团对市政有很大的影响力。犹太人知道查士丁尼皇帝是热心的天主教徒，正在东方迫害犹太教徒。他们担心向他的军队敞开城门之后自己的命运，于是在恐惧的心情中等待着。实际上，这时查士丁尼想把已经改信天主教的法兰克人也拉进对哥特的战争，给法兰西王国送去了内容如下的一封信：

> 哥特人侵犯、盘踞意大利已有半个世纪。居住在意大利的人们与我们共同拥有真正的基督教义。我有拥有意大利的正当权利。我要求哥特人归还他们非法占有的土地和非法统治的人民。然而，他们无礼的答复令人忍无可忍。我不得不向他们宣战。
>
> 此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异端阿里乌斯教派。因此，这是一场正统信仰击退邪恶信仰的战争。我们两人（东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兰克国王）都被神授予了捍卫正确信仰的责任。

查士丁尼呼吁法兰克人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攻意大利北部，与北上的贝利撒留组成共同战线。但这个劝说在当时未见成效。不过，这封给

法兰克国王的信函昭示了查士丁尼进行哥特战争的本意。拜占庭皇帝既已决定不能容忍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自然不可能承认“异教”犹太教徒。居住在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的恐惧十分正常，贝利撒留在此第一次遭遇到像样的抵抗。

仅靠陆地方面的进攻不可能攻陷面临大海的城市。可是，贝利撒留没有可用于海上封锁的海上兵力，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沉下心来展开进攻。但不拿下那不勒斯就去不了罗马。贝利撒留想着如何速战速决正不得门路，这时有个士兵对他说，不妨尝试利用一下已经废弃不用的水道桥，这桥似可通到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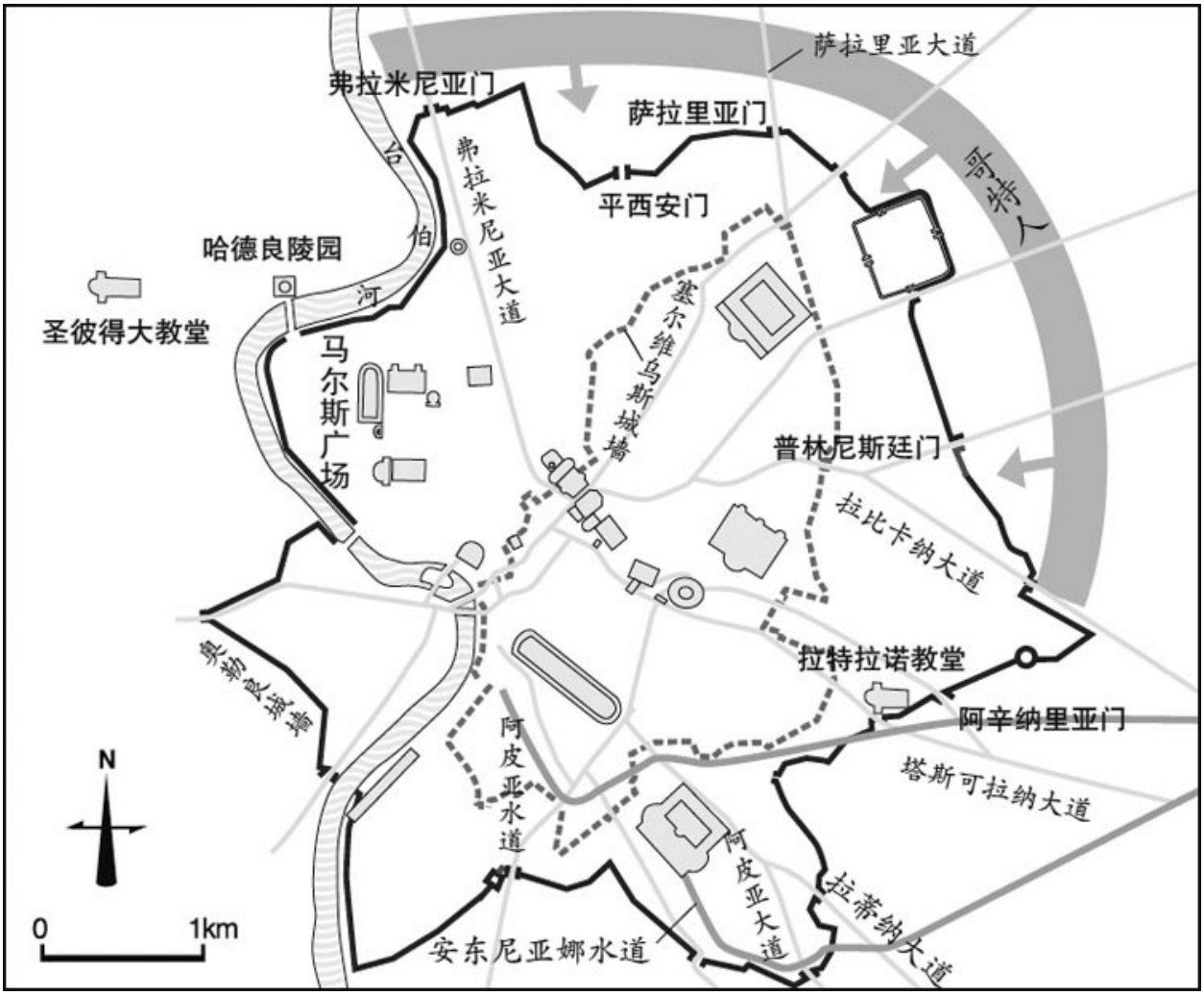
贝利撒留立即派队长指挥几名士兵，在夜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察了一番。靠着微弱的灯火引导，一队人行进在高架水道内。他们发现水道桥通到城墙内的一座废屋。

所谓废屋，不就是一座水塔（castellum）嘛，这种水塔的作用是把高架水道流过来的水暂时贮存起来，除去杂物，然后向市内各处配水。我想这水塔应该是水道不能使用后才被废弃的。如果是“水塔”，就应在城墙之内，而且应该相当宽敞，作为穿过水道潜入市内的士兵隐蔽的场所再合适不过了。

这次哥特战争以后，水道这个与罗马大道齐名的由罗马人建造的两大基础设施之一就不复是水道，而成为历史遗迹了。这是由于为不断提供新鲜水源而建造的高架水道在军事上受到了注意的原因。水道桥在那不勒斯已经废弃不用，但在罗马，尚在使用中的水道桥转成了军事用途。让所有人都能用上足够的新鲜水，这本身就是高度的文明表征；建设水道只需考虑通水，这也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象征。

如果水道桥作为士兵潜入城市的通道而引起注意，罗马文明将无生存之地。首都罗马有11条水道，行省首府也有三四条，就连小城镇都必定通有一条水道。每次看到这些水道，我都会苦笑：“连这样的镇子

都……”但时常向人们提供大量新鲜水这样最低限度却最重要的文明，哥特战争之后消失了。从公元前312年建设最古老的阿皮亚水道算起已有850年的历史，有记载的最新的安东尼亚娜水道建造以来也已有320年的历史。现在，把时常向普通人配水作为卓越政治的罗马文明死亡了。



罗马市略图

贝利撒留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他决定让士兵们在夜里通过不再使用的水道潜入市内，隐蔽在水塔中，黎明时这些士兵出来袭击守卫近处城门的敌人，用夺来的钥匙从内侧打开城门。大队人马在夜幕掩护下靠近城墙，等待黎明时分城门从内侧打开。贝利撒留向士兵们宣布这个方案之后说：

就把抢夺金银当做对你们勇敢的犒赏吧。但是禁止杀戮居民，他们是天主教徒，是你们的同胞。

作战获得完美成功，但居民并非全体安全。拜占庭军队的士兵把总司令的话理解成为不杀不抵抗者。

于是，出于保护妻子孩子的市民和由于对天主教徒士兵的恐惧而忘我抵抗的犹太人，凡抵抗者都被杀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道不杀不抵抗者的800名哥特士兵却只是被俘而已。这800名士兵直接被编入了贝利撒留的部队。攻占那不勒斯耗时长达20天，牺牲者全是普通老百姓。蒙受伤害最大的是意大利人民，而他们却不是战争参与者，哥特战争的这个特征在那不勒斯已显露无遗。

从那不勒斯去罗马有两条路：一条是穿越平原的阿皮亚大道，另一条是蜿蜒穿过山岳地带的拉蒂纳大道。贝利撒留的军队沿这两条路北上。与其说贝利撒留这样做是分散风险，不如说他是想兵分两路同时行军，尽快到达罗马。那不勒斯到罗马之间不存在遭遇数量集中的哥特兵的危险。

贝利撒留率领沿拉蒂纳大道行进的部队，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似乎沿阿皮亚大道前往罗马。尽管这条大道被弃置了200多年，从来没有维护过，现在仍然是石板相接，严丝合缝。这位巴勒斯坦出身的希腊历史学家叙述这条“大道女王”（regina viarum）时充满了惊叹的心情。

罗马正在酝酿着罗马主教居间调停的对策，试图避免那不勒斯那样的攻防战。哥特方面也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进行彻底的抗战是一条良策。他们需要集结15万人以上的兵力，一旦需要还要返回意大利北部。

公元536年12月10日，哥特将士们列队雄赳赳地从罗马西北面的弗拉米尼亚门出城，而贝利撒留的将士们则欢呼着从罗马东南面的阿辛纳里亚门进城，就像换防一般。统治者进行了不流血的更迭，也没有发生

暴虐行径，犹太人只要在他们居住集中的“台伯河对岸”（Trastiber）不造次，也平安无事。

可是，任何人都能预料到，哥特人不会轻易放弃统治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意大利。贝利撒留没有闲暇观光初次看到的罗马。什么都可以放下，长达20公里的城墙必须修补。哥特人在意大利北部有根据地，他们会从北面进攻，必须修补拱卫北方的弗拉米尼亚门到萨拉里亚门这段城墙。可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却说，这部分城墙很完善，没有必要修补。贝利撒留问其原因，神职人员回答说，圣保罗一直在保佑这里。贝利撒留将这些意见当做耳旁风，抓紧实施工程。

36岁的总司令不仅要修补城墙，还要在城墙外侧挖一圈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他还不能忘记从西西里进口大量小麦，从那不勒斯近郊的农产地购买主食以外的食品。

公元536年与537年之交的冬天是在工程的锤音和人车往来的嘈杂声中度过的。市民们起初还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5000名士兵，后来他们发生了变化，开始一点点帮起忙来。贝利撒留决定给他们一个自卫军的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和拜占庭士兵一道担任防御。据说“自卫军”的人数达到3万，这对只统率着5000人的贝利撒留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罗马攻防战

在古代，传统上都是在3月份开始打仗。公元537年3月，哥特军队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和萨拉里亚大道两路南下，在罗马城墙前布阵。除掉狄奥达图斯后当上东哥特王国国王的维提吉斯担任总指挥。他拥有15万兵力，照理能够包围全市，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从东面的弗拉米尼亚门到西面的普林尼斯廷门一带布满了哥特兵的帐篷。不知什么

原因，台伯河以西、南侧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的起点都不见哥特兵的身影。

贝利撒留把自己军队的大本营安在平西安门的内侧。这就是说，总司令亲临最前线。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兵力劣势，他把防御力量集中到敌人可能攻击最集中的各个城门。为了及时掌握各城门防守部队的情况，他还组织了专门士兵，在总司令与各部队之间进行联络。他要用3.5万人迎战15万人，必须采取能够想到的所有对策。

不过，贝利撒留也不是一无有利之处。他并无必要一定打胜，只要久拖不败，让敌人放弃即可。

对城市的攻防战，并不是两军隔着城墙的简单对峙。防守方不时会打开城门，冲出去打一仗，然后再撤回城里。这次的攻防战也是如此。尤其是贝利撒留擅长积极的战法，常常亲自指挥，冲出城墙战斗。这样，防守方的损失少得令人吃惊。贝利撒留自己解释了处在数量劣势的地位也可与敌人周旋，甚至经常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原因。他说，其中的原因在于哥特骑兵与拜占庭骑兵的不同。哥特人的骑兵是一边驱马一边用长矛刺击，而拜占庭骑兵则受到波斯弓箭兵战法影响，一边驱马一边射箭，可以远距离击倒敌人。

攻防战向有利于防守方的方向发展。罗马是一个大都市，尽管与鼎盛时期相比人口锐减，但现在仍应有15万人。战斗隔着北边城墙激烈展开，市民却仍旧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尤其在南半部，日常生活气氛平静，令人无法想象攻防战正在进行。在台伯河西岸的圣彼得大教堂，参拜的信徒络绎不绝。进攻方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人们在长年的经验中了解到，他们不会动天主派教堂一根手指头。这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不过，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贝利撒留总能够打退敌人发动的总攻，而自己的军队每次出击都能打倒数量众多的哥特兵，安全返回。尽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哥特方面

却也一直没有放弃。你来我往之中，春去夏来。哥特方面使出了断水战法。他们在高架水道的每个桥拱下都挂了帐布，用作兵舍。但为了这次断水作战，他们破坏了水道桥。由于水源未断，破坏之处一定会一片汪洋。哥特人大概也会想到不能让自己的阵营泡在水里。这给贝利撒留带来了两个担心：

第一，如何确保夏天的饮用水。

第二，敌人会通过遭到破坏而断水的水道桥潜入城内。

用水攻之法进攻有河流流经的城市，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愚蠢。况且，出于处理7座山丘渗水的需要，罗马的下水道比上水道建设得更早。于是，鼓励使用井水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罗马人洗澡是在热水里浸泡、清洗身体，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享乐。但在改信基督教之后，洗澡作为他们喜好的生活习惯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时，有人抱怨不能用足够的热水洗澡了。

贝利撒留采取了不怎么罗马式的方法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他首先破坏了不再来水的渠道，堆砌石块堵住破坏后的口子，再用灰浆涂抹加固。就这样，公元537年，已有850年历史的罗马水道不复存在了。

随着攻防战的延滞，存粮开始见底。虽然不久前实施了严厉的配给制度，但仍赶不上消耗的速度。要在粮食告罄之前，制定出彻底的对策。

贝利撒留决定减少吃饭的“人口”。通往意大利南部的大道依旧安全。他派人在市内各处宣读命令老人妇女儿童前往意大利南部避难的总司令布告。他还决定让奴隶也一起撤走。

总之，他想要尽量减少不能打仗却要保证口粮的人口数量。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挤满了前往那不勒斯及更南方去避难的人和车，而塔

斯可拉纳大道和拉比卡纳大道则因前往罗马近郊农村去避难的人和车而混乱不堪。贝利撒留甚至拿出一部分配置在北面的兵力，来保证这些大道的通行安全，直到居民的避难告一段落。

可是，也有一些人对这种临战状态感到更大的不安。其中一人就是罗马主教兼教皇西尔维里乌斯。他曾经促成了贝利撒留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罗马城，在贝利撒留到来以前早就与哥特方面的高官们相熟。

西尔维里乌斯是主教，住在主教宅邸，与罗马的主教教堂拉特拉诺的圣乔万尼大教堂毗邻。阿辛纳里亚门就在位于罗马南部的这座教堂附近。这位主教想出一条“拯救罗马的策略”，趁夜悄悄打开这座城门的锁，虚掩城门。他以为如果潜入城来的哥特士兵纵穿市内，从背后袭击正在防守北面的贝利撒留部队，就可以结束攻防战。

不知道是谁告的密，贝利撒留知道了这件事。可是，就算他是总司令，也不过是一介武将，既不能审问主教，也不能侦察主教是否已经私通哥特国王。他所能做的只是把主教和参与其事的几个元老院议员押送到君士坦丁堡，交给查士丁尼去发落。

这件事让贝利撒留注意到罗马居民中开始形成厌恶拜占庭军队的气氛。也难怪贝利撒留要惹人生厌，罗马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统治者共存，甚至没有觉得被宗教异端统治有什么不适。半个世纪后，拜占庭军队打着复国的旗号打过来，罗马人不得不忍受没完没了的攻防战。贝利撒留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他不再信任过去一直天真地信任着的罗马人。他决定，此后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把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员也要经常换防，并且只限少数心腹知道这个决定。

哥特人与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正在进攻罗马的哥特国王维提吉斯下令杀掉在拉文纳的全部元老院议员。除了

两个人逃脱之外，意大利北部上流阶级的人悉数被杀。也许是身在罗马的某位元老院议员向贝利撒留密告了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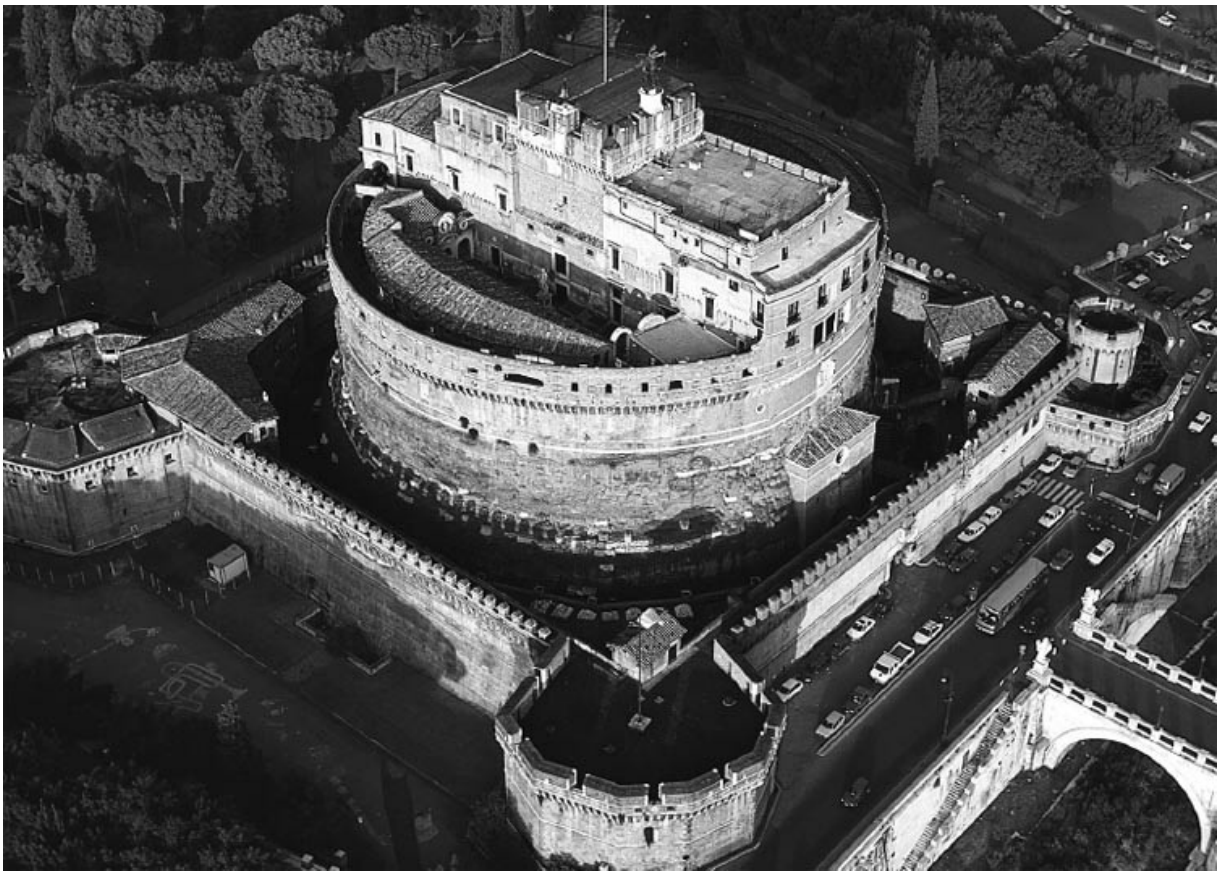
日耳曼人与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就这样被割断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奥多亚克时代算起60年之后，自狄奥多里克把与被统治者共存作为统治的基本方针时算起43年之后，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的共存关系宣告终结。日耳曼人开始把罗马人视为敌人，视为比敌人还要可恨的背叛者。

贝利撒留是武将。武将懂得没有比战斗开始后却又半途而废更愚蠢的事情。此外，厌恶拜占庭军队的空气尚未波及一般市民，“减少人口”的方法也开始奏效。

也许是知道了主教的策略，哥特方面开始向以前从不派兵的罗马南面和西面发起了进攻。

其中，敌人集中攻击的是400年前哈德良皇帝建造的陵园（现在的圣天使堡）。如果这里被攻下，台伯河西岸一带就将落入敌手，有9座桥与之相连的东岸也将受到敌人来自西边的攻击。贝利撒留一声令下，当天的防御也集中到这一处。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叙述那天的攻防战。

> 哈德良陵园距离新奥雷里亚门只有一箭之遥。哈德良陵园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只能用“出色”二字来形容。整个建筑用切成长方形的大石块严丝合缝地堆砌而成，不使用砂浆。外墙用帕罗斯岛出产的白色大理石装饰。建筑物自身呈正四边形，每个边都是抛石可达的长度。建筑物高于环绕城市的城墙，周围排列着白色大理石做的诸神和马的雕像，都是造型美妙的杰作。



现在的圣天使堡（罗马时代的哈德良陵园）

哥特士兵不使用攻城器械。他们的战术是仗着人多不停地投掷石块，趁守方躲避的空隙架起云梯登城，把守城的士兵挑下城墙。哥特士兵数量惊人，梯子也多得吓人，他们云涌一般地冲过来，争先恐后地架起梯子。

一时间守城的士兵不知如何迎战，茫然地俯视着城下。不知谁下的命令，士兵们立即动起手来。他们拉倒诸神和马的雕像，并砸成碎石块，然后用双手举起碎石块朝敌人头上砸去。这着立即见效。敌人扔掉梯子，争先恐后地一溜烟逃开。

“大量杀戮”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建造的大理石雕像杰作，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论是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罗马将军对出自希腊人之手的造型美术杰作的态度与对敌人重要俘虏的态度没有两样。罗马将军在必需时也会杀戮敌人，但没有杀戮过艺术作品。正因为

胜者是如此尊重败者的遗作，我们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人才能在美术馆里欣赏到这些艺术品。离哈德良时代仅有400年的6世纪，时代变化了。贝利撒留是6世纪的武将，普罗科皮乌斯尽管理解希腊罗马文明，毕竟也是6世纪的历史学家。

哥特军队对罗马西面和南面的进攻没有因为进攻哈德良陵园失败而停止。他们攻占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贝利撒留甚至不得不亲自率兵前去夺回。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也不再安全。如果通往意大利南部的道路被封锁，就不可能去那不勒斯筹措军粮武器，普罗科皮乌斯曾被派去过好几次。

长期的攻防战也给进攻的哥特方面带来了许多不便。首先，士兵们被贝利撒留的巧妙战法所折腾，牺牲不断增加。哥特人在意大利生活了半个世纪，已经不再是以前不懂文明生活的蛮族了。有人开始抱怨在水道桥拱下挂帐布就地野营的不便。国王维提吉斯是靠着士兵们的支持当上国王的。他绝对不会允许放弃将近一年的进攻而撤军，但也不能无视士兵不断郁积起来的不满情绪。

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哪一方提出的了。总之，双方都有了休战的愿望。休战而不求和，哥特国王维提吉斯便可不伤体面地撤军了。

公元538年3月，历时一年零九天之后，罗马攻防战暂时落下了大幕。普罗科皮乌斯没有描写全体坚守者欢欣沸腾的场面，也许他们连喜悦的气力也没有了。但38岁的贝利撒留从一开始就没想遵守休战协约。在开始追击撤走的哥特军的军事行动前，他给查士丁尼皇帝写了一封可以说是“御状”的信：

> 遵照陛下敕命，臣进攻哥特人统治之地，夺回西西里，称霸坎帕尼亚，并使罗马回到陛下手中。尽管师出有名，但也付出了惊人的牺牲。直到现在这个阶段，陛下的士兵们抗击了大群蛮族，英勇善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臣明白胜利靠的是神意。但王和将军的名声取决于他们制定的计划，取决于这计划的结果是好是坏。

请允许臣坦言，如果陛下希望士兵今后活下去，就请送粮食来；如果陛下希望他们勇敢战斗，继续收复失地，就请送武器、马匹和援兵来。

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当初把我们当做同胞和解放者来欢迎。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缺兵少粮，并由此认为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初对我们的期望，那么，他们的好意可能会直接转变成对我们的敌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人生已经奉献给了陛下，如何调遣概由陛下决定。如果陛下认为我的死将有利于陛下的名誉和帝国的繁荣，我已作好准备，甘受一死。

简单地说，这只是一封“突然翻脸”的信，令人哑然失笑。我们不知道查士丁尼皇帝是如何解读这封信的。不过，他决定要派人支援。至于派什么人和怎么派，就只能是查士丁尼式的做法了。

1600名士兵渡过意大利半岛西面的第勒尼安海，在意大利南部泰拉奇纳登陆。7000名士兵沿意大利东面的亚得里亚海北上，在意大利中部皮切诺登陆。他们带去了大量金币和银币。当初开始意大利半岛收复战时只有5000人，现在的支援可是下了大决心的。不过，查士丁尼还派来了另一位司令官，说是指挥那7000人。

纳尔塞斯将军

我忘记了是拿破仑还是谁曾经说过，两位优秀的将军不敌一个平凡的将军。纳尔塞斯是宦官，与走宫廷官僚路线的许多宦官一样，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不详。但传说公元538年时他已有60岁了。纳尔塞斯完

全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宦官”，他是一个别有特色的宦官。只有他不是那种脑满肠肥、做官能力出众但长于中饱私囊的宦官，也不是那种一心只想着借侍奉在皇帝身边的机会耍弄阴谋、陷害忠良的宦官。

从年轻时起，纳尔塞斯就一贯身材苗条，行动也与同僚不同，总是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他集皇帝和皇后的信任于一身，从皇宫的仆人做起，直到执掌整个宫廷。他被派到意大利来之前，业绩仅限于内政和外交，毫无指挥战斗的经验。他得到重用的原因在于他能在任何状态下解决问题。纳尔塞斯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派纳尔塞斯出来时，查士丁尼皇帝对他说：“在你认为对帝国有效时要听从贝利撒留的指挥。”没有比这更不懂战争的指示了。他把“对帝国有效”的判断权交给了纳尔塞斯。难道下这道指示的查士丁尼会认为自信满满的60岁的人会那么容易地听从38岁人的命令吗？

实际上，贝利撒留指挥的6500人和纳尔塞斯指挥的7000人是各自为政的。这时正处于罗马守军保住罗马、兵力倍增、乘势转入攻势的时期。两雄并立的状态导致了国家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和兵力。不，甚至造成了无法用兵力和时间衡量的巨大损失。

当时贝利撒留没有向查士丁尼皇帝告“御状”，但其手下将士的不满似乎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决定召回纳尔塞斯，把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也划归贝利撒留指挥。

一位不平庸的将军何止胜过两位，简直胜过三位、四位将军。指挥系统一手抓的贝利撒留一改战略，决定直接攻击敌人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有四个理由这样做：

一、维提吉斯得到了喘息时间，已再次集结了号称15万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各个击破，收复意大利半岛的原定目标势必后延。

二、查士丁尼劝诱法兰克国王共同战斗，但法兰克国王一直在观望，没有参战。如今哥特方面已经转为守势，法兰克国王便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开始进攻意大利北部。

三、米兰遭到哥特军队进攻，陷入毁灭状态的惨状如果传到意大利其他地方，就会出现意大利居民完全站到反拜占庭一边的危险。

四、哥特军队钻了拜占庭军队二将并立无法组成统一战线的空子，扩大了行动范围，使得意大利中部的居民遭受兵祸，陷入了悲惨境地。

关于第一点，战争的拖延对进攻的一方更加不利，如果有办法阻止拖延，就值得一搏。

关于第二点，法兰西王国决然进攻意大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从了查士丁尼的劝诱，赞同所谓天主教徒共同合作，消灭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哥特王国的想法。在罗马时代，高卢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边”（Transalpina）,法兰克人称霸于此。对他们而言，“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一边”（Cisalpina）的意大利北部并非另外的世界，而是来往容易的同一个世界。因而，对贝利撒留而言，法兰西王国不是同盟者，纵令不是敌人，也必须时常对其动向保持警惕，必须在其势力扩大到此之前控制意大利北部。

第三是米兰事件。贝利撒留已经派去1000人的兵力承担防卫。哥特人已经抛弃了狄奥多里克时代与罗马人共存的路线，把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人视为敌人。他们袭击了米兰。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写道：

> 守城兵和居民相信了哥特方面的承诺，打开了城门。所谓承诺，就是不杀不抵抗者，也不毁城。可是，哥特方面完全没有遵守这个承诺。首先，城市遭到完全破坏，被焚毁殆尽。其次，男人不论老幼全部被杀，人数达到30万。（这是相当夸大的数字。有研究者说，这个时期的米兰人口在15万以下。——作者注）女人也全部

被当做奴隶，分给了为哥特方面参战的勃艮第士兵。

米兰的长官（praefectus）列帕拉图斯被俘后没有立即被杀，而是被活生生地大卸八块，然后切成小块喂狗。只有队长威尔简提努斯和少数士兵逃脱，横穿意大利北部之后终于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在那里向皇帝报告了米兰的惨状。

后来，哥特军队轻而易举地攻下了被米兰惨剧吓破胆的周边城市，将意大利北部的西半部分再次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罗马成为有名无实的首都以后，米兰一直是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的首都。霍诺里乌斯皇帝把皇宫移到拉文纳只是出于防御上的原因。拉文纳位于波河河口湿地，不可能替代位于平原地带的米兰，仅干线就有4条罗马大道会集到米兰。

圣安布罗西乌斯致力于使天主教会更加组织化，他任米兰主教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受这位优秀宗教家的影响，米兰发展成为一座规格次于罗马而信仰之强烈却胜于罗马的天主教城市。米兰居民对查士丁尼皇帝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正因为如此，贝利撒留在罗马攻防战休战时，立即派部将率1000名士兵前去保卫米兰。

现在，米兰化做一片无人的废墟。拜占庭军队的安全保障如此无力，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城市遭到彻底破坏，男人被杀，女人沦为奴隶被掳往勃艮第。人口仅次于罗马的都市米兰，竟连一个村庄都不复存在了。这样的境况持续着，米兰在数百年之间也未能再次崛起。在此期间，意大利西北部的中心移到了30公里以南的帕维亚。米兰城再次在历史上露脸已是进入中世纪后期的事了。

关于第四点，贝利撒留的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叙述意大利中部

的惨状。虽然行文略长，我还是把这部分全部译出。这是能让我们了解一旦家园化为战场人们境遇如何的最好史料：

> 那年（公元538年）夏天。田里小麦开始抽穗，却不是往年那样的丰收景象。农民数量不足，无法用牛拉犁耕地后播种，只能把种子撒在没有犁过的土地上。发芽成长的作物数量很少，能结果的就更少。
>
> 埃米利亚也是一样。农民连自食的小麦都收获不到，他们舍地弃屋，带着家人来到马尔凯。这里濒临亚得里亚海，拜占庭方面掌握着制海权，可以指望得到拜占庭送来的救援物资。
>
> 干农活的人口减少，农作物匮乏。托斯卡纳也发生了这种现象。托斯卡纳居民为躲避哥特军队多半逃进山区。可山里食物不足，他们只好采集橡树果磨粉，靠吃橡树果粉做成的面包活命。
>
> 粮食极端匮乏自是疾病的温床。很多人没有饿死，却死于疾病。据说仅马尔凯饿死的人数就不下5万，而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死者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
> 我亲眼看到了实情，我想写下他们的死亡过程。
>
> 人先是消瘦下来，脸色变黄。身体长期得不到食物补给时，要靠古人所说的“吃自己的肉”来维持生命。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已低下，胆汁泛滥，侵蚀脏器，肤色脸色都变成茶褐色，看上去蜡黄一片。这样的状态不断发展，皮肤失去原有的水分，干燥得令人难以想象，皱纹深刻，就像没有鞣过的皮革裹在骨头上。
>
> 不久，茶褐色变为铅色，再变为黑色。到了这一步，人的身体会变得像被火烧得发黑的木烛台，眼睛不再注视什么，只是吃惊似的大睁着。人们大多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死亡。
>
> 由于过分饥饿，体力极度衰弱，偶尔看到野草想过去吃，却无力靠近，以手伸向前方想去拔草的姿势倒伏地面死去。
>
> 尸体被弃置原地，没有人还有体力掘墓埋尸，连贪吃的狗和啄

尸的鸟都不会去看一眼这些被遗弃的尸体，那些尸身上连狗噬鸟啄的东西都没剩下。死神袭来时他们已饿得连自己的肉体都完全消耗殆尽。

纳尔塞斯被召回，贝利撒留成为唯一的司令，又像一年前那样可以一个人决定战略了。他绝对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逆转颓势。否则，3年来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进入公元539年后，贝利撒留攻势果敢，势如喷火。他必须扭转现状，而且必须尽快。

拉文纳陷落

在过去近30年中，拉文纳已经数度遭受进攻。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们把皇宫放在这里，推翻这些皇帝的北方日耳曼系蛮族国王们也把王宫放在这里。水路成网，拉文纳便位于网格纵深处，只从陆地方向进攻则易守难攻。

贝利撒留从陆地和海上两个方向对拉文纳同时发起进攻。他填埋了陆地上的运河，又动员周边港口城市的船只封锁海上。他为此花去了半年时间。到了公元539年12月，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维提吉斯和全体手下将士一起，接受了贝利撒留的劝降。

贝利撒留遵守了让对方投降所作的所有承诺，把国王及其家眷送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皇帝接受了贝利撒留的进言，将保留他们的性命。东哥特人的财宝以及与国王一同保卫拉文纳的士兵也都被送往君士坦丁堡。

可是，皇帝在承诺保证全体哥特人和国王性命的信件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我想，以后与哥特人的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劳烦阁下这样的武将。皇帝急盼能早日亲见并赞美此次胜利的最大功臣，急盼听到帝国最高将军亲口说出的高见。除了我们的将军，无人能够迎战东方波斯再次发动的攻势。

一言以蔽之，皇帝以“别人无可替代”为由命令贝利撒留从意大利撤回。的确，贝利撒留已经占领了王宫所在地拉文纳，国王及其手下重臣们也都被押上拜占庭的船，正准备出发前去君士坦丁堡。

然而，哥特兵大都还留在意大利半岛，那可是不下10万人的战斗力。查士丁尼召回了贝利撒留却没有派来替代的司令官。这意味着，要让一直在贝利撒留手下作战的11位大队长在他离开后继续清剿哥特军队。这次可不是二将并立，而是十一将乱立了。

贝利撒留没有说一句抗议的话，就连对心腹普罗科皮乌斯也没有吐露半点内心的想法。他什么都没说，上了开往君士坦丁堡的船。在船上，他聊其他事情，可绝口不提查士丁尼的信件。

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为他举行收复北非时那样的凯旋仪式，我想这恐怕也是贝利撒留的意思。然而，老百姓由衷的敬爱都集中在刚满40岁的贝利撒留身上。查士丁尼也破例准许贝利撒留拥有7000名家兵，给予他的地位大大高于作为臣下的将军，已近乎封建君主。尽管如此，对查士丁尼而言，贝利撒留终究不过是臣下，是将军。不到一年，贝利撒留便被派往东方，他的下一个任务是与波斯作战。

东哥特人的国王维提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很自由，根本不像是战俘。他改信了天主教。他还被授予元老院议席，位列“贵族”，因为这位战俘已然成了皇帝的密友。虽然东哥特人的财宝被收归国库，但他衣食无忧。来到君士坦丁堡两年，他活得很悠然。和国王一起投降的哥特兵被编入了拜占庭军队。当然，他们也都改信了天主教。

战端再开

可以想见，国王被俘并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哥特军队由于贝利撒留的离开得以在意大利半岛东山再起。公元540年秋，贝利撒留离开还不到一年，托提拉被选为国王，哥特人又集结在他的麾下。拜占庭军队与哥特军队以意大利半岛为战场再开战端。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即是米兰和皮切诺惨剧的易地重演。

这种的状态持续了4年。哥特军队在托提拉的指挥下统一战略，协同作战，把11位指挥官各自为政的拜占庭军队玩弄于股掌之间。拜占庭方面不仅在军事上，在统治方面也一再失分。

拜占庭不能尽到保障安全这个为政者的第一职责。行政官们只热衷于横征暴敛，还把拜占庭帝国行政官僚贪污受贿的习惯带到了罗马。难怪意大利半岛居民们的感情开始倾向于哥特人一边了。

哥特国王托提拉利用了这一点，他把清廉与宽容放在首位。他不仅欢迎对待遇不满的拜占庭逃兵，还利用这些士兵去劝诱那些仍在拜占庭军队的士兵开小差。他严厉命令自己的哥特军队士兵不得袭扰农民市民等民间百姓，还命令以前强抢在乡下避难的女人索要赎金的人，免去赎金放人。托提拉亲自对士兵说，战胜拜占庭要靠端正的行为。

托提拉还致函罗马元老院。在信函中，这位哥特国王称罗马人为亲爱的朋友，发誓哥特人将回到当年狄奥多里克实行的与罗马人共存的路线上。这个誓言不只停留在语言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连普罗科皮乌斯也不得不认可哥特方面的这种公正性。

哥特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自己的统治达到了现有的意大利北部，还进一步达到了意大利中部，甚至达到了那不勒斯以南的卢卡尼亚、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等地。这样，哥特将意大利南部地区也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些地方连狄奥

多里克时代都不在日耳曼系蛮族的统治圈之内。留给拜占庭的，只是从拉文纳到罗马的带状地域。拜占庭受到挤压，唯一的优势是还保有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权。

托提拉

面对现状，就连不可一世的查士丁尼也必定感到有必要打开局面。这时浮现在皇帝脑海里的还是贝利撒留。贝利撒留在波斯前线收到皇帝的命令，他被再次派往意大利战线，感觉上只是顺便路过了一下君士坦丁堡似的。这时的贝利撒留已经44岁。

这年秋天，贝利撒留到了拉文纳。他听取了自己不在的这4年中意大利战线的情况汇报，并亲自作了视察。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之后作何感想。他给查士丁尼皇帝送去了下面这封信：

蒙神深深眷顾的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再次回到意大利我才知道，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士兵、马匹、武器和军费，我们缺乏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

查士丁尼（左）与贝利撒留

在来这里的途中，我路过了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两地，边走边招兵。可是我只招到4000人。这些人非但没有武装，而且完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甚至不知如何使用武器。

我军在意大利的所有士兵也因军粮不足、拖发军饷，不满即将爆发。这4年来遭受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信心，如惊弓之鸟，一听到哥特军队，便会丢盔弃甲，逃之夭夭。

长久以来，在意大利已征不到税。能够征到税的地方都已处在

蛮族的统治之下。征不到税便不能给士兵发饷。如此一来，我们指挥官便无从行使叱责士兵让他们服从命令的权力。

陛下，您可知道，我们的士兵已经有很多投降了哥特方面。

如果以我之死便能结束战争，这即刻可以办到。但是，如果陛下希望打赢战争，就不能不作许多准备。没有军事力量，将军不过是徒有虚名。

首先请允许我的私家军队前来意大利。要与哥特重新开战，我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兵力。此外，根据来意大利途中在巴尔干获得的情报，匈奴人的骑兵团有意参战。如果能够雇用他们，将会帮上大忙。但是他们不见现金不会参战。这时必须金钱先行。

贝利撒留紧急派遣一位信得过的队长，带着信件前往君士坦丁堡，严命他必须直接将信件交到皇帝手上。然而，不知道是查士丁尼没有理解贝利撒留直接上书的意义，还是认为没有必要，他亲切慰劳了送信的队长，甚至为他张罗结婚对象，却始终没有写回信。好像他钦准了7000名私家兵前往意大利，也许他认为这已足够。

贝利撒留等不来军费、武器、马匹和士兵，只能依靠手上的兵力重新开战。这时，意大利半岛的大半已归哥特人统治，战役不可能像8年前攻占意大利南部时那样顺利。艰苦作战，疲于奔命，两年时间转瞬即逝。

司令官不能保障军饷、军粮和武器，指挥也就不灵。贝利撒留只拨给派去防守罗马的两个队长3000名士兵。他们可能因此丧失了斗志，在哥特军队将要打过来之际，非但不专心准备防御，反而大肆倒卖军用物资。公元546年夏天，罗马再度遭到哥特军队的攻击。

在9年前的罗马攻防战中，敌人只集中攻击了一半的罗马城墙，还不能说是包围战。可是这次不一样了。托提拉指挥的哥特军队包围了包括台伯河西岸在内的整个罗马。台伯河上也拉起了牢固的铁锁链，从奥

斯提亚来的船只完全进不了罗马城。从罗马南去的阿皮亚大道及其他大道也被全部封锁。尽管这个时期罗马市内的人口进一步减少，但仍留有近10万人，他们被完全封锁在罗马城内。

贝利撒留断然决定突围。他让人在奥斯提亚调集了200艘船，让步兵和武器上船，靠牛在两岸牵引和人力划桨沿台伯河溯流而上。骑兵团顺着奥斯提亚大道和港口大道这两条沿台伯河通向罗马的大道行进，护卫逆河而上的船队。贝利撒留想利用流经罗马市内的台伯河去增援已被包围的防守部队。

行进在前面的两艘船比其他船只要大，船头经过特别加固。两艘大船的任务是突破铁锁链，其他船只也为防备岸上敌人的攻击，在船腹围上了一圈厚板。

哥特方面一定预料到罗马方面会利用台伯河突破封锁，所以事先在河上拉起铁锁链。他们在拉起铁锁链的地方筑起高塔，派200名士兵把守。

贝利撒留站立船头，亲自指挥，断然实施突破，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岸的两座高塔均被破坏，哥特士兵一个不剩，全部被杀。船队成功靠岸，沿阿皮亚大道而来的骑兵团也逼近了守在城外的哥特军队，已是面对面的距离了。

然而，尽管派出密使提前作了指示，防守罗马的拜占庭的两个队长和他们手下的3000名士兵却按兵不动，至少没有像贝利撒留所期待的那样行动。这样，贝利撒留和他的部队面临被关进包围中的罗马的危险。贝利撒留只得再次登上船，命令其他船只和士兵撤回奥斯提亚。

未能响应此次突围的不仅是罗马市内的拜占庭将士，罗马居民也没有组成自卫队奋起响应，这与上次的情形不同。他们在挨饿，饥饿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身体，也销蚀了他们的意志。

在进攻的哥特军队方面也能看到与前次攻防战的不同之处。他们并未像9年前那样不断发动进攻，而只是持续包围。这场攻防战很奇妙，感觉就是实施包围，从外部彻底封锁，等待市内的消耗。贝利撒留的秘书官普罗科皮乌斯看着这样的罗马写道：

> 被托提拉完全包围的罗马市内缺乏所有物资，其中食物匮乏最为严重，而且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捕食平日绝不会去吃的东西。
>
> 被派去保卫这些罗马人的两个拜占庭将军和他们手下的士兵，非但没有奋起防御，反而热衷于向市民高价倒卖为他们特别储备的小麦。买得起的人极其有限，因为价格已经飙涨到了1摩第（约等于8.73升）小麦需花7枚金币的地步。
>
> 更多的市民只得采集荨麻来吃。这种杂草生长在神殿、公共浴场和会堂等倒塌后的遗址上，是罗马市内唯一量大的东西。但是这种草生有细刺，直接食用会伤及口腔和咽喉，需要煮炖，直到草刺变软。
>
> 但是，光吃荨麻体力就会下降。人们的身体随着包围日久逐渐消瘦，脸色也会变成铅色，宛若幽灵。人们嘴里嚼着荨麻，幽鬼一般地走在路上，不时有人突然倒毙。而市内没有埋葬之处，尸体便被弃置路旁。

贝利撒留命令市内的队长疏散人口，但结果与9年前攻防战时完全不同。

9年前疏散人口时，大量的人、车挤满了南下的大道，人们都有避难的去处，车上装着家具、衣物和食物。然而，公元546年的难民却一无所有。普罗科皮乌斯这样写道：

> 拜占庭军队的两位将领，最后允许市民离开罗马去各自希望的地方逃难。只有少数人选择留下，大多数人选择了逃离罗马。

可是，这些人迈出打开的城门后，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大道上。长期的饥饿使得他们体力衰竭，沿大道行走也成为重负。他们在路旁、在河边迎来了死亡。

哥特兵在等着走在前面的人。哥特兵根本不需要战斗，只要枪尖一挑，无力抵抗的难民便呜呼哀哉。

这就是世界上曾经人人憧憬的、光鲜无比的罗马市民现在的形象。

不久，哥特军队于12月进入罗马城。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罗马从内部崩溃。被派来保卫罗马的拜占庭士兵已经在哥特人进城之前悄悄溜走了。

哥特国王托提拉首先参拜了耸立在台伯河对岸梵蒂冈的奉献给圣彼得的教堂。虽说是属于阿里乌斯教派，但哥特人也是基督教徒。后来的托提拉与曾经发誓成为罗马人亲密朋友、回到狄奥多里克共存路线上来的自己已判若两人。自己已成为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命运则取决于自己。这种想法清楚地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上。

首先，三分之一的城墙被毁。虽然被毁长度总和是城墙总长的三分之一，但城墙到处被截断，已被破坏得无法使用。留下来的罗马市民被迫对城墙进行了破坏。其次，留下来的元老院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俘，哥特军队走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直到赎金送到。可是，元老院议员的财产基础是大农庄，长期的哥特战争已使农庄荒芜。筹集赎金也不像哥特国王所期待的那样顺利。这些被称为元老院阶级、权势显赫的元老院议员和他们的家人亲戚，就这样在肉体上被消灭了。没有被杀的人也都去向不明。

这就是自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国以来，一直与罗马国家共浴荣光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m）的终结。

也许是哥特人觉得这座罗马城已经失去所有魅力，便抢完能抢的东西，押着元老院议员离开了此地。此后40天，这个曾被称为“世界之都”、广袤帝国无人不晓的罗马，被抛弃在悲哀与荒凉之中，无人回头再看上一眼。这就是翌年2月贝利撒留再次夺到手里的罗马。

贝利撒留从修复城墙着手，开始重建罗马。但查士丁尼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命令贝利撒留把罗马防御交给别人，优先肃清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哥特势力。查士丁尼这个时期的命令，不像是在了解意大利战况之后发出的，而好像是基于造访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人带来的情报和某些人的陈情。战线南移到意大利南部，也许就是某位在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拥有大型农庄的人陈情的结果。不管怎样，贝利撒留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只能挥师南下。

耗费一年时间，贝利撒留终于取得了夺取意大利南部的胜利，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哥特势力被一扫而光。然而，在这一切告一段落后的公元548年秋天，送到贝利撒留手上的是查士丁尼皇帝的召回令。这次召回不是让他负责波斯战场。关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后的任所，命令中没有任何表述。

因而，人们感到这时的召回就是事实上的解职。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战场，人们都在传言，贝利撒留因未能结束哥特战争而被追究责任。

的确，他第二次被派到意大利战场即将4年。在此期间，哥特军队的势力未见衰退，国王托提拉也安然无恙。出于好意来评价，他所取得的战绩也只能说是阻止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可是，考虑到贝利撒留回来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和派给他的兵力，他不可能取得更好的战绩。

不过，在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作出决定，却不承担责任。臣下没有决定权，却不得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基督教国家，君主受神意而立，追究君主的责任就是追究神的责任。不能追究神的责任也就不能追究君

主的责任。贝利撒留不过是臣子，查士丁尼大帝对他也不过是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对待臣下而已。可是，查士丁尼召回了贝利撒留，却没有派人去顶替他。

查士丁尼这样做，是因为斯拉夫民族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不断激化，拜占庭帝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此。巴尔干紧靠君士坦丁堡的西边，而意大利半岛对君士坦丁堡而言则是遥远之地。

贝利撒留离去后，意大利半岛的状况已不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哥特军队与拜占庭军队在意大利半岛各地冲突不断。意大利天主教会的主教们看不下去，派代表去君士坦丁堡请愿，请求查士丁尼皇帝不要再在意大利打仗了。

可是皇帝没有理睬这个近似哀求的请求，但又不愿增派军队一决胜负。这样，又过去了4年。在此期间，贝利撒留有时会被派往多瑙河下游指挥与保加利亚或斯拉夫民族的战斗。除此之外，不管享有多高荣誉，在皇宫里有多高地位，他事实上一直处于“赋闲”状态。从48岁到52岁，这对男人来说是最后拼搏的时期，而贝利撒留却被放在闲职上虚度年华。

战争结束

公元552年，查士丁尼似乎终于下了决心要结束哥特战争。可是他没有任命52岁的贝利撒留，而是任命年过七旬的纳尔塞斯一个人担任总司令职务。不过，即使在这个年龄，纳尔塞斯也还保持着不输给壮年男人的智慧。

纳尔塞斯有着宫廷官僚的资历，而贝利撒留则只有军人资历。贝利撒留是一旦被任命就会立即奔赴战场战斗、然后直接向最高司令官皇帝报告的一类人。纳尔塞斯却是没有完全作好准备就不上战场的一类人。

公元552年，纳尔塞斯横跨巴尔干地区进入意大利北部。我们不清楚他率领了多少士兵去意大利，但加上尚在意大利的兵力，总数在3万人。收复意大利的战争以5000人兵力开始，花了17年的岁月也未能结束，这次投入了当初6倍的兵力。纳尔塞斯一定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用决战的形式一决胜负。这种打法就是引诱哥特军队进行会战，力求击毙敌方头目，一战定乾坤。

这个战略本身并不坏。但纳尔塞斯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带来的士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数过万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是起源于东北欧的蛮族，居住在现已成为各方势力真空地带的多瑙河中游以南一带。在北方蛮族中是最新到来的部族。6世纪时，人们已开始犹豫是否还把已在高卢称霸的法兰克人和逐渐称霸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继续称为“蛮族”。这时的伦巴底人却还只是名副其实的蛮族。

纳尔塞斯把武器交给伦巴底人，教他们如何使用，向他们支付佣兵费来使他们通过货币接触货币经济。他还把他们投入与哥特军队的战斗中，让他们积累实战经验。他把这群乌合之众造就成了出色的军人。然而，这样做很快就让意大利人和拜占庭人都吃了大苦头。伦巴底人即将成为因哥特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意大利半岛的下一个主人。

会战，就是以广阔的平原为战场，两军相对布阵，一声令下，两军士兵激烈冲撞，一战而决胜负。会战是战斗之花。两军的司令必须同时有会战的决心，会战才能进行，这应该是会战的一个缺点。不论纳尔塞斯如何想打会战，如果哥特国王托提拉不愿意，会战就打不成。自从贝利撒留被召回之后，哥特军队在战斗中一直处于优势，托提拉很是强硬。

公元552年夏，纳尔塞斯率领拜占庭军队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托提拉率领哥特军队则沿同一条大道北上。两军接近，距离只有18公

里。纳尔塞斯派使者给托提拉送去一封信，内容当然不是建议讲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如果投降就饶恕你们！”

托提拉看了信，口头回答了使者。回答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不战胜则战死。”使者问道：“何时开战？”托提拉的回答也只有一句：“8天以后。”

然而，第二天天一亮，哥特军队便发起了进攻。纳尔塞斯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他选在平原宿营，这样数量上占优势的己方军队能够展开，可以及早发现敌人的偷袭，并迅速布阵。这位老将并没有花时间作鼓舞士气的演说。他让人抬着许多准备奖赏给英勇作战的士兵们的金链子从整齐的队列前面走过，展示给士兵。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日头西斜。虽然伦巴底士兵的伤亡大于敌人，但他们死死守住了奉命坚守的阵地。而哥特军队有6000人战死，国王托提拉一度逃出包围，但很快被追上，壮烈战死。

敌兵尸横遍野，获胜的纳尔塞斯跪在地上祈祷，感谢神、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战败的哥特人尽管属于阿里乌斯教派，但也是基督教徒。然而正统天主教徒人人都坚信不疑，神与自己同在，而不在敌人一方。

祈祷之后，纳尔塞斯向为自己而战的伦巴底士兵支付佣兵费，然后把他们解散。伦巴底的士兵们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撤离，回阿尔卑斯山脉背面的故乡去了。他们在回乡途中一路抢掠，暴行连连。

纳尔塞斯率领剩下的拜占庭军队，踏着哥特士兵的尸体，继续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贝利撒留离开后又被哥特人占领的罗马城。

命运多舛的罗马城也是意大利半岛命运的写照。

公元536年——贝利撒留入城。

公元546年——托提拉入城。

公元547年——贝利撒留入城。

公元549年——托提拉入城。

公元552年——纳尔塞斯入城。

这就是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人所不得不经历的命运历程。

意大利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因长达17年的哥特战争疲弊已极，而拜占庭军队和哥特军队也免不了消耗。哥特王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15万到20万兵力了。他们呼吁同为日耳曼系的阿勒曼尼人共同作战，结果反被戏弄，遭到攻击。不过他们尚存气力与拜占庭军队继续战斗。托提拉战死后，哥特人选出特阿斯接替托提拉，着手重组军队。

纳尔塞斯却不等他们做完这一切，当他得知哥特人重组军队所需资金藏在库马的神殿后，便立即进攻那不勒斯附近的这座古城。他料到特阿斯知道后会率兵赶来保卫库马，便设下了一个圈套。

就这样，第一次会战半年以后的公元553年春天，拜占庭与哥特在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南部平原展开了激战。激战在第一天未能决出胜负，整整对决了两天。翌日，当落日的余晖把第勒尼安海染成金黄色的时候，东哥特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特阿斯与众多士兵一道战死沙场。这是英勇奋战之后壮丽的一死。

得知国王战死，哥特军队投降了，保命是唯一的条件。纳尔塞斯命令他们选择要么服膺拜占庭皇帝的统治在意大利生活，要么离开意大利回到阿尔卑斯山脉北面去。哥特士兵多半选择了后者。

意大利之死

就这样，普罗科皮乌斯叙述的这场战争的第18个年头结束了。

《哥特战记》撰写至此，普罗科皮乌斯搁笔。从收复西西里算起，查士丁尼皇帝发动的收复意大利的战争长达18年，终于在公元553年结束。在罗马帝国存续的时期，意大利是帝国的本土。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因持续了18年之久的这场战争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和损失。同样信奉天主教的拜占庭帝国发动了哥特战争。这场战争给意大利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打击，比一个世纪前蛮族的反复入侵更加沉重。这是近现代许多历史研究者所公认的事实。意大利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引领复兴的领导层被消灭殆尽。

此外，哥特战争的幸存者也没有运气拥有光辉的明天。这次以“皇帝代理官”（exarch）之名负责统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纳尔塞斯，露骨地暴露出了他那君主专制国家官僚的本质。他知道身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想要收回战争期间花掉的费用。纳尔塞斯对已是拜占庭帝国领土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横征暴敛，课以重税，而且是在人口锐减、土地荒废、生产凋敝的状态之下。纳尔塞斯似乎相当长寿，这位皇帝代理官连续统治意大利长达15年之久。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在18年的战争之后，又在苛政之下痛苦挣扎了15年。扼杀帝国本土意大利和首都罗马的不是蛮族，而是同胞东罗马帝国。

翻译成农庄也好，别墅也罢，在整个罗马时代，“villa”（拉丁文原意有农场、农庄、村庄、乡间宅邸、别墅等义。——译者注）都是农业生产的基地。近年来，整个意大利都在发掘它们的遗迹。规模大且分明是农业生产基地的“villa”，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据从事发掘的考古学家说，很难证明到6世纪后半叶仍然有西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villa”。他们说，从这个时期开始，宏伟壮观的“villa”都化为了废墟。

如果他们所言不谬，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villa”熬过了蛮族灭亡

西罗马帝国，却未能熬过拜占庭帝国发动的战争和战后的苛政，而古代的大规模农庄就相当于现代的基础产业。

贝利撒留之死

就在纳尔塞斯在意大利独擅大权的公元559年，贝利撒留少有地被授权指挥在巴尔干地区与保加利亚人的作战，他获胜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年已59岁的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之后，贝利撒留又被赋予闲职，在皇宫中闲晃。公元561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在绝对专制的国家里极易致命的事件。

当时，查士丁尼皇帝去世的流言在君士坦丁堡传得满城风雨。查士丁尼已经79岁，死亡并不足为奇。贝利撒留未经确认就信以为真，公然毫不掩饰地批判查士丁尼。查士丁尼闻讯后大为震怒。皇帝暴怒，盘踞皇宫的官僚便趁机搞起阴谋。这也是绝对君主政体国家必有的现象。贝利撒留的一个朋友被捕，交代说贝利撒留阴谋暗杀皇帝。

可是不知为何，对贝利撒留的“处罚”决定竟花了两年时间。公元563年判决下达，贝利撒留被没收全部财产，软禁在家。查士丁尼也许难下决心将40年来给帝国带来无数胜利的忠臣投入牢狱。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半年后重新判决贝利撒留无罪，返还财产，恢复自由。

可是，贝利撒留仅有8个月的时间享受这一切。公元565年3月13日，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武将病逝，享年65岁。

查士丁尼之死

公元565年11月14日，贝利撒留死后8个月，查士丁尼病逝，他83岁

的天年亦属罕见。

他的统治长达38年。最后的15年让他颇多烦恼。老皇帝的忧虑大约有下述三点：

一、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渐渐转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使拜占庭和波斯这两个东方强国疲弊至极。不久以后，波斯就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面前一下子崩溃了。这也可以说是波斯与拜占庭之间毫无收益的长期战争的余波。

二、拜占庭帝国很难阻止渡过多瑙河下游蜂拥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即使在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出生之地，也是拜占庭帝国之祖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之地的巴尔干地区，帝国的力量也一直在衰退。

三、在东部、巴尔干，尤其是在西部，长期持续的哥特战争给拜占庭帝国的财政带来重创。查士丁尼的侄子，后来继位当上皇帝的查士丁二世在统治之初就明确说过：

> 在我面前打开的国库里，除了许多借款凭证以外，一无所有。帝国财政的现状令人绝望。缺乏军费，军事便会乏力，这样下去只会被蛮族欺凌。

这就是最大限度扩张领土、炫耀最高权势、号称最繁荣的查士丁尼时代的东罗马帝国乃至拜占庭帝国的形象。

这位被后世尊为大帝的查士丁尼死后3年，在意大利施以苛政的纳尔塞斯也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568年，同年伦巴底人南下来犯。意大利已经再也无人无力抗击这个新来蛮族的入侵了。

东罗马帝国耗时18年赶走了哥特人，收复了意大利，却又在15年之

后遭到伦巴底人的掠夺。伦巴底人的统治给意大利半岛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创伤，甚至让人觉得哥特人的统治根本算不上什么。

此后45年过去，历史走到了公元613年。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此后100年间伊斯兰势力迅速发展，不断蚕食着拜占庭帝国的领土。

公元636年，叙利亚被伊斯兰化。

公元642年，埃及被伊斯兰化。

公元650年，阿拉伯人进攻小亚细亚，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

公元670年，北非被伊斯兰化。

公元698年，北非的心脏迦太基陷落。

进入8世纪后，伊斯兰势力迅速波及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甚至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法兰西。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阻止了这一攻势，但其时伊斯兰已经成为覆盖从中东到北非，进而覆盖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巨大势力。

地中海的东、南、西三面均为伊斯兰势力所包围，基督教势力只残存于地中海的北面。中世纪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过去了。

世纪到7世纪的意大利半岛（选自A. Giardina, G. Sabbatucci, V. Vidotto, 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地中海已经不再是罗马人曾经称呼的“内海”（Mare Internum），她已经变成了分隔异教和不同文明的界海。

从意大利首都罗马到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如果乘飞机要比从罗马到巴黎还快。可是一出机场，你就会感到来到了不同的文化圈。没

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纯感觉上的“互不相同”。不过，如果你去美术馆欣赏罗马时代的雕像和镶嵌画，如果你移足郊外，站在残留至今的众多罗马时代遗迹面前，你一定会产生与身在罗马市内的古罗马广场和圆形竞技场中一样的感觉。

面对北非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遗迹，要比身在罗马更适合想象往昔的罗马时代。

这是因为由于文明的进步，残留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遗迹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们被埋没在众多建筑中苟延残喘；而残留在因人们久不居住而沙漠化的北非的罗马遗迹，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在利比亚的古城市遗址，人们可以180度地眺望地中海，天空湛蓝，阳光强烈，连筑城所用的大理石也变得色彩柔和，赏心悦目。

北非的遗迹并不苟延残喘于现实生活的人群之中。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绝迹，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文明迥异，根本不会去凭吊遗迹。于是，遗迹至今还在那里展现着自己的生命。

一人独自站在那里，把身子靠在圆柱上，或是坐在半圆形剧场的石座位上，你甚至会听见曾经生活于此的罗马人的声音。你甚至还能实际感受到，罗马时代的北非，其文明程度之高，内涵之丰富，比同时代的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都更接近帝国的本土意大利。

在古代，地中海的南北两面属于同一个文明圈，直到7世纪以后才开始分离。过去是连在一起的，现今却已分开，那已经不是罗马人创造的罗马世界了。

罗马世界灭亡于地中海不再是“内海”之时，消失于地中海不再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通途，而变为隔离人与人的界海之时。

以后的地中海成了这样的一片海洋，海边崖顶必定建有通知人们撤

拉森海盗来袭，让人们上山逃难的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海面上航行着满载十字军士兵东去的船只。

公元1000年逝去的时候，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意大利海洋城市国家（城邦）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交易日益兴旺，地中海渐渐成为贸易船只往返航行之海。再后来，地中海又成为高举古代复兴与人权复兴大旗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海。

可能是盛者必衰、诸行（res gestae）无常的缘故吧。

我想，如果这就是历史之理的话，那么我们后人应该正冠整衣目送历史，正是我们对先人孜孜努力积累起来的历史应有的礼貌。

—— 全书终 ——

结语

为什么要写罗马史，还要写上15卷？回答简单之至。这与“历史的写法”、“带着对现代的问题意识写史”之类全无关系，其发端只是“朴素的疑问”而已。

问到罗马史，答复都与“衰亡”相联系，这是以往的一般倾向。我想这是因为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影响。我的第一个疑问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既然有衰亡，那以前必定强盛过，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关心强盛期，却只谈衰退期呢？

于是，我首先想知道罗马为什么，又是如何强盛的。我在本丛书的第1卷到第5卷里写了罗马的强盛期。这5卷中描写的罗马在对外战争中度过了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在罗马史上是“高速发展的时期”。也许这一时期开始于王政，其后共和政体一贯到底，因而近现代以这个时期“共和政体的罗马”为题材的史书和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也许是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似乎都喜欢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

也许是因为上面的原因，随着共和政体向元首制的转变，从面向一般读者的历史书籍到学术研究，无论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在锐减。我考虑过这里的原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帝政时代的罗马脱离了政治史的一般观念。政治史的一般观念是，王政经过共和政体这种亦称贵族政体的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体之后，下面应该是民主政体。可是罗马却走向了被称为“元首制”的君主政体。这被视为是历史的倒退，换句话说，这是保守，是反动。

可是我生活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时代，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多么的

苍白无力。既然如此，我想抛开政治史的一般观念，而只考虑对一般人来说统治是否是善政。

这样一想，我觉得像过去那样轻视元首制下的帝政时代终究很可惜。首先，在长期而广泛地享受体味着强盛期所获得的果实这个意义上，这一时代相当于罗马史上的“稳定发展时期”。

在历史上生而又亡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强盛之后立即走向衰退，鲜有能在强盛期与衰退期之间拥有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也许因为这一点，长存的国家必定拥有稳定的发展期。无论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古代的罗马帝国，无不如此。

其次，帝政罗马的第二个特色是“pax”（和平）的形成。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就是“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由罗马主导的这种和平，时间持久而能够在地域辽阔的帝国全境得到维持，着实了不起。就说欧洲、北非和中近东长达两百年没有战争这件事，虽已过去了两千年还直让人感叹不已。

我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了解这种“和平”为什么会实现和怎样实现，这与政体是否为帝政并无什么关系。

本丛书的第6卷到第11卷这5卷书即聚焦于此。提出“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思想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撇开他的故事就无从展开。描写恺撒的第4卷和第5卷两卷书对了解帝政不可或缺。恺撒是罗马史从共和政体走向帝政，即从“高速发展时期”走向“稳定发展时期”的“导演”，连罗马人也认为恺撒是罗马帝国事实上的第一位皇帝。苏埃托尼乌斯所著《皇帝传》（中译本《罗马十二帝王传》，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和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译者注）也是从恺撒写起。

本丛书的最后三分之一是始于第11卷终于第15卷的时代。历史走到这里总算是步入了罗马史所独有的衰亡时期。

论述罗马衰亡的史书和研究著作多如海滨之沙粒。除了荒唐无稽的之外，多多少少都有正确之处。收集这些书籍，便有可能便捷地了解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我没有心情在四处拾人牙慧的工作中耗费只有一次的人生。

于是，在最后5卷书中，我把重点放在写“如何”衰亡，而未放在“为何”衰亡的阐述上。

一个国家的历史犹如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想彻底了解它，就只能从它的诞生一直追寻到它的死亡。

写从诞生到死亡的所谓通史，对我而言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写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书名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第二次就是这套《罗马人的故事》。虽然这两个国家在享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方面相类似，但若论及给同时代其他国家和后世的巨大影响，这两个国家却截然不同，不可比较。这就是《海洋之都的故事》两卷而终，而《罗马人的故事》却写了15卷的原因。不写上15卷，就写不了罗马的历史。

写这部15卷的《罗马人的故事》，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想了解罗马人。现在写完了，我可以由衷地说，我懂罗马人了！

如果读者也能在读完本书，掩卷之后觉得“我也懂了”，这对我来说便是无上的喜悦。所谓书籍，是靠作者写书、出版社出书、读者读书才能构成的媒体，连接这三者的红线就是“共享同一种想法”。

盐野七生

2006年秋于罗马

附录一 罗马人用以自律的“基本道德”一览表

拉丁语	盐野译案	意大利语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罗马人认知的意义及其解释
pietas	虔诚	pietà	piety	piété	piedad	Pietät	尊重永恒价值。对诸神意志心怀敬意。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良好行为。
humanitas	人性	umanità	humanity	humanité	humanidad	Humanität	重视人际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家庭之间、朋友之间还是国家之间的

							。
libertas	自由	libertà	liberty	liberté	libertad	Freiheit	尊重个人人格。保护自己及他人之人格意志。
clementia	宽容	clemenza	clemency	clémence	clemencia	Nachsicht	宽容对待投降之敌。宽容对待不同宗教、文化和风俗。
mores moralis	道德	morale	morality	morale	moralidad	Moral	道德是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积累的智慧，它不是某个时代某个个人所能单独形成的，因而是一种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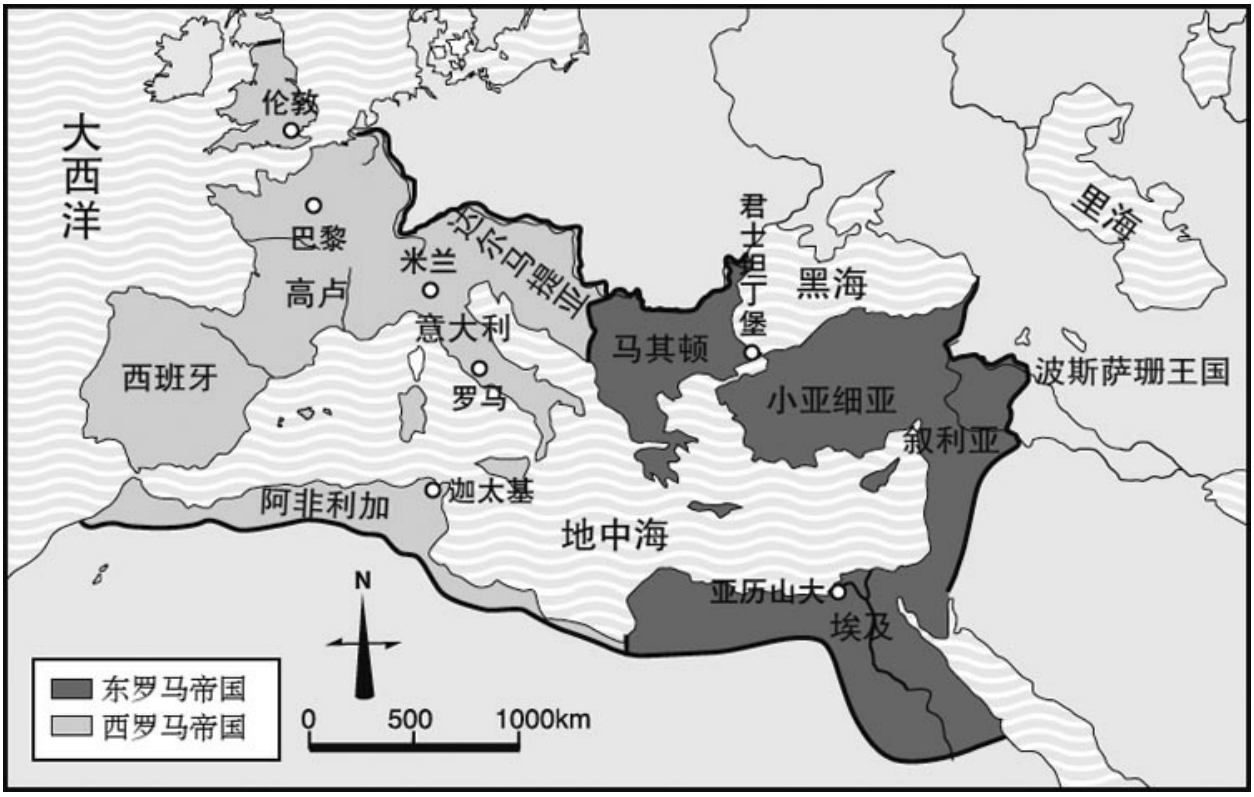
							尊重的传统。
autorita	权威	autorità	authority	authorité	authoridad	Authorität	不惟上司和权力者是从，而是服从智慧者和经验优越者的价值观。
fides	信义	féde	fidelity	fidélité	fidelidad	Treue	信义是认同罗马意志的人们之间应有的感情基础，并不限于朋友之间。
							纪律是使家庭、社会、帝国等人类共同生活其间的各种

disciplina	纪律	disciplina	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a	Disziplin	组织发挥功能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应该通过每天的训练使纪律得到遵守。
severitas	严格	severità	severity	sévérité	severidad	Severität	这更是一种严于律己的纪律。
gravitas	威严	gravità	graveness	gravité	gravedad	Gravetät	认清真正重要的事情，充满责任感地予以实施。
constantia	一贯性	constanza	consistency	consistance	consistencia	Konsequenz	方针一旦确定便扎扎实实坚持到最后的、一以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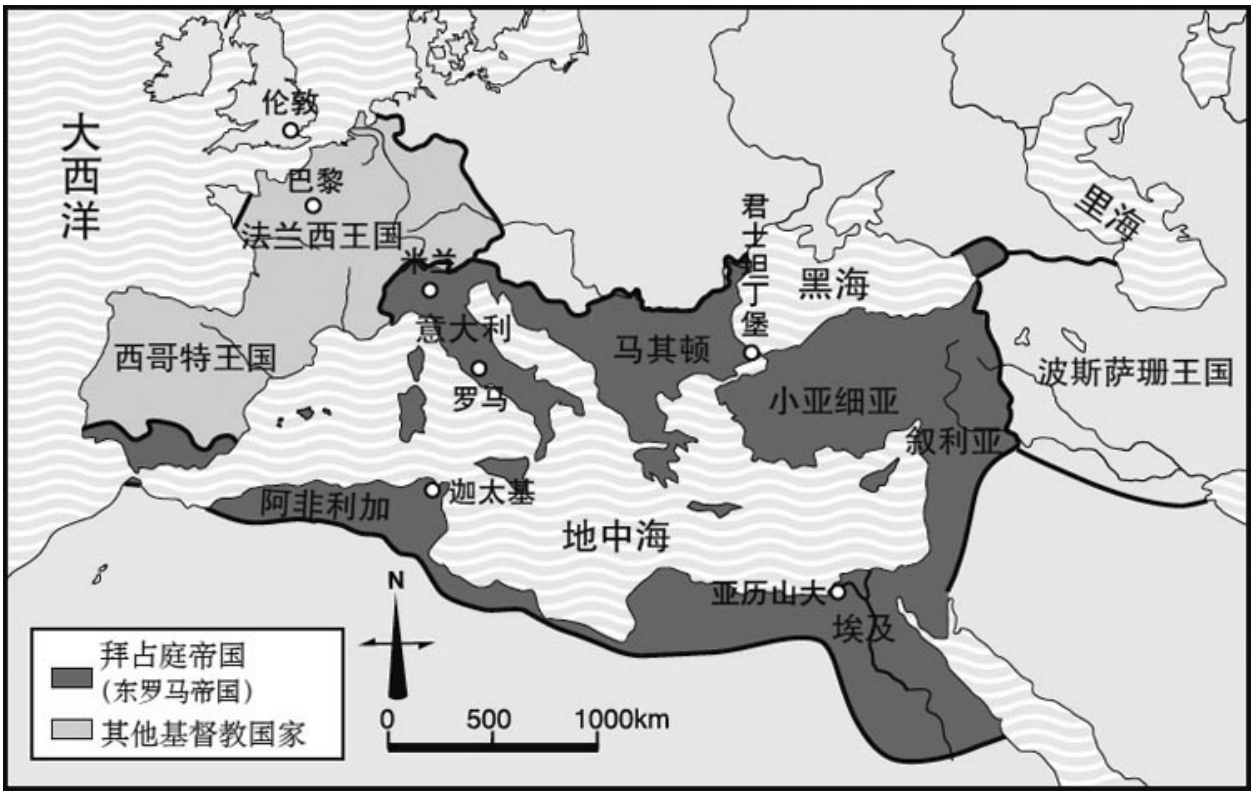
							之的态度。

附录二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盛衰（公元395—145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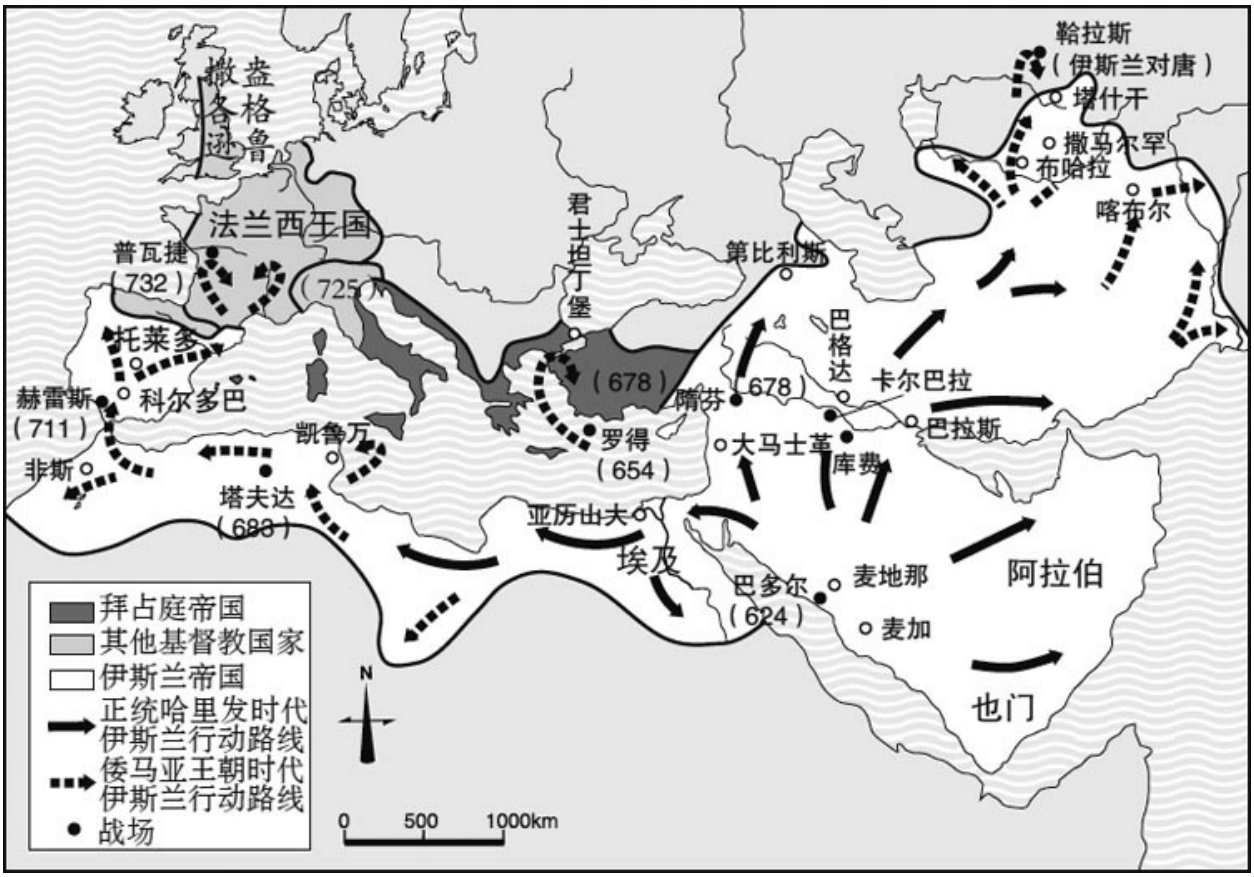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东部在与西部分离之后延续了一千多年，这点一直得到人们的赞赏。下面是这一千多年的实况地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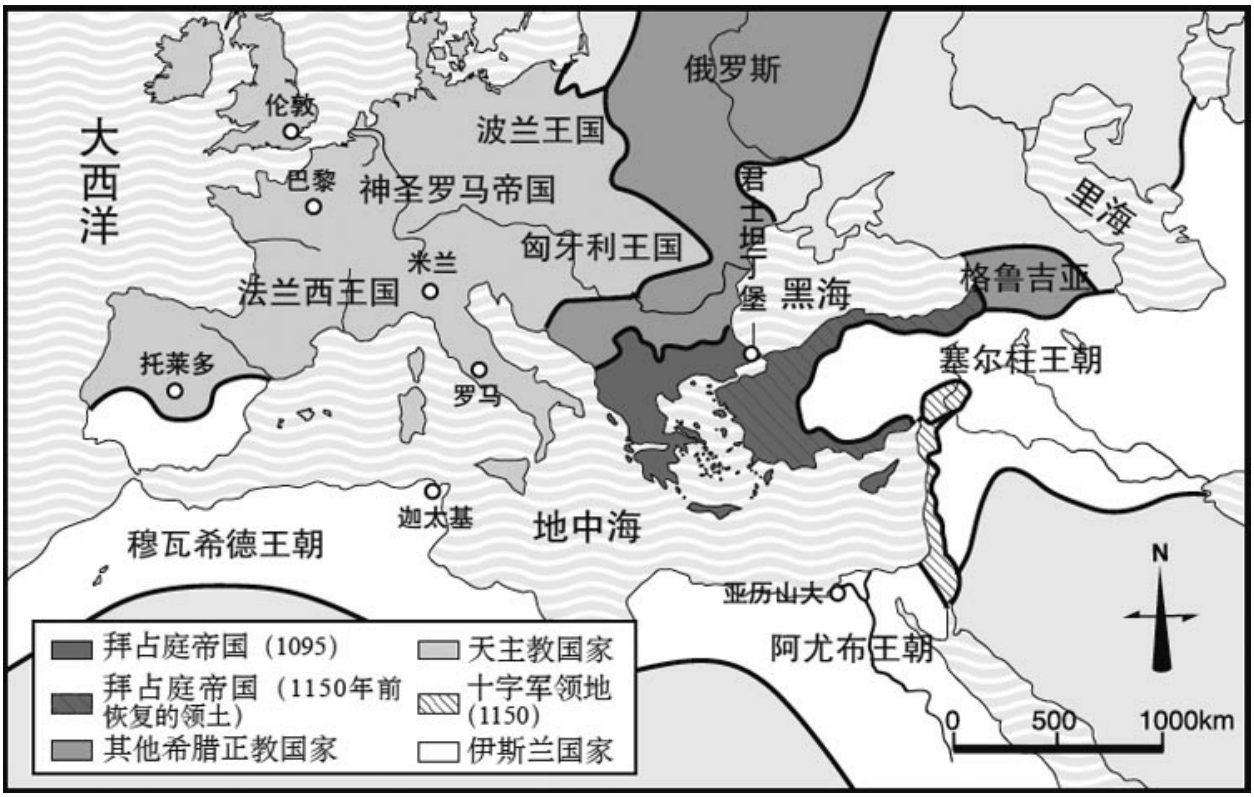
1.公元395年前后的东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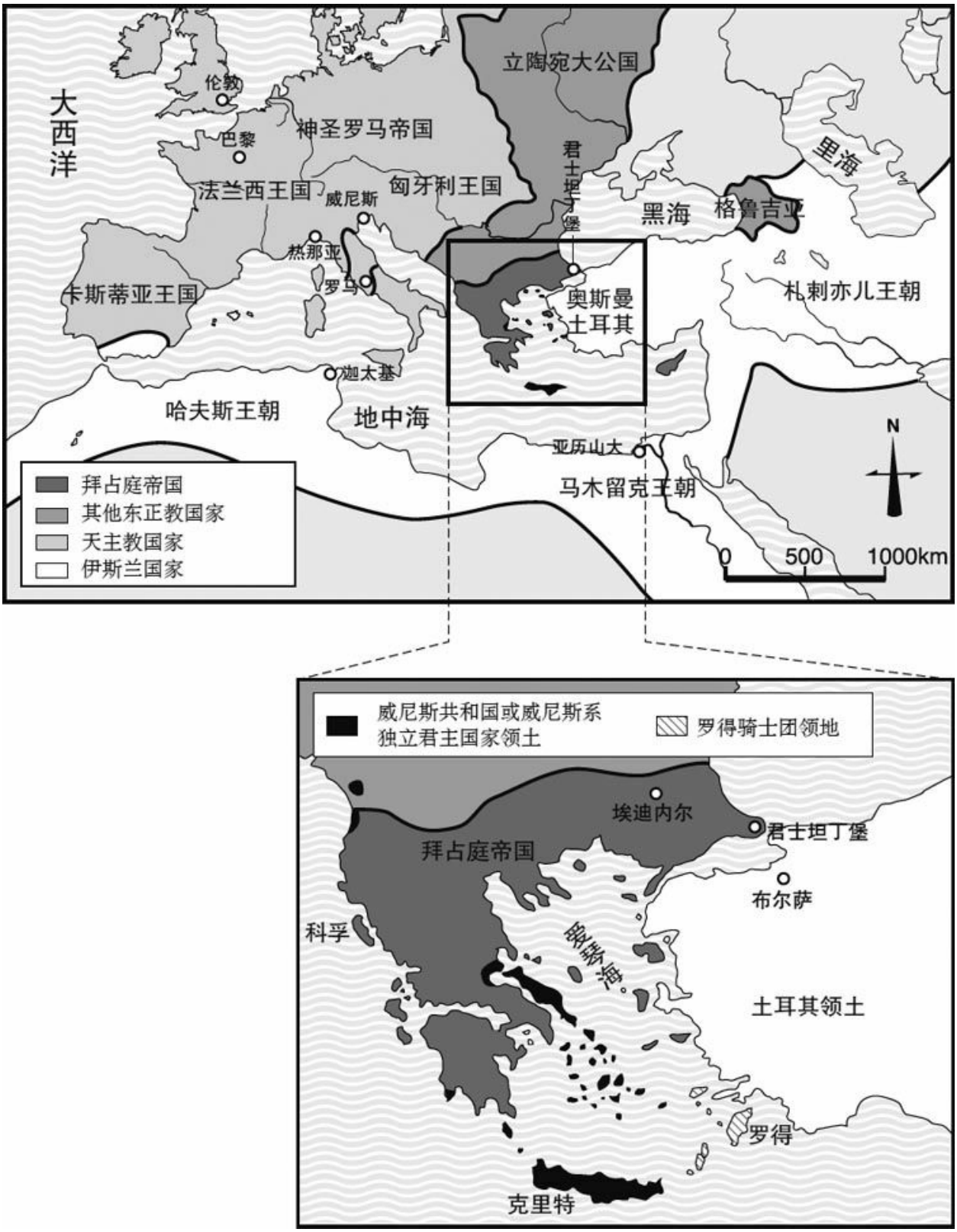
2.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当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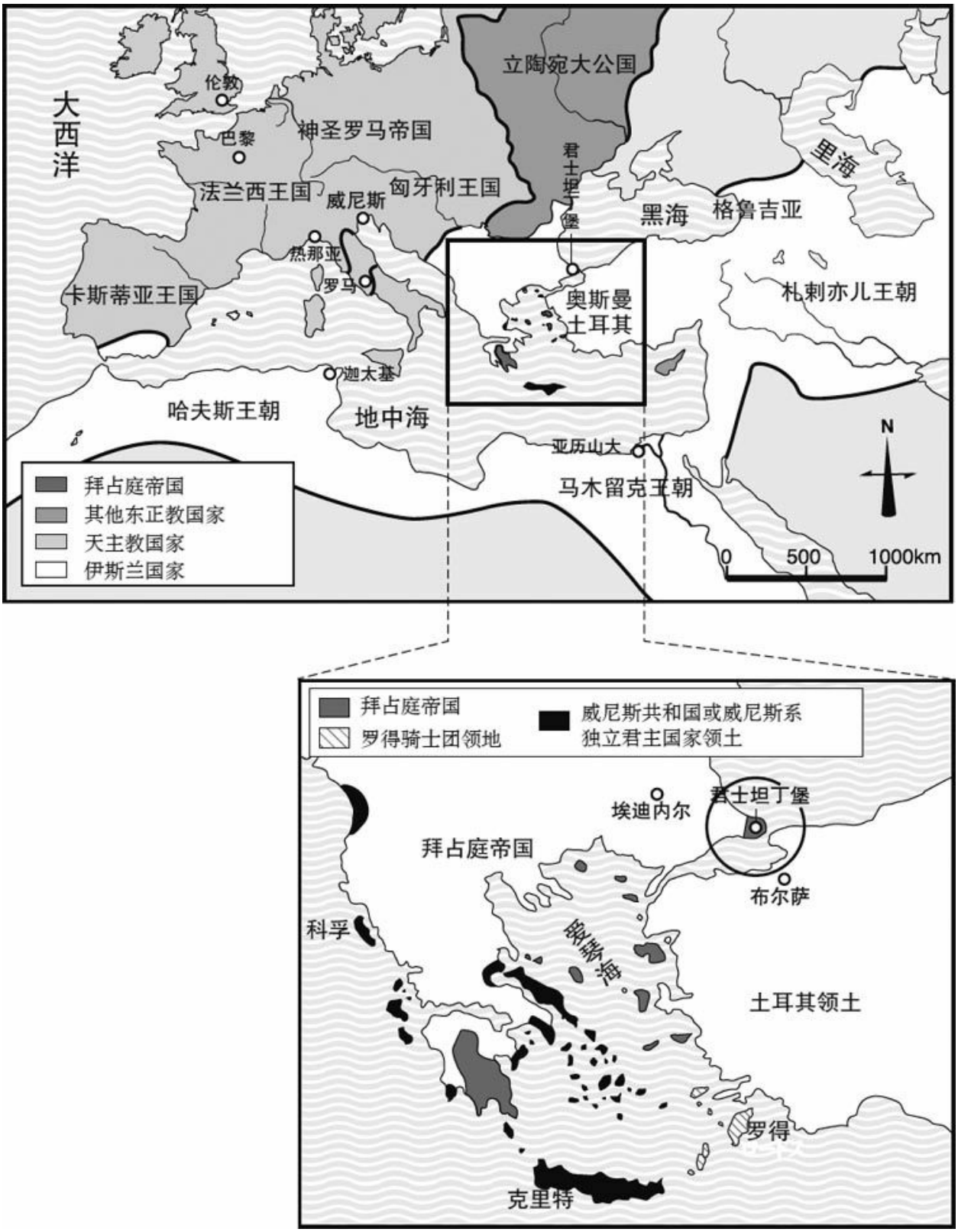
3.公元740年前后的伊斯兰势力范围（选自A. Giardina, G. Sabbatucci, V.Vidotto, Manuale di Storia, Vol.1: II Mideoevo）



4.十字军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公元1180年前后）



5.公元1340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6.灭亡前夕的拜占庭帝国（1453）

大事年表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395	狄奥多西皇帝任命汪达尔人出身的斯提利科为军队总司令。 1 月 7 日，狄奥多西皇帝逝世。帝国东部由长子阿卡狄乌斯、西部由次子霍诺里乌斯继承。自此，罗马帝国东西分离。 西哥特人以阿拉里克为统帅入侵巴尔干地区，斯提利科率罗马军队迎战，因东罗马帝国宰相鲁菲努斯作梗而退兵。		（日本）古坟时代。 （朝鲜）高句丽，好太王即位（391）
		11 月 27 日，在君士坦丁堡的阅兵式上，鲁菲努斯被士兵刺杀。	
396		阿拉里克率兵再次入侵巴尔干地区，把侵略之手伸向希腊全境。	（朝鲜）高句丽，进攻百济，占领其北部（396）
397	奥古斯丁被选为北非希波·雷吉乌斯主教。 春，斯提利科率军从意大利出发，奔赴希腊。 负责阿非利加的大元帅吉尔多宣示效忠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北非禁止向意大利出口粮食。 罗马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	斯提利科的西罗马军队击退阿拉里克。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任命逃过一命的阿拉里克为负责罗马帝国伊利里亚地方的大元帅。	
398	派遣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讨伐吉尔多。吉尔多的部队战前投降，吉尔多被杀。		
401	秋，居住在多瑙河上游北边的蛮族入侵行省雷蒂亚。斯提利科率军前往击退入侵。 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北部。	帝国内部排斥蛮族、异端运动激化。 哥特人出身的东罗马军队司令盖纳斯失势被杀。	
402	斯提利科回师意大利，致力于讨伐阿拉里克。 4 月 6 日，斯提利科军在波伦佐与阿拉里克军会战。会战以斯提利科军获胜而告终，阿拉里克逃回巴尔干。 斯提利科致力于完善防御体系直到翌年，把高卢的罗马军队根据地从特里尔移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		
404	秋，罗马举行纪念斯提利科战功的凯旋仪式。 西罗马帝国皇帝的根据地从米兰移到拉文纳。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05	秋，以拉达加伊索率领的东哥特人为首的日耳曼系蛮族人侵西罗马帝国。		
406	5 月，斯提利科立法使征召奴隶士兵成为可能。 6 月，西罗马军队在意大利中部与拉达加伊索率领的蛮族对战。斯提利科指挥的西罗马军队围攻蛮族军队。 8 月 23 日，蛮族军队投降，战斗以西罗马军队的胜利告终。 12 月，日耳曼系蛮族渡过莱茵河，再度入侵高卢。		
407	僭称君士坦丁三世的士兵率领驻屯在不列颠尼亚的罗马士兵开始进入高卢。 秋，斯提利科派遣讨伐军进入高卢。		
408	斯提利科公布与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进行的同盟交涉。元老院经讨论，同意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斯提利科的长女，霍诺里乌斯皇帝的皇后玛利亚去世。斯提利科将次女嫁给霍诺里乌斯续弦。 霍诺里乌斯皇帝访问帕维亚军事基地时，当地的斯提利科派高级军官遇害。 8 月，斯提利科去拉文纳谒见霍诺里乌斯皇帝，被以叛逆罪处死。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从巴尔干入侵意大利，封锁罗马，要求履行协约。罗马元老院同意支付巨额金银和物品，封锁解除。	5 月，阿卡狄乌斯皇帝去世。皇子狄奥多西二世继位，母亲优多克西娅摄政。	
409	夏，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开始再度围攻罗马。		
410	8 月 24 日，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市内，开始历时 5 天的“罗马浩劫”。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被西哥特人掳走。 霍诺里乌斯皇帝下诏将行省防御交给各行省自理。 阿拉里克在离开罗马前往意大利南部途中去世。 阿道法斯继位，成为西哥特人族长。 阿道法斯在高卢南部与加拉·普拉西提阿举行婚礼，霍诺里乌斯皇帝不予承认。		
411	霍诺里乌斯皇帝开始复兴因浩劫而荒废的罗马（—417）。 冬，进入高卢的君士坦丁三世被部下刺杀，不列颠尼亚兵陷入混乱。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12	霍诺里乌斯皇帝派君士坦提乌斯将军赴高卢，率不列颠尼亚士兵平定蛮族。		
			（朝鲜）高句丽建好太王碑（414）
415	西哥特人族长阿道法斯被杀。加拉·普拉西提阿回到意大利。 君士坦提乌斯与加拉·普拉西提阿结婚。 西罗马帝国与西哥特人结为同盟，决定让西哥特人定居高卢西部。		
419	君士坦提乌斯与加拉·普拉西提阿育子，被命名为瓦伦提尼安三世。		
			（中国）刘裕灭东晋，兴宋（420）
421	1 月，霍诺里乌斯皇帝指名君士坦提乌斯为共治皇帝。 8 月，君士坦提乌斯去世。 加拉·普拉西提阿携子瓦伦提尼安三世移往东罗马帝国。		
423	秋，霍诺里乌斯皇帝去世。		
425	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和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回到西罗马帝国。 加拉·普拉西提阿提拔波尼法提乌斯将军担任皇帝侍卫长，同时担任负责北非的大元帅。任命埃提乌斯将军为负责高卢的大元帅。		
427	加拉·普拉西提阿向波尼法提乌斯发出召回令，波尼法提乌斯拒绝接受。加拉·普拉西提阿向北非派遣以哥特人为主的讨伐军。		
429	波尼法提乌斯向汪达尔人请求援军。以根西里克为族长的汪达尔人从西班牙举族前往北非。 波尼法提乌斯怀柔讨伐军，尝试共同迎战汪达尔人。		
430	8 月，汪达尔人攻陷北非主要城市希波·雷吉乌斯。波尼法提乌斯逃往意大利。 希波·雷吉乌斯主教奥古斯丁去世。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32	波尼法提乌斯在意大利北部里米尼附近的平原与埃提乌斯对决。埃提乌斯获胜，波尼法提乌斯战死。 加拉·普拉西提阿任命埃提乌斯为“联军总司令”。		
437	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与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皇帝的女儿结婚。		
439	迦太基陷落，汪达尔人统治北非全境。		（中国）北魏统一长江以北。南北朝时代开始。
442	西罗马帝国与汪达尔人媾和，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得到承认。		
444		匈奴人的阿提拉因兄长之死而统帅整个部族。 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入侵东罗马帝国，直逼君士坦丁堡。	
447		东罗马帝国缔结承认匈奴人为“同盟”的协约。	
450	加拉·普拉西提阿去世。 加拉的女儿、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的姐姐霍诺丽亚娅派使者前往阿提拉处求婚，阿提拉接受，瓦伦提尼安三世拒绝。	7 月 28 日，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去世。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皇姐普尔喀丽娅指名元老院议员马尔基安继位。普尔喀丽娅与马尔基安结婚。	
451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渡过莱茵河中游入侵高卢。 埃提乌斯与以西哥特人为首的日耳曼各族交涉共同作战。 6 月 24 日，西罗马帝国军队在香槟平原与匈奴人会战（“沙龙会战”）。西罗马帝国获胜，匈奴人从高卢撤退。 秋，匈奴人进攻意大利。		
452	匈奴人掠夺意大利北部全境。 秋，罗马主教利奥率元老院议员面见阿提拉，请求其退出意大利。阿提拉承诺，匈奴人回到多瑙河以北。		
453	阿提拉去世。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54	埃提乌斯向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为自己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提亲。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震怒，刺死埃提乌斯。		（日本）古坟时代。
455	3 月 16 日，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在罗马的阅兵式上遇刺。罗马元老院选出元老院议员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继位。 北非的根西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在意大利登陆，压制奥斯提亚。 6 月，马克西穆斯皇帝被杀。 6 月 15 日，罗马主教利奥造访根西里克。汪达尔人发动“罗马浩劫”（直到 29 日）。 阿维图斯在高卢被拥立为皇帝。		
456	阿维图斯进入意大利被杀。		
457	蛮族出身的军人马约里安被选为皇帝。马约里安意欲加强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计划远征北非。	马尔基安皇帝去世。军人利奥被选为继任皇帝。	
461	马约里安皇帝被杀。塞维鲁被选为继任皇帝。		
465	塞维鲁皇帝去世。在宫廷官僚里西默操纵下，东罗马帝国前皇帝马尔基安的女婿安特米乌斯登上帝位。		
467	安特米乌斯皇帝进入罗马，举行加冕礼。		
468	东西罗马帝国并肩作战，共派军队镇压北非的汪达尔人。 罗马帝国军队中了根西里克的奸计，在迦太基全军覆没。		
		利奥皇帝与根西里克缔结媾和协约。	
472	3 月，宫廷官僚里西默将奥利布里乌斯扶上帝位。 7 月，安特米乌斯的军队与奥利布里乌斯和里西默的军队在罗马市内决战。 7 月 11 日，安特米乌斯战死。 8 月 20 日，里西默病死。 10 月 23 日，奥利布里乌斯遭暗杀。		
473	格利西里乌斯登上帝位。		
474		东罗马帝国指名达尔马提亚大元帅尤里乌斯·尼波斯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475	10 月 31 日，宰相奥列斯特的儿子罗穆路斯·奥古斯都登上帝位。	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被赶下帝位。	
476	蛮族出身的奥多亚克将军反叛。 9 月，奥多亚克战胜皇帝的军队，奥列斯特被杀，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被迫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奥多亚克称意大利王。	芝诺重登帝位。	
477	汪达尔人族长根西里克去世。		
			（中国）萧道成灭宋，建立齐国（479）
481	克劳德维克任法兰克王（直到 511）。		
488		狄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西进。	
489	4 月 28 日，奥多亚克军队与东哥特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索查河作战。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军队获胜。		
490	8 月 11 日，奥多亚克的军队与东哥特军队在米兰附近再次交战，奥多亚克战败后逃进拉文纳。东哥特军队开始对拉文纳发动攻城战。		
493	5 月，奥多亚克与狄奥多里克缔结媾和协约，其后奥多亚克被杀。狄奥多里克掌权意大利。		
500	狄奥多里克访问罗马，受到市民欢迎。		
			（中国）齐灭，梁建国（502）。
525	元老院议员阿尔比乌斯被告发暗通东罗马帝国皇帝，企图在意大利清除包括狄奥多里克在内的阿里乌斯教派。 重臣波伊西乌斯为阿尔比乌斯辩护遭软禁。		
526	波伊西乌斯被处死。 8 月，狄奥多里克去世。		
527		4 月 4 日，查士丁尼被伯父查士丁任命为共治皇帝。 8 月 1 日，查士丁皇帝去世。查士丁尼成为一人皇帝。 《罗马法典》开始编纂。	
529	本笃建立修道院。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533	9 月 15 日，贝利撒留进入迦太基城。汪达尔王国灭亡。	查士丁尼皇帝命令贝利撒留将军开始收复旧西罗马帝国领土。 6 月，贝利撒留及其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赴北非。 秋，贝利撒留凯旋君士坦丁堡。	
535		贝利撒留被选为执政官。 秋，查士丁尼皇帝再次派遣贝利撒留去西部。	
536	春，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半岛登陆。 贝利撒留攻占意大利南部城市。哥特人逃往意大利北部。 12 月 10 日，贝利撒留率领拜占庭军队进入罗马城。宫廷官僚卡西多里乌斯辞去公职，在意大利南部建 Vivarium 学园。		
537	哥特人南下，开始进攻罗马城。		
538	3 月，贝利撒留守住罗马城，迫使哥特人媾和。		（日本）这个时期，佛教由百济传来。
		查士丁尼皇帝把宫廷官僚纳尔塞斯作为将军派往意大利。	
539	贝利撒留攻占拉文纳，东哥特国王维提吉斯投降。为应对波斯的紧张局势，贝利撒留被召回君士坦丁堡。		
		贝利撒留被派往东方，指挥与波斯的战争。	
540	秋，哥特人新选托提拉为国王，再度集结，开始入侵意大利半岛。		
544		秋，查士丁尼皇帝再次派遣贝利撒留赴意大利。	
546	哥特人占领罗马。贝利撒留率军从奥斯提亚逆台伯河而上，直逼罗马。 12 月，罗马城墙遭到破坏，哥特人侵入市内。元老院被废除。		
547	2 月，贝利撒留进入罗马。后奉查士丁尼皇帝之命进军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肃清哥特人。		
548	贝利撒留接到撤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		

（续）

公元	西罗马帝国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尼亚、西班牙、北非）	东罗马帝国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其他各国
552	夏，纳尔塞斯率领以伦巴底族为主力的军队与哥特人决战并获胜。	查士丁尼皇帝派纳尔塞斯赴意大利。	
553	春，拜占庭与哥特决战。纳尔塞斯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获胜，在意大利肃清哥特人。		
			（中国）陈霸先灭梁，建陈（575）。
559		贝利撒留在巴尔干与蛮族作战并获胜，回到君士坦丁堡。	
561		贝利撒留批评查士丁尼皇帝。	
563	贝利撒留被判没收全部财产和在家监禁，半年后改判无罪。		
565		3 月 13 日，贝利撒留去世。 11 月 14 日，查士丁尼皇帝逝世。	
568	纳尔塞斯去世。 伦巴底人南下，攻取意大利。		
			（日本）苏我马子杀物部守屋（587）。 （中国）陈灭，隋统一中国全境（589）。 （日本）圣德太子摄政（593）。
613		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布教。	
636		叙利亚伊斯兰化。	
642		埃及伊斯兰化。	
650		阿拉伯人入侵小亚细亚，直逼君士坦丁堡。	
670	北非伊斯兰化。		
698	迦太基被伊斯兰攻陷。		
1453		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	

参考文献

《原史料（同時代人の記述ないし著作）》

Ambrosius　アンブロシウス

De obitu Theodosii,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SEL）Vol. LXXIII; De obitu Valentiniani, CSEL Vol. LXXIII; Epistulae XL, Patrologia Latina（PL）Vol. XVI.

Augustinus　アウグスティヌス

De civitate Dei libri XXII, PL Vol. XLVIII; Epistulae, PL Vol. XXXIII など、手紙、説教を含む全著作。日本語訳は『神の国』（岩波文庫、1982-91年、服部英次郎他訳、全５冊：『告白』（岩波文庫、1976年、服部英次郎訳、全２冊）など

Symmachus, Aurelius　シンマクス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MGH, AA）Vol. VI（O. Seeck編）.

Victor, Aurelius　アウレリウス・ヴィクトル

Epitome de Caesaribus, Leipzig, 1911（Pichlmayer編）.

Cassiodoros　カシオドロス

Chronicon, MGH, AA Vol. XI（Th. Mommsen編）; Variae, MGH, AA Vol. XII（Th. Mommsen編）.

Chronica Minora saec. IV, V, VI, VII（3 vols.）, MGH, AA Vols. IX. XI. XIII.

Berlin, 1892-98 (Th. Mommsen編).

Claudianus, Claudius　クラウディアヌス

Invectives contre Eutrope, MGH, AA Vol. X, Paris, 1933 (Th. Birt編); De bello Gildonico; De bello Pollentino sive Gothico; De consolatu Stilichonis; Epithalamium de niptiis Honorii Augustii; Fescennia da nupitiis Honorii Augustii; In Eutropium; In Rufinum; Panegyricus de quarto consolatu Honoriis Augusti; Panegyricus de sexto consolatu Honoriis Augusti, Panegyricus de tertio consolatu Honorii Augusti, MGH, AA Vol. X, Paris, 1892 (Th. Birt編).

Codex Theodosianus, Lyon, 1665 (J.Gothofredus編); 同書, Berlin, 1905 (Th. Mommsen & P.M. Meyer編).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IL), Berlin, 1863.

Corpus Iuris Civilis (Institutiones, Digesta, Codex Iustinianus, Novellae), Berlin, 1912-22, (Mommsen, Krueger, Schoell, Kroll編).

Corpus legum ab imperatoribus romanis ante Iustinianum latarum, Leipzig, 1857 (G. Haenel編).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SEL) Vol. V, Wien, 1882 (Zangemeister編).

Epigraphica, 《Rivista italiana di epigrafia》, Milano, 1939-.

Eunapius　エウナピウス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IV, Leipzig, 1870 (C. Mueller編).

Eusebius　エウセビウス

Historia Ecclesiastica; Vita Constantini, Berlin, 1903-0 (E. Schwartz編).　日本語訳は『教会史』(山本書店、秦剛平訳、1986-88、全三冊)、『コンスタンティヌスの生涯』(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秦剛平訳、2004)

Eutropius　エウトロピウス

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 Leipzig, 1887 (F. Ruehl編).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FHG) (5 Vols.), Paris, 1841-84 (C. Mueller & Th. Mueller編).

Georgius　ゲオルギウス

Historia Francorum, MGH,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Vol. I, Paris, 1884 (W. Arndt編).

Heronimus　ヒエロニムス

In Rufinum, PL Vol. XXIII; Epistolae（完録版） PL Vols. XXII-XXX, Vienna, 1910-18.

Isidorus　イシドルス

Historia Vandalorum, MGH, AA Vol. XI; Historia vel Origo Gothorum, MGH, AA Vol. II.

Libanius　リバニウス

R. Foerster, Libanii opera (12 vols.), Leipzig, 1903-27 (R. Foerster編).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Auctores Antiquissimi (MGH, AA).

Marcellinus, Ammianus　マルケリヌス

Rerum gestarum libri (Clark編), Berlin, 1910 (伊訳); Historiae, (A. Selem編), Milano, 1994.

Namatianus, Rutilius　ナマティアヌス

De reditu suo, Milano, 1992 (A. Fo編).

Orosius, Paulus　オロシウス

Historiae adversus paganos libri VII, Wien, 1882.

Panegyrici latini veteres, Leipzig, 1911 (E. Baehren編).

Patrologia Greca (PG), Paris, 1857 (J.P. Migne編).

Patrologia Latina (PL), Paris, 1878 (J.P. Migne編).

Paulus Diaconus　パウルス・ディアコヌス

Historia Langobardorum（羅伊対訳 Storia dei Longobardi, Milano, 1991). ロンゴバルド族出身者がラテン語で書いたロンゴバルド族とその時代の歴史

Procopius　プロコピウス

Anecdota（伊訳 Storia segreta, Roma, 1972); Polemon（伊訳 Le guerre persiana, vandalica, gotica, Torino, 1977).

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epste fuer die Jahre 311 bis 476 n. Chr., Stuttgart, 1919 (O. Seeck編).

Rufius, Festus　ルフィヌス

Festi Breviarium rerum gestarum populi Romani, Leipzig, 1886 (C. Wagener編).

Sidonius Apollinaris　シドニウス・アポロナリス

Camina, MGH, AA Vol. VIII, Berlin, 1887 (C. Lütjohann編).
Socrates　ソクラテス（紀元4世紀—5世紀の教会史家）
Historia Ecclesiastica, PG Vol. LXVII.
Vegetius, Flavius　ヴェゲティウス
Epitoma rei militaris（羅伊対訳：L'arte della guerra romana, Milano, 2003).
Zosimus　ゾシムス
'Ιστορία νέα, Leipzig, 1887 (L. Mendelssohn編).
作者不明（帝政末期の人）
De Rebus Bellicis（羅伊対訳 Le cose della guerra, Milano, 1989).

《後世の研究著作》

Aalberg, N., *Die Franken und Westgothen in der Völkerwanderungszeit*, Upsala, 1932.
Adriani, M., *Tolleranza e intolleranza religiosa nella Roma antica*,《Studi Romani》6, 1958; *Il concetto di tolleranza religiosa nella storia delle religioni*,《Cultura e Scuola》1, 1961.
Aegyptus, Rivista italiana di Egittologia e di Papirologia, Milano, 1920刊行開始.
Agnello, S.L., *Silloge di iscrizioni paleocristiane della Sicilia*, Roma, 1953.
Albertini, E., *L'Empire Romain*, Paris, 1929.
Albertoni, G., *L'Italia carolingia*, Roma, 1997.
Alföldi, A., *On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a few note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RS)》37, 1947;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and pagan Rome*, Oxford, 1948; *A conflict of idea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the clash between the Senat and Valentinian I*, Oxford, 1952.
Alföldy, G., *Noricum*, London, 1974; *The Social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85.
Allard, P., *La persécution de Dioclétien*, Paris, 1908; *Storia critica delle persecuzioni*, Firenze, 1913-18 (伊訳).
Altheim, F., *Attila und die Hunnen*, Baden-Baden, 1951; *Röm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 II*, Milano, 1960 (伊訳).
Amari, M., *Storia dei Musulmani in Sicilia* (3 voll.), Catania, 1933-39.

Amatucci, G.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romana*, Napoli, 1912-16;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cristiana*, Bari, 1929.

Amory, P.,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Cambridge, 1997.

Andreoli, A., *Contributo topografico alla battaglia dei Campi Catalaunici*, 《Historia》 1, 1927.

Frank, T.（編）,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6 vols.）, Baltimore, 1933-40.

Angenendt, A., *Studien zu Pirmin und den monas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München, 1972.

Anton, H., *Der König und die Reichskonzilien im westgotischen Spanien*, 《Historisches Jahrbuch》 92, 1972.

Arce, J., *El último siglo de la Hispania romana*, Madrid, 1986.

Arquillière, H., *L'Augustinisme politique.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moyen âge*, Paris, 1934.

Atti del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Città del Vaticano, 1940.

Ausenda, G.（編）, *After Empire. Towards an Ethnology of Europe's Barbarians*, Woodbridge, 1995.

Azzara, C., *Gregorio Magno, i Longobardi e l'Occidente barbarico. Costanti e peculiarità di un rapporto*, 《Bullettino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 e Archivio muratoriano》 97, 1991; *L'ideologia del potere regio nel papato altomedievale (secoli VI-VIII)*, Spoleto, 1997.

Balducci, C., *La politica di Valentiniano III*, Bologna, 1934.

Baratta, M., Fraccaro P. & Visintin, L., *Grande atlante geografico, storico, fisico, politico, economico*, Novara, 1939（45枚の図版つき）.

Barbagallo, C., *Lo Stato e l'istruzione pubblica nell'Impero Romano*, Catania, 1911; *Giuliano l'Apostata*, Genova, 1912; *Storia Universale, Vol. II-2: Roma antica. L'Impero*, Torino, 1932.

Barker, E., *L'Italia e l'Occidente dal 410 al 476*, 《Storia del mondo medievale》 1, Milano, 1978.

Barnes, T.D., "*Patricii*" *under Valentinian III*, 《Phoenix》, 1975.

Baron, S.W., *Histoire d'Israel*, Paris, 1957.

Barra, G., *Acta Martyrum*, Torino, 1945.

Bartoli, A., *Il senato romano in onore di Ezio*, 《Rendiconti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22, 1946-47.

Bartolini, E., *I barbari,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nel racconto dei contemporanei*, Milano, 1982.

Bassett, S.（編）,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 London-New York, 1989.

Bayet, J., *Histoire politique et psychologique de la religion romaine*, Paris, 1959（伊訳）.

Bayless, W.N., *The Visigothic Invasion of Italy in 401*, 《Classical Journal》72, 1976.

Baynes, N.H.,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1929.

Beaujeu, J., *La religion romaine à l'apogée de l'empire Vol. I: La politique religieuse des Antonins*, Paris, 1955.

Beck, H.G., *Kirche und theologische Literatur im byzantinischen Reich*, München, 1959; *Konstantinopel–das neue Rom*, 《Gymnasium》71, 1964; *Konstantinopel. Zur Sozialgeschichte einer frü hmittelalterlichen Hauptstadt*, 《Byzantmische Zeitschrift》58, 1965.

Beloch, J., *Der Verfall der antiken Kultu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84, 1900.

Bertolini, O., *Roma di fronte a Bisanzio e ai Longobardi*, 《Storia di Roma》4, Bologna, 1941; *Storia Universale Vol. III-1: I Germani, migrazioni e regni nell'Occidente già romano*, Milano, 1959-65.

Bloch, G., *L'empire romain. Evolution et décadence*, Paris, 1922.

Boak, A.E.R.,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London, 1955.

Bognetti, G.P., *L'età longobarda* (4 voll.), Milano, 1966-68.

Boissier, G., *La fin du paganisme*, Paris, 1891.

Bouché-Leclercq, A., *L'intolerance religieuse et la politique*, Paris, 1911.

Brion, M., *La vie d'Attila*, Paris, 1933; *Theoderic*, Paris, 1935.

Brogiolo, G.P., & Gelichi, S., *La città nell'alto medioevo italiano. Archeologia e storia*, Roma-Bari, 1998.

Brown, P.,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London, 1971;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London, 1972.

Bühler, J., *Die Germanen in der Völkerwanderung*, Leipzig, 1922.

Bugiani, C., *Storia di Ezio generale dell'Impero sotto Valentiniano III*, Firenze, 1905.

Bulic, F., *L'imperatore Diocleziano*, Spalato, 1916

Buonaiuti, E., *Sant'Ambrogio*, Roma, 1926.

Burckhardt, J., *Das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ssen*, Stuttgart, 1929.

Burns, T.S., *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 Bloomington, 1984.

Bury, J.B.,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London, 1889; *The Provincial List of Verona*, 《JRS》 13, 1923;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2 vols.), London, 1923;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1967.

Calderini, A., *Aquileia romana*, Milano, 1930; *Manuale di Papirologia*, Milano, 1938.

Calza, G., *La statistica delle abitazioni e il calcolo della popolazione in Roma imperiale*, 《Rendiconti dei Lincei》, 1917.

Cameron, A., *Theodosius the Great and the Regency of Stilicho*,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3, 1969; *Claudian: 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 Oxford, 1970; *Circus Factions. Blues and Greens at Rome and Byzantium*, Oxford, 1976; *Il tardo impero romano*, Bologna, 1995; *Un impero, due destini. Roma e Costantinopoli fra il 395 e il 600 d.C.*, Genova, 1997.

Cantarelli, L., *Annali d'Italia dal 455 al 476*, 《Studi e Documenti di Storia e Diritto》, 1896; *La Diocesi Italiciana*, Roma, 1903.

Caravale, M., *Ordinamenti giuridici dell'Europa medievale*, Bologna, 1994.

Carcopino, J., *Aspects mystiques de la Rome païenne*, Paris, 1941.

Carraresi, G., *Cronologia generale dell'era volgare dall'anno 1 all'anno 2000*, Firenze, 1875.

Carrington, P.,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Cambridge, 1957.

Carson, R.A.G., Kent, J. P. C. & Burnett, A. M.,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X*, London, 1994.

Carson, R.A.G., Hill, P.V. & Kent, J.P.C., *Late Roman Bronze Coinage, A.D. 324-498*, London, 1965.

Cecchelli, C., *Mausolei imperiali e reali del Basso Impero e dell'alto Medioevo*, 《Atti del III Convegn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Roma, 1941.

Cerfaux, L., & Tondriau, J., *Un concurrent du Christianisme*, Paris-Roma, 1956.

Cesa, M., *Impero tardoantico e barbari: la crisi militare da Adrianopoli al 418*, Como, 1994.

Cessi, R., *Marcellino e l'opposizione imperiale romana sotto il governo di Maioriano*, 《Atti del R. Istituto Veneto》, 1915-16; *La crisi imperiale degli anni 454-455 e l'incursione vandalica in Roma*, 《Archivio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40, 1917; *Regnum e imperium in Italia*, Bologna, 1919.

Chadwick, N., *The Celts*, Harmondsworth, 1970.

Chastagnol, A., *Observations sur le consulat suffect et la préture du Bas-Empire*, 《Revue historique (RH)》 219, Paris, 1958; *La préfecture urbaine à Rome sous le Bas-Empire*, Paris, 1960; *Les fastes de la préfecture de Rome au Bas-Empire*, Paris, 1962; *Lesénat romain sous le règne d'Odoacre. Recherches sur l'epigraphie du Coliseé au V siècle*, Bonn, 1966; *Le Bas-Empire*, Paris, 1969; *L'evolution de l'ordre sénatorial aux III et IV siècles de notre ère*, 《RH》 496, Paris, 1970; *Le recrutément des sénateurs au IV siècle, in Recherches sur le structures sociales dans l'Antiquité classique* (Colloque de Caen, aprile 1969), Paris, 1971;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De Stilicon à Justinien*, Paris, 1976.

Chenon, E., *Etude historique sur le defensor civitatis*, Paris, 1889.

Christlein, R., *Die Alamannen. Archäologie eines lebendigen Volkes*, Stuttgart-Aalen, 1979.

Chrysos, E.K., & Schwarcz, A., *Das Reich und die Barbaren*, Wien-Köln, 1989.

Ciccotti, E., *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nel mondo antico*, Torino, 1899; *Motivi demografici e biologici nella rovina della civiltà antica*, 《Nuova Rivista Storica》, 1930.

Cilento, N., *L'Italia meridionale longobarda*, Milano-Napoli, 1966.

Claude, D., *Die byzantinische Stadt im 6. Jahrhundert*, München, 1969.

Clover, F.M., *Geiseric the Statesman: A Study of Vandal Foreign Policy*, Chicago, 1966.

Cohen, H., *Description historique des monnaies frappées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880-92.

Contamine, Ph., *La guerre au Moyen Age*, Paris, 1980.

Costa, G., *Graziano il cristianissimo*,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23.

Costanzi V., *La rivolta di Pavia e la catastrofe di Stilicone*, 《Bull. della Società Pavese di Storia Patria》, 1904.

Courcelle, P.,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Paris, 1948.

Courtois, C.,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1955.

Cracco Ruggini, L.,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Italia annonaria. Rapporti fra agricoltura e commercio dal IV al VI secolo d.C.*, Milano, 1961; *Il paganesimo romano tra religione e politica (384-394 d.C.): per una reinterpretazione del Carmen contra paganos*, 《Atti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Rendicont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376, Roma, 1979; *La fine dell'impero e le trasmigrazioni dei popoli*, La storia, Milano, 1993.

Cumont, F., *Les religions orientales dans le paganisme romain*, Paris, 1929.

Dagron, G., *La città bizantina, in Modelli di Città. Strutture e funzioni politiche* (Pietro Rossi編), Torino, 1987; *La romanité chrétienne en Orient. Héritages et mutations*, London, 1984.

Dalton, O.M., *Byzantine Art and Archaeology*, Oxford, 1911; *East Christian Art*, Oxford, 1925.

Daniel, N., *Gli Arabi e l'Europa nel medioevo*, Bologna, 1981.

De Bacci Venuti, T., *Dalla grande persecuzione alla vittoria del Cristianesimo*, Milano, 1913.

De Labriolle, P., *La réaction payenne. Étude sur la politique antichrétienne du I au VI siécle*, Paris, 1934.

Delbrück, H.,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The Barbarian Invasion Vol. II*, Lincoln-London, 1980.

Delbrueck, R., *Antike Porphyrwerke*, Berlin, 1932.

De Lepper, J.L.M., *De rebus gestis Bonifatii comitis Africae et magistri militum*, Tillburg-Breda, 1941.

Delogu, P., Guillou, A., & Ortalli, G., *Longobardi e Bizantini*, Torino, 1980.

Demandt, A., *Die Kelten*, München, 1998.

Demougeot, E., *Note sur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Stilicon, de 405 à 407*, 《Byzantion》 20, 1950; *De 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 395-410. Essai sur le gouvernement impérial*, Paris, 1951;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Vol. II*, Paris, 1969; *Constantin III, l'empereur d'Arles*, Montpellier, 1974.

De Regibus, L., *Politica e religione da Augusto a Costantino*, Genova, 1953.

De Rossi, G.B.,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I-II*, Roma, 1857-88; *Roma sotterranea cristiana*, Roma, 1864-67;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septimo saeculo antiquiores*, Roma, 1957.

Díaz Martinez, P.C., *El alcance de la ocupacíon sueva de Gallaecia y el problema de la germanización, in Galicia: da romanidade á xermanización. Problemas históricos e culturais*,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92.

Diehl, E., *Inscriptiones Latinae Christianae Vol. I-III*, Berlin, 1925-31.

Dill, S.,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London, 1898.

Doehaerd, R., *Le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Paris, 1971.

Duchesne, L., *Le dossier du Donatisme*, 《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890.

Dudden, F.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 Oxford, 1935.

Dufourcq, A., *Le Christianisme et l'Empire*, Paris, 1930.

Dvornik, F., *Byzance et la primauté romaine*, Paris, 1964.

Ensslin, W., *Gottkaiser und Kaiser von Gottes Gnaden*, Monaco, 1943; *Theodoric der Grosse*, München, 1947.

Etienne, R., *Le culte impérial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Paris, 1958.

Fargues, P., *Claudien. Étude sur sa poesie et son temps*, Paris, 1933.

Ferrari Dalle Spade, G., *Immunità ecclesiastiche nel diritto romano imperiale*, 《Atti R.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99, 1939-40.

Ferrero, G., *La rovina della civiltà antica*, Milano, 1926.

Ferril, A.,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London, 1986.

Fliche, A. & Martin, V. (編), *Histoire de l'Eglise, Vol. II: De la fin du II siécle à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Vol. III: De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à la mort de Théodose*, Torino, 1938-40 (伊訳).

Follieri, E., *La fondazione di Costantinopoli: riti pagani e cristiani, in Roma, Costantinopoli, Mosca. Da Roma alla Terza Roma.*

Fournier, G.,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1966.

Fracassini, U., *L'Imper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Da Nerone a Costantino*, Perugia, 1913.

Francovich, R., & Noyé, G., *La storia dell'alto medioevo italiano (VI-X secolo) alla luce dell'archeologia*, Firenze, 1994.

Frediani, A., *Gli itinerari alpini delle invasioni barbariche*, 《Archivio di Studi per l'Alto Adige》, Firenze, 1993; *Gli assedi di Roma*, Roma, 1997.

Freeman, E.A., *Aetius and Bonifac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Fifth Century*, London, 1904.

Frey, I.B., *Corpus inscriptionum Iudaicarum*, Roma, 1936-52.

Gabba, E., *Iscrizioni greche e latine per lo studio della Bibbia*, Torino, 1958.

Gabotto, F., *Storia dell'Italia occidentale nel Medio Evo*, Torino, 1911.

Gabrieli, F., & Scerrato, U., *Gli Arabi in Italia. Cultura, contatti, tradizioni*, Milano, 1979.

Galdi, M., *La religione dei Roman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I* (Tacchi Venturi, P. 編), Torino, 1954.

Galassi, G., *Roma o Bisanzio*, Roma, 1930.

Gallina, M., *Potere e società a Bisanzio. Dalla fondazione di Costantinopoli al 1204*, Torino, 1995.

Garcia Moreno,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isigoda*, Madrid, 1989.

Garrucci, R., *Storia dell'arte cristiana nei primi otto secoli della Chiesa*, Prato, 1873-85.

Gasparri, S., *Prima delle nazioni. Popoli, etnie e regni fra Antichità e Medioevo*, Roma, 1997.

Gautier, E.F., *Genséric roi des Vandales*, Paris, 1933.

Geary, P.,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Oxford-New York, 1988.

Geffcken, J., *Der Ausgang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Heidentums*, Heidelberg, 1920.

Gentili, R., *La rivalità tra Ezio, Felice e Bonifacio e l'invasione dei vandali in Africa*, 《Il Mondo Classico》 5, 1935.

Gerosa, P., *S. Agostino e la decadenza d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16.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776-88; *A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896-1900 (J.B. Buryの解説つき); 同伊訳, Torino, 1926-27;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86; *Storia della decadenza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87.

Gigli, G., *La crisi dell'impero romano*, Palermo, 1947.

Ginsburg. G., *Rome et la Judée*, Paris, 1928.

Ginzel, F., *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Leipzig, 1906-14.

Giovanditto, A., *Teodorico e i suoi Goti*, Novara, 1993.

Giovannoni, G., *Nuovi contributi allo studio della genesi della basilica cristiana*, 《Atti Pont. Accad. di Archeologia》, 1920; *La tecnica della costruzione presso i Romani*, Roma, 1925.

Gitti, A., *Eudossia e Genseric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SI)》, 1925; *Ricerche sui rapporti tra i vandali e l'impero romano*, Bari, 1953.

Goffart, W.,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 418-584*, Princeton-Oxford, 1980.

Gordon, C.D., *The Age of Attila: 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 Ann Arbor, 1960.

Goyau, G., & Cagnat, R., *Chronologie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1891.

Graley, G., *Ces fameux Champs Catalauniques*, Troyes, 1964.

Grant, 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Reappraisal*, London, 1976.

Grégoire, H., *Recueil des inscrip. grecques chrét. d'Asie Mineure*, Paris, 1922; *Les persécutions dans l'Empire romain*, Bruxelles, 1964.

Gregorovius, F., *Storia della città di Roma nel Medioevo*, Roma, 1912.

Grenier, A., *Le génie romain dans la religion, la pensee et l'art*, Paris, 1938.

Grisar, H., *Roma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 Roma, 1930 (伊訳).

Grossi Gondi, F., *Trattato di epigrafia cristiana latina e greca*, Roma, 1920.

Grumel, V., *L'Illyricum de la mort de Valentinien I (375) à la mort de Stilicon (408)*,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9, 1951.

Guarducci, M., *I graffiti sotto la Confessione di S. Pietro in Vaticano* (3 voll.), Città del Vaticano, 1959.

Gutermann, S.L.,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persecution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51.

Gwatkin, H.M., *Studies on Arianism*, London, 1900.

Haarhoff, Th., *Schools of Gaul. A study of pag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xford, 1920.

Hadrill, W., *Occidente barbarico*, Milano, 1963.

Halphen, L., *Les barbares*, Paris, 1926.

Hansen, A., *De vita Aetii*, Dorpat, 1840.

Hartmann, L., *La rovina del mondo antico* , Torino, 1904（伊訳）.

Heater, P., *Goths and Romans, 332-489*, Oxford, 1991; *The Goths*, Oxford, 1996.

Heering, W., *Kaiser Valentinian*, Magdeburg, 1927.

Hefele, K. J. & Leclercq, H., *Histoire des Conciles*, Paris, 1907-21.

Heitland, W.R., *The Roman Fate. An Essay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1922.

Hillgarth, J.N., *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350-750. The Conversion of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1986.

Hodgkin, T., *Italy and her Invaders Voll. I-II*, Oxford, 1880-90.

Homo, L., *Les empereurs romains et le Christianisme*, Paris, 1931; *Le haut Empire*《Histoire Romaine》3, Paris, 1933; *Topographie et démographie dans la Rome Imperiale*,《Comptes Rendus de l'Acad. des Inscriptions》, 1933.

Hönn, K., *Konstantin der Grosse. Leben einer Zeitwende*, Leipzig, 1940.

Howald, E., *Kultur der Antike*, Potsdam, 1935.

Hübener, W.（編）, *Die Alemannen in der Frühzeit*, Bühl-Baden, 1974.

Hughes, K., *The Church in Early Irish Society*, London, 1966.

Huttmann, M.A.,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Proscription of Paganism*, New York, 1914.

Jalabert, L. & Mouterde, R.,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Paris, I, 1929; II, 1939.

James, E., *The Franks*, Oxford, 1988.

Julien, Ch.A.,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31.

Juster, J., *Les Juifs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14.

Kaegi, W.E., *Byzantium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Princeton, 1968.

Karsten, S., *Die Germanen*, Berlin, 1928.

Kollwitz, J., *Oströmische Plastik der theodosianischen Zeit*, Berlin, 1941.

Kornemann, E., *Das Problem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1922.

Krautheimer, R., *Corpus Basilicarum christianarum Romae*, Città del Vaticano, 1937; *Three Christian Capitals. Topography and politic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1983（伊訳）; *Tre capitali christiane. Topografia e politica*, Torino, 1987.

Lanciani, R., *Pagan and Christian Rome*, London, 1892; *Ruins and Excavations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897.

Lanzoni, F., *Le Diocesi d'Italia dalle origini al principio del secolo VII*, Faenza, 1917.

Laqueur, R., *Eusebius als Historiker seiner Zeit*, Berlin, 1929.

Last, H., *The study of the persecutions*, 《JRS》 27, 1937.

Latouche, R., *Les grandes invasions et la crise de l' Occident au v.e siècle*, Paris, 1947.

Latte, K., *Die Religion der Römer und der Synkretismus der Kaiserzeit*, Tubingen, 1927.

Leciejewicz, L., *Gli slavi occidentali*, Spoleto, 1991.

Lemerle, P., *Les plus anciens recueils des miracles de S. Démétrius et la pénétration des Slaves dans les Balkans* (2 voll.), Paris, 1979-81.

Leon, J., *The Jews of Ancient Rome*, Filadelfia, 1960.

Le Patourel, J., *The Norman Empire*, Oxford, 1976.

Levi, M.A., *L'Impero romano*, Torino, 1963.

Lizérand, G., *Aetius*, Paris, 1910.

L'Occidente e l' Islam nell' alto Medioevo (2 voll.), Spoleto (研究会論文集).

Lot, F., *De l'étendue et de la valeur du caput fiscal sous le Bas Empir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1925;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Paris, 1927; *Du régime de l'hospitalité*,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7, 1928; *L'impôt foncier et la capitation personnelle sous le Bas Empire*, Paris, 1928; *Les invasions barbares et le peuplement de l'Europe* (2 voll.), Paris, 1937.

Lot, F., Pfister, Ch. & Ganshof, F., *Les destinées de l'empire en Occident de 395 à 888*, Paris, 1928.

Lugli, G., *Aspetti urbanistici di Roma antica*, 《Rendiconti Pont. Accademia d' Archeologia》, 1937.

Maddalena, A., *Le fonti per la storia di Diocleziano e di Costantino*, 《Atti del R. Istituto Veneto》 45.

Maenchen-Helfen, O.J.,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Los Angeles, 1973.

Manaresi, A., *L'Impero Romano e il Cristianesimo*, Torino, 1914.

Marchesi, C.,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Messina, 1932-33.

Marrou, H., *Μουσικὸς ἀνήρ*, Grénoble, 1938; *S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 1938, *Decadenza romana o Tarda antichità? III-IV secolo*,

Milano, 1979.

Martroye, F., *Une tentative de révolution sociale en Afrique. Donatistes et circoncellions*,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76, 77; *Genséric. La conquete vandale en Afrique et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Occident*, Paris, 1907.

Marucchi, O., *Epigrafia cristiana*, Milano, 1910.

Matagrin, A., *Histoire de la tolerance*, Paris, 1905.

Matthews, J., *Western Aristocracies and Imperial Court, A.D. 364-425*, Oxford, 1975.

Mattingly, H.,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Dunedin, 1955.

Maurice, J., *Numismatique Constantinienne*, Paris, 1908-12.

Martindale, J.R., *Prosoph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Cambridge, 1980.

Mayr Harting, H.,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72.

Mazzarino, S., *La politica religiosa di Stilicone*, 《Rendiconti R. Istituto Lombardo》 70, 1938;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Roma, 1942; *Serena e le due Eudossie*, 《Real. Ist. Stud. Rom》, Roma, 1946; *Antico, tardoantico, ed era costantiniana*, Bari, 1974; *Aezio, la "Notitia Dignitatum" e i Burgundi di Worms, Renania romana*, Roma, 《Atti dei Convegni Lincei》 23, 1976;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Milano, 1990.

Mazzarino, S. & Giannelli, G., *Trattato di Storia romana Vol. II*, Roma, 1962.

Mazzolai, A., *Alarico*, Firenze, 1996.

McCormick, M., *Eternal Victory. Triumphal Rulership in late Antiquity,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Cambridge, 1986.

Melucco Vaccaro, A., *I Longobardi in Italia. Materiali e problemi*, Milano, 1982.

Mochi, S., *Vescovi e città (sec. IV-VI)*, Bologna, 1933.

Momigliano, A., *La caduta senza rumore di un impero nel 476 d.C.*,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3, 1973.

Mommsen, Th., *Stilicho und Alarich*, 《Gesammelte Schriften》 4, Berlin, 1906; *Le province romane da Cesare a Diocleziano*, 《Romisch. Gesch.》 5, Torino-Roma, 1879 (伊訳).

Monumenta Asiae Minori Antiqua Voll. I-VIII, 1962.

Moorhead, J., *Theoderic in Italy*, Oxford, 1993.

Moreau, J., *La persécution du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aris, 1956.

Moricca, U.,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cristiana*, Torino, 1925.

Morpurgo, A., *Arbogaste e l'Impero Romano dal 379 al 394*, Trieste, 1883.

Musset, L., *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etienne (VII-XI siècles)*, Paris, 1965;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Milano, 1989.

Nagl, M.A., *Galla Placidia*, Paderbon, 1908.

Negri, G., *L'imperatore Giuliano l'Apostata*, Milano, 1902.

Niel, J.C., *451. Attila dans les Gaules, La bataille de Troyes*, Guénange, 1951.

Nischer-Falkenhof, E., *Stilicho*, Vienna, 1947.

Oberziner, L,. *Le guerre germaniche di Flavio Giuliano*, Roma, 1896.

Obolensky, D.,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Collected Studies, London, 1971.

O' Flynn, J.M., *Generalissimos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Edmonton, 1983.

Olivetti, A., *Sulle stragi di Costantinopoli del 337*, 《Rivista di Filologia》 43, 1915; *Osservazioni storiche e cronologiche sulla guerra di Costanzo contro i Persiani*, Torino, 1915.

Orlandis, J.,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la España visigoda*, Madrid, 1975.

Ortega & Rubio, *Los Visigotos en España*, Madrid, 1903.

Ostrogorsky, G.,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tes*, München, 1963.

Palanque, J.R., *St. Ambroise et l'Empire Romain*, Paris, 1933.

Papini, M.A., *Ricimero, l'agonia dell'impero romano d'Occidente*, Milano, 1959.

Paredi, A., *S. Ambrogio e la sua età*, Milano, 1941.

Pareti, L., *Storia di Roma e del mondo romano Voll. IV-VI*, Torino, 1955, 60, 61.

Paribeni, R., *L'età di Cesare e di Augusto*, Bologna, 1950.

Parker, H.M.D., *The 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 《JRS》 23, 1933.

Paronetto, V., *La crisi politica in Africa alla vigilia dell'invasione vandalica*, 《Miscellanea greca e romana》 4, 1975.

Passerini, A., L*inee di storia romana in età imperiale*, Varese-Milano, 1949.

Pastorino, B., *La prima spedizione di Alarico in Italia*, Facoltà di Magistero dell'Università di Torino, 1975.

Pavan, M., *La politica gotica di Teodosio nella pubblicistica del suo tempo*, Roma, 1964.

Pepe, G., *Il medioevo barbarico in Italia*, Torino, 1941; *Il medioevo barbarico in*

Europa, Milano, 1967.

Perrin, O., *Les Burgondes*, Neuchatel, 1968.

Pfister, K., *Der Untergang der antihen Welt*, Leipzig, 1940.

Picotti, G.B., *Il patricius nell'ultima età imperiale*, 《ASI》 4, 1928; *Sulle relazioni tra re Odoacre e il senato e la chiesa di Rom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4, 1939.

Pietri, Ch., *Roma christiana. Recherches sur l'Eglise de Rome, son organisation, sa politique, son idéologie de Miltiade à Sixte III (311-440) Vol. I-II*, Rome, 1976.

Piganiol, A., *L'impôt foncier des clarissimes et des curiales au Bas-Empire romain*,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27, 1907; *L'impôt de capitation sous le Bas Empire Romain*, Paris, 1916; *L'empereur Constantin*, Paris, 1932; *L'Empire chrétien (325-395)*, Paris, 1947.

Pincherle, A., *Cristianesimo e Impero romano*, 《Bull. Com. Int. Sc. Hist.》, 1933.

Pippidi, D.M., *Recherches sur le culte impérial*, Paris, 1939.

Pirenne, H., *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xelles, 1937.

Pohl, W.,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Leiden-New York-Köln, 1997, *Die Germanen*, München, 1998.

Puech, H.Ch. (編), *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70-76.

Ravegnani, G., *Giustiniano*, Teramo, 1993.

Rehm, W., *Der Untergang Roms in abendländischen Denken*, Leipzig, 1930.

Reinhart, W., *Historia general del reino hispánico de los Suevos*, Madrid, 1952.

Rougé, J.,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66.

Ricciotti, G., *Storia d'Israele*, Torino, 1942.

Riché, P., *Les invasions barbares*, Paris, 1953.

Ridley, R.T., *Zosimus the Historia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65, 1972.

Rinaldi Tufi, S., *Archeolog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Roma, 2000.

Roberti, M., *Invasione vandalica dell' Africa Romana*, 《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1938.

Romano, R., *Le dominaz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395-1024)*, Milano, 1910.

Rose, H.J., *Roman Religion 1910-1960*, 《JRS》, 1960.

Ross Taylor, L., *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n, 1931.

Rostagni, A., *Giuliano l'Apostata*, Torino, 1920.

Reinhart, W., *Historia general del reino hispánico de los Suevos*, Madrid, 1952.

Rougé, J.,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66.

Ricciotti, G., *Storia d'Israele*, Torino, 1942.

Riché, P., *Les invasions barbares*, Paris, 1953.

Ridley, R.T., *Zosimus the Historia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65, 1972.

Rinaldi Tufi, S., *Archeologia delle province romane*, Roma, 2000.

Roberti, M., *Invasione vandalica dell' Africa Romana*, 《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1938.

Romano, R., *Le dominaz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395-1024)*, Milano, 1910.

Rose, H.J., *Roman Religion 1910-1960*, 《JRS》, 1960.

Ross Taylor, L., *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n, 1931.

Rostagni, A., *Giuliano l'Apostata*, Torino, 1920.

Schreiber, H., *Gli unni*, Milano, 1983; *I Vandali*, Milano, 1984.

Schultze, V.,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Heidentums*, Jena, 1887-92.

Schurer, E., *Gesch. des jud. Volkes in Zeit. Jesu Christ*, Leipzig, 1901.

Scott, K., *The imperial Cult under the Flavians*, Stuttgart, 1939.

Seaver, J.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 (300-438)*, University of Kansas, 1952.

Senac, Ph., *Musulmans et Sarrasins dans le Sud de la Gaule du VIII au XI siècle*, Paris, 1980.

Sesan, V., *Kirche und Staat in römisch-byzantinischen Reiche seit Konstantin bis zum Falle Konstantinopels*, Czernovitz, 1911; *Die Religionspolitik der christlichen römischen Kaiser von Konstantin bis Theodosius*, Leipzig, 1911.

Simon, M., *Verus Israel*, Paris, 1948.

Sinnigen, W.G., *The officium of the urb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7, Roma, 1957.

Solari, A., *Gli Unni e Attila*, Pisa, 1916; *La tradizione geografica sugli Unni, Sulle leggi di Costanzo II contro i Pagani*, 《Rendiconti Accad. di Bologna》 9, 1924-25; *Coerenza ideale nell'attività legislativa dell'imp. Giuliano*, 《Atti del III Congresso Studi Romani》, 1930, *La elezione di Gioviano*, 《Klio》, 1933; *La ques-*

tione sociale nel dissidio tra Valentiniano ed Ezio, 《L'Antiquite classique》 2, 1933; *Intorno alla reazione sociale del 408-410*, 《Klio》, 1935; *L'Impero romano* (4 voll.), Genova-Roma, 1940-47.

Sorel, G., *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 Paris, 1923.

Spengler, L.,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Berlin, 1920-22.

Staccioli, R., *Guida di Roma antica*, Milano, 1986.

Stauffer, E., *Le Christ et les Césars*, Paris, 1956 (仏訳).

Stenton, F.M.,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1943; *Angli e Sassoni al di qua e al di là del mare* (2 voll., Spoletoでの研究会論文集)

Straub, J., "*Parens Principum*": *Stilichos Reichpolitik und das Testament des Kaisers Theodosius*, 《Regeneratio Imperii》, 1972.

Tabacco, G., *La storia politica e sociale. Dal tramonto dell'Impero alle prime formazioni di Stati regionali*, Torino, 1974.

Teillet, S., *Des Goths à la Nation gothique. Les origins de l'idée de nation en Occident du V au VII siècle*, Paris, 1984.

Terzaghi, N.,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latina da Tiberio a Giustiniano*, Milano, 1934.

Testini, P., *Archeologia cristiana*, Roma, 1959.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 The Augustan Empire, 44 B.C.-70 A.D., 1934; *Vol. XI: The imperial Peace, A.D.70-192*, 1936; *Vol.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1939; *Vol.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1939.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Vol. I: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 1936; *Vol. IV: The Byzantine Empire (1: Byzantium and its Neighbours; 2: Government, Church and Civilisation)*, 1966-67.

Thompson, E.A., *Storia di Attila e degli Unni*, Firenze, 1963; *The Visigoths from Fritigern to Euric*, 《Historia》 12, 1963;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65;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1969; *Barbarians Invaders and Roman Collaborators*, 《Florilegium》 2, 1980; *Romans and Barbarians*, Madison, 1982.

Thouvenot, R., *Salvien et la ruine de l'Empire Romain*, 《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20.

Todd, M.,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Cambridge (Mass.), 1992.

Toesca, P., *Storia dell'arte italiana Vol. I*, Torino, 1927.

Tomaselli, G., *Il crollo dell'impero romano in Occidente*, Messina-Firenze, 1973.

Tramontana, S., *La monarchia normanna e sveva*, 《Il mezzogiorno dai Bizantini a Federico II》, Torino, 1983.

Turchi, N., *La religione di Roma antica*, Bologna, 1939.

Vaccari, A., S. *Girolamo*, Roma, 1921.

Valentini, R. & Zucchetti, G., *Codex topographicus Urbis Romae I*, Roma, 1940.

Vàrady, L., *Stilicho proditor arcani Imperii*, 《A. Ant. Hung.》 16, 1968.

Vasiliev, V., *Histoire de l'empire byzantin I*, Paris, 1932.

Vassili, L., *La figura di Nepoziano e l'opposizione ricimeriana al governo imperiale di Maggioriano*, 《Athenaeum》, 1936.; *Rapporti fra regni barbarici e impero nella II metà del V secolo*, 《Nuova Rivista Storica》 21, 1937.

Vessel, C.,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Graecae veteres Occidentis*, Halle, 1936.

Villari, P.,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in Italia*, Firenze, 1901.

Vlasto, A.P., *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the Christendom.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Slavs*, Cambridge, 1970.

Vogt, G., *Kaiser Julian und das Judentum*, Leipzig, 1939.

Wallace-Hadrill, J.M., *L'Occidente barbarico, 400-1000*, Milano, 1963.

Weber, W., *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 《Die Wahrheit》, 1896.

Webster, G.,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London, 1979.

Werner, H., *Der Untergang Roms. Studium zum Dekadenzproblem in der antiken Geistesgeschichte*, Stuttgart, 1939.

Wes, M.A., *Das Ende des Kaisertums im Westen des römischen Reichs*, The Hague, 1967.

Westermann, W.,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Decline of ancient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15.

Wickham, C.,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 London, 1981.

Wilcken, U. & Mitteis, L., *Grundzu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griech. Papyrusurkunden*, Berlin, 1916-12.

Wilpert, G., *I sarcofagi cristiani antichi*, Roma, 1929.

Wilpert, J., *Roma fondatrice dell' arte monumentale paleocristiana e medievale*, 《Att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rte》, Roma, 1912; *Die Mo-*

saiken und Malereien der christlichen Bauten, 1916.

Wolfram, H., *Geschichte der Goten bis zum Mitte des 6. Jahrhundert*, München, 1979; *Storia dei Goti*, Roma, 1985.

Wood, I.,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New York, 1994.

Wroth, W.,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8.

Zecchini, G., *Aezio: l'ultima difesa dell'Occidente romano*, Roma, 1983.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全集）

DE MARI NOSTRO POST DELETAM ROMAM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国 田建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总　目　录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册）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册）
返回总目录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DE MARI NOSTRO POST DELETAM ROMAM

（上册）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国 田建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册）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田建华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卷首语
序
第一章 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伊斯兰抬头
撒拉森人
海盗
绑架
变本加厉的入侵
神圣罗马帝国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伊斯兰的“圣战”
梦见西庇阿
打到罗马去
巴勒莫陷落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再攻罗马
基督教的“圣战”
“海洋共和国”
“撒拉森塔”
叙拉古陷落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间奏曲 某种共存
“伊斯兰的宽容”
伊斯兰·西西里
地中海的奇迹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起来，意大利！
诺曼人到来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十字军”时代
“先下手为强”
最后的十字军
意大利的经济人
贸易商品
撒哈拉的黄金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拯救修会”
“拯救骑士团”
年表
返回总目录

卷首语

海盗

在日语中，只有一个词语可以表示结伙横行海上、袭击其他船只和沿岸居民、进行抢劫和绑架的海上盗贼，那就是“海盗”。

但在日本之外，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海盗。以英语为例，有pirate和corsair。

英语pirate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pirates，进入罗马时代后演变为拉丁语的pirata。在拉丁语的长子——意大利语中，pirata一词至今未改其貌。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中，海盗一词的词源都是古代拉丁语。这表明这种海盗古已有之。

然而，corsair一词则不同。英语中的corsair源于拉丁语的cursarius，但这个拉丁语词既非源于古希腊语，也非源于古罗马人所操的拉丁语，而是进入中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这个中世纪拉丁语词派生出了后世西欧诸国表示此义的词语：

意大利语corsaro

法语corsaire

英语corsair

德语Korsar

由于意大利人与中世纪地中海主人公之一的海盗有着长期而深刻的

关系，这两个表示海盗的词在意大利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Pirata是不为官方公开认可的海盗，而corsaro则被官方公开认可。

前者是以获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从事海盗行为的人。

后者则指虽然从事同样的海盗行为，但其背后，无论官方是公开认可还是默认，这些人都受到国家和宗教的控制。所谓corsaro被认为是会带来公益的海盗。近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著名的例子。

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代的罗马帝国，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他们是单纯的罪犯，可予以惩罚。也许在只承认法治国家的罗马人看来，即使是为了国家利益，绑架无辜之人，抢夺他们财产的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拉丁语用cursarius一词表示这种意义上的海盗。这一词语不是古罗马人的拉丁语，而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拉丁语。语言上的这个情况似乎证明了上述史实。

在日语中只有海盗一词，意思上没有pirata和corsaro的区别。我想个中原因，大概是日本人绝对不是可以与罗马人比肩的法治民族，日本也没有苦于corsaro式海盗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也许因为这一点，在外国语译成日语的辞书中，pirata和corsaro这两个词都被译为“海贼”[1]。

日语辞书编纂者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无法明确区分这两种海盗的情况太多了。先是作为corsaro参加海战，归途中摇身一变成为pirata，袭击回程时经过的沿海村镇，返航时整船装满了掠夺而来的财物和俘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这也是人类世界秩序崩溃时代的特点之一。把单纯的犯罪和有大义

名分的犯罪区别考虑，而人们对此并不质疑，这本身就意味着法的权威的堕落。

在本书中，不论是pirata还是corsaro，我都只能用“海盗”一词来表示，使用日语写作也只能如此。

最后补充一句。海盗船的桅杆上高挂着黑底白色骷髅旗，这样的海盗，可能是加勒比海的海盗。即使是所谓加勒比海盗，也不过是小说和电影里的臆测和虚构。

---

[1] 海盗，日文汉字写作“海贼”。——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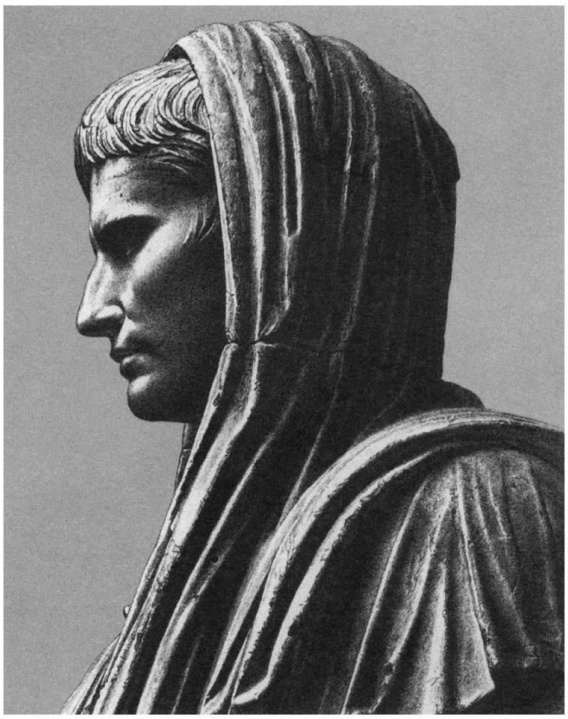
序

罗马市的火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玛西摩宫”（Palazzo Massimo）的美术馆。在罗马市，国立的、市立的美术馆比比皆是，通常都以被辟为美术馆之前的建筑物名称来称呼。例如，主要展示希腊美术的阿特姆彼斯宫（Palazzo Altemps），陈列着较多文艺复兴时代展品的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而朱利亚庄园（Villa Giulia）则多有伊特鲁里亚的美术藏品。玛西摩宫内充满了古代罗马人的嗜好之物。

走进玛西摩宫大门，登上级数不多的台阶，透过玻璃朝院里望去，便能看见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立像。主导宗教祭祀是罗马皇帝的重要任务，奥古斯都的这尊塑像是以洁白托加袍的一端裹着头的形象，表现出浓郁的罗马情调。最近，这座全身立像背后的墙上，出现了下面一段文字：

> 每个人想向神祈求的一切，神想赐予人类的一切，奥古斯都都准备了，并保证这样的神赐经久不绝。
>
> 那就是坚信劳动必得报偿，就是对神助人们努力的信心，就是对财产不会被任何人剥夺的安心，就是每个人对人身安全的放心。

这段文字摘自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所写的《历史》一书。在活到77岁的长寿皇帝奥古斯都眼中，他属于儿辈或孙辈。他虽然留下了名为“历史”的一本书，但却连元老院议员都不是，也不是以教育或写作为业的知识分子阶级中的一员。他的大半生都在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尼禄手下为将，最终似乎官至大队长。用现代的话说，他大约是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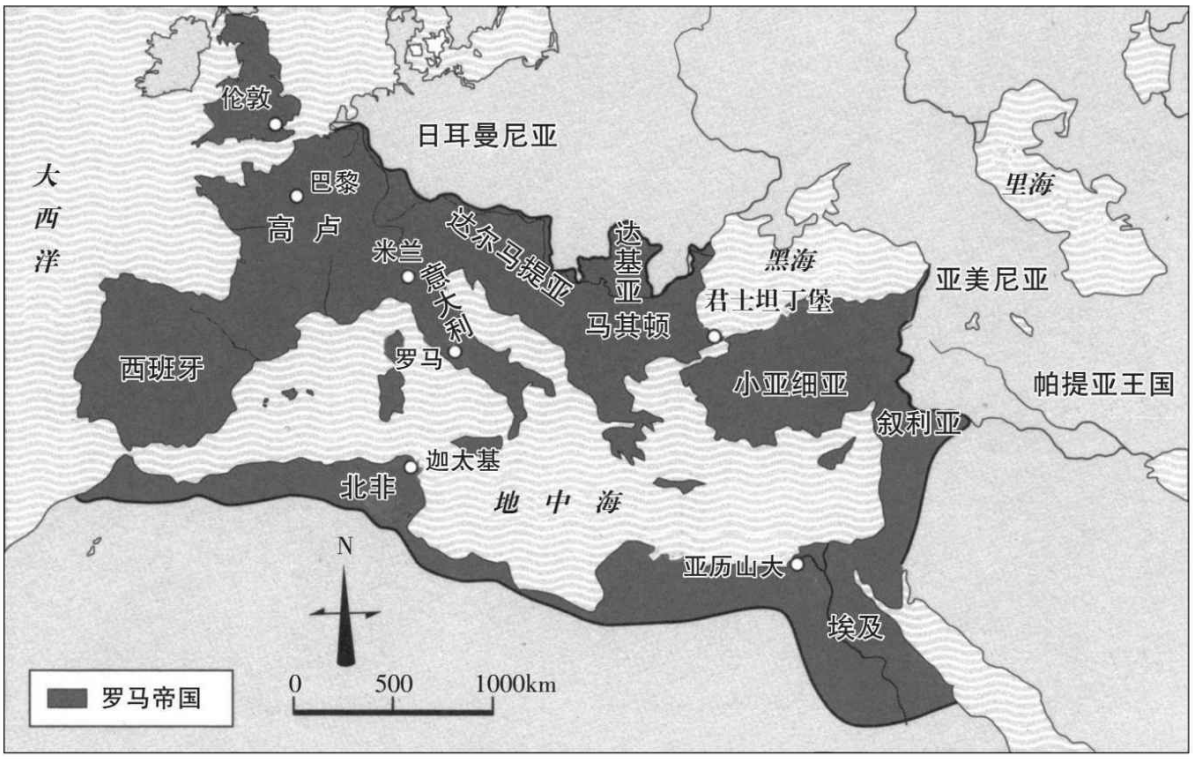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既不属于统治阶级，也不属于对统治阶级多有批评的知识分子阶级。但他跟随提贝里乌斯·尼禄走遍了帝国各地，这些经历使他精于人情世故。他一辈子对政治的看法至为单纯，只有善政与恶政之别，而与政体是共和或是帝制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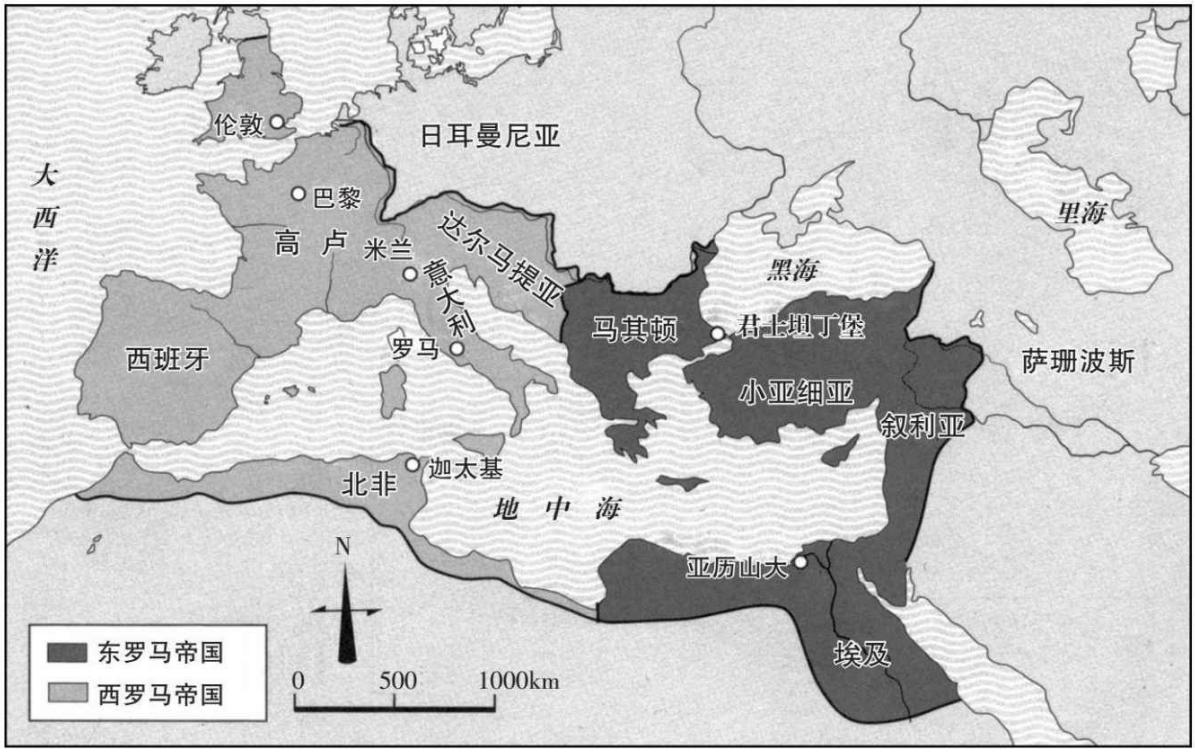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死后，帕特尔库鲁斯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一生完满的人给予皇帝奥古斯都的评价。没有别的什么评语能够如此直率、如此简洁地评价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了。或许因为他是活在现实中的一介武夫，才能做出如此评价。

可是，荣枯盛衰既为历史之道，罗马帝国也概莫能外。作为罗马人建立的国际秩序，“罗马治下的和平”也已经成为过去。不过，人类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停止祈祷。如果不能指望统治者实现人类的根本愿望，剩下的就只有依靠神了。这个神不是可以与其他神祇同在的多神教的诸神，而是断然拒绝与其他神祇同在的一神教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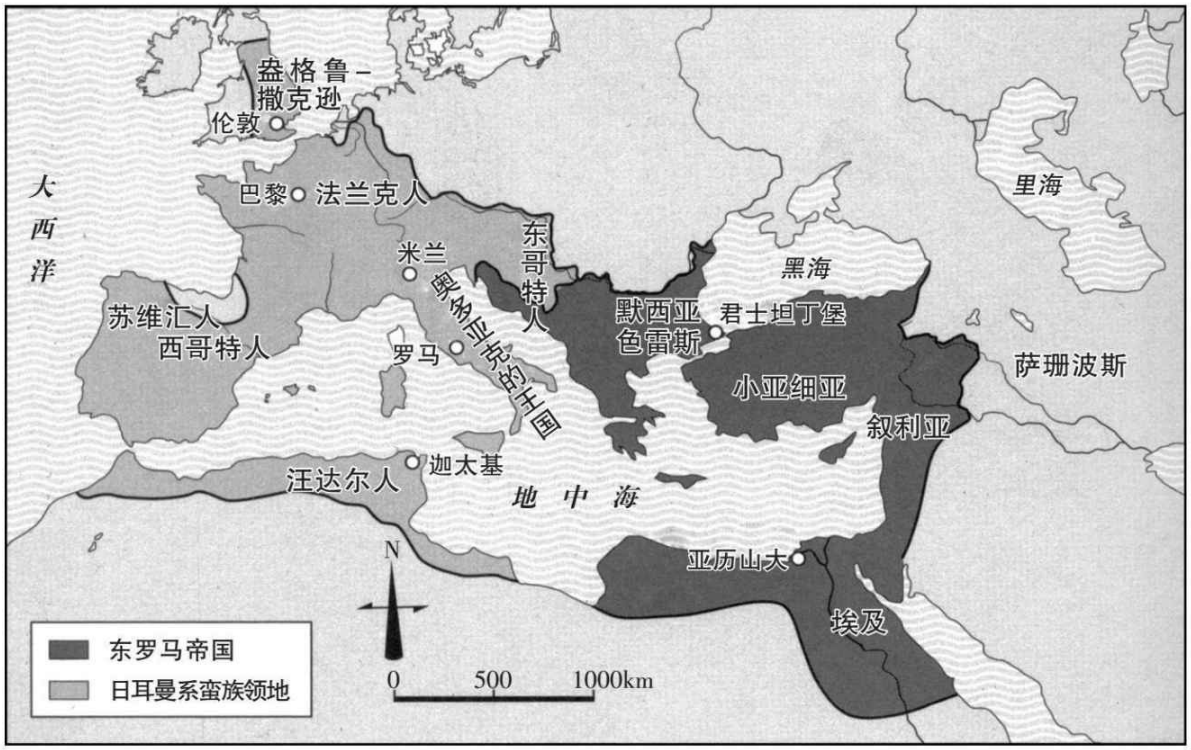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一神教在地中海的两岸隔海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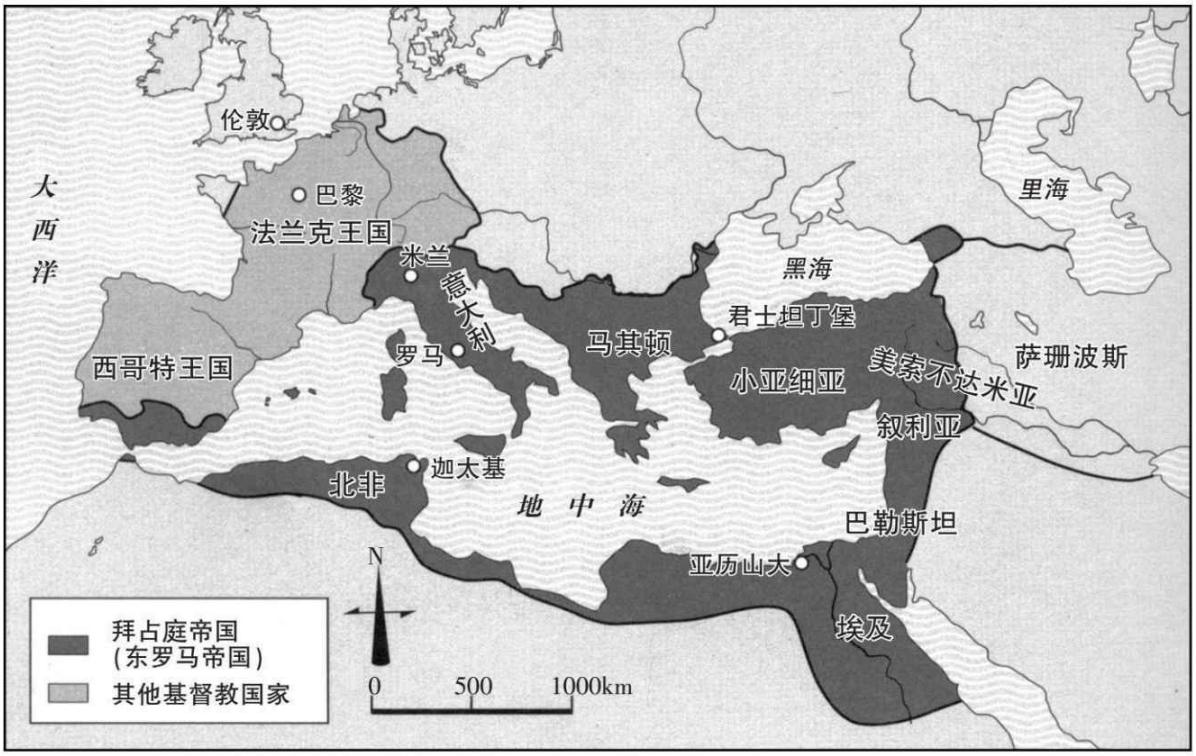
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1、2世纪）



狄奥多西皇帝死后东西分治时代的罗马帝国（4世纪末）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东罗马帝国（5世纪末）



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久的拜占庭帝国（6世纪后半叶）

第一章
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伊斯兰抬头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在统治长达37年之后于公元565年去世。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让人编撰了古罗马时代制订的众多法律之集大成——《民法大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从476年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北方蛮族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半岛和北非。因为这一点，历史上称他为“再征服者”。

然而，蛮族盘踞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曾经的罗马领土的状况并未改变，说他再次征服有过誉之嫌。不过，意大利半岛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北非又是罗马的粮仓，可以说，他收复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留下的主要地方。

6世纪到7世纪的意大利半岛（采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Manuale di Storia Vol. 1，II Medioevo）

但是，这位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仅3年，伦巴底人便南下意大利。

东罗马帝国在长达20年与哥特人进行的意大利半岛争夺战中已经耗尽了气力，还要在东线应付没完没了的针对波斯的战争，再要驱逐新来的北方蛮族伦巴底人已经力不从心。伦巴底人也无力完全称霸意大利半岛。结果，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希腊人统治的地盘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盘便逐渐在意大利半岛犬牙交错，共生共存了。这种状态在被统治一方看来，只意味着不安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难以生存的时代。

570年，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过5年，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他于613年开始传教，632年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使半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了。先知穆罕默德似乎还有武者之才。

先知死后便是其继承者哈里发（khalifah，伊斯兰教领袖）统率的时代。“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其成功相当惊人。两年后，他便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遂将目标北移，先是巴勒斯坦，进而叙利亚。他于635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并迁都至此。翌年又战胜前来迎战的拜占庭帝国正规军。在700年里一直是罗马帝国东部要冲的叙利亚被伊斯兰化。此后他马不停蹄，东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西向小亚细亚纵深进攻，南向埃及，连续闪电进击，所向披靡。

伊斯兰势力于公元642年攻陷亚历山大，使埃及伊斯兰化。仅仅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的黎波里，将现在的利比亚地方伊斯兰化。其后伊斯兰势力没有停下称霸北非的步伐，公元698年后征服了迦太基。这时，北非全境已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了。公元670年，伊斯兰势力在现今突尼斯境内突尼斯以南15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北非最早的阿拉伯人城市，取名凯鲁万（Kairouan）。他们无疑打算把这里作为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前沿阵地。

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公元710年，在攻陷迦太基，完全称霸北非之后，伊斯兰势力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开始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

征程。但是，在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把伊斯兰化的巨浪推向整个高卢时，法兰克国王前来迎战，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普瓦捷之战”，遏止了这一浪潮。在后世看来，这一“遏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欧洲免于伊斯兰化。在当时急剧扩张的伊斯兰势力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们大概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是暂时的，也总算是让他们停顿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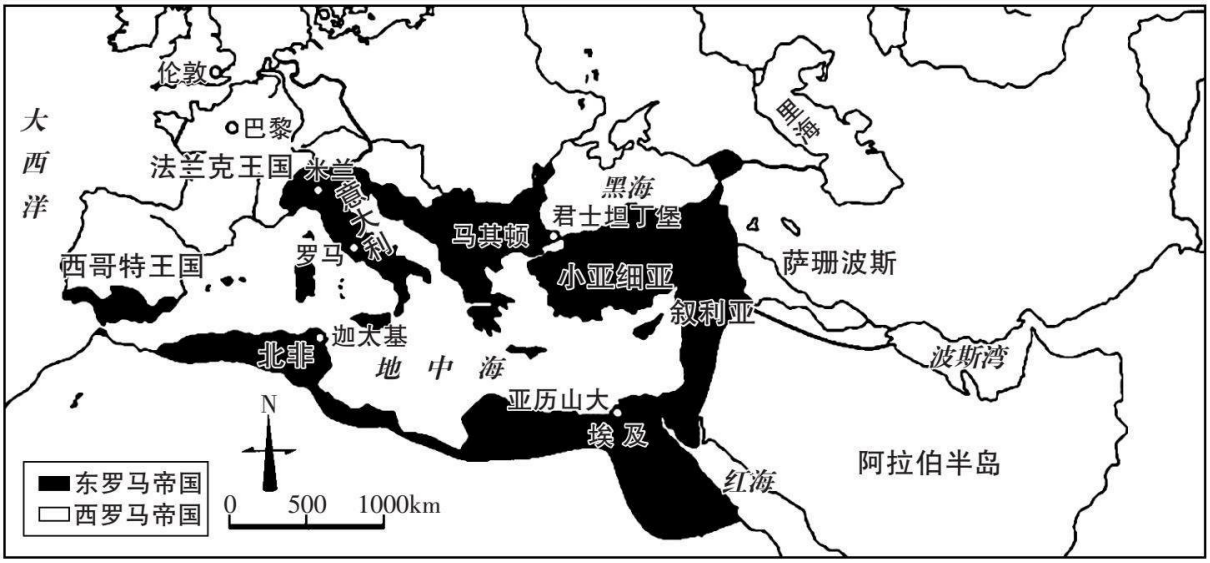
好似在巨幅白纸上泼墨一般的伊斯兰化浪潮，在中东更加彻底。先是罗马帝国，接着是拜占庭帝国的宿敌波斯。萨珊王朝虽已衰落，但也实在是“其亡也忽焉”。就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被注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夹、中东强国经常作为根据地的地方，这个一直是东方文明母体的地方，也被伊斯兰化了。

不知是阿拉伯人没有心情把波斯的首都当作自己的首都呢，还是他们认为应当新建伊斯兰的首都，公元762年，他们舍弃了以往所有帝国都在此建都的泰西封，在距此仅有40公里的地方建设新首都，取名巴格达。首都随即从靠近地中海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西岸新建的巴格达。其间还两次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势力不但灭掉了长久统治东方的波斯帝国，并已强大到可以扼制正式名称还叫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咽喉的程度。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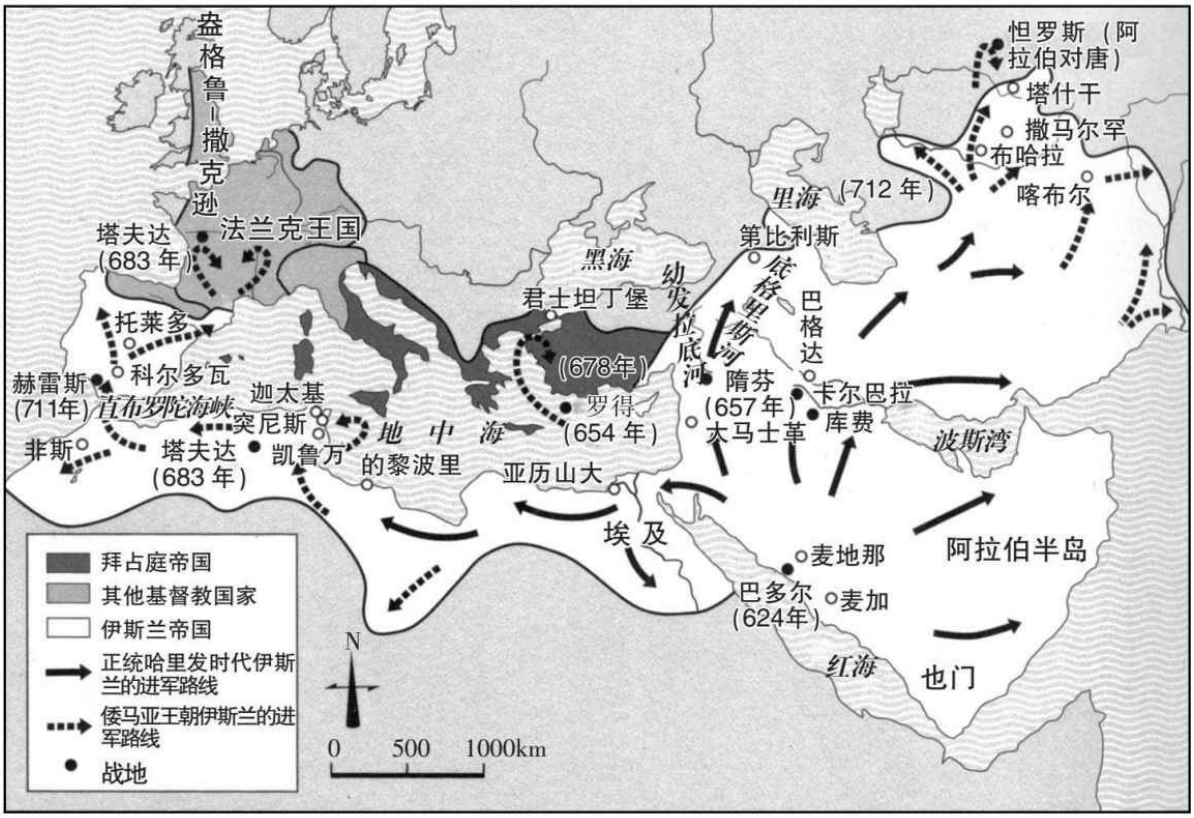
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尽在一事之中：

“这是新兴宗教常有的突破力量与阿拉伯民族的征服欲合为一体的结果。”

换成口号式的说法就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



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去世当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7、8世纪的伊斯兰化浪潮（采自A. Giardina, G. Sabbatucci, V. Vidotto著 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l Medioevo）

这是基督教方面的看法，伊斯兰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处在1300年后的现代，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仍然感动着每个人，这才是原因。时至今日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真正的伊斯兰教厌恶暴力。这一说法似乎也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双方可以相互接近的起点。

然而，在直到最近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却不是这样。

“当抵抗……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指犹太人、基督教徒），你们要与他们战斗。”（《古兰经》第九章“忏悔”第29~30节）

“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你们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古兰经》第四十七章“穆罕默德”第4节）

基督教世界将“圣战”正当化是接近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在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方面的“强制”。无关人性是好是坏，在正视人性现实的思想复活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并未直接指向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

“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意思是宗教不论说教多么正确，如果不具有强迫他人的力量，就不会成功。

在宗教夺取现有世俗国家的权力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类似，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宗教费时300年。与此相比，伊斯兰教得天独厚。

基督教当初的对手是强大而尚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伊斯兰教面对的是步入衰落期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波斯帝国因东北蛮族的侵略和与拜占庭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拜占庭帝国也与此类似，加之东方基督教独特的教理论战，教会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相互憎恶不已。

论战起于耶稣基督是神还是具备神性之人。因为论战，拜占庭帝国的两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主教甚至公然敌对。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国家，主教相争对一般民众而言，既然领袖之间是敌对关系，民众相互之间也成为仇敌。

听闻亚历山大被伊斯兰势力占领的消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居然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除了帝国内部分裂，拜占庭帝国还存在贪污和重税，这是它的特质之一。恶政如此深重，不满自然在人们中间蔓延。伊斯兰教的渗透也就无须像基督教那样需要300年的时间。绝望的人会去寻找值得依靠的对象。

深远的教义也许会净化内心，赐予死后的安心，但却不能给活在现世的人以足够的力量采取行动。而具体现实的好处，往往会使人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苦于苛捐杂税，他们一定会想，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会把自己的烦恼一扫而光，这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只要成为伊斯兰教徒，就可以不用再向拜占庭帝国缴税了。

撒拉森人

无论在利比亚、突尼斯，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地中海阳光灿烂、风平浪静，展现在眼前的这片景象自古未变，直到21世纪的现代。事实上，地中海已成为谋求生路的“路径”，难民不惜铤而走险把命运交给橡

皮艇和破船，渡海前往欧洲各国。眼下热门的是前去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距今1300年前的8世纪，撒拉森人镇压了北非之后，并没有把展现在眼前的地中海视为挡住去路的“壁障”，而是看作自己面前的一条“大路”，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所谓撒拉森人，来源于古希腊语“Sarakenoi”，罗马人称其为“Saraceni”，自古为人所知。这个称呼并非泛指所有阿拉伯人，似乎单指住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他们只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古代撒拉森人袭击乘坐沙漠之舟——骆驼往来的商队，抢劫货物，或是以保护为名收取过路费，也有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参战。根据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公元378年，在著名的哈德良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在与北方蛮族的战斗中惨遭大败，连皇帝都战死在沙场之上。战场上，罗马方面英勇善战的就数撒拉森士兵。当时，撒拉森人是站在基督教徒一边战斗的。

打那以后，撒拉森人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了，直到200年后才因先知穆罕默德而再次现身历史。此后，伊斯兰化的大潮所到之处，无处不有撒拉森人尖兵。地中海对岸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尤其把镇压北非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也许回忆起了古时的称呼。这样一来，经过中世纪1000年的漫长岁月，这个称呼固定下来，它不仅指阿拉伯人，也用于称呼居住在北非的全体伊斯兰教徒，包括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如果想出海获取生活食粮，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做商人，要么当海盗。在食物保存只有干燥或盐渍这两种方法的时代，从事渔业并不是个好出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不知道古罗马盛行的牡蛎养殖和大规模鱼池养鱼的方法。这不是因为技术被人遗忘。农业是典型的需要实实在在沉下心来投入其中的产业，和平和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中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不出海即能生存，就不会有人去风浪中玩儿命。古代的北非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是葱郁富饶的农耕地带，今天已无从想象。可是这久已成为过去。北非失去了和平与安全，帝国灭亡后，占居民大半的民族已不同于帝国时代。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这些流浪民族和沙漠民族历史悠久。还有摩尔人。尽管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罗马帝国子民，但绝称不上是农耕民族。这些民族在传统和历史上都不是天天下地劳作，以期收获的农耕民族。

地中海时常风平浪静，阳光充足。这些人成了地中海南岸广袤地区的“主人”，能迅速获利的海盗业对他们自然更有魅力。而且，他们新奉的宗教已把加害异教徒的行为视为正当行为。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国家、民族、人种都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信不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今后要转变为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想法，世界只有“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这两个家。“伊斯兰之家”成员的职责是去“战争之家”战斗并取得胜利，从而扩大“伊斯兰之家”。

基督教并非不重视，而是最重视推广耶稣的教义。这一点是基督教与其母体犹太教的重大差异。不过，推广教义的“传教”是主教、祭司等教会专业人士的职责，而不是每位信徒的职责。与此相反，在伊斯兰教中，这也是一般教徒的职责。于是，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即使是对异教徒的敌对行为也会与“圣战”（jihad）联系起来。既然相信《古兰经》是唯一圣书，这样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不过，“海盗”的意思却由此发生了变化。

海盗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徒的海盗第一次袭击基督教世界是在公元652

年。伊斯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发，袭击了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大肆破坏、掠夺，绑架了800名男子和妇女，在亚历山大的奴隶市场上出售。这就是此后戕害地中海千年的撒拉森海盗之始。

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地中海再大也是内海，风向易变，老练的水手也经常会有行船失控，卷进涡流的危险。专程从地中海东边的亚历山大远道来到西边的叙拉古，只是为了海盗的勾当，这种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况且，回程时船上满载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却不停靠北非的任何地方，直接回到亚历山大。夏天，地中海大多是西风劲吹的日子，尽管人、货可以一起上船，伊斯兰船的船舱里可以塞满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但这时期沿途的北非却不是可以放心停靠之地。要知道，虽然伊斯兰打下了的黎波里，已经控制了利比亚，但突尼斯还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北非要港迦太基是在公元698年才投降伊斯兰的。

虽然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与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海盗的重要基地，但突尼斯在7世纪末才彻底完成伊斯兰化。我认为，这就是7世纪中叶袭击叙拉古事件以后长达50年间，伊斯兰海盗没有再来袭击基督教领土的原因。沿贸易路线有相应的基地是海上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海盗也需要在一定距离内有方便停靠的基地，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详述。不论怎样被宗教上的热情所驱使，往返于埃及与西西里之间而中途不停靠港口，其距离都嫌太远。

意大利南部、叙利亚及北非

不过，这个偶发事件显示，沙漠之民的阿拉伯人，只要能玩转东方的海洋民族希腊人，就可以往来于地中海之间。

公元700年，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个岛接连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两个小岛，现代都属于意大利领土，但当时却和西西里一样，属于拜占庭帝国。两年前迦太基投降时逃亡的人们移居于此。这些基督教徒全被杀害，其空间由刚刚伊斯兰化的北非移民所填充。现在这两个小岛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时却无甚产业，征服这里大概只是出于确保海上交通线停靠港的目的。

这个时期北非的“首都”尽管在突尼斯境内，但却不是沿海的迦太基和突尼斯，而是阿拉伯人出于和在中东建设巴格达同样的考虑新建的凯鲁万。

这座城市由从东方前来赴任的地方长官（Amir）[2]治理。这座城市建在突尼斯以南150公里，距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公里的内陆地区，这显示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充分了解地中海。从凯鲁万出海，最先碰到的是兰佩杜萨岛，紧靠其北面的是潘泰莱里亚岛。从突尼斯、迦太基等沿海城市出海，挡在面前的不是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就是阿拉伯人要率先攻占这两座小岛的原因。

撒拉森海盗自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袭击。无论是从凯鲁万出发，还是从突尼斯出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都是其首要的目标。在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之前，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这个目标很早前就已决定。伊斯兰势力在仅仅百年的短时间内便迅速扩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速攻”。我甚至在考虑，伊斯兰势力即使推迟确立对攻占之地的统治权，也会优先考虑不断进攻的。

公元704年，伊斯兰战士大举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6年之前，凯鲁万的地方长官穆萨宣布进行“圣战”。当年夏天，地方长官亲率1 000名伊斯兰士兵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杀戮掠夺之后乘船凯旋，回到凯鲁万。据说如果把掠来的物品卖掉，将收入全部分配给参加行动的人，人均会得

到100枚第纳尔金币。他们懂得了一件事，基督教世界不仅是能予以杀戮的异教徒聚居之地，还是可以迅速致富之地。

此后，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开始称呼居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人们为“鲁米”（Rumi），意即“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全是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鲁米”即基督教徒，即不信真主之徒。

公元705年，也许是前一年的成功令海盗们心情大好，他们再次从凯鲁万出发，突然袭击了叙拉古。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叙拉古一直都是重要城市。西西里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叙拉古也一直是其首府，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防守坚固。只动用1 000人的兵力袭击叙拉古表明，此战并无征服的意图，目的只在骚扰。

事实上，海盗并不攻击防卫坚固的城市，破坏的只是城墙之外广阔的郊区。可见中世纪的海盗也很善于骚扰敌后。烧抢之后再掳走居民，自然使得人人恐惧。周边地区连续受害以后，农耕生产率下降，物产向城市的流通不畅，大城市的脖子就这样一点点地却是扎扎实实地被扼住了。

不过，705年这次袭击叙拉古以后，撒拉森人发动的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像风暴戛然而止一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阿拉伯编年史的作者坚信，这一时代伊斯兰势力在安拉的庇护下，不断发动着进攻。他们以生动的笔法逐一记录了这些进攻，流传后世，唯独这15年里一次进攻的记录也没有。我想这是北非伊斯兰势力于710年开始了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将力量集中于此的缘故。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凯鲁万的大清真寺

肩负扩大“伊斯兰之家”使命、使北非全境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与被他们征服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原住民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在8世纪时的伊斯兰教中，并没有把感觉上可以称之为“原生”的阿拉伯半岛出身的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变宗教信仰的其他地方的居民同等看待，而是分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以向一般教徒说教《古兰经》为使命的伊玛目（imam，导师）一定是“原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古兰经》的语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伯语。

还有一件事将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

“原伊斯兰教徒”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战士”，负有参加战斗扩大“伊斯兰之家”的职责，也拥有把战斗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员

归为己有的权利。说白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而“新伊斯兰教徒”没有资格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战斗，也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伊斯兰战士大约是想让这些“新伊斯兰教徒”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然而，被伊斯兰化的北非居民是罗马帝国时代就不擅长这些工作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他们再也不想默不作声地旁观眼前海盗业的收益了。正好，这段时期大部分伊斯兰战士都集中于征服西班牙的征战之中。

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民族不会繁殖兴旺，往往人口较少。我想，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原生阿拉伯人的悲哀就在于人口稀少。“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做法也许和战士阶层人数减少的风险不无关系。

最后妥协的似乎是原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注意到从事海盗业适合于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的共生共荣。

不论是做什么事业，只有在全体参加者认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才会成功，才会长久。利害一致方能成功，成功方能长久持续。对北非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海盗行为这种“幸运之例”，既可以给原伊斯兰教徒带来完成圣战的满足感，又能给在宗教地位上不及他们的新伊斯兰教徒带来迅速到手的财富。

到了公元725年，海盗行为再度开始。这时，即使是打着圣战旗号出海的海盗，也都不再从阿拉伯人充满推广伊斯兰教义之心建设的凯鲁万出发了。由原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长官亲自率领的海盗行为也逐渐少见。此后的出发港都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多数都是自古以来以海港城市而闻名的港口。较之于离海岸线50公里的内陆地区的凯鲁万，一出家门就是大海的港口城市对出海更为有利。人们从这点可以想象，此后海盗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已经从原伊斯兰教徒转为新伊斯兰教徒了。虽然不清楚始于何时，海盗出海的利益分配也按下面的方法确定下来。

收益的五分之一上缴地方长官，剩余的五分之四由船主、船长和船员分配。

绑架

然而，新方法起初几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公元725年的海盗行动彻底失败，居然没能登上西西里岛。船队倾覆于狂风巨浪之中，船只相互剧烈碰撞，仅极少数人得以逃生，其他人几乎全部葬身海底。也许凭着信仰、主张冲过风浪前进的原伊斯兰教徒与长期居住在北非了解地中海、主张撤回的新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据说漂浮到西西里海岸的尸体中，有几具是把《古兰经》紧抱在胸前的。

翌年的海盗行动，同样未能踏上西西里土地。但在第三年，公元727年海盗出海，使西西里南岸一带遭殃，海盗们满载着掠夺品和绑架的人口凯旋。进入港口的海盗船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迎风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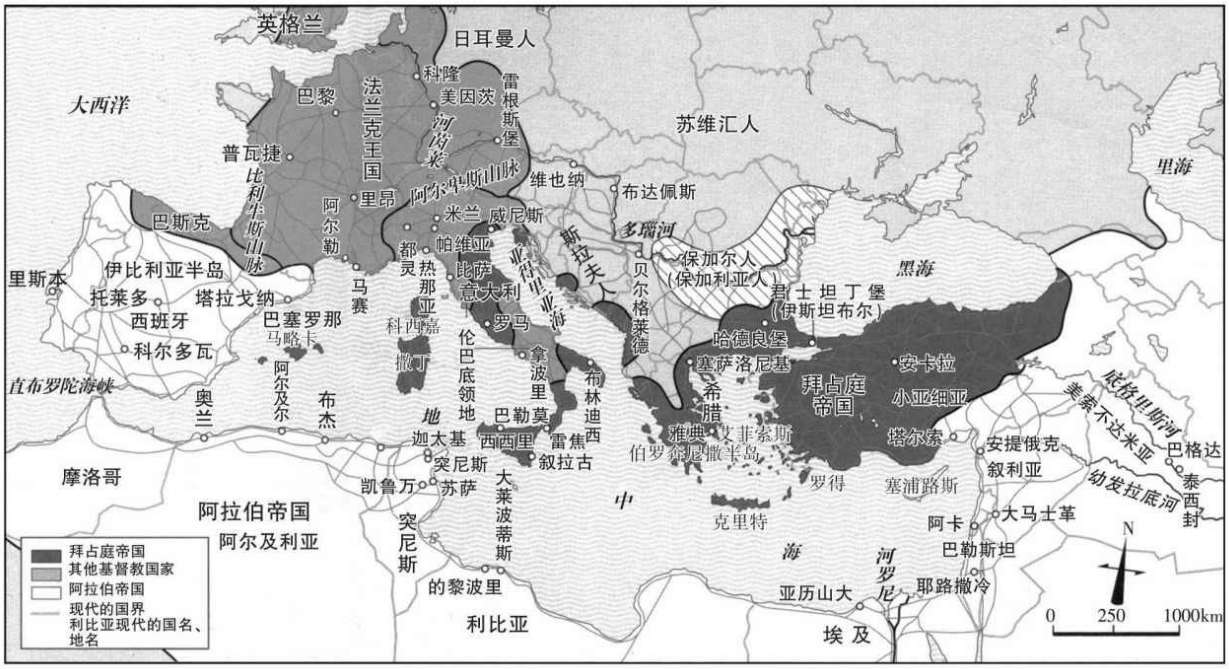
被海盗绑架带到北非来的西西里居民并不是迎战海盗而失败的人，因而不是俘虏。但在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海盗看来，他们是失败者，是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的战利品，而且是些伊斯兰教认为的信仰“错误教义”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尽管承认犹太教、基督教是先行宗教，但却断定由于它们脱离了真的道路，作为宗教已经堕落。

如果这就是伊斯兰的基督教观，被绑架的人就只有做奴隶一条路了。如果被绑架来的基督徒是男子，他会有下面几种命运：

第一，做以海盗船为主的伊斯兰船的划桨手。

在靠帆和桨航行的加莱船[3]上，划桨手承担着发动机的作用。在无风或风小以及风力过大而无法用帆的时候，或是进出港口的时候，就要

发挥划桨手的作用了。划桨手如果是奴隶，划桨时要被锁链铐住。



8世纪前半叶的地中海世界

第二，加入正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圣战的伊斯兰军队。

参战士兵要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既是圣战，伊斯兰军队中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被允许参战。

第三，在奴隶市场出卖，在买主手下当一辈子奴隶。

第四，送进不知为何而被称为“浴场”(balneum）的强制收容所，等待愿意使唤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前来挑选。当然，他们的报酬极低，是廉价劳动力。不过，他们也经常会被提拔为“浴场”管理人，但仅能获得极少的食物。从早到晚在“浴场”干重活，就是这些人的生活。

如果被绑架的是女人，则几乎都会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虽然结果仍是当奴隶，日子与被绑架的男子并无两样，但女子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却极高，因为伊斯兰教禁止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

公元727年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其后的多次海盗行动。以现代的地域而言，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西面的海港，用铁锁链成队锁住的基督教徒奴隶的身影越来越多。

同时，西西里人感到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海盗袭击，人人惊恐万状。从这时开始，他们的脑海里刻上了这样一种图式：

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 = 撒拉森人 = 海盗

但是，应以保卫他们的安全为己任的拜占庭帝国却拒不出战。

说拜占庭帝国无力迎战也许更为准确。8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被伊斯兰势力夺去了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帝国最富庶的地方，还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侵略，连三重城墙护卫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时常受到威胁。在帝国西部，已经很难压制住新的北方蛮族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拜占庭有义务保障其安全，但是帝国却无力向这些地方派出正规部队。

不能保障本国国民安全就失去了统治的资格。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问题，还会让绝望的人们倒向敌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要比处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希腊更为富庶。

变本加厉的入侵

蛮族从欧洲北部南下了。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势必成为罗马帝国军队迎战蛮族的战场。过去，曾经有过向战胜后滞留的蛮族提供三分之一耕地，从而维持蛮族与罗马人共生的时代，但北方蛮族素好意大利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事实上不在这种体系之内。此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属下的将军贝利撒留打了一场哥特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尽皆荒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并未成为战场，

因而免遭荒废。

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富庶，是与北部和中部相比较而言的，并不能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相提并论。不过，在中世纪的最初时期，这里还留有古罗马式农庄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体系的残余。在拜占庭的皇帝看来，可以指望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获取相当的税收。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总督经常会在西西里首府叙拉古的官邸里慨叹边境工作，但这位总督的主要工作却是征税。

几乎可以肯定，西西里岛已成为撒拉森海盗的目标，这种险境已由总督报告给了皇帝。但是帝国没有余力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帝国对险境报告的回应只是命令驻防叙拉古的防卫兵前去迎击。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728年，撒拉森海盗700人又从突尼斯港出发，要到岛屿南端抢掠，西西里派兵迎击。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让敌人遭受损失，反而西西里兵被轻易打败，仓皇逃回叙拉古，空自让撒拉森海盗燃起了打跑拜占庭正规军的自信。

不过，伊斯兰方面也不是事事顺利。也许撒拉森人原本就不长于思考如何扎扎实实地积累战果。

也许是打败拜占庭军让撒拉森人心情太好，翌年他们四处搜罗，征集了180条船，组成庞大船队。这次他们已不满足于袭击小镇小村，而把目标指向了沿海围着城墙的富庶城镇。他们从突尼斯港出发了。

拥有180艘船，这可是大型船队的规模。撒拉森海盗常用的船是加莱船中最小的一种，称为“福斯塔”（fusta），是一种小型的军用快船。这种船有一根桅杆，使用与船身长度差不多的三角帆，划桨手有16至20人。这种船一般只能载水手、划桨手和战士40人。180艘这样的船所能装载的战士不会超过2 000人。这一人数尚不到一年前打败拜占庭兵力的3倍，以此兵力去攻打防守坚固的城市，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鲁莽。

攻打有城墙的城市，必须做持久战的打算。守方即使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因其可以灵活用兵而有可能长期防守，攻方却需投入远超守方的兵力。

还有军粮问题。防守方已经储存了平常需要的粮食，而攻方只能靠外部补给。进攻城市需要投入远超防守方的兵力，是因为需要一边持续攻击一边派兵去后方运粮，有时是抢粮，这些人数也要计算在内。如果人数上没有余地，那就必须像全盛期的罗马军队所做的那样，确保与后方基地之间的补给路线，保持它的作用。公元729年的攻城战，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以后撒拉森人也大多缺乏这种综合战略，甚至让人觉得莫非这就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海上排列着180艘战船，刚开始时对居民产生了恐吓的效果。随着撒拉森军队实际情况的不断明朗，防守方也增强了自信心，开始以彻底抗战的决心来直面进攻。战斗陷入僵局。战事起于夏天，但在你来我往的持续中，冬天临近。尽管西西里地处南国，但冬天西北风仍然寒冷凛冽。原本就不擅长持久战的撒拉森人决定就此撤退，等待来春。

可是，冬天的地中海对他们并不温柔。他们在归途中遭遇猛烈的暴风雨。180艘船中竟有163艘连同船上人员一同沉没。原本要前往突尼斯所在的西南方，却漂流到了南方，仅有17艘船漂流到利比亚的黎波里。司令官阿尔·穆斯塔尼尔乘坐在这17艘中的一艘船上，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撒拉森海盗行动的第一次大败。惨状很快由的黎波里的地方长官通报给了突尼斯的地方长官。突尼斯地方长官接到通报立即命令“即刻送还”。

阿尔·穆斯塔尼尔被带回突尼斯，以怯懦无能致大量安拉的战士死亡为由被宣布有罪。起初他被鞭打到流血，仍不能得到宽恕。接着被绑在驴背上在城里游街，再被投进监狱。他每天被拉到监狱院中棒打。几

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士兵打开牢房门锁，再要拉他到院子里去时，发现这位前司令官已经断气了。

然而，一次惨败不会让撒拉森人打消念头。3年之后的公元732年，安拉的战士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与前来迎战的法兰克王国军队作战，大败于普瓦捷近郊。伊斯兰势力在短短20年时间内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得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不过，打消了沿内陆征服欧洲的念头，却意味着更想从海上征服欧洲。

西西里居民成为目标，厄运连连的时代已经到来。阿拉伯人的编年史家也写道："灾难连绵，无法逐一记录。"撒拉森人似乎也不再好高骛远，不再进攻筑有城墙的城市。他们改变了战法，用十来艘"福斯塔"船组成小型船队，出海抢劫，抢到即回，如此循环往复。

“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安拉的战士

这样的战法很适合撒拉森海盗。因为是抢了就走，只要装足去程够用的淡水和粮食即可。如同现代比赛用的赛艇，只需装上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船只自然轻巧。船又是小型船，水和风的阻力都很小。船速很快，又是少量船只行动，不大会引起居民的注意。海盗船旋风一般地从海上袭来，抢夺绑架，又如旋风一样地消失在大海深处。这已成为南方岛屿西西里夏天的平常之事。

撒拉森海盗的目标不仅是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随着海盗出海次数的增加，自然会有撒拉森海盗出没于与西西里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一带。撒拉森人还意识到可以利用西地中海中央的撒丁和科西嘉这两座岛屿。从地中海一侧进攻法兰克南部，如果失败，伊斯兰船

归途可漂流到此落脚。

这两座岛屿在古代不似西西里繁荣富庶，可说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积蓄较少，即便进入中世纪，也还不敌西西里。但岛屿多有面海的沙滩和断崖下的洞窟，能够补给新鲜水和食物，作为海盗在掠夺后回到母港之前稍事休憩的地点最为适合。这两个岛上尽管没有可以卖得更多第纳尔金币的物品，但却有居民。伊斯兰势力在这个时期进行绑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劳动力，这两个岛在这方面也有利用价值。实际上，当年了解这个情报后，从突尼斯出海袭击了西西里的海盗船队并未像平常一样掉头返航，而是继续北上，登上了撒丁岛。不光是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撒丁、科西嘉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大海是第勒尼安海。现在，这片海域也不再安全了。

随着出没海域的扩展，海盗需要相应的更多的坚固船只。行动范围拓展了，遭遇暴风雨等的风险也就更多。公元734年，亦即普瓦捷战败的第二年，地方长官命令在突尼斯建造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早的造船厂。既是受地方长官之命建设，这船厂就不是私营，而是公营。在8世纪前半叶，所有基督教世界都没有这种造船厂。虽有造船修船的工厂，但当年也都规模偏小，只相当于现代在任何街道都能看到的汽车摩托车修理厂之类的水平。在罗马帝国尚能发挥其基本职能之时，海港中必有附属造船厂。但这些造船厂现已倒塌，成为废墟，只余杂草繁茂。港口也被河流带来的泥沙淤塞。造船厂自然化为废墟。

然而，北非朝向地中海的那一面又开始回荡起造船的当当锤声。

“中世纪”是后世学者所起的名称，所指时代大致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92年热那亚出生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代被视为“中间期”，可实际上也是历时千年的漫长岁月。通常，这1000年以公元100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前

期”和“中世纪后期”。按照这种方法，“中世纪前期”在地中海世界掌握主导权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

我不想议论文化文明方面孰优孰劣，但说到最大限度凭自身力量上升的意愿，在“中世纪前期”，伊斯兰方面绝对表现卓越。不过这种意愿投向了海盗业，这对海盗的目标——基督教世界的居民而言是一种不幸。

地中海世界就这样进入了8世纪后半叶。小股海盗开着快速的小型加莱船，不断袭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沿海一带，这仍然是夏季的常态。这时，海盗已把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作为落脚点。这样，连意大利中部也不得不与海盗发生关系。

“坎帕尼亚”的中心是拿波里，“拉齐奥”的中心是罗马。伊斯兰势力不但开始深入意大利中部，甚至把手伸向了基督教世界的中枢、“神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脚下。这时，海盗的根据地东起突尼斯东部的利比亚，西至阿尔及利亚，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良港。

拜占庭帝国面对伊斯兰势力的攻势，从不想真正迎击挑战。有时装模作样地派来一星半点儿的战船，却没有一次能给撒拉森海盗以沉重打击。绝望的西西里总督用金钱收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试图买到和平。但不独突尼斯，无论何处的地方长官都是只收钱不办事。就算从大马士革前来上任的地方长官有意遵守约定，实际上也挡不住海盗的反对。这时的地方长官似乎仍继续由阿拉伯人担任。被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情愿在这个伊斯兰教本家出身的人的统治下从事海盗业。海盗业对原伊斯兰教徒来说是圣战，但对新伊斯兰教徒来说已经成为打着圣战的大义旗号的产业，是一种生意。

间或有两三年不见海盗船的踪影，这对基督教徒来说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往往是地中海对岸外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的摩尔人、柏柏尔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基督教徒把他们都称为“撒拉森人”，但撒拉

森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然而，这种“休战”不会持续很久。海盗业虽然被冠以“圣战”之名，实质上却已是一种生意。暂时休业之后，海盗就会来袭，进行更为彻底的掠夺、放火和绑架，以期夺回休业期间减少的收入。

从这时开始，海盗对绑架来的人按照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行分类。除了在奴隶市场出售或当作奴隶残酷使用直至其死亡以外，又搞出了一个新名堂——收取赎金。

收取赎金这个新名堂的对象，不只是个人，整个城市也会成为收取对象。海盗们已经不需长期艰苦地攻打铜墙铁壁似的海港城市了，只需荡平城市周边，瞅着城市哀鸣求救的当儿，以撤退为条件勒索赔偿金就成。小城镇赔款尚可理解，叙拉古防守坚固，据说在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这样的城市也曾支付赎金，以求海盗撤退，这可真是到了世界末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基督教素有末日思想。

8世纪就是公元700年到800年之间的100年，这是地中海世界东南西三面都被伊斯兰势力覆盖的一个世纪。退缩于北方的基督教世界不断遭受海盗袭击，渔船亦不能远航。所谓海盗，也并不只是在海上施暴。

在海盗看来，这可以充分理解。如果袭击航行在海上的商船，一次袭击可能收获很大。但商船却是运动中的靶子。地中海浩渺广阔，在没有雷达的时代，要捕捉到航行中的商船并非易事。而如果上岸袭击，就只需瞄准静止的靶子。北非产的马形体矮小，一艘福斯塔就能装十来匹。

撒拉森海盗就是这样，在大海上靠轻快的小型加莱船，在陆地上靠体形矮小但吃粗耐劳的北非良马，使用最合适的突袭战法，进行着海盗行动。

那么，谁来负责防止这些灾害？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既然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撒丁都正式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安全保障的责任就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在查士丁尼大帝以后的意大利半岛，拜占庭领土和南下入侵并盘踞下来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犬牙交错，而北方蛮族伦巴底人也改宗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罗马教皇是信仰上的领袖，而皇帝是世俗领袖。这样，即使在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防卫责任最终还是落在拜占庭皇帝的身上。

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后来的新兴力量伊斯兰势力不断蚕食，如今已被逼到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翼的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之间。它正在竭尽全力保卫所剩无几的土地，再无余力向意大利伸出援手。因此，无人能掌握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拜占庭甚至把保卫希腊西面的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的责任，也托付给了尚在成长中还谈不上可以独当一面的威尼斯共和国。

伦巴底人也没有力量承担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保障。伦巴底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贝内文托大公和萨莱诺大公徒有漂亮的称号，实际上只是几个部族的头领，统治着各自的地盘而已。他们之间也时常生出争端，大动干戈。

未曾被伦巴底人侵略，留在拜占庭帝国的只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可是，正像我们曾在有关西西里的章节里所述，拜占庭已不能保障这里的安全，却还要收税。这样，沿海居民一直处在撒拉森海盗的威协之下，哪里都没有希望。他们所能拥有的自卫手段，只是选择在能够瞭望到广阔海域的地方建塔，尽早发现海盗船的来袭，给居民们多一些逃跑的时间，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样的瞭望塔，意大利语称之为“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现在意大利半岛还留有为数众多的这种塔，分明是16世纪大炮普及以后的造型，但这些塔却不是16世纪建造的，而是对以前的塔进行加固后形成

的。

塔内还残留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原物。建在海岸边上的瞭望塔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由于海岸线的侵蚀，已经浸在海水中，遭到遗弃。在罗马的南方，亚壁大道边的福尔米亚塔就是其中的一座。据说这座塔建在西塞罗的别墅之上。古罗马有情趣的人喜好在近海的地方建别墅。这些昔日的豪邸已经坍塌，却为中世纪的百姓提供了建造瞭望塔的石材，毕竟新开石材并运到海边也是需要花费人工和费用的。

可是，不论建多少撒拉森塔，也不能完全躲避海盗之灾。撒拉森海盗来袭时不会在桅杆上高悬黑底白色骷髅旗，也不会打起绿底白色月牙旗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常常挂出别的基督教国家的旗帜，或挂着被袭地同盟国的旗帜靠近。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瞭望者为了早一秒辨明靠近船只的真相而在塔上拼命凝神定睛，这种心情委实令人同情。对生活在中世纪前期，即公元1000年以前西地中海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愿意被绑架去当一辈子伊斯兰教徒的奴隶，就只能依靠这点儿自卫手段了。

后世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世纪并不黑暗。不过，至少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生存其中的“中世纪”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800年是学习西方历史的学生必须记住的年头之一。

1200年过去了，在现代的布鲁塞尔，与欧盟（EU）相关的大厦中有一幢被冠以“查理曼”（Charlemagne）之名。

公元800年11月中旬，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

山进入意大利。他们首先横跨意大利北部进入拉文纳。当时，在逼退了伦巴底人之后，意大利北部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因而查理曼率领大军顺利地横跨意大利北部。

查理曼和平地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把托付给儿子丕平的部队驻扎在拉文纳，自己则只率手下沿亚得里亚海“轻装”南下。从安科纳进入内陆直奔罗马。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带有多条古道通向罗马，宛如河流流向湖泊。在离罗马尚有一天行程的门塔纳，教皇利奥三世前来迎接。

查理曼的加冕典礼

查理曼和利奥牵手走进罗马城门的准确日期现已不详。不过12月25日基督圣诞那天，他们出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罗马教皇亲手授予法兰克王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冠。这是中世纪史上的大事件，被后世历史学家视为“欧洲的诞生”。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理由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大团结，再创历史辉煌。

说是再创历史辉煌，但既然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就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世纪半之前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完成的短暂的“罗马帝国”。那厢的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打着基督教旗号，但却正式号称“罗马帝国”。因而这厢加上“神圣”一词，不就是想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区别和从此以后的分离吗？因为催生“神圣罗马帝国”的真实意图源于拜占庭帝国从来不关心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欧洲之防卫。

在王侯和地方豪绅相互之间整天为领土你争我夺的时代，罗马教皇多少感到自己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责任。

这不是由于罗马教皇们有出色的政治感觉，而是因为尽管也被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住在西方。但罗马教皇并非像拜占庭帝国皇帝那样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首先，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罗马教皇曾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送去过几多请求保障西方安全的信函，却每次都大失所望。就像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也无余力做到这些了。但罗马教皇是神职人员，而非政治家。他只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而不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他把拜占庭皇帝优柔寡断的应对解读为拜占庭皇帝不想为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西方履行防卫职责。

情绪发展到如此地步，一丁点儿过失都极易酿成大事。圣像破坏问题就是一例。在关于是否认可圣像崇拜的争论中，拜占庭皇帝断然持“否定”的态度。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大量圣像被焚毁破坏。

愤怒的罗马教皇开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教籍。开除教籍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皇拥有的最强大武器，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并无义务追随被开除教籍的人。皇帝也好，王公也罢，只因有大批部下追随

才能维持帝位和权力，一旦随从离去，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

因而，对俗世的君主王侯而言，开除教籍是一个可怕的武器，然而这对拜占庭帝国的臣下却并无明显效果。

这里的原因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直轻视灭亡后被蛮族割据的过去的西罗马帝国，将他们看低一等，自信自己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个原因是，君士坦丁堡也有主教，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罗马的主教，感情上不能允许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第三个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破坏圣像问题。

于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知道拜占庭皇帝靠不住，罗马教皇需要另寻伙伴。教皇不具有军事力量，伙伴的资格首先是要拥有军事力量。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意大利半岛与拜占庭势力分庭抗礼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于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其南下耗费了漫长的岁月。但到8世纪中叶，他们竟也把首都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南下当初，伦巴底人并未与被征服的罗马人融合，只是作为统治者君临当地。到了8世纪前半叶，登上王位的利乌特普兰德不仅改信了基督教，还完善法律制度、组织统治制度，成为罗马教廷眼中“可与之对话的对象”。利乌特普兰德修筑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首屈一指的地方，或许是西欧第一的繁华都市。建国不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带着从君士坦丁堡贩来的东方奢侈品到帕维亚出售，而不去其他城市。

可是，这位被尊称为“立法者”的利乌特普兰德在公元744年去世了。之后伦巴底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分散状态。罗马教皇本想让意大利半岛确立强大势力，以对抗风头正健的伊斯兰，到这时这个想法也夭折

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想出对付伊斯兰势力的对策。教皇的目光这次投向了法兰克王国，它正在欧洲中部逐渐形成广阔而统一的国家。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理由中，字面上既未提到拜占庭帝国，也未言及伊斯兰。不过我想，如果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良好，或者不是伊斯兰势力形成了如此威胁，神圣罗马帝国便不会产生。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否加上“神圣”二字，实际上都是东方有一个名为“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又要创立另一个“罗马帝国”，要有一位与“罗马帝国皇帝”并立的皇帝。这件事也表明了罗马要在西方主导下与君士坦丁堡分离的意志。

如果再放任不管，欧洲迟早要被伊斯兰吞噬。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普遍抱有这种危机意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处境来看，其根据再充分不过。

实际上，从公元700年到800年的一个世纪之间，伊斯兰势力发展惊人。

公元762年新建巴格达，“《古兰经》之民”的首都就已从地中海附近的大马士革移到了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望的巴格达，尽可作为伊斯兰帝国之都。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民活力四射却野性十足，而波斯人虽被阿拉伯征服，却在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历反复的历练，这是阿拉伯力量与波斯文明的幸福结合。在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水平之高令人惊异，大大优越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一切在基督教看来，伊斯兰世界现已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而且兼备文化文明的力量，自然越发被视为巨大的威胁。伊斯兰士兵发出豪言壮语，“要把圣彼得大教堂变成伊斯兰的马厩”，这已不能只作为士兵的逞强之言而充耳不闻。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来依靠查理曼，也是这一危

机意识的自然结果。

法兰克人当初不过是罗马帝国末期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北方蛮族之一，进入前后长达400年的中世纪前期以后，已成长为堪当欧洲守护者的势力。

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人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资质。日耳曼系蛮族勇猛而残忍。卫生观念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以此指标评判，法兰克人则是不卫生和马虎的民族。

不过，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族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使发生了杀死族长的权力之争，他们也经常会言归于好；几乎不会滥杀被自己征服的人民，更多的是去融合他们。法兰西人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他们是日耳曼系蛮族征服者与被他们征服的罗马系高卢人的融合。

这两个特质对法兰克族的强盛起了作用。首先，减少了因镇压被征服者起义而需投入的兵力，可以将军力对外；第二，有可能招募到扩军所需的足够士兵。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父亲率领法兰克大军，在普瓦捷的原野大败伊斯兰军队。大军中血统纯正的法兰克士兵的比例低于其他蛮族国家。

到了查理曼这一代，在法兰克人的特质之外又加上了查理曼个人的军事才能。结果，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已经向北达及多佛海峡，向南达及比利牛斯山脉，向东越过莱茵河，达及易北河。趁着拜占庭帝国不介入的做法，法兰克王国又把手伸向了意大利，把伦巴底人赶到了意大利南部，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这样，在9世纪前夕的欧洲，法兰克已经成为无人比肩的领国之主。

在蛮族中，法兰克人最早改信基督教，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辽阔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化先行者的资格。查理曼登上王位后一直转战各

地，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者最合适的人选。教皇利奥三世一定也想不出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不是无懈可击。

公元800年前后查理曼统治的地域

首先，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戎马生涯之后，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查理曼已是即将60岁的年龄。

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在才能卓越的查理曼率领下才能发挥作

用，才能存续下去。这种情况也令人不安。

查理曼似乎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已是基督教在欧洲防卫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也许是模仿古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桥梁。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有击退以渡过多瑙河南下为目标的敌人，才能确保多瑙河以南广阔土地的安全。

然而，这桥不过是把小船和浮筒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木板的浮桥。多瑙河是条大河。只要上游稍稍下点儿大雨马上就会冲走这样的浮桥。即使上部是木造的，但至少立在水中的桥墩和用来支撑桥板的桥梁应该用坚固的石头建造，这样才能承受桥体的自重和过桥的人、车重量。图拉真桥是700年前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著名桥梁。这座桥与查理曼浮桥的差别，是古代帝国与中世纪帝国的差别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个例子不能不令人深思。

查理曼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还创建了舰队，这大概是他接受了教皇利奥的请求，教皇对撒拉森海盗的危害了若指掌。舰队有“阿基坦舰队”（Classis Aquitanica）和“意大利舰队”(Classis Italica)两支。从名称推测，前者一定是为保卫法兰克南部不受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而建，而后者一定为的是保卫意大利半岛西侧和西西里的。法兰克人以前并不是海洋民族，这是一项值得褒扬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这两支舰队的确切规模，但当时海战的胜负是靠接近并爬上敌船后的白刃战决定的。而法兰克将士对陆战非常自信，一定会充分利用陆战经验取胜。船似乎是由意大利水手操纵的。

舰队的海上巡逻似乎很快见效。舰队创建后12年，812年9月7日教皇利奥给查理曼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由于上帝的恩宠和圣母马利亚的慈悲，由于阁下的慎重和果敢，我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守护，免除了危害，令人不胜喜悦。

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二人都不应忘记为使现存防卫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努力。”

两年后的814年，查理曼逝世。又过了两年之后，教皇利奥三世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主角。人们只知道他们去世的年份，却没有他们出生年份的记录。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懂得了没有正确的记录就不会有商业繁荣的道理以后，存在于古罗马的“重视正确记录的精神”才得以复活。这时出现的国情调查（census）正是这种精神复活的表现。

不过，古代有一个“复活”的东西，那就是肥皂。据说查理曼来到罗马，了解到使用肥皂洗涮的好处，回到法兰克后做了推广。此前也使用肥皂，但仅限于古罗马遗风尚存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直到今天，马赛传承古风，仍是肥皂和洗涤剂的著名产地。或许马赛制皂业中兴的鼻祖还是查理曼呢。

人死了，肥皂可以留存下来，可是统帅人物死后，依靠个人才华发挥功能的组织便一同死去。这是这种组织的宿命。查理曼死后，留下的“欧洲”不仅被儿孙瓜分，他们之间还因此争端不绝。很快，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了。保卫地中海沿岸不受伊斯兰海盗祸害的两支舰队也消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解散的时间。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由于这二位深谙此道的人物的去世，欧洲再度陷入战乱，地中海也回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伊斯兰势力在销声匿迹10年后，不会不好好利用这个绝好机会。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海盗很快就像神圣罗马帝国创立之前一样横行起来。陆地上也不安全。撒拉森海盗驾着“福斯塔”在沙滩上登陆，骑着个儿小却快速的阿拉伯马四处袭击，抢掠、破坏、放火、绑架，然后撤走。海盗非常了解袭击何处可以高效且收益巨大，就像事前做好了调查。修道院首当其冲。

我原本以为，修士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整日祈祷、劳动；修道院以贫为德，是静谧度日的宗教设施。但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却不是这样。隐者自然另当别论，他们一个人躲进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洞穴中，靠附近人们施舍，过着孤独的祈祷生活。贯穿整个中世纪，在善恶两方面都发挥了莫大影响力的修道院，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当地主教、封建领主无法插手，因而是事实上独立的宗教组织。

首先，修道院常常建在城市的城墙之外，而不在远离乡村的僻壤。修道院因信众的捐赠和遗产赠予而拥有广阔耕地。出售耕地上的收获物使之与俗世有着充分的交流。

其次，在中世纪前期，有不少神职人员娶妻。修士是独身者，没有结婚生子引起的财产分散，也不拿薪水。

最后，向上帝祈求却未成事，是因为不够虔诚，上帝不会被问责，因而不必要考虑愤怒的信徒前来袭击破坏这类风险。

相反，如果向上帝祈求后如愿成功，信徒就会感恩戴德，贡奉“恩宠收条”（grazia ricevuta）。虽然这种奉献有时只是一幅绘画、一打鸡蛋，但如果受到恩宠的人地位很高或是很有钱，对“恩宠”的回报就会是金银制作的弥撒用贵重圣具、沃田或是带有葡萄园的山庄。因为修道院是宗教组织，还可以免税。

修道院靠运营、使用这些资产所得的收益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兴办

慈善和教育等各种事业。以后，这些都成为基督教会的垄断事业，即使所需经费加上修士的生活费，也还是收入大于支出，这种状况从未改变。中世纪的人由于生存环境严酷，信仰颇为坚强。这使得所谓宗教组织财源滚滚，古今东西概莫能外。撒拉森海盗可期望得到最大效益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修道院。

同样的理由也使教堂经常成为海盗的目标，虽然教堂建在城镇，海盗有诸多不便。人们得知海盗来袭后最先逃往教堂，教堂便成为海盗可以一次绑架众多居民的地方。

排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后，海盗的目标就是领主的城堡和富人的宅邸。这些地方多有守护人员，抢掠绑架不便。海盗首先会瞄准防守薄弱的地方。他们没有粮草，人数亦少，必须尽快完事。

信息量越多，据此所下判断的准确度也越高——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即使所获信息很少，但在具备能迅速而正确地解读其意义的人手中，信息就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皇帝布告用拉丁语写成，在公布时一定会译成当地居民能够读懂的语言，例如在帝国的东部要译成希腊语。重要的政策还经常会刻在大理石上，放置在人们聚集的广场上，甚至会刻在人们每天握在手里的货币上，以此传递着信息。

然而在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于政治意志的国家灭亡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无人去做。这样，以中世纪史为专业的后世历史研究家们便苦于史料的极度匮乏。这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状态意味着人们对统治者的行为毫不知晓。对付海盗的舰队需要维护费用，便征收特别税；为建造撒拉森塔便向人们收费。只有这时，人们才注意到统治者在做什么。

信息靠这种方式传递实在是一种不幸。但如果这样还能显出效果，人们或能忍受。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表明这样的统治意志，即它的防卫不会像以往那样依赖拜占庭帝国，而要靠西方自己。但因创立者查理曼之死，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只延续了不到10年时间。神圣罗马帝国创立后，意大利半岛居民成为皇帝的臣下。他们甚至还未来得及感受自己付出的费用和劳力是否被有效使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卫意志就已消失殆尽了。

但是，地中海对岸却有人正确解读了这10年多来西欧动向的个中意义。中世纪前期，伊斯兰势力特别以其积极的态度超越了基督教势力。行动积极证明大脑活跃。得到少许信息，也能立即理解其重要性。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意味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意味着基督教世界东西方并肩战斗的可能性越发渺茫。

换句话说，如果进攻拜占庭帝国，西方各国也不会立即出手救援，而进攻西方某国，拜占庭帝国也不会派出军队。而且，曾被视为强劲对手的神圣罗马帝国10年之后便已名存实亡。以普及《古兰经》教义为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以及尚无这样强烈意识的新伊斯兰教徒，都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对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的伊斯兰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尽管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尚未被波及。从北非到西西里，顺风时只需一天时间。这时的北非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自然开始对征服西西里产生了强烈兴趣。

不同于大部分土地被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人统治的意大利半岛，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至今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果攻打西西里，能来抵抗的至多也就是微弱的拜占庭军队。法兰克王国、伦巴底各公国以及与拜占庭皇帝不和的罗马教皇，都不会轻易出手救援。

海盗航行的目的是掠夺财物、绑架人员，而征服航行的目的是要把

全岛收入手中。这两种航行是不一样的。况且，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摩尔人合在一起，撒拉森人也没有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绑架基督教徒也正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劳动力。但只要不改信伊斯兰教，基督教徒奴隶就只能当划桨手，而不能用作士兵。由于这些原因，撒拉森人看到机会来临却无法利用。不过，西西里的基督教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

尽管地处最西端，西西里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圈内，由常驻在首府叙拉古的总督（esarca）与负责防卫的武官联合统治。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前来赴任的“总督”名义上是文官，通常是帝国的贵族。负责防卫的武官则大多由西西里岛当地出身的人担任。这反映出拜占庭帝国防卫力量的衰弱。公元827年到西西里赴任的人也是拜占庭帝国贵族，名叫帕拉塔。迎接这位文官的武官名叫欧赫米奥，长期担任驻扎在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总指挥官。

在为庆祝“总督”上任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帕拉塔对欧赫米奥的妻子奥莫尼莎一见钟情，不光是恋着这女人，还把她夺来为妻。

奥莫尼莎原来是修女，欧赫米奥让她还俗，娶为自己的妻子。被人横刀夺爱，欧赫米奥的愤怒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古老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没有仅止于一个被人夺爱的丈夫的愤怒，这愤怒蔓延到西西里的男人，引发了驱逐拜占庭的风潮。

这似乎是历史被偶然事件所左右的一个案例，但这与很多类似案例一样，不过是水已积满因而最后一滴溢出而已。即使没有帕拉塔的轻率举动，在西西里人的内心，无疑已对拜占庭帝国充满了不满情绪，怨恨拜占庭只知横征暴敛，却不真心保卫西西里免受撒拉森海盗的残害，否则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团结一致奋起驱逐拜占庭帝国。

然而，借用西西里历史记录者的话说，到了这一步，欧赫米奥却“玩起火来”。

他向身在凯鲁万的地方长官要求结成统一战线，把拜占庭赶出西西里。

根据长年从事西西里防卫的经验，欧赫米奥知道突然袭击、抢完就走的短平快战斗是撒拉森人的拿手好戏。西西里地域辽阔，只要为数众多、分散在岛内各处围着城墙的城市不被攻破，就无法征服西西里全岛。撒拉森人既没有这种毅力也没有这种实力，迟早会泄气撤退。欧赫米奥认为，撒拉森人撤走之后，遭到撒拉森人攻击的拜占庭军队一定会更弱，仅靠西西里人的力量也足以把他们赶走。他甚至还认为，自己会成为摆脱拜占庭统治后的西西里君主。

然而，事情却并未按欧赫米奥预想的方向发展。他要求人们与伊斯兰教徒共同战斗，这唤起了虽对拜占庭统治不满，却是基督教徒的西西里人的反感，把许多赞同他，有心奋起反对拜占庭的西西里人推向了拜占庭一边。结果，追随欧赫米奥的兵力大大少于预想人数。

伊斯兰的“圣战”

在大海对面的北非，征服西西里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到欧赫米奥共同战斗请求的凯鲁万地方长官是从巴格达派来的，大概是位把扩大“伊斯兰之家”当作自己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新伊斯兰教徒不同，像他这样的原生伊斯兰教徒都是对“圣战”坚信不疑的人。

地方长官向北非全境发出布告。

“安拉之外没有神，穆罕默德之外没有先知。现在时候到了！全体伊斯兰教徒鼓足气力，杀向无信仰之徒的老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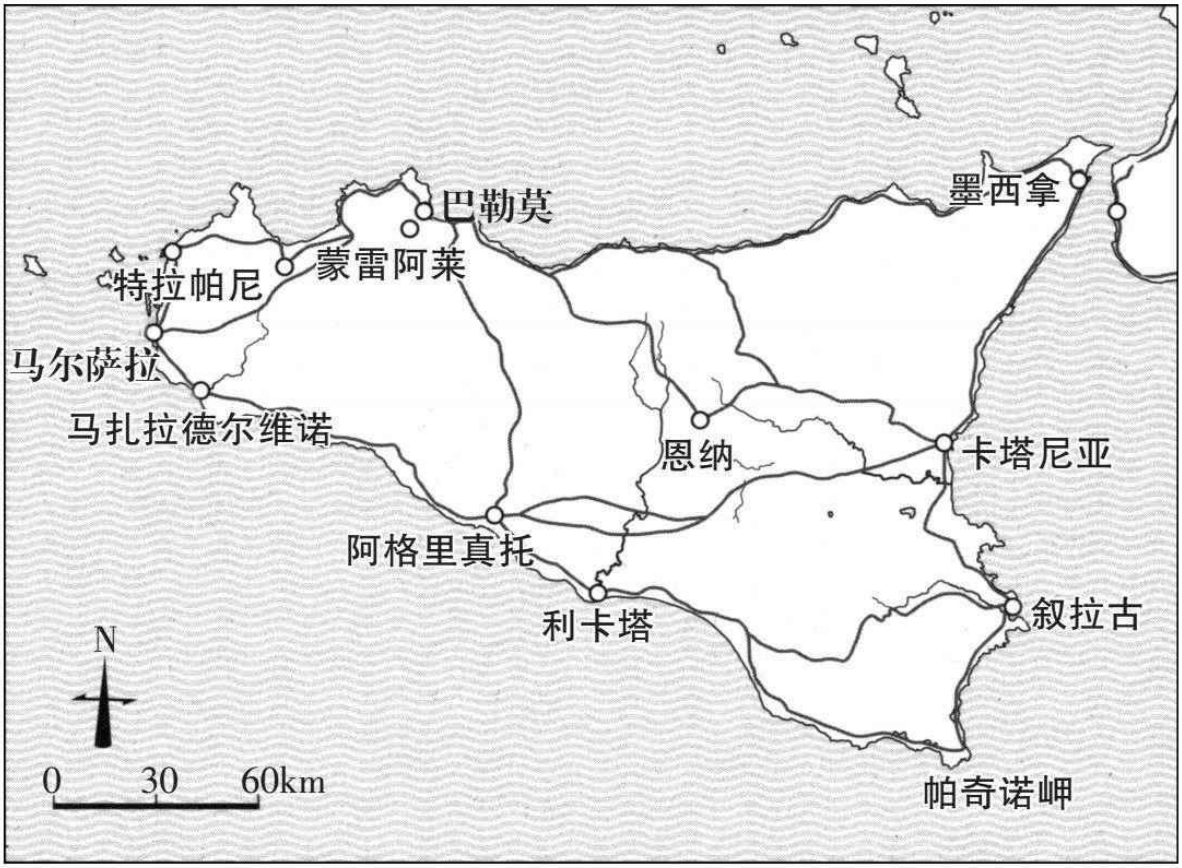
也许是布告的作用，地方长官召集到了1万名志愿者、700匹马和数

量不详的船只。如果这一切都是从北非招募而来，在当时就意味着在招募海盗和海盗船。

被委以这支伊斯兰远征军总指挥之职的不是专程从巴格达来的军事老手，而是专司司法的原伊斯兰教徒阿布·阿拉·阿萨德。全部人马集结于突尼斯东岸的苏萨港。总指挥官阿萨德站在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前，面向全军再次宣读了地方长官的布告，宣布出征。

公元827年6月14日。初夏时分，这一带海域最适合于快艇帆船的航行，即使在现代这里也以此闻名。使用当时的加莱船，到达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扎拉也只需两天的航程。马扎拉从罗马时代起就一直是前往北非的港口，欧赫米奥带着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前来迎接。

让1万名士兵和700匹马上岸，让众多船只停泊并随时可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的时日。撒拉森人并不习惯做这些事。做完这一切，出发去到平原，花去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给了总督帕拉塔时间，使他可以调集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庭军队，赶赴马扎拉。



西西里

公元827年7月15日，拜占庭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在马扎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伊斯兰方面担任总指挥的法官阿萨德在宣告战斗开始前，对一旁自以为在共同指挥的欧赫米奥不容分辩地说道：“这里不再需要你和你的士兵了。离开战场。就此消失也好，留下观战也罢，这是你们的自由。如果想要观战，我劝你们用那边的草把头盔盖上，免得被误为拜占庭兵而杀掉。”

欧赫米奥只得听从这个劝告，别无他法。战斗在欧赫米奥及其部下的眼前进行。对西西里居民来说，这场战斗交战双方的士兵都是他国人，不论哪方胜利，西西里的命运都掌握在他国人手中。

当天的战斗，以伊斯兰方面的胜利而告终。战场尸横遍野，没有留

下伤兵和俘虏。担任总指挥的阿萨德不是军事专家。他一遍又一遍地用阿拉伯语诵读着《古兰经》。对他这样彻底相信《古兰经》的人来说，基督教徒这样的异教徒连人都不是，而只是狗。这些异教徒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狗”，把剑挥向伊斯兰。只有杀掉他们，才是恰当的处置。

但还是有一部分士兵成功逃脱。幸运的是打了胜仗的伊斯兰兵并不追击，他们更热衷于把战死者全身剥光。总督帕拉塔从西西里逃出，在卡拉布里亚投靠了拜占庭人，却反被他们杀害。

伊斯兰势力战胜拜占庭军队后，依旧以高喊圣战的阿萨德为先锋，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进程。征服依旧是杀戮抵抗者，抢掠所有值钱的东西，绑架不抵抗的人送到北非，如此反复。当时的胜利消息似乎也传到了北非，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争先恐后蜂拥来到西西里的圣战战士总数曾经达到4万人。

司法者阿萨德当然没有能力按照军事战略组织如此数量的人。涌到西西里的撒拉森人各自为战，向东面和西面打去，在西西里遍地进攻。

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一气打到了叙拉古。我认为这是他不谙军事的例证。谁都知道，攻下了叙拉古就等于攻下了西西里全境。然而，叙拉古防守坚固，连罗马军队也曾陷入长期攻城战的泥淖。过早地把目标放在了不可能轻易攻下的叙拉古，这正是狂热信仰而无视军事战略的证明。实际上，进攻叙拉古的战斗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

为孤立叙拉古而下令在其周围打焦土战，这也只是外行的做法。焦土战本应是受到进攻的一方为对付进攻方而采取的军粮攻势。这次，因为进攻方采用了焦土战术，虽然到了收获的秋季，伊斯兰军队却比守在城里的叙拉古人更加缺粮。

据说缺粮的伊斯兰士兵把专门从北非带来的马匹吃掉充饥。叙拉古岿然不动。迟滞的战事和严重的缺粮使安拉的战士们不堪忍受，他们请

求指挥官阿萨德权且撤回北非。他们说："伊斯兰战士的生命比罗马人的所有财富更宝贵。"

阿萨德听到这些不动声色，冷冷地回答道："让逃离战场的伊斯兰战士回到圣战不是我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么干，安拉是不会不问的。士兵们也只有沉默。

叙拉古顶住了进攻，而赶来救援的拜占庭军队却再次一败涂地。

叙拉古攻防战打了10个月。缺粮导致体力衰退，伊斯兰军队的士兵中，病倒的人比被敌人的剑和矢击中的还多。指挥进攻的阿萨德也病倒了。

伊斯兰军队失去了司令官，一切都匮乏，士兵数量也减少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而在广袤的西西里，却没有攻下一个好在屋檐下睡个安稳觉的城镇。这样的现状使得参加征服之行的伊斯兰士兵士气低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看好攻占叙拉古的事。

通常，人们会考虑如何趁此机会打击已经衰弱的敌人。然而，欧赫米奥却主动要求打头阵，去内陆为撒拉森人寻找能在屋檐下睡安稳觉的城镇，他已经无法回到拜占庭一边了。

伊斯兰教徒如大群蝗虫从北非渡过地中海袭击西西里岛，这一情报早就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中。情报来源非止一处。

第一个来源是意大利商人。这个时期北非伊斯兰教徒与意大利几个城市之间已有明显的贸易，也有意大利商人到北非港口城市去。商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动向格外敏感，不会不注意到因为"圣战"而喧腾的人和船。

第二个来源是居住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他们与西西里只隔着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与其说是情报，不如说是悲鸣。没有比这更原始的情报传递手段了，而“恐怖”却是最有效的传递手段。

第三个是安拉的战士自己带来的情报。

北非伊斯兰教徒始于公元827年的西西里征服，并不是根据事先慎重考虑好的战略进行的，因而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实施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是因为有人提倡“圣战”，而有人响应，是由这样聚集起来的一伙可称为乌合之众的人进行的。不少应该去西西里的船都不知所踪。

其中有若干只船随风漂流，居然漂到了罗马教皇领地的意大利中部海岸。圣战的战士昨天还是海盗，漂到哪里都行，到了无信仰之狗所居之地，便重操起他们早已习惯的掠夺绑架的旧业。当然，他们完事后就会回到船上扬帆而去。

这个时期在位的教皇是格列高利四世，他出身于罗马有实力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年富力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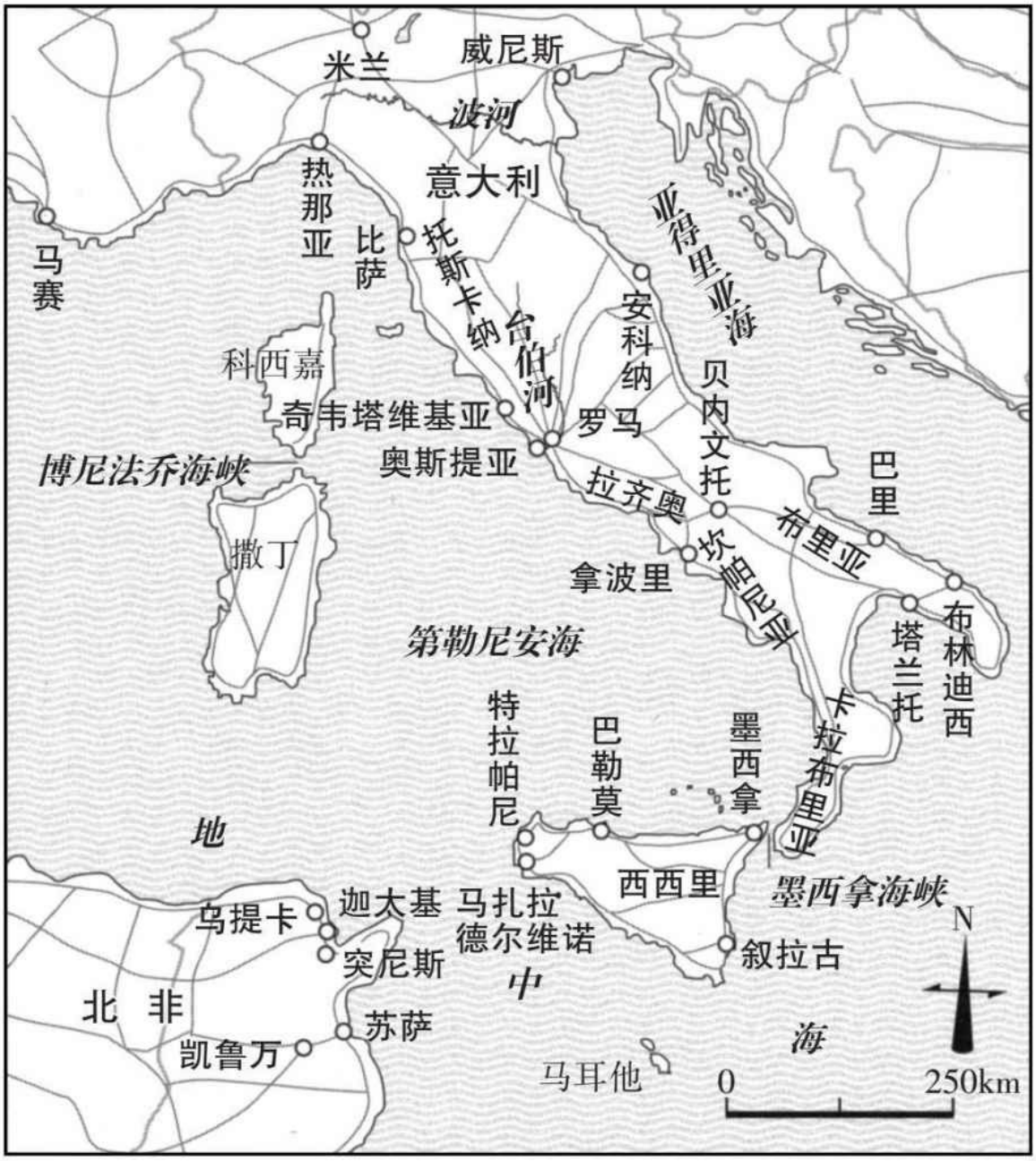
他首先正式向负责意大利防卫的神圣罗马帝国请求派遣援军。但是当时的法兰克王国整天国内纷争不断，根本顾不上西西里，对教皇的请求充耳不闻。

支援西西里需要船只，于是他转而向正成长为海洋国家的比萨和威尼斯请求合作。

但这样做也无甚效果。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尚不能确保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是保障他们最重要的东方贸易通道所不可或缺的。为确保制海权，最要紧的是打退盘踞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海盗。换句话说，眼下威尼斯的利益与支援西西里并无密切关系。

承诺提供船只的比萨也并非不考虑本国的利益。确保亚得里亚海航

行安全是威尼斯的最大课题，而对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比萨而言，意大利半岛西侧第勒尼安海的安全则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最大问题。北非北上而来的撒拉森海盗已逐渐成为这片海域的最大威胁。



意大利及其周边

现在，这些海盗正在袭击西西里。如果西西里被伊斯兰化，海盗船将会从西西里港口出发来袭，这比从北非港口出发要省一半路程。只要看看地图，我们便可理解这个时期以后比萨应对伊斯兰变得积极起来的原因了。

虽然由于比萨的支援有了船只，但船上却没有士兵。成为海洋国家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形成陆上战斗力，转而向海洋求生路。比萨即使能够提供船只和水手，也无法提供打仗的士兵。

教皇仍未放弃。他把眼光投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家臣、负责第勒尼安海防卫的博尼法乔伯爵。教皇成功说服了这位托斯卡纳的豪族。教皇立即发出征兵布告。招募到的士兵数量不详。根据当时的记载，参加征服西西里之战的伊斯兰士兵有1万人，而教皇征到的士兵数量要大大少于这一数目。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四世本来的意图，组建这支由博尼法乔伯爵率领的基督教军队的目的，是支援遭到伊斯兰军队攻击的西西里。可是，博尼法乔却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天才的点子。

梦见西庇阿

伯爵的点子是不去西西里，而去直捣敌人的根据地凯鲁万。当时的凯鲁万类似于地处遥远东方的巴格达，是一座对伊斯兰教徒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博尼法乔认为，如果进攻凯鲁万，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恐怕不得不回师救援。

他也许想起了1　000多年前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那场布匿战争。博尼法乔可能是想仿效当年西庇阿果敢的战略。

汉尼拔甚至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打进意大利半岛，此后连战连胜，使罗马人的梦魇持续了16年之久。一位罗马的年轻武将想，要把这个噩梦驱赶出意大利半岛，只有突袭汉尼拔的老巢迦太基。他认为，迦太基遭到突袭而惊慌失措，不可能不给最高武将发出回防的命令。这一战略非常成功，罗马在扎马会战中打败了汉尼拔，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

往事越千年，博尼法乔自然想仿效这一做法。

“原版”与“模仿”毕竟有差异，但博尼法乔仍然想全盘照搬地模仿西庇阿。攻打凯鲁万从突尼斯东部登陆是近道，他却在突尼斯北部乌提卡附近的海岸登陆，理由或许与西庇阿选择登陆地点的理由相同。博尼法乔从这里沿陆路杀向突尼斯。博尼法乔肩负着一个西庇阿所没有的任务，出发前教皇与他约定，解放在农村做奴隶的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徒。

他没有抽出时间去攻打突尼斯城。也许是扬言要攻打突尼斯的威胁奏了效，他成功地解放了收容在突尼斯城里的基督教徒奴隶。他用获得自由的奴隶扩充军队，挥师直指原本的目的地凯鲁万。

行军途中，博尼法乔注意从奴隶那里收集情报，这是他值得赞扬的长处。他甚至了解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已用快船向西西里派出信使，向正在西西里作战的本国军队传达本土危险的情况，命令他们从速回国。

凯鲁万与突尼斯不同，防守设施并不完善，但防守气概豪壮。这里是伊斯兰的圣都，守护这里的士兵士气高涨。

在统帅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看来，这些仓促招来的阿拉伯士兵有着坚决的战斗意志，他的指挥也坚决而毫不松懈。

萨夫农率领的伊斯兰军队与博尼法乔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凯鲁万郊外展开决战。

战斗从日出开始，日落仍未结束。激战持续了5天，自始至终激烈而残酷。最后获胜的是基督教军队。伊斯兰战士在“无信仰的狗”面前败逃了。经常身先士卒的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也差一点做了俘虏。他逃到苏萨港，向西西里发出快船，再次命令伊斯兰士兵回师救援。

突尼斯地方长官和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似乎这时还不知道去西西

里的远征军的状况，也不知道统帅阿萨德已经病死。统一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时，命令再多，如果不知谁来接受，想执行也无人率领。

西庇阿的战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有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天才做对手。

一心想效仿西庇阿的博尼法乔给人留下笑柄。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方面虽然圣战的意欲高涨，却也净出乱子。正因为历史有其不乏滑稽的一面，才映射出了人类社会的立体图景。

博尼法乔的做法颇为滑稽。他并不知晓正在西西里远征的伊斯兰军队的现状。因为长期逗留在敌国令人不安，他决定回国。季节也到了秋天。

博尼法乔预测，只要本土的“埃米尔”下令，正在征战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就会中断行动回国。预测碰巧与奇妙的现状吻合，却没有成为现实。他并未攻下突尼斯，连凯鲁万的市内都没能进去。不过，他解放了被锁链铐住、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的众多基督教徒。博尼法乔觉得这就够了。

据说他集合士兵，带上被解放的人们，回到了原来登陆的地点。如果真是这样，直线距离也有120公里之遥。走完这120公里而未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远征伊斯兰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便成为事实。全部人员安然登船，船队没有停靠西西里，而是直奔北方的撒丁岛。他们在撒丁岛停靠，途经奇维塔韦基亚。原来的奴隶下船后，他们便向比萨凯旋而去。

博尼法乔班师后受到了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全境人们的一片赞扬。然而这一快乐仅持续了公元828年一年。撒丁岛与科西嘉岛之间的海峡直到现代仍被称为“Bocca di Bonifacio”，直译是博尼法乔之嘴。博尼法乔负责的海域是东起意大利半岛、西至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之间的第勒尼安

海。

不知为何被命名为“博尼法乔之嘴”，但根据民间传说，这是吞掉撒拉森海盗的意思。实际上，撒拉森海盗不但未被吞掉，以后照样继续横行海上。这是百姓表达美好愿望的又一个例子。

伊斯兰在西西里的征服行动混乱不堪，难以为继，但他们并未因厌烦而撤退，反而一心向前，足见宗教狂热之不可救药。接续阿萨德法官高举绿底白色月牙旗涌入西西里的撒拉森人中，有一个名叫哈尔卡莫的伊斯兰教徒。

哈尔卡莫在西西里南部刚一登陆，就命人在部下眼前烧毁了来时所乘的所有船只。他对惊讶的部下说，非洲已无路可回，我们只能在这个岛上住下来。他说完便身先士卒，率领不得不跟随他的部下，开始向西西里北部行进，一路上自然是不断地做着抢掠、放火、破坏、绑架的勾当。

这位撒拉森男人似乎言出必行。今天，在连接巴勒莫和特拉帕尼的高速公路边上还有一个名为阿尔卡莫的城镇。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哈尔卡莫变音为阿尔卡莫。正是由于有了像他这样的伊斯兰教徒，开始时错漏百出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才会不懈地延续下去。这对做事容易厌倦的撒拉森人来说是件稀罕事。

打到罗马去

地中海西边伊斯兰教徒的象征性城市凯鲁万遭到攻击，而且被“无信仰的狗”打得一败涂地，无论如何要雪耻报仇。让他们得胜撤走不被追究，就不能继续把他们当“狗”看待了。这对正在进行的征服西西里行动不会不产生恶劣的影响。

自诩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对雪耻的愿望比谁都强烈。在北非，阿拉伯人既是外来民族，又是征服民族，他们与被称为新伊斯兰教徒的被征服者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的关系紧张，经常担心后者会起来反叛。

阿拉伯人在北非数量很少。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就需要不断地显示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威和权力的有效性。如果失败，权威就会受到伤害。这种失败哪怕只有一次，也必须迅速挽回。

他们认为，基督教徒狗仔们都打到了凯鲁万，只有直捣他们信仰的象征性城市才算雪耻。而象征基督教的城市只有罗马。于是，在博尼法乔撤走还不到一年的公元829年6月，满载大军的伊斯兰船队从突尼斯的港口启航。

登陆地点选在了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这个港口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图拉真皇帝所建，进入中世纪之后仍是罗马教皇所领有的拉齐奥地方的主要港口。奥莱利亚大道连接着奇维塔韦基亚和罗马。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一直把意大利半岛叫作“鲁米人居住的狭长土地”。他们看准了奇维塔韦基亚，把这里作为基地，去进攻位于“狭长土地”半腰上的罗马。

在古罗马时代，奇维塔韦基亚被称为“Centumcellae”，意为“万物仓库”。恰如其名，这里港口的规模堪与帝国时代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相匹敌。

当时，港口建造得合理而坚固，港内沿岸建有为数众多的仓库。由于是强大帝国的主要港口，才会有如此的设施。进入中世纪后，设施虽已闲置朽坏，但墙壁厚而坚固，不愧是罗马人所建。可以躲在这些仓库中作战，是奇维塔韦基亚得以抵抗伊斯兰军队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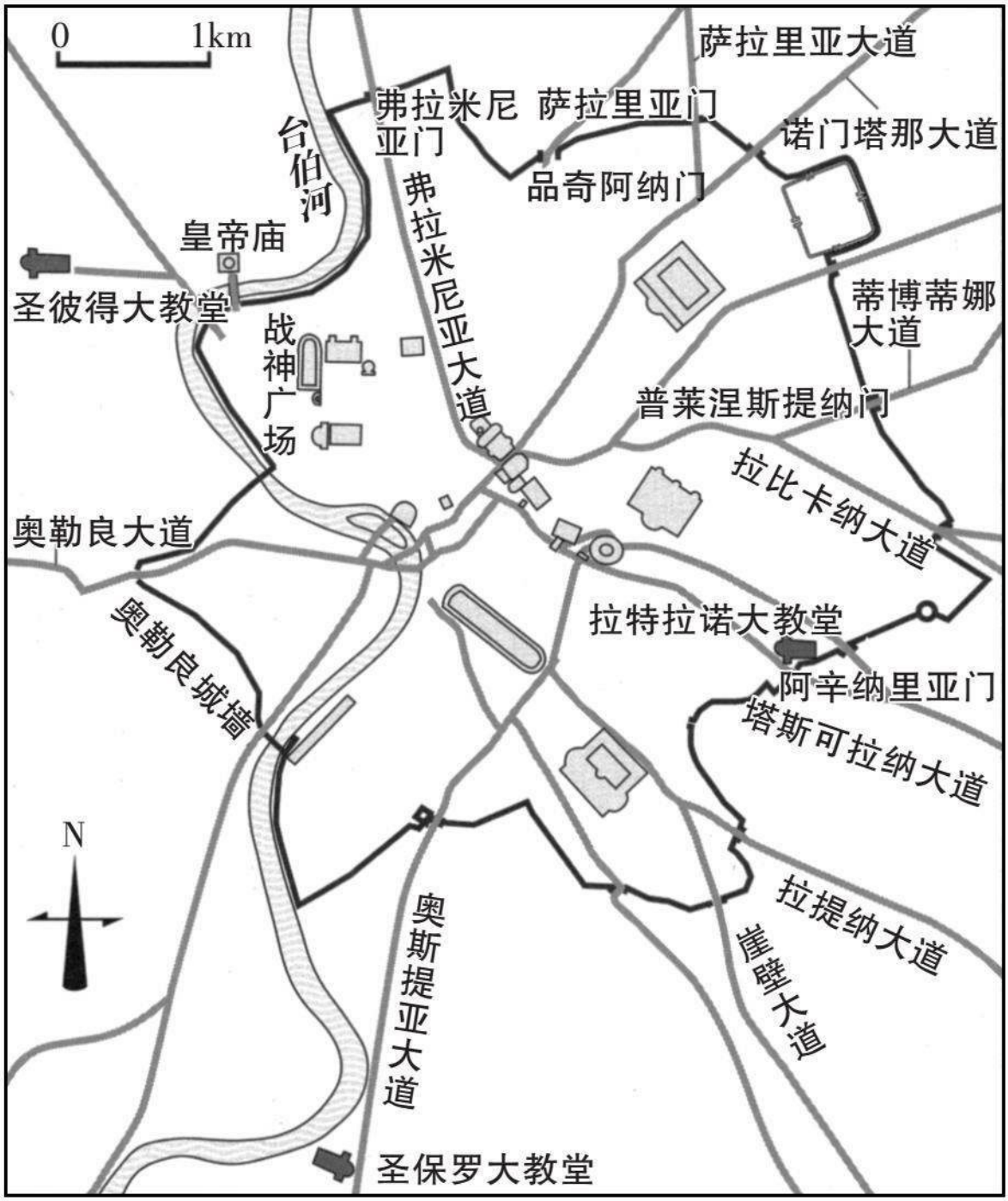
可是，长达两个月的保卫战以失败而告终。破城之后的屠城使奇维塔韦基亚成为无人之境，幸存的人们纷纷逃离，去了内陆深处。

在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基督教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支援奇维塔韦基亚。罗马教皇并无军队。本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兰克国王正忙于在意大利北部进攻同是基督教徒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几个小公国的伦巴底人因惧怕伊斯兰军队而不敢靠近。拜占庭士兵也因防卫西西里腾不出手来。这就是9世纪“鲁米”即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所在的“狭长土地”上的状况。

也许是知道这一状况，伊斯兰军队攻陷奇维塔韦基亚后并未急于进攻罗马。他们知道近旁的奥莱利亚大道的终点就是罗马，却决定在托斯卡纳悠然过冬。当然没有缺粮之虞。不消说，意大利中部一带所有城镇村庄全都被撒拉森战马的铁蹄践踏蹂躏。当时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记录：铁蹄踏过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袭来飞去。

第二年，公元830年春，伊斯兰军队留下少数守兵后向罗马进发。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奥莱利亚大道南下，一路沿海岸从海上到奥斯提亚港，下船后通过沿台伯河的道路去罗马。把船队调至奥斯提亚，是为了尽快把掠夺的物品和绑架的人们装船运往北非。

基督教方面的援军没有出现在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号称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甚至没有援军前来救援。



罗马市区略图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兵力。可能是为了把抢来的东西和绑架的人们随时运去北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士兵离开了队伍。统率大军是要有很多条件的，但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却看不到有关情况。大

概撒拉森人因兵力减少便分成小部队进行袭击，这也是海盗们更为习惯的方式。小镇小村抗不住撒拉森人袭击，但罗马城是帝国后期建设的，有超过20公里长的高大厚实的城墙拱卫。而攻击罗马的撒拉森人与海盗的所为并无二致。当年的罗马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然而，位于城外的教堂却没有一个逃过劫难。

奥斯提亚大道旁的圣保罗教堂名为“Fuori di Mura”（城墙之外）。这样的教堂自不待言，就连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建设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也遭到了伊斯兰士兵的洗劫。圣彼得大教堂是遵从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体之上建造教堂”的教诲而建，建在圣彼得殉教的梵蒂冈。这座教堂在基督教世界享有至上的尊崇地位。伊斯兰士兵实现了他们说过的话——“把圣彼得大教堂变为马厩”。

罗马教皇居于建在城墙内侧的圣拉特拉诺大教堂。罗马人虽然没有打出城去的兵力，但尚有不让撒拉森人越过城墙的力量。教皇格列高利四世身先士卒，激励大家，全体市民行动起来，成功地守住了罗马城。

伊斯兰军队未能攻进城内，扫荡周边地区以后撤退了。他们从奥斯提亚港乘船返回北非，留下的人再次沿奥列里亚大道北上，在奇维塔韦基亚驻扎下来。他们没有改变把这座港口城市作为进攻罗马的桥头堡的想法。敌人夸口要抓住“无信仰狗的头目”，他们将在离格列高利四世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宫只有50公里的地方扎下根来。

此时，北非又传来了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消息。

在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一带，正在集结300艘的船队和2万人以上的军队。这300艘船，可能多为“福斯塔”这种小型加莱船。即使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撒拉森人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船队。

船队的目的非常明确，在西西里岛西岸登陆，企图一举攻陷巴勒

莫。这次远征军的指挥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柏柏尔人阿斯巴哥，与其说他是安拉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地道的海盗。

巴勒莫陷落

现代的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区——西西里岛的首府，在此有区长官的官邸，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但在古代，在中世纪前期，这里还只能算是主要城市之一。叙拉古自古以来一直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雅典为得到叙拉古曾不惜冒远征的风险。柏拉图对统治组织抱有强烈的兴趣，为了看到最佳例证也访问过叙拉古。希腊人也曾祭出阿基米德研制的新兵器与罗马人苦战。罗马人认为，不攻下叙拉古就得不到西西里。这一想法与希腊人一致。

后来，在罗马逐步将地中海变为“自家之海”（mare nostrum）的过程中，位于与北非相对位置上的特拉帕尼、马扎拉和阿格里真托等都成为对罗马很重要的港口。在整个古代的历史中，巴勒莫的重要性都仅次于这些城市。进入中世纪以后，拥有西西里的拜占庭帝国让派去统治西西里的总督常驻叙拉古已成定例。

确定巴勒莫为目标，似乎也是顺应着这个传统，莫非公元830年的北非伊斯兰教徒中有优秀的战略家？因为叙拉古面海向东，阿格里真托面海向南，马扎拉面海向西南，特拉帕尼向西，而巴勒莫却面海向北。这就是说，巴勒莫面向着地中海这个广大的基督教世界。如果希望扩大“伊斯兰之家”，巴勒莫作为前沿基地最为合适。在攻下巴勒莫之后，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岛就成为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西西里得天独厚，军粮可以自给。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并非开始就是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无论如何，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徒阿萨德统率的征服西西里行动，自大肆张扬地开始以后，3年过去仍未攻下叙拉古。在西西里东西线中段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城堡都市恩纳。这里位于要害之地，防卫相当严密。伊斯兰军队数次进攻均未奏效。顺便一提，为伊斯兰势力创造了征服西西里机会的欧赫米奥，被派来与守城的拜占庭军队谈判。他随即被捕，被指向伊斯兰出卖西西里而被处死。他借伊斯兰之力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后，自己当了统治者，但这美梦没能持续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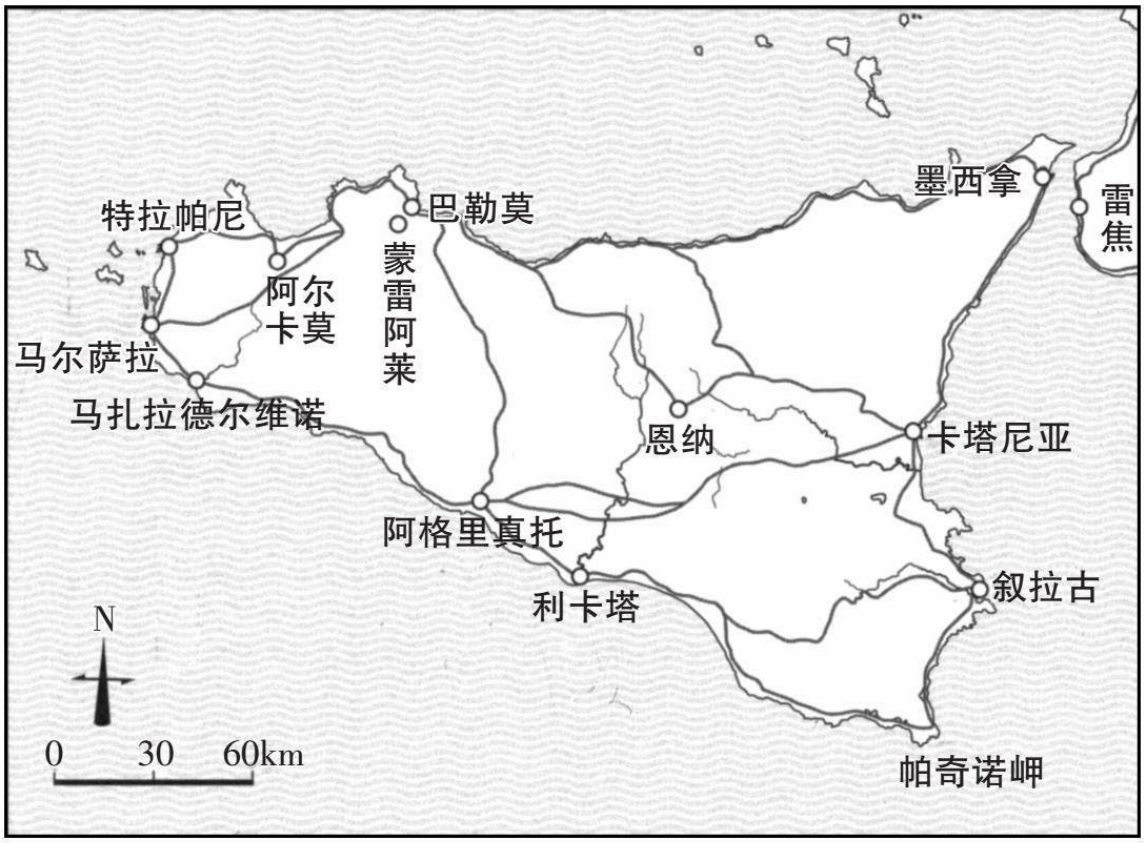
撒拉森人的海盗行动长年不断，他们或许认为征服西西里易如反掌。然而征服行动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把罗马选作目标的同胞已经带着掠夺而来的人和物满载而归，受到欢迎。他们知道后也许开始着急起来。出于以往的海盗经验，他们选择了防卫肯定比叙拉古薄弱的巴勒莫作为目标。

不论当初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择，这一选择甚至考虑到了恒久的益处。从此以后，巴勒莫比叙拉古更经常地成为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就是明证。在战略上值得赞赏的是，这次不是小股队伍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举投入大规模兵力的军事行动。

从马扎拉登陆西西里，已经成为北非伊斯兰势力这3年来的常路。公元830年这年，伊斯兰人也从马扎拉登陆，但船只多达300艘，无法全部进港。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另一路直奔北面不远的马尔萨拉港。这样登陆后队伍也分成了两支。阿拉伯人较多的部队去了巴勒莫，阿斯巴哥率领的柏柏尔人部队去了阿格里真托。他们准备进攻恩纳，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向叙拉古。

可是，这支队伍来到阿格里真托时遭到了瘟疫的袭击。瘟疫总是在体力衰弱的时候或卫生状况最差的时候来袭。我们不知道柏柏尔人是否比阿拉伯人更不讲卫生，但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平安无事地行军时，第二队的人却因疫病眼见着一个个倒下。阿斯巴哥自己也倒下，死掉了。剩下的士兵都觉得征服西西里行动难以为继，乘上从西西里人那里抢来

的船只逃回了北非。2万人的半数开了小差。



西西里

前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却意气风发。打头阵的士兵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先知穆罕默德之旗”，队伍中有较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主流。

巴勒莫当时只不过是西西里的主要城市之一，加上那年听到撒拉森人逼近的消息后从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巴勒莫共有7万人口。只看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比意大利半岛富庶。巴勒莫人根据以往直接、间接的经验知道，落入撒拉森人之手，其后的命运不是死亡便是沦为奴隶。他们拼死守城，坚持了一年之久。这让进攻的伊斯兰人也深感震惊。城里的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怖和绝望之中。

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赶来救援。这一点我已经写腻了。

拜占庭军队在防守坚固的恩纳和叙拉古坚守不出。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及基督教世界的各路王侯为守护自己的领地已经拼尽了全部精力，稍有余力的人脑子里也只想着如何侵略他人地盘。

罗马教皇在拿不出行动这一点上也与他们同罪。不过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说服不了拥有军事力量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说明教皇动用了开除教籍的武器，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正式领土。但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实在不好。他们之间围绕圣像问题存在教理争论。虽有拜占庭皇帝，但教皇却又特意造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虽同为基督教徒，这些事件仍然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不定在罗马教皇的内心深处，还有冷眼观战，看拜占庭如何守卫西西里的心思。这时的巴勒莫食物匮乏，许多基督教徒饿死病死。

公元831年9月，巴勒莫攻防战已打了近一年。市内一切匮乏，应该说什么都没剩下更为准确。

在防卫战打到将近半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派来统治巴勒莫的总督、主教就已乘着准备好的船只出逃意大利了。没有找到船只，只得沿陆路西去的修士在逃跑途中被撒拉森人抓住，被逼做出选择：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去死。他们全体选择了死亡。

城市在这种状态之下陷落，并不是那种迎击发起总攻之敌之后雄壮的陷落。就像一点点地衰弱迎来死亡的人一样，城市终结于一片阴森恐怖的寂静之中。据说在长达一年的守卫战中死亡6万多人。

城市陷落后，市内还剩3 000多人，但多数都已衰弱到了极点，胜

利者觉得送去做奴隶也无价值。还能走动的男女和儿童被装上了船，其余的人全部就地处死。

巴勒莫化为无人之境。后来，北非来的伊斯兰教徒在此定居下来。如果无人居住，拿下巴勒莫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重新引入居民，使城市再生。

很快就有地方长官被派到巴勒莫，地位低于突尼斯的地方长官，但官名一样。北非的伊斯兰势力将征服西西里全岛看得与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同等重要，让巴勒莫成为西西里中心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基督教方面，似乎很少有人能正确认识到巴勒莫陷落意味着什么。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即使在能够采取对策并有相应实力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个中的意味。

拜占庭帝国皇帝比其他任何人都能主张领有权，但其行动是在陷落4年以后的公元831年。虽然当时拜占庭帝国东有伊斯兰势力的进逼，北有斯拉夫民族的逼迫，但无论如何行动都嫌太晚。

在此期间，伊斯兰势力照例毫不留情地杀戮企图抵抗的人；抢掠贵重物品，甚至粮食、家畜；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要抓来送到北非去当奴隶；最后放火烧屋，使之变成废墟。他们用这种做法征服了西西里西部，又将势力扩大到东部。

人们感到拜占庭帝国终于“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只能说是粗陋不堪。

皇帝任命女婿亚历克西斯为常驻西西里总督，命他组建救援西西里的大军。这事做得不错，拜占庭帝国正式表现出出征的架势。可是，此后的表现却证明，这只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国家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做派。

亚历克西斯来到仍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西部，热心

组建大军，成功地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士兵和船只。可是拜占庭皇帝知道后内心起了疑窦，想亚历克西斯莫非是想率领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把自己拉下皇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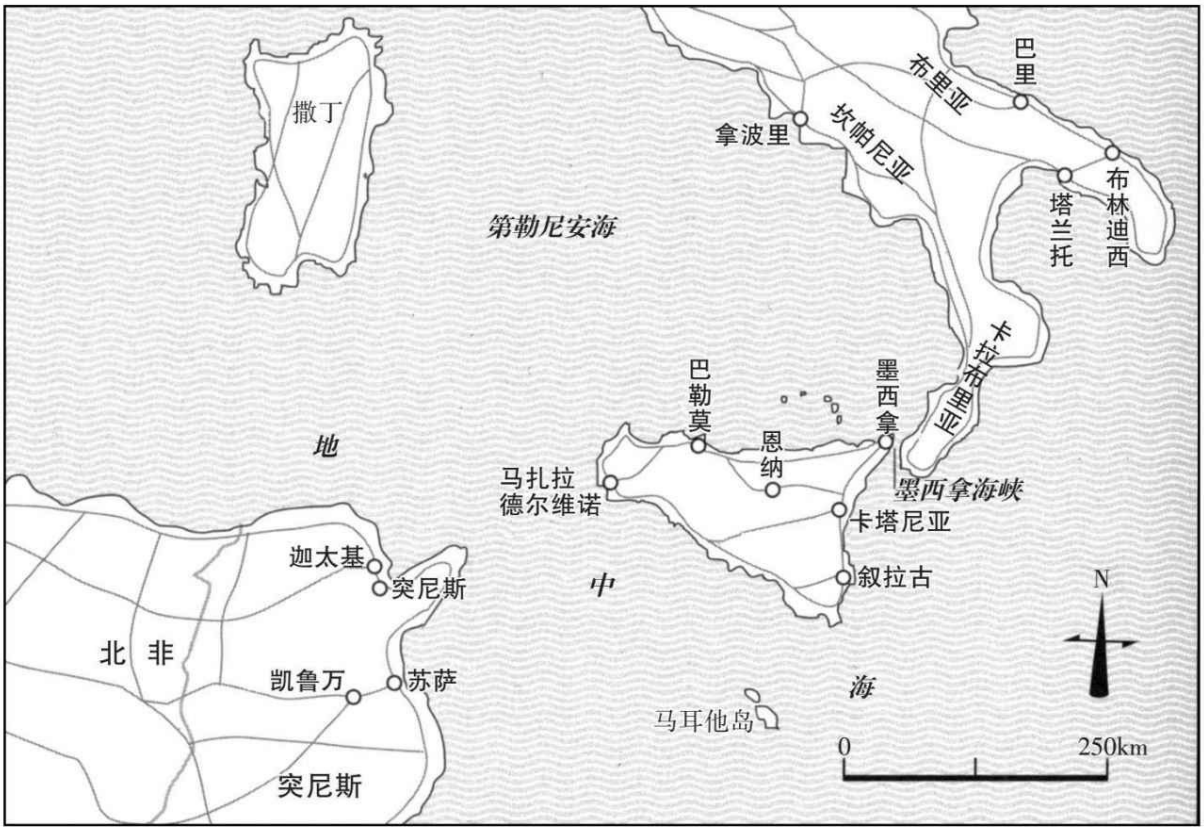
皇帝的疑虑给了专制君主国家必然存在的宫廷阴谋家绝好的借口。亚历克西斯被突然召回，直接投入了监狱。在牢里，这位拜占庭的贵公子似有所思，说他万念俱灰也许更加正确。他宣布舍弃公职、地位和妻子，要去修道院，于是被释放出来。回到现实世界后，他便在社会上彻底消失了。

拜占庭海军本应以海港城市叙拉古为基地，以保障地中海西部海域的安全为己任，但皇帝这个司令官的表现尚且如此，海军也就一事无成了。这时，拜占庭战船对撒拉森战船已是每遇必逃。

北非突尼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在现代欧洲被称作“西西里海峡”（Canale di Sicilia），因为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领土，但古罗马人却称同一片海域为“阿非利加海”（Africum Mare）。

在那个时代，西西里和北非同属一个文明圈，由一个皇帝统治。以隔海相望的随便哪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都不会意有所指。可是，到了中世纪，隔海相望的国家分属于不同文明圈。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辽阔海域自然会以拥有制海权一方的名称命名。

我甚至认为，在中世纪前期的这个时代，如果要给这片海域起名，用古代的称呼“阿非利加海”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片海域的制海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的手中。



西西里及其周边

换成古代罗马人的观点，所谓制海权就是拥有把海洋称为“自家之海”的资格。一旦居住在北非的撒拉森人认为眼前这片地中海是“自家之海”，接着的想法就是要把横亘在地中海对岸的陆地也称为“自家的土地”，甚至还可用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大义名分去行掠夺之实。

拿下巴勒莫大有好处，紧接着征服了从巴勒莫到墨西拿的海港城市群，使得这个好处更加完美。

意大利南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地受到西西里伊斯兰化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地方包括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膝盖以下的所有地方。这样的情形是很自然的。撒拉森海盗此前的做法是从北非来袭，猛击一下之后又回到北非。现在却可以中途先在不沉的航空母舰上落脚，然后再次出击。从此以后，以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拿波里为中心的坎

帕尼亚地区完全暴露在撒拉森海盗的“猛击”之下。

同样打着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旗号，但地中海东部与西部情况并不一样。

在东部，伊斯兰势力从小亚细亚东部逐渐侵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征服所有包围东地中海的陆地后已经过了两个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已经完全成为“伊斯兰之家”。或许可以认为，伊斯兰势力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恐怕已有相当的组织程度。此外，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其土地之辽阔恐怕不能称之为半岛。这里处在以科尔多瓦为根据地的“埃米尔”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业已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伊斯兰势力的指挥体系。

在沿着扩张路线突飞猛进的9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北非在统治组织化方面最为落后。这片地区就后世的国别而言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阿非利加”是因袭古罗马的习惯。历史完全不同的埃及往往被区别开来。中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仍然继承了这个习惯。

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伊斯兰世界中，北非的定位是“伊斯兰之家”的内部成员，但其地位却莫名地有所偏离，待遇方面类似于相当程度上被授予自治权的“埃米尔”所统治的领地。“埃米尔”一语的日语究竟是译为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好呢，还是译为有着强烈的实力者意味的“酋长”好呢，人们莫衷一是。顺便一说，这个词儿有时译为“酋长”，是参考了现代将“United Arab Emirates”译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例。

总之在中世纪前期，北非的统治形态明显尚未确立，连伊斯兰史专家一般也在这一方面不甚明了。

但是指挥体系不明确的状况却会令其敌手困惑。如果指挥体系明

确，必有一定的战略战术预测其动向，事先“读懂”并非难事。军队越庞大就越容易在其准备、整编阶段察知其动向，也就越容易确定迎战体制。

可是，中世纪前期的北非情况完全相反。“地方长官”埃米尔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不明确。时常有埃米尔亲率大军前来进攻的情形。撒拉森人大多情况下是以小规模海盗船队前来袭击。令基督教徒悲叹的“大群蝗虫”也并非一次性集群来袭，好似分为小群分别在不同日子袭击不同的目标，形成波状攻击，反复不已，令人防不胜防，放马后炮都来不及。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从撒拉森海盗的传统、习惯和性格来考虑，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完美的。

他们操纵着容易控制的小型加莱船，船上没有多余之物，船快如飞，小规模行动使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打着基督教国家和城市的旗帜骗人眼球，登陆后丝毫不浪费时间，只做海盗该做的事情，然后和来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大海深处。

在他们的祖国，这样做完全不是犯罪。不，甚至还是英雄行为。

第一，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在市场上出售，所得金额的五分之一会自动上缴给“酋长”。

第二，撒拉森海盗在基督教徒居住地区采用的是恐怖战法。如果这样能引起人们恐慌，使人们绝望，就比出兵征服容易得多。撒拉森人的海盗行为也是伊斯兰化的前哨战。

第三，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对于居住在北非一带的人们来说，海盗业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也给未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

要把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换成“收益”，就需要有人来判断这些商品的价值，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项工作，管理、运营收容掳获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

“浴场”一词自古就有两个意思：洗澡的地方以及收容战争俘虏的场所。

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不少词语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浴场”也是其中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洗澡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洗澡带来的愉悦会使人堕落，因而有害。罗马时代被称为“庶民宫殿”的豪华而设施齐全的公共浴场也都化作废墟，人们已忘却了公众浴场这个词。而在同时代的北非，这个词语的意思转变成为“收容掳获来的异教徒的地方”。

因而，在中世纪听到“浴场”一词后首先联想到的是强制收容所。不过这与20世纪纳粹的强制收容所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8世纪到18世纪北非的“浴场”接受外面的雇佣委托，被收容的人可以到收容所外面劳动。这意味着“浴场”是奴隶的收容场所。劳动报酬不直接付给奴隶，而是付给管理运营“浴场”的伊斯兰教徒，充作“浴场”全体人员的伙食费等费用。当然，管理者最热心的事是极度降低伙食的质量，更多地中饱私囊。

海盗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以造船匠为主的工匠是高效推进海盗业不可或缺的。随着船只使用次数的增加，损耗也不断加大。经常需要新造船只，修理修复的工作更不待言。不过，北非伊斯兰教徒中适合这种工作的人手不足，而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绑架来的人可以派上用场。

但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给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创造了机会。把他们称为“pirata”也好，“corsair”也罢，他们实质上都是海盗。

海盗也和士兵一样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可能会遭遇敌方船只，在交战中战死，也可能在袭击城镇的过程中战死。海盗船遭遇暴风雨沉没的概率也不低。海盗这一职业成功后到手的报酬很高，但风险也很高。

正因为如此，从征收收益五分之一的“酋长”到船主到船长，都在积极发掘有能力的人才。

在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中，体格健壮的年轻男人几乎都充当划桨手。其中有些人会在面临危险时处置得当，或在别的方面表现出众。海盗就会招揽这些人。

不过，这些人继续信奉基督教是不合适的，要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海盗们便设下圈套，诱使某个年轻人去杀伊斯兰教徒。异教徒哪怕是不得已杀死伊斯兰教徒，等待他的只有死刑。可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即使杀死其他伊斯兰教徒，只要有人证明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就会被认可为正当防卫。这就是海盗招揽有能力的基督教徒的手段。这与现代国家的谍报机关所擅长的招募间谍的手法如出一辙。

无论如何，海盗业想要产业化，决定成败的是“人”，这与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后来甚至还有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意大利南部青年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例子。在此700年前的9世纪时，就已有原基督教徒当上撒拉森海盗船的船长了。历史上的所谓强盛期，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时代。在8、9、10三个世纪，这种运气确实偏向于北非的伊斯兰方面。

人们对其他产业的兴趣和对海盗业投入的减少并不能阻止海盗业作为一种产业取得成功。在迦太基统治的时代，或是在被罗马帝国收编的时代，北非还是丰饶的农耕地带，甚至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自古就

以出口农产品闻名。

到了中世纪，这一切全改变了。海盗袭击之处，小麦等农作物也会遭抢。农作物刚收获就被抢走，这使我们感到同情，但同时也感到愕然：连小麦这样的大量低价的便宜货都值得抢吗？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越来越依靠海盗业为生了。长远来看，这就是导致地中海南岸居民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是中世纪前期的9世纪，是一个海盗竭尽全力，因而极富攻击性、强而有力的时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西西里这个中转基地了。罗马以南的沿海地区已经没有一块基督徒的安身之地了。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以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这里是意大利半岛著名的丰饶之乡，耕地辽阔，古罗马人称之为“幸运的坎帕尼亚”（Campania felix）。

这里位于拜占庭帝国和伦巴底各公国统治圈的边缘，直到9世纪一直是权力的真空地带。拥有如此丰饶的腹地，不受压制的人们一定会有想法。这想法就是建立独立的共同体。这样想这样做的都是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海港城市，自北向南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政治组织也都是以执政官（consul）为最高长官的共和政体。

这些海港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意大利北部的感情不如对北非更为亲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睁眼就能看到地中海的缘故吧。这些城市的港口全都是面向南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同，船就是脚。海盗的“脚”也是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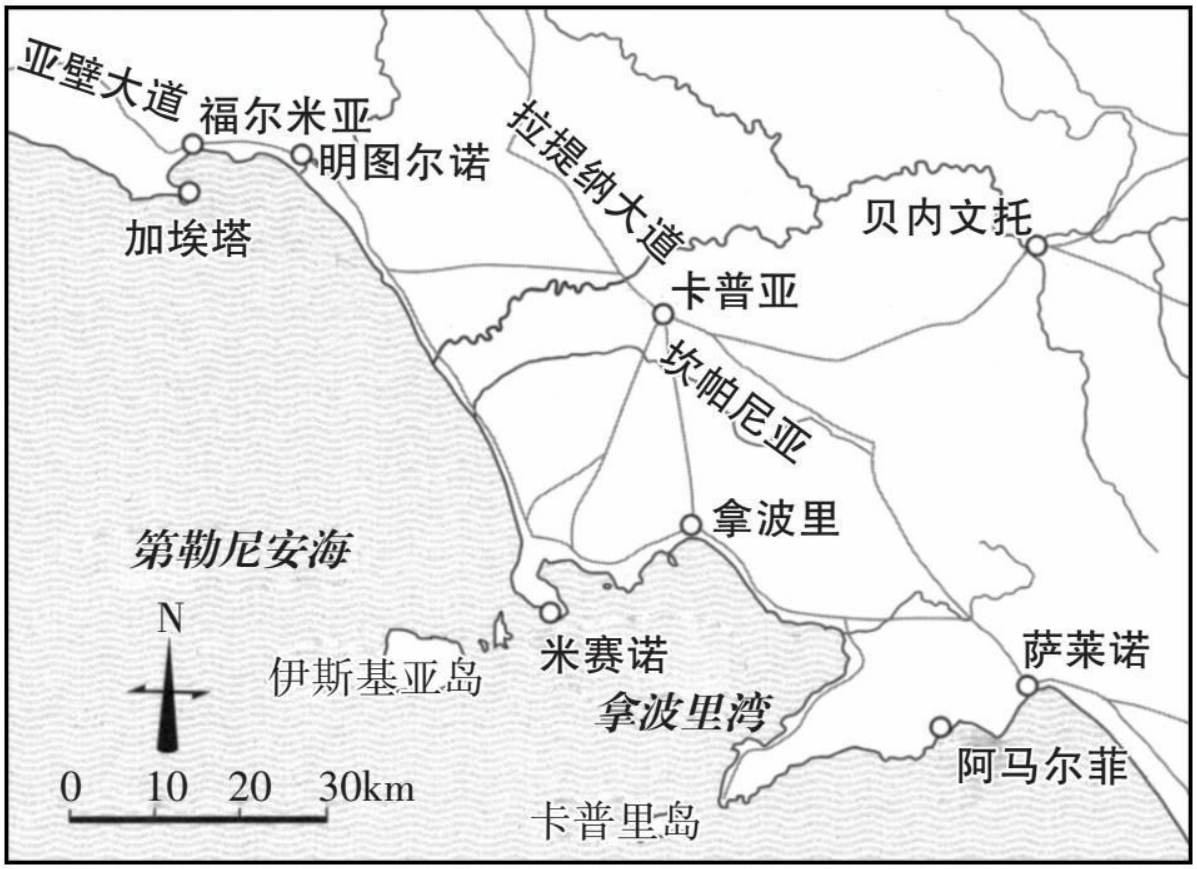
可以想象，即使在北非伊斯兰化以后，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的坎帕尼亚并不忌讳与异教徒进行贸易，坎帕尼亚在中世纪依然还是农产品的出口地。

近在眼前的西西里也正在扎实地进行着伊斯兰化的转变。与其被从西西里中心巴勒莫出港而来的海盗抢劫绑架，不如与住在巴勒莫的伊斯兰教徒进行贸易。这种想法很难受到责备。当然，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受到谴责。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与敌人结好就是背叛。不过，谴责他们的人也并没有出动船队，前来保卫坎帕尼亚海港城市的安全。

岂但如此，虽然同为基督教徒，拥有内陆地区的伦巴底各公国并不满足，还把手伸向了这些海港城市。贝内文托是伦巴底的公国之一，大公亲自率领军队向三个海港城市中土地最为富饶的拿波里发起了进攻。

公元835年，巴勒莫落入伊斯兰之手仅过了4年，拿波里就在海上有撒拉森、陆上有伦巴底的腹背受敌的状态下，与巴勒莫的“酋长”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

罗马教皇谴责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缔结这个条约是“与恶魔结盟”。的确，即使不考虑宗教上的差异，这也是一座“危险之桥”。



坎帕尼亚及其周边

伦巴底人看到巴勒莫“酋长”派来的船队，就不再攻击而撤退了。眼前的危机消除了。然而，同盟关系常被强大的一方所左右。只要对方认识不到破坏同盟关系的后果，持久的外交也不会得到保障。

即使是短暂的，拿波里一带的人总算又能睡个安稳觉了。然而，撒拉森人的海盗业已经产业化，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于是，撒拉森海盗改变了一下袭击目标，转向了位于长筒靴踵部的普利亚。以前这一地方较少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现在这里也进入了海盗的视野。

把目光转向这里的伊斯兰势力已不满足于只做海盗，他们的意图是像占有西西里那样完全占有这块地方。他们已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自古以来就以良港而闻名，背后又是广阔麦田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

拜占庭的皇帝是意大利南部的正式统治者。但拜占庭军队撤退以后，伦巴底人的一支贝内文托公国便包抄而来。拜占庭并未尽到防卫和保障安全这一统治者的义务，却一个劲儿地主张统治权，间或派些军队过来，好像要证实一下这种权力。

从北非和西西里来的伊斯兰势力在与拿波里结盟之后的5年中，与贝内文托公国交手三次，三战三胜。撒拉森海盗越发认为基督教徒胆小懦弱。伦巴底人源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南下而来在意大利落脚，改信基督教以来已有300年。即使不以伊斯兰教徒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一定认为，这些伦巴底人不是对手，普利亚很容易征服。伦巴底士兵没有拦住撒拉森人，威尼斯共和国却成功堵住了他们。

威尼斯人如何会在这时出现呢？其原因据传是威尼斯正式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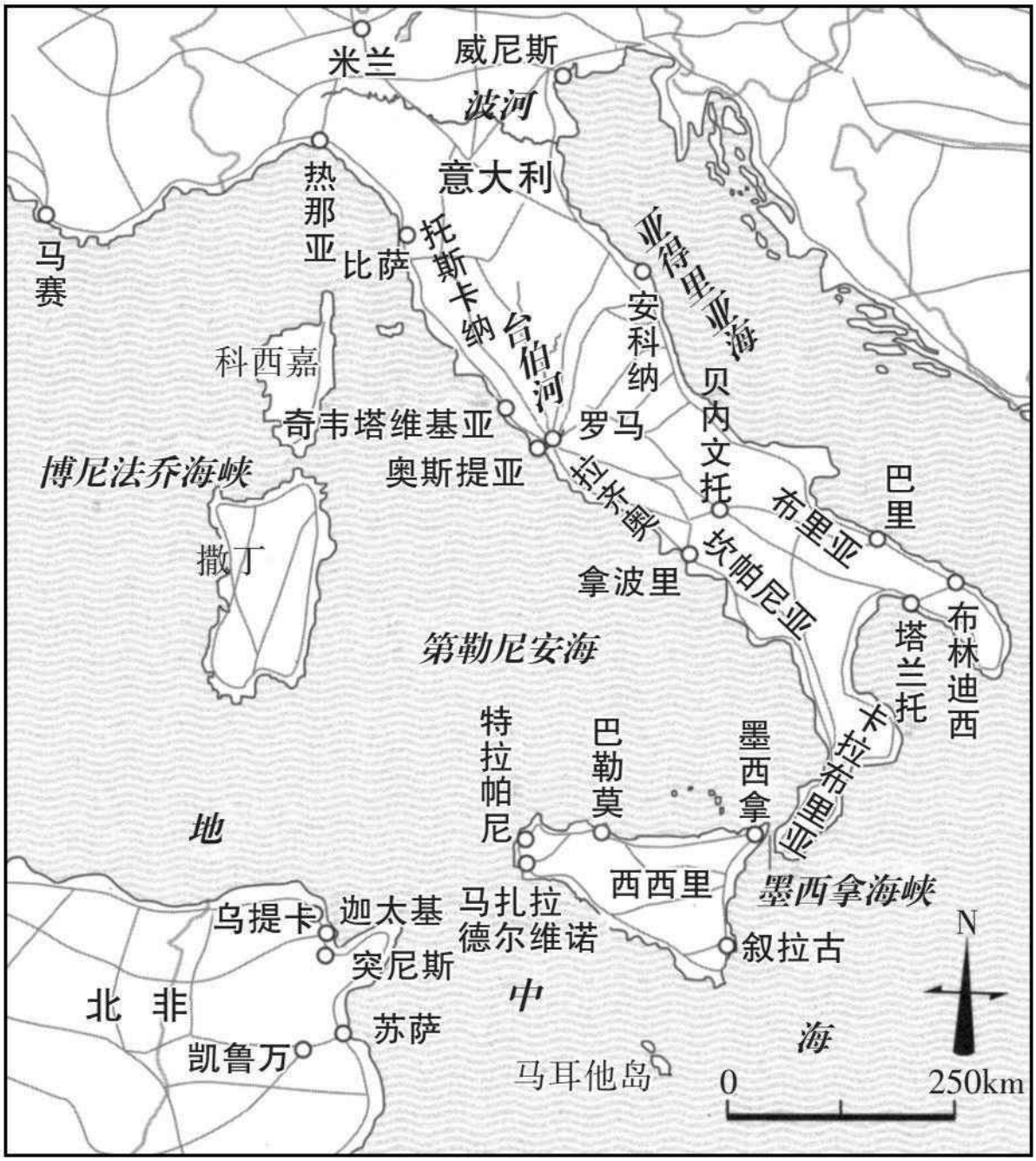
5世纪中叶，为了躲避大举入侵的蛮族，人们在一片汪洋的潟湖海滩上建设了居民共同体。如果将那时作为建国起点的话，到9世纪中叶，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但这个共和国有着长达1400年的历史，以人的成长作比喻，度过最初的400年可以说是刚刚踏进青春期。

拜占庭帝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的正式统治者。但由于威尼斯位于拜占庭帝国的西端，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所有方面都处在专制君主统治的负面影响之外，没有受到压制，这是非常幸运的。威尼斯商人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去，会比其他欧洲商人享受到更有利的条件。威尼斯有能力给拜占庭帝国带去它所需要的东西。

最初，拜占庭帝国向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打退当时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海盗的巢穴散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如果斯拉夫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土地毗邻的君士坦丁堡就会受到威胁。

威尼斯当然会接受这个请求。他们从建国之初就以通商立国。亚得里亚海是通商要道，确保海上的安全航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9世纪前半叶，他们才刚刚开始着手这样做，离确立的目标路还很遥远。

解读以后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大国之一威尼斯共和国的钥匙是“国家利益最优先”。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宗教各方面，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为信仰、名誉冲昏头脑的时候，只有威尼斯的统治者置身局外。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甚为令人生厌的现实主义者的集团。



意大利及其周边

公元840年时，纵令没有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威尼斯大概也会出动海军。个中原因看看地图就会知道。塔兰托和布林迪西所在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部位一旦伊斯兰化，就堵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威尼斯也就无法与东方进行贸易，为刚刚确立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所付出的辛苦也

将付诸东流。如果不能从亚得里亚海深处走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死路一条。

9世纪威尼斯海军在规模上还称不上是海军。总督彼得亲自率领，海军倾巢而出，能集结到塔兰托外港的也只有60艘加莱船。他们不但规模小，战术和士兵也不熟练，在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中大败亏输。

威尼斯士兵几乎全部战死，仅有的幸存者也都当了俘虏，被送往北非的“浴场”。只有总督乘坐的船和其他极少数船只成功逃脱，但也一次次地遭到追击。据说他们一直沿亚得里亚海北上逃到海湾，都忘不掉背后受敌的恐怖。

撒拉森人这时很冷静，未去攻击威尼斯本土。但他们在沿亚得里亚海返航途中，袭击了沿途经过的所有港口。尽管离波河河口稍有距离，他们还是沿河逆流而上，沿途扫荡，就连罗马时代的港口城市安科纳也未能幸免。每次袭击后，撒拉森船都会加载抢来的东西和人。凯旋回到塔兰托港时，所有船只都超载得几乎沉没。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撒拉森的海盗船队于翌年841年再度从塔兰托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北上。去年遭到沉重打击的威尼斯出动船队迎击，但再次败北。威尼斯船队只得又一次逃进潟湖。

威尼斯海军在中世纪后期被称为地中海女王，基督教舰队也只有在威尼斯参战时才能获胜，但在中世纪前期却是如此惨象。

如果伊斯兰方面当时乘胜追击，亚得里亚海大概也已成为伊斯兰之海了。斯拉夫人同样也是海盗，这两家无论谁胜，亚得里亚海一定会成为海盗之海，而不再是商人之海。

然而，撒拉森人救了威尼斯。撒拉森人的行事方式一贯不够谨慎耐心。他们在努力称霸西西里的同时，还把手伸向了意大利半岛、撒丁岛

和科西嘉岛。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战果惊人，却忘记了这战果，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

威尼斯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他们具有正视失败，从头开始的坚韧意志和忍耐力。威尼斯两度败给撒拉森海盗。这一定给斯拉夫海盗增添了勇气，让他们卷土重来。他们此前被威尼斯人赶进了地势复杂的江河入海口深处，潜伏下来。威尼斯人不得不从头开始整治亚得里亚海上的海盗。

再攻罗马

但是，威尼斯海军败北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亚得里亚海。两年后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完全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进攻教皇这个“胆小的基督教狗”的最高人物居住的地方已无任何障碍。

距罗马仅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也已被伊斯兰占领。进攻罗马的船队也可以从巴勒莫和墨西拿这两个良港扬帆起航。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有陆上战斗力的是伦巴底人，其中贝内文托公国已被屡次击败，必定不会出头，其他公国正忙于内讧，不会成为问题。伊斯兰方面判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救援罗马。威尼斯也还龟缩在亚得里亚海的深处。

凯鲁万的“埃米尔”看准现在正是进行圣战的好机会，命令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地方长官做好准备。

圣战是忠实实行《古兰经》教义的事项之一。圣战允许以下的行为：

剥夺基督教徒这些信错神的教义的人们和犹太教徒的财物是正当行为，抓获信仰错误的人当奴隶也是正当行为。于是，不仅伊斯兰教徒，听从圣战召唤行动起来、对额外好处更感兴趣的撒拉森海盗也卷了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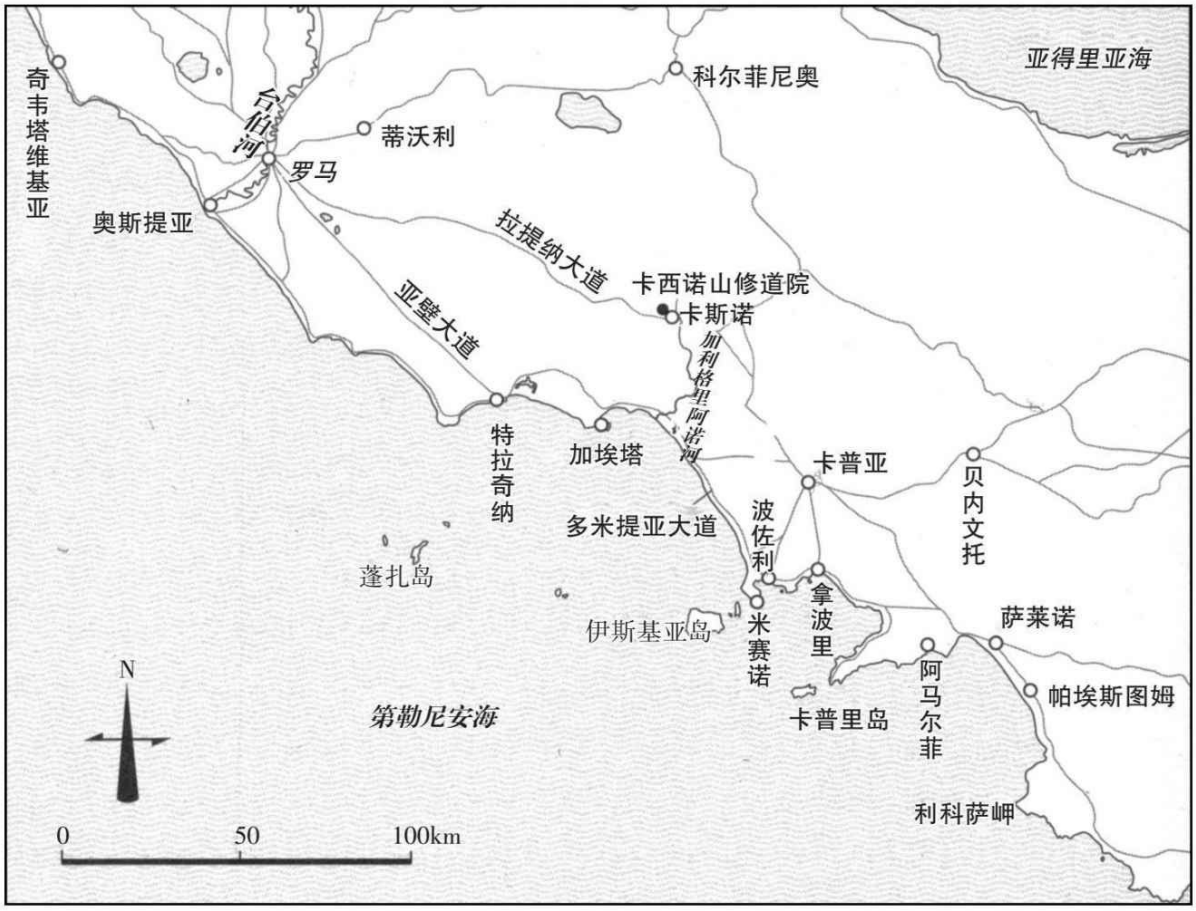
来。

他们在以往的海盗行动中了解到，基督教徒奉献的财宝集中在大修道院和城里的主要教堂中。

15年前的公元830年，撒拉森海盗打到罗马，却因城墙阻隔未能进入市内，只扫荡了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位于城墙外的教堂。虽然这两座教堂在罗马的教堂中数一数二，但城墙内还有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等罗马七大教堂中的三座。教堂之外，罗马还集中着贵族和豪门望族的宅邸。在伊斯兰教徒眼中，罗马既是“错误信仰之徒的头目居住的城市”，还是一座有众多猎物的城市。

从北非各地出发的伊斯兰船只首先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集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模多大，总司令官是谁。历史上只有时在夏季大船队集结的记载。船队在巴勒莫分两路出海。一路可能打算在墨西拿靠港，然后进入伊奥尼亚海，在塔兰托登陆后沿着古老的亚壁大道，直指罗马。

主力所在的另一路离开巴勒莫之后一路北上，进入第勒尼安海，然后一分为三。其中一队在利科萨登陆。帕埃斯图姆在现代以古代神庙遗迹而闻名。利科萨是帕埃斯图姆南方的一个海岬，控制了这里，阿马尔菲、拿波里和加埃塔等地连商船也将无法出海。



意大利中部

同时，另一队在蓬扎岛登陆，占领了这座小岛。在罗马帝国时代，蓬扎岛是流放，或是说隔离发生丑闻和制造麻烦的皇族成员的地方。该岛并非孤悬海外，一旦控制了这里，船只从意大利南部驶向罗马的必经海域便可尽收眼底。蓬扎处于拿波里的势力之下。蓬扎与拿波里签有同盟条约，但该岛被占领，拿波里却一声不吭。

第三队好像去了已被占领的奇维塔韦基亚港。

仅仅这些也已是相当规模的大战略了。撒拉森海盗的行动是走哪算哪。只有这一年，凯鲁万的“酋长”让人觉得准备充分，行为符合圣战宣言，是依据经过相当推敲的战略在行动。

拿波里的执政官比谁都早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执政官赛乔向海港城市加埃塔和阿马尔菲发出了呼吁。这三座海港城市的代表都非常害怕，如果罗马陷落，整个意大利南部就会被伊斯兰化。他们迅速组成船队，然后率领船队来到利科萨，团团围住停泊在附近的伊斯兰船队，进行威胁，让其选择是回到巴勒莫去，还是以自己的血来祭奠这片海域。

撒拉森海盗善于登陆抢掠，却不喜海上作战。他们决定撤退，离开了利科萨。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可得到巨大收获的圣战。他们也不会自缚于与拿波里的约定，拿波里人也是基督教徒。

伊斯兰势力离开利科萨后并没有去巴勒莫所在的南面，而是不理睬拿波里，径直北上，在拿波里湾西端的米赛诺登陆了。

米赛诺是罗马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军港所在地。这里可以停泊众多的船只，陆上交通也很便利，拐上多米提亚大道和亚壁大道，可以直通罗马。

伊斯兰船队在米赛诺卸下士兵和马匹之后，空船往北驶向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他们连拿波里也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加埃塔了。陆地北上的士兵和海上北上的船只都不理睬加埃塔。伊斯兰士兵沿着古老的罗马大道前行，他们高呼口号，直奔罗马而去。

“砸烂无信仰者的神圣之都！在它的瓦砾上赞美安拉的荣光，建造清真寺！”

北非侵略者为求军粮一边行军一边抢劫。8月的强烈阳光似乎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

公元84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是3年前登基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在中世纪前期，很多教皇的生年不详。这位教皇情况同样如此，不知他有多大年纪。他在第二年去世，可能不是老死就是病亡。伊斯兰大军逼近，他

并不能身先士卒，奋起指挥，是罗马的市民奋起保卫自己的城市。罗马首次记录下了伊斯兰军队的规模。

船只有73艘，其中50艘为大型船，其余23艘为“小船”（sottile），这些小船可能是为军事目的而造。

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进攻的军队总数大约为3万人。据说其中1.5万人是步兵，所以3万人这个数字中也许包括划桨手。伊斯兰船上的划桨手经常是基督教徒奴隶。他们经常被铁锁链相互连成一串，锁在划桨台上，一边挨着鞭打一边划桨。这些人只是“马达”，不是兵力。纯粹意义上的士兵人数，不论如何高估，2万已是极限了。要攻打由周长超过20公里的城墙防守的大城市，这点儿兵力太少了。这些兵力也许就是当时北非伊斯兰世界能够动员起来的最大限度了。

能够动员的军队人数必然反映出人口的状况。罗马帝国末期因为人口锐减，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数量也减到了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以下，罗马帝国以这样的状态进入了中世纪。地中海南边的伊斯兰世界和北边的基督教世界大概都面临着可动员的人数减少的类似情况。在某种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穷人之间的对决。

绵延不断的环绕罗马城的坚固城墙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以前遭受过撒拉森海盗祸害的人们得知伊斯兰军队要来进攻后，纷纷逃来罗马避难。他们与罗马人的共同点是“绝望”。然而“老鼠急了也咬猫”[4]。绝望的老鼠齐心协力，奋起抗猫。附近的伦巴底士兵和驻扎在罗马的法兰克士兵也都参加了罗马的防卫。近郊拥有领地的豪族也带领手下的男子赶来罗马。时常为弹丸之地你争我夺的人们，也因为罗马的危机而将平日的恩怨置之脑后。也许“绝望”与“信仰”超越了消极性和利己心。没有谁来做总指挥，但防卫的一方团结紧密，士气高昂。

罗马周围高大厚实的城墙因由奥勒良皇帝建造而被称为“奥勒良城墙”（Mura Aureliana）。伊斯兰军队来到这座城墙前，城墙上箭矢如雨

而下,箭雨中一个个士兵又被投石机抛来的大石块击中。

伊斯兰士兵的服装优先考虑的是要能自由活动，对箭矢和石块几乎没有防护作用。他们也并不擅长这种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要攻下这座“无信仰狗的神圣之都”，非得等到防守一方粮尽而降的时候。伊斯兰方面只有2万名士兵，也不可能将有20公里以上城墙环绕的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

攻不进城去，就彻底扫荡城外的广阔地方。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首当其冲。根据教廷的记录，从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者查理曼，历代皇帝贡献的金银圣器都被劫掠一空。这个记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在15年以前，这两个教堂就曾被劫掠过。

不过，这些“集500年间贵重物品贡献之大全的一大博物馆”中的一部分还会遭到劫掠。

有过15年前被劫掠的经验教训，人们应会将这些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内的教堂中。但在基督教徒中，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想法非常浓厚。像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这样最重要的教堂，也不可能全部搬空。伊斯兰士兵这次还会有相当丰盛的收获。据说这些士兵向绘有基督圣像的镶嵌画放乱箭，在自己的阵地上通宵狂欢乱舞，寻欢作乐。

这些情况传到城内基督教徒的耳中，他们群情激愤。第二天夜里，人们趁着夜幕，悄悄渡过台伯河，攻入了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人们手执火把，袭击了伊斯兰士兵。偷袭取得成功，至少将伊斯兰士兵赶出了圣彼得大教堂。

成功夺回圣彼得大教堂，给城里的人们增添了信心，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意大利中部。罗马奋起了，整个意大利中部都在奋起反击伊斯兰。自古仅自北方而来的大道就有奥莱利亚、加西亚、萨拉里亚、诺门

塔那和蒂泊蒂娜五条大道汇集于罗马。中世纪前期，这些道路虽有破损但仍可使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大道来到罗马。公元846年，人们通过这些大道聚集而来，拯救罗马。

不知是为了信仰，还是出于勇气，抑或是由于面对危机的绝望，也可能是这些兼而有之，大批民众不断聚集而来。伊斯兰士兵震惊了。

以前他们认为基督教徒是“胆小没有反抗勇气的狗”。狗现在要冲过来，而且是成群结队的。伊斯兰士兵开始退缩。他们溃不成军，只想着带回抢来的东西，于是乱成一片，四散而逃。

有些人向停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船逃去，有些人涌上亚壁大道，一个劲儿地南逃。多数赶来救援罗马的人都是沿大道从北方而来，伊斯兰士兵便全部向南逃去，向基督教徒不会过来的方向逃去。然而，冬天将至，他们即使南逃，也不再安全。

加埃塔、拿波里，还有阿马尔菲，这些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已经与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缔结了同盟条约，但这次也明确地站在了基督教一边。这样，逃往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兰士兵在罗马与拿波里之间受到了夹击。

绝望的伊斯兰士兵用信鸽向巴勒莫的地方长官求援，信鸽是他们之间使用良好的通信工具。地方长官收到了信，但船只出港要看天气。虽然地中海总是风平浪静，在冬季也会不时波涛汹涌。到了次年的公元847年，靠抢掠度过一冬的伊斯兰士兵盼望已久的船总算从西西里、从北非开来。不过在此期间，基督教徒已经组建了防卫军，指挥系统也已确立，总指挥是法兰克国王、曾经的意大利国王鲁多维科。伊斯兰方面也重整旗鼓，留在奥斯提亚和米赛诺的船只也南下与从西西里和北非来的船队会合。

在此后的半年里，伊斯兰方面企图进攻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与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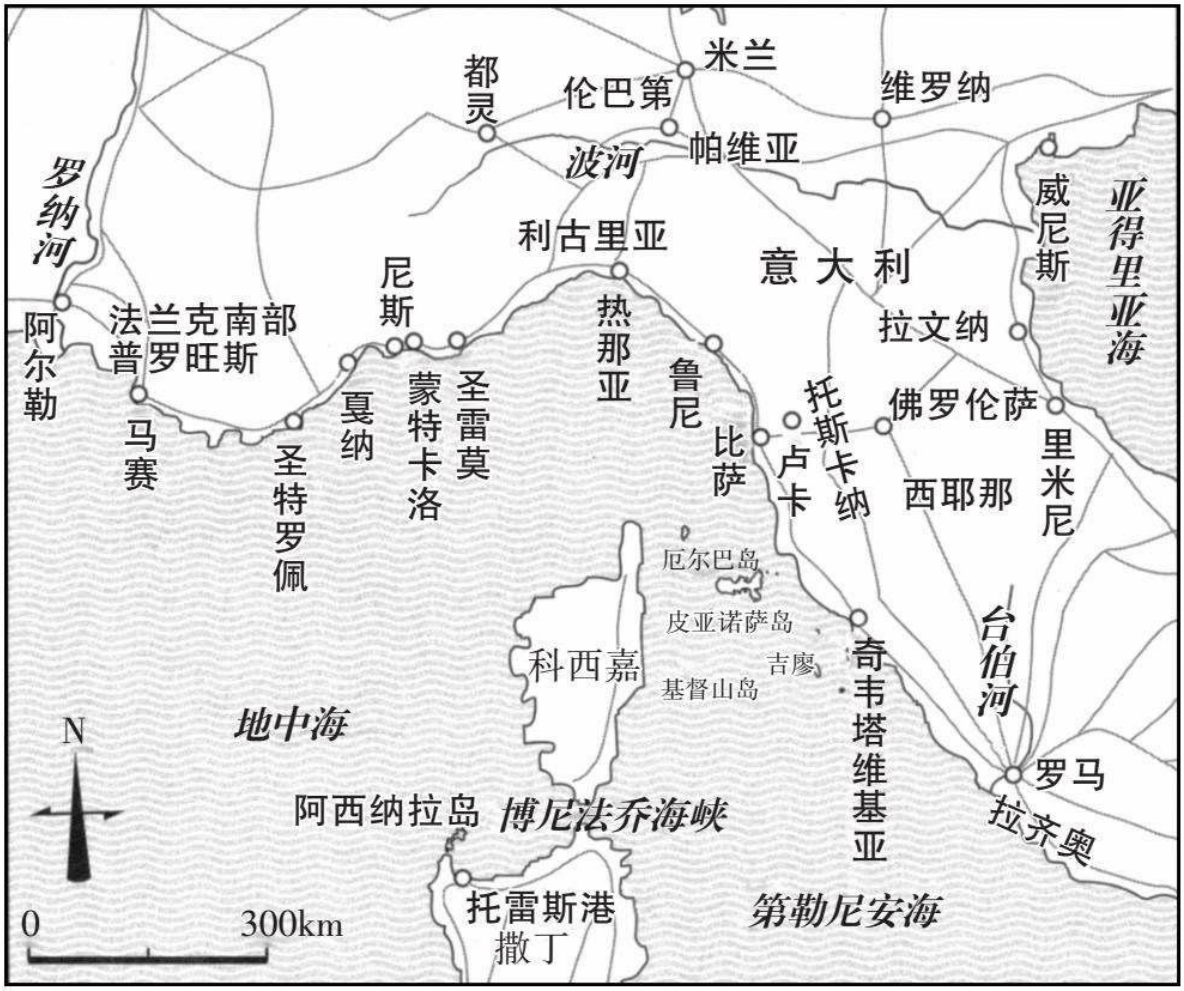
一致的基督教方面展开了地面战，双方都要争夺这座意大利南部最为著名的修道院。春天的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在卡西诺山下布阵的伊斯兰军队被水冲走。基督教方面认为这正是上帝的恩宠，他们沸腾起来，感谢上帝。载着幸存士兵的伊斯兰船队与载着基督教方面士兵的阿马尔菲和拿波里船队之间展开了决战。

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这时上帝又出手相助。在海上决战打响前，胜负就已决定。强风突如其来，袭击了加埃塔港外海战场。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尚未出港，躲过一劫，强风直接袭击了已经来到港口外海的伊斯兰船队。据说加埃塔附近海岸满是溺毙的撒拉森人的尸体。被铁锁链连成串的划桨的基督教徒奴隶和船只一起消失在海底。也许上帝的恩宠是有优先顺序的。就这样，公元846年开始已打了7年的、以征服基督教首都罗马为目标的伊斯兰圣战彻底失败了。

但是，伊斯兰方面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是一场凯鲁万的埃米尔发动的圣战，凯鲁万相当于西方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这也是一场起着首都作用的突尼斯的埃米尔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征服罗马为目标，并得到了举国支持。就这样败下阵来，对这两人而言都有面子的问题。北非的新伊斯兰教徒都是被军事征服后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原住民，一旦败退，这两个人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失去威望和权力。圣战的成功与否还是国内稳定的关键。

不等这年结束，说教继续圣战的导师就从凯鲁万分赴北非全境。他们在各地清真寺的经坛上热情说教。

“征服错信上帝教义的无信仰之徒的首都罗马，是安拉和穆罕默德的共同愿望。参加圣战是我们忠于伊斯兰教义的义务。天堂在等待着参加这场神圣战斗的人们。去吧，伊斯兰的战士们！打到罗马去！”



法兰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

第二年，公元848年的整整一年中，北非全境建造新船的锤声就没有间断过。士兵们不再去想过去的失败，开始集结。凯鲁万的埃米尔也高调宣布要在翌年重开圣战。

在意大利半岛，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面对面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没有一个人认为伊斯兰就会这样退走。这里的人对撒拉森海盗的恐惧，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所谓世袭感情。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半岛居民认为，如果罗马屈服，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将屈服于伊斯兰。历史上并不缺乏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西西里，除了恩纳和叙拉古之外，全岛已被伊斯兰势力征服。

意大利南部数一数二的良港塔兰托和巴里也已落入伊斯兰之手。

在意大利中部，要把伊斯兰势力从教廷领土内第一港的奇维塔韦基亚驱逐出去，却无法着手实行。

在其他地方，人们惧怕海盗的小船队，风一般来袭，抢人越货后又风一般消失在地平线之外，连渔民也只能在海岸附近捕鱼。

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随处可见被称为“撒拉森人洞窟”（grotta saracena）、“撒拉森人入海口”（cala saraceni）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们发动袭击之前的藏身之地。不光在第勒尼安海的基督山、吉廖、皮亚诺撒以及厄尔巴岛这样的小岛，就连撒丁、科西嘉这样类似陆地的大岛沿岸也遍布着这种海盗的藏身之地。这意味着，不仅罗马以南的地方，就连罗马以北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

好似要证明这种情形一样，公元849年刚刚入春，撒拉森船队在鲁尼登陆，其目的与其说是打圣战，不如说是做海盗。

鲁尼位于托斯卡那北端，自古以来就是港口城市，港口背后有耕地，以富饶闻名。撒拉森海盗捣毁了鲁尼。他们并未在劫掠、绑架后立即撤走，好似要向基督教徒显摆伊斯兰发怒的后果。从此以后，鲁尼成为一片废墟，化为无人之境。撒拉森人撤退之后，回来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撒拉森人毁灭了鲁尼之后并未停止北上，他们接连扫荡了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们的暴行甚至波及法兰克南部，之后才终于南退。即使在普罗旺斯，人们也不敢放心地靠近大海了。

基督教的“圣战”

这个时代，只有罗马教皇能够设法拯救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于水火。前任教皇去世后，利奥四世一年前被选为教皇，他以积极进取而著称。

利奥教皇没有坐等北非的再度挑战。当选为教皇后，他立即进行了罗马城墙的加固工程，还制定了用粗铁链封锁台伯河的战术，并完成了准备工作，如果敌船沿台伯河逆流而上进攻罗马，随时可以付诸实施。

利奥四世认为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他并未向拜占庭的皇帝发出呼吁。虽然他向神圣罗马帝国请求组织军队，抵抗伊斯兰，但却同样未抱多大希望。与其依靠这种地位崇高的世俗者，不如依靠对撒拉森的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意大利人。他将拿波里、加埃塔和阿马尔菲的代表召到教廷所在的拉特拉诺。

问题在于，是等撒拉森人登陆后予以迎击，还是在海上严阵以待，在撒拉森人登陆前展开决战。我们不知道教皇是与什么人商量的，说不定教皇采纳的是应召而来的阿马尔菲代表的意见，他是三个海港城市中最了解北非情况的人。教皇选择了在海上决一雌雄。

9世纪的阿马尔菲仅次于同时期的威尼斯，几乎是西欧唯一深深介入东方贸易的国家。他们和威尼斯一样，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有贸易关系，常常引起敌视伊斯兰的教皇不快。

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伊斯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撒拉森人不但不惯于攻城战，而且也不善于海战。

也许同样根据这三位代表的意见，决战的战场定在奥斯提亚港前方的海面上。可能教皇认为，如果这场海战失败，台伯河两岸设置的铁锁链将不起作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这时传来了消息，在大

海彼岸，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大船队已经离开突尼斯港。

代表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提供的船只和水手已经全部开进奥斯提亚港。志愿参加海战的士兵也已开始从整个意大利集结到达奥斯提亚。接到报告的教皇利奥也走出位于城墙之内的安全的拉特拉诺宫，前去奥斯提亚。教皇来到这个图拉真皇帝建设的巨大港口，向停泊在此的船上的船员和士兵高声说道：

> 万能的上帝啊！昔日在您的救助下使徒彼得曾行走海上。您还三度拯救了遭遇风暴即将沉没的使徒保罗。这次，请听听我们的祈祷吧！基督教的信徒们，现在正要为正当神圣的大义献出生命。如果他们在即将开始的海战中获胜，那也是为上帝的荣光而做出奉献。愿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永昌！

教廷的记载中记录道，人们凝听着，神圣之火在心中燃烧。

地中海彼岸人们的心间燃烧着“神圣之火”，地中海此岸也同样燃烧着“神圣之火”。

伊斯兰称“圣战”为“jihād”，同一个词语基督教则称为“Guerra Santa”。所谓圣战是一神教才会有的概念，一神教最大的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的存在。

教皇利奥没有回罗马，在奥斯提亚住了下来。他打算亲赴上帝之子即将开始的海战。无须久等，派去侦察的快船回来报告，伊斯兰船队已经逼近。

台伯河入海口两边，海岸线一望无际。伊斯兰船队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渐行渐近。

岸上观战的人都觉得，伊斯兰船队与出港迎战的基督教船队短兵相

接，一场血战就要开始。可是突然之间，风向大变。

猛烈的西南风从正在开过来的伊斯兰船队背后袭来。对阵的基督教船队很快注意到这阵风，舵手使出全身力气转舵。可伊斯兰船队可能缺少能够辨别风向的老练水手，未及反应就被强风吹走，友船相撞，一片混乱。有些船撞击后被狂风卷起，猛撞海岸。只能这样认为，神这次没有眷顾穆罕默德，而偏向了耶稣基督。

伊斯兰船只破损严重，不能再用，但划桨手却得以挣脱锁链成为自由之身，还俘虏了大批伊斯兰教徒。

数千人的俘虏被锁链成串锁住押回罗马。在去罗马的大道上以及进入罗马之后，沿街人山人海。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撒拉森海盗被锁链锁成串的情景，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睹为快。

利奥教皇让这些俘虏建造环绕梵蒂冈的城墙。为使圣彼得大教堂不再被伊斯兰教徒践踏，教皇决定在以大教堂为中心的梵蒂冈周围建造坚固的城墙。利奥假手伊斯兰教徒建造了这座被称为“利奥内墙”（Mura Leonina）的城墙，它现在依然矗立在梵蒂冈周围，守卫着基督教世界位列第一的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

奥斯提亚海战

这场战斗在历史上以“奥斯提亚海战”而闻名，罗马教皇认为这是基督教值得纪念的胜利。文艺复兴时代，教皇委托拉斐尔以此战为题材挥毫作画。人们今天还能在梵蒂冈的“拉斐尔画室”观赏到这幅画。站在基督教一方来看，教皇的想法顺理成章，毕竟这是第一次战胜伊斯兰对手的战斗。然而，并非取得了一次胜利，形势就会好转，事态依然不容乐观。

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的明火执仗的圣战，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北非伊斯兰势力改变了战术，又转回采用海盗波浪式攻击的方法。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明智的策略转换，其理由有四。

第一，只是回到了长年惯行的方法而已。

第二，海盗已经成为产业，不论是采用直接的方法还是间接的方法，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只能坚持下去。

第三，海盗必须上缴收获的五分之一，对统治北非各地的“酋长”而言，这笔收入不可或缺。

第四，海盗以基督教徒居住之地为目标，自然是削弱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视为圣战。

总之，当时伊斯兰教徒去做海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海战伴有失败的风险，但海盗总是袭击没有准备的人，风险既小，收入也稳定。

在基督教方面，“神圣之火”就像对胜利的欢呼一样早已湮灭。伦巴底人诸公国为地盘争夺不休，四分五裂。贝内文托公国占领萨莱诺以后，又对近边的阿马尔菲表现出了露骨的领土野心。

阿马尔菲这样的贸易国，少有耕地，人们只能出海谋生。让他们完全自由，在通商贸易方面取得成绩，这对周边国家也是有利的。贝内文托既然已把萨莱诺这样拥有耕地、能够生产出口物产的城市弄到手里，就应该把出口委任给能胜任此事的阿马尔菲人。企图在阿马尔菲行使像内陆一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方法是不明智的。

但伦巴底人是从北方南下而来的民族。只知道陆地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大海的作用。不过他们定居意大利已有300年的历史。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并非是因为陆地民族而不了解大海，而是仍未具备领悟大海效用的能力。实际上，伦巴底人的统治在意大利北部十分有效。以米兰为中心的区至今仍叫伦巴第（Lombardia），这个名称即起源于伦巴底（Langobardi）。

“海洋共和国”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有4个海洋国家具备在地中海世界与海盗渡海作战的海上战斗力。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就是缆绳围着的这四个国家的旗帜（参见本书卷末彩页）。

军旗上这四个国家的顺序，从上至下是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比萨。这些国家的商人靠与海外的贸易积累实力，构筑起财力基础。国家政体也是商人主导的少数人领导的共和政体，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海洋共和国”。

但是，如果按照作为海洋力量崛起的先后顺序，应该是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才对。我曾思考过这种顺序的变化，但在地图上观察各国位置的一瞬间，我明白了。

阿马尔菲位于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比萨位于意大利中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威尼斯不仅位于意大利中部，还处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位置。

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中，距离北非伊斯兰世界较近的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形成海上势力。换言之，防卫撒拉森海盗的必要性使它们成为海洋国家。威尼斯最后成为海洋国家，也是因为它虽曾两度在海上败给撒拉森海盗，却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撒拉森海盗打到家中抢掠破坏、人民从未被绑架过的国家。

但如果按照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这四个国家排序将会不同。在文字是从左往右阅读的国度里，左上方通常是最重要的位置。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把这个位置给予了威尼斯。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四个海洋共和

国中只有威尼斯一直维持着独立，还因为它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已成为海军国家，被称为“地中海的女王”。

按这样的说法，人们似乎会说，下排左边的阿马尔菲要比位于其后的比萨在历史上更为重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阿马尔菲是“海洋共和国”的先驱，应当受到相应的尊敬。

阿马尔菲崛起的契机是伦巴底人的“瞎管闲事”。这事饶有趣味。虽然大海的弄潮儿并非不满意做拿波里的盟弟，但他们也许对受旱鸭子统治感到厌恶。公元860年，准确地说是在那年前后，阿马尔菲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起步了。当时意大利南部的形势扑朔迷离，激烈动荡，渺小的“海洋共和国”很容易被一口吞掉。

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和卡拉布里亚，撒拉森势力已经侵入内陆腹地，伦巴底人本应奋起反抗，但其内部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向撒拉森人求援。而罗马教皇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让伦巴底人的统治者不要忘记自己是基督教徒。而伦巴底人却只有在与撒拉森人的共同作战不利时才会“想起”这一点。

北非伊斯兰势力战术的改变涉及了正在征服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海盗改变了战术，不再是袭击、掠夺，然后离去，而是侵入意大利南部的内陆腹地，建立据点，再从那里出去抢掠。

他们不再辛苦地袭击修道院，而以烧杀抢恐吓威胁，勒索容易运输又不需兑换的金币。

所有的修道院都是勒索的目标。意大利南部最负盛名的修道院是圣本笃创立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就连这座位于山顶、被认为最易守难攻的修道院也交出了3 000枚金币后才免于被付之一炬，这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然而，交钱之后，下次又会被盯上。中世纪前期甚至可说是修道院的时代，各地都有大型修道院。撒拉森海盗的袭击日趋严重，修道院也逐渐建得像城堡一样。本该是用于祈祷的建筑，外观却越来越像军事设施。

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始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以后。

人们离开近海地方，为寻求安居之地，纷纷移居到悬崖之上或深山之中。这个现象在意大利南部尤为突出。在现代，人们驱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很多村镇紧贴在高耸的悬崖之上。如果不了解历史，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要特意住在那么不方便的地方。但生活在中世纪前期的人们要豁出命去求生。以前只有信仰狂热、追求孤独隐遁生活的人才会隐居在深山里，而现在普通人也移居了进来。

山里大约不缺新鲜水。但再怎么努力开垦，深山里的耕地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有耕作近海平原时那样高的生产效率。此外，移居选择的地点是连撒拉森人都不来的偏僻之处，与外界以及附近的其他人交流也相当不易。由此而来的孤立，不仅在精神上，也使实际生活受到影响。

听到在小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就会联想到这种生活理想而和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很大的生活方式。别的居民共同体可以大量生产、购买的东西这里都得“自给”，这导致了生产力低下。

罗马帝国是广域经济圈。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中世纪，只有成为狭域经济圈一条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物产流通是昌盛还是停滞。

共同商议后做出判断，这种意义上的合议制，应该只适合于富有自信的人们集合而成的共同体。相反，对提反对意见失去自信而逃匿的人而言，由某个人下决断，其余人服从命令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安全感。

时至今日，人们一踏入建在深山里的城镇，便会产生穿越时光隧

道，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保留了昔日的原样。与简朴的房舍形成对照，修道院或领主的称为城堡更为准确的宏伟建筑，更加给人以中世纪的感觉。修道院除了宗教事务以外，还起着指导开垦和耕作的作用。一旦有事，领主可以提供防卫保障。

这二者几乎都是农田的地主，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保护费。罗马时代这些租费约占收益的一成，而在中世纪，至少也超过五成，原因是自耕农已经消灭，保护费是地方越小，人均负担越高。这一点只要与罗马帝国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时有着很好的体系，可以利用完备的罗马大道向需要的地方派遣军队。

“撒拉森塔”

中世纪也有人决定不逃进深山而留在海边。这恐怕是权衡生活方式之后的决断。

这些人首先在能够眺望到广阔海面的海岬和悬崖上像串珠似的建起了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监视塔。

他们接着组建了迎击撒拉森人来袭的舰队。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撒拉森海盗最讨厌劳而无获。即使是商船，只要有护航船，遇袭的概率立刻锐减。

然而，即使不再遭到直接袭击，也还常有撒拉森海盗在附近登陆，沿陆地袭击的危险。虑及于此，城镇建筑牺牲了舒适性，以防御为最大目的。用一句话说，城镇建筑的设计是小巷曲折，宛如迷宫。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穿行于这座城市房屋下面狭窄昏暗的小巷之中，眼前会突然一亮，出现一小片空地。这空地并非为周围房子的采光而建。

往这里一站，谁都会想到，如果把刚才进来的小巷和对面的小巷用铁门或别的什么东西堵上，来袭的海盗就成了口袋里的老鼠。阿马尔菲的小巷不仅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有些地方还会突然变窄。这些小巷还会在某个方向上建成复线。从阿马尔菲最大的教堂出来，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有两条小巷，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你都能逃出城外。

这种城市建筑在地中海南部的伊斯兰世界称为“卡斯巴城”（Kasbah）。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城至今都很有名。我们不知道北非的阿拉伯人为什么喜好这样的城市结构。然而，地中海北方的意大利“卡斯巴城”则是为防御从地中海南方卡斯巴城来袭的海盗而形成的。

有些人想建造以防御为目的的“卡斯巴城”而无法建造。他们居住在广袤平原之上的港口城市，背后没有阿马尔菲那样的峻峭山峦。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组建相当强大的舰队，城中的居民就只能逃入内地。这类人在中世纪前期占了绝大多数。

有一个办法最适合现代人想象哪个地方的人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最甚。

这个方法要在大脑里进行电脑制图。不过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有想象力就行。

从法兰西南部开始，沿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往下，围着“长筒靴”的脚踵部画一个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濒临第勒尼安海和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域。这一带如今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充分享受到“地中海”的游趣。这些地方的共通特点是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让我们在大脑中将这里的所有人、房屋建筑和港口船只统统屏蔽掉，在大脑里把这里变为无人之境。在古代，这里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平原上有片片耕地，每一个角落都被精耕细作；上下水道完备的城市和村镇像珍珠首饰一般串成珠链；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让我们在大脑中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从这片土地上统统抹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恍然明白中世纪前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也一定能够从心底里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中世纪暗无天日”。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最为悲惨的9世纪，保卫基督教徒应该是专门为此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义务。这时的皇帝是鲁多维科二世。他和历代的法兰克皇帝一样以法兰克为根据地，却拥有“意大利王”的称号。

经不住罗马教皇再三请求，公元860年，他终于答应去意大利，敌人当然是撒拉森人。

就在马上要为保卫臣民安全前往意大利前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向意大利半岛的臣民发出了这样的布告：

> 动产较多之富人有义务动用其财产让杀人犯出狱，并为其准备武器装备，送他们上战场，越多越好。
>
> 贫者中，拥有10个以上铜币者有义务担任所住地区及其海岸一带的警戒。财产不足10个铜币者免除本义务。
>
> 多子之父，只可留下一个最适合的儿子，其他必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
>
> 仅有二子者，则其子均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有三子者，则许其中一人留在家中。
>
> 领主和土地管理者亦不得免除这些义务中任何一条，概无例外。全民均有参军义务。但允许以前帮工的用人中有一人，或为继续以前工作可再有二人留下，以保卫留下家属之安全。
>
> 如果违反本令，有企图留下更多人者，将剥夺其领主之地位，若为地主，将剥夺其拥有土地之权利。
>
> 修道院、尼僧院也以同等条件与领主和地主承担同样义务。如

有怠慢此项义务者，将剥夺其神职人员之资格，并没收修道院和尼僧院所有的土地及其他一切不动产。

只看字面，这布告表现了皇帝奋起反抗撒拉森人的坚定意志。可是，发出这项命令的皇帝长年以来一直敷衍着自身的义务和职责。这命令也许得到了遵守，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大概是大打折扣的。

皇帝来到罗马，皇后同行相伴，仪仗豪华，显示着基督教世界中的俗界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然而，此后赴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海盗作战，结果却是惨败。失败不止一次，翌年又吃败仗。皇帝自己也险些做了俘虏，全靠临阵皇后的机灵才免遭危难。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撒拉森海盗的俘虏，北非全境的伊斯兰教徒一定会高奏凯歌。皇帝也许会被当成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无信仰的胆小无能的基督教徒”的活标本，用锁链锁成一串拉着游街。撒拉森人最想抓到的人就是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个时期，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地方一直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我不再一一记述这些事情，因为撒拉森海盗的祸害已成家常便饭，千篇一律，逐一写来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这些海滨城市经过千年之后，以老百姓为主角的祭祀活动今天依旧延续。前面打着护城圣人画像，祭祀队伍在城里迤逦而行。几乎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祭祀活动都集中在夏天。因为北非的海盗多是乘着夏季的西南风或东南风来袭，夏天地中海的潮流也是自南向北流动的。

来袭的撒拉森船队未能躲过突然改变的风向，猛撞崖壁后沉没，海上现出了圣母马利亚；圣尼古拉唤醒了塔上打瞌睡的放哨人，城里的人得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护城圣人的由来因地而异，形形色色，但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

9世纪，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恐怖是同义词。在这个世纪里，准确地说，是在公元87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八世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 撒拉森人结伙袭击，每每犯下种种暴虐残忍的暴行，这使我心中不能不充满深深的苦恼和悲哀。可以说，这种惨状没有一天不使我痛苦万分。
>
> 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在想，任何笔都会因不堪书写这无休无止的种种悲惨而折断，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那些惨状的细节。
>
> 我自己也在深深的苦恼中度日。我眼前浮动的，尽是基督的敌人让信奉基督的人们痛苦、死亡的景象。上帝的孩子在各地流血，忠于上帝教义的人们的灵魂正在逝去。所有地方都已化作掠夺、杀戮和放火的舞台。人们躲过剑锋也逃不过大火。逃过大火，等待他们的也是铁锁链，他们被带走送到异教徒的地方，在那里当奴隶，做牛做马，迎来死亡。这就是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命运。
>
> 曾经人口稠密的城市、村镇和田园已经不见人踪，如今或是成为撒拉森人的巢穴，或是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
> 而罗马城，已经成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避难之所。看到这些人，我就心如刀绞。
>
> 亲爱的皇帝啊！这是降临到上帝的孩子们身上的灾难，是不能不让我痛苦的现实情形。

然而，绰号“秃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二世连封回信都没有写。他正全力以赴收拾法兰克内部的各种势力。也许无法完全不理睬教皇的屡次请求，他还是向伦巴底族公国之一斯波莱托的领主下令，要求组建抵抗撒拉森的军队。

可是，斯波莱托大公古伊德根本没有对抗撒拉森，反而率领大军进攻了卡普亚和拿波里。意大利南部各城市重新开启了与撒拉森的交涉，

使他有了进攻基督教同胞的口实。

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等城市在得不到皇帝和伦巴底各派势力保护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起来，谋求与撒拉森人建立良好关系。这确是事实。

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是海港城市，接近撒拉森的理由不难理解。商船的安全航行对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没有耕地的阿马尔菲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卡普亚是内陆城市，老是受到伦巴底系的贝内文托公国的觊觎。这块名为“卡普亚伯爵领地”的独立领土，逃脱不了被贝内文托公国吞噬的恐惧。于是，战胜伦巴底人的想法逐渐扎根，他们试图投向撒拉森人。人被逼到生死边缘，人种、宗教的差异也许就成为第二层次的了。这些人都拥有健全生活，不是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

如果卡普亚站到了撒拉森一边，罗马教皇便会陷入危险。从罗马向南去的大道，不论是亚壁还是拉提纳，都要经过卡普亚。古罗马大道虽然在中世纪也被弃置，根本得不到修缮，但因为没有建设其他的基础设施，仍然还是最好的交通手段。一旦卡普亚伊斯兰化，就等于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

教皇约翰八世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靠不住，在公元877年，即发出前述信函的第二年，沿亚壁大道南下，在明图尔诺与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的代表见面，目的是说服他们不要与伊斯兰结盟。教皇说道，要想对抗伊斯兰势力，基督教方面只有团结起来。但是，代表们默不作声，教皇的话音只不过是被当作耳旁风。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最终也没能得到他所期待的不与伊斯兰结盟而与之对抗的答复。非但如此，拿波里的执政官赛乔辞别教皇回去后，让人逮捕了反对与伊斯兰建立良好关系的急先锋阿塔纳西奥主教，挖去他的双眼并把他扔进了牢房。

没有一个人响应教皇拼死的请求，听从他的说服。而撒拉森海盗一直继续着野蛮的暴行。教皇被迫做出选择，是把宗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信徒的痛苦置之不理，还是为了哪怕是暂时的拯救而把耶稣基督暂放一边。

教皇选择了后者。他以一年之内不得掠夺意大利西海岸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罗马教廷铸造的2.5万枚银币。

在此以前，叙拉古、拿波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都曾有过花钱买平安的事，但还从来没有过西欧基督教之首的罗马教皇与伊斯兰海盗做交易的先例。

如果回到公元877年，我们去问居住在当地的人们，首先向伊斯兰屈服的是君士坦丁堡还是罗马，我想更多人的回答会是罗马。意大利半岛在9世纪后半叶的任何时候被伊斯兰化都已不足为奇。终于，西西里发生的事件使这个判断更为确实。

叙拉古陷落

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的行动始于公元827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已结束在望。西西里主要城市只有恩纳和叙拉古尚在基督教手中。城堡恩纳矗立在山顶之上，一个市民向伊斯兰方面密告了上山的秘密通道，恩纳随即陷落。最后只剩下了叙拉古，这是一个把突出于海上的海岬整体打造成为要塞的城市。

然而，在被视为北非伊斯兰教徒首都的凯鲁万的埃米尔看来，不能控制叙拉古就等于没有征服西西里。既然宣布并开始了圣战，如果不能完全征服，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圣战也会失去威严。

即使不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来看，位于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也

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曾经发生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即是始于对西西里的争夺。不拿下叙拉古，就不能完全称霸西西里。

进入中世纪以后，叙拉古的重要性并未改变。这个时期，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岛屿的正式统治者还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西里是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土。总督官邸也设在叙拉古，肩负防守西西里全岛任务的拜占庭军队也驻扎在这里。征服了叙拉古，地中海西部的拜占庭势力也就被一扫而光。

此外，叙拉古具有自古以来不可小觑的知名度。譬如没有见过地中海的北欧人，哪怕不知道巴勒莫，也会知道叙拉古。攻陷叙拉古，意味着在心理上给基督教世界一个重大的打击。

凯鲁万“酋长”新任命因战斗果敢而崭露头角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担任西西里“酋长”。不知是否是为了纪念征服西西里之行50周年，他还把攻克叙拉古大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交给了贾法尔。

贾法尔来到已经成为伊斯兰西西里首都的巴勒莫上任。他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气力。

他向西西里并且向北非全境发出号召，征募志愿者。同时，他让人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对于伊斯兰武将来说这些器械非常罕见。贾法尔大概认为灵活使用攻城器械会有助于那些不善进攻有城墙的大城市的伊斯兰士兵。

巴勒莫城里立刻成了一座大兵工厂，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人头攒动。时间紧迫，到处都在忙着赶工。这给日后的贾法尔带来了灾难，但进攻叙拉古的准备工作却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时节已经入夏。公元877年，在开始征服西西里行动的第50个年头，士兵们高举圣战旗帜，骑着战马，带着攻城武器从巴勒莫出发，杀向最后残留的叙拉古。

叙拉古也在奋起防卫，似乎已把曾经用堆积如山的拜占庭金币做交换，让伊斯兰撤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连同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叙拉古共有2万居民。能够打仗的士兵人数不详。从已投降伊斯兰的城市和要塞撤退而来的士兵约有1万人。在修士狄奥多西奥后来编写的《编年史》（Chronicon）的记载中，却没有关于本该常住在叙拉古官邸的“总督”的叙述。说不定他在公元877年春天伊斯兰明确攻打意图时，就离开了叙拉古，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向皇帝搬救兵去了。总之，在长时间的攻防战期间，“总督”这位防御总指挥一直没在叙拉古。

但是，并不是没有人担任防御战总指挥。总指挥是位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修士狄奥多西奥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说起指挥官，还有一位名叫尼凯达的队长，他经常厉声激励前线士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尼凯达也是希腊的塔尔索人，这时已失去家园。圣彼得与圣保罗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两大支柱，圣保罗就出生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塔尔索。对基督教徒而言重要无比的圣人出生地，也已伊斯兰化了。

叙拉古攻防战，就这样似乎成为伊斯兰与奋起抗击的已基督教化的希腊之间的战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也是希腊人僧侣。这回拜占庭帝国倒像认真考虑派遣援军了。一个不断衰退的国家，特点就是作决定很慢，决定的事情实施起来也很慢。进攻海港城市叙拉古，一定要实行海上封锁。攻占这个城市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伊斯兰方面既没有封锁海上，也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拜占庭能够快速决断并付诸实施，就能使援军在叙拉古尚能顶住敌人猛攻的期间到达。打防御战的人只能依靠援军的救援。

中世纪后期尚不能使用大炮轰击，遑论使用飞机轰炸。在这样的时代，进攻坚固城墙环绕的城市，其难度远非我们后人所能想象。

在没有火药的时代，所谓攻城武器的效果也可以想象得到。发射球

形石弹的目的是破坏城墙，发射点着的火球的目的是杀伤城内的人。然而在中世纪，决定这些武器命中率的技术水平远逊于古罗马。不独伊斯兰方面，基督教方面也是一样。所以，大城市攻防战的结果取决于下面几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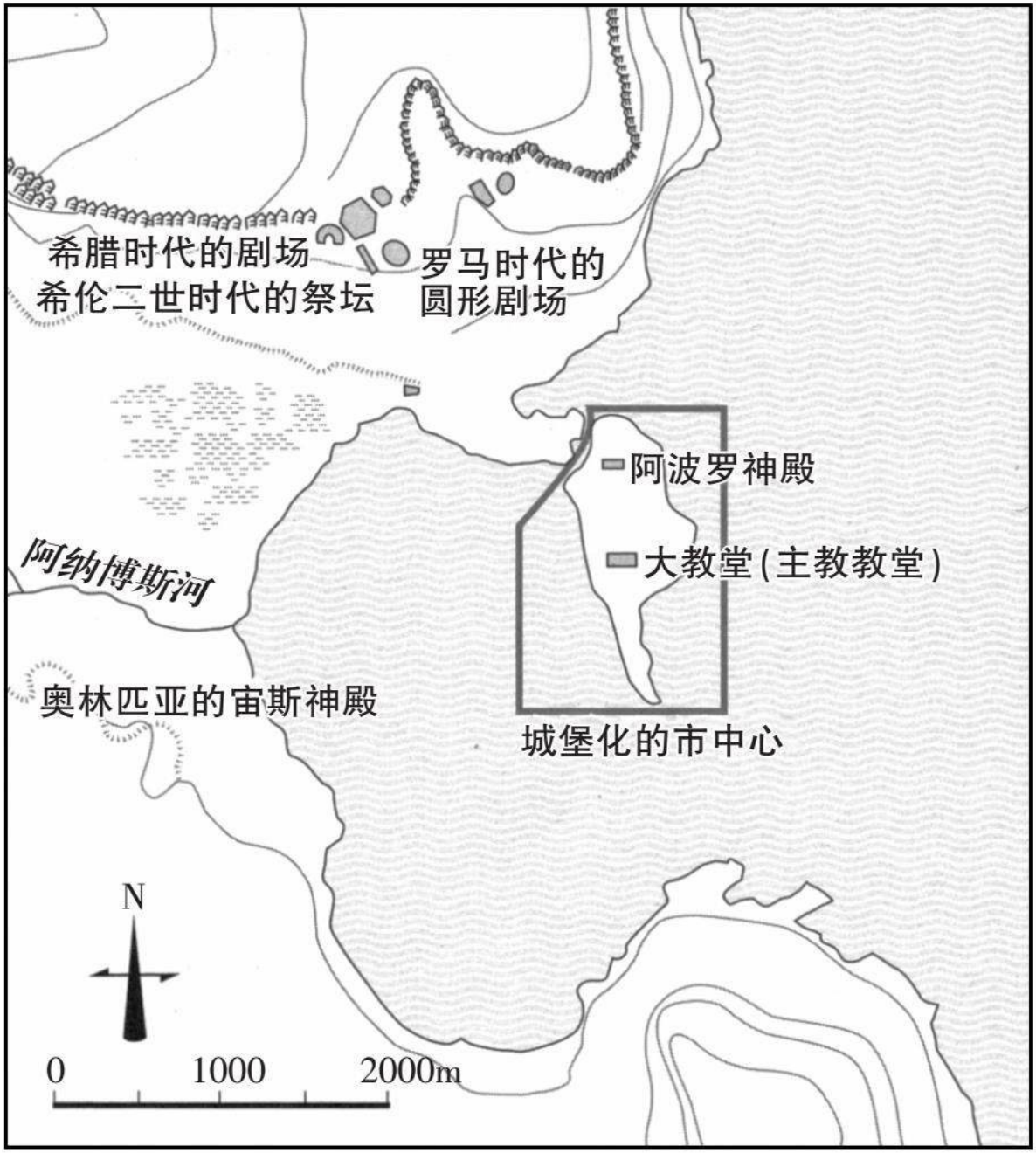
第一，防御方须在人和物两个方面拥有经得住持久战的足够力量。

第二，进攻方须持续拥有能将城市围困得如铁桶一般的力量。

第三，进攻方是否受到瘟疫、恶劣天气等灾害的影响。

第四，防御方翘首以盼的援军能否到达。

在公元877年的叙拉古攻防战中，叙拉古具备第一项条件；伊斯兰方面不具备第二项条件；这第三项条件，伊斯兰军队过去经常遭到瘟疫的袭击，有很多因此而撤退的先例。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援军能否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次动了真格的消息传到了叙拉古。



叙拉古

这次奋起守卫叙拉古的人们不是殉教者。殉教者往往会受到狂热的宗教热情煽动，而去参加抗击基督教敌人伊斯兰的绝望战斗。这次参战的是相信冷静思考也能打胜仗的普通人。

不过，当年的叙拉古有一点不足，这件事也许让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修士无法理解。这就是西西里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人为了保卫叙拉古而前来参战。

这是因为叙拉古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暴政和剥削的象征之地。对居住在西西里其他城市和地方的人来说，叙拉古是吮吸“总督”所课重税并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叙拉古以外的地方已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但人民并没有全部成为伊斯兰教徒。反抗伊斯兰的暴动也时有发生，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赶来参加叙拉古保卫战。

叙拉古攻防战开始于公元877年8月。总司令官贾法尔率领大军不断攻城。他们高唱着战死荣升天堂的战歌，高举着圣战大旗，决心坚决战斗到底。叙拉古也在坚持着。攻城军队用石弹和火球进攻，防御的士兵则用一种叫作“希腊之火”的武器回击。“希腊之火”是点火即燃的雾状喷火武器，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火焰喷射器”。他们把这种武器在城墙上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向一齐登城的伊斯兰士兵喷发火焰。

夏天转瞬过去，秋天也过去了，进入了冬季。没有援军到达叙拉古。满载拜占庭士兵的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出了爱琴海后却不再西行，而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过冬去了。

那时，只要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冬季是不打仗的。特别是进攻大城市的士兵不得不长期宿营野外。为了使他们得到休整，事实上冬季多为休战期。伊斯兰方面的总司令贾法尔也决定回巴勒莫过冬。这时，传来了基督教徒在巴勒莫近郊发动暴乱的消息。

贾法尔是进攻叙拉古军队的总司令官，也是在巴勒莫设有官邸的地方长官。镇压暴动也是他的任务之一。然而，这次他没能回到久违的官邸睡上安稳觉。他刚到巴勒莫就遭到暗杀，最终也没有查清凶手是谁。基督教方面的记录推测，这是一个嫉妒贾法尔地位和权力的伊斯兰教徒所为。不过，进攻叙拉古的行动并未流产。伊斯兰方面决定擢升名不见

经传的阿布·伊萨为进攻叙拉古的总司令官，待来年的878年春天再启战事。

伊斯兰方面虽然换帅，但战术未改，还是人海战术。因温暖而一下子变得干燥的西西里的气候，给进攻的一方带来了运气。可能是受到安拉的眷顾，这次没有发生常常使伊斯兰军队痛苦不堪的瘟疫。历史上没有这次攻防战的详细记载，现场的唯一证人狄奥多西奥是一位修士。他可能对人们的悲惨处境敏感于心，但对战斗展开的战略战术却毫不关心。我们后世之人便无从知晓当时的战况。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以下这些情况。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军粮和兵力充足，没有遭遇到坏天气和瘟疫的不幸，可谓条件优良。然而事实却是耗时9个月，他们才最终攻下叙拉古。

防守的叙拉古方面则军粮告罄，城内满是病人和伤员，甚至无处可以掩埋尸体，始终见不到援军出现于水天之际。他们在这种状态中坚持了长达9个月的漫长时光。起初的几个月里，城墙被破坏后，当天夜里居民就会全体出动修复。但转年之后，前线的人逐渐减少，可以说战斗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敌人一步也未能踏入叙拉古这个建造在海岬上的城堡城市。

终于，坚固的城墙也有几处被攻破，却来不及修复。居民们在坚持战斗。他们知道，如果投降不是被杀就是去做奴隶。伊斯兰方面把抛掷石弹和火球的攻击集中到了夜里。白天，满脑子想着叙拉古城里财富的撒拉森人攻击城墙坍塌的地方，晚上休息。晚上，攻城武器又开始上阵。叙拉古城内的人日夜得不到休息。

5月20日，距攻防战开始已过去了9个月。这天夜里，敌人的攻城武器不知道为何一直沉默着。南国的初夏之夜在恐怖的寂静中度过。

21日天刚破晓，伊斯兰方面动员了所有士兵，动用了所有攻城武器，发起总攻。防卫者已无力应对敌人的全线总攻。撒拉森人开始从各处入城。根据狄奥多西奥修士的记载，撒拉森人蜂拥而入，像恶魔一样狂叫着，手里挥舞着绿底白色月牙旗，赤裸着双脚，浑身污秽不堪，只有眼睛像野兽看到猎物一样闪着光芒。

不论是士兵还是市民，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他们见人就杀。叙拉古城内的地面自古都是用平整的石头铺成，路面因石头上流淌的鲜血而打滑，拖住了逃跑人的脚步。

在海岬的前端，有座高塔可把大海尽收眼底。9个月以来一直担任守卫战总指挥的拜占庭贵族和手下70个奋战的叙拉古权势人物躲进塔里，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是，全城都陷落了，孤立的一座塔不可能幸免。他们最终投降，全部做了俘虏。西西里首屈一指的城市叙拉古有地位高于主教的大主教。大主教索弗洛尼奥和三位神职人员躲在叙拉古的主教教堂里。他们也被抓获。这三位神职人员中就有《编年史》的作者狄奥多西奥。

叙拉古在陷落的当天被胜利者掠夺了整整一天。叙拉古美丽富饶，历史上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它被称为地中海的珍珠，难怪撒拉森士兵抢红了眼。仅仅因为待在撒拉森士兵闯进去的房子里，人们不抵抗也会被杀。

第二天，全部俘虏被押到中央广场，士兵和市民被两边分开。屠杀随即光天化日之下开始。

第一个是那位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他的罪名是对伊斯兰以刀相向的首领。

根据狄奥多西奥的记载，这位希腊人贵族听到死刑判决后面不改色，沉静地毅然赴死。这使得宣布他死刑的总司令阿布·伊萨也很惊

讶，撒拉森人过去一直侮辱嘲笑“没有信仰的狗”，他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被切断喉管。

接着，连续处死了70位叙拉古的权势人物。这些人也都慷慨赴死，面对死亡的态度丝毫不逊于希腊贵族。

死亡，也降临到了9个月以来共同战斗的士兵身上。他们被驱赶到广场中央，绑着手脚一个挨一个地坐下。撒拉森士兵对他们枪刺棒打，反复不断，最后把他们送到枯草丛生的山上，周围点上火活活烧死。

狄奥多西奥唯一记下名字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塔尔索的尼凯塔。尼凯塔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嘲笑冲过来的伊斯兰士兵说：老子是狗，那你们是什么东西？每当此时，撒拉森士兵都恼怒地还他一句，打下叙拉古一定要让你享受特殊待遇！伊斯兰士兵没有食言。

出生在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队长被作为留到最后的乐趣。他最后才被拖到广场中央，仰面按在地上，捆住四肢，等待着他的是东方式的酷刑——活剥人皮。

活剥人皮，做不到只剥皮，要连皮带肉地撕下来。撒拉森士兵用枪去刺暴露出来的内脏，再用枪尖把内脏挑出来满广场乱抛。揪出心脏的士兵用牙齿撕碎了再啐出来。人们不知道塔尔索的尼凯塔是何时候断气的。他的遗体和被集体烧死的士兵的遗体一道，被暴尸弃置，直到胜利者撤出叙拉古。

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仅是城市陷落时叙拉古的死者就已达到了4 000人。果真如此的话，活着逃出来的大概没有几人。这仅有的人中有几个乘坐藏在港内的船逃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向停泊在那里的拜占庭军舰队报告了叙拉古的陷落。这个舰队是派来救援叙拉古的，但却以过冬为由推迟出港。这时，传来了叙拉古陷落的消息。救援军司令官得知后，便率领舰队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叙拉古在古代作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而发祥，后来强盛繁荣，甚至受到雅典的敌视。柏拉图曾经访问过这里。这里还诞生了阿基米德。如今，叙拉古也落入了伊斯兰之手。当时的负责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应对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距离比君士坦丁堡近得多的罗马教皇也不会不知道叙拉古遭到进攻。这个时代的通信手段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是，这可是一场围绕地中海中心西西里最重要城市的攻防战，而且，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

9世纪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是黑暗的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无论大小，都与伊斯兰控制下的西西里和北非进行着通商贸易。有关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些人传到西欧。其中阿马尔菲在意大利半岛的大客户是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修道院不归当地主教管辖，而是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知道的事情不会不传给罗马教皇，而且也应该会通过罗马教皇传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

总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要人全都知道这一切，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无论把天然的要地打造成怎样的要塞，援军不至，早晚也会陷落。

叙拉古陷落的消息在凯鲁万卷起了欢乐的旋涡。这里在伊斯兰化之后俨然已成为北非圣都。征服西西里全岛的圣战目的已胜利达到。市内挤满了感谢安拉的人，埃米尔命令举行特别庆典。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比圣战的胜利更能证明他们所信宗教的正确了。

在叙拉古，胜利者正在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伊斯兰教徒讨厌膜拜上帝和圣人画像的行为，认为这是圣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要把教堂改成清真寺，首先需要破坏上帝和圣人的造像。叙拉古的主教堂是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同时，用奉献给异教的雅典娜女神的神殿改造而成的，现在又要改建成清真寺。

叙拉古在罗马时代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帝国基督教化

之后，也许是因为存在太多无法全部破坏的缘故，在叙拉古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希腊文化遗产。伊斯兰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但还有一些留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因而那次破坏也并不彻底，只是破坏了他们所能看见的而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的神祇。

据说所有这些一直到7月才结束。掠夺破坏、改建教堂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些不光是胜利者所为，俘虏也为此做着劳役。

后来，胜者和败者全都去了巴勒莫。败者被用绳索和锁链绑成一串儿，从东到西横贯西西里，走了六天时间。

到了巴勒莫以后，俘虏被分为两组。大多数人的一组被作为奴隶卖掉，少数人被投入牢狱。狄奥多西奥修士是这少数人之一。牢房是地牢，在14级石阶之下，昏暗潮湿，肮脏不堪。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黑人罪犯、阿拉伯人等一股脑儿关在一起。关进来以后，狄奥多西奥才知道，大主教索弗洛尼奥也被关在这里。大主教和其他入狱者一样手脚都被铁锁链铐着。

8月12日是伊斯兰教的节日。居住在巴勒莫的撒拉森人要求“地方长官”火炙大主教，以表示对安拉的敬意，但其他伊斯兰教徒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手拿《古兰经》反对说，伊斯兰法律禁止人身作为供品。于是，大主教索弗洛尼得以继续他的牢狱生活。

这位大主教最终是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还是拒绝改教而殉教，不论是阿拉伯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都未留下记录，也没有他死在牢里的记录。说不定他被作为一张牌留了下来。从这时开始，伊斯兰对西西里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明晰。伊斯兰对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的统治渐趋独特，至少有别于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这是一种独特的共生路线。

人们最恐惧的不是文明的侵蚀，而是军事的侵蚀。文明的侵蚀，人们可以不喜欢不理解从而不接受，但军事上的侵蚀却不能就此了事。这

样的事不用说，人们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叙拉古陷落以及西西里全岛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意大利半岛和法兰克南部的人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恐怖。

西西里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附近撒丁岛的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顺便说一下，日本九州的总面积是4.2万平方公里，四国是1.9万平方公里。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岛和第二大岛撒丁岛的面积小于九州，大于四国。和九州、四国都没有“岛”的感觉一样，西西里和撒丁也不太给人以“岛”的感觉。但西西里和撒丁仅仅在这一点上与九州、四国相类似。

在现代，这两个岛都是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游客来访。两个岛气候温暖，风光秀丽。周边大海呈现的颜色不能用“蓝色”这个字眼来形容，而是一种深蓝色。游客在这两个岛上的游兴不一样。在撒丁岛，划艇和海水浴是主要的愉悦项目。而在西西里岛，除此以外还有漫步，参观各地的2000年以前的古代遗迹以及这个岛屿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留存的教堂、市政厅、宫殿和别墅。一句话，西西里“历史深厚”。而撒丁岛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时代飞跃。进入19世纪以后，一种以“大旅行”[5]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的旅行形式流行起来，欧洲各国富家子弟也为习得教养而纷纷赴南欧旅行。西西里是他们的必访之地，而撒丁却很少有人涉足。

顺便一提，19世纪欧洲各国逐渐流行精英和精英后备军赴地中海各地游历的做法。那时，伊斯兰海盗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伊斯兰海盗依然出没于地中海，北欧富家子弟就是绑架后勒索巨额赎金的最好对象，这种个人游历就不会流行。

让我们把时代的时针再次拨回来，接着叙述。即使在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也已经有足够厚重的历史了。希腊人在叙拉古建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种“厚重的历史”可以提高漫长岁月中积累起来的

人类技能水平，提高对这个时代而言特别重要的港口和造船厂的建设和整备水准，发展出最重要的造船和航行技能。占有了西西里就意味着拥有了所有这一切。这就是可以把西西里而不是撒丁称为航空母舰的原因。“航母”西西里完全被伊斯兰统治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冲击，其原因也在于此。

身在罗马的教皇约翰八世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比其他任何人都敏锐。前一年付了2.5万枚银币买来的“安全”已经过了约定的一年。公元879年春，撒拉森海盗重新开始扫荡教皇的领地。对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南部、中部乃至北部的人们来说，和平与安全只是词典里的词语。伊斯兰夺取西西里，兹事体大。

教皇把这些基督教羔羊的困境写信告诉了应负保卫这些羔羊职责的意大利王查理三世、法兰克王以及德意志王。教皇对每位国王都加了一句诱惑的邀请：如果您能率军南下，解除撒拉森对意大利的威胁，我就将在罗马为您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三人都接受请求来到意大利，教皇又该怎么办呢？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三位国王都未理睬教皇近乎哀求的请求。他们光处理各自国内的纷争就已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打击伊斯兰海盗。

教皇对北欧各国国王感到绝望，又向在意大利南部各地拥有领地的伦巴底人各位大公发出了呼吁。但大公们此前多次败在撒拉森人手下。再具诱惑性的辞藻，对他们也不再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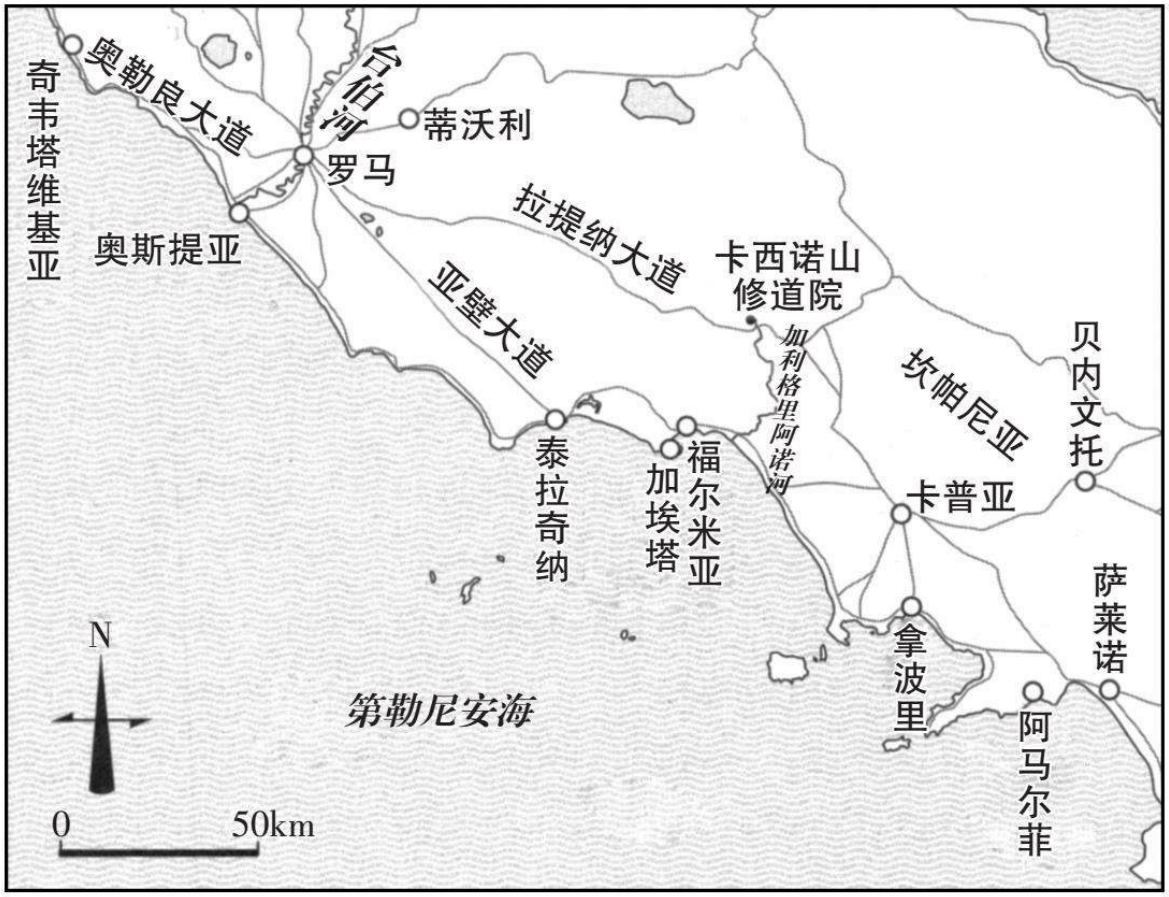
教皇还呼吁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萨莱诺等罗马以南的海港城市加入抗击撒拉森人的同盟。然而，这些海港城市在叙拉古陷落之前就与巴勒莫的“酋长”有通商关系，所以让他们参加同盟的先决条件是撕毁这种通商条约。

教皇命令他们毁约的说法是，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保持通商关系只对敌人有利。可是，通商对这些海港城市也有利。加埃塔、拿波里和萨

莱诺都没有遵从这一命令。

唯一有反应的是阿马尔菲。在这些坎帕尼亚的海港和通商城市中，阿马尔菲已经把贸易渠道扩展到了地中海的东部，也许更能接受风险。这个时期的阿马尔菲的商人们积极而大胆，把地中海东半部分也作为了贸易对象。看到现在美丽小巧的观光地阿马尔菲，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成了威尼斯商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但是，阿马尔菲也是建立在商人的合议制基础上的以通商立国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在与北非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的贸易中获利。与撒拉森海盗开战，同样会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虽然因为与东方的贸易活跃，并不会牺牲全部利益，但的确也要牺牲相当部分。不知是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对现状彻底绝望，教皇承诺向阿马尔菲提供1万银币，作为抗击撒拉森海盗的军事经费。这样，阿马尔菲共和国应该撕毁与北非和西西里“酋长”的协约，把阿马尔菲的加莱船组建成军事舰队，担负起第勒尼安海的海上巡逻责任。



意大利中部

就在这个协定即将签字时，阿马尔菲方面提出了异议，说约定的银币不是1万，而是1.2万。阿马尔菲代表与教皇之间为此甚至起了争执。阿马尔菲坚持不让步。他们不知通过教廷的什么人了解到，前一年教皇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2.5万银币，得到了一年不侵犯的承诺。也许阿马尔菲人认为，自己都已牺牲了与地中海西部伊斯兰世界通商的利益。最终，教皇与阿马尔菲的共同作战体制胎死腹中。

教皇越发绝望，甚至去信给根本靠不住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巴西尔派来了小规模舰队，在海上刚遭遇撒拉森海盗就吃了败仗，狼狈地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教皇对把自己屡次号召当作耳旁风的拿波里感到恼怒，对拿波里的

实力人物处以开除出教的处分。开除教籍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严重的处罚，但对这个时期的拿波里人却毫无效果。

公元882年，教皇约翰八世去世。为民众的悲惨而落泪，对统治者的自私而愤怒绝望了10年之后，他走了。教皇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杀害的。他大概是碍到了某些人的事。无人知道这某些人究竟是谁。中世纪前期罗马教皇的处境相当危险，还经常面临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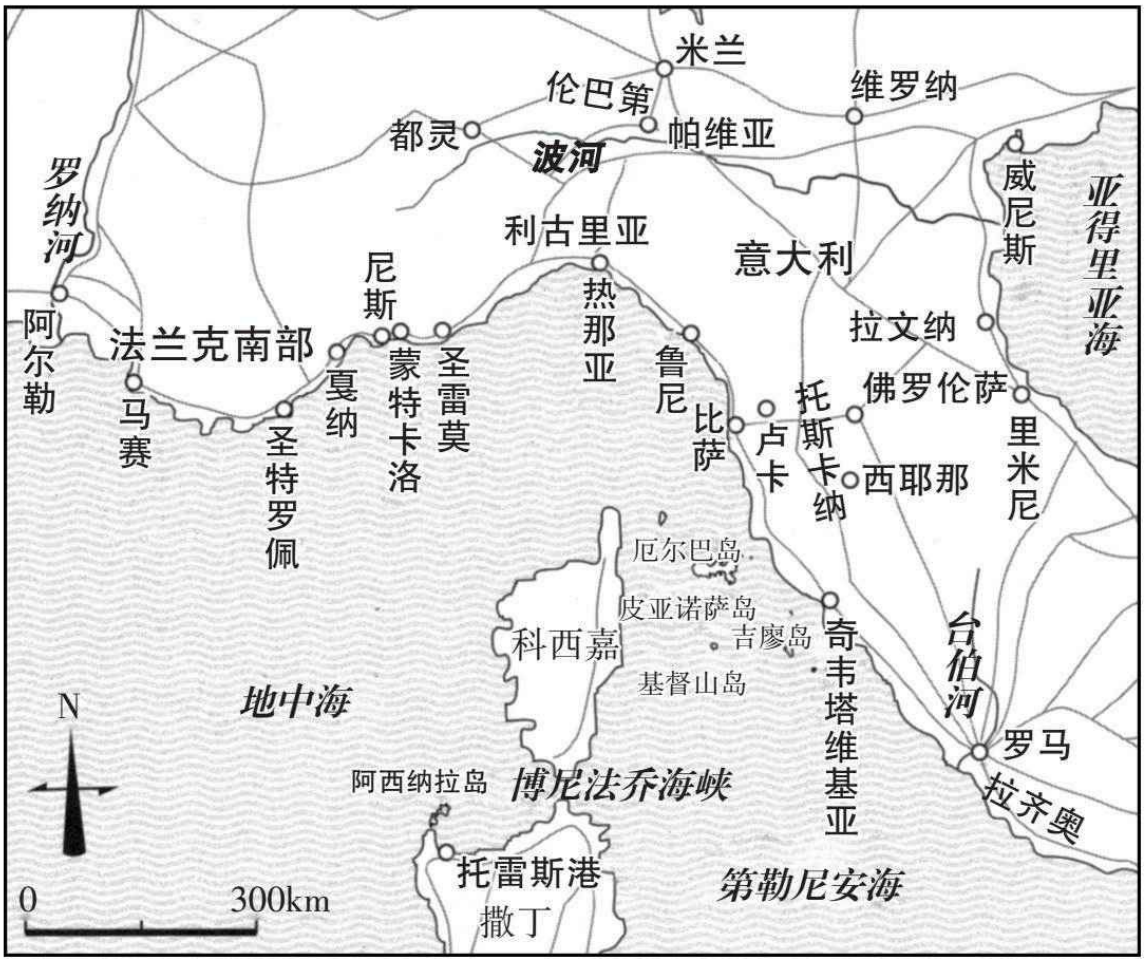
自约翰八世被害到公元914年约翰十世即位，32年间共有13位教皇死亡。教皇是终身制的，这种情况大可说是处于无领袖的状态了。同时代欧洲各国也是王位交替频繁，但只是政局不稳而已。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抵抗伊斯兰方面非但不团结，反而一直在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纷争浪费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已经完全化作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意大利南部也不再有阻挡伊斯兰的基督教势力了。撒拉森海盗可以自由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拥有可以转变为战力的海上力量，但他们更加重视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贸易，而不是与之打仗。

这个时期的一切事情都令人心情黯然，唯一的捷报大约就是总算把伊斯兰军队赶出了教廷领土内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可是，这唯一的捷报与撒拉森人同年夏天于加利格里阿诺设置基地的消息相比便算不上有分量了。

加利格里阿诺河注入第勒尼安海，入海口一带因河名而被称为加利格里阿诺。河口附近的河边不仅可以隐蔽船只，还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两条连接罗马和意大利南部的古代干道，一条是到达同一海湾内的福尔米亚，然后转上亚壁大道；另一条是溯河而上进入位于内陆的拉提纳大道。

这就是说，这里可以直通罗马。在罗马看来，大道那头总有敌人。这里还处于加埃塔和拿波里的连接线上，从这里可以切断这两个港口城市的联系，这样加埃塔和拿波里也都在有效威慑范围之内。如果进而来到拉提纳大道，还有卡西诺山大修道院，其富裕程度使得撒拉森人不论是掠夺还是以掠夺相威胁勒索，都可以保证收入丰厚。西塞罗时代，在这一带海边拥有别墅是地位的象征。那时的罗马人大概根本想不到，时代变了，不动产的价值也会改变。基督教方面在得知加利格里阿诺已成为撒拉森人的基地以后，第一次感到了这一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法兰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对北非伊斯兰教徒战略眼光的准确性感到吃惊的不仅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基督教徒。因为撒拉森海盗的危害并不止于第勒尼安海一侧，还波及了法兰克南部。有坚固城墙保卫的马赛也两度遭到掠夺，沿罗纳河稍向上游就可到达的阿尔勒也两度遭到掠夺。这个数字还只是9世纪中叶约10年间的次数。防守坚固的马赛和阿尔勒都是如此，濒临地中海的其他城镇村庄的受害便不可估量。较之意大利，法兰克濒临地中海的地方极少，但也未能逃过撒拉森海盗的侵袭。

撒拉森海盗又在法兰克南部安置了基地，位于今天的圣特罗佩附近。这里在中世纪时还沿用着弗拉克西涅图姆这个古拉丁语的地名。戛

纳、尼斯、蒙特卡洛沿着蓝色海岸（Côte d'Azur）连成一线，是地中海屈指可数的享乐之地。这里在1 000多年以前还飘扬着伊斯兰的月牙旗。

“伊斯兰之家”是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的别名，撒拉森人也有义务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圣战。拿下圣特罗佩不是为了享受日光浴，而是为了进攻内陆地区。在法兰克南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之间通有几条古代敷设的道路。进入中世纪以后没有维护保养，不能指望往日的便利。但体形矮小、适应恶劣环境、脚力扎实的非洲马扩大了撒拉森海盗在陆地上的行动范围。这样，海盗的袭击扩展到了以都灵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财物被抢掠，居民被绑架，城镇被破坏，内陆城市也并无安全可言了。

法兰克南部曾经是法兰克等北欧神职人员造访教皇所在地罗马的通道。走海路有落入撒拉森海盗魔爪之虞，中世纪前期的人尽量选择走陆路。但现在陆路也变得危险起来。这拉大了罗马教皇与北欧基督教各国国王之间的距离，通信也不易往来。

“和平”，不光是保障安全，还有缩短横亘在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效用。中世纪前期，时代往前走了，但人们之间的距离却比古代拉得更大。只有撒拉森海盗是例外，他们来往于地中海西部，好似走在自己家中。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约翰十世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基，做了罗马教皇。他成为教皇之前一直担任拉文纳的主教。他也许可以通过意大利北部更加了解北欧国王的想法。这就是说，他心里非常明白，依靠这些人，意大利无法摆脱撒拉森海盗获得自由。

教皇约翰十世倡议建立十字军。中世纪的人们有虔诚的信仰。在这悲惨而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时代，能依靠的只有上帝。教皇宣布要亲自率兵抵抗伊斯兰，人们纷纷志愿参战，虽然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惯于使用武器。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约翰十世针对月牙旗打出了十字旗，却不单为宗教热情而挥舞，他定下了具体目标。教皇亲自统率十字军的目标是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

在实际军队指挥者的人选上，教皇也只看重是否具备武将的能力，而不看其他方面。队长名叫贝伦加里奥，经历复杂。这个人过去非但不以伊斯兰教徒为敌，反而总与基督教徒打仗。约翰十世重视能力的做法，在攻取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夺回撒拉森船进出频繁的加利格里阿诺，不能缺少海上战斗力。具有这种力量的近邻国家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教皇也知道，这三个海港城市与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教皇却没有逼迫这三个海港城市撕毁与伊斯兰的通商协定。他没有理会这些事情，只是坚决要求他们加入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的十字军。

这支抵抗伊斯兰军队就这样勉强拼凑了起来。如果不想看到十字军在犹豫和谨小慎微之中销声匿迹，就只能趁热打铁。公元916年，教皇约翰十世即位不到两年，便从罗马出发，沿亚壁大道南下。宗教领袖身先士卒，令人感到可叹可悲。责难声并未传到这位教皇耳朵里。不，教皇应该听到了，但他并未理睬。

一方高举月牙旗，一方高举十字旗，战斗持续了3个月。这3个月的前半期，双方在加利格里阿诺打仗，后半期十字军追击沿河逃往内陆的撒拉森势力。这期间教皇没有回罗马，一直留在前线。这给基督教徒增添了勇气。伊斯兰方面也打得很顽强，指挥他们的撒拉森海盗头目成功地煽起了部下的宗教狂热。

这场战役本身是局部规模的，不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战场上

的对阵双方，一方忘记了通商赚钱，另一方忘记了做海盗的打劫营生。

基督教一方获胜。撒拉森人的身影从加利格里阿诺消失了，海盗船的踪影也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消失了。夺回了奇维塔韦基亚，又夺回了加利格里阿诺，这对居住在罗马的教皇而言是件好事，北去的奥莱利亚大道、南下的拉提纳大道和亚壁大道都不再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但是，仅靠一场胜仗不可能驱逐一直给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带来威胁的撒拉森人。非常幸运的是，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原来时有发生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摩尔人的内部纷争，即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纷争连续爆发。这些纷争发生后，北非各地连续发生暴动。暴动期间海盗们便关门歇业。

这一时期的北非内部纷争持续了数年。这期间除了意大利南部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享受到了和平。既然这样，那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建立防卫体系，以防敌人的下次袭击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基督教世界再次分崩离析。拜占庭帝国甚至以每年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的代价，与撒拉森海盗缔结了停止袭击拜占庭商船的协定。但这个协定没有得到遵守，拜占庭白白付出了这笔钱。

教皇约翰十世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又活了10年，于公元928年被杀身亡。这位教皇大概又成了什么人的绊脚石。中世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前期，担任教皇是要豁出性命的。

---

[2] 原文为Amir，译者根据情况在此译为“地方长官”。Amir通译“埃米尔”，也可根据不同情况译为国王、大公、总督、酋长、头人等。——译者注

[3]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作战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译者注

[4] 日本谚语，原文为“窮鼠猫を噛む”，犹言“困兽犹斗”、“狗急跳墙”。——译者注

[5] 大游行（The grand tour），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这是旧时英国贵族子女绅士教育

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通过周游欧洲列国接受广泛的文化教养。——译者注

间奏曲 某种共存

“伊斯兰的宽容”

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这就使巴勒莫的“酋长”心生厌恶。站在他的立场上，理由并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续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动，只有开始时是依靠突尼斯所派兵力进行的，后来的军事行动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所为。

第二，这些人虽然多为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已经厌倦了北非经常爆发的柏柏尔人、摩尔人等新伊斯兰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稳定因素很复杂，不光是“原”与“新”的差异，也不仅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宗派之间的抗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这一时代已经极为炽烈。

第三，他们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兰教徒统治方法的启发，这一点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者是叫“埃米尔”，还是叫“哈里发”，他们与北非同辈的关系都相当淡薄。

第四，西西里虽是岛屿，但其面积足可匹敌突尼斯“酋长”统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积而用生产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说西西里还在北非

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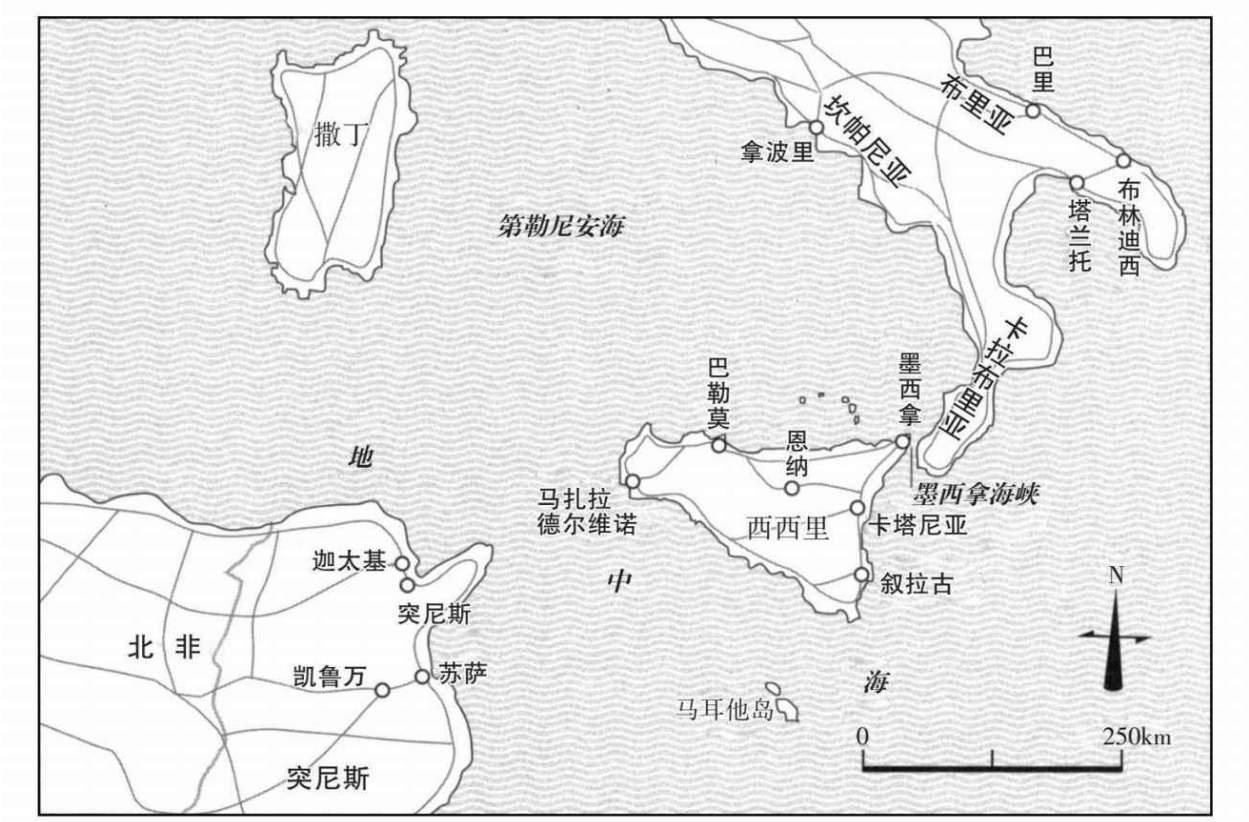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代，虽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农产品，但重要程度却远不及同时代的突尼斯。在古代，说起非洲几乎就是指突尼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有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农业和商业，特别是有从非洲内地运来的黄金，使其具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被视为北非要地。

可是，北非在帝国末期被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征服，后来又遭受拜占庭帝国的连连恶政，到了公元7世纪归入了伊斯兰统治之下。罗马式思维已死，被誉为帝国粮仓、繁盛的农业已死。居民没有活路，遂使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化为海盗的巢穴。

而这个时期的西西里躲过了北方蛮族的袭击，没有成为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战争的舞台，所受拜占庭帝国恶政的影响也小于其他地方，走过了一个比较安泰的时代。当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与改信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后，他们所要统治的是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古风的基督教徒，统治方法有所改变亦属自然。

常驻巴勒莫的“酋长”不知玩弄了何种计谋，巴勒莫的“酋长”不再由凯鲁万和突尼斯的“酋长”任命，而改由巴格达的哈里发直接任命了。从突尼斯到巴勒莫只有一两天船程，而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传到巴勒莫的时间无法与之相比。上司所在越远，受命行动之人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长”似曾一度僭称“哈里发”，他对西西里的统治已经具备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教徒对西西里的征服，从公元827年开始到878年叙拉古陷落结束，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当然，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并没有等待叙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叙拉古陷落之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条统治路线就是伊斯兰方面自画自赞的“伊斯兰的宽容”，并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及其周边

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把另外一个一神教基督教徒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殉教者。就是说，没有人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个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次，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当同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叙拉古遭到了进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却几乎无人赶来参加保卫战。保卫战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发反伊斯兰起义也不足为怪。趁统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举行起义，是被统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过起义。

叙拉古是过去拜占庭帝国恶政的象征，不愿意为救援叙拉古而卖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叙拉古防卫成功，整个西西里也不会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西西里全岛几乎都已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当时的叙

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个月的保卫战期间发生了起义，大概也不过是对伊斯兰统治的反弹，而不是要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这一连9个月，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最后，西西里屈服于伊斯兰统治之后，来自于此的袭击“鲁米”（直译为“罗马人”，意译为“基督教徒”）之地的海盗行动几乎绝迹。实际上，“鲁米”也已从这时起，开始区别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称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盗为业的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则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

西西里在归入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以后，甚至享受到了不优于却也不亚于古罗马的繁荣。这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方法之所赐。那么，这种统治方法的支柱“伊斯兰的宽容”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在现代，正像“伊斯兰各国”的说法那样，伊斯兰教徒也分国别。非伊斯兰教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原本不存在国家这个概念，只有涵盖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斯兰之家”的概念。

可是，没有国家概念会有一件麻烦事——无法征税。税收是国家为代行国民个人无法办到的事情所需要的费用。国家的意义不存在了，税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在伊斯兰国家，无法征收始于古希腊城邦、完成于罗马帝国又延续至现代的“国税”。

这种情况在实际层面上使人非常困惑。纵使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仍然是一种居民共同体。

《古兰经》也承认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有可能征“税”。这就是向伊斯兰教徒征收的唯一税种，名为“扎卡特”（zakat），其意义却不同于希腊、罗马式的税。“扎卡特”直译的意思是“富人为净化见穷人饿死而不救助所感到的悔恨之情”而解囊。因而，“扎卡特”不是被课而缴，而是一种自发捐赠的行为，这与基督教世

界的慈善相同。与基督教世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不通过国家相似，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以援助贫穷伊斯兰教徒为目的的慈善事业团体，捐赠也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的。现代基督教国家认为钱款从这些团体流向了恐怖分子，但即使向贫困伊斯兰教徒提供援助的团体与恐怖集团有牵连，在逻辑上也无法指摘。

我们先不谈这一问题，且把话题拉回到中世纪前期的伊斯兰世界。“扎卡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以“净化悔恨之情”为目的的自发行为，就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设定税率。可是，如果钱款进项不确定，就不可能制定救济贫民的福利政策，也不可能使之组织化。此外，穆罕默德还认可另一种税收。

这是一种向战败者即被统治者课征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税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忠实实施。但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近东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没有改教的多为犹太教徒。这种税在东方专以犹太人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税种在征服者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征收，犹太人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坚守自己信奉的宗教并生存下去，就要拿出收益、收入的一半。按伊斯兰的说法，这是非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之家”中得以“容忍”的“代价”。也许有人认为50%的高税率实在没有人性，但在中世纪前期这个时代，却未必可以这样说。

罗马帝国也有向被统治者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10%。但是在中世纪，自耕农要向封建领主和同样是大地主的修道院支付税金，尽管因土地所有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超过50%。这是因为古代的税制“广而浅”，到了中世纪演变为“窄而深”，也是因为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为首的免税对象变得越发庞大，社会上不纳税人数多于纳税的人数。

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看来，这个50%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伊斯兰教中只要纳税就认可“异教徒”的存在，基督教中却不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连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都不认可，遑论“异教徒”。

在西西里，征服当初，大概是圣战狂热过了火，对失败者的处置过于残酷，对被征服者的这种税收也实施得极为严格。所以，在首先被伊斯兰征服的以巴勒莫为中心的西西里西部，起义时有发生，也有大批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改信伊斯兰教，不但可以免重税，也不会再有被当作奴隶卖到北非的危险。

我因此想象，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统治者后应该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既然要淡化与北非的关系，朝独立的方向迈进，最好不要发生被统治者的起义和暴动，避免给北非以派兵的口实。

第二，如果西西里只有伊斯兰教徒，那么面向非伊斯兰的这种税就征收不到。净化对穷人悔恨之情的“扎卡特”即使收进来，也不能挪作行政和军事费用。

可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找到了非常现实的统治方法。

首先，决定不奖励被征服者西西里人改信伊斯兰教，相反鼓励他们不改宗教。

当然，要向这些人征税来作为“容忍”他们存在的代价。通过把地租税和人头税分开的方法，做到实质上减税。

地租税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拉吉”（kharaj），税率是耕地收入的10%另加课于动产家畜头数的2.5%。对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征收这种税。

人头税只向居住在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征收。人头税，在阿拉伯语中叫“吉齐亚”（jizya）。人头税的征收对象也并非全体基督教徒。妇女、儿童、身体残疾者、乞丐、奴隶免交此税，其课税对象仅限于成年男子。

人头税不是等额征收，而是按财力分上中下三等，各等级所缴纳银币数目不同。下面记录的是以“迪拉姆”（dirham）银币为单位的一年纳税数目：

上等：48枚

中等：24枚

下等：12枚

迪拉姆银币由3克白银铸造而成，搞清它在中世纪的价值非常困难。当时的白银绝对要比21世纪的今天贵重。正因如此，撒拉森海盗才更要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基督教的弥撒及其他祭典所使用的圣器几乎全是白银制成。

由于这样的情形，想要知道1 000年前银币的货币价值近乎不可能。如果只是想大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如下。假定在2008年11月这个时间段，1克白银为0.5欧元弱，1欧元合125日元，那么：

上等：144克白银=72欧元=9 000日元

中等：72克白银=36欧元=4 500日元

下等：36克白银=18欧元=2 250日元

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只会说这太“便宜”了。但在那个时代，价值说不定10倍、20倍于此。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不人性的。这是基督教徒

为了在伊斯兰统治下也能坚守信仰生活下去的“代价”。对伊斯兰方面来说则是“容忍补偿金”。

阿拉伯人称此为“兹因玛”（dhimma），是“保护”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本意是“容忍”，只说“保护”是相当虚伪的说法。在罗马那样的多神教世界可以直接称为“保护费”，但在一神教世界，“保护”的意思也成了“容忍”。但如果想到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存在，而在这里付钱即可，也许这种“伊斯兰的宽容”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要问基督教徒支付了“容忍补偿金”，其境遇是否就会与伊斯兰教徒一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基督教徒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承认，财产也受到保护，但他们必须忍受几个方面的不自由。他们终究只是“二等公民”。

严格禁止向伊斯兰教徒说教基督教教义。

禁止新建教堂。

禁止在基督教节日上街游行，教堂不得鸣钟。

禁止携带武器行走。在家可饮葡萄酒，但禁止在人前饮用。

基督教徒必须在家门上打上某种“标记”，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些标记的内容。

严禁与伊斯兰教徒通婚。

在路上遇到伊斯兰教徒时必须避到路边让路。

这些禁令即使不从近现代尊重人权的理念来看也是非人道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使人感到屈辱得不堪忍受。暂且不说很早就被征服、据传已有300多座清真寺的巴勒莫，就连征服行动前半期归入

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据说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西西里东部，墨西拿、卡塔尼亚、叙拉古这些古希腊时就有的城市较为集中，这里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未改教。可以想象，在周围尽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中，这些禁令也不会带来多少不适。不是吗？路上与伊斯兰教徒邂逅的概率几近于零。非但如此，受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反而多占了便宜。

伊斯兰·西西里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农业形态从大规模农庄转为了中小规模的自耕农。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农业一直是主要产业。罗马时代的西西里有着大规模的农庄。农庄的合理运营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粮仓的主要原因。进入中世纪以后，在生产效率方面有所下降。尽管没有受到北方蛮族的侵略，也没有受到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危害，西西里的农业还是衰落了。

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广泛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这一制度避免了耕地的分割，但却使农庄经营僵化。世袭而代代重叠，使经营者极其自然地成了守业者。想要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只要继续生产以前所生产的产品即可。在西西里，自古以来的主要产品就是小麦。

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新统治者以后，似乎强制推行了伊斯兰阿拉伯式的继承法，其理由不得而知。这是一种把继承权传给所有儿子而不仅是长子的继承制度。

大农庄制度因此骤然崩溃，中小自耕农变成了西西里农业的主人公。在早期纳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农田因农庄主及其家人被杀

而成为无主土地，很多阿拉伯人便把这些农田据为己有。这个继承法看来也适用于这些伊斯兰教徒。所以在西西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并无区别，一同进入中小自耕农时代。这带来了诸多好处。

第一，农庄主本人开始直接参与农庄运营，可以关注到细节。

第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了自由竞争的环境。

第三，阿拉伯人农庄主带头从东方引种了许多新品种。

第四，这无疑也是阿拉伯人积极主动所为——西西里引入了东方的灌溉方法，中世纪东方在这方面绝对先进。

第五，农业要繁荣，必须保证下面几个条件：安全与和平得到维持、流通与市场的网络功能正常。

由于以前袭击掠夺的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和贸易，安全与和平便以极其自然的形式得到了保障。

流通与市场网络方面也不成问题。北非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已经伊斯兰化。西西里拥有这样的广阔市场，还有乘着南风或东南风几天即可到达的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不久以后，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也会加入这股基督教势力。

被伊斯兰统治后的西西里既不用担心海盗登陆，也不用担心在海上遭到撒拉森海盗船袭击。西西里的船已成为伊斯兰船。如果袭击西西里船，撒拉森人就不再是自诩圣战一翼的“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而是纯粹的“海盗”（pirate）。在伊斯兰的法律中，对这种罪犯的处罚也相当严厉。

在伊斯兰阿拉伯时代，巴勒莫已明显成为西西里的中心。10世纪造访巴勒莫的阿拉伯人旅行家留下了以下叙述。

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位于大海之滨，面积大于阿尔福斯塔特（现开罗旧城区）。城市根据功能分为几个地区。由于使用瓦和石灰，很多建筑物的颜色红白相间。城里有水路，各处的喷泉喷着水花。城内还有宽阔的运河，名为瓦底·阿巴斯河（Wadi Abbas，现奥莱托河），水车数量很多。由于水源丰沛，这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城市有很多清真寺。市场位于郊外，除星期五外连日开放。市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区。这一切使得全城充满活力。城墙环绕着城市，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出，出城后的道路通往西西里全岛。

——阿尔·穆卡达西（Al-Muqaddasi）

同一时期遍游西西里的地理学家也留下了以下叙述。

整个西西里岛因其美丽富饶被誉为地中海的珍珠，的确名副其实。西西里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举世无双，为不同的统治者所钟爱。

现在的西西里，旅行者来自各国，贸易商人云集，他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西西里的重要性和它的美丽，羡慕与岛上居民进行贸易的收益。西西里的这些利处，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吸引力。

西西里历史所拥有的魅力，会给亲眼见过她的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昔日辉煌的遗迹，不同的时代统治者留下的业绩都遗留至今。如今西西里的统治者，只要想到自己是这些古老统治者的继承人，心里一定会感到自豪。

——伊本·豪卡特（Ibn Hawqat）

这位伊斯兰教徒似乎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不同，对希腊和罗马的异教文明并不排斥。

阿拉伯人不仅在西西里的首都巴勒莫建设了贸易中心，还从厌恶拜

占庭帝国的禁锢而逃到波斯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并移植了所有他们知道的哲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已不顾圣战大义，停止了袭击掠夺基督教徒。他们决定在西西里生产，并将其作为生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全部移植过来。他们已把西西里当作了自己的家，所以非常热心地要使家里舒适。

他们最热心的是移植农作物。我在这里制作了一份一览表。看了这份表，人们大概可以理解后世欧洲人在《你可知晓那遥远的南国》[6]的歌中所讴歌的西西里其实是阿拉伯人所创造的。在一览表中，除了农作物以外，我还加进了一些语源为阿拉伯语的一些词汇。大家一定能通过这些了解到，伊斯兰阿拉伯的影响决不限于9世纪至11世纪伊斯兰统治时代的西西里，后代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

汉语	日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德语
柠檬	レモン	laimūn	limone	citron	limón	lemon	Zitrone
橙子	オレンジ	nūragia	arancia	orange	naranja (*or* anaranjado)	orange	Orange (*or* Apfelsine)

汉语	日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德语
砂糖	砂糖	sukkar	zucchero	sucre	azúcar	sugar	Zucker
茄子	茄子	bādingiān	melanzana	aubergine	berenjena	aubergine	Aubergine
藏红花	サフラン	Za‘frān	zafferano	safran	azafrán	saffron	Safran
洋蓟	アーティチョーク	kharshūf	carciofo	artichaut	alcachofa	artichoke	Artischocke
（玻璃）蒸馏器	（ガラスの）蒸留器、ランビキ	alambig	alambicco	alambic	alambique	alembic	Destillierkolben
年鉴	歳時記	al-manah	almamacco	almanach	almanaque	almanac	Almanach
海军将军	海軍提督	amīr al（－bahr）	ammiraglio	amiral	almirante	admiral	Admiral
天蓝色	紺青色	lāzwardi	azzurro	azur（*or* bleu）	azul（*or* azul claro）	azure	Himmelblau
海关	税関	dīwān	dogana	douane	aduana	customs	Zollamt
茉莉花	ジャスミン	jāsāmīn	gelsomino	jasmin	jazmín	jasmine	Jasmin
鲁特琴	リュート	al－‘ūd	liuto	luth	laúd	lute	Laute
仓库	倉庫	mahāzin	magazzino	magasin（*or* entropot）	almacén	magazine（*or* storehouse）	Magazine（*or* Lager）
笔记本	手帳、メモ帳	taqwin	taccuino	carnet（*or* calepin）	agenda（or carné）	notebook	Notizbuch
价目表	料金表	ta‘rīfa	tariffa	tarif	tarifa	tariff（*or* rate）	Tariff（*or* Gebühr）
巅峰、顶点	天頂、頂点	samt	zenit	zénith	cenit	zenith	Zenit

然而，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阿拉伯数字。这是基督教世界引进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礼物。阿拉伯人在印度学会了这种类型的数字，并带到了地中海世界的西方。这种数字现在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所使用。

1—Ⅰ

2—Ⅱ

3—Ⅲ

4—Ⅳ

5—Ⅴ

6—Ⅵ

7—Ⅶ

8—Ⅷ

9—Ⅸ

10—Ⅹ

50—L

100—C

500—D

1000—M

这就是9世纪到11世纪的西西里，它不是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母，而是地中海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出入西西里港口的不再是海盗船，而是商船。在西西里安定下来的伊斯兰教徒已不再是海盗。事实上，在西西里，甚至在巴勒莫都没有被称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而这种收容所必定存在于同时代的北非主要港口。把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廉价劳动力也是冒着遭到迎头痛击或海难死亡的风险绑

架而来，如果有别的生路这事就不划算。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找到了“别的生路”。

中世纪也有奴隶。与古代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基督教徒不能把基督教徒作为奴隶，但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伊斯兰教徒不能把伊斯兰教徒作为奴隶，但可把基督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信奉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作为奴隶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回溯到1 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西西里并不存在名为“浴场”的奴隶收容所，尽管这时西西里已经属于伊斯兰世界。这件事值得特书一笔。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和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经常遭到基督教世界的责难，原因是这些国家与西西里有贸易关系，并将这种贸易关系优先于参加罗马教皇呼吁的对伊斯兰战争。但是，伊斯兰统治下的西西里并不从事海盗业。

他们在一旁冷眼看着伊斯兰圈内的北非依然继续着海盗业，自己却没有同流合污。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勇敢地反抗袭击他们国家、绑架他们同胞、阻拦他们商船的海盗。不，可以说，出于防御海盗的需要，这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具备海军力量的海洋国家了。

地中海的奇迹

阿拉伯人在西西里的统治持续了200年。公元1072年，西西里被诺曼人征服。

诺曼人征服了英吉利以后在11世纪处在活跃时期。诺曼人从法兰西西北部的诺曼底到英吉利相距很近，但到南欧西西里的距离却很远，新统治者诺曼骑士的数量很少，这是西西里的幸运之处。人少使他们变得现实。虽然被同属基督教的诺曼王朝统治，西西里却没有多大改变，纠正的只是坏的一面。

新统治者也是基督教徒，以前200年间西西里的基督教徒所忍受的“二等公民”的处境自然不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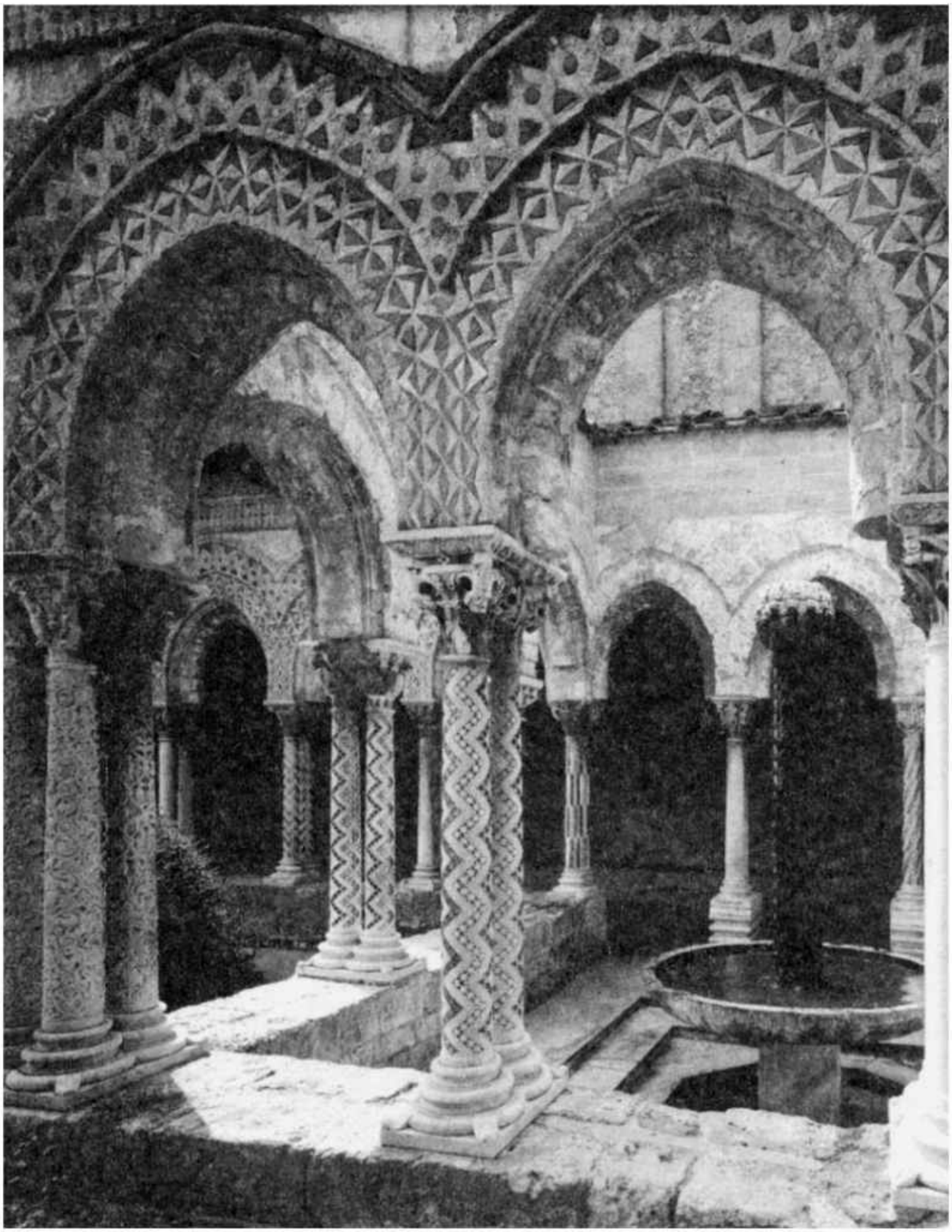
不需要再缴纳只向基督教徒征收的“吉齐亚”人头税了。

建造新教堂、在基督教的节日里上街游行、在钟楼上连续敲钟，这些都可以不必顾虑而堂堂正正地去做了。

诺曼人统治者并未让已沦为被统治者的西西里伊斯兰教徒沦为“二等公民”，只是把巴勒莫的主要清真寺恢复为教堂。清真寺本来就是用基督教教堂改建成的，这不过是与字面一致的“恢复”。其他的清真寺则都保留下来。保留清真寺意味着认可伊斯兰教徒可以不加改变而生存下去。人头税具有“容忍异教徒存在”的意味，但也未向伊斯兰教徒征收。诺曼的统治者反倒积极利用这些伊斯兰教徒。

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可用“勉勉强强”形容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共存社会，这时以更接近理想的形式实现了。

西西里东部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全部生存下来，叙拉古是其象征性的城市。蒙雷阿莱则是进入诺曼时代以后仍有众多阿拉伯人居住的西西里西部城市。造访过叙拉古的图奥莫和蒙雷阿莱的大教堂的人，一定会表示首肯。



蒙雷阿莱大教堂的回廊

图奥莫是叙拉古的大教堂，恢复成基督教教堂之后完全看不到阿拉伯的色彩。这里在作为教堂之前是古代神殿。这段历史至今仍旧给人以压倒性的冲击感。叙拉古让人感到，不论是作为基督教的地盘，还是屈服于伊斯兰，它都背负着古希腊一路走来。

而在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的大教堂，不论从正面看去基督的镶嵌画有多么巨大，没有人感受不到教堂整体装饰所体现的浓厚阿拉伯色彩。著名的回廊完全是阿拉伯式的。这是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全面配合诺曼国王建设其所教堂的结果。

这两个教堂是我在全部意大利教堂建筑中最喜欢的五处中的两处。叙拉古的图奥莫就像古希腊的雕像，没有丝毫冗余，全体飘荡在静谧之中。只有最小限度的物件，却让人感受到其丰富无比。第一次造访这里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希望想要一个具有这种感觉的书斋。

相反，蒙雷阿莱的大教堂则投入了所有的色彩，而这一切却能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罕见的美感世界的榜样。尽管因为过于愉悦，使得精神难以集中而不适合于做书斋，但它却最适合于做工作结束后休憩的起居室。

让你二者挑一，你一定会感到纠结。因为如果说前者是镶有粲然生辉的一颗大钻石的戒指，那么后者就是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珍珠等搭配绝妙、做工考究的项链。要是我，大概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回答："两个我都要！"

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建筑式样在研究家中被称为"西西里阿拉伯式样"，但按照这个式样建造的建筑物却不局限于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统治曾经达及意大利南部，所以在拿波里以南至今尚有众多遗存。让19世纪北欧旅行者为之倾倒的"那遥远的南国"，不光是毫不吝啬地洒向南国的阳光、地中海湛蓝无垠的大海、芬芳的柠檬和橙子。意大利语中称为"sicuro arabo"（安全的阿拉伯）的"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的房屋和别

墅，在北欧人的眼中也都颇具异国情趣。甚至可以说，如果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没有了阿拉伯色彩，对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这里也就不会再是他们所憧憬的地方了。

十字军仅重要的远征就有8次，其中仅有一次，有人未杀一个伊斯兰教徒就拿下了圣地耶路撒冷。这个人就是腓特烈二世，他是诺曼王朝的一位国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带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在西西里。文明史家布克哈特评价说，他是打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界限的人物。但如果没有前面叙述的西西里，就不会有腓特烈这位考虑并通过与伊斯兰领袖的和平谈判征服耶路撒冷的人。顺便提一下，中世纪后期在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种也是在他统治时代的巴勒莫点燃的。

在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实现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共存状态，在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后依然持续着。

“伊斯兰阿拉伯统治”：公元827年—1072年

“诺曼—霍亨斯陶芬统治”：公元1072年—1266年

如此，这种情形至少延续了400年。

德意志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被得到罗马教皇支持的法兰西系安茹王族取代之后，这个时期打上了休止符。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因西西里民众大起义而遭受挫折。这次起义因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西西里晚祷》而闻名于世。然而，取代被赶走的法兰西人进驻西西里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

法兰西人比意大利人受到基督教化的地方更多。西班牙人又比法兰西人更加基督教化。西班牙人统治后的西西里，最先消失的是清真寺。经历了400年已经完全西西里化的阿拉伯人，与其逃至如今仍操海盗业

的北非，不如选择改信基督教。

于是，地中海的奇迹消失了。西西里作为地中海一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宣告结束了。在西西里点燃火种的文艺复兴精神，在相距遥远的佛罗伦萨结出了果实。

---

[6] 这首歌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昂布罗瓦·托马（1811—1896）于1866年根据歌德小说创作的三幕歌剧《迷娘》中的一首咏叹调。歌曲歌颂了意大利南部的优美风光，表达了思恋故乡的情怀。——译者注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西西里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勉强实现了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共存的局面，但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对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而言，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就是圣战的成果。征服西西里之后，圣战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指向了与西西里隔海仅3公里的意大利南部。

话虽如此，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高举大旗进行的圣战与海盗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海盗行为具有走向全面称霸的前哨战的意义，还是一种使同胞活命的产业。也许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已经没有必要出去干海盗的营生，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撒拉森人仍有此必要。

从9世纪末到10世纪，狂飙席卷般的撒拉森海盗暴行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但要问其他地方是否就能安身，回答则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从北非港口出发向东北航行可以抵达的所有海岸及其腹地，都不能免于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是因为地中海中央盛行西南风和西风的缘故，尤其在夏季。

只要能借助这股西南风，人们就可以完成下列航行：从奥兰和阿尔及尔出发可以到达法兰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从布杰（Bougie）和博纳（Bona）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从突尼斯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从的黎波里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半岛长筒靴状的脚尖的卡拉布里亚

和脚踵处的布里亚。与现代的情况不一样，夏季刮起西南风和西风，人们就不能享受日光浴。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虽然西南风有时会吹来撒哈拉沙漠的沙粒，但这风带来的不是夏季，而是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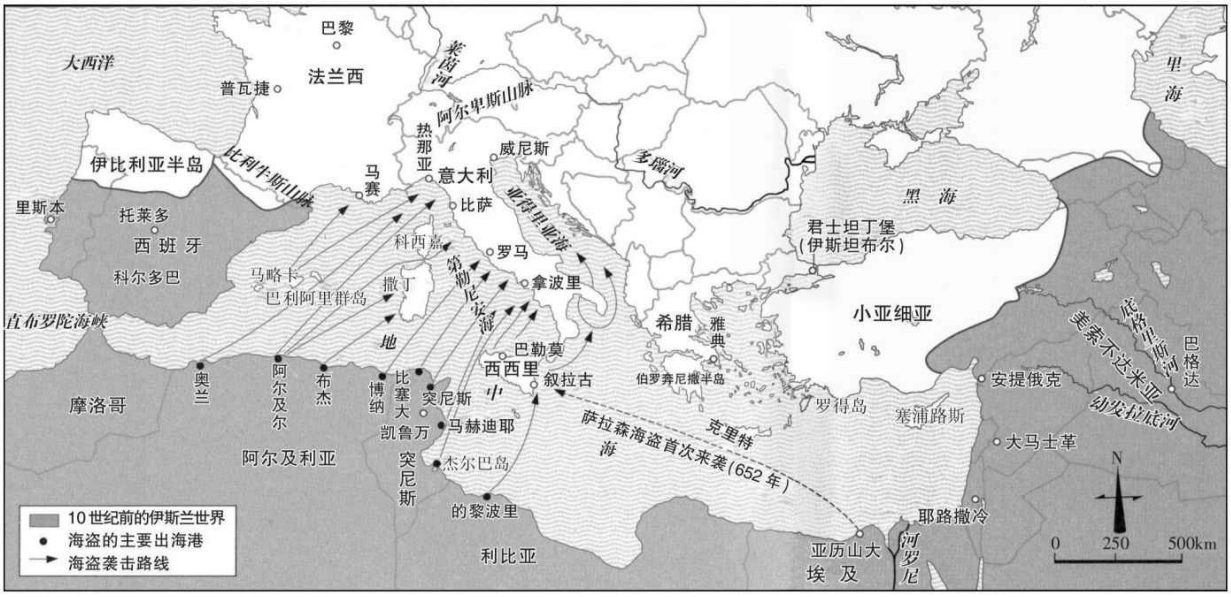
海盗们并不缺乏危急时的避难港。西西里尽管已经不再是海盗船的出港地，但伊斯兰教徒还是可以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岛上无人的洞穴和沙滩使用起来都很方便。除这几个岛以外，第勒尼安海上还散落着诸多中小岛屿。拿破仑被流放的厄尔巴岛是中等大小的岛屿。像小岛中的基督山岛，只要划着小船绕岛一圈，便可以知道那里是海盗的理想巢窟。我在想，大仲马为了创作《基度山伯爵》可能到实地考察过。

这就是地中海的中央海域第勒尼安海。如果想在这里安全航行，放心捕鱼，得以安眠而不被“撒拉森塔”的警报惊醒，就只有使用海军力量夺取制海权。

然而，不用说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世界大跃进的8世纪，就连9世纪和10世纪，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事实上也一直在伊斯兰一方。

没有制海权，不仅敌人会在海上为所欲为，还会有敌人自由登陆，甚至入侵内陆腹地的危险。公元882年发生的惨案，不仅使第勒尼安海附近地方，就连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内陆深处的人们都毛骨悚然。

亚平宁山脉像脊梁骨一样自北向南贯穿意大利半岛。沃尔图诺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注入第勒尼安海。河的上游有圣温琴佐建立的名为“圣温琴佐·阿尔·沃尔图诺”的修道院，属于本笃派，是圣本笃建立的意大利南部著名的卡西诺山大修道院的小兄弟。这两座修道院都没有幽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而是紧傍着人间社会，忠实地践行着圣本笃的思想，在信仰和实际生活方面，积极指导居住在周边的人们。



撒拉森海盗的主要出航地及其袭击路线

卡西诺山在拉提纳大道这条干线公路的近旁，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则位于偏僻之地，它建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盆地中。沃尔图诺河上游湍急的河水在附近流过，自古因产良马而闻名。这里是萨摩奈族的发源地，这个民族挡在罗马征服亚平宁半岛的途中，寸步不让。萨摩奈族骑兵让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头痛了40年之久。

据说圣温琴佐修道院的修士们也会灵巧地策马飞奔，道袍下摆在风中飞舞。还有人说，修道院同属圣本笃派，年轻的修士会被派往冬季寒冷的圣温琴佐修道院，老年时再转回气候温暖且富人际关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

公元882年秋，撒拉森海盗袭击了这座“沃尔图诺的圣温琴佐修道院”。屡屡遭到海盗袭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经常交出黄金制品以换取海盗不再掠夺和破坏的承诺。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却对海盗的这个提议不屑一顾。他们已胜算在握。

第一，他们有年轻健壮的修士近千人。

第二，他们认为，季节已到秋季，一到10月，亚平宁山中就要开始飘雪。如果能坚持到冬天，北非的撒拉森海盗就会放弃进攻而撤退。各地的修道院主导生产，这是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世界的特点。因而圣温琴佐修道院也有长期坚守的储备。

然而事与愿违。海盗也身强力壮，人数众多。即使放弃进攻，他们冬天也无处可退。撒拉森人不惧基督教徒，却怕冬季的地中海。他们想避开风雪，一开始就发起了一刻不停的总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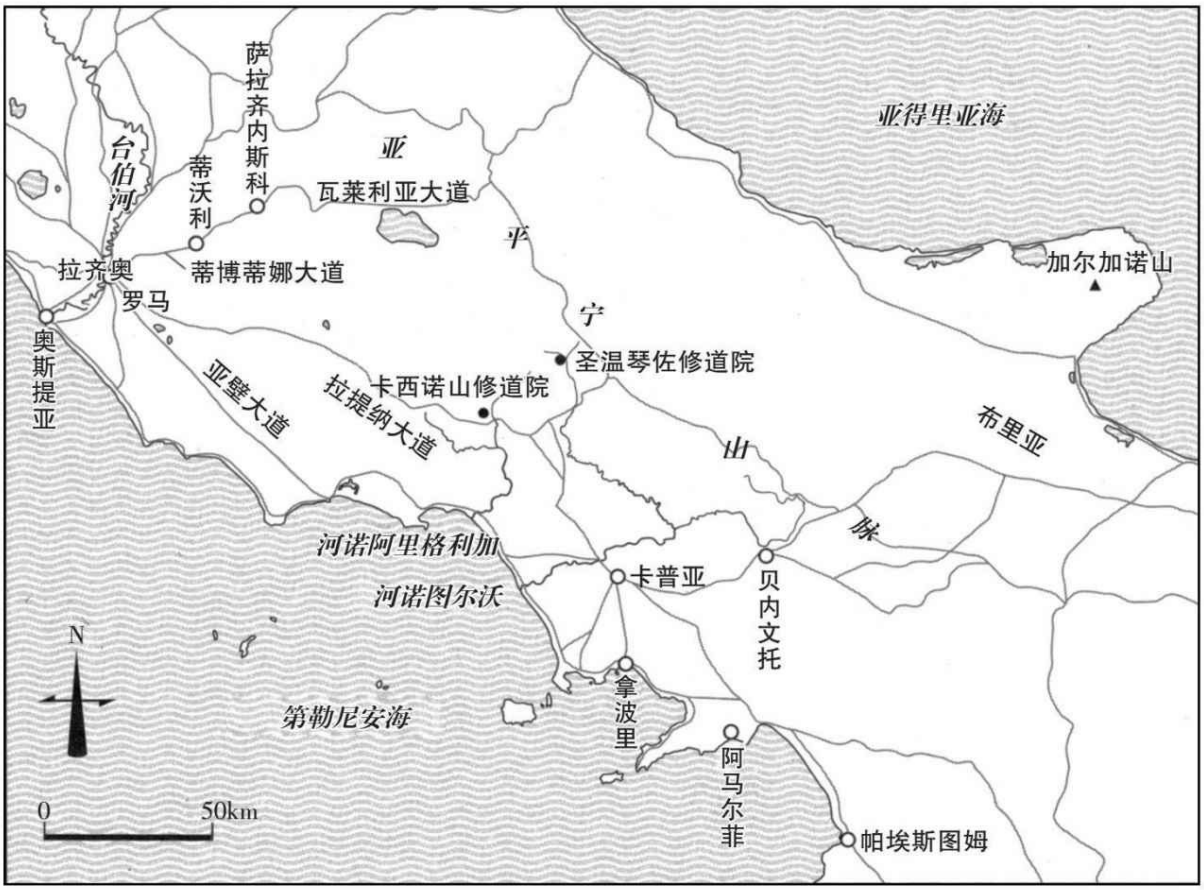
年轻健壮的修士们死伤不断。他们擅长骑马却不习惯射箭。寒冷日甚一日，10月11日，圣温琴佐修道院陷落了。

修士半数战死，余下的全被带到了海盗面前。修士们都年轻力壮，带往北非当奴隶出售应该很好。不论在农庄劳动还是当划桨手，他们都应该有相当的价值。海盗一定会把他们卖掉赚钱。

然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为基督教奉献了一生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徒开弓射箭的神职人员，已没有让他们成为奴隶的价值。修士们被捆上手脚，从桥上一个一个地被投进沃尔图诺河。下游的农民们藏在河边，努力救起冲下来的修士。可是，河水湍急，手脚被捆绑，修士无法躲避河里突出的岩石。据说没有一个修士被活着救起。沃尔图诺的地方志中记录着，500名修士被抛入河中淹死。撒拉森人在这里过冬，撤走时彻底破坏了修道院并将它付之一炬。不久，修道院开始重建。细水长流，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但却再未能恢复其原先仅次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就在同一时代，撒拉森海盗甚至在教皇领地拉齐奥也构筑了城堡。城堡建于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海拔900米的山岗上。古代的瓦莱里亚大道如今已成为国道5号线，撒拉齐内斯科可以俯瞰这条国道。从罗马沿蒂泊蒂娜大道到蒂沃利，在这里转上瓦莱里亚大道，越过亚平宁山脉，便可以到达亚得里亚海。通过瓦莱里亚大道人们把内陆地

区的产品运到大都市罗马，进入中世纪以后，通行量经常居高不下。在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这座山村，小路纵横交错，让人想起北非的要塞。盘踞在此的海盗看到猎物，便会驱马沿着缓缓的山脊而下，抢掠货物，绑人上山。



意大利中部

从罗马到蒂沃利有20公里的距离，从蒂沃利到撒拉齐内斯科耸立的山岗也是同样的距离。瓦莱里亚大道运送着来自内陆地区的产品。如果交通断绝就会非常不便。伊斯兰势力渗透到如此靠近的地区，对身在罗马的教皇而言，必定是一个威胁。没有人再居住在撒拉齐内斯科周边。曾几何时，罗马皇帝可以不带卫兵来往于这条大道，700年后的这个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需要，连农民也都要尽力避开这里。

进入10世纪以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公元915年，拜占庭帝国皇后佐伊代年幼的儿子摄政，她无法完全回绝仍在各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贵族的请求，向巴勒莫的“酋长”提出了订约请求。这份协约每年要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以换取海盗不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这是一个一旦进入衰退期，便收集不到准确情报的例子。拜占庭应该与北非撒拉森人缔约才对。实际上遵守这个协约的只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而时间仅有一年。巴勒莫的“酋长”已经洗手不做海盗了，承诺不干海盗易如反掌。他把钱揣进了腰包。撒拉森人得知后怒不可遏。虽然同为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毋庸赘言，既不是协约的一方，也没有拿到钱的撒拉森人当然集中袭击了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当时的撒拉森人把基督教徒鄙视为“信仰错误的胆小鬼”。他们原本以为，拜占庭是唯一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能派出阵容不容小觑的海军的国家。而这个拜占庭帝国已是这副模样，撒拉森人觉得自己在地中海西部所向无敌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有一件撒拉森人不知道的事情，使对撒拉森海盗袭击感到绝望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更加绝望。佐伊皇后拿出的2.2万枚金币，既不是皇后自己的，也不是从拜占庭帝国国库中支出的，而是常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官僚征收当地人民的特别税。可是，交到巴勒莫“酋长”手上的这份年贡只是最初一年的，以后年份的都被官僚们私吞了。如果这些钱能持续交到撒拉森人手中，他们也许多少会手下留情一些。遭到撒拉森海盗泄愤的意大利南部居民有理由感到二重三重的绝望。

时代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有一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诞辰1000周年的这一年，是上帝审判的一年。善良的基督教徒想到上帝的审判，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倾听谁的声音呢？是高叫“你忏悔吧”的主教和祭司的声音。200年前开始不断遭受伊斯兰海盗袭击，人们已跌落到贫困的渊底。这些人在被榨干的情况下，还是按照主教和祭司的意思，挤出了2.2万枚拜占庭金币。可即使这样，也并无效果。

公元925年，位于长筒靴脚踵部位布里亚的一个镇布林迪西附近的奥里亚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常驻当地的拜占庭官僚早已逃跑，但市民

中有6 000人被杀、1万人被抓往北非，其状惨不忍睹。

这里没有可以抢掠的东西，又不临海。袭击这里的目的是绑架劳动力。被杀的6 000人都是年老的男人和孩子，他们不会立即成为劳动力。北非依旧需要劳力。

第一，送往西班牙，作为兵力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作战的最前线；

第二，在市场上出售，男人用作农庄奴隶，女人用作家务奴隶，一生劳作；

第三，用铁锁链铐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

没有黄金物品可以掠夺的城镇也已无法安身。

公元930年，撒拉森海盗在位于萨莱诺南面的帕埃斯图姆登陆。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公元前6世纪时被称为“Magna Graecia”，意为“大希腊”。帕埃斯图姆从那时起就已存在，因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神殿而闻名，古代这里也被称为“波赛多尼亚”（意为波塞冬的城市）。

不论是在希腊人殖民的时代，还是在被罗马吞并后的时代，沿海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得“地利”的。可是在中世纪，这却成为“不利”之处。

由于远离基督教势力的中心，这里在罗马帝国末期排斥异教的狂风暴雨中未被击倒。但是，一旦国家丧失功能，也就不再关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护。结果，疟疾流行，人口减少。不过在中世纪前期，人们的房屋还比较集中在神殿聚集地区的周围。公元930年海盗来袭，扫荡了这片区域。

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

居民或被杀害，或被绑架，城市化作无人之境，房屋和所有的一切全被烧光。剩下的只有古希腊时代的神殿、罗马时代的街道以及椭圆形竞技场的遗迹。帕埃斯图姆就这样沉睡着，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近代的曙光。19世纪以前尚有海盗的威胁，人们不愿意居住于此。如今，作为在意大利可以感受到古希腊的历史遗址，这里名声大噪，游客很多。

中世纪前期，帕埃斯图姆不过是意大利为数众多的沿海小城之一。帕埃斯图姆的遭袭还不至于震撼整个意大利。但是，如果开始崛起的海洋商业国家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蹂躏，情况就会大不同。这事发生在帕埃斯图姆化为废墟的4年之后。

公元934年，热那亚遭到突然袭击。过去，从靠近意大利的法兰西南部，经热那亚到托斯卡纳北端的利古里亚，沿海各城市都曾遭受过撒拉森人的袭击和掠夺，但热那亚却不曾直接遭到过袭击。热那亚背山面海，金城汤池，在撒拉森海盗看来也很难对付。这一年，撒拉森人用30艘船组成船队，向这座城市袭来。

海盗突破了人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偷袭大获成功，还抢到了物品和船只。海盗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到突尼斯港。因无所作为而使海盗大获成功的热那亚不仅在临海一侧，也在陆地一侧构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墙。这一年在大兴土木中度过。

第二年夏天，撒拉森海盗再度来袭。夏季是海盗的活跃期，也是商人的活跃期。海盗看准了男人们全部出去的空隙，大摇大摆向港口奔袭而来。

如果打着黑底白色骷髅的旗子，人们马上就会认出是海盗。撒拉森海盗采用惯用伎俩，打着与热那亚关系良好的法兰西南部港口城市的旗子闯了进来。等看到船靠码头，撒拉森人下船，为时已晚。这次有很多女人被掳走。

根据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热那亚的商船队此时正向东方航行，从追上来的快船那里得知了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返航。他们袭击了停靠在科西嘉岛的海盗船队，夺回了被掳走的女人。

这个说法是否属实，现已无从知晓，但至少热那亚的男人已经意识到，光靠防守坚固已不能防范撒拉森人了。早些时候，比萨的船队也突

袭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马略卡岛。当时，西班牙附近的巴利阿里群岛已归入伊斯兰世界，这里也是伊斯兰海盗的巢穴。

与已经开始行动的意大利北部相反，意大利中部没有这样积极主动的教皇，除了比萨以外，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中。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更加糟糕，这里最近已经归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西里。

公元948年，撒拉森人袭击了与西西里只隔着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的雷焦（现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完全征服了这座古已有之的港口城市。城市遭到劫掠，但却少有居民被绑架送往北非。居民被课以与西西里一样的“吉齐亚”。这种人头税是居住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所必须支付的，也只向这种人征收。西西里有伊斯兰教徒居住，而雷焦还没有。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征服的地方，只要是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任何人都有义务支付“吉齐亚”这种“异教徒税”，甘愿受二等公民待遇。这与伊斯兰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无关。

在雷焦，有几座基督教堂很快改造为清真寺。由钟楼改造的宣礼塔（minaret）上传来宣礼师的声音，洪亮的阿拉伯语回荡不息。

“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唯一的先知！”

在意大利半岛上建造清真寺，这还是第一次。

10世纪，伊斯兰势力就这样推进了对意大利南部的渗透。也许是感觉到再也不能这样不闻不问了，正式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终于出面。公元963年，皇帝福卡斯派出的拜占庭军队与撒拉森军队交锋，拜占庭军队惨败，战斗的结果可以用“完败”一词形容。皇帝甚至向北非派出特使，签署了媾和条约。条约内容不详，但此后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尝试与撒拉森海盗进行决战。

西西里再大，即使放弃也只是个岛屿。意大利南部却与教皇所在的

罗马土地相连。罗马教皇夜不能寐，再三恳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皇帝接受了教皇的请求，于公元982年夏天率领由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半岛。

然而，这次南征的结果惨败。皇帝失去了4 000名士兵，扔下一切逃到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然后径直回北欧去了。

起来，意大利！

离公元1000年越来越近，地中海世界的伊斯兰势力已很强大，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不能与之抗衡。如果意大利半岛想防范伊斯兰的进攻，就只有意大利人自己站出来了。

公元1002年，阿马尔菲出动舰队，成功击退了进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1004年，总督佩德罗·奥赛罗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到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海港城市巴里救援，这里正在遭受撒拉森军队的袭击。巴里在千钧一发之际免于陷落。

公元1005年，比萨的舰队向蹂躏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撒拉森海盗船队发起挑战，取得了胜利。

意大利的海洋国家终于发起攻击了。他们认识到，商人为了进行贸易，不仅需要商船，还需要战船。

那么，同样蒙受危害的法兰西南部的海港城市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公元975年，他们成功地将伊斯兰海盗从圣特罗佩赶了出去，很久以前这里就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一起事件使法兰西国王决心派出军

队横扫海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从法兰西到意大利去的途中，在圣特罗佩遭到海盗袭击，被洗劫一空。在这个时代的法兰西，与意大利卡西诺山齐名的克吕尼大修道院的院长是比国王还要受到尊敬的人。贵人受害便成了一件大事，为此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古今东西都是一样。虽然普罗旺斯的百姓每天都因撒拉森海盗而胆战心惊。

事实上，肃清了法兰西唯一的海盗巢窟，对伊斯兰海盗的警惕便从法兰西要人们的脑海里烟消云散了。而且说到海岸线的长度，法兰西南部无法与意大利相比。撒拉森海盗从来不乏登陆、掠夺、绑架的地方。

海洋城邦国家出头了，海盗方面便也开始考虑对策。似乎以公元1000年为界，海盗的专业化开始明显。专业化并非要降下圣战大旗。撒拉森人不是金盆洗手，也不是用积累起来的资产投资贸易，与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竞争。

他们推广了一种海盗集团的形式，把海盗集结到一个颇有才干的头目手下。

他们还是圣战的排头兵，仍然要向盘踞地的“酋长”上缴收入的五分之一，以换取认可。

可以认为，发生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变化，在做法上给撒拉森海盗提出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方向。

撒拉森海盗历来不喜海上作战，不似希腊人那种十足的海洋民族。他们喜欢打着假旗号，靠近并袭击缺乏防卫能力的商船，或是登上防御薄弱的海岸，绑架附近的人们。

专业集团化使撒拉森海盗的这种传统倾向成为主流。对海盗集团的头目而言，手下人是很好的生产手段，也是自己长期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让他们无所事事，对所有者和经纪人而言不是有效之策。

不过，这里有的也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纵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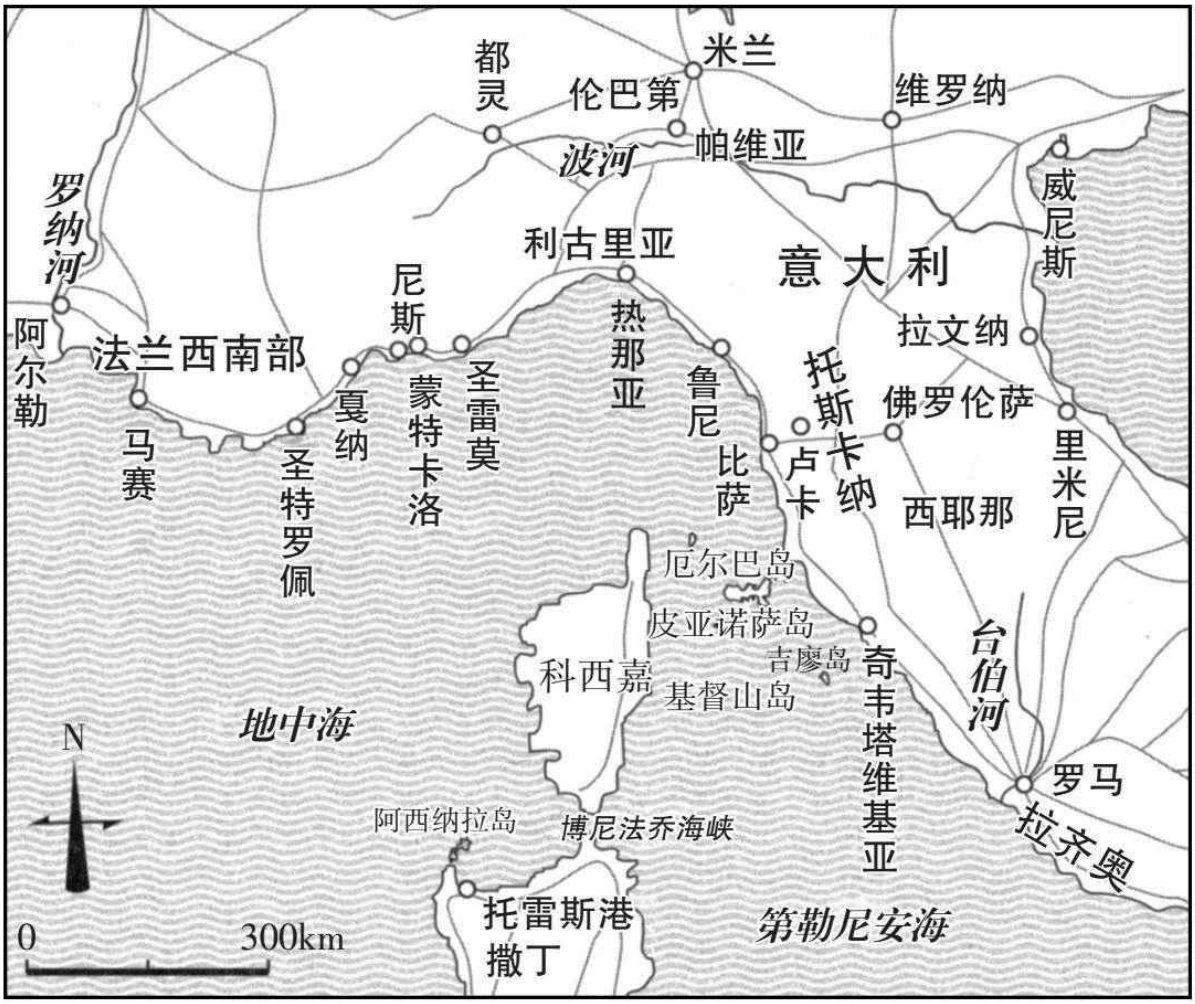
正在成长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如同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所示，有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国，这四国是贸易商人掌握国政的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个人利益极其自然地与共同体利益相一致。这一点有利于增强防卫力量。城邦国家虽小，但构成国家的人的性格倾向也不会不在国家政策中反映出来。这四个共和国各具性格，体现在海洋上，可作如下分类。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商船队几乎不配备护航船。这三个国家的海上军力多用于独立的海军行动，而较少用于护航。其做法是采取追踪击溃撒拉森海盗船队的办法来保证本国商路的安全。

相反，威尼斯共和国属于团队行动型，感觉就像是威尼斯股份公司。他们采用护航船队的方式，只要不遭到直接攻击，便不会向撒拉森海盗挑战。威尼斯的做法是通过提高商船船队所运送货物的档次来消化护航所增加的费用。重视与东方的贸易，也是因为以胡椒为主的香料价格较高的缘故。相反，运送体积大而单价低的木材和中端纺织品的商船则不派船护航，似乎在说：把命运交给老天爷吧。

在以西地中海为舞台的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大戏中，前三个国家的戏份最多，尤其是比萨和热那亚。但是，一旦必须作为国家整体与伊斯兰势力对决的时刻来临，威尼斯的存在便不可或缺。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海盗集团头目的名字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人知。这是撒拉森海盗变为专业集团后当然的结果。不过，伊斯兰教徒的名字不论是阿拉伯语还是柏柏尔语，对意大利人来说大概都很难发音。很多著名海盗的名字都用绰号。穆塞托（Muscetto）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以后灿若繁星般地涌现出来的海盗英雄的领跑者。



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穆塞托的本名似乎是穆贾希德（Mugehid），出生于伊斯兰化后的西班牙。他本该更多地袭击法兰西南部，但他可能讨厌法兰西国王出头，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意大利。从西班牙到意大利路途遥远。他把海中间的撒丁岛建成了基地。撒丁岛西北端有个港口叫作托雷斯。岛前方的海上还有一座叫作阿西纳拉的小岛，20世纪是一座监狱。这里的地形最适合于做海盗的巢窟。穆塞托的意图是以托雷斯港为根据地，蹂躏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

穆塞托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利古里亚与托斯卡纳交界处的古都鲁尼。这是让鲁尼南北两面的比萨和热那亚感到震惊的大胆行动。自罗

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鲁尼，受到穆塞托及其手下的猛攻化作一片废墟，古迹遗留至今。这是穆塞托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挑战。

但穆塞托无意与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在海上交锋。组织大船队易被发觉，他像攻击鲁尼一样，全部以小船队行动。他的战术是以小船队在海上航行，到达目的地会合后，全体进攻。这个战术的有效性在进攻鲁尼时得到了证实。

比萨海军最终没有发现海盗，并且还应教皇的请求南下，参加夺回雷焦的战斗去了。雷焦清真寺宣礼塔上依然回响着阿拉伯语的宣礼词。

穆塞托躲在海岛背面，确认比萨海军向南走远后，直接袭击了比萨港。比萨海军接到追来的快船告急，调头返回为时已晚。

物资遭到抢掠，人被绑架，市区已被烧毁。看到这些人人愤慨。比萨人也是托斯卡纳人，他们素以好强的性格而闻名。

托斯卡纳人，不论是佛罗伦萨，还是西耶那、比萨或是卢卡，城市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协调。他们不善于采取共同步调，但却都争强好胜。眼看着祖国的惨状，比萨的汉子们发誓要掐死穆塞托及其手下。

这时，罗马教皇出面了，他一直在想把伊斯兰势力赶出意大利。他在把撒拉森势力逐出撒丁岛的大义之下，提议热那亚和比萨这两个憎恨撒拉森海盗的国家并肩作战。他建议比萨海军负责穆塞托盘踞的托雷斯港北部，热那亚海军负责散布着撒拉森海盗巢穴的南部。

两个国家都响应了教皇的提议，公元1012年，比萨向科西嘉和撒丁之间的海域派出了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每条船的桅杆上都高高飘扬着比萨的国旗，如此规模堪称舰队。

舰队越过博尼法乔海峡西行不久，便在海上与前来迎战的穆塞托舰队打了起来。船船对打，意大利的海上勇士更厉害。与战斗力相比，意

大利人的控船能力更胜一筹。穆塞托舰队败下阵来，逃回了托雷斯港。

然而冬季来临。比萨人决定来春复仇，也回比萨去了。在撒丁南部，热那亚也顺利地一路横扫。比萨人带回了战利品。他们让在海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划桨手重获自由。战利品中还有穆塞托的妻子，她当时乘坐在一条船上。也许妻子的被捕使这位海盗头目决定进行外交交涉。

当年冬天，一位号称穆塞托使者的人造访了罗马教廷。这人在接待他的教皇面前把带来的一大袋东西撒了一地。袋子里装满了栗子。穆塞托的使者向教皇转达了主人的话：

“来春，将有如此众多的撒拉森人涌来‘鲁米’（住在意大利的基督教徒）所住之地。”

教皇本笃八世面不改色，向一个贴身侍从耳语了几句。侍从搬来一个大袋子，撒在了使者面前。袋子里装的是无数的小麦粒。侍从说道：

“去告诉你的主人穆塞托，我们‘鲁米’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等着穆塞托和他手下的海盗。”

中世纪，没有度量是不能胜任教皇的。

同是“鲁米”的比萨人等不及了。第二年开春刚能航行，他们便再次出航，目标直指撒丁。这一年，他们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穆塞托属下几乎所有的海盗船或是沉没，或是被焚，很多海盗被杀。他们还成功解救出被俘的比萨人。被锁链铐在海盗船上的基督教徒奴隶也获得解放，跟着凯旋的舰队一起回到了比萨，然后分别回自己的故国去了。

只有穆塞托辗转在撒丁的许多洞穴之间，没有被抓到也未被杀死。后来他逃到北非，总算躲过了比萨人的追捕。不过，穆塞托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海盗业绩大受打击，召集部下和寻找船主大概也都相当困难。这期间，他隐藏在博纳港的街区中，顽强地谋划东山再起。实际上

他以后真的东山再起，还试图夺回撒丁，真是令比萨人头痛的对手。

诺曼人到来

中世纪指的是夹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长，名称听起来也颇具讽刺意味，前期和后期加起来有千年之久。除了时间长，这还是一个纷乱至极的时代。

诺曼人征服之前的意大利（11世纪）

研究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真令人同情。群雄割据是英雄们的争雄斗勇，而中世纪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玉”少“石”多，石子相互碰撞的时代。我总认为，即使是天纵英才也不可能系统地写出中世纪的历史！

不过，也会发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有的开心事。有些历史现象我们只能认为是很少的人在很多方面撞上了好运，从而颠覆了历史。诺曼人的到来即是一例。

公元1016年，比萨人为追杀逃亡海盗穆塞托，眼睛都红了。这一年，意大利南部有一行40人的诺曼骑士来到了布里亚的加尔加诺山。加尔加诺山一直延伸到海边，这样的景致在海岸线平坦延绵的亚得里亚海难得一见。这些诺曼人从巴勒斯坦朝圣回来，顺道看看山里的一座奉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

在中世纪前期，不论是地中海东部还是西部，进攻的伊斯兰势力和防守的基督教势力之间冲突不断。尽管如此，朝圣却一直在这样的战乱中持续着。进入11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东部确立了优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虽然对立，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用墙或其他什么隔开，从而使交流完全断绝。基督教国家意大利的海港城市一直在与东方或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着贸易就说明了这一点。虽说有危险的感觉，但朝圣者还是会冒着战火去巴勒斯坦，朝圣后再回故乡。

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女人也都可以从罗马去耶路撒冷，朝圣后再返回。距离再远也是国内旅行。可是进入中世纪后，朝圣就必须通过统治者不同、信仰不同的国度。如果不是强壮而惯于使用武器的男子，便无法走完从欧洲到中东的遥远路途。为参拜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来到加尔加诺山里的，都是些身强力壮的骑士，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也不足为奇。

这一年，布里亚的实力人物也逃进了加尔加诺山，他们强烈希望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海盗统统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先是想驱逐拜占庭势力，失败后便被拜占庭士兵追捕而逃进山里。

这些意大利人向诺曼骑士提出，请他们来意大利南方，赶走拜占庭和撒拉森这两股势力之后，统治意大利南部。50年以后，发生了诺曼人

征服英吉利的著名的“诺曼征服”事件。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诺曼征服”的半个世纪之前，但进取的个性大约已在诺曼人中间萌生。从圣地归来的诺曼骑士接受了这份请求。但是，40个人太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回到故乡诺曼底后再带伙伴回来。布里亚的实力人物未提异议。

诺曼人征服后的欧洲（11世纪）

第二年的公元1017年，诺曼骑士如约而至，人数似乎从40人增加到了250人，准确数目不得而知。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也加入到这些诺曼人中间，他们首先着手从意大利南部扫除拜占庭势力。

从这一年开始到公元1019年的两年之间，双方进行了四次战斗。但参战人数如此之少，战斗还脱不出小打小闹的范畴。四次战斗的结果是诺曼—布里亚联军三胜，拜占庭军一胜。据说，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兵力因这四场战斗仅剩十分之一。诺曼骑士们的牺牲也很惨烈，人数由250人减至10人。

靠这点儿人要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势力从意大利南部赶出去，简直就是做梦。但诺曼人甚至超越了梦想，他们还要征服西西里。这种勇气称为蛮勇可能更为合适。处在上升阶段的民族的勇气真是难以揣度。但因只有10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帮助遭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萨莱诺防卫，为基督教战士取得了高分。

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花去了近20年的时间。他们得到了既厌恶拜占庭统治又厌恶身处撒拉森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人们明里暗里的合作。诺曼骑士中人才辈出，一旦有能力的武将战死，马上就有人顶上来。当初以10个人开始的征服行动于公元1037年基本结束，人们再也听不到清真寺宣礼塔上阿拉伯语的宣礼词了。

但是，西西里就在意大利南部近旁。只要西西里还属于伊斯兰，在意大利南部打拼出来的诺曼人的统治就远远谈不上稳固。不论是来到意大利的诺曼人，还是30年后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都没有回诺曼底家乡的想法，他们打定主意要在新天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公元1038年，诺曼人渡过隔开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墨西拿海峡。第二年攻陷墨西拿。转年便很快逼到了西西里东部最大城市叙拉古的城墙脚下。但是，他们在这里受到挫折，只得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南部。原因是此前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一直关系不睦，在得知西西里将要被基督教徒夺回之后，他们团结应战了。另一个原因是，已经处于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沿海城镇正在再次逐渐成为撒拉森海盗的饵食。所谓统治权，只有捍卫了治下人们的安全时才能维持。征服西西里只能推后了。

公元1061年，罗杰率领的诺曼骑士再次渡过墨西拿海峡，也只有150骑。新兴民族诺曼人的人口一定有所增加，他们5年后进行了“诺曼征服”。他们生长在北方海边的诺曼底，与遥远的南国相比，对一海之隔的英格兰自然更有亲近感。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依然很少。

就在这一年，罗杰的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迅疾前来与先行出发的罗杰汇合。他们二人率领的诺曼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分为两路，声东击西，击破了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的伊斯兰势力。然而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不论如何勇猛，仅靠这150人征服西西里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征服行动缓慢但扎实地推进着。

公元1072年，诺曼人渡过墨西拿海峡10年之后，阿拉伯人统治的西西里首都巴勒莫，在经过5个月的保卫战之后陷落了。5年之后的1077年，与巴勒莫一样居住着众多阿拉伯人的特拉帕尼陷落。公元1086年，叙拉古再度回到基督教徒之手。这个时期与征服者威廉在遥远的英格兰进行“诺曼征服”的时期正好重合。

结果，地中海世界的“诺曼征服”耗时25年。在这25年中，大概会有少量援兵从诺曼底前来。征服始于150人，也只花了短短的25年。想想伊斯兰势力从数千人开始，增加到数万的兵力，花了50年才征服了西西里，数百人花25年时间，耗时绝对算少。西西里版“诺曼征服”成功的原因可以列出以下几条。

第一，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围绕教义和统治权的内部抗争，这可以说已成惯例。西西里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不好。非但如此，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之间也并不团结。不能击退150个诺曼人，也是因为伊斯兰教徒之间屡屡发生内讧。

第二，由于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实施所谓“伊斯兰的宽容”，许多基督教徒留在了西西里。

但是，这一点起初对诺曼人产生了不利影响。西西里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还没有不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不能信任不太了解且人数很少的北方汉子。尽管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没有轻易表态。诺曼人不断取得胜利，才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这并非因为其他原因。要让观望的人站到自己方面，只有用胜利显示力量才行。总之，很多基督教徒留了下来，一定是“诺曼征服”在西西里成功的最大原因。

第三，比萨、热那亚这些拥有海军力量的基督教国家，从海上帮助了诺曼人。诺曼骑士再勇猛，也是陆上战斗力，他们很难完全称霸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是海港城市的西西里。这些深知制海权重要性的海洋国家，在军事方面给了诺曼人积极的支援。比萨甚至从海上向巴勒莫发起了攻击。

不论是比萨商人还是热那亚商人，都是阿拉伯统治下在巴勒莫开花结果的“贸易中心”的常客。但是，阿拉伯统治下的西西里虽然不往外派海盗，却让从北非北上的海盗停靠其港口。撒拉森海盗已经成为比萨和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最大障碍。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将为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就这样，西西里在时隔200年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世界。诺曼人罗杰这位西西里的新统治者确定了比过去200年阿拉伯人“伊斯兰的宽容”更进一步的路线，推行对西西里的统治，打造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共生共存的社会。这堪称“地中海的奇迹”。

不过，第一代西西里君王罗杰并不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物。这不过是一个根据需要而产生的现实性政策。不论如何，诺曼人作为统治阶级人数还太少。而必须统治的居民则有在当时被置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基督教徒和为数不少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首先，罗杰既没有杀害失败者阿拉伯人的实力人物，也没有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把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统治的意大利南部内陆的土

地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作为农庄主优裕地生活下去。当然，把内陆的土地交给他们，就使得他们不能方便地与北非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

其次，罗杰把没了头领的阿拉伯士兵编入了自己指挥的诺曼—西西里军队。这些战后处理做得十分漂亮，实在值得现代的某些国家一学。

最后，罗杰自己搬进了巴勒莫“酋长”居住的宫殿。此时这里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Palazzo dei Normanni），但观其内部，彻头彻尾的阿拉伯风格一目了然。让巴勒莫名闻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原样保留了下来。学者、商人、工匠、农庄经营者留了下来，连士兵也留了下来。清真寺甚至还回荡着宣礼词的声音。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沦为二等公民。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以更加理想的形式实现了地中海的奇迹。信仰不同神祇的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成为现实。

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不容许基督教徒以外的人生存。在伊斯兰世界，虽然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们共存，但那是因为由伊斯兰教徒提供了保护，基督教徒必须持续支付“吉齐亚”，作为“保护费”或“生存容忍费”。基督教徒被禁止在教堂鸣钟，房屋被强制做上标记，还必须遵守路遇伊斯兰教徒须靠边让道的规定。

在这些现象很普遍的时代，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天地。我在想，罗杰和他手下的诺曼人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来自欧洲北部，不像长年遭受撒拉森海盗危害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那样心怀宿怨呢？

心中怀有宿怨，就会总想着过去，从而看不到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这种宿怨所碍，才会站在古代被称为“恺撒的宽容”的立场上，实施宽容的统治政策。

基督教徒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徒的技能浑然融合的巴勒莫近郊蒙雷阿

莱大教堂是“地中海的奇迹”的完美成果。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创始人罗杰一世似乎是一位在人性方面相当有趣的人物。他甚至准备了一条礼船，把在叙拉古攻防战高潮中战死的阿拉伯人总督的遗体送到他在北非的家人那里。

他自我满足的不仅是自己的这个骑士风度的举动。接受遗体的人当中有凯鲁万的“酋长”，罗杰没有浪费这一机会。他与这位名叫塔米尔的“酋长”缔结了可称之为互不侵犯的协定，以北非诸港为根据地的撒拉森海盗不再袭击西西里。

海盗一般不会遵守什么约定，但这次尽管不很情愿却遵守了这个协定，真是不可思议。你细想来，如今的西西里已经确实成为他们难以掠夺的土地了。

虽说已被基督教徒国王统治，但伊斯兰教徒在西西里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受到了重用。他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居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伊斯兰教徒而缴纳特别税。就连在王宫工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一到每天5次的礼拜时间，就把屁股对着国王开始祈祷。

这样一来，就连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找不到认定他们是“具有错误信仰的人”而大打圣战的大义了。

由于这样的原因，起初是诺曼人的国王们，接着是通过与诺曼人公主联姻而开始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延绵了200年。这期间，这里再也没有成为圣战的战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还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和对岸的北非，以保卫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攻击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要敌视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了共存共荣的关系，尽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创这一切的正是罗杰一世。

诺曼人国王罗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居住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外地方的基督教徒陷入困境，尽管具有同样的信仰，他也不会立即拿起宝剑前去参战。连逃到罗马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的教皇求救，他也没有理睬。

这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因为刚愎自用，滥用教皇权力，并不受好评。所谓“卡诺莎之行”（l'umiliazione di Canossa）是教皇与皇帝抗争的象征性事件，震撼了中世纪的欧洲。其中一方的主人公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开除了反对自己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开除教籍是对待世俗君主的强有力武器，它的力量在于身为基督教徒的家臣没有义务再追随被开除教籍的君主。

陷入困境的亨利在大雪满地的卡诺莎城外站了三天三夜，终于请教皇取消了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写成一个最大限度发挥了教皇权力的人，被列入了圣人之列。然而，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亨利刚被取消开除教籍的处分就立即转为攻势，把教皇逼得十分窘迫。为了不落入皇帝手下的德意志士兵之手，教皇逃到了圣天使城堡。尽管身在远离抗争的西西里，罗杰对这些情况也许知道得一清二楚。

信仰相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内讧不绝，这不仅是伊斯兰教徒的拿手好戏，也是基督教徒的拿手好戏。我想，在内讧普遍的时代，仅仅是实现了异教徒之间的共生共存，就值得特书一笔。

不过，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不光是没有理睬教皇的请求，连对帮助他进攻巴勒莫的比萨也没有给予回报，可见他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彻底的。但是，由比萨人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他们的自由。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比萨曾经血红着双眼寻找的海盗穆塞托终于以北非的博纳港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又开始出没于撒丁岛的近海。此时的比萨已明确了成为海洋城邦国家的生存方针。这样，穆塞托就不再是单纯的复仇对象了。

放任海盗穆塞托，就等于允许其他众多的海盗横行。对穆塞托采取断然措施，就等于对整个撒拉森海盗采取断然措施。

一支舰队从比萨港出发南下第勒尼安海，直驶北非的博纳港，袭击穆塞托的根据地，掐住他的咽喉。

突袭作战以穆塞托一个人为目标，获得了成功。好强的比萨汉子对胆大无敌的海盗、当时已经84岁的穆塞托毫不留情，砍下了他的头颅。比萨从长年的噩梦中解放了出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场单纯复仇剧的落幕。它让撒拉森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成长。海盗们不得不明白，对手已经不再是“胆小的狗”了。西西里不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这对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以后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丁语里有一个词“consul”（领事、执政官之意）。这个词在欧美各国语言中发音不同，但在日本不知为何是按照拉丁语发音，翻译成“执政官”的。古罗马从王政过渡到共和政体时，以前由国王一人处理的国政成为由两个执政官担当的工作，日语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不过，执政官由皇帝兼任，共和政体时代的意义便淡薄了。这种现象在从共和政体过渡到帝政后也一直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consul”这个词仍在使用，但意义与古代不同，变为“领事”之意，不再指国家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而指以保护居住、常驻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为己任的国家公务员。有些词语虽然词形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变化，“consul”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是何时、为何而发生变化的呢？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始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不同之处在于，拉动共和政体的罗马的“少数人”是在土地上拥有经济基础的元老院议员，而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少数人”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也一定懂得“consul”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刚开始时会在“少数人”中选出了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来做“consul”。在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阿马尔菲，“consul”做的工作类似于首相。

可是不久，人们开始把派出去负责保护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公民的人称为“console”（意大利语发音与consul类似）。既然决定贸易立国，保护海外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必然上升。

“Consul”最早演变为“领事”意义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把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总督”（doge），把海外通商基地的负责人称为“领事”（consul）也许与此并无抵牾。对把贸易作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而言，与海外的关系是生死问题。这样一来，古代的“执政官”到了中世纪便成了“领事”。同时，“领事”还被赋予了一项“执政官”所没有的任务。

这项任务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intelligence”，即情报收集工作。

但这却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才把这项工作交给领事的。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自不必说，如果想积极开拓新的进出口产品，大量而且正确的情报不可或缺，收集情报的工作便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后来，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被认为是情报立国，并因此颇受后来自诩以情报立国的英国人的尊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贸易立国到情报立国极自然且身不由己的转变而已。记账如果不准确，店铺早晚得关门大吉。

海洋城邦国家都在北非主要港口设置了常驻领事。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在当地工作的意大利商人的环境。北非“浴场”的情况终于传遍了欧洲，而不仅是意大利。世人终于知道了基督教徒被绑架到北非，投进被称作“浴场”的强制收容所，每有工作便被带出做奴隶的悲惨状况。

此前，地中海的北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的不幸状态。首先，有贸易商人带回的情报。其次，还有海盗船划桨手因海盗船被基督教徒捕获而成为自由人，他们回到家乡后透露的情报。各教区祭司记录撒拉森海盗带来损害的信件也送给主教甚至教皇。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幸人们的遭遇并非广为人知，因为他（她）们都是无名百姓。我们这样说的证据是，撒拉森海盗在8世纪、9世纪和10世纪连续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其中有名的人物只有一人。这就是在从法兰西赴罗马的途中遭到海盗袭击，被抢个精光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时法兰西国王不仅派军队救出了这位院长及其一行，还把从圣特罗佩附近的撒拉森基地法尔西内特到海盗的老巢统统扫荡了一遍。因为受害者是重要人物，国王才出面干预。而如果是不知名的寻常百姓被掳走，不要说国王，就连“割据”的“群雄”也都会无动于衷。

我认为，所有受害者几乎是无名百姓，加之情报时断时续，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实情没有充分传到欧洲的原因。连续也是一种力量。海洋城邦国家的领事通常好像两三年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任务重要，替换的人必定赴任。这样，他们得以向各自的国家传送连续的情报。

领事们热心收集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目的也在于拯救那些在航行中被抓或被海盗登陆绑架的本国公民。这已是领事最大的任务——保护本国公民的分内之事了，热心于此当属自然。

在寻求本国公民消息的过程中，虽为其他国家公民但同为基督教徒的不幸实情也越来越清楚。

在这些海洋城邦国家领事们送来的情报中，那些有关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也极为自然地集中到了罗马教廷。为了生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伊斯兰教徒来往，但在宗教上他们仍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悲惨遭遇这样多地传到了罗马，教皇再不积极，也会感觉到自己寻找失踪“羔羊”的“牧羊人”身份。公元1087年，时任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建立以拯救可怜的基督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

他似乎从开始就没有指望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们，“卡诺莎之行”以来教廷与他们一直关系险恶。他号召的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

西西里王罗杰好像以诺曼人刚刚夺回西西里，尚无余力为由表示不参加行动。真实原因在于他与凯鲁万“酋长”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仅坦率成就不了外交。威尼斯共和国不参加的理由不为人知。但如前述，尽可能回避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是这个“海洋之都”一贯的国策。

不过，不独威尼斯不参与和本国无关的事务。10年之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大张旗鼓的展开，目标是进军巴勒斯坦，夺回圣地。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响应教皇号召的都是认为这事与己有关的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以及自认为基督教世界精神导师的罗马教廷。人们可以从派来军队的国家惊讶地看到11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之势。当时，只能从大海上来的阿马尔菲自不必说，就连比萨、热那亚这些人口不多的国家，也已成长为这样的强国，一次战斗就能投入众多的战船和战士。

迄今为止一直在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增添色彩的是举着绿底

白色月牙旗的伊斯兰势力，而从公元1000年到1100年的11世纪，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开始反击伊斯兰攻势”的世纪。从地中海世界的范围来看，担任这次“反击”带头人的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他们因为贸易关系而更加了解伊斯兰。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公元1087年，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组建了十字军，据称集结了300艘战船，士兵包括船员在内有3 000人。这次的战斗力几乎是以往基督教各国海军力量的10倍。这次行动打出的旗号是拯救基督教徒奴隶，从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员，不仅罗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等国直接参战，意大利半岛沿第勒尼安海一侧从南到北还有很多个人志愿加入战斗。

教皇的军队由罗马势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家族的掌门人亲自指挥，还决定由一位主教代表教皇参战。十字军的意义在于军队由教皇亲自统帅。

热那亚共和国的军队由共和国议会选出的两名实力人物担任指挥。

阿马尔菲则由地位可敌共和国首相的潘塔列奥涅亲自出马。

参战战船数量最多的比萨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作战专家西斯蒙第和维斯康蒂。

目标选在何处？他们将这无比重要的目标确定为北非伊斯兰世界地位最高的城市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Mahdia）。在突尼斯、博纳和阿尔及尔要拯救的奴隶人数更多，但他们把马赫迪耶、凯鲁万作为目标，应该是罗马教廷的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撒拉森海盗执拗地把罗马作为目标，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教廷也认为凯鲁万是北

非伊斯兰教的中心，从而把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当成了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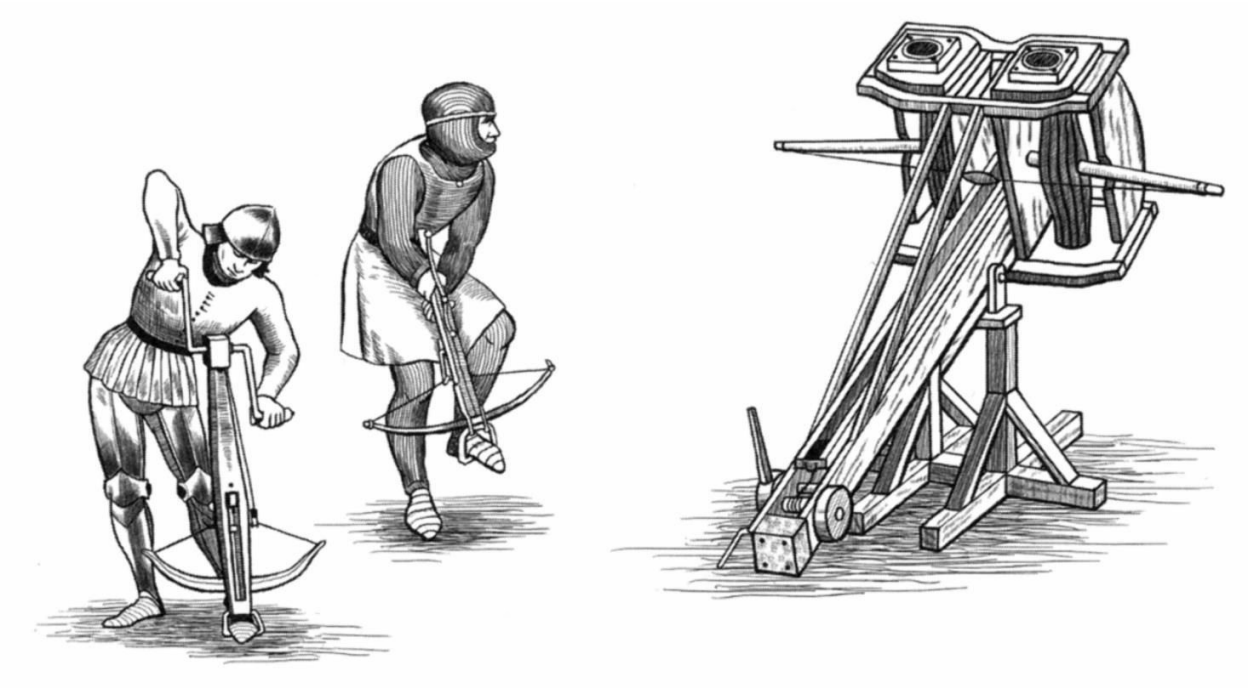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集结地是哪里。我认为，军队大约是先从热那亚、比萨集结到位于教廷领土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再从那里直指北非，在途中与阿马尔菲的海军会合。全军在位于西西里西南的马尔萨拉临时靠港之后，一鼓作气直奔潘泰莱里亚岛。

潘泰莱里亚是一座小岛，感觉就像是地中海的太阳和大海凝聚的一点。这个岛现在是意大利的著名观光地之一，当时属于伊斯兰世界。那里驻扎着守备队，但攻下此岛易如反掌。然而就在这时，潘泰莱里亚守备队长已把基督教舰队来袭的情况报告给了马赫迪耶的“酋长”。他用的是信鸽。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联络方式中，使用信鸽传递情报相当普遍。得知基督教徒来袭的“酋长”用两道铁链封锁住马赫迪耶港的入口，严阵以待。基督教舰队通过先头的侦探得知此事后，便停止直接袭击港口，转而采取了在附近海滩登陆的战术。

凌晨，海上泛起鱼肚白，登陆作战正式开始。基督教舰队动员了所有军用帆船上的小艇以及一同前来的小型快艇（frigate），这些小型快艇相当于后世的护卫舰（fregate），在敌人发现赶来迎击之前，登陆就已结束。

基督教舰队只是模仿了撒拉森海盗拿手的登陆战法而已，不过人数更多。成功登陆的士兵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教廷、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的旗帜下集合，高举大旗向马赫迪耶挺进。

他们一到城墙下就开始了进攻。他们好像并未携带攻城武器，用的只是弓箭、石块和绳梯，以及一种称为balestra的石弩。



石弩（balestra）和投石器（ballista）

伊斯兰士兵的传统是强于进攻而弱于防守。就这么一点儿兵器也使他们很快陷入了劣势。

防御的一方打开城门，放出豢养的狮群。但狮子并没有冲向拿着长矛杀过来的基督教军队，而是逃向了山野。就这样，经过几天称不上激烈的战斗，城门告破。

被伊斯兰教徒叫作“鲁米”的人洪水一般一举攻入城内。指挥官之间似乎事先已有分工，冲进城后分成了三路：一路冲向港口，放火焚烧停泊在那里的所有船只；一路直接去“浴场”解放基督教徒奴隶；而作为主力的一路则包围了“酋长”居住的宫殿。

马赫迪耶的“酋长”也叫塔米尔。他认为再抵抗下去已是徒劳，便提出媾和。请求被接受，作为教皇代言人参战的主教与伊斯兰“酋长”达成了媾和条件。

第一，塔米尔像以往一样继续拥有“酋长”的地位。

第二，拆除围绕马赫迪耶的城墙。

第三，不限马赫迪耶，释放塔米尔“酋长”统治的所有地方的奴隶，关闭“浴场”。

第四，以后严禁海盗行为。

第五，“酋长”向教廷支付10万第纳尔金币的赔款。

“酋长”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将基督教舰队送上归途。所有的船都满载着解开锁链的奴隶和占领期间抢来的金银财宝启航了。十字军出征以来速战速决，一个月结束战斗。他们好像忘记了要进攻凯鲁万，这与伊斯兰海盗的情况很相似，他们以罗马为目标却只满足于攻下外港奥斯提亚。

不过，解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目的完全达到。归途中停靠了意大利南部的每一个港口，每次停靠都放下了原先的奴隶。迎接他们的亲人以为他们被绑架后早已死去，这时泪如雨下。十字军向罗马凯旋而去。沿途每个村镇的教堂都敲响欢迎的钟声，十字军带来了由衷的喜悦，他们受到欢迎理所当然。

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打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正面进攻了北非，但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贸易商却依旧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保持着通商关系。对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而言，与这些西欧人做生意所获取的利益不容忽视。

进口、出口的品目容后再叙，这里只提一句，意大利商人带到北非去的物产是伊斯兰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旦这些物品进不来，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将不再有船只、武器等质量较好的东西。也许只有贸易中的某一方认为自己有不可缺少的需求，相互间的通商才会超越诸多障碍进行下去。

的确，公元1087年拯救奴隶的战斗是成功结束了，但与“酋长”签订的媾和条约的所有条款，尤其是严禁海盗行为的第四款，以后能得到遵守吗？北非撒拉森人不能停止海盗行为的原因不仅在于抢夺他人财物不是恶行这一沙漠民族的传统想法，还在于他们只有这一条生路的社会现实。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但其想法和一贯的做法却与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不同，让我们看一看威尼斯共和国的海盗对策。他们的做法不仅与其他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主要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威尼斯人采取了当时特别怪异的海盗对策。

关于威尼斯共和国，我曾于27年前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题写过两卷本的通史，从公认为其诞生年代的公元452年一直写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这部书的上卷第二章“走向大海”集中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海盗对策。我在这里只想做些摘录和简单的归纳。摘录是因为除了书中的写法以外至今还没有其他的写法。

“航海致富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事贸易，另一条是以海盗为业。

“刚刚诞生的威尼斯共和国选择了第一条路。这样，他们最初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威尼斯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对已经决定走向大海的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就成为仅次于建国的国家规模的事业。

“在现代，亚得里亚海东岸被分割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如果我们驾船在这一带走一圈，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接一个出

现的入海口，数量很多，结构复杂。而亚得里亚海西岸意大利半岛长筒靴小腿肚部分，从威尼斯南下直到布林迪西，没有醒目的入海口，沿岸曲线柔缓，与东海岸形成对照，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地形一定适合于海盗。海盗躲在岛的背后，等哨兵报告的商船一靠近，就划着快船扑上去。遭到追赶时也不缺藏身之处。这样，海盗集中横行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而非西岸也就不难理解了。10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海盗乘拜占庭帝国衰落之际南下，出没于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与东方贸易，除了穿过亚得里亚海别无他路。

“也许会有人问，既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蠢蠢欲动，为什么不避而沿西岸航行呢？撇开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形势不谈，只从气候方面看，走这条航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谈不上有利。

“与大洋长时间风向相同的信风不同，地中海以及属于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的特点是风向变化无常。在这样的海上，几乎不可能连续多日顺风扬帆航行，为等顺风不得不经常靠港。只因这一条理由就不得不沿海岸航行。西岸的海岸线平坦连绵，而东岸海岛重重，处处海湾，更可以避开逆风，等待顺风，具备绝对有利的航行条件。沿海岸的航行，对海盗合适的地形也对船员有利。

“因而，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不单要击败海盗，保障本国船只航行安全，还涉及如何确保停靠港即基地的问题。公元1000年前后，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年轻领袖准备周到，行动果断，点燃了导火索。”

威尼斯共和国展开了肃清海盗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成为短期的“作战”，而是以“国家”的形式坚持下来，这里的原因在于威尼斯式的思维方式。

拥有众多小岛的海湾地形，其成因是山地延绵至海边，这样自然没有广阔的耕地。这在现代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但中世纪还没有旅游业，这种地形意味着这里的居民缺乏维生的手段。威尼斯向这些不做海盗无以为生的人提供了活路。

船载着商品，带着中高级船员从威尼斯出发，然后立即转向亚得里亚海东岸，沿途不断靠港南下。在这些东岸港口停靠的目的不光是采购要在地中海食用的生鲜食粮，也是为了集中划桨手，他们是使用加莱船不可或缺的人力。即使是战舰做法也一样。速度对战舰很重要，即使不装货，战舰也比商船需要更多的划桨手。

可见，威尼斯船在驶出亚得里亚海之前并没有备足航海所需的人和物。威尼斯船只在到达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克基拉岛）时，方才具备了航海的能力。各船以科孚岛为起点，向东方，向北非，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英吉利的南安普顿，各自向东西星散而去。

威尼斯一直采用这种做法，通过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威尼斯称这些斯拉夫系的人为“斯基亚沃尼”（Schiavoni，斯拉夫人）。一直延绵到圣马可广场对面的码头也被取名为“斯拉夫人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他们不单是划桨手，在遇到海盗和敌船的时候，还是与威尼斯人船员一起奋起防卫的重要战士。这些“斯基亚沃尼”在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之前，一直与威尼斯共命运。

直到今天，在威尼斯的博物馆中还有厚厚布底上打满铁钉的划桨手专用的防箭防弹背心。考虑到划桨的方便，这些都是没有袖子的背心。

加莱船如果幸得风助，就可以靠帆航行，划桨手可以休息。划桨手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世船上的发动机。在北非伊斯兰世界，这种“发动机”用的是基督教徒奴隶。但在基督教世界，使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例子并非全无，但屈指可数。理由很简单，因为绑架还不普遍，没有人

来做这事。在西班牙，更多的是使用重刑犯做划桨手。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使用本国人或雇用邻近国家的人做划桨手。但这些城邦国家缺少肥沃耕地，都是海洋国家，原来人口就比较少。如何确保划桨手一直困扰着他们。

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兴衰顺序也是先兴先亡。威尼斯最后灭亡，我想其原因也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海洋城邦国家相比，威尼斯成功地建立了组织体系，可以经常性地确保拥有忠实可靠的下级船员的缘故。这不是唯一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世，威尼斯共和国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战船都一直不用奴隶做划桨手。

不用奴隶做划桨手，在中世纪这个时代，就如同表明不做海盗。在热那亚人中，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的那样，也并非无人想挣快钱而从事海盗业。但这在威尼斯，却为国法所严禁。战船被允许装载一定数量的商品，在目的地做些生意。如果一个人想从零开始积累财富，不是有做战船战士的职业吗？我把这个职业看作威尼斯式的失败者复活系统。在威尼斯，不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别国人都不允许做海盗。

以上叙述了威尼斯共和国以海盗对策为主的思维方式。威尼斯不相信十字军的成果——“酋长”不做海盗的承诺，所以没有参加公元1087年的十字军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威尼斯没有参战，并非因为它与其他三个海洋城邦国家相比，是非常的利己主义者。威尼斯人以其现实主义已经参透，靠进攻伊斯兰世界，解救被俘的基督教徒奴隶，从“酋长”那里得到不做海盗的承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到20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变成了现实。

这20年间“休战”的原因不是因为北非撒拉森海盗尊重自己的“酋长”所做的承诺，而是因为地中海突然动乱。海盗不会袭击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只袭击比自己弱小的人。

“十字军”时代

十字军东征自11世纪末期开始持续了200年，我不拟在此详述。这是象征中世纪的重要现象，一旦详述，本书恐怕就不得不沿这条线索写下去。不过，我想从地中海的角度写一写这场运动。欧洲对中近东的远征仅大规模的就有7次。除了第一次、第二次是从陆上过去，其余都是乘船从地中海东去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碰巧遇到伊斯兰方面陷入窘境，只用了3年就成功“夺回圣地”。

之所以十字军东征迂回曲折却持续了两个世纪，是因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海上补给发挥了作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地中海的东部。陆上战斗力主要由法兰西、德意志和英吉利提供，但意大利的海上支援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支援一词所能包括的范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096年8月出发，1099年7月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比萨以120艘规模的船队东进，抵达叙利亚、巴勒斯坦。

公元1100年，热那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派出150艘船。

公元1100年，威尼斯派遣了200艘的船队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第一次东征时虽然没有运送十字军士兵，但却运输了重型攻城武器、兵器武装和军粮等。当然运输不是白做的，报偿是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后，确保这几个国家在那里的通商基地。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都建起了通商基地。他们在建设基地时考虑了不使三个国家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但在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争执还是屡屡发生。

公元1147年进行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巩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夺回的圣地，那次东征并无明确的政略和战略。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不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这样的欧洲强国君主亲自参战，各率7万大军，在豪华铺张的朝圣后结束了东征。

同一时期，英吉利骑士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他们的路线是从英吉利出港后沿法兰西西岸南下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一气横渡地中海，直指巴勒斯坦。这些基督教战士身穿白底红十字的护胸衣，航行在地中海上，右舷依稀可见北非的港口城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多想被关押在那里“浴场”中的基督教徒所遭受的不幸。

公元1189年决定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时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终于走向结束，伊斯兰势力团结一致，奋起夺回被基督教势力占领的地方。统一伊斯兰世界的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萨拉丁这位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说起来并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可见萨拉丁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

他能够再次统一伊斯兰世界，还因为他在公元1187年向基督教徒发起了“圣战”。萨拉丁出现后兴起了“圣地危急”的思潮，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是受到这种思潮的裹挟。

绰号“红胡子”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军队从陆路向东挺进。

在另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率领法兰西军队来到热那亚，乘上热那亚船，通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直奔巴勒斯坦。

英格兰国王查理也选择了从海路进军巴勒斯坦。抵达后他与萨拉丁打了一场漂亮仗，人们给他起了“狮心王”的绰号。他们先在马赛乘船，在热那亚、比萨、罗马、拿波里各港停靠后穿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地中

海，又在克里特、塞浦路斯停靠后进入巴勒斯坦。十字军历史的英雄，一位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丁，一位是基督教的狮心王查理，这两人都不是顽冥的宗教狂热信徒，这一点非常有趣。浪漫的查理与冷血的腓力性格不合。英法两国国王之间关系不好，这在十字军内部也是出了名的。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大张旗鼓，国王亲自担任统帅，但却没有取得成果。倡导者罗马教皇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也属无奈。

这时，有一队德意志骑士从北海经过大西洋，沿法兰西西海岸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横渡地中海后一路来到巴勒斯坦。地中海正逐渐成为北欧基督教徒去往东方的主要通道。

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愿意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死去。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已得不到欧洲皇帝和国王的响应。发誓远征的是只有法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这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谙事理，甚至不懂得自己不遵守契约，对方也不会遵守的道理。所以，这次东征始终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威尼斯在为所欲为。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叙述，在此省略不表。如果详细叙述，作者就会像骑着难以驾驭的奔马一样，一旦过头就有远离正题的危险。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公元1202年开始历时两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推翻了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以拉丁帝国取而代之。对基督教徒而言不应该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件事把以往宗教热情背后隐藏的领土扩张的事实暴露无遗。这一事件在基督教世界评价糟糕，导演兼主演威尼斯共和国因此遭人忌恨。

公元1212年，出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同的理由，被认为是“十字军之耻”的少年十字军试图进军圣地。受到狂热说教者煽动的少男少女成群结队地从欧洲各地聚集到马赛，他们受了恶劣船主的欺骗，不是被卖到北非当奴隶，就是在途中与沉没的船只共命运。

西西里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力二世在几度延期后，终于在1227年实现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腓力二世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于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组成的西西里，对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偏见。作为西西里的统治者，

他要求北非伊斯兰“酋长”归还被绑架者，“归还没有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回到祖国的基督教徒”。他的观点是如果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继续住在伊斯兰地方，可以各随其愿。

他如此的做法使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率十字军东征也是无奈之举。不过，他从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出发以前，与埃及的哈里发多次互通书信，事先进行了磋商。

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登陆，然后挺进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伊斯兰方面签订媾和协定，结束了东征。协定内容首先是将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这些基督教徒的圣地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管辖之下。协定还写明，在全面保证基督教徒参拜、朝觐圣地的同时，也全面保证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同等权利。至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未流一滴血。

然而，虽然保证了基督教徒朝觐圣地的自由，但十字军对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却未开杀戒，这就是向敌人的妥协。以此为理由，这次东征在当时遭到了大合唱一般的谴责。巴勒斯坦的神职人员首先起来反对。罗马教皇已开除了腓力的教籍，并号召倒皇派进攻腓力的领地意大利南部。腓力不得不紧急赶回意大利，此后腓力一直被称为“基督的敌人”。未流一滴血实现的与伊斯兰方面的协定也只维持了10年。

在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世界，像腓力这样公开声言并做如下事情的人，会被当作异己分子遭到敌视。

这是皇帝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一个插曲。一天清晨，皇帝向耶路撒冷统治者伊斯兰的高官问道：为什么昨天没有听到宣礼的声音？伊斯兰高官回答道：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统治者来访，我们不想失礼。于是腓力说道：“如果这样，在你们访问基督教世界时，我们不是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吗？”

公元1248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率领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时腓力二世尚未去世。路易九世与“基督的敌人”完全相反，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要把受伊斯兰压迫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埃及的哈里发。于是他率领军队从马赛出发进军埃及。这个见解本身并不错误。但十字军登陆埃及后只有初战告捷，以后连遭败绩，不但大量骑士战死沙场，国王自己最后也成为伊斯兰的俘虏。留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全体动员，募集赎金，这才赎回了国王的自由之身。国王随即从海路返回法兰西，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254年结束。

公元127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再次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不过这次的登陆地点选在了突尼斯。我准备在写到13世纪后半期时再对此详细叙述。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路易去世而告终。这是最后一次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东征。

20年后的公元1291年，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最后堡垒阿卡陷落，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时代落下了帷幕。照伊斯兰方面的说法，十字军东征是以伊斯兰方面“把最后一名十字军士兵赶下地中海”而告结束的。

但是，这200年间，参加十字军的基督教徒没有一个人说起要解救被抓到北非的基督教徒，这真不可思议。不，有一个人要除外，那就是一直被谴责为“基督的敌人”的腓力二世。

十字军以“上帝所愿”（Deus lo vult）的雄壮怒吼开始并结束。上帝“所愿”的大概是要夺回如今已归伊斯兰世界的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这些“圣地”。至少中世纪的多数基督教徒对此坚信不疑。北非与巴勒斯坦一样，同为伊斯兰世界，在此被迫为奴、痛苦不堪的人们却不值得“夺回”。教皇允准赦免前去夺回圣地的基督教徒过去的一切罪过，但却没有给予9年前毅然前往突尼斯的马赫迪耶拯救基督教徒并凯旋的人们如此的褒奖。拯救不幸的基督教徒，只有等到以拯救为目的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这与是否赦免罪过并无关系。

当然，遭到撒拉森海盗掠夺绑架的是居住在法兰西和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人们。而十字军是由并不靠近地中海的北欧人所组建。在情报传递很少的时代，地中海海盗大概并不为北欧所知。但问题可能并不止于此。

人不论是好是坏，对远离现实的事物内心更感狂热，更会心动。中世纪的人信仰狂热，才会发起十字军。但信仰心之所向必须是圣地。正是因为要夺回圣地，才会发展成有那么多人参加的、延续那么久的群众运动。如果以拯救被绑架的不幸的人们为号召，那十字军即便可以得逞一时，也不能持久。我想，这不正是欧洲历史上地中海海盗持续千年的现象并未受到重视的原因吗？

“先下手为强”

十字军各国的船只在地中海穿梭如织，但这里的海盗却远未销声匿迹。

在大约20年左右的短时间内，他们老实了。这20年间，进军巴勒斯坦的船只，船上的全副武装的骑士，都对北非毫不关心。这20年撒拉森海盗就在得过且过之中度过了。我们不能忘记，不做海盗便无以为生是北非伊斯兰世界的特性。在港口城市，海盗要向那里的统治者“酋长”上缴海盗收益五分之一的做法还在延续。

但是撒拉森海盗捞钱的地方确实也在不断缩小。

首先，不能再去袭击靠得最近的西西里了。诺曼的国王们以及后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与凯鲁万的“酋长”之间有互不侵犯协定。即使在基督教与伊斯兰在巴勒斯坦相互敌对的十字军时代，这些协定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关系不是强势的一方在压迫弱势的一方，而是双方都在不断寻求不伤体面的妥协。

公元111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功夺回圣地，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基督教国家。载着前往巴勒斯坦的本笃派修士的船只，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修士做了俘虏。海盗船在把他们连人带船拖回北非的途中遭到了强风袭击，漂流到了西西里。

当时的西西里国王罗杰既不想与因十字军而狂热的基督教世界背道而驰，也不想破坏与北非“酋长”的良好关系。

于是他居间调停。被抓的修士恢复了自由，再度乘船，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撒拉森海盗也未被投进监狱，而是被送回了北非。

不过，这位西西里王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妥协。他派出军船和士兵占领了伊斯兰领土马耳他岛。北非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被称为“西西里海峡”。他向对岸的伊斯兰教徒显示了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名称。

西西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关系，进入腓力二世的时代以后，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这两个地方。撒拉森海盗的活动范围越发狭窄。

然而，在同一个时代，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却以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付海盗。

第一，这些国家拥有可以随时出港的百艘战舰规模的海军力量。

第二，这些国家长期在海上支援十字军，从而在东方各地拥有通商基地，使得东方贸易的收益远大于北非贸易。换言之，即使与北非伊斯兰教徒打起来也不怕。

第三，比萨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托斯卡纳气质，热那亚人也好似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体。他们的性格不是挨打后再还手，而是先下手为强。他们不是防御来袭的敌人，而是在遭袭前主动发起攻击。

他们的自信不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船只的数量，而是来自操纵船只的能力。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全面发挥，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才会如此繁荣昌盛。不久以后，伊斯兰海盗头目中也开始出现少年时被海盗掳走，在伊斯兰地方成长起来的意大利人。在著名的海盗头目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令人瞩目。我甚至认为操纵船只的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样，在海上遭遇时，逃跑的只会是撒拉森人。

居住在东方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技高一筹。这个时代，从红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水手自由自在地航行在大海之上。撒拉森人应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以为，在中世纪后期，对出没于地中海西部的海盗而言，“撒拉森人”，只不过是一个名头，实际上他们是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驾船能力确有差距。此外，撒丁、科西嘉事实上都已成为比萨或热那亚的领土。海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登岛藏身了。可停靠的港口越少，对于擅长于小船、小规模船队的撒拉森海盗就越不利。这一点不可忽视。

第四，与威尼斯不同，比萨和热那亚的办法与撒拉森海盗一样，但却没有丝毫犹豫。

在海上遭遇海盗与之交战，打赢了连船一起夺走，威尼斯也会这样做，但比萨和热那亚的船会进而攻击海盗根据地，打进这些港口城市后，对抵抗者格杀勿论，掠夺金银财宝，然后返航。

比萨大教堂以比萨斜塔而闻名。教堂展现了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的精粹，美轮美奂。比萨共和国投入了贸易利润，建起需要如此高难度技术和大量金钱的教堂和高塔。从海盗那里抢来的收益也成为建设费的一部分。想到这一点，人们观赏比萨斜塔时也会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尽管比萨、热那亚都会把抓到的海盗吊在桅杆上，把能抢的东西都

抢走，但他们不会绑架那里的老百姓。事实上，不论是比萨还是热那亚，不，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北非主要港口城市必有的“浴场”，没有绑架异教徒充作奴隶劳作的社会体系。虽然比萨、热那亚都模仿海盗与撒拉森人打仗，但他们毕竟是贸易立国，而不是海盗立国。

不过，对比萨和热那亚而言，地中海中央的第勒尼安海是本国商船去任何地方的必经海域。能否确保这片海域的航行安全，甚至决定这两个国家的命运。12世纪，以靠近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为根据地的海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一般，横行于这片海域。他们也是伊斯兰海盗，但根据地不在北非。他们威胁商船的安全，增加了法兰西南部沿海、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沿海成为海盗盘中餐的可能性。为了切断危害的源头，法兰西南部领主与热那亚和比萨组建了联合舰队，要肃清以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所有岛屿上的海盗。

承担主要战斗的比萨在此一战中投入了300艘船和4万名战士。船只是比萨自己的，4万士兵是从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志愿前来的，人们对这场战役有着共同的目的。对苦于伊斯兰海盗的人来说，与其不远万里去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不如与眼前的海盗打仗更为重要。人们把他们称作“西方十字军”。

“西方十字军”大获成功。海盗被歼灭，许多基督教徒奴隶从马略卡岛上的“浴场”里被释放出来，乘上比萨的船回到故乡。

但不论比萨还是热那亚都是城邦国家。与领土型国家不同，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国家人口很少。人口较多的威尼斯也才10万人，而热那亚和比萨都未超过5万人。他们开始把主力投入与东方的贸易之中，没有足够的人手使巴利阿里群岛完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后来不久，巴利阿里群岛再次沦为海盗的巢穴。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来说，到处追击海盗的辛劳永无尽头。

如果当时比萨和热那亚，再加上威尼斯联手合力对付撒拉森海盗，

谁都会认为很快就会把海盗赶出西地中海。但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把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旗帜叠合在一起，这在学习意大利海军史的人们中间成为笑谈。我想在此做一介绍。

在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意识高涨的时代，意大利人是地中海的统治者。而四面旗帜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统治着地中海。竞争意识有时会发挥正面作用，但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关于意大利的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第六章“竞争对手·热那亚”中有过集中叙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13世纪进入后半叶，地中海西部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公元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也是西西里王的腓力二世去世，他曾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统一起来。继承他的是嫡子和庶子两人，但他们未能打破因腓力之死而气势大涨的罗马教皇及其一派的攻势。持续了200年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于公元1266年崩溃了。

新统治者是法兰西国王的弟弟、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安茹家族的查理。但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遭到西西里人的深恶痛绝，不到20年就被“西西里晚祷”起义赶下台，歌剧《西西里晚祷》就是以这场起义为背景的。后来统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在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发生了巨变。

安茹和阿拉贡是顽固的基督教徒，他们得到了深恐腓力二世反教会路线的罗马教廷的支持。大约在这个时期，巴勒莫和其他城市的清真寺消失了。在出入王宫的官员中看不到裹着头巾的身影，在直属于国王的军队中，也不再混有伊斯兰教徒了。

堪称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结晶的蒙雷阿莱大教堂，以及其他众多的

建筑没有受到破坏，这些建筑已经成为西西里自身的一部分。狂热的基督教徒虽然厌恶伊斯兰，却没有破坏这些建筑。

也没有发生强迫西西里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生共存的社会已存在了200年，伊斯兰教徒也发生了改变，没有多大抵触就改信了基督教。这就像人们已经忘却了柠檬和橙子原来都是阿拉伯人移植过来的一样。也许信仰深刻、抵触改教的伊斯兰教徒都已经回北非去了。总之，西西里内部变化平稳，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注意。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却不安稳了。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如今一变而成了敌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已经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又开始受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威胁。

就在同一时期，突尼斯“酋长”登上了公元670年建都60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北非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凯鲁万“埃米尔”的宝座。突尼斯是撒拉森海盗的最大基地，这在当时无人不晓。这就如同海盗的最大头目当上了一个国家的正式统治者。

公元1270年进行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的十字军

20年前在埃及大败，手下大量骑士被杀，后来又被长期囚禁在伊斯兰地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接受教训。他宣誓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

路易似乎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好人，但他的亲弟弟查理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查理是怎样说服哥哥的，他让哥哥把第七次东征的目的地改为北非的突尼斯，不是基督教徒水深火热的巴勒斯坦，也不是可以一雪

前耻的埃及。已是西西里王的查理自己也承诺率领属下军队与哥哥会合。

7月初，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从位于马赛的艾格莫尔特出发，阵容豪华，所率领的骑兵堪称中世纪骑士之精华。

法兰西国王和两个王子、英格兰王子、纳瓦拉国王，率领大军。他们全部由王妃相伴。阳光下，这些高贵之人的随从骑士甲胄枪剑闪闪发光，簇拥着王妃的宫女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流光溢彩。这简直就是有闲阶级的观光旅行，连海上的暴风雨也都敬而远之。

十字军避开暴风雨，在撒丁岛南端靠港之后南下，直指突尼斯。7月17日，他们不知为何在古老港口迦太基附近登陆了。

迦太基是整个古代北非物产的集散地，繁荣兴旺，但在伊斯兰统治之下，由于集散中心转移到了突尼斯，迦太基成为废都，被沙漠所包围，看不到一丝古代荣华的残影。路易一行就在这片沙漠上登陆，就地宿营，等待查理的军队。他准备与弟弟会合之后，全军进攻突尼斯。

不知是讨厌浪费时间，还是久违地踏上伊斯兰之地而燃起对基督教的信仰，法兰西国王路易给突尼斯“酋长”写去了一封信。

“如果阁下打算改信基督教，敝方备有为你做洗礼之人。敝人将带领10万士兵前去寻找阁下。”

突尼斯“酋长”的回信很快到达。

“敝人决定请阁下在战场上做洗礼。如果阁下的军队前来进攻突尼斯，敝方将杀死身在敝处‘浴场’的全体基督教徒。”

路易九世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应对，难掩困惑。他向西西里派出快船催促弟弟查理尽快出兵，同时催促他送来水和粮食。

但查理刚刚当上西西里王。西西里人对新王并无好感，不但征兵困难，就连水和粮食的采购也不尽人意。

在盛夏的太阳暴晒之下，这支不知人数几何的军队缺水少食，宿不择地。路易军队的状况逐日恶化，瘟疫开始流行。

进入8月，没能践约的查理得知路易卧病的消息。

查理加快了士兵的招募和补给物资的采购。查理和他的军队从西西里西岸特拉帕尼的港口出发，到迦太基登陆时已经是8月25日。

十字军远征时去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

没有人前来迎接查理。查理直奔路易的帐篷，但他看到的是哥哥刚刚断气的遗体。

在恶劣环境下病倒的不止国王一人。作为教皇代言人同行的主教和路易的一个儿子特里斯坦也丧了命。另一位王子菲利普则卧病不起。

生前被尊为广受尊敬的圣人死后，遗体要立即解剖，心脏要放在罐子里保存，留下骨头，身体的其他部分火化。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习惯。这个习惯于公元1300年被罗马教皇废止。但路易死于1270年，就连亲弟弟查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体被肢解。

有人报告，伊斯兰军队从突尼斯奔杀而来。查理急忙集合能打仗的士兵布阵迎敌。

伊斯兰军队与基督教军队激烈交锋，虽然各种不利情况接踵而来，战斗还是以基督教方的胜利告终。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两军面对面的会战都不是北非伊斯兰教徒的强项。这时，突尼斯“酋长”看到眼前的失败惊慌失措，急忙求和，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进入突尼斯城。作为代价，他将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基督教方面的西西里王查理、父亲去世后刚刚当上法兰西国王的菲利普，以及纳瓦拉国王特奥巴尔多三人与突尼斯“酋长”签署了协定。英格兰王子爱德华拒绝签字，这并不是因为他忠于十字军精神，而是因为只有他在分配战利品时被排除在外。

媾和的内容如下：

1.突尼斯“酋长”向国王们支付21万盎司金条。

2.今后5年，每年向西西里王支付30万枚拜占庭金币。

3.坚决承诺不向基督教徒居住之地进行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切攻

击。

4.立即释放被收容在“浴场”里的全体基督教徒奴隶。

11月20日，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带着被解放的奴隶，离开旧迦太基。

时间已到11月下旬，地中海南部也完全进入了冬天。商船、渔船都已停止出海。然而，十字军的首脑中并无一人熟悉大海。

船队在接近西西里的特拉帕尼港时遭遇了冬季风暴，立即就有18艘船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眼前被海浪吞没。船上乘坐的4 000人与马匹武器一起葬身海底。

特拉帕尼居民动员了所有渔船、小艇前往救援即将沉没的船只，救起被船上抛下来的人，据说救援一直持续到天黑。

西西里王查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纳瓦拉国王和英格兰王子，还有路易九世和菲利普的王妃、路易的女儿纳瓦拉王妃都被救起，得以生还。

这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待身体恢复到能够长途旅行时都纷纷出发返回故乡。出发以前，国王们参拜了特拉帕尼教堂，庄严起誓，相约4年后的公元1274年7月22日，共同参加为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圣公墓教堂而组建的十字军。然而，到了那年那天，没有一位国王信守这个誓言。

回到西西里以后，在突尼斯染上瘟疫的人不断死亡。12月4日，纳瓦拉国王和王妃去世。纳瓦拉国王夫妇的遗体与从北非运回的路易九世的遗骨以及死于伊斯兰之地的王子特里斯坦的遗体一道，被葬于蒙雷阿莱大教堂。西西里王查理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参加了葬礼。所葬的遗骨和遗体都不完整。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护送父亲路易和弟弟特里斯坦的遗体回法兰西。他不想再尝海上风暴的滋味，归途选择了沿意大利半岛北上的陆路。途中，已有身孕的王妃从马上跌落而死。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不得不随着三具遗体回国。

抵达巴黎后，法兰西为路易九世举行了国葬。国王的心脏装在罐子里，一路风尘，此时终于被安葬在巴黎圣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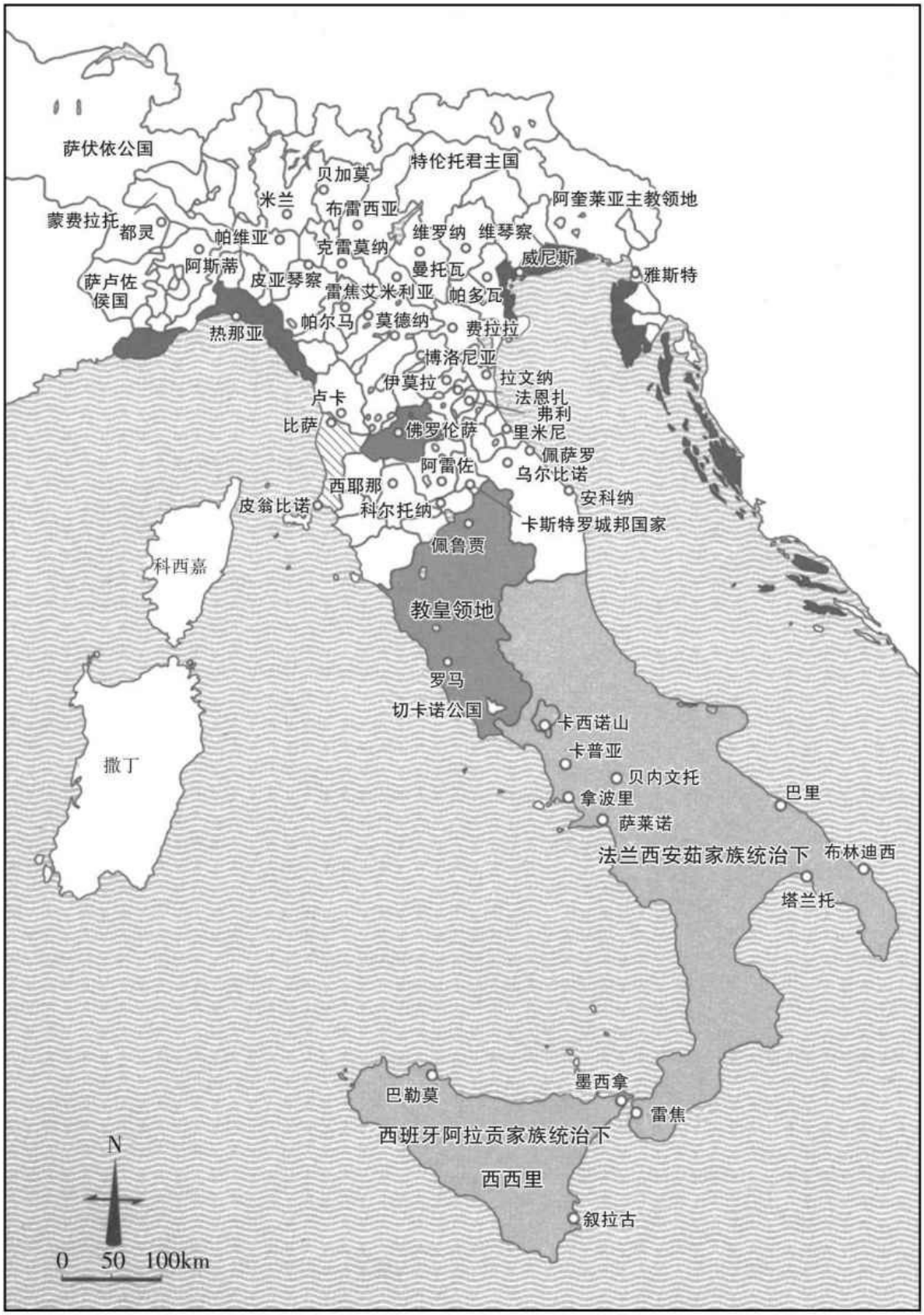
路易九世死后27年的公元1297年，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他列为圣人。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在历史上被称为“法兰西的圣路易”。

罗马市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其中一座的游客一定多于其他教堂。游客是为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杰作而来。现代的游客又有几人知道这座教堂是献给路易九世的呢？教堂进门后的左侧立着一尊全身雕像，身穿十字军铠甲，浪漫得如同梦境。人们来到这里欣赏把人类的真实嵌入画景的米开朗琪罗的画作，无关乎这里是做礼拜的地方。游客中可有人注意到圣路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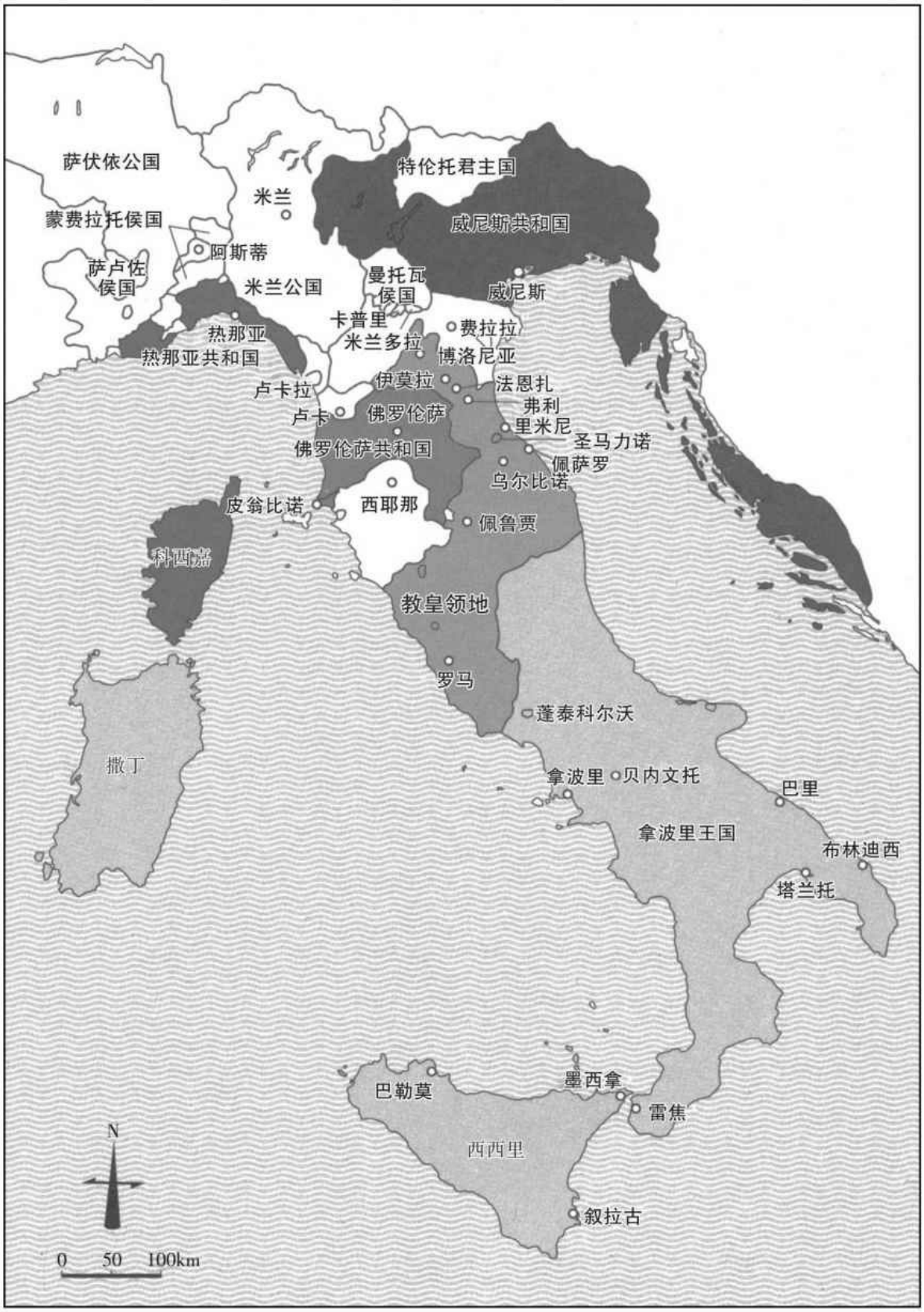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进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时代终结于公元1291年。可是打着“圣战”旗号的海盗行为，却完全没有结束。十字军进攻了北非的海盗基地，从“浴场”救出不幸的人们，并让“酋长”誓言禁止海盗行径，但誓言没有得到遵守。

进入14世纪以后，十字军的狂热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也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种被称为“城镇”（comune）的自治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城镇”的主人是在土地上没有经济基础，只能把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当作武器的城市市民。这些都是小型城邦国家，但却在面向下一个世纪的重组过程中，萌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帷幕。萌生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巴勒莫的文艺复兴，将在逐渐成为金融圣地的佛罗伦萨开花结果。接力棒由皇帝交到了商人手中。

在意大利北部开始剧烈变动的同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维持着封建制，拥有土地的人是社会的实力人物。不论对法兰西系的安茹王族而言，还是对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而言，考虑到自己占据的最高宝座的安泰，持续维持这个制度将会好处多多。意大利南部与城镇自治体和城邦国家没有关系。


萨伏依公国
特伦托君主国
贝加莫
米兰
布雷西亚
阿奎莱亚主教领地
蒙费拉托
都灵
帕维亚
克雷莫纳
维罗纳
维琴察
威尼斯
阿斯蒂
曼托瓦
雅斯特
萨卢佐侯国
皮亚琴察
雷焦艾米利亚
帕多瓦
帕尔马
莫德纳
费拉拉
热那亚
博洛尼亚
伊莫拉
拉文纳
法恩扎
卢卡
弗利
比萨
佛罗伦萨
里米尼
佩萨罗
阿雷佐
乌尔比诺
西耶那
安科纳
皮翁比诺
科尔托纳
卡斯特罗城邦国家
佩鲁贾
科西嘉
教皇领地
罗马
切卡诺公国
卡西诺山
卡普亚
撒丁
贝内文托
巴里
拿波里
萨莱诺
法兰西安茹家族统治下
布林迪西
塔兰托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
西班牙阿拉贡家族统治下
西西里
叙拉古
N
0 50 100km

14世纪的意大利（城镇割据的世纪）


萨伏依公国
特伦托君主国
米兰
蒙费拉托侯国
威尼斯共和国
阿斯蒂
萨卢佐侯国
米兰公国
曼托瓦侯国
威尼斯
卡普里
费拉拉
热那亚
米兰多拉
热那亚共和国
博洛尼亚
伊莫拉
法恩扎
卢卡拉
弗利
卢卡
佛罗伦萨
里米尼
圣马力诺
佛罗伦萨共和国
佩萨罗
乌尔比诺
皮翁比诺
西耶那
佩鲁贾
科西嘉
教皇领地
罗马
蓬泰科尔沃
撒丁
拿波里
贝内文托
巴里
拿波里王国
布林迪西
塔兰托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
西西里
叙拉古
N
0 50 100km

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合并的世纪）

意大利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首的阿马尔菲也成为这个变化时代的牺牲者，它衰退了。经济常常为商人所左右。土地所有者很少承担风险。如果听命于土地所有者，人们就无法发挥从事高风险事业时才会有的才能。无论在意大利南部还是在西西里，一直都有海港城市。然而在阿马尔菲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极走向海外这个意义上的海洋城市。

意大利的经济人

在这种形势之下，地中海北部与南部的对立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世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入了协定时代。

但北方的船只与南方的船只在地中海上完全不是友好地相向而过。从北面而来的是商船，自南面而来的是海盗船。以往，海盗是在防御薄弱的地方登陆，绑架居民，现在情况也不同了。

由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带头，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缔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

比萨共和国最早开始走这条路线。早在12世纪中叶，比萨就向突尼斯的“酋长”派出特使，缔结了协定。12世纪是十字军的鼎盛时期，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于尽量减少比萨船向巴勒斯坦运输人与物的航海障碍。

不过，如果把真实意图表露无遗，就建立不了外交关系。于是，比萨以在靠近北非沿岸的岛屿采集珊瑚为由，让“酋长”同意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贝贾亚开辟了两处比萨人居留区。在突尼斯，比萨还以保护居留区内比萨市民为由，取得了常驻领事的权力。领事隐蔽的任务，当然是收集包括海盗在内所有领域的情报。

13世纪以后，这种协定较前相比留下了更多的记载。

公元1230年，比萨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缔结了30年有效的协定，协定中载明了如下事项：

1.保证比萨市民及他们所运物资的安全以及在北非全境陆上和海上的贸易自由。

2.比萨市民有权在他们的商馆（fondaco）住宿并将商馆作为贸易基地。

3.确保常驻北非的比萨市民有一个教堂和一块墓地，以备不幸死亡时下葬之用。

4.只赋予比萨市民以进出口双重特权。

得知比萨缔结了这个协定，热那亚立即于当年向北非派出特使，与“酋长”缔结了几乎同样内容的协定。

第二年的公元1231年，一直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良好的西西里王腓力二世也重签了每15年须更新一次的协定。我们无从知晓这已是第几次更新。这个协定的内容也是让“酋长”承认西西里人的安全和贸易自由。当时西西里与北非之间已有互派使节的关系，西西里又不以贸易立国，所以协定中没有言及领事和专用商馆。至于教堂，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逆反儿认为根本用不着。

公元1236年，热那亚再次与突尼斯“酋长”更新了协定。6年前签订的协定尚在有效期内，只是在细节上重新斟酌，使之更加有利于本国。1250年，对协议内容再作修改后，双方又重签了协定。

公元1251年，威尼斯共和国已加入了这个市场。起步虽晚，但这是一个做事彻底的国家。以总督代表的资格派来的特使从突尼斯“酋长”那

里得到了以下各项保证：

1.保证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及与威尼斯有合作关系地方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2.保证领事的常驻及延续。

3.保证威尼斯公民专用商馆的设立及延续。

4.以上权利不限于突尼斯，还适用于北非全境的海港城市和内陆城市。

第二年的公元125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市场。以前佛罗伦萨商人一直通过比萨进行贸易，现在也出来独立开拓市场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已经进入兴盛期，走向海外是这种情况自然的反映。佛罗伦萨与北非协定的内容和比萨与北非所签的基本相同。在此期间，比萨已数次更新了协定。

公元1265年。在长期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开始向南进攻。西班牙的“阿拉贡、马略卡、巴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王”出面与突尼斯“酋长”缔结了协定，内容如下：

1.承认西班牙商人在突尼斯港口的通商权。

2.节制突尼斯“酋长”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对西班牙基督教徒统治地区的海盗行动。

3.保证西班牙在突尼斯建立商馆和教堂的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下面这些条款。

“如果被突尼斯追赶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逃进阿拉贡国王领地的港口，保证领地公民不向该船提供任何帮助。”

要而言之，只要不是西班牙船只，你们尽可对其采取海盗行动。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还有腓力的西西里在与伊斯兰缔结的协定中所要求的都是本国公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其他国家的公民与我无关，不像西班牙国王那么露骨。不知什么原因，西班牙国王与“酋长”之间的协定，却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公元1323年更新的协定中，又增加了下面一项条款。

“海盗造成的损害，两国均须于3个月内申报。逾期不承担补偿义务。

“双方明确申明，即使领地公民被绑架或实施绑架之海盗被捕获，均不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国民被绑架也与国家间的外交没有关系。

总之，不论是十字军时代，还是因基督教方面的败退使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地中海世界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携手合作，一直保持着关系。各国与“酋长”之间的协定直到15世纪中叶，还在切实地持续更新着。

海盗为什么能够延续，前面各处对这个问题已有所叙述。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维持贸易关系，又是为了追求什么呢？

贸易商品

有出售的商品，还要有购买的商品，才能建立起贸易关系。并非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才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也是经济动物，虽然不像威尼斯那样彻头彻尾。

他们销往北非的商品虽因国家而异，但有下面一些相同名目。

木材，尤其是造船用的木材。中世纪的北非不但经常缺乏木材，也没有技术制作桅杆、桨和必须具有微妙曲线的造船建材，进口这些成品对北非更为合理。

布料，其中出口量较大的是帆布。帆，要求质地牢而轻。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制造的帆布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华丽的高级纺织品也用于出口。伊斯兰世界的上流人物也喜好华美的服饰，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上流人物并无二致。

武器装备。以半月刀为代表的武器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北非自己即可制造。而盔甲这样的武器装备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使用者的身体，要求结实轻便。这就需要能够制作薄而坚韧的钢铁片材的技术，意大利城邦国家拥有这种技术。可以说从事金融和手工业的人是构成意大利城邦国家的两大平民阶层。

工艺品。伊斯兰世界的东方明显受到波斯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拥有生产高超完美工艺品的技术。但是，东方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而北非却地处边缘。居住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自然不是波斯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也不再是阿拉伯人。北非伊斯兰教徒大半是身处罗马文明圈外的沙漠之民柏柏尔人，以及虽属罗马帝国之民但却总在圈外的摩尔人。这些人意欲购买意大利人运来的、自己不会做的意大利工艺品。

我们在此不讨论有关意大利人本质上所具有的美感，具有美感且有益的东西没有一定的量也不能成为贸易商品。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的市民在企业化生产以及产品的量产化方面，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在北欧也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自己却已遗忘，阿拉伯商人看到了它的作

用，将它带到中近东。在沙漠上行走与在大海上航行的情形相似。

阿马尔菲商人通过阿拉伯人知道了指南针，他们最早把指南针改造为小型便携的罗盘出售。便携式罗盘转眼间便在意大利各地批量生产，不但意大利水手使用，还卖给阿拉伯人，这种做法令人佩服。

纸、玻璃和印刷术也都不是威尼斯人所发明，但却是在威尼斯投入了企业化生产。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后不到20年，威尼斯人便挺进出版业。又过了30年，威尼斯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

较之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时候不易写错，还有“零”的概念。比萨商人把阿拉伯数字带入欧洲。这种方便的数字很快风靡整个意大利，甚至有的威尼斯学校也用阿拉伯数字教育儿童。阿拉伯数字普及以后，在比萨去佛罗伦萨途中的城市普拉托，有一位商人发明了簿记，即刻受到威尼斯人的注意。他们不但引进了簿记，还完善成为复式簿记。采用复式簿记以后，商人们第一次得以全面掌握遍布各地的市场网络。簿记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如今谁都不会怀疑航海不能缺少海图。海图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但是，是比萨的水手首先画出了更准确、更细致、一张纸上包含更多信息的海图。比萨败给竞争对手热那亚，退出海洋城邦国家之后，威尼斯使这一技术企业化，绽放出更绚丽的花朵。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世，船员们没有威尼斯制的海图便不会出海。地图和海图是准确把握整体以及局部情况的最佳手段。

一叶知秋，意大利出口到北非的物资相当丰富。其中有若干在现代完全属于禁止出口的商品，当时罗马教皇也因为其有利于伊斯兰教徒而发出禁令，不准出口。不过，从不断发出这种禁令的情况来看，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把禁令当作了耳旁风。

那么，他们又从北非伊斯兰教徒那里采购了什么呢？

小麦和橄榄油，野兽的毛皮和椰枣。这些是当时北非的主要产品，只有这些可以出售。

然而如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也会说，意大利方面肯定会贸易顺差。如果贸易如此不均衡，既没有必要设置领事，也没有必要建立商馆。又是派驻领事，又是运营商馆，甚至还要维持居住区，意大利商人一定另有企图。

不错，他们的确另有目的，还不止一个。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很早就有了海洋法。在这方面，阿马尔菲是先驱者。阿马尔菲在11世纪就制定了通称为“阿马尔菲公文”（Tabura Amalfa）的文件，今天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了解这个文件的内容。

留有文字记录的第二名是诺曼王朝的西西里，一般认为文件制定于罗杰二世时代，也就是12世纪前半叶。

第三名是威尼斯共和国。文件制定于公元1223年，年代确凿。

热那亚共和国紧随其后，也制定了海洋法。比萨制定同样法律是在公元1233年。

但不论是威尼斯、热那亚，还是比萨，初次制定海洋法的时间都不是在13世纪前半叶。根据专业研究者的说法，上述年份是整理统合此前已有各种海洋法的年份。

这些海洋法规定细腻，包罗万象，为后世世界各国海洋法的范本。威尼斯共和国的海洋法最为完美。从船只大小到装运货物的品目、重量、运费、靠港费自不待言，还列入了与船只和航海有关的所有事宜。不了解威尼斯历史的人看了这些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不就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嘛！

海洋法明确了从船主、船长、高级船员到划桨手的权利与义务，还规定了即使对待遇等有所不满也严禁在航海过程中罢工，罢工被认为是一种怠工渎职行为。有关人员可以在航海结束后向海洋法庭起诉。海洋法庭是专门的司法机构，由航海经验丰富的第三者组成，审理诉讼。不过，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市民没有人毫无航海经验。即使是眼下为国家掌舵的元老院议员，年轻时也都是为商船掌舵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海洋法中载有保障从船长到划桨手所有船员身份的事项。定期支付确定的薪金自是当然，还保证了航海中因病不能出工时的薪金。对航海中死亡、受伤的人，船主负有支付规定额度补偿金的义务。在威尼斯，包括商船在内，所有加莱船均为国有，每次航行均须租赁，船主是共和国政府。国家也同样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这就是说，在海上“工作”时，如果遭到海盗袭击，船员被抓走带到北非，被“浴场”收容或被卖为奴隶，船主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负有支付赎金予以赎回的义务。海洋法中并没有如此写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扩大解释并付诸实行亦属合理。

有如此完善的海洋法，自然会出现完善的海上保险。要想保护船员，就必须保护负有保护船员义务的船主。

同时，航海中遭遇海盗船也是一个概率问题。派船出海更多的国家，遭遇海盗船的概率也更高。来自北非港口的海盗船看到对手强大便不会下手，因而配有护卫船队的帆船商船队较为安全。但是，若因货物廉价不派护卫船，这时的商船危险性会很高。

领事在港口、“浴场”和奴隶市场，通常都有情报收集网络。即使不是本国公民，如威尼斯，一旦得知发生与本国船员有关的事件，哪怕他只是居住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领事也都会立即采取行动。

领事首先会向当地“酋长”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反两国间所缔结协定的暴行。意大利人在实际处理方面是现实主义者。

要求释放俘虏的有效手段之一是用自己抓到的俘虏进行交换。但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不是海盗立国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俘虏可供交换。所以，这种手段只有在马耳他骑士团后来采取了与海盗同样的做法以后才得以使用。

于是，只有支付赎金这一种办法才能换取俘虏。但是，撒拉森海盗只袭击弱小者，不袭击比自己强大的人。海洋城邦国家的船员很少有人成为奴隶，因此赎买本国船员所需的费用达不到足以纠正贸易不平衡的程度。

那么，用什么来纠正贸易不平衡呢？

撒哈拉的黄金

用纯金或非常接近纯金的黄金铸造的金币有很高的价值。这种金币不是市场上通常使用的通货，但可以起到对发行国家经济实力、信用程度的计量作用。

金一直以来受到重视，原因是与银和铜相比，金绝对易于保存。我有两枚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金币，如今依然金光灿灿，简直想象不出这是2300年前的古代之物。如同2000年前古罗马皇帝们的奥里斯金币一样，黄金如果太多也会失去品位，拉丁语中的“aurum”（金），具有贵重、重要、阳光的意思，可以作为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象征。“黄金时代”一词中“黄金”的用法较之于“淘金热”中的“金”在意义表述上更为合适。

罗马的奥里斯金币在帝政时代比在共和政体时代更为普及，原因是

帝政之后的罗马已把北非完全纳入了帝国的范围之内。如果只要少量的金，到处都可采到。但如果需要大量的金，就只有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地穿越撒哈拉沙漠运来非洲黄金了。

到中世纪的时代，非洲产的黄金已不再能进入欧洲。北非归属伊斯兰以后，欧洲通货就只有银币了。查理曼领有辽阔的欧洲地域，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因而被称为“大帝”。就连他用自己名字铸造的货币也是银币。罗马教廷发行的通货也是银币。欧洲能够开采到银。这个时代信用度高的金币只有伊斯兰世界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币面上只雕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字，伊斯兰人憎恶偶像。

13世纪以后，金币又回到了欧洲。

公元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佛罗伦萨共和国紧随其后，于第二年即公元1252年发行了名为“弗罗林”的金币。

到了公元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也开始发行名为“达克特”的金币。至于威尼斯为何落后于其他国家，请读者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这三个国家的金币都重3.5克。

第纳尔金币重量相同，威尼斯向伊斯兰金币发起了挑战。“弗罗林”只有18K金，而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则为24K金，纯度为0.997。这个重量和纯度一直保持到1797年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为止。

热那维诺金币（直径20毫米，3.5克，1252—1339年铸造）

达克特金币（直径20毫米，3.49克，1280—1289年铸造）

第纳尔金币（直径23毫米，2.36克，1252—1277年铸造）

优质的“达克特”金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国际通货。在欧洲，说起金币也必是“达克特”。我手头的金币是在开罗的跳蚤市场买的，金币边缘开了个小孔。金币为纯金所制，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便以金币来保存财产。他们在每枚金币上开个眼儿，用线穿起来保管。

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当时共和国总督的名字。我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路德维科·马宁的名字，他是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东方人依旧继续持有威尼斯的金币。

在基督教世界，13世纪以前也铸造金币。阿马尔菲就曾发行过叫作“塔里”的金币。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也曾发行过同名的金币。但这些金币的重量仅为1克强，也许是想使其价值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使用最多的“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

此外，腓力二世发行过名为“奥古斯塔尔”的著名金币。从名称上看，这种金币制造时明显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金币重5克以上，与其说其制造是为经济目的，不如说是因政治意图。

信用度高、持久性好，因而与经济振兴密切相关的金币，还有待于

以经济立国的各意大利城邦国家发行。发行金币在“撒哈拉黄金”的进口得到保障以后才有可能。

从发掘于墓地的人骨调查得知，意大利居民的体格在中世纪前期突然衰退，中世纪后期才恢复到古罗马时代的水平。人们不禁会想到，这与金币重新流行的时间相吻合。

名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货币不是孤立存在的史料，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货币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最佳指标。”

撒哈拉黄金使意大利城邦国家与北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贸易达到平衡。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都在北非驻领事、设商馆，与“酋长”们不断更新协定。

不过，这个历史现象只与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人们相关。在同一时代，还有居住在意大利南部、与北非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群，这些人不受海洋法的保护，不能成为海上保险的对象，也与船员之间自古存在的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工会”（scuola）没有关系。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带来的和平，说得现代点就是“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是，罗马人并不认为和平与安全单靠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他国军队蹂躏就能实现。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不受盗贼、山贼、海盗等人类社会敌人的侵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和平与个人的安全。

为了明白地说明这种“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内容，我想在这里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六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卷末的一段插曲。

故事发生在波佐利，奥古斯都去世前不久周游拿波里湾时停靠

在这里。一艘商船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到达，乘客和船员发现老皇帝正在附近停泊的船上休息。大家便从船上齐声向老皇帝欢呼，那情景宛如一场大合唱。

“拜您所赐，我们生活安康！”

“拜您所赐，我们旅行安全！”

“拜您所赐，我们享受着自由和平！”

不期而遇的人们献上的赞美之辞让年迈的奥古斯都龙颜大悦。他下令赐予他们每人40枚金币。但有个条件，要用金币购进物产销往其他地方。奥古斯都虽然老迈但仍是一个现实的人。只有人和物都自由地流通起来，才能提高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我在考察长年横行于中世纪地中海的海盗时注意到，被绑架的人中没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地位高的人和有钱的人。

我想原因很简单，地位高和有钱的人身边经常有大批护卫。中世纪中期开始，地位不高也不富有的人，只要他属于海洋城邦国家，即使被绑架也会很快获释。

随着时代的进步，海盗的目标越来越少。但在北非伊斯兰世界，海盗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海盗业人们就不能生存，因而海盗不能歇业。问题是把目标定在哪里、对准谁。

海盗决定袭击哪里、绑架谁的理由也很简单。

目标是防御薄弱的地方以及绑架后不会把事闹大的人。

如果掳走重要人物，就会立即成为大事件，当地统治者不得不出面打击海盗。这样，对力求避开强手的海盗来说，活动区域会越发狭小。因而海盗把目标锁定在了普通百姓。

那么选择哪里下手呢？当然会首选地中海沿海地区，但也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可以。尽可袭击能从海上到达的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海盗的视线渐渐集中于仍然残留着浓重封建制度的专制君主的领土。富于启蒙主义精神的专制君主会关心普通百姓的安全，而对其他领

主而言，农民、渔民还不如他们所拥有的牛马。即使把他们绑架到北非当奴隶，非海运国家的统治者也不会为此勉强组成舰队，拼尽全力跑去解救回来。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会竭尽全力解救被绑架者，即使他们是老百姓，只要是本国人或是与本国合作的人都会如此。但他们的积极行动只限于与本国有关的人。与其他国家相关的情报到了领事手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请求，也不会采取解救行动。但各国似乎都把情报传给罗马教廷。基督教徒也是经济动物。

总之，没有地位、交不起赎金的普通百姓的悲惨状况从来没有改善过。

即使没有值得抢夺的金银财宝，海盗也会在你的眼皮底下抢走好不容易盼来收获的农产品。东西被抢走还算好，有时人也会被掳走。不论男女，一到适合劳动的年龄便会被掳走，好似专等着田里的收获一样。这就是生活在基督教势力不断南下的西班牙东海岸、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法兰西南部，以及西班牙系阿拉贡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普通百姓的实际情况。科西嘉和撒丁情况也是一样。热那亚和比萨一直在争夺这两个岛的领有权，但这两个国家是海洋城邦国家，没有足够的兵力保卫这两个岛屿的全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团体，他们都以拯救被绑架到北非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为目标。

一个是修士的组织，与神职有关，成立于公元1197年。

另一个由骑士组成，可谓是世俗团体，成立于公元1218年。

这两个团体都是超越国界的组织，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两个团体都由历代罗马教皇控制。教皇不是主宰者，而是支持者。

我在下面列举这两个团体的活动，有一点请读者注意，这就是这两个团体的成立时间。

公元1197年正好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期，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交锋，出手漂亮而被誉为十字军之花。公元1218年也正处在威尼斯唱主角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与腓力二世兵不血刃赢得圣地朝觐权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间。

这两个完全不依仗武力进行拯救活动的团体，与十字军是同时代的产物。

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是修士和骑士。前者挥舞的是印有十字的旗帜，后者挥舞的是宝剑。修士和骑士都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之下，以明确的形式参战。上帝之“所愿”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夺回圣地”。

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上帝之“所愿”不仅是夺回圣地，还包括拯救那些被掳到伊斯兰地盘上受苦的不幸的基督教徒，他们因为无权无钱而无望获释。这些人一直在坚持实施拯救他们的行动。

如果他们参加十字军，必定会在欧洲正史中留名，回国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颂，也会成为流行法兰西的众多歌唱十字军歌谣中的主人公。然而，他们抛弃了这一切，不断孤身冒险来往于敌境之中。当时，异教徒就是敌人。

下面我要叙述的，就是这些人和靠他们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故事。

“拯救修会”

这个修会的正式名称是“Ordo Santissima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以救济奴隶为目的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会)。

创始者是三位修士：生于法兰西普罗旺斯的约翰·杜·玛塔、法兰西王族成员菲利克斯·瓦卢瓦，以及瓦卢瓦的弟子、生于英格兰的约翰。

这个时代的欧洲，不仅热衷于十字军，各地也在竞相建造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并不缺乏宗教热情。可是，正如我在夺回圣地的章节中所述的那样，建造宏伟大教堂可以不惜重金，但救济可怜的基督教徒却并非如此。这三位修士建立修会后并没有立即行动。

时任罗马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出手，使得资金有了着落。教皇不仅承认这个修会是基督教会的正式组织，还为其筹备了持续的财源，以便修会的活动今后能够持续下去。

教皇在罗马七山之一西里欧山的一角为修会本部提供了地点，教皇还将从罗马城墙11座城门中的4座所收关税直接交给修会。在中世纪，任何城市都要向进入市内的物产征收关税。在罗马，关税缴纳给教皇，而其中的十一分之四成为“拯救修会”活动资金的基础。拜其所赐，这个团体成立两年后便很快地开始了活动。这实属特例。

历史教科书只把教皇英诺森三世写成了一位把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其实，他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人。他生长在罗马，成年后在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修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动向极其敏感。

腓力二世3岁就成为孤儿，是这位教皇将他培养起来，尽管教皇没有料到这位腓力后来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叛逆儿。

教皇很早就承认了圣方济各建立的方济各修会。刚建立的方济各会以贫与爱为座右铭，其会规在当时的基督教界是革命性的，如果教皇也参与反对大合唱，也许方济各和他的同志会被戴上异端的帽子，受到火刑。对全是年轻修士的方济各派而言，教皇的承认是比其他任何物质都更重要的帮助。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曾同意惹起争议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他还把阿尔维翁派定为异端，甚至强行建立基督教徒攻击基督教徒的十字军。这些事都已成为教科书的内容。但是，也是这位教皇从现实的角度支持了玛塔及其同志的“修会”。

“拯救修会”的创始者是法兰西人玛塔和英吉利人约翰，从他们去世的年份推算，创建修会时当在30岁上下。这两位也和圣方济各一样，代表了天主教会的一种新潮。

他们于公元1199年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行动。年迈的瓦卢瓦留在本部，玛塔和约翰二人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目的地定为摩洛哥。有情报说那里的“浴场”中收容了很多法兰西人。

教皇要即将出发的两个人带去几个摩尔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在做海盗时当了俘虏，被投进教廷监狱，可以用他们交换奴隶。“拯救修会”的记录里没有记载摩尔人的人数。修士是带着赎买奴隶的钱出发的，那些摩尔人的数量大概不足以交换奴隶。

教皇还托两位修士带信，嘱咐他们见到摩洛哥的苏丹曼苏尔时转交给他。这封信的内容是教皇劝苏丹改信基督教。

玛塔怀里还揣着另一封信，这是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写给摩洛哥苏丹的，要求保证修士在摩洛哥境内的通行安全。这是一张安全通行证，也就是今天的护照。两位修士带上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保障”出发了。

玛塔和约翰二人乘上雇来的船，离开了教廷领土上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港。从船长到船员都是老手，船箭也似地掠过摩洛哥的地中海沿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摩洛哥的大西洋一侧。他们登陆后直抵马拉喀什。在马拉喀什会见了统治当地的苏丹之子，通报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协助，并递交了教皇的亲笔信。

苏丹年轻的儿子读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来信立刻大笑起来。

在北非的伊斯兰世界，人们用希腊语直接称呼基督教神职人员，叫作“帕帕斯”。帕帕斯的头头罗马教皇就是“大帕帕斯”。英诺森三世的名声似乎也传到了摩洛哥，苏丹的儿子便没有把这位教皇劝诫改教的外交失礼行为当一回事，命令手下人为“大帕帕斯”要求的另一件事——赎买“拉基克”（raqiq）提供方便。

“拉基克”是北非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徒奴隶的称呼。

这是第一次行动，与对方交流不畅，对交涉的考虑和推进方式也都不同于基督教世界。此外，不仅要在马拉喀什，还要不辞辛劳地去内陆寻找奴隶。这次选择赎回奴隶的条件是须为法兰西人，且长期被迫为奴，体弱多病。

玛塔和约翰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赎买了186名奴隶。带去的资金只够赎回这些奴隶。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186人弄上船，离开了摩洛哥，向马赛驶去。途中遇到大风，他们被风吹到了西班牙西岸，落到了正在与卡斯蒂利亚王交战的摩尔人手中。

难道要让刚刚解放的“拉基克”再次沦为“拉基克”吗？玛塔豁出去了。他拼命向摩尔军的队长解释，他们正带着经摩洛哥苏丹许可而获得自由的人回国。摩尔人对“帕帕斯”的解释不以为然，但他们对苏丹很敏感。苏丹曼苏尔是著名武将，在摩洛哥以外也广为人知。

两位修士和186人得以重新上船，这次颇得风助，几天后便抵达了马赛。这186人回到没有任何可以恐惧的地方了。

这件事显示了修士约翰·杜·玛塔是一位罕见的组织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怜人的回归。

码头站满了群众，船在码头的正前方下锚。曾经的奴隶幽灵般地一个接一个下得船来。他们衰弱憔悴至极，头发胡须也从未修剪，手腕和脚踝上留着铁锁链勒出的红色印迹。这些人已被当作奴隶做牛做马十多年。

手里拿着打开的手铐的修士玛塔像

起初，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鸦雀无声。居住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兰西南部的人没有亲人不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群众中有几个人走近奴隶的队列问：在“浴场”有没有见到过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听说过名叫某某的人的消息？这时，全马赛教堂的钟声响起，接着挤满码头的群众欢声沸腾。

在玛塔和约翰的带领下，186名被解救的奴隶向马赛的大教堂走去，去感谢上帝。

过去的奴隶一定想尽早回到故乡拥抱亲人，但重要的仪式在等着他们。他们被带到巴黎，接受法兰西国王致辞欢迎，然后回家。

巴黎的夹道欢迎带来了巨大效果。这186名奴隶被绑架时没有成为“事件”，他们的回归却成为“事件”，这自然使得对“拯救基督教徒修会”的捐赠和志愿者人数激增。

5年后的1204年进行了第二次拯救行动。这5年的时间不是花在筹集资金上，而是用在了为提高拯救效率而进行的情报收集和完善组织的工作方面。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逐渐成为合作者，以后长期在背后支持着这个组织。在“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为了通商关系的顺利发展，已经与北非“酋长”缔结了协定，派驻了领事，运营着商馆，不便做损害这些关系的事情。

意大利人有着比当时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关于北非的情报。他们非公开地向进行拯救活动的修士提供这些情报。不论是在修士要去的“浴场”，还是在修士与奴隶管理者之间进行赎买交涉时，他们都不会在场。伊斯兰世界将这些事委托给第三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担任了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徒那里赎买基督教徒的中间人。

第二次拯救行动的目的地是突尼斯，目的是救出意大利人。

玛塔与苏格兰人威廉这两位修士春天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借着春天最后的北风南下，一路顺风。他们这次没有携带教皇的亲笔信。英诺森聪明机智，他肯定知道带信也不会有效果。从此以后，这些事就委托给了常驻北非主要港口的意大利领事和商人了。

这一时期的突尼斯处在摩洛哥苏丹的势力之下。修士认为，苏丹已同意解救奴隶，去突尼斯便可轻易成功。

的确，他们很容易地取得了突尼斯“酋长”的许可。然而，与摩洛哥苏丹的“同意”一起传来的还有修士为了赎买奴隶会不惜金钱的情报。

这样，带去了足够赎买200人的钱却只赎回了110人。以“酋长”为首，突尼斯“浴场”大幅提高了赎金。

两位修士不想空手而归，决定即便只能赎回110人也认了。但是，当他们二人为挑选这110人来到“浴场”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派惨景，恍若来到地狱。

蜷缩，不，被抛弃在坍塌墙壁下的全是已经年老不能再劳动的人，

在劳役中因事故失去一只脚或一只手的划桨手，因长年的恶劣劳动条件和营养不良生病而不能劳动的人和长年在阳光强射下劳动丧失视力的盲人。年轻苏格兰人修士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几乎瘫软倒地。

只要不是相当狂热的基督教信徒谁都会发问：为什么在此之前不改信伊斯兰教呢？个中原因是伊斯兰教禁止让伊斯兰教徒当奴隶。改信了伊斯兰教，就不会做奴隶了。而且，伊斯兰教徒的使命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如果基督教徒改教，不就等于扩大了他们自己的“家”吗？

因而，实情很简单，伊斯兰方面不但没有强迫他们改教，甚至连劝说都没有。

伊斯兰教强迫改教的，只是那些要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去当兵打仗的人，那里正在进行着与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势力的战役。站在扩大“伊斯兰之家”最前线的“伊斯兰士兵”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此外，在做划桨手期间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船长或水手长的人也被强迫改教。向伊斯兰教徒下命令的人也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其他的人不如让他们继续做基督教徒更好。即使向“浴场”管理者支付一点使用费，使用奴隶也比使用伊斯兰教徒绝对便宜。

在被绑架的基督教徒中，女人几乎全部被迫改教。海盗只绑架年轻女子。伊斯兰教禁止教徒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不管是不是正式结婚，想要把她们作为家奴使用，就必须让她们抛弃基督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这是她们的命运。在“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强制收容所“浴场”中，几乎没有女性收容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不论条件何等残酷，仍然有人坚持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对中世纪老百姓的影响力，应该说是精神上的约束

力非常之强，强大到我们这些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人们所无法想象。

而且，在一神教中，改教本身即不简单。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会被视为叛徒。而改教在基督教世界则并非如此就可了事。

公元1232年，罗马教廷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裁判信徒的信仰是否正确。这里不以异教徒为审判对象，审判对象是基督教徒，包括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徒。宗教裁判所后来成为西班牙和北欧愈演愈烈的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的地方。这是它的宿命。

在这个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再改回基督教的大门事实上是关闭的。即使改回来也会被怀疑是否真心。这种怀疑与被视为异端是一样的。

多神教的古代与一神教的中世纪之间的不同，在改教难度上也可见一斑。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能活下来，靠的是梦想终有一天会被救出的一线希望。我们不能责备这些人连改教这点智慧都没有。

面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哀求无论如何把自己带回家乡去死的可怜人，两位身着僧衣的修士要从中挑出110人，这比上帝的考验还要残酷。出生于普罗旺斯和苏格兰的这二位修士，硬是闭着眼睛做完了这项工作。他们要赶在“酋长”没有变卦之前让这些人上船，把他们带走。

从突尼斯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归途奇迹般地顺利。两位修士和110个奴隶在奥斯提亚上岸后受到了与在马赛同样的欢迎。然后他们立即分船，溯台伯河而上，到了罗马。

在罗马，道路两旁以及沿途房屋的窗户里都挤满了摇铃的人。这一行人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到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打破庄严肃穆

的惯例，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

后来，二位修士被招进另外的房间，接受了教皇的询问。英诺森三世想知道所有的一切。玛塔说的下面这件事使教皇最为关心。

两位修士懂拉丁语，自然会说与拉丁语最接近的意大利语。他们说，听懂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人都是意大利人，但不会说标准意大利语。他们所说的意大利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几乎所有在“浴场”终其一生的不幸的基督教徒都是无权无钱的下层百姓。

教皇英诺森三世承诺，以后将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拯救修会”是超越国界的组织。罗马教廷也是超越国界的组织，其最高人物承诺继续支持，就保证有了强有力的支援者。

修士玛塔策划实施的先做出样子，再筹措资金的战略获得了完美成功。

亲眼看到同教教徒不幸身影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必须拯救这些人。捐款和志愿者申请纷至沓来。

玛塔认为钱多多益善。

伊斯兰方面已涨了价格。玛塔还想在各个“浴场”建立医院，其实是简单的治疗所。

“修会”决定在除罗马本部之外，在欧洲各地开设分部。按现代国别，开设分部的地方有如下国家和地区：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在意大利只有总部设在罗马，而中部和南部以外的地方由海洋城邦国家暗中运作。

在欧洲历史上以十字军为代表的这个时代，“修会”以拯救基督教徒为目的，其活动这时走上了正轨。玛塔战术巧妙，他不仅依靠国王和君主的援助，也没有轻视所谓“草根”的支持。他在每座教堂里都放置了一个指针已坏无法使用的罗盘，哪怕只是直径只有10厘米的便携罗盘。弥撒结束后，信徒们总会向里面投入一些银币和铜币。这也是他让人们保持易逝的同情心的一种策略。

公元1209年发起了第三次拯救行动，目的地是突尼斯。约翰和托马斯两位修士前往，两人都出身于英格兰。

他们春天从奥斯提亚港出发，顺利抵达突尼斯，成功赎买了394名不幸者。尽管伊斯兰方面涨了价，他们还是赎买了这么多人，可见筹集了很多捐款。赎回的人几乎都是意大利南部各地的被绑架者。

然而，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没有料到的障碍。

修士托马斯让全体人员上船后心里松懈下来，似乎忘记了“修会”对“酋长”的承诺，居然在突尼斯中央广场上布道，赞美基督教的教义。

“酋长”虽然许可修士花钱赎买基督教徒，但却没有认可他们向伊斯兰教徒布道，传教受到禁止。这在伊斯兰世界百姓皆知。于是“酋长”震怒，派兵前来。士兵尚未到达，广场上的人们就先动了手。托马斯饱尝了他们的老拳。

幸运的是他们未被投入监狱。两位修士赶紧走人，与394人一起离开了突尼斯港。归途一帆风顺。他们在奥斯提亚港上岸后去了罗马，照例在市民的夹道欢呼声中，列队来到位于西里欧山的修会本部，然后各自回自己的故乡。

这次的宣传效果也很大，“修会”随即筹集到了足够立即再赴北非的

捐款。

当年实行了第四次拯救行动。这次仍从奥斯提亚出发去突尼斯。前往的修士也依然是上一次的约翰和托马斯。

他们航行顺利，但在突尼斯登陆后遇到了麻烦。两位修士甚至未被允许进入突尼斯城。在发誓严格遵守“酋长”提出的“不准向伊斯兰教徒说一句有关基督教的话”之后，他们才好不容易进入城内。

这次，他们用带来的钱赎回了240人。在带这些人去港口的路上，有个人告诉修士，突尼斯有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少年与父母一同被海盗绑架，不久父母去世，少年被拉到奴隶市场上出卖。一个撒拉森有钱人买了他，逼他改信伊斯兰教，做他的娈童。这事在“浴场”里尽人皆知。

修士约翰下决心救出这位少年。约翰身上英格兰人坚持原则的性格似乎久已形成。他把240人登船的事情交给同事托马斯，自己亲赴突尼斯“酋长”处，当面要求释放这位少年。

“酋长”没有拒绝，告诉他说，主人似乎很在意这位少年，赎回恐怕要花大价钱。有附加值的商品价格就高，这是市场的逻辑。出售奴隶收入的五分之一要进“酋长”的腰包。赎买奴隶价格的五分之一也要进“酋长”腰包。要求支付附加价值，自己的腰包也会相应增收。

然而，即使根据市场逻辑，修士也已一文不名。于是约翰说，先确定赎回少年的价格，把少年带回去。在罗马送来这笔钱之前，自己留在主人这里当人质。

“酋长”嘴上说“你疯啦”，但还是让人叫来少年的主人，对这个伊斯兰教徒问道：“你接受站在这里的这位‘帕帕斯’的建议吗？”他还说，如果听说“帕帕斯”在这里当人质，罗马的“大帕帕斯”不会弃之不顾，少年的赎金一定会付到。

修士约翰年纪轻轻，金发碧眼，是个英格兰帅哥。

但少年的主人看到约翰毫不动心，回答说不打算卖掉少年。

“酋长”听了他的话大发雷霆。他愤怒的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将被毁掉。他命令少年的主人把少年带来。少年被带来后，他又严厉地命令交出少年，让“帕帕斯”带走。

修士约翰打算把一切托付给同僚托马斯，于是请求“酋长”给他做这些事的时间。他带着少年向港口走去。

然而，主人并没有断念。他企图夺回少年，埋伏在去港口的路上，向赶来的修士挥起了宝剑。如果没有人前来助阵，英格兰人会被杀死。在伊斯兰世界，杀死异教徒不算犯罪。

这时，碰巧有个伊斯兰教徒路过，单看外表就知道他是个富人。这人命令随从按住了冲动的主人。

修士很感激，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人听后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相当于“酋长”确定钱数的银币交给主人，并告诉修士，可以在下次来突尼斯时连本带利归还他这笔钱。

大概这位人物与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有生意关系。尽快且足额地付款是意大利商人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时的铁则。利息制度也已很完善。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债年利5%，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

船只载着连同少年在内的241人和两位修士启航。船在出港后遇到强风，漂向马耳他岛。不过，此后的航行顺利，他们在奥斯提亚平安上岸。他们照例列队接受欢迎，领到了足够的食物和衣物，伤病也得到了治疗，然后各自回故乡去。少年的故事似乎引起了同情，教皇英诺森三世把这位孤儿带进了教皇的宫殿，为他安排今后无忧的人生。

公元1210年5月，玛塔和苏格兰人修士威廉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从那里乘船前往突尼斯。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带回不幸者。这次约翰·杜·玛塔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建设他念念不忘的“浴场”医院。为此，他只能去求突尼斯“酋长”。他们还带了两名医师同行。

哪里会有医师呢？说来令人感到意外。当时医术先进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而撒拉森海盗在这里为害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意大利南部无论何事都会两极分化，在极尽奢华的大教堂旁边，麇集着穷人歪歪倒倒的房屋，这情景并不罕见。

意大利南部靠近拿波里的萨莱诺有欧洲最早创立的最古老的医学校。

该校创立的时期不详。研究者中有的说它创始于7世纪，也有的主张创始于9世纪。但该校10世纪时就确已存在，到11世纪已向整个欧洲的宫廷和修道院输送毕业生了。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萨莱诺创立医学校。不过，11世纪以后，萨莱诺医学校得到了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历代国王的有力支持。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王朝领土的北部。

萨莱诺也是一个濒临大海的海港城市。港口流通的不仅是物产，也有人员。一种新的文明，无论内部有多么强大的后援，如果没有外部的即异物的刺激是不会产生的。

另外，医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宗教的影响过于强大，就有可能阻碍它按其自身规律成长。萨莱诺医学校非常幸运，诺曼—霍亨斯陶芬的国王们采取了使其与罗马教皇保持距离的政策。与意大利南部的另一个培养医师的地方卡西诺山修道院相比，萨莱诺医学校宗教色彩不浓，很适

合做俗世的医师培养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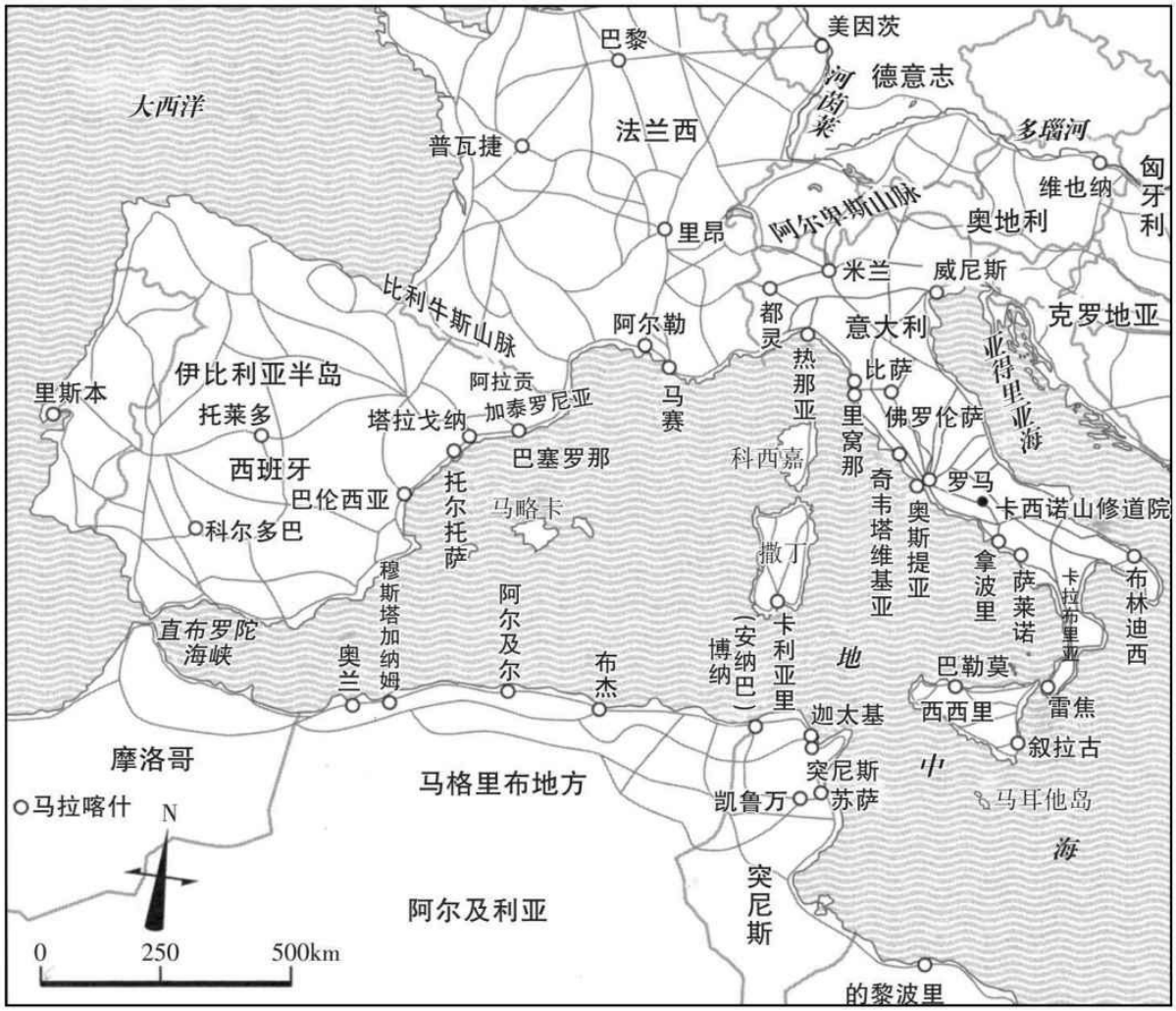
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萨莱诺医学校当初是由意大利、希腊、阿拉伯和犹太的四位医学家联合创建的，因而教科书有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书籍。教师、学生当然不会同时懂得四门语言，但大概有不少人懂得两种语言，学校规模不大，互相翻译一下也足以应付。医学是实践科学，基本靠观察。教科书即使用阿拉伯语写成，也一定不会有太大障碍，因为这种阿拉伯语有着古希腊、古罗马、犹太以及吸收了这些精华的波斯而来的传承。萨莱诺医学校特别重视临床医学。

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毕业证书上有所有国家的人名。仅我所调查的范围，意大利人自不待言，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匈牙利人，从名字上看，明显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还流传着学校有女学生的说法。

卡西诺山的医师学校附属于修道院，仅限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人。而同时代的萨莱诺医学校，则不分人种和宗教，至少在其鼎盛时期完全没有这种差别。

萨莱诺医学校难道不也像西西里—阿拉伯模式开花结果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一样，是地中海世界的奇迹吗？不正是这点点滴滴在各地萌芽的奇迹汇集起来，形成滚滚洪流，掀起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中世纪的帷幕吗？



地中海西部及其周边

修士玛塔为建医院可能招募了萨莱诺医学校的毕业生，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不过，要设立医院就需要医师。玛塔的“修会”所设立的“浴场”医院也并非只有突尼斯一家。

公元1210年春，玛塔肩负着开设这种医院的任务来到突尼斯。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向那位好心的突尼斯人连本带利归还去年修士约翰所借的钱，然后立即前往“酋长”居住的城市，请求同意开设医院。

“酋长”同意开设医院，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认为，基督教徒奴隶恢复了健康，就可以让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浴场”一角修建医

院，被收容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

玛塔从罗马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带来了许多填充着麦秸的垫褥。他们从被收容者中选出合适的人，让这些人做助手和护士的工作。治疗和教育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们表情逐渐开朗，恢复了元气。“酋长”可能了解了这些情况，还同意了玛塔在“浴场”内建教堂的请求。也许“酋长”认为，如果奴隶们精神安定，就可以更好地劳动。如果建了教堂就要派主教常驻。于是玛塔询问“酋长”是否可以派驻主教。“酋长”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在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不仅有与宗教无关的医师常驻，甚至有基督教的主教常驻。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居留区的教堂，经常会有乘商船而来的神父举行弥撒。这便是后来在伊斯兰世界也经常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渊源。

伊斯兰世界对此事的反应耐人寻味。扩大“伊斯兰之家”在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人眼里是最重要的事业。“圣战”是实现的手段，同时被视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然而对他们来说，经济也不能忽视，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行贸易立国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功地与伊斯兰世界维持着关系，大概只是因为经济这一点吧。在经济面前，教皇颁布的禁令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并非一切顺利。在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并未停止南下，成为守势的伊斯兰势力对基督教的憎恶似乎也蔓延到了北非。这时，伊斯兰教徒就会把经济置于脑后，爆发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抗和敌意。

每当此时，“浴场”里“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待遇就会恶化，对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海盗行为也会激化。气氛险恶，但修会的拯救行动仍在继续。

这种针对基督教徒的狂热敌意经常爆发，玛塔自己也体验过多次。有一年发生过这样的事。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像往常一样带着赎回的人去港口，遭到一伙手执半月刀的暴徒的袭击。已经赎回的奴隶又被扔进“浴场”。

玛塔手上负伤，脸上流着血。他就这样找到“酋长”控诉。“酋长”冷冷地答道，想带走他们就得支付双倍的钱。

玛塔已身无分文。半夜以后，有人轻轻敲响了玛塔住的房门。玛塔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身披黑色披风的男人，问道：“您是玛塔修士吗？”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玛塔一只皮囊，转身离去。皮囊里装着玛塔急需数量的银币！

玛塔用这些钱把不幸的人们再次带出“浴场”。暴徒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改变了战术。

他们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船只，扯掉了所有的帆，折断了好几根桨。

奴隶们对茫然的玛塔说道：宁沉海底不回“浴场”，不论发生什么事，绝不回“浴场”。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脱下身上的披风，挂上桅杆。奴隶们用手紧紧拉住披风下端，做成了一张帆。甲板的木板也被拆下用作船桨。

满身疮痍的船出港了，把暴徒甩在码头，这些人在那里手舞半月刀，嘴里叫骂着“没有信仰的狗”。上帝吹来了顺风，披风做帆的船只顺利抵达了奥斯提亚。

教廷正式宣告，圣母马利亚深夜造访，留下了装有银币的皮囊。

不过，玛塔知道真相。那是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贸易商人知道玛塔的困境后，秘密筹集了银币。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身穿黑色披风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他拿来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金币流通有限，容易暴露出处，而银币流通广泛，暴露的危险较低。

约翰·杜·玛塔于公元1213年去世。他所创立的“拯救修会”从1199年第一次拯救行动到他去世前一年的1212年这13年间，成功救出的人数总计达到7 000人。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修会在存续的500年中，救出的人数达到50万人。创立者玛塔去世50年之后，1262年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想想法兰西国王路易，他的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两度失败，教皇给玛塔这个待遇就是极其当然的事了。

玛塔去世后,“拯救修会”也一直坚持活动。这意味着，北非海盗没有停止绑架基督教徒的行径。看一看仍在进行拯救行动的1480年，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不是文艺复兴这朵文明之花在佛罗伦萨绽放的时代吗？一方面是波提切利描绘的《春》给人以生的欢乐，另一方面却有人在异教徒的国度当奴隶受苦受难。这也是一个例证，证明历史并不是平衡发展的。

既然现实如此，修会分支发展到遍布地中海沿岸港口，也是理所当然。在这些分支中，举其要者就有以下这些：

西班牙西部的巴塞罗那、托尔托萨；法兰西南部的马赛；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中部的里窝那，它取代了衰退的比萨；还有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和西西里的巴勒莫。

在整个地中海拥有分支方便于出港前往北非。不仅突尼斯有“浴场”，阿尔及尔以及北非地中海沿海主要港口也都有。这些分支的任务不仅在于筹集捐款，还包括收集情报。关于北非“浴场”的情报，可以通过意大利城邦国家的领事和商人了解，但地中海此岸失踪者的情报只能靠各地的分支收集。

建在罗马西里欧山上的修会附属医院墙上，有一幅相传为玛塔让人制作的镶嵌画留存至今。画中的基督端坐中央，被铁锁链铐着双脚的白人和黑人分立两旁，感谢基督使他们恢复自由。

如果有人看了这幅画认为玛塔的“修会”致力于解放奴隶而不问肤色，因而是600多年后基于尊重人权理念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先驱，那就错了。

中世纪与现代不同，非洲黑人是不能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被绑架的基督教女人与摩尔男人生下的混血儿肌肤黝黑，这些孩子几乎都被卖为奴隶。在“浴场”的收容者中混杂着看似欧洲人的黑皮肤男人。

描绘基督与两个奴隶的镶嵌画（1213年前后）

是否生为基督教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救被收容在“浴场”中，特别是那些能够判明身份，其家庭和亲属也无力支付赎金的人。这是玛塔及其“修会”拯救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方针，即使在玛塔死后也长期坚持未变。

“拯救修会”长年坚持，成功救出了为数众多的不幸者。这只是非国家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活动，令人惊叹。然而，有得必有失。这样的活动使北非海盗认为绑架有利可图，不能用作奴隶的人也能转化为钱。

结果，海盗的袭击一如既往。西欧的海军力量比伊斯兰更占优势，但海盗仍未绝迹，其原因就在于此。不怕无物可抢，抢到人便可赚钱。

但是，在任何出于善意的活动中都会发生类似的矛盾。问题只是有矛盾还要不要坚持。玛塔“拯救修会”选择了坚持。另一个设立于20年之后的拯救团体，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他们也选择了坚持。这个组织不像玛塔和他的同志那样由神职人员组成，而是由骑士这一世俗身份的人组成。

“拯救骑士团”

“骑士团”是中世纪独特的组织之一，与十字军一同诞生。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保卫领土和朝觐的基督教徒不受伊斯兰教徒的袭击，“骑士团”应运而生，其设立集中于十字军时代的初期。从欧洲去中东路途遥远，朝觐者到达后极度疲惫。也有骑士团以帮助朝觐者获得休息和治疗为目的，与保卫工作并举。

在这些“骑士团”中，当时颇具实力且在历史上也很重要的骑士团名称和建立年份如下：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1024年

“圣葛斯默·达弥盎骑士团” 1118年

“圣殿（圣墓）骑士团” 1174年

“条顿（德意志贵族）骑士团” 1191年

不过，这个时期诞生的“骑士团”并非仅以中东为活动舞台。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前期很早便被伊斯兰化了。随着中世纪的演进，基督教

开始了夺回运动。以西班牙人为主，组成了许多骑士团，担任了这一运动的先锋。伊斯兰教徒被他们视为敌人，这也与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样。即使与伊斯兰作战的地点不在东方而在欧洲，对参加骑士团的人而言，这无疑也是十字军作战。

“圣本笃·戴维斯骑士团” 1162年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 1158年

“圣雅可布之剑骑士团” 1175年

“阿尔坎塔拉骑士团” 1178年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 1218年

这些中世纪的骑士团正如其名称明确表示的那样，都是以剑，即以武力对付伊斯兰的组织。只有“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武力之外也从事医疗业务。但医疗毕竟是它的副业，实际情况请读者参阅我以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记》一书。伊斯兰势力采取攻势把这个骑士团逼到了罗得岛，人称“罗得骑士团”。它后来又被赶出罗得岛，把根据地移到了马耳他岛，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本书下卷会叙述马耳他岛时代骑士团的情况，这个骑士团是盔甲重于白衣。

以伊比利亚半岛为舞台的西班牙系骑士团，其军事性质并未变化。伊斯兰教徒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但同时代的基督教徒也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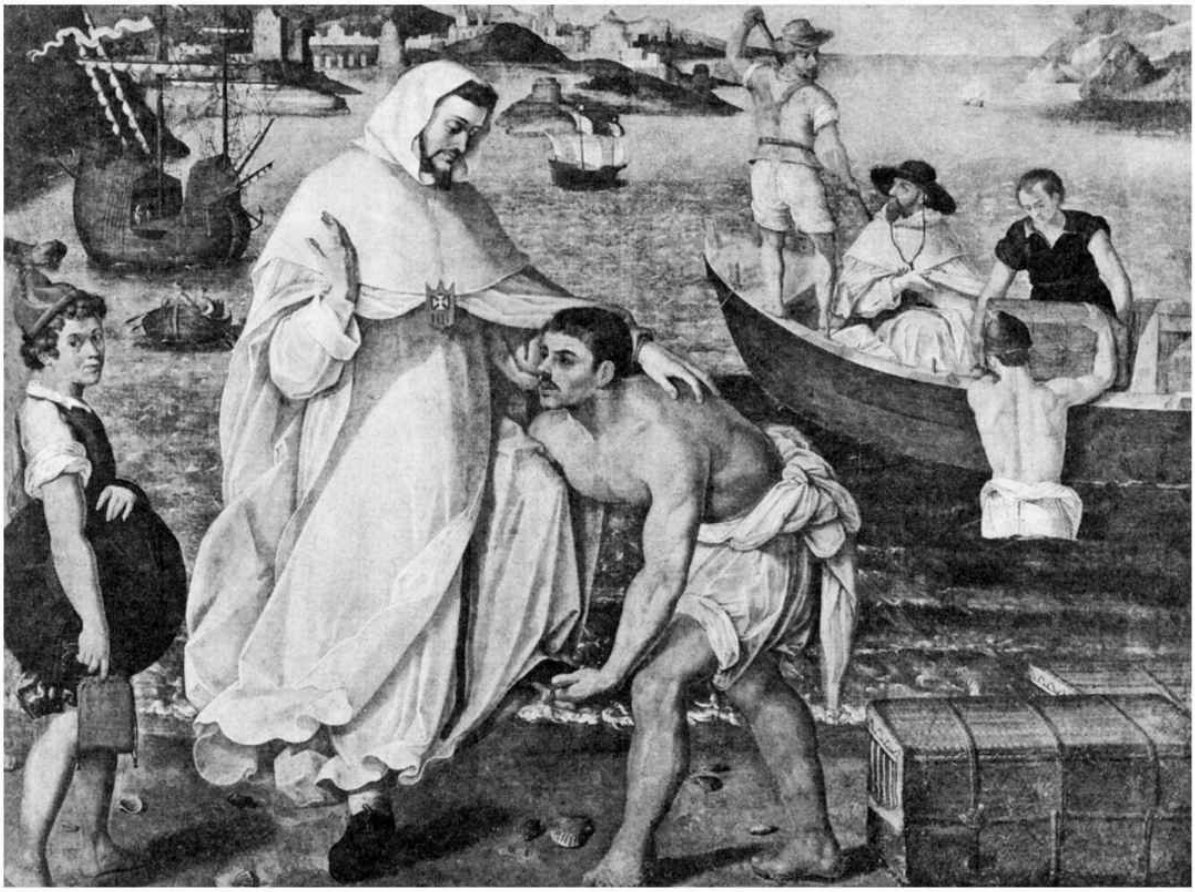
在这些骑士团中，只有“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情况特别。他们也是骑士，也同样对付伊斯兰教徒，但却一直采用非军事手段。

他们是骑士团，也遵循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士团相同的规矩。

即使是骑士团，他们也和修道院一样，要承担作为圣巴西略、圣本笃，稍后是圣方济各修士的义务。他们遵循的规则是终生独身，没有私人财产，生活朴素，以服从为美德，把一切献给上帝和基督。

修士仅被称为“修道士”（monaco），而他们则被称为“修道骑士”（monaco cavaliere）。与修道院一样，骑士团也须经罗马教皇认可才具有正当性。因而骑士团直属罗马教皇，不归世俗君主及其领地的主教管辖。

生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骑士圣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18年建立了“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他恐怕，不，几乎肯定是受到了玛塔“拯救修会”的影响。由于创立者是西班牙人，骑士团正式名称也是西班牙语，叫作“Real y Militar Orden de la Mercede para la Redenciōn de Cautivos”。阿拉贡王朝支持着骑士团，所以名称前面冠以“Real”。这个名称的直译大约是“以赎买奴隶为目的而建立的皇家骑士团”，但我们还将沿用意译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名称。尽管都是骑士，但他们使用的手段最终却是钱，而不是武器。



骑士诺拉斯科拯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

他们与玛塔的“修会”在性质上稍有不同。骑士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认为，当然可以把自己作为人质，以解决预料之外的事件。

“骑士团”起初的活动资金是团员变卖资产的收益和阿拉贡国王赐予的资金。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都属于具有实力而富有的封建领主阶级。不过，他们在与伊斯兰教徒的战斗中，选择了与本阶级其他人不同的道路。

公元1222年，骑士团建立4年之后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他们立即开始行动。目的地是阿尔及尔，这里是北非海盗巢窟的集中之地，与突尼斯不相上下。

骑士团带去了阿拉贡国王给阿尔及尔“酋长”的亲笔信。可能是这封信的作用，第一次拯救行动成功赎回了160人，他们回到了巴塞罗那港。阿尔及尔的卡塔洛尼亚商人收集的情报也帮了诺拉斯科的忙。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继承了先辈“拯救修会”的做法，先向公众展示赎回的不幸者，然后募集捐款。统治阶级子弟发起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募集到了来自其他富有阶层和普通百姓的捐款和志愿者。

第二次拯救行动也顺利达到目的。问题出在1225年的第三次行动。那年，根据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罗尼亚商人的情报，骑士团决定出海。加泰罗尼亚商人认为被绑架而来、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基督教徒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在奴隶市场上出售，消失在买主的深宅大院。把无偿的爱献给女人也是中世纪骑士的义务之一。年轻的诺拉斯科和另一位骑士古埃尔默不能听之任之。

他们离开巴塞罗那向阿尔及尔进发，一到达就立即开始了赎买交涉。对方说，在家庭劳动的奴隶不是收容在“浴场”的人，交涉前要支付定金。于是，两位骑士只能先付定金再开始交涉。这次救赎的对象不仅是女人，还有因她们不情愿的非婚关系而出生，不知生父的孩子。诺拉斯科乐观地认为可以赎回249人。

交涉好不容易就要完成的时候，对方突然涨价，还声称没有收到定金，逼迫他们要么按照要求付钱，要么走人。

绝望的诺拉斯科无法抑制愤怒，他给阿拉贡国王写信，在信中说：“跟这帮人有理讲不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都做不到，遑论谈论道理。”

然而，不幸的女人和孩子们就在眼前。他们向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

罗尼亚商人借用不足的钱款。可商人的答复模棱两可，不知是不能还是不愿借。这些商人在异教之地做生意，他们不想与当地人为敌也情有可原。

骑士没有退缩。在与古埃尔默商量之后，诺拉斯科提出了另外的解决方案。先从这里带回249人，不足的钱款待抵达巴塞罗那港后交给加泰罗尼亚商人，收到钱款之前把骑士古埃尔默留在这里做人质。对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阿尔及尔，人们也知道基督教徒遵守承诺。

就这样，船只载着249个女人和孩子离开阿尔及尔，回到了巴塞罗那。只有诺拉斯科一人没有参加阿拉贡国王也出席的欢迎仪式。他变卖了家产，正在四处筹钱。他将筹来的钱款交给了加泰罗尼亚商人，古埃尔默恢复了自由。

过了3年，1228年拯救行动目的地也是阿尔及尔。途中在海上遭遇了以马略卡岛为根据地的海盗船的袭击。带去的钱款遭到洗劫，船长和船员的个人物品也被抢劫一空。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被掳走。这样，即使去了阿尔及尔也达不到目的，他们只好返回了巴塞罗那。

伊斯兰教徒海盗认为在公海上掠夺是他们当然的权利。在其意识中，公海、领海没有区别，只要不被驱赶就一切自由。“拯救骑士团”虽有资金租船，却无钱雇船护航。他们毕竟是骑士。“拯救修会”出海时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拯救骑士团”的骑士们又能依靠谁呢？靠每个人的勇气吗？他们是骑士，手里却从来没有武器，也没有盔甲，不带随从。

1228年，他们遭遇海盗，被抢动劫之后只能返回。在巴塞罗那，他们计划年内再次前往北非。两位本会产生恐惧的骑士再次志愿参加了即将启程的拯救行动。

这次没有遇到海盗，赎回了290名奴隶。他们到阿尔及尔的“浴场”，倾尽所带资金，从被收容的人中间赎回了290人。

骑士应该坚强，但“浴场”里的惨状还是让两位骑士震惊不已。监督基督教徒的摩尔人没有任何理由，不，他们有“没有信仰的狗”这个漂亮的理由，动辄毒打基督教徒奴隶，用粗棍棒把他们打翻在地。奴隶躲不开，因为他们的脚踝，有的人还有手腕都被沉重的铁锁链铐住。

奴隶们被从“浴场”押到劳役场地，带着铁锁链的响声走过街道，这已经成为早晚时分阿尔及尔司空见惯的风景。遇到奴隶队列的小孩都会向被牵着前行的奴隶投掷石块，嘴上骂着“鲁米”、“狗”这些辱骂基督教徒的词语。

“拯救骑士团”的两位骑士甚至丧失了出港返回的勇气，他们不忍留下那些未被挑中而绝望的人们。他们决定，无论如何至少带回10个病魔缠身、受到虐待的基督教徒。可是，钱已分文不剩。两位骑士中的一位提出留下做人质直到10个人的钱款送到为止。对方也相信了钱款数日后便会送到的话。另一位骑士带着挑好的290人和另外的10人出发了。

然而，不曾想筹集这10个人的费用竟花去了许多时日。约定的日子已到，却不见钱款送来。伊斯兰方面暴怒。留下当人质的骑士被拉出来游街，被骂成是“拿撒勒[7]狗”。游街后骑士被剃光胡须。在伊斯兰世界，男人没有胡须就不被视为男子汉。因为“浴场”管理人的阻止，骑士才未被情绪激昂的群众杀死。管理人对前来拯救奴隶的修士已经十分熟悉，知道一旦杀掉修士，钱款就拿不到了。

幸运的是，虽有延误，钱款还是到了。伯尔纳多·德·科尔多巴骑士终于回到了巴塞罗那。

根据“拯救骑士团”的记载，这是第九次拯救行动。果若如此，从1222年开始到1228年的6年间，拯救行动共有9次。骑士们个个都是良家子弟，精力充沛，体格强健，年轻有为。

但是，数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使诺拉斯科遭到伊斯兰教徒的愤

恨。

一位叫作特蕾莎的西班牙贵族的女儿与阿拉贡国王订了婚。为了结婚，她从所居住的罗马一路迤逦，来到巴塞罗那。然而，国王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已经选择与匈牙利国王的女儿结婚。

特蕾莎当然生气，声称不想在巴塞罗那多待一天，一定要回罗马。她不听路途危险的忠告，决意从巴塞罗那出发从海路回罗马。

想想当时地中海西部的状况就能预料，她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连同行的弟弟一起被带到了阿尔及尔。

因为是年轻男女，他们没有被直接送往“浴场”，而是在奴隶市场出售之前暂时被留置在一个人家。他们在那里邂逅了诺拉斯科。这个时候的诺拉斯科正在践行“拯救骑士团”的老办法——为了尽量多地赎回不幸者，自己留下做人质，被留置在“浴场”监视人的家中，等钱款送到。他不是奴隶，可以在阿尔及尔市内自由行动。

诺拉斯科一眼就看出了特蕾莎的身份。他们毕竟都属于阿拉贡王国的望族人家。诺拉斯科向特蕾莎耳语道，不能暴露身份。一旦得知她是贵族的女儿、国王的妃子，伊斯兰教徒索要的赎金必定会高得惊人。被留置的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特蕾莎已成不了王妃，她现在的主人海盗船船长也不知道这一点。

诺拉斯科封住了特蕾莎的口之后，先到加泰罗尼亚商人那里去借钱，然后拿着借来的钱去见船长。海盗船的船长在地中海世界被称为“raīs”。诺拉斯科向这位船长请求用这些钱赎买那位年轻女子和她的弟弟。船长也许是想尽快得到钱，接受了请求。

然而，在船长手下当甲板长的人是抛弃了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在海上抓住特蕾莎的弟弟时就觉得眼熟。他向船长告发了特蕾

莎姐弟的真实身份，说他们二人不是西班牙百姓，而是有钱的贵族。

船长大为光火，痛打了拿着钱再次前来的诺拉斯科。如果不是同行而来的奴隶贩子拉架，他差点就被杀掉。在伊斯兰世界，奴隶贩子也知道送钱而来的诺拉斯科的价值。伊斯兰商人的经济感觉救了诺拉斯科。特蕾莎见状决定孤注一掷，碰碰运气。

既然贵族女儿的身份已经暴露，她也就不再否认。她甚至谎称自己将要成为阿拉贡王妃，并向船长提出了一个他从没想过的建议，该建议涉及常乘坐这条船的犹太商人。

她的方案是，如果用犹太商人的船把自己和弟弟送回西班牙，她将在那里支付巨款。船长和犹太商人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大概相信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发财机会。可是，犹太商人被独吞巨款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当天深夜悄悄让特蕾莎姐弟二人上了船，径直起航走了。

第二天早晨，船长不见了二人，便向阿尔及尔“酋长”申诉，说这一切都是诺拉斯科的阴谋。其实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犹太商人的谋划。但“酋长”深信基督教徒欺骗了伊斯兰教徒，大发雷霆，把诺拉斯科投入牢狱，对他说，不把与那两人身份相符的赎金送来，就休想出去！

这时，连诺拉斯科也绝望了。他只能横躺在满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牢里，忍受着身上的伤痛，心想顺利逃走的姐弟二人根本不会专门来送巨款。

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一天，地牢的门被打开，进来的是“拯救骑士团”伙伴之一的彼得·阿美利奥，他带来了特蕾莎交来的巨款和一封信，信上写了从逃脱到抵达巴塞罗那的全过程。从狱卒把信抢走交给“酋长”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是犹太商人搞的名堂。

“酋长”下令释放诺拉斯科，允许他回国。“酋长”也深知诺拉斯科带

来的经济效益。生意就是生意，有钱能使鬼推磨。

诺拉斯科回到巴塞罗那，没有休息，很快投入到下一次拯救行动的准备之中。他与一位同志再度出发前往阿尔及尔。但他们在途中遭遇海盗，带去的钱全被抢光，两位骑士也被押到了阿尔及尔。他们携带的由阿拉贡国王签发的安全通行申请书被海盗扔进大海，两位骑士被当成普通人，沦为奴隶。

到了阿尔及尔，诺拉斯科立即去求海盗船长，对他说：放我回西班牙，我会带来两人的赎金，另外一人可以留下当人质。

船长问道，为什么你自己不留下来呢？诺拉斯科回答，我能更快地筹到钱。然而，这位船长似乎不是“酋长”那样能听得懂话，即有经济头脑的伊斯兰教徒。他用充满讽刺的口吻对诺拉斯科说，给你一艘无帆无桨的小船，你还要回去吗？诺拉斯科接受了这个挑战。

阿尔及尔港和突尼斯都是马格里布（北非西半部）的重要港口，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大船进进出出，码头上也有许多伊斯兰船员和商人，非常热闹，还有很多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教奴隶在装卸货物。

诺拉斯科一个人上了没有桅杆没有桨的小船。码头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认为这是疯狂的行为。

诺拉斯科坐在小船中间，开始用两手划水。用手划水，小船只能缓缓前行。但他没有停歇，一点点靠近了码头的出入口。

刚出码头，诺拉斯科便忽地站起，叉开双腿，伸展双手，手指紧紧抓住穿在身上的披风衣襟，披风成了风帆。当时不论是修士还是骑士，男人都会穿披风。

基督教徒们不由地停下手头的活计看着诺拉斯科。在他们眼里，诺

拉斯科的身影无疑就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伊斯兰教徒可能也会想起基督教徒奴隶用木板做的十字架，钉在上面的耶稣基督垂着头颅。不管遭遇多么残酷，基督徒却决不放弃十字架。

根据“骑士团”的记载，诺拉斯科数日后到达巴伦西亚的海滨。这是奇迹，一个神助的奇迹。

“拯救骑士团”此后也一直在诺拉斯科的率领下坚持活动。从建立时起到发生这件事的6年间，他们成功地实施了30次拯救行动。骑士们再年轻，也只能平均每年实施5次拯救行动。救出的人数，每次平均200人，6年间总数也达到了6 000人。这些可怜的人恢复了自由，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56年去世。他在坚持拯救行动38年以后，离开了人世。

死后410年，他也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修士玛塔在死后50年时被列为圣人。我想，个中原因不仅在于玛塔和他的同志都是修士。玛塔的“拯救修会”在创立者死后，仍然顽强执着地坚持着拯救行动，尽管救出的人数不多。而诺拉斯科“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却有起伏。

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骑士团”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实际关照，财源得到保障。另外，他们在全欧洲的所有教堂中都放置了旧罗盘，下了许多功夫，使大众广泛投入到拯救基督教徒奴隶的运动之中。

还有，“骑士团”是具有强烈个性的诺拉斯科为统帅的西班牙骑士所建立，并延续到他去世的组织。“骑士团”在诺拉斯科死后失去了领袖，活动中断长达37年。公元1293年重新活动之后，骑士的性质没变，但集合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各地前来的志愿者，强化了“无国界骑士团”的性质。这恐怕才是为不用武力拯救人质运动奉献一生的圣彼得·诺拉斯科梦寐以求的事。

我想在这里讲讲“拯救骑士团”从西班牙扩展到欧洲以后的几个故事。在异教地盘上进行活动的艰难程度与以前别无二致。而且非常不幸，随着时代的演进，无国界行动又受到国家间对抗的波及，而只想劫人越货的海盗行径却没有停止。

公元1293年，“拯救骑士团”重新开始行动。但此时时机不好。1270年法兰西王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目的地不是中东，而是北非的突尼斯。时间过了20年，北非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恶感一直没有好转。

那年，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从巴塞罗那出发。他们刚到外海，就遭遇了海盗。了解海盗情况的船长选择了逃跑，返回巴塞罗那港。两位骑士只好另外雇船。

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突尼斯，获得“酋长”同意交涉的许可。但这位“酋长”并非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摩尔人，原本是奴隶的儿子，后来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被纯粹的伊斯兰教徒称为弃教者、叛教者，一直有自卑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认为，只有比伊斯兰教徒更加残酷地对待基督教徒，才能挽回改教者的名声。这位“酋长”就是其中之一人，虽然同意交涉，却又找理由取消。

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在希腊商人家借了一个房间开始交涉。希腊商人眼红二人带来的钱财，向“酋长”告发这两人是间谍。“酋长”派兵搜查，在两位骑士的随身行李中发现了突尼斯市区地图。

骑士解释那是为外出寻找奴隶时用的，但解释不起任何作用。常驻突尼斯的意大利各国领事和商人为骑士辩护，“酋长”也置若罔闻。两位骑士被宣判为西班牙阿拉贡国王或拿波里安茹国王的间谍，处以死刑。

热那亚骑士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被群众用乱石砸死。法兰西骑士被从突尼斯城墙上倒栽葱推下摔死。二人带来的赎金被希腊商人和“酋

长”平分。“拯救骑士团”第64次拯救行动未能成功。

7年后的公元1300年，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成功进行了第67次拯救行动，从突尼斯带回了228人。

公元1302年，第69次拯救行动又获成功，带回218人，目的地也是突尼斯。

1306年，生于佛罗伦萨的名为诺维洛的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一同前往阿尔及尔。“酋长”先同意了，但看到诺维洛已年迈，又改变了主意。“酋长”不但以定金的名义收取了赎金，还把诺维洛投入监狱。佛罗伦萨人没有挺过牢里悲惨的日子。他是死于牢狱还是被杀，情况不详。我们所能知道的确切情况是诺维洛死了，同行的另一位骑士好不容易才回国。这就是第73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在同一年，法兰西人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也实施了拯救行动，地点是博纳，即现在阿尔及利亚东端的安纳巴（Annaba），当时以海盗出海港闻名。他们得到了当地“酋长”的同意，付完了将要带回的108人的赎金。就在这时，他们见到了借房附近住着的一位年轻西班牙女人。她被绑架来后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做了买主的小妾。法兰西骑士向女人说教，说要把她赎回去，她应该在故乡开始新生活。已经对人生绝望的女人动了心。这事被主人发觉。

在伊斯兰地盘上不论对谁说基督教教义都被坚决禁止。“酋长”接到主人申诉，将法兰西骑士投入地牢。白天与其他基督教徒奴隶一样，在采石场干重活。

消息传到“拯救骑士团”总部所在地巴塞罗那，一年后惊动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派出特使，与博纳的“酋长”交涉放人。交涉成功，但条件不详。第二年，已经付了赎金的108人和法兰西骑士回到了巴塞罗那港。这就是第74次拯救行动的结果。这位法兰西骑士名叫迭戈，一年

多来，在残酷的环境下身心俱损，回来后不久便去世了。

偶尔也会发生夹着笑话的插曲。公元1317年春，十字军运动偃旗息鼓，意大利骑士亚历山德罗一行二人从巴伦西亚港出发前往突尼斯。他们也雇了犹太人，“骑士团”以前拯救基督教徒行动一直雇用他们。亚历山德罗告诉中间人伊斯梅尔说，要优先挑选“浴场”收容者中有病的人。于是按照这个条件进行了挑选，赎买的交涉也已结束。

这时，这位犹太人说，我家也有一个生病的奴隶，请把他也买走吧。意大利骑士决定先到伊斯梅尔家去看看这个奴隶。

只看了一眼，亚历山德罗便哑然无语。这个奴隶不仅病重，而且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他断断续续地向自己国家的骑士诉说，死也要死在意大利，不能死在异教的土地上。

既然是“拯救骑士团”的一员，就不能把这话当作耳旁风。但骑士已身无一文。于是亚历山德罗说，这个奴隶的赎金送到以前，自己留下来当人质。

生病的奴隶在一旁听到这话样子大变。踏上故乡土地的愿望给了他力量。趴在地上的他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

犹太人伊斯梅尔见状大惊。他问亚历山德罗：难道你能创造奇迹吗？意大利骑士回答说：如果说这就是奇迹的话，那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创造的。犹太人还是说：“基督？胡说！很久以前他在耶路撒冷被处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奇迹啊？”

亚历山德罗骑士便把基督教义耐心地说给这位犹太教徒听。伊斯梅尔完全感动了，竟说也要改信基督教，改教后去巴伦西亚，做一个基督教徒生活下去。

但是，“酋长”只给被赎买的奴隶和两位骑士发了出港许可。于是，

亚历山德罗对伊斯梅尔说，以索要自家已恢复健康的奴隶的赎金为由和他们一起走。伊斯梅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说不但自己和家属要上自己的船一块儿走，为了骗过码头的官员，让骑士也上自己的船。两人说定了这事。

未曾料到，在伊斯梅尔家干活儿的摩尔人佣人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酋长”。

“酋长”派出的贝都因人警备队到达码头时，两艘船都已起航了。载着奴隶的船已到港外，犹太人的船载着骑士尚在港内。骑士亚历山德罗只能看着船只远去，自己却被抓住，押到了“酋长”面前。

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哪怕是向犹太教徒说教基督教义也被禁止。“酋长”以违反此条之罪判处骑士火刑。

意大利骑士被绑在广场中央的柱子上，周围挤满了群众。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点燃。群众不断向人体火柱投掷石块。傍晚开始下雨，那火终于被雨浇灭。

夜半过后，几个从“浴场”偷跑出来的奴隶走近焦黑的柴炭堆捡拾尸骨，回到“浴场”分给大家，每人一片，用绳子拴好，当作圣物挂在颈上。这是第84次拯救行动的结局。

公元1350年，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二位骑士把阿尔及尔确定为拯救行动的目的地。进展一切顺利。船只满载着近200名赎回的奴隶准备出港，这时人们发现，一个拿波里女子不见了踪迹。这人年纪轻轻就被绑架到这里，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来和许多女人一样做了买主的妻子。即将出发时，她对回故乡在基督教世界生活生出了恐惧。二位骑士只得撇下这女人出发了。这是第112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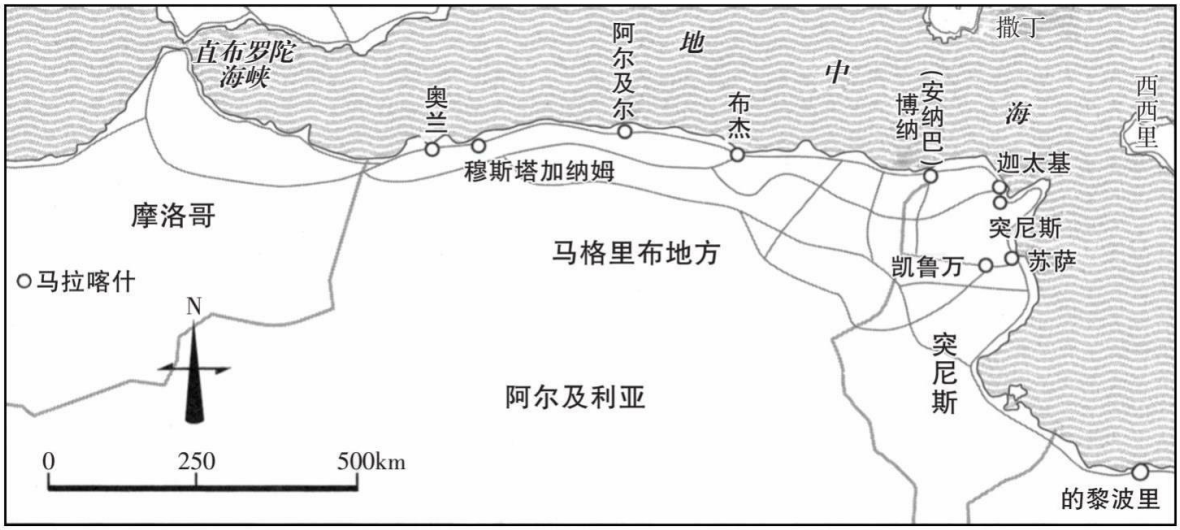
类似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整个拯救北非基督教徒的活动中，罕有成

功救回女人的例子。

这期间，不论是玛塔的“修会”还是诺拉斯科创立的“骑士团”都在坚持活动，从未停止。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舞台都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城市，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北非从西向东的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现在的安纳巴）、突尼斯、的黎波里等都是海港城市，也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收容绑架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规模大，收容奴隶的数量也多。拯救行动也只能集中在这些海盗集中的地方。

第二，这些城市的“酋长”都已经适应了这两个组织的拯救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懂得经济方面的理由。拯救行动没有当地“酋长”（相当于总督）的许可就不能成功。常驻当地的欧洲领事和商人提供的情报也是进行拯救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北非

第三，是治安方面的原因。在北非伊斯兰世界，“酋长”的影响力也只限于沿海地方，一旦进入内陆，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贝都因人为首的盗贼团伙横行霸道。内陆地区也有基督教徒奴隶，尽管人数比沿海地

方少。不过，进入内陆地区寻找奴隶，即使是伊斯兰教徒也有危险，更何况基督教徒。第166次“骑士团”的拯救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公元1430年，两位生于托斯卡纳的骑士深入内陆寻找奴隶。他们把赎金装在皮囊里放上驴背，顶着灼热的太阳，徒步离开了突尼斯。

可是，旅程不到一个星期便结束了。跟踪而来的贝都因盗贼夜里袭击了骑士，抢走了他们所带的一切，把两人绑在岩石上，用乱箭射杀他们。突尼斯“酋长”把他们被秃鹰啄食得狼藉不堪的遗体交给了佛罗伦萨的领事。

另外还有人虽未遇害却被盗贼作为奴隶，10年后才好不容易回国。也许是因为“拯救骑士团”的成员都是骑士，与修士的“拯救修士会”相比，同样的拯救行动却更富波澜。下面介绍的插曲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有一年，深入突尼斯内陆的法兰西骑士在行进途中遇到一个人，没有戴脚镣但戴着铁制项圈，一眼便知是一个“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这人上了年纪，衣衫褴褛，可能是饥饿的原因，他脚步蹒跚。骑士问道：“你是谁？”

老人用意大利语回答：“我生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在一个沿海小村当教士。有一次，海盗来袭，我被绑架卖身给这附近的村民当奴隶，也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老人继续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一大早就干搬石头的活儿，但什么都还没有吃。”

年迈的意大利人一边嚼着递过来的面包一边说：“现在是撒拉森人的斋月。进入斋月，他们不吃东西，也不给我们吃东西。可是，太阳落山后他们吃饱喝足，却只给我面包和水。”

骑士心生怜悯，但要向前赶路，便说一起进村给他买食物。老人却

回答说："那怎么行！耽误了活计我会被主人毒打。"骑士说下次来一定把你赎回去。说完心情黯然地与老人分别。然而，赎买老人的机会不会再来，这位法兰西骑士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在内陆地区，欧洲人还是很惹眼的。村里有人看见他给老奴隶面包，和老奴隶说话。其中一个人向突尼斯"酋长"告发。

虽然"酋长"同意了法兰西骑士的拯救行动，也只好把他关进监狱。"酋长"并未打算判他死刑。有传言说有几个年轻人不知在哪里得到许可，去牢里给骑士送食物，骑士与年轻人说了话，"酋长"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这五位年轻人是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学习的学生，在附近海边游玩时遭到海盗袭击，被带到了突尼斯。这类事情在海盗横行的当时并不稀罕。

他们被带到船上就开始遭到拳打脚踢。这五个人都意识到，等待自己的命运只有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或去"浴场"。毕竟是学生，他们很快寻找打开局面的途径。在命运尚未向不幸的方向转舵之前，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抵达突尼斯港口时，海盗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五人被安排在伊斯兰教导师那里从头学习《古兰经》，然后被迫与柏柏尔族女人结婚生子，每周五去清真寺，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活了下来。他们都还年轻，得知法兰西骑士被投入监狱之后便以送面包为由接近他。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青年在坦言了他们的情况之后问道："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法兰西骑士回答道："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回到祖国，就必须忏悔自己抛弃基督教义之罪，必须在伊斯兰教徒的面前声明回到基督身边，哪怕这样做对你们意味着死亡……"

听到狱卒的报告，“酋长”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五个年轻人被禁止出入监狱。伊斯兰社会严禁基督教的布教行为。“酋长”没有对骑士处以在广场中央执行火刑，而是减少牢里的食物，让他渐渐衰弱而死。就这样，法兰西骑士被杀害了，好像是自然死亡。

“酋长”选择这样的屠杀方式，是因为这个时期正与拿波里有些交涉，而拿波里处在法兰西安茹王朝统治之下，他不想把法兰西骑士之死搞得沸沸扬扬。无国界是“拯救骑士团”活动的理念，有时也并非与国家间的事务毫无关系。

这是15世纪中叶的故事。在佛罗伦萨，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期，“骑士团”成功地进行了第185次到第195次共计11次拯救行动，帮助3 000多不幸的人们恢复了“人的尊严”。

与此同一时期，有一位骑士被置留北非10年以上，后来终于回国。他留下了对下面问题的回答。这位骑士也是在前往北非进行拯救行动时，遭到海盗袭击被俘，所带的安全通行证无效而被卖为奴隶，被强迫干重体力活。后来他终于回到祖国。

“请你谈谈被囚禁在巴尔贝利亚（北非西部）的人们的真实状态。”

“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长期以来，我也是一直按照买我的主人的命令从事重体力劳动，从荒地上搬走石头，开荒种地，在采石场凿石运走。我的体格和体力都不适合这种重体力劳动。干活稍慢一些，主人就会发怒，每次都会辱骂我，对我拳打脚踢，还经常用鞭子抽我。

“能暂时在‘酋长’奥特曼身边干活就是我的幸运了。每当想到没有我这样运气的人靠什么信念活下来，我就会黯然伤心。”

奥特曼“酋长”让这位骑士在宫殿里干活儿，是因为中世纪后期，欧洲进入了各国重组的时代，伊斯兰世界也开始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需要懂得其语言的优秀官僚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工作几年之后就可以让骑士如愿回国，可见奥特曼“酋长”也是一位富有外交感觉的人。“拯救骑士团”在欧洲已是家喻户晓，其中的一位骑士回国，一定会给西欧各国留下良好印象。

即使这位骑士已经讨厌再看到伊斯兰世界，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他。但是，在上述谈话后的第二年，这位骑士却又去了阿尔及尔。他要充分利用“酋长”表示的好意。这第185次拯救行动带回来的是300多名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老百姓。

第195次拯救行动进行于公元1480年。以往对于“修会”和“骑士团”活动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年爆发出来。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两个拯救团体的活动使北非海盗意识到赚取赎金的效用。他们竭力寻找、袭击防守薄弱的地方。只要绑来人就行，即使付不出赎金，也会有“修会”和“骑士团”替他们支付。

第二，支付赎金赎买的做法导致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伊斯兰世界更加富裕。

于是，时任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公布废除令，废除了历代教皇一直承认的减轻向这两个团体捐款者罪责的特赦令。

当年9月，“骑士团”的两位西班牙骑士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人数锐减至56人。失去了教皇的特赦，募集捐款不再顺利。

翌年开春，冰雪消融，“拯救骑士团”的代表路易斯·德·罗斯里奥斯赶赴罗马。他带着前一年9月救出的56人直接与教皇谈判。

“这些人生活在无法想象人类能够生存的悲惨境地之中，仅靠要回故乡的希望才活了下来。在北非，光是有名的‘浴场’里就有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突尼斯等多处，里面都塞满了基督教徒。他们被残酷地对待，做着重体力劳动。有谁一旦不能劳动了，他只能等死。”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只能收回成命。他甚至还向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统治者们和领有拿波里、西西里的阿拉贡国王写去亲笔信，请求他们向这两个团体进行资金援助。罗马教廷自然也不例外。两个团体得以再度募集到捐款，重新开始拯救行动。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好坏两重意义上，都是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典型代表。梵蒂冈美术馆吸引游客最多的“西斯廷教堂”(Capella Sistina)就是他建造的，教堂名称意为“西斯图的教堂”。这位教皇邀请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佩鲁吉诺以及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画家在教堂里左右各画了一幅壁画。天穹和正面是后来米开朗琪罗所画。这位教皇迈出了用古代和文艺复兴的杰作创造梵蒂冈美术馆的第一步。然而，颁布废止捐款特赦令又收回成命的也是这位教皇。

15世纪后半叶之后，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席卷佛罗伦萨，也波及到了罗马，而拯救被绑架的不幸基督教徒的行动也仍在继续。就在达·芬奇挥舞画笔、米开朗琪罗挑战大理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在地中海不远的对岸还有“浴场”，还有很多不幸的人被锁链锁着，被强制劳动。就在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穹壁画同一年的公元1513年，“拯救骑士团”从突尼斯成功救回200人。

公元1779年，这个骑士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拯救行动。10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但还有需要拯救的基督教徒奴隶。

“拯救骑士团”成立于1218年，从1222年进行第一次拯救行动开始，

其活动整整持续了557年之久。这期间，他们实施了344次拯救行动，平均一年半多一点儿一次。

较之“修士会”，“骑士团”留下了相当多的史料，较易追溯其活动。但我们仍不可能准确掌握救出的总人数。每次救出的人数不到100人时，很多就不做记录了。“修会”也同样如此。因此，我认为还不能轻易否定有些研究者主张的“修士会”和“骑士团”合计救出的总人数达到百万人的说法。不管怎样，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持续了500至600年之久。另外，在此期间，在拯救行动过程中殒命的修士和骑士也不计其数。

这两个团体都彻底贯彻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只拯救那些因无地位而国家不出援手，因无钱财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他们救出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名人便证实了这一点。坚守铁一般的原则长达500年以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彻底。

唯一的名人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他于公元1571年参加了黎凡特海战，一只手被打成残废，在回故乡西班牙的途中被海盗掳走。他在阿尔及尔的“浴场”过了两年的奴隶生活。28岁的塞万提斯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未成功，双手双脚被套上镣铐，成为重点监视对象。他被“拯救修士会”赎回，恢复了自由。《堂·吉诃德》是他被赎回以后创作的，这位为世界文学增光添彩的塞万提斯，当时不过是个无名的可怜人，是一个被“修士会”和“骑士团”作为拯救对象的普通百姓。

“浴场”是收容伊斯兰教徒称为“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地方。这是一种什么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我所知，没有一本书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想象描述。这是一个在市内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古罗马时代公众浴场的废墟呢？罗马人建造的大型建筑中还有斗兽场和圆形竞技场，但一般都在市外。市内的大型建筑只有以广场为中心的古罗马广场和公众浴场。

伊斯兰教徒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有更强的卫生观念，并不把洗澡视

为罪恶。但是，要使用罗马式大浴场，却不是只要有建筑物就能办到的。首先，为给大浴场供水，水道必须能用。供水之外，燃料和人员的组织也不可或缺。在所有方面不形成组织，罗马式大浴场便不能发挥作用。

伊斯兰教徒在罗马帝国东部也修复并使用罗马时代的浴场，但不是全部。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北非，就连部分恢复使用也未做到。这些罗马时代的大浴场虽成废墟还剩屋顶，伊斯兰教徒是不是把这里作为收容奴隶的强制收容所了呢？

有这种“浴场”的海港城市几乎都是罗马时代就有的城市。只要是城市，古罗马人都会在那里建设公众浴场。

现代辞书只解释说强制收容所称为浴场，但那称呼不是自古就有，而是沿用中世纪伊斯兰社会对强制收容所的称呼。古代罗马人那么喜欢洗澡，用艺术作品装饰大众浴场，使之成为“百姓的宫殿”。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这样的古罗马人会把收容俘虏和奴隶的地方称作“浴场”。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在现代，地中海已经没有海盗出没了。海盗何时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呢？

那是公元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兰西殖民地以后的事。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兰西人征服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为了标榜全面消除反对《人权宣言》的海盗业，而是为了将其作为本国的殖民地。不过从结果上看，事实是以法兰西为首的西欧各国殖民北非之后，地中海终于摆脱了海盗的威胁，从我们叙述至此的时代之后一直到19世纪前半叶，海盗始终出没于地中海。

海盗既然是社会现象之一，也就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简而言之，绿底白色的月牙转变成了红底白色的月牙。

[7] 拿撒勒（Nazareth），又译纳匝勒，基督教圣城之一，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北部。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利亚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译者注。

年表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476	蛮族出身的将军奥多亚克举起反旗，战胜皇帝的军队，逼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		（中国）萧道成灭宋建齐（479）。
565		查士丁尼皇帝统治37年后去世。	（中国）陈霸先灭梁建陈（557）。
568	伦巴底人南下入侵意大利。		
570		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	（中国）陈国灭亡，隋朝建国，中国全境统一（589）。
613		穆罕默德开始布教。	
632		穆罕默德去世。	（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630）。
634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哈里发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	
635		伊斯兰势力征服大马士革，迁都于此。	
636		叙利亚被伊斯兰化。	
642		伊斯兰势力征服亚历山大，埃及伊斯兰化。	
644	伊斯兰势力征服的黎波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伊斯兰化。		
651		波斯萨珊王朝灭亡；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化。	（中国）伊斯兰教传入（651）。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652		从亚历山大出发的海盗船袭击西西里首府。从此，海盗入侵基督教世界。	
670	北非第一个由阿拉伯人建设的城市凯鲁万在突尼斯以南 150 公里的地方建成。		
698	伊斯兰势力征服迦太基，北非全境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		（中国）武则天即帝位建周（690）。（日本）迁都藤原京（694）。
700	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岛遭撒拉森海盗袭击。		
704		凯鲁万的地方长官宣布开始“圣战”，袭击西西里南岸。	
705	撒拉森海盗从凯鲁万出发袭击叙拉古。		
710	伊斯兰势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伊比利亚半岛。		（日本）迁都平成京（710）。
727	撒拉森海盗船从北非出发，袭击西西里南岸，绑架居民。		
728		叙拉古的拜占庭军队迎战撒拉森海盗，惨遭败绩。	
732	撒拉森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法兰克，在普瓦捷平原被击退。		
734	突尼斯建成伊斯兰造船厂。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744	以帕维亚为根据地的伦巴底人国王利乌特普兰德去世。此后伦巴底人再度回到以前的分散状态。		（中国）唐朝将军高仙芝在怛罗斯河畔与伊斯兰军队作战败北（751）。
762		伊斯兰势力建成新都巴格达，由大马士革迁都。	
800	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授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		（日本）迁都平安京（794）。
814	查理曼去世。		（日本）最澄从唐朝回国，开创天台宗（805）。（日本）空海从唐朝回国，开创真言宗（806）。
816	教皇利奥三世去世。		
827	伊斯兰军队在西西里登陆，在马扎拉—德尔瓦洛附近的平原与拜占庭军队作战获胜。北非伊斯兰教徒开始征服西西里的历程。		
828	受教皇之命博尼法乔伯爵进军凯鲁万获胜，解救了被绑架的基督教徒。		
829	伊斯兰大军从突尼斯出发，在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登陆并占领该港。此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也成为海盗的目标。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830	在托斯卡纳过冬的伊斯兰势力进军罗马，失败。组建完成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伊斯兰军队。以阿拉伯人为主的第一队袭击巴勒莫。拜占庭军队未来救援。		
831	巴勒莫陷落。此后伊斯兰势力完全征服西西里西部，并向东部扩大势力，西西里成为海盗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基地。		
835	坎帕尼亚的拿波里与巴勒莫的伊斯兰地方长官缔结友好同盟条约。此后撒拉森海盗将目标转向普里亚。		
840	威尼斯海军在塔兰托港外大败于撒拉森海盗。		
843	受伊斯兰势力攻击，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归于伊斯兰统治。		
846	北非各地的伊斯兰势力在西西里集结，经意大利南部进军罗马。再度为罗马城墙所阻。掠夺城外的教堂。罗马和意大利中部、南部各城奋起反击，夹攻伊斯兰势力。		
847	撒拉森援军从西西里和北非赶到，与法兰克王兼意大利王鲁多维科率领的防卫军在陆上作战。决战前加埃塔港外暴风雨突起，直击撒拉森军队，征服罗马以失败告终。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849	春，撒拉森海盗在托斯卡纳北端的鲁尼登陆，大肆掳掠。然后继续北上，横扫从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海岸到法兰西南部地区。教皇利奥四世号召意大利各城市组成防卫军，在奥斯提亚港外迎战伊斯兰船队。猛烈的西南风袭击伊斯兰船队，捕获众多俘虏。（《奥斯提亚海战》）		
86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多维科二世接受罗马教皇的请求，在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军队作战，遭到惨败。		
877	教皇约翰八世会见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各城市代表，欲说服其不要与伊斯兰结为同盟，未果。 约翰八世以一年之内不再掠夺意大利半岛西部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2.5万枚银币。 西西里“酋长”从巴勒莫出发，进军叙拉古。		
878	春，伊斯兰势力再度开始进攻叙拉古。9个月攻防之后叙拉古陷落，伊斯兰统治西西里全岛。		
879	撒拉森海盗再度开始掠夺意大利半岛。约翰八世向意大利王、法兰克王、德意志王请求救援未得理睬；向已经与伊斯兰势力逐渐建立通商关系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苏莲托请求共同作战又遭拒绝。		
882	约翰八世去世。 撒拉森海盗袭击、破坏圣温琴佐修道院。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915	拜占庭帝国摄政皇后佐伊与巴勒莫“酋长”签订协约，以不攻击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为条件支付2.2万枚拜占庭金币，但仍然遭到协定范围以外的北非海盗的袭击。		（中国）唐灭，后梁立，进入五代十国时代（907）。
916	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奇维塔韦基亚。加利格里阿诺失陷。教皇约翰十世号召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组建军队，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经过了3个月战斗，肃清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伊斯兰势力。		
925	撒拉森海盗袭击布里亚的奥里亚，杀害6 000人，绑架1万人去北非。		
934	撒拉森海盗袭击热那亚。		
948	撒拉森海盗征服意大利南部雷焦。		
963		拜占庭帝国皇帝福卡斯败给撒拉森军队。此后拜占庭帝国再未尝试与撒拉森海盗对决。	（中国）宋立（960）。
975	法兰克王肃清盘踞在法兰克南部圣特罗佩老巢的撒拉森海盗。		
98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率领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与撒拉森军队决战，遭到惨败。		
1002	阿马尔菲舰队击退袭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004	威尼斯舰队击退袭击亚得里亚海海港城市巴里的撒拉森军队。		
1005	比萨舰队击退扫荡卡拉布里亚的海盗船队。		
1012	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并肩作战，击退海盗穆塞托。		
1016	逃进布里亚加尔加诺山里的布里亚豪绅请求朝圣归途中的诺曼骑士从意大利南部驱逐拜占庭和伊斯兰势力。		
1017	诺曼骑士与布里亚的意大利人着手从意大利南部肃清拜占庭势力。		
1024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成立。		
1037	诺曼人肃清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势力。		
1038	诺曼势力征服意大利南部以后开始进攻西西里。		
1061	罗杰率领的诺曼人再度进攻西西里。		
1066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1072	诺曼人占领巴勒莫。		
1086	诺曼人占领叙拉古，统治西西里全境。		
1087	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组建抵抗伊斯兰的军队，进攻凯鲁万港外港马赫迪耶，成功救出基督教徒。		
109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出发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099		第一次十字军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1147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王路易七世参战。		（日本）保元之乱（1156）。（日本）平清盛任太政大臣（1167）。
1174	圣殿骑士团成立。库尔德人萨拉丁再度统一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的争斗终结。		
118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法兰西王腓力·奥古斯都、英格兰王理查参战。		（日本）坛浦之战中平氏一门灭亡（1185）。 （日本）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1192）。
1197	修士约翰·杜·玛塔等人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援下创建拯救基督教徒修士会。		
1199	拯救基督教徒修会从奇维塔韦基亚出发前往摩洛哥，成功救出 186 名基督教徒，经马赛回国。		
120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欧洲各国君王不理睬英诺森三世的号召，只有佛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参加东征。		
1210	拯救基督教徒修会在突尼斯的奴隶收容所内建立医院。		
1213	修士约翰·杜·玛塔去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218	西班牙骑士圣彼得·诺拉斯科建立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		（日本）北条氏开始执政（1219）。（日本）承久之乱（1221）。
1222	教廷承认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骑士团出发前往阿尔及尔拯救基督教徒。		
1223	威尼斯制订海洋法。		
1227	西西里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召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来到耶路撒冷，与伊斯兰势力媾和。		（日本）道元自宋回朝，开创曹洞宗（1227）。
1230	比萨与突尼斯“酋长”签订在突尼斯保护贸易安全、设立商馆和教堂的协约。热那亚迅速仿效，缔结内容基本相同的协约。		
1231	腓特烈二世与伊斯兰势力更新承认西西里人安全和贸易自由的协约。		
1232	罗马教廷设立宗教裁判所。		
1248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召集第六次十字军进攻埃及，遭到惨败，路易九世被俘。		
1251	威尼斯与突尼斯“酋长”缔结在突尼斯保护本国国民安全和行动自由、设立领事馆和商馆的协约。 热那亚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1252	佛罗伦萨与突尼斯“酋长”签订贸易安全和设立商馆、教堂的协约。佛罗伦萨开始发行弗罗林金币。		（日本）开创日莲、法华宗（1253）。
1256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诺拉斯科去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262	罗马教廷将约翰·杜·玛塔封为圣人。		
1266	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成为新统治者。		
1270	路易九世组建第七次十字军前往突尼斯，路易九世病故。		（中国）蒙古人创建元朝（1271）。（日本）元军率高丽军队远征日本失败（1274）。（日本）元军再次入侵失败（1281）。
1284	威尼斯开始发行达克特金币。		
1291		巴勒斯坦基督教势力最后堡垒阿卡陷落。十字军时代结束。	
1297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路易九世列为圣人。		（日本）足利义政建成银阁（1483）。
1480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废除减轻向拯救基督教徒修会和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提供捐赠者罪责的特赦。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第 195 次拯救行动前往阿尔及尔，因捐赠锐减，只带回基督教徒 56 人。		
1453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	（美洲）出生于热那亚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481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代表路易斯·德·罗斯里奥斯向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请求撤回特赦捐赠者的废除令。		
1513	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穹壁画。		（美洲）葡萄牙的费迪南德·麦哲伦通过麦哲伦海峡（1520）。
1571	塞万提斯从军参加黎凡特海战后回西班牙时被海盗绑架。		（美洲）13 个殖民地宣布从英国独立（1776）。
1779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最后一次拯救行动。		
1789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7	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1830	法兰西入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殖民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田建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498-1
Ⅰ.①罗…Ⅱ.①盐…②田…③田…Ⅲ.①地中海区-中世纪史Ⅳ.①K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980号
Roma-nakiato no Chityuukai-sekai (1)（2）
Copyright © 2008，2009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田建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DE MARI NOSTRO POST DELETAM ROMAM

（下册）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国 田建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册）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田建华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拜托读者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挺进爱琴海
海盗·新时代
教廷海军
挺进伊奥尼亚海
挺进西地中海
海盗库尔特格尔
教皇美第奇
“神圣同盟”
保罗·维托里
热那亚的大海汉子
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年轻的掌权者们
教皇克莱蒙特
犹太人西纳姆
海盗“红胡子”
安德烈亚·多里亚
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攻占突尼斯
弗朗索瓦与卡洛斯
法兰西—奥斯曼同盟
抗奥联合舰队
普雷韦扎海战
海盗图尔古特

远征阿尔及尔
威尼斯的“情报战”
变成国宝的红胡子
海盗之子
图尔古特回归
马耳他骑士团
“杰尔巴屠杀”
海盗产业
海盗乌尔齐·阿里
圣斯德望骑士团
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马耳他攻防记
“马耳他之鹰”
攻防开始
图尔古特的到来
以眼还眼
防守成功
奥斯曼与威尼斯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
通往黎凡特之路
塞浦路斯攻防战
建立联合舰队
黎凡特海战
黎凡特之后
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后宫中的威尼斯女人
骑士与海盗
地中海世界的夕暮
附录一 因民族而异的海盗对策
附录二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历史也会发生强震。毋庸讳言，这样的强震伴随着大量的破坏和杀戮，对人类社会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事件。然而，强震在另一方面却有着正面效果。那就是痛击那些不论是由于精神懈怠还是出于无知而一直拒绝直视时代变化的人们，强迫他们睁开眼睛。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发生于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就是这样一次强震。

也许会有许多人反唇相讥。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拜占庭帝国走向灭亡，这是国际政治，普通百姓却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错，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历史上的大事件，但这与居住在地中海沿岸饱受北非海盗之苦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二者看似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是由深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不仅见于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在21世纪的现代，也能随时随地举出例子。我甚至想，如果从这里切入，也许可以写出意味深长的人类历史作品……

如果效仿地震学家收集过去预兆的做法，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但在200年前已可见其端倪。

说到这里，我们只能承认，蒙古人是中世纪地震的始作俑者。给急速扩张后迅速繁荣的伊斯兰世界带来强震的也是从东方来袭的蒙古人。公元1258年，巴格达遭到蒙古军的猛攻而陷落。

巴格达在波斯语中是“神赐都城”之意。伊斯兰势力入侵流淌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便放弃了以前一直认为最适合统治者建都的泰西封，在稍远的地方新建了纯粹的伊斯兰都城——巴格达。神赐都城中的“神”不是别的，而是安拉。

不难想象，自公元762年建都以来，巴格达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就是一个特别的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很多希腊人和波斯人所建的城市并不相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巴格达，这座城市表现出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与波斯人的文明幸福结合的成果。

这座城市500年后在蒙古人面前屈服了。在所有伊斯兰教徒眼中，蒙古人被视为瘟神并不奇怪。1258年巴格达陷落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便不断西移，远离了蒙古人所在的东方。

赛尔柱突厥帝国把首都设在了小亚细亚中央的科尼亚。取而代之登上伊斯兰世界盟主宝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把首都迁到了布尔萨。布尔萨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马尔马拉海已在近前，只要能出海，距离君士坦丁堡就只有一步之遥。以马尔马拉海为界，东边为亚细亚，西边为欧罗巴。伊斯兰世界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开花结果于美索不达米亚，现在越来越把它的中心移向了欧洲。

到了14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土耳其进而吞并了位于欧亚边缘的布尔萨。入侵欧洲的土耳其军队征服了色雷斯，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也纳入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首都迁到了位于色雷斯的城市埃迪尔内。

顺便说一句，“君士坦丁堡”在日本沿用的是英语读音，大约是因为英语在日本更为普及。但它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希腊语读音“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大帝之都”。罗马帝国后期皇帝君士坦丁被尊称为“大帝”，这里是他所建之城，因而得名。

“埃迪尔内”是按土耳其式发音，希腊语原名是“Hadrianopolis”（哈

德良之都），因为它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哈德良建起的城市。

这两座城市的古名到了中世纪发生了变化。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人留下的史料最多。这一时期从头至尾，以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主的意大利通商城市国家都与地中海世界东部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关系。基督教的核心——教廷也在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不得不在宗教方面关注着伊斯兰世界的动向。因此，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座城市在欧洲人中间最为普及的称呼是意大利语式发音的希腊名称“Constantinopolis”和“Hadrianopolis”。

不过，这些地方归入土耳其的统治以后，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只是把以前的名称以土耳其的发音念出而已。于是，起源于古罗马的这两座城市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名称沿用下来。这两座城市在5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属于土耳其，这些名称也就延续至今。

古代（希腊语）：	Constantinopolis	Hadrianopolis
	↓	↓
中世纪—近代（意大利语）：	Constantinopoli	Adrianopoli
	↓	↓
近代—现代（土耳其语）：	Istanbul	Edirne

城市名称的变迁不单是叫法在此时此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东方民族已经蚕食到曾为世界霸主的罗马帝国皇帝们所建的城市。哈德良堡于公元1362年改称为埃迪尔内，这座城市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它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势力的东西夹击。

地震学家这时可能已经发出警告：岩浆可能随时喷发！喷发口当然

就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专程前往欧洲，面对自己过去一直鄙视的罗马教皇和西欧君侯们，请求派遣援军抵抗土耳其进攻。

了解地中海世界东部的人都能看到，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已是风中残烛。奥斯曼已经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再乐观的人也能看到这个完美的包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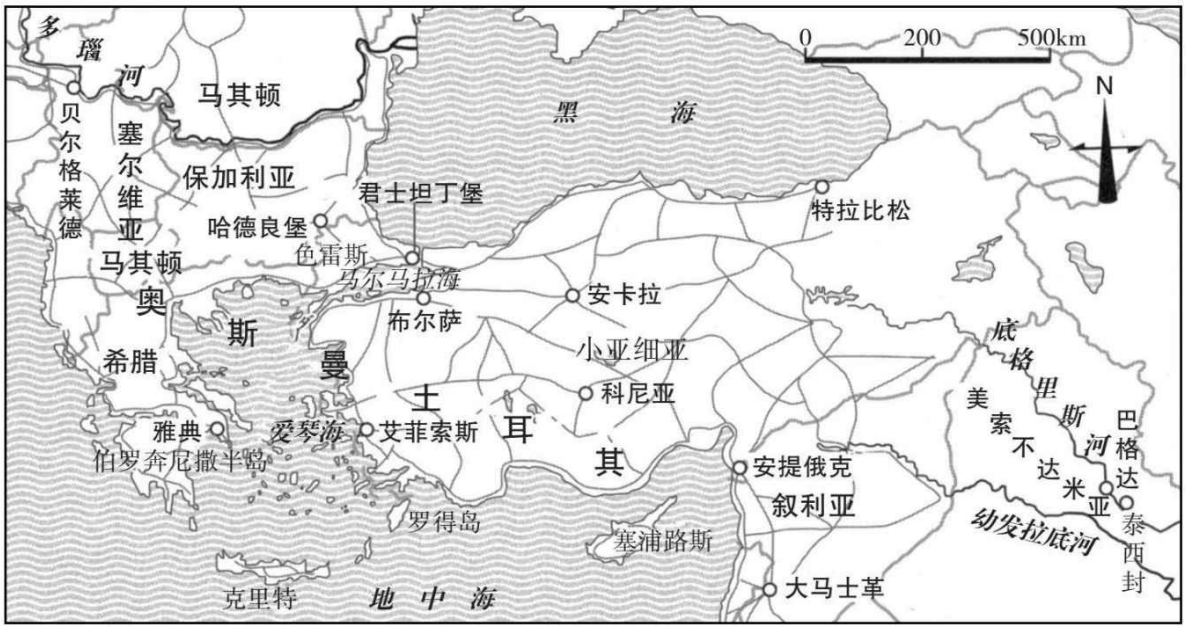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这时，奥斯曼面前出现了拦路虎。这拦路虎不是拜占庭帝国，也不是欧洲的基督教势力，前来挑战的又是蒙古人。

公元1402年，由勇将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入侵小亚细亚中部，东方伊斯兰教徒视这支军队为洪水猛兽。奥斯曼为躲避帖木儿不断西迁，虽然首都移到了欧洲，但领国的主体却还在亚洲。一旦小亚细亚蒙古化，奥斯曼土耳其将面临存亡危险。

苏丹亲率10万奥斯曼大军从首都埃迪尔内出发，经过君士坦丁堡附近向东挺进。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居民以为大军冲着自己而来，好几天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10万奥斯曼军队不过是为了迎战帖木儿的蒙古军路过而已。

蒙古与奥斯曼在小亚细亚安卡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奥斯曼军大败，苏丹被俘。这一惨状实际证明了迄今伊斯兰教徒中最能打仗、力量最强的奥斯曼军也不是蒙古军的对手。10万士兵大部分当场被杀，只有少数士兵逃脱，能逃回首都埃迪尔内的少得可怜。奥斯曼士兵向以残忍闻名，但蒙古兵的凶悍远在其上。

失去了苏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了立国以来首次毁灭性的失败，奥斯曼宫廷惊慌失措，立即陷入内讧，根本无法重振败军。国家濒临崩溃，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及其周边（此后地图中所画的“—”线表示罗马时代铺设的道路）

在东方称霸是靠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以不消灭周边国家为条件，让这些国家出钱出人，即强制支付高额的年贡和提供战争所需兵力这两点来实现的。蒙古军打败了奥斯曼，剥夺了它的“霸权”。奥斯曼彻底败给帖木儿以后，以前一直向奥斯曼进贡的国家也不再支付年贡。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纷纷摆出一副年贡与己无关的面孔，远离了奥斯曼。拜占庭帝国也不例外。前番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赴欧洲，请求派兵对付奥斯曼，这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认为风雨飘摇的本国命运时来运转。安卡拉会战后仅三年，帖木儿亡故。蒙古帝国在他死后急剧衰退，奥斯曼以后，拜占庭帝国不必再惧怕来自蒙古的威胁。中近东进入到一种很久未曾有过的安定状态。

让周边国家安心度日的时间不过20年。奥斯曼深知军事力量是国家的基础，开始从毁灭中点点滴滴但却扎扎实实地着手重建。20年是重建奥斯曼军队所需的时间。15世纪的前四分之一过去了，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又回到了向奥斯曼缴纳年贡的状态。也就是说，到1425年，奥斯曼已经恢复元气，可以随时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军，终结其千

年的历史。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苏丹穆拉德生于1404年，即蒙古军大败奥斯曼军的两年之后。他成长的岁月正是大败后的奥斯曼军队为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的时期。他成年时，奥斯曼军队已完成再建。穆拉德亲眼看着重建的军队艰辛长大，自然会谨慎使用这支再次强大起来的军队。他年轻时也曾尝试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见其并非易事便立即撤退，在以后的30年中再未一试。

穆拉德选择把重建的奥斯曼军用于稳定对重回奥斯曼霸权之下各国的统治，而非大规模的侵略行动。穆拉德在位30年，奥斯曼帝国一直坚持这条路线。真想称其为“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地享受着这种状态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穿越时光隧道，来到15世纪中叶的君士坦丁堡，采访一下走在大街上的希腊裔居民和欧洲来的商人，我想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奥斯曼眼下大概会持续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已经没有理由非要灭掉拜占庭帝国了，它只剩下首都及其周边地方。维持帝国的现状对奥斯曼并无不利。这时的君士坦丁堡对任何国家的商人来说只是一个理想的自由港，此外什么都不是。奥斯曼也充分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带来的利益。土耳其民族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行政上都具有相当的才能，但却不是经商民族。

穆拉德的接班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出生于1432年，成长于奥斯曼军队重建后的时期。这位年轻人年方19就成了苏丹，是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如果要问没有他历史会不会转向？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

奥斯曼宰相（大维齐尔）卡里尔·帕夏向往苏丹穆拉德的“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不遗余力地协助苏丹实现这种理想。根据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运作最佳的威尼斯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情报，卡里尔·帕夏

被认为是奥斯曼宫廷里亲西欧、亲拜占庭派的代表人物，颇得苏丹穆拉德的信赖。苏丹不但重用富于卓越平衡感的卡里尔为宰相，还把自己儿子——下任苏丹的培养重任交给了他。这位父亲让儿子称卡里尔为“老师”，尽管卡里尔是他的臣下。

父亲去世后刚登上苏丹宝座的穆罕默德二世让卡里尔·帕夏留任宰相职务。威尼斯“谍报机构”看到这种情况，甚至向本国报告奥斯曼将延续以往的外交。然而，西欧首屈一指的谍报机构也不知道，此后不久，奥斯曼深宫内发生了一件事。

新苏丹即位一年之后，1452年的一天深夜，穆罕默德二世着人传唤宰相。卡里尔·帕夏在迎候他的黑奴陪伴下出现了。他一定对此时的紧急召见感到疑窦重重，但还是守着被主人召唤时的臣子之礼，用银盆装满了金币带来献给主人。

穆罕默德二世穿着宫廷里的便装接待了他。老宰相以头叩地行了大礼，然后将带来的银盆献到主人面前。

20岁的苏丹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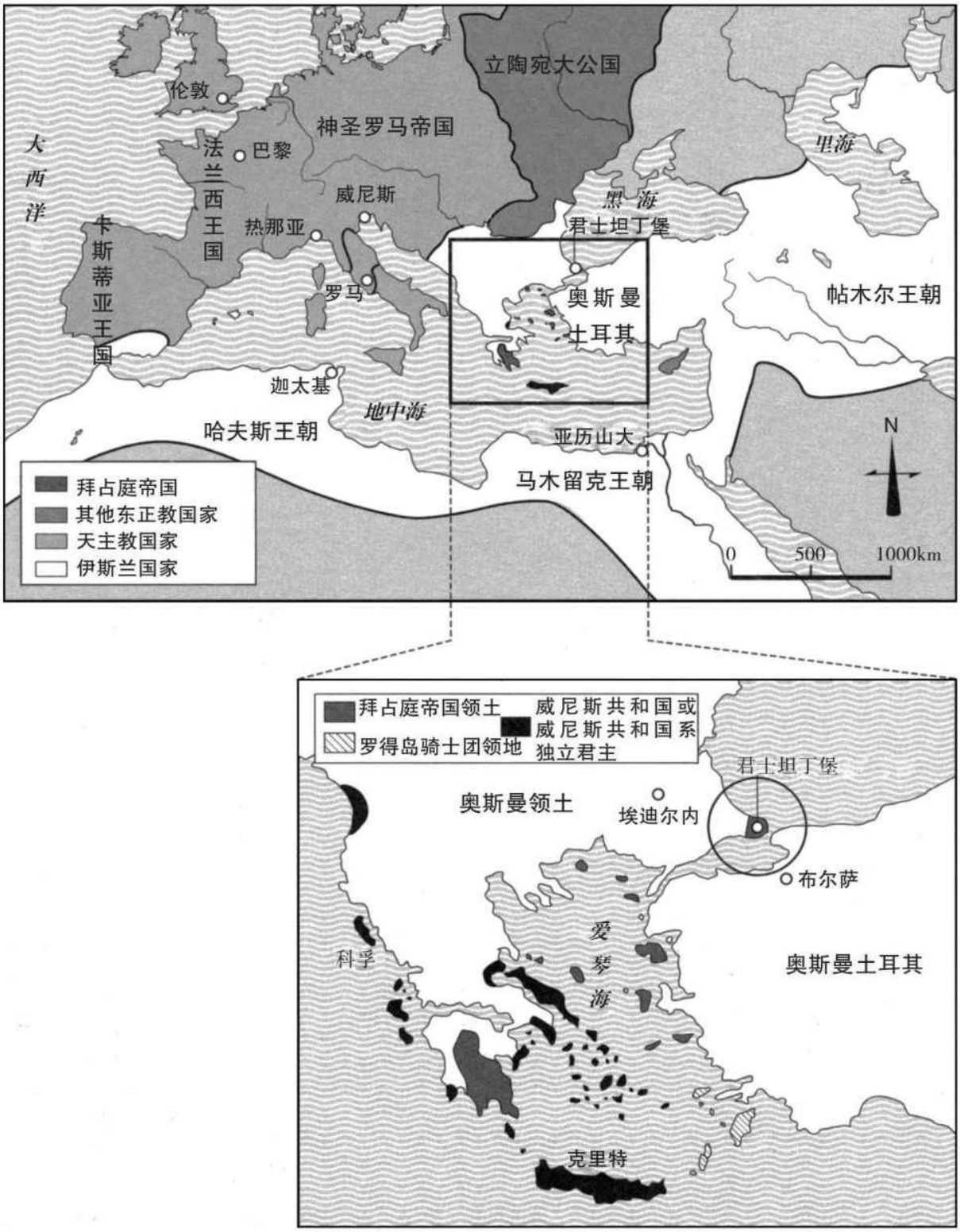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二世当上苏丹之后，除了正式场合之外还是称呼卡里尔为“老师”。

“主人，位高的家臣深夜奉主人召唤时不能空手前往，这是规矩。我也要守规矩。我献上的东西原本就是主人的，而不是我的。”老宰相回答道。

年轻人道：“你拥有的财富，我已经不需要了。相反，我能够赐给你的远多于你已拥有的。我只想向你要一样东西……请把这座城市给我。”

宰相卡里尔·帕夏感到，他和先苏丹穆拉德一起长年坚持的政策全

线崩溃，但他只是一个臣下。年迈的宰相只能无力地垂下头，发誓竭尽全力效劳。



灭亡前的拜占庭帝国（1453年）

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已经决定。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延续了千年，画上终止符的这一天来到了。

拜托读者

有一事拜托读者。公元1453年的4月12日，奥斯曼军的大炮喷出火焰，打响了持续56天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请读者恕我在此不述其详，并请理解这样做的原因。

进攻方伊斯兰教奥斯曼的军队仅陆上就有16万人。基督教防守方加上西欧的商人勉强才到7　000人。在绝望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是一台大戏。只有详细追述攻防战的每一天和每个参战人员的想法和行动，才能写全这出戏。

但要在这里这么做，就会有世人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大树枝叶繁茂，四处伸展。我们一旦将描述聚光于繁叶掩蔽的大树，就会偏离描画整个森林的目的。

在执笔编写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海洋之都的故事》时，困扰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海洋之都的故事》是“森林”，而君士坦丁堡攻防战、圣约翰骑士团遭到奥斯曼进攻时的艰苦战斗，还有伊斯兰与基督教双方正面冲突的黎凡特海战，这些事件与威尼斯关系再深，终究都是“树”，尽管是大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采用了把“树”移到“森林”外面，描写“树”时忘记“森林”的办法。

如此这般，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以外，我又写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战》、《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

现在的我又面临与写作《海洋之都的故事》时遇到的同样问题。这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也是“森林”。而且，“海洋之都”、“地中海世界”都不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森林”，而是以同一时代、同一地中海世界为描写对象、有着微妙重合的“森林”。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撰写《海洋之都的故事》时，我是站在威尼斯来看地中海的；而撰写本书时我却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来看前后左右的。

本书上卷中言及威尼斯的地方很少就是证据。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以威尼斯方式解决了海盗问题。收容在北非各地“浴场”里的基督教奴隶中，几乎见不到威尼斯市民。

但在本书下卷中，提到威尼斯的地方多有增加。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海盗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对同样是海洋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靠以往的海盗对策已经无法应对。

《海洋之都的故事》出版已经近20年，这多少会占些便宜。尽管立足点不同，但描述同一时代地中海世界这片森林的《海洋之都的故事》已经刊行，与此关系深刻的“树”也已有三棵出版。如果您想更详尽地了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请阅读已经出版发行的威尼斯通史这片“森林”和描写三大战役的三棵“树”。这本书我要集中描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作者的请求如此任性，可能会被认为是行为失礼。但要再现历史这部人类世界众生相，总是要聚焦某一点，把立足点放在某一处。我甚至认为“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几乎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

不过，当我回顾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很愉快：在写那部书的15年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树”与“林”的关系。

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不也写完了吗？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同样是1　　000年的通史，与两卷本的《海洋之都的故事》相比，《罗马人的故事》有15卷之多。分量上的差异分散了这种意识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我觉得原因不止于此。

罗马人创建并一直运营这个囊括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大帝国。那个时代的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内海”（mare　nostrum）。这片地域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自行解决，不，也只能自行解决。于是，写罗马人时，我也可以极其自然地采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写法。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员，但不是罗马那样的霸者。对威尼斯而言，被海盗绑架到北非、在“浴场”受苦的人即使与自己一样也是基督教徒，但只要不是威尼斯公民或有关人等，就不构成“我们的问题”。

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都批评威尼斯，说它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脑子里只想着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人国家。我也认为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

但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和帝国，不论大小不都是威尼斯式的国家吗？区别只是现在把这叫作“大国的自私”而已。

我开始认为，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罗马以后的国家，即使被称为帝国，其性质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象方面，都与罗马不同。

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苏丹的装束

拜占庭帝国被后世史家称作东罗马帝国，一直被认为是“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的帝国”。1453年5月29日，这个帝国随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灭亡。

胜利者穆罕默德二世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甚至说“把那座城市给我”。他把自己统率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迁到了这里。基督教徒居民沦为奴隶，基督教堂被改造成了新居民伊斯兰教徒的清真寺。这一系列变化显示，这位刚刚二十来岁的胜利者满脑子都是进攻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想法。

拜占庭帝国这个缓冲地带已经消失。现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真正感到了在年轻有为、极具胆魄的指挥者率领下的强大伊斯兰帝国的威胁。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为了与这位年轻的胜利者改善关系，威尼斯共和国派出了特使马尔切洛。随行副官朗斯基亲历了长达8个月的艰难交涉，他将这期间的印象做了如下记录：

> 苏丹穆罕默德22岁，身材匀称，个子高大，长于武功。他给人以威严而非亲切的感觉，不苟言笑，谨慎而不为任何偏见所惑，言出必行，行而大胆。
>
> 他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渴望着荣耀，每天让齐里亚科·旦科纳

和另一位意大利人给他读罗马史。他喜好希罗多德、李维、库尔提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和教皇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国王们的故事。他会说突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斯拉夫语，熟悉意大利半岛地理。他有一份地图，从埃涅阿斯居住地到教皇居住的罗马、皇帝和国王们建设宫殿的城市、欧洲各国，都分别着色，标有记号。

他有特别的统治欲，对地理和军事技术表现出最强烈的关注。他会非常巧妙地对我们欧洲人进行诱导式的讯问。

这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基督教徒今后必须面对的对手。

灭亡拜占庭帝国，把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像杀回马枪一般，开始入侵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刚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

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很早就离开了祖国，从东正教改宗了天主教，在威尼斯过着学究生活。当人们问他苏丹穆罕默德野心何在时，他回答道："靠他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只存在唯一的神，只有一个皇帝统治。除穆罕默德以外，不承认其他先知。"

不论穆罕默德二世如何崇拜亚历山大大帝，他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亚历山大大概会这样说："靠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同时存在各人所信的诸神，但只有一个皇帝统治，承认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所有先知。"

但信奉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徒心目中的"世界"是由伊斯兰教主导的"世界"。犹太教自不必说，对基督教的存在也不予承认。

苏丹穆罕默德已经具备实现这个野心的军事力量。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光陆军就投入了16万兵力。穆罕默德没有耽误任何时间，迅速将这支强大的军队用于进攻西方。不允许浪费时间。

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不是古罗马帝国，不把维持常备军置于最高位置。

进攻君士坦丁堡所投入的16万兵力中，可视作正规军的不满三分之一，其余的都来自奉奥斯曼之命提供兵员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弱小国家，能够派出的兵员数量也很少。因奥斯曼苏丹之命不得不参加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只有1 500名骑兵可参战，加上随从和马夫等也就4 500人。

塞尔维亚尚且如此，巴尔干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兵员也就可想而知了。结果，16万的半数以上是冲着战利品而来的雇佣兵。奥斯曼军队的这一实际情况，正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弱点。为了持续拥有大军，奥斯曼必须持续取得胜利。属国一旦看到奥斯曼力量衰退，就不会再提供兵源。只把战争看作发财机会的人绝不会咬紧牙关忍受失败，一显败像便弃甲而逃。

尽管苏丹是胜利者，但他所能信赖的只有不足两万的奥斯曼新军。

在花几年时间才能攻占大城市的时代，君士坦丁堡不足两个月便城破陷落。这当然让属国再次看到了奥斯曼的实力，让老兵油子看到了在奥斯曼军队里作战有利可图。这次胜利不是普通的胜利，而是大胜利，获益巨大。

持续取得胜利越发成为苏丹穆罕默德的使命。只要吃一次败仗，16万人就可能会立刻减至6万。此外，还不能让士兵们无所事事。得胜后无处打发时间的士兵最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的确，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的行动反映出不给敌人喘息时间的急躁感。他必须尽快发起下一次战役。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二年，他便下令进军西方。此后不到一年，他于公元1455年成功征服塞尔维亚。尽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塞尔维亚支

援了1　500名骑兵，但塞尔维亚人还是沦为亡国之民，只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

翌年，波斯尼亚也屈服于奥斯曼的统治。波兰和匈牙利不得不站在了基督教世界抵抗伊斯兰奥斯曼的最前线。

1460年，穆罕默德二世挥师南下，目标是肃清统治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最后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战死。这一战，又使他的弟弟一个战死，一个亡命罗马。希腊从北到南归入了奥斯曼的统治之下。

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挺进小亚细亚，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目标是攻占小亚细亚北部黑海沿岸城市特拉比松。这一行动也获得了成功，继承拜占庭帝国皇统的另一个国家特拉比松也灭亡了。黑海成为奥斯曼的内海。

威尼斯谍报机构这时向本国通报：奥斯曼将把爱琴海变为内海。

这个预测不到两年就变成了现实。1463年，以往只在陆上作战的奥斯曼军队进军海上。

挺进爱琴海

第一个目标是热那亚200多年的殖民地莱斯博斯岛。奥斯曼军的战术一如既往，8万大军登陆，从陆地方向进攻城墙坚固的城市。防守的热那亚方面只有5　000士兵。另有2万市民协助防卫，但无法顶住8万奥斯曼军队。

莱斯博斯是爱琴海中的岛屿，离已成为奥斯曼领土的小亚细亚西端很近。奥斯曼虽然不是海运国家，但也不用忙于确保补给。这也是8万

大军得以踏踏实实专心进攻的原因。

陷落后的惨状昭示着败给奥斯曼的后果，让西方基督教徒不禁再次想起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居民们被允许留在岛上，但只限于老人和儿童。身体强健的年轻人被奥斯曼人充军，女人被带走做奥斯曼人的奴隶，匠人和知识分子被迁往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奥斯曼人中间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陷落时有大量居民变为奴隶，需要不断补充人口。

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挑选了多达800人的少年和女人供自己享用，把他们强行带到了伊斯坦布尔。特拉比松国王的义妹、被誉为当时希腊世界之最的美女、莱斯博斯岛领主的妻子也在其中。

领主及承诺投降不杀的300名当地人全部被杀，就好像没有任何承诺一样。莱斯博斯岛真正的统治者热那亚人被全部杀光，一个没留。

热那亚共和国因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遭受重大损失，莱斯博斯岛的陷落不啻为对其的最后一击。

形势逼人，已经不能再允许热那亚的竞争对手威尼斯袖手旁观了。

6年之后的1469年，不祥的情报让威尼斯不安起来。

小亚细亚制造了大量火药。按照苏丹的命令开始征兵，数量超过10万人。

盖利博卢和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正在快马加鞭地大量造船。

这都是威尼斯谍报机构探知的消息。下面介绍的例子反映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收集情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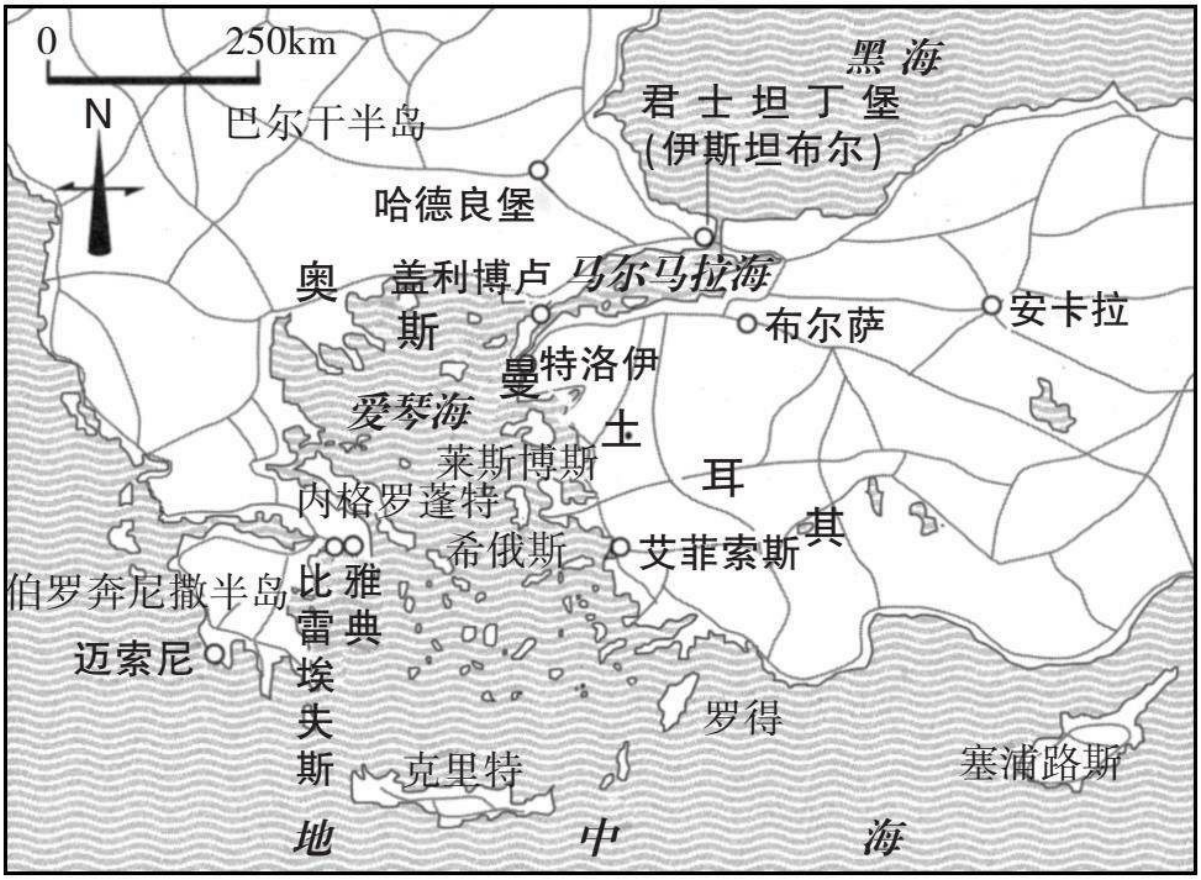
多处在造船，这些地方被严密隔离，连当地人也被禁止入内。通过分析与热那亚商人有交易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威尼斯人判明了造船的事实。

有大量涂料售出。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就搞清了热那亚商人的买卖对象是奥斯曼政府。热那亚人没有忘却被奥斯曼夺走通商基地莱斯博斯岛的愤怒，透露了平时不会透露的信息。接下来通过潜伏在奥斯曼宫廷里的间谍探知舰队的进攻方向。

威尼斯的谍报机构这时已经成功获取了准确情报，难怪后来英国谍报专家说“谍报机关”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

穆罕默德二世放出假情报，说大舰队将去黑海，但这已经骗不了威尼斯了，他们掌握了准确情报，250艘的大舰队不是去北面的黑海，而是要去南面的爱琴海。而且根据情报推测，大舰队将要进攻威尼斯领土内格罗蓬特岛[1]。

将军卡纳莱率领32艘军用加莱船迅速离开威尼斯，奔赴内格罗蓬特。



爱琴海及其周边

内格罗蓬特位于雅典北面，是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面积辽阔，有克里特岛的三分之二大小，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与其说岛屿，不如说是本土的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强烈。自威尼斯主导的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270年间，这里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走定期航线去希腊的船队都是从威尼斯出港，南下亚得里亚海后进入地中海，再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在内格罗蓬特靠港。走定期航线去威尼斯的船队为应对海盗，出发时经常配有军舰护航，军舰必须在海军基地停靠。

商船在这里靠港没有任何不便。内格罗蓬特与希腊本土之间的海峡风平浪静，相传古时前往特洛伊的联合舰队就是在这里集结。后来，这里一直作为商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最适合的中转基地。外港比雷埃

夫斯不再使用以后，雅典失去了物产集散地的作用，内格罗蓬特取而代之。威尼斯共和国坚信，发挥好有计划、持续的贸易体系的作用才是繁荣本国经济的关键。对威尼斯来说，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不亚于东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基地克里特岛。

威尼斯政府任命的总督，其待遇与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驻开罗大使和克里特岛总督完全一样，他们被授予同等权威和权力。在属于威尼斯管辖的时代，岛上构筑了众多要塞，至今仍散布在全岛，证明了威尼斯对内格罗蓬特的重视。

穆罕默德二世选择内格罗蓬特作为自己首次指挥的作战目标，这是他第一次征服威尼斯领土的战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乘着消灭拜占庭帝国的气势，从陆海两路向西方基督教世界展开大规模攻势。对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挡在奥斯曼帝国面前的拦路虎，陆上有匈牙利，海上有威尼斯，尽管威尼斯是一个海洋城邦国家。

正因为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投入了12万士兵和250艘船只，比进攻莱斯博斯时更多。这支大军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出发，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涌进了爱琴海，其势蔚为壮观。威尼斯的间谍报告说，南下船队桅杆如林，成片地从眼前掠过，连绵不绝。

威尼斯防守内格罗蓬特基地的陆军防卫力量等于零。威尼斯全国人口包括妇女儿童也不到20万，这样的城邦国家，无力派遣本国男子去常驻分散在海外的众多基地。不到1 000人的威尼斯士兵和配合防卫的希腊人居民以及借这块威尼斯通商基地做生意的西欧贸易商全部加起来，总人数还少于热那亚当时守卫莱斯博斯的兵力。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热那亚在加拉塔丧失了一大居留地，人员撤退到了莱斯博斯岛。而以克里特为首的威尼斯共和国在爱琴海各地的海外基地依然存在。

然而，12万奥斯曼大军压境，不可能靠不到其十分之一的兵力布防全岛，只有采取据点防卫一条路。威尼斯决定集中力量防卫建于内格罗

蓬特的最大港口、面临狭长海峡却突入海中的城堡。总指挥当然由总督担任。

威尼斯的陆上防卫力量劣势明显，海上防卫力量在数量上也处于劣势。与投入了250艘船的奥斯曼相比，加上克里特和其他基地前来的援军，威尼斯也才只有71艘船。但是，海上的军事力量建立在海运传统之上。没有海上贸易传统的奥斯曼把操纵船只的工作交给了被征服的希腊人。尽管如此，据称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与奥斯曼的单舰海战能力有以一当四到以一当五的优势。这样，威尼斯不但能够以70艘船对抗250艘船，而且有充分的可能占据优势。

这是海上战斗力差距。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一现实，极力避免与威尼斯进行海战。而被派来防守内格罗蓬特的总督卡纳莱也缺乏战场指挥官所必需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1470年6月初，卡纳莱接到了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报。他命令快船前去侦察，如果奥斯曼军队以60艘船编队，就是准备打海战，必须紧急报告。

他断定奥斯曼军队会忠实地遵循大舰队出海的常识，分成若干船队编队航行。这本是常识，但穆罕默德二世深知奥斯曼海军的短处，下达命令，所有的250艘船组成一个编队前进。掌握不好船间距离，船只会猛烈相撞而沉没，但这不过是这位专制君主所允许范围内的风险。

这样，侦察船看到的奥斯曼舰队根本不成队列，乱作一团，简直就像一群小孩子的游戏。卡纳莱接到报告，决定等待计划从克里特前来的援军，还决定在内格罗蓬特的另一处港口等待时机，这里远离原来确定进行据点防卫的城堡港口。就这样，奥斯曼军队于6月15日全军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阻挡。

38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临阵指挥，并得知来自克里特的援军并未

穆罕默德二世

到达，卡纳莱指挥的32艘舰船驶向了岛上的其他港口。奥斯曼方面也有间谍，穆罕默德二世巧妙地利用了以赚钱为目的的间谍。

穆罕默德二世信心十足，充分利用大好机会，登陆10天之后发起了第一次总攻。但城堡岿然不动，不愧是威尼斯长期以来的重要基地。相反，奥斯曼却死了1.6万名士兵，30艘船被焚毁，只得撤退。

人和船的损失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预料之内。5天以后开始的第二次总攻，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进攻没有丝毫放松。7月5日和8日，又持续进行了总攻，大炮开火，士兵像蝗虫一般冲锋。防守方顶住了攻击，他们士气高涨，坚信值得自豪的威尼斯海军一定会来。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巨大的损失和总攻的反复失败做了反省，而是不愿意总攻久拖不胜，而克里特的援军会赶到。

所谓改变战术，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船把士兵运到城堡，而是把小船排列起来，在狭窄而无浪的海峡上建一座浮桥。一船船地运载士兵与让士兵一举过桥，投入兵力的总量大不一样。

防守方立即感到事态严重。城堡里的大炮向在建的浮桥开火，石弓像箭雨一样射向正在造桥的奥斯曼士兵。同时。城堡的塔楼上高高地挂起告急黑旗，向正在其他港口待命的卡纳莱舰队发出了催促参战的信

号。然而，卡纳莱看到信号却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通过逃出城堡的希腊人了解到了城堡防守薄弱的地方。第二天，所有的炮击都集中到这个薄弱点上。很快浮桥建成，不仅士兵过了桥，设在桥上的大炮甚至可以开炮轰击了。

堪称威尼斯基地要害的内格罗蓬特城堡，海陆两面受敌。然而，近在咫尺的本国海军却袖手旁观。夜幕降临仍炮声隆隆，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唱起东方歌曲，令守城者心生畏惧。

这一切使防守方陷入绝望。顶住第五次总攻后的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送来了劝降信。内格罗蓬特总督听取了防守方主要人物的想法后，决定接受劝降。穆罕默德二世向安拉起誓，承诺绝对不斩降者。就这样，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城堡在奥斯曼军的大炮开火后不到一个月，于7月12日投降了。

穆罕默德二世以他自己的方式遵守了诺言。他没有砍下总督以及防守的全体西欧人的头颅，却把他们的身体劈成两截，统统杀光。

陷落当天，洛里丹指挥的23艘和威尼尔率领的来自威尼斯本土的16艘战船赶到，加上卡纳莱指挥的32艘，总共集结了71艘战船。威尼斯和奥斯曼的舰队在一种奇妙的气氛中对峙，却只是把穆罕默德二世牵制在内格罗蓬特两个星期而已。威尼斯引为自豪的海军未交一战便将本国的重要基地拱手交给了敌人。

奥斯曼舰队载着穆罕默德二世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似乎在嘲弄威尼斯人。他留下了2万兵力守卫刚刚征服的内格罗蓬特。

直到奥斯曼舰队进入爱琴海开始北上，威尼斯舰队都打不定主意。他们追踪着和来时一样以密集队形向北航行的奥斯曼舰队，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海战，有人主张为确保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海军实

力。这种时候，讨论拖得越久，大势就会越倾向于谨慎派。这次也不例外。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便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凯旋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7月30日得知内格罗蓬特陷落，十分愕然。他们知道陆军的劣势，但相信海军有万全之策。他们预测，优秀的威尼斯海军将切断奥斯曼军的补给线，使其不能坚持持久的攻城战，放弃征服内格罗蓬特而撤退。正因为如此，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保卫战不到一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与陷落的消息同时传来的是这场悲剧造成的惊人损失。佛罗伦萨的商人没有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传统，许多人都在威尼斯的通商基地做生意。仅佛罗伦萨所受损失的金额高达40万弗罗林。威尼斯蒙受了太大的损失，就连西欧以统计精确而排名第一的威尼斯政府，这时也无法公布准确数字。

阻挡伊斯兰从海上进攻西欧的势力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意大利海洋国家。这些国家也是贸易国家，要弱化它们，就要攻占它们的通商基地，从经济上卡住它们的咽喉。穆罕默德二世这样想并付诸行动。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正确的，而死守成例的威尼斯错了。

威尼斯政府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召回将军卡纳莱，并追究其责任。他未被处以死刑，而是被终身流放至渔村波尔托格鲁阿诺。

即便如此，西欧各国君主的减刑要求还是雪片般飞来。尼科洛·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兰西的大使，还是经常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常客，是威尼斯市民在国外最有名的人物。

但威尼斯政府没有听从这些权威意见。他们再也不敢把本国海军交给著名知识分子，而是任命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有丰富海军经验的人担任

将军。按这个标准受到任命的皮埃特罗·莫切尼哥即刻起程前往内格罗蓬特，成功重振了先前一仗未打便败下阵来因而士气低落纪律涣散的威尼斯海军。即使遭到痛打而倒下也要立即爬起来，倒下后不爬起来就会像热那亚那样被赶下拳击台。

威尼斯共和国爬起来依靠的不光是军事，重视收集情报的国家也会重视外交。为了削弱不断进攻的奥斯曼势力，这个时期的威尼斯政府从计划暗杀穆罕默德二世到向他试探媾和，用尽了手段。详细情况请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

吞并塞浦路斯岛是其中未流一滴血而以完美成功告终的一例。威尼斯究竟是怎样做的，请阅读《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第四章。由于成功吞并了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几乎完全挽回了丧失内格罗蓬特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追溯了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15世纪后半叶东地中海的变化，可以看到奥斯曼势力已经势不可当，整个地中海世界插遍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貌似所向无敌的奥斯曼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潜藏着致命缺陷。威尼斯的观察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认真仔细。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并非连战连胜。征服罗得岛时派出了10万大军，骑士数量却只有600人，3个月后就不得不撤军。尽管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防御坚固，但奥斯曼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持久战中格外脆弱。

请回想一下，奥斯曼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投入的16万人中，称得上是真正奥斯曼士兵的只有不足2万新军，此外就是5万左右从奥斯曼各领地征来的士兵。余下的10万人中大半无疑都是为钱而来的乌合之众，这

就是震撼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实际情况。

不过，奥斯曼素来陆上军力强大。纵是乌合之众，也不乏具有统率能力的指挥官。

可在海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奥斯曼人没有海运传统，懂得操纵船只的人数量不足，这种能力不是说要就有的。

奥斯曼帝国决定从海陆两路进攻西欧基督教世界。要进入地中海，不能只靠对船和航海一窍不通的奥斯曼将军指挥。虽说操纵船只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希腊人，但在船上奥斯曼人船长的军阶要高于他们。军用帆船形成不了战斗力，因为没有人会服从明显无知的上司的命令。

海盗·新时代

注意到奥斯曼海上战斗力缺陷的究竟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还是奥斯曼宫廷里的某个心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奥斯曼找到迅速解决本国海军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海盗起死回生，起初是在东地中海，接着渐次遍及西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决定把本国海上战力托付给海盗头目。这个办法不仅来得快，价格也便宜。

海军的平时维护要比陆军费钱。首先要有船，需要在各地备有建造、修理船只的造船厂，还得养着船员。这就是海军的特点，需要各种设施及维护经费。而如果交给海盗，就不再需要这些费用，也不用时时操心。

海战无法避免时，只要召集海盗就行，平时可以让他们专事海盗

业。这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称为佣兵的非正规军事力量。佣兵制这种机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也被广为采用。不过，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佣兵，有两点与西欧不同。

第一，符合以无信仰之徒基督教徒为敌的伊斯兰大义。

第二，可以获得只做肥一己私囊的海盗所无法得到的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

与以前掠夺而来的人和物要向“酋长”上缴五分之一的时代相比，海盗的地位有了提高，他们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一员。

奥斯曼没有进入地中海以前，北非的海盗因热那亚、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军的逐渐强大而急速衰落。罗马教廷甚至说，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下去，来自北非的海盗有可能被打回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近海。

本书上卷叙述了“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为拯救被绑架而沦为奴隶的基督徒的种种活动，现在他们赎回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在15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逆转。1492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个拯救组织从北非“浴场”赎回的总人数超过了500。从种种史料推测，当时尚有百倍于此的人在名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受苦。这一切都源于奥斯曼对海盗的鼓励政策。

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为如果海盗活跃，奥斯曼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打击所要征服的国家。

夺取战船，就会导致受害国海军力量的减少。

夺取商船，就会打击受害国的经济实力。

登陆掠夺、绑架居民，也会导致受害国经济实力和从事经济的人力

减少。

西欧基督教世界不但要面对奥斯曼的威胁，还必须面对在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下以10倍于前的船只攻来的北非海盗。他们必须应对在量和质方面都已经提高的海盗。

海盗船的数量增加了，海盗船队头目的量和质也都有所提高。海盗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迅速发财致富，可以放手大干了。优秀人才自然聚集而来。

地中海的海盗也迎来了新时代。本书上卷中提到的海盗几乎没有后世留名的，而下卷中可称为明星的海盗却不断涌现。这就是一个证据。

对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来说，何日才能从恐怖中解放出来？

奥斯曼进入地中海之前，海盗头目的出身地也仅限于北非一带，可以用“撒拉森人”（Saraceni）一语涵盖，他们或是随伊斯兰教的普及一起流入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

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也为海盗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海盗头目的出身开始多样化，有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根据地虽然还在北非，但带着手下大摇大摆行走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这些人仍在做海盗，但如今已经不是头目，只是喽啰。

出身的阶级藩篱不见了，凭能力在社会上胜出。在这个意义上，莫非伊斯兰海盗世界也结束了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这个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奥斯曼是一个除了苏丹之外所有人都是奴隶的国家。所谓所有人都是奴隶，也就是苏丹以外人人平等。海盗世界也进入了凭能力当头目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人才从各地汇集而来。当然，凭能力的目的还是做海盗，这与同样凭能力而在各个方面飞跃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不过，这表明这些海盗世界的“成功者”已经跟上了时代。

希腊人被奥斯曼征服以后，虽然被允许信奉希腊正教，但终究是被当成居住在伊斯兰国家的另一个一神教——基督教的教徒，在社会上只能是二等公民。许多希腊人选择了这条路，也有不少人从希腊正教改信伊斯兰教。当初刚被征服时，很多人沦为了奴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摆脱奴隶身份，就只能改信伊斯兰教。

这些改教的希腊人，一定在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地中海的战斗中承担了海上运输工作。莱斯博斯岛、内格罗蓬特、未攻下的罗得岛、攻下却没有占领而放弃的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这些岛都隔着海洋。就算是连战连胜不可一世的奥斯曼陆军，不用船运也到不了目的地。

受奥斯曼人驱使的希腊船员这时大概也悟出奥斯曼民族对大海的无知和没有经验。这些希腊人自然会想，既然这样，索性搞一个“子社会”，在“母社会”需要的时候与其合作，其他时间则干自己的事。况且“母社会”还鼓励这样做，具备建立“子社会”的环境。建立的条件是改信伊斯兰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奥斯曼人与阿拉伯人不同，在信仰方面更加开放，也较少歧视来自基督教的改教者。于是，海盗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希腊人。

另一方面，海盗中很少有犹太人，能当上头目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这大概是因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数量本身就很少的缘故。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海盗既然是作为一个集团行动，就是一个组织。要管好这个组织，必须有一群信得过的手下。但与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只相信亲人的倾向严重。即使犹太人有足够能力做海盗头目，其下属的数量也不够。犹太人中也会有“成功者”，但这种人的成功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合作关系之上的。这在犹太人中较为少见。

意大利人很少有只相信亲人的这种性格，他们能够巧妙地与希腊人、奥斯曼人、北非原住民等构筑合作关系。但有一点完全不同。出生于意大利的伊斯兰海盗几乎全是少年时代就被绑架的人。他们的出身地集中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多遭受北非海盗的袭击。这些人平常积极从事海盗业，但遇到奥斯曼政府征召，就要充作海军，他们都从基督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教徒，历史上称之为“再征服”（Reconquista）。在伊斯兰教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势力又靠军事力量夺回了这片土地。从这时起，出现了出生于西班牙却经常袭击西班牙的海盗。被赶走的伊斯兰教徒多数逃到了北非。伊斯兰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长达800年。如今，西班牙出生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成为纯粹的难民，活路不多，其中不少人投身于因奥斯曼的鼓励政策而死灰复燃的海盗世界。在伊斯兰统治的时代很少受到海盗袭击的西班牙，却因为赶走了伊斯兰教徒而受到了海盗袭击的威胁，真是一种讽刺。

就这样，时代前进了，海盗却没有消失。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文艺复兴文化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大国奥斯曼的支持下，濒临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却成为海盗活跃的舞台。基督教各国不得不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对策。因为海盗们认为，非战争时期的海盗行为是一种骚扰战术，把当事人以外的人卷进来才更有效果。

可以说，在15世纪末，由国家负责抵卸海盗对策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威尼斯建立基地掌握制海权的地方有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爱琴海。但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却有西西里、埃及、北非，还有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才能到达的北欧和不列颠。这需要在没有制海权的海域航行，然而，现在就连在拥有制海权的海域都不能放心航行了。

于是，习惯根据最坏情况制定对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为商船队

常配护航舰。即使与奥斯曼处在非战状态的平时，派出商船队时都要配上两艘大型军用帆船护航。威尼斯依靠自己的国民维持着一支常备海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颇具效果。不管常备海军的质与量如何提高，他们知道如果不出手打击强硬对手，伊斯兰海盗也只会像以前一样横行霸道。

但即便是威尼斯，也没有余力为旅游观光船配备护航舰。那个时代的旅游观光就是朝圣。从威尼斯出发去巴勒斯坦之后再返回的这种船，航行时只能听天由命。在不安定的国际形势下穿梭航行充满了惊险。当时的威尼斯已经参与到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之中，同时还在组织朝圣旅行团，赚钱手法真是老到。这一点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第九章“朝圣团队旅行”中有所叙述，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教廷海军

说是朝圣，目的地并不止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一地。

对中世纪笃信宗教的人而言，圣地还有相传圣彼得和圣保罗二人殉教之地的罗马。罗马教廷也喜欢听金币的响声，这一点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商业国家。

因而教廷想出了一招，设立“圣年”（giubileo，又称大赦年），公元1500年恰逢“圣年”。

这一年，笃信基督的教徒从欧洲各地聚集罗马。这在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们看来，简直就是成群来到狩猎场的猎物。作为信徒的牧羊人、“圣年”的主办者罗马教皇，并不限于让这些羊安然祈祷。

于是，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一支教廷海军，目的当然是保护来罗马朝圣的信徒不受海盗侵袭。而“圣年”结束之后还要继续保持这支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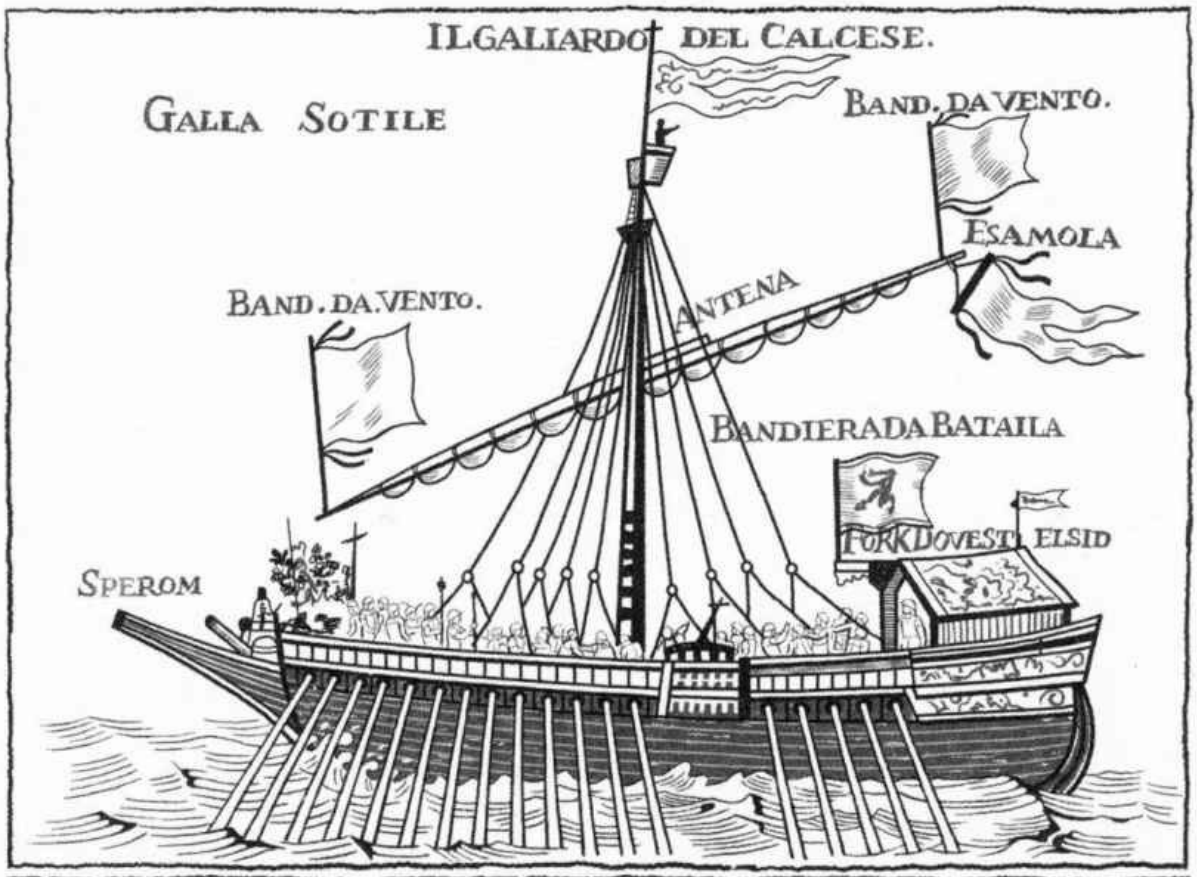
则反映出地中海当时已经成为伊斯兰海盗的狩猎场。即使不是“圣年”，也常有朝圣者到访罗马。神职人员感到需要制定对策保护这些人不受海盗侵袭。我们不妨认为，奥斯曼率领的伊斯兰势力不断进攻造成的危机感是教廷不得不设立海军的根本原因。

这支“教廷海军”实际上在15年前就迈出了第一步。不论奥特朗托再靠南，总还在意大利半岛。奥斯曼突袭奥特朗托的事件足以让罗马教廷颤抖。奥特朗托惨剧仅5年之后，教廷便建立了“海军”，至少要保护一下外港奥斯提亚。当时只有一艘船，这艘军用帆船一共能载200人。虽说可以形成战斗力，但由于只有一艘船，只能成为海盗们的笑柄。

这样根本无法令人放心，而且“圣年”即到，来罗马的朝圣者将会激增。时任教皇博尔吉亚决定建立正规海军。

作战用大型加莱船（galea）三艘；作战用小型加莱船（fusta）两艘；承担运输任务的大型加里昂（galeone）两艘；中型帆船（brigantino）三艘。名为捕鲸船（balenièra），实则用于旗舰与其他舰船联络及侦察的小型快船一艘。

这12艘船构成了教廷大张旗鼓建立起来的海军，规模与海洋国家威尼斯和能够动员海盗的奥斯曼帝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就是维持这种程度的战斗力也需要稳定持续的财源。罗马教廷决定对进入罗马市内的所有物产课征2%的税。没有抗议，人们接受了上缴海盗保险费的说法。地中海沿岸的老百姓普遍都对死灰复燃再度活跃起来的伊斯兰海盗抱有恐惧感。


ILGALIARDO DEL CALCESE.
GALLA SOTILE
BAND. DA VENTO.
ESAMOLA
BAND. DA VENTO.
ANTENA
BANDIERADA BATAILA
SPEROM

GALERA GROSSA.

由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积极从事海上陆上贸易，“保险”（assicurazione）这个概念已普及到不直接参与贸易的人们中间。这个意大利语词的词源是拉丁语，但却不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也许是因为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不需要保险吧。

不论制度多么适应时代的要求，要想以后维持下去，就必须拿出成效。尽管只有可怜的12艘船，但公元1500年整个“圣年”，没有一艘朝圣船在前往罗马途中因遭北非海盗袭击而受到损失。这肯定也是“圣年”结束后教廷海军仍得以维持的原因之一。

以前一直没有自己军事力量的罗马教廷也终于有了海军，虽然还没有陆军。这也证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穆罕默德二世向西方扩大势力的欲望不仅在于扩大领土，还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在创业者穆罕默德二世死后，他的孙子塞利姆当上苏丹后一直延续。

挺进伊奥尼亚海

横亘在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大海叫作伊奥尼亚海。这片海域的希腊一侧，自北向南大大小小排列着科孚、帕克西、莱夫卡斯、伊萨卡、凯法利尼亚、扎金索斯等岛屿，是威尼斯走出亚得里亚海前往东方的航路。威尼斯一直努力在这些岛上设置基地，维持制海权。

这些岛屿长期属于威尼斯的领土。有一天，奥斯曼军突然登陆莱夫卡斯岛并占领了它，随后立即筑起坚固的城堡，指派勇猛的奥斯曼陆军中以更加勇猛著称的奥斯曼新军常驻把守。

不过，如果只是派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常驻，那还是普通军事行动，

苏丹塞利姆还把这座岛提供给海盗，让他们做根据地。海盗的名字叫卡马尔，意大利人称他为卡马里奇奥。不必说，他带着手下高兴地移居岛上。此后，奥斯曼方面便向在附近航行的基督教国家的商船索要法定金额之外的通行费。

奥斯曼新军以安装在城堡中的大炮相威胁。有船不理睬开过去，海盗就会驾驶快船尾随而来强行索要，声称“不想失去船只、船员和货物就快付钱”。被卡马尔追踪不得不支付的通行费直接进了卡马尔的腰包。这说明奥斯曼此举的目的并不在于收取通行费。奥斯曼的意图在于摧毁威尼斯共和国的制海权。

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利用这条航路最多的威尼斯。不过，威尼斯一直为商船队配备护航船，损失比率也并不高。倒是那些派去东方、商船数量较少的国家，哪怕只有一艘受到损失也不得了。佛罗伦萨发出了惨叫，法兰西也起了轩然大波。西欧方面不得不再次认识到，奥斯曼的目标不仅是威尼斯。

威尼斯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做罗马教皇的工作，说只有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奋起抗击，才能阻止奥斯曼的暴行。因为现实的威尼斯尽量避免以一己之力与奥斯曼对抗，但如果作为基督教国家之一，给人的印象就不同了。

公元1502年，各国响应博尔吉亚教皇的号召，组成了以抗击奥斯曼为目标的联合舰队。实际数目如下。我们只记录海上战斗力——军用帆船的数量。

威尼斯共和国：50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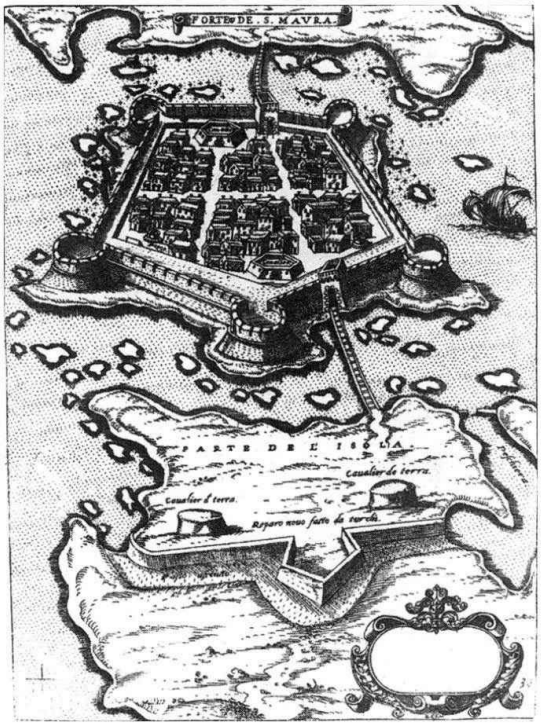
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3艘

法兰西：4艘

罗马教廷：13艘

联合舰队组建两年以后，不但没有损失一艘船，反而增加了一艘。

但是，海军光有船没用。指挥教廷13艘战船的人是主教，名叫雅各布·佩萨罗。这位威尼斯出身的主教的兄长本内迪托·佩萨罗，是威尼斯海军参战的50艘军舰的总司令。仅从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知道，1502年的基督教联合舰队实质上是威尼斯海军，指挥权在威尼斯。



威尼斯建设的圣马武拉城堡

7月，中世纪以圣马武拉而闻名的莱夫卡斯岛周围的的大海上，出现了基督教舰队的身影。8月，战斗开始。城堡里有奥斯曼士兵2 500人。其中大部分是海盗。威尼斯曾经决定不与奥斯曼进行无谓的战斗，但一旦打起来却非常坚决。战斗开始后不到一个月，8月29日，城堡被攻下。

600名奥斯曼新军士兵当了俘虏。联合舰队总司令本内迪托·佩萨罗给奥斯曼新军士兵战争俘虏的待遇。虽然必须忍受俘虏生活，但不会被杀。但同时抓获的海盗却被当作罪犯处以极刑。海盗被处以绞刑，一个挨着一个被吊死在围着城堡的城墙上。不用说，被海盗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绑架而来做划桨手的人都获得了解放。

这场夺回莱夫卡斯的战斗表明，历史已经进入了必须出动正规海军才能打击海盗巢窟的时代。奥斯曼正规军与伊斯兰海盗的共同作战体制使得西欧对抗奥斯曼更加困难。

挺进西地中海

海盗见对手厉害便避其锋芒。海盗知道威尼斯共和国不惜出动50艘军船组成正规海军之后，便将活动海域从伊奥尼亚海转移到第勒尼安海。不过，他们的活动地点并不限于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所在地托斯卡纳以及罗马的所在地拉齐奥的沿海一带。

来自北非的海盗船队也日益大型化，人才济济。他们把活动舞台从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扩大到了法兰西南部，甚至扩大到了被基督教统一的西班牙。

当然，在奥斯曼抬头之前就有海盗横行于西地中海。以公元1500年为界，前后有三点不同：海盗船队大型化、装载大量大炮等火器装备进步以及海盗头目能力提高。所有这些都实际证明了与上缴获利五分之一但无法改变地位不被认可的情况相比，得到官方即奥斯曼的认可对海盗是多么有利。

为了对抗新时代的海盗，教廷创建了海军，威尼斯出动了正规海军，就连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势力的西班牙也都不再无动于衷。

海盗注意到了这些，改变战略，他们不再组成易被发现的大规模船队出海，而改成只有少量几条船的小船队。伸缩自由也是非正规军有利的地方。分散行动的小规模海盗船队也可以在必要时立即集结成为大军。

此外，海盗船队小型化之后，小型船也成为主流。被称为“福斯塔”的快速小型加莱船成了“海盗船”的同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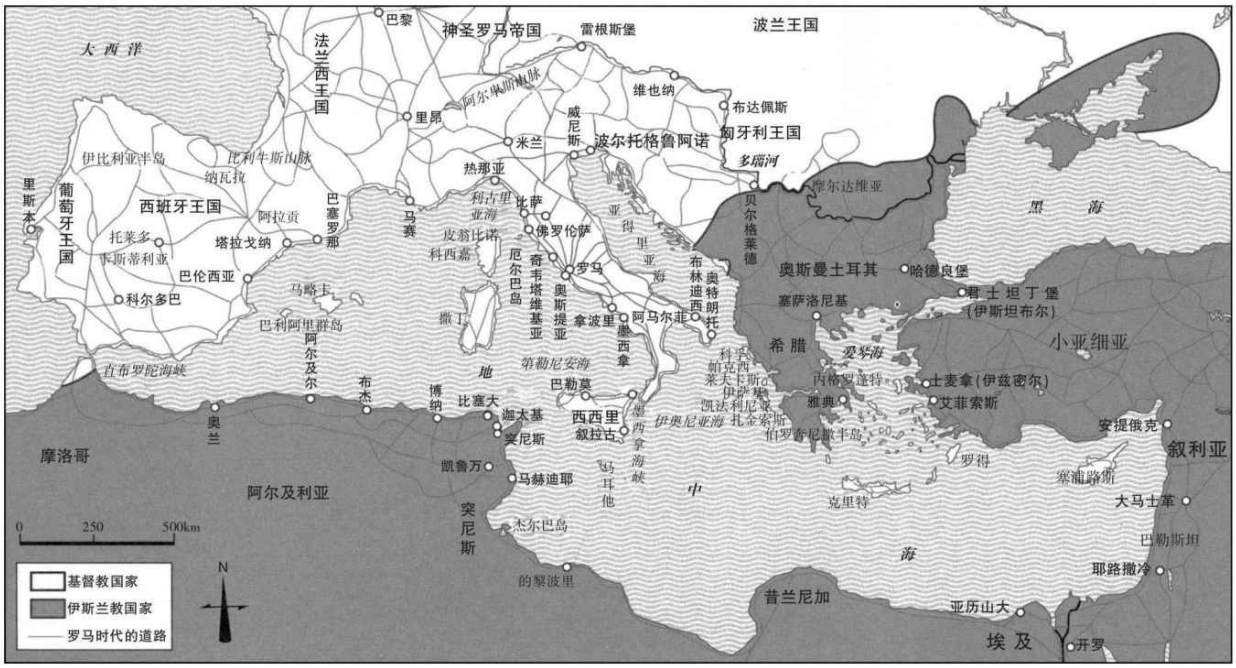
最早发出悲鸣的是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1508年，多个小型船队袭击了利古里亚。热那亚躲过此劫，因为海盗认为海洋国家热那亚主港的

防御一定非常坚固，但附近的港口城市逐个遭到掠夺、绑架和焚烧。这种袭击就像是步枪连射，而不是大炮轰击。

第二年，连罗马附近也遭到了侵袭。教廷海军是在没有海军传统的地方临时抱佛脚建立起来的，还不知道平时不能放松警戒。教廷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停泊在外港奥斯提亚的2艘战船中的一艘连船带人被海盗掠走。

教廷海军只有3艘战船，被抢走的是旗舰。桅杆上飘扬着白底上用金丝绣着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船被劫到位于突尼斯北部的比塞大港，伊斯兰教徒见状狂喜不已。相反，被伊斯兰抢去了教皇旗的基督教徒却深深叹息，愤怒不已。

自从满载以金银为主的新大陆物品的船只往返西班牙港以后，西班牙也不得不开始以国家之力对付海盗。来自新大陆的船只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北上驶入西班牙在地中海一侧的港口卸货。在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为根据地的海盗看来，只要在家门口等着就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16世纪初的地中海世界

我想，如果保险在这个时期的西班牙也和同时代的意大利一样普及的话，为从新大陆回来的船只所缴的保险费率一定很高。西班牙国王自然感到有必要给与突尼斯同为北非最大的海盗根据地的阿尔及尔以重重一击。

阿尔及尔“酋长”得知此事后，想出了转移敌人矛头的策略。他向西班牙国王的宫廷所在地巴伦西亚派出了特使，请求改善西班牙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特使带来了三份“礼物”：

一、立即送还被绑架为奴的50名基督徒，作为阿尔及尔方面有意改善关系的表示。

二、以后每年向西班牙国王支付年贡。

三、禁止从阿尔及利亚港口出航的船只从事海盗行径。

我们不知道国王本人是如何回复这个请求的，但西班牙军队对北非

的远征按计划实施。1509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尔港北侧突起的海岬，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

西班牙人在这个海岬上建设了城堡，派了一支500名士兵的部队常驻。安装在城堡上的大炮炮口对着阿尔及尔港进出的船只。上司严令驻守城堡的西班牙士兵，看到海盗船便立即击沉。耸立在海岬上的这座西班牙城堡，后来以“阿尔及尔的佩尼翁要塞”之名为人所知。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在这个时期的战果也传到了意大利，打击海盗似乎取得了成果。然而，实际成果并不大。如果从港口的南北两面加以控制，情况则另当别论，但只在一个方向控制，就会有很多逃路。况且，又有谁会在出港时高喊自己是海盗船呢？结果，“佩尼翁要塞”只满足了西班牙国王的自尊心而已。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只满足于建一座城堡。没有资料表明守军只是在“佩尼翁要塞”里孤立生存的。在城堡里生活期间，西班牙将士大概也进过阿尔及尔城，应该也见到过成群的基督徒拖着铁镣哗哗作响地走在街头，他们被剃光头发和胡须以示奴隶身份。这景象在当时的阿尔及尔司空见惯，但是没有记载着这些情况的记录和信函留存下来。将士们是否会想，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士兵，尽管也是基督徒，却与这些奴隶不一样呢？

“阿尔及尔要塞”的存在是阿尔及尔居民的耻辱。伊斯兰教徒的这种屈辱感却并非来自自己领土的一隅被人占领。这些人坚信基督徒就是拥有错误信仰的“无信之徒”。在他们眼里，基督徒不论是什么人，都是不如自己的下等之民。实际上，大部分北非伊斯兰教徒所知道的基督徒，就是像这些从眼前走过的被铁锁链锁着的、衣衫褴褛形同家畜的悲惨之人。

他们不能忍受自家的一隅被这样的下等人所占领。如果没有宗教介

入，敌人只不过是单纯的敌人而已。在地位上，只是力量弱者屈服于强者而已。然而，一旦宗教介于其间，敌人却不再是单纯的敌人。16世纪的西班牙人播下了使这种微妙关系恶化的种子，而这样做对消除海盗的危害收效甚微。

海盗库尔特格尔

如果要从伊斯兰方面选出能够代表16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人物，大概就是海盗头目库尔特格尔了。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在同业者中极为罕见。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早就被当时的苏丹塞利姆发现。这个时期的突尼斯尽管居民是伊斯兰教徒，但还没有归入奥斯曼的统治之下，还不能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塞利姆决定，利用海盗库尔特格尔向突尼斯扩张势力。

库尔特格尔被召进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在苏丹面前起誓，前往突尼斯，专事以基督教徒为攻击对象的海盗业。苏丹送给他丰裕的资金，让人感觉是先期投资。

库尔特格尔带着这些钱来到突尼斯，首先会晤突尼斯“酋长”。“酋长”名为阿布·阿卜杜拉·穆哈迈得，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北非原住的柏柏尔人，对奥斯曼苏丹推荐来的人并不热情。而且，这位突尼斯的酋长当时与热那亚共和国关系良好，热那亚商人与北非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部分已使他腰包鼓胀。

不愿意屈服于奥斯曼的淫威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酋长”没有给海盗满意的答复。让他腰包鼓起的热那亚人也属于库尔特格尔所要袭击的基督教世界。库尔特格尔见状决定走其他途径。

他请求准许把比塞大港作为海盗的根据地，这里距离突尼斯直线距离有60公里，同时承诺向“酋长”上缴海盗收益的1/5。他甚至建议说，如

果热那亚提出抗议，就说海盗是私人组织，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可以佯装不知。听到这里，突尼斯的“酋长”才点头应允。

“比塞大”（现在的Bizerte）在迦太基时代由罗马统治以后就一直是海港，在地中海的北非港口城市中，自古以港口知名，尤其以出产古代高贵颜色紫色的原料贝壳而闻名。进入中世纪后萧条了，原因是代表皇帝的颜色紫色在基督教中是丧色的缘故。也许还因为这里与取代迦太基而成为港口的突尼斯之间距离太近，在出海的人们眼里是一个死角。但是，这里进深大，避风效果好，水域广阔，可以隐藏众多的船只，库尔特格尔看中了这些条件。

库尔特格尔在比塞大站稳脚跟后，着手征召船只、水手和士兵即海盗。看来苏丹塞利姆所给资金丰厚，不费时日就召到了30艘小型帆船“福斯塔”和6 000水手，以及水手一半数量的划桨手。奥斯曼海盗连划桨手也自给自足了。因为使用收容在突尼斯“浴场”的基督徒奴隶需要“酋长”的许可，而出海后在撒丁、西西里登陆把人绑来则可省此麻烦。

这位库尔特格尔的第一次活动，是于1508年在利古里亚一带进行的掠夺。热那亚政府向突尼斯“酋长”提出严正抗议，“酋长”则完全按照库尔特格尔的建议，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以不知道为由蒙混过去。

翌年，库尔特格尔突袭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连人带船抢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以后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的活动有增无减。他曾经与公认的海洋国家热那亚的海军在科西嘉海上交战，连人带船缴获了一艘热那亚船，押解到比塞大。连热那亚都尚且如此，意大利半岛西岸从南到北也自然遭受祸害。

库尔特格尔在第勒尼安海为所欲为，但却没有殃及伊奥尼亚海，甚至一步也没踏进过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如果库尔特格尔刺

激基督教国家中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威尼斯，与之陷入敌对关系，就会违背其主子奥斯曼苏丹的意愿。威尼斯也并不是那种对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坐视不理的“国家利己主义”者。

于是，罗马教廷和热那亚共和国就成为挡在库尔特格尔面前的障碍。与其说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战船可以形成战斗力，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时这两个国家都有性格坚毅的人物决不容许海盗横行霸道。

教皇美第奇

这个时期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他是佛罗伦萨繁荣的文艺复兴文化的真正支持者。他是被人们尊称为“伟大君主”（Lorenzo il Magnifico）的洛伦佐的次子。他虽身为神职人员，却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红人，是这一时代真正的意大利人。同一时期，达·芬奇也曾在他所居住的教皇皇宫小住，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则会每天来往工作。

顺便说一下，1515年这一年达·芬奇已经63岁，米开朗琪罗40岁，拉斐尔32岁。利奥十世虽然身处基督教的最高地位，却仍生活在现世世界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记作家保罗·乔维奥这样评论利奥十世：

> 教皇利奥认为，靠祈祷和说教战胜奥斯曼帝国和体现其意志的海盗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主张如果希望摆脱他们带来的恐怖和不安，我们就只有武装起来，形成并巧用战略上的军事力量。

那年40岁的利奥十世不仅思考，而且行动。他重建了旗舰被掳面临瓦解的教廷海军。不过，这时的海军只有3艘军用帆船和4艘运输船，一共7艘船只。这点儿家当终究不是库尔特格尔的对手。

那年春天，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出现在教廷国家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的海面上。这是一支由4艘大帆船和23艘“福斯塔”小帆船组成的船队，船只多达27艘。海盗船队使人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惊恐之下便去了厄尔巴岛。

教皇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在给教廷驻法兰西宫廷大使的书信中讲述了这件事，然后说道：“接到这个报告时教皇非常沮丧。”

垂头丧气也属当然。因为他手下才有3艘船，而对手却有27艘。

大型帆船可以形成防御能力，但不能成为攻击力量。敌对双方用大炮远距离相互轰击的特拉发加海战是300年以后的事，而以16世纪的地中海为舞台的海战，打的都是近战，用桨划船相互靠近后，登上敌船，靠白刃战决定胜负。

在这类海战中，只能依靠帆的帆船算不上战斗力。因为帆船进退全靠风，而风向和风力却不受战术控制。

所以，海上战斗力只能靠加莱船，这种船备有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根据目的分别使用帆和桨。

一旦进入战斗，加莱船就会落下帆来，单靠划桨前进。划桨的是人，可以完全按照计划好的战术行动。人们通常用加莱船的数量计算海上战斗力。因伊斯兰海盗惯用而闻名的“福斯塔”虽然比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要小，但因为有帆和桨，所以也属于加莱船，具有卓越的战斗力。

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中有很多船长度达到40米，这是因为这些意大利海洋国家都是商业国家，船只需要装载商品。

一条船要用多达200人的划桨

利奥十世

手，人工费自然很高。威尼斯自不必说，热那亚也从不使用戴铁镣的奴隶做划桨手。他们没有袭击异教徒的土地绑架居民的习惯，想使用奴隶也没有。同时代的西班牙船上则经常使用在异端裁判中被判有罪的人。但在对宗教狂热经常保持清醒的意大利，即使把这类人集中起来，人数也不足以划动一艘小型船。所以，威尼斯早就建立起长期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人做划桨手的机制。就连人口很少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雇用本国的自由民做职业划桨手，向他们支付工资的。

“人工发动机”使航海费用居高不下。威尼斯政府采用这种船只装运单价昂贵商品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单价高昂的商品就是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只有实际上垄断了香料市场的威尼斯才能这样做。

同为意大利海洋国家，热那亚就做不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被无情地挤出了与东方的贸易，单价高昂商品的交易本身就很难，更何况其人口比人口小国威尼斯更少。热那亚自然把船都改成不用划桨手的帆船，这样劳务费为零。威尼斯港建在广阔的滩涂内侧，港内水浅。热那亚则不同，港口傍山而建，港内水深，与吃水浅的加莱船相比，更适合于吃水较深的帆船。

除此以外，两国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意识也不同。威尼斯的大型商用帆船都是编队航海，用军用帆船为船队护航业已成为常态。这是国家不遗余力维持经济力的意志表现。相应地，一旦国家需要，经济界人士也须予以合作，这已经形成规矩。在途的满载大量胡椒的船只，一旦附近

海域发生战争，即有义务将货卸在附近基地的仓库，船员和船都要赶来，在海军司令的指挥下加入战斗。在威尼斯，商船可以变成战船。法律还规定，如果船只不幸沉没，留在仓库的货物将由国家负责运回国内，交还货主。

热那亚共和国的四大家族则分成两派，彼此争斗不休。争夺霸权失败的一方，绝对不会服从政府的命令。与举国一心的威尼斯相比，热那亚人个人主义倾向强烈。我甚至认为，正因如此，热那亚才会诞生哥伦布。

在地中海与意大利海洋国家争斗的北非伊斯兰海盗船，虽然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主力却不是大型加莱船，而是小型的“福斯塔”。

不是因为造船技术差。袭击基督教各国船只抓来的人中有技术人员，可以强迫他们合作。所以，伊斯兰的造船技术即使赶不上意大利海洋国家，也已经相当发达，水平接近。

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苏丹认为海盗是非正规军，援助从不吝啬。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因为不是商船，不受装货越多运费越便宜这条经济规律的制约，没有必要使用大型船。

第二，他们用基督徒奴隶做划桨手。

用铁链锁着在每艘大型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数量要超过200人。伊斯兰教徒船员人数只有50人。他们要进攻基督徒的船只。战斗中，基督徒划桨手不知何时就会解开铁镣从背后袭击他们。海盗们忘不掉这种恐怖。

“福斯塔”是小型帆船，只需要半数的划桨手。海盗虽然勇猛，但

200人和100人所带来的压力毕竟不一样。意大利船打起近战来，划桨手会立刻变为战士。但海盗船却不可能这样。威尼斯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伊斯兰海盗船却没有。

有的海盗当上了头目，也会因炫耀和虚荣心而使用装饰华丽的大型加莱船做旗舰，但他们在实际的海盗行动中也只用“福斯塔”。提到“福斯塔”，指的就是“海盗船”。

“神圣同盟”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同时代的罗马教廷。16世纪初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他年方40，正值壮年。他的父亲是被冠以“伟大”尊称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三兄弟中，他不仅热心学艺的成长，还比其他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政治方面冷峻大胆的基因。当得知教廷海军与海盗库尔特格尔的战斗力对比是3：27时，利奥十世虽然一时沮丧，但心情很快平复。他的大脑里起了这样的念头：要对抗受到奥斯曼苏丹支持的伊斯兰海盗，只有依靠基督教世界共同战斗。这个想法催生了“神圣同盟”。

教皇利奥首先向热那亚共和国发出呼吁。前一年，热那亚也遭到库尔特格尔的抢劫，连船带人被抢走。船被拉到比塞大港，船员被“浴场”收容，这个记忆使热那亚的大海男儿夜不成寐。他们与被抢走旗舰的教廷感同身受，自然爽快地响应教皇。

教皇还呼吁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共同战斗。法兰西并没有受到伊斯兰海盗特别巨大的祸害。爱好艺术的教皇认为，有相同爱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欧洲国王中较易驾驭。教皇利奥曾经带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人出席与这位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重要会议。法兰西国王还很年轻，被介绍认识了这三位之后非常兴奋，就像粉丝见到了大明星。

会谈也因此走上了有利于利奥的方向。神圣同盟形成之后一两年，应弗朗索瓦一世的盛情邀请，达·芬奇移居法国。

威尼斯共和国也曾应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派本国画家贝利尼去奥斯曼。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教廷也会把文化用于外交。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有了需求，艺术家们也就会卯足了劲供给。

不出所料，弗朗索瓦一世答应派遣6艘加莱船参战。然而，教皇如此拉拢法兰西国王，却导致了西班牙国王的不参战，抗击伊斯兰的统一战线有了不好的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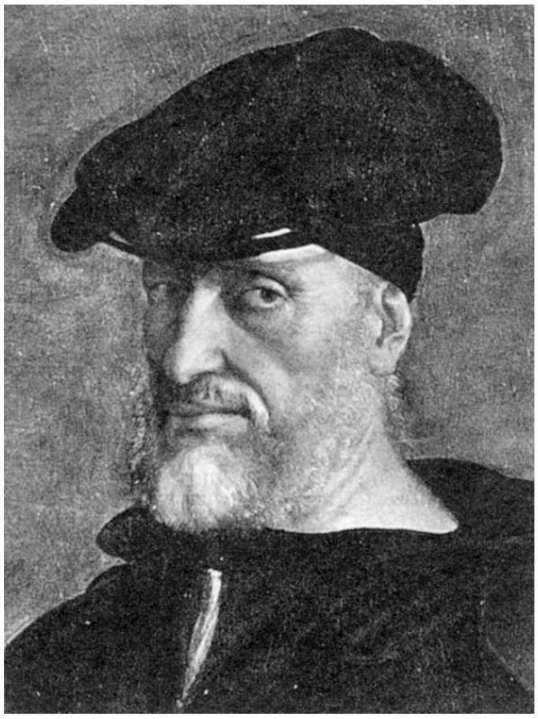
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大强国之间的争霸是16世纪欧洲的特色。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1515年时，弗朗索瓦21岁，卡洛斯16岁，年纪轻轻的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登上王位。这两个人都长寿，16世纪前半叶一直在位。整个欧洲卷入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削弱了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势力的抵抗力量。

没有人知道教皇利奥是否也呼吁过西班牙国王参战。不过，那年恰逢西班牙国王更迭，即将登基的卡洛斯年方16，现实的利奥十世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邀请他。总之，从1516年开始，两国便进入了一方参战另一方就罢战的状态。

此外，教皇利奥肯定连参战邀请都未发给威尼斯共和国。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友好通商条约还在继续。威尼斯是一个只要与本国利害没有直接关系就不会打仗的国家。

最终，法兰西和热那亚响应教皇利奥号召前来参战。加上教廷的3艘船，共有19艘加莱船。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如连“福斯塔”在内超过27艘军船的海盗船队，但基督教方面有安德烈亚·多里亚。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时已经年逾50，但应把他当作比实际年龄年轻



安德烈亚·多里亚

20岁的人来看待。他出生于热那亚首屈一指的名门，但大器晚成，50岁才起步。这点令人印象深刻。1516年组成了“神圣同盟”。这时以“神圣同盟”进行的战斗名垂青史，也是他后来辉煌经历的第一步。

基督教方面还有一位性格坚强的人——保罗·维托里，他被利奥十世任命为教廷舰队司令。我认为他是因与马基雅维利私交甚好而历史留名的弗朗切斯科·维托里的哥哥。果若如此，他应该是40来岁，富有不拘偏见，行为自由大胆的气质，是当时典型的佛罗伦萨人。

1516年7月，所有集结在奇维塔韦基亚的神圣同盟船只驶向第勒尼安海，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他们搜遍了厄尔巴、撒丁、科西嘉各岛，连海盗船的影子也没见到。当时正值夏天，并不是海盗结束活计撤回根据地的季节，但又的确没有找到海盗。被召集起来开会的舰长，一致认为，库尔特格尔得知基督教舰队出动，不愿意打海战，撤回了根据地比塞大。

围绕下一步如何行动，意见出现了分歧。热那亚和教廷主张进攻比塞大，而法兰西则有不同意见。热那亚和教廷此后开始了单独行动。

寻找海盗只需打仗用的加莱船，而去北非，必须有运输船队随行。但眼下已接近7月底，没有时间等待所有船只集结。大军在向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的舰队下达了跟进的命令之后，加莱船便强行南下。要打海盗一个冷不防，只能进行比海盗更快的速攻。

果然不出所料，库尔特格尔和所有海盗都回到了比塞大。派去侦察的小型快船报告，海盗船队全部停泊在港内。港口入口被牢固的铁锁封住，好像在告诉人们，年内不再有海盗航行了。

热那亚攻击比塞大的意志没有改变，但向教廷提出了一个请求。热那亚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故希望参加攻击的热那亚船的桅杆上不挂热那亚国旗，而悬挂教皇旗。保罗·维托里是商业大国佛罗伦萨人，知道必须考虑维护经济关系。

8月4日黎明，大型帆船冲断铁锁，攻入港湾，桅杆上教皇旗高高飘扬。停泊在湾内的海盗船一艘接一艘地被放火焚毁。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全部在岸上，海盗船全无防备。

点燃所有海盗船之后，战场转到了陆上。基督教船一般不用奴隶，这时划桨手成为士兵。他们把基督徒奴隶们从“浴场”解放出来，之后并未停手，又进行了掠夺。尽管杀死了许多海盗，却没有发现库尔特格尔。他向内陆逃去，但这时的“神圣同盟”军还没有足够的陆上战力进攻陆地深处。

还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根据热那亚得到的情报，去年被掳往比塞大的热那亚船不知为何被转移到了突尼斯港。在热那亚人看来，必须夺回被拉到突尼斯港的友船和船员，否则就徒劳无功。

但是攻入突尼斯港就会违反与伊斯兰“酋长”缔结的条约。说突尼斯港像比塞大一样是海盗巢窟，这个理由行不通。于是，司令官多里亚亲自指挥了自己谋划的隐秘行动。

热那亚人分乘3只小船，深更半夜潜入了突尼斯港内，悄悄摸到已经沦为划桨手的同胞的船上，戴着铁锁链的同胞还在熟睡，放哨的海盗还未来得及叫喊就被干掉。随后，3只小船用缆绳拴住大船，将它静静地拖往港外。他们行动迅速而安静，熟睡的划桨手们知道自己已经获得

自由的时候，船只已经被在港外等待的友船包围。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大胆而狡猾的胜利。

后来，基督教海军不但掠夺了突尼斯海岸一带，恢复了被囚禁在“浴场”里的基督徒奴隶的自由，还屠杀伊斯兰教徒居民，掠夺他们的财物，抢走了3艘伊斯兰船，8月底踏上了归途。神圣同盟声名大噪，但除了解放沦为奴隶的不幸者以外，其行径与伊斯兰教徒同样野蛮。然而，越是跟海盗一样暴虐，对海盗作战就越是有利。这虽然令人遗憾，却也是事实。

外交上经常会右手打一拳左手拉一把。有人会说，既然要拉一把，就用不着打那一拳。这样想的人心地善良，但不懂外交。当然，不打就能解决问题最好不过，但事实是有很多挨了打才能解决问题的例子。

马基雅维利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写道：即使被憎恶也不可被轻蔑。他还写道，在政治中应选择使人害怕，而不是被人爱戴。因为人会被热爱自己的人轻易抛弃，却不能轻易离开可怕的对手。外交处理的是国家间而非个人间的问题，被轻视、被轻蔑都会导致实际损害，因而绝对避免这种情况便成为外交中最重要的事。

1516年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这样行动的。在突尼斯海岸一带像海盗一样施暴回来之后不久，热那亚向这一带的行政负责人突尼斯“酋长”派去使节，明确表达了以下的意思：

“热那亚船被拖到了突尼斯港的事实表明，突尼斯认可掳走船只并将其拖往北非的海盗库尔特格尔的行为。

“如果今后还想与热那亚继续保持通商关系，如果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领土不想再次被毁，就应该承诺把海盗从你所统治的所有地方赶出去。”

“酋长”阿卜杜拉坚持说自己没有纵容海盗，但还是不得不做了以下承诺。第一，不袭击热那亚船只；第二，不袭击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还承诺把这两条转告给库尔特格尔。

但他对把海盗赶出所有港口一事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予以答复。因为“酋长”知道库尔特格尔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即便如此，热那亚政府也并不相信突尼斯“酋长”的承诺。热那亚海军回国后不久，利古里亚一带便开始建造瞭望塔，数量惊人。原有的瞭望塔也得到了加固（参照本书上卷卷末彩图）。热那亚在取得承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御。

同为欧洲人，在同一个时代对北非海盗的应对方法却如此不同，真是发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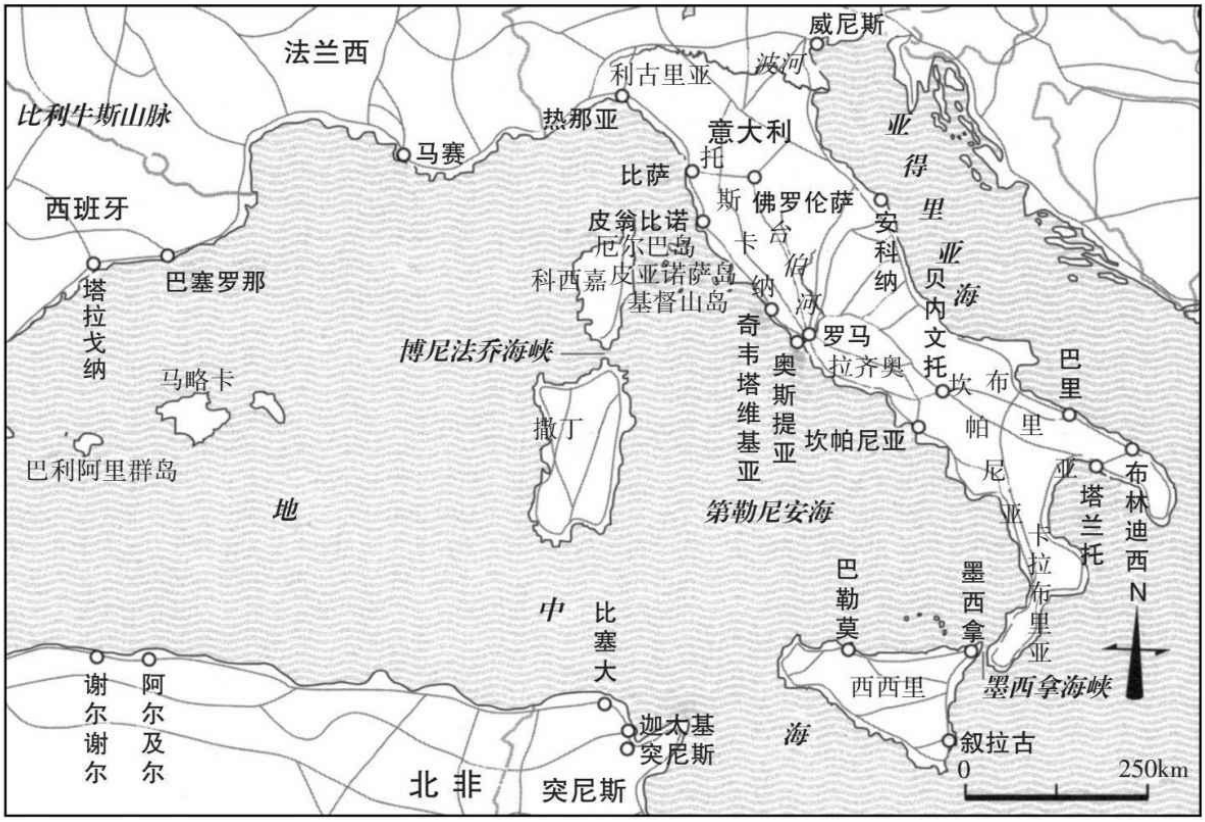
热那亚共和国采用的对策如前所述。与热那亚比肩的另一个意大利海洋国家威尼斯则选择了不打但也不容许轻视的处理方式，堪称此类国家的榜样。

威尼斯的商船队都配有护航船，他们一贯的方针是谁敢动手决不容忍。他们抓住前来袭击的海盗，不像热那亚那样带回国去关入监牢，而是当场吊死在帆桁上。威尼斯认为，海盗不是战俘，只是单纯的罪犯。因此很少有海盗袭击威尼斯船，在“浴场”受苦的基督教徒中，威尼斯人的比例极低，几近于零。

第三种处理海盗的办法大概就是当时西班牙国王的做法。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并为两大海盗根据地。西班牙国王在阿尔及尔港附近构筑了一处以“佩尼翁要塞”知名的城堡，在城堡里装上大炮，以后便事不关己。真是一种西班牙式的感觉。对西班牙的统治者来说，保住大国的威信也许比实际成果更为重要。其结果，海盗船在阿尔及尔港进进出出，被绑架来的西班牙人拖着铁锁链，哗哗作响地走在阿尔及尔街上。他们的身影从未绝迹。

库尔特格尔又在干什么呢？与不得不假装自律的“酋长”不同，他没有官方地位，也没有自律的义务。不过，他似乎还是尊重“酋长”对热那亚许下的不袭击其领土的承诺。离开根据地比塞大港后的海盗活动，没有把船头对准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

当然，海盗库尔特格尔只是为了给突尼斯“酋长”面子，并非放弃了对热那亚领土实施海盗行为。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热那亚政府加紧努力，利古里亚沿海地方防御坚固，迅速形成铁壁。临海的所有崖顶上都矗立监视海盗船用的高塔。居民至今仍称之为“撒拉森塔”。从海上望去，高崖和矗立其上的高塔，与这一带为数众多的石矶浑然一体，形成绵延不断的防御铁壁，而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战船在热那亚港内待命，准备随时出战。进攻这样的热那

亚，意味着以卵击石，这是海盗最不感兴趣的事。

这样，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两个地方就成了这年库尔特格尔的目标。把目标锁定在这两个地方，对库尔特格尔来说有着特别的原因。

托斯卡纳是教皇利奥的本家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地方，拉齐奥则是教皇利奥在罗马的居住地。去年进攻比塞大是在教皇的旗帜下进行的，基地被毁的库尔特格尔也许想着要对教皇干点儿什么。

海盗库尔特格尔想通过绑架教皇完成这个心愿。好一条豪气大胆的汉子！

不晓得库尔特格尔从哪里得知教皇利奥来到了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交界的马雷马平原。这片平原全是沙滩，延伸到第勒尼安海。海盗率领满载着手下的12艘小型快船“福斯塔”靠近平原，等到半夜全体登陆。新月当空，他们在暗夜顺利上岸。

海盗的第一个失算是等到天亮才去进攻利奥下榻的本地贵族的城堡。

海盗的第二个失算是忽视了教皇利奥年轻时起就喜好狩猎，虽然身体肥胖，却能娴熟地驾驭马匹。

城堡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却没有对其形成完全包围的态势，这是海盗决定性失算。

天一亮城堡外面就骚动起来，利奥当即意识到这是海盗来袭。他飞身上马，一溜烟地逃回了罗马。他看到罗马北边城门的时候，还不到中午，足见他骑乘的速度之快。

他虽然抛弃奋起反抗海盗的朋友和随从，但却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免遭史无前例的屈辱。

假如现任罗马教皇被活捉，用铁锁锁着押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在苏丹面前屈膝的事情发生，以后的基督教世界将陷于不可恢复的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劣势。

我们不能忘记，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奉的对象不同，而在于信奉方式的对错。在伊斯兰教徒看来，基督教徒是对唯一神的信仰的途中误入歧途的人，所以都是无信之徒，不是人而是狗。没有比戴着铁锁被押解到伊斯兰世界的教皇更好的标本。尝试绑架基督教世界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库尔特格尔是在那个时代值得赞赏的伊斯兰教徒。

虽然行动失败，但绑架罗马教皇的新闻传遍了整个欧洲。没有发现12艘敌船靠近而使其登陆的第一责任人是担任守卫近海任务的教廷海军司令。人们都认为他将被解职。然而与大家的预料相反，教皇并没有撤掉这位既是同乡又是亲戚的司令官。保罗·维托里和利奥二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豪放好强，一向气味相投，关系甚好。

此次事件以后，维托里司令再也不允许自己指挥下的3艘军船停泊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内守株待兔。他让各自为战的军用帆船分别配上联络用的小帆船不断在海上巡逻，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警戒体制。

陆上沿海岸线也同时开始建设用于监视的“要塞”（rocca）。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有很多“塔”（torre），那里的山崖往往延伸到海边，这种地势非常便于放哨监视。但是在沙滩很多的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带，在监视之外还需要派驻足够数量的士兵迎战登陆的海盗。这两处需要建造要塞，哪怕只是小型的，否则无法防卫。

陆上进行着突击工程，保罗·维托里率领的教廷海军在海上不断巡逻。尤其是维托里乘坐的旗舰远离海岸，远航到撒丁和科西嘉四处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一旦遭遇，便用自己仅有的几艘船去突击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

但海盗船直到当年秋天也不曾现身。保罗·维托里满腹狐疑，他派出快船潜入比塞大港附近侦察。也不见库尔特格尔的影子。

库尔特格尔既不在第勒尼安海，也不在北非的比塞大，原来他按照苏丹的命令去了君士坦丁堡。

苏丹塞利姆并没有因为绑架教皇失败而责备库尔特格尔，相反给了他巨额赏金，亲自犒劳他过去的种种辛苦。但苏丹没有再派库尔特格尔去北非，会不会因为期满解散而让他引退呢？事实上正好相反。

库尔特格尔在西地中海四处为祸，甚至尝试绑架教皇，尽管此举未能成功。奥斯曼苏丹把这位无比胆大的奥斯曼海盗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各国之间并未有大型海战。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实际负责的海域仅限于地中海东部。此后，库尔特格尔的名字便在西地中海以基督教国家为对手的海盗的历史中消失了。

然而，对为害西地中海的伊斯兰海盗而言，库尔特格尔的晋升无疑反映出海盗未来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只要在海盗行动中取得成绩，就可能当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总司令。库尔特格尔成了海盗的示范。

在16世纪初的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形成了“伊斯兰之家”。这些地方所环绕的东地中海可以说是“伊斯兰之家的庭院”。

这座“伊斯兰之家的庭院”并不是没有基督教徒。

首先，有根据地在罗得岛已久的圣约翰骑士团。他们是特异分子，自以为是基督的战士，以袭击航行到附近的伊斯兰船为职责。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干着海盗的勾当，但在欧洲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当“骑士”，所以他们与北非海盗存在区别。

圣约翰骑士团——尽到作为基督战士的职责——海盗。

北非的海盗——作为海盗取得成绩——尽到作为伊斯兰战士的职责。

在第三者看来，这样的区别愚蠢不堪，但他们本人却一本正经地放在心上。

还有一支在“伊斯兰之家的庭院”自由来往的基督教势力，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就把与他国贸易作为国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动物而言，宗教的不同不是障碍。即使在伊斯兰的“庭院”里，他们也拥有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两处基地；甚至在“家”里，他们在各地都派有领事，运营着商馆。如果威尼斯奋起对抗奥斯曼，经济关系陷入危机的时刻也就到了。

在以奥斯曼为盟主的伊斯兰世界看来，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处在“伊斯兰之家”以外。西、北两个方向受到基督教世界扼制的西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基督教世界。伊斯兰势力在北非无论怎样渗透，只要海盗是其代表，就不能说正式属于奥斯曼帝国。正因为如此，奥斯曼苏丹才将利用海盗作为扰乱敌人后方的实际部队付诸行动。

不得不承认，利用海盗是一个妙招。

使用本国海军最理想，但海军的装备和维持比陆军费钱。威尼斯共和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因为它有着悠久的海运传统，并投入了通过贸易获取的莫大财力。如果没有这两条，他们也会像教廷海军那样，拥有几艘到十几艘军用帆船的规模。

奥斯曼帝国即使拥有莫大的财富，也不具有海运传统。所谓传统，需要各方面的储备。奥斯曼无基础，在需要海军的时候只能招募海盗。

所谓需要，包括向进攻目的地运送兵力和攻城武器，或者切断那里

的补给。基督教海军与伊斯兰海军这时尚未开战，不久之后便在海上发生正面冲突，打起了海战。这就是“需要的时候”。其他时间，尽可以去做海盗。正式海军平常的维持也要花钱，但如果是临时招募海盗，就不必有这种担心，这样做绝对省钱。而且，海盗干大了还有可能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前途光明的正途已有先例，鼓舞了海盗的干劲。这种人才策略后来一直行之有效。基督教世界遇到了一个麻烦的敌手。

保罗·维托里

海盗过去在伊斯兰进攻地中海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仍将如此。库尔特格尔亲自选拔了自己的接班人，经苏丹塞利姆认可后确定下来。这个人名为加达里，长期是库尔特格尔的手下，曾掌分队指挥权。

与有着纯粹奥斯曼血统，长着一副东方面容的库尔特格尔相反，取代他成为突尼斯一带海盗头目的加达里全身精瘦，皮肤黝黑，目光锐利，嘴唇紧闭。他凶相毕露，举止野蛮，和画在纸上的基督徒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样子。

根据基督教方面的记载，他特别热衷于把抓来的基督教少年阉割之后赠给伊斯兰各国的宫廷。尽管基督教方面对伊斯兰的记录不会全信，但加达里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基督教方面迎战加达里的人是统率热那亚海军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和统率教廷海军的保罗·维托里。

1518年是取代库尔特格尔当上海盗集团头目的加达里开始活动的一年。我们不妨称这年夏天为“海盗的季节”。加达里离开比塞大，和手下的海盗船队一路北上，驶向预定的第勒尼安海。加达里积累丰富的海盗经验。他遵守着海盗的铁律，不碰强大的对手。他没有去安德烈亚·多里亚严阵以待已成为铜墙铁壁的利古里亚，而是在地中海中央停止了北

上。他决定把这年的活动地点放在教廷海军守卫的意大利中部。撒丁和科西嘉诸岛在盛夏期间已经成为掳获奴隶的收割场。他绕着这些岛屿，把时间耗在了“割草”上。把绑架来的人装上船，运去北非，也是海盗的老套做法。

9月将半，加达里和海盗船队径直转舵向东，靠近了托斯卡纳。

正在附近巡逻的维托里接到海盗船队出现在厄尔巴岛近海的报告，径直朝那片海域驶去，却未做好充分准备。跟随维托里所乘旗舰的只有一艘军用帆船和两艘小帆船。船队逆风北上，没有配备划桨手的帆船无法快速行进。另一艘军用帆船不如旗舰大，速度也不如旗舰。后续的三艘船与旗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维托里明知这一点，却仍然让他所乘的大船单枪匹马地追击敌人。

在本土的皮翁比诺海岬与厄尔巴岛之间的海峡，他追上了一只北上的船只。

维托里司令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岛屿附近与敌人对决的危险，脑子里只有眼前这艘敌船。他用船头撞击敌船。海盗船立即大幅倾斜。海盗经不住登上甲板的教廷海军和划桨手的联合攻击，投降了。

就在这时，附近岛屿的背后出现了8艘“福斯塔”船。这8艘小船立即包围了维托里的船。围攻没多久便胜负明朗。正在此时，后续的一艘大帆船和两艘小船赶到了。

前面说过，小帆船没有攻击力。即使有战斗力，现在也是以二对八。迟到的三艘判断旗舰已呈败势，为救旗舰而冲入敌阵无异于发疯，于是退到敌人追不上的海面上作壁上观。他们别无选择，决定见死不救。

维托里船上连划桨手一道全员上阵。司令像一头狂怒的狮子，一直

在亲手杀敌。维托里身受重伤，但他没有忘记司令的职责。他在视线的尽头看见了在海面上旁观的友船，命令还能动的人全部弃船跳海。之后，他倒了下来。

缴获了教廷海军的旗舰，报了两年前比塞大遭受攻击的一箭之仇。加达里满足了，认为这足以完成当年的工作，撤回了比塞大。当然，他们拖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作为库尔特格尔的后任，加达里在这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教皇利奥和保罗·维托里不但同为佛罗伦萨人，还是好友。想到维托里遭袭的命运，平时性格爽朗的教皇也掩饰不住悲伤。冬天将至。冬天，是船舶进港维护和检查装备的时令，水手和划桨手可以回家休息。但来春要再开海上巡逻，这个冬天还必须确定舰队司令的人选。

可是，教皇利奥怎么也定不下替代维托里的人选。心腹们送来的名单，他一看就推在了一旁。利奥的理由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没有维托里死亡的确证，他内心难以放弃最后的一缕希望。

一想到好友被铁锁链铐着投入监狱，严刑拷打之后被斩首，教皇利奥就悲情难抑。保罗·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两年前被教廷海军蹂躏的北非伊斯兰教徒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敌将维托里押至广场公开处决。文艺复兴时代也是战乱的时代，教皇利奥身处其间，完全知道等待败将的命运。然而，1518年的冬天，利奥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春天来了，海盗的季节开始了。

如果今年海盗加达里仍把目标锁定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这两个地方的沿海一带必定会遭受惊人的损失。防守这片海域是教廷海军的任务，而教廷海军不仅旗舰被敌人抢走，就连司令也还空缺。前一年的成功让加达里过分自信。

1519年春天，加达里把去年缴获的教廷旗舰改为自己的座船，率领手下的海盗船队，离开北非北上。这个消息被常驻突尼斯的热那亚领事传回了本国。眼下还不知道加达里的目标是哪里，但热那亚还是开始了迎战准备。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负责抗击海盗的安德烈亚·多里亚预测海盗今年将攻击热那亚。这个预测相当准确。因去年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加达里，去年还躲着热那亚，今年却认为能打赢它了。于是，加达里对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看都没看一眼，一路北上，直指热那亚。

这一年，热那亚港口只配备了4艘具有攻击力的加莱船。热那亚政府从护卫热那亚近海考虑，认为4艘足够。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多里亚虽然已经53岁，但地位较低。只负责热那亚港的防御。

但是，认定海盗必来的多里亚不是唯唯诺诺的人，哪怕这是本国政府的决定。他向政府要求再拨两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政府以有船却无划桨手为由拒绝了多里亚。多里亚不会因为这点儿挫折而退缩。他提出使用囚犯，并让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

囚犯在海上服务的条件是，做一段时间的划桨手便可减免刑期。他们在意大利船上不会被铁链捆绑。但既然是犯人，就需要看管他们，这与一般的划桨手不同。这些人被称为“博纳波利亚”，直译是“良好愿望”，意为这些人不在监狱而在海上尽热那亚公民的义务。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他们可以与其他水手一样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安德烈亚·多里亚把囚犯分散到各条船上。这样一来，他组成了一支有6艘加莱船的船队。他率领这支船队出海迎敌。在防守坚固因而安全的港内守株待兔不是他的性格。

热那亚的大海汉子

4月底的一天，正在南下的热那亚海军收到了侦察船送回的报告，

多艘“福斯塔”海盗船正结队沿皮亚诺萨岛近海北上。皮亚诺萨是科西嘉和厄尔巴之间的小岛，在这片海域北上表示敌人正向热那亚进发。

多里亚没有采用阻挡北上海盗船的战术。他知道海盗不善海战，即使船只数量占优势，一见敌人船队就会逃跑。而且，这时的风是东南风，有利于北上之敌，对己却是逆风。

多里亚摆出来要逃跑的样子，掉头向北，其他5艘船也跟随而去。

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船只喜用三角帆，而不是四角帆。四角帆遇到逆风便束手无策，而三角帆却可以曲折前行。公认热那亚水手对这种帆的操控能力超过威尼斯人。他们改变航向的技艺精湛，远非北非海盗所能及。正因如此，安德烈亚·多里亚才敢使用这种需要高难度行船技术的战术，这就像在海风劲吹的海面上走钢丝一般。对热那亚水手来说，一边顺风前进一边渐次减速易如反掌。这时，海盗加达里满脑子只想着追击逃跑的敌方船队。

就在皮亚诺萨岛消失在水平线上，船队经过厄尔巴岛的时候，多里亚乘坐的旗舰桅杆上高高打出旗语，命令船队再度调转船头。

热那亚舰队突然改变航向，所有船只都已降下船帆。降下船帆，只靠划桨航行，这意味着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顺风追赶而来的海盗船队遇到敌人突如其来的迎面冲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没想起降帆便冲入了敌阵。热那亚方面以完美的态势迎战敌人，而海盗却是被风推着进入战斗。这不能不影响到双方战士的斗志。热那亚的士兵和水手团结一致，口中高喊着“圣乔治”攻上敌船。“圣乔治”是守护热那亚的圣人。

海上激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多里亚乘坐的旗舰同时大战5艘敌船。许多热那亚人倒下了，但战斗以海盗的完败而告终。

500多海盗战死，20多艘“福斯塔”被俘，近30艘海盗船仅有区区3艘“福斯塔”成功逃脱。被海盗用锁链捆在一起的基督徒划桨手全部得到解放。

被海盗船队当作旗舰的是去年被抢去的教廷海军旗舰，如今又回到了基督教方面。

当多里亚得知加达里就在为数很少的俘虏当中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完美成功。安德烈亚·多里亚没有像同时代威尼斯海军司令们那样，当场把加达里吊在帆桁上处以死刑。海盗头目加达里被铁锁铐着带回了热那亚港，这成为凯旋的亮点。加达里随后被投入皮亚诺萨岛的监狱。据说他悲愤过度，两年后死在狱中。

旗舰被送还给了罗马教皇，他由此得知热那亚舰队的胜利。这艘船上的很多人在教廷旗舰时就是船上的水手，船被海盗作为旗舰之后又成为奴隶而劳作。一年后他们回到了国内，教皇利奥掩饰不住喜悦，欢迎他们。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曾经的司令维托里的消息。

教皇也只好承认司令的人选安排已不能再拖。当初维托里乘坐的旗舰是一艘安装了大炮的最新式船，海盗加达里拿下这艘船后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船。这条船现在正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出发。教廷舰队已经恢复到了教皇利奥辛苦创建当时的状态，所缺的只是司令官。

热那亚政府通过教廷驻热那亚大使转达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预测，加达里被收拾了，但北非海盗不会因此停止袭击，第二年必定会来袭。那时托斯卡纳和拉齐奥可能会是目标。

此外，热那亚政府还传过话来，热那亚海军准备与教廷海军联手防卫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确定主事人教廷海军司令的人选已经到了不能再推的地步。

就在这个当口，保罗·维托里的亲笔信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上。这封在威尼斯船上写的信让教皇利奥狂喜不已。维托里在信上写了他被俘虏以后的情况。

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维托里，被抬到加达里的船上，送到了比塞大。在去比塞大的船上，他得到了犹太医生的良好救治。到了比塞大被投入监狱时，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可以忍受牢狱生活。

我们不知道加达里和维托里是如何见面的，也不知道维托里是如何说服海盗头目的。照我的想象，保罗·维托里也使用了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使用过的“招数”。公元前1世纪，在庞培横扫海盗之战以前的地中海，海盗还很猖獗。年青的恺撒落入了海盗之手，他使出了这样一招。

首先必须保命，这是先决条件。恺撒向海盗许诺支付高额赎金。金额必须多到对海盗的魅力大于杀死眼前人的程度。至于是否出得起这么多赎金，这时不必多想。不被杀死优先于其他任何条件。

保罗·维托里是否用了这一招不得而知。只是教廷海军司令未被处死，并不可思议地被允许拥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这使他得以接触威尼斯驻突尼斯领事。

与加达里协商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作为一个人质的赎金，这种高价码前所未闻。维托里虽然出身名门，但其家族并不像其他佛罗伦萨名门那样经营金融业，这些赎金就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

那个时代，在城市里除去房租，一年的生活费有20到25达卡特也就足够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行政官僚中间阶层的年薪也就100达卡特。圣母像如今已经成为教廷的至宝，当时向米开朗琪罗支付的制作费也只有150达卡特。我们不知道赎金高达6 000达卡特，究竟是海盗的要求，还是教廷海军司令的提议，但这个金额非个人所能支付得起的。

加达里相信了维托里所说教廷会支付赎金，赎金也通过数个威尼斯人在突尼斯的账户支付完毕。被囚生活不到半年，保罗·维托里便获得了自由，乘坐前来做买卖的威尼斯船离开了突尼斯。

他不是不能直接回罗马。尽管威尼斯人为帮助教廷海军司令获得释放不遗余力，还是要等确认垫付的6 000达卡特赎金汇入威尼斯银行之后才能送还维托里。因而，维托里才作为赎金的担保乘威尼斯船去了威尼斯。他在船上写信给教皇，除了尽早向教皇报平安外，意在请求教皇尽快向威尼斯银行支付那6 000达卡特的赎金。

维托里的来信给已经开始绝望的教皇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据说他用个人财产担保，筹措了这笔前所未闻的巨额赎金。1519年入冬时节，完全获得自由的维托里回到了罗马。

事实上，是教廷海军司令在信中拜托教皇，请他先帮助垫付赎金，钱总会还给教皇的。半年后再次现身的好友又重复了这样的话，教皇利奥用爽朗的笑声做了回答。我在《上帝的代言人》一书中列举了4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如果有人有过一次在伊斯兰海盗手下当俘虏的生活经历，他自然不愿意再次出海。即使不直接拒绝，说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也一定不会受到非难。

16世纪是所有不同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

基督教对伊斯兰教；

天主教对希腊正教；

天主教对新教；

天主教稳健派对异端裁判派；

法兰西对西班牙和德意志。

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自穆罕默德死后就开始分为各个宗派，相互抗争，延绵不断。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一支独大，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抑制抗争的作用。但在基督教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奥斯曼那样的势力，冲突长久持续。西班牙想独掌西欧霸权，法兰西则坚决不允，两者之间的权力游戏使欧洲成为战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这样的时代，监狱内情况恶劣，囚徒生活严酷到了极点。这一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并无两样。恶劣严酷的情形与是否有宗教介于其中并无关系。围绕权力和利益的抗争只有“胜者”和“败者”之分，可是宗教一旦介入，就会分为“正”与“邪”。

这种时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囚禁生活对基督徒来说不可能舒服，尤其对全体基督徒的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海军司令更是如此。

保罗·维托里对自己在比塞大和突尼斯将近半年的囚禁生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他最先拜托教皇的不是让自己回到故乡佛罗伦萨，而是早日恢复自己教廷海军司令的职务。教皇利奥则爽快应允。维托里有着能屈能伸的性格，同为佛罗伦萨人的利奥十世更是如此。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新教背离教廷，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面对如此局势，教皇利奥都没有恐慌，他不可能会为区区6 000达卡特耿耿于怀。就这样，维托里回到了奇维塔韦基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全体士兵、水手和划桨手鼓掌喝彩，欢迎他的回归。第二年，教廷海军就已经恢复到了可以再度出海的状态。

前一年安德烈亚·多里亚俘虏海盗头目加达里，这一事件影响巨大。

即使是海盗集团，一旦失去领导机能也会失灵。他们连被关在弹丸小岛皮亚诺萨的监狱中的自家老大都没能抢回去。现在，第勒尼安海的

北边有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海军紧盯着，南边有维托里指挥的教廷海军进行常规巡逻。面朝这片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海岸实际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

与西地中海相反，东地中海骤然恶浪滔天。奥斯曼帝国开始再次向圣约翰骑士团的根据地罗得岛发动了进攻。

自公元1517年把叙利亚和埃及完全置于霸权之下以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确立起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当然也就把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环绕的东地中海当成了自己的内海。唯一残存在东地中海中央的基督教世界堡垒，就是如今仍被宗教骑士团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残余盘踞的罗得岛。

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罗得岛被称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但主宰这块“骨头”的人并没有在罗得岛上老老实实地待着，不但袭击来往于堪称海洋要道的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之间航路上的船只，还袭击来往于周边海域的伊斯兰船只，用可谓是海盗的手法专心致志地与伊斯兰战斗着。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十字军的继承者。

然而，这对来往于这一海域的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伊斯兰教徒害怕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称他们为“基督的蛇”，称他们盘踞的罗得岛为“基督的蛇穴”。已成为伊斯兰盟主的奥斯曼苏丹对此不能坐视不理。

1480年奥斯曼曾经尝试过以消灭“蛇穴”为目的的攻击。但当时海上补给线尚不完善，10万大军登陆后不得不撤退。直到1520年，才有了第二次尝试的苗头。

早早得知奥斯曼国内这种苗头的骑士团团长意大利人德尔·卡雷托飞速向西欧基督教各国发出了派遣援军的请求。教廷自然最先派出援军。教皇利奥决定答应这个请求，并点名让保罗·维托里担任援军指

挥。

如果把这个任命想象为教皇为6　000达卡特的赎金让维托里到最前线去与伊斯兰打仗卖命，则不免令人发笑。接受命令的维托里也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他精神抖擞，重返抗击海盗的最前线。而他的对手加达里却蹲在监狱，手下的海盗已销声匿迹，就像举起的拳头无处可打。

骑士团长的信上说，海盗正在罗得岛近海四处扫荡，意欲切断骑士团的补给线。这可说是正式进攻罗得岛的前哨战，而指挥海上作战的正是库尔特格尔。

曾使西地中海惊魂的海盗库尔特格尔此时已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司令。奥斯曼发动军事行动，他当然会从海上予以支持。库尔特格尔是维托里难忘的敌人。他企图绑架罗马教皇。绑架虽然未遂，但毕竟发生在负责教皇安全的教廷海军司令维托里鼻子底下。要与库尔特格尔再度决战的想法，在这位佛罗伦萨汉子的胸中燃烧。

三艘装有大炮小炮的大型帆船驶向了罗得岛。教廷海军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船，是教皇利奥再次借款紧急建造的。普通的帆船没有攻击力。可是装有大炮的大型帆船则完全具备攻击能力，这种船被称为“加莱奥内”（Galeone）。要能经受得住去罗得岛的长途航行，又要具备攻击能力，“加莱奥内”比加莱船更加合适。

大型帆船的乘载人数也多。三艘“加莱奥内”出港时，不但装载了数量众多的大炮和大量火药，每艘船上还乘载了250名士兵，他们全部都是志愿者。

春天，他们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沿意大利半岛南下，穿过墨西拿海峡，横渡伊奥尼亚海，抵达罗得岛港口。这时已是6月，法兰西国王送来的17艘船已经进港。法兰西国王派来援军意味着西班牙并无援

军。骑士团团长认为再等其他援军则是浪费时间，他把共计20艘船的海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保罗·维托里。不过，这个任命似乎是维托里要求的。法兰西船的船长中很少有人有与伊斯兰海盗的作战经验。维托里就像重回大海的鱼儿一样，抵达罗得岛后表现出惊人的活跃。

骑士团团长法布里齐奥·德尔·卡雷托在1520年8月25日给教皇利奥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此人虽然身在罗马，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一员）的信中写道：

> 我最敬爱的保罗·维托里每日归来都有卓越的战果，无愧于基督教海军司令之名。维托里功劳卓著，奥斯曼船只一艘也不能靠近罗得岛的近海。
>
> 尤其是日前的战果十分了得。他追得指挥奥斯曼海军的海盗头目的座船四处逃窜，最后击破并焚毁了这艘船，还押回了许多俘虏。他不但把奥斯曼海军扫除出了罗得岛近海，还补充了我们人手不足的划桨手。

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圣约翰骑士团使用捕获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

保罗·维托里念念不忘的目标是库尔特格尔。尽管库尔特格尔乘坐的船只沉没了，但人却逃走了。可以说维托里赢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奥斯曼方面已经断念，不再企图建立从外部切断罗得岛补给的封锁网。

法兰西援军的目的已经达到，17艘船踏上了归途。保罗·维托里也受到骑士团全体成员最高礼仪的送行，同属下的三艘船一起向西进发。

当时，罗得岛已两次击退了奥斯曼的进攻，所有人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测。罗得岛的命运与把地中海卷入其中的国际政治的动向不无关系。

[1] 优卑亚岛的旧称。——译者注

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年轻的掌权者们

如果把焦点对准1522年这一年，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下列人物。他们全都年纪轻轻，手握重权，统治时间长久，而且都是英明的君主。

苏莱曼一世（1494—1566年）：因父亲塞利姆去世于1520年26岁时成为奥斯曼苏丹。在长达45年的统治期间，他在陆上直逼维也纳，海上持续进攻威尼斯等基督教国家，使领土最大化，成就了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力者，就连基督教方面都尊称他为“大帝”。

1522年他28岁。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1515年21岁时登上法兰西王位。作为君王，他在军事和外交上当时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他的统治长达34年，这期间总能有所作为。法兰西全部国土都是耕地，富饶且人口众多。要说作为国王的功绩，三顾茅庐把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请到了法兰西，给了这位伟大天才短暂的安居和身后的长眠之地可算其一。《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感谢的馈赠，保留在了法兰西。

卡洛斯五世

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一世

除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憧憬和热爱之外，作为法兰西国王，他的一生是在对西班牙的憎恶中度过的。想想当时卡洛斯的势力，这并不足为怪。

1522年他28岁。

作为西班牙国王称为卡洛斯一世，作为以德意志、奥地利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为卡尔五世（1500—1558年）：1516年16岁时成为西班牙国王，19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不仅把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荷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还是除威尼斯以外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的统治者、殖民化进程中的美洲新大陆的主人。

1522年他22岁。本书中称他为“皇帝卡洛斯”。

除此三人之外，还有两人是16世纪权力游戏中不能缺少的主人公。

第一个是威尼斯共和国，共和国避免突出个人，因而经常以国家之名行动。威尼斯共和国的人口不到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之所以能在决定国际政治的场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大国，更因为它拥有奥斯曼、西班牙、法兰西都不能小觑的海军力量。一旦打起

海战，威尼斯是否参战决定着胜败的走向。

第二个是罗马教皇。“上帝的代言人”教皇与世俗君主不同，他不能拥有军事力量。与其说不能，不如说这在教徒看来不合适。以防御海盗为目的设置的教廷海军，若比较构成战斗力的单层甲板军用帆船，其数量还不到号称地中海最强海军威尼斯的百分之一。

但是，罗马教皇拥有任何大国统治者都不具备的无形权力。

在基督教教义中，世俗君主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承认才处于君主地位。其具体体现是获得神意传达者教皇的加冕。哪怕是西欧世界位列第一的统治者卡洛斯，也要跪在罗马教皇面前，请他授予皇冠后才能取得统治者的正统性。如果教皇不喜欢某个君主，甚至可以将其开除教籍。基督徒没有义务跟随一个被开除出教的人。昨天大权在握今天可能会变成凡夫俗子。经过文艺复兴，开除教籍的效力已经锐减，但如果自己的国王被开除教籍，臣下的善男信女也就不会再臣服于他。

此外，统治者们进行的战争因罗马教皇是否承认而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即使是单纯的军事同盟，也可能被冠以“神圣同盟”之名。

教皇的权力不容忽视，所以各国历来都力图把对本国有利的人物扶上罗马教皇的宝座。罗马教皇由称为“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投票决定。但投谁的票却不是作为人的红衣主教个人决定的。按照基督教义，神灵会暗示每一位红衣主教投谁的票。但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红衣主教即使有也为数极少，于是各国君主都会暗中活动。

活跃于多个舞台的教皇利奥于1521年底去世，享年46岁，死因似乎是肥胖。外界评论教皇与法兰西走得很近，他在这个年龄突然去世，完全出乎法兰西的预料。法兰西尚未动作，西班牙抢先一步。被“圣灵的暗示”选为教皇的是皇帝卡洛斯的家庭教师、荷兰乌德勒支的主教。西班牙成功夺回了以前倾向于法兰西的教廷。失去了后盾的教廷海军司令

保罗·维托里的地位不由得微妙起来。新教皇是荷兰人，连地中海都是第一次见到，向他解释伊斯兰海盗一定很困难。维托里用4艘加莱船去西班牙迎接新教皇，一路护送他来到罗马。

历史已经进入了年轻君主们玩弄权力游戏的时代。地中海世界不可能不受影响。

尊为“大王”、“大帝”者毫无例外地都是靠进攻他国成功扩大本国领土的人。君主在内政方面无论取得多么重要的业绩，也只会被称为“贤帝”，而非“大帝”。人是一种在胜利中取得快感的动物。所以，领袖，尤其是将要开始自己统治的领袖，向被领导者获得这种快感很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感到前途光明，将来即使遭遇困难，也会跟你前行。相反，如果在起步时就磕磕绊绊，大家就会意气低迷，以后的统治也会事倍功半。刚刚继位的苏丹苏莱曼下定决心，断然进攻罗得岛。

1522年8月1日开始了4个月坚苦卓绝的攻防战。结果，苏莱曼战胜了圣约翰骑士团，端掉了“基督的蛇穴”。

不到600人的骑士，加上外来的雇佣兵和拿起武器奋起抗击的罗得岛居民，兵力总共不满5 000人。但是他们靠这点儿兵力与300艘船运来的10万大军对抗了4个月之久！

防守方死伤4 000人，而进攻方奥斯曼军的死伤人数却达到了10倍于此的4万人。牺牲者如此之多，进攻方通常都会撤退，等待下一次机会。可是，4个月来苏莱曼身在战场，脑子只考虑取胜，任凭什么样的牺牲都不能动摇这位28岁年轻专制君主的意志。直到取得胜利，他才回到首都伊斯坦布尔。

这次攻防战的详情，请读者阅读我于20年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记》一书。被称为“罗得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于1522年撤离罗得岛以后，地中海东部完全成为“伊斯兰海”。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都预料到这

种情况会波及西地中海。

教皇克莱蒙特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换成苏莱曼以后，利用海盗的战略没有改变。

加达里死在皮亚诺萨岛的监狱里，海盗西纳姆取而代之。西纳姆是犹太人，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士麦拿（今伊兹密尔），改教后成为伊斯兰教徒。西地中海一带的人称他为“犹太人西纳姆”。他是个独眼龙，用一块黑布斜罩着那只盲眼，指挥喽啰的样子，活脱脱一副海盗相，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副模样使遭到他袭击的人无不吓得瑟瑟发抖。

他不仅残忍，而且狡猾奸诈。他的基地在以往从未被海盗注意的杰尔巴岛上。该岛在突尼斯东岸附近，北上扫荡周边的基督教国家是“犹太人西纳姆”的职业，同时也是在完成奥斯曼苏丹交给他的任务。“犹太人西纳姆”是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以强烈憎恶基督徒而著称。他成为保罗·维托里的下一个敌人。

1523年，只做了9个月教皇的荷兰人去世，意大利人朱利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登上教皇宝座，成为克莱蒙特七世。新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与教皇利奥十世是堂兄弟关系，性格却相反。

利奥豪放爽朗，拿得起放得下。而克莱蒙特即使对心腹也不轻易打开心扉，优柔寡断。他头脑清晰，判断力强，却拖沓。

堂兄弟间性格迥异，传闻不断，这源于克莱蒙特的身世。

1478年，“帕齐的阴谋”不但震惊了佛罗伦萨，也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这个阴谋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西斯都（西克斯特）四世在背后操纵。

朱利奥·德·美第奇（左）与利奥十世（右）

他以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帕齐家族的男子作为行动部队，设计暗杀美第奇家族年轻的当家人洛伦佐和他的弟弟朱利亚诺。

洛伦佐受伤不重幸免于难，弟弟朱利亚诺却被杀死。但是，朱利亚诺死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洛伦佐没有深入调查，就把这个婴儿领养在自己身边，视同己出。这个婴儿就是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洛伦佐的正式养子，其身世却无人不晓。洛伦佐让朱利奥进入了神职界。在文艺复兴时代，连罗马教廷也很开放，也是一个能力主导的世界，即使是私生子，大门也是敞开的。

不过，当时罗马教廷里出身美第奇家族的人不止朱利奥一个。洛伦佐的嫡出次子乔万尼已经当上红衣主教，开始了自己的生涯。朱利奥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协助大他三岁的堂兄。在乔万尼以利奥十世的教名登上教皇宝座以后，朱利奥当上了红衣主教，是教皇利奥的第一心腹。

长期以来，朱利奥一直是美第奇家族在宗教界的第二号人物。45岁那年，终于轮到他坐上教皇的宝座。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利奥的早逝及后任荷兰人教皇的无为。

不少人认可红衣主教时代朱利奥·德·美第奇诚实规矩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性格。但是，当时世界不论东方西方都已经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优秀专制君主们相互争夺霸权。在这种时代，靠在各国之间均衡势力的路线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洛伦佐·德·

美第奇曾经以此做法声名鹊起。

同时代人、教皇克莱蒙特的心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的好友马基雅维利提出了领袖不可或缺的三个条件：

富于“力量”（virtu）；惠于“运气”（fortuna）以及“时代所需”（necessita）。

更多内容请大家阅读《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一书。我们不能说新教皇克莱蒙特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来说，这种性格的教皇一定很难伺候。至于马基雅维利，则被视为思想过激，甚至被断绝了仕途。

然而，对同为维托里家族一员的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来说，克莱蒙特却很好沟通。相比于被选为教皇来到罗马才第一次见到地中海的前任，教皇克莱蒙特对地中海的现状相当了解。佛罗伦萨出生的教皇和教廷海军司令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想法，那就是与其浪费时间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不如优先保卫地中海沿岸的居民不受北非海盗之苦。

教皇把保罗·维托里放在教廷海军司令的位置上，还任命他担任教廷海军驻屯港奇维塔韦基亚的全面负责人。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一座坚固要塞是维托里的新工作。

奇维塔韦基亚自古罗马时代图拉真皇帝开埠以来，一直是罗马堪与奥斯提亚比肩的繁荣主港。进入中世纪，这里也像其他罗马时代的基础设施一样被弃置，并被作为撒拉森海盗进攻罗马的前线基地。为了防御撒拉森海盗，基督教各国开始建立海军力量，奇维塔韦基亚也随之渐渐恢复了昔日的模样，但还没有到可以容纳众多船只的规模。教皇克莱蒙特的意图是，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面对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与热那亚不相上下的港口。教皇认为，要保护第勒尼安海不受北非海盗的袭扰，绝对需要一个规模足可容纳造船厂等设施和众多船只的港口。

地中海中央

于是，在16世纪前半叶以后，奇维塔韦基亚港的面貌发生了巨变。400多年以后的今天，可以停靠豪华巨轮的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港

口仍然是热那亚、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和拿波里。里窝那是过了半个世纪后才建成的港口，也是由统治托斯卡纳的大公美第奇家族建设。

保罗·维托里是奇维塔韦基亚大改造工程的全面负责人。他热情高昂，工程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便告完成。1523年夏天结束时，港口已经可以迎接预约的客人了，虽然还有一些细部工程有待完工。

前一年，圣约翰骑士团在坚持了4个月之后被奥斯曼击败，只得退出罗得岛。他们无处可去，权且在克里特岛落脚。克里特是威尼斯的领土。苏丹苏莱曼同意打了败仗的骑士带着武器什物离岛而去，但他并不希望骑士团逗留在罗得岛附近的克里特岛。威尼斯共和国不想破坏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欢迎骑士团这样的客人。教皇克莱蒙特自己也是骑士团的一员，他决定在骑士团最终的落脚点没有确定之前，暂时接受他们。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分乘三艘加莱船和数艘帆船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保罗·维托里在刚刚完工的城堡上用礼炮迎接了他们。团长和他手下的骑士们都认识以前曾被派到罗得岛的维托里。

几天后，维托里向骑士团团长建议共同防御出没于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并告诉他教皇克莱蒙特也同意他们这样做。骑士们也觉得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以伊斯兰为敌，整天游手好闲不配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便答应了此事。他们可以在奇维塔韦基亚堂而皇之地做当初在克里特岛时威尼斯禁止他们干的事情。

就这样，罗马教皇与圣约翰骑士团建立了举着防御伊斯兰海盗大旗的统一战线。具备战力的加莱船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也只有五六艘而已。圣约翰骑士团因以前长期用实际行动以牙还牙地抗击伊斯兰海盗船而闻名。现在他们失去了根据地罗得岛，更加憎恨奥斯曼。

以奇维塔韦基亚为基地的教廷海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不单是

船只数量的增加。当年一整年没有一艘海盗船靠近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就是明证。

犹太人西纳姆

翌年的1524年6月，“犹太人西纳姆”从杰尔巴岛基地出发北上。他率领的海盗船队虽然由小船“福斯塔”组成，但却有34艘之多。他们一路北上，先是在左舷看到突尼斯东岸，然后在右舷看到西西里西岸。进入第勒尼安海时，意大利半岛西岸便开始响起警报。西纳姆不顾一切，继续北上。

没有人知道海盗这一年的目标是哪里，但明显不是奇维塔韦基亚。海盗的目的是抢人抢物。战船没有装载值得一抢的“物”，只有水手，但要抢这些“人”必定会遇到的激烈反抗。所以海盗躲开军船，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引发海战。海盗并不是因为怕打败仗才躲避战船的。

不过，这里正蕴藏着胜利。保罗·维托里和圣约翰骑士团团长都懂得这一点。他们决定用仅有的5艘加莱船攻击34艘海盗船。这时传来情报，敌人的船队正在靠近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的海域。

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有个小岛只有渔民才会靠近。打前站的加莱船桅杆上的瞭望哨发现两艘敌船正在接近小岛。

维托里乘坐的加莱船和骑士团团长乘坐的船绕过小岛，出现在敌船前方。另外3艘船切断了敌船的退路。5艘加莱船对两艘“福斯塔”，胜负立判，连大炮都没有用上。船上的海盗悉数当了俘虏，被用铁锁链锁在原来锁基督徒划桨手的划桨台上。他们径直把船开到了奇维塔韦基亚。

基督徒划桨手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恢复了自由，进入奇维塔韦基亚港后，各自回故乡去了。

海盗被剃光胡须和头发投进监狱。按照圣约翰骑士团以往的做法，他们将在监狱里排队，等待做基督教国家帆船的划桨手。

第二年，教廷海军与圣约翰骑士团的统一战线公开破裂，发端可能就是对伊斯兰海盗的这种处置方法。

剃光胡须和头发，这对男性伊斯兰教徒是奇耻大辱。正因为如此，他们仅因拥有错误信仰就把绑架来的基督徒视为人类所不齿的动物，并剃光他们的胡须和头发作为标志，收容到“浴场”之中。

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成年男子留不留胡须只是个人兴趣问题。在与伊斯兰世界拥有悠久贸易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去东方的人必须了解一点，在那里没有胡须就不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男人，所以男人必须蓄须。

这只是文化差异，与可以做到人所一致的文明不同。文化具有这种固有的特点，有其特别顽固之处。就连同为基督徒的人，也会因是否尊重某人某事而有所区分。

教皇克莱蒙特和保罗·维托里都出生于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与引领潮流的美第奇家族渊源深厚，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人”。他们当然对继承十字军思想的圣约翰骑士团的做法心存异议。

他们认为，既然是俘虏，戴上铁锁，关进监狱是不得已之事，但有必要侮辱俘虏，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吗？

捕获海盗加达里并把他囚禁在皮亚诺萨岛监狱中的人是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但他也没有把加达里剃光须发。

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特书一笔。当时与伊斯兰世界有直接来往的基督教国家，不管是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或是教廷，都没有也不想有同时代北非为数众多的“浴场”。他们有时会抓到伊斯兰教徒。当时的基

督教世界根本不存在“浴场”这样的设施，不会只因异教徒一条理由就强制收容俘虏，把他们当作奴隶使唤。“浴场”只存在于北非伊斯兰世界。

正因如此，在基督教世界中，“拯救修会”、“拯救骑士团”这些带着赎金去北非，从“浴场”里救出不幸者的活动才能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同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则完全没有这种组织。没有一个伊斯兰团体带着赎金到基督教国家救人。这个事实反映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贯穿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的一种区别。

另一方面，不能冷漠拒绝圣约翰骑士团的想法也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这是战胜敌人要以牙还牙的观点。不用与伊斯兰海盗同样的办法便无法战胜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一个正确的战法，圣约翰骑士团的漫长历史以及志愿者络绎不绝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以夺回圣地为目的的十字军的主力是法兰西人，与之类似，圣约翰骑士团里也有很多法兰西人。

海盗“犹太人西纳姆”在教廷海军和圣约翰骑士团两军的进攻下损失了两艘船，这只是34艘中的两艘而已。如果西纳姆愿意，他完全可以率领剩下的32艘船突袭奇维塔韦基亚，夺回被捕获的那两艘船。然而西纳姆没有这样做。他直接撤回了根据地，但海盗不会空手而归。他们沿路袭击意大利南部沿海地方，一边撤退，一边掠夺绑架。

受害地方主要集中在拿波里以南。当时意大利南部处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统治之下，由西班牙派来的“副王”（vice re）统治。并非西班牙统治者对防御北非海盗不热心。国王和副王命令建造了无数瞭望塔（撒拉森塔），残存至今。但其“热心”的程度，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并不一样。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接到海盗船队靠近的情报，加莱船就会立

即从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出动,予以迎击，好似自己国家领空被敌机侵犯时紧急起飞一样。

但在意大利南部，只要主要城市未被作为目标，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意大利南部的海盗对策是，一旦被告知海盗来袭，人们立即逃进山里，在海盗为所欲为的这段时间里，屏住呼吸躲藏起来。这就是意大利南部遭受祸害的原因，海盗在这里可以确保在北部和中部得不到的最低收获。

尽管没有空手而归，西纳姆的行动还是被视为临阵脱逃。无奈，他作为海盗头目的名声大为受损。

海盗世界似乎也需要华丽的表演，即使没有实质性成果，有时也需要与基督教国家的正规海军碰撞一下。光靠合理的行动，追随者心里热不起来。这一点海盗也是一样。在这以后，西纳姆仍然是海盗头目，但北非海盗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却开始从他手中一点点丧失，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从资金到武器弹药各方面支助的大老板奥斯曼苏丹，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了“犹太人西纳姆”以外的人。

海盗“红胡子”

哈依尔丁（Khair-ad-Din）是出生在爱琴海岛屿莱斯博斯的希腊人，人们只知道他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的这个名字。他生在以海盗为业的家庭，自幼只知道海盗。他年轻时曾与哥哥结伙祸害东地中海，奥斯曼统治埃及以后，东地中海成为帝国庭院，不再有事可干。骑士团从罗得岛撤走后越发如此。像其他海盗一样，他和哥哥把活动地点转移到了西地中海。哥哥被杀后，他当上了头目，他们当时还是一个只有4艘“福斯塔”的小海盗团伙。

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意大利的历史记载中，意大利

语写作“barba rossa”（红胡子）。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这样写，只是发音有所不同。头巾盖住了头发，他的头发颜色不得而知。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那恣意生长的胡须是红色的。在东地中海活动的时候，他曾被圣约翰骑士团俘虏过，有在罗得岛监狱生活的经历。他原先没有深谋远虑，一心干着以基督教各国船只为劫掠对象的海盗营生。这种被俘体验使他成了一个发自内心憎恨基督教的人。不少海盗骂“犹太人西纳姆”怯懦，但只有红胡子决定要取而代之。

海盗红胡子

1526年，保罗·维托里去世。虽然死得突然，但却是病故。对于他的死，居民比他的任命者教皇克莱蒙特还要悲痛。据说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方，教堂丧钟长鸣，人们排着长队前往吊唁。维托里的海军将领才能不得不说卓越非凡，但更重要的是，他只要听到海盗船到来，就会放下一切立即出动，甚至席不暇暖。大家都知道，第勒尼安海沿岸地方免遭海盗祸害是托了他的福。

安德烈亚·多里亚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不，与其说教皇任命了这位热那亚人，不如说是与他签订了合同。

“雇佣兵队长”在中世纪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它指的是带着手下士兵，为雇主打仗的人。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邦国家是中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城邦国家也有弱点。这些城邦国家人口较少，很多人一心一意从事经济活动，形成一种对国家有利的共同体。与其摆弄使不惯的武器，不如全力以赴投身贸易更能提高整个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战事不

常有，打起仗来再雇佣军队更加便宜。这种合理主义成为滋生雇佣兵制度的土壤。

佣兵制度的盛行与中世纪成长起来并成为文艺复兴原动力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陆军战将人数众多，甚至可以写一本《雇佣兵队长列传》。就连海军绝对使用本国公民的威尼斯共和国，陆战时也采用雇佣兵制度。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只使用雇佣兵。

包打陆战的人很多，而海上的同业者却很少。这是因为在海上，雇佣兵队长是一个比在陆地需要更多投资的职业。

首先，雇佣士兵，要保证其吃饭和所用武器装备，有时还需要马匹。

陆军的雇佣兵队长做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而海上雇佣兵队长却还要有船。

平时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巨大的费用支出。威尼斯是唯一拥有海军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奥斯曼、西班牙，领土再大也没有常备海军，而是选择使用雇佣兵。奥斯曼使用的“海上雇佣兵队长”毋庸置疑就是海盗头目。可见，海上雇佣兵队长花费更多。队长要把一切理顺，跟雇主签合同。队长报酬也要根据业绩另付，自然会很高。

中世纪几乎没有海上雇佣兵队长，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期，也只有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其中原因在于，中世纪时，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国的海军均由本国公民组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威尼斯保留了这个传统。衰退后被其他国家吞并的阿马尔菲、比萨另当别论，就连热那亚也没能继续维持一支纯粹由本国公民组成的海军。

这并非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这源于热那亚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安德烈亚·多里亚作为海军将领再有才能，一旦反对他所出身的多里亚家族的派别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不但会失业，还得流亡国外。与教皇签订雇佣合同的那年，多里亚便是在流亡中。热那亚政局的不稳定，是首屈一指的海军将领多里亚走上雇佣兵队长道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地方施展才华。威尼斯人中没有一个海上雇佣兵队长的事实便是证明。

安德烈亚·多里亚与教皇签订的雇佣兵合同金额不详，但我们知道以下情况。

安德烈亚·多里亚带着自己的6艘军用加莱船开进了奇维塔韦基亚港。这6艘船加上教廷的2艘加莱船和4艘帆船，组成了教廷海军，多里亚担任司令。多里亚认为这点儿战斗力不够，请求教廷增加2艘船。教廷作为突击工程也满足了他。多里亚进而要求把停靠在奇维塔韦基亚的3艘圣约翰骑士团的加莱船也完全由自己指挥。他的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教皇克莱蒙特能够想象得出保罗·维托里死后，“红胡子”率领海盗船队出现在眼前的样子。以前曾经有海盗甚至要绑架他的堂兄利奥教皇。

保罗·维托里于1526年5月底去世，安德烈亚·多里亚于6月中旬开进奇维塔韦基亚港。7月初，多里亚便率领麾下船队全体出动，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们频频接到“红胡子”的船队正在靠近的报告。

安德烈亚·多里亚那年已经60岁，如前所述，他起步很晚，要比同时代人减去20岁去看待他。他一贯的做法是主动出击，而绝不守株待兔。

根据最新情报，超过30艘的红胡子船队正在厄尔巴岛与皮翁比诺岛之间的海域南下。这片海域位于奇维塔韦基亚西北偏北的方向，要去迎敌必须逆风航行。若是平庸的海军将领，大概会采取在已经建成城堡的

奇维塔韦基亚港内，等待顺风南下的敌人通过，等到自己也顺风时再去追击的战术。这样做的风险是敌人随时随地会改变航向，有可能逃脱。多里亚自己船上的水手、划桨手都长于逆风前进的技能。他们的老板多里亚头脑灵活，会把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变为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多里亚命令船队跟随自己乘坐的旗舰，全体北上。

船队顶着逆风北上，高高的桅杆上飞扬着白底金丝绣着圣保罗钥匙的教廷旗帜。红胡子见状大惊，他原来以为保罗·维托里死了，教廷海军会瘫痪一段时间，正是教训无信之狗的大好机会。对海盗而言，海战不是大胜就得不到任何好处。红胡子决定逃走，可是这时他却必须逆风而行。

三角帆逆风也可前进，但“人工马达”划桨手必须开足马力。海盗船的划桨手是被迫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基督徒。他们内心认同越靠越近的教廷海军的船队。

没有什么人号召，划桨动作慢了下来。监视他们的海盗立即发现，开始疯狂地挥舞鞭子。基督徒划桨手咬紧牙关，继续怠工。

同是逆风行船，在多里亚军与红胡子军之间，操帆技术有着巨大差距。而且，多里亚的划桨手全力以赴。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追来的多里亚船队赶上了红胡子船队的尾部。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

多里亚似乎事先已经下过命令。多里亚的6艘船与圣约翰骑士团的3艘船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逼近敌人的15艘船，教廷的4艘船殿后。红胡子船队的后半部三面被围。

多里亚知道这种战术会使红胡子逃掉，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战果。也许红胡子在想下次还有机会。在战场上，目标明确才会胜利。基督教方面的13艘船面对伊斯兰方面的15艘船毫不含糊。而海盗船的划桨手也从怠工进入了罢工阶段。

这场战斗称不上是一场海战。敌人的15艘船全部被缴获，船上的海盗也悉数被俘。不用说，人们砸断了海盗船划桨台上锁住划桨手的铁锁链。划桨的这些人几乎都是羊倌儿、牛倌儿，是意大利社会的下层百姓，他们放牧的地方远离村镇，最容易受到以抢劳动力为目的的绑架。

正是他们这样的社会下层百姓，才是伊斯兰海盗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来不知道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会被解除奴隶身份，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却信仰笃深，也许认为如果改变了信仰，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地狱。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本书上卷最后详述的志愿团体“修会”和“骑士团”仍在进行拯救活动。这两个团体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没有社会地位，绑架他们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从伊斯兰的“浴场”里拯救出来。

被俘的大量海盗当然要被送进监狱，但在如何送进监狱的问题上，多里亚和圣约翰骑士团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骑士团主张剃光胡须，剃成光头，而多里亚却认为可以直接关进监狱。不过，多里亚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尊重异文化之类现在的时髦话语，而只是说裹着头巾的胡须面孔辨认方便。多里亚认为红胡子仍然在海上横行，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命令再度出海，都未做休整。

但是当年并没有再次发生多里亚与红胡子的对决。丧失了一半军力的红胡子选择了回到北非的策略。这两个人也许在不为感情左右这点上很相似。

他们还有一点很相像。即使有着自己的军队，也会以使用这些军队的人即雇主的意志为转移。雇佣他们的是奥斯曼和西班牙、法兰西等国，当时都是16世纪以后兴起的大国。

安德烈亚·多里亚

现代意大利海军有一艘训练候补士官用的大型帆船，亲眼见过的人肯定都会为它的华丽发出赞叹。这艘船名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是公元1500年前后两度横渡大西洋，告诉欧洲，美洲乃为新大陆的人物的名字。热那亚人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所到之地是印度的一部分，但10年后完成了同样伟业的出生于佛罗伦萨的韦斯普奇注意到，那是一片新大陆。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就连亚美利加（美洲）这个名称都取自于他的名字“亚美利哥”。他是掀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主角之一，近代国家意大利海军属下的一艘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不奇怪。

不过，尽管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有足够大的胆量驶向未知的大海，但却没有海战的经验。他虽然是航海家，却不是海军将领。

以前每次看到教练舰“亚美利哥”号，我都会想，为什么不用“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呢？现在对多里亚有了些许了解，感到自己已明白了其中原委。与现代意大利海军有关的人谁都不会对多里亚是意大利海军史上屈指可数的将领这一点存有异议。我理解那些人的心情，他们认为他的名字不适合用来命名培养年轻单纯的候补士官生的教练舰。

用人名命名舰艇是意大利海军的传统习惯，他们不会放过意大利海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实际上，意大利有以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命名的战舰。这支战舰现在不光活跃在地中海，还活跃在中东海域。

“incrociatore”译成日语叫作“巡洋舰”。除了大炮，舰上还载有导弹，没有护卫舰也可自行作战。用空军打比方，它相当于空战的主角“战斗机”。我甚至认为，巡洋舰专司攻击，不是护卫舰、补给舰或医疗舰，这样的战舰更适合安德烈亚·多里亚。追溯他后来的生涯，大家便可理解他的名字不适合命名候补士官的教练舰，但却适合命名战舰。久经战火的勇将才配得上乘坐船舷涂有“ANDEREA DORIA”（ 安德烈亚·多里亚）巨大字样的战舰。

帆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号

巡洋舰安德烈亚·多里亚号

安德烈亚·多里亚完美地履行了1526年的合同。教廷一定希望续签合同。多里亚起初似乎打算留任教廷海军司令。但第二年，1527年5月，发生了一件史称“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最高统治者，应该比任何人都要负起保卫基督教世界宗教最高领袖罗马教皇的责任。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进攻教皇，难怪善良的基督徒悲叹世界末日到来。

“罗马浩劫”说明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从法兰西与西班牙势均力敌的状态大大偏向了西班牙。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德意志、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法兰西国王当然觉得自己四面被围。弗朗索瓦一世终于决定不择手段地遏制卡洛斯的势力。

顺便一提，关于“罗马浩劫”，我在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节中已有详述，读者有兴趣可以阅读。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震惊基督教世界的大事件呢？简单的情况如下。

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毫不掩饰自己对法兰西的同情，卡洛斯对此心生不悦，意图用武力逼迫教皇改变路线。事件发生时，罗马全市被卡洛斯派来的以德意志兵为主体的皇帝军整整破坏、掠夺了7天。事实上，克莱蒙特在保罗·维托里去世前的确托他给法兰西带过一封密信，卡洛斯的怀疑并非误解。德意志兵里有很多新教徒，他们对破坏马丁·路德极口非难的堕落之都罗马尤为热心，这也是罗马遭到更大损害的原因。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个时期大概在奇维塔韦基亚，置身于罗马遭袭的悲剧之外。然而，“罗马浩劫”却并非与他毫无关系，因为他的雇主是罗马教皇。教皇本人被皇帝军追得逃进了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提心吊胆地度日。这时，多里亚收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劝诱信。

弗朗索瓦一世因为害怕卡洛斯从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两面夹击，从地中海攻过来，夜不能寐。于是，他想把法兰西南部的防御托付给前一年打击红胡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多里亚。作为佣兵费的报酬似乎也比教廷给的要高。

首先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利益，威尼斯共和国因此政局稳定。与此相比，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却充满了内部纷争，甚至令人怀疑这两者还是不是同时代同为意大利人的共和国。

有实力的四大家族一直分成两派相争不已。到了16世纪，这种内部抗争演变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的争斗。四大家族之一的多里亚家族属于法兰西派。所以多里亚对为法兰西国王效力没有抵触。多里亚教皇效力看不到前途，于是拒绝续约，率领自己的船队去了马赛。

弗朗索瓦一世能够完美理解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思，认为没有什么能比给这位天才提供安居之地更为亲切了，但他却不能理解自己需要安德烈亚·多里亚。

对海上雇佣兵队长多里亚而言，按照合同支付报酬比国王亲自授予自己圣米歇尔勋章更为重要。报酬使船只和大炮等武器随时可用，对检修、整备和补充不可或缺。泊港期间他也得向水手、划桨手兼士兵支付工资。钱款哗哗地流出。弗朗索瓦一世该付的钱却迟迟不到。即使是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名门，多里亚个人能够负担的时间也有限。

多里亚在马赛港不得不决定自己的态度。在他脑子里，思来想去的除了钱款，还有祖国热那亚的命运。

热那亚已经无力像威尼斯那样独立于世，未来只能依附于大国。这个时代只有法兰西或西班牙可以依附。如果在过去，多里亚自然会选择与法兰西联手，但法兰西会像以前那样靠得住吗？也许投到在年轻卡洛斯的统治下不断兴盛的西班牙的保护伞下，对热那亚，进而对自己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翌年1528年春天，一条新闻传遍欧洲各国宫廷，安德烈亚·多里亚就任卡洛斯皇帝的海军总司令。

原来的教皇海军司令改换门庭跟了进攻教皇的皇帝，仅此已是丑闻，何况与法兰西国王的合同尚未到期，新主人又是与法兰西国王处于敌对关系的西班牙国王。没有比这更甚的丑闻了。尽管有很多人知道弗朗索瓦一世没有支付佣兵费，但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仅此就对一国君主心怀不满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多里亚对这些评价置若罔闻。而卡洛斯则用最高的礼仪回报了多里亚的“倒戈”。

首先，卡洛斯把梅尔菲的领土分封给安德烈亚·多里亚，并赐给他梅尔菲公爵的称号。梅尔菲包括意大利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及其周边一带。靠海运和通商做大的城邦国家热那亚人多里亚又成了封建领主。

其次，卡洛斯任命多里亚担任了西班牙海军总司令。陆军有雇佣兵队长担任总司令的先例，海军还是第一次。不过，说是西班牙海军，西班牙人却没有海运的传统。多里亚率领的自家船队不得不成为主要战斗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承诺，只要多里亚坚持为其效力，热那亚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时他就会派西班牙军队前去防卫。这就等于西班牙与热那亚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

据传这个条款安德烈亚·多里亚坚持写进合同，可见他还是一位爱国者。

红胡子的立场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巨变。

海盗哈依尔丁以“红胡子”这一绰号留名地中海历史，不知是因为有着从希腊正教改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境遇，还是因为他的个人才能，他的想法和许多同僚不同。

首先，他不像其他海盗头目那样只满足于从基督教各国抢物掳人。其次，他也不苦等奥斯曼苏丹授予自己海盗头目所憧憬的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的地位。他主动兜售自己。当然，兜售自己需要拥有相应的业绩。从被安德烈亚·多里亚打败那年到1530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积累成绩。

红胡子把剩下一半的船只和人手恢复到原有的战斗力。这可不容易。给吃了败仗的海盗投资的人减少了，愿意在打了败仗的老大手下干的海盗也不多。红胡子打开了这个困难局面，可见他不单手段了得，还

具有卓越的笼络人心的能力。

以往的北非海盗在这种情况下会再度北上，在基督教国家大干海盗勾当，靠抢物掳人的收益恢复战斗力，用这种办法打开局面。可是，这个时期的红胡子无法如此行事。

安德烈亚·多里亚战胜红胡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引起了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注意。胜利也给沿岸一带的小领主和老百姓增添了勇气，和以前只想着逃跑不同，老百姓开始勇敢地抗击登陆的海盗。红胡子认为以一半的战斗力再次挑战多里亚非常愚蠢而不会这样做。红胡子即使成功，风险也会提高。正规的海军经得起牺牲，但海盗却经不住，来钱快风险低才是海盗要干的。只要安德烈亚·多里亚瞪着那双警惕的眼睛，去基督教国家干海盗的勾当就会很困难。

那么，红胡子准备做什么来恢复和维持手下的船只和人员呢？

以北非港口为根据地的伊斯兰海盗不能攻击北非的其他港口城市，那样做是伊斯兰教徒自相残杀。而且，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地的“酋长”几乎都是阿拉伯人或北非当地的摩尔人，他们允许海盗头目把根据地放在北非，海盗也一直向他们上缴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报偿。

红胡子无视这个在北非持续了很久的习惯。北非是伊斯兰教徒的土地，但还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红胡子看到了实现自己野心的机会。

或是明目张胆地使用武力威胁，或是背后设计把现任“酋长”赶下台，红胡子在各地的做法并不一样。他凭借这些手段成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等主要港口城市的实际统治者。这个战略的收官之战是横扫常驻在“佩尼翁要塞”的西班牙势力。这个要塞由西班牙国王占领，有一队西班牙士兵常驻。对阿尔及尔的伊斯兰教徒居民而言是“无信仰的狗窝”，是一种“耻辱”。

虽然红胡子是海盗头目，但他有时也会显示正规军将军的做派。在进攻“佩尼翁要塞”时，他就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将军。

首先，他向守将法尔古斯派去使节，劝他和平开城。但西班牙骑士的答复十分明快：“只要西班牙国王的旗帜还在飘扬，只要要塞里还有一个西班牙士兵，就休想让我们投降！”

1530年5月，30艘加莱船掩住了“佩尼翁要塞”前的海面，船上大炮一齐开火，发出了战斗信号。炮击持续了10天。城墙在不间断的炮击下坍塌，红胡子手下1 000名海盗冲了上来。陷入绝望之境的防守方仍在抵抗。5天后，揳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西班牙堡垒陷落了。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法尔古斯身负重伤，俘虏们根本没有得到救治就被扔进了“浴场”。

红胡子劝法尔古斯改教，放弃基督教，说做伊斯兰教徒可以免死。西班牙骑士付之一笑。红胡子命令将骑士的头颅砍下扔进大海。红胡子下令彻底破坏“佩尼翁要塞”，以免阿尔及尔人以后再看到这一“耻辱”。

那年，红胡子在这以后还未罢休，他带着手下海盗突袭了西班牙西部城市巴伦西亚。他们没有打到巴塞罗那，那里是国王的居城和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常驻地，但其南面的巴伦西亚一带，光天化日之下大遭海盗掳掠。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措手不及，还没有来得及派出防卫军，许多大炮和美女便被抢走。

红胡子凯旋回到阿尔及尔后，特别派了一艘船，装上抢来的大炮和美女，送往伊斯坦布尔。这是他给奥斯曼苏丹的贡品。但苏莱曼最喜欢的礼物是从瓦赫兰、阿尔及尔直到突尼斯一带的北非土地。红胡子把靠自己力量夺来的地方献给了奥斯曼苏丹。这样，奥斯曼帝国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把北非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埃及是苏丹亲率军队攻下后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则是海盗献给奥斯曼的领土。

红胡子的投资终有回报。苏丹苏莱曼迎接被请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位海盗，称赞他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最勇武的杰出将军”，并当场赐予他“埃米尔”称号。

“埃米尔”这一称呼在阿拉伯语中既有“司令官”的意思，也可以与表示海军之意的“al-bahr”组合，构成新词“海军司令”，意大利语为“ammiraglio”,英语为“admiral”。这样，海盗红胡子获得了“海军将军”的正式地位。不过要问红胡子是否成功地兜售了自己，回答只能是成功了一半。苏莱曼这位专制君主喜欢别人评价他为“立法者”。他让红胡子当上了海军将军，却没有让他担任正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想法。红胡子还需要积累业绩，好好表现。

苏莱曼清楚如何利用红胡子的价值所在。他把当上海军将军的红胡子再次派往西地中海。这一年，无处落脚在各地流浪了8年之久的圣约翰骑士团，终于在马耳他岛定居下来。这是苏莱曼决定派红胡子到对抗基督教世界最前线的背后原因。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把马耳他岛送给了骑士团，但他并不是出于对无处落脚的骑士团的同情。马耳他岛位于西西里以南遥远的海面上，前方与利比亚、右方与突尼斯遥遥相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把圣约翰骑士团安排在了对抗伊斯兰的最前线，他们自十字军时代以来就一直憎恨伊斯兰。圣约翰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称为“罗得骑士团”，而从此以后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

地中海周围的地中海世界，分为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相互对抗的漫长历史长达800年。但从此以后，这种对抗演变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欧洲各国的对抗。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图谱却一成不变，只是伊斯兰方面原来的绿底白色月牙旗变成了红底白色月牙旗。

苏莱曼的野心是把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全境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版图，使之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之家”。

几乎没有人在成为强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后能够抵挡扩张领土的诱惑。唯一例外是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的古罗马帝国。也许结束征服，充实国内的想法太过朴素，对于已成为“大权集于一身”的人来说太无魅力。喜欢被人评价为“立法者”的苏莱曼也是如此，法律必须由他本人制定。

此外，尽管苏莱曼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但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古兰经》说扩大“伊斯兰之家”是伊斯兰教徒的职责。大国之主具有的领土扩张欲就这样与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职责结合在了一起。

要与这位苏莱曼对决的卡洛斯是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设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一位生来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德意志、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的大国之主。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念念不忘要把统治范围向北扩大到荷兰，向南扩大到意大利，从未想过如何充实帝国内部。他甚至说过，自己连续40年的统治生涯，一大半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在忠于自己信仰的宗教信条这一点上，卡洛斯毫不逊色于苏莱曼。在已经基督教化的欧洲，不必要对征服之地进行教化的工作。但在当时正处在殖民化过程中的美洲南部，西班牙传教士起着宗教教化的中心作用。基督教也把通过宣教拯救那些不懂真正教义的人们作为基督徒高尚的职责。

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立场，只能说这两位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各有策略，但到公元1532年，他们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

苏莱曼首先出手。他派遣大军，通过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巴尔干到达多瑙河，从陆上进攻维也纳，直接攻击卡洛斯皇帝的领土。

在海上，他派出了80艘加莱军船。这时他已任命拥有“帕夏”称号的

奥马尔·阿里担任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指挥。“帕夏”是授给地方总督的称号。这样就等于任命了一位拥有奥斯曼政府官方地位的高官指挥正规海军。此人似乎没有海战经验，也未向身在阿尔及尔的红胡子打一声招呼。

卡洛斯成为迎战方。在陆地，由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负责迎战。安德烈亚·多里亚受命负责在海上迎战。

这已经不是奥斯曼与西班牙的对决，而是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军与西班牙主导的基督教军之间的大决战。多里亚率领的基督教海军仅战舰就有38艘，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多国联军。

多里亚的堂兄弟，后来接任多里亚的安东尼奥·多里亚率领教廷海军12艘，马耳他骑士团提供了4艘，多里亚己有6艘，加上西班牙、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派来参战的16艘，共计有38艘船。也许人们会想，西班牙本国并没有多少船，这也算西班牙海军吗？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当时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在卡洛斯看来，这完全是自己国家的海军。

除了这38艘加莱船以外，还有55艘小型帆船。这些小船用来运载炮弹、弹药、补充武器装备，以及粮食等各种物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负责军需。

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爱琴海向西驶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迎击他们的战斗会发生在何时何地，也无法预测一边搜索敌人一边航行得花多少时间。他们也许还要驶入找不到补充给养港口的海域，甚至必须进入敌人的海域。

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靠兵站打胜仗”。在此后1 000多年的16世纪，理解“兵站”重要性的除了威尼斯海军以外，大概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正因为这样，在卡洛斯命令他以奥斯曼80艘军船一半的战力前

去迎战时，他在让卡洛斯同意派几乎相同数量的帆船同行后才点头受命。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来说，牺牲与他无缘。

相反，奥斯曼海军“兵站”的概念颇为淡薄。奥斯曼既非海运民族也非贸易民族，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地筹措是他们惯用的方法，无论是通过掠夺还是花钱采购。这个办法可以用在三面环绕奥斯曼的东地中海。但是，这一年奥斯曼海军所要进攻的是西地中海。

8月初，接到奥马尔率领奥斯曼海军南下爱琴海，已经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情报，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全体船队从墨西拿出发。他想在伊奥尼亚海追上奥斯曼海军，挑起海战，在敌人尚未进入某个海湾前，决一胜负。

多里亚认为，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伊奥尼亚海上，能够保证奥斯曼海军安全停泊的是普雷韦扎港。可以停靠船队的港口还有很多，但科孚岛等岛屿已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地盘。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有着友好通商的关系，但这不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同盟关系。威尼斯持中立立场，并无义务允许奥斯曼海军靠港，帮助补充军粮。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

在伊奥尼亚海域，黎凡特和普雷韦扎与已经并入奥斯曼的希腊相连。但是，黎凡特所在的帕特雷海湾过于宽阔，一出海湾便是威尼斯领土凯法利尼亚。另一方面，普雷韦扎的大小却正适合隐蔽舰队，进出港口可以躲开威尼斯的监视。多里亚认为敌人会把目标定在普雷韦扎。实际上，不知道是为了补给军粮，还是为了观察基督教方面的动向，奥马尔也正驶向普雷韦扎。

奥斯曼军自东而来，但多里亚并未从西面迎击，他决定绕到北面，迎战将要北上的敌人，在广阔的海域挑起海战，更难于切断敌人的退路。

容易产生过分强势或者过分弱势的心态，是文官领军时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奥马尔是文官。普雷韦扎就在眼皮底下。自己有80艘加莱军船，敌人只有38艘。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勇猛在北非海盗中广为人知，但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他的名字还不为人知。

然而，奥马尔却命令全体船队撤退。来时逆风，掉头就成了顺风。也许这一点促使奥斯曼海军司令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多里亚当然奋起直追。他们也是顺风，全力划动，追击敌船，希望在奥斯曼海军逃进帕特雷湾之前追上他们。

但奥斯曼海军一味南下，好像没有想到左转舵就能进入帕特雷湾。多里亚确认前方已经没有海湾可让奥斯曼海军逃跑时，便降低了追击速度。他认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会绝望，停止逃跑转而进攻。他不愿意让自己军队的水手和划桨手过度疲劳。降低速度并不等于停止追击，他令7艘加莱船组成的别动队全速追击，如遇敌人掉头进攻，立即撤回。

多里亚根本没有料到奥斯曼帝国大张旗鼓派出的正规海军只会逃跑。可是，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7艘追击敌船的加莱船中有4艘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没有停靠爱琴海的任何岛屿，朝达达尼尔海峡一路北上。几天后，其余的3艘船也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经马尔马拉海向伊斯坦布尔驶去。

时间已进入了9月。安德烈亚·多里亚判断，奥斯曼海军年内不会再出动了。但一仗未打，他作为雇佣兵队长业绩不够。眼下刚进9月，还是地中海的适航季节，尚可一鼓作气，利用一下奥斯曼海军已逃离的大海。多里亚决定夺回属于奥斯曼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迈索尼城堡。

9月21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陆上部队登陆，开始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城堡里驻扎着300名奥斯曼士兵，于两天后投降。城堡的塔上高高地飘扬着三面旗帜：圣彼得的钥匙旗、马耳他的十字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鹫鹰旗。那年多里亚率领的是教廷海军、马耳他骑士团和卡洛斯的船队。

多里亚没有用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对待投降的奥斯曼士兵，只是命令他们立即全部退走。他留下1 000名西班牙士兵守卫刚刚打下的城堡。

这一年完全没有遭遇敌人的危险。多里亚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攻陷迈索尼后，他一路北上，进入帕特雷湾。奥斯曼为进攻黎凡特在港内建立了基地，驻扎着2 000名奥斯曼士兵。在陆海两面夹击下坚持了两天，这2 000人就做了俘虏，也可能多里亚在迈索尼对俘虏的处理方式传到了黎凡特。不过，攻陷耸立在黎凡特附近海岬上的另一座城堡却花了7天时间，应战的奥斯曼部队是以勇猛著称的新军军团的士兵。这里陷落以后，奥斯曼船已经不能在宽阔的帕特雷湾安全停泊了。

就这样，加上属于威尼斯的各岛，整个伊奥尼亚海都已成为基督教一方的海域。秋天结束的时候，多里亚解散了他所率领的海军，各自回国。

1532年是奥斯曼最倒霉的年份。

这一年，奥斯曼在陆上因匈牙利王英勇善战而不得不解除对维也纳的包围；在海上也只是一味逃跑。苏丹苏莱曼亲率大军进攻失利，从维也纳撤回伊斯坦布尔。他因而心情大坏，对前来乞求宽恕的奥马尔大发雷霆，撤掉了他的职务。苏莱曼任命的后任是鲁夫提·贝。此人也是一个文官，虽然有统治经验，却无海战经验。苏莱曼严令这位宫廷礼仪完美的官僚，来春一定要率领海军向基督教徒雪耻。鲁夫提·贝甚至没有必要重新组建海军，逃跑的奥马尔没有损失一艘船，也没有必要补充水手。

1533年春天，鲁夫提·贝率领90艘加莱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船只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0艘。他不愧是官僚出身，决定首先做讨苏丹开心的事。他大概在想，如果夺回去年失掉的迈索尼和鲁夫提两座城堡，自己的地位便会稳固。然而，他没有考虑到海战。

6月初，奥斯曼海军来到迈索尼前的海面，迅速开始攻击。他认为很容易就能攻下只有区区1　000守军的城堡。但抵抗的顽强出乎他的预料。奥斯曼和西班牙是这个时期的两大强国，都是陆军更强。

安德烈亚·多里亚料到奥斯曼会来夺回城堡，也已料到届时需要救援迈索尼。他事先已取得了卡洛斯的批准，安排了62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用帆船，做好了出战的准备。他率领船队驶向伊奥尼亚海。近百艘大船队难于统一步伐。他让热那亚的船队先行，把写有一定前去增援的亲笔信送到迈索尼。士兵们一旦知道援军已近，一定士气大振，英勇防守。让人们抱有希望也是司令官的一大义务。一周过去了，城堡岿然不动。

一心只想着进攻迈索尼城堡的鲁夫提·贝看到多里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背后大惊失色。如果冷静考虑，就会发现敌人只有62艘船，而自己有90艘。可是，奥斯曼海军司令方寸大乱，一心想着逃跑。这一年，奥斯曼正规海军再次逃跑。多里亚却没有追击。因为卡洛斯还给他下了密令，不要做有利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事。这一年多里亚舰队的船和人回港都早于去年。

苏莱曼见到逃回来的鲁夫提·贝，与其说是惯怒，不如说是绝望。派出的由高官率领的奥斯曼正规海军，连续两年不战而逃。苏丹终于明白，只能起用武官。奥斯曼是个陆军国家，没有长于海战的海军军人是奥斯曼的软肋。就连苏莱曼这样的人，说到专业海军将领脑子里也只有海盗。于是，一艘奥斯曼船载着持有苏丹邀请信的使节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向阿尔及尔。

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红胡子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生为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

被视为二等人。他刚改信伊斯兰教不久，只干过海盗，现在却当上了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司令。一军之将尚有其他人等，而总司令却只有一个。邀请信上写道，职位由苏丹亲自任命，盼来首都。红胡子手拿邀请信时的喜悦不难想象，但他却没有放下一切立即前往。

在海盗的世界里能成大事的人，其组织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红胡子对苏莱曼决定起用他的意图有着清楚的理解。

红胡子首先把北非全境的海盗头目召集到他所在的阿尔及尔。这些头目中虽然有犹太人西纳姆那样的前辈，但更多的是红胡子的部下，都是红胡子把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搞到手之后，让他们独立出去的海盗。

这些海盗齐聚阿尔及尔，红胡子在他们面前说道：大家可以各自为战，搞活西地中海的海盗业。这是在命令他们扩大战线。对手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如果在西地中海各地同时发起攻势，多里亚就会于应付。他让大家在自己去伊斯坦布尔期间全力以赴这样做，目的只是骚扰敌方。

红胡子还说，自己已经不是海盗的最高头目，而是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你们的所作所为也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送走海盗之后，红胡子终于出发去伊斯坦布尔。他决定途中停留，而不直航。奥斯曼苏丹的宫廷有个惯例，受到苏丹邀请的家臣要携带贡品，这是不成文的法律。红胡子也决定遵守这条规矩。不过，他带去的“贡品”，实在是海盗式的。

威尼斯出生的画家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是米开朗琪罗的朋友，因创作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肖像画而闻名。作为肖像画家，他在当时很有名气，订单纷至沓来。他有很多作品画的都是当时的名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美女茱莉亚·贡萨格的肖像画。这个女人出生于曼托瓦领主贡萨格家族，嫁给了与奥尔西尼家族齐名的罗马实力贵

族科隆纳家族，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

红胡子不可能亲眼见过这幅肖像画，也许是从传闻中听说科隆纳家族的年轻寡妇是一位绝世美女。他决定把这位美女绑架来作为送给苏丹的贡品。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打探到的，此时这位意大利第一美女正在位于丰迪的科隆纳家族城堡之中。

丰迪是从罗马通往意大利南部的亚壁大道边上的一个小村。沿亚壁大道从罗马直线朝南便可到达太拉奇纳，从这里可以深入内陆腹地。位于这里的丰迪不是沿海村庄，从来不用担心海盗。中世纪前期撒拉森海盗深入意大利半岛内陆的情况不算罕见，但后来意大利各国加强了海军力量，海盗的登陆比以前大为减少。这次，红胡子要强行登陆作战。

茱莉亚·贡萨格

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等到黑夜，分乘小舟，靠近了斯佩尔隆加的海岸。斯佩尔隆加的海边有古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别墅遗址，在这里藏船被人发现的风险很小。登陆前红胡子严命手下，目的只是绑架一个女人，不要想着其他的人和物。

丰迪沉浸在黑暗之中，没有人注意到红胡子及其手下已经潜入村中。很快看到了城堡。城堡的四个角由圆筒形的塔楼护卫，周围是低矮的房屋。

红胡子和喽啰见丰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便采取了强攻战术。他想只要在城门前乱放一通枪，城堡里的人就会因恐惧而打开城门。可是，后门开处，一个女人策马飞奔而出。显然她刚从睡梦中醒来，穿着一身白色睡衣，披头散发，一溜烟逃

走了。

红胡子并不懂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不但美丽，还有勇气。他也不知道，与伊斯兰女人不同，她们中间不乏阳刚之人，纵马在山野疾驰如履平地。“virag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胜过男人的女人”，是当时男人赞美女人的词语。

红胡子怒气冲冲地烧掉了村子里的全部房屋。目的无法达到，只能悻悻而去。红胡子没能实现把意大利第一美女作为礼物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他去见奥斯曼苏丹时献上了什么贡品。

不过，海军的总司令会想到绑架人做礼物，没有比这更能显示当时奥斯曼帝国海军性质的事情了。奥斯曼帝国不会因为任命红胡子为正规海军的总司令，就会让他洗手不干海盗。相反，海盗行动也是一种扰乱敌人后方的战术，还要让他更加卖力地干。红胡子就任总司令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宫廷。

红胡子也要用实绩显示苏丹提拔他当总司令的正确性，他于当年即1534年，发动已有海盗，在整个西地中海展开了攻势。分散的海盗团伙各自为战，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抢物掳人后扬长而去。正像红胡子预料的那样，靠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终究应付不过来。那年，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去世，教廷无法采取行动，导致教廷海军行动迟缓。如此下去，即使没有海盗破坏，地中海西半部分也会变成奥斯曼之海。

9月，教皇克莱蒙特去世。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的亚历山德罗被选为教皇，以保罗三世之名继位。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蒙特教皇以亲近法兰西而闻名，但新教皇保罗三世则是一位拥有文艺复兴情怀的人。可是，作为基督教会最高领袖的教皇，他支持反宗教改革，他认为允许宗教改革派的分离是教会的软弱。

三年后的1537年，亨利八世与英格兰王妃、皇帝卡洛斯的侄女凯瑟

琳离婚，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

1538年，这位教皇正式承认反宗教改革的排头兵耶稣会。

1542年，这位教皇还主持了为反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的特伦托会议。

一位保罗三世这样的教皇理所当然地与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西班牙国王，甚至有天主教国王之称的卡洛斯情投意合。

1535年的大反击，正在这二人之间逐渐酝酿成形。

攻占突尼斯

卡洛斯也终于明白了：

一、奥斯曼已正式决定让伊斯兰海盗负责在海上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方针。

二、在海上挑战海盗只会无功而返。海盗遇到基督教国家的海军不但不会迎战，只会立即逃跑。

三、既然如此，要想消灭海盗，就必须摧毁海盗的根据地。

这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还没有在地中海实现，海盗可以为所欲为的公元前1世纪庞培考虑并付诸实行的战略。也许是1 600年以后，教皇和皇帝注意到了这个战略的有效性。基督教世界的这两大领袖联合行动，集结海陆大军，准备对北非实施打击。

当时人们脑子里的北非，是除了埃及和昔兰尼加以外，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全部地方。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仅海盗作为根据地的港口就

超过10个。其中，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整个城市都从事海盗业及相关行业。

本书上卷介绍的“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是以拯救被绑架并收容在“浴场”里的基督徒为目的的志愿者组织。从他们携带人们捐赠的赎金前往的目的地一览表中可以看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出现的次数最多。这两个团体留有何年去往何处救出并带回多少人的记录。根据记录，半数以上的目的地是阿尔及尔，其次是突尼斯，但与阿尔及尔有相当大的差距。前往奥兰及其他地方的拯救行动不到阿尔及尔的十分之一。拯救行动多于其他地方，意味着这两个城市里有更多需要拯救的基督徒。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是伊斯兰海盗的两大根据地。

卡洛斯开始似乎主张将目标锁定在阿尔及尔。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情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不幸的基督教徒。西班牙人统治的特征是并不太关心治下的百姓。当时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新大陆也与此类似。

让卡洛斯打击海盗的原因有二。第一，海盗是奥斯曼西攻的先锋队；第二，以阿尔及尔和奥兰为根据地的海盗船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上前往巴塞罗那的海域守株待兔，偷偷抢劫满载金银财宝从新大陆返航的西班牙船。

教皇保罗三世与卡洛斯针锋相对，主张以突尼斯为进攻目标。这是因为从突尼斯出发的海盗船专门袭击意大利南部，突尼斯“浴场”里收容的不幸者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老百姓，教皇不能容忍对这些人弃之不顾。当然，打出的旗号是为了拯救被绑架者，而实质却表现出对自己可能遭绑架的恐惧。红胡子现在已经具有官方地位，更加强大起来。他认为罗马是无信之徒的都城，便率军来袭。在这些伊斯兰教徒看来，罗马教皇是无信之徒的“大老板”。

两人的主张都基于自身利益。他们都明白，目标必须集中在一处。

想把罗马教皇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卡洛斯妥协了，决定在次年即1535年的春天，以突尼斯为目标，组织基督教联军攻击北非。一切有关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了安德烈亚·多里亚。

响应罗马教皇号召组成的“神圣同盟”军队的实力如下：

首先是海军，以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数量计算。

教廷：12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西班牙本国：16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西班牙治下的拿波里：14艘

热那亚共和国：3艘

葡萄牙：加莱船1艘，三桅快速帆船“Caravel”12艘

安德烈亚·多里亚：19艘

加莱战船共计79艘。葡萄牙参战的三桅快船也被视为战船，这样就有91艘战船。关于水手的数量，基督教国家加莱船的划桨手是自由民，可以算作战斗力。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加上打仗的战士，人数已到3万人。这个数字绝非夸大。此外，还有多达200艘的装运攻城武器等其他物品的运输船。陆军除了高级军官乘坐加莱战船以外，其余的人全部分乘运输船。这支海军的总指挥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他看上去完全不像是69岁的老人。

陆军中步兵占了大半，按国别编队，由相应国家出身的将军指挥，

他们都是卡洛斯的部下，具体如下。

意大利兵1.3万人，由教廷所在的意大利中部、拿波里所在的意大利南部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北部的志愿兵组成。那年马耳他骑士团来的参战者中佛罗伦萨人居多，这一队就由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莱昂内·斯托罗兹指挥。

德意志兵8 000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也是包括德意志在内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些越过阿尔卑斯山远道而来的德意志兵由赫尔巴斯坦伯爵指挥。

西班牙兵8 000人，由唐·安托尼奥·德·阿拉尔孔指挥。

葡萄牙兵500人。这一队的指挥官是葡萄牙国王的弟弟伊凡特·唐·路易斯公爵。

这些部队组成了陆军，总指挥是欧洲闻名的西班牙陆军将领唐·阿方索·达瓦洛斯。这人是正与法兰西国王争夺米兰所有权的卡洛斯派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的统帅。提香为他创作的肖像画至今保存于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

这里说点儿题外话。我想说一下在写活跃于16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时，使我大为惊讶的一件事。

几乎所有这个时代的主人公的肖像画都是意大利画家而且是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所画。

如果想瞻仰皇帝卡洛斯、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阿方索·达瓦洛斯以及当时决定地中海世界命运的大国威尼斯共和国总督们的“面孔”，我只能建议大家去看马德里、佛罗伦萨、拿波里等地美术馆保存的提香的作品。安德烈亚·多里亚和克莱蒙特七世等人的肖像也出自威尼斯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之手。500年之后的现代人想瞻仰他们的面容，

只能去看文艺复兴后期硕果辉煌的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当然，正是因为这些强国的实力人物订货，画家们才得以描绘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找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自己画像呢？

这个时代的实力人物中，只有两人没有让威尼斯画家留下肖像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和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没有留下肖像画只能从宗教方面找原因，伊斯兰教义厌恶具象化。事实上，伊斯兰人物的肖像画，只限于西欧人创作并留存在西欧，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由真蒂莱·贝利尼创作，只有在伦敦国家美术馆才能见到。

然而如此憧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弗朗索瓦一世，却没有让当时排名第一的肖像画画家提香为他画肖像。理由实际上很乏味：出于一种法兰西人特有的脾性，不愿跟风。他觉得卡洛斯让提香作画，我弗朗索瓦一世便不再委托此人，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大家都会委托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作画呢？我个人推测：

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与此相比，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只是更加纯粹关注绘画本身。忘掉透视法，不去做其他的科学探索，凝视着眼前的作品，充分享受绘画带来的快感。年轻时的提香曾把自己的画作拿给米开朗琪罗看，米开朗琪罗建议他再学点儿解剖学。

委托方则会考虑：自己的面庞从解剖学角度画得是否准确有那么重要吗？与其如此，不如欣赏能够充分表现自己的肖像画。

提香从未想过要把对象画得比现实中的更美更好。他不是一位满足于把隐藏着的内在挖掘、表现出来的平庸画家。他只是静静地观察对象。不论是画别人的肖像还是自画像，这种宁静而冷彻的眼光都是一样

的。这不是非常理想的肖像画家吗？如果是我，要画肖像也会选择提香，而不是米开朗琪罗。

作为一代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希望通过向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提供安居之地留下爱好文化的美名。但他因憎恶西班牙而与提香肖像画失之交臂，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主人死后，提香画的《卡洛斯》至今还“继续活”在马德里及其他各地的美术馆里。弗朗索瓦一世却错过了这种继续活下去的机会。权力，只要拥有它的人死去便会终结；艺术，却会拥有永恒的生命。

联想所及，顺便再记一事。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有三幅肖像画留存至今。其中一幅为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所画，当时就被誉为杰作。这三幅作品中没有一幅出自热那亚画家之手，作者有两人是威尼斯画家，一人是佛罗伦萨画家。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热那亚人，心底讨厌威尼斯人。这两国虽然都是海洋城邦国家，一路走来，如今的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已经不再是热那亚人可以轻松面对的了。

虽然同为意大利人，但在突出个人作用的热那亚人看来，经常举国一致行动的威尼斯人也许是气质不同的另类。因此，多里亚与威尼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不稳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找了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他作画。也许思维理性得多里亚认为，热那亚人中没有这样的画家，而威尼斯的画法更胜一筹，这样做也是事出无奈。

热那亚共和国作为海运国家发展壮大，最终止步于商业国家。而威尼斯则既是海运国家，又是商业大国，克服稳定国内的困难，政治更成熟，成为外交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对手热那亚”一章中探究了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区别。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在研究相同时代，相同生活环境，相同的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时，肖像画也有其作用。

1535年，没有加入“神圣同盟”的大国有法兰西和威尼斯。法兰西不加入的原因毋庸赘言，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卡洛斯做的事他就不做，卡洛斯不做的他才做的法兰西人。

威尼斯共和国不加入的原因是与奥斯曼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但这完全不是因这种关系而不愿引起风波的消极。毫不懈怠地维持强大的常备海军，反映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一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当时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的威尼斯总督是安德烈·古利提。他的精美肖像画由提香所作，今天仍藏于华盛顿。但凡看过提香笔下古利提总督的肖像的人，一定会理解威尼斯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懦弱。

1535年的“神圣同盟”军的海军由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陆军由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这两位将军在当时家喻户晓。皇帝卡洛斯也亲自参战。出师正规，声势浩大至极。只需看一眼参战指挥官的名单就可知道，这里汇集了当时欧洲的贵族之“花”。

这就是基督教国家的联军，目标在攻占突尼斯。突尼斯不过是海盗的一个巢穴。红胡子非常了得。如果他也请提香画肖像，肯定会留下一幅肖像杰作，500年后的基督教徒也会花上门票钱前去欣赏。

1535年6月下旬，神圣同盟全军集合完毕。部队从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等地汇集，集结地就选在了与这些地方等距离的撒丁岛南端。从这里一路南下，航行数日即可抵达北非。这一切都是多里亚决定的。全军集结完毕，出征却延后了几天，因为要等顺风。既然开始，就要一鼓作气，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惯常做法。

6月24日清晨，出征的时候到了。最先出港的是一艘大型加莱船，那是多里亚的旗舰、卡洛斯皇帝的坐乘。桅杆顶上，飞舞着黄底黑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旗。

接着是奥尔西尼率领的教廷旗舰。舰队出战，在白底上用金丝绣着

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迎风飘扬。再后面是马耳他骑士团、拿波里、西西里、热那亚、葡萄牙各舰队的旗舰。各支舰队都以旗舰领航，副将乘坐的舰只殿后。帆船队在最后。因为顺风，加莱船不需用桨。既然第二天就有可能登陆，不如就让划桨手休息。单为这一点，也要等到顺风再出发。

第二天一早，北非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在等待顺风的时候将领们已经开过作战会议，各船准确地驶向预定登陆地点。这里是古代迦太基第二大海港城市乌蒂卡所在之处。经过漫长岁月，海岸线向海里延伸，形成了大片沙滩，已经不能再用作港口，除渔民外已无人居住，不大会遭到伊斯兰军队的伏击。这里距突尼斯只有30公里，是超过3万人的大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让卡洛斯皇帝和高官们留在旗舰上，多里亚换乘快速的小型加莱船，离开开始登陆的士兵，只身前去侦察。

当然，他事先已经从热那亚等国常驻突尼斯的领事、“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那里得到情报，基本掌握了突尼斯的情况。他想知道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以后，是否对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和加固。简单的侦察无济于事，精通战事的人需要亲眼所见。

多里亚回来后，在引颈而待的卡洛斯和各路司令面前报告了侦察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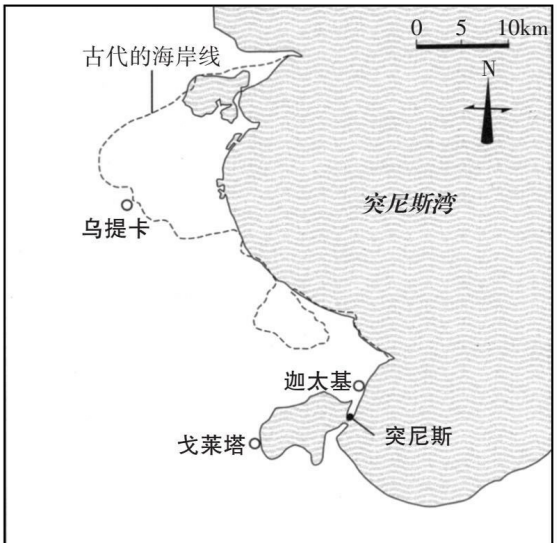
他首先报告，突尼斯湾向东而开，北面有一个叫戈莱塔的海岬突起，成为港口的屏障，已被打造成要塞。能否拿下这里，决定了能否攻陷突尼斯。

他接着说，从港内停泊的船只来看，一定会有援军赶来，要在援军还没有在红胡子的指挥下整编好以前，即在防御方尚未准备好之前，尽早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相反，战斗拖得越长就越对敌方有利，而不利

于远征而来的我方。

69岁的多里亚在35岁的卡洛斯的直视下清楚说出下面的的话。

此次远征成功与否取决于陆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走完前往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言外之意就是告诉远征的最高司令官卡洛斯，别想乘着安全舒适的加莱船进入突尼斯。看到皇帝一同吃苦，每个士兵一定会士气大涨。



突尼斯及其周边

陆军总指挥阿方索·达瓦洛斯也派人侦察，摸清了去突尼斯的路程。这位西班牙武将说：去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大半是沙漠和滩涂，行军速度一定快不了，全程至少需要4天。眼下又是夏天，在北非的酷热中行军，对欧洲来的士兵来说非常严酷。而且，带来的面包（其实是面包干）很多已经发霉，不能食用。不过，新鲜饮用水和面包的问题没等会议结束便已解决。有通报说，多里亚通过西西里总督事先准备的补给船已经抵达。

集中了各参战国司令官、指挥官的作战会议在坐在上席的卡洛斯面前结束，会议结果几乎全盘接受了多里亚的意见。

他们的战术是陆军海军一齐向突尼斯进发，待陆军到达戈莱塔城下，陆海两军一齐向戈莱塔发起攻击。一旦城池失去抵抗力，立即从陆海两路向突尼斯发起总攻。

不过，西班牙随军最高神职人员反对皇帝一连4天在酷暑中一同行军。多里亚让步了。皇帝一直在加莱船上观战，直到占领戈莱塔。等到

海陆两路进攻突尼斯时，皇帝再登陆参战。卡洛斯比谁都赞成这样做。35岁的皇帝希望作为一个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皇帝留名后世。

伊斯兰方面的迎战准备也毫不逊色。红胡子也知道，戈莱塔的命运决定着突尼斯的命运。

他把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6 000奥斯曼兵直接派去防守戈莱塔。这些兵是奥斯曼苏丹派来给正式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红胡子做卫队的。

红胡子还让人把停泊在突尼斯港的所有船上的大炮卸下，装到戈莱塔城墙上，把戈莱塔城墙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炮台。

红胡子任命“犹太人西纳姆”负责戈莱塔的防御。海盗头目从不一个人行动，而是带着部下一起行动。戈莱塔交给了奥斯曼兵和海盗共同防御，由老海盗西纳姆指挥。死守一处时奥斯曼士兵的勇敢尽人皆知，而海盗的长处在于熟悉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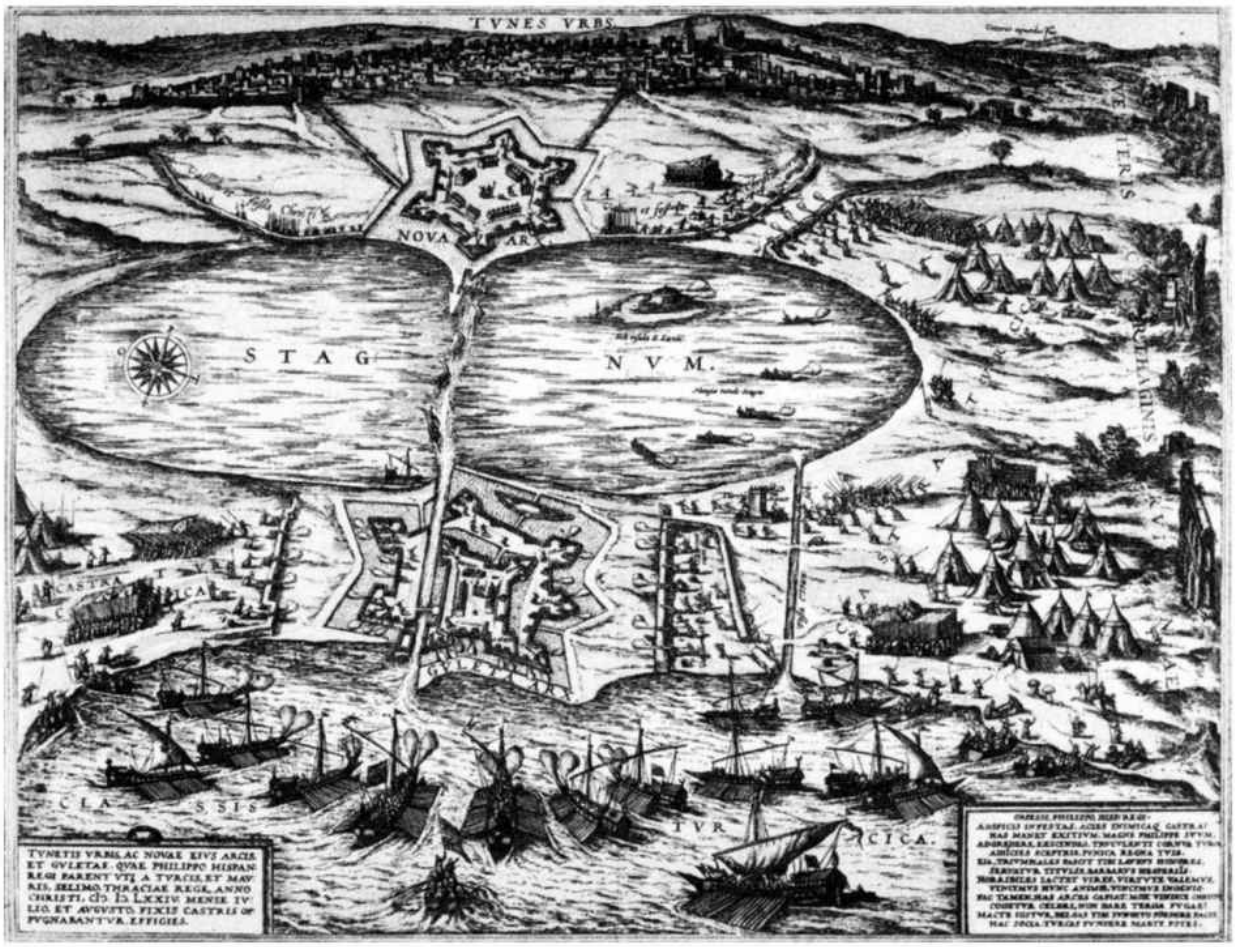
突尼斯城墙的防卫交给了海盗哈桑·阿加。有城墙的城市防御要害在于四处洞开的城门。红胡子把城门的防卫也交给了海盗。

红胡子成功地召集海盗，并使之机动化。他在判明卡洛斯皇帝亲率基督教联军的目标是突尼斯以后，很快向北非全境的海盗发出了召集令。尽管夏天是赚钱季节，海盗在1535年的夏天没有去“活动地点”，而是响应老大的号召前来集结。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官方地位极具影响力。

红胡子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相当巧妙。他成功地把以前毫不隐晦反感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动员了起来，参加到保卫突尼斯的战斗中去。

容忍基督教攻击伊斯兰违反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这个口号对伊斯

兰教徒忘记过去对奥斯曼的反感，奋起抗击基督徒极具力量。突尼斯市内看到更多的是伊斯兰的绿底白色月牙旗，而不是奥斯曼的红底白色月牙旗。唐·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陆军向突尼斯挺进，但每次士兵们从沙丘后面突然出现时，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骑兵队都让他们难以招架。



戈莱塔要塞

红胡子不仅号召海盗，还呼吁不是海盗的伊斯兰教徒。这时的红胡子很狂热，似乎他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把被俘的卡洛斯皇帝献给了苏丹苏莱曼，并煽动大家将其变成现实。在听者心中，突尼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海港城市防御的问题。

7月13日，基督教方面召开了最后的作战会议，第二天要向戈莱塔

发起总攻。海上部队已经在戈莱塔前的海面上集结完毕，陆上部队也挖好了通向戈莱塔的地下通道。为靠近城墙时不受妨碍，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尽头填满炸药，引爆后可以破坏城墙。

7月14日黎明之前，海上风平浪静，看什么都还朦朦胧胧。4艘加莱船静静地破浪前行，停靠在戈莱塔的岩壁下。士兵们鸦雀无声，依次登上海岸。霞光照亮周遭时，登陆已重复多次。

又一轮登陆过后，信号发出，大炮齐鸣。戈莱塔立刻应战。同时，戈莱塔开始炮击海面上的船队。戈莱塔连续不断地向海陆开炮。不知道作战情形的人看来，一定以为半夜登陆的基督教士兵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但是，多里亚深知就里。

遭到大炮的不间断轰击，攻击方的行动受阻。但是，炮击之间需要填石弹装火药，总有时间上的间隙。

多里亚利用了这个间隙。等敌人的炮弹掀起水柱，4艘加莱船载着登陆士兵出发，目标直指戈莱塔。因为只是划桨前进，纵使炮弹飞来，一边躲避一边前进也不是什么难事。船一靠岸，士兵立即登陆，然后船只再次利用炮击之间的间隙返回。在炮击的间隙往返运输。当时的大炮难于瞄准运动目标，被敌人命中的概率并不高。

大炮连发就会发热，有自爆的危险，因而，大炮实际上不可能不间断地连续发射。这样，红胡子安排的所有大炮，效果与数量并不成正比。

基督教方面不仅在海上运送士兵。马耳他骑士团载着15名炮手，在船尾装备了24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船头装备了8英寸的大炮，从海上炮击戈莱塔。水手们自如地操纵着加莱船，船尾炮轰击后，迅速调转船头，船头炮再开炮。不光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加莱船用这种方法炮击。

速攻军队根据多里亚的方案，轮番更替“选手”，连续攻击敌人。这样一来，守卫戈莱塔的奥斯曼兵和海盗都没有余力注意爬上城墙的敌兵。

陆军也在使用车轮战的进攻战术。陆军需要应付前方的戈莱塔和后方的阿拉伯骑兵两路敌人。不过，伊斯兰兵有一个缺点，全军一齐冲锋很强，但坚持不了很久。虽然陆上进展不如海上明显，但车轮战战术还是初见成效。

近午时分，两军突然停止了炮击。指挥官并未下令，相互炮击持续了6个小时，硝烟和被炸毁的城墙上升起的尘土，模糊了双方视线，都已看不清该向哪里开炮。

需要花一段时间视野才能明晰起来。随着视野逐渐清晰，基督教联军的每一个陆军士兵和每一个海军划桨手都亲眼看清了半天进攻的成果。

本身是一座巨型炮台的戈莱塔城墙已经惨不忍睹。看到战果后，士兵中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多国部队的欢呼声也因国家而异。当时欧洲人在欢呼时喊的是自己国家守护圣人的名字。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人呼喊圣彼得；热那亚人呼喊圣乔治；西班牙兵呼喊“为了圣地亚哥”；马耳他骑士团呼喊圣约翰。没有统一的欢呼声，只是一片听不清内容的喊叫声。所有的人都呼喊着圣人的名字，奔走呼号。不光是士兵，将军也是这样。一时间卡洛斯皇帝周围没了人影。对戈莱塔的最后总攻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下达命令。

一旦突破便进展飞快。戈莱塔城中最高的塔上，飘扬着教皇旗、皇帝旗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士兵们见状士气大增，当天没等日落就攻陷了戈莱塔。

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不小。毕竟在激烈的炮击之下打了半天白刃战，贵族中也有几人战死。伊斯兰方面的牺牲更为惨重。守卫戈莱塔的6 000奥斯曼士兵几乎全部战死。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和陆军总司令达瓦洛斯在崩溃的戈莱塔巡视了一番。开战前还在突尼斯，炮击开始后逃到基督教一方来的热那亚商人加入了他们。这些商人注意到战死者中没有一个海盗。受伤的人中也没有一个知名的海盗。死伤者中和俘虏中都不见“犹太人西纳姆”的身影。

商人们说，炮击掀起的尘烟遮天蔽日的时候，海盗们就逃之夭夭了。“犹太人西纳姆”10岁的儿子逃得晚了一些，成了海盗中唯一落到基督教一方手中的“战俘”。这个少年被参战的意大利领主皮翁比诺以膝下无子为由收养。

不用多里亚强调，在攻占戈莱塔的过程中，速攻的有效性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明显的。以卡洛斯为首，司令官都对攻陷戈莱塔后立即攻打突尼斯没有异议。

第二天凌晨，在陆上，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分别编成三列纵队，再度行军，直奔突尼斯。年轻的阿尔巴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骑兵紧跟其后。在海上，连运输的船都动员起来，前去封锁突尼斯港。这样形成了从东、北两面攻击突尼斯的阵势，但西、南两面并未派兵，那一年，基督教军队没有余力四面包围。尽管如此，专事强攻的西班牙将军们没有一个感到不安。皇帝卡洛斯也在想象自己明天就能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城，对回加莱船绝口不提。

次日早晨，陆军已到突尼斯城下，城墙一览无遗。城墙里边露出了清真寺高耸的尖塔。城墙前面有很多士兵，从头巾的颜色就能看出，里面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他们手拿半月刀，在朝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进入了迎战状态。红胡子站在这些被奥斯曼帝国视为下等人的当地人面前，向戈莱塔逃来的“犹太人西纳姆”等海盗分配城墙要害部位的防

守。

由于彻夜行军，军队兵临城下也不能立即发起进攻，需要让士兵休息。当天，陆军总司令唐·阿方索·达瓦洛斯只是让人把所有大炮摆放到最前线。

7月17日，但等晨曦照亮四周，基督教军的大炮便一齐开火。总司令达瓦洛斯根本不用小规模战斗试探，开始便下达总攻令。炮声、坍塌声、各国士兵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打起了争夺城墙要害的激烈的白刃战。

伊斯兰方面高喊“伟大的安拉”投入了战斗。两军都认为这是正确信仰的人与错误信仰的人之间的战斗。两军都是一神教徒，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就一定错误。正因为如此，死亡也充满喜悦。激战了一个上午，基督教都无法攻破城墙。

到了近午时分，发生了两军都未曾料到的事情。

突尼斯市内的一个“浴场”里收容了1万多绑架、俘虏来的基督徒。红胡子害怕他们暴动，在基督教军登陆乌蒂卡时就把他们全部转移到了位于郊外的一个洞穴中。

沙漠地带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天然洞穴，北非居民用来储藏小麦、橄榄油、椰枣。从“浴场”转移来的人就被塞在这样的几个洞里。他们都被铁锁链锁成一串。以往看管他们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要去守城，转由犹太人看管被塞进洞里的人中有一位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

这位骑士是意大利人，与海盗船的交战被俘后投进“浴场”。他有丰富的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经验，在被带到洞穴的途中看到整个突尼斯城为准备防御而乱成一团，便预料基督教方面这次要动真格进攻了。于是，骑士刚被带进洞就开始说服看管他们的犹太人。

——基督教攻占领突尼斯后，你这位犹太人也会与伊斯兰教徒同罪，因为你曾看管过基督徒。但只要你拿来开锁工具，就不再追究。

一开始犹太人也没同意，但随着炮声传到郊外的洞穴，他改变了主意。这段时间里马耳他骑士已经说服了同伴一起起义，铁锁打开时已众人同心。这个做法立即传到了其他洞穴。“浴场”里收容的都是加莱船的划桨手和强制在矿山劳动的人，所以全是男子。这1万人在骑士保罗的带领下一窝蜂地冲进了突尼斯城。守军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战线，这时在背后遭到新的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

奥斯曼兵处在劣势时也会留下死战，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看劣势马上就会逃走。奥斯曼兵已经在戈莱塔全军覆没，防守突尼斯的只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或是长于逃跑的海盗。红胡子骑在马上拼命叫喊守住，但没有一个人停下逃跑的脚步。

全面崩溃。基督教方面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突尼斯就陷落了，攻城战未满一天。

这回，海盗又全部逃走。

犹太人西纳姆从突尼斯一路向南，快马加鞭，逃回了突尼斯东海岸附近的根据地杰尔巴岛。

红胡子先是钻进突尼斯市内的卡斯巴城堡，趁基督教士兵们在不熟悉的迷宫里转悠的空当离开城堡，从陆路逃到博纳，再乘船逃到阿尔及尔，他总算逃回了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之前从事海盗业的根据地。

有一个著名海盗，因长相太丑，在意大利有一个绰号，叫“驱鬼人”（caccia diabolo），意思是连恶魔见到他也要逃走。他就没有上面二人那么幸运了。据传他也逃出了突尼斯，但却误入沙漠，一连几天没有水喝，后来终于发现水井，却因喝水太急太多，当场猝死。

总之，有名气的海盗没有一个被基督教方面抓获，也没有一个战死。

多里亚和达瓦洛斯二位将领在攻下突尼斯后立即进了城。皇帝卡洛斯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的时间延到了4天后的21日。在攻陷突尼斯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上，高官们在围绕是否允许掠夺和破坏突尼斯城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教廷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势力，以居民并没有参加防卫战，攻占突尼斯也没过多牺牲为由，反对掠夺、破坏已经只剩下老百姓的突尼斯城。

但是，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强烈反对，寸步不让。最后决定权掌握在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卡洛斯皇帝手中。

从第二天起一连三天，突尼斯城里和周边地区遭到彻底毁坏。近万居民仅仅因为是伊斯兰教徒就被杀害，相同数量的居民被当作奴隶带去西班牙。清真寺遭到破坏，就连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也被毁坏。

一切结束之后，皇帝进入突尼斯城。北非主要港口城市之一突尼斯，在卡洛斯的眼里已一片荒芜，住着绝望的人们。不过，这是自诩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人一生常见的景象，区别仅仅在于是在欧洲还是北非。

卡洛斯决定让哈桑·穆拉格出山，把突尼斯的统治权交给他。在红胡子被赶走之前，他一直是突尼斯的“酋长”。卡洛斯和他达成了媾和条约。

一、突尼斯以后有义务每年向西班牙国王上缴12 000达卡特的年贡。

二、西班牙派一队士兵常驻，经费由突尼斯承担。

三、突尼斯“酋长”发誓，今后与海盗断绝一切关系。

四、戈莱塔城对保障突尼斯港的安全至为重要，同意重建。

军事占领之后，找个当地人交还统治权。我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存心打算向海盗提供基地，作为远征军的最高领导人也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是信任哈桑·穆拉格的能力，则是无知。此人曾被红胡子赶走，在红胡子就在附近阿尔及尔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自由行动。事实上，他只在头一年上缴了约定的年贡，还是在让他预支的情况下才拿到的。

签完这个条约，仍是盛夏。虽然7月就要结束，但8、9月没有大风，仍是地中海南部的适航季节，还有足够的时间进攻阿尔及尔，彻底打垮红胡子。如果现在继续追击，彻底消灭北非海盗这一西地中海灾难的根源也不是梦想。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海盗的两大根据地，其中一个已被收拾，只剩下阿尔及尔了。

但是，卡洛斯皇帝选择了充分享受攻陷突尼斯所带来的荣光，而非追击海盗，巩固占领突尼斯的成果。卡洛斯认为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不知内情的北欧，卡洛斯皇帝的声望在攻陷突尼斯后达到了顶点。

的确，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强烈希望解放收容在“浴场”里不幸的基督徒，即使只是解放了突尼斯的1万人也算实现了这一愿望。停靠在突尼斯港的80艘海盗船成为战利品，这些船上遭受奴役的近8 000名基督徒划桨手也可砸开锁链返回故乡。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海盗全部逃脱。红胡子逃回了就像自家一样的阿尔及尔，在那里活得很滋润。现海盗无须救援，即便苏丹派来援军，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尔及尔路途遥远，需要时间。眼下，红胡子指望不上任何地方的支援。要消灭他，只有“现在”。

达瓦洛斯主张追击，卡洛斯却没有同意。8月初，他决定解散“神圣同盟”的军队，士兵各自回国，自己在西西里登陆，横穿西西里后沿意大利南部北上，前往拿波里。他优先考虑了想看看自己领土和意大利南部的想法。

就这样，1535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结束了。参战国的船和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故乡热烈地迎接他们，人人笑逐颜开。至少海盗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些海盗使他们一看到海平线上的船影就只会逃跑。

从战术上看，这一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是充分利用速攻长处的典范。

6月24日从撒丁岛南端出征，8月初就已结束进攻离开突尼斯，耗时40天，其中实际用于战斗的只有进攻戈莱塔的一天和总攻突尼斯的一天，一共两天。虽然牺牲者众多，但算上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而战死的6位贵族，相对6万大军而言也少得惊人。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一开始就主张速攻并付诸实施，陆军司令达瓦洛斯不打前哨战便直接投入全军发动总攻，从而一决胜负，这场战役是海陆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完美一战。

然而，取得战斗的胜利与保持战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君主一直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位35岁就成为欧洲声名最显赫的君主卡洛斯。

弗朗索瓦与卡洛斯

卡洛斯的虚荣心救了红胡子。

红胡子得知“神圣同盟”军队解散返回欧洲，便着手重组船队和水手（海盗），也不再侈谈伊斯兰大义了。召集大家的理由不是去找基督教世界雪耻，而是重开海盗业。也许他懂得招兵买马时眼前利益更有效。阿尔及尔靠海盗业发家，据说基督徒奴隶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一。

转瞬之间一支40艘战船的船队便组织起来，尽管都是些小型加莱船。海盗也募集到位。划桨手不成问题。“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的最多的就是阿尔及尔。“浴场”在阿尔及尔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

已是深秋季节，但红胡子根本不在乎，率领40艘船北上。最初的目标是梅诺卡岛。马略卡岛就在近旁但却防守坚固，红胡子连看都没看一眼。出于同样原因，红胡子没有靠近西班牙的主要城市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梅诺卡完全是西班牙领土，红胡子要在卡洛斯的领土上故意捣乱。

海盗船队挂着西班牙国王的旗子，岛民还以为是从突尼斯凯旋的船队，打着圣人画像，在码头迎候。等船靠了岸才发现不对，但为时已晚。等在码头上的人，除了老人，全被绑架，村镇也被抢了个遍。

红胡子轻易得手，收获颇丰，暂且撤回阿尔及尔。卸下东西和人以后，一路北上，目标直指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这是在跟多里亚捣乱。考虑到与多里亚交战的危险，他避开了热那亚，接连祸害了从热那亚到与法兰西南部交界的地方。当然，靠近利古里亚沿海地方时挂的是热那亚的旗子。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尽管红胡子祸害了整个利古里亚沿海地区，却没有深入腹地。海盗来袭的消息传到利古里亚之前，红胡子和40艘船就早就把飘扬在桅杆顶上的旗帜换成教廷旗，奔教廷领地拉齐奥南下而去。

他同样没有靠近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和防御坚固的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只瞄着警备薄弱的地方靠岸、登陆、掠夺、绑架。红胡子后来一路骚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都没有改变这个方针。哪怕在各地收获再少，也要彻底避免与基督教国家海军对决的风险。为此哭泣的是那些住在中央防御力量鞭长莫及之处的无名也无防备的老百姓。

“神圣同盟”拉开了1535年的帷幕，上半年基督教胜出，下半年则为红胡子所用。逃回阿尔及尔的红胡子终于觉得胸中郁结一扫而光。抛开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身份，作为海盗，他充分挽回了面子。

根据奥斯曼史料，他们的海军总司令的生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476年。果若如此，被迫逃离突尼斯那年他已经59岁。这样的年龄竟有如此能量，其头脑和体力都与安德烈亚·多里亚有得一拼。

被任命为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却不常驻首都伊斯担布尔，而是派往“伊斯兰之家”以外的西地中海，红胡子对苏莱曼这样做的意图有着准确的理解。在海战中打胜仗固然重要，但干好海盗业，对扩大“伊斯兰之家”这个大战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战。

红胡子并没有因为把突尼斯输给了基督教方面而到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请罪，似乎连封信都没有写。相反，他把海盗业做得很好。苏莱曼也没有写信斥责他。

海盗业有一点与纯粹的私人企业一样，事业的扩大与投资额成正比，投资的扩大与业绩成正比。1536年春夏两季，红胡子把能量集中于海盗业。到了年底，他已经拥有100艘加莱船的身家，即使不仰仗奥斯曼本土的支援，军事力量也已壮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与基督教联军正面对抗。单凭这一点，红胡子就成为奥斯曼苏丹手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而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爆发的激战，不但给那年下半年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红胡子的地位。

历史学家把16世纪前半叶称为欧洲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这两人之间为什么会玩起炽烈的权力游戏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两个人上台时即已是统治辽阔领土的专制君主。

要说领土，统治西班牙、德意志、荷兰、匈牙利，还有新大陆的卡洛斯必定处于优势。但法兰西国土的大部分都是平原，即为耕地，富饶且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我们不能忘记，工业革命之前，农业一直是欧洲

的主要产业。经济富裕，人口众多，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组建大规模军队。

第二，两个人年龄只差6岁，属于同时代人。

如果年龄相差较差大，就可以指望对手早死。但只差6岁便无此可能。

第三，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掌握政权，当时都很年轻。弗朗索瓦统治了34年，卡洛斯的统治则长达42年，都是统治长久的君主。

弗朗索瓦21岁登上法兰西王位，卡洛斯则在16岁就登上了西班牙王位，19岁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苏莱曼成为奥斯曼苏丹时26岁。

如果举出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著名人物，可以做成下表。

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不仅爱好文化，还是一位头脑清楚的人。他很早就意识到，卡洛斯从母亲继承了西班牙，从父亲继承了德意志，他的存在对法兰西是一种危险。

西班牙王位和德意志领主地位都是世袭，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是由诸侯们选举决定的。卡洛斯是先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人们认为他会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但在选举时，弗朗索瓦同为候选人。理由是19岁的卡洛斯，太过年轻。不过，一个25岁的人提出这样的理由，也许说服力太弱。这件事成了后来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长达30年对抗的开始。

主要人物生卒年表

弗朗索瓦	法兰西	1494—1547 年
卡洛斯	西班牙	1500—1558 年
苏莱曼	奥斯曼	1494—1566 年
安德烈亚·多里亚	意大利（热那亚）	1466—1560 年
红胡子	奥斯曼	1476—1546 年
米开朗琪罗	意大利（佛罗伦萨）	1475—1564 年
提香	意大利（威尼斯）	1487—1576 年

亚平宁半岛成为这两人抗争的舞台，这与始于15世纪末的时代变化不无关系。

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以质取胜的时代。许多人不是封建领主出身，没有作为传统经济基础的土地，但他们对使用头脑和双手的技能却很自信。很多这样的人集中起来形成了“城邦国家”。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极高，区区10万人口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与人口1 000万左右的法兰西、西班牙或奥斯曼相匹敌。如果没有佛罗伦萨银行的融资，法兰西或英格兰的国王，都无法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运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也坚持不了200年。

但是，正如同时代的史家奎恰迪尼所写，以1494年法兰西国王进攻意大利为标志，城邦国家的时代逝去，领土国家的时代来临。个人能力强弱，生产力高低都无关系，人口多就能胜出。所谓近世，是“量”的时代。这就是进入16世纪以后的法兰西、西班牙、奥斯曼、英格兰……

德意志，很晚才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只要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不了这里，就没有国王，这里分裂为各大领主的地盘。但作为军事力量，德意志拥有一支被称为“雇佣步兵”（Landsknecht）的新教派农民军，与瑞士步兵相比肩，正一步步成为决定欧洲战争胜负的战斗主力。这也反映出

时代的变化，人口众多的领土型国家将要决定欧洲的命运。

顺便提一下，根据专家的说法，16世纪前半叶主要国家的人口大致如下。

奥斯曼（埃及、北非除外）：1 600万

法兰西王国：1 600万

西班牙王国：800万

葡萄牙王国：100万

英格兰王国：300万

德意志：1 0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 100万

威尼斯共和国：本土20万，加上意大利东北部属地145万

意大利城邦国家，每个市民的能力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享受着从经济到文化各个方面的繁荣，却也因此完全没有跟上以“量”取胜的领土型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浪潮。由此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出生于典型城邦国家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君主论》等警世名作。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进入16世纪以后仍能维持独立，并成功跻身于欧洲强国行列。

其他地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已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也事实上成了卡洛斯的保护国。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托斯卡纳公国取代。正因为有了卡洛斯的支持，美第奇家族得以恢复元气。

在意大利中部拥有教廷领地的罗马教廷，也受到西班牙色彩浓重的反宗教改革的冲击，渐渐倒向卡洛斯一方。就连当初与威尼斯并称海洋城邦国家之雄的热那亚，也是因为安德烈亚·多里亚在卡洛斯手下效力，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共和国的名分。除了威尼斯，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并入了西班牙领土。

与意大利接壤的法兰西对此怀有危机感。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法兰西与西班牙发生了正面冲突。

然而，在以争霸意大利为目的的这场激战中，法兰西国王不仅战败，还成为俘虏。31岁的弗朗索瓦在25岁的卡洛斯面前饱尝了生不如死的屈辱。在一国之主的危机感中又加进了一个男人的怨念。

11年过去了。1536年，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这次是为了争夺米兰的所有权。

1536年10月，米兰领主斯福尔扎公爵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弗朗索瓦马上在斯福尔扎家族面前搬出200年前的陈年旧账：领有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曾经把女儿嫁给了法兰西国王，因此米兰应归法国所有。卡洛斯拒不同意。教皇保罗三世居间调停也告失败。

弗朗索瓦寸步不让。卡洛斯也不惜做出诉诸武力的姿态。弗朗索瓦命令自己的军队从法兰西南部向热那亚进军。卡洛斯则命令德意志兵南下都灵。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意大利的西北部。

已是冬季。冬季休战是因为实际上无法打仗。意大利北部寒冬严酷。于是两军便在都灵和热那亚之间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进入了冬令营。

弗朗索瓦在这个冬天有所行动。不，行动从秋季就已开始。只是入冬以后，法兰西国王才同意建立同盟。

法兰西—奥斯曼同盟

已经42岁的弗朗索瓦一世内心也许不得不承认，法兰西军队以及担任总司令的自己都不擅长打仗而处于劣势，与可以调遣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的卡洛斯交战并无胜算。为了改变这种令人悲观的现状，需要寻找新的伙伴。这个伙伴，却是基督教国家意想不到的对手。

法兰西国王派出密使专程前往奥斯曼宫廷进行联络。从这一点看，提出法兰西—奥斯曼结盟的极有可能不是苏莱曼，而是弗朗索瓦。连当时号称情报机构水平最高的威尼斯都完全没有注意到双方的结盟，可见办事之巧妙。

到了第二年1537年，法兰西—奥斯曼同盟公开化，基督教世界震惊，教皇整天哀叹，各国一致谴责法兰西。

过去欧洲国家中只有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条约。但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的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军事条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和威尼斯承认并尊重相互间的贸易自由，而非在军事上结成统一战线。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却是纯粹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的内容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就在法兰西军队把卡洛斯的军队牵制在意大利北部的时候，奥斯曼海军袭击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

卡洛斯因此被迫要在意大利南北两条战线投入兵力，结果自然很难再向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中欧派兵防卫，奥斯曼陆军在那里发动攻势。这样一来，奥斯曼军队对欧洲的进攻也比以前更为容易。

这就是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所订条约的主旨，说法兰西国王因仇恨卡洛斯而向伊斯兰出卖了基督徒也许不错。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在与法兰西的共同战线启动之时，着手重增陆海军力量。为此他将红胡子召到伊斯坦布尔，犹太人西纳姆也被召去。

红胡子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再度明确负责的海域为西地中海。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苏莱曼给红胡子定出了明确目标：并不需要夺回突尼斯，而是要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建立基地，以此为据点，掠夺破坏。为此，苏莱曼给了红胡子充裕的资金。

海盗干的就是掠夺破坏，通常是扫荡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基地。但这次苏莱曼命令红胡子改变做法，不再返回基地，而是就地盘踞，把传统海盗行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南部。这是把卡洛斯的军事力量分割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策略，如果红胡子扫荡后回国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这就是说，红胡子在做海盗的同时还必须充当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为了让手下的海盗同意这样做，就必须保证他们能得到与纯粹做海盗时一样的收入。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人跟他走。苏莱曼给红胡子的充裕资金也是佣兵费。

苏莱曼也给犹太人西纳姆安排了新任务。西纳姆的活动地点移到了红海，埋伏在红海的出口，即现在的索马里海域，袭击去印度的葡萄牙船。自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新航线后，经红海去印度购买香料的航线就被葡萄牙垄断。袭击去印度的船，抢光船上的金银币，这就是奥斯曼苏丹交给海盗西纳姆的任务。葡萄牙是西班牙的盟国。

带着新任务回到阿尔及尔的红胡子跃跃欲试，干劲十足，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超过百艘的船队。又从除突尼斯以外的北非全境召来海盗，登船出发，完成任务。

他没有忘记让几艘“福斯塔”小船先行，四处停靠，散布假情报说，红胡子船队正去埃及，将与身在红海的犹太人西纳姆共同作战。红胡子的新任务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建立基地，而布里亚所在的伊奥尼亚海一带有威尼斯的谍报网。

红胡子船队靠近希腊西海岸后突然改变方向，全速向西北驶去。布里亚位于呈长筒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处。红胡子并没有去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这两个城市是布里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防御坚固，易守难攻。他把目标锁定在了奥特朗托以南10公里的一座名为卡斯特罗的港口。

遭到4　000多海盗的袭击，小小的港口城市毫无招架之力。从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下来告急的人跑到城里的时候，港内已经挤满了海盗船。

红胡子驱使全体居民构筑了适合做基地的城堡。在突击完成的城堡的高塔上，飘扬着红底白色月牙的土耳其帝国旗。

但海盗就是海盗，成不了战士。他们让居民建设基地，自己却全力以赴地掠夺周边地区。

“红胡子在布里亚登陆”，这一消息传到了基督教方面。

“撒拉森塔”不仅可以向附近居民报告海盗来袭，还可以燃起狼烟，逐塔传递消息。发生在布里亚南端卡斯特罗的情况就这样传到了身在拿波里的唐·佩德罗·阿尔瓦雷斯那里，他以西班牙副王的名义统治着意大利南部。

阿尔瓦雷斯立即命令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一队人马南下，同时派出快船前去通知正在第勒尼安海上寻找红胡子的安德烈亚·多里亚。

这次，多里亚的行动依旧神速，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经年过七旬。他

用快船联络，要求各国速派船到墨西拿集结。说是各国，实际上也仅限于能够迅速驰往西西里东北墨西拿的国家。

这一年，多里亚率领25艘加莱船四处寻找红胡子的下落。他自己的船达到22艘，西班牙船只有3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依然不了解大海。他命令多里亚阻止法兰西军队从海上向意大利运兵，却只派给他3艘船。多里亚这时的行动好像没有取得卡洛斯的批准。也可以认为，只求拿出战果，已没有时间去请求批准。

没有扩大参战国范围也是一件幸事。不到一周，所有船只便集结到墨西拿。

多里亚率领着自己的22艘船和西班牙的3艘船到达了集结地。副王阿尔瓦雷斯派出的6艘船已经从拿波里抵达。几天后，奇维塔韦基亚来的教廷海军的7艘船进港。来自马耳他骑士团的两艘大型帆船也随后抵达。骑士团还带话来说，一俟准备就绪，还将再派几艘加莱船。这时，战斗用的加莱船数量已经有38艘。根据多里亚获得的情报，红胡子有100艘加莱船。多里亚知道，海盗船多是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

但是38比100，战力差距还是太大。然而多里亚认为，与其给敌人更多时间，不如改变战术，照样打这个仗。他命令由38艘加莱船和两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全体出港。

优秀将领的首要条件是精通地理。听到卡斯特罗这个一般热那亚水手都不知道的布里亚小港口的名字，多里亚不但估摸出了它的位置，还想象出了它周围的情况。

那个地方，红胡子也能轻易攻取并作为基地。但要以此为基点北上进攻意大利南部，来自奥斯曼本土的补给不可或缺。阿尔及尔城除了面海的一侧，三面都有城墙环绕，但没有技术也没有工厂，连弹药也不能自给。这里依靠海盗业而繁荣，没有制造业。多里亚认为，军事行动旷

日持久，定会使这里的所有物资短缺，它只能靠土耳其本土补给。

多里亚决定，与其直接进攻夺回卡斯特罗，不如切断其补给。他决定采取途中设伏的游击战术。

何处设伏将关系到这个战术的成败。奥斯曼补给船只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通过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沿这片“多岛海”南下，到达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向西北跨过伊奥尼亚海到意大利布里亚南端。这条路线距离最短。

不过，如果没有特别有自信的水手，不是特别大的船队，一般船只都会选择沿海岸航行。多里亚预料，要是那样，航线就该是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半岛西侧北上，到达科孚岛近海后转向西北，驶向布里亚南端的卡斯特罗。他决定在科孚岛南端设伏。

科孚岛长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一直保持着中立。在这个岛附近埋伏，不用担心腹背受敌。

多里亚的幸运是敌人的行动与他所料完全一样，而且行动迅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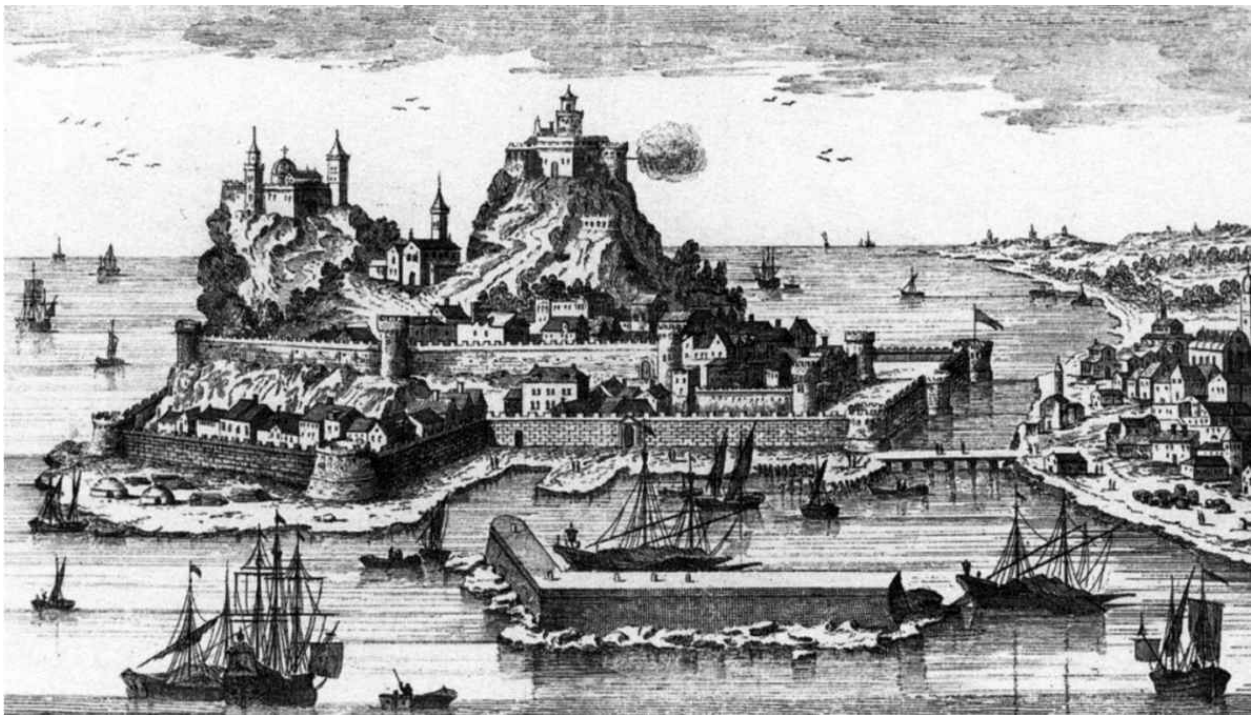
只等了几天，海平面上就出现了奥斯曼的运输船。奥斯曼帆船不喜欢使用种类繁多、需要高度技巧的三角帆，他们多用只需升降即可的四角帆，很远就一看便知。奥斯曼的14艘运输船组成一支船队，正在顺风北上。

多里亚让所有船只在桅杆上高高挂起自己国家的旗帜。

奥斯曼船只发现了这些船。返航太远，他们决定转向西北，躲进目的地卡斯特罗。

多里亚当然追击。他命令自己的22艘船采用只有热那亚水手才会的需要高度技巧的操纵方法。首先，三分之一先绕到正在逃跑的奥斯曼船

队前方。另外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右侧，剩下的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左侧，三面夹击。剩下的一面让其他加莱船封堵，加莱船可以放下帆来划桨航行。这样，奥斯曼的14艘船就在海上被包围了。



科孚岛的城堡

运输船上没有多少士兵，包括水手在内有180人。只开了一炮，他们便全体举手投降。

这支船队满载粮食、弹药和火药。多里亚通过审问水手得知，船队的出发港不是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而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货物由西纳姆奉苏丹之命采购。只有这一点多里亚预料错误。不，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让一艘运输船逃脱。

红胡子在卡斯特罗翘首以待，他从好不容易进港的那一艘船得知，多里亚的游击战术获得了成功。多里亚在知道一艘敌船逃脱时候就确信，红胡子一定会出动。但他不想逃跑，也没有必要逃跑。

奥斯曼运输船队所载的物资分到了所有船上，可以航行很久而不用靠港。他还决定用俘虏的800名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化的希腊人充当划桨手。基督徒划桨手都加入到了士兵的行列。此外，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已经到达。多里亚可用的船只有42艘加莱船和两艘大型帆船。

他认为，这样便可与红胡子一搏，即便他手下有100艘船。刚到7月下旬，还有很充分的海上作战时间。

多里亚多方派出了侦察船，打探情报。其中一艘报告说，有12艘奥斯曼加莱船正在北上。这艘侦察船甚至潜入加莱船队停泊的港口，探到了这个船队的重要情报。

这12艘加莱船满载着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他们作为苏丹近卫军闻名遐迩。

目的地是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去维罗纳，是为苏丹苏莱曼从陆上进攻维罗纳做准备。维罗纳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的布里亚隔海相望。现代从阿尔巴尼亚去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就是划着橡皮艇从维罗纳港出发的。在维罗纳，可以从最窄的地方渡过亚得里亚海。500年前的奥斯曼苏丹好像也这么考虑。他想攻占维罗纳，把这里建成进攻对面意大利南部的基地。从维罗纳到卡斯特罗，只隔着一步之遥的亚得里亚海。

这次，多里亚也没有去征求任何人的建议。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12艘奥斯曼加莱船抵达维罗纳前将其击垮。他认为，这支船队也会沿希腊西海岸航行，一路北上。与帆船相比，加莱船多会选择沿海岸航行。

多里亚决定，在科孚岛与希腊西海岸之间的海峡设伏。不过，即将成为战场的海域远比伏击帆船队时的科孚岛南面狭小。海面狭小，船只数量众多，便有自己人相互冲撞的危险。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地区

敌人有12艘船。多里亚决定，此次只带马耳他来的4艘和自己的11艘，共15艘船前去埋伏。这15艘的划桨手全都是基督徒自由民。多里亚预料此战必定激烈，近战需要划桨手兼做士兵。他命令其余船只在附近的帕克西岛待命。

正如所料，12艘奥斯曼加莱船进入预定海峡，尚未发现正在海峡深处等待的多里亚船队。入夜，月亮近乎满月。海域狭小，站在岸边即可将对岸一览无遗。多里亚不再等待，命令主动出击。于是15艘船与对方的12艘船在狭窄的海面上发生激烈冲撞。

组成奥斯曼新军军团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满10岁就被定期巡视的奥斯曼政府官员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家庭中强行带走，训练军事技能，加以培养。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过着独身的集体生活。新军军团士兵是奥斯曼军队精兵的代名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能依赖父母，苏丹便极其自然地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发誓效忠的人。

因为他们勇猛而忠诚，新军军团成为苏丹的近卫军。

在被强行带走的少年中，有不少人聪明伶俐，在苏丹的宫廷，也就是今天的中央政府中，走上了高级官僚的道路，其中不乏当上大臣的人。正如当时的马基雅维利所写，“奥斯曼帝国除了苏丹都是奴隶”。这话真是一语中的。

没有被提拔为官员的人全都成为新军军团士兵。他们有自己的规矩：逃跑者死，哪怕是战友。在敌人面前逃跑的人会被战友杀掉，这就是规矩。当然，在基督徒面前逃跑另当别论。

真蒂莱·贝利尼所作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素描

迎战这样的新军士兵，后半夜打响的这场战斗注定是一场恶战。月光照亮甲板，这里就是战场。船只猛烈相撞后，士兵们登上敌船，打起白刃战。半月刀在月光下寒光闪闪，基督教士兵的惨叫声响成一片。但大刀手立刻便成为步枪的牺牲品，倒下不能动弹。激战中迎来了清晨。

晨曦映出了战斗的残酷。奥斯曼方面损失惊人，基督教方面，尤其是马耳他的4艘船上也惨不忍睹，一派地狱景象。

其他船只也是桨橹相咬，大炮不能开火，船只动弹不得。多里亚明白，必须改变战术，只有炮击才能收拾混战的局面。

为了保护排列在船腹的划桨手，加莱船上的大炮通常安装在船头或

船尾。不久前，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开始在划桨手队列的旁边高台上安装了旋转式炮台，可以90度转向开炮，这样在左右船腹也能进行炮击。也许是因为没有迫切需要，这项技术改良还未被使用过。多里亚决定采用这项技术。

他立即召来教廷海军司令奥尔西尼和马耳他骑士团司令斯特罗兹，告诉他们采用这个战术。各船开始把大炮从船头移到腹部。

多里亚在内的所有参战国的司令全都加入敢死队，亲自参加抗击奥斯曼新军军团15艘船的战斗。

与敌船搅在一起的船开始一点点分开。到了可以炮击的距离，立即下令开炮。

大炮在旋转式炮台上一齐开火，接二连三地命中奥斯曼加莱船的中部。在近距离炮击下，连船身较低的加莱船也不堪一击。

一艘船在眼前沉没。在激烈的炮火下，看到友船在眼前沉没，不可一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也在队长阿里·塞里夫的带领下举手投降了。

两军受损的惊人程度不相上下。奥斯曼的11艘船被缴获。新军军团800士兵当了俘虏。没有奥斯曼方面战死人数的记载，但伤者记录达2 500人。运载奥斯曼新军军团加莱船的划桨手也是奥斯曼人，而不是基督徒奴隶。通常在缴获伊斯兰船时一定会有对获得解放的基督徒划桨手的记述，但这次却没有记录，原因就在于此。

基督教方面战死300人，伤者达1 200人。没有船只沉没。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天就率领自己的15艘船和缴获的11艘奥斯曼船去了自家军队留守待命的帕克西岛。正值夏季，需要赶紧埋葬死者，救治伤者。

就在这时，他知道了红胡子正率领整个船队向这里开来。

这种状态下，即使红胡子不是对手，也不可能再打一场海战。尽管刚到8月，多里亚还是决定率领全部船队回墨西拿。这就相当于从红胡子面前逃跑。虽然打了胜仗，但己方牺牲过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船队首尾相连，一直航行到西西里出现在海平线上。海上经常会有遭遇海盗的危险。来到西西里近海，骑士团的船告别舰队回马耳他岛。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受损严重，没有两艘帆船的牵引就无法前行。

其余的船安全抵达墨西拿。不过，多里亚的船队和教廷的船队既没有回热那亚，也没有回奇韦塔维基亚，他们决定在墨西拿港待到秋天。他们虽把红胡子和他的百艘船队甩在了伊奥尼亚海，但多里亚也无法预料事态何时会发生突变。

奥斯曼苏丹得知本该在维罗纳等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命运之后暴跳如雷，他只得动用自己带来的军队占领了维罗纳。他后悔从海上运送精锐。没有新军军团，连巩固占领地都困难。近旁科孚岛上威尼斯基地如何行动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对维罗纳的占领。苏莱曼命令前来联络的红胡子：攻占科孚岛！

喜欢人们叫他“立法者”的苏莱曼发怒前似乎丧失了理智。科孚岛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土。进攻科孚岛将违反与威尼斯之间缔结的友好通商条约。

但在苏莱曼看来，多里亚两度在科孚岛近海对奥斯曼军队为所欲为，而科孚岛上的威尼斯人却一直袖手旁观，这本身就是违反友好条约的行为。

通商条约不是军事条约。正因为如此，威尼斯从本土派来增援基地的加莱船队，但却完全保持了中立。

多里亚也理解这些情况。因而，尽管使用各方面设施齐备的科孚岛要方便得多，他还是命令船队到帕克西待命。这一点奥斯曼人却不能理解。

多年以来，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把科孚岛作为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堡垒，致力于巩固防御设施。即使遭到红胡子和他的100艘船的进攻，科孚岛也将岿然不动。

但是，苏莱曼身在维罗纳，正规奥斯曼海军的总司令红胡子向科孚岛发起进攻，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无异于奥斯曼突然宣战。

苏莱曼屡败屡战仍要继续进攻维也纳，在地中海也不会只干一次就罢休。

要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归入奥斯曼版图，把西岸的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建成稳固的奥斯曼基地，威尼斯正当其中，封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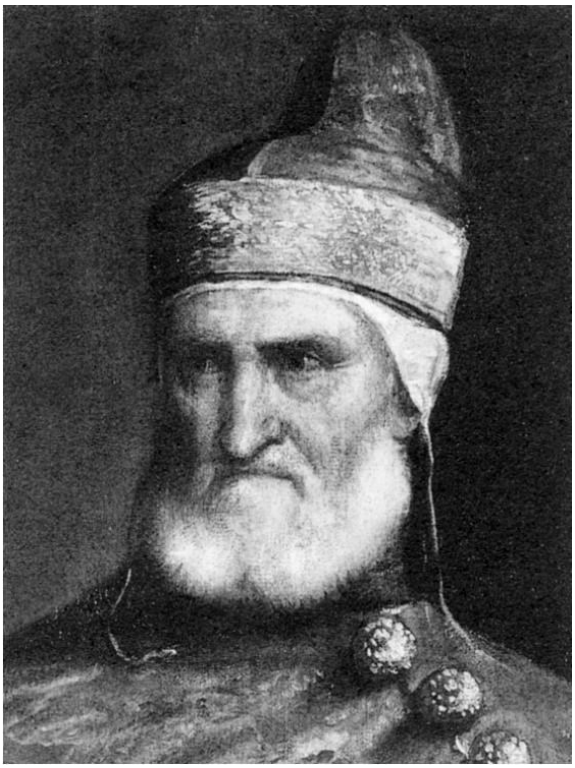
威尼斯政府在亚得里亚海各处基地布置战备，同时在本土，元老院连日来围绕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的中立政策的对错，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

到了秋天，事态终于平静下来。

苏莱曼返回了伊斯坦布尔。红胡子要回卡斯特罗基地。

多里亚通过侦察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墨西拿，驶向伊奥尼亚海，追击红胡子船队，他击破了队尾的几艘船。但因红胡子船队的大部队已经进入卡斯特罗港，多里亚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只好撤回墨西拿。

撤回途中发现法兰西大使乘坐的帆船队正在驶向伊斯坦布尔。帆船



安德烈·古利提

队满帆顺风逃走。也许，半年征战也使多里亚感到了身心疲惫。

在墨西拿停泊几天后，多里亚回到自己的祖国热那亚。他放心不下全力以赴防御法兰西军队的祖国。

行至中途，同行的教廷船队也作别，返回奇维塔韦基亚港。

因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而沸腾的1537年就这样过去了。

弗朗索瓦一世还没能把热那亚弄到手，卡洛斯的军队就已经侵入米兰。

奥斯曼军对维也纳久攻不下。以红胡子为先锋，对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进攻也仅局限于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地区。

威尼斯受到欧洲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冲突余波的冲击，总督安德烈·古利提苦涩的面孔经常出现在激烈争论中立对错的讨论席上。关于总督古利提的详细情况请读者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下卷“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一章。当时威尼斯的领袖之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奥斯曼。他不但自己拥有丰富的奥斯曼经历，还有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并改信伊斯兰教的儿子。关于他的这位儿子，以前我在《圣马可杀人案》一书中有所描述。

然而，即使拥有安德烈·古利提的资质和经验，也无法解决这个时期威尼斯所面临的难题。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前一年冬天开始行

动，而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在这一年冬天也行动起来了。

抗奥联合舰队

位于长筒靴脚踵处的港口城市卡斯特罗再小，也是属于亚平宁半岛的。奥斯曼的旗帜在这里飘扬的现实，必然会让身在罗马的教皇保罗三世心生不悦。

陆地相连与中间隔海不同，使人感受到的威胁有巨大的差别。对奥斯曼在陆上之强大，基督教各国君侯无人会有异议。没有人知道奥斯曼什么时候就会以卡斯特罗为基地派大军北上。教皇一直在为保卫维也纳奋战在前线的匈牙利国王筹措军费。虽然身在罗马，远离前线，教皇保罗三世对危机也与在前线一样感同身受。

这个时期，年逾60却热情不减的米开朗琪罗正在位于教廷一角的西斯廷教堂里奋力创作《末日审判》。

保罗三世年轻时曾留学佛罗伦萨，可以说也是一位饱受文艺复兴文化浸润的人。《末日审判》是前任教皇克莱蒙特请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但因1527年的“罗马浩劫”而中断，保罗三世再次请求他完成作品。

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有《创世记》，那是米开朗琪罗30多岁时的作品，独步天下。如果米开朗琪罗能在里面的整面墙壁上完成的《末日审判》，与两侧墙壁上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和佩鲁吉诺等人的壁画合璧，整个西斯廷教堂就将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大圣殿，从而无愧于“Cappella Sistina”——教皇西斯图的礼拜堂这一称号。

保罗三世被称为文艺复兴最后的教皇。毫不奇怪，这一想法像一直燃烧着的火焰，温暖着他的内心。他每天在抗击奥斯曼与争斗不息的基督教各国间，紧张不已。这念头就像穿透繁茂树叶的间隙射进丛林的阳

光，使他内心得到些许温暖。相传他已年近70，每天都要造访创作现场，令小他7岁的米开朗琪罗感到厌烦。

《末日审判》中央的基督，完全不是温柔慈悲，而是狂暴发怒的样子。听说教皇并不讨厌与自己同辈的艺术家所描绘的这位愤怒的基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所面临的难题也令人无法不狂躁发怒。

但是，外交是一个不隐藏愤怒就寸步难行的领域。教皇保罗三世提倡基督教世界结成抗击奥斯曼的同盟，但在推进过程中，教皇却一再隐忍。

教皇首先向卡洛斯派去特使，因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保卫基督教世界是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目的。卡洛斯不能坐视奥斯曼在自己领土上，哪怕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角落建立基地，西班牙国王的回复正如所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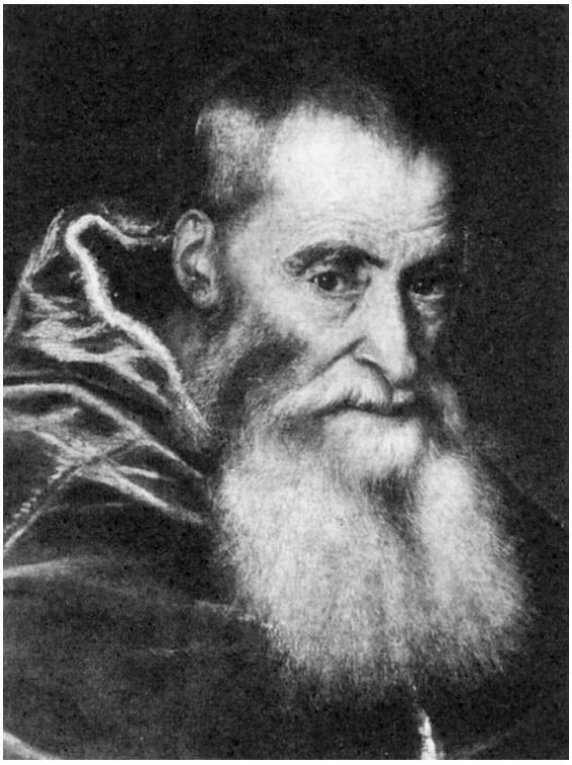
几乎同时，教皇也号召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参加同盟。教皇知道法兰西与奥斯曼是同盟关系，但他还是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大义努力说服弗朗索瓦一世。可是，尽管不惜与奥斯曼结盟而组成的反卡洛斯战线没有结出果实，失望的法兰西国王并未给出教皇所期待的答复。

教皇提出至少与卡洛斯休战的请求。法兰西国王对此也没有给出理想的答复。中世纪的教廷有“开除教籍”这个最强的武器，但这一招对经过文艺复兴的君侯越来越无效力。

教皇保罗对拉威尼斯共和国加入同盟比对法兰西更为执着。

结成抗奥同盟的目的是把已经入侵到意大利半岛和希腊之间伊奥尼亚海的奥斯曼势力彻底赶走。当然，可依靠的与其说是陆军不如说是海上战斗力。说到海上战斗力，与拥有1 600万人口、号称欧洲人口最多

的法兰西相比，只有其十分之一人口的威尼斯更加强大。教皇保罗认为，没有威尼斯就不能战胜奥斯曼。威尼斯的科孚岛在这一年遭到奥斯曼的进攻，重新审视以前与奥斯曼的关系迫在眉睫。



教皇保罗三世

威尼斯接待了教皇的特使，但难以立即表态。

他们以贸易立国为国策，避免战争。西班牙为反宗教改革派所操纵，他们不仅敌视伊斯兰，还憎恶同为基督徒的新教。威尼斯虽属基督教，却总与宗教保持着距离。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友好共处。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风头正劲，而同时期的威尼斯却没有一个人因宗教原因被判死罪。被宗教裁判所盯住的人只有逃亡一条活路。而悄悄向这些人伸出援手的人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他们：逃到威尼斯去吧！

然而，威尼斯目前正深陷困境。失去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和威尼斯商船安全的科孚岛，就等于失去了海外贸易。威尼斯政府一向不关心扩张领土，只重视海外贸易的自由与安全。奥斯曼苏丹所关心的是扩张领土，而不是贸易。这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理”，而是“力”。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欧洲第一，但仅靠一己之力也无法对抗实力强大且不惜把海军交给海盗发动攻势的奥斯曼帝国。

威尼斯终于做出了决定，站在基督教世界一边，与伊斯兰的奥斯曼作战。

响应教皇保罗三世的号召结成的同盟于第二年即1538年2月8日签约，正式启动。盟约内容如下：

一、所有战争费用六等分，主要加盟国按以下比例分担：

教廷：六分之一

威尼斯：六分之二

西班牙：六分之三

教廷国家（罗马教皇也是领主，拥有以教廷所在地拉齐奥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的广阔领地）和威尼斯承担的部分由这两个国家的国库支出，但负担了一半战争费用的西班牙却不可能由国库全额支付。拿波里以南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属西班牙统治，西班牙负担中的一半由这两地通过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形式承担。统治者并非自己投入人力、财力来保护你，绝大多数情况是如果你出人出钱我就保护你。这也是近代殖民帝国的一种“剥削”方式。

二、1538年各国筹备的战斗力总数为：

加莱战船： 200艘

运输用船： 100艘

步兵：5万人

骑兵：4 000人

三、各主要加盟国负责筹备的加莱船数量为：

教廷：36艘

威尼斯：82艘

西班牙：82艘

各国不单要提供加莱船，还要提供船上的水手、划桨手和战士（今天所谓的水兵）等人员及其所需费用。威尼斯提供的数量与西班牙一样，看上去不合常理，但这似乎是因为威尼斯是海运国家，拥有造船能力，习惯于做这样的准备。

四、基于同样原因，100艘运输用船的大半也由威尼斯负责，但规定造船费用由各国比照战费的负担比例支付。

五、对陆上战斗力颇有自信的卡洛斯决定负责5万步兵和4 000骑兵中的大半。而连船带人的海上战斗力的责任更多地分派给了威尼斯。

如果各国都能全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地中海的战斗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六、奥斯曼方面正在陆上进攻中欧。那里的防卫一如既往由匈牙利国王负责。各同盟国也按以往的做法，继续予以资金支持。顺便一提，当时的匈牙利国王是卡洛斯的弟弟费尔南德。

七、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保留席位，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加盟。

八、签约的同盟国家须在1538年3月以前完成一切海陆准备工作，在科孚岛集结。

九、陆军总司令由教廷陆军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韦尔担任；海军总司令由西班牙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

卡洛斯与威尼斯之间就海军总司令的人选发生了争议，致使同盟签约花了整整一个冬天。

威尼斯坚决反对多里亚担任总司令，理由是不能把自家军队的命运托付给雇佣兵队长。

威尼斯共和国人口较少，与其他国家一样，陆军只能依靠雇佣兵制度。但雇佣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与其说士兵为付钱的雇方打仗，不如说当兵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职业，他们会采用尽量不冒风险的办法完成任务。雇佣兵打雇佣兵，战斗虽漂亮，但却无人伤亡，更不用说战死。借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家布克哈特的话说，这是“作为艺术的战争”。雇佣兵方希望速战速决的战斗打起来后总是一拖再拖，只见金钱哗哗流出。

同时代人马基雅维利极力谴责这种雇佣兵制度。因为自己作为官吏服务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一直被雇佣兵队长所玩弄，他一直主张创建由本国国民组成的军队。不过，同一时代的威尼斯采用了更为现实的解决办法。

威尼斯把称为“proveditore”（直译为监督官）的人作为参谋紧密跟随雇佣兵队长，使雇佣兵队长不能为所欲为。佣兵费的支付权完全交给了监督官，他对雇佣兵队长具有相当的发言权。总之，威尼斯对雇佣兵队长如此不信任，反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总司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卡洛斯毫不让步，甚至扬言不让多里亚当总司令就退出同盟。作为妥协，教皇保罗试图以让同盟军陆军总司令的德拉·罗韦尔兼任海军总司令的方案来说服威尼斯。但把自己国家的海军交给毫无海战经验的乌尔比诺公爵，这对威尼斯来说是更大的噩梦。当然，卡洛斯也反对这个方案。

结果威尼斯让步了。既已决定与奥斯曼打仗就必须取胜，他们决定相信当代第一的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位大海英雄的气概，尽管

他是雇佣兵队长。

同盟条约的最后一条第十条规定了战胜奥斯曼后各加盟国的利益分配。北非归卡洛斯，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海港口归威尼斯，罗得岛归马耳他骑士团。尽管这是不知前景如何的如意算盘，但定不下来就无法开仗。这也是有多个国家参加的同盟军的现实。

这年的抗奥联盟，自筹备阶段开始就聚集了上起教皇下至百姓的无数人的希望。他们经常生活在被抢被烧被绑架的恐惧之中。现在，地中海周边国家在把海盗赶出地中海的大旗之下集结起来，追击并彻底歼灭红胡子及其喽啰已经不再是梦想。各地造船厂全负荷运转，报名当划桨手和士兵的志愿者蜂拥而至。

3月中旬，威尼斯的82艘船早早地如约抵达集结地科孚岛。威尼斯负责提供的运输船也结为若干船队，正在南下。威尼斯舰队由82艘加莱船组成，司令是温琴佐·卡佩罗。他不仅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干过，拥有丰富的海外基地经验，还是这个时期威尼斯海军的总司令。威尼斯为这一年的抗奥联盟打出了最好的一张牌。

可是，约定的集结日期3月的最后一天已过，教廷海军和西班牙海军却都没有现身。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并不担心。盟约于2月8日缔结后，传回各国并立即着手准备，也只有威尼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威尼斯拥有当时地中海，不，包括北欧在内技术水平最高、制造规模最大的“国营造船厂”（Arsenale）。考虑到这个情况，联盟将集结时间后延定在了3月底到6月这段时间内。

此外，教廷通报了教廷海军迟到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奇维塔韦基亚的造船能力，第二是因为教皇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让法兰西加入同盟的努力。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不顾高龄从罗马出发，亲赴萨伏依公国的尼斯，

把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召集在一起，希望以抗奥联军的组建为契机探索改善长年不和的法西关系的途径。

然而，把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减弱了罗马教皇权威的光环。对普通信徒而言，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而与其个人能力无关。耶稣基督对彼得说“要在你的身体上修建教堂”，彼得便是第一代教皇，历代罗马教皇都被认为是彼得的继承者。罗马教皇至今仍对老百姓有着极大的权威。但对为政者却不然。曾几何时，开除教籍的绝罚威力巨大，但到中世纪也失去了效力。这就是现实。

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没有到有教皇等候的尼斯。

但教皇没有放弃。尽管让法兰西加盟一事失败了，他仍在力争实现法西之间停战10年的目标。使节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往返穿梭于尼斯与巴黎、尼斯与巴塞罗那之间，终于在5月底使双方签字。

这就是教廷海军迟至6月中旬才到达的原因。就算教廷海军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准备停当，没有教皇的命令也寸步难行。

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哪怕只有10年，对欧洲来说当然也是值得庆贺的喜报。法兰西和西班牙在欧洲各地屡屡发生冲突，现在双方收剑入鞘。教皇保罗三世带着这个喜讯回到罗马，命令教廷海军出发。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以往卡洛斯必须把军力兵分两路，一路在意大利北部防范法兰西的入侵，一路在意大利南部抵抗奥斯曼的攻势。而今后至少10年，他不需要这样做了。其影响对同盟未必是好事。

卡洛斯首先命令把奥斯曼势力从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卡斯特罗赶出去，这事轻而易举。红胡子及其手下的海盗被苏丹召回伊斯坦布尔，不

在卡斯特罗。而收复卡斯特罗对卡洛斯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加入同盟的一个理由。

6月中旬，教廷海军抵达了集结地科孚岛。但时至7月，仍不见多里亚率领的拥有82艘舰船的西班牙海军的影子。威尼斯海军来到科孚岛已经三个月，但他们一点儿也没浪费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科孚岛等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岸各处威尼斯基地的防御。但进入7月，就到了等待西班牙海军的极限。从船长至划桨手都开始抱怨：西班牙人究竟在干什么？

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和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一致同意派侦察船去墨西拿。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海军要来科孚岛，必须经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但侦察船带回了情报，说等了一周，连西班牙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进入8月。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机构已深深渗入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根据那里的情报，身在科孚岛的卡佩罗得知，红胡子已率领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港出发。他还了解到，这支奥斯曼正规海军，不但总司令是红胡子，主要战斗力也全由海盗构成。红胡子把先遣队交给其下能人图尔古特指挥，而图尔古特的目标是把航行途中所遇到的威尼斯基地打个遍。

奥斯曼已经开始行动，多里亚却不见人影。

8月10日，矗立在科孚岛南端的瞭望塔看到挂着白底黑鹫皇帝旗的船出现在西边海面上。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以为多里亚终于到达，让人派船，亲自出迎。然而，来者不是多里亚。坐在船上的是西西里的副王唐·费兰特。被委以联军陆军指挥的乌尔比诺公爵病重，命他前来代替。

费兰特是意大利北部曼托瓦领主贡萨格侯爵的第三子，卡洛斯手下

著名的武将，当时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西西里就由他统治。卡洛斯生性阴柔，从不轻易敞开心扉，但在用人方面却独具慧眼。

在科孚岛城的一间屋子里，费兰特与表情严峻的卡佩罗和格里马尼见面，递上了一封卡洛斯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我们的总司令多里亚早晚会到，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耐心等待。信中明确写道不同意一切没有多里亚的军事行动。

当晚，科孚岛总督官邸举行晚宴，欢迎联军陆军总司令的到来。出席者全是男子，显示出科孚岛是抗击奥斯曼的前线基地。席间，卡佩罗试探性地询问年纪尚轻的费兰特，卡洛斯皇帝的信来自何方。

费兰特说，信在巴黎写成，由多里亚的部下送到西西里的巴勒莫，交到自己手上。未等卡佩罗多问，费兰特接着说道：

> 为了庆祝缔结10年停战条约，弗朗索瓦邀请卡洛斯去巴黎。卡洛斯计划乘多里亚的船从巴塞罗那到马赛，再从那里去巴黎，在法兰西国王的款待下小住数日，再返回马赛，乘船回巴塞罗那。多里亚正在马赛待命。

年轻直率的费兰特的这一席话，与常驻法兰西宫廷的威尼斯大使传回的情报完全吻合，卡佩罗预感不妙。

出席晚宴的格里马尼听了费兰特的话也深感疑虑。被委以教廷海军司令的格里马尼的本职是阿奎利亚的主教，是神职人员。他是热那亚人，却不擅海战。所以尽管同为热那亚人，他却没有像多里亚那样选择做海上雇佣兵队长。

格里马尼把卡佩罗悄悄地叫了出来，问他有无可能不等多里亚到来就发动军事行动。格里马尼说，威尼斯和教廷加起来，光是加莱船的数量就有118艘。这么强的战斗力，足以与红胡子一搏。

但是卡佩罗没有同意，理由是如果打起来，不得大胜没有意义。

但是，已经有情报传来，5万奥斯曼陆军正在从亚得里亚海各处的威尼斯基地向西横穿希腊。还有消息称，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海军已经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进入伊奥尼亚海。不久谣言四起，说卡洛斯要把联合舰队的出动延到第二年。准备了82艘船却只能在科孚岛待命，威尼斯舰队对西班牙的怒火即将燃烧。

9月8日，多里亚终于到达科孚岛。根据协议，他应该带来82艘加莱船，但只有41艘到达，他只带来了承诺数量的一半。运输船的数量也不满约定的一半。

这41艘船中，多里亚有22艘，骑士团有2艘，其他则是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提供的，西班牙本土的船一艘也没有。卡洛斯以自己国家不承担一切风险的形式“参加”了抗奥基督教联合舰队。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感到，不妙的预感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然而，卡佩罗根本不知道，卡洛斯命令推迟出发的多里亚不许打对威尼斯有利的仗！

刚刚进入9月。光是集结在科孚岛的军事力量就足以向奥斯曼发起挑战。

威尼斯：82艘

教廷：36艘

西班牙：41艘

加莱船总数：159艘

水手、划桨手、战士总数：3.7万人

大小炮具总数：2 500门

9月10日，在科孚岛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召开首次作战会议，两天前抵达的多里亚参加了这次会议。

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一开始就强烈主张主动出击。教廷舰队司令格里马尼也完全赞成。西西里“副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家臣费兰特·贡萨格也主张对红胡子出击。但多里亚却说：“季节已经进入不利于航海的秋季。必须时刻想到暴风雨的危险。这种时候把大舰队投入到海战相当危险。”

等待6个月之久的卡佩罗和等待3个月的格里马尼只能表情木然地注视着多里亚。他们知道，出海意味着战斗，是否出海，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由总司令决定。他们不由得再次思考多里亚的立场。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雇佣的海军将领，这就不允许他强行去做违背雇主卡洛斯意愿的事，哪怕这样与他作为海军总司令的身份违背。就算卡洛斯的意向有损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多里亚也必须服从。

不过，作为雇佣兵队长，多里亚在决策时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他可以站在作为海军将领的专家立场上进言。但这一年，多里亚没有进言，只是彻底贯彻了卡洛斯的意向。也许这是一个热那亚汉子对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唯一成功保持独立并成为欧洲大国的威尼斯所怀有的那种无法启齿的情绪所致。

但对威尼斯的海军将领卡佩罗来说，“现在”很重要。对威尼斯而言的“现在”，就是战胜奥斯曼。卡佩罗当然针锋相对地反对多里亚的谨慎论调。率领教廷海军的格里马尼也认为就这样回去无颜见教皇保罗，同意卡佩罗的意见。费兰特·贡萨格自从以“副王”之名当上西西里统治者以后，对自己保护饱受海盗威胁的岛民的立场已有所悟，也认为“现

在”是消灭海盗的大好时机。这三人拉着多里亚参加连续多日的作战会议。

但每次召开作战会议，多里亚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搪塞。有时他甚至会以威尼斯船上炮手数量不多为由，命令西班牙炮手登上威尼斯船。

卡佩罗当即看透了多里亚。多里亚意在让西班牙兵登上威尼斯船，控制威尼斯船。

卡佩罗一边克制自己的愤怒，一边明确拒绝。

他说，威尼斯舰队没有本国元老院的决定，哪怕是总司令多里亚的命令也不会服从。

他还明确说，如果炮手不够，可以从威尼斯领土科孚岛和扎金索斯岛募集，不劳多里亚操心。

多里亚只得点头。不过，这样一来，他与其他海军将领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如此这般，没有结果的作战会议反复不断地召开，空耗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安全驶入了普雷韦扎港。

这个消息通过威尼斯的情报机构传到了科孚岛。多里亚好像就在等待这个消息，下令两天后出发。但了解这员海将果断战法的人，无论谁都会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理解多里亚在前一天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所提出的战术。

从科孚岛出发后不去敌人所在的普雷韦扎湾，而是继续南下，到达普雷韦扎以南的黎凡特湾。这个战术是要让奥斯曼舰队知道基督教舰队通过普雷韦扎，使其离开普雷韦扎进行追击，然后在敌人无路可逃的广

阔海域调转船头，用海战决定胜负。

这个时候，基督教方面已从威尼斯谍报机构获得了关于红胡子所率奥斯曼舰队战斗力的准确数字报告。根据报告，敌人有94艘加莱船和66艘“福斯塔”。双方旗鼓相当。

在敌我力量相当时，诱敌出动予以打击的战术应该有效，需要给敌方后力，但是这次，多里亚根本没想逼迫红胡子，只是一味等待红胡子主动舍弃安全之地出来挑战。

多里亚断言红胡子一定会出动。卡佩罗也只能期望他的断言成真。时间已到9月底，适航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9月25日凌晨，仅加莱船就达150艘的基督教联合舰队从科孚岛出发，70艘以上的运输船紧随其后。舰队于当天傍晚抵达帕克西岛。派出的侦察船夜里返回，报告说普雷韦扎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并无动静。

多里亚说，第二天早上出港后按计划通过普雷韦扎，继续南下。他也向卡佩罗、格里马尼和费兰特三人表明，要在普雷韦扎前小试计策。是何计谋，他却闭口不答。

第二天接近正午时分，威尼斯和教廷的舰队成了在普雷韦扎海湾上演的绝妙独幕剧的无奈看客。

多里亚命外甥简内特·多里亚率4艘加莱船侵入了普雷韦扎湾内，但不让他进得太深，在与追出来的几艘奥斯曼船之间相互打上几炮后，逃出海湾。

伊奥尼亚海、爱琴海周边

你来我往，重复数次，仅此而已。观战的威尼斯船连划桨手都看出来：这只是一种示威。

联合舰队继续南下。27日清晨，舰队来到一片海域，这里可以把威尼斯基地所在的圣马武拉（莱夫卡斯）岛尽收眼底。

这时，桅杆瞭望台上大声报告：北方海面上发现红底白色月牙旗。

一如多里亚所料，红胡子出动了。红胡子大概在离开普雷韦扎时就想着从背后袭击，一开始就摆出了战斗队形，追踪而来。前锋由红胡子的左膀右臂图尔古特率领，中军由红胡子坐镇指挥，后卫也由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率领。名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及其手下人几乎全是海盗。这意味着奥斯曼舰队的加莱船划桨手基本都是绑架而来用铁锁链铐住的基督徒。

作战会议在多里亚乘坐的旗舰上召开。卡佩罗、格里马尼都主张开

战，但多里亚这次仍然没有轻易表态。多里亚的意见是，一旦在这里吃了败仗，还有谁来保卫地中海沿岸居民不受海盗之苦呢？既然存在的风险，就需要审慎决断。

但卡佩罗此时毫不让步，他强调，威尼斯决定开战才派出海军，本土和海外威尼斯基地的安全对策是元老院决定的政治问题。自己的任务就是战胜眼前的敌人，水手和划桨手都已完全统一在这一思想之下。格里马尼、费兰特和只有两艘船参战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意见也完全一致，认为只有在这里给海盗以痛击才能保证今后地中海的安全。

回避海战的只有一人。多里亚在这种状态下仍未停止争取时间。几小时的作战会议毫无结果。这期间基督教方面的船队继续缓缓南下，与紧追而来的奥斯曼舰队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近午时分，已看得清敌舰上奥斯曼士兵铠甲的颜色了。

终于，多里亚做出了决定。总司令的旗舰上飘起了命令编队的旗号。等到卡佩罗、格里马尼各自回到舰上的时候，从船长到划桨手都已经全员振作，士气高涨，只等总司令发出冲锋命令。

就在这时，风向突变。舰队正在按照多里亚命令改变阵形，极易受风向影响的帆船队被孤立出来。

奥斯曼方面见状放弃攻打强大的加莱船船队，转而向帆船群突袭。威尼斯的帆船大型居多，经得住成群袭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的攻击。但见海面上孤军奋战的己方帆船，加莱船水手们心急如焚。

卡佩罗、格里马尼都在等待多里亚下达冲锋命令，但却久等不来。卡佩罗跳上传令艇靠上多里亚的船，大声诘问为什么不下令冲锋。多里亚仍拒不下令。

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船再也忍不下去，甚至不等卡佩罗下令就冲

进了正在袭击帆船队的奥斯曼加莱船队，转眼工夫击沉了敌人8艘“福斯塔”。但随后被敌人的加莱船团团围住，未经激战便被击沉。

这时，总司令多里亚的旗舰上飘起了信号旗，但这令旗不是命令冲锋，而是撤退。多里亚率领的主体舰队开始向北逃去，从为袭击帆船队而绕到右边的奥斯曼舰队旁边掠过。近旁的教廷舰队也紧随其后。威尼斯舰队如果留下，将不得不以劣势战斗力面对求胜心切的敌人，只好逃逸。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帆船队被敌人追上，被迫应战。威尼斯的帆船队和一艘西班牙帆船还是逃回了科孚岛，与自己人会合。

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败仗。基督教方面损失了两艘威尼斯加莱船，4艘西班牙帆船被俘获。奥斯曼损失了8艘“福斯塔”，但却俘获了4艘满载西班牙陆军士兵的帆船。

基督教方面并不是没有牺牲，不过相对于投入的150艘加莱船，牺牲委实很小。但这一仗对基督教方面而言却是败仗，正规海军败给了海盗集团。

回到科孚岛的卡佩罗还没有来得及追究多里亚的责任，图尔古特就奉红胡子之命向科孚岛发起了进攻，似乎要把先前奇怪的败仗变得不奇怪。卡佩罗请求多里亚批准威尼斯舰队单独出动迎击敌人。多里亚同意了。

但图尔古特不是傻瓜。得知卡佩罗出动迎击后，他收手不再攻击科孚岛，转而开始破坏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的基地。直到深秋，基督教方面才打退图尔古特，把海盗赶出亚得里亚海。

联军解散了，大家心照不宣。多里亚回到了热那亚，卡佩罗回到了威尼斯，必须向教皇报告的格里马尼回到了罗马，费兰特·贡萨格则回到了西西里。

这年冬天，各国宫廷都在议论被称为“普雷维扎海战”的这场奇怪的战斗。各国一致谴责多里亚，只有卡洛斯为他辩解。不过，据传多里亚一听到“普雷维扎”四个字便会立刻拂袖而去。多里亚一贯被人看作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而在这一年的年底，他也许尝到了72岁这一年龄和雇佣兵队长这一处境的苦楚。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不仅不再信任多里亚，也不再相信卡洛斯。一位当时的威尼斯外交官鲁说：“良知是被动一方才会说的话，有主导权的一方是不会在乎良知的。”此时的威尼斯应该能品出个中况味。

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由200名左右的议员组成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但是，200人要形成决议不仅费时，也不适合讨论机密问题。在威尼斯，凡是必须尽快做出结论，需要秘密实施的事情都将转至简称为“C.D.X”的“十人委员会”（Consiglio dei Dieci），而不在元老院讨论。马基雅维利赞赏这个机构，称它是既要维持共和国政体又想提高统治效能的国家的榜样。关于这个机构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普雷维扎海战之后的威尼斯外交决策，也被交给了“C.D.X”。

第二年即1539年早春，“十人委员会”的指令便秘密送达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大使，让他秘密开始与奥斯曼交涉，务必成功地与奥斯曼媾和并重建过去那种友好通商关系。

1540年，双方完成签约并对外公开发布。此前西欧各国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纷纷谴责威尼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但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的毕竟只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法奥军事同盟条约。这是一个在可由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上与奥斯曼签订的条约。

采取这种策略原因在于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有必要继续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另外威尼斯懂得，持续保持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

维持友好经济关系更为有效。

威尼斯不是国土即为耕地、可以自给自足的法兰西。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来说，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它都需要。贸易离不开买卖双方。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需要能够超越宗教冷静而现实的政治。

不出威尼斯所料，普雷维扎的失败带来的影响在第二年便显现出来。由罗马教皇提议，集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海上总战力的正规海军，却败给了实质上是海盗集团的奥斯曼海军。奥斯曼海军所向披靡的评价传遍地中海，伊斯兰海盗的蛮横暴行不断升级，无休无止。地中海又回到了沿岸地区无处不被海盗袭击的境况之中。

考察亚平宁半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上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时，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塔的加固工程都集中在以16世纪中叶为中心的50年间。这与海盗在奥斯曼海军的名义下再度发威的时代相吻合。老百姓的防御就像回到了中世纪前期，一听到海盗就只能逃跑。

“普雷维扎海战”在海上也有巨大影响。以往，有两到四艘加莱船就足以进行沿海警备或为商船护航。而在“普雷维扎海战”之后，没有两倍于此的力量根本没有效果。还没弄清是不是海盗船，很多船只便闻风而逃。在基督教国家，就连水手也都成为自卑意识的俘虏。

“普雷维扎海战”的第二年，海盗成了地中海的主人。红胡子多在伊斯坦布尔，西地中海的海盗行动全都交给了图尔古特。红胡子似乎热心于培养新人，出现了许多堪称红胡子门生的、堪当大任的优秀海盗。

被称为红胡子门下英才的图尔古特也像师父一样，精于组织。以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为基地的哈桑·阿加的工作是埋伏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袭击向西班牙运输新大陆出产的金银的船只。以突尼斯北部博纳为基地的马米·莱斯专事袭击西西里。而图尔古特的主要活动地点则是面

临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

这一年，基督教方面悄无声息。

威尼斯共和国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进行媾和谈判，对伊斯兰只搞防御，即使对海盗也是如此。

肩负保卫基督教世界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去了雷根斯堡，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争斗，根本不去想与伊斯兰的海战。

多里亚虽然身在热那亚，但没有卡洛斯的命令就动弹不得。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再怎么想对伊斯兰采取行动，靠只有7艘加莱船的教廷海军，顶多也只能警卫罗马近海。

马耳他骑士团从卡洛斯那里得到马耳他岛没几年，招募意大利工匠，加强全岛防御要比对付海盗更为优先。

这样一来，从北非港口北上的海盗，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均可为所欲为。图尔古特告诉手下，只要有30艘“福斯塔”就可应付。即使是30艘小型加莱船，也没有人敢迎战。这样下去，地中海恐怕会再度回到中世纪前期的状态，成为“伊斯兰海”。

这一年行将结束之时，海盗成灾的情报传到了身在德意志的卡洛斯的耳朵里。尤其是其中来自新大陆的船只连续遭劫的消息，引起了卡洛斯的充分注意。设法改变现状的命令传到了身在热那亚的多里亚手中。

海盗图尔古特

第二年是1540年，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多里亚这年74岁。他接到雇主卡洛斯的命令后立即行动。

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组织实战部队——舰队。威尼斯拥有常备海军，这在当时完全是个例外。其他国家，连奥斯曼、西班牙都是每遇战争才组建的海军。多里亚除了自己的船只以外，也只能从外部募集。皇帝卡洛斯提议邀请教廷和马耳他骑士团参加，组建海军当然会有浓烈的基督教色彩。多里亚这个时期还不知道威尼斯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谈判。不过他并没有指望威尼斯参战。显然，威尼斯还没有忘记“普雷维扎海战”。罗马和马耳他则回复，愿意在多里亚指挥下参战。

这样，多里亚自有舰船22艘，加上拿波里、西西里来的船，再加上西班牙的船只，共计70艘加莱船。卡洛斯这次积极地让本国船只参战。此外加上教廷的7艘船、马耳他的4艘船，多里亚可调遣的全副武装的加莱船总共有81艘。所谓全副武装，是指装备着多门大炮，每艘至少载有专事战斗的士兵40人。这是一支专以战斗为目的的舰队。

5支基督教联合舰队的分布

战略的第二阶段是设定目标。多里亚把目标锁定在图尔古特一人身上，不论是将他击毙，还是俘虏。哪怕不顾海盗造成的损害，也要拿下图尔古特。他决定，所有的战略战术都要围绕追踪图尔古特船队制定。

多里亚把舰队的81艘加莱船分成5队，分别配置到遭遇图尔古特概率较高的海域。

第一队：10艘，由多里亚家族的埃拉斯莫·多里亚指挥，在以西班牙东海岸附近的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近海布网。

第二队：21艘。由安德烈亚·多里亚内定的接班人简内特·多里亚和罗马贵族奥尔西尼两人指挥，负责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近海。

第三队：11艘，由统治西班牙治下意大利南部的“副王”托莱多公爵指挥，在从拿波里到阿马尔菲的海域布网。

第四队：17艘，由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率领，在西西里和突尼斯、利比亚之间的海域守望。

第五队：22艘，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自家的舰只，由他亲自率领，任务是在遭遇海盗概率最高因而也最危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尔近海布网。

1540年4月，81艘船全体出发，驶向各自海域。

5月初，多里亚首先掌握了图尔古特已经离开阿尔及尔的情报。但是，多里亚的22艘船担负着广阔海域的搜寻，形单影只，在他还未赶到之前，图尔古特就已消失在北方海平线之外。

这个消息通过快速传令艇传递到了所有的5支舰队。他们没有守株待兔，一边在所负责的海域巡航，一边等待猎物的出现。

海盗图尔古特

然而，5月过去了，没有一支舰队得到有关图尔古特船队的确切情报。很多情报都说“亲眼见到”，但都如海市蜃楼，小心靠近，却不见踪影。

到了5月底，终于传来图尔古特船队正在第勒尼安海的确切情报。根据从科西嘉逃出来的渔民的情报，图尔古特北上途中在科西嘉东岸掠夺并绑架居民，后驶向科西嘉与厄尔巴岛之间的卡普拉亚岛。

率领第二队21艘船的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二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迅即奔赴卡普拉亚岛。但当他们赶到这座小岛时，图尔古特的身影已经消失。根据战战兢兢以为再度遭到海盗袭击的岛民的证言，海盗船队在岛上补给了饮用水之后立刻离港，再度扬帆向科西嘉北部驶去。

第二队的两位指挥官怀疑图尔古特发现了他们正在追踪。在卡普拉亚岛他们得到了另一个宝贵的情报。据岛上的主教说，图尔古特手下的马米·莱斯与其同行。果若如此，图尔古特率领的船只数量将超过30艘“福斯塔”。即使30艘，对己方的21艘来说，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用21艘船追击多于30艘船的敌人，不是冒险，而是危险。

但简内特·多里亚和教廷舰队司令奥尔西尼都还年轻。两人一致决定强行追击。

但当他们赶到科西嘉北端时，图尔古特和马米·莱斯的海盗船队已经绕过科西嘉北端，开始沿岛的西岸南下。

简内特·多里亚

跟踪追击，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做法都一样，不能让对方发觉。在海上，追踪时要躲在海岬或入海口内。21艘加莱船队分成了几个小队，跟踪时注意不要走失。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次进入入海口时都能从居民那里得到情报。通过汇总、分析这些情报，弄清了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正停泊在位于科西嘉西岸的一个名叫吉罗拉塔的海湾里。

吉罗拉塔在今天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称为寒村的小小渔港。但是，这里位于海湾深处，可以完全避开大风，而且周边开阔。从逃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情报，图尔古特正在这里与马米·莱斯分赃。

基地不同的海盗共同行动时，会在掠夺财物的地方附近分赃，然后分头踏上归途。这也是北非海盗惯常的做法。要回阿尔及尔的图尔古特和要回突尼斯的马米·莱斯一定是在那里分配扫荡科西嘉东岸时抢掠的财物。海盗收工后狂欢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不愧是年轻人，两人都大胆敢为。他们意见一致，要将海盗一网打尽。然而，对手是图尔古特。而且，敌人至少拥有数量两倍于己的船只。仅靠胆识，会牺牲自己，所以还需要使用大胆而狡猾的战术。

他们决定，让比自己还年轻的多里亚家族成员乔治·多里亚引蛇出洞，其他船只在吉罗拉塔湾北侧的海岬背后待命。正好，海岬北侧也是一个小小的入海口。

诱敌战术能否成功取决于速攻能否奏效。速攻必须等待顺风。

盼望的西北风刚开始刮起，作战便迅即开始。乔治·多里亚率领6艘船绕过海岬，驶向吉罗拉塔。他们大胆地在桅杆上挂起黄底刺绣黑鹫皇帝旗，从正面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海湾。支在海滨的帐篷里，海盗们还在睡大觉，停泊在海湾里的船已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没信仰的狗打过来啦！”喊声把海盗从梦中唤醒。

图尔古特把保护战利品的事交给马米·莱斯，自己率领几乎所有船只逼近入侵的6艘船。

乔治在图尔古特眼前华丽掉头，其他的船也毫不逊色地施展绝技调转船头。在这种时候，热那亚水手往往可以发挥出威尼斯水手也望尘莫及的技能。

向外逃跑是逆风而行，但他们靠巧妙操纵三角帆和划桨手一丝不乱的动作轻易化解了不利因素。他们甚至故意一点一点地缩短与紧追不舍的图尔古特船队的距离。这样一来，只顾追击的图尔古特，没有注意到拐过海岬第二队已经在对面摆开了战斗阵形等着他。

来到事先约定的能看到松树的地方，乔治船队的大炮突然开火。这是战斗的信号。第二队的15艘船从海岬对面现出身影，旋即横向排成一条直线，顺风猛扑过来。

图尔古特知道自己的舰船在数量上占优，但有逆风的不利，于是命令后续船队全体撤退。撤退，就可以转为顺风。他肯定在想，只要逃进吉罗拉塔湾就能抓住战机。

尽管都是顺风，三角帆和四角帆的张帆方法不同，速度也会出现差异。意大利水手显示出技能优势，眼见得小多里亚的第二队与图尔古特船队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图尔古特见状改变了战术，发出了调转船头进入战斗的命令。

但是，控船技术卓越的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来说是一个顶俩，对北非海盗来说则是以一当十。海盗船掉头非但不是完美迅速，而且又慢又笨。这就使船腹暴露给敌人的时间更长。

正等着敌舰掉头的第二队21艘船上的所有大炮一齐开火。炮弹纷纷命中海盗船的船腹，准得让人难以置信。16世纪，大炮的破坏力和命中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装在加莱船上的大炮都不是巨炮，然而一旦命中，仍破坏力惊人。桅杆被炸飞，船身大幅倾斜，迅速沉没。图尔古特乘坐的是大型加莱船，遭到炮击后也开始下沉。图尔古特换乘到旁边的船上，发出了冲锋命令。

虽因炮击遭受重创，海盗们仍然打得十分顽强。他们在图尔古特的带领下，挥舞着半月刀跳到基督教舰队的船上，像一群受了伤的野兽。

激烈的白刃战并未持续很久。擒贼先擒王，图尔古特被俘获的消息一传开，其他海盗也都扔下了半月刀。

基督教舰队最先做的事情是把被迫在海盗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从铁锁链中解放，把刚抓到的海盗锁在划桨台上。

第二队指挥官之一奥尔西尼伯爵率领教廷的7艘船驶入吉罗拉塔湾。见此情形，马米·莱斯认为已防守不住，弃船向内陆逃去。但在居民的配合下，当天就把他搜了出来。

1540年6月2日在地中海抗击海盗的历史中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热那亚湾的途中，其他海盗都被铁锁链锁着做了划桨手，只有图尔古特被用铁锁链绑在船尾的船桥上，动弹不得。一路上他极尽恶骂之能事，不住地骂道，黄毛孺子算计老子，不服这口气！

有个人对图尔古特说："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这人名叫拉·瓦莱塔·帕里森，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25年后，奥斯曼大军进攻马耳他岛，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马耳他攻防战"，这人就是马耳他方面的总指挥。图尔古特一句也没有回答这位四分之一世纪后将在战场重逢的法兰西骑士，只是面目狰狞地瞪着他。

"抓到图尔古特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世界。正在北非近海游弋的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先得到报告。他当然为之欣喜，但没有就此返航。他弄清了在歇尔谢尔港城里的"浴场"里收容着多达800人的基督徒。

分散在广阔海域张网的22艘船全被召集到多里亚身边，袭击了位于阿尔及尔西面的谢尔谢尔。谢尔谢尔港不是阿尔及尔那样规模的大型海盗基地，22艘加莱船队冲进来，只能举手投降。登陆的热那亚人不顾攻占的城镇和居民，直奔城镇一隅的"浴场"，救出800多基督徒，将他们带上船后，扬长而去。

回热那亚途中在墨西拿停靠时，74岁的海军将领才向皇帝卡洛斯报告了详情。此前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卡洛斯整治海盗的命令所为，但具体的战略战术则完全按多里亚的思路推进。

卡洛斯仍在德意志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纷争，他在回信中赞赏多里亚。他写道：被俘的图尔古特是多里亚的战利品，可由其任意处置。

图尔古特被绑在简内特·多里亚船上押解到热那亚，成了小多里亚凯旋队伍中最大的展示品，被押着在热那亚城里游街示众，遭到对海盗恨之入骨的民众的唾骂。然后他被投进监狱，等待多里亚回来。

取代红胡子成为西地中海最大海盗的图尔古特，如今命运被攥在了

堪称宿敌的多里亚的手心里。在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方面，无论是罗马教皇、威尼斯共和国、法兰西、西班牙，还是受北非海盗伤害最深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图尔古特终于将要被吊死在热那亚船的桅杆上。

然而，盛夏时节就已回到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图尔古特继续着他的牢狱生活。

这期间，坊间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红胡子要用巨款赎回图尔古特。还有人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接到盟国奥斯曼苏丹苏莱曼的亲笔信，正在活动谋求释放图尔古特。我们不知道这些只是单纯的谣言还是有根据的情报。我们只知道，图尔古特的囚徒生活持续了三个月。

当年9月初，地中海的基督教方面，从各国宫廷到街头广场，传播着一个令人愕然的消息：图尔古特被释放了！

人们得知此事的时候，图尔古特已经身在驶向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船上了。而多里亚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图尔古特承诺今后不再做海盗。除此之外，人们就只知道图尔古特用3 500达卡特赎金换得了自由。

没有人能接受这件事。

第一，人们根本不相信安德烈亚·多里亚会相信海盗的承诺。

第二，3 500达卡特的金额作为重要人物的赎金也太过便宜。

的确，这个金额与“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北非各个“浴场”赎回被绑架去做奴隶的老百姓的赎金无法相比。

20年前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落入海盗加达里手中时，这个海

盗头目要求教廷支付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当时，对这笔巨额赎金人人瞠目结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从新大陆带回的大量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之前。可以认为这20年间的金钱价值只有微弱变动。即使这样，海盗只需当年一半赎金，大家当然无法释怀。

而且，维托里与图尔古特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异。

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这支海军最多时也只不过有10艘加莱船。以这样的战斗力，最多也只能进行沿海防御，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共同作战，远征北非就只是梦想。

而图尔古特却有着一声号令就能使用上百艘战船的地位。凭着这样的战斗力，他一直以西地中海为舞台干着海盗勾当，根本不用借助其他任何人的力量。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寻找与之地位对等的人物，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作为海洋英雄，这两人都有超一流的手段。不过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图尔古特不能做违反奥斯曼苏丹意志的事，多里亚不能作违抗西班牙国王的意愿。

即使在当时，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多里亚想要以3　500达卡特的赎金放掉图尔古特。安德烈亚·多里亚原本就出生在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加上长年担任雇佣兵队长的资历，他拥有的金钱之巨，连国家公务员的威尼斯海军司令也望尘莫及。卡洛斯赐给他的领地梅尔菲虽不辽阔但收入颇丰。没有任何顾虑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为什么会让图尔古特重获自由？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揣测这个问题，但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我的推测并不足取，但想在此一述。我的出发点是，大海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舞台，他以做雇佣兵队长为职业。

黑泽明有名作《七武士》。这部电影的开头是，沦落到饭食无着地步的7位浪人武士，以有米饭吃为条件受雇于农民，前去打击祸害他们的山贼。

如果优先考虑能每天吃上米饭，武士们就不应该彻底消灭山贼，而只是给予适度打击。只要危险继续存在，就会继续需要能够解除危险的人。

然而，在为应对山贼的袭击而组织农民进行训练的过程中，武士们的胸中重又燃起已被忘却的武士精神，结果山贼被根除了，7位武士中却有4位战死，活下来的3位也被农民解雇，再度失业。这个故事中的7位武士彻底发扬了武士精神，忘记了自己的雇佣兵身份。看过这部电影的欧美人，也深感震憾。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时让图尔古特恢复自由的本意何在不得而知。16世纪的海军雇佣兵队长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不做任何辩解。

安德烈亚·多里亚

图尔古特向多里亚承诺不做海盗，这好像是事实。图尔古特在伊斯坦布尔老老实实地待了一阵子。不过，其他海盗却并未承诺。

以海盗为业，在北非有着漫长的历史。所有地中海的沿海城市，经济结构几乎都离不开海盗业。奥斯曼苏丹认可的社会地位和短期暴富的诱惑，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海盗世界。更有红胡子这个热心培养门生的老大。虽然图尔古特慎行自制，马米·莱斯也没了消息，但从来不缺取代他们的人才。

绰号“坎迪亚的瘸子”（Zoppo di Candia）的人在地中海填补了红胡子和图尔古特的空缺，其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坎迪亚是中世纪对克里特岛的称呼，因而这一绰号意为“克里特的瘸子”。也许此人正是出生于东地中海最大岛屿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成为威尼斯领地为时已久，岛上的原住民应该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希腊人，也有可能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

“克里特的瘸子”，单是这个绰号就令人想起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书中的海盗也是克里特出生，瘸了一条腿，走路需要很粗的拐杖。他虽然不是独眼龙，却有着一种与海盗身份相符的残忍，连手下都会怕得发抖。这个“坎迪亚的瘸子”很快就完全填补了图尔古特退出舞台后出现的真空。袭击来自新大陆的船，一次就会有巨大收获，当然要优先考虑。

听说卡洛斯对此十分恼怒。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停以失败而告终，他也许变得比平时更加暴躁。

从德意志回西班牙的途中，卡洛斯顺道来到热那亚，与多里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当场决定进攻阿尔及尔。

这次一定要彻底摧毁阿尔及尔这个海盗基地中的基地。

远征阿尔及尔

6年前的1535年，卡洛斯曾与多里亚一起进攻突尼斯。6年以来，突尼斯再未公开向海盗提供过基地。“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记录中，突尼斯作为目的地的次数骤减就是证据。据说突尼斯以前绑架基督徒的数量仅次于阿尔及尔，而现在突尼斯“浴场”中收容人数已经减少。但突尼斯其他港口并未收手，仍然有海盗船从博纳和杰尔巴岛出航。但至少在突尼斯港，赶走红胡子及其手下海盗以后扶植起来的“酋长”，在过去的6年中遵守了他对卡洛斯所做的承诺，未向海盗提供基地。

卡洛斯希望把阿尔及尔也变成突尼斯，决定再次联手进攻突尼斯时的完美伙伴多里亚。皇帝说，自己会像进攻突尼斯时那样亲自参加进攻阿尔及尔的战斗。

即将75岁的多里亚同意了40来岁的卡洛斯的这个想法。他也已无法继续容忍“克里特的瘸子”为所欲为的现状。

两人商量后，决定进攻阿尔及尔时已经进入7月。对载运大军的大船队而言，地中海相对平静、适于航行而不用担心气候骤变的季节只有6、7、8、9这4个月。了解大海的人通常会等待来年行动，但卡洛斯务必要在这一年进攻。也许他又想到了在德意志调停天主教和新教冲突时所遭受的失败。

多里亚身心都要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一旦决定，行动迅速。卡洛斯发出的加盟令很快奏效，一个月后便完成了舰队的组建工作，共有65艘加莱船和超过百艘的运输船。加莱船的数量如下：

西班牙国王：12艘

多里亚自有：20艘

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12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教廷海军：7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共计65艘，另有运输船百艘以上。

再看乘员人数，水手和划桨手接近1.3万人，士兵达2.2万人。士兵的来源如下：

德意志兵：6 000人

西班牙兵：6 000人

意大利兵：5 000人

其他欧洲国家的志愿兵、骑士、士兵等：4 500人

卡洛斯皇帝的近卫军：200人

被授予指挥权的贵族和队长：150人

马耳他骑士团骑士：150人

皇帝亲自上阵，指挥官一级的人中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名门贵族多若星辰。陆军总指挥这次还是著名的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西班牙阿尔巴公爵前来参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班牙产白兰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与卡洛斯酒齐名。因征服墨西哥而名垂青史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前来参战。

意大利贵族也毫不逊色。由罗马实力派贵族科隆纳和奥尔西尼牵头，封建领主悉数到场。热那亚有与多里亚家族比肩的名门斯皮诺拉家族的掌门人前来参战。以卡洛斯为首的指挥官阶层几乎全都是6年前攻打突尼斯时的原班人马。

与上次一样，法兰西此次仍然没有参战。尽管与卡洛斯还处于停战状态中，但弗朗索瓦一世不愿意破坏与奥斯曼之间的同盟关系。

威尼斯共和国这次也没有参战。它如果加入，海上战斗力至少增加一倍。尽管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但两年前随多里亚率领的军队参加“普雷韦扎海战”时的惨痛教训，是威尼斯不参战的最大原因。

8月中旬，进攻阿尔及尔的准备基本就绪，但卡洛斯却声称自己方

面尚未准备完毕。9月初他要与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会晤，要等得到教皇的祝福之后再踏征程。卡洛斯是一个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相信宗教的人。

9月12日，卡洛斯在意大利中部的卢卡与教皇会晤。卡洛斯没有穿皇帝华丽的盛装，只是披了一件没有任何饰物的黑色毛织披风，里面裹着一件修士穿的朴素僧衣，毕恭毕敬地跪在老教皇的面前。

基督教世界俗世的最高领袖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最高领袖面前要谦卑跪下，这才是基督徒理想的社会图景。然而就在14年前，还是这位皇帝曾经进攻、破坏过教皇所在的罗马城。有时做做表面文章，其他时候则我行我素，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

卡洛斯原以为教皇一定会欣喜地祝福自己。然而专程去了意大利之后，他并没有得到教皇的祝福，相反，教皇反对进攻阿尔及尔。匈牙利正在遭受奥斯曼陆军的进攻，苦苦支撑。眼下不宜远征阿尔及尔，而应将兵力派往多瑙河。东欧正在遭受奥斯曼的蹂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应该离开欧洲。这就是保罗教皇向卡洛斯表述的意见。

北非及其周边

当天晚上，参战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到卡洛斯下榻的卢卡宫殿，进行商议。可能是从教皇的坦言中获得了力量，多里亚以季节正在变得不利于海上远征为由，率先建议延期到来年春天。被授予陆军总指挥的达瓦洛斯也持同样意见。

全体与会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延期。一直静默听取别人意见的卡洛斯考虑了短短几分钟，所言甚少：“今年必须行动。准备就绪立即出港。神附我体！”

几天之后，卡洛斯乘上多里亚准备的皇帝旗舰，驶向预定的集结地马略卡岛。径直南下就可到阿尔及尔。

10月18日，所有船只整装待发。离集结地最远的拿波里、西西里和马耳他来的船也都到齐。卡洛斯及手下指挥官全体待命。

然而多里亚禁令出港。他要实现大船队南下，一船不落，等待顺风，一举成功乃为上策。于是，出港延期了两天，后又延期了两天。

到了23日，多里亚终于发出命令：第二天一早出发。

1541年10月24日，桅杆上高悬黄底黑鹫皇帝旗的卡洛斯乘坐的旗舰打头阵，右面是教廷海军的旗舰，左面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旗舰，所有船只一齐出港。26日，船队靠近了阿尔及尔所在海湾东面长长的海滨，迅速开始登陆。

登陆时天气骤变。刚刚越过的海平线被乌云笼罩，顺风一变而为暴风，风势越来越猛，还下起雨来。

对地中海气候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连续晴天的夏天结束后，地中海的雨就像西西里人常说的“下得很认真”。大雨倾盆，狂风卷来，转眼成为暴风雨。船只在暴风中摇曳，有的冲上海滩搁浅，有的猛烈冲撞悬崖，船体损毁。

这年进攻阿尔及尔时似乎没有掌握足够准确的情报，登陆地点选在了柏柏尔人居住的区域。他们当然前来迎击。加莱船可以开炮驱散柏柏尔人。但柏柏尔人用小船队分散前来，大炮的炮击便失去了效果。暴雨一宿未停。

第二天中午，陆军登陆完毕。卡洛斯骑在马上，带着近卫队，四处激励已经登陆的士兵。

激励士兵非常必要。帐篷虽已支起，但士兵们已经被暴雨浇成了落汤鸡。士兵们看到骑在马上的皇帝，恢复了士气。

登陆后就要西进进攻阿尔及尔城。部队分为前锋、大部队和后卫行军，以便随时进入战斗。费兰特·贡萨格率领的西班牙兵和西西里兵担任前锋。以卡洛斯为中心的大部队主要是德意志兵，由西班牙第一大贵族阿尔巴公爵指挥。意大利兵和马耳他骑士团担任后卫，科隆纳任指挥。

如果这次行军是在晴天进行，单凭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甲胄、长枪和众多大炮掩护下行进的22 000人的大军就能吓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但风雨中行军，士兵心情黯然，敌人的士气反倒越来越高。骑着阿拉伯矮马的小股部队不断袭击基督教士兵的行军队伍，打了就走。这种波浪式的进攻让基督教军队烦恼不堪。

陆上行进的大军右方是辽阔的地中海，海上的情状也越来越令人恐怖。比加莱船圆而高的帆船在狂风暴雨中进退维谷。加莱船严格遵守多里亚的命令，落下全部风帆，只靠划桨前进，同时注意船间距离，所以加莱船所受损失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习惯用囚犯充任划桨手的西班牙船没有躲过狂风，自撞而沉没的船不在少数。这种船上的划桨手都被铁锁链绑在划桨台上，一旦沉船，他们只能与船共命运。西班牙与意大利不同，是一个盛行异端裁判的国家，从来不缺宗教囚犯。在西班牙人眼里，宗教方面的罪人比强盗更低贱。

不过，即使是其他国家的船，乘员也不能弃船登陆。帆船上装载着远征军所需要的一切，加莱船上还装有大炮。根据事先的安排，多里亚

担任总指挥的由加莱船和帆船组成的舰队要在海上向西挺进，配合陆地上发起进攻的陆军，从海上攻击阿尔及尔。

困扰着陆上行军部队的不仅是狂风暴雨和敌人的袭扰。整夜的暴雨已将枪、火绳和火药统统淋湿，无法使用。西班牙军队长于火器。他们虽然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却无法抵挡靠弓箭和抛石机攻来的敌人。高科技在无法施展的环境里也会不敌古老技术。长枪败给投石机，士兵的士气自然低落。

第二天早晨，情况仍无一丝好转。大海狂躁不已，运输船任凭摆布，沉没的数量不断增加，海滩到处是被冲上来的尸体。补给本该每天一次由海上提供给陆军，现在根本做不到。登陆时随身携带的面包干也吸饱了水膨胀起来，士兵们只好连水一起吞下去。这样的一顿饭，还得在敌人袭扰的空隙才能吃上。

这天下午，大军终于行进到了能够远远望见阿尔及尔城墙的地方。敌人已经完成了迎战准备，城墙上站满了士兵，高塔上红绿黄三色旗在狂风中招展。曾在阿尔及尔住过的同行商人说，那是伊斯兰教徒在迎战基督徒时挂出的旗子。

卡洛斯按照惯例，开战前向阿尔及尔派去了劝降的使者。我们不知道谁是当时阿尔及尔的“酋长”，接待卡洛斯使节的是海盗哈桑·阿加。他在红胡子手下崭露头角，以阿尔及尔为根据地，承担袭击满载新大陆财富返航的西班牙船的任务。从阿尔及尔回来的使节向卡洛斯皇帝转达了海盗的答复：“想要阿尔及尔，凭实力来争夺！”

卡洛斯有足够的信心夺取阿尔及尔，但他的士兵情状悲惨。他们夜不能寐，雨中一路而来，铠甲武器沾满烂泥，冻馁交加。马匹同样无精打采，只能吃到浸透雨水的草料，还要被迫强行军。

这时，一位多里亚派来的热那亚人带着他的信前来。多里亚在信里

卡洛斯五世

写道：如果现在返回登陆地点，尚有足够的船可载士兵回家。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大张旗鼓进攻阿尔及尔的远征军，登陆北非后才两天就不得不撤退。

卡洛斯在将军们的簇拥下远望阿尔及尔城墙，回头简短地说道："撤！"

然而撤退也是一件苦差事：要列队整齐回到登陆地点，不能看出丝毫退却，恶劣的天气没有一点儿改善，还得时刻提防伊斯兰教徒的游击进攻。士兵严禁离队。为了尽量多地带走伤病员，拿不走的物件被统统扔掉。

大炮和搬运用的大车要扔掉。位高权重者的物件如华丽的帐篷、服装、银制餐具也要扔掉。拉车的牛马当场宰杀，把肉分给了士兵。但无火烧烤，无法食用，结果还是全部扔掉。

首先让数以千计的伤病者先行，德意志兵和意大利兵从旁护卫，但不断有人掉队。他们也像无法带走的物件一样被丢弃。大家都明白，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伊斯兰教徒屠杀，便是被送进"浴场"。

无论怎样伪装，撤退骗不过敌人。数倍于来时的敌人发起了波浪式攻击，激烈程度，一浪高过一浪。敌人射出的箭矢甚至落到近卫军骑兵团簇拥下前行的卡洛斯身边。

牺牲最大的是负责后卫的马耳他骑士团。他们像被追赶的小动物，

一个接着一个被猛兽咬死。阿尔及尔郊外的一座桥后来被竟阿尔及利亚人称为“骑士之墓”。泥沼中的撤退，情状极为悲惨。29日夜晚仍旧暴雨连天，帐篷白搭，大家挤作一团过了一宿。

30日早晨继续撤退。风势减弱，雨也小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袭扰骤减，他们都去争抢卡洛斯军队沿途扔掉的东西。

这天傍晚，好不容易回到了原先登陆的海滨。多里亚和舰队等候多时。人们不顾日暮，开始登船。黑夜里登船仍在继续。

31日早晨，登船完毕，可以起航了。然而天气又变。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候。

在多里亚的提议下，联军当场解散，连船带人各自回国。多里亚负有护送卡洛斯皇帝安全回国的责任。但这样的暴风雨，别说到巴塞罗那，就连到马略卡岛都没有保障。于是载有卡洛斯的多里亚船队决定去阿尔及尔以东的布杰，在那里等待天气转好。

秋冬袭击地中海的暴风雨多为来自北方的强风所造成。这时，即使北去马略卡岛有困难，仍有可能靠着热那亚船员水手的能力东去。

布杰现代被称为贝贾亚（Beijaia），与北非其他港口城市一样，也是海盗的基地。西班牙占领扼制阿尔及尔海湾的“佩尼翁要塞”时，布杰海湾海岬上的堡垒也被西班牙占领。后来，“佩尼翁要塞”被红胡子夺回，但布杰的堡垒仍驻有西班牙的守卫部队。卡洛斯如果不想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当俘虏，只能接受多里亚的建议。

卡洛斯竟被困在这个狭小的堡垒中近一个月，天气仍未转好。这一个月中，他的心情一定无法放松。身在阿尔及尔的哈桑·阿加只要愿意，可以轻易攻取孤悬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这个小堡垒。卡洛斯唯有祈求海盗不再来犯。

时至11月28日，天气终于转好，卡洛斯得以上船。回到西班牙南部港口卡塔赫纳已经是12月3日。无人知晓卡洛斯何时从卡塔赫纳回到皇宫所在地巴塞罗那。没有庆祝胜利的凯旋式，他悄然无声地回到了首都。

1541年的阿尔及尔远征行动就此结束。损失的船和人数，一说人员损失1万人，船只损失150艘。准确数字至今不详。西班牙人不像威尼斯人那样认真，打了败仗也要留下准确记录。这就是登陆后前进两天撤退三天的远征结果。

责任在谁一目了然。虽说天气恶劣，但决定在天气多变季节进行远征的毕竟还是卡洛斯。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卡洛斯。

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受上帝之托统治基督徒的人，如果没有传达上帝意志的罗马教皇的加冕，就不能正式获得这个地位。向皇帝问责就等于向上帝问责。信仰深厚的基督徒自然不会。可以向将军问罪，一军之将是皇帝或国王这样的“人”任命的。

没有人追究卡洛斯皇帝的责任。人们并不知道他自己对这次远征结果作何感想。他没有留下一句感慨，也没有发生遭雷劈或者心梗而亡的事情。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遭到了天谴。

人们可以充分想象到，在远征阿尔及尔失败后的地中海世界，海盗将变得更富攻击性，更加残暴。基督教世界地位权位最高的卡洛斯竟然在一伙海盗面前溃败了。

不是西班牙人缺乏勇气和积极性，他们所缺的是实战经验。

法兰西国王对卡洛斯的失策比任何人都高兴。弗朗索瓦一世当然不会在巴黎举行庆祝宴会。法兰西国王由主教亲手加冕，这表示他具有受上帝之托统治法兰西基督徒的身份。对手栽了跟头，对同为基督徒的他

来说正是机会。

弗朗索瓦认为，如今对手卡洛斯威风扫地，正是推翻德意志和西班牙联军势力的大好时机。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他派出全权密使，加紧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之间的联系。

威尼斯的“情报战”

代表国王进行交涉的密使，不能让西班牙、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发觉。为此，必须秘密、安全、迅速地走完从巴黎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遥远路途。

海路，完全未在考虑范围。如果走海路，必须组建多艘船的船队。船队从马赛港出发之后，必须通过多里亚监视的利古里亚海域，再通过奥尔西尼伯爵率领的教廷舰队巡逻的第勒尼安海、威尼斯舰队紧盯着的伊奥尼亚海以及爱琴海，走完通往伊斯坦布尔行程的安全完全没有保证。

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关系友好，但仅承认友好通商的协定，而非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军事同盟。奥斯曼是威尼斯的朋友并不意味着奥斯曼的朋友法兰西也是威尼斯的朋友。法兰西国王派遣的是密使，不能由惹眼的船队护送。国王想到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

密使装扮成贸易商人从巴黎出发，翻过阿尔卑斯山到都灵，乘内河船抵达威尼斯，再由威尼斯换乘商船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当时，意大利北部一分为二，都灵、米兰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西北部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维罗纳和帕多瓦所在的意大利东北部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

弗朗索瓦一世认为，装扮成“商人”潜行，可以骗过西班牙和威尼斯

的眼睛。

他们的确骗过了西班牙当局的眼睛。但接下来是威尼斯共和国。就连自诩且公认是谍报工作鼻祖的英国谍报人员都说，谍报工作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两位密使从巴黎出发时威尼斯就已经知晓。密使也是大人物，要受托全权代表国王进行交涉。密使中的一位原是卡洛斯的外交官，后倒向法兰西国王。另一位是热那亚名门弗莱格佐家族的一员，是法兰西派，在西班牙派多里亚独揽大权的热那亚属于反体制派。

装扮成商人的两位密使每人只带一个仆从，十分像是商旅之行，顺利走完了到都灵的旅程。从都灵雇船沿波河而下，就可以直抵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是当之无愧的欧洲经济中心之一，来自全欧洲的商人云集。他们料定只要混在这些人中，在威尼斯境内就不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

他们在都灵上了船，但没有直接沿波河下行，中途在沿河的几个城镇作了停靠。这条线路每次停靠都能上岸住宿，颇得旅客的赞赏，于是沿波河下行的船不断泊港已成惯例。

船停靠皮亚琴察，下一站就是威尼斯的克雷莫纳。这天晚上，几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密使下榻的旅店。其他客人相安无事，只有两位密使当场被杀，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蒙面人对两个仆从看都没看一眼，就像出现时一样迅速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弗朗索瓦从逃回来的两个仆从的报告中得知此事。

案子不在威尼斯境内，而是在边境归西班牙统治的地方发生的。法兰西国王向卡洛斯提出了正式抗议。

正式抗议密使被杀，这事很荒唐，这样做就公开了法兰西国王向奥斯曼苏丹派遣密使一事，法王这么做另有目的。

法兰西国王企图利用密使暗杀事件撕毁与卡洛斯之间休战条约。

面对弗朗索瓦一世的强烈抗议，卡洛斯答复完全不知情。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半岛的统帅是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他也对上帝起誓全然不知。

教皇保罗三世从罗马告诫二位国王，基督教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停战协定不能因此而被撕毁。他特意给弗朗索瓦一世写去亲笔信，强调与异教徒的国家奥斯曼的同盟才应该废除。

威尼斯以“案子并未发生在我国境内”，一直保持沉默。

但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还对另一件事保持着沉默。

那就是暗杀密使时抢到手的法兰西国王给奥斯曼苏丹的亲笔信。

信上写道，法兰西打算废除与西班牙之间的停战条约，全力以赴投入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共同战线。信中还写道，奥斯曼应下决心在进攻匈牙利的陆路方面投入20万部队。法兰西海军将配合奥斯曼从海上进攻包括意大利南部在内的全部西班牙统治区域。

如果公开这些内容，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的谴责一定会铺天盖地。就连长期争斗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势力都在呼吁团结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伊斯兰。

威尼斯没有也不能公开这封信。

这封信一旦公开，威尼斯在别国，尤其是大国西班牙统治地盘上实施暗杀他人的行为就会暴露。不过，没有公开还有另外的原因。

亚平宁半岛事实上已经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威尼斯共和国是半岛上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威尼斯知道卡洛斯一直觊觎着自己。而只要卡洛斯身边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敌人法兰西，他就没有余力把手伸向明显不易攻取的威尼斯。

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最好莫过于西班牙与法兰西交恶。威尼斯并不担心法兰西海军与奥斯曼海军这个事实上的海盗集团之间的联合。法兰西海军的实力在水平和规模上完全可以忽视。威尼斯没有强大的陆军，尤其担心来自陆地的进攻，最好有别的军队可以牵制西班牙军队。

威尼斯暗杀了两位密使，却放跑了两个仆从。“十人委员会”的真正意图在于让法兰西国王知道二位密使在西班牙领土被害。

行事前深虑至此，秘密情报工作方可称作谍战。收集情报只是工作的一半，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情报。

法兰西国王似乎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与奥斯曼秘密往来了。他决定堂而皇之地向奥斯曼派驻大使，当然，要派护卫船护航。这样一来，威尼斯也就无法出手阻碍了，因为威尼斯是率先保护外交人员安全的国家。

变成国宝的红胡子

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谈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弗朗索瓦一世正式邀请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访问法兰西，访问于1543年实现。

当然，卡洛斯也没有虚度红胡子成行前的这一年光景。

他常常去热那亚商讨对策。安德烈亚·多里亚、瓦斯托侯爵达瓦洛

斯、西西里“副王”费兰特·贡萨格、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和教皇代理人卢伊·法尔内塞，这5个人是卡洛斯在热那亚的常客。

美第奇家族得到卡洛斯的支持重回佛罗伦萨统治者宝座。科西莫一世参加的原因是卡洛斯以20万达卡特转让了里窝那。长期渴望出海口的佛罗伦萨终于有了自己的港口。比萨是中世纪中期繁荣的海运国家，但比萨港却必须沿阿诺河逆流而上才能到达，上游冲下的泥沙长年堆积，港口已不能使用。里窝那港口则使用至今，是16世纪中叶美第奇大公组织的大规模工程。自从有了这座港口，过去一直与海盗无关的佛罗伦萨也加入了抗击伊斯兰海盗的共同战线，成为联盟一员。

1543年春，红胡子按照约定率领仅士兵就有1.4万人的150艘大船队，离开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法兰西大使也一同乘上了红胡子的旗舰。邀请方陪同受邀方同行前往目的地，这符合外交礼仪。但是，邀请方法兰西的国王在马赛等待的受邀方是海盗，前来马赛的航程就不会像一个正规海军司令礼节性访问那样简单。

沿爱琴海南下直到横渡伊奥尼亚海，红胡子一忍再忍。5月中旬靠近亚平宁半岛后，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红胡子命令150艘船兵分两路，一路前去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抢劫。红胡子率领大队进入墨西拿海峡，袭击了墨西拿对岸的雷焦。

雷焦的居民听到奥斯曼船队进了墨西拿海峡时已逃进了山里。海盗登陆时无人抵抗，却留下了可供掠夺的财物。总有人来不及逃跑。他们被逼迫挑着海盗掠夺来的财物、饮用水和食物上船。法兰西大使看到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也许他只认为这些人是我王憎恨的敌人卡洛斯的臣民。被带走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当夜就被逼改教，成了红胡子一个手下的私有财产，遂了那人的愿。这件事成了水手们的话题，大使不会不知道。

在第勒尼安海中沿意大利南部西侧北上掠夺布里亚的一路人马赶了

上来。红胡子及其手下就像洗劫海岸线一样，一路北上洗劫了卡拉布里亚和坎帕尼亚，实施掠夺和绑架。

船队一路洗劫，渐渐靠近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沿台伯河逆流而上就能到达罗马，这是连刚做海盗的人都知道的事。红胡子似乎一度也为给罗马一击的诱惑所动，同行的法兰西大使说，如果进攻教皇所居之地，法兰西国王也许会不高兴。红胡子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是在奥斯提亚港抢了些水和粮食。

红胡子从这里开始停止沿意大利半岛北上，而是向西北转向，穿过科西嘉与撒丁之间的海域，一气抵达马赛。这样走无须通过多里亚所在的热那亚近海，对红胡子有利。

7月5日，红胡子率领150艘船，昂然进入了马赛港。

弗朗索瓦一世在王宫等候红胡子，宫廷高官到港口迎接。也许是出于对传奇人物的好奇，民众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在人群的簇拥中，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带着两名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帕夏从船上走下来。

红胡子身穿金光闪闪的奥斯曼风格长袍，头戴五彩缤纷的宝石装饰的白色头巾，华丽而又威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红胡子在法兰西高官的引导下穿过人群前往宫殿，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热情欢迎。

弗朗索瓦一世

红胡子

没有人知道欢迎宴会结束后红胡子在哪里又是如何度过的第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就在码头指示手下，挑出25艘船，把一路上掠夺的财物和绑架的人运回北非。这天，码头上也满是看热闹的人。被绑着带走的人和看热闹的法兰西人都是基督徒。25艘船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航了。

被视为法兰西派的意大利贵族也受邀参加法兰西国王的欢迎宴会。在国王的介绍下，逐一向红胡子致欢迎词。

这其中也有奥尔西尼伯爵的身影。

伯爵在安德烈亚·多里亚当上卡洛斯的海军将领以后，几乎年年都是教廷海军的司令官。他和小多里亚一道，是抓捕号称红胡子左膀右臂的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他还经常率领教廷海军参加多里亚统率的对海

盗的作战行动。我们不知道这位伯爵在红胡子面前鞠躬时内心的想法。但没有什么事情比他出现在这种场合更能反映当时意大利的分裂状况了。

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两个家族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罗马的实力贵族。这两家是竞争对手，关系总是不睦。只要科隆纳家族接近西班牙，奥尔西尼家族就会靠近法兰西。即使奥尔西尼是教廷海军司令，也仍然属于奥尔西尼家族。

热那亚的四大家族也总是分成两派，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以血还血的内斗历史。与多里亚和斯皮诺拉联盟对立的是费耶斯基和弗莱格佐联盟。现在，多里亚当上了卡洛斯的海军将领，弗莱格佐就要做法兰西的密使去奥斯曼。

佛罗伦萨也一样，国内分裂为两派。美第奇家族与斯托罗兹家族是宿敌。

这就与中世纪时代“教皇派”（guelfi）和“皇帝派”（ghibellini）的两派争斗一样，只不过这种争斗经过文艺复兴进入近代之后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之间的争斗而已。

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权力的人往往借助外力或外人达到目的。对意大利人的愤怒促使马基雅维利写成了《君主论》。可以对《君主论》进行各种批判，唯独不能批判其伪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没有这种内部争斗。威尼斯留下了许多详尽而准确的记载，但却没有写出向人类现实发出警告的《君主论》。这也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无此必要的缘故吧。

弗朗索瓦一世年轻时曾在意大利被引见给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如今他已年近50，好奇心却丝毫未减。他对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说，想看看停满马赛港的奥斯曼舰队。国王

的愿望当即就被满足。

从加莱船到帆船弗朗索瓦一世看了个遍。虽说舰队停泊在基督教国家的港口，但基督徒划桨手却被铁锁链铐着扔在甲板下面。

这些人的遭遇，似乎一点都未能打动曾经三次邀请达·芬奇的弗朗索瓦一世。也许这才是人性的现实，他们的遭遇，连反映庶民思想的编年史中也没有记载。

此后近一年，红胡子一直呆在马赛。与其说他喜欢法兰西，不如说他的任务就是细化奥斯曼与法兰西的联合作战方案。

但是，就算当上了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还是一个海盗。接近8月底，法兰西—奥斯曼联军开始对西班牙统治区发起进攻，与海盗的袭击同出一辙。

袭击的目标是从尼斯到圣雷莫，即今蓝色海岸一带。西班牙派的热那亚人顽强反击，多里亚也加入其中。尽管红胡子亲自指挥，袭击也未取得多大战果。

基督教世界终将矛头对准可耻的法兰西，谴责它勾结伊斯兰海盗，实施海盗行为。这已经不是谴责，而是憎恶，就连不可一世的弗朗索瓦一世也不能置之不理。

然而，红胡子照样待在马赛，好像在告诉人们，马赛已像阿尔及尔一样，变成了他的基地。红胡子率领海盗船从马赛出发，烧杀掳掠后再返回马赛。

对此，弗朗索瓦一世也很为难。他婉言劝说红胡子回东地中海，但红胡子照样进出法兰西的港口，如同自家一般。后来，在船上装满80万枚金币总算请走了他。按照红胡子的要求，金币当面点清。据说80万金币可以买下巴黎全城。金币1 000枚装一袋，整整数了三天三夜。

这就是华丽开场的法兰西—奥斯曼同盟的结局。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法兰西人不懂政治。这句话如今依然言犹在耳。

到了1544年春，红胡子终于离开了马赛。他是奥斯曼海军正式的总司令，要率领舰队回到伊斯坦布尔。红胡子本质上是个海盗，他不愿意直接回去。海盗有需要什么就抢什么的习惯，根本不会事先准备长途旅行所需要的物资。于是，归途也是一路掠夺。这次，佛罗伦萨人路易·斯托罗兹奉法兰西国王之命陪同红胡子回伊斯坦布尔，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卡洛斯和手下的将军们经常聚集在热那亚，反复讨论过对策，在奥斯曼船队途经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加强了防守。多里亚防守的热那亚自不必说，美第奇在里窝那加强了防卫，与教廷海军基地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一起，建成经得住百艘以上的红胡子船队攻击的防御体系，但红胡子必须补给新鲜水和食物。结果，这一年又是防卫薄弱的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遭殃。

绕开防守坚固的地方航行，红胡子只靠近了一次意大利。那是在路过厄尔巴岛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干海盗勾当。当初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他与手下“犹太人西纳姆”有过约定，他要去践约。

海盗之子

9年前卡洛斯率领基督教军攻打突尼斯时，俘虏了西纳姆的儿子。那时，他年方10岁，被参加进攻的皮翁比诺领主领养。西纳姆拜托红胡子抢回这个儿子。

红胡子把船队停泊在厄尔巴岛，向不远的皮翁比诺领主派去了使者。使者带去的信上写道：是交还西纳姆的儿子，还是等着进攻？

9年来，皮翁比诺的领主阿皮亚诺养育了这个少年，视同己出。西纳姆的儿子已会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意大利语甚至法语，并已成长为一个具备当时一流教养的年轻人。

青年说自己去见红胡子。据说阿皮亚诺流着眼泪，目送着他身着文艺复兴风格的服装，乘着奥斯曼船远去。红胡子也遵守承诺离开，没有动皮翁比诺一个手指头。

相传第二年，犹太人西纳姆奉奥斯曼苏丹之命，接受了袭击途经红海的葡萄牙船的任务，终于又与儿子重逢。也许是与出落成出色青年的儿子再会使他兴奋过度，这个海盗突发心脏病，当场猝死。

另外，在一份同时期威尼斯驻奥斯曼大使的报告里写到过一位通晓西欧语言的年轻奥斯曼外交官的情况。如果这位年轻人与西纳姆的儿子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在意大利成长了9年的海盗之子并没有子承父业。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外交关系频繁，越来越需要懂得语言、精通事理的官员。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提高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同盟的实效性，邀请海盗出身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去了法兰西。红胡子在马赛一待几乎就是一整年。

弗朗索瓦一世因此得到了什么呢？

至少迫使卡洛斯不得不下力气加强防御体系，不得不放弃进攻威尼斯共和国，从而阻止了他完全称霸亚平宁半岛。不过，与其说这有利于法兰西，不如说有利于威尼斯。而且，苏莱曼最终也没有向匈牙利战线投入20万兵力，把卡洛斯逼入窘境。

然而，作为代价，弗朗索瓦一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以下损失。

第一，他不得不向红胡子支付了80万的巨额金币。报告此事的威尼

斯史料中使用了“buona uscita”的表述。这个词语在现代的意思是，房东为了让占据着租屋不走的房客老老实实地搬出去而向其支付的金钱。

第二个损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潮水般的谴责。

国王不在乎世间谴责的想法并不全对。来自民众的谴责，有时会给反对派以大义名分。即使是专制君主，总是无视的舆论也会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红胡子进出马赛如同自家，他及其手下带来的损失惊人。他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实质是海盗行为。仅此所带来的人员损失，就有1.5万到2万基督徒遭到绑架。每次处理这些“收获”，红胡子都要动用一部分海盗船只，将他们装运后送去北非。目的地当然是几乎所有北非港口城市都有的“浴场”。人数之众为近年所无，人们甚至说，相当一段时间北非不再需要补充划桨手。

绑架基督徒并不单为了确保以划桨手为主的劳动力。“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到这时已经持续了500年，北非人已经知道，即使是不适合重体力劳动的老人和病人都能换钱。马赛市民在这一年中不断看到去北非的船上甚至混杂着不知为何而被绑架的人。

“拯救修会”筹集赎金的手段之一是把用过的罗盘放进各个教堂收集捐款。法兰西南部的教堂里也放有这种罗盘。

此外，对法兰西国王有逆反。在不满国王外交的诸侯子弟中，志愿参加对伊斯兰海盗态度强硬的马耳他骑士团的人数有所增加。

这样，弗朗索瓦一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向红胡子支付80万枚金币后请他离开。

然而，同样的事情会因不同的国家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

红胡子结束了在马赛一年的逗留，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上自苏丹下至码头挑夫的欢迎。红胡子集奥斯曼帝国全国尊敬于己身，两年后度完了自己的余生。1546年红胡子去世，伊斯坦布尔有红胡子的墓地，参拜的奥斯曼人至今络绎不绝。红胡子仍被现代土耳其人尊为“土耳其海军之祖”。

苏丹授予红胡子的官衔由其后代继承。我只能将这个官衔翻译为“海军总司令”。不过，在伊斯兰教徒的最正统语言阿拉伯语中，这个词是用由司令官之意的“amir”和海军之意的“al-bahr”合成的词语。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ammiragio”，在英语中是“admiral”，在法语中是“amiral”，在西班牙语中是“almirante”。在日语中，直到前不久还是“アドミラル·トーゴー”（adomiraru·togo）。从这个角度看，红胡子有资格名垂海军史。

不过，造访伊斯坦布尔，向现代土耳其人打听墓地所在地时一定要说“Khair-ad-Din”，否则对方听不懂，红胡子是欧洲人为他起的绰号。

最后的晚年，红胡子决定享受退休生活。苏丹任命图尔古特接替他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也就是那位多里亚好不容易才抓住，却只用3500达卡特赎金便换得了自由的图尔古特。

由海盗头目担任正规海军总司令，在奥斯曼已经渐成惯例。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的海域就是与基督教世界面对面的西地中海，这也渐成常例。

图尔古特回归

图尔古特的准确生年不详。从他的经历推测，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那年，应该在37岁左右。

他出生于安纳托利亚，是一个纯粹的奥斯曼人。人们经常看见他的行为不像海盗而更像奥斯曼人，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出身的缘故。

图尔古特年纪轻轻便投身军旅，起初在陆军当兵。但即使在奥斯曼引以为骄傲的陆军中，常备军事力量也只有奥斯曼新军军团。奥斯曼新军军团是奥斯曼军队的精锐，只有从小就被强制集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才能成为这个军团的一员。奥斯曼人只能在因战争才会组建的军队中服兵役。图尔古特在埃及战争结束后便失业了，以后涉足海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问你的民族与出身。

刚入行时，图尔古特在以杰尔巴岛为根据地的犹太人西纳姆手下做事，崭露头角后便被红胡子看中。他的名字最初为西欧所记录是在1533年袭击威尼斯商船的时候。

威尼斯人认为，只有记账准确，才能做好生意。他们记录所有一切，甚至记下了袭击本国船只、年纪尚轻的海盗的名字。他们还记录与威尼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种性格正是威尼斯古文献库成为地中海世界历史宝库的原因。

如果当时被捉住，按照威尼斯把海盗吊在帆桁上的做法，图尔古特的一生就会当场结束。幸运的是他活着逃回了红胡子的身边。

5年后，发生了红胡子与多里亚正面对决却又以奇妙形式结束的“普雷维扎海战”。当时图尔古特很年轻，三十左右的年纪却已经成长为红胡子的左膀右臂。

“普雷维扎海战”结局奇妙，但获胜的是红胡子。伊斯兰方面也许因此认为基督教海军不足为惧，红胡子竟把西地中海交给了年轻的图尔古特。

于是，多里亚不得不专心驱逐图尔古特，终于使用安德烈亚·多里

亚式的战略，成功地抓住了图尔古特。整个地中海世界都知道了图尔古特被捕的消息，这证明了图尔古特的海盗价值。

然而，多里亚放虎归山。权且不论3 500达卡特的赎金是否过于便宜，这次重获自由的并不是来日无多的老海盗，而是年方而立、颇具才能的汉子。

5年后，他取得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正式任命回归。不到40岁的新任总司令接替了功成名就的红胡子，被委以重任要把基督教世界逼向末路。

自1545年至1560年的15年间，地中海西部成为“图尔古特之海”，再也没有国家和个人挺身而出抗击奥斯曼海盗。

1547年，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驾崩，亨利二世继位。这位法兰西国王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对卡洛斯的憎恨。

两年后的1549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去世。在反宗教改革势力增强的罗马教廷里，这位教皇一直致力于改善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努力团结基督教各国抗击以海盗为先锋的奥斯曼势力，做了罗马教皇所能做的一切。在他之后，教皇都完全按照西班牙国王的意志行事。

西班牙至今仍在酿制一种名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的白兰地酒。即使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卡洛斯一世对西班牙人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在西班牙历史中，没有任何人治下所拥有的领土比卡洛斯时期更为广阔。他16岁就登上了王位。1545年，他才只有45岁。年纪轻轻就开始活跃的人，活力也会早衰。长年的对手退场，目标也就失去。从这个时期开始，卡洛斯越发消极，与实际年龄不相吻合。他死于1558年，但从数年前开始，他在修道院的日子已经多于宫殿。

多里亚年过五旬才开始活跃，他的活跃时期持续很长，人们都说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1545年他已79岁。两年后热那亚发生“费耶斯基之乱”事件，年逾八旬的多里亚不得不逃离热那亚，暂避风头。

这是一场费耶斯基家族策划的反对多里亚绝对权威的政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多里亚重返热那亚，但被他确定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却在骚乱中被杀。简内特·多里亚是5年前抓捕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合适的接班人人选。这位甚至被卡洛斯法看中的年轻将领，没有死在与海盗的战斗中，却殒命于本国的内讧。

这就是图尔古特回归时基督教方面的现状。地中海西部理所当然地成为“图尔古特之海”。

图尔古特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决定把基地定在马赫迪耶，既不是阿尔及尔也不是突尼斯，更不是他年轻时的“家”杰尔巴岛。马赫迪耶位于突尼斯以东的海湾。这里的港口原来是北非伊斯兰化时作为圣都建造的凯鲁万的外港。图尔古特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帝国的纯粹一员。凯鲁万是伊斯兰在西方的圣都，堪比东方的巴格达。可以想象，在他看来，把根据地放在背靠圣都的港口以对抗基督教世界，是伊斯兰赋予自己的职责之所在。

以基督教世界的状况，图尔古特甚至没有必要像红胡子那样统率数量超过百艘的船队。他经常从马赫迪耶出发北上，专事海盗活动，常备船队也只有40艘左右。对手力量削弱了，这点儿船也就足够了。

卡洛斯、多里亚和教廷，面对图尔古特并未袖手旁观，但却不似以前那样态度坚决，组建大军进攻。

不过，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所说，战争的进程取决于谁掌握主导权。只要掌握了主导权，以后的战斗就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展开。相反，主导权一旦落入敌手，再努力也会受制于人，即使孤注一掷，一决胜负，对

敌人也形不成致命一击。

图尔古特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的15年，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就一直掌握在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一方。

不过，如果海盗挑起海战，强于正面海战的基督教方面大概会夺回主导权。被称为海之狼的多里亚虽然年迈但尚健在，图尔古特深知这一点，他规避正面海战，完全采取了今天所谓的游击战法。

我认为图尔古特在这一点上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巧于组织，灵活使用各自为战的战术。他以基地在阿尔及尔，表现活跃的哈桑·阿加为首，让在西欧颇有名气的六七个海盗头目从各自位于北非各地港口的基地出发北上，分别大干海盗勾当。

西欧用意为风暴同时兼有鸟群之意的“storm”一词来形容这个时期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的袭击。鸟的行动不是以大集团，而是以分成小规模的群体进行。从北非北上而来的海盗集团也像不同的鸟群一齐飞落那样袭击地中海沿岸各地。

马耳他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执拗地坚持抗击“storm”。

这个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叫作“罗得岛骑士团”，根据地迁到马耳他岛后又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而它的正式名称是“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的创建可以追溯到公元1113年，创建的目的是向前往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提供医疗服务。与十字军时代的其他宗教骑士团体一样，十字军东征后，保卫十字军国家越发重要。保卫基督徒不受伊斯兰教徒之害的目的，让这些人成为站在抗击伊斯兰最前线的战士。

成为骑士团团员有着严苛的条件，团员只限于贵族，或堪与贵族比肩的实力家族出身者。但从创建的理由看，这个组织可以说超越国界，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并一直保持了这种形式。顺便说一下，这个时期的骑士团团长是英格兰人谢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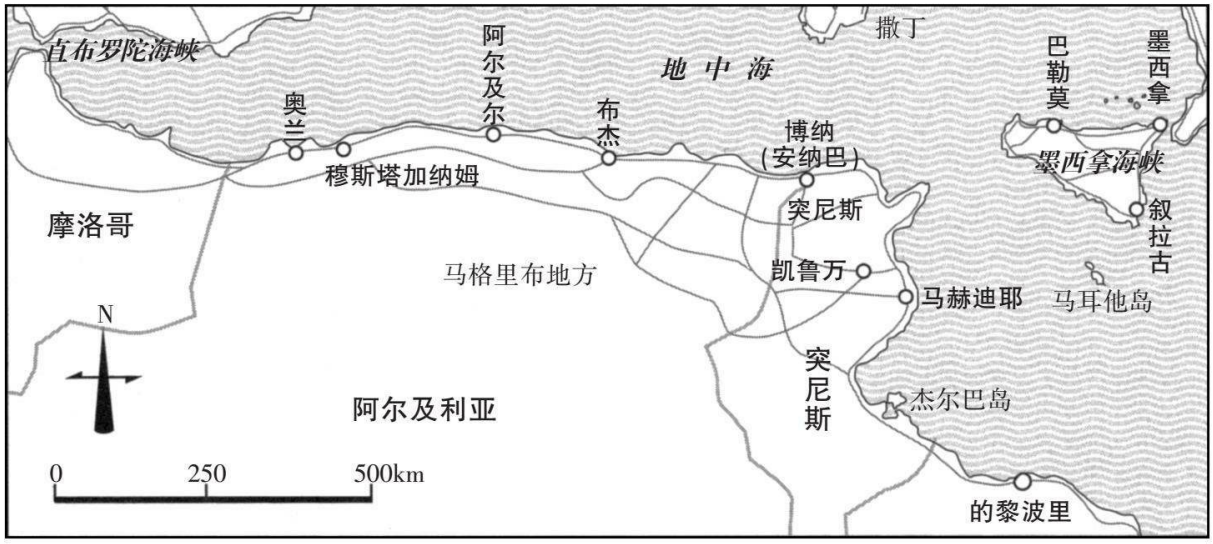
1197年生于普罗旺斯的法兰西人玛塔修士创建的“拯救修会”、1218年西班牙人诺拉斯科创设的“拯救骑士团”也都是国际性组织。这些团体的成员是来自欧洲全境的志愿者，与创建者的出生地无关。

到了这个时代仍在坚持活动，说明需求仍然存在。这两个团体的目的都是拯救支付不起赎金的人们。但“拯救修会”与“拯救骑士团”两者之间活动色彩略有不同。

“拯救修会”不仅支付赎金，把人带回祖国，还在收容这些人的“浴场”里建立小型教堂，重视精神方面的救助。此外，还设立了医院，治疗疾病和伤痛。因而一时间在异教之地北非逗留的修士不在少数。

“拯救骑士团”是骑士组织，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修士。他们的活动只集中于支付赎金，带回被绑架者这件事上。也因为如此，“拯救骑士团”的活动不只局限于临海港口城市的“浴场”。他们甚至涉足突尼斯、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内地，寻找已经失去返回故乡希望、被迫从事劳动的基督徒奴隶。这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与沿海地方不同，北非内陆地区对基督徒而言危险多多。但既是骑士，就要甘冒风险。有去无回的骑士数量众多。他们通常是两人同行，但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我认为，这两个组织就是今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或红十字会。马耳他骑士团同样是国际性组织，但我却不认为它也是这样的组织。



北非与马耳他岛

马耳他骑士团遵守了创建以来的传统，把医疗作为骑士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在马耳他岛上的骑士团医院医疗水平之高，据说可与当时欧洲最高水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医院相媲美。

不过，骑士团的主要任务终究在于与伊斯兰战斗。从基督教各国汇集而来的骑士是抗击伊斯兰的战士。这体现在要成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贵族出身是必须条件，而同属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医师却不要求有贵族血统。骑士团遭到奥斯曼军队进攻不得不离开罗得岛，找不到安身之地。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他们。人们一看地图就会立刻明白，马耳他岛位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也有软肋。由于骑士仅限于贵族，故数量很少。宗教骑士团的骑士是被当作修士一样对待的，不准结婚，人数只能靠外部补充。这是骑士数量在低水平徘徊的主要原因。在组建基督教联军时，马耳他骑士团通常只能有三四艘船参加，没有那么多士兵需要更多的加莱船运送。

尽管如此，马耳他骑士团却能一直挺立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原

因是他们自己的做法与伊斯兰海盗如出一辙。

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中，只有马耳他骑士团的船把伊斯兰教徒绑在划桨台上充当划桨手。原因是马耳他岛全岛一片荒凉，原本居民就少。马耳他骑士团不仅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与海盗一样。他们袭击伊斯兰船只，抢人劫财。只要船还能用，他们就会牵引到马耳他，改建成自己的船。不能用的船，便当场烧毁或凿沉。也许是因为他们站在最前线，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战胜敌人的最有效办法。

不过，即使这样，马耳他岛上也没有“浴场”。骑士团也没有把只要支付赎金就释放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当作自己的财源。

他们似乎暗地里进行着俘虏交换。有不少确实被海盗抓走的骑士后来又积极活动的事例。为什么这些骑士能够回到马耳他呢？骑士团的记载始终不着一言。

不过，海盗也好骑士也罢，失去有能力的人才对谁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海盗抓住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会将他们投入监狱，储存起来，作为海盗被抓时的交换对象。

图尔古特被抓住时，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拉·瓦莱塔对这个被五花大绑仍大骂不止的海盗说道：“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可两年不到拉·瓦莱塔竟被图尔古特手下的“坎迪亚的瘸子”抓住。这个“瘸子”当然把这件事报告了已恢复了自由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命令将他投进“浴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只要不是自己要求，一般不会被投进“浴场”，只有拉·瓦莱塔进去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浴场”经验。但不知何时他又回到了马耳他，比之前更加活跃地奋战。

如果说多里亚的宿敌是红胡子，那么图尔古特的宿敌就是就是出生

于奥弗涅的法兰西人骑士约翰·杜·拉·瓦莱塔·帕里森。他们俩一个在马耳他，一个在突尼斯东岸，近在咫尺。长达20年之久的对峙终于在1565年马耳他岛攻防战而达到顶点。

马耳他骑士团站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的港口就成了各地舰队的集结地。当时欧洲对抗击海盗的消极态度也表现在了集结到马耳他的舰队上。

马耳他骑士团：4艘加莱船

教廷海军：3艘加莱船

西西里：4艘加莱船

齐卡拉子爵：3艘加莱船

摩纳哥公国：2艘加莱船

其他：2艘加莱船

共计：18艘加莱船

西西里的4艘船是奉西班牙国王之命而来，尽管马耳他骑士团被卡洛斯放在了前线，但卡洛斯也参与抗击伊斯兰的战争。齐卡拉子爵原本是热那亚人，因热那亚内讧而移居西西里。为了保卫自己在西西里的领地，他从这个时期开始率领自己的加莱船参加了抗击海盗的战斗。

摩纳哥公国存在至今，也起源于内讧中败北而移居摩纳哥的热那亚市民。摩纳哥地处沿海，遭到海盗袭击无山地可逃，为了自卫必须奋起反抗。其他的两艘船来源于意大利各地的志愿者，是在沿海地区拥有土地的人们出资组建的加莱船。既然大国不能保卫自己，就只有靠自卫。

这支舰队一看便知是拼凑而成，图尔古特自然认为只要有40艘“福

斯塔”便可对付。

然而，如此规模的舰队见到海盗船也会勇敢挑战。我们反复讲过，海盗不喜海战。加莱船是用于打仗的，海盗发现加莱船队便立即逃窜。马耳他骑士团主导的基督教舰队所能做的也只是驱散敌人而已。

海盗分散行动。你能赶走一个海盗，却无法驱赶其他海盗。追击一个海盗，却让图尔古特乘机北上。

一次，骑士团的船只载着从欧洲各地募集来的7万达卡特的巨额资金，在去马耳他途中停靠拿波里附近的波佐利港，遭到图尔古特及其手下的袭击，船只悉数被夺。这是用于建设利比亚的黎波里防御设施的资金，卡洛斯将的黎波里与马耳他一道转让给了骑士团。骑士团当即策划夺回资金，但直到两年之后才将船只夺回。

就这样的状态下，1550年临近了。对基督徒来说，这一年是25年一遇的“圣年”。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每到“圣年”也会有大批信徒来到罗马。对生活在16世纪的人们来说，除了军事和商务，旅行就只有朝圣。不论老少贫富，一到“圣年”大伙都会一齐奔向罗马。在这一年朝圣罗马，会比其他年份获得更多的罪过赦免。对善男信女来说，免罪的好处更胜于途中的危险。生前积下罪孽的多少对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极大的影响。

朝圣者汇聚到罗马来迎接“圣年”,保障他们的安全本来是主办者教廷的义务。但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于是以保护基督徒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便应担任保护者的角色。这是基督教会的规矩。

但卡洛斯年近半百，并不积极。他命令多里亚想办法。走陆路来的朝圣者多于走海路的人，但陆路也是越接近罗马越靠近海边。去罗马要经过古代的罗马大道。大道靠近海边，虽然平坦，但遭海盗袭击的危险也大。

多里亚接到卡洛斯设法保护朝圣者的命令，不顾84岁高龄，决定亲自指挥。他所考虑的战略，虽具多里亚式的大胆无畏，却只有暂时效果。

多里亚是西班牙海军总司令，如果他亲自出马，包括马耳他骑士团在内，各加盟国的所有舰队都会归入他的指挥。当时的总体战斗力情况不详，多里亚自己的20艘，加上西班牙及教廷海军的3艘、马耳他的4艘，和镇压了费耶斯基之乱的热那亚，还有来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船只，光是加莱船就有50艘之多。多里亚重视后勤，没有运输船便不考虑远征。加莱船加上帆船，总数当有百艘。

多里亚不会坐等图尔古特北上再予以迎击，而是考虑进攻图尔古特的基地马赫迪耶。

多里亚虽然年迈，但依旧雷厉风行。他没有把集结地定在一个地方，等待全军集结。他的办法是一边在热那亚、奇维塔韦基亚、拿波里和墨西拿召集船只，一边南下，在西西里海域与马耳他的4艘船会合后，所有船只才到齐。然后全军直取位于突尼斯东部的马赫迪耶。多里亚一开始就放弃了从陆上进攻的战术。他的陆上战斗力不够。

7月11日开始了对图尔古特基地马赫迪耶的攻击。士兵们从海上炮轰之后登陆作战，与前来迎战的海盗展开持久的白刃战。

登陆后的战斗十分惨烈，一开始就死伤不断。能够收容的遗体和救出的伤员被装船运到马耳他。这样的运输船来回穿梭。7月过去了，8月也结束了。

9月，马赫迪耶终于陷落。敌人大多被杀或被俘。从马赫迪耶的“浴场”里解放了700多名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在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就战死80人，受伤200人。牺牲最

多的是马耳他骑士团，战死者达到30人。连续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冲锋在前，英勇作战。

战死的骑士们被葬在西西里最美的蒙雷阿莱大教堂。教堂里刻着卡洛斯亲笔写的一段文字：

> 这片大理石地面下长眠着因义而献身的战士们。他们拼死留下的业绩永恒！在引领英雄的坚强信仰面前，上帝将把天国里最好的席位赐予他们。他们的勇气带给我们荣光。这些战士们肉体里流淌出的鲜血，将变成他们由匆匆过往的现世去往永恒来世时的辉煌。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领袖，这是理所应当的悼词。但麻烦的是，伊斯兰方面也有人怀着同样的想法。

马赫迪耶被攻占后，1 000名西班牙士兵驻扎于此，并像在突尼斯一样扶植了一个当地人“酋长”，替代海盗进行统治。条件也和攻占突尼斯时一样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海盗作基地。不能想象多里亚会相信这样的战后处理，但在多里亚看来，这样即可完成卡洛斯让他想办法去完成的任务。1550年一年中，没有发生朝圣者的船遭到海盗袭击，也没有发生朝圣者充斥北非“浴场”的情况。

10月中旬，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全部离开马赫迪耶，返回各自的港口。多里亚也回到热那亚。他对这一年的战果并不满意，图尔古特逃脱了。图尔古特老早就逃回了他的老窝杰尔巴岛。

进入第二年（1551年）后，多里亚很早就收到了情报，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开始备战，准备雪耻。多里亚不顾适航的春天尚未来到，着手组建攻岛舰队。虽然只征集到28艘加莱船，84岁的海军将领只带着这些船就从热那亚出发，南下抵达北非，旋即开始进攻杰尔巴岛。

老年安德烈亚·多里亚

然而，28艘船数量太少，陆上战力也太弱。多里亚一边炮击杰尔巴港，一边向西西里和拿波里派去快船，请他们派来援兵，但多里亚无功而返。与其说是志愿者数量减少，不如说招募志愿者的一方毫无热情。对“圣年”的热度高涨，对伊斯兰海盗的战斗意识反而下降了。

当多里亚得知图尔古特再次逃掉的时候，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并命令自己指挥下的所有船只各自国。这一年多里亚打了最后一次多里亚式的仗。85岁的高龄对他已是重压。

下定决心撤退，还要尽可能减少损失，对领袖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战斗打响后不战而退，会增长敌人的勇气。前一年刚占领的马赫迪耶自不必说，连好不容易赶走了海盗的突尼斯，海盗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

卡洛斯理当奋力挽回局面。然而他却失去了对权力的留恋。他先把对荷兰和勃艮第的统治权让给了儿子腓力，后来又把自己统治下的美洲新世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统治权交出。他在56岁进修道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让给了他的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卡洛斯作为一个修士度过了最后的晚年，他于1558年去世。

多里亚也老了。奥斯曼海军策划占领科西嘉时，他曾不顾年老体衰率领40艘船上阵。如果科西嘉也被伊斯兰化，它对岸的热那亚便国门洞开。这次战斗也只取得了暂时的成果。奥斯曼海军撤退，没有酿成大祸。

多里亚于1560年去世，晚卡洛斯两年。他活了94岁，是罕见的长寿者。

继承弗朗索瓦一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亨利二世，利用老卡洛斯消沉的机会，拿出了颠覆西班牙优势地位的计策，但他的做法只是模仿先王弗朗索瓦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种想法没错。但实际这样去做，便是缺少政治感觉。

他要与奥斯曼共同作战，组建舰队，扫荡西班牙统治下的各国。但奥斯曼派来了120艘加莱船，而法兰西只有20艘参战。决定进攻地点和进攻方法，以及如何分配掠夺来的人与财物，当然是承担风险多的一方有决定权。法兰西与奥斯曼共同作战所得到的只是基督教世界的谴责和轻蔑而已。

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因为前一年作战又输给了西班牙军队而死心，1559年4月，亨利二世与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缔结了媾和条约。谁都欢迎基督教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和平，法兰西举行了种种庆祝活动，热烈豪华的场面吸引了欧洲人的眼球。

然而，亨利二世作为国王，政治上浅薄，在个人性格方面也很浅

薄，他竟亲自上场参加庆祝活动中的一项马上长矛比赛。

他似乎还对比赛中作为自己对手的骑士说不要手下留情。这样做很公平，但对手当真按他所说，一矛刺来，刺穿了国王的右眼。国王从马上摔下，不久断气。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王妃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美第奇家族的卡特琳娜）的眼前。亨利二世留下了一个打着不同宗教旗号，处在血腥内战中的法兰西。法兰西的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地中海，即抗击伊斯兰的问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为了欧洲第一实权人物。

“杰尔巴屠杀”

作为儿子，腓力二世刚一继位就一心想着如何超越声望很高的父亲。他决定夺回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这是卡洛斯去世前一直没有做到的事。不过，这对父子不同的是，卡洛斯多亲自率军，但儿子腓力却不是这样的脾气。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卡洛斯和腓力的时代，但腓力二世却非亲自动手即自己承担风险型的君主。

细细想来，腓力夺回的黎波里的主张是一个可笑的借口。

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从来就不曾是西班牙的领土。1530年，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圣约翰骑士团的同时，也把的黎波里赐给了骑士团。但那实在是一种没有责任的让渡，感觉就像是对骑士团说了句话：赶走住在那里的几个伊斯兰教徒，那里就是你们的了。

无处可去的骑士团竭尽全力把马耳他岛改造成了根据地，但对的黎波里却鞭长莫及。马耳他是海岛，而的黎波里却是北非的一部分，建设和防御都不容易。尽管骑士团一度建了一座城堡，驻扎了一支军队，但受到一次攻击后就撤退了。马耳他的城池建设和防御已很辛苦，再将隔着大海的的黎波里纳入骑士团的防御圈，这对战斗人员不到1 000的马耳他骑士团来说，负担过重。

腓力二世却想越俎代庖。我们已经提到多次，西班牙国王们信仰笃深，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相比有天壤之别。于是，为了上帝一句话就会让他们不顾一切。

这次打的是“基督教联军”的旗号，与新老交替的时期正相吻合。可是，新老交替只是基督教方面，伊斯兰方面并没有变化。奥斯曼的苏丹还是苏莱曼，被委以现场指挥的海军总司令也还是图尔古特。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生于1527年，从策划夺回的黎波里到以失败告终，是他33岁到35岁的时期。作为一国之主，这个年龄已经不再稚嫩。这位不上战场的最高司令官把现场指挥权交给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当时以“副王”的名义代西班牙国王统治西西里的美第纳切利。与其说他是一个武将，不如说他是一个宫廷官僚。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如果没有另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的命令便不行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情况将会如何？腓力二世偏偏让这个人做自己的现场代理人，任命他为“基督教联军”总司令。

另一个是接替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他很年轻，刚满20岁，从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那里继承了船只、水手等一切。多里亚没有儿子，培养作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抓捕图尔古特的功臣，已在使热那亚陷入混乱的“费耶斯基之乱”中殒命。

腓力二世把“基督教联军”的命运托付给了这两个人。拿破仑后来曾说：“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要是他知道了这个任命，又会说什么呢？

法兰西没有参加这支打着“基督教联军”旗号的军队。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有参加，理由却与法兰西不同。结果，参战者都是老面孔。战舰的数量以加莱船计算如下：

教廷：3艘

马耳他骑士团：5艘

热那亚：13艘

拿波里：5艘

西西里：8艘

佛罗伦萨：4艘

共计：38艘

热那亚的13艘船是受雇于西班牙王的多里亚的船队，拿波里和西西里算在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份内。佛罗伦萨的4艘来自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出力建造的海港里窝那。美第奇家族从这时起开始积极投入抗击伊斯兰势力。

这38艘船加上摩纳哥公爵的2艘、齐卡拉子爵的2艘等由各地小领主率领但费用由西班牙国王承担的15艘，共有53艘船。西班牙本土没有船只参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大概认为，加上热那亚、拿波里和西西里的15艘船，自己已经动员了41艘加莱船参战。所有船上乘载的1.4万士兵多为西班牙士兵，腓力二世一定认为，西班牙已经负担了全军的五分之四。

这个规模的战斗力已经足以与图尔古特匹敌，不过条件是不能浪费时间。

首先，全部船只集结到墨西拿耗费时日过多，离开墨西拿时已经入秋。地中海的秋季天气多变。船队到马耳他岛之前天气尚好，但到马耳他时天气转坏，不得不在马耳他港紧急躲避。

但更糟糕的是，船队一出马耳他港就不得不返航，如此反复了5次。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他们只想着不怕碰壁，反复挑战便能闯出一条路，却不懂得迂回也能打开局面。结果时间白白流逝，给了图尔古特充分的时间巩固防御体系。

图尔古特得知基督教军要来进攻，马上在北非为抗击基督教招募志愿兵。日子一天天过去，的黎波里满是为“圣战”而志愿当兵的伊斯兰男子。北非的原住民柏柏尔人并不乐意接受奥斯曼的统治，经常举旗造反。可是一旦基督徒打过来，便会忘记造反的想法，跑到奥斯曼的麾下。

来去之间进入了冬天。这个时期的马耳他刚刚开始招聘意大利工匠建设城池，还不能容纳大量逗留士兵。马耳他岛本身也一无所有，只是气候适于过冬而已。随着滞留时间不断延长，士兵们渐生厌烦。

图尔古特未把精力只集中在的黎波里的防御方面。他命令手下海盗袭击意大利南部，扰乱后方。基督教士兵中多有从意大利南部来的志愿者，他们中间有些人担心故乡遭殃，家人被绑架，便偷船逃走。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提出停止远征的黎波里回国。但美第纳切利奉的是国王之命，只想着完成作为西班牙国王代理人的使命，坚称没有国王的答复不能改变计划。然而国王的命令却迟迟不到。就这样一年过去，1561年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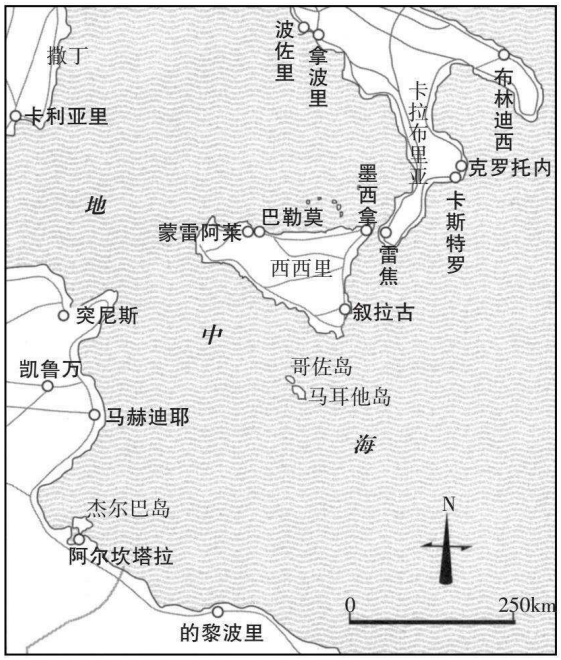
1561年2月10日是重新远征的黎波里的日子。2月出海简直就是疯狂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决定。冬季出海的危险很快成为现实。离港数日后遭遇风暴。南去的黎波里的船队大大偏离了航向，被刮向西南方，漂流到杰尔巴岛附近一处名为阿尔坎塔拉的海滨。

不得已就地登陆，想补充一点饮用水。但这里就在以海盗巢窟著名的杰尔巴岛附近，还有柏柏尔人的村落。

舰队遭到海盗和土著民的袭击，没有补给到水，却有150名士兵被杀。喝了劣质水之后，不断有人病倒。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倒下了，卧床不起。

舰队只好撤离。所有船上都收容了伤病员，军船就像医用船。这使士兵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2月17日再次出发，但目的地既不是马耳他岛也不是墨西拿，而是的黎波里。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说，既然国王没有撤销进攻的黎波里的命令就只能坚持下去。他毫不让步。远征军总司令美第纳切利有最终决定权。



西西里及其周边

从阿尔坎塔拉去的黎波里的途中，常识不能想象的事情不断发生。他们让舰队停在途中海滨，清点可用于进攻的黎波里的人数。这项工作竟花了13天时间。美第纳切利认为既然率领的是国王的士兵，就有义务知道人数。

3月2日在将领们召开作战会议上，搞清了有2 000多士兵不能用于战斗。尚未遭遇敌人，就有2 000士兵要离开战场。

美第纳切利大惊失色，提出不再去的黎波里，而把目的地改为杰尔巴岛。改变目的地的根据只是杰尔巴岛比的黎波里更近。在作战会议上，马耳他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美第纳切利毫不让步。他的地位最高，占据着他大脑的只有一点：不能毫无所获回去见亨利二世。

作战会议上反对美第纳切利的不止拉·瓦莱塔一个人。教廷海军统帅奥尔西尼也反对继续远征。他不是红胡子时代的奥尔西尼，而是同一家族的另一位奥尔西尼。

奥尔西尼刚刚得到威尼斯来的绝密情报。威尼斯共和国更加重视与奥斯曼的通商条约，所以没有参战。但即便如此，威尼斯也经常会把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传回国内的情报捅给基督教世界。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感情，而是出于不想彻底切断与基督教世界之间联系的策略。

极为秘密地透露给奥尔西尼的情报是，图尔古特派手下亲信乌尔齐·阿里去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苏莱曼在迎战“基督教联军”时派兵支援。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的实力贵族奥尔西尼家族在与劲敌科隆纳家族长期对抗中，更亲近法兰西。威尼斯不是法兰西派，但在反西班牙方面与奥尔西尼利害一致，所以把要捅给基督教世界的情报先透露给了奥尔西尼。这样说的证据是，威尼斯并未把情报透露给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或者西班牙的雇佣兵队长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更不用说西班牙先头部队一般的马耳他骑士团。正因为如此，奥尔西尼在作战会议上不能透露情报的来源。这时还没有得到皮拉尔帕夏已率援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准确情报。

这就是尽管他反对美第纳切利继续远征的方案，却又不得不跟着走的原因。派出去侦察的船回来报告，敌人集中精力防御的黎波里，杰尔巴的防御薄弱。因为这个情报，确定了进攻杰尔巴的方案。

杰尔巴的防御的确薄弱。3月7日，从海上一阵炮轰之后开始了登陆作战。打了10天白刃战，战斗以“基督教联军”的胜利而告终。海盗方面战死200人，负伤人数超过600，而“基督教联军”则战死25人，负伤30人。3月19日，包括从“浴场”里解放出来的所有人在内，全体人员着手

建设城堡。

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一旦攻陷一个地方就会立即着手建设城堡，也许是不钻进城堡就觉得不够完全。

正在建设城堡的时候传来了让“基督教联军”心惊胆战的情报。

皮拉尔帕夏率领奥斯曼援军到来的情报成为现实，而且这是一支有80艘加莱船的大军。奥斯曼宫廷的高级官员皮拉尔帕夏不了解西地中海的地理情况，但有原来是意大利人，后来在图尔古特手下当海盗的乌尔齐·阿里与他同行。

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与相邻的布里亚都是繁荣之地，在古代有“大希腊”（Magna Grecia）之称。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曾在这里开设学校。虽然如今在克罗托内只遗下一根圆柱，但在古代，这里建有地中海屈指可数的壮观的赫拉神殿，毕达哥拉斯学校也建在这里。进入罗马时代之后，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直发挥作用的缘故，这里延续着繁荣。进入中世纪后，古时的“大希腊”成为被海盗洗劫的地方之一。到了16世纪，这种状态并未改变。

从克罗托内绕过海岬，有一个叫作卡斯泰拉的小渔村。一个名叫卢卡·加利尼的人在此出生。后来，此人改叫乌尔齐·阿里这个具有奥斯曼风格的名字。

孩提时代，他与父母一道被来袭的海盗绑架。父母双双死在“浴场”之后，这个孩子在奴隶市场被一个海盗买走，具体经过不详。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为乌尔齐·阿里的卢卡·加利尼受到了海盗世界的瞩目。据说他靠智慧，而非蛮力脱颖而出。随着他长大成人，他成为图尔古特手下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统率奥斯曼海军。

皮拉尔帕夏大概听从了这位原来是基督徒的海盗的意见，没有带着伊斯坦布尔的80艘船直奔的黎波里，而是袭击了靠近马耳他岛的哥佐岛。也许他们认为，一旦马耳他骑士团得知哥佐岛遭袭，就会立刻从杰尔巴回防马耳他。实际情况果然如此。

4月4日，急报送到了正率领着5艘船参加远征的拉·瓦莱塔手上。他立刻请求召开作战会议。他在会上说，出于马耳他防御的需要，可以留下1艘船，但其他4艘不得不从进攻中脱身。参加会议的奥尔西尼这才知道威尼斯的情报已成现实，于是主张不仅马耳他骑士团，全军都要撤退。美第纳切利抱着头，似乎已经丧失了决断力。拉·瓦莱塔没有等会议得出结论，马耳他的4艘船旋即离开杰尔巴港。眼下是4月，如果只是想安全回家，全员弃战而逃，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然而，到了这时还在浪费时间。每晚召开作战会议，但迟迟无法拿出结论。主张撤退的并非奥尔西尼一人，病愈参会的约翰·多里亚也成为明确的撤退派。然而，西西里的“副王”、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优柔寡断。就这样，马耳他骑士团离开后又浪费了1个月时间。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当然不会对马耳他岛出手，那里因拉·瓦莱塔与4艘船的回防而更加坚固。他们开始南下，驶往本来的目的地杰尔巴。

面对一直不愿意下决断的美第纳切利，年轻的多里亚拿出了新战略。

第二天一早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恐怕就会现身杰尔巴。多里亚自己将率领热那亚的13艘船连夜出港，隐蔽在海岬背面，等候天明。一俟敌人的80艘船驶入杰尔巴港便立即断其后路。敌人的80艘船将同时遭到城堡和港内船只从前面断其后路的15艘船从背后发起的炮击，只能举手投降。这就是22岁的年轻的多里亚的战略。

美第纳切利没有拒绝这个方案，但也没有完全同意。西班牙国王的

代理人，完全接受一个20来岁年轻人的意见，颜面何存。首脑的代理人比首脑还重面子，这样的人很多。于是，美第纳切利提出了建议，不，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他说，折中是最好的方案。

他的建议是多里亚率领的13艘船不是当夜，而是第二天一早出港。于是，热那亚船定于5月11日凌晨出港。

可是，快到黎明时分，风向变成北风。这样的风使得出港变为逆风。加莱船即使逆风也可以靠三角帆和相当于现代发动机的桨曲折前进，并非完全不能出港。但敌人逼近眼前时低速出港相当危险，这一点连划桨手都懂。

全军进退维谷。

又在浪费时间。这时，不出年轻的多里亚所料，海面上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敌人的80艘船乘着北风，乌尔齐·阿里率领20艘前锋船冲进杰尔巴港。

港内一片混乱。人人都想逃进城堡。就连已上船的人都弃船跑向城堡。

乌尔齐·阿里没有让自己船上的奥斯曼兵登陆追击逃走的基督教士兵。相反，他首先捕获停泊在港内的“基督教联军”的船只。防守的士兵都已逃走，很多船事实上已无防备。很快，在入港口附近下锚的20艘船被包围。

这期间，皮拉尔帕夏率领的大队人马也冲入港内。80艘船合兵一处，开始对“基督教联军”的舰队大肆“狩猎”。这已不是“战斗”，而只是“打猎”。

要从这种场合逃走，只能穿过敌船缝隙，顶风逃跑。没有相当的操舵技术和从容不乱的划桨技能，根本不可能做到。

首先，马耳他的一艘船突围逃到了港外。奥尔西尼乘坐的教廷旗舰紧跟其后逃了出去。接着又有佛罗伦萨的一艘船逃出。其他24艘船也从友船杀开的血路上冲出来，逃到港外。最后，西班牙派来的几艘船跟着这些加莱船逃了出来。尽管这几艘是帆船，无桨可划，没有“发动机”，但还是逃到了港外。

奥斯曼方面很快派出30艘船追了过来。这些船都是加莱船，眼看与西班牙帆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可是，追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突然遭到猛烈炮击，是逃到港外停下来等待友船的教廷海军旗舰开的炮。

炮击重挫了追击的奥斯曼船的气焰。奥斯曼船水手的技能水平就此暴露无疑。他们张皇失措，开始自相冲撞，很快就有5艘船掉队。但是，只有奥尔西尼指挥的一艘船在对抗追来的奥斯曼船，25艘奥斯曼船把炮火都集中在了这一艘船上。

教廷旗舰的三根桅杆中，被称为“主桅”的中央桅杆断成两截。排在船腹右侧的桨几乎全被掉落的桅杆砸断。这意味着船已不能再航行，而奥尔西尼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地投降，等待支付赎金获释。凭他教廷海军司令的地位和罗马两大贵族之一奥尔西尼家族主人的身份，这个选择会有极大的可能性得以实现。

第二，坚持作战，让自己人逃走。这样做要一直战斗到己方船只全部到达安全地带，与赴死无异。

无人知道弗拉米尼奥·奥尔西尼的选择。但从后来他的做法看，他似乎选择了第二条路。

旗舰是有三根桅杆的大型加莱船，不仅船头和船尾，船腹也装有大

炮。这时所有大炮一齐开火。

船已不能继续航行，动弹不得，成了海上城堡。奥斯曼船如果超过10艘就难以统一指挥。奥尔西尼命令大炮直接炮击这些船。奥斯曼船也顾不上追击渐行渐远的基督教船，一边躲避炮击，一边拼命靠近教廷旗舰，但等待他们的只有粉身碎骨。

根据被俘的一名厨师的证言，海上激战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不仅是士兵，从水手到划桨手，就像被置于死地一样，在绝望中坚持战斗。

这场激战的结果，奥斯曼兵得到已经被烧得不能使用的教廷旗舰。奥尔西尼坚持激战到最后，敌人登舰后他亲自挥剑上阵，坚持白刃战，最后扑倒在船桥前，不能动弹。

敌兵挥着半月刀，寒光一闪，砍下了他的头颅，抓住头发把头颅高高拎起。这时，奥斯曼船上欢声雷动。奥尔西尼的身体和战死的士兵、水手、划桨手的尸体一道，被当场扔进大海。奥斯曼船队总算结束了激战，把奥尔西尼的首级挂在破损不堪的教廷海军旗舰折断的桅杆上，凯旋杰尔巴港。

逃进刚建成的城堡中的“基督教联军”的士兵与进攻城堡的奥斯曼军之间的攻防战持续了一个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虽然基督教士兵都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如果还有等来援军的希望，四面受敌还能顶得住，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

当攻防战打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美第纳切利和多里亚两人带着少数部下乘船逃回了西西里。一说是乌尔齐·阿里故意放走了他们。这个说法的真伪不明，但有人向他们提供去西西里的船只却是事实。城堡在两位司令官走后又抵抗了一个星期，于7月30日陷落。

奥斯曼兵手下毫不留情。所有人当场杀死，没有留下能够说清陷落

情况的证人。

战死的“基督教联军”士兵的尸体被集中在郊外的某处，没有掩埋，也没有焚烧，只是剥光战衣堆放在那里。岁月流逝，尸山变成了一堆白骨，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白骨冢。

据说直到19世纪中叶还能看到这座白骨冢。有记载表明，1846年法兰西驻突尼斯大使向突尼斯请求清除白骨冢，白骨冢才被清除。白骨冢一直存在了285年。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牵头的、以夺回的黎波里为目的的“基督教联合”行动就这样收了场，其损失如下。括号内是远征出发时的数字。

加莱船：29艘（52艘）

运输帆船：14艘（40艘）

战死人数：1.8万人（2.5万人）

这就是1561年远征的严酷现实。“基督教联军”原本要进攻图尔古特防守的的黎波里，然而与图尔古特尚未照面便已灭亡。

当然，没有什么声音为这次失败向西班牙国王问责。作为国王代理人参战的美第纳切利的“副王”地位也不曾被撼动，照样继续统治着西西里。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仍旧继续当他的西班牙国王的雇佣兵队长。

这次失败史称“杰尔巴屠杀”，它给地中海世界留下阴影。人一旦有了自信，有时会超常发挥水平。“杰尔巴屠杀”之后的海盗便是如此。

不过，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20年前挫败了企图占领阿尔及尔的卡洛斯，这次又打败了企图占领

的黎波里的腓力大军。短短20年时间里，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王俩父子，两度成为手下败将。海盗们当然会觉得这是老子的天下！他们冲锋在前，后面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支持。

海盗产业

即使是仅为获利的海盗（pirata），实际出海干海盗勾当的人数也很少。人数虽少却能持久，是因为在这个“核心”周围有许多同情者和利害一致的人。这些人不仅是家人和亲属，还有逃回时窝藏他们的人、出售抢来的赃物和处置被绑架者的人、造船和修船的人等等。有了这些相关人等，海盗业才成其为一种职业。

而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是一些得到国家官方认可而干海盗的人，其“核心”周围的人群规模更大，内部也更加有组织，堪称企业。让这种大规模组织发挥作用，是当然的想法，阿尔及尔即是典型。16世纪后半叶的阿尔及尔呈现出惊人的繁荣，据说城市和港口的建设直追同时代的热那亚和拿波里。

即便如此，从意大利各港口出口到阿尔及尔等北非港口的物产与这些船从北非带回的物产之间，其区别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从欧洲出口到北非的是钢铁制造的武器、帆布等各种工业制品，而从北非出口到欧洲的则几乎都是农产品，且不是小麦、橄榄油等主要农产品，多为椰枣，欧洲不产椰枣。

这样，欧洲完全是贸易出超。通过进口“撒哈拉黄金”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情况10世纪以来不曾改变。可是北非非但没有因此衰退下来，反而繁荣起来，其原因就是海盗已成为一大产业，并长年得以延续。

海盗收益的分配也一直随着时代不断“进化”。

海盗当作基地的是面朝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统治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周边一带的，以前是“酋长”（amir、begh），从16世纪开始称为“总督”（pasha，又译帕夏）。

海盗的收益中百分之十二上缴给“总督”。

此外，还要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港口建设费。

还有一项重要支出，海盗必须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清真寺及其附属学校的费用，这是规矩。

另外必须为救济穷人捐款。捐赠没有比率的规定。《古兰经》里说过，帮助穷人是伊斯兰教徒的重要义务。通常的做法是向实际救助穷人的组织和团体捐款。

付完这些之后剩下的收益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左右。这些收益将一分为二，一半在船主和船长之间分配。船长是海盗的头目，收益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由出资人和经营者分红。

剩下的一半根据船长决定的比例分给海盗船上的所有人。划桨手是奴隶，船长在出港前必须向“浴场”的管理人支付租金。“浴场”的管理运营似乎归“总督”管辖。

看到这些，我在想，海盗业在北非是主要产业，却不是国营企业。这倒不是因为没有法人税的缘故，而是感觉像在租用国家的设备而支付使用费，使人想起同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把国有加莱商船租借给贸易商人的制度。北非的海盗业不是国营企业，并不在所有方面都有规定，生产力大概很高，能聚集优秀人才也理所当然。

另外，海盗世界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开放得多。

威尼斯当时是欧洲唯一一个合理且没有忘记照顾社会上失败者的国

家。但在威尼斯，要进入领导层光有业绩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威尼斯共和国市民”的资格，这个资格只赋予有威尼斯人血统者。

与此相比，海盗世界的市民权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能力”授予。像红胡子那样的希腊人、西纳姆那样的犹太人、乌尔齐·阿里那样的意大利人，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前途无量。

这种人一旦有了自信结果会怎样？如果有大国毫不犹豫地起用他们，在身后支持他们，结果又会怎样？

进入16世纪后半叶后，基督教世界也一直被迫面对这一难题。

“杰尔巴屠杀”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在“杰尔巴冲击”的状态下把保护自己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马卡提尼奥·科隆纳10年后在黎凡特海战中担任教廷海军司令，他有两块领地安齐奥和涅图尔诺，不幸都在海滨。他曾从所住的罗马给领地的居民代表写去一封信，落款日期离“杰尔巴屠杀”过后仅有10天。不过，“杰尔巴屠杀”的新闻恐怕早就传到了罗马教皇的耳朵里。

“顷接我王（腓力二世）军队在北非对奥斯曼军作战遭到惨败的消息。损失船只超过30艘。可以想见这些船只将直接用于海盗船队，加强他们的力量。从今以后海盗的袭击将更加疯狂。

“因而，我吁请居民立即避往山区。妇女和儿童务必全员避难。我在山区没有领地，不能指示逃往何方，希望大家相互商量，选择你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尽早避难。避难生活必定漫长，出发时务必携带所有必需品。

“是否留下男人防御，我自忖无法决定。如果你们认为有效果则可留下。不过我希望，只有在上帝还不希望你们去死的情况下，你们才可以去考虑效果。

“我与教皇陛下商量过这事，陛下也同意我的想法。”

这可不是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故事，在那里遭到海盗袭击并不会成为新闻，这是距罗马只有50公里的安齐奥和涅图尔诺的事情。这两个港口面对的大海是教廷海军巡逻的海域。教廷海军派出三艘加莱船远征的黎波里，损失了其中的两艘，司令奥尔西尼战死。作为对居民安全负有责任的领主，所能做的只是劝告全体居民逃难。

海盗乌尔齐·阿里

海盗们信心大增，活动已不再限于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图尔古特的手下乌尔齐·阿里开始大胆行动，只率几条加莱船沿地中海北上，接二连三地袭击热那亚负责的意大利北部沿岸的海边村镇。

这个时期，萨伏依公爵及其夫人碰巧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逗留。萨伏依公国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公国，首都在都灵，与法兰西王族的关系比与意大利还深。公爵夫人就来自法兰西王族。公爵夫妇在此就意味着宫廷成员全都在此。在附近抢掠途中不忘收集情报的乌尔齐·阿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时的公爵是历代萨伏依大公中以勇武而闻名的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接到瞭望塔海盗正在靠近的报告后，他并未逃跑，而是决定动员所有手下与海盗决战。

大公手上有步兵300人，火枪手25人，家臣不到百人。

开局占优势，心情大好，不料遭到隐蔽在山背后的另一路乌尔齐·阿里海盗的袭击，在并不宽阔的海岸上受到了两面夹击。结果，100名士兵和家臣40人被俘。

当时，无人不知被海盗抓走的人将是什么命运，不是被卖当奴隶，就是被逼当划桨手，被铁锁链铐着终其一生。如果放弃他们，主君萨伏依大公的名声将被玷污，一生难以洗刷。大公只得向乌尔齐·阿里派去使者，交涉赎金事宜。

海盗很快给出了答复，140人的赎金共计1.2万达卡特。金额之巨让大公瞠目结舌，接着读到乌尔齐·阿里的附加条件后，大公感到极度屈辱，脸色苍白。

“赎金不得以萨伏依公国的货币支付，也不得用手头的金银和珠宝代替，而要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准备金币可能需要若干时日，我们可在港口等待。”

难怪萨伏依公爵会狂怒。海盗答复的含义是，你们国家的货币没有信用，你们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赎金要用货币信用度很高的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答复甚至说，你们大概没有那么多信用度高的金币，在你们筹措期间，我们等在港口。大公当然怒火中烧。乌尔齐·阿里了解萨伏依，尽管称之为公国，实际上不过是阿尔卑斯山边上的一个小国。大公只能派特使驰往热那亚的银行。

公爵一直在隐忍，自我安慰只要金币一到一切都会结束。可是，等在港口的乌尔齐·阿里又给他出了道头痛的难题，说：“我家主君奥斯曼苏丹与法兰西国王是同盟关系，大公夫人又是法兰西王的伯母。请允许我作为奥斯曼苏丹的家臣，代表主君苏丹拜会大公夫人。”

乌尔齐·阿里的老板图尔古特位居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所以奥斯曼苏丹也是乌尔齐·阿里的主君。他请求拜会合情合理。

可是，让大公夫人会见海盗，没法向大公夫人的娘家法兰西王族交代。失败的屈辱，后续的赎金，甚至让大公夫人同海盗见面，这肯定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萨伏依公爵只好躲进修道院不出来。可是如果拒绝海

盗的请求，被抓走的140人可能就会被当场砍头。以勇武而闻名的萨伏依公爵面对窘境一筹莫展。

家臣们只能看着大公干瞪眼。一个宫女上前一步对大公说道：

“我替夫人去一趟吧。”

就此上演了一幕在全欧洲的宫廷中成为逸事的替身活剧。这里备述其详会跑题太远。我很久以前曾经在《爱的编年史》一书以“蓝色海洋”为题的章节中写过这个故事。欲知其详，还请阅读那篇写成小说的文章。我接着前面的话题往下讲。总之，“杰尔巴屠杀”以后，海盗更加大胆，相反，基督教方面的应对却越发迟缓。

马耳他骑士团是基督教世界中唯一勇敢对抗伊斯兰海盗的团体。在经常只有几艘加莱船的状况下，骑士们的战斗积极性也未曾衰减。骑士团有很多法兰西出身的骑士，拉丁语和法语是通用语言。志愿参加骑士团的骑士有三分之一出生于法兰西，这点耐人寻味。也许这是他们对其君主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结盟反弹的表现。

圣斯德望骑士团

这个时期建立了另一个骑士团，正式的名称叫作“圣斯德望海上骑士团”。“骑士团”是在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热情关怀下创建的。

骑士团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击垮伊斯兰海盗。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还有医疗任务，而“圣斯德望骑士团”只有一个目的：与伊斯兰海盗战斗。

马耳他骑士团团员的条件是出身于在欧洲被称为“蓝色血统”的贵

族。但要做一名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员，普通的“红色血统”足矣。美第奇家族也出自商人，佛罗伦萨因为经济才得以繁荣。以佛罗伦萨人为中心的骑士团如果以贵族血统为条件，只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就连美第奇家族嫁给法兰西国王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背后也常被说成是商人的女儿。

圣斯德望骑士团总部设在比萨，舰队基地在里窝那，那里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外港。新建立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是争强好胜不落人后的托斯卡纳人为狠狠打击伊斯兰海盗而成立的组织。正因为如此，这个骑士团才会在海盗肆意横行的地中海上，与马耳他骑士团一道成为一支勇猛果敢、敢打敢拼的海上力量。顺便一说，这两个骑士团之间经常联合作战。

然而，这两个骑士团能够出海的战斗力经常都只有3到5艘加莱船，从来没有超过10艘，只能跟乌尔齐·阿里所率海盗战斗力的实力相当。然而，海盗却可以同时把五六支这种规模的船队派往地中海各地。

在西地中海，基督教势力中只有这两个骑士团见到海盗船队不会逃跑，敢于与其对阵。伊斯兰教徒都会想，不如就此一口气把地中海西部也变成“我们的内海”，趁势再度登陆70年前被赶出来的伊比利亚半岛，把欧洲第一大国西班牙变成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这样想。

苏莱曼活着的时候就被尊称为“大帝”。历史上，大帝是人们对扩大疆土的君主的称呼，古今东西概无区别。苏莱曼在长达40年的统治期间，既完善了内政，在扩张领土方面也不亚于前任。在陆上，他征服了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就连在维也纳也常能望见奥斯曼军队。在海上，东地中海可说成了“奥斯曼海”。

对苏莱曼而言，挡在他称霸西地中海路上的拦路虎就是马耳他骑士团。从骑士团以往的战绩看，虽说只是蜗居小岛上的小规模战斗力量，

却不容无视。骑士团的船只要看到伊斯兰船都会发动攻击，不管它是战船还是商船。苏莱曼决定首先攻陷马耳他，再向西去。

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马耳他攻防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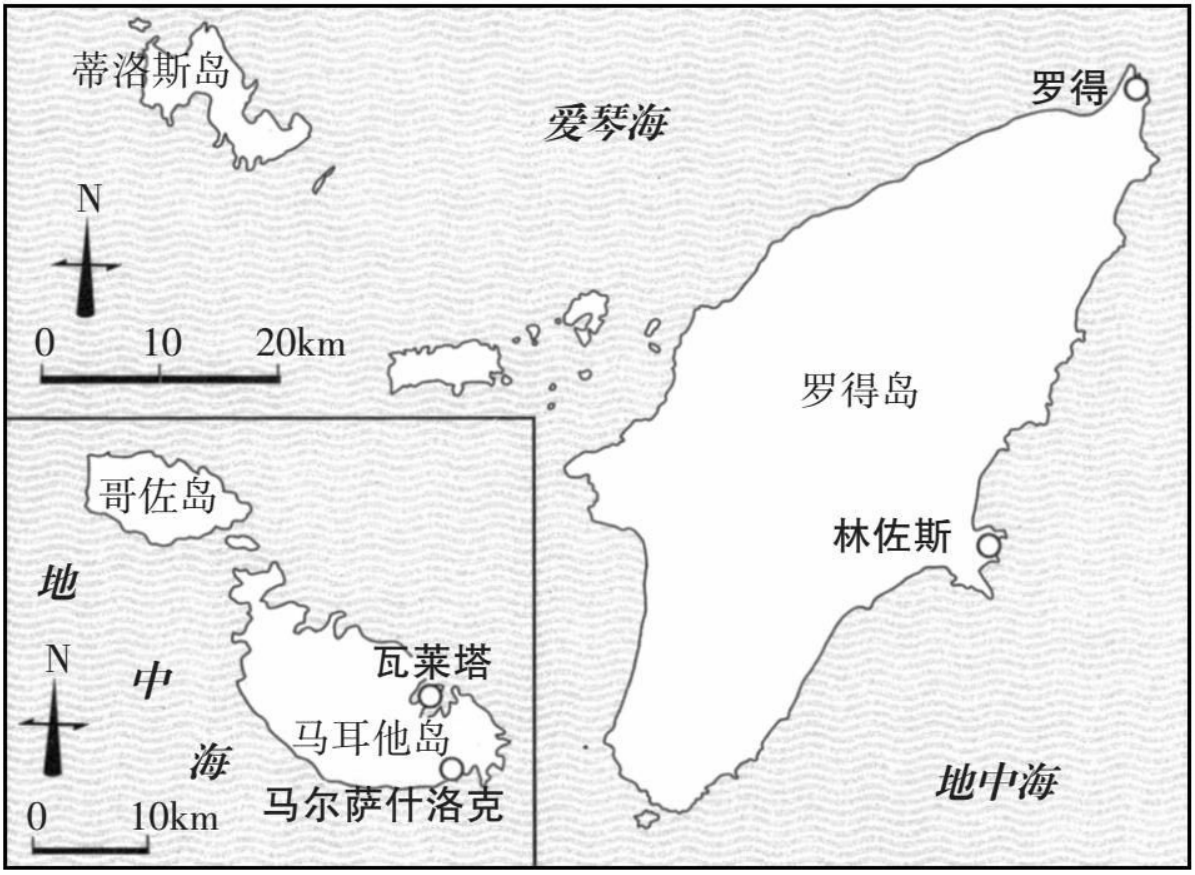
苏莱曼与骑士团交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43年前的1522年，他亲率奥斯曼军进攻罗得岛，半年后占领了该岛。奥斯曼宫廷高官们以罗得岛大于马耳他岛为由对苏莱曼说，攻占罗得岛用时半年，攻占马耳他一个月足矣。

我们不知道苏莱曼是否相信了这个说法。不过，进攻马耳他只投入了当初进攻罗得岛的一半左右的兵力。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莱曼或许也认为攻取马耳他较为容易。尽管投入的兵力只有一半左右，但却是经过挑选的精兵。由此可见，出于攻占罗得岛并不轻松的经验，苏莱曼也并未过低估计蜗居在马耳他的骑士团的实力。

根据身临其境的一位医生两年后的记录，苏莱曼在马耳他投入了超过3万士兵和接近200艘船只的战斗力。

这3万人中有6 000人是号称奥斯曼军队之花的新军军团士兵，是主要战斗力的核心。

另有1万人为土耳其语中所谓“Spahi”，即来自被奥斯曼征服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各国的士兵。



马耳他岛与罗得岛

另有被称为“Iayalar兵团”[2]的来自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士兵5 000人。

以上的2.1万人形成了主要战力。其他还有从北非全境召集而来的海盗，以及各地聚集而来的想发战争财的冒险家团伙。另外还有需要特殊技能的水手和炮手，实际规模大约在5万人。而如此规模却只是进攻罗得岛时的一半！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奥斯曼军士兵中，生为伊斯兰教徒的居然只占少数。

前面已经介绍过，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是孩提时代就被迫与居住在奥斯曼的基督徒父母分开后造就而成。他们虽已改信伊斯兰教，但原

本却是基督徒。此外，“Spahi”也是从被奥斯曼征服的东欧各国招募来的人，这些人极有可能仍是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生为伊斯兰教徒的恐怕只有从帝国东部招募来的“Iayalar兵团”的5 000人。

在奥斯曼帝国，宗教并不是忠于苏丹的绝对条件。不论生来信奉什么宗教，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可。奥斯曼的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受苏莱曼之托进攻马耳他的两位司令官身上。

陆军总指挥是战场经验丰富并以勇猛闻名的穆斯塔法帕夏，而受托统率海军的是苏莱曼的女婿皮里亚帕夏。

据传，这两个人中只有穆斯塔法生为伊斯兰教徒。皮里亚是宫廷高官，军事经历不为人知。由此推测，他原来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新军军团由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徒中强行征召达到一定年龄的少年男子所组成。容貌、头脑特别优秀的军中少年会受到特别培养而成为宫廷官员。其中成为大臣的人不在少数。因而有人被苏丹招为女婿也不足为怪。传说苏莱曼的后宫中有嫔妃300多人，他的子女数量也一定很多。

除了这两个司令外，苏丹还任命图尔古特为司令，苏丹先前已任命他为的黎波里总督。图尔古特的加入，意味着北非海盗也被全体动员起来，参加了进攻马耳他的战斗。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苏莱曼想一举攻陷马耳他。

那就是在对大军远征时不可或缺的后勤兵站方面的考虑。

进攻罗得岛时，岛屿自身面积辽阔，土地富饶，可以从当地筹措军粮。罗得岛靠近奥斯曼的小亚细亚，容易向岛上往返穿梭运送武器和其他补给。

但是，马耳他岛却不似这样。岛很小，土地荒凉，就连粮食和饮水

都不可能在当地筹措。从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运来又路途遥远。距离较近的北非各城市，虽然海盗业昌盛，其他产业却不发达。

一切都只能在船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装在船上。粮食自不必说，大炮、炮弹、火药、武器、装备……所有战争必需品都得带去。据说连奥斯曼人爱吃的蜂蜜点心都带上了，可见奥斯曼军在前线也想维持鼎盛时期帝国的生活水平。

他们究竟准备了几个月的用度呢？据说200艘船几乎全都用于运输。如果相信奥斯曼高官的豪言壮语，一个月便可打下马耳他，估计他们准备了一个月的，或再保守一些，两个月的用度。

进攻马耳他于1565年付诸实施。延期是因为苏莱曼的长子在波斯举旗造反，穆斯塔法帕夏不得不东去镇压。穆斯塔法镇压成功返回后的第二年，奥斯曼大军才从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攻马耳他。

苏莱曼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苏丹苏莱曼那年已经70岁。迎战的马耳他骑士团方面也有70岁的老将，他就是骑士团的团长约翰·德·拉·瓦莱塔·哈里森。他出身于法兰西奥佛涅的名门，年轻时就加入了骑士团，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把一生献给了骑士团。

不过，这两人只有年龄相同，经历却迥然不同。苏莱曼是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君主，周围是荣耀、名声、权力和奢华。而法兰西骑士在人生中没有品尝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这两人曾经碰过一次面，那是在1522年，那年两人同为28岁。

在罗得岛攻防战激战半年终于结束的时候，胜利者苏莱曼很绅士地对待战败的骑士，同意他们带着武器撤离罗得岛。这种做法在欧洲被称为“武将的荣誉”，是对败者的最高礼遇。奥斯曼苏丹对骑士团长说道：“我胜利了，我必须将您和您部下这样勇敢忠义的人赶出家园。对此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悲哀。”

当时，骑士团长的秘书官拉·瓦莱塔也在场。不过，苏莱曼可能并未看一眼这位与自己同龄的骑士，拉·瓦莱塔不过是与骑士团长同行的18位骑士中的一位，但拉·瓦莱塔没有忘却。

我们可以确信，在马耳他攻防战期间，拉·瓦莱塔眼中的对手既不是穆斯塔法帕夏，也不是皮里亚帕夏，而是苏莱曼。一位70岁的老人盯准了另一位并不在场的70岁老人坚持战斗。28岁那年以后的42年间，拉·瓦莱塔走过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之路。如果没有28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必要走这条路。

骑士团被赶出罗得岛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8年的流浪岁月。他们辗转克里特岛、西西里的墨西拿、拿波里、奇维塔韦基亚，没有一处可以久留。已经是接受了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洗礼的时代，因而很多人把圣约翰骑士团视为十字军时代的遗物。寄居在教廷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的数年时间里，他们让人们看到了骑士团存在的理由。教廷海军的规

模只有几艘船，骑士团与之联合，活跃在打击海盗的最前线。然而，骑士团寄人篱下的境遇却丝毫没有改变。骑士团一直在不懈努力，与各国沟通，争取一块地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苏莱曼（引自现代美国国会浮雕。浮雕中苏莱曼与梭伦和编撰《罗马法典》的查士丁尼大帝等并列，被视为历史上的立法者之一。）

瓦莱塔（引自现代英国出版的I. C. Lochhead所著The Siege of Malta. 1565, 1970）

好不容易到了1530年，传来西班牙王卡洛斯要把马耳他岛赐给骑士团的消息。马耳他是一个孤岛，不是西班牙领土，自然也无西班牙驻军。把它赐给骑士团是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卡洛斯的条件是每年进贡一只猎鹰。骑士团别无选择，接受了马耳他岛。卡洛斯在进攻突尼斯失败后，又试图进攻阿尔及尔。他并不是想要马耳他猎鹰，他赐岛的意图在于把一贯憎恨伊斯兰的骑士团放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们就这样被送进了与敌人面对面的边境堡垒。

接受了卡洛斯的赐赠，来到当时的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一定傻了眼。拉·瓦莱塔是骑士中的一员，那年他36岁。

8年前骑士们离开罗得岛，罗得岛还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那里全年气候温暖，气温很少超过25摄氏度，整日微风拂煦，轻抚肌肤。罗得岛意为玫瑰花盛开的岛屿。这座岛屿风光绮丽，历史悠久。

漫长历史意味着人们乐于在此居住。罗得岛虽无辽阔的耕地，但却地肥水丰。这里有天赐良港，自古就因海运和通商而繁荣。

这里的居民为希腊裔，文化气息浓厚。至今仍为梵蒂冈美术馆至宝之一的拉奥孔群像也出自于罗得岛艺术家之手。岛屿东面悬崖上矗立着林都斯（Lindos）神殿的遗迹。站在这片遗迹上远眺，地中海尽收眼底，思绪不禁驰骋在古代文明之中。

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罗得岛的存在价值不曾减弱。移居岛上的希腊著名学者在这里开办学校，罗马有知识的上流社会的青年汇聚于此，追求学问。知识分子是无须奢侈，舒适即可的一群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称为“清贫”。西塞罗、恺撒都曾留学罗得岛。古代的罗得岛稳静、舒适而具品味，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罗得岛是骑士团200年来的家园。

马耳他骑士的作战服前胸缀有创建以来一直未曾改变的红底白十字。日常服装胸前却是黑底白色的变形十字，这是骑士团被迫离开罗得岛后的制服。改成黑底，表现对失去的罗得岛的哀思。马耳他骑士身裹丧服，正是因为苏莱曼的奥斯曼帝国的缘故。

“马耳他之鹰”

罗得岛上拥有的马耳他岛上全然没有。现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马耳他，是拉·瓦莱塔在攻防战后重建，并以此为主体长年扩建而形成的建

筑景象。骑士们于1530年移居岛上。要想象他们眼中的马耳他，就得把现在的一切从岛上全部抹去。成为骑士团根据地的马耳他当时一无所有。

遍地岩石，缺水，土地荒芜，雨水稀少。蓄积的雨水不过滤便不能饮用。夏天持续高温，气温接近40摄氏度，非洲刮来的东南风使天气酷热。到了冬天，天气剧变，西北风劲吹，寒冷刺骨。遍地岩石，不适于耕种，不足1万人的岛民散落在全岛各处，全靠饲养牛和山羊过活。虽然周围尽是大海，马耳他的渔业却不发达。住在海边，只会遭到海盗的绑架。

在这样的土地上不可能创造历史。尽管留在罗得岛上的一切令人日思夜想，但如果不愿意像十字军时代创建的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那样消亡，就只有把马耳他改造成新的家园。

把马耳他岛改造成新家园的资金来源于骑士团在欧洲各地所拥有的不动产的收入、出身名门家产富有的骑士们的捐赠，以及从事海盗业获得的收益。马耳他骑士团并未像圣殿骑士团那样从事自己的金融业。圣殿骑士团因有资产而惨遭法兰西国王的毁灭，马耳他骑士团不想重蹈覆辙。圣约翰骑士团像在罗得岛时一样，靠袭击所见的伊斯兰船只，获得收入。移居马耳他后如能延续这一做法，不但是一种收入来源，还能起到基督教世界前沿堡垒的作用。

现在所见的马耳他骑士团的相关建筑都是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然而，1565年马耳他攻防战时，骑士们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与这样的豪华奢侈完全无缘。他们建了教堂，也建了以医疗为目的的医院。医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特色。此外，和在罗得岛时代一样，按母语不同分别建了骑士馆。不过，在所有这些建筑中，最好的也只是至今仍残存在罗得岛的那样的水平，差一点儿的还达不到，绝对不是遗留在今天的马耳他岛上的那些豪华的巴洛克式建筑。那时，马耳他骑士团移居到环境恶劣、一无所有的马耳他岛才不过35年。

不过，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严酷环境里生活了35年的骑士们，已经成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能经得住任何考验的人，与同时代在欧洲各国宫廷中生活奢华的同类迥然不同。

骑士们天天与海盗对面相见，死亡和被铁锁链铐着的囚徒生活完全是家常便饭。拉·瓦莱塔就是作为伊斯兰海盗船的划桨手度过了他47岁那一年。由于交换俘虏，他恢复了自由，回到马耳他，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马耳他骑士团的团长由骑士们选举确定。但一旦确定，全权集于团长一身，这点颇似教廷。被选为团长那年，拉·瓦莱塔已经66岁。那可不是一般人的66岁。当然，这句话不仅可以对他一个人说，对所有放弃祖国优雅安乐的生活，来到马耳他的其他骑士也都可以这样说。

苏莱曼因长子发动叛乱而推迟进攻马耳他，结果给了拉·瓦莱塔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

70岁的骑士团长冷静地做着准备，他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

饮用水：移居马耳他后，骑士团立即在岩石地上挖好又深又大的蓄水池，由所属医师负责保持水质清洁。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秋季结束和春季开始的时候多雨。每次下雨，都收集雨水蓄存在蓄水池里。

食物：前一年的收获期开始时，骑士团就已经在附近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确定了采购渠道。不过，这只限于必不可少的物资。小麦、橄榄油、洋葱、腌肉和奶酪占了储存食物的一大半。葡萄酒是奢侈品，根本谈不上点心之类。甜味则靠蜂蜜。此外还需要荒地上也能生长的廉价角豆的果实，干燥后研成粉末可以代替小麦。马耳他岛也产奶酪和角豆，但他们不向马耳他农民购买，岛民们也要忍受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围困生活。

拉·瓦莱塔决定，让马耳他居民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到位于岛屿中央自古就有城墙环绕的山中村庄躲避。他还决定，让打仗的男人去巩固三处即将迎敌的城堡。骑士团的骑士禁止成家，他们没有妻儿，但对从事医疗的医师并无这样的要求。这些人属于骑士团，但不是骑士，他们的妻儿也被送去山村避难。

在尚未明了奥斯曼大军的舰队第二年春天何时会杀奔马耳他的时候，拉·瓦莱塔便早早请求欧洲各国派遣援军，但以国家名义响应的只有西班牙。腓力二世命令统治西西里的“副王”唐·加尔西亚·德·托莱多集中1.6万名士兵，但他没有明确这支援军何时派往马耳他。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也并非全部挤在根据地。不少人在宣誓成为骑士后仍住在祖国，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

拉·瓦莱塔认为骑士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便召集这些居家骑士。不过，宗教骑士团团员是志愿性质，召集并无强制性。当然，居家骑士也没有对危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虽然不少骑士没有驰援马耳他，但却提供了资金援助。拉·瓦莱塔似乎早已料到这种情况，欣然接受。于是，派去欧洲的马耳他船载着响应召唤的少数骑士和用援助资金采购的大量武器返回了马耳他。

响应马耳他骑士团请求的国家很少，谁都认为在动真格的奥斯曼军队面前，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已然注定。然而，船未来人却来了。多达4 000人的志愿兵开始到达马耳他。他们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士兵，是地方领主们雇佣后派来的。

随着战云在海上不断聚集，人们也开始向地中海中央的小岛马耳他聚集而来，加上原先生活在马耳他岛上的人，骑士总数达到501人。兵力来源如下：法兰西出身者200人，意大利出身者170人，占了大半数量，还有不少西班牙人，新教势力强大的德意志中部也来了13人，从天主教分离出去、创建了英国国教会的英格兰也来了3位骑士。另有骑士

团的相关人员，以及仆从和杂役百余人。意大利来的4 000名志愿兵和马耳他岛居民5 000人也参加了防御战。

申请参战的岛民并没有作战经验。骑士们的任务是把他们训练成士兵。骑士们可能用《七武士》中所描述的办法进行了训练。但是，靠临时抱佛脚的训练也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士兵。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哪怕是辅助性的，也可以使担任主要战斗力的骑士们腾出手来，更加活跃。

防守方的士兵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有9 600人，迎战5万敌军就要靠这些兵力了。主要战斗力只有500骑士。如果奥斯曼方面的主要战斗力是新军军团，这500人就要与6 000人作战。欧洲各国有理由认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将就此了结。

然而，拉·瓦莱塔可不是沉溺于同归于尽想法中的领袖。他参考自己所亲历的罗得岛攻防战经验，思考了战略战术。

罗得岛攻防战中，奥斯曼方面给予防御方重创的战术，不是用大炮直接轰击城墙，而是把地道挖到城墙下，填满火药，靠爆破从根基上破坏城墙。

拉·瓦莱塔认为这个战术在马耳他用不了，至少不容易用。罗得岛土壤松软，马耳他却是岩地，坑道掘进是一大难事。即使奥斯曼军队采用一贯的人海战术，挖掘岩地的工程也将耗费相当时日，也根本不可能同时开挖几条坑道。地道数量少，发现并采取对应措施的概率就高。

马耳他岛是岩地，是整片的岩石地带不是一块岩石。奥斯曼军队炮火之猛烈令遭受过炮击的维也纳人几个世纪都不能忘怀。不过，要使用堪称巨炮的奥斯曼大炮，就需要足够坚固的地基安装炮身。在岩石地带，这也非易事。炮台不稳固，炮击便发挥不出全部威力。在罗得岛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马耳他岛却不好办。

这一情况决定了拉·瓦莱塔防守马耳他的战略。当时马耳他尚未建成像罗得岛那样坚固的城堡。事先考虑到大炮直接轰击的情况，防守不会只靠坚固的一道城墙，而是靠多道城墙。即使一道城墙遭到破坏，前方还有一道挡在那里。这也是一种心理战。

这样一来，补给线过长以及奥斯曼士兵养尊处优的生活都将成为防守方的有力武器。取得补给最近的地方是西西里。但“杰尔巴屠杀”以后，西西里南岸也加强了防御，抢掠不会轻易得手。而北非港口没有能力供给大军的全部所需。马耳他岛上连水都没有。奥斯曼大军将不得不靠运来的物资供5万多人吃喝以持续进攻。

一言以蔽之，拉·瓦莱塔为这场“马耳他攻防战”最后一搏，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将马耳他岛的不利条件尽量转化为能为防御所用的有利条件。

拉·瓦莱塔最害怕的不是敌人像进攻罗得岛时那样，大军登陆后沿陆地进攻，他最担心的是奥斯曼用运来大军的船只切断通往西西里的海路。无论如何必须确保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援军驰援马耳他的道路畅通。于是，骑士团最重要的5艘加莱船全部被派往西西里方向的西北方。由西班牙出身的骑士罗梅加斯率领的这5艘船的任务是，以位于马耳他岛西北端的海湾为基地，对朝这个方向驶来的奥斯曼海军，予以阻击。

拉·瓦莱塔根本没有指望加上外来志愿兵和岛民在内尚不足1万人的兵力击退奥斯曼军。他只想坚持到援军从西西里赶来。于是，他向身在巴勒莫的西班牙国王代理人唐·加尔西亚派去了特别任命的骑士。这位骑士的任务就是催逼西西里的“副王”尽早派遣援军。

马耳他骑士团的船只数量虽少，但都是双桅大型加莱船。这种船用于作战，每艘至少需要20名战士。这个任务非得老练的骑士才能完成。这样留在拉·瓦莱塔身边的骑士只有不到400人。这400人中，有不少是

刚刚来到马耳他，第一次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年轻骑士。为了用好这些空有勇气的年轻人，拉·瓦莱塔下了一番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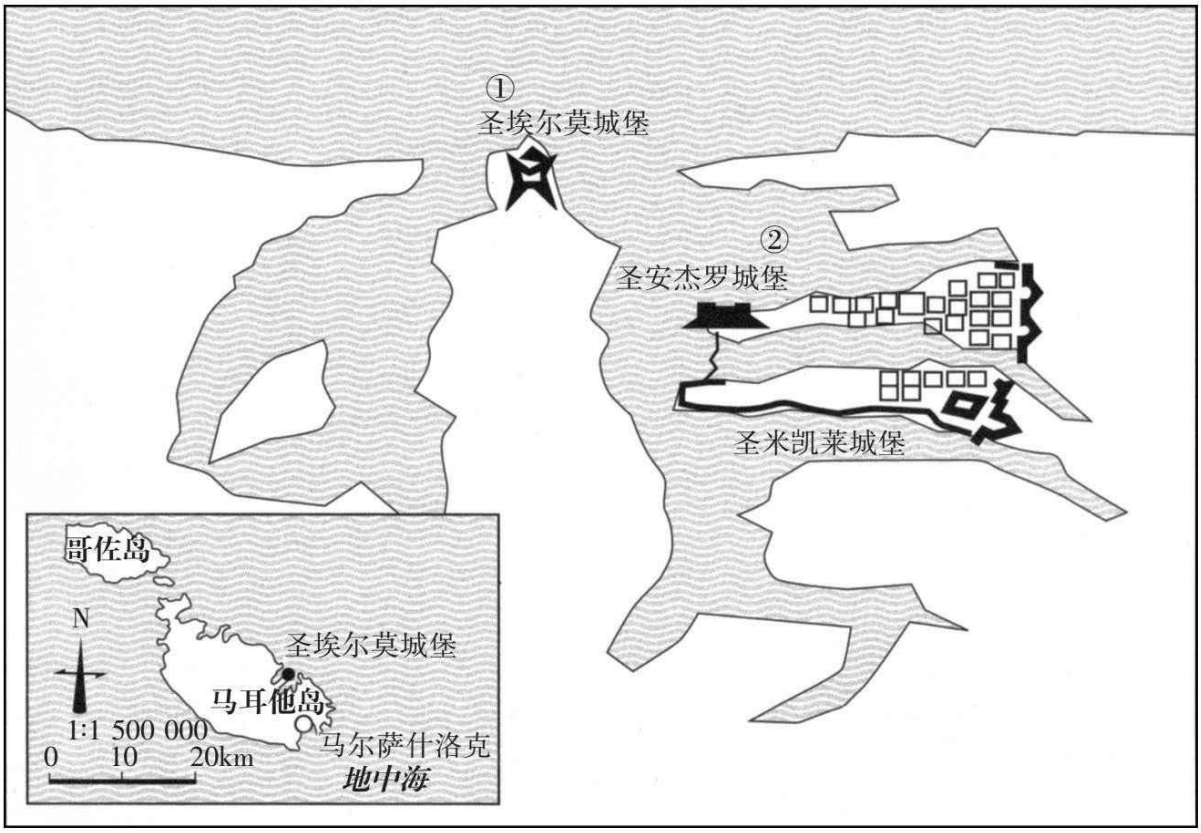
这位70岁的“马耳他之鹰”，既不需要说到骑士就会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种从头到脚用闪亮耀眼的钢铁铠甲保护起来、头盔上饰有华丽羽毛的骑士，也不需要那种骑在披着华丽马衣的马上、手持长矛站在坚固城墙前面的骑士。

他决定把防御集中在半岛前端已经建有城堡的三个地方，一处陷落就坚守下一处，再陷落就坚守再下一处。这种打法，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忍耐力取胜，没有一丁点儿华而不实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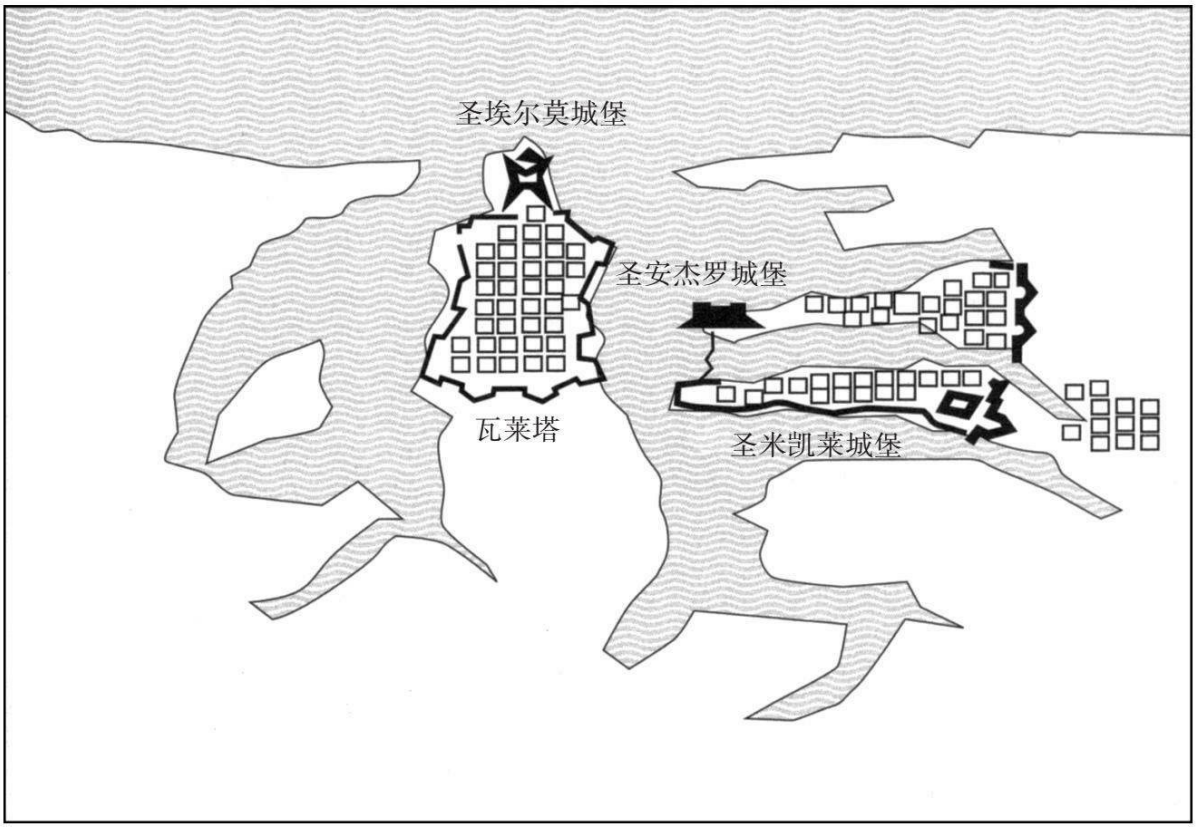
拉·瓦莱塔禁止骑士们在头盔上插装饰羽毛，也禁止穿包裹全身的铠甲，只允许戴护头的头盔和胸甲。胸甲也做成了胳膊部分能够拆卸的形式，实际允许穿的只是不带胳膊的胸甲。此外，除联络外禁止骑马，骑兵变成了步兵。刚从欧洲来的年轻骑士感到不满，但团长的命令至高无上。这样一来，重装成为轻装，打起仗来更加方便。攻防战预计会在夏天进行。马耳他的夏天酷热，激战将在酷暑中展开。

攻防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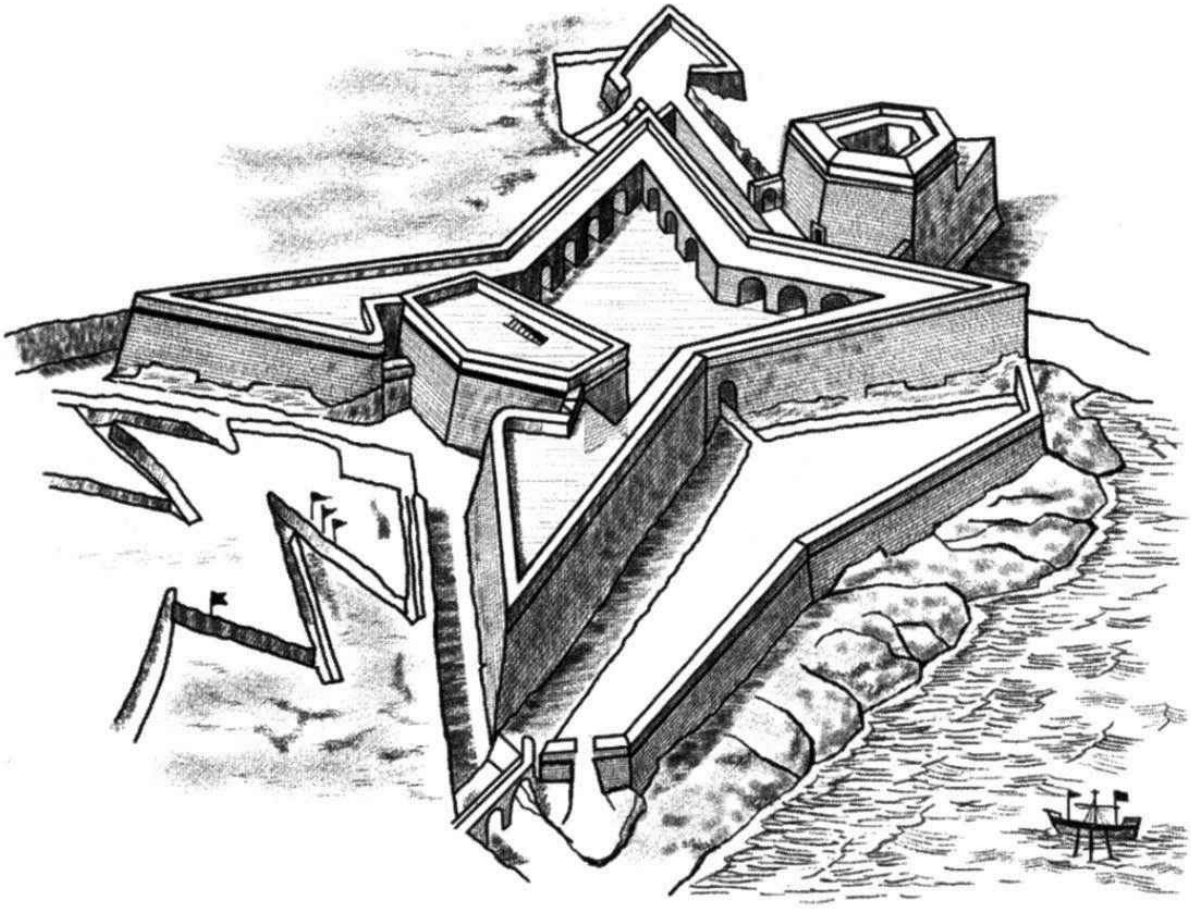
奥斯曼大军于1565年3月22日离开伊斯坦布尔，5月18日出现在马耳他。一如所料，船队进入了马耳他岛东南部的马尔萨什洛克海湾的湾口。马耳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供193艘船运来的大军登陆。他们卸下了50门据说能射出24公斤重磅炮弹的大炮，还卸下据说可供射击10万次的炮弹和火药。当然，卸载估计至少3万人的士兵和攻城所需的所有物资用去了10多天时间。一切规模都大得夸张，显示了超级大国的威仪。


①
圣埃尔莫城堡
②
圣安杰罗城堡
圣米凯莱城堡
哥佐岛
N
圣埃尔莫城堡
马耳他岛
1:1 500 000
0 10 20km
马尔萨什洛克
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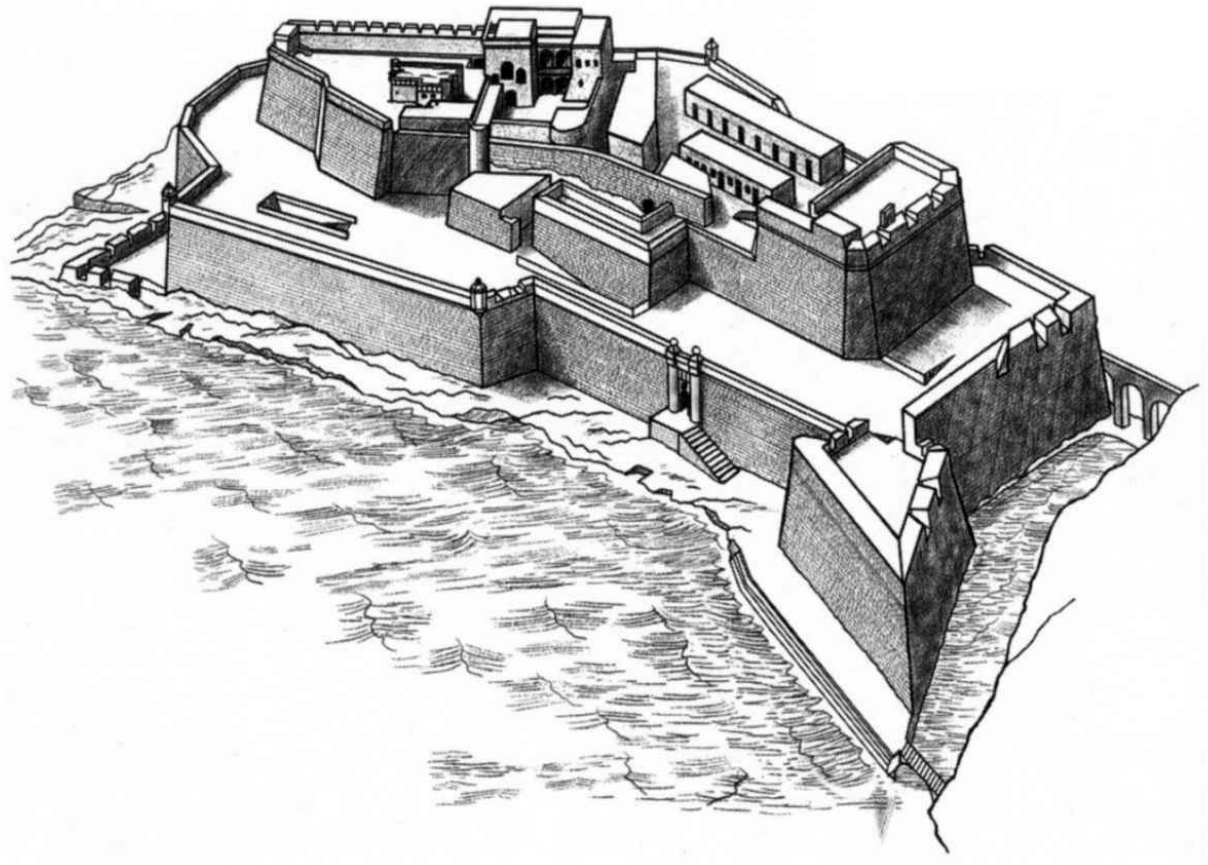
攻防战前的要塞



攻防战后重建的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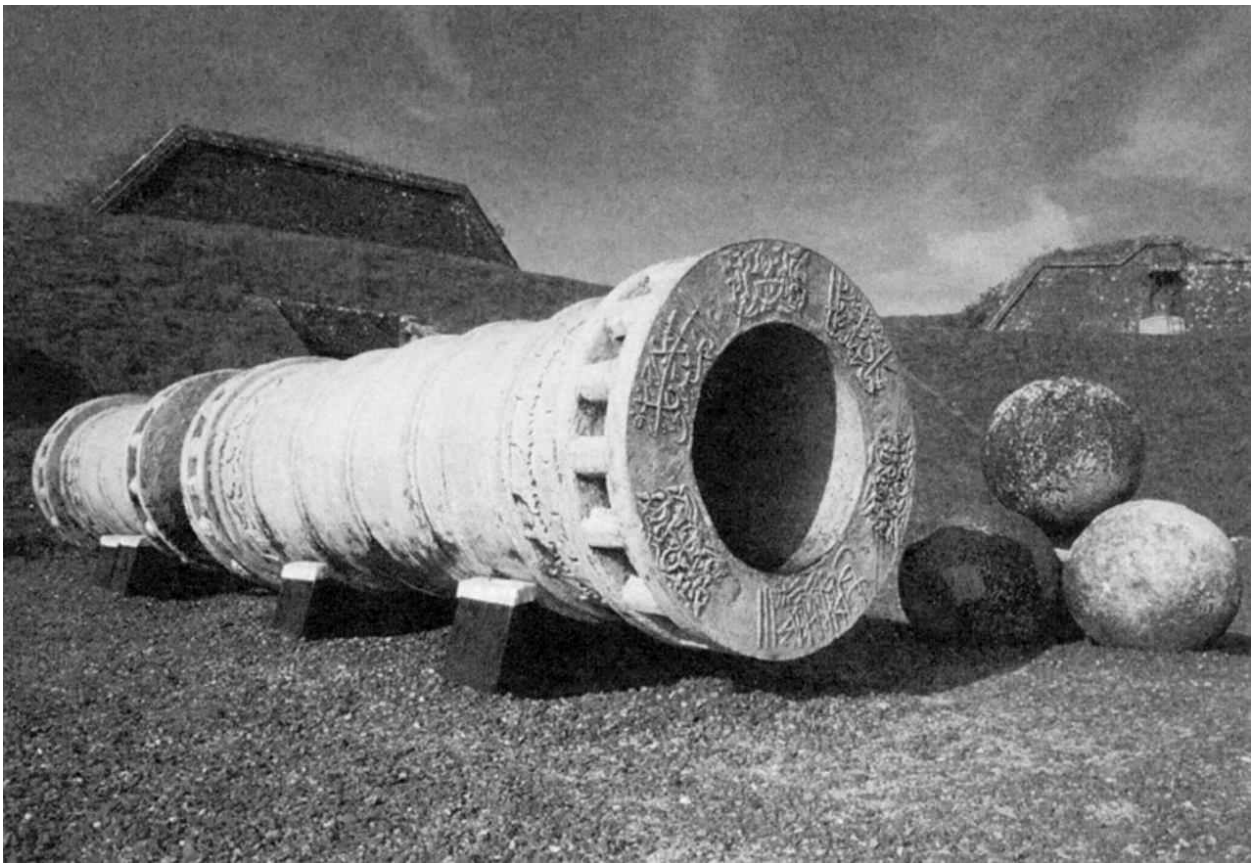


圣埃尔莫城堡



圣安杰罗城堡

以上四图均选自S. C. Spiteri所著Fortless of the Cross, Hospitaller Military Architecture（1136—1798）



奥斯曼军的大炮

可是，船队没有在卸载完毕后就地下锚，而是从西面绕过岛屿，向北驶去。为了让年轻气盛的骑士初次体验抗击伊斯兰的战斗，拉·瓦莱塔派他们去监视奥斯曼军。年轻人被批准骑马前去，他们心满意足，在陆上与海上的奥斯曼船队齐头并进。

这样当然会被敌人发现。他们与已经登陆的一队奥斯曼兵打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结果，他们中有两人，一个法兰西骑士和一个葡萄牙骑士被俘。葡萄牙骑士经受住了严刑拷问，而法兰西骑士却向敌人交代比尔古是马耳他防御的薄弱之处。

海军司令是苏丹的女婿皮里亚帕夏。他一心想抢在率领陆军的老将穆斯塔法帕夏前面夺得首胜，一听这话就扑了过去。

奥斯曼新军士兵

船队全部奔向比尔古。一到那里，皮里亚帕夏就让全体士兵登陆。他决定自己在旗舰上观战。这将是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在马耳他岛上高高飘扬的首次战斗。

然而，年轻的法兰西骑士说的是假话。比尔古挤满了马耳他士兵，他们顽强反击。皮里亚帕夏看到的是一场自家军队的士兵被迫苦战而不得不退却的战斗。法兰西骑士被绑在一旁，看着自己交代的成果，脸上浮现出冷笑。等待着他的是最残酷的死刑——凌迟。

现在从海上靠近马耳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圣埃尔莫海岬前端威严的要塞。这座要塞不陷落，便无法去往位于其后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

拉·瓦莱塔深知圣埃尔莫要塞的重要性。平时这个要塞由6名骑士和600名士兵把守，现在他又增派了46名骑士和200名士兵。老练的意大利骑士普罗里奥指挥这52位骑士和800名士兵把守要塞。

奥斯曼军5月31日开始对马耳他发起进攻，首先炮击圣埃尔莫要塞。不过，大炮不在圣埃尔莫所在的半岛，而在北面隔着大海的海岬上。位于悬崖顶上的炮台基础不牢，中间还隔着大海，奥斯曼军引为骄傲的巨炮也只能在海面上掀起水柱而已。

穆斯塔法帕夏见状命令同时进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这

两座要塞位于突出于海上的半岛前端，可以从陆地进攻。他大概想一下攻陷拉·瓦莱塔集中防御的三座要塞。可是，这里虽然没有大海的屏障，但在岩石地带安装炮台困难更大。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之间架有绳索和铁链做成的跨海桥，奥斯曼军进攻的不是一座孤立的要塞。攻打孤立的要塞要容易得多。

拉·瓦莱塔发明的奇妙兵器在抗击陆上进攻的土耳其军时大显身手。

那是一种会喷火焰的火圈，用麻或木棉布缠绕成圈，再在油里浸泡而成。他们把这种火圈大量掷向奥斯曼新军。奥斯曼新军的士兵是苏丹的近卫军，军服也是华丽的长袍，作战时要把长袍的下摆掖在腰带上。这华丽的军装是他们的骄傲，只要敌人没有来到眼前，他们就不会掖起下摆。这已是他们的习惯。

火圈战对新军以外的奥斯曼士兵也发挥了威力。尽管是在酷暑中作战，奥斯曼士兵却不想脱掉帽子，取下头巾。如果再不脱掉漂亮的棉布军装，只要用火点着色彩斑斓的帐篷，就会令他们吃惊莫名。拉·瓦莱塔见状派出一队骑兵，在士兵出战已空无一人的帐篷营地里四处放火。奥斯曼士兵更加军心动摇，自己重要的个人物品全部化为了灰烬。

图尔古特的到来

6月2日，图尔古特和13艘加莱船一起来到马耳他。他在北非各港口城市走了一遭，招募了一批精选士兵，稍晚才到。所谓精选士兵是被称为“Matasiete”的人，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向安拉起誓至少杀死6个基督徒士兵的战士。在北非伊斯兰教徒中，这些士兵以最狂热的信仰和凶猛而闻名，所持兵刃都是大号半月刀。图尔古特召来了1 600名这样的狂人。翌日，乌尔齐·阿里也带着800名海盗赶到了马耳他。

对圣埃尔莫要塞的进攻由于海盗的参战变得更加激烈，隔海炮击以外，又有来自半岛陆地的进攻。据说，这是听取了图尔古特意见后改变战术的结果。可见图尔古特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了这里的战斗。他率领着令人恐惧的1 600名“伊斯兰狂犬”攻打圣埃尔莫要塞。

虽是隔海炮击，没完没了地打也会奏效。以多取胜是奥斯曼军的拿手戏。圣埃尔莫要塞遭连日炮击，受到了严重破坏，通宵赶工也来不及修复。当然，图尔古特建议的陆地进攻也有缺陷。部队毫无掩蔽，就像一艘把船腹一直暴露给敌人的船只一样，饱受来自右方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的炮击。马耳他骑士团的大炮数量不敌奥斯曼军，但命中率奇高。由于长年的经验，他们已经习惯于向漂浮在海上的船只开炮。

6月17日，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图尔古特所率精选士兵用做盾牌的巨岩。被炮弹炸得四处迸飞的岩石碎片，削飞了冲在前面的图尔古特的脑袋。

图尔古特死后，进攻圣埃尔莫的任务又回到穆斯塔法帕夏肩上。他用大炮轰击，让士兵爬上坍塌的城墙，日复一日地轮番进攻。

圣埃尔莫的城墙已经坍塌，惨不忍睹。852名誓死坚守的骑士和士兵已减员到200人。这200人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投降。而奥斯曼方面仅因攻打圣埃尔莫要塞就损失了4 000余人。

以眼还眼

6月23日，来自圣埃尔莫要塞的炮声沉寂了。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圣埃尔莫要塞终于陷落。当天，奥斯曼兵像雪崩一样涌入要塞，防守方所有人被当场砍下头颅，连伤员也未剩下一个。

听说留下了10名骑士，但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烈的死法。他们被活活剥去人皮，绑在原木上扔进了大海。海流经过圣埃尔莫要塞前方流进海湾，把这些骑士冲到了圣安杰罗要塞所在的海边。奥斯曼方面估计到了这样的结果，才采用了这样的行刑方法。

紧接着，奥斯曼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派使节往见拉·瓦莱塔，说："如果骑士团团长不想也这样死去，就请接受我的建议。我会像罗得岛攻防战时苏莱曼许可的那样，同意你们体面地撤走。"

拉·瓦莱塔对使者说："回去告诉穆斯塔法，他在马耳他所能得到的土地只有他的葬身之地。"

拉·瓦莱塔估摸着使者把话转告给穆斯塔法帕夏的时间，采取了以下行动。他把迄今俘虏的所有奥斯曼兵全部带到敌人看得见的城墙上，一个一个地砍头让敌人看。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当作炮弹射进奥斯曼阵地。马耳他攻防战就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持续着。

马耳他骑士团在钢铁意志的团长率领下岿然不动，而奥斯曼军却开始动摇。攻防战已经超过了向苏莱曼许诺的一个月时间。

经过一个月的进攻，本该高高飘扬在马耳他全岛的红底白色半月旗只在圣埃尔莫要塞上空飘扬。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是正殿，在那里猎猎飘扬的仍然是骑士团的红底白色十字旗。

皮里亚帕夏对进攻打法提出了批评。他本该待在海上却登上陆地，事事与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唱反调。穆斯塔法当然不会高兴。士兵们成天看着他们两人骑马并行，争论不休。士兵的厌战情绪开始抬头。

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在把不同任务交给两个司令官时应该考虑好，把最终决定权交给谁，任命时即应明确。苏莱曼好像疏忽了这一点。

况且，马耳他攻防战时奥斯曼方面的这两位将军实在不是什么非凡之将。

穆斯塔法帕夏战争经验丰富，但那些展开大军战斗的战场都是在多瑙河沿岸的匈牙利、美索不达米亚等辽阔的平原。他并不习惯于在狭小且地形复杂的马耳他岛，尤其是在岛上狭窄且遍布岩石的地带作战。他完全被拉·瓦莱塔制定的把敌人调集到这种地带一决胜负的战略套了进去。

而皮里亚帕夏则连平凡都谈不上，遑论非凡。

首先，他被授予近200艘船舰的指挥权，却不懂得有效利用。封锁通往西西里的海路以阻止来自西西里的援军这种念头，似乎从未在他脑海中闪现过。于是，马耳他骑士团的5艘舰船直到攻防战末期都一直无所事事。

更加严重的失职是，他根本没有尝试从海上攻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圣埃尔莫陷落后，奥斯曼船便可以自由出入海湾了。如果把船驶进海湾，用船上的大炮轰击，这两座要塞都将遭到来自海陆的两面炮击。然而，船舰在皮里亚帕夏指挥之下，一直在远离要塞的湾内安全海域下锚停泊。就连奥斯曼兵自己也在相互议论，说他一心只想把苏丹岳父托付的海军一艘不失地带回伊斯坦布尔。

虽然如此，皮里亚帕夏坚持说进攻迟缓的责任在穆斯塔法帕夏，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年长武将一步不让。两人的关系很像经过野战锻炼的司令官与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时候后者往往更加盛气凌人。

坚守方马耳他骑士团的境况也越来越差。尽管他们在坚忍不拔地坚持战斗，但战斗力却在不断减弱。和威尼斯共和国一样具有当时最高水准的骑士团医师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断气，伤员被运来时已无

法施救。不论是被炸飞了一条腿，还是箭深深扎进腹部，只要还能动他们就在坚持战斗。

一个多月过去了，翘首以待的西西里援军迟迟未到。西西里传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募集不到士兵。

西西里全岛不可能募集不到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名士兵。身居“副王”高位、受西班牙国王之托统治西西里的唐·加尔西亚，在确定奥斯曼军要来进攻时曾亲自到访马耳他，与拉·瓦莱塔共商防御大计。当时他对派遣援军相当积极。但他是西班牙国王手下的官僚，敏锐地感觉到腓力二世已被欧洲战争所吸引，对马耳他的关心开始淡薄。于是，他对驰援马耳他变得消极起来。如果他仍像以前一样态度积极，他可以呼吁同样地位的拿波里“副王”，很容易募集到1.6万人。

拉·瓦莱塔已经不再固执于1.6万这个数字，请求能募集多少就派多少。他甚至传过话去，将派骑士团的5艘舰船护卫西西里援军由海路来马耳他。可是，唐·加尔西亚的暧昧态度并未因此稍有改变。

就这样，7月过去了，时间进入了8月。海上刮来了东南风，混杂着撒哈拉沙漠沙子的黄风还带来了海上大量的湿气。奥斯曼兵不适应这种气候，大受其苦。奥斯曼式的军服适合冬季穿着。军装也是一种文化，不会为适应作战地区而改制。罗马帝国的军团兵在北欧作战时，穿的也是裸露着手臂和脚部的军装。

奥斯曼军士兵的粮食充足，但看着存粮日减，也会令人产生匮乏感。在战场上，这种感觉会导致对饥饿的恐慌。乘船回祖国的海路需时两个月，这让不安萦绕在他们心头。

绝对缺乏的是新鲜水。地中海南部的夏天几乎不下雨。在原本就缺少绿色的马耳他岛上，没有天然泉水。缺少新鲜水导致了疫病的发生。奥斯曼士兵因病而亡的人数在增加，比来自两个要塞的炮击和骑士经常

性的游击行动所造成的牺牲还要多。这使得奥斯曼士兵的士气更加低落。

穆斯塔法帕夏真的急了。从抵达马耳他的5月18日算起，被拖在马耳他已经有3个月了。如果想打开战局，就需要改变战术。

奥斯曼军第一次把船队开进了两个要塞所在的海湾，他们想从海上发起进攻。可是，从船上炮击后士兵却不能登陆。要塞面海的一侧只有巴掌宽的地带围着高耸的城墙。穆斯塔法命令士兵在这巴掌宽的地带登陆，然后用绳梯攀爬城墙。这不是一个海军将领的打法，他毕竟只是一名陆战将领。

这个动向早被骑士团发现。拉·瓦莱塔命令，在参战的马耳他岛民中特别挑选农民出身的士兵，在狭长地带上布阵，任务是袭击登陆上岸的奥斯曼兵，砍掉他们的脑袋。他们常年饲养牛羊，即使不习惯挥剑，也惯于使用短刀。海上攻击没有收到穆斯塔法希望的效果。

进入8月以后，奥斯曼军向两个要塞发起的总攻都没有取得成果。骑士团以一当十，牺牲自然很大。奥斯曼军先投入了1.5万人，接着投入2万人，但回到营地的最多只有2/3。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总攻后回到帐篷，皮里亚帕夏喋喋不休地责备他。这种情形士兵们已经司空见惯。

防守的骑士已经奄奄一息，但奥斯曼方面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就这样，进入了这年9月。

9月7日，穆斯塔法帕夏正在指挥总攻，连水手都动员了起来。他自己也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总攻了。这时，他收到了一条来自皮里亚帕夏的消息，说载着西西里援军的船队在马耳他的5艘船护卫下渐行渐近。

正在防守阵地指挥作战的拉·瓦莱塔更早地收到了这条消息，是马耳他5艘舰船的统帅罗梅加斯发来的。他写道，援军不足6 000人，而不

是1.6万人。

但拉·瓦莱塔却宣布道，1.6万人的援军将陆续抵达，然后把写有援军将到的字条绑在箭上大量射进奥斯曼阵营。

这一招彻底摧毁了穆斯塔法帕夏最后的斗志。主要战斗力3万人，加上其他人员共5万人的奥斯曼军因战斗和瘟疫已损失了2万人。

穆斯塔法帕夏命令全军上船。皮里亚帕夏同意了这道命令。士兵们也一定不愿再在马耳他多待一刻。帐篷被迅速叠起，登船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然而，已经离去的奥斯曼军两天后于13日又返回来了。不知他们是在哪里又是怎样得到的消息，说抵达马耳他的西西里援军不是1.6万人，而是不足6 000。心有不甘的穆斯塔法帕夏认为还可以再战，于是命令全军掉头返回。

西西里援军在马耳他岛北部登陆，开始奔向战场，他们不到6 000人。奥斯曼军纵然有1万人，但却斗志丧尽，在穆斯塔法帕夏眼前被打得屁滚尿流，奥斯曼军司令只得命令再次登船。这回奥斯曼军是真的离去了。

防守成功

援兵们目之所及的是四处崩坍的城墙和遭到大炮轰击已经不成样子的要塞，巨石遭到惊人的破坏。石缝中现出骑士和士兵的身影。他们肮脏不堪，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就像刚从地狱里走过一遭，甚至让人在看到他们的瞬间不敢上前。

骑士团的正式记录中也没有幸存者数量的准确记载。只有在穆拉多

利编辑的、收集了古代记录的《意大利编年史》一书中有所记载，基督徒即防守方面的战死者是4 000人，其中骑士战死的人数一说是240人，另一说是300人。

如果取其中间数，则有270名骑士战死。在拉·瓦莱塔手下参战的骑士不足400人，殒命的骑士数量达到了近70%，3个人中就有2人战死。这是坚持了4个月的攻防战所付出的代价。

马耳他攻防战胜利的消息迅疾传遍整个欧洲。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写来充满赞誉之词的亲笔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马克西米利安也寄来了贺辞和赞美词。

已经卧病在床的罗马教皇庇护四世，也专程派来使节祝贺，传达了授予拉·瓦莱塔红衣主教之位的旨意。

在法兰西，为儿子摄政的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到处得意地宣称，骑士团团长出生在法兰西，这是法兰西的骄傲。此事拉·瓦莱塔听了必定会苦笑不已。

但是，与各国当权者相比，老百姓的反应要直率的多。钟声在全欧洲的教堂里响起，庆祝抗击伊斯兰久违的胜利。教堂的钟声因撞法不同有表现喜悦的钟声、警钟或丧钟等的区别。当时的人听到钟声就能分辨。甚至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也是教堂钟声长鸣，传达着喜讯。当时英格兰已创建了英国国教会，并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了出去。

唯一兴奋不起来的恐怕是拉·瓦莱塔和在他指挥下出生入死打过来的骑士们。

教皇任命拉·瓦莱塔担任红衣主教，这是基督教会中仅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收入足以保证他安乐优雅地度过余生。然而，他慎重地拒绝了这一任命。全欧洲王侯发来的赞美信中，只要有人提到如果需要愿意援助，他就会立即回信请求资金援助。马耳他在将近4个月的攻防战中已被破坏殆尽，需要重建。较之溢美之词，较之红衣主教的地位，他更需要资金和技师工匠。招来的5名技师都是意大利人，当时意大利在这方面属于先进国家。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王室建筑师，由腓力二世派来。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马耳他首都的名称一直是“瓦莱塔”（Valletta）。现代“瓦莱塔”的骨架是攻防战后由拉·瓦莱塔建立的，这样的命名极其理所当然。瓦莱塔在后来的200年间经过了无数次改建和装修，但仍是攻防战后重建的底子。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于攻防战后的第二年去世。但与他同龄的拉·瓦莱塔却无暇安详地老死。他在攻防战期间一直临阵指挥，战后又继续站在第一线指挥重建。

马耳他骑士团以超级大国奥斯曼为对手，战斗到胜利，它的名声响彻整个欧洲，资金和人员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拉·瓦莱塔是骑士团的象征。马耳他完成重建之前他不能死。他是一个狂人，又是一个现实而理性的人！

攻防战三年之后的1568年，拉·瓦莱塔在马耳他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为庆祝攻防战胜利而建的维多利亚教堂。1798年，骑士团被拿破仑赶出马耳他。如今，骑士团总部设在罗马，只有拉·瓦莱塔的墓还留在马耳他。

圣埃尔莫、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得到了彻底重建。今天，从海上去马耳他岛时，最先迎接到访游客的是沐浴在一片朝晖中的圣埃尔莫要塞，连接欧洲与马耳他的摆渡船总是一大早到达马耳他。

任何人都会被这座要塞的威严所震慑。自1800年起的150年间，马耳他一直是英国的领地。这一时期中马耳他得到了加强，但那是为适应航空时代而进行的加固。只要看一下攻防战后实际参与了马耳他复兴的意大利技师留下的素描就会知道，即便在16世纪后半叶，马耳他要塞的威严就已令人震撼。英国执着地要把马耳他岛建成军事基地。我们可以想象，马耳他就是一艘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空母舰。航母是活动的堡垒，要塞是不动的航母。尽管马耳他成为了独立国家，成了欧盟的一员，但仍不失为战略要地。

苏莱曼得知马耳他攻防战失败后，一定会为自己年轻时在罗得岛的绅士做派感到后悔。因为当时自己假装绅士，让骑士们体面撤走，把凶猛的“马耳他之鹰”放回了天空。

不管是历史，还是政治、军事、经济，只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学”字，对人类精神情感的关怀立即就会淡薄下来。精神情感是一种没有形态，也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东西。是不是成为严密的学问便不适于关照人类精神情感呢？

当然，毋庸赘言，没有任何对策而高唱精神至上，是愚中之愚。但是有一种人，明明有力量拿出对策却又放弃，感到无论如何都是徒劳。如果精神至上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只要做就不会白费力，精神至上还是不能丢弃的。

奥斯曼帝国拥有辽阔的领土，靠陆军和大炮的威力称霸东欧，势力已经扩张到了中欧。而马耳他岛只是弹丸地，马耳他骑士团的那点儿军力微不足道。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却与奥斯曼苏丹大张旗鼓派来的大军战斗到最后，打退他们，取得了胜利，让世人看到了全欧洲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可能”，看到了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军并非不可战胜。

老百姓也看明白了，在长期的攻防战中，海盗根本成不了战争的决定因素。海盗只是在袭击和抢掠弱者时才是威胁。以往漫长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海上堂堂正正地正面对决的海战中，海盗几乎从来没有打赢过。

有这样的想法就能打赢。懂得这一点，人们就会认真巩固备战体制。不过，这可不是老百姓能做的事，而是在沿海拥有领地的领主的责任。人们甚至在高高的悬崖上构筑临海城堡。在至今仍叫作“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传来海盗警报时，人们也不再逃进山里，只让妇女儿童进山躲避，能拿起武器的男人都不再逃走，他们守在城堡里，在领主的指挥下迎战海盗。

耸立在意大利半岛海岸上的许多城堡都是16世纪后半叶修建的。虽有很多后来都经过改造，但基础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6世纪后半叶最忙碌的一定是城堡工程师，马耳他攻防战以后，城堡建设的需求大幅增加。

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人们不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资金方面都不遗余力。我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人们的想法已从做任何事都是徒劳，转变成了做什么都不会白费。

从整个欧洲史来看，马耳他攻防战不过是一个地区性事件；但对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而言，马耳他胜利的影响远大于新旧教徒在法兰西的血战，荷兰人对西班牙军队的顽强抵抗，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迅速抬头的英格兰所带来的影响。顺便说一句，英格兰成为大不列颠，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莎士比亚就出生在马耳他攻防战的前一年。

奥斯曼军被迫撤出了马耳他，但这并没有立即导致地中海海盗势力的衰弱。

穆斯塔法帕夏和皮里亚帕夏既没有受罚，也没有被撤职。苏丹苏莱

曼仅仅一年后就去世了，也许他并不愿意做出可能令奥斯曼军队解体的这种决断。

苏莱曼上了年纪，在他手下四处征战的穆斯塔法大概也老了。皮里亚帕夏一如既往受命统率奥斯曼海军，他年轻却无能。即使遭到皮里亚率领的80艘舰船的袭击，西欧也没有受到像海盗袭击那样的损失。

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被任命为的黎波里总督。奥斯曼帝国政府这时还不想任命这位改信伊斯兰教但生于意大利的海盗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皮里亚在改教之前应该是基督教徒。这两个45岁左右的同龄人在晋升速度上的差别，不能不使人认为奥斯曼的用人系统已经开始僵化。乌尔齐·阿里依旧以的黎波里为基地，精力旺盛地干着海盗勾当，但奥斯曼帝国的支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力。如果在以前，拉·瓦莱塔不可能在攻防战刚结束后便能专心致志地复兴重建。

苏莱曼统治了45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作为绝对的君主统治着奥斯曼帝国。由才能卓越的君主长期统治并习惯于这种统治的任何国家或民族，统治结束后都会进入停滞期。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因此而减弱。这对地中海世界基督教方面的人们而言，意味着安稳的日子即将来临，哪怕这只是相对的安稳。1565的马耳他攻防战后，5年时间就这样逝去了。

奥斯曼与威尼斯

我忘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奎恰迪尼在书里写过一句话，这句话长年萦绕在我的脑际：“现实主义者总是在认为对手跟自己想的一样而不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时犯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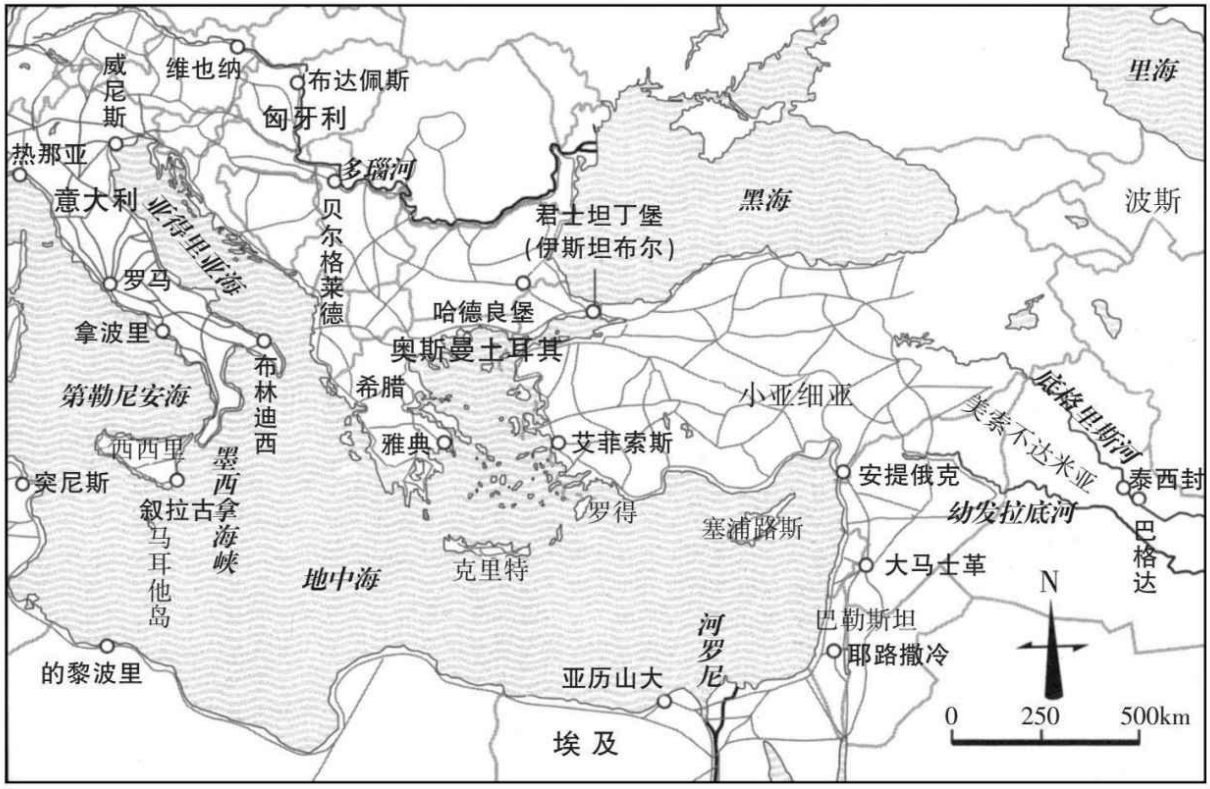
威尼斯共和国靠东西方贸易繁荣起来。进入16世纪以后，威尼斯又成为自己也从事生产的工业国，但威尼斯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者的地位

却没有发生变化。

对威尼斯而言，商贸顺利发展才是最重要的。那种没有必要却要扩张领土还为此自鸣得意的领土欲跟他们无缘。他们只需要船舶的停泊港和贸易据点，没有统治其他民族的欲望。同时，他们毫不关心其他民族是否与自己信奉不同的宗教。连教皇都不禁叹息道：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唯独威尼斯人是个例外。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是伊斯兰世界的盟主，热衷于扩张“伊斯兰之家”，但面处现实处境却不狂热。他正是把骑士团赶出罗得岛的罪魁祸首。罗得岛时代的骑士团是这样一个集体，他们认为，见伊斯兰船就打就抢是宗教骑士团的职责。可是这样一来，宗教问题就变成了治安问题。骑士团作为根据地的罗得岛处在连接奥斯曼帝国两大城市——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的海上要道上。

奥斯曼认定东地中海是自己的海域，但威尼斯共和国却在这里拥有领土，仅举其大端者就有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两个岛屿。



意大利及东地中海

如果苏莱曼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就会认为虽然现已称霸整个东方，建成了庞大帝国，也还必须遵守《古兰经》的教诲。《古兰经》反映了穆罕默德的思想，他为争霸阿拉伯半岛而备尝艰辛。这样，苏莱曼一定会在罗得岛得手之后，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来，并入“伊斯兰之家”。

然而，苏莱曼没有那样做。他采取了现实路线或者说平衡外交，从不越过这条底线，从而统治了半个世纪。当然，在苏莱曼时代，也会不时对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进行军事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一种示威，为的是让威尼斯意识到贸易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奥斯曼认可的缘故。

苏莱曼知道威尼斯的存在价值。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迎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方政治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物产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提高。

在西方，16世纪就像一个出发点，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英格兰等领土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一齐起跑。西方也渐渐成为一个好的买家和一个好的卖家。

东西方不是竞争对手，各自的物产不相同。

威尼斯是最适合连接东西方的人。

第一，它没有领土欲望；第二，它不受宗教束缚。

他们重视持续性。

在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中，威尼斯屡屡落在对手后面。但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一贯重视持续性，总是贯穿着两条原则：自己赚钱也让对手赚钱，坚守信用。

在葡萄牙发现绕过非洲的新航线，打开与香料原产地印度直接交易的路线时，此前一直垄断香料市场的威尼斯用下列办法克服了危机。

由于葡萄牙的介入，作为中介的阿拉伯人失业了。为了保证他们的再就业，威尼斯人的加莱商船在地中海东岸等着这些阿拉伯人跨越沙漠运来货物，再转运到西欧。这些加莱商船有着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到货日期。威尼斯人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危机。里斯本不过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线后的一个时期成为香料贸易中心。以后，香料市场的中心又回到了威尼斯。

如果奥斯曼帝国像曾经的罗马帝国那样，一以贯之地贯彻把各个领域的事分别交给擅长其事的民族的方针，如把学问艺术交给希腊人，把商业交给犹太人和希腊人，把骑兵交给骑马民族摩尔人，把箭矢交给东方人，那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罗马人把自己的这种做法叫作“宽容”（clementia）。乍一听“宽容”，好像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其实，古罗马人所说的“宽容”，并不含感情色彩，而是一种冷静的统治哲学，让对手共存，在其擅长的领域发挥力量，让他们确认自身存在的理由，以此为基础形成命运共同体。

然而，奥斯曼人是一神教徒，而罗马人是多神教徒。一神教认为，只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才是真神，越是热衷于信仰，就越不能平等看待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

因而，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也不时紧张。读一下潜伏在奥斯曼各领域的间谍发给威尼斯“十人委员会”的情报和常驻大使的绝密报告，我们便可知道，即使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奥斯曼也是威尼斯的头号假想敌。威尼斯派驻奥斯曼的大使通常担任过驻法兰西、西班牙的大使，是老手中的老手，他们总是单身赴任，以防万一。

尽管威尼斯海上战斗力处于优势，但在陆上，只要苏丹一声令下，奥斯曼就能轻易组成数量与威尼斯全国人口不相上下的军队。与这样的帝国搞外交，就如同当时威尼斯大使所说的玩“玻璃球游戏”。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这是一场威尼斯完全不想让“玻璃球”掉落在地的“游戏”。因此，一旦奥斯曼方面有人受到诱惑要把“玻璃球”扔到地上，“游戏”马上就不再是“游戏”了。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

继苏莱曼之后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宝座的是他的儿子塞利姆。由于父亲长寿，他直到45岁时才执掌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

不过，他当皇太子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长子，人们都认为颇有能力的长子会继位，去治理难搞的地方这样的重要职务全都给了哥哥。而塞利姆则足不出户，享受着快乐生活。

直到两年前哥哥失足，苏丹的宝座才轮到弟弟塞利姆。根据威尼斯情报机构的情报，同父异母的哥哥巴耶济德在波斯造反，也是塞利姆的生母、苏莱曼的宠妃罗克珊娜搞的阴谋，但真相不明。不管怎样，塞利姆在45岁时坐上了连他自己都不曾奢望的苏丹宝座。

刚刚当上苏丹的塞利姆对前来祝贺的威尼斯大使说，愿与共和国维持与先父时期同样的关系，表面上并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完全相信对手的话无法胜任肩负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威尼斯大使很快告诫国内，要特别注意新苏丹的言行。被称为“国务会议”的奥斯曼内阁的大臣们对大使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是危险的前兆。

作为儿子，塞利姆自打出生以来听到的就是“伟大的苏莱曼”，一听就是45年。他的心情似可同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掉拜占庭帝国，被称为“征服之王”。继承他的巴耶济德二世一心一意巩固了父亲的丰功伟绩。如果没有他，下一任苏丹塞利姆一世便不可能称霸埃及，再下一任的苏丹苏莱曼也无法大举进攻中欧，即使实现，时间也会很晚。扩张和改革之后，巩固必不可少。然而继承苏莱曼的塞利姆缺乏这种认识。45岁才终于荣登大宝的这位最高统治者，只对父亲不曾做过的事情感兴趣。

他决定进攻塞浦路斯。

为什么不是克里特而是塞浦路斯呢？

攻打塞浦路斯补给线较短之类，都是后来大臣们找的理由。苏丹塞利姆的本意在于，如果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可以把岛上的葡萄酒据为己有。

塞浦路斯盛产葡萄酒。在这座岛屿成为威尼斯领土以来的100年间，由于威尼斯人高效的农庄经营和质量管理，这里的葡萄酒已经获得了名酒最高的地位。这座岛上产的玛尔维萨酒，在当时的欧洲享有与现

代的香槟酒同等的地位。

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和威尼斯在伊奥尼亚海上的领地凯法利尼亚岛特产的葡萄干，还是向新兴国家英格兰出口的主要商品。这些物产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南安普敦港卸货，卖掉后用以采购英格兰产的粗羊毛，装船运回威尼斯；在威尼斯的工厂制成最高级的衣料，再运往英格兰销售。当时意大利在英格兰很热门，据说连伊丽莎白女王都懂意大利语。英格兰是威尼斯产高级纺织品最好的市场之一。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多以意大利为舞台，反映出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的爱好。

正是因为有了威尼斯人的经营，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才如此有名，并非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能产出上等好酒。可是，因伊斯兰的戒律而不敢公然饮酒，私下里却豪饮成性的塞利姆没有想到这一点。

要做父亲没有做过的事情，征服塞浦路斯，把上等葡萄酒据为己有，这些想法宣告了“玻璃球游戏”的终结。超过10万大军和200艘船集结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这让威尼斯最终放弃了长年苦心维系的中立立场。

“强国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维持和平，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具有这种地位。”

这是那个世纪初工作在威尼斯外交第一线的弗朗切斯科·萨兰佐给政府报告中的一句话，16世纪初，东面奥斯曼崛起，西面法兰西和西班牙不断强大之际，威尼斯共和国就已经冷静地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外交才会如此现实，有时又寸步不让、毅然决然。16世纪后半叶的1570年，负责外交的是同属于萨兰佐家族的乔万尼·萨兰佐，这事纯属偶然。不过，在被派往罗马教廷，为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而努力时，他的脑海里闪现的不就是亡父的这句遗言吗？

通往黎凡特之路

威尼斯共和国是唯一一个自中世纪鼎盛时期的13世纪起就向各国派驻大使和领事的国家。凡遇重大问题，都会从本国派遣特使。常驻大使自特使到任便立即归其指挥。

特使乔万尼·萨兰佐刚到罗马上任，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说服罗马教皇庇护五世，请他号召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

庇护五世被选为教皇前，在因狂热和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当了30年法官。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逮捕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教皇便公开谴责，原因是玛丽·斯图亚特为天主教徒。法兰西的新旧两派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权力斗争，这位教皇公开支持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也仅仅因为她是天主教徒。德意志的新教、荷兰的市民阶级，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庇护五世的敌人，教皇对他们的残忍程度胜过异教徒。

可见庇护五世是反宗教改革的骄子。尽管威尼斯与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缔结协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庇护五世不可能心无芥蒂。威尼斯在当时还是一个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国度。幸存者从异端裁判所的牢狱中逃出，所有向他伸出援手的人都会说：逃到威尼斯去吧。威尼斯的书肆里公然摆放着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的书籍。

这个时期的威尼斯需要罗马教皇。但是，庇护五世在看到异教和异端失败之前拒绝吃肉而只吃鸡蛋，如果只是救援塞浦路斯，无法说服他。于是，萨兰佐大使决定利用老教皇心中燃烧着的十字军精神。这样，自以为来日无多的教皇被彻底说服。

罗马教皇的价值不在于他所拥有的那一点儿军事力量。他的价值在于其影响力，他能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资格，让强国的统治者行动起来。然而，当时的状态不允许欧洲列强轻易响应上帝代言人的号召。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正在迎战包围匈牙利的奥斯曼军，无法腾出手来。

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摄政下的法兰西正处于两年后爆发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前夜，根本不可能考虑国外的事情。

结果，靠得住的欧洲大国只有西班牙。尽管30年前在“普雷维扎海战”中蹊跷失败的威尼斯不能忘怀被迫喝下苦水的经历，但至少眼下在地中海世界，自己与西班牙利害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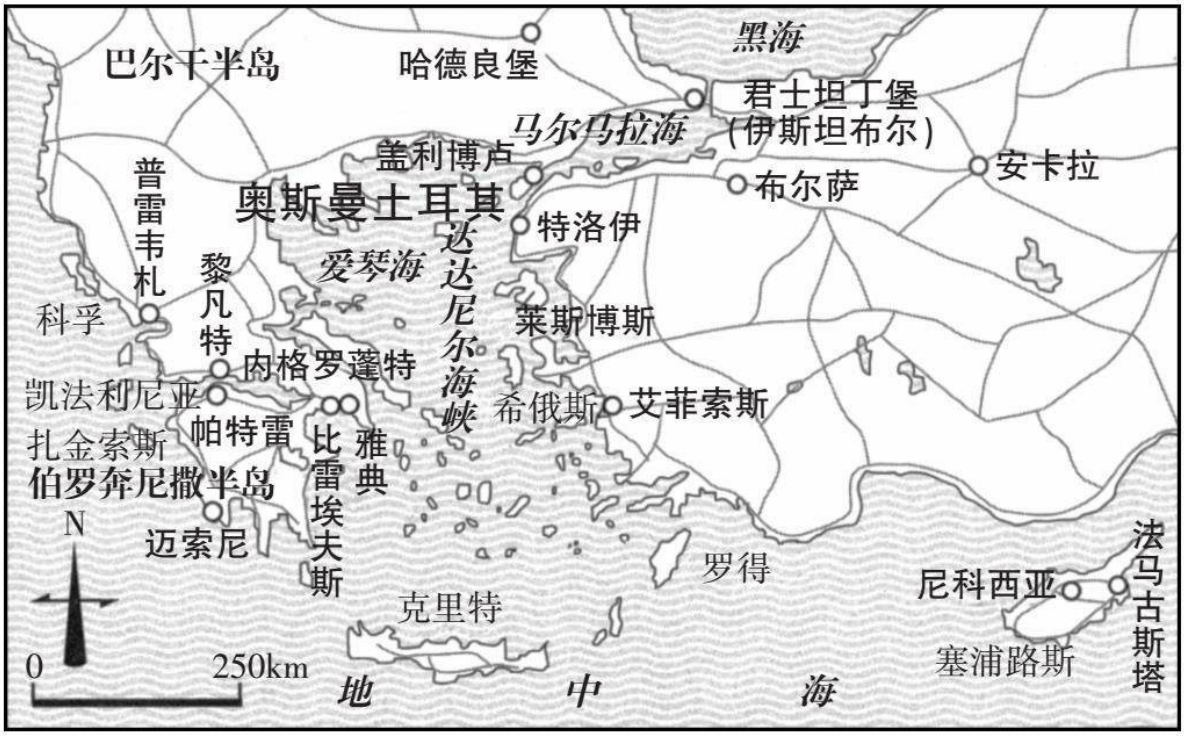
腓力二世

然而，狡猾的腓力二世并未被以抗击异教徒为旗号的十字军的说法所蒙蔽，他察觉到组成联合舰队的本意在于救援塞浦路斯。可是，历代西班牙国王都拥有“天主国王”的荣誉，不允许他无视罗马教皇的请求。西班牙提出要求：如果威尼斯提供的船只多于其他国家，并由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西班牙就参战。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是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海军将领，与他的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一样，是和自己的船队一起受雇的海上雇佣兵队长。当年，威尼斯曾被安德烈亚·多里亚在普雷维扎灌下一杯苦水。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是威尼斯可以接受的人选。威尼斯直接拒绝了腓力二世的提议，交涉受阻。

塞浦路斯攻防战

1570年6月，奥斯曼军开始大举进攻塞浦路斯。仅受命封锁海上的加莱船数量就达160艘，运送10万士兵的帆船，多得数不清,挤满了塞浦路斯海面。这些士兵开始从塞浦路斯岛的几处海滨同时登陆。在被大海包围的岛上，无法阻挡他们。穆斯塔法帕夏担任奥斯曼大军的总指挥。这位老将5年前进攻马耳他，无功而返。塞利姆对他说，如果这次再失败便要掉脑袋，他下定必死决心，踏上了塞浦路斯的土地。



爱琴海及其周边

遭到攻击不得不奋力防守的塞浦路斯士兵，加上新参军的500名希腊岛民，总数还不到4 000人。威尼斯先从克里特派出一队援军，带着补给物资在法马古斯塔成功登陆。位于岛屿东北端的法马古斯塔已被建成要塞城市，防御坚固，奥斯曼军尚未接近。

同时，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率领130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本土出发。威尼斯还命令常驻克里特岛的舰队司令马可·奎利尼紧急前往科孚岛会见威尼尔，讨论突破奥斯曼军包围的战术。

8月4日，来自威尼斯和克里特的舰队在科孚岛会合。可是，威尼尔率领的130艘船在南下亚得里亚海途中染上瘟疫，接二连三有人病倒，按此状态不可能再去塞浦路斯，也不可能与奥斯曼的160艘船交战。

在此期间，萨兰佐大使的努力也泡了汤，为建立联合舰队的交涉迟迟没有进展。

教皇庇护五世催促西班牙国王的亲笔信一封接着一封。但腓力二世总是犹豫不定。另一方面，被任命为教廷海军司令的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前往威尼斯，说服威尼斯接受西班牙国王的建议。威尼斯政府仍然拒绝把自己国家的船和人交给雇佣兵队长。

腓力二世面对罗马教皇的再三请求不能再拖延，派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西班牙船去了东方，但没有给他明确的指令。

地位最高的人物无须挑明自己拒绝的意向。如果想发出不要行动的命令，只要态度暧昧即可。臣下自己会判断是否采取行动。腓力二世的深意在于，对威尼斯有利的事情，西班牙都不会出手相助。腓力二世还是这样的一位君主，不论是文件还是语言，不会留下任何遭谴责之虞的证据。

多里亚深知国王的心意向东驶去，与正去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舰队会合。他首先反对教皇提出的让科隆纳担任总司令的妥协方案。接着，他指出按威尼斯舰队的现状，月底前难于继续东进，拒绝让自己的船队出发。

集结在克里特岛的战斗力，加上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共有加莱船180艘和加莱塞排桨帆船12艘，足以迎击正在包围塞浦路斯的奥斯曼海军，但多里亚却坚持己见。瘟疫导致威尼斯的战斗力减弱也是事实。

联合舰队全力召集克里特岛民，直到9月过半才解决水手不足的问

题。9月18日，舰队全体出发，驶向塞浦路斯。然而不久就接到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

消息说，尼科西亚陷落于舰队从克里特岛出发前的10天，即9月8日。抵抗奥斯曼大军3个月的进攻，防守在第一线的威尼斯人全部壮烈牺牲。100年来，塞浦路斯岛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它的命运取决于岛屿东北部的法马古斯塔是否守得住。

得到消息的时候，舰队已经驶往塞浦路斯的途中。意见分歧当即表面化。威尼斯的司令自然主张直接前往塞浦路斯。而秉承西班牙国王意旨的多里亚反驳说，他们专程东来，不是为了救援一个大半已经落入奥斯曼之手的塞浦路斯。结果，载着2 500名士兵的20艘船被派往法马古斯塔做援军，其他的船全部西撤。可是，这20艘船也被乌尔齐·阿里率领的海盗船队挡住了去路，无法靠近法马古斯塔，只得返航。

一来二去，地中海上的风也越发寒冷起来。天气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这比敌人更为恐怖。转眼间暴风雨袭来，就像海神波塞冬要向人们夸耀自己的存在一般。船队要么一举逃进法马古斯塔港，要么向西撤走。这种时候，人们会极其自然地选择回到自己习惯的地方去。

于是，威尼斯舰队回到克里特和科孚岛，西班牙舰队回到西西里，多里亚带着自家船队回到热那亚，各自过冬。多里亚约定明年早些前来。威尼斯舰队也想来春尽早集结，决定不回威尼斯本土，在附近的克里特和科孚岛过冬。

他们没有抛弃法马古斯塔。南面岛屿塞浦路斯的冬季也很严酷，陆上事实上处于休战状态。布拉加丁总督率领5 000士兵防守的法马古斯塔有完美的城堡，在威尼斯的海外领土中以坚固闻名，仅次于科孚和克里特。尽管只有5 000人的防御力量，而敌人有10万人，但他们军粮充足，可以坚持一冬。

但是，1570年拥有180艘加莱船和12艘加莱塞排桨帆船的联合舰队，一仗未打就解散。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缔结契约。明确的契约有时会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一直待在罗马的特使萨兰佐的最大任务，就是以明确的契约形式建立一支联合舰队，不给任何国家留下退路。

建立联合舰队

从1570年到1571年的这个冬季，威尼斯、罗马、马德里之间一直在艰难的交涉。争论的重点有四个。

一、让谁当总司令？

二、让哪个国家的哪个人当副总司令？

三、战略目标确定在哪里？

四、经费如何分担？

关于总司令：

西班牙力推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坚决反对。

威尼斯力推新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的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西班牙坚决反对。

教皇提议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威尼斯不接受，西班牙也同样拒绝。

事情毫无进展，同前一年一样毫无变化。

选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当副总司令，威尼斯和西班牙都没有强硬反

对。副总司令要在总司令突发状况时立即取而代之指挥全军。这个职位不能轻易授给没有海战经验的著名陆军将领科隆纳。让科隆纳担任这个职务的条件是，所有战略战术均须与其他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威尼斯的司令协商后才能决定。有了这个条件，科隆纳担任副总司令的事总算落实下来。

和总司令的人选一样，西班牙与威尼斯在战略目标上也不一致。西班牙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主张攻打黎凡特（东地中海），两厢针锋相对。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幕：威尼斯的代表说只要不在地中海给奥斯曼重重一击就决不去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交涉官员则反唇相讥，说如果那样联合舰队就难于在年内出动。

这个问题总算也有了结论：大家决定不管是在东地中海还是在西地中海，都要与遭遇到的奥斯曼舰队主力交战。以后的行动待海战后再行讨论。

集结地点定在地中海中央，西西里的墨西拿。定下尽快集结，具体时间未定。

经费分并不是各国分别出资后集中使用，而是各国自筹包括船只、水手、划桨手以及大炮等武器在内的战争所需的一切，并各自组建相当于现代所谓海军的战斗部队，然后根据各自所占比例确定分担率。

这个分担率确定为西班牙11/18，威尼斯7/18。其他国家提供的战斗力太少，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概没有必要专门记上一笔。

问题是没有确定参军船只的数量。在看到抵达集结地的船只之前，没有人知道威尼斯和西班牙能不能遵守协议规定的分担率。

总司令的人选终于也有了结果。

西班牙推荐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取代多里亚。他是卡洛斯皇帝的庶

子，是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这位26岁的贵公子虽然在陆战方面有几许业绩，却没有担任海战总指挥的经验。但威尼斯急于建立联合舰队，认为这要强于硬行推荐多里亚，也就接受了唐·胡安担任总司令。

不过威尼斯附加了条件。只要没有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威尼尔和教廷海军总司令科隆纳的同意，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就不能决定战略战术。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海战布阵时，唐·胡安的旗舰在中央，威尼尔乘坐的威尼斯旗舰和科隆纳乘坐的教廷旗舰将一右一左加强侧翼。西班牙方面也同意了这些条件。

如果1571年5月25日在罗马、威尼斯、马德里同时签字的这个协定立即付诸实行的话，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和坚守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或许会发生改变。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威尼斯舰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早地到达集结地墨西拿，但威尼斯依靠的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不仅是欧洲第一大强国，还把新大陆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不仅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是超级大国。

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确立的世界秩序”。而在这个时代，即使有“西班牙确立的世界秩序”也不足为奇。西班牙已然成为殖民大帝国。然而，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来到之前并没有迎来“西班牙统治下的和平”。我想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班牙人政治的短视。他们缺乏利用其他民族的才能。灭掉印加帝国的也是西班牙人。

1571年5月25日，正式签订了协定，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联合舰队宣告成立。

威尼斯舰队按照协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早地抵达集结地墨西拿。6月初，舰队全部进入墨西拿。

教廷海军的实战力量不过3艘船。于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负担费用备齐了9艘船，合起来共12艘，组成了科隆纳指挥的教廷海军。这支教廷海军于7月初进入墨西拿。

可是，本该率领西班牙舰队前来的总司令唐·胡安却迟迟不到。人们只知道船队于6月6日从马德里港出发驶向登船地点巴塞罗那，以后应该在热那亚停靠后驶向墨西拿。可是，预定的到达日期已过，仍不见船队的影子。等在墨西拿的威尼尔和科隆纳开始担心，莫非又是腓力在卑鄙地阻挠。可唐·胡安不是宫廷官僚，而是国王的家臣。这位年轻贵公子并非不理会腓力二世的意思，他可能忘记了这件事。

他去巴塞罗那、热那亚，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完成异母哥哥命令他的各项事宜。8月23日终于抵达墨西拿。联合舰队可以出击了。

集结在墨西拿的联合舰队实际情况如下：

威尼斯：110艘（含6艘加莱塞排桨帆船）

西班牙：14艘（来自西班牙本土）

36艘（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拿波里和西西里）

22艘（多里亚船队）

共计72艘

教廷：12艘（含托斯卡纳大公提供的船只）

马耳他骑士团：3艘

萨伏伊公国：3艘

其他：3艘

总计：有战斗力的加莱船203艘

传令和侦察用的小型加莱船50艘

运输用大型帆船30艘

这些船的乘员如下：

指挥官：300人

意大利兵：2万人

西班牙兵：8 000人

船员等：1.3万人

划桨手：4.35万人

总计：8万余人

威尼斯投入了100艘船，而西班牙国王投入的船只，即使加上在其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多里亚船队才只有72艘。这样，非但没有反映出两国的经费负担率，威尼斯负担的反而更重。西班牙对威尼斯的非难充耳不闻，强调自己派来参战的经验丰富的士兵有8 000人之众。

西班牙本土派来的船只还不到所有船只的1/10，这个数据究竟反映腓力二世的想法，还是表明西班牙原本就不是海运国家？令人生出种种遐想。

被称为“加莱塞”的排桨帆船是一种大型帆船，就像是把帆船和加莱船合为一体，是这个时期威尼斯开发的新式武器。在靠桨也能航行的加莱塞船上，前后左右都密集地排列着大炮，被称为“浮动炮台”。海战时

首先在海上转着圈炮轰敌人，摧毁敌人阵营，这就是开发这种船的威尼斯工程师的意图。威尼斯投入的6艘加莱塞船上还有专业技师，这种新式武器在黎凡特海战中控制了开战时的局面。

黎凡特海战

如此大规模的舰队挤满了墨西拿港，见到其阵势威容的人一定会被镇住。一想到自己是舰队总指挥，无论是谁心中也会热血沸腾。一位西班牙高官跟随国王年轻的弟弟来做监军，可不论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唐·胡安内心的想法。

9月18日，舰队从墨西拿出发，向东驶去，寻找敌人。舰队收到了情报，奥斯曼苏丹得知基督教世界组建了联合舰队，他派出的奥斯曼舰队业已离开伊斯坦布尔西去。

率领这支奥斯曼舰队的是苏丹特别任命的总司令阿里帕夏。此人毫无海战经验，但却是宫廷里级别最高的官吏。他乘坐的旗舰上载有奥斯曼新军士兵400人。仅此一点就已表明，这次奥斯曼帝国没有依靠海盗，而是投入了本国的精锐。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有277艘，这个数字包括了被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这样，海上战斗力与基督教方面旗鼓相当，但两者仍有区别。

在这场以“黎凡特海战”之称名垂史册的海战中，基督教方面在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最左翼和最右翼的位置上，分别配备的是威尼斯海军将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这位老手中的老手，以及西班牙国王雇佣的对大海了如指掌的热那亚人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伊斯兰方面似乎想法一样，也在相对位置上配备了老手，但这两人都是海盗。

与巴尔巴里戈相对的最右翼安排的是绰号为西洛克的夏鲁克，与多里亚相对的最左翼安排的是乌尔齐·阿里。夏鲁克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总

督，乌尔齐·阿里也已功成名就，拥有阿尔及尔总督的正式地位，但他们两人至今仍然是海盗。指挥奥斯曼舰队后卫的是在马耳他攻防战中战死的图尔古特之子，此人也是海盗。除此三人之外，所有要害处安排的都是海盗。另外，从各船船长的名字推测，奥斯曼舰队一半以上都是海盗船。写到这里，已经不用多说，奥斯曼舰队船上的划桨手全部是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也有的船上用囚犯当划桨手，条件是战斗结束后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战斗一开始，他们便被打开锁链放了出来，也许是想让他们逃脱与沉船共命运的结局。

这两点就是在双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黎凡特海战中，伊斯兰方面与基督教方面的不同之处。两军总司令都由不具海战经验的担任。

支撑起总司令的，伊斯兰方面是海盗，基督教方面是威尼斯海军将领。这一点两军相似。

想来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场黎凡特海战是地中海世界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海战，是从事“海洋业”的海盗与唯一维持常备海军的国家威尼斯第一次正面冲突的海战。

联合舰队把墨西拿甩在了身后，向东挺进，但决定目的地的人们却不是一条心。

这时9月已过半。在途中停靠科孚岛时，同行的西班牙宫廷官僚以现已进入大舰队航行有危险的季节为由，提出了将行动推迟到来春的方案，一时间甚至让唐·胡安都产生了动摇。但是，威尼斯方面坚决主张继续行动，他们害怕推迟到最后舰队会自然解散。

可就在这时，传来了塞浦路斯唯一剩下的法马古斯塔陷落的消息。

塞浦路斯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在首都尼科西亚陷落后又支撑了半年

多，现在也终于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从登陆塞浦路斯算起，奥斯曼军已经在塞浦路斯连续打了一年多。总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最怕重蹈马耳他岛攻防战的覆辙，玩弄了计谋。他建议弹尽粮绝、等不到援军而陷入绝望的防守方打开城门，条件是让他们安全撤离该岛，说是想效仿以前苏丹苏莱曼进攻罗得岛时对骑士团采取的宽大处理的方式。塞浦路斯总督马卡提尼奥·布拉加丁决心开城，条件是奥斯曼方面承诺不但要保障常住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还要保障岛民的人身安全。

可是，穆斯塔法帕夏是从马耳他撤退时的奥斯曼军司令，亲身体会到了苏莱曼的绅士行为后来导致了怎样的结果。他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承诺。

开城后，首先是威尼斯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商人，在被残忍敲诈之后全部斩首。岛上的希腊人也被指站在威尼斯一边与奥斯曼为敌而受到惩罚。岛民中老幼被杀，其余的全部卖为奴隶。

施暴时布拉加丁一直在场，等待他的是特意为他准备的特殊死法，作为他持续抵抗奥斯曼军一年多的惩罚。

威尼斯总督先是被活活地剥掉人皮，然后被反复浸到海里。布拉加丁还在喘气，直到头颅被砍下后才断气。

奥斯曼兵把剥下来的人皮缝起来，里面塞上麦秸，把砍下来的头颅再缝上去。真人皮的人偶被送到奥斯曼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放在中央广场示众，然后又在奥斯曼帝国巡回游街。

因为防守方全员被杀，未能派出向威尼斯本土报信的船，准确情况的报告很晚才到达。得知了这一消息，先前一触即发的西班牙士兵与威尼斯水手之间的对立也消弭于无形。所有人都心情悲痛，对奥斯曼的暴

行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

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要撤军。

在这里写出接着而来的海战详情事实上已做不到。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否则无法叙述下去。所谓战役，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其过程瞬息万变，不去追究过程，便不能把握它的全貌。但事无巨细地写下去，又包藏着迷失大方向的危险。这倒不是要为从简了事开脱。

在执笔《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从威尼斯共和国的诞生写到灭亡时，我便面临这个问题。

当时我选择的办法是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中言及大概，而战役的详情则另写一本书。所以，写完《海洋之都的故事》上下两卷后，我又写了与威尼斯有关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记》和《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都是以地中海为舞台伊斯兰与基督教激烈冲突的战争故事。马耳他攻防战也足可写一本《马耳他攻防记》。当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围绕马耳他岛的攻防战是唯一与威尼斯没有关系的一场战役。

职是之故，《黎凡特海战》一书于20多年前便已写成。这里拜托大家去读这本书。这本书以委实无聊的理由，司令中只有一人战死而令人怜惜，让大家迷上了威尼斯海军将领巴尔巴里戈。即使隐去书中小说化描写的部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把西洛克率领下由地道海盗组成的56艘敌舰驱入浅海，予以歼灭，这种战术当时就受到了高度评价。巴尔巴里戈指挥的左翼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早地升起了宣告黎凡特海战胜利的旗帜。即使没有爱情故事的色彩，这场以黎凡特海域为舞台的海战也充满了戏剧性。

1571年10月7日，在希腊西部帕特雷湾外的海面上打响了黎凡特海战，这是加莱船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海战，基督教方面大获全胜。

超过5小时激战的结果，伊斯兰方面情况如下。

阵亡人数为8 000人（不包括落入海中溺毙者）。

其中包括以总司令官阿里帕夏为首的几乎所有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奥斯曼新军军团长及其部下400人。此外，阵亡者名单中赫然排列着莱斯博斯、希俄斯、内格罗蓬特、罗得等被奥斯曼占领并纳为自己领土的岛屿总督的名字。著名海盗红胡子的两个儿子也在黎凡特战死。率领右翼作战的海盗西洛克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

指挥官中成功逃脱的只有指挥左翼的乌尔齐·阿里一人，包括海盗在内的奥斯曼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被俘人数约为1万人。

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被俘，被唐·胡安作为礼物送到了腓力二世所在的马德里。

被迫充当伊斯兰船划桨手、在这场海战后即被解放的基督徒的人数，据说达到了1.5万人。

烧毁、沉没的的伊斯兰船只仅加莱船就达80艘。

缴获的船有加莱船117艘，“福斯塔”20艘，共计137艘，其中包括以前被海盗俘获并使用的基督教国家船只近10艘。

然而，尽管取得了胜利，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也不在少数。

阵亡人数：7 500人。

伤员人数：8 000人。

其中包括在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所属的一条船上孤军奋战，左腕

中弹负伤的年轻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一书的作者）。

主要参战国的伤亡人数如下：

威尼斯：阵亡4 836人；伤员4 584人

西班牙：阵亡2 000人；伤员2 200人

教廷：阵亡800人；伤员1 000人

威尼斯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这个国家在传统上就有重视精确统计的作风；西班牙和教廷在这点上做得实在太马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威尼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指挥官一级的阵亡者数量之多引人注目。而且，地位较高的武将除了乘坐在教廷旗舰上的奥尔西尼家族的两人之外，阵亡者大部分属于威尼斯的统治阶级。

舰长一级的牺牲者共有18人，全部都是威尼斯人。巴尔巴里戈家族加上率领左翼的巴尔巴里戈共牺牲了4人，康塔里尼家族牺牲了2人。萨兰佐家族、威尼尔家族仅舰长级的牺牲者就各有1人。为威尼斯千年历史增光的名门，在黎凡特又为阵亡者名录增了光。

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不仅是威尼斯统治阶级。只要看一下按职务划分的阵亡者和伤员的人数分布便可知道，从工程师到划桨手再到厨师，他们都全力冲向敌人。

威尼斯共和国以前一直是像玩“玻璃球”一样谨慎，避免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当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能维系时，他们便果敢奋起。这就是对威尼斯而言的黎凡特海战。

黎凡特之后

胜利让人陶醉，但是陶醉于胜利的人往往会忘记原本的目的。

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懂得黎凡特不是结束而可能只是开始。

如今，奥斯曼海军不复存在。威尼斯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打垮奥斯曼，可最终这不过是吹向陶醉于黎凡特大胜的人们一阵微风。

第二年春天，唐·胡安确实如约到达墨西拿。但是，1572年的唐·胡安已经不是前一年的唐·胡安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打对威尼斯有利之仗的态度，比前一年更加顽固地约束着国王的这位年轻弟弟。

结果，在进退之中贻误了战机。到了10月20日，联合舰队以季节不再利于航海为由解散。尽管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承诺，来年将派遣更加强大的舰队与伊斯兰势力较量，但威尼斯已经不再相信。

威尼斯决定合作到此为止，要与奥斯曼单独媾和。“十人委员会”指示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开始正式交涉。这个机构在威尼斯办理极端秘密的事宜时会被委以全权。无所作为的联合舰队解散后4个月，1573年3月，双方签署了明确载有威尼斯放弃塞浦路斯的媾和条约。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然而，这个交涉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没有通知元老院。欧洲各国知道时，条约已经签字。人们纷纷谴责威尼斯是叛徒。马耳他骑士团甚至见威尼斯船就打，尽管威尼斯也是基督教国家。

然而，威尼斯此后享受到了与奥斯曼之间70年的和平。因而威尼斯再次恢复了自己连接东西方的作用，享受到了繁荣的果实。

这样一来黎凡特海战中付出的牺牲不就白费了吗？

牺牲没有白费。

奥斯曼苏丹正式任命逃回来的乌尔齐·阿里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嘱托他重建奥斯曼海军。乌尔齐·阿里完成了海军重建工作，速度之快甚至使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都惊叹不已。然而，只是数量得到恢复，而具备使用船只能力的人却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状态。

被称为“奥斯曼帝国伟大海军”的奥斯曼舰队，在黎凡特海战前刚刚现出锋芒，就随着这场海战一道灰飞烟灭。

于是，执拗地想做父亲苏莱曼从未做过之事的塞利姆也接受了与威尼斯的媾和。与其说他开始考虑现实路线，不如说他不得不承认与威尼斯海军为敌所带来的不利。

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一直常驻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从战前，经过战争直到战后，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努力完成艰难的使命。他于媾和条约签订后回国。在威尼斯，离任大使在元老院做汇报演说已成惯例。他也做了演说，但内容却是对政府方针的痛责，甚至让在座的政府首脑和元老院议员脸色大变。大使在敌国工作了5年，体力消耗殆尽。他在演说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 国家的安定与永存不只依靠军事力量，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中间，对他国的态度具有重大意义。
>
> 这些年来，奥斯曼人注意到我们威尼斯最后总是妥协逃避。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过于卑屈，超越了外交礼节。威尼斯从不指出奥斯曼的弱点，又怠于明言自身的优势。
>
> 结果，奥斯曼人本来具有的傲慢、自大和蛮横，受到我们不正常的热情的鼓舞。他们觉得只需让被征服民族、下等人希腊人送来一纸通知就可以得到塞浦路斯。这件事是威尼斯外交的耻辱！

黎凡特海战的胜利甚至让远方的英格兰都为之欣喜若狂。这次战败导致了奥斯曼海军的毁灭，也挫败了奥斯曼帝国对西方的攻势。

在陆上，维也纳成功的防卫阻止了“伊斯兰之家”向西方的扩张。黎凡特的胜利，阻止了奥斯曼从海上对西方的进攻。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随着苏莱曼之死开始衰退。肉眼并看不到衰退的形态，但如果这种形态表现为不再进攻，那么苏莱曼死后奥斯曼的确有所不同。

人一旦看到奋起抵抗的效果，以后就会不再逃跑。黎凡特海战带来的精神上的影响，超过了一味忍耐坚持的马耳他防卫战。黎凡特的胜利是激战后的胜利。

黎凡特之战证明了奥斯曼尚不是一个海军国家，西班牙很快证明自己也并非一个海军国家。著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发生激战，彻底大败。这一年离黎凡特之战仅仅过去了17年。

奥斯曼舰队只是没有海战的时候才是“奥斯曼帝国的伟大海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如果没有威尼斯参战，也只是在没有海战时才“无敌”。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也是世界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前兆。

但是，前兆不过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出现的兆头而已。客观要求统治者对眼前事态采取对策，不允许有任何懈怠。在全欧洲都在为黎凡特的胜利而沸腾的时候，只有与奥斯曼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失去冷静。

首先，威尼斯在质上而不仅是在量上巩固海军，把在黎凡特海战中发挥了威力的新式武器加莱塞排桨帆船分配到各个基地。

其次，把黎凡特海战的凯旋将军威尼斯海军总司令选为共和国总督。一句话，这也向奥斯曼传递了一个信息：好战派上台了。

与此同时，威尼斯把曾被派到罗马担任特使、为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做出贡献，从而艰难打赢黎凡特海战的萨兰佐派往海上。这位原外交官担任东地中海的海军司令，在前线服务时，遭到因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而愤怒的马耳他骑士团的袭击，在战斗中战死。威尼斯共和国与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很相像，是一个不分文官武官的国家，有才能的人便会得到重用而不论用在何处。

---

[2] 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部队。——译者注

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想想人类世界真是遗憾。恕我冒昧直言，让战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

当然，人们的和平愿望会间接地发挥效力。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打了败仗才会产生厌战情绪，失败会让人自我反省。统治者作为失败的责任人也不可能感觉不到失败所带来的压力。于是统治者也变得消极起来，从而切断战争资金。

黎凡特海战之后，战胜方基督教各国分裂，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恢复了战前的关系。如果奥斯曼还有心进攻西方，威尼斯就会恢复中立，敌人就只有西班牙，这绝对有利于奥斯曼的海上作战。西班牙海军的实际情况一如17年后无敌舰队惨败所昭示的那样。

苏丹塞利姆也在黎凡特失败后不久把重建奥斯曼舰队的任务托付给了乌尔齐·阿里。这个出生在意大利的海盗成功地组建了一支舰队，连同运输船在内舰船数量有300艘，在数量上达到了黎凡特海战之前的规模。

尽管如此，塞利姆并没有命令这位自己任命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乌尔齐·阿里去干一般海盗所为之外的事。黎凡特的失败，不啻向一心想超越父亲苏莱曼的塞利姆泼了一盆冷水。

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的单独媾和条约于黎凡特海战两年后的1573年签署。翌年苏丹塞利姆去世，死因是醉酒后在浴池里滑倒，脑袋磕到

了地面的瓷砖上。穆拉德三世继位，当上了奥斯曼苏丹。

虽然同为后宫女人，新苏丹的生母与以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嫔妃不同，她并非出生于俄罗斯、格鲁吉亚或哥萨克，她是威尼斯共和国贵族的女儿。

后宫中的威尼斯女人

塞西莉亚出身于威尼斯古老家族之一的巴福家族。12岁那年，在克里特岛上父亲的庄园逗留后，由父亲和哥哥领着，乘船返回威尼斯。

船只遭到海盗的袭击。父亲和哥哥迎击海盗，在战斗中战死，少女塞西亚则和其他人一起被海盗俘虏。

海盗头目把这个有着栗色卷发和碧绿眼睛的美少女献给了苏丹。如果她和其他人一样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很快就会引起常驻当地的威尼斯商人的注意，启动已有的救济系统将她赎回。可是，一旦她被送进苏丹的后宫，大使也无可奈何。

威尼斯政府在绑架事件发生不到一年的1538年由元老院做出决议，决定向奥斯曼宫廷发去书面文件证明塞西莉亚·巴福是威尼斯贵族。这一决定付诸了实施。奥斯曼人通常会给俘虏中地位高的人以特殊待遇。

苏丹苏莱曼没有把这个威尼斯美少女送进自己的后宫，而是让给了儿子塞利姆。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人怀疑长子巴耶济德将继承苏莱曼。父亲大概是想给将会一辈子待在宫里的次子一个可心的玩伴。塞利姆比塞西莉亚大4岁。

威尼斯并不是一个发出一纸证明就觉得尽到了义务的国家。

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历任大使都多了一项隐秘工作，与身在后宫的塞西莉亚保持联系，她已改为奥斯曼名字叫努尔·巴奴。奥斯曼后宫禁止男性出入，威尼斯便收买了一个犹太女珠宝商人充当中介。

起初也许是只送些威尼斯特产的玻璃香水瓶，上面有纤细的花边和金丝的花纹图案，令人怀念祖国威尼斯。那些容易在后宫女人中间引起风言风语的贵重物品，因为引人注目，严禁馈赠给她。

栗色卷发少女似乎有着很好的能力适应不同的环境，两年左右便生下了塞利姆的孩子，还是个男孩儿。据说这个时候开始，塞西莉亚便逐渐被传为是塞利姆的第一爱妾。

巴耶济德造反被砍头后，塞利姆一跃成为苏莱曼的继承人。两年后苏莱曼去世，塞利姆便登上了苏丹的宝座。塞西莉亚在后宫生活了30年之后，也成为奥斯曼苏丹4个正妃中的第一妃子，曾经的美少女也已年过四旬。

威尼斯贵族的女儿成了大帝国专制君主的宠妃，但若因此认为这是攀上了高枝，那可就大错特错。16世纪，奥斯曼处在鼎盛期，威尼斯共和国也处于繁荣的巅峰。

21世纪的今天，威尼斯街道覆盖着一层肉眼看不出的灰色薄层。如果揭去薄层，仔细洗净磨光，16世纪灿烂辉煌、美丽奢华的威尼斯便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当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聚宝盆。奢华的不仅仅是街道，居住于此的女人也在讴歌生命。在威尼斯共和国，以外国元首为主宾在总督官邸举行的舞会上，主角就是统治阶级的贵族女人。威尼斯引领着欧洲女性的时尚。

而在同时代的奥斯曼，财富和奢华都只集中在男人身上。后宫的女人没有特别允许不许外出。即使外出，也只能坐在四面罩着厚帘的轿子

里，或是在游船上隔着百叶窗看看外面。她们有的就是珍宝首饰，但即使把自己打扮起来，也不许让人看见。住在后宫里的，除了苏丹以外，只有数百女人和阉割后的男奴。如果没有超凡的适应能力，崇尚自由、奢华更甚男人的威尼斯上流女人是无法忍受这种环境的。

在塞利姆长达8年的统治期间，塞西莉亚做到了什么实际上很值得怀疑。这期间，塞利姆不光决定攻打塞浦路斯岛，并且付诸实施。他还打响黎凡特海战，虽然终以失败告终。

播种后精心培育，一定会结出果实。谍报活动格外需要坚韧和忍耐。黎凡特海战三年之后，威尼斯与奥斯曼恢复友好通商关系一年，1574年，播下的种子终于结果了。

塞西莉亚的儿子以穆拉德三世之名登上了苏丹宝座。女人，苏丹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母亲却只有一个。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威尼斯大使秘密送来的请求与建议，也比以前更加具体。

在苏丹的后宫里，最有权势的女人不是苏丹的宠妃，生了子嗣也不是决定性的。后宫真正的主人是现任苏丹的生母，已经49岁的曾经的卷发美女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她把位于托卡比宫最里边的居室移到了最靠近门口的地方。以后，这一块地方就固定成为了母后的专用居所。

长廊由此延伸到深宫之中，长廊边上是苏丹4个妃子和其他爱妾的居所，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些居所置于监视之下。苏丹的寝宫也与之毗邻，从那里去离后宫不远的召集大臣们开阁僚会议的大厅，必须经过母后寝宫的门前。

这样一来，苏丹每次处理政事，进出后宫，都要在礼节上来向母后问安。塞西莉亚自然对奥斯曼帝国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更有甚者，据

传这位母后还会在隔壁房间旁听阁僚会议。

有一个人可能成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这个人就是宰相索科卢。他是自苏莱曼以来侍奉了三代苏丹的宰相，一度曾被塞利姆疏远。他以才华卓著和为官清廉而闻名。作为一个奥斯曼人，他毫无宗教狂热，理性、现实、有才，按照威尼斯谍报机关的分类，是对威尼斯抱有善意的高官之一。然而，他是宫廷官僚中鲜见的奥斯曼民族出身的人，当奥斯曼与威尼斯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又会毫不犹豫捍卫奥斯曼利益。

无人知晓母后从何时开始向苏丹进行打压宰相。但是，奥斯曼惯用的叛国罪却无法强加到他的身上。他侍奉了三代苏丹，没有人会怀疑索科卢的忠诚。

于是，母后便向苏丹耳朵里吹风，说索科卢秘密染指由苏丹专卖的火药生意，积累了巨大财富，甚至还拿出了交易合同作为物证。苏丹相信了母后的话。如此细腻的技法，生活在后宫中的人是做不到的。这一定是通过宫外人的手备妥后秘密送到母后手上。这却决定了宰相之死。

在阁僚例会上，一无所知的宰相和大臣们正在议事。这时，门被突然打开，冲进来一个黑人奴隶。黑人手持短剑，径直朝坐在中央的索科卢刺过去。

宰相来不及叫出声便被杀死。大臣们大声呼喊警卫。这时，旁边的房间里现出苏丹的身影，说出了宰相的罪状。大臣们只能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不久便查明这是冤枉。伊斯坦布尔的百姓们都在传，这是母后的权力欲导致的悲剧。常驻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各国商人也无不怀疑这个事件与威尼斯有关。但是，威尼斯方面的史料，甚至绝密文书，也没有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透露出威尼斯与此事有关。

可是不久以后的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 000达卡特巨款，作为向苏丹母后送礼的采购费用。索科卢被害与支付巨款之间相隔一段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在等待刺杀宰相事件后社会舆论的平息。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件使人联想到刺杀事件与母后之间有关联的史料留存下来。

此事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但直到1583年塞西莉亚去世，不，直到儿子穆拉德一直在位的1595年，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和平未曾受到破坏，历时四分之一世纪。12岁就被送进奥斯曼后宫的卷发美少女，即便身在奥斯曼后宫之中，也一直是一个威尼斯女人。

1583年冬季的一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响起了音色低沉的丧钟。威尼斯的百姓们无人知道这丧钟为谁而鸣。圣马可教堂受“十人委员会”之托敲响丧钟，但也没有被告知为谁而鸣。

骑士与海盗

黎凡特海战之后，海盗依旧横行。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似乎又是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黎凡特败北后迅速重建了奥斯曼海军，数量达到战前海军的规模。由于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恢复了友好通商关系，威尼斯海军这个黎凡特胜利的原动力已不再是奥斯曼的敌人。

尽管如此，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海军对西欧的威胁明显减弱。可能是因为新登基的苏丹的生母是威尼斯人的缘故，奥斯曼征服欧洲的欲望有所减弱。

事实上，对于过去一直充当奥斯曼海军先锋的北非海盗而言，以资金为主的各方援助开始日益减少。

不断发展的英格兰也加入了以欧洲大陆为舞台的霸权斗争之中，冲淡了西欧对地中海世界的关注。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少而精的团体也登台亮相。黎凡特战役之后，一直以海盗为业的海盗们不得不仍操旧业。而与他们对抗的则是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和以意大利中部里窝那为根据地的圣斯德望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的团旗是红底白十字，圣斯德望骑士团的旗帜是白底红十字。

马耳他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骑士团，至今仍以创建初期就有的医疗活动为旗号。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在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欧洲各地自然积累了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收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团员为以法兰西为主的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志愿者。被称为“修士”（frate）的这些骑士组成了修骑士团。

圣斯德望骑士团创建于16世纪初，创建者是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历代骑士团长也都由托斯卡纳大公担任。说起来，这是一个由托斯卡纳人组成的骑士团。贵族血统不是加入这个骑士团的必要条件。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的中心，托斯卡纳汉子的好强在意大利数一数二。这个集团来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宗教色彩不浓。团员不必向上帝发誓成为独身的“修士”。

这两个骑士团各自所拥有的船只从来没有一次超过10艘，只能采用少而精策略。

但是，弱小的队伍打起仗来也会有行之有效的战略。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个骑士团都在模仿海盗的战法，袭击、掠夺、抢物绑人。

里窝那港也有“浴场”。北非各地的“浴场”是强迫绑架来的基督徒劳动的收容所。里窝那的“浴场”则是收容伊斯兰俘虏的地方。在与北非“浴场”收容的基督徒交换之前，俘虏被收容于此。马耳他骑士团把俘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加莱船划桨手除了极少数

以外，通常是基督徒志愿者。

在里窝那，被铁锁链铐着的伊斯兰海盗的身影大概并不少见。直到今天，城里还留有以4个伊斯兰海盗为模特的抗击海盗战役胜利纪念碑。

两个骑士团的根据地分别在靠近非洲的马耳他和意大利中部的里窝那，但他们并不因此有分工，一个负责非洲近海，一个负责第勒尼安海。两个骑士团之间并不敌对，但只要不是教皇呼吁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他们从来没有结成过统一战线，一直是各自独立地横行天下，抗击伊斯兰。他们甚至远征被称为奥斯曼海的东地中海，说他们横行天下一点不错。

在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舰船指挥官中，有一连串佛罗伦萨著名家族的子弟。我不禁要想，被大海包围的马耳他骑士团且不去说，不靠海的佛罗伦萨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想来，远洋航海驶向新大陆，把名字留在了美洲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就是佛罗伦萨市民，如今名字依然留在纽约哈得孙河桥上的维拉扎诺，也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的基安蒂。

两个骑士团通常都只有7到8艘加莱船。圣斯德望骑士团把船一分为二，一队守卫托斯卡纳近海，另一队远航寻找敌人，从适合航海的春天到秋天，两队数度轮换。

1579年，里多尔菲率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三艘船远征东地中海，成功地俘获了在西地中海干完海盗勾当正在返航的四艘海盗船，夺回了被抓走的200人，解放了被迫在海盗船上当划桨手的基督教徒200多人。他们载着所有人回到里窝那。

同年，另一队在西地中海与六艘海盗船遭遇，击沉一艘，俘获五艘，带回了300多名基督教徒划桨手。

翌年是圣斯德望骑士团丰收的一年。

首先，三艘船攻击了阿尔及尔附近的城堡，不仅夺回了被掳走的基督徒，还俘虏了40个阿尔及尔人，凯旋里窝那。

其次，四艘船出港，远征当时被称为黎凡特的东地中海，袭击了奥斯曼的大型帆船，俘获了大量物资和30个奥斯曼人后回港。

骑士团的船只不分海盗船还是商船，见伊斯兰船便打。实际上，即使是海盗船也不会挂出黑底白色骷髅旗，经常伪装成普通船，很难分辨。

奥斯曼一直认为东地中海是其内海，圣斯德望骑士团远征到此，奥斯曼苏丹不能听之任之。母亲是威尼斯人的苏丹穆拉德向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建议，希望缔结与威尼斯一样的友好通商条约，不要再攻击奥斯曼商船了。

然而，同样位于意大利半岛，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却与威尼斯不同。

威尼斯共和国是把本国产品，尤其是德意志所产著名的钢铁武器运到东方，再从东方运回胡椒香料的贸易国家。而托斯卡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曾经是经济立国的国家，16世纪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国以后，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没有必要像威尼斯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奥斯曼的关系。

托斯卡纳大公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未能缔结友好条约，托斯卡纳大公仍旧担任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长，骑士团也活跃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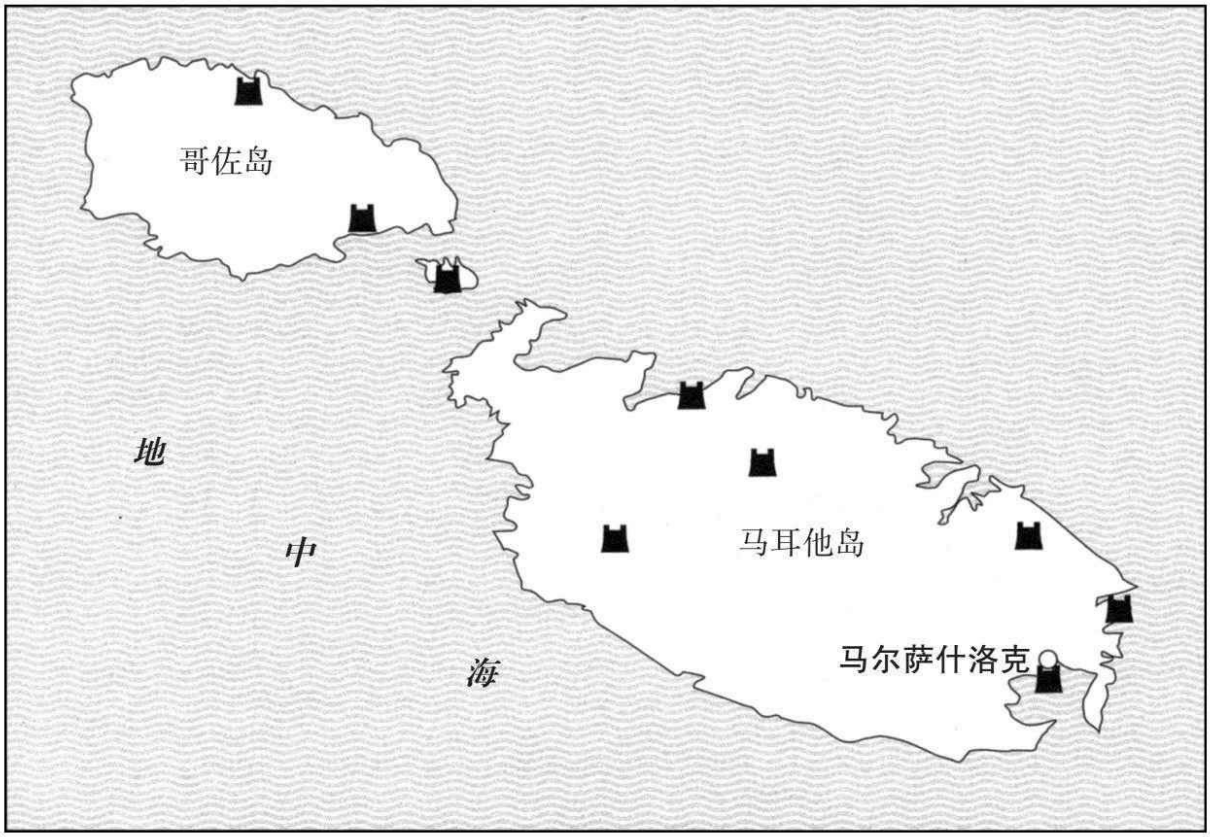
顺便一提，在托斯卡纳大公下力气振兴以后，基安蒂开始成为托斯卡纳的葡萄酒生产中心。此外，这话也许多余，现代意大利的海军水军学校在里窝那，但水军大本营却在威尼斯，至今使用的水军军旗仍是过

去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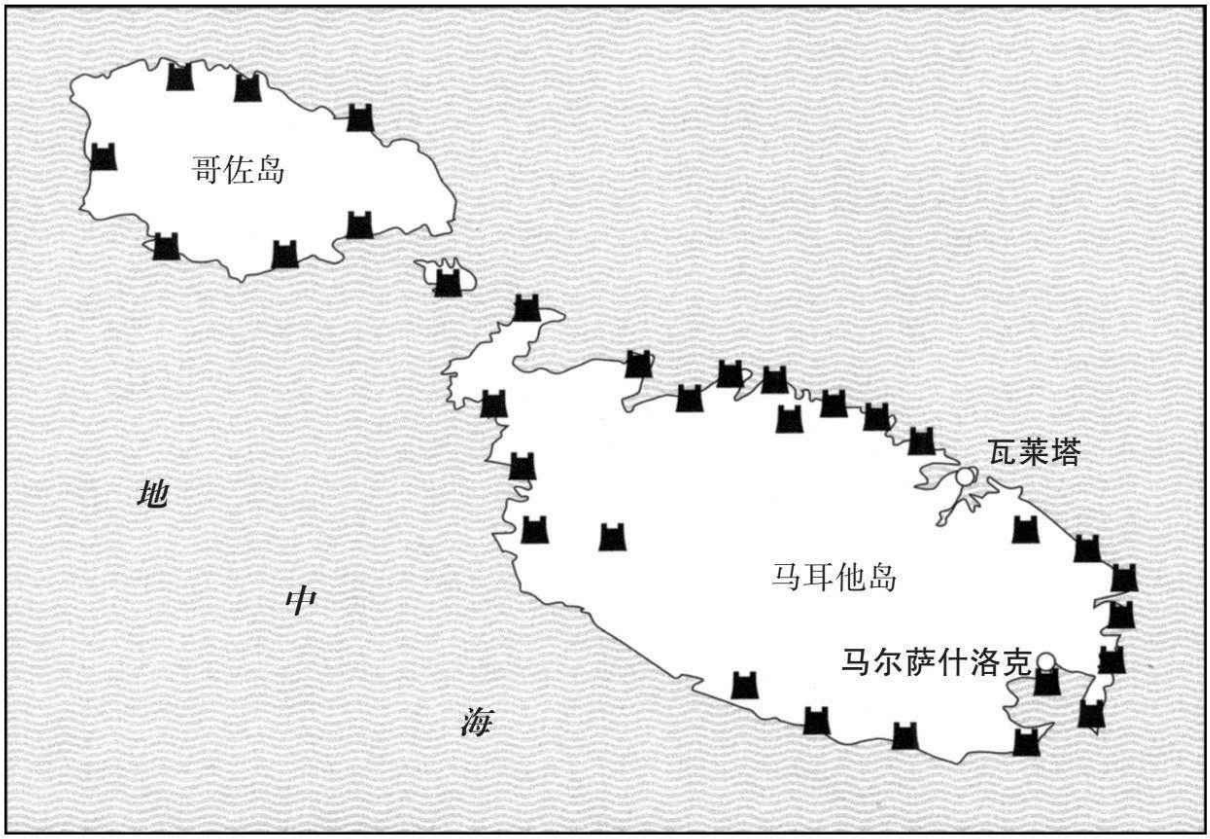
圣斯德望骑士团活跃于地中海之上，马耳他骑士团也不甘示弱。只要看一眼记载马耳他骑士团的舰船袭击海盗船及其收获的史料，就能想象得出当时马耳他骑士团的特殊地位。

马耳他与里窝那不同，它全身暴露在伊斯兰的北非视野之中。里窝那港的要塞是由米开朗琪罗等托斯卡纳建筑师建设，十分坚固。马耳他岛的要塞建设，则因动员了当时这方面的先进国家意大利的全部建筑师，而面貌大大改观。单看要塞的建造方法，便可理解这里是最前线的基地。与同时还是农产品出口港的里窝那不同，马耳他首府瓦莱塔是一座纯粹的军港。以瓦莱塔为名的首府，城市中心不是分散守卫的单个要塞，而是整体建成为一个要塞。马耳他骑士团的根据地就在这个大要塞中。仅此一点便揭示出了马耳他骑士团存在的理由，它处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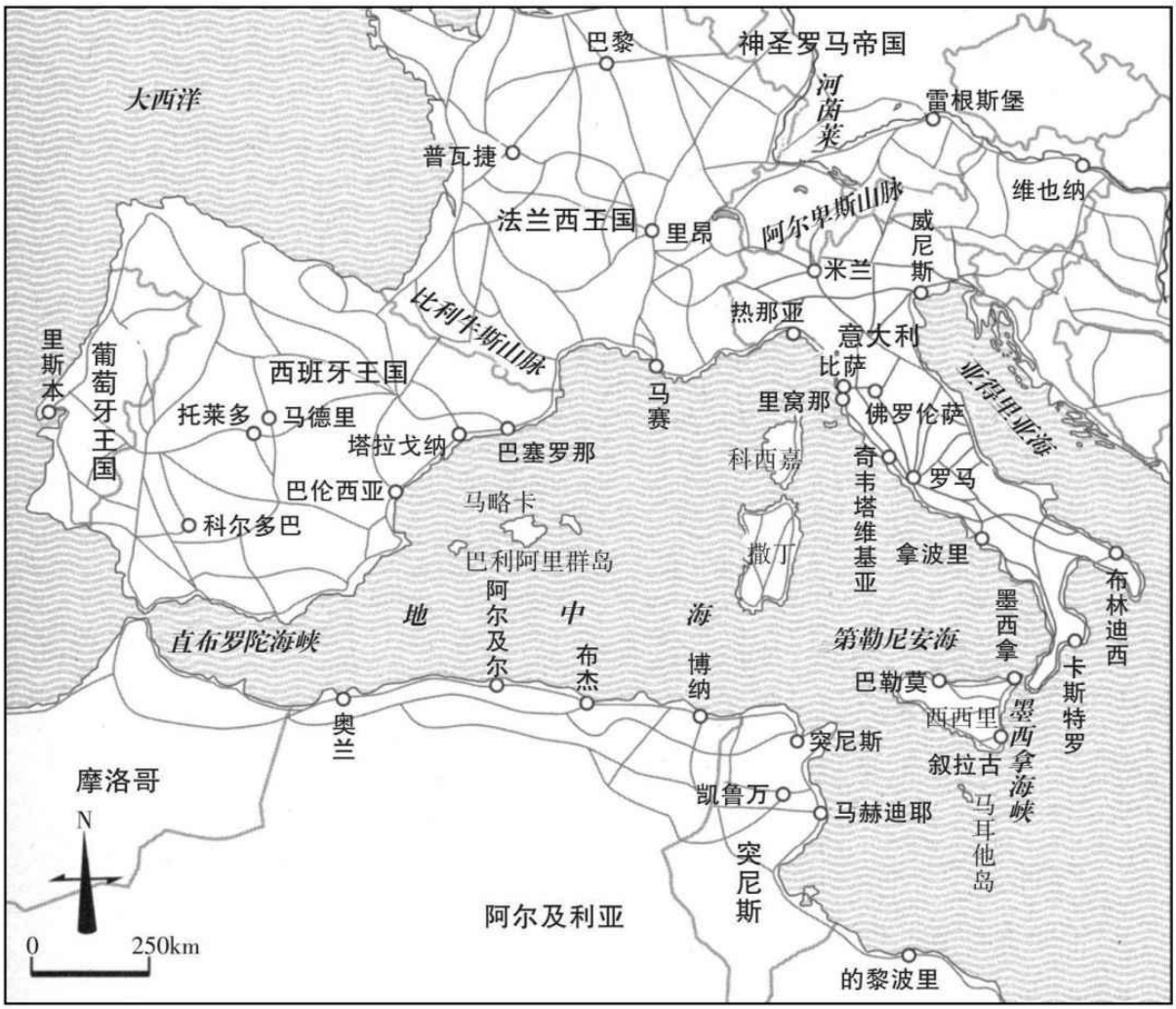
马耳他全岛要塞遍布，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大要塞。



1565年攻防战时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前）



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后）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马耳他骑士团也和圣斯德望骑士团一样，采用轮流制。不，应该说后来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模仿了先辈马耳他骑士团的做法。

两个骑士团的做法都是把船队分成两队，一队用来防守近海，另一队远航追踪海盗船。这对仅仅拥有不到10艘加莱军船的组织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直采用这种做法，可以形成三艘或四艘船的船队，从适于航海的春天直到秋天，经常四处追踪敌人。这不是抗击，而是追击。这个做法对不善海上冲突的海盗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

黎凡特海战之后，挂着红底白色十字旗的马耳他舰船和挂着白底红色十字旗的托斯卡纳舰船开始在地中海恣意横行，这两个骑士团像是在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领主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逃跑。拿波里和巴勒莫也开始积极抗击海盗船。

相反，北非海盗开始转为守势。

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还被任命为阿尔及尔总督。但是，这位曾是原基督教徒的海盗首领鉴于黎凡特的经验不再诉诸海战。

不过，他却绝对没有疏于维持北非的伊斯兰势力。突尼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伊斯兰手中。马耳他骑士团和圣斯德望骑士团都无法靠近的黎波里以及他自己担任总督的阿尔及尔。

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会策划一些攻击，也会以奇妙的形式与骑士团打个平手。这样的状态渐渐在地中海世界扩展开来。

地中海世界的夕暮

历史学家说，历史不会因为个别人而改变。这个说法我赞成一半。至于另外一半，我认为历史存在着因个别人而改变的可能性。我至今忘不掉以前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著作中说的一句话。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构想出所有的政体形式。王政、亦被称为贵族政体的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还有共产主义体制，但是人类未能构想出没有领袖的政体。”

至今各国仍在采取措施应对针对政要的暗杀行动。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个体的某些人，他的想法或许会决定国家的走向。

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在地中海的阵容很耐人寻味。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的母亲是威尼斯人。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尽管已经理所当然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他年老退休后，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静静地安度余生。苏丹穆拉德任命了新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地中海世界。这个人也是生于西西里的意大利人。

西纳姆帕夏本名为西庇阿·齐卡拉，在奥斯曼帝国改名。他原本是热那亚人，在热那亚的国内权力斗争失败后移居西西里，成为一个僻野的领主。既是领主，就有义务保护属民的安全。这个家族拥有两三艘自己的加莱船。与来袭的北非海盗作战是齐卡拉家族男人的传统。

在马耳他攻防战前4年、黎凡特海战前10年的1561年，齐卡拉家族的主人照例出海，迎战海盗。长子西庇阿同行，当时他才10岁。

那年的对手是臭名昭著的图尔古特。齐卡拉的船队吃了败仗，家族的主人当了俘虏。也许是图尔古特心情不好，他被投进了监狱，死在狱中。但图尔古特把同时被俘的儿子西庇阿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了苏丹。

这个时期的苏丹还是被人称为大帝的苏莱曼。大概是苏莱曼对这个少年源自良好出身的高雅品位产生了深刻印象，把他的名字改为西纳姆，放在托卡比皇宫自己的身边养育。当然，让他改信了伊斯兰教。

西纳姆成长为一个苏莱曼所希望的青年。金发碧眼的西纳姆在黑发黑眼的奥斯曼宫廷中非常醒目。奥斯曼人都会因为他是地位崇高者的儿子而多看他一眼。苏莱曼给这个年轻人的待遇也与其他许多孩提时代就被掳来的原基督徒不一样。既没有让他做奥斯曼宫廷官僚，也没让他当奥斯曼新军士兵，一把他送进奥斯曼新军后，就让他当了队长，就像是顶尖候补生。

西纳姆顺利地出人头地，成了奥斯曼新军的军团长。他的名字成为西纳姆·阿加。阿加（aga）是“顶尖”的意思。

他后来青云直上，当上了分管波斯的大臣。苏丹把整个波斯地方的统治都交给了他。巴格达作为伊斯兰阿拉伯的圣都建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奥斯曼奥斯曼帝国的昌盛，伊斯兰世界的首都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至今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应该是巴格达。这里经常发生叛乱。可见波斯全境统治的好坏将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派遣苏丹最信任的人管理波斯已成惯例。

从这时起，昔日的西庇阿·齐卡拉开始被尊称为“西纳姆帕夏”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威尼斯政府得知酒鬼苏丹塞利姆野心勃勃地要占领塞浦路斯，便设计在东波斯发动叛乱，试图打击塞利姆对西方的野心。但是，西纳姆帕夏统治时期的波斯是那样的稳固，叛乱被扼杀在摇篮中。

西纳姆帕夏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伊斯坦布尔。紧接着他又被派往多瑙河，全权统治奥斯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服的匈牙利。我们不清楚他统治了多少年。这位西纳姆帕夏从1594年开始进入欧洲历史。那一年，苏丹穆拉德任命他取代退休的乌尔齐·阿里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9月，西纳姆帕夏统率着一支由70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舰队，出现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海域。从他还叫西庇阿·齐卡拉的时候算起，33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

舰队春天离开伊斯坦布尔港，首先去了埃及。西纳姆首先要再次确认东地中海是奥斯曼帝国之海。然后再向西调转船头，船队驶过伊奥尼亚海出现在西西里海面，已经进入9月。到手的一份情报使他没有东去。

以“副王”名义统治西西里的时任总督只考虑按照上司西班牙国王腓

力二世的意志行事。当他得知西纳姆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立即把西纳姆尚在世的母亲鲁克蕾齐亚和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及其一家投进了监狱。尽管监狱环境并非像地牢那般严酷，但毕竟还是监狱。如果总督认为此举能够牵制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行动，那就只能说他太幼稚了。

西纳姆帕夏和100艘舰船一起驶进了墨西拿海峡，从那里给身在叙拉古的“副王”送去一封信。亲笔信用意大利语写就。

内容委实简单明了，只有一句话：我想见母亲和家人，如果遭到拒绝，将把西西里各个港口城市变成火海。他让出生在西西里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基督徒将信送给“副王”。

不要说拒绝，西班牙国王的家臣所能做的只有同意，以保持体面。西西里总督要求，齐卡拉一家人在西纳姆船上度过的那一天里，要扣押两名西纳姆的部下在总督官邸作为人质。西纳姆当即答应。

两位奥斯曼武将先从西纳姆派来的小型加莱船上登陆。然后，如今已经年迈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上船。小型加莱船靠上了停泊在海面上的奥斯曼海军旗舰。一位中年汉子从旗舰放下的梯子上跳下来，和船上的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母子时隔33年后重逢。

那天，夕阳就要落入西西里群山背后，旗舰上又放下了梯子。儿子搀扶着母亲下了梯子，让老母亲在船上坐稳，然后返回旗舰。西纳姆只当了一天西庇阿·齐卡拉，在旗舰上目送着小型加莱船渐渐远离自己的视线。

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受西纳姆之托给“副王”又捎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鲁克蕾齐亚和齐卡拉一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立时就让西西里化为焦土。

西纳姆帕夏就地向东调转船头。奥斯曼舰队离去了。

乌尔齐·阿里也在其他地方干着海盗勾当，但从来没有祸害过自己出生的故乡卡斯泰拉周边地区。在西纳姆帕夏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时期，西西里也没有明显受害的记录。这就是黎凡特海战之后开始笼罩地中海的气氛。

也许有人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都不曾想再次改做基督教徒呢？

的确，基督教方面曾经劝诱过他们。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想把有能力的人才挖过来。

但这种劝诱从未成功过。如果我是他们的母亲，也会让他们千万别回来。

这是一个以反宗教改革先锋自许的宗教裁判发威的时代。这种宗教裁判是一种异端裁判，其目的不是审判原本就是异教徒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后，其信仰是否出自真心也有问题。这才是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inquisizione”的异端裁判所的目的所在。在意大利，首当其冲的是伽利略·伽利莱。在西班牙，镇压集中在被称为“Marannos”的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身上。

这个机构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认可，称呼它的时候经常要加上“圣”（santa），叫作“圣异端裁判所”。自认为行为正义的人在裁判所内进行的特有的残酷拷问，遭到了有良心的人们的厌恶和忌讳。

然而，不论怎样厌恶忌讳，这个时代的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之外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在被拿破仑征服前，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异端。拿破仑下台后立即重新开始这一行为。这是一个信仰偏激的国度。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对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来说不是

一个可以改回信仰的地方。

研究专家们也说，生为基督徒而改信伊斯兰教的人，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在伊斯兰海盗横行的千年中肯定有数百万之多。

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二人作为这些人中的代表留名史册。众多的人默默无闻地融入了伊斯兰社会，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伊斯兰的宽容”与“恺撒的宽容”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要求个人信仰。伊斯兰世界的“宽容”只是容忍基督徒在伊斯兰社会生存，而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统率阿拉伯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社会的要职最终只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开放。这意味着，如果一直保有伊斯兰教以外的信仰，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只能做二等公民。既然一神教存在的前提在于不承认其他诸神，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便是合理的。不过这与不允许伊斯兰教徒居住的基督教世界以及中世纪、近代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虽说有附加条件，却也相当宽容了。

黎凡特海战之后的地中海世界与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的战前相比，实际上已变得安定起来，尽管这种安定微不足道。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能归于奥斯曼方面三个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形成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西进的兴趣降低，西欧各国的兴趣已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冲突总是在当事双方都有兴趣的时候才会发生。

所以，并非因为没有了冲突，被视为已经没有记载价值的绑架老百姓事件就会全部消失。

“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创建于中世纪，目的是拯救被绑架到伊斯兰世界强制劳动而吃尽苦头的人们。他们在这期间也一直在坚持活动。不论在任何社会，总有人被国家和组织的保护所遗漏。人们不能安

居在海边的时代此后又延续了150年。这些组织出于拯救被绑架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们的愿望而设立，一直到1799年以后才解散。这时，离法兰西爆发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

即便如此，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居住条件已经有了些许改善。这一点反映在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的建设方面。

在内地建塔，要能看得见耸立在海边的塔上升起的白烟。再往内地去建第三座塔时，所隔的距离要能看到第二座塔的白烟。按这样的方法建起第四座、第五座塔的地方，在海盗袭击频繁的时代都是人们隐居的地方。随着海盗袭击的减少，这个系统不再只用于逃跑，也开始用于通知大家何时可以返回海边。

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就这样，从在山里寻求安居之地变为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夏天住在山里，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住在海边。如果在以前，要想在海边建造住所，除非领主，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领主可以建造坚固城堡，四周安排大量士兵保护。而现在，老百姓也渐渐开始可以拥有海边居所了。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borgo”，源于罗马帝国末期拉丁语中的“burgus”，意思是位于城墙围绕的城镇之外的村庄。这个词似乎起源于原本是北方蛮族语言的凯尔特语。

但是进入中世纪，对居住在濒临地中海的人们而言，“borgo”一词的意义已经演变为躲避北非海盗而隐居的村庄。

17世纪起，人们开始渐渐从“borgo”返回海边，尽管随着适航季节的变换，还会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如果是现在，来回往返可以避暑避寒，多么惬意。但在当时却生死攸关，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如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撒丁海域附近的很多村庄还会在盛夏

时节举行村祭。全体居民一道欢度村祭，连移居海外的人们都会回来参加。

在村祭仪式上，祭祀队伍在安放于村镇教堂中的、多为拯救人们逃脱海盗之难的圣人圣女像的引领下，沿着山路从村镇前往“borgo”，在那里做弥撒，然后再回到海边村镇。这种祭祀游行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如今已经不再有海盗来袭，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保留在夏天地中海沿岸的村祭活动中。

即使在遥远的过去，有出海历史的城镇一定都会充分利用海盗开始转攻为守的时机。

阿马尔菲是活跃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意大利四大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沿海美丽的小城镇现在已经完全用于观光，但如果留心观察旧市街，一种回到抗击海盗时代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撒拉森塔耸立在大海附近和悬崖半腰。主教教堂（duomo）外观富丽堂皇，令人缅怀往返东方广做贸易的富裕时代，主教教堂有多条用于逃跑的路径。曲折蜿蜒的小路让人想起卡斯巴城，但却不是阿尔及尔那样的卡斯巴城。沿着各家各户门前的昏暗狭窄的小路前行，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小片空地。小空地只与另外一条小路相连，周围被墙高窗小的房屋包围。如果放下铁门封死这两条小路的入口，入侵者即刻就会变成口袋里的老鼠。

这里多条小路可以通往城外，穿过葡萄地就能逃进深山。

阿马尔菲自从被挤出拥有自己的海军积极打出去的海洋城邦国家的行列以后，其城镇建设不得不以防御伊斯兰海盗为第一目的。阿马尔菲曾经的对手比萨也是如此。这样的建设格局延续到现在，是今天阿马尔菲的魅力之一。

阿马尔菲也有几个称得上“borgo”的地方，我认为其中最为理想的是今天仍不失为最高级避暑胜地的拉韦洛。

作曲家瓦格纳造访的时代，只能骑在驴背上晃晃悠悠地在山路上前行。现在，山路已通了汽车。不过，一看城镇式样马上就会明白，凿山通隧道之前的拉韦洛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与防御第一的阿马尔菲不同，拉韦洛的房屋和小路都造得很开放。

传说，帝国末期的罗马人为躲避北方蛮族逃到此地，隐居在拉韦洛，这就是拉韦洛的起源。进入中世纪后，拉韦洛很快归于阿马尔菲的统治之下，成了阿马尔菲人躲避外敌的避难之所。

拉韦洛位于崎岖山路尽头的临海高崖之上，是躲避海盗的理想隐蔽之所。从海上绝对看不出有人居住，但站在悬崖边上向下看，阿马尔菲的港口和近海尽收眼底，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从拉韦洛观察，不用依靠撒拉森塔传递消息便可知道海盗是否离去。这样的“borgo”安全隐蔽，海上根本看不到，这就是拉韦洛在迷倒北欧艺术家之前存在的理由。

乘游艇或者客轮游览地中海便可一目了然。从西班牙东岸出发，经过法兰西南部，到达亚平宁半岛，再沿意大利西岸南下，如果还能看到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岛屿，你就会感到今昔差别甚至会感到冲击。

地中海波涛冲刷的所有地方如今都成了旅游观光地。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深受海盗祸害而无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建筑最早也是建于巴洛克时代，一般都是19世纪以后建造的。了解了这一点，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少有更早以前的建筑呢？

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比萨、拿波里、叙拉古、巴勒莫等地留下了很多古建筑，其原因是这些海港城市拥有自卫能力。其他城镇村庄

的建筑都建于不用再担心海盗危害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撇开自北非来袭的伊斯兰海盗，地中海世界从7世纪开始到18世纪这1 000多年岁月的历史便无从谈起。

每次从海上眺望这些观光地时，每次见到如今已经用作餐厅和夜间俱乐部的撒拉森塔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所谓“和平”（Pax）首先是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我还会带着不由自主泛出的苦笑去想，人只是一种只要能保障安全就会自己活得很好的动物。

1740年，奥斯曼以国家的名义签署了全面禁止海盗行为的《海盗禁令》。

这时，海盗再也不是受到官方支持的“corsair”了，又成为只为私利的“pirate”了。

1816年，北非的主要城市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即曾经的海盗三大基地也实施了禁止海盗的法律。

1830年，法兰西开始对阿尔及尔进行殖民化统治。

西欧各国对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进行殖民的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

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Naval War）公布，宣告严禁一切海盗行为，不论是“corsair”，还是“pirate”。

禁止海盗行为成为国际间的协议。

这样一来，至少在地中海世界，海盗销声匿迹了。

附录一
因民族而异的海盗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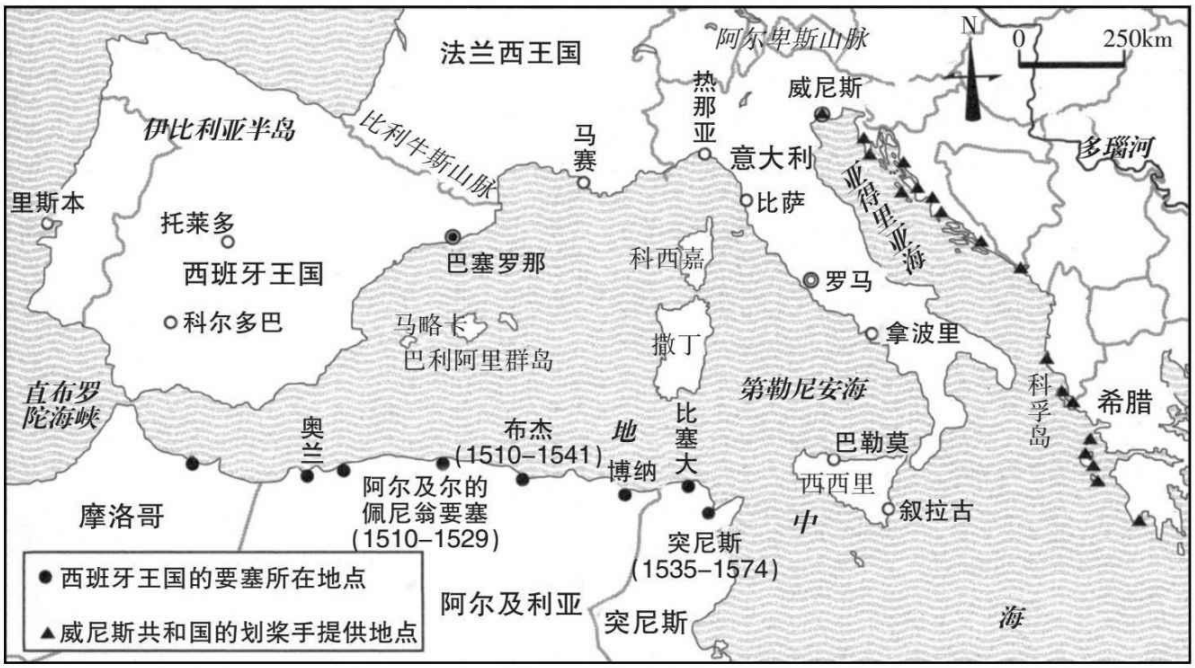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第三卷所讲述的那样，罗马早在公元前27年实行帝制前就对横行地中海的海盗断然施行大手术，灭绝了海盗，同时占领了海盗的根据地，把与海盗业有关的人全部迁移到内陆地区，通过分配农田将他们变成农民，解决了海盗难题。

威尼斯共和国

与罗马不同，威尼斯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首先派出海军，在亚得里亚海确立了制海权。亚得里亚海对威尼斯船只的航行生死攸关。同时，威尼斯让海盗的所有基地提供加莱船划桨手，以此确保年轻人得到雇用；用采购生鲜食品、建造船舶修理厂的方法，保证中老年人得到雇用。威尼斯通过这些措施把海盗基地变成了自己的命运共同体。

关于威尼斯的这种做法，本书中也有叙述，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上卷以“走向大海”为题的章节中有详细描述。



西班牙王国的要塞所在地点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划桨手提供地点

西班牙王国

正如本书叙述过的那样，西班牙的海盗对策是在海盗根据地北非港口外的海岬建设要塞，派驻一队西班牙士兵。这是他们的独有做法。但是，他们不能同时维持图上标记的所有地方。而且，就连维持时间最长的突尼斯，也不是40年间一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从建在港外海岬上的要塞监视海盗船的出入事实上也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时期，海盗从这些地方出发袭击基督教国家，造成的损失丝毫没有减少，这足以证明这一点。

以这三个民族的海盗对策做一个有效期的比较，情况如下。

罗马帝国：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到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600年间。

威尼斯共和国：11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800年间。

西班牙王国：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几乎没有实际效果。

附录二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海洋之都的故事》上、下两卷

这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配套作品，内容以地中海为舞台，时代也在古罗马灭亡后的1 000年期间。

所不同的只是，《海洋之都的故事》是立足于威尼斯看地中海，而《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则是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放眼四周。贯穿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世，在地中海世界这块色彩斑斓的拼图上，占据北边大块拼画的就是“海洋之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罗得岛攻防记》

《黎凡特海战》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描写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地中海为舞台进行的代表性战役。

这三场战役的结果是，基督教方面一胜，伊斯兰方面两胜。不过，如果加上《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卷描述的马耳他岛攻防战，战绩则为二比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叙述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第一章里详细讲述了“罗马掠夺”。第四章“卡特瑞纳·科尔纳罗”详细叙述了吞并塞浦路斯这一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胜利。

《切萨雷·波吉亚或优雅的冷酷》

第一部“绯衣”讲述了将奥斯曼流亡王子作为一张牌来牵制奥斯曼侵略的故事。同时，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描述了跨越中世纪的意大利。

《上帝的代言人》

文艺复兴精神甚至改变了基督在人间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不论是他对十字军的看法，还是对新教这个在天主教徒看来是异端信仰的看法。

其中关联较大的是讲述庇护二世和利奥十世的两个章节。

《什么是文艺复兴？》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我认为，文艺复兴这场精神运动源于中世纪末期人们对自己以往生活方式产生的怀疑。

我还认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有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伊斯兰世界产生过类似列奥纳多·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物吗？

就算有，一一记述他们我力有不逮，只能期待伊斯兰方面的专家。如果有谁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一定最先拜读他的作品。

《爱的编年史》

本书中的《绿色的海洋》是讲述海盗乌尔齐·阿里的一篇小品文。

《沉默的少数派》

这部作品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一次越狱记”，讲到异端裁判所是怎么回事。《平凡的二将》是我在思考威尼斯共和国性质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

《意大利逸闻》

这本书感觉上就是历史逸闻。第六章“后宫里的法兰西女人”中讲到西欧与奥斯曼的关系。第九章题为“大使与咖啡”。“后宫来信”和“从奴隶到皇后的女人”等章节描述了当时就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好奇心的奥斯曼苏丹的后宫实情。

《圣马可杀人案》

威尼斯现任总督的儿子却成为一名伊斯兰教徒。本书通过这一人物描写了鼎盛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靠一般手段无法应付的复杂关系。

不过，我想写的是提香时代的威尼斯。在写作过程中，提香描绘的威尼斯人物一直在我脑际萦绕。

《教廷杀人案》

作品描写了教皇保罗三世时代的罗马。

年表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258		巴格达遭蒙古军猛攻而陷落	（朝鲜）高丽归属蒙古（1259）
1432		穆罕默德二世诞生。	
1451		穆罕默德二世继苏丹位。	
1453		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朝鲜）李澄玉之乱
1455		奥斯曼征服塞尔维亚。	（日本）太田道灌建江户城（1457）
1456		奥斯曼征服波斯尼亚。	
1460		奥斯曼南下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	
1461		奥斯曼进攻小亚细亚，征服特拉比松。	
1463		奥斯曼以 8 万大军进攻热那亚共和国领土莱斯博斯岛。	
1470		奥斯曼海军以 250 艘船的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征，攻占内格罗蓬特。	（日本）应仁之乱（1467—1477）
1479		奥斯曼军登陆威尼斯领土莱夫卡斯岛并占领该岛。	
1480		奥斯曼进攻罗得岛，被圣约翰骑士团（后马耳他骑士团）击退。	
1481		穆罕默德二世去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492	阿拉贡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女王肃清伊斯兰教徒，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再次征服。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500	教廷海军建立。		
1502	教皇波吉亚号召各国组成联合舰队。除教廷外，威尼斯共和国、圣约翰骑士团、法兰西参加。	基督教国家联军进攻莱夫卡斯岛并从奥斯曼手中夺回该岛。	（日本）颁布德政令（1504）
1508		海盗克尔特戈尔奉苏丹之命赴突尼斯，以比塞大港为据点开始海盗航行。	
1509	克尔特戈尔率领海盗攻击停泊在罗马外港奥斯提亚的教廷海军，掳走旗舰。 西班牙军进攻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之后，在阿尔及尔港建设要塞（佩尼翁要塞）。		
1515	教皇利奥十世着手重建教廷海军。 弗朗索瓦一世即法兰西国王位。		
1516	在利奥十世的号召下神圣同盟建立。除教廷海军外有热那亚、威尼斯、法兰西参加。 热那亚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和司令保罗·维托里率领的神圣同盟出航第勒尼安海，寻找海盗克尔特戈尔。进攻比塞大。 卡洛斯一世即西班牙国王位。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17	克尔特戈尔在托斯卡纳与拉齐奥交界的马雷马平原登陆，企图绑架利奥，未遂而终。	奥斯曼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成为伊斯兰世界名副其实的盟主。	（中国）葡萄牙人渡海来到广东。
1518	教廷海军在厄尔巴岛附近与伊斯兰海盗船队作战。司令维托里遭绑架。	奥斯曼苏丹任命克尔特戈尔为海军总司令。	
1519	多里亚率领热那亚海军在皮亚诺萨岛近海与伊斯兰海盗船队交战获胜。 教皇支付6万达卡特赎金赎回维托里。维托里仍任海军司令。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以查理五世之名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		
1520		奥斯曼海军继续攻打罗得岛，遭到基督教国家联军抵抗。 苏莱曼即苏丹位。	（中国）鞑靼人进攻大同。
1521	利奥十世去世。		
1522		苏莱曼进攻并占领罗得岛。圣约翰骑士团撤出罗得岛，得到教皇的庇护。	
1523	利奥十世的堂弟朱里奥·德·美第奇即罗马教皇位，是为克莱蒙特七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24	维托里率领教廷海军和圣约翰骑士团在奇韦塔维基亚近海与伊斯兰海盗作战获胜。		
1526	维托里病亡。年届六旬的多里亚继任教廷海军司令。 多里亚率领教廷海军和圣约翰骑士团与海盗红胡子作战获胜，救出沦为奴隶的基督徒，但未能抓获红胡子。		
1527	罗马遭劫掠。卡洛斯进攻罗马，破坏罗马历时7天。亲法兰西的克莱蒙特七世被逼改变路线。		
1528	多里亚辞去教廷海军司令之职，一度拟往法兰西，后改变主意就任西班牙海军总司令。		
1530	红胡子占领从瓦赫兰到突尼斯的主要港口城市，成为北非一带的实际统治者。 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予圣约翰骑士团，作为其驻扎地。此后，圣约翰骑士团通称马耳他骑士团。	红胡子把北非一带献给苏莱曼，在伊斯坦布尔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司令。	（日本）一向一揆兴起（1531）。
1532	卡洛斯把弟弟匈牙利国王费迪南德安排在维也纳，把多里亚率领的联合舰队安排在地中海，采取迎战态势。 多里亚从奥斯曼手中夺回迈索尼要塞，攻占黎凡特，掌握伊奥尼亚海的制海权。	苏莱曼着手攻占卡洛斯的领土维也纳，同时让海军挺进地中海。	（中国）大同兵变（1533）。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34	克莱蒙特七世去世。保罗三世即教皇位。	红胡子晋升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1535	响应教廷号召组建的神圣同盟海军与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海军在攻打突尼斯戈莱塔要塞作战中获胜。红胡子逃往阿尔及尔。 红胡子重组海盗集团，重新开始攻击意大利半岛的港口城市。		
1536	弗朗索瓦做苏莱曼的工作，与之结成军事同盟。		
1537	红胡子在意大利南端的港口城市卡斯特罗登陆，构筑要塞。多里亚军反击，取得海战胜利，但未能夺回卡斯特罗。		
1538	保罗三世呼吁威尼斯和西班牙，提议组建神圣同盟军。决定各国舰队在科孚岛集结。5月，法兰西与西班牙缔结协议，停战10年。 9月，共计150艘神圣同盟军的舰船到齐，从科孚岛出发。在圣马武拉岛与红胡子及其左右臂海盗图尔古特率领的奥斯曼海军遭遇。多里亚见形势不利，命令全军撤退。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40	威尼斯与奥斯曼实现媾和。 奉卡洛斯之命，多里亚组建抗击奥斯曼部队，教廷海军和马耳他骑士团参战，以图尔古特为对手的海战取得完胜。图尔古特被俘。多里亚释放图尔古特。		
1541	卡洛斯亲率大军进攻阿尔及尔。10 月，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多里亚自有部队、教廷海军、马耳他骑士团参与攻击，在阿尔及尔近郊的海滨登陆。 卡洛斯军因暴雨消耗，陷入苦战，付出巨大牺牲后撤退。		
1543	弗朗索瓦谋求加强与奥斯曼的关系，邀请红胡子作为国宾访问马赛。红胡子在马赛逗留一年多，后回到伊斯坦布尔退休。图尔古特取代他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日本）葡萄牙人渡海来到种子岛。
1547	弗朗索瓦去世。其子亨利二世即法兰西国王位。 被视为多里亚后任的简内特·多里亚在热那亚内乱中殒命。		（日本）武田信玄颁布分国法《甲州法度》。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49	教皇保罗三世去世。		（日本）圣方济·沙勿略渡海来到鹿儿岛。
1550	卡洛斯为保护于圣年来罗马朝圣者的安全命令已经84岁的多里亚集结舰队。 多里亚率领的联军从海上进攻并攻克图尔古特作为根据地的马赫迪耶。图尔古特逃脱。		（中国）沙勿略在上川岛去世（1552）。
1558	卡洛斯去世。其子腓力二世即西班牙国王位。		（朝鲜）倭寇入侵全罗道（1555）。
1559	一直与奥斯曼军联合进攻西班牙所属各国的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缔结媾和协约。 多里亚去世。		
1560	腓力二世策划夺回利比亚的的黎波里，集结军队。		
1561	受腓力二世之命组建的联军无法统率，陷入苦战，把目标从的黎波里转到杰尔巴岛并攻占该岛。 马耳他骑士团脱离战线。 联军受到出生于意大利的海盗乌尔齐·阿里率领的奥斯曼军攻击而失败。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65	奥斯曼军开始攻击马耳他岛的圣埃尔莫要塞。 图尔古特随自己的舰船一道前来增援奥斯曼军，在战斗中阵亡。马耳他骑士团持续炮击抵抗。圣埃尔莫要塞在奥斯曼军攻击下陷落。 奥斯曼陆军司令劝骑士团团长约翰·德·拉·瓦莱塔投降，遭到瓦莱塔拒绝。 马耳他骑士团连续苦战，腓力二世承诺的西西里援军迟迟不到。 奥斯曼海军侵入湾内，向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发起总攻，失败后撤退。马耳他骑士团损失惨重。	苏莱曼为攻占马耳他岛集结大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	
1566		苏莱曼去世。其子塞利姆即苏丹位。	
1568	攻防战后为重建马耳他岛要塞而竭尽全力的拉·瓦莱塔去世。		（日本）织田信长进入京都。
1570	腓力二世在庇护五世的再三要求下，派多里亚的接班人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随西班牙军一同增援。	奥斯曼军开始进攻威尼斯领地塞浦路斯岛。教皇庇护五世力促腓力二世组建联合舰队，腓力态度暧昧。 威尼斯援军抵达克里特岛。 西班牙军与威尼斯军一同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岛。很快传来塞浦路斯岛首都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由于严冬和海盗的抵抗，去路受阻，联合舰队解散。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其　他
1571	西班牙、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同去年一样无法统率，后一致同意由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担任总司令。各国舰船在墨西拿集结，向东寻找奥斯曼军。	塞浦路斯岛的城市法玛格斯塔在奥斯曼军进攻下陷落。 黎凡特海战。联合舰队与奥斯曼军在希腊西部的黎凡特海湾的外海作战，联合舰队胜利。	
1572	威尼斯为进攻不断削弱的奥斯曼，呼吁西班牙再次组建联合舰队，西班牙未予响应。		
1573	威尼斯与奥斯曼单独媾和。		（日本）室町幕府灭亡。
1579	圣斯德望骑士团与 6 艘海盗船作战，夺回人质 300 人。	圣斯德望骑士团成功俘获海盗船，夺回被抓走的数百名人质。	
1580	圣斯德望骑士团攻击阿尔及尔附近的要塞，夺回遭绑架的基督教徒，并俘虏 40 名阿尔及尔人。	圣斯德望骑士团在黎凡特攻击奥斯曼的大型帆船，俘虏 30 名奥斯曼人。	（日本）派遣天正少年使节团前往罗马（1582）。
1740		奥斯曼作为国家在全面禁止海盗行为的《海盗禁令》上签字。	
1816	禁止海盗法在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实施。		
1830	法兰西进攻阿尔及利亚，占为殖民地。		
1856	宣布严禁一切海盗行为的《巴黎海战宣言》签字生效。		

参考文献

原史资料

AL-NUWAYRI, *Historie des Berberes par ibn-Khaldoum*, Algeri, 1852.

AMMIRATO, S., *Storie fiorentine*, Firenze, 1641.

ANONIMO SALERNITANO, *Chronicon.*

《ASV(Archivio di Stato, Campo dei Fari), Arsenale》

BARBARO, N., *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 Cornet 编), Wien, 1856.

BEMBO, P., *Opera omnia, Epistolae Leonis X Pont. Max. nomine conscriptae*, Venezia, 1729.

BENEDETTO DA S. ANDREA, *Chronicon, apud Georgium Henricum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Hannover, 1839.

BERTRAND, H.G., *Batailles de Napoleon*, Paris, 1847.

Bullarium Romanorum, Epistola XI papae Innocentii III ad Miramolinum, 1199.

CAFFARO, *Annali Genovesi* (C. Roccatagliata, Ceccardi & G. Monteleone 翻译, Municipio di Genova 编), 1923-30.

CENNI, C., *Codex Carolinus*, Roma, 1760.

CALEPIO, A., *Vera et fedelissima narr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espugnatione et defensione del regno di Cipro*, Venezia, 1580.

Chronicum Volturnense.

CONTARINI, G.P., *Historia delle cose successe de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mossa da Selim ottomano ai Venetiani fino al dì della gran giornata vittoriosa contra i Turchi*, Venezia, 1572.

CONTI, N., *Historie dei suoi tempi*, Venezia, 1589.

DAN, P.F.P., *Histoire de Barbarie et des ses Corsaires*, Paris, 1649.

DANDOLO, A., *Chronica per extensum descripta* (E. Pastorello 编),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XII, part I, Bologna, 1938-40.

DE BOURDEILLE BRANTÔME, P., *Mémoires contenans le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et grands capitains françois de son temps*, Leyde, 1665.

DE SALAZAR, P., *Historia de la guerra y presa de Africa con la destruccion de la villa de*

Monastir, Napoli, 1552.

Destructio Monasterii Farfensis, Chronicon Farfense.

DIACONO, G., *Chronicon Venetum,* Roma, 1890.

DINAR, I.A., *Histoire de l'Afrique,* Tunis, 1286.

DORIA, A., *Compendio delle cose di sua notizia et memoria occorse al mondo nel tempo dell'imperatore Carlo Quinto,* Genova, 1571.

EGIARDUS, *Annales fuldenses,* 806-07.

FERUA, A., KIRSCHBAUM, E., GHETTI, E.J. & APOLLONI, B., *Tipografia poliglotta vaticana,* 1950.

FAZZELLO, T., *De rebus Siculis,* Catania, 1753.

FESTA, N., *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co I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serie V, vol. XIII, 1894.

FONTANA, A., *Le glorie immortali della Sacra ed Illustrissima Religione di S. Stefano,* Fano, 1708.

GIOVIO, P., *Historie del suo tempo* (L. Domenichi 翻译), Venezia, 1608; *Vita di Leone X.*

GIUSTINIANI, A., *Annali di Genova,* 1537.

GOUSSANCOURT, F.M., *Les Martyrologe des Chevaliers de Saint-Jean de Jérusalem dits de Malte,* Paris, 1643.

GUAZZO, M., *Storie,* Venezia, 1549.

JOANNIS VIII, *Epistolae ad Carolum imperatorem; Epistolae imperatori et imperatrici.*

LEONE OSTIENSE, *Chronicon; Vita Leonis.*

LIUTPRANDO, *Antapodosis.*

MALIMPIERO, D., *Annali veneti dell'anno 1497 al 1500,*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serie I, vol. VII, Firenze, 1843.

MARANGONE, *Cronache Pisan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Muratori, L.A., *Annali d'Italia; Antichità italich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NUCULA, H. (Orazio Nocella da Terni), *De bello Afrodisiensi,* Roma, 1552.

L'Ordine dei Trinitari e l'Africa, Spunti Storici, 1940.

PALERMO, F., *Documenti sulla 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6.

PALMERS, P.R., *Libro delle redenzioni,* 1199.

RAYNALDUS, *Annuarium Ecclesiasticum.*

ROSEO, M., *Storie del mondo,* Venezia, 1598.

ROUSSEAU, A., *Annales Tunisiennes,* 《*Traites entre 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et la Tunisie-Époque anterieure a l'etablissement de la Régence*》, Alger, 1864.

S. ANTONINO, *Chronicon,* Lugd., 1586.

SIGONIO, C., *Della vita et fatti di Andrea Doria, principe di Melfi, libri due, tradotti nella*

nostra volgar lingua da Pompeo Arnolfini, appresso Giuseppe Pavoni, Genova, 1598.

TEODOSIO MONACO, *Chronicon.*

ULLOA, A., *Vita di Carlo V,* Venezia, 1566.

VASARI, G., *Vite,* Firenze, 1906.

VENTURA, A.(编),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vol. I-II, Biblioteca degli Scrittori d'Italia degli Editori, Arti Grafiche Gius. Laterza & Figli, Bari, 1976.

后世的研究著作

著者多数,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federiciani, e Studi ezzeliniani,* Roma, 1963.

AGRICOLA, G., *De Re Metallica,* book XII.

AL-ATHIR, A.I., *Annales du Maghreb & de l'Espagne: Traduites et annotes par Edmond Fagnan* (原著作1231年),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1.

ALMAGIÀ, R., *Planisferi, carte nautiche e affini dal secolo XIV al XVII esistenti n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aticana,* I, Città del Vaticano, 1944.

AMARI, M.,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Firenze, 1876; *I Musulmani in Sicilia,* Catania, 1933.

AMICO, V. & DI MARZO, G., *Dizionario topografico della Sicilia,* Palermo, 1855.

ANDERSON, R.C.,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52.

ANNOVAZZI, V., *Storia di Civitavecchia,* Roma, 1853.

《Archivio Veneto》

ARBORIO MELLA, F.A., *Gli arabi e l'Islam,* Mursia, 1992.

ASTUTI, G., *L'organizzazione giuridica del sistema colonial e della navigazione mercantile delle città italiane nel Medioevo,* 《CHM》, 1962.

BABINGER, F. *Due ritmi ed una narrazione in prosa di autori contemporanei intorno al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1470* (F.L. Polidori 编),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 IX, 1953; *Maometto il Conquistatore,* Einaudi, Torino, 1957.

BADUEL, C., *L'ordine di Malta nell'assistenza ospedaliera,* 《Bollettino Stor. Ital. Art. Sanit.》 XIV, 1934.

BENVENUTI, G.,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Pisa,* Pisa, 1962 & 1982;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Milano, 1977.

BESTA, E., *Il Senato veneziano (origini, costituzione, attribuzioni e riti),* 《Miscellanea di storia veneta》 serie II, vol. V, 1899.

BILIOTTI, C., *Tunisi e la sua storia,* 1868.

BOGNETTI, G.P., *La nave e la navigazione nel diritto pubblico mediterraneo dell'Alto Medio-*

evo,《CHM》, 1962(=*Méditerranée et Ocean Indien: Travaux du Si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M. Cortellazzo 编), no. 23, Civiltà veneziana, Studi della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Venezia, e parte della Bibliothéque generale della ÉPHÉ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6 Section, Sevpen, Paris, 1970).

BOISGELIN, L., *Ancient and modern Malta,* London, 1804.

BOLANI, D.S., *Storia di Reggio Calabria,* Napoli, 1857.

BONOLIS, G., *Diritto marittimo medievale dell'Adriatico,* Pisa, 1921.

BORSARI, S., *Il dominio veneziano a Creta nel XIII secolo,* Napoli, 1963; *Il commercio veneziano nell'Impero bizantino nel XII secolo,*《Rivista Storica Italiana》LXXVI, 1964.

BOTTARELLI, G., *Storia politica e militare del Sovrano Ordine di S.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detto di Malta,* Milano, 1940.

BOUWSMA, W.J., *Venice and the Defence of Republican Libe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1968.

BOWEN, F.C., *The Sea, Its History and Romance* I-IV, London.

BOWNESS, E., *The Four-Masted Barque,* London, 1955.

BRANCA, V.(编), *Umanesimo Europeo e umanesimo veneziano,* vol. II della serie *Civiltà europea e civiltà veneziana: aspetti e problemi,* Centro di Cultura e Civiltà della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San Giorgio Maggiore, Sansoni, Venezia, 1963.

BRAUDEL, F.,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2 vols., Paris, 1962; Einaudi, Torino, 1976; Il Mediterraneo, Mondadori, 1990.

BROWN, H.F., *The Venetian Printing Press,* London, 1891.

BROWNE, E.J., *La medecine arabe,* Paris, 1933.

BRUNETTI, M. & VITALE. E(编), *La corrispondenza da Madrid dell'ambasciatore Leonardo Donà, 1570-73,*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Venezia-Roma, Firenze, 1963.

CADDEO, R. 他(编), *Storia marittima dell'Italia,* Garzanti, Milano, 1942.

CALEGARI, M., *Navi e barche a Genova tra il XV e XVII secolo,*《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Centro Per La Storia Delle Tecnica in Italia》.

CALISSE, C., *Storia di Civitavecchia.*

CALIXTE DE LA PROVIDENCE, P., *Trinitarie, Corsaires et Rédempteurs,* 1884.

CALLISTO DELLA PROVVIDENZA, *P., Vita di S. Giovanni de Matha,* Roma, 1894.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J.B. Bury 监修), 8 vols., Cambridge, 1911-36.

CAMOLIETI, G., *Guida a Venezia e ai Veneziani sconosciuti,* Sucarco Edizioni, Milano, 1978.

CANALE, M.G., *Nuova I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初版1797), Firenze, 1858.

CAPASSO, C., *Barbarossa e Carlo V,*《RSI》XLIX, 1932.

CAPITANI, O., *Storia dell'Italia medievale,* Laterza, 1986.

CAPPELLETTI, G.,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13 vols., Venezia, 1850-55.

CASSANDRO, G., *La formazione del diritto marittimo veneziano,* 《Annali della Storia del Diritto》 XII-XIII, Giuffrè, Milano, 1968-69.

CASSAR, P., *Psycological and Medical Aspects of the Siege of 1565,* Malta, 1929; *Medical History of Malta,* London, 1964; *A medical service for slaves in Malta during the rule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Med. Hist.》 vol. XII, 3, 1968.

CESSI, R., *La Regolazione delle entrate e delle spese,* 《Documenti finanziar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serie III, vol. I, Padova, 1925; *Problemi monetari veneziani,* 《Documenti finanziar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serie IV, vol. I, Padova, 1937;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2 vols., Milano-Messina, 1944-46; *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d il problema Adriatico,* Napoli, 1953.

CESSI, R. & ALBERTI, A., *Rialto: l'isola, il ponte, il mercato,* Bologna 1934.

CHAFFANJON, A., *Les Grands Ordres de Chevaliere,* Paris, 1970.

CHALANDON, F.,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en Italie et en Sicilie,* 2 vols., Paris, 1907.

CHAMBERS, D.S., *The Imperial Age of Venice, 1380-1580,* 《Histo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ibrary》(G. Barraclough编), New York-London, 1970.

CHARANIS, P., *Piracy in the Aegean during the reign of Michael VIII Paleologus,* 《Annuaire de l'I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 vol. X, Université Libre, Bruxelles, 1950.

CILENTO, N., *Le incursioni saracene in Calabria,* 《Atti del IV congresso storico calabrese》 (Fiorentino 编), Napoli, 1969.

CONTARINI, G.P., *Historia delle cose successe de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mossa da Selim l'ottomano a Venetiani fino al di della gran Giornata vittoriosa contra Turchi,* Venezia, 1572.

DA MOSTO, A., *I Dogi di Venezia nella vita pubblica e privata,* Aldo Martello, Milano, 1960.

D'AJANO, R.B., *L'industria della seta a Venezia,*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C.M. Cipolla 著) vol. I, Einaudi, Torino, 1959.

DAVIS, J.C.(编), *Pursuit of Power: Venetian Ambassador's Reports,* Harper Torchbooks, 1970.

DE BLASIIS, *Insurrezioni Pugliesi.*

DE CESARE, F., *Le antichità di Pestum, disegnate e incise dall'architetto Fr. De Ces.,* Napoli, 1834.

DE PIERREDON, G.M., *Les Oeuvres Hospitalieres Francaises de l'Ordre de Malte (1927-1998)*, 《Societé de l'histoire et du patrimoine de l'Ordre de Malte》, Paris, 1999.

DE ROOVER, 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XVI, 1942.

DEGUIT, D., *Quand Malte defendait l'Occident,* 《Miroir de l'Histoire》 164, 1961.

DELAVILLE-LEROULX, E., *Les Hospitaliers à Rhodes,* Paris, 1913.

DUCAUD-BOURGET, F., *La spiritualite de l'Ordre de Malte,* Roma, 1955.

DUDAN, B., *Il dominio veneziano di Levante,* Bologna, 1938.

ENGEL, Cl.E., *L'Ordre de Malte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1956;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Paris, 1972.

ERCHEMPERTO, *Chronicon Cass.*

FAGLIA, V., *La difesa anticorsara in Italia dal XVI secolo: Torri costiere, edifici rurali fortificati,* Istituto Italiano dei Castelli, Roma, 1974.

FEDELE, P., *La battaglia del Garigliano dell'anno 915,*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vol. XXII, Roma, 1899.

FERRARO, M.S., *Memorie religiose e civili della città di Gaeta,* Napoli, 1903.

FILIPPINI, A.P., *Storia di Corsica,* Tournon, 1594.

FINLAY, R.,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0.

FINLEY, M.I. & Smith, D.M., *The History of Sicily,* Viking Press, 1987.

FOLENA, G., *Cultura e poesia dei siciliani,*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E. Cecchi & N. Sapegno 监修), vol. I, Milano, 1965 & 1987.

DEGUIT, D., *Quand Malte defendait l'Occident,* 《Miroir de l'Histoire》 164, 1961.

DELAVILLE-LEROULX, E., *Les Hospitaliers à Rhodes,* Paris, 1913.

DUCAUD-BOURGET, F., *La spiritualite de l'Ordre de Malte,* Roma, 1955.

DUDAN, B., *Il dominio veneziano di Levante,* Bologna, 1938.

ENGEL, Cl.E., *L'Ordre de Malte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1956;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Paris,

GAY, J., *L'Italie Méridionale et l'Empire Byzantin,* Paris, 1904.

GAZZANO, *Storia di Sardegna,* Cagliari, 1777.

GEANAKOPLOS, D.J., *Emperor Michael Paleologus and the West, 1258-82: a Study in Byzantine-Latin Relations,* Cambridge, 1959.

GEROLA, G., *I plastici di fortezze venete al Museo storico navale di Venezia,* Venezia, 1931.

GIBBON, 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7 vols,(J.B. Bury 编), London, 1896.

GIGLIO, C., *La Barberia dalla invasione araba alla conquista turca(VII-XVI)*, 《Storia dei Popoli》.

GIOVINI, A.B., *Sulla dominazione degli Arabi in Italia,* Il Vespro, Palermo, 1979.

GOSSE, P., *Storia della Pirateria,* Sansoni, 1962.

GREGOROVIUS, F., *Storia di Roma nel Medioevo,* Einaudi, 1973.

GRENDI, E., *Traffico portuale, naviglio mercantile e consolati genovesi nel Cinquecento,* 《RSI》 vol. LXXX, 1968.

GUARNIERI, G.G., *I Cavalieri di S. Stefano,* Pisa, 1960.

GUERRAZZI, F.D., *Vita di Andrea Doria*, Milano, 1864.

GUGLIELMOTTI, A., *La Squadra permanente (1573-1644)*, (*Storia della Marina Pontificia* 分册), Roma, 1882; *Storia della Marina pontificia*, Roma, 1866-93.

GUGLIELMOTTI, P.A., *Storia delle Fortificazioni nella Spiaggia Romana*, Roma, 1887; *Dizionario marino e militare*, Milano, 1967.

HALDUN, I., *Historie de l'Afrique et de la Sicilie.*

HEERS, J., *Types de navires et spécialisation des trafics en Méditerranée a la fin du Moyen-Age, in Le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Moyen-Age au XVIII siècle principalement en Méditerranée*, 《Travaux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7》, ÉPHÉ, 6 Section, 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Sevpen, Paris, 1958 ; *Genes au XV siècle*, ÉPHÉ , 6 Section,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vol. XXIV, Sevpen, Paris, 1961.

HEIBERG, J. L., *Les sciences greques et leur transmission II. L'Oeuvre de conservation et de transmission des Byzantins et des Arabes*, 《Scientia》 vol. XXXI, 1922.

HESS, A.C.,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vol. LVII, 1972.

HEYD, W., *Le colonie commerciali degli italiani in Oriente nel Medioevo*, 2 vols., Venezia, 1866-68; *Historie du commerce du Levant*, II.

HIBBERT, A.B.,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II, Cambridge, 1963; Einaudi, Torino, 1977.

HILL, G., *History of Cyprus*, vol. III, cap. XIV, Cambridge, 1948.

HOLMES, G.C.V., *Ancient and Modern Ships*, 2 vols, London, 1916.

HOPPEN, A., *The Finances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ol. III, 1973; *The fortification of Malta by the Order of St John, 1530-1798*, 1979.

HUGHES, J.Q., *The Building of Malt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1530-1795*, 1956.

HUME, E.E., *Medical Work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Baltimore, 1940.

JARDIN, P. & GUYARD, P., *I Cavalieri di Malta* (M. Gabbi 翻译), Edizioni San Paolo, Cinisello Balsamo, Milano, 2004.

JOANNE, A., *Tunis et ses environs*, Paris, 1896.

JORDAN, E., *Les Origines de la Domination Angevine en Italie*, Paris, 1909.

KING, J.W., *War-Ships and Navies of the World*, Boston, 1880.

LA VARENDE, J., *Chevaliers de Malte*, Paris, 1970.

LADAGE, J.H., *Merchant Ships*, Cambridge, 1955.

LAFONTAINE-DOSOGNE, J., *Monuments venetiens de Chypre,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Firenze, 1974.

LANDSTRÖM, B., *La Nave* (A. Fraccaroli 翻译, A. Martello 编), Milano, 1962.

LANE, F.C.,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III, 1958; *Le vecchie monete di conto veneziane ed il ritorno all'oro*, 《Atti dell'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vol. CXVII, 1958-59; *La marine marchande et le trafic maritime de Venise à travers les siècles*,《*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 siècle*》, Actes du Quatr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9, ÉPHÉ, 6 Section, Bibliothéque generale, Sevpen, Paris, 1962; *Economic Meaning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Compas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VIII, 1963; *Venetian Merchant Galleys, 1300-1334*, 《Speculum》 vol. XXXVIII, 1963; *Tonnages, Medieval and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 II, vol. XVII, no. 2, 1964; *Navires et constructeurs à Venise pendant la Renaissance*, ÉPHÉ, 6 Section, Sevpen, Paris, 1965; *Maritime Law and Administration, 1250-1350, Venice and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C. Lane*, Joh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66; *Pepper Prices before De Gam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XVIII, no. 4, 1968; *Venetian Seamen in the Nautic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1968; *The Enlargement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Venice*, 《Florilegium Historiale: Essays presented to Wallace K. Ferguson》(J.C. Rowe & W.M. Stockdale 监修),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1; *Storia di Venezia*(Giulio Enaudi 编), Torino, 1978; *Naval Actions and Fleet Organization, 1499-1502*, 《Renaissance Venice》.

LATTES, A., *Diritto marittimo privato nelle carte liguri dei secoli XII e XIII*, Roma, 1939.

LATTES, E., *La libertà delle banche a Venezia dal secolo XIII al XVII*, 1869.

LEPORE, E., *Mediterraneo e popoli italici nella transizione del V secolo*, 《Storia di Roma》.

LEVI, C.A. *Navi da Guerra costruite nell'Arsenale di Venezia*, Venezia, 1896.

LEWELLYH, L., *Roma nei secoli oscuri*, Laterza, Bari, 1971.

LOMAX, D.W., *The Reconquest of Spain*, London, 1978.

LONGO, F., *Guerra di Selim*, 《Arch. Storico Italiano》.

LOPEZ, R., *I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veneto-turca nel 1463*, 《Archivio Véneto》 serie 5, vol. XV, 1934; *Storia delle colonie genovesi*, Bologna, 1938; *Venezia e le grandi line dell'espansione commercial nel secolo XIII*, 《*La civiltà veneziana nel secolo di Marco Polo*》, Sansoni e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Venezia, 1955.

LUTTRELL, A.T., *Venice and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of Rhode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XXVI, London, 1958.

LUZZATO, G., *Il debito pubblico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Documenti finanziar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Padova, 1929;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Cedam, Padova, 1954; *Tasso d'interesse ed usura a Venezia nei secoli XIII-XV*, 《Miscellanea in onore

di Roberto Cessi》, Roma, 1958;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Centro Internazionale delle Arti e del Costume, Venezia, 1961; *L'economia veneziana nei secoli XV e XVI*, 《Bergomum》 vol. LVIII, no. 2, 1964; *Per la storia delle costruzioni navali a Venezia nei secoli XV-XVI*, 《*Studi*》.

MANFRONI, C.,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dal trattato di Nonfeo al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vol. II, Livorno, 1902.

MACONI, G., *Gli schiavi redenti*, Livorno, 1877.

MAGGIOROTTI, L.A., *Architetti e architetture militari*, 《*L'opera del genio italiano all'estero*》, Roma, 1933.

MANDICH, G., *Forme associative e misure anticoncorrenziali nel commercio marittimo veneziano del secolo XV*, 《Rivista delle società》 vol. VI, Milano, 1961.

MANFRONI, G., *Genova*, Roma, 1929.

MARMORA, A., *Della Historia di Corfù*, Venezia, 1672.

MARCHESI, P., *L'castelli, Fortezze Veneziane, 1508-1797*, Rusconi Libri S.P.A., Milano, 1984.

MARTINI, P., *Storia dell'invasione degli Arabi in Sardegna*, Cagliari, 1861.

MATTINGLY, G., *Renaissance Diplomacy*, Boston, 1955.

MAZZAOUI, M.F., *The Cotton Industry of Northern Ital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1150-1450*, 《Journal of Economis History》 vol. XXXII, 1972.

MEURSIUS, G., *Creta, Ciprus, Rhodus*, Amsteldam, 1675.

《Miscellanea storica ligure》, *Guerra e commercio nell'evoluzione della marina genovese tra XV e XVII secolo*, 《n.s.》 vol. II, Genova, 1970.

MOCENIGO, M. N., *Storia della marina veneziana da Lepanto 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Roma 1935.

MOLMENTI, P., *La storia di Venezia nella vita privata*, vol. 3, Bergamo, 1927.

MONTERISI, *Storia del S.M.O. di Malta, Milano*, 1940.

MORGHEN, R., *Il tramonto della potenza sveva in Italia*, Roma, 1937.

MOUSNIER, R., *Le trafic des offices à Venis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set etranger》 serie IV, vol. XXX, 1952.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1961.

MUSSET, L., *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etienne* (VII-XI siècles), 1965.

NEGRI, T.O., *Storia di Genova*, Milano, 1968.

NORWICH, J.J., *I Normanni nel Sud: 1016-1130*, Mursia, 1974.

Ordine S.M.H. di Malta, *A Modern Crusade*, Pubblicazione dell'Ordine di Malta, Roma.

PADULA, V., *Calabria prima e dopo l'Unità*, Laterza, 1977.

PANETTA, R., *I Saraceni in Italia*, Milano, 1973; *Pirati e corsari turchi e barbareschi nel Mare*

Nostrum, Milano, 1981.

PAPADOPOLI, N., *Le Monete di Venezia*, 4 vols, Venezia, 1893-1919.

PASANISI, O., *La costruzione generale delle torri marittime oridinata dalla R. Corte di Napoli nel sec. XVI*, 《Studi di storia napoletana in onore di Michelangelo Schipa》, I.I.T.E.A., Napoli, 1926.

PASTOR, L., *Storia dei Papi*, Roma, 1911; *Geschichte der Papste*, vol. XII, Freiburg im Breisgau, 1928.

PERTUSI, A., *Venezia e l'Oriente, vol.IV della serie Civiltà europea e Civiltà veneziana: aspetti e problemi*, Centro di Cultura e Civiltà della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San Giorgio Maggiore, Sansoni, Venezia, 1966.

PIERI, P., *Intorno alla politica estera di Venezia al principio del Cinquecento*, Tipomeccanica, Napoli, 1934.

PINELLI, A., *Codice per la veneta mercantile marina*, Venezia, 1786.

PISTARINO, G., Faina, G., *Fasti del più grande porto italiano*, Tuttitalia, Sansoni-De Agostini, 1962.

PRETO, P., *Venezia e i Turchi*, Firenze, 1975.

PROMIS, C., *Memorie dell'antica città di Luni*, Massa, 1857; *Biografie di ingegneri militari italiani*, 《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 vol. XV, 1874.

QUELLER, D.E., *Early Venetian Legislation on Ambassadors*, Droz, Genova, 1966; *The Office of Ambassador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y, 1967; *The Civic Irresponsibility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in Economy,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taly: Essays in Memory of Robert L. Reynolds*,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ent, Ohio, 1969.

RICINIELLO, S., *Codice Diplomatico Gaetano*, vol. I, La Poligrafica, 1987.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ezia, 1853-61（再版1912年, 第3版1972年）.

ROMANO, R., *La marine marchande venitienne au XVI siècle*,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 siècle》, Actes du Quatr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9, ÉPHÉ, 6 Section, Sevpen, Paris, 1962.

ROMEO, F.G., *Pirati e Corsari nel Mediterraneo, lo scontro tra cristiani e saraceni tra il IX e il XVII sec.*, Capone Editore, Lecce, 2000.

ROSCOE, *Vita di Leone X*, Milano, 1817.

ROSSI, E., *Una missione di Redentori a Tripoli di Barberi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vol. X, Roma, 1907.

Ruddock, A.A.,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Records Serie, Oxford, 1951.

RUIZ, F.M.,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Mediterranean*,《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 I, Roma, 1972.

SACERDOTI, A., *Venise et les Régences d'Algér, Tunis et Tripoli (1699-1760)*,《Revue africaine》vol. CI, 1957; *Note sulle galere da mercato veneziane nel XV secolo*,《Bollettino...veneziano》vol. IV, 1962.

SANTORO, R., *Le antiche torri costiere della Sicilia*,《Rivista Marittima》, Roma, 1976.

SASSI, F., *La guerra di corsa e il diritto di preda secondo il diritto veneziano*,《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vol. II, 1929.

SCHAUBE, A., *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uge*, Munchen-Berlin, 1906.

SCIALOJA, A.(Antonio Scialoja 编), *Le galee grosse della Repubblica Veneta, I: Un precedente medioevale dei "Pools" marittimi, Saggi di storia del diritto marittimo*, Roma, 1946(《Studi in Memoria di Bernardino Scorza(Università di Bari 编, Roma, 1940)》初出).

SELLA, D., *Commerci ed industria di Venezia nel secolo XVII*,《Studi》no. 11,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Civiltà veneziana, Venezia, 196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enetian Woolen Industry, Crisis and Changes in the Venetian Economy*(B. Pullan 编), Methuen, London, 1968.

SERENO, B., *Commentari della guerra di Cipro*, Montecassino, 1845.

SESTIER, J.M., *La Piraterie dans l'antiquitè*, Paris, 1880.

SFORZA, G., *La distruzione di Luni nella leggenda e nella storia*, Misc., F.lli Bocca, Torino, 1922.

SHAW J.S. *L'Impero ottomano dopo il 1453*,《Storia dei Popoli》, Utet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 1976.

SHUSTER, I., *L'Imperiale Badia di Farfa*, Roma, 1921.

SINGER, C. 他,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5 vols, Oxford, 1955-60; Boringhieri, Torino, 1966-68.

SISMONDE DE SISMONDI, J.C.L., *Histori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Bruxelles, 1838.

SKINNER, P., *Family Power in Southern Italy: The Duchy of Gaeta and its Neighbou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LESSAREV, V., *"Ecclesiae Mercatorum" and the Rise of Merchant Colonies*,《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 XLI, no. 2, 1967.

SMITH, V.H., *The Mediterranean, a memoir physical, historical, and nautical*, London, 1854.

SORBELLI, A., *La lotta tra Genova e Venezia per il predominio del Mediterraneo, I, 1350-1355, Memorie della R.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Bologna*,《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ezione di scienze storico-filologiche》serie I, vol. V, 1910-11(再版1921).

SOTTAS, J., *L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de Venise au XIV et XV siècles*, Paris, 1938.

SOUBIRAN, A., *L'islam, conservatoire de la medecine*, 《Aesculape》 vol. 48, 1965.

Storia delle Civiltà Veneziana, 9 vols., Sansoni, Firenze, 1955-65（讲义录：于 Centro di Cultura e Civiltà della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Isola di San Giorgio Maggiore, Venezia）.

Studi editi da G. Pistorini》, Fratelli Bozzi, Genova, 1970.

TAYLOR, E.G.R., *The Haven-Finding Art*, London, 1956; *Mathematics and the Navigator*,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London, 1960.

TENENTI, A., *Naufrages, corsair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á Venice, 1592-1609*, ÉPHÉ, 6 Section, Sevpen, Paris, 1959; *Venezia e i corsari*, Bari, 1961; *Cristoforo da Canal: La marine venitienne avant Lepant*, Paris, 1962;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1615* (J. & B. Pullan翻译・用语集), Berkley, 1967.

TOTI, O., *La città medioevale di Centocelle*, Allumiere, 1958.

TUCCIAONE, R., *I Saraceni nel ducato di Gaeta e nell'Italia centromeridionale*, Gaeta Grafiche, 1991.

VALENTE, G., *Vita di Occhiali*, Casa Editrice Ceschina, Malino, 1960; *Calabria, Calabresi e Turcheschi nei secoli della pirateria*, Edizioni Frama's, 1973.

VIVOLI, G., *Annali di Livorno dalla sua origine sino all' anno 1840*, Livorno, 1845.

VON HAMMER, J., *Storia dell'Impero Ottomano*, Paris, 1830; *Storia ottomana volgarizzata*, Venezia, 1830.

VON NORMANN FRIEDENFELS, E., *Don Juan de Austria als Admiral der Heiligen Liga und die Schlacht bei Lepanto*, Pola, 1902.

WATSON, A.M., *Back to Gold-and Silv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 II, vol. X, 1967.

ZENO, R.（Vallo）, *Storia del diritto marittimo italiano nel Mediterraneo*, 《Pubblicazioni della Fondazione Vittorio Scaloja per gli Studi giuridici》 vol. III, Giuffrè, Milano, 1946.

《美术馆》

Museo Navale, Genova

Museo Storico Navale, Venezi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田建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498-1
Ⅰ.①罗…Ⅱ.①盐…②田…③田…Ⅲ.①地中海区-中世纪史Ⅳ.①K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980号
Roma-nakiato no Chityuukai-sekai (1)（2）
Copyright © 2008，2009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田建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马基雅维利语录

【日】盐野七生－编 万翔－译

穿越500年的智慧语录总有一句是为解答你的困惑而存在

《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独家编译首次完整呈现马基雅维利哲学

勤于自我提升的领导者的理想伴手读物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马基雅维利语录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致读者
第一部 君主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第二部 国家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第三部 人间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返回总目录

致读者

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并非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概括，而仅仅是摘要。毕竟我既没有完全翻译，也没有概括，更没有解说。我想，必须说明一下，本书是以摘要方式选辑的语录。

首要的原因如下。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我笔下至今以来的男女中，虽具备都是历史人物的共同点，却也有一点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他与《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中的四位教皇以及《海都物语》中出现和消失的男子们相比，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留下了作品。

前面提到的人物写过诗作、信件和公共文书。但从写作内容来说，他们和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马基雅维利所留下的作品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固然曾陷入不可避免的失业，于是又不得不以不可避免的“人生的写照”，自然地表现了以写作为人生的精神气概。

我以“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为题的作品，就是描写这位人物的。

但是我虽然写下了关于他的作品，却未曾对他的人生和思想有多少兴趣。我打算书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代表性城邦的历史，在《海都物语》所描写的威尼斯共和国之余，还准备写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故事。我以为，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历史现实中的产物，可以作为描写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贴切素材。

他的一生不到60年，这不仅远比威尼斯共和国1000年的历史要短，用以注解佛罗伦萨共和国300年的繁荣，也是不充分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以但丁的时代为上升期，以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中心的时期是鼎盛期，到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就是衰退期了。我常想，未来总会有人把前两人时代的历史写下来吧。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短暂。

在写下上述这些片面理解以后，我不得不说自己错了。

倘若我的假设正确，国家兴起的原因和衰落的原因相同，那么只写衰退期的历史不能说是不充分的。至少与只写兴盛时期的历史相比，这更有助于把握整体的形象。因此，虽然有必要追溯并记录下衰退期以前的历史，历史的整体形象并未因只写衰退期而从视野中消失。进入整体的历史视野，也就抓住了一个民族固有的精神。因此我以为，这种精神正是国家兴衰的原因所在。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恰好为有着以上考虑的我，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但是，以上所述的马基雅维利，并非简单的素材而已。相反，他是一位遗留下作品的思想家。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的“人生的写照”到今日依然留存，而且——绝不仅仅是留存，他还是富有古典和现代价值的著作之作者。追溯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在生活中并没有感到幸福。我在将他的故事写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于是研究他的生活和思想，并反复研究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落与他思想的关系。

最终我的结论是，两者之间应该分开考虑。《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的主人公，在作为一个人的同时，也是他所在的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叙述素材。他的思想中根本的一点，即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是那个时代中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这是我有意选取的论点。毕竟，我所未曾言及的，除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存在，也包括值得进行“历史

的”、“喜剧的”、“悲剧的”评论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衰落历史上的种种事件。

然而，将马基雅维利的人生与思想，和当时的历史分离之后，关于如何理解他的思想，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以往的研究者之间最常见的做法是继承前辈学者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阐释。对此，在我脑海里不能忘却的是他本人写下的一句话。

如果以原文引用的话，就是《君主论》第十五章中的一句：

sendo l’intento mio scrivere cosa utile a chi la intende...

（我写作的目的，是写一些对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有用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说这番话时脑海中的对象，无疑是他生活的16世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以及同时代更广范围内的意大利人。

他的作品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当今时代作为古典作品，对500年后日本的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用的东西”，此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不得不说是很糟糕的。

但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完整地阅读翻译成日语的《君主论》与《论李维》（在日本出版时定名为《政略论》，全名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编者注）应该就可以了。虽然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还未完全翻译成日文，细细读罢这两篇代表作，就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思想了。这两本书由会田雄次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已在中央公论社出版。

而我希望自己所收集的语录并不限于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思想，更将他与500年后日本人之间横亘的思想障碍完全去除。我也

希望能使读者体味到马基雅维利写作当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生气。

我这种希望，由于对古典的敬而远之，还远未实现，完全做到也是不可能的。

我为什么对古典敬而远之呢？

在并非学者的我看来，古典作品在正文之后似乎总是附加大量注释的。我做不到尽可能详细地阅读那些注释，因此很难充分体味正文的意思。就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说，由于其论述过程中时常引用具体的事例，若没有关于这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知识，就无法理解他的论点。日文译本后附的大量注释，就是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解说。

不过，马基雅维利的书稿是在他死后5年才初次出版的，原书完全没有所谓的“注释”。

这很容易理解——马基雅维利在为阐述自己的论点而引用事例时，没有必要加任何注释。作为他同时代的人，参考那些非常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可以从整体上理解他的思想。他特别以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作为自己《论李维》的素材，这对当时的西欧人来说，就如同过去的日本人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熟悉程度一样。

因此，倘若马基雅维利生活在现代的日本，当他著述《君主论》时，大概一定会将圣德太子与秦始皇，成吉思汗与毛泽东，从织田信长、坂本龙马到西乡隆盛，或者进一步将从吉田茂到中曾根康弘、竹下登，以及里根、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等作为事例。关于这些人的注释，恐怕没有必要吧？

这种相同之处，不要说对今天的日本人，就是对现代西欧人来说也是存在的。

对我们来说，圣德太子、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是不需要注释的。对普遍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现代西欧人来说，尤里乌斯·恺撒，或者亚历山大大帝，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了。如今已经出版的

《马基雅维利全集》中，也完全没有注释了。在意大利文版即本书原著的注释中，不时有从古典语风转译的现代的口吻，在英文版本和德文版本的注释中，仅仅有作为常识的简单意大利历史回顾。

简言之，加入大量的注释不仅对16世纪时的意大利人没有必要，即使对想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现代西欧人来说，是否会造成理解上的累赘，也值得商榷。固然，对注释的阅读无法回避，毕竟它是基于现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但500年以来西欧范围内的“马基雅维利派”与“反马基雅维利派”之间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这种广泛的论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

最终，我决定在这本书中不加入任何注释。

不过西欧人之间存在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与其文明圈迥异的我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我已经将马基雅维利引用的具体事例中不加注释就无法理解的那些，从《语录》中去除了。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每一位读者都能理解的情况下，为现代日本人提供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途径。

因此，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是他的“人生的写照”中的精华。它是在我考虑是否适合现代人这一点之后，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抽取的精华部分。这指的是我个人主观认为的“精华”，其他部分并未收录。

其中《战争的艺术》的部分，收录寥寥，这是出自马基雅维利本人的理解。他曾经这样写道：

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是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常有的情况是，古时候非常有效的策略，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毕竟这是受到技术进步影响最大的领域。

马基雅维利生前亲眼见到的印刷出来的本人著作，就只有这本《战争的艺术》了。

换句话说，这本书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来，更为当时人所接受。然而到了500年后的今天，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他嗣后出版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在这两部作品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受欢迎的同时，《战争的艺术》成为一个包含着落后于时代的危险性的例子。

基于以上的看法，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主要以《君主论》和《论李维》为中心而摘要。

此外，关于我为什么不采用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进行一番解说，而只是进行摘要，还另有一点原因。

这就是我回溯500年以来对他的思想赞成或反对的双方相互对立的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

即便是责难马基雅维利的人，如果考察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实际情况，也不免得出相同的结论。

在创作《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的过程中，我为后世如何接受他的思想而感到不解，最终并未触及这个问题的实质。这是因为我相信，赞成或反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说法，对正确理解他本来的意图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针对断言他的思想是“反伦理的”、对“好的基督徒”来说有害的反对派意见，不属于这一派别的我，只能做如下的回应：

就政治来说，在一定场合下不得已提出反伦理道德观点的马基雅维利，其思想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恰恰在于将政治与伦理明确地分离考虑。这样做与否，并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点来选择，其答案自然是不能将二者分离考虑。

然而，我也不能说自己与为马基雅维利辩护的一派，持有相同的观点。

因为有像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中那样的情况，就去为他的思

想之产生而辩护的逻辑——属于“辩护派”的人，并未注意到自身落入了一个悖论。因为越发强调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就最终否定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普遍性。

不能不说，一种具备普遍性的思想，即使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可能超越时代而存在。为马基雅维利的辩护如果只表明被否定之余他的些许贡献，那就成了对他的讽刺。

作为世界名著的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是属于绵延的人类智慧谱系之一的。这一点难道不是普世性的吗？

就对思想的述评来说，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终究是述评者所处时代的反映。

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要说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是对相关研究者的思想，也是如同第三者视野之镜像中所反映的一般了。与其通过研究者的透镜来观察，不如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直接展示出来。这样就算反对其观点，也能得到很多收获吧。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出版之后，一些书评指出，我既没有为他辩护，也没有对他进行责难。在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中，我也沿袭了相同的做法。

在日本，既没有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完整翻译，也没有对他的解说，但有一些作家著有他的小传，方便人们理解。我知道除了佐佐木毅著有《马基雅维利》（讲谈社），还有名叫森鸥外的一位先生。这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森鸥外在一部译名为“人主策”的《君主论》译序中对这部作品，在已有两种日文译本的情况下还应重新译介的理由，做了如下的叙述：

马基雅维利《人主策》（《君主论》）虽仅为一本小册，其行文纡曲，证例冗繁，不可称其为易读之著作。及阅过之际，摘其要而抄记之。

我读到此处，不免莞尔。我想，森鸥外先生一定是读到了冗赘不堪的译文吧。

而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意大利文的原文。现代意大利文豪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译者注）曾就马基雅维利的文章说，只要一读起他的作品，就会感觉到其间充满的力量，给人的感觉好似运动员隐藏在皮肤之下的肌肉运动一般。若要我以改变自己的文风来概括这样的文风，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我选择摘要的原因，是为了体会那种完全没有“纡曲”的马基雅维利的文风所给予读者的快感。选取“精华”的部分，绝对不能再说是“证例冗繁”了。

仅仅让读者成功地听到原作者的“人生之声”，还不能说是完全达到了我的著作目的。我的目的还在于，让马基雅维利本人面向现实的观点展示出来。

这就需要拜托各位读者了。

对于各位所关心的内容，我一定倾听各位的意见。我想，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意见，在出版后都会出现。毕竟，就算我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再大，也有些与他不同的意见。

也许我比谁都想了解各位的意见，我相信马基雅维利一定正在地狱里——说过天堂不过是无聊的人才会去的话的他，现在一定在地狱里吧——与历史上的伟人们对话。

基于各位的意见，我想自己总要写一部作品。我想到了“马基雅维利与日本人”这个题目。

顺便提一句，我所用以翻译的原著是现代以来最可信的版本，即1960年出版的Feltrinelli版。说句题外话，Feltrinelli出版社是代表意大利左翼力量的。

说到政治，我不愿意眼前再浮现永田市附近县政府所在地发生

的那一幕。（此处指“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部分青年军官率千余名士兵发起政变，后失败。此事最终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编者注）虽然那也是政治，但那样的地方所涉及的只是狭义的政治而已。在我看来，所谓广义的政治，并不是能够尽量公正而富有效率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的“技术”（わざ，相当于英语的technique。——译者注）。

因而，无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政治动物”而居于高位的古希腊人，从历史上看，都有着首先以强大的经济，而后以成熟的政治著称的事实。这就是说，尽数体现人类自身智慧之价值的事物，是“艺术”（アルテ，即英语的art，其日文、在日语中的汉字写法与前面的“わざ”相同，都是“技”字。——译者注）而已。

这样说来，马基雅维利也曾打算在其人生中以政治为赌注。而我认为，在现代日本人当中，并没有与之相同目的的政治。

最后，“君主”的原文是principe，而现代的“第一人”英语是leader，常用于指领导者的场合；而“国家”这个词的使用场合，也与从西欧传来的“共同体”、“组织”等意译的词语一样。

盐野七生

1988年春，于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

·语录·

第一部
君主篇

01

我写作的目的，是写一些对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有用的东西。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最有用的是讨论现实中存在的事件，而不是想象的世界里存在的事件。

历史上东西方的许多贤者曾经论述过只在想象的世界里存在而在现实中没有的共和国或者君主国。然而对人们来说，应当怎样生活，与实际的生活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以至于，如果一个人仅仅谈论应当如何生活，从而不能直视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那么他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目前拥有的，还会导致自我毁灭。

毕竟，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以善行自持的人，在置身于恶者之中时，难免遭到毁灭的命运。

因此，想要保全自己地位的君主，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者，并且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一般的行为来。

——《君主论》

02

作为屹立于历史的国家，无论涌现过多少出众的施政者，其实施的各种政策都是以下面两点为基础的：

这就是正义与强力。

为了不在国内树立敌人，正义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防御国外的敌人，强力是十分必要的。

——《就佛罗伦萨共和国之未来答美第奇家族所问》

03

您提到：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对他们时，是团结一致的。”

然而，我反对您的意见。

对大国的领导者来说，达成团结一致是很难的。但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一点，想要把团结的局面维持下去，是更加困难的。

——《马基雅维利书信》

04

对个人之间的法律、契约、协定来讲，守信是有用的。

但是在掌权者之间，是否维持信义，则仅仅依据各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了。

——《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

05

人们常常对君主（领导者）有如下的评论：

有人被赞誉为慷慨，

有人则被贬斥为吝啬；

有人被视为乐善好施，

有人则被斥为贪得无厌；

有人被评判为残酷无道，

有人则被称为慈悲为怀；

有人被批驳为毫无诚信，

有人则被赞赏为言而有信；

有人被讥笑为如女人一般软弱、胆小如鼠，

也有的人在众人看来勇猛强悍；

有人被称为和蔼可亲，

也有人受到傲慢尊大的恶评；

有人私底下被认为是好色之徒，

也有人被众口评为高洁之士；

有人大家一致认为表里如一，

也有人表里不一，必须防范；

有人被众人指责为脾气顽劣，

也有人看上去就平易近人；

有人可谓是冷静威严，

也有人表现得轻浮不堪；

有人以其虔信著称于世，

也有人毫无信仰，凡事走极端。

各位读者自然会同意我的一点是：领导者如果能表现出上述品质中所有的积极方面，他一定能得到最高的称颂。

然而，任何人都不具备将所有优良品质集于一身的能力。纵使真的有那样贤明的人物，他也无法在现实的人世间将这些品质完全发挥出来。

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注意如何避免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同时还必须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不要太在乎，任由其发展也无妨。

当君主在不做恶事就无法挽救国家于存亡之际，去为这些恶行所受到的恶评与污名而感到不安，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这是因为，有些看上去好似美德的事情，往往是真的实施起来就会自取灭亡。相反，另一些看上去是恶行，实施之后却给整个社会带来安全和繁荣。

——《君主论》

06

作为君主（领导者）不必完全具备各种好的品质。

但是，他在人们面前，有必要显得自己具备这一切品质。

甚至我敢说，实际具备这些品质是有害的，而如果显得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却是有益的。

显得慈悲为怀、重视信义、合乎人道、光明正大、信仰虔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当不得不舍弃这些美德以行事的时候，一定要具备彻底违背这些原则的能力。

必须谨记的是，作为君主，特别是一位新的君主，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不能去实践那些所谓的美德。

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也要放下所谓的慈悲之心。很多时候迫于需要，也要违背人道，把信仰置于一边。

因而，对君主来说，为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态的变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应背离良善的美德，但若有必要的话，绝不应该对为非作歹有所回避。

君主最应当放在心上的是保持国家运行良好。如果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都会认为其手段是光彩的，他也会得到广泛的称

赞。

在谨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场合，或者在当初承诺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深思熟虑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信义。

倘若人人都是善良的，那我的这一点考虑自然就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大都是恶劣与自私的，您也就不得不从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考虑而背信弃义。

君主总是有正当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转向”辩护，这种实例数不胜数。

——《君主论》

07

任何人都相信，君主不使用诡计，而是光明正大地行事，是非常值得赞美的。

然而，我们得到的经验却是，那些并不重视守信的君主，却建立了丰功伟绩。

不仅如此，那些善于操控人们头脑的君主，比那些相信臣民的君主，更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若探究个中缘由，首先必须理解如下的情况：

取得成功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法律，另一则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是人类的方法，而第二种则是野兽的方法。

但因为前者在现实中常常无法充分发挥，诉之于后者往往是有效的。

总之，君主必须懂得善于使用人类的和野兽的两种方法来取得成功。

这一点已经由古代作家记述下来。他们描写半人半马的怪兽喀戎如何喂养和教导阿喀琉斯和古代的许多君主。这些记载暗示了，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有必要学习人类自身的和野兽的特质。

如果只拥有一种特质而缺少另一种，就难以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了。

我认为，既然君主必须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对于野兽中狐狸

和狮子的特点，尤为需要效仿。

由于狮子不能避免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又不能单独抵御狼的威胁，因此君主要有像狐狸一样逃出陷阱的能力，又要能像狮子一样驱散狼群。

能够看穿陷阱的人才算是具备了狐狸的能力，而能够驱散狼群的人才算是人群中的狮子。

因此，对于单纯做狮子就满足了的君主，或者单纯做狐狸就满足的君主来说，还不能算是完全认识了野兽的方法。

而狐狸的特性并不仅是灵活地实施策略，而是在必要时假装无知，极为巧妙地隐藏自己的内心，在行事时装傻。

人类其实是单纯的动物，容易为亲眼所见的现实所吸引。这就是现实——试图欺骗他人的人，总会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

——《君主论》

08

当被认为是善人的人物为了达到目的不得已作恶的时候，一般来说，他最好一步一步进行，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过，如果好机会降临，也可以当机立断，立即行事。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急剧转变的策略，可能在失去以前的支持者之前，取得新的支持者。

但若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真实意图为众人所知，则会让以前的支持者丧失殆尽，很可能突然导致毁灭的结局。

——《论李维》

09

在世袭的君主国中维持政权，比在新兴的君主国中维持政权要容易得多。因为在世袭国家中只要沿袭先人实行的制度就可以了，而如果遇到意外事件，只要随机应变就可以了。采取这样的治国之道，只要不发生大的异变，普通水平的国君就能够继承国家了。

但是新兴的君主国就面临种种困难，对其君主来说，需要有特别优异的能力。

这是因为，当新君主确立其地位时，他总不免伤害国内的某些人。这些人随即与他成为敌对关系。之后的危险是，除了最初的敌人以外，原来站在他一边的某些人，当看到自己的期待不能实现时，也就逐渐成为他的对手了。

——《君主论》

10

当迫于需要而支配他国，并成功将其征服之后，继续对其进行支配的方法，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首先，被征服的国家可以分成以下两类：第一类是语言、风俗习惯和征服它的国家有共同之处，其居民已习惯了自由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将此前统治者的影响根除，就可以充分支配该国了。将这一根本问题处理好，在其他方面只要继续沿袭以往的体制和风俗，其居民就会安然地接受新君主的管辖。在法国统一的过程中，勃艮第、布列塔尼与加斯科涅地区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

征服这些地区的君主如果想维持自己的主权，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是根除此处原来的君主的血统；

其次是不要对当地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加以干涉。

倘若做好这两点，在短时间内，征服者就能跟被征服者很好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至于第二类，也就是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各种制度上与征服它的国家迥然相异，其征服者要想维持自己在新征服土地上的统治，就需要相当的运气和巨大的努力了。

最简单实际的永久性解决办法，就是征服者亲自移居被征服的土地了。征服拜占庭帝国的突厥民族，选择迁都君士坦丁堡，就是

一个实例。由于君主驻跸在新获取的土地上，任何事情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如果君主做不到亲自移居新的领土，第二个良策是在该地区选择一两个据点，建立宗主国移民的社区。如果连建立移民点都做不到，那么新的统治者只能考虑在当地投入大量军事力量，以直面各种可能的事态发展了。

——《君主论》

11

在古罗马时代，当面临纷争时，任何贤明的君主都会挺身而出。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仅仅针对眼前的纷争采取对策，也不忘着手防止未来的纠纷。罗马人以各种努力，对内部的纷争防患于未然。

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纠纷，防患于未然的对策也不难做出。这就像治病，药效的发挥是有一个“适当的时机”的。

古罗马人一定不会喜欢我们现代（16世纪）的智者常常谈起的“等候时间的惠赐”这样的话。与之相比，他们更依赖由自身的力量和判断所带来的成果。

可以说，时间把一切东西都送到面前，在带来好事的同时，也会带来坏事，反之亦然。

——《君主论》

12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再没有比建立新的制度更加困难的事业了。没有比这实行起来更困难、实行的成败更不确定的，因此在实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处处留心。

因为革新者会把所有在原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都树立为敌，相反，在新制度下受益的人，却可能只是半心半意的支持者。

产生这种半心半意态度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他们对原有体制下受益的人怀有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则来自自身对新事物不轻易信任的心理。

——《君主论》

13

倘若我们打算充分论述这个问题，就需要区别这些建立新体制的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在他人帮助之下完成。

如果是依靠他人实行新的制度，其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阻碍，达到自己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假如他们是依赖自己的力量，不管中间遇到什么问题，总是可以战胜困难而取得成功的。

因而，所有武装起来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起来的先知则失败了。

——《君主论》

14

对于突然继承了君主之位的人来说，开始统治时最紧迫的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些基础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早就已经奠定的，对于突然继位者来说则是就任同时就要不失时机地把握的。

这是由于，如果君主在一开始不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事后再去弥补，就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此外，在后期真正去弥补的时候，不仅对建立统治基础来说是危险的，对于建构者来说也是非常头疼的。

——《君主论》

15

建立新国家的君主，应注意以下的事项：

在敌人面前确保自身地位的方法；

广交友邦，并争取建立一个友好关系网络；

依靠策略和武力，以及一切可能的手段争取胜利；

使民众对自己既爱戴又畏惧；

让部下充满服从和敬意；

对那些叛乱和意图加害自己的人，以高压的方式消灭；

对旧体制，以新的方法进行改革；

以恩威并济的手段，显得宽宏大量，而又能够鼓舞人心；

遣散不忠于自己的军队，创建新的军事力量；

确立和其他国家领导者的友好关系，从而取得各国显贵们的敬意，这样他们就算有侵略的念头，也不敢轻举妄动。

以上诸项对于新兴君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我所看到的实施这些事项的典范之一，就是切萨雷·波尔吉亚公爵了。

——《君主论》

16

如果有人相信将新的恩惠给予掌权者，就可以使其忘记旧日的怨念，他就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君主论》

17

肯定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像阿加托克利斯那类人，毫无底线地奸诈且残暴，而后却能长期保有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外敌的侵害或本国公民的反对。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他们对于残暴奸诈的手段，是巧妙地实施还是笨拙地实施的问题。

所谓的巧妙实施，指的是在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以后除非是能对国民的利益有好处，否则不再使用。

相反，笨拙地实施残暴手段，就是一开始寥寥为之、之后与时俱增的做法。

前者是成功的，而后者却会导致无法避免的失败。

总而言之，恶行的实施，只能毕其功于一役。

这样做的话，人们感受到这些手段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也就不容易导致由之而来的憎恶了。

至于恩惠则应该一点一点地施予，使人们能够长期感受到它带来的好处。

——《君主论》

18

一位君主面临的敌人，有内外两方面的。

而在敌人面前保全自己的方法，是不可懈怠的防御力量和友好关系两方面。

因此，具备强大力量的君主，往往能拥有真正的朋友。

——《君主论》

19

一个国家，若没有以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身安全的意志，就无法期待独立与和平了。

因为如果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能依赖的也就只有侥幸了。

“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不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势和名誉了。”（塔西佗语）

我相信，以这句贤者的名言用来评价任何时代都是恰当的。

——《君主论》

20

当现代（16世纪）的君主和共和国不得不诉诸战事时，不以本国国民为主组建军队，对于领导者和国家来说，都是可耻的事情。

毕竟，没有本国的国民军队，不仅无法使用国内的兵士，在需要保卫国家时也无法振奋士气。这自然是领导者的责任了。

——《论李维》

21

如果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也没有直面自己错误的能力，就不可能做到忠诚。

——《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

22

君主除非使自己承担损失，否则就不会经常得到发扬自己慷慨美德的机会。

英明的君主，不应该对吝啬的评价有所介意。

出于节约而收入充盈，这位君主可以在成就伟大事业的同时不给民众加重负担，那么过一段时间，人们对他的恶评会自然变为好评了。

在我们的时代（16世纪），真正做出大事业的，几乎都是被我们认为吝啬的那些人。

——《君主论》

23

做君主的人，不要对招来吝啬之名有所介意。毕竟这样的“恶德”，是保持自己的金库不至于亏空，也不至于变成勒索强夺之徒的保证。

——《君主论》

24

然而如果有人这么说：恺撒也是因为慷慨而取得罗马的统治权的。而且不止他一人，由于慷慨而获得成功的人太多了。

我就会这样回答他：

您这样认为，是因为您要么已经获得了君位，要么正在争取统治的地位。

对于已经获得君位的人来说，慷慨是有害的；然而对正在争取君权的人来说，慷慨行事则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恺撒，他是在取得罗马统治权的过程中表现出慷慨的。但他如果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还那样慷慨，那就是在毁灭罗马了。

——《君主论》

25

关于是仁慈的君主更好还是残暴的君主更好这一问题，我想每一位君主都希望被人认为是仁慈的而不是残酷的。

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一定不能滥用这种仁慈。

切萨雷·波尔吉亚是公认的残暴君主了，但他的残暴使原本不法之徒横行的罗马涅地区恢复了稳定和忠诚。

与之相反的是，佛罗伦萨人为了避免残暴的名声，一念之差采取的行动，酿成了破坏皮斯托亚街市的恶果。

因此可以说，与佛罗伦萨人相比，切萨雷·波尔吉亚要仁慈得多了。

所以说，作为君主，对残暴之类的恶评完全没有必要在意。在历史上，和那些得到圆满评价的人相比，往往是那些被称为残暴的人，更能使民众团结一致，在取得国民信赖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统治下的秩序。

——《君主论》

26

对君主来说，究竟是受到爱戴更好呢，还是被人畏惧更好？

自然，不会错的回答是最好两者都具备。可在现实当中，要想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并不是不可能，却需要君主具备无可比拟的能力。

那么，如果要从两者之中有所取舍的话，为了君主的安全考虑，与其受到爱戴，我宁愿为之选择被畏惧的局面。

毕竟，对君主来说，被畏惧要比受到爱戴安全得多，因为被畏惧的君主不大会由于自身的宽赦而受到伤害。

人这种东西，会受到恩义、爱情这样的东西的羁绊，在利害面前却会从容地把恩情一刀两断，却难以抗拒危难或仇恨带来的恐惧。

除此以外，君主如果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也一定要避免受到人民的嫉恨或憎恶，同时努力做到为人民所敬畏。

使人畏惧并不一定换来人民的憎恶，相反可以结合畏惧和爱戴。最重要的是不要对自己的臣民的财产和妻女有所染指。

这是因为，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自己的家产被人剥夺要快得多。

——《君主论》

27

对于君主来说，如果在严重事态面前不严加防范，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轻蔑对待。

——《君主论》

28

对一位君主来说，最大的恶德就是受到憎恨与轻蔑对待了。

倘若能避免这两种恶德，他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君主的本分，至于其他的负面评价，并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

如果霸占国民的财产或者妻女，就会为国民所憎恶，而避免这一点是不难的。

诚然，古今东西的人们无论谁的财产或名誉被人夺去，都会感到意外而心生不满的。

而当君主被认为变化无常、轻率浅薄、怯懦软弱而优柔寡断之时，国民自然会对其轻视了。

因此，君主应该像航行中的船只提防暗礁一般，注意不要给人民留下上述的印象。

他应该努力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出伟大、勇敢、严肃、庄重，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

——《君主论》

29

作为领导众人的人物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招致他人憎恨的并非只有恶行，善行也可能带来相同的后果。

出于心中善意而行的事，逐渐导致了恶果，因而使人心生憎恨。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这种情况下的善行，尽管是完全出自善意，却带来了恩将仇报的后果。

——《君主论》

30

君主，特别是新君主们，会发现在刚刚取得君位时，那些看上去敌对的人，往往比看上去友好的人更加有用。

因为那些看上去是敌人的人，出于消除君主坏印象的考虑，会为君主殚精竭虑。

相反，被认为友好的那些人，一般会觉得没必要那样做。

结果君主从那些看上去敌对的人那里得到的利益，要比从那些看上去友好的人那里要多得多。

——《君主论》

31

若考察使君主得到尊敬的作为，我认为首先是做出伟大的事业和具有其前任所不具备的品质。

因为当君主完成一件件大事业之时，他的臣民会感到心神不宁、惊叹不已，失去了反对他的决心和时机。

此外，他对敌友的态度迥然分明。这种明确的态度，也会使其得到人民的尊敬。

对敌友态度分明，不仅能使君主得到尊敬，也的确会导致对其自身有益的结果。

这是因为，无论最后的结局是自己的敌方战胜友方，还是自己的友方战胜敌方，采取始终优柔寡断的态度，终究会遭到敌友双方无情的对待。

领导者务必谨记在心的一点是，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要与比自己更强的一方结盟，攻击第三方。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即使最终取胜，我方就将受到比自己更强的那一方的支配。

君主应当尽力避免处于受到支配的状态，而是要尽可能地争取自由。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总是能够以一种万全之策

维持其统治。

与之相反的现实是，它应当常常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毕竟当一方面问题得以克服之时，难免不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

但是，深思熟虑的统治者可以明察各种困难的实质，从而通过这种思虑选择害处最少的方法，作为处理问题的良策。

一位君主必须积极录用具有才能之士，并充分地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奖励。

而对他的国民，君主要鼓励他们安居乐业，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害怕自己的财产被强征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不至于因为担心被课以重税而不愿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此，君主应该尽力褒奖那些致力于城市和国家发展壮大的人，并不要忘记在每年适当的时候使民众欢度他们喜爱的节日。

若实行了以上诸项，君主不仅将在精神方面得到尊敬，还可以在物质方面得到实际的好处。

——《君主论》

32

人心中深深存在的嫉妒心，使其相对于所受到的褒奖，更在意他人的批评。

因此，当提出新的方法，或引入新的制度时，对于力主革新的人来说，其“事业”的危险程度，无异于向未知的海洋或大陆发起的探险。

——《论李维》

33

对于共和国来说，当一位市民掌握大权，准备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时，他必须首先考虑压服人们的嫉妒心。

纵然是具备超群实力并为了国家的利益做了充分准备的人，倘若受到旁人嫉妒心的妨碍，本来能实现的事业也终将化为泡影。

成就大事业的条件是将权力集于一人之身，而人们的嫉妒心自然就成了妨碍这一事业的绊脚石。

压服这种嫉妒心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首先，要让众人理解成大事所不得不直面的困难事态。在他们认识到这种困难事态之后，也要意识到，若想从此之中脱困，必须依靠领导者的力量。

其次，无论是采取高压还是其他策略，必须尽量消灭那些拥护嫉妒者的人。

摩西当时就把反对他的人尽数杀死了。

与普遍的期待相反，人们的嫉妒心绝不会随着其行善而自然消失。因为内心的邪恶并不会因为任何的馈赠而改变。

人们能否从一开始就克服嫉妒心，是其能否成就大事业的决定因素。

——《论李维》

34

选择何人作为近臣，对一位君主来说，是绝对不可轻视的问题。

君主的英明与否，往往取决于自己是录用了优秀的人才，还是为无能者所包围。

事实上，选择何人作为近臣，是衡量一位君主能力的重要标志。

能称为贤明的君主，其所选择的大臣往往是诚实而有能力的。因为他熟悉这些大臣，就自然知道怎样运用这些大臣的贤能。

在相反的情况下，这位君主的能力就值得怀疑了。因为他在最初选择近臣时，就已经犯下了错误。

按照理解能力来区分，人的头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

第二种是在别人说明之后，就能够正确判断；

第三种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从他人的说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

第一种人的头脑是最优秀的，第二种也是不错的，而第三种人的头脑就是所谓无能者的代表了。

但是，由于第一种人在现实中非常少见，对近臣选择的把握，就是对为君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了。

——《君主论》

35

此外，我必须提及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君主对臣下的选择不够深思熟虑，就会最终无可避免地面临极严峻的困境。

这就是如何避免那些来自谄媚者的危险。

惯常谄媚的人总是充满宫廷。从他们所作所为的毒害中脱身，是为君者绝不应忽视的一点。

毕竟，人们出于自尊心，对自己的成就很容易滋生自满，以至于无法抵御谄媚者带来的灾祸。

为了免受谄媚者带来的灾祸，必须采取一种对策。这就是让人们知道，对君主讲真话并不会真的得罪君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可是如果谁都能对你直言相告的话，你所受到的尊敬自然会减少，这样也是危险的。

因此，深思熟虑的君主，还有另一种应对的方法。

这就是在其国内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这些人享有向他讲真话的自由。

即便如此也只是在君主询问时才要求他们讲真话，而对他们自发的发言，也要禁止。

相应地，君主应就一切事宜征询他们，并且要求他们自由而率直地发表意见。

在此之后，君主应按照自身的判断做出决定。

他也有必要让这整个的建言群体认识到，谁越能提供自由率直的见解，谁就越会受欢迎。

除了这些人之外，君主不应再寻求其他人的建言，而在汇总这些意见之后，他必须以自身的责任，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计划。

如果君主不如此行事的话，他不仅会受到谄媚者各个方面的侵害，还会因为摇摆于各种不同的意见之间而过多地改变自己的决定，其结果是使自己在人民中间的评价一落千丈。

这个问题的例子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这位皇帝非常喜欢保守秘密，他常常既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也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

但当他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时，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于是周围的人中自然会出现反对的意见。

结果这位容易动摇的皇帝就轻易改变自己的计划。他对昨天做出的决定，到今天就推翻了。于是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以及究竟想做什么。最后大家普遍认为，皇帝的决定是无法信赖的。

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常常听取别人的意见，但这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那些建言者愿意的时候。

而对于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的事项，他应该让所有人都闭嘴，不要提任何意见。

同时，君主对于别人的意见，要保持大度量，做一位耐心的聆听者。而如果建言者出于某种原因不率直地陈述看法，他应该赫然表示不快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那些被认为是英明的君主，与其说是自身的品质

所致，不如说是因为其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

这一点显然是一种误解。

因为正是君主本人的英明，才使他能够善用建言者。

如果君主缺乏这种英明，在建言者很多的情况下，就无法选出有益的意见，也就不可能整合这些意见，做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了。

由于在人民之间私欲横流的现实情况，在听取意见的同时，君主必须考虑到建言者自己的立场。

我们不能认为君主所选的贤能近臣没有受到私利私欲的支配。毕竟即使是善良的人，在情势所迫之下，也可能做出邪恶的事情来。

因此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对正确的意见做深入考虑的君主，比因为君主的深思熟虑而产生的正确的意见，对社会更为有益。

——《君主论》

36

如果君主不得不直接求助于掌握行政权力的贵族，在应对他们之时，需要将这些贵族分两类来考虑。

这两类就是，与我方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贵族，以及与我方之间并无这种关系的贵族。

贤明的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臣属切身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做到这一点，臣属们就会保证在任何时候对君主都是忠诚的。

——《君主论》

37

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一位软弱的领导者继承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之后，很难维持以前的局面。

即便是法国那样自古以来已经建立了很牢固政体的国家，连续经历两代软弱的领导者之后，也不可能维持其强大的局面。

——《论李维》

38

关于做人这一点，从来就没有谁是完美无瑕的。

就算一开始能做到慎思明辨，不犯错误，经过一段时间，困难仍会自然渐渐发生。

因此，领导者有必要时常对法律、制度等方面做出合乎现状的改变。

——《论李维》

39

无论是拥有何种政体的国家，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具备完整的组织形式。

故而一次次的改变是非常必要的。大量的事实证明，越想把这种改革进行得彻底，就越需要有一位具有能左右改革成功的意志和能力的人。

但是这位负大任于一身的人，在做到把公共利益放在自己私欲和子孙后代利益之先的同时，要想取得根本性的改革成果，必须要努力获得国家的全部权力。

因此，绝对不应非难领导者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所使用的任何一种非常手段。

只要结果是好的，手段总能够被作为正当的来对待。

善于发挥自己思考力的优秀人物，也能够灵活运用手中的权力，而绝不会将其让渡于任何人。

因为人相比于行善，更容易染上恶习。前任出于高尚目的而运用的权力在后任那里却成了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任何一位强有力人物全力投入自己的精力所建立的事业，若要在建立之后维持其效果，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能实现。

因此这最后的一点是国家存续的保证。

——《论李维》

40

我想明确以下的论点：

想在危险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就正确把握其实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

因此在一开始，与踏踏实实地花时间做事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慌慌张张地寻求对策。

毕竟，在踏踏实实花时间做事之前，危险自然就消失了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而危险不断增大，却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无论何种情况，君主都有必要全神贯注地防备。

在分析局势的时候不要犯错误，选择对策时也不允许犯错误，最后在实施对策的时候，也不应当犯错误。

拿植物过度浇水也会枯萎来做譬喻，君主一定要避免行事过度的情况。

但是，一旦各个方面都准备妥当，就一定要毫无怀疑，当机立断做出回击。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自信，把事情暂且放一放，就是比较好的策略。

——《论李维》

41

我可以断言，保持中立的做法，绝不是好的选择。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当存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或假想敌的情况时，保持中立是非常有害的。

中立的一方，在战争结束后不仅会被胜者当作敌人来看待；在败者看来，由于没有得到帮助，也会对其抱有敌视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书信》

42

一位君主如果想成就伟大的事业，一定要学会欺骗他人的伎俩，也就是权谋之术。

不仅对君主来说这是必要的谋略，对共和国的领导者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至少，在国力鼎盛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使用各种权谋，是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

罗马所具有的其他对手没有的强大之处，在于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以及对各种权谋的灵活使用。

——《论李维》

43

当罗马初建还是弱小国家之时，该国就已经认识到权谋之术的必要性。

况且，对处在上升期的弱小国家来说，对权术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在灵活采用权术的同时，罗马人会尽量做到秘密地行动。如此一来，在他们成功之时，常能避免那些因从事这些不正当的行为所受到的谴责。

——《论李维》

44

采取某一种政体，对于国家的领导者来说，无论多么迫于形势，是应得到优先考虑的自主选择后的结果。

富于谋略者，在现实中不得不采取措施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将自由意志有效地加于周围的人和环境。

——《论李维》

45

为形势所迫时大胆果敢的行为，可与缜密思考后的行动等量齐观。

——《佛罗伦萨史》

46

君主绝对不可以在损害自己权威的风险面前妥协。即使具有忍受这种风险的自信，妥协的立场也是不可取的。

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敢于直面对方，即使以失败告终，也是好于一再地让步的。

倘若出于回避正面冲突而一心采取让步的策略，最终仍会出现无法回避的情况。

无论如何，一再地让步会使对手不再满足，相反，对方的敌意会在其对我方敬意尽失的同时露骨地表现出来，相形之下，我方的士气已大为低落。

此外，由不假思索的让步而表现出的我方弱点，最终会使可能成为友方的人们失望或认为受到我方冷淡的待遇。

与之相反，倘若我方明确知晓对手的真实意图，并充分加以应对，针对其劣势做出反击，虽然是敌对状态，对方也不得不对我方刮目相看。

总之，若能取得敌国的敬意，则自然会得到友方的支持。

但上述策略仅限于单一敌手的情况。在有多个敌手的情况下，当正面冲突开始后，我方必须采取策略，决定对哪一方让步，以使其脱离战线。

——《论李维》

47

无论领导者是谁，以下的话须牢记于心：

无论是对个人或国家来说，都不要将对手逼入绝望、愤怒之下的痛苦境地。

毕竟，经受极度痛苦的人，除了反击和复仇之外，不会考虑其他的策略。

——《论李维》

48

我们的宗教（基督教）虽宣传真理和正直的生活方式，却不宣传对世俗名誉的尊重。

然而古代人对人类行为中的名誉最为重视，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里充满了勇敢与力量。

古代宗教还有一种特质，即无论对军事指挥官还是国家领导者，受到祝圣的都拥有耀眼的世俗名誉。

我们的宗教倾向于认为：和善于行动者相比，善于冥想的人更受到青睐。

此外，我们以谦逊和服从为至上美德，却轻视人真实的形象。

反之，古代的宗教强调精神之伟大和肉体之强健，强者总是被视为具备了一切善行的人。

相形之下，现代的宗教要求我们表现出坚强的时候，并非以追求伟大的行为为目的，而是要求我们具备坚忍的品格。

——《论李维》

49

古罗马共和政体与其他共和国相比，更加强调对本国有功者的奖赏，特别是在军事指挥官犯策略性错误时，会给予充满宽赦的待遇。

如果指挥官的罪过是故意为之，将会受到影响其个人名誉的处理；而如果是无意犯错，非但不会受到处罚，还会得到奖赏。

在罗马人之中，这种处理方法是最普通寻常的。

以上的考虑是基于对军队的指挥官来说，专注于军事任务的精神状态总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本来就被委以困难无比的军事指挥职务的领袖，如果由于各种外部的担忧而乱了军心，那么就算是指挥官再有能力，也无法取得光辉的战果。

——《论李维》

50

读李维的《罗马史》，若要思考从中得到的教训，则有必要认真检视罗马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互动。

值得检视的事件固然有很多，而我认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以下的问题。

我关注的是，执政官、临时独裁官、军团司令官等军事领袖，会获得元老院和平民赋予的多大程度的权限。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古罗马人会赋予他们非常大的权限。

当新的战争打响时，元老院将不再具有讲和条件的决定权。关于战争或讲和的一切条件都将以现场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为决断。

这一点恰恰可以说是元老院成员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是由于如果元老院将其决议强加给指挥官，后者就无法在战场上全力以赴。毕竟，无论最终取得多么辉煌的战果，只要是元老院下达的作战指示，都不能算作指挥官个人的荣誉。

此外，如果元老院对自身并不熟知的事态下达指示，将不可避免地使军队陷入险境。

元老院的成员中自然多有战争经验丰富者。然而，由于其并未亲临现场，无法对作战时各种有必要实施的细节和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做出判断，因此不能避免处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古罗马军事指挥官出于自身判断而行动，而胜利的荣誉

也仿佛是其个人所有物一般。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情况则与上述相反。

此两国的指挥官就连火炮位置的选取都要视本国政府的命令而定。其现状是战争开始后的一切行动都体现了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

换句话说，实际当中普遍缺乏个人荣誉、荣誉由集体所有的堂而皇之的局面，成为现在两国惨淡经营的原因。

——《论李维》

51

军队指挥官中语言能力较强者，往往会成为优秀的指挥官。

单方面从让部下遵守军规的角度看，以超强的才能来管理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指挥官没有将作为多数人集合体的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这时，与诉诸过度的严厉惩罚相比，采用激励与鼓舞的手段，反而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相应地，为了能够充分传达自己的想法，掌握言辞的技巧是十分必要的。

但我本人是不会将作战的事务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的。

不让兵士了解作战细节，是战时有效的指挥策略。

——《论李维》

52

没有领导者的民众，是毫无价值的存在。

——《论李维》

53

如果指挥官对自身和对手的力量对比都有冷静的把控，就会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对属下的官兵来说，其士气比人数更有价值。因而常有的情况是，具备地形优势和更强士气的一方，容易取得胜利。

面临新的战况之时，官兵会表现出慌张。相反，按照熟悉的经验用兵，官兵会较少受到心理刺激。

因此，对于使官兵领会新战略的问题，要从小处着手，俟机而动，逐渐地使其适应。之后才可以进行决战。

由于敌方的过度失误而侥幸取胜的部队，会因为胜利而骄横起来，在接下来的交锋中会尝到失败的滋味。

军粮储备不充分的部队，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就已陷入失败之中。

到底是以骑兵为重点还是以步兵为中心来配置，必须要依照作战现场的地势而定。

当敌方揣摩我方作战意图之时，我方应及时应变自己的策略。

指挥官往往不得不倾听将领的建言。然而，指挥官自己的决定有必要仅仅对少数将领明确展露。

官兵在阵地时应当谨守军规，对不遵守军规者必须严厉处罚。一旦进入战场，培养取胜的愿望和进行奖励就是对官兵最充分的鼓舞。

优秀指挥官在形势所迫时可以利用战机，但绝不能急于求胜。

作战开始时，攻击的重点自然应当首选敌军最薄弱的部位。以我方精锐部队对抗敌军最强部队的愚蠢做法，是绝对不能采取的。若见到我方某一部队溃败，最强的部队应相应撤退。

战役开始以后，应以坚定的作战运筹方略确保部队的安全。如果在战役中常常变更命令，只会导致属下官兵的混乱。

难以预测的事故往往导致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然而，如果加以提前预判，即使受到意外袭击，也可能较容易地挽回所受的损失。

人、武器、金钱和面包，是战争的“神经”。

然而，以上四种中尤为重要的是前两者。这是因为，如果拥有人和武器，就能够得到金钱和面包，而只拥有金钱和面包，是无法得到人和武器的。

那些没有武装起来的富人，是给贫穷士兵的奖赏。

因为属下的官兵对享受高雅的生活和拥有奢侈财富的富人抱着轻蔑的态度，他们肯定会将富人的财物洗劫一空。

——《战争的艺术》

54

战役中欺骗敌人的行为不应受到轻蔑，而是值得赞赏的。

日常生活中欺骗他人的行为，会导致对方极度的憎恶，但战时与此不同。我认为，在战时状态，以策略误导敌人，以取得胜利，是与正面交锋的胜利一样值得夸奖的。

关于这一点，书写历史上伟人传记的作家们持有相同的看法。

在他们对善用策略取胜的汉尼拔等伟人的评论中，洋溢着赞美而不是非难之辞。

但是我必须做如下的评论：

尽管我认为欺骗行为是正确的策略，但它毕竟是背叛信任和破坏现有条约的事件。

因此，纵然此种关乎廉耻的行为导致某国的国土被征服，其名誉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处理与我方从一开始就不能相互信任的对手时，可以采取欺骗的方法。当然这指的是战时的情况。

一个例子是陷入罗马军队包围的汉尼拔从佩鲁贾湖畔成功逃脱的战术。他在从费边的包围圈中逃脱时，利用在牛角上捆绑点燃的柴火的计谋，欺骗了罗马军队。

——《论李维》

55

富于谋略的军事将领会将属下官兵引入无路可退的战斗中。

一俟面对敌人，进入这种战斗状态的官兵会迸发出强大的执行战略战术的能力。

古代的将领知道如何充分利用在各种战争形势下官兵的求胜欲望。为了尽可能提高战斗力，官兵们进入无路可退的缠斗中，就会充分贯彻执行战略战术。

同时对敌军来说，他们并没有立于悬崖绝壁之上的感觉，因此会难以执行己方的策略。

因此，他们会故意将能够封锁的道路向敌军敞开，却将我方士兵的退路封锁起来。

——《论李维》

56

优秀指挥官一定会践行下面两点：

第一是想出敌方想象不到的新型策略。

第二是对敌将所出的策略，不仅能尽数看破，还能着手最终将其一一击破。

——《论李维》

57

看透敌方的计谋，对于指挥官来说并非是最重要的事情。

固然，这一点并非是对优秀将领资质的能力要求，但对具备此能力的指挥官进行赞赏，无论如何也是不过分的。

相较于预知敌军行动，预判敌方计谋要容易得多。

而当由于相距较远而无法知道对方行动的情况时，预先了解对方的计谋，总是对我方有利的。

——《论李维》

58

建立在金钱雇用基础上的雇佣兵制度之所以无用，是因为掌控这些16世纪兵士的基础，除了支出的薪金以外别无他物。

这样，自然无法期待他们对雇主的忠诚了。以此衡量，很容易知道他们不会有为雇主而牺牲的服务精神。

因此，崇拜指挥官，并因此勇敢对敌的战斗精神，在现在的士兵群体里是无法看到的。

无论是采取何种政体的国家，若期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必须将本国国民武装起来，建立本国国民的军队。

这是历史上所有发挥其国力而奏效的国民共有的特点。

——《论李维》

59

是勇将领导疲弱之兵，还是弱将领导精锐之兵更值得信赖呢？

按照提图斯·李维的说法，相比之下还是前者更为强大。罗马国力之所以增强，正是勇将辈出的缘故。

然而历史上后者的例子也有很多。

以前一种军队和后一种军队相互依存，以期完全达到目的，看上去是不错的情况。

因此，仅仅采用其中一种军队是不可行的。恺撒对此也有提及。

在西班牙，恺撒征讨庞培副官率领的军队时，论述说："此战应当会取胜的，因为征伐的对象是没有主将的军队。"

而当他在希腊的色萨利地区与庞培对决之时，也对自己具有相同的胜算确信无疑，写道："我将征服无法控制军队的主将。"

——《论李维》

60

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必须是一个人。

指挥权分散给多人则是有害的。

尽管如此，现代（16世纪）的国家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从行政方面看，委任多人的情况很常见。

结果对国家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并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混乱。

因此，我断言：

实施任命时若给予每人相同的权限，与其任命两位职权相等的优秀人才，不如任命一位才智普通的人更有益。

——《论李维》

61

曾被彻底侮辱或严厉惩处的人，不能被委以重任。

因为这些人为了抓住机会一举挽回曾经得到的恶评，或由于其认为恶行已成事实，对其自身的评价不能再坏，很容易铤而走险。

若将任务交付给他们，很可能带来糟糕的结局。

——《论李维》

62

冀望在任何事上都取得成功的人，拥有的事业越大，便越深知自己在所生活的时代中必须付出更多的劳作，以配合事业的发展。

疏于照管与时代和情势相符合的事务，或者由于与生俱来的性格无论如何也不能胜任这些事务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生不幸的打击。他们希望做的事情最终往往不能达成。

与之相反，对情势深入了解、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人，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目的。

——《论李维》

63

此前多次述及的是，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在于能否采取与时代相适应的行动。

众所周知，有的人总是带着迸发的激情行动，其他人则慎之又慎、步步为营地行动。无论是何种情况，若两者中不管谁越过了自己的界限，最终都会导致失败。

相反，少犯错误、受幸运眷顾的人，能把握时代的脉搏，采取符合时代要求的行动而成功。这与其采取激情主义或是慎重主义的态度无关。

费边·马克西姆斯虽然是罗马人，却少有罗马人特有的激情与大胆，而是一位以谨慎作战闻名的武将。

他取得成功的方法就是与当时的时代节奏合拍。

在当时进攻意大利的汉尼拔依然年轻而幸运。他两次击破罗马军队，使当时的罗马共和国精锐军团全部丧失，在常胜的汉尼拔面前茫然而失态。

正当此时，费边这种极为慎重于军事行动的迁延型指挥官，是罗马人不错的选择。因为虽然他不能击败敌军，却能够牵制住汉尼拔的军队。

可以说，费边得到的荣誉和幸运是产生于与他性格相适应的时代基础上的。

事实上，当情况变化时，在为终结战事而组织前往非洲敌营的

远征军时，西庇阿主张派遣费边，此时没有任何人反对。

这是对自己熟悉的做法习以为常且不善于转变的人常常出现的情况。

如果费边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决了，汉尼拔还能在意大利站稳脚跟吗？

在战争中，应随着时代和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

假如费边是一位专制君主，罗马一定会败给迦太基的。

但费边毕竟是共和国的一员。共和国是能够使各种不同性格的人自由生活于其中的。

在罗马共和国里，既有适合在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军队的费边，也有在胜负的天平已经倒向罗马一方时，能够保持十二分的精力灵活使用策略的西庇阿式的人物。

而倘若做长时段的考察，具有摆脱各种困境的能力的人是非常少的。

我以为，这种稀少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人是很难违背自己天生的性格的；

第二，对于天生就善于解决各种问题的人来说，从困境中脱身也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找到能够接受的策略，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此，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人们的做法同以前相比还是一样的。

——《论李维》

64

撕毁被迫签订的协议，绝不是可耻的行为。

如果对方的国力比我方弱时，在公开场合撕毁协议是自然的事。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君主之间所缔结的协议，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此外，如果缔结协议的条件不存在了，将它撕毁也是自然的事情。

——《论李维》

65

关于统治民众的方法，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手段还是比较严厉的态度更为有效，是需要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来回答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等级差不多；而第二种情况自然是统治者比被统治者高一等级。

在第一种情况下，高压统治是要不得的。相反，如果采取宽容的手段，会有效得多。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不受被统治者的欺骗，秉持严厉的态度才是有效的做法。

在贯彻上述严厉态度的同时，统治者也一定要防止受到被统治者的憎恶。毕竟受到憎恶对任何领导者都有害无益。

——《论李维》

66

若论及使对方屈服的情况，比起无情的暴力行为来，使用充满温情的人道的手段，要有效得多。

历史上有很多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无法攻陷的城市、在人道的宽大对待后开城投降的例子。

——《论李维》

67

汉尼拔和西庇阿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笼络下属，但两人的做法收到了相同的效果。

对于喜欢阅读历史的人，不必就此进行说明。当西庇阿到西班牙赴任时，他做了充满人情味的演讲动员，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当地的人心。

再看汉尼拔，他在意大利始终采取高压政策和无情的态度。这一做法与西庇阿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取得的是相同的效果。由于汉尼拔的挑动，在除罗马以外的意大利城市中，民众发起了针对罗马的叛乱。

若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人总是容易受到新的人和事物的魅惑。这对不满意当时现状的人来说是自然的，而对一部分满意现状的人来说，他们也有在新情况中寻求变化的心理。

如果具有这种喜欢变化的心理的人是外部的人，人们会打开城门迎接他；而如果是我方内部的人，周围的人就会声援他，而且拥护他。

不管这种人做什么，做好事也罢，做坏事也罢，都会大有进展。

第二，人会受到爱戴或恐惧等突如其来的情感变化的很大影

响。

因此，一旦人的心中油然而生爱戴的念头，或者恐惧的感觉，就会给人带来同样大的改变。

然而相比于爱戴的对象，人们更容易渐渐屈服于惧怕的对象。

因此，对于那些具有强大个人魅力并为众人所佩服的人，是选择被爱戴还是被惧怕的做法，是很关键的问题。

像汉尼拔和西庇阿这样能力超群的人物，无论怎样选择，都很容易消除由此导致的过错。

但即便是有这样能力的人，也应该有如下的考虑：

选择被爱戴的做法会导致下属的轻视，而选择被惧怕的做法会招致下属的怨恨。

然而如果选择一种中间的道路，就违背了人的本性，最终会让情况很棘手。

总之，既然完全把握人心是最困难的事，汉尼拔也好，西庇阿也好，他们都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能力。

——《论李维》

68

为了笼络人心，采用严厉还是温柔的态度更为有效，这个问题就算是对具有相同程度的能力的领导者来说，也不是能一言以蔽之的。

这是因为严厉和温柔这两种态度，都是能反映领导者态度的做法，所起到的效果是相同的。

至于所起到的效果的大小，则与被笼络者的情况有关。

在有必要对对方采取强制手段的情况下，采取严厉的态度自然能起到作用。

与此相反，如果沿袭之前统治者的做法更好的话，就应该尽量以温情笼络人心。

因为人人都对变化感兴趣，而臣民又不完全清楚统治者的态度，故以温情笼络人心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就应该坚决以温情对待民众。

而在另一些时候，当臣民们看到君主严厉的态度，就会认为有自身难保之虞，这时在贯彻严厉态度之后，表现出温情来，可以大大软化他们的抵触情绪。

——《论李维》

69

下面我来分析君主受到臣民憎恶的几个可能原因。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君主夺去了民众最重要的东西。

绝对没有人不在乎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被人夺去。相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对每个人的影响与日俱增。每过一天，人们就会感觉到所失去的事物的价值，对剥夺者的憎恨也因而不断增长。

第二个原因则是君主傲慢尊大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会使得受到压迫的臣民反感，而对自由市民持这样的态度，则是更为有害的。

这不仅指精神上的压迫而带来的民众的憎恶，横暴的态度所引发的对民众物质利益的实际损害，会让其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对君主有所憎恶。

在民众的憎恶中生活的君主，就像航行中的船只要时刻提防暗礁一样，不得不毫无懈怠地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保持警戒。

诚然，对自己所引起的憎恶持袖手旁观的态度，是缺乏谋略、思考不周的君主的作为。

——《论李维》

70

我可以举出不少因为女人而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当亚里士多德谈到专制君主失败的原因时，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原因。

这包括因为受到女人的诱惑而出丑的情况，也包括因为夺人妻子而侮辱他人的情况。

女人自身的存在绝不是邪恶的。

但是因为想染指女人而产生的恶行，则是每位君主都应该尽力避免的危险事态。

也就是说，君主必须注意自身在染指女人时所产生的那些考虑不周的事件，以及其所引起的秩序混乱的情况。

——《论李维》

71

一位君主不要因为民众犯下某种错误而抱怨他们。

因为如果统治者不对民众犯下的错误斤斤计较，当统治者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过度地抱怨了。

李维曾经这样说：

“大众经常模仿政治人物。”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对此持相同的意见，他还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君主所做的事，大众也照着做。因为他们的视线往往不离开统治者的身上。”

——《论李维》

72

由于我相信，在共和国里不可能出现具有伟大君主的贤能的人或者有能力的组织者，我的共和主义理想，最初可能是有着很大的君主制倾向。

——《马基雅维利书信》

73

难道领导者的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吗？

即使再多的说教，领导能力也是学不来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书信》

74

武装起来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军事力量的先知都失败了。

这是因为民众的心理太容易变化，很难通过说服的方法使其顺从，必须以强力的手段让他们信服。

——《君主论》

75

历史上的教训对谁来说都是有益的，而特别对肩负治国重任的人尤为有益。

——《佛罗伦萨史》

76

历史是我们行事的指导。

特别对领导者来说，应以历史为导师。

人类社会中总会有思考着相同的事件、怀着相同愿望的人。

即使社会结构变化了，有的人统治别人，有的人被人统治，有的人愿意被统治，还有的人不满受到统治的命运，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不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的结局，终究都是一样的。

——《关于基亚纳谷地叛民的处理方式》

马基雅维利

·语录·

第二部
国家篇

01

在事关祖国存亡的情况下，为了国家采取任何手段，只要最后有效果，都应该被认为是正当的。

这一点，绝不限于执政者，就算是一名普通的国民，也要有这样的认识。

当为了祖国的存亡而孤注一掷时，不管手段是否正当，不管是宽仁的还是残忍的，也不管会受到赞赏还是会受到耻笑，都没有必要太顾虑。

比任何其他问题都需要优先考虑的，是祖国的安全与自由。

——《论李维》

02

倘若我们仔细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出，建立共和体制的人，在需要改革的制度中，为了确保公民自由而建立的制度，应当放到第一点来考虑。

这是因为，如何建立一个能确保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在这个国家存在的任何时期，维护公民自由的决定性因素。

选择了共和制的国家，固然是由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组成的，但确保公民自由的职责，由二者中哪一方来担当，是分不同的情况的。

在古代的斯巴达和现代的威尼斯，是统治阶级负责确保公民自由；而在古罗马，则是平民阶级负责这一点。

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究竟哪一种共和制是更加正确的选择。

虽然选择两者之中任何一种都有其相应的理由，仅仅从结果这一点来判断，由统治阶级来负责确保公民自由，是更好的选择。毕竟在斯巴达和威尼斯，公民自由都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保障。

究其原因，作为保障公民自由的角色，与其交给没有自由、还在争取自由的民众，不如交给那些已经拥有了自由、为了保障其自身自由而努力的统治者。

但是对已经拥有自由的人，以下的两点尚需注意：

第一，必须设立一个限制统治阶级权力的机构；

第二，不能让统治者有一种随时会失去权力的不安和恐惧感。

对于一个人来说，对可能失去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不安和恐惧，以及获得新事物的强烈欲望，往往会导致相同的后果。

——《论李维》

03

对于人们为什么强烈地向往自由这一点，答案是简单直白的。

在历史上，只有自由的国家，才能扩张其领土，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在庇西特拉图僭主制统治下拥有公民自由的雅典，仅仅百年间取得的成果值得赞叹。以此与废除王制之后罗马共和国的兴盛繁荣相比，其令人惊叹之处还要多一些。

其原因是很简单的。

这是因为，在雅典，相对于个人的利益，城邦共同体的利益被摆在优先的位置。

如果有待实施的政策损害了个别人的利益，而因此政策受益的人为多数时，最终这项政策还是会得到实施。

因此，尽管利益受损的少数派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在国家整体的利益面前，这些人最终还是会沉默下去的。

——《论李维》

04

宗教也好，国家也好，如果想长期保持其兴盛，有必要时常使其回复到初始的样子。

这是在谋求各种改革的时候，根据自然情况所能做出的最理想的改革了。如果一旦有契机使改革者认识到其必要性，而以此方法着手改革，也是能收到长期效果的。

也就是说，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对国家放任不管的态度，只能导致该国短命而终。

因此，改革的必要性是要恢复国家初创时的那种热情，因为这是对任何形态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益的状态。因此，在国家初创时期，总是有后来所没有的一些优势的。而正是由于这些优势，才实现了日后国家兴盛的局面。

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曾经的优势就逐渐磨灭而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随着放任国家这样下去，最终就走向了灭国的命运。

让国家恢复到本来的样子，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是自发判断的结果，同时也是部分来自外部的压力所导致的结果。

而论及使社会共同体恢复元气的问题，我相信与其出于外部压力而迫不得已改革，不如为了使觉醒的民众放心而积极做出改革。

——《论李维》

05

如果想治理好一个长期发展的共和国，就一定要向斯巴达和威尼斯学习。

也就是说，在保证国内秩序井然的同时，对国外方面，虽有天然的要害可守，但也决不懈怠国土防御，相信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敌人的侵略了。在这些方面，上述两国都是很成功的例子。

在感受到邻近国家威胁的同时，此两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强大自己的国力。

如果能坚持上述介绍的这几点，经过比较长的时期，国家就一定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公民的自由。

因为对共和国来说，其他国家来侵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侵略者的领导者有征服共和国的欲望，另一点则是会有对于可能反而被该共和国征服的担忧。

因此，消除这两点原因，并对国家的建设做好准备，该国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就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来了。

——《论李维》

06

如果要在不正义但拥有秩序的国家和正义却没有秩序的国家中选一个的话，我会选择前者的。

——《马基雅维利书信》

07

如何解释为什么古代社会秩序井然，而现代（16世纪）的统治是没有秩序的，其原因非常简单。

其全部的缘由是，过去是自由的人，到今天却过着奴隶一般的日子。

可以这样解释这一现象，在人们能够自由生活的国家，社会整体上能享受到繁荣带来的好处，也能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

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没有逃避结婚的倾向，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能保持子孙繁衍，因而人口得以健全增长。

双亲将自己的儿子生在自由的社会中，就有理由相信其能够通过自己的才能而成长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因而他们也会乐于生育，并花费精力养育孩子。

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个行业的财富都会不断增加。可想而知，人民也会因财富的增加而享受到与日俱增的快乐。

支配这样的社会运转的原理就是自由竞争。公私两个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因此自然得以保障，共同实现繁荣。

——《论李维》

08

所谓变革，就是指一旦开始，必然要求进一步变革下去。

——《君主论》

09

仅仅依赖一个人力量的国家是短命的。

因为无论这个人的才华有多么出众，当他去世之后，一切才华就都不复存在了。然而，将前任领导者的才能传授给后继者的例子则是事实存在的。

所以我相信一个制度健全的国家应该有这样的机制，即当出色的领导者死后，无论谁继承其位置，都应该将其所实行的路线完整地继承下来。

——《论李维》

10

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预先制定的法律得不到遵守，是非常有害的。

特别是，倘若制定法律的人自己却不能遵守的话，无疑是最糟糕的。

对国家来说还有一点特别有害，就是在遭到形形色色人物一次次的纠缠和责难之后，国民之间就会弥漫着互相充满敌意的氛围。

对国家和领导者个人都非常有害的一点是，不断地镇压会使人们的心中充满恐惧和疑惑。

这就不只是有害，而是危险了。

因为当人们感受到令人绝望的恐惧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就不只是保护自己，还会毫无顾虑地干出狂暴的袭击事件。

因此，领导者绝对不要犯下以刑罚镇压的方法来压迫市民阶级的愚蠢错误。

相反，若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让人人安心生活的环境，市民们就自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了。

——《论李维》

11

历史的教训是，对国家来说，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其他的任何政体，绝不能受到因嫉妒而散播的谣言中伤之类的损害。另一个教训是，如果对这些损害置之不理，导致的危险很可能出乎想象。

为了消除这类造谣中伤的损害，国家必须确立公民能从法律上将其告发的权利。

其原因在于，造谣中伤会使公众意见陷入分裂的风险中，而主动告发则会消除这一风险。

因此，要想使造谣中伤无法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告发是有益无害的。

当然，在告发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来证明造谣中伤的确存在。此外，为了防止造谣中伤发挥作用，必须防止其在人群中扩散，否则告发者会感到恐惧。

毕竟主动告发只能在法庭这样的场所进行，而造谣中伤却是在广场、街道、舞台那样的地方展开的。

当谣言广为散播时，就不能采用一般的告发形式了，而是应特别设立机制，受理对谣言的告发。

与此同时，必须对造谣者加以严厉的惩罚。

——《论李维》

12

统治者对民众，不仅要以善政待之，更要以其对自由的冀望为追求。

——《论李维》

13

从自由社会到奴隶社会，或从奴役状态向自由政体变革的时候，有的国家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完成，而另一些国家则最终爆发流血事件，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这与该国家建立之初的情况有关。

如果该国本身就诞生于暴力之中，政体变革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很多流血牺牲。因此，当该国陷入危机当中之时，过去的牺牲者和现在的牺牲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报复的关系。这种积怨就导致了一再的流血冲突和死难的结局。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是在本国多数国民的赞成中得以成立的，即使出现对变革的要求，只要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就可以了。虽然也有积怨和报复之类，却不至于使无辜的人流血牺牲。

——《论李维》

14

在有秩序而尊重法律的国家，区别公民行为的善恶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对行善者给予奖赏，而对作恶者做出惩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有一点，若行善者后来作恶，则不能考虑其过去的善举，而应该严惩其恶行。

若充分保证这一制度，国家就能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能获得长期的稳定。否则的话，该国就无法避免衰退的命运。

毕竟有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会醉心于通过其行善而获得名声，于是有了做任何事都不会受罚的想法，继而鲁莽行事，最终突然破坏社会秩序。

应该像古罗马人那样，让公民普遍觉悟到对作恶者必须惩罚，同时对善行必须加以奖励。这是十分重要的。

但当国家贫弱，只能对行善者加以些微回报的时候，也不要怠慢行事。

无论回报的性质如何，对于得到国家回报的一方来说，是能感受到极大的褒奖与声誉的。

——《论李维》

15

古罗马人是非常重视名誉的民族，受到过去下属的命令，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

居于高位者以接受部下交与的任务为耻，这是现代（16世纪）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然而，这样似乎对个人的名誉影响不大，却无疑对整个社会共同体有不利的影响。

在信赖共和国的市民中，与从较低地位升迁者相比，从较高地位降职者一般能够更为满意地完成任务。

由于前者经验不足，需要得到周围的人的帮助来做事，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可以得到信赖。相反，后者并不需要这个过程，因此他的部队直接就拥有了战斗力。

——《论李维》

16

古代的历史学家曾说过如下的话：

“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就会烦恼，而在开心的时候又会容易厌倦。这两种倾向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一样的。”

其实，在没有为存亡做斗争之必要的时候，人们是为野心而斗争的。

更不用说在人获得极大的成就时，其膨胀的野心是根本无法消除的。

究其原因，自然是人对于自己期望的事，就算是再难以实现，也会努力去创造条件的。

因为人在对自身能力之外的事物有所期望却不能实现的时候，常常不断地抱怨。结果，有的人希望多得到一些东西，另一些人却不愿放弃手中的东西，于是就起了纷争。

然而对国家来说，从此就划出了一条两边截然不同的命运分界线。

在有些场合，这样的纷争就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在另一些场合，斗争却使国运蒸蒸日上。

——《论李维》

17

为了保持国家的秩序以及保障每一位国民的自由，领导者的清贫是最为有效的。

例如在罗马建国不到四百年的历史当中，就充满了崇尚清贫的风气。

因为对于罗马市民来说，贫穷不是阻止其得到任何公职地位或荣誉的障碍。

如果清贫者具有真正的能力，就算是居住于再简陋的小屋中，他也拥有信心，相信自己有机会得到录用。

因此，在没有追求财富压力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不会有贪欲之心了。

这样一来，罗马的制度就使罗马人自身没有狂热追求财富的愿望了。

事实上，像从退隐务农中临危受命担任罗马临时独裁官的辛辛纳图斯那样才能出众的人物，就是因为以清贫著称而受到民众青睐的。

罗马的例子表明，与富裕相比，清贫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好处，是举不胜举的。

崇尚清贫的风气会给国家、城市的社会共同体都带来荣誉；相反，盲目追求财富的行为，只会导致国家的衰退。

——《论李维》

18

虽然古罗马的共和制度一直没有变化，但当市民之间逐渐从平等变为不平等之后，共和制就瓦解了。相反，当佛罗伦萨共和国从不平等向平等发展之后，共和制就趋于瓦解了。

——《佛罗伦萨史》

19

在公民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国家中，无法建立共和制度；而在公民之间彼此平等的国家中，也没有君主制建立的土壤。

——《就佛罗伦萨共和国之未来答美第奇家族所问》

20

古代共和制下的罗马人关于危机管理的对策，是确立如下的制度：

临时独裁官制度。

这一制度是，给予一个人在一定期限内特大的权力，允许此人以独断的方式做决定，而不允许任何人在其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发表异议。

这一制度在当时颇为有效。罗马所面临的许多无法预知的事态，在这一制度下悉数得到了克服。

——《论李维》

21

历史学家中，不少人认为罗马人的临时独裁官制度导致了后来僭主的出现。

对他们的论点，我只能说，如果不存在这一制度，尤里乌斯·恺撒就会采用其他称号，依然手握大权。

因此，那样认为的学者，是在并未充分检视事实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临时独裁官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是后来罗马走向奴隶制度的原因。这一官职任期的延长，才是普遍奴隶制化的真正原因。

此外，在罗马，如果不采用临时独裁官这一名称，也会有别的职务名称代表相同的职位。毕竟，欲望是创造名称的原因，而官名不是欲望产生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的临时独裁官并非终身制，而仅仅有六个月的任期。

而选举这一职务的目的，仅仅在于应对非常事态，赋予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们的权力仅限于决定针对非常事态的决策。

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临时独裁官可以对任何相关事件做出独断的决定，可以无视他人的控诉，也可以惩罚他人。

但绝不允许他削弱国家的力量，或夺取元老院和国民大会的权力。因为这一职务是不能破坏现行统治形态的。

总之，赋予临时独裁官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另外，其任期是短暂的。罗马人民也不能向其行贿。

这样一来，临时独裁官就完全无法逾越自己的权限了。

因此可以说，满足以上诸条件的独裁制度，对国家并非有害而是有益的制度。

共和国内实行的政治程序，实际上一般是缓慢推进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都不是一人决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他人组成机构共同决定的。要统一各个方面的意见，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了。

这种缓慢的程序，在紧急事态的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就极为危险了。

因此，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采取古罗马临时独裁官那样的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强大的国家之一。在该国内，为了应对非常事态，在共和国议会和元老院讨论之外，还会将大权委托给少数委员进行讨论，以决定最后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十人委员会”（Consiglio dei Dieci）。

没有认识到这一制度的必要性的共和国，保守其固有的政体，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如此说来，如果想避免国家的灭亡，就不得不直面所陷入的僵局，打破现有的政体。

对古罗马临时独裁官制度必须要注意的另一点是其选举的方法。注意到这一点，就明白罗马人有多么明智了。（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有相同之处。）

罗马共和国地位最高的领导者是执政官，但当选举出临时独裁官之后，执政官的地位和全体人民一样，低于临时独裁者。这就要求拥有执政官地位的人，一定要贤明与大度。

因此，执政官是拥有对临时独裁官的选举权的。

毕竟一个人无论多么受伤害，如果是因自身的责任而造成，其伤痛的程度也是较轻的。

——《论李维》

22

同样是来自国民自由选举选出的领导者，为什么临时独裁官能够给国家带来好处，古罗马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i）却给国家带来了坏处呢？

这是因为为了制约过大的权力而选择临时独裁官制度或者十人委员会，是有区别的。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两者所行使的权力。

临时独裁官虽然有对保民官、执政官和元老院元老任意罢免的权力，但没有变革制度的权限。

因此，其他的权力机构对临时独裁官的绝大部分权力有制约的作用。

但罗马的十人委员会选出的委员可以废除执政官和保民官，并最终废止了国民公决制度。

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十人委员会，最终自然成为其中极具野心的一员阿庇乌斯（即阿庇乌斯·克劳狄·克拉苏，公元前451—前449年任委员。——译者注）施展其野心的舞台。

如果要确保公民自由投票的权利，并保证共和制度不会受到损害，就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

首先要明确权力的使用范围，并建立一个能够在日常对权力有所制约的制度。

第二是权力只能在一定期限内赋予特定的人。

在能够保障统治秩序的共和国中，不能长期将统治权委任给某个个人的情况下，想要趋利避害的话，可以参考斯巴达公民对其国王的做法，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民对其元首的态度。

在这两个国家，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其权力，都确立了相应的监督制度。

如果存在任何人都不能制约的权力，就算它掌握在圣人的手里，对国家的利益都是没有好处的。

这是因为，无论对任何人来说，绝对的权力都会在短时间内使其陷入腐化的境地。而如果这些人不在乎自身的清贫，也没有亲属需要照顾，就更不能让人放心。

可以看出，与包括财富在内的各种利益相比，权力是他们首先追求的东西。

——《论李维》

23

这是我想对民众说的。我希望你们用心铭记这一点。不存在所谓当权者、领导者、统治者的社会，是没有先例的。

因此，选举领导者是必要的，至于要限制其滥用权力这一点，则需要制度来约束。

——《论李维》

24

我想在这里对所谓特权阶级做一个严格的定义。

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持有大量财富，因此可以仅仅依靠其收入就可以获得生活的享受。他们完全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

这些人的存在对任何共和国都是有害的。

但与他们相比，更为有害的，是一有机会就构建城堡，滥用左右他人自由的权力的那些人。

——《论李维》

25

我认为，在存在特权阶级的国家里无法实现共和制度，而也有人以没有贵族就无法施政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例，持相反的观点。

但我的看法则是，威尼斯的例子其实非常特殊。

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除了在名称上与其他国家相同，实质上和其他共和国的贵族完全不同。

威尼斯的贵族并不依赖于来自不动产的收入。他们的绝大部分财产是来自经营动产和商业等各种事业所获得的收益。因此，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建立城堡，从而享受治外法权，并在普通人之上行使各种形式的权力。

人们将其称之为贵族，是因为他们有参与国政者应有的威严，因而以贵族之称表达对他们执政责任感的敬意，这就跟其他国家的贵族完全不同了。

虽然是作为共和国而存在，在威尼斯共和国之内也有不同的阶级：

那就是特权阶级（Gentiluomini）与平民（Popolani）。

前者会得到所有的名誉光环，而后者完全没有获得名誉的途径。

威尼斯国内的阶级斗争没有引起社会混乱的原因，正是由于该国上述的特殊性了。

——《论李维》

26

人在大局所迫的情况下很容易犯错误，而从具体的情况看，做出正确的判断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民众并不需要在大事上具备判断力，他们只要对与自己相关的细节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可以了。

关于如何让民众得到正确的判断，只要遵循下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这就是，在需要民众对大局做出判断时，不要对他们说大局上的事情，而是要个别地为其分析与其自身相关的情况。

英明的领导者不能忽视的是：

建立给予任何人荣誉或褒奖的机制。

这一机制中，英明的领导者在没有确定每个人特定的荣誉或褒奖该如何分配之前，是不会贸然实行的。

这是因为民众正当的判断力会在荣誉或褒奖面前发挥出来。

——《论李维》

27

如果把官职授予卑劣邪恶的人，那么可以推测的是，最卑劣邪恶的人必然会与高洁之士竞争同等的职务。

这样的话，执政者必然不清楚二者之中谁是贤者，最终选择了邪恶的人任职。

我可以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因为民众虽然对形势截然分明的事物有正确的判断，但在仅显示理论的事物面前，做出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

——《论李维》

28

关于民众，我想提醒领导者注意下面两点：

第一，民众容易受到表面利益的诱惑，而忽略与自己的灭亡有关的事物；

第二，如果民众所信任的人物将事情的真相告知民众，说服他们不要犯错误，这些民众就会把祸害引向国家，成为重大危险的根源。

——《论李维》

29

我下面想讨论的是，对如何得到民众的赞同来说，什么方法容易、什么方法困难的问题。

容易的是下面的方法：

对他们具体说明如何做是有所得的，如何做是有所失的。

还有，告诉他们怎样做会被认为是勇敢的，而其他的做法则会被认为是怯懦而卑劣的。

无论这些背后的困难有多大，造成的牺牲有多大，如果在表面上保持坚定而正当的立场，就不难说服民众了。

相反，即使是对民众再有好处的政策，如果在表面上对民众造成了损失，在形象上不那么光鲜，就很难得到民众的赞同。

——《论李维》

30

使处于狂怒中的民众恢复平静的唯一方法，就是让那些受尊敬的、身体条件比民众更出色的人物，在他们面前现身。

——《论李维》

31

民众一旦形成群体就会做出大胆的行为，而作为个体却是怯懦的。

——《论李维》

32

民众的本质中有善良的方面，而与其本质中恶的方面相比，其善的方面并不重要。

即便民众的本质是善良的，这种本质需要在好的体制之下才能发挥出来；相反对其本质中恶的方面，则要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对其进行防备。

——《论李维》

33

由于没有领导者的群众是散漫、无秩序的，我们可以大概预判他们并不会造成令人恐慌的局面，但他们也绝非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论李维》

34

由于民众是愚昧的，他们做不到前后一致，这是提图斯·李维的评价。其他的历史学家笔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事实上，常常见诸历史的是，当民众中有人被执行死刑之时，其他人会流下后悔的泪水。

对此，李维有如下的评价：

“甫一死去，他所带来的威胁即告消除，民众受到后悔之念的驱使，流着泪怀念他。”

而当希耶隆的外甥希耶隆尼慕斯（Hieronymus of Syracuse，公元前213—前214年在位，叙拉古的僭主。——译者注）死后，叙拉古就发生了大动乱，李维写下了这样的话：

“奴隶的卑屈和奴隶主的傲慢，就是民众的本质。”

到此可以说，我对于是否接受为民众辩护这一困难的工作，仍然是犹豫不决的。我想，充当这些受到严厉谴责的人们的辩护者的角色，明显是不利的，最后的结果也必然会是当众出丑。

然而恰恰由于其相反的论点是正确的，我敢为民众辩护，因为历史学家谴责民众的弱点，其实在所有人当中都存在，尤其是在领导者身上。

因为违反法律的事情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发生，领导者和无秩序的民众一样，会犯错误。

做出不假思索的鲁莽行为的民众的性格，如果放到领导者的身

上，就是罪加一等的了。无论是民众还是领导者，只要是欠缺考虑的人，谁都可能犯相同的错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看法是不分阶级的，而必须一视同仁地谴责所有人的弱点。

所谓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的说法，并不完全在理。

虽然，公众意见能发挥不可思议的力量，能通过它预测未来的情况。

而且民众的判断力往往出乎意料地正确。当两种对立的意见一起提出时，公众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是，公众意见也有自身的缺点。与真知灼见相比，公众意见很多时候只是赚取眼球的平庸见解罢了。

对于领导者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提出平庸见解的情况也不少。而且，由于领导者的欲望导致的问题，比出于为民众利益考虑反而造成负面效果的情况要多得多。

因此，如果放下民众和领导者的区别，将两者共同的缺陷加以讨论，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了。

——《论李维》

35

为了共和国，不能不时刻注意市民的行为。

这是因为，表面上看他们的行为与私利私欲无关，而实质上，他们可能在秘密谋划着如何攫取权力。

而对这种有嫌疑的行为，如果能在表面看出善意的方面，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对其修正，使之进入正轨。

话虽如此，这绝非简单的工作。对于共和制度来说，如果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市民的拥护，关乎其存亡的危险也就随之变大了。

然而，由于强有力的市民的突出表现，伴随而来的向僭主制变化的风险，也是现实的问题。

那么，不得已之策只有一条了。

在充分发挥强有力的市民力量的同时，必须确立一种制度，使这样的市民无法侵犯其他人的自由。

与之相关的具体讨论首先是，国家从一开始就要将一位市民所获得的公共的声誉和私人的声誉区别对待。

因此，如果他的作为是出于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那么他所应得到的回报就绝不能太低。倘若只能投以些微的回报，地位在其之上的人就应该给予援助，如此的话，其他市民才会努力效仿他，服务于公众。

如果是因这样的行为所获得的名声，那么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

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而公民出于私人的意图所获得的名声，就是极为危险的了。

因为它是市民在实现其私人利益过程中获得的名声。

我指的是通过发放贷款、为嫁女寻婿、充当官员代理而获取便利等方式获得的好名声。

以上这些行为会使这些市民获得善于打点的名声，而他们旋即就自然而然结成了党派。

这样肯定是没有好处的——结党会逐步削弱法律的权威，对社会共同体极为有害。

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避免此问题发生的办法。可以说，确立一个抑制此类问题发生的制度，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绝对是必要的。

对为公共利益而有所作为的市民，应该肯定他们的名誉；而对那些为了私人利益而声名远播的市民，就必须建立限制他们的制度了。

——《论李维》

36

有一种衡量一国国力的方法，是审视其与诸多邻国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假使近邻的诸国为了保持与该国的友好关系而对其有所贡纳，那该国可谓是强国了。

相反，如果邻国本身就弱小，却还对该国进行金钱方面的援助，那该国的国力肯定是非常弱小的了。

如果通读一遍罗马史，马萨利亚人（以今法国马赛为核心的希腊殖民地民族，作者误为亚述人，即アッシリア人。——译者注）、埃都人（依附罗马人的一支凯尔特民族，其原住地在今法国的杜河和索恩河之间。——译者注）、罗得岛人，以及叙拉古的耶罗二世（Hiero II，约公元前308—前215年，叙拉古僭主。——译者注）、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公元前197—前159年在位，小亚细亚帕加马王国国王。——译者注），以及马西尼萨（Massinissa，约公元前239—约前148年，北非努米底亚王国国王。——译者注），都是和罗马接壤的国家或君主。他们为了保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向罗马缴纳贡金，并为了得到罗马的保护，不对罗马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在弱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之相反的例子。

从我们的祖国佛罗伦萨开始看，即使在其兴盛的过去，也向与我国接壤的罗马涅诸小国负担了大量贡金的经费开支。相反，我国则从他们处获取经济援助。

倘若佛罗伦萨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情况一定会是相反的。我们不必花钱来获得友好关系，而会通过友好关系获得财富。

这种尴尬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佛罗伦萨一国，在威尼斯共和国和法国，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法国国王不得不向瑞士和英格兰国王纳贡。

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忽视本国的国民武装，而依赖于外国雇佣兵。

这种短视的国策，虽然在一开始有助于打开局面，最终却将国家拖入危险的境地。

——《论李维》

37

弱国的决定常常是优柔寡断的。

因此，做决断时浪费时间，总是有害的。

对于这一点，我可以说是很有信心的。就国家行为来说，模糊处理每个问题，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是多么有害，我已经有了切身的体验。

欠缺决断力的人，无论做多么郑重的协商，其得出的结论总是模棱两可而没有意义。

而与优柔寡断一样有害的是，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后迟来的结论。

这是因为，比方说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贻误时机，不仅无法起到帮助对方的作用，还可能使其以怨报德。

很多时候，如果一开始的协商内容就含糊不清，最终想以明确的话语表示出来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留下明确的话语之外的内容。

以上的内容，对君主制下与共和制下的领导者来说，都是必须谨记于心的。

——《论李维》

38

弱小的共和国所表现出的最坏的倾向，就是对任何事物都采取优柔寡断的态度。

因此，该国所制定的政策，会在实施时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各种压力。即使其中有良策，也并非出于执政者的深思熟虑，而是压力之下不得已的产物。

也就是说，对态度犹豫不决的共和国来说，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其领导者就制定不出好的对策。这是因为其国力衰弱导致的社会不稳，使执政者失去了做出决断的勇气。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驱动下，这种“衰弱”只会让该国越来越犹豫不决。

——《论李维》

39

在共和体制下的罗马，其执政官的职位会授予平民。这一官职的授予与门第和年龄等无关，而仅仅与此人的能力有关。

罗马曾经一直没有关于担任公职的年龄限制。

其原因在于罗马人认为，对国家需要的人士，这一点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很多讨论，而我想强调以下的问题：

首先，将那些没有显赫的门第但对社会共同体有贡献的人物任命为执政官，这一任命是与门第无关的，但也不能看作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褒奖，毕竟，此人不可能在担任职务时全力以赴。

关于年龄，我有相同的观点。

年轻人被任用的时候，他一定会努力做出超过具有经验和成就的熟练人士的辉煌业绩。

但在未能合理利用上述人士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对国家造成损失了。

这是因为，即使是再有能力的年轻人，当其还未成熟时，就不能正确发挥出其无畏的气概和强悍的行动力。

——《论李维》

40

认为本国是大国的领导者，必须留意对以各种手段进入本国的人口加以统计。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就不能成为大国。

为了人口的流入，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爱惜他们，第二种是使用强制手段。

第一种方法是对想移居到本国的外国人开放门户，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在这里生活和居住，要为他们创造好的环境。

第二种方法，无须赘言，就是强制移民了。要使这种方法真正成功，实在是非常困难的。

——《论李维》

41

为什么有一些民族会舍弃自己的土地而侵入他国，并在其领土上建国？其原因自然是战争了。

这些人会在战乱时由于饥饿等原因，不得已全家族侵入别国，而并非出于占有领土的欲望。尽管如此，他们驱赶、残杀当地住民的情况时有发生。最终导致的情况是，与普通战争的残酷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为原领地被占领而走投无路入侵别国的民族人数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必然驱赶、残杀原住民族，抢夺其财产，最终建立新的国家。

以摩西或侵入罗马帝国的各民族为例，他们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就改变了原来的地名。

将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改名为伦巴第（Lombardia）、将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改名为法兰西的情况，就是以侵入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民族来命名新的地名。

将伊利里亚（Illyria）改名为斯拉沃尼亚（Sclavonia）、潘诺尼亚（Pannonia）改名为匈牙利、不列颠改名为英格兰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而摩西也将其征服的一片叙利亚的土地改名为犹太。

——《论李维》

42

关于领土扩张的利害问题，需要根据扩张国的实际情况来回答。

首先，由于战争而招致国力消耗的国家，即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扩大了领土，也得不到任何利益。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是典型的例子。

威尼斯占领北意大利之后，佛罗伦萨拥有托斯卡纳之后，其国力要比前者只满足于海上霸权、后者只满足于对其城墙六英里外领土的所有权之时要衰弱很多。

因为这两国仅仅为了自身领土扩张的欲望而行事，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明确地利用所扩张的领土。

——《论李维》

43

城市也罢，国家也罢，只要是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缺陷。

因此它们需要“医生”。

换句话说，为了应对时代变化的要求，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

这种情况下的“医生”常常是冒牌医生。当改革的必要性越来越大时，就不得不尽可能寻求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了。

——《论李维》

44

在艰难时期，真正强有力的人物会活跃起来；而太平盛世里，则是拥有财富和门第的人，享受自己权倾一时的感觉。

那些远比大众优秀的伟人，往往会在国泰民安的时代受到冷遇。

因为与他们的能力相配的地位和名声，会因他人的嫉妒心而被夺去。

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曾经记载过下面的一段历史。

当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度将骄横的斯巴达制伏，并进而支配几乎整个希腊之时，它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征服西西里了。

虽然阿尔基比亚德斯等几位雅典公民赞成此次远征，但在雅典公民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尼西亚斯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在公民大会上做了如下的演说：

“我之所以反对远征西西里，并非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如果我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明哲保身，远征西西里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如果雅典维持其和平的状态，即使是不如我优秀的人，也会在名誉和地位上超过我，而如果是在战争状态，相信没有什么人比我强。仅仅作为一名公民来说，不要说比我优秀的人，就连与我同样优秀的人都没有。”

正如此例所示，优秀的人物在和平时代得不到与之相配评价的情况是很多的。

而这一现象给那些比一般人优秀的人造成了两点不快：第一是他们得不到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位置；第二则是眼睁睁看着不如自己的人得到比自己更高的评价。

这虽然不是对社会共同体直接有害的事，却会造成与社会共同体自身衰退有关的损失。

——《论李维》

45

军队的类型有三种：

第一种类型是古罗马的军队。

这种类型的军队的力量源泉是它的纪律。审视历史，罗马军团的军规就是其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罗马军团的士兵，如果没有指挥官的命令，就不会饮食、休息或与女性来往，更不要说擅自发起军事行动了。

因此，罗马的军队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保持着必胜的信心，能够一战再战而始终保持勇猛的状态。

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例子是高卢的军队。

虽然高卢人是极为勇猛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却毫无纪律可言。

因此，当战斗甫一开始，高卢军队的勇气令人惊骇，但不能持续下去。由于纪律的约束，其能力就无法得到发挥。

第三种类型的军队就是现代（16世纪）的意大利诸国军队了。

他们是既没有勇猛的意志也没有像样的纪律的部队。这样的军队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倘若他们幸运地遇到一触即溃的敌人，也能取得梦想一般的胜利。

这里论及的并不仅限于军队的组织。我想，此问题能够说明的一点是，单纯的勇猛与真正的实力是完全不同的。

——《论李维》

46

所有的国家，无论在任何时代，采取任何政体，为了其自身的存在，实力和谨慎两者都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谨慎一点是不够的，只有实力一点也是不够的。

如果只做到谨慎这一点，就不能充分地将计划付诸实践；如果，只有实力这一点，在实行之后就难以继续。

——《论李维》

47

我一再强调：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但最后我们不得已面对了现在的局面。

倘若您认为对我国来说军事力量是必要的，佛罗伦萨不需要法国国王的保护，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就不能以进攻我国相要挟，我会回答说，这样考虑并不是轻率的。

因为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想要侵略其领土的敌人的威胁，其中有些敌人是无法防御的。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任何国家在今天，在将国土防御委以其他国家之时，难道不应该考虑保证自身的安全吗？

——《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

48

身边常有一批能征善战者，对于执政者来说是没有危险的。

理想的军备是为一批在没有战争必要的时候能够回家、高兴地担任各种职务的军士而设立的。

——《战争的艺术》

49

拥有真正防御力的难点不仅仅要考虑军事力量，军队的名声也应作为军事力量来考虑。

抵挡非正义的战争，是使军队全力以赴、让敌人胆怯的重要原因之一。

计算防御力时，应将武器和士气两方面综合起来考虑。

——《战争的艺术》

50

萨卢斯提乌斯在其作品中对尤里乌斯·恺撒做了如下的真实描述：

“无论结局多么败坏的事件，一开始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

·语录·

第三部
人间篇

01

如果详细检视声名显赫的领导者的行为，除了偶尔的机遇之外，没有人能依靠幸运成功。虽然有机遇，也只是给他们提供了物质基础，唯有他们自身的才能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即便是有很好的机会，如果他们自身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机会就会浪费掉；相反，如果他们没有赶上好机会，自身的能力就无法发挥。

——《君主论》

02

谈命运

对于所谓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由命运和神的旨意左右和支配的看法，我不得不赞成。

人们无论如何殚精竭虑，也无法改变宿命。不仅如此，在命运面前，个人无论采取任何对策，也终究于事无补。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经是在很多人中间流行的想法了。因此他们断定，与其辛苦劳作，不如听从命运的支配。

在这个每天世事变幻层出不穷、远远超过人们意料的时代（16世纪），他们意见的可信度的确很高。很多时候，生于此时代的我，也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这种意见。

谈力量

然而，我们绝不能把强烈的自由意志消灭掉。

命运大概左右了我们行为的一半。而剩下的另一半，则是由我们自己来支配的。

当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做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的强大威力就显露出来了。

谈时代性

但是，与其谈论前述的问题，我想不如专门讲讲下面几个方面。

有的君主，今天还在夸耀自己国家的昌盛，明天就倒台了。但他在性格或才能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我觉得他们倒台的原因在于，完全依赖命运的安排。

毕竟，命运是太容易变化的东西。

因此，想在变化无常的命运洪流中不致被吞没，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时代的发展。

只有成功地适应时代，才有可能在命运的洪流中存活下来。相反，就算一个人的能力再出众，自己不顺应时势来做事的话，只会招致倒台的结局。

人们之所以重视时代性，是因为在其实现荣誉与财富等各自追求的道路上，有种种不同的途径。

有的人是谨慎小心的，也有的人是大胆果敢的。有的人善于使用强力手段，有的人则善用技巧。有的人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达到目的，有的人则以相反的方式成功。

然而也有两个同样谨慎小心的人，一个人成功了、另一个人却最终失败了的情况。

此外，也有一个人谨慎小心，另一个人大胆果断，两个人尽管气质迥异，却都获得成功的情况。

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做法是否与时代的特性相符

合。

但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行为的贤明人物并不多见。

这是因为，人们很难离开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所主宰的人生道路。

而改变自己一直以来成功的做法，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因此，一个做事慎之又慎的人，在时势变化之后，需要以果敢的态度行动时，拿不出应对的措施，最终就导致了毁灭的结局。

由此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命运是不停变化着的。如果一个人在命运的变化中仍然坚持自己做事的方法，只要他能够密切协调和命运的关系，就可以做到在这种变化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我可以断言，勇敢果断的人，在命运方面好过谨慎小心的人。

毕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如果你要在她面前取得主导权，就必须采取暴力的手段。

命运这个女人宁愿屈服于那些露骨地表现出征服她的欲望的人，而不会青睐那些冷冰冰对待她的人。

总之，命运就像年轻人的女友一样。年轻人因为缺少心计，不考虑事后的种种，于是就激烈而勇敢地征服了命运这个女人。

——《君主论》

03

古罗马史家提图斯·李维曾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其在命运面前别无选择，这个人就已经盲目了。”

我认为没有比这句名言更体现真知灼见的了。

的确，无论是拜好运所赐，还是受厄运折磨，都不值得赞赏或责备。

因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上天给予的境遇，总有人受到机遇的眷顾，也有人的好运被上天平白无故地取走。

当命运要成就自己伟大的事业时，常常就会选择一位才能与品质兼备的人作为她的工具，而他也常常能抓住她所赋予的好境遇。

当她要给人间带来灾难时，也会选取一位相应的人。

而倘若有人要逆命运之意志而为之，她的回应要么是死亡的代价，要么是通过剥夺他所有的力量，使这个人再也无法做出违逆命运的事情。

环顾历史，我可以断言一条真理，那就是，人们只能顺应命运，而绝对无法违逆之。

人们可以在命运的大网中往复穿梭，却无法切断任何一根命运的丝线。

因此，因为命运不济而绝望是不应该的事。

命运在想什么，谁都无法探悉，而有时她就会在我们的期待中微笑着出现。

因此，无论落入怎样的逆境之中，都不要放弃人生的希望。

——《论李维》

04

在个人实力欠缺的情况下，命运就发挥着更强大的力量。

因为命运在不断变化着。对国家来说，由于命运多变，实现自由是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如果以古代的实例中出现的人来考量，应该像古罗马人一样清醒地依赖自身的力量自由行事，以牵制命运的力量。

——《论李维》

05

我想明确这一点：

命运的裁决，对于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来说，是不会改变的；而上天，对于想着自己要灭亡的人来说，既不会帮助他，也无法帮助他。

——《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

06

实力出众的人物，无论是受到命运的青睐或遗弃，其态度并不会与平时有多大变化。

无论命运如何改变，他们常保留着一颗泰然处之的心，因此在他人眼中看到的，就是命运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命运的转变可以通过弱者的外表体现出来。在好运面前，他们会陷入狂喜，仿佛是因自己个人之力而得意，从而导致周围的人无法忍耐而憎恨他们。

然而，一旦好运不再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些人立即沮丧下去，最终变成奴颜婢膝的人。

如果君主拥有这种弱者的性格，就会带来糟糕的结局。

这一类君主在逆境中并不考虑如何防御，而是急于逃避。此外，这些君主一定是在好运降临时抱着碰运气的态度，而在逆境中不考虑对应策略的，这种情况最糟糕。

而西庇阿曾说过如下的话：

“罗马人在战败时不会沮丧，在战胜时也不会骄横。”

一个人的性格是否容易受到命运的左右，与其受到的教育有关。

在无法受到适当教育的情况下，人们的性格容易被命运所左右。相反，如果受到了适当的教育，人就会不为逆境所动摇。

因此，教育作为教导人理解社会的活动，能够促使人们明白社会的剧烈变化，并形成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动摇的性格。

以上的话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国家来说也适用。

但从国家的角度看，只讨论精神方面的问题是不够的。如果一个国家想在逆境中屹立不倒，它还应当有必要的制度建设做保证。

——《论李维》

07

环顾人们的行为，就算是再完美的期待，最后也必然导致不完美的结局。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优点必然是跟缺点分不开的。

因此，如何避免缺点起作用，就成了能够成功与否的关键。

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利用命运所赐予的好时机。只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时机，缺点才有转化为优点的可能。

——《论李维》

08

对于想成大事的人，首要的是专心做准备。

等到机会来临之后再做准备就晚了。在幸运向你微笑之前，就应该完全准备好。

倘若能不懈怠地做到这一点，只要有好运来临，就能够捕捉到机会。

如果一开始抓不住好机会，好机会就会从手边溜走。

——《战争的艺术》

09

对过去和现在抱有想法的人，尽管所处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在受到相同欲望驱使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相同的性格特点。

这是因为，仔细考虑过去情形的人，不仅容易正确判断现在的局势，也能参考古人的做法，制定相应的对策。

诚然，在过去找不到和现实完全相同的情况，但由于本质是一样的，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出对现实的预判了。

但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即有的人在无视过去，或者读了历史却无法理解的情况下，不能对执政者晓之以理而最终被杀的例子。

这是人类永远不变、一直在重复的丑态。

——《论李维》

10

在这个世界上，以相似的做法发展下去的事情，总会得到相似的结局。无论是好的倾向还是坏的倾向，都会以不变的形式共存下去。

但是由于各国的风俗不同，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也就不一样。而从人类全体来看，就没有多大的变化了。

然而国家的优势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亚述曾经拥有的盛世，后来为米底所继承，接下来是波斯，最后则为罗马所拥有，促成了罗马的兴盛。

——《论李维》

11

尽管时代在变，在同样地方生活的人，会保持相同的气质。

有识之士如果愿意知悉人间冷暖，就会审视过去。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常常会受到相同的热情驱使，而最终导致相同的结局。

尽管时代的变化不能为我们所亲见，各地的不同却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教育等都不一样。

因此，如果想从能看到的过去来预测未来，就要仔细调查某地居民长期以来的习惯以及其具备的优缺点。

总之，过去节俭的居民，现在也是节俭的；曾经是狡猾的居民，永远都是狡猾的。

——《论李维》

12

不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有不同的气质类型。就算是在同一座城市中，不同家族的气质也不一样。

以罗马贵族为例，曼利乌斯家的男子个个都是严厉而固执的，而瓦莱里乌斯家的男子则因其宽容而成为平民的伙伴；阿庇乌斯家则全体都是野心家，抱持着敌视平民的态度。

具体地看待这些家族，就能够区别出各个家族的气质了。

不能认为这些区别仅仅是由于家系的原因。所谓的血统，经过多次婚姻以后，就会变化。

因此我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还包括家庭内部的风气，以及各人所受的不同教育。

儿时听从自家长辈的话而受到教育，长大之后自然会形成和长辈相同的性格特点。

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阿庇乌斯家的男子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并受到同样强烈热情所驱使的事实，就顺理成章了。

——《论李维》

13

大自然是不可能不变化的，同样，一个民族的命运也不可能是静止的。

在最开始，一个民族是不断上升发展的。到达发展的顶点以后，因为不得不下降，就开始了下降的过程。

有的是经历从善到恶的变化，而有的则经历了从恶到善的变化。

尽管其发展优势使该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获得了安定的局面，但很短的时间以后，这种安定就会催生安逸的状态，最终把这一民族引向无秩序的境地。

此后，由于无秩序导致衰退，等到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只有觉醒了的人才能恢复秩序。

任用有能力的人，在他的率领下，恢复秩序和往日的繁荣，都是可能的。

——《佛罗伦萨史》

14

下面的两点是绝对不能轻视的：

第一，只有具备忍耐与宽容，才能够消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

第二，只有给予对方报酬或援助，才能促进敌对关系的好转。

——《论李维》

15

对人所做的事业，只能从结果而不是动机来评价。

——《论李维》

16

人们几乎总是沿着前人走过的道路行进。通过效法前人的事迹，后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尽管如此，后人不可能完全沿着前人的道路，即使如此，也很难达到所效法的人的能力。然而一个明智的人，一定会努力踏上才华出众者的道路，并效法这些人的行为。就算是他的能力并不如前人，也能在他身上看到那些人的影子。

打个比方，就像谨慎的弓箭手那样，在他看到箭靶距离太远，以自己的臂力不可能达到的时候，他就会把弓抬高一些。抬高瞄准的原因，正是由于箭靶的距离太远。

——《君主论》

17

谁是促使他人变得强大的原因，谁就是自取灭亡。

这一点是毫无例外、普遍适用的原则。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促成强大者的实力与心机铸就的，而一旦对方强大起来，原来促成其强大的实力与心机就与其自身的存亡息息相关。因此他就必然会猜疑促成他强大的人了。

——《君主论》

18

以自己的谦让为美德而自信能战胜狂妄的对手的人，实际上是犯了错误的。

——《论李维》

19

伪装自己有不同的人格，是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处世的好方法。

例如对掌权者不满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但在将其付诸实践之前，必须首先客观把握自己的实力。

在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与掌权者正面交锋。这样做危险最小，也会给自己带来名誉。

相反，在不具备进行正面斗争的充分实力时，就要运用一切手段，努力维持与对手的友好关系。

其具体方法包括迎合其趣味，以及做出其喜好的行为。

一旦与掌权对手建立亲密关系，我方自身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而掌权者所享受的快乐生活，也成为值得我方快乐的优势。

接下来，我方就可以在非常有利的局面下，将深谋远虑付诸实施了。

——《论李维》

20

从我的个人体验来说，人们的意见里所充满的各种虚伪，各种基于误判的欺骗，实在令人震惊。

因为特权者的野心与专横而毫无自由可言，受到他们统治的民众，不过是被执政者所利用的镜子罢了。

——《佛罗伦萨史》

21

人们以巨额财富购买古代的雕塑，并热衷于将其置于身边，向他人炫耀，或让人制作仿品。我们能对他们致以与对古人高贵行为相同的敬意吗？

人们应该对历史上的人物报效国家的行为心存赞赏，但最好不要用制作人像来模仿。

我思考了这种制作仿品的行为的好处之后，深感遗憾。

我想这种行为是基督教的负面影响造成的。因为古人虽然批评坏的野心，却对好的野心致以相应的敬意，而基督教却把怀有野心当作个人的罪恶了。

——《论李维》

22

使个人获得最高声誉的行为，就是做对祖国有用的事。

具体而言，制定法律、创立制度、着力于改革的人，都在此列。他们所受到的赞赏，应当比任何人都多。

毕竟，只有少数人能有做出如此贡献的机会，而能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就更少了，最后只有几个人能够以自己的贡献而获得声誉。

于是，一个人所能期望的至高荣誉，就单单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人了。

此外，即使得不到治理国家的机会，也可以将治国方略写下来传诸后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人，也会以其作品的价值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

和执政的梭伦、来库古等人相比，他们没有实际治国的经验，但并不代表其对政治无知。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们得到执政的位置罢了。

——《就佛罗伦萨共和国之未来答美第奇家族所问》

23

在一国中，常有民众对某个特定人物表示不满和愤慨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给予这些民众一个合法的发泄途径。

在一个没有合法发泄途径的社会，民众只会以极端的方式发泄其不满和愤慨，最终会将全体国民卷入危急事态之中。

因此，提前以将合法发泄途径立法的形式来应对民众，对国家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论李维》

24

对待民众应当宽大为怀，要不然就把他们消灭掉。

这是由于人们在受到轻度侮辱时会产生复仇的心理，而如果受到巨大的损害，他们就对复仇无能为力了。

因此，在侵害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达到让自己无须害怕其报复的程度。

——《君主论》

25

将对手逼至无路可逃的绝境的做法，不是有成熟思考的人应该采取的行为。

因为对前途失去希望的人，由于失去了做正确判断的冷静，怎样凶狠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佛罗伦萨史》

26

民众的情绪是极容易动摇的。因此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并不困难，但想保持自己所得到的支持，却是很难的事。

——《君主论》

27

正如西塞罗所说，民众尽管无知，却具有看穿真相的能力。

因此，倘若有将众人信赖集于一身的人将事实相告，他们便很容易被说服了。

——《论李维》

28

长期习惯于受支配的民众，若是因机遇而偶然获得自由，那么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长久地维持所获得的自由。

他们好比动物园里饲养的猛兽，如果哪天被放归野外就不知如何生存了，很容易就能将其再次捕获。

习惯于受支配的民众并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因此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跟随领导他们的人以外，他们并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下去的结局，是回到比原来更严苛的受支配状态中去。

——《论李维》

29

人的行为往往和小鸟没有什么两样。

和小鸟一样，人只注意抢夺眼前的利益，却忽视了头顶上鹰鹫的威胁。

——《论李维》

30

即使是带着议题参加会议的人，也会不止一次地做出错误判断。

就算参加会议的都是杰出人物，所做的决议也时常与正确的路线相反。

更不用说在堕落的共和国中，那些比大众出色的人物，往往是极少数的。

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往往是发表真知灼见的人被晾在一边，而由只考虑现实利益的人支配了会议的决议。

——《论李维》

31

如果相信亡命之徒的言语，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而无法自拔。

这些人口中所谓的信义和誓言，是废纸一样的东西。

他们一旦回到国内，在能找到跟自己臭味相投的人之后，就会把与我方的协议抛在脑后。

此外，亡命之徒的话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手段，为了得到对其有用者的援助，他们会将不可能实现的事项写入协议之中。

如果我方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行动，结果必然是最终的失败，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招致我方的毁灭。

——《论李维》

32

给外交人员的建议

在对国家有贡献的工作中，外交工作是最容易让人出名的工作之一。

完成从外交部门接受的命令固然简单，将任务做到完美，却是极为困难的事。

首先，应当对驻在国领导者的性格有完全的把握。因此就要把握住一切可以接近他们的机会，对他们进行研究。

而且，所交涉的事项越困难，就越容易得到与具有决定权的人士直接交涉的机会。

这是因为随着交涉事项困难程度的增加，具有决定权的人的职务会相应提升。

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外交人员自身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这一点是值得全力去做的，而且只是与自身意志相关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提高知名度的方法是被评价为令人注目的人物。若要做到这一点，就须保持坦诚的心态，绝不能两面三刀，并取得驻在国领导者的信任。

从我的切身体验来说，只依赖自己头脑的判断、缺乏灵活处理问题能力的外交人员，最终会失去驻在国领导者的信任，从而无法

进行正常的交涉。

毕竟外交交涉是以交谈为主的工作，而且为了隐瞒真实的意图，也需要谈话的技巧。

当然，这样的技巧是绝对不能让谈话对象识破的。

对外交人员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撰写向本部门提交的报告书。

关于报告书的撰写，要注意下面三点：

第一是与正在进行的交涉有关的事项；

第二是与已经结束的交涉相关的事项；

第三是对以上事务的进展情况及所产生的结果的预测。

在这三点中，前两点略微困难，最后一点则较为简单。

其原因在于，即使是当时列为机密的事务，随着时间的变迁，也会浮出水面。

报告事实情况是外交官的任务，因此如果不亲临现场并根据自身的判断加以推测，就达不到完美完成任务的目的。

高效地完成对事实的报告，是外交官建立情报网络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总之，要在驻在国内建立人脉，为了收集必要的情报而广交朋友，以出色地完成任务。

特意举办宴会，或者举行博彩游戏，都会有益于情报收集的工作。而如果外交官把交往扩大到私人关系中，将使其得到与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物开诚布公对话的机会。

建立广泛的人脉对各个方面都很重要。自己一个人不知道的情

况，可以从他人那里了解到。

建立人脉的好处还有一点：

你想散布的信息可以通过人脉来传播，从而起到比自己一人远为广泛的传播效果。

此外，对于外交人员来说，无论多么无聊的内容，都必须把它全部发送到本国国内。

外交人员的情报收集工作要遵循互相让步的原则。当不存在无偿情报时，可以以一定代价收买。

在为本国外交部门撰写报告书时，要讲究技巧。

外交人员不仅要对事实进行报告，还有必要加入自身的判断与推测。但倘若写明是自己做的判断和推测，可能会增加被某些人厌恶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点，应按照如下的顺序撰写报告书：

首先应报告的是进行交涉的具体情况，然后是交涉对方的性格和交涉场合的气氛。在此之后加上下面的语句：

“以上报告内容中所包含的事项，由驻在国的审慎人士以×××方式进展之中，最终将以×××之结局而告收场。”

×××的部分自然是撰写者的意见和推测了。

如果能巧妙运用这样的撰写方法，所写的报告书就会大受好评。而如果写得不好，就会给人留下此人不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印象。

第二点技巧是在向本国外交部呈送关于大局的报告书的同时，每日坚持记录细小的事项，并将其中重要的时间摘录整理，每八到十天递送外交部一次。

第三点技巧则是在递送以上两种报告书的同时，每两个月递交

一次关于驻在国整体局势的报告。

做到以上三点的外交官，不仅可以使对自身的评价得到提高，对祖国也是大有贡献的。

这是因为不断递送的报告书会使外交部的领导对驻外人员的驻在国保持清楚的认识，使他们即使身居远方，也能够如身临其境地制定对外政策。

——《赴任驻西班牙大使前致拉斐尔·吉罗拉米的备忘录》

33

人这种东西，一旦实现一个野心，立即就会想着实现下一个野心。

这一特点，无论在支配别人的时候还是受别人支配的时候，都绝不会改变。

——《论李维》

34

人出于本性，无论在得到恩惠的时候还是施与他人恩惠的时候，都会受到义理的感染。

——《君主论》

35

对想要加害自己的对手表示亲切并施之以恩惠的人，与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总是得到感恩的。

——《君主论》

36

在众人之中没有百分之百善良的，但也没有百分之百邪恶的。

正因为如此，常常是处于善恶中间的人，最终陷入了毁灭的境地。

——《论李维》

37

人们常常对能够预测到哪怕只有一点点困难的事业持反对的态度。

——《君主论》

38

人们会因为恐惧和厌恶的心理而做出过激的行为来。

——《君主论》

39

一开始只想着防卫自己的人，在保全自己之后，就会打算侵犯他人了。遗憾的是，这就是现实。

——《论李维》

40

古代贤人遗留下来的记载，即使是在现代（16世纪）读来也是栩栩如生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民众在其自由失而复得的情况下所做的过激行为的描写。

——《论李维》

41

人不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行善。

因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状态，谁都会做出自私的事来，在混乱与无秩序里横行无阻。

如果在不存在法律、人们却向着好的方向前进的时代，法律就不是必需的了。但在没有这样好的风俗习惯支配的情况下，制定法律就是非常必要的。

——《论李维》

42

没有任何保证，可以让一个人得到比他现在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这个人所乐于拥有的。

——《论李维》

43

证明一个人是贤明审慎的人物的证据之一，是他没有留下任何胁迫或侮辱他人的言辞。

因为这两种行为不仅会伤害对方，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

胁迫只会让对方留心戒备，而侮辱则会使对方树立起敌意来。结果自然会导致对手不假思索地实施毁灭我方的决心。

古罗马人对这一点谙熟于心。无论他们是出于真心还是说笑，都明白这两种错误行为必定会导致对方心生憎恶。

塔西佗这样写道：

“怪里怪气的玩笑，特别是在完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必然会附着更加尖酸的回味。”

——《论李维》

44

个人也罢，团体也罢，在取得胜利之后，或者仅仅在看到胜利的机会之时，就屡屡口出狂言，并做出狂妄的举动，很容易导致一无所获的结局。

迦太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队以后，他遣使去迦太基汇报战果，并请求派军支援。

迦太基的元老院就此事展开讨论。议席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汉诺发表了如下的演说：

“这场胜利对我国与罗马的和平共存十分必要。在取胜的情况下，我们就掌握了缔结和约的有利条件。相反，如果一味地求胜而冒进，导致失败之后就很难像现在这样达成对我们有利的协议了。因此，现在我们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只要避开血本无归的情况就可以了。”

但是汉诺的建议未获采纳。虽然迦太基最后失去了以有利条件换得和平的好机会，这位公民仍然以其深思熟虑而著称于世。

人在不清楚自己期望的界限的情况下，就会犯下盲动的错误。由于不能客观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走向了毁灭的境地。

——《论李维》

45

评价一个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他与什么人交往。

毕竟，几乎完全没有人不会受到与自己亲密交往的人的影响。

——《论李维》

46

即使是为了再多人的利益，伴随着全新的大事业倡导者的必然是巨大的危险。

而这种危险并不会在倡导之时自行消除。在推动其计划实施，直到完成，以及此后的保障和运营阶段中，危险也不会有所减少。

这种危险为什么会产生呢？

因为人都是以结果来论英雄的，如果事业没有什么成果，责任都会算在倡导者的身上。

相反，即使确实有所成就，倡导者得到了赞赏，从大事业长期的成败来看，其所受的赞赏跟责难相比也算不得什么了。

在无论如何也无法躲开这一危险的情况下，就只能根据事态发展，尽可能适度地完成各项工作了，这一点应当牢记。

如果倡导者不能自己说明具体事项，在宣传自己所做的事情时，就不要凭着热情任意去做。

当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周围的人必然会对此有所期待，但如果他们无法服从于我们坚持不懈的劝说，我们就不要勉强。

如果不这样灵活处理，我们所倡导的事业就必然会受到众人的强烈反对，倘若导致了不良的后果，就是倡导者自己的责任了。

然而就算是这样谨慎行事而取得了成功，倡导者所得到的声誉和赞美，与周围人的反对之声相比也少得可怜。但谨慎行事还是有以下两点好处的：

第一点好处是，不必一个人应对全部的威胁了；

第二点好处则是，如果我方的倡导未能获得响应，而被他人的提议所取代，导致最终失败的时候，我方就会因先见之明而受到广泛的称赞。

当然，此种情况下个人所受到的称赞，是以国家受到巨大损害为代价的，这必须谨记于心。

——《论李维》

47

名誉并非只属于成功者。

成功者固然应该获得名誉，但失败者也有获得名誉的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能够证明失败完全是自己责任以外的东西。

第二种途径则是在失败之后，将失败一笔勾销，转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论李维》

48

残酷无情的现实是，一个人手上拥有的权力越大，他就会越倾向于滥用权力，最终日益令周边的人难以忍受。

——《佛罗伦萨史》

49

满足于适度胜利的人，往往是常胜将军。

而只渴求压倒性胜利的人，常常会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

——《佛罗伦萨史》

50

在各种林林总总的“斗争”之中，使得自己不断弱化的斗争，是绝对不能卷入的。

要尽可能避免让自己失去名誉的事件。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所谓的积极进取就成了有害无益的愚蠢行径。

——《佛罗伦萨史》

51

谁都不免会犯错误，但谁都没有理由犯错误。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预料今天还是烈日当头、明天就大雨倾盆的情况。

——《关于资金援助提案的若干绪论与必须考虑的事项》

52

谁都愿意处理尽可能简单的事务。

然而对同一件事来说，就有能简简单单办到的人，也有经过刻苦努力却最终实现不了的人。

究其原因，能办到的人肯定在办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是否抓住机会具有良好的判断力。

毕竟，无论怎样全力以赴，并非总能成功的。

这时候，判断力的好坏，就是一个人人生顺利与辛苦的分界线了。

——《战争的艺术》

53

我认为，对军事指挥官来说最重要的资质是想象力。

这一资质的重要性对任何级别的指挥官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对任何职业来说，没有想象力的人都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

——《战争的艺术》

54

你不能只说下面的话语。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下了“尝试完之后再后悔，总比还没有尝试就后悔要好得多”这句话。

今天你正在享受的、从喜爱的事情所得到的喜悦，明天可能就再也得不到了。正在享受喜悦的你，就像英格兰国王那样令我羡慕。

——《马基雅维利书信》

55

以好的一面示人的人，无论如何也必然会同时以坏的一面示人。

这就是盛者必衰的道理。

——《马基雅维利书信》

56

我们必须经常关心的是如何减少实际的损失。

对此，应在各种可能的策略中，选择害处较少的一种来实施。

这是因为在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种策略是完全无害的。

——《论李维》

57

上天堂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熟知去往地狱的道路。

——《马基雅维利书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利语录 /（日）盐野七生著；万翔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7–5086 – 5654 –0
I. ① 马… II. ① 盐… ② 万… III. ① 马基雅维利，N.（1469 ～ 1527）－语录 Ⅳ. 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665号

马基雅维利语录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万翔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盐野七生作品：文艺复兴的故事

（全六册）

中信出版集团

盐野七生作品：文艺复兴的故事（全六册）

[日]盐野七生 著

中信出版社

总　目　录

文艺复兴是什么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全两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神的代理人
返回总目录

文艺复兴的故事
01

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是什么

【日】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目　录

致读者
第一部 佛罗伦萨篇
第二部 罗马篇
第三部 基安蒂的格列韦篇
第四部 威尼斯篇
附录 重要人物简历一览
返回总目录

致读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对古罗马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对此，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写过文艺复兴。”听到这个回答，近90%的人会接着问：“那么，又是什么缘故让你对文艺复兴感兴趣的呢？”听了这样的问话，我心里总会有隐隐的失落感。我从事写作已经30载，为什么大家还不了解我呢？于是，为了让读过我作品的读者温故而知新，也为了方便尚未读过我的书的人们能够了解我，我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并依照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这本书。对话体是柏拉图以后的欧洲人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也曾用过这样的写作手法。

在东京的家里整理东西的时候，我找出了一本高中时代学过的世界史年表。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正式的历史年表。我感到很亲切，忍不住翻开书，看到了用毛笔认认真真写在封面内页的一个圆圈里十分醒目的一句话：**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那一年，我16岁。

升大学之前，我很懵懂，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门学科。于是，我考虑先巩固一下学业基础，结果就选择了哲学专业。也许是时任院长安倍能成的想法，当时学习院大学（位于东京都丰岛区内的一所私立大学，日本的大多数皇族就读于此，故被誉为“皇家大学”。——译注）文学系哲学专业的学生在修完哲学、历史、宗教等课程以后，毕业论文题目可以自选。在欧洲，文科类的高中要学习人文教育课程，也就是通识教育。很偶然，我在大学学习了这门课程。于是，毕业论文我就选择了“论15世纪佛罗伦萨美术”这一论题。论文指导老师有三位，他们是研究西洋美术史的富永惣一老师、研究中世纪思想史的下村寅太郎老师、研究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吴茂一老师。之所以有三位老师指导我一个人，是因为那一年哲学专业人文学科四年级的10名学生中，只有我一

人选了与西方相关的题目。

三位老师给我的论文打了个“良”。现在回想起来，那篇论文只是写了一些皮毛而已。尽管当时的我只是一名学生，但是，始于歌德《意大利游记》终于奥维德《哀歌》的这篇文章实在算不上是论文。在论文答辩现场，三位老师嘴里说着“你的想法我们理解”，脸上流露出来的神情却很茫然，让正在进行答辩的我感到十分好笑。对于这三位仁慈的老师，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每次出新书，我一定会赠送他们一人一本。

不管怎样，大学总算顺利毕业了。毕业典礼结束后有一个师生告别会。学习院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生加上选修哲学课的学生总共不到20人，所以我们去了目白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馆。当时的告别会非常节省，就连学习院大学也不例外。

指导我毕业论文的三位老师都没有去。坐在我前面的一位教授和我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说：

“你研究的不是历史。”

“您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学我理解，但是如果您说不是历史，我不同意。”

当时的日本还很穷，大学生去海外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没看到过实物，参照的都是照片。两年后，我到了意大利，最先去的就是佛罗伦萨，参观了乌菲兹美术馆。

第一次面对如此非凡且数量众多的美术作品，我感动万分。我向诸神发誓，绝不评价任何一幅作品。我深深意识到艺术作品不应该听别人的讲解，而是应该自己虚心地去体会，从中悟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么，怎样才能和作者进行心灵交流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

多地去欣赏优秀作品。后来我用了两年时间，以意大利为轴心，游历了欧洲和中近东、北非。《米其林指南》也被我翻烂了。

就在我结束这次旅行之后，在一位相识的编辑建议下，我开始了写作。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对艺术作品不作任何评价。所以书中的主人公不是那些留下了作品的创作者，相反，主人公都是未曾留下过任何作品的创作者。因为赶上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因为赶上了中世纪价值观蜕变而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观的时代，所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成为时代的创作者，虽然他们没有留下供我们今天可以用肉眼去欣赏的作品。创作者留下的作品无须别人论长道短。但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肉眼欣赏的作品的人，我想，了解他们不会一无用处。

就这样，我写作并发表了15部以上的作品，统称为“文艺复兴种种”。写作就要学习，学了就要思考。写毕业论文时我遇到了很多疑问，阅读日本人写的研究成果时碰到了许多我无法理解的问题，正因为大学毕业时的我把这些疑问一股脑儿地扔了过去，才让参加答辩的老师们感到茫然不知所云。所以我想，要解开这些疑问，必须阅读相关史料，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住在意大利。

在学习、思考、写作的过程中，随着对文艺复兴的了解越来越多，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西欧奠定的价值观不断蜕变的时代。我赶上了统治近代西欧的价值观崩塌的时代，赶上了支配中世纪的基督教价值观崩塌后的文艺复兴人。他们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观，首先回归的是古罗马。我也要回归，我要首先弄清楚古罗马是什么。于是我写罗马。鉴于上述原因，我对罗马人抱有浓厚的兴趣也是很自然的。

第一部 佛罗伦萨篇

对话是在以下几个地方进行的。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巴杰罗宫、圣马可教堂、美第奇宫、圣洛伦佐大教堂、鲁切拉宫、韦奇奥桥、皮蒂宫，以及现在叫作米开朗基罗广场的、站在上面能将佛罗伦萨尽收眼底的小山丘等。

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不知道该从何问起。其中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于我的脑海，就从这里问起吧。

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本质上了。既然这样，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就先放一放，我先来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吧。

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就是后人命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的本质。

但是，这一精神运动不只是局限于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这种欲望爆发的结果就是在以造型美术为中心的各个领域，结晶出了一件又一件“作品”。

创造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理解行为的“王道”。但丁说过，单纯依赖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口、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scienza”（科学）。意大利语中的“scienza”翻译成英语就是“science”，其词源是拉丁语中的“科学”（scientia），其背后的意思是“知识”、“理解”。我想，scienza这个词，无论是把它翻译成“科学”还是“学问”，都不如其词源所隐含的“知识”乃至“理解”更为贴切。为什么

说但丁这话是正确的呢？只要你试着把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用口头的形式告诉他人或者用笔写成文章自然就会明白。你会明白大脑中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表达这一途径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当然，说和写是向他人传递思想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手段的话，那它们充其量不过就是手段而已。事实上，它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作品，甚至被说成是未完成的创作家。但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我认为他之所以未完成作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众多艺术家所猜想的一样，即莱昂纳多主动放弃继续创作，因为他认识到了以自己的能力无法把大脑中描绘的美和深度用画笔表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只有像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才知道的，那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品尚未完成，他已窥见了作品的全貌。既然已经看到了、知道了出来后的作品会是怎样的，那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就随之消退。这种情况下，莱昂纳多的做法就是放下画笔。与他相比，才能远不及他的画家们完成作品的比例要高许多。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这一假设。

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批怀揣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的人。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从而学习、制作，自然而然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

那么，为什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这种欲望到了那个时期会突然爆发呢？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千年间，人们的欲望一直受到抑制。

是谁抑制了人们的这种欲望呢？

是基督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者有幸”。也就是说，天堂之门只为相信的人开放。

相信的反面就是怀疑。从你连连发出“为什么”这一态度来看，你已经具备“文艺复兴精神”了。

这么说，我上天堂已经没有可能了。

如果你是生活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徒，那真是希望渺茫。

附在本书后面的重要人物简历一览中，您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排在了“文艺复兴人”的第一个，他是基督教徒，而且死后被列入了圣人的行列。然而根据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文艺复兴”的第一人通常不是但丁就是乔托·迪·邦多纳。

认为文艺复兴始于诗人但丁或画家乔托，大概是考虑到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在艺术上的成就吧。应该说，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艺术家们都是一朵朵巨型的花。要让这些巨型的花盛开，首先需要肥沃的土壤，同时，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也不可或缺。文艺复兴作为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运动，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最华丽的成果。提供这一精神运动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阳光等条件的，我想正是宗教人士圣方济各和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尽管乍看上去，他们似乎与艺术毫无关系。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非宗教性。然而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修道会的创始人，并为普及基督教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圣方济各是文艺复兴人呢？而且还是第一人？要说清楚这一点，有必要先了解基督教在他之前也就是在中世纪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我说明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把范围限定在西方宗教上。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有教义

的宗教，另一类是没有教义的宗教。两者完全不同。有教义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属于一神教。无教义的宗教代表是希腊人及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属于多神教。

其次，有独立的神职阶级和无独立的神职阶级。两者也不相同。有无神职阶级与宗教是否有教义关系密切。因为无论是犹太教的祭司还是基督教的神父，他们作为神职人员，任务是向普通信徒传播并解释、讲授教义。这个任务正是他们存在的主要原因。希腊、罗马的宗教没有教义，自然无须专事传播或讲授教义的神职阶级。事实上希腊和罗马也没有这一阶级。

4世纪初，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一世。他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其他宗教存在，罗马的宗教也还没有遭到禁止。但是到了4世纪末，在皇帝狄奥多西的授意下，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原本就认为神是唯一的，不承认有其他神的存在。从理论上说，狄奥多西的决定是正确的。就这样，在明确了属于一神教的基督教为唯一合法宗教后，包括罗马宗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都被看成异端邪教而遭到禁止。基督教有《圣经》，有教义。既然天下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那么，读《圣经》、向普通信徒布道的神职阶级势必获得更强的独立性以及更大的权力。

一个组织在排除异己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的组织。这算不上是好事，却是现实的人性体现。一个组织为强化自我，使用的第一个“武器”就是针对每一项罪行制定出相应的惩罚制度。基督教出台的惩罚制度极为严苛，就连未及时忏悔、周五吃了肉等等，都是罪孽，都要受到惩罚。如果把所有的罪孽加起来，一个人即使花上一生也不可能赎回。第二个“武器”是强调地狱的存在，用“会下地狱”威胁人们。基督教说，现世遭遇的不幸是上帝对人的考验，只能忍受。因为从没有人去过地狱并从那里回来，自然无法证实地狱是否真的存在，那么作为威胁，

只能说这个武器是有效的。信者有幸，天堂之门将为他们打开。于是，善男信女们自不必说，那些害怕死后下地狱的人也会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神职人员抛却俗世把一生奉献给了神，他们因此可以免除这些罪孽。可想而知，神职人员的威望和权力自然大大提高。

话虽如此，人们怎么可以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始终做顺从的基督教徒呢？

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要强大起来，单靠抽象的说教是不行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人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伪造的。这份捐赠书的内容是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后，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国土也就是后来的欧洲的土地捐赠给罗马教皇。在整个中世纪，没有人怀疑这份捐赠书的真伪，它成为教会坚称土地的真正所有权属于基督教会的依据。在这片生产基地同时又是生活场所的土地上，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向教会租借了土地而已，其租赁权是否继续生效，决定权在基督教会。

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洛伦佐·瓦拉是位著名的古典文献学者。他通过分析《君士坦丁捐赠书》中使用的语言，证实基督教徒所依据的这一史料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世时的4世纪所写，而是11世纪伪造而成的。这就意味着从12世纪到13世纪的圣方济各时代，人们依然相信《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真实的。我想，中世纪的人们之所以成为教会这一“牧羊人”后面顺从的“绵羊”，原因之一就是现世的这种束缚吧。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标准基督教徒眼里，怀疑就是邪道。洛伦佐·瓦拉对既有观念提出怀疑，并断定《君士坦丁捐赠书》系伪造的这份勇气，完全符合作为文艺复兴人的条件。但是，第一个有勇气对既有思想表示疑惑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怀疑的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既然这样，我很想知道圣方济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无疑是个异类。

先说说他的出身。他是跨国婚姻的结晶，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混血儿”。父亲是阿西西人，因为经商在法国南部逗留期间结识了当地一名女子并与她结了婚，把她带回阿西西，生下的孩子就是方济各。所以圣方济各身上同时流淌着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血。他父亲为他取名为方济各（Francesco，又译弗朗西斯）。现在的欧美，取这个名字的男性非常多，但在他之前从没有人用过，英语叫Francis，法语叫Francois，德语叫Franz，西班牙语叫Francisco。这些名字的出处都是出生于阿西西的圣人方济各，所以都是意大利语Francesco的派生词。Francesco是法国人的意思。给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可以想象，丈夫是多么爱那个从法国远嫁而来的妻子。尽管我们不知道圣方济各的母亲姓甚名谁，但是作为一个妻子，她一定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圣方济各提倡的基督教教义，不是之前人们听到的既严厉又恐怖的教义，而是充满了爱的教义。我想这与他父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

只要抛却中世纪前期那个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固有观念，虚心学习《圣经》，那么，圣方济各带给基督教会的革命，一定可以让人们体会到耶稣的教诲是充满爱和善的。耶稣基督认为与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相比，盛开在野地里的百合花更值得爱惜。由此可见，圣方济各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是正确的。传教时，他使用意大利语。在当时意大利语被叫作俗语。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尽管知道拉丁语是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当时

的世界通用语，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学习拉丁语。用拉丁语向他们传教无异于对牛弹琴。尽管他们用拉丁语做祷告，充其量只是机械地背诵，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相反，如果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意大利语，那么无论是传教还是祈祷，民众都会有切实的感受。圣方济各的希冀就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基督教的教义。就这样，阿西西的这位修道士打破了由神职人员建立起来的宗教独裁体制。

圣方济各最关心的是贫困，这是他创设的方济各修道会的宗旨。但是尽管如此，他没有向罗马教廷发出断交信，虽然罗马教廷汇聚了程度不及所罗门却也穷奢极侈、饱食终日的高层神职人员。相反，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罗马教皇对方济各修道会的认可。既然这样，与后来的路德相比，难道还要说是圣方济各给基督教会带来了革命吗？

在意大利语中，神职阶级叫clero。圣方济各并没有否认这一神职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专职人员传授并讲解教义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对于教义的解释，自己与之前的其他神职人员不同而已。对圣方济各开创的崭新解释所体现的意义表示理解并全盘接受的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如果你了解英诺森三世，就更容易理解圣方济各作为当时的神职人员之一，是怎样的一个异类。

说到英诺森三世，我想起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说，他是一位让罗马教廷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教皇。

此人出身于罗马近郊一个封建领主的家庭。在当时，这样的家庭通常由长子继承家业，次子成为神职人员，老三或受雇于其他领主担任军职或入赘妻子家，以此来保证家族的平安。所以，英诺森三世进入神职界并非缘于他多么信仰宗教。作为一个家庭，如果孩子能在基督教会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中出人头地，那么一家的平安系数就会大大提高。因此，他们毫不吝惜地对要进入神职界的孩子进行教育投入。年轻时的英诺森三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过神学，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过教会法。

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在当时的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

本来就有异于常人的天赋，再加上这样完美的学习经历，在罗马教廷这样一个汇集了封建领主子弟的组织中，英诺森三世自然会受到重用。刚满38岁，他就当选上了教皇。

坐上教皇的位置以后，他取法号为英诺森三世。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加强以罗马为根据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权力，而上面提到过的《君士坦丁捐赠书》就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工具。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他使出的杀手锏一是“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二是“开除教籍”。教皇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令一下，意味着某地的神父不得为众信徒主持各种仪式。这样一来，刚出生的孩子就无法接受洗礼，年轻人结不了婚，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涂油圣礼。也就是说，将要出生的孩子、准备结婚的人以及即将离世的人都得不到神的祝福。这样一来，善男信女们就会感到不安。

开除教籍的处罚就更严厉了。教皇规定基督教徒不得和被开除教籍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于是，被开除教籍的人生意做不成了，服从领主的义务也被剥夺了。这样的处分对皇帝，对国王，对封建诸侯来说具有多么强大的威力，你可以想象得到吧。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领主，正因为有顺从他们的人，其地位才能稳如泰山。如果没有了追随者，那么皇帝将不成其为皇帝，国王不成其为国王，领主不成其为领主。因此，在这个强有力的武器面前，他们束手无策。罗马教皇的惯常做法是，首先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惩罚。如果不奏效，就以“开除教籍”来穷追猛打。无疑，在中世纪再也没有比这些武器更强有力的了。像德意志国王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四世站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向教皇祈求撤销开除教籍处罚的“卡诺沙忏悔之行”，只可能是发生在圣方济各时代一百年前的事件。

利用这一武器，教皇英诺森三世迫使英国、德意志王国、法国、意大利的王侯们接受了他的说法，即王国正统的所有权属于罗马教廷，他

们不过是受罗马教廷的委托来管理各自的国家而已。他甚至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充其量只是月亮。以上就是教科书中对“天主教会鼎盛时期的罗马教皇”所作解释的依据。

文艺复兴人之一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如果“领袖必须同时兼具狮子般的勇敢和狐狸般的狡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英诺森三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人物自然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因此，尽管教皇英诺森三世是基督教会旧体制的代表，但是他意识到方济各修道会将成为天主教会的新体制，于是他为方济各修道会的成立送去了祝福。对基督教信徒来说，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礼物。我想这不是因为喜欢贵族派头、喜欢奢华生活方式的英诺森三世对圣方济各提出的清贫思想有共鸣，而是因为他认为，罗马教廷这一巨大的组织作为“太阳”，有必要引进新鲜血液，来激发组织的活力吧。这一年，身着华丽法衣的英诺森三世51岁，只穿一件清贫修道服的圣方济各2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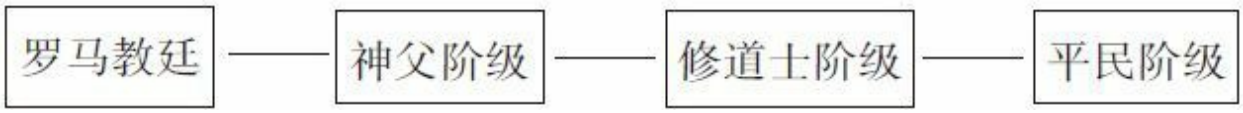
英诺森三世接受一个异类，承认他的地位并帮助其开展事业的行为，不能不说出人意料。也许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让英诺森三世看人的眼光也变得客观了吧。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关于此人后面会详细谈到，他是勇敢举起反旗，反对罗马教廷，但又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一个人。

从修道会后来的发展来看，可以了解同意方济各修道会活动的英诺森三世的判断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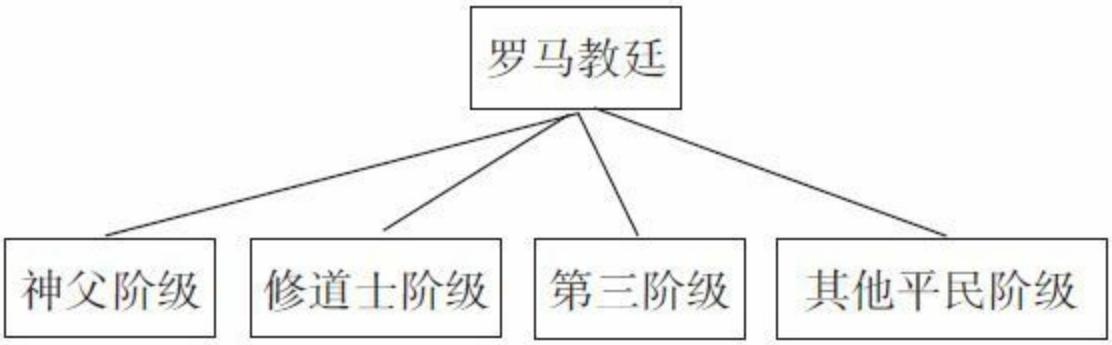
耶稣基督说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教皇。因此得到教皇的认可，年轻的圣方济各以及和他同辈的、圣方济各派的年轻修道士们都非常高兴。更重要的是，教皇的祝福增强了信徒们的安全感。因为得到教皇的认可，意味着不会被说成是异端，也不会被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乃至开除教籍的惩罚。如果当时坐在教皇宝座上的不是英诺森三世，而是顽固的守旧派人士，那么刚刚诞生的方济各修道会或许会被打成异端吧。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僵化。

但是，方济各修道会兴盛的原因并非是得到了教皇的首肯。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于圣方济各对《圣经》所作的崭新的诠释。他诠释基督教是传播爱的宗教。第二个原因是接下来要说的，在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圣方济各是商人之子，对现实非常敏锐，可以说他的这种组织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在当时，欧洲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徒，欧洲社会分三个阶层，分别是总称为“贵族”的神父阶级、被称为“教士”的修道士阶级以及平民阶级。不娶妻不生子、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的人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用图解方式，大概是这样的：



圣方济各打破了这一阶级划分，用图解方式来看打破这一划分后的结果如下：



圣方济各对于那些无意进入修道院度过一生但从心里赞成圣方济各提出的宗旨的信徒，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无须违背自己的意志，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基督教的规定，留在俗世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每年离开俗世到修道院修行几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

可以想象，他的这一回答带给当时的人们多大的慰藉。圣方济各把

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他们为“第三阶级”（teizaordine），纳入到方济各修道会。人们因此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不仅男性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女性同样因为参加了第三阶级而自认为得到了拯救。出身阿西西、与圣方济各自幼相识的圣基亚拉创设了方济各修道会女子组织，和男子组织一样成为第三阶级。圣方济各宗派信徒数量激增，这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把圣方济各看作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还在于他接受并践行了选择自由这一人类的最基本权利。

他认为把自己的每一天奉献给神的神父和教士与生活在俗世的平民之间的区别，不是前二者优于后者，而是选择的不同。此外，圣方济各从不强调只有自己的宗派是正确的，从而指责其他宗派是错的。就算遭到了同时代创设的竞争对手多明我会的谩骂和侮辱，方济各修道会也从不予以反击。至少从圣方济各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谴责其他宗派的话。不仅如此，他对不属于圣方济各宗派的平民也不带任何偏见。因为他坚信这些人有选择的自由。

他坚信只有基督教的神才是正确道路的引领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一神教教徒。对于坚信这一点的宗教人士来说，向异教徒传教是对神应尽的义务，而且当时正处于十字军东征时代。皇帝、国王以及君侯身先士卒，为夺回圣地而亲率的十字军远征总计就达七次。事实上，在诸王侯回国以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局部战争也从未间断过。也就是说，从1096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到1270年第七次十字军远征结束的170年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从未停止过战争。

已过35岁的圣方济各决定前往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他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同时通过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共处。

说到底他终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前往巴勒斯坦的他裹着头巾，身

穿茶色修道服，腰系草绳，脚穿皮拖鞋，和平时的装束并无二致。随行的是几名同样装束的修道士。他们未带任何防身用具，别说是武器，连短刀也没带一把。就这样，他们来到伊斯兰方面的营帐前，宣传基督教，呼吁实现和平。

对于这一状况，伊斯兰方面异常吃惊。天天与从头到脚藏身于钢铁盔甲中的基督教骑士们刀剑相接，某一天突然出现几个如此奇怪的男人，他们当然会吃惊。

当时的阿拉伯人坚信自己比西欧人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阿拉伯人没有逮捕圣方济各一行人，也没有杀他们，反而派出士兵护送他们回到基督教一侧的阵营。阿拉伯人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杀宗教人士，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几个人是疯子。圣方济各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了的事不会轻易放弃，即使失败也绝不退缩。但是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再作第二次尝试。大概他也明白自己怎么做都是徒劳。

尽管如此，在西欧的教徒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在圣方济各步入老年之前，赞同并接受他教诲的人已经跨越意大利，遍布到了欧洲各地，尤其是当时的新兴阶级——商人和手工业者。

他说只要遵守基督教教义，挣钱也是好事。只要把挣来的钱捐赠给修道会，用于帮助麻风病患者、孤儿以及穷人，就是对神的献礼。既然挣钱不影响成为好的基督教徒，人们自然高兴。我再说一遍，当时是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只要有战争，人和物就会动起来。生产是手工业者的事情，而把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物品推向社会的是商人。负责输送人和物资的是拥有船只的意大利海洋城邦。阿玛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这些海洋城邦成了“十字军特需”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罗马教廷有一个汇集庞大款项的收入体系。这些款项来自基督教徒缴纳的“什一税”。佛罗伦萨的兴盛就是始于他们负责管理自动进入罗马教廷的这些款项。很难用“商人”一词来概括的这些新兴阶级成了圣方济各宗派的中坚。

尽管这一类人成了信徒的中坚，但是，圣方济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因此抛却尊重穷人的精神。他的这种坚守为文艺复兴在艺术领域铺平了道路。

圣方济各认为教堂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装饰不宜豪华。但是让很大一部分目不识丁的人理解《圣经》中的故事很有必要。之前的教堂利用镶嵌工艺把《圣经》内容以及圣人们的行踪以“图解”的形式绘于墙壁之上。但是镶嵌工艺制作费过高，而且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与此相比，在半干的灰浆上面快速作画的壁画画法不仅费用低，而且因为在灰浆干透之前即会画好，所以出来的壁画效果既素雅又大方，给人很质朴的印象。

可以说没有圣方济各，壁画艺术就得不到复兴。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壁画，其中绝大多数杰作都在圣方济各宗派的教堂里。它成就了乔托，并为文艺复兴绘画艺术开辟了一条大道。文艺复兴不能不提圣方济各。

原来如此。关于圣方济各在文艺复兴中的位置我懂了。但是，作为离不开政治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什么也是文艺复兴人呢？他是神圣罗马帝国之长，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算作中世纪的产物，所以他应该是属于旧体制的人，而不是新体制的人，不是吗？

你说的没错。无论是其出身还是社会地位，他都属于主宰中世纪的旧体制一方。

首先，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组织，它试图在欧洲复兴类似以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之名存在的、由基督教主宰的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而这个组织的皇帝恰恰是腓特烈二世。强调教皇是“太阳”，而他只是“月亮”的主张是基督教会强加给他的一个立场。

其次，十字军东征是借“神之所望”这句话而发起，在这个时代，他

的先辈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积极参与者。腓特烈二世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祖父的伯伯康拉德三世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他的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历史上著名的“红胡子”（巴巴罗萨），此人是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另两位将帅是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腓特烈二世本人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尽管他在想法和结果上与两位先辈截然不同。

作为皇帝的后代，完全浸泡在旧体制中的腓特烈二世，其出身和商人之子圣方济各完全不同，但是二人又有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是“混血儿”。圣方济各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腓特烈二世的父亲是“红胡子”的儿子亨利六世，所以是德意志王国的人，母亲康斯坦萨是诺曼王朝之后，其祖先从诺曼底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后开启了诺曼王朝，所以腓特烈二世是法裔意大利人。

第二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意大利出生长大，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当时的意大利在接受异域文明方面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开放。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异类的加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有很多接受后世所谓“文化冲击”的机会。

第三个共同点也是第二个共同点的必然结果，那就是二人都对既有观念持怀疑态度。有了怀疑就会设法寻求解开疑惑的方法。

圣方济各认为应该恢复耶稣提出的教诲——“穷人要得救”。皇帝腓特烈二世则认为基督教世界应该恢复耶稣的另一条教诲——“神的东西归神，皇帝的东西归皇帝”。

第四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阿西西是意大利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

个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要培养独生子，财力上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尽管相距并不遥远，圣方济各终究没有迈入博洛尼亚大学之门。

腓特烈二世3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尽管如此，他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所以理应受过一些教育。只是他没有上过在当时用拉丁语叫作“universitas”的大学。回头看一下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可是就读过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人。

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必不可少。但是教育也会带来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接受的教育越多，灌输的既有观念就越多。圣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碰巧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毒害。我想，或许这就是决定他们二人人生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只是摆脱了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因素而不懂正面的东西，就会终其一生陷于无智的境地。好在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教育上的不足。当然，二人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圣方济各虚心学习《圣经》，倾听耶稣基督的教诲，关心保护那些不愿意和人交流、讨厌别人接近、只会一个人面对大自然倾听小鸟鸣叫的麻风病患者。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看重源自自己心底的声音。

腓特烈二世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沉湎于阅读一本又一本的书。由于母亲这方的祖先、诺曼国王们的开放政策，生活在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很多。因为他和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都有交往，所以他接受的是自由的、现实的教育，远离偏见。蒙雷阿莱主教堂是腓特烈二世的外祖父那一代人建的，内部装饰采用的是镶嵌工艺，装饰风格是阿拉伯式样。相信参观过这座教堂的人看到此番情形一定会瞠目结舌。腓特烈二世虽然是德意志王国的人，却生长在意大利。在这里，用意大利语读音来称呼他的名字Federico更适合。圣方济各据说会意大利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而腓特烈二世会的语言远远不止两种，除了意大利语和法语，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阿拉伯语。之所以学习阿拉伯语，不只

是因为他的西西里臣民中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更是出于学习科学的需要。腓特烈二世兴趣广泛，尤其擅长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要学习这几门知识，在当时要么看阿拉伯文写的书籍，要么请阿拉伯人授课。

于是，在基督教世界里腓特烈二世只能是一个异类。如果他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人，那么就算是异类也没有任何不方便，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存在有赖于和异教徒之间的通商。但是，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保护基督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想，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圣方济各比他容易多了。因为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首肯，方济各修道会不存在被认定为异端从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相反，腓特烈二世终生未能摆脱被开除教籍的惩处。因为他拒绝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

腓特烈二世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800年了，现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分成三类，用意大利语就是：

“无神论者”（ateo）——泛指无神论者、无信仰者、不相信神的存在的人。

“有神论者”（credente）——说的是有信仰者，特别是那些说自己是“职业的”有神论者的人，他们忠实地遵守规定，每逢周日必去教会做弥撒。

“信而不迷神者”（laico）——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是明确区分宗教和非宗教领域的人。

修道士圣方济各自然是“有神论者”，而且是“职业的”有神论者。至于腓特烈二世，他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在那个时代，即使是“信而不迷神者”也被看作是“无神论者”。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信而不迷神者”，他的著作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科学家伽利略是“信而不迷神者”，在基督教会的高压下，他被迫宣布放弃支持日心说。文艺复兴就

是这些“信而不迷神者”发起的一场精神运动。腓特烈二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生活在基督教会肆无忌惮地宣扬“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那个时代。他不得不与这样的基督教会为敌。

除他以外的皇帝和国王们从不抗议自己被当作月亮或星星吗？

抗议是常有的事。但是，他们的抗议只围绕一个任命权，即在皇帝或国王统治的国家里，负责神圣事务的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应该掌握在教皇手中，还是应该掌握在皇帝或国王手中。人事权是权力之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摆脱不了单纯的权力之争的印象。然而，腓特烈二世向教会提出的反抗是要从根本上分离政治和宗教。可以说这已经是15世纪马基雅维利以及18世纪兴起的启蒙主义的前兆，是“信而不迷神者”思想向中世纪体制发起的挑战。

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的精神具体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呢？

第一点是完善法律。因为古罗马帝国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所以或许应该说是法律的再完善。

第二点是设立官僚机构，辅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设想中的帝国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所以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官僚机构必不可少。

有没有建立类似中国科举制度那样的考试制度呢？

没有。与其相信别人的判断，腓特烈二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第三点就是完善税制。由于国家功能在漫长岁月里遭到废弃，要让国家功能重新发挥作用，就需要重建基础设施。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需要经费。在筹措经费方面，通过完善税制，他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税率实在很高。

在那个时代，税金通常由各封建诸侯负责收取。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征收，只要能收上来。腓特烈二世制定的税率虽然高，但不是对所有情况都课以重税。关税是最容易征收的，但是，关税的税率定得很低。这是因为他知道提高经济实力是帝国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经济的振兴依赖物产的流通，那么降低关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第四点是整顿通货。这是为了追求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出台的一项政策。

中世纪时代的国际通货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铜币和伊斯兰国家的流通货币第纳尔。欧洲的流通货币被看作是劣币，信誉度很低，就连欧洲人自己在收到自己国家的货币后也会马上把它兑换成铜币或第纳尔。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欧洲货币的信誉度永远得不到提高。只要继续使用没有信誉度的劣币，那么经济振兴只能是一场梦。腓特烈二世立志复兴优良货币。

他给新发行的金币取名为“奥古斯塔尔”（奥古斯都式）。重量只有罗马时代金币的三分之二，但是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金币一样，用纯金制成，不掺杂其他物质。正面雕刻皇帝的侧脸，周围刻介绍性文字。显而易见，这样的设计沿袭了整顿罗马帝国通货制度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做法。据说这种货币刚发行时就受到人们的追捧，连东方人也很快接受了它。人们总以为是劣币驱逐良币。事实上，就算良币被劣币驱逐，那也只是暂时的，长远来看，被驱逐的还是劣币。当时，大多数王侯只顾眼前利益，乱造劣币，只有腓特烈二世深知拥有良币的好处。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根据地意大利南部铸造奥古斯塔尔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才发行高信誉度的优质金币，这些城邦在和他国的通商中逐渐积累起财富。

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第五个政策是改革学术和艺术领域，这个政

策带有浓厚的“信而不迷神者”色彩。

他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新建了一所大学。表面的理由是作为统治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内优秀人才为了求学不得不去外国大学就读这一现状。然而，腓特烈二世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博洛尼亚大学深受罗马教廷的影响，他不喜欢臣下学习博洛尼亚大学所教的基督教法律。也就是说，那不勒斯大学是为了对抗博洛尼亚大学而设的一个学府。那不勒斯大学可以看作是一所政法大学，这里教授的法律是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法律，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现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正式名称还是叫“腓特烈二世大学”。

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萨勒诺有当时欧洲唯一的一所医学院。腓特烈二世把它改造成了更加开放的学府。不论民族，不论宗教信仰，只要想在这里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不用说了，据说这所大学里还有女学生呢。

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西西里的巴勒莫既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自己的朝廷所在地。就在这个巴勒莫朝廷里，他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在这里收集到的文献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还有阿拉伯语的文献。聚集在这里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分别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拉伯和犹太国家。所以我忍不住想，这也许同样是模仿了古代著名的研究机构——埃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腓特烈二世甚至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君主写信，委托他们介绍优秀学者前来加入自己的研究所，而那些君主是当时教会严令禁止交往的穆斯林。皇帝直属的这个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使用的语言是欧洲知识分子也是世界通用语——拉丁语。名义上和事实上的真正“研究所所长”腓特烈二世本人也写过若干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关于对其喜好的猎鹰的考察。这项成果完全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是一本科学书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鸟类学的开端。

研究员中除了学者，还有不少文人。这些文人对源自古拉丁语俗语

变形而来的意大利语进行了改良。曾经的意大利语是平民百姓的语言，很粗俗，知识分子不屑于使用。把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推而广之的，就是腓特烈二世的宫廷。

意大利语作为一门语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就只能继续依附于独立性很强的拉丁语。当时的拉丁语是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独家经销商品”。只要这种状态继续，那么知识领域就很难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腓特烈二世需要创造出既可以表达高尚思想也可以表达细腻感情的意大利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的这一设想就在诗人但丁的笔下开花结果。《圣经》里说先要有语言。的确，语言这种东西在明确表现理性、感性和悟性方面是最好的“工具”。腓特烈二世坚信语言不属于神，它属于人类。

但是，腓特烈二世应该算是早于18世纪的启蒙君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受到来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小城市激烈而顽强的反抗呢？这些地方应该比同时代其他地区更充满生机的。

启蒙君主是有明确改革目标的领袖，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能一味地等待人们觉醒。等待人们去理解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有时为了实现目标，不得不行使强权。正因为如此，成为专制领袖就成了启蒙君主的宿命。

古希腊城邦雅典，在伯里克利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就是一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评价那个时代的雅典：表面上看是民主政体，实质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讨论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常常拿来与伯里克利时的雅典作比较。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功实现了政治稳定，而佛罗伦萨政局的稳定始于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掌握政局的时期。尽管科西莫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市民的身份，但是我们仍把从科西莫出道到其孙子洛伦佐去世的那个时代叫作美第奇时代。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作美第奇家族的

僭主时代。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从政治到文化的主导权都掌握在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从一介商人突然发迹的美第奇和出身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腓特烈二世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之间不只是出身的不同，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看，也有着两百年的差距：一个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一个生活在15世纪前半期。还有一点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极强的时代，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腓特烈二世心怀复兴罗马帝国型国家的野心。研究历史的后人常常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一野心是纯粹的时代错误。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洛伦佐·瓦拉揭露《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炮制的伪史料是在进入15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教皇以这份捐赠书为挡箭牌，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为手段，长期束缚着人们的言行。腓特烈二世认为，要对抗如此强大的罗马教廷，只有建立强大的世俗国家。

但是，腓特烈二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他把经济活动也纳入了统一管理之下，从而成功实现了意大利南部的经济振兴。他以为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然而，在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不依仗国家的帮助，他们的成绩都是依靠自身努力取得的，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反对皇帝的统制经济政策。古罗马人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会批准这些城市为自由城邦，允许他们实施城邦内政自治。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仅靠中央集权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一时成功也不会长久。只有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无论国土多么辽阔，国家功能都可以成功发挥作用。也许是因为腓特烈二世没有意识到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也许是因为他不得不与强大的宗教势力罗马教廷为敌，使他无法充分发挥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总之，在其他领域处事灵活的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了。

不管怎样，一直对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言论极度不满和愤怒的罗马教廷利用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商人阶级的反对，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这就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吧？

是的。发生在意大利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围绕神职授任权展开的教皇与国王之争不同，前者是意大利特有的现象。意大利商人虽然站在教皇一方，但是他们并不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应该说在观念上他们更接近腓特烈二世而非教皇，因为他们是信仰圣方济各创立的新宗派的中坚力量，而圣方济各的新宗派不提倡宗教介入俗世。也就是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反对的并非是腓特烈二世核心思想中的政教分离，他们反对的只是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国家统治的规定。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他们与教皇派是一致的。

罗马教廷除了征收统称为“什一税”的宗教税，还有来自分布于各地的大片领地以及信徒的捐款，数额庞大。但是在罗马教廷清一色的神职人员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管理这笔巨款。于是罗马教廷把管理这笔巨款的工作委托给了佛罗伦萨及米兰的金融业者。而极尽奢华的高层神职阶级所需的东西也都购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

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不同的抗争，它不过是一场缘于现实利害冲突的对抗。事实上，如果说佛罗伦萨属于教皇派，那么比萨和阿雷佐则是站在皇帝派一方。只因为这几个城邦相邻，平时就交恶不断。只有威尼斯站在这场争斗的外围，始终保持中立。因为威尼斯商人的顾客不是罗马教廷，而是东方的异教徒。

虽说在直接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撒下对抗种子的是他的爷爷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但是，腓特烈二世不加质疑地全盘继承了腓特烈一世。对此，我们只能怀疑他对现实的感觉过于迟钝了，甚至让人忍不住

想，在其他领域对现实相当敏感的他，是不是过于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了。圣方济各通过设立第三阶级使经济活动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与腓特烈二世相比，他对现实的敏锐度或许就源自其商人之子的出身而熟知商人的缘故吧。

说到圣方济各，我想起来了，这位宗教人士和腓特烈二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人都去过圣地，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和平。对吧？

不完全一样。圣方济各希望通过说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从而实现巴勒斯坦的和平。腓特烈二世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圣地之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圣方济各前往圣地完全出于自愿。

基督教徒为了夺回圣地，利用“神之所望”的借口派遣十字军东征。对此，腓特烈二世不仅不赞成甚至还很反感。他认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基督教徒的圣地，同时也是穆斯林的圣地。所以对于基督教徒所谓的“夺回”圣地这一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他持怀疑的态度。

话虽如此，但在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是世俗社会的最高长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所处的时代是基督教当道的时代，作为皇帝率领十字军东征是教皇强加给他的首要任务。罗马教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腓特烈二世率领十字军远征夺回圣地，每次他总想方设法找借口推脱，如等到把德意志诸侯完全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去，如等到镇压了意大利北部的教皇派叛乱后就去，种种理由不一而足。他一次次找借口拖延、一次次找借口推脱的态度激怒了罗马教皇。罗马教皇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严令腓特烈二世即刻率十字军远征，否则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

32岁的皇帝不得已只好率领军队离开了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然而，行至途中，他以船内疫病暴发为由，不到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国内。这下罗马教皇彻底震怒了，不仅给了他开除教籍的处分，还严令禁止意大利南部所有神职人员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

年轻的皇帝没有屈服，他以死罪相威胁强行要求自己领地内的神职人员一如既往地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同时谴责罗马教廷以《君士坦丁捐赠书》为挡箭牌，干涉俗世权力。当然，从心里他希望避免与基督教会发生正面冲突，他只是不赞成像从前那样派遣十字军远征。事实上，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基督教徒的皇帝和穆斯林的君主之间，在隔着地中海的西西里的帕勒莫和埃及的开罗之间，有过多次信件往来。

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和宗教人士圣方济各不同，他不相信只凭口头言爱别人就会接受你。他知道要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件事情必须对对方有益。和西欧大多数人不同，他熟知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形。他很清楚东方伊斯兰君主在那个时候完全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战争的条件。皇帝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建议。当时正好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刚刚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是耶路撒冷国王的独生女儿。因为这次婚姻，他的名号中又加进了耶路撒冷王的称号。埃及君主不愿意和这位既是耶路撒冷王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十字军对决，于是接受了腓特烈二世的提议。

确认了埃及君主的态度之后，腓特烈二世这才从海路向巴勒斯坦出发，时间是1228年6月，此时距离以疫病暴发为由返回国内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又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罗马教皇不明就里，终于放下心来，等待这个叛逆儿与异教徒之间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不辱他身上流淌着的鲜血。那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康拉德三世和率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红胡子”传给他的血。

因为事先已经和伊斯兰方面谈妥，所以虽然皇帝登陆时，随行的骑兵和多数士兵从头到脚身披钢铁盔甲，但是丝毫没有赶赴战场的气氛，倒像是前去参加阅兵式的现场。特意从开罗赶来迎接皇帝一行的穆斯林代表以同样的态度恭候贵客的到来。

腓特烈二世在独具伊斯兰特色的华丽宫殿里度过了在圣地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当伊斯兰高官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问：“为什么我没

有听到清真寺尖塔传出声音？难道它没有提醒信徒应该开始祷告了吗？”伊斯兰高官毕恭毕敬地回答：“为了表示对基督教世界的俗世首领的尊重，在皇帝逗留巴勒斯坦期间我们不举行祷告。”听闻此言，33岁的皇帝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

“这么说，你们穆斯林访问欧洲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徒也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

也许是皇帝的这句话让他们放了心，祷告恢复了，一到穆斯林祷告时刻，圣地的清真寺尖塔就齐齐地响起了钟声。祷告虽然恢复了，伊斯兰方面的高官还是有所顾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伏地祈祷。然而他们看到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情形，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只见跟随腓特烈二世而来的臣子中，有不少人一听到尖塔的钟声，也不管自己是否背对皇帝，都朝着麦加的方向跪了下去，头伏地开始祷告。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神情平静，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圣地的穆斯林这才知道神圣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臣子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不在少数。

在开罗的君主曾经严格要求他们对腓特烈二世一定要礼遇有加。但是，上面这一幕让他们在感情上起了变化。他们变得主动起来。也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圣地逗留期间一切进展顺利。第二年，34岁的皇帝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正式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

与伊斯兰之间有关和平协定的谈判同样进展顺利。谈判结果如下：

第一，巴勒斯坦境内与耶稣基督渊源深远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的主权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属于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基督教方面尊重并保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的主权，尊重并保证来圣地参拜的穆斯林的信教自由和安全。

第二，同意皇帝的军队驻扎在圣地。其任务是保护前来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兼顾保护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穆斯林。

第三，基督教方面从此不再向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所有伊斯兰国家发起侵略行动。

以这些条款为核心的和平协定在腓特烈二世和开罗君主签字画押后正式生效。十字军中的一部分人就这样留在圣地，担负起了警卫的任务。这就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对这个和平协定心怀不满并采取过激行为试图破坏协定的一定不会是伊斯兰方面，而是迄今为止在巴勒斯坦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的狂热基督教徒。事实上，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极力反对和平，并一次次地向罗马教皇告状，谴责腓特烈二世屈从了异教徒。

腓特烈二世回到意大利，迎接他的不是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而是继续执行这一处分。罗马教皇的说法是，没有杀死一个异教徒的十字军不是十字军。按照他们的想法，即使保证信徒在圣地朝圣时的自由与安全，但是既然这不是打败异教徒后取得的成果，那么，十字军就不是以夺回圣地为目标的十字军。所以，腓特烈二世严重亵渎了皇帝的职责。

结果，腓特烈二世的和平协定只维持了短短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伊斯兰方面不合作，而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和欧洲两地的基督教徒的强烈反对。围绕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再次燃起战火。在腓特烈二世缔结和平协定过去了短短15年后，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就被伊斯兰方面一一攻占。4年后，为了再次夺回圣地，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奔赴东方，经过6年的艰苦战斗却以失败告终，基督教徒未能如愿夺回圣地。路易九世于是再次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在远离巴勒斯坦的北非突尼斯成功登陆后，就被前来迎战的伊斯兰军队打得晕头转向。国王吃尽了苦头，最后病死在那里。接着，1291年，正如伊斯兰方面夸下海口说过的那样，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地中海，十字军被赶出了阿卡城，对于基督教方面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堡垒。至此，始于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宣告结束。当然，此时腓特

烈二世早已不在人世。罗马教廷把同样已经辞世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列入了圣人行列，历史上的圣路易说的就是此人。路易九世之所以被列入圣人行列，不是因为他创造了奇迹，也不是因为他像圣方济各那样拯救了无数的人，而是因为他远征异教徒并死在了他乡。

想到现在犹太和伊斯兰围绕耶路撒冷依然冲突不断，我觉得真是无话可说。

不是没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长久保持和平需，要各方的配合。这是必不可少的。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基督教徒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所以只要实现这一点，十字军就应该已经达到目的。但是，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最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也就是说，从最初要确保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变成了要把穆斯林赶出巴勒斯坦。腓特烈二世就是要终结手段目的化的弊端，只是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那个时代”这个词或许换成“在任何时代”更为贴切。

如果说生前信徒不断增多、死后第二年就早早被列入圣人行列的圣方济各是历史上的赢家的话，那么腓特烈二世只能算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在56年的生涯里他始终与罗马教廷抗争，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并且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在其子曼弗雷德这一代结束。但是不断远离中世纪的、有良心的欧洲人一定可以理解影响了后来欧洲各国形成的“信而不迷神者”的国家雏形就在腓特烈二世设想并为之努力的帝国之中，他们一定可以从腓特烈二世的无数功绩中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只有政治和军事强大，还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术以及文化等，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腓特烈二世表现出了一位优秀领袖的风度，而这正是文艺复兴诞生的自新又自立的人物形象。

今天还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去过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方一个叫蒙特的城堡（山上的城堡），你一定会关心建此城堡的目的何在，一定希望了解建造如

此特别的城堡的男人心中是怎样的想法。

最后，再说说腓特烈二世的外表形象吧。

因为基督教会把他断定为异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腓特烈二世的肖像画或雕像。刻意去找的话，最多可以看到一些画家画在其著作某个角落的画像或刻在皇帝御用印章里的浮雕以及印在金币上的侧脸。有记录说，他的头发和他祖父一样是红色的，但是没有任何史料提到他的身高如何。好在他临幸巴勒斯坦时，有一个见过他的阿拉伯人留下了一份记录。根据这份记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看上去身体极为虚弱，若放在奴隶市场，甚至卖不出高价。

蒙特城堡

从他一生的作为和成就推测，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他是一位很威风的美男子。然而，中世纪这位伟大的叛逆者，其形象竟然极其虚弱，甚至在奴隶市场上卖不出价钱，想想还挺有意思。

但是，肉体是父母所赐，思想则是后天自己形成的。如果是我，我更愿意用蒙特城堡来形容他的形象，以此缅怀这位不得已成为中世纪最大叛逆儿的男人，只因为他是过早出生的文艺复兴人。蒙特城堡以地中海上蓝天为背景，沐浴在阳光下，泛着白色的光芒，呈现出既优美且清晰的姿态。

接下来我们该谈到文艺复兴之花盛开的时代了。为什么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会在意大利发生呢？

罗马教廷是旧体制的根据地。有这样的罗马教廷近在身边是第一个原因。相距遥远时不容易看到问题所在；当它就在你眼前时，不用刻意去看，你也会注意到问题的存在。马基雅维利写过“罗马教廷快快搬去瑞士”，圭恰迪尼写过生前最想看到的三种情形之一是“神职人员不再对政治指手画脚”。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在同时代的法国、德意志王国以及英国找不出一个。在意大利，除了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以佛罗伦萨为首的其他城邦都是通过管理罗马教廷的财务来奠定经济发展基础的。每年罗马教廷会收到来自全欧洲信徒的税款、捐赠款，数额巨大。管理这些款项的是意大利金融业者。一旦人际关系中介入了金钱的因素，就一定可以看到人性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在一门心思赚取更多金钱的同时，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职阶级的真面目。

第二个原因是意大利出现了以居民自治为宗旨的“城市共同体”。这个“城市共同体”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进入法国，摇身变成了“公社”。

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同体”纷乱林立，到了15世纪，为数众多的“城市共同体”分别加入了米兰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罗马教廷）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等强国之下。

至此，共同体不再是自治体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而是摇身变成了“城邦”——符合各国国情的统一组织。当时各国的国情分别是这样的：米兰公国由公爵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由国王统治，教皇国由罗马教皇统治，热那亚共和国由四大家族分成两派交替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由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继续维持少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即寡头政治。

但是，真正担当得起“城邦”这一称呼的，看地图就知道只有威尼斯和佛伦罗萨。只有这两个共和国家继承了“城市共同体”的独立自主精神，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坚持这一精神。于是，文艺复兴之花首先在佛罗伦萨盛开，接着在威尼斯继续盛开。

为什么城邦只出现在意大利，而且还很兴旺昌盛呢？

这就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城邦。

想一想古希腊的城邦。所谓城邦，意思是“先有城市”，接着从城市开始，一步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最后形成国家的一种国体。城市共同体和城邦出现以前的中世纪处于以土地为资产的经济结构之下，是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掌握主导权的时代。相反，由那些没有土地但有智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城邦。甚至可以说城邦相当于智慧集团。两者在精神领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前的“贵族”是由血统决定的，此时成了但丁所说的“决定贵族的不是血统而是高贵的精神”。之前，看一个人是看他所拥有的土地有多少，看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多少代以前；此时，才能的高低和气魄的大小成了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

对于文艺复兴发生在中世之秋还是近代之春的争论我没有兴趣。因为时代的划分不是可以用一条线来划定的，不能简单地说某个时间点之前是中世纪，之后是近代。

话虽如此，13世纪是个分水岭却是事实。圣方济各和腓特烈二世是

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的两个人。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人口增长趋势突然停滞不前，而且由于瘟疫大爆发，人口急剧减少。尽管如此，在短时间内人口还是得到了恢复。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现在因为有福利制度，所以即使是弱势群体，生存也相对容易。在那个时代，人口增加的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能吃饱饭了。因“十字军特需”而出现的经济提升，受益的不只是海运、贸易、金融以及手工业，同样也惠及了其他各行各业。

受益的主要群体就是生活在智慧集团即城市里的市民们。他们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高，有学者认为，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们的生产力甚至达到了在封建领主以及修道院所属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40倍。事实上，从领土大小来看，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只能算作中等国家，但是它们的经济实力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法国、英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国家。

通商必须和异己建立联系，通过和异己的交流，就有机会接触新的事物，受到新的刺激。而受到这种刺激的正是在生产性上超群的智慧集团。因此如果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成功，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意大利各城邦一步一步地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它们的伟大之处不仅限于此，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对学术领域的投入。腓特烈二世也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他创设了萨勒诺医科学校，把原先单一的医术学校改造成了研究医学的学府，仅次于早已存在的世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腓特烈二世还创设了那不勒斯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该大学因为有威尼斯人的支持而成为最高水平的学府。这些被称为“大学”的最高学府集中创立于13世纪前半期。加上和它们在同一时期开始活跃起来的巴黎、牛津、剑桥等，现在依然领先于世界的欧洲主要大学，在13世纪都已经是大学了。有意思的是，进入14世纪，意大利的这几所大学和巴黎大学便早早开设了有关阿拉伯的专业。

1270年，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1291年十字军最后一名士兵被

赶出巴勒斯坦。至此，由西方向东方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西方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但是，战败后的欧洲并没有打算彻底忘记东方，忘记伊斯兰教，忘记阿拉伯。相反，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东方，了解伊斯兰教，了解阿拉伯。应该说这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美国各大学在越战结束后纷纷开设有关东亚的学科，两者何其相似。

无论是作为士兵还是作为海运业者或从商业者，参加过十字军远征的这些男人可以说对东方了如指掌。但是了如指掌只是个人的智慧，不会成为共有财产。只有经过科学研究，再通过语言、文字把它公之于众，才能成为人们的共有知识，让那些无缘亲历的人也能共享这些知识。冷静的、透彻的、科学的研究精神是改变偏见的最佳武器。无须借研究狂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作为例子，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根本。作为智慧集团的中世纪大学和城邦，尽管目的不同，手段却出乎意料地相似。罗马教廷以及封建诸侯极度反感因异类的加入而出现的文化冲击，他们坚持传统培养。到了中世纪末，他们陷入危机，成为诞生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开端。文艺复兴是重视质的时代，而不是重视量的时代，无论是与之前的中世纪相比，还是与后来的近代相比，这就是它的特点。因此，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国家形态就是作为智慧集团的城邦。一个事物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无论它有多好，都不会成功。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兴起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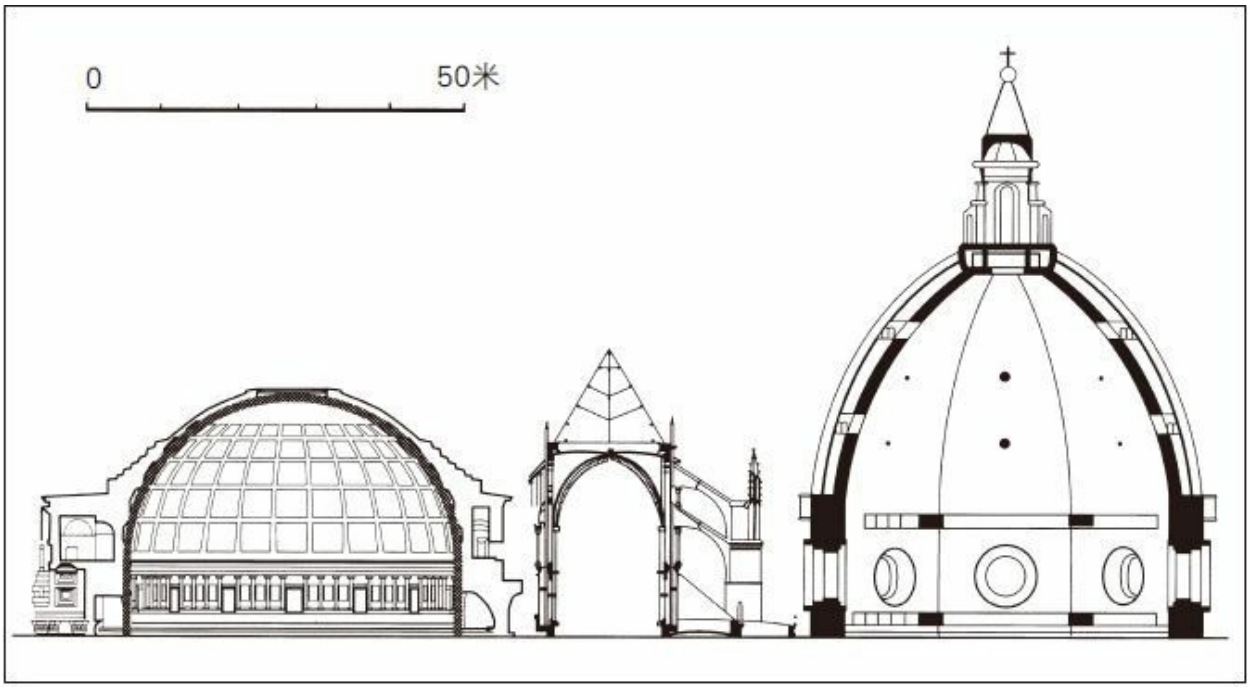
不能忽略古罗马帝国本土在意大利、首都在罗马这一事实。因此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罗马帝国。现代欧洲代表性的城市伦敦、巴黎、科隆、维也纳等已经发展成为与罗马齐肩或者规模超过罗马的大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美术馆中与罗马相关的展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及罗马的一座美术馆，即便是大英博物馆也同样如此。因为这些大城市在罗马时代，不过是多达38个

行省中的行省首都或军团基地，而罗马则是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之都”。罗马帝国时代的巴黎人到罗马后的感受和得克萨斯牛仔来到纽约、站在曼哈顿时的感受一定是相同的。

经过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并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再加上被当成便利的建材采掘场，罗马和意大利早已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注重质和量，所以尽管长年累月被弃之一边，尽管可用于建材的东西被劫掠一空，尚存的东西在质和量上依然胜于他地。在漫长的中世纪，异教徒的遗物或被抛弃或被束之高阁。随着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提倡“只要有价值，不论是否是异教徒的遗物都应该学习”，因而刚进入文艺复兴时代，这些东西就得以重见天日。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复古，对吧？

复兴是复兴，但它不是单纯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的模仿。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和他的雕刻家朋友多纳泰罗一起去看了以万神殿为首的很多罗马时代的建筑，这些建筑给了他一个启示，让他想到了佛罗伦萨第一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MariadelFiore，或译花之圣母大教堂）的圆顶应该如何去建。当然，罗马时代的圆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并非完全相同，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两者的比较图就一目了然。万神殿的圆顶顶部是开口的，透过这个洞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相反，在欧洲教堂中，第一个采用圆顶建筑的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其顶部是用大理石的顶塔封住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个金色的铜制圆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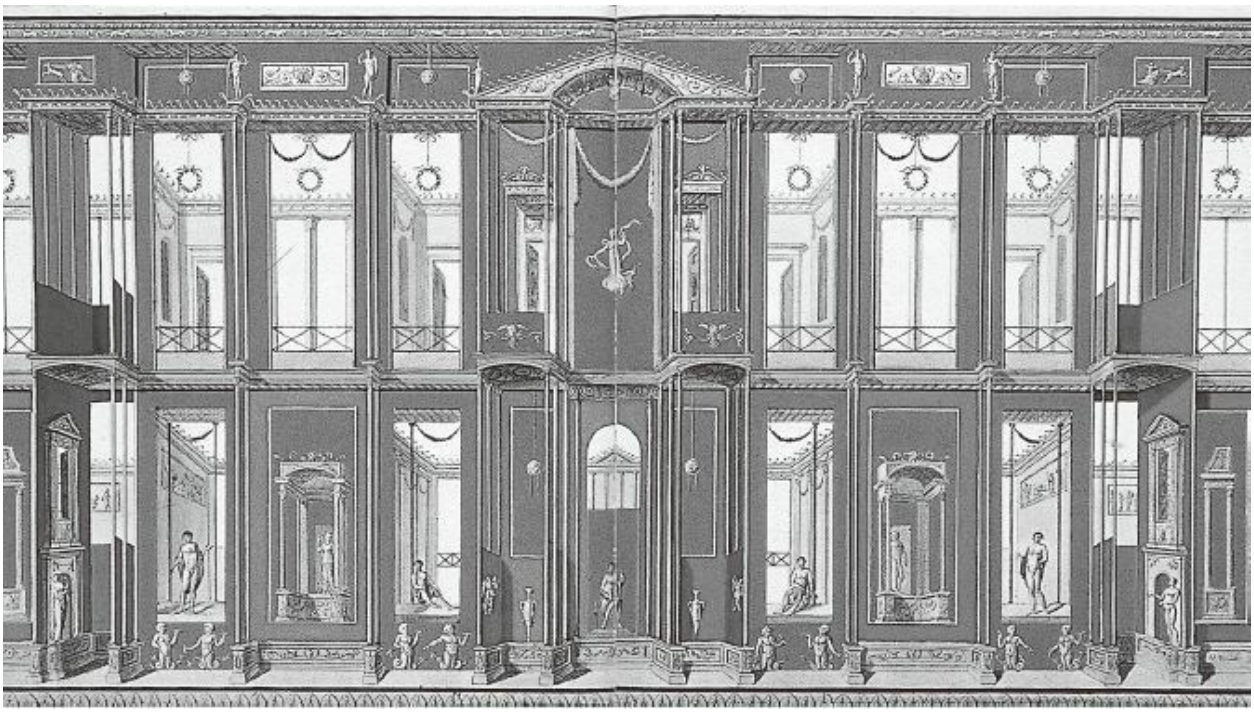
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比较（自左向左）：万神殿（罗马时代）、亚眠大教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圣母百花大教堂（文艺复兴时代）

于是，出于承重的考虑和抗震的需要，圆顶构造不得不改变。当然不能采用万神殿那样越往上洋灰屋顶越薄、再通过增加洋灰中的浮石来减轻重量的方法。因为即使减轻了圆顶上部的重量，塔顶的重量也会导致圆顶倒塌。于是，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加大倾斜度、增设八条棱线来增加屋顶部分的强度以及对整个圆顶采用双层结构解决了这一难题。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教堂作为祷告的场所，顶部开口并从开口处可以看到天空的开放式结构是不合适的。经过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改造之后，既复兴了罗马建筑的特色，即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满足了基督教的要求，从而创造了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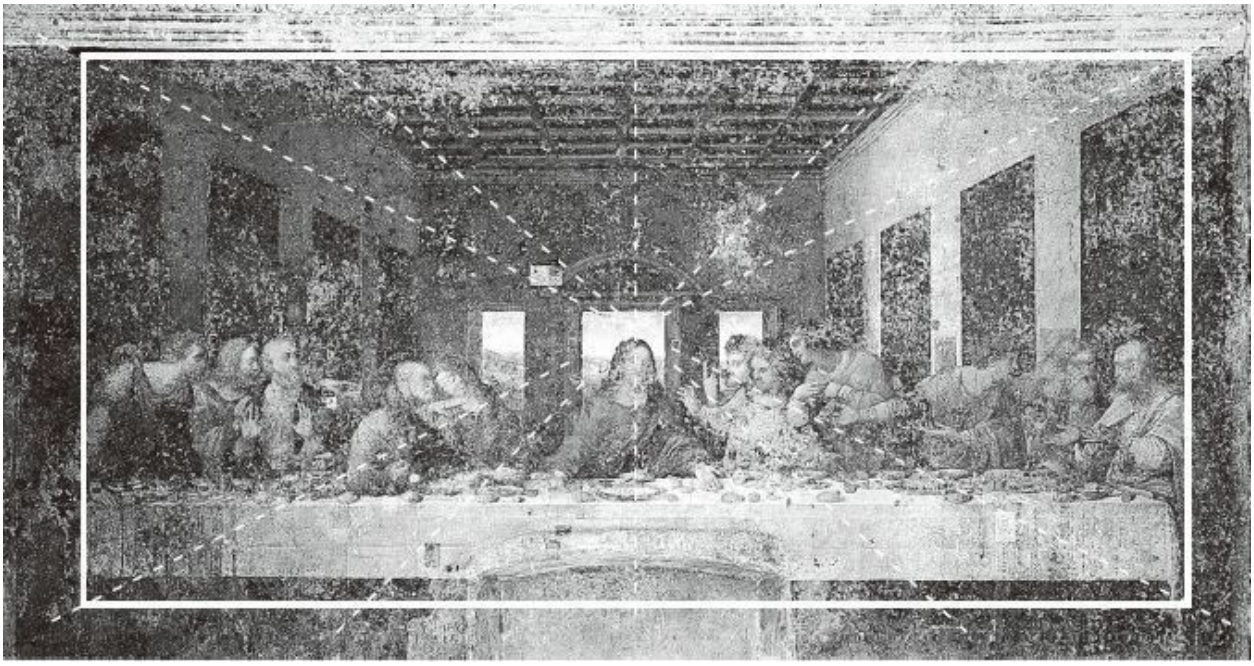
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绘画领域。发掘庞贝古城，使罗马时代的壁画重见天日是在19世纪以后，所以生活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无缘见识这些壁画。他们能看到的只有长期埋没在早已成为遗迹的图拉真浴场下面的壁画以及以“黄金宫殿”之名而广为人知的皇帝尼禄宫殿的壁画。现在，因为破损程度严重，很难重现其色彩。但是在500年前

的文艺复兴时期，相信这些壁画的线条和色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保存较好的。画家们看到这些壁画后，知道透视画法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得到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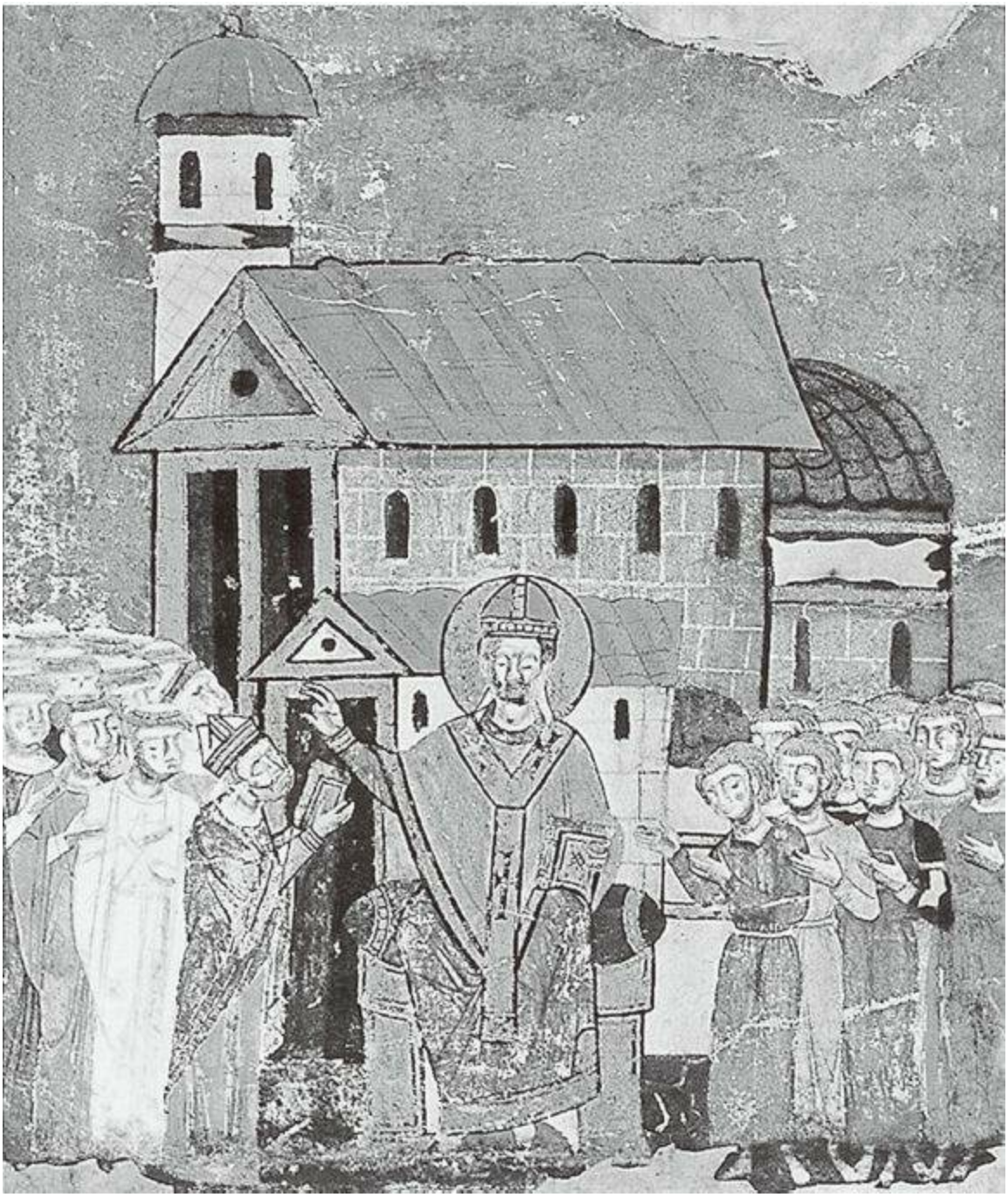
雕刻领域的情形也完全一样。人们在建造别墅时，把偶然发现的古物冲洗干净，并放在自家宅邸里作为装饰，这种举动最初并非源于对考古学的兴趣，也不是出于对艺术品的爱好。然而，放在家里的这些古物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新兴暴发户甚至不惜重金把它们纷纷收入囊中。结果连普通市民也开始纷纷效仿，他们或走进台伯河河床寻找古物，或挖掘古代竞技场遗迹和公路周边寻找此类物件。毕竟中世纪已经过去，曾经被当作不祥的邪教遗物而受到排斥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换成大把大把的金钱了。人们为拥有这些古物而自豪，他们会得意地向来客展示古物。而美第奇家族这样的藏家还会把自家的藏品拿到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在回廊里展出，供年轻艺术家们参观学习。在前一个时代，在基督教徒们的眼里，这些还都是肮脏的、不堪入目的东西，而此时，就连带头排斥它们的罗马教廷也改变了态度。无论是购买所得，还是强取豪夺所得，身披托加的人们穿行在这些不断增加的古代裸体雕像中已变得习以为常。回廊展示虽然还没有形成美术馆的格局，却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想看随时都可以去参观。



皇帝尼禄的黄金宫殿壁画（复原图）



最后的晚餐（1495—1498，莱昂纳多·达·芬奇画，为了展示透视画法，加上了辅助线）



中世纪的绘画：被信徒围住的圣人（13世纪手绘本）

只要没有被固有观念蒙住眼睛，看到从地下发掘出来的、重见天日的这些古希腊以及古罗马雕像，人们一定会为之叫好。文艺复兴人发现人体美再到发现裸体美是在人们看惯了中世纪着装雕像之后的事，这一

定又是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因为在中世纪，人们看到的裸体像，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瘦弱的基督。

但是，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1700多年的庞贝古城另当别论，那些无论是被弃之高阁还是躺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人们应该是能看到的。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中间有长达1000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说没有人发现这些东西，我很难理解。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当他不想看的时候就真的会看不见，当他不愿意思考的时候就真的不会去想。我不知道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否合适，请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普通德国人和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死去的犹太人。大多数德国人都知道有强制收容所。一个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平素里关系很近的人突然有一天不见了踪影。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也不愿意去想这件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真的看不到，也不会去想。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不愿意知道罢了。

尤里乌斯·恺撒说过这样的话：

>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作品中介绍说，没有比这句能更好地揭示人性真谛的话语了。尤里乌斯·恺撒是古罗马人，马基雅维利是距离他1500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这期间经历了中世纪，没有人"重提"恺撒语录。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恺撒的这一说法没有引起过任何一个人的注意。

正如此例所示，文艺复兴人不仅重新发现了人类的肉体美，也发现了前人说过的话。那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做到再发现的呢？

因为不适合作为基督教徒的读物，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虽然有抄写本却一直在修道院的图书馆被束之高阁。是人文学者找到了它们，并让它们重见天日。发现西塞罗著作的彼特拉克只是其中一人而已。读到这些著作的人们，为其中所使用的浅显的词语、明确而简洁的文章逻辑架构而惊叹。同样是拉丁语，从神职人员口中说出来的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复杂又煞有介事，而此时发现的古代拉丁语竟是如此浅显易懂。他们知道了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达可以如此不同。

语言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使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会让自然产生的想法变得富有条理性。如果表述的内容、写出来的文章可以做到既清晰又富逻辑性，那么此人的大脑一定既清晰又富逻辑。也就是说，思考和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时代已经发展至此，人们自然会意识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亲眼所见、内心所想的魅力。想一想中世纪，一切都要通过神去看、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思考、要用《圣经》语言去写。由此可见，布克哈特提出的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类”的说法是何其正确。语言一旦成为人类的语言，人们才有表达只有人才能感受到的微妙感情的机会。理性也好，感性也好，语言也罢，既然脱离了神职人员的控制，自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同胞了解并接受它们。就这样，原来只是拉丁语圈中一个方言分支的意大利语，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语言。

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被认为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在佛罗伦萨完成的一部又一部著作中确立的，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形成于从但丁到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文人手中。其证据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日语所说的现代意大利语的翻译。即便是小学生读的也是原文，尽管他们需要借助用来解释古文的“注解”。佛罗伦萨电影院银幕之上的壁画中，刻有诗人、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创作的诗歌中的一节原文。那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诗，意思是：既不知明日事，何不享受当下。享受的“当下”竟然是电影，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意大利语没有古文。相反，在日本，像《平家物语》《太平记》《徒然草》《花

传书》这样的书籍，如果没有现代日语译文，又会有几个人可以读懂原文呢？我想，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因为语言不再是神职人员独有的东西，正因为语言成了俗世人们的语言，所以才形成了连后人都可以理解的国语吧。为这一倾向的确立和扩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刚刚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以及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名字，但是，我想知道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的人就很少了。他是一位出版人，是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创造和普及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在另一本书《意大利遗闻》题为“一个出版人的故事”中已经作过介绍，在这里只概括说明一下。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把古腾堡的发明转化成实用型技术的一个人。

如果说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455年的话，那么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是在6年前，即1449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有了梦想。他想成为人文学者，于是先去了罗马，在那里学习拉丁语。接着移居到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因为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希腊语学者就在费拉拉领主埃斯特家做家庭教师。30岁后，他也做了家庭教师，是在小领主皮科家里。这是一个因修养深厚而广为人知的家庭。在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有识之士有两大就业职位：一是担任教皇、君侯或共和国政府的秘书；二是做家庭教师，负责有权势家庭的子弟教育。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家庭教师的同时还兼任主君的秘书，所以，他们的身份很难用现代语言中的“家庭教师”一词来界定。

米兰多拉公国领主皮科家出过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是由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著名的柏拉图学园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家的藏书在质和量方面都属上乘。阿尔杜斯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整理皮科家的藏书。年过30岁的阿尔杜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10年间，对出版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掌握了创业所需的知识。

阿尔杜斯决定涉足出版业，他把出版社设在了威尼斯。这一年是1490年，他已经41岁。为什么他会选择威尼斯而不是佛罗伦萨或者米兰，亦或是罗马呢？

首先，威尼斯已经形成了出版业的“里程碑”。在古腾堡的发明问世20年后，西塞罗的《书简集》经过两个威尼斯排版工之手正式出版发行，成为意大利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印刷100本耗时4个月，与以往的手抄相比，效率大大提高。初试告捷，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再版的时候，花费同样的时间，印数提高到了600本。

第二个优势是在威尼斯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当时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可以不受基督教会的干涉和镇压的自由。威尼斯是一个沿海国家，国家经济依赖于和东方异教徒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们完全不在乎教皇提出的“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的规定，尽管在其他地方，人们闻之色变。威尼斯市民却公然夸口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对于这样的威尼斯人，罗马教皇也只有感慨的份儿，说：“在其他任何地方，自己都是教皇。但在威尼斯不是。”同一时代，把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搞得人心惶惶的异端审判和巫女审判，在威尼斯共和国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就像当时一位来自法国的旅游者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因反对罗马教廷而被列入禁书行列的路德著作、因宣扬政教分离而被作为禁书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等，在威尼斯都可以找到。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出版自由。虽然也有言论自由得到保证的情况，但这种保证更多的是依赖于有势力的个人来实现。如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伪造的文书，为此惹恼了神职人员。一位神职人员准备把他送去接受异端审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瓦拉的主君、那不勒斯国王站出来保护了他。但是，一个人的势力无论多么强大，仅靠个人保护终究很难长久。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此种局限的那个时代，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以国家的立场，坚持拒绝教会的干预。16世纪后半期，文艺复兴已近尾声。此时，为对抗宗教改革兴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也席卷了意大利。罗马教廷也被反宗教改革派控

制，其中行为最激烈的耶稣会对异端分子的滥捕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人侥幸越狱成功。一路上躲避追捕的时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给了他同样的忠告——“逃到威尼斯去。”所谓言论自由不只是对纯粹以言论为职业的人有用，它是所有的自由之“母”。

除**了这**两个原因，阿尔杜斯选择威尼斯的理由还有很多。例如在那样一个乱世，只有威尼斯依然国泰民安，有利于招揽到优秀的工匠；再例如，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很多希腊学者流亡到了威尼斯，这些人带来大量的古典手抄本，可以就近拿来参考，等等。但是，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还是在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它就是以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为首的威尼斯出版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欧洲同行第一的重要原因。

海豚缠锚是阿尔杜斯公司的徽标。阿尔杜斯公司出版的、印有这一徽标的最早读物是发行于1494年的《希腊诗集》。书中附有拉丁语对照翻译。这是因为有了拉丁语译文便于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理解。同时，在当时的欧洲，拉丁语是世界语。由此可见，阿尔杜斯公司的市场目标是整个欧洲。接着，1498年出版了当时就深受好评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这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业。除了古希腊文学作品，阿尔杜斯公司还出版了从古罗马作品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意大利文学、伊拉斯谟的《拉丁格言集》等当时的现代文学作品。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共出版发行了1821种读物，其中仅威尼斯出版的读物就占了447种。排在第二位的是巴黎，有181种。威尼斯把发明印刷技术的德国远远甩在身后，成了最大的出版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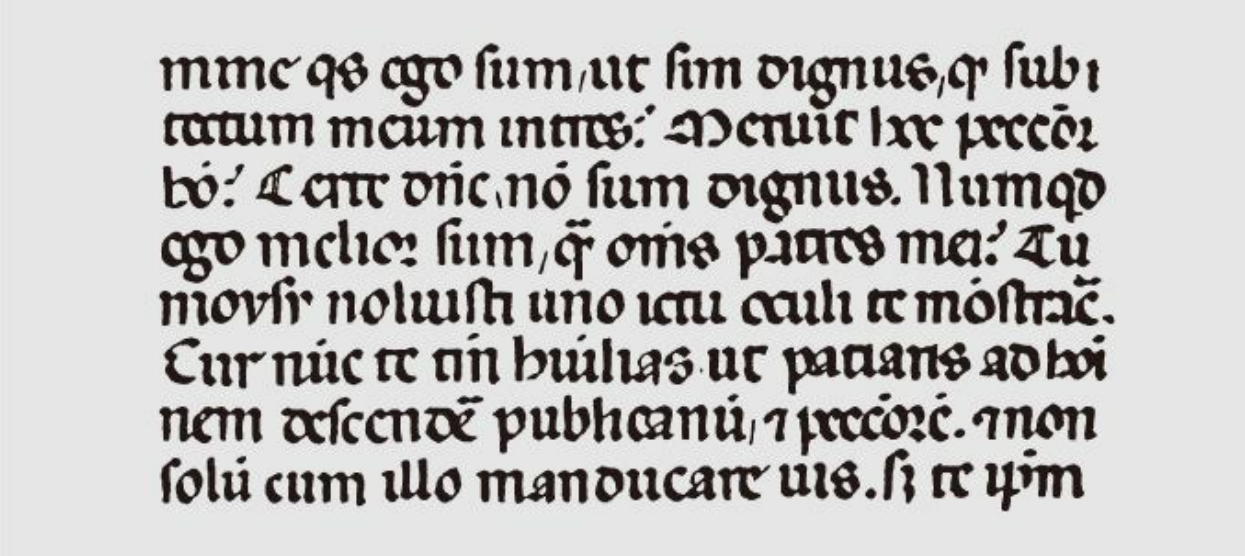
阿尔杜斯公司的徽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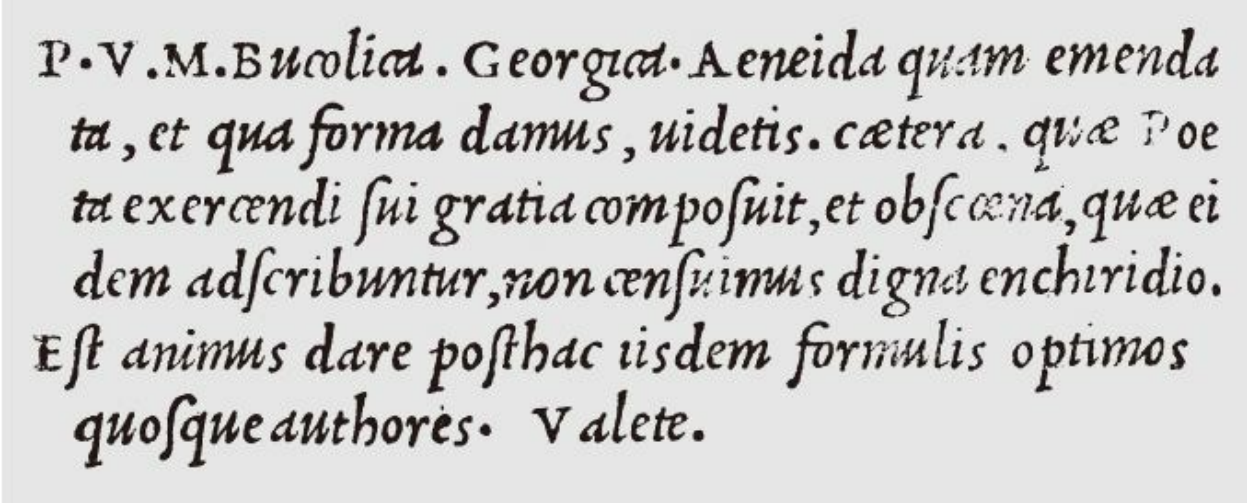
出版人阿尔杜斯成功的原因不仅于此。首先，他发明了斜体字

（italic）。这种字体现在依然存在。与哥特体相比，尽管美观度差一些，却非常便于阅读。而且，使用斜体字，一页纸可以印刷更多的文字。

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阿尔杜斯发明了“袖珍本”。因为要对折三次所以统称为“八开纸”的这种规格就是后来的“口袋书”（可以放进口袋里的书）的起源。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没有口袋，所以这样的书是放进衬衫和西装背心之间的。

不管怎样，袖珍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不仅受到相距不远的帕多瓦大学学生的欢迎，还在普通人中很快普及开来。袖珍本既便宜又便于携带，它的出现宣告了大开本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既贵且少的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神职阶级独霸知识时代的终结。审判时必不可少的各种知识也走出教会和修道院，向全市普及开来了。所以说到文艺复兴，不提出版业是不可能的。1515年，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去世，享年66岁。摆在教堂里的他遗体周围放的是一本又一本他出版过的书，而其他死者四周放的只有花。




P·V.M.Bucolica. Georgica· Aeneida quam emenda
ta, et qua forma damus, uidetis. cætera, quæ Poe
ta exercendi sui gratia composuit, et obscœna, quæ ei
dem adscribuntur, non censuimus digna enchiridio.
Est animus dare posthac iisdem formulis optimos
quosque authores· Valete.

中世纪的哥特体（上）和斜体字（下）

听您这样说来，我觉得与中世纪划清界限的、叫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精神运动在意大利任何地方发生都不足为奇，而实际上却始于佛罗伦萨。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他们具备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时候难免伤及自身。在其他城邦，即使发生内讧，也只发生在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者之间。而同一时期的佛罗伦萨，教皇派内部还要分裂成黑白两派。所以，他们的这种性格很不利于政局的稳定。但是，他们这种个人主义至上的性格对学术、艺术领域来说是最好的土壤。例如，多纳泰罗曾经应帕多瓦邀请制作了骑马像中的杰作《格泰梅拉达将军像》，从而闻名于意大利北部。但是他面对来自威尼斯、米兰等地的种种诱惑毫不动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那些地方工作，对此，雕刻家回答说：因为在那里听不到佛罗伦萨人不留情面的批评。

那个时代的工作室集中在现在叫作历史中心的佛罗伦萨市中心。日本风格的工作室在一楼，意大利风格的在地下院子和院子周围的各个房间。“工作室”（Bottega）这个词除了工作室、作坊之意外，还有商店的意思。因为是商店，所以无论是有意购买的人还是纯粹闲逛的人都可以

进来。如果来人是佛罗伦萨人，看到工作室的一切，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意见。艺术家只有具备桀骜不驯的性格才有可能成为一流艺术家。听到有人对于尚在制作中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一般的人都会反击说："住嘴吧。"但是，越是优秀的艺术家越是贪心，只要有利于自己作品的创作，即使是恶魔的忠告他们也会虚心听取。在批评者走后，他们会悄悄拿起画笔或凿子进行修改。

当时的工作室，只要和美有关的工作什么都做。我想，这样的体系也很符合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不仅仅是绘画和雕刻，还有从制作用于祭祀的旗子、妇女服饰、珠宝、桌上摆件到大型建筑物，再从制图、款式设计到熔解金银铜等所有的工作都在工作室里进行。各种工作不以专业划分。尤其是在学徒阶段，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派往任何地方帮工。刚刚还在调颜料的人，转眼就可能坐在熔化金属的大火旁拉起了风箱。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好奇心是表和里的关系。如果在学徒期间只学习绘画或雕刻，依着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一定不会满足。在一个什么都做的工作室里学习各种技术，之后独立出来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开花结果是佛罗伦萨艺术家的成长模式。当然也有像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那样很难界定他们属于哪个专业的人。莱昂纳多独立后，依然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包括绘画、雕刻、城市规划、解剖和机械器具等；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雕刻和建筑杰作甚至遍布全意大利。因为无法确定专业，所以只能称他们是"全才型"天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画家只专注于作画、建筑师只专注于建筑的威尼斯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超级天才另当别论，对于其他创作者来说，威尼斯方式不是更有效吗？

在威尼斯，专业细化并非是因为威尼斯人重视效率，而是因为威尼斯派绘画始于追随佛罗伦萨派的成功。专业细化是一个先要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后才会发挥效用的体系。相反，没有细化、浑然一体的做法更适

合初期的创造。因为新的思想是跳出已有的条条框框后产生的。正因为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对于拆除条条框框，相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他们的抵触要少得多。

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在佛罗伦萨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第二个答案只能说是因为佛罗伦萨经济的繁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操心一日三餐，他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关心学术、艺术。也就是说，佛罗伦萨很有钱，所以学术、艺术的“内需”与此成正比地发展。创作者和演员、音乐家一样是在喝彩声中成长的，而内需的增加使得创作者在金钱收入增加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一旦创作成为“名利双收的职业”，父母就会送自己的儿子去工作室做学徒，工作室会因此聚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希腊的雅典也是经济发展先于文化繁荣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走的也是同样的路。

您是指美第奇家族吗？

不是，美第奇家族的兴旺是在15世纪以后，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明显开始于14世纪。所以，早在美第奇家族发迹之前，佛罗伦萨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

要说佛罗伦萨经济的第二大支柱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是金融业和纺织业。但是，佛罗伦萨的经济体系和学术、艺术一样，很难作出明确的分类，这又是它的一大特点。最大的巴尔迪家族和仅次于他的佩鲁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两大势力。他们涉足的领域极广，包括金融业、手工业和商业。像这样的规模，我们只能称他们是财阀。他们的客户遍布全欧洲，英国、法国、那不勒斯各国王室以及罗马教廷是他们最大的客户。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为了战争的需要，甚至以国王领地关税作担保，向巴尔迪家族借贷。可惜，尽管有国王领地的关税作担保，巴尔迪家族终究没能避免破产。所以向国王借钱也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吧。正是这些当时的经济人成了圣方济各的支持者，也给了文艺复兴绘画第一人乔托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出自乔托之手的圣方济各生涯的绘

画作品，布满了位于佛罗伦萨的圣克罗齐大教堂内巴尔迪家族的礼拜堂。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佛罗伦萨成为经济大国的时间是14世纪，到了15世纪则迎来了政治上的成熟。

如此说来，美第奇家族不是经济发展时期的经济人，而是政治成熟时期的经济人了？

可以说作为经济人，美第奇家族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意识，深知缺少出于政治考虑的调整、自然出现的经济兴旺不可能维持长久。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知道此时不再是从前意大利内部各列强相互倾轧的时代，他提出了平衡各方势力的政策并为之努力。

所谓精神运动，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别的什么，往往发生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政治的成熟正好与此相反，在于以实现社会稳定为目的并努力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会发芽开花。以佛罗伦萨为例，急剧的动荡发生在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前半期，14世纪后半期开始趋于平稳。所以我想，15世纪中叶开始的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政治的成熟带来的社会极其稳定的时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艺复兴也不是一天完成的。

如此说来，1300年前后是个急剧动荡的时期。作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人，除了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您还列举了契马布埃、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但丁、乔托、彼特拉克，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您把画家契马布埃列为文艺复兴人我完全理解，因为他发现了乔托的才能。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不仅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甚至在西欧文学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文人，所以说他们是文艺复兴人我也理解。但是，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不过是一位雕刻家兼建筑师，我不理解为什么把他也列为文艺复兴人。他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教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名石匠而已。

应该说中世纪时代的建筑等于教堂建筑。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

的“基础设施”是罗马人留下来的，没有经过像样的修复。教堂建筑说到底是为神建造住所。建设者通过建造教堂来为神服务，所以在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对神的不敬。中世纪时代的匠人和艺术家几乎都不为人所知，就是因为创作行为本身是一种信仰的体现。

但是，出于信仰的考虑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建造教堂是为神服务，于是不记名，因为不记名，一旦发生问题也不追究制作者的责任。但是，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考虑，既然是倾尽全力制作，那么结果就应该自负，特别是在建筑领域。这个时代的建筑不再局限于建设人和神相会的场所，它已经扩大到了建造人与人相会的场所。阿诺尔夫·迪·坎比奥是生活在这两个时代夹缝中的人。因此，有些建筑物上留下了他的名字，有些建筑物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此外，他不仅仅是一位建筑师，正像写过文艺复兴雕刻家、建筑师列传的乔治奥·瓦萨里说过的那样，他还是一位“向后人指明了前进道路”的人。他给了佛罗伦萨人居住的“箱子”，换言之，他是一位城市规划师。

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父母”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在他之前，苏拉曾经派自己的士兵定居此地建设城市，但是还未安顿下来，就发生了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参加此次战斗的士兵们几乎无一幸存。四年后，当选执政官的恺撒通过完善有关向移居者出租土地等法律，实现了这里的城市化建设。因此，佛罗伦萨诞生于公元前59年。为了祈求诸神的帮助，在一个经测算认为是风水宝地的中央位置举行了祭祀仪式，时间是“花祭”（Iudiflorales）这一天，这是罗马时代祝贺春天欣欣向荣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佛罗伦萨（Firenze）的古代名称“Florentia”的由来。所以，把佛罗伦萨叫作“花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正因为罗马人在社会资本整顿方面绝不追随其他民族，所以佛罗伦萨被建成了一座完美的罗马式城市。城市建于亚诺河沿岸，呈四边形，每个边都开一个门，始于四个门的通道相交于城市中心位置。连接市外

的公路、上下水道、横跨亚诺河上的桥梁、公共浴场、中央广场、半圆形剧场以及圆形竞技场等罗马人认为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出罗马时代的城市全貌。只是曾经的广场现在更名为“共和国广场”了。

教　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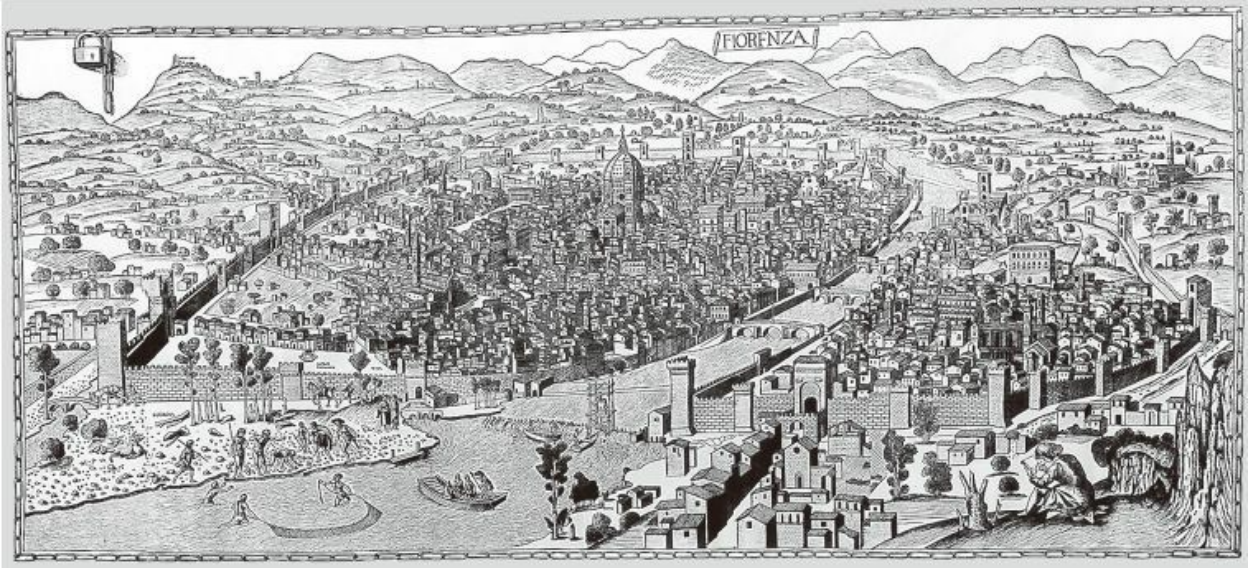
1. 圣母百花大教堂
2. 圣洛伦佐大教堂
3.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4. 卡米尼圣母小教堂
5. 圣灵教堂
6. 圣克罗齐大教堂
7. 圣母领报圣堂
8. 圣马可教堂

大宅第及其他

9. 美第奇宫
10. 斯特罗齐宫
11. 鲁切拉宫
12. 皮蒂宫
13. 韦奇奥宫

罗马时代的道路
罗马时代的街区
中世纪（13 世纪前）边界
文艺复兴时期边界
城门（通往市内的入口）
主要教堂　政府机关
主要大宅第　广场

继恺撒之后，哈德良皇帝对佛罗伦萨作了进一步的扩建美化。然而，当阿诺尔夫·迪·坎比奥看到佛罗伦萨时，距离恺撒和哈德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此时的佛罗伦萨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味道，是一座被毁坏的罗马时代的城市，有权有势的人家在城里胡乱私建塔楼。作为佛罗伦萨的总规划师，阿诺尔夫恢复了它作为城市的秩序。他把广场设计成市场，以此保存广场的空间，同时，在罗马时代的四边形城市一角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在它的对角建市政厅——韦奇奥宫，掩盖住外侧的半圆形剧场遗迹。因为罗马时代所建的桥脚早已变形，阿诺尔夫考虑在该古桥附近重建罗马时代的石桥，以此取代中世纪时代所建的木桥，并在其上游位置再架设一座桥。这两座桥的名字分别是韦奇奥桥和格拉琪亚桥。他还打算在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外围空地上建圣克罗齐大教堂。从上面的规划可以看出，阿诺尔夫对扩大后的佛罗伦萨未来全貌早就有了自己的设想。无论是教堂、市政厅、广场，还是桥梁，这些世俗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刺激地域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虽然进入15世纪后，刺激佛罗伦萨发展的主角变成了鲁切拉宫、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等有实力的、市民争相兴建的、崭新而气派的大宅第，但不管怎么说，佛罗伦萨能比其他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更美丽、更有活力、更有秩序，这份建设功绩的最大功臣正是名义上只是工头的阿诺尔夫·迪·坎比奥。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现代的佛罗伦萨

同一时期，亲自参与市政工作的乔凡尼·维拉尼开始书写《新编年史》（NuovaCronica）。他对已经迈出强有力步伐的佛罗伦萨作了高度评价。但丁也开始了《神曲》（Ladivinacommedia）的创作。以1300年为界，这个时期也许充满了混乱和不稳定，但正因为如此，新时代的气息开始在各个领域弥漫开来。

乔凡尼·维拉尼宣称自己要模仿古罗马编年史作家们使用日常用语书写的方式，用自己的日常用语意大利文来写编年史。同样，但丁也选择了用意大利文来书写，因为他讨厌神职人员使用的拉丁文。我甚至猜想，从他们的面容上应该就能看到这种气概吧。

维拉尼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写作能力，精彩至极。但丁的《神曲》显示了语言可表现的深度，无与伦比。地狱篇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但丁遇到了因为淫乱罪被打入地狱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二人：两人原本不可相恋，有一天当他们共处一室时，保罗为弗朗西斯卡朗读亚瑟王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亚瑟王王妃吉内佛拉爱上了圆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兰斯洛特。这个故事唤醒了二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恋情。两人战栗着互相吻了对方。说到这里，保罗停顿了一下，对但丁说了最后一句："那天，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这短短的一行字已经预示了二人其后的不幸，因而深入人心。由此可见，尽管意大利语被贬称为俗语，在表达上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故而我们可以自然地认为后世意大利的标准书面语就形成于700年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

但丁

1348年瘟疫大流行，处于上升期的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吧？

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所以应该也经历了一次地狱之旅吧。乔凡尼·维拉尼就是死于那个时候。

意大利其他城市怎么样呢？

大同小异吧。只是瘟疫这种东西，越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受害程度越大。当时的意大利，人口最多的不是罗马，也不是那不勒斯，而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得知瘟疫传播途径来自东方的时候，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规定来自东方的船只，无论是威尼斯的船还是阿拉伯的船一律不得进港，只可停泊于海湾中的各个小岛。40天以后方可进入威尼斯港口，因为病毒的潜伏期被确定为40天。现在坐飞机出行的人，进港时也要过“检疫门”（quarantine）。翻译成“检疫”的这个英语词源自威尼斯方言“quarantin”，意思是“40天”。据说检疫和复式簿记、外交官驻外制度一样，都始于威尼斯共和国。遗憾的是，这场瘟疫在威尼斯的真实情形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像薄伽丘这样的见证人写下《十日谈》这样的证言——《十日谈》记录的只是佛罗伦萨的情形。当时威尼斯官方机构还在正常工作，所以瘟疫的危害程度大概没有佛罗伦萨严重。薄伽丘的《十日谈》一开始就描写了瘟疫的威力。我很想详细介绍这段“记录”，但是直接引用至少要占20页以上的版面，作为引用实在太长。因此我就介绍一下讲谈社文艺文库出版发行的、由河岛英昭教授翻译的《十日谈》吧。河岛英昭教授是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研究的专家，希望详细了解瘟疫之威猛的人可以买来看一看。

就像文字描述的那样，那真是个人间地狱。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十日谈》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极度绝望，只想着眼前一时享乐的

三个男人和七个女人不得不离开城市躲进了乡下别墅。在那里，他们互相分享各自的故事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是的。“十日谈”的意思是十天的故事。它是希腊语中表示“十”这个数的deka和表示“日”的hemera这两个词的复合词。见识过地狱的人，无论是谁，一定会从最初的绝望渐渐变得自暴自弃吧。薄伽丘在这部作品中，写作风格自始至终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无论是描写瘟疫肆虐的时候，还是写到为躲避瘟疫逃到乡下别墅里的几个人之间互享故事的时候。通过揭露神职人员的谎言和虚伪的故事，可以看出薄伽丘对人性观察的尖锐和深刻。一个逃避现实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他就是在那个地域里冷静观察地狱的一个人。

当然，面对肆虐的瘟疫，佛罗伦萨并没有坐以待毙。当瘟疫的威力开始减弱后，佛罗伦萨首先着手改善卫生状况，并在市内各重要地段增设大大小小达35所医院和诊所。暴发于1348年春的这场瘟疫越过阿尔卑斯山蔓延到北欧的时候，据说佛罗伦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当然，那时已经是在瘟疫爆发一年之后了。

仅仅一年时间，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经历了这一惨状的佛罗伦萨人应该会反省说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于是已经谈化的基督教价值观该重新抬头了吧？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状，不得不致力于善后，没有工夫去感慨这是不是神的惩罚。而且，瘟疫袭击了俗世的人们，但也没有放过神职人员。再加上瘟疫的暴发虽然惨不忍睹，终究不是人祸。当时面对天灾，需要反省的是如何建立具体的防疫体系以应对这样的灾难，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倒并无反省的必要。如果这场瘟疫大流行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许基督教方面会一举成功击退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文艺复兴潮流吧。但是，在意大利、在坚信继承古罗马荣耀的不是当今的罗马而是佛罗伦萨的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人身上，神罚主义找不到入侵的缝隙。

人口的急剧减少，使人们更注重效率。之前，佛罗伦萨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瘟疫之后，则通过重视质量、提高个人生产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威尼斯也完全相同。我想，流行于1348年至1349年的瘟疫迫使不断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意大利各城邦不得不重组经济结构吧。话虽如此，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终究不同。按但丁的说法，佛罗伦萨缓慢而坚实地开展社会改革，就像忍着病痛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一样，重组是在跌跌撞撞中进行的。1378年还爆发了著名的工人暴力罢工事件，叫“穷僻之变”。原因是工人不满贫富差距的加剧。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在争争吵吵中前进，最初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接着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抗衡。直到1434年以后，即瘟疫大流行过了百年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才真正像竞争对手威尼斯那样实现国内和平。但是，尽管有势力的家族之间不断相互倾轧，在那个时代文艺复兴精神依然在发展。也许动荡的时代和新价值观的创造是可以共生的。

建筑师兼雕刻家布鲁内莱斯基、洛伦佐·吉贝尔蒂、多纳泰罗都是活跃于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文艺复兴人，这一时期的开始也恰逢彼特拉克的古典研究达到顶峰。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这三个人中，彼特拉克是唯一荣获桂冠诗人称号的抒情诗人。但是，他真正的工作不是写诗而是古典文献研究。从修道院图书馆发现古罗马屈指可数的作家西塞罗著作的人是他。西塞罗著作的发现成了文艺复兴人发起复古运动的里程碑。彼特拉克之后，是以莱奥纳多·布鲁尼、波焦·布拉乔利尼为首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们。有意思的是，这些古典研究者几乎都是官僚，都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府。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专事学问的人，他们是从事政务的人。佛罗伦萨的这一传统延续了很久，马基雅维利和创作了长篇《意大利史》的圭恰迪尼也都是官僚出身的历史学家、思想家。这与古罗马的情形如出一辙。在古罗马，创作过文字作品的人几乎都担任过公职。由此，知识只属于神职阶级的中世纪彻底成为过

去。

1434年，内部分裂不断的佛罗伦萨终于实现了国内统一。这一年，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确立了僭主政治统治。所谓僭主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政治。它没有成为阻挠学术、艺术领域发展的障碍吗？因为学术、艺术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得到保证。

政治的稳定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方式，通过吸纳反对派实现国内统一；另一种是古雅典和佛罗伦萨的方式，分裂的两派争夺主导权，胜者排挤败者来实现国内统一。两大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的方式，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即便现在，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用。

伯里克利不仅成功实现了雅典的政治稳定，还因为政治稳定给雅典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关于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表面上是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个人的独裁统治。同样，对于形式上是共和政体、实际上实施僭主政治的美第奇家族，圭恰迪尼是这样写的：美第奇是专制君主，却是个理想的专制君主。可见，有英明领袖的领导，自由和秩序这一二律背反也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的60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鼎盛期。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大量涌现，甚至在这里都懒得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看一看卷末人物简历一览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在这个从低矮的山顶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城市里，百年难遇一个的天才们在竞相追逐，就好像这60年间，一个接一个送上夜空的烟花在进行华丽的表演。金融业和纺织业方面成为欧洲最强国的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下，经过政治的成熟期，一跃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至此，良性循环开始出现。自恃有才的人不请自来。因为每个创作欲强烈的人都深知与其他优秀人才竞争、接受来自他们的刺激是促进自己创作最有效的方法。

把佛罗伦萨变成这样的人是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对吧？

别急。一个人要创造全新的事物不可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从既有事物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实现重组是可能的。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科西莫就是重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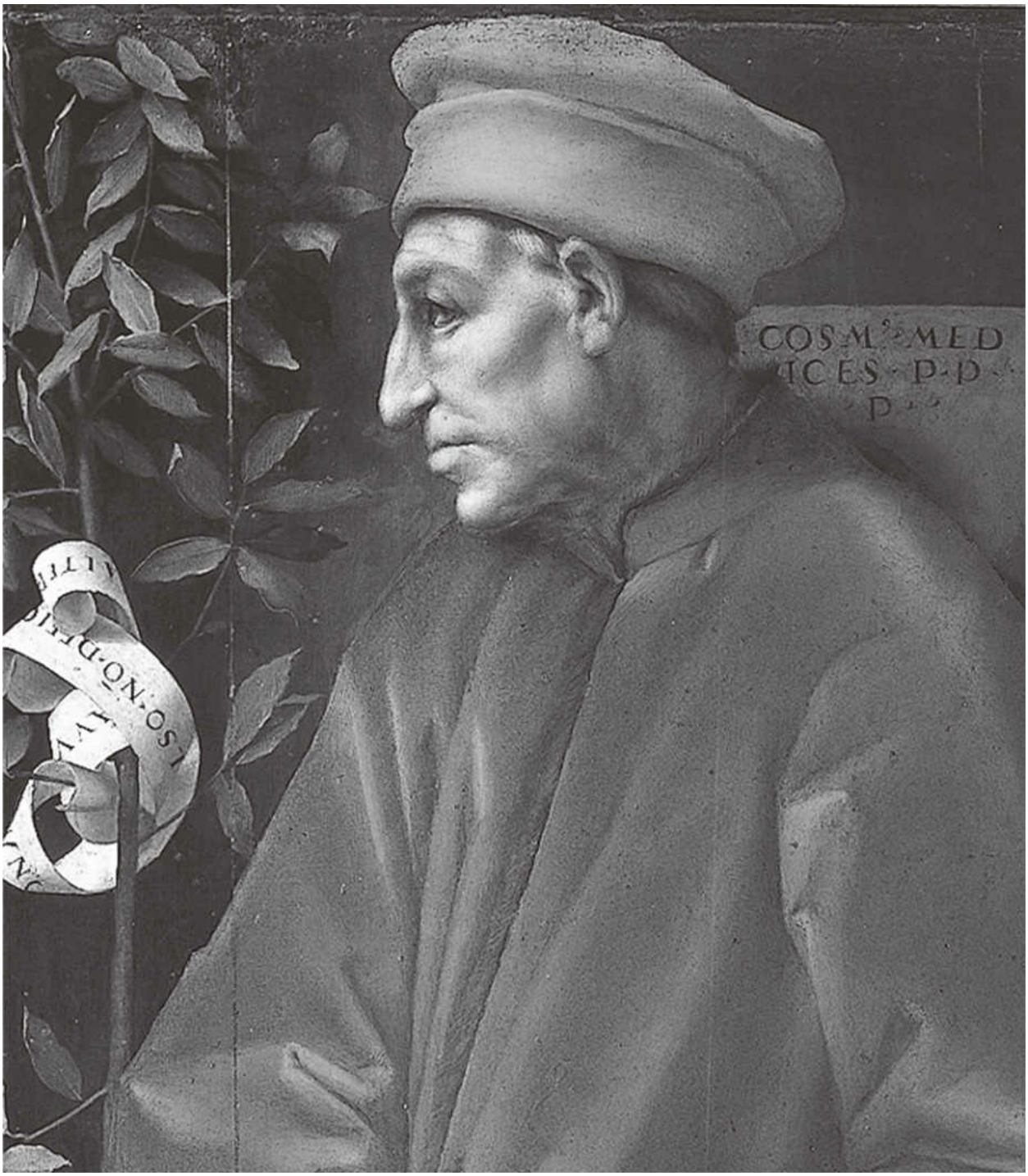
如果要把这个人的生平和他的业绩写下来，那会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一样成为一部厚厚的书。所以这里只摘重点来说。

138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不是白手起家兴建美第奇家族的。大约在百年前，美第奇家族先人从画家乔托的故乡穆杰罗的农村来到佛罗伦萨开始经商，积累起了财富。科西莫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地扩大了美第奇家族的经济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科西莫看作是创业者也未尝不可。当时佛罗伦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这里，因实力雄厚而闻名全欧洲的商人数不胜数，如果说美第奇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事实上，相对于为保护大资本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实力雄厚的商人集团，美第奇家族只是民众派的资本家，在美第奇家族的上升途中就已经被定性。当然，这样的定位并非缘于科西莫对作为民众派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同情。这位经济人在解读时代精神方面具备卓越的才能。

科西莫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剧烈动荡的时代度过的，他没有接受过著名家庭教师的教育，也没有在当时的著名大学学习过。但是，因为家族生意的关系，他到过欧洲很多地方。经商这样的工作，其性质是必须正视现实，否则只有失败，而他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工作。其次，他有得天独厚的绝好条件，就是在商旅中认识现实社会。再次，他本人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正是这三点把科西莫培养成为一个善于解读时代精神的经济人。

经济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没有进取心，没有竞争意识，振兴经济只是一句空话。但是，经济振兴的程度一旦超出可控范围则可能危及自

身，使自己陷于毁灭。政治就是最好的平衡手段。换句话说，政治是通过平衡来实现经济长足发展的人类智慧。为此，政治成熟带来的政局稳定就成了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实现了政局稳定。科西莫为了实现佛罗伦萨的政局稳定，与势力强大的商人集团进行对抗，不幸失败而遭到流放。其间，他留在了威尼斯。



科西莫·德·美第奇

1434年，45岁的科西莫离开流放地回到佛罗伦萨。他回到祖国意味着驱逐他的势力已经衰退。美第奇家族乘机开始了僭主政治。掌握了统

治权的科西莫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通常都会报复。他只是惩罚了反对派中几个主要人物，把他们流放到国外，却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旧体制派。想一想之前的佛罗伦萨，他的做法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番。因为流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曾经的常用手段。但丁遭到过流放，彼特拉克则是被流放者的儿子。

担任佛罗伦萨国政的人选广泛向各阶层开放。录用的依据不看所属阶级，而看是否有能力。尽管他自己属于高收入人群，但仍然制定了累进税制度，这在欧洲大概也属首创。因为认识到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的历史研究者很少，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详细情形不是很清楚，所得税的税率似乎是在4%到33.5%之间，分档征收。也许，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打算，就是通过制定并推行累进税制，打击势力强大的经济人集团吧。当然，在他的心里一定还想到了八成国民属于中产阶级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当时，成功避免内讧的国家除了威尼斯找不出第二个。那么，为什么在威尼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在佛罗伦萨却如此之难呢？

佛罗伦萨人的经商对象是北欧各国，走陆路即可到达。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第奇银行的分支机构都设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因为去北欧各国走陆路可以到达，所以只要脚力健壮又擅长谈判的人，自然会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因为佛罗伦萨周边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一旦工人为改善待遇罢工，只要把工厂迁到一个从未想过要罢工的工人聚居地就行，这种做法也很简单。此时的佛罗伦萨，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利害关系不一致，同时，资本家和资本家间的利害关系也不一致。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的“脚”是船。与以帆船为主力的热那亚不同，威尼斯的船是大划桨船，需要同时用到帆和桨。桨相当于发动机，无风的时候在出入港时桨的作用很大。威尼斯人不喜欢依靠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做事更喜欢胸有成竹。所以大划桨船是符合威尼斯人性格的一个选择。重视桨的作用意味着必须重视最基层的船员，即划桨手。在

海上，一旦遭遇风暴，首先船长必须作出正确判断，另外，包括划桨手在内的全体船员的齐心协力也至关重要，否则船只就会倾覆沉没。所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威尼斯人的骨髓。

威尼斯政府也努力强化国民的这种意识。为了让没有足够财力拥有私家船的人也能参与到海外贸易中，“脚”的主力大划桨船都属国有。从船长到划桨手的全体船员都是领取工资的。除了工资，全体船员出海时还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到了目的地，他们可以出售货物，所得归个人所有。此外，威尼斯还有一种叫作有限责任合伙关系的股份制度。所以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买卖的人，对于船只春季出港秋季返航的事情也会放在心上。除了自己国家内部，威尼斯共和国还把命运共同体的网扩大到了他们认为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其他国家。他们在那里设立商行，既作为船只修理厂，又作为情报收集地，同时还向驻外公馆以及商人提供谈判场所。为此，他们不仅向当地提供经济援助，还通过雇用当地男性做船员来保证他们的生活。说到威尼斯船上的划桨手，几乎都是连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南部斯拉夫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褒奖这些人的工作，威尼斯的主要港口甚至被冠以“斯基亚沃尼堤岸”（斯拉夫人的码头）的名字。

掌握威尼斯共和国政治的是实力雄厚的商人们，他们都是大资本家，他们会把划桨手也看作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而在佛罗伦萨，这样实力雄厚的商人成了和科西莫针锋相对的势力集团。

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个人主义的意识非常强，这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放任个人主义盛行就无法实现社会的稳定。科西莫引进了威尼斯式的因素，在保留佛罗伦萨好的一面的同时，努力纠正不好的一面。为此，可能需要专制的做法。当然，在佛罗伦萨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在威尼斯完全用不上。利用专制手段，美第奇僭主政治延续了60年，直到科西莫的孙子辈，所以他是成功的。科西莫的成功不只在于他热衷于推行累进税制，同时也在于他热衷于提高纳税人的

经济实力。

科西莫振兴经济的措施之一是振兴农业，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实现城乡健全的共存关系。其证据是他整顿了中世纪时代没有人关心的基础设施。首先他开通了亚诺河上的水运。自古罗马时代终结后，亚诺河上再度出现了货船来来往往的热闹景象。

科西莫还具备杰出的经营才能，在他的经营下，美第奇家族的财力得以持续增长。当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增长。人们开始认为，美第奇家族的男人是佛罗伦萨下的美第奇，佛罗伦萨人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人。可见，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非常成功。

科西莫知道和平共处不仅限于国内，与国外和平相处也很重要。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帝国兴起。对于西欧世界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有效地利用这次打击，成功确立了意大利的和平。当时，意大利半岛有五大势力，分别是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梵蒂冈和那不勒斯王国。他向这五大势力发出倡议，停止以往的争端，和平共处。通过缔结“罗迪条约”实现的和平是均衡各方势力政策的开始。科西莫的外交还延伸到了土耳其。佛罗伦萨在东方没有太多利益，需要保护的权益极少。因此，与跟东方利害关系极大的威尼斯相比，做起事来要容易得多。科西莫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搭建东西方间沟通的桥梁而奔走。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扩大本国商人的权益，不如说是为了施恩于西方各国。结果，美第奇家族和土耳其君主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而且维持了很久。科西莫去世后的第14年，即1478年，佛罗伦萨发生了著名的反美第奇武装政变，叫“帕齐的阴谋”。他们的目标是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兄弟二人。洛伦佐躲过了凶器，朱利亚诺不幸死于刀下。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参加政变的一人逃到土耳其，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二世抓住了他，并无条件地把他引渡回了佛罗伦萨。

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能力之大之深我了

解了。在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吧？

答案无疑是Yes。被乌菲兹美术馆围起来的广场四周排列着出自佛罗伦萨的一个又一个天才的雕像，美第奇家族的两个男子——科西莫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雕像分立美术馆正门左右。美术馆内的艺术品也好，立于广场的天才们的雕像也好，大多得益于这两个男人的支持。所以他们享受这样的待遇无可厚非。

按照同时代人的说法，科西莫既不是一个学识出众的人，也不是对艺术有充分理解的人。但是这样评价科西莫的人接着又写道：他是一个视野极其开阔的人。事实上，推动学术、艺术发展的人最重要的品质莫过于此人不偏执于自身的感受、喜好和观点，就像科西莫一样。对于学术界、艺术界的人来说，最受鼓舞的就是有人购买自己的作品。科西莫坐拥美第奇家族企业，资力雄厚。他照顾精神方面的“内需”是因为他深知文化带来的影响。一个国家即使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仅靠这些还是不能成为领袖，因为做到这些还得不到被领导者的支持。科西莫要把佛罗伦萨建成文化大国，并且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

科西莫在佛罗伦萨郊外卡雷基有一座美第奇家族的别墅。他在那里成立了“柏拉图学园”，邀请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担任校长。他成立的这个学院不是单纯研究学术的一个研究机构，而是柏拉图在古代雅典创设的“学园”的复兴，正像“柏拉图学园”这一名称所显示的那样。

真正的柏拉图学园创设于公元前4世纪末，位于雅典郊外的森林中。希腊进入罗马霸权统治下以后，柏拉图学园依然是一所最高学府。在这里学习过的名人很多，其中就有罗马的西塞罗、希腊的普鲁塔克和犹太人菲隆等。一如没有种族歧视的罗马帝国，这里的研究者来自各个国家。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借口学园会危及基督教徒，下令解散了柏拉图学园。1000多年以后，科西莫重建了这所学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机构，聚集在这里的大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不仅有佛罗伦萨人，还有

来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人。“柏拉图学园”的成立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罗马、那不勒斯也纷纷成立“学园”。古代就这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得以复兴。

科西莫·德·美第奇对于艺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之大，若一一写下来可达数页之多。所以就借用他说过的话来代替吧。

“我了解这个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族被赶出历史舞台大概用不了50年。但是我们的东西会留下。”

时间又过去了500多年。在如今的佛罗伦萨，每当我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佛罗伦萨城和欣赏到的这座城里的艺术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应美第奇家族或受美第奇家族刺激的其他佛罗伦萨人委托制作或收集的“东西”。

科西莫向柏拉图学园校长、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支付年金来保证他的生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对艺术家给予同样的关照。

雕刻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尤其喜爱的艺术家，多纳泰罗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不愁没有工作。但是，他的个性很强，遇到不懂雕刻的顾客，常常与之发生冲突。为了多纳泰罗不为生活担忧，专心创作，科西莫临终前在遗言中加了一条，赠予他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一个农庄，这座农庄可以保证有丰厚的收入。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科西莫的儿子皮耶罗当然遵守了遗嘱。多纳泰罗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份厚礼，因为他从此可以不与那些不懂雕刻的顾客打交道，也不用担心会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双方签订了正式的赠予合同。

然而没过多久，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想归还农庄。皮耶罗不解，问他为什么。艺术家回答说：“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

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皮耶罗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接受了还回来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佛罗伦萨雕刻家的代表多纳泰罗死于1466年，他留下遗言要求葬在科西莫墓的旁边。皮耶罗同样遵守了这个遗嘱。现在，在美第奇家族祖坟地所在地圣洛伦佐教堂科西莫墓的旁边还可以找到多纳泰罗的墓。

但是，如此感人的插曲并非他们的独创。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有一个朋友叫盖乌斯·梅塞纳斯。这个人因为资助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而闻名。为了感谢梅塞纳斯赠予自己山庄而使自己得以专心创作诗歌的贺拉斯死前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梅塞纳斯墓的附近。后来，人们就用“梅塞纳斯”（maecenas）来指称支持学术、艺术的行为，法语叫“mécénat”。多纳泰罗和皮耶罗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一人留下遗言，另一人完成了他的遗愿。古代就像血管中流动着的鲜血，活在文艺复兴人的心中。

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死于1464年，早于多纳泰罗两年去世，享年75岁。就像罗马教皇评价的那样，科西莫虽然没有君主的头衔，也没有奢极一时的生活，却是事实上的君主。正因为他以一介市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所以科西莫的葬礼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没有一位来自国外的吊唁者。只有佛罗伦萨议会授予了科西莫“国父”（Paterpatriae）的称号。“国父”这一称号是尤里乌斯·恺撒之后罗马元老院授予罗马皇帝的称号。纵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获此称号的人只有科西莫一个。

因为身体虚弱，皮耶罗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间不超过5年。在他之后，接管美第奇家族并领导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是刚满20岁的洛伦佐。关于这个男人，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会作更详细的介绍。

我之所以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对洛伦佐有详细描述，是因为生于1469年的马基雅维利的青少年时期正好和洛伦佐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大红大紫的时期一致。读者们可以参看第一部第二章“美第奇家的洛伦佐”、第三章“帕齐的阴谋”以及第四章“花都佛罗伦萨”，在这里我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此人与其祖父科西莫不同，做事喜欢张扬，喜欢引人注意，人们甚至称他为“ilMagnifico”（伟大乃至华丽的人）。他是一流的政治家，是和平路线的继承者，和他祖父一样积极地推进均衡势力政策。只是，科西莫习惯于幕后操纵，而洛伦佐更偏好在首脑会议上作决定。不管怎样，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写的下面一段话应该是对“豪华者洛伦佐”的功绩所作的最高评价：

> 佛罗伦萨人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的1492年之前，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洛伦佐运用自身的智慧和他的权威，成功把意大利内部的战争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全部的心思只为了让他本人和祖国佛罗伦萨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洛伦佐和他的祖父一样热衷于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但是柏拉图学园到了洛伦佐这一代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也许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按照哲学史的说法，此时的柏拉图学园把研究的重点从研究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转移到了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即公元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的思想。同时，以“赫尔墨斯文书”之名、被认为是新纪元前后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因为他提出了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唯心论成为了主流。人常常迷醉于寻找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原理。于是，天文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占星术，化学转向了炼金术。

VIRTVTVA
OMNIV
VAS
VITIA
VTI

在所有有关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您对洛伦佐时代的柏拉图学园表现得很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关心的是生活在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却不愿意加入柏拉图学园的那些人。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莱昂纳多认为讨论虚无缥缈的东西毫无意义，所以应邀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迈进这所学园一步。洛伦佐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还是个少年，在卡雷基的别墅举行的研讨会不可能邀请他参加。我想即使他早出生10年并受到了邀请，也一定会和莱昂纳多的想法一样吧。因为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关心的是无法用单一原理解释的人类众生相。

我认为所谓的哲学早已止步于希腊哲学，以后的哲学只是对基督教和哲学一体化的重复劳动，只能无功而终。如果说重复劳动的说法过于偏激，那么换句话说，也不过是对希腊哲学提出的命题给出每个时代的答案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是信仰，哲学是怀疑。探索唯一的原理，在哲学中就是一次次地提出原理，再把它推翻。原理一旦成立，随即把它当成神圣不可侵的、必须遵从的圣条的话，那就不是哲学。我说哲学已经止步于希腊哲学，是因为希腊时代是一个多神教的时代，不接受神化的、不可侵犯的一神教规定。

我对柏拉图学园表现冷谈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的思想很受推崇，甚至一度影响了全欧洲，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他们的思想是不堪一击的。在洛伦佐去世两年后，他们的思想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1492年洛伦佐去世。对于柏拉图学园来说，他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了靠山。两年后，美第奇银行破产。马基雅维利在著作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只能说在生意场上，洛伦佐实在很不走运。究其原因，在于他所任命的各地分店店长的散漫。分店店长们的言行举止与其说是私营企业的经理，不如说他们更像官营企业的老板。为此，美第奇家族投资于西欧各地的资产纷纷流失。

看来伟大的洛伦佐不如他的祖父科西莫，作为企业经营者似乎并不够伟大。

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美第奇银行的破产不是一家银行破产那么简单。他们坚信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在这样的信念中过了60年。美第奇银行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核心事业。它的破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佛罗伦萨未来的担忧。不用说，此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年，修道士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的说教开始横行，给了佛罗伦萨人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谴责佛罗伦萨人之前的生活方式，训诫说若不悔改必遭神罚。正巧这一年，法国国王的大军入侵意大利，又给了萨伏那罗拉借口，他叫嚣说这就是神对佛罗伦萨的惩罚。

不只是佛罗伦萨普通市民，连柏拉图学园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屈服。就连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也投向了萨伏那罗拉，米兰多拉曾经高举文艺复兴思想的旗帜，提出人是一切的中心。学园的常客、把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描绘得美不胜收的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也表示悔改，画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无限欢欣变成了深深的哀怨。至此，柏拉图学园彻底瓦解。学园的唯心论一旦受到其他唯心论的冲击，竟然表现得如此脆弱。15世纪末的这个时期，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走到了尽头。之前，接受国外顾客的委托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们一旦完成工作就会回到佛罗伦萨，而此时，一方面来自国外的订单数比来自佛罗伦萨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即使完成了创作，艺术家们也不再回到故国。曾经人才

济济的佛罗伦萨，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向外流出。

最后，介绍一下作为文人才能出众的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的诗作，同时也作为“佛罗伦萨篇”的结束。我想就介绍“Theend”吧，意大利语叫“Fine”。

在他不满43年的人生中，他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和短篇小说，即使是在500年后的今天，汇集出版后也达三卷之多。这对于一位大忙人来说非常难得。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可以按内容进行分类，分别是“喜之歌”、“爱之歌”和“灵魂之歌”。仅这几部作品，足以反映文艺复兴鼎盛期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一个人像洛伦佐那样深得命运和上帝的垂爱。”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吗？

我在这里要介绍《酒神之歌》的第一部分。这首诗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中学生都要学习。它深受欢迎，甚至被雕刻于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建筑中。因为是献给酒神巴库斯的诗，所以人们常常在敲锣打鼓、闹哄哄结束的狂欢节上吟唱。事实上，一到狂欢节人们就会唱这首诗。为了不改变音调，我把原文照抄如下，因为意大利语发音和罗马字读音相近，所以找音调应该不难。

《酒神之歌》

Quant’ è bellagiovinezza,

chesifuggetuttavia!

(chivuolesserlieto,sia:

didomannonc’ è certezza.)

试着翻译一下，是这样的：

青春多么美好，

却又如此短暂！

（尽情享受当下，

明天太不确定。）

这首诗共有八段。第一段中，我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两行，是每一段结尾需要重复唱两遍的副歌。这种诗与朗诵相比，更适合在琵琶的伴奏下吟唱。或许这也是它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顺便提一句，刻在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就是作为副歌的这两行。

洛伦佐创作的《酒神之歌》不仅在佛罗伦萨，据说在全意大利都很流行。下面是我的猜想。这首诗后来传到了日本，采用的不是我这样的直译，而是意译。不清楚是上田敏还是别的日本文人去威尼斯旅行时，在威尼斯狂欢节上听到了传唱至今的这首歌。回国后，他跟音乐人吉井勇提起这首歌，给了吉井勇灵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歌，取名为《贡多拉之歌》，这不正说明这首歌和威尼斯的关系吗？

《贡多拉之歌》

生命短暂，恋爱吧，少女

趁你红红的嘴唇尚未褪去

趁你沸腾的热血尚未冷却

只因明日的时光能否依旧

两首歌意思相近。如果洛伦佐知道500年后会出现这样一首日语歌，该有多么感慨啊。

洛伦佐42岁去世。尽管英年早逝，马基雅维利却说，在最好的时候，他死了。马基雅维利比洛伦佐小20多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

警世思想家。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走下坡路。马基雅维利试图挽救佛罗伦萨。可见，上面这句话应该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他羡慕洛伦佐生活在幸福感很强的佛罗伦萨，同时对已成故人的洛伦佐充满了惜别之情。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论》。这是一部世界名著系列中必不可少的、至今依然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说明领袖应该是怎样的，并以此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教分离观。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自始至终坚持政教分离，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洛伦佐的做法大加赞赏。所以，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君主论》中提及最多的应该是洛伦佐，甚至把他当作模范也不奇怪。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一次也没有提洛伦佐，更不用说把他当作适应时代潮流的领袖榜样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意大利，作为领袖榜样，在很多方面都与洛伦佐截然相反的切萨雷·波吉亚被认为更合适。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欧洲，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显然都属于先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科西莫和洛伦佐推行的均衡势力政策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均衡势力政策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对于尚未形成国家的地方来说，这一价值观是行不通的。因为所谓均衡势力政策其实等于是维持现状政策。当某个不满足于维持现状的国家，率领人数相当于推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国家人口总和的大军打了过来会怎样呢？15世纪末，意大利各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法国国王的军队打进来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想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代变了，榜样领袖不能不变。

佛罗伦萨共和国向法国派遣了外交使节团。面对他们，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公然说道：

“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当时，年仅30岁的马基雅维利还只是使节团的末席。他当即反驳道：

“法国人不懂政治。”

然而，再怎样义正词严地反驳，作为军事大国同时又是政治大国的国家，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只有罗马帝国一个。这就是人类世界的现实。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对他来说，已故的洛伦佐虽然是政治上的智者，但是他没有重视军事。所以在论述意大利现状的《君主论》中不值一提。

相对地，在讲述佛罗伦萨历史的《佛罗伦萨史》中，他高度评价了洛伦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从根本上来说，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是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

要说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不是最典型的吗？我们后世的人一想到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莱昂纳多，甚至感觉文艺复兴等于莱昂纳多。关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篇，我希望以莱昂纳多来作为结束。

你的意思我明白。意大利文艺复兴涌现出了大量的天才人物。说到天才中的巨人，只能是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论作品之多当属米开朗基罗，但是，论涉及的领域之广非莱昂纳多莫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著作之一是《西方的智慧》（WisdomoftheWest），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 哲学与科学一样，始于某人对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提出疑问。最早全民都充满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现在的我们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希腊文明是知识运动的爆发，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华丽的事情。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可与希腊相媲美的知识的爆发。在短短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

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等所有领域都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并形成了其后西方文明的基础和体系。

欧盟（EU）有一项活动，每年选一个文化城市。第一年选出的是希腊的雅典，第二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第三年以后不记得是哪里了，大众媒体也不提了。因为即使这项活动还在继续，也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意义。

之所以介绍伯特兰·罗素的这段话，是因为我想说，知识的爆发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之后就是以佛罗伦萨为先导的意大利。而且我认为，罗素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讲述莱昂纳多。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像莱昂纳多那样一生都在追问“为什么”。我想象中的莱昂纳多总是嘴里念着“perche，perche，perche”，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样子。“perche”是意大利语，意思是“为什么”。

人们评价莱昂纳多是“万能人”。这不是说他什么都会，或者说他心灵手巧，而是因为他涉足的领域太多太广。对他来说，为了弄清“为什么”，有时绘画是最好的方法，有时解剖又成了最好的手段。当然，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他是“什么都会的人”也未尝不可。

在他身上，艺术、科学、技术以及观察力融为一体，这都是源于“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同时思考很多问题的人，最初他只有一个“为什么”，但是，在寻找结论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渐渐地变成了多个问题。

所有的创造都是始于“为什么”，即使是才能普通的人也一样。只是普通人只知道要在创作过程中或者在创作完成后才能弄清“为什么”，而莱昂纳多在创作完成之前就已经知道“为什么”的答案了。

这就是莱昂纳多留下很多未完成作品的原因吗？

是原因之一吧。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当他明白创作无法完成的时候。据说《最后的晚餐》壁画中，坐在最中间的基督的脸到最后也没有画好，《三王来拜》在草图阶段就放弃了。所谓完成也有能做到的意思，做到一定程度后死心的，如果想继续还是可以完成的。

莱昂纳多没有死心吗？

莱昂纳多死心了。只是这与作品完成与否无关。从本质上来说，莱昂纳多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谦虚是创作者必不可少的素养吗？

是的。当然绝不输给他人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样必不可少。

谦虚和桀骜不驯不是自相矛盾吗？

普通人如果同时存在这两种性格会造成思维混乱，容易导致精神失常。但是，创作者只有不偏不倚地控制好这一对矛盾体，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莱昂纳多的傲慢甚至激起了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的嫉妒之心。

莱昂纳多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素描和设想呢？

你好像也患上“为什么”病了。也许为了弄清“为什么”，莱昂纳多只有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并对一个又一个问题提出相应假设的答案这一个办法吧。我个人的想象中，他总是在不断重复一件事，就是观察、思考、把感悟到的东西写下来或画下来，并在写或画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自己的理解。无论是文笔还是画笔，利用这些工具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同时也在说给自己听。因为通过写作或绘画，大脑中的想法会愈发清晰。表达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思想，也会让大脑中的思想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真是这样的话，请他创作也很不容易吧？

绘画方面，莱昂纳多的收费总是当时最高的。米开朗基罗比他小23岁，也许不适合作比较，好像莱昂纳多的收费至少是米开朗基罗的两倍。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热衷于对飞机及解剖学的研究，而这样的领域既不会有委托人，也不可能有资助者。所以，他把绘画赚来的钱存在教会附属的一种信托银行里，作为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资金。为了寻找赞助商，在旅途中他一次次地来到佛罗伦萨。其中自然有回到故里的乐趣，但更大的目的是为了钱。

下面是莱昂纳多的赞助人或者有赞助关系的人。

首先是被誉为“豪华者”的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从结论上说，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洛伦佐既没有成为另一位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莱昂纳多的赞助人，甚至也没有做类似于赞助这样的事情。洛伦佐和莱昂纳多只有3岁之差。现在，佛罗伦萨男性名字中，用得最多的是洛伦佐和莱昂纳多。这是题外话。从表面上看，二人之间关系非常冷淡，不知道是因为洛伦佐理解不了莱昂纳多，还是好恶分明的洛伦佐的世界与莱昂纳多的世界格格不入。柏拉图学园倾向于唯心论，充分反映了洛伦佐的趣味。莱昂纳多对这所学园丝毫没有兴趣，而同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师兄波提切利则常常出入这个学园。尚在学徒时期，莱昂纳多曾经在师傅韦罗基奥的作品《基督洗礼》的左端画过一个天使，美得无与伦比，远远超出同时期波提切利所画的圣母玛利亚以及天使。他这种异于常人的审美感不可能不引起洛伦佐的注意。然而，洛伦佐所做的只是把他介绍给米兰公爵，为后人所说的人才外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个人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因为他肤色黝黑，人称“ilMoro”（摩尔人）。也许是因为这位米兰公爵不清楚自己到底爱好什么，所以更适合做学术、艺术的支持者吧，总之，莱昂纳多在米兰生活的时间长达16年。洛伦佐去世、美第奇银行倒闭、佛罗伦萨屈服于萨伏那罗拉以及4年后萨伏那罗拉受到处罚的消息，他都是在米兰听说

的。

莱昂纳多一到米兰，就向公爵出示了洛伦佐的介绍信，同时递上一封著名的自荐信。自荐信像是一位工程师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一开头列了9项内容，之后又说自己所作的画好过任何人。因为在佛罗伦萨，是绘画成就了他的名气。所以不知道该说这封自荐信表现了30多岁的年轻莱昂纳多的霸气还是傲气。米兰公爵自然不傻，他充分利用了这位画家的才能，甚至还让他为自己的爱妾画了肖像画呢。当然，像这类作品，莱昂纳多创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LA BELLE FERONIERE
LEONARD D'AVINCI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的肖像（抱银鼠的女子，莱昂纳多画）

这位摩尔人允许莱昂纳多从事任何研究，甚至包括令人厌恶的解剖类的研究。然而，这样一位摩尔人，因成为法国国王军队入侵时的靶子而下台。莱昂纳多只好另寻支持者。他求到了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但是，这个女人看中的不是莱昂纳多的才能，而是他的名声，她要求莱昂纳多为自己画肖像画。其实，她的这个要求在宣称自己是学术、艺术保护者的人中很常见。对此，莱昂纳多的回答含糊其辞，侯爵夫人只有离他而去。顾客的要求可以刺激创作者，但是，对于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要求，莱昂纳多似乎过于正直了。

之后，他亲自去找了切萨雷·波吉亚。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切萨雷是唯一一位可以拯救危机中的意大利的领袖。在当时，因为极力反对维持现状的路线，他被很多人当成了危险人物。莱昂纳多主动上门寻找切萨雷帮助这一行为在后世研究莱昂纳多的学者眼中，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莱昂纳多除了在很多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他还关心城市规划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切萨雷·波吉亚与洛伦佐不同。洛伦佐只要维持好先辈留下的国家即可，而切萨雷必须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王国。正因为莱昂纳多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向切萨雷申请要一份工作，并接受了切萨雷提供的建设总监的职务。如果切萨雷执政时间长一些，也许莱昂纳多设想中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础设施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了。遗憾的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这位榜样人物执政仅仅只有一年就下台了。已经51岁的莱昂纳多只好另找出路。

莱昂纳多一次次地往返于佛罗伦萨和法国国王统治下的米兰之间，只为寻找一个安居之地。再后来，洛伦佐的儿子利奥十世就任教皇，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随他移居到了罗马。应朱利亚诺的邀请，莱昂纳多也去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没有要求逗留在罗马的莱昂纳多创作绘画作品，因为此时拉斐尔也在罗马。拉斐尔的趣味和利奥十世十分相

近，一旦开始作画，就一定会完成作品。美第奇教皇没有要求莱昂纳多作画，却禁止他解剖尸体。也许开明的美第奇家族的男人一旦当上罗马教皇就不得不遵循基督教会的戒律吧。没过多久，莱昂纳多的保护人朱利亚诺死了。莱昂纳多接受有过一面之缘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时间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刚刚去世的1516年。莱昂纳多已经64岁了。

与其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以保护者的身份邀请莱昂纳多，不如说是因为他崇拜、尊敬莱昂纳多才邀请了他。他为莱昂纳多提供了位于法国南部昂布瓦兹郊外的葡萄庄园。当然除了支付从生活费到其他所有的日用开销，还提供给他足够的年金。国王从不要求他作画。国王曾经这样对莱昂纳多说："我不是希望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留在这里就够了。"对于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生活保障是令他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吧。而且，莱昂纳多已经老了，到了流浪已成难事的年龄了。

莱昂纳多在昂布瓦兹安逸而宁静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1519年5月，莱昂纳多在这里走完了67年的生涯，尸体葬于圣休伯特教堂。然而，不久教堂在战乱中被毁，遗体不知去向。如果可以找到遗骨的话，或许以现在的最新科学技术，可以找出他的死因吧。莱昂纳多曾经与一位行将死去的老人有过一次对话。在这位老人死后，为了研究他安详死去的死因，莱昂纳多解剖了这位老人。所以，如果他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不高兴的。

莱昂纳多临终前留下遗言，把一直伴随着他的《蒙娜丽莎》送给国王。也许是为了感恩弗朗索瓦一世对自己的善待吧。短短三年时间的恩情，他把《蒙娜丽莎》留给了法国，成了卢浮宫美术馆如今的至宝。尽管为莱昂纳多提供过生活保障的还有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

最后，送你一句莱昂纳多说过的话吧：

无论是强大的统治力，还是小小的支配力，只有支配本身的力量才是永恒。

换换句说，就是战胜自己的意思，也就是克己吧。我认为这一句话就是莱昂纳多的文艺复兴宣言。

第二部 罗马篇

我以为屋顶阳台只有这里一处呢。往远处一看，原来到处都是啊。

住在罗马市中心，意味着可以欣赏到三个罗马：一是由街道和罗马广场构成的罗马，二是家中的罗马，三是屋顶上的罗马。当然只有那些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同时享受到这三个罗马。

的确，从这里看出去，我理解了为什么说还有屋顶上的罗马。从屋顶上向远处望去，不仅可以平视教堂的圆顶，而且因为视野开阔，心情非常舒畅。这里的气候好像也跟佛罗伦萨不同。

形容罗马的词中有一个词叫“阿里奥索”（arioso）。意思是通风好、不小气。佛罗伦萨位处盆地，夏热冬冷。与此相反，罗马则冬暖夏凉。在意大利半岛，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是罗马和那不勒斯一带。古罗马人把罗马定为首都，把景观优美、温泉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周边选作休养地，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们选择的巧妙。

说到古罗马我想起来了，罗马帝国灭亡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但是罗马市依然把4月21日作为建国纪念日。古罗马被认为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这一天，由罗穆路斯建立国家的。所以在罗马帝国尚存的时代，作为国庆节，每年都要纪念这一天。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一天不再是建国纪念日。但是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存在至今，所以作为建城纪念日，这一天还是值得庆祝一番的。现在的罗马市，简称依然是古罗马时代的“SPQR”，它是由拉丁语“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的每个词的首字母构成的，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说起来有点可笑，因为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纳入伞下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存在，罗马市民不再是庞大帝国的主人，他们不过是生活在罗马的居民而已。但是，现代罗马人

和古罗马人一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他们修改了“SPQR”的意思，变成了“SonoPorciQuestiRomani”的缩略语，意思是“罗马市民是猪”。

就是这样一座永远不倒的城市罗马，说好听点，这是一座不小气的城市，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浮躁随性的城市。也许，只要留在罗马，任何人都会变得“arioso”（阿里奥索）。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是《随想录》作者、著名的蒙田在《意大利纪行》中讲述的逗留在罗马期间的事情：

> 居住在罗马，感到安逸舒适的一个原因是这座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世界性。在罗马，外国人、祖国是哪里都不是问题。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做到像罗马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很多。说到外国人，同一国家的人自成一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一样。罗马的统治者是罗马教皇。只要是基督教徒，无论住在哪里，都受罗马教皇的管辖。所以，他所居住的罗马当然就由那些与他相邻而居的不同国家的团体构成。在罗马，选举教皇也好，任命红衣主教也好，从来不会把国籍当成问题。
>
> 威尼斯也是一座外国人聚居的城市，但是这里的情形与罗马截然不同。不少外国人是受该国合理而自由的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来到威尼斯的。但是，他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异国。相反在罗马，对神职人员来说有非常合适的组织，制度也是如此。但是，外国人根据各自的财力和地位生活着，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一样……在罗马，我们法国人穿法国服装、西班牙人穿西班牙服装、德国人穿德国服装，还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人也分别穿着他们各地的服装。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差别，普通市民完全熟视无睹。只有乞丐看到不同的着装才会用相应的语言说：“请施舍一些吧。”

接着，蒙田又讲述了他本人取得“罗马市民权”的全部经过。他的市民权似乎是通过法国驻罗马大使馆走通了教皇的儿子（在罗马，神职人员可以有孩子）索拉公爵以及侍从长穆佐提的关系取得的。对此，这位法国首屈一指的道德家非常高兴。他这样写道：“尽管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称号”，“但是它唤醒了我们对古代荣誉和伟大的神圣记忆”，“感到异常高兴”。也许他以为自己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市民，而这时的法国还叫高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至此，我们还可以微笑着读他的《意大利纪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觉得可笑了。也许是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吧，蒙田本人没有记录下来。据说蒙田利用关系取得罗马市民权的理由是蒙田自称是法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是在雅典的“学园”教授哲学，该学园解散的理由是不适合基督教徒。如今一位法国的苏格拉底在基督教管理的罗马得到市民权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以为基督教到了罗马也变得自由散漫。蒙田只是短期逗留罗马的一个旅行者，只因为他是法国的苏格拉底就授予他罗马市民权的教皇是出生于博洛尼亚的额我略十三世。蒙田去罗马的时间是1581年。当时的罗马刚刚经历过宗教改革浪潮和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如果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我想，罗马不只是“通风好”，应该还充满蓬勃生机吧。

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因为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文艺复兴何时成为中心，何时变成外围，是无法说出明确界限的。它和台风的移动相似。文艺复兴在罗马停留的时期大约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最初的30年。因为这个时期，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文艺复兴巨匠同时生活工作在罗马。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是佛罗伦萨的大商人们。那么，罗马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又是什么人呢？

应该说是历代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带领基督教徒的牧羊人。为什么他们会脱离强调通过《圣经》来看世界、来思考、来行动的中世纪而成为提倡用人类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问题、用人类的判断来行动的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推动者呢？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像基督教这样善于适应时代潮流的。这是他们真正的能量。也就是说，曾经对圣方济各的清贫思想主动示好的罗马教廷，在过了近200年后，也积极参与到华丽的文艺复兴绘画、雕刻和建筑创作中了。

但是，耶稣基督选择的是一朵野百合而非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耶稣是神的儿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是神子，他们是很复杂的生物，既爱野百合也爱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说教堂装饰过于富丽堂皇不适合作为祷告场所的看法过于忽视普通百姓的感情。毕竟，教堂不只是用于新生儿接受洗礼、年轻人举行婚礼、为亡者举行葬礼的场所，它同时也是年轻人追随在心爱的女子身后、从教堂后座向祷告的女子投去炽热目光的场所。这样的地方装饰得漂亮些有什么不好？

但是，除了把教堂装饰得富丽堂皇之外，神职人员职位越高生活越奢侈。这难道不是神职阶级的堕落吗？

没有人会赞赏奢侈的生活，可见奢侈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平民总是喜欢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那种奢华，或者说是向往这样的生活。当今的王室、影视界和音乐界的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是因为他们有身处不同位置的平民的支持。

另外，与教皇、红衣主教们华丽的法衣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一群穿

着或黑色或茶色或白色的简朴僧服或修道僧服的人。这样两个极端形象同时存在正是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优势。它同时满足了奢华和清贫两个方面的需求，反映出基督教会熟知人类追求这两者的本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作为宗教人士，或许有点太过随性。但是，作为基督教会这一组织之长，他们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胜任神职界之长的职位，而且对于世俗社会的领袖之职也完全可以胜任。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群男人，所以艺术家们才可能与之展开激烈的辩论吧。老老实实完成订单的人只是“匠人”，“艺术家”是利用订单来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东西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有下面这样几位（括号内时间是其在位时间）。按照意大利人的称呼习惯，教皇名字不采用拉丁语而采用意大利语的读音。

庇护二世（1458—1464），俗名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劳米尼，出生于锡耶纳附近的皮恩扎。他是当时被称作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写有很多著作，是一位文人教皇。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评论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拯救国家，他多方奔走，希望成立十字军，但是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站出来响应。

保罗二世（1464—1471），俗名彼得·巴尔伯，出生于威尼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势力的衰退。他没有组建十字军，而是配合祖国威尼斯通过重建通商关系来挽回西方国家的势力，从而改变了罗马教廷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方针。据说此人当选为教皇就是威尼斯共和国主动出击的结果。所谓主动出击，指的是收买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每人手上各有一张选举教皇的选票。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俗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出生于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教皇，是开启裙带关

系的人，他把自己的侄子们一个个扶上了红衣主教的位置。他组建十字军来抵抗奥斯曼帝国，却因参与国之间的不和而受挫。他把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的侄女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通过此次联姻，正式承认俄罗斯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从而保住了面子。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罗马教皇们热衷于组建十字军，这是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之首对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不能不采取的措施。他们的立场和现在的教皇一样，只是现在的教皇作为和平使者倡导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纠纷。也就是说，教皇们组建十字军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是基督教会之长，他们有责任抑制异教徒的崛起。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巴茨家族的男人们把美第奇家族看作眼中钉，密谋杀死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表面上看，“帕齐的阴谋”好像是佛罗伦萨内部的反美第奇势力、巴茨家族的男人叛乱，实际上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背后指使。这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尽管教皇憎恨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在学术、艺术领域所起的作用他却全盘学了过来。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通过收集修道院收藏的抄本，进一步充实了由四代之前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创设的梵蒂冈图书馆；把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重建的柏拉图学园迁至罗马，以高薪聘请人文学者，创设“罗马学园”的也是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另外，建造文艺复兴绘画殿堂西斯廷礼拜堂的还是他。“礼拜堂”在意大利语中叫“Cappella”，是阴性词，再把sisto（西克斯图斯）变形成阴性词，就成了“CappellaSistina”。忠实地把它翻译成意大利名，就叫西斯廷礼拜堂。

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聘请的翁布里亚和佛罗伦萨的画家们完成的。他们是彼得·佩鲁吉诺、波提切利、科西莫·罗塞里、路加·西诺雷利和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在40米×13.5米的长方形两翼的12幅壁画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教皇也大大方方地邀请了曾经受美第奇庇护的画家。如果洛伦佐不同意，他

完全可以阻止这些画家的罗马之行，但是有意思的是，洛伦佐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奖励他们前往罗马。也许双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改善罗马教廷和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把艺术交流作为突破口了吧。

西斯廷礼拜堂艺术殿堂化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20年后成为教皇的朱利奥二世完成的。当时负责的画家是米开朗基罗，成果就是覆盖了整个天花板的《创世记》。负责殿堂化最后阶段的也是米开朗基罗，成果是画在西斯廷礼拜堂整个西侧墙面上的《最后的审判》。委托人是教皇保罗三世，完成的时间是1541年。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那些年正好是罗马成为文艺复兴中心的那个时期。

英诺森八世（1484—1492），俗名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博，出生于热那亚。据说他曾经被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用计抓捕过，而洛伦佐深知与罗马教廷为敌对自己是不利的。

洛伦佐要把自己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教皇的儿子弗朗切斯凯托·西博为妻。当然这不是单纯为了和教皇建立姻亲关系。站在英诺森八世的立场上，他自然希望儿子的将来会有保障，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任命儿子为教皇国的小领主。如果教皇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洛伦佐的女儿自然就成了侯爵夫人。但是，对父亲洛伦佐来说，同时也是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这将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不得不做那个小领国的后盾。教皇拥有的权威和权力虽然强大，但是一旦教皇去世，这一切就成了过眼烟云，所以教皇的权威和权力是有限的。洛伦佐认为，对有限的权威、权力做如此的投资并不合适。

于是，“豪华者”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豪华宫殿，把女婿迎进了门，还为他提供足够多的年金。这样一来，女儿不用成为教皇的人质，相反女婿倒成了自己的人质。教皇没有意识到洛伦佐的这一意图，他和儿子都心满意足。同时，洛伦佐还让世人觉得自己没有利用教皇的裙带关系，依然坚持公平原则。为此，他的声望又提高了许多。

作为经营者，洛伦佐非常失败，是他导致了美第奇银行的倒闭；作为有智有谋的政治家，他却是超一流的。但是，1492年4月，“豪华者”洛伦佐离开了人世，接着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在三个月后去世。这两人的离去宣告了意大利和平时代的结束。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俗名罗德里戈·波吉亚，出生于西班牙。他曾经迎战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这次外国军队的入侵让文艺复兴的主角意大利各城邦意识到了时代的变迁。我想此时，大概只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以及马基雅维利三个人早早意识到了通过维持现状政策来实现意大利内部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维持现状政策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倡导并维持的一种和平政策。切萨雷则考虑把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教皇国变成军事强国，使之成为抵御外国势力的坚强后盾。其父亚历山大六世则利用教皇的权力和权威意图帮助他促成此举。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用理论论证了这一政治的合理性。意大利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代。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亚历山大六世受到了萨伏那罗拉的批判，被指责是沾染了俗世堕落恶习的神职阶级的代表。后者是在流放美第奇家族之后，试图在佛罗伦萨确立神权政治的说教僧。教皇波吉亚不认为忠实于神的教义的政治是有效的，他熟知佛罗伦萨人的性格。所以他坐观萨伏那罗拉自我瓦解，而没有付诸正面对决。四年后，佛罗伦萨惩处了萨伏那罗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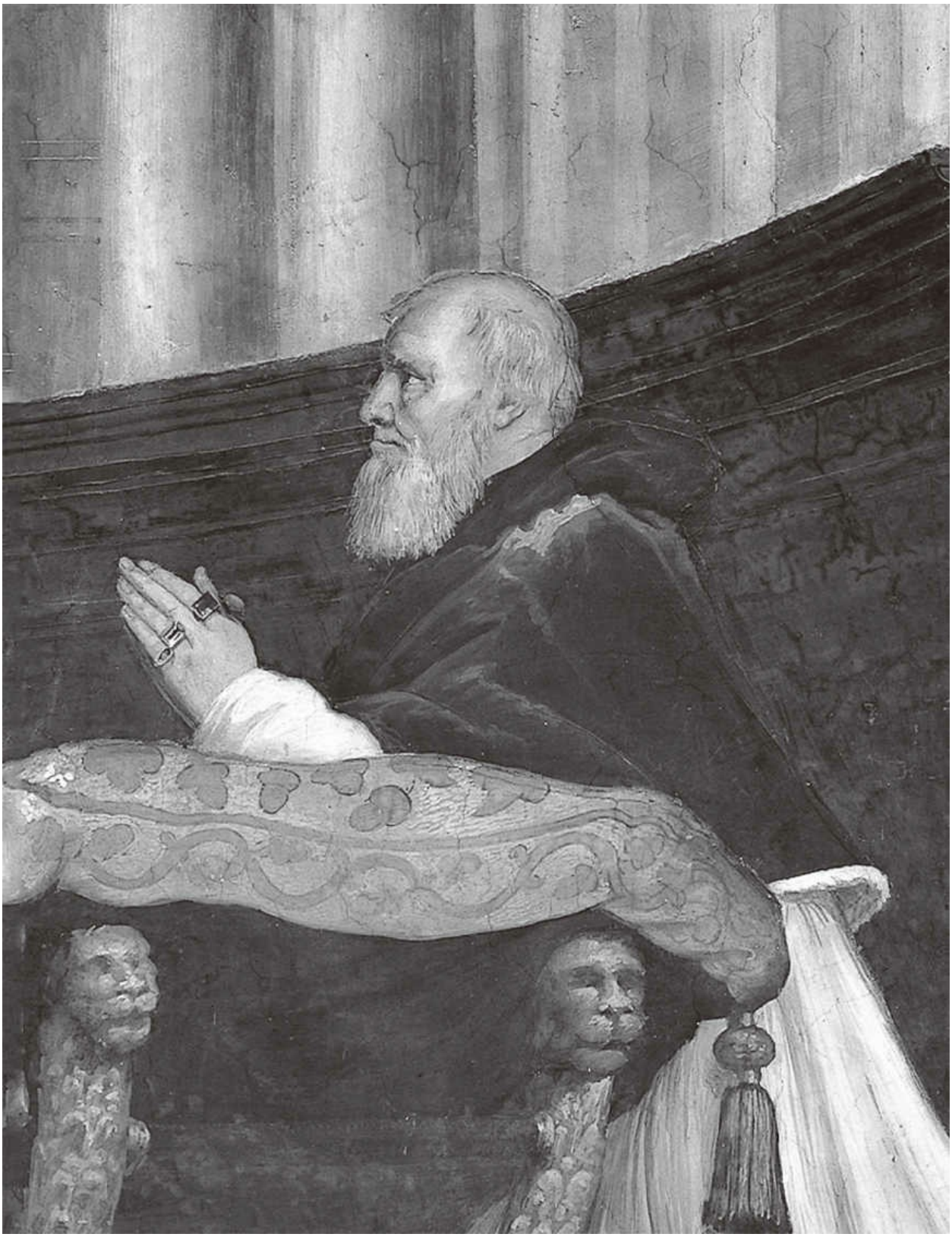
和波吉亚父子有关系的艺术家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和父亲有关系的平托里乔。波吉亚的公寓的一隅就有平托里乔所作的美丽壁画，现在依然完好地保存于梵蒂冈宫内；另一位是和儿子有关系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他们是在波吉亚建立罗马尼亚公国一跃成为意大利风云人物的那个时期相知相交的。

朱利奥二世（1503—1513），俗名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出生于萨沃纳，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这位教皇行事捉摸不定。他缔结了康布雷同盟，大家都以为他要攻打不听话的威尼斯，可他转脸却与昨天的敌人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联手攻打昨天的盟军法国，其可谓气宇轩昂。神圣同盟的口号是“赶走蛮族！”——他们把法国国王看成了蛮族。然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评论说，究竟谁是蛮族，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和他有关系的艺术家队伍庞大，著名的人物就有下面两位：

1508年，33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在西斯廷礼拜堂天花板上创作精妙绝伦的《创世记》。

同年，25岁的拉斐尔在现在依然叫“拉斐尔的房间”的墙上着手制作同样精妙绝伦的壁画。

朱利奥二世既谈不上有教养，也不好说他言行举止高贵干练，但是他在发现年轻艺术家的才能方面独具慧眼。他和拉斐尔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米开朗基罗却冲突不断。原因大概在于拉斐尔性情温和，而米开朗基罗性格过于暴躁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插曲。一天，教皇来到西斯廷礼拜堂，问正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工作的艺术家“什么时候完成”，他听到的是米开朗基罗从天花板上毫不客气扔下来的一句话：“完成的时候！”好在《创世记》完成于朱利奥二世尚在人世的时候。遗憾的是，拉斐尔的全部壁画完成的时间已经是下一任教皇利奥十世的时代。



朱利奥二世

从教皇朱利奥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工作量之大上来看，这两个人的性情一定有相似之处吧。二人在创造某种独特的东西时，似乎谁也离不开谁。

利奥十世（1513—1521），俗名乔凡尼·德·美第奇，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出生于佛罗伦萨。他把美第奇家族对学术、艺术的热爱带进了梵蒂冈。

这位教皇在位时间不长。但是正好在他的统治期间，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都在罗马，在梵蒂冈宫内从事创作。三人中，拉斐尔最小，他由衷地尊敬两位前辈。据说在他所画的壁画之一——《雅典学派》中，站在中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脸，前者酷似莱昂纳多，后者酷似米开朗基罗。美第奇教皇遗传了父亲收集古代美术品的爱好，而且非常热衷于此。他任命拉斐尔为挖掘遗迹的总监。在拉斐尔的领导下，罗马开始正式的遗迹发掘工作。现在，梵蒂冈美术馆收藏的古代美术品都是始于利奥十世，并由其后历代教皇继承下来的遗迹发掘成果所组成的。这些美术品一方面显示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作为异教世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忌讳；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当年基督教世界的根据地教皇国早已成为了过去。

利奥十世

利奥十世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了美第奇家族男人的风采。他熟知艺

术可以为政治所用。在与法国国王和谈时，他带上了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三人。自认为是文艺复兴艺术爱好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态度当时就缓和了。尽管是失败的一方，利奥十世与法国国王签署了有利于自己的和平条约。当然，除了上面三位巨匠，让拥有大军的法国国王变软的对策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教廷收藏的古代雕刻杰作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利奥十世舍不得把原作送给法国国王。好在法国国王尽管爱好艺术，但对古代艺术品了解不多。于是，这一赠品的原件就留在了利奥十世的手里。这件作品现在收藏于乌菲兹美术馆。也许是受前任国王路易十二世的影响，在意大利众多艺术家中，弗朗索瓦一世好像只崇拜莱昂纳多一个人。而此次相逢成了以后莱昂纳多在法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契机。

一个人个性越强，他的爱好就越明显。利奥十世崇尚华丽和优美，他不喜欢莱昂纳多追求真相的执着劲儿。最重要的是，这位巨匠从来不为他作画。米开朗基罗宏大的绘画风格非常符合前任教皇朱利奥二世的喜好，却不符合利奥十世的趣味。利奥十世最钟爱拉斐尔。可惜拉斐尔37岁就去世了。对于拉斐尔的英年早逝，利奥十世十分伤心，把他葬在了万神殿，那是古罗马时代诸神的殿堂。保留至今的拉斐尔的墓碑上，刻着皮耶特罗·本博用优雅的文体写的墓志铭。此人又是深受利奥十世喜爱的、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一位文人。

> 拉斐尔在这里安息，在他活着之时，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而当他一旦溘然长逝，大自然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在前一年，莱昂纳多在遥远的法国去世。三人中，独米开朗基罗一人留在世上，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

文艺复兴之花在罗马盛开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美第奇银行的倒闭导致美第奇家族集团早已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教皇利奥十世想用私有财产资助艺术，也无奈囊中羞涩。于是，教皇利奥十世想到了

售卖赎罪券的方法，说在赎罪券箱中投金币时，如果听到里面发出叮当的声音，那么投金币的人就完成了预约死后在天国的席位。在意大利，没有人受这种把戏的欺骗，却骗倒了德国淳朴的善男信女们。预约天国席位的钱送到罗马，变成了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拉斐尔绘制的杰作以及利奥十世奢华的生活。对此种行为，马丁·路德极度愤慨，他向教皇抗议，扬言要带领教徒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利奥十世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试图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来打击宗教改革运动，但没有成功。于是把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的宗教改革拉开了序幕。拉斐尔去世那一年——1520年，对罗马教廷来说是个多灾之年。

之后，坐上教皇之位的是荷兰人阿德里安六世。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随即，教皇的位置再次回到意大利人手中。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俗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一位私生子，其父亲是“帕齐的阴谋”中遇害的朱利亚诺。洛伦佐把他过继过来，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后，把他送进了神职界。在当时的意大利，神职阶级的世界不会抛弃私生子。因为当时在罗马教廷，即便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法律上也只能算作私生子。朱利奥当上了佛罗伦萨的一名主教。后来，利奥十世即他的堂兄弟乔凡尼就任教皇后，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因此，他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教皇。

出生于北方国家荷兰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六世就任教皇的一年间，根据编年史作者的描述，罗马“好像死了一样”。然而，随着克莱门特七世的即位，罗马再次焕发出了生机。罗马梵蒂冈宫在利奥十世时代被称为“欧洲最辉煌的宫廷”，此时再次成为古典学者及艺术家们竞相展示才华的场所。

遗憾的是，第二位美第奇教皇缺少政治灵敏度。除了意大利，当时的欧洲已经迎来国际政治变革期。这一政治动向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还有，有着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在四年前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同时还主宰着德国和西班牙，他手中

的权力非常强大。对此，克莱门特七世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谓同盟，是弱者与弱者相互合作力争成为强者的一个手段。在特定的时代里，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再好的策略，只要不适合时代的潮流就一无用处。在佛罗伦萨做主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克莱门特七世与马基雅维利成了好友，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理解马基雅维利一直在提的“时代性”。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结成了科尼亚克同盟，结果却导致了1527年的“罗马浩劫”。教皇国的首都罗马被皇帝统治下的德国雇佣军攻陷，遭到了长达一周的烧杀抢掠却毫无还手之力。不得已，克莱门特七世和红衣主教们离开梵蒂冈宫，逃到已然城市化的圣天使城堡，躲过一劫。保护教皇的瑞士雇佣军在战斗中无一幸存。

西斯廷礼拜堂变成了士兵们的临时营房，拉斐尔创作的壁画所在位置变成了马厩，教皇墓纷纷被盗。占领军野蛮的行为连西班牙方面也深感震惊。西班牙军高级将领给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 整个罗马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廷成了士兵和马匹的居所。我们的队长奥兰奇公爵试图整顿军队纪律，然而，面对这群强盗般的雇佣军却束手无策。德国雇佣军野蛮至极。他们全然不把罗马教廷放在眼里，让人不得不想，路德会教徒原来是这样一伙人。无数贵重物品、艺术品被盗并遭到毁坏。

接到罗马遭受如此重创消息的伊拉斯谟给他的朋友红衣主教萨杜里多写了一封信：

> 罗马不只是基督教徒的首都，它是具有高贵精神的艺术女神慕斯的居所，是我们的母亲。我为罗马的悲惨遭遇深深哀悼。

置罗马于群龙无首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逃到意大利中部小城市奥尔

维耶托避难。这里四面悬崖，易守难攻。当然，他也在积极寻找对策，希望与皇帝卡洛斯达成和解。同时，卡洛斯也需要与教皇达成和解。因为作为基督教社会的世俗第一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做到名副其实，罗马教皇主持的加冕仪式必不可少。“罗马浩劫”三年后，双方在博洛尼亚举行会谈，达成了和解。卡洛斯戴上了皇冠。克莱门特七世迫使皇帝答应为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统治地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年，佛罗伦萨因拒绝美第奇家族回归，遭到皇帝军队的攻打而沦陷。从此，佛罗伦萨从共和国变成了皇帝保护下的公国。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看到卡洛斯正式授予亚历山大公爵称号后离世。关于亚历山大，私生子的传言曾经盛极一时。

保罗三世（1534—1549），俗名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出生于罗马。

法尔内塞教皇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天主教界首领。他与亨利八世因为后者的离婚案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他同意英国基督教徒成立英国国教会，从罗马教廷分离出去。他还正式承认了反宗教改革中最具战斗精神的耶稣会，并主持召开了反宗教改革的理论武装之地塔兰托大公会议。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现在的罗马，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比比皆是。原因是在“罗马浩劫”中，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重建。既然是重建，就要用新的建筑样式，于是正在兴起的巴洛克样式成了主角。现在的罗马较完好保存下来的文艺复兴样式建筑已经很少，威尼斯广场南侧的威尼斯宫是其中之一。这里曾经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皇们的私宅，后来用作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的公馆，所以现在依然保留了这个名称。出生于锡耶纳的银行家基奇的家——基奇宫是其中之二。再有就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法尔内塞宫。这座建筑物是为教皇和其儿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红衣主教而建的住宅。现在，威尼斯宫变成了美术馆，基奇宫成了首相官邸，法尔内塞宫为法国大使馆所用。在意大利，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通常使用“基奇宫”或“法尔内塞宫”来表示首相官邸或法国大使馆。

法尔内塞宫（文艺复兴样式）

波利宫（巴洛克样式）

法尔内塞教皇统治的15年对于文艺复兴那时唯一留在世上的巨匠米开朗基罗来说，正好是他59到74岁的这个时期。从年龄上看，他已进入老年。但是米开朗基罗不是老人，教皇委托给他的工作还很多。除了设计法尔内塞宫，其余的都是公共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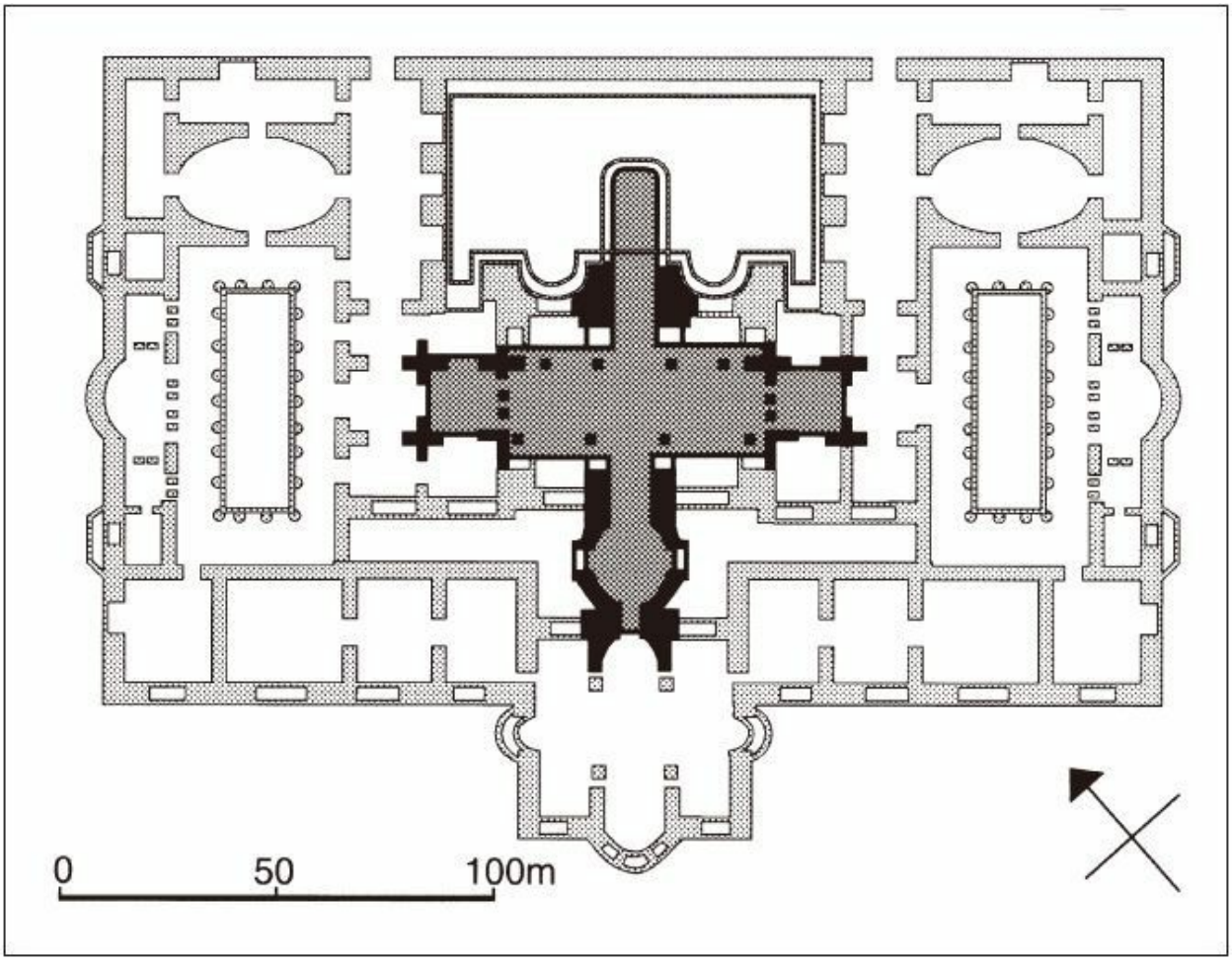
法尔内塞教皇继承了前任美第奇教皇的想法。1535年，他委托已经60岁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尚未画有作品的唯一一面墙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在天花板上创作《创世记》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只有

30多岁，完成作品只用了3年时间。但是，《最后的审判》却耗时达6年之久。这又是一幅力作，给人感觉是这位巨匠竭尽最后的力量而作。随着这幅壁画的完成，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绘画殿堂化的进程随之结束。

1538年，《最后的审判》尚在绘制之中，教皇又委托米开朗基罗重新开发早成废墟的卡匹托尔山。这是罗马著名的七丘山之一。在这个山上，63岁的米开朗基罗是这样设计的：中央是一个广场，立一尊马可·奥勒留大帝的骑马像；骑马像后面和左右两侧分别建起三座建筑物；正面是平缓且宽大的台阶，可以通往威尼斯广场。古代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长期搁置在圣约翰大教堂前的广场里，米开朗基罗考虑把这座像利用起来。据说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在罗马，皇帝的骑马像不下22尊，除了这一尊，其余全部被毁。基督教徒视罗马皇帝为敌人，自然不会接受皇帝的骑马像。这一尊皇帝骑马像之所以得以留存，据说是因为他被当成了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的皇帝。虽然后来基督教世界人们一度仅仅因为是异教徒留下来的东西就要把从古罗马到古希腊的所有艺术品或毁坏或扔进台伯河，再把铜像熔化，制成其他东西，但当人们知道这尊骑马像表现的是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上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憎恶虽然不再，漠视却延续了很久。就这样，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骑马像一直被搁置着。1350年，是米开朗基罗让它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现在，这尊像进了同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与卡匹托尔广场相邻的美术馆，用玻璃罩保护了起来。不是为了预防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其进行破坏，而是为了防止受到大气的污染。现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支起这尊骑马像达460多年之久的底座上，放着一尊粗制滥造的仿制品。我相信如果米开朗基罗看见一定会大发雷霆。不过底座是真的，委托人法尔内塞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

米开朗基罗很长寿，教皇一个个地离去，而他却一直活在世上。1561年，教皇国的统治者换成了庇护四世。此时的罗马正处于反宗教改

革的关键时刻，力求重整因宗教改革而威信尽失的天主教会。教皇庇护四世考虑要在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的遗址上建设基督教堂。戴克里先是4世纪初的罗马皇帝，他曾经有计划地迫害过基督教徒，因此恶名远扬。传说为了建设这个大浴场，他强迫4万基督教徒参与了建设。教皇的想法是，为了再次证明基督教的胜利，就要在这样的地方建教堂。



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深色部分是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

当然，适合这项具有纪念意义工作的人，除了名震天下、甚至被冠以“如神”这个形容词的米开朗基罗之外别无他人。已经86岁高龄的这位巨匠接受了教皇的委托。

完成后的这座教堂取名为“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其构造

非常奇特。通常，教堂建筑呈纵十字形，而这座教堂却是横十字形。正面也不是平面，而是半圆形，这在古代叫艾赛德拉。这样设计的原因是米开朗基罗要保留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中央部分的原样。所以，如果你想亲身感受一下古罗马大浴场的空间感，与其去卡拉卡拉皇帝浴场，不如走进这座教堂更有用。因为虽然卡拉卡拉皇帝浴场在规模上与古时一样，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墙壁和地面。在《最后的审判》中，米开朗基罗又把基督画成了肌肉健美的裸体形像。经他之手，原本为了纪念基督教胜利之事却变成了纪念异教徒的古代建筑师。三年后，米开朗基罗离开人世。

不知道是因为它是米开朗基罗最后的作品，还是作为文艺复兴和古罗马相融合的象征，现在，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意大利政府主办的国葬场。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是从庇护二世到保罗三世的话，那么也就是从1458年到1549年的90年，这期间共产生了9位教皇。罗马教皇应该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牧羊人，领导信徒是他们的任务。但是这9位教皇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都做过，也具备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没做，那就是引领迷途的羔羊。

的确如你所言。电影《第三个人》临近结束的地方有一段奥森·威尔斯扮演的“第三个人”说的台词。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尽管有波吉亚这样的人为非作歹，世界动荡，依然创造出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化。清新平静的瑞士不是也只创造了布谷鸟报时挂钟吗？”

我不是为恶行辩护。我只想说，霸气、活力和勇气与善恶无关。毕竟人类现实社会中，野百合和所罗门的荣华富贵是共存的。

您在“佛罗伦萨篇”中也说过，学术、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繁

荣。但是，罗马教廷与佛罗伦萨的经济人不同，他们既不是创造财富的个人，也不是构筑财富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就有一个义务，即每年要向教会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理由是资助穷人。在“什一税”的体系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随之增加。罗马帝国灭亡后延续了上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就像人口缓慢增长一样，经济的增长虽然缓慢却一直在持续，税收自然也随之增加。此外，中世纪时代的修道院既不是单纯的祷告场所，也不是单纯的抄写古典之处，在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修道院同时还经营着农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过去后，因惧怕海盗打来，农民们纷纷弃地而去，农耕地变成了荒地。在这样的土地上，修道院的修道士们重新开荒种地。查阅意大利葡萄园的原始账簿，会发现它们最初大多属于修道院。当修道士开垦的土地上又可以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农民就会回来，农作物就会增收。农作物增收了，农民就有了养育后代的能力。大多数修道院建得像城堡一样固若金汤，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海盗侵袭时，可以用作农民的避难所。

就这样，随着修道院农耕地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土地的“地主”罗马教廷的财力随之增强。中世纪到了后期，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什一税”的税收进一步增加。罗马教廷的财力与人口成比例地增长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有钱未必崇尚学术、艺术。对学术和艺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钱人可是多得很。

的确如此。人类以及人类书写的历史很多时候不能只用数字来解释。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力，孩子也一样，年轻时的生命力最为旺盛。但是，在生命力之外如果加上意志力，就会形成斗志或者野心，拉丁语

叫“vietus”（美德），意大利语是“virtu”。这个词的意思是“道德”、“优点”、“力量”、“能力”和“才干”等。生命为自然所赠，而美德却是人类意志力的结果。所有人都有生命力，但美德不是人人具备。马基雅维利说过，这种“美德”（vietus）会在不同民族间转移。古代是从希腊到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佛罗伦萨到罗马，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就是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吧。回顾一下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这句话：

>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正因为恺撒看透了人性的现实，所以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作为“更多的人”中的一员，难道只能对自己绝望了吗？那也不是。因为，更多的人如果想看到，他们就能看到。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想看的欲望。也就是说，只要有想看的欲望就可以看到。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是文艺复兴的根源。继佛罗伦萨之后的罗马也受到了这一文艺复兴精神的感染。

文艺复兴精神的导火索是复兴古代，所以，一旦感染上这种精神，罗马无疑比佛罗伦萨有利得多。在佛罗伦萨，学者和艺术家只能通过访问罗马、阅读美第奇家族购买的古典文献、欣赏美第奇家族收藏的艺术品等来发现古代精神，与此相比，这样的东西在罗马随处可见。之前，人们没有想看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发现“古代”。然而，一旦有了想看的欲望，他们就看见了。这里所谓的“看见”，指的是人们为这些东西的美而觉醒。

尼禄是被认为曾残忍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所以尼禄宫殿（黄金宫殿）受到基督教徒的嫌弃。但是，如果抛弃偏见认真欣赏遗留在这座宫殿遗迹上的壁画，尽管壁画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仍可以了解到古代业已存在的透视画法的重要性。还有，罗马斗兽场，之前一直被当作可以获取建材的场所，仔细观察，你会为其构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赞叹不已。此外，被投入台伯河又捡回来的神像、因为鼻子被削扔在路边的雕塑等，静下心来欣赏，你会发现眼前泛着白光的大理石曾经竟是一件件艺术杰作，尽管上面布满了河泥造成的斑痕，尽管他们少了鼻子。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慧眼”，意思是看清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文艺复兴精神就是人类让自己重新拥有慧眼的一场运动。

慧眼的意思我懂了。在这方面，佛罗伦萨和罗马有区别吗？

简单地作一下分类，也许可以说，佛罗伦萨风格的慧眼，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而罗马风格的慧眼，代表人物则是米开朗基罗。至于为什么是他们二人，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只有细心欣赏这两位巨匠留下来的“作品”才能体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莱昂纳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可以是莱昂纳多，而米开朗基罗，只有在罗马，他才是米开朗基罗。

你的意思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造就了米开朗基罗吗？

是的。应该说同时也是米开朗基罗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

20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访问罗马后写过一篇印象记。事实上到了罗马得到慧眼的文人艺术家，以歌德为首，多到不胜枚举，马克·吐温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一说到他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的那篇印象记就让人觉得实在幽默得很。他这样写道：

> 今晨心情极好，因为昨天得知米开朗基罗死了。

在罗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米开朗基罗的存在。对于以创作为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暗自庆幸米开朗基罗的死，庆幸这个把什么都做了的人终于死了，他再也不能创造。话说回来，500年前，当米开朗基罗看到眼前无数的古代杰作，大概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吧。他可能会想，虽然他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东西，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再也无法创造了，而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创造。一位优秀的创作者对另一位优秀创作者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终于死了，太好了。"

随着米开朗基罗离开历史舞台，罗马的文艺复兴随之呈现衰退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宗教改革吗？

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日本的文艺复兴学界占压倒性的意见是因为没有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是不完整的。对此，我实难接受。当然，一个大学生嘛，学到的知识很少，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虽然觉得奇怪，却拿不出可以用来论证的论据。后来，在写作有关文艺复兴的过程中，渐渐地，我有了信心。我确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是不完整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一个论据是不够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说说马基雅维利和路德。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路德生于1483年，卒于1546年，故而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同时代的两个人。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但是人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人类社会依然充满了罪恶。对此，他们感到迷惑。两人认真地思索其原因并真心地寻求打破现状的方法。

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 基督教思想作为指导理念，统治这个世界长达千年之久，人性却没有因此改善。那么只能说，不变的是人性。因此，只有从人类

现实的形象而不是想象的形象入手去改变，或许才会有效果。

另一方面，德国人路德的想法又是这样的，他说：

> 千余年的基督教社会在改善人性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基督（即神）和信徒之间隔着一个神职阶级。不是基督的教诲对改善人性没有作用，而是因为隔着堕落了的神职阶级，所以未能起到作用。因此，改善人性的方法是废除神职阶级，让神和人直接交流。

天主教会由神职阶级构成，是存在于神和信徒之间的一个组织，罗马教皇为最高神职官，下设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和修道士。之所以设神职阶级，是因为他们需要向信徒传授教典（即《圣经》）。而路德提倡的新教，特点是不要这个过滤层。

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并非没有看到神职阶级的世俗化。只是从地理上，他们对十字军东征之举看得更透彻，所以对于失去过滤层后可能出现的危害也更敏感。

神不会说话。所谓神说了什么，不过是信徒的想象而已。有宗教专家神职阶级在，他们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某事某说法进行过滤。所以，类似信徒声称听到了神的声音这种事情就不会被大量公之于众。如果没有这层过滤，则很容易有人站出来声称听到了神之声音。也就是说，神和信徒如果直接交流最容易出现的情形是，信徒个人的想法被说成是神的想法。

十字军东征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的欧洲无力养活增加了的人口，于是这些吃不饱饭的人们拿起武器，一次次地向富庶的东方发起了战争。但如果只是纯粹的民众，他们做不到斗志激扬，这就需要寻找理论依据，而宗教是再合适不过的理论武器。欧洲民众就是以宗教作为夺回圣地的借口，借口从异教的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教的圣地是神的指示，服

从神的旨意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而十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神之所望”。正因为有神职阶级存在，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神职阶级，那么信徒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宁可容忍小恶来阻止大恶，而不要在废除小恶后出现危害更大的大恶。

这不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的想法。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他们和同时代的伊拉斯谟一样，尽管批判起神职阶级来毫不留情，却没有人提出废除神职阶级。这并不是说他们比路德更稳健，事实上与路德相比，他们只是不相信人性的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他引用了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一句话：

> 无论多么坏的事，最初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的。

我想，发起宗教改革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尤其是到了现在，在路德之后又过去了500多年，人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因此，我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不同类这一论点提出的论据。至于你提出的罗马文艺复兴衰退的原因是否缘于宗教改革这个问题，既然我采用了“不同类论”，那么，我的回答只能是：不是直接原因，却是间接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虽然表示反对但对路德提出的废除神职阶级论深有同感的人中有不少是文艺复兴人，其中包括马基雅维利、其好友圭恰迪尼、伊拉斯谟，甚至罗马教廷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教皇利奥十世虽然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但是这位美第奇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谈话中常常提及路德，并就路德的想法展开自由讨论。这种自由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本质。对此，反宗教改革派愤慨不已。他们认为，正是罗马教廷内的这种自由气氛才让新教得以泛滥猖獗的。

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内部危机意识的产物。赞同此说的人，包括赞成此说的神职人员认为，发生在1527年的“罗马浩劫”与其说是新教教徒德国士兵对天主教根据地罗马进行的破坏，不如说是神给予罗马的神罚，因为罗马感染上了文艺复兴的色彩。所以为了罗马不再受到第二次神罚，为了从危机中拯救天主教，他们认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约束。自此，残酷的异端审判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说接受不同思想的是文艺复兴，那么拒绝接受不同思想的就是反宗教改革。这又是一个“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的例子。我想文艺复兴就是被反宗教改革扼杀的，而反宗教改革的主角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西班牙人。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成为禁书、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基督裸体像被画上腰布、伽利略不得不宣称放弃日心说的时代到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一生正好处于文艺复兴鼎盛期，如果他晚出生50年的话，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形。相信他那坚定的、科学的探索精神一定会与反宗教改革风潮下的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也许为了避免成为异端审判的牺牲品，他会逃往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避难吧。从异端审判官的作为来看，一旦被他们盯上，就难逃有罪判决。人们谈异端审判官色变，甚至称他们是蛇。他们下令进行的拷问之残忍之凄惨，可以让人们真正了解到自认动机正确的人所作之恶是多么骇人。异端审判不是在16世纪中期突然爆发的，在欧洲其他地方早已出现。只是它来势汹汹地到达罗马是在罗马教廷被反宗教改革派占领以后的16世纪中期。臭名昭著的异端审判官抓捕之手没有伸及的地方据说只有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地，这就是16世纪中期的现状。

于是文艺复兴也从罗马转移到威尼斯了，对吗？

从历史上来看，威尼斯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威尼斯没有拒绝罗马提出的设立宗教裁判所的要求。他们同意设立宗教裁判所，条件是裁判所中必须有共和国方面的代表，也就是有世俗社会的人加入。而在其他国家，宗教裁判所只有神职人员。同时，宗教

裁判所的会议章程规定，只要有一位委员退席就必须流会。

于是在威尼斯，在宗教裁判所会议上，神职人员刚开始说明理由，提出要对某市民进行异端审判，宗教裁判所中的元老院议员就会起身退席。所以表面上威尼斯并没有反对反宗教改革，只是让它“流产”而已。正因为这样，在反宗教改革之风呈横扫一切之势的欧洲，威尼斯成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港之一。文艺复兴也来到威尼斯避难，就像一个世纪之前，为了躲避战乱，从意大利各地来到威尼斯避难的手艺人一样。

第三部 基安蒂的格列韦篇

我们坐的是罗马开往威尼斯的火车，我以为会直接去威尼斯，没想到您催着我在佛罗伦萨下了车。我以为您要让我再看一次佛罗伦萨，没想到我们在车站前上了出租车却没有去市中心，反而走上了前往郊外的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托斯卡纳山区的一个村中广场。为什么您要把我带到这样的村庄来呢？

这个村子叫格列韦，地处基安蒂地区的中心，位于佛罗伦萨以南，距离佛罗伦萨不足30公里。每年葡萄收获季后举办的基安蒂红酒节就在这个广场上进行。当然，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请你喝葡萄酒。你瞧，广场中央有一个铜像。你猜他是谁？

是为基安蒂红酒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吗？

现在，格列韦被说成是基安蒂地区葡萄酒的心脏。但是，那个人跟葡萄酒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名字虽跟葡萄酒没关系，倒是和美利坚合众国有很深的渊源。纽约哈得孙河在流入大海的海湾处有一座桥，连接史泰登岛和布鲁克林。那座桥叫“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有一尊乔瓦尼·达·韦拉扎诺的铜像立在那儿，他就出生在格列韦。

出生于基安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成为纽约的桥名呢？

因为他是乘船沿北美东海岸从加拿大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一个人。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想让你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出生在海边的人对于乘船出海应该不会有抵触，因为从小看着大海长大，在他的意识里，自己与大海的关系有时比与陆地更密切。热

那亚、比萨、威尼斯、阿玛菲之所以会成为意大利海洋城邦之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城市都紧邻大海。但是，佛罗伦萨从来都不是海洋城邦，更不用说距离佛罗伦萨30公里的内陆村庄格列韦。那么出生在这里的韦拉扎诺为什么会去美洲那样遥远的地方呢？而且他还去了两次，甚至在第二次探险中，因为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把命都留在了那里。他出身于一个专事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的富足农民家庭，如果在当地终其一生，一定可以过一个地方名流的安逸生活，老了以后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地死去。然而，他乘船出海了。为什么？15世纪到16世纪的那段时间，出生于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的人中，出海的人出乎意料地多。

我一直在重复提到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才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根源。文艺复兴开花结果的领域不只在艺术和学术上，在政治、经济以及海运领域也一样。比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精神与大航海时代关系更深，其证据是，几乎没有什么意大利人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关系密切的，而与大航海时代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却很多。

关于大航海时代，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大”字呢？

那是因为之前的航海都局限于地球海洋的一小部分。

就欧洲而言，在15世纪末之前，欧洲人航海的区域基本上局限在地中海、大西洋东北部以及波罗的海，在非洲是大陆西岸沿海岸线稍稍南下一段的区域，在美洲大陆也不过是原住民用划艇或木筏即可到达的东海岸的一部分而已。太平洋西北部除了日本沿海，完全没有固定航线供船只定期往返。在欧洲人称作“Orient”的东方世界，从红海到波斯湾的海域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航行区域，以东是印度人的航行区域。当然，这些海域并没有分界线，都是连在一起的，只是被人为地区分开来。曾经有一位中国人（郑和）一度到过非洲东部，但是，在当时（15世纪）他并没有到过菲律宾南部。东南亚各民族也只在他们居住地周边的海域乘船往返，而印度洋南半部分还是人迹未至的海域。终于，航海

时代把地球上所有这些孤立的海域都连了起来，所以，在航海前面加上“大”字，把那个时代称为大航海时代。也就是说，各海域间的界线没有了，大海变成了一个整体。列举大航海时代著名的航海家，有以下这几位：

首先是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曾经沿非洲大陆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此次探险之行的时间是在1487年到1488年间。

其次是意大利人哥伦布。他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于1492年出发。目的地也是亚洲。他的航线是向西横跨大西洋，然后到达西印度洋群岛。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504年的8年间，哥伦布共进行了4次探险之行。在这4次探险中，他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东部和南部、特立尼达、委内瑞拉海岸、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地峡。显而易见，他一直在寻找直达东亚即太平洋的航路，哥伦布本人相信自己发现的就是亚洲的某个地方。

接下来的一位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从1497年到1499年间，他绕过好望角抵达了印度卡拉卡特。他此次航海的成功意味着只要绕过非洲，就可以通往亚洲。

第五位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哥伦布一样也是意大利人，不同的是哥伦布出生于热那亚，而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在西班牙结识哥伦布后，他深受刺激，于是从1499年到1502年间，他进行了两次航海探险。好像是追随哥伦布似的，他首先到达的是南美大陆北部一带。第二次在大西洋上一路向西南航行，走遍了南美大陆东岸。让欧洲人知道南美有一条叫亚马孙河的人正是他——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他出身于佛罗伦萨的名门，但是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所以曾经在美第奇家族经营的“企业”西班牙分支机构工作过。

当时的公文都用拉丁语书写。因此，哥伦布也好，亚美利哥·韦斯

普奇也好，他们与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契约文书中留下的是拉丁文的意大利名。于是，意大利语的Colombo变成了Columbus，AmerigoVespucci变成了AmericusVespucci。后来Americus又变成America。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亚洲的一部分，亚美利哥和他不同，他隐隐感觉自己探险所到之处是一个新大陆。拉丁语中，意为新世界的词是Mundusnovus。据说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就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也许是受这两位航海家的刺激，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人前往中美和南美的航海探险之举接连不断。其中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大航海是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的。他和他的船员在1519年到1522年间，绕过南美大陆最终进入了太平洋。这条航线的发现，终于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连在了一起。后来就把连接这几大洋的南美海峡命名为麦哲伦海峡。太平洋的名字也是他取的。穿过波涛汹涌的麦哲伦海峡，展现在眼前的是辽阔的大洋。对于船员们来说，这就是太平的海洋。而指挥船只横跨不再是未知海洋的大西洋，再掉转船头一路向北的正是出生于基安蒂一个小小村落格列韦的韦拉扎诺。

韦拉扎诺共进行了两次探险之行，时间是在1524年到1528年间。第一次航海，他到了纽约，这里是哈得孙河流入大西洋的入海口。第二次探险时，他走遍了北美大陆东岸。美国人没有忘记这一史实。尽管哈得孙河和纽约都是后人取的名字，但是美国人还是用此地的发现者——韦拉扎诺的名字命名了400年后架起在这里的一座桥梁。

原来如此。只是大航海时代被认为是欧洲人对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进行殖民统治时代的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出于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这些出海探险的文艺复兴人说到底也不过是打开殖民帝国时代帷幕的人，不是吗？

以马可·波罗为首的先人早就开始了陆地探险，欧洲人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航海探险的。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和日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两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所以大航海无疑也是追求利权的一种探险行为。

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还是追求创造的喜悦，有利可图才是人类活动的动机。如果只是作画或孜孜不倦的古典研究，没有资助人也可以做到。毕竟，画只是挂在墙上的东西，研究可以独自在家进行。但是探险行动需要经费。首先，船只至少需要三至五艘，还要招募船员。因为不是商船，目的地又是未知的世界，所以要找到合适的船员并不容易，再加上事先不知道补给地会在哪里，食物必须准备充足。探险是一项大事业，没有资助者就无法付诸实现，没有能力筹措到庞大资金的人不可能进行。即使有能力筹措到如此庞大款项的人，如果不能给投资者预期的回报，不会有人拿钱出来。这就是现实社会真实的人性。因此，通晓天文学、数学、地理，同时又是航海技术专家的大航海时代的主人公们，不论自身的探索欲望多么强烈，在获取资助的时候只能向资助人强调可能带来的利益。就好像电影导演说服电影制片公司说绝对会有观众来看电影一样。当然，探险行动的资助者决定了下一个时代的特点。

下面我介绍一下大航海时代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资助者吧。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出生于葡萄牙——葡萄牙国王出资。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西班牙女王出资。

瓦斯科·达·伽马——出生于葡萄牙——葡萄牙国王出资。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西班牙国王出资。

费迪南德·麦哲伦——出生于葡萄牙——西班牙国王出资。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法国国王出资。

大航海时代最有名的就是这几个人。

葡萄牙和意大利各出了三位航海家，资助他们进行大航海探险的，葡萄牙有两次，西班牙有三次，法国有一次。意大利有航海家参加航海探险，却没有人出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是意大利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错失了新时代的这股潮流？

这些大航海家和资助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出资者策划并准备好资金后，招募合适的人，令其出海探险这样的关系，而是航海家向资助者推销自己的探险计划，获得资助后实现航海之行的。既然资助者同意出资，那么，他一定有赌一下的想法。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最初找的是威尼斯，但是，威尼斯共和国经过详细研究后拒绝了。于是他转而找到西班牙国王，航海才得以实现。哥伦布没有找自己的国家热那亚，是因为当时热那亚已经处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不适合做自己计划的资助人，仅此而已。至于韦拉扎诺的资助者为什么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是因为他的计划正中法国国王下怀。当时，西班牙对于进入中南美洲表现积极，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尚未伸及的地区只有北美。为了抗衡西班牙，弗朗索瓦一世试图在北美寻找新的出路。

刚才你问，意大利城邦，尤其是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城邦之雄，是否错失了新时代的潮流？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半也许可以说是错失了，另一半只能说不是。

首先，所有这些大航海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开通往亚洲的商路，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在开发商路和新市场方面，威尼斯、热那亚以及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都是遥遥领先的，尽管他们的活动区域只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外延伸。相反，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在这方面都是后来者。走在前头的或许没有继续开发新商路或市场的需要，而后来者必定有这个需要。而留给后来者的，只有走在前头的尚未触及的地方，那就是新大陆（Mundusnovus）。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问。热那亚已经处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因为美第奇银行的倒闭，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所以这两个城邦

此时消极开发新商路的原因显而易见。威尼斯作为海洋民族又有悠久的海运历史，且资金实力雄厚，为什么会对寻找新大陆如此消极呢？原因是其因为经济持续良性发展，无须开发新大陆。印度是威尼斯主要贸易商品香料的集散地，虽然绕过非洲的新航线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直抵印度的好处，但是，威尼斯用威尼斯人特有的合理政策与之抗衡，并取得了成功。所谓的合理政策究竟是什么，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只能请你找《海都物语》读一读。毕竟，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绕道好望角的“印度直航”与威尼斯经济衰退没有任何关系总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威尼斯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提出的资助要求给了一个“No”。

威尼斯“错失”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和威尼斯对于开发新航线以及新市场的想法不同。

由于葡萄牙事实上已经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在新大陆的地位后来被英国取代，所以，威尼斯可比较的对象就是西班牙了。西班牙既不是海洋民族，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海军国家。西班牙成立过唯一一支正式舰队叫“无敌舰队”。所谓的“无敌”，说的是它不作战的时候。后来在一次和英国的交战中，战斗刚打响就吃了败仗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西班牙人设想的新市场不是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他们的目的是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威尼斯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威尼斯在国外的领地不是殖民地，而是贸易基地。岛屿中，他们占有了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科孚全岛，但是在占领地上，他们只占有商用、海运和军事所需的土地。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们对基地有“点”和“线”的概念，却没有殖民地的“面”的概念。但是，新世界是大陆。要进入这个新世界，“面”的概念更适用。占领者要占有“面”，要把这个“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看作是隶属者而不是平等交易的伙伴。威尼斯人以及除他们之外的意大利人大概并不习惯这样的概念吧。学者之间经常会交流一则笑话，说的是，如果大航海时代的主导权掌握在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意大利人手中，就不会有印加帝国的灭亡了。而因为西班牙人掌握了主导权，

所以中南美洲变成了殖民地。可以说这也是反宗教改革的产物。因为，殖民地化就是铲除不同思想、不同人种的行为。意大利人错失殖民帝国时代也是缘于他们的性格和想法与殖民帝国时代不合拍。

不管赶上了新时代还是错失了新时代，这都是国家的问题。抛开国家的因素，个人的丰功伟绩会代代相传。这些大航海家中，没有一个人是在荣华富贵中走完一生的。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从好望角顺利返回，却在另一次探险途中死去；哥伦布在不得志的时候郁郁而终；瓦斯科·达·伽马取得了葡萄牙在印度的商业特权，但是还没有享受到这个特权带来的荣华富贵就早早离世；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曾经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员工，后来荣升为西班牙海军的“领航员长”，而他生前得到的荣誉只是同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大陆美国而已；因为麦哲伦是历史上第一个绕地球一周的航海家，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他，但用3年时间真正完成绕世界一周的其实只有他率领的5艘船中的一艘和18名船员。麦哲伦本人在绕世界一周成功前一年，就在菲律宾附近的岛屿被原住民杀害；还有韦拉扎诺，在北美大陆探险时，同样因为卷入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而失去性命。

如果是出于积累财富的考虑，在当时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他们是最优秀的船员，同时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如果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黄金才出海的，我是不会同意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航海时代的主人公中有两名佛罗伦萨人，但佛罗伦萨并非海洋民族，这是为什么呢？

可不止两个人。两个人只是船长（也就是指挥官）、总负责人的人数。以朋友或幕僚的身份参与到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韦拉扎诺航海之列的人中还有很多意大利人。

也就是说，佛罗伦萨人在海洋上的腾飞，这两个名留后世的人并非特例。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保罗·托斯卡内利。

此人1397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在帕多瓦上大学期间以及应红衣主教朋友的邀请，在罗马逗留过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除此之外，直到1482年去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佛罗伦萨。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他是一个身在佛罗伦萨、心在地球，不，超越地球，飞翔在天体上的人。怎么飞翔呢？是通过数学的手段。

他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有地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等。这些学问都需要通过询问亲眼见过的人，通过观测自然现象，以此为基础，运用数学计算得出假设。他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十分相像。据说，提出纬度和经度概念的人也是他。

作为数学狂人的他影响了同时代很多人。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圆顶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建筑总监，是他的朋友。据说布鲁内莱斯基之所以擅长数学就是他教的。他还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吃透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和佛罗伦萨人、被人们称为“万能人”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成为好友的。据说，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之前，他已经观察到四次，并以此为基础，绘制了天象图。

但是，后人知道托斯卡内利不是因为他在这些学术领域的成就，而是因为哥伦布曾经写信向他求教。当时哥伦布刚过30岁，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了托斯卡内利在1474年写给葡萄牙朋友的一封信的内容。在那封写给葡萄牙僧侣马丁内兹的信中，托斯卡内利说，从欧洲通向亚洲最近的海上路线不是沿非洲大陆南下，而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向正西的航线。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成为人们看低托斯卡内利的原因。因为哥伦布

发现的不是亚洲而是美洲新大陆。也就是说，托斯卡内利和哥伦布一样，都没有预计到新大陆的存在。就在托斯卡内利去世17年之后，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大陆抵达了印度。从结果上看，苏伊士运河建成以前，从欧洲通往亚洲最近的海上路线只有绕过好望角。在这点上，托斯卡内利也没有算对。

发现美洲大陆并留下这一记录的第一人始终是哥伦布。和他一样，托斯卡内利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唤起不熟悉大海的佛罗伦萨人对大海的兴趣方面。

佛罗伦萨不靠海，基安蒂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格列韦甚至也不靠河，但是，“港口”的概念早就深入人心。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界在欧洲各地拥有众多分公司。我们不清楚韦拉扎诺开始探险之前的经历，只知道他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一样是“企业员工”。他的任职地和韦斯普奇不同，很可能是在法国而不是西班牙。顺便提一句，韦拉扎诺探险之行的出资者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位国王爱好文学艺术，直到韦拉扎诺出海的5年前，他还是和韦拉扎诺同为佛罗伦萨人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也许，这两位佛罗伦萨人曾经在某个地方相遇过也未尝可知。

晚年的莱昂纳多名扬天下，人们不分国界，纷纷前来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这位巨匠从不拒绝来访者，据说对于来自他年轻时爱恨交织的故国佛罗伦萨的来访者态度尤其亲切。或许这其中就有年轻的韦拉扎诺也未尝可知。毕竟，二人都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人都是外流的精英。我们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像佛罗伦萨那样本国精英大量流向国外的。像威尼斯共和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这是威尼斯的特点。

人才是否外流是不是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国于1530年垮台而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延续到1797年的原因？

不是唯一原因，但的确是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就去威尼斯了解意大利城邦中唯一持续保持繁荣发展并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最后一个中坚的威尼斯的秘密吧。

第四部 威尼斯篇

对话在穿行于运河之中的贡多拉上、圣马可广场及其周边小巷里以及面对运河的屋顶阳台上进行。

贡多拉这种小船坐上去后感觉并不很舒服啊。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代步工具，所以，不舒服也无所谓。它们好比穿梭于城市里的小汽车，不是用来进行长途旅行的工具，所以不需要舒服的感觉。当然在陆地上行走和在水面上行船，区别还是很大的。请看去往那边的渡船。威尼斯有一条大运河（CanalGrande）把市中心一分为二，整条运河上面只有三座桥。若想去对岸，要么绕道从桥上走过去，要么就只有坐往返于大运河两岸的“站站停”渡船。坐“站站停”渡船经常会绕远路。于是，大运河上出现了私营渡船，只要花公交车走一个区间的钱，就可以把你送到对岸。观察一下乘坐这种小船的人，可以判断出他们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本地人通常会站在船上，外来客往往坐在船内，尽管时间很短。好像是歌德很高兴地写过这样一句话：此时，自己也能像威尼斯人一样站在渡船上了。现在的威尼斯人早已没有了雄飞大洋彼岸的想法，但是，他们终究继承了不惧怕坐船的习惯。

话虽如此，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即便是现在，人们还会相互提醒：高速公路上看到挂有威尼斯车牌的车，一定要小心避让。威尼斯是一个无车城市，汽车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人们对威尼斯人的驾车技术深表怀疑。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坐马车出行时的笨拙样子甚至还被画成了漫画。

威尼斯人说话听上去好像也和佛罗伦萨人不一样。威尼斯人虽然和

佛罗伦萨人一样都说意大利语，但是感觉很从容。

佛罗伦萨人说话语速很快，很直接，常常会冒出一些警句直刺他人要害。与此相比，听威尼斯人说话感觉很舒服。但这不是因为威尼斯人性格温和，而是因为在风声、波涛声不绝的船上，要顺利传递信息，只能放慢语速。在早已成为旅游胜地的威尼斯，这又是保留至今的海洋国家时代的习惯之一。

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不是旅游胜地吗？

不仅仅是。自古以来，威尼斯有“海上之都”之称，有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威尼斯人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愿意充分利用一切已有资源来吸引游客的到来。所以，还是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就已经是一个旅游胜地，只不过那时的威尼斯不仅仅是旅游胜地而已。

再来说说不仅仅是旅游胜地时代的威尼斯吧。在路过基安蒂时，你说过佛罗伦萨是精英外流的国家，威尼斯不是。那么，威尼斯是人才流入型的国家吗？

15世纪末之前，佛罗伦萨也是一个人才流入型国家。14世纪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里，有才能的人都向往佛罗伦萨，都愿意去佛罗伦萨。首先因为佛罗伦萨的雇主有智慧，有很高雅的审美观，需求旺盛；其次，来自各地的有才之人聚在一起、相互切磋的气氛很热烈。佛罗伦萨成为人才外流型国家可以说是始于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去世。至于和佛罗伦萨并列为意大利城邦之雄的威尼斯成为人才流入型国家的原因，在需求旺盛这一点上和佛罗伦萨一样，但是第二个原因不同。当时反宗教改革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所以，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自由”，无论是言论还是在艺术表现上。

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共和政体于1530年垮台，之后是美第奇家族统

治的君主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与此相反，从建国到灭亡的1200年间，自始至终都实行共和政体。当然，说是共和政体，既不是古代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政治，也不是现在的代议制民主。那时威尼斯的共和政体是由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叫寡头政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同类，与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有点相似。

只要出身于一个权贵家族，一到成年即可得到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席位，不需要经过选举。但是，以后的晋升之路则采取选举制。120到200人不等的元老院议员就是由共和国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的。元老院人数并不固定，这是因为一个家族只能拥有一个元老院席位。元老院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事实上的国会，所有官职都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尽管如此，没有内阁，威尼斯同样无法行使其职能。如果想了解详细内情，我只能再推荐你读一读《海都物语》。事实上，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类似于内阁的机构叫“十人委员会”，虽然事实上有17个人。当急需出台一项政策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这些方面，威尼斯与古代共和政制的罗马非常相似。但是，一个国家需要最高领导人。在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在威尼斯，最高领导人则是元首，只有一人，一旦当选，任期终身。元首不世袭，儿子等直系亲属不能成为后任。元首是共和国的“面子”，所以，他的威望高于所有人，但是他的权力只是元老院200张票中的一张，“十人委员会”17票中的一票。为了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能充分发挥作用，威望和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威望和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是君主政体，在古罗马就是帝制。

这样一来，普通市民完全被排除在国政之外，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专制政体。那么无缘国政的普通市民没有揭竿而起吗？还有，在这样的政体下，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还会有充分的自由呢？

启蒙主义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在威尼斯，有权势的人都是通过贸易积累起财富的人们。由这样的人把持国政是有威尼斯特色的共和政体。他们深知要守住自己的财富，国家——威尼斯必须发挥其国家的职能。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出现过堪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德国的富格家族匹敌的大富豪，但是，财力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人家很多。贫富差距当然存在，只是这种贫富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威尼斯有一个让失败者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的体系，另一方面，对于为保护在外利权，在参加不可避免的战争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即使他们只是普通市民，政府每年也会向他们的遗族发放抚恤金。抚恤金的金额不高，以最低额为例，相当于当时著名画家提香·韦切利奥一幅画的画料的十分之一。所以，单纯依靠抚恤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尽管如此，抚恤金制度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尚未出现。

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经济人管理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威尼斯，无论你多么财大气粗，个人不得拥有大型划桨商船，以利润最高的胡椒为首，各种香料都是这些商船的主要货物。所有大型划桨商船归国家所有，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委托发送货物。到了东方，他们可以用带来的货物售后所得买来胡椒再运回威尼斯。这一政策不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和东方国家的贸易之中，同时也有效地分散了有钱人的风险。除了上述商船，也允许个人持有用于运输利润较低的商品如羊毛、原棉、小麦等的帆船。所以，在威尼斯，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那样，拿出全部财产投资的两条船不幸沉入海底而还不起债的威尼斯商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真是丢尽了威尼斯商人的脸面，他们在被放债的犹太高利贷者追债之前早就被喜欢行政指导的威尼斯政府叫去接受调查了。

威尼斯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得也很好。在西欧，教皇派和皇帝派争执不断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装出一副自己属于遥远的拜占庭帝国管辖的样子，保持了中立。当然，他们没有单纯地静观其变，而是主动请缨，力劝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解，促成了二者在威尼斯的会谈。当全欧洲抱成一团向伊斯兰势力发起决战的时候，还主动派遣军队站在

西方一边。

如此灵活的外交政策得以实施，原因有三：第一，没有威尼斯从中起着桥梁的作用，东西方就没有贸易往来。在同一个城市里，既有德国商行也有土耳其商行的只有威尼斯。第二，要想解决与伊斯兰之间的问题，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必不可少。没有威尼斯舰队就没有勒班陀海战。第三，威尼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信息。威尼斯共和国早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起在国外常驻外交官的制度，他们收集情报之快、之准确绝非其他国家所能比。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就无法进行买卖。

但是，尽管掌权的是商人，他们并没有忘记充实军备。和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的陆地兵力依靠雇佣军，而保护本国市场所必不可少的海军则由本国国民组成。在元首选举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就是候选人是否担任过海军总司令官。威尼斯海军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主人公那样的人，摩尔人做了海军将领。

说到这里，大概你又要问，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该国居民享受到的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关系可就大了。威尼斯领导人努力保护的就是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拒绝别国的干涉。那么，独立的最大障碍来自哪里呢？来自基督教会，来自基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威尼斯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政教分离主义者。奉行这一主义的国家和个人用意大利语叫作“信而不迷神者”。如此彻底的“信而不迷神者”，除了威尼斯人，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就连普通市民也常常把“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是基督教徒”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威尼斯共和国允许一切自由，除了不反对威尼斯特色的政体这一条件。当然，他们并非出于尊重自由的理念，只是为了避免来自基督教会以及借基督教之威的其他国家的干涉。因为在人类世界里，即便只是围

绕领土之争或利权之争，打着宗教旗号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我想与基于抽象理念的自由和独立相比，只有坚持出于具体利益考虑的自由和独立才会长久。

前面已经说过，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有三个政府方面的代表。会章规定，只要一人起身退席，裁判所的审判就流会。所以在这里从来没有过完整的异端审判或巫女审判；在这里，路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可以无所顾忌地出版发行。我说过，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证的地方出版业难呈繁荣之势，而威尼斯的出版业始终处于欧洲领先地位。蒙田为威尼斯的自由惊叹不已。在他之后，到过意大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很多，其中有一人在游记中写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买了大量的书，一切都很圆满。但是，如果把这些书直接寄送到位于勃艮第的家里，可能会引起警察机关的注意。于是，只得寄往了随员的父母家。这事发生在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仅仅半个世纪之前。同时代的伏尔泰提出了疑问：在旧式寡头政体下的威尼斯，为什么可以保证有这样的自由？

至今，研究此问题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了。研究者为了这一问题，甚至还举办过学术会议，主题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在这里我秉承现实而具体的威尼斯人的标准，列举三个具体事例，看看威尼斯是如何与宗教保持距离的。

现在你我所在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曾经的威尼斯共和国首都、威尼斯的中央广场，正面是圣马可大教堂，教堂左边现在是主教馆，右边是政府机关叫“道奇宫”（元首宫殿）。中世纪的城市由行使政权的政府机关和主持宗教事务的城市最大教堂这两大支柱构成。在佛罗伦萨，韦奇奥宫和圣母百花大教堂是该城市的两大支柱，佛罗伦萨主教居住的主教馆就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附属的洗礼堂前面。也就是说，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是作为市民共同体的两大城市支柱。

但是，唯有威尼斯不同。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在威

尼斯，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宗教活动，都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游行队伍会走在前面的广场上。然而，真实的情形是圣马可大教堂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个人礼拜用的小教堂，教堂的主权也不属于罗马教廷。威尼斯的主教和东方基督教界首脑一样叫“Patriarca”，而不是西方的“Vescovo”，他所居住的主教馆也没有设在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圣马可大教堂周边。共和国时代的主教馆设在造船厂对面距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现在的主教馆位于圣马可大教堂左侧，是威尼斯共和国垮台、威尼斯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后迁来的。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存续的1200年间，威尼斯人在与宗教界保持距离的问题上，固执到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证据。了解这一历史就会理解罗马教皇为什么会感叹自己走到哪里都是教皇，只有在威尼斯不是。

第二个证据就是威尼斯教堂里随处可见的圣遗物。昨天你看到后，曾经很吃惊地问这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戴在头上的棘刺冠上的一根棘刺、圣人的一根腿骨等，这样的东西就叫“圣遗物”。中世纪，从东方向西方进口圣遗物也是一桩很红火的买卖。威尼斯人是东西方贸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东方收购圣遗物，运到西方后出售，从中获利。但是，无偿捐赠给祖国威尼斯的教堂的东西也不少。因为威尼斯百姓虽然对主教馆被赶到城市的边缘没有任何不满，但是看到值得瞻仰的对象就在身边，而且数量又多，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为此，佛罗伦萨人嘲笑过威尼斯人，他们嘲笑现实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会信仰所谓的圣遗物，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哪儿弄来的马骨头。对此，有一个威尼斯人反驳道：与信仰圣遗物相比，信仰活着的圣人不是风险更大吗？一言击中了佛罗伦萨人的痛处。因为他们不信仰圣遗物却信仰萨伏那罗拉，把他当成活着的圣人了。

有这样一个插曲，萨伏那罗拉借口“烧毁虚荣”，要焚毁现世题材的绘画、雕刻以及文学书籍。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中央，艺术品堆积如山。眼看火就要点燃这些作品，一个威尼斯商人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花钱买

下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当然，一心想把佛罗伦萨变成神治国家的说教僧萨伏那罗拉和追随于他的人们一口回绝，他们认为这个威尼斯人的举动是执念虚荣的表现。艺术品随之付之一炬。在自己国家不惜一切努力拒绝宗教干涉、尽量保持独立的威尼斯人眼里，如此杰出的艺术作品一一被焚，一定心痛不已。真正合理的一方，究竟是不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佛罗伦萨人，还是不仅默认甚至奖励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威尼斯人呢？

最后一个证据是一个真实的越狱犯手记。我在《沉默的少数人》中以“越狱记”为题作过介绍。此人在耶稣会控制的罗马宗教裁判所被判异端罪而投入监狱。经过一番艰辛，越狱成功。在逃跑途中，受到很多人的暗中帮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些人对他说了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逃到威尼斯去吧”。

到了反宗教改革的时代，依然存在于威尼斯的“自由”究竟是什么？研究威尼斯和自由关系的作品比比皆是，以此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也有，但是我想，与这一切相比，这个越狱犯留下的手记给我的感觉更加真实。

威尼斯共和国成了文艺复兴运动最后的堡垒。

在佛罗伦萨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精神到了罗马就变成了罗马特色的文艺复兴，那么，到了威尼斯就会变成威尼斯特色的吧？

的确如此。所谓威尼斯特色，在绘画界就叫威尼斯派。关于威尼斯派的绘画特点，好像是美术史家贝伦森说过这样的话：

> 欣赏出自佛罗伦萨人之手的绘画作品必须有透视画法、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等，但是欣赏威尼斯派的绘画作品无须了解这些东西。威尼斯人画的就是画，你只需要充分享受赏画时的那份愉悦就可以了。

原话也许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在大学写毕业论文时看到过这段话而已。但大意应该就是这样。威尼斯派的画家只专注于绘画，他们既没有进军雕刻或建筑领域，也不关心数学或解剖。对于威尼斯画家来说，文艺复兴精神的真髓——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应该只在形状和色彩之中。

瓦萨里写过一段话，是米开朗基罗对提香的评价，在后世很有名。当时，米开朗基罗60岁，提香48岁左右。

> 这一天，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相约去贝韦代莱宫拜访提香。（贝韦代莱宫位于梵蒂冈附近，由建筑师布拉曼特设计。提香应出生于威尼斯的红衣主教的邀请，在罗马住了一年左右，时间是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文艺复兴教皇的保罗三世时代。）
>
> 提香给我们二人看了他从威尼斯带来的一幅画，画的是宙斯化身黄金雨落在浑身赤裸的女人达娜厄身上。米开朗基罗当着主人的面对此赞不绝口，然而，离开那儿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说：
>
> “威尼斯画家不学素描基本功实在令人遗憾，不向优秀的前辈学习绘画技法同样遗憾。如果那个男人如同从大自然中学习绘画那样，从前人的艺术作品和技巧中学习绘画，再加以不断练习画实物（模特儿）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一位让他人望尘莫及的优秀画家。提香具备艺术家的气质，善于把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擅长运用逼真的技法。”

有意思的是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后来分别走了各自不同的路。仔细想想，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城市之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在威尼斯甚至找不到古罗马的一点影子。威尼斯原是海湾中的一个浅滩，荒无人烟。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逃避入侵蛮族的追杀，人们来到这里筑城而居。这就是威尼斯的起源。但是如果说威尼斯人对

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知识分子狂热追捧的古代复兴毫无兴趣，则大错特错。只不过文艺复兴到了威尼斯，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成了威尼斯式的文艺复兴而已。

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以一己之力广泛收集古典抄本，并建起了图书馆。在威尼斯不存在这样一个家族。威尼斯的图书馆是公立的，由共和国政府建造，时间早于佛罗伦萨。为了逃避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人们亡命到威尼斯时带来了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威尼斯政府购买这些古典，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图书馆。

威尼斯没有美第奇家族主持的柏拉图学园那样的研究古典的机构，但是，威尼斯人出版了古典的对照译本，甚至发明了廉价的袖珍本，使学生也能买得起。

在佛罗伦萨，政府机关的秘书厅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威尼斯，政府机关事务官僚的修养也很高。马基雅维利是秘书厅的官僚，晚于他半个世纪的赖麦锡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赖麦锡曾经编写过当时最完整的世界各地旅行记，甚至连日本也收入其中。

警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特有的历史学家，而威尼斯始终没有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历史学家。原因是政府职能发挥充分，人们无须担忧国家的未来。虽然威尼斯没有诞生警世的历史学家，却涌现出很多忠实记录事件的编年史家，而且常驻国外的大使以及海外分公司送来的报告，其数量之大远超同时代的大国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威尼斯驻外大使卸任时，有义务向元老院作详尽的报告。现在这些报告按国别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出版，只要想看谁都可以看到。看过这些报告的人一定会想：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前的欧洲史和中近东史只要依据这些报告就可以写成。

对于商人来说没有完整的账簿就无法买卖，这些报告就源自商人的这一精神。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商人精神，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才有可能了

解以准确而客观的史料为基础的历史。

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并非始于对罗马的传承。文化文明的创造除了财力和自由这两个条件之外，旺盛的进取心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条件威尼斯一样也不缺。只是威尼斯具备的这些条件一开始并非向古希腊和古罗马开放，而是向同时代的东方开放。请看威尼斯的建筑，你不认为它充满异国情调吗？现在尚且如此，在当时的西欧一定更显得有异国情调。这一切都是因为威尼斯与当时所谓的东方、后来的中近东和北非的密切关系超过了后者与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

要追溯威尼斯的建筑史，最简单最廉价的方法是乘“站站停”渡船，从火车站前广场出发，沿大运河到达圣马可广场。之所以我取名为“站站停”渡船，是因为只有这条路线在大运河两岸交替停靠。坐在渡船最前面，既可以欣赏两岸风景，还可以观察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变迁。威尼斯向海外发展的时代，大商人们就在货船可以停靠的地方纷纷建起他们的办公室兼居所，因为大运河是威尼斯的交通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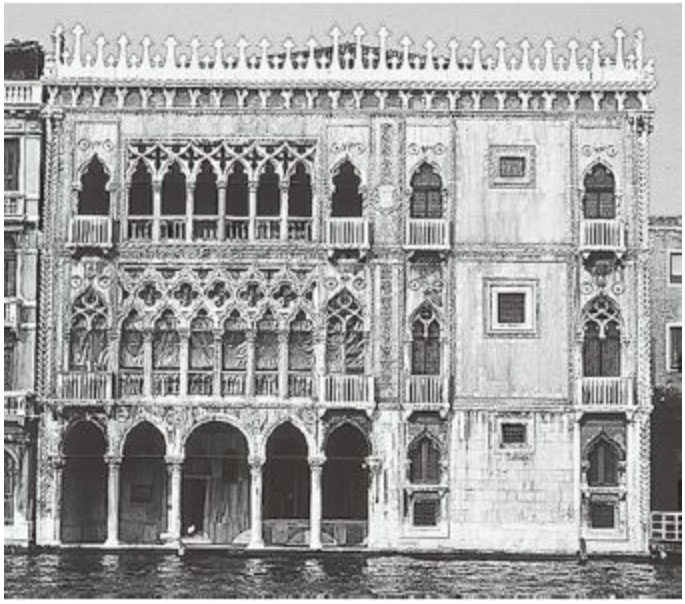
因为是站站停，虽然步行到达圣马可广场只需20多分钟的时间，而坐渡船则需要1个小时。然而，这1个小时绝对物超所值。从简朴的14世纪样式建筑到华丽的15世纪样式建筑，再到壮观的16世纪样式建筑，坐在渡船上，威尼斯建筑史可以尽收眼底。前两种样式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到了16世纪的建筑样式，显而易见变成了西欧风格。这是因为1527年发生“罗马浩劫”事件后，建筑师纷纷逃离罗马来到威尼斯。威尼斯热情接纳了他们，并委托其中的雅各布·桑索维诺担任威尼斯主要建筑的设计。

出生于佛罗伦萨活跃于罗马的桑索维诺和安东尼奥·桑加罗，出生于帕多瓦的帕拉第奥等建筑师也来到威尼斯，接受了威尼斯委托给他们的建筑设计工作。但是在绘画领域，威尼斯对人才的流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不对，也许应该说他们无此需要，因为威尼斯派画家的绘画早已自成一体，并且名声在外。

贝利尼家族出了两位著名的画家，他们是詹蒂利和乔凡尼。1429年，二人均出生于威尼斯，最后又都死在威尼斯，前者死于1507年，后者死于1516年。前者受共和国政府派遣，曾以艺术使节的身份前往土耳其，留下了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此画现在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后者好像是提香学徒时期的老师。

但是，对提香影响更大的据说是生于1477年、死于1510年的乔尔乔内。人物画可以画出人物内心是同时代人献给乔尔乔内的赞美之辞。

继这些前辈之后崛起的就是生于1487年、卒于1577年的提香。在这位威尼斯派绘画巨匠之后出现的是生于1518年、卒于1594年的丁托列托和生于1528年、卒于1588年的保罗·委罗内塞，之后兴旺繁荣的16世纪威尼斯派绘画艺术拉上了帷幕。



威尼斯的三种建筑样式：萨戈瑞多宫（上，14世纪）、圣索非亚宫（中，15世纪）、角宫（下，16世纪）

“没有意大利就没有莱昂纳多，没有莱昂纳多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罗马就没有米开朗基罗，没有米开朗基罗就没有罗马”。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威尼斯就没有提香，没有提香就没有威尼斯”。可以说提香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因为有了提香才变成真正的威尼斯。无论对于创造者还

是欣赏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一件事吗？

作为创作者，提香的艺术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上，他使用大量的色彩，甚至多到可以掩盖米开朗基罗指出的那些缺陷。为什么威尼斯派绘画的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答案就在遍布全城的运河里。在威尼斯，除了太阳直射下来的光，还有运河水面反射上来的光，由此呈现出了色彩的多样性。正是这多样的色彩把威尼斯派画家以及其中最具威尼斯风格的画家提香培养成了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

当然，提香不是一位简单的色彩画家，他的人物像除了画像本身还可以从中看出人物的人生。一位小说家只要看提香创作的人物画像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说。不消说，来自全欧洲的王公贵族纷纷请求他为自己作画。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当时最吃香的画家的原因吧。16世纪中期欧洲最高权力者是卡洛斯一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班牙国王。此人三请提香，把他请到了王宫所在地西班牙的马德里，他只允许这个威尼斯人为自己画肖像画。皇帝卡洛斯是一位英明君主，他深知要呈现自己的人生并不容易。但是到了提香的画笔下，之前的所有故事就会浓缩在一张画布上。如果是我，我会害怕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他呈现出来。

罗马文艺复兴更多依仗于教皇朱利奥二世，他曾经把大量工作交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去做。16世纪的威尼斯也有一个威尼斯文艺复兴的推动者，他就是在1523年至1538年间就任元首的安德烈·古利提。

人们评价安德烈·古利提是为统治而生的男人，在《海都物语》中我用了数页的篇幅介绍过此人。我试图通过追忆史实来呈现威尼斯共和国鼎盛时期的这个男人，然而依然不及提香画的一幅肖像画。这幅肖像画现在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呈现了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此人的一生。没有一幅作品可与此相提并论。

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从罗马来到威尼斯时，元首古利

提热情接待了他，并把威尼斯公共建筑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阿雷佐的阿雷蒂诺来到威尼斯后，古利提为这位文人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环境，从佛兰德聘请音乐人担任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还委托提香在元首宫殿各会场绘制壁画。如果这些人早已功成名就，他这样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三人当时都只有三四十岁，都还年轻。然而，正因为70多岁的元首古利提的智囊团中有了这三位年轻人，威尼斯文艺复兴才开出了华丽的鲜花。

不管一个人的资质多么优秀，仅靠纯粹培养是不可能创造出文化的，文化创造需要来自异类的刺激。元首古利提从来没有想过要保留威尼斯风格，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创造真正威尼斯特色的推动者。16世纪的威尼斯音乐界还需要从佛兰德聘请专业人才，但是在此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威尼斯涌现出了很多像维瓦尔第这样的音乐人才，一跃成为欧洲音乐界的领军人物。元首宫殿内提香所画的壁画大多毁于火灾，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是丁托列托和保罗·委罗内塞后来画的。也许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也许有人觉得这样挺好，这是个人的喜好问题。

16世纪一跃成为文化大国的威尼斯共和国是否遗忘了商人精神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威尼斯人的特点。

帕多瓦大学是欧洲第二所古老的大学，仅次于博洛尼亚大学。它是威尼斯共和国花了大力气兴建的本国最高学府，教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这所大学采用平行授课制，即每一门课有两位教授授课，而不是一位教授负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生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教授的工作评定，吸引不来学生听课的教授会被开除。教授除了正常授课，还对提高学生学业负责，为此，教授们不得不时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里进行课外辅导。伽利略·伽利莱曾经为此叫苦不迭，他认为此举严重影响自己专心研究。幸好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愿为他提供年金，于是他回到了故国佛罗伦萨。然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毅然离去并没有改变帕多瓦大学的平行授课制度，实在令人感慨。

在艺术领域，威尼斯政府也没有惯宠艺术家们。桑索维诺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后担任了共和国建设总监的职位，因此，他承担的工作大多是设计公共建筑。圣马可钟楼看上去冷冰冰的，他为这个钟楼增添了小回廊，缓解了冰冷的感觉。钟楼左侧的图书馆是他设计的，不料在修建期间发生了坍塌事故。这种事故责任在设计者，桑索维诺因此被送进监狱。提香和其他艺术家们对他深表同情，纷纷为他上书请愿，他才重获自由。但获释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费重建图书馆。不愿意再过牢狱生活的建筑师当然接受了这个条件。

就是在这样的威尼斯，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出了最后的一朵鲜花，结果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威尼斯全城成了一座大美术馆。18世纪来到威尼斯的德国文人歌德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仅靠肉眼去看威尼斯远远不够，必须用心去看。"

必须用心去看，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也一样。

的确如此。整个意大利汇集了各个时代的人类遗产，要周游意大利，哥特式的用心是绝对必要的。

文艺复兴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遗产。概括起来，他们都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现代人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一件件艺术品。如果能用心去看这些艺术品，就太有用了。

第二是对精神独立的强烈而执着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想，用自己的语言乃至于手去呈现的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三种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它不同于二元论。基督教中，神是"善"的象征，而"恶"的部分要是不让恶魔来承担的话，便解释不通

了。人类世界不可能杜绝“恶”，于是人们只好把“恶”转嫁到他物身上。这就是西欧人的二元论的出发点，也就是一切事物可以分成善与恶、精神与肉体、神与恶魔两个“元”。

然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因为信奉多神教，所以神也有“善”“恶”之分。到了人类社会就更不用说了，同一个人身上就有“善”“恶”两个方面。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才是完整的。于是如何做到抑恶扬善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抑恶扬善正是苏格拉底的宗旨。

在复兴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当然是中心。既然善恶并存的人是中心，就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再把责任转嫁到恶魔身上，恶同样存在于我身。于是自我约束成为必要，坚强的意志成为必要。也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精神领袖们发起的一场运动，诗人但丁把他们叫作精神贵族。

但是，这样的解释意味着不能说现代的我们继承了精神层面上的文艺复兴遗产。

继承者不是那样容易出现的，所以现在依然叫“遗产”。

有没有简单又具体的方法继承它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呢？

芥川龙之介写的《澄江堂杂记》中有一篇题为“历史小说”的短文：

> 既然叫历史小说，那么一个时代的风俗也好，一个时代的人情也好，多少总是要忠实于它的。同时一个时代的特色，尤其是道德上的特色，这样的主题也应该存在。例如，日本王朝时代对于男女关系的想法与现在的大不相同。作者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写得既大方又坦荡，犹如他是和泉式部的朋友。这一类的历史小说在对照古今的过程中，自然能给出某种暗示，梅里美的《伊莎贝拉》是这样，

法国（阿纳托尔）的《彼拉多》也是这样。

但是，日本的历史小说中尚未出现此类作品。日本的小说描写都很直截了当，大体都注重人类的闪光点，如古人的心与今人的心相通云云。年少的天才中，有没有人会提出上面这样的新方法呢？

欣赏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以及提香的作品不需要事先阅读介绍这些文艺复兴天才的研究书籍，导游的解说词也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站在他们的作品前，你要做的是把自己当成“年少的天才”，“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和他们交心即可。所谓天才，只有自己把自己当成天才才能近距离接触到。

对于那些像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这样以文章为表现手段的人也一样。他们写文章不是为了自我满足，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希望向他人传递信息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来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用“你”这个称呼，如果你不把自己看成莱昂纳多笔下的“你”，又怎能理解莱昂纳多？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当作是莱昂纳多、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的朋友，看着他们的作品，虚心聆听他们的心声，抛开一切偏见，认真思考体会，然后再把自己的体会所得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精神。

我感觉终于理解了文艺复兴是什么。如果可以把它换成“慧眼”、“克己”之类的词语，文艺复兴就不是遥远时代的历史现象，我想它和现在的我们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语言意味着有概念。日本的语言不属于西欧文明圈，在这样的语言中也能找出相通概念，足以证明文艺复兴的普遍性。

宗教改革也好，反宗教改革也好，说到底只是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西欧基督教徒来说，它们是重要的历史现象。但是，对于非基督教徒的人来说却“毫无关系”。

但是文艺复兴不同。文艺复兴提倡的精神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来说，同样“有关系”。证据之一就是现在常说的“慧眼”、“克己”等。我认为仅此一点正是中世纪末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超越时代、民族以及宗教的不同具有普遍性的原因。

附录 重要人物简历一览

向小鸟说教（局部）（乔托画，圣方济各圣堂/阿西西）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SanFrancescod’Assisi

1181/82—1228

意大利圣人，13世纪初基督教会改革运动的领袖。1180年初出身于阿西西一个富商之家。继承家业后经历了一段流浪时期。25岁前后抛弃

包括家人在内的一切，过起了清贫的生活。1209年，带着12名弟子去了罗马，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同意，扩大传道范围，创设了方济各修道会。1224年，隐遁于德尔维尔纳山，1228年，在阿西西近郊的宝尊堂去世。

刻在硬币上的腓特烈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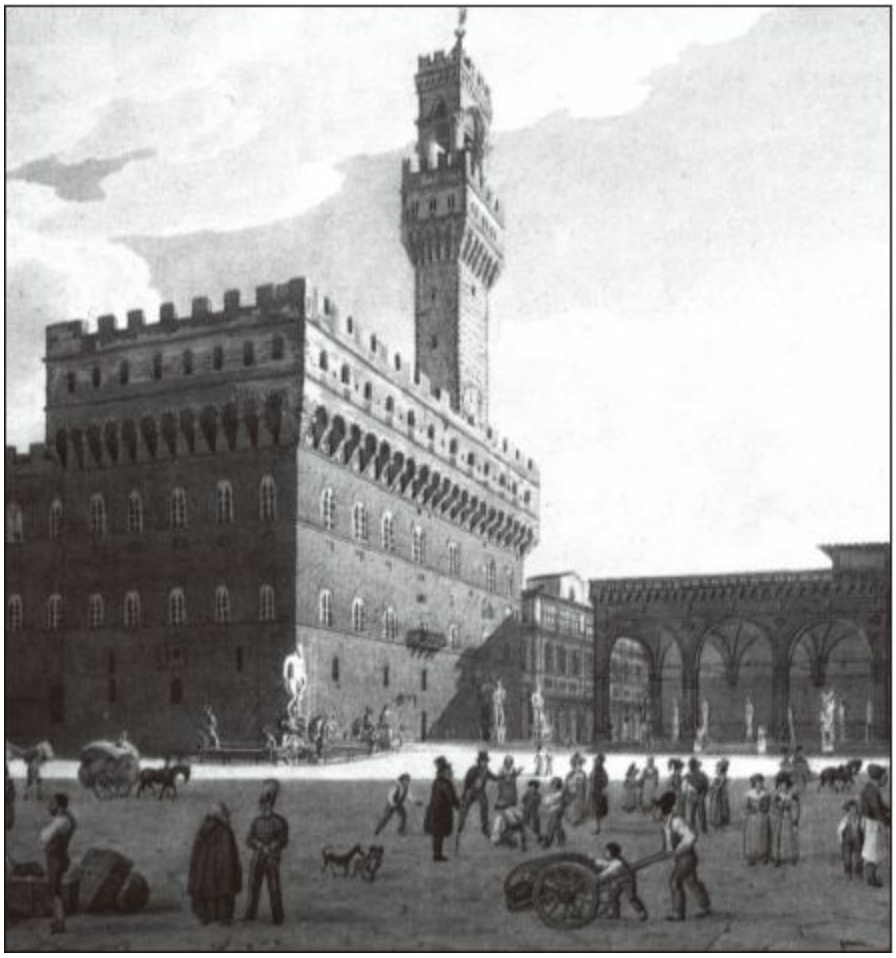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194—1250

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220—1250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在位时间1197—1250年）。父亲是

亨利六世。1209年前后开始与罗马教皇关系恶化。1227年，以不参加十字军为由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1228年，无视开除教籍的处罚，率领第五次十字军出发。1229年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之后，直到其突然去世，始终与意大利各国以及罗马教皇处于对立关系。1250年转战途中在托斯卡纳去世。



韦奇奥宫（佛罗伦萨）

阿诺尔夫·迪·坎比奥

Arnolfo di Cambio

约1240—1300/10

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师。留下了兼具后期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式

建筑的作品。绘画师从契马布埃，雕刻从学于皮萨诺。作为皮萨诺的助手，参与了锡耶纳大教堂布道坛的制作（1265—1268）。1281年，制作了佩鲁贾的喷水池。1296年着手为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花之圣母大教堂）设计并建造正面装饰雕刻。此外，还设计过韦奇奥宫、圣克罗齐大教堂。可能是1301年，也可能是1310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庄严的圣母（局部）（乌菲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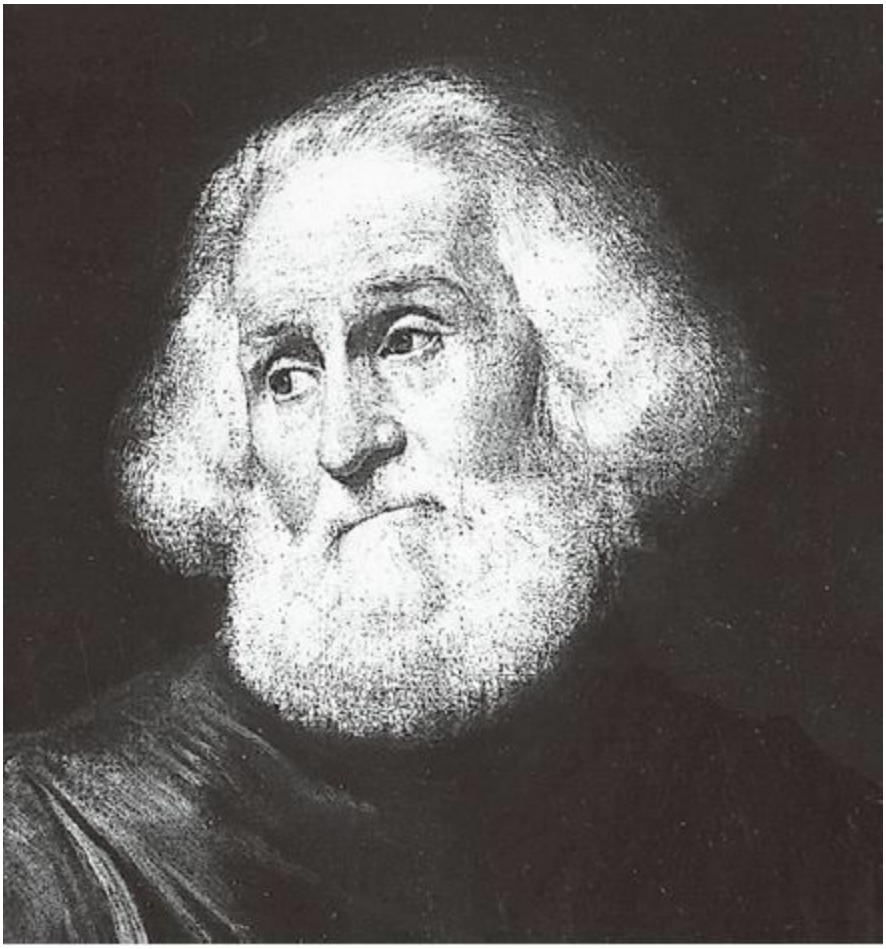
契马布埃

Cimabue

约1240—1302

拜占庭派最后一位意大利画家、镶嵌细工师。据说是佛罗伦萨派奠

基人乔托的老师。他一方面忠实于拜占庭的表现样式，另一方面给人物画像注入了人类的感情，开启了基督教绘画的新时代，受到但丁的高度评价。瓦萨里在《美术家列传》中把他列为首位。代表作有《圣母的一生》《十字架上的基督》和《庄严的圣母》等，分别画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堂和佛罗伦萨圣克罗齐大教堂。



马可·波罗（提香画，多利亚·庞斐力画廊/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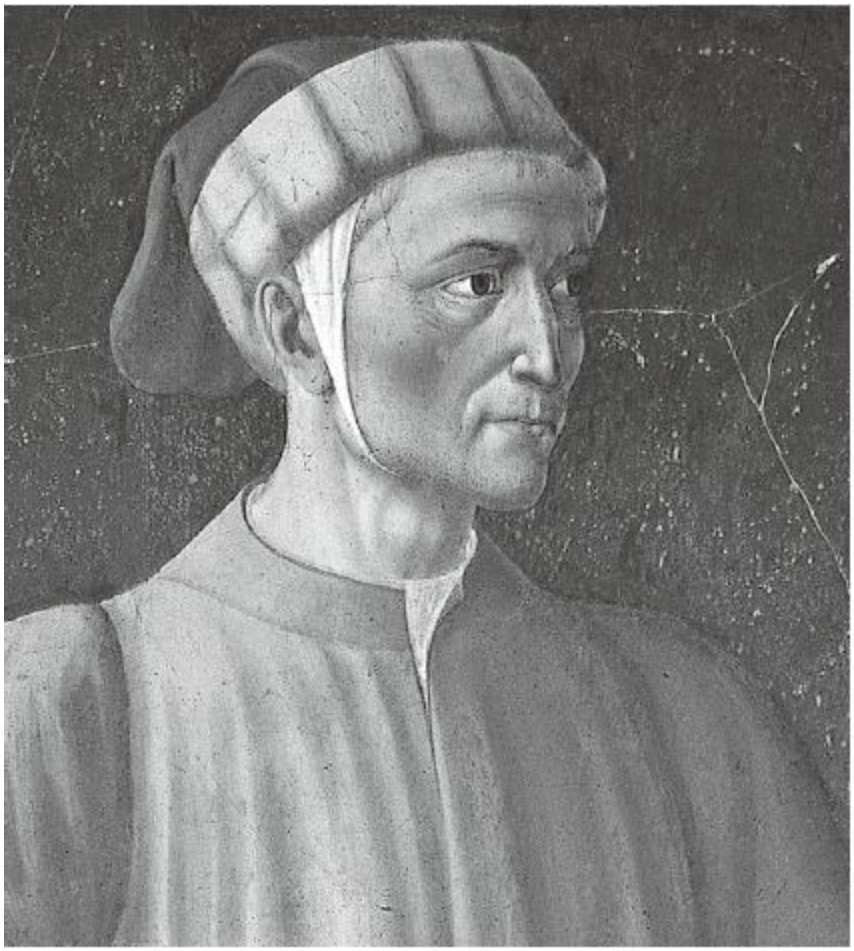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商人、探险家、旅行家，与人合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1254

年前后生于威尼斯。和父亲、叔父一起经过中亚，于1275年到达中国（元代）。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后，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去了东南亚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中国生活17年后辞去朝廷官职，于1295年经过印度和波斯，从海路回国。在一次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捕，在狱中口述《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留下的信息对大航海时代影响巨大。1324年在威尼斯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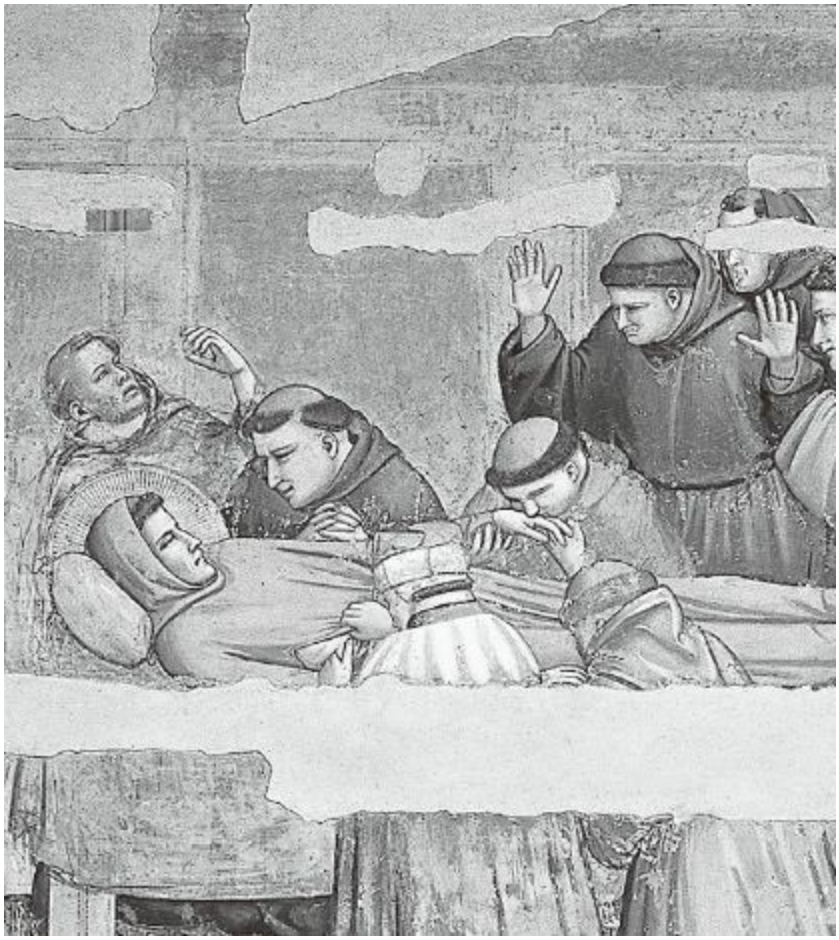
但丁（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但丁

Dante

1265—1321

佛罗伦萨诗人、文艺复兴先驱。40岁前后到晚年间，撰写了很多洋溢着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神曲》用托斯卡纳方言写成，发表后令其声名大噪。但丁也有用拉丁文写的作品，如《帝政论》，书中提倡国家应该独立于教会。30岁后，他以行政长官的身份整顿佛罗伦萨政治的混乱，却遭到流放。除了恋爱诗集《新生》，大部分作品诞生于流放期间浪迹意大利各地宫廷的途中。他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看作是人类理性的象征，并为他深深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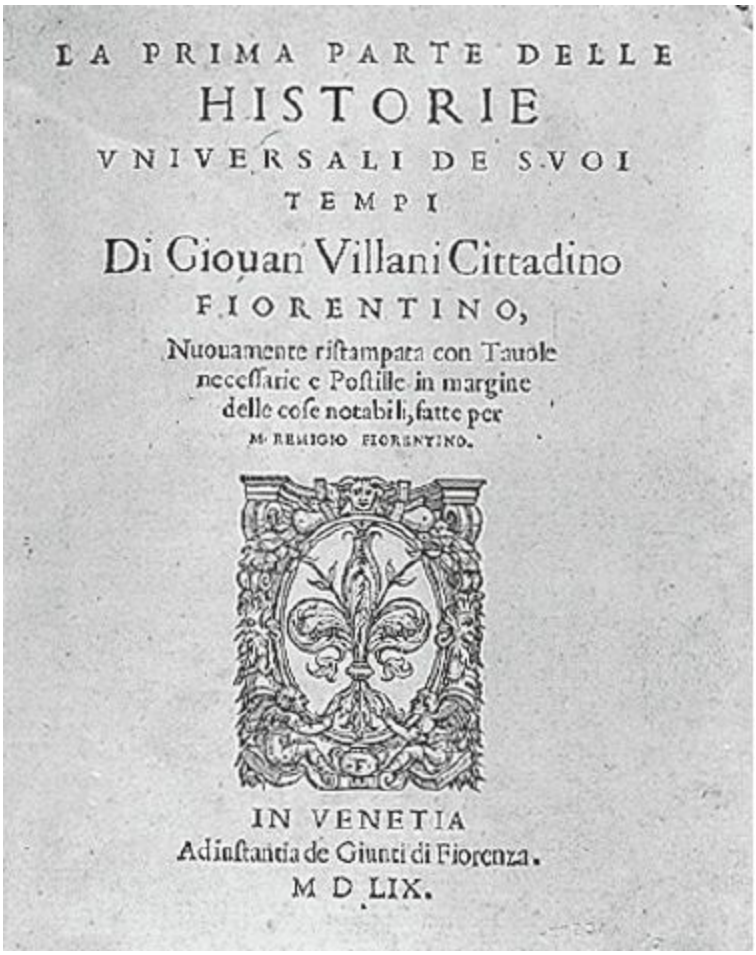
圣方济各之死（局部）（圣克罗齐大教堂/佛罗伦萨）

乔托

Giotto

1266/76—1337

意大利画家，被认为是契马布埃的弟子。出身于佛罗伦萨近郊一个佃农之家，时间可能是13世纪60年代，也可能是70年代。在罗马、阿西西、帕多瓦、里米尼、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各地留下了大量湿绘壁画和胶画板绘。作品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堂中的壁画、帕多瓦阿雷纳礼拜堂的《约阿基姆传》《圣母玛利亚传》《基督生涯》以及佛罗伦萨圣克罗齐教堂的《圣方济各传》等。1337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LA PRIMA PARTE DELLE
HISTORIE
VNIVERSALI DE SVOI
TEMPI
Di Giouan Villani Cittadino
FIORENTINO,
Nuouamente ristampata con Tauole
necessarie e Postille in margine
delle cose notabili, fatte per
M. REMIGIO FIORENTINO.
IN VENETIA
Ad instantia de Giunti di Fiorenza.
M D LIX.

《新编年史》（1559年版，皇家图书馆/维琴察）

乔凡尼·维拉尼

Giovanni Villani

约1275—1348

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编年史家。1300年以后，作为一名银行家活跃于以罗马为中心的欧洲各地。1308年前后辞去银行工作，着手编写《新编年史》。《新编年史》共12卷，用俗语即意大利语描写了佛罗伦萨走向繁荣的初期，详细统计并记录了佛罗伦萨当时的行政、财政情况，非常珍贵。1348年死于瘟疫大流行。后来，其弟马特奥编写了1348年至1363年的记录共10卷，其儿子菲利波编写了1366年的记录共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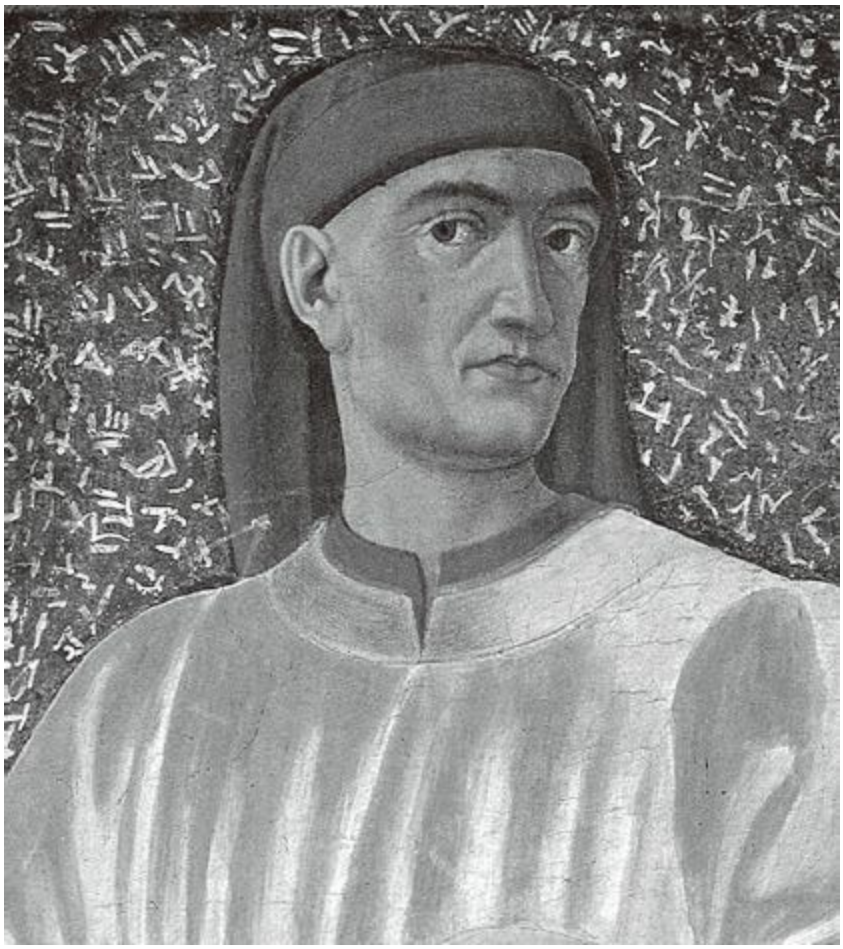
彼特拉克（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因为父亲被逐出佛罗伦萨，他出生于阿雷佐。在博洛尼亚大学等地学习法律。对文学情有独钟。在担任意大利诸侯的外交官的同时研究文学和古典，作为抒情诗诗人赢得了声望。代表作是诗集《歌集》。1341年接受罗马元老院授予的桂冠，成为“桂冠诗人”。1374年去世。除了诗作，在发现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著作后，开始研究从塞内加、维吉尔到希腊的荷马、柏拉图的作品，对古典文献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薄伽丘（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乔凡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诗人、作家。1313年出生于巴黎，是佛罗伦萨一名商人的私生子。1327年，为了学经商来到那不勒斯，却被文学深深吸引。陷入和那不勒斯国王女儿的恋爱，14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诗作等几乎都以和这位公主玛利亚之间的恋爱为主题。代表作《十日谈》写于1348年至1353年，1470年出版发行。以躲过瘟疫的10个男女青年讲述100个故事的形式写成。晚年放弃创作，投入到研究之中。1375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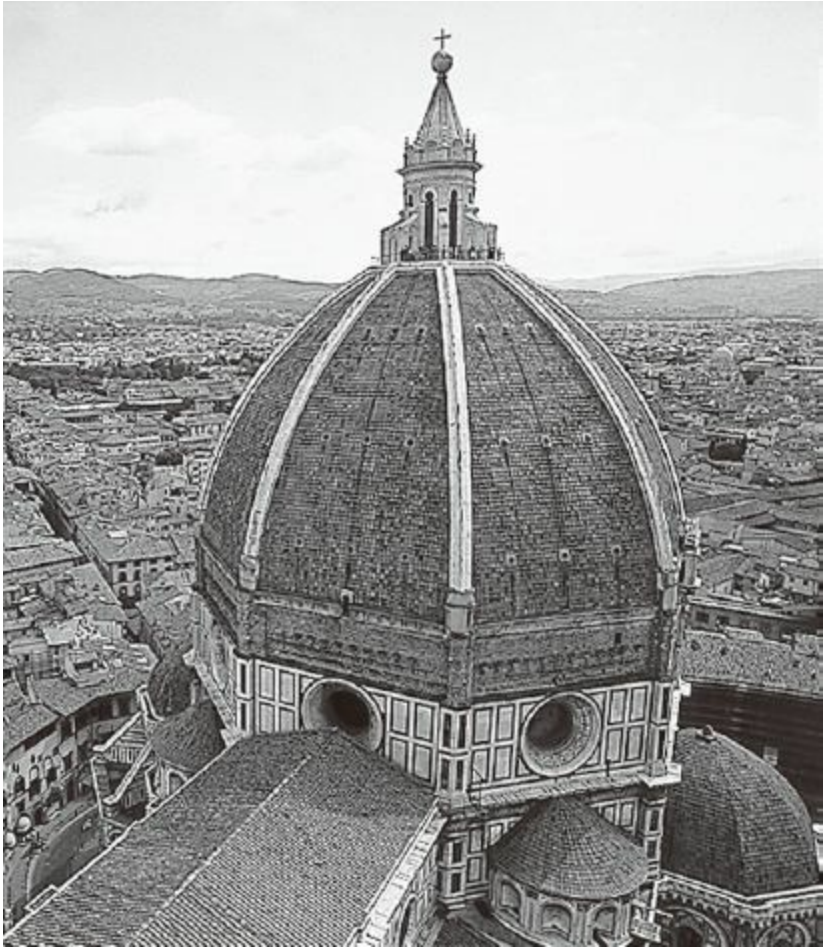
布鲁尼（阿尔弗雷德·古德曼画）

莱奥纳多·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约1370—1444

意大利人文学者、政治家。1370年前后出生于阿雷佐。1405年起担任罗马教廷秘书，从1437年到1444年去世，一直担任佛罗伦萨秘书长。在严格查证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史》十二卷。用西塞罗式的优雅文体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人的希腊古典翻译成拉丁文，为西欧的希腊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还用意大利文撰写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传记。144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圣母百花大教堂（拍摄者不详/佛罗伦萨）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

佛罗伦萨建筑师、工程师、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第一人，对后世影响巨大。布鲁内莱斯基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完成了结构上被认为不可能的圆顶构造。拥有大圆顶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成了佛罗伦萨的象征。他留下了无数杰作，其中有巴茨家的礼拜堂、皮蒂宫以及孤儿院等。据说孤儿院是文艺复兴最早的建筑。同时活跃于筑城领域，参与过各地的城堡建设和改建工程。在佛罗伦萨去世，葬于圣母百花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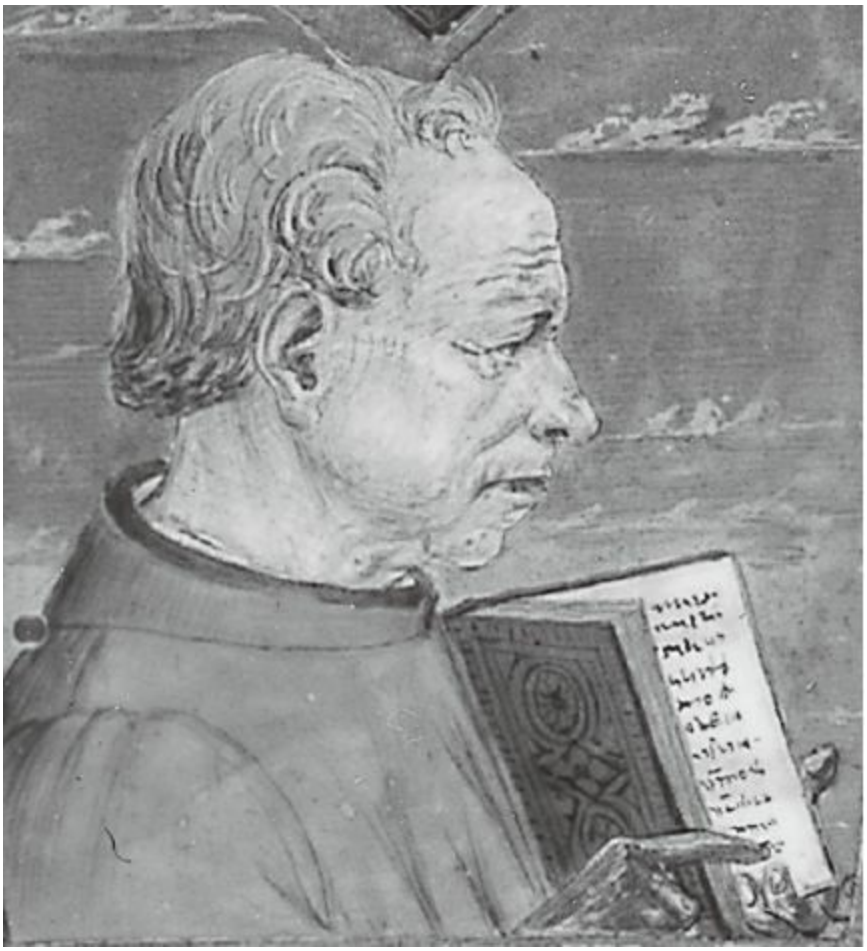
天堂之门（局部）（圣乔凡尼礼拜堂）

洛伦佐·吉贝尔蒂

Lorenzo Ghiberti

约1378—1455

佛罗伦萨雕刻家、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领袖、先驱。1378年前后出生于佩拉戈，在身为金匠的父亲手下掌握了技术，也学习了绘画。1402年在比赛中胜出，为佛罗伦萨圣乔凡尼礼拜堂制作了《天堂之门》，为文艺复兴时期青铜雕刻杰作之一。多纳泰罗和乌切罗等人曾经在吉贝尔蒂工作室为徒。撰写了有关美术史和理论的《评述》（共三卷）。他的奥尔圣米开莱教堂的三体圣人像也很有名。1455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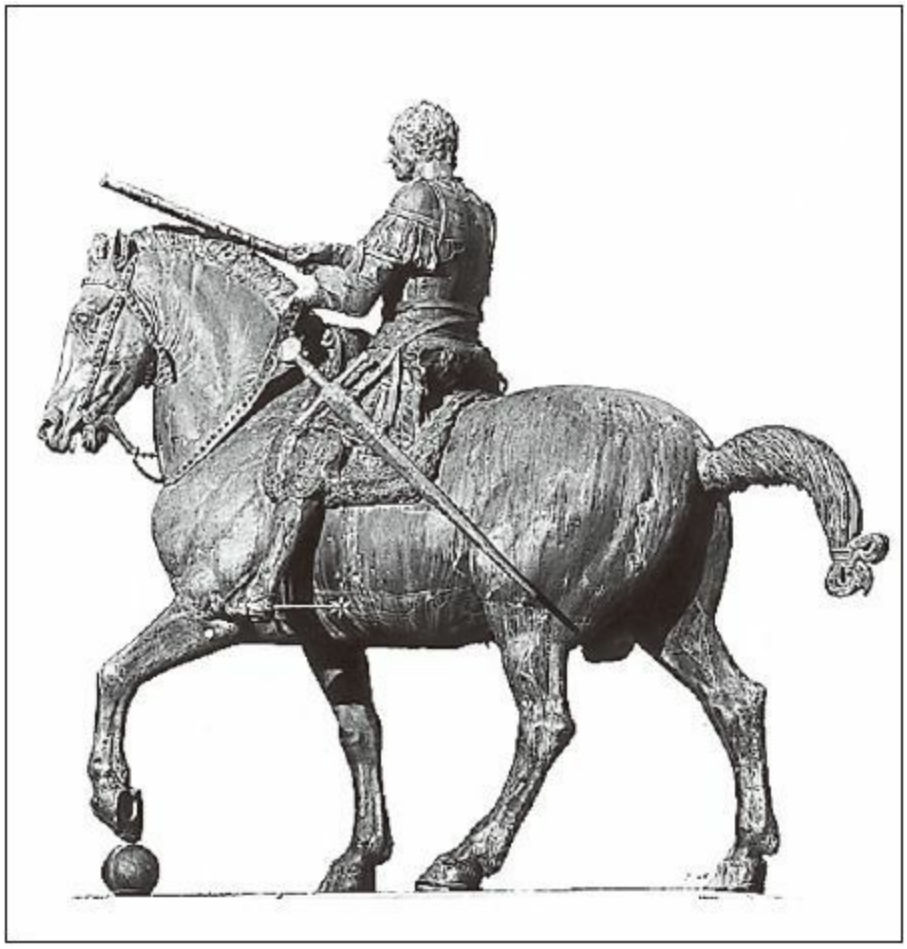
布拉乔利尼（出自布拉乔利尼著作，梵蒂冈图书馆）

波焦·布拉乔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

佛罗伦萨人文学者、书法家。1380年出生于特拉诺瓦。在佛罗伦萨专事抄本工作，发明了罗马字体的原型。1403年移居罗马，为教皇波尼法提乌斯九世工作。1415年在克吕尼修道院发现西塞罗未发表的演说草稿，以此为开端，在欧洲各地修道院中发现了大量西塞罗、昆体良等人用拉丁文写的珍贵古典抄本。1453年就任佛罗伦萨秘书长，编撰市史。著有《逸闻妙语录》一书。145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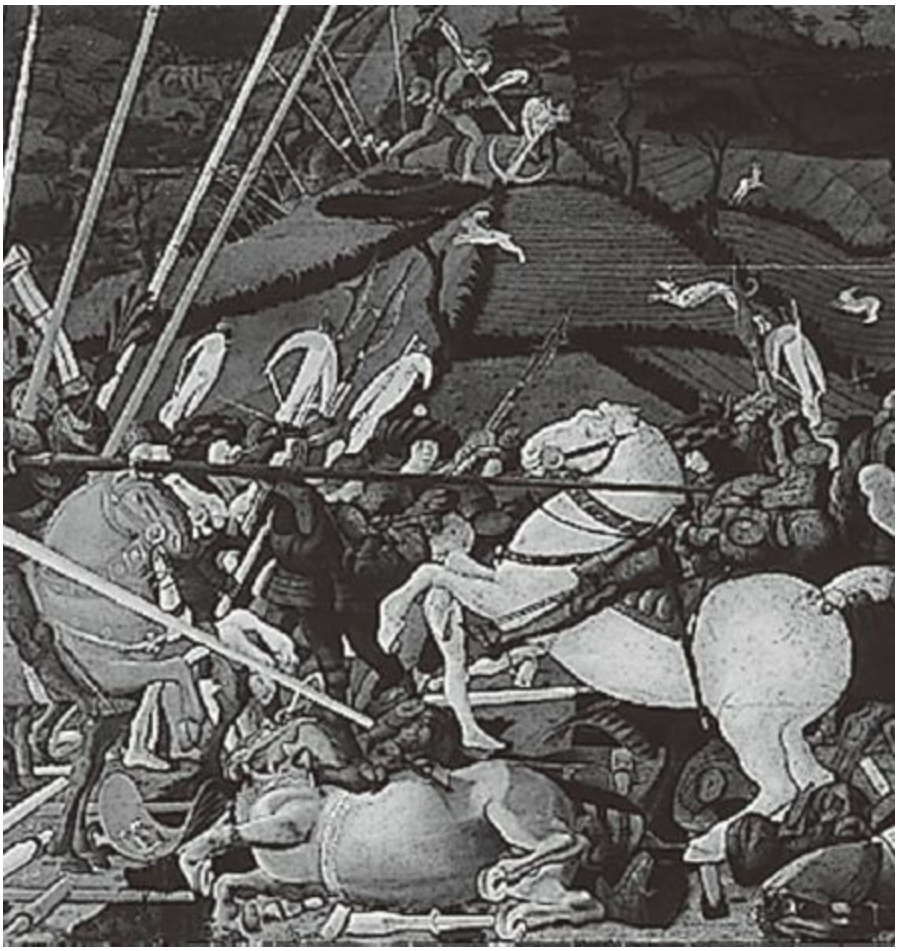
加塔梅拉达骑马像（教堂前广场/帕多瓦）

多纳泰罗

Donatello

约1386—1466

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刻家代表。有关古代雕刻的知识为同时代人之最。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纺织工匠之家，近20岁时进入吉贝尔蒂工作室。15世纪30年代，居住在罗马研究古典雕刻。1443年到1445年生活在帕多瓦。1457年以后往返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两市之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大理石、青铜、木雕作品。1466年在佛罗伦萨去世。代表作有《圣乔治》《大卫像》《加塔梅拉达骑马像》等。



圣罗马诺之战（局部）（乌菲兹美术馆）

保罗·乌切罗

Paolo Uccello

1397—1475

佛罗伦萨画家，透视画法的研究者。融合了华丽的后期哥特风格和初期文艺复兴的大胆手法开创了独特的画风。10岁进入吉贝尔蒂工作室学习各项技能。1425年至1431年在威尼斯参与了镶嵌工艺品的制作，没有留下作品。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为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回廊绘制壁画等。1456年接受美第奇家族的委托完成了包括发生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之间的战斗《圣罗马诺之战》在内的系列作品。

托斯卡内利（乔治奥·瓦萨里画，韦奇奥宫）

保罗·波偌·托斯卡内利

Paolo dal PozzoToscanelli

1397—1482

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1397年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医生之家。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数学、哲学和医学。以后主要在佛罗伦萨活动。坚持研究自然科学。与以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为首的众多学者和艺术家有很深的交情，是同时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人物。据说他教过布鲁内莱斯基几何学，细致观察彗星，并绘制过天体图，还影响过哥伦布的航海计划。1482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在辩论的哲学家

卢卡·德拉·罗比亚

Luca della Robbia

1399/1400—1482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雕刻先驱之一。可能是1399年，也可能是1400年，生于佛罗伦萨。1431年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制作的大理石圣歌坛浮雕是文艺复兴雕刻的代表之作。1441年为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制作圣柜。罗比亚完善了赤陶施釉的手法，装饰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圣具室门上的基督复活图和升天图的陶像就是该手法的代表作。1482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弗拉·安杰利科（路加·西诺雷利画，奥尔维耶托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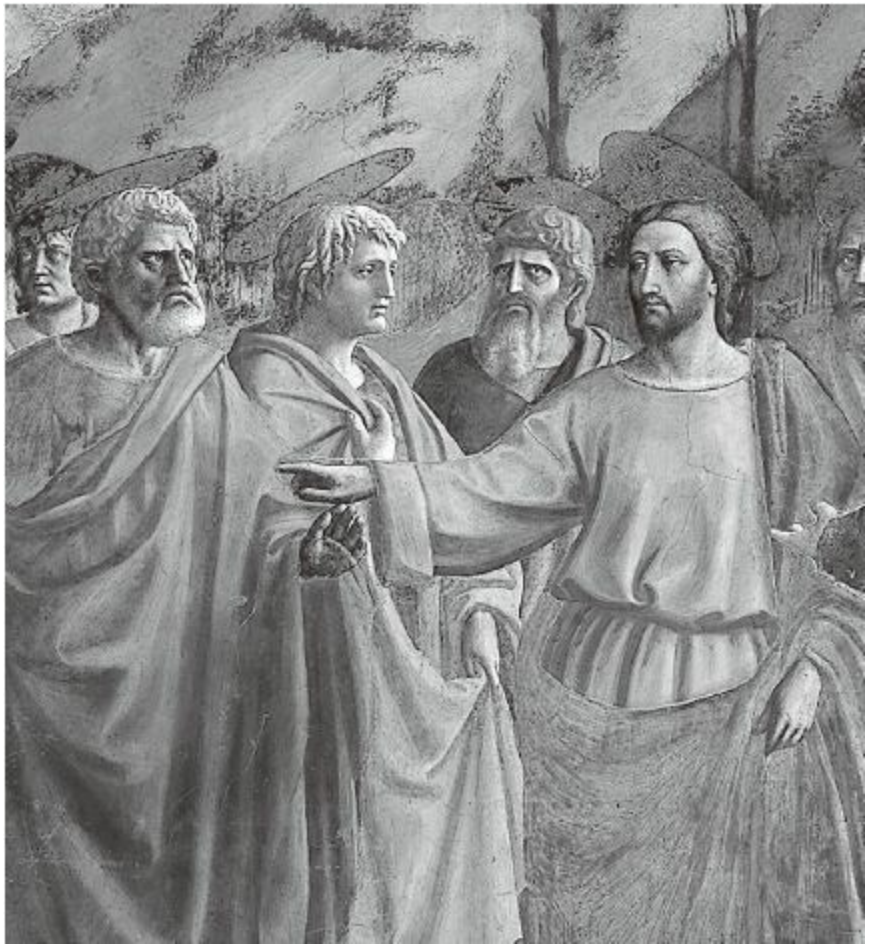
弗拉·安杰利科

Fra Angelico

约1400—1455

佛罗伦萨15世纪画家代表之一。他的画风优美，人际关系简单，人称“天使般的弗拉·安杰利科”。1420年前后进入多明我会的圣马可修道院，在修道院生活期间创作了众多祭坛画、壁画名作。1446年应罗马教廷之邀，为尼古拉礼拜堂绘制壁画《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提乌斯生平》。1450年前后为佛罗伦萨圣母领报圣堂银器收纳壁柜绘制门绘。代表作有《受胎告知》《圣母领报》等。1455年在罗马去世。

受胎告知（弗拉·安杰利科画，圣马可教堂/佛罗伦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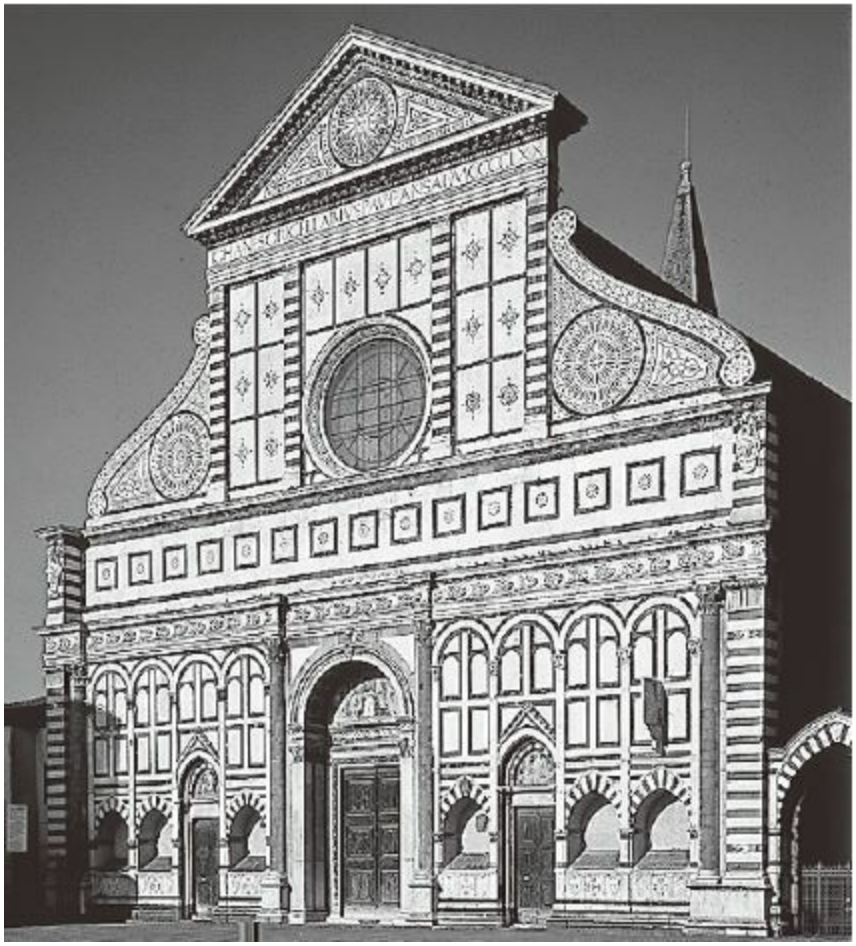
《圣彼得的生涯》中“纳税银”（局部）（布兰卡奇礼拜堂/佛罗伦萨）

马萨乔

Masaccio

1401—1428

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代表。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父亲是秘书，母亲是客栈老板的女儿。21岁加入佛罗伦萨画师行会。现存的最早期作品是《圣吉奥瓦祭坛三圣翼》。主要在佛罗伦萨活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圣三位一体》在壁画史上首次运用科学的透视画法，名噪一时。布兰卡奇礼拜堂的《圣彼得的生涯》的手法和表现力对文艺复兴绘画影响巨大。后来应邀去了罗马。28岁英年早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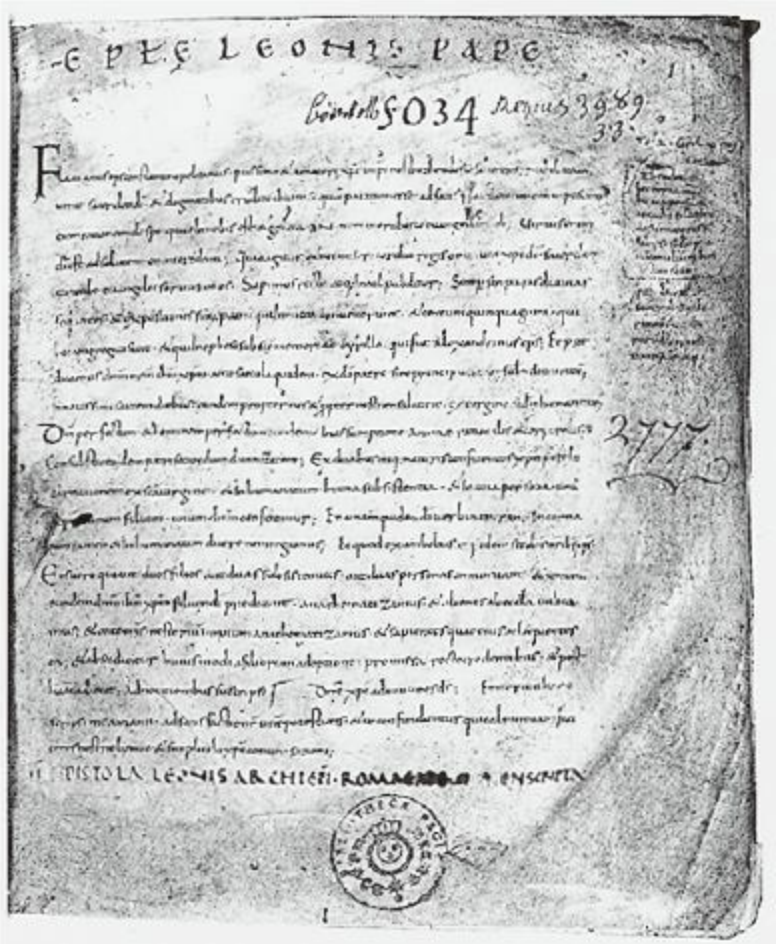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

意大利建筑师、画家、雕刻家、作家、人文主义者。1404年出生于热那亚，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罗马教廷工作期间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人称“万能人”。尤其在建筑领域。作为建筑师，亲自动手制作了佛罗伦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正面以及曼托瓦的圣安德烈圣堂等，奠定了文艺复兴建筑的基础。其建筑理论收集在其主要著作《建筑论》中，影响波及欧洲整个艺术界。1472年在罗马去世。



《君士坦丁捐赠书》（作者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

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

1407—1457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古典文献学者，罗马教廷审判官之子。1407年生于罗马。在帕多瓦大学教授修辞学的同时撰写了《快乐论》。其后成为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朝臣。1440年证实《君士坦丁捐赠书》系伪作。1448年教皇尼古拉五世任命其为秘书官，移居罗马。翻译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研究《新约全书》的各种抄本。其著作《拉丁语言详析》在全欧洲各学校用作教科书。1457年在罗马去世。

费达蒙特费尔特罗肖像（乌菲兹美术馆）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约1420—1492

翁布里亚派画家。1420年前后出身于阿雷佐近郊圣塞波尔克罗一个鞋匠之家。立志成为画家，来到佛罗伦萨。成功后，活跃于出生地和费拉拉等地。代表作有阿雷佐圣方济各教堂的《圣十字架故事》《乌尔比诺夫妻肖像》等。精通数学等学问，晚年放弃创作，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孜孜不倦地研究透视画法，撰写了《绘画中的透视法》等。此项研究在20世纪后被高度评价并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业。

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国家美术馆/伦敦）

詹蒂利·贝利尼

Gentile Bellini

1429—1507

威尼斯派画家，父亲是画家雅各布，自小在父亲工作室学习。1466年为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制作风琴盖绘。1497年奉威尼斯元首之命来到君士坦丁堡，为时任君主穆罕默德二世绘制肖像画。在很多集会场所绘制了以威尼斯为题材的大型宗教画，如《圣马可广场上的十字架行列》等。这些作品细致地刻画了15世纪威尼斯的建筑和生活，作为记录资料极具价值。1507年在威尼斯去世。

雷翁纳多·罗雷丹总督像（国家美术馆/伦敦）

乔凡尼·贝利尼

Giovanni Bellini

约1429—1516

奠定了威尼斯文艺复兴艺术中心的画家之一，是詹蒂利·贝利尼的兄弟。15世纪80年代替已去土耳其的詹蒂利，为威尼斯元老院议会会场绘制了装饰画，其时所作的七八幅画作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全部毁于后来发生的火灾。据说他在威尼斯的工作室是当时最大的，乔尔乔内、提香曾在那里学习。代表作有圣扎卡里亚教堂祭坛画和《狂喜中的圣方济各》等。1516年死于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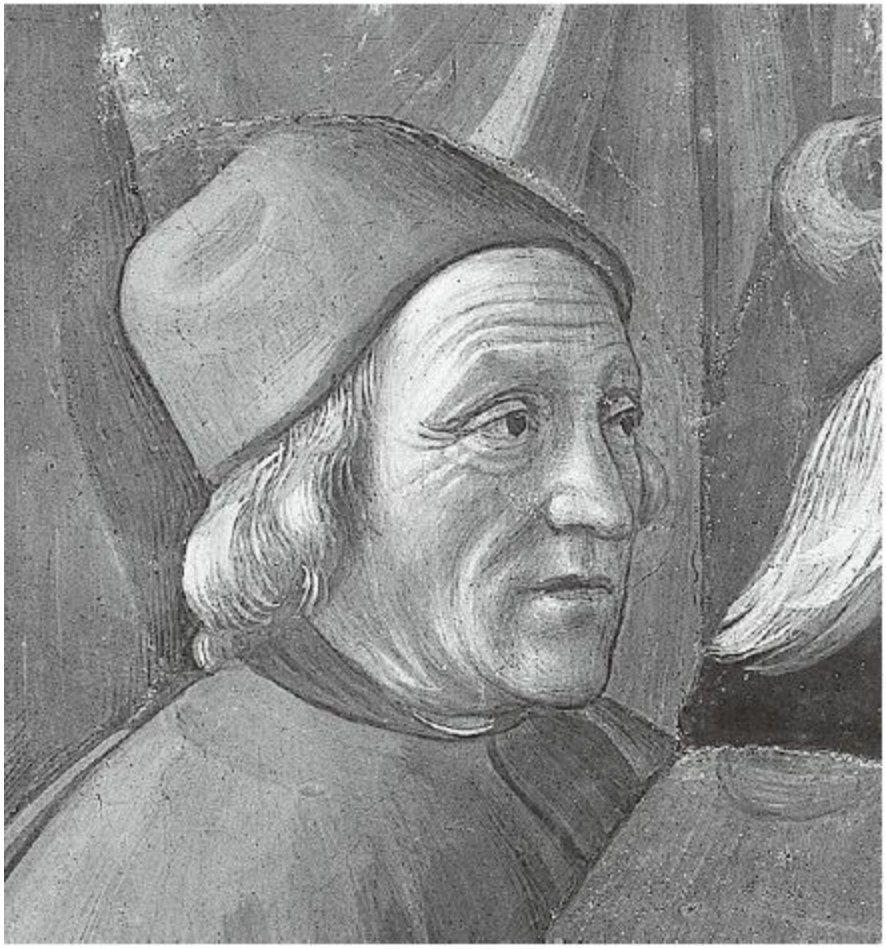
妇人像（局部）（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米兰）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伊奥罗

Antonio del Pollaiolo

1429/33—1498

雕刻家、画家、版画家、金匠。可能是1432年，也可能是1433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和弟弟皮耶罗一起经营工作室，联名留下大量作品，为佛罗伦萨艺术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的工作室被认为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工作室之一。波拉伊奥罗是最早通过尸体解剖研究人体的艺术家之一。1484年在罗马为英诺森八世和西克斯图斯四世制作墓碑。1498年在罗马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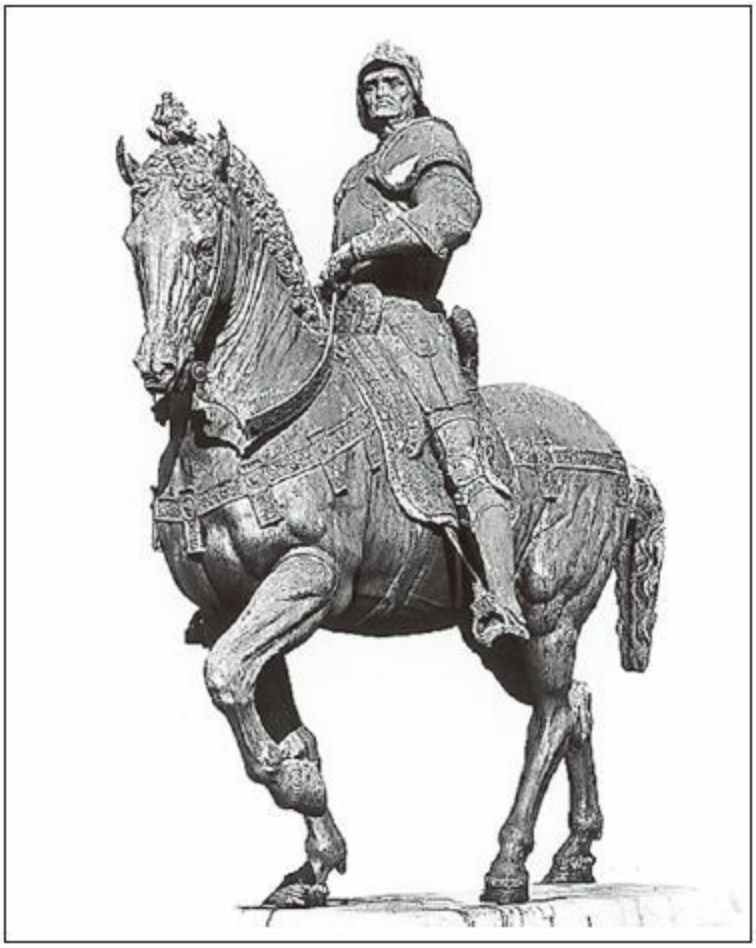
费奇诺（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佛罗伦萨）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Marsilio Ficino

1433—1499

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1433年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位医生之家。学好拉丁语后，又学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医学，之后又学习了希腊语。在美第奇家族的庇护下研究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所有著作以及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并把它们译成拉丁文。担任过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校长。复兴柏拉图主义，提倡与基督教之间的和谐关系。影响欧洲思想达两个世纪。著作有《柏拉图神学》。149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威尼斯）

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

Andrea del Verrocchio

1435—1488

雕刻家、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老师。生于1435年。在佛罗伦萨有一间大规模的工作室。以莱昂纳多为首，培养了佩鲁吉诺、洛伦佐·迪·克雷迪、波提切利等众多艺术家。1468年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墓制作雕塑。1483年制作奥尔圣米开莱教堂的青铜群像《圣托马斯的怀疑》。他的《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是文艺复兴雕刻的代表作。1488年在威尼斯去世。

圣彼得大教堂内的小礼拜堂（罗马）

多纳托·布拉曼特

Donato Bramante

1444—1514

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建筑师代表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乌尔比诺近郊。在乌尔比诺，作为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助手积累了丰富的知识。1477年移居伦巴第。最初作为画家绘制壁画等，后来专心于建筑领域。1488年设计了帕维亚大教堂。1500年前后活动地点转移至罗马。受朱利奥二世之托，着手圣彼得大教堂的改造计划等。还设计了圣玛利亚教堂。1514年在罗马去世。

《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桑德罗·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佛罗伦萨派画家之一，菲利波·利比的弟子。20多岁时已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活跃于绘画界。1481年应邀来到罗马，参与了西斯廷礼拜堂壁画的制作。1490年起，随着萨伏那罗拉的兴起，转而倾心宗教，画风随之大变。后来弃笔，在贫困潦倒中死去，终身未娶。其代表作有《维纳斯的诞生》《春》《三王来拜》等。留下了众多以宗教为主题的祭坛画。

春（波提切利画/乌菲兹美术馆）

圣母访问（局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多米尼科·基兰达约

Domenico Ghirlandaio

1449—1494

与波提切利并列为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派画家代表。1449年出身于金匠之家。佛罗伦萨诸圣堂的壁画《仁慈的圣母》《哀悼基督》被认为是他最早期的作品。波提切利喜欢华丽的画风，而他以写实的画风闻名。很多作品画的是当时的建筑和风景，气势宏大。代表作有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圣母的一生》以及韦奇奥宫的《圣吉诺比乌斯与圣人们》等。

马努提乌斯（参照贝利尼所画肖像的版画，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纽约）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

Aldo Manuzio

1449—1515

文艺复兴出版人的代表。1449年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庄。在罗马和费拉拉学习。1490年到威尼斯。邀请学者和排字工人着手准备开展出版事业，1495年成立阿尔杜斯出版社。和学者们一起准确地再现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原籍，还出版了众多同时代人的作品。去世后，出版社经过妻弟阿索拉尼传给儿子保罗、孙子阿尔杜斯。据说直到16世纪末的百年间，阿尔杜斯家族出版了上千种书籍。

哥伦布（里多尔夫·基尔兰达约画，佩里船舶博物馆/热那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foro Columbus

1451—1506

航海探险家。全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年出身于热那亚毛纺织品业主之家。少年时代乘船周游欧洲各地。15世纪70年代，经过分析大量资料，确信从大西洋向西航行必可到达印度。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后该计划得以实现。1492年抵达西印度群岛。以后又进行了四次航海活动，到达的地方都是美洲大陆，而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的一部分。1506年在西班牙的巴拉多利德去世。

自画像（皇家图书馆）

莱昂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芬奇，在去世了近500年之后的现在依然被冠以“天才”、“万能人”的称号。在佛罗伦萨韦罗基奥工作室度过了学习时代，制作了《受胎告知》等。30岁后去了米兰。在斯福尔扎家族的庇护下绘制了《最后的晚餐》等。1500年回到佛罗伦萨。晚年应弗朗索瓦一世之邀去了法国，并在那里离世。作为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发明家，还精通解剖学、植物学、土木工程学和物理学等，在众多领域展示了他的才能，遥遥领先于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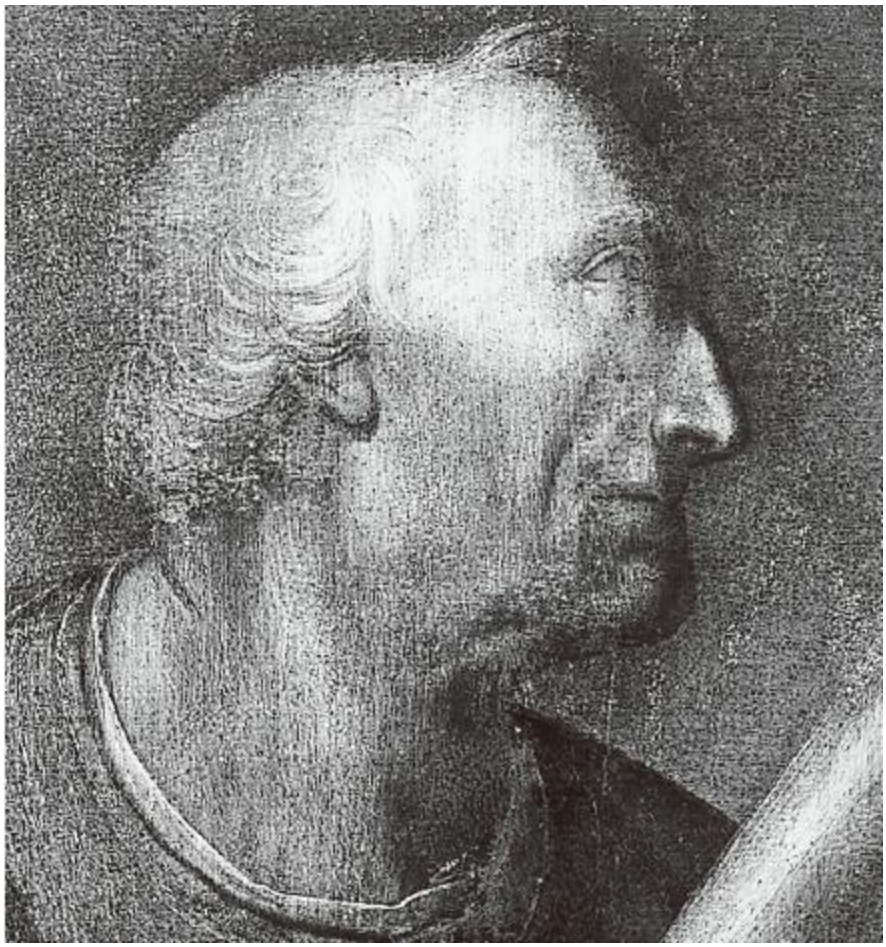
波利齐亚诺（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安吉洛·波利齐亚诺

Angelo Poliziano

1454—1494

诗人、古典人文学者。在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哲学、语言学方面发挥了才能。1454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1475年来到美第奇家，成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长子皮耶罗的家庭教师。荷马的《荷马史诗》的拉丁文翻译使他声名大噪。1480年开始在佛罗伦萨讲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创作的《比武篇》（1475—1478），是意大利文学杰作之一。149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韦斯普奇（作者不详，乌菲兹美术馆）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

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商人、航海家。“美国”的国名即源自他的名字。1479年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宣传员前往法国。回国后进入美第奇银行。取得信任后，1491年被派往塞维利亚，1495年，也可能是1496年，出任分店店长。后来接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航海前往美洲大陆，沿大西洋岸南下，到达现在的巴西。和哥伦布不同，韦斯普奇意识到自己到达的这块新大陆不是印度的一部分。1512年在塞维利亚去世。

瓦斯科·达·伽马（出自16世纪的书籍，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

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约1460—1524

葡萄牙航海家。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之命，率领船队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行航海探险。1497年从里斯本出发，1498年成功抵达印度西南岸的卡拉卡特，从而开辟了从西欧到印度的新航线，随后回国。后来，为了镇压叛乱再次领命前往卡拉卡特，在那里滥杀无辜，烧毁港口。也是在那个时候，占领了卡拉卡特以南的印度科钦港。1524年就任印度总督，第三次航海成功，同年在印度去世。

圣乌苏拉殉难（局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威尼斯）

维托雷·卡巴乔

Vittore Carpaccio

约1460—1525/1526

威尼斯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代表。1460年前后生于威尼斯。初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深受詹蒂利·贝利尼和安托内罗·达·梅西那等人的影响。1490年前后为圣乌苏拉会场着手创作《圣乌苏拉殉难》，从而确立了他独特的画风。其表现力和光的运用能力受到高度评价。其他作品还有圣乔治信众会会堂的《圣耶罗尼米斯》连环作、圣斯特凡诺会堂的《圣斯特凡诺传》。可能是1525年，也可能是1526年，在威尼斯去世。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科西莫·罗塞里画，圣安布罗焦教堂/佛罗伦萨）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文学者、哲学家。1463年出身于米兰多拉公国一个领主之家。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还学习了包括希伯来语在内的多门语言。从欧洲各国邀请众多学者研讨问题，涉及多达900个命题。因其中13个命题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异端而入狱。获释后，接受美第奇家族的保护。晚年成为萨伏那罗拉的追随者。其著作《论人的尊严》（1486年完成，1496年出版发行）表现了文艺复兴的新人类观。149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马基雅维利（塞迪·第·提托画，韦奇奥宫/佛罗伦萨）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出身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家庭。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遭流放后，29岁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之后历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重要职位包括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与教皇沟通的外交使节等，支持共和国政治的运作。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返权力舞台，马基雅维利被免职、流放，后隐遁到近郊山庄，此后专心写作。代表作是《君主论》（1532年出版发行）。此外，还有《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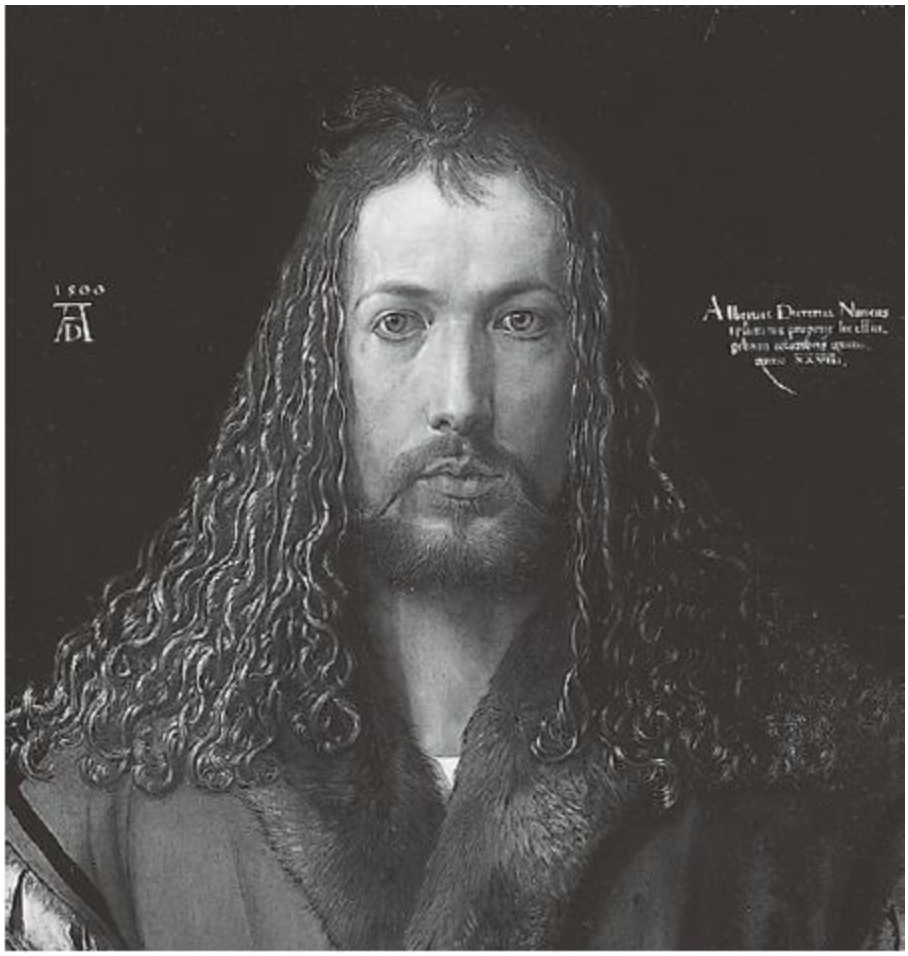
伊拉斯谟（昆丁·马赛斯画，罗马国立美术馆）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北方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1466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是一位主教的私生子。曾于奥古斯丁会为僧，担任过康布雷主教的廷臣，之后留学巴黎。在剑桥大学执过教鞭。1521年在巴塞尔作客出版商弗罗贝。出版了希腊文版《新约全书》第一次印刷校订本。对很多古代典籍作了注释校订。著书有《愚人颂》《基督教战士手册》。1536年在巴黎去世。他对宗教提出批判，大大影响了宗教的改革。他与路德针锋相对，最终决裂。



自画像（老绘画陈列馆/慕尼黑）

阿尔布雷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画家、版画家，德国文艺复兴的巨匠。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祭坛画、宗教画、肖像画和自画像。1471年出身于德国纽伦堡一个金匠家里。在父亲的工作室担任素描师。1486年师从画家瓦格缪特。1490年开始四处旅行。在意大利深受波拉伊奥罗和曼特尼亚版画的影响。后来研究人体比例以及透视画法。作品有《圣母的七个悲哀》《兰道尔祭坛画》《四使徒》《约翰启示录连作》等。1528年在纽伦堡去世。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画，签字厅/梵蒂冈）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

147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卡普列塞。师从基兰达约。20岁后前往罗马。制作了《酒神巴库斯》《哀悼基督》等雕刻。1501年回到佛罗伦萨，着手创作《大卫像》。1527年在教皇和罗马皇帝引起的佛罗伦萨围攻战中站在防卫一方，后逃往威尼斯。不久得到教皇恩准，1534年开始在罗马制作西斯廷礼拜堂内的祭坛画，1541年完成《最后的审判》。晚年担任圣彼得大教堂建筑总监。

自画像（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布伦瑞克）

乔尔乔内

Giorgione

1477—1510

威尼斯画家，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威尼斯画派先行者之一。生于1477年。1490年前后在乔凡尼·贝利尼手下开始学习绘画。初期作品有威尼斯德国商行外墙上的壁画装饰。位于故乡卡斯泰尔弗兰科的圣利贝拉莱教堂内的《卡斯泰尔弗兰科》祭坛画、被同时代知识分子高度评价为风景画杰作的《暴风雨》等也很有名。瘟疫大爆发时未能幸免，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死让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备感遗憾，甚至说出了“全威尼斯为之愤慨”的话。

托马斯·莫尔（汉斯·荷尔拜因画，弗利克美术馆/纽约）

托马斯·莫尔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英国政治家、人文学家。1477年出身于伦敦一个法学家的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1499年以后的四年时间在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度过，没有担任任何神职，但终生坚持宗教信念。1510年就任伦敦司法长官。1516年的著作《乌托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形态。1529年担任大法官，因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1532年辞去该职。1535年因拒绝否定教皇为教会之长的地位被处以大逆之罪而受到刑罚。

麦哲伦（作者不详，乌菲兹美术馆）

费迪南德·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

约1480—1521

葡萄牙航海家。1505年与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同行去了东印度，1512年回国。1519年受命于西班牙国王，为开发抵达印度的西线航路率领船队出发。经过南美最南端（现在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通往太平洋的路径。其后船队到达菲律宾，与当地人发生冲突。1521年麦哲伦在战斗中遇难，幸存下来的船员们仅靠一条船继续航海，1522年回到西班牙。被认为是史上第一次环球航海。

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拉斐尔·桑西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1483年出生于意大利乌尔比诺，父亲是一位画家。最初向父亲学习绘画，后来去了佩鲁贾，成为佩鲁吉诺的弟子。1504年移居佛罗伦萨，深受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影响。四年后转至罗马，受到教皇朱利奥二世的重用，开始制作梵蒂冈宫殿内三室的壁画（《雅典学派》等）。参与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同时为古罗马遗迹的发掘和复兴鞠躬尽瘁。37岁去世，留下了很多圣母子像及妇人像。

博尔赛纳的弥撒（局部）（拉斐尔画，埃利奥多罗厅/梵蒂冈）

路德（卢卡斯·克拉纳赫画，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米兰）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家。出生于萨克森。从埃尔福特大学毕业后，1507年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主教。1512年受聘为维滕贝格大学教授。其间对罗马教廷的衰颓深感疑惑。在德国开始售卖赎罪券的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以示反对。1521年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同年受到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传唤，被要求撤回主张，他一口回绝。后来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开始《新约全书》的德文翻译工作。

自画像（普拉多博物馆/马德里）

提香·韦切利奥

Tiziano Vecellio

1488/90—1576

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威尼斯派画家。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小村庄。在威尼斯师从乔凡尼·贝利尼，深受师兄乔尔乔内的影响。活动初期与他们之间的合作颇多。进入16世纪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公认的画家。他的成名作是1518年制作的《圣母升天》。他是唯一一位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行三顾之礼邀请的画家。应邀到了罗马后，受教皇保罗三世的委托绘制肖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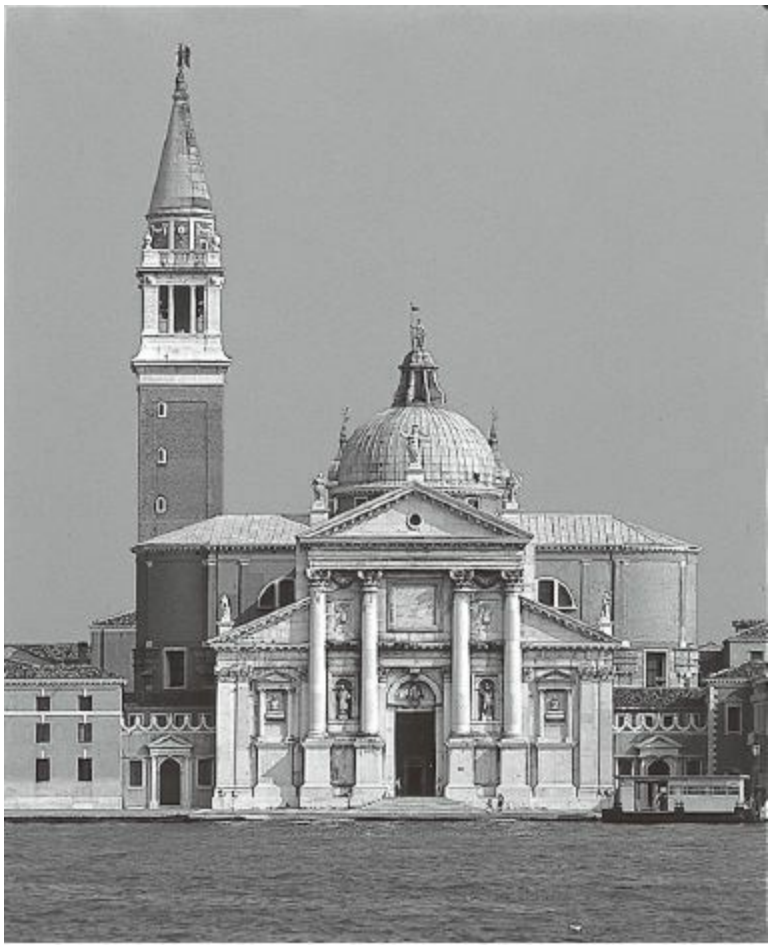
拉伯雷（路易·瓦伦丁·埃利亚斯·罗伯特画，个人收藏）

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

法国文艺复兴作家的代表。1494年出身于普瓦图一个律师之家。完成法律学习后成为了一名主教。在巴黎习得医学。发表了颇具讽刺和嘲笑意味的豪放长篇《世人传》第一卷（1532）和第二卷（1534）。其深厚的人文学知识备受称赞。后来因为对宗教极尽讽刺和猥亵而遭受迫害，藏身于当时的权力人物保护之下。第三卷发表于1546年，于第四卷、第五卷发表后的1553年在巴黎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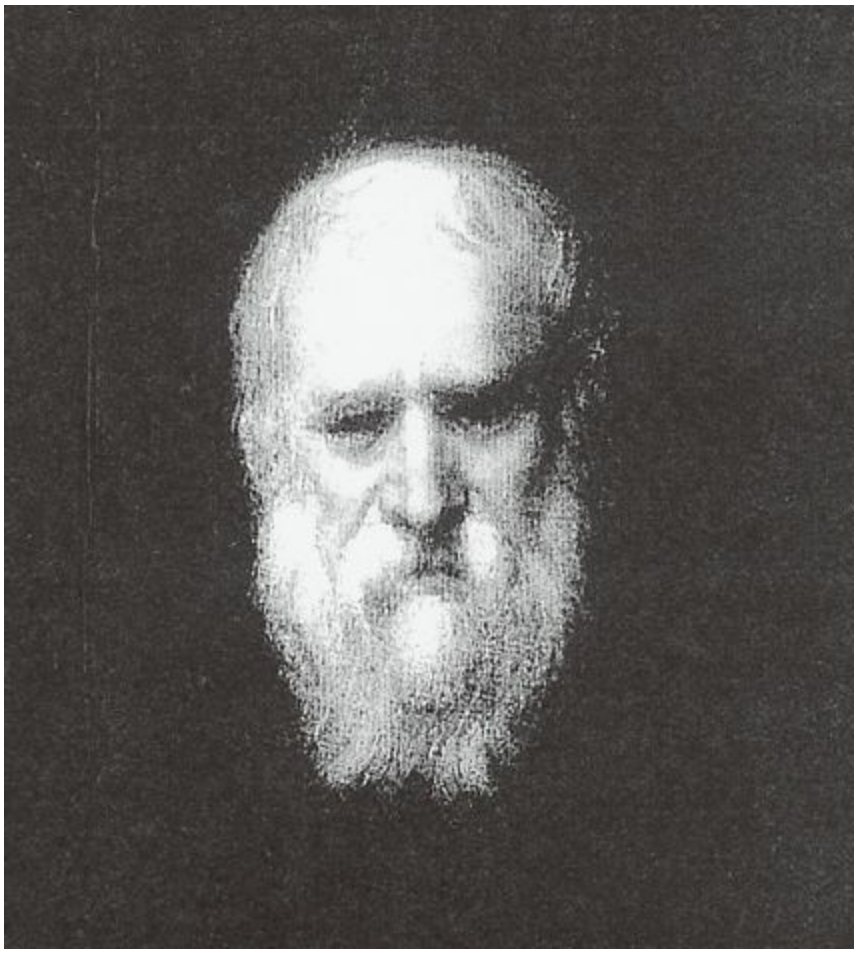
圣马乔雷教堂

安德烈亚·帕拉第奥

Andrea Palladio

1508—1580

16世纪意大利北部建筑师的代表。1508年生于帕多瓦。在维琴察做过石匠。到罗马后，研究古罗马及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建筑，对后世的风格影响巨大。在维琴察和威尼斯留下了很多他的建筑物作品。代表作有圆厅别墅、圣马乔雷教堂、奥林匹克剧场。著有有关古典建筑的《建筑四书》，大大影响了其后的欧洲建筑。1580年在维琴察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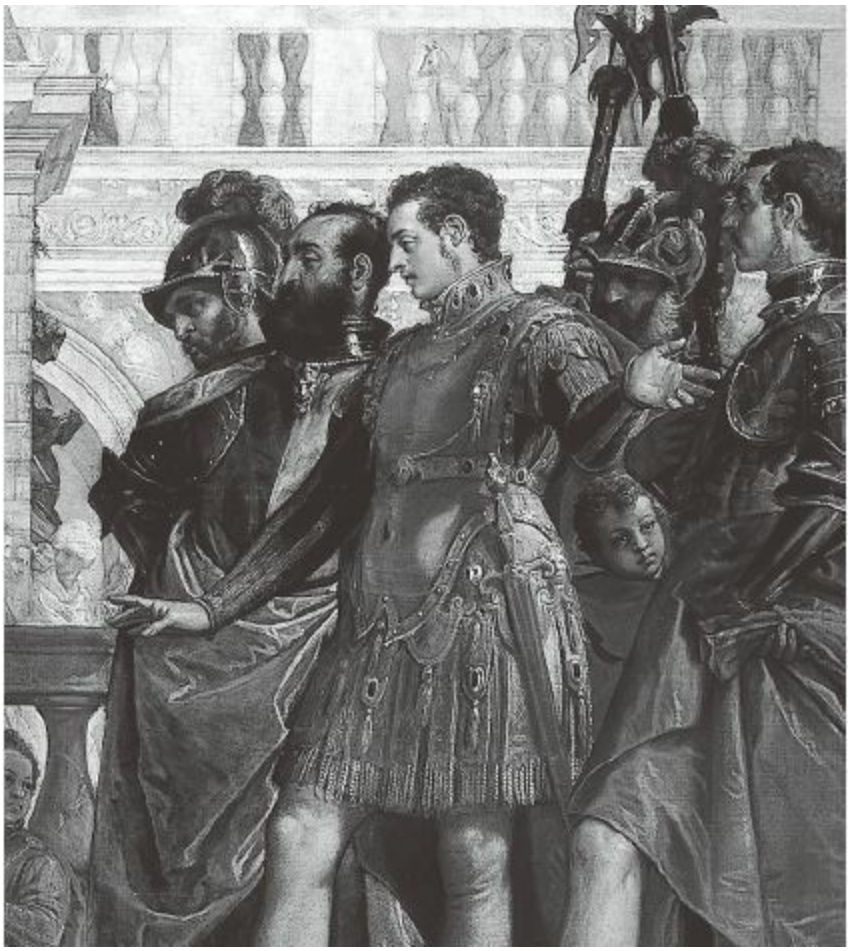
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丁托列托

Tintoretto

1518—1594

威尼斯画家。本名叫雅各布·罗布斯蒂。“丁托列托”是他的外号，因为其父亲是开染坊的（丁托列）。有人说他是从提香那里学的绘画。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威尼斯度过。为圣罗科教堂和道奇宫等创作了很多作品。作为肖像画家也很有名，留下了近百幅以政治家、贵族、学者等为主的作品。晚年为圣马乔雷教堂制作了三幅《最后的晚餐》。数月后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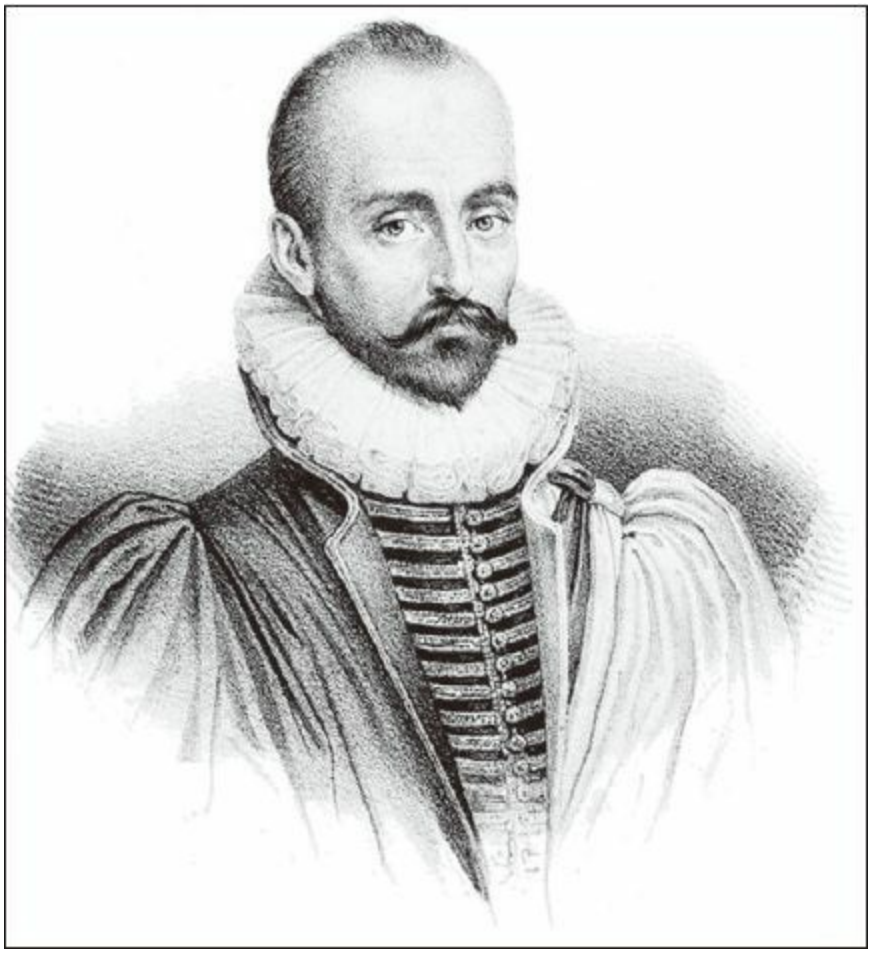
大流士一家和亚历山大大帝（局部）（国家美术馆/伦敦）

保罗·委罗内塞

Paolo Veronese

1528—1588

16世纪威尼斯派画家的代表。出生于维罗纳。最初参与家族事业做过石匠，后来成为画家。在同一地区的画家巴蒂勒的指导下学习绘画。1553年到威尼斯，受命制作元老院议会会场的天井画（1555—1556），从此声名大噪。1573年受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的委托制作《利未家的宴会》。此作品最初起名为《最后的晚餐》，因为描写酒鬼和打诨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质疑，不得已改名。



蒙田（作者不详）

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思想家、散文家。《随笔集》的完成确立了新的文学体裁。被认为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高尚的道德家。蒙田出身于一个领主之家，受过广泛的人文教育。在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后入职波尔多高等法院参议院，1570年辞去该职。其后的每天都在写作和思索中度过。1581年至1585年出任波尔多市长。1572年开始写《随笔集》，1580年出版最初两卷，1588年出版第三卷。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撰写了《意大利纪行》。

圣母升天（局部）（圣十字博物馆/托莱多）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

1541—1614

西班牙画家。1541年出生于威尼斯领属克里特岛。1560年前后来到威尼斯，师从提香。也到过罗马。意大利时代的格列柯制作了16世纪威尼斯文艺复兴样式的绘画。1577年移居西班牙，定居在托莱多。以其新颖的构图以及色彩创造了独特的画风，受到宗教界以及知识分子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作有《脱掉基督的外衣》《圣莫里斯的殉教》《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基督洗礼》《基督受刑》等。1614年在托莱多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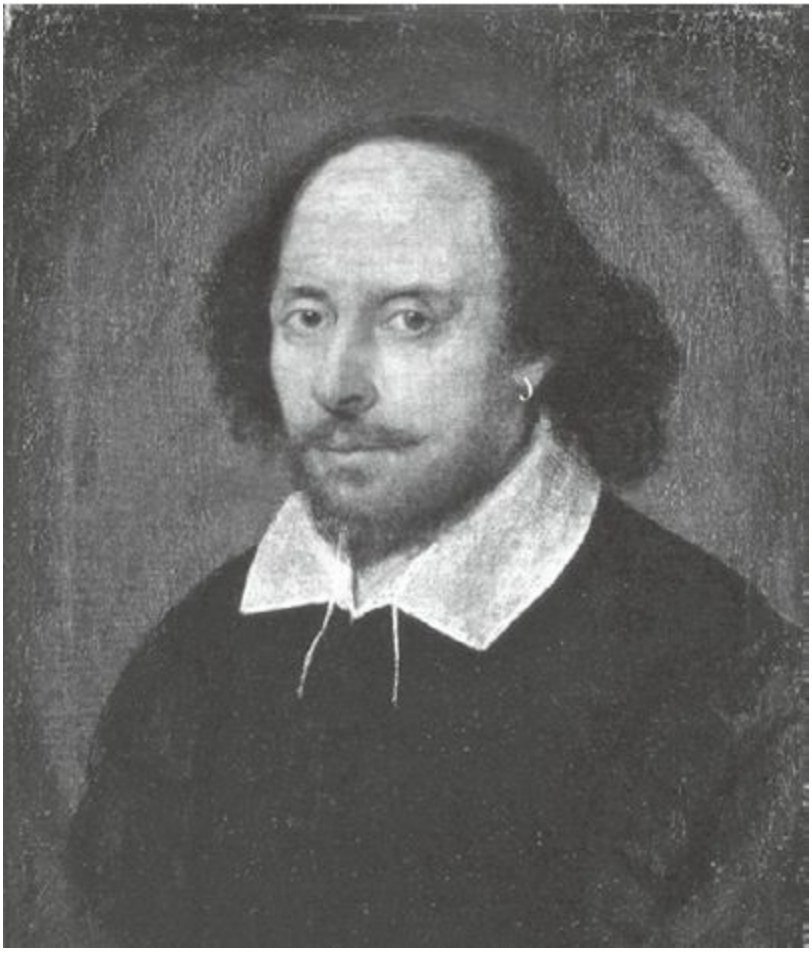
塞万提斯（费莫·塞尔马画）

米格尔·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西班牙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其作为近代小说先驱的作品《堂·吉诃德》被译成60多种文字。1547年出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1569年在罗马为红衣主教阿夸比瓦工作。1571年参加勒班陀海战受伤，造成左手残疾。1575年回国途中遭遇海盗，被送到阿尔及利亚为奴。1580年回国后写下大量诗歌、剧本，为西班牙演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写过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1616年在贫困潦倒中死于马德里。



莎士比亚（约翰·泰勒画，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国剧作家、诗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不朽名作。1564年出生于斯特拉福。16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来到伦敦，受雇于剧场，后来成为演员兼专属作家。1590年以后的20年间，专心从事剧本创作。充分发挥才能，成为一代名家。作品除了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外，还有《尤里乌斯·恺撒》《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1611年回到故乡，1616年去世。

文艺复兴的故事
02

盐野七生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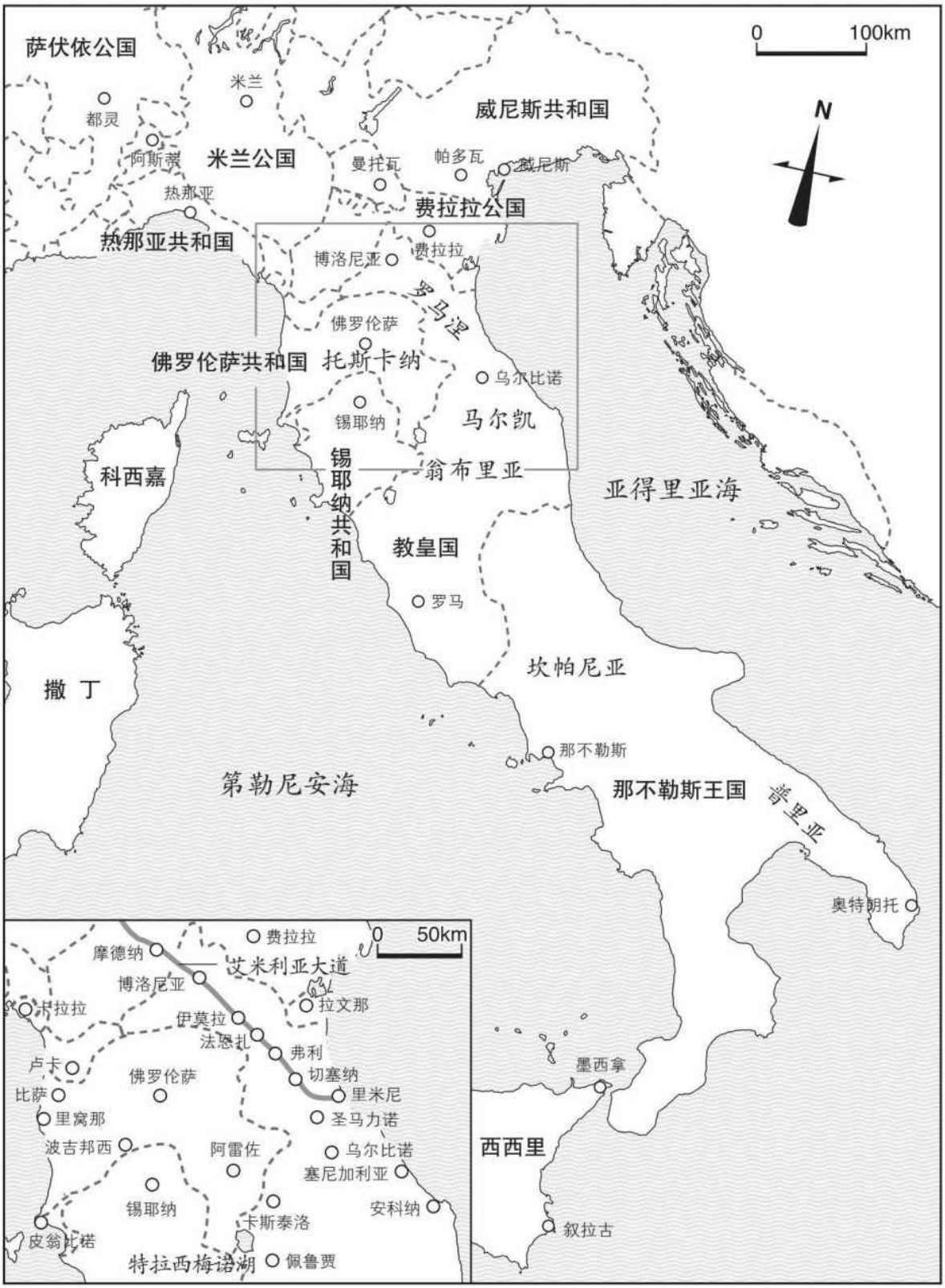
——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目　录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第三章 帕齐阴谋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 （1507—1512年）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在此之后
图片出处一览
译者跋
返回总目录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左下为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离开佛罗伦萨市区，有三条道路通向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那里是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Il Principe*）的山庄所在地。

从佛罗伦萨南面的罗马门[1]出城，这三条道路并行几公里后到达加卢佐村。在这里，沃尔泰拉大道最先右折而去。这便是第一条道路。

从加卢佐不拐弯一直前行，就上了卡西亚大道。这条大道是古罗马大道之一，现在仍叫卡西亚大道。不过，古罗马时代通往罗马的卡西亚大道并不经过锡耶纳，而是经过阿雷佐。起于罗马门的这条大道大概只是古代卡西亚大道的一条支路。这是第二条道路。

顺便一提，在通向罗马之门这层意义上，只要历史上围有城墙的城市都有罗马门，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与古已有之的沃尔泰拉大道和卡西亚大道不同，第三条道路修建于20世纪。这条道路既没有向左直接连接卡西亚大道，也没有向右转个直角连接经过此地的米兰至罗马的高速公路，而是并入了路口在这两条道路正中间的通往锡耶纳的“高级公路”。

这条公路从佛罗伦萨通往锡耶纳，它并不叫高速公路。这倒并非是因为它不是由国家公路集团修建，而是因为它没有高速公路所不可缺少的各种服务设施。不过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没有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这条路与高速公路不同，它并不收费。

然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有资格被称为高级公路。它单向双车道，与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条道路由一家私营企业——总部设在锡耶纳的锡耶纳牧山银行——出资修建，大概是银行想要反哺社会吧。这家银行创建于马基雅维利时代，其主要储户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农业经营者。据说在1929年大萧条时它岿然不动，顽强地挺了过来。

这是一条去往马基雅维利的山庄最近的道路。上路后开车不到5分钟，进入一个短短的隧道，出来不久就会看到道路的右边有一块写着“圣卡西亚诺”（San Cassiano）的路标。车子在这里离开高级公路，爬一会儿坡度平缓的乡村公路，登顶后向右转，再有500米就到了目的地。从距离上看，这条道路与其他两条没有多大差别，但因为可以高速行驶，所花时间却要少很多。

如果选择走卡西亚大道，人们沿溪流前行片刻就能看到横跨在河上的一座桥，从这里离开古道，沿着坡度略陡的道路爬到顶，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这条路在离开大道后向北经过一片森林，受到葱茏繁茂的树木遮挡，地面接收不到阳光，享受不到阳光带来的温暖。在冬季，这条道路上的积雪难以消融，道路又比较陡，还是不走为好。不过，如果走这条道路，离开佛罗伦萨城门到达此地只有区区10公里的距离。

从加卢佐村向右转，就是沃尔泰拉大道，这是一条经沃尔泰拉城通往第勒尼安海的道路，路名即源于此。这条道路古时因运盐而闻名。

出了加卢佐村以后，道路变得蜿蜒曲折，坡道平缓。加尔都西会[2]城堡式的古老修道院静卧在眼前，每转一次弯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致。

爬到坡顶，中世纪的修道院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托斯卡纳田园风光。托斯卡纳地区位于意大利中部，低缓的丘陵重叠延绵。佛罗伦萨是建在盆地里的城市，出城驱车五六分钟便可以饱赏美丽风光。

墨绿色的扁柏，令人联想起雷斯皮基[3]在《罗马的松树》中描写的著名的伞松。茂密温暖的绿色松林，充分沐浴着地中海的阳光，储存温暖。托斯卡纳就是伞松的“北极线”了。松林之间，满是橄榄树和葡萄园。每当风儿吹来，橄榄树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出叶背的白色；每当季节变换，葡萄园就会改变容貌。人们从丘陵之上望得到以钟楼为标志的

教堂、修道院和山庄，这些山庄都夸张地围有带箭垛的围墙。人们只需顺着生长在丘陵山脊的扁柏走，便会很容易找到去往那些地方的道路。

沃尔泰拉大道沿着丘陵的山脊走，不缺阳光，盛夏可能难耐，但冬季从来不会受到冰雪的困扰。大道左右两边缓缓向下的斜坡是一片葡萄园。这地方是丘陵地带，只要排水好，这里所产的大部分葡萄都能酿出好酒。

“基安蒂”并不是某一家酿酒企业的产品名称。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丘陵地带称为“基安蒂”，这个地区产的葡萄酒都叫作“基安蒂酒”。

基安蒂酒有上品与普通之分。上品指的是基安蒂某特定区域酿造的葡萄酒，称为“经典基安蒂”（Chianti Classico），商标是黑色公鸡图案。普通则是指基安蒂其他地区产的所有葡萄酒，使用天使图案做商标，称为“天使基安蒂”（Chianti Putto）。其他还有少数品种称为“锡耶纳基安蒂”，但也属于普通品种。

沿着沃尔泰拉大道进入基安蒂地区，人们会首先看到画有天使的牌子，表示已经进入了普通基安蒂酒的产地了。过后不久又会看到画有黑公鸡的牌子，上面写着：“您已经进入经典基安蒂的产地。”上品葡萄酒产地位于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基安蒂地区，但位置更靠近佛罗伦萨。

在这附近拥有山庄（fattoria），意味着你不仅拥有山庄的建筑物，还拥有周围的葡萄园和橄榄园。马基雅维利的山庄也不例外。马基雅维利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属于上品。

当然，划分这种上品与普通的历史不过百年。基安蒂地区的农业振兴始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4]登上托斯卡纳大公的宝座之后[5]，马基雅维利在此前半个世纪就已去世。

与工业产品不同，人们很难在一无所有的新地方生产农产品。振兴政策能够发挥效果，也是因为那里已经有相当基础。根据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教廷的葡萄酒负责人朗切里奥[6]留下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当时还没有“基安蒂”这个名称，这一带就已经在出产优质的葡萄酒了。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父亲留下的记录，他曾经于1486年把提图斯·李维[7]写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送到佛罗伦萨的装订作坊装订。他在记录中写到，他给装订作坊带去了3瓶基安蒂红葡萄酒和1瓶用红葡萄酒酿制的醋作为酬金。这种醋在日本叫作酒醋（wine vinegar）。酒和醋都装在为基安蒂酒特制的下半部分用干草包好的大肚酒瓶（fiasco）中。送去的酒要是不好喝，作坊恐怕会要求用银币支付酬金吧。

用葡萄酒和橄榄油支付钱款未必代表家境贫寒。在佛罗伦萨，把自家做的酒、橄榄油和火腿送给那些不需付费的律师、医生和孩子学校老师的行为，至今仍是流行的礼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货币经济虽已经建立，但以物易物仍很盛行，这种付款方式大概也极为普遍。拎着4个酒瓶走进装订作坊，腋下夹着用兽皮或布装订好的《罗马史》出来，那人一定就是刚满17岁代父前来的马基雅维利了。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困扰了我15年的疑问：马基雅维利究竟能不能喝酒。

我瞪大双眼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一处写到他喝醉或喝多酒的文字。不过，酒鬼大约不会写这些事。况且意大利人惯于每餐必饮，平常不大会醉酒。不知是谁曾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体质不适合饮酒。但是一想到他偶尔也会胡闹一下，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每次胡闹时都没有喝醉。他在佛罗伦萨城里出生、成长、去世，而这座似乎是他母亲娘家财产的山庄正位于上品酒产地的中心区。这就产生了最大

的疑问，体质上不适合饮酒的人能那样冷静地写出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吗？

我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疑问，进一步的推理拜托给各位读者，我接着往下写。

人们沿着沃尔泰拉大道欣赏着田园风光，很快就到了转向圣卡西亚诺村方向去的路口，从这里左拐，走一会儿再左拐，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走这条路比走卡西亚大道距离远些，但这条路沿着丘陵的山脊，道路平缓，没有陡坡，乘马车也没什么不便之处。这条路当初是用于为大城市佛罗伦萨运盐，盐是必需品，交通一定很繁忙，治安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可担心之处。如果没有急事，人们一般会走这条路面平坦、视野开阔的道路。

现在，这三条道路都通有公交车，但即使在最近的车站下车，你也得步行1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很小，甚至不能称为村。虽然我叫它村，这里也只是丘陵之上的一片平地，有一座小教堂，有一户地主，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家，还有一家酒馆（osteria）和一口井，另外就是几户当时的佃户和其他小手艺人住的房子。这么点房子简朴地挤在一起，隔着通往卡西亚大道的小路与圣卡西亚诺村相望。

即使在500年后的今天，这里也只增加了塞里斯托里家族的葡萄酒窖。塞里斯托里伯爵是马基雅维利子孙中的一位女子再婚的夫家，他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山庄和附属的农庄，如今卖着一种用马基雅维利的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酒馆的招牌上也很老练地用着同样的标识。这家酒馆自马基雅维利时代就已存在，现在还在卖着塞里斯托里酿造的、用马基雅维利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当然，这是一种印有黑公鸡图案的基安蒂上品葡萄酒。像这样酿酒厂直销的生意在基安蒂地区司空见惯。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到过自己失业了，没有了收入，怕是只能靠养鸡糊口了。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子孙中竟有人如此善于经营，一定会很羡慕。这一点确切无疑。如果知道自己的侧面像被用作商标，性格狷介的但丁肯定会表现出不快，而马基雅维利则一定会露出愉快的微笑。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想到卖葡萄酒会成为一项事业。这种事只有威尼斯人想得到并做得到。他们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有组织地生产玛尔维萨酒（Malvasia）呈赠给教皇和王侯君主，通过这种宣传方式，玛尔维萨酒赢得了类似今天香槟酒一般的好评，出色地成就了一番盈利事业。马基雅维利生来就没有这种福分，他不能只靠来自领地的收益就能悠闲自得地生活，如果没有薪水，他就只能靠养鸡过活了。

山庄的房屋与葡萄酒窖和酒馆隔路相望，临街的一面造型简单乏味，但面向庭院的一面则沿用了佛罗伦萨近郊别墅的典型式样，更富立体感。站在街上一眼望去，会使人感到这是一处相当好的别墅。沿着沃尔泰拉大道，坚固的城堡造型的别墅和华丽的文艺复兴式样的别墅随处可见，与它们相比，我还是坦率地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我生来贫穷”这句话。山庄的房屋也可称为别墅，但在意大利语中，城墙之外的独栋房屋都叫别墅（villa），与豪华还是简朴并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觉得把著名先祖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当商标使用心中有愧，或许仅是为了表示对天才的敬意，塞里斯托里家把别墅辟作了马基雅维利资料馆。别墅的两翼为后代所增建，但中间部分几乎保持了500年前的模样。

钻过一扇中世纪风格的小门，人们会进到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里展示着翻译成各国语言的马基雅维利著作，但没有日文译本，因为日本还没有出版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全译本。

这个大房间与其他房间的隔墙也是用厚实的石头砌成。壁炉的大小与造型、石造阶梯两边的窗户造型，都在告诉人们这座别墅建造于16世纪以前。二楼大概是用作家庭成员的卧室，三楼用于晾晒农作物，这在

拥有农庄的别墅极为普遍。

一楼房间中有一间，想必是马基雅维利的书房。房间里设有壁炉，他晚上工作，这壁炉一定会为他驱走深夜的寒冷。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在这间房间里写了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朋友、佛罗伦萨政府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被誉为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美的信函之一。[8]

……在这里，太阳一出来我就起床，走向树林。我在那里让人锯树伐木。我在森林里和伐木工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来检查前面的工作。这帮人一会儿弄伤了手，一会儿自己争吵起来，一会儿又跟邻居争吵，总是闲事不断……

出了树林，我走到泉边。在那里我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度过光阴。我会带一本书去，但丁、彼特拉克[9]，或更加轻松的诗人的作品，像提布鲁斯[10]、奥维德[11]他们的作品。我读着作品中讴歌的浓浓的爱和诗人自己的爱情，回忆着我自己的爱情，很是享受。

然后我重新上路去酒馆。我在那里跟旅人聊天，询问他们家乡新近发生的事情，倾听他们带来的信息。我能了解到这些人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思想。

这样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我回到家里，同家人一起围坐在桌旁，吃着这座别墅和仅有的财产所能给予我们的饭食。

吃完饭，我又回到酒馆。这个时候酒馆的常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磨坊主，还有两个瓦窑工。我跟他们一起玩牌赌博，过得像个无赖。在纸牌骰子飞舞交错之间，生出千百争执，口吐粗言詈语，做尽了想得出的恶作剧。

每次都下注赌钱，我们发出的粗野声浪甚至传到了圣卡西亚诺村。这样，我才可以消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我的命运。我这样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我如此痛

苦而感到羞愧。

夜幕降临，我回到了家，走进书房。进书房前，我会脱去被泥土或别的什么弄脏的便服，换上礼服。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什么是君主国家？它有哪些种类？如何才能成为君主？怎样才能维持君主地位？为何会失去君主地位？

我想，就算你对我以前的所有空想都不中意，你也不会不喜欢这篇论文。我认为，这篇论文一定会被君主尤其是新兴的君主们所接受。

壁炉里的火在马基雅维利的背后燃烧。那是踏实的主妇、关心丈夫的妻子玛丽埃塔花费心思生上的，即使不加很多柴火也能长时间保持温暖。这里虽然地处南欧，但田园的冬季可不留情，稍不留心，这石造的房子就会冷得像个冰窖。不过，只要炉火持续不断，哪怕只有些许温热，人们住在这种房子里并不会感到寒冷。

马基雅维利用来写作的桌子跟别墅的其他家具很般配，是一种简朴的木制书桌，源于修道院食堂的餐桌（fratino）。这种桌子简朴且最适合用于写作。桌面由七八厘米厚的木板制成，通常长2米，宽1米，桌腿用两根粗壮的树桩做成，并用两根粗而长的木头在下面固定住。桌子用

白色的木头打造，组装好之后涂上褐色涂料，再刷上清漆。如此制作的桌子历经岁月后会产生深暗色的光泽，老托斯卡纳人的家里一定会有这样的桌子，可以说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具。

修道院食堂里用的餐桌适合修士们坐成一排，有4米之长，但宽度只有窄窄的半米左右。这样的桌子放在普通人家里多有不便，所以普及版的桌子是缩短长度、加大宽度的修改版。

马基雅维利坐的也许是被称为“但丁椅”的折叠椅。这种折叠椅用坚固的粗木交叉制成，坐上去宽敞稳固，胳膊放在扶手上也很自然。屁股坐的地方和靠背的地方绷着皮革或厚天鹅绒，摸起来舒服，坐上去舒适。

既然被称作但丁椅，这种椅子应该自13世纪以来就很普遍，这也是托斯卡纳地区特有的一种家具。记得10年前我曾有一次在古董拍卖会上看到过这样的椅子，心想如果拍价5万日元我就把它买下，可刚准备举手，上来的起价就是这数目的20倍。我慌忙打住，手僵在了半空。

16世纪前后，佛罗伦萨及其近郊使用的椅子大致有三种式样。如果但丁椅是第一种式样，那么第二种式样就是萨伏那罗拉椅，它于15世纪后半叶开始普及。这种椅子也可以折叠，所有部位都用细木制成，坐上去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木头的摩擦声也颇使人心烦。这种椅子的外观和坐感都是禁欲式的。但把这种椅子与15世纪末非难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谋划建立神权政治的狂热修士萨伏那罗拉[12]扯在一起，让人觉得有些怪异。这种椅子大概很适合用在集会场所。

第三种是高背椅，有的有扶手，有的没有。这种椅子给人的印象有点华而不实，坐上去也会感到僵硬，用于人数较少的聚餐和会议倒很合适。我觉得，亚瑟王[13]圆桌周围的椅子非它莫属。

考察一番之后，我渐渐感到但丁椅最适合作为那个时代的书房用

椅。这种椅子用很多黑色和红色毛纺布料做成，打理身上穿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外交官的官服也不会有什么困难。[14]

在高高的铁脚支撑的铁盘中倒满油，油里浸着灯芯，它的一端燃烧着，这大概就是书房的灯了。蜡烛的价钱太贵。因为昂贵，中世纪的人把点着的蜡烛奉献给上帝就成了有意义的事。烧油就会有恶臭，但如果人们都点这样的灯，自然也会习惯，他们一定不会感觉到我们现代人的烦恼。况且，马基雅维利还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

马基雅维利坐在桌前，灯光如豆，屋内气氛柔和沉静。他的眼睛朝着一个角落似看非看。他的目光不时变得强烈，口角边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桌上放着鹅毛笔，他用支在桌上的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时间缓缓逝去。

突然间，鹅毛笔在纸上滑动起来，气势异乎寻常，好像鹅毛笔的主人害怕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的某个念头转瞬即逝。当时，纸张非常昂贵，写错了揉成团扔掉的事不可想象。书写的时候要尽量少留余白，也不换行，字要小，行距要窄。马基雅维利一旦写起来，甚至会吝惜让鹅毛笔蘸墨水的时间。片刻之后，鹅毛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利又把下巴支在两只手上，再度沉湎于思考之中，借用他喜欢的话说，这是在享受历史的想象。

在二楼，妻子玛丽埃塔、10岁的长子、另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发出了天真无邪的鼾声，但是另外的事情占据了这位44岁的原佛罗伦萨政府秘书的头脑。

对一个44岁的男人而言，被解职意味着什么？他当然要维持生计，但事情远不止于这些。这样年龄的人突然被从职场上赶走，他又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马基雅维利从29岁那年的春天起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

书长的职位上工作着，到这一年已经15年了。他喜欢这个职位。他抱怨差旅费太少，但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工作失误，却被突然撤职了。因为共和政体崩溃了，以前一直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执掌政权了。

马基雅维利蒙受的灾难还未到头。第二年，反美第奇的阴谋败露，他因加入阴谋的嫌疑被投入了监狱。很不幸，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就被强加在了他的头上。马基雅维利的牢狱生活一个半月以后结束了，因为美第奇家族的枢机[15]主教乔凡尼当选罗马教皇，成为利奥十世[16]。第一个由佛罗伦萨人担任的教皇诞生了！佛罗伦萨人欣喜若狂，忘掉了美第奇和反美第奇还有什么区别。马基雅维利出狱，不是因为他洗清了罪名，而是因为庆祝教皇利奥十世登基的大赦。

如果马基雅维利只是被撤销秘书官职务，他仍然可以继续住在佛罗伦萨市内。但由于这次牢狱之灾，他不得不选择自我流放的生活，尽管这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置。1513年4月，他同家人一道来到了位于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山庄，在44岁生日的前一个月，被迫隐遁乡间。

马基雅维利在这一年的12月10日写信告诉密友韦托里，他准备撰写《君主论》。这时，他的“隐居生活”已经进入第八个月。

人们都说，但丁不遭流放就不会有《神曲》，马基雅维利不遭此难也就不会有《君主论》。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这在当事人看来又会如何呢？我想这可不是简单地说一句“不幸是杰作之母”便可释然的。

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两人在时代上相差200年，但这两人都是在寸铁杀人的警句创造力方面有定评的地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他们知道后世如此评价他们，他们的嘴里肯定会喷出一些让我们这些后生全身紧张的警句。然而两个人都没有留下这类语句。不论是《神曲》还是《君主

论》，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并非以文人开始，但丁也一样。

他打心底里知道，如果以写作开始自己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将会十分孤独。

>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
>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这就是作家的世界。在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滑稽得让人觉得此人已疯。

>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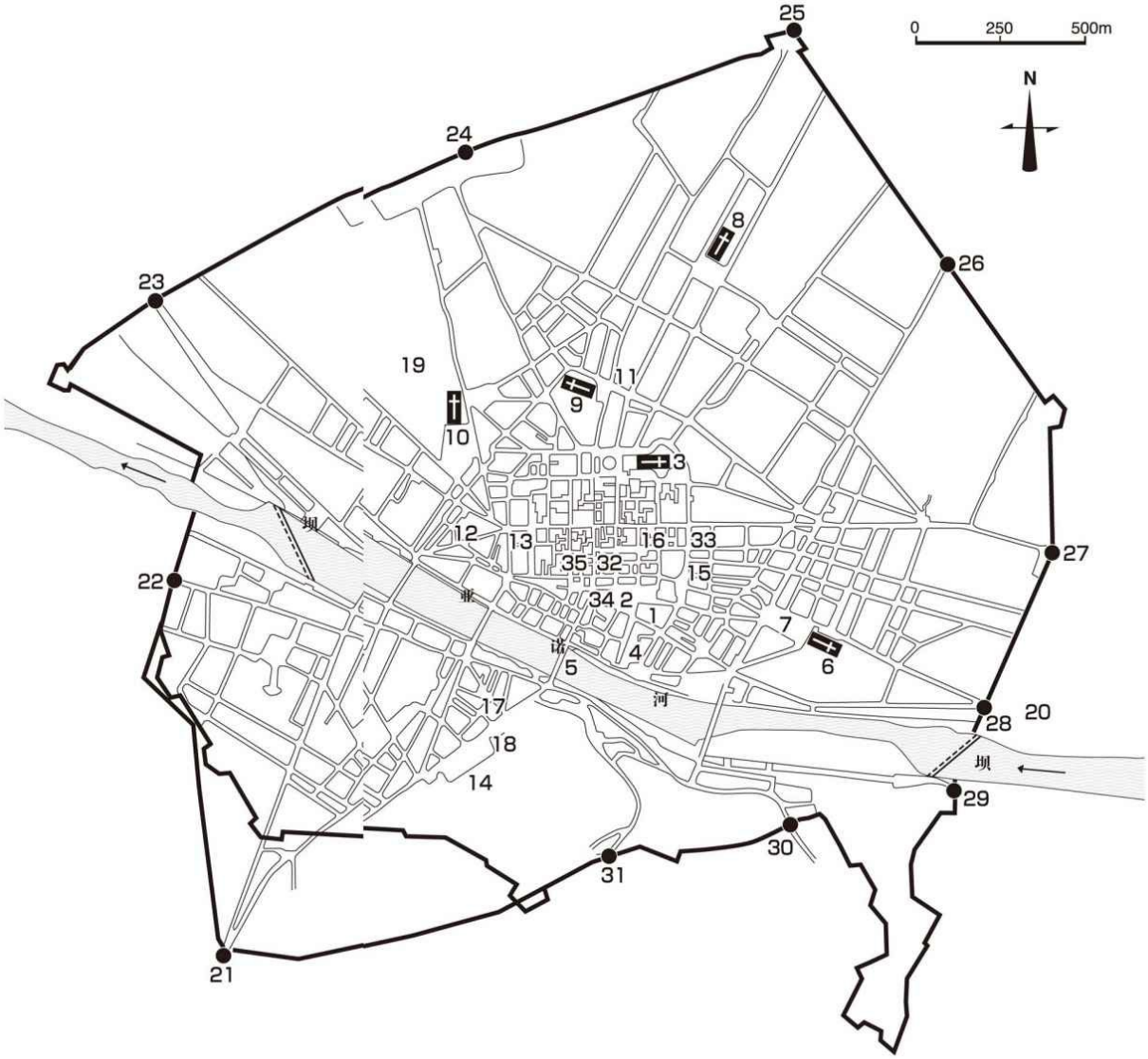
把虚幻变为现实也仅此而已。写完这部著作，虚幻世界里的人就完成了任务。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虚幻世界里的人所做的警示，得看现实世界里的人。现实世界里的人该出场了。

但是，虚与实有时也会因人因时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说实话，这种状态不就是最接近理想的人的活法吗？至少思维跟着感觉走的人，不都是在做着自己的梦吗？

从南面眺望佛罗伦萨市中心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起步于官场。如果恶魔梅菲斯托费勒斯[17]出现在他的面前，逼迫他在古今杰作《君主论》和持续十几年以往官场生活之间做个选择，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十几年的官场生活吧。我觉得，钥匙恐怕就藏在这里，用这把钥匙可以辨别哪些是超脱现实世界的真正隐居者的著作，哪些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人们穿过圣安德里亚别墅一楼的厅堂，就到了像阳台一样的庭院。从房屋前面的马路上看，这个庭院与马路等高，但在里面看比路面高出一截。这是因为别墅建在丘陵的斜坡上。庭院下方起了库房的作用，可以收纳农具、葡萄酒桶和橄榄油桶。说不定在某个角落还养过马、羊、猪、鸡等。如今，从这里下去再到对面丘陵，满坡都是葡萄园，景色秀美。高出一截的庭院，也许还能当眺望台用。



佛罗伦萨市区图（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

1. 韦奇奥宫（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现佛罗伦萨市政厅所在地）
2. 领主广场
3. 圣母百花大教堂
4. 现乌菲兹美术馆
5. 韦奇奥桥（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
6. 圣十字（教堂、修道院、方济各会）
7. 圣十字广场
8. 圣马可（修道院、多明我会）
9. 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家族墓地）
10.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教堂、修道院、多明我会）
11. 美第奇宫（现托斯卡纳州政厅）

12. 鲁切拉宫
13. 斯特罗齐宫
14. 皮蒂宫（现皮蒂美术馆）
15. 巴杰罗宫
16. 但丁故居
17. 马基雅维利故居
18. 圭恰迪尼宅邸
19. 奥里切拉里花园
20. 刑场
21. 罗马门（通往罗马的大路口，南门）
22. 圣弗莱蒂亚诺门
23. 普拉托门（通往比萨的大路口，西门）
24. 法恩扎门（1534年开始建设要塞）
25. 圣加洛门（通往博洛尼亚、法恩扎的大路口，北门）
26. 平蒂门
27. 圣十字门（东门）
28. 正义门
29. 圣尼可罗门
30. 圣米尼亚托门
31. 圣乔治门
32. 羊毛业行会
33. 律师公证人行会
34. 金融业行会
35. 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

走出庭院，我随意向右边的方向望了一眼，突然感到身体一阵疼痛，好像胸膛被尖刀捅了一下。

佛罗伦萨出现在了眼前！我在右下方远远地看见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红瓦色圆形屋顶和上面的白色棱线。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象征，它的穹顶是西欧首创，于1471年5月根据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18]的方案完成。马基雅维利那年才2岁。他是看着这个圆顶、感受着这个圆顶成长起来的。这个圆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骄傲，红瓦色加上白色棱线，美轮美奂，它是到访佛罗伦萨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鲜花之都”的标志。马基雅维利在完成了外交任务回国时，一定会在横跨亚诺河两岸的佛罗伦萨市街上，多次眺望高高耸立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穹顶之下就是佛罗伦萨。这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都市，它还拥有可以让当时意大利最美的花朵绽放的城市文明。

那个时代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城邦”这个名词表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

意大利能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第一次悟到了“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的道理。佛罗伦萨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是创造出这种意义的城市的人民。

被称为“海洋之都”的威尼斯和被誉为“鲜花之都”的佛罗伦萨在“先有城市”这点上是相同的。城市诞生在先，在这个城市性质的延长线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家。马基雅维利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生、成长、去世，作为纯粹的城市人获得并结束生命。

佛罗伦萨很远，阴霾雾霭之时，人们站在圣安德里亚山庄的庭院无法看见它。但如果天气晴朗，你就是不想看也能看到它的雄姿。马基雅维利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这里眺望佛罗伦萨的呢？

在那座穹顶下的市街里，有他去了15年的职场，有他担任国务秘书时的同僚，还有不是同僚却受到他启发的许多人。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而且在智慧上都属于上流社会。那里有他能够用共同语言相互沟通的真正朋友，那里有以秘书厅为集散地的各种信息情报。他由于职务所在几乎全部看过、自己也抄写并发送过这些情报。那里还有许多外国领袖人物，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曾经直接与他们会面交流、谈判交涉。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座穹顶下还有一种“毒素”，一种创造出独特而具有普遍性文明的城市一定会有的“毒素”。对创造者来说，饮多了这种“毒素”必将自取灭亡，但如果适量饮用却是最好的兴奋剂。

44岁的马基雅维利被迫离开了所有这一切。离开佛罗伦萨的这10公里，不仅仅是10公里的距离；从庭院里可以看到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也不单单是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自称无赖的他同屠夫、磨坊主和两个瓦窑工一起玩纸牌赌小钱，沉溺于游戏之中，旁若无人地大声争吵。他靠这种行为去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自己的命运。他自称如此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他如此痛苦而感到羞愧！

他的这种愤怒，在内容和程度方面与单单被断了生计的人所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人都会有只有自己才特别需要的东西，当这个东西被夺走时，便会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愤怒。这在不关心这种东西的人看来甚至无法理解。

马基雅维利也一定有他特别需要的某种东西。

能否理解这种东西，关系到能否理解他本人，也关系到能否理解他在以《君主论》为代表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

15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第一次知道从圣安德里亚别墅的庭院可以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我望着好似摆放在丘陵之间漂亮饰品般的穹顶，决定写写马基雅维利。我当时就定下了书名："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

[1] 罗马门（Porta Romana），又译罗马涅门。（未特别注明者皆为译者加注）

[2] 加尔都西会（Ordo Cartusiensis,O.Cart），天主教隐修会之一，1084年由圣布鲁诺创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该会会规严格，修士过着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有"苦修会"之称。

[3] 雷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1879—1936）,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最著名的作曲家，其创作具有印象派和古典主义的特征，代表作有交响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等。

[4] 美第奇家族（Medici），祖先为托斯卡纳农民，后经商致富。13世纪成为贵族，逐渐获得政治地位。这个家族虽经历过三次政治放逐，但在14—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佛罗伦

萨的实际统治者。家族中产生过三位教皇和两位法国皇后。美第奇家族捐资修建教堂和公共设施，资助艺术家，奖掖文化事业，在文艺和建筑方面有重大贡献，对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居功至伟。

[5] 1532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为世袭公爵，佛罗伦萨成为大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后被称为科西莫一世）于1567年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称号，于1569年建立托斯卡纳大公国。

[6] 朗切里奥，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受水平及资料所限，本书中某些人名、地名等未能找到相应的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7]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前59—公元17），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巨著《罗马史》（又称《建城以来史》）。

[8] 对比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后发现，本书所引某些马氏原作的日文译文与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的中文译文之间在内容和表达方面相去甚远，故决定在翻译本书引用的马氏原著内容时，均按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不使用现有的中文译文。

[9] 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与但丁、薄伽丘齐名。代表作有《诗集》《阿非利加》等，对历史学和地理学亦有贡献。

[10] 提布鲁斯（Tibullus，前55—前19），古罗马诗人。

[11]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公元17/18），古罗马著名诗人，出身于骑士家庭。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爱情诗》等，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

[12]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一方面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又反对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文主义者视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9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处以火刑。

[13] 亚瑟王（King Arthur），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他有一张可容150人（一说50人）的圆桌。圆桌意味着平等。拥护他的骑士形成圆桌骑士团。在英国人心目中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象征着正义和希望。

[14] 马基雅维利于1498年至1512年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故本书作者有此一语。

[15] 枢机，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16] 利奥十世（Papa Leo X,1475—1521）,1513—1521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他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于1492年16岁时成为枢机主教。

[17] 梅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又称梅菲斯特），西方传说中的恶魔。歌德曾在取材于16世纪德国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对它做了种种描绘。

[18] 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和工程师，其主要建筑作品均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其杰作之一。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睁着眼睛出生的，就像苏格拉底，像伏尔泰，像伽利略，像康德……”

最近迎来百岁、头脑依然敏锐的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普雷佐里尼[1]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并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后世称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所处的时代为中世纪，却称同一时期意大利所处的时代为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大有区别。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

佛罗伦萨中心偏南是一片盆地，亚诺河流经此处，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便开始在此居住。这里是这个城市的起源。城墙夹河而建，沿着城墙从北向南步行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这里生活着7万人，一有风吹草动，整个城市便会立即反应起来。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中心区，这里无论如何也该算是“城中心”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佛罗伦萨的“城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一般称为韦奇奥宫（意为旧宫）的市政厅位于领主广场。市政厅前的广场几乎总是佛罗伦萨发生重大事件的舞台。从韦奇奥桥到广场这一

带，挤满了丝绸商、毛料店和行会（arte）[2]的房子。自然，那些银行也根本没有想过要让总部离开这个“城中心”，虽然它们的分行遍布于北起英国的伦敦、南至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广袤大地。从政治中心的领主广场去宗教中心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不到5分钟，沿途以及在这座佛罗伦萨主教堂周围，艺术家的工作室鳞次栉比。

工作室（bottega）尊重匠人的传统，都开在城中心很普通的四五层楼房中的第一层。二层以上通常是师傅和徒弟们起居的地方，为了防止火灾，厨房设在顶层。

在这种格局之下，一层的工作室没法不对外开放。著名师傅指导的工作室与院子相连，通常相当宽敞，路人很容易看到里面的工作情形和已完成的作品。这种工作室同时也是艺术学校，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艺术家们成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创作。

雕塑家多纳泰罗[3]的工作室也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创作了佣兵队长加塔梅拉塔的骑马像，一举扬名海外。他后来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这里不断有人说我的坏话，这些坏话刺激我更加努力学习，结果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这就是多纳泰罗回来的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被贬低，多纳泰罗恐怕也不会一味地抒发爱乡之心。没有认可就没有艺术。首先，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坏话”是指内行人的批评，这也是一种刺激。外行人的批评有害无益。当时作品的质量至今仍然吸引着外国游客，这已经证明“坏话”并非来自外行人。其次，这里有买家，没有比购买作品更高的赞赏了。佛罗伦萨的艺术之花绚丽绽放也源自旺盛的内需。

佛罗伦萨人强悍有力，说起“坏话”来毫不客气，不会顾忌你是否在海外受到好评，或是在国内是否拥有势力强大的赞助人。可听着“坏话”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不是仅满足于虚名的人。

多纳泰罗如此中肯地吐露心声，却也留下了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热那亚商人向多纳泰罗订制一尊青铜头像。做中介的科西莫·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的主人，当时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也是多纳泰罗的赞助人。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青铜头像的制作，商人也很满意。但是在热那亚商人看来，多纳泰罗索要的制作费不合常理，说制作铜像的时间只有一个月或更短，即使按照每天工钱半个弗罗林[4]，他的要价也太高了。

于是多纳泰罗生气了，说：“你这种人不要来买雕像，去买豆子更合适。”说着就把刚刚做好的铜像扔出窗外。头像重重地摔在地上，成了一堆摔扁的铜块。热那亚人后悔了，说愿出两倍的价钱请他再做一尊。可是多纳泰罗连听都不听，科西莫再劝也没用。

和多纳泰罗一同主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艺术的布鲁内莱斯基也不乏这种故事。

佛罗伦萨决定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想建造首屈一指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但由于他的方案在建筑技术上太具有革命性，赞助人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感到害怕。行会希望给大胆的布鲁内莱斯基踩踩刹车，决定派著名雕塑家、建筑家吉贝尔蒂[5]和另外一个人作为工程的共同监理人，跟着布鲁内莱斯基。

布鲁内莱斯基对此深恶痛绝。他根本不希望也没有要求派监理人。一项大工程大张旗鼓地动工了，布鲁内莱斯基却称病不出。布鲁内莱斯基不来，日子却在一天天逝去，两位监理人一筹莫展。他们告诉羊毛业行会，仅靠他们二人工作无法进展。行会领导被迫进行抉择，要么废掉

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案，采用其他设计建造穹顶；要么让布鲁内莱斯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长时间商量以后，行会代表来到布鲁内莱斯基家，告诉他指挥工程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消说，第二天一大早布鲁内莱斯基就出现在了建设现场，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布鲁内莱斯基死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23年。长寿的多纳泰罗也于马基雅维利出生3年前去世。他们是巅峰般的人物。山麓富饶广阔，巅峰人物走了，又会有其他巅峰耸立。拥有波提切利[6]、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韦罗基奥[7]工作室及其竞争对手波拉伊奥罗[8]的工作室吸引了佛罗伦萨人的目光。不久，人们又在基兰达约[9]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年轻好胜、忠实于佛罗伦萨艺术传统的米开朗基罗学习和工作的身影。

单单聚焦艺术方面，就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于此。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生于斯长于斯的佛罗伦萨。

从领主广场出发，过韦奇奥桥，在去皮蒂宫的大路上走过一半就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家。这一带极有权势的圭恰迪尼[10]的宅邸就在这条路上，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开始，这条路就被叫作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圭恰迪尼大街18号。

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现已不复存在。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的建筑物没有大门，进去后里面有几家店铺，二楼以上用于办公和居住。在右侧门楣的位置上，放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感觉跟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附有这样说明的古旧方木在房屋后部还有一根。这两根梁是马基雅维利家留下的唯一纪念。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很普通，在当时的佛罗伦萨随处可见，但这所房子至少被保存到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德军不断败退，如同在罗西里尼[11]导演的电影《战火》中所描写的那样，战线从南向北横扫意大利半岛。双方在佛罗伦萨隔着亚诺河交火。德军炸毁了韦奇奥桥之外的所有桥梁，双方都不惜破坏亚诺河两岸他们认为历史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那些建筑。皮蒂宫和离马基雅维利家只有五六十步之遥的圭恰迪尼家的宅邸幸免于战火的破坏。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马基雅维利出生、成长、去世的房屋了。伽利略的家和米开朗基罗的家都被留存了下来。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后半生的知心朋友，作为历史学家，也是马基雅维利的竞争对手。他的家由于建筑出色而得以幸免。人们并不知道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住宅在哪里，不把他的家列入史迹也许会使他更有荣誉。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座颇具战略价值的房子里。他的父亲贝尔纳多[12]是一位不出名的法律顾问。母亲巴尔托洛弥娅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后来才改嫁给了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她属于佛罗伦萨古老的内利家族，懂一些宗教诗和一些其他诗歌。马基雅维利出生时父亲38岁，母亲29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他5岁，一个大他2岁，5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弟弟。

追溯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似乎起源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这家人很早以前就移居到佛罗伦萨，彻底过上了城市生活。虽然他的家庭在乡下一直拥有带农庄的房产，但已在城市里扎根了。威尼斯人必须渡过大海才能接触到田园，他们会在巴掌大的庭院里种满绿色植物。相比之下，佛罗伦萨人只要跨出城墙就能饱赏丘陵连绵起伏的大自然美景，他们可以奢侈地在城里自家的庭院里铺上石板。在共和政体时代，佛罗伦萨是城邦的中心。16世纪后半叶共和政体崩溃，佛罗伦萨又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时起，佛罗伦萨开始有计划地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在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皮蒂宫后面的波波利花园还是一片绿地，尚未形成后来被凡尔赛宫苑模仿的那座优雅的花园。当时那

里一定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刚刚建成的皮蒂宫以它的新潮和豪华冠盖周边建筑。这座宫殿由与斯特罗齐[13]和美第奇比肩的大商人卢卡·皮蒂[14]委托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3年建成。顺便说一下，米开罗佐[15]设计的美第奇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9年，斯特罗齐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28岁那年。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6]设计的鲁切拉宫，这4座宫殿被认为是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四大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军和德军都没有对它们动一根手指头。

从皮蒂宫门前的广场到韦奇奥桥是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与圭恰迪尼宅邸隔街相望。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这侧房屋密集。当时房屋的法定宽度为5.25米，这里的房屋都有四五层高，颇有13世纪佛罗伦萨塔楼林立的遗风。建筑内部通常有因采光需要而设计的内院，进深很大。一层用于开店铺或工作室，右侧开有宽1米左右的门通往楼上，打开大门就能看到楼梯。当然，有权势的人家和富户不会把一层用于店铺或工作室。日本的所谓“木屐公寓”[17]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社会中下层居住的地方。

这条街上现在的三件事是马基雅维利绝对没有看到的。

第一件事是游客瞄准商铺蜂拥而至。现在的圭恰迪尼大街已是清一色的旅游氛围。这条大街连接着佛罗伦萨最大的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与皮蒂宫，中间还要经过连战火都退避三舍的韦奇奥桥。我倒想，既然地处这样的观光游览线路，马基雅维利家也该有一块刻着“马基雅维利出生遗址”的碑石什么的，然而并没有，遗址只剩下了两根房梁。不立碑石是因为自惭形秽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的历史遗迹太多了？

游客从乌菲兹美术馆出发，沿着亚诺河来到韦奇奥桥，穿过桥上密集的店铺，过桥后走过圣菲利西塔教堂正门，再从背后绕过坐落在圭恰

迪尼大街的房屋，便可到达皮蒂宫走廊。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恢复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后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当时，韦奇奥宫是大公的官邸，大公又从皮蒂家族购得皮蒂宫，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基础上大加扩建，用作私邸。为了能避人耳目地往返于两宫之间，大公找人建造了这条两侧带有铁格栅小窗户的走廊（瓦萨里走廊）。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喜好与民众接触、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的美第奇时代，走廊建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这是他没有见到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韦奇奥桥的变化。这座桥虽然不在圭恰迪尼大街上，却是这条大街的起点，离马基雅维利的家只有一分钟的距离，马基雅维利肯定每天都会过桥数趟。这座桥也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崩溃起着变化。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韦奇奥桥是佛罗伦萨最早建造的桥梁。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座桥一直是石头桥墩、木头桥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77年。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桥梁往往比较宽，桥面为两车道并且两侧有步道。韦奇奥桥在1177年被改建成石桥，只是人们脚下的桥面没有像罗马时代那样铺上石头，而是按照中世纪后期的铺装方式铺上了红砖。

1333年暴发洪水，整座桥梁都被洪水冲毁。桥梁重建是1345年以后的事了。重建后的桥梁有3个拱形桥墩支撑桥体，坚固而宽阔，桥面恢复了罗马式的石头铺装。当时，桥面两侧已经建满商铺，只留出中间部分供人眺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在桥上的商铺在建桥后200年间一直由肉贩使用。

当时的人们不太喜欢吃牛肉，肉铺中多为羊、鸡、鸽、野鸡和珍珠鸡，应该还有兔子。猪肉多被加工成生火腿和蒜肠，生鲜肉一般都在专门卖猪肉的店铺出售。

当时的韦奇奥桥上一定是人声鼎沸。桥面两侧有这么多的肉铺，不热闹才怪呢。挂在店里的肉并不是切得很碎，牛肉、猪肉也只是大致分解一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块肉来自哪个部位，然后再根据客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切割。羊肉也是剥了皮就挂出来。鸡是活的，还在喔喔喔地叫着。野鸡、鸽子、珍珠鸡杀好后便挂起来，连毛也不拔。店铺前的路要用水冲洗脏物，想穿着细软的皮鞋避开脏水走过去，不习惯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肉铺里的人在切割时会把不要的骨头之类随意扔进背后的河里。韦奇奥桥上游出了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个刑场，刽子手也会把被分尸的人的四肢扔进亚诺河里。

已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美第奇认为，韦奇奥桥这样下去名声不好。连接官邸和私邸的走廊从韦奇奥桥上通过，走廊下方便是一派肉铺景象。这对要把女儿嫁给法国国王的大公来说太不合适。于是肉铺被强行搬迁，经营贵金属品的店铺迁了过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暂且不论肉铺和首饰店的区别。威尼斯的里阿尔托桥的情况也与韦奇奥桥一样。在桥上建店铺的造桥方式让人联想到城邦时代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意味深长。

人们过桥的时候会被两边的商铺所吸引，忘记自己正走在桥上，忘记自己是在水上，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对岸。人们已经不再留意河流把城市一分为二。我想，只要是走过韦奇奥桥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有人想从桥上观赏景色，桥中间就有专门的地方。对过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无兴趣赏风景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过桥。在这个意义上，韦奇奥桥比里阿尔托桥更为理想。

人们不禁要想，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不一样，背后不是没有土地，为什么非要把城市向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河对面扩张呢？

实际上，罗马人当初是沿着亚诺河，集中在河的北侧建佛罗伦萨城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越发向北扩展，这是建城的第二个阶段。到

了中世纪中期，在建城的第三个阶段，人们才把亚诺河包进来向南扩张。我觉得，正是因为把亚诺河包在了城中，佛罗伦萨才成为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河流在市内流淌，会给居民带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安谧感。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因这条河河水湍急而弃之不用，他们在上下游两处截流，使流经城市的水流成为平静的缓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猜是在14世纪前半叶就已完成了这项工程，从那时起，韦奇奥桥的样子就一直没有变化。

人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洪水的恐惧，也可能是应对河流枯水期的对策。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硬对策带来了软效果的绝好实例。水流舒缓的亚诺河不仅没有把佛罗伦萨分成两半，反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把它整合成了一座宜居城市。

你可以试着站在韦奇奥桥下游不远处的天主圣三桥上眺望一下。映在水面上的韦奇奥桥和两岸的房屋，就像映在湖面的倒影一样一动不动，景致平静，令人想象不到那是实景在河面上的映像。

流过威尼斯的运河水流舒缓，让人辨不清水是否在流动。运河把威尼斯城围在水中，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安宁。假如这些把城市分割成网格一样的运河都是湍流，也许可以保持河水清澈，但无法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

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有水就好。但水对人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就看城市如何处理。佛罗伦萨人不必像威尼斯人那样需要积极利用水资源，但他们和威尼斯人一样，在处理水的问题上没有犯错。

马基雅维利从上天主圣三桥附近的小学时开始，直到在韦奇奥宫任职的整个期间，每天都要数次过亚诺河。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

一个词写到“过河”的意思。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不止韦奇奥桥一座桥上建有建筑，这座桥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叫“恩宠桥”。桥上建有十数座小礼拜堂和住有修士的小教堂，桥的名称由此得来。

在桥上建店铺和礼拜堂的想法并非只是出于要充分利用有限土地的考虑。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必要专门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城墙附近的土地都闲置着。

佛罗伦萨的做法是要把亚诺河完全纳入城市之中。

“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

马基雅维利后来如是写道。以前我动辄产生同情，而近来不再那样了。我觉得，贫穷经常是以主观标准而不是以客观标准来衡量的。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他一年的收入是110弗罗林金币外加14个铜币。当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在同时代的威尼斯，国营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和商船船长的年收入才100达克特[18]金币。尽管弗罗林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金币，而达克特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币，但两者的含金量几乎一样，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的价值也一样。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工程师可住公家住宅，船长还可以做贸易，实际收入肯定比这要高。而熟练工匠的年收入是50达克特，刨去房租，人口少的家庭一年有15到25达克特就能过得下去。

多纳泰罗听到他耗时一个月创作的铜像只值15弗罗林后大发雷霆，他那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了。为梵蒂冈创作留存至今的至宝彼得大理石雕像时，当年24岁的米开朗基罗还没出名，他的要价是150达克特。委托人枢机主教抱怨他要价太高，米开朗基罗平静地回答：“占便宜的，是你。”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没有因为被人抱怨要价太高而砸掉大理石雕像，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件杰作。

那个时代，艺术作品收取这点费用也会被人抱怨太贵。16世纪的威尼斯画家提香[19]被誉为是欧洲的顶尖画家，他不断接到各国帝王为自己创作肖像画的委托，他的一幅画就值200达克特。

年收入110弗罗林的人不是贫穷阶层。他们虽然绝对算不上富裕阶层，但在佛罗伦萨过得也不是被称为“popolo minuto”的庶民的生活，算作中间阶层大概比较恰当。应该说，马基雅维利用错了“贫穷”这个词的意思。

实际上，在父亲贝尔纳多留下的记录中，没有一处叹息过贫穷。他因病收入减少的事实作为史实留存了下来，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哀叹贫穷的话。尽管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个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但我想，他的收入加上农庄的收入，完全可供自己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

他的儿子马基雅维利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往上爬的意识，但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机会认识王公贵族。如果他想找与他同样知识水平的人交往，即使在佛罗伦萨城里，也得找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父亲贝尔纳多还是一位即使在职业上得不到满足也能在生活上得到满足的人。书是他的兴趣所在，更可以说是他生存意义之所在。

这位爱书家写的《藏书目录》甚至使人动容。

不用提古腾堡[20]的名字人们也知道，近代印刷技术是在德国发明的。而威尼斯在把别人的发明迅速投入企业化生产方面出类拔萃，威尼斯于1490年前后成为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从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发行了1821种书籍，其中447种出版于威尼斯，位居第二的

巴黎出版了181种，而佛罗伦萨只有40余种。

不过，马基雅维利父亲购书的时间比这早了25年。那段时期，也就是在1471年到1476年的5年间，威尼斯出版的书籍最多，而佛罗伦萨只出版了5种。

那时，即使印刷本比手抄本便宜，书的价格也不可能与纸张费用和印刷数量无关。在稿酬方面，古典作品不必向作者支付稿酬，但对当时作家的作品，可以用赠送成书的方式支付稿酬，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出书成本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却不可忽视。

出书成本无法知晓，但数量可以追踪。1490年以后，威尼斯平均出书的数量是每部400册到500册。在那以前，初版数量一般是100册。《圣经》虽是例外，但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000册。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压低书价。当时出版业的发达证明了企业可以盈利，可以完全自立。不过，在现在看来，当时由于书籍的需求很少，价格十分昂贵。

法律方面的书籍最为昂贵，一本就要四五个弗罗林。其次是古典书籍，不论哲学还是历史，每本都要三四个弗罗林。像但丁、彼特拉克的这类“近代文学”书籍平均价格是两个弗罗林。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a）的价格为中产阶级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假定某人的年收入为500万日元，买一本需要花费他15万日元。

在这样的时代，这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的藏书超过20种，其中不乏每种数卷的书，按册数计算，应该超过40册，仅举日本人熟悉的就有：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部著作有附解说的和不附解说的两种）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西塞罗的《辩论集》（*De oratore*）

老普林尼[21]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

估计他还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大概每个家庭都有这两本书，他并未把它们列入目录。文学方面有但丁的著作，也许是为了给家中的女子阅读，他还有插图本的《历史》。此外，他还有很多古典和近代的法律书。

我不知道他收藏这些书籍花了多少年，但一本要花费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估计他买书也得郑重其事。书经过反复阅读，封皮磨坏了就再送去装订，翻新后继续阅读。

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因此就成了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拥有更多的书籍。撇开西欧最大财阀美第奇家族不说，这些人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住宅甚至能让500年后的战火退避三舍。不过，我们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见不到描绘书籍充塞书架的情形。

此外，一个人的藏书并不能供他阅读一辈子，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阅。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父亲的记载中就有一本写着“书已出借”。当时，佛罗伦萨也有公开的“图书馆”，但是书并没有收藏在专用的房子里。美第奇家族中爱书的科西莫想让读书人能够读到他们家不计成本收藏的书籍。他本打算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建一座图书馆，但尚未实现他就去世了。他的孙子洛伦佐也热心购书，藏书不断增加，于是洛伦佐认真思考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洛伦佐死后，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基础上建成了以美第奇家族藏书为主的图书馆，至今仍被称作洛伦佐图书

馆。

马基雅维利父亲简朴的藏书一本也没能留到500年后的今天。但他的这份简单的藏书目录质朴地表达了他的自豪，使500年后的我们受到启迪，让我们思考良多。让我们再看看他的藏书内容。

他的藏书几乎全是古典作品，没有一本是宗教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作为一介市井中人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是创造了文艺复兴文明的佛罗伦萨的市井中人。文艺复兴运动因复兴古代而开始。有人对复古的冷嘲热讽，安吉洛·波利齐亚诺[22]回应他们的话语流传了下来：

> 你说我学习了很多西塞罗，却一点不像他。但是，我首先不是西塞罗，我通过了解他才了解了我自己。

抽出一本父亲的藏书翻阅是孩子读书的第一步。马基雅维利后来可以自如地引用古典，但未必会与原文一致。为引用而专门学习的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长期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受到触动而自然喷涌时，人们才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古典对他来说，大概就像自然环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嗜爱书的父亲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宗教书，这对马基雅维利日后思想的形成不会没有一点影响。此外，信仰笃深的母亲也会偶尔作些诗，莫非马基雅维利遗传了她的多愁善感？

有种家庭物质上虽很贫穷，精神上却很富有。马基雅维利可能就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中。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处会使人想到他所生长的家庭有什么不幸。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自己是个Dottore（博士），被尊称

为“Messer”或简称“Ser”（先生）。这个尊称使人想到“Mister”（先生）的词源。尽管不知名，但他毕竟在律师行业执业。但是，他没有让长子马基雅维利去接受大学教育。

在父亲的《备忘录》里记载着，马基雅维利7岁那年开始学习语法和读写，10岁时学习算术和簿记，12岁时开始学习拉丁语。这在当时是中等以上阶层的子弟极为普通的教育。如果孩子小时候素描画得好，就会被直接送进工作室当学徒，而不会进学校。孩子想当艺术家，在当时从事“正业”的父亲看来根本不会失望，反倒是一种让父亲充满希望的选择。不像现在，一听到儿子说要当画家，一般的父亲就会张皇失措。当时，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艺术品的需求都很旺盛，只要有才华，与王公贵族平等交往就不再是梦想。艺术是红火的“朝阳产业”，经济收益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如果马基雅维利有这方面的天赋，毫无疑问，恐怕他早就被送进离家几分钟距离、自己挑选的工作室了。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天赋。

马基雅维利只接受过普通的初等教育，在父亲的《备忘录》中没有更高的学历记载。

《备忘录》一直记述到1487年。父亲贝尔纳多活到1500年，不知道最后13年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再记录，还是遗失了记录。有记录的最后一年马基雅维利已年满18岁。在当时，如果要想送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话，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年龄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让人联想到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

当时，从佛罗伦萨只要越过亚平宁山脉就能到达博洛尼亚。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富有传统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声名远播。另外还有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建虽晚于博洛尼亚大学，但教学内容新颖，这方面的名声已超过了博洛尼亚大学。威尼斯共和国把帕多瓦大学作为本国的最高学府，在充实教学内容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这所大学的医学院很有名气。这两所著名大学不仅对本国的青年开放，外

国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中世纪的大学给教授和学生充分的“自由”，这点与现在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此外，如果想选靠近佛罗伦萨的大学还有比萨大学。

这也是一所古老的大学。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想把比萨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深谋远虑，没有在佛罗伦萨设立最高学府，而是致力于充实比萨大学的教学内容，结果使这所大学在1472年进入了一流大学的行列。那年马基雅维利3岁，如果他有心想上大学，应该能够上这所距离很近、可以在周末回家的大学。

马基雅维利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的确，当时进大学是要花钱的。以比萨大学为例，由于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这所大学有着一流的教授阵容，其学生多出身门第一流，但头脑并非一流。美第奇家族的子弟自不待言，就连切萨雷·波吉亚[23]也曾一度在此上学，尽管他并未毕业。

不过，对出身贫寒但从心底里想研究学问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进入神职界，就会有很多途径进入大学学习。在当时，对投身于神职的人来说，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一辈子不能正式结婚。而且，神职人员与艺术家一样，拼的是实力，能否升到教皇与你的出身毫无关系。要想当枢机主教这样高级的神职人员，很多时候，出身好门第会很有利，但想在枢机主教中占据实力地位，归根结底要凭实力。在宗教信仰的深浅与选择神职几乎没有关系的时代，神职是一个相当愉快的职业，它不但可以让人不花钱就能满足追求学问的欲望，还有可能让人出人头地。佛罗伦萨人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对文艺复兴精神非常敏感，他在选择时应该不至于烦恼困惑，但他没有让儿子选择这条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马基雅维利自己不希望进大学吗？不

过，当时的家长有很大的权威和权力，人们年轻时一般都会顺从父亲的意愿。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推测，那就是青年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人才，至少他不具备符合当时人才标准的那种才能，不值得送进大学。与现在不同，当初的大学只有极少精英才能进入。

总之，马基雅维利不是“大学出身”。如果进军实业界或艺术界，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不能挂法律顾问的牌子。如果他想当官，他有着当时不可忽视的障碍。现在的研究家已有定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懂希腊文，而是否懂希腊文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标签。多年后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巴尔基评论道：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不过，年长马基雅维利17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在马基雅维利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佛罗伦萨。他自己写道：

“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

达·芬奇从小就进了工作室，甚至没有初中学历。他写这句话并不感到羞耻，这行字的背后升腾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自信。

马基雅维利有所不便却当上了“公务员”。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公职的人都必须是某个行会的会员，马基雅维利也是行会的一员。如果是“大学出身”，他也许会进入律师公证人行会。但他不是“大学出身”，便加入了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在20世纪的今天，塞里斯托里伯爵仍在制售葡萄酒，他并没有辱没祖先。

学校，不只是老师教授学生这一种模式，对睁着眼睛出生的人来说，处处皆学校。29岁尚未起步的马基雅维利，他在起步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呢？

[1] 朱塞佩·普雷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1882—1982），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作家，办过多种文化杂志。著有《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等。

[2]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1182年是佛罗伦萨行会见诸记载的最早年份。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arte maggiori，俗称“肥人”）和14个中小行会（arte minute，俗称“瘦人”）。1375年梳毛工起义后又建立了3个工人行会。1382年大行会重新控制政权后被取消。

[3] 多纳泰罗（Donatello，约1386—146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最杰出的雕塑家，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作有《圣乔治》《大卫》《加塔梅拉塔骑马像》等。

[4]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被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5]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约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艺术家。主要作品有《天堂之门》等。

[6]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7] 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1435—14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铸造家和艺术教育家。代表作有《基督的洗礼》《耶稣与圣托马斯雕像》《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裸天使与海豚》等。他的工作室培养出了达·芬奇、基兰达约等众多艺术家。

[8] 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1432/33—149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写实主义画家和铸铜雕塑家。代表作有《阿波罗和达芙妮》《赫拉克勒斯与九头蛇》等。

[9] 基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在宗教画中表现出平民日常生活的场景。代表作有佛罗伦萨圣玛利亚大教堂中的玛利亚传记壁画等。

[10]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教廷驻外总督等职。著有《意大利史》《格言集》等。

[11] 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06—1977），现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代表作有《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维雷将军》《德意志零年》《战火》等。

[12]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全名为贝尔纳多·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Bernardo di Niccolo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母亲的全名为巴尔托洛弥娅·迪·斯泰法诺·内利（Bartolomea di Stefano Nelli）。

[13] 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佛罗伦萨银行家、政治家、作家。

[14] 卢卡·皮蒂（Luca Pitti,1398—1472），佛罗伦萨银行家，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朋友和主要支持者。皮蒂宫即由他和斯特罗齐所建。

[15] 米开罗佐（Michelozzo di Bartolomeo Michelozzi,1396—147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家和雕塑家，参与设计、建造了众多教堂等建筑，欧洲许多地方有他的建筑作品，在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享有盛誉。代表作有银雕《施洗者约翰》、美第奇宫等。

[16]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作家、诗人，设计了鲁切拉宫、圣玛利亚教堂正立面等。著有《论绘画》《论雕塑》《论建筑》等。

[17] 木屐公寓，底层设店铺或办公室、楼上为住宅的楼房。

[18] 达克特（du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19] 提香（Tiziano Vecellio，又译提齐亚诺，英语国家常称为Titian,1488/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他留有大量作品，主要题材为宗教和古罗马神话。代表作有《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爱神节》等。

[20] 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古登堡、古滕贝格，约1398—1468），德意志人。他于1445年发明了欧洲近代意义上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使用滚筒印刷机和铅镍锑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以及含油墨水，在纸和羊皮纸上印刷文字。

[21]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2/23—79），古罗马博物学家、政治家、军人，曾任罗马帝国海外行省的总督。著有《博物志》37卷。

[22]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古典语言学家，曾为美第奇家族做过家庭教师和秘书。

[23]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他邪恶、残忍，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勇敢、果断、坚强，才华横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他有专门论述。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20年。

在有些时代，两个人出生相差20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而在另一些时代，这20年会表现出决定性的差异。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出生于20年前的1449年，他后来被冠以具有“伟大”、“卓越”或“华丽”等意义的尊称“il Magnifico”[1]。

如果马基雅维利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出生在同一年、同一个时代，他也许就写不出《君主论》了。然而，马基雅维利比“豪华者”洛伦佐晚生了20年。洛伦佐43岁去世，而20年后马基雅维利43岁时，这位佛罗伦萨人写出了《君主论》。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是一个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借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他也是一个“死于最大幸福中”的人。

捍卫城邦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关系到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一心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生活的时代，人们都确信这一点。可是，马基雅维利晚生了20年。在他生活的时代，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与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没有关系，越是全心全意地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越是不能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

不写美第奇家族就无法描写15世纪的佛罗伦萨。“海洋之都”威尼斯

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单靠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力量（virutu）不能左右国家前进的道路。但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完全相反。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进行了比较，他写道：“这两个国家恰似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后来很快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2]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Le Istorie Fiorentine*），他在序文中用如下的话来说明这本书为何要从遥远的罗马帝政末期写起。

> 当初我想从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亲政的1434年起笔，但在构思过程中我感到，要表现出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必须从更久远的过去开始叙述。

从13世纪到14世纪，进而到15世纪的200年间，“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别的人去写，对这个时代的结论都会一样，用一句话说就是：“这是一部内讧不断的历史。”

但丁是现场证人，他把当时的佛罗伦萨比喻成一个不堪痛苦的病人，这病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地变换体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体变换频仍，人们甚至必须做成一览表，不然会头脑混乱。每次政体更迭都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被流放者。但丁自己就是被流放的，彼特拉克因父亲被流放而出生于流放地。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也出生于流放地，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曾被流放。更准确地说，佛罗伦萨的旧家族中没有一个家族没有人被流放。别的国家最多分裂成两派，但同时期的佛罗伦萨分裂成了四派。

不过，内讧对共同体也不仅仅只有负面作用。如果弱肉强食的理论能够得到健全发挥，内讧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会有作用。此外，如果共

同体内部充满活力，经得起内讧，内讧便也不足为惧。我们就可知的年度统计了佛罗伦萨的城市人口：

1280年 80000人

1300年 105000人

1338年 90000人

1340年 75000人

1348年鼠疫大流行

1382年 59747人

此后再度大幅增加到70000人左右

1552年 降到70000人以下

13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生活着大约是15世纪1.5倍的人口，拥挤不堪。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有权势的人竞相建起许多高塔，庶民阶层的房子毫无秩序地充斥着塔间的空地，根本不能称之为美丽之都。不过，如果没有这个城市银行家的融资，英、法等国的国王连一场战争也耗不起。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摆脱了静如处子的状态，好像脱兔一般迎来了建设的热潮。到15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鲜花之都”。

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的人口比100年前减少了近一半。意大利的形势变化也使佛罗伦萨进入了一个不允许一再发生内讧的时代。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五个国家吞并了近30个小国。有些小国即使未被吞并，也实质上处于某个大国的统治之下。意大利迎来了五大国并立的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如果想与其他国家为伍，就必须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政体。

可是，威尼斯共和国在100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凭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体制，而佛罗伦萨共和国却在内讧中度过了同样的100年。它强调统治效率，只能选择依赖个人力量的体制。不过，佛罗伦萨的体制在向实质上的君主制转换，这符合意大利当时的大势。威尼斯反倒是个例外。

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受益于许多生逢其时的人物。

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的人给予了相当简洁明快而又贴切中肯的评价：

乔凡尼 善良、优秀

科西莫 贤明、智慧

皮耶罗 富于人性

洛伦佐 伟大、奢华、谨慎、冷静

美第奇家族在13世纪前半叶还只是金融业行会的一员，到了乔凡尼（1360—1429）这一代，他参与了教廷的财务运营，家族经济实力急速上升。他恐怕也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家。没有明确记载表明他参与过佛罗伦萨市的政治。他从未被流放过，从这点来看，他在政治上不活跃，不那么引人注目。他捐建了育婴堂和圣洛伦佐大教堂，他也很关心艺术。

乔凡尼的儿子科西莫在父亲去世时已经40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的财产和良好的口碑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后来科西莫把这一切扩展到了欧洲，而不仅仅限于意大利。

不知道是时代使然，还是自己失策，科西莫在父亲去世4年之后被流放，事情起因于在卢卡战争[3]问题上同阿尔比奇家族[4]成员里纳尔

多的对立。

这场权力斗争导致了科西莫的被捕并被宣判死刑。但抓他的人没有立刻把他处死，而是选择囚禁他，并想彻底瓦解美第奇家族。

这大概是考虑到美第奇在市民中所享有的人气而谨慎行事的结果。敌人的谨慎救了科西莫。

首先，几个佛罗伦萨实力人物呼吁支持科西莫，威尼斯共和国和费拉拉[5]大公也来劝说减刑。科西莫也没有忘记借助自己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内外同时“工作”。这样做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科西莫被流放到帕多瓦，未来10年美第奇家族的人不得担任公职。

但丁曾经感叹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吃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6]。但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流放生涯真的与此不同。科西莫先流放到威尼斯领内的帕多瓦，但很快就到了威尼斯，受到了威尼斯政府国宾般的礼遇。作为各地都有支行的美第奇银行的总帅，科西莫不缺资金。他向威尼斯提供战争经费，还让自己心仪的建筑家米开罗佐前来陪伴。这就是科西莫的流放生涯。科西莫请米开罗佐建造了圣乔治图书馆，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外操纵佛罗伦萨的局势。结果流放仅仅一年，科西莫就被佛罗伦萨政府请回国。相反，反美第奇的急先锋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却被判永久流放，流亡国外。那年科西莫45岁。

科西莫从这一年，即1434年开始正式“亲政”。就在这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结束了因权势人物被流放而大放异彩的内讧时代。

从1434年开始到1464年去世，科西莫统治了佛罗伦萨30年。他的贤明名副其实，他非常理解佛罗伦萨人。

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甚至会伤害到自己。因此，佛罗伦萨人尽管在许多才能方面大大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但在团结和协

调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佛罗伦萨虽然称作共和国，但除了1378年梳毛工起义[7]后的4年之外，实质上是一种寡头政体。然而，市民们坚信自己也可以参与的民主政体才是辉煌的政体。

真正的民主政体绝不辉煌，但只有不被那些主义、主张迷住双眼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自由”（liberta）这个词，甚至为战争而设的委员会也要起名为“战争与自由委员会”。捍卫自由需要明智并做出踏实的努力，可他们又不喜欢这样做。

面对这样气质的国民，科西莫做出了寡头政体不适合佛罗伦萨的判断。正因为他了解巧妙运用寡头政治的威尼斯共和国，才会做出这种判断。科西莫搞起了僭主政体[8]。这种政体实质上是君主政体，但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君主最好还是躲在幕后，这样既可以维持共和政体，又可以统治国家。科西莫的聪明就在于此，而且，他把这种聪明发挥到了极致。

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正义旗手”（gongfaloniere di giustizia），其实就相当于任期一年的总统。科西莫只做过三届这样的“总统”，分别在1434年、1438年和1445年。这个数字没有超过同时期做过“总统”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卢卡·皮蒂做过三次，另外有三个人做过五次。内政方面一切均按此成例。

不过在外交上，科西莫几乎就像君主一样。除了威尼斯以外，米兰、那不勒斯、教皇国，以及法兰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君主制，他不需要小心翼翼。其他国家也都明显只认科西莫。

科西莫在外交方面的功绩是在意大利各国之间落实了势力均衡的政策。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开始采取进攻态势，意大利各国感到了团结的必要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意大利享受到了和平。科西莫在经济上的能力也出类拔萃，美第奇银行成为西欧屈指可数的财阀。

不过，使科西莫·德·美第奇留名后世的是他所培育的学问、艺术。没有人会像他这样资助，什么都让人收藏，什么都让人建造。他说：

“我懂得这座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用不了50年就会被赶走，但‘东西’会留下。”

科西莫留下的不仅仅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古抄本，他还在佛罗伦萨创立了名为“柏拉图学园”的古典研究中心。希腊学者们看到拜占庭帝国的衰退，知道只要投靠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就会受到欢迎，于是他们纷纷离开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佛罗伦萨来得华美，这里是古典研究的圣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佛罗伦萨与执出版界牛耳的威尼斯不同，它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上，美第奇的别墅就是会场，人们在这里不仅能够聆听到学识水平极高的演讲，还能饱尝科西莫提供的豪华餐食。科西莫向才华横溢的学者提供衣食起居方面的保障，使他们可以专心研究。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研讨会。科西莫本人并不是什么学问家，但正因为如此，他反倒能成为一位理想的学问艺术的理解者。学者和艺术家必须是专家，但专家往往起不到学问艺术培育者的作用。

1464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去世。他生前选择了做一位平民，他也同一位平民一样死去，葬礼按照他从简操办的遗嘱办得非常简朴。但佛罗伦萨市民很快决定，把“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尊称献给了他。

继承科西莫的是长子皮耶罗，他不仅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家长地位，还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家长地位。这在僭主政体中是理所当然之事。上承“祖国之父”，下接“豪华者”洛伦佐，皮耶罗却被称为“痛风者”（gottoso）。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评价。的确，皮耶罗46岁继承了科西莫，在其后的5年间，他大半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然而，他将所继承的东西丝毫无损地传给了儿子洛伦佐，单凭这点他就应该得到更好的评价。马基雅维利评价他富有人性。威严的科西莫去世后，又有一些人谋划恢复由显贵家族统治的寡头政体，皮耶罗平息了风潮而未流一滴

血。洛伦佐的起步没有遭遇流血是皮耶罗的一大功劳。

在对外关系方面，科西莫依靠个人力量赢得了外界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好评，而“痛风者”皮耶罗成功地将其转变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好评。“痛风者”皮耶罗巧妙地保证佛罗伦萨不会因科西莫的去世而改变路线，使得有此担心的国家放下心来。稳定的对外关系促进了国内关系的稳定，实力派人物找不到打倒美第奇的理由。

5年时间很短，也许皮耶罗会为自己没有献丑而感到幸运。想想后来的另一个美第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继承的东西破坏殆尽，可以说皮耶罗已经充分完成了赋予自己的任务。这位富二代不仅兵不血刃地成功击退了对手，而且在艺术振兴方面发挥了马基雅维利评价他的“富有人情”的特点。

雕塑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衷心喜爱的艺术家之一。多纳泰罗的名声当时已无人能及，但科西莫还是在遗言中列入一项，赠给他一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农庄，这座农庄有着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他不用担心生活而专心于创作。皮耶罗在所有方面都忠实执行了父亲的遗言，自然也兑现了这一条。多纳泰罗因而可以不与不理解他的人争论，也不用担心会在贫穷中死去。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馈赠，还正式签订了赠予合同。

可是不到一年，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要归还农庄。皮耶罗问他缘由，这位艺术家回答道：

“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皮耶罗大笑，接受了退回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

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就应该这样。美第奇家族有足够的资格被评价为文艺复兴文化有力的保护者和培育者。

皮耶罗·德·美第奇还不仅仅是一位具有良好感觉的人。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儿女婚事的考虑方面。

当了30年佛罗伦萨僭主的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实力雄厚的家族之一——托尔纳波尼家族中为继承人皮耶罗挑选了一位妻子。科西莫自己的妻子也是佛罗伦萨人，有着大银行家巴尔迪家族的血统。巴尔迪家族远比美第奇家族历史悠久，早在200年前那个时代，只要巴尔迪家不融资，法国国王、英吉利国王就连一场战争也打不起。美第奇和巴尔迪这两个家族之间一直按照佛罗伦萨显贵家族的传统联姻通婚。

皮耶罗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把女儿嫁给了佛罗伦萨的名门帕齐家族，又从国外为大公子洛伦佐挑选了一位妻子。这位妻子就是出身于罗马大贵族奥尔西尼家族的克拉丽切。同美第奇家族的人不一样，她不是城里人。奥尔西尼家族是封建领主，领地在罗马的北方。册封他们的是教皇，但后来他们的力量比教皇更为强大。这位奥尔西尼和罗马南方的领主科隆纳总是争斗，如何控制他们是历任教皇的头痛事。这两个家族对教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皮耶罗看来，奥尔西尼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及其军事力量，大概是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的好处所在。当时的意大利处在佣兵制度全盛的时期，奥尔西尼家族也和科隆纳家族一样，出了许多优秀的佣兵队长，并以此闻名。

洛伦佐和克拉丽切于1468年在罗马订婚，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举行了婚礼。结婚时新郎20岁，新娘比新郎小4岁。皮耶罗也许是在完成了这桩儿女婚事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年年底便撒手西去，留下了20岁的洛伦佐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一年。同一年，洛伦佐继承父亲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我曾通阅过同时代人关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记录和后世学者所做的研究，没能发现有谁对他的评价比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终章里所描写得更加简洁恰当且美丽优雅。我会在本书第四章里做一介绍。也许虚幻世界里的文人往往比现实世界里的学者更擅长逼近真实。

“他得到了命运和上帝最大限度的垂青。”马基雅维利写道。

很少有人能像洛伦佐·德·美第奇那样一生为幸运女神所眷顾。首先，他继承的遗产与众不同。

第一是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美第奇财阀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二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好感。

第三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外国领袖对美第奇家族基于敬意的信任。

第四是因祖父、父亲，尤其是祖父科西莫周到的关照，洛伦佐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前来参加祖父主持的报告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就能做到这一点，教育环境既简单又自然。所以，虽然他“非大学出身”，但照样完美掌握了希腊文。不过，尽管洛伦佐自己也给子女们同样的关照，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莫非教育这东西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受教育者的素质，而只能发展其已有潜质而已？

第五就是洛伦佐自幼接受了完整的帝王教育。祖父和父亲表面上是一介平民，但在对外关系中，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名声和经济实力，国宾来访时他们必须出面应酬。外国王侯访问佛罗伦萨时住在美第奇的宅

邸，美第奇宫也经常举行以他们为主宾的宴会。为了防止这种突出某个市民的情况发生，威尼斯共和国则一直坚持在元首官邸举行国宾级客人的欢迎宴会，客人的住宿地也轮流分配在显贵家族的宅邸。威尼斯是寡头政体。虽然同样号称共和国，佛罗伦萨却是僭主政体，即使考虑客人的意见，接待也都会安排在美第奇家。

洛伦佐也因此从小就习惯与有地位的人交流。10岁那年，米兰公爵的继承人来访，洛伦佐受命前往佛罗伦萨城外迎接。由于父亲卧病时间较长，他还曾以父亲的名义前往罗马教廷。他也常有机会代替父亲受邀出席佛罗伦萨议会“百人委员会”的会议。尽管洛伦佐在年龄上还不够参与公务的资格，自知病重的父亲皮耶罗却要让他在佛罗伦萨内外公务中露脸。皮耶罗这样做是要变这种不自然为自然。有很多佛罗伦萨人相信民主政体最好，只要有些许君主政体的气味，就会立刻引起他们的拒绝反应。

但是，洛伦佐的青春并非只有刻板的责任感。在乡下的别墅里，他跟同龄朋友和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一起无拘无束地四处玩耍。家庭教师写了一封交织着爱怜与叹息的信给他的母亲卢克蕾齐娅。

假如上帝跟这个洛伦佐搞了一点恶作剧，那就是让他成了一个丑男。祖父遗传的黝黑皮肤还算好，高挑的个头儿和壮实的身体也不赖，但方方的下巴没法不招人眼。大大的黑眼睛充满活力，但近视得厉害。眼睛下方的鼻子忠实遗传了母亲托尔纳波尼家族的特征，硕大而扁平、耷拉。他还嗓音嘶哑。当然，“女大十八变”这句话可能也适用于男人，到了二十来岁，他的这些相貌上的缺陷就显得不是那么糟糕了。

洛伦佐的气质原本就生龙活虎、快乐阳光。他富有教养，机灵幽默，精神健全，总是被包围在华丽的氛围之中。他拥有天字第一号的财力和权力，他还有着那种具备得天独厚才华的人所特有的自尊心，能够非常自然地迅速迷倒对方。

洛伦佐·德·美第奇

如果你认为洛伦佐不具魅力，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他很受女人喜爱。连马基雅维利都写道："在爱情方面他也非同凡响……"就算是个丑男，从整体来看他也是一个十分吸引女性的丑男。他的妻子奥尔西尼家的小姐生了三儿三女，算是完成了任务。但读一读她那通篇错误且内容无聊的书信，你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洛伦佐将其所爱集于一身的女人。相反，倒是洛伦佐的母亲卢克蕾齐娅·托尔纳波尼具有足够的教养和判断力，担当得起20岁便不得不成为一家之长的儿子的顾问。

洛伦佐·德·美第奇最大的幸运是在年纪轻轻的20岁便能独立。科西莫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也许是上帝为了让科西莫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赐给了他75岁的长寿；而上帝想让洛伦佐一生幸运，则只能赐给他早早起步的恩惠。

父亲去世两天后，佛罗伦萨的实力派人物纷纷来到还在服丧的美第奇家，拜托20岁的洛伦佐像父亲皮耶罗那样行事。洛伦佐接受了这样的请求。他自己这样写道：

> 我认为，在佛罗伦萨，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很难生存。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这件事发生前7个月。洛伦佐则在这件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结了婚。刚出生的婴儿当然看不见、弄不懂这些事。美第奇家族洛伦佐的结婚仪式是绽放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的一朵硕大花朵。马基雅维利一定听父母多次说起过这场婚礼。婚礼这种事会刺激女人的梦想和想象力，母亲和女性长辈们也一定会谈得更多。

光是外国小姐嫁过来就是佛罗伦萨的一件大事，迎娶排场也符合当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

庆贺仪式通常从长枪比武大赛开始，颇有为新郎最后的独身时光增添光彩的意味。1469年2月，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门前广场三面都搭起了看台，只留下教堂正面。庆贺仪式的这一天，所有看台都挤满了人。由穿戴一致的号手和鼓手开道，洛伦佐身披镶满珍珠的白色丝质披风，带着12名佛罗伦萨良家子弟组成的骑士随从，骑着白马进入赛场。一进场，洛伦佐就换上了天蓝色的天鹅绒战袍，战袍上用金线绣着佛罗伦萨城徽的图案。为了保护头部，他在头上戴了一顶用白色羽毛装饰的头盔。

洛伦佐的两匹坐骑是那不勒斯国王和费拉拉大公专为这个吉日赠送的阿拉伯骏马，甲胄也是米兰公爵赠送的。军旗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作品，正在那里学习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也一定参与了制作。这是一件艺术品，带到尘土飞扬的赛场上着实可惜。

比赛中，洛伦佐一度落下马来，但他立即上马再战，最终赢得了比赛。裁判打分大概多少会有些偏向。胜利者从当时佛罗伦萨社交界当红角色、传闻与洛伦佐有染的多纳蒂家族的卢克雷齐娅手中接过了鲜花编成的花冠。几天后，洛伦佐对当天的情形这样写道：

> 在圣十字广场举行了长枪比武大赛，奢侈豪华至极，花费了1万多弗罗林。虽然不能说我在比赛中始终都勇猛果敢，但总算荣膺了最高荣誉。

4个月后，结婚仪式连办3天，让佛罗伦萨沸腾了起来。宴会没有在门户关闭的室内举行，美第奇家的宅邸门户大开，流水席摆上了街道。厨房分在4处，做好菜肴后运到宴会场。宴会共用去了150头小牛和2000只鸡，喝掉的葡萄酒、吃掉的果盘和点心的品种不计其数。3天内举行了5场大型宴会。人们在街道上不断跳舞。无论谁都可以吃喝，都可以跳舞。当然，年长位高的人和他们的夫人都有所安排，不会同老百姓混在一起，但年轻人则不加区别，这是美第奇的希望。洛伦佐的单身生活

以这3天为界画上了句号。6个月后，他失去了父亲。

洛伦佐·德·美第奇20岁便担起了大任，但他并没有因为感到责任重大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洛伦佐了。洛伦佐是这样类型的人：他具有相反的两面，但能很好地协调，使这两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有“鲜花之都”之称的佛罗伦萨得此高手后鲜花盛开。随着弟弟朱利亚诺长大成人，洛伦佐把主角让给了他，但没有放弃表演。

这个年轻人有着明确的野心，那就是要把整个佛罗伦萨置于美第奇家族的完全统治之下，同时不用君主政体，而用僭主政体。他知道佛罗伦萨人嗜好美好与奢华，他把这些给了他们，而形式更为美妙。这是因为洛伦佐自己嗜好同样的东西。他的做法获得了最大的效果，佛罗伦萨人感到，洛伦佐的身体里流着和自己同样的血，认为他以最好的感觉和最大的限度给予了自己所希望的华美。佛罗伦萨人爱戴洛伦佐，并将他引以为荣。

佛罗伦萨展现出了辉煌。由于有了洛伦佐，佛罗伦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灿烂辉煌。

洛伦佐让韦罗基奥、波拉伊奥罗工作室扬名海外。菲利波·利比[9]、波提切利、基兰达约挥舞着画笔。洛伦佐听说15岁就翻译了《伊利亚特》（*Iliad*）的安吉洛·波利齐亚诺苦于贫困，就把他拉到自己家里，让他继续研究。洛伦佐和博洛尼亚、帕多瓦竞争，把有实力、有追求的年轻教授会集到比萨大学。这位23岁的“非大学出身”的人自己创办了大学。洛伦佐知道，振兴学问与艺术最终会带来实际利益。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他事先谋划好的策略，只要他忠实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行动，结果都会使自己和国家获利。他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那是洛伦佐22岁那年的事情。刚当上教皇的西克斯图斯四世[10]举

行即位仪式，洛伦佐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使团的成员前往罗马。使团团长是年龄与他有祖孙之差的多纳托·阿奇阿尤利[11]，年轻的洛伦佐在使团里只能忝列末座。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被称为“万能人”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领路人。洛伦佐邀请他一同前往罗马。在正式活动的间隙，洛伦佐一边听阿尔伯蒂讲解，一边游览罗马的古迹。他的这一举动让同来罗马的人纷纷赞叹：“不愧是美第奇！”同时，洛伦佐也没有忘记他的生意，他更换了美第奇银行负责教廷财政的人选，这个职务实质上拥有对教廷财政部的业务管理权。

佛罗伦萨共和国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尽管佛罗伦萨有过一次不得不自己面对的战斗，但直到1478年为止，都处在安泰平静之中。那次战斗源于佛罗伦萨境内的沃尔泰拉地方造反，洛伦佐坚持强硬路线，几乎是他一个人决定反击。佛罗伦萨人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他已经成功地镇压了反叛。这场战斗的结果使洛伦佐的个人“行情”看涨。

马基雅维利也在这安稳奢华的佛罗伦萨生活到9岁，似乎这一切理应如此。在他6岁那年，美第奇家族举行长枪比武大赛，朱利亚诺从头至尾都是主角。父亲有没有带马基雅维利去看那场大赛呢？从他们家去赛场不过10分钟的路程。

这年的长枪比武大赛奢华美丽，甚至被吟咏成诗，描绘成画。跟哥哥6年前的那次大赛不同，弟弟朱利亚诺在勇猛善战的参加者中武艺高强，他的获胜名归实至。为胜利者戴鲜花花冠的女神也不同于6年前的那次大赛，这一年的女神是因纤细美丽而获得好评的西蒙内塔·韦斯普奇。

这场美丽与年轻的飨宴，被波利齐亚诺讴歌成诗《比武篇》，被波提切利结晶成名画《春》。美第奇家族22岁的二公子举止优雅，娴于武艺，有着一副潇洒倜傥的公子哥的性格，在佛罗伦萨市民中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他比哥哥长得俊俏。

佛罗伦萨人把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兄弟视作自己的王子。洛伦佐是年轻人为追求快乐而建立的“树桩”俱乐部的头儿，朱利亚诺则主持着另一个名为“钻石”的类似俱乐部。兄弟俩年龄相差无几，因此往往会关系不和，但这两人不一样。洛伦佐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娱乐场合，都会让小他4岁的弟弟不离左右。

佛罗伦萨人可以在“百人委员会”上见到一同出席的美第奇两兄弟，如果第二天是节日，人们还能在舞蹈的老百姓中看见他们抱着鲁特琴[12]忽隐忽现的身影。不过朱利亚诺跟哥哥不同，他似乎不喜欢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包围中度过时光，这很像二少爷的做派。他与哥哥同样受到佛罗伦萨人的爱戴，尽管其中的意味略有不同。如果有人想策划打倒美第奇，只消灭一个洛伦佐是不行的。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

这次美如画卷一般的长枪比武大赛3年之后，真的爆出了反美第奇的阴谋。洛伦佐不得不第一次亲自应对危机，佛罗伦萨人也不得不久违地奋起抵抗。这是发生在马基雅维利眼前的大事件，一定会让当时只有9岁的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少年时代的体验未必都会给日后带来影响，但其中必定有一些会成为他成熟以后启迪思想的源泉。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帕齐阴谋”（la Congiura dei Pazzi）一定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

如果消灭一两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方针，那么，具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就不会发生阴谋，威尼斯就是一例。然而，不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僭主政体，只要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上，对阴谋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执着、热衷而冷静地分析阴谋，而且，每涉阴谋他必谈“帕齐阴谋”。

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既然是历史学家，阴谋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人间万象不全是摆在明面儿上的。人们深感偶然和运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事情的成败，所以不得不严肃对待。“帕齐阴谋”不是马基雅维利从父母那里听来的，这是他有生以来亲眼看到的第一个大事件。

---

[1] 洛伦佐·德·美第奇被尊称为“Lorenzo il Magnifico”，中文通常译为“豪华者”洛伦佐或“华丽者”洛伦佐。

[2] 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478—1534）,1523—1534年在位，本名为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

[3] 卢卡战争，1429年底，佛罗伦萨发动了夺取卢卡的战争。此举引起了佛罗伦萨与周边各国及威尼斯相互之间关系的动荡。为争夺卢卡，最终形成了以卢卡、米兰、热那亚、锡耶纳为一方，佛罗伦萨、威尼斯为另一方的战争态势。双方在互有胜负、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于1433年4月签订和约，各方退回到战前地盘。这种结果对佛罗伦萨而言意味着失败。

[4] 阿尔比奇家族，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起源于阿雷佐，是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自1382年梳毛工起义后直到1434年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一直掌握着佛罗伦萨的权力。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Rinaldo degli Albizzi,1370—1442）,1433年支持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成为正义旗手，抓捕并流放了科西莫·德·美第奇。一年后美第奇东山再起，他反遭流

放，后死于安科纳（Ancona）。

[5] 费拉拉公国（Ducato di Ferrara,1471—1598），位于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印刷、法律、艺术（特别是音乐）等方面发展迅速。此时的费拉拉大公是尼可罗三世·德斯特（Niccolo III d’Este）侯爵。

[6] 见《神曲·天堂篇》第17章：“你会知道吃着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知道上下别人的楼梯路途有多么艰难。”（张曙光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

[7] 梳毛工起义（Il Tumulto dei Ciompi）,14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等下层人民无权组织自己的行会，生活日益贫困。1378年7月20日，对教廷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下层人民及部分不满政府政策的市民举行起义，要求公平税制和组织行会的权利。他们包围市政厅，驱逐政府代表，选出米凯莱·兰多（Michele di Lando,1343?—1401）为正义旗手，夺取了政权。但仅数周下层人民对新政权即感失望，新政权与小行会的矛盾日趋激烈。8月31日，大小行会的势力联合起来，驱散了聚集在市政厅广场的梳毛工，起义遂告失败。

[8]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9] 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代表画家，长于用世俗的精神和现实的人物形象描绘宗教题材。代表作有《博士来朝》《天使拥戴的圣母子》等。其子为另一位著名画家菲利比诺·利比（Filippino Lippi）。

[10]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11] 多纳托·阿奇阿尤利（Donato Acciaiuoli,1429—147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学者，长于希腊文和数学，翻译过希腊先哲著作。他积极参与国政，1473年曾任正义旗手。

[12]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第三章
帕齐阴谋

在历史上，“帕齐阴谋”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早在佛罗伦萨人陶醉于年轻的朱利亚诺参加长枪比武大赛的雄姿之前，这个阴谋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佛罗伦萨的显贵家族之一帕齐家族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勾结，搞了这个阴谋。历史学家在下述各个方面寻找这一事件的起因：

一、洛伦佐·德·美第奇让人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从而否定了帕齐家族的一位成员主张的遗产继承权。

二、帕齐反对事实上的君主美第奇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专制。

三、帕齐夺走了美第奇多年的教廷财政管理权。

四、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以反美第奇闻名。有那么多地方不派，教皇西克斯图斯偏偏要把他派到图谋吞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比萨去任大主教。

五、教皇没有听从洛伦佐让弟弟朱利亚诺当枢机主教的请求。

所有这些大概都是真实情况。教皇与洛伦佐的关系开始发展得很好，后来渐渐恶化，最后发生了正面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二人内心对统治意大利的想法完全不同。

洛伦佐的想法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是军事大国，只有守住意大利半岛的独立与自由，才能守住佛罗伦萨的独立与自由。迄今为止意大利也不是军事大国，要守住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意大利境内各国就不能

互相争斗。因而，问题在于消除意大利各国争斗的源头。

20岁就拥有一国领袖地位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上任伊始就有着来源于自己独特政治感觉的想法。

各国间争斗的原因是什么？大国之间当然有由于直接原因而引起的冲突。但大国往往因为想把统治扩张到它们之间的小国而引发战争，而这种战争极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威胁意大利独立与自由的借口。现实中，后者远比前者多得多。

在15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都是可以用“列强”这个词来形容的所谓大国。这些大国只要使其他大国难以向与自己接壤的小国扩张势力便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根据洛伦佐的想法，小国群体的健康存续正是大国间维持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大国而言，态度处于模糊状态的小国最富魅力。

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小国保护政策”并非源于小国国民也有权享受自由与独立之类的意识形态。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不给大国以诱饵，从而事先排除扰乱大国间和平的因素。虽然同样也叫作“势力均衡政策”，这项政策在这一点上与祖父科西莫考虑并实行的并不相同。

科西莫采取的做法是，如果米兰开始强大就去联合与之对抗的威尼斯，如果威尼斯变得过于强大就转而与米兰结盟以牵制威尼斯。但孙子洛伦佐的做法略有不同。领导佛罗伦萨的这位20岁的年轻人认为，必须消除争斗的根本原因。

但这项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现状。洛伦佐生来就拥有了一切。人们不能指望他会有一无所有者的革命性，不能要求他去做不符合他本性的事。洛伦佐·德·美第奇以热衷于写诗和在节日跳舞一般的热情推进着这项符合他本性的政策。每当小国需要时，财政援助就会从美第奇银

行秘密流出。

相反，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生来便一无所有。不论是好是坏，他是教廷的主人，因而他不能不具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性格。教廷位于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但当意大利与教廷发生利害冲突时，教廷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意大利。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这样的例子，西克斯图斯四世是一个好强的人，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教皇国强大起来，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自己位于世俗世界的所有君主之上。

教皇发迹于贫困之中，他有很多穷亲戚，必须尽快保证他们的收入。他让其中几个人当上了枢机主教，还得为其他人找土地。在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看来，让教皇国强大和对亲人的爱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同一件事。可是他很快发现，每次当他要将这些事付诸实施时，洛伦佐的影子就会挡在面前。

教皇要进攻翁布里亚地区的小国卡斯泰洛城，因领主维泰利一族的顽强抵抗而未果。维泰利的顽强抵抗，靠的就是洛伦佐的援助。

另外，位于罗马涅的小国法恩扎也是一样的情况。西克斯图斯四世放弃了以武力夺取法恩扎的想法。他知道法恩扎的领主曼弗雷德债台高筑，便告诉曼弗雷德说，如果不还清债务将失去统治资格，教廷就要收回曼弗雷德的领土。法恩扎与卡斯泰洛城一样，形式上是教廷的领地，原则上领主是受教皇的委托实施统治的。

没有人认为曼弗雷德还得起钱，可是他在40天的还款期限内还掉了高达3万银币的巨额借款。因为洛伦佐借钱给他，教皇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挫折。

于是，教皇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和帕齐联手也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里亚里奥是教皇的侄子，娶了米兰公爵的庶出女儿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为妻，他一直觊觎着法恩扎的领土。而帕齐原本就有太多反美第奇

的思想，但不知道如何出手。帕齐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家长雅各布的侄子弗朗切斯科，他忍受不了美第奇的专横而离开佛罗伦萨定居罗马。

马基雅维利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文章。这是一篇美文，所有作家读起来都不由得称羡。马基雅维利在文中这样评论弗朗切斯科：

> 弗朗切斯科在帕齐家族的男人中性格最敏感，最有血性。他因此让家族中的其他男人得其所缺，同时也让他们失其所有。

家长雅各布·德·帕齐以谨慎闻名，也是洛伦佐餐桌上的常客。但在罗马，阴谋在西克斯图斯四世、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之间不断发酵。因为这事不能离开武艺高手，受雇于教皇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不久便加入进来。比萨的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也是每次密谋必定到场的人物。

暗杀策划得十分周到。

他们要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杀死美第奇两兄弟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为此，他们要在便于实施暗杀的状态下制造两人同时出现的机会。他们不能坐等偶然的机会，而是要有计划地创造两人必须同时出现的机会。

他们决定用枢机主教拉法埃迪·里亚里奥作为诱饵。这位主教才17岁，是教皇侄子的侄子，有比萨大学的学籍。他以这样的身份，利用复活节前后的休假，去访问一下离比萨很近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他所在的比萨的大主教陪同访问也是当然的惯例，因为在天主教会中，地方大主教的地位在枢机主教之下。在两位高级神职人员进行这次旅行时，教廷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及其下属士兵作为警卫随行也并不显突兀。当时，枢机主教旅行时是要有50人左右的武装士兵跟随

的。此外，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也回到了久未回来的佛罗伦萨，理由是向伯父雅各布报告罗马帕齐银行的业务情况。

就这样，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佣兵队长蒙泰塞科、弗朗切斯科三人安全进入了佛罗伦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下榻在帕齐的宅邸。帕齐家族一手包揽教廷财务以来与教皇走得很近。由他们来接待教皇亲戚访问自己的大本营佛罗伦萨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眼下不能说教皇与美第奇的关系良好，但既然现任教皇的亲戚来了，美第奇也没有道理不宴请一下。如果不这样做反倒会成为话柄。这种宴请，不但要请全体随行人员，惯例上还要请负责接待这一行人的帕齐家的人。既然主宾是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出于礼貌，宴请方应该由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人一同出面。

阴谋者决定在这次宴席上果断施行暗杀行动。他们也正是为此才来到佛罗伦萨的。

一切进展如他们所愿。洛伦佐也在美第奇的一座别墅里宴请了枢机主教一行。但直到宴会结束，刺客们都没能亮剑。朱利亚诺没有出席宴会。洛伦佐称弟弟身体不适，替弟弟道了歉。刺客们相信，不同时除去这兄弟俩就不能达到目的，暗杀行动只能推迟。

既然不能行动，刺客们便只好装作午宴的一般客人。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年轻稚嫩、天真无邪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声音。这位年轻人对年长的洛伦佐说，他想在复活节时去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参加弥撒。洛伦佐回答说愿意奉陪。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是否是同谋，这是史家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从他的年轻和事后的表现看，他可能并不知情。行刺的时间和地点就此确定，时间在复活节，地点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弥撒现场。刺客们确信，这次朱利亚诺一定会出席。

行刺顺序也确定了下来。刺客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在教堂里，在弥撒开始时杀死美第奇兄弟俩。这个组分成两股，一股负责刺杀洛伦佐，另一股负责刺杀朱利亚诺。

暗杀朱利亚诺的行动由弗朗切斯科·德·帕齐和同为佛罗伦萨人且口碑很好的班迪尼二人承担。但在这时，一开始就确定负责刺杀洛伦佐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却说不愿在教堂里杀人。不得已，改由大主教萨尔维亚蒂手下的两名主教代为行动。

第二组由萨尔维亚蒂率领，以宣告弥撒开始的钟声为号，占领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与此同时，雅各布·德·帕齐带领的第三组冲向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向市民宣告美第奇倒台，号召建立新政权。拒绝在教堂里杀人的蒙泰塞克接受了行刺开始后控制整个市区的任务。

1478年的复活节是4月26日。

正式弥撒将于当天下午3点举行。人们已经开始走进佛罗伦萨城里众多教堂的大门。在圣母百花大教堂，人们已经知道枢机主教将要莅临，弥撒开始前很久就早早地挤在了教堂大厅，人群中还有很多佛罗伦萨显赫家族的人物。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到场了，洛伦佐在教堂门前迎接，并陪同他来到设在正面祭坛前的特别坐席就座。洛伦佐被朋友和熟人簇拥着，在祭坛右边通往存放弥撒用品的圣具室边的坐席入座。刺客们也各就各位。

可是，这次朱利亚诺又没在。弥撒就要开始了，但设在祭坛左边他常坐的那个座位仍然空着。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觉得行动不能再延迟了，便自己走出教堂，决定亲自去美第奇宫迎接朱利亚诺。他曾与朱利亚诺是玩伴，了解这位美第奇家二公子出门一向磨蹭。从教堂到美第奇宅邸的距离走过去也不过两分钟。

果然朱利亚诺还在家里打扮。弗朗切斯科在隔壁房间等候，不断催促他抓紧时间。朱利亚诺终于打扮完毕走了出来，两个人相互搭着肩膀结伴向教堂走去。弗朗切斯科搭着朱利亚诺的肩膀，没有忘记用手顺着朱利亚诺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下滑动，试探着他有没有在衣服下面穿防护铠甲。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迟到的朱利亚诺刚刚就座的一瞬间，班迪尼的剑就奔他袭来。紧接着，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剑也刺向倒在地上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家的二公子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便死于非命。

刺杀洛伦佐的那一组进展得不怎么顺利。刺杀原来预定与弥撒同时开始，现在行动突然提前，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还没反应过来。剑锋只是擦过洛伦佐的喉咙。因为弥撒场上不能动武是礼节所定，洛伦佐的朋友们便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洛伦佐和朋友们逃进了圣具室，但坐在洛伦佐旁边的一位朋友遭到杀害。

巨大的教堂大厅顿时充满了人们的惊呼声和喊叫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向大门口蜂拥而来。祭坛附近，刺客们挥舞着手中的剑，人们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并寻机摁住刺客。人群忽而形成一个漩涡，旋即又散开。每当这时，地上都留下一动不动的尸体。正面座位上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一脸茫然，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很快被人拉走，从教堂后门跑了出去。

逃进圣具室的人关紧大门，但仍然不能放心。门扉有着青铜底衬，不必担心会被攻破。朋友们怕的是洛伦佐被毒剑所伤。一位朋友用嘴对着伤口不断地吮吸、吐掉，吐掉后再吮吸。

外面静下来了，里面的人终于打开了圣具室的大门。洛伦佐一直担心着弟弟，这时才看到他的情况。25岁的弟弟的躯体躺在空无一人的教堂冰冷的石头地上。洛伦佐伫立着，凝视着弟弟，没有流一滴眼泪。朋友们一边催促着他，一边扛起朱利亚诺的遗体，一群人急急奔向美第奇

宫。在美第奇宅邸，迎接他们兄弟的是母亲卢克蕾齐娅绝望的叫声。

萨尔维亚蒂大主教负责占领市政厅，这事也不顺利。

大主教是高级神职人员，却不打招呼就跑到市政厅来。正义旗手切萨雷·彼得鲁奇出来迎接他。彼得鲁奇在前些年的“普拉托之乱”[1]中曾让人见识过他的宏大胆略。他身材魁梧，孔武威严，是大主教有效发挥权威的最大障碍。尽管他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却从大主教的态度上迅速领悟到事态非同小可。

对刺客们更加不利的是，彼得鲁奇对技术感兴趣，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市政厅内自己办公室附近所有大门的锁都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大门会自动关闭，关闭后的大门如果不用特制的钥匙，不论在里面还是从外面都不能打开。大主教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根本不是彼得鲁奇的对手，他和手下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任凭他怎么叫唤，士兵们也无法执行命令。

雅各布·德·帕齐率领的第三组也成果寥寥。

“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

尽管他拼命叫喊、煽动，但民众无人附和。人们很快知道了教堂里发生了惨案，彼得鲁奇也敲响了市政厅钟楼里的警钟，人们不断会集到广场上来。人群中只听到“叛徒！”的呼喊声。雅各布率先落得了被民众投掷石块的下场。阴谋者感到有生命危险，哪里还敢煽动，全都溜之大吉。

阴谋者能逃的全都逃走了。蒙泰塞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最先逃离。关在市政厅里的人被抓获，反抗的人全部被杀。在教堂的拼斗中负了伤的弗朗切斯科·德·帕齐流着血跑回帕齐宫，脱下血衣就倒在了床上。他的伤口相当深，已经动弹不得。这时，民众冲了进来，他来不及

穿衣就被拖了出去，直接被拖到了市政厅。

弗朗切斯科的态度与其他被抓的人不同，他没有乞求饶命，也没有痛哭流涕，而是保持着毫不畏惧的态度。他冷冷地瞥了一眼咒骂并向他投掷石块的人们，就被从市政厅面向广场的窗户上勒着脖子吊了下来。接着，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也被从窗户上吊了下来。诗人波利齐亚诺证实，大主教不停地诅咒导致事态落到如此地步的始作俑者弗朗切斯科，借着吊绳的晃动，他一口咬住了吊在旁边的弗朗切斯科的脚。

激奋的民众已经失去理智，不再理会什么正式审判，对神职人员也毫不留情。市政厅的窗外吊满了人，附近的行政长官官邸（又称警察长官官邸）的窗外也吊了人。莱昂纳多·达·芬奇用素描的形式描绘了一具从窗户上吊下来的受刑尸体。

民众欢呼、咒骂、投掷石块、吐唾沫。人群中，26岁的莱昂纳多静静地走笔龙蛇。9岁的马基雅维利是在投石块呢，还是在一眨不眨地瞪大双眼看着这幅地狱般的图景呢？

美第奇宫前宽敞的街道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人们同声高喊着“Palle!Palle!”（圆球！圆球！）美第奇家族的族徽上有6个使人想到药丸的圆球，人们在这里喊“Palle!Palle!”就是在呼唤美第奇。

洛伦佐的身影出现在美第奇宫的窗边，缠绕在他头颈上的白色绷带闪现在黄昏的薄霭中。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角没有一丝笑容，面对民众的欢呼，他只是呆呆地伫立着。尽管如此，人们的心情得到了满足。洛伦佐几乎每隔15分钟就会被叫到窗边一次。在房间里，母亲卢克蕾齐娅就像儿子还活着一样抚摸着朱利亚诺的脸庞。她已经哭干了眼泪，悲叹声笼罩着整个房间。

整整三天，佛罗伦萨疯狂了。受绞刑的人暴尸后被放下来，砍去脑袋。群众把这些头颅挑在长矛尖上游街，满街响彻着“绞死叛徒”的呼喊

声。尸体游街后已被拖烂，统统扔进了亚诺河，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埋葬。

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躲在修道院里被人发现，当场被狂怒的民众打死。人们群情激奋，要不是警察进来制止，修道院的其他教士立即会以包庇罪受到严刑。

帕齐一家除了女人孩子，包括家长雅各布在内的所有人都被逮捕，而且几乎全部被处以死刑。就连娶了洛伦佐姐姐的古列尔莫·德·帕齐也未能免于被流放的命运，尽管他被认为完全无辜。直到6年之后，他才得与妻儿重逢。

显示帕齐家族的东西被从所有地方拆下。位于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厅中间的壮丽的帕齐宫也遭到破坏，连地基的石头也未被放过。

莱昂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阴谋者被吊死的素描
译者按：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这幅画描绘的是班迪尼受绞刑的情形。班迪尼在事件的翌年被处绞刑。这幅画并非达·芬奇在事件现场所作。

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也没有逃脱。根据他和雅各布·德·帕齐的交代，人们弄清了这次阴谋的幕后人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并且获得了细节的证据。尽管佛罗伦萨人有很强的世俗倾向，但在根本上一直信仰上帝。他们愕然了，上帝在俗世的代理人竟然操纵杀人。许多佛罗伦萨人前来，参加了4月30日举行

的朱利亚诺葬礼，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

就在朱利亚诺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了一个孩子。洛伦佐并未仔细了解就认下了这个孩子，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养育。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刺客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这个人就是首先向朱利亚诺挥剑的班迪尼。他逃到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一直对洛伦佐怀有好感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逮捕了班迪尼，把他遣送回佛罗伦萨。等待班迪尼的当然是死刑。

罗马教皇得知阴谋失败后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霸道，这时仍想采用高压政策，他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以下条件：

一、处死萨尔维亚蒂大主教等多名神职人员是对教廷内政的干涉。处罚神职人员是教皇的权力，不是一国政府所能干预的事情。

二、洛伦佐·德·美第奇应予流放。

三、必须把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安全送回罗马。

把信送到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让人逮捕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然而不到一天，他又不得不释放了大使，因为他无法无视各国驻罗马大使的抗议。虽然如此，他又让人把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抓了起来。

为了解救同胞，佛罗伦萨考虑利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年轻的枢机主教在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被庇护在安全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原因不能把他定为共犯。洛伦佐把他保护在愤怒的民众到不了的地方，这也是洛伦佐的心机。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趁着夜幕悄悄出了佛罗伦萨城门，在佛罗伦萨军队的护卫下回到了罗马。于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堡（又译圣天使城堡）中的400名佛罗伦萨商人恢复了自由。

可是教皇并未停止实行强硬政策。事件过后一个多月的6月1日，教皇发布了布告，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宣布开除洛伦佐的教籍，同时还宣告，如果不流放洛伦佐，将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Interdetto）的处分。停止教权将使初生的婴儿不能受洗，人们不能结婚，即将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最后的救赎。在受此处分之处，弥撒、婚礼……一切都不具宗教效力。这里的人不被承认是天主教徒，死了得下地狱。对信仰笃深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恐惧仅次于被开除教籍。

然而，这个威胁没有产生效果，仍然没有洛伦佐被流放的消息。教皇震怒了，6月20日，他果真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佛罗伦萨人依然没有动摇。面对这一切，教皇下了决心，要用战争夺取靠暗杀没有得到的东西。

洛伦佐弄清了事件的全部真相后，给各国君主和政府寄去了书信，说明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各国早已从自家大使和情报官那里得到了报告，但这毕竟是当事人的正式见解。书信中的叙述准确而客观，没有一处提到涉嫌阴谋的三个核心人物中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及其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这封书信写得相当巧妙，各国政治当局读后必定都能理解个中奥妙。

正如洛伦佐所期待的那样，各国都有了反应。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美第奇兄弟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判断，在这种时候，相对于不断施压的教皇，洛伦佐的做法对各国更有利。

首先是威尼斯共和国，接着是米兰公国、费拉拉公国和曼托瓦侯国，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都寄来了书信，对朱利亚诺的死表示哀悼，对洛伦佐幸免于难表示欣慰，同时确认了法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这相当于正式宣告，各国都不站在教皇一边，而是站在洛伦佐一边。

只有一个国家的态度不明朗，那就是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已经决心

向佛罗伦萨公然挑起战争，但他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要把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3]拖进来。参战条件只有一项，那就是佛罗伦萨被征服后作为那不勒斯国王的封地，将由吉罗拉莫·里亚里奥领有。

当年夏天，教皇与那不勒斯国王的联军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战争开始了。佛罗伦萨奋起迎战，虽然它一直是出了名的军事弱国。他们搬来了雇佣军，威尼斯和米兰也派来了军队，这些军队都由费拉拉大公指挥。想靠这个阵容去统一战略就好比做梦。敌方也一样，教皇军队的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4]与统率那不勒斯军队的总司令卡拉布里亚公爵[5]总是意见相左，他们同样无法用兵。

考虑到佛罗伦萨人的气质，他们团结一致的精神令人惊叹。教皇多次传话说敌人只是洛伦佐，自己同佛罗伦萨人并无怨仇。但佛罗伦萨人没有抛弃洛伦佐，即使被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他们也毫不动摇。他们负担军费，还忍受着通商中断带来的经济恶化，一直忍到了那年的冬天。这时，战斗实际上进入了休战状态。

第二年，即1479年，入春后战端重开，情形明显开始朝着不利于佛罗伦萨的方向发展。洛伦佐跑遍了前线，努力更有效地使用军费，但结果并不理想。那不勒斯兵开始出现在离佛罗伦萨市区10公里的马基雅维利家的山庄一带。曾经发誓与佛罗伦萨站在一起的各国也态度暧昧起来。祸不单行，那年夏天佛罗伦萨遭遇了鼠疫。街上店铺萧条，通商中断引起的经济恶化表现了出来，这一切都无法隐瞒。到了秋天，卡拉布里亚大公一时兴起，表示要休战三个月，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认真响应了。

洛伦佐决心赌这三个月的时间。民心已经疲惫，想要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已不现实。

赌博的对象不是教皇，而是那不勒斯国王。很难想象这个狡猾的家伙会完全相信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承诺。如果他不相信这个承诺，就

没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打下去。洛伦佐把赌注押在了这里。这次谈判也是一场赌博，洛伦佐没有派出使节，而是自己亲自出马前往交涉。众所周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把人杀死做成木乃伊，然后在木乃伊面前用餐，这样的故事没少流传。他还派人杀掉了前来那不勒斯投靠他的著名佣兵队长皮齐尼诺[6]，这事还记在人们的脑子里。投进这种人的怀抱是最不合适的事。

洛伦佐似乎事先也做了一些疏通的准备工作。他通过娶了那不勒斯国王妹妹的费拉拉大公做了一些工作，也求米兰公爵牵线，但主要还是起用了久居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银行家菲利波·斯特罗齐去做工作。斯特罗齐后来回国，建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堪与皮蒂宫和美第奇宫媲美的斯特罗齐宫。

不过，疏通不允许耗费太多时间。休战期间一天都不能浪费。30岁的洛伦佐仅凭那不勒斯国王悄悄捎来的“你来我就见”这句话便出发了，这是1479年12月的事。

洛伦佐只跟少数朋友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佛罗伦萨。1479年12月7日，他来到了离佛罗伦萨50公里的圣米尼亚托，在那里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一封信。他吩咐将信送出后，就又沿亚诺河西去，在里窝那坐进了等候在那里的那不勒斯的加莱船[7]。

教皇是敌人，教皇国的土地隔开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洛伦佐去那不勒斯就只能走海路。就在载着洛伦佐的船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同时，有人在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向聚集在那里的政府官员宣读了洛伦佐写的信。

洛伦佐在信中首先道歉，说自己非常失礼，没有通知便采取这种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行动，然后他阐述了决定把自己交到那不勒斯国王手中的原因。

我相信，我所采取的行动是恢复佛罗伦萨和平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认为那不勒斯国王还关心佛罗伦萨人的自由，我们就应该让他早点领悟到这一点。而且，如果仅以一个人而非众人的损失就能做到这点，这事便无须赘言。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人便是我，我为能够做那个人而感到满足。

第一，我才是敌人责难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反倒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来探出那不勒斯国王的真意。因为如果敌人只要求我个人做出牺牲的话，我此一去便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

第二，没有人比我在这个国家享受到更高的荣誉和更温暖的情意。因而我有义务比别人更多地为国家尽力。

我心怀这两个理由上路了。上帝也许希望由我亲手结束这场因弟弟和我的鲜血而起的战争。总之，不是生便是死，不论对我个人而言这是祸是福，我只求我的祖国永远幸福。

据说政府委员听着宣读肃然起敬，有人热泪盈眶。不过，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资了解洛伦佐此时在海上航行的心情，也没有一句诗句写下他此时的心境。

也许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感到害怕。但是洛伦佐知道自己的运气好，骰子既已掷出，他也就伸开四肢躺在船上，享受阳光的沐浴，直到抵达那不勒斯。

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赞美“豪华者”洛伦佐，说他是豪华者，同时也是谨慎、冷静的人，其本意也许是说他具有出人意料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说，法国也可以派援军迎击教皇和那不勒斯的联军。洛伦佐却这样回答道：

我还做不到不顾整个意大利的危险而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我

祈祷上帝不要让法国国王想到在意大利一试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一旦成为事实，意大利可真要灭亡了。

事实上，法兰西历代国王都在觊觎那不勒斯国王所领有的意大利南部，他们的野心在欧洲无人不晓。有件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费兰特一世的父亲阿方索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那时他曾经被米兰公爵菲利浦·玛利亚·维斯孔蒂俘虏过。当时，阿方索对维斯孔蒂充满威胁地说：

“如果不是我而是法兰西的安茹家族统治那不勒斯的话，法兰西人统治意大利就会成为‘明天早晨’的事。”

维斯孔蒂连赎金都没有要就释放了阿方索，甚至还与他结成了同盟。

在意大利，15世纪是一个理比情更管用的时代。

洛伦佐导演了一出华丽的戏剧，而且扮演了主角。载着洛伦佐的船靠近那不勒斯，几天后便可到港的时候，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了他大胆的冒险行动。

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慌忙致信那不勒斯国王，劝他等洛伦佐一到就把他投进监狱。

威尼斯共和国的“CIA”（中央情报局）——C.D.X.（十人委员会）[8]向已潜入那不勒斯的间谍发出指令，要求他们报告洛伦佐到达那不勒斯后的所有动向。

传说在米兰公爵的宫廷里，有人提议赌一赌洛伦佐的下场是毁灭还是胜利。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明确下注，赌局也就没有设成。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是关注这出戏发展情况的人物之一。

演出受到观众的如此关注，洛伦佐不可谓不开心，至少他一定会比在佛罗伦萨节日中的表演更感愉快。洛伦佐在已经送交佛罗伦萨政府的信中写得有点过头，但对他而言，这大概也是自我意志的自然流露吧。享受愉悦是洛伦佐的另一面。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成功。实际上，进港后等待洛伦佐的，不仅仅是南欧的气候——这里的气候温暖得使人忘记了现在还是冬天。

---

[1] 普拉托之乱，1470年发生于佛罗伦萨境内普拉托的一场短暂叛乱。贝尔纳多·纳尔迪（Bernardo Nardi）因卢卡战争遭到流放。他不堪忍受流亡之苦，挑动普拉托人反叛。叛乱因得不到民众支持而迅速失败。切萨雷·彼得鲁奇当时是佛罗伦萨派驻普拉托的行政长官，全家被反叛者抓住，凭着机智逃脱了被绞死的命运。

[2] 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1432—1481），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第七任苏丹（1451—1481年在位）。他毕生征战，开疆拓土，以“征服者”著称。

[3] 费兰特一世（Ferrante I,1431—1494），那不勒斯国王，1458—1494年在位。

[4] 乌尔比诺公爵（Conte di Urbino），即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1444—1482年在位，是一位优秀的佣兵队长，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他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也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5] 当时的卡拉布里亚公爵（Conte di Calabria）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长子阿方索。阿方索后于1494年继位，称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6] 雅各布·皮齐尼诺（Jacopo Piccinino,1423—1465），佩鲁贾人，著名佣兵队长尼可罗·皮齐尼诺之子。他本人是多处封建领地的领主和佣兵队长。1465年，他去那不勒斯接受阿布鲁佐总督职位并去担任费兰特一世军队的首领时，被费兰特一世杀害。

[7]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8]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即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等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了国家权力。“十人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消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我阅读约翰·勒卡雷[1]的间谍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视线停在了一个地方，记得是斯迈里与吉列姆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

“艺术家就是能够集相反的两种性格于一身的人。”

另一个人问这是谁说的。第一个人回答说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在小说里说的。我读这种小说都是一目十行，去翻手头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意大利文译本也没能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只是那句话还留在脑海里。我在写洛伦佐·德·美第奇时，脑海里又浮现出了这句话。

离1479年12月底越来越近，洛伦佐乘坐的加莱船驶进了那不勒斯港。这里的冬季蓝天晴朗，气候温暖，人们紧张的内心不由得舒缓下来。30岁的洛伦佐也会这样吗？洛伦佐眺望着右方远处薄烟缭绕的维苏威火山进入了港口。他看清了在码头上等着他的人。在这一瞬间，他便确信这次“冒险”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站在码头上等着船靠岸的不是表情冷酷的士兵和官员，而是久违的笑容可掬的二王子弗雷德里克。

年纪尚轻的二王子与洛伦佐是旧知，对年长的洛伦佐怀有类似景仰的尊敬之意。大王子阿方索只是一介粗鲁的武将，而二王子景仰洛伦佐，对学问和艺术兴趣浓厚，趣味优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命他负责接待来那不勒斯的洛伦佐。此外，那不勒斯宫廷里还有几位高官与洛伦佐是旧知且志趣相投。

老练狡猾的费兰特一世不会轻易地让洛伦佐满意，或许国王自己也

很困惑，决定不了洛伦佐的死活。国王与洛伦佐谈判的内容别人无从知晓，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别人只好去想象了。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月也过去了。洛伦佐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他并没有因为只能与国王谈判而焦虑不安。洛伦佐还用位于佛罗伦萨近郊的两座别墅作为抵押去筹款，用筹集到的巨款收买民意。

他买下了100名在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奴隶，给他们自由；他还为贫穷的姑娘们出嫁妆钱。他没有忘记捐助医院，还会在节日里赞助大量的葡萄酒。这是他为建立宽厚的君主形象而采取的策略，获得大量赠品而兴高采烈的不仅仅是女人。

此外，洛伦佐还有一位非常好的合作者，她就是嫁给那不勒斯大王子阿方索的米兰公爵的姑妈伊波丽塔。这位夫人比洛伦佐大几岁，有着极高的教养，可以很好地陪伴有着当时一流教养的洛伦佐。她那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湾的别墅很快便成了以洛伦佐为主角的沙龙。对那不勒斯宫廷里的人来说，在这里受到招待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

但是，与国王的交涉迟迟没有结果。国王邀请洛伦佐参加狩猎和晚餐会，却不愿意说出最后的想法。洛伦佐眼看就要在那不勒斯住满三个月了，尽管他在人前举止悠然，但一个人的时候无法掩饰阴沉的表情。

艺术家的善忍出人意料，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可以发挥出常人不可想象的忍耐力，绝不会束手待毙。他会一边等待，一边穷究是什么让敌人逡巡，一旦找到原因，便会立即出手一决胜负。洛伦佐与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互明事理的对手。洛伦佐发现，国王的犹豫在于即使要毁弃与教皇的同盟，也不能采取那不勒斯单方面毁约的形式，不然今后会在那不勒斯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方面留下隐患。

洛伦佐提出了方案。他公开声称已经不能再等，便离开了那不勒斯港。他的船刚驶到加埃塔海面，国王使者乘坐的船就追了上来，传达了国王请洛伦佐回那不勒斯重启会谈之意。但洛伦佐拒绝了，说眼下虽然

正在休战，但敌军已经逼近祖国佛罗伦萨，情况已经不允许继续进行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了。然后洛伦佐让船继续北上，实际上船行速度却很慢。在此期间，回到那不勒斯的使者得到国王的指示后又折返回来，驾着快艇追赶洛伦佐，并瞅准了洛伦佐在里窝那港下船的时候追上了他，传达了国王让那不勒斯军队撤出战斗的决定。

这事肯定是洛伦佐向国王建议的。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证实这件事，我在这里用了“肯定”这样的推断词语。不过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发展的。我如此推理的依据是洛伦佐往返那不勒斯航海所用的时间，人们无法解释来去天数的差距怎么会有如此之大。

总之，洛伦佐给了那不勒斯国王面子。当然，给对手面子而自己也得实惠是外交的基本做法。

洛伦佐于1480年的3月13日回到里窝那，两天后回到了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市民像欢迎凯旋将军一样迎接洛伦佐。虽然不像古罗马将军那样驾着4匹马拉的战车归来，但他被市民抬在肩上胜利而归。市民们这样的盛情绝不亚于古罗马人欢迎他们的凯旋将军。洛伦佐身边聚集了太多欢呼的市民，连朋友们都无法靠近他。

正如马基雅维利后来所写的那样，佛罗伦萨的市井平民们找到了一位不惜牺牲自己而为国家和人民赢得和平的理想领袖。洛伦佐胜利了！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大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违反父王之命，不肯从佛罗伦萨近郊撤走自己率领进攻佛罗伦萨的那不勒斯军队。他禀报国王已撤军，实际上却留在了托斯卡纳的土地上。他可能不愿意轻易放弃已进入很深的佛罗伦萨的领地，这已是既成的事实了。洛伦佐的脸色再次严肃起来。

不过，洛伦佐终究运势强盛。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用马基雅维利

的话来说是“天佑洛伦佐”的事件。

这一年（1480年）7月，载着7000名士兵的土耳其舰队首次靠近了意大利南部。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所向无敌的气势大举扩张势力。现在，他决心进攻意大利南部，他的理由是自己灭亡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旧有领土的主权就应该归自己所有。意大利南部的确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那可是400年前的事了。

土耳其军队在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奥特朗托近郊海岸登陆。8月11日，海港城市奥特朗托陷落，居民2.3万人中一半被杀，其余的被卖为奴。

这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盘踞在佛罗伦萨近郊的卡拉布里亚公爵坐不住了。8月底，他率领全部那不勒斯军队紧急南下，要夺回奥特朗托。当时传言，土耳其军队谋划年内把奥特朗托建成前线基地，等待来年苏丹随大军前来，一举征服意大利。洛伦佐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不勒斯军队撤走后，他派雇佣军巩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防卫。

因土耳其入侵而警醒的不仅仅是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无法继续进攻佛罗伦萨了。教皇听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放言，土耳其兵要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喷泉池饮马，他睡不着了。洛伦佐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立即向教皇请求，希望教皇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和解。

这时洛伦佐并没有忘记给对手“面子”。他打出了大义名分，当此伊斯兰土耳其入侵之际，基督教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御敌，而首倡者非罗马教皇莫属。这样一来，教皇也就顺势响应了。

1480年12月3日，由佛罗伦萨共和国领袖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抵达罗马，洛伦佐不在其中。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在

教皇面前跪下，在形式上为佛罗伦萨对教皇的失礼行为谢罪。教皇虽然难掩怒气，但还是用权杖轻轻敲打代表团所有人的肩膀，正式解除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停止教权的处分，并送上了祝福。虽然没有解除对洛伦佐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但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市民都认为这件事可放在以后处理。作为和解的代偿，代表团承诺佛罗伦萨共和国将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用于对土耳其作战。代表团旋即回国，向洛伦佐报告一切均按计划办妥。

如果土耳其军队真如穆罕默德二世所决心的那样进攻意大利，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将会在为解决了与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的问题而高兴之后立即面临重大危机。然而，这一次又是“天佑洛伦佐”，不满50岁的穆罕默德二世于第二年即1481年5月突然亡故。

欧洲最早得到这个情报的是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已于5月底通过驻罗马大使通报了教皇。同一时间，在意大利南部奋勇作战的土耳其军队也如退潮一般地撤走了。意大利南方的老百姓不明就里，异教徒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走呢？那不勒斯国王舒了一口气，罗马教皇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而洛伦佐捡了便宜，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的义务不了了之。

一到6月，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便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命令，为了庆祝“基督之敌”的死亡，连续三天在教堂祈祷，感谢上帝。教堂里挤满了前来祈祷、感谢上帝的人们，欢庆的钟声数日不绝于耳。

佛罗伦萨也一样，应该说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欢快地向上帝献上了自己的感谢。人们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在广场上围成圈跳起舞来。

佛罗伦萨人知道，洛伦佐直接与那不勒斯国王谈判并获得成功，靠的是他个人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土耳其军的入侵和后来的苏丹之死并不是洛伦佐使然，更多靠的是他的好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认为洛

伦佐·德·美第奇的功绩可以打折扣。由于“基督之敌”在这个时间亡故，市民对洛伦佐的评价更趋完美。

人总是同情运气不好的人，喜欢好运连连的人。

这并非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之类的简单想法。每个人天天都在与各种“上帝赐予的考验”做斗争度日。在他们看来，看着那些不用天天挣扎的“上帝眷顾的人”，自己也会觉得能够得到拯救。

据说如果两位将军才能一样，拿破仑会重用运势强的那位。要想做事，再优秀的人单靠才能也是不够的，运气会起很大的作用。只有马基雅维利能够理解这一点。人们喜欢运气好的人，这是人类共有的倾向，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流露。洛伦佐作为理想的领袖已经在佛罗伦萨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洛伦佐·德·美第奇不想沿袭祖父科西莫坚持了一辈子的一介市民式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君主，即使延续共和政体，也没有一个对手能够得到比他更多的来自市民的支持。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洛伦佐的行动中，他对自身的安全有着绝对的自信。洛伦佐带着他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吃遍了佛罗伦萨城里的酒馆，而这位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却一直拒绝带卫兵。

不过，他同祖父一样，知道佛罗伦萨人的性情多变，需要有所准备。洛伦佐设立了类似于威尼斯元老院[3]的“七十人委员会”。政府的工作都交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或由这个委员会选出来的人去做。“七十人委员会”的任期为5年，这在任期通常为1年的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特例。而且，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背地里几乎都听洛伦佐的。一位未必喜欢美第奇的同时代人这样写道：

“他确实是专制君主，但他是一位快乐的专制君主。”

在对外关系上，洛伦佐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领袖。因为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还有当时的米兰公国都承认，洛伦佐独特的势力均衡政策是当时可以期望的最好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导致了洛伦佐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之间的冲突。

意大利需要和平，意大利不能窝里斗，这样会给正在逐步完成国内统一的法兰西、西班牙等国以侵略的口实。到洛伦佐去世为止的10年间，意大利发生过3次局部战争性质的争斗，每次都在洛伦佐的调停下得以平息。

意大利境内的列强中只有教廷一家不赞成洛伦佐的政策。一直敌视洛伦佐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1484年去世。

接替他任教皇的是英诺森八世[4]。洛伦佐想把这位教皇拉到自己一边，从而改善佛罗伦萨与罗马的关系。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玛达莱娜嫁给了新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科·西博。

在一起步就碰到好运气的人中，会有既无才能又无野心的人，也会有无才能却有野心的人，还会有既有才能又有野心的人。

以历代教皇的侄子和儿子为例，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属于第二类人，后来与马基雅维利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应该是第三类人，而弗朗切斯科·西博则属于第一类人，岳父洛伦佐的最大目的是通过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他不会去做给女婿安排领地这样的事。对洛伦佐而言，幸运的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并无这种野心。弗朗切斯科·西博在岳父赠送的佛罗伦萨城中的宫殿里安稳度日，得以寿终正寝。

顺便说一下，“帕齐阴谋”的罪魁祸首之一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于1488年被暗杀，暗杀者是他自己的部下，洛伦佐秘密煽动他们起来造反。洛伦佐一直等到吉罗拉莫的后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死后才动手，

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第三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中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但15年前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对洛伦佐对外政策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虽然国内外的一切都称心如意，但洛伦佐也有伤心事，那就是美第奇财阀的经济和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

美第奇家族经济实力衰退，曾经的经济大国意大利的经济也走到了转捩点，这两者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人们无法根据这点为洛伦佐辩解。洛伦佐缺乏经营能力，这一点并不能瞒过市井商人的眼睛。但洛伦佐果真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吗？或许这是他关注其他很多事情而不能专注于打理个人财富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在为他做过度的辩解吗？

洛伦佐只要不过早看重回本，他就是个投资高手。有效使用巨款，这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才能。但是，这也只限于有财源才能做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洛伦佐的财源已经见底仍不改一贯做法。动用亲戚的财产不要紧，但很快他就把手伸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款上。因此在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背上了高达7500弗罗林的巨额债务。1494年，洛伦佐死后两年美第奇银行就破产了。

然而，洛伦佐活着的时候，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人愿意高声责难他晚年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他们知道洛伦佐过去为了国家消耗了很多私财。所有这些私财反馈回来，使佛罗伦萨受益。佛罗伦萨因此成为稍有知识的欧洲人最为憧憬的都市。

但是，资金不足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洛伦佐订购的艺术品与祖父科西莫相比少得惊人。在他那个时代创作的艺术品，如名作《春》等，大多数都为其他佛罗伦萨人所订购收藏。建筑几乎都是在祖父科西莫那一代建造的。洛伦佐在米开朗基罗年轻的时候曾经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培养，但洛伦佐后来亲自写信把莱昂纳多·达·芬奇推荐给了米兰公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努力设法留住这位天才。于

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开始活跃在罗马和其他国家。

话虽如此，这并没有使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丧失理解学问和艺术之心。“输出”文明文化在当时的威尼斯也很受重视。佛罗伦萨是文明文化的中心，这样的美誉不知道让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了多少好处。而提香和贝利尼[5]的肖像画，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等大国维持关系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后世的美术史家认为使佛罗伦萨成名的是科西莫·德·美第奇，而不是洛伦佐。他们往往喜欢把上述乍看衰退的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据。从表面看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无论这些艺术家在外国工作得多么出色，培养他们的毕竟是佛罗伦萨。洛伦佐将自己收藏的全部古代雕塑集中在庭院里，他建起图书馆，对外开放古代书籍。这些地方都是他用私产运营维持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些设施培养了艺术家。洛伦佐自己付不出钱，却号召其他有实力的家族订购艺术品。当有人咨询他的意见时，他都会提出具体的创作建议。

这并非因为洛伦佐有权，而是因为他有着说服别人的感觉。佛罗伦萨即使在15世纪末，也充满着刺激艺术家创作欲望并助其实现的围氛，而核心人物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如果说洛伦佐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就是他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艺术家自身的个性或情趣太过分明，他们很难成为理想的赞助人。

不过这位“艺术家”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谓货真价实。他在散文方面也是名家，他的作品读上去就像被写得古香古色的19世纪的美文。谈论意大利文学史就不能不谈到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的全集今天仍在刊行，诗歌、散文、评论合起来有3卷之多。洛伦佐的文章富有特色，不论韵文还是散文都平易明快，显示了作者明晰的思维。

在现代意大利并没有意大利古文的现代文译文。经常有读者感佩，说我阅读500年前的史料一定很难。每每这时，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复杂

起来，因为实际上困难的只是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和与现代意大利语殊异的威尼斯方言。如果你说关于佛罗伦萨的资料难读，那会被意大利小学生笑话。

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是以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为主体形成的，而托斯卡纳则以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为中心。由于但丁、薄伽丘、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努力，托斯卡纳方言在他们的时代业已完备，只是传承到今天而已。文章中自然会有许多老旧的说法，但加个“注解”便能解决问题。所以，意大利文中的古文并不像外国读者想象的那样困难。

即使是但丁700年前写的《神曲》，也不必翻译成现代文。学校要求小学四年级学生背诵“地狱”篇的开头部分，要求小学五年级学生背诵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著名诗篇。

洛伦佐有一首诗在当时颇受欢迎。佛罗伦萨有一家电影院把这首诗镌刻在银幕上方的墙面上，刻的当然是原文。我问了当时（1985年）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他回答说：“《神曲》有意思，洛伦佐的诗没意思。”《神曲》像是一种“科幻”作品，感觉像《外星人》[6]和《星球大战》[7]一样，小学生看起来一定很开心。

孩子认为洛伦佐的诗没有意思当然在情理之中，10岁的孩子如何能懂这首诗？这首诗写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20岁左右，就算他能明白意思，也一定不会受到感动。只有刚刚面对死亡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晚年的洛伦佐为痛风所苦，这种病一直困扰着美第奇家族的男性成员。

这首诗题为“酒神之歌”，是为狂欢节写的乐歌。全诗有8段，我在这里只介绍最有名的第一段，这段诗500年后被镌刻在电影院里。

Quant’ 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oul essere lieto, sia:

di doman non c’ è certezza.

我勉强把这段翻译如下：

青春那么辉煌，

却是倏忽即逝。

欢乐必须及时，

明日不再复至。[8]

由我来译这首诗，译文相当拙劣。但如果类似的诗放在情节丰富的《神曲》中，我便能按原文的节奏译出。相比之下，我会觉得翻译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比较轻松，容易译成比较贴切的日文或者英文的现代文。洛伦佐的诗太过抒情，使人感到困难，只好放弃翻译。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个我早已有之的想象。

有一位日本文人，不知道是上田敏[9]还是别的谁，去威尼斯旅行时听到了这首诗，回到日本后告诉了大家。吉井勇[10]从中得到了灵感，写出了《凤尾船[11]之歌》。我猜想，这首诗是经过威尼斯传到日本的，所以才在日本被冠以这样的标题。我这样推测的根据是，洛伦佐的这首诗不仅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也风靡一时，尤其在威尼斯，这首诗作为狂欢节上必不可少的曲目，一直流传到久远的后世。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趁朱唇尚未褪色，

趁热血尚未冷却，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12]

歌曲与诗的大意基本是一样的。我想，洛伦佐如果知道了这首诗的日文译文，一定会很佩服。不过，人在同样的情景下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因而这首歌也许完全是吉井勇的创作。我看了黑泽明[13]导演的电影《人之欲》才知道这首歌风行于大正[14]时代。

洛伦佐的这首诗一共有8节，第一节的最后两行一定要在其他7节的末尾反复吟诵，形成叠句。我想，这样的结构使这首诗既可用舒缓的叙事诗调吟诵，也可用带有戏谑的语气轻快地吟诵。但是吉井勇所作的歌词就一定得用中山晋平[15]的旋律歌唱。

最后一两年，洛伦佐·德·美第奇由于痛风旧病而苦不堪言，写信也成了苦差事。他死于1492年，去世时刚满43岁。

马基雅维利那年23岁。我们可以认为，他28年后的文章是他在23岁这年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为洛伦佐·德·美第奇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文章稍长，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全文：

……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前，佛罗伦萨人一直生活在最大的幸福之中，因为洛伦佐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权威成功地把意大利的内战消弭于未萌。

他为如何创造伟大的自己和自己伟大的国家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他让大公子皮耶罗迎娶了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的阿方西娜，又努力让二公子乔凡尼赢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乔凡尼晋升枢机主教时还不满14岁，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特例。这一成功打开了家

族通向日后荣誉之巅的大路（乔凡尼于1513年被选为教皇，即利奥十世）。只有三公子朱利亚诺在父亲去世时年纪尚幼，没有沐浴到父亲的恩泽。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雅各布·萨尔维亚蒂，二女儿嫁给了弗朗切斯科·西博，三女儿嫁给了皮耶罗·里多尔菲（萨尔维亚蒂和里多尔菲都是佛罗伦萨的豪族），四女儿嫁给了美第奇家族的人，她去世时年纪尚轻。

说到洛伦佐的私人事务方面，人们不得不说他在商业上实在不走运，其原因在于他把实际工作完全交给了各地的分行行长，而他们个个挥霍无度。他们是私企经营者，但端着国营事业运营者的架子。美第奇家族在西欧各地的巨额动产大多被他们损失掉了。（中略）

他很关心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一座更加美丽宏大的城市。当时城区里还有未建住宅的空地，他便下令在那里铺路盖房。于是，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宏大。

为了让佛罗伦萨共和国人民享受和平，洛伦佐没有忘记设法应对敌人的侵略。他在亚平宁山脉建起了菲伦佐拉要塞，巩固了对博洛尼亚的边境防卫。他重建了波焦皇帝山，把它建成了对锡耶纳的防御要塞。为了对付热那亚，他买下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两个镇，加强了边境防卫。

洛伦佐也不忘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来确保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他对佩鲁贾的僭主巴利奥尼、卡斯泰洛城的僭主维泰利，尤其是对法恩扎的曼弗雷德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使这些小国都成为保卫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坚固“堡垒”。

就这样，洛伦佐成功地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和平。他还热衷于把佛罗伦萨建成一个节日之都，经常举办长枪比武大赛，一年到头都有地方上演戏剧，从现代剧到古代凯旋剧应有尽有。佛罗伦萨城在所有意义上都成了一个富裕的城市，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共同生活在一种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中。

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美好优秀的东西，洛伦佐都会无比热爱。

洛伦佐对文人也给予了毫不吝惜的支持。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16]、希腊人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17]等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证，尤其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8]值得特书一笔。这位米兰多拉有着超人的才华，他了解欧洲的所有城市，却舍弃了它们，为洛伦佐的伟大所倾倒，移居到了佛罗伦萨。

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无论是建筑、音乐，还是诗歌，洛伦佐都能把玩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他不仅创作诗歌，而且还点评了许多诗文。

为了让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更高的学问，洛伦佐在比

萨重建了大学，请来了一批他能请到的最高层次的学者。洛伦佐还请奥斯定会[19]的马里亚诺·达·基纳扎诺来布道，做佛罗伦萨人宗教信仰的导师，并为他修建了修道院。（这似乎是一个策略，用以对抗渐获好评的多明我会[20]修士萨伏那罗拉。）

大概没有人比洛伦佐更受到命运的青睐和上帝的眷顾了。他的所有工作都有完美的结果，而他的敌人全都以不幸而告终，不仅是帕齐，其他的敌人也概莫能外。

洛伦佐的生活方式因有谨慎和好运点缀而精彩纷呈。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受到了意大利人以及远方人们的钦佩和尊敬。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匈牙利国王对他所做的事都会表示钦佩和尊重。在“帕齐阴谋”中，杀害朱利亚诺的凶手班迪尼逃到土耳其首都，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尚未接到请求就把他送回了佛罗伦萨。每次洛伦佐冷静谨慎地解决问题之后，都会在意大利名声大振，因为他能英明、迅速、大胆地解决难题。

当然，他身上也并非没有缺陷。他终其一生沉湎于女色，也喜欢戏弄男性。此外，他喜欢像孩子一样反复无常，这些行为都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经常被人发现混在孩子堆里玩耍。

他既有快乐、好交际的一面，又有严谨思考的一面，就好像在他身体里住着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使人觉得洛伦佐把不能相互结合的东西结合了起来。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洛伦佐受着病痛的折磨，胃病也无可救药。他于1492年4月8日去世，享年43岁。

洛伦佐的去世给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悲伤，没有什么事可以与之相比。他的死就像暗示了巨大不幸的开始，连老天爷都显现出若干明确的征兆。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上的尖塔遭到雷劈，掉落损毁，这件事使得人人惶恐不安。

佛罗伦萨的所有人、意大利的所有君主都为洛伦佐之死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感到悲痛的理由在洛伦佐死后很快便显露无遗。

意大利失去了唯一一位有权威的建言者。活着的人中已经没有人能够震慑住米兰公国的摄政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野心。这位斯福尔扎在洛伦佐死后不久便开始播种他那邪恶的种子。这些种子滋生的灾祸已经无人能够消弭，它们不断蔓延，成为毁灭意大利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用赞美的语言描述了洛伦佐·德·美第奇被称为“豪华者”的真正原因，纯粹的史家不能望其项背。有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很难找出比洛伦佐更理想的君主了。马基雅维利在写下这段文字的7年前还写作了《君主论》。他在《君主论》中花些笔墨多写写洛伦佐，不也理所当然吗？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没有一处提到洛伦佐。这本书论述的是君主政体，尽管佛罗伦萨事实上是君主政体，但名义上仍是共和政体，这样的“君主”也许成不了论述对象。那么，《论李维》[21]又如何呢？在日本，这部论述共和政体著作的书名被译成了“政略论”，并已约定俗成。洛伦佐的活跃场景在《佛罗伦萨史》中得到高度赞赏，在《论李维》中着墨多点也并不为怪。但实际又不是这样。

在《论李维》中，洛伦佐只有在下列5处出现过：

第一处在叙述洛伦佐死后不久教堂尖塔遭到雷击落下时。

第二处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三处也是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四处还是在与帕齐有关的地方。

第五也是最后一处，洛伦佐才首次作为像是共和国领袖的角色亮相，书中这样写道：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对这样的观点抱有同感，他说："君主怎么做，民众也会怎么做，人们的眼睛总是关注着君主其人。"

这就是书中提到洛伦佐的所有地方。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史》中受到那样的赞美，但为什么在《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本论述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同时还是领袖论的书中会受到这样的冷遇呢？

为什么《君主论》不以洛伦佐·德·美第奇为论述对象呢？

我们不会认为马基雅维利会对洛伦佐晚年贪污少量公款一事神经过敏。马基雅维利没有要求君主有道德，他只是说，如果君主的德行对操纵民众有效，就应该去做。此外，马基雅维利是自由的，他不必囿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偏见，这些人因为洛伦佐所处环境的优越和他很高的起点而对他后来业绩的评价打折扣。马基雅维利认为，洛伦佐有比别人优越的环境是他的好运之一。马基雅维利知道太多的人，这些人有很好的运气却没有能力用好。

从这一点看，马基雅维利不把洛伦佐作为《君主论》的论述对象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洛伦佐非但没有被作为主角，甚至不在书中出现的数十个人物之列。《君主论》的主角是切萨雷·波吉亚，这个人教养低下，无法与洛伦佐相比，他只想着如何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力量和运气爱着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君主论》这部凝结了他思想精华的书？解开这一疑问的钥匙就藏在这里。人们只要了解了这一点，就等于读懂了马基雅维利。

同为佛罗伦萨人，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人极其相似，想起来便会令人发笑。

马基雅维利不是不知道他这是在评论一国的领袖。不过我真的想

说，马基雅维利在叙述洛伦佐“无德”之处时，还是隐去了许多。

被女人迷住的是马基雅维利。他不光戏弄男性，还经常说一些和写一些不能让孩子们看的事情。至于爱胡闹，我这个局外人也觉得马基雅维利有时候会过分，甚至第二天他自己就会后悔，无颜去见朋友。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快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思索的人。马基雅维利的身体里也住着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毕竟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都是纯粹的佛罗伦萨人，都拥有基本相反的两种性格、同时又能够发挥力量的艺术家。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尽管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威尼斯人却不具有佛罗伦萨人特有的这种闪光点。

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把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君主论》的主角，但他与洛伦佐大概会有很多共同感觉。到了洛伦佐那个年纪以后，马基雅维大概也会因与他心有灵犀而能脱口吟诵出那首诗：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趁朱唇尚未褪色，

趁热血尚未冷却，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

---

[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本名David J.M.Cornwell,1931— ），英国著名间谍小说作家，曾服务于英国军情机关和英国外交部，并曾在伊顿公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其作品表现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扑朔迷离的间谍战。代表作有《柏林谍影》《德国小镇》《秘密朝圣者》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出版于1974年，表现了苏联与英国的特工组织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曾于1979年被改编为电视剧，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斯迈里和吉列姆是该小说中的人物。

[2]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当过兵。193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奠定了他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生动反映了2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主要作品除上书外，还有《人间天堂》《夜色温柔》

等。

[3] 威尼斯共和国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由480多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Major Consilio）负责立法和监察。元老院（Consilio dei Pregadi，或称Senato）掌握行政大权，其成员半数由大议会选出，另外半数由上届元老院选出，经大议会批准。元老院设立于1229年，1542年时，元老院成员已超过220人。

[4] 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西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

[5]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29—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造了许多新的绘画题材，在形式和色彩方面带来了新的感受，将写实主义提升到新的境界。代表作有《在花园里苦恼》《圣母与小树》《诸神之宴》等。

[6] 《外星人》（Extra-Terrestrial），美国科幻电影，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1982年首映。

[7] 《星球大战》（Star Wars），美国系列科幻电影，由乔治·卢卡斯导演，首集于1977年在美国上映，曾获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多项大奖。

[8] 此诗根据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

[9] 上田敏（1874—1916），日本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曾担任过多所大学教授、讲师。他还创办过文学刊物，介绍西方文学思潮。著有《诗圣但丁》《最近海外文学》《文艺论集》《现代艺术》等，有多部译作刊行。

[10] 吉井勇（1886—1960），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唯美主义诗人、剧作家。

[11] 凤尾船，即贡多拉（gondola），古代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威尼斯所特有。贡多拉为一种造型别致的木制黑色平底船，船体不对称，两头尖耸高翘，形似凤尾。船身长10余米，最多可乘6人及船夫1人。

[12] 根据日文翻译。

[13] 黑泽明（1910—1998），享有国际盛誉的日本电影导演，一生导演过30部电影，作品曾获得过诸多国际电影艺术的奖项。代表作有《罗生门》《人之欲》《影武者》《七武士》《乱》等。电影《人之欲》（又译《活着》）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曾获196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参议院特别奖。影片叙事流畅，表现丰富，表现了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触及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为什么活着这一哲理问题。

[14] 大正，日本年号，1912年至1926年。

[15] 中山晋平（1887—1952），日本作曲家，1912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写有数量众多的童谣、流行歌曲及新民谣作品，《凤尾船之歌》即由他谱曲。

[16] 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Cristofano Landino,1424—150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诗人。他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评注古典作家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分子

有较大影响。

[17] 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Demetrio Chalcondylas,1423—1511），希腊人文主义学者，曾在意大利教授希腊文长达40年之久。出版、翻译过许多重要的希腊古典文献，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亦有贡献。

[18] 乔凡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论人的尊严》《900论题》等。《论人的尊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

[19] 奥斯定会（Ordo Sancti Augustini,OSA），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另三大托钵修会为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该会修士遵从奥古斯丁所倡守则，抛弃家庭和财产，在教会内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除修行外，还从事济贫和传教工作。

[20]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由西班牙人道明·古斯曼（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于1215年创立于法国南部的普卢叶（Prouille）。该教派传播经院哲学，提倡学术讨论，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修士披黑色斗篷，故被称为“黑衣修士”。

[21] 《论李维》，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部著作，完成于1517年。这部著作的原名为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直译为《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章》，中文书名有《李维史论》《论李维》等，日文书名有《政略论》《罗马史论》《李维论》等。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话说28年以后，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佛罗伦萨政府之邀撰写《佛罗伦萨史》，甚至还正式签订了合同。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做了政府的工作，政府向马基雅维利发出了工作邀请。

朱利奥是在“帕齐阴谋”中被杀的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朱利亚诺遇刺时还是单身，哥哥洛伦佐知道他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便收养了这个婴儿，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来抚养。不论是血缘关系，还是成长环境，朱利奥完全是美第奇家族的人，他与时任罗马教皇的洛伦佐二公子乔凡尼是堂兄弟关系。

这意味着，当时美第奇家族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教皇利奥十世和枢机主教朱利奥希望马基雅维利来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当时，一度被赶走的美第奇家族已经东山再起，尽管佛罗伦萨不是正式的君主国家，佛罗伦萨的政治实权却掌握在枢机主教朱利奥手中。美第奇家族希望要的是一部绕不开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史，而当时的马基雅维利也还没有完全放弃依靠美第奇的认可而官复原职的希望。

到这一步条件已很“不利”。出于最普通的考虑，处在如此境地的马基雅维利已难以做到客观记述。实际上，的确也有不少历史研究专家认为，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把美第奇家族描绘得如此高大。

不过，说这话的人不懂得作家的心理，也不懂得写作需要怎样的气概来支撑。何况在那个时代，书籍尚不能印刷，要靠手抄本传阅，难有

众多的读者。马基雅维利生前亲眼见到自己作品印刷本的只有《论李维》一种而已。就连在他生前就已经获得很高评价的《君主论》，也是在他死后5年才有印刷本。这意味着读者的数量有限。既然读者为有限的少数人，他们当然知道事情的经过。有哪位作家会去写可能成为读者笑柄的东西呢？

然而，对当时的马基雅维利而言，把美第奇家族这样强有力的赞助人推向敌人一边，也肯定是名副其实的愚蠢之举。既不能成为人们的笑柄，又不能做出愚蠢之举，这需要用点智慧。马基雅维利的“智慧”就是以“豪华者”洛伦佐之死来结束自己受命撰写的《佛罗伦萨史》。

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马基雅维利于1520年撰写《佛罗伦萨史》。其间28年的前5年马基雅维利还没有担任公职，这前5年开始于马基雅维利23岁之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不会什么也没有看到的。

接下来的15年间，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左右臂，能够接触到最高机密，由他来撰写这本书最为合适。然而，他只写到洛伦佐去世便撂笔了，这不是智慧又是什么？

如果书写到洛伦佐死后再往下写，作者就不能不批评美第奇家族了。尽管利奥十世是位令人愉快的人，但把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的人往好里写会引人窃笑。我甚至想，他们的血液中莫非混进了非佛罗伦萨人的血液？如果照直去写，就不能不伤美第奇家族的心。

书真要写得既不会成为笑柄，又不至于做出愚蠢之举，马基雅维利就得设法照顾好两头，因此马基雅维利以洛伦佐之死终结了《佛罗伦萨史》。他这样做是基于下面的事实：自那年以后，佛罗伦萨丧失了对意大利局势的主导权，佛罗伦萨的辉煌随洛伦佐一道失去了。

父亲去世那年，皮耶罗·德·美第奇21岁，弟弟乔凡尼虽然才16岁，却已成为枢机主教。老三朱利亚诺只有14岁。父亲洛伦佐是在20岁那年

担当大任的。如果皮耶罗能够全部继承享有伟大尊称的父亲的遗产，我们还不能说他运气不好，可惜他缺乏力量。我甚至感到，给他起“不幸者”（Sforutunato）这个外号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皮耶罗在真正意义上的不幸是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机制，这个机制在洛伦佐时代靠他个人的个性才能发挥功能。虽然如此，皮耶罗还是开始做了一些连他父亲都不曾做过的事情。

美第奇宫变成了市政厅。皮耶罗因为年轻而未被允许担任共和国政府要职，他便把市政厅搬到了可以允许自己处理政务的地方。就连美第奇派的佛罗伦萨人都对这一做法投来了怀疑的眼光。在那些显贵市民中间，有些人掩饰不住不快的心情，其中就有洛伦佐的姐夫、皮耶罗的姑父贝尔纳多·鲁切拉，还有洛伦佐的表兄弟保罗·安东尼奥·索德里尼。年轻的皮耶罗也许认为危险迫近了。像皮耶罗这号人，不安会迅速导致动摇。于是，美第奇家族的年轻掌门人动摇了，他连连犯错。

1492年4月8日，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

同年7月25日，与美第奇关系最好的教皇英诺森八世去世。

8月11日，波吉亚家族出身的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即位。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五强国之一的米兰公国，前代公爵卡莱亚佐的弟弟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因面色黢黑得了个“摩尔人”的外号。1476年，卡莱亚佐被暗杀，9岁的吉安·卡莱亚佐继位。此后“摩尔人”便以摄政地位开始统治米兰公国。史家一致认为，斯福尔扎有着过人的能力。莱昂纳多·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以后，斯福尔扎成为他的赞助人，这使得斯福尔扎的名声大振。

斯福尔扎并不满足于摄政的地位，他想正式做米兰公国主人的野心正在膨胀。洛伦佐之死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绝好的机会。1492年这一

年，斯福尔扎一直以体弱多病的理由不允许其参与国政的吉安·卡莱亚佐公爵也已经23岁，“摩尔人”41岁。

不过，排挤公爵而由自己取而代之的阴谋要想成功并不容易。首先，那不勒斯王国就不会同意，因为年轻公爵的妻子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女儿。如果洛伦佐在世，他也一定会阻止这件事，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意大利内部的势力平衡，造成外国入侵的口实。然而，洛伦佐已然不复存在，“摩尔人”的障碍就只剩下了那不勒斯国王。

其次，查理八世[2]于1483年坐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他13岁登上王位，到1492年也只有22岁。他身体孱弱，几近残疾，但却是完成了国内统一、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法兰西的国王。这位国王还是十字军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还坚信，如果往上追溯到安茹家族，那不勒斯国王的王位也属于自己。

最后还出现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他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虽说是仗着教皇做了枢机主教，但才能不凡，后来竟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3]。为在教皇选举中胜出，他曾与波吉亚展开激烈的斗争，结果一败涂地。1492年他刚刚败选，满脑子只想着如何逼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

转年到了1493年，“摩尔人”开始了露骨的行动。他把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公爵妹妹的比安卡嫁给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4]，并送上了40万达克特的嫁妆，数额之巨前所未闻。这位死了皇后的独身皇帝可是有名的见钱眼开之人。

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最强的国家，“摩尔人”用巩固米兰与威尼斯同盟的方法去接近威尼斯。他阻止了德皇南下，确保了威尼斯的边境安全。当时，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对土耳其不得不处于守势，因此，能够保障它在意大利的边境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收获。

“摩尔人”还对佛罗伦萨采取了对策。他派出了使节，请求皮耶罗·德·美第奇在米兰与那不勒斯对立时站在自己一方，但皮耶罗态度犹豫。

教廷这时刚刚迎来了新教皇，“摩尔人”便放手让赞成他实现野心的弟弟、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去应对。因为阿斯卡尼奥在波吉亚当选教皇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摩尔人”确信他对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具有影响力。

1493年在“摩尔人”发动攻势和那不勒斯国王暗中拼死抵抗之中过去了。进入1494年后，形势急转直下。1月25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去世。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立即主张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权。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驳回了查理八世的主张，批准先王的嫡子阿方索继承那不勒斯王位。

教皇的这一决定不仅激怒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也引起了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不满和反对。这一派的首领是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教皇决定后的第6天，这位枢机主教逃离罗马，出走法兰西，投靠了法国国王。

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9万人的军队，离开格勒诺布尔，翻越阿尔卑斯山。他同时向意大利各国遍派使节，要求各国为法国军队提供通行自由和必要的物资。

9月，法国军队通过都灵，进入阿斯蒂城，受到“摩尔人”夫妇的迎接。查理八世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并辔同行。

10月，法军进入米兰公国第二大城市帕维亚。6天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去世。他死后8天，“摩尔人”正式即位，成为新的米兰公爵。

下面，让我们以现场证人的证言为主线试着描述一下佛罗伦萨的形势。这里我们使用了卢卡·兰杜奇的日记。这个人当时50多岁，在佛罗伦萨街上拥有一家经营香料的商店，他的话最能反映市井小民的观点。但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什么教养，他的记述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地方仅靠翻译难以理解，我只能用我的笔做些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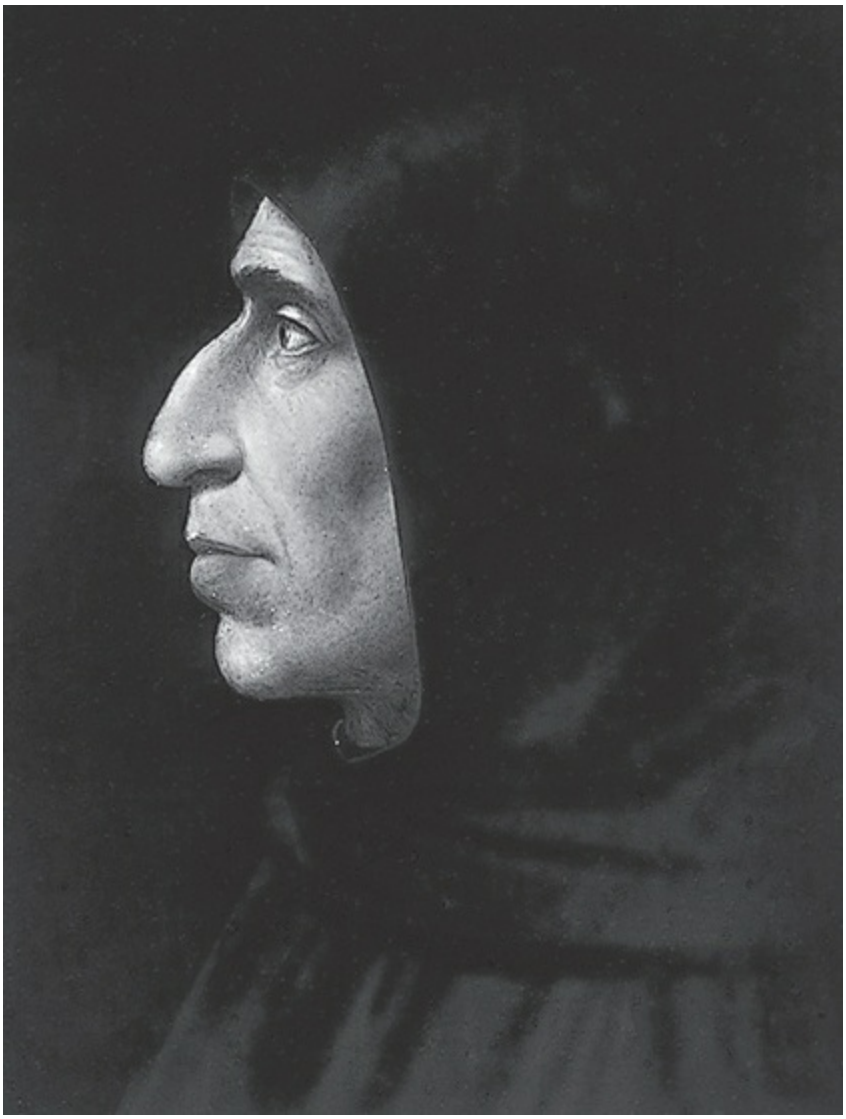
1494年10月26日，皮耶罗·德·美第奇也没有跟显贵们商量一下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是为了去见南下比萨途中的法国国王。见到法国国王以后，皮耶罗请求他不要加害于佛罗伦萨，作为交换，佛罗伦萨向国王的军队投降，并向国王交出佛罗伦萨境内两座城的城门钥匙，提供相当于20万弗罗林的金币作为保证。法国国王当然同意，但佛罗伦萨人并不答应。他们说，没有任何必要去如此屈辱地应对。他们谴责这是皮耶罗的年轻幼稚之举。

10月29日，佛罗伦萨境内的一个城市遭到法国军队的进攻，人们打开城门后，城市被洗劫一空。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城里向恐惧的民众布道，他说道：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流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修士萨伏那罗拉

11月4日，市政厅向市民发出命令，法国兵将前来为驻扎选房，届时要让他们进房查看。命令还说，不许把家中的东西搬走，要让他们看到现在的样子。市民对此极端不满，谁都说这是过分害怕法军的表现。

11月5日，法国国王的家臣造访佛罗伦萨，寻访市内的房屋，在选中的房屋门上用白垩做上记号。选中用于驻扎的房屋何止几百间，数量竟至数千间之多。法兰西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房屋前只需说一句话："把门打开！"佛罗伦萨人所能做的只是把妇女儿童送往乡下，或是把他们暂时寄放在门上未做记号的人家。

11月6日，由5位显贵人物组成的交涉团前往法兰西王驻跸的比萨，修士萨伏那罗拉担任首席。同一天，法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佛罗伦萨，分散住进先前选好的房屋。

这天半夜刚过，市政厅钟楼的大钟已经响过的谣言一阵风似的传遍全城，市民纷纷涌向市政厅。然而，这是误传。

11月8日，前去见法国国王的皮耶罗·德·美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皮耶罗一进美第奇宫就向市民分发点心和大量的葡萄酒，说是与法国国王讲好了有利的媾和条件，要庆祝一下。

11月9日，星期天，晚钟时分，武装起来的市民们开始向市政厅前广场聚集，有人在喊召开平民大会（parlamento）。这时，萨伏那罗拉派的著名人物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骑着马走进广场，高喊："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广场中的人们当即响应。这时，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人人高呼："Popolo!Liberta!"

皮耶罗·德·美第奇策马向广场奔来，口中高呼："Palle!"（美第奇派之意）但跟随他的市民人数并不太多。由于广场已挤满了武装起来的市民，皮耶罗也改变了主意。这时，市政厅发出了命令，其中有一条是对支持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人处以绞刑。

皮耶罗从弟弟朱利亚诺事先打开的圣加洛城门奔出城去，他的母系亲属奥尔西尼家的武装家丁已经在城门外接应他。可怜的枢机主教没有与哥哥皮耶罗和弟弟朱利亚诺一同逃走，一个人留在了美第奇宫。我亲眼看到这位年轻的枢机主教乔凡尼跪在窗边，双手合十地祈祷。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我想，即便有什么事情，那个小伙子也是个好人。但很快他也离开了佛罗伦萨，那里已经没有一位美第奇家的直系亲属了。听说他是化装成一个普通修士逃出城去的。

直到第二天，"Popolo!Liberta!"的呼声依旧响彻佛罗伦萨全城，共和国政府宣布，杀死皮耶罗·德·美第奇者赏金2000弗罗林，杀死枢机主教弟弟者赏金1000弗罗林。

真是的，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整个佛罗伦萨笼罩在极度混乱之中。

美第奇被驱逐了，这件事离“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不过两年半的时间。

修士萨伏那罗拉统治了洛伦佐曾经统治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他们两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是那么迥异，以至于每个人都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

就在美第奇家族被驱逐的同一天，即11月9日，进入比萨城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按会见佛罗伦萨共和国特使的规格接见了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修士对国王说：

基督徒的国王啊，您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您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您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不过，国王啊！如果您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您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您，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您！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您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佛罗伦萨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22日，国王在佛罗伦萨向所有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不勒斯之后我将以那里为据点，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

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大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逗留了十来天。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萨伏那罗拉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佛罗伦萨还收回了皮耶罗·德·美第奇先前自作主张拱手献给法国国王的两座小城。而且，提供给法国的20万弗罗林资金也只需一次性付12万，余额以年贡1.2万弗罗林的形式支付即可，成为法国国王今后保障佛罗伦萨共和国防卫的“合同款”。人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占到了什么便宜，但对因“豪华者”洛伦佐之死而丧失了自信的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来说，既有萨伏那罗拉的推荐，又能获得法国国王的安全保障，这大概就是难得的好处。佛罗伦萨笼罩在了这位出生在费拉拉、布道如同烈焰一般的修士的影响之下。查理八世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下榻在主人已经不知去向的美第奇宫。11月28日，法国国王统领大军离开佛罗伦萨南下。萨伏那罗拉在国王出发前一刻去见了他，再次向他说教，要他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详细叙述法国国王此后的行动将会偏离本书的主线。各位欲知其详请看《文艺复兴的故事006·冷酷的优雅》一书第一部“红衣”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只做简单的过程回顾，而把叙述集中于佛罗伦萨。

转过年来，即1495年2月，那不勒斯王国向法兰西军队打开了城门，查理八世成功地夺回了安茹家族世世代代所要求的那不勒斯王国。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到了3月，教皇提议成立了反法兰西大同盟。法国国王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5]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和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连煽风点火让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米兰公爵“摩尔人”都加入了这个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参加。

正在南方享受好时光的查理八世再也坐不住了，慌忙在5月离开了那不勒斯。他想走海路返回，但理应提供船只的热那亚没有明确的答复，便只好沿着来路由陆路返回。在罗马，查理八世想与波吉亚教皇敲定一些事，教皇却踪影全无，找不到人。不得已，查理八世只好继续北上，连佛罗伦萨也没打算再做停留。到了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波吉邦西时，萨伏那罗拉跑来见他，又是一通使命云云的说教。可是受到孤立威胁的查理八世再无心倾听。这时，一路北上，走在前面的法国军队刚刚进入意大利北部，就与以意大利为主体的同盟军打了个照面。

一仗下来同盟军获胜，但同盟军军规混乱，让法军得免大败。尽管如此，法军仍然难以改变局势。查理八世抛下坚持到最后的奥尔良公爵，一溜烟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对意大利而言，这是狂风暴雨的一年，只有“摩尔人”从中渔利，但也产生了另外的效果，让意大利少数有洞察力的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多年以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1494年是一个悲惨时代的开始。”意大利城邦已经习惯于打仗以“质”定胜负，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夸耀这种打法的优越性。然而，压倒多数的军事力量让他们醒悟到“量”的威力。可是，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一切的，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少数派。

就在法国军队离开佛罗伦萨开始南下的4天以后，即1494年12月2日，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召开了平民大会。佛罗伦萨着手对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之后的政体进行改革。法国大兵的身影终于消失了，“人民”（popolo）、“自由”（liberta），加上“民主”（democrazzia），这三个词成了佛罗伦萨的口号。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佛罗伦萨开始走上了确立民主政体的道路。萨伏那罗拉的“领导”已经不限于在教堂的布道坛上了。不论是在市政厅的大会议厅里，还是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那袭黑色道袍的身影都在激烈地辩论。

那么，佛罗伦萨人脑中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豪华者”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的基础“七十人委员会”被废止了。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各阶级各派别在热烈讨论之后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建立一个模仿威尼斯的政体。然而，威尼斯的共和国议会并不是一个建立在民主政体基础上的机构。详情请阅读我的另一本书《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第五章“政治的技术”。威尼斯共和国是寡头政体或曰贵族政体的国家。即使参考威尼斯，最终也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佛罗伦萨国情的政体，因此各阶级各派别达成了妥协。

在意大利语中，“major”与“grande”在“大”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议会”在威尼斯称为“Major Consiglio”，而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则名之为“Consiglio Grande”。内容与威尼斯相似，但已经同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鸣钟集合全体市民召开平民大会风马牛不相及了。要取得议会的议席，在佛罗伦萨也需要具有资格。

这个资格就是，必须是年满29岁的男性佛罗伦萨市民，并且曾经在三大委员会中担任过职务的人，或是家族中祖上有人曾担任过三大委员会委员的人。为了照顾被这一规则排除在外的人和年轻人，每年还允许24位24岁至29岁的男性加入议会。按照这个方式，在当时佛罗伦萨大约7万居民中，有3200人可以取得议会议席。这个“民主”相当谨慎。

所有居民均有参加政治的权利，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还未被认可。那个时代，“平民”的定义还只是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平民虽然包括了商人和工匠，但被雇用者即劳动者，即使他是一家的顶梁柱也没有被包括进来，何况女性。不过，这些非平民的人可以在领主广场平民集会的外围席旁听。事实上，在讨论决定大方向的时候，这种外围席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这种方式由于容易受到蛊惑宣传的影响并不完全自由。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缺陷，威尼斯很早前便废止了这种平民大会。

在这种3000人的议会上讨论全部议案，其统治效率并不现实。所

以，模仿威尼斯的元老院，佛罗伦萨还新设立了“八十人委员会”。这是在洛伦佐时代的“七十人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10人的得意之作吧。“八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与威尼斯元老院相同，国政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的决定由议会（“大议会”）批准，平民大会给予支持。这就是1494年形成的佛罗伦萨的“民主政体”。

然而，佛罗伦萨人参考了威尼斯的政体，却没有参考威尼斯人的精神。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形成于200年前的13世纪末。当时实行这样的政体时，威尼斯已经经历了阵痛。这一时期，威尼斯集中发生了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起反政府阴谋。威尼斯在度过这一时期以后，便考虑如何巩固自身独特的政体。这时，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尚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理想政体。

负责威尼斯共和国国政的少数人被称为“贵族”（nobile），他们的特权仅限于负责国政，但随之而来的义务是打仗时要冲在第一线。威尼斯政府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平等实施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贵族也不例外。在政府的另一项基本方针“败者复活”中，贵族也有堂堂正正参加的权利。我们只能说，在对生存共同体的认知方面，佛罗伦萨与威尼斯是完全不同的。与威尼斯的同行相比，佛罗伦萨的国政担当者完全缺乏这种冷静的认知。他们参考威尼斯只是因为威尼斯成功了200年，所以这只是一种简单模仿。

另外，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之间还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威尼斯在建国时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做法，而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却容许了萨伏那罗拉的领导。

这位多明我会的布道僧根本不是在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才登上舞台的，在洛伦佐死前两年，他就已经在佛罗伦萨反复宣传他的教旨了。洛伦佐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压制言论，萨伏那罗拉也不忌惮任何人，他不

断地谴责洛伦佐所代表的佛罗伦萨人的现世倾向。但在洛伦佐生前，佛罗伦萨人没有动摇过。虽然有人对萨伏那罗拉抱有同感，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政治决策。

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自信，他们丧失了只有在“豪华者”洛伦佐这根支柱支撑下才会有的自信。而200年来威尼斯人却没有依赖个人支柱，他们有自信处置类似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人所面临的危机。佛罗伦萨人需要支柱，否则就只知道内讧，因此他们要么有科西莫或洛伦佐这样的支柱，要么就转而寻求别的支柱。美第奇的子孙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令他们失望。在萨伏那罗拉“现在的危机是你们过去的罪孽造成的，忏悔吧！紧跟上帝吧！”的说教面前，佛罗伦萨人屈服了。

此外，佛罗伦萨人本来就有一种对理想孜孜以求的性格。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在艺术方面得到了发挥，才产生了文艺复兴。然而这种性格也容易导致在政治上不厌其烦的探索。萨伏那罗拉宣称要创造耶稣加国王的新政体——政教协调运行的政体。这个说教点燃了佛罗伦萨人心中的理想主义之火。萨伏那罗拉称佛罗伦萨人为“上帝之民”，称佛罗伦萨为“上帝之城”。在有基督附体的国王的国度里，人民平等，僭主可容，没有君主，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平安，拒绝争斗，和平得以维持。

萨伏那罗拉的这些说教，不仅打动了原本宗教心就很深的佛罗伦萨中下层市民，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很多他的仰慕者，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6]、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等哲学家和文人，波提切利、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等这样的艺术家，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雅各布·萨尔维亚蒂、皮耶罗·圭恰迪尼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显贵。特别是以前在洛伦佐鞍前马后的那些学者和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萨伏那罗拉洗脑。也许是对支柱的依赖度越高，对失去支柱的感受就越深吧。

佛罗伦萨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陷入了窘境。在萨伏那罗拉领导下，佛罗伦萨选择了亲法兰西的路线，查理八世逃回阿尔卑斯山西面把佛罗伦

萨逼入了孤立状态。唯一没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佛罗伦萨，与参加了同盟的国家教皇国、威尼斯、米兰以及德意志、西班牙的关系自然紧张。佛罗伦萨被敌国包围，连比萨都造反独立了。

佛罗伦萨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佛罗伦萨的经济基础是金融业和制造业，以前曾经执北欧各国之牛耳。如果现在这些国家也都打入相同的领域，佛罗伦萨就别再指望同以前一样获利。威尼斯曾经面对这种情况，但它早早就开始了经济结构的重组，而佛罗伦萨面对同样情况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只能决定性地处于守势。1494年美第奇银行破产，这意味着佛罗伦萨在北欧各国经济霸权的终结。

佛罗伦萨的一切都在衰落，唯有萨伏那罗拉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回荡。

我再引用前述卢卡·兰杜奇的日记来谈谈这一时期佛罗伦萨人的心理状态。我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8·神的代理人》一书的第二部“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中也描写了这一时期，那部书中聚焦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不过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描写佛罗伦萨，所以这里仅列举《神的代理人》所用四种史料中的一种——兰杜奇的日记。

> 1495年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万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上教坛，大家忘记了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不是只有法国国王吗？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主义。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回到意大利来，结果一定会给佛罗伦萨带来好运。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这正是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民众的胜利和骄傲。

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这时也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第二年，1496年。

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蒙着头巾的少年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大人们吃惊地交头接耳："看那些少年修士！"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赶走已经堕落的习惯"。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第三年，即1497年。

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佛罗伦萨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

游行队伍到达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金字塔一样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7]（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七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雕刻和书籍。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这里马上就要进行萨伏那罗拉常说的"烧毁虚荣"。听说有个威尼斯人说想出4万达克特来买走这一切，但大家说这正是堕落的典型，把他赶了回去。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凉廊[8]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起了火。火焰瞬间燃遍了

整个金字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钟楼鸣响了大钟。这钟声就像一个信号，全城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群众发出欢乐的声音，开始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汇着，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还有不少年轻人。这些男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

第四年，即1498年。

3月27日。今天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说，要用“火刑审判”向萨伏那罗拉挑战。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这些都会被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所证实。他还说：“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际证明一下。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烧得正旺的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就承认他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3月28日。公认的萨伏那罗拉大弟子多米尼科修士宣称由自己来接受昨天的挑战。

3月30日。今天两派定下了进行“火刑审判”的代表。方济各会[9]派出的代表是修士隆迪奈里、多明我会的代表是修士多米尼科。

4月3日。萨伏那罗拉派的皮阿尼奥尼等人闯进市政厅，催逼尽快进行“火刑审判”，跟随而来的男女老少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

4月7日。一大清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漩涡。皮阿尼奥尼胜券在握，希望尽早看到结果。反萨伏那罗拉派的阿拉比阿蒂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举行“火刑审判”的领主广场。

广场上已经为“火刑审判”搭好了舞台。舞台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舞台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考验的时间定在正午，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舞台和群众之间戒备。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是今天的主角，他们在各自的领袖萨伏那罗拉和弗朗切斯科两位修士的带领下进入广场，然后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什么也没有开始。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进入火里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拿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里，便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用于个人考验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米尼科一定会让步。然而他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能搞“火刑审判”。两派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在政府的调解下进行协商。可是他们老也不出来。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请示完又进了市政厅。这种情况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响起谴责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的时间，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气氛紧张起来。担任警卫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

地方继续等待。修士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快到下午5点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待在凉廊中的几个多明我会的修士站了起来，高呼："奇迹！奇迹啊！这就是上帝不希望'火刑审判'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当然要生气。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去了："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阿拉比阿蒂与皮阿尼奥尼一样愤怒。不，是皮阿尼奥尼反过来向萨伏那罗拉倾泻出了炽烈的怒火。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一个人走了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刑审判"。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唱着圣歌，走向他们的圣马可修道院附属修道院。群众怒从心头起，向修士的队伍奔去。怒吼暴风雨般地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泼去。为了在袭来的群众中保护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才把修士们送回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皮阿尼奥尼们大叫："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阿拉比阿迪们也大叫起来："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两派人都一样愤怒。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萨伏那罗拉修士的毁灭何其速也。第二天，他就和两位弟子一起遭到逮捕。群众连续两天涌向领主广场，要求审判他们。时间到了5月下旬，终于开始进行公开审判。卢卡·兰杜奇旁听了审判。

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星期天，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受罗马教皇委任主持审判的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萨伏那罗拉的双手捆起来。在把他高高吊起之前，主教问萨伏那罗拉："你要在这里承认自己刚才坦白的事情：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说听到了，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他不认罪，自己就是预言者。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瞬间被高高吊起。我们就座的旁听席上方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认罪，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当天的公开审判到此便结束了。

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名弟子被判处死刑。三人均为神职人员，因而天主教会做出了这个判决，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神圣罗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处绞刑后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刻开始搭建绞刑台。

5月23日。教皇特使和政府高官们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刑审判"那天还多，现场鸦雀无声。三名修士被从市政厅中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名修士被剥去黑色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三个人都被用白布蒙上了眼睛。

修士西尔维斯特罗首先被推上临时搭起的木走廊。走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上面横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挂着绳索，绳索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头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修士的身躯。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萨伏那罗拉最后被吊在了两人的中间。对相信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

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就要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很是失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绞刑台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火舌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三人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躯体投掷石块，要把躯干砸下来。掉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韦奇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亚诺河，什么也没给他们的信徒留下。

5天以后的5月28日，29岁的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一介官僚的生活。不过与迷恋于萨伏那罗拉的商人兰杜奇不同，这4年间，20多岁的马基雅维利始终冷眼关注着修士从辉煌到毁灭的全过程。

现在还遗存着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写的一封信。写信日期是“火刑审判”前一个月的1498年3月9日。信是写给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里恰尔多·贝基的，从文字上推测，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对大使希望得到有关萨伏那罗拉消息一事的答复。因为是给年长且地位高的人写报告，年轻的马基雅维利极力控制不谈自己的判断，只是客观地报告情况。不过，信中还是有一行字泄露了他的见解。他在信中这样说，萨伏那罗拉的说教“总是以夸张的威胁开始，对不善于冷静思考的人才有效果”。从报告的写法看也让人不能不感到他论事冷静。多年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再次谈到萨伏那罗拉。他说，得到民众的支持并不那么难，但如何维持已经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却很难。不消说，他把萨伏那罗

拉当成了失败的例证。

以上这些都是这位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在进入“工作”前亲眼所看见、亲身所感受的事件。在佛罗伦萨，他作为一介官僚与国家政治休戚相关。这时的佛罗伦萨已经不再是“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也不再是萨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了。佛罗伦萨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求之不得。

29岁还很年轻，而且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这里是他所希望的职场。残留着火葬萨伏那罗拉的黑色斑迹的广场铺石，挡不住他轻快的步伐。他的岗位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厅韦奇奥宫。春天已经到来，5月的佛罗伦萨尤为美丽，被称为“佛罗伦萨的五月”（Maggio Fiorentino），天下闻名。对佛罗伦萨来说，“春天”已经逝去，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春天”才刚刚开始。

---

[1]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本名罗德里戈·波吉亚（Roderick Llancoi i de Borja）。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

[4]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5] 费迪南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ua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不勒斯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 II 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以“天主教徒费迪南”著称。

[6]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国内最近有此书译本《论柏拉图式的爱》出版）等。

[7] 布拉乔奥（ 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8] 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凉廊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跨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着许多雕塑作品。

[9] 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又称小兄弟会或弗朗西斯派，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修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教士”，修士间互称小兄弟。1209年由意大利阿西西的方济各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提倡清贫生活，托钵行乞，效忠教皇，反对异端。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1498年6月19日，佛罗伦萨共和国在市政厅韦奇奥宫召开会议，这场会议也可称作“共和国的议会会议”。市政厅有一个大厅，叫“五百人会场”，意思是可以容纳500人。这个会场1495年刚刚扩建，目的是为容纳因萨伏那罗拉的国政改革而数量急剧膨胀的议会议员，内部装修尚未完全到位。这一天要在这里讨论决定的事项中，有一项是选出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

5月28日，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6月15日，可谓是共和国元老院的“八十人委员会”批准了这份名单，19日议会全体议员投票决定人选。候选人有4人：

辩论术教授 弗朗切斯科·加迪

律师 弗朗切斯科·迪·巴罗耐

公证人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律师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无业者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虽然没有记录留存下来，但出席会议的议会议员通常有五六百人，他们会在听取每位推荐人的演讲后投票。做法是赞成者把白色扁豆、不赞成者把黑色扁豆投入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那天投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当选，他获得的白色扁豆数量多于其他三人。

人们一定会觉得录用区区一介事务官员却要议会投票决定，未免小

题大做。然而，这个事务官很难用“区区一介”来形容。我想，这个误解源于我们把马基雅维利将要赴任的任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Cancelleria”翻译成了“秘书厅”。

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司法，只要不涉政治犯，由距韦奇奥宫一两分钟路程的警察厅司掌。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国立美术馆了。立法由韦奇奥宫的“八十人委员会”和议会负责，行政由以正义旗手为首的“执政团”（signoria，相当于内阁）承担。马基雅维利就职的秘书厅是内阁下属机构，处理各种事务，英语是“chancellery”。我甚至认为，如果选择用贴近当时佛罗伦萨实情的译文，翻译成“内阁官房”[1]较为贴切。这样一来，刚当选的马基雅维利的官职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阁官房次官助理。

大家都知道，让马基雅维利留名青史的，不是他在佛罗伦萨的官职，而是《君主论》等一系列著作造就的政治思想家之名。他自己也喜欢在其著作中署上“佛罗伦萨国务秘书”（Segretario Fiorentino），后世也接受了这个头衔。如果采用这个头衔，他的官衔就只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chancellery）秘书（chancellor）。因此，我们只能请诸位下面再看到“秘书”这个词时，一定要把它想象成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认知的职位。

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这个岗位上的人能够最先收到最新情报，接触到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应该由议会决定人选。

这个职位官阶不高，实际工作却十分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三个“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而选择4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非大学毕业生”呢？这在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中也一直是一个谜。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属于某个行会，这是义务。其他3位候选人分别属于社会上最有权威的律师、公证人和审判官行会，而马基雅维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属于葡萄酒酿造业者及酒馆客栈

经营者行会。为此，称呼其他3人时要加上“先生”（Messer或Ser）的敬称，而马基雅维利的正式称呼只能是“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先生之子尼可罗”。达·芬奇也不是大学毕业，父亲也是公证人，与马基雅维利一样，他50岁时已名扬海外，但在公文上照例也只能称为“皮耶罗·达·芬奇之子莱昂纳多”。

当时29岁的马基雅维利不仅无业，也没有什么著作，并不是在论坛上高谈阔论地讨论国际关系，从而在人们的关注中得到提拔的新星。谁都会想，究竟为什么要选择马基雅维利呢？

3个月前，马基雅维利应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的要求，给大使寄去了一封信，分析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以及佛罗伦萨市民的反应。驻罗马大使担负着与教廷交涉的重任，通常都会派重磅人物担任。可以认为这位重磅人物请29岁的无业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理性和判断力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这就是说，在当选为秘书之前，该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年轻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马基雅维利是在萨伏那罗拉被处死5天后成为4位候选人之一，30天之后被议会决定录用的。此前，佛罗伦萨人在“豪华者”洛伦佐死后失去了好领袖，他们外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军队的祸乱，内受萨伏那罗拉荣耀与毁灭的折腾，经过了6年的混沌迷茫，共和国的上层也同样如此。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要把希望寄托在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

也许，这一行文字所体现的气氛和挤满“五百人会场”的那些人所表现出的气氛都是一样的，而且这是在主张政教合一的萨伏那罗拉刚刚倒台之后。在马基雅维利给大使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萨伏那罗拉划清了界限。可以认为，他比其他3人获得更多白色扁豆的气氛已充分形成。虽然他在这4人中最年少，但29岁的年龄对担任公职来说已经不

算太年轻。当时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在威尼斯，年龄不到30岁便不能担任公职。

家和工作场所离得近，这种环境对谁都方便。马基雅维利的家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从那里到他工作的韦奇奥宫，就算过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也只有四五分钟的距离。在年轻男子脚下也许3分钟就足够了。每天都要上下班，马基雅维利很可能会挑近路走。看他的性格，我们想象不出他会提前到达，整理办公桌等着上班。当时，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政府每天开始工作的时间也相当早。他可能每天早晨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糊弄一下早饭便奔出门去上班。他年轻清瘦，跑步不算苦事，但每次迟到都会被记录在案，次数一多，便会被扣工资来缴罚款。

如前所述，当时韦奇奥桥上有一大排肉铺。在南欧，做生鲜食品生意的很多人都是下午休息，所以早上会早早开门营业。马基雅维利尽管初涉官场，是位新人，但从进出市政厅的第一天起，他就得穿官服上班。穿着红黑相间、罩住脚踝的宽大官服，在满载肉块穿梭交错的手推车的缝隙之间穿行，而且还得跑步，又不能弄脏衣服，这不但需要很高的技巧，而且很累人。

韦奇奥宫

过了韦奇奥桥，马基雅维利恐怕不会每天都走银行和大商店林立的圣玛利亚大街或是走沿亚诺河的大街去上班，那样去市政厅等于绕了远路。他一定会走捷径，过了桥沿小路跑到市政厅。这条路虽然弯弯曲曲，却是一条近了很多的近道。从这么近的距离和并不好的家境来看，他不会骑马上班。骑马上班的人，可以在市政厅前下马，把马拴在离墙有适当距离、排成一列的铁环上。不只是韦奇奥宫，很多其他的建筑物边上今天也还能看到这种铁环的残迹。这些排列着铁环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停车场。

现在，乌菲兹美术馆的建筑占据了市政厅南面一大片地方，当时并没有这些建筑。马基雅维利自然也没有见到过矗立在美术馆回廊里的那些佛罗伦萨杰出人物的石雕像。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的石像也与达·芬奇和但丁的石像并列矗立在了回廊里。如果他生前看到表情严峻的自己的石像，又会做何感想呢？也许他会说："我的表情可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啊。"

说起韦奇奥宫，同韦奇奥桥一样，现在已经成为专有名词。市政厅建于14世纪，从面对广场的正面看去，从建成当初历经马基雅维利时代直到现代，看不出它有什么大变化。当初建造时依照城堡建筑的基本法则，一层很高而窗户很小，最高处排列着锯齿形的垛楼。700多年过去了，这些都未曾变化。镶嵌在高塔外墙上的巨大时钟，700年间也未曾停摆。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没有人有手表，每到上班、午休、下午上班和下班的时刻，塔上的大钟就会按时鸣响。

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面积与现代当无太大变化。只是那个时代，地上铺的不是石头而是红砖。在市政厅正面左侧，矗立着一座青铜骑马雕像。那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代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雕像，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并没有这座雕像。在靠近市政厅的地方，现在有一座海神喷泉群像，这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也是没有的。市政厅正门入口处，装饰着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巨大的大卫像。雕像

完成于1504年，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还不见影，后来却要天天照面。

马基雅维利时代已有凉廊，凉廊是带有屋顶的集会场所，建屋顶是为了不让下雨妨碍市民集会。现在，廊道里摆放着许多雕像，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除了多纳泰罗创作的友第德与何乐弗尼像外，这里还没有其他雕像。到16世纪中叶，佛罗伦萨作为城邦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君主国家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以后，不论是广场还是凉廊，都成为显示君主权威的展示场。

不过，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市政厅的主人还是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市政厅正门边上立着石狮子，前脚举着绘有红菖蒲的盾牌，守卫着市政厅。野生的红菖蒲是城邦佛罗伦萨的徽章。这座石狮子现在还立在市政厅前，只不过稍稍挪了挪位置。

如果不从正面而从侧面看韦奇奥宫，人们会发现这个宫殿后来扩建出来的部分与原先的建筑并不协调。扩建出来的部分大小接近原先建筑的一半，是大公国诞生以后的产物。韦奇奥宫现在仍然是佛罗伦萨市的市政厅，造访的人不只是游客。由于户籍科在那里，现在的佛罗伦萨市民每每需要证明书什么的，还是要来这里办理。除了市长办公室和接待室以外，大公国时代扩建的部分用于市政厅办公，共和国时代的建筑则向游人开放。两个时代只隔了半个世纪，人们却看到了在美的创造力方面的差距。当然，现在的户籍科在大公国时代的建筑物内。

这位无学历官僚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没走正门。正门只在外宾来访举行正式仪式或是有学历官员第一次上班时才会打开。正义旗手就任时自不待言，马基雅维利的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以及精英官僚圭恰迪尼第一次来市政厅上班时走的肯定是正门。圭恰迪尼曾经在佛罗伦萨、费拉拉及帕多瓦的多所大学学过法律，然后成为官僚。他的官僚生涯始于担任驻西班牙大使。他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才28岁，比马基雅维利任官时还小一岁。多年以后，他成了历史学家，也成了马基雅维利的朋

友。

韦奇奥宫正门朝西，宫殿两侧，南北各开一个侧门。没有上过大学的马基雅维利上岗的第一天走的应该是侧门。朝南的侧门现在正对着乌菲兹美术馆，从马基雅维利家的方位看，他每天早晨上班走的一定是这个门。市政厅的北面现在有两个门，靠近正面的门于1380年粉刷后封死，1910年才重新打开，因而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个门并未使用。靠东边的门是当时宫殿除正门外唯一通向广场的门。马基雅维利不是工作一完马上回家的人，傍晚下班后多半会跟同事三五成群，从回家相反方向的宫门出去，直奔小酒馆。

正门经常不开。进到里面不几步就是一条回廊，环绕着一个小中庭。中庭中央现在有一个喷泉，上面安放着一座韦罗基奥亲手创作的小天使像，怀抱海豚，煞是可爱。这也是16世纪中叶科西莫大公让人从位于卡雷吉的美第奇别墅中移来的。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里安放的是多纳泰罗创作的大卫青铜像。而这座大卫像也曾被放在佛罗伦萨市内美第奇宫的中庭作为装饰。1494年美第奇家族倒台，大卫像也被没收，放到了市政厅。现在，这尊雕像放在了国立美术馆。顺便一提，到处造喷泉的喜好是16世纪巴洛克的风尚之一。

韦奇奥宫那么高，包括二楼夹层在内却只有4层。每层的高度很高，现代建筑已经用不到那样的高度。在意大利，一进门的大厅层叫作地面层（piano terreno），而不是叫作一层。韦奇奥宫的这一层有一个带有中庭的回廊，还有一个拴马匹、放武器的泥地大堂。一层的一部分由税务和其他一般事务部门使用，二楼以上才有房间。那是韦奇奥宫的“一楼”，有用于召开共和国议会的“五百人会场”和“八十人委员会”开会的“二百人会场”，其他房间是正义旗手的私人用房。正义旗手在任期内必须住在市政厅内，这是义务。一楼与其上的二楼相连，中间有夹层。夹层的高度和大小完全可以住人。一楼“五百人会场”所占空间的上方不是二楼。因为“五百人会场”的天井很高，它高过夹层直达二楼。所

以，在二楼可以远远地俯瞰“五百人会场”。

除了被“五百人会场”占去的空间以外，二楼集中了正义旗手的办公室、接待室和各委员会的房间及秘书厅。如果说一楼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脸面，那么二楼就是它的大脑和心脏。这一层北面有一个大开间，叫作“百合厅”，墙上是漂亮的蓝底金色的百合花。大厅用雕塑和壁画装点得非常精美。在马基雅维利时代，这个开间也如今天所见的这般漂亮美观。这个大厅隔壁的朝北房间就是秘书厅的办公室。虽说这个房间朝北，但面对着领主广场开了三扇大窗户，面积比留到今天的还要宽敞，在里面办公感觉应该不差。从窗户往外看，不仅能看到广场上来往的行人，还能远远地正面望见布鲁内莱斯基造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和那坐落在红底上的白色棱线，美不胜收。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办公室。现在的导游图上，这个房间标着“Antica Cancelleria”（秘书厅旧址），房间灯光下有马基雅维利的一幅画像和一尊木制胸像。画像上马基雅维利的表情有些腼腆，而胸像则像护照照片似的表情呆板。辉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的象征——正义旗手办公室没有被保留下来，而一位普通官员的办公室却成了史迹，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文名隆盛，尽管500年来围绕他的著作争议不绝。

我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区域，可以说是邻居，到这里来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我经常会来这里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每当我看着马基雅维利的画像和木雕像总会忍俊不禁，好不尴尬。我每次发笑的时候，总觉得眼前的马基雅维利也会笑起来。马基雅维利有点不配受到如此祭奠，他自己比谁都更能感受到这一点。大体上说，他不是终日坐在办公桌前埋头于事务的人，他那份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29岁的马基雅维利供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组织机构如下：

第一秘书厅

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卢卡·费奇诺、奥塔维亚诺·达·里帕

第二秘书厅

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秘书长第一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与马基雅维利竞争国务秘书职位的三人中的一位）

秘书长第二助理 朱利亚诺·德拉·瓦勒

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巴托洛梅奥·鲁菲尼、尼可罗·瓦洛里

秘书厅还配有递送命令和情报的通信官员，相当于传令官和信使。

秘书厅分为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但在马基雅维利刚任职的时候，这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理解为合署办公更接近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当初划分时是这样确定的：第一秘书厅负责外交，第二秘书厅负责内政和军事。然而，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地方都一样，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总是划分不清的。后来设立了一个名称冗长的委员会——“和平与自由十人委员会”（后简称“十人委员会”）负责军事。这样一来，似乎第二秘书厅就只负责内政事务了，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合署办公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政府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并立的状态。我们只能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对外策略而已。原因是向外国派遣使节时，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头衔要比秘书长助理好听一些。实际上，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因这类任务的出差次数要远远多于第一秘书厅秘书

长。由于这个实际情况，两个秘书厅虽处并列状态，但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位和待遇都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之下。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也可视为秘书总长。他虽然只比马基雅维利年长5岁，但已是法律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当然是大学毕业，还是“豪华者”洛伦佐发现的大文学家波利齐亚诺的大弟子，被认为是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阶层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比马基雅维利早半年担任这个职位。他一边担任公职一边在大学执教，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即兴演说技巧高超著称，有诸多拉丁文著作，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传统知识分子。

从15世纪初期的科卢乔·萨卢塔蒂开始，到莱昂纳多·阿雷蒂诺、巴托洛梅奥·斯卡拉，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的最高负责人都是由佛罗伦萨顶尖知识分子出任的，这已成为惯例。选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出任这一职务，也是忠实地沿袭了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共和国市政厅事务厅局级别的长官虽不是正义旗手，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那可是共和国的“脸面”。而且，1502年以前正义旗手的任期都只有一年，辅佐正义旗手的大臣任期仅为两个月。所以，一旦当选为秘书厅的秘书长，通常都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到死，他有充分的理由一直保持这个“脸面”。萨卢塔蒂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0年，维尔吉里奥的前任巴托洛梅奥·斯卡拉干了32年。不消说，秘书厅的全体人员都是学士。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他不仅在思想上忠于秘书长的传统，在身体上也充分具备“脸面”的资格。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行为举止充满威严，相貌英俊，声音洪亮，穿透力强，是主持正式仪式的不二人选。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总是去做解释，这样做早晚会被那些重视自己亲眼所见、注重自我思考的人甩在一边。这是他的风险。但是，人类世界多数人遇事都是喜欢听貌似明快的解释，因而维尔吉里奥地位稳固。

马基雅维利作为维尔吉里奥的第一部下，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

体方面都与这位上司正好相反。马基雅维利中等身材，身体瘦弱，头颅偏小，相貌寒酸。他头发乌黑，油性很大，总是贴在头皮上。他双眸黢黑，炯炯有神，但举止慌忙，让人不敢恭维他威严庄重。他在座谈时常有明星范儿，但拙于在大庭广众之上演讲。他的嘴唇很薄，嘴角上翘，那曲线给人的感觉既似嘲讽又像愉悦。他体毛很重，只是在官服的掩盖之下不为人知。

在处理工作的方法上，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和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对比鲜明。维尔吉里奥偏于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做法，作为秘书长并不积极主动地揽工作。但他并非不重视自己的分内工作，他充分履行了自己作为官府“脸面”的职责。

马基雅维利则完全相反，分工不明确对他正好，他会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工作，还会自己揽活儿做。15年以后，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而官居其上的维尔吉里奥却被继续留用，这也是一个原因。

实际上，生龙活虎的马基雅维利很快就成了秘书厅的核心，秘书总长反而成了摆设。这也正是秘书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得以继续做官的原因。我在撰写马基雅维利此后长达15年的为官生涯时很震惊，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但我很少有机会写到他。尽管除了这位上司外，马基雅维利到处都有上司。

读着维尔吉里奥留下的字面漂亮的书信，我总感到这位知识分子精英官僚没能理解他的部下马基雅维利。这不是他脑子不够用，而是他对马基雅维利一生魂牵梦萦的事情关心不够。但这位上司一次也没有妨碍过这位与己不同的部下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有着一位理想的上司。

至于秘书厅的其他官员，不管是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马基雅维利也好，助理也好，普通官员也好，大家都是名副其实的职场伙伴，不存在

职位高低的差别。

对被派遣到外国去的人来说，这些伙伴是让他嗅到祖国气息的信息源。到了外国的人也不会忘记给秘书厅的人，哪怕是某一个人写信，聊一聊正式报告里不能写的俗话俚语。马基雅维利从出差地寄回来的信，大家一起看，总是很佩服。他们总是给马基雅维利写回信，告诉他他的信把大家逗笑了。读着回信，马基雅维利不由得露出微笑。秘书厅的工作到了下班时间也干不完，于是大家就把工作带到一个伙伴的家里一起干。已经结婚、生活有着落的博纳科尔西家就是大家经常的去处。这就是秘书厅除了“脸面”维尔吉里奥以外所有成员周遭的气氛。

我写出了博纳科尔西等所有马基雅维利同事的名字。他们仅仅因为是马基雅维利的职场伙伴而留名青史。当然，也只有他们才是马基雅维利的第一读者。作家没有读者便不能成长。

借用京极纯一[2]先生的话说，日本的官僚们就像贪心老太婆，什么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弄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这位29岁的“佛罗伦萨秘书长”不也有点像吗？尽管他不至于搞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但在像贪心老太婆一样什么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这一点上还是相当像的。

7月14日，马基雅维利当选第二秘书厅秘书长不满一个月，就又被任命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几乎就在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正义旗手两位秘书中的一位。这后两项秘书职务由正义旗手任命，不需经过议会投票。“十人委员会”秘书的任期为一年，可以连任。结果，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马基雅维利一直干着这个秘书。他担任正义旗手秘书4年后，正义旗手改为终身制，只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不说要换秘书，他的这个秘书职务也就会任期无限。而索德里尼从来没有说过要换秘书。

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这位官场的新人进入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中枢。也许人们会说这并非他个人所愿。不错，“工作”是上面派下来

的。但派给职位比他略低的同事博纳科尔西的工作也一样。博纳科尔西也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也曾短期做过正义旗手秘书。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工作量随着年头拉开了差距。这是马基雅维利工作得到认可的结果。拼命工作得到认可，得到认可更加拼命，这样，派给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工作充满热情当然是好事，但马基雅维利拼命工作能拿到多少薪水呢？

1498年，马基雅维利担任公职的同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体系做了修改。根据这个体系，我们所知道的人员收入情况如下：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年薪33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年薪19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年薪7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年薪8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年薪6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科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 年薪96弗罗林

上面的数字是通常称为“密封弗罗林”的小弗罗林[3]，如果换算成用于外汇市场的大弗罗林，马基雅维利的年薪是128大弗罗林，这样的年薪不高也不低，但比他不太有名的律师父亲要高些。年薪额因人而异，不一定与职位高低成比例，个中缘由实难理解。话虽如此，第一秘书厅秘书长是共和国事务机关的“脸面”，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却不是，二者的地位差距也反映在了薪酬差距上。

可是，根据1498年修改后的薪酬体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年薪是200弗罗林（指小弗罗林，下同），正义旗手秘书的年薪才192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身兼这两个职务，却拿不到合计的392弗罗林，只能拿较少的那份年薪，即192弗罗林。看来在500年前的佛罗伦萨也一样，就算“工作”量增加了，工资也不会加倍。尽管如此，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拿不到200弗罗林，而只能领取较少的192弗罗林那份薪水呢？这同稿酬一样，一经确定就很难再涨。所以我真想给他一个忠告，上任时应该好好谈妥。不过，也许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能够做上自己期盼已久的工作已经很好了，薪水多少随他去吧。于是这个年薪额15年间从未动过，尽管那个时代没有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官员的薪水情况。既然谈到金钱问题，我顺带对艺术家究竟能赚多少钱也产生了兴趣。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共和国官员的薪水大体也在这个水平。与支付给艺术家的金额做比较，我们不能只看私人委托的情况，要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公家委托的情况做比较。

在马基雅维利的任期中，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曾经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定制过艺术作品。向达·芬奇定制的是在“五百人会场”的一面墙上描绘安吉亚里战役[4]的一幅画作，在对面墙上描绘战斗场面的画作则委托给了米开朗基罗。我们本想以同样的壁画创作来做比较，但搞不清支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金额是多少，只好拿他第二年创作的巨型大理石雕塑《大卫》来做比较。比较均以弗罗林小金币计。

达•芬奇在壁画制作期间，政府每月支付月薪22.5弗罗林。完成时的支付金额不详。创作画稿用的纸张和创作工作室等的经费由政府承担。

米开朗基罗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政府每月支付月薪9弗罗林。完成时政府支付400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政府每月支付月薪16弗罗林，出差的各项费用由政府支

付。

达·芬奇因最终没有完成画作而未能拿到完成时应得的报酬。米开朗基罗花了两年半完成雕塑制作，按此计算，折算成月薪为22弗罗林。这位29岁的艺术新星风头正健，比新晋官僚挣得多。

有言在先，这种薪水比较是一种“游戏”。既然可供比较的史料不存在，严肃比较也就只能停留在游戏层面。而且，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艺术家或许比官员赚钱多，但上面的金额也只是像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名噪一时、无可比肩的艺术家才能赚到。二三流的艺术家只能拿到说得过去的报酬。毕竟，靠文化生财一般是做不到的。而靠实业生财的美第奇家族，举办一次长枪比武大会甚至花费了1万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仅仅拿了中等水平的薪水，况且不论如何被认可，也绝无可能晋升到更高职位，他为什么还会对工作抱有那么大的热情呢？

我想这是因为他就像一个贪心老太婆，什么都想揽在怀里，一旦揽进来又不肯撒手。秘书厅、正义旗手秘书、“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无法分清楚的。做正义旗手秘书可以了解在秘书厅所不了解的最高机密。有些情报眼下虽然还不是最高机密，但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最高机密。在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每天都能接触到这类情报。

马基雅维利并非只接触重要事项。作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他要以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大使的训令；作为正义旗手的秘书，他还得用同一支笔给尚未完成壁画创作便去了米兰的达·芬奇写这样不解人情的信件，请他回国完成画作，否则就要求他返还政府已支付的月薪。作为秘书长，马基雅维利还必须说走就走，踏踏实实地去出差，进行那些尚不至于派遣大使但很重要的交涉。

说起来，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事都要马基雅维利过目经

手，他所没有的只是足以代表国家的职位和决定政策的权力。从做大使起步的圭恰迪尼从驻在国西班牙写信回来，叹息情报太少。从这点看，不具晋升资格[5]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条件要好得多。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所关心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政的技术”（arte dello Stato）。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比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更有意思的职位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比接触最新情报更能刺激他的好奇心了。就算当不上大使，当个大使副官，他也有很多机会见到各国领袖直接交谈；就算没有政策决定权，制定政策时，他也可以根据自己接受、分析、综合的情报阐述意见。当然，建议是否被采纳则另当别论。何况，秘书厅的同僚对他的想法会给予积极活泼的回应，那是一伙让人愉快的家伙。29岁的马基雅维利欣喜而振奋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口中不时冒出“Ecco mil”的口头语。

我着实犯迷糊了，怎么翻译“Ecco mil”这句意大利语才算恰当呢？根据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状态，用他一贯的谐谑语气来表达的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马基雅维利，来啦！”

---

[1] 内阁官房，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负责整理内阁会议材料，处理内阁事务和收集情报。内阁官房长官为国务大臣，统辖与内阁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助手。

[2] 京极纯一（1924— ），日本政治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及校长职务。2001年被日本文部省授予“文化功劳者”称号。著有《政治意识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与政治学》《日本的政治》《日本与政治》等。

[3] 佛罗伦萨当时的货币弗罗林有如下区分。大弗罗林（fiorino largo），又称金弗罗林[fiorino d’oro（in oro）]，这种金币更大、更重一些。小弗罗林（fiorino piccolo），又称密封弗罗林（fiorino di suggelo，因经称量检验后被封在盒子或袋子里而得名），它因货币价值的波动而贬值。1500年时，1个大弗罗林值7里拉，而1个小弗罗林约值4里拉。

[4] 安吉亚里战役（Battaglio di Anghiari），米兰与佛罗伦萨之间发生于1440年6月29日的一场战役。此役，佛罗伦萨在安吉亚里以极小的代价击垮了来犯的米兰军队，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5] 在日本，通过某种国家公务员考试（如综合职、上级甲等或I种等），被选拔进入候补干部序列为中央政府部门录用的国家公务员俗称为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キャリア（career）]，

而其他公务员俗称为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ノンキャリア（non-career）]。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改革，考试根据学历分为“综合职”、“一般职”和“专门职”进行。合格录用后，经过一定的工作实践，根据本人意愿及人事评价，参加候补干部培养课程，在考试后决定是否进入候补干部序列。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在晋升和待遇方面与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有较大区别。因为日语中的“キャリア”有“具有学历”、“具有晋升机会”、“精英”等意，本书作者将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时下的日本情况做类比时，把有学历者视为有晋升资格者，无学历者视为无晋升资格者。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事情很偶然，就在马基雅维利任秘书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对他个人来说并非坏事，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则不是“不幸”这个词所能尽言的。“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沉醉于萨伏那罗拉掀起的大革命之中。整整6年欠下的账，不得不在这个时期全部清偿。

佛罗伦萨一直很孤立，这是它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走得太近的结果。那不勒斯王国、教廷、威尼斯共和国一直都对佛罗伦萨的动向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并没有因为萨伏那罗拉被处死而烟消云散。佛罗伦萨与法国国王的关系也很微妙，佛罗伦萨已经无力明确这种关系的走向。在意大利的孤立状态使佛罗伦萨对明确自己与法国国王的关系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又让自己的孤立状态得不到满意的改善。佛罗伦萨陷入了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了佛罗伦萨当时最迫切需要尽早解决的比萨问题上。

佛罗伦萨希望得到比萨作为出海口。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西欧经济霸主地位，从那以后佛罗伦萨人就一直力求将本国经济的突破口转向东地中海地区，出海口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直到“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结束时，巧妙的怀柔政策已经对比萨成功地实施了90年。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态度暧昧，踌躇不决，比萨趁机恢复了独立。重新领有比萨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最大课题。这个问题一直烦恼、折磨了佛罗伦萨人15年，直到1509年才得以解决。佛罗伦萨现在还有一句谚语：“宁愿死神来访，也不愿比萨

人站在家门口。”

这句谚语用于被迫进行二选一的时候。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会不由得苦笑。如果换成比萨人，他会怎么看？比萨一定会有调换了主语的同样谚语。

比萨问题之所以棘手大致有两个原因：

首先，尽管昔日的繁荣只给比萨留下了华美的教堂和斜塔可供凭吊，但在仅仅200年前的13世纪，比萨还是活跃在地中海上的四大海洋城邦之一。没有比领有一个曾经先进而今没落的国家更难的事了。实际上，比萨人对独立的执着，是那些从未登上过国际舞台的小国国民难以想象的。比萨不愧为曾经的通商国家，它在大国之间巧妙运作，顽强抵抗，使佛罗伦萨伤透脑筋。

其次是“豪华者”洛伦佐预见到的现实：小国问题很容易和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纠缠不清。而且，与曾经成功领有比萨的洛伦佐时代相比，国际关系早已物是人非。

教廷的军事力量还不成气候，但影响力不可小觑。教廷主人的宝座上坐的是波吉亚家族出身的亚历山大六世。亚历山大六世1492年即位以来，巧妙地渡过了查理八世的军事力量与萨伏那罗拉的言论相结合所造成的危机。他提倡并成功地建立起以抗击查理八世为目的的神圣同盟，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而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稳固的地位，帮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实现野心。

对教皇而言，佛罗伦萨领有比萨会使佛罗伦萨更加强大，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益处，既然这样，冷淡应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尽管佛罗伦萨最终埋葬了萨伏那罗拉，但他在台上的那6年中，这个国家一直在持续挑战亚历山大六世的耐心。亚历山大六世可以毫不吝惜地使用外交辞令，可他对佛罗伦萨不可能抱有好感。游离于神圣同盟之外的

佛罗伦萨根本不能指望波吉亚教皇会善意地关心比萨问题。

那不勒斯王国已经完全是敌人了。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目的就是征服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却热情欢迎。尽管这是萨伏那罗拉煽动的结果，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也不能原谅。

威尼斯共和国同样也是敌人。当时，威尼斯正围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自家基地与土耳其开战。我所戏称的“胡椒冲击”——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逼着威尼斯在经济方面紧急应对。威尼斯经济的昌盛是以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胡椒贸易垄断为支柱的，现在也走到了巨大的转折点。这时，如果佛罗伦萨把比萨作为出海口，在经济方面渗透进来，威尼斯又会怎样呢？不管让谁来考虑，肯定都会认为要予以阻止。事实上，威尼斯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向比萨提供了援助，这在物质方面撑起了比萨人的抵抗心。

引来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国原先似乎能与佛罗伦萨统一步调，现在也指望不上了。原因是查理八世于1498年4月亡故，继承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路易十二[1]主张米兰公国的主权由法国国王、耶路撒冷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共享。这也是当初查理八世所提倡的。路易十二认为，自己继承了一百多年前维斯孔蒂家族嫁给奥尔良公爵[2]的瓦伦蒂娜小姐的血统，现任公爵斯福尔扎家族是与瓦伦蒂娜的弟弟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孔蒂[3]的独生女结婚后才成为米兰公国主人的，自己做米兰公爵才更正统。如果是常人，肯定会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之极。然而，一国之王不是常人。主张主权之类的事情，大抵都把立足点放在此类事情上。不过，对现在的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拿这种谬论来胡搅蛮缠的对手是统率千军万马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国王。在这种时候，即使米兰公爵对佛罗伦萨重新领有比萨的事情充耳不闻，也在情理之中。

佛罗伦萨共和国甚至要用自己在意大利的孤立作为交换来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法国国王又是如何看待比萨问题的呢？

前面讲过，路易十二刚上台就表明了要领有米兰的意图。但是他即位后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同王后离婚，迎娶安妮·德·布列塔尼[4]，她是先王的未亡人，嫁妆是广袤的土地。这就得要罗马教皇批准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无效，否则，国王的离婚便无效。亚历山大六世当然不会便宜了这桩事。[5]实际上，教皇可以“高价”批准此事，但比萨问题对他们两人不值多大价钱。在法国国王眼里，佛罗伦萨是否领有比萨，说白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谁也不会去犯傻为这桩小事惹教皇不高兴。

法国国王企图征服米兰，把与米兰接壤的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拉到自己一边才更有利，而威尼斯并不希望米兰成为佛罗伦萨的掌中之物。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难道不知晓这种现状吗？非也，他们十二分清楚。但他们仍然要把领有比萨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也许应该说他们摆脱不了法国国王。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上任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他作为一个完全没有主导权的国家官吏，在此形势变化之际走马上任了。在他任官的第一年，主要工作就是外交和军事。他的第一次“出差”也是为了比萨问题。

马基雅维利上任还不到一年，又是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吏，并不担心第一次去哪里出差会给他以后的前程带来什么影响。所以，交给他的第一次对外交涉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向一位佣兵队长传达政府的意图。交涉在佛罗伦萨境内进行，甚至没有让马基雅维利带上派遣使节必备的国书。他的任务仅仅是去蓬泰代拉，到大本营设在那里的雅各布·达·阿皮亚诺处，向他传达佛罗伦萨共和国同意这位佣兵队长提出的增加佣兵费的要求。

蓬泰代拉在佛罗伦萨城区西面，沿亚诺河向西约70公里。佛罗伦萨城围着城墙，城墙上开着11个城门。出了离亚诺河最近的圣弗莱蒂亚诺

门，朝比萨方向沿河走，便能到达蓬泰代拉。这次出差只能住一宿，距离较远，所以他可能是骑马去的，但一定是他一个人。通常外出交涉，出发时都会带上一个称得上是外交信使（corriere）的人员同行，以便携带报告紧急返回。而这一次的任务只需他回来后自己报告就行，所以一人足矣。马基雅维利劲头十足，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佣兵队长。佣兵队长这类人虽然可能带来种种弊害，但眼下佛罗伦萨又缺不了他们。

雅各布·阿皮亚诺是第勒尼安海边小国皮翁比诺的领主。小国的领主为了赚钱和保障本国安全，会到大国当佣兵队长。这在当时的意大利很普遍。佛罗伦萨为攻打比萨组织了军队，阿皮亚诺加入进来，成了一个佣兵队长。佛罗伦萨军队本身就由佣兵队拼凑而成，所谓佣兵完全不是用来补充兵力的意思，而是正式军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涨价。

佣兵制度是14、15世纪意大利的特色之一。简单说来，队长的实力和与之相应数量的兵员、战斗所需的武器构成了佣兵队，指挥佣兵队的佣兵队长与雇主国家签订雇用合同。这就是佣兵制度。合同期通常为一年，若无问题，第二年自动延续。这种佣兵制度需求不绝，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因为是城邦，城市占据了国家的中心位置。城市里的居民自然多数从事商业和工业，这些人是市民中的主流。在日本，大家知道法语词“bourgeois”（有产者）指的是市民阶级。在意大利语中，这个词就是“borghese”，词源可能来自日耳曼语，意思是居住在城墙围起的城市里的人。

因为天气原因，当时的战争通常在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进行。但这段时间恰好是“市民”们工作的最好时间，不可能把他们赶上战场，如果这样还不如不打仗。但是直到20世纪的今天，也从来没有以不合理为由成功躲过战争的案例。在最适合工作的季节，将年龄最适合工作的男丁

驱向战场，将会招致经济的疲敝。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市民们专心工作，把工作所得利益的一部分作为税收，用于雇用专门从事战争的人，让他们负责打仗。由于这种佣兵制度的普及，意大利的所谓战争都是佣兵打佣兵。就拿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它的海军全由本国人组成，但它的陆军也引进了在意大利占主流的这种制度。

有需求就有供给。意大利各国在最适于工作的季节充分利用最好年龄段的男丁，使得国家非常富裕。不少专业打仗的人都从德意志和英吉利到意大利来讨生活。不过，在这些佣兵队长眼里，手下的士兵是很好的机器。既是机器，当然希望尽量不要有损伤。这样的结果是，战斗轰轰烈烈，却只有一人因从马背上掉下而摔死，于是战争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布克哈特[6]给这种战争起了一个名字："作为艺术作品的战争"。

这种艺术的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满足了所有人。市民们得以专心工作，国家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打不得不打的战争。战争都是事先已串通好的，敌兵也很自律，就连那些不被当成"有产者"的农民也不用害怕打败被抢。而在欧洲其他国家，打了败仗必定会遭到抢掠。小国领主和无主流浪汉靠承包战争也能活下去。像米兰公爵斯福尔扎那样，靠着运气和才能，还能打开一条当大国主人的通途。著名的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不过是佣兵队长出身，他成了发迹于佣兵队长的第一人。

这个稀里马虎却又深得人世间精妙的愉快制度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遭到了沉重打击。当时的法国与城邦林立的意大利不同，中央集权发展很快。但在意大利人看来法国仍是后进国家，经济方面也是意大利富裕，当时意大利人都看不起法兰西人。但法兰西人有个传统：打仗毫不含糊。这些法兰西人毫不含糊地打进了意大利，给了意大利人沉重的一击。查理八世的军队不怕被骂成"非艺术"，干的是彻头彻尾的掠夺和暴行。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马基雅维利成了热心的反佣兵制度论者。这与查理军队来袭引起的变化不无关系。不过，要彻底改

变这个200年来运行良好的制度，无论何时、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法军入侵4年后的1498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去见佣兵队长。

这次出差没有留下报告，也许是返回后只做了口头汇报。若干年后，他对雅各布·阿皮亚诺有过以下简短评价：

“这个人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

佣兵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由于雇用双方是合同关系，“武将一言为定”的做法行不通。尤其比萨战争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已被彻底看透，情况最为糟糕。马基雅维利工作的最初几年，时间都耗费在了与多半是“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之人的佣兵队长的交涉之中。这也反映了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境况。

他的第二次出差也跟佣兵合同相关，只不过这次的交涉对手是个女人。与前次只是传达政府的决定不同，这次他被委以交涉任务。所以这次出差是30岁的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首次对外交涉。

马基雅维利创立了“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些听上去令人恐怖的政治哲学，直到20世纪的今天还遭到善男信女的唾弃。当时的他那么年轻，就要面对一位女性谈判对手，这件事刺激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家们。马基雅维利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写下了数量庞大的报告，有些学者从未通读过这些报告，却瞪着碗大的眼睛阅读这次出差期间他写的报告，还写论文论述马基雅维利被耍弄了，或没被耍弄……每当我这个女人读到这种研究论文时都觉得可笑之至。不过我认为，如果对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他们就不会如此热情地去议论了。我能理解，虽是女人，但这女人毕竟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马基雅维利见到卡特丽娜的时候，她已36岁，正似鲜花盛开，艳美夺目，光彩照人。她面庞美丽，身材优美，尽管生过十多个孩子，依旧

魅力慑人。她是前任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庶出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结了婚。这人是“帕齐阴谋”的首谋者之一，因而一直受到“豪华者”洛伦佐执拗的追杀，最终被暗杀身亡。于是，她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但她似乎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因为丈夫并不爱她，一味地粗暴待她。暗杀是家臣所为，弗利、伊莫拉这些小国领主的地位因此岌岌可危，这才是对她的严重打击。反叛的家臣将她的孩子掳为人质，以为有孩子当人质，这位伯爵夫人就会俯首听命。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一般女人就此也就屈服了，但卡特丽娜并没有屈服。她逃进了城

堡，叛乱者威胁说再不出来就要杀死孩子。这时，她出现在城墙上，呼地撩起裙子，大声喊叫：

“你们这些王八蛋！知不知道，孩子，老娘以后靠这里想生多少有多少！”

这是所有意大利编年史作家都会不惜笔墨浓书重彩描写的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只有25岁。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之后，她终于成功地镇压了家臣的叛乱。后来，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又曾两次同自己所爱的男人结婚，却又两次成为寡妇。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女人，被赞誉为“意大利第一女人”和“意大利女杰”。

女人用纤弱的手保卫国家，通常会给人以拼命决死的印象。但有意思的是，这位大胆而美艳的伯爵夫人甚至让人感到游刃有余。同一年，就在马基雅维利见过她后不到几个月，她遭到了切萨雷·波吉亚军队的攻击。在围城战最激烈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在投入敌阵的石弹上写下这样的话：

“打炮能不能悠着点儿，别把你们的蛋蛋玩崩了。”

当时的男人不喜欢伪善的优雅，所以，这样作为的女人在他们中人气颇高。法兰西武将以奉献骑士精神的纯真爱情而闻名。就算她没有名气，也会在他们中间拥有众多倾慕者。马基雅维利的同事博纳科尔西也是她的倾慕者。他给在弗利出差的马基雅维利写信通报情况时，还顺便加上了一笔：

> 帮我找一幅伯爵夫人的画像，回国时带回，价格高不要紧。画像不要折叠，要卷好带回。

切萨雷·波吉亚刚打完胜仗便把手下败将卡特丽娜带到自己的住

处，当晚和第二天一整天都和她闭门不出。这个事实引起了倾慕者们的极大愤慨，纷纷谴责这是在趁胜强奸。切萨雷当时24岁。教皇的这位儿子是个美男子，这次是初上战场。但他很快就会搅乱整个意大利。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写到这位卡特丽娜时曾经说过，我很难附和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强奸说法。我这种想法后来愈加强烈。随便怎么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自己选择男人，一向都选年轻的美男子。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谈判对手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年方30岁的独身新手秘书与36岁的“意大利女杰”相互面对，即使是外交工作，是否被耍弄的议论也会沸沸扬扬。这些暂且按下不表。马基雅维利带着国书，沿着夏天的山道向北而去。这次的任务是交涉，他带了一个飞毛腿信使帮他传送报告。

弗利城在佛罗伦萨北面，翻过亚平宁山脉就到。这一带是罗马涅平原，古罗马时代的艾米利亚大道从濒临亚得里亚海的里米尼开始，经博洛尼亚一直到帕多瓦。这一带正是这条大道通过的地区。从里米尼往西北方向直到博洛尼亚，切塞纳、弗利、法恩扎、伊莫拉等城市一线排开。这些城市都是古罗马时代沿大道形成的。古罗马时代，罗马涅是罗马与行省的边界。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这里名义上属于教皇国，实际上却是小君主国林立。这也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也是小君主之一。

然而这些小国位于佛罗伦萨与强国威尼斯共和国的边境地带，仅此一点对佛罗伦萨而言就非常重要。人所周知，“豪华者”洛伦佐生前极力推行势力均衡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法恩扎领主曼弗雷德。这些小国越是安然无恙，佛罗伦萨就越不用发愁没有“堡垒”。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真正的任务所在。这次出差也与比萨问题有关，尽管是间接相关。

从佛罗伦萨去弗利，沿着东北方向大约有120公里的路程。马基雅维利上次出差是沿着亚诺河往下游走，可以骑马一气到达。这次却不同，他要在夏天翻越亚平宁山脉。马基雅维利于7月13日出发，7月16日

到达弗利，途中在卡斯特罗卡罗村稍做停留，检查了武器弹药的现存量，并向佛罗伦萨发去了报告。

使节如果携有政府签发的国书，只要事情不是十分紧急，到了目的地以后，通常是先找住处，在那里洗漱干净，换上官服，然后再去政府官厅或者王公宫殿求见。这是一般的程序。大使级别的使节一般都是先派副使去求见，但马基雅维利没有副使，从找住处开始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做。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午到达后便早早去了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请求伯爵夫人立刻接见他。他已听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上午有事，会见安排在了下午。

一般来说，把副使级别的人当正使外派，说明任务不太重要。马基雅维利这次的工作是更新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跟第一任丈夫所生长子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之间的佣兵合同。

奥托维阿诺很年轻，但作为武将毫无所长，不像他那身穿铠甲亲自统率军队的母亲。但一年前，佛罗伦萨还是如伯爵夫人所愿，与这位年轻人签订了佣兵协议。奥托维阿诺是参加比萨战役的佣兵队长之一，但没有实际参战。佛罗伦萨与他签约是为了与领有弗利和伊莫拉的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签订佣兵协议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这位弗利年轻人的佣兵费是一年1.5万弗罗林。

这份佣兵协议到期时如无问题将自动更新。但伯爵夫人传来话说没有更新的意思，可是过了一阵子她又说还是想更新。于是，佛罗伦萨决定派马基雅维利来弗利一趟。马基雅维利接到的命令是可以续签佣兵协议，但佣兵费要限制在1万弗罗林。

根据马基雅维利自己写的详细报告，那天下午终于见到了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在米兰来的顾问陪同下接见了这位佛罗伦萨的秘书长。这表示她在会见马基雅维利前就已经考虑好了如何对付这位佛罗伦萨使节，而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递交国书后，马

基雅维利口若悬河，说佛罗伦萨共和国认为弗利的伯爵夫人如何如何重要，如果能使夫人满意佛罗伦萨将高兴地续约，他甚至把佣兵费如果定为1万弗罗林便不会有问题的内情都说了。要是我，肯定会裁定这时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牌局一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底牌亮给对手的赌徒。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不愧是一位老手，头脑冷静，显示出丰富的经验。等急于求成的年轻秘书长讲完，她说道："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嘴上让我满意，行动上却正相反啊。"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绵里藏针地开了腔，然后直奔主题，说："你们说友好友好，还不是因为我的领国在你们与威尼斯的中间起了缓冲作用嘛。"

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晚，夫人的秘书造访了马基雅维利的住处，虚情假意地告诉他，米兰公爵也让伯爵夫人派兵，老缠着要回复。他们要骑兵50骑、石弓手50人。派给米兰还是派给佛罗伦萨，这是夫人早晚要定的事。这人肯定是卡特丽娜派来的。新手秘书长把这些情况逐一向政府写了报告。这是第一份报告，落在纸上长达5页。马基雅维利逗留了8天，这样的报告竟有7份之多，等于他每天都在写报告。不过，本国政府发来的训令也多达5份。

不光是看，还能把所见周详地写下来，说明作者把所观察到的东西装进了大脑，缜密思考过。小国命运脆弱，其君主即使能力卓越也难有作为。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在弗利逗留的8天时间里，对这种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即便对方不是漂亮寡妇，他可能也会下意识地觉得被她耍一下也不要紧。他在报告中评论自己的对手说，她气质高雅，判断任何事情都放得开。伯爵夫人取消了会谈，说她1岁的儿子生了病。马基雅维利信以为真，在报告这件事时，笔下还流露出了一丝同情。这孩子是美第奇家族旁系的乔凡尼担任佛罗伦萨驻弗利大使期间与伯爵夫人坠入情网、结婚后所生的孩子。恐怕这也是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心怀好感的原因。乔凡尼·德·美第奇有美男子的美誉，却没有等到儿子诞生就去

世了。

这时的婴儿日后成长为一名武将，外号叫“黑条”乔凡尼[7]，名声很大。他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一缕“希望之光”。然而希望没有成为现实，乔凡尼英年早逝。他的儿子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第一任大公科西莫一世。

言归正传。1万弗罗林的佣兵费谈不下来，马基雅维利便请示本国政府，问能不能在1.2万的底线上妥协。佛罗伦萨政府习惯于将佣兵费交涉等同于贱卖香蕉，给了肯定的答复说可以。

伯爵夫人认为：“与其讨价还价，不如拿出结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马基雅维利顺利地签订了与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的佣兵协议。

当然，马基雅维利也没有一味地让步。卡特丽娜主张，佛罗伦萨要承认弗利是自己的同盟国，对于侵犯伯爵夫人领国的行为，无论是哪个国家所为，佛罗伦萨都应派出援军予以支援，并要正式写成文书。但马基雅维利对此没有让步。本国政府指示他，在对弗利的关系方面要含糊其辞，绝对不可明确佛罗伦萨的立场。马基雅维利遵守了这一指示，不过他采用的是“走为上”的方法，没有一味死守。

7月25日早晨，马基雅维利早早地离开了弗利。他按照训令再次前往卡斯特罗卡罗稍做逗留，然后返回佛罗伦萨，并于8月1日回到佛罗伦萨。博纳科尔西要他卷着带回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画像，希望他没有忘记。

连同这次在内，马基雅维利出差总共超过30次，所有的出差报告装订成册有3卷之多。不仅是这些公函，私人书信往来也很频繁。每每读到这些，我就会深深地感到，若不是笔头勤快还真做不了这500年前的官。在那个时代，电话电报还都是梦想，更别谈电子办公机器，只能靠

手写。看着他们写下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如何考虑对外交涉与情报之间的关系，意味深长。

马基雅维利到乍看上去与国际关系无关的小国去交涉佣兵费，却能发回与大国有关的情报。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报告中附上了佛罗伦萨驻威尼斯大使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8]寄给本国政府报告的抄本，还有罗马的情况、法国国王的动向以及与弗利有叔侄关系的米兰公爵的情报，一样都不少。特别是关于威尼斯，马基雅维利对其与土耳其战争的进展情况写得非常详细。

这是因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如何应对佛罗伦萨不能不受到威尼斯和米兰动向的左右。土耳其越难对付，威尼斯在意大利内部的行动就越迟钝，弗利的缓冲作用自然就会降低。此外，法国国王对米兰公国的动作越活跃，伯爵夫人的伯父就越靠不住。这样交涉就会变得对佛罗伦萨有利。负责交涉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在十分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谈判。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身陷如此处境，却成功地把佣兵费从1万弗罗林涨到了1.2万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还是吃了些小亏。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发来的报告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厅受到好评和欢迎。他的报告在观察、分析、判断、预测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的报告不仅供秘书厅阅读，还呈送给正义旗手和阁僚以及“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的成员阅读。马基雅维利的第一次出差成功了。

不过，有人拍手欢迎，也有人听了这掌声不开心。上任一年，30岁的马基雅维利就在职场上引起了摩擦，让人惊讶。反马基雅维利的领衔人物是第一秘书厅秘书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瓦勒被称为“先生”，应该是大学出身。这位安东尼奥先生在政府中四处说大话说：“要是我去，我会更加大胆地干。”也有些人赞同他的论调。博纳科尔西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细细地描述了秘书厅的这种气氛。读着这些信，我会感到任何时代都一样。那么，马基雅维利又是怎

么想怎么处理的呢？马基雅维利这个时期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过观察他以后的言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事。因为马基雅维利“错误”连连，而一个能跟周围巧妙地和谐相处、把自己地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人是不会犯那些错误的。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小14岁，这时他还是个少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仕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逐步登上了官僚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他在《备忘录》（Ricordi）的非公开书籍中这样写道：

> 在佛罗伦萨，想博得人们好感的人必须小心，绝对不能得到有野心的评价。而且，无论事情再小，也不要让人感到你比同事更优秀，更引人注目，或是更干练。因为在一个最重视平等、充斥着嫉妒念头的国家，没有比自己想与众不同、被人认为远离平凡更致命的不利了。

这位精英中的精英官僚也只限于在非公开的场合才这样明明白白地去写。而马基雅维利似乎与他是完全相反的人。

在马基雅维利还没有因写自弗利的报告备受关注以前，他还受“十人委员会”的委托以答辩的形式，就佛罗伦萨人最为重视的比萨问题写过一篇论文《论比萨事务》（Discorso sopra Pisa）。文中的论考大胆而直率。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 佛罗伦萨如果还希望自由，那它就必须再次领有比萨。

哎哎，请别先贸然断定这就是超级鹰派言论。“如果还希望自由”这句话不过是当时的一句口头语。我们再看下面数行文字：

> 我相信你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没有必要再一一

细述理由。我只在这里讨论为达到再次领有比萨这个终极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两方面的可能性，是依靠武力还是依靠爱，是军事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马基雅维利接下来追溯历史，分析了比萨和比萨周边的各种情势，论述了军事解决和和平解决何者更加现实。最后，他明快地下结论道：

根据以上的理由，要达到再度领有比萨的目的，只能依靠军事解决。

接着他阐述了既然只能军事解决，那么应该如何推进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没有通篇局限于士兵、大炮等硬件方面的讨论。他在更广的意义上思考了包围战，提出了具体方案。作为军事解决方案，当然不能缺少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具体办法。于是马基雅维利逐个详述了攻击据点和每个据点应该配备的部队规模。

这一切所需的经费，相当于每个月雇用1000名佣兵的水平。

马基雅维利甚至没有忘记考虑经费，让人感到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下面拥有一位经验老到的秘书。不过，他的本意明显是主张积极战法。他建议，抵达比萨城下，准许妇女、儿童和老人撤离后要果断投入全部军事力量。

这篇论文只有4页半，可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处女作。如果说处女作包含了作家未来的一切，那么可以说，这篇《论比萨事务》也完美地体现了贯穿于马基雅维利全部作品的特色。当代研究马基雅维利的第一人费代里科·卡博德[9]这样评论道：

这篇论文已经让我们接触到了马基雅维利独特的论述方法，这就是摆出可以选择的方法，分析这些方法可能引发的情况，使用具体例子说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里不允许半途而废，不存在妥协。

这篇小论文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人人皆知。佛罗伦萨政厅里多半是有教养的人，撰写著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不论是编年史、历史叙述，还是诗文，他们都会写。但这篇论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章写法，与同时代人同样的咨询报告相比高下立见。仅让人爱读这一点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不过，有人佩服就会有人反对。我觉得，秘书厅分裂成马基雅维利派和反马基雅维利派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在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正义旗手、执政团、“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各个层面，还没有反马基雅维利的动向。在他们这帮精英眼里，马基雅维利再耀眼也不过是无名小辈，只有他们这些人才对马基雅维利报告操有生杀大权。在1499年这个时段，马基雅维利的提案只通过了一半，和被废弃并无两样。不过，政府上层还是决定重用这位写了亮眼咨询报告的年轻秘书。马基雅维利刚从弗利回来就受命专司比萨问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

[1] 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法兰西卢瓦卢王朝国王，1498—1515年在位，被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

[2] 奥尔良公爵，即（瓦卢瓦的）路易一世（Louis 1er de Vallois,1372—1407），他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之子、查理六世之弟，于1392年受封为奥尔良公爵，1398年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351—1402,1395年成为第一任米兰公爵）之女瓦伦蒂娜（Valentina Visconti，约1371—1408）结婚。

[3] 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392—1447），瓦伦蒂娜的同父异母弟弟，1412年成为米兰公爵。他是维斯孔蒂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后代，他的唯一继承人、独生女比安卡·玛利亚·维斯孔蒂（Bianca Maria Visconti,1425—1468）1441年嫁给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弗朗切斯科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4] 安妮·德·布列塔尼，即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de Bretagne,1477—1514），是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Francois II）的独生女，于1488年继承了公爵领地。她先与后来成为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结婚，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害怕布列塔尼落入他人之手，便发动进攻。她被迫于1491年解除了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婚姻而嫁给查理八世。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后，她又嫁给了继位的路易十二（查理八世的堂叔）。

[5] 路易十二为保有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公国而与法兰西的让娜（Jeanne de France,1464—1505）离婚，并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1498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路易十二为此做了一笔交易：教皇解除路易十二与法兰西的让娜的婚姻，而路易十二册封教皇之子切萨雷·波吉亚为瓦伦蒂诺公爵（Duc de Valentiois），封地在瓦朗斯（Valence），并援助他征服罗马涅。瓦伦蒂诺公爵是路易十二为切萨雷·波吉亚创设的爵位，“瓦伦蒂诺”是波吉亚家族发迹地瓦伦西亚（Valencia）的昵称。

[6]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okhardt,1818—1897），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重点研究欧洲艺术史和人文主义，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Ranke）。布克哈特曾长期担任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曾是他的学生。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等。

[7]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Medici），父子同名，父亲称为“平民”乔凡尼，儿子因作战勇猛，成为教皇认可的佣兵队长，称为“黑条”乔凡尼。“黑条”乔凡尼死于1526年与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军队的作战中，时年28岁，此时他的儿子、后来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任大公科西莫7岁。

[8] 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Giovan Battista Ridolfi,1448—1514），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外交家。他曾是萨伏那罗拉的支持者。1512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被驱逐流亡后当选为正义旗手，后去职。

[9] 费代里科·卡博德（Federico Chabod，又译查波德或沙博，1901—1960），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灵大学毕业后去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德国学者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意大利多所大学任教。著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导论》《欧洲思想史》《意大利对外政策：1870—1896》等。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归来后看到，佛罗伦萨完全笼罩在战争氛围中。不知是否是受他那篇处女作论文的启发，政府终于朝着军事解决比萨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499年6月，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佣兵队长保罗·维泰利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庄严的拉丁语演说中就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市民们以为终于要解决比萨问题了，于是忘记了以前的不满，注视着这一切。市民们以前一直不满于花了太多的军费，成果却不理想，把“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戏称为“征收与浪费十人委员会”。他们祈祷早日解决比萨问题，在这点上一点也不逊于政府高层。

在这种形势下，“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特别繁忙。对“浪费十人委员会”的恶评搞得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委员选举都无法进行，1499年下半年，“十人委员会”已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马基雅维利必须在没有顶头上司的情况下工作，只能从正义旗手和执政团成员那里接受指令。这时，战争爆发了。

8月6日，佛罗伦萨军队攻到比萨城下，展开了炮轰攻势，成功地把城墙撕开了一个20多米的口子。8月10日，又攻陷了一座守卫城墙的堡垒。在佛罗伦萨，人人都相信这就等于再次领有了比萨。

就在这个时候，最高司令维泰利却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撤退。虽然只是命令自己属下的士兵撤退，但既然是最高司令下令撤退，其他佣兵队长也就无法再动。城市巷战兵力损失巨大。明知这种战斗会损失“设

备”，还有哪个“资本家”会自己冲锋在前呢？比萨前线处在一种奇妙的胶着状态。很快，有士兵由于疟疾而病倒，各佣兵队长纷纷撤兵，到9月14日，攻势彻底瓦解。

比萨人松了一口气，佛罗伦萨人却怒火爆发了。政府需要在怒火转向自己以前想出对策。

9月29日，大本营设在卡希纳的保罗·维泰利被捕，被带到韦奇奥宫。他的罪名之一是秘密勾结威尼斯共和国和皮耶罗·德·美第奇，被判叛逆罪。第二项罪名是无故临阵脱逃，让参加比萨防卫的一名敌方佣兵队长逃脱。维泰利受到拷问，但死活不承认第一项罪名。对放跑敌人佣兵队长一事，他说自己不忍看到有力量的人物被杀。

夜已阑珊，民众却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不愿散去，他们要求正义。市民要求的所谓正义，多数场合与处死是同义词。他们要求尽快执行。10月1日，保罗·维泰利在市政厅内被处死。市民终于出了一口气，各自回家去了。

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不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认为维泰利无罪，而历史学家纳尔迪则认为维泰利有罪。当时，收集情报能力最强的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没有讨论这件事是否与己有关，但报告说维泰利疑似与美第奇家族有密约。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持什么态度，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

然而，可信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政府以执政团名义发出的相当数量的指示和训令，无论是从文体还是从词语的选择上看都出于马基雅维利之手。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则马基雅维利完全知晓国家的最高机密。与当时还是一介市民的圭恰迪尼、纳尔迪不同，马基雅维利身处政府中枢，并不缺乏判断事物所需的情报。他撰写了大胆而直率的咨询报告

《论比萨事务》。他说话也一样大胆而直率，也许他确实进言应该对维泰利处以极刑。威尼斯也有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佣兵队长因犯背叛罪而被处死的案例。对当时佣兵队长中有很多人就得这样杀鸡儆猴，否则就甭想指望他们会有忠心。

自己的军队不战自灭，比萨问题却不能不解决，佛罗伦萨共和国只能再次召集佣兵队长，重新组织军队。这种时候，政府上层想要依靠的还是法国国王。他们请求国王分些兵力给他们。说是分，实际上是佣兵，由佛罗伦萨出钱雇用。不过，佣兵是由佛罗伦萨自己张罗，还是做成法国国王援助的形式，政治意义差别巨大。

米兰公爵“摩尔人”要以最不幸的方式收获自己在5年前播种长成的恶果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先王查理八世完全不同。他们同是安茹家族的子孙，都主张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但路易十二丝毫没有想拿下那不勒斯以后以那里为跳板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只想要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领土，就同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维斯孔蒂家族的血统，要拥有米兰公国主权一样。“摩尔人”创下了让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先例，他并不知道法国国王已把入侵意大利的第一目标变成了米兰。对路易十二来说只有行动，而且越早行动对自己越有利。

“摩尔人”连防御战都没有时间准备，他只是听到法军在边境集结的消息，就带着巨额金钱逃到德意志去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是“摩尔人”侄女的夫家，“摩尔人”认为他不会坐视对手法国国王取得成功。1499年9月11日，法军没有受到像样的抵抗，就进入了米兰城。

这样一来，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要保持行动的一贯性便是做梦。佛罗伦萨政府赶紧派出特使，向路易十二表示祝贺，同时请国王帮助攻打比萨。佛罗伦萨曾经请求米兰公爵帮忙攻打比萨，但事到如今已经管不

了那些了。10月1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就此签订了协定。协定内容如下：

佛罗伦萨有义务向路易十二支付他进攻那不勒斯所雇用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的佣兵费，共计5万弗罗林；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进攻那不勒斯准备500名骑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持续占领米兰提供4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

同时，法国国王同意，在他开始进攻那不勒斯之前，佛罗伦萨可以自由使用国王手下军队中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但使用期间的佣兵费由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有义务向佛罗伦萨归还其在查理八世时代被迫放弃的要塞中尚未归热那亚所有的那部分要塞；法国国王承诺，绝不参与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阴谋；法国国王承诺，佛罗伦萨商人在法国国内继续享有其传统权利。

这就是法兰西与佛罗伦萨友好关系的实质内容。佛罗伦萨按国王所愿，完成了3个月内分期支付了5万弗罗林的所有安排。实际上，佛罗伦萨通过住在米兰的本国银行家在1499年内支付了将近一半的金额。国王催促佛罗伦萨加紧支付余下部分。转年进入1500年后不到一个月，催促付款的文书已然变成了有威胁意味的文字。

就在这时，政府决定派马基雅维利去米兰。当然，给他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说明佛罗伦萨经济状况恶化了，只能按照协约规定的时间支付。不过，这趟出差突然取消了。

法国国王催命般的催促事出有因。国王得到消息，逃到德意志去的“摩尔人”已在米兰边境集结了8000名瑞士雇佣军。还不到一个月，即2月5日，“摩尔人”率领瑞士步兵团进入米兰城的消息就传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政府紧急通知原本负责给法国国王付款的银行家波尔蒂纳里改任使节，去“摩尔人”那里祝贺他成功返国，同时命令马基雅维利中

止出差。我们后世只能看到这份本该由马基雅维利带着出发的国书了。签发国书与“摩尔人”返国的日子是同一天，这证明那个时期风云变幻有多么急遽。

形势还在突变。4月，瑞士雇佣军反水，“摩尔人”反被囚禁，这时离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摩尔人”雇用的瑞士步兵与法国国王雇用的瑞士步兵串通，得知法国国王出的佣兵费更多，便抛弃了“摩尔人”。佛罗伦萨又去祝贺法国国王夺回米兰，再次根据协约安排付款。不过，佛罗伦萨又可以攻打比萨了。

马基雅维利没能去成米兰，却被派到比萨前线，法军刚刚开到那里。这是1500年6月初的事情。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于5月19日去世，但服丧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的母亲已于4年前过世。

1500年的这场比萨战役最能反映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无能和由此带来的困境。

奔赴前线之前，4000名瑞士步兵和2000名加斯科涅士兵在预定的集结地帕尔马集结。法国国王承诺派遣5000名瑞士兵，但只派来4000名，国王违约了。违约行为还不止于此。列队点数后发现总人数多出1500人。但向国王求助的是佛罗伦萨，谈好的佣兵费是瑞士兵每人3达克特、加斯科涅兵每人2.5达克特。可这多出的1500人不能扔下不管，只好按定价付钱。

可是，让这7500名士兵向比萨进军，法国国王手下的这些大兵却不干。本来只需从帕尔马南下即可，他们却偏要朝东南方向，绕道博洛尼亚、米兰多拉、科雷焦、卡普里这些和比萨战役毫无关系的地方，白白浪费了近两个月。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法国国王关心的地方。路易十二是在用佛罗伦萨的钱炫耀自己的肌肉。6月22日，法国国王的兵好不容易到了比萨前线，开始抢掠周边地区，一发而不可收。指挥官是国王手下的武将博蒙，却搞不清他是打算指挥还是不打算指挥。比萨请求媾和，

雇主佛罗伦萨却只想军事解决，要求他积极用兵打仗，这位佣兵队长竟不知所从。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罗伦萨向前线派出了两名顾问，去监督前线情况。可是，他们的处境比通常使用佣兵队长的战争更差。

因为佛罗伦萨政府绝对相信法国国王的“帮助”，解散了全部的意大利雇佣军，理由是不能付两份钱。这导致了法国国王手下大兵为所欲为。掠夺比萨周边地区对策划占有比萨的佛罗伦萨并无益处，只能起到反作用，让包括卢卡在内原本亲佛罗伦萨的这一地区燃起反佛罗伦萨的情绪。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两名顾问卢卡·德利·阿尔比奇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副官，处在这场战乱的漩涡中间。马基雅维利不像阿尔比奇和里多尔菲那样出身于佛罗伦萨的顶尖名门，他甚至不能安寝一地，要从前线返回佛罗伦萨报告情况，政府根据这些报告发出训令，他是秘书长还要起草这些训令，再把训令带到比萨。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这里且举一例。6月22日，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以“十人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顾问的训令；6月24日又在前线，以两名顾问的名义起草了给“十人委员会”的报告。马基雅维利身兼二职，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没过多久，顾问之一里多尔菲因病返回佛罗伦萨后，他就更忙了。

同态度暧昧的博蒙交涉是阿尔比奇和马基雅维利的事，加斯科涅兵对一切都不满意，便向他们抱怨葡萄酒不好喝。这事传到根本不懂葡萄酒味道的瑞士兵那儿，他们立即附和，处理起来更加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不可能有进展。法军破城后却拒绝进城，大半士兵回到搭建在城下的军营中。甚至有一群士兵绑架了佛罗伦萨的顾

问阿尔比奇索要赎金。据说阿尔比奇被武力绑架时，马基雅维利说要跟着一起去，但阿尔比奇命令他留下，立即向国内报告。几个小时后，阿尔比奇交了1500达克特的赎金做交换，得到释放。

攻城的军队在攻进城的前一刻烟消云散了。7月9日，加斯科涅兵走了，瑞士兵也撤了。1500年攻打比萨的战役前功尽弃。佛罗伦萨共和国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一次都没有按照佛罗伦萨的意志行事，就这么走了。佛罗伦萨一片茫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佛罗伦萨政府已经为这些一事无成却败事有余的军队付了太多的佣兵费，没有再支付瑞士兵回去的费用。这笔钱是法国国王付的，国王认为继续占领刚征服的米兰公国需要这帮瑞士兵。

马基雅维利后来主张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执拗地主张自己国家的命运不能依靠别国的军事力量。正是这一年的比萨战役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的确，说到亲历者，马基雅维利是最有价值的亲历者。他第一次出使外国也是这种经历的延伸。

1500年比萨战役的失败不仅使佛罗伦萨共和国白费了巨额战争费用。被人看穿、被人嘲弄的状况让佛罗伦萨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威风扫地，不可能再显当年雄风。当时的佛罗伦萨无论是在时间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没有条件重振雄风。佛罗伦萨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还有什么方针的话，这就是它的唯一方针。

路易十二很不情愿地支付了剩余的瑞士兵佣兵费3.8万弗罗林。为此他感到震怒，公然把比萨战役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佛罗伦萨，宣布废弃与佛罗伦萨的同盟关系。佛罗伦萨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手足无措，决定派使节前去解释。可笑的是，这次使节的国书签发日期是7月17日，离法军撤退之日只过了6天。这是明显的手足无措。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工作又派给了马基雅维利。其实，曾经同他一起去比萨前线的阿尔比

奇曾被任命为正使，但他巧妙地推掉了。

任命马基雅维利的理由是他熟知比萨前线的情况，向国王“解释”会有说服力。但他地位卑微，于是政府决定由“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驻法大使、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弗朗切斯科·德拉·卡萨作为正使，与马基雅维利组成搭档。这是31岁的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去与一国之王进行交涉，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观察意大利以外的国家。

前面简单提到过正使、副使这种当时的外交官制度。这里我想再明确一下，因为这有助于理解秘书长时代马基雅维利实际工作的内容。

“Oratore”一词开始指的是说话人或交涉人，后来才有了大使的意思。这个词比起初就是大使意思的“ambasciatore”更为古老。“Oratore”是指代表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涉并有权结束交涉的人。我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词分别翻译为“大使”、“正使”、“特使”、“使节”等。欧洲最先采用常驻大使制度的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在13世纪就开始采用这一制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直是与威尼斯并驾齐驱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到了马基雅维利时期，常驻大使制度在佛罗伦萨也在完美地发挥作用。

代表一国的大使必须得到驻在国的认可。与才干和力量相比，大使的出身更重要。威尼斯的规矩是从贵族当中选拔大使。佛罗伦萨通常也是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中任命大使。不这样做会破坏本国在对方国家的印象，在外交上是一种愚蠢行为。

这样选出来的正使通常可以配一名副使。副使的作用是收集情报，观察、分析情况，总之，协助正使办理交涉事务就是副使的任务。副使不代表国家，因而出身不是问题，威尼斯也有很多副使不是贵族。在佛罗伦萨，怎么也算不上名门的马基雅维利家族的人也当上了副使。但尽管是副使，并非不重要。

第一，正使因某种原因不能亲临交涉现场时，副使将代替正使站在交涉第一线。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副使没有正式升格为正使，就无权结束交涉。

第二，送回本国政府的报告由正副使两人署名，但实际上多为副使撰写。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几乎所有报告都是他一个人所写。也许所有人都认为他笔头好，交给他写是上策。

第三，选择副使的标准是即使无“名”也要有“实”，所以副使的地位很复杂，对副使的使用也是五花八门。门道之一是派遣副使有一个好处。如果派遣正式大使，免不了会给第三国、第四国造成影响。但如果派出副使级别的人物，则可免去这种影响。两年后马基雅维利被派到切萨雷·波吉亚那里去就是一例。任务是重要的，但派遣国不想让其他国家太清楚内情，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派副使一个人去。

第四是节约经费。如果是代表国家的大使，必须带随从，有时还要带乐师，要开招待会，副使就不需这些费用。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佛罗伦萨共和国非常吝惜在外交方面花钱，所以，佛罗伦萨对副使的充分利用一定很敏感。

第五，当然，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交涉普遍是派副使去的。马基雅维利就是例子，跟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交涉就是他一个人去的。不过，即使这种情况下，副使的作用仍不仅仅是交涉，他的观察和报告对本国政府而言，仍是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

在马基雅维利15年的为官生涯中，一次也不曾当过“oratore”（正使），每次出差的国书上的头衔都是“佛罗伦萨国务秘书”。而这位国务秘书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报告末尾签上“humillimus servitor”。这是当时的公文格式，但把这个拉丁文直译过来就是“卑下的服务者”，也就是“公仆”。

前几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与您的其他作品不同，您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写很多有关金钱的事吗？”我不由得苦笑。

这样问的原因大概是，这是我第一次写与自己收入一样的人物，即收入极其微薄的人物。写“豪华者”洛伦佐那样挥金如土的幸运者时，即使写下他花钱的数目，也不会有实际感受。

另外，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中描写的威尼斯共和国，外交官待遇优厚。所以，在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中，找不到像马基雅维利说钱不够用那样低档次的诉苦。不过，在威尼斯，不管是驻外大使还是副使，如果与驻在国的人有职务以外的关系，即贿赂授受关系，立即就会被召回，等着他的是死罪。这大概是那种“我保证你的待遇，你别给我丢脸”式的思维方式。

可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做法是“我保证不了你的待遇，你也别给我丢脸”，所以马基雅维利这样生来不富、囊中羞涩的人，在金钱方面也一直很辛苦。

“豪华者”洛伦佐和威尼斯外交官是例外，大部分人不都是马基雅维利这种类型的人吗？这就是我撇开自己的实际感受，固执地写低层次事情的理由。

再回到金钱的话题上来。马基雅维利的首次外国出差是从经费问题开始的，这具有象征意义。

派遣使者是应急之举，主要目的是向法国国王做“解释”。因此，佛罗伦萨政府可能认为这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或是被比萨战役的失败造成的巨额浪费惊呆了，因而极度削减了两位使节的经费。政府给首席使节德拉·卡萨的经费是每天8弗罗林小金币，换算成大金币不到5弗罗林，给副使马基雅维利的只是这个数的一半，每天4弗罗林小金币。

马基雅维利对此提出抗议，理由是这一点点钱完不成任务。他要求至少增加4弗罗林，同首席使节的经费一样。意见是要提的，但他很清楚必须尽快去向法国国王解释佛罗伦萨的立场。因而要求提了出来，人也出发去了法国。听说路易十二国王那个时候在里昂，他们一定沿着古罗马时期就有的奥勒利亚大道北上。正使副使各自领到了政府发的每人80弗罗林的经费。这时他们领到的弗罗林应该是大金币。副使马基雅维利有义务从中支付各项经费。

马基雅维利说是秘书厅之长，实际只是个秘书而已。他的增加经费的要求，在政府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政府讨论了15个昼夜，直到8月27日才终于全额批准了马基雅维利的要求。这离马基雅维利出发已经过去40天，离他们到达里昂开始执行任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马基雅维利的弟弟僧人托托，给兄长写了一封信，详细记下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反应，读来令人发笑。刚开始时，好像政府里的一大半人都认为，已经给马基雅维利付了一份秘书的工资，差旅费应该与工资结合起来考虑。首席使节德拉·卡萨不担任常勤公职，只领取经费，但他是富人。经过15天没日没夜地讨论，靠着正义旗手尼可罗·扎蒂和菲利波·布昂德尔蒙蒂等人热心的辩护，情况得以逆转。增加经费的要求被接受了，首先弟弟托托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这厢里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那厢里他的哥哥每天都在用钱，已经给弟弟写来了信要急借50达克特。每次都是弟弟四处奔波为哥哥借钱。

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寄给政府的报告也许对促成这件事加了一把力。马基雅维利有夸张描写的癖好，还会因事而异。他在从法国寄回第二份报告的时候就在感叹差旅费不足，他写道“相信执政团各位的判断力和人性”，乞求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马基雅维利的经费增加了一倍。

然而，当时付给战死者遗属的年金是25达克特。一天5达克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了。这么多钱怎么还不够用呢？这钱都用到哪儿去了

呢？

第一，当时法国国王的宫廷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宫廷在法国国内迁得很勤。外国的常驻大使也好，特使也好，不跟随宫廷跑就办不成事。住在一处和到处迁徙，所花费用自然不同。

第二，宫廷移动频繁，动作又大，每次移动都会征用很多马匹。逃过国王征用而剩下的马匹，租借价格暴涨，给经费带来沉重负担。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到过这事。

第三，既然是代表一国的特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自己开伙的廉价小客栈。马基雅维利甚至连他们没有住包餐旅店（osteria）而租住了可以自己开伙的房子这种事都做了报告。马基雅维利还写道，虽说租房，也得保持一定规格，就是自炊，也不能让正副特使亲自动手，所以最少必须有两个用人。

另外，特使必须有合适的服装，还需要常备信使给本国送报告，信使很重要，一顿饭可省，信使不可缺。老想着等信使从佛罗伦萨送来政府的训令，再让他把报告送回去，那就办不成外交了。

还有一些小额支出别指望拿到收据。出差时间一长，这可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开销。这次出差从1500年7月开始一直到12月才结束，长达5个月。这种没指望有收据的小额支出究竟都是些什么，马基雅维利自己就写过。他写过一篇题为“赴法国国王宫廷进行外交交涉者注意事项”的小文，文中这样写道：

> 外门守卫每人1达克特；内门守卫每人2达克特；第三道守卫，因为他们与我方的交涉对象关系太近，每人3达克特；联系人每人4达克特；喇叭手不需支付，但最好请他们喝酒；负责邮递的人，如果是长期关系，最好赠送些礼物。鲁昂枢机主教（路易十二的宰相）宅邸守卫2人，每人1达克特；在里昂当地已久的纳吉家（佛罗

伦萨商人）用人总共3达克特。

这篇文章后面还谈到琐碎的注意事项，诸如一开始就要同旅店主人把话说清楚、如何对待法国用人等，读来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文中还有涉及换算的地方，透出马基雅维利这一级外交人员运筹的艰辛，让人微笑之余感到佩服。

> 从博洛尼亚北边开始直到米兰境内，使用米兰货币或威尼斯货币较为合算。直到阿斯蒂均可如此。但从阿斯蒂到布翁维基诺应使用萨伏依的货币。在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以前宜兑换成法国货币，法国人会故意压低意大利货币进行兑换。不要忘记在阿斯蒂，起码在米兰境内，把钱换成萨伏依货币。

货币兑换看似闲话，实非如此。他们出发时，佛罗伦萨政府只给了少量的差旅费。向政府反映交涉会延期，经费会不够，他们才白天黑夜地讨论，最后总算汇钱过来。但汇来的都是佛罗伦萨的货币弗罗林金币。兑换时吃亏定让马基雅维利有了切肤之感。

总之，给马基雅维利的经费有限，他的诉苦不无道理。就算不用钱去贿赂，赏钱和小费还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说法兰西堕落了。在同时代的土耳其，从政府要人到门卫，行贿受贿是半公开的规矩。威尼斯与土耳其有很多交涉，威尼斯外交官一开始就会把贿赂费用算在经费里。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外交经费相比，佛罗伦萨共和国过于抠门。这也是政治无能造成经济浪费的一个例子。佛罗伦萨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一个地方浪费了，就得在其他地方省出来。政治无能常会导致选错强制节约的部门。马基雅维利被强制节约，而他的任务却是补救政府的无能。

经过10天的旅行，他们虽然精神十足但已疲惫不堪。当他们赶到里昂时国王已经离开，无奈再次出发追赶北上的国王。等他们在位于巴黎与里昂中间的一座小城追上国王，时间已到了8月7日。他们首先与鲁昂枢机主教、时任宰相安布瓦兹会面，然后才得到许可与国王见面。因为法国少有人懂意大利语，会谈中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安布瓦兹会说拉丁语，国王会不会说不得而知。

佛罗伦萨使节向法国国王递交了国书和政府公函，向国王陈述说自己的来访原因已全部在信中写明，佛罗伦萨始终信任国王，今后也将一以贯之。对此，路易十二答道，比萨战事的情况不必再谈，那已经是过去的事，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恢复失去的名誉和实利。国王接着谴责说，比萨战役失败的原因全部在于佛罗伦萨方面，同时威胁说需要重新审视法兰西与佛罗伦萨的传统关系。

路易十二的真实意图很明显。首先，让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已支付的瑞士佣兵费，以及尽量多地承担其他费用。进攻比萨对国王来说只是个次要问题。既然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佛罗伦萨使节的任务就集中在这一点。国王不要听对比萨战役的“解释”，那就不能让国王不开心，同时要尽量少花钱。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困境，他几乎要一个人完成这项任务。9月14日以后就只剩下他这个副使了，年老的卡萨病倒了，到巴黎治病去了。不过，虽然孤军奋战，但刚满31岁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因此拥有了和法国国王以及国王头号心腹安布瓦兹一对一对决的机会。此外，国王平均每月在国内移动两次，在跟随国王的5个月时间里，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法兰西和法兰西人。

再说交涉的结果。马基雅维利着力说明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经济恶化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法国国王并没有想要彻底以佛罗伦萨为敌，国王的威胁也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两国决定重新签订同盟协议。可是马基雅维利不是正使，没有结束交涉的权力。12月12日，佛罗伦萨政府发出命

令，召回马基雅维利，命令资深官员托辛吉以正使资格赶赴法国。

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发回的那么多报告都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获得了好评。以后，每当政府需要派人去法国，多数都会派他去。马基雅维利告诉大家在法国要付小费，大家才不再见怪，他也因此被大家认为是法国通。

在阅读马基雅维利数量庞大的报告时，人们能够从中看到这位年轻人在宫廷内外广泛接触所有人，同他们讨论，贪婪地观察法兰西的情形。《论李维》一书中写到的插曲恐怕就发生于这众多的机会之中。他写道：有一次，安布瓦兹枢机主教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马基雅维利立即反唇相讥道：“法国人不懂政治。”

安布瓦兹是国王的心腹，又是宰相和枢机主教，他听到这话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当作无礼之人赶出去。即使他这样做，马基雅维利也没法抱怨。但这位枢机主教的耳朵里留下的恐怕是年轻人下面这句话。31岁的马基雅维利接着说道：“如果法国人懂得何为政治，就不会如此卖力地让罗马教廷强大起来。”

马基雅维利说这话的时候，切萨雷·波吉亚已经开始行动。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这位儿子，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正在意大利策动革命。而马基雅维利下一次的工作便是与这位刚满25岁的风云人物进行接触。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从头开始重写，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写完扔掉，再写再扔，可谓苦吟。自打开始写马基雅维利以来，我还没有过如此惨淡的经历。

原因何在？因为这一章的标题是切萨雷·波吉亚。我在1970年以“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为书名写了他的一生。他是我最为熟悉的人物。我在写这一章以前还曾确信，写他不费什么事。可为什么这一章就这么难写呢？

望着装满了稿纸的字纸篓，我一筹莫展。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曾经有人约我写50页左右的文章，谈谈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或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曾经写过这两个女人。我略加考虑后回答说：“已经写过150页的东西，再新写50页，我写不出来了。”不过，如果是我未曾写过的人物，我写得出来。我便写了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1]的皇后梅萨利娜。

就是这样，往多里写做得到，往少里写做不到。15年前用600页纸写过的东西，抽出其中与马基雅维利有关的内容也得有400页。把400页的内容压缩到40页，别人做得到，我可做不到。

转念一想，不是有缩写法吗？于是我实际试了一下，结果非常惨，就好比重要的东西都从网眼漏掉了一样。

《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成书后有300页。随便落笔的作品，篇幅没有限制。他的一生尽管短暂，但丰富多彩。要写透，这点篇

幅是需要的。人的一生，还有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很多细节都要写进去。正是有了细节的支撑，著名事实才能写活。所以，作者要把爱情注入细节。我之所以说写梗概别人能做到，就是因为别人虽然也知道细节重要，但没有倾注爱情。只有那些决定写爱情的作者才会有爱情，只有凭自己的意志选择阅读爱情的读者才会有爱情。

我“苦吟”本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会面对马基雅维利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要写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就绕不过这一段。他们两人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必须相应地写进来。这也给我加了一些压力，感觉要胃穿孔似的。

我老实地坦白了这事，可就要鞠躬拜托各位读者了。请还没有读过《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的读者去读一读这本书；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从书架上取下来再读一遍。这本书写于15年以前，我发现书中有一行文字翻译错误。撇开这一点不说，我现在写不出更多关于切萨雷的文字了。

切萨雷·波吉亚

我现在正在写马基雅维利，可重读那本书，一种不足之感油然而

生。

这可不是因为我比15年前更成熟。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要对那本书里所写的我的判断、我的思考做任何修改。我想，不足是因为以下原因。

15年前我写的切萨雷，对我来说是一位历史人物。书中也写了马基雅维利，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的视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现场证人。15年前，我与切萨雷是同龄人。那时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描写一位燃烧于15世纪到16世纪的同龄人。

作为历史人物的切萨雷，尽管我自认为把他该写的都写了，但15年后重逢，我感到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作为理论象征的切萨雷·波吉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切萨雷·波吉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那时我30岁上下，虽然在写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和国家，但要写透理论象征，我的能力和成熟度都还不够。我认为写是写了点，但不能说已经写透。

站在马基雅维利的视角来看切萨雷，这可是弥补这个缺陷的好机会。如果这样做能够消除15年前为切萨雷画像时的不足之处，我也算没有白活这么些年。

马基雅维利同切萨雷·波吉亚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乌尔比诺，只有几天。第二次是在伊莫拉及其周边地区，时间超过三个月，就在波吉亚身边，可以用“贴身采访”这个词来形容。第三次是在罗马，时间两个月，那时切萨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行将崩溃。三次见面都在1502年开始的3年之间。这位青年君主以非常的气势上升，发出史无前例的耀眼光芒普照天下，然后又以非常的颓势坠落。马基雅维利逐一观察到了这一切。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并没有彻底改变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只是给马基雅维利已经拥有的模糊思想赋予了清晰的形式。他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刺激最大的人物。他们邂逅时，马基雅维利33岁，切萨雷27岁。

1502年6月22日，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前往乌尔比诺，去见切萨雷。

当时，正使是索德里尼主教，马基雅维利照旧只是个副使。以前被派往法国时，他的名字还与正使并列写在国书上，可这次没有这样，他的地位只是随员。

佛罗伦萨是被山地包围的盆地，而乌尔比诺靠近亚得里亚海，同样也是被山地包围的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小城。从佛罗伦萨到乌尔比诺净是山道。两位使节22日离开佛罗伦萨，一路上紧跑慢赶，24日才进入乌尔比诺城。就像匆匆草就的国书流露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共和国已经被切萨雷·波吉亚逼得走投无路。

切萨雷这时已经成功征服了罗马涅，正在建立罗马涅公国。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称支持切萨雷，同时也支持佛罗伦萨。考虑到路易十二不愿意攻打佛罗伦萨，切萨雷决定对佛罗伦萨采取迂回战术。他要求佛罗伦萨雇他当佣兵队长。佣兵合同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其意义等同于同盟条约。切萨雷的真意也在于此。

一年前的1501年，切萨雷的军队南下攻打皮翁比诺，行军路线安排得很巧妙，让佛罗伦萨上了当。慑于切萨雷的威势，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签订了佣兵合同。“雇用”佣兵队长切萨雷和手下300名士兵3年，代价竟高达3.6万达克特。切萨雷从佛罗伦萨撤出以前，成功地弄走了首期9000达克特的钱款。后来佛罗伦萨政府便装起蒜来。然而，切萨雷可不是一个能被糊弄过去的人。

1502年春天，比萨市民代表造访切萨雷，请求把比萨的所有领国纳

入其保护之下。切萨雷的暗战获胜。自不必说，一直认为能否再次领有比萨事关生死存亡的佛罗伦萨对此感到绝望。就连一直支持比萨、不想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威尼斯共和国也措手不及。切萨雷骗过了拥有西欧头号情报网的威尼斯。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佛罗伦萨胆战心惊的事件。佛罗伦萨境内的阿雷佐造反，为切萨雷手下的一员武将维泰洛佐·维泰利打开了城门。佛罗伦萨失去了以阿雷佐为中心的瓦尔迪基亚纳地方。第勒尼安海边的小国皮翁比诺也已投降了切萨雷。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切萨雷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

切萨雷再次胁迫佛罗伦萨履行合同，兀自开始了军事行动。同以前一样，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进攻目标。

6月12日，切萨雷和他的军队离开罗马，20日出其不意地突袭乌尔比诺，兵不血刃地进入乌尔比诺公国首都乌尔比诺市，领主逃匿。与乌尔比诺接壤的小国圣马力诺和卡梅里诺在切萨雷攻城前便打开了城门。在切萨雷闪电行动面前大惊失色的不仅仅是小国，强硬的要求也摆在了佛罗伦萨面前。佛罗伦萨感到不能一味地依赖法国国王，于是紧急决定派遣特使。特使人选定为索德里尼主教，不论从崇高的神职地位还是从佛罗伦萨名门出身，哪个方面都不用担心这个人选会败坏切萨雷的心情。马基雅维利随行，按照惯例，马基雅维利负责起草给政府的报告，因而可以列席谈判。

6月24日深夜，两个佛罗伦萨人接到切萨雷的首次谈判通知，要他们在乌尔比诺城堡的一个房间里等候。这里是逃亡领主圭多巴尔多公爵起居的城堡，美丽壮观，却被切萨雷及其心腹和卫兵当成了宿舍。两个佛罗伦萨人刚刚抵达，甚至无暇换上这种场合所要求的礼服。他们等待片刻，切萨雷的身影出现了。

索德里尼主教刚要照例说些外交辞令，切萨雷阻止了他，谴责佛罗

伦萨不履行已签合同的行为，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对待，从头到尾语气严厉而明快。

“如果佛罗伦萨共和国想要我这个朋友那很好，如果不想要，那从即刻开始，我得认真应对与佛罗伦萨接壤的我的领国的安全。要知道，我对因此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关心，当然就会减少。”

佛罗伦萨人当然不能沉默。他们说，要获得佛罗伦萨的信任和友谊，先决条件是切萨雷公爵召回侵略阿雷佐后赖着不走的维泰洛佐·维泰利。但切萨雷的态度并未松动：“不错，维泰洛佐是我的部下，但我并未参与阿雷佐发生的事情。”

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维泰洛佐是3年前在佛罗伦萨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保罗的弟弟，他一心想为哥哥报仇，这事路人皆知。入侵别国领土这种大事，没有切萨雷的允许，维泰洛佐一个人是无法强行的。这天夜里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切萨雷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天的谈判：

“我不是为施行暴政而生，而是为打垮暴政者而生。”

对不足4个月便再次见到切萨雷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句话不啻为一种预示。

第二次谈判仍没有任何进展。索德里尼主教要请示政府，请求延缓数日，切萨雷同意了。马基雅维利飞马奔回佛罗伦萨，这事除了他也没人能干。马基雅维利在夏日的道路上策马疾驰，从乌尔比诺直奔佛罗伦萨而去。一路上，他胸中充满了怎样的思绪啊？

这次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见面以前，切萨雷刚打完胜仗，采取了高压态度。

“我讨厌你们的政府，没有信用，应该推翻它。”

这些话连法国国王都不会说，切萨雷却公开说了出来。这在外交上不是明智的行为。

然而，马基雅维利也许在想，瓦伦蒂诺公爵虽然采取了高压态度，但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佛罗伦萨政府的优柔寡断也常令马基雅维利咬牙切齿。马基雅维利说，贪小便宜的政府终将会吃大亏。这不是逻辑上的问题，而是外交上的软肋。

马基雅维利必须维护本国利益，却陷入了认可敌人说法的窘境。这也许只是一种讽刺。但年轻的官员在思考，真正的政治是什么，最好的国家又是什么。他肯定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政府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岂止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使他的祖国佛罗伦萨陷入困境的这个人——切萨雷·波吉亚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政治，他所要建设的才是最好的国家。

马基雅维利在乌尔比诺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报告，把这样的想法抛给了现在操纵政府的上层阶级。他这样写道：

> 这位君主是一位真正具有力量的伟大人物，打仗勇猛果敢，再大的困难到他手里都会化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光荣和征服，他不知疲倦，不怕痛苦和危险，神出鬼没。
>
> 他把最好的意大利人收作臣子，受到他们的仰慕。他为近乎完美的好运所青睐，不断取得令人恐怖的胜利。

马基雅维利为得到政府的指令，留下索德里尼，一路策马奔向佛罗伦萨。就在这时，另一个佛罗伦萨人与他擦肩而过，进了乌尔比诺的城门。

这人就是年届50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两个月前，即8月18日，切萨雷领国内的地方长官、守城官、队长直到士兵，都收到了当时身在帕

维亚的切萨雷公爵的一份布告：

> 本人最亲密的朋友、建筑技术总监莱昂纳多·达·芬奇得在所有地区自由通行，任何人必须对他表示善意。本人已将视察公国内所有城堡的任务委派于他，各地必须为他完成任务提供一切必要之协助。公国内所有城堡、要塞、设施和土木工程，在施工以前和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均须与莱昂纳多·达·芬奇总监协商，执行其指示。有违反本人之命令者，不论本人曾对此人抱有多大之善意，必将遭到本人唾骂。切切此布。

马基雅维利是公务员，对他而言，与切萨雷接触是执行命令的职务行为。而达·芬奇是自由职业者，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到切萨雷这里的。他将在此后的一年内为切萨雷做事。

不过，即便是不能自己选择工作场所的公务员，也可能会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好机会从天而降。离开乌尔比诺3个月以后的10月初，马基雅维利再次疾驰来到切萨雷身边。这次去的是伊莫拉，是切萨雷决定的罗马涅公国的临时首都。

这次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佛罗伦萨政府按自己的考虑，结果选择了他。

在此稍前，佛罗伦萨政府的情报网得到情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正在造反。威尼斯共和国也察知了此事，但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在切萨雷看来，只要强大的威尼斯不站在反叛者一边就足够了，所以打起了外交战，让威尼斯持续保持中立。

但切萨雷并不需要像担心威尼斯那样担心佛罗伦萨，他要求佛罗伦萨履行已签订的佣兵队长合同，用这种形式表明两国的同盟关系。这是要佛罗伦萨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切萨雷一边。

不过，由于爆发了部下的叛乱，切萨雷现在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而且，佛罗伦萨不能忽视的法国国王尚未应切萨雷的请求派来援军。在此情况下，佛罗伦萨政府做出判断，只能按通常的办法行事。

接受瓦伦蒂诺公爵的要求明确同盟关系是危险之举，因而不能派有签约权的大使级人物去。但无视切萨雷的要求，不派人去也是危险的。佛罗伦萨不能让切萨雷察觉到佛罗伦萨的中立态度。而且，佛罗伦萨也需要了解眼下处于台风中心的切萨雷身边的情报，还要让切萨雷认为佛罗伦萨一直在希望加强与公爵的友好关系。

政府派遣有能力而无资格官员的原因实际上是想争取时间，但争取时间相当难。

政府在马基雅维利与公爵会面时递交的公函上写道："为探讨现状之下维持两国友好新的可能性，特派遣佛罗伦萨市民、政府秘书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前往贵处，请予关照。"

又不是去参加研讨会，马基雅维利拿着这样一封国书被派到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军攻下的地方去，也够辛苦的。而已经陷入困境，又来了这样一位不明不白的使节，切萨雷也够让人同情的。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回轮到切萨雷关心起维持友好关系了。这位瓦伦蒂诺公爵一改当初在乌尔比诺的高压态度，和蔼地接待了佛罗伦萨的小官员。

1502年10月7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宣布反叛的前一天，马基雅维利遵照政府的命令，快马加鞭赶到了伊莫拉。他赶得太急，甚至把随从和行李都落在了后头。傍晚6时到达后，他直接求见罗马涅公爵[2]，立即得到允许。马基雅维利身着旅装，出现在了切萨雷的面前。

切萨雷公爵接受了马基雅维利递交的共和国政府的公函，让他坐下休息后，便兀自读了起来。

不一会儿，切萨雷问马基雅维利为何而来。马基雅维利答道：“我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向罗马涅公爵表示友好感情而来。”切萨雷对此报以愉快的笑声。他说，自己并没有帮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自己也和佛罗伦萨一样与法国国王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自己与佛罗伦萨之间保持友好关系是当然之事。虽然如此，自己眼下还不想向共和国求援，自己只是建议与佛罗伦萨之间相互协助，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接着说，叛军会被打败，“那是一群无能之辈！”这是那天晚上切萨雷唯一一句泄愤的话。

马基雅维利此后又与切萨雷有三个多月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马基雅维利怎么也收集不到充分的材料来怀疑切萨雷的胜利。从马基雅维利到访算起都两个星期了，切萨雷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却始终没让马基雅维利参透他的内心。在一次会谈时，切萨雷说道：“我关注着一切，等待着自己的机会来临。”

马基雅维利始终未能探明所谓“机会”什么时候又以什么形式来临。

叛乱者的会合地点在其中一人奥尔西尼的领地马焦内城，人们便把这场切萨雷手下佣兵队长的反叛称为“马焦内之乱”。我简单地说明如下。首先罗列一下相关人等的名字：

保罗·奥尔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奥尔西尼家族领地的领主

维泰洛佐·维泰利——卡斯泰洛城领主

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费尔莫领主

詹保罗·巴廖尼——佩鲁贾领主

安东尼奥·达·韦纳弗罗——锡耶纳僭主潘多尔福·彼得鲁奇的代理人

埃尔梅特——博洛尼亚领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的代理人，儿子

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乌尔比诺公国圭多巴尔多公爵的外甥

瓦拉诺家族的詹马里亚·达·瓦拉诺——卡梅里诺领主

詹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这场叛乱的首脑人物

总之，反波吉亚战线非常完美。这里说他们是“领主”（signore），原本不过是受教皇委托统治教廷领土的人而已。博洛尼亚也一样。

那么，这群人为什么要造切萨雷的反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佩鲁贾领主巴廖尼说得最为透彻：

“如果不想一个挨一个地被龙吃掉，就只有一起把龙杀掉。”

这群人不单单是佣兵队长，他们还是一国的领主，尽管他们的国家很小，尽管形式上他们都是受教皇的委托。他们都是按照当时意大利的习惯兼任佣兵队长的。对这些人来说，卡梅里诺和乌尔比诺与自己地位相同，却在三个月前软弱地屈服了切萨雷。他们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叛乱者统一了步调。切萨雷得知确切情况已经是10月6日了。第二天，马基雅维利就来到伊莫拉，与切萨雷见了第一次面。

先说结果。“马焦内之乱”起事三个月后的12月31日，叛乱的全部首领中了切萨雷的计，在塞尼加利亚城会聚议和，结果统统被杀，上演了一出整个意大利无不拍手喝彩的“漂亮骗局”（bellisimo inganno）！切萨雷几乎未用武力，仅靠外交战便取得了胜利。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一直都在切萨雷身边，见证了切萨雷的全部手段。他一共给佛罗伦萨政府写去了54份报告（legazione）。事件结束后不久，他又写了《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泰洛佐、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帕戈罗大人[3]及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的方式》

（以下简称《记述》）一文。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有位传记作家打了个比方说，在这期间，切萨雷和马基雅维利二人同处一个密室，一人在玩台球，一人从旁观战，说得惟妙惟肖。

可以说，报告忠实地记录了这期间的每一次出手，是观战的记录；《记述》则是在游戏结束后一气呵成的观战总结。

说密室里切萨雷一人打台球，是指击球看似单纯，其实并不简单，而这场不简单的游戏始终由切萨雷一人专擅。除了刚开始时的军事行动以外，反叛者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击到自己的球。

说还有一位观战者，意思是说就算有人同处一室，但如果对台球既无兴趣也理解不了，那是成不了观战者的。当时在切萨雷身边，没有人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既喜欢这场游戏，又有能力理解这场游戏了。

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忠实地通过观战记录，体味每一次出手，才能充分掌握玩家玩技的真谛；只有对每一次出手都问一个为什么，而后心中叹服，最后才会拍手叫绝，送上喝彩。不过，我现在没有这样做的余裕。我在《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这本书中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并给出了理由。结果，我写成书时竟达到60页之多。所以在这里，我只能介绍一下观战记录和观战总结了。

我们再回到台球的比喻上来。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密室里实质上只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人是否能超越各自的立场而产生友情呢？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切萨雷·波吉亚多被称为瓦伦蒂诺公爵，但他正式的头衔有瓦朗斯公爵（duca）、罗马涅公爵、乌尔比诺公爵、安德烈亚和韦纳弗罗君主（principe）、皮翁比诺领主（signore），还兼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这样的人物与佛罗伦萨政府的一介秘书之间能产生只有相互理解的人之间才能产生的那种超越各自立场的真正友情吗？

有人会这样想象。毋宁说，这种想象才符合人性。

萨默塞特·毛姆[4]在小说《时常》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我们暂且不谈毛姆模仿了后来马基雅维利所写的粉色喜剧的结构。在毛姆笔下，切萨雷劝马基雅维利辞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职务，到自己麾下来做伊莫拉的长官。虽然马基雅维利拒绝了，但这是在挖人，说明切萨雷认可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当时，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在切萨雷的身边。

然而，真实或是接近真实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切萨雷·波吉亚与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一位是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创始者。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确实一直在一起。

不过，切萨雷自始至终只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发言人，他不知道这位发言人会在10年后写出《君主论》，使自己永垂不朽。他完全没有想象到，在政治哲学家、史家马基雅维利的全部作品中，自己的影子直接或间接地无处不在。他总是对马基雅维利以“秘书长”相称。

而马基雅维利称切萨雷为“公爵”，但没有把他与其他公爵同等看待，而是把他当成了君主。马基雅维利认为切萨雷是君主的象征。马基雅维利来到伊莫拉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感到，靠与现在君主们的接触体验来理解这位君主是不够的，还需要向古代的伟人学习。好友博纳科尔西在10月21日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写道：

> 我们努力去找普鲁塔克[5]的《比较列传》，但这部书佛罗伦萨没有卖的。再耐心一点吧，我们必须托威尼斯的书店去买。你这家伙托我们买这玩意儿，真是见你的鬼！

马基雅维利发现自己的梦想在切萨雷身上具体体现了出来。切萨雷有着铁打的身板，俊美的面容，举止老练沉稳，威严高雅，令人爱惧交加。他在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上禁止抢掠，不失时机地推出统治政策。他思想自由，在所有方面不受传统束缚。他不相信佣兵制度，引入全民皆兵制度便是一例。他极富决断力，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他有战略头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是一个贵族主义者。

这样的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没有刺激才怪！

然而，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公爵是公爵，秘书长是秘书长。

切萨雷有话要向佛罗伦萨政府发言人讲时才召见马基雅维利，无话可说时任凭马基雅维利怎么求见他都不见。而马基雅维利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一直是互相哄骗。只是这种关系始终明快爽朗，这缘于两人气味相投，年龄也相仿。他们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

有一次，切萨雷对佛罗伦萨的秘书官说道："你的上司究竟会怎样定位我呢？"

马基雅维利愉快地答道："按我想象，我的上司怕的是为您定位的不是他们，而是您自己。"

在台球场上，切萨雷从未回答过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打这个球，为什么要把球打到相反方向去。不过，他说话总让你感到他是在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可是一旦你信以为真，那就惨了。别忘了，马基雅维利恭维切萨雷，给他起的外号是"伟大装傻者"（grandissimo simulatore）。

上过这位"伟大装傻者"当的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组织严密的情报收集能手威尼斯上过他的当，撰写《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超过

40年的圭恰迪尼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后世能够不为他所骗，只是因为过了500年后我们发现了被湮没的史料，可以研究它们而已。小说家毛姆也是时间的宠儿之一。

切萨雷骗局第一步：

12月10日，切萨雷终于离开伊莫拉，前往塞尼加利亚与叛乱者讲和。途中，他在切塞纳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谁都以为法国大兵是他的靠山，而在切塞纳他却让法国兵撤了回去，个中缘由无人知晓。马基雅维利也去询问切萨雷的心腹，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的主子搞秘密主义。"他去问那些忙着出发的法国兵，得到的答复是："上峰命令回家，所以我们回家去，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马基雅维利也只好写报告告诉政府说："事实如此，不明就里。"

骗局第二步：

12月26日清晨，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发现雷米罗·德·奥尔科暴尸街头。

所有人大惊失色。奥尔科是切萨雷的三个心腹之一，又是罗马涅的长官。他秉承切萨雷的意旨在常年无法无天的罗马涅建立起法律秩序，厥功至伟。他现在被身磔两段，暴尸街头。

对此，威尼斯的情报里写道："原因不明。"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个"不知派"，但他在报告中加了一句话：

> 这位君主（切萨雷）是否想表示一下，他对臣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考虑来决定是提拔还是毁灭。

不过，马基雅维利在10年以后撰写的《君主论》中对此事件做了如下的解释：

公爵在征服罗马涅时已经觉察到，这个地方过去一直由无能的统治者统治，他们不是正确地统治属民，而是掠夺属民，不是去引导属民团结一致，而是制造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因而这个地方充斥着纷争和各种各样的暴力。公爵认为，要想使这里恢复秩序，提高君主的统治力，就必须施行良好的政治。

于是公爵将他冷酷的家臣雷米罗·德·奥尔科派到罗马涅，并授予他很大的权力。这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恢复了这里的秩序与统一，这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因为害怕引起民众的憎恨，认为再给他过分的权力将非常不利，便在领国内设立了法庭，任命了优秀的庭长，并在各个城市安插了自己的辩护人。

公爵知道，过去的严酷行为已经或多或少引起了民众的仇恨，他要除去民众心里的这种不满，把民心完全争取过来。他想让民众看到，过去严厉到残酷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想，而是出于奥尔科那苛刻的性格。于是公爵在一个早晨将奥尔科被斫为两段的尸体暴尸于切塞纳的广场之上，身边还放着一块木板和一把血淋淋的刀。民众见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凶残景象，既感到恐惧，又有一种痛快的满足感。

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或许是对的。实际上，罗马涅的民心以此为契机完全倒向了切萨雷一边。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动手，这个时候动手并不合适。在和睦气氛高涨的媾和前夜搞血祭并不吉利，甚至有给叛乱者向往和解的心情泼冷水的风险。

让对手希望和解，把他们召到塞尼加利亚，然后一网打尽，这才是切萨雷的计谋。没有人会认为在这决定胜负的4天以前让对手产生戒心是上策。

这里有一则史料，是一位叫乌尔巴诺的人写的。说的是保罗·奥尔

西尼化了装到伊莫拉来见切萨雷，想谋求和解。这则史料就是两人第一次会面时的对话，所以这是10月25日左右的事情。那次见面时，切萨雷并没有对这位叛乱的首谋之一发火。保罗·奥尔西尼把小君主们反叛的责任推给了雷米罗·德·奥尔科。切萨雷听后说道："我和你们，以及民众很快就会看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是说，奥尔科成了牺牲品。另一方面，法国兵撤退看似毫不相干，却是给反叛者一个和睦信息，与整个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切萨雷给尚在遥远之地的叛乱者发出了两个信息，而且是无言的信息，不用担心将来留下记录。

法国兵是切萨雷军队的精锐力量，法国兵撤退暗示着切萨雷没有战斗意志。

处死雷米罗·德·奥尔科一事所传递的信息是，既然奥尔科是叛乱的真正责任人，其他叛乱者就是可以原谅的。

骗局的第三步不似前两步是遥控的，而是在现场执行的。叛乱者满怀和好心情赶来聚会。切萨雷与他们一一亲切拥抱，似乎为了友谊的恢复而欣喜。几分钟后，他便向8个心腹示意，叛乱者当场被捕，首谋全被处死。

切萨雷就像台球高手一样，为让左边的球落袋而去击打右边的球。开始时，墨绿色的台上没有几个切萨雷的球，而且分散在不利的位置上。经过一杆一杆地巧妙击打，敌人的球最后全部落袋。切萨雷及时进军，参加叛乱的小君主们的领地全部被征服。如果真的是打台球就只是场游戏而已，可切萨雷是把这件事当作政治来搞。胜负甫定的那一瞬间，切萨雷回过头来对观战的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他们是我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我对能够消灭他们感到欣慰。"

他接着又说道："意大利灾难的根源消灭了。"

马基雅维利一定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到今天为止，除了但丁和彼特拉克这样的诗人以外，何曾有人用过"意大利"一词！在当时的意大利，有佛罗伦萨人，有威尼斯人，有米兰人，有那不勒斯人，就是没有意大利人！切萨雷不只是对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用了这个词，事件结束后，他在给各国通报事件结果的公文中这样说：

> 他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不啻是一种公害，我对他们的灭亡不胜喜悦。

马基雅维利是知道的。他知道切萨雷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不过，只要私利与公利相吻合就好。正因为这样，马基雅维利甚至在不可以表达个人情感的报告书中，在传达了切萨雷的话语之后不由自主地接着写下这样一行：

> 我不由得感叹由衷。

这句话在10年后的《君主论》中升华为下面这段文字：

> 迄今为止，我们曾经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过一束光芒，使我们认为上帝可能派他来救赎意大利。不过非常遗憾，在他事业的鼎盛期，他被命运所抛弃。

仅仅在马基雅维利发出感叹的8个月之后，切萨雷便被命运所弃。那是1503年8月份的事。罗马流行疟疾，先是切萨雷的教皇父亲染病，第二天，切萨雷也卧病在床，这是波吉亚家族倒台的开端。两个月后，为收集新教皇的选举情报，马基雅维利被派到罗马。在这里，他第三次

见到了切萨雷。当时，切萨雷已从病痛中恢复。疟疾杀死了72岁的教皇，却未能打败28岁的切萨雷。但重病大大地改变了切萨雷。切萨雷见到久未谋面的马基雅维利后这样说道：“我曾经考虑过父亲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一切，找到了对策，并在逐步实施。但是，我没有料到父亲死时，我自己也会徘徊在死亡线上。”

切萨雷后来被他所仰仗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出卖，就像贴上了“危险品，请注意”标签的行李一样被送到了西班牙。后来他成功逃脱，参加了纳瓦尔战役，战死疆场。这一天是1507年3月11日，离马基雅维利最后一次见到他过了3年半。再过半年，切萨雷就将迎来自己的32岁。再过6年，马基雅维利写下了《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目睹了切萨雷·波吉亚的急速倒台。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

> 公爵死了，但他的想法和做法仍不失为优良。公爵的失败在于非人类所能超越的巨大不幸，以他的失败来否定他的一切是错误的。
>
> 斯人已逝，但他的思想和实行其思想的方法仍长存人间。

切萨雷·波吉亚从一位历史人物转变成为一个理论象征。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没有提及纠缠切萨雷的任何一件丑闻。因为他是一个把政治、伦理和宗教严格区分开来的人。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从不议论某人的私生活如何，更没有幼稚地用私生活来议论某人的政治能力。正是这样，我们才得以把他的记述当作台球赛的观战记录来阅读，才得以在通过他的眼睛看政治的时候不被多余的事情所妨碍，能以很高的透明度识别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丑闻也会起作用。有无丑闻并不是问题，了解这些丑闻的来

由，对我们观察人物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坦白地说，人物就是靠“丑闻”活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毛姆才会去描写竭力寻花问柳的马基雅维利。

---

[1] 克劳狄乌斯（Claudius，前10—公元54），古罗马皇帝，41—54年在位。梅萨利娜（Messalina Valeria，前17/20—公元48）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2] 罗马涅公爵，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1年5月册封切萨雷·波吉亚为罗马涅公爵，此后切萨雷迅速占领了罗马涅的许多地方。

[3] 帕戈罗大人，即詹保罗·巴廖尼（Giampaolo Baglioni），在马基雅维利的原文中写作il signor Giampagolo（帕戈罗大人）。

[4]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的作品浅显易懂，故事性强。著有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雨》《红头发》，剧本《圈子》《弗雷德里克夫人》等。《时常》（Then and Now）是一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5] 普鲁塔克（Plutarchus,46—120），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人著述家。曾在雅典学习修辞、数学和哲学，担任过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他著述颇丰，著有《比较列传》（Le Vite Parallels，又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英豪列传》）、《道德小品》（Moralia）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多取材于他的记载。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也许是苏格拉底的例子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一说到天才，好像人们就会莫名其妙地认为他的妻子一定是位恶妻。如果认为有个凶悍的老婆，男人的热情就只能放在工作上，那么庸人的心里就会觉得可以替自己辩护了。可是马基雅维利的妻子是一位贤妻，这让那些人自惭形秽。

我没有说是贤夫人，我只是说是贤妻。不过我想，正因如此，她反倒是适合马基雅维利的配偶了。

500年前的意大利，也存在男大当婚的观念。我们的马基雅维利也已迎来了32岁，终于要考虑婚姻大事了。

马基雅维利的母亲于5年前亡故，父亲也在1年前去世了。两位姐姐出嫁已久，弟弟也已出家住到外面去了。一个中流家庭，再怎么简朴，也总得有个女人来打理，但那还不是家。马基雅维利参加工作已经3年，有固定收入。自己也已32岁。成家不是坏事，他也需要成家了。

我们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和私人信件，里面没有他先恋爱后结婚的蛛丝马迹。大概是别人有认为合适的女人介绍给他后，他也觉得合适，便结了婚。他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一定是相亲式的婚姻。

在20世纪的今天，听到科尔西尼，外国人大抵都会点头表示知道，那是科尔西尼公爵家族的姓氏传承。不错，现在科尔西尼公爵依旧健在，在亚诺河沿岸拥有一座漂亮宫殿。

但在佛罗伦萨，不是贵族的科尔西尼比比皆是，占据了电话号码簿

上一页的四分之一。顺便一说，在电话号码簿中，姓马基雅维利的一家之主有3人，叫美第奇的一家之主有29人。这个数字是住在佛罗伦萨城里的，不包括住在郊区星罗棋布的别墅里的居民。

科尔西尼这个姓在佛罗伦萨很大众化，即使姓这个姓，也不意味着就是那几个同姓豪门。萨默塞特·毛姆也搞错了这里面的关系，因为这个情况500年前也一样。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利与精英中的精英圭恰迪尼不一样，对密切亲缘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好像并不那么神经质，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并没有给他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地位带来什么变化。

当然，凭马基雅维利的出身和在职场上的地位，想娶大家闺秀那是做梦。可是，社会地位低下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如果马基雅维利对这点有所考虑，找个有巨额嫁妆的姑娘结婚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可他没这样做。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思，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只工蜂，久而久之，一般人会往心里去的事情他也不再在乎，心想拉倒吧，于是结了婚。马基雅维利举办了终身大事，仅靠自己挣的薪水养家糊口的状况便一直延续下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是物质简朴、精神富有。读到这里读者也该了解，走上社会后他的日子也过得不错。同事很好很爱他，工作很好上司认可他。并且他的私生活也很好，得到了一位好妻子。

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看，他绝不是一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晚年的不幸才超越了单纯的不幸而变成了悲剧。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不是美女，成不了男人们的话题。她也不是一个知识女性，能在教养方面与丈夫比肩。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女性的兴趣。他也不是那种为出入名流夫人沙龙而自鸣得意的知识

分子。我认为，他对女人的兴趣应该不弱。

马基雅维利妻子写的书信只有一件存世。从朋友和孩子们信中的内容想象，她似乎并不写信。这封唯一留存于世的信是她写给在罗马出差的丈夫的，日期是24日。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这封信写于1503年11月24日。这是他们结婚的第二个年头。

我亲爱的尼可罗：

您不该笑话我是一个傻女人，因为只有您在家，我才会感到满足。现在都在传说罗马流行瘟疫，您想想我吧，我白天黑夜都担心得不能休息。

我最先要告诉您儿子出生的好消息。您能不能多给我写些信，到现在为止我才收到您三封信。不过，请不要怪我不写信。直到今天，我还在发烧，写不了信。我也没有因为收不到您的信而生气。

孩子现在很好，他长得可像您呢，皮肤雪白，头发像黑色的天鹅绒。他还像您一样汗毛很重。他不管什么都像您，在我看来就是个美男子。他像一岁多的孩子，满屋子都是他的哭闹声。可我们女儿的身体不怎么好。

不要忘了早些回来，我盼的就是那一天。愿上帝保佑您。

我给您寄去一件棉短上衣、两件衬衫、两块手帕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我亲手缝的。

您的玛丽埃塔

这可跟那些觉得老公身体要好、最好别在家待着的女人们大相径庭。

这是一封真爱丈夫的妻子写的信。有史料支撑也好，没有也罢，我也是女人，我能断言这一点。对女人来说，儿子最重要。夫妻之间关系

再好，儿子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也是不会变的。说最宝贝的儿子“像您”，不爱丈夫的女人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没有沉醉于爱情也说不出这样的话。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爱她的丈夫马基雅维利，尽管未来丈夫的境遇发生了巨变，她的爱情却没有变。堪称幸运！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妻子，除此以外几乎无其他史料。首先是丈夫马基雅维利没有写下有关她的任何文字。学者们都有无史料就不去研究的倾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妻子的介绍便止于上述那封信。所以，要想象马基雅维利对妻子的心情，就只能求助于小说家了。

马基雅维利似乎不是那种能够刺激小说家想象力的历史人物，几乎没有以他为题材的小说。据我所知，这样的书只有一本萨默塞特·毛姆的《时常》。

那是一部让人开心的小说，我很想推荐大家一读，但做不到。那本书已经绝版，听说出版方现在没有再版计划。此外，那本书不是毛姆作品中的名著，原文恐怕都很不容易搞到手。所以我想把这本书中有关玛丽埃塔的部分介绍给大家。我借用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新潮社出版的清水光先生的译本。

当时佛罗伦萨已婚妇女的装束

毛姆作品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1502年10月开始的三个多月里，当时马基雅维利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处做使节。这与我在前一章里所讲的时间相吻合。不过毛姆在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时，不仅写了他因与切萨雷“邂逅”而受到刺激的一面，还写了他热衷于寻花问柳的一面。毛姆作品的结构采用了马基雅维利后来作品中的喜剧风格，所以读者肯定会对马基雅维利寻花问柳的一面印象更深。不过，作品很好地描写了马基雅维利乐天的本性。

门外来了三匹马。一匹是马基雅维利骑的，另外两匹是随从骑的。皮耶罗把自己小马的缰绳交给随从，跟着叔叔进到家里。马基雅维利焦急地等着他们出来，淡淡地道别。

“好啦，出发了！”他说。

玛丽埃塔满眼含泪。年轻的夫人算不上美人，但马基雅维利跟她结了婚，她是否漂亮便不是问题了。他在这个年龄结婚也是合适的。玛丽埃塔出身名门，嫁妆颇丰，同马基雅维利这样资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可惜了。

“别再哭了，”他说道，“不过是离开一小会儿嘛。”

“可是，您不能去啊。”她一边抽抽搭搭，一边转向比阿吉奥，“他不能长时间骑马，身体不行。”

“尼可罗，怎么啦？”比阿吉奥问道。

“老毛病啦，又闹胃病了，没完没了。”

说着，马基雅维利拥抱了玛丽埃塔。

“夫人，我们走啦。”

“多多来信啊。”

“哎，多多写信。”他微笑道。

他微笑起来，总是贴在脸上的冷酷表情就会一扫而光，深藏内心的别样感情就会浮现出来，看到这个表情的人都能理解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爱他。他吻了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面颊，道："你不要太难过，比阿吉奥会照顾我呢。"

就是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却在出差去的伊莫拉被一位叫奥莱莉亚的有夫之妇迷住了。下面我再引一段他与皮耶罗之间的对话，皮耶罗受马基雅维利的挚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之托一块儿出差。

"你说，莫娜·塞拉菲娜不会把漂亮的奥莱莉亚对年长丈夫不忠的事儿说出去吧。"马基雅维利坏笑了一下问道。

"不会的。听说奥莱莉亚除了做弥撒很少出门，就是去做弥撒时，也得母亲或女仆陪着，否则是不会去的。莫娜·塞拉菲娜说，奥莱莉亚笃信上帝，认为欺骗自己的丈夫就等于死罪。"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沉思。

"你跟那位夫人说到我的时候，有没有提起过玛丽埃塔已经怀孕的事呀？"

年轻人的脸红了起来。

"我觉得没啥关系吧。"

"没什么。她知道了也不要紧。"

马基雅维利微微笑了一下，似乎带有某种意味。但皮耶罗没看懂这微笑的含义。马基雅维利不是为了爱才跟玛丽埃塔结婚的，他尊重她，认可她的优良人品，很高兴她能为伺候自己而献出一切。她是一位很会过日子的主妇，从来不浪费一分钱。这对他这样没什么家产的男人来说颇为重要。她很快就要做孩子的母亲了，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可以说，值得马基雅维利满含宽容和爱情去尊重的条件玛丽埃塔都具备。但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自己因此就必须对她保持贞操。奥莱莉亚的美貌使他惊艳，但使他动心的还不

仅仅是她的美貌，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让他一见倾心不能自持的女人。强烈的欲望甚至让他感到胃痛。

他对自己说："哪怕赌上一条命，也要把她弄到手。"

他对女人有很深的功夫，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很少失手。他对自己的长相没有错觉。他非常清楚，比自己更有男人味的人多得是，比自己更有财力和地位的男人多得是。但他确信自己有吸引女人芳心的力量。他能让女人很享受，他懂得让女人们高兴起来的技巧。他有一套本领，可以让任何女人都对他敞开心扉。不过，他的撒手锏就是他渴望女人。随着女人们渐渐清楚地意识到马基雅维利渴望她们，她们的欲火也已经燃烧起来。

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比阿吉奥说："如果一个女人浑身的神经都感受到了男人的欲望，她也就无法抗拒了。只有当她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的时候才不会这样。"

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但谁又能断言，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时就一定不会这样吗？

马基雅维利如果一直按这条路线坚持走下去就好了。可他却又玩起了"曼陀罗"[1]式的计策。最终他重蹈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覆辙。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粉色喜剧才成其为喜剧。

就在他要实行万全计划的当口，切萨雷·波吉亚要召见他，于是一切泡了汤。他是佛罗伦萨政府的特使，不能不响应。可偏偏那个晚上与切萨雷的会谈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拖。原本照万全计策行事的主人公是马基雅维利，这会儿比阿吉奥带来的小厮皮耶罗替他去了。马基雅维利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心里嘀咕道：

奥莱莉亚真蠢，虽然有些地方也跟别的女人一样算计计较，但归根结底是个傻瓜。要不是傻瓜，她就不会扔下我这个男人味十

足、受政府委托来进行重大交涉的堂堂实干家不睬，把手伸向那个细嫩的小帅哥了。随便让谁去比较，只要他们有点头脑，肯定是我有优势呀。没有谁会不喜欢我这样的人呀。就连我老婆玛丽埃塔都常说特别喜欢我的头发，就像黑色天鹅绒一般……

玛丽埃塔是一个那么难得的女人，一个信得过的女人。马基雅维利将近半年不在家，她也会心无旁骛。她最近是有些烦，这是事实。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比阿吉奥捎话来，表达心中的不平，抱怨他不但总也不回家，连信也不写，还不寄钱，把她晾在一边。本来嘛，马基雅维利如此对待她，她当然会生气。他离家也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也该大起来了。什么时候生孩子呀……马基雅维利想了一下。他和妻子已经决定，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给他取一个和已经去见上帝的爷爷一样的名字——贝尔纳多。总之，玛丽埃塔唠唠叨叨地抱怨他老不在家，就证明她爱着他。可怜的丑女人！

他轻声对自己说，回到老婆那儿也不错，老婆也有老婆的好处。比如一旦想要伸手可及。老婆比不得奥莱莉亚漂亮，但很守妇道，不会有莫娜·卡特琳娜姑娘那样的事情。啊，对了！给玛丽埃塔买点小礼物就好了……他忽然记起，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唉，现在要买也没钱了。

为奥莱莉亚花了那么多钱，真是犯傻，围巾、手套、蔷薇精油……还有金锁，不，不是金的，是镀银的。还送给莫娜·卡特琳娜一个金锁。如果那个女人多少懂点礼貌，就应该还给我啊。这样就可以送给玛丽埃塔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你见过女人收了礼物还有退回来的吗？

马基雅维利的猎艳无疾而终。按萨默塞特·毛姆的描写，马基雅维利是在与切萨雷进行命中注定的会面的间隙去猎艳的。马基雅维利经常且长时间地同切萨雷会谈，按他自己的说法，平均每六天他们之间就有一次这样的见面。所以他也许有足够的时间去猎艳，不，去玩弄猎艳的计谋。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这段时间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毛姆可以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儿子贝尔纳多是一年以后出生的，如果这时玛丽埃塔有身孕，那胎儿应该是贝尔纳多前面的那个女儿。但这也不能确定。

不过文坛耆宿毛姆非常好学，他读遍了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原始史料，从作品到给政府的报告，从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到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段对话，他都说得出引自哪里。他知道哪一段情节是从哪一份报告得到灵感后写出来的。他已年逾七旬，说实在的，真令人叹服。

不过，在史实方面毛姆的作品谬误颇多，比如把马基雅维利儿子出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年，等等。不过毛姆完全清楚这些。他把自己判断为重要的事件，不管是这个时期以前的还是以后的，统统塞进了这个时期。把历史事实写成小说，这项工作受到的制约格外多。

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波吉亚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学者还是史家对此已有共识。我与毛姆不同，才能平庸，不敢恃才把这段历史写得花团锦簇。我选择实事求是地追述马基雅维利的一生。

所以，在前面一章中，我写了切萨雷为什么会成为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象征，把聚光灯打在所谓历史的“著名事实”上。接下来，我想在这里追述一下那些“非著名事实”。

毛姆已经写了著名事实，并描写了马基雅维利的风流韵事，把它当作与之并列的非著名事实。而我愚钝，便不再去写这些。

马基雅维利是1502年10月6日离开佛罗伦萨，1503年1月23日回到佛罗伦萨的，所以，他被派在切萨雷·波吉亚身边的时间超过三个半月。

马基雅维利在这段时间内观察到了切萨雷的力量。音乐学中有一个评语叫作“大师”（virtuoso），是献给那些技巧完美、演奏华丽的演奏家

的赞美之词。切萨雷在这三个半月中的表现堪称“大师”。

这些给马基雅维利留下的不只是影响，恐怕还有伴随着知性快感的经验。他在这一期间给政府写了54份报告，报告的文体十分生动便是明证。33岁的马基雅维利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了血脉贲张的感觉。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这三个半月里，头脑清醒，热血沸腾，每天过得很充实，那你就错了一半。用一半来说事，是因为他有一半日子的确过得绚丽多彩，可是另一半日子却是在急切想回佛罗伦萨的心情中度过的。

首先，马基雅维利找不出自己长期待在切萨雷身边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没有大使地位，借了佣兵协议的名义，却无权缔结同盟条约。不召回他，说明佛罗伦萨政府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确立同盟关系。

而马基雅维利却认为应该趁此时机建立同盟关系。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感，也不像上次索德里尼主教在乌尔比诺那样，是出于恐惧的判断。归根结底这来自他的逻辑判断。

马基雅维利刚到伊莫拉时，切萨雷就已经对他说过：“靠山法国国王在意大利，教皇还健在，这两个事实好似强大的火力。要灭火，需要的水量惊人。”

当然，说这话时切萨雷的处境十分险恶。这也反映在佛罗伦萨政府上次派的是索德里尼主教那样的高官，而这次派的是马基雅维利。

但马基雅维利深具洞察力。就在切萨雷的3名武将在各地败在反叛者手下的时候，10月17日，他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切萨雷10天前所言不虚。

起来反对波吉亚的佣兵队长的领地正式说来都是教皇国的领土。这不是刚才发生的事，而是已经延续了1000年的事实。切萨雷是教廷军队的总司令，造他的反就是造教廷的反，就是说叛乱是冲着教皇本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纵令叛乱者取得了胜利，实质上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们不可能除掉教皇，所以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教皇对他们既得权力的重新认可。

如果是这样，在他们不能确保推翻优秀武将切萨雷的情况下，一定会倾向于与之和解。切萨雷是军事战略家，有足够的力量，最了解这帮在自己手下效力的人。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做出的判断。形成这个判断花了不到10天的工夫。仅仅8天之后，叛乱者之一保罗·奥尔西尼就在10月25日那天乔装打扮找到切萨雷，打探和解事宜。

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向明天的胜者卖好，今天就得行动。

可是，佛罗伦萨政府一如既往地优柔寡断，于是马基雅维利就得一直留在切萨雷身边，直到切萨雷在塞尼加利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佛罗伦萨政府才决定“派出大使”。1503年1月20日，“大使”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到了，马基雅维利同他完成业务交接后，终于踏上了回佛罗伦萨的归途。

马基雅维利想回国的第二个原因正是所谓的“非著名事实”——妻子玛丽埃塔发疯了。

马基雅维利出发12天后的10月18日，受马基雅维利之托照看玛丽埃塔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给马基雅维利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莫娜·玛丽埃塔让弟弟到政府来询问你何时能归。她说你临走

时说8天左右就回来。可你现在却音信全无。她还说她根本不想写信。

接下来的一句话直译过来就是：“她发疯了”，就是说她歇斯底里发作了。玛丽埃塔歇斯底里发作的报告还见于10月21日的书信，表述同样是“她发疯了”。

可是到了23日，玛丽埃塔莫名其妙地安静了下来。她自己不写信，但通过比亚焦的信向丈夫转达了快些回来的话。

可后来在12月21日的信里她又变得十分狂躁。丈夫不在身边已超过两个半月，也难怪。

走时说8天就回来，可一走就是三个半月，玛丽埃塔这才生了气。有一次她甚至回了娘家。负责安慰她的比亚焦恐怕也非常难办。不过，他很崇敬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出差时也常托他照顾家里，申领工资、寄钱，什么都让他做。比亚焦虽然时有抱怨，但一直尽心尽职。

在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留下私人信件。根据同事的信来看，他还是照例给他们写信，刺激他们，让他们开心，这是事实。然而他的信件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了解马基雅维利对妻子发疯的反应。不过，他不会完全不闻不问吧，毕竟结婚也差不多两年了。

马基雅维利希望回佛罗伦萨的第三个原因照例是经费不足。

刚出差时，马基雅维利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瓦伦蒂诺公爵在这十几天中花掉了无论哪个国家两年都花不完的钱。

这话有些挖苦的意味，但也仅止于此了。可是随着出差时间的延

长，马基雅维利逐渐失去了这样的心情。他越来越强烈地确信应该派大使来接替自己，与切萨雷签订同盟条约。10月23日，他第一次写信请求政府召回自己。27日，他第二次发信请求召回自己。

佛罗伦萨政府这时还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结盟，完全没有响应马基雅维利的请求。他们认为，在他们不再需要马基雅维利以前，他必须待在切萨雷身边。于是，他们开始对不断要求回国的马基雅维利展开了抚慰和激励的攻势。

秘书厅的同事们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私信，说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内容充实，说他人才难得，无可替代。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仍在不停地叫唤“放我回家”，于是11月7日，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亲自出马了。

> 很难找到有您这样判断力的合适人选。

这是马尔切洛私信里的言辞。

但马基雅维利还在继续嚷嚷着“放我回家”。这回就连前不久刚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也提起笔来，给马基雅维利写了封私信。

他是正义旗手，即便是在私信里也不能滥用抚慰和激励的言辞。他在11月2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 我需要您留在那里，您不要想离开。我确定地告诉您，需要召回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您。请您拿出热情努力完成任务。

即使这样，马基雅维利还是没完没了地以经费不足为由要求召回。于是12月21日正义旗手再次提笔写了封私信：

您信中所写之事是有理由的，我已经下令给您寄钱。请不要忘记任务，继续收集情况，发回报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寄钱了。事实上，只要马基雅维利不拼命申诉经费不足，佛罗伦萨政府就不寄钱来。也许是受到同事和上司的劝慰，他的胆子大起来的缘故，他开始考虑采取策略，诉诸非常手段，缓解久拖不决的经费不足问题。他让飞毛腿信使给政府送报告时采用了“到付”方式。不过，每次收到汇款时，他就会采用半额“到付”方式。也许他觉得这种时候采用全额“到付”的手段会过于“非常”。

“到付”方式是从11月20日开始使用的。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在伊莫拉度过了40天。他并非每次都这样做，有钱的时候不会采用这种非常方式。

12月2日开始，他再次使用了到付的方式：“请支付送信人6里拉。”

12月6日：“请付给这封信的信使1个金斯库多[2]。”

12月14日：“请支付1金弗罗林。”

12月20日也一样，要求支付1金弗罗林。

经费不足的叹息此后也没有停歇。

12月31日：“我已掏腰包垫付信使3达克特，请政府支付剩下的3达克特。我垫付的部分请交给比亚焦……”

1503年1月2日：“我已掏腰包付了1达克特，并答应他政府会再给他2达克特。请原谅。请将我垫付的那份交给比亚焦。”

1月10日：“请付给送信人10里拉。”

1月13日：“在塞尼加利亚事件之后，我花费了5达克特寄出了3封邮件，请政府将此款交给比亚焦为盼。”

1月21日：“我承诺给这个送信人3里拉，请予支付。”

我很吃惊，送信的费用并不便宜，可能因为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一个中等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100达克特上下。顺便一说，弗罗林也好，达克特也好，斯库多也好，它们的价值大致相同。

在这里我顺带写一下。给政府的报告之类的重要文件要委托可靠的专业信使传送。但寄钱之类，即使是给出公差的人寄钱，很多情况下好像也是委托有事去当地的个人捎带。给马基雅维利这种地位的人寄钱，金额也不大，恐怕没有必要动用银行汇票。

4年以后有一段插曲。1506年，马基雅维利到罗马出差，受政府委托，给他送去经费的人竟然是米开朗基罗。这是后话，但毛姆把这件事竟然写成了1502年的事。同事比亚焦照例写了信，信中写道：

> 一笔钱已由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带去。

可是5天后他又写信说：

> 正当我以为米开朗基罗一定已把钱带去时，他的一个仆人把钱送了回来，原因是他不去罗马直接返回了。现在我正在想别的办法寄钱。

米开朗基罗返回的原因是，这位31岁的艺术家血气方刚，为创作的事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生了争执。

从1502年的秋季到冬季，马基雅维利每天都能看到切萨雷·波吉亚

展示出的力量，叹为观止。他写道：“我由衷地感叹！”同样也是这些日子，马基雅维利要为留在国内的妻子发疯而心烦意乱，又要为政府寄来的经费总是不够而伤脑筋。前一个是“著名事实”，后一个是“非著名事实”。

然而，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非著名事实”也不可或缺。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颉颃的关系，而是极其自然地并存融合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要想写好历史事件，就需要相应的分量。

佛罗伦萨政府小气，但我想说句公道话，这倒不是提到了米开朗基罗名字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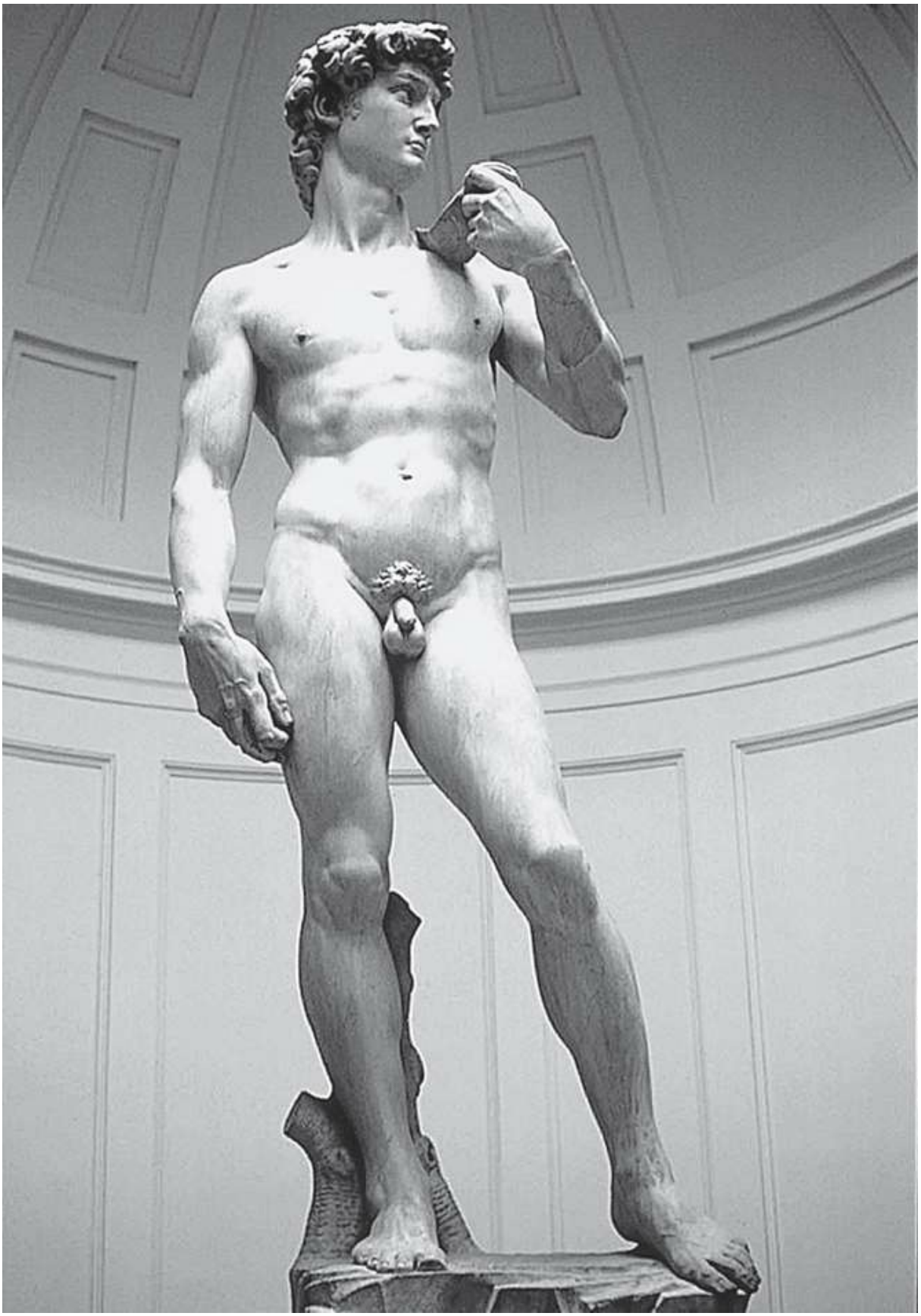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经济上吝啬，支付经费不爽快，在政治上只是一味地优柔寡断。但就是这个政府，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文化方面却非常活跃，因为他们拥有佛罗伦萨出生的伟大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这时已经开始创作《大卫》。这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于1503年底完成。1504年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把这座雕塑杰作安放在哪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文艺复兴美术史上的主角。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3]、菲利比诺·利比、科西莫·罗塞利[4]、基兰达约、波拉伊奥罗[5]、波提切利、桑加罗兄弟朱利亚诺[6]和老安东尼奥[7]、桑索维诺[8]、佩鲁吉诺[9]、洛伦佐·迪·克雷蒂[10]，还有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一个时代出一个足矣的天才，竟有十多人济济一堂。

达·芬奇似乎主张把雕像放在建有屋顶、可避风雨的回廊中。米开朗基罗心中对这位年纪长他24岁的前辈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主张哪怕风吹雨打，也要把雕像立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前。最终，大家采纳了作者米开朗基罗的意见，把《大卫》安放在了市

政厅前。不过，现在放置在那里的是复制品，真品安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中。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依旧熠熠生辉，五百年如一日。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卫》

鲁本斯临摹的达·芬奇画作《安吉亚里战役》

佛罗伦萨政府还考虑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在市政厅大会堂左右两面的墙壁上比赛创作壁画。

两幅画作的主题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取得胜利的战斗场面。51岁的达·芬奇选择的是安吉亚里战役，27岁的米开朗基罗则选卡西那战役[11]作为主题。

如果画作得以完成，一定会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杰出作品之一，佛罗伦萨市政厅也会像罗马西斯廷教堂一样，成为美术爱好者最神圣的“巡礼之地”。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达·芬奇由于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先撂下了画笔，接着米开朗基罗也不知为何放弃了创作。达·芬奇的画

还在底稿阶段，就被评价为伟大的杰作。稍后时代出现了几幅对此底稿的临摹画，我们后世托此之福才得以稍稍欣赏到一些巨作的风采。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佛兰德[12]画家鲁本斯[13]的临摹画。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最先繁荣的是经济，接着开花的是政治外交，最后结果的是文化。

马基雅维利或许就是一个出生于文化时代的政治人物。

---

[1] “曼陀罗”是马基雅维利于1518年左右创作的一部喜剧的名字。

[2] 斯库多（scudo，复数为scudi）,19世纪以前意大利半岛用过的多种银币的名称。最早由查理五世（Charles V）于1551年在米兰发行，称为scudo d’argento。在马基雅维利时代，1斯库多约值1个标准金弗罗林（约合6或7里拉）。

[3]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Andrea della Robbia,1435—152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陶瓷艺术家。他一生为美第奇家族服务，创作了众多的彩陶作品。代表作有佛罗伦萨育婴堂敞廊拱间壁上的14块圆形浮雕等。

[4] 科西莫·罗塞利（Cosimo Rosselli,1439—150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主要活跃于佛罗伦萨，也曾为卢卡的教堂和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绘制过作品。

[5]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约1429/33—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对陶瓷艺术品中釉料使用的技法发展卓有贡献。代表作有版画《裸男的战斗》，为西克斯图斯四世制作墓碑等。

[6] 朱利亚诺·达·桑加罗（Giuliano Giamberti da Sangallo,1445—151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兵器工程师。主要作品有位于波焦阿卡亚诺的美第奇别墅、位于普拉托的圣玛利亚教堂等。

[7] 老安东尼奥·达·桑加罗（Antonio Giamberti da Sangallo il Vecchio,1453—1534），朱利亚诺·达·桑加罗的弟弟，因与侄子同名而称为老安东尼奥，侄子称为小安东尼奥。建筑家，长于城堡和防御工事的设计。作品有位于蒙特普齐亚诺的桑比亚焦教堂等。

[8]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9] 佩鲁吉诺（Perugino，约1448—1523），本名为Pietro Vannucci。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画派的代表画家，拉斐尔是其最为著名的学生。他是梵蒂冈及西斯廷教堂壁画创作的中坚人物。代表作有《交钥匙》《皮埃罗》《圣女的婚礼》等。

[10]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约1459—153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雕塑家，与达·芬奇互有影响。代表作有《受胎告知》《幼子的崇拜》等，他曾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画过肖像画。

[11] 卡西那战役，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于1364年7月28日发生在卡西那的一场战役。

[12] 佛兰德（Flandre），比利时西部至法兰西北部北海沿岸一带地区。14世纪末至17世纪，这里的美术有了独特的发展，形成了佛兰德美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兰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对油画技巧的成熟也产生了影响。代表人物早期有凡·爱克兄弟（Hubert van Eyck,Jan van Eyck）、凡·德·威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后期有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der Oude）、鲁本斯、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等。

[13]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曾师从提香等大师。其画风华美，充满绚丽的色彩美和感官美。在巴洛克美术中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涉及宗教、历史、肖像、风景等众多题材，主要有《竖起十字架》《玛丽·德·美第奇生平》等。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交涉，回到了佛罗伦萨，等待他的是已成为共和国惯例的政体改革。

说实在的，这次政体改革1502年9月就已定下。那时马基雅维利正要出发去同切萨雷进行第二次交涉，说政体改革“等待他”并不确切。不过，11月1日，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索德里尼上任，启动了政体改革。可最初的几个月人们无法进行改革工作。所以，索德里尼当选为正义旗手后的统治体制一直等到1503年春天才正式起步。马基雅维利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卸任回国。

但丁在《神曲》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政体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祖国佛罗伦萨比作一个疼痛难忍始终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可是但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佛罗伦萨人的这种性格却毫无改观。每当统治能力碰壁，他们不是寻求根本的解决方法去面对，而总是采取改变形式、把危机糊弄过去了事的策略。直到16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1502年的“改革”，就是把正义旗手的任期从以往一贯的一年一任制改成了终身制。

正义旗手终身制显然是对当时政治最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模仿。佛罗伦萨人可能认为，只要搞了终身制，政局就会安定。但是，读过《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的人马上就会认同我的观点：16世纪初期，威尼斯享受到的稳定在意大利是数第一的，但威尼斯的政体却是长达两个世纪周到安排的产物，是200年前威尼斯经历阵痛却不放弃并谨慎加小心地培育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是每次面临危机都只考虑快速解

决并靠侥幸而成功的。

何况，根本没有这种道理，在威尼斯成功的事在佛罗伦萨也一定能成功。威尼斯的主要产业是贸易，“活路”是海路。佛罗伦萨的主要产业是金融业，“活路”是陆路。走海路如果没有下层百姓划桨手的合作，船长的技术再好，船也不会前进。但如果走陆路，个人行路能力的不同，会给行程带来极端的差距。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对共同体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只要一国的政体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或曰气质不合，就不能指望它会高效率地发挥功能。

佛罗伦萨人在文明文化方面堪称伟大，但他们的政治形同儿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这样具有革命性思想的政治哲学家。佛罗伦萨是一张罕见的温床，会让关心政治的人怒不可遏。而威尼斯虽然被公认为是政局稳定的榜样，到头来不光在政治哲学方面，在历史领域中也没有产生出独创性的理论。

不过，仅就官僚马基雅维利而言，正义旗手的终身制尽管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快招，却给了他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而且，这个天赐良机在他30岁刚出头的绝佳年龄段降临到他身上，正合时宜。

运势如果不合时宜就成就不了好运。

佛罗伦萨共和国决定采用正义旗手终身制。1502年9月20日，皮耶罗·索德里尼当选为首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20天以后，马基雅维利踏上旅途，第二次去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

佛罗伦萨人渴望统治能力，却又害怕一人独大。所以他们选出来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人物。

索德里尼年届五十，中等身材，形体偏瘦，教养并非特优，但有辩才。

他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索德里尼家族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事后不久就当上了枢机主教。皮耶罗娶了意大利北部富有的豪族马莱斯皮尼家的女子为妻，尚无子嗣。这一点让佛罗伦萨市民很放心，他们怕有形成世袭制的危险。

皮耶罗·索德里尼曾经担任过一年制的正义旗手，在经验方面没有问题。他属于无可挑剔的上层阶级，却被视为平民派。他信仰笃深，慈悲为怀，没有野心，钱财干净，没有绯闻，在选举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动用了金钱。他当选的时候甚至人都不在佛罗伦萨。

索德里尼还是一个重法之人。哪怕敌军逼近，指日可待，他都要把决定交付议会讨论。宽容和忍耐是他施政方针的根本，哪怕罪犯犯罪事实清楚，他也不愿施以极刑。任何人都无须担心他会滥用职权。于是，他以绝对多数赞成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

如在平时，他应该是一位理想的领袖。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处在乱世之中，因为新兴的专制君主国家法兰西和西班牙开始把意大利半岛当成舞台，争夺欧洲霸权。

马基雅维利与皮耶罗·索德里尼似乎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特别是他刚刚和正义旗手的弟弟枢机主教一起参与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第一次交涉。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非常欣赏马基雅维利的能力。

当终身正义旗手的哥哥如前所述，此后10年他一直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除了弟弟的推荐以外，皮耶罗·索德里尼也非常认可马基雅维利在第二次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并给予了提拔。但马基雅维利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上司”的呢？

20年以后，皮耶罗·索德里尼去世时，53岁的马基雅维利正在撰写《十年纪》（*Decenale*）下卷。他在书中这样与索德里尼做了了断：

> 皮耶罗·索德里尼死去那晚，他的灵魂来到地狱门口。可普路同[1]吼道："愚蠢的灵魂也来地狱？不要再说傻话，去那灵薄狱[2]与婴孩为伴。"[3]

普路同是冥府的冥王。灵薄狱是来不及受洗便已夭折的婴儿灵魂的去处，据信位于地狱和天堂之间。

后世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多认为，马基雅维利受到索德里尼的赏识，得到过他的提拔，这样的评价过于严酷。不过，这只能是一个证据，表明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中与马基雅维利拥有共同精神基础的人有多么少。这样想的人应该思考一下，客观评价究竟是什么。要知道，恩义、亲爱之情等等与客观评价一个人毫无关系。在乱世之中，实际拥有重法之人、正义之人、中庸主义者索德里尼这个上司的人，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当时34岁，他与这位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上司关系怎样呢？

皮耶罗·索德里尼1502年11月1日正式就任终身正义旗手，住进了官邸韦奇奥宫。当时，马基雅维利奉派去了伊莫拉，与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第二次交涉，不在佛罗伦萨。所以，直到1503年春天，马基雅维利从伊莫拉回来两个月后，他才开始与索德里尼面对面地工作，而不再通过写报告的方式。

那时，索德里尼就任有终身保障的职位已有5个月，似乎已经有勇气提出一些不受市民欢迎的政策了。他终于决定提出一项事实上已迫在眉睫的新税法案。如果不征收新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财源早就枯竭

了。可是无论是500年前的过去还是今天都一样，新税总是不受待见。这件事谁的心里都不会赞成，实施时又不能让这种不满爆发出来。为此，需要一个人用谁都不能不认可的理论依据来推行此事。

索德里尼把寻找建立这个理论依据的事情交给了马基雅维利，于是便有被认为是《君主论》先声的短文《关于筹集资金的提议——若干铺垫和需要思考事项的叙述》[4]留存下来。这篇短文标题奇异，而且只谈应该考虑作为铺垫的若干事情，完全没有涉及真正的目的——资金筹措。文章只讨论了标题所示内容的一半，真是一篇奇文。

话虽如此，马基雅维利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明确地论述了自己的想法：让国家高效率地发挥功能究竟需要些什么。文章的论述方法是实话实说。这一点在意大利被誉为是“全文之经脉”。形式上文章是在给索德里尼等有决策权的人物提建议。

> 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也不论统治者是绝对君主，还是一群贵族，还是像现代佛罗伦萨这样的民众，所有城邦（或国家）都需要用“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来保卫自己。只有“远虑”不够，只有“力量”也不够；只有“远虑”无法实行所想之事，只有“力量”则行之不远。
>
> 因而，这两者与政体无关，它们是能够使政体发挥良好效力的政治之根本。这一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接下来，马基雅维利拍了一个马屁，说改为正义旗手终身制后，自己满怀希望。但这个话题不长，他话锋一转，直来直去地谈起他后来为什么会失望。他写道：

> 你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现实是什么。

马基雅维利一个接一个地列举事例，说“远虑”和“力量”这两件东西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个也没有。他的毒舌终于说出了最近的失策，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他继续说：

> 我要再说一遍，城邦（或国家）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会走向终结。这个终结可能是被破坏，也可能是被奴役。这几年来，你们差点陷入这两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你们很快会再次招致同样的事态。到那时，请你们不要说，以前没有人告诉过你们。
>
> 如果你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军事力量呢？佛罗伦萨不是与法国国王签订了安全保障协定了吗？佛罗伦萨的敌人不是都已经离去了吗？不是已经不用害怕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攻击我们了吗？那我来回答你们。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比你们这些想法更危险的了。
>
> 因为对每个城邦、每个国家来说，想着领国可以侵犯的人是敌人，同时，不认为侵犯可御的人也是敌人。时至今日，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还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把防卫交给他国而能保全本国安全呢？

说完了这些话，马基雅维利开始逐一讨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现状，说如果佛罗伦萨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甚至连本国国民的忠诚都不会得到。

> 人是不会忠于不能保护自己、无力纠正错误的人的。

马基雅维利甚至说，即使国民对不愿履行这种义务的领袖不忠诚，领袖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 你们不能把他们叫作臣民。只有最先攻击他们的人才可以称他

们是臣民。

感觉上这是一介小官的信口雌黄，但这位34岁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是在给政府最高官僚洗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他们。

请你们看看外面，再看看佛罗伦萨周边被哪些国家所包围。你们会看到有这么两三个国家不是希望它生，而是希望它死。你们再把目光移开托斯卡纳，放眼整个意大利，你们就会知道控制意大利的是法国国王、威尼斯人、教皇和瓦伦蒂诺公爵他们这些人。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不能指望这些当权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会尊重佛罗伦萨的国家利益，也不可以去指望他们。接着，他按照自己的一贯论述方法，一边一一举例说明控制意大利的这四股势力，一边论证自己观点的根据。

他的结论是：

在个人之间，法律、契约和协定让他们守信。然而，使权力者守信的只有武力。

马基雅维利断言，尽管到现在为止还不错，但今后仍想依赖法国国王的军事力量就是错误。

因为时代会变，最重要的是别人的剑不一定靠得住。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所以在强大的敌人还没有逼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搞好自己的军备。

马基雅维利认为时不我待，他甚至介绍了一段往事，说拜占庭帝国

的每个家庭都有财力，却不与国家合作。等到土耳其的大炮响起来再要求捐款，已经为时晚矣。他进一步说服道：

> 人们六个月前不同意拿出20达克特，六个月后却被抢走了200达克特。

他肯定地说：

> 你们看不到如此下去佛罗伦萨将会更加脆弱，你们也不知道命运的多变。
>
> ……
>
> 人们通常会因为看到邻人的危险而变得聪明，但你们不会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中增长见识。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不想去看你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改变想法，就只能枉自流泪。
>
> 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运气不会垂青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它不会改变它已决定的事情，老天爷也不会帮助想要自毁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得救。
>
>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们这些自由的佛罗伦萨人、你们这些还有着决定自由力量的人会希望自取灭亡。我相信，只要你们希望生来自由，并且愿意自由地生活下去，就不会不郑重考虑这件大事。

马基雅维利的这份“提议”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在审议是否通过新税法案的议会投票之前，索德里尼做了充满热情的演讲，很有说服力。索德里尼即使没有原文照念马基雅维利的提议，也一定是拿他的这篇文章作底稿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原本难以通过的新税法案投票时却一次通过。

首先，新的财源成功地得到了保障。但是刚刚得到保障的财源并没有用在马基雅维利竭力游说的目的上。此后又花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自卫力量才得到确保，不再依赖别人。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芝麻官第一次亲自染指制定的政策。

不知是福还是祸，马基雅维利的这三年并未专心致志地只做创建国民军这一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的秘书官就好似游击队长，这样的工作不允许他一直坐在市政厅办公桌前。他依然频繁地到国外出差，罗马两次，法国一次，交涉对象从教皇、国王到小国领主，并不限于没有资历的低级官员。他的谈判能力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被随时派到任何地方去出差。

也许是这些经历发生了作用，马基雅维利愈发坚定了让他心潮澎湃的思想。波吉亚家族瓦解后，意大利只是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竞争雄心相互碰撞的舞台，有力量与这两个国家对抗的国家只剩下威尼斯共和国了。马基雅维利愈来愈强烈地确信，在这种形势下，保卫本国国民自由的防卫力量不可或缺。

但他没有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又不愿意改变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把马基雅维利的想法看作“没有先例的新鲜事”。人们往往对没有先例的事情抱有戒心。正义旗手索德里尼是一位有名的中庸主义者。中庸主义者往往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会行动。起初，虽然谈不上热情，索德里尼还同意马基雅维利的想法，但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也淡漠了。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要考虑政策决定以后如何落实。落实就是在议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然而，如果认为政策的内容好就一定会得到议员的赞同，那是做梦，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因而需要做准备工作。那么，马基雅维利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他首先从说动索德里尼主教开始。在第一次与切萨雷·波吉亚谈判

时，枢机主教与马基雅维利是搭档。他们的关系非止于此。第二次谈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逗留期间，索德里尼主教被派到了法国国王的身边。所以，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此外，每次去罗马出差，马基雅维利都会在已经当上枢机主教的索德里尼的府邸下榻。尽管这是佛罗伦萨政府节约经费的结果，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数月，也少不了交换意见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利用做“客卿”的机会，可能没有停止过向枢机主教灌输自己的想法。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和他哥哥可不一样，他是一个想法热情奔放的主儿。这与神职人员的身份不大相称，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职人员中很普遍。他似乎为马基雅维利的能言善辩所打动。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期间，他充分了解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平时对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也很认可。他也赞成马基雅维利有必要确立自卫能力的主张。

索德里尼已升任枢机主教，工作就是辅佐教皇，已经不能再为祖国佛罗伦萨当外交官了。但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资历来说，他仍然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是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弟弟。马基雅维利请求这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担当起说服正义旗手哥哥的角色。主教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他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哥哥寄去了好几封信，表示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考虑的政策，力陈实行马基雅维利的政策对佛罗伦萨必不可少。他还在信中赞扬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这几封信一直留存至今。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不会放过维持这种良好关系的机会。在罗马的索德里尼府邸当“客卿”期间，马基雅维利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出生了，他便请主教做了儿子的第一教父。

教父母制度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为儿子请的另外一位教父是佛罗伦萨政府官僚中排名第一的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他是职场上的上司，礼数不能缺。维尔吉里奥对此的回应不失官僚做派，也成了一位马基雅维利的赞成者。

不过，马基雅维利也是人，而且是一个过于人性化的人。他没有只请对自己的工作有用的人来做儿子的教父。除了上面两位大人物以外，他还请了官位比自己还要小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位从心底里敬佩自己、在自己出差时积极通报详细信息、并在自己不在家时不厌其烦地照顾自己家庭的这位亲密朋友。我觉得，在被请为马基雅维利长子教父的人中，最高兴的就是这位博纳科尔西了。

马基雅维利认为，许多人都能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即拥有决策权的人发挥影响力，所以只做索德里尼兄弟的工作是不够的。他没有忘记做另外两个人的工作。这两人无论是在出身、人格还是能力方面，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政界都备受尊敬。他们就是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5]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

里多尔菲曾与马基雅维利一同被派往比萨前线，两人的朋友关系超越了各自所属的阶级，有事说句话就行，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上层大人物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马基雅维利把刚刚脱稿的诗文《十年纪》上卷献给了这位人物。这部作品在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的策划之下很快就印刷刊行了。这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该书印刷本的第一页上就印有接受献书者的名字——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说实话，《十年纪》上卷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诗文的形式讲述了自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开始到前一年即1503年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但作为文学作品成色并不好。不过，作品冷静分析并猛烈抨击了进入乱世的意大利，充满热情地呼吁人们冲破危机，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作品。大概正因为如此，拥有同样思想的韦斯普奇才策划刊行了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大受好评，甚至没有征得作者马基雅维利的同意，很快就在其他地方再版发行。

出了盗版说明这本书的初版销售大概不错。我们不清楚初版书的印数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付给了作者多少版税。不过，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不能指望作者能得到多少版税，拿到几十本样书送送人，也就算是“版税”了。所以，马基雅维利的第一部印刷本著作，想来也不会是例外。但马基雅维利至少可以拿自己的作品送人了。他似乎把这些书派上了大用场。

一些人收到了赠书，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位，他在信里把读后感写了下来作为受赠的回礼，而这封信又被保留了下来。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他是小国的领主，曾经在切萨雷·波吉亚麾下做过佣兵队长，当时是由佣兵组成的佛罗伦萨军队的总司令。他的读后感非常好。

这本书是献给佛罗伦萨政界大佬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这位大人物实际上对实现马基雅维利所构思的“没有先例的新鲜事”发挥了不少影响，尽管他以前曾经评价说马基雅维利是个无赖。

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在提倡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决策者们往往会主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一致同意。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个托词。谋求实现政策的人不能给人以任何托词。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为了唤起舆论开始四处奔走。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奔走。自1505年到1506年，马基雅维利以他30岁时才有的敏捷，奔走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农村地带，今天穆杰洛，明天卡森蒂诺，四处招兵买马。他的想法是，要把农民武装成步兵。

马基雅维利认为，目前已经不可能在城市居民中征兵，很久以来，佛罗伦萨市民一直相信战争要交给佣兵去打。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闻名。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分裂成教皇派和皇帝派。但在佛罗伦萨，不仅分裂成这两派，获胜的教皇派还要再分裂成黑党和白党。

这就是佛罗伦萨的国家性格。马基雅维利把希望放在了还没有受到这种抗争污染的农民身上。

在军事史上一直存在着骑兵和步兵孰为主力之争。到了16世纪初期，时代已经改变，作战主力已经从炫耀华丽军装、看似具有绝对实力的骑兵队转变成了组成军团顽强推进的步兵团。貌似愚笨却不易崩溃的瑞士人步兵团受到各国君主的高价雇用。马基雅维利比谁都更了解这个现状。

马基雅维利四处奔走，说服农民。也许光荣辉煌的古罗马步兵军团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但切萨雷·波吉亚组建的罗马涅地方农民军的记忆，恐怕给他的刺激更大。

他不再诉苦说出差费用少了。他要么拿到了休假，要么是让上司睁只眼闭只眼，这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走”了。但是，即使说服成功，武装农民也需要花钱。他不是富人，负担不起武装农民的钱。也许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被弟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轮番进攻般的说服所征服，他编造出了一些理由，通过正当途径提供了费用。由于没有史料可以讲清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弄到这笔钱的。

马基雅维利“奔走”的结果于1506年2月15日这一天展现在挤满市政厅前领主广场的市民面前。

我们通过卢卡·兰杜奇日记介绍一下这天的情形。我们经常引用这位编年史作者的记录。要了解佛罗伦萨市井小民的观点，他是一位最值得信任的证人，因为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兰杜奇1506年2月15日的日记完全直译是这样的：

> 今天，广场上举行了400名步兵的阅兵式。这是根据正义旗手命令进行的。士兵都是农民，他们身着统一的白色上衣，穿着红白色紧身裤，戴着白色贝雷帽，脚蹬靴子，胸带护甲，手持长枪。还有

一队扛着步枪。听说这叫作“战斗连”（battaglione），有一位指挥官指挥他们，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

这些兵平常待在家里，需要时召集起来。听说采用这种方式，光在农村地区就能确保数千人的兵力。这可真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事，非常好，非常美。

民众喜欢。马基雅维利的杰作国民军虽然是一支只有400人的小型部队，但在政府高官面前，在挤满广场的人山人海的民众面前列队、行进，受到了人们的鼓掌喝彩。卢卡·兰杜奇没有记下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人们不知道发起人谁是。但是这位发起人没有心情沉浸在作品首展成功的激动之中，他的眼睛既要关注这人山人海的反应，还要关注坐在贵宾席上的那些决策者的反应。这只小型国民军表演的真实目的是要让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人们看一看老百姓的反应。

当时佛罗伦萨的决策者们并不是因为愚笨而缺少进取精神，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比法国国王聪明。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想要做“没有先例的新鲜事”的人来说不好对付。恐怕贵宾席中就有不少人得出了这样做不现实的判断，因而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在看热闹。碰巧这一天又赶上狂欢节，真是怪了。

在这以后，这样的表演又反复搞了好几次，或许应该说不得不如此。因为马基雅维利提议的这项政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议会上讨论。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在整个农村，所有适龄男子均有义务进行兵役登记。但不进行全民征兵，发生战事时招兵，规模定在5000人。

首先编成小队，人数在150人到200人之间，每队都有队旗，也有小

队长。

3到5个小队集在一起，编为中队，由中队长指挥。

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的总人数计划为5000人。

此外，马基雅维利好像还考虑让城里的市民出30名骑兵和50名石弓手，加入进来。

这支军队称为佛罗伦萨正规军。马基雅维利认为，军备应该以保家卫国的精神为基础。即使实战时得与佣兵编组使用，也得让他们有正规军军人的荣耀。队旗也好，统一的军服也好，目的都在于此。这是从切萨雷·波吉亚的农民军团学来的。

这一点也表现在大队长的人选上。马基雅维利推荐了被誉为切萨雷·波吉亚左膀右臂的唐·米凯洛托。此人是西班牙人，唐·米凯洛托是他的俗名，真名叫米圭尔·德·科雷拉。切萨雷失败后他在佛罗伦萨被捕入狱。马基雅维利把目光投向了他。他曾经指挥过切萨雷的农民军团。

让一个外国人来做本国军队的总指挥，威尼斯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但在佛罗伦萨，这样做反而容易得到决策者的赞同。因为佛罗伦萨的权势者最害怕的是，本国军队的建立会巩固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权力。他们认为，如果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位与佛罗伦萨没有瓜葛的外国人，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马基雅维利为了不埋下这类担心的种子，没有忘记确立文官领导体制。佛罗伦萨正规军的负责人不是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而是由议会选出9位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九人军事委员会”，从而形成了一种从征兵到装备一切皆由文官决定的体制。

到了战时，“九人委员会”并入以前就有的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指挥系统。“十人委员会”也是文官团体。

选中米凯洛托的真正原因是佛罗伦萨习惯于使用佣兵作战，没有人会指挥军队。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明说，否则便会鸡飞蛋打。马基雅维利坚持文官主导原则，并诉诸政策决策者，消除了他们对军队变成正义旗手直属军的恐惧。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经过“八十人委员会”三次投票，总算提交给了议会。1506年12月6日，议会以841票赞成、317票反对获得通过。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任何记录，可知这件事并没有成为市民们的话题。这与当初军队盛装表演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这才是他充分享受发自心底的喜悦的一天。他成功了！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一天无疑是37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按规定，“九人委员会”设两位秘书，其中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他又像贪心老太婆一样揽了一堆新工作。这些事是自己想出来的，哪有心情交给别人去做呢！另一位秘书由与他志同道合的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担任。马基雅维利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体制就此完成。翌年，1507年的1月10日，选出了9名委员；一个月后，唐·米凯洛托就任最高指挥官。

马基雅维利不仅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两年半以后的1509年6月，以马基雅维利创建的正规军为主力的佛罗伦萨军队，成功地夺回了比萨。曾经被嘲笑为“狂欢节假面具”的农民军团实实在在地打赢了战争。佛罗伦萨人认为重新领有比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农民军团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厥功至伟，民众沸腾了。

沸腾的不光是民众。毕竟，佛罗伦萨被这件事折腾了15年之久。几天后，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位知识分子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

这次可贵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您。……您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比犹太民族伟大的先知们所做的还要伟大。哦，尼可罗，尼可罗，说真的，我已经找不到足以表达我心中所想的语言。

成功夺回比萨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真正值得纪念的大事。但是，有功之臣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并没有被镌刻在大理石板上记载下来，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不足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为他留名的必要。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建功立业时得不到什么回报，稍有不好却会立刻被人想起，真让人接受不了。做事太扎眼的报应三年后果真到来。

---

[1] 普路同（Pluto），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2] 灵薄狱（Limbus），意为地狱的边缘，天主教指安置耶稣基督出生以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出生后从未接触过福音的逝者之处，未受洗的夭折婴儿死去后的灵魂也安置于此。

[3] 这首诗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以“短句二则”（徐卫翔译）为题独立成章，并不包含在《十年纪》中（参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戏剧诗歌散文》第36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此处译文为译者根据日文译文转译，参考了徐译。

[4] 此文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的标题为“关于筹款的讲演辞”，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下》第89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

[5] 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Alamanno Salviati），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曾任驻法国大使。佛罗伦萨收复比萨后曾任驻比萨总督。他于1502年任执政团成员期间对平定斯皮托亚、阿雷佐和瓦尔迪基亚纳的叛乱以及政制改革等方面出力甚大，他提议创设了终身正义旗手的职务。他的女儿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妻子。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 （1507—1512年）

我在这一部开头写过，如果勉强以现代日本为例，可以认为在那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地位相当于内阁官房的事务官员。我当然知道，16世纪初，佛罗伦萨这个城邦加上周围的农耕地区，人口数不过50万。与人口超过1亿的现代日本相比，它的内阁官房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说“勉强为例”。

我们勉强做个比较。从1498年到1506年底，马基雅维利坐上第二秘书厅的头把交椅，可以说是内阁官房的一员。他还兼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可以认为是借调到防卫部任职。此外，他还是共和国正义旗手的秘书，等于他还兼任着首相秘书。

这种情况在官僚组织完备的现代先进国家不可能存在。况且，马基雅维利是属于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这样的任职在现代日本就愈加不可能了。

然而，自1507年初到1512年9月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马基雅维利除了上述职务外，实质上还成了正义旗手的副官。如果这样，现代日本很多没有晋升机会却喜欢工作的人，都恨不能生在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了。人嘛，没有什么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更幸福的事了。

从37岁到43岁这段时光，马基雅维利享受着这种幸福。他提议并成功实现了组建国民军，法案通过后也没有放手，还在负责指挥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中担任秘书，活跃在第一线。可以说，在当时佛罗伦萨政府中，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位置一定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的精

英官僚圭恰迪尼重要得多，工作也很有干头。

然而，马基雅维利享受到的幸福归根结底是事实上的东西，他的正式地位从29岁担任公职时起就从来没有变过。

他的头衔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尽管到处兼任秘书，薪水并无增加。虽说那个时代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但14年间看不到他有一次加薪的情况。皮耶罗·索德里尼当上终身正义旗手后在市政厅韦奇奥宫里得到了办公室和一处居所，并住了进去。但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作为他的“副官”甚至“心腹亲信”，马基雅维利在这附近拿到过斗室一间。没有任何人想到或提议把他从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提拔到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基雅维利薪水没涨、地位没升，不光徒增了工作，他还干得专心致志。马基雅维利在收入有保证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用好这些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没有留出富余，做到有备无患。6年的“副官”生涯就在他兴冲冲的工作中逝去了。

这样说是有证据的。马基雅维利成为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心腹以后，他去外国出差的规格没有提高，依旧是政府不想明确表态的时候派他去。他曾被派去见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罗马教皇等。他不是出身名门，利用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专门为了争取时间和收集情报。这同过去8年没什么两样。

另外，只要需要，他一样会被随意差遣。他曾被派去与区区佣兵队长谈判，他也经常去见小国君主。总之，借用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话说，是被“呼来唤去，席不暇暖”。可是，尽管他诉过经费不足之苦，却没有抱怨过差事辛苦。他大概对秘书长这个头衔很满足。

当然，马基雅维利还是当过一回“大使”的。那是1511年5月的事情，他被派往摩纳哥，去和领主卢西亚诺·格里马尔迪谈判。这是他第

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以“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Ambasciatore communitatis florencie）的头衔被外派。

当时的摩纳哥是热那亚西边一个小不点儿大的小国，还不是现在的大公国，没有赌场，也没有游艇码头。热那亚人格里马尔迪把这里当作根据地，一半从事海运，一半做海盗。顺便一说，曾经的好莱坞影星格蕾丝·凯莉[1]就嫁到了摩纳哥。她的丈夫兰尼埃[2]大公就姓格里马尔迪，是马基雅维利大使谈判对手格里马尔迪的后代子孙。

就这样，只要需要，马基雅维利就会被派到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于是，只要是重要的国家，他便会自然想到把自己在出差过程中观察、分析、思索、综合的东西记录下来。要不然就是他第一次出差的记录得到了好评，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他虽没有留下《摩纳哥事务概览》，但留下了《法兰西事务概览》和《德意志事务概览》。这些报告在观察、分析和综合等各个方面，堪与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大使卸任后根据义务在元老院做的述职报告相媲美，堪称双璧。但从叙述能力上看，威尼斯人的记述准确但乏味，而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则文采飞扬。《法兰西事务概览》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 今天，统治法兰西的王朝和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气势，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其原因如下……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刚开始当作家时编辑对我说的话。他说：“开头三行抓不住读者的心，就算不上专业作家。”

我想介绍一下同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述职报告的开头部分，给大家做个参考。我省略了报告开篇那些“先生们，女士们”式的冗长称呼。

> 巴黎位于法兰西，是一个富裕的、商业活跃的城市。它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法兰西虽然富庶，但还远不及威尼斯。即使这样，

就我所见，人们已满足于此。

马基雅维利认为，无论政体如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思想和实力就生存不下去。在他看来，当时拥有思想和实力的，正是这些论述乏味的威尼斯人。相反，没有思想和实力的恰恰是现实的佛罗伦萨。不管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多么文采飞扬，他“辅佐”的还是这个佛罗伦萨共和国。

处在这种现状之下，佛罗伦萨甚至连国家政体的变化都未必起因于国内情况。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辅佐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以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为中心，而左右共和国民主政体命运的却不是国内的反索德里尼分子，而是国外的、佛罗伦萨周边的国际形势。

1508年，马基雅维利成为索德里尼事实上的副官以后不久，威尼斯共和国这个不但具有力量而且还应该有思想的国家，犯下了在它近千年的历史中几乎唯一的一次外交错误，愚蠢地把对意大利半岛抱有领土野心的所有列强同时树为敌人。

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使罗马教会强大起来，因而对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不怀好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在做着美梦，暗中幻想着要戴上教皇的皇冠，从而成为欧洲权势最大的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仗着自己以前在意大利半岛的业绩，处处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作对。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在以赞助哥伦布航海探险而闻名的伊莎贝拉女王[3]去世后，事实上已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正立足那不勒斯，觊觎意大利。

威尼斯共和国在东方和意大利北部拥有广阔领土，经济实力欧洲第

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城邦。当时的威尼斯可以漂亮地对付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但同时与所有这些国家为敌，就只能是愚蠢行为。

我忘记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圭恰迪尼，对这时的威尼斯外交失算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 现实主义者犯错误都是在认为对手也和自己一样不会做蠢事的时候。

威尼斯认为，自己的作用对西欧各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现状是，正因为威尼斯拥有海军力量，在东方各地有健全的基地，土耳其的攻势才未能达及西欧。而且，威尼斯的业绩使得威尼斯繁荣的贸易成了西欧经济活力的源头。最后，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地也不是靠领土野心而获得，获得领地的目的是确保通商道路畅通，而其属民也沐浴着威尼斯善政的恩惠，这个事实已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据此判断，削弱威尼斯的行动不会给教皇或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所以削弱威尼斯的愚蠢之举即便有人口头上叫叫，也不会付诸行动。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加入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倡导的反威尼斯同盟。

这就是著名的“康布雷同盟”。同盟的全体成员为了各自的目的，事先确定了瓜分的对象。

教皇——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威尼斯领土。

皇帝——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以及位于威尼斯以北弗留利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里亚半岛。

法国国王——贝加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等意大利西北地区除米兰以外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西班牙国王——亚得里亚海沿岸南部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匈牙利国王虽然没有实际参战，但也在同盟中挂了名。同盟的所有各方都参与了对威尼斯领土的瓜分。如果瓜分成功，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浮在浅滩上的首府和克里特岛，因为同样在同盟里挂名的萨伏依公爵已经要求塞浦路斯岛归自己。

那么，佛罗伦萨共和国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抗击威尼斯的全欧洲联盟呢？

从结果上看，佛罗伦萨保持了中立。不过，那是因为各国都没有理睬它，因而它没有收到强烈邀请。就连比佛罗伦萨小的小国曼托瓦侯国、费拉拉公国等，也都参加了同盟，分得了一杯羹。不论是曼托瓦还是费拉拉，它们的领主拥有自己统率的军队。

不过，佛罗伦萨的中立并不严格，似乎偏向于同盟一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都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不能逆着他的意志采取行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无须立字据。当然，瓜分没有佛罗伦萨的份儿。

“康布雷同盟之战”因此与佛罗伦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佛罗伦萨彻底失去了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这里不去详述这场战争，但写一下简单经过还是有必要的。欲知详情的读者，请阅读我描写尤利乌斯二世政治的《神的代理人》第三部“刀剑与十字架”。

威尼斯共和国事前工作失败，便勇敢面对全欧洲的对手。但勇敢只是表象，知道威尼斯行事方式的人都会说这是接受现实的权宜之计。威尼斯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打算一面奋起迎战，一面看情况再打外交战。

虽说是权且一战，结果却很惨。同盟军中，法国军事行动准备得最好。威尼斯军队在阿尼亚德洛一役中，惨败给了法军。原因是两位总指挥意见不合，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结果，总指挥中甚至有一人被俘，其状甚惨。

因为这次胜利，法国国王在其他同盟国尚未正式参战的情况下，就一举成功地获得了当初分给他的所有地方。当时，马基雅维利正在附近出差，他向国内报告说：

> 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这应该是那个阶段大部分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认为，意大利的头号强国威尼斯怕是要完蛋了。然而，法军的绝对胜利却成了威尼斯的幸运。威尼斯找到了重开外交战的线索。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乏大无畏精神，但缺少深谋远虑。凭着一腔怒火成功地打垮了威尼斯，但打垮威尼斯的不是教廷军队，而是法国国王的军队。这使他很不爽。不仅不爽，他对法兰西势力在意大利过于强大而感到不安。威尼斯外交从这里打进了一支楔子。威尼斯向教皇三拜九叩，起誓恭顺，请求停止南来的进攻。同时，又向德意志皇帝三拜九叩，献上领土，努力掉转北来的矛头。这是威尼斯离间同盟国的策略。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样写道：

> 威尼斯的大使们跪地匍匐，行状凄惨。了解他们尊大傲气的人看到这番光景，无不感叹今非昔比。

威尼斯没有只依靠外交战，在帕多瓦保卫战中，它打败了皇帝亲率的军队，这使得教皇更加不安。在以威尼斯为对手的战斗中，法国国王打赢了，德意志皇帝却打败了。皇帝御驾亲征却未取胜，他对法国国王

感觉不会好。威尼斯的外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

1510年，准确地说是“康布雷同盟”结盟后仅仅一年，争斗的对象就起了变化，变成了教皇和威尼斯联手与法军对决。一直态度暧昧的皇帝权且站在了教皇一边，没有实际参加战斗。这下法国国王成了孤家寡人。

这样一来，一贯采取亲法主义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困境。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法战争的旗号是：“野蛮人滚出去！”翻译成“野蛮人”一词的原文是“barbari”，这在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外国人的意思。16世纪初所说的“野蛮人”，就是指意大利人以外的人。这样的旗号打出来，佛罗伦萨人作为意大利人就不能站在野蛮人一边。尤其是说这话的人物又是教廷的主人，作为基督教徒也很难反对。

话虽如此，从以往与“保护人”法国国王的关系上看，佛罗伦萨共和国又不能轻易地明说站在教皇一边。阿尼亚德洛一战已经证明，军事上还是法国最强。佛罗伦萨归根结底不能以这个法国为敌。

佛罗伦萨政府无计可施，只好采用惯用伎俩，而且派出去的人也是老人。为了拖延时间，1510年7月，马基雅维利出发前往法国国王身边，逗留了三个月。从目的上看，这又是一次漫长的出差。

这次赴法出差的任务可不单是拖延时间。意大利半岛上空笼罩着黑色战云，没有任何很快散去的样子，但还不至于有大规模战役。马基雅维利去法国，意在避免大规模战争。可是佛罗伦萨已经不掌握国际关系的主导权了。这样的国家，即使根据准确的预见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时的佛罗伦萨正是一个好例子。

我想在此稍稍脱离叙述主线，介绍一下著名事实以外的非著名事实。这话有些猥琐，但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人。

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或因为这是个非著名事实的原因，日本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都忽视了这个插曲。所以，这个插曲在这里是第一次被翻译成日文。

这封信写于1509年12月。佛罗伦萨没有从“康布雷同盟”中分得好处，但要为德意志皇帝筹集战争费用。马基雅维利受命给皇帝送去40万达克特战争费用中的第二批钱款。故事便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封信发自维罗纳，因为当时皇帝正驻跸于此。同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代表性城邦威尼斯在5个月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而佛罗伦萨却拒绝不了德意志皇帝的筹款要求。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对抗策略就是请求分批支付这么一点。

教皇与法国国王的对抗尚未表面化。马基雅维利写这封信的8个月之后，事态表面化，佛罗伦萨政府陷入困境，再次派马基雅维利去了法国。

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公务出差期间所写的私人信件，收信人是路易吉·圭恰迪尼。他是日后成为马基雅维利亲密朋友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是名门子弟，当时31岁。写信人马基雅维利40岁。这封信的言辞猥琐龌龊，正经词典里都不见收录。尽管如此，这样的文章只要才气横溢，在意大利照样会被评价为“色彩丰润的文章”。

这事太难堪了，路易吉。在同样的情况下，命运这东西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结果。

就说睡女人吧，你能得到你的所想，而我就不同啦。

我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那种饥渴已给理性蒙上了一层雾。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个能帮我洗衣服的老太婆。她在自己的家里洗衣服。那房子是一个半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洞照进来。

那天，我经过那个房子，老太婆认出了我，殷勤地和我说话，请我到她家去一下，说是给我看几件漂亮的衬衫，兴许我看中会买

下呢。

我这个憨蛋就相信了老太婆的话，去了她家。

在那房子的角落里，好像有个女人。在昏暗的光线中，那女人的头和脸隐藏在放干衣服的台子后面，身子害臊地蜷缩着。那老太婆抓紧我的手，把我拉到那女人跟前说："这就是我要卖给你的衬衫，你先试试，可以完事后付钱。"

你知道我是胆小鬼，完全给吓傻了。老太婆说完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黑暗中只剩下了我和那女人两人。

结果，我一口气把她干了。我觉得那女人大腿松松垮垮，阴部湿漉漉的，呼出的气息也很臭。就是这样，受到令人绝望的欲望的驱使，我一下子就射了。

完事以后，我才想起要看看这件商品。我从壁炉中取出一块燃烧着的木块，去点一盏放在壁炉上的马灯。刚要点着时，马灯还差点从手里掉下来。

啊，咋回事啊！那女人太丑了！我差点没倒在地上死过去。

原以为颜色朦胧的头发已经全白，头顶已经秃掉。我看到有几只虱子正在这秃顶上散步。这样稀疏的几绺头发还垂到了眉梢。她脑门窄小，满是皱纹，中间有个疤痕，就像是节日市场上被打上烙印、拴在木桩上的动物。她的眉毛垂向眼睛，每根眉毛的末梢都粘着虱卵。

那女人一只眼睛往上吊，另一只眼睛又朝下塌，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掉光睫毛的眼皮边上沾满眼屎。鼻子紧挨着满是褶皱的额下，鼻涕堵着一个鼻孔。那嘴唇就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嘴唇一个德行。

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我读了好几遍，每读到此都不免喷饭。

被尊称为"豪华者"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灵魂

（spirito），是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灵魂时代的佛罗伦萨的灵魂”。这个人物已死了17年。尽管洛伦佐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在17年之后，说到嘴唇与他很像，别人听得懂，可见所谓同乡人真的可怕。不错，洛伦佐是长了一张蛤蟆嘴一样的嘴巴。我相信，路易吉·圭恰迪尼看到这封信后也会忍不住喷饭的。

说了那女人的嘴唇跟洛伦佐一模一样之后，马基雅维利继续描写下去。这个“商品”好像还长着胡须。这女人太丑了，令人晕倒，而马基雅维利的描写细致入微，就像在看一幅精密的自然主义画派的画作。他继续写道：

> 我看着这个魔怪不知所措。是不是我搞错了，那女人开了口。“先生，怎么啦？”那人是个结巴，嘴巴蠕动着在说着什么，我无法听清她说的话，只能猜测是这个意思。她嘴里的臭气吹了过来，那恶臭厉害得连虫子都要躲开，我的眼睛和鼻子顶不住了，我的胃也受不了这样的凌辱了，呕吐起来。就这样，我支付了与这商品匹配的代价后才逃了出来。
>
> 哎呀呀，只要受过这么一回苦，也一定会保证我死后能去天堂了。但可能这样还嫌不够。一到伦巴第，那令人绝望的欲望就又回来了。
>
> 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还会让你有更多的愉快。我也要感谢上帝，只是我所要感谢的是，上帝让我做了想做却不能做的过分之事。
>
> 我想，这次出差会剩下一点钱，我想在回到佛罗伦萨后，用这些钱去做点事情。我在想是不是把养鸡场搞起来。不过，我不能直接来做这事，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忙，也许皮耶罗·迪·马尔蒂诺合适，我去问问他愿不愿意。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他不愿意，我还要另外找人。

这封信是寄到曼托瓦的，路易吉·圭恰迪尼当时也因公出差到曼托瓦。两个人都在出公差，还要写这种信。

真想不到马基雅维利是个让人两倍三倍地吃惊的人。经费不足时，他是那样急切地报告，一旦有了些钱，马上就会公款私用。就在写这封信的几个月前，马基雅维利辛苦建立的佛罗伦萨正规军，钻了大国竞争的空子，成功地夺回了比萨，了却了佛罗伦萨人的一个心愿。

趁话题回到夺回比萨的机会，我想把话题从非著名事实拉回到著名事实。

我在13年前写的《神的代理人》中，专门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写了一章，标题是“刀剑与十字架”。那一章的时代背景与我现在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完全一样，但那一章几乎没有涉及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是因为当时写的主角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那些当时以教皇为中心活动的主角——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等相比，当时的佛罗伦萨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比起佛罗伦萨，我腾出了更多的笔墨写了小国费拉拉公国的动向，因为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4]是当时唯一一个关注并利用大炮威力的君主。

1508年是威尼斯与教皇、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在对决，到了1511年变成了教皇、威尼斯、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决。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危害直接体现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身上。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国家既无“远虑”又无“力量”的下场。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昨天还是朋友，今天成了敌人，但最为难的是佛罗伦萨。

教皇打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旗号，只要是意大利人就很难反对。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也加入反法同盟。而法国国王仗着多年充当佛罗伦

萨“保护者”的“业绩”，指定在佛罗伦萨刚夺回的城市比萨召开旨在排除尤利乌斯二世的大公会议[5]。

佛罗伦萨如果轻易接受，必定招致教皇的暴怒。教皇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力量，但在他的背后现在站着威尼斯和西班牙。

但佛罗伦萨又不能轻易拒绝，因为法国国王的军队在意大利半岛的力量最强。

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在马基雅维利的辅佐下，成功地规避了这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大危机。

佛罗伦萨不能完全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便开始逐个游说正在前往比萨途中前来参加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刚刚进入佛罗伦萨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说服他们道：“不去比萨对双方都是上策。”忤逆教皇意图去参加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并不多，马基雅维利一人便足以应付。尽管如此，教皇还是因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正式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也没有拒绝向枢机主教们发放国内通行证而震怒，并以此为由对佛罗伦萨处以“禁止教务”的处分。但是，因为不是开除教籍，佛罗伦萨避开了最坏的结果。

因此，到预定开会的9月1日为止，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这也是教皇为抵制大公会议，宣布将在罗马的拉特兰圣乔凡尼大教堂召开大公会议的缘故。4个人开不成大公会议，因而会期延期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对佛罗伦萨政府而言也可用来想办法。于是，索德里尼的“心腹”马基雅维利又一次被派到法国国王那里。任务已经无须多说，就是向国王说明佛罗伦萨的困难处境，让国王息怒，努力说服国王和教皇尽可能避免决战，亦即战争。不过，不管是教皇还是国王，即使按佛罗伦萨的要求照办，当时的佛罗伦萨也拿不出任何东西给他们了。纵令马基雅维利的外交能力再优秀，没有舍，也就没有得了。

马基雅维利回国了，等待他的是法国国王赌上自己的权威，哪怕只有4个人也要召开的比萨大公会议。大公会议是顾及到法国国王才召开的，而马基雅维利的新任务就是尽早把开会地点挪往别处。比萨市民并不欢迎在自己的城市召开这个问题多多的大公会议。马基雅维利瞅准了这一点。如果拿没有信心维持好治安作为理由，参会的枢机主教们也不会漠不关心。马基雅维利最初的意图是让会议地点移到法国或德意志，但这样移动太惹眼，最后达成妥协，将地点移至法国国王领下的米兰。法国国王退的这一步让教皇很高兴，他取消了对佛罗伦萨的“禁止教务”处分。12月，大公会议的地点移至米兰，很快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来便不了了之，结果并没有成功。

然而，对争强好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把胜利控制在适可而止的程度更难的事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既然喊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口号，不达目的他不会善罢甘休。决战逐渐明确，这并不以佛罗伦萨一介小官的意志为转移。1511年底，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成立，最终酿成拉文那会战。这次，军力虚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又只能在一边旁观。

拉文那会战被称为是中世纪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战役，据传是16世纪上半叶最为惨烈的战斗。参战双方都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铠甲武装起来的重装骑兵。这场战役的详情我在《神的代理人》中有详细叙述，并配有两军的战斗配置图，这里不再重复。两军在拉文那平原布阵，总兵力达到4万人。联军总指挥是西班牙人雷蒙·德·卡尔多纳，法军则由年方23岁的加斯东·德·富瓦统率。

1511年4月11日上午8时双方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下午4时。结果法军获胜，因为下令撤出战斗的是卡尔多纳。两军共战死1.4万余人，损失巨大。但法军因总指挥富瓦战死，远无胜利的喜悦。

马基雅维利事先的解读是正确的。他的判断是，断然切断与法国国王的关系对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利。在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

这是正确的判断。拉文那会战的结果是，在阿尼亚德洛战役之后再次证明了法国军事力量的优势。

不过，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一点，这一点在拉文那战役之后表现了出来。请允许我从《神的代理人》一书中引用一下相关情况。

> 夜幕降临，拉文那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东·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
>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那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那城。胜利者加斯东·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
>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理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联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给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那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
>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6]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联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7]枢机主

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东·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由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万人的大军尚存四分之三。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联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十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那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那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那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坚持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首先付出“代价”的是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他没能判断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竟会这样错失大好时机。马基雅维利已经有三次出使法国的经验，他了解路易十二的性格。然而，他根本没有想象到路易十二病得如此之重。

如此还能称为误判吗？或者应该说这是极尽人类智慧也无法准确判断的不幸？路易十二的优柔寡断和因此而得救的教皇的决断，要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

就在法国国王在将军队召回米兰的时候，联军的散兵游勇也开始一点点集聚起来。威尼斯趁法军尚未重整旗鼓，钻了空子，开始收复1509年在阿尼亚德洛之战中丧失的那些城镇。他们不是靠派军队去武力收复。这些城镇的居民本来就不愿意法兰西或德意志来统治他们，而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来统治他们，于是趁着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队不在身边的机会，再次回归威尼斯。如此而已。“康布雷同盟”结盟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次战役就让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积累的一切。仅仅4年之后，威尼斯就成功地夺回了他们彼时丧失的一切。然而，佛罗伦萨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拉文那会战中吃了败仗的联军中，威尼斯军队有着这样得以重整旗鼓的目标，西班牙军队却没有这样的目标。没有什么比处置一支漫无目标的乌合之众更难的事了。佛罗伦萨正挡在总指挥官卡尔多纳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行军路上，一定有不祥的预感。而且，被佛罗伦萨驱逐长达18年之久的美第奇家族就有人在这股西班牙军中。

美第奇家族不仅参加了这支西班牙军队，还出了行军费用。美第奇家族不会白白出钱。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的意图，还得到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这位教皇曾以佛罗伦萨奉行亲法政策多年，允许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为由，决定制裁佛罗伦萨共和国。

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与西班牙军队一路同行，一步步地逼近离佛罗伦萨只有20公里的城镇普拉托。

---

[1] 格蕾丝·凯莉（Grace Patricia Kelly,1929—1982），美国影星。1954年以《乡下姑娘》（The Country Girl）一片夺得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1956年与摩纳哥亲王兰尼埃结婚。1982年因车祸去世。她的从影生涯仅有6年时间。作品有《乡下姑娘》、《红尘》（Moganmbo）、《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日正当中》（High noon）等。

[2] 兰尼埃三世（Rainier III,1923—2005），全名为兰尼埃·路易·亨利·马克桑斯·贝特朗·格里马尔迪（Rainier Louis Henry Maxence Bertrand Grimaldi），摩纳哥亲王。他于1949年继位，1956年与格蕾丝·凯莉结婚。

[3] 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I Catolica,1451—1504），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之女。她于

1474年从同父异母兄长恩里克四世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她于1504年去世，王位由女儿胡安娜（疯女胡安娜，Juana I de Castilla,la Loca）继承。伊莎贝拉一世曾资助哥伦布航海探险，后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4] 阿方索一世·德斯特（Alfonso I d’Este,1476—1534），佣兵队长，以拥有重武器大炮而闻名。1505年成为费拉拉大公。

[5] 大公会议（il Concilio Ecumenico），又称公会议、普世公会议、普教会议，是传统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

[6]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即在“帕齐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7] 乔凡尼，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92年16岁时当上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准确地说，普拉托离佛罗伦萨只有18公里。从佛罗伦萨上高速公路去比萨，第一个出口就是到普拉托的。亚平宁山脉横亘在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从山脉的尽头沿着亚诺河向前便是一马平川。普拉托、皮斯托亚、卢卡、比萨、里窝那这些城镇挨个儿向西排列，直到第勒尼安海。普拉托是平原上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就无法防御。这里还是从博洛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大道的出口。

这里不单是佛罗伦萨的卫星城市，在14世纪中叶成为佛罗伦萨领土之前，这里就是纺织工业的兴旺之地。特别是毛纺工业，佛罗伦萨刚开始衰退之时，便被普拉托逐渐取代。这一传统近年来越发强化。普拉托很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托斯卡纳的曼彻斯特。在现代，佛罗伦萨举办的纺织品展览会广受喜爱，人流汇聚，但会上展示的纺织品全是普拉托的产品。

史上著名的“普拉托之乱”发生在16世纪。当时，普拉托虽不比现代富裕，但也绝不是一个简朴的乡村市镇，光是城里的常住人口就达到6000人。现在，有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在一步步逼近这座城市。拉文那会战已经过去4个月，这些大兵是西班牙军队的残部，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此期间并非无所作为，空耗时间。从拉文那会战前一年开始，佛罗伦萨就已经预见到法国国王与教皇、威尼斯、西班牙联军之间难免一仗，开始着手建设城堡以巩固边防，并加强了国民军的力量。这两件事都由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军事防卫“副官”马基雅维

利负责。

在建设城堡方面，马基雅维利与擅长筑城技术的建筑师朱利亚诺·桑加罗同行，挨个儿巡视城堡的整备情况，并发出指示。在加强国民军方面，他开始在传统步兵军团的基础上组织骑兵队和炮兵队。马基雅维利还是采用他的一贯手段，当骑兵达到百骑时，就在领主广场举行阅兵式，唤起舆论，以便进一步增补加强。

在外交方面，佛罗伦萨虽然偏向法国，却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准备已经就绪。

此外，起初的形势发展完全如马基雅维利所料。拉文那会战证实了法国的军事力量绝对胜过教皇、威尼斯和西班牙的联军。然而，会战之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马基雅维利的预料。法国国王把军队撤往米兰，使拉文那会战的胜利成果付之东流，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在意大利中部流窜的西班牙军队残部。

西班牙士兵以前一直由西班牙领地那不勒斯的总督、联军总指挥卡尔多纳指挥。但是打了败仗以后，士兵由7000人减员到5000人，谁都指挥不动这些残兵。卡尔多纳本人也不知道该把这些士兵带往何方，军费也已告罄。美第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美第奇家族已经被佛罗伦萨驱逐了18年，在此期间，因为行动草率而把整个家族逼上流亡之路的皮耶罗已经去世。这位掌门人死后，美第奇家族便由他的弟弟乔凡尼枢机主教统领。1492年以前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豪华者”洛伦佐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个疯子，一个贤良，一个老好人。”

对1512年的美第奇家族来说，幸运的是疯子已经死去，而接班的正是被评价为贤良的老二乔凡尼。

1512年8月，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他们对佛罗伦萨政府提出了下述要求：

支付军队的维持费用10万达克特；废黜索德里尼政权，正义旗手换人；撤销对美第奇家族的驱逐令，允许美第奇家族以私人身份返回佛罗伦萨。如果不同意上述各条，就攻打普拉托。

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对此回答如下：

没有理由支付10万达克特，予以拒绝；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政权系由市民选出、共和国议会所决定的，变革的决定权在市民和议会，外国人不得置喙。

这完全是正义之论。对重法之人索德里尼而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反驳了。他不愧是一个坚持法律的人，把决定权交给了议会，议会决议支持索德里尼。

索德里尼的正义之论不单单是一种逻辑，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背后有着对佛罗伦萨自卫能力的自信。到1512年的夏天，马基雅维利策划建立国民军的法案获得通过已有5年半的时间，国民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已经拥有步兵9000人、炮兵300人，甚至还有骑兵数百人。此外，普拉托还驻屯了400名兵士，他们判断，佛罗伦萨能够抵抗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

此外，已经表态支持索德里尼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议会还批准了索德里尼支出紧急军费5万达克特的申请。他们认为，就算普拉托失守，只要城墙坚固，拥有7万人口的佛罗伦萨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固守城池，就能赶走那些残兵败将。

雷蒙·德·卡尔多纳得知佛罗伦萨政府的答复之后并没有立即开战，而是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威胁。这并不是因为这位西班牙武

将情义特别深厚，说不定他对率领残兵败将打仗也没有信心。佛罗伦萨没有改变答复。于是，进攻开始。

历史证明，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善恶两极分化的，在他们那里没有“中庸”一词。在以西班牙人为主力开拓的新大陆殖民地，直到今天仍在为政局不稳所困扰。看看这些，我们都能想象得出他们的性格。何况1512年8月攻打普拉托的是一群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可以想象他们会穷凶极恶，不比寻常。

8月29日，普拉托失守。双方隔着城墙战斗，防守方激烈抵抗。但是一旦城墙被撕开，西班牙士兵便蜂拥而入，战况便毫无疑问地向着有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面对攻进来的敌兵，马基雅维利创立的国民军乱了阵脚，全面崩溃。他们虽然凑足了人数，但还没有变成军队。剩下的就只有杀戮一件事了。虽然普拉托的居民也遭到杀戮、凌辱和伤害，但光武装士兵就有4000人被杀，他们大部分是佛罗伦萨国民军的农民兵。

发生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的惨剧震惊了整个佛罗伦萨。不过，人们还不至于害怕到马上开门迎敌的地步。尽管如此，背水一战的准备进行得并不顺利，人心还是动摇了。这一点被乔凡尼枢机主教抓住了。

在开始攻打普拉托以前，美第奇家族这位37岁的枢机主教就已经开始与佛罗伦萨市内的美第奇派取得了联系。成功打下普拉托后，他也没有给敌人喘息之机。8月31日，普拉托陷落仅2天之后，有5位市民来到市政厅，要求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他们过去一直都是美第奇公开的同情者。

与其说是见面，不如说是突然袭击。这5人都在二三十岁，分别姓阿尔比奇、韦托里、卡波尼、鲁切拉和瓦洛里，显示出他们都属于佛罗伦萨上层阶级。这个阶层把提拔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中产阶级，把决定权交给议会这样的政权叫作平民政权，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感到不

满。索德里尼认为只要把话说明白他们会理解的，便出面会见了这5个人。不料这5个人却对他说道："我们要杀了你。不过，如果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可以饶你一命。"

不论索德里尼如何说这事需要议会讨论，他们就是不理睬。这5个人拿着武器，守住四周，行动神速，整个事件神不知鬼不觉，在市政厅所有人都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

索德里尼叫来马基雅维利，然后对进到房间里的马基雅维利说："你马上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问问他愿不愿意担负起保卫正义旗手人身安全的责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曾经与马基雅维利一起作为使节出使过法国，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不过他也是5人当中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去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很快与他一起回到市政厅。索德里尼向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做了交代，在那5个人同意后，走出了市政厅。当夜，索德里尼从佛罗伦萨南面的城门出城，先朝锡耶纳去，然后很快转向，朝意大利南部的洛雷托而去。可能考虑到那里也不安全，他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去了拉古萨。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 1512年8月31日。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和5个使节和平地达成协议。索德里尼说："不要骚扰佛罗伦萨市民，作为我个人，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乐于遵从。"
>
> 就这样，佛罗伦萨没有了正义旗手，前正义旗手与上帝一道出了城。有几位市民跟他一起离开了佛罗伦萨，一部分去了锡耶纳，另一部分去了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
> 9月1日。今天，美第奇家的老三朱利亚诺进了佛罗伦萨城。在没有正义旗手的情况下，新政府在市政厅韦奇奥宫成立。

政变成功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索德里尼政权不是因为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崩溃，而是因为政变而倒台。

对于这次政变，事先是有应对预案的。随着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佛罗伦萨美第奇派市民的言行已经肆无忌惮。但是“法律人”索德里尼不同意没有证据抓人，这使只是少数派的美第奇同情者得以自由行动。索德里尼未能得到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但在大多数的市民心里，对他的不满同接受美第奇家族并不能等量齐观。

同时代人的菲利波·德·内利这样写道：

> 索德里尼没能成为一个坏领袖，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领袖。他太相信忍耐，太相信时间了，总认为时间能解决一切困难。

马基雅维利在第二年开始撰写的《论李维》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 他相信只要用忍耐和善意去面对就能克服困难。这样会给敌人提供良机，他却绝对不会使用武力来消灭敌人。
>
> 我认为，有时也得做些违反法律的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不知道索德里尼离开佛罗伦萨时马基雅维利送了他多远。40名骑兵护送索德里尼到了锡耶纳，马基雅维利也许把这位曾经的上司送到了罗马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马基雅维利并不在兰杜奇所写的追随索德里尼的“几个市民”之列。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堆积如山，这也是事实。正因为马基雅维利是索德里尼的心腹，索德里尼被如此轻易地打倒后，工作交接才离不开他。他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通晓所有工作的细节。根本不想为索德里尼殉葬的马基雅维利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也许他在盘算如何通过忠

于职守取悦于新政权。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名公务员，再优秀也不过是一介小官僚。

美第奇家族的人在被驱逐18年后回到了佛罗伦萨，但他们没有像凯旋将军那样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华彩入城。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成功回归是怎么一回事。

9月1日，索德里尼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一个人来到佛罗伦萨。有市民高喊代表美第奇家族的“Palle!Palle!”（球！球！）表示欢迎，朱利亚诺向他们回了礼。他没有去美第奇宫，而是绕道阿尔比奇家后去了市政厅。他按照佛罗伦萨男人的习惯，把一直蓄着的美髯剃了个溜光。可见美第奇家的人在极力回避刺激佛罗伦萨市民的任何事情。当然，他们没有带来西班牙的一兵一卒。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放下了心。

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主要成员有4人：

次子乔凡尼枢机主教，37岁。6个月后，他被选为教皇，称“利奥十世”。他是美第奇家族事实上的掌门人。

美第奇家族的族徽

三子朱利亚诺，33岁。曾被父亲“豪华者”洛伦佐评价为“老好人”。他很快便成了达·芬奇的赞助人。但他的健康堪忧。

主教朱利奥，34岁。他是在“帕齐阴谋”中遇刺的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的遗腹子。堂兄乔凡尼被选为教皇后，他被授予枢机主教的红衣，

11年后的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在回归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中，他是掌门人乔凡尼的右臂。

洛伦佐，20岁。他是死去的长子皮耶罗的儿子，是美第奇家的直系，但他也不是一个钢铁般健康的主儿。

这样的结构很自然，朱利亚诺抛头露面，乔凡尼和朱利奥两位高级神职人员在背后支撑，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让洛伦佐继承的考虑。

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想把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父亲“豪华者”洛伦佐1492年去世前的那种关系，让佛罗伦萨维持共和政体，实际上施行僭主政治，由美第奇家族来统治。也是这个原因，他们才避免高调回归。他想让外界感觉到，美第奇家族的变革只是驱逐了索德里尼而已。

然而，美第奇家族仍然让西班牙军队驻留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美第奇以这个无声的压力为背景，开始了表面温和的变革，议会还没有正式决定，他们就让佛罗伦萨新政府背上了向西班牙军队支付12万达克特军费的义务。

9月8日，终身正义旗手制被废除，恢复了1502年时的制度，正义旗手任期一年。当天就选出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担任正义旗手。这是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人物，在索德里尼政权中也做过事，对美第奇家族既不反也不亲近。选出这样一位人物是美第奇家族巧妙策略的结果。里多尔菲属于上层阶级，但他很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与此同时，“八十人委员会”增加了人数。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事只有这个委员会同意才能提交到共和国议会上讨论。增加委员的人数当然是为了掺进美第奇派的人。另外，在市政厅工作的公务员们也加了薪。

9月16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正式进入市政厅。他是辅佐一年任期正义旗手的八人之一。

9月18日，“佛罗伦萨国民军”解散。兰杜奇日记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想必马基雅维利的劳力之作国民军是被悄悄解散的，甚至没有民众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无法探知这一天马基雅维利的心境。不过，他是那样地坚信国民军，为了国民军的创建和生存呕心沥血，不可能对国民军没有感情。作为“九人委员会”的秘书，他是承担所有事务工作的人。解散时，一切工作都会归到他这里。也许，正是这些忙碌救了他。

同一天，西班牙军队总指挥卡尔多纳造访佛罗伦萨，一直驻扎在普拉托的西班牙军队终于决定要撤走了。12万达克特已于4天前支付到位。

第二天，即9月19日，西班牙军向罗马开拔了。

10月5日，以佛罗伦萨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归还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时从美第奇宫和别墅抄走的所有物品，违令者斩。许多物品又回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10月13日，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职务，并决定将其驱逐5年，将其弟弟们驱逐3年。在这期间，举行了新任正义旗手里多尔菲的就任仪式。

11月7日，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被免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一职也被免除。至此，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公职均被罢免。同一天，协助马基雅维利工作的好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也被解职。

马基雅维利不但被罢免了职务，还被逐出佛罗伦萨城一年，一年内

不得进入市政厅，并不得离开共和国领土。他还背上了缴纳1000达克特金币的义务，并说这是保证做到这些的保证金，但做到了也不会退还，所以应该叫作罚款。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几乎相当于他10年的薪水。听说是他的三位朋友为他垫付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马基雅维利总算免去了牢狱之灾。美第奇派的米凯洛齐当选，成为他的后任。

不过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仍然留在佛罗伦萨市内，几乎每天都去市政厅。

这是因为，如果马基雅维利不好好交接工作，新政府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作为索德里尼的心腹年头已久，嘴上不积德的人叫他是“索德里尼的走狗”。如果让人们不去考虑其在市政厅里的地位，说出谁最了解共和国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细节，大概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他还是负责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的秘书。单说资金方面，能够实际调动资金的人也就是他。所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依然要去以前的地方上班。

马基雅维利料到自己会被解职了吗？他有一封信被留存下来，可以确定是在他被决定解职以前写的，收信人似乎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女人。但我们不清楚这封信是否真的寄了出去，抑或只是写写自己的心情而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多少还是有所预料的。也许他知道，既然索德里尼被驱逐了，他的心腹马基雅维利也不会平安无事。

但是，马基雅维利是否百分之百地预料到了呢？我想也不是。如果他意识到索德里尼的垮台就等于自己的垮台，那他肯定会早早就跟索德里尼一起行动了。只有逃出去，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这是政变者给索德里尼的条件。而马基雅维利却留在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否以为自己会被留任呢？他是不是认为虽然有些不安，但留任的可能性更大呢？

当时有很多材料可以支撑他的这个想法。

首先，选出的新正义旗手里多尔菲与他也很亲近。里多尔菲既不是反美第奇派，也不是美第奇派。

其次，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已经留任。马基雅维利被解职时，除了他和博纳科尔西以外，秘书厅无人被免职。

再次，事实上，在索德里尼政权担任要职的人没有一个被免职。政变时索德里尼把事情交代给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证明他深得索德里尼的信任，而他很快就接到任命当上了驻罗马大使。

怎么只有自己会被免职呢？马基雅维利无法相信这个罢免处分。

然而，这就是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的深谋远虑。

只把正义旗手的任期改为一年，其他基本不变。这种状态起到了缓和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不信任感和对渐变成僭主政体的恐惧感的作用。让里多尔菲担任新的正义旗手很好地隐藏了美第奇的野心。事务级官僚的“脸面”、第一秘书厅秘书长维尔吉里奥也留任了。他也是既不反美第奇也不亲美第奇，对美第奇家族并无不便之处。人人都知道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但他是佛罗伦萨名门出身。他还是政变时为美第奇效劳的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既没有名气，也没有说得上话的亲戚。他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获得的地位，又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失去。他的失势和副部长留任而罢免了实力处长的做法如出一辙。

马基雅维利不懂，他不懂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的内心。

不到4个月，乔凡尼枢机主教就当选了教皇。刚刚即位，他就给年轻的侄子洛伦佐写了一封信，教他统治佛罗伦萨的手段。信中有这样一段：

> 不要忘记在佛罗伦萨官僚机构的主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获取情报。尼可罗·米凯洛齐可能是我们在这方面最好的工具。

尼可罗·米凯洛齐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后任，是美第奇家族在马基雅维利占据了15年的这一岗位上安插的一个间谍。马基雅维利被免职事出有因。

那么，马基雅维利在这时还不知晓这一切，他的心境又怎样呢？

对一位43岁的男人来说，被剥夺了所有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他的工作不是被一点点地剥夺的，感觉就像一朝醒来已经赤身裸体，一切归零。

我们应该想到，马基雅维利无论在此以前所写的论文中，还是在以后的著作中，都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位追求理想政体型的政治哲学家。

他一次也没有主张过应该选择某种政体。对他而言，王政也好，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无所谓，因为他相信，每个民族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体。他孜孜以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才能使政体有效地发挥功能。

就算马基雅维利伺候的上司从他并不太尊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换成了美第奇，对他又会有什么不便呢？15年来，他一直是作为管理专家型官员过来的。即使执政党下野，昨天的在野党掌握了政权，会有部门主管辞职吗？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把一切能力都豁出去工作的人，既然新政权也需要自己的能力，那么，就算主人换了，自己继续伺候下去也

是当然的。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仍得去市政厅上班一个多月，这就证明政府需要他的能力。

可是他不知道，美第奇认为他的岗位适合于安插间谍。正是因为不知道，他才会在被免职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回归职场的希望。

我们后世知道了美第奇的这封信，才觉得马基雅维利是个见识肤浅的傻瓜。我们知道了这些，才了解了博纳科尔西被罢免的原因。他不过是一介官僚马基雅维利的助手而已，却和马基雅维利一起遭到罢免。马基雅维利至少还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有前科，不是无缘无故被罢免的。可是，受到免职处分对可怜的博纳科尔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因为有博纳科尔西当助手，新任秘书长就当不了间谍。

马基雅维利被免职后仍然每天去办公室，每天都要和除博纳科尔西以外的老同事碰面。大家都知道，后任的能力明显不如马基雅维利，这是事实，但马基雅维利要向他交接工作。马基雅维利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他一贯笔头不懒，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写过信，却有一封奇妙的私信留存下来。这封信形式上是给流放到拉古萨的索德里尼写的回信，但据说实际上并未寄出。首先，这封信一改他一贯的愉快风格，读来令人吃惊：

> 送到我手中的您的信件是别人的代笔，签名也是别人的。但读过十个字，我便知道这是您的信。……我反复读了您的短信，所以我的话会很长。
>
> 我必须向您表示感谢。您经常为我的所为而踌躇，您很了解我，有些事如果是您，您是不会做的，而您给了我做的机会。其实我很惊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太复杂了……
>
> 凡是人，谁都是按照自己的幻想行动的。……不要给别人忠告。除了一般事情，也不要接受别人的忠告。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和意志活着的。

即使撇开对军队统率能力不谈，汉尼拔[1]和西庇阿[2]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前者在转战意大利时，以冷酷、虚伪和无信仰的方式统率自己的军队，从而赢得了民众的爱戴。爱戴他的民众为追随他，甚至背叛了罗马人。而后者在西班牙打仗时，以慈爱、信仰和诚实的方式统率士兵，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爱。他们两人同样都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我们不去谈罗马人。洛伦佐·德·美第奇（“豪华者”）不让佛罗伦萨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佛罗伦萨。相反，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靠把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博洛尼亚。……

命运女神是年轻人的朋友，要试运气，就要接受运气随着女神的心情而变化。……当好运离你而去时，毁灭就会开始。家庭、城市和个人都一样，一旦好运离去，你就必须用自己还拥有的手段再把它找回来。……

方法完全一样，有时可得到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时代变化了，周围环境也在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如果人们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即使有的时候会碰到好运，有的时候他也会因厄运而悲泣。但是，如果有大智慧者在，早早察觉时代的变化，预见到世间诸事如何变化，让自己能够应对，那么他就一定会得到好运的垂青。……然而，这种大智慧者并不存在，人们照旧短视，结果不得不为命运所左右。……如果西庇阿把他的方法用在意大利，而汉尼拔把他的方法用在西班牙，恐怕他们俩谁都取得不了如此大的成果。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这封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日期，但无须解释，这就是一个真真切切一朝失去了一切的43岁男人所写的文字。

42岁是男人的灾年。这仅仅意味着肉体上的灾难吗？或者还意味着

精神上的灾难呢？这个灾年能有一年的伸缩期吗？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43岁这一年劫难连连，不说这一年是他的灾年都没有人信。他失业了，还付出了相当于10年薪水的巨额罚款，可是事情并未结束。转年到了1513年，这年2月，一起事件又把他交给了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

索德里尼已经被流放。一天，在他的亲戚伦齐的家，一个名叫科齐奥的锡耶纳人偶然遇到一个叫保罗·博斯科利的年轻人，碰巧捡到一张从这个年轻人口袋里掉出来的字条。博斯科利不喜欢美第奇家族是出了名的，科齐奥没有把那张字条还给他，因为那张字条上列着一些人的名字。科齐奥认为这肯定是一张反美第奇阴谋者的名单，并立刻报了警。这张字条上列了近20个人的名字，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

佛罗伦萨的警察局被称为“八人委员会”，美第奇非常在意对政府的渗透，东山再起之后很快也在这个司法机关里安插了自己人。警察接到列有名单的字条后立即对博斯科利发出了逮捕令，他的密友阿戈斯蒂诺·卡波尼也同时被捕。警察开始对这两个人进行拷问。

两人很快交代了，他们坦白说：反美第奇阴谋是事实，目的是要杀死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等美第奇家族的人，把佛罗伦萨从暴政下解救出来。这两人刚过30岁，一直希望回到萨伏那罗拉时代，因此已经上了黑名单。

这两个人坦白了阴谋事实。他们还交代说，那张纸片上所列的人并不是阴谋的参与者，不过是他们认为可以成为参与者的人而已。但“八人委员会”不相信他们的话，就在2月28日逮捕这两人的当天夜里，对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发出了逮捕令。

马基雅维利似乎没有立即被捕。因为政府于2月19日发出了一份布告，内容如下：

凡知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尼可罗下落者须于一小时之内报案。有违反者处以没收财产的刑罚。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一开始就想逃跑，还是偶然下落不明，最后是他自己投案而被捕的。他被押进了当时的佛罗伦萨警察局巴杰罗宫。

马基雅维利免不了像其他被捕的人一样遭到拷问。他被用绳子吊起来拷问，还算不得那么残酷，但他似乎被吊起来审问了6次。可是，不管怎么审问，他也没有什么可招供的，真的很无奈。那些年轻人自以为是布鲁图斯[3]，行动草率。但是，已经步入壮年的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般认为，这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事实。但怀疑不能被排除，他无法免去牢狱之灾。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曾经给他的枢机主教哥哥的秘书写过一封信，写信日期是2月19日，也就是马基雅维利被捕的当天。这封信被保留下来。信中罗列了12个没有确切证据但有嫌疑的人，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范围从20人缩小到了12人后依然有他。

3天以后，主犯博斯科利和卡波尼二人被处斩首，另外一人尼可罗·瓦洛里被投入沃尔泰拉城[4]的地牢服刑两年，其他人被投入了警察局的监狱。

现今，巴杰罗宫已经变成国立美术馆，只要买门票谁都可以进去。这座美术馆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的宝库，藏有多纳泰罗等艺术家的作品。当时的装饰品展示也很好。建筑物内部保存得相当完善，让人感叹文艺复兴时期连警察局都有如此精美的装潢，真是要对那个时代的人具有这样的审美意识刮目相看了。我想，这里莫非就是历史上最美的警察局了？

不过，关马基雅维利的监房当然没有这么舒适。那是在地牢，现在用于存放杂物。没有光线、潮气逼人的狭小监房一间挨一间地建在最美警局的地下。马基雅维利被关在其中的一间里。

监房的情形究竟如何，马基雅维利本人用诗的形式写了下来。

根据诗中所写，牢房里恶臭熏天，墙上爬满了虱子，虱子又大又圆，简直就像蝴蝶。传到耳朵里的只有锁链的声音、打开锁链的声音和钥匙碰撞的声音，再就是“吊得太高了！”的惨叫声，那是在拷问……

16世纪的监狱到处都是一个样。地位很高的人会提供舒适一点的监房，对这些人进行惩罚不是目的。佛罗伦萨的世道也变了，被怀疑有参与反美第奇阴谋的嫌疑之人，单凭被怀疑有嫌疑这一点，就要受到惩罚。

就在马基雅维利受拷问期间，或拷问结束开始与一群群圆鼓鼓的肥虱子一起生活的时候，1513年2月20日，热衷于战争胜于祈祷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去世。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秘密会议（conclave）于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乔凡尼·德·美第奇一开始就进行了有利的争夺。他的才干早已众所周知，不利之点是他才37岁，年龄偏轻。

教皇实际上是由枢机主教每人一票投票决定的。但话要说成是圣灵降临，指引投票，圣灵决定的人选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教皇一经选出，地位至死不变。在这种制度之下，如果选出的是年轻人，他会在位数十年，这样一来枢机主教们就不好办了，因为枢机主教个个都是下届教皇的候选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没有忘记采取策略弥补自身的不利。恰在这时，他老毛病恶化，便故意在会议期间做了手术。所谓的老毛病就是痔疮。

但这样做有让枢机主教们觉得他这样的身体再年轻也活不久的效果。不过，教皇选举私密会议的结果取决于是否能成功获得才能优异、自成一派的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所掌握的一票，他的交换条件是解除把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及其家族全体成员逐出佛罗伦萨的驱逐令。

3月11日，圣灵做出了决定，选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为新教皇。“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即位新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消息传来，佛罗伦萨全城一片欢腾，不分美第奇派和反美第奇派。自己家乡出身的人当上了教皇，这还是佛罗伦萨人的头一次。全城满是喜气洋洋的人群。美第奇家传出话来，要拿出10万达克特举行新教皇的庆祝盛典。这让已经厌烦索德里尼政权紧缩财政政策的佛罗伦萨人喜上加喜。

本乡人当选教皇，也给巴杰罗宫的地牢带来了光明，宣布大赦，马基雅维利也沐浴到了恩泽。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狱时间，但教皇是3月11日当选，马基雅维利通知出狱的信写于3月13日，所以我想，大赦是教皇当选后立即宣布的，马基雅维利是第二天12日或13日出狱的。从去年8月31日索德里尼政权倒台开始，马基雅维利从11月被罢免，到2月被捕，6个多月他一直对世间保持着沉默。3月13日，他才给现已担任驻罗马大使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写了第一封信：

> 想必您已从保罗·韦托里那里得知，我在全城欢腾共庆之际出狱了。我的出狱靠了保罗和您的尽力帮助，我非常感谢。
>
> 这里我就不写我所经历的漫长灾难了，我只想告诉您，命运做尽了一切来加害于我。托上帝的恩惠，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祈祷不会再次遭遇这种事情了，因为我会更加谨慎，时代也会变得更加自由宽松，不再如此多疑。
>
> 我想您知道我的弟弟托托在神职界的情况，我把他的今后拜托给您和保罗。托托和我都希望自己能在教皇身边尽点力。

请记住托托的事。另外，如果有可能，请在新教皇耳边吹个风，我也还想重新工作，在教皇的身边，或他手下人的身边开始做些什么。我恢复工作会给让我工作的人带来好处，也于己有益。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13年3月13日于佛罗伦萨

可怜的马基雅维利！是笃信只要有才定会为人所用呢，还是愈来愈苦的家计不能再容他这样无业下去？

他已43岁，必须养家糊口。家里有妻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二年的9月还会再添一个孩子，这是将有7口人的家庭。他被解职了，薪水是零，还必须支付那笔相当于他10年薪水、如同罚款一般的钱款。三位朋友只是帮他垫着这笔钱。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平时储蓄以备不测、拼命干副业的人，他的财产只有佛罗伦萨城里的房子和圣安德里亚的山庄。

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失业后求职并不容易。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教书自不必说，就连律师、公证人也都做不了。就算他愿意谋求较低职业将就，恐怕也会因为曾经受到过嫌疑而变得困难。

我们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举家迁到圣安德里亚山庄的。这山庄过去他只是在葡萄和橄榄的收获季节才会去一下。从他在这段时期写给韦托里的信的内容来看，他们大约是在出狱后一个月迁居的。利奥十世的登基大赦不仅使马基雅维利得以出狱，还赦免了他一年之内不得回佛罗伦萨的流放刑，因而如果愿意，他是可以留在城里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迁居到了山庄，主动接受了流放。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山庄位于佛罗伦萨郊区，周边当然拥有田地，虽然土地不适于种植小麦，但其他东西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衣服不能自给，但他们有不愁销路的特产橄榄油和葡萄

酒。只要一家七口人不追求奢侈，是不至于忍饥挨饿的。

不过，他根本就是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刚才还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对他而言，山庄寂静的生活意味着与世隔绝，让他难以忍受。这不能不让马上就要44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不堪。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甘于平静隐居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悠然面对第二人生的人，他是满腔愤懑而“隐居”的。《君主论》就是这种愤懑的产物。这个推断对吗？

---

[1]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2] 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前235—前183），古罗马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因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而闻名，被称为“征服非洲者”。他热爱希腊文化，周围聚集有不少学者。为区别于其父亲及继孙，他常被称为大西庇阿，而与他同名的父亲被称为老西庇阿，继孙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艾米利安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ntinus，前185—前129）被称为小西庇阿。

[3] 马尔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院议员，公元前44年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暗杀行动。

[4] 沃尔泰拉城，在佛罗伦萨城西南方向约50公里处。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我决定把本书分成三部来写马基雅维利。

第一部写马基雅维利从1469年诞生到1498年担任公职前的29年。由于叙述的需要，有的地方并不限于这段时间，但主体还是这29年间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接着我在第二部里写了1498年到1513年这15年间发生的故事。这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时期。从年龄上说，这是他从29岁到44岁的时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这部里讲述1513年到1527年这14年间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这是从他失去公职到去世的那段岁月。第三部叙述的基础应该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论》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为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思考。如果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为官，他早晚会被遗忘；而作为作家，他却名垂青史。贝特兰·罗素[1]在《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简洁地说：

> 马基雅维利有两大政论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
>
> 《君主论》论述了在君主政体之下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

持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论李维》则以共和政体为主，论述了各种政体之下的权力及其应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求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充满慈爱的高尚德行。他甚至断言，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恶行也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卑劣不吉。

但是，我要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一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他并不相信人性本恶。他所探索的东西已经超脱了善恶，而类似于核物理学家的实验。

如果想要得到权力，方法只有一个：冷静。

至于手段是善是恶则是另一个问题。对这另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无兴趣。人们可能会谴责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不关心这另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论述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去声讨他则毫无意义。

不论让多么有权威的辩护证人出庭，缺席审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这里应该倾听一下被告人的陈述。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写道：

在决定祖国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必要去考虑手段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宽容的还是残忍的，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可耻的。维护祖国的安全与自由才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目的。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politica）与伦理（etica）是一回事，他们当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体。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2]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掺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伦理越来越远离尘世。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从未怀疑过政治即伦理的想法。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麻利地将政治和伦理切分开来，这两

者长久以来一直联系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质已经变质。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艺复兴。

我们不用上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只比马基雅维利小9岁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3]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德行’（virtus）的问题。”

大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马基雅维利也一样会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语词“virtus”解释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把它用于表达“能力、力量和才能”。

“Virtus”在意大利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马基雅维利要求领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Virtu：能力、力量、才能

Fortuna：运气、好运

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

但“virtu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这里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们都没有用错这个词，区别只是在使用时把重点放在哪个意义上。

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正表现了这个人对人性的思考吗？

话题回到马基雅维利。本书第三部开篇的第十四章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13—1515年，其间不满两年，这是马基雅维利从44岁到46岁的一段时期。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他不具能够看破红尘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论李

维》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构思。

我想通过他与一位友人的书信往来追踪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去讨论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这是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华的结晶，但不是了解他作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会不加改变地去写自身伤口滴血的惨状呢？

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他比马基雅维利小5岁，他与马基雅维利通信是在39岁到41岁这段时间。韦托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之一，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因此与美第奇家族也有关系，他的妻子出身于卡波尼家族。在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基雅维利看来，他完全属于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正是这个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蛰居山庄，而他却担任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一要职。

他们两人之间有多达43封往来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为通信时间恰好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执笔时间相吻合。即使撇开这样的史料价值不谈，这些信函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他们在这些信件中的呼吸叹息，让人难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信件不是双方有意而为之，通信开始于纯粹的偶然。请读者回顾一下我们前一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写给身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马基雅维利向为自己出狱尽了力的韦托里报告了出狱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写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立即回信，就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通信往来，回信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您发生变故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饱尝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苦

恼。……当初令弟托托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新教皇当选之后，我乞求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您的自由。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吧！冬天不会永驻。如果情况允许，如果那时我还继续常驻罗马，到我这里来吧。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您来，我会感到无上欣喜。

我们过去的同事布兰卡奇今天到了罗马。他从波吉邦西来，累得筋疲力尽。乔凡尼·卡瓦尔坎蒂拉着他不放，今天晚上没能见到教皇。

再见！

弗朗切斯科

信写得多么温柔和蔼啊！马基雅维利在短短7个月内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索德里尼政权倒台、被撤职、被罚相当于10年薪水的罚款、被流放市郊一年并被禁止进入市政厅、坐牢、拷问、出狱……对他来说，这封信不啻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变中的表现而一时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拷问。但他现在是驻罗马大使，他所说的“冬天不会永驻”这句话，对把马基雅维利从悲叹中解救出来尤具功效。马基雅维利读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笔，日期是三天后的3月18日。

伟大的大使阁下：

您的信充满亲切，令我忘却了过去的所有不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对我的友谊，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封信一样让我感受到您的友情。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好。我向上帝祈祷，有朝一日我能为您效犬马之劳，以报答您的恩情……

说到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

还是忍了过来而没有自暴自弃。这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失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希望，我会回到在政府任职之前的状态继续活下去，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如果您可以继续常驻罗马，我一定会去那儿。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

信的后半部分，他应韦托里信中的请求，写了在政府任职时期的同事们的情况。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样：

伙伴儿们都向您问好。大家每天都泡在您也认识的多纳托（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家。那里总有几个女人，对恢复精力最为理想。

昨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出门去看庆祝游行。我们每天就这样在因教皇登基而沸腾的市内徜徉，享受剩余的人生。想起坐牢，简直像是在做梦。

如果只是这样相互安慰、报告近况，两三封信也就够了，并不会有不断的信件往来了，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又把球抛了过来。

马基雅维利被开除了公职，只能把曾经的同事当成玩伴交往，“大使阁下”把他唤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韦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写了意大利内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过，原本就比马基雅维利悲观的韦托里还加了一句：“我不喜欢议论这样的大事。”

这封信为马基雅维利点了一把火。4月9日，他写道：

无论多么认真地议论，事情也不会按我们所想的那样发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而您不喜欢议论大事。如果您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马基雅维利继续写了这段留给后世的名言：

> 但是，命运没有让我熟悉丝绸纺织业，没有让我在棉纺织业赚到钱，也没有让我在金融业出人头地，我只能思考政治，其他什么都不会。

就这样，在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开始了以讨论政治为主的书信往来，主题是4月1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之间刚刚缔结的友好条约。大概是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书厅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对应于朋友在来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国务秘书）。

信函对话要具有价值，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写信的两个人都认为是在通过信函进行对话。因此，回函必须根据对方来函的内容而写。如果双方都只写各自随意所想，那就不成其为信函对话了。

回函也必须是读完来信后立即写就。尽管回函是根据对方信函内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对方已经忘却，对话就会失去光彩。

说点题外话。看了两人的信函日期，知道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寄信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令我惊叹不已。两天的时间，即使在500年后的现在，如果使用国营邮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驿。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事是文明总在进步这一原则的一个例外，要么是这一原则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写信双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对话是人与人的相互碰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无关。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完全不担心的人，韦托里也同样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内心

里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没有学历，不像韦托里那样是一位有学历的官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边工作。索德里尼政权崩溃时没有流血，也是由于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合作做了幕后工作。

我想，两人年龄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同代人说话容易投机。

第三个条件是双方拥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正值三四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安全，就是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而只关心“小事”，那他们关心的对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第四个条件是双方都具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无须特别费力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写封信都会成为心理负担，便成不了信函对话的当事人。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多年后也写了历史书，他也是一位写作高手。

最后一个条件是双方都认为与对方谈得来，在时间和精神方面有无余裕不是大问题。说起来很偶然，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都很空闲。一般认为，尤里乌斯·恺撒是信函对话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于他人的。恺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这里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通过信函进行对话而已。

回到两人的书信上来。

原国务秘书关心政治的火被点燃了，他于4月9日写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原先说厌倦议论大事的韦托里改变了想法。

尼可罗，亲爱的朋友：

我原来觉得再也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政治了，但新的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没有时间细写，快马即将出发，只讲一件事吧。

如果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这份条约真有其事，我想，就不能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像传说的那样是一个精明慎思的人。或许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三方会像把我们拥在怀里的猫一样，我已经多次听说过，已经最后决定瓜分可怜的意大利。即使有人详细研究了形势，说这不可能，我也不会相信他的……

其次，希望您能明白，我帮不上您的忙，只不过是我连自己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缘故。……您提到是否该与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商量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并不合适……

在最后这一部分，韦托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无法给马基雅维利一个满意答复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曾再三托韦托里给他找份工作，即使这样必须移居罗马。马基雅维利回归政治第一线的梦想只能一点点地远去。马基雅维利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诗[4]：

我时而欢笑歌唱

我只能这样吐出

我那苦涩的眼泪

心地善良的韦托里收到了这封信，三天后便用自己的叹息回答了朋友的叹息。他的这封信开头写了纳税给他带来的苦恼，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早晨刚一醒来，立即想起了4弗罗林的事，这是向我们兄弟征收的税款。还有4弗罗林，是向伯父征收的。这也太多了，即使与

其他富人相比也太多了。这件事不能不让我心绪纷乱。

我没有其他工作，收入只够生活，没有节余。我有两个女儿，个个都要考虑嫁妆。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赚过钱。日常用品和其他东西从来也不奢侈，反而显得有些寒酸。当然也不能说很困难。

我觉得韦托里像我，可能有点低血压。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也许是刚刚醒来的时候血糖偏低，人会变得很悲观；也许是因为对征税感到愤慨，他联想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殿下接着写道：

那时，我觉得不论是对索德里尼，还是对谁都有好处，便采取了那样的行动。然而我却被大家说得很坏。

话题涉及了政治，联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韦托里开始详细写前面说的那份双边友好条约。如果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佣兵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测，并进行论述。他最后在撂笔时写道：

就算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就没有必要去想想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吗？我在床上比往常多躺了两个小时来想这事，但还没有得出结论。

请给我写信，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吧。如果您说这个友好条约是西班牙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会同意您的意见。不是在说奉承话，我不知道有谁比您的判断力更加敏锐而正确了。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

这封信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慈雨，就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已下定决心隐居山庄了。

职业上一贯不顺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经济上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利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出狱才一个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他觉得自己已被彻底打垮，只得到山庄隐居了。这时，大使的来信寄到了他的手上，还说“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这让马基雅维利在基安蒂地区充满阳光和绿色的4月景色中恢复了生气。为了回答朋友给他寄来的罕见长信，他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回信，印刷出来也有9页之多，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谈论政治这个“大事”上了。

> 在我还享有幸福的时候，与您共同探讨是我最最愉悦的事情，我总能从中受到教益。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您的来信更让我幸福的了。再三展读您的信，我感到您就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又聆听到了您的声音。托您的福，我得以忘去现在的种种不幸，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当时忙于工作的时光。现在我已经移居乡下，与世隔绝了。对我来说，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从现在的种种烦恼中解放出来。

然后，马基雅维利一边说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经接触不到各种信息，一边逐一回答韦托里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友好条约让西班牙得到了什么，又让法国得到了什么说起，逐步推进话题。他没有忘记谈论年纪尚轻的亨利八世[5]，他正统治着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英格兰。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现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国王完全不是轻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维与法国国王缔结了条约。

如果全文介绍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明白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区别，他们一个比平常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思考也未能得出结论，而另一个则分析敏锐。但那样会篇幅太长，我们只好在此做个归纳。

根据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了。马基雅维利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冷静而透彻，这是他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的缘故呢，还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锐笔法直接用来撰写《论李维》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韦托里把“活下去”的机会带给了被迫远离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相互谈论的是国际政治。他们分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导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国务秘书。这就好似两个曾经在英国外交部共过事的40岁的人在一起探讨、谈论美国总统与苏联总书记会谈的真实意图。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20日，马基雅维利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 不久以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您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有关和平的论述。之后再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也没有再给您写信。因为我听说您就要离任回国，于是想与您当面讨论。可是您离任回国的传言似乎冷寂下来，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上次的信中，马基雅维利从置身度外的角度论述了整体的国际关系。而这回马基雅维利进了一步，把着眼点放在“如果自己是现任教皇”这个假设上，再度分析了西欧的形势。

根据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当时形势的两大强国是法国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牵制法国的英国和瑞士佣兵团，再其次是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共和国。教廷随着教皇更迭，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否认它具有类似审判的作用。只是这种审判与公平相去甚远，一般首先考虑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也很现实地认清了这一点，他以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为目的展开了讨论。

韦托里收到这封冷静而热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写来了回信。与马基雅维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内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许这是因为他本来认为可以离任回国，却又不能实现，从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忐忑状态。

亲爱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不是这星期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可以离任回国，想着回去的时候和您聊个痛快。可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滞留于此。……只要教皇愿意，恐怕我就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只要他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我就会欢快地回到故国。我每个星期都去向教皇请求离任回国，没有落下过一个星期。现在，教皇说了“你不要走”，我已无法再去请求了。所以只能待着无所事事。就同当年我们，布兰卡奇和我，再加上您，一同被派往德皇那里的时候完全一样。

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常驻之地，大概已使韦托里厌倦不已。他接着写道：

不管是法国人得胜还是瑞士人得胜，随他的便吧。如果这还不够，让土耳其人和所有亚洲人打进来吧，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回到您以前以及现在来信的主题，我认为您的分析和预测完全正确，而我却错了。我没有想到西班牙缔结条约的理由如此简单明了，老觉得背后有什么内幕。我错了，条约缔结后种种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初收到您的信，我就恍然大悟，现在我更佩服您所言甚是。尤其是您这次信中的论述方法，更加明快。虽然我不像您那样偏重瑞士步兵之力，但我全面赞成您的看法。

这之后，韦托里仍在继续议论他的“大事”，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

道：

> 我们聊的净是些基督教徒的话，而没有议论土耳其人。但恐怕就是这个土耳其，会在西欧君主们和和打打的时候设下什么计谋。正是他们，才会干出那些现在西欧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
> 土耳其苏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争上都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好运站在他的一边，统率士兵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他们经济富裕，国土广大，与鞑靼人的关系也很好。在这个帝国的前途上看不到大的障碍。所以，就算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攻进意大利，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如果那样，至少会把那些罗马牧师赶走。

关注到土耳其苏丹的威胁证明了韦托里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相反，马基雅维利对于西欧问题极具“对话”的意志力，却根本没有回应朋友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话题。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欧近在眼前的威胁吗？

当时的土耳其已经拥有巨大力量，它于4年后的1517年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包围东地中海的大帝国，8年之后它迎来了苏莱曼大帝[6]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就在与韦托里保持通信往来的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还与一位亲戚韦尔纳奇有过几封信件往来，内容是家庭方面的。韦尔纳奇因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进入苏莱曼大帝时代以后，马基雅维利的长子因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7]。马基雅维利与长子也经常通信。

阅读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那么贪婪地了解西欧，甚至写出了论文，但他事实上对土耳其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们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写给亲戚和长子的，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无法与之谈

论政治话题，那也倒罢了，但马基雅维利也太不关心了，当时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国，他理应产生兴趣。

《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数很少，然而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判断却很精准，这让人越发不解。大概这就是他的本领吧，凭借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料也能够逼近核心。

1513年7、8月间，这两位朋友之间就国际形势持续活跃地交换意见。马基雅维利有空闲时间，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职的韦托里也处在下面所说的状态之中：

> 说是大使，却无事可做。开始时更多的是和枢机主教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现在连这都没有了。因为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来自佛罗伦萨的使节也很多，我最年轻，便成了旁观者。我也尽量躲避参加任何仪式。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政策争论才充满了热度。马基雅维利暂时放下了《论李维》，开始写作《君主论》。韦托里不明就里，于11月23日给这位朋友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平时的风格迥异，他暂停了议论国际形势，说要谈谈私生活。

> 在这封信里，我决定向您描绘一下我在罗马的日常生活。……我住的地方在博尔戈的圣米迦勒。十分靠近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并不那么远离人烟，由古人称为雅尼库隆的山丘守护着。房子本身造得很好，有许多小房间。房子朝北，可以享受到凉风。
>
> 这所房子有路通到教堂。不过您也知道，就我这信仰，一般都是路过，把它作为教堂一年也就一次。
>
> 从教堂可以通到果园。不久前这里还修整得很漂亮。但由于季节的原因，加上久不下雨，现在基本荒芜了。出了果园就可以登上

雅尼库隆山，你可以从山里葡萄园中日照很好的小径登上山顶，不会遇到任何人。据那些古人说，这里曾是尼禄[8]皇帝的葡萄园，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辨。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我和9个仆人，此外还有布兰卡奇（副使）、一位牧师、一名文书和7匹马。这种生活花光了我的全部薪水。

刚刚上任当大使的时候，我还想过高贵奢靡的生活，经常招待外国人，供应三四种餐食，使用银质餐具。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花费过大，觉得这样下去并不享受，便不再这样了。我决定不再邀请重要人物，保持一定的水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把银质餐具归还了原主。……

最近，我早晨10点左右起床。梳洗后就上宫里去。不过，不是每天都去，而是两三天去一次吧。在宫里，我要和教皇（利奥十世）说上20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10句话，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殿下说上6句。如果无法和朱利亚诺说话，我会和教皇的秘书官阿尔丁盖利说上几句。然后和在场的无论什么大使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此后我会返回住所，除了偶尔会陪美第奇枢机主教一起吃午饭。

回家以后，我就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饭桌上也会有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比如萨诺和在塔兰托时就在一起的托马索、乔凡尼·鲁切拉[9]或者乔凡尼·吉罗拉米[10]。午餐后，要是有伴儿，我就会玩玩扑克牌，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打牌。这时，我会穿过教堂到果园里散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马到罗马城外走走。

夜幕降临时我就回家。我还买了很多历史书呢，尤其是罗马史方面的书。比如李维的、普鲁塔克的、塔西佗[11]的、苏埃托尼乌斯[12]的、撒路斯提乌斯[13]的等等。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曾经的罗马就是忍受了这些皇帝的暴政才震撼世界的。我有时会想，就算它现在忍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样的教皇，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每4天向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报告，内容都是些不值一写的东西。其他也就是给您写写信了。

读书之后，我会和布兰卡奇和经常来串门的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聊一会儿天，然后去睡觉。每逢祭圣日，我就去闻一闻弥撒的味道。我不像您，您连这都不会去的。

如果您问我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会告诉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来串门的。但后来我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决定谢客了。她是一个相当美丽、说话风趣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她嫁给了贵族，现在守寡，人不赖。

尼可罗，我请您来过这样的生活。您要是能来，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同回佛罗伦萨。在这里，您只要在街上到处转转看看，然后回家和我们戏谑欢笑就够了。您不用去想这是在大使的家里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完全自由。尽管有时我会穿上长袍，但穿短装的时候更多。我连骑马都是一个人，不得已时才会带徒步的随从一起出去。偶尔出门，也只是去见见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他就只是比比埃纳[14]枢机主教了，虽然要在他不生病卧床时才能见到。

我不管对谁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是觉得我不称职，就把我召回佛罗伦萨好了，那才正如我所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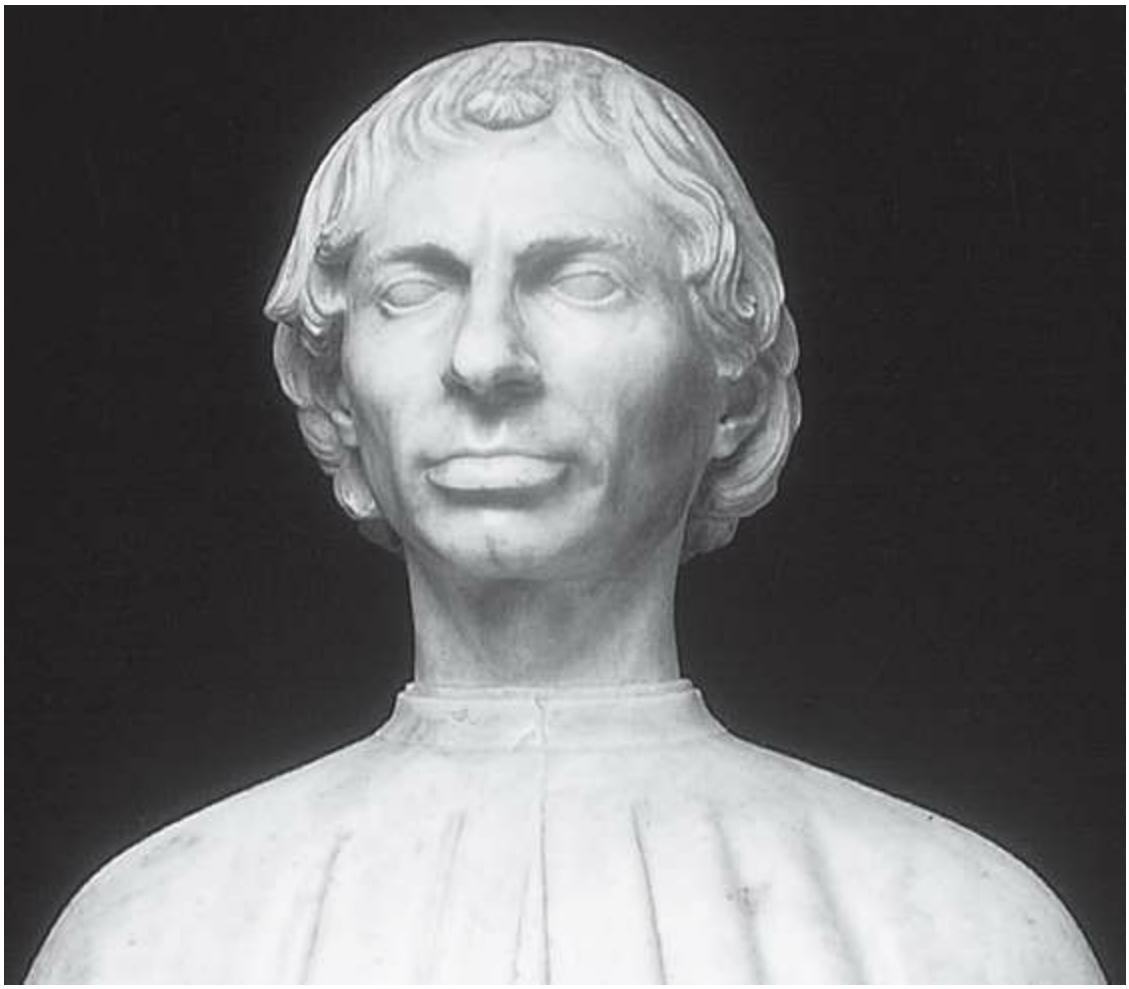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我希望您相信，这绝不是奉承您。我在罗马结识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让我满意。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遇上一个比您更好的人。……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1513年11月23日于罗马

只有这封信，我几乎做了全文翻译，因为本书“序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那封著名书信，实际上就是对这封信的回信。报告自己在佛罗伦萨郊外山庄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写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一遍马基雅维利的“回信”吧。

不过下面，马基雅维利依旧在向朋友倾诉想要工作。他一边说《君主论》还需要推敲，一边不忘征求朋友的意见，问把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怎样，他坦率地写道：



马基雅维利

这样，美第奇家族的什么人兴许会给自己一份工作。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无所作为地消耗自己。

他还写道：

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就会发现，15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arte del

stato）。这些经验应该会对某些人有用。

这与大彻大悟的心境相去甚远。这是直到此时马基雅维利仍未断念、想要回归前线的证据。《君主论》是燃烧着这种想法的人一气呵成的作品。

这两封信还显示出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不同资质，颇有意思。

韦托里的信写得不错，是一封很好的书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态度。我能感到，就是现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对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的驻意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类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做情人。不过，他的信毕竟只是一封信。而马基雅维利的信则是文学，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opera）。

这封信还说明了创作者总是需要刺激。如果韦托里不写他在罗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会产生马基雅维利的这篇“作品”。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将其升华为发出刺激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东西，这才是创作者的特质。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又相互写了22封信。信中当然议论了“大事”，但也不乏关于“小事”的对话。他们甚至相互报告了恋爱感情方面的事。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即使在失意时期，也许正因为失意，还爱上了一位寡妇，委托朋友在罗马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寄回来。不消说，他的朋友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韦托里也恋爱了，对象也是一位寡妇。两个40来岁的男人都不钟情于年轻女子，有点奇怪。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最不得志的时候与他分担内心忧愁的人就是韦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韦托里的评价都很差。

第一个原因是，尽管马基雅维利再三恳求，韦托里都没有劳神费力地去为失意的朋友寻找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批评背后，是对韦托里处世技巧的反感，他的处世技巧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实际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两人同时下狱为止，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后，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1515年，韦托里离任回到佛罗伦萨后立即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连续驻法三年，其任务与其说是做大使，不如说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监护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韦托里于1521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这一时期，虽说正义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仍然失业的马基雅维利做了点什么。马基雅维利于失意中去世后，韦托里再次担任驻罗马大使，据说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时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心腹。

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之后，他作为胜方的一员回到祖国。其时，佛罗伦萨正在向君主制转变，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亚历山大[15]的监护人。这位公子遭到暗杀后，他又暗中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继承权力而大事活动。他对亚历山大的去世秘不发丧，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所在。

然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是一个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也不会一帆风顺。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辈，而科西莫大权在握后却疏远了这位功臣。

拥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这位韦托里外，还有圭恰迪尼，他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保持着通信往来。圭恰迪尼和韦托里很相像，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这么两个人却被一个年仅17岁的毛头小伙儿给整了，真是意味深长。

不过，韦托里尽管失意，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

那样因求职而苦苦挣扎。他撰写、散发政治论文，过着优雅的隐退生活。圭恰迪尼隐退后的日子虽然无聊，却也写出了一部颇受历史学家好评的大作《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韦托里不受后人待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对《君主论》做出恰当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然而他却懈怠了，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诉韦托里，自己已经开始撰写《君主论》。当月24日，韦托里写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几行提及此事：

> 我从您的来信中得知，也听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说起过，你在写政治论文。不过，是否将其呈献给朱利亚诺殿下一事，我想在读了之后再定。

马基雅维利曾于12月10日说书稿需要推敲，他或许这时已将尚未完成的《君主论》早早地寄给了韦托里一个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18日的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 我读了您的作品，极为钦佩。但因为这还不是定稿，我想在读过定稿之后再正式谈我的读后感。

他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尽管他在以后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论》，但只是议论书是否应呈献给某人、马基雅维利是否应亲自把书带来罗马之类的话题。正因如此，韦托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的确，两人相互通信，谈论国际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谁都会认为，韦托里理应寄来长篇大论的《君主论》读后感。然而，韦托里却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驻罗马大使韦托里之所以很高兴地与在山庄过着失意生活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国际政治，是因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情报分析能力有很高评价。马基雅维利写来的意见很多都经过韦托里之口传给了当时教廷的两位实力派人物利奥十世和朱利奥枢机主教。韦托里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粉饰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诉他们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原话，有时甚至让他们直接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信。他们两人非常佩服马基雅维利，但还没有想让他到自己手下来听使唤。所以，在罗马常驻期间，韦托里为朋友找工作并非不卖力。由于美第奇家族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危险人物，韦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终。

再往深里去，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在怀念佛罗伦萨这一点上，韦托里并不亚于马基雅维利。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 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我们祖国的安全。我爱它的人民，爱它的法律，爱它的风俗，爱它的城墙，爱它的宅宇，爱它的街道，爱它的教堂，爱它郊外的田园。如果这一切遭到破坏和蹂躏，会令我悲痛到极点。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经历之所以让人想起冲浪高手，原因就在于此。只要能保卫美丽的佛罗伦萨免遭破坏，这位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可以接受任何政体。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对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500年过去了，佛罗伦萨今天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罗马遭到德意志军队的破坏和掠夺，已经很难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想到这里，我只能想韦托里的努力没有白

费，他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

不过，再好的内科医生，在面临绝对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态时，他的高明有时反而得不到好报。当时的意大利更需要外科医生，而不是内科医生。而只有马基雅维利一个人在说意大利需要动外科手术。到了这个程度，马基雅维利已完全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此前，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撰写以共和政体为主、兼论其他政体的《论李维》了，但他为何中途停下，而一气呵成地去写《君主论》呢？

马基雅维利生长在共和政体之下的佛罗伦萨。尽管事实上的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佛罗伦萨仍然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之下，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形成于洛伦佐这位卓越的领袖巧妙运营的时代。接下来的索德里尼政权是更为民主的共和政体，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15年。

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一样，对共和政体抱有亲近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一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不过，论述君主政体的《君主论》却先完稿了。而且，书中并未把“豪华者”洛伦佐作为好君主的典范，虽然20年来对他的好评未有稍减。非但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断言切萨雷·波吉亚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虽然没落已逾10年，许多意大利人想起来仍觉得他像一个恶魔。

马基雅维利自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以前他就确信，在领袖的必要条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运气、好运）以及“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不可或缺。现在，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来。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豪华者”洛伦佐获得的赞誉再高，他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名君。洛伦佐的政治在国内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僭主政治；在国外则是在意大利各个列强之间实行势力均衡政策。这种政治可以完美地运用于意大利之外专制君主国家势力尚弱的时代。“豪华者”洛伦佐是过去意大利幸福时代的名君。

但是，洛伦佐死后，时代变了。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拯救不幸时代的佛罗伦萨，进而拯救意大利，就必须有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人物。

这就是原本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转向”的原因。这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抛弃共和政体。他得出了结论，要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安全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他的衷心朋友韦托里的根本区别。

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arte）。在他的头脑中，大概还没有现代意大利领土的概念，这张版图是加里波第[16]和加富尔伯爵[17]合作在19世纪末才描绘出来的。按现代意大利的版图实现统一，这在16世纪初并不现实。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国会加入进来，它当时在巩固的政体之下社会稳定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法国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认同法国对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的强烈野心方为现实之考虑。再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势力渗透很深，要迅速改观相当困难。在16世纪初的状况之下，只有在意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才能够跟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国家正在形成的时代，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遏制来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国和南面西班牙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切萨雷·波吉亚思考并付诸实施却中途受挫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思考在当时的意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们像恐

惧恶魔一般害怕切萨雷·波吉亚，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从官僚们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就连非常欣赏并使用马基雅维利才能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恐怖而会把他调去任一个闲职吧。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毛姆在《时常》中发挥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来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实了。毛姆在小说中想象，如果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能够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下干事。

这虽然是当时的大气候，但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着找工作的念头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固然看透人性，在这方面却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而他看自己时却是一位天真至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身上。我还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莱昂纳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其主题具有挑战性，文体明快，体量可供人一气读完（这也是这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点），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马基雅维利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一直温暖、刺激着他的心。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这位朋友这样写道：

> 我想，任何人要是读了我们的书信，一定会对我们信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大为惊讶。因为咱们俩，一会儿以庄重的口气议论国际政治，像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页翻过去，话题一转，就谈起了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轻松内容。
>
>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损品位，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坏。因为我们人类是效法自然的动物，而像大自然那样的丰富多彩是理所当然的，丰富多彩不应当受到非难。

韦托里给失意的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生”。马基雅维利也不断地整理

思考过的东西，写成了《君主论》。尽管孤独，但他拥有这样的“生”：

>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
>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不过，如果只能有这样的“生”，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定会很痛苦。韦托里给了他能够感受到人类体温的“生”。这无疑使他在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时下笔遒劲。创作也许开始于精灵赐予灵感之时，但持续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8]这样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论》：

> 读了这部著作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作为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具有张力。这种力量就像体育运动员的肌肉，虽然都在皮肤之下，但块块凸现。现代作家已经失去了的这种力量，是由颇具魅力的矛盾酝酿而成。这种力量合理但新奇，符合逻辑却又充满热情，严谨缜密，同时任凭感性驰骋。

也许韦托里未能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绝对需要韦托里这样的人。

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断言，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是不幸者，我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确，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来，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种不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创作的可能。创

造性的行为单靠幸福是不够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办到的。但是，这种幸福也许很难被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学者所理解。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结束于1515年1月13日马基雅维利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们仍然相互写信，但两人都不再写像这将近两年中使人感到“对话”的信了。韦托里离任回到了佛罗伦萨，很快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而去了法国，但两个人之间并未重新开始通信。

马基雅维利写完了《君主论》，又开始整理《论李维》，这时他又有了另外的对话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失业两年还心存天真幻想的乐观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也对复职失去了信心。他充满了复职的希望，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洛伦佐。但他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位最好的理解者，这两人对他的复职毫无用处。他还写了一篇献词：

>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的二位，我没有将它献给能够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的人，而是献给那些虽然没有权力做到这些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人。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获献《君主论》后甚至连书都没读。但是获献《论李维》的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扎扎实实地阅读了这部书。他们看到了46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的绝望。对作家来说，有人阅读他的书比什么都好。

原秘书长死了，而一位作家诞生了。

---

[1]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领域有众多成就，著述丰富。他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婚姻与道德》等。《西方的智慧》是他用通俗语言写的一部西方文明史。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他

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英格兰人，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做过律师，曾任英国副财务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职。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及离婚而遭斩首。著有《国王查理三世本纪》（英国历史学第一部名著，未完成）、《乌托邦》等。

[4] 这三行诗引自彼特拉克第102首十三行诗，马基雅维利将原诗中的“掩藏”（celare）一词改为了“吐出”（sfogare）。

[5]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1509—1547年在位）。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将王室权力推向顶峰。在位期间，他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亨利八世多才多艺，自己写作、作曲，在其统治期间，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

[6] 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1494/95—1566），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1520—1566年在位。他完善内政，强化法制和封建制，保护、扶植学术和艺术。他为扩张领土，对欧洲进行了10次、对亚洲进行了3次远征，使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7]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现名埃迪尔内（Edirne），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个小镇，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8]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9] 乔凡尼·鲁切拉（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贝尔纳多·鲁切拉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反对者，教士、人文主义者、作家。著有《罗丝蒙达》（Rosmunda）。

[10] 乔凡尼·吉罗拉米（Giovanni Girolami），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的一名代理人。

[11] 塔西佗（Publus Corelius Tacito，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他继承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

[12]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llus,69/75—130/140），古罗马历史学家。曾在罗马做过法律工作，担任过多种宫廷职务。代表作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译《十二恺撒传》）等。

[13]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著有《罗马史》（散佚，仅有片段存世），流传下来有两部著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西方将他与李维和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

[14] 比比埃纳，指枢机主教贝尔纳多·多维齐（Bernardo Dovizi,1470—1520），他来自阿雷佐以北的小镇比比埃纳，又被称为“比比埃纳人”。他是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也是喜剧《卡兰

德里亚》（La Calandria）的作者。

[15] 亚历山大·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1510—1537）,“豪华者”洛伦佐之孙洛伦佐二世的儿子，美第奇家族直系最后一代男性后裔。据考证其生父为朱利奥·德·美第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年成为佛罗伦萨僭主，1532年成为第一代世袭佛罗伦萨公爵，1537年遭同族人暗杀身亡。

[16]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他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17]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18]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当代著名记者、小说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小说笔法写实，注重心理分析，触动人们心灵。二战中，他的多部作品遭法西斯当局查禁。他的代表作有《冷漠的人们》《愁闷》《假面舞会》《罗马故事》等。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两个人是有相当年纪、功成名就、富有并爱好学问的人。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之后，我屡屡见到学者写到他们“年轻”。我想他们即便年轻，也肯定30岁出头，对此我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

当时，即使是名门子弟，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也在30岁。不论在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般认为30岁是对国政具有发言权的年龄起点。

当然，也有像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和切萨雷·波吉亚那样，20来岁就开始活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别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的幸运儿。即使当时的人生只有50年，一般也不会认可不满30岁的人独当一面。

我同学者不一样，我不认同没有形象地浮现在眼前的事物。仅仅是“年轻”两个字并不能让我满意，我需要确认究竟年轻到什么程度，否则便不会产生实际感受。

科西莫·鲁切拉的年龄很快就搞清楚了，他生于1495年。但我迟迟搞不清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年龄，感觉一筹莫展。根据《论李维》中的记叙推测，他似乎要比科西莫大一两岁。不管怎么说，他们与马基雅维利都有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差距。一般认为，《论李维》完成于1517年。这样算来，马基雅维利把这部花了4年时间才写成的巨著献给了两

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尚未走上社会。马基雅维利甚至还称赞他们“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

《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嫡系洛伦佐，获献的时候他也只有21岁。《君主论》和《论李维》同样都献给了年轻人，但两者的情况不同。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的公子，是马基雅维利谋求复职的一项活动。而《论李维》的获献者却是“虽然没有权力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两个尚未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马基雅维利献给这两位年轻人的作品还不止《论李维》一种。他在晚《论李维》三年写成的传记作品《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1]传》（*La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da Lucca*）的献词中写道：

> 献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和他们的朋友们。

路易吉·阿拉曼尼与科西莫·鲁切拉同年，也是一位尚未独当一面的年轻人。

说起《君主论》和《论李维》，一定会提到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战争的艺术》（*L’arte della Guerra*，又译《用兵之道》或《兵法》）。在这部著作里，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实名登场。

《战争的艺术》的写作形式是4位年轻人就战略的所有方面对当时著名武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2]的采访录。这4个人便是科西莫·鲁切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还有一位是他们的一位朋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采访在形式上一般比论文容易安排。在作家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在作品结构方面的战略，因而使用了相互认识的4个伙伴。这是一个

由年近古稀的老将与4位刚及弱冠的年轻人的组合，因而酝酿出了感觉颇好的气氛。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中的论述要比北方人克劳塞维茨[3]的同类著作，更具地中海式的明快风格，也更具文学性。

但无论是怎样的作家，也使唤不动讨厌他的人。只有心怀好意，才能够巧妙利用他人。

即使是奉献作品，对作者来说，用来表明意志也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的心意，他是不会不事先讲好就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想给自己以地位、名誉和财富但做不到的人。

1516年到1522年，马基雅维利从47岁到了53岁。20来岁的年轻人究竟能给他什么呢？

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向西南方向步行20分钟左右，就几乎走到城墙根了，鲁切拉家的别墅就在那里。这座别墅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庭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叫作“Orti Oricellari”，翻译过来，大约就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意思。

第一张佛罗伦萨地图绘制于1548年。那是一张鸟瞰图，感觉就像坐在直升机上俯瞰一样。根据这张地图，鲁切拉家别墅的这座庭院非常之大。这份晚于马基雅维利时代60余年的地图实在准确，同1972年航拍的照片对比，佛罗伦萨这座城市40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煞是有趣。但航拍照片显示，鲁切拉家庭院面积却缩小了相当大一部分。

昔日，这座庭院是树木花鸟的乐园。而今再访，这里已为美国人建起了教堂，别墅的房屋已经成为银行，马基雅维利当年常去时的模样已荡然无存。如果是去寻访旧迹，可以说无异于白跑。想要缅怀昔日佛罗伦萨知识分子的活动，怕就只有马路对面的德语学院了。

奥里切拉里花园最初的主宰者是鲁切拉家族的主人贝尔纳多。鲁切

拉家族靠商业积累起财富，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之一。贝尔纳多的父亲请建筑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设计建造了鲁切拉宫。这座宫殿与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一道成为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代表，是堪称文艺复兴建筑里程碑式的杰作。

贝尔纳多·鲁切拉生长在这个家族，他嗜好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柏拉图学园的常客，这个学园在“豪华者”洛伦佐时期达到鼎盛。他娶了洛伦佐的妹妹为妻，从而与美第奇家族结缘。

贝尔纳多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分量不断增加。他有两个儿子，次子很早就被送进了神职界，一路升到枢机主教。虽为神职人员，他仍笔耕不辍，在这点上，他继承了鲁切拉家族的血脉。

长子科西莫年纪轻轻便去世了，没有看到儿子的出生。因而，刚刚出生的婴儿取了与亡父同样的名字，也叫作科西莫。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位。

1492年，柏拉图学园随着“豪华者”洛伦佐的去世消亡了。两年后的1494年，美第奇家族继承人皮耶罗的无能导致了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在这个骚乱的时期，与美第奇家族缘分颇深的贝尔纳多·鲁切拉靠着学问爱好者的牌子幸免于难。柏拉图学园也移到了鲁切拉家的别墅，成为知识分子的沙龙而延续下来。

只是学园已经不能再叫柏拉图学园，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诗歌与哲学，而转变成为历史与政治，这可能是主持者的兴趣不同所致。在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奥里切拉里花园是知识分子聚会最大的场所了。

1494年到1512年左右，是贝尔纳多·鲁切拉主持的时代。这段时间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皮耶罗·索德里尼统治下采用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的时期相吻合。在这个时代，对象征着反美第奇家族的索德里尼政权而

言，鲁切拉家的聚会虽说是纯学问性的，但这里也被视为是亲美第奇分子的老巢。

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去接近这个时期的奥里切拉里花园。这也可能是因为奥里切拉里花园是自己所侍奉政权的反对派，但马基雅维利在那个时期也是一直东奔西走，在秘书厅席不暇暖。我想，他的实际原因在于没有时间。当然，他当时也并无必要挤出时间去参加这种聚会。

贝尔纳多·鲁切拉于1514年去世。继承他的是19岁的孙子科西莫。科西莫在继承鲁切拉家族的同时，也继承了知识沙龙主人的角色。

不幸的是，这位科西莫·鲁切拉从孩提时代起就卧病在床，在别墅生活的时间自然比在市区的宅邸要多，甚至可以说他几乎一直住在拥有巨大庭院的奥里切拉里花园。

科西莫虽然肉体上遭受不幸，却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他聪明，逻辑能力很强，家中毫无经济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很自然地会聚了一群同龄青年。

人们做了一副可以移动的躺椅。到了夏天，科西莫就躺在上面，让用人把他送到阴凉的树荫下，有时是朋友送过去。于是，年轻人在科西莫周围的草地上随便席地而坐，读书聊天，度过时光。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子弟。

《战争的艺术》第三卷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记述。承担了第一卷、第二卷采访者角色的科西莫·鲁切拉提出要换人。我稍许翻译一些这里的内容：

扎诺比：要是你继续下去，我们会很满意。不过，你想换人，那么你至少得指定一个接替你的人。

科西莫：我想请法布里齐奥大人接着干。

法布里奇奥：我很高兴接着干下去。不过，希望我们也能遵循威尼斯的方式，最年轻的最先说……

科西莫：那就从你开始吧，路易吉。

后来的采访每次换人，都是换成年龄稍长的，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大家知道科西莫·鲁切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两人都是1495年生人，据此，路易吉·阿拉曼尼之后是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扎诺比之后是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他们的年龄相差大概在一岁左右。这就是他们按年龄的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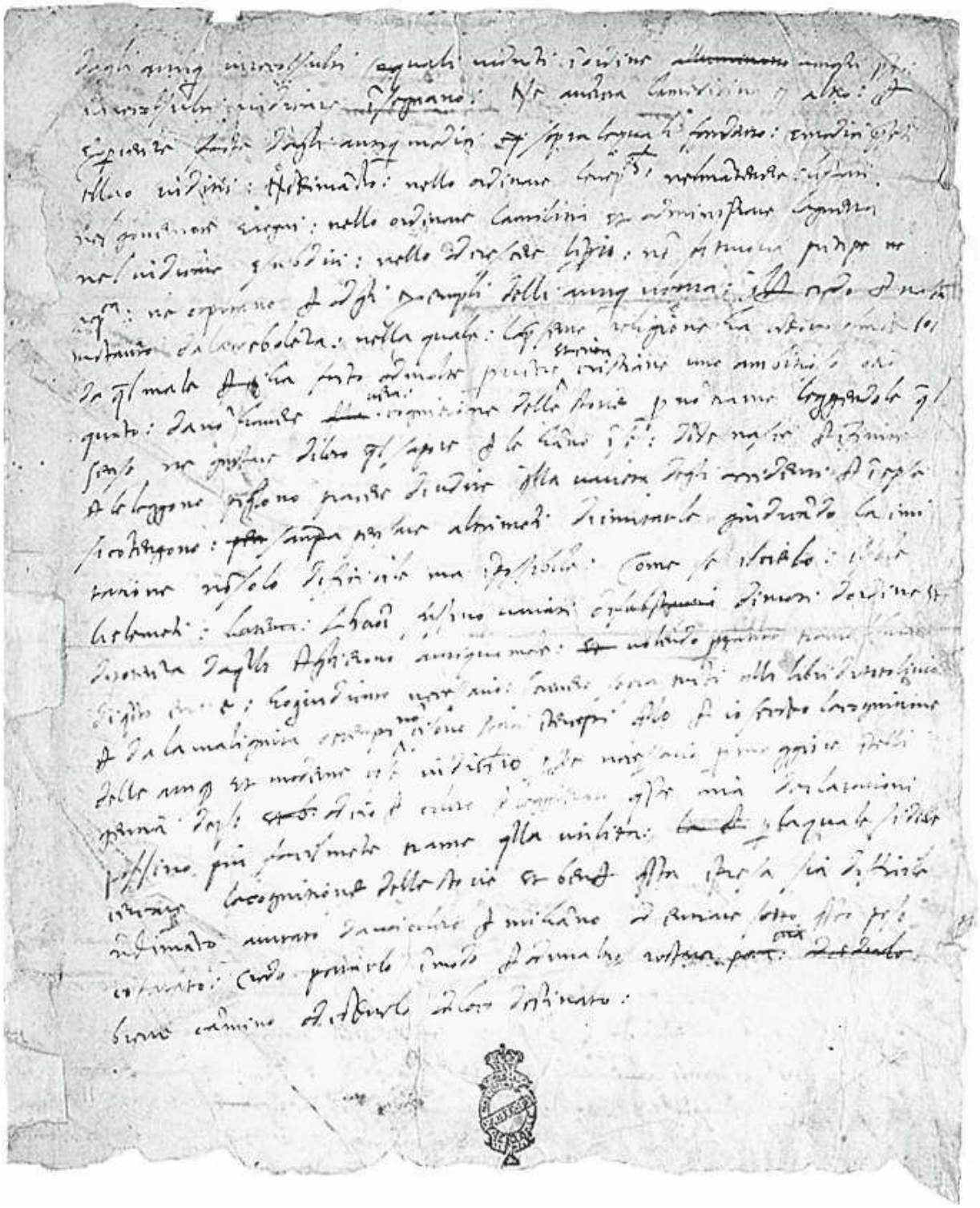
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疾病缠身的科西莫身边经常不止这三个人，这里还少不了托马索·阿拉曼尼和菲利波·德·内利这两位佛罗伦萨上流阶层的子弟，还有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此外，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是频繁露脸的人物之一，《战争的艺术》就是献给他的。几乎所有常客都和主人科西莫同辈，是20来岁的年轻人。但也不是没有年长者，常客之一的雅各布·纳尔迪[4]是1476年生人，只比马基雅维利小7岁，他后来记叙了佛罗伦萨的历史。纳尔迪是出身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与马基雅维利相类似。

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这个沙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在1516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在第二年。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1516年夏天的说法似乎更为有力。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快完成《论李维》。那年他47岁，科西莫和他的伙伴们在二十一二岁。

那么，是谁把马基雅维利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呢？

奥里切拉里花园被视为是亲美第奇的圈子。在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于此的同时，科西莫的叔父鲁切拉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在别墅上演，教皇利奥十世作为主宾曾经莅临现场。马基雅维利于1512年失业，翌年反美第奇阴谋败露，被误解为同伙而入狱，美第奇家族对他一直抱有怀

疑。马基雅维利一直未能复出便是明证。



《论李维》节选（马基雅维利手稿）

也许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对有关自己喜爱的事物以外的信息知之甚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以前的经历并不太上心。那次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也许美第奇家族当初对他的恶感也在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最初的介绍人到底是谁，但历史资料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胡乱推测，韦托里把马基雅维利带进沙龙的说法最为合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自己又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于1516年进入这个沙龙的说法正确，那么，这时韦托里已经去了法国。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群佩服《君主论》的年轻人把作者邀请了进来，这样的想法最接近于真相。事实上，《君主论》于两年半前脱稿，完成后立即就有许多手抄本在相当数量的人群中传阅。

这要归功于比亚焦·博纳科尔西。马基雅维利失势的时候，他自己也受到牵连而被免职，但他并没有怨恨。长年以来，马基雅维利是他心怀敬意的亲密朋友。博纳科尔西把这位朋友的第一部正式著作抄写了三本，还抄写了两本《战争的艺术》。

这些年轻人还不能领会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真正想说的内容，他们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但他们一定感受到了《君主论》中燃烧着的那份炽热的忧国情感。从马基雅维利身上只学到了这一点是他们的唯一缺点。

年轻人用近乎狂热的善意和良家子弟自然具备的良好礼貌欢迎马基雅维利。我们可以根据两份史料推测马基雅维利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情况。

我们先从奥里切拉里花园常客之一雅各布·纳尔迪撰写的《佛罗伦萨城市史》中节选一段：

……科西莫及其朋友们十分爱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就我所知，科西莫还赠送给马基雅维利一些谢礼。尼可罗的话句句意味深长。他一边朗读自己的作品，一边讲述，不能不使年轻人深受感动。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后面所提到的）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第二个证言选自马基雅维利自己撰写的《战争的艺术》，尽管这是马基雅维利本人所言，但可以认为其可信度极高。

《战争的艺术》中的人物都是创作该书时尚在世的人物。只有科西莫·鲁切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去世也不到一年，在人们的心里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战争的艺术》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创作。但是，如果阅读这部作品的人开始就认为科西莫不会这样说话，或扎诺比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如果让读者感到细节是谎言，作者是无法编造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圆这个谎言的，好作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下面是马基雅维利的证言。在《战争的艺术》中，他这样写道：

（在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返回位于罗马以南领地的途中，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路经佛罗伦萨的时候，）科西莫招待了这位闻名遐迩的武将，详细听他讲述，向他学习各种事情。……科西莫和他的朋友们倾巢出动，迎接法布里齐奥的到来，其中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三人。这三个人都是科西莫的朋友，个个都怀有强烈的探究之心，才华横溢……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科西莫在他的庭园中接待客人，这里的树木最为茂盛，隐蔽多阴，不用担心有人打搅。参加者各自随意坐在事先放好的椅子上，或坐在绿草如茵、凉爽如意的草地上，等待着谈话的开始。……

科西莫说道：“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殿下，请您不要有任何拘谨，坦率地对我们讲述。我们也会不客气地向您提问……”

马基雅维利过去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介官僚，现在只是一位失业的作家。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出身于意大利一流家族，又是有名的佣兵队长。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无法相比。然而，通过《战争的艺术》中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对话的氛围以及对话是怎样展开的。

在大树的树荫下，科西莫躺在躺椅上，马基雅维利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朗读《论李维》，一边讲述。一群青年环绕在他们身边，毫不拘束地随意坐在草地上。他们坦率地交谈着，没有客套。年近50岁的马基雅维利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马基雅维利成了年轻人真正意义上的导师（Maestro）。

我觉得，如果把“Maestro”这个意大利语词读成“Meister”（德语中“师傅”之意），那么在低声吟诵“Maestro”时的那种怀旧感便会淡薄。这个词不管是译成“师傅”还是译成“老师”，都不准确。米开朗基罗从不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是他的导师（Maestro），但终其一生都认拉斐尔为导师。

马基雅维利是另一位导师，他把《论李维》献给了弟子们，献给了热心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并有生动回应的这群年轻弟子。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值得感谢的也许还不止于这种精神上的报酬。人们可以想象，就像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纳尔迪有点恶搞地所写的那样，科西莫支付的些许谢礼，对没有收入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却很珍贵。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经济上面临破产，为赚取佣金，他甚至要接受佛罗伦萨商人的委托，去热那亚代为讨债，虽然这样他还可以享受一下去佛罗伦萨以外地方的乐趣。为挣佣金，他曾于1520年去过卢卡。

但是，即使是鲁切拉家的主人，科西莫毕竟是一个疾病缠身的20岁孩子。他支付谢礼，不可能像曾经的美第奇家族主人赠送养老钱或者整幢别墅那样出手阔绰。纳尔迪已经说白了是“些许”谢礼。如果说这些谢礼是为《论李维》而赠，这金额一定太过可怜。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酬谢。

科西莫·鲁切拉于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3年后的1519年去世，享年只有24岁。《战争的艺术》献给了科西莫学习会的常客之一菲利波·斯特罗齐。该书第一卷是这样开头的：

> 我相信任何人死后都会得到赞颂，我会毫不迟疑地赞美我们的朋友科西莫·鲁切拉。每当想起这个名字，我都会潸然泪下。他资质优秀，对朋友们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市民。……我发自内心地坦言，在我迄今所认识和打交道的人中，没有谁比他更怀有对伟大事物的热切欲望了。……他才真正配得上“好友”这个词。……
>
> 苟活于世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使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更加鲜明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祈愿，科西莫会在（这部书读者的）心中复活。

在结束这部具有很高文学性的战略论述时，马基雅维利让70岁的老将法布里齐奥这样说道：

> 我的前途有限，自己的想法再强烈，也不会有机会去实现了。你们年轻有为，因此，我对你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倘若你们认为我的想法妥帖，去把它建议给君主们，为他们助益。
>
> 我希望你们不要泄气，不要怀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为佛罗伦萨自古就是一座有着起死回生特质的城市。只要看一看诗歌、绘画和雕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我已经不能指望亲眼看到你们这些努力的成果了。假如命运能够再对我微笑一下，我相信这些成果会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我会向你们显示，古人的兵法现在依然有效。

做到了这点，无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我都会死而无憾。

一般认为，《战争的艺术》完成于1519年到1520年之间。如果是这样，书中最后的这一部分应该写于1520年。马基雅维利那年51岁，他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被他称为“他们”的，是路易吉·阿拉曼尼，25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26岁上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在二十六七岁。还有菲利波·斯特罗齐，他虽然没有出现在书中，但马基雅维利也把书献给了他。他不但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还出身于斯特罗齐家族，这个家族以美第奇的顾问而闻名。这些难道不是马基雅维利尚有野心要对政治世界的统治者施加影响的证据吗？

依我看来，这才是政治思想家健全的活法，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所有健全人的想法。

《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当时都激起了很大的浪潮，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基雅维利去世5年后于1532年才付梓的。大概是因为《战争的艺术》触及了1520年代意大利人最关心的主题，这本书在脱稿仅一年后于1521年付印。根据记载，这本书的初版于1521年8月16日发行，发行数量不明。书在发行后立即获得好评，接二连三地重版发行。书以采访的形式写成，读起来容易使人感到亲近，这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书中人物家喻户晓，这也是一味创作的调料。人们不能想象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会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如此聪明的头脑。但他恰于1520年，即该书印刷本普及前一年去世。而马基雅维利说过，死后谁都会受到称颂。佛罗伦萨4位足不出户的年轻人也由于畅销书《战争的艺术》，名声远播国外。

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之间的导师与弟子的关系即使在1519年科西莫·鲁切拉去世后也未曾中断。可能奥里切拉里花园已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庭园，但是，聚会会在某位的家里坚持下来。他们都是名门子弟，一定不缺舒适的去处。这些年轻的子弟们，在为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愿望而积极活动。

1520年3月，菲利波·斯特罗齐把马基雅维利带进了美第奇家的大门。接待他们的是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美第奇家族计划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可他们陆续去世了。教皇利奥十世便把这位枢机主教派来统治佛罗伦萨。会晤美第奇枢机主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和美第奇家族终于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不睦关系。年轻弟子之一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利用逗留罗马的机会，热心地向教皇宣传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侧击或许也产生了效果。

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并没有认可马基雅维利复职，没有想让他再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倒是提出让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来写一部佛罗伦萨的历史。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两年之内完成写作，每年可获得100弗罗林小金币的报酬。马基雅维利当秘书时的年收入是192弗罗林，这个报酬差不多是当时收入的一半。这些钱如果折合成大金币是57块。而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每年付给编年史家萨努托[5]的报酬是150块大金币。与马基雅维利签约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受托撰写本国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马基雅维利被低估了价格。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踊跃地投入了写作之中。这时是1520年11月，他去卢卡代人催债两个月后刚刚回国。年轻的弟子们由衷地期盼作品的完成。

他去卢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佣金。这次去卢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一半是为佛罗伦萨政府去工作。卢卡的有钱人破产了，相当数量

的佛罗伦萨市民蒙受了损失。挽回这些损失就是他此行的工作。美第奇枢机主教为他给卢卡当局写了封介绍信。这样，马基雅维利也不便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报酬是多少。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主要是与卢卡市当局交涉，这样的工作不会占用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基雅维利利用闲暇时间写成了一部短篇传记小说，人物是14世纪卢卡的一位领主，作品的题目就是上文提到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从《论李维》到《战争的艺术》，再加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除喜剧以外的所有作品，全都献给了他们。马基雅维利的好意很容易想象，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呢？

他们寄给马基雅维利的一些信件被留存了下来，但数量并不多。他们这些年轻人尚无机会因公出行，而马基雅维利大概也只能在佛罗伦萨城里生活。因为相互间经常见面，有事便说，不需要写信。只有当他们中有谁去了罗马，或马基雅维利去卢卡出差时才会写信，因而信件的数量很少。

这点为数不多的史料，却反映出他们的大致性格。

总体上看，他们诚实而认真。

他们个个年轻，礼仪自然，毫不放纵无礼。

除扎诺比以外，其他年轻人的信中都洋溢着对马基雅维利的敬爱之情，有似撒娇一般。

还在科西莫·鲁切拉活着的时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似乎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的性格当然就是兴趣的焦点。这位年轻人只给马基雅维利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于1520年9月6日寄给逗留在卢卡的马基雅维利。

尊敬的阁下：

我们于上月29日收到了您的信和您撰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这封信是26岁的青年写给51岁的老人的。我读着这封信，不禁莞尔。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胡乱的联想，浮现出了一个26岁的青年的形象，他家住在成城学园[6]附近，父亲是某公司的重要领导，他在统考中取得最好成绩直升东京大学，如今在读研究生。

我和路易吉、圭代蒂、迪亚切托、安东·弗朗切斯科一起阅读了（这部作品），一致断定，总体上这是一篇好东西，写得十分出色。

读到这些，人们可以知道，扎诺比不是一位专制君主式的领袖，而是非常民主。尽管如此，这位26岁的青年对51岁的老人完全平等相待。只有从未怀疑过自己才华的年轻人才会这样说话。而且，他的脑子的确聪明。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如再稍做加工便可增色，尤其是最后记述卡斯特鲁乔言行的部分如再加删削，文章便会更加漂亮。这部分文章过长，明显是出自古代人之口的话语过多。

说最后部分太长，我也赞成，后世的研究家也都会赞同。我佩服他很早就能指出这一点。但从信的这个地方开始，我的微笑也变成了苦笑。

扎诺比在这封不太长的信的后半部分再次提及《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他这样说道：

……我认为，无论如何，（卡斯特鲁乔临终前的）那段告白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在我想来，与其说那段告白忠实于史实，不如说那是按照您的风格所写。既然题材取自史实，写法就应该适合于这种做法。

这位秀才还写道：

包括我在内，我们全体的意见是，您应该全力以赴投入到撰写这部历史（《佛罗伦萨史》）中去。

这封信透露出，为了能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这群以扎诺比为领袖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以美第奇家族为中心四处热心活动的情形。他们期待马基雅维利能写出《佛罗伦萨史》这样忠于历史的作品，而不是像《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种偏离历史的东西。

这事关个人嗜好，只好随他去了。但是，欣赏不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是问题吗？

单凭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一封信就给他下判断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青年。他出身于良好门第，头脑聪明，诚实认真，思维缜密，充满自信，人望甚高。他还是一位身体健壮的漂亮青年，胸中燃烧着一腔热情。

但是，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人，在我看来有一点缺憾，他完全缺乏谐谑精神。他与马基雅维利亲密接触已达6年之久，却没有从他身上学到这种精神，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位青年原本就欠缺这种精神吗？

说起来，《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是打发余暇的消遣之作。马基雅维利身在卢卡，他按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题目虚构了一篇作

品，根本没有注意什么史实。这对他来说是玩一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定下，就像达·芬奇创作绘画前要画很多素描一样，马基雅维利也用历史素材试了试手。

这是一篇印出来只有32页的小作品，平均每两页就有一处研究者们做的注，“此处亦为马基雅维利之杜撰”、“史实为……”云云。每读于此，我就忍俊不禁。

作品开头说的是卡斯特鲁乔出生的秘密，一读便知那是模仿《圣经·旧约》中摩西出生的故事。那是一则被人不分时代地到处引用的著名故事，稍有教养的人立即能够指出出处。作品借14世纪人之口所说的那些话，我记得曾在古代历史学家的书籍中读到过。这是一部让人读来发笑的历史小说。就说卡斯特鲁乔打过的那些仗，你要是相信了作品中所写的东西，历史考试必定不及格。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笑着去读会很开心的传记小说。如果把回光返照时卡斯特鲁乔的坦言当作马基雅维利自己一吐胸中块垒，你就会感到愉悦，甚至会肃然起敬。倒是在信里写那不是史实、需要斟酌的人，过于片面地对待人情味了。

“偏离历史”有时会产生比“历史原样”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效果。《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就是一部显示出这种效果的作品。没有任何历史记述能像这部作品那样反映出14世纪意大利真实人物卡斯特鲁乔鲜活生动的形象。

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即使不看生理年龄也很年轻。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如果人性就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那么人所写的作品当然也会丰富多彩。我相信，如果是曾经与马基雅维利有过通信往来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他一定会含笑欣赏这部作品。

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热烈地尊敬马基雅维利，但在谐谑精神上似乎与

这位“导师”没有共同之处。1522年6月，反美第奇阴谋败露，马基雅维利与他们的交往便以非常残酷的方式终结了。

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而奥里切拉里花园的这帮年轻人密谋了这个计划：

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路易吉·阿拉曼尼、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托马索·阿拉曼尼、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并非所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人都是阴谋的参与者。菲利波·德·内利、雅各布·纳尔迪和菲利波·斯特罗齐都没有参与此事。前面所列扎诺比等人都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要成员。马基雅维利与他们关系密切，他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要么是献给他们的，要么就有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中。这些出身家庭与美第奇家族很亲近的年轻人谋划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行动。

托马索·阿拉曼尼和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迪亚切托两人没能躲过追兵。他们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交代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阴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了法国，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提前一点躲过了追捕，也逃到法国得以幸免。迪亚切蒂诺和托马索·阿拉曼尼于6月7日被处以斩首刑，同日发布布告，宣布没收所有阴谋参与者的财产。

这个阴谋事件实际上在两年前的1520年便开始策划，它导致了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毁灭。这些年轻人一方面热心运动，做美第奇家族的工作，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一方面又在谋划推翻美第奇家族。而马基雅维利对此却毫不知情。

密谋者们的计划如下：

第一步，他们要杀掉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接下来以法国军队为后盾，恢复隐居在罗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职位，确立民主政体。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法国，就是为了调动那里的军队。

这就是几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为在佛罗伦萨复兴民主的共和政体而进行政变的全部内容。被捕的两个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对美第奇枢机主教本人并无敌意，为了要在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们下决心要杀害他。他们的心情大概与布鲁图斯把剑刺向尤里乌斯·恺撒的时候一样吧。

不过，客观地分析，发起这场政变的根据实在不足。

首先，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根本没有想要当佛罗伦萨专制君主的意思，他觊觎的是教皇宝座。枢机主教都想做教皇，而他有相当高的概率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521年阴谋败露的前一年，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去世了。在紧接着召开的教皇选举会议上，美第奇枢机主教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候选人。但他错误地对意大利出身的枢机主教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认可了选举荷兰籍的阿德里安六世[7]为教皇。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认为美第奇枢机主教大有希望。实际上，阿德里安六世教皇在位一年就去世了。这位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于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阴谋败露时他在佛罗伦萨，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当佛罗伦萨的专制君主，而是因为他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给了荷兰人，想在这里专心致志地收复失地。

在朱利奥枢机主教的心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想把佛罗伦萨变为专制君主国家，当时的美第奇家族并无可以胜任的人才。美第奇家族没有进入神职界的直系男性，除了朱利亚诺和洛伦佐，而他们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尚无所作为便去世了，空留下了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著名雕塑《美第奇家族墓》。美第奇家族还没有养育出合适的男性来成就此事。朱利奥枢机主教瞄准的是教皇宝座，在他看来，能

保证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安泰就已不错了。这时的教皇不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美第奇家族一旦有事，并不能指望罗马的支援。

实际上，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朱利奥枢机主教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专制君主的味道。非但如此，他还把今后佛罗伦萨应该采用怎样的政体这个课题交给了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几名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提交了论文，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内容是共和政体更适合于佛罗伦萨。

朱利奥枢机主教对这样的内容并不生气，他甚至还把正式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使命交给了马基雅维利，而后者对美第奇家族以正式的形式去垄断权力说不。

暗杀这样的人，对市民有说服力吗？

年轻人阴谋的第二个弱点是抬出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个人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的民主共和政体时代的正义旗手，认为他是共和政体的一号人物并不难理解。但他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想想他在担任终身正义旗手期间的言行，他也不具备可以成为政变中心人物的气量。其实，政变败露一周之后，他就因旧病恶化而一命呜呼。仅从想着要把这样的人物抬出来这一件事，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阴谋参加者的洞察力。

最后一个弱点是，他们认为法国国王会行动起来而不索取代价。即便法国军队会来当后盾，成功之后他们会允许佛罗伦萨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权吗？

由于这些原因，奥里切拉里花园的阴谋尚未在佛罗伦萨市民中产生任何波澜，就以主谋中两人被处死刑、所有主谋被处没收财产的结果而画上了句号。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被扯上嫌疑。马基雅维利可能对这个事件大感震惊，躲进了圣安德里亚山庄。但他所害怕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甚至没有命令他中止《佛罗伦萨史》的写作。

但马基雅维利个人的内心状况究竟怎样呢？这段时间他没有留下文字，也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他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所写的信，也只是关于出售山庄收获作价的事务性内容。马基雅维利憋在圣安德里亚山庄，人们在他身上只能看到沉默。

1513年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被投入牢房，甚至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出狱后他并不避讳谈论这段“不幸”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他与韦托里的往来信件中看到这一点。然而，1522年的时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沉默。这是他害怕事件波及自己呢，还是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悲哀和苦恼使然呢？

没有参与阴谋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雅各布·纳尔迪在《佛罗伦萨城市史》中有下面这句话。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部书中有一段记述了马基雅维利如何受到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人科西莫·鲁切拉及那里的年轻人欢迎和爱戴。在那一部分的最后一行有这样一句话：

> 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1522年暴露的阴谋小组的理论指导就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来亲美第奇的一群年轻人怎么就反起美第奇了呢？而且还采取了过激行动？凡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至少在当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假设。马基雅维利在索德里尼民主共和政体政权时期是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现在还在毫无忌惮地说着共和政体适合佛罗伦萨。年轻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疯狂起来的。

不过，朱利奥·德·美第奇似乎并没有这样想。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未因此获罪，他在继续撰写美第奇所希望的《佛罗伦萨史》。也许美第奇枢机主教要惩罚那些读了杀人小说而去杀人的人，但不会惩罚那个写小说的人。

我们在前面说过，扎诺比这帮年轻人的所谓计划实在是幼稚之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到底有没有读过献给自己的《论李维》中的第三卷第六章“论阴谋”呢？马基雅维利在这里精辟分析了各种情况。如果读过，那他怎么还能想出这种完全违背马基雅维利意思的阴谋呢？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事先察觉这场阴谋，无疑他会先于任何人让他们作罢或告诉他们这么搞法不会成功。他在《论李维》中那样恳切细致地谆谆教诲，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反美第奇阴谋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年轻的弟子们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必用雅各布·纳尔迪的证言去证明。可是一旦要付诸行动，这些弟子却完全按照自己所想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为师者会是怎样的心境啊。尽管这些年轻人有些过于认真，也有点憋闷，但很可爱。1522年，马基雅维利彻底沉默了，这似乎并非单单因为害怕。

如果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思想家冷静地去给他们打分的话，他大概只能对这些不肖弟子大失所望。但作为一个人，马基雅维利必定做不到只是如此冷眼观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群年轻人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地回应着他的作品。直到昨天还一起读书、一起谈论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两个人掉了脑袋，其余的亡命法国。但最让马基雅维利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他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瞒着他，在暗地里制订阴谋计划。

年逾五旬的导师完全被弟子们排除在外了。即便这是弟子关心老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为师者也不能不感到悲哀。关于1522年初夏发生的这一事件，马基雅维利至死都未置一词。

---

[1]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1281—1328），卢卡的领主，佣兵队长。

[2] 法布里奇奥·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1450—1520），意大利著名佣兵队长，参加过许

多著名战役。

[3]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参加过若干重大战役。《战争论》（Vom Kriege）是他的代表作，被誉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

[4] 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1476—1563），意大利史家，曾为佛罗伦萨政府工作过。1527年参加驱逐美第奇家族的活动，1530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流放。其后在意大利各地，主要在威尼斯生活。他的主要著作是《佛罗伦萨城市史》（Istorie della Citta di Firenze），叙述了1498—1538年间佛罗伦萨的历史。

[5] 马里诺·萨努托（Marino Sanuto,1466—1536），威尼斯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总督传》等。他的《日记》（I Diarii）58卷起于1496年1月1日迄于1533年9月，记录了威尼斯与欧洲及东方关系中的许多信息，是他的重要的编年史著作。

[6] 成城学园是日本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学校。学园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设施。学园始于日本近代教育家泽柳政太郎于1917年创办的成城小学，该小学是他改造日本初等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学校。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1459—1523），又称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本名阿德里安·佛罗伦斯（Adrian Florensz Boeuens），荷兰籍日耳曼教皇，1522—1523年在位。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既然人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马基雅维利的内心里就不会只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虽然有些打趣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在他名字后边写上了“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historico、comico、tragico）。

马基雅维利是悲剧作家和史家的说法已为《君主论》《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以及《佛罗伦萨史》等著作所证实，只有喜剧作家的说法有待证实。文艺复兴时期喜剧杰作《曼陀罗》（Mandragola）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基雅维利。哥尔多尼[1]的喜剧曾经让歌德赞不绝口，说这是“第一次见识意大利喜剧”。有人说，《曼陀罗》比哥尔多尼的喜剧还要好，要说差，也只是与高乃依[2]最好的作品相比而已。《君主论》和《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书信对话时代的产物。如果认为同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人的交往是产生《战争的艺术》的土壤，那么，较为妥帖的看法是，《曼陀罗》也是因这种交往而产生的作品。

不过话要说回来，作家根本不会受交友关系的左右。作家原本就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才能结晶出作品。环境只能起到让作家觉悟到自己具有这种素质的作用。马基雅维利还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的时候，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在他出差法国时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 来信已于三天前收到，它是用伊特鲁里亚文写的，却大受欢迎，因为它来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因为看不懂伊特鲁里亚文，他们便嘲笑写公文报告时文字工整的马基雅维利也会在私信中胡乱书写。

> 我读了您写给马尔切洛（秘书长）的报告，读了另外两封写给秘书厅的信，以及写给比亚焦的信。大家都很想跟您说话。
>
> 您的话愉快风趣，富有机智，能让我们大家放松下来，打起精神。在我们因无休止的工作而疲惫不堪、筋疲力尽的时候，您的话能让我们重拾自信。奥塔维亚诺·达·里帕（“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在谈起您时说：没有人像您这样充满幽默，头脑敏锐，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当场回答得让人佩服。
>
> 真是这样！您一掺和进来，我们会立刻忘掉一切，开朗快乐，眉开眼笑。哦，那可是毫不掩饰的非常低俗的笑，会把我们笑得趴下……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才30岁出头。但是，他这方面的秉性即使在尝尽苦难到了50多岁的年龄，只要棋逢对手，照样能够潇洒发挥。曾经是奥里切拉里花园青年之一的菲利波·德·内利当时已经接了圭恰迪尼的班，当上了摩德纳的地方长官。他也给马基雅维利写过这样的信：

> 您离开了巴尔博格里亚，这让这里的百姓明白了一件事：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您不在了，我们谁都不再想聚拢在桌旁，也不再泡在酒馆里，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带坏了这一带的民风。
>
> 多纳托回来工作了，巴奇诺再也不见人影，只有乔凡尼（Giovanni）玩心十足，我可没有那心情。不管怎么说，您不在这里，总是没有人把这帮人聚在一起……

这就是56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的“赞美词”。

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的人，1513年马基雅维利失意之后，这个人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频率相当高。多纳托是个商人，资产可观，但从姓氏看完全不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像是个中小企业主，或许是个新兴暴发户，这个人的年龄也没搞清楚。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研究的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都不太愿意触及此人。研究者们更愿意把笔墨用于出身名门的精英官僚韦托里、圭恰迪尼，或用于奥里切拉里花园那帮年轻人身上，虽然他们年纪尚轻还没有成为官僚，但他们出身名门望族。他们认为，类似多纳托这样的人尽管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但属于拿不上台面的一类。然而当时已处于自由的文艺复兴的最后时期，连韦托里以及同是名门出身的精英官僚菲利波·德·内利也都不再避讳与多纳托的交往。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但即使不靠佛罗伦萨名门的正业金融业赚取财富，只要家中大气、开放，能经常会聚一些“安逸闲散的女人”，这样的人也会大受欢迎。

这位暴发户借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500达克特巨款，但教皇的这位弟弟根本没打算还这笔钱。马基雅维利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背运时期，还曾委托过驻罗马大使韦托里帮助讨还这笔钱，甚至数度拜托。他的热心也颇奇怪。这位暴发户还对政治怀有欲望，极想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议员。马基雅维利也曾托韦托里帮他一把。不过，我们看不到韦托里有行动的迹象，结果这两件事在韦托里截至1516年的任期内均未实现，可能是韦托里认为没有必要太热心地考虑这两件事。

不过马基雅维利没有灰心，他利用在奥里切拉里花园认识的年轻人与美第奇家族的亲密关系，只要他们中间有人去罗马，他就请求其帮助讨回500达克特。终于在1520年，马基雅维利8年的热心得到了回报，这500达克特再次回到了多纳特的腰包。借款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4年前便已过世，时任教皇利奥十世替他还了这笔钱。凑巧的是，这一时间与

美第奇家族对马基雅维利感情好转的时期相吻合。研究者中人品不好的人便说，马基雅维利如此热情是为了赚取佣金。

多纳托未能成为政治家，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才能。事实上，比起为多纳托讨债，马基雅维利对他转向当政治家少了一份热情。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这个人的姓氏很滑稽。提起科尔诺，谁都会联想到被戴绿帽子的男人[3]。而他恐怕连《君主论》中的一个字都理解不了。但他似乎对人很友善，任何时候都对马基雅维利敞开自家大门，打心底里喜欢性格开放、不加矫饰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如果经济上遇到困难，他便会借钱给他，虽然马基雅维利并未向他借过500达克特巨款。这两个人之间令人生疑的友情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去世。

但是，这位多纳托的“沙龙”在文化气息上恐怕无法与同时代伊莎贝拉·德斯特[4]和维托丽娅·科隆纳[5]的沙龙相比。马基雅维利一生与名流夫人充满智慧的沙龙无缘。是马基雅维利无心接近呢，还是名流夫人没有邀请他呢？大概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米开朗基罗是维托丽娅·科隆纳沙龙的常客，他把这位颇富修养的贵妇人奉为精神上的恋人。但马基雅维利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他而言，女人就是女人，好像面包就是面包一样。

马基雅维利的女性朋友和情人，不是附近的寡妇，就是操持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女人，均无名气。值得一提的只有歌女芭芭拉。但丁有贝雅特丽齐[6]，彼特拉克有劳拉[7]，但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类似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缺少成为缪斯女神的资格吗？她们常常亲切地接待马基雅维利，对别人说他的好话。但可怜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艺术家不是那种由女神唤起灵感的人，刺激马基雅维利创作欲望的总是男神或男神们。

马基雅维利从1520年起又交了一位有些可疑的朋友，名叫雅各布·

德·菲利波。他是一位砖厂厂主，和多纳托一样也是一位暴发户，似乎比多纳托还要富，马基雅维利的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Clizia*）的首次公演就是由他赞助的。由于这位雅各布的关系，马基雅维利认识了平生最后一位恋人芭芭拉。砖厂厂主和歌女与《曼陀罗》的公演也有很大的关系。

佛罗伦萨城中心有一个奥利沃洛剧场，从俗称“大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剧场叫作“奥利沃洛”只是因为它在同名马路上而已。在佛罗伦萨的剧场中，这个剧场很小，只有一层，观众席大概也远少于300席，以上演话剧为主。但这个剧场的舞台纵深大，能够表现出舞美效果，座位舒适，不亚于电影的首映影院。4月的一天晚上，我去这个剧场观看了正在上演的《曼陀罗》。票价是9000里拉，按现在的汇率折合1000日元，公演期间为20天。这是我第几次看《曼陀罗》呢？我对话剧提不起兴趣，只有这部戏看了五六遍，因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巴杰罗国立美术馆院子里的那场演出，这座美术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警察局。当时的海报很让人开心，海报是这样写的：

编剧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主演 路易吉·圭恰迪尼

路易吉·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好友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哥哥。我们在前面介绍过，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为官时期，曾经在维罗纳有过一次荒唐的嫖娼行为。他曾经向这位路易吉·圭恰迪尼写信聊过这事。脑子里的这一闪念使我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圭恰迪尼家族的绝大多数男性都叫路易吉或弗朗切斯科。主演的名字大概是这个家族祖上传下来的吧。圭恰迪尼家族延续到了今天，其掌门人仍是话剧表演家。人们一望便知，海报上所写的搭档与500年前的一样。

可是，最近在4月份看戏的时候，演员换了人，剧团也不再是政府文化部特设的了。这个剧场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之前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剧目。这意味着，《曼陀罗》受到了与莎士比亚、哥尔多尼、纪欧多[8]、皮兰德娄[9]等大家作品一样的待遇。

这次上演虽然海报上写着由佛罗伦萨市文化处赞助，但人们既看不到旅游团队，也看不到学生团体。顺便说一句，学生折扣只便宜1000里拉。也许是平日晚场的缘故，剧场只有七成观众，但感觉像是上映优秀影片的电影院。

虽然这部戏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了现代语言，但关键地方用的仍是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方言，观众应该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发出笑声的地方非常得当。

写意大利文学史，甚至写欧洲戏剧史，《曼陀罗》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喜剧。剧情梗概大致如下。

剧名“曼陀罗”意译过来大概是“春药”。

刚刚进入16世纪不久，法国住着一个名叫卡利马科的男人。他年届而立之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0岁时来到法国，至今已有20年，这个佛罗伦萨人在法国生活没有丝毫障碍。卡利马科听佛罗伦萨来的人谈论说，有钱人尼洽年事已高，但妻子卢克蕾佳年轻美貌，品行卓越，他便恋上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并想占有她。于是他冒着连天的战火，带着精明的仆人西罗，离开法国来到意大利。剧情从这两人到达佛罗伦萨开始。

如何接近卢克蕾佳呢？卡利马科仗着自己的财富，托了一个名叫李古潦的朋友帮忙。李古潦总是缺钱但不缺坏点子，这多少让人联想起马基雅维利。李古潦自然接下了这件事。按李古潦所说，尼洽和卢克蕾佳以前没有任何绯闻，夫妻间唯一的软肋就是两人没有孩子，而丈夫尼洽

非常想要孩子。

于是，卡利马科首先想到要把这对夫妇带到温泉这个男人容易接近女人的地方。但他失败了，原因是尼洽年事已高，不爱出门。尼洽回话说，出门走动得动员所有用人，他不愿这样做。

李古潦被迫改变做法，他想了另一个主意。他想，卡利马科长期在外国居住，佛罗伦萨无人认识，可以借此把他假扮成一个在法国很有名的医生，把他吹嘘成一个能让石女怀孕的专家。李古潦首先开始说服丈夫尼洽，说如果服用了“曼陀罗”这味药之后与妻子同床，妻子一定会怀孕。他又说吃了这种春药的人会很快死去。尼洽很快相信了这位由卡利马科假扮的号称经常出入于法国王室、动不动就说拉丁语的医生，也相信了春药的功效，但尼恰不愿意马上就死，所以很犹豫。

这时李古潦告诉尼洽不用担心，说他会带一个陌生人来，这人就要当父亲了，会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代尼洽行事便不会有问题。这样终于让丈夫放下心来，解决了男方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有名的贞女卢克蕾佳参与其事呢？又是李古潦提议，让卢克蕾佳的忏悔修士提莫窦去说服她。这位修士一边谈论着天堂，一边却贪婪金钱，金币哗哗的响声让他接下了这桩差事。

他们让卢克蕾佳的母亲也察知此事，为提莫窦修士打掩护，使卢克蕾佳答应与修士见面。面对卢克蕾佳，提莫窦修士说服她道：“你是为了丈夫才这样做的，这不是罪过。”连修士都说不用担心天堂的位子，卢克蕾佳也就放下了心。这给卢克蕾佳和别的男人上床提供了一个名分。

说到这里，想必读者会注意到毛姆的作品《时常》就模仿了这部作品。毛姆在作品中把马基雅维利写成了一个卡利马科和李古潦合二为一的人物。这就是毛姆作品的味道。

计划完成了，剩下的只是实施了。卡利马科丢掉了医生的伪装，摇身一变成了陌生人，顺利地上了卢克蕾佳的床。

这幕以后非常有趣。大家认为卢克蕾佳蒙在鼓里，但她偏偏感觉到了这一切。完事后，她一边心醉神迷地吻着半入梦境的假扮陌生人卡利马科，一边对他说：

> 你的狡猾、我丈夫的愚蠢、我母亲的轻信和忏悔修士的贪婪，竟让我做出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儿。我只能想这是天意。既是天意，我就不能拒绝。
>
> 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丈夫和保护人。为了我，也请你常常让我做你认为的好事儿。
>
> 我丈夫乐意咱们这一夜，我希望今后就这样下去吧。我是说，你和我丈夫结交做个朋友吧。明天你也来教堂吧，回头再来家里一起吃饭。这样，我们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随时都能见面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是最好的办法了。

卡利马科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所有人都通过吃了并不会死的“曼陀罗”得到了满足，全剧在一片叫好声中结束。我劝日本女人都看看《曼陀罗》，哪怕只是听一听卢克蕾佳最后这几句台词。

16世纪初《曼陀罗》上演后大获成功，剧本迅速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一般认为，该剧首演于1518年。以后，每年到了复活节——那也是戏剧季节——各地都会竞相上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1522年，该剧在威尼斯上演时，由于观众太多，剧场爆棚，甚至不得不延长演出期限。

该剧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好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教皇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但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看后开怀大笑。时任罗马涅总督要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对该剧的上演十分热心。这个时期，文

艺复兴精神还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仅仅过了10年之后，文艺复兴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的两面夹击，最终消失在了这两大巨浪之中。

马基雅维利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完成于1524年，1525年1月首演。

砖厂厂主的宅邸这天一变而为剧场。舞台美术由著名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0]担纲。该剧以希腊的雅典为舞台，剧场大概笼罩在雅典式氛围之中。观众席上，有以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为首的佛罗伦萨名门。这是著名的《曼陀罗》作者第二部作品的首演。剧演到一半时唱起了主题歌，主唱当然是歌女芭芭拉，她与马基雅维利共同创作了这首主题歌。

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时，在另外的房间已经备妥了奢华的晚餐，人人心满意足。砖厂厂主对高效的投资感到满意；芭芭拉为情人和自己的成功感到满意；马基雅维利当然也心情大好。其后，《克莉齐娅》在威尼斯也大获成功，威尼斯是当时唯一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剧场的国家。马基雅维利作为喜剧作家名满意大利。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君主论》，也没有看过知识阶层的畅销书《战争的艺术》，但他们非常开心地观看《曼陀罗》。

我们不知道付给这位剧作家多少酬金，但的确是付了一些。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想在任职地博洛尼亚上演《曼陀罗》，马基雅维利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给我的那份不要了”，表现了马基雅维利难得的大方。

在此4年以前，即1521年的4月中旬，52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了一封久无联系的人写来的信。写信人是隐居罗马的往日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位原共和国正义旗手因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而遭驱逐，马基雅维利也一并失意。他知道马基雅维利与出身佛罗伦萨名门的自己不同，没

有工作便无法生活。索德里尼在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牵挂，想给马基雅维利介绍工作。

亲爱的尼可罗：

拉古萨[11]的宰相一职好像不合你的心意，但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我了解到普洛斯佩罗[12]大人正在寻找一位秘书。我说了你的事，他对你很满意。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13]，便要我撮合此事，我这才写信给你。

年薪是200达克特大金币，经费另外列支。请你充分考虑之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千万不要与任何人商量这件事。决定之后就请离开佛罗伦萨，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事是我迄今所谈中条件最好的一件。我想，至少要比为弗罗林小金币而写历史要好。

请保重身体！

你的皮耶罗·索德里尼

1521年4月13日于罗马

我们不知道52岁的马基雅维利怎样回复年逾七旬的老上司的这份亲切关怀。但从结果来看，马基雅维利婉拒了这份举荐。尽管年薪要比撰写《佛罗伦萨史》多近4倍，他还是选择了现在的身份。从其后发生的事来看，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位出自罗马名门科隆纳家族的著名佣兵队长出生于1452年，当时已经69岁，他在这件事两年以后便过世了。

但是，马基雅维利婉拒4倍以上年薪机会的原因不止这一点。在这件事发生前7年的1514年，他在给当时“对话”的对象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 像现在这样栖息在虱子中间，忘掉有所作为的时代，我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上帝希望我这样无所作为地消耗下去，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去给某地的长官或队长当家庭教师或秘书。如果连这也没有运气得到，那我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教孩子读书写字。
>
> 抛下家庭出走。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以为我死了。没有我，他们会活得更好。因为我总是花钱。我习惯了花钱，没钱花简直活不下去。
>
> 我不是想要让你担心才写这些的，我只是想一吐为快。现在说出来是为了不再提起这个没出息的话题。

不仅是在当时，马基雅维利一辈子都不关心穿戴是否整洁以及是否有仆人可供使唤这些外在的东西，可称上为花钱的地方好像只是赌博。但他没有赌博的天分，总是输多赢少。

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如此郁闷的状态下收到索德里尼的信，他会二话不说飞跑去担任普洛斯佩罗·科隆纳的秘书吗？他曾经说过，如果教廷有职位，他会很高兴地去罗马。去不去罗马不妨碍他接受普洛斯佩罗秘书一职。说到薪水，那是他担任共和国秘书时期的两倍。当时的马基雅维利并无什么收入。

马基雅维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大会接受，虽然他可能会十分烦恼犹豫。我以为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马基雅维利彻底厌恶佣兵制度。切萨雷·波吉亚在法国国王手下干，未必不能称他为佣兵队长，但他有创立自己王国的明确目标。同为著名人物，普洛斯佩罗却没有这样的目标。他和其他佣兵队长一样，把军务当作一种职业来考虑。马基雅维利刚写完严厉谴责佣兵制度的《君主论》，并已开始撰写《论李维》，他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吗？

第二个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的职业观。马基雅维利在给朱利奥·美第奇枢机主教的回复中阐述了什么样的政体才适合今后的佛罗伦萨，并断言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工作就是为国尽力。地位高低并不是问题。如果去争地位，那也只是因为地位越高对实现自己的想法就越有利。如果不幸自己地位低下，但只要地位崇高的人能够倾听意见，地位也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时过8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还在牵挂昔日部下的工作问题，他一定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他大概也很喜欢这位曾经的部下，但很难认为他理解马基雅维利。他给马基雅维利找了些不过是威尼斯小属国的宰相、佣兵队长的秘书这类马基雅维利不感兴趣的职位。从这一点看，我们也不能认为他的亲切是建立在理解马基雅维利其人基础之上的。

此外，索德里尼推荐职位的时机也不好。可以说，这也是马基雅维利1521年婉拒他的原因。

1521年，马基雅维利已是有相当资历的作家了。

1513年——开始撰写《君主论》《论李维》。

1514年——《君主论》完成。

1516年——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

1517年——《论李维》完成。

1518年——《曼陀罗》完成。

1520年——与美第奇家族关系转圜；完成《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开始撰写《佛罗伦萨史》；受美第奇枢机主教委托执笔撰写《佛罗伦萨政体改革论》；完成《战争的艺术》。

1521年——《战争的艺术》刊行；被佛罗伦萨共和国派往卡普里，结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2年——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反美第奇阴谋败露。

1525年——喜剧《克莉齐娅》首演获得成功；《曼陀罗》出版；《佛罗伦萨史》完成，为将此书献给委托他的当时的枢机主教、现已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美第奇，马基雅维利前往罗马。

由此可知，1521年时的马基雅维利已经完全摆脱了只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的状态。恐怕在1513年到1525年这12年的创作时间里，1521年是他最充满自信的时期，《曼陀罗》和《论李维》得到好评对此大有作用。

《君主论》《论李维》和《战争的艺术》都是划时代的杰作，《曼陀罗》也是改写西欧喜剧史的独创作品。马基雅维利这些作品的写作时期，要么是在他抱怨只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得到韦托里安慰和激励的时期，要么是紧随其后的时期，这时他得到了奥里切拉里花园年龄不到他一半的年轻人和多纳托那里不知名女人的支持。这个事实意味深长。莫非或多或少的不幸对创作，尤其是独创性的创作而言不可或缺？或1521年前的8年间，马基雅维利已经写尽了想写的东西？

同在1521年，接到老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为他斡旋工作的信后不到一个月，52岁的马基雅维利于5月11日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卡普里镇。

在普通人眼中，马基雅维利的工作远不如去罗马给著名的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当秘书来得体面。交给他的任务微不足道，是让他去交涉，把佛罗伦萨的小兄弟会从整个托斯卡纳的组织中独立出来，并安排布道僧在明年四旬节[14]时到佛罗伦萨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前者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后者是羊毛业行会的委托。马基雅维利接受了这些任务。工作再小也是在为佛罗伦萨工作，尤其是这

些工作体现了美第奇家族实力人物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的意思，正是他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

不过，这次公差给马基雅维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他邂逅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后世的人们动辄拿他同马基雅维利做比较。后世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人绝对多于论述圭恰迪尼的人，所以应该说是拿马基雅维利同他进行比较。他们两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的佛罗伦萨人。

---

[1]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奠基人。他曾经担任过20多年的律师，1647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共写有各类剧作32部，代表作有《熙德》《贺拉斯》《西拿》《波里厄克特》等。

[2]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意大利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打破即兴假面喜剧的程式性与庸俗性，用讽刺手法给喜剧注入新的生命。他一生的剧作多达100多部，喜剧剧本有《女店主》《一仆二主》《亲切的挑剔者》等。

[3] 在意大利语中，corno（发音为“科尔诺”）意为“动物的角”,cornuto（发音为“科尔努托”）意为“有角的动物”或“头上长角的”，也指女人不贞。

[4] 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1474—153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文艺方面的著名女性。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二世·德斯特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夫人。16岁时嫁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丈夫死后以摄政地位统治曼托瓦侯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她少时受过良好教育，钟情于文艺，在时装方面的影响远及法国王室，有“世界第一女性”之称。

[5] 维托丽娅·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著名佣兵队长法布里奇奥·科隆纳的女儿。她是16世纪意大利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基罗有诗文来往，且友情很深。

[6] 贝雅特丽齐（Beatrice），但丁在《新生》《神曲》中作为基督教之爱的高贵而加以歌颂的女性。传说但丁9岁时爱上这个女孩，她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23岁时去世。但丁终其一生都未能释怀对她的爱恋之情。她是但丁心中纯洁爱情的天使，缪斯的化身，在他内心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

[7] 劳拉（Laura），彼特拉克于1327年结识的一位骑士的妻子，彼特拉克对她一见倾心，深陷情网。劳拉于1348年死于黑死病。彼特拉克为她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8] 贝纳·纪欧多（Bernard Giraudeau,1947—2010），法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幸运搏击》《鸟瞰地球》《我是杀手》等。

[9] 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以个体的异

化为主题，用革新的喜剧创作技巧开辟了通向现代戏剧的道路。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亨利四世》和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等。

[10]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代表作有《阶梯上的圣母玛利亚》等。

[11] 拉古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小国，索德里尼刚被驱逐时的逃亡地。——原注

[12] 普洛斯佩罗，即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us Colonna）。——原注

[13] 大概是指马基雅维利把他的堂兄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用作了《战争的艺术》一书的主人公一事。——原注

[14]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Great Lent），基督教会称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这段时间。圣公会称为大斋节，清教称为受难节。基督徒在此期间增加祈祷、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做慈善事业，为基督复活（生命的革新）做准备。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佛罗伦萨名门圭恰迪尼家族的次子，生于1483年3月6日，与马基雅维利相差14岁。就像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之间相差20岁一样，这点不能不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

马基雅维利年长14岁，但很显年轻，充满热情，不放弃希望。相反，圭恰迪尼虽然年轻，但能客观地洞观世事，具有足以自持的气质。莫非14岁的年龄差距从圭恰迪尼身上抢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拥有的那种热情吗？

圭恰迪尼出身于上等阶层，所受的教育也与马基雅维利不同。他大学毕业，所上大学远近闻名。他是一位法学学士，具有被称为“先生”的完美资格。

圭恰迪尼年轻时就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不具宗教之心，但自信能够当上枢机主教，打算进入神职界。幸好父亲不这样想，他才得以留在世俗社会。完成学业后他的最初职业是律师，似乎以民事为主。

圭恰迪尼的婚姻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他决定25岁成婚，确定的对象是佛罗伦萨政界重镇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利亚。当时马基雅维利已是国务秘书，为使共和国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设立佛罗伦萨国民军议案”，马基雅维利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十年纪》（Decennli）献给了这位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父亲告诉圭恰迪尼，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嫁妆，还有更多姑娘可供选择。

但年轻的圭恰迪尼没有改变主意。与嫁妆相比，他更看重与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萨尔维亚蒂家族联姻。他的眼光没有错。

1511年，28岁的圭恰迪尼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在当时，担任公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何况还是常驻新兴国家西班牙的大使，这一提拔实属特例。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两年，而这两年与马基雅维利成为共和国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心腹的时间相吻合。那一时期，以“十人委员会”和索德里尼的名义向大使发出指令的大部分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驻西班牙大使圭恰迪尼一定也收到过马基雅维利亲笔书写的指令。同时，最先看到大使发来报告的也是正义旗手的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也一定读过圭恰迪尼写的缜密报告。不过，这种关系因1512年夏天的政变而告结束。

索德里尼的失势和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使得马基雅维利遭到驱逐，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圭恰迪尼的身上。他没有被认定为索德里尼派，圭恰迪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渊源深远，使他得以幸免，只是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不过政府中有好几个职位在等着离任回到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他认真地承担了这些职务，同时也没有忘记插手丝织业，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1516年，时任教皇利奥十世任命33岁的他为教廷领地摩德纳的长官。翌年，圭恰迪尼的辖地又增加了雷焦。1521年，即他与马基雅维利邂逅的这一年，教廷把替教皇统治从德斯特公爵那里抢来的摩德纳和雷焦的艰难工作交给了圭恰迪尼。那一年，他的辖地进一步扩大到帕尔马。到了1525年，与利奥十世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42岁的圭恰迪尼担任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总督。这使他位极人臣，出人头地。

这个地方很难统治，有人说，以前只有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统治过这个地区。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帕尔马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进入1526年以后，意大利风云突变，越发显出了圭恰迪尼的重要性。教皇派军队参加了反西班牙同盟，任命他担任教皇军队参谋。他处在风口浪尖上，做不到像过去那样慎重行事了。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圭恰迪尼的身边。

1527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军队打进罗马，“罗马浩劫”发生，佛罗伦萨再次放逐了美第奇家族。同年，马基雅维利去世。3年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30年崩溃。圭恰迪尼借此机会进行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豪赌。但在他看来，预测豪赌的胜率极高，也许并未将此看作一场赌博。

共和国政体崩溃后，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抬出了17岁的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旁系。他们把他捧为君主政体的君主。圭恰迪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荐给科西莫，让他们结婚。他判断，17岁的科西莫还年轻，以后的实权将由自己掌握。

可是，这位17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像是单纯朴素的武将、“黑条”乔凡尼的儿子，他对权力有明确的思考。科西莫不但拒绝同圭恰迪尼的女儿结婚，而且疏远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这样如同今天的部长助理级别的人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告别语是：“政治我自己搞。”他希望与玛格丽塔结婚，玛格丽塔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美第奇本家亚历山大的遗孀。正是因为亚历山大被暗杀，科西莫才获得了这份权力。可是，卡洛斯不同意这桩婚姻。这位年轻人转而希望与西班牙国王的家臣、统治那不勒斯的副王佩德罗的女儿埃利奥诺拉结婚，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圭恰迪尼的豪赌彻底失败了。

后来，发生了反美第奇阴谋事件，菲利波·斯特罗齐、安东·弗朗切斯科·德里·阿尔比奇等奥里切拉里花园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弟子们都卷入其中，只有圭恰迪尼一人超然事外。事发后他隐居别墅，专心致志地撰写巨著《意大利史》。圭恰迪尼于1540年去世，享年57岁，他以史家之名流芳后世。

除了《意大利史》外，圭恰迪尼还著有《佛罗伦萨史》等数部作品。但这些都只是历史著作，要在书中寻求哲学，可就奢侈了。因为书中没有哲学的指引，虽然在客观性方面几乎可以打满分，但并未能超越同时代人。

当然，圭恰迪尼也写有小品文，坦率吐露他的“哲学”。那是一篇不以发表为目的、写给家人和弟子的东西——《备忘录》（Ricordi）。在圭恰迪尼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发表这样的东西，将不利于自己的仕途。我在这里介绍其中几段：

> 祈祷上帝吧！愿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者一边。如果你站在胜者一边，即使你没有任何功劳也会得到回报，而一旦错站到败者一边，功绩再大也会遭到批评。

这只能令人苦笑，但却是现实。

>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三件事。但我已来日无多，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一个梦。
>
> 这三件事是：第一，我能够活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佛罗伦萨；第二，意大利能够摆脱所有野蛮人（即非意大利人），恢复自由；第三，全世界都能够从邪恶者的暴虐中被解救出来。

这些想法应该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一致。但圭恰迪尼自己在邪恶者统治下的履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辉煌。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 不能以宗教为敌，还要留心不能以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事情为敌，这些东西都会对愚人的大脑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说得太对了！

任何人都会追求权力和名誉。一般人只看到权力和名誉光鲜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辛苦和不快的另一面。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追求权力和名誉的理由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便会消失殆尽。这剩下的理由就是，人们认为，对上帝越敬，他就会越靠近上帝。生为男人，有谁不希望靠近上帝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劝别人掌握权力，自己却从未拥有过权力。在他看来，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伪善。这样的话只有圭恰迪尼才说得出来。

正如人们从留存至今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肖像画上看到的那样，他仪表堂堂，举止庄重，与人交往极有分寸，游刃有余，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圭恰迪尼位极人臣，在精神上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他没有密友。他只能在不公开发表的《备忘录》中才会坦率地吐露心声。

那么，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为什么单单向马基雅维利如此坦率地表现自己呢？两人所想相同大概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性情开放，对自己所交往的人敞开心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马基雅维利特有的交友方式融化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圭恰迪尼。这位世所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再也没有写过像他写给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的文字了。

1521年5月，马基雅维利在去卡普里出差途中顺路去了摩德纳，邂逅了地方长官圭恰迪尼，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一开始便语气亲切。顺便说一句，从摩德纳城区到卡普里镇距离不足20公里。

呈伟大的佛罗伦萨特使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阁下：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深切地感到，派您这样的人去挑选一个布道僧也真亏羊毛业行会想得出来。这恰如把为朋友找妻子的事委托给一个同性恋者。

我所希望于您的，就是您要好好想想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要忘记尽快处理这件事。因为在那种地方待得越久，您面临的两种危险就越大。

一是那里神圣的修士会把您变为伪善家，二是卡普里的空气会把您变成谎言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可是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而且我担心，一旦您不幸寄宿在了一家卡普里居民家里，危险将不可避免。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1年5月17日于摩德纳

马基雅维利于当日立即回信：

呈伟大的摩德纳长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阁下：

您的信使到来时我正在如厕，正在认真思考与您信上所写的完全一样的内容

……

但是，我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而做的，今后仍然会这样做。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跟我的性格完全相悖。佛罗伦萨人希望布道者教诲他们通往天堂之路，而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则是走向魔鬼的道路。佛罗伦萨人要求一个谨慎、完美和真实的布道者，而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比篷佐（修士多米尼科·达·篷佐）更疯狂、比萨伏那罗拉更狡猾、与阿尔贝托修士[1]一样伪善的布道者。

在我想来，在混乱的现状之下，后面这种布道者会更有用。我认为这才是上天堂的真正道路。为了避免下地狱，首先要熟知下地狱的道路。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两个任务我都没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我的头脑还好用，我还可以在那帮穿木屐的小子们（指小兄弟会修士）中间挑起些风波。如果有您的建议会大有用处。

如果您能找个理由来这里一趟，那是最好。即使来不了，给我写信也很好，就像今天这样，您每天写信，让士兵送过来，我将会大受其益。

第一，我会得到您的建议；第二，我会在这里的这帮人眼中像是个重要人物。今天收信时，送信的弓弩兵向我鞠了个头快低到地上的躬，对我说："这是您的加急信。"边上的人个个跳了起来，

骚动不小。

我这种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他们说：皇帝在塔兰托整装待发；瑞士佣兵马上就要开始搞点新花样；法国国王想开战，但心腹们反对。这帮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手上拿着帽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还远远地围着我，看我写个不停，非常佩服，兴奋的眼光直盯着我。我也是，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异，时不时停住笔，做出整理思路的样子，深深地吸口气。于是他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就像连续打哈欠那样闭都闭不上了。不过我想，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定会更加惊异。

您也知道，修士们总是说，在受到上帝恩惠的人身上，任何恶魔的图谋都不会起作用。通过跟这帮人交往，我也不再害怕成为一个伪善之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了。您也不用再担心卡普里人撒谎的影响了，我在这方面能让他们甘拜下风……

好，明天也请继续这个游戏。汗流浃背的士兵的到来，有助于改善我在这里的待遇。在这初夏时节，出汗对训练士兵也没有坏处。我想写的还很多，留到明天再写吧。

驻小兄弟会使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21年5月17日于卡普里

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看上去比38岁年龄老成的圭恰迪尼，看到这些恐怕也会笑起来吧。他居然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戏弄人的建议。第二天，弓弩兵拿着长官阁下的亲笔信出发，一脸紧张地来到了卡普里。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头脑向您提出建议，但我决定，只要能够从侧面支持您艰巨的任务，我可做任何事情。我让弓弩兵送去这封

信，命令他说，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要尽快送到。我还说，衣服汗湿了也没有必要换。这个士兵到达时碰巧在场的人大概会认为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同修士交涉委屈您了。他们一定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给您的待遇。

随信发去来自苏黎世的报告。随便您怎么使用，可以出示给他们看，也可以拿在手里到处走动，您认为怎么有效果就怎么用吧。

昨天，我还给您借宿的那家主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您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回信要我告诉他您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我没有直说，我想这样迷惑更深……

圭恰迪尼好像很喜欢这个他接受下来的游戏，当天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看到您的信末尾写的您现在的头衔——驻小兄弟会使节时，我不由觉得您的交涉对象不是修士，而是您曾经交涉过的种种对手——国王、公爵和君主。我还想起了莱山德[2]的古代往事。这位将军曾经为祖国斯巴达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却被指派给士兵分肉的任务，而这些士兵都曾在自己的指挥下战斗过。我又想起了这个古代往事，所不同的只是人们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即使有所不同，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原样。这种现象，在莱山德之后一定也有，但只有独具眼光的人才能关注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历史，它会让人们知道当时看不到、弄不清的事实。……

就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博得了后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极大好感。韦托里的名字同样也叫弗朗切斯科，他也曾多次写信给马基雅维利，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分析敏锐的人”，但从来没有为马基雅维利写过这种文学性的赞美词。在为人处世技巧方面压过韦托里一头的圭恰迪尼，因为这一段文字便获得了马基雅维利第一密友的资

格。

马基雅维利收到信后的感觉又如何呢？他读信后立即提笔回信。回信是以这样的语气开始的：

> 我们恶作剧的效果巨大。面对汗流浃背到达的士兵和他带来的大捆文件，所有人都诚惶诚恐。不光是这家的主人，邻居也都大为激动。我也是，把瑞士来的信件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
>
> 提供给我的膳食分量大增，我的食物简直可以喂饱六条狗和三头狼。如果送信的士兵哪天来佛罗伦萨，我得酬谢他……

马基雅维利始终都用这种语气回信。在这期间的回信中，回应圭恰迪尼赞美词的只有这么可怜的几行：

>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那种稀世人物。我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读书，要不就是沉默思考，仅此而已。您是在嘲笑我吧……

对韦托里亲切但平淡无奇的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简直就像要冲过去热吻伸过来的手一般；而面对圭恰迪尼的如此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却是这样平静而冷漠。这是为什么呢？

1513年马基雅维利确实很绝望，而现在8年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作品，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是不是他曾经的绝望和苦恼也已经淡漠了呢？

马基雅维利曾经与王侯交涉，而今52岁的人却沦落到与“穿木屐的小子们”打交道的地步，而又被圭恰迪尼这位时运正佳的年轻行政官僚

的一把手一语揭穿，从而陷入了挫败感当中。是这个原因吗？莫非这种挫败感妨碍了马基雅维利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

如果这也不是，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想到圭恰迪尼这位38岁的才子会给自己献上出人意料的赞美词，年过五旬的他一时间心中充满温暖，却反而选择了平淡的反应？马基雅维利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沉默寡言，要比千言万语都要意味深长。

他们二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友谊。圭恰迪尼在罗马涅再次高升，无法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以后便替他看将要购买的别墅，甚至操心圭恰迪尼女儿们的婚嫁对象，只能说他爱管闲事了。但圭恰迪尼有4个女儿，要一个个找好对象，备妥嫁妆，政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为此头痛不已。

马基雅维利向圭恰迪尼通报可能的女婿候选人的信息，还很不谨慎地建议说，因为他是在为教廷尽忠效力，可以让教皇帮他出嫁妆。读着这些往来书信，想着马基雅维利管闲事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十多年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的遗产继承问题久拖不决，当时马基雅维利曾给予他极大帮助，这一说法也许是事实。

总之，无论是出身还是气质，再到个人经历，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两人都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类似相互关怀的情感，这一点却是事实。拥有可用共同语言交谈的朋友，才是人生最大之快事。

但是，就算在秀才前面加个“大”字，天才与秀才之间也总是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认为，有无独创思维是划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界线。

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圭恰迪尼失势后不能再署大使、地方长官、总督等头衔的时候，他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我想，他只能写“史家”了。他有非凡的理解能力，但他不写喜剧，也没写“悲剧”。

圭恰迪尼又是怎样的史家呢？他的著作《意大利史》忠于史实，叙述客观。但是，如果没有贯穿整体的思想便写不了历史。没有史观就只能止步于客观记录。圭恰迪尼的思想何在呢？

仅就政治思想而言，圭恰迪尼所寻求的是贤人统治型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被称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他不相信个人和大众的力量，认为具备才能的少数智者才可信赖。圭恰迪尼家族以及类似的佛罗伦萨名门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不同，单靠某个家族不能独擅权力。在圭恰迪尼看来，为“有秩序的共和国”带来秩序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所属的佛罗伦萨名门集团。这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别，后者并非出身于名门从而得以摆脱名门而自由存在。

这种思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圭恰迪尼错就错在把威尼斯共和政体当成了佛罗伦萨的榜样。当时贵族政体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威尼斯，产生这种错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支撑威尼斯共和国的精神与佛罗伦萨完全不同。不能忘记，威尼斯花费了*200*年的忍耐和努力，才使这个政体像16世纪前半叶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出色地发挥机能。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意识与佛罗伦萨的意识完全不同。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遥远国度的本国公民。”

佛罗伦萨同威尼斯正相反，它甚至从来没有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遑论达及海外。佛罗伦萨人拥有威尼斯人所没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如此，如何去移植威尼斯式的政体呢？为什么稀世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圭恰迪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却从未说过应该以威尼斯的政体为榜样。相反，尽管马基雅维利逗留威尼斯的时间微不足道，但他精准地把握了威尼斯政体赖以存在的精神。这里仅举一例。他写道：

> 共和国中的政治手续通常都是急不得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能一个人决定，基本上都要与其他人共同决策。要让这些人的意志统一起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缓慢的做法，在不容犹豫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古罗马临时独裁执政官那样的制度。
>
>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共和国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把事情放到共和国议会或元老院去进行一般讨论，而是采取让被授权的少数委员讨论、决策的办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领悟到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它一定会碰壁：要么死守传统政体，国家便会灭亡；为避免国家灭亡，又必须摧毁政体本身。
>
> ——引自《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是，如果想要维持某种制度，有时还要敢于做与这个制度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事情。这个哲学与圭恰迪尼的哲学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而圭恰迪尼则局限于史家的差别所在。《意大利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一部大部头著作。

秀才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天才的伟大之处，庸才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感到幸福。但上帝赐予秀才高于庸才的才华，所以秀才不能容忍。明知“上帝垂爱之人”的伟大之处，自己却无缘得到，人们觉悟到这一点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几乎是唯一一位对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留下评论的同时代人。他以“考察”（Considerazione）为题评论过《论李维》。

不过这篇评论的主旨不明快，而且并未完成。研究者们名之为消极的反驳。但消极的反驳是反驳吗？难道不是一种赞美之词吗？圭恰迪尼是唯一一位写下反驳的同时代人，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论李维》，甚至帮助该书在罗马出版发行。那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韦托里是马基雅维利无所不谈的密友，但马基雅维利照样毫无忌讳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 我爱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圭恰迪尼的悲剧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却是时代的悲剧。

---

[1] 阿尔贝托修士，根据1984年都灵联合出版社意大利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编者加埃塔（Franco Gaeta）所作注释，阿尔贝托修士大概是指薄伽丘《十日谈》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中的修士阿尔贝托·达·伊莫拉（frate Alberto da Imola），或1495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到佛罗伦萨的修士阿尔贝托·达·奥尔维耶托（frate Alberto da Orvieto），他曾建议教皇以某种理由把萨伏那罗拉传唤到罗马，以便将其逮捕。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两人都是伪善者。

[2] 莱山德（Lysander,?—前395），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政治家。他于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的支持，击败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军队随后占领雅典，建立了三十人僭主集团，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时代突飞猛进，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时代。

左右历史进程的力量，渐渐从以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手中，转移到了法国、西班牙、土耳其、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手中。

这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力量由质向量的转移。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为确保通商路线，而是为了获取领土。

在以质取胜的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人公是威尼斯这些个人面孔并不清晰的共同体，而在以量取胜的时代则完全相反，变成了面孔清晰的个人。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已有五世，准确地说，他应该称为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他是一世，应该称为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现今还有名为“卡洛斯一世”的白兰地酒。在西欧史上，卡洛斯的名字很有名，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

卡洛斯生于1500年，1558年去世。

他出生在西班牙，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儿子腓力一世[1]，母亲是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所

生的独生女。他父母早亡，16岁时因外祖父去世而登上西班牙王位，同时领有当时属于西班牙领地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他在19岁那年因祖父去世成为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领地的统治者。这意味着除了岛国英格兰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中北部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之下。1520年，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西班牙国王，他还自动成为新大陆的统治者，这块土地的殖民化正方兴未艾。

弗朗索瓦一世，1494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15年，年方21岁的他继承岳父路易十二成为法国国王。他酷爱文化艺术，也以晚年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而著名。

卡洛斯的统治区域广大，尽管这源自正当的权力继承而无可挑剔，却不能不给仅比他年长6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造成心理威胁。法国夹在德意志和西班牙之间，这两位国王之间的对立简直就是一种宿命。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打破这种现状，不但需要利用英国，还试图利用土耳其。

亨利八世，1491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09年，在他18岁那年继承父亲亨利七世成为英国国王。

苏莱曼大帝，1494年出生，1566年去世。

从26岁即位到去世的46年中，他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土耳其，把土耳其建成为一个大帝国，使东地中海成了本国的内海。

上面4个人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即位时年轻，他们个个都是英明的君主，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最值得特书一笔的共同点是，他们4个人占据绝对君主的地位没有任何勉强。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二章“世袭君主国”中论述的那样，通过行使正当权力获得地位的人，在统治本国时不要求具有出众的能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勉为其难。如果他拥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就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效。

这4位君主都很幸运，只靠声张正当权力就已足够，何况他们个个英明，年纪轻轻就已会行使权力。此外，即使国土即耕地的法国算是特例，他们各自拥有广袤的领土，一旦发生不测均可充分地自给自足。这就是说，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相反，意大利的城邦没有把经济基础放在土地上，他国的存在便成了本国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需要他国才能生存的国家和不需要他国即能生存的国家之间发生对立时，情况的发展会对谁有利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三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城邦一直担当着国际关系主人公的角色，但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威尼斯共和国是怎样渡过这个危机的呢？我用《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下卷的整个篇幅写了这个问题。

与威尼斯相应的意大利城邦之雄佛罗伦萨又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呢？我想，这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得到反映。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死亡同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灭亡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君主论》这样的警世之作。

1525年2月24日，在米兰以南30公里的帕维亚平原上，法国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对阵。法军共3.1万人，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西班牙军队则以略少于3万的人数与之对阵。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是前不久因亡妻财产继承问题与法国国王闹僵而倒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德·波旁。

波旁在法国是元帅，卡洛斯毫不犹豫地启用了他，把这位不久前的敌人任命为自己军队的最高司令。

不仅总司令是外国人，说起来是法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但都是以各国佣兵为主体的混成部队。我们仅看一下两军中步兵的构成：

法军步兵2.3万人，其中法兰西人6000人、意大利人4000人、瑞士人8000人、德意志人5000人。

西班牙军步兵2万人，其中西班牙人5000人、意大利人3000人、德意志人1.2万人。

这里的德意志人是被称为“Landsknechts”的德意志佣兵[2]，都是路德派新教徒。天主教和新教是当时对立最尖锐的两派，两派的人却以领取薪水的佣兵形式隶属于同一支军队。除此以外，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在其他战斗中还有瑞士人，他们可以随意加入法军或西班牙军，这也是使得16世纪战争情形复杂化的要因之一。

尽管如此，打仗还是得靠雇来的人。帕维亚会战的结果是，尽管国王亲自出马，战役还是以法军的完败而告终。弗朗索瓦一世负伤，坐骑也被打倒，国王成了俘虏。听说查理三世·德·波旁在餐桌旁迎接身份与昨日已有天壤之别的法国国王，禁不住热泪纵横，站在一旁为国王当仆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把旧主押送到马德里。

“法国国王成了西班牙国王的俘虏”，这个消息着实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冲击。但在意大利，这就不仅仅是冲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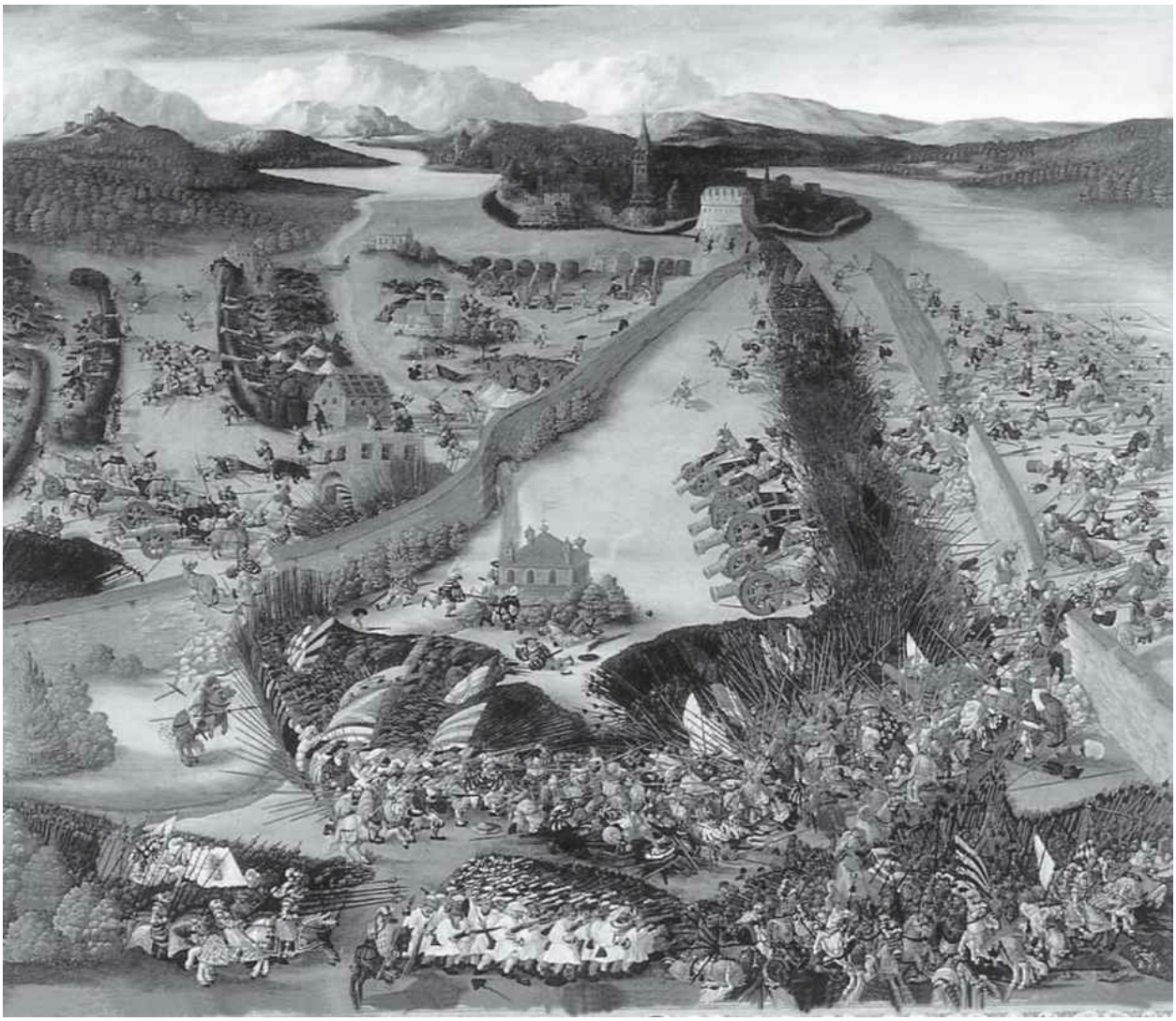
进入16世纪后，意大利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两大势力激烈冲突的舞台。法兰西渗透进了以米兰、热那亚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西班牙则在专心致志地确保其在那不勒斯、西西里等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影响。如此一来，两个大国以意大利半岛为舞台展开角逐便成顺理成章之事。

帕维亚会战的结果，首先是允许意大利人斯福尔扎作为主人回到此前一直处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米兰，其次是把同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热那亚划入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强国法国不会允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但眼下国王还是敌国的俘虏。渐渐开始流出传言，说作为摄政代替国王处理国政的母后路易丝（萨伏依的路易丝）正通过娘家萨伏依家族在意大利各国招募扭转局势的志同道合者。

1525年5月，帕维亚会战已过去了3个月，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他带去了刚刚脱稿的八卷本《佛罗伦萨史》。他于5年前开始写作这部书，就他而言写作速度不算快，但他总算全部写完了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的《佛罗伦萨史》。

他此行去罗马的目的是把这部著作呈献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书尚未付梓，还是誊写得很漂亮的手抄本。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枢机主教为他提供了写作这部书的机会。这位5年前的枢机主教，已于1523年当选为教皇。

克莱门特七世捎过话来：“如果能来，我将很高兴会见你。”于是马基雅维利下决心去罗马。当时，只有了解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和《论李维》作者的人才知道他，知名度并不算高。但印刷本《战争的艺术》已广为流传，作为《曼陀罗》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已妇孺皆知。



帕维亚会战

罗马之行非常成功。教皇似乎格外中意《佛罗伦萨史》，这也是因为这部书写到“豪华者”洛伦佐去世就结束了，没有触及后来美第奇家族的那些糗事。克莱门特七世喜欢这部作品的证据就是他付的酬劳。他不仅自掏腰包给了马基雅维利120达克特的奖励，还委托他继续写以后的历史，而写作的年薪则翻了一番。这也是教皇的亲戚、马基雅维利的亲密朋友菲利波·斯特罗齐活动的结果。

年薪100达克特这个金额略小于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代的年薪。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否真心想续写《佛罗伦萨史》，但他接受了教

皇的委托。从当年8月起，每年都会付来100达克特。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并未写出《佛罗伦萨史》的续篇。

换成普通人，一介佛罗伦萨市民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早就毕恭毕敬地从克莱门特七世的御前退下，怀揣奖金一路回家了。但马基雅维利不会这样善罢甘休。他见教皇很高兴倾听自己的话，便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把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话题撂在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观点。

说起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甚至在当时都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那就是依靠国民军的自力防御论。这是他从担任秘书时起就一直秉持的信念。这次是讲给教皇听的，教皇也需要在罗马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组织兵力。士兵只有为了捍卫自己家族才会勇敢作战，这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国民军的根本精神。切萨雷·波吉亚也曾出色地组织过国民军队，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强调这个先例，摇动如簧之舌，激情辩说。

克莱门特七世听后为之所动，对卡洛斯实力不断增强的不安感，使他倾听了《战争的艺术》作者的簧舌之论。教皇命马基雅维利前去罗马涅，与那里的总督圭恰迪尼商量此事。

马基雅维利忘乎所以。他忘了撰写《佛罗伦萨史》续篇的事，忘了把奖金交给妻子，也忘了确认给他涨年薪的事，他一路直奔罗马涅。其实他顺道回一下佛罗伦萨也绕不了多少路，但他根本就没去。

他认识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理解他的朋友之一。和他去说，大概会有些名堂，何况教皇也动了心。56岁的马基雅维利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了。罗马是他憧憬的地方，可是他于6月10日离开了完全入夏的罗马，在此逗留尚不足一个月。罗马涅的总督官邸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法恩扎。

人一旦出人头地，被派到远离上司的地方去常驻时，往往会觉得只

与上司联系不够。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圭恰迪尼也是这样，他在罗马有私人秘书，帮他打探情报，或做一些不便公开的接触。这位私人秘书早早就将马基雅维利的事情通报给了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还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驱马赶来的途中，圭恰迪尼便给在罗马的私人秘书发去了指令：

“请向教皇询问接受这个方案时的想法，就说是我问的。告诉教皇，如果想靠这个办法改变现状，时间不够。”

马基雅维利到了法恩扎以后，充满热情地想说服圭恰迪尼。他这次面对的是不用讲客套的朋友，吃饭时也没有停下话头。圭恰迪尼一向沉着冷静。但面对年长自己14岁、已经接近人生终点的马基雅维利，听着他热情洋溢的话语，圭恰迪尼大概也会沉浸在温情之中。他给罗马秘书写信时这样说道：

> 假如这个方案成为现实，那就是克莱门特教皇做了一件最有益最值得称赞的事情。

然而，圭恰迪尼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除了时间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涅的民众以无法无天闻名，如果把武器交给他们，即刻便会天下大乱，往后越发不可收拾。而且，不能指望他们会忠于你，一旦把武器交给他们，他们甚至会马上投奔敌人。听了圭恰迪尼的这个意见，克莱门特七世立刻动摇起来。

在法恩扎，总督阁下没有响应，罗马来信的内容也很冷淡，最后连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也同意了教廷应再加研究之后做出结论的意见。马基雅维利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法恩扎已无大用，遂决定7月份返回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目光远大之人，而圭恰迪尼目光短浅，克莱门特七世则是一个远近都看不见的君主。

不过，圭恰迪尼似乎认为政策方面虽然意见不同，但友谊方面要另当别论。也许他对悄然离去的马基雅维利感到愧疚，于是追写了一封信给马基雅维利：

> 自您离去以后，玛丽斯科塔对您大加赞赏。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因为一切会使您满足之事都是我向往的。

马基雅维利马上写了回信：

> 我读了您提到玛丽斯科塔的信，心里感到格外温暖。她的话令我感到无比光荣，胜于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玛丽斯科塔好像是一位跟总督有交往的妓女，也是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女友之一。

此后不到两个星期，马基雅维利于8月中旬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负责东地中海事务的部门让马基雅维利到威尼斯出差。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佛罗伦萨商人带着货物自东地中海回国途中，遭到威尼斯监视船的检查，货物被没收。佛罗伦萨政府认为此事不妥，需要派一个人去谈判赔偿事宜。马基雅维利一直抱怨说自己很无聊，一来二去就接下了这活儿。他冒着8月的酷暑，又策马北上。他写信给圭恰迪尼，说法恩扎正好是顺道，回来时顺便路过一下。

马基雅维利平生只有公差旅行，威尼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的地方。可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共和国所做的评价却是那么准确，你能想象这是他第一次去威尼斯吗？马基雅维利从未对自

然风物感兴趣，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他没有留下一行文字写到威尼斯这座独一无二的海洋之都的风物。相反，一打理好工作，他马上就与教廷派驻当地的大使纵论国际形势，打发时光。此外要问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还做了什么，那就是他还买了些共和国发行的彩票，中了一点小奖。把马基雅维利当兄长对待的摩德纳长官菲利波·德·内利说，中奖的金额有3000达克特之多，但这怎么说都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菲利波会不会听错了一个或者两个“0”。

在当时，名声最大的提香画的肖像画价值为200达克特，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哀悼基督》（Pieta）价值150达克特。圭恰迪尼要为4个女儿筹措嫁妆而感头痛，如果他能为每个女儿筹到5000达克特，就不用担心没有面子了。马基雅维利总是缺钱，如果他中了3000达克特，他不会不写信告诉别人。依他的性格，就算中了300达克特，他也会召集亲朋大宴宾客的。然而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就从一点看，马基雅维利在威尼斯买的彩票大概也就让他得到了30达克特左右的实惠。

不过，这也是件夏夜的快事。尚未到深秋，马基雅维利便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返回的途中顺路探望了圭恰迪尼，重温旧交，他们之间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法国国王的俘虏生活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变动不大。两人这个时期书信往来的内容，主要是交换一些私人信息，比如如何筹措圭恰迪尼4个女儿的嫁妆，圭恰迪尼想买别墅，马基雅维利代他去看房的感想，以及圭恰迪尼的想法，等等。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苦于消化道不适，照现代人看来，大约是压力太大的缘故。马基雅维利给朋友寄去了根据自己的想法配制的药丸。

> 送上刚刚配制的药丸25粒，药的配方附在信末。这种药丸对我很有效。请于每天晚餐后服用一粒，如果药力发作即请停药。如果药力不发作，请服用两到三天，最多不要超过五天。我从来没有连

服两粒以上，这也是在一星期内胃痛或头痛的时候。

现代药物学家按照这封信末尾所列成分复制了药丸，听说这药即使有效，也是服后症状不会恶化，但病情不会好转。写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56岁，而圭恰迪尼42岁。

就在他们两人交换着这种信息聊以度日的时候，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些新动向使他们越发需要马基雅维利特制的药丸了。

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秘书莫罗内认为，在所向无敌的卡洛斯面前，米兰公国的命运就像风中的火烛，令人担心。到目前为止，他的预测没有错，他们错在了打开局面的人选上。他们以那不勒斯王位为诱饵，向卡洛斯的家臣之一的佩斯卡拉侯爵费兰特·阿瓦洛斯挑明了反卡洛斯的阴谋。他们以为，尽管佩斯卡拉侯爵是西班牙人，但他出生在意大利，对祖国主人的忠诚大概也会像意大利人一样淡薄。佩斯卡拉侯爵对国王的忠心究竟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绝不是一个白痴。他明白，西班牙国王把那不勒斯当成直辖领地，甚至派了一个所谓“副王”（*vicere*）当总督去统治那里，西班牙是不可能轻易撒手的。佩斯卡拉侯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紧急报告给了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

卡洛斯派出的军队很快压制住了米兰公爵几乎所有的地盘，只剩下克雷莫纳和围着城墙的米兰。卡洛斯让人逮捕了莫罗内，要求斯福尔扎公爵退出米兰。斯福尔扎拒绝了这一要求。意大利西北部的形势急转直下，暴风骤雨随时都可能袭来。

10月21日，身在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给在法恩扎的圭恰迪尼寄去了一封信，似乎在预言此后12个月所要发生的事件：

莫罗内已成了阶下囚。米兰公国被命运抛弃了。不幸的是，他的所想也是其他君主的所想，已经无药可救了。

写到这里，马基雅维利引用了一句但丁《神曲》中说眼见得基督的代理人（教皇）就要被抓住的那句话。然后，他用不抱什么希望的语气回应了圭恰迪尼在法恩扎上演《曼陀罗》的建议，写了下面几句话便结束了这封信：

> 至多在狂欢节的时候开开心心地演一回吧。请在修道院为芭芭拉安排一个住处。那些家伙可能会发疯吧。我的那份收入就不要了。请代我向玛丽斯科塔问好。请告诉我您打算如何上演这出戏。
>
> 我因撰写《佛罗伦萨史》身价变成了100达克特。我现在又开始再次撰写，通过谴责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的君主们，发泄胸中的郁闷。
>
> 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
>
>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圭恰迪尼也颇有同感，他写来信说，1526年1月到2月就要迎来狂欢节，其间罗马涅总督将亲自担任赞助人上演《曼陀罗》，届时将邀请作者马基雅维利前来。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戏是上演了，但总督未能亲临现场。因为形势骤变，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朋友不在法恩扎，马基雅维利也就没有再过去。

1526年1月14日，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签署了媾和协议。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自由，代价是承诺以下事项：

一、割让勃艮第地区。

二、与嫁给葡萄牙国王后成为孀妇的卡洛斯的姐姐利奥诺[3]结婚，其嫁妆40万达克特由法国国王提供。

三、把法国国王的长子或另外两个王子送到马德里宫廷做人质。

四、放弃对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主权。

如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遵守协议，欧洲的霸主定然就是卡洛斯，意大利将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相反，假如法国国王一旦获得自由立即改变态度，主张媾和协议系被迫签订，并无义务遵守，意大利也免不了成为两个国王对决的战场。

强国法国的国王很年轻，刚刚31岁，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前一条道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么预测的，并没有谁怀疑这一点。后者发生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一定是为了商讨对策。

2月，还有3月，在罗马教廷的宫殿深处，正在密谋建立反卡洛斯联盟。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有几个心腹，但这个时候的核心则是圭恰迪尼。

虽然是密友，但这件事圭恰迪尼一点都没有向马基雅维利透露过。3月15日，马基雅维利突然给圭恰迪尼寄去一封信：

> 我要告诉您一件在您看来是疯狂的事，但我还是要说。
>
> 我的这个想法，在您这样谨慎的人看来，也许是鲁莽和愚蠢。然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大胆而非同寻常的决定。
>
> 佛罗伦萨人都在说，乔凡尼·德·美第奇[4]是佣兵队长，谁付钱多他就为谁打仗。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把国家的防御交给他。听到这样的话，我想与人民总是正确的说法唱个反调。
>
> 的确，他是一名佣兵队长。但眼下在意大利，还有比他带兵更加巧妙、更加受到士兵信任、连外国人都逊色一筹的武将吗？这点儿事连市民都知道。他们懂得，没有一名武将会比乔凡尼殿下更加勇猛善战，更加适合于在大舞台上表演。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现在赶紧悄悄地把这个人物做大，给他尽量多的士兵、马匹和武器，把他打造成意大利防卫的主心骨。

这位乔凡尼殿下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位旁系亲属与弗利的伯爵夫人所生的独生子，1岁生日之前就死了父亲，10岁那年失去了母亲。这位母亲正是马基雅维利为官不久便受命交涉的对手——“意大利女杰”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儿子乔凡尼与其说是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血统，不如说更多地继承了这位母亲的血统。虽说他属于美第奇家族，但因为是旁系，并无实实在在的保护人，需要靠商业或神职安身立命，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把实业和学问抛在一边，带着一帮小喽啰无恶不作。在意大利，家族的麻烦制造者被叫作“黑羊”（pecora nera），乔凡尼就是美第奇家族不折不扣的“黑羊”。

家里人认为想让他安稳就得让他结婚，便凭着美第奇的姓氏让他和佛罗伦萨名门中的名门萨尔维亚蒂家的女儿结了婚。但他恶习不改。尽管他不做太坏的事，但一叶知秋，让我们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听说有这么一次，乔凡尼同往常一样带着一帮喽啰路过自家门前，碰巧看见妻子怀抱刚出生的儿子科西莫的身影出现在二楼窗前。乔凡尼便向妻子喊道：“把孩子扔下来，我在下面接着。”年轻的妻子顺从了，闭着眼睛把孩子扔了下来。乔凡尼接住落下来的孩子，对身边的喽啰们大侃了一通男孩就得这样的谬论，然后把孩子交到一脸惨白来接孩子的妻子手上。

就这样，乔凡尼让越来越贵族化的美第奇家族感到头痛。只有教皇利奥十世不知怎的偏爱这个年轻人，把他召到罗马加以照顾。他的喽啰与日俱增，照顾他和他的这些喽啰，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利奥十世把教皇近卫队的任务交给了乔凡尼和他的喽啰们。这很中乔凡尼的心

意，基本和过去一样行事，教皇还要付他薪水。

乔凡尼也应该很感激教皇利奥十世。教皇去世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把自家军队的旗帜、士兵的服装，还有长矛、宝剑，统统改为清一色的黑色。从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黑条”乔凡尼（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了。那时，他麾下的喽啰平常也不下2000人。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黑条”乔凡尼并非是理想的领袖形象，因为乔凡尼有着狮子一般的雄心，却没有狐狸一般的头脑。但这位27岁的武将对可以为他去死的部下而言并没有任何缺点。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此危急关头，只有狮子的雄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而圭恰迪尼不就有着狐狸一样的头脑吗？

收到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后，圭恰迪尼没有给他回信。也可能他写了回信但没有被留存下来。不过，读了同为教皇心腹的菲利波·斯特罗齐半个月后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后，人们会觉得圭恰迪尼并未回信。圭恰迪尼让教皇和他的心腹看了马基雅维利的“疯狂建议”。斯特罗齐在信中写道：“读了您给圭恰迪尼的信……”

那么，拥有决定权的教皇和以圭恰迪尼为首的教皇心腹们有何反应呢？顺便说一句，菲利波·斯特罗齐这个人物是马基雅维利呈献《战争的艺术》的对象，也是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员。

他们的反应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不”，其理由是，如果教皇或佛罗伦萨雇用“黑条”乔凡尼，一定会刺激卡洛斯。我觉得，都到了讨论结成反卡洛斯同盟的阶段了，还有必要顾忌这些吗？马基雅维利又遭到了密友拒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尽管斯特罗齐的信写得亲切优雅，但拒绝马基雅维利建议的意思没变。

“黑条”乔凡尼

然而，尽管谨慎的人们如此顾忌，春天尚未结束，形势已急转直下。弗朗索瓦一世恢复自由回国了，紧接着于5月23日结成了“干邑同盟”。

因为这个同盟于法国干邑城签署协议，因而被称为“干邑同盟”。下面这些国家决定参加同盟：法国、教皇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热那亚共和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也确认加盟。这个同盟的假想敌当然是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于一身的卡洛斯。乍一看让人感到卡洛斯相信君子协定，释放了法国国王，上了当，但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从军事力量上看，法国在加盟国中位列第一，但同盟完全没有商定法国应以怎样的规模加盟。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自然应由法国人出任，但人选不明确。教廷希望，波旁离去后，这个职位应由法军第一人劳特累克[5]将军出任，但同盟签字时并未定下他何时到任。

第二个问题是，同盟没有明确英国以什么形式参战。如果英法协同作战从西线进攻西班牙，而意大利诸国负责东线攻势，同盟就会发挥出效力。然而，英国的义务一开始便模糊不清，结果只有意大利诸国成为实际的作战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的人选问题。威尼斯推荐了乌尔比诺公爵[6]，教廷和佛罗伦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由于威尼斯在意大利各国拥有最强的整体军事力量，这样做便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威尼斯共和国让乌尔比诺公爵出马有其图谋。教廷和佛罗伦萨都不应接受。为了把乌尔比诺公爵的领地赐给自己的外甥，教皇利奥十世在任时赶走了乌尔比诺公爵，乌尔比诺公爵逃亡到了威尼斯。利奥十世与现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都出自美第奇家族。虽然几年前恢复了乌尔比诺公国，但仍有两个地方还属于佛罗伦萨。这样的人对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会抱有怎样的心情值得深思。如果情况不允许拒绝强国威尼斯的意愿，那么，应该把那两个地方先归还给乌尔比诺公爵，梳理好公爵的心情后再启动。

第四个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邀请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加盟。

费拉拉公国是意大利一个中等大小的君主国。由于历代君主的善政，国家治理得很好。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把它举为世袭君主国家的正面实例。费拉拉的力量还不止于此。阿方索一世很看重大炮的威力，这在当时西欧的君主中十分罕见，他自己就是一位工程师。他为充实这方面的力量而不惜重金。据闻西欧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抵抗费拉拉的大炮，或许土耳其还能抵挡一下。这个事实已经在14年前的拉文那会战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居然把这个费拉拉推到了敌人一边。因为教廷收回了费拉拉公国的领土摩德纳和雷焦，预料费拉拉会拒绝加盟，因而没有邀请它加盟。

如果没有什么前提，阿方索一世大概会拒绝加盟。但是，如果给出归还摩德纳和雷焦的条件，答案也许会变化。即使答案不变，也能确保其中立的立场。至少，应该绝对避免将其推到敌人一边。

第五个问题是，指挥系统不明确。虽然同盟军实质上只由意大利诸国的军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的位置空缺。他们可能是在等法国国王派劳特累克来。但无人发号施令意味着责任不明。

威尼斯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指挥，佛罗伦萨军队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教皇的军队决定由“黑条”乔凡尼指挥，但因不想刺激卡洛斯，名义上他是法国国王的佣兵队长。虽有一颗狮子般的雄心，行动却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三位武将之上的，不是具备临机应变军事能力的武将，而是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原本他就是一位以控制武将为己任的文官。在这种架构下，军队还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那反倒是怪事了。

教皇和他的心腹们都知道，指挥系统必须明确。所以，当他们明白

无法指望劳特累克尽早就位时，他们开始寻找总司令的人选。

由罗马教皇召集成立的同盟一般称为“神圣同盟”（lega santa），同盟的总司令通常由教廷军队的总司令担任。这个位置对基督教徒来说无比荣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在上任前宣誓，凡是罗马教廷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哪怕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规矩。

那么，最终要看宣誓担任教廷军总司令的人是谁了。要找这么个人并不难。教皇身边的人知道，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贡扎加[7]。他们很高兴，认为既然这样，把对干邑同盟态度暧昧的曼托瓦君主贡扎加请出山，以宣誓书为担保，把总司令一职强加给他，这样既能让指挥系统明晰起来，又能把曼托瓦拉到同盟一边，真是一举两得。可是，宣誓书找不到了。

当然找不到。教皇利奥十世去世后，他的秘书阿尔丁盖利把宣誓书以1000达克特的价格卖给了当时曼托瓦驻罗马大使。大使又把宣誓书送给了曼托瓦侯爵。侯爵母亲的政治感觉远比侯爵敏感，当她知道教皇不可能在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立中置身局外的时候，便一把火烧了宣誓书。曼托瓦侯爵的母亲就是伊莎贝拉·德斯特，费拉拉大公阿方索的姐姐。

这时的曼托瓦公爵已经不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8]，而是她的长子费代里科。伊莎贝拉的三子费兰特是西班牙军中的队长。教廷在想到别把这位母亲的长子和三子推到敌方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手段。而且，这不过是政治感觉敏锐的伊莎贝拉放在表面的大义名分，教廷被双重愚弄了。

这就是有名无实的法兰西式干邑同盟的真相。很明显，在这样的状态下启动同盟的最大责任人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同盟的头脑却是圭恰迪尼。

不仅在日本，即使在欧美也有不少人认为，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本人完全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就好似有人不去了解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数百年的惨状，而说中世纪并不黑暗，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判断。

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当然要有政治判断力。但凡多少懂得一点政治的人，又怎能以那样的形式来推进干邑同盟这样的同盟呢？

干邑同盟的构想本身不坏，但实施过急。由于操之过急，就不得不在关键步骤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启动。的确，当时意大利面临危机，但还不至于那么着急地实施对策。着急的应该是在不得不答应的条件下媾和的法国国王，他才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意大利各国，尤其是教廷只需等待。而且，他们应该把外交的最大目的定在如何把法国与西班牙对决地点移到布列塔尼。如果这个外交成功，意大利的终结就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惨。

与全然没有参与其事的马基雅维利不同，圭恰迪尼一直身处决策的现场，拥有可以充分行使的决策权。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具备能力，但他的缺点是决定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多变，遇到大事优柔寡断。作为一名高官、一名亲信，圭恰迪尼在教皇手下工作了十多年，不可能不掌握上司的这种性格。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保一种状态，不管上司的决定如何摇摆，工作整体上不应受到太大影响，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工作。这时操之过急最为有害。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大概想到了密友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他的大作《意大利史》从马基雅维利撂笔的地方开始起笔，是作者的同时代史。我认为他不得不写这部书。这部书因记叙客观而获好评，但读者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去阅读，应该会读懂。这部书也是一部巧妙地为自己辩护的书。

圭恰迪尼作为心腹深得教皇信任，又是干邑同盟的推进者。他不仅仅是始作俑者，教皇赐予43岁的他“教皇代理人”（luogotenente）的地位，把他送进了同盟军总部。这意味着他爬上了文官的最高位置。尽管从结果上看同盟军由教皇主导，但在军中最有权威的话语人就是圭恰迪尼，怎么能允许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克莱门特七世身上呢？

另一方面，尽管马基雅维利把军队全权交给“黑条”乔凡尼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并未退缩，不到半个月就又提出了新的方案。这次的建议是加固佛罗伦萨的城墙。他的理由是不管打不打仗，现在都需要加固城墙，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市民的防卫意识。

克莱门特七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和教皇的认可很快送到了帕塞里尼枢机主教手中，他正辅佐美第奇家族年轻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统治佛罗伦萨。

5月9日，佛罗伦萨政府成立了城墙加固委员会，任命马基雅维利为委员长。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是他在13年之后重新回归政府。他又把一切忘到了脑后，给圭恰迪尼写了一封报喜信：

> 我满脑子都是城墙，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
>
>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

罗马派来了专业的城墙工程师，马基雅维利同这位工程师一起进行实地勘察，自己好像也成了工程师，热心于撰写土木工程学报告。报告一直留存到现在，20世纪的专家看了都说写得像模像样。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热情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教皇的心思为其他事情所吸引，疏于向佛罗伦萨发出指令，而帕塞里尼得不到教皇的命令便无从动作，他对保障财源不再热心。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无事可干，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急切之心，便跑到了同盟军的集结地皮亚琴察。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这次去意大利北部是受佛罗伦萨政府派遣，还是他的自行决定。肩负重任的圭恰迪尼此时正在皮亚琴察。

干邑同盟于1526年5月23日正式启动，7月初来到集结地的军队才达到以下规模：

教皇军队：步兵8000人，骑兵400人，由“黑条”乔凡尼以法国佣兵队长的名义指挥。

佛罗伦萨军队：步兵4000人，骑兵300人，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

威尼斯军队：步兵1万人，骑兵600人，由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乌尔比诺公爵指挥。

现有兵力已超过2.3万人，而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步兵加骑兵总共不到1.2万人。

卡洛斯需要时间。实际上，卡洛斯得知干邑同盟结盟后首先开始了外交战。但同盟军方面也完全不是没有问题。诸位将领对是否要驰援被包围的米兰军队意见不一。

马基雅维利到达皮亚琴察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同盟军。小说家班戴洛[9]所描写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的情景。班戴洛写道：

> 有一天天气很热。“黑条”乔凡尼在阵营中看到马基雅维利，便叫住他说：
>
> “喂，马基雅维利，听说你小子（乔凡尼说话不好听是出了名的）写了一本什么战略战术的书？拿来实践一下，我借给你2000名

士兵。”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在2000名步兵面前究竟心境如何，但他接受了挑战。他发出号令，试图调动这2000人，但怎么都不好使。不要说行进，就连队列都整不好。马基雅维利满头大汗，喊哑了嗓子，情况越来越糟糕。大概圭恰迪尼和手下高级军官都看到了这一幕。

过了一会儿，人并不坏的乔凡尼笑着说：

“行了行了。不然吃不上午饭了。”

乔凡尼随即走上前来，面对和自己一样穿着一身黑的2000名士兵，他先让鼓手擂鼓，接着微微动了动视线，说了几句什么。仅此而已，士兵们却一下子排好了整齐的队形。于是，大家便去吃午饭了。

看了这段插曲我也不禁笑起来，觉得马基雅维利挺可怜的。武将发号施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各行有各行的道道。由于书已印刷，阅读《战争的艺术》的人很多，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更多的人嘲笑这部书的作者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发笑的不仅仅是小说家，同是马基雅维利的老乡、两位精英官僚之间有这样的书信往来。

圭恰迪尼在给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罗伯托·阿洽约利的信中说：

> 马基雅维利到这里来了。他来的目的是让军队有序，但他一看状态太差，便放弃了这个会给他带来荣誉的任务。他站在一旁观战，每当士兵出错，他就会发笑说，这真令人绝望……

阿洽约利在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说：

>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够重振军队，我会比任何人都首先感谢他。

但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实现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好似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还是应该回到佛罗伦萨去专心加固城墙，那倒是可以有助于人的。形势越来越需要您这样的人了。

这些意见在当时一定都是常识。

我们再把故事向前追溯。理论上，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已经与整个欧洲为敌了，但他处惊不乱。这位26岁的年轻君主没有立即派遣大军去意大利，而是派去了一位老练的家臣。

这位家臣叫作雨果·德·蒙卡达[10]，他在意大利住过30年，十分了解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选了一条奇妙的路径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根据地那不勒斯。

蒙卡达在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下了西班牙船，表面上的理由是前往米兰慰问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丝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然后，他没有一路南下，而是沿着艾米利亚大道横穿意大利到亚得里亚海，再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行进路线的安排舒缓从容。旅途中，他甚至打着友好使者的旗号看望了正在集结途中的同盟军，同盟军的队长们还让全体士兵列队欢迎这位蒙卡达。尽管蒙卡达现在来意大利的身份是外交使节，但他在以前的30年一直是一位优秀的武将。除了“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之外，似乎没有人记起这些事。

蒙卡达在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情况下侦察完毕，终于开始他的真正任务，向教皇发起单独进攻。不过，他没有把卡洛斯的名字放在明面，而是启用了蓬佩奥·科隆纳枢机主教。此人自从在教皇选举会议上失败以来，一直怀恨美第奇教皇。科隆纳家族是名门望族，在罗马南部势力雄厚，与那不勒斯王国在地理上也很接近，他们并不掩饰其亲西班牙的态度。此外，科隆纳家族还同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奥尔西尼家族

不对劲。这两个家族一南一北唱着对台戏，处于一种宿命式的竞争敌对关系之中。

科隆纳一派与蒙卡达签订了一份密约，由科隆纳主导在罗马发动骚乱，把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逼入绝境。

在此期间，卡洛斯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他把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查理三世·德·波旁送到了意大利。这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武将突破了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11]的重重封锁，在热那亚附近的海岸成功登陆，然后马不停蹄地向米兰进发，掌握了包围米兰的友军的指挥权。

说真的，如果下定决心，同盟军6月底便可以开战了。那时虽然军队无序，但在数量上断然胜过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然而，在同盟军首脑会议上，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意见分歧，形成了两派。

只有“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主张立即出动全军杀奔米兰，从背后突袭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而其他人都认为要等参战的1万名瑞士兵中至少3000人抵达后再开始行动。圭恰迪尼似乎与“黑条”乔凡尼有着同样的心情，但他不是野战型军官，没有上司的明确指示他不会行动。而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难以决断。

拖延之时，3000名瑞士兵到达。但与此同时，波旁也到了。虽然波旁只带了300名士兵，但这位一年前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像统率着千军万马。军粮枯竭行将饿死的米兰守军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7月25日，在包围中坚持了一年的米兰向波旁打开了城门。斯福尔扎公爵在投降文书上签了字。

同盟军的大本营在离米兰东南不到70公里的皮亚琴察。同盟军得知米兰投降的消息后大惊失色。“黑条”乔凡尼狂怒万分，圭恰迪尼一脸严肃地一言不发。“黑条”乔凡尼率领手下突袭了西班牙军队，取得了些许战果后收兵回营，但这只能起到维持士气的作用。不久，8000名瑞士兵

到达。

同盟军首脑召开作战会议，已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会议了。“黑条”乔凡尼坚决主张与刚刚攻陷米兰的西班牙军队决战。他说：“我们在皮亚琴察集结不就是为了救援米兰吗？”圭恰迪尼这次站在了赞成者的一边。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独断专行，没有迹象表明教皇指示他这样做。然而统率威尼斯军队的乌尔比诺公爵却反对开战，他说：“过去我们带着救援米兰的镣铐，但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夺回米兰。”他还提出了要求，说如果要夺回米兰，就要任命他为总司令。不信任乌尔比诺公爵的圭恰迪尼对此提出反对。问也不要问，“黑条”乔凡尼也根本不会同意，他甚至在作战会议上无所顾忌地叫喊“公爵是胆小鬼”。

就这样，同盟军尽管坐拥3.5万多人的庞大军队，却一味坐视时间流逝，整个7月毫无作为地过去后进入了8月。这时，南边的罗马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科隆纳一派在罗马城内发动了骚乱。罗马市民一直被课以重税而对教皇没有好感，对骚乱漠不关心。这使得骚乱取得了超乎蒙卡达想象的效果。克莱门特七世吓破了胆，逃进了教廷的堡垒圣安吉洛堡，被骚乱者包围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去争取时间，逃进城堡的当天夜里就派出使者到台伯河对岸科隆纳的宅邸媾和去了。教皇接受了科隆纳提出的所有条件。

科隆纳离开罗马撤回到领地，但教皇必须做到：

一、让同盟军退至波河以南。

二、让多利亚指挥的教廷海军军船解除对热那亚港的封锁，退至奇维塔韦基亚港。

三、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中只留下400名瑞士兵警卫教皇的宫殿，其余的全部遣散。

四、为保证教皇遵守以上各条，让教皇的侄女婿菲利波·斯特罗齐作为人质，与完成任务的蒙卡达一起到那不勒斯。

这项媾和协议一直拖到9月底才签署，同盟军在这期间又白白浪费了8、9两个月。这还不是和平协定，而只是一项为了获得4个月休战期的媾和协议。

然而，克莱门特七世还在动摇。蒙卡达和科隆纳一伙刚刚消失在南方，克莱门特七世立即接二连三地向圭恰迪尼下达命令：

让同盟军后退至波河南岸；把同盟军内尽量多的士兵调配到“黑条”乔凡尼麾下，仍保持乔凡尼法国国王属下武将的名义；把2000名瑞士兵和“黑条”乔凡尼手下的2000名士兵调来防卫已经毫无防御能力的罗马。

这样一来，即便是优秀官僚圭恰迪尼，当然也会像一直在他身边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心情糟糕，大为光火”。同盟军原本就不能说已经治理良好，由于这次隶属和地点的改变，陷入了更加难以收拾的状态。克莱门特七世根本没有让圭恰迪尼好不容易派去的士兵去加强罗马的防守，而是让他们去掠夺科隆纳的领地，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科隆纳一伙的重要人物全都在那不勒斯，这个举动不过是泄愤而已。

遵照教皇的命令，圭恰迪尼率军渡过了波河，他的心情可能只能以“茫然”一词来形容。他也没有想到克莱门特七世竟会搞到如此地步。后来，他在《意大利史》中比较了这几个月来的同盟军与尤里乌斯·恺撒的闪电战法，做出了下面的评论：

恺撒打了胜仗之后向祖国发去了电文一样的报告：

Veni, vidi, vici ——来了，见了，胜了！

相比之下，我军却是：

Veni, vidi, fugi ——来了，见了，逃了！

与圭恰迪尼同行的马基雅维利也说，如果开战，两天便能打胜。他在给年轻朋友卡瓦尔坎蒂的信中说，教皇简直是个孩子。

入秋以后，不吉利的传言从阿尔卑斯山北面缓缓地自北向南，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德意志最高君主卡洛斯的命令，德意志雇佣军正在向蒂罗尔集结。德意志雇佣军是对路德派新教徒佣兵的称呼，他们以其在战场内外的暴行而闻名。德意志雇佣军在帕维亚会战时首次现身意大利。正在向蒂罗尔集结的是弗伦茨贝格[12]指挥下的1.2万人。

德意志雇佣军毫不掩饰对天主教徒及其大本营罗马教廷的憎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与这种疯狂的宗教信仰毫无瓜葛。德意志雇佣军带给意大利人的不仅仅是对1.2万人这个数字的不安。当时这种传言还只是朦胧的不安或不吉利，并没有确证。然而这种不安已经波及一般市民，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甚至犹豫是否要关掉店铺。

佛罗伦萨政府也同样为不安所扰。佛罗伦萨虽然是共和国，但实际上美第奇家族仍在亲政。德意志雇佣军高调宣称要杀掉的教皇正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门特七世。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以美第奇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常常被派到圭恰迪尼身边，目的是观察情况和商量突发情况下佛罗伦萨的防卫事宜。那年，共和国的正义旗手是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圭恰迪尼，路易吉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一同搞恶作剧的伙伴。

但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职务并不明确。尽管他是佛罗伦萨派出的使节，但一到前线，很快就成了教皇代理人圭恰迪尼的秘书。57岁的马基雅维利大概因为能上前线而兴奋莫名，根本没把职务不明确当成一回事儿。时值严冬，他一次次穿越寒冷难行的亚平宁山脉，没叫一声苦。

圭恰迪尼也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单纯当作一个跑腿听差。虽然有时会让他传令奔走，但即便这时，他也需要马基雅维利进行观察。他经常在首脑会议上念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如果马基雅维利在营中，他也会经常带他参加会议。圭恰迪尼会带着马基雅维利一块儿去要求乌尔比诺公爵行动，甚至让他去说服公爵。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以怎样的资格来做这事的。

这个时期，他们二人给人的感觉是同心同德。尽管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难掩敬爱之情，有时也会怒火中烧。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第三次去同盟军总部出差的任务。受圭恰迪尼的委托，在返回佛罗伦萨途中，他顺道视察了两个城市。他照例把两地的视察报告寄给了圭恰迪尼，但同时还寄了一份多少有点多过头的“经费”报销单。

1526年10月30日，圭恰迪尼从总部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始便有些怪异。信的起首称呼马基雅维利为仁兄，表达了像哥哥一样尊重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但在接下来写信件寄达地时，圭恰迪尼写着：佛罗伦萨或无论什么地方。这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

这位彬彬有礼的精英官僚首先写了首脑会议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寄来的报告，然后话锋一转，圭恰迪尼写道：“但不说这些吧。”信的后半部分写得文如其人：

> 我不知道您跟谁在一起，吃喝就花掉了5达克特。……此等快事对您大概是喜剧，但对我却是悲剧。

光是抱怨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似乎还没能解气，他还给马基雅维利顺访地之一摩德纳的长官菲利波·德·内利写信，斥责他监督不力。菲利波是奥里切拉里花园聚会以后马基雅维利结交的年轻朋友，肯定也在一起凑过热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一个野心家，但似乎同时还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马基雅维利再三提醒他可以让教皇为女儿出点嫁妆，他都回答说拿这种私事去麻烦教皇现在不是时候。他内心认为不能做这样的事。严于律己的人往往也会严格要求别人。作为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掌管着同盟军的伙食，对每一达克特的支出他都锱铢必较，并以此为荣。马基雅维利式的公私不分惹他光火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两人这方面的不同不可能不反映在史家对他们的评价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即使花钱的方式公私不够分明，但只要目的为公，就可以宽容。而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这一点上却极其严格。不用说把教皇金库当成自己金库的切萨雷·波吉亚，就连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做法，他也绝对不允许。

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滥用经费一事大为恼怒，给他写了信。看看马基雅维利做何回答，我们便能清楚地了解他们二人气质的不同。马基雅维利没有感到丝毫惭愧，根本没有回应此事。但是，密友归密友，圭恰迪尼毕竟是高官，对他的批评总不能置之不理，马基雅维利还是写了回信。但回信的腔调实在是文如其人：

教皇代理人阁下：

我从摩德纳寄给阁下的报告里没有写，但后续的情况是这样的：

菲利波（菲利波·德·内利）对我说：

“真是的，难道我总是不能把事情办好吗？”

我笑着回答道：

“总督阁下，不用叹息，这不是您的过错，而是今年（1526年）的过错。在这一年里，有谁做成了什么事吗？皇帝（卡洛斯）派了那么多军队，本该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没有；西班牙人本可以把动乱搞得更大，但他们也没有做；我们（意大利人）本来可以打赢战争，却不知道掌握这个好机会；教皇不相信1000名士兵，却偏信媾和协议的条文。……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叹息的。在疯狂的时代里只有疯子才能做点事。因此，我的总督阁下，如果在今年做成了什么，那才让人担心呢！”

菲利波说道：

“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

于是喜剧的第一幕结束了。

马基雅维利委婉报告了两天他花费5达克特花天酒地的情况，这不过是紧接而来的第二幕喜剧而已，信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直接辩解的词语。不过，用意大利人喜欢的说法，圭恰迪尼也是一个“有境界之人”（spirito），面对马基雅维利式的辩解只好苦笑，很快便恢复心情，写了回信。一旦不在一起就写信的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

这一时期的通信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通信。形势急剧动荡，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这种嬉笑怒骂的书信往来了。

11月间，马基雅维利翻过积雪很深的亚平宁山脉北上。他受佛罗伦萨政府的派遣，去见身在同盟军总部的圭恰迪尼。德意志雇佣军开始南下的消息使整个意大利笼罩在一片寒气之中。

---

[1] 腓力一世（Philippe I,1478—1506），又称“美男子”，他是勃艮第公爵（称为腓力四世，1482—150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称腓力一世，1504—1506年在位）。他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疯女胡安娜的婚姻成为该王国的共同统治者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

始祖。

[2]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利奥诺（Leonor de Austia，法语名为Eleonore d’Autriche或Eleonore de Habsbourg,1498—1558），她于1518年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幸运者”）结婚。曼努埃尔一世于1521年去世。1530年她又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结婚。

[4]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1498—1526），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乔凡尼·德· 美第奇（“平民”乔凡尼）的儿子，佛罗伦萨佣兵队长。或许是因为他的士兵在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时在白色军旗上涂以黑色条纹而得绰号“黑条”。

[5] 劳特累克（Odet de Foix,Vicomte de Lautrec,1485—1528），法国将军，1516年出任法国占领下的米兰公国的总督，1528年在与那不勒斯王国的战争中死于鼠疫。

[6] 当时的乌尔比诺公爵是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

[7]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侯爵（后成为公爵）,1536—1540年在位。

[8] 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1484—1519年在位。

[9]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约1480—156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小说家，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做过僧侣、城邦君主的文书和家庭教师。晚年在法国做主教。他的小说取材于古代或中世纪史实、传说，或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民间故事等，情节曲折，描写情感冲突酣畅淋漓，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作品充满戏剧性，适合于改编成戏剧。代表作为214篇的《短篇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作即以其为素材。

[10] 雨果·德·蒙卡达（Hugo de Moncada,1476—1528）,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班牙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曾任西西里总督（1509—1517年在位）、那不勒斯总督（1527—1528年在位）等职。

[11] 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约1468—1506），出身于热那亚名门，热那亚海军将领、政治家。1524—1528年间曾任法国舰队总司令，1528年转而效忠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夺取热那亚后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他曾为打击海盗做出过贡献。

[12] 乔治·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德意志军事家，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佣兵队长，对近代早期欧洲步兵战术的形成卓有贡献。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经过都灵自西向东流淌，横穿意大利北部。好几条河流在克雷莫纳附近合流，水量大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河。波河横穿曼托瓦南部，流经费拉拉北部，在威尼斯南部很远处的地方流入亚得里亚海。16世纪的时候，从米兰东南的克雷莫纳往下游可以乘船走水路。波河是德意志军队从阿尔卑斯出发南下的第一道障碍。

弗伦茨贝格指挥的1.2万名雇佣军选择了翻越布伦纳山口，经过加尔达湖东岸前往维罗纳的路线。这是一条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传统路线。翻过布伦纳山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和美丽的树木，使人感觉到了南方的气息。一路南下来到维罗纳，南风吹拂着人们的每一根头发，让人觉得德意志那厚重的铅灰色天空太过沉重。德意志雇佣军远远地绕过维罗纳，那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他们也知道这个意大利第一强国的威名。他们途经曼托瓦附近，不断靠近波河。

这时，在此西方100公里处的同盟军大本营里，大家辩论正酣，唾沫星四溅。

“黑条”乔凡尼主张即刻出战。他的根据是，冬天的曼托瓦周边一片泥泞，南下之敌很难维持队形，正是击破他们的最佳时机。圭恰迪尼也赞成出击。眼下敌人有两股力量，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与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之间隔着200公里的距离。在这两股敌军会师之前，正在他们中间的同盟军应首先打击其中一股。在人数上，同盟军远占上风，正可以用两倍以上的兵力袭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这就

是圭恰迪尼赞成的理由。

然而，一直态度暧昧的乌尔比诺公爵这时却说什么都反对出战。公爵以前的磨蹭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恶感，此次他却有了雇主之命这个名分。

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对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甚至对同盟军的军事效力产生了怀疑。现在大群饿狼又自阿尔卑斯方向大军压境。在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内部，主张威尼斯人花钱雇用的军队应该用于守卫威尼斯共和国边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了反对出战的结果。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圭恰迪尼在同盟军机构中地位最高，他应该有方法。即便排除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1万人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手下仍有2.5万多人的兵力，他完全可以下决心把这些兵力交给“黑条”乔凡尼投入战斗。乔凡尼的战术是向东出击，打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兵，再杀一个回马枪，袭击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

然而没有上司的批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走不出放弃1万人威尼斯军队这一步。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时已经与蒙卡达签订了媾和协议，根本没有勇气命令圭恰迪尼采取与之相违背的行动。

要袭击正在曼托瓦附近南下的德意志兵，就必须北渡波河。教皇已经承诺让军队后退至波河以南并已付诸实施。克莱门特七世就像看到了藏在蒙卡达身后的卡洛斯，惊恐莫名。

“黑条”乔凡尼忍无可忍，28岁的他只带着跟随自己的兵力杀入了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军中。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乔凡尼的腿部负伤，被抬进了曼托瓦。医生诊断说若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接受了手术，手术时一直是自己举着烛台。但这位豪迈的武将并没有战胜死亡。

11月25日，“黑条”乔凡尼负伤。

11月28日，德意志军队渡过波河。

11月30日，乔凡尼死亡。

刚刚到达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得知此事，在给佛罗伦萨的报告中写道：“乔凡尼·德·美第奇之死，是所有人的不幸，是极其悲哀的一大痛事。意大利毫无意义地失去了唯一一位有价值的武将。”

尽管如此，命运并没有彻底放弃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军虽然渡过了波河，但卡洛斯的军队仍旧分为两股。

波旁征服了米兰，但他和他手下的西班牙军队仍然无法冲出米兰，与友军会师。西班牙军队也是一群佣兵，若不付佣兵费，纵然是大将的命令也不会服从。士兵们身在米兰，薪水常常被拖欠，他们已经拒绝出战了。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1526年的12月和1527年的1月过去了。同盟军在这期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保住了士兵的性命。积极行动打破这种僵局的不是教皇，也不是圭恰迪尼，而是查理三世·德·波旁。

作为军人，波旁知道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拖得越久，对他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就越不利。他召集米兰有权势的人提议说，如果给他3万达克特，他立刻撤出米兰。谁都不愿意征服者的军队住在身边。米兰市民不想继续忍受种种暴行，同意支付3万达克特。这样一来，波旁就能给士兵们付薪水了。2月初，西班牙军队离开米兰，去与渡过波河正在休整的德意志军队会师。

他们的目的是去会师，完全没有理会帕尔马附近的同盟军大本营，只是在50公里远的地方擦肩而过。同盟军失去了“黑条”乔凡尼，屏住呼吸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会师了。

在这期间，圭恰迪尼只做了一件事，即与从佛罗伦萨返回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一同前往乌尔比诺公爵的军中，说服他开始军事行动。乌尔比诺公爵提出了条件，要求归还利奥十世时代被佛罗伦萨抢去的两个地方。圭恰迪尼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并未请示教皇，而是先斩后奏，事后才请教皇批准。这件事说明，作为教皇代理人而统率同盟军的圭恰迪尼是有权力的，只要想做是可以做成的。

但这时已太迟。乌尔比诺公爵虽然承诺开始军事行动，却说要等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南下到博洛尼亚、完全不用担心威尼斯国境安全时才能行动。圭恰迪尼甚至被这位看上去并不贤明的乌尔比诺公爵耍了一把。

坏消息仍未就此结束。费拉拉公爵的态度一直暧昧，他既未收到同盟军的加盟邀请，也没有追随卡洛斯。可这会儿他突然表明了态度，他决定不向波旁派出援军，而向他提供大炮和粮食。这让波旁感到高兴，哪一样都胜过给他5000名士兵。冬季，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抢粮。在大炮方面，西班牙和德意志都属落后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教皇慌了手脚，通过圭恰迪尼去说服费拉拉公爵，说立即向费拉拉归还摩德纳和雷焦，请他站在同盟军一边，但此时为时已晚。费拉拉公爵回答说，他们在马德里签了协定，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卡洛斯的军队兵合一处，人数达到3万，又拖着大炮继续南下。2月的意大利中部平原仍然覆盖着积雪。大部队行军七天就需要一个让士兵歇息的大城镇。总司令波旁和德意志军的指挥官弗伦茨贝格决定首先去博洛尼亚。

同盟军现在被一切两段。圭恰迪尼一边连续几天给乌尔比诺公爵写信求他南下，一边率领手头仅剩的教皇和佛罗伦萨军队提前一步进入了博洛尼亚。然后差人早早关上博洛尼亚的所有城门，向要求开城的波旁表明了寸步不让的态度。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已经跟随圭恰迪尼共同行动了两个月。他为

朋友充满勇气、不辞辛劳、不惧大炮的态度而激动不已。而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者的圭恰迪尼和他曾经嘲笑的理想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同样满怀着炽热的忧国之情。尽管上司靠不住，圭恰迪尼还是投入了全力。一年多来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的同盟军至少没有散伙，这还得归功于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在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好友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 我爱圭恰迪尼殿下，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
>
> 我可以根据60年的人生经验断言，现在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又不能避免战争。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都已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君主（克莱门特七世）的重负。

克莱门特七世一直希望和平。可是，每当他想为和平做点什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将事态推向战争。他在1527年3月底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此情况徒增一例而已。

3月7日，波旁率领德法联军抵达博洛尼亚城下。如前所述，圭恰迪尼拒绝他们入城。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片雪原上露营。费拉拉公爵送来的粮食必须让3万人吃上饭。他们想抢，冬天里猎物也很有限。粮食已经告罄，还要被迫在冬季野营，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

暴动爆发于抵达博洛尼亚城下第6天的3月13日，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弗伦茨贝格身受重伤，当即就被送回故国德意志，不久便一命呜呼。波旁早早逃离，捡回了一条命。这个事件对波旁是危机，对克莱门特却是大好时机。然而，把波旁从这个事件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人。

尽管从圭恰迪尼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还是在这时开始了媾和谈判，提出媾和的不是教皇，而是卡洛斯皇帝。卡洛斯向教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一、向德意志雇佣军支付20万达克特赔款。

二、割让奥斯提亚、比萨、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诸港。

三、将帕尔马、皮亚琴察两座城市割让给卡洛斯，将摩德纳和雷焦归还给费拉拉公爵。

四、在卡洛斯的同意之下让斯福尔扎家族回归米兰公国。

五、停战8个月进行媾和谈判。在此期间，波旁指挥的军队退至开战以前的地区。

六、谈判期间，扣押斯特罗齐和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作为人质。

七、签署媾和协议后，教皇和皇帝将共同努力建立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

纵使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想极力避开战争，也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次媾和是单独媾和，只是在教皇与卡洛斯之间达成的协议，事先连一个字都没有与干邑同盟的其他加盟国法国、英国和威尼斯商量过。因此，3月26日，在得知媾和协议正式签订之后，这三个国家都通过驻罗马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

盯死教皇的威尼斯共和国向乌尔比诺公爵发出密令，指示他尽量避开战端。此外，法国也完全没有心情再去考虑派遣劳特累克指挥的军队。弗朗索瓦一世为不再派军找了一个台阶，给同盟军拨去8万达克特的资金。然而，教皇却把其中的6万达克特用于赎回两个人质。

对教皇的态度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这些大国的君主，不如说是身在前线执行教皇意图的圭恰迪尼。不过，因此得以停战，他也可以喘上口气了。然而，有消息传来说，实际调遣卡洛斯军队的波旁不满这样的赎人条件。不知怎么计算的，波旁认为减去赎回人质所需的金额，余额应

为15万达克特。他对此金额十分不满，说非得给他24万达克特。他与带着8万达克特的佛罗伦萨使节走岔，便产生了误解，扬言只有进军罗马一条路，并付诸实施。德意志雇佣军本来就憎恨教皇，现在波旁号召打到罗马去，大家便想象着罗马的财富，听从队长的命令，一呼百应。

从博洛尼亚翻过亚平宁山脉，马上就到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的要地。波旁没有走覆盖着残雪、行走艰难的翻山之路，而是选择了距离虽远但平坦的古代罗马大道。他沿着艾米利亚大道走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抵罗马。当时行军更多的是边走边抢，走居民多的平原也更为方便。

克莱门特七世重视媾和，只发来了避免冲突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了，带着教皇和佛罗伦萨雇用的军队追赶走在前面的波旁。因为害怕大炮，两军之间的距离长达40公里。在他们的后面，隔着10多公里不即不离地跟着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被迫进行着屈辱的行军，马基雅维利与他同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显得很自然了。几天后，从罗马传来了不仅令他们二人而且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消息。

克莱门特七世得到波旁再度南下的报告后大惊失色，竟然采纳了那不勒斯总督蒙卡达的建议，解雇了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只剩几百名瑞士兵保卫教廷宫殿。

罗马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正式说来，当时的罗马只是教皇国的首都。但是，这里有天主教会的大本营梵蒂冈，罗马不单单是一座城市。这对欧洲人是如此，对意大利人更是如此。让这样的罗马不设防，就像是让整个意大利不设防。佛罗伦萨与罗马是命运共同体，很多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波旁率领的“皇帝军”实际上由德意志佣兵、西班牙佣兵以及意大利佣兵组成，其比例是德意志占二分之一，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占四分之一。这支混成军的指挥官是法国人波旁，完全掌控德意志佣兵的弗伦茨贝格死后无人接任。这样一支军队扬言要进军罗马，沿途城镇的居民又会有谁放得下心呢？从博洛尼亚到罗马，沿途的大城市只有佛罗伦萨，不定什么时候波旁的军队就会锋芒西向，袭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近郊农村将最先遭到血洗。马基雅维利一家住在离佛罗伦萨10公里远的山庄，他们也决定到有城墙环绕的佛罗伦萨城里避难。4月17日，马基雅维利的三儿子圭多给跟随圭恰迪尼一直没有回来的父亲写了一封孩子气十足的信：

敬爱的父亲大人：

4月2日的来信收到。我们终于得知父亲大人安康。愿上帝保佑您。（这个孩子不久便入了教籍）……

我们不再害怕德意志雇佣军了。因为您承诺过，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母亲玛丽埃塔也说不担心了。

一旦敌军朝佛罗伦萨开来，请立即通知我们。山庄里还放着很多东西，酒和油什么的，我们已经让人搬了20或23桶到城里的家中，铺盖也搬了过来。剩下的东西运到圣卡西亚诺村，也需要两三天。

家里人全都安康，我尤其好，妹妹已经痊愈。我们打算在复活节一起唱歌和演奏乐器。我正在学习语法的分词，拉丁文已经开始阅读奥维德的作品了。父亲大人回来后，我会把脑子里的都告诉您。

母亲向您问好，她说要给您寄去两件衬衣、两块毛巾、两顶帽子、三双鞋和四块手绢。

请您尽快回来，大家都等着您呢。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圭多·马基雅维利

于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不是给家里写信很勤的那类人，但还是留下了几封写给儿子的信。其中有一封给三儿子的信，信中写道："学习吧，只要学习，就能像父亲这样与伟人们交朋友。"

这让人忍俊不禁。父亲马基雅维利难道不是平凡得出奇吗？身处乱世之中，应该像圭恰迪尼那样教育孩子向上帝祈祷，无论如何要站在胜者一方。这种教育会有用得多。

马基雅维利的4个儿子中有点儿学问的也就是三儿子圭多一人。也许长子、次子亲眼看到了父亲虽然勤于学问，但父亲的交友只能产生如此的结果，因而他们不愿意学习。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好运总是站在胜者一边。

三儿子圭多写了这封信后不久，马基雅维利短暂地回了一趟佛罗伦萨。这大概并不是因为他向家里的承诺，而是因为圭恰迪尼再也无法预料波旁军队的去向，认为起码要防卫佛罗伦萨，便率军挥师佛罗伦萨。实际上，就在马基雅维利回来的第二天，圭恰迪尼就进驻了佛罗伦萨。

5月2日，圭恰迪尼离开佛罗伦萨，他不能对正向罗马进军的波旁军队放任不管。尽管是友军，驻扎众多的士兵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反美第奇派已经开始在佛罗伦萨市民中间抬头，这样会更增加风险。圭恰迪尼与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哥哥路易吉协商，结果认为引兵撤走方为良策。波旁的军队也已经远去，从距离上看不会轻易掉头袭击佛罗伦萨。

尽管统率着军队，但没有教皇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成，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追在波旁的后面。这种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身影也和

平时一样，跟随在圭恰迪尼的身旁。威尼斯的军队又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身后行军。春日阑珊，时间已经到了更加适合悠闲散步而不是行军的季节。

从此以后，马基雅维利再无文字留存下来。他说不定写过一封信什么的，但没有流传下来。他生前写下并流传下来的最后文字，是1527年4月18日写给韦托里的信。我们无从了解从这一天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去世为止这两个月间他的内心世界。

从对历史的关注来看，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件憾事。这两个月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马基雅维利亲身见证了这个终结。

他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场证人。要了解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可靠的史料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人员写回的报告、威尼斯市民马里诺·萨努托多达58卷的《日记》，以及马基雅维利包括秘书任内的报告在内的全部著作。这是因为威尼斯的外交官们客观地记述了那个时代，萨努托事无巨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而马基雅维利则用他无与伦比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了那个时代。假如马基雅维利为我们写下点儿什么，那么，我们会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把握文艺复兴的终结。可是，偏偏马基雅维利没有写。

不过我想，如果关注马基雅维利其人，这段时间他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未必是令人绝望之事。我们大概已经不能依据史料探知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内心世界。但是通过想象去感觉的话，就要凭各位读者的心情了。

这样一来，我所起的作用似乎就像16世纪时的编年史家，或现代的记者，一一列出那两个月的形势变化和马基雅维利的行踪。也就是说，由我提供史实，帮助各位读者发挥想象，这也是尊重人性的一种体现。这个念头时时向我袭来。

在列举史实之前，有一件事请诸位放在心上。

马基雅维利最早是在1503年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给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答辩书中断言，要保卫国家，“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都不可或缺，没有自卫力量的国家终将难逃遭受破坏和沦为奴隶的宿命。这是2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撰写了《君主论》，他告诉人们，时代发生变化，统治方式也需要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1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7年完稿的《论李维》中告诫人们，要想维持共和政体，有时要有勇气敢于做违反共和政治精神的事情，否则共和政体本身就会垮台。这是10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21年刊行的《战争的艺术》中深入论述过国民兵役制度的必要性。这是6年以前的事情。

以当时的“常识”，人们一直断定这位马基雅维利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冒进主义和纸上谈兵。可是，二十来年，这些非现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1527年的春天，58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直在跋涉行军，伴随他的是他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未被接受的“事实”。他写给韦托里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

> 如果认为像这些佣兵一样通过战争获利的人会希望和平，那才是疯了。我觉得命运会让他们进行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的战争。

5月2日，波旁率领的德意志、西班牙联军到达离罗马不足100公里的维泰尔博。圭恰迪尼率领的教皇军跟在后面，相隔8天的距离，后面又跟着威尼斯的军队，相隔2天的距离。佛罗伦萨军队预定4天后出发。

从维泰尔博到罗马只有卡西亚大道一条路。

5月3日，教皇命令关闭罗马的所有城门，紧急任命了5位枢机主教，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征用4万达克特，用这20万达克特十万火急地征召了4000名佣兵，建立了一支防卫军，甚至征召了大学生。由有勇无谋的佣兵队长伦佐·达·切里担任指挥官。

卡洛斯军队包围克莱门特七世藏身的圣安吉洛堡

5月4日，波旁来到罗马城下，要求开城。城内没有任何应答。

5月5日，由3万人兵力组成的卡洛斯军队在罗马西北梵蒂冈背后的城墙下布阵，这里的城墙最矮，住家较少，不需要考虑居民的抵抗。

5月6日黎明，以炮响为号，攻城开始。守卫方激烈抵抗，隔墙展开

了激战。查理三世·德·波旁中弹阵亡，副官奥朗日公爵[1]立即接过指挥权。

与波旁相比，奥朗日公爵的指挥能力非常差。不过对势头正盛的士兵来说，指挥官的能力大小已经不是问题。据说战斗持续了6到8个小时。伦佐醒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弃战，中午时分大势已定。

雪崩一样冲进来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士兵立即控制了以教皇宫殿为中心的梵蒂冈一带。教皇和枢机主教们全都逃进了圣安吉洛堡，还没到晚上，台伯河对岸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宅邸林立的鲜花广场和纳沃那广场就陷入了敌手。

这就是历时6个月的历史上所称的“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这是意大利文的写法，英文、法文的写法也与意大利文相同）进攻一方的西班牙国王的家臣加蒂纳拉[2]给卡洛斯发去了这样的报告：

> 整个罗马都被破坏了。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殿如今都已变为马厩。我们的队长奥朗日公爵努力让士兵们保持秩序，但大兵们已经成为一群强盗，无法指挥。德意志雇佣军更是行径野蛮暴虐。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那是一帮对罗马教会毫无敬意的路德派教徒。所有的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不是遭到破坏，就是被盗抢一空。

今日的罗马给人的印象是巴洛克之都，这是因为在这次浩劫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八成都被烧毁或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据说上次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出得起赎金的居民被抓了起来，出不起或稍有抵抗的人统统被杀死。到了夏天，又有鼠疫袭来。

在这6个月中，罗马的人口从9万人减至3万人，其中2万人被杀，2万人逃亡，2万人死于鼠疫。就连战胜者德意志雇佣军，人数也从1.2万人减少到了7000人。

马基雅维利一直与教皇军同行，5月10日得知罗马陷落，这时距罗马陷落已有4天时间。考虑到距离与事件的重大程度，4天后报告才到，实属迟缓，但教皇被围在圣安吉洛堡，大概无法派出信使。

罗马如此轻易地就陷落了，想必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都无语。

罗马城周围的城墙长达21公里，号称有9万名居民，防御兵力达到1万人。这样的罗马仅仅一天就陷落了，一定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

74年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城市周围的城墙全长21公里，居民3.5万人，防御兵力不足7000人，在遭到土耳其军队猛烈炮击的情况下城市还坚持了50多天。即使那里地形优越，可谓是天然要塞，又有三层城墙，但打过来的土耳其军队有着16万多人的兵力优势。

此外，在仅仅5年前的罗得岛攻防战[3]中，以全长5公里的城墙为后盾，守卫方靠不足2000人的兵力，与10万人的土耳其敌军打了6个月。这两场攻防战都以进攻方胜利而告终，但防御一方都是因为援军不到才失守的。

1527年“罗马浩劫”的情况是，友军只有两天时间便可赶到。但守军只有一天就轻易败阵，因为他们缺少像前两个战例中所见到的那种最高负责人的坚定意志和居民的合作。

不过我想，不管是最高负责人教皇，还是罗马市民，当他们亲眼看到后面的惨剧以后，一定会后悔当初不坚持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天真地认为虽是敌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基督教徒。

圭恰迪尼于4天后的5月14日得知罗马陷落的消息，他指挥大军前进了30公里，到达蒙特菲阿斯科尼。他叫来了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乌尔比诺公爵，决定今后的方针。

首脑会议上争论得相当激烈。乌尔比诺公爵主张继续进军罗马是愚

蠢的策略，他寸步不让。圭恰迪尼有权决定教皇和佛罗伦萨两军的进退，但他也对只率领手下士兵进军罗马犹豫不决。按他的考虑，先决问题归根结底是救出形同人质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理由是如果教皇成为人质，就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圭恰迪尼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合作。他派马基雅维利去了多利亚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但好像没有获得多利亚的合作，结果教皇由海上逃亡的方案胎死腹中。

5月31日，教皇的兵力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兵力组成的同盟军已经来到了离罗马两天路程的地方，却决定要挥师北返，这是事实上的解散。

6月5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以近乎无条件投降的形式向卡洛斯屈服。

但马基雅维利在奇维塔韦基亚得到了一个重大消息，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共和政体。

马基雅维利已经回不到朋友的身边了，他只是给圭恰迪尼寄了份报告，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急奔佛罗伦萨而去。我们可以认为，5月底他确实已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一定是先过比萨，在那里选择了逆亚诺河而上的路线。内陆地区有一仗未打就成为败兵的同盟军残兵出没，相当危险。

马基雅维利抱着一颗激动的心回到了祖国。他确信，在没有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共和政体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位置。有消息说，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弟子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也回国了。

6月初，马基雅维利竞选因美第奇家族被驱逐而空缺的第二秘书厅秘书一职。经“十人委员会”筛选，送共和国议会参加选举。

6月10日，议会在市政厅内“五百人会议厅”开会，选举第二秘书厅秘书。出席议员567人，缺席议员34人。议长由刚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担任。

投票结果：投意味着赞成的白豆者12人，投意味着反对的黑豆者555人。

马基雅维利落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为美第奇干活，要了他的钱。听说一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忠诚的人。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的拉票演说似乎没有收到效果。

单凭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的姓氏，人们便可预料，1527年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活跃其中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时代的共和国，不如说更加接近于从前狂热信奉宗教的萨伏那罗拉时代的共和政体。既在索德里尼政府里工作过又在美第奇僭主政体下做过事的圭恰迪尼和韦托里，都曾为高官，他们对卡波尼共和政体不再抱有幻想。圭恰迪尼早早地归隐郊外山庄，韦托里也逃出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想再次为国效力的愿望被祖国拒绝了，而原因不是58岁的年龄。当选的托辛吉与马基雅维利同龄，他并没有为打倒美第奇出过力，只是在美第奇家族复辟期间没有做过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已。

落选的消息立刻从市政厅传给了等在家中的马基雅维利，他家离市政厅只有5分钟的距离。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在这个家里度过此后10天时间的。在第10天的6月20日，他病倒了。根据同时代史家瓦尔奇[4]的说法，落选是他生病的原因。

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都赶到了他的床前。菲利波·斯特罗齐、路易吉·阿拉曼尼、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雅各布·纳尔迪，可以说是他最年轻的弟子、24岁的巴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也赶来了。

两天以后马基雅维利去世了，享年58岁零1个月。他的四子、13岁的皮耶罗·马基雅维利给一位亲属寄去了这样的一封信：

> 我不能不含泪通知您，我们的父亲尼可罗于本月22日去世了。20日服用药丸引起的腹痛应该是他去世的原因。他向最后陪伴着他的马泰奥修士做了最后的忏悔后安详辞世。
>
> 如您所知，我们的父亲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家。
>
> 暂告如上，等您来佛罗伦萨时，我再一一详告。

马基雅维利的遗体葬在圣十字教堂。此后不过几十年，马基雅维利家族绝嗣，墓地无人维护，也没有人再来凭吊。

将马基雅维利葬于圣十字教堂并无更多的目的。圣十字教堂在现代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有但丁以及很多佛罗伦萨出生的伟人的墓。与但丁一样，马基雅维利去世时根本不是祖国的骄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十字教堂里壮观的马基雅维利墓，是18世纪一位爱好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英国人所建，这座墓的下面并没有马基雅维利的遗骨。

---

[1] 奥朗日公爵（Principe d’Orange，又译奥兰治公爵），当时是让·德·沙龙（Jean de Chalon）。

[2] 加蒂纳拉（Mercurino Arborio Marchese di Gattinara,1465—1530），神圣罗马帝国首相。

[3] 罗得岛位于地中海中，当时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堡垒，工事坚固，由罗得岛骑士团700人及当地武装6000人防守。15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罗得岛遂成为障碍。1522年6月，10万人的土耳其军队进攻罗得岛，至12月中旬方才攻破城防，土军亦伤亡惨重，至少5万人丧生。

[4] 瓦尔奇（Benedetto Varchi,1502/03—156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诗人。早期曾参加过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活动。著有记叙1527—1538年间历史的《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

在此之后

“罗马浩劫”两年后的1529年6月，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卡洛斯在巴塞罗那签订了媾和协议。教皇承认了卡洛斯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权。把意大利出卖给西班牙的克莱门特七世得到的仅有一项，卡洛斯不惜使用武力帮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东山再起。

同年10月，卡洛斯向拒绝美第奇回归的佛罗伦萨派去了奥朗日公爵指挥的军队，开始了耗时10个月的包围战。

1530年2月，教皇与西班牙国王在博洛尼亚会面，卡洛斯通过克莱门特之手正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按照程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应该在罗马举行，但三年前以卡洛斯之名发动的“罗马浩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加冕典礼总不能在罗马市民的怨念之中举行吧。

同年8月，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破城之后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惧怕的类似发生在罗马那样的野蛮行径。卡洛斯下令不许有刺激市民怨怒的举动，他想通过把西班牙女人嫁给已在佛罗伦萨复辟的美第奇家族，间接地把已经成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1537年，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传说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私生子）被同族的一个成员暗杀，“黑条”乔凡尼的独生子科西莫·德·美第奇掌握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开启了专制君主政治。不久以后，科西莫成为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

佛罗伦萨已彻底不再是城邦了，它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除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意大利实质上归入了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反对宗教改革的

暴风骤雨横扫文艺复兴的诞生之地意大利，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1532年，得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赞同，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得以刊行。

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1]将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指定为禁书，原因是这些著作不适合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徒阅读。

马基雅维利自称的所谓“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在意大利语中既可以用作名词，同时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

---

[1] 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l IV,1476—1559），本名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1555—1559年在位。

图片出处一览

插页地图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佛罗伦萨市中心照片：铃木美知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韦罗基奥制作　美第奇·　里卡迪宫（佛罗伦萨/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波提切利画 卡拉拉学院美术馆（贝加莫/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莱昂纳多·达·芬奇画 博纳美术馆（巴约纳/ 法国）©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作者不详 科梅拉博物馆（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弗拉·巴托洛梅奥画　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韦奇奥宫照片：松藤庄平

洛伦佐·　迪·　克雷蒂画　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　意大利）©Foto Giorgio Liverani, Forli

保罗·　乔维奥著《伟人传》（1575年）插图©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p er i Beni e le A t tivà Cu l tu ra li）

切萨雷·维切里奥著《服装今昔》（*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

上 米开朗基罗制作 美术学院美术馆（佛罗伦萨）©Ken Wels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下 鲁本斯画 卢浮宫（巴黎）©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普拉托利诺别墅（普拉托利诺/ 意大利）©Massimo Listri/Corbis/PPS

传为波拉伊奥罗制作 巴杰罗宫（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马基雅维利手稿© Scala, Firenze

作者不详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鲁普莱希特· 赫里尔画 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斯德哥尔摩/ 瑞典）©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布隆齐诺画 美第奇家族美术馆（佛罗伦萨） © Scala, Firenze p.432 16世纪版画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译者跋

盐野七生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展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本书与作者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罗马人的故事》《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等在叙述上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又独立成篇，在历史长河中撷取一叶，铺陈发华，读来引人入胜。

本书第一部着力于介绍马基雅维利的生活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相关情况，交代时代背景；第二部重点介绍马基雅维利的职场生涯，包括主要经历、业绩、相关历史事件和遭遇；第三部着重介绍马基雅维利失意后的奋斗经历和著述生涯，介绍和评价了他的重要著作和成就。

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专著，也不是小说或虚构故事，而是报告文学般的真实历史普及读物，有史料依据，完全面向大众。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类似电影或电视剧的叙述手法，总体上依据时间顺序叙述，根据需要在时间和地理两个或其中一个维度上将镜头拉近或推远，间或插入一些其他画面，尽量使对几百年前的场景、事物的叙述更加生动和通俗易懂。因此，夹叙夹议也是本书写作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在叙述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将自己学习、研究历史的心得和成果融在了书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对主人公的描写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和生命力。

作者曾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自己虽然身为女性，但在创作时从来没有自觉地去意识自己的女性性别角色，也没有专门从女性的角度用女性的眼光看待自己所要写的那段历史、那些事件和那些人物。尽管如此，从书中的表述和描写上，我们还是能够细细地体会到作者的女性情

怀和手法，比如叙述的绵长、描写的细腻等。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语言平易流畅，不失那种谈心式的、娓娓道来的口语风格，可读性强，老少咸宜。

根据本书的特点，我们对翻译的要求是在准确的基础上尽量晓畅、生动但又不随意改变原作风格。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一是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不能直译的或直译出来译文语言过于生硬的地方，则采用有限度的意译方法；二是译文的词语和句式选择尽量平易又不失文雅、庄重，力求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译文力求生动、简洁，富有趣味，争取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当的可读性。为了便于读者（特别是对欧洲史了解不多的读者）阅读，使读者读来不觉突兀或因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够而感到阅读困难，我们按照以下原则为本书做了一些注释：

1. 做注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较为顺利地阅读本书，并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趣，增长相关知识。因此，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了解的内容不再做注。

2. 对书中已有相关叙述以及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障碍的内容不再做注。

3. 注释尽量简洁明了。

4. 可以做注但限于译者能力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的没有加注。

我们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虽然在翻译和做注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仍不敢保证译文和注释完全准确和充分贴切。如发现译文和注释内容不妥、不正确或不必要，请出版社和读者、专家匡正。中文译名的确定基本依据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尽量做到与之一致；在确定中文译名时我们还参照了意大利文原名及英文译名；对某些限于条件和水平没有查到西文原文的，我们根据日文做了音译。虽然这类译名不多，我们还是恳请出版社、读者，尤其是专家不吝

指教。

我们有幸参加了中信出版社组织的盐野七生女士的《罗马人的故事（XV）·罗马世界的终曲》《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以及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参加了中信出版社安排的作者访华的部分接待工作，其间与作者朝夕相处，甚至同她交上了朋友，既接触了原著，又接触了作者，还接触了我们用作翻译参考的各种相关书籍或书面资料、网络资料和有关数据库，从中学得颇多，对作者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书中所涉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对翻译工作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我们对翻译“日本作者用日文创作的西方历史读物”所带来的语言和知识面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译名问题不再抱有恐惧心理，能够勇敢面对，不但要解决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力求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当然，我们的翻译绝非十全十美，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尤其在网络发达的当下，恳请广大网民提出宝贵意见，以鞭策我们不断学习，提高翻译水平。

最后，作为译者，我们感谢出版社的努力、读者的阅读和社会的评论，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勇于承担译文文责的勇气，必将成为我们今后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源泉。

田建华 田建国

2015年8月1日于南京九华山寓所

开放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新知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上下册）》 [美]威廉·麦克尼尔

《世界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美]雅克·巴尔赞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册）》 [英]约翰·麦克里兰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论历史》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57》［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套装）》［美]托尼·朱特

《论欧洲》［美]托尼·朱特

《沉疴遍地》［美]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美]托尼·朱特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待出）［美]托尼·朱特

《记忆小屋》（待出）［美]托尼·朱特

《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记》［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套装（共15册）》［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精编体验本：与盐野七生同走罗马路》 ［日]盐野七生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1：文艺复兴是什么》［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2：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3：马基雅维利语录》（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5：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6：优雅的冷酷》（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7：神的代理人》（待出） [日]盐野七生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美]芭芭拉·W·塔奇曼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美]芭芭拉·W·塔奇曼

《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文艺复兴的故事
03

盐野七生

海都物语
威尼斯一千年

（上册）

【日】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文艺复兴的故事
海都物语（上册）
威尼斯一千年
盐野七生
03
社科文化
sci+hum.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文艺复兴的故事
海都物语（下册）
威尼斯一千年
盐野七生
03
社科文化
sci+hum.

目　录

致读者
上册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第二章 走向海洋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下册
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第九章 朝圣之旅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后记
简略年表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致读者

大概是从5年前我收集资料开始，就不断地有意大利的朋友问："为什么不写佛罗伦萨，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

孕育出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巨匠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确更为世人所知，但我要写的是"果实"的部分。当然，这只是心里话，通常我会很简单地回答："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在国家体制不变的状态下，维系如此长久。"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规律从古至今无一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逆转。人类智慧所能及的，只是尽量地减缓衰退的速度，推迟衰退的时间而已。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完全没有得到上天眷顾的毫无资源的国家，或许正因为天生的缺陷，才会力求将这份艰难的事业做到极致。对于长年居住国外，习惯从外部眺望祖国的我而言，对威尼斯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回归。

不过，我完全没有打算让读者去探究绵藏于文字中笔者的心思，仅是了解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兴亡这一件大事就足够复杂，足够有趣了。

历史是愉悦的。不用专门去挑拣那些有趣的内容下笔，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妙趣横生。这是我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由始至终坚持的写作态度。如果有人从书中获得前车之鉴，当然很好，那些无所谓历史教诲，只希望纯粹享受这份快乐的人，同样也是我非常重要的读者。我相信只有让后者得到满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温故知新。

在现代，把历史当成一种享受的民族，当属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国家的历史书籍，哪怕学者的论文亦相当精

彩。从来都不是作家启蒙读者，而是读者培育了作家。古罗马的文人贺拉斯曾经说过：

“为了令人生趣而写的文章，才是好文。”

1981年10月于佛罗伦萨

罗马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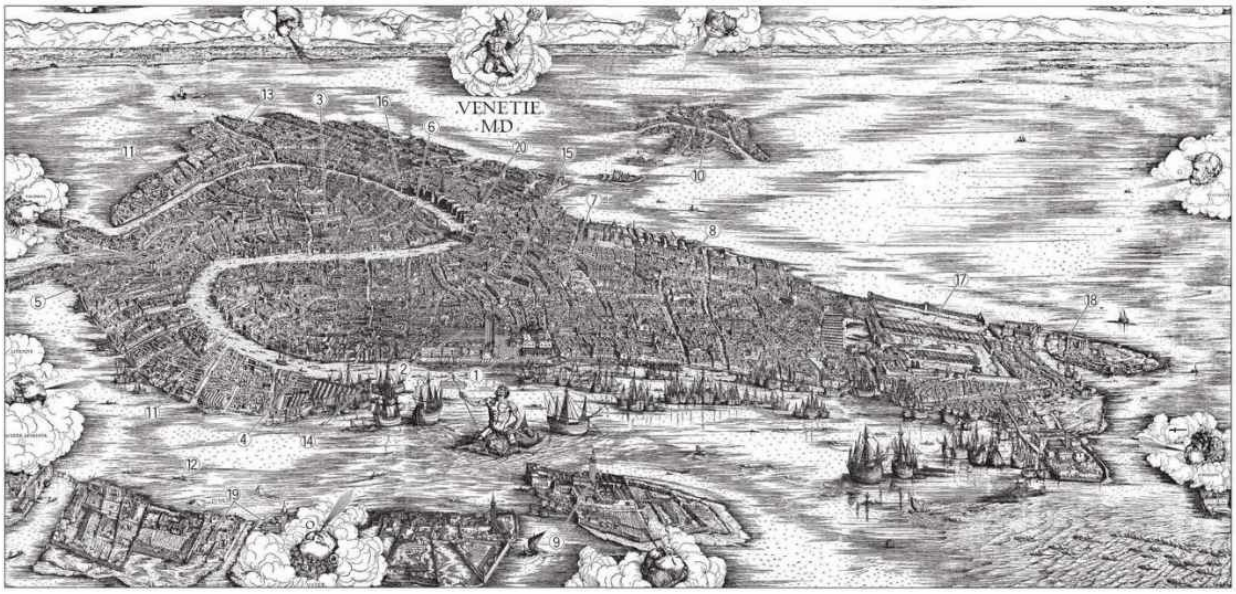
海都物语

威尼斯一千年

上册

【日】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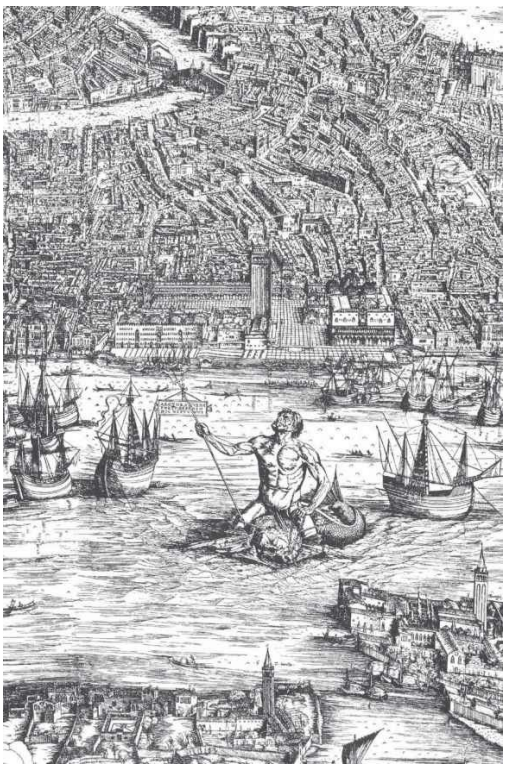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15世纪的威尼斯

1. 元首官邸
2. 圣马可广场
3. 圣保罗广场
4. 圣格里戈利教堂
5. 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
6. 圣雅各伯教堂
7. 圣玛利亚福尔摩萨教堂
8. 圣撒迦利亚教堂
9. 圣乔治马焦雷教堂
10. 圣米迦勒教堂
11. 大运河
12. 朱代卡运河
13. 卡纳雷吉欧运河
14. 海关
15. 梅尔契里埃
16. 黄金宫
17. 国有造船厂
18. 圣皮耶罗堡教堂
19. 朱代卡岛
20. 里亚尔托桥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有一部系列纪录片叫“俯瞰意大利”，忘了是埃索（Esso）还是奥利韦蒂（Olivetti）公司投资制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威尼斯的。通常在这类影片的开头，整个画面会出现如同是漂浮于水上的威尼斯的美丽街景，一如我们在旅游指南上看到的照片。然而本片的导演福尔科·奎利奇（Folco Quilici）的手法却是别出心裁。

晨雾中，是茫茫无际的潟湖（Laguna）。零星露出水面的地表上，一片片芦苇随风摇曳，却不见树木的踪影。

这个画面只出现了一瞬，大约两三秒后旋即消失。紧接着，晨雾渐

渐散去，视野愈发清晰，云雾中只见长满芦苇的潟湖，慢慢地变幻着身姿。早晨清澈的空气中，仿佛有仙女拿着魔杖，轻轻一挥，整个威尼斯浮现在阳光璀璨的碧海之上。

既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旁白，这是一幕无声的光影转变。应该说，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首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乐曲的交响诗。

我本打算将接下来要撰写的威尼斯共和国通史，取名为“水都物语”。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城邦国家，通常被称为花都和水都。但看过纪录片之后，我觉得“水都”似乎名不副实。

“水”字给人的印象多是静态的。即使有动，也是朝着一个方向缓缓流淌。然而，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则完全不同，它复杂多样，充满动荡，惊心动魄。

要说水都，欧洲境内比比皆是，就连日本的松江或大阪，大概都配得起这个称呼。可我要写的，不是单纯在水上建城的人，而是那些走向海洋、以海为生的人物故事。

因此，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水都物语”，必须是“海都物语”。

逃离蛮族

“阿提拉打过来啦！”

“匈奴人杀过来啦！”

“听说阿奎莱亚（Aquileia）也遭焚城，女人孩子无一幸免!”

蛮族太可怕了！无论抵抗与否，格杀勿论，就算献上钱财也无济于事。凡是蛮族经过的地区，寸草不生……诸如此类的传言四处蔓延，速度快过疾风。惊慌失措的人们围着神父，诉说着心中的不安。

时值罗马帝国的末期。蛮族的入侵，将习惯于生活在“罗马和平”下的欧洲人，推向恐怖的深渊。其中以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为凶猛。当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Veneto）的人们听说他们教会所在的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阿提拉袭击后，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赶紧逃吧。”

不过没人想往山里逃。这一带是由几条流向大海的河川汇集而成的平原，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往对面的远山跑，恐怕来不及到达目的地，途中就会被追来的蛮族杀死。那么，不如沿着海岸线南下，逃往帕多瓦（Padova）或是更南面的拉文纳（Ravenna）。

可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得不立即把话收了回去，因为蛮族正向帝国的首都罗马逼近。逃亡者们要抢在蛮族之前走同样的路线，即便没有妇孺拖累也办不到。望着眼前这群等待自己给出明示的人们，神父无言以对。他张开双手朝向天空，与其说是在向神祈祷，更像是绝望的控诉。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爬到塔上去，从那里往大海的方向看，所见之处，便是你们未来的家园。”

于是，人们登上教会的高塔。彼时正逢退潮，从塔上可以看见零星露出水面的沼泽地，除了茂密的芦苇，湿地上见不到任何树木的影子。

但这是神的指示。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众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迁移。通常人们搬家会带上财产和家当，而威尼斯人还得带上造房子的木材。因为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一无所有，不过至少保住了性命。

上述内容来自威尼斯初期编写的编年史，即所谓的传说。事实上，神应该什么也没说过吧。在那些把历史当作科学研究的人们眼里，民间传说或许一文不值，但对于试图了解当时民众的心情、获得切身感受的人而言，民间传说却是不能被轻视的材料。

如果是当今美丽的威尼斯，相信不少现代人都愿意定居于此。但是，对于距今1500年前那些已具备相当程度的文明，却不得不迁移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人们而言，即使形势逼人，迁居仍需要极大的决心。如果不是用神的指示来说服众人，恐怕最终很难付诸行动。毕竟当时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只剩下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迁居潟湖的人们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的入侵仍然时有发生，但这个不易生存的地方，同样也不易受到攻击。说到底，是因为当时威尼斯人的那点儿财产根本挑不起蛮族人进攻的欲望。继匈奴人之后征服了北意大利的哥特人，也没有侵犯过这一小群生活在沼泽地的人们。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撰写的文书被公认为是了解当时威尼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当时在拉文纳宫殿侍奉哥特王的官员，写的不是普通的记录文，而是指示令，但其笔调又和统治者向下发出的命令多少有些不

同。这份写于公元538年的公文，是这样开始的：

请按照已下达的指令，将今年获得丰收的伊斯特拉（Istria）的葡萄酒和橄榄油送往拉文纳。你们在海边拥有数量众多的船只，应该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住民委托的货物顺利地运送出去。此番所得利润，你们可以与他们平分，因为这是一件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办好的事情。

好了，你们立刻开始这趟短途吧。再长的海旅，你们都已习惯，这一次犹如国内航行，或者说就是在家门口打个转。

我不会指定你们走哪一条航路。若有惊险海浪，可改走河川。按照你们认为安全、可靠的方式去做即可。

……

回想你们建造房屋的经历，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在过去（罗马帝国时代），就以多产才华横溢、品行高贵的人才而闻名的威尼斯，南面邻接拉文纳与波河（Po），东面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理想的海滩。在那里，土地因潮水的涨退，时开时闭。

你们的房子就像水鸟一般，有时浮于水上，有时收起双翼，在地面歇息。

这些并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只有鱼是取之不尽的食物。不论贫富，人人平等共享。造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屋，使你们远离那种嫉妒他人的世俗恶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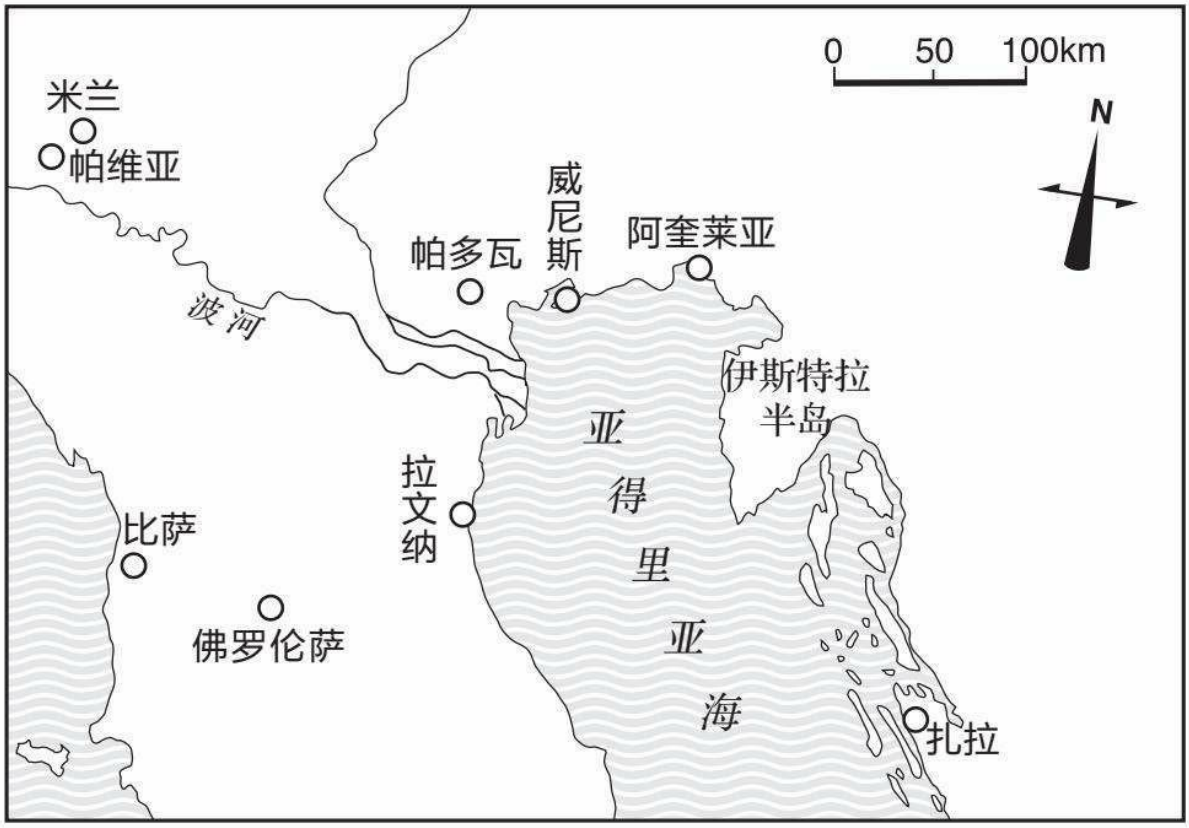
你们主要的产业是开发盐田。其他地方的人们挥动锄头和镰刀在农田中耕耘，而你们则是转动石臼磨细海盐。没有黄金，人依然可以生活，但能让食物变得鲜美的食盐，谁都缺不了。所以，你们可以卖掉盐，然后买回其他必要的生活物品。

好了，装备好你们的船，就像把家畜圈在土房里那样，将它们

系在房屋旁待命。我已经派熟悉此事的洛伦佐前往。他一旦结束那边的事务，便会加入你们的行列。别让什么麻烦或经费问题耽误了运送，尽快安排货物早日抵达拉文纳。

这样的和平生活持续了不到30年，北方蛮族一支的伦巴第人（Langobardus）打过来了。

威尼斯人虽然是为了保命，被迫迁移潟湖，但在最初阶段，大家还是希望住在靠近陆地的沼泽地带，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伦巴第人彻底摧毁了他们主教堂所在的格拉多（Grado）、赫拉克利亚（Heracleia），原以为逃进沼泽躲过灾难，一度安下心的人们，再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而且，伦巴第人从帕多瓦（Padova）到伊斯特拉，即由西向东横扫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其附近的城镇。因此，逃往潟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亚得里亚海北部

这一次，不再需要神的指点，因为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原以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可以生存。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认清另一个事实：即使是沼泽地，只要靠近陆地，仍不算安全。

后逃过来的人们与先住民一起开始迁往沼泽的中央，尽量远离陆地。从北边逃来的人，住在托切罗岛（Torcello）或布拉诺岛（Burano）；西边过来的，则住在阻断外海与威尼斯沼泽地带的佩莱斯特里纳（Pellestrina）以及马拉莫科（Malamocco）。至于里亚尔托（Rialto）发展为当今威尼斯的中心区域，则是距那以后250年之后的事情。

那个时期，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国，虽然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却保持着实质上的独立。（拜占庭帝国以拉文纳为大本营，掌控意大利。）威尼斯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船和水手，能满足所有的水运需求。

随着岁月的推移，船舶的吨位及数量不断增长，水手的技艺益发娴熟，人数势必也呈上升趋势。威尼斯人的贸易行为，多半是从最初的用盐交换生活必需品，开始转向非必需品的买卖。渐渐地，他们占据了意大利内河贸易的主要市场。

之后又发生过几次从本土的迁移，因此人口也大幅增加。原本以教堂和神父为中心，按教区（parrocchia）居住的人们，此时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教区，带领这个共同体前进的领导人。

公元697年，威尼斯人首次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元首（doge，亦译总督），威尼斯的基本政体由此奠定。之后这个通过民

选，选出终身制元首的制度，一直持续至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最初由一批难民组成的小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了自己国家的形象。

就这样好不容易撑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新生小国，首次直面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

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作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意大利都是自己的领土。查理曼的长子丕平（Pepin，史称驼背丕平）胁迫威尼斯脱离拜占庭帝国，改为接受他的统治，而且还预谋将威尼斯人赶出内河贸易。然而，威尼斯拒绝了丕平的要求。

之所以拒绝，倒不是威尼斯讲究道义。比如说稍早前因圣像崇拜问题，拜占庭帝国内发生动乱，威尼斯人就视而不见，一如既往地朝拜圣像。其实，这是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们的精明打算，拜占庭帝国满足于统治者的名分，并不干涉通商自由。所以隶属拜占庭，最符合威尼斯人的利益。

但丕平的决心非常强硬。他开始在拉文纳附近打造战船。这片哥特人、巴伦第人，甚至拜占庭帝国都没有入侵过的沼泽地，如今法兰克人要攻过来了。威尼斯人除了挺身自卫，别无他选。哪怕是拜占庭方面派兵救援，从君士坦丁堡过来，路途也过于遥远。当初以为最安全才逃来此地，如今已逃无可逃。因此，威尼斯人这一次决定不再逃跑，而是奋起反击。

迎头反击

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是闲着的。当时威尼斯中心的马拉莫科挤满了从周边岛屿赶来支援的人们。大家都很清楚，此处是敌人的首要目标。众人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内陆城镇基奥贾（Chioggia）陷入了一片火海，这反而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

然而，几乎就在基奥贾的熊熊火焰升向天空的同时，法兰克人的大型战船也驶近了佩莱斯特里纳的岸边。站在马拉莫科教堂的钟塔上，仿佛可以看见法兰克士兵陆续登陆的景象。

这时，有一个男人提议说与其付出无谓的牺牲，不如撤退。

“还能往哪儿撤呢？”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男人似乎早有打算。站在他身边附和的另外几人，看上去也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于是，大家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24小时之后，马拉莫科的街上见不到半个威尼斯人的人影。长驱直入的法兰克士兵彻底捣毁了空城，然后将之烧成灰烬。

那个时候，威尼斯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拔起了伫立在海中，原本是用来标示船舶航行区域的木桩。没了这些木桩，如果不是经验特别丰富的水手，即使涨潮时，船也很容易搁浅；退潮时，哪怕小船，也有误判航路的风险。

另一方，因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威尼斯的首都马拉莫科而士气大振的法兰克人，正驾驶着战船驶向潟湖中心，他们打算一举歼灭逃进沼泽深处的威尼斯人。此刻，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威尼斯人，已组建好船队，起帆准备迎击。就在两军的船队驶近到弓箭射程的距离之内时，威尼斯的战船突然开始后退。法兰克船队乘势往前追，威尼斯人左躲右闪、四处逃散，就这样重复了几个回合，威尼斯所有的战船与敌人拉开了距离。

法兰克人依然紧追不舍。就在这时，只听见有人大叫：“船动不了啦！”伴随着惊恐的声音，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搁浅。一眨眼的工夫，海水开始退潮，海滩上四处散落着船底深陷入泥浆的战船，场面十分凄惨。

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的法兰克士兵们，还没缓过神便看到无数只威尼斯人的小船急驶而来。原来威尼斯人早就计算好退潮的时间，换乘小船出击，因为小船在浅海上也能自由航行。一支支火箭射向无法动弹的法兰克大船，船帆很快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甲板。法兰克人想救火，却找不到水。束手无措的士兵纷纷跳下着火的大船，可一落地，双脚又陷进了泥沼里。

面对站立不稳的敌人，威尼斯人气定神闲地射出一支支利箭，犹如打靶练习。法兰克人只有寥寥几艘船能够侥幸死里逃生。因为是排在船队的末尾，所以当这几艘船看到退潮时，急忙折返外海。

滩涂上，那些烧焦的船骸仍然冒着黑烟，数以千计的法兰克士兵横尸泥沼之中。不过，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随着潮起潮落，这一切都会被冲进外海。就这样，威尼斯人在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了他们的首次战斗。

然而，威尼斯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在一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与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签订了合约，查理曼不仅正式放弃对威尼斯的领土权，承认威尼斯隶属拜占庭帝国，而且允许威尼斯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自由通商。这对于已经取得拜占庭帝国内自由经商权的威尼斯人，以及预见到贸易将是国家未来的威尼斯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胜利。

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帕维亚（Pavia）的集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从

波河溯流而上的威尼斯人的身影。他们什么都卖，据说在帕维亚的集市，甚至能从威尼斯人那儿买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御用工厂织纺的红色布帛，要知道那可是皇帝做赏赐用的名贵物品。

当海外的威尼斯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地之时，他们在国内的同胞也开始着手建设一个真正的、恒久的国家。

威尼斯人决定把国家的中心从马拉莫科迁移到里亚尔托。法兰克人的攻击，已经充分证明马拉莫科在国土安全问题上有致命的缺陷。

首先，马拉莫科面临亚得里亚海，如果敌人组成舰队，这里是守不了多久的。

其次，如果基奥贾被攻破，敌人可以沿着陆地一路杀来。尽管涨潮时两地之间的道路会被潮水隔断，但只要用古罗马时代开创的建造临时渡桥的方式，将小船连接在一起，再铺上木板，就能轻而易举地运送大量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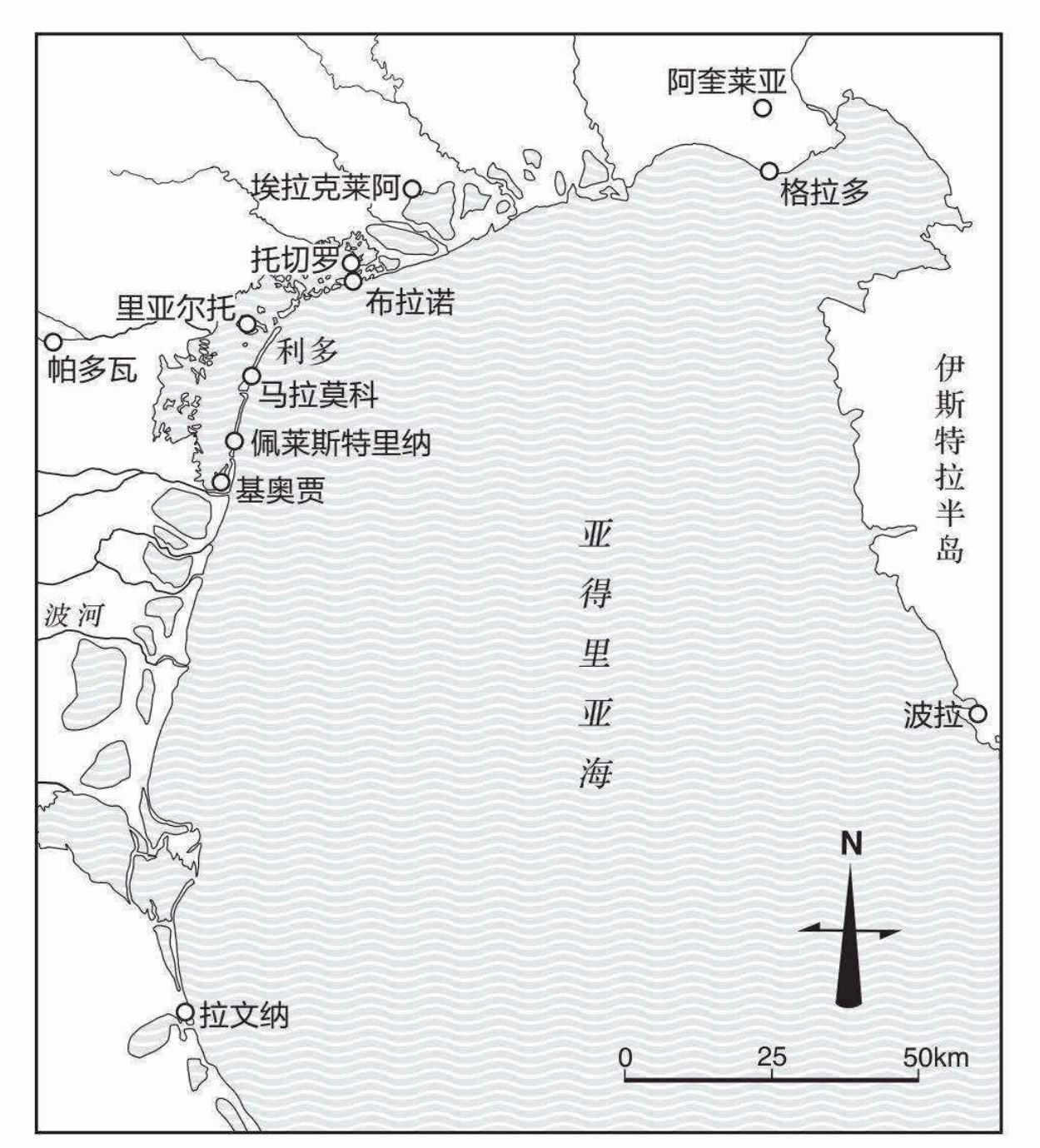
威尼斯人虽然战胜了强敌法兰克，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还是继续往潟湖的中央撤退，尽量远离陆地。

当时的里亚尔托由几个很小的岛屿组成，岛上只有渔民居住。与潟湖的其他岛屿相比，它位置偏僻，到了涨潮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陆地能露出水面。如果要把国家的中心设在此地，一切需要重新开始。不过，里亚尔托也有两大优点。

第一，它位于潟湖的中央，距离陆地最远。

第二，由于是沼泽地，不直接连接外海，非常安全。只要把通往利多（Lido）的水路建成港口，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如果再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这里不仅能抵御外敌，而且可以凭借代步用的船只，开拓海上贸易。9世纪初的威尼斯人，与他们当年为了寻找一片安身之处，四处逃散的祖先们相比，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威尼斯人在他们的第十任元首昂内尔·帕契帕索（Agnell Participazio）的带领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大迁移。在这片潟湖中，不会再有比里亚尔托条件更好的地方了。所谓背水一战，大抵如此。



当时的亚得里亚海最北端

就这样，在我们如今看到的地方，威尼斯开始了它的建设。20世纪后，威尼斯铺设了连接大陆的铁路。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一座以船代步的海上之城。

有关威尼斯人的建国，这里我会以土木建筑作为重点来展开。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于这部分内容，几乎都是轻轻带过。对他们而言，或许政治经济、社会构造以及战争的论述才是重点，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大道是怎样建设及其维修保养，便能很好地理解古代罗马人的性格。同样，如果了解如今叫作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征服之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认识土耳其，这个在15世纪成为威尼斯人宿敌的民族，会有所帮助。一个国家的建设，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建设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因此它的发展走向，决定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 住在威尼斯的人们，人格必然会变得非常独特，就像威尼斯是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
>
> ——歌德

拿破仑1797年攻占威尼斯的10年之前，歌德曾造访过威尼斯。彼时的威尼斯，国家建设和人口的增长已经结束，正走向最后的衰败。然而，歌德却说不能用肉眼去看威尼斯，而需要用心灵之眼。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人们齐心协力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了哪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的确，威尼斯是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努力的结晶。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彻底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话说回来，每一名民众都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用实际行动去

改善它，甚至加以运用吗？我想就算歌德也不会这样想。理解与行动，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唤起民众积极性需要一个“契机”。那些对行动前的“契机”不屑一顾的人，想必总是失败；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是有能力的领导者。

如果说5世纪时的威尼斯人为了逃避阿提拉，决定移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契机是神的指示。那么，又是什么契机让9世纪的威尼斯人愿意再次从零开始，为建立恒久的国家，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呢？

圣马可

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828年。名叫特里布诺（Tribuno）和鲁斯蒂科（Rustico）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将船停靠在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然，他们为生意而来。在当时，罗马教皇禁止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易，因此，这两个人等于是破坏了戒律。

他们眼中的亚历山大城，因不停的街头争斗而显得嘈杂纷乱。住在那里的基督徒，不知是不是都躲在了家里，街上只能看见口中大呼小叫，手上挥动着武器的阿拉伯人。这是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不定期发动的反基督教活动。在这种时候，即使那些被默许存在的教堂，也会遭到暴徒们的破坏。

尽管对这种情形已司空见惯，两位威尼斯商人仍保持着谨慎，带着货物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所以供奉福音书的作者圣马可的遗骸而闻名的修道院。

一位修道士战战兢兢地替他俩打开门，一脸掩不住的惊恐。其他的修道士们也吓得直打哆嗦，因为他们听说这里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圣马可的圣体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如何是好？”

两位威尼斯商人闻言，遂提出把圣体交给他们带回安全的威尼斯。

“那可不行！”修道士们摇头拒绝。正因为有圣体，埃及的基督徒们才会来此朝圣，捐献丰厚的善款。

就在说话的当口，院外的动静越来越大，突然间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门刚打开，哈里发的手下便闯了进来，差点儿撞倒了过去开门的修道士。来人说哈里发要用修道院回廊的大理石柱子修建浴室，他们傍晚前会来取走。盛气凌人的闯入者离开之后，修道士们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害怕。哈里发强征教会财产，意味着默认民众抢夺，圣马可的遗骸变得愈发危险。这时，威尼斯商人又提出了买下遗骸的要求，修道士们犹豫许久，最后终于点头答应。

两位商人随即走出修道院。不一会儿的工夫，又推着一台手推车折了回来。车上放着两个原本用来装面包的大篮子，篮里塞满了猪肉。

商人究竟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这笔生意是做成了。圣马可的遗骸被藏在篮子的底部，上面堆着严严实实的猪肉块。两位商人在眼泪汪汪的修道士们的目送之下，推着手推车走出了大门。

路上正巧遇上刚才那位哈里发的手下带领着拆柱子的工人往修道院走，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为即将到手的收获而兴高采烈的随从。

威尼斯人见状，用阿拉伯语大声叫着：“猪！猪！”伊斯兰教教徒们的脸上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纷纷让开了道路。“猪”被穆斯林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看猪便会恶心头痛，严重者甚至呕吐，尤其是见到装面包的篮子顶上的猪头，真的有人当场吐了出来。

两位商人一路上轮番吆喝着“猪呀猪”，穿过亚历山大宽阔的街道，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可这还不算结束。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必须通过海关检查之后，才能扬帆出海。检查员登上了他们的船，两位商人知道这是最后一道难关。

圣人骸骨是基督教的崇敬之物，如果让这些人发现了圣人的遗骸，势必会漫天要价。倘若不从，又可能遭没收。于是，他们不得不委屈圣人的遗骸继续与猪肉待在一起，把整个篮子放进了当作仓库使用的船底。果不其然，还没等威尼斯人解释完篮子里是水手的口粮，穆斯林的检查员便捂着鼻子跑上了甲板。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威尼斯商船安全地离开了埃及，却在靠近希腊的海域遇上了强风暴雨。小船仿佛一片树叶在海浪中翻滚，船桅吱吱作响，仿佛随时会被折断。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已脱离了猪肉，而且洗刷干净并撒上香料的圣马可的遗骸，第一次展示了圣物的奇迹。

次日早晨，出现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夏日阳光下一片宁静的希腊海。前夜的暴风雨像梦一般不见了踪影。相信这两位商人一定会对圣人的守护感激涕零，忘了他们花钱买遗骸的糗事。不知道是不是安置在船舱中的圣遗物的护佑，暴风雨之后一路抵达威尼斯一直是顺风顺水。

编年史上这样描写威尼斯人迎接两位商人带回的圣人遗骸的情景：“全城欣喜若狂。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开口便谈此事。大家都说圣人必定会守护威尼斯国的繁盛和荣光。”

从元首到百姓，威尼斯人全体动员。圣遗物在众人合唱的赞美歌声中上了岸。元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以建造圣马可大教堂供奉圣遗物。而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两位商人也作为共和国的大功臣，留名于史。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威尼斯人的信仰并不算特别虔诚。史料已经证明，像上述两位那样无所顾忌地违反教皇禁令的商人为数不少。因此，较之别国的教徒，威尼斯人是属于最远离宗教狂热的一群人。

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威尼斯人原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守护圣人（亦译守护神），叫圣狄奥多（San Teodoro）。但这位出身于希腊的圣人，在圣人教阶中，地位不高，大概只能算三流之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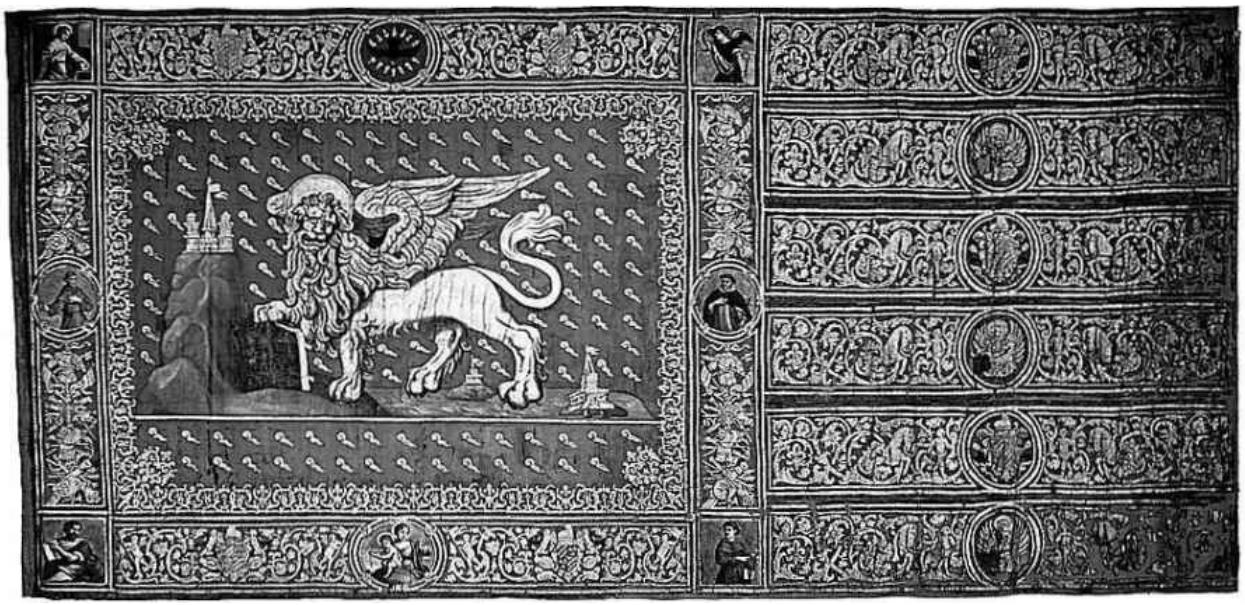
然而，圣马可就完全不同了。基督教圣人中，拥有最崇高地位的，当然是十二使徒。接下来是圣保罗以及福音书的作者圣路加、圣马可，都是一流圣人。另外，施洗者圣约翰也属于这个级别。顺便提一下，佛罗伦萨的守护圣人是施洗者圣约翰，而罗马则是圣彼得。

这下，威尼斯也有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人们的雀跃之情不难想象。他们立刻决定，让圣狄奥多退居二位，将圣马可奉为威尼斯正统的守护圣人。

福音书的4位作者都有各自的代表动物，根据《约翰启示录》记载，分别是：

圣马太——代表诞生的人类

圣路加——代表牺牲的公牛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圣马可——代表复活的狮子

圣约翰——代表升天的老鹰

这些有象征意义的人和动物都长着翅膀。

长着翅膀的狮子，圣马可的狮子绝对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把书写福音书的智慧的圣人安放于供奉他的教堂；将前爪扶着《圣经》的飞狮，作为国旗的图案。从此，这面绯色布底上绣着金丝的国旗，伴随着东奔西走的威尼斯人，四处飘扬，保存至今。除了商船必悬挂国旗之外，金币上也刻铸了这个纹章。那两位带回圣马可遗骸的威尼斯商人，不仅为祖国带来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也等于带回了国旗。至于圣人遗骸的真伪，以及是用钱买来的问题，从来无人提及。

这就是契机，它激励了人心。威尼斯举国上下，情绪高昂地投入了艰苦的国家建设之中。

海上之都

我丈夫有一位叔伯辈的亲戚曾经作为意大利建设部派遣的官员，长年在地方负责公共事业的规划建设。其职位在意大利语中叫Provveditore della Opera Pubblica。

日本的建设省或国土厅应该有类似的职位，因找不到资料，这里就不做翻译。总之，就是公共建设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派到帕多瓦、西西里，以及“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领土的地方工作时，所授的都是这个官职，唯有在威尼斯，名称变成了Magistrato alle Acque。直译过来大概是水务行政官，不过具体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这个官职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正式启用的，但9世纪威尼斯人在里亚尔托开始国家建设的时候，就有了负责类似事务的职位。被委以此任的人责任重大，因此新官上任时，会在元首带领下，站立民众面前，举行一场特别的就职典礼。

元首向聚集的国民大声呼叫：“让我们赞赏他的功绩！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倘若他不能担负起这重责大任，我们就将他绞死！”

这种轰轰烈烈的就任典礼，要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才被废止。可亡国才不过200年，如今的威尼斯城便经常浸在水里。

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对威尼斯人而言，它既是朋友，又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其可怕之势，是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走在如今的威尼斯街头，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的情景。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我租了摩托艇，绕着被称为潟湖的沼泽地带，彻底转了一圈。其实我是想乘坐贡多拉的，但由于太耗钱，又费时，最终还是选择

了现代的摩托艇。即使坐摩托艇，涨潮和退潮两段时间相加，环湖还是用了7个小时。可见，再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沼泽内也无法高速行驶。当然，去外海就另当别论了。

潟湖中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通行的。由三根粗大的木头制成的木桩，伫立于湖中各处，提示着航道，再小的船也只限于在木桩标示的范围内航行。这些木桩上刻有水深标示，傍晚之后还有电灯照明。当然这些都是现代的产物，在过去，夜间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作为通航标示的木桩，以前就有。

沿着航路前行。退潮时，可以看见收敛翅膀的水鸟，在湖两边的湿地上歇息。一旦涨潮，这里便是茫茫汪洋。一些涨潮时也露出水面的地方，杂草丛生、树木稀疏，还有些摇摇欲坠的小破屋。那里的海水几乎是静止的，仿佛腐烂了一般。想来退潮时，就会变成泥泞的沼泽地吧。

绕湖之行后，我这才明白了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对于“水务行政官”以及威尼斯人而言，是何等重要。海水必须保持流动，一旦停滞，腐烂的东西就会沉淀，成为传染病的源头。

托切罗岛在威尼斯建国初期，曾经是比里亚尔托更为繁荣的经济中心。现在如果有人想寻找威尼斯共和国昔日的景象，一般都会被建议去托切罗岛。但那里早已荣华不在，冷冷清清。这一切皆因疟疾所致。

Laguna Morta——“死亡的潟湖”，是可怕的。

有两条河注入潟湖。这意味着比海水更容易变质的河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流向湖中。再加上隔开潟湖与亚得里亚海的利多岛，一左一右，像堤坝似的环抱着潟湖。河水不仅易变质，还会带来泥沙。虽然利多岛隔开外海，解决了安全问题，但同时它也有着流沙沉淀的危险。早

在建国初的811年，威尼斯就设立专职，负责调节河水与海水的流量。这正是“水务行政官”的主要工作。

那么，为了让潟湖始终活着，威尼斯人究竟想出了怎样的对策呢？

运河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运河。

运河一词，（日本）字典里是这样注解的：“为了行船，挖掘陆地建起的水路。”苏伊士运河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在威尼斯，即使也叫运河，含义却大相径庭。讲清楚什么是威尼斯运河，也就完全解释了威尼斯的特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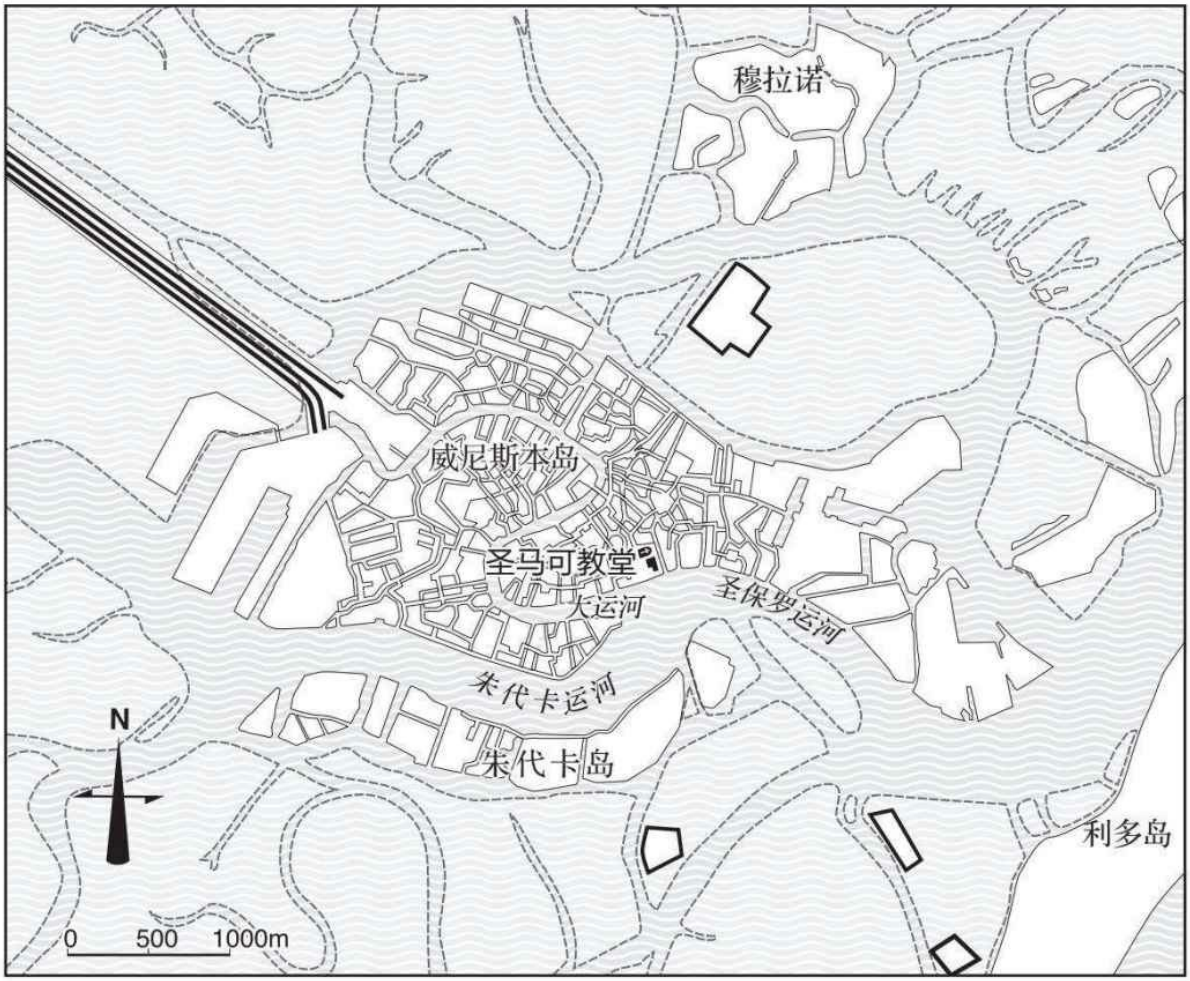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威尼斯的运河不是为了通航，而是为了通水而建。当然，河上也能行船，但那不过是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引水。

对威尼斯人而言，要日久天长地住在沼泽地，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

威尼斯运河另有一个特征，它的水路并非是掘地而成的。掘地而成的运河的确有几条，但大多数是利用岛屿和岛屿、沙洲和沙洲之间的水流，留取其最深处，再用木桩和石材加固两边的河岸。威尼斯的运河之所以多蜿蜒曲折，就是因为先有水路再开拓而成的。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把两条河流引向两侧，让组成威尼斯的众多岛屿相连，然后再填平中间的海水呢？反正那些所

谓的岛屿，不过是沙洲。人要在此居住，就必须先用木桩和石头围起来，再填平里面的海水。与其这样一个个岛屿地填，不如整个城全部填海造地。



当今威尼斯及其周边的潟湖

可是威尼斯建于潟湖的中央，还有潮汐的问题。除了定期的潮水涨退，也要一并考虑大风以及流入河中的雨水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贸然地全部填平，每当河流水量增加，又遇到海水涨潮，这两股无法纾缓的力量相互撞击，势必造成泛滥。筑起了堤防，并不等于天下无敌。为了避免洪水，必须精细地计算海水涨潮与河水的流量，在适当的地方，开凿出如梳子般密集的水道，抵消水的冲力。

如果已有现成的合适水道，就增强牢固；如果方向不对，就让它转弯。那些原本没有水道却需要水道的地方，就从头挖起。总之，水路弯直与否不是重点，始终保持水流畅通，才是目的。形状如逆“S”形的著

名的威尼斯大运河，其实就是一条自河川流向大海的水道的升级版。

这样，众多的岛屿像“寄木细工[1]”一样被拼装起来；运河蛛网般密布其间；河上建起鳞次栉比的桥梁，威尼斯城就此成形。

在威尼斯，运河有两种称呼，一般都译作“运河”。一种叫canale，如威尼斯大运河便称“Canale Grande”。另一种叫rio，威尼斯城中星罗棋布的运河，基本上都属于此类。我原以为canale与rio的不同在于天然水路与人工河道的差别，查找资料后，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好像水域较宽的称作canale，狭窄的则叫rio。

正如威尼斯建造运河的目的，是引水而非通航，像一道堤防横隔在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利多，当然也不例外地开凿了几条运河。为了“活着的潟湖”，在不破坏湖中宁静的海水的同时，还必须保持与外海之间的水流交替。

造完这些运河，并非万事大吉。从定期维护这一点来说，它比陆地道路的保养更麻烦。就职仪式上元首威胁水利官“若玩忽职守将处以绞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毕竟这是攸关威尼斯人生死的大事。

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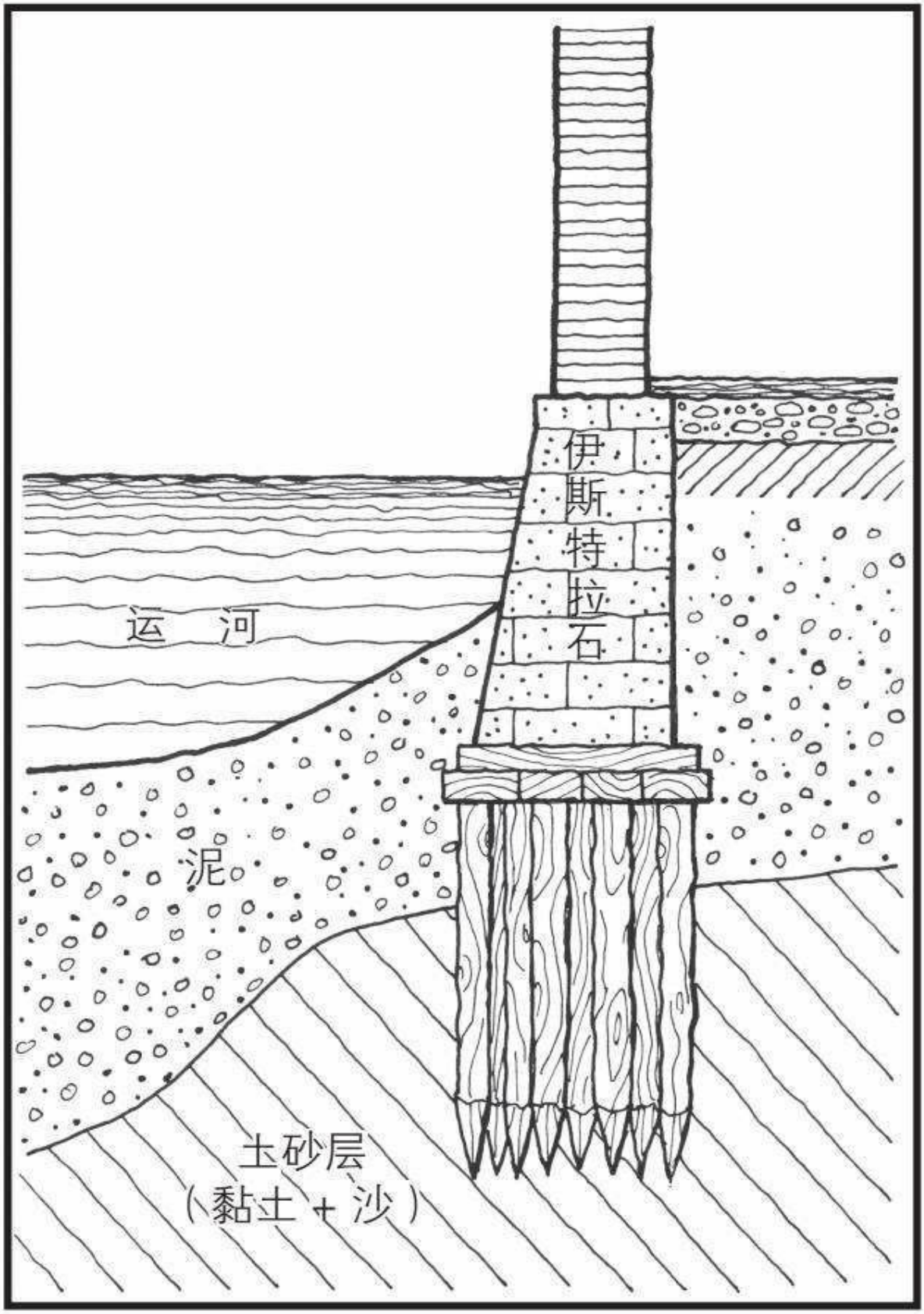
决定水路之后，接下来就是造地了。

当然，具体实施时，不可能如此按部就班。相对于由中央决定的水路建设，建设陆地一般交给当地的居民团体。这一点多少也证明了水路更加受到重视。

话说回来，造地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威尼斯人不能随心所欲

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建造居所，因为在沼泽地里建造地基，不是一个家庭能够独立完成的。

首先，需要制作大批的木桩。挑选尽量坚硬的木材，制作成25厘米粗细、2米——5米长的四方或圆形的木桩，将木桩头削成如钉子般尖利，然后，把它们密密麻麻地打进沼泽里。现在的威尼斯地下犹如老树盘根一般，仍保留着无数的木桩。尤其是在建筑物的墙壁、柱子的底部，以及运河的沿岸，木桩数量尤其多，而且特别深。


伊斯特拉石
运河
泥
土砂层
（黏土＋沙）

威尼斯的地基建设

打完桩，再挑选耐海水腐蚀的石头，层层垒上，最后在石头缝隙间灌上水泥固定。建筑物的地基以及被称为fondamenta的河岸地基，都是用这种方法建成的。fondamenta译为河岸是根据其使用目的，原意则是地基。

那些威尼斯运河沿岸的房屋，正因为用这种方式打造地基，所以看上去才像建在水面之上。

当然，在9世纪建国时，还没有非常扎实的地基建设手段，那时的石层应该比较单薄。如今环游潟湖，仍然可以在一些小岛的周围，看见如梳齿般密集地插在海中的木桩，上面建着房屋。威尼斯人的造地工程，是在进入15世纪以后为防止火灾废弃木材改用石材建造房屋，才算真正的完善。

广场

威尼斯人建起了威尼斯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居住在陆地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要介绍后来的人们是怎样移居到威尼斯的。

与逃离阿提拉和伦巴第人的入侵一样，人们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无限制地迁移，而是以神父为中心，以教区为单位地迁移。这种方式并非威尼斯人的首创，在中世纪时，基本上都是以教区为中心构成居民区。

意大利语Parrocchia（教区）指的是，以精神支柱的教会和主教为中心，加上物质面的有力支持者及其工作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伙伴和

他们的家族所组成的团体。如果把威尼斯当作一个生物体，那么教区就是生物体的细胞，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12世纪。教区数量最多的时候在70个以上，每个教区平均的人口大约是1500人。

直至12世纪，教区似乎都保持着相当强的自主性。以元首为长的共和国政府，就是由教区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虽然在哪里开凿运河由中央政府决定，但是造地以及街道的建设却属于教区负责的公共事业。

各个教区所在的居民区建设，首先是从决定教堂的位置开始。意大利语称campo的广场，建在教堂的正前方，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做弥撒之后的聚会地，也是市场。无论宗教活动还是买卖，居民所有的集会活动都在广场上举行。

在意大利语中，广场通常被称为piazza。可是在威尼斯，除了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其余的都叫campo。这可能与初期的教堂广场上种植树木、饲养家禽有关，因为campo的词源就是“农田、田园之家”的意思。不过，进入15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campo（广场）都铺上了石板。

广场的正面，当然是教堂。其他面向广场的地方，是权势者的家宅以及小型造船厂。不过，广场旁边占地面积比教堂更大的地方，必须留给运河，这也是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如今，一些地方已被填平，不见踪影，但是在当年，视“活着的潟湖”为生死大事的共和国时代，广场边上总有运河流过。在威尼斯，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的运送，都必须依赖水上交通。运河因此理所当然地与人们精神生活中心的教堂，享有同等的待遇。广场上建有阶梯，可以下到运河，算是简单的登船口。

广场至少会有两条被称为calle的小路，连接教区的中心广场及其后面的普通民宅。在这一片背对广场的居民区中，也随处可以见到campiello（小广场）或corte（空地）。为了尽量利用土地资源，威尼斯的房屋一般都造到四五层高。这些空间除了是妇女和儿童的休闲地，也给楼宇林立的环境，带来了阳光和清风。通常，这些小广场都不面向运河。

小广场不是市街的尽头。正如渔网般纵横交错的运河，再怎么弯弯曲曲，最终会流入大运河或大海，在威尼斯只要用脚走路，必有捷径可寻，没有什么死胡同。

无论小广场还是空地，一定会有两条方向相对的小巷。广场小，巷子自然也很狭窄，就像歌德所形容的那样，只要抬起双肘，就会碰到两旁的建筑。还有一种穿插在建筑物楼下叫作sotoportego的小路，初来乍到的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种小路的。

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广场，眺望着四周的楼房，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个人，穿过广场，消失在小巷里。遇到这种情景，我总是会忍不住地生发联想。

一位杀了表兄弟佛罗伦萨公爵的年轻人，逃到威尼斯避难。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自然不会放过他，派杀手追到了威尼斯。

某一个夜晚，久未外出的年轻人，出门办完事后急急地往回赶。就在他离开贡多拉，从广场拐进小路时，发觉背后有人，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感到危险的年轻人加快脚步，跑到了提着油灯替他照路的仆人的前

头，眼看着离他那位于广场一角的藏身之所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只听见身后一声惨叫，年轻人回头张望，借着掉在地上的油灯发出的光线，看到仆人倒在血泊之中。

年轻人刚想敲门进屋，三个戴着黑色面具、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围了上来。年轻人拔腿狂奔，即使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儿跑。穿黑色斗篷的男人们紧追不放，最后，他跑到一片空地，绕着中间的一口水井不停地躲闪，全身的力气几乎耗尽。至此，追逐者与被追者都认为是逃无可逃，三名刺客一语不发地拿起刀剑，年轻人闷声倒地。

周围的人家门窗紧闭，一片漆黑，应该没有目击者。刺客们放心地取下面罩，他们的脸暴露在暗淡的月光下。

突然，他们觉察到一丝异样，抬眼环顾四周，只见空地的一角站着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水手。这位小酌了几杯，带着微醺往家走的水手，原本想抄近路，没料到遇上了杀人现场。

刺客们立刻反应过来，不能放过目击者。因为被杀的年轻人作为政治流亡者，已经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庇护，如果威尼斯政府知道他是被佛罗伦萨人所杀，绝不会就此罢休。只有杀人灭口了。

三人向水手奔去。水手可不是不谙地形的外来者，他成功地逃脱了刺客的追杀，但还是暴露了长相。就是从那天晚上起，这位名叫安德烈亚（Andrea）的水手，开始了他惶恐不安的日子。

以上是历史真实事件，刺客的模样以及目击者的部分，则是我个人的想象。总是在那些非专长的土木建设中打转，似乎会抑制作家的想象力。偶尔我会情不自禁地去联想一些故事、一些可能发生的场景。

好吧，还是言归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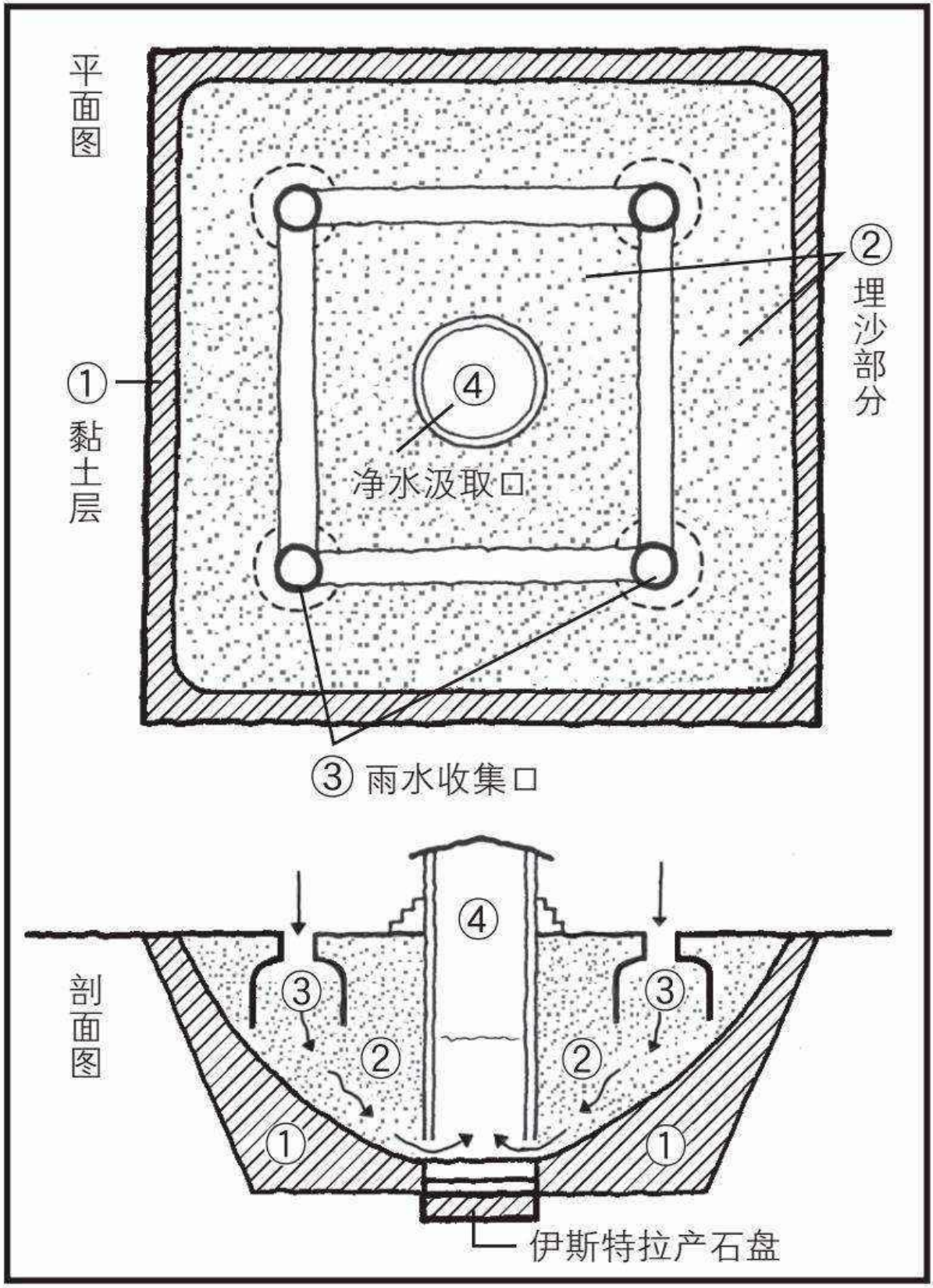
水井

教区居民的另一项共同事业，就是挖掘水井，意大利语称“pozzo”。在威尼斯，无论大小广场还是空地，中间一定会有一口水井。

将“pozzo”译作水井，我多少是有点儿犹豫的。（日语）字典中对于水井的注解是：“挖掘地面，开采地下水的构筑物。”这个注解适用于日本和意大利其他的地区，却不适合威尼斯。因为威尼斯的水井，不是开采地下水，而是贮存雨水，再做汲取。或许译成蓄水槽更妥当。不过，既然威尼斯人将海外殖民地的城塞里用来汲取地下水的水井和国内贮存雨水的蓄水槽，都称为“pozzo”，那么我就决定将它译作水井。

威尼斯到底有没有地下水呢？答案是：虽然水质不怎么好，有还是有的。然而，开采地下水会导致地基下沉。即便是为了保证饮用水这个重要目的，但对于煞费苦心建造起地基的威尼斯人而言，破坏地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威尼斯人运用开采盐田的经验，开创了威尼斯独特的水井。

首先，在广场中央，挖出一个尽可能大的正方形的深坑，做成水池。接着，用黏土将水池的内部固定成一个炒菜锅锅底似的形状，这个黏土层主要是为了隔开地底下渗进的海水的盐分与储存的雨水。完成黏土层后，再向池中灌入大量的沙子。


平面图
①
黏土层
②
埋沙部分
④
净水汲取口
③ 雨水收集口
剖面图
④
③
③
②
②
①
①
伊斯特拉产石盘

威尼斯水井

接下来，将一个上方四角开洞，下方无底的箱子埋入沙中。地面上的雨水会流入洞内，经过沙层过滤后，沿着炒菜锅锅底般形状的黏土层，汇集到水池的中央。池中央装有耐海水腐蚀的伊斯特拉产石盘，过滤后的雨水储蓄在石盘上，逐渐注满水井，等着人们汲取。

时至今日，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广场的石子地有微微的倾斜，倾斜的角度正朝着水井上四个雨水的入口处。威尼斯的广场建设之所以比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他国起步早，是有其切实原因的。

在气候干燥的意大利，威尼斯属于湿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如果只是饮用水，水井足够满足需要。可是除了饮用，人们还有洗涤、卫生等需要，仅是厨房的用水量，就相当可观。这些生活用水是利用一根从屋外看不见的管子，把落在屋顶的雨水引入屋内。通常，储水桶会放在厨房边上。

而下水则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运河。在威尼斯共和国千余年的历史中，政府曾数次颁布命令，规定下水道排放口的高度，不得低于涨潮时的水线。否则，涨潮时下水道内的浊物会倒流回屋内，那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如今威尼斯的下水道仍然是直接排放到运河。想到这点，印象中美丽的威尼斯不免魅力大减，但朝夕的潮流，是它天然的清洗方式。从建国之日起就把“活着的潟湖”作为至高使命的威尼斯人，从来没想过海水会有停止流动的时候。因此，污水会随着潮汐带到外海，人们不会连日被恶臭所困。与同时代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威尼斯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准。

由于大多数威尼斯人按教区居住，因此在事实上消除了因贫富差距分区而住的现象。一直要到进入12世纪以后，有钱人才开始在自家的庭院内挖井取水。在此之前，生活中最重要的饮用水，都是大家共同享用的。

另外，在沼泽地带建造房屋，需要众人齐心合力。因此，应该是在很早的时候，威尼斯人就丧失了土地私有化的观念。建国初期，威尼斯和别的地方一样，也将那些拥有不动产的人，认定为有产阶级。但这些人所持有的地产不在威尼斯，而是在本土。在12世纪前后，威尼斯人大胆地展开了第二次国家建设，没有土地私有化观念，或许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运河以及造地建设中，可以看出威尼斯是一个政府“行政指导”非常强势的国家，但是它的市街却没有单一化的格局，正是因为教区制。

那些认为城市应该如棋盘般整齐如一的人，或许不会喜欢威尼斯迷宫般的街道，但它却是一个不会令人厌倦的城市，在那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为规划所无法呈现的自由形态。

国家建设

威尼斯除了盐和鱼，连打造地基的木材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威尼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自给自足。不过，威尼斯日后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不在意国家是否能自给自足。

一般而言，国家大致分为陆地型和海洋型两种。我认为，可以从是否有自给自足的概念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不同。

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产生交换的思想，至少不会深入人心。这类国家发展的最终归结，就是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对他们而言，侵略他国，不过是扩大自给自足圈而已。

鉴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在那里，生活用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扩张领土，最终只落得资源的浪费。

除了盐和鱼别无所有的威尼斯人，对自给自足概念的不在意，势必是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过，如果教区制作为威尼斯国家的主要生活形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因为教区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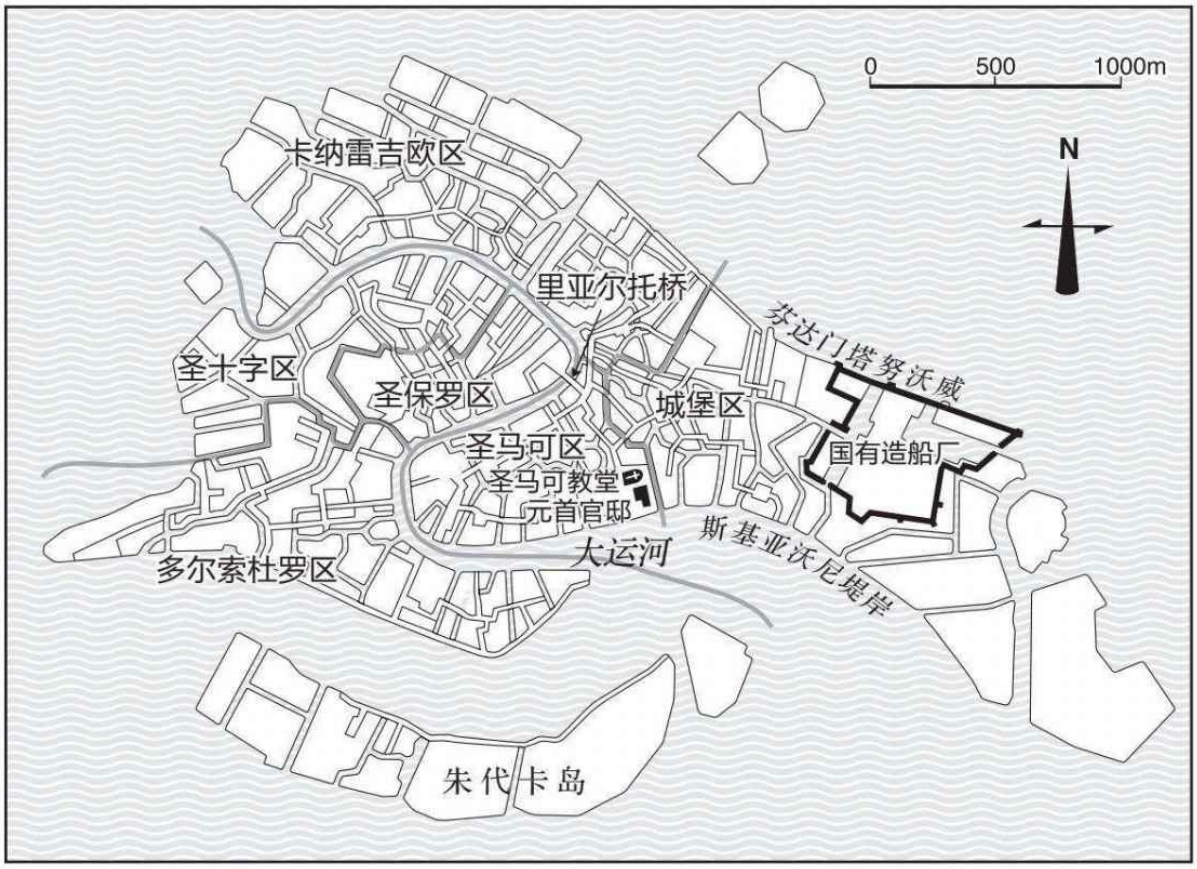
每一个教区有教堂，商业行为在权势者家中进行，同时伴有宗教活动。教区中配备了销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从木工、泥水匠、教师（神父）到助产士，各行业人员齐全。甚至还有小型的造船厂，连船都无须求他人打造。换言之，教区几乎可以满足居民所有的需要，生活形态与从前日本的村庄，准确地说，与欧洲的乡村大抵相似。

这种状态，在进入12世纪时发生骤变。作为居民共同体的教区的功效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Sestiere的行政区制度。

当然，教区并没有就此被废止。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中，绝不会抛弃以前的生活形态，这成了威尼斯国家的一个行政特色。教区居民仍然拥有自己的教堂，举行各自的宗教活动，各教区的集市一如既往地照常营业。不过，生活所需在教区内得到满足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变化叫作威尼斯走向都市化。我坚信，进步所需的一切能量，唯有从都市中产生。换言之，只有在彻底放弃自给自足的地方，才会产生进步的能量。

以呈逆S型流动的大运河为界，威尼斯分成两大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三个被称作Sestiere的行政区，总共6个行政区，因此叫六区制。



威尼斯的行政区（六区制）

大运河北边的三区，由西向东，首先是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

接着是以流经里亚尔托桥到圣马可大教堂和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后面的运河为界，西临大运河的圣马可区，这里是威尼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从圣马可区再往东延伸，是造船厂以及港口集中的奥利佛洛区

（Olivolo），又称城堡区（Castello）。

大运河南面的三个区，分别是位于经济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圣保罗区（San Polo）及其西北面的圣十字区（San Croce），以及包括朱代卡岛（Giudecca）在内的南面一带的多尔索杜罗区（Dorsoduro）。

1171年制定的六区制，一直沿用至今。数量超过70个以上的教区被编入各个行政区，但仍保留了教区的名字和大部分活动。六区制与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区制最大的不同是，它纯粹是由于行政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

在开始实施六区制的同一时期，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的模样以及美丽的玫瑰色元首官邸修建完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此确立。

比政治中心稍早建立起来的，是位于里亚尔托和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作为贸易用的港口。此外，国有造船厂（arsenale）也完成了建设。对于作为海洋国家正在崛起的威尼斯而言，造船无疑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伴随着这些变化，一种不同于以往教区制的居住形态开始产生。

如今的威尼斯只是一个观光都市。要说它有别于其他同类城市的，应该就是大运河。征服了威尼斯的拿破仑将大运河定为国宝（这个法律保留至今），只要是去过威尼斯、曾经坐船游过运河的人，想来都会赞同他的这个决定。

不过，相对于大运河本身，河两岸比肩而立的豪华宫殿更引人注目。人们眺望着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想象着当年那些富豪们是如何不惜重金，在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建起一座座豪宅。

为了美化自己的居所，这些富豪们的确是大费周章，以至于我们来往一趟大运河，即浏览了一遍整个威尼斯的建筑史。然而，这一切不是从开始就有意而为的。富豪们在运河两岸兴建豪宅，并非为了炫富，而是由于生存与繁荣的需要。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基于其必要性而存在。按这个思路去观察，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威尼斯人。

12世纪开始的国家建设，可以看作威尼斯建国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威尼斯的商贸活动，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改变，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

威尼斯的有产阶级，原本是依靠在本土的地产而获得收入。不过从很早开始，这些人就将一部分收入投资贸易，只是投入的金额很小。随着河川贸易的兴起，他们投资于贸易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逐渐上升。这个比例逆转之时，正好是12世纪，威尼斯作为海洋国家就此诞生。

大型船成了必需品。商船最好能直接停泊至交易地。于是，那些建在运河沿岸的小型造船厂、石材工房，奉命迁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地主变身为贸易商的人们，他们将原本面向教堂广场的居所，搬到了大运河的两岸。当时的大运河，可以停泊200吨位的船只。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大幅度地增高，因为它必须承担灯塔的职责。为了保证从外海经利多港进入潟湖的船舶的安全，到了晚上，钟楼便点火照明。在里亚尔托，架起了开关式的木桥。以此桥为中心的运河两岸，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前在这一带销售鲜鱼和蔬菜的市场搬到了别处，曾经充斥着鱼贩子和女人们喧嚣的地方，变成了希腊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各种语言混杂的国际市场。（如今这

里又恢复为菜市场。）

人们的居住状态，与从前以教堂为中心的教区时代相比，也不得不发生改变。

以贸易为生的家庭原本居住的那种入口朝向陆地的房子，已经不能再满足需要。为了提高物资运输的效率，房屋必须有一个朝向运河的入口。如Casa Fondaca（住居兼仓库）一词所示，居所和工作场所不得不合二为一是由于威尼斯的土地有限。

进入面向运河的正面大门，首先是前后贯通的中庭，周围并排而立的房间，既用作仓库，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另外还有一个入口可以从中庭通往外面的小路。中庭并不宽敞，中央照例有一口水井。

中庭内建有台阶，拾阶而上，先是回廊，廊柱后面是来客用的房间、主人家客厅以及食堂等。再往上一层，是主人的卧房，最顶层则是仆人的房间。通常大商人家的房屋格局便是如此。

现在，如果想不受拘束地参观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去威尼斯最高级的酒店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昔日的中庭，如今天井已覆上了玻璃。坐在酒店的大堂眺望四周，让人不禁相信传说中的深闺大小姐是真正存在过的。小姐们只要站在一楼的回廊，便可以随意饱览楼下在中庭干活的男人们。同样，楼下的男人，透过哥特式廊柱蕾丝般的镂空雕纹，望见影影绰绰的美人，也会怦然心动吧。这类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将富商们建在大运河沿岸的一栋栋豪宅算作头等区域，那么在这些建筑背后，无须面对运河仍然不影响营生的工匠、日用品商贩的住家则属于次等区域。

第三等则是造船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人们的居住区。这一带靠近Fondamenta Nuove（新河岸）。新河岸与大运河方向相反，是私营造船厂的聚集地。

尽管居住地有所不同，但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过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平民区。因为大多的威尼斯人必须将住所的底层用于工作，所以自然是选择最适合工作的地点而居。

大运河沿岸能建造的房屋数量有限。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国有小麦仓库的建造，优先于任何大富商的公馆。因此，对于商人们而言，哪怕是住在货船可以进出的小运河边上，就很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客乘坐的贡多拉驶进狭窄的小运河（rio）时，眼前会突然出现豪华大宅的原因。

桥

教区制转为六区制，产生了一种威尼斯独特的副产物——桥。

在各教区独立的时代，教区内的运河上虽然建有简单的桥，但要去其他教区，只有靠船移动。在各个教区编入6个行政区，即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成型之后，自然不能再依靠船来连接全域。桥成了需要，而且是无数的桥。

最早的桥是木造的，不是那种仅用于渡河的呈水平状的桥，而是犹如屋顶般隆起，以便于桥下行舟。到了13世纪末期，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桥都变成了拱形石桥，除了横跨大运河的里亚尔托桥依然是中间可以开合的木桥。不同于其他狭窄运河上的桥梁，里亚尔托桥的桥下有大型船通过，而当时的技术尚未能解决桥身高度的问题，因此一直要到16世

纪，它才被改建为石桥。

尽管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桥，但运河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少。的确，依靠陆地解决人的移动以及物质运输的比例不断上升，但运河的使命是保证“活着的潟湖”。12世纪的威尼斯人连接国土的方式不是填平运河，而是在它上面架起了无数的桥梁。

于是，由150个以上的岛屿、近180条运河以及410多座桥梁所组成的威尼斯就这样诞生了。其他城邦国家以墙围城，而威尼斯的城墙就是水。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说此话的，是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

的确如此。这两个被视为文艺复兴双花的共和国，差异之大，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同样出自意大利人之手。

我打算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启示，将威尼斯当作一个人，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来讲述它是如何以建国时所培养出的人格，去面对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不同。佛罗伦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只要汇总各路英雄的事迹，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家历史。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反英雄的国家。从人格上来论述它的历史，相信是唯一的方法。

接下来的第二章，讲的是威尼斯人走向海洋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

当初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求生的威尼斯人，在付出艰辛努力，克服了困难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将不利的因素转变为有利的武器。对他

们而言，那就是走向海洋。从河川贸易，转向高风险、高利润的海洋贸易。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为《启示录》中预言的即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降临的巨大灾难而惊慌不已。

---

[1] “寄木细工”是日本箱根地区一种传统的工艺。选用不同材质的木材，利用天然色差拼出各种图案。——译者注

第二章
走向海洋

打击海盗

靠海洋致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经商，另一种是当海盗。

新生的海洋国家威尼斯，选择了前一种方法。因此，他们首先要应付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到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打击海盗——这对于决定走向海洋的威尼斯人而言，是继建国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级规模的重大事业。

我曾经去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旅行。那里以前是南斯拉夫的领土，后来分别属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掠过眼前无数的峡湾及其复杂的构造，与对岸的亚平宁半岛从威尼斯向南至布林迪西（Brindisi）呈平缓曲线的地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海盗而言，这里地形肯定是绝佳的基地。他们埋伏在峡湾里，一旦收到发现商船的情报，立即驾驶快船出击。抢劫之后，也不愁没有藏身之地。难怪海盗猖獗的地区不在亚得里亚海西岸，而是集中于东岸。10世纪时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是因拜占庭帝国的衰退而势力渐长、逐渐南下的斯拉夫人。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人要想与东方做生意，除了穿越亚得里亚海以外别无他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东岸海盗猖獗，为什么不避而远之，沿着西岸航行呢？

从航海必需的诸条件来看，西岸就算能走，也不是一条理想的航线。与大洋上风向很少改变的贸易风（信风）不同，地中海，包括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风向，时常不定。在这片海域航行，几乎没有连日顺风扬帆的可能。为了等待顺风，船必须经常靠岸停泊。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商船不得不选择沿岸的航路。与海岸线平坦的西岸相比，东海岸岛屿众多，到处有深入的峡湾，对避开逆风非常有利。总而言之，对海盗有利的地形，对水手同样有利。

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并非赶走他们就了事了。为了确保商船一路的安全，必须建立停泊港，即基地。公元1000年前后，一个同时可以击退海盗与建立基地的好时机来临了。一位年轻人以万全的准备和果断的行动，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皮耶托·奥赛罗（Pietro Orseolo）15岁的时候，其父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当选为元首。可是两年之后，原本就信仰笃厚的奥赛罗一世，放弃了元首大位，隐遁修道院。13年以后，儿子当选，时年30岁，是史无前例的年轻元首。

公元991年就任元首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势都很不稳定的国家。

当时的欧洲世界两股势力拉锯。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自诩是古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凡事必争，互不相容。

尤其是威尼斯，政治上附属于拜占庭帝国，地理上接近神圣罗马帝国，立场非常微妙。经过漫长的岁月，威尼斯已积累起相当的海上实力，因此也成了两股势力拉拢的对象。不管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威尼斯国内培植各自的支持者。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画像

鉴于政治上或是地理上的理由，威尼斯国内原本就存在着支持拜占庭帝国以及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派系。再加上外部的煽风点火，内

部的矛盾愈发激烈。在皮耶托·奥赛罗二世上任前的半个世纪，两派之间的流血纷争从未间断，甚至有元首因此遭流放或被刺杀。奥赛罗一世放弃元首的地位，隐居修道院，也许就是为了逃避派系间的斗争。

然而，年轻的元首与其父不同，他没有逃避。那时的威尼斯，或许可以说是面临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国内各派纷争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向来是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特色。如果威尼斯不是在这当口消除了动乱的根源，它会像其他亚平宁半岛的国家一样内患连连，不可能在日后成就宏伟大业。年轻的元首为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但不鲁莽。打击海盗，不仅是赶走他们，就像金币有正反两面，确保商船的基地，才能真正解决海盗出没的问题。

以前，也有几位元首亲自率领战船出海讨伐海盗。但结果都是胜负参半，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保证商船航行安全优先的考虑，威尼斯甚至像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其他城市一样，每年向海盗支付贡金。然而，这种做法是承认自己弱势的立场，属于一种最不可靠的保证。彻底摆脱近邻的威胁，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初上任的元首，虽然没有立即出征，但他停止了向海盗交付年贡。与此同时，为即将展开的行动，开始了周全的准备。

奥赛罗二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992年5月，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和从前的一样，威尼斯共和国在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依然维持作为拜占庭帝国附属国的地位。经济上，继续享有在拜占庭帝国境内通商的自由。如果这项条约仅仅是对以往内容的再确认，就不能将之称为奥赛罗二世的胜利。之所以说胜利，关键是以下的条款：

威尼斯商船停靠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港时，只需要交纳两苏尔多（soldo）金币，加上离港时的15苏尔多金币，合计17苏尔多金币。

在此之前，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等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支付30苏尔多金币的码头税。如今可以节省13个苏尔多金币，而且只有威尼斯的商船享有此特殊待遇。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中心地。少了近一半的码头税，对于威尼斯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笔极大的红利。威尼斯商人与他国商人的待遇差别，显示在他们销售的从东方带回的商品价格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成了威尼斯海洋贸易飞跃性发展的一大基础。

在享有优惠的同时，威尼斯也被要求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这项义务不仅对威尼斯人无害，反而是他们内心期待的结果。拥有广阔领土的拜占庭帝国，东面有塞尔柱土耳其（Selçuklu）的威胁，南面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始终麻烦不断。因此，它打算利用威尼斯的海军，来保护其西部的领土安全。

驱除斯拉夫、撒拉逊（Saracen）海盗，取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原本就是威尼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就算拜占庭帝国不提出要求，他们自己早晚也要出手解决。现在，帝国给了一个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务，对威尼斯而言，以后就是师出有名了。

师出有名的功效，不在于行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而在于可以巧妙地掩饰真正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在事前堵住周边那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的强国的抗议之声。

元首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却深谙外交之道。选择盟友，最好是强国，而且离威尼斯越远越好。因为就算是国力不强的盟友，多少也会被

其所牵制。如果对方是大国，则更是后患无穷。邻近的盟友，往往比邻近的敌人更难对付。

元首结交远方盟友的政策，保护了威尼斯。如果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日后势必会卷进引发西欧动荡的皇帝党（Ghibelline）与教皇党（Guelph）的争斗中。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在地理位置上离威尼斯更近，同时也是威尼斯人销售东方商品的大主顾，即便不做朋友，也不能让它成为敌人。

在与拜占庭帝国签订条约两个月之后，元首没同国内的亲西欧派做商量，直接派使节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向皇帝提出请求，希望他能保证威尼斯商人在帝国国内，即西欧境内经商的自由。

自查理曼以来，神圣罗马帝国一直给予威尼斯在其境内通商的自由（虽然有中断的时期）。威尼斯只是对以前的保证，来做再次确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无须威尼斯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相对于有需求的拜占庭，这份保证不太稳定。

4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Otto III）访问意大利，元首奥赛罗二世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奥托皇帝能做他儿子的教父，并将年幼的长子与信件一并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为了感谢皇帝教父的关照，奥赛罗二世将长子的名字皮耶托，改为奥托涅（奥托的意大利语读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为孩子命名之父与教子的关系，形同亲生父子。他的此番举动，是向神圣罗马帝国表示双方在精神上的紧密关系。

事前准备已经布置周全，接下来就是捕捉时机，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个好时机，正在一点点地成熟起来。面对拒绝缴纳年贡，背后又有拜占庭帝国撑腰的威尼斯，海盗们改变了战术，放弃海上的正面交战，换成陆上抢劫。那些遭海盗施虐的小城人民苦不堪言。

这些小城市在政治上隶属拜占庭帝国，人民自认是拉丁民族，与那些南下的斯拉夫人不同。既然宗主国的拜占庭鞭长莫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向同为拉丁民族的威尼斯求救。而威尼斯共和国奉拜占庭皇帝之命，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卫，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僭越。

海上的高速公路

公元998年5月，耶稣升天节当日，彼时37岁的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率领着众多军船，从威尼斯港扬帆起航，驶向目的地扎拉（Zara）。在那里，亚得里亚海东岸城市的20多位代表正在恭候他们的光临。为获得保护，这些代表将宣誓效忠威尼斯。

宣誓仪式庄严隆重，唯独缺少了莱西纳（Lesina）和库佐拉（Curzola）两个岛屿的代表。

仪式结束后，元首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威尼斯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未效忠的两岛的居民不得不俯首称臣。所幸，威尼斯军队的做法有别于当时战争的惯例，他们不杀投降者。

海盗被彻底打败了。实际上，在威尼斯军溯河而上，展开大规模歼灭活动之前，斯拉夫海盗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人们不用再为海盗的袭击而胆战心惊。拜占庭皇帝非常满意这次的胜利，为犒赏奥赛罗二世的辛劳，赐予他“达尔马提亚公爵”（Duke of Dalmatia）的封号。

在如此天时地利的好条件之下，换作欧洲其他地方，势必会立即展开征服领土的行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却没有这样做。或许应该说，

人口不足5万的威尼斯，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对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诸城市，不管是自愿臣服，还是靠武力征服，只要对方宣誓效忠，威尼斯共和国都给予它们几乎完全的自治权。威尼斯承担海上维安，而这些受到保护的城市，则同意向威尼斯提供港口、淡水、食物以及船员。

当时，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地方出身的船员居多，威尼斯至今还有一个叫作“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的港口。

不仅是地名，亚得里亚海东岸各个城市，几乎都维持了原来的政治体制，法律、风俗等一切不变。大概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先属于古罗马，后属于拜占庭的同种文明圈，所以这种统治方式才能成功。事实上，威尼斯打击海盗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流血之后，立即用智慧想办法将昔日的敌人化为今天的朋友。

维安任务名义上是保护他国，实为保护自己。但对威尼斯而言，长期扮演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角色，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从北向南，沿线建起坚固的城塞。这些地方包括了波拉（Pola）、扎拉、希贝尼克（Sibenik）、斯帕拉托（Spalato）、莱西纳和库佐拉两岛、拉古萨（Ragusa）、卡塔罗（Cattaro）、斯库塔利（Scutari）和位居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发罗纳（Valona），以及加莱船（galley，桨帆船）一天航行所能抵达的城镇。港口附近，需要建造可以维修船舶的造船厂和存放货物的仓库。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那些地形复杂的峡湾、港湾深处等战略要地建立起无数的要塞或高塔，地形越复杂，所需要塞和高塔的数量越多。时至今日，我们去这一带旅行，还能见到当年威尼斯人建造的要塞遗址。要塞遗址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旅游者一路走到意大利本土时，再也激发不起好奇心。这些要塞造得都很结实，近年发生的地震，对它们也没有任何影响。可见，威尼斯人不仅擅长经商，建造要塞的技术也非常了得。

米兰
0 100 200 300km
N
威尼斯
波雷奇
费拉拉
波拉
西尼亚
比萨
拉文纳
佛罗伦萨
亚得里亚海
扎拉
安科纳
希贝尼克
斯帕拉托
莱西纳
罗马
库佐拉
拉古萨
卡塔罗
斯库塔利
乌尔齐尼
那不勒斯
阿马尔菲
巴里
都拉佐
发罗纳
奥特兰托
特拉帕尼
巴勒莫
墨西拿
科孚岛
普雷韦扎
帕特拉斯
西西里
圣塔莫拉
凯法罗尼亚
锡拉库萨
伊奥尼亚海
摩利亚
马耳他
莫东

公元1000年前后的亚得里亚海周边图

就这样，威尼斯通过在陆上建立起的要塞和海上巡逻的军舰，成功地担当起了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责。担任“警察”意味着成了大国。从此之后，直到18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称为“Golfo di Venezia”，即威尼斯湾。所以在中世纪的地图里，是找不到“亚得里亚海”的。

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曾经这样评价过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之所以能长期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因为威尼斯人没有像商人般依赖金钱，而是靠鲜血换取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有人因此讥讽布罗代尔过分情绪化，不像学者。我觉得是这些人不懂亚得里亚海的历史。斯基亚沃尼人没有反抗威尼斯的统治，或许是因为彼此都是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同属拜占庭文明圈的拉丁民族，但这个地区不久之后成了匈牙利王的领地。另外，从南意大利到西西里一带，先后也被阿拉伯人、诺曼人（Normans）所统治。与这些征服者的统治方式不同，威尼斯不征用被占领区的人民当士兵，仅这一点就很不利。因此说威尼斯“死守制海权”，绝没有言过其实。

话说回来，由于只考虑军事上的意义，一开始我对“死守制海权”，尽管大脑能理解，心里却总也产生不了共鸣。为此，我走访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各个城市；在逐一调查了威尼斯人留下的遗迹之后，才全身心地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即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在海上建设“高速公路”。

在现代，陆地上的高速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加油站，

甚至还设有零部件齐全的小型修理工厂，以便故障车辆的应急处理。人们出行前，不必带上大量的三明治、饮料等食品，公路沿线不仅有餐厅、商店，就连汽车旅馆和简单的诊所，不用离开高速，也都能找到。在彼时，威尼斯人打算在海上实现的就是这种保证旅行安全和节省时间的出行方式。

现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们只要跑到有SOS（国际求救信号）标示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附近的加油站，就会有救援车来。当年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有类似的应急措施。只要船不偏离既定的航线，悬崖上的要塞便能接到求救信号，派出救援船去抢救。除了应急，还有预警机制。就像现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张贴的例如“亚平宁山（Apennines）大雪，请使用防滑链”等告示一般，在威尼斯商船途中停靠的港口，会对航船前往的目的地的政局、是否需要加强武装等做事先的提示。向航船提供有效的情报，是停泊港的职责之一，或许应该说它是威尼斯驻守各友邦的领事们（Consul）的最重要的工作。

情报的来源，除了一部分来自本国，大多来自进港船只的船长们的报告。向领事提供消息，是船长的义务。不过天气报告不在要求之内，这大概是因为即使不听消息，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只要望一望天空的模样，闻一闻大气的味道，就能推算出未来三天吹的是不是scirocco（从非洲吹向南欧一带的非洲热风）了。

历史上以高速公路模式的建设事业，唯一可以与威尼斯媲美的，是古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大道。两者都是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理念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罗马道路大多建设于未开化地区，因此必须在马车一天的行程距离内，定点建造住宿及其他服务设施。而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则是选在已存在城镇，整顿原有的设施，不需要从零开始。

不过，威尼斯人的任务不能说就一定比古罗马人轻松。顺便提一下，英文mansion（大厦、宅邸）的词源，就是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罗马大道旁的住宿地。欧洲现在不少的城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街道沿线

的客栈发展起来的。对于务实民族而言，不管是新建或改造，理念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威尼斯人只满足于鱼和海盐的买卖，是不用如此劳师兴众的。但倘若想以地中海为舞台拓展生计，那么就必须将海上航线高速公路化，并且防守得固若金汤。对威尼斯人而言，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番大业的基础设想及其实践，来自一位30多岁的青年，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年轻，才不会产生明天可能会死之类的消极想法。30岁伊始，以后至少还有20年的寿命，所以能制订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虽然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担任元首17年后死去，但他所指出的方向，一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在长达800年的岁月里，始终是威尼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政策。

威尼斯的“高速公路”，借由200年后发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经希腊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彻底完成了建设。（有关这部分，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叙述。）这很好地证明了在整个欧洲充斥着十字军思想之际，威尼斯仍未丧失其一贯的务实精神。

与大海的婚礼

现实主义需要的是人的理性。然而，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人往往又是少数。从这一点来说，它并不适合用于民众的动员。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唤起民众的东西。”言下之意，感性的号召十分重要。

为了让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长期存在，威尼斯人必须付出莫

大的牺牲。但仅仅依靠一小撮能够理性思考的精英阶级，身先士卒地付出牺牲，是远远不够的。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民众的支持必不可缺。然而，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若不使用感性召唤，是引发不起民众的热情的。12世纪正式制定的威尼斯国家庆典“海亲节”（Festa della Sensa），就是希望通过每年举办的方式，唤起民众的热情，事实上它的确颇有成效。

“海亲节”定在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出征之日，那天也是耶稣升天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元首都会率领政府的高官，登上绯红、金色相间的御用黄金船（Bucintoro）。这艘庆典用的加莱船十分豪华，连船桨都涂成了金色。在大批船只和贡多拉的簇拥下，黄金船驶向威尼斯的外港利多岛。在利多教堂参加完弥撒之后，元首再次登上黄金船，回到海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他对着大海高声地说：“海啊！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

然后，元首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扔进大海中，仪式正式结束。民众在迎接元首回港之后，狂欢庆祝，整天无须劳作。喜庆活动自然缺不了饮酒助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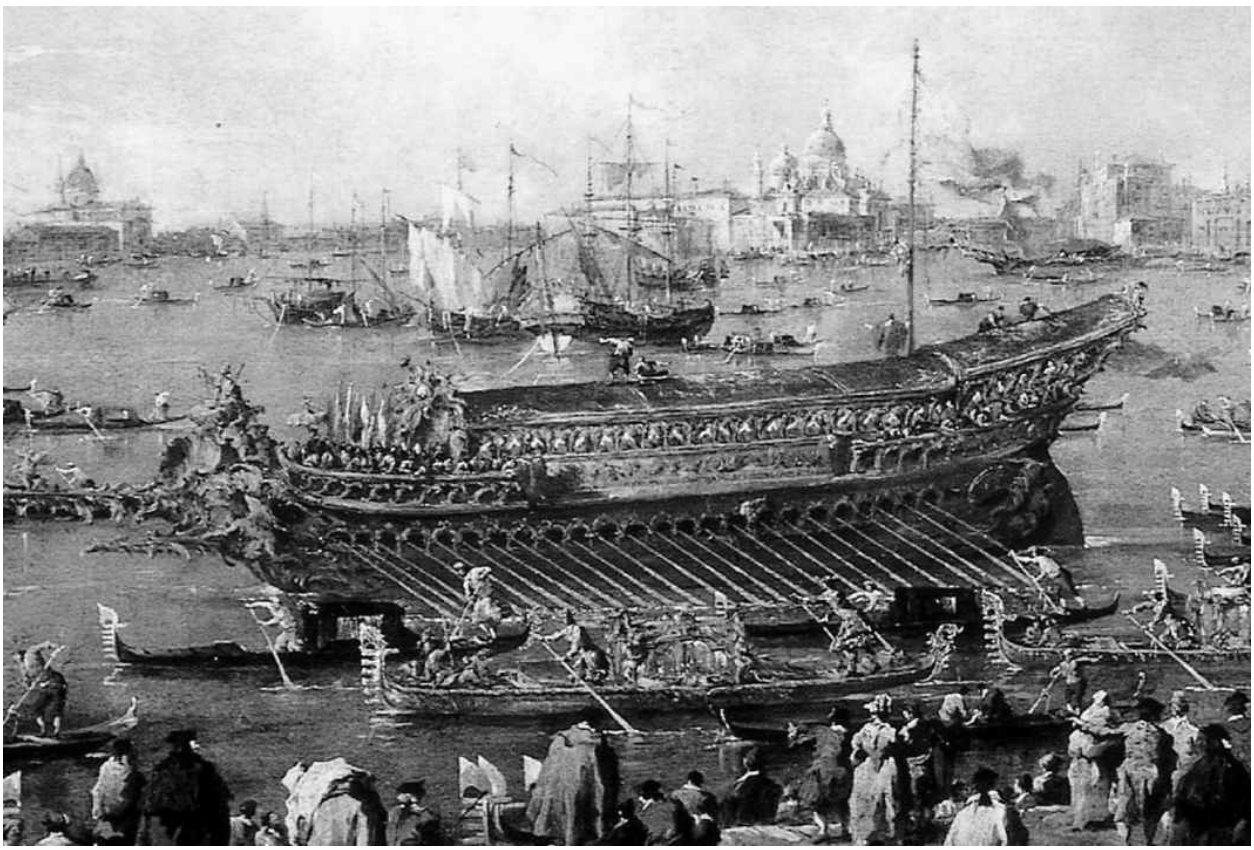
有日本学者曾经撰文，说仪式代表了威尼斯这个女人与大海这个男人的结婚。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儿奇怪。

如学者所言，在意大利语中，共和国的确是阴性名词，大海是阳性名词，而且海神还是最具阳刚之气的波塞冬（Poseidon）。

可是，“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这种话若是出自女子之口，岂不是成了向心不甘情不愿的男人逼婚了吗？作为激励民心的口号，这似乎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还是某位法国人的解释合乎情理，应该忽视文法，将元首代表的威尼斯视为男人，把大海当作

女人看待。相信威尼斯的男人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话说回来，不管是通过理性思考，还是因为受到激励，以贸易为生，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辛劳的商人们一定会感叹，经商还不如做海盗来得轻松。



黄金船（18世纪的绘画）

交易商品

说到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大多数人会想到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交易。的确，奢侈品是威尼斯商人销售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做买卖，一定是从提供买方绝对需要的货物开始，至于

其他那些刺激人们购买欲望的产品，是下一步的事情。

在以河川贸易为中心的时代，威尼斯商人贩卖的商品一直以鱼和海盐为主。10世纪进入海洋贸易时代之后，主要商品被木材和奴隶取代。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大主顾——北非伊斯兰教教徒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基督教禁止将基督徒作为奴隶买卖，但没有完全废止奴隶制。那些所谓的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即非基督徒，是可以作为奴隶进行交易的。

天主教对此的解释是：肉体上的束缚有助于精神上的救赎。根据这个解释，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那些同为基督徒但非属天主教的，例如一向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的东正教的信徒，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奴隶买卖的。当然，最大的奴隶产地，还是那些没有基督教化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奴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0世纪，则是东欧的斯拉夫人。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奴隶的来源逐渐减少。11世纪之后，为了寻求奴隶的供给，威尼斯商人不得不远赴黑海。

中世纪的奴隶贸易，是从欧洲流向非洲的。奴隶的买主，大多数来自北非的撒拉逊人。虽然有一些奴隶被卖到后宫，但绝大多数被卖给了穆斯林的军队以补充军力。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曾下令禁止将奴隶卖给异教徒，与其说这是出于道德上的理由，不如说是鉴于军事上的考虑。禁令反复颁布了数次，可见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作为威尼斯最初的两大主力商品，与奴隶并驾齐驱的是木材。买方同样也是北非的伊斯兰教教徒。非洲的北部地区，由于长期砍伐，对森林缺乏保护，木材相当紧缺。相反，在威尼斯的背后，有着大片的木材供给地。甚至有人说，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先进的造船国家，正是因为

周围有物美价廉的木材供给地。装满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船，经过亚得里亚海（应该说是威尼斯湾），驶向非洲。

可是，中世纪的木材也是军需物资。教皇和皇帝频频颁布命令，禁止将木材出售给异教徒，威尼斯商人对此照例是置若罔闻。

在北非卖了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人，拿着伊斯兰教教徒支付的金银“外币”转向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采购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西欧人最渴望的奢侈品，如香料、布料、金银手工艺品以及宝石等。带着这些奢侈品，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到威尼斯。上述的路线，是威尼斯商人初期行商时的主要路线。商船一抵达威尼斯，还来不及卸货，货物就被从欧洲各地赶来的等候多时的商人们抢购一空。

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东方文化的先进程度远高于欧洲。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祭坛背后，有一块叫作“Palad’Oro”的黄金屏风，屏风上刻有诸圣人的浮雕，周边镶满了璀璨的宝石。据说这是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定制的，所以可以确定是公元10世纪末期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制作这类精美的作品需要专门请君士坦丁堡的黄金工匠打造。

威尼斯的船

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船是他们的国家基础。法律规定：除了老朽不堪的破船以外，威尼斯人不得向外国人出售任何船只。威尼斯人买的船，必须是国内制造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一直到16世纪为止始终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遵守第二条法规，对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向外国人出售船只会遭到重罚。因此，只能卖零件，不能卖成品。

帆船

有关从13世纪末开始到14世纪期间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的变革，将留在第四章中叙述。这里要讲的是在此之前的事情。当时威尼斯的船，从功能上分成两大类：帆船和加莱船。

帆船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典型的商船。它在结构上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船帆为主动力，没有船桨。航行时一旦遇到海风骤停的情况，唯有耐心等待风再起。进出港口时，需要放下事先预备的小船，靠小船牵引。

船形从侧面看呈圆状。长度大约是宽度的三倍，给人一种圆嘟嘟的感觉。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载货。

船上有2——3根桅杆。船帆呈三角形，俗称“拉丁帆”（lateen）。船头和船尾各有一个舰桥，操舵室设在船尾的舰桥上。若是大型的帆船，船尾的舰桥会高达数层，在顶层除了操舵室之外，还有供贵宾使用的船舱。

桅杆上建有瞭望台。它不仅有观察之用，作战时还可以作为攻击的火力点。

甲板通常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客舱和船员休息室，下层堆放货物。

在朝圣这项“观光事业”上，威尼斯属于发达国家。因此随着商人、十字军战士以及朝圣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帆船日益趋向大型化，年代记里甚至将那些大型帆船称为“漂浮的要塞”。威尼斯拥有排水量500吨级的帆船，的确不辱“Roccaforte”（要塞）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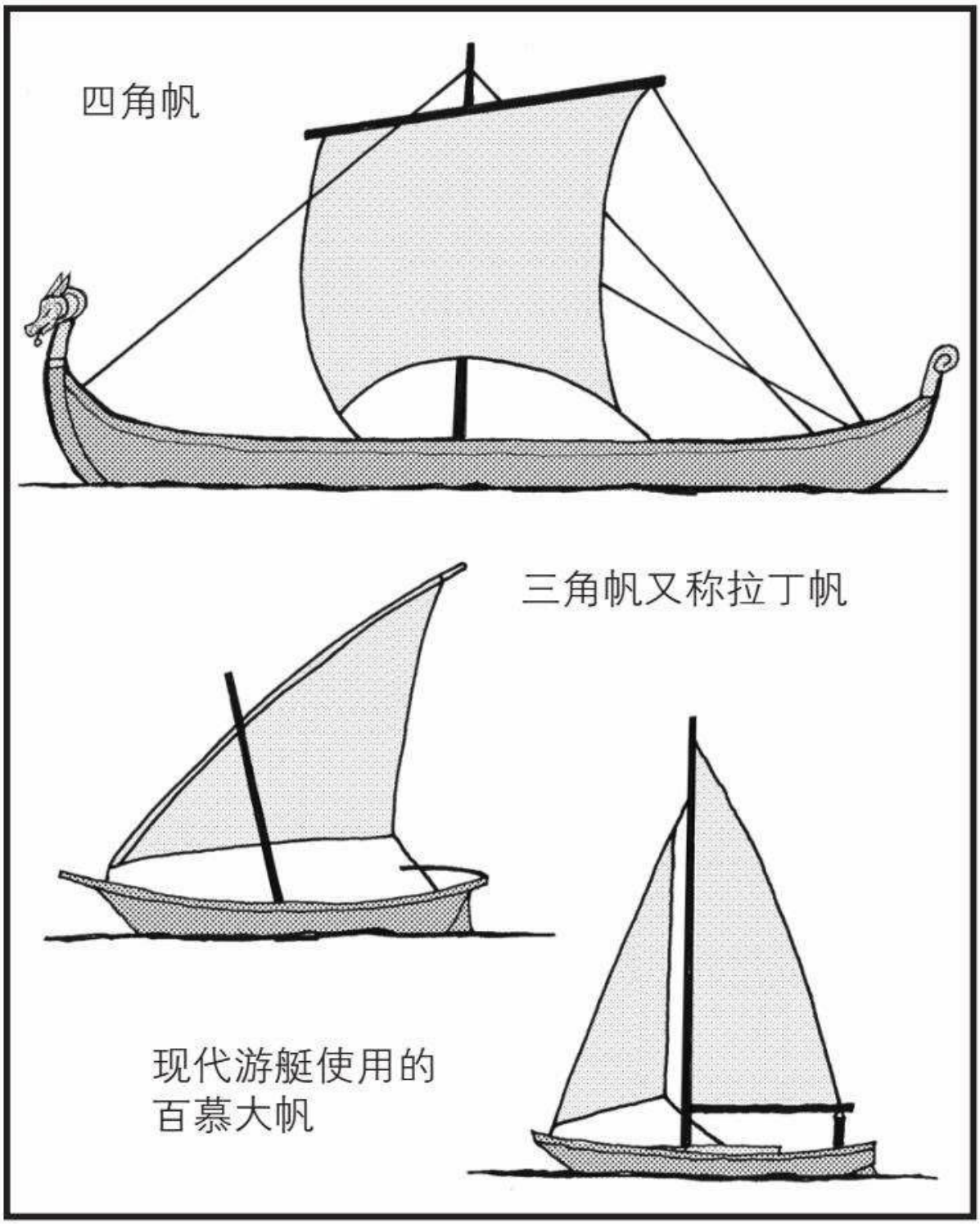
在现代，即便是普通的商船的排水量也在1万吨级左右，10万吨级的远洋油轮更比比皆是。与它们相比，威尼斯的帆船似乎根本微不足道。不过在19世纪之前，500吨级已属于大型船。18世纪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不过比威尼斯帆船稍大一点儿而已。“五月花（May Flower）”号的吨位是180吨，而哥伦布乘坐的“圣玛利亚（Santa María）”号才100吨左右。

中世纪时拥有200吨级大型帆船的，只有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些活跃的海洋国家，至于“要塞”级别的，据说整个地中海仅有6艘。根据1260年的记录，威尼斯和热那亚各拥有两艘。因此，当时的大型商船，通常是在200吨级。

这类大型帆船，有两个形状像独木舟划桨似的舵干，设置在船尾的两侧，由操舵室控制。

船上大约有10——20个大小不一的船锚，根据其各自的用途，配备了不同长短的锁链。这些船锚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详细情况将在第四章中说明。

大型的商船装有三根桅杆，其他船则是两根。桅杆不是笔直向上，而是微微前倾。桅杆的上方有一根斜桁，其长度几乎与船相同，上面挂着的，就是前言所述的三角帆。



帆船图

船上预备了大量的船帆。说到大量，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英国纳尔逊

（Horatio Nelson）统帅时代的帆船。那时帆船的桅杆上有若干根帆桁，帆桁上均绑着一面船帆，航行时同时迎风扬起。但是威尼斯的帆船，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桅杆上只有一根帆桁，帆桁上只挂一面船帆。之所以要预备大量的船帆，一是做破损时的替换，二是根据情况不同轮换使用。比如说，微风的情况下，前桅的帆桁上挂的是用薄棉料制成的大型帆，叫作“阿提莫内”。而当暴风雨来临时，便会降下帆桁（当时的帆桁没有固定在桅杆上），换上厚重面料制成的小型帆。船停靠港口时，帆是卷在帆桁上的。

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四角帆，为什么在中世纪以后，变成三角帆了呢？无论是古代或中世纪，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并未改变，唯一的解释就是技术改良。四角帆和三角帆，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首先说四角帆。它在顺风时强劲有力，所谓乘风扬帆、飞速前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可一旦遇上逆风，不消说前行，稍有不慎就会被吹得倒退。换言之，四角帆适合于在一定时期内，定向吹贸易风（信风）的大洋航行。只要算准了刮顺风的时机，便可以出海。

三角帆虽然在顺风时速度比不上四角帆，但逆风时，只要转换45度角，走“之”字形即可前行。地中海以风向多变著名。在这一带航行，相对于不刮顺风便无法航行的四角帆船，三角帆船在行动上有着更大的自由度。

当然，四角帆船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有不少只用四角帆的小型船只。1300年以后，一艘船上同时配备四角帆和三角帆的船只逐渐增加，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了顺风航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风力，其二则是开通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贸易之路。

根据风向，（日本等）国家把风称为东南西北风。相比之下，古代欧洲风的名字可是有趣多了。（据说这里指示的方向是以出亚得里亚海到地中海中心的一带为基点。）

北风——屈拉蒙塔那风（Tramontana），Trans　Montagna的简称，意思是从山对面吹来的风。

东北风——格雷科风（Greco），不用说就是希腊的意思。

东风——莱万特风（Levante），太阳升起的方向，东地中海通常被称为Levante海。

东南风——西罗科风（Scirocco），从叙利亚方向吹来的风。

南风——澳斯特罗风（Austro），澳大利亚的国名由此而来。

西南风——利贝乔风（Libeccio），从利比亚方向吹来的风。

西风——波南脱风（Ponente），太阳落下的地方。

西北风——马埃斯特尔风（Maestrale），法语称密史脱拉风（Mistral），意为从罗马方向吹来的风。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古罗马是“全民族之师”（Maestro di Popoli），简略成Maestrale，即来自尊师所在的方位。

如今，渔夫们依然使用这些风的名称。另外，它们也经常出现在天气预报以及学术文献中。

说回帆船。尽管三角帆在逆风中保持了较大的机动性，但是像“要塞”级的大型船，由于逆风时风的阻力过强，无法出港的概率相当大。可见，船体不是越大越好。于是，出现了一种名为“克里提”的小型帆

船。由于它的排水量在百吨左右，因此在逆风时也可以自由航行。

这类船有一个舰桥，设在船尾。只有一层甲板，吃水较浅，不适合用于作战，故多用于运输。另外还有一种体积稍大，叫作“乌西雷”的船，专门用来装运战马。船身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将马直接从马场拉进舱底。这种运马的船，之后在运载十字军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加莱船

如果问活跃于中世纪地中海上的是什么船，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是加莱船。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那些认为地中海上所有的船都是有船桨的加莱船，而且划桨的全是戴着锁链的奴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章节所述，威尼斯的船并不都是加莱船，帆船的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因其短圆的形状，又被称作柯克船（Cocca）。与之相比，加莱船的长度是宽度的8倍，所以叫“长船”（Nave Lunga）或“细船”（Nave Sottile）。加莱船的宽度通常在5米，因此长度就有40米之长。除了大型船之外，一般的加莱船上只有船尾一个舰桥。

桅杆通常是两根，如果是大型船的话，不少船会装三根桅杆。帆桁与船身同长，也是40米。船帆当然是三角帆。不过加莱船与帆船不同，它的备用帆仅供帆破损时交换，不必像帆船那样，为应对气候的变化而预备种类不同的帆。如果遭遇恶劣气候，加莱船需降下船帆，改用船桨推进。

相对于没有风就不能动弹的帆船，加莱船的优点在于受风向影响的程度较小，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因其船体构造狭长低矮，所受风力及海水的阻力小，速度很快，据说可达到4——6节（1节＝1海里/小时

=1.85公里/小时）。

不过，加莱船也有缺点。一是载货量不多，二是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不太适合作为商船使用。与帆船相比，它需要划桨手。如前文所述，如果划桨手不是奴隶，就必须付薪酬雇用水手。

当时最常见的加莱船是一种叫作“布雷米”（Bireme）的船，每块座板上并排坐两名划桨手，每人各持一支船桨。不久之后，一排坐三名划桨手的“特雷米”（Trireme）成了主流。有时候将之翻译成“三层桨船”，这种译法姑且不论古代，至少不适合中世纪时的实际情况。

船桨固定在船舷外的支架上。之所以不固定在船舷上而是延伸至舷外，是鉴于杠杆原理，支点离手越远，越能提高划桨手的划桨效率。这种方法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采用，威尼斯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

普通的加莱船有27排，每一排的两侧各有两名划桨手，一条船上共计有108名划桨手。“要塞”级的超大型帆船，据说船员人数在百名以上。一般的加莱船，仅是划桨手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如果是普通的200吨级的大帆船，船员应该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加莱船除了百名以上的划桨手之外，另外还需要20到40名船员。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150人的与50人的薪水差额是相当大的。

加莱船虽然是靠船桨推进，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不会有连续10小时繁重劳动。加莱船的航海日志上，常常会出现“喜遇顺风”的文字，可见，它不是始终以浆划行的。我认为，船桨类似于现在游艇上的马达，能用帆的时候，尽量使用，所谓的当风使尽帆。而划桨手则将船桨固定在略高于水平的位置，趁机歇息。不过，船在进出港时，划桨比用船帆更容易操作。此外，遇到海风突然停止的情形，也是加莱船的应变能力强。海上突然无风无浪，而且持续连日的状况其实是挺频繁的。

帆船的航海日志中，常常出现因没有海风，只好在海上漂流了数日的记录。就算情况没有如此糟糕，但清晨或日落前海上无风的现象，只要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经历过。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加莱船的确比帆船更具有优势。与交易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向是威尼斯商人最为重视的问题。因此，能够较准确估算出航行时间的加莱船，有其作为商船的价值，尤其是它适合在风向和地势均很复杂的地中海航行。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经常靠港进行补给。不过由于当时的航行只能依靠简单的航海图、指南针以及肉眼观察，即便是大型船，也会尽量避免夜间航行，因此这也不能算致命性的弱点。顺便提一下，罗盘是在进入14世纪以后才普及的。

加莱船最大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军船。打仗时，它的那些诸如人工费用过高、货载量不足等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遭遇敌军时，立即降下船帆、飞快地划动船桨，此时此刻，加莱船不受风向影响以及容易操舵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方不是加莱船，那么，是否开战的决定权便在这一方了。

一旦开战，加莱船尖锐的船头就变成了武器，直接插入敌船的腹部。那时大炮尚未普及，海战形式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撞击，以及双方士兵在甲板上肉搏。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人多有利。威尼斯加莱船的划桨手也属于战斗力，因此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不过奴隶是不打仗的，所以就不能让奴隶充当划桨手。

军用加莱船的划桨手是按照以下方式征召的：

威尼斯有60多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20——60岁男子的征兵

登记册，按顺序细分为12人一组。每次军务，该派谁参加，由小组全体成员决定。决定人选之后，其余的11个人每人拿出1里拉，再加上国家付的5里拉，出征的人可获得16里拉的俸禄。若被征召的人因某种理由无法出征，他可以支付6里拉，请组里的其他人顶替。这就是威尼斯的兵役制度。

以上讲的是军船的情况。如果是商船，人员则都是为了赚钱的劳工。由于威尼斯人口少，仅靠本国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船员中不少是来自友邦或殖民地的民众。除了威尼斯雇用自由民作为划桨手之外，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都鉴于同样的理由不使用奴隶。那些用锁链锁住奴隶或战俘，强迫他们划桨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者海盗。

威尼斯共和国要求船上的所有成员自备武器，因此，负责战斗的不仅是专门的骑士，船员、划桨手们也必须携带轻武器登船。划桨手们的座板之所以建在上甲板，而不是能遮风挡雨的下甲板上，就是为了战情发生时，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在接近敌船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划桨，一旦两船相近，即刻绑好船桨，拿起斧头和刀剑，杀向敌人。在划船驶向敌人时，常常会遭遇对方船上射来的弓箭，所以进入战斗状态的加莱船的船舷上会放上盾牌，保护划桨手。

除了剑、斧、长枪、弓箭等武器之外，还有一种钉满尖钉的角材掷向敌人。另外，肥皂水也是重要的武器。船员们把它泼向敌船，弄得甲板滑不唧溜，让对方的士兵站不住脚。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大男人们滑倒在满是肥皂泡的甲板上，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可不是我在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在威尼斯共和国，商船与军船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始终如此。

虽然大致上可以把加莱船视为军船，把帆船看作商船，不过这只是鉴于加莱船适合打仗，帆船适合行商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加莱船也作为商船使用，不适合战斗的帆船，也曾作为运输船，称职地担当了军船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些装载着商品，正驶向目的地的船，才能算真正的商船吧。

以威尼斯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不能严格地区分使用商船与军船是形势使然。一旦在海上遇到突发事件，从威尼斯本岛或其他基地即刻会出动军舰救援。同时，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军船也会行动起来。甚至商船如果碰巧距离事发地不远，有时也会接到去指定港口报到的命令，那是一个商船也必须配备自卫武器的年代，看似匆忙中临时组建的队伍，其实是训练有素的舰队。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海上发生紧急事态早就有所预料，所以无论是军船或商船，从船的大小、武装程度、船员人数、货物载运量，到航行时间以及大致的航路，都由国家指定并严格地掌控。

当然，军事专用的船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纯粹的军事用船，在构造上与其他的加莱船无异，船员也并非都属于威尼斯海军，仅仅是因为人员数量多于商船。当时海战的形式为短兵相接，因此，士兵的数量左右战况。包括划桨手在内，军船上的武装人员自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是加莱船，如果船员数在60人以下，都不能算作军船。在船上出现大炮之前，所谓的军船是由船员数决定的。那些商用的加莱船或帆船，在航行途中，一旦因形势需要组成舰队，就必须听从军舰指挥官即海军统帅的指挥。

正如我在第一章的国家建设所述，威尼斯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国家决策力，其“行政指导”之强势，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同例。这一点让异国的民众颇感不可思议：威尼斯民众为何能忍受这种情况，没有抱怨呢？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威尼斯人知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一

致的。再加上威尼斯统治阶层即大商人们，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平等执行法律以及公正（不是平等）分配利益的行为，没有让民众感到不满吧。如果只是单纯地依仗权力，由上至下地施压，共和国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政府的运动不可能仅发生两次，威尼斯人也不可能享受到同时代的他国人民不曾拥有的安定的国内环境。

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所奠定的国家政策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第一，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第二，保持独立，不依附东方或西方任何一方的强国。第三，利用代替东方强国拜占庭帝国执行安保任务的机会，当上了亚得里亚海的“警察”。

以上这些政策，从公元1000年前后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担任元首开始，一直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仅第三项政策有所变化，200年间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外交的基本方针。至于是固守还是改变方针，其决定因素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原则。

有道是“起初有言”。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则是：“起初有商”。威尼斯人是中世纪时的“经济动物”，但这些“经济动物”们对此似乎并不抱有劣等感。威尼斯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持高效的商贸运作，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精准、巧妙的手腕，而这种技能，毫不逊色于创造作品的艺术。凭借“起初有商”，威尼斯共和国生存了1000余年。

海上的“高速公路”给威尼斯带来了安全、可靠以及节省时间等好处。而对于建设及运营“高速公路”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威尼斯人将它们看作为了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经费”。与威尼斯同时代的其他海洋国家，其实也很热衷于基地的建设和维护，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

威尼斯那样，政策贯穿始终，而且坚持不懈。

“威尼斯人靠自己的鲜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那些并不欣赏威尼斯共和国做法的人给出的赞词。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持这种观点的尤其多。如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些赞扬，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那些谈论独立与自由的人们，往往是出自意识形态。与之相反，威尼斯人保卫独立和自由，完全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阅读威尼斯人的文章时，我发现与其他文字相比，独立与自由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也许他们不属于疾声高呼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吧。

然而，实际上威尼斯人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地守住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历史上不乏强调捍卫独立和自由，可是一旦遭遇苦境，就轻易地放弃了高尚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倒是威尼斯人的执着，更令人感到有趣。相信事情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可能比相信理念上的好事，来得更顽强一些。威尼斯人从来不会一面倒地依附于东方或西方的某一强国，由始至终保持独立和自由，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威尼斯地理上虽然近西欧，政治上却隶属拜占庭帝国。因此，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能将威尼斯占为己有。同样，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以威尼斯人是天主教徒为由，强迫他们服从教皇的命令。因为威尼斯人尽管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但在政治上属于东方帝国。这种巧妙的身份立场，让威尼斯躲过了席卷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最初因对教理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成了权力之争。那些所谓的皇帝党和教皇党，其实并不是对皇帝或教皇深信不疑，而是原本就交恶的人们选边站而已。由于纷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来自各国的内部，因此战火愈演愈烈，远到佛罗伦萨都深受其

害。整个意大利，几乎只剩下威尼斯没有卷进这场斗争。从保证国家公权力有效运转的角度来看，这是威尼斯幸运的选择。

话说回来，由于地理上位置相近，再加上宗教上信仰相同，威尼斯不可能完全地做到事不关己。它决定担当起调停的角色，毕竟没有战争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公元1177年，威尼斯邀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到威尼斯。在主人塞巴斯蒂安·齐亚尼元首（Sebastian Ziani）的斡旋之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定。当然这场名为教理争论，实为利益冲突的争战，不可能因此偃旗息鼓，但是它让冲突的两方都认识到威尼斯对哪一方都无恶意。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尼斯商人的通商自由将不会受到侵犯。

其实，真正让威尼斯下功夫的，是与另一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给予威尼斯人行商特权的同时，要求他们代帝国担当起保卫其西方领土的职责。双方的这种关系，从11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

向东方扩张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人面对的是斯拉夫或撒拉逊海盗。到1081年，征服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变成了他们的新对手。

这些占领了南意大利、来自遥远的诺曼底地区的人们，尽管不断地从故乡呼朋唤友、招兵买马，终究还是人数有限。但他们不仅作战能力优秀，统治能力也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他们中的一支渡海到英国，征服了那片土地。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同样如此，占领意大利南部并不能让他

们满足，拜占庭帝国才是他们的远大目标。

拜占庭帝国的西部边境，位于希腊的西岸。诺曼人从他们管辖下的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巴里（Bari）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附近的狭窄海域，在对岸的都拉佐（Durazzo，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都拉斯）登陆。从都拉佐到君士坦丁堡，有一条古罗马时代建造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近乎笔直地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恺撒就是沿着这条路追击庞培；屋大维——安东尼联军与布鲁图会战的腓立比平原，也是在这条大道边上。中世纪时的路况因年久失修已今非昔比，但沿途没有障碍阻挡精兵良将前进的绝好条件，却是古今不变。拜占庭皇帝写信给威尼斯元首，希望他出兵拦截已经在都拉佐登陆的诺曼人。

其实不用皇帝开口，威尼斯势必也会出兵。因为诺曼人的行动，对于威尼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狭窄地带也被诺曼人占领，威尼斯将会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接到皇帝要求的威尼斯共和国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反倒向拜占庭提出了出兵的交换条件：一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威尼斯的商业基地，二是让威尼斯商人享有与拜占庭商人同等的待遇。

眼看着烽火越烧越近，皇帝不得不点头接受。于是，威尼斯舰队驶出了威尼斯港。都拉佐攻防战是威尼斯打的第一次真正的战役。双方在激战之下，最后以威尼斯胜利而告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总算松了一口气。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以当“警察”打海盗为条件，换得了港口税减半的优惠待遇，但这一次与诺曼人作战，拿到的才是真正的特权。

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商人开放了境内所有的领土。这意味着威尼斯商人可以在包括色雷斯（Tharce）、马其顿（Macedonia）、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在内的几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自由行商。而且，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商人同样享受关税全免的待遇。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允许威尼斯人在位于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金角湾（Gold Horn）建立居住区，不仅是商店、仓库和领事馆，甚至可以建造威尼斯船专用码头。居住区内理所当然地享有治外法权。从特许颁布的1082年开始，威尼斯“商社”的分店，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一间接一间地开张。

以前，威尼斯商船只能走威尼斯到东方、东方到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如今不再受此限制。查阅当时商船的航海资料，会发现很多船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从黑海一带经叙利亚前往埃及，然后原路返回。这意味着威尼斯商船不必每次都得先返回本国港口，而是直接取道异地。这个变化，为威尼斯商业飞跃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说当时有1万名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按其本国（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不足10万的总人口计算，大约每三名威尼斯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东奔西走地做着买卖。从那之后，威尼斯政府对拜占庭国内的动向，变得愈发地敏感。如果从君士坦丁堡作为威尼斯商业根据地的重要性考虑的话，这种反应实属正常。

所以，当11世纪末西方开始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最初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拜占庭帝国对十字军的行动颇为怀疑。对威尼斯而言，参加十字军所能获得的利益，与拜占庭给予的特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说白了，就是不划算。

话说回来，有人受益，难免就有人受损。尤其是在那个力量至上的

年代，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因威尼斯商人的蓬勃兴起而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的拜占庭的商人们。以前，两者间有待遇上的差别，又属于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待遇平等之后，威尼斯商人则变成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对手。更何况威尼斯商业在“行政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一直得到本国的大力支持。对于蜂拥而至的威尼斯商人，拜占庭的同行们自然是义愤难平。

拜占庭商人们的不满，正巧与因付出过高代价而感到后悔的皇帝不谋而合。再加上不甘心被对手威尼斯拔了头筹的热那亚和比萨的旁敲侧击，拜占庭皇帝开始表露出不再延续特权许可的意向，甚至打算把目前给予威尼斯的利益，转授予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最弱势的比萨。

1099年，打着十字军舰队旗号的威尼斯舰队，从亚得里亚海南下，驶向东方。可是舰队在罗德岛（Rhodes）靠岸下锚后，便没了继续朝巴勒斯坦前进的迹象。他们走访附近的岛屿，收集圣人的遗骸，消磨时间，就是原地不动。而此时的巴勒斯坦正处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激战之中。

期间，传来消息说比萨的舰队正集结于爱琴海。负责十字军海上补给的比萨主力舰队正准备与本国的援军会合。这时，威尼斯人的舰队开始行动了。但他们不是驶向巴勒斯坦，而是前往相反方向的爱琴海。

威尼斯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是在他们歼灭了比萨舰队，并且从惊慌失措的拜占庭皇帝那里再次确认了既得特权不变之后。

当威尼斯舰队的身影出现在雅法（Jaffa，今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海面上时，比萨、热那亚的舰队早已抵达，十字军战士们正陷入苦战。

十字军的将领乔弗雷·布里昂希望威尼斯舰队加入战斗，因为他们的船上配备了最新的攻城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威尼斯人获得了基督徒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所有区域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舰队不仅攻击了雅法，在获胜之后又参加了海法（Haifa）之战。

一年半后回到威尼斯的舰队带回了丰厚的“土产”——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各个城市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设立贸易基地的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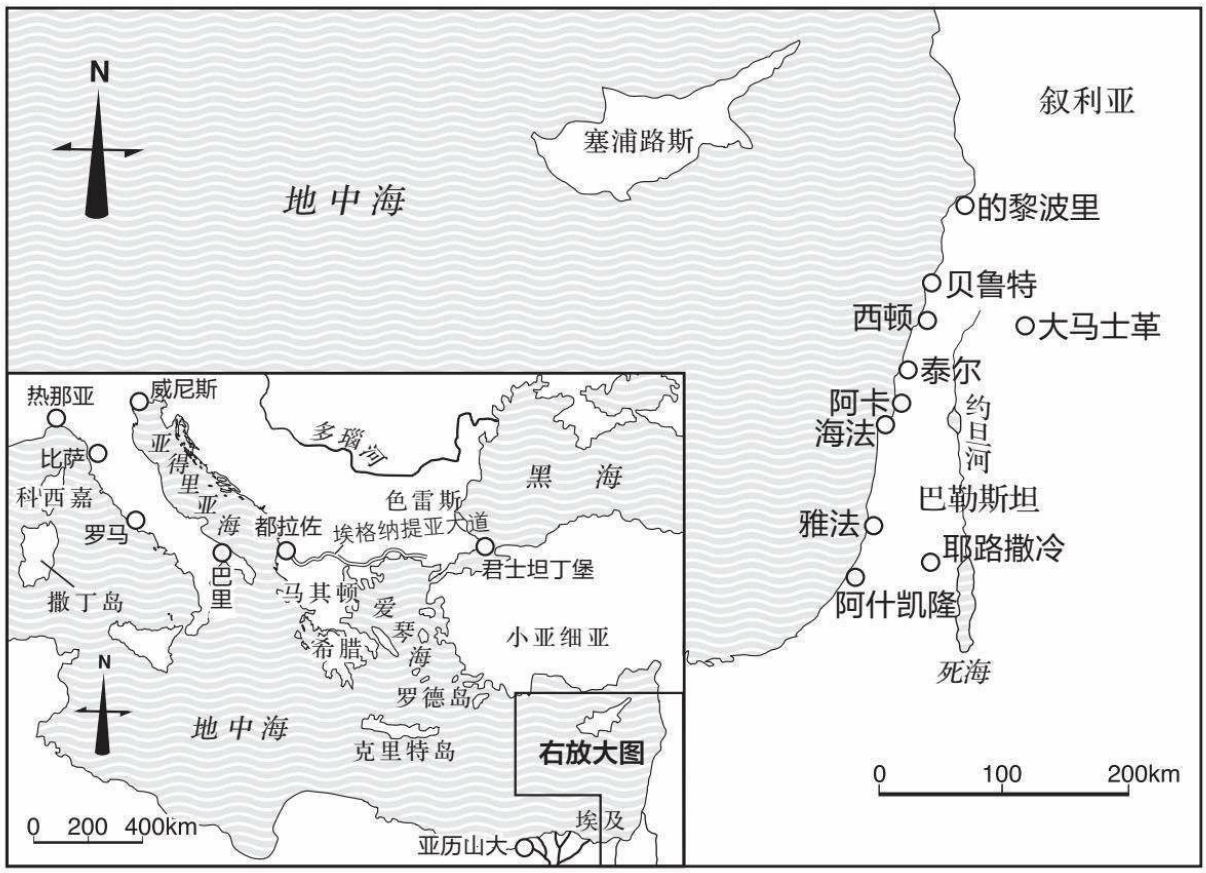
热那亚和比萨通过参加十字军提供海上供给，很早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商业。丧失了先机的威尼斯，现在终于可以和他们比肩而立了。

一旦抓住机会，绝不迟疑，即刻进取，直到完全占有——这是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的手法。但是，在中东确立了立足之地后，20年间威尼斯的舰队从未涉足那里。他们不是不去，而是不能去。

为了消灭匈牙利王企图占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野心，威尼斯花了20年的时间。匈牙利王是拜占庭皇帝的亲戚，又因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与罗马教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海盗不同，他是真正的劲敌。与匈牙利王为敌的威尼斯，为守住“高速公路”可谓是千辛万苦。除了匈牙利王，威尼斯与已经攻打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诺曼王，也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直到遏制住这两大强敌之后，威尼斯才腾出精力，将目光投向了巴勒斯坦。

1123年，由40艘加莱船、28艘帆船，以及4艘大型加莱商船所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在元首多米尼克·米迦勒（Domenico Michele）的率领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横穿过爱琴海，一路向东行。但

舰队进入雅法附近海域时，已进入夏季。



巴勒斯坦周边图

由于埃及的穆斯林军转为攻势，雅法遭受着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可是，就在威尼斯舰队到达前的一刻，雅法摆脱了围困。这样，威尼斯海军不必打仗，只需要负责海上警戒，以防敌人随时来袭。但元首并没有让斗志昂扬的士兵们就地休息，决定立刻追寻埃及方面的踪迹。埃及穆斯林舰队一定正朝着他们占领下的阿什凯隆（Ascalon）港行驶。

为防止被敌人发现，威尼斯舰队伪装成运输船队，由4艘大型的加莱船打前阵，让对方误以为是朝圣者乘坐的商船。朝圣船上有钱的基督徒居多，一向是穆斯林军队的上好猎物。

果不其然，原本已经靠近阿什凯隆，正准备进港的埃及舰队，发现

了笼罩在晨霭里的4艘大型加莱商船，他们随即调头驶回了海上。晨霭渐渐消失，折返的埃及舰队这才发现，大商船的后面竟然还跟着40艘加莱军舰。措手不及的埃及人来不及逃生，便被卷入了混战中。战斗以威尼斯的获胜而告终。元首乘坐的旗舰，用加莱船特有的锋利的船头，刺向对方旗舰的船腹。沉入海中的舰船，将方圆3公里的海面染得通红，为威尼斯的胜利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彻底击败了埃及人之后，威尼斯舰队继续南下，途中遇上驶向阿什凯隆港的埃及商船。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地将其捕获，船上诸如金银、胡椒、肉桂等大批货物自然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威尼斯舰队，挥师北上，加入了十字军的泰尔城（Tyros）攻城战。1124年，泰尔沦陷。自此，阿什凯隆以北，再也没有一个港口被伊斯兰人所占领。也就是说，十字军诸国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港口都是安全的。

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的女王，逐渐变身为东地中海女王，能与威尼斯海军分庭抗争的，唯独剩下热那亚。

即便如此，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打算完全脱离拜占庭帝国。不过，对于拜占庭皇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原本只是让威尼斯代为保护西方的安全，没想到它变得如此强大。但现实中拜占庭又离不开威尼斯海军的保护。虽有心想找别国取而代之，偏偏热那亚和比萨正在为争夺科西嘉岛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这个余力。

纵使心中有万般不愿，拜占庭皇帝还是不得不继续让威尼斯商人享受特权。而威尼斯人的确是一个与无利可图的霸权思想绝缘的民族。

虽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境内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克里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岛（Cyprus）是例外。因为这两个岛屿作为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具有非凡的意义。日后，当威尼斯人计划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占为己有时，首先盯上的就是这两座岛屿，而且在得手之后，不惜任何代价誓死捍卫。

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这种微妙的关系到1170年前夕终于破裂了。因为威尼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过于强大了。

1168年，为了对抗拜占庭皇帝迟迟不肯更新对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元首维塔·米迦勒（Vital Michele）二世发布禁令，禁止所有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两年后的1170年，改变了主意的皇帝与元首达成和解，威尼斯人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可是，一年后，即1171年，拜占庭的皇位刚完成交替，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威尼斯人运动。这场由皇帝暗中煽动的民众暴动很快就蔓延开来，愈演愈烈。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破坏；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被放火烧毁。更不幸的是，很多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被皇帝的手下绑架，作为人质囚禁起来，甚至有人遭到杀害。那些侥幸坐船逃离君士坦丁堡的人，先在叙利亚等城市躲避了一阵，最终还是只能返回祖国。不用说，两国间断绝了来往。

从那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城中看不见威尼斯商人的踪影。威尼斯将其主要贸易地，转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威尼斯人一边以这些地方为中心进行商业活动，一边以相当克制的态度，努力修复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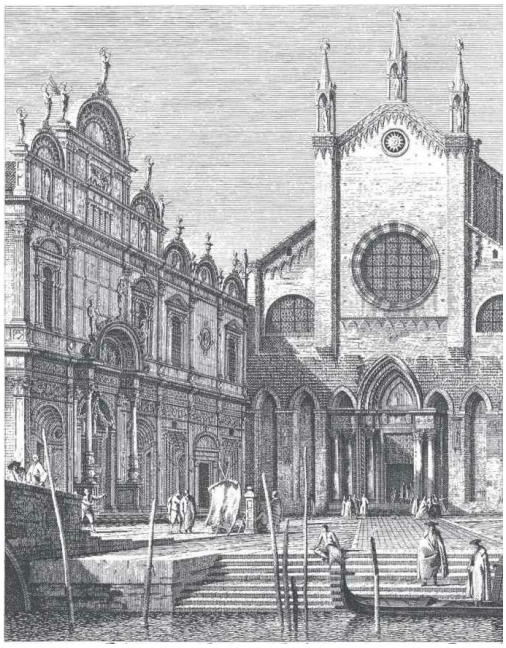
119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商人又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从事贸易活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非常清楚，不可能再期待拜占庭帝国像过去那样长久地与他们保持特殊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着手计划与拜占庭完全划清界限，把现在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那时的西欧，也正处于低迷的状态。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1187年，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1189年，十字军声势浩大地开始第三次东征，可是除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的英雄事迹之外，其余可谓是乏善可陈。这让西欧的骑士们无地自容，他们非得干点儿什么来挽回颜面。

这两股潮流，就这么巧合地交汇在了一起。1202年开始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正是两股潮流的交汇点。

这是一出由威尼斯人编剧、导演、主演的大戏。当然，一切遵循的还是“起初有商”的原则。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若干年前在日本，曾经有人问我：“无论是国家或个人，秉持现实主义观点为什么总是被人所厌恶呢？”

当然，我和他之间不必事前就现实主义先做一个定义。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通过与现实抗争，获得生机的一种生存形式。

不过，那时我没有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现在，我感觉似乎有了答案：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遭人厌恶，是因为他们就算嘴上不说，却用实际行动将一个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

种滑稽的存在，理想主义者的所思、所为，往往是最不适合实现其理想的。

理想主义者虽然没有智慧能够看清自己手段上的错误，倒也不至于愚蠢到无法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笑话，或者自以为的最善之策完全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事实。所以，才会对功成名就的现实主义者心生厌恶。理想主义者经常会爱敌方的理想主义者，胜过友方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遭人厌恶，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谁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恶人？从日本高中的历史课本，到被誉为十字军历史权威的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我们从1198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在法国骑士精神的中心香槟地区（Champane）城中，举办了一场马上枪术比赛。

主人是22岁的香槟公爵蒂博（Thibaut de Champagne），主客布卢瓦伯爵路易（Louis of Blois）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两位贵公子，既是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的外甥，也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都是1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这场比赛，就是以这两位同时拥有贵族血统和十字军传统、来自赫赫名门的年轻人为中心展开的。不难想象，法国优秀的骑士们一定都到场参加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依然情绪高昂的骑士们面前。他是在前一年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委任为十字军布道的人物。传教士雄辩的言辞，轻而易举地就点燃了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年轻人

的心。

首先，香槟公爵宣誓参加十字军远征。几乎同时，布卢瓦伯爵起立宣誓。紧接着，30多位王公、骑士们纷纷加入了行列。他们派信使快马加鞭地赶往布鲁日（Bruges），目的是游说当时人在那里的香槟公爵的姐夫——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参加十字军。接受了邀请的伯爵，和他弟弟亨利一起宣誓参军。佛兰德斯伯爵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除了兄弟俩，另外还有近40名骑士加入了十字军。

有关这70多位王公及骑士的名字，无一不漏地被记录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所撰写的年代记中。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香槟公爵的佐将，同时也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全程的见证人。他的文字朴素且生动。

只要是熟悉中世纪法国历史的人，相信都能清楚地知道，年代记中出现的这一连串名字可谓是西欧骑士精英之汇集。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骑士，没有人拒绝香槟公爵的相邀。

数月后，宣誓参加十字军的人们，聚集在苏瓦松（Soissons），就远征的时间和途径等事项进行商议。然而，遇到这种具体的问题，骑士们没了方向，商量上百次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于是，他们选出6个人，由他们代表全员做出决定。

这6位代表分别是：香槟公爵旗下的两位骑士、布卢瓦伯爵的旗下的两位骑士，以及佛兰德斯伯爵的两位家臣。代表香槟公爵的手下之一，就是上述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聚集苏瓦松的骑士们也一致同意，将这份“壮举”报告给罗马教皇。

接到消息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深感满意。英诺森三世被后世的历史学

家评价为是将教廷的权力推向顶峰的人物。当时才30多岁的他很清楚，十字军运动对于提高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十字军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第三次接连失败的原因，他也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第一次东征在没有任何诸侯将相参与的情况下，仅靠那些一无所有，唯独精力过剩的下等骑士和平民百姓就能赢得胜利？而第二、第三次由皇帝、国王等组成的明星队伍却招致失败呢？教皇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来自皇帝、国王各自的野心以及相互之间的嫉妒心。这一次，由法国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对于不希望皇帝、国王搅和其中的教皇而言，是最好的人选。虽然少了皇帝或国王，但这些人都是地位仅次于皇帝、国王的实力雄厚的王公和骑士，在影响力上毫不逊色。教皇将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不同民族的集合。而这一次由法国人主导，就算德国、意大利有人参加，也不是主力。在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案中，这一次的十字军构成，教皇认为最为理想。教皇通过传教士，在欧洲各地宣导，凡参加十字军一年以上的人，无论犯过什么罪，都可获得赦免。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其说是爱的宗教，不如说是用死后清算生前罪孽的惩罚的恐惧来威慑人心。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没有比免罪更能救赎心灵了。

被选出负责解决具体问题的6位代表，在经过慎重的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将十字军远征的目的地定为埃及的开罗。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彻底夺回耶路撒冷，必须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大本营埃及。这是根据狮心王理查的意见决定的。

二、远征路线采用海路。陆地距离遥远而且途中危险重重。对于这一点，无人表示异议。

三、十字军全军的运输任务，委托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前的三次远征，海上运输主要是由热那亚和比萨担任，那是因为运输量较少。而像这次大规模的军队、物资的运输，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依靠海运能力强大的威尼斯。

6位使者被派往威尼斯，时间是1201年5月。

恩里科·丹多洛

时任威尼斯元首的是恩里科·丹多洛（Enrio Dandolo）。这位在使者们眼中年过80且近乎全盲的元首，实际上是一位头脑精明、行动果断的人物。

“各位使节，我拜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的王公们让你们带来的委任状。委任状中提及你们的要求和决定，就是他们诸位的意向和决定。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使节答：“阁下，请您召开内阁会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明天就举行。我们将在会议上传达我们主人们的要求。”

元首表示明天来不及，但会在4天后召开会议。

这个场景让我不禁猜想，从那一刻起，威尼斯一方就展开了心理战攻势。因为通常有大事发生，不消说是次日，当夜就会立即召开会议。这4天的时间，应该是威尼斯方面做密议所需。不谙内情的法国人，度日如年般地熬过了4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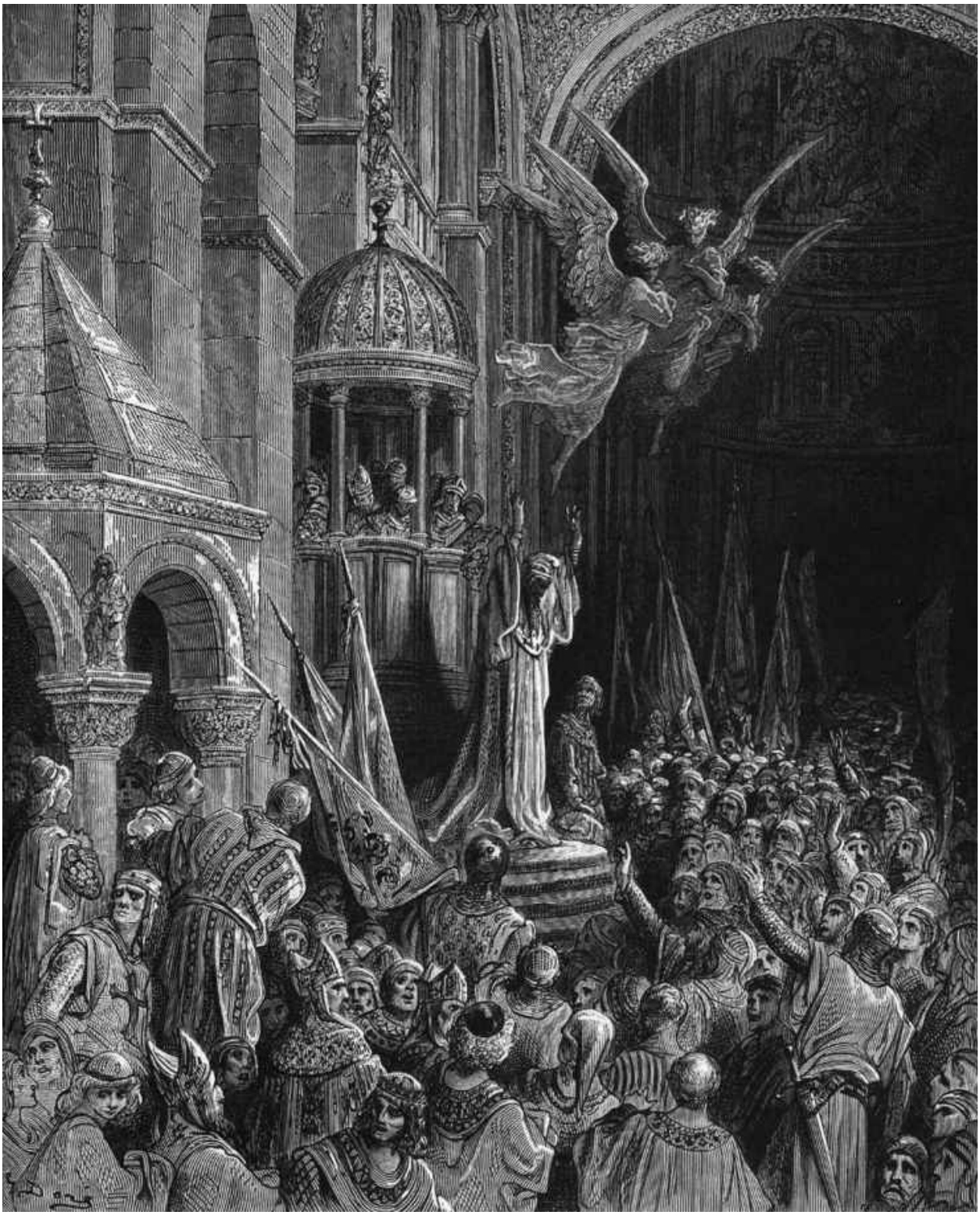
约定日的当天，使节们被带到金碧辉煌的元首官邸。从元首到分管内政、外交的全体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他们的到来。

“阁下，我们是法国最尊贵的王公派来的使节。我们的主公向十字架发誓，若是神的意愿，必定洗雪耶稣基督所受的屈辱，收复耶路撒冷。

“我们深知，各位与贵国民众所拥有的海上力量，他人无可比拟。恳请你们能倾力相挺，帮助我们夺回大海彼岸的失地，洗清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屈辱。”

元首问：“用什么方法？”

使者答：“什么方法都行。”话虽如此，法国的使节其实是要求威尼斯提供运送十字军的船只。当然，船需要船员和划桨手，航行中还需要粮食，总之要提供所有运输必需的人力和物质。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会见十字军战士（古斯塔夫·多雷，19世纪）

听完使者的要求后，元首说："这诚然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你们

赋予的任务实在巨大，8天后，还是这里，我们再答复各位。”

8天后，使者们按照约定，再次拜访了元首官邸。

“使者各位，我们决定接受你们的要求。不过，这项决定需要得到共和国国会和市民大会的认可。”

接着，元首又说：“我们将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运载4500名骑士和两万名步兵的船只，以及搬运4500头马匹以及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合约中包括了人和马匹所需的粮食。

“我们提供的价格低廉。一匹马4马克，每个人2马克。我们保证遵守合约规定的义务，时间自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出发起，为期一年。费用总计8.5万马克。”

契约

为了避免大家误解，首先做一个说明。中世纪的马克并不像现代德国的马克那么强势。它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马克，在当时不属于硬通货。法国与威尼斯两国间的交易，不管是用法国货币还是威尼斯货币，甚至他国的货币支付，都没有问题。用马克报价，不过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尼斯人索价过高，那不过是他们的偏见，把牟取暴利视为商人的天性。10年前，热那亚与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所签订的合同中，运载两匹马和三个人，以及8个月的口粮，价格是9马克。而威尼斯的合约期限是一年。相比菲利普·奥古斯当时要求运送的

650名骑士和1300名马夫，威尼斯这一次承运的人员和马匹的数量，要高出许多。

两次运输军队合同比较

	10年前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与热那亚的合同	法国骑士们与威尼斯的合同
骑士	650人	4500人
马夫	1300人	9000人
步兵	0	20000人
马	1200匹	4500匹

我们从上图的数字可以看出，热那亚应该是不必另造新船也能完成任务的。但威尼斯不仅要动员所有的商船，而且需要建造大量的新船，其中也包括为了运输战马特别制作的平底船。

所以说，威尼斯并非漫天要价。即使那是一个货币价格变动不大的时代，很多的学者仍然认为威尼斯提出的价格，符合当时的“行情”。

根据合同，每匹马有3磨臼（8蒲式耳，约等于142公斤）的燕麦；每个人则提供面包、小麦、蔬菜以及半瓶双耳酒瓶的葡萄酒。

学者们倒是没有对骑士和马夫同样收两马克的问题产生过质疑。那主要因为骑士通常都有自备食粮、另吃“小灶”的习惯。

总计8.5万马克的费用，决定以4次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8月中旬先付1.5万，11月1日前再付1万。翌年1202年2月支付第三笔的1万，剩余的5万马克则在4月中旬付清。

而威尼斯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后，即1202年6月24日前，备齐所有的船只及其船员。

法国使节们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逐字逐句地看完了合约。

可就在这时，威尼斯提出了一个比萨、热那亚从未有过的要求。

威尼斯元首将亲自率领50艘加莱战船及其所需的船员、战士6000人参战，条件是得到十字军征服的土地的一半。换言之，威尼斯不只扮演运输员的角色，而是想成为共同出资人。

对此，使节们提出需要一段时间考虑。可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得出了结论：法国骑士们一定会为意外地获得威尼斯这样实力雄厚的同盟而感激不尽，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元首便收到了使节们爽快的答复。

威尼斯元首立即召开了40人委员会会议。委员们与总统及其阁僚们的具体商谈内容，由于没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不过，从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到所有与会者，统统是商人，而且都是从年轻时就纵横地中海，拥有丰富贸易经验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会不知道8.5万马克的金额相当于当时法国或英国国王年收入的两倍。就算香槟公爵、佛兰德斯伯爵地位仅次于君王，这些威尼斯人难道会真的相信他们有支付能力？不管怎么样，威尼斯共和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元首提出的与法国王公们的协议。

数日后，借用使节之一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话，“在所有存在的教堂中最美的教堂”——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上，万人聚集，举行了庄严的弥撒。元首派人送信给在下榻处等待的使节们，希望他们亲自去请求威尼斯市民们批准合约。

使节们在众人的注目之下进入教堂。香槟公爵的佐将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作为代表，做了以下发言：

“市民诸君，最高贵、权威的法国王公派遣我等6人来到这里，希望

你们为夺回遭受异教徒奴役的耶路撒冷尽一份力。让我们与贵方的同盟，以神的名义，洗刷基督的耻辱。

“选择你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拥有像你们这般勇敢的人民。王公令我们跪在你们脚下请求，直到你们对大海的对岸发出怜悯之心。”

6名使者同时跪下，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感动的泪水。用吉本（Edward Gibbon）那充满讥讽的英国腔调说，当时的骑士们动不动就感动得掉眼泪。

没有落泪的是元首。因骑士们的下跪，气氛变得肃静的教堂中，突然响起了元首低沉的声音：

“让我们接受吧，诸位！”

元首的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全场。“接受！”“接受！”群众的欢呼声似乎要震裂雄伟的教堂。当喧嚣过后，恩里科·丹多洛，这位被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称赞为善良、稳重又有勇气的元首，向群众说了以下这番话：

“市民诸君，请你们想一想，神赐予了我们多么大的荣誉。这世上最优秀的人民，选择的不是他人，而是希望与各位结成同盟。让我们共同去完成解救主耶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拿到了威尼斯国民的许可，剩下来就是正式签约了。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的日期，定在翌年，即1202年6月24日，那天是圣约翰日。所有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参加者，都必须在那天之前来到威尼斯集合。威尼斯方面也必须做好整装待发的准备。

使节和元首署名之后，面对完成的契约，将手放在《圣经》上，向神发誓必定履行契约中的每一项义务，法国使者们再次落下了感动的眼泪。他们立即派人去罗马教廷向教皇报告，教皇也随即传回了对双方签约非常满意的口谕。

可是，这份内容详细到军粮数目的合约，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目的地。根据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解释，是为了保守秘密，所以只说是大海彼岸。至于保密的理由，他没有提及。我推测可能是为了不给敌人有准备的时间。然而，这件事情，却对日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完成了签约手续的使节们，向威尼斯银行借款2000马克，支付了部分的首款后，启程返回法国。一行人走到米兰附近时，兵分两路，其中两人直接返回法国，余下的4人绕道热那亚和比萨，打算去与对方商议，当十字军抵达“大海彼岸”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帮助。不过，这一趟最终无功而返。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直接回法国的两名使节之一。他在途中遇到了布里昂伯爵（Jean de Brienne）。这位伯爵也是当时和香槟公爵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人物。在宣誓不久之后，他与普利亚（Puglia）公国的国王塔恩库雷的女儿结婚。这一次正是为了确保婚后所获得的领地权，率领手下前往南意大利。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将威尼斯之行知会了伯爵，布里昂伯爵闻讯大为兴奋：“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们从威尼斯出发时，我们也会火速赶去与你们会合。”

可是，布里昂伯爵在成为普利亚领主后，眼见着同袍乘坐的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他和手下的骑士们却始终没有动静。

另一方的威尼斯，在使节们离开之后，举国上下投入了准备之中。要提供两万人、4500匹马，以及各种攻城兵器和军粮的运输船，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地中海航行的所有商船被令必须在指定日期内返回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每一个城市都张贴着召集水手的布告；造船厂夜以继日地赶工生产，尤其是需要新建大量运输战马的平底船。东征至少需要准备400艘船，就算是海军力量位居榜首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也必须全国总动员才能完成任务。对于威尼斯人而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大型“投资”。正因为如此，他们履行了合约，甚至做到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

为了早日将好消息报告给主人，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途中换了几匹马，终于抵达法国，可见到的却是卧病在床的主人，这让他震惊不已。香槟公爵虽然重病缠身，听完报告后依然喜悦无比。他说许久没有骑马，得起来练习一番，随即差人牵来了战马。但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才跨上马背坐了一会，又不得不重新躺回床上。

香槟公爵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于是开始写遗嘱，将准备带去远征的财物，分发给与他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手下骑士。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些人要向神发誓，势必在期限前到达威尼斯。香槟公爵将另一部分财产委托给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用作远征中急需。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香槟公爵便撒手人寰。可是，不少分到财产的骑士，钱进了口袋，可人却最终没有出现在威尼斯。

失去了统帅的十字军骑士们，急着找人接替。他们商议之后，决定请勃艮第公爵出马。可是公爵不仅拒绝了骑士代表提出的担任元帅的请求，甚至连十字军都不肯参加。骑士们又去找香槟公爵的表兄弟巴勒迪克伯爵（Bar-le-Duc），结果又遭拒绝。

香槟公爵去世后，作为十字军的最重要的三位人物，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伯爵聚首苏瓦松，共同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请意大利人孟菲拉特侯爵博尼法修（Bonifacio de Monferrato）出任统帅。这位既是勇敢的武将，又是法国国王表亲的孟菲拉特侯爵，欣然地接受了骑士们的请求。

来到法国的孟菲拉特侯爵，在表兄弟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宫廷中接受了盛大的欢迎之后，前往苏瓦松。他在当地的圣母教堂（Notre-Dame）与当初宣誓参加十字军的王公、骑士们一起，对着十字架和宝剑立下誓言，跪在地上见证侯爵担任总指挥的骑士们，又一次热泪盈眶。仪式结束，全体人员在约定准时相聚威尼斯之后，各自散去。这些骑士们将苏瓦松宣誓一事，传播到法国各地。那些尚未宣誓参战的人们因此受到激励，纷纷举手报名。其踊跃程度甚至被形容成所有的法国精英骑士都准备渡海前去。

奔赴威尼斯

时间来到1202年。那一年的复活节是4月14日。性急的人从那天起就开始向亲朋好友一一挥泪告别；动作慢一点儿的人，也在6月2日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当日，整理出发的行李。前往集合地的威尼斯，需要先穿过法国，再横断意大利北部。

一些拥有自家船队的佛兰德斯地区的骑士们，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

准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朝威尼斯方向航行。包括布鲁日城主在内的一行人，在他们的主人佛兰德斯伯爵面前，手按《圣经》宣誓，势必会合威尼斯。伯爵及其弟弟亨利将大部分的行装托给走海路的骑士们，自己率领大多数的骑士，走陆路前往威尼斯。

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就是没有抵达威尼斯。之后传来消息说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东（Modon）会合，结果那里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群人不知何故竟然直接去了叙利亚。在那里，他们才与阿拉伯人交手，就被打得一败涂地。有人被杀，侥幸活下来的，拼着命才逃回故乡，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十字军远征。

法国骑士中还有一批不去威尼斯集合，从马赛走海路，准备在莫东与大部队会合的人。结果这些人也没在莫东现身。他们最终的命运，大概和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相差无几。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在记述同伴的离去或背叛时，笔调充满了悲愤。他写道："不说这些了，还是来谈谈到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吧。"从此对离叛者只字不提。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与被他评价为善良的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不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善良的绅士。那些诸如待在婚后获得的领地上不肯行动，分到遗产却不遵守事前约定，或者是带着主人的行装但没有如期现身的我行我素的骑士们，一定让这位香槟公爵的爱将感到十分绝望。"每个人走的不同的路，都是神替他们安排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经常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语。

另外还有一位善良的绅士，在离约定的时间很早之前，就到达了威尼斯，他就是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子的接近，来到威尼斯的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战士不断增加，可是总人数还是太少。他们不得不从中再选出一些人，去催促那些正在途中的人加快脚步。

孟菲拉特侯爵来口信说因为有事会晚到几天，而布卢瓦伯爵则不见踪影。使者一路走到帕维亚，总算在那儿找到了悠闲自得的伯爵。使者声泪俱下，苦苦劝说，好不容易才说服伯爵前往威尼斯。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和圣保罗伯爵出面担任了说服工作，要劝说布卢瓦伯爵这样身份的人，使者本身也得具有相当的地位。

尽管派出代表在沿途催促，仍然有不少骑士从皮亚琴察（Piacenza，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位于威尼斯的西南方）出发，不往北而是朝南行进。其中有些人的理由是不相信威尼斯人，另外一些人则是想效仿获得了普利亚领土的同胞，就近找个地方占山为王。当然，最后没有一个人与十字军汇合。

由于出现了诸多离叛者，因此来到威尼斯集合的十字军战士非常少。实际人数不到当时法国王公骑士们估算并通报给威尼斯的1/3，据说只有一万人左右。

集聚在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们，被安排住在威尼斯外港利多的圣尼科洛岛（San Nicolo）上的宿舍里。这些刚安定下来的人，立即又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借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语言："没有一个基督徒曾看过这么雄伟的船队吧！"无数的帆船、加莱船和平底船，泊满了整个港口。善良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叹息："啊！想到那些没有来参加的骑士们，多么可惜呀！有了如此壮盛的军容，基督的军队本可一举摧毁异教徒的啊！可是在这里的人，只有这些舰队运载数的1/3！"

威尼斯方面完美地履行了合约。除了从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Dalmazia）召集了大量的水手，威尼斯全国半数以上的成年男子将参加为期一年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以举国体制，信守了诺言。

没有遵守契约的是法国的骑士们。就算是有着崇高的信念，可相当

于国王两倍年收入的8.5万马克的金额，以及3.35万的参与人数，究竟是以何基准得出的呢？法国国王打内战时能够征用的兵力，在一万左右，而他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带去的只有2000人。那些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王公们，尽管各自有自己的队伍，但超过3万的数字，未免过于乐观。

果然，实际来到威尼斯的正是一万余人。4次的分期付款，在支付了前两期的2.5万马克之后，剩余的6万马克便没了下文。而且很多人连两马克的伙食费用都没有，就这样两手空空地来了，结果只能由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王公、骑士们代为支付。

即便如此，费用还是不够。威尼斯方面声明：如果不付清合约规定的款项，就不发船。

对于威尼斯的要求，后世的某些历史学家评判说，既然只来了1/3的人，费用理应打折。我认为不懂契约的人才会口出此言。那些拿不出钱的王公们，肯定是非常苦恼，但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提出类似的交涉。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在文章中写道："威尼斯履行了合约，错的是我们自己。"

十字军方面决定，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威尼斯，可还是不够。终于，佛兰德斯伯爵提出把他带来的金银器拿出来抵债，其他王公、骑士们也跟着效仿。于是，堆积如山的金器银器落到了威尼斯人的手里。欠债因此减少了许多，但仍然缺3.4万马克。不过，此时的十字军从王公到一介小兵，身上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了。

毕竟是法国骑士的精英们，绝不能因为付不出钱便解散军队打道回府，否则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想向威尼斯银行借款吧，这种狼狈不堪的状态，哪里还有信用可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们。而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则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还

款。原定6月24日的出发，当然是不可能兑现了。

仿佛被软禁在利多圣尼科洛岛上的十字军战士们，渐渐地烦躁不安起来。王公、骑士们尚能去威尼斯市内走动走动，普通的士兵却不被允许。为了保证安全和防止传染病，大军不得进入市内属于当时的惯例，因此，士兵们也无从抱怨。

眼望着面前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扬帆起航的舰队，自己却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十字军官兵们，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7月。正当8月也快结束的时候，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向王公们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建议。

元首提出，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如果十字军能够帮助威尼斯攻下扎拉（现称扎达尔）的话，可以将还款期限延长至他们有能力支付之时。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威尼斯人建设的“高速公路”沿线的一座重要城镇。后来由于受匈牙利王的煽动，变成了与威尼斯敌对的城镇。对于威尼斯而言，丢失扎拉，等于是将“高速公路”拦腰截断，因此无论如何要夺回这块失地。

然而，元首的建议却让十字军方面颇感顾虑。不仅由于扎拉人是基督徒，其背后的匈牙利王也是基督徒。以打击异教徒为目的十字军，去攻打同为基督徒的人民，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处境异常窘迫，可光是想到教皇的反应，就让十字军们伤透了脑筋。

看不见出口的困境，终究需要打破。经过几天的商议，由于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等势力强大的贵族们都站到了赞同的一方，于是决定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建议。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反对的骑士决定与大部队分开行动，想办法从哪找条船直接去叙

利亚。还有人索性返回了祖国，原本的一万人，又少了一点儿。

元首听说十字军内部已达成共识，便率领威尼斯所有的参战者，向十字架宣誓，也成了十字军战士。威尼斯一方同样有不少人来自声名显赫的豪门，可以说与法国人的阵容不分伯仲。加上帆船、平底船的船员，在人数上也基本与对方持平。

王公、骑士们分到了各自的战船，法国军队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同坐旗舰。

众人突然变得忙碌了起来。有人在整理行装，或者搬运攻城兵器；有人则负责将一匹匹的战马牵进船舱……在这种忙碌的气氛下，9月很快就过去了。

1202年10月8日，翘首以盼的出发日，终于到来了。雄伟的舰队布满了整个海港，壮观的景象足以让法国骑士们忘却出发晚了三个月的窘事。

数量超过300件的攻城兵器，器宇轩昂地排列在各条战船的甲板上；桅杆上五彩缤纷的王公、骑士的各家旗帜，随秋风飘荡。整齐划一地竖立于船舷的上千只盾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盾牌的背后，是手持长枪的威武雄壮的骑士们。唯一一艘船身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的加莱船，是元首孟菲拉特侯爵乘坐的旗舰。旗舰的桅杆上挂着的绯红色底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在秋风中舞动不停。

旗舰的舰桥上并排站着4位喇叭手，同时拿起银色的喇叭，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刹那之间，无数根船桨像蜈蚣脚一般，伸出加莱船的船腹，齐刷刷地插入水中。紧跟在后的是被加莱船牵引着的帆船，舰队缓

缓地滑向外海。出港之后，船帆陆续张开，随即便鼓满了风。加莱船与帆船之间的绳索已被切断，加莱船也扬起风帆，随风前行，船桨仿佛水鸟的翅膀般，水平地固定于船舷之上。就这样，庞大的舰队在港口民众的目送之下驶向海平线那端的彼岸。

有关整个舰队的船舶数量，各有其说，没有定论。作为见证人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只写下了“壮观！前所未闻！”的感叹，并没有记录详细的数字。根据吉本引用赖麦锡（Giovanbattista Ramusio，威尼斯历史、地理学家）的记录：

加莱船——50艘

帆船——240艘

平底船——120艘

运输船——70艘

总计：480艘

如果按每艘船可容纳的人数来计算，以上的数目未免太多了。

这数字大概是当初约定的威尼斯在6月24日之前，必须备齐运载3.35万人的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人的总船数。我查阅了稍稍晚于这个时代的各年代记，发现了以下数字：

加莱船——50艘

帆船——约50艘

平底船——80艘

运输船——20艘

总计：约200艘

舰船数量之所以会有出入，是因为威尼斯方面的人数没有变动过，而法国一方则减少到预计人数的1/3。

无论如何，在13世纪初，200艘舰船集聚一堂是史无前例的。即便是400年后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对阵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派出的战船数量，不过200艘多一点儿。

舰队离开威尼斯后，沿东南航线，向伊斯特拉岛的波拉驶去。来往于东方航线的威尼斯船队，通常都会在远航之前，在波拉补给淡水和粮食。舰队在那里停留了一天。

对此，一些不喜欢威尼斯的历史学家推论："威尼斯人利用法国人不了解亚得里亚海的弱点，为赢得时间，带着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海上东游西荡。"

相反，那些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则反驳："在伊斯特拉或达尔马提亚的港口，购买粮食装船，召集划桨手上船，是威尼斯船队的惯例。"

后者之言的确有理可循。特别是船队出发比预定的6月末晚了三个月，当初召集来的水手，应该有不少人早回了老家。要重新召回这些人上船，自然要比平常多花一些时间。毕竟这一趟不是普通的东方之旅，工作时间长达一年，而且还是去打仗，人选方面，也必须做严格的筛选。

11月10日，舰队出现在扎拉的海面上。从船上眺望环绕着扎拉城的城墙，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牢不可破的印象。

“如此坚固之城，除非神明亲自动手，否则如何攻破？”不了解海港城市的法国人，陷入了不安。威尼斯虽然也是面向海洋的城市，但正如第一章中所述，海水就是他们的城墙，所以没有中世纪都市常见的那种城墙。因此，从陆地去到威尼斯的法国人，第一次看见的海港城市，就是扎拉。

元首无视法国人的叹息，首先向扎拉居民喊话，要求他们切断堵在入港口的铁锁，俯首投降。可是，扎拉人不肯屈服。他们在城墙上高举十字架和教会的旗帜，呵斥说从来没听说过攻击基督徒的十字军。

为了催促那些看见十字架后变得束手束脚的法国人赶紧行动，威尼斯人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战士们搭起敞篷，完成了从陆地一侧攻城的准备。而海面一侧已经被进港的加莱船队封锁住了。

从第二天（11日）开始的战役，打了三天，输赢基本已定。到了第五天，扎拉城沦陷。元首下令摧毁了临海而建的一面城墙，扎拉人又像从前一样，宣誓效忠威尼斯。

然而，教皇接到攻占扎拉的报告之后，勃然大怒，宣布将所有的十字军逐出教会。慌了手脚的法国人赶紧派出使节赶往罗马，向教皇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原委，请求宽恕。在了解了法国骑士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之后，教皇赦免了他们，但没有收回开除威尼斯人教籍的破门令。对此威尼斯人表现得相当坦然，也没有派任何人去向教皇求情。

按理说，基督徒要断绝与被开除教会的人来往，破门令才算是发挥了效果。而这一支十字军却变成了教徒与被逐出教会的人所组成的奇妙军队。

解决了扎拉，终于可以去讨伐异教徒了。法国人燃烧起的熊熊斗志，被元首冷冰冰的一番话彻底浇灭。元首说冬季航海极其危险，到明年复活节之前，留在扎拉城比较安全。在地中海域行商的商船，通常也会避开冬季航行，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间，留在祖国，做一些船舶修理等事情。对于海上专家的意见，法国人不得不言听计从，决定将讨伐异教徒的行程，放缓到翌年春天。

1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扎拉过冬的十字军营地里，出现了一位在法国人眼里看似东方人的人物。他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王子阿历克塞（Alexius）。王子带来了德意志王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的介绍信，身边还跟着德国护卫。

阿历克塞王子的父亲伊萨克（Isaac）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皇位遭其弟所夺，又被剜去双眼关进了牢里。王子本人一度也遭囚禁，之后成功越狱，躲在商船里逃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港（Ancona），从那里翻过阿尔卑斯山，向德意志王菲利普寻求庇护。王子的姐姐最初嫁给了西西里的诺曼王，丈夫死后，改嫁德意志王菲利普。在政治通婚盛行的当时，德意志王与拜占庭公主基于爱情的婚姻，算是相当罕见的例子。凡是能让王后高兴的事情，菲利普王都愿意做。亡命而来的年轻的王子，自然是得到了姐夫的厚待。不仅如此，菲利普王还向小舅子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实现王子收复故国的愿望。

阿历克塞王子流着眼泪，恳请十字军将领们把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

堡，帮助他攻下拜占庭首都，杀死毫无人性的叔叔，让自己这位正统继承人，登上皇位。

王子答应，一旦事成，他将提供以下的条件赞助十字军：

第一、支付20万马克。

第二、攻打埃及时，提供一万名士兵及其所有的开销，而且由王子或手下猛将率军。

第三、只要是他本人在位，保证提供500名骑士守护圣地。

第四、将希腊正教（东正教）并入罗马天主教。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哑口无言。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切肯定是前所未闻。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记载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王子会出现。如果连他这般地位的人物都不明就里，那么其他的骑士们就更不知情了。

不过，他们中有一位人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就是十字军统帅孟菲拉特侯爵。香槟公爵死后，侯爵被选为继任统帅。他在苏瓦松结束宣誓仪式后，顺道去拜访了德意志王菲利普。同一个时期，王子也在那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三人之间举行了秘密的会谈，而且内容涉及目的地从埃及的开罗改成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十字军因此获得的酬劳等事项。

事实上，第一个表示赞成的就是孟菲拉特侯爵。他举出了接受王子建议的种种好处，积极地去说服那些动摇不定的王公们。

如果有20万马克，十字军不仅能还清威尼斯的欠款，而且能让如今一贫如洗的军队变得富裕。

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埃及远征，对方会提供一万兵力及其费用，这无疑是增强了十字军的战斗力。

保护圣地的500名骑士，再加上随从，实际人数将达到1500左右。这对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至于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的统合，这个历代教皇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如果能实现，将是对教皇英诺森三世莫大的贡献。

法国骑士们感到万分纠结。当初攻打扎拉，心中已有内疚，现在君士坦丁堡可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就算那里信仰东正教，可毕竟是基督徒的城市，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然而，不可否认，王子给出的条件中，最后一项对法国骑士们特别有吸引力。当然前三项也很诱人，但对于一向以拥有坚定信仰而自负的法国人而言，能够亲手完成历代教皇所期待的东西方教会统一的心愿，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法国王公、骑士们苦恼不堪的模样，外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点可怜。

没有陷入苦恼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他果断地表示了赞成。

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应该是不太相信阿历克塞王子的承诺有兑现的可能性。兑不兑现对他大概都不是问题。攻下君士坦丁堡，让一个不得不对威尼斯表现善意的人，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才是元首真正关心的事情。

其实，攻打埃及对威尼斯几乎无利可图。埃及与威尼斯一向保持着良好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在拜占庭皇帝表现出排挤威尼斯商人，欲让比萨商人取而代之的意图之后，威尼斯就将东方的贸易中心，逐渐地从君士坦丁堡转向埃及的亚历山大。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与身为异教徒的埃及人有贸易往来。威尼斯人曾为此提出抗议，表示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禁令等于是让威尼斯人去死。教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放宽了禁令。除了木材、铁、亚麻和焦油等军需物质之外，其他商品允许交易。说来，这已经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情况也是一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当萨拉丁率领的从埃及出发的穆斯林军队与从西欧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军队在巴勒斯坦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往来于亚历山大和威尼斯之间的商船并没有因此停航。

威尼斯共和国向来尽可能地与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国家维持长久的良好关系。因为那些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无法分离的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政治手腕进行干涉。和埃及一样，叙利亚对于威尼斯而言，也是一个可以保持好关系的国家。

与威尼斯交恶的国家是支持扎拉脱离威尼斯的匈牙利王国，以及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改变以往的亲善政策，疏远威尼斯的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国家国境相连，又因匈牙利的王女嫁给拜占庭皇帝，结为了姻亲。说来也很讽刺，当时威尼斯人与基督徒的关系，远不如他们与异教徒之间来得友好。

然而，留下“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这般惊世之言的威尼斯人，哪怕对方是异教徒，只要能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他们是不会为违背了所谓的“良心”而烦恼的。

扎拉已经重新回到了威尼斯的手中。如果君士坦丁堡亦能如此，那么威尼斯人的这次“投资”，便是功德圆满。

顺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华。可是面临突发情况，能够充分利用随之而来的机会，则需要非常优秀的能力。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不仅在此刻发挥了这个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才华，而且在之后的决断中也将这种才华一以贯之。

君士坦丁堡

为了决定是否将东征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在深受良心煎熬的法国人中间，对立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不仅是王公、骑士们产生分裂，与他们同行的神职人员，也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同样来自熙笃会（Cistercians）的修道士们，因各自立场的不同而相互争斗的场面。

不过，因为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这些十字军的首领们都站在赞成一方，所以决定了局势。最后，大多数人都决定去攻打君士坦丁堡。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无法忍受攻打基督徒的行径。大约有500人抢了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战船，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渡海去埃及。可他们没有威尼斯人驾船的本领。这些人乘坐的船驶出扎拉港没多久，便在严冬汹

涌的大浪的肆虐下沉没海底，无人生还。

另外还有一些人选择走陆地前往圣地。他们也是离开扎拉刚进入匈牙利王的领地内便遭遇匈牙利士兵的追杀，侥幸逃生者，不得不再次回到扎拉。

当然，威尼斯方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叛离者。

十字军与阿历克塞王子在德意志菲利普王的特使见证下，签署了合约。可是，十字军方面，无论如何也凑不到12位以上的联署。继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和元首丹多洛之后，只有6个人的签名。其他人虽然同意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实在下不了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到东征目的地变更的报告，教皇再次被激怒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号称史上最有权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屡屡处于事后承认既定事实的被动地位。但是对野心勃勃的教皇而言，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实现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东西教会的统合，是一个无比美妙的梦想。因此，与攻打扎拉时相比，这一次教皇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

第二年，即1203年4月6日，复活节当天，舰队从扎拉出发。首先是帆船、平底船陆续离开港口，受风力影响较小、航行速度比较稳定的加莱船，则晚一天出港。两批船队的第一次汇合地点定在科孚岛（Corfu）。由于舰队由不同种类的船所组成，考虑到速度上的差异，整段航行会在中间汇合数次，等全船聚齐一处之后，再驶向下一个集合地点。通常每次集合后再出发都是同一种船型的船队依次出发。

元首、佛兰德斯伯爵、阿历克塞王子乘坐的加莱及其船队，一路顺

风顺水，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途中，在距离科孚岛还有两天航程的都拉佐靠港下船。都拉佐是威尼斯的友好港口，从这里开始往后就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都拉佐人承认阿历克塞王子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且向其宣誓效忠。目的达成之后，加莱船队继续起航，朝科孚岛驶去。

先于加莱船队出发的其他船队，已经达到科孚岛。士兵们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骑士们搭起各自的敞篷放松休息。岛上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茂密葱郁的杉树，这一切让来自欧洲北方的法国人，感到悠闲、平静。

科孚岛是十字军踏上的希腊的首个岛屿，他们在此停留了三周。表面上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宣誓效忠王子，实际上是在等待那些离叛者归队，他们就在科孚岛附近的普利亚。可是，去了普利亚的那些人，不知是不是热衷于抢占领地，并没有与科孚岛的同袍联系。白等一场的法国骑士们，只能作罢，同意出发，继续前进。

5月24日，按惯例帆船先行，其他船队紧跟在后，整个舰队离开了科孚岛。这一天天气极好，空气清澈透明，海风轻柔甘甜。所有的船都张满风帆，破浪前行。放眼望去，海平面上千帆竞过，法国人不禁感叹从未见过如此美景，沉闷的心情再次变得开朗。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Pelopónnisos）半岛南下，途中在半岛南端的莫东岛短暂停靠之后，改向东行驶。就在船队准备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面进入爱琴海之际，在狭窄的海峡上，船队与当初单独从马赛出发去叙利亚的两艘船擦身而过。船上坐着的正是那些从叙利亚空手而归的骑士们。

当双方的船靠近时，佛兰德斯伯爵派人去对方的船上，打探还有谁

健在。或许是因为对方看到这一边豪华的阵势而感到羞愧，离叛者们没有给出答复，不过，有一位骑士倒是提出非常希望加入这边的船队。当他上船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那两艘船则一路朝西驶去。

此时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船队沿途频频靠港补充军粮，又在以水质清甜而著名的安德罗斯岛（Andros）囤积了淡水。之后，船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 Strait），进入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又称马摩拉海）。当君士坦丁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6月已经过去了一半。

宏伟的君士坦丁堡，让从来没见过也没来过这里的法国人感到震撼不已。围城而建的城墙高峻挺拔，矗立于四周的塔楼固若金汤。隔着城墙望见的，是数不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与教堂。无论阶级高低，所有法国人都屈服于这壮观的景象，为自己要攻打这座世界最大都市的痴心妄想战栗不止。

在附近岛屿登陆之后，十字军将领们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发言说："各位王公，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各位将要做的是一件其他民族不曾尝试过的伟大事业，因此，必须采取贤明而且有效的行动。

"如果从陆地进攻，那边地广人多，而我们人少且食物短缺。如果分散队伍去找寻找粮食，小队人马即刻会被歼灭。我们的兵力已经够少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再有一兵一卒的损失。

"这附近有众多岛屿，物资丰富，适合补给军粮。我们先囤足粮食，再去投入神赋予我们的事业。吃饱喝足的战士一定比饥饿的士兵要来得勇敢。"

会议到此暂作结束，将领们回到了各自的船上。

第二天，6月24日，十字军的每一位士兵都在忙碌地保养着自己的武器。当舰队利用南风驶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示威时，十字军将士们一扫前日的恐惧。尽管墙头上看热闹的人数之多仍然令他们吃惊，但是自己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的思想，似乎已经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表现得英勇威武。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听不进元首的忠告，他们竟然趁士气高涨之时，一举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占据了皇帝在当地的宫殿，就此住下不肯动弹。也许他们认为粮食这种小事不该是骑士们操心的事情吧。当这些人在宫殿内尽情享受着拜占庭皇帝式的奢华之际，威尼斯人正按照预定的计划，忙着储备粮食。就这样，9天过去了。

另一方的拜占庭帝国又制定了怎样的防御策略呢？从他们得知自己的首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已经过去了半年，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商议对策。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拜占庭人没有做任何准备。根据拜占庭的年代记记载，当时能凑齐20艘战船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士兵方面主要依赖因祖国被日耳曼人占领沦为雇佣兵的英国人。这座城市在几个世纪里遭遇过数次的攻击，但从未被攻陷，这大概是让他们气定神闲的理由吧。何况这次面对的又是连恭维地讲都称不上大军的十字军，因此更没了当真应付的意思。要说皇帝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放火烧了城内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杀了些威尼斯人。

与侄子同名的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派了一位使者去斯库塔利

（Scutari）的宫殿，面见占据在那里的十字军将领。皇帝大概认为法国人是既不懂希腊语也不懂拉丁语的野蛮人，特地派了位会说法语的人去。来者用傲慢的口吻，斥责十字军不该侵略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法国人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说自己是来打倒用不义手段取得皇位的皇帝，帮助正统的皇帝登基。他们对使者大叫："以后不许再来！"将他赶出了宫殿。这下是真的要开战了。不过，之后在元首的建议之下，大家还是决定先尝试用和平方式解决。

在十字军将领们的簇拥之下，披着皇袍的王子阿历克塞登上加莱船的旗舰，出现在聚集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的众人面前。十字军方面以为，那些反对皇帝的市民们看见穿紫色皇袍的王子一定会有所回应。没料到，民众们对王子称自己才是正统皇位继承人的诉求，态度异常冷淡，城门依旧纹丝不动地紧紧关着。

7月11日，是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拉太（Galata）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可以清晰地看见海对岸摆好阵仗的拜占庭军队及其正中央的皇帝的营帐。

船上的法国骑兵团整齐列队，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盔甲上的彩色羽毛随风扬起。战马披着长至地面的豪华马甲，在马夫牵引下，跃跃欲试。

十字军舰队的阵型是加莱船在两侧，中间是帆船和平底船，船与船之间用粗壮的绳索连接在一起。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方向的潮流，一向以湍急著名，即便不刮风，也是白浪翻滚的状态。为了不让船被冲散，通常会采取船与船绑在一起的方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舰队还未停靠加拉太岸边，法国骑士们已急不可耐地跳进齐腰深的海水中，战马纷纷被牵出平底船，手持长枪的骑士们，飞身跃上马背。

不愧是来自骑士精神本家的法国人，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迎面攻击的拜占庭军打得稀里哗啦。十字军的步兵们拿着弓箭不断射向逃散的敌人，拜占庭军彻底乱了阵脚。皇帝眼看着自家的军队节节溃散，连营帐都来不及收起，急急忙忙地翻过加拉太山丘，渡过金角湾，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加拉太与君士坦丁堡不同，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两侧，全都是倾斜的山丘，最高一处的战略要地上，还有一座如今被称为“热那亚人之塔”的堡垒。因此，对于习惯在平地作战的法国骑士而言，加拉太的地形并不是非常有利。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久违的陆地上驰骋让他们感到兴奋，倍增了勇气。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拜占庭军队基本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

做出比较顽强抵抗的，是守在加拉太塔楼中的防卫军。他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从欧洲来的雇佣兵。不过，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人还是全部成了十字军的俘虏。

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将骑士和步兵运上岸之后，便开始了下一项任务——切断封锁在金角湾入口处的粗大铁链。待顺风吹起，平底船中吨位最大的“老鹰”号随即撑满风帆，朝铁链冲去，加莱船、帆船、货船紧紧跟在后面。锁链断开，威尼斯的船队蜂拥而上，金角湾中的拜占庭船队难以招架，被刺穿了船身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金角湾与加拉太同遭沦陷的命运。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攻城大战了。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在加拉太战斗结束之后，十字军方面迅速召开了作战会议。威尼斯方面主张从金角湾一侧发起攻击，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相对另外两个攻击点，金角湾一侧的城墙最低，而且塔楼也不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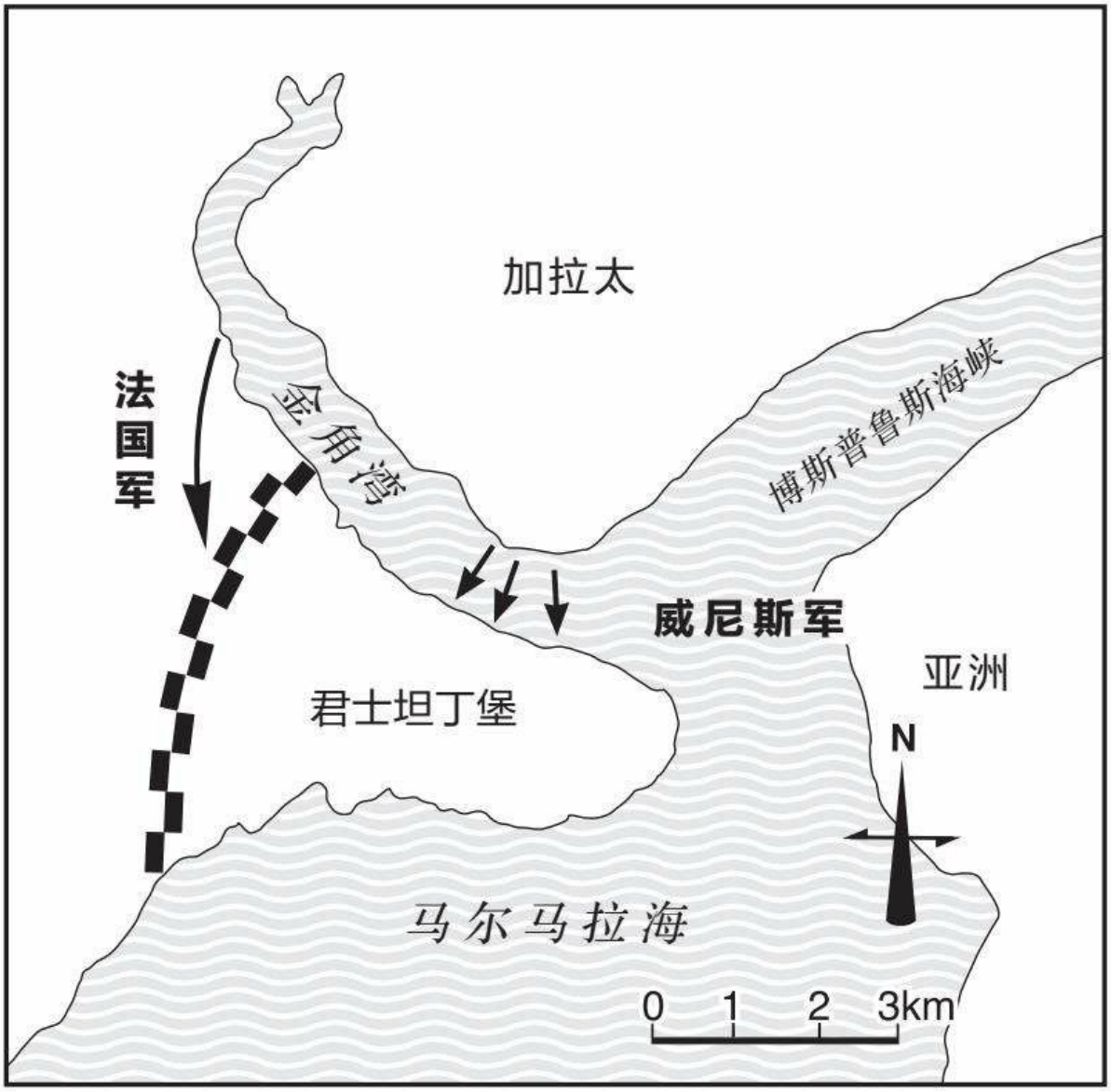
二、鲜有军队会从海上发起攻击，因此防守会较薄弱。

三、海风与浪潮可以保护战船，加莱船的机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攻打临海城市，一般都会从陆地上发起进攻。攻方船队的主要任务是在运载战士上岸后封锁港湾的入口。因此，作为防守一方，护城墙靠近陆地的一面都造得最为坚固，而靠近大海的一面则相对低矮和单薄。

靠海的城墙，或者是直接建于海边，或者是像金角湾那样，造在码头的边上。靠陆地的城墙，当然是竖立于平坦的地面之上。在装火药的炮弹尚未实用化的当时，要破坏城墙基本上是靠投掷石弹，或者在墙下挖坑埋上火药引爆这两种方式。由于在傍海的城墙下埋设火药非常困难，攻城者大多选择靠陆地一侧埋火药，因此，建造城墙时两侧的构造会有差异，君士坦丁堡也不例外。

然而，法国人却极力反对从海上发起攻击，称自己不像威尼斯人有一双“水手之足”，怎么也不肯在船上作战。元首理解法国人的弱点，所以没有强行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大家决定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兵分两路，威尼斯军从金角湾，法国军从陆地发起攻击。



君士坦丁堡周边图

数日之后，在威尼斯船队的运载下，法国军队在金角湾的深处登陆。他们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修复了被拜占庭人破坏的跨河大桥。然后按照事前的部署，在城墙前布好了阵仗。

佛兰德斯伯爵率领打头阵，第二至第五分队则分别由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圣保罗伯爵、布卢瓦伯爵、蒙莫朗西公爵（Montmorency）率领。第六分队是来自香槟地区的骑士们，后卫则是由意大利人、印度人

以及南法等来自各地的混合部队组成，孟菲拉特侯爵负责指挥。

法国军选择了靠近皇宫的城墙，那里只有一扇墙门。布阵期间，拜占庭方面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这对法国人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城里的人数是他们的200倍。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扎营之时，拜占庭开始了反击。从那一天开始，法国人就过上了武器不能离身、眼睛顾不上合的紧张日子，哪还有工夫去找军粮。法国人开始抱怨威尼斯人提供的粮食太少，这一情形后来被吉本讽刺说："不知是威尼斯人太小气，还是法国人太会吃……"总之，十字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的行动，倒是进行得有条不紊。为防止被城墙上扔来的"希腊火"击中，他们将舰桥、甲板以及桅杆上的瞭望塔都盖上了浸湿的厚布和野兽的皮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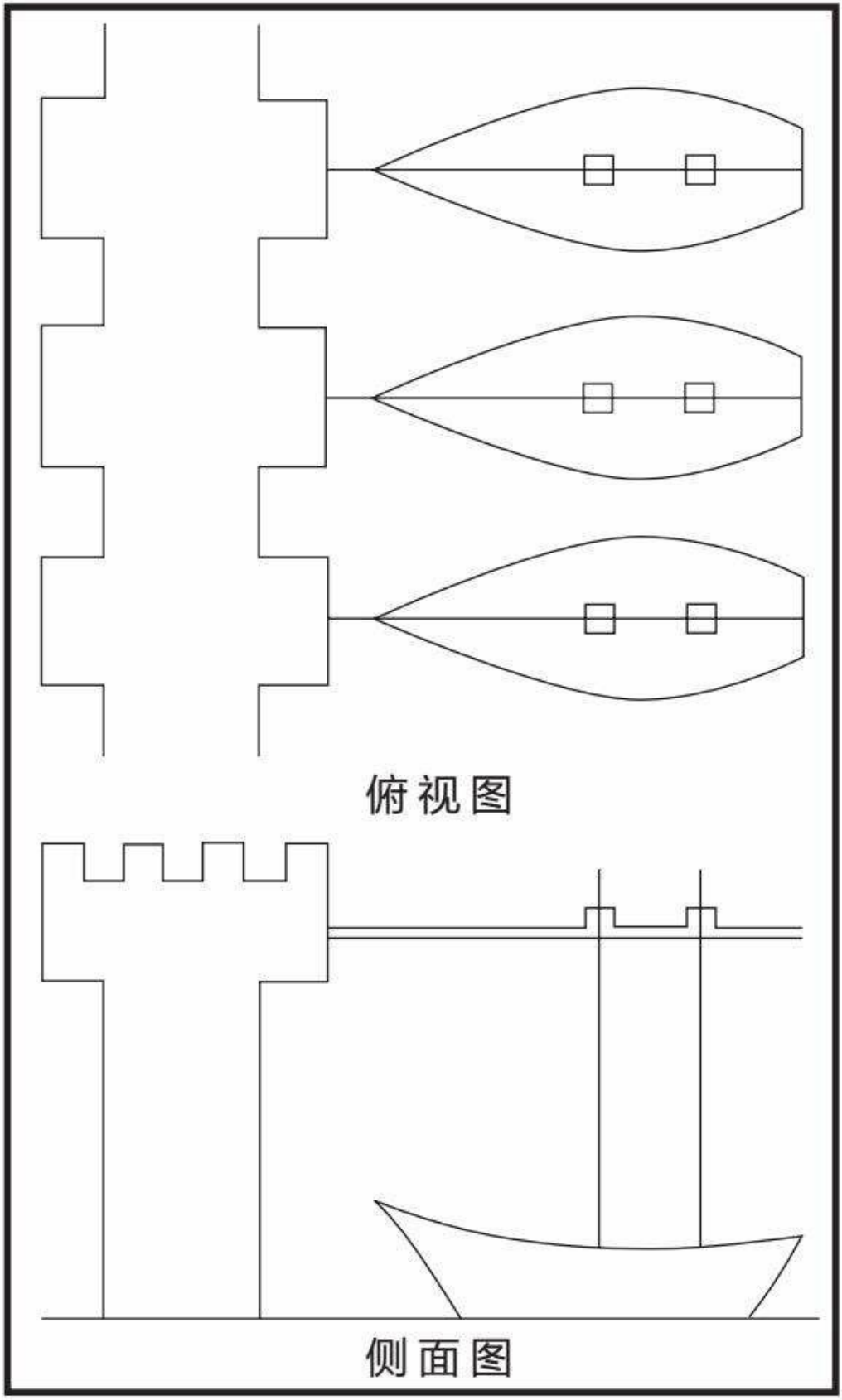
帆船上的风帆被降下，收进了下甲板。帆船和平底船夹在依靠船桨滑行的加莱船中间，只要跟着加莱船的节奏掌舵即可。不过，这种时候非常考验掌舵的技术，稍有闪失，船队就会撞上城墙下的岩壁。因为船是用粗绳相连接的，一艘船掌控失误，直接危及整个横列船队的生命。

威尼斯军队还添了一样新武器：在两根桅杆之间搭起一块木板，长度与船身同长或更长，朝船头的方向延伸。木板被称为"移动桥"，宽度足以让两位士兵并肩作战。凭借这个"移动桥"，士兵们可以跳上高度与之相仿的城墙。

当然，传统的武器，诸如前端带有挂钩的绳梯、破城门用的装有大锤的破坏车、投石器以及用来射击钉满尖刺的方木材的弓弩等也一应俱全，充分发挥了效力。不过，像"移动桥"这般武器，还真是只有拥

有“水手之足”的威尼斯人才想得到。它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正是因为人口稀少，威尼斯军队讲究务实和合理性，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另一方习惯使用常规攻城武器的法国人，本着全力以赴的骑士精神，打起仗来近乎鲁莽，对于研究、开发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机械，毫无兴趣，因此陷入苦战之中。


俯视图
侧面图

“移动桥”

由于拜占庭军的不断骚扰，法军想在城墙下挖坑埋炸药的计划久久未能实行。粮食仅剩下小麦和香肠，可食用的生肉，只有死马肉。至于葡萄酒之类的，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们甚至连组装攻城武器，都不得不先围起一个作业区，派人在四周24小时把守才能完成。拜占庭军中，尤其以皇帝亲卫队的撒克逊雇佣兵最为凶猛。

在金角湾一侧，威尼斯船队为防止撞上岸壁，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尽量将船驶近城墙。城墙上敌军射出的一排排箭，如下雨般落在船上，爬上瞭望台和“移动桥”的威尼斯军也在努力应战。

就在这时，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出现于旗舰的船头，全副武装，纹丝不动，身边竖立着绯色的圣马可狮子的巨大国旗。

当加莱船即将碰到岸壁之际，元首大声下令让他下船，违命者严处。旗舰上的人不得不唯命是从。年过80、近乎全盲的元首，与国旗一起昂首立于岸壁的景象，让所有的威尼斯士兵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愧不已，大家争先恐后地登上了陆地。与此同时，从“移动桥”成功跃上城墙的士兵，也在高墙上竖起了威尼斯国旗。

至此，最艰难的一道坎过去了。势不可挡的威尼斯士兵，杀得防守军丢盔卸甲，没一会儿的工夫，便攻下25个塔楼。金角湾一带的城墙，就这样几乎全部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元首派人向法国军报捷，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元首再次送出披着拜占庭马衣的战马，这才让他们接受了事实。

在得知金角湾一带的城墙被攻破、威尼斯军涌进城内的消息之后，阿历克塞三世皇帝下令，放火烧毁那一带的住家。火势趁着北风迅速蔓延，在威尼斯军与拜占庭军之间筑起了一道烟雾墙。皇帝见机命令城内所有的军队，从靠近陆地一侧的三个城门出城应战，皇帝亲自出征。

那一天，担任警戒的是佛兰德斯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率领的第二分队。亨利公爵发现有大批的敌军出城，急忙通知了大本营。接到消息的法国军，立即拿起武器、牵着战马来到防护栏前，按照预先决定的队列，布下了阵势。每一队的前列是手持弓箭或石弩的步兵，骑兵紧跟其后，末尾是侍从和马夫，近200名失去了战马的骑士组成突击队，站在队伍的中央。整个队列由7队组成，阵仗呈细长型。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不仅横向宽，纵向也是法国人的10倍。法国人除了从正面进攻，无计可施。

布下阵仗的两军，按兵不动，相互对峙。皇帝骑着白马，巡视军队，与法国军的距离似乎只有一箭之遥。拜占庭军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接到法国军与希腊大军对峙的报告，元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令让所有威尼斯的军人放弃占领区，带着从金角湾发起进攻的全体官兵，赶去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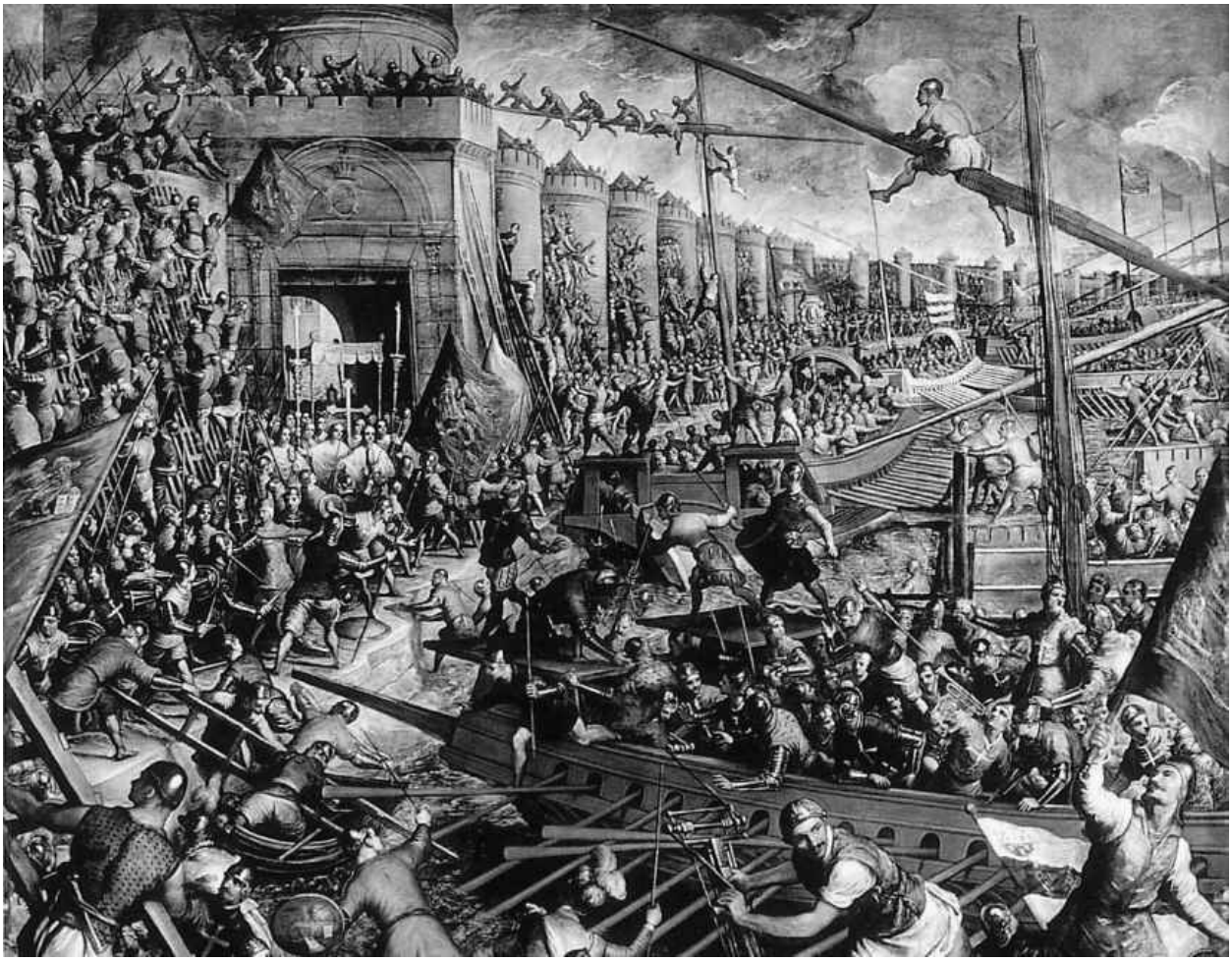
前进中的拜占庭军，看见法国军的左右两侧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威尼斯军队，似乎有一瞬间的恍惚，怎么眨眼的工夫，对面就多出了一倍的人？他们继续死死地盯着对方，慢慢移动，方向却改成向右，拜占庭人撤退了！

法国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竟然消失在敞开的城门里面。回过神来的骑士中，有些人试图追击正在撤退的皇帝，但三两下就被护驾的亲卫队打退了回来。

这天晚上，一仗未打却累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睡得不省人事。就在此刻，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皇帝带着他宠爱的一个公主和所有能带走的珠宝，逃到小亚细亚去了，失去统帅的拜占庭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丧失了斗志的士兵们不再听从将军的命令，大臣们一致决定，释放瞎了双眼的前皇帝，让他重新登基。这样，十字军就再也没了攻城的理由。

因这个“奇迹”而欣喜若狂的法国人，迅速地解除了列队，威尼斯军队也返回了宿营地。阿历克塞王子按照十字军的要求，在十字军全体王公的列席之下，加冕戴冠，与其父同为皇帝。



《君士坦丁堡攻防》（1500年前后的作品）

即位后的新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仍然经常前往加拉太，拜访在此宿营的法国王公们。起初法国人以为他只是单纯地友好访问，可是不知在第几次的时候，新皇帝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为了巩固皇位，希望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多停留一段时间。原本与威尼斯的合约在9月30日到期，皇帝提出将合约延期一年，所需费用由拜占庭帝国支付。十字军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到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是远征埃及或叙利亚，由十字军自行决定。

十字军阵营陷入一片混乱。一些忠实于骑士精神的骑士们，特地千里迢迢地向埃及苏丹送去了挑战书，听说东征再要延期半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众人抗议说："请按照约定给我们战船，提供我们前往叙利亚的船是你们的义务。"

不过，也有人赞成皇帝的建议。因为皇帝尚未支付约定的钱款，与威尼斯的合约到期后，他们根本没钱雇用船队。而且，如果现在出发，不管是去叙利亚还是埃及，抵达时都已进入冬季。在冬天远征陌生的土地，非常危险。以孟菲拉特侯爵为首的十字军将领们，全体都认为如此。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当然也是赞成者之一。甚至有传言说，那些所谓被十字军将领说服改变了主意的骑士们，其实是被威尼斯人用金钱收买了。

十字军费心费力信守了诺言，可是当初在扎拉签署的合约，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一项也没兑现。或者应该说，他努力想去兑现，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尤其是合约中的第一和第四项，更是令他望尘莫及。

由于拜占庭历代皇帝的任意挥霍，国库基本已空，根本无力支付原本承诺的登基后给20万马克。新皇帝无奈，向国民课征新税，自然又引发了国民的不满。

第四项的东西教会统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东正教教会断然拒绝了由罗马天主教主导的统合。东正教教会因带有“正”（Orthodox）字，所以一向有高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罗马教会才是异端。要他们服从罗马教会的管制，完全是痴心妄想。

从普通百姓到神职阶级，开始同仇敌忾地对拉丁人怀有敌意。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也不要再像之前那样，频频地造访十字军的营地了。

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迎来了冬天。无所事事的法国人，时不时会离开加拉太驻地，渡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城内闲逛。豪华的寺院和宫殿让他们目瞪口呆，城内富得流油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集市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的商品，让那些第一次见识的人们兴奋无比。

不过，法国人中也有狂热的基督徒。像君士坦丁堡那样各民族、宗教并立的国际都市，让当时的法国人感觉很不习惯。

虽然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城中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供奉的天主教堂，但同样也有为穆斯林而建的清真寺。于是，对此感到不满的法军狂热基督徒放火烧毁了清真寺。

被烧的不仅是清真寺，犹太教堂（synagogé）也难免其难。火速迅速蔓延至有“拉丁区”之称的西欧人居住区，人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大火烧了整整8天。

火灾之后，市民们与十字军相互推卸责任，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愈加恶化。住在“拉丁区”的人们再也没法待在君士坦丁堡，纷纷逃往加拉太

的十字军驻地避难，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人数高达1.5万人。

十字军方面对皇帝的失信非常气愤，多次派人去催促付款，而皇帝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每次只付少许欠款，到最后，连一分钱也不肯付了，反而对来者勃然大怒，呵斥说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不允许在拜占庭皇帝的面前无礼，并将他赶出了皇宫。渐渐地，十字军与拜占庭士兵的冲突变得四处可见，在双方的敌意日益加深的状态中迎来了1204年。

1月，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停泊在金角湾近加拉太海域的威尼斯的舰船上，突然传来了哨兵的惊叫声。几艘烧成火团的船只，从金角湾的深处正朝着舰队的方向漂来。如果让它们闯进船队，泊在一起的战船势必会一并燃烧。

被惊醒的威尼斯人，立刻起身冲上舰船，拿着带钩的长棒，推开渐渐靠近的火船。燃烧着的船火花四溅，但没有人开口抱怨，默默地继续着艰苦的作业。火焰的光芒，映照着他们脸上及胸口的汗水。

眼见着火球一般的船随着浪潮向港外漂远，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停止了手中的作业。随浪漂走的火船共有17艘。

这是否是皇帝的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拜占庭的什么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在船上装满易燃物品，点上火、张开风帆，漂向十字军船队停泊的方向，意图烧毁船队。所幸，威尼斯人应对敏捷，将损害减小至最低。即便如此，还是损失了三艘大船，其中一艘还是满载货物的比萨商船。

烧船事件发生之后，十字军与皇帝双方都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拜占庭人公然开始了防卫的准备。另一方的十字军，从士兵到随军

的神职人员，都对拜占庭人的背叛感到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一战。

然而，作为十字军，不能仅仅因为对方不履行合约，或者是做出挑衅的行为，就向同为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发起攻击。就在众人踌躇不定之际，拜占庭给十字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2月，抵抗派的首领、阿历克塞三世的女婿慕特索夫洛（Mourtzouphlos），趁夜深人静，勒死了沉睡中的皇帝阿历克塞四世，并宣布登基。数日后，被勒死的皇帝的父亲也原因不明地死去。

犯下杀人罪，哪怕是基督徒也不可饶恕。攻打君士坦丁堡，终于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教士们声称教皇也会准许进攻行动，这番话拭去了法国骑士们最后一点儿犹豫。

3月，战争前夕，十字军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各项措施。具体如下：

一、新皇帝由十字军及威尼斯方面各派出6人进行选举。大主教由推举皇帝未果的一方任命。

二、君士坦丁堡的1/4和帝国的1/4领土归新皇帝所有，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三、战利品的1/4留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元首又提出一个要求：全帝国境内，凡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其他将领们接受了这个要求。

4月6日，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开始。

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从陆上进攻吃尽了苦头，法国人这一次接受了威尼斯人的忠告，将攻击的主力集中于金角湾一侧。陆上由亨利公爵率领第二分队负责，主要是配合大部队监视敌人的动态。

话说回来，这一次拜占庭方面也有了经验。他们加高了靠近金角湾一侧的城墙，即使“移动桥”接近城墙，还是矮了一截，从低处往高墙上跳，自然是十分费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了塔楼上防守军的数量。

威尼斯军的作战方式是用投石器连射石弹，趁敌人蹲下躲避时，从“移动桥”上跑向塔楼，迅速占领。但拜占庭的防守对策大大降低了这种作战的效力。十字军陷入苦战，牺牲人数超过了拜占庭方面，低落的士气，与对方斗志昂扬的情绪，呈明显的对比。

暂时撤回加拉太营地的十字军，召开了作战会议。

如果再次改为从陆上进攻，士兵的人数根本无法抗敌。法国人提出还是从海上攻城，但地方改到马尔马拉海一侧，那里的城墙低矮，而且防守也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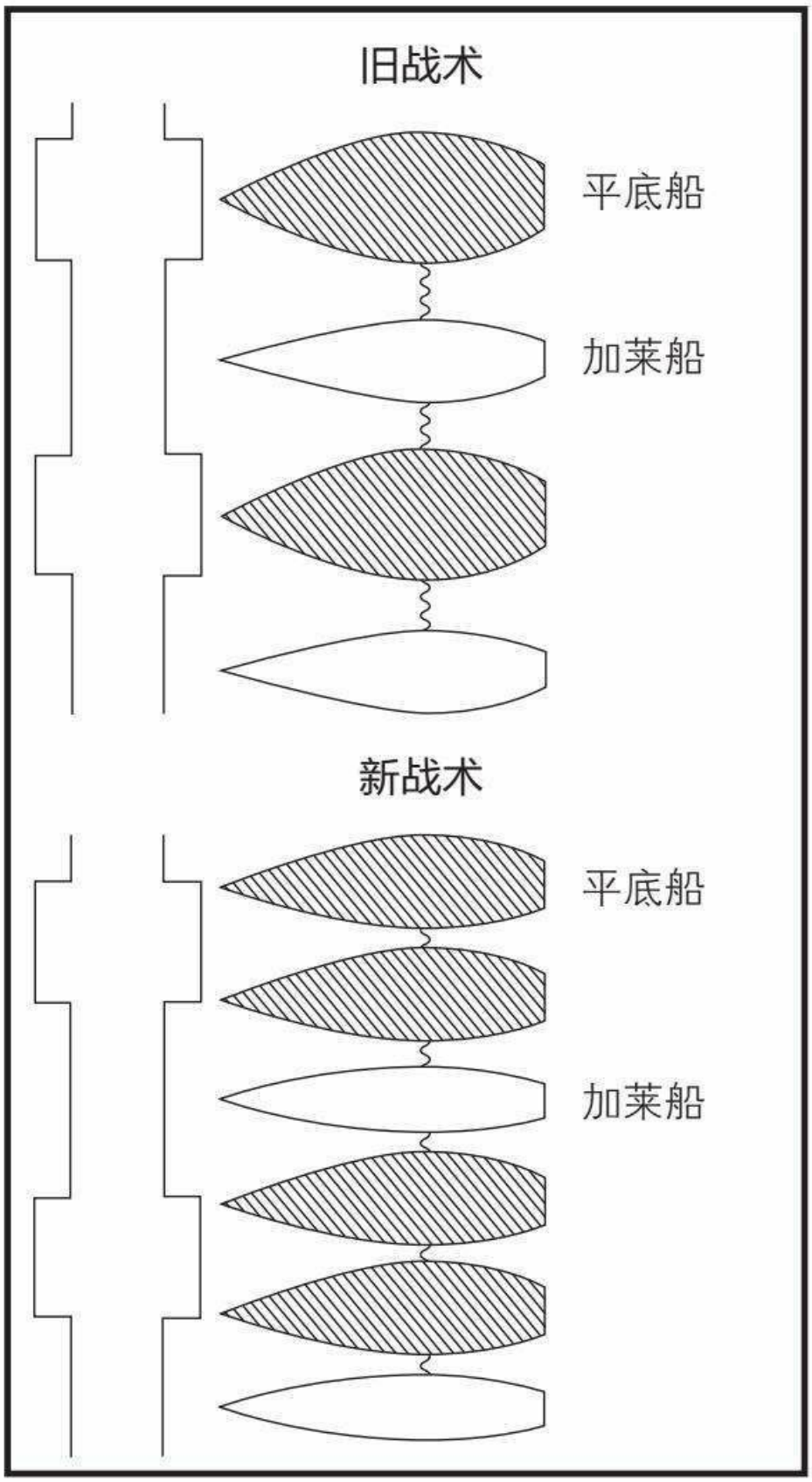
法国人的建议被元首一口否决。马尔马拉海一侧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浪和强劲的海风，连接船舶的绳索会因此被扯断。战船被海浪冲走，哪还有什么船队展开攻击。要凭借少数兵力攻打君士坦丁堡，只有从金角湾一侧进攻。这是元首反对的理由。

对此，法国人不得不接受，同意再从金角湾试一次。

不过，这次威尼斯人改变了战术，将之前的一艘船攻一个塔楼，改成两艘船攻一个塔。这样即使“移动桥”低于塔楼，但进攻塔楼的人数多了一倍。另外，为了让战船尽可能地靠近城墙，需要有风相助，而且必须是强劲的风。

12日，天上吹来了期待已久的屈拉蒙塔那风（北风）。

船队以加莱船夹住大型平底船、船船相连的阵型接近城墙。城墙上守军顽强抵抗，箭如雨下。船上的攻击一方不停地投出石弹，射出飞箭予以回击。双方的激战持续了很久。


旧战术
平底船
加莱船
新战术
平底船
加莱船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战术变化示意图

打到近正午时分，最大的两艘平底船“巡礼”号与“天国”号逼近至城墙，一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威尼斯士兵终于成功地攀上塔楼，插上了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国旗。看见塔楼上飘扬的旗帜，船上发出一片欢呼声，众人不甘落后，你争我抢，从“移动桥”蜂拥般地攀上城墙。转眼间，四座塔楼就落入了攻方的手中。

见此情景，其他士兵们也纷纷跳上岸，把绳梯搭在城墙上，顺势往上爬，墙内的守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城门从里面被打开，骑着战马的骑士们一举冲进城内。刚刚弑君登基，坐镇于紫色营帐中在城墙附近指挥的新皇帝见状，下令放火烧毁周边一带建筑，撤回了皇宫。

夜幕降临。十字军将领们看见士兵们累得七倒八歪，决定将城内巷战延后至第二天早上。于是，威尼斯兵回到船上，法国兵在占领下的城墙附近露营，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在城墙上部署岗哨。佛兰德斯伯爵则在皇帝丢弃的营帐中休息。

没想到，皇帝慕特索夫洛趁着夜深人静，带着妻子逃出城门，跑去了先前老丈人逃去的地方。拜占庭军心因此动摇，不论阿历克塞三世的另外一位女婿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如何鼓动叫嚣，军队已无心再战。拉斯卡利斯见大势已去，竟然也带着妻子，与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一起逃出了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早晨，准备打一场大仗而冲进城内的十字军，几乎没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皇宫里只剩下皇帝的妃子们及其侍女。

按照当时的惯例，十字军允许属下的士兵们进行三天的掠夺。

城陷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情形，应该与其他遭攻破的地方大抵相似。可是它所拥有的财富，在质与量上，都是同时代的任何城市无可比拟的。它富裕的程度足以让那些振臂高呼去叙利亚、埃及攻打异教徒的骑士们忘记他们的良心。

不管是教会，还是宫殿，无不遭受践踏、洗劫，圣索菲亚大教堂豪华的帷幔就因为有黄金装饰，便被撕得粉碎。教堂的圣具室如狂风扫过，弥撒用的金银杯子在醉汉手中传来传去，葡萄酒洒满一地。历尽三次大火，硕果仅存的珍贵的古抄本被不懂其价值的法国人、佛兰德斯人扔进火中，烧成灰烬。而那些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绝美的雕像，由于无法带走，索性将其砸烂。

那些造得稍有些气派的住宅主人，面对侵略者完全是一筹莫展，任由宰割。家中的金银币就不用说了，银器、地毯、天鹅绒或织锦缎制成的高级服装、丝绸纱罗的布料以及美丽诺羊毛等皮草，统统被搜刮一空。要想知道有多少艺术品遭掠夺和破坏，得看败者一方的尼基塔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录，而不是文采平平却属于胜利方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叙述。

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大臣，又是攻城战拜占庭一方的见证人，尼基塔斯在这场浩劫中，自然是无法置身事外。

在宅邸遭受了两次火灾之后，他与家人及友人一起躲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另一处住所避难。那里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相识的威尼斯商人帮他们安排了十字军把守。但家中有女儿正值青春妙龄，情况总是令人担忧。一个寒冷的深夜，大臣及其家人，靠威尼斯友人的帮助，在仆

人全部逃散的情况下，自己扛着行囊，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900年来作为东方世界的基督教首都、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君士坦丁堡沦陷了。侥幸未遭破坏的艺术品被有眼光的威尼斯人抢走并带回了威尼斯，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如今仍然摆放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正面的青铜四头马雕像，最初是罗马皇帝尼禄用来装饰凯旋门的，后来被带到君士坦丁堡，放在竞技场的门前。现在如果想看拜占庭文明的古迹，全世界最好的去处便是威尼斯。

大量被称为圣遗物的圣者遗骨、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木片，甚至不知是否真的绑过某位历史名人的锁链的一节，在信仰虔诚的威尼斯和法国人看来，都是魅力无穷的宝贝。这些圣遗物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

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暴行和杀害，连大概的数目都无人知晓。那些家园被毁、一无所有的人们，蜷曲在教会的石头地上，看着那些近乎全裸的娼妇们坐在祭坛上，唱着淫荡的法国小调，以及围在她们身边的酒气熏天的西欧人，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落城的悲惨景象，不论古今东西，总是如此相似。

第四天早上，十字军以统帅孟菲拉特侯爵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无论何人不得私藏战利品，一律上缴，由各主君进行分配，违者处死。事实上，圣保罗伯爵真的绞死了一位抗令的手下骑士，但应该有更多的官兵成功地蒙混过关。不过，光是上交的物品、金币等就足足堆满了三所用来存放战利品的教堂。

收到的现金，按规定，留出全额的1/4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与

威尼斯对分。

十字军从分到的现金中，拿出5万马克付给威尼斯。这5万马克包括从威尼斯出发前借的3.4万马克，加上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阿历克塞四世违约而由威尼斯代为垫付的军需费用。

十字军在偿还了威尼斯的欠款之后，那些王公们的手中还有10万马克的余额，再加上金银器、宝石、皮草以及高价的布料，据说战利品总额达到40万马克。

至于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艺术品、圣遗物，不包括在上述金额之中。它们最终被那些懂得其价值的人带走了。而那些无缘遇到慧眼的物品，则毁在了那些以破坏为乐的人们手中。

拉丁帝国

既然拜占庭帝国更名为拉丁帝国，就必须选一位拉丁人做皇帝。依照事前的商议，十字军和威尼斯两方各派6名代表，进行投票选举。

最初，呼声最高的，是以冷静和勇敢赢得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提名。

不过，元首拒绝成为候选人，却另外有真正的原因。这位老者害怕，身为威尼斯市民的自己成为皇帝之后，会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带来不良的影响。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威尼斯。有可能动摇国家基础、损害共和国制度的行为，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除了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最可能成为拉丁帝国初代皇帝的，当属十字军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他本人也估计自己会当选。不知是不是为

了给选举人造成心理影响，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迅速地娶了先帝伊萨克的王妃，同时也是匈牙利王的胞妹为妻。

但是威尼斯并不希望侯爵当上皇帝。由于孟菲拉特侯爵是北意大利的领主，与邻近的热那亚关系密切，如今又和觊觎亚得里亚海的匈牙利王结成了姻亲，因此对威尼斯而言，他不是一个成为君士坦丁堡主人的好人选。威尼斯方面暗地里决定推举佛兰德斯伯爵当选。

由于可能成为候补的人都不能参加选举，因此法国方面的6位选举人都是神职人员，而威尼斯则是丹多洛家族以外的豪门家族。

新皇帝出乎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选了出来，当选人是佛兰德斯·鲍德温伯爵。威尼斯的6位代表一致投给了伯爵，而十字军方面也有佛兰德斯本人派出的代表，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拉丁帝国的首位皇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替皇帝戴冠的，也是新当选的大主教——威尼斯人托马索·莫罗西尼（Tommaso Morosini）。孟菲拉特侯爵率领全体王公及骑士，作为臣下，向皇帝宣誓效忠。

虽然3/8的帝国疆域分给了十字军各王公、骑士，但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这些人而言，承认只有1/4领土的皇帝为主权人，并且对他宣誓效忠，完全没有任何抵触。

威尼斯一方倒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不过觉得这样做对他们不利。所以，同样拥有3/8的领土权，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并没有向皇帝宣誓效忠，法国人对此也没有提出抗议。威尼斯对其获得的土地，无论是从名义还是实质上，都是真正的主权人。

从此以后，元首即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在“威尼斯共和国元

首”“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头衔之外，又多了一个“Signore di un quarto e mezzo dell’impero romano di oriente”（东罗马帝国3/8的主权人）的新名号。另外，还规定了辅佐皇帝的大臣中必须要有威尼斯人。

不仅如此，如果再加上攻城前威尼斯与十字军签署的协议中“全帝国境内，凡是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这一条，等于是成功地将以热那亚为首的竞争对手踢出了帝国领域。

在办妥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在第二年的1205年，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于君士坦丁堡。

尽管十字军的统帅是孟菲拉特侯爵，但是在法国人的记录中，也将元首称为军队的大脑。这位非凡的人物，被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石棺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拉丁文刻着“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石棺。

丹多洛的墓址，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之后，仍然没有变动。他的遗骨后来之所以被移送回故国，是因为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47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使者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希望他们提供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威尼斯挑选了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并赋予他共和国公用画家的地位，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落款时间为1480年11月25日、如今陈列于伦敦国家画廊的这幅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诞生的。

不知是否来自共和国的授意，贝利尼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向穆罕默德二世提出，希望将丹多洛的遗骨带回威尼斯。被贝利尼的画深深

打动的苏丹，欣然接受了画家的请求，不仅是遗骨，连同石棺内的头盔、胸甲、宝剑以及马刺，统统让他带回了祖国。

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不仅被威尼斯人所铭记，也留存于代代西欧人的心中。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似乎就有着丹多洛家族的血液。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要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树立起的最光辉的纪念碑，应该就是完成了威尼斯与东地中海所有商业要地之间连锁式的“高速公路”。这个英明的决策以及之后坚固的守护，使得威尼斯的头号劲敌热那亚，用了50年的时间，才扳回输局。

威尼斯人虽然获得了拉丁帝国3/8的领土，但除了那些商业以及军事上的要地之外，其余都交由法国的王公贵族管辖。这是人口稀少的威尼斯非常贤明的决定。他们只尝试去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于要地以外的内陆领土，丝毫没有兴趣。

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他们也只要了金角湾边上靠近皇宫的一带，因为那里适合建造码头，还有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周边，用来作为威尼斯人的居住区。因此，威尼斯占有的领地，不是呈块状或线状，而是分散的点状。即便是这些点，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时，也会很干脆地放弃对其的所有权，只要这些地方保证与威尼斯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最务实的一种做法。威尼斯的友好城市包括：

亚得里亚海中央的扎拉，它在东征途中就成了威尼斯的领地。

占据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位置的都拉佐。

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最初的岛屿科孚岛，这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土，几年后威尼斯放弃了所有权，改拥有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科孚岛最终再次成为威尼斯的领土是1386年之后。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莫东和科伦（Coron），这两个海角的基地，也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同样位于南端、靠近克里特岛的开俄斯群岛（Cerigotto）。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爱琴海入海口的特尔米西欧涅（Thermis），之后因战略上的需要，威尼斯于1386年放弃对该地的所有权，改换成位于海湾处的纳夫普里翁（Nafplio）和阿尔戈斯（Argos）。

爱琴海的米洛斯（Milos）、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米克诺斯（Mykonos）、斯坦帕利亚（Stampalia）、蒂诺斯（Tinos）以及安德罗斯（Andros）等岛屿。

由于共和国力量有限，无法对这些岛屿进行直辖管理，因此将它们分给了威尼斯的几个名门望族。这些家族自然是忠实地按照国家的方针来管理岛屿。

拥有岛屿的家族见下：

萨努多家族（Sanudo）：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帕罗斯岛；

基吉家族（Chigi）：米克诺斯和蒂诺斯岛；

朱斯蒂尼安家族（Giustinian）：塞里福斯（Serifos）和宰阿（Zea）岛；

奎里尼家族（Querini）：斯坦帕利亚岛；

丹多洛家族：安德罗斯岛。

这些家族中的次子或三子，带着家人移居岛上，与其说是去占领，不如说去经营更为合适。驻守这些岛上的海军也非常优秀，常常应国家的要求，或者与国家海军共同战斗，或者是单独完成军事行动，为祖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不过，作为控制爱琴海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今埃维亚岛（Euboea）]是由共和国直接管辖。守住此地，等于是掌控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最后说一下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时至今日，这里仍被称为“浮在东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与德军曾经在此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可见这里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对威尼斯而言，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威尼斯与埃及等北非沿岸城市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然而，当初在分割领土时，克里特岛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的领地。威尼斯将属于他们的特撒利（Thessaly），外加1万马克，与侯爵做了交换。既然威尼斯人大费周章才将克里特岛弄到手，当然是由国家直接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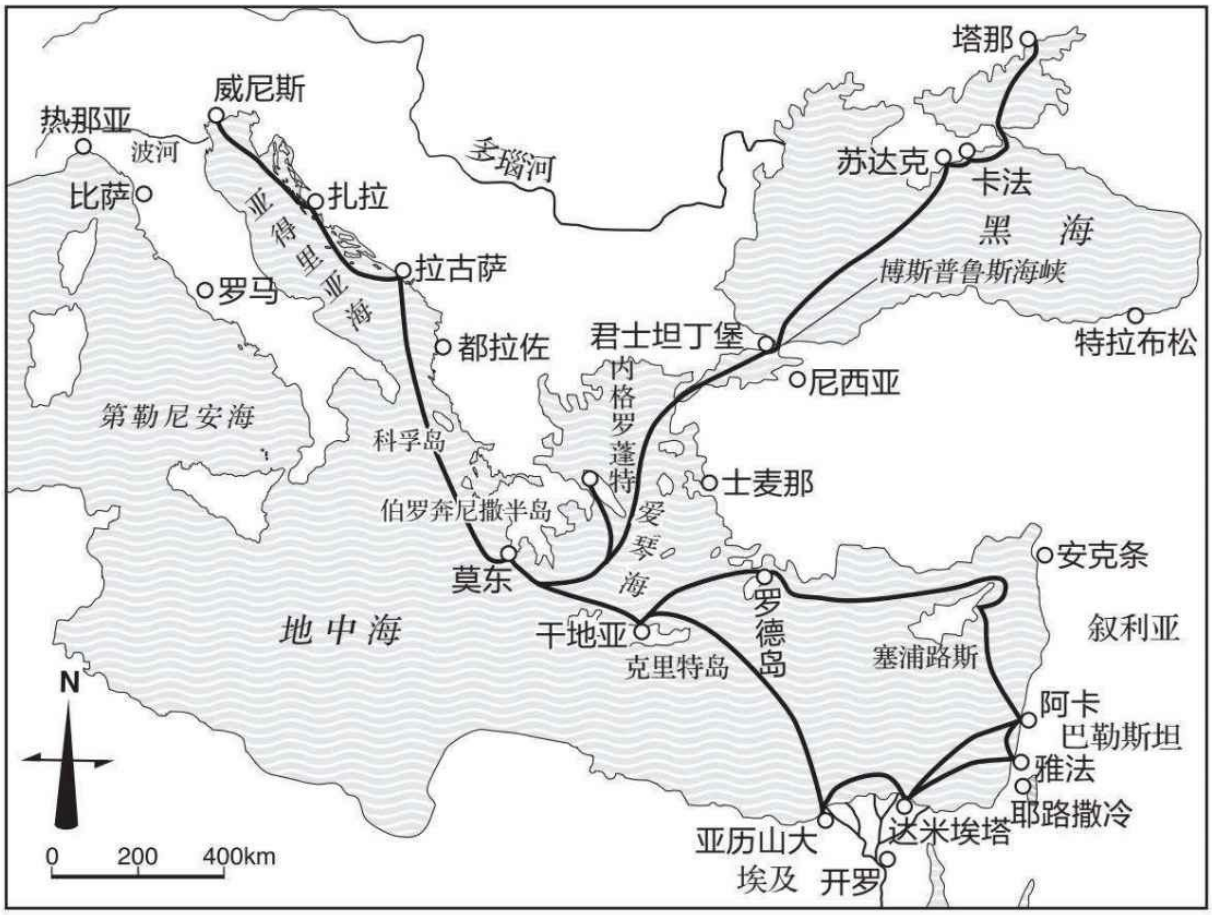
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真正可以用“死守”二字来形容。他们表现出的顽强和付出的牺牲，甚至超过了（“二战”中）对抗德国的英国军人。

就这样，威尼斯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口仅10万左右的小国，要成为控制东地中海流域的贸易大国，必须要有合理且扎实的基盘。威尼斯人充分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好时机，成功地奠定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话说回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如前文所述，可谓是恶名昭彰。以朗西曼为代表的欧美历史学家们，批判这次东征的理由，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对于文明的破坏以及毫无理由地对当地人民的暴虐行为。

第二、玷污了十字军精神，减弱了之后十字军运动的势力。



东地中海上的威尼斯高速公路

第三、原本作为抑制穆斯林势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衰退，使得基督教世界日后在对抗穆斯林攻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

就我个人而言，对学者们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调查，由衷地感到敬佩。但是从上述的理由来批判第四次东征，却很难表示赞同。

首先，有关破坏与暴虐的行为。从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三次十字军狮心王理查的行为来看，这种暴行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在浩劫中毁于一旦，

我感到极其遗憾。但回顾历史，罗马帝国瓦解时，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为例，多少文明惨遭肆虐，而且不少都是毁于基督徒之手。在破坏文明的行为上，基督徒的狂暴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徒。

唯一让我们感到的救赎，是胜利者能够懂得文明的价值。至于那些东西是作为宝贵的人类遗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还是用来点缀圣马可教堂等威尼斯的街景，我个人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次，有关对十字军精神的玷污。的确如学者所言，打着收复圣地旗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却将他们抢占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为了满足掠夺的欲望，军队连辛苦一下跑到偏僻的巴勒斯坦，摆个姿态的工夫都省去了。即使是那些去了巴勒斯坦的，不少人一听到拉丁帝国建立的消息，立马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精神堕落无疑。十字军运动自第四次东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

但如果跳脱十字军研究的角度，第四次东征难道真的带来了如此大的罪恶吗？

坚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人视为恶魔的同行者和自己的敌人。纵使其中不牵涉物欲，纯粹是崇高精神的驱使，我个人也不能同意此类观点。这种由穆斯林发起、基督徒继承的圣战思想，至少从十字军运动上体现了其逐渐减弱的趋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十字军历史上，另外还有一场遭到恶评的战争，那就是由腓德烈二世率领的第五次东征。这位凡事都采取客观态度的皇帝，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通过外交谈判，使得穆斯林承认了基督徒朝拜圣地的权

利。由于他没有杀害任何异教徒，遭到了西欧世界的非难，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让他一辈子都带着基督教敌人的烙印。之后，法国的路易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败给穆斯林军队，路易连耶路撒冷城都没看见便死在途中，但却进入了圣人的殿堂。

第三点导致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说法，要看是从现代回望，还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可以说，这一条是因历史观不同而影响历史评判的最好范例。

当人处于事件旋涡之中时，即便是深谋远虑的智者，在那个当口，同样也无法预测一些事态的发生。在第四次东征时，如果有谁能预测到100年后会诞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且势力之强大以至于在250年后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震撼整个西欧世界，那个人一定是神。要求历史人物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对他们的无能口诛笔伐，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关威尼斯历史的书籍中，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都出自英国人之手。也许源于同为海洋国家的亲近感，英国人似乎非常欣赏威尼斯。不过，从这些书籍中还是可以看到英国人卫道士的一面。向来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英国人，再怎么热爱威尼斯，毕竟那也是别人家的历史。然而，只要对英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道貌岸然的英国人更滑稽的民族。爱尔兰有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大英帝国日不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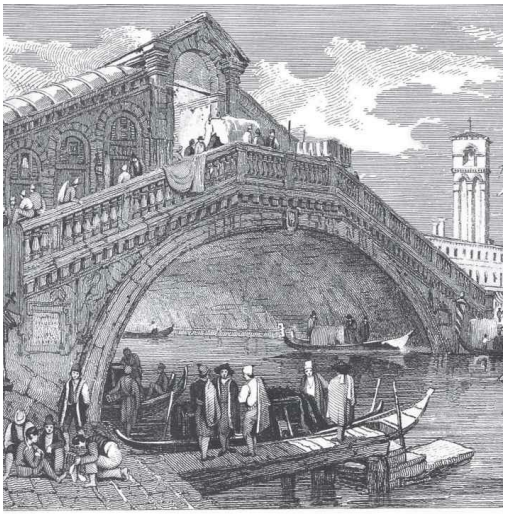
“因为上帝不相信日落后的英国人的行为。”

在英国人还不那么虚伪的时代，他们真是非常可爱。《罗马帝国衰

亡史》的作者吉本，正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

至于威尼斯人，除非伪善能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绝不会去扮演道德卫士。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以威尼斯为舞台的有两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那就是《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

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创作的这两部作品的确让威尼斯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给想真正了解威尼斯的人，多少带来了一些障碍。当然艺术家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只要作品足够赏心悦目，便是圆满。

我们先说说《奥赛罗》。把海军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威尼斯，连商船的船员都由本国人担任，像海军将官或海外基地的司令官这样的要职，不消说黑人，就是其他国家的白人，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然而，明知有违史实，仍然用黑人来表现一个饱受嫉妒心之苦的伟岸英

雄，不仅能够反映当时威尼斯的国际性，同时也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让人敬服。

《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一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为了帮助窘困的朋友，以自己身上的一磅肉做担保，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借下巨款，却因所持有的商船沉入海中而还不出钱的故事。

威尼斯商人对于分散风险，做得相当彻底。像剧中人物因为几艘船沉没，就变得身无分文的事情，不会在现实中发生。而且能够完全拥有一艘船的人，尤其是远洋船，在威尼斯唯屈指可数的富豪才有这个实力。拥有整艘船，船上满载的都是自家商品的情形，可以说几乎是不成立的。

再说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的3000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某些欧洲国家的金币）。即便是高利贷，这么一笔大钱也不可能找一个人借，势必会分散数目向数人借款，尽量减少借款抵押的额度。

当然，在为数众多的威尼斯商人中，一定会有失败者，所以，我不能像评论《奥赛罗》那样说得那么决绝。不过，就算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安东尼奥确有其人，也肯定会让其他的商人避而远之。这种拿人肉做担保的危险男人，没有人会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当然，正因为是一磅肉，才有戏剧性，如果做担保的是国债或土地，这戏就没法看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正是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史实，或者说尽量能接近史实的威尼斯商人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完全没有戏剧性，我甚至可以将本篇的题目改为“威尼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群非常务实且近代化的男人们。

我要讲的是12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近300年间发生的事情，分成以下4个时期来讲述：

第一时期——12世纪后半叶——1204年

第二时期——1205年——1260年

第三时期——1261年——1300年

第四时期——14世纪初——15世纪初中期

如此划分，不过是为了方便论述而已。历史进程中的各种事物，不仅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有时还会倒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要清楚、简单地切割历史，终究是徒劳。之所以勉为其难地做时间上的划分，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时期讲述的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的历史。

第二个时期是从拉丁帝国建立，到拜占庭佩利奥格洛（Palaeologue）王朝复辟，从而导致拉丁帝国瓦解为止。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流域，处于威尼斯独占体制之下。

第三个时期是威尼斯独占体制崩溃，同时也是十字军势力因1291年阿卡沦陷，彻底退出东地中海的时期。马可·波罗就是生活在威尼斯这一最为艰难的时代的人物。

第四个时期是度过艰难岁月后，威尼斯的经济达到顶峰的时期。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生活在第一时期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位名叫罗马诺·马伊拉诺（Romano Mairano）的男人。用历史学家们的话来说，他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威尼斯商人。

从马伊拉诺这个姓氏可以判断，他不属于威尼斯的上层阶级。而且，从他妻子结婚时带来的嫁妆，也能看出他不是出身于小康家庭，估计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本钱。

他出生年月不详，不过从其死亡的时间倒算，他开始从事东方贸易的年龄，大概是在25岁前后。

1155年，马伊拉诺拿着通过“海上融资”所获得的资金，加入了专门为采购商品和运输提供资金的“有限合资公司”，从威尼斯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他负责销售木材。在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伊拉诺卖了木材，从获益中拿出一部分归还了“海上融资”的借款，支付了“有限合资公司”的费用。

不过，他没有立即返回威尼斯。像当时许多同行一样，马伊拉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奔走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Smyrna）、巴勒斯坦的阿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至于资金的周转，也是和其他商人一样，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

而且，马伊拉诺并不只是商人，他还是一位旅行者。1156年，他担任了从士麦那到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船的船长。当然他仍然会按照行规，除了担任船长之外，也靠从上述两处融来的资金购买商品，然后在亚历山大转手卖掉。

商人兼旅行者又是水手，这就是13世纪初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形象。

马伊拉诺在离开祖国去东方打拼了9年之后，于1164年回到了威尼斯。那一年，他妻子去世了。

没想到，第二年他又航海去了东方。这一次，他既是船的主要出资人又是船长，船上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商品。商船从威尼斯出发，经由君士坦丁堡，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对一个经商10年的商人来说，仅这点儿生意是远远不够的。经商有了信用，更容易融资。因此，马伊拉诺扩大了他的事业，成了走另外航线的商船的共同出资人，在船上寄放了一些适合于当地的商品，委托他人销售。相信这条船的船长和马伊拉诺一样也是商人，他应该也有商品放在马伊拉诺的船上。

可是，三年后的1168年，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元首下令禁止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商业活动。马伊拉诺和同行们一样，只有返回威尼斯。那一年他再婚，估计这只是巧合，他也不是有心利用回国的机会才结的婚。不过，两年后，他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即将恢复之际用自己和妻子带来的钱，再加上从前面提到的两个地方融来的资金购买了船和商品，再次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那个时期到1204年，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关系非常微妙，每年都有变化。第二章中对此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威尼斯政府为了保护国家的贸易历尽艰辛，商人们更是拼上了性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马伊拉诺勇敢地奔赴东方的第二年。

对于把君士坦丁堡当作自己家一般来去自如的威尼斯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平素就带着一种被伙计抢了店铺的店主一般的愤懑之感。1171年，在皇帝的煽动之下，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发起了排斥威尼斯人的暴动。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袭击，货仓被烧成灰烬。还有很多不幸恰

巧在那时滞留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不仅遭到殴打，更因皇帝的命令被关进了大牢。

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也无一幸免地被暴徒烧毁。商人们用湿布盖在甲板上，心想保不住船，至少想保住船上的货品。可这些努力到底还是杯水车薪。马伊拉诺的船也在受害之中。不过，他比很多同行要幸运，总算保住了性命。他先逃到阿卡，之后搭上开往威尼斯的船，侥幸地回到了祖国。这次事件让他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足足用了12年时间才还清借债。至于威尼斯商人整体所受到的损失，就无法估量了。

不过，那时年纪应该已经过了40的马伊拉诺，就像他不屈的祖国一样，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既然君士坦丁堡不行了，威尼斯政府便改变策略，将贸易重点转移至亚历山大。马伊拉诺依照国家的方针，决定将根据地设在亚历山大。资金则来自元首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的儿子彼得罗。彼得罗在父亲当选元首后，代父亲管理家族的财产。他投资马伊拉诺，也许是威尼斯的大富豪们为了让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深受打击的中小商人们重新振作所采取的救济措施。齐亚尼家族是当时公认的威尼斯首屈一指的豪门。

于是，马伊拉诺再次开启了他的东方之旅。他这次仍然负责销售木材，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马伊拉诺在他熟悉的亚历山大卖了木材之后，购买了胡椒。用胡椒而不是用现金向齐亚尼在亚历山大的代理人偿还了欠款。

之后，马伊拉诺并没有回国。他将剩余的胡椒卖给了回威尼斯的商人，用这笔收益开始了北方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当然，他再次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增加了资本。

他出资建造了新船，航向北非。按照威尼斯商人惯用的方式，请与他一样既是商人又兼船员的同行担任船长，委托此人销售商品。而他本人则担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航线的船长，除了自己的货物，也

代销别人的商品。就这样，他东奔西走，20年从未返回过祖国。在这期间，他彻底还清了因君士坦丁堡暴动而欠下的巨款。

在威尼斯政府以克制的态度，采用海军力量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政策之下，1190年，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终于得以改善。威尼斯商人在20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商权。然而，就在这一年，或许是因为年龄已近60，罗马诺·马伊拉诺决定退居二线。可以说，他已经无懈可击地完成了船长的职责。

马伊拉诺退休后回到祖国的那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10年后，即1201年，马伊拉诺离开了人间。那是威尼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投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一年。马伊拉诺这位威尼斯商人，终究没等到祖国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女王的时代。

像马伊拉诺那样，总是在外商业旅行，几乎不回祖国的商人，并非都是中小商人。包括上层阶级在内的商人兼船员的经商模式，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模式对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即使是没有资本的人，只要有心就能参与海外贸易，获得致富的机会。而支持这种经商模式运转的，正是“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的制度。

集资方式

海上融资的原文为Prestito Marittimo，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融资的制度，年利率两成。虽然利息看上去很高，但在当时的欧洲实属平常。如果借款人能满载货物平安地返航，卖出商品，归还利息和本金之后，盈

余全归自己。尽管利息高得让人咋舌，倘若经商手法适当，还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融资制度叫有限合资公司，我将它翻译为“有限合资公司”（也可译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日本，除了美术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威尼斯的著作。由于没有先例参考，我只好自己从单词开始翻译。不过，“有限合资公司”我自认译得相当糟糕，所以以后的叙述中还是使用意大利原文。Colleganz本意指“连带”，与之相同的制度，在热那亚称为“Commenda”（介绍，推荐）。

这个制度并非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的首创，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等商人们所采用。不过，他们只限用于家人、亲戚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是同国人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确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最早启用的。

一直到14世纪中叶为止，不仅是威尼斯，在热那亚、比萨等海洋国家，有限合资公司始终是最主要的融资制度。它根据合约的不同分成两种融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适用于建造新船、投标租借国有船只，以及采购商品。

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人出资2/3，剩下的1/3由经营者，即船员兼商人负担。所获利润，在扣除必要开销后，由投资人与经营者对分。

第二种方式是由投资人全额出资。经营者没本钱也无妨。归航后销售商品所得利润的3/4归投资人，1/4归经营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经营者要冒着海上的危险，在外地售卖商品，然后再购买本国需要的商品带回去。要成交生意，买与卖都是难度极大的工作，实际操作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只能获得1/4的利润，未免

有欠公平。

这里，我请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有4块糖果，母亲拿1块，3块给孩子。如果我们把数字扩大10倍，有40块糖、10个孩子，每人还是拿3块，母亲手中就有了10块糖果。

有限合资公司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经营者并不是只能同一位投资人结成“连带”关系。虽然一次航海，只获得1/4的利润，但倘若同时和10位资本家结成“连带”，那么利润就是4/10。反正出一趟海做每笔买卖所耗费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劳力是相同的，一位经营者连带10个投资人的合约完全可以成立。通常，有限合资公司仅限于建造一艘船，或一趟航行。航海结束之后，“连带”也随之结束。再因其他目的，结成新的“连带”。

这种方式，不仅给没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因为能分散航海以及商业上风险，受到出资人的欢迎。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的当时，这是减少损害的唯一方法。

有限合资公司之所以长期被威尼斯人所采用，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不仅分散了风险，而且凭借与去向不同目的的人结成“连带”，开启多元化的经营。同样的木材，装在航线不同的船上，既可以从亚历山大换取香料，又可以从叙利亚得到丝织品。投资人要做的工作，一是提供资金，二是将从东方带回的货品在威尼斯市场上转手卖给从欧洲来的商人。

这个制度对于经营者也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并且靠与若干位投资人“连带”，增加收益。

还有一点，是投资人和经营者都无法忽视的益处。这种精细的分散

投资方式，让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国内或国外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尤其是有一点儿小钱的人，有了投资的机会。向这些普通人集资，即便每个人能拿出的金额不多，但汇总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这种集资方式，为威尼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运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威尼斯人能够募集到资金，与阿拉伯、犹太人只限于血缘关系间的融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267年去世的威尼斯元首雷涅罗·泽诺（Reniero　Zeno）留下的遗产明细，从而了解被威尼斯人叫作Colleganz的这种融资方式，从12、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在威尼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动产——10000里拉

现金——3388里拉

贵金属——3868里拉

各种债券——2264里拉

国债——6500里拉

有限合资公司（132种）——22935里拉

在威尼斯，像元首这般身份地位的人，其遗产的大部分都会捐赠给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属下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可见，有限合资公司、国债等也是福利机构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威尼斯商人生意做得越好，不仅是资本家或经营者获利丰厚，也让那些需要依靠福利

机构生活的人们受惠。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使用了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单词来说明。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上文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至少到14世纪中叶为止，是不可能清晰地划分两个阶级的。A商人将资金投到B商人所搭乘的开往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船，而A自己却乘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船上载有B商人投资的商品。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那些人在威尼斯不出海的投资人，指的是壮年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或者是普通的投资人。即便那些有参政机会的名家子弟，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也是在海上度过的。换言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在陆地或海上，都没有阶级之分。

那么，这些贸易商是怎样航海的呢？有关船的部分，已在第二章中说明，就不再赘言。在12、13世纪，航海技术唯一依靠的就是经验和直觉。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航海图是13世纪后半叶制作的。不过它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比萨人制作的。

尽管当今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但仍然每年都会发行提供游艇、摩托艇使用的叫作Portolano的航海指南，着重介绍具有导航意义的特征地形和地物，比如说某地入港前的海峡的外观等。可见，眼睛所见对航海有多么重要。在13世纪，航海人的经验自然占了更大的比例。像罗马诺·马伊拉诺这样常年往返于同样航线的商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势必深深地印刻着一张准确无比的航海图。

当时商船上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批既是航海专家又是商人的人物，他们中有人担任船长，有人是乘客，所以并非是船长特别优秀。同一条船上，一般会有几条船员的航海技术不亚于船长。正因为是这种情况，船上的事情，自然不会是船长独断专行。比方说，遇到暴风雨来袭，需要变更停靠港等决定，通常都会由船长、一位船的所有人（也是商人）以及两位从其他商人中选出的代表，4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哪怕船上有人来自豪门，倘若缺乏经验，同样无权参与决策。

另外，包括划桨手、见习水手在内，全体乘务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携带不同数量的商品上船，无须支付运费，当船长的好处正在于此。这样的规定，使得从船长、乘客到下级水手，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

指挥权交由谙熟此道的专家们，不让一人独断专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岗位上谨守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回馈给个人。这种充分展现于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威尼斯精神，或许就是在商船航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其实，把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说成是威尼斯独占东地中海的时代，我是有相当抵触的。

当然，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确是非常丰厚，完成了一条连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高速公路”。从此以后，威尼斯商人航行时，可以逐一停靠这些领地或友好国家的基地。然而，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它从未享受过像古罗马“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般的太平盛世。

古罗马帝国是陆地型国家。它不仅拥有富饶的天然资源，除了帝国末期之外，人力资源也从未匮乏过。

另一方的威尼斯，虽然因为其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爱国心常常被称为“中世纪的罗马”，但它终究是海洋城邦国家。它唯一的天然资源是海盐，人力资源虽然略胜于竞争对手热那亚，但那个时期也只有10万人上下。1338年时，人口数量曾经达到了13.3万，可是10年后黑死病爆发又立减了2/3。即使是被认为人口最多的1483年，也不过在19万左右。在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巴黎和那不勒斯被称为西欧第三大城市。不过作为陆地型国家的首都巴黎和那不勒斯，周边地区有足够的人力，而威尼斯城的人口就等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就算可以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各地召集水手，但这些人只是下等船员，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得依靠威尼斯的市民。

威尼斯的领土就像庭院中铺设的踏脚石，一块块分散相隔，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与内格罗蓬特等海外领土加在一起，面积远远超过了本国。单是守住那些地方，便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再加上拉丁帝国统治无能，从建国的当初起，国力便始终处于弱势。如果不是威尼斯海军的保护，国家安全早就陷入危机。虽然海岸地区靠威尼斯海军的力量，还算安泰，但内陆地区却相当薄弱。看准了这一点，各自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拉丁帝国逼近。北方有新兴的保加利亚，东方有拜占庭帝国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Νίκαια），西面有伊庇鲁斯（Epirus）的僭主。南面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安全地带，是因为它面朝威尼斯统治下的爱琴海。

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匮乏的威尼斯，为了避免与这些陆地型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拉丁帝国建国12年后，不顾西欧人指责他们没有节操，与伊庇鲁斯的僭主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三年之后，又与尼西亚帝

国的皇帝签下了同样的条约。伊庇鲁斯的僭主控制了从都拉佐到帕特雷斯（Patras）一带，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而尼西亚皇帝则掌握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沿岸。

陆地上危机四伏。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海上就安全呢？我觉得在安全的前面有必要加上一个副词“比较”。威尼斯在海上的强敌，是同为海洋国家的热那亚。

有关热那亚，我将会在第六章中详细叙述，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论及热那亚人的特质，只需要几行话就能概括。

首先，他们与威尼斯人不同，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太考虑共同体的利益。由于与国家的关联淡薄，单枪匹马型的人居多，行事作风偏向孤注一掷。

热那亚人不仅有商业头脑，也是行船的天才。这样说绝不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哥伦布。就是这样一群人向威尼斯的独占体制发起了挑战。当然，真正的大反攻，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让威尼斯麻烦不断的头号对手了。

这些拥有航海天赋的独行侠们，虽然大多是个人行动，但他们赌徒般的冒险作风却很难让人承受。换句话说，他们形同海盗。

如果在海上遇到交战国的商船船队，先开战，然后赢家拿走输家的所有货物、船只甚至船员。船员和乘客必须交赎金才能换回自由。这种方式的抢夺，威尼斯商人从来不逊于他人，不过纯粹在海上寻找猎物的海盗行为，在很早之前便消失了，首先政府就不允许。

但热那亚人则不同。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一旦遇到不顺利，立马变身为海盗。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一个生意失败，却成功转型为海盗的热那亚人的故事。话说回来，像热那亚人这种行为在当时较为普遍，反倒是威尼斯人的行事风格比较罕见。

尽管威尼斯以细长型的快速加莱船组成的船队经常巡逻于海上，但面对独狼般出没的对手，仍然感到相当棘手。

更何况威尼斯当初在拉丁帝国建立时的条约中，明确写明了被威尼斯视为敌国的商人，不得在拉丁帝国境内行商。这实际上就是将竞争对手的热那亚和比萨踢出了局。尽管拉丁帝国国力软弱，但毕竟掌握着君士坦丁堡及其通往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热那亚人竟然不能在这个东方贸易的重镇经商，难怪他们会热衷于游击战，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儿同情。

而威尼斯方面，后来也对独占君士坦丁堡所获得的利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损失，做了一番衡量，最终得出了继续封杀对手不见得有利的结论。于是，威尼斯在1206年，首先对比萨的商人开放了君士坦丁堡，又在1218年解除了对热那亚的禁令。威尼斯人优待比萨人，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只不过与热那亚商人相比，比萨人容易相处一些。

交易市场

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落入西欧人之手后，在贸易面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西欧商人首次进入了黑海沿岸。

在此之前，尽管拜占庭帝国给予了威尼斯诸多的特权，允许西欧的

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自由行商，但唯独不准他们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沿岸的诸城市直接贸易。西欧的商人们只能待在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商人采购运来的商品，然后再卖到埃及或西欧去。现在，这个禁令被解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四处飘扬着意大利海洋国家的旗帜，各国的商船船队争先恐后地涌向黑海。可见，与黑海沿岸城市的直接贸易对商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首先，黑岸沿岸有丰富的小麦、盐、盐渍鱼、皮草和奴隶。其中，最受香料集结地的埃及、叙利亚人欢迎的商品是奴隶。商人们卖掉奴隶，购买香料、高价布料带回西欧销售。少了拜占庭人的倒手，意味着采购价格变得更低。意大利商人们干劲十足，的确是有道理的。

其次，与黑海沿岸的城市直接贸易，不仅是采购其周边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购买波斯的丝绸、香料、珍珠、织锦缎、蓝色染料等这些让西欧人爱不释手的商品。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相比其作为拜占庭首都的时代，的确是光华不再，但是单凭作为通往黑海的中继站这一点，它仍然保持着十足的商业活力。

尤其是买卖奴隶更是一笔好生意。以塔那（Tana）为首的黑海地方诸城市的奴隶集散地，有来自各地的奴隶。黄种人是来自中亚的鞑靼人，白种人有俄罗斯、高加索人等。这些奴隶们被运上帆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销往东地中海地区。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他们被当作农奴；在埃及充当士兵；在北非等伊斯兰世界作为划桨手……需求量有增无减。奴隶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大多是帮忙干些家务，基本上就是有钱人家的装饰品，因此具有异国风情的黑人奴隶较受欢迎。相反，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白人奴隶的价格则会高一些。

由于基督教的普及，欧洲地方的奴隶供给越来越少。如今增加了黑海这个新市场，对西欧商人而言实在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威尼斯商人，

在君士坦丁堡这个绝佳的中继站里有治外法权的居住区和专用的码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势的威尼斯人，获利肯定比他国商人多得多。

对于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型国家而言，即使是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前面也必须加上一个“比较”。同样，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不利的前面也得加上“比较”二字。

之所以说“比较”，将这个时期与前期相比，以及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

1261年到1300年，是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划分的第三段时期。期间发生了以下三件政治大事：

1261年，拉丁帝国崩溃；

1268年，安条克沦陷；

1291年，阿卡沦陷。

对于西欧商人，尤其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光是考虑如何将生意维持下去就够他们苦恼不已。可见，经济与政治无法分割的情况不是现代才有的。

1261年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重建拜占庭帝国，这对威尼斯是一个打击。而且这一切源自竞争对手热那亚的背后支持，打击因此更为沉重。

暗地里与热那亚签下密约的佩利奥格洛，利用所在位置最靠近君士坦丁堡的优势，趁威尼斯舰队去遥远外海的间隙，与城内的支持者里应

外合，一举拿下了君士坦丁堡。闻讯急速返航的威尼斯舰队，面对大局已定的事实，也无回天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护城内居住地的同胞上船避难，将这些人运到内格罗蓬特的基地。

佩利奥格洛皇帝与热那亚签订的合约内容主要是：热那亚负责对抗威尼斯，不让威尼斯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迄今为止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盘，除了君士坦丁堡，还有遏制着金角湾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加拉太（亦称佩拉），全数转给热那亚。威尼斯人不仅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意无望，甚至被踢出了拜占庭帝国的整个疆域。

虽然威尼斯仍然掌控着大半个爱琴海，但彼时正值占领巴格达的蒙古人改变政策的时期。蒙古人自1258年攻下巴格达后，从初期的热衷破坏逐渐转向和平，欢迎西欧人来经商，因此不能通过拜占庭参与黑海沿岸的贸易，对威尼斯实在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形势发生了“比较性”的变化。或许是因为轻易地就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佩利奥格洛对热那亚似乎没什么感激之情，他开始后悔不该把好处都给了热那亚商人。当然，威尼斯政府暗地里采取得机智、柔软的外交手段也起到了成效。

7年后的1268年，威尼斯商人又一次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的许可，不过丧失了以前那样的特权。而在加拉太，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已颇具规模，威尼斯人想从中介入，并非易事。更何况，从1255年开始，威尼斯与热那亚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百姓，就在彼此的眼皮子底下做生意，虽然对那时的商人而言，这种情形属于家常便饭，但终究是令人胆战心惊。

要想知道热那亚人对黑海贸易的重视程度，我们只需看一看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个城堡要塞。至今保存下来的遗址中，除了两处

是土耳其人后来建造的之外，其余全部出自热那亚人之手。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是从黑海出发的。彼时正值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的前夕。返程时他们避开了黑海，从波斯穿过地中海，回到威尼斯。1271年带上马可·波罗同行的第二次旅程，他们是从威尼斯出发，绕过黑海，从地中海的东岸进入波斯。回程因为是在20年之后，所以是从波斯经由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Trebizond）先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再从那里返回威尼斯。

围绕黑海沿岸城市的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了百年的战争。从马可·波罗一行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些一边避开战火，一边继续行商的商人们的影子。

不仅有马可·波罗

有关马可·波罗的事迹，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这里无须再做详细的叙述。撇开先行者的伟大这一条，如果说离国多年这件事情，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像上文中提及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20多年在海外经商没有回过祖国的，大有人在。

波罗家的男人们，尤其是马可，无疑比他的同代人们多了一份好奇心，更喜欢旅行，更希望与其他民族交流。当然，第一个到大都（现北京）的西方人是马可的父亲和叔叔，他本人则是首位在（中国）宫廷担任官员的西方人。不过，在他们之后，有不少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也去了大都。

马可·波罗的幸运之处，是遇到了一位将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的人。

马可在结束漫长旅行之后，卷入了当时不断爆发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在牢中，为打发时间，他向狱友讲述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而狱友将这些内容汇集成文。托此人的福，世界知道了很多东方国家，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这里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去未知的土地做商业旅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继波罗一家旅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名字在威尼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男人们的旅行。

1338年，乔瓦尼·洛雷肖（Giovanni Loredan），和其他5位与他同样出身豪门的商人，出发前往印度德里（Delhi）。他本人刚从大都回来。由于在波罗一家之后，又有若干人去过中国，已经开辟了道路，因此他们可以从黑海深处的塔那走陆地到达萨拉伊（Sarai）。

不过，当时的西欧商人们还不知道顺着伏尔加河航行至河口，再沿着里海南下，翻越帕米尔高原边上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进入印度的这条路线。

为了和印度国王达成交易，洛雷肖一行5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当时新型的工业产品钟表和喷水器。洛雷肖个人还带上了佛罗伦萨产的羊毛织物，以便途中变卖换得旅费。

或许因为是首次来访的西方人，平安抵达德里的一行人受到了印度苏丹热烈的欢迎。他们立刻献上钟表和喷水器，苏丹大悦，赐给他们价值高过礼品十几倍的贵重的印度特产。他们带来的其他商品，也在转眼间便销售一空，第一次的印度商旅似乎大获成功。洛雷肖一行在归途中经过波斯时，卖掉了印度苏丹的赏赐品，用这些钱买了波斯的特产珍

珠。

如果这些人能平安无事地返回祖国，将缝在衣角里的珍珠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的话，他们会和马可·波罗一样出名。可惜洛雷肖一行没有那么幸运。洛雷肖和另外两位伙伴因病死在了途中，只剩下三个人回到了威尼斯。在坚守法律的威尼斯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死者的权益由遗属继承，那些投资在死者身上的投资人的权益，当然也不会血本无归。

像马可·波罗、乔瓦尼·洛雷肖这样的商人，与大多的同行相比，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异数。如果是热那亚，一定会对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将他们的大胆作风视作国家的发展方向。

然而，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

威尼斯并不是否定或压制本国商人勇敢的探险行为，而是将马伊拉诺这样的普通商人当作国家发展的栋梁。威尼斯人，特别是控制政府的大商人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有着与当时其他的国家（现在也一样）不同的见解。

按照字典的解释：

统治——治理国家及其国民。

经营——从事经济型事业。

那么，威尼斯人究竟是如何进行国家统治的呢？我想，用“经营”这个词会比“统治”更加适合。中世纪经济史权威、耶鲁大学的洛佩兹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与热那亚、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更倾向于稳定成长，因为这样更符合经济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使

用“行政指导”，特别是在海外局势动荡的这个时期，手段愈发地强硬。

固定航线的确立

被叫作“幕达”（Muda）的商船固定航线制度，建立于1255年。那正是威尼斯长期以来（比较）享受的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开始动摇，与对手热那亚的对决公开化的时期。其他海洋国家也有相同航线的船只集结在一起的“幕达”制度，不过，它仅仅是为了防止商船遭到海战或敌对国舰船袭击这单一目的。而威尼斯的“幕达”航线中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加入了提高海外贸易效率的元素，凝结着威尼斯人智慧的结晶。

“幕达”一词原指昆虫等动物在春天褪去外壳，蜕变，意译是“航海的解禁”，后被用来形容解禁期间出港的商船的固定航线。

最初，组成船队的是私人的加莱船，没过多久，都变成了国有船。数量通常是5艘，有时候也会是10艘。进入14世纪以后，由于加莱船趋向大型化，船队大约由2——3艘组成。船队的首领称作船队长，由政府任命。即使是私人船组成船队的时期，队长也是国家指定的。在战争期间航海时，常常会派加莱军船护卫，不过商用加莱船，包括划桨手在内，有战斗能力的人为数众多，所以它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船队的航线、目的地，甚至是中途停靠港，全部由国家决定。有时候政府会应因形势，对每一个船队做出不同的决策。船队在春天出港，秋天归来，如果是8月出港，则在海外度过冬天，直至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这份航海行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

航线有时会因为海外的形势而中断，或是更换目的地，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以下4条航线属于大河级的航线：

一、希腊航线——船队不仅去君士坦丁堡，常常会有部分船只中途脱离大部队，前往黑海。

二、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

三、亚历山大航线。

四、佛兰德斯航线——大多的船队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然后北上前往欧洲北部，中间停靠英国的南安普顿港（Southampton）。

这些“幕达”，即由数艘加莱商船组成的船队，等到航海期解禁之后，便纷纷离开威尼斯港。每一季出港的船舶数量大约在30——50艘左右。除了佛兰德斯航线之外，所有的船队在通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马塔帕洛角（Matapalo）之前，走的都是同样的航线。马塔帕洛海角附近的海面风向多变，被视为危险之地。闯过这个难关后，“幕达”们分道扬镳，各自向北、东或南航行。由于“高速公路”的完成，每一条航线上都设有领事馆、商馆、修船厂等完善的设施，保证航海和通商在途中不受阻碍。

要解释这些“幕达”为什么如此规划，我必须列出每一条航线的船队负责的不同的进出口商品。

首先是希腊航线，出口的是佛兰德斯的毛织品、佛罗伦萨的纺织品、德国的金属制品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进口产品包括葡萄酒、橄榄油、果实、丝绸、砂糖、蜂蜜、蜡和染料等。虽然黑海地区盛产小麦、毛皮和皮革，但由于这些产品的单价较低，因此被禁止用加莱船运输。它们只能使用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帆船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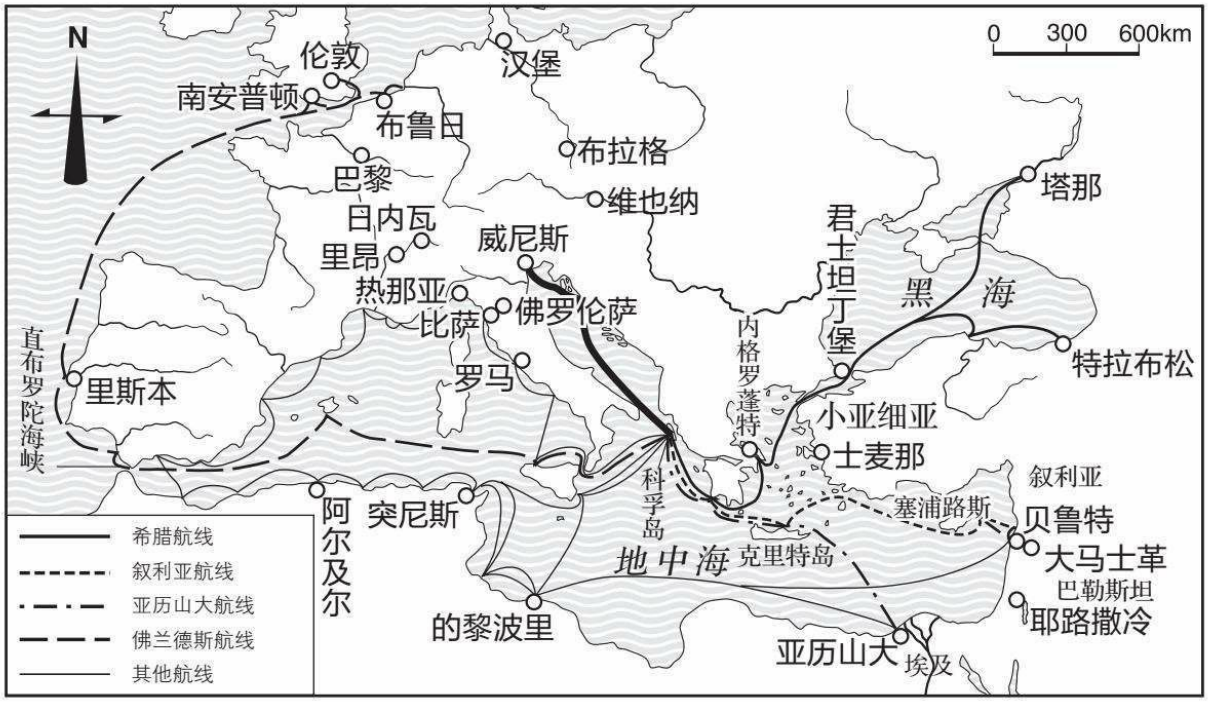
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的出口产品也差不多，就是多了

一个木材。进口产品以香料为主，再加上大马士革产的丝绸织物、果实、染料等典型的东方物产。

亚历山大航线则清一色是东洋特产的香料。而威尼斯出口的是金属制品、毛织物、木材和奴隶。

佛兰德斯航线是在14世纪初才开辟的最晚的一条航线，出口商品有香料、砂糖、希腊产的葡萄酒（这是英国人的最爱）、高级布料，进口的全是羊毛。这些羊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纺织成高级布料后，销回西欧，可见威尼斯的商业具有中介的特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沿着这些“幕达”航行。正如我在上文中将“幕达”比喻成河流，很多小帆船就像流入大河的支流，将船队不去的地方的特产，运到固定航线船队停靠的每一个港口。还有一些大型帆船因为主要运载盐、小麦、木材、腌渍鱼、奴隶等商品，所以会沿固定航线航行。



15世纪威尼斯的固定航线

由加莱船组成“幕达”的船队，虽然在准时和安全性上有优势，但由于需要众多的划桨手，所以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加莱船通常规定优先装运重量轻、价格高的诸如香料、染料、高级纺织品等商品。那些分量虽轻但价格便宜的棉花则要看加莱船是否有空间存放，如果没有，便改用帆船运输。而分量最重的盐和木材，则完全依靠帆船。不过，那些来往于支流的小船，甚至是沿着固定航线行驶的帆船，除了运载商品的期间之外，是不受政府的“行政指导”的。

如果我们在脑海中勾勒一张地中海全域的地图，那么整个图面上会有4条以威尼斯为据点的横贯东西的粗线，周围有多条细长的纵横短线与主干合流，无数条长短不一的航线，就像血管分布图一样。

在冰箱尚未问世的年代，肉类的保存方法只有盐腌或风干。能吃到没有臭味的鲜肉着实需要好运气。香料是除去肉的臭味，改善味道的唯

一办法。自从发现了香料的妙用后，西欧人便无“香”不欢。

香料类似于日本的调料，以鱼为主的日本料理，靠葱、姜、芥末提味，同样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生姜能够让肉变得更为鲜美。其他如月桂树的叶子也是香料的一种，不过这种西欧可以出产。

对胡椒，我想就不用再做什么说明了。肉桂在日本叫作“Niki”，使用方法与胡椒相同。丁香是将花蕊晒干后直接使用。肉豆蔻是一种差不多圆粒糖果大小的树木的果实，用研磨机磨碎后使用。至于生姜，没有日本产的那么饱满，干干的没有水分，看上去像骨头的碎片，要泡过水后才能使用，用途与日本料理一样。

以上这些统称为调味料的各种香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中，可谓是炙手可热的商品。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西欧的肉类料理必不可缺的元素，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虽然这时的欧洲人对香料，不像有些国家的人那样视之为珍贵的异国物品，不过也是放在小小的袋子里一包包出售。直到16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叫作“香料集市”的地方，因为生意几乎全部由威尼斯人操控，所以又被称为“威尼斯人的集市”。集市热闹非凡，景象堪为壮观。

正如中世纪的绘画或雕刻中所描绘的那样，装满香料的大麻袋放在店铺的门口，店主随手铲上一勺卖给客户，和日本卖黄豆的情景颇为相似。麻袋口随意张开着，里面的货少了，店主就将袋口朝外翻折，让袋子看起来始终是满满当当的。集市周围弥漫着强烈的香味，味道之浓郁会让人感到头疼。曾经是西欧香料集散地的威尼斯，想必也是这般光景。

印度、锡兰出产的香料，是通过以下4条路线，越过印度洋，被运到威尼斯固定船队抵达的东方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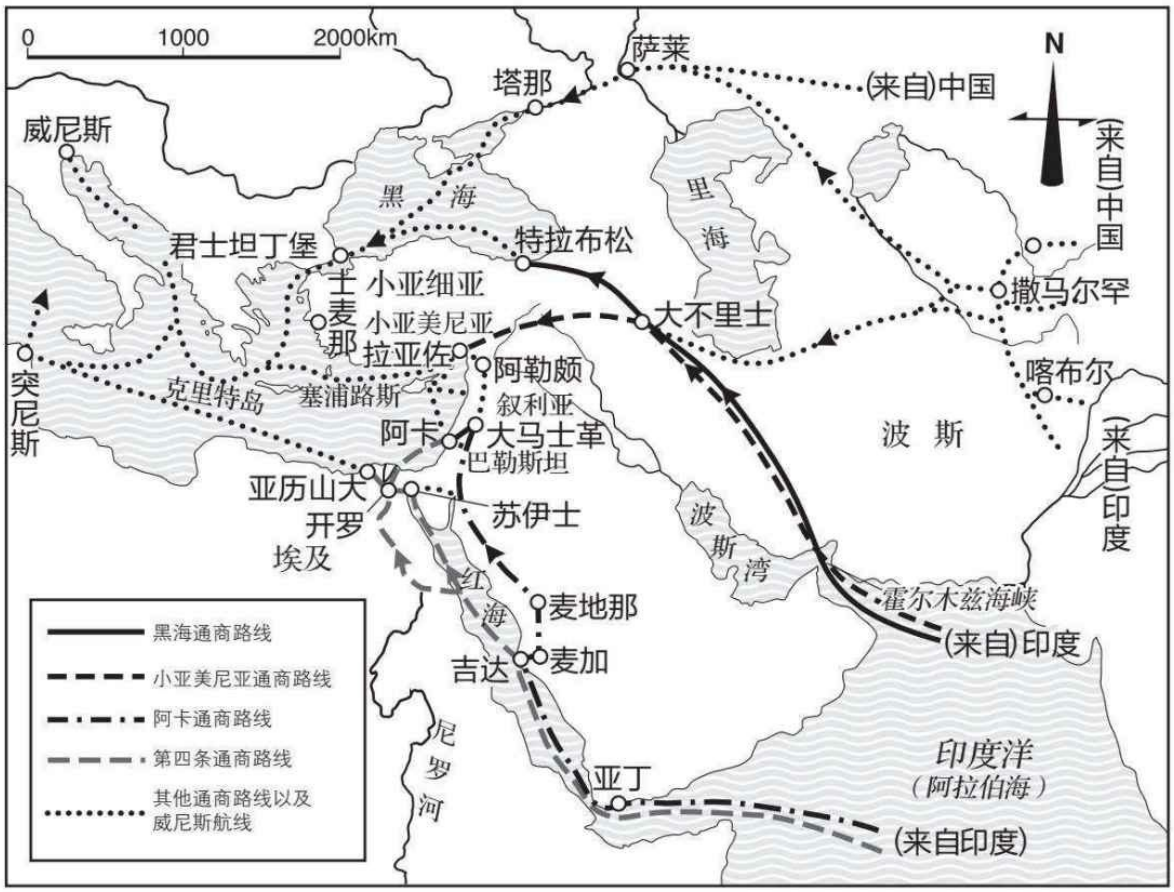
一、黑海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在波斯登陆。穿过波斯，从里海附近的大不里士（Tabriz）前往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

二、小亚美尼亚通商路线：这一条是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抵达大不里士的路线，与上述相同。之后取道往西，前往濒临地中海的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Laiazzo）。

三、阿卡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进入红海。从红海东岸的吉达（Jidda）登陆，经由麦加（Mecca）、麦地那抵达大马士革。这一段陆地的运输是靠“沙漠之舟”的骆驼。从大马士革到地中海沿岸的阿卡，大约是三四天的路程。

第四条通商路线则是沿着红海继续北上，抵达苏黎世，或是途中在西岸登陆，顺着尼罗河南下至开罗、亚历山大。也有些船队在到达开罗后，不去亚历山大，而是转向阿卡。

来往于以上这些商路的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人都是在战火等危险状态下，依然能够继续做生意的老手。哪怕是十字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增加了途中被掠夺的风险，沙漠中的通商，从来没有因此中断。



香料之路

除了军火买卖之外，一般都是形势越稳定，生意越兴隆。不管是那些穿越沙漠卖商品的商人，还是乘船来买商品的商人，就算他们本身不是和平主义者，也是打心眼里期望天下太平的。然而，现实形势往往不能如他们所愿。从1268年重开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直到1343年重开亚历山大航线的75年中，威尼斯就不得不频繁地更改“幕达”的航线。

撇开1314年建立的佛兰德斯航线不谈，从1268年重新开启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之后，黑海航线、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以及亚历山大这3条航线，真正能做到通行无阻的，只有23年的时间。1291年，作为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叙利亚最后堡垒的阿卡被马穆鲁克王朝攻破。

威尼斯在阿卡不仅设有领事馆，从专门的教堂到面包房一应俱全。对于把此地当家乡的威尼斯人而言，阿卡的沦陷，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除了不能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也同时失去了已经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大本营的埃及的生意。亚历山大的航线因此关闭。另外一条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也只能走到塞浦路斯便折回返航。因为罗马教皇对十字军的败北十分恼火，严禁与穆斯林做任何商品的交易，哪怕是非军需物质。

不过，从教皇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可以想象，多少还是有些生意在暗中进行。1302年，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秘密签订了通商条约。

从那以后的20年间，威尼斯与教皇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威尼斯人偷偷去某个城市做生意，等事情快要暴露，便逃到另外的城市。想到从沙漠里来的骆驼也得配合威尼斯人忙着东躲西藏，便让人忍俊不禁。

终于，教皇忍无可忍，于1322年派特使前往威尼斯，将十几名与穆斯林做买卖的商人逐出了教会。这些人都在威尼斯政府担任要职，其中还有一位是圣马可教堂的监察官，这是一个除了元首之外唯一能够享受终身制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很大，却拥有崇高的威信。把这些商人逐出教会在威尼斯一下子成了社会问题。

那些被破门的人们，死后不能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他们的孩子们受洗、结婚都不得以基督教方式进行，社会伤害极大。尽管威尼斯政府提出了抗议，教皇对此还是置若罔闻。无计可施的威尼斯不得不向教皇低头，在之后的23年里，亚历山大港再也没出现过一艘威尼斯的船。

我这样写，似乎会让大家感觉威尼斯忍气吞声地放弃了与穆斯林通商的丰厚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在现代经济术语中叫作“dummy”（挂名，虚拟）的办法，将目标锁定在东方的基督徒身上。与西方的教徒相比，这些人受教皇的影响较小。

不能和穆斯林做生意？好吧，那就换成东方的基督徒。事情就那么简单。

威尼斯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东藏西躲地做生意了，交易地就定在塞浦路斯岛和拉亚佐，尤其以后者为重镇。拉亚佐位于塞浦路斯岛的对岸，是一个四周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着的东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小国。它属于亚美尼亚的一个城镇，原本就是东方物产的集散地。拉亚佐集市上销售的香料，自然是途经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运来的。早在教皇大发雷霆的10年之前，威尼斯每年就有船只来往于拉亚佐。或许是为了不让教皇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威尼斯派出的都是私人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如今的形势下，他们不过是将所有的航线都换成了拉亚佐航线而已。

就这样，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成了来自波斯、红海的商品集散地。埃及的苏丹在赶走十字军之后没多久，便与威尼缔结了通商条约。由此可见，与西欧人的贸易对埃及来说多么有利。通商条约规定：威尼斯以向埃及苏丹交付年贡的形式，支付商品通过小亚美尼亚国境时的关税。作为交换条件，苏丹不会攻击属于基督教国家的小亚美尼亚。虽然不清楚威尼斯暗地里做了些什么，但从条约精细的内容来看，这非常像威尼斯人的思考方式。

与东方的基督徒通商，教皇也无话可说。于是，威尼斯共和国将亚历山大和阿卡这两个中断的生意的缺口，用黑海和拉亚佐给补上了。这样的贸易维持了21年。

1343年，据有说一位住在塔那的威尼斯人杀了一个原住民，激怒了当地的领主。他下令袭击了威尼斯商人的居住区，烧毁了货品。同时受害的还有热那亚商人。威尼斯人不得不放弃黑海地区主要商业基地之一的塔那。虽然除了塔那之外，威尼斯在附近另外还有如特拉布松等基地，黑海地区的通商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但全面依赖这条航线过于危险。

就像前文所述的有限合资公司的特点，威尼斯的个体商人对分散危险都做得非常彻底。作为整个国家，更不会冒险将筹码全押在一处。于是，他们决定向教皇行贿。

1344年，即一年之后，教皇向威尼斯政府传达了允许他们与伊斯兰人通商的指令。理由是威尼斯对于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脱离土耳其海盗的统治，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真正的功臣是圣约翰的骑士团，威尼斯不过是派出了五六艘加莱战船而已。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的航线得以重新开启。而维持了30年以上繁荣的拉亚佐，也因为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沦为东地中海沿岸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货物通过小亚美尼亚商人的中介，无疑是增加了一道流通环节。既然现在可以与伊斯兰世界直接通商，这个环节则可以省去。同样，埃及的苏丹也没了再对小亚美尼亚保持温和的必要，不久后便占领了此地。威尼斯对此也没有强烈的理由反对，反正就算以后形势有变，他们还有塞浦路斯。

那么，另外一条与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佛兰德斯航线又怎样呢？是不是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呢？事实上完全不是。航线自1314年开启后才4年，由于威尼斯船员卷入南安普顿住民的纷争，导致英国与威尼

斯一时断绝了两国的关系。虽然威尼斯在商业基地布鲁日设有领事馆，商船不至于全面停航，但20年后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使得这条航线再也无法继续。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期，热那亚照例又发生了内斗，教皇派的热那亚人与那不勒斯王勾结，皇帝派的背后有西西里王支持，两派相斗日益激烈，西地中海地区被搅得鸡犬不宁。三艘脱离船队抵达西西里港的威尼斯商船，遭到热那亚人的袭击，货物被抢劫一空。如前文所述，热那亚人无论是教皇派或皇帝派，一旦有机会，就会变成海盗，非常难对付。

威尼斯政府评估形势在短时期不会改善，于是决定关闭佛兰德斯航线。即使关闭了航线，威尼斯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欧洲西北部与威尼斯之间的陆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通行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从那之后的40年间，威尼斯完全依靠陆地，与欧洲西北部进行贸易来往。不过，最爱希腊葡萄酒的英国人不知道是如何熬过这段岁月的。葡萄酒经受得住海浪，可受不了马车的颠簸。沿途停靠英国南安普顿港的佛兰德斯航线，一直要到1380年以后才重新开启。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威尼斯政府依然坚持采用国有船队行驶固定航线“幕达”，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一、船队由加莱船组成，这种船型适合作为军船。遇到不测时，可以随时成为舰队。

第二、船舶一般在使用六七年后就必须重新打造，其间还有损坏、维护等问题。使用国有船可以让商人们摆脱这些精神及物质上的负担，集中精力做生意。

第三、通过运载香料等高价物品，抵消加莱船高额的人工费所产生的运输成本。此外，固定的航线可以保持出海频率稳定，从而加快资本运转的速度，增加利润。

第四、正因为是国有船，只要支付运输费，任何人都可以装载自己的商品。当政局稳定、航海安全有所保障的时期，政府会采用竞标的方式向私人出借船只。为了防止得标者哄抬价格，排除异己，独占仓位，法律规定了得标者可收取的运输费的上下限。而负责监视各条船的船队长，则是政府任命的官员。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独占商船相当有效，向所有希望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威尼斯那样用心地去培育、保护中小商人。关于这一点儿我会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大企业的独占行为，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整体经济僵化。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竟然是掌控威尼斯政权的大商人们。这与任由巨贾独占市场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航线的定期化对确保海外市场有利。交易的另一方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安排骆驼商队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受益的威尼斯人基本上独占了香料市场，即使是那些大胆、精明的热那亚商人们也几乎没有插足之地。

第六、政府经过准确的情报分析制定的“幕达”制度，因为是以安全、可靠为首要目的，所以无论是在资本或人力方面，对于促使威尼斯国民广泛地参与海外贸易有所贡献。

第七、强势的行政指导往往容易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威尼斯政府很明白这一问题，所以政府只负责管理固定航线。此外的航线完全交由私

人打理，新商品及新市场的开发几乎全部出自那些商人之手。但如果贸易地区的形势发生突变，政府判断有必要介入之时，会毫不迟疑地对私营者们发出行政指令。

最后一点好处是，国有商船的固定航线制度使威尼斯共和国的基本方针“国家利益等于私人利益”得到了具体的落实。或许应该说，由于这项制度符合威尼斯人的民族性格，所以才能高效地实施。

海商法

在实施“幕达”的同一年，威尼斯政府颁布了《海商法》（Leggi Marittime，亦译为“海上法”），把所有固定航线有关的事项法制化，以促进“幕达”更有效地运作。

《海商法》的内容包括船队中加莱船的吨位、运载量、运输费的上下限，采用竞标制度时承租人对船只的损伤、修理或沉没所需负担的额度。无论货物大小，必须记录在案，目的是为了在保护货物的同时监管超载的问题。

此外，《海商法》还规定了船长与船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船长有义务给予船员规定的待遇，同时船员必须遵守指示，不得擅自行动。不过，即使真有船员不听指挥，船长也不能当场给予处罚，必须在返港后，向专门负责《海商法》的“海上法庭”（Curiaedel Mare）提出上诉，由法官根据法律在听取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证词之后做出裁决。不仅是船长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诉，船员同样也有权利控告船长。

与违反规定的船员要受到惩罚一样，在遇到突发状态时，没有进行合议擅自变更航线的船长同样会受到惩处。如果船长收取了商人的贿

赂，按照商人的希望更改停靠港的话，一旦查证属实，则将被处以几乎要倾家荡产的巨额罚金。如果不能让当事人感到受贿是件极不划算的事情，这个问题是无法杜绝的。

当然，《海商法》也针对航海中死亡或受伤的船员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船员等级最低的划桨手的权利的保证。除了对他们伙食的质量、薪水和损害赔偿有所规定之外，还明确地注明了他们同样有商品买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携带货物上船，在东方卖掉后，再用赚来的钱买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当然，这原本就属于从船长到船员人人都有的权利，划桨手不过是与他们同享而已。

威尼斯政府如此用心良苦地考虑到划桨手的权利，并非是尊重人道主义精神，在中世纪还没有哪个民族有保护人权的观念。

正如第二章所述，划桨手之于加莱船，犹如马达之于游艇。而且发生战事时，这些数量最多的人员是作战的主力。对于以加莱船为核心的威尼斯国家而言，划桨手们是一群不可或缺的男人。因此，保证这些人的权利，只是政府精心规划的经济运营中的一项必要措施。

当年为划桨手专门设计的防弹衣（准确地说是防箭衣），至今仍然保存。正因为将他们视为战斗的主力，才会出现这样的装备。如果是奴隶，才不会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这些威尼斯的划桨手们有一个习俗。每次用餐时，会邀请他们的守护神圣佛卡（Foca）同桌共食。当然圣人是不会现身的，他的那一份食物就多了出来。于是，大家每个人都出一份钱，以圣人餐费的名义存起来。等船靠港后，再将这份钱捐给当地的贫民。在中世纪，相同职业的人通常都有共同的守护圣人，以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的荣誉感。

为了说明“有限合资公司”和“幕达”，这里涉及很多与14世纪有关的内容。本章叙述的是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威尼斯商人”，我把14世纪以后的事情放在最后一段讲，其实是有理由的。

以1300年前后为界，首先航海技术发生了革命，紧接着是船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技术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商人的类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指南针与航海图

首先，由于指南针、航海图以及被称为“Tavoladi Marteloio”的航线一览表出现，引发了航海技术的改变。这3样东西逐渐成为航海的必需工具。

据说早在9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它被阿拉伯人带到地中海，在1302年经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改造，提高了性能，从而在地中海地区的船员中迅速普及。之后（14世纪中），它又经过了数次改良。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航海图（portolano），是1270年绘制的，通常称为“Carta Pisana”。它是意大利另一个海洋城邦国家比萨的商人所制作的。而现在能够考证的威尼斯人最古老的航海图制作于1300年，而威尼斯人可能在此之前就开始使用航海图了。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海图已经绘制得相当准确。特别是他们活跃的主要舞台地中海流域的精确度，甚至当今仍然适用。不过，那时的海图上北欧一片海域的情况就不怎么准确了。

“Tavoladi Marteloio”是一种将东西南北分为32个区的图表。但船员

们对它的依赖度不如指南针和航海图。

计算航线与目的地间的距离，一般是根据风向，再利用指南针和航海图，用三角法测量法计算而出。但这种方法唯有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很快得出答案。毕竟海上风云多变，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计算上。可是，如果使用了航线一览表，就算没有快速读懂航海图的能力，或者不擅长三角法计算，只要能使用指南针、航海图，并懂得一些简单的计算，便可以很快地算出航线。换言之，即使不是航海老手，也可以追随着不断变化的风向，迅速决定航线。

这种方法在威尼斯人中得到广泛使用，却不怎么被热那亚人重视。或许他们自认为是航海的天才（事实亦如此），对这种给门外汉使用的道具不屑一顾。相反，威尼斯是一个喜欢机械化和合理化的民族，能让越多的人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就越能提高经济效益。

这些技术革新，大幅度地延长了航海的周期。无论是下雨、起雾、阴天，甚至因受制于肉眼能见度而无法出海的冬天，都能航行。技术革新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以往3月末才开启港口，如今可以提前到2月甚至1月。固定航线也做了日程上的调整，冬天出港的船队5月末返航；夏天出发的，则在秋天或初冬归来。一年只有一次的航海机会，变成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会有两次收益。

与此同时，英国、佛兰德斯的毛纺业，以及德国的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销往西欧的货物随之增加，大大提升了当地的购买意愿。对于东西方贸易中介的威尼斯而言，这是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对船舶做了结构上的改造。

船的变化

1300年前后，北欧的圆形船，传到了地中海流域。它是一种吃水线较高的四角帆船，叫“柯克船”（Cocca）。由于它节省人工，即运输成本，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注目。

首先，帆船与加莱船相比，原本人工费就比较低，另外，四角帆还可以根据风力的强弱，随意调整风帆的面积大小。而三角帆则需要卸下帆桁换上其他的风帆，或者是推着帆桁变换方向。操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减少了劳力。

如第二章中所述，地中海流域风向多变，仅靠四角帆航行，会浪费不少时间，于是出现了三角帆和四角帆并用的方式。

北欧帆船的另一长处是船舵的位置。由于加莱船的船尾呈锐角，因此必须左右各设一个舵。圆形船的船尾是直线型的，所以只需要一个船舵，便于操作。很快，两个舵的大型帆船就在地中海消失了。原本意指北欧船的“柯克船”，成了圆形帆船的统称。

就在这个时期，作为地中海海洋国家代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不得不面临船舶结构的选择。

热那亚最终决定全力投入大型帆船，甚至建造了千吨以上的船只。热那亚港口水深，而且他们的主要商业航线是从西地中海跨越大西洋，再加上无法确保划桨手的数量，因此使用大型帆船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利。说实话，大型帆船非常适合热那亚人那孤注一掷的独行侠气质。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尽管也追赶船舶大型化的风潮，但依然坚持以加莱船为主的一贯方针。一直要到15世纪初，他们才开始建造作为军船

用的大型帆船，最大的排水量在720吨左右。

威尼斯港口的水位浅，大型帆船在亚得里亚海无用武之地。当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在东地中海一带，与不得不越过大洋的热那亚相比，大型帆船的使用率很低。另外，威尼斯可以从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招募划桨手，与人口只有威尼斯的一半，而且周边没有类似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劳力供给地的热那亚相比，威尼斯减少船员数量并非是特别迫切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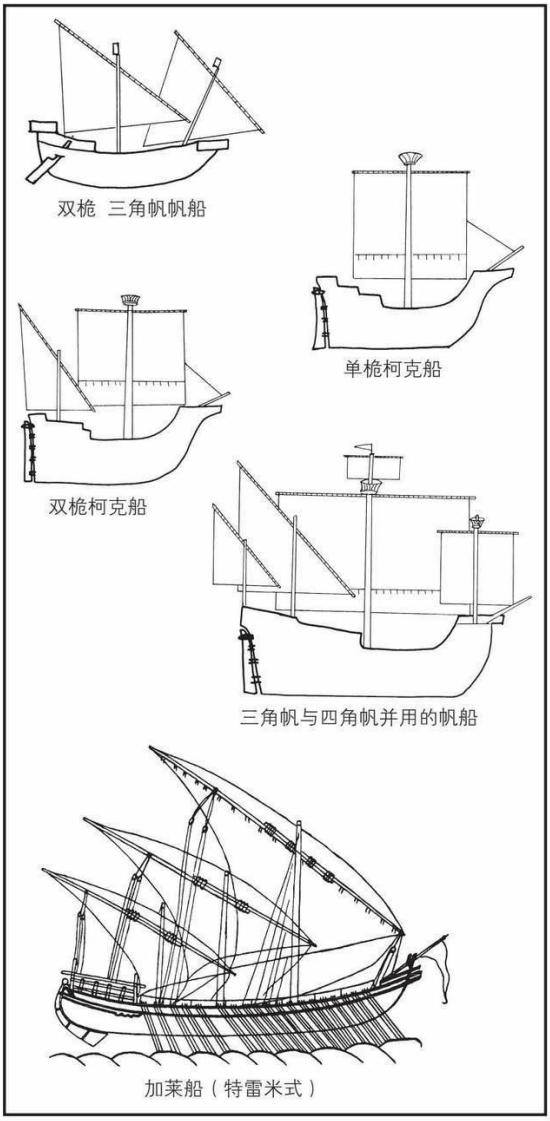
以往的加莱船称“GaleaSottile”（细身加莱船），大型化之后叫作“GaleaGrossa”（宽身加莱船），由于是为商船而开发，所以又称加莱商船。两者的差异不仅是船体的宽度。

	宽身加莱船	细身加莱船
长	46 米—47 米	40 米
宽	7 米—8 米	5 米
高	3 米	2.4 米

“细身”船的桅杆是一到两根，“宽身”船一般都是三根。而划桨也从原本两人并排的“布雷米”（Bireme），变成了三人并排的“特雷米”（Trireme）。大型化后，船的受风阻力变大导致速度减慢，因此需要通过增加船帆和划桨手的数量来加强动力（速度甚至超过以前）。船大了运载量自然提高，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节省人工意味着成本降低，利润增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对于热那亚大型帆船一个船员可拥有10吨货物的运载量，威尼斯的加莱商船每个人只有一吨的份额。威尼斯是如何弥补这之间的差距的呢？

首先，作为威尼斯固定航线主力的加莱商船，必须优先运载香料等



摘自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的《威尼斯的历史》（Storia di Venezia）

高价货物，因此缩减了不少差距。不过，真正让威尼斯能与热那亚抗衡的武器，是航线的安全性和定期性。威尼斯人凭借航行安全、航期稳定这两个优势，不仅可以和东方的卖家讨价还价，压低产品的价格，而且快速的资金运转，也增添了高利润的可能性。虽然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海上保险制度，但没有哪个威尼斯商人会为走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上的货物去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对固定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绝对的信心。

其次，热那亚虽然有大型帆船，但千吨级的毕竟数量极少。哪怕普通级别的大型帆船，仍然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人员以便船只正常运转，不可能过分精简。此外，为了航行的安全，还必须配备一些专门的战斗人员。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到了17世纪，英国的商船仍然规定每位船员只有5吨货物的运载量。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之外，热那亚大多数船只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

再次，如果帆船的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船只速度不同，是无法组成船队的。而热那亚人又是最受不了步调一致的，他们的船大大小小，按照不同的船速，各走各的路。这样，自然会增大风险。热那亚的保险制度之所以发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一次航海，他们要支付大约是货

物总额的两成的保险金。

综合以上两个竞争对手的各自利弊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威尼斯选择加莱商船作为规定航线的主力，是没有错的，他们绝对有能力对抗换成了大型帆船的热那亚。

中世纪的“金融区”

作为改革的第三项，同时又是中世纪特色之一的商业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从簿记（bookkeeping）的普及开始的。

传说簿记是由威尼斯人发明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普拉托（Prato）的一位商人想出来的，不过，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是威尼斯人。这种可以让交易内容一目了然的复式簿记法，很快地就在威尼斯、热那亚乃至西欧的商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称复式簿记为“Venziana”——威尼斯式。

簿记不可欠缺的阿拉伯数字，要归功于13世纪将它引进欧洲的比萨人。最初，因为它是异教徒的产物，多少受到了来自教会等方面的阻挠。不过，阿拉伯数字的便利性，是罗马数字无法相比的。它不易写错、看错，还有0的概念。所以，纵有教会的妨碍，它还是在讲求实惠的商人们之间广为流传，威尼斯甚至还设立了专门教孩子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

商人们通过使用阿拉伯数字记录的复式簿记，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参与的生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通过海外代理人进行的贸易明细，全盘掌握商业的进展。这对威尼斯商人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簿记的发明和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功劳不归威尼斯人，但近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创立，却百分之百是他们的功绩。

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种叫作“Banco”的银行。店铺的桌子上到处堆着金币银币，主要从事的是汇兑或借款业务。而威尼斯人创建的银行，因为店铺的桌上只有账簿，所以又称“书写的银行”（Banco di Scritta）。

在里亚尔托桥的桥端有一座里奥多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教堂的入口前是一条建有屋檐的长廊，这里成了“银行街”，总有四五位银行家坐在那里，桌上放着账簿。在教堂门口公然地做金钱交易，这实在是太像威尼斯人的作风了。不过话说回来，里亚尔托桥下的大运河两岸，原本就是贸易的中心，把银行设在此合情合理。再说银行家与东奔西走的贸易商不同，大多时候都是坐着的，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也无可厚非。

教堂的钟楼后来装上了挂钟。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去银行，在最醒目的地方都能看见挂钟。

随着这些银行的开业，当时的里亚尔托，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从北（伦敦）到南（开罗）的商人们对它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我们听到金融区、华尔街时的感觉相似。

虽然没有《华尔街日报》那么高端，当时的里亚尔托也有类似的商业小报，我们不妨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按商品种类分开，派发给顾客。

商人们会参考报纸上的价格进行交易，成交后便去银行办手续。他们在银行都有账户，只要告诉银行家向某某人的账户汇入多少钱，银行家依嘱登记在册，钱就这样过了户。商人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提着装着金币银币的袋子去做生意了。

受托将钱汇入他人的账户，银行家并不会提供收据证明。银行有账本的副本，始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因此没有开具票证的必要。

威尼斯的商人们通常会同时和数家银行来往，想与威尼斯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基本也都在威尼斯的银行开设了账户，所以账户之间的金钱流动非常方便。即使在威尼斯银行没有账户的人也可以通过威尼斯银行和自己的银行间的操作，即汇票形式，进行异地付款。这样，除了能够降低随身携带钱币的危险，商人们不必非得将卖货的收益，用来购买商品。

汇票使得商贸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它不仅用于商业，对于那些编制舰队、设立大使馆等需要大笔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创新。

距今8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近代规模的银行。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银行业务之一的融资呢？

涉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威尼斯人实在太精明。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竟然是国家。那个时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百年战争，正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煞费苦心。

当然，银行也针对个人进行融资，但仅限于贷款，不做投资。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在威尼斯开设银行，需要事先向国家交3000里拉的保证金，其中也有付了保证金，却因为过度贷款而倒闭的例子。不过像佛罗伦萨那样借钱给外国的国王，结果因国王战败，导致银行收不回本钱破产的情况，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威尼斯，经济界的主角不是银行，而是从事实业的商人。银行只是一个从侧面协助的配角，帮助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化和效率化。曾经有人提出疑问：作为中世纪经济一大中心的威尼斯，为什么

没有像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出现巴尔迪（Bardi）、贝鲁奇（Peruzzi）以及后世的美第奇家族等以银行为中心的大企业集团？我想答案就在于此。同样，这也是日后控制热那亚政治、经济的圣乔治银行，不会在威尼斯出现的原因。

如果将美第奇家族所代表的企业比作财阀的话，威尼斯商人们选择的就是商社模式（贸易公司）。

对于经济，我是个外行。写簿记、汇票这些专用名词时，一点儿实际的感受都没有。之所以要提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些非科学的假设，很多事情就无法说清道明。

首先，财阀型代表了大企业优先的经济，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在优先发展大企业的前提之下，金融业纯粹是一个依靠贷款收取利息和本金的机构，自然是选择条件良好的企业作为融资的对象。因此，不会产生扶植弱势的中小企业的概念。

而商社则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卖方越多，对买方就越有利。相反，买方越多，卖方不用出手也能削价，同样有利。习惯于这种经营模式的人，不太会产生独占市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不利于经营的概念。

当自己处于买方立场时，如果竞争对手过多，可以组成企业联盟共同采购。例如对埃及香料的采购，威尼斯政府就经常下令，指示在当地的威尼斯商人们组成“卡特尔[1]”。

反之，如果作为卖方企图独占市场的话，威尼斯的“公平竞争委员会”会立即介入，严惩不贷。曾经有商人采购了大量的住宅用建材，打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政府迅速出手干涉，没收了货物，改用竞标方式销售。按照威尼斯政府的规定，买家的购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且在出售必须依循市场价。

靠塞浦路斯的甘蔗栽培和开发盐田发迹的威尼斯当时的首富费德里柯·科纳（Federico Corner）被中小商人们控告违反禁止垄断条例时，政府并没有因为他是首富而改变一贯的立场，针对科纳要求购买砂糖或盐时必须同时购买棉花的销售手段，对他发出了违背国家方针的警告，命令他在塞浦路斯不能硬性搭卖商品。除此之外，政府还对科纳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以防他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威尼斯建立垄断体制。

从上述的内容，以及固定航线全部使用国有加莱船，给予没有能力拥有商船的人们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等措施，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对于保护、培养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相当彻底。这一切并不是中小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向政府争取而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正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大商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通过执行全力支援中小商人健全、活跃的商业活动这一贯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经济僵硬化。这样的构想，也是它有别于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唯有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威尼斯，才会制定禁止大企业垄断的政策，政策才能够得到公正、彻底的实施。

虽然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但我对日本商社的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从商社的本质来看，威尼斯人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只有从商社式思维中才能产生，在日本应该没有得到高效的实施。因为相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扶植中小企业，反而是威尼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做法，更能彰显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而且地位更为稳固。说到底，威尼斯人是被称为将自己的国家当作私营企业来运营的国民。

要论述14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业技术的革新，就不能不谈及货币与税

制的问题。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出现的货币就是威尼斯金币达克特。文中出现的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罗马人、米兰人、费拉拉人（Ferrara），甚至是法国国王，大家要的都是达克特。可见威尼斯的货币是当时的国际货币，而且一直到某个时期为止，主要以银币为主。它是1202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为了筹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而铸造的，称为“格罗索”的（Grosso de Argento）的大额银币。大银币直径23毫米，重量2.18克，纯度高达0.968，几乎就是纯银，在之后的300年间始终保持同一标准。这种大额银币的“格罗索”很快地就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流通货币。

“里拉”也是常常出现的货币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货币存在，它只是一种记载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等于240个大银币。我觉得它和英国的几尼（guinea）相似。

市内流通的货币是叫作“皮可洛”（piccolo）的小银币。直径14毫米，重量0.362克，纯度25%。“1里拉的皮可洛”是240个小银币的意思。制作银币的原料，从德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矿山进口。

西欧最早的金币，不是威尼斯所制，而是1251年热那亚铸造的“热那维诺”（genovino）。第二年，佛罗伦萨也铸造起著名的“弗罗林”（florin）金币。因为正好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从北非进口黄金。

威尼斯铸造金币是在1284年，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晚了30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银币”在国际上十分通行，没有立刻铸造金币的急迫性。第二是威尼斯支持的拉丁帝国的金币，因国体衰退而纯度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威尼斯发行本国金币，势必会引发拉丁帝国的经济走向最终的崩溃。

虽然被对手抢先了一步，但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的威尼斯人的特质，同样也反映在金币铸造上。

称为“达克特”的威尼斯金币，重3.56克，和“弗罗林”重量相同。不过与18K金的“弗罗林”相比，“达克特”是24K金，纯度达到99.7%，几乎等同于纯金。“达克特”自1284年发行以来，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纯度。

虽然发行了金币，不过在10多年时间里，贸易结算、银行账户乃至国债，使用的仍然是“大银币”。直到14世纪初期，由于白银的供给量减少，金币与银币的关系才出现变化。1328年，政府介入，制定了1达克特等于24个大银币的固定汇率，原本由银币主导的货币市场转向以金币为主。

为了保证本国币值的稳定，威尼斯政府常常出手“行政指导”，比任何国家都付出了更多的、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威尼斯国库的收入基础依靠国债，大家大概更能理解这番努力。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威尼斯人没有什么所得税、地产税、直接税等概念。所谓的税金就是间接税。

绝大部分间接税来自以里亚尔托为中心的交易所，以及德国商馆等的交易税，税率只有交易额的1%。由于交易总额庞大，累积的交易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消费税，主要针对葡萄酒、肉、盐、橄榄油等产品。税金包含在价格中，购买商品时等于自动交付了消费税。

另外，因筹集军费等目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这种短期的临时国债，利息高达12%——20%。中世纪时很多城市都发行类似的短期国

债，利息通常都会达到20%。

如果依靠税收来填满国库，不仅会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且会削弱国家或城市的财政。于是，威尼斯想到了发行长期国债。利息虽然只有5%，但由国家负责每年派发两次利息。根据记录，威尼斯政府持续支付利息的时间长达百年。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回报稳定的长期国债，受到相当的好评。由于它的安定性，作为保证财产的投资手段之一，稳健形的投资人首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也有人是鉴于它价格稳定，容易转手的理由。银行也会购买国债，甚至是威尼斯近邻的一些专制君王们，因担心自身的地位不稳，也会去买威尼斯的国债以防万一。这种做法与现代的独裁者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算是同工异曲。

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发行长期国债，同时也是最早拥有直接税概念的国家。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全部销售给希望购买的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强制购买。被强迫购买国债的人，都是高收入者，其中包括拥有威尼斯市民权的外国人。

1379年到1380年正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威尼斯做了一次资产调查。根据保存下来的调查记录，被认定为资本家的有2128人。虽然不清楚当年确切的人口数字，不过从前后关系推算，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4%左右的人成为课税的对象。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主的数量。

在这些人之中，因14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革获得参政权的贵族有1211人，可以说贵族阶级几乎全部榜上有名。其余的917位市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蔬果商人。（详见下图）

资产额（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	贵族	市民
50000以上	1	—
50000—35000	4	1
35000—20000	20	5
20000—10000	66	20
10000—5000	158	48
5000—3000	145	88
3000—1000	386	214
1000—300	431	541
总计	1211	917

摘自：G.Luzzatto的“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个人财产申报按家庭住址在各个区域同时进行。或许我们会立即想到是否会有虚报，不过威尼斯的管理不是靠人的良知，而是巨额罚款，所以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超过了人们预想。

政府根据这些富人的财产数量，按比例分配国债，强制他们购买。前文提到的元首雷涅罗·泽诺留下的遗产中有大量的债券，就是这样买下的。

以上例子很好地显示了由大商人组成的威尼斯统治阶级以“给执政者需要的正义，给人民需要的面包”统治国家，应该说经营国家的理念。

我想写的《威尼斯商人》既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马可·波罗般的冒险家。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凡的商人。与12世纪后期的自己带着商品出海，一生从事海外贸易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等商人相比，这些人多少有所改变。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构造的变化以及商业技术

的革新，是促使他们转型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扶植中小商人的政策，就不会有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Andrea Barbarigo）这般的男人出现。

又一位贸易商

从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的姓氏判断，他属于威尼斯的贵族阶级。但作为商人，他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他的生辰年月不详，根据其他资料推测，1418年时他应该是18岁。

就在前一年，担任固定航线船队队长的安德烈亚的父亲，由于在亚历山大航线的回程中违反了航海规则被处以一万达克特的巨额罚金，全家因此破产。第二年的1418年，安德烈亚拿着母亲给他的200达克特，开始了商人的生涯。这是一笔绝对不用担心会被强制购买国债的小本钱。

首先，他担任了加莱商船负责战斗的弓弩手，这是国家为没落的贵族子弟提供的职位之一。担任这项职务首先可以学习航海技术，同时因为船员全体都被允许携带商品上船，所以可以学习如何在东方销售商品，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买下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出售的经商技巧。

按当时的惯例，贵族子弟在学完文法和算术后，十四五岁时作为加莱船的弓弩手出海，进行实地学习。因此安德烈亚在18岁之前应该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在亲人照顾下的学习，与既要自食其力又要学本领的情况还是很不同。纵使18岁之前的安德烈亚有过做弓弩手的经验，那也是在他父亲的保护之下。

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在反复的航海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船员、战

士和商人。通常，在结束这段实地学习之后，他们会被派驻海外，负责父亲在海外的事业，同时也接受其他人委托的海外派驻员的工作。代人买卖所收取的手续费，代销是商品总额的2%，代买是1%。

可是，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没有那么幸运。他作为弓弩手积累了航海经验之后，又做了海上法庭的书记员。虽然这也是国家为救济没落贵族子弟安排的一种工作，但这个地方是学习法律的最佳场所。

1431年，安德烈亚31岁，持有的资金已经增加到1600达克特。他将所有的资金，再加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贸易。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究竟是在威尼斯还是海外，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认为，他应该身在海外，而且担任海外派驻员，奔波于多国之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日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同时指挥20位各地的代理人呢。

39岁时安德烈亚结了婚。身为巴尔巴里戈家族的成员，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威尼斯的贵族卡佩洛（Capello）家的女儿。新娘带来了4000达克特的嫁妆，这些钱也全部给安德烈亚拿去做了投资。他十分热衷于此道，曾经因为投资过度，为了10达克特，而不得不典当戒指。

威尼斯的商人似乎都有把妻子的嫁妆拿去投资的习惯。其中更有像之前提到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还是新婚便带着新娘的嫁妆出国行商，20年未归的鲁莽汉子。好在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婚后决定安心留在威尼斯。与其说是他的决定，不如说是形势所趋。距离马伊拉诺的时代，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年，此时的威尼斯商人即使留在本国，仍然可以活跃在海外贸易的第一线。

之后的10年，安德烈亚一直待在威尼斯。按照威尼斯的惯例，贵族到了40岁左右的成熟年龄，有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的义务。尽管安德烈亚经历曲折，估计还是尽了贵族应尽的义务。他涉入政治究竟有多深，

不得而知，不过他积极经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的簿记被完整地保留至今。

根据这本簿记的记录，他与巴勒斯坦、叙利亚、西班牙、佛兰德斯、英国等将近20位海外驻员签下代理人合同，让他们负责海外的业务。安德烈亚指挥代理人，向东方出口西欧各地生产的羊毛织物，从埃及进口香料，从叙利亚进口棉花，从君士坦丁堡进口金饰品，从黑海的塔那进口小麦，然后再将这些进口商品转手销往西欧各地。货款的支付或收取，都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可见，他很明白使用汇票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资金。

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解决了所有货物的运输问题，因此尽管进出口量很大，安德烈亚本人却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只。他只需要每天来往于里亚尔托，便能从事海外贸易。（参照上册“香料之路”图）

像他这样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必须了解很多事情。特别是以下几项，需要每日学习。

一、政府（实际上是元老院）决定的各船队的停靠港以及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的规定。

二、埃及苏丹和拜占庭皇帝对威尼斯商人的待遇。那些君主们的态度宛如猫眼般善变，必须时刻掌握最新的动态。

三、准确预测海盗或敌对国的行动对航海安全的影响程度，然后再根据商品的种类，决定是使用安全系数高但运费昂贵的加莱商船，还是安全系数较低但运费便宜的帆船运送。

四、尽早获取各地物产当年的产量、品质以及价格波动的准确信息。

五、了解各地的局势。一旦发现当地有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事先抢

购商品。

这些消息的来源，有些是与安德烈亚同等阶级的元老院议员提供，有些来自海外驻扎人员的报告，或是在里亚尔托和同行们交流中所得。

安德烈亚根据这些情报做出决定后，用限时派送的方式，迅速将信件发给海外各地的人员。所谓的限时派送，不是用一艘船投递信件，而是在各个停靠港换船派送。有重要的交易时，为了确保对方能够收到自己的指令，安德烈亚会写7封同样内容的信件。比如说要寄到巴勒斯坦的阿卡，三封经由克里特，三封经由亚历山大，还有一封自己留底。那是没有电话、传真和互联网的时代，中世纪的商人们非常勤于写信。

海外驻在员中有些人是安德烈亚的亲戚，有些则是外人，他们都不是仅受雇于安德烈亚一人。驻在员们可以同时成为数位雇主的代理人，依照合同，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所以对安德烈亚这样的商人而言，必须尽快地将指令送到驻在员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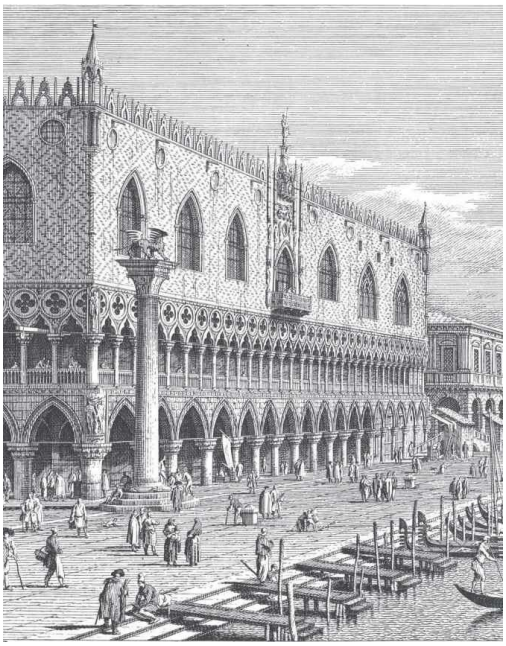
在这10年里，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似乎收获颇丰。1443年，他买了新房子；1449年去世时，他留下了1.5万达克特的资产。虽然算不上是大富豪，但肯定属于被政府强迫购买国债的富裕阶层。

以上描述的就是威尼斯商人的身影。尽管这些生平事迹无法让他们成为影视剧中的主人公，但他们是支撑威尼斯经济的栋梁。当这些商人们从政时，会出现怎样一个政治形态呢？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五章中讲述。

---

[1] Carterl：“同业联盟”，即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编者注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将降低伤害作为真正的目标，处理所有的危机。因为一个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14世纪前夕，威尼斯准备进行一次改革，以决定共和国未来的政治体制。通过改革确立起的这个政体一直持续了500年直到共和国瓦解为止。这是当时的人们，上至权贵下至百姓，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改革的推动者是一位刚满38岁的男人，名叫皮耶托·葛登尼哥（Pietro Gradenigo）。只有他和几位理念一致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

即将实施的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命运。

对威尼斯而言，那是一个危机四起的时代。

独占东地中海贸易的体制崩溃，已没有重建的希望。十字军的惨败，让教皇怒不可遏，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变得十分困难。

西欧的形势也不乐观。各国都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化，民主政体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各个自治都市（Commune，又译为“城市共同体”），纷纷在摸索建立更为强势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开始是自立为王的僭主制，之后因教皇、皇帝追认了事实，又演变成君主制。政治生态面临急剧变化。

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下，威尼斯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与对手热那亚的战争状态，打打停停持续了50年，非但没有决出胜负，威尼斯一方还处于下风。威尼斯人也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有优秀治理能力的政府，即强权的政体。不过，素有中世纪最商业化国家的威尼斯，选择了与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不同的政体，准确地说是创立了一种新制度。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从外海经过利多外港进入威尼斯的潟湖，只要不是雾气笼罩，整个威尼斯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宫殿、钟楼、元首官邸远远地浮在海面上，仿佛电影中的画面。

从利多去威尼斯，只需在海上直行便可抵达。一路所见，不禁令我想起去佛罗伦萨郊外别墅时的情景。大门口有一排柏木树，笔直地伸向别墅，沿着一棵棵大树往里走，大屋的正面渐渐地呈现在眼前。同样，

当船接近威尼斯城时，首先看见的是清晰可数的宫殿的窗口，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宛如精致的蕾丝般的窗饰。待船继续前行，两岸一边是威尼斯城东的国有造船厂，另一边是圣乔治和朱代卡岛，那些站在玫瑰色元首官邸廊柱下的人们的表情似乎一目了然。此刻，大运河的河口就在眼前。

这里是威尼斯的大门玄关。海上之都的正面当然是向着大海。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佛兰德斯返航的固定航线商船，都会经过这条水路回到祖国。担任科佩尔（Capodistria）总督的皮耶托·葛登尼哥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归国就任时，便是在祖国派出的12名特使和5艘加莱船的簇拥下通过这条水路，抵达圣马可码头的。那是1289年12月3日。

如今只剩下观光价值的威尼斯，在冬季相当冷清。然而，在700年前，12月却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季节。为了赶在圣诞节前售出商品，急急返航的加莱船队接二连三地进入港口；那些在附近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做买卖的小帆船，也为了与家人共度这神圣的节日，纷纷回国，大小船只淹没了港口。位于正面玄关深处的里亚尔托一带，更是热闹非凡。那些希望在年终最后赚上一笔，然后赶回家乡的德国、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吆喝不停。

国有、私营造船厂和船帆布纺织厂也没闲着。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回港的冬天，正是这些工厂赶工修理的旺季。

冬天的威尼斯，无论是船还是人，都比夏天要多得多，洋溢着一派蓬勃生机。新任元首坐船前往圣马可码头的途中，一定会听见从码头一带的造船厂内传出的修理工不停敲打榔锤的声音。

元首官邸正对着圣马可码头。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元老院议员和豪门的代表们集聚一堂，在此恭候皮耶托·葛登尼哥下船。

在政府任职的男人们，穿着代表他们各自官位的紫红或朱色的宽大外套，衣长及地，拜占庭式的大袖口袖子。冬天，外套内会加一层毛皮的里衬，单边肩膀上一年四季挂着细长的黑丝绒的披肩。

元老院的议员们穿着同款黑色的外套，搭配红色的丝绒披肩。医生、律师等没有官职的人同样也是黑色长衣。所有人都戴着与外衣颜色相同的黑色的无檐帽。当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欧，流行紧身裤配华丽短外套，威尼斯男人们的这身装束，在其他西欧人眼里，一定充满浓浓的拜占庭风味。在威尼斯，只有还没长出胡须的年轻人，才穿紧身裤和短外套。

说到胡子，这一点又很像拜占庭，即希腊式。威尼斯的男人们通常下颚都留着茂密的胡须，这让他们细长的脸显得庄严。

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威尼斯人的个子较高，不知是不是因为长至地面的外套的影响，他们的动作也较缓慢，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外国使节应邀参加聚会时，常常会被同席的威尼斯人的气势所压倒。

从仅存的资料中显示，皮耶托·葛登尼哥似乎就是一位典型的威尼斯人。面对这些迎接他回国的威尼斯的权贵们，他应该发现大多数人的茂盛的胡须已经发白，比他年长许多。38岁的年轻元首，的确是一个特例。

为了庆祝新元首的到来，以圣马可教堂为首的威尼斯的各个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年轻的元首在钟声中，穿过面向码头的小广场

（Piazzetta），被人领着进入了右侧的元首官邸。他登上中庭的台阶，准备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从宣誓仪式开始。元首面对政府的全体官员以及威尼斯的权贵们，宣读长长的誓词，保证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誓词相当于宪法，内容繁多，其中包括不得与外国女子结婚的条例。这一条是为了消除共和国最高地位的领导人受其他国家影响的隐患。

宣誓结束后，元首由人协助脱去黑色的帽子和外套，换上金光闪闪的织锦缎长披风，戴上称为“角”（Corno）的元首专用冠帽，正式成为共和国元首。盛装的新元首，率领着参加仪式的全体成员，前往元首官邸边上的圣马可教堂，接受在那里等待的威尼斯市民（形式上的）的批准。

宽敞的圣马可教堂内人头攒动，连二楼的阶梯上都站满了人。可是，百姓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淡。无论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入场，还是到弥撒结束离去，虽然响起少许欢呼声，但很快就消失在四周冰冷的沉默里。年轻的元首肯定清楚其中的原委，已预料到市民的冷淡反应。

一个月前的11月2日，前任元首乔瓦尼·丹多洛去世。死讯传出后，市民们聚集圣马可教堂，召开市民大会，会上雅各布·蒂耶波洛（Jacopo Tiepolo）被推选为新元首。尽管没有立法，但是新元首由1172年成立的共和国国会选出，早就是持续了百年以上的惯例。因此，议员们对民众选出新元首颇感无趣。

雅各布·蒂耶波洛不想自己成为市民大会和国会对立的借口，主动离开威尼斯，回到家乡特雷维索（Treviso）蛰居。国会在对包括雅各布·蒂耶波洛在内的候选人做了慎重的审议之后，选出了新元首，他就是

皮耶托·葛登尼哥。

共和国议员们并不是因为尊严受损，才故意选了一个与市民大会相左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议员们的判断基准和一般的市民有所不同。

其实，雅各布·蒂耶波洛并没有什么缺点，他大胆而慎重。从之后辞任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着优良的政治平衡感和冷静性格的人物。议员们认为他不适合做元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雅各布·蒂耶波洛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出任元首；二是他作为军人的经历过于辉煌。

相反，市民们似乎对于出身名门、富有、经历辉煌的人物有莫名的憧憬。雅各布·蒂耶波洛之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是因为他完全具备了这3项条件。可国会议员们偏偏认为这3条对共和国是一个危险。

另一位皮耶托·葛登尼哥，论出身，一点儿不输给蒂耶波洛。威尼斯人效仿十二使徒，将建国初期的一些著名家族称为“使徒”（Apostlica），其中葛登尼哥家族就是使徒之一。相比之下，蒂耶波洛家族只能算新贵。

尽管葛登尼哥的祖父曾做过克里特总督，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战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元首。葛登尼哥本人和其他名门子弟一样，在十四五岁时去海外学习军事和商业，在海上度过了将近20年。回到陆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科佩尔总督，除此之外，政治、军事上没有任何建树。只有官员们才知晓他沉着冷静的性格。

不知道推举他的议员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将引发一场改革进而决定共和国的命运？想来大多人只是希望意大利不要步其他国家的后尘走上君主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数次遭遇向君主制演变的危机，而制造这种危机的，一概是在政治军事上有不凡建树，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元首们。所以，元首的人选才会让议员们煞费苦心。

下面举几个制造危机的元首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是在第二章中所介绍的建立起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威尼斯商业发展奠定基础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统治的末期，他曾经试图将元首地位改为世袭制，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共同元首。然而，奥赛罗二世这个在其他国家可能被视为平常的心愿，在威尼斯却无法实现。

经过这件事情学聪明了的威尼斯人，将奥赛罗二世的子孙赶出威尼斯，在选出新元首的同时，另外又任命了两位元首辅佐官。没有这两人的同意，元首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

第二个例子是元首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自1096年至1172年的76年间，米迦勒家族有62年占据着元首的位置。这些人个个表现优秀，受到人民的尊敬。可是当米迦勒二世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要职的行径开始变得露骨时，依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不满。

其实米迦勒二世对威尼斯的经济做了不少贡献，但他犯下一个错误，没有和元首辅佐官商量便擅自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合约，这是明显的僭权行为。感觉到周围气氛异常的米迦勒二世，表示出隐退之意，可惜无济于事。他在准备退隐的圣萨卡利亚修道院（Chiesa di San Zaccaria）的门口，遭到了刺杀。

就在这一年，共和国国会（Maggior Consiglio）成立。在此之前，元首是由市民大会推举。实力雄厚又有知名度的人物往往容易当选。国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候选人仅依靠人气胜出的可能。操控市民大

会，将民众的意愿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其实并非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只需事先做一点儿筹划，再找若干共鸣者声援，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便有机会成功。威尼斯以往不乏类似的例子。某个人登高一呼，边上立刻有些人跳出来表示赞成，乘着这股劲头儿获得了全民的拥戴。

但是从1172年开始，元首选举改为由共和国国会推举，再经市民大会获准的方式。那一年当选的元首，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tian Ziani），显然这是国会为了防止米迦勒等豪门专横而做出的选择。

凭借地中海贸易，一代创下财富的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以他商人的直觉经营政治，治理国家，对讲求务实的改革派而言，那的确是一段硕果累累的太平时期。初建不久的共和国国会，首先选出4位代表，再由他们选出100名议员，任期一年。在葛登尼哥实施改革之前，这种选举方式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变动，由少数人选出全体议员的规矩基本没变。阶级问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市民大会对决议的事项只有事后承认通过的权利，但它仍然是当时最高的国家政治机构。

尽管元首改由国会选出，但不是每个议员都拥有投票权。基于过往的经验，威尼斯人再也不相信多数人的集会就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所以连投票者都需要经过挑选。他们采用的是威尼斯人独特的方法：抽签加选举。光凭抽签，或许会比较公平，但容易产生不当的人选。可如果仅靠选举，又无法回避选举运动所带来的弊端。

首先，从共和国国会的议员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30人。这30个人再抽签淘汰，人数减至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0人。当选的40人抽签淘汰，留下12人。

由这12个人选出25人。当选的25人抽签淘汰，留下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5人。当选的45人抽签淘汰，留下11人。

由这11个人选出41人。最后的这41个人，才是有权选举元首的投票者。

元首候选人必须获得41票中的25票，才能当选。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极为复杂，但好在谨慎小心，而它真正的精髓是内含了败者复活的理论。

即便是如此严格选出来的元首，威尼斯人似乎还是认为有必要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在纯粹商人出身的齐亚尼元首时代，辅佐官的人数从两人增加到6人。六个行政区各推举一名代表，元首的家族成员一律不允许担任辅佐官。辅佐官任期为6个月，不得通过再选连任。元首未经辅佐官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的约束，也明确地成了法律规定。

话说回来，纵使设置了层层关卡，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君主制的阴影。继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之后，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Orio Mastropiero）担任元首。从这两位的姓氏上判断，他们均来自新兴阶级。在他们两人以经营私人企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这个时期，的确是不用担心君主制的问题。可是，接下来的元首是恩里科·丹多洛。

如第三章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述，恩里科·丹多洛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连本带利狠狠地赚回了投资。作为商人，他的手腕完全不输于齐亚尼、马斯特罗皮耶罗。但是他来自丹多洛家族，这是威尼斯名门中的名门。这位家世显赫的人物，在垂垂老矣之际，不仅征服了占

庭帝国的首都、世界最大的都市君士坦丁堡，而且占有了克里特岛等地的领土，为威尼斯建立起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毋庸置疑，他受到了威尼斯人民的爱戴。如果恩里科·丹多洛打算做君主国的君主，想来也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就算是他本人不做君主，让儿子继任元首，估计也没多少人会有站出来反对的勇气。

民众喜欢英雄。恩里科·丹多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他在出征之前，委任儿子拉尼尔在其留守期间，代为行使元首的职责，而且明确地表示，没有人比儿子更适合托付大权。恩里科·丹多洛本人在赢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之后，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君士坦丁堡。拉尼尔·丹多洛（Ranier Dandolo）成为下任元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拉尼尔·丹多洛比其他人想得更深更透。自己不仅来自名门，还有一位功名显赫的父亲，如果真的继任元首，沉寂许久的旧势力一定会重新抬头。因两位来自新兴阶级的元首的连续执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阶级对立，恐怕又会风云突起。

于是，拉尼尔推荐了性格谨慎、有做事能力的皮耶托·齐亚尼（Pietro Ziani），即塞巴斯蒂安·齐亚尼的儿子，作为下任元首的候选人。在皮耶托·齐亚尼当选元首后，拉尼尔作为舰队总司令率军出海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战死沙场。像拉尼尔·丹多洛这样为了国家利益而甘居二线的人物，在之后的威尼斯历史上层出不穷。

最后一次危机，就是市民大会选出了雅各布·蒂耶波洛。明知当选元首却远走国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想必是与拉尼尔·丹多洛有同样的考虑。

年仅38岁成为元首的皮耶托·葛登尼哥，面对摇摆不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决定做出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强劲，同时又不会变成君主制的体制。

政教分离

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权力结构的定义有两种：由上至下和从下往上。

由上至下指的是：上帝、教皇、皇帝、领主，权力由上至下递减。教皇党与皇帝党为了教皇与皇帝的地位孰高孰低，相争不休的根源正在于此。这种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是君主制，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

另一种从下往上，则是由居民共同体选出代表，权力结构当然是由下往上递增，即民主政体。

两种体制都建立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两种权力结构也都有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从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中，宗教被允许介入。耶稣的继承们完全忘记了“恺撒（皇帝）的归恺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将皇帝的统治权与神的训诫相结合，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从下往上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存在问题。它的问题是很难控制民众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操控市民大会并非难事。

因此，务实的威尼斯人避开意识形态，将焦点锁在如何尽量减少实际危害这一个问题上，最终想出了两种类型混合的体制。

首先是防止宗教的介入。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一国之长元首的权威，是上帝所赐予。国旗和货币上都印有圣马可之狮的图案，这一点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一国元首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以投票方式选出。何况，为新元首加冕的，是元首辅佐官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不是作为教皇代理人的主教，这一点又属于第二种。

圣马可大教堂可谓是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但它是作为元首个人的礼拜堂而建的。在其他国家，必须是有主教座位的教堂才是主教座堂，而威尼斯的主教一直待在位于造船厂林立的城堡区，从没挪过地方，始终远离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为供奉守护圣人圣马可，圣马可教堂收到大量善款。这些钱并不是交给受教皇支配的主教，而是选出类似于圣马可财团理事的监察官，由他们负责打理。监察官有9位，没有薪酬，终身任职，与威尼斯共和国官员中唯一终身制的元首享受同等待遇。监察官终身任期的目的，在于排除罗马教廷的干扰。甚而有之，与民众有密切关系的教区的神父，也是由教区内居民推举，然后提交主教做象征性任命。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曾经感叹地说过："我在任何国家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对威尼斯人而言，政教分离不过是恪守了耶稣的教诲，让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样做对神，对人类都有利。

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圣物信仰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嘲笑打从骨子里就是精明商人的威尼斯人，竟然会崇拜不知是哪个人身上的骨头。威尼斯人圣物信仰的风俗的确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不过作为防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对策，还真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信众需要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获得心灵的安慰，宛如在天堂预约下了位子。如果众人信仰的对象是传闻中的圣人的一块遗骨，或者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碎片，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被物品所煽动，因此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尽管购买圣遗物需要用钱，但这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而另一方自认为是理性的佛罗伦萨人，不信仰圣遗物，只信仰活生生的圣人，因此常常发生被宗教人士操控的事件。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要问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哪一种方式为民众带来安宁的信仰，降低了实际伤害，我想是威尼斯略胜一筹。

正因为政府有如此缜密的考虑，才让威尼斯人保持了自由，没有卷入十字军的狂热、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偏激、猎杀巫女、异端审判等疯狂行径。中世纪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罗马教廷威慑力不足的地方。在这方面，威尼斯可谓是自由的天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等的著作随处都能买到。

威尼斯人基本上成功地排除了因宗教介入所带来的弊害，可是如何抑制民主主义政体容易滋生的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得小心从事。

我手里有一张用颜色区分的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势力分布图。在14世纪初，从中部向北的部分，有各种颜色的小型共同体、僭主国，色彩斑斓，仿佛打翻了水彩盒。到了15世纪初，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完全消失，单色块的版图变大，可见，仅仅100年的时间，势力分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国纷纷统合为君主国或共和国，如同五彩缤纷的小花，变成了大瓣的花朵。[1]

威尼斯以大运河为界，河岸两边各有三个行政区。在皮耶托·葛登尼哥进行改革前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如前文所述，是每三个行政区选出两位代表，由这4个人共同推选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一半的100位议员。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保证了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选的权利，并且只要拥有威尼斯的市民权，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

但实际上势力家族垄断的倾向非常严重。只要几个家族联手，很容易选出4位代表。这4个人自然是把票投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100人。以1292年的选举结果为例，仅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就有18人当选议员。另外的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有10人，莫罗西尼（Morosini）家11人当选。

共和国国会的议席都这样被豪门瓜分，由国会指定的政府各委员会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对于必须极度防范个人权利集中才能成功的共和制而言，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任期过短也是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急着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难免草率。时间有限，在选拔人才上也容易优先考虑自己的内亲外戚，而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适任者。对于一个要在对外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而言，这种低效的人才运用方式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做法。

理论上是一个能够反映每一位市民心声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少数家族横断独行。当时的威尼斯人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皮耶托·葛登尼哥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这些弊害，但他并

没有立即付诸行动。

首先，他不想刺激共和国最高决定机构的市民大会。大会推举雅各布·蒂耶波洛的余波未平，如果此时有不满政府的豪门与民众联手，便会上演西欧典型的反政府运动。葛登尼哥绝不想这种事情在威尼斯发生。

同时，他也不想无端地去刺激那些满足于现状的势力家族。他们在各方面都有民众拥戴，也不能让这些人有借口与平民势力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葛登尼哥担任元首的三年前，国会曾经提出过一次改革方案，建议只有其先祖在国会曾经拥有过席位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方案最终因以乔瓦尼·丹多洛元首为首的现状维持派的反对，遭到了否决。

所以，皮耶托·葛登尼哥在等待时机成熟，一等就是8年。好在元首是终身制，他有这个条件慢慢地等。

政治改革

1297年，已年届45岁的元首，向共和国国会提交了以下改革法案：

> 共和国国会所有现任议员，以及在之前的4年里拥有议员席位的人，若能获得“四十人委员会”的12张选票，即可当选终身议员。

提案自然受到了大多数现任议员的支持，现状维持派也没有提出反对。而那些视市民大会为国政最高机构的民主派们，因为提案将使议员的人数增加至目前的近两倍，有扩大民意的功效，所以同样没有表示异

议。

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画像

两年之后，为了补充上述的内容，元首又提出了另一条法案：

经元首以及6位元首辅佐官推荐，并获得“四十人委员会”半数以上赞成票者，可成为共和国终身议员。

这条法案同样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立法。

如果补充法案没有被通过，葛登尼哥的改革目标，大概只能算达到了一半。因为通过这第二条法案，他成功地让那些非豪门出身的有识之士进入了国会。不少长年身居海外，与祖国关系疏远而无缘政治的人们，有了进入国会的机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勒斯坦阿卡地区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后因1291年阿卡被击败十字军的埃及所占领，不得已返回祖国的一批人。他们中间有12个家族成了共和国国会的新成员。

与其说这是对归国者的对策，倒不如说是葛登尼哥看中了这些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男人们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共和国在今后遭遇各种困难时摆脱困境。

后世曾有人批评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是让既有的贵族阶级独揽政治大权，把平民排除在外。我认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地回避使用“贵族”这个词语，以“豪门”或“势力家族”代替。因为在改革前的威尼斯，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直到这项改革之后，拥有共和国国会议席的人，才开始被叫作贵族（Gentiluomo或Nobile）。所以，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贵族，在改革前的威尼斯是不存在的。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有特权阶级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共和政体的。或许有

人会以威尼斯共和国的例子来反驳我，因为在威尼斯，除了贵族之外，其他人都无法获得任何（政治上）的地位。

“但是威尼斯的这个现象，并不能攻破我的观点。因为威尼斯共和国所谓的贵族阶级，只有名义上的特权。他们并非依靠不动产的收入生活，庞大的资产来自贸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城堡里，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司法权力。其他国家的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威尼斯贵族完全没有享受到。”（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雷恩教授，是研究威尼斯历史的最高权威。他甚至拒绝使用“关闭国会”（Serrata dell’Maggiore Consiglio）这个词汇。雷恩认为这个传统上被威尼斯历史研究学者们惯用的词汇，并没有传达出真正的历史事实。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根本不是关闭国会，而是对外开放。

的确如雷恩教授所言，改革增加了国会的议席，它非但没有向市民关上国会的大门，反而建立了从市民中选拔人才的机制。议员世袭制的制度是在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13年之后，到1323年才制定的。

议员任期的终身制，在强化了国会权限的同时，也使得市民大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虽然市民大会正式失去国家最高机关的资格，要在很久之后，但它当时已经失去了权利。13年之后推出的议员世袭制，算是彻底完成了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

如今提到世袭制，肯定是人人喊打。但是请大家想想，在14世纪，有什么机构能够培养政治精英？又有什么公正的录用规则来招用这些人才？在那个时代，有关这方面的教育，唯有依靠父亲传授给儿子的方式。

国会议员的世袭制度，等于建立起了一个专业的政治阶级，成功地抑制了个人野心，以及容易与个人野心相勾结的民众的暴力。同时，它

也防止了因由上之下的权力结构而无法避免的教皇或皇帝的介入，摆脱了趋向君主制的危机。从这个时期开始，威尼斯成了一个贵族制的共和国。

从现在开始，我会使用“贵族”一词。贵族的子弟，如果是嫡子，只要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5岁时即可登记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到16世纪时，年龄规定降至20岁。

议员的人数，会根据人口的增减有所变化。1311年时，议员数为1071人；1340年是1212人；1437年是1300人；1490年是1570人；1510年则是1671人，占成年男子总数的3%左右。

国会每周日在元首官邸内的大会议厅举行。议长由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担任。会议不对外公开，与其说是为了保守秘密，不如说是杜绝议员对旁听席上的听众做出刻意的影响。若干年前，英国国会曾经就是否在议会内设置摄像机发生过争论。反对者的理由之一，就是摄像镜头会让议员有意识地感到观众的存在而失去平常心。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

在之后的500年里，这个共和国的国会，成了官家“货仓”，包括元首在内的政府所有官员，都是从这里推举产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威尼斯的社会结构，从之前的势力阶层与一般市民的划分，变成了是否在国会拥有一席的区别。不过，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贵族只拥有参与政治这一项特权。

在第四章中，我曾经介绍过1380年（即改革后80年）的被认定为资

本家的一览表。如表所示，威尼斯的富豪，并非由贵族独占。不少贵族更不是马基雅维利口中的“靠贸易获得了庞大的资产”。与其他国家的贵族相比，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反倒是经济型的中产阶级，属于安定稳健派。他们是支撑威尼斯国家制度的不容忽视的稳定要素。

法律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市民权利不被贵族侵害，还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任何市民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告诉。相反，对贵族就没有什么保护委员会了。正可谓是“给贵族以正义，给国民以面包”。

同样，贵族在税制上也没有特殊的待遇。第四章中我曾经讲到过一种类似于直接税的长期国债的强制购买制度，资本家必须按其财产的总额，购买相应比例的国债，哪怕是贵族，也不能幸免。这就是威尼斯贵族与别国的贵族们的不同之处。他们在获得贵族的荣誉和享受参政这唯一特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带头守法、带头纳税、带头站在战斗第一线的义务。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皮耶托·葛登尼哥为了避免内部的对立，尽量地让统治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是就在他实施改革后的第十年，即1310年，爆发了威尼斯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反政府叛乱。参加这场叛乱的几乎全部是在国会拥有议员席位的贵族们。

这场叛乱在500年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的高度评价，被

认为是因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而失去权力的民众，为争取民主的一场义举。且不论事实如何，皮耶托·葛登尼哥是一个极力铲除独裁和多数人统治，建立少数精英体制的铁腕人物，对叛乱绝不会手下留情。话说回来，如果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知道这次叛乱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肯定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评价。

内乱往往是因外政的失利所引起的。这一次的叛乱也不例外。

威尼斯利用费拉拉（Ferrara）因僭主上位发生混乱之际，趁机军事介入。结果，不仅军事上没捞到便宜，政治上也输得一败涂地。

费拉拉是正式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威尼斯为了确保自己在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利益，出兵进攻费拉拉，彻底惹恼了教皇。

当时位于阿维尼翁（Avignon）的罗马教廷，将全体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威尼斯人遭教会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宗教上的不自由忍一忍总会过去。可是这一次的破门，还包括不准其他基督徒与威尼斯人通商的禁止令。对于依靠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国会上，马尔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对主战派的领袖皮耶托·葛登尼哥元首发出责难，并且提出了与教皇妥协的方案。元首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过一段时间便能熬过困境。元首的意见得到了朱斯蒂尼安、莫罗西尼等家族的支持，大多数议员也表示赞同。其实，葛登尼哥本人也承认出兵的失策，已经考虑向阿维尼翁派遣密使，收买教皇解除破门令，以不损伤名誉的方式从费拉拉撤军。但是正在筹划中的事情需要保密，不可能向超过千人的国会议员广而告之，知道内情的只有6位元首辅佐官和“四十人委员会”中的3位委员长。不了解情况的马尔可·奎里尼

却一心认为葛登尼哥改革后的政府机制，缺乏治理能力。

皮耶托·葛登尼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我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述过当教皇颁布禁止与伊斯兰教教徒通商的法令时，威尼斯通过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间接地与穆斯林继续来往，就是现代经济用语中称为虚拟（dummy）的钻漏洞方式。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可以说，他是一位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教皇行贿的基督徒。

那时的教皇，是被但丁痛斥为缺乏法的观念、行为肮脏的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如果公开地向他表示屈服，还不知道会遭到多少刁难。大多的议员们即使不了解秘密交涉的内幕，至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对元首给予信赖。反倒是马尔可·奎里尼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问题是他是名门一族的当家人，要网罗一定人数的党羽并非难事。

其实，马尔可·奎里尼与皮耶托·葛登尼哥还有个人恩怨。由于他是费拉拉战争的指挥官，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打算杀了元首，解散葛登尼哥一手建立的国会，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君主制。而他心中最佳的君主人选，是其女婿贝雅蒙特·蒂耶波洛（Bajamonte Tiepolo）。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的父亲就是那位获得了市民大会的推举，却因国会提名皮耶托·葛登尼哥而没能成为元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当年雅各布为了避免国家分裂，选择了急流勇退，但他的儿子贝雅蒙特却恨透了葛登尼哥。

贝雅蒙特憎恨葛登尼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0年前，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担任莫东总督时，由于生活豪侈，其奢华程度不亚于君主，从而引起政府注意，派人去莫东调查，结果发现了他滥用公款的事实。贝雅蒙特因此受到罚款的处置。由于罚金数目巨大，他自己无法承担，最后靠向友人和妻子的娘家借款才算付清。贝雅蒙特认为对他的处罚就是葛登尼哥在幕后主使。话说回来，性格豪放、平易近人的贝雅蒙特并没

有因此失去人气，每当他带着大批随从街上走过，总是获得到四周民众投来的赞许的目光。对葛登尼哥心怀不满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决定参加马尔可·奎里尼的谋反行动。

还有一位主谋，名叫巴巴多·巴杜尔（Barbado Badoer），也是位贵族。巴杜尔7年前曾担任过元首辅佐官，与葛登尼哥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负责与帕多瓦的教皇派打交道，当时意大利的皇帝派势力明显减弱，而葛登尼哥及其同伴又不肯屈服于教皇，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皇帝派。巴杜尔深感国家权力掌握在这帮势力日渐衰退的皇帝派手里，威尼斯的未来必有危险。他的反叛，完全是来自扭曲的爱国心。

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大宅都在隔着大运河的圣马可教堂对岸、朝向里亚尔托桥的一侧，因此决定6月14日半夜在广场集合。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兵分两路出发。

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跨过里亚尔托桥，南下至圣马可广场的东侧，奎里尼的队伍则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抵达广场的西侧，双方在此汇合。

而巴杜尔则率军从帕多瓦沿布兰塔（Brenta）河南下，出亚得里亚海后，通过基奥贾港进入威尼斯潟湖，然后将船停泊在圣马可码头。待东、西、南三面的军队全部聚集之后，一举向元首官邸发起攻击。

行动差一点儿就如期进行了。

14日入夜后，里亚尔托桥上闪过一个人影，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匆匆地渡过大桥，没有人察觉到异样。

子夜前夕，两个男人敲响了元首官邸的大门。他们一位是平民，一位是这个男人居住地的负责人。正准备就寝的葛登尼哥，听见下人的呈

报，又折回起居室。屋里除了下人之外，还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人吓得牙齿直打战，话也说不清楚。这位平民经常出入奎里尼府，原本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可事到临头又心生恐惧，向住区的负责人将此事全盘托出。

葛登尼哥处乱不惊、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听完报告后立即部署了应敌之策。

首先，他火速向国有造船的工人家里发去了召集令。没有近卫军的威尼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同时，又命令下人去向元首辅佐官等官员报信，让他们带上武器赶来官邸。这些官员都是确定无疑的亲元首派。

元首也没忘记向基奥贾的总督下达命令，严令他在当地阻击巴杜尔的船队，制服叛军。就在政府的快船驶向基奥贾之时，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当接到召集令的人们陆续到达官邸门前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在强风下坚守着圣马可广场，贵族们则负责官邸的警备。

叛军一方，此刻却发生了问题。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袭击位于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国库的行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此延误了到达圣马可广场的时间。巴杜尔的船队也由于天气的缘故，没能按时出发，途中又是险象环生。结果，准时到达广场的，只有奎里尼的队伍。

严阵以待的工人们与奎里尼率领的反叛军展开了激战，比原定人数少了2/3的叛军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奎里尼战死，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杀，侥幸逃生的只有奎里尼的弟弟皮耶托和另外几人，奎里尼的部队就这样被全数歼灭。

迟到的蒂耶波洛军队，还没赶到圣马可广场，便迎面遇上了政府军。两军在狭窄的巷中对峙，蒂耶波洛一方的人数同样寡不敌众。受到后面不断涌上来的人流推挤，政府军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在政府军的猛攻之下，蒂耶波洛一方节节败退。

碰巧这时，从小巷两边并排而立的民居的窗口，有一名妇女朝下扔出一个石臼（另有花盆一说），石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蒂耶波洛军的旗手头上，旗手应声倒地。不见了军旗的叛军士气大减各自抱头逃命。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也不得不带领残余暂时撤退。他们穿过里亚尔托桥后，破坏了桥梁，躲进蒂耶波洛的大宅死守。

坐镇元首官邸内的葛登尼哥，不断接到捷报，马尔可·奎里尼战死，巴杜尔就擒。曾经作为最年长的元首辅佐官，也担任过副元首的巴杜尔和他的队友们，身上绑着锁链从帕多瓦被押送至圣马可码头，随即被关进了监牢。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了解蒂耶波洛性格的元首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手段，势必会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于是以流放海外的条件，要求蒂耶波洛放弃抵抗。蒂耶波洛接受了协议。

以巴杜尔为首的被捕的叛军们，在接受正式的审判后，纷纷伏法。

巴杜尔在一周后被斩首，蒂耶波洛的家宅被拆毁，空地上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叛国的罪行。

奎里尼的家宅则被拆了2/3，因为奎里尼家三兄弟之一的乔瓦尼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可剩下1/3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于是国家出钱买下这部分房产，拿到钱的乔瓦尼，在其他地方重新购置了住宅。

那位向蒂耶波洛军队的旗手扔石臼的妇女，获得了她所希望的政府的奖励。她提出的两个希望，一是节庆日时可以在家中的窗口悬挂威尼斯国旗，二是不得调涨房租。这位女子的房东是圣马可教堂的“财团”，也就是政府。根据1468年的记录，这间房子的租金在158年之后一直没变。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及其余党虽然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却没能过上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被事无巨细地上报给威尼斯政府。查阅这些记录，仿佛在读一本精彩的间谍小说，其中甚至还有女间谍。

威尼斯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情报，牢牢地监控着那些叛军。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异常表现，威尼斯政府立刻会要求当地的政府将他们流放。在以蒂耶波洛为首的叛军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集结各地的皇帝派卷土重来，因此威尼斯政府始终绷紧着神经。

就这样，流亡者们被遣散到四处各地，渐渐地便成了一盘散沙。在此期间，威尼斯政府伺机派出杀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斩草除根。马尔可·奎里尼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被暗杀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最后不得不向其母亲一方的家族求援，逃往克罗地亚。他在事件发生的18年后死去，死因不明。

这就是在18、19世纪时被奉为民族主义先锋的事件真相。参与这场叛乱的平民，只有一位隶属于画家工会的男子。

十人委员会

除了改革国会，葛登尼哥遭到后世批判的另一项作品，就是在叛乱

发生两个月之后创建的简称“C·D·X”的“十人委员会”。

以防止反国家阴谋为目的而建立的“十人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限逐渐增大，成了一个决定秘密事项和重大裁决的审议机关。

10位委员从由国会推举的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可兼任其他职务。任期届满后，至少休职一年以上，才有资格再次参选。

委员长有3位，每人轮值一个月。为了防止与外国人或者是有意影响裁决的人士做私下交流，委员长有避嫌的义务。因此，在担任委员长期间，宴会就不用说了，连在街上散步都不行。这种寡淡的生活不可能持续长久，所以任职期限定一个月。

每一位贵族都希望能够成为“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参与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定，权力对从政者是无法抗拒的魅力。当然，这个职务是没有俸禄的。

话说回来，也不是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都有资格参选“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元首和6位辅佐官的家族成员，一开始便失去了资格。名为“10人的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元首及其辅佐官，再加10位委员，因此，根据一个家族一名委员的原则，家族其他成员必须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与教廷有关联的也不能成为候选人。如果哪个家族中有人当上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或者说这位枢机主教成了教皇，在他驾崩之前，这个家族的成员别想进入“十人委员会”。

“十人委员会”是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机构，威尼斯人觉得有必要做谨慎的考虑。

虽然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时代，“十人委员会”遭受恶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并非如此，甚至受到了那些把政府的治理能力看得比意识形态更重的现实主义者的赞誉。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的执政者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十人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是由10位委员、元首、6位元首辅佐官共17人组成。但如果面临重大事件，在保守机密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为了慎重地做出决定，也会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20位临时委员，组成37人的委员会。

促成37人委员会成立的首次大事件，发生于1355年。它的影响程度，与当年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此次事件不仅震撼了意大利，整个欧洲都为之侧目。因为叛国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元首本人。

元首法利耶之乱

时间距离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在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发生后的一年去世的。在这50年间，无论是威尼斯与热那亚陷入泥沼的关系，还是意大利各国君主制导致小国合并的形势，都没有任何改变。

阴谋的发生，大抵起因于芝麻绿豆的小事。

位于元首官邸一楼的海军部的一间屋子里，来自丹多洛家族的乔瓦尼，正对着一个叫伊沙内罗（Isarello）的人大发雷霆。原因是乔瓦尼推荐了一个船员，却遭到了水手长伊沙内罗的拒绝。

乔瓦尼·丹多洛怒不可遏地质问伊沙内罗："你哪来的胆子，竟敢抗令！"

"哪怕是上头的命令，不合格的人就是不能上船。"伊沙内罗据理力争，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

在威尼斯，类似这般事情，上级的命令并不是绝对的。因此，乔瓦尼除了暴跳如雷，无计可施。

然而，离开海军部的伊沙内罗，却咽不下这口气。他随即前往附近的海员集会所，向聚集在那里的同伴们大吐苦水。"毛头小伙一个，仗着贵族的身份指手画脚，他懂什么船上的事情！"边上的人你一句我一语地同诉愤怒之情。

不久之前，一群由市民组成的舰队被火速派往前线，接替好不容易才摆脱与热那亚的苦战回到威尼斯的国家海军出征，结果打了胜仗。参加了战斗的伊沙内罗及其伙伴们，自然是意气风发。

“就因为交给那帮贵族，威尼斯才被打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此时此刻，这群水手们的怒气仅仅是针对乔瓦尼·丹多洛，只想着好好教训一下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眼看就快到官厅关门的时间，他们十来个人来到元首官邸门前，来来回回地走着，等着丹多洛出来。乔瓦尼·丹多洛闻讯后惊慌失措，同僚们都下班走光了，他仍然躲在房间里不敢迈出大门。无奈之下，他向元首报告了此事。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Marino Falier）令人把伊沙内罗带来，呵斥他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不该做出如此莽撞的举动。伊沙内罗听从元首的命令，解散了聚集的伙伴，丹多洛这才平安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元首悄悄地派人去伊沙内罗家，将他叫进官邸。席上，元首向伊沙内罗提出，希望平民们协助自己推翻贵族制，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威尼斯。

伊沙内罗即刻点头答应。还建议让他的好友、在平民阶级中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卡兰达里欧（Calendario）加入此事。卡兰达里欧是石匠工的总管，也是位拥有私人船舶的富豪。伊沙内罗估算，他本人和卡兰达里欧可以召集到20位小头目，他们每个人各自又能找到40个帮手。

元首法利耶表示一切交给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处理，决定于4月15日的深夜在元首官邸集合。之所以将行动时间定在4月15日，是因为第二天星期四是元老院、“十人委员会”、各行政部门开会的日子。全体贵族集聚一堂的国会日是在星期天，元首存心避开这天，是考虑到800人的叛军，要对付超过千百人的贵族，肯定吃亏。

可是，这个阴谋在召集人马的阶段就出了麻烦，大多的受邀者都拒

绝加入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元首。而且参加筹划的人比预想中的多出很多，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传言的几位贵族，向元首做了报告。法利耶却回答说不必大惊小怪，并没有下达追查的指示。但直属“十人委员会”的谍报网，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参与阴谋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秘密逮捕，未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贵族们的声音开始变大，要求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召开会议讨论。既然有人提出了要求，元首只好召集开会，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没料到结果竟然查出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元首，他立即被禁闭在官邸的一间房里。

4月16日，“十人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于要对重大事件做出裁决，因此又选出20位临时委员，加上6位元首辅佐官，共36人出席会议。当然，元首是不会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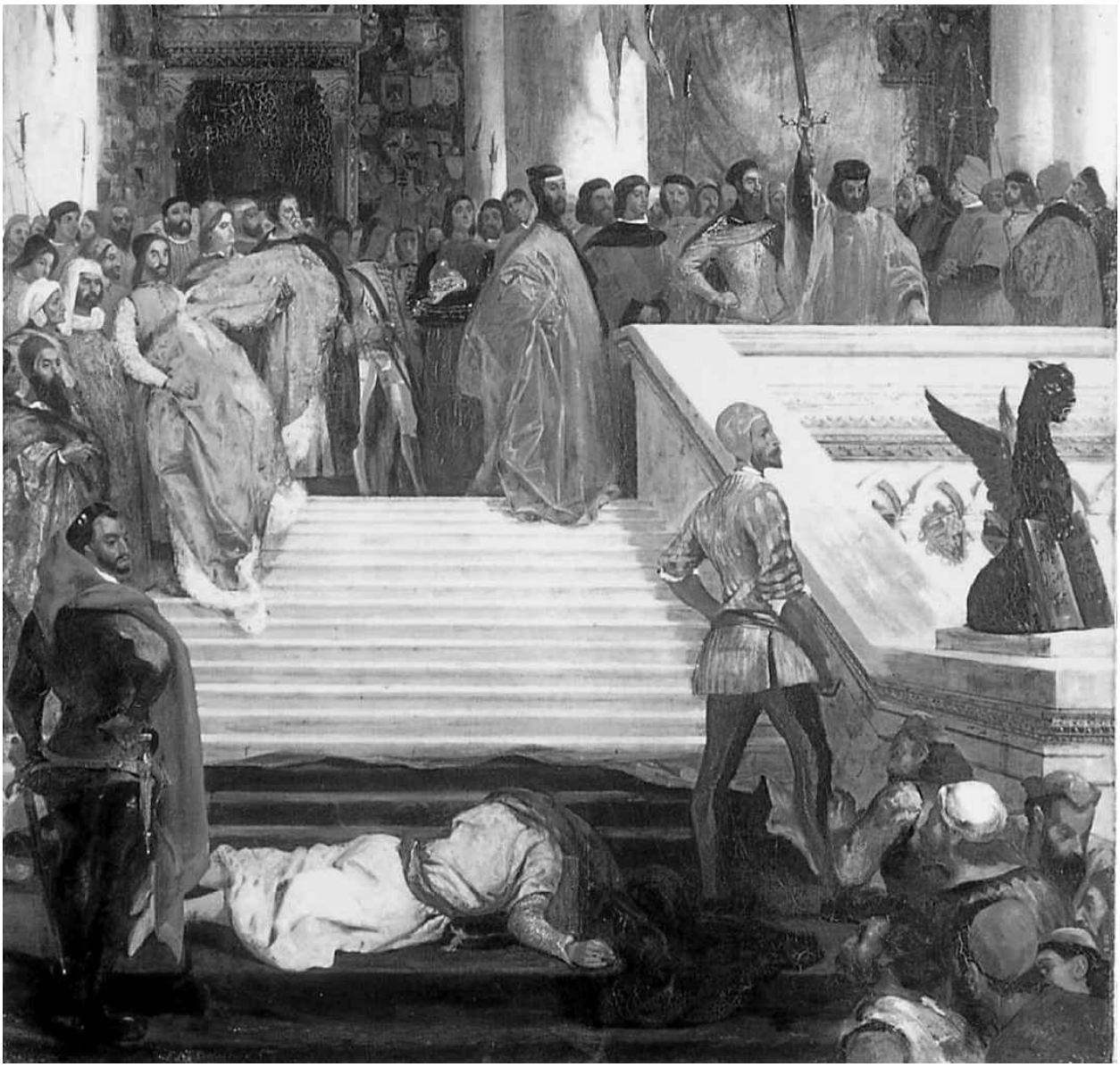
当天傍晚，委员会对已经被逮捕的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做出了裁决，两人均处以绞刑，并且于深夜在元首官邸内执行。几天以后，被处以绞刑的增加到11人。

对于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判决，委员们几乎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进行了讨论。17日，元首被带进“十人委员会”的会场，聆听了对他的判决。当日傍晚，在官邸内庭通往二楼回廊的宽敞的台阶上，71岁的元首接受斩首之刑。讽刺的是，仅6个月之前，他刚在这里宣誓就职。

在所有政府官员的见证之下，刽子手手起刀落，只见一股鲜血喷出，被摘下金线织花锦缎冠帽、露着苍苍白发的头颅，滚落在地。“十人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用长矛挑起元首的头颅，从官邸的阳台上，对着外面聚集的民众大叫：“叛国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

整个事件受到处罚的人数详细见下：

斩首1名，绞刑11名，终身刑3名，1年徒刑1名，流放5名，缓刑31名。马里诺·法利耶的财产遭没收，其妻同时也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孙女的露西亚，自愿隐居修道院。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处刑”（部分画，德拉克洛瓦作品，1825年前后）

现在，如果去威尼斯参观元首官邸，会看见在官邸最大的一个房间，即共和国国会会议厅的墙上挂满了历代元首的肖像，只有一处画着黑幕，这里本该是马里诺·法利耶的肖像。黑幕上写着：“因他所犯叛国罪而被处死。”

由于事件的戏剧性，刺激了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以画，拜伦以文，多尼采蒂

（Donizetti）和罗西尼（Rossini）以曲……艺术家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故事。在大多的作品中，马里诺·法利耶的悲剧原因，缘起于其妻与年轻的贵族米伽勒·斯泰诺（MicheleSteno）之间的爱情。年轻人中伤了元首夫人，却只受到轻罚，元首对此愤愤不平，才挑起了事端。不过，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而传说中的主角之一的米伽勒·斯泰诺，倒是在事件发生45年之后，当选为共和国元首。

如果威尼斯成为一个君主国，大概没有人比马里诺·法利耶更适合做君主。他的家族是在11世纪时已经出过两位元首的名门。他本人在壮年时期，曾经担任过负责君士坦丁堡周边警卫的海军司令，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并且数次作为大使，被派往各国的宫廷。当选元首时，他正被派往位于阿维尼翁的教廷，与热那亚进行困难的和平谈判。他与国外的重要人物们也交情甚深，当时被誉为最知性的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就是他的挚友。换言之，当时在国外最有名的威尼斯人便是马里诺·法利耶。

除此之外，法利耶还是一位不辱贵族之名的商业高手，在奔走于各国之间忙于公事的同时，仍然不忘操纵各地的代理人，兴隆生意。这样一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样样出色的人物，自然有着极高的人气。当他被选为元首，从阿维尼翁赶回威尼斯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迎接凯旋将军一般的热烈欢迎。

如果是在意大利其他的国家，马里诺·法利耶或许早就成了君主。生在威尼斯，是他的不幸。

政治与行政

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与马里诺·法利耶阴谋，是威尼斯共和国所经历的仅有的两次反政府事件，而且都发生在14世纪前期。自此之后的500年，威尼斯的政局始终保证安定，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热那亚两国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以“十人委员会”为首的机构的严厉监督，当然是起到了维安定功效，除此之外，威尼斯政体在为防止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甚至是某一个机构独揽大权方面，有精心的设计。

首先，元首由6位辅佐官负责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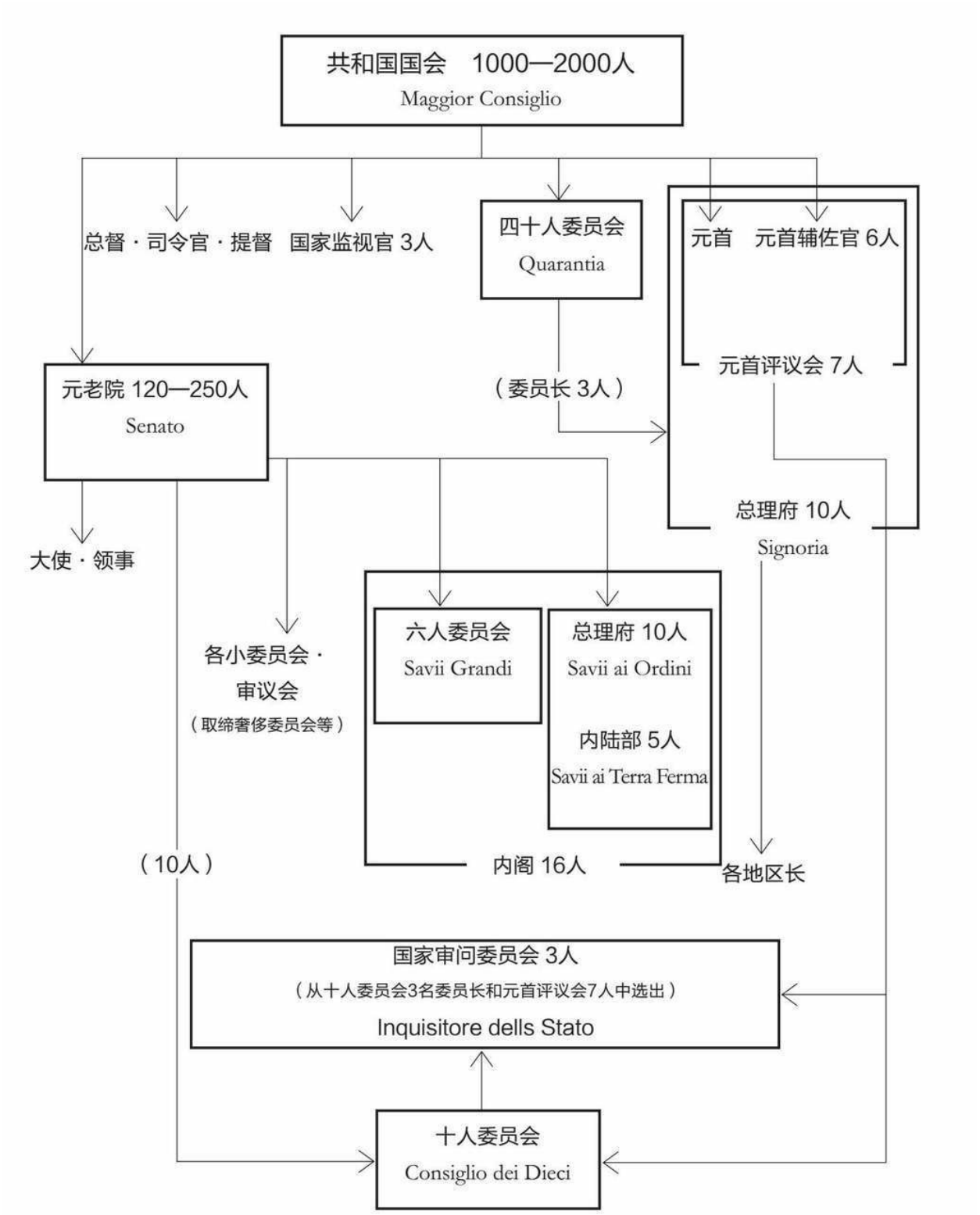
元老院主管外交，“四十人委员会”主管财政，彼此监督。

总理府与内阁的事务，不做明确的划分，以便相互牵制。

即便是对大权在握的“十人委员会”，也在200年后的16世纪，增加了一个与其平级的“国家审问委员会”予以控制。审问委员会成员三名，从“十人委员会”与元首评议会选出，每个家族只限一人。

如下页图表所示，合议制渗透到威尼斯政体的方方面面。除元首之外，担任职务的人都在两名以上。哪怕贵为元首，如果事先没有与辅佐官们商量，甚至无法召开会议。这是一个连商船航线都不容船长独断而需要众议的国家，决定国家航线的政治，采用合议制，是再自然不过了。

威尼斯的任职期限也有独特的规定。任期届满后必须经过一定的休职期，才能申请再选。除了终身制的元首和国会议员之外，没有休职要求的只有任期为一年的元老院议员。元首辅佐官的任期为6个月至1年，休职两年；“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一年，休职一年。内阁的各个部门的任期均为6个月，休职6个月。



威尼斯共和国组织结构简略图

从政者的年龄也有所限制。国会议员的申请登记年龄，最初规定在25岁，后来降至20岁，但其他重要的职务，30岁以下是绝对没有资格的。

成为共和国国会一员的年轻贵族们，首先必须担任警察官，这个职位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夜晚的统治者”（Signore di Notte）。6个大区，每区推选一人，任职一年。其目的大概是让这些年轻人在管理国政之前，先了解一点儿民间疾苦吧。有过两次“夜晚的统治者”的经历之后，便可“升官”成为海军部的官员。这也是内阁所有官职中，唯一不需要元老院议员资格的职位。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产生质疑：这么频繁地更换官员，如何保证政策的一贯性呢？的确，“大臣”和“长官”们，一年或者6个月便做一次更换，而且，不休息一年半载，还不能重返岗位。

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不能一次性同时更换，否则将影响公务正常进行。所以，采用一次更换一半的方式。即便如此，仍然没改变任期过短的事实。另一个让后人感到颇为不解的是，威尼斯人认为长官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应该经常转换岗位。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执行的。其实，如果想想（日本常发生的）所谓“内阁改造”的闹剧，大抵能够理解。哪怕大臣、政务次官走马灯式地更换，只要事务次官以下的人员没有变化，行政上便不会出现障碍。

总之，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政治家不能以专业划分，但行政官员必须是懂行的专家。威尼斯的官僚组织，就是这样从下至上地支撑着政体，尽量减少政权持续中所带来的各种伤害，是保证国家有效、合理运行的不可欠缺的要素，它的完整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些官员被称为“Cittadino”（非贵族市民）。作为行政专家，他们与政治专家的贵族不同，是终身雇佣制。总人数基本与贵族持平。虽然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利，不过决策所需的情报是经他们之手分析、整理

后，提供给贵族，即政治家。尽管无权参与讨论和决议，但每次委员会开会必定在场的，总是这些行政官，而不是贵族。

行政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政府秘书长（Gran Cancelliere）。凡元首出席的场合，他必定列席。即使是讨论开战、和谈等高度机密的事项也不例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通常是元老院议员、元首以及6位辅佐官，再加上秘书长及其手下的25位秘书和两位书记员。如果会议内容事关秘密，至少也有秘书长和两位书记员列席。

可见，除了元首，最了解政府所有事务的人物，就是秘书长。由于当选元首的人通常年龄较大，平均在位时间10年左右，因此，常常会出现同一位秘书长连续服务几届元首的现象。比如说被斩首的法利耶的前任，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元首的秘书长，在24岁时受到提拔担任此职，因为是终身制，所以到了晚年他简直就是一本活字典，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地拉拢他。话说回来，这种怀柔攻势从未成功过。想来这位秘书长本人也十分清楚，即使成了法国宫廷的贵族，也难逃“十人委员会”的穷追不舍。

据不少资料记载，那些拜访威尼斯接受元首及其相关委员接见的外国使节，在听说那位站在元首边上，身披金线织花的红色披风，穿着比贵族还富贵的人物竟然是平民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平民可以享受如此待遇。

如果这些外国使节看到祭祀时元首的队伍，恐怕就不只是惊诧，而是目瞪口呆了吧。元首一行由大主教负责“开道”，元首走在队伍的中间，在他的前面有两个人，一位是着正装的秘书长，另一位是负责计算投票用的布团数量的平民的孩子。如果那时有聚光灯的话，那么焦点一

定是集中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正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象征。

在威尼斯，约3%的成年男子是掌握政治的贵族，行政专家的“市民”人数大约与贵族相同，那么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又该怎样去满足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呢？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如果天性被长久地抑制，总有一天会爆发。为了中和民众的情绪，威尼斯有一种被称为“Scuol”的公会组织。同样的组织，在佛罗伦萨叫作“Arte”。

在佛罗伦萨，那些作为国家支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公会，如毛织品公会、丝织品公会等。但是在威尼斯，则没有属于海外贸易商或海员的公会。可能是因为国家热心于海外贸易的养成，又有海商法保护海员们的权益，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专门组建一个公会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同样，造船工人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公会。国有造船厂的工人，对于没有专门警卫队的政府而言，是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的“机动部队”，因此有相当高的信用度。何况，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从业人员，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一向周全。民间造船厂的工人，倒是以不同的工种，成立了各自的公会，如木工公会、油漆工公会等。小企业主、店主、画家也都有同业公会。不过，医生、律师都没有成立公会。

佛罗伦萨的公会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要求政府妥协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而威尼斯公会的性质类似于合作社，侧重于同业间的互帮互助。至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可以向常设的专门委员会申诉，这一点国家早有安排。

规模虽然不同，但每个公会都有专属的礼拜堂和集会场所。甚至有些公会还有医院和养老院，营运完全交由公会成员负责。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贵族入会，但有一条贵族不得担任公会要职的条文。

对于被称为“Popolano”的一般平民而言，公会就是他们的城堡。虽

然14世纪以后，针对这些市民团体下达了反体制运动的禁止令，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请为元首官邸绘制壁画的画家替自己的会堂作画，作品完全不输于，甚至超过元首官邸。比如说圣洛可（San Rocco）公会的会堂，铺天盖地全是丁托列托（Tintoretto，16世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的杰作。这些事情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祭祀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既然让非贵族市民（Cittadino）站在聚光灯之下，同样也要为一般平民们（Popolano）提供一个华丽的舞台。威尼斯的祭祀活动，每个公会都会列队参加。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是举着公会旗帜的旗手，后面的人们恭敬地捧着只有这一天才拿出来的珍贵的圣遗物，神采飞扬地地走在人海中。

“十人委员”的委员们是没有这样舞台的，祭奠活动的主角，不是贵族，也不是市民，而是一般的平民。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是资源丰富的陆地型国家，哪怕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国家的完整。例如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不久后即将崛起成为威尼斯宿敌的土耳其帝国，都属于这类情况，持续的恶政，并没有立即引发帝国的崩溃。但是，像威尼斯这样没有资源的国家，恶政是不被允许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国家灭亡。大多的海洋国家之所以短命，理由便在于此。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0万到15万的小国而言，哪怕是一次饥荒，都是致命的，威尼斯的统治阶级深知其理。负责国有小麦仓库的官员不仅每个月要呈报一次准确的库存数以及可维持全国人口口粮供给的天数，而且必须确保库存量不低于委员会规定的最低限量。威尼斯因此从未发生

过饥荒。

在缺乏资源的海洋国家中，威尼斯算是成功地维持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特例。其中最大的原因要归功于皮耶托·葛登尼哥发起的政体改革。对于威尼斯人而言，他们没有讲求意识形态的余闲，建立一个具有优秀治理能力的体制，是最为迫切的议题。

以人的良知为基础建立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530年走向终结。而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是在不相信人的良知的前提下构建的。它在佛罗伦萨灭亡之后，又延续了300年的生命。

---

[1] 参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1：文艺复兴是什么》彩插。——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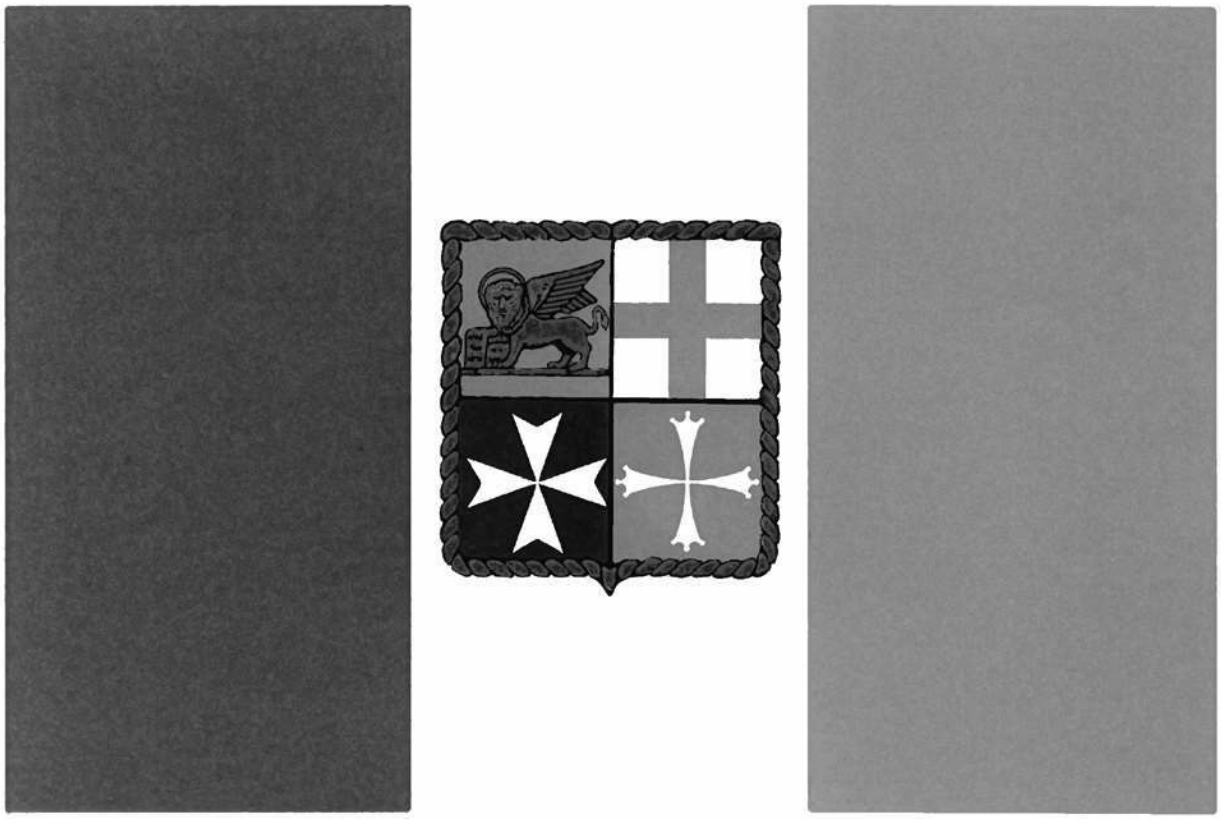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想来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的国旗是绿、白、红三色。不过那是陆地上的旗帜，海上的用旗稍有不同，商船用旗在国旗的基础上，中间白色的部分多出4个纹章，用金色的绳索框起。军舰旗在纹章上多了一个王冠，基本图案与商船用旗相同。

那么，这4个纹章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们是意大利的4个海洋国家的国旗。上排左边是威尼斯，右边是热那亚，下排左边是阿马尔菲，右边则是比萨。

昔日，环抱地中海拥有辽阔疆土的古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Mare Nortrum”，意思是“我们的海”。事实上，那时的地中海，的确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内庭。

然而，随着陆地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地中海不再是“我们的海”。罗马帝国瓦解后，地中海成了拜占庭帝国和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猖獗一时的场所。尤其是撒拉逊人，他们不愿经商，而是选择做海盗，以快速的方式牟取暴利。那是地中海最黑暗的中世纪。



意大利商船用旗（1945年以后）

海上共和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的势力卷土重来。如果说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在地理位置上最早迎接阳光的意大利人，当然是站在了这场反击的前沿。何况，他们还拥有古罗马文明这样一份丰厚的遗产。

进入9世纪之后，以贸易而非海盗为目的的意大利商船，为地中海再次带来了活力。这些商船正是来自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历史上将它们称为“四个海上共和国”。

这4个国家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14世纪下半叶到达顶峰，之后因土耳其的不断攻击以及哥伦布、达·伽马等开创的大航海时代，于15世纪末期走向衰落。在此之前，它们绝对可以说地中海是“我们的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追寻昔日的荣光，意大利海军以及商船的旗帜用的都是上述图案。不过，如今的地中海霸主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似乎是反映意大利人性格的典型例子，当他们单独行动时，往往颇有建树，聚在一起，反而一事无成。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他们单打独斗、互比高下的时代，也就是地中海属于他们的海的那个时代。

如果问为什么这4个城市会发展成海洋国家，我想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是位于那不勒斯湾附近的阿马尔菲。由于那不勒斯湾西端的波佐利（Pozzuoli）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阿马尔菲人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从地势上来说，它面积狭窄，只有巴掌般大小，不适合耕地，再加上陆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现在，如果有机会从海上眺望来往于萨莱诺（Salerno）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公共汽车，可以看见它在横穿阿马尔菲时，在山道上每拐一个弯都要按一声喇叭，仿佛警笛长鸣。如今能够通车的公路，情况都尚且如此，在1000多年以前，这里大概就是一块陆地上的孤岛。阿马尔菲的男人们，除了出海别无生计可寻。

在出海求生路这一点上，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与南部的阿马尔菲情况极其相似。

热那亚也是背靠山岭，城中多斜坡，没有像样的农耕地。今日的热那亚作为意大利的第一海港，高楼耸立，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如此，它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环境良好的居住之地。环形高速公路上的隧道一个接一个，刚露出点光亮，又进入黑暗。人们只能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间，匆匆一瞥海的模样。

不管怎么说，热那亚的陆地状况比阿马尔菲还是要好一些。从古罗马时代起，这里就铺设了连接罗马与南法里昂的奥勒里亚大道（Via Aurelia）。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与马赛之间的海上中继站，因此，历史上热那亚男儿的身上便流淌着水手的血液。

有关威尼斯的部分，已经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详细地讲述了它的诞生经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威尼斯虽然不是群山环抱，但土地面积仅够人们居住，几乎没有任何耕地，交通完全依赖船只。可以说，地理条件比阿马尔菲和热那亚更为恶劣。

4个“海上共和国”中，唯有地处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情况略有不同。它并不临海，是流经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Arno）入海前的河畔城市。

比萨最初发迹于古罗马时代奥勒里亚大道穿越阿尔诺河之处。当时的奥勒里亚大道距离海滨很近，如今海岸线则向内陆后退了15公里以上。

由于比萨是河岸城市，因此，周围的耕地面积相对丰富。不过，缺点是必须为大型船舶另外建造临海的港口。它是这4个“海上共和国”中最早发迹的一个城市。

话说回来，比这4个“海上共和国”条件更好的天然海港，在意大利另有其处，比如那不勒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不勒斯没有发展成海洋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平原，农产丰富。耕地在中世纪是价值最高的资源，所以那不勒斯就算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也没人愿意选择危险的海上营生。

那么，是不是所有没有“资源”的临海城镇，都发展成海洋国家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在类似的众多城镇中，唯有4个地方的居民活跃于海上。与阿马尔菲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索伦托（Sorrento），最终也没成为海运国。情况相似，结果不同，历史现象往往不能一概而就，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阿马尔菲

游客稀少的秋季，地中海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让人懒洋洋的，直想闭上眼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这就是如今的阿马尔菲，一个小小的避寒地。造访此地的人们大概无法想象，当初西欧人首次渡海前往东方行商，恢复了自古罗马以来断绝的东西方交流的男人们，竟然是从这么一个寂静的港口出发的。

今日的阿马尔菲，能够令人联想起昔日荣华的，大概只有与这个小渔村很不相称的华美的教堂以及山坡上的修道院里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回廊。当年，为西欧航海技术带来划时代变革的指南针，就是由阿尔马菲的商人首次引入西欧的。

据说指南针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从其发明地中国购得，后转卖给了阿

马尔菲人。阿马尔菲人把它带回欧洲，在意大利进行改造之后，又卖给阿拉伯人。沙漠中行商，如同航海，茫茫大漠之中，指南针势必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直到16世纪，便携式指南针仍然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们的必备之品。想到意大利商人在东方把小型指南针不断地推销给阿拉伯人的景象，不禁让人莞尔。

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阿马尔菲，几乎无法查证，想必与今日的小渔村情形相差无几。当时那不勒斯的近郊，是罗马上层阶级的别墅区，波佐利又是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与阿马尔菲近在咫尺的卡普里岛（Capri）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地，阿马尔菲的渔民们想来是不愁鱼虾的销路，说不定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红火。

有记录显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不到百年的6世纪，阿马尔菲已是一个主教区。这意味着此地经济活跃，人口较多，服务信众的神父数量随之增加，因此需要有负责管理的主教坐镇。基督教会非常重视传教，有主教坐镇，也说明这里是一个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城镇，因此有必要设置传教的据点。

人员的流动量大，当然是与商业活动频繁有关。因此，被指定为主教区的时间是判断该地的经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活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威尼斯成为主教区是在8世纪中期前后，比阿马尔菲晚了200年。

海洋国家阿马尔菲的黄金时代，大概是从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的百年间。在当时的商业重镇，处处可见阿马尔菲商人的身影。在君士坦丁堡，有专门为阿马尔菲人建造的一所教堂以及两间修道院。当时的修道院还兼有驿站的功能，修建修道院，正是出于为那些短暂停留的阿马尔菲商人提供便利的考虑。说到10世纪时的地中海世界，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一个是威尼斯，一个是阿马尔菲。在那不勒斯一带，军事上，要依靠阿马尔菲海军的防守才能阻挡撒拉逊海盗的袭击。经济

上，用的也是阿马尔菲的货币。当时的阿马尔菲，正如造访此地的一位阿拉伯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比那不勒斯更为重要、繁荣的城镇。

阿马尔菲的兴起，首先基于与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的贸易活动，通过与伊斯兰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从而成了罗马教廷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中间商。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从东方采购的商品，主要卖给了罗马教廷，以及位于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拥有独立国家一般强大势力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

全盛时期的阿马尔菲，名义上隶属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元首制共和国。在这一点上与威尼斯十分相似。不过，阿马尔菲逐渐向世袭制倾斜，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君主国家。而威尼斯则是坚决反对世袭制，为防止政体的变质不遗余力，这是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之处。

或许是因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生存之道，阿马尔菲商人中飞黄腾达者居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大概就属毛罗（Mauro）了。毛罗靠东方贸易起家，获得成功后在耶路撒冷为来朝圣的基督徒建立了圣约翰骑士团。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之后，骑士团的根据地转到罗德岛，所以也称罗德骑士团。后来罗德岛受到土耳其的攻击，根据地再次移至马耳他，因此，又有了马耳他骑士团的称号，它是中世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骑士团。

骑士团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和必要的医疗救护。历史上，像这样由一个商人创立的骑士团体绝无仅有。因此，圣约翰骑士团的纹章与阿马尔菲相同。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阿马尔菲走向衰败，竟然和圣地耶路撒冷有关——他们没有赶上十字军运动。准确地说，阿马尔菲人错失了投资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大好时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从陆路前往耶路撒冷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

必须依靠海上的补给来维持胜利成果。自第三次东征起，每一次都是从海上前往巴勒斯坦，当时担任海上补给任务的，是热那亚和比萨。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十字军的主要国家法国距离相近。威尼斯虽然起步也晚，但是在第四次东征时，以举国投资，成功地扭转了落后的局势。而没能参与这项中世纪最大海运事业的阿马尔菲，则注定了衰败的命运。

话说回来，当时的阿马尔菲即使想投入十字军运动，也是有心无力。1073年，诺曼人取代拜占庭帝国成为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阿马尔菲沦陷。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区等地的海外商人们一心救国，不惜余力地向利害一致的拜占庭提供经济援助。诺曼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君士坦丁堡，阿马尔菲商人的援助对拜占庭皇帝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不过，真正挫败诺曼人野心的，是威尼斯强大的海军力量。尽管诺曼人登陆希腊，可迎头便遭到威尼斯海军的痛击。大败的诺曼人哪还有征服拜占庭的余力，能逃回南意大利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皇帝给予威尼斯商人免除关税的特别优惠。可是，阿马尔菲商人却只获得了与比萨、热那亚同等的待遇。皇帝给予威尼斯人特别优惠，是希望日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失去祖国的阿马尔菲商人，个人财富再雄厚，也无法与威尼斯国家的实力相比。这也成了两个国家前途明暗的分水岭。

同样，大海运事业以及十字军的运输，都属于国家级别的事业，失去了国家的阿马尔菲人自然是无法参与其中。部分个体的商人，或许还是可以凭一己之力，从事一些海上运输，但若要想进一步发展，获得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等国的许可，在其境内设立居留区作为贸易据点，背后仍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支持。在这一点上，阿马尔菲相比其他3个国家相差甚远。

失去祖国阿马尔菲的商人，依然行走于各地，经商活动似乎并未受

到影响。但经济活动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连，这些商人的身影还是一点一点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继诺曼人之后，阿马尔菲又被安茹（Anjou）以及阿拉贡（Aragon）这些与海运事业无缘的陆地型国家征服。那些活跃于国外的大海之子的阿马尔菲商人们无家可归，只能逐渐融入当地，最终不见踪影。“海上共和国”中的一员，就这样从地中海的舞台上消失了。

比萨

说起比萨斜塔，人人皆知。看过斜塔后，不妨去参观一下边上的教堂、洗礼堂和修道院。相信一定会有人对这小小的城镇有着如此华丽的建筑而感到不可思议。仅作为一个农作物的集散地，当然是无法办到这一切的，只有依靠贸易积累的财富，才能造就这般豪华。按照一般的常识，只有临海的港口城镇才能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地。然而，比萨却超出常规，虽不临海，但确实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国家。中世纪时，船舶相对小型，距离海口不远的河畔城镇比萨，发展成为海运国，并不像如今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比萨建立于公元前90年前后，属于托斯卡纳地区最古老的一个城镇。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主教区。由于地处奥勒里亚大道的沿线，又是向外运送托斯卡纳地区物产的唯一海上出口，比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荣的城镇。

与周边面向大海、有着天然良港的城镇相比，位于平原中的比萨之所以能变成一个强大的海运国家，似乎另有其因。比萨人在与从北非而来的撒拉逊人的对抗中逐渐成长为强健的海上民族。

如果背后有山麓，那么即使撒拉逊人来袭，还能逃进山中。可是比

萨却地处阿尔诺河沿岸的平原之中，无处可逃。唯一的方法，就是建造坚固的城墙，据守城内。但这样的战术，对于防守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撒拉逊人军队的进攻时并不怎么奏效。

于是，比萨人改变战术，出海迎敌。比起妇女、儿童都不得不参与的守城战，海上出击更能提高战斗效率。夺得制海权，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安心从事贸易。事实上，在9世纪到10世纪期间，比萨人与撒拉逊人之间的争斗还分不出高下，可是到了11世纪，比萨海军已经远征至北非沿岸撒拉逊人的大本营附近。撒拉逊人在比萨海军的威慑之下，根本无法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海军的强大，促进了经济的活跃。十字军远征又给比萨发展为海运国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整个12世纪是比萨的黄金时代。各地都设有比萨商人居留区的商业基地，仅列出重要城市就有：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的黎波里（Tripoli）、巴勒斯坦的雅法、阿卡、泰尔、埃及的亚历山大、开罗，以及北非沿岸的诸城市等。著名的比萨斜塔就是在比萨这段最为辉煌的时期建造而成的。

不过，比萨在海陆两面都受到威胁。海上的敌人最初是撒拉逊人，后来是热那亚人，准确地说热那亚应该算是竞争对手。比萨与热那亚这两个海洋国家，在11世纪之前，一直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撒拉逊人。之后为了科西嘉岛（Corsica）的所有权，两国发生利害冲突，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比萨在陆地上的敌人是佛罗伦萨。随着经济的强大，佛罗伦萨共和国对海港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有了将比萨占为己有的打算。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需要海港不一定非比萨不可，可以把附近的里窝那港（Livorno）开发成佛罗伦萨的专属港。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海洋国家，是因为它牢牢地控制着周边的制海权。比萨一早就盯着里窝那港，佛罗伦萨想使用，需征得比萨的同意。当然，比萨是不会答应的。而佛罗伦萨始终不愿放弃拥有海港的理想。固执的佛罗伦萨人为了

拿下比萨，断断续续地打了三个世纪的战争。恨透了比萨的佛罗伦萨人至今还流传着“与其让比萨那帮家伙站在家门口，还不如让死人站在那里。”的谚语。

当然，对于死缠不休的佛罗伦萨人，比萨人的恨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比萨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但从陆地面积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国，凡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可比萨犯下了意识形态过于鲜明的错误。

比萨是意大利皇帝党的根据地，历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德国南下去罗马接受加冕时，必定经过此地。像但丁那种被教皇党扔石头、吐口水的皇帝党人士到了比萨，便可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比萨的这种姿态，给了处于教皇党势力之下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攻击它的好借口。虽然比萨国内也有教皇党，但由于皇帝党的色彩太浓厚，不仅在对外关系上，国内的政治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贵族与市民之间纷争不绝，一直到国家灭亡，人民也没有享受过安定的政局。面对混乱的内政，比萨人想到或许外国人立场会比较中立，曾一度考虑请威尼斯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最初将阿拉伯数字带进西欧，为日后数学的发展奠定下基础的是比萨人。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也远远大于其他的海洋国家。比萨人在君士坦丁堡发现了古抄本，并以此为据重新振兴了对罗马法的研究。这样一个在科学、文化上颇有建树的国家，到了13世纪下半叶开始露出衰败的征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去之后，意大利的皇帝党势

力一落千丈。面对四周不断增强的教皇党势力，比萨宛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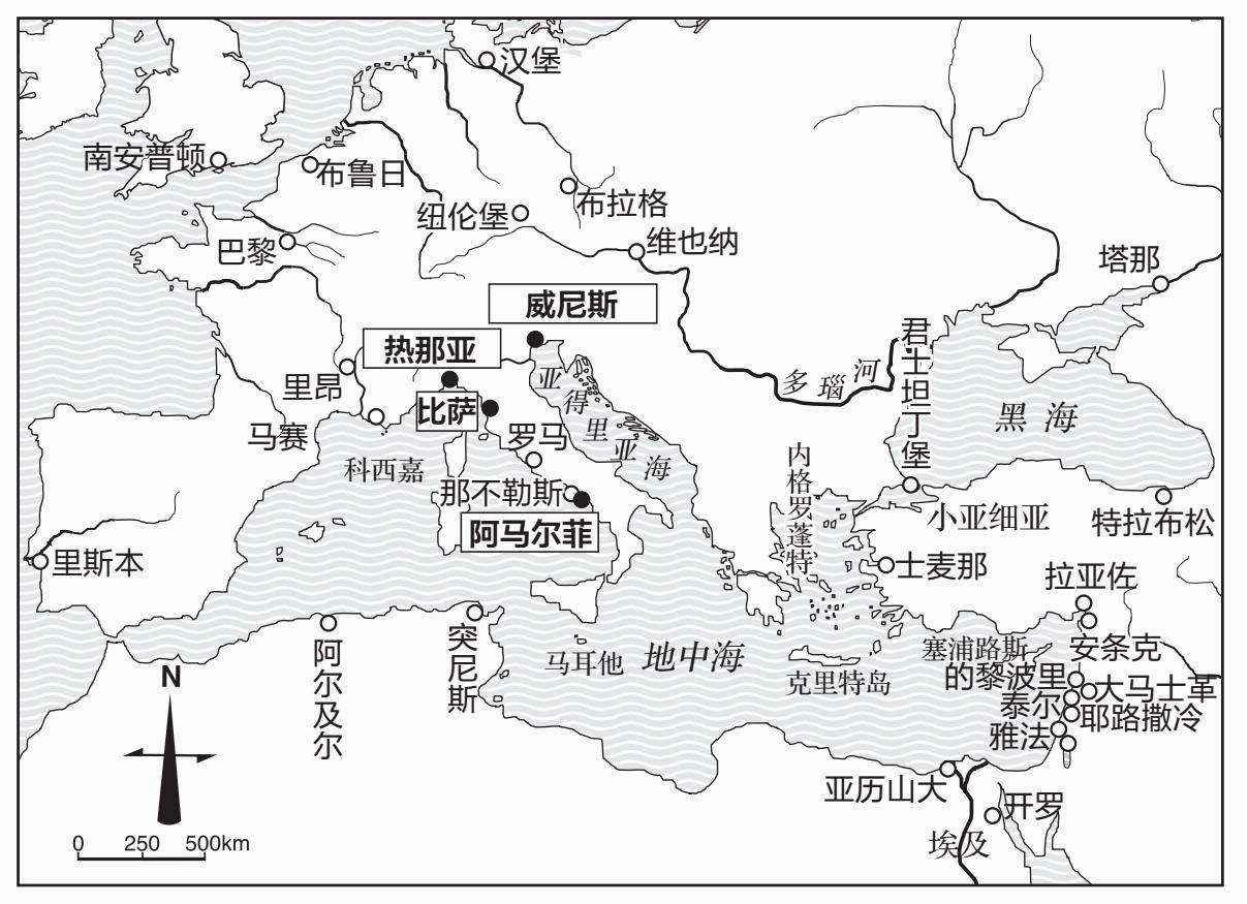
导致坚守皇帝派立场的比萨走向衰退的关键，是1284年在梅洛里亚（Meloria）发生的与热那亚的海战。这场战争中比萨输得一败涂地，失去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物。没有战死的，大多也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当时甚至有“想见比萨人，要去热那亚”之说。战败后的比萨，退出了一线海洋国家的行列，海上贸易远远落后于热那亚，手工业也不及佛罗伦萨，从此没有东山再起。

话说回来，比萨作为城邦国家依然存活了下来，他们的商人们以个体的形式，继续活跃于东方的各个港口。只是它作为海洋国家，继12世纪上半叶消失的阿马尔菲之后，在13世纪末丧失了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的资格。

热那亚

马基雅维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比喻成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如果让他评价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话，应该会给出同样的评价吧。与以金融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通过海上贸易大获成功的国家。两国进出口的商品几乎完全一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说到中世纪人的忠诚，除了对上帝之外，大概只限于对红颜知己之类的人了。威尼斯人对国家的忠诚，即具有共同体意识，在当时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另一方的热那亚则完全没有这种观念，那里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乐园。如何充分地去施展个人的才华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事情。热那亚人相信自己比任何海洋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比对手威尼斯人，有着更高的天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一群天才，无论是作为水手还是商人。

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第四章中介绍的“威尼斯商人”的形象。不是马可·波罗那样的特例，而是像罗马诺·马伊拉诺、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般的商人。他们才是真正支撑威尼斯经济的顶梁柱。不可否认，这些人往往令人联想到讲求稳健成长的中规中矩的公司经营者，而热那亚商人的形象就鲜活许多。他们虽然任性，不负责任，但在外人看来却是

十分有趣。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就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典型的热那亚商人。

热那亚商人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1248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家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在从事海外贸易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扎卡里亚在11岁时渡海前往东方，之后的经历不详，但他与尼西亚帝国的帕里奥洛加斯皇帝（Palaiologos）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尼西亚帝国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由逃亡的拜占庭人组建的国家。他们对于促成十字军东征成功的威尼斯，当然是充满了憎恨。尼西亚善待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有一部分就是出于对威尼斯的反抗之心。那个时期的尼西亚帝国是公认的热那亚商人的大本营。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也在尼西亚设有大本营。他的好运，是从皇帝将福恰（Foca）的土地赐给他和其弟曼努埃尔开始的。位于小亚细亚士麦那附近的福恰，看似毫不起眼，地底下却蓄藏着明矾矿石。皇帝是否清楚此事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扎卡里亚决定以西欧染料业不可缺少的明矾，作为他发展事业的基础。

与西欧从黑海沿岸地区进口的明矾相比，福恰产的明矾质量低劣。于是，扎卡里亚利用皇帝的关系，要求他禁止西欧商人从黑海采购明矾。可是禁令遭到了扎卡里亚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皇帝只能撤回成命。扎卡里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威尼斯商人的身上，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蒙混过关。他会立即受到本国“垄断禁止委员会”的责难，被处以巨额的罚金。

不过，热那亚人的扎卡里亚，完全没有与同胞共存共荣的意识。他用压低明矾价格的方式，企图再次建立起垄断体制。由于他拥有自家的商船船队，因此与其他必须支付高额运输船费的竞争对手在价格上拉开了距离。

但压低价格，并没有能够让他如愿地垄断明矾市场。于是，扎卡里亚在热那亚本土建造工厂，将精炼后的明矾推向市场。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击败了从黑海地区采购明矾的对手们。取得胜利之后，扎卡里亚又将目光投向了黑海市场。

就这样，整个明矾市场完完全全地掌控在扎卡里亚一个家族的手中。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威尼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威尼斯实施的是由国有加莱商船组成的固定航线，哪怕是私有船只，也规定了运费上限，政府不遗余力地保证所有商人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集资的方法，也体现出十足的热那亚式个人主义。他采用的是当时海洋国家惯用的方式，在威尼斯称为“有限合资公司”，热那亚则叫作“Commenda”。不仅如此，他还想出了雇人经营的点子，这个办法与现代资本家经营股份公司类似。由于是短期性的组织，所以经营者们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商才，而经营者的才能与扎卡里亚本人的获利是成正比的。

海上保险也是扎卡里亚的主意。一开始，他可能发现自己的船队支付的保险金占销售额的20%——26%，于是意识到保险会是门不错的生意，进而设立了保险公司。除了自己的船队之外，也接受别人的投保。

扎卡里亚的作为如果仅限于此，就称不上痛快淋漓。他回到热那亚，在祖国发行的国债上也狠狠地赚了一笔。除了染指明矾市场，他还将乌克兰、保加利亚的小麦、南俄罗斯的毛皮和鱼类进口到热那亚，又向东方出口香槟地区的纺织品和米兰产的武器。当然，他也不会放过买卖奴隶，就连科西嘉岛的海盐也用帆船运往东方。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

同时，他还经营着染色工厂。

日理万机的扎卡里亚，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地方。他乘坐着自家船只，纵横于地中海之上，操控着各方的生意。他的船叫“富裕”号，在那个通常以圣者的名字或者以基督教的名称命名船号的时代，扎卡里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航船取了一个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名字，着实有趣。

这位扎卡里亚“财阀”的统帅，作为一名海军军人，也充分表现出其超乎常人的才华，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

扎卡里亚36岁时，热那亚与比萨的关系恶化，战争不可避免。他被选为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之一，率领自家的12艘战船参战。根据他的建议，热那亚海军封锁了海面，当比萨军试图突围时，热那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式，成功地将对手的舰队一分为二。

比萨在这场梅洛里亚角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三年后，他们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可是那些连接在港口的铁链，被张满风帆的扎卡里亚的“富裕”号撞断，最后连铁链都被热那亚人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国。这场战役决定了比萨从此没落的命运，而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又重新回到了热那亚人的手中。

自此，扎卡里亚的威名传遍整个地中海流域。卡斯蒂利亚王（Castile）委托他帮忙夺取直布罗陀海峡；法国国王准备攻打英国时，请他担任创建海军的技术指导及其指挥；当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发生危机时，热那亚政府也是派他前往救援。每一次执行任务，扎卡里亚带去的都是自家的船队。

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意味着为意大利海洋国家开辟了大西洋航线，

给祖国热那亚带来了莫大的利益。然而，除了夺取直布罗陀海峡和保卫的黎波里之外，扎卡利亚接受的其他任务，与其祖国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扮演了雇佣兵的角色。不过，热那亚对于同胞的此类行为，从来是不干涉的。

1308年，坐拥莫大荣光和财富的贝内代托·扎卡里亚在他那位于热那亚海边的豪华大屋里寿终正寝。他的一生证明了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地中海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我的海”。

虽然扎卡里亚生性自由奔放，但他一生并没有做出违背祖国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热那亚的顶峰时期。在国力上升期，个人主义的放任并不会带来危害，反而往往会产生好的结果。

然而，一旦出现障碍，国力与个人的能力就未必成正比。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存之道的热那亚人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比如他们明知帮助阿拉贡王国会影响热那亚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却还是替没有海军的阿拉贡担负起海上的防卫。这种决策在威尼斯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话说回来，热那亚人这种过激的个人主义倾向，多少还是有一些辩解的余地。与威尼斯的同行不同，他们的政府并不保障个人的权益。热那亚人天生聪慧，但缺少合作精神，结果导致内部冲突不断。

在这一点上，热那亚人与佛罗伦萨人非常相似。但丁曾经形容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像一个不能忍受疼痛而不断转动身体的病人。热那亚共和国的政局激荡程度超过了佛罗伦萨。

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阶层由四大家族组成：多里亚（Doria）、斯

皮诺拉（Spinola）、菲耶斯基（Fieschi）、格里马尔迪（Grimaldi）。可是，四大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总是分成两派，整天搞政治斗争。

如果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当道，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遭到流放。这些实力与当权者不相上下的流亡者们，躲在距离热那亚一步之遥的摩纳哥，蠢蠢欲动伺机夺权。只要看见反对派的船只通过，哪怕是商船，他们也会发起进攻，占为己有。

待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夺回大权，便轮到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两大家族亡命海外，与国家为敌。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之所以比较爱国，是由于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多里亚、斯皮诺拉一派的势力比较强大，而扎卡里亚家族与多里亚家族有姻亲关系，因此他被当作多里亚方面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是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派掌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卡里亚是不会率领自家的船队为国效力的。

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派别斗争不断，被统治阶级只能靠自己来保护个人的利益。热那亚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两次市民政权，但最终都因为取得政权之后内部分裂，短命收场。导致政权无法持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掌权的中产阶级对待下层民众的手段比以往的贵族阶级还要严厉。

同胞对立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内，甚至蔓延至海外。热那亚人优秀的商业才华，让他们在海外殖民地、商业基地内的居留区拥有极大的势力。结果，这股强大的力量常常与本国政府背道而驰，尤其是当他们反感的家族掌权的时候，会做出完全反国家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国家里，以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为先，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与其向憎恶的同胞妥协，不如把国家交给外国人管理，无法期待稳定政局的热那亚民众，曾经一度将政权让给了法国国王和米兰公爵。时值14世纪，热那亚与对手威尼斯的对抗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则在着手建立恒久的政体，在极力排除个人和多人专横的同时，实施国家一体化。

威尼斯的富裕阶层，在必要的时候，愿意接受类似于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将之视为富人应尽的义务。而热那亚的富豪们可没有那么顺从，他们宁可去攻打一个岛屿，把它作为殖民地经营以筹集军费或物资。希俄斯岛（Chios）就是这样成了热那亚的领土。

威尼人与热那亚的对决与一般的战争性质不同，它无关种族和宗教，纯粹基于经济利益。这两个仅存的“海上共和国”的生死之战，不是军事或经济力量的一比高下，而是两种不同生存之道的较量。

热那亚对决威尼斯

两国间的暗斗，因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浮出水面。一位居住在巴勒斯坦亚阿卡地区的威尼斯商人，为了点儿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把一个热那亚商人给杀了，尸体被运回热那亚人居住区，引发了众怒。燃烧着复仇之火的热那亚人随即拿起武器，袭击了隔壁的威尼斯人居住区。措手不及的威尼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馆被烧、住家被毁，仓库中的货品被掠夺一空。

热那亚人通过暴动来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恨。半个世纪前，威尼

斯凭借第四次十字军的成功，不仅获得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希腊半岛各地的基地，而且将其竞争对手比萨、热那亚赶出了这些地区。虽然不久之后，比萨和热那亚重新获得了通商权，但威尼斯在希腊以及中东建立起的强大地位却不可撼动。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比萨对此只有忍耐，但正处于上升期的热那亚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的抗争意识日益高涨，紧张形势一触即发。尤其是阿卡，对于有“东地中海女王”之称的威尼斯而言，属于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而与十字军有长久渊源的热那亚，一直在此地有强大的势力。同胞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热那亚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稍早之前，双方为了居留区边界上的修道院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过冲突，如今的杀人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就这样，阿卡因两个势力强大的居住区的对抗，整个城镇分裂成两半。威尼斯一方有圣殿骑士团（Temple）、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支持；支持热那亚的，则是因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在此定居的法国贵族们。占了上风的热那亚封锁了港口，阻止威尼斯的船只进入。

事态发展至此，威尼斯本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1257年，威尼斯政府按照战时模式，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商船船队派遣了由14艘加莱战船组成的护卫舰，从威尼斯起航。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正是东方物资重要的集结地阿卡。

抵达阿卡港口的威尼斯舰队虽然没有悬挂战旗，但码头上的任何人都看得出，舰队处于完全的备战状态。商船位于后方，前列的加莱战船的船舷上一律竖起了保护划桨手的盾牌，以防不测。藏在盾牌后面不见人影的划桨手们手握船桨，脚边势必放着战斗用的斧子。桅杆下还有一队手持武器的石弓手。

威尼斯舰队司令官洛伦佐·蒂耶波洛（Lorenzo Tiepolo）见港口果然如情报所说的绑上了铁链，便下令所有的战舰升起船帆，全速划动船桨，一鼓作气撞向锁链，成功地突破封锁，一举占领了港口。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的船只，接二连三地燃起火焰，热那亚商人的仓库，受到威尼斯人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被搜刮一空。

阿卡是热那亚人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商业基地，热那亚人居留区一直享受着治外法权。这一次它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威尼斯人致命性的破坏。住在阿卡的热那亚人仓皇地逃往临近的蒂洛斯（Tilos），一夕之间，威尼斯与热那亚在阿卡的地位天翻地转。

这下轮到热那亚本国出手干涉。翌年，即1258年，待航海季节的春天来临，他们派出大型舰队向东方出发。威尼斯一方也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洛伦佐·蒂耶波洛得到了来自国内以及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支援，完成了大舰队的组建，规模已不是当初的护卫舰。

6月，到达巴勒斯坦海域的热那亚舰队首先停靠蒂洛斯，与当地的统领菲利普·德蒙福尔侯爵（Philipde Montfort）商议战事。

双方决定，蒙福尔侯爵率军从陆路、热那亚从海上发起进攻。

此刻，在阿卡应战的威尼斯军也做好了战线的部署。威尼斯负责海上，圣殿骑士团负责陆地的守卫。威尼斯舰队由洛伦佐·蒂耶波洛和安德烈·泽诺（Andrea Zeno）指挥，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们也带着武器登船加入了战斗。

从蒂洛斯出发时已挂上战旗的热那亚舰队经过一日的航行，出现在阿卡海角。由50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组成的大型舰队的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迎战的威尼斯舰队有39艘加莱

军船和4艘大帆船，另有10艘小帆船紧随其后。同样，所有的船上都高高地悬挂着绯色底绣金圣马可狮像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尽管双方的战船数量相近，但战斗力是热那亚略胜一筹。两军都降下加莱船的船帆，准备开战。

随着两军的号角声在海面上漂荡，战争正式打响。船头相撞时发出的钝音，压迫着周遭，间中夹杂着船桨激烈的打斗声。石弓手放出火剑，冷冷地划破天际，中箭的帆船顿时冒起了火焰。两军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划桨手们纷纷扔下船桨，操起武器，借着两船间搅在一起的船桨，跳上了敌船。混战中，原本处于优势的热那亚军，渐渐露出了败象。原来威尼斯军在开战前兵分两路，两位司令官各率领一支舰队，从左右两边夹攻热那亚军，很明显，这个战术奏效了！

经过半天的激战，威尼斯一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热那亚的战船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击沉，数量减少了一半。人员损失同样惨重，战死及被俘的人数超过了1700人。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驾驶着战船，逃回了蒂洛斯。

陆地上的战况，也是威尼斯一方占了上风。圣殿骑士团骁勇善战，又得到了对专横的热那亚人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的支持。陷入苦战的热那亚一方的法国骑士团，在闻讯威尼斯赢得海战之后，便停止攻击，撤退回蒂洛斯。阿卡就这样完全落入了威尼斯人的手中。

胜利者们将竖立在阿卡城中央广场的两根精美的浮雕石柱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时至今日仍然摆放在圣马可教堂的边上。与石柱一同送回本国的，还有热那亚的俘虏。不过，意大利海洋国家间的战争俘虏不会像落在穆斯林手里那样沦为奴隶，战俘们只是缔结休战条约时的筹码。再怎么不济，付钱也能赎回自由身。阿卡战役中被俘的热那亚军人，在教皇的介入之下，很快就被释放了。

然而，在威尼斯大获全胜的三年之后的1261年，热那亚夺走了威尼斯商人在东方的最大根据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扳回了败局。如果这场仗是靠他们流血流汗赢来的，还不至于令人感到惊叹，热那亚人竟然借他人之手，成功地演绎了一场逆转大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贵族取代瓦解的拜占庭帝国，于1204年成立了拉丁帝国。然而，拉丁帝国在不善治理的法国人统治下，先天虚弱，周边既有拜占庭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又有新兴的保加利亚王国，以及伊庇鲁斯的僭主国，始终无法摆脱遭受威胁的局势。

这个与周边国家人种迥异的西欧人建立起的国家，之所以能在东方延续半个世纪，完全是因为背后有威尼斯的经济和海军支撑。如果没有威尼斯人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以及海上防卫，拉丁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威尼斯人也是在天平上掂量过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之后，才决定给予支持的。

可是，在这半个世纪中，被罗马天主教压制的希腊东正教徒们的不满与憎恨，却是与日俱增。就在这个时候，临近的尼西亚帝国的米海尔·帕里奥洛加斯（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篡权夺得皇位，他野心勃勃地想再次振兴拜占庭帝国。一向与尼西亚帝国关系紧密的热那亚，当然了解帕里奥洛加斯的打算，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热那亚与尼西亚秘密地鉴定了《宁非奥条约》（*Treaty of Ninfeo*），约定了各自承担的义务。

热那亚负责击退威尼斯海军，从侧面协助帕里奥洛加斯攻占君士坦

丁堡。皇帝在复兴拜占庭帝国之后，将威尼斯人赶出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全帝国疆域。

密约在3月签署，威尼斯政府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7月，即条约签署的4个月之后，帕里奥洛加斯开始了行动。他利用负责警备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舰队去黑海远方巡逻的间隙，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高层早被尼西亚收买，君士坦丁堡就在这种形同政变的情况下易主换人。当前来支援的热那亚海军抵达目的地时，王朝交替已经成功完成。

闻讯急急从黑海折返的威尼斯舰队，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一筹莫展。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护送拉丁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和威尼斯大使，以及市内那些无所适从的威尼斯人，前往内格罗蓬特。这是威尼斯的一个重大疏失。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威尼斯从那时开始构建情报网，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近代，其准确性和迅速性，都远远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话说回来，当时的威尼斯并没有就此放弃君士坦丁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威尼斯享受了莫大的经历利益。如今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等于失去了整个黑海地区的贸易，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与此相反，对手热那亚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彻底扳回了之前在巴勒斯坦的劣势。不仅是扳回，应该说远超于威尼斯。不甘心失败的威尼斯，从国内派舰队前往爱琴海，与负责君士坦丁堡警卫的舰队汇合，编组成60艘加莱军船的大型舰队，与热那亚海军对峙。

尽管派出了军队，威尼斯政府还是就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检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威尼斯不惜余力地支援着拉丁帝国，不仅对它虚弱的国体一清二楚，同时也知道天主教统治东正教徒的不易。而那些热衷于内斗的西欧诸国的王侯们，对拉丁帝国的命运毫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单凭区区10余万人口的威尼斯，再有强大的海军也很难收回失地，连维持现状都是不现实的。

最终，威尼斯决定撤退，放弃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但是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获得的其他领地，以及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岛等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则采取死守的原则。大型舰队负责这些地区的防卫，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开始展开了秘密的外交行为。尽管形势逼人，但威尼斯政府却相当谨慎。

威尼斯舰队的任务虽然是防守基地，但在行动上从不消极。但凡遭遇热那亚海军，必定挑战。哪怕没有正面遭遇，只要掌握了热那亚海军的动向，就会一路追踪，直到彻底打败对方。而成功地将对手赶出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却没有与威尼斯正面冲突的打算。就这样，威尼斯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上你追我躲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威尼斯在海军力量上拥有优势，热那亚一方能逃则逃，或者躲在港口无视对方的挑衅。可是一旦两军相遇，哪怕双方势力旗鼓相当，赢家一定是威尼斯。

1263年的希腊近海之战与1266年的西西里海角战役，都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失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仍然是东地中海女王的事实。比任何人都更察觉到这个事实的，是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帕里奥洛加斯。

帕里奥洛加斯在夺取拜占庭皇位时，并没有用到热那亚的援军。他之所以仍然遵守《宁非奥条约》，是因为担心威尼斯的逆袭。如果威尼斯没有此意，他也没必要继续对热那亚讲究道义。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更强大的海军，始终把这样一个强国当作敌人，对拜占庭帝国反而不

利。因为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力量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不堪一击。何况威尼斯要的不过是东地中海、黑海地区的自由贸易权而已。

在现实主义者之间，妥协总是会发生的。1268年，帕里奥洛加斯皇帝准许威尼斯商人重返君士坦丁堡，设立居住区，并再次承认了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获得的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

那些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如果想起昔日的光景，一定会深感落魄。居住区不到以前的一半大，和比萨商人比邻而居，与他们将整个金角湾作为专用港的时期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就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太，对手热那亚拥有筑起城墙的大居住区。由于加拉太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威尼斯商船前往黑海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航行方向，以免误入热那亚要塞的射程范围里。虽然历经7年时间，终于再次获得了通商的机会，但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场艰辛万苦的重新启程。

称为“慕达”的威尼斯商船固定航线，建立于1255年。那还是他们独占君士坦丁堡市场的时代。按理说，独占君士坦丁堡等于掌握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但威尼斯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热那亚船只的海盗行径，所以才实施了组织船队来保护商船的策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降低遇袭的危险。

可是，当威尼斯人在7年之后重返君士坦丁堡时，东地中海上热那亚人的海盗行径变得比以前更为猖獗。

首先是因为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岸加拉太建立了大根据地，活动范围变广，行动也更自由。

其次，由于与威尼斯舰队的正面交锋屡屡挫败，索性选择打游击。热那亚舰队常常因为司令官之间的意见不合，无法组成统一战线，所以才会败给威尼斯，反倒是游击战更适合他们的性格。

威尼斯与热那亚同为商业之国，从事的都是海外贸易。但他们采取的不同手法，充分体现了两国人之间迥异的性格。

威尼斯按照各个目的地，将船速不同的加莱船与帆船组成商船船队，并配备加莱军船护航。

而另一方的热那亚人，让他们统一步调简直是比死还难受，因此不会采用相互之间需要协调船速的船队航行方式。他们的商船大多是单独行动，即便组成船队，所有的船只一律是速度相仿的加莱船或帆船。由于组成船队的情形非常少见，没有派遣护卫舰队的必要性，所以这些军舰可以完全地用于军事行动，换言之，就是充当海盗。而那些独自航行在大海上的热那亚商船，就只能听天由命，没遭遇威尼斯舰队，属于运气，遇上了便自认倒霉。

相比之下，先尽人事再听天命的威尼斯人，则是组成配备护卫舰的商船船队，在固定航线间运行。不过，在那个时期，这种方法也存在3个缺点。

第一，由于每一个船队都必须配备15艘左右的加莱军船护航，因此没有充足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第二，庞大的船队引人注目，往往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三，一旦敌人设法调开了护卫舰，商船队便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1264年发生的事件，就使威尼斯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那一年，热那亚的海军统帅格里洛听说威尼斯商船队正沿着亚得里

亚海南下，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勇武的热那亚人中，格里洛尤以胆大妄为著名，相较于海军统帅，海盗王更适合他的身份。获得威尼斯方面情报的格里洛，率领舰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各个港口打转，四处传播他的舰队正朝巴勒斯坦的阿卡航行的假消息。实际上，舰队驶向马耳他岛，在那里伺机行事。

威尼斯人中了圈套。一旦失去阿卡，就等于丧失了船队运载的大部分商品的销售以及采购东方特产的重要市场。两利相权取其重，护航舰放弃了商船的警卫，为抢在热那亚人之前抵达阿卡，急急地朝东地中海方向驶去。

格里洛闻讯后，率军从马耳他出发一路北上，在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都拉佐的海面，遇上了没有护卫舰保护的正在南下的威尼斯商船队。

成为攻击目标的威尼斯商船队，以500吨级的大型帆船“漂浮的要塞”为中心，由20艘百吨级的小型帆船组成。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货物。当热那亚舰队突然出现在水平线上时，威尼斯人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进都拉佐港，于是决定应战。

首先，他们把小帆船上运载的分量轻但价格昂贵的商品，转移到“漂浮的要塞”上，只留下量重价廉的货品。“漂浮的要塞”船如其名，高高地浮出海面，船上设有两个坚固的舰桥，适合防守。威尼斯人将战斗力集中于此，小帆船上只留下操舵所需的人员。

事实证明，“漂浮的要塞”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突围，逃进了都拉佐港。而其他小帆船则在热那亚舰队的猛烈攻击下，全数被虏。虽然威尼斯人采取了正确的战术，但几乎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一整年的贸易商品。

从此之后，威尼斯人行动变得更为谨慎，护卫舰尽量不离开商船，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而热那亚海军的海盗活动则是一如既往，因

为抢来的货品可以瓜分，多数人宁愿选择这种方式获取财产，而不是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贸易商。

采取了不同战法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如果要论哪一方的经济损失较大，答案是威尼斯。由于威尼斯的军船多用于商船护卫，因此没有多余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也就是说不可能实施海盗行径，这等于是给了那些听天由命的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机会。热那亚人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且还可以通过做海盗再捞到一票。那时的热那亚人，肯定会认为威尼斯人愚蠢无比，他们坚持脚踏实地，却看不到切实的成效。不过，一旦海上交战，逃之夭夭的又是热那亚人。

最初希望停战的是威尼斯一方，他们的经济无法承受更大的打击。而一切都顺风顺水的热那亚，当然是没有这个打算。最终，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干涉下，热那亚才点头答应。路易九世正在准备十字军东征，需要大量的军舰运送军队，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国相争不下，不利于大局。

路易九世派遣使节前往热那亚，要求他们停止针对威尼斯商船的海盗行为，并威胁说倘若不从，将逮捕所有居住在法国的热那亚人。无奈之下，热那亚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协议。

1270年，在教皇克雷芒四世、南意大利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 d'Anjou）、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调停下，这两个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暂时停止了战争。

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地中海属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的世界。威尼

斯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而热那亚更是势如破竹，迎来了全盛时代。上文中提及的热那亚人商人贝内代托·扎卡里亚活跃的身影也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热那亚通过1284年的梅洛里亚海战将其在西地中海的竞争对手比萨彻底踢出了队列。而获得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又让他们开辟了西洋航线。这里，我用维瓦尔迪兄弟（Vivaldi）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热那亚人是怎样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两位热那亚人，在129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打算渡海前往印度，不幸在非洲中部地区断了音讯。如果他们达成目的的话，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创下的宏伟大业，则可提前200年实现。

当时的热那亚人，不仅活跃于地中海之上，亚洲、非洲、北欧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十日谈》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足迹遍布最广的，当属传道士和热那亚商人。我甚至认为有热那亚人打算来东方。当然，威尼斯人也应该不会落后于对手，因为就在同一个时期，马可·波罗刚从中国归来。

尽管商务频繁，来往于多国之间的旅人众多，但没有任何热那亚人留下旅行手记。传道士必有文书记录，哪怕是威尼斯人也会写些简单的报告，而热那亚在这一点，同样彰显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本色。他们害怕自己开拓的市场或航线暴露，影响利益，因此，就算是对同胞，同样是三缄其口，彻底保密。所以，他们经历的许多冒险不为人知，开辟的那些航线，因没有得到流传而最终遭人遗忘。

同胞之间都步步设防的热那亚人，面对商业对手的威尼斯人，当然更不会留情，一旦获得权益，誓死捍卫，绝不拱手相让。而另一方的威尼斯的态度同样强硬。停战期间仍然不时发生零星战事的两个国家，相隔25年之后，终于在1295年公然开战。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起因，与第一次相同，都是为了争夺市场。第一次是为了巴勒斯坦的阿卡，第二次的焦点则是黑海沿岸的市场。

话说4年之前，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据守的最后一片领地阿卡，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猛攻之下沦陷。以法国人为主体的十字军势力从此在巴勒斯坦地区销声匿迹，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也深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对西欧基督徒的败势大为不满的罗马教皇，颁布了禁止与穆斯林交易的命令。热那亚与威尼斯不得不中止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的商业活动，西欧商人唯一能采购到香料等东方物产之处，只剩下黑海地区。

黑海沿岸可以说是由热那亚人开拓的市场。在两国停战后，威尼斯的商船也正式开始出入此地。阿卡沦陷后不久，威尼斯政府立即与控制着黑海沿岸地区的蒙古可汗正式签订了通商条约。市场规模原本就已经缩小，眼看着仅存的一块市场又将被威尼斯人抢占的热那亚人，下定决心要把威尼斯人赶出黑海。尽管双方间的敌意日趋明显，小型的争夺战不断在各地上演，可是正式开战却拖延到4年以后。这是因为两国都在为无法与穆斯林交易的损失，费心费力地寻找弥补的办法。换言之，两国人都在政府的支持下，打破教皇的禁令，忙着走私生意。在买卖优先于宗教这一点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想法倒是完全的一致。

1294年春天，定期来往于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拉亚佐的威尼斯商船队，在舰队的护卫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他们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取道往东，打算停靠克里特岛后前往塞浦路斯。一切似乎都相当顺利，但其实早在船队航线朝东转向时，其行踪已被热那亚人察觉。

热那亚人立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内组成舰队，从金角湾的热那亚专属码头出发。虽然住在对岸居留区的威尼斯人发现了对手的异动，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向同胞报警。热那亚舰队一路南下爱琴海，在拉佐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正驶向最终目的地拉佐亚的威尼斯商船。清一色加莱战船的热那亚舰队，全部降下船帆，进入了战斗状态。

冷不防遭遇敌人的威尼斯船队，由于正扬帆航行中，无法立即做出敏捷、正确的反应。船上满载货物，行动变得迟缓，再加上入港在即，船员们的精神比较松弛，败局就此注定。除了侥幸逃跑的加莱船之外，总共有20艘商船被劫，船上的人与货物一并被虏获，护卫舰队的司令官战死。热那亚人大获全胜。

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场有损名誉的战斗。热那亚商人临时自行编成的舰队，竟然打败了由威尼斯国家组成的舰队。相反，这是一场热那亚人迄今为止打得最痛快的战役。它证明了仅是海外殖民地的商人，就能打败威尼斯国家的舰队。

意气风发的热那亚人在第二年（1295年），以165艘加莱船、3.5万人的士兵及船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舰队，打算借此一举击溃死对头威尼斯。威尼斯的舰队也全部是加莱军船，数量虽然少于百年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其战斗力堪称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最大、最强。

面对跃跃欲试的热那亚，威尼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全国16到60岁的男子，都做了兵役登记，贵族、富豪阶级除兵役义务之外，还需缴纳临时税作为加莱船的武器费用。然而，全国上下总动员，最终组成舰队

的战船数量也只有65艘，不到热那亚的一半，最多也就能防守亚得里亚海的出口。

与此同时，热那亚的大舰队，在周边各国的注目之下，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预计在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进行补给之后，前往与威尼斯对决的目的地。

可是，按照预定在墨西拿完成补给之后的热那亚舰队，既没有前往亚得里亚海，也没有去爱琴海，而是转回了热那亚本土。热那亚人的临阵脱逃，作为对手的威尼斯当然是感到如释重负，可是却让周边那些准备看一场大海战的国家，感到匪夷所思。

热那亚人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奇妙的举动，是因为舰队统帅多里亚害怕国内的反对派会利用自己不在期间伺机而动，所以不想长久待在海上。结果，热那亚人高昂的斗志，没有朝向对手威尼斯，而是消耗在本国人之间的争斗之中。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这两大派系的纷争，让热那亚再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尽管拥有庞大的舰队，热那亚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都无法出兵。

威尼斯方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改变了战术。他们仿效热那亚人，不再给商船船队提供护卫舰，舰队纯粹用于军事行动。

通过这番尝试，结果证明了威尼斯人的海盗才能一点儿也不亚于热那亚人。他们袭击了塞浦路斯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掠夺热那亚在黑海的贸易根据地卡法（Kaffa），火烧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居留区，可谓是战果累累。商船船队也因此得以安全航行。

同为海盗行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不同之处在于，船员不能瓜分抢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必须上交国库，充当组建舰队的费用。

1298年，内部斗争总算告一段落的热那亚，终于正式派遣舰队，向威尼斯开战。

从热那亚出发的舰队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通过墨西拿海峡，朝亚得里亚海前进。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域之后，袭击了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个个港口。达尔马提亚是威尼斯的友邦，热那亚人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威尼斯人接受挑战。威尼斯随即派出大型舰队，两军在亚得里亚海中间地带的科尔丘拉岛（Korcula）附近相遇。

两军的舰队都是由清一色的加莱战船组成，威尼斯方面有90艘，热那亚有80艘。威尼斯海军统帅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一声令下，威尼斯战舰以弓形阵型围住敌人，这是战船数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采用的战术。而热那亚一方，则在海军统帅兰巴·多里亚（Lamba Doria）的指挥下，分成了3队。

没有任何多余的开仗仪式，两军即刻投入了战斗。多里亚乘坐的战舰一马当先，热那亚海军就像大浪袭来一般，涌向威尼斯一方。加莱船的碰撞声此起彼落，战况异常激烈。

相比之下，热那亚战船的速度拥有优势。就在不久前，他们根据贝内代托·扎卡里亚的构想，将两个人划一支船桨的传统方式，改为一支船桨配备三个划桨手，也就是所谓的“特雷米”方式，从而提高了推进速度。他们成功地打破了威尼斯海军的阵型，进入混战。热那亚人操作船只的技能，远远胜过于威尼斯人，战况明显对他们有利。

果不其然，热那亚最终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威尼斯海军有84艘战舰被击沉或遭虏获，仅有6艘船侥幸地逃回了本国。战死者高达7000人。被俘者的人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数量应该超过了战死者。做了俘虏被带回热那亚的威尼斯人当中，包括刚从东方回来的马可·波罗。他的东方见闻录，就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写成的。

这场著名的“科尔丘拉岛战役”，对威尼斯而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舰队元帅安德烈·丹多洛负伤被俘后，或许是出于自责，在牢房中不停地以头撞墙，自杀身亡。

不过，威尼斯的确是尽了全力。热那亚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说热那亚死伤人数与威尼斯一方持平，大量战舰被毁。他们已无余力带走那些掳获的威尼斯战舰，只得就地付之一炬。

这种状态下的热那亚海军，只得打消进攻威尼斯本岛的计划，甚至连逃兵都无心追击，就这样返回了热那亚。

对威尼斯人而言，这是一场屈辱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打垮。一位叫多梅尼科·斯基亚沃（Domenico Schiavo）的平民船员在战败后的第二年就干了一件痛快解气的事情。他将科尔丘拉岛战役中幸存的战船组成船队，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然后一鼓作气北上第勒尼安海，把印刻着圣马可头像的威尼斯金币钉在热那亚港的防波堤上。完事之后，斯奇亚沃没有直接返回威尼斯，而是以热那亚附近的摩纳哥为据点，专门袭击出入附近海域的热那亚的商船。当时的摩纳哥，是被掌控热那亚的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扫地出门的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反政府大本营。

尽管仇恨不减，但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的国内，主张讲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浓。威尼斯对海战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而热那亚一方也因内斗消耗了过多的精力。

1300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相当简单。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对利古里亚（Liguria）地区的主权，热那亚承认威尼斯拥有亚得里亚海的主权。威尼斯方面不会支持和勾结摩纳哥的教皇派，做出侵犯热那亚主权的行动。

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双方在东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和平协定，对消除两国间的对立问题，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讲和，说到底是因为两个国家打得筋疲力尽。第一次威——热战争，威尼斯虽然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但无力将胜利进行到底，而第二次则是由于热那亚不能利用本国的优势而宣告终结。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非常之奇妙。两者决出胜负用了125年的时间，实际的交战总共不过20多年，等于是打5年，歇一阵，然后再打，周而复始。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双方势力不相伯仲，谁也没办法彻底消灭对方；二是因为两国间的对立无关于人种、宗教，纯粹出于经济利益。换言之，这是两个经济动物的争斗。因此，当他们发现经济上的冲突反而给自己的经济带来损失时，都会产生暂时停战的“良知”。所以第一次战争打了5年之后，停战了25年第二次战争后的和平时间甚至长达50年。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不要打仗，设法找出一条共存共荣的道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多么精明的经济动物，能够具有如此“良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已经不能动辄诉诸武力的现代，在解决此类冲突时，依然是举步维艰。

话题重新回到700年前。1300年缔结了停战条约的两国，史无前例地维持了50年的和平。在14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不是处于有争斗之心却无战斗力的状态，就是处于不打仗更有利的形势之下。

首先，来看一下经济形势。正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经济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重大变革。船舶的构造有所改变，加莱船和帆船皆趋向大型化；指南针的出现促使航海技术呈飞跃性发展，航海可能的季节

倍增；复式簿记、阿拉伯数字的普及，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商业圈，提高了商业效率。

与此同时，西欧诸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物资的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物资交流，与以往相比，无论在质或是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比如说，曾经被英国羊毛业者视作梦幻的希腊葡萄酒，在那个时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中介东西方物产的商人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北大西洋航线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教皇也解除了不得与穆斯林做买卖的禁令。威尼斯的4条固定商船航线全线通航，就是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以商为本的国家，毫无疑问会将精力投入商业。何况，市场规模的扩大，让他们可以不用为了争夺市场而拼死相战。

双方不愿开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不过，在政治、社会层面，虽然也处于停战状态，但不是因为停战有利，而是没有精力再战。

先说热那亚共和国。如家常便饭一般频频发生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浪费了半个世纪。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两派，谁都不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力量，所以内部斗争始终没有解决的迹象。仅仅是在14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以下的政变：

1311年——疲于内斗的两派决定，索性让外国人管理国家，于是将政权拱手让给了法国国王。

1313年——法国国王去世后，内部斗争再次开始。

1317年——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重新掌控热那亚。

1335年——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复辟。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遭驱逐。

1339年——反贵族的市民阶级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同样因为内讧

分裂成两派，相互斗争。

1353年——政权转让给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

不过短短半个世纪，便如此颠倒乾坤。正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但丁形容的那样，不堪疼痛，辗转反侧的病人，绝非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

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统治能力的政体，是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缺乏资源、土地和人口稀少的城邦国家而言，优秀的治国能力，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威尼斯选择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它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大众政治，而是威尼斯独特的共和政体。有关威尼斯人在治国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判断力，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一文中已做了详细的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威尼斯人无论作为水手还是商人，技术都略逊对手热那亚一筹。但在组织能力上，威尼斯绝对出类拔萃，而这一点也成了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停战状态，终于在1350年画上了句号。并不是因为两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反，两年前爆发的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48年爆发的这场因薄伽丘的《十日谈》而闻名的黑死病，也重创了威尼斯，人口减至原来的2/3。舰队的水手，只招募到5000人，仅够武装25艘加莱军船。

黑死病夺去了大量的生命，整个社会弥漫着厌世的气氛。我在第二

章中曾经介绍过威尼斯的征兵制度，不想参战的人可以付钱免除兵役。以往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黑死病之后，逃避征兵的人逐渐增多。

而那些好不容易召集到的军人，又全都是不听从管教的散兵游勇，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威尼斯海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曾经在几天内便能组成百艘舰队的威尼斯，如今加上从达尔马提亚、希腊招募来的士兵，最终才凑齐35艘战船，再加上士兵素质低下，所以此时的威尼斯根本不具备与别国开战的条件。

热那亚的情况与威尼斯大抵相似。它的人口数量原本就不及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战斗力肯定在威尼斯之下。

两个国家都在无力打仗的情况下再次开战，其原因还是与商人们无法忍受市场被占有关。也就是说，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市场。

那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终于开始感觉到了来自土耳其的威胁。马尔马拉海的东岸，都处于这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实际掌控之下。唯有海上的防卫才能避免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土耳其的侵袭。而真正拥有海军力量的国家，只有热那亚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一次没有向同盟国的热那亚提出保护的请求，而是转向威尼斯。热那亚国内的纷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促使皇帝改变了态度。替代热那亚接下防卫任务的威尼斯开出了交换条件，他们要求皇帝将热那亚商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沿岸的市场。热那亚人对此怒不可遏，战火重新燃起。

1350年爆发的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在5年里发生了3次大战。结果是热那亚二胜一败。热那亚如果打输，国内立刻会为推卸责任而产生内讧，最后不得不将政权交给外国人。他们打赢了战争，却输了外交。

因此，威尼斯总是能够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与热那亚人达成停战协议。

1335年签署的两国停战协议，与以往一样，并非出于热那亚人的本意，而是当时掌控热那亚的米兰大公维斯孔蒂，优先考虑到米兰的利益。打算向意大利中部扩展的米兰大公，不希望自己的计划遭到威尼斯的反对，所以才按照威尼斯的要求，强迫热那亚接受了和谈。在停战条约签署不久，威尼斯国内发生了马里诺·法利耶的叛乱，对于需要稳定国情的威尼斯而言，能够停战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运。

在之后20余年的停战期间，热那亚仍然按照其独特的方式生存着，而威尼斯则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从几个世纪之前就不断袭击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匈牙利王，终于成功地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而言，东岸的安全，与攸关生死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密切相关。丧失达尔马提亚，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公元1000年时的元首奥赛罗二世以来，威尼斯的元首一直拥有“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封号，400年之后，却不得不将之放弃。

如今属于克罗地亚领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指的是亚得里亚海东岸北半部，包括扎拉、希贝尼克、斯帕拉托、莱西纳和科尔丘拉岛，一直到拉古萨。这一带不仅是威尼斯船只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提供划桨手等水手的来源地，每一个港口城镇都是威尼斯海上“高速公路”的驿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它距离威尼斯只有两天的航程，因此，威尼斯迄今为止，可以说是一直在誓死固守达尔马提亚地区。

失去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再次施展了他们独特的“务实策略”的外

交。匈牙利王是基督徒，于是威尼斯人通过教皇，有节制地与匈牙利人进行着交涉。尽管匈牙利人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毕竟不是海洋国家，制海权仍然掌握在威尼斯人的手里。如果威尼斯撒手不管，达尔马提亚沿岸很快就会成为从北非过来的海盗的目标。如果匈牙利王能够看清这一点，允许威尼斯继续在此设立基地，那么即使丧失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也不算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件让威尼斯深感屈辱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这里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后，唯一残存的属于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塞浦路斯归属法国人香槟公爵家族，但经济命脉却操控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塞浦路斯出产的糖、盐以及著名的葡萄酒，都是在威尼斯人殖民地式的经营之下，成了当地的经济动脉。

为了哪一国的大使坐在塞浦路斯王的右边，威尼斯与热那亚相争不下，重新煽起了两国间多年来的敌对情绪。塞浦路斯王对威尼斯的偏袒令热那亚人深感不安，担心自己会被赶出此地。于是，他们从国内派来了舰队。

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的第一大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胁迫国王改变政策。威尼斯因为正忙于解决家门口的达尔马提亚的问题，没有余力再派舰队前往远方救援，除了撤侨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友好的塞浦路斯王任由热那亚宰割。

不过，这个事件在经济上并没有对威尼斯带来太大的打击。威尼斯政府的“行政指导”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为失去塞浦路斯市场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们开辟了一条无须停靠塞浦路斯港，同样可以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亚历山大的航线，让他们的商贸活动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

人丁不旺的热那亚，其实不可能完全占领塞浦路斯全岛。岛屿的南半部依然是威尼斯人经营的蔗糖田地，像以往一样出口糖和葡萄酒。原

以为威尼斯在中东的贸易会出现漏洞的热那亚人，占领塞浦路斯不到一年，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打错了算盘。

威尼斯人面对困境所展现的灵活性，不仅在塞浦路斯，从地中海到英国、法兰德斯，但凡他们出没的地方，处处可见。这种柔软的应对能力，也是威尼斯经济外交的特色。

话说回来，这件发生于1374年的事件，在政治层面上还是有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形象。因威尼斯见死不救而不得不向热那亚人屈服的塞浦路斯国王，从此不再依靠威尼斯的帮助。从王位的安全考虑，能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威尼斯失去了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的信赖。

威尼斯人面临的第三次考验，是克里特岛发生的叛乱。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威尼斯一直把克里特岛作为最重要的基地，向岛上输送了大批移民，建立起与本国相同的政治体制。尽管威尼斯占领此地之后，原住民的希腊人时不时会引发动乱，但这一次的主谋却是来自威尼斯望族的葛登尼哥和维尼尔（Venier），这让本国政府感到相当错愕。

那些移居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贵族们，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地生活之后，已从威尼斯市民变成了以克里特岛利益为重的一群人。在反对重税的问题上，这些威尼斯裔克里特岛人与原住民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威尼斯人的爱国心，向来令威尼斯政府深信不疑并且引以为傲。这次贵族的叛乱，等于狠狠地打了统治者一记耳光。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克里特岛叛乱的主谋们，竟然向热那亚发出

了支援的请求。虽然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负责托管爱琴海诸岛的威尼斯人与本国方针唱反调的事件，但没有任何人去乞求与祖国敌对关系的国家援助自己。威尼斯政府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彻底肃清乱军，不能拖到达尔马提亚问题解决之后再去处理。

满载着陆战用雇佣兵的大型舰队立即向克里特岛出发。行动之迅速，远远超过了热那亚人。叛乱很快被镇压，主谋被处以极刑。威尼斯政府严格挑选了具有忠诚度的贵族和市民移居岛上，彻底更换了岛上原有的统治阶层。

至于第四次考验，由于没有以具体的事件形式出现，反而比较棘手，对策上更需慎重。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开始时，由于军事费用的激增，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为了弥补短缺，政府推出强制购买国债的政策，将负担集中在贵族和富人身上。权贵们因财富减少而产生不满，甚至有人为了避税而将财产转移至国外。这种现象，也许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在威尼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

曾经有人说过，为了所赋予的名誉，精英阶级应该像修道士无私奉献给上帝一般奉献社会。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完全看不清人性的本质。修道士有上帝保佑他们死后会上天堂，或者说他们相信上帝会兑现诺言。但是，那些没有向上帝宣誓奉献自己的世俗的精英分子们，即使身为基督徒，也没有理由必须无偿奉献。对他们的能力给予相应的报酬，才能让这些人充分地施展才华。所幸，威尼斯政府是由贵族组成的，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不再针对精英阶层采取高压式的课税。不过，为了顾及社会的公正性，作为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项制度若是被废，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财政首先就会出问题。

两位威尼斯男人

从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有一座叫作特内多斯（Tenedos）的小岛。它的附近是特洛伊（Troy）古战场。当年攻打特洛伊时，奥德修斯将藏在木马里的士兵送进特洛伊城内后，希腊大军就是在特内多斯岛上待命出击。

威尼斯看中了这座岛。由于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地，于是威尼斯便向拜占庭皇帝进言，说达达尼尔海峡需要防卫。一得到皇帝的首肯，威尼斯立即在岛上筑起了坚固的要塞。

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就等于控制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威尼斯的举动，自然让热那亚大为恼火。就这样，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次，威尼斯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应战。

同时，威尼斯在外交上也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达尔马提亚的问题尚未被解决，他们没能阻止匈牙利王与热那亚结下同盟关系。因此，威尼斯不仅不能使用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众多基地，连招募水手也得另寻途径。更糟糕的是，匈牙利王准许热那亚海军使用基地，并同意他们在当地募集水手。双方甚至决定联手从海陆两方夹攻威尼斯，热那亚负责海上，匈牙利负责陆地。

与热那亚结盟的还有一个国家，是位于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帕多瓦的僭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准备率军从西面发起进攻，从陆地上封锁威尼斯。威尼斯自建国以来，像这样三面受敌的情况还是头一遭。

在这场因“基奥贾战役”而著名的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造就了两位威尼斯英雄：卡洛·泽诺（Carlo Zeno）和韦托尔·皮萨尼

（Vettor Pisani）。

卡洛·泽诺是一位很有意思的男人，与人们印象中稳重老练的威尼斯人形象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贵族，家族中曾经出过元首。父亲战死于士麦那，留下的遗产，不足以分派给包括卡洛在内的10个儿子。这种情况在威尼斯，不论贵族或平民，为了防止财产分散，通常都由长子继承遗产，其余的孩子要么做人家的养子，要么从事神职工作，总之需要自食其力。卡洛被要求去做神父，这份工作需要学问，于是，他前往帕多瓦大学学习神学。

可是，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却很讨厌读书。因为人长得高大英俊，卡洛深得女人们的喜爱，他的学生生活一开始便沉浸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中。如果仅仅是有女人缘，倒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是他还喜欢赌博，手气又差，很快就把学费赌了个精光。最后他不得不变卖教科书，可还是不够抵债。虽说女人和赌博是当时大学生最热衷的两件事情，不过卡洛·泽诺做得实在太过分。

为了还债，卡洛加入了当时意大利盛行的雇佣兵行列。不爱学问的他，应该是兴高采烈地投笔从戎。这一去便杳无音讯，所以当卡洛在5年之后重返威尼斯时，家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不过，当初为他准备的神父的职位倒还保留着。

于是，卡洛去帕特雷斯教区任职。与弥撒相比，他更喜欢与附近的土耳其人打打杀杀。由于与穆斯林冲突属于十字军行为，他的上司即主教对此没有发声制止。但是当这位卡洛神父杀死了与他决斗的当地的一位法国骑士时，主教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决斗的原因是为了女人，再加上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神父杀了教徒，就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主教叫来卡洛，狠狠地痛斥了一番，但没

有免除他的职务。倒是卡洛自己不想再继续这份烦人的职业，干脆抛弃了圣职。他离开帕特雷斯，打算去君士坦丁堡做一名商人。

天知道卡洛究竟是不是真有心去君士坦丁堡经商，反正没多久便发生了特内达斯岛事件。热那亚人袭击了正在建设要塞的威尼斯人，防守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小岛上，突然出现了卡洛·泽诺的身影，原来他是来当志愿兵的。也许天生就具有领导的才能，又习惯了作战，卡洛很快便崭露头角，成功地击退了热那亚人。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担任过海军将领的卡洛·泽诺被任命为负责希腊方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他之后那些高调华彩的表现，充分证明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职业。

另外一位英雄韦托尔·皮萨尼，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海上男儿。在威尼斯男人中，他属于小个子，身体不胖却很敦实。他是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指挥两次主要的海战、获得一胜一负战绩的指挥官尼可洛·皮萨尼的侄子。当年韦托尔跟随着伯父，经历了那两场海战。

在停战期间，他做了商船队的船长。这绝不是一份丢人的差事，一个能成功统率商船船队的人物，战时就是海军战将的最佳人选。他也参加过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

韦托尔虽然生性易怒，但也很容易恢复平静。与其他贵族不同，他从不看低别人，因此深得下级船员的爱戴。除了为人处世讨人喜欢之外，他作为水手的才华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总而言之，韦托尔·皮萨尼在海上男儿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威尼斯，无论是商船或军船，在出港前的一个月，担任船长的人会带着书记官坐在船只停泊的码头，等待水手们前来报名。这不是船长挑选水手、分派工作，而是水手们在远航之前，选择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哪一位船长的制度。而韦托尔·皮萨尼的船只前，总是排成长长的队

伍。

137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已箭在弦上。皮萨尼被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率领14艘加莱军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出发，开往敌军海域的第勒尼安海。

14艘军船，实在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由此可见，失去达尔马提亚这个水手来源地，对威尼斯的影响之大。如果说30年前的黑死病留下了人口不足的后遗症，热那亚也同受其害。不过，这一次他们有达尔马提亚可以利用。在皮萨尼舰队出发的同时，只有单人划桨手的加莱船队，开往克里特岛。他们在克里特岛、希腊等地补充了划桨手，总算能够编组成舰队。

就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之下，皮萨尼率领军舰，纵横于第勒尼安海上，在安齐奥（Anzio）的外海突袭了热那亚舰队，辉煌的战果让提心吊胆的祖国松了一口气。而战败的热那亚，则有很多贵族成了俘虏。

随后，皮萨尼的舰队开往爱琴海。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与在克里特岛完成了人员补给的6艘战船汇合，前往塞浦路斯，打算一举歼灭热那亚势力。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敌人只受了点儿轻伤。

米兰
0 100 200 300km
N
威尼斯
波雷奇
费拉拉
波拉
比萨
塞尼
拉文纳
亚
佛罗伦萨
扎拉
安科纳
得
希贝尼克
斯帕拉托
里
莱西纳
亚
罗马
科尔丘拉
海
拉古萨
卡塔罗
斯库塔利
那不勒斯
乌尔齐尼
阿马尔菲
巴里
都拉佐
特拉帕尼
巴勒莫
奥特兰托
发罗纳
墨西拿
科孚岛
帕特拉斯
普雷韦扎
西西里
圣塔莫拉
凯法罗尼亚
锡拉库萨
伊奥尼亚海
摩利亚
马耳他
莫东

亚得里亚海及其周边

1现名莱夫卡达。——注
2现伯罗奔尼撒古称。——注

从塞浦路斯折回的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袭击并占领了已沦为敌方领土的卡塔罗和希贝尼克，再次向对手表明了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此时，已近年底，皮萨尼打算率军回国。

他向政府提出了回国休整人员和维修船只的希望，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他们命令皮萨尼带着舰队在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过冬。理由是波拉接近达尔马提亚，容易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舰队又可以直接开往海上巡逻。整备战船所需的用品，政府决定派补给船送去。无奈的皮萨尼和他的舰队，只能留在波拉越冬。翌年，即1379年的春天，皮萨尼又带着舰队前往南意大利的普利亚地区，为装满小麦回国的商船全面护航，随后便返回波拉港，在陆上清洗和修理战船，过了一段太平无事的日子。

5月7日，热那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波拉的外海，战船上还悬挂着剑刃向上、代表挑战的旗帜。皮萨尼立刻下令鸣号，集合所有人员。包括补给船在内，能够使用的战船，共有24艘，而热那亚海军只有16艘加莱船。其实热那亚舰队有22艘战船，因为有6艘躲在海角的暗处，所以看上去只有16艘。

皮萨尼反对接受挑战。虽然战船的数量多于对方，但没有几艘能够真正用来打仗，他认为还是守在港口为上策。但是由各条船指挥官组成的作战总部，却以敌人数量有限，临阵脱逃实属懦弱等理由，极力主张迎战。威尼斯的规矩一向是少数服从多数，作战会议也不例外。因此，皮萨尼只好下令所有能够使用的加莱船，进入战斗状态。

这场以波拉港口为舞台的海战，从打响那一刻起，威尼斯就占据了

上风。皮萨尼乘坐的旗舰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型，紧随其后的战船，迅速地向热那亚舰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热那亚的旗舰转眼间被攻破，海军统帅战死。

可是，就在威尼斯海军即将收获胜利的那一刻，一直埋伏在暗处的敌舰从背后切入他们的阵型，威尼斯舰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战况逆转。这下轮到热那亚海军痛击对手，威尼斯死亡超过百人，包括24名贵族在内有多人被俘。眼见形势不妙的皮萨尼，向仍在战斗中的6艘战船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也和舰队一起逃往威尼斯。

得知战败消息的威尼斯政府惊愕不已。他们原以为皮萨尼的舰队足够担负起亚得里亚海的防卫任务，所以刚在一个月前，把卡洛·泽诺指挥的第二舰队派出去袭击热那亚的商船船队。攻击商船，可以牵制负责其防卫的舰队，这样热那亚海军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潜入亚得里亚海。没想到热那亚先发制人，搅乱了威尼斯政府的计划。

敌人的舰队，近在咫尺。友军的舰队，等于没有。匈牙利王从北逼向威尼斯，帕多瓦的军队在西面切断了所有陆上的补给路线。最后的一击发生在8月16日，热那亚军队占领了基奥贾。自建国以来，威尼斯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

由于海上和陆地都遭封锁，所有的东西都进不了威尼斯。不要说买卖，连粮食都成了问题。威尼斯被困在潟湖中的岛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泽诺舰队的返港成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他本人却对国人的期盼一无所知。因为出发时，他还深信这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海上打游击。威尼斯政府向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提出了停战的请求。但热那亚人却回应说："不把缰绳套在圣马可教堂正门前的驷马铜像上，绝不停战！"

在此之前，威尼斯也曾经遭到过一次包围，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及过，公元9世纪初时查理曼的儿子丕平率领法国军队围攻威尼斯。不过，法兰克人是陆地民族，从海上封锁海洋民族，终究是经验不足、漏洞百出。而这一次却是来自海洋国家的敌人封锁海上，情况完全不同。海上封锁之严密，用陆地语言形容的话，就是连一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欧洲各国都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必败无疑，它将重蹈阿马尔菲、比萨的命运，走向衰退，最后胜出的海洋共和国，唯有热那亚。

在他国援军不可期的形势下，威尼斯人仍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誓死守卫家园。

首先，食品供应改为配给制。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因此始终保持着3个月的小麦存量。但由于潟湖中的“困城”不知会持续多久，所以一开始就以最低的限量配给。托配给制的福，在全面封锁的情形下，威尼斯人没有遭受饥饿之苦。

当然，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以往为了组建舰队所采用的每个行政区12个人为一个单位的征兵制度，这一次被用作保护街市。

各个行政区的防守，由各区的住民自行负责。特别是临近前线的区域，行政区内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参战。内围的行政区除了留下数人负责防守之外，其余男子都被分派去守护国家的重要建筑，如造船厂、元首官邸、大运河的入口等。为了防止敌船的侵入，大运河的入河口也打下了木桩。

另外，政府还派出了敢死队，令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前往东地中海。敢死队有两个任务：一是寻找卡洛·泽诺的舰队，通知他们尽早回国救

援；二是巡视各海外基地、殖民地，鼓励那些得知祖国被困而心生不安的同胞，提醒他们尽早做好准备，以防热那亚人的攻击。敢死队不辱使命，成功地突破了重围。

威尼斯在积极防守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外交战。匈牙利王、帕多瓦僭主、热那亚的三国同盟必须攻破，为此威尼斯与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和谈交涉。然而，三国都认为威尼斯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根本不愿谈判。这样，威尼斯在外交上也处于绝望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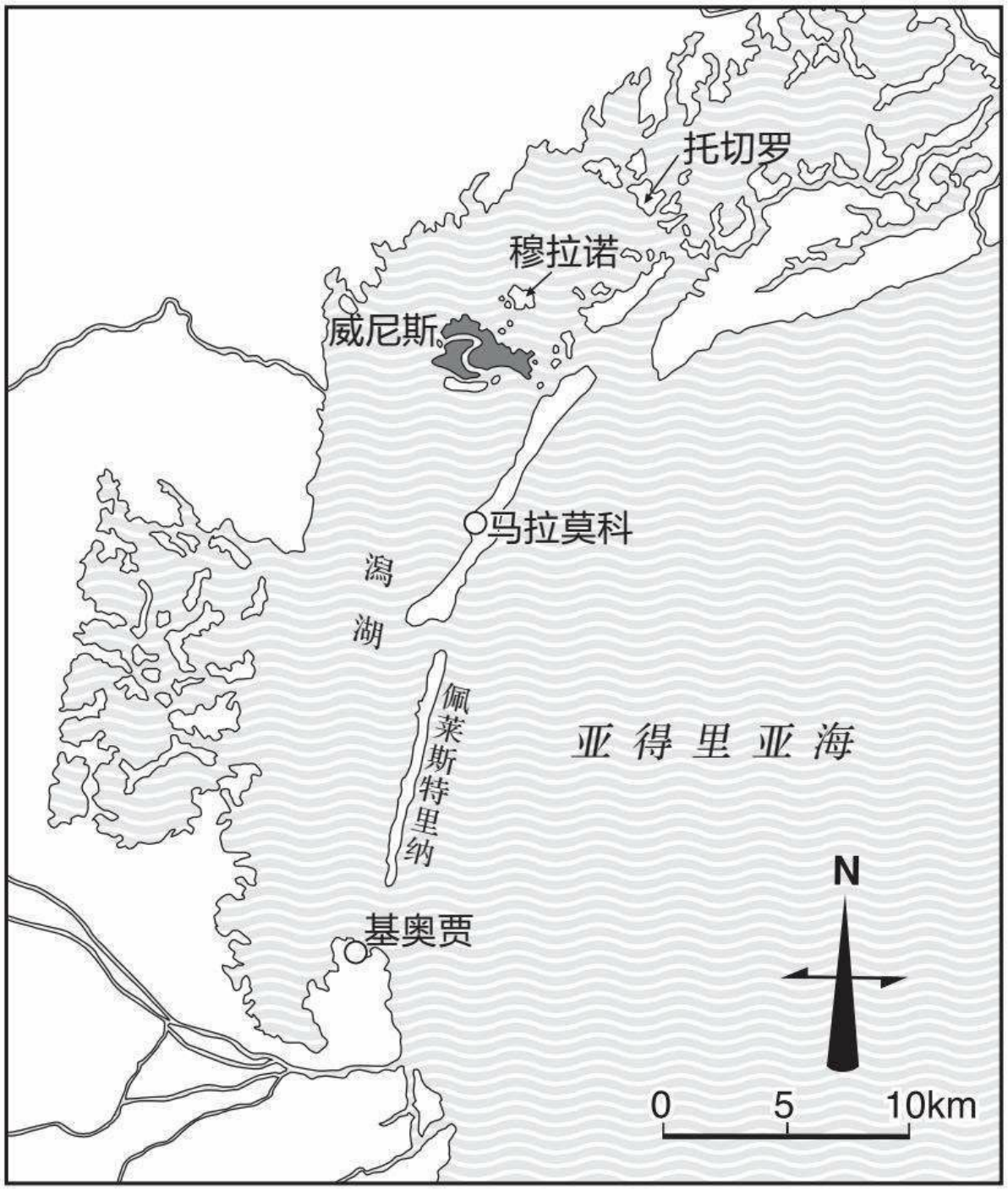
同一时期，热那亚又从国内派来援兵，舰队的战斗力提升至两倍以上。仅是加莱战船就有47艘。皮耶托·多里亚（Pietro Doria）代替波拉海战中战死的卢恰诺·多里亚（Luciano Doria），成了新一任的海军统帅。

占领了基奥贾，并以此为据点的热那亚海军，隔着潟湖与威尼斯对峙着，似乎只要越过这片浅海就能直捣敌营。不过，热那亚人到底是海上男儿，他们非常清楚浅海的潟湖比石头垒砌的城墙更为坚固。同为大海之子的威尼斯人也很明白，胜负的关键就取决于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片潟湖。

正如第一章“威尼斯的诞生”中所述，威尼斯开凿运河的首要目的是引水，其次才是行船。来自本土的数条河流注入潟湖，倘若不能顺利地将它们引向外海，千辛万苦建起的水上之城随时会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而且，河水比海水更容易变质，不洁的潟湖之水将成为传染病的源头。因此，城中那些貌似毫无章法、呈网状般的运河，其实是为了能让河水更畅通地流向外海，保证潟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的潟湖，其实也有天然河水流入。与城中那些人工运河一样，威尼斯人把这条天然的运河也叫作“Canale”。查看威尼斯

海运局发行的潟湖航行线路图，可以发现他们用浓淡有别的天蓝色标示出不同深度的水路，血管一般地纵横交错于潟湖之中。了解水深，是潟湖航行不可或缺的知识。这里的水路高低不平，深的超过了10米，浅的不到1米，有些地方甚至水面下就是海泥。



威尼斯和潟湖及其周边

通常，天然运河沿途都会打上木桩，作为航行的标志。但是在1379年的战役时，这些木桩都被拔了出来。热那亚人虽然熟悉水性，但由于

热那亚港吃水较深，因此并不怎么了解潟湖的状况。尽管他们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基奥贾，攻击了横隔于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佩莱斯特里纳和马拉莫科，却不敢轻易进入潟湖。他们加固封锁线，准备坐等威尼斯油尽灯枯。

真正是背水一战的威尼斯，偏偏在这种时候，举国一致的体制意想不到地出现了破绽——水手们表示不愿配合政府的政策。国有造船厂没日没夜地好不容易造出16艘加莱船，结果来应征的水手仅够6艘船使用。原来他们不满政府对韦托尔·皮萨尼的处置，用消极的态度以示抗议。

波拉海战之后，皮萨尼因为战败，遭到政府问责，被关进了监狱。在土耳其等国家，战败的将军，通常是不问原因，一律砍头。但在威尼斯是先审后判，被判失责才会遭刑罚处置。

皮萨尼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没有提供各战船的指挥官们充足的准备时间，草草开战；二是战斗中临阵脱逃。在检察官、辩护人完成证人质询之后，元老院进行了投票，结果78人认为皮萨尼有罪。认为无罪的48人，另有14票弃权。根据威尼斯的海商法，舰队的司令官不得在战争途中撤离战场。因此，检察官要求依法判处皮萨尼死刑。元首念及皮萨尼以往的功绩，提出处以罚金以及终身不得担任指挥官的建议。元老院经过再度审议，采用折中方案，判处皮萨尼6个月的监禁，并且终身不得出任指挥官。皮萨尼因此锒铛入狱。

然而，水手们却不服这个判决。他们认为是元老院拒绝皮萨尼提出的要求，不准许人员和船只回国休整，舰队只好在波拉整修船只，效率不比国内，所以错在元老院。敌人来袭时，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迎战，责任不在皮萨尼的身上，是各船的船长没有忠实地执行他的作战命令。众人抱怨代替皮萨尼出任海军司令的塔代奥·朱斯蒂尼亚尼（Taddeo

Giustiniani）缺乏经验，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样不谙水性的贵族，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威尼斯政府真是要山穷水尽。如果执意维护政府的权威，就无法达成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国家濒临灭亡的危急时刻，首先必须众志成城，于是政府决定释放皮萨尼。

皮萨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招进元首官邸，元首希望他能不计前嫌，继续为国效忠。随后，皮萨尼前往圣马可教堂做祈祷。当他结束祈祷走出教堂，步入广场时，守候在四周的水手们发出了大声的喝彩："万岁！韦托尔！"

皮萨尼慌忙举手制止："小子们，请安静!我们应该欢呼万岁！圣马可！"

于是水手们改口叫着"万岁！圣马可！万岁！韦托尔！"，欢天喜地簇拥着皮萨尼返回家中。

政府虽然牺牲威信释放了皮萨尼，但如果再次任命他为最高司令官，元老院会颜面丢尽。于是，元老院给了他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那些以为皮萨尼官复原职，纷纷来应征入伍的水手们，听说最高司令官仍是朱斯蒂尼亚尼时，顿时闹了起来。他们聚集在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前，把帽子踩在地上，对着正在开元老院会议的元首官邸大声地骂着脏话，言语之不堪以至于年代记作者羞于下笔。泄愤后水手们各自散去，征兵之事又成了泡影。

这时，年近80的总统安德烈亚·孔塔里尼（Andrea Contarini）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由他本人出任最高司令官，皮萨尼担任副手。

水手们接受了皮萨尼成为实质司令官的事实，先有6艘加莱船召集到了船员。

按照惯例，韦托尔·皮萨尼坐在靠在岸边的船只前接受众人的报名。争先恐后抢着应征的水手们，让记录名字的书记官忙得头昏眼花，威尼斯总算是进入了举国一心的状态。

威尼斯需要战船，多多益善。按照皮萨尼制订的作战计划，起码还差40艘船。然而，造出的战船，需要配备划桨手、船员和战斗的战士才能发挥战斗力。战士与水手不同，不一定需要熟悉水性，因此可以使用雇佣兵。当时意大利各地战事不断，从英国、法国、德国过来的雇佣兵络绎不绝，只要付钱，不愁找不到卖命的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富裕众所周知，很多人不顾热那亚的封锁，设法钻空子潜入了威尼斯。有钱还真是好办事。

威尼斯政府针对贵族以及富裕阶层展开资产调查，以强制配额购买国债的方式筹集军费。可是单凭富人们购买国债，还是达不到目标。于是，国家号召大众捐款，凡捐款金额最多的前30名，晋升为共和国国会议员和贵族，外国人捐款，即可获得威尼斯市民权。通常外国人获得市民权，至少需要在威尼斯居住25年。

政府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反响。要求捐款的人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真正爱国的，也不乏出于各种私利考虑的人。我们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巴托洛梅奥·巴鲁塔：捐赠两艘加莱船，提供40名弓箭手和120名划桨手一个月所需的费用；提供10名士兵及其所有费用。除此之外，他的两位弟弟和侄子参军，不拿军饷。

马可·席卡那：提供两队士兵及其所有费用。

弗朗西斯科·梅佐：率领全家族加入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一切费用自付。另捐赠10名弓箭手两个月所需的费用，以及1000达克特。

伯纳迪诺·卡桑尼：捐赠200达克特，提供给死伤或被俘者的家属，并负担最高司令官旗舰上的所有弓箭手一个月的军饷。另外以购买国债的方式，提供25艘加莱船上所有弓箭手15天的费用。

以上都属于大笔捐赠。另外还有一些感人的行为。比如说，名叫皮耶托和弗朗西斯科的两位画家，希望从5月开始在保罗·莫罗西尼指挥的加莱船上，无偿担任军务，直到战争结束。类似这样的捐赠还另有其人，有一位被敌人夺去家园、身无分文的基奥贾男子，提出捐出自己的身体，国家接受了他的这个捐赠。妇女们也不让须眉，不管贫富贵贱，纷纷捐出首饰，特别是金、银制的饰品。

在众人拾柴的努力下，有34艘加莱船加入了战线。连同原已具备战斗力的船只，总数超过了60艘。尽管战船的数量超过了热那亚，但实际战力却不能与对手相抗衡。

由于无法从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地募集到划桨手，熟练的水手们又必须负责操纵船只和升降风帆，没有多余的人力，因此，划桨的任务就落到了一般市民的身上。

这些平素作为街头店铺的老板、手工匠的人们，自然没接受过加莱船划桨的训练。要让这些最多在运河上划过小船的男人们在短期内登上战船，必须进行特别的训练。

性格急躁的皮萨尼强忍着耐心，开始训练这批平民。练习船来往于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到利多港的直线区域内，每条船上有皮萨尼手下的

将官负责指导，从拿船桨的姿势，到跟随号令转换方向时的船桨操作等，巨细靡遗。老元首孔塔里尼也不虚最高司令官之名，每天都去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对那些汗流浃背地接受训练的临时水手们，一一给予慰问和鼓励。

当威尼斯全国上下精神上趋向团结一心的时刻，皮萨尼脑海中的作战计划也完整成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一旦失败，威尼斯将万劫不复。皮萨尼谨慎且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话说卡洛·泽诺这些日子又在干什么呢？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他和他的舰队杳无音信。

这位浪荡子虽说是执行国家的任务，实际上却为所欲为。他的任务是在第勒尼安海布下罗网，袭击从热那亚出发去各地的商船，牵制住护卫商船的热那亚的海军，让他们不能离开这片海峡。

卡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但凡看见挂着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船，不管是商船或军船，一律攻击，见人就掳，见货便抢。损伤严重的船只，毫不留情地就地烧毁。在热那亚与叙利亚的海域之间往返两次之后，卡洛的舰队又出没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的岛屿之间，继续大肆掠夺，吓得热那亚商船惊恐万分，甚至不愿出港做生意。

卡洛·泽诺原本应该在第勒尼安海不断地重复类似的袭击。可是他却判断，这里已经无所作为，于是不等本国的指示，便擅自将舰队带往任务之外的海域。所以，热那亚国内派出的援军，才捞到机会在基奥贾沦陷之前赶到目的地。出海后从没和政府联系的他，自然不知道波拉海战败北以及本国被困的事情。当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卡洛·泽诺及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一带热火朝天地干着海盗的营生。

泽诺首先来到久违的特内多斯岛查看情况。在守卫军的热烈欢迎之下，他做出整备要塞的指示，并向军人们传授了袭击海上经过的热那亚商船的战术。随后，他率领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袭击了位于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放火烧毁了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商船。把热那亚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卡洛继续南下，以特内多斯岛和克里特岛为根据地，在爱琴海直至贝鲁特的海域横行霸道。

对泽诺的舰队而言，根据地除了补给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由于掠夺了太多的货物，无法带回国内的商品，所以需要在根据地另外装船，运送到附近销售，俘虏则留在根据地看守。

卡洛·泽诺接到政府令他火速回国的指示，就是从运载战利品回克里特岛的货船那儿得知的。按理说，他应该带领旗下的11艘加莱船，立刻赶回等得心急如焚的祖国。可是，就在临出发前，卡洛从潜入罗德岛的手下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据探子报告，罗德岛港口停泊着热那亚的商船。这艘名为“里吉钮尼”的商船是地中海海域，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船上运载着价值高达50万达克特的货物。即使富如威尼斯，资产总额在50万达克特以上的富豪，也只有一个人。

船上300名乘客的中有160名是商人。光是想想这160个人的赎金，便足够令人热血沸腾，就算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6世纪英国航海探险家）大概也抵抗不了如此的诱惑。卡洛·泽诺权当自己没收到政府命令，决定干完这一票大的之后再回国救援。

在泽诺的命令下，三艘加莱船打头阵，冲进了罗德岛港。然而，受

击的大帆船纹丝不动。就在这时，泽诺率领的主舰队从海角后方出现了。他们没有直接去攻击大船，而是抢夺了停在港口的其他帆船，然后，从这些帆船的桅杆上向“里吉钮尼”射出火箭，密如雨点的火箭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船上。

圆形的帆船的船身原本就比加莱船高，桅杆顶上的瞭望台当然也高过加莱船的瞭望台，因此，从上往下攻击，比由下至上更有效。热那亚的巨型帆船终究不敌，举手投降。

根据威尼斯的规定，船员不得瓜分所有掠夺的商品，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当作奖赏。这一次，船员们可是拿到了巨额的“奖金”。划桨手每人领到20达克特，弓箭手则更多，每人40达克特。之后，泽诺舰队回到克里特岛，开始为漫长的归国航程做准备，不日将与热那亚军厮杀海上，战船的整修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出发的日子。

基奥贾战役

说回威尼斯国内。皮萨尼见时机成熟，于是下令发起大反击。

12月22日黎明之前，一艘接一艘的船悄悄地离开圣马可码头和斯基亚沃尼堤岸。加莱船拖着堆满石头的货船，小船上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旗舰上除了皮萨尼之外，还有元首安德烈亚·孔塔里尼同行。

当时正值黑夜。若在平日，需点起火把，提醒船与船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在这个夜里，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改用白布标示。船队在熟悉的潟湖中前行，大船行深水区，小船选水浅之处。

船队经马拉莫科运河通到外海后，沿着佩莱斯特里纳航行至基奥贾附近。在那里，船队分成两队，第一队是牵引装满石头货船的加莱船，

第二队则是以小船为主的登陆船。第一队经过佩莱斯特里纳运河，再次进入潟湖内；第二队则由海上溯河而上，停靠在基奥贾的南边，开始登陆。此刻，天空露出了鱼肚白。

皮萨尼的作战计划是，利用基奥贾凸出于潟湖之中的地型，同时切断南、北两边，使其孤立。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原本被围困着的威尼斯，将反过来封锁热那亚军。

从南边登陆的威尼斯军，在对手顽强的阻击之下，不得不撤退离开。然而，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北面港口的封锁不受阻挠，必须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南边。沉船作业按计划顺利地进行，装满石头的大船沉入基奥贾港的出口处，面向潟湖地方，也沉下了几艘小船。等热那亚人发现事情不对，急匆匆赶到时，这座海上的“路障”已完成了大半。热那亚舰队被锁在港口内，动弹不得。

很快，热那亚人就察觉到事态严重，因此做出了更顽强的抵抗。他们驱船赶到“路障”附近，想除掉这些绊脚石，威尼斯战舰挡在前面，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些仓促成军的威尼斯水手们不谙海战，眼见着同袍一个个中箭倒下，惊恐万分，口口声声地叫着要撤退。老元首大声呵斥说，要么战死，要么让热那亚人投降，自己绝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在元首的威势之下，水手们再次拿起了船桨。

战斗不分昼夜地持续着。即使在战火停息的片刻，威尼斯海军也没有中止海上巡逻。由于南面没有被完全封锁，帕多瓦的援军得以赶来增援，热那亚军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威尼斯的战船来往于潟湖中间，轮流作战，不过，自皮萨尼以下的由贵族组成的士兵全体都留在船上，战船的补给依靠小船运送。在热那亚战船也无法侵入的潟湖之中，退潮时，小船是最有效的运输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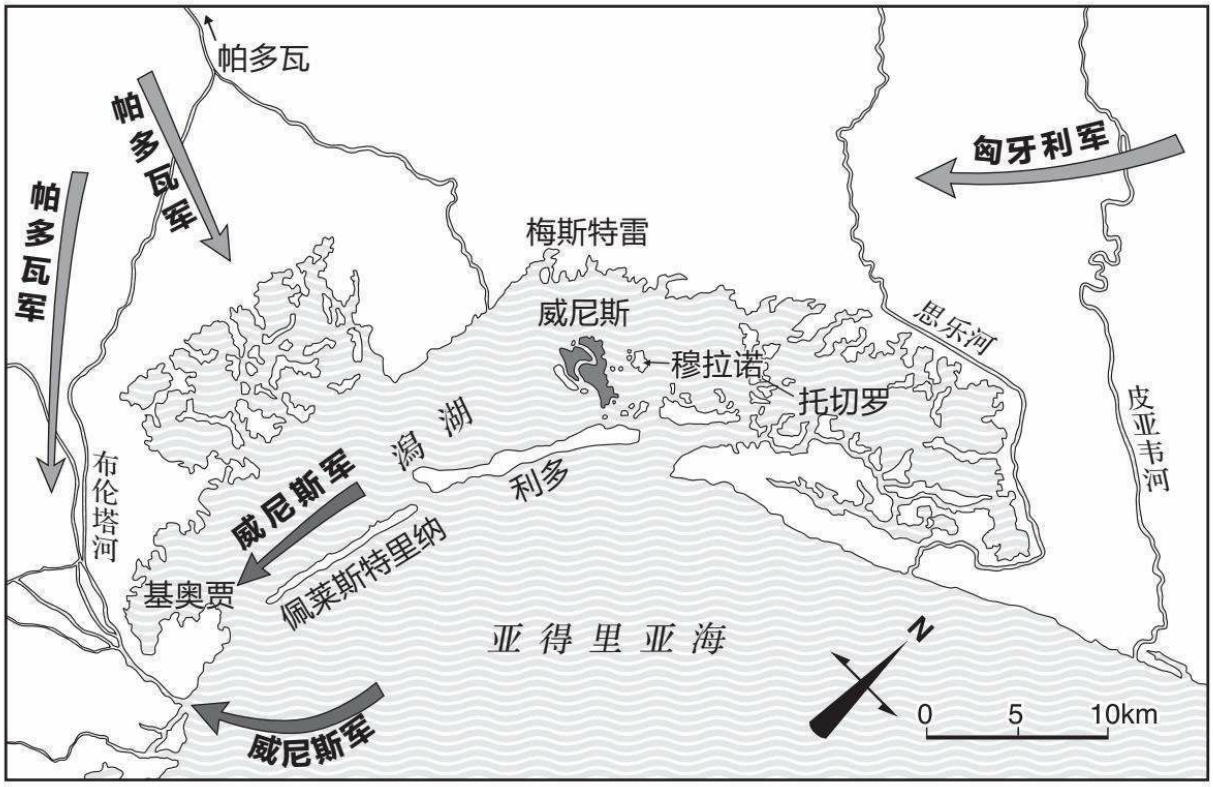
10天后，即1380年1月1日，众人翘首盼望的卡洛·泽诺舰队终于回到了祖国。原本只有11艘的加莱船已经增加到18艘，另外还拖着热那亚的巨型帆船“里吉钮尼”。泽诺舰队的归来，不仅增强了战斗力，威尼斯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卡洛·泽诺归国后立即被派往战况最激烈的基奥贾南部。如果不能成功地封锁住那里，就无法中断帕多瓦人沿河运来的补给，全面封锁热那亚军队的目标便无法达成。同样，热那亚一方也誓死保卫着这条补给线，战事因此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南面是陆地战，战线上多为外国雇佣兵，而指挥这些来自英国、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雇佣兵，正是泽诺的强项。不知是因为年轻时当过雇佣兵的经历，还是此时已年届45岁的他与生俱来的大胆和勇敢，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在艰困的战争中善用雇佣兵，原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因为泽诺，这些人最终成了威尼斯宝贵的战斗力。

在这场“基奥贾战役”中，大炮首次登上了战船。使用的火药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火”。西欧自14世纪开始，便利用大炮的爆发力射弹，当然，那时用的是石弹。而基奥贾战役是史上第一次将大炮装在船尾的舰桥上。

话说回来，大炮的命中率不怎么高，威力甚至不比弓箭手射出的飞箭。不过，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石弹，在攻击城墙时还是发挥了功力。热那亚军的司令官皮耶托·多里亚就是压死在遭炮轰而坍塌的高塔之下。



威尼斯周边图（基奥贾战役）

时间进入4月。1月底从热那亚出发的由39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威尼斯海岸。他们立即向威尼斯发起挑战，似乎想通过海战，做一个彻底了断。

威尼斯军中很多人因疲于长期的作战，也希望一鼓作气打到底，因此极力主张迎战。然而，皮萨尼却不肯让步，他认为封锁基奥贾与海战不能同时进行，元首孔塔里尼和泽诺也赞同皮萨尼的意见。

挑战未果的热那亚舰队，无奈退回达尔马提亚港。因为要进攻威尼斯，舰队唯一可走的水路就是经过利多港，进入潟湖内水深10米以上的航道。可是水路两边都是威尼斯的要塞，根本无法突破，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撤退。

舰队的撤退对于被困中的热那亚军，仿佛抓到手中的救命绳索断

裂，众人陷入了绝望。威尼斯的包围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缩越紧，终于将港口内与陆地一侧的守军切成一分为二。不仅火药不足，严重的粮食缺乏，已经影响士兵的行动。帕多瓦方面送来的军粮，屡屡被威尼斯人夺走，反而让威尼斯捞了便宜。

于是，热那亚军使出最后一招，收买敌人来获取食粮。他们自然不会找威尼斯人，他们看中的是那些雇佣兵。雇佣兵果然上钩了，可没想到被威尼斯士兵发现，双方大打出手，差一点儿酿成一场威尼斯人与雇佣兵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幸卡洛·泽诺介入，平息了风波。被泽诺说服的雇佣兵们，中止了通敌的行径。

受困于基奥贾的热那亚军，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在1380年6月4日无条件投降。当时的记录说他们“衣衫褴褛，惨不忍睹”。当日，4870名热那亚人被俘、14艘加莱船被缴，同时被扣押的还有200名帕多瓦士兵。获胜的威尼斯一方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最初遭封锁的4个月，到之后虽然反包围成功、却依然艰苦卓绝的日子，他们整整熬过了10个月。

但战争还未结束。39艘战舰组成的热那亚舰队，仍然游走于亚得里亚海上。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就不算被夺回。刚打完基奥贾战役、无暇休整的皮萨尼，这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威尼斯海军最高统帅，出征对战热那亚舰队。卡洛·泽诺担任其副手。

采取攻势的威尼斯舰队旗开得胜，可是皮萨尼却在海战中受伤。因伤口恶化，他被送往战场附近的意大利南部的曼弗雷多尼亚港（Manfredonia），终因不治，在基奥贾战役结束仅两个多月的8月13日去世，享年56岁。

卡洛·泽诺接任皮萨尼，率军继续作战。没过多久，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再次完整地回到了威尼斯人的手中。于是，威尼斯凭借基奥贾战役的胜利以及重夺亚得里亚海制海权这两个筹码，开始了台面下的和谈。

首先，威尼斯通过派驻米兰的大使柯纳罗，成功地游说了对热那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如前文所述，米兰公爵为实现占领意大利中部的野心，不希望威尼斯从中阻挠，因此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威尼斯卖了一个人情。不过，如果公爵的态度过分露骨，恐怕又会刺激到热那亚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威尼斯请与热那亚、威尼斯两方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萨伏伊（Savoy）伯爵出面调停。萨伏伊是法国国王传统上的盟友，因此当地的十字军精神强过其他的意大利公国。由萨伏伊伯爵以“两个代表性的海洋国家相争，不利于反异教徒大业”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倡议和谈，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一年后的1381年8月，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外，匈牙利王、帕多瓦的僭主卡拉拉以及奥地利大公也参与了合约的缔结。奥地利大公的加入，其实是威尼斯的一个策略。威尼斯的内陆不仅是威尼斯进口德国、法国货物的通道，同时也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出口东方商品的陆路。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地区，绝不能被卡拉拉所占。然而，威尼斯自身又没有能力占领此地，因此打算让给关系友好的奥地利公国所有，杜绝卡拉拉吞并的野心。威尼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

这次的和平谈判被称为“都灵和议”，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特内多斯岛今后归萨伏伊管辖，中止建造要塞，热那亚船可以

自由靠港。

二、黑海沿岸的塔那地区，在今后的两年内，威尼斯与热那亚保持完全平等的贸易权利。

三、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岛的政治特权。

四、特雷维索归属奥地利大公。

五、威尼斯正式承认匈牙利国王对达尔马提亚的主权，每年支付贡金以换取当地港口的使用权。

对于以上的条约，很多历史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引发两个海洋共和国对立的矛盾根本没有被解决，一切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对于专家们认为威尼斯赢得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说法，我却无法苟同。我认为威尼斯取得基奥贾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对手热那亚，威尼斯的民众非常团结，没有内斗、政局不稳的困扰。一个世纪前由皮耶托·葛登尼哥实施的政治改革，尽管中间遭遇过一些危机，但国家体制并没有因此被颠覆，基本的政治理念得以继续保持。

当然，威尼斯国内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为逃税而将资产外移的现象，就出现在第三和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之间的休战期。

此外，平民尤其是水手们，对于贵族的领导能力相当不满，双方的矛盾甚至达到过一触即发的状态。第三次战争时，正是这种矛盾曾经让威尼斯陷入不利。不过，相比同一个时期的周边国家，西蒙·波凯涅拉

（Simon Boccanegra）领导的平民阶级（暂时）成功地取得了热那亚政权，佛罗伦萨也爆发了象征无产阶级兴起的著名的“梳毛工起义”（Tumulto dei Ciompi），唯独威尼斯没有因类似的冲突而消耗资源，反而通过有效运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增强了国力。这要归功于葛登尼哥在13到14世纪间实施的改革，制定了具有威尼斯特色的政治方向。基奥贾的胜利，对于落实国家基本方针，起到了很大的功效。

战争从来都是悲惨的，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人们的欲望单纯化。每个人心中曾经的不满，因为战争的发生而消失。威尼斯被封锁时，面对抱怨粮食不足的群众，元首孔塔里尼曾说过：“到贵族家去，他们会把仅有的面包分一半给你们。”贵族们做到了这点。

威尼斯政府兑现了募捐时的承诺，赋予名列前30位的高额捐款者共和国国会终身议员和贵族的地位，向有功的外国人发放了威尼斯市民权。对于尽全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保障遗属和负伤者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还决定每年从国库支出5000达克特，作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重新自立的基金。

贵族阶级也充分地尽到了义务。老元首不负威尼斯第一市民之名，身先士卒，皮萨尼、泽诺以及他们率领的贵族们，在战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而因为购买高额的国债，经济上遭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们这一群人。

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基奥贾战役的胜利，让威尼斯唯一得到的，就是全体国民达成了共识。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战果”，它对日后威尼斯的重新崛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尽管缔结了《都灵和议》，但包括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民在内的所有人大概没谁相信这两个海洋国家旷日持久的相争会就此结束。

造成两国对立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势均力敌。就像第一、第二、第三次的停战被打破，大家相信第四次停战，终究也有结束的一天。正因为如此，两个国家都没有忘记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

不过，在治国能力上，威尼斯远远高于热那亚。因此，当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抓住时机的速度更敏捷，行动更彻底。

对于威尼斯而言，《都灵和议》之后的30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那些与威尼斯有利害冲突的强国，接二连三地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匈牙利王国。为了取得靠港权，威尼斯不得不向匈牙利王缴纳年贡金。然而，匈牙利国王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姻亲那不勒斯王因那不勒斯的王位火拼，腾不出手打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属地。海盗伺机而动。饱受匈牙利王恶政和海盗肆虐的当地居民，不禁怀念起威尼斯人统治时期的好光景。

对此，威尼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等他们确定了民心所向，判断热那亚不会介入这场与匈牙利王的战争之后，这才顺应达尔马提亚人民的心意，在1409年夺回了这块曾经拥有过300年的失地。为了等待这个最佳时机，威尼斯人整整守候了30年。

威尼斯小心行事是有理由的。他们在之前刚利用一次那不勒斯王国的内斗成功地获得了遏制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重要战略地科孚岛。1386年，威尼斯从一位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人手中买下科孚岛之后，立刻在岛上建起了要塞，由于建造得十分坚固，时至今日仍然为希腊海军所

用。

对于陆地一侧的强敌，威尼斯采取的也是各个击破的方针。

1387年，威尼斯与米兰、帕多瓦结成同盟，推翻了维罗那（Verona）僭主斯卡利杰里（Scaligeri）。第二年，威尼斯与米兰联军，又击败了帕多瓦僭主卡拉拉。1402年，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去世。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既是威尼斯不得不依靠的伙伴，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公爵的死，对威尼斯实属幸事。没过多久，威尼斯便将维罗纳和帕多瓦占为己有，原本归属奥地利大公的特雷维索，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地。

就这样，威尼斯人再度自由、安全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之上，在陆地上同样是通行无阻，从西欧来的商人们没有了中途被截的担心。守卫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最理想的位置科孚岛，属于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两个基地莫东和科伦，一如既往地看管着周边的海域。内格罗蓬特，甚至克里特岛都牢牢地掌控在威尼斯人的手中。

另外，威尼斯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法国人那里一点一点买下法国在第四次东征时获得的城镇——勒班陀、帕特雷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雅典，以及爱琴海诸岛。法国人因为害怕土耳其的攻击，与其被抢不如卖了，所以才将这些地方转让给威尼斯，变卖时自然是被买方的威尼斯狠狠地砍了价。因为这些并非是威尼斯势在必得的地区，他们只是为了防止落入热那亚手中，才先下手为强。

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再次，应该说是第三次迎来了全盛时代。与东方之间的贸易顺风顺水，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繁荣依旧，令人生畏的新兴国家土耳其在1402年大败于帖木儿帝国之后，沉寂了不少，威尼斯商

人迎来了和气生财的好时代，而他们的确是没有放过这个运气。

那么，这30年，热那亚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在基奥贾战败后的5年里，热那亚更换了10位元首，政局动荡不安。之后，他们接受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如果将短暂的独立以及归属米兰公爵的时期都算进去，这种情形延续了130年，直到1528年为止。从那以后直到意大利统一，热那亚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附庸国。而在同一个时期，威尼斯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独立。

但是，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因为基奥贾战败而中止。

阿马尔菲在1131年被西西里王占领之后，商人们依然活跃于海外；1284年比萨在梅洛里亚海战失败后，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商业实力。同样，热那亚的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地中海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位于黑海沿岸的热那亚基地卡法、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加拉太，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如往昔。热那亚人最大的特色，即无与伦比的航海天赋，更是在一个世纪后创造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个从意大利语音译过来的名字，应该是人人皆知。有关这位大航海家的冒险事迹，就不再赘言。可我想说的是，当他在西班牙感叹“我身在此地，心系祖国”时，他的祖国正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发迹于热那亚，成功经营科西嘉岛殖民地，实力雄厚堪称当时的跨国企业的“圣乔治银行”，我们也不清楚它为祖国做过什么贡献。

最能说明热那亚状况的，应该是勒班陀海战时它的参战方式。在这场爆发于1571年的土耳其与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的大战中，威尼斯以共和国的身份参战，向基督教联军贡献了接近总数一半的战斗力。相

比之下，尽管热那亚人尚安德烈·多里亚（Gianandrea Doria）担任了镇守右翼舰队的司令官，但他并不是代表热那亚，而是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海军上将参战的。可以说，作为独立的海上国家，热那亚在14世纪末已销声匿迹。当年地中海上的4个海洋共和国，只剩下威尼斯。

持续了120年以上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长久之争，不禁让我联想到你来我往过招、迟迟难决胜负的两位冠军的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五轮时，威尼斯出现在赛场上，而热那亚的身影却终于消失了。

因此，威尼斯是不战而胜。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取胜，结果是不变的，而且赢家往往能收获价值高于形式的实质性的东西。两强相争，威尼斯重现雄风，热那亚则从此萎靡。

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个全盛的时期。然而，能够经历几度兴盛的国家，却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一次的辉煌，靠的是因缘巧合，而重复出现的繁荣，则是有意识的努力换来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尼斯历史研究权威雷恩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与热那亚经过长期的抗争，最终胜出的威尼斯，靠的不是其海军力量或海战技术。自1270年之后，威尼斯已经失去了这些方面的优势。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即社会的组织能力。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有着极大的落差。"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1968年的春天，由乔治·契尼（Giorgio Cini）基金会主办的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召开。当时我正在准备写《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最后一位主角——从威尼斯贵族之女成为塞浦路斯王妃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正好是一个机会，便去旁听了会议，在场的日本人就我一个。

记得是最后一天的集体研讨会，一位法国的女性学者，就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社会地位发表了演讲，她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没有出现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作为女性，我对此深感遗憾。”

话音未落，台下立马有人大声叫道：“所以威尼斯的政体才能保持

健全！”

会场内坐满了雷恩、洛佩兹等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世界级权威，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相信，这些笑声不是针对法国女学者，而是对调侃者的赞同。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此确信无疑。

那时我刚写完几位不让须眉的女性的故事，正在烦恼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与伊莎贝拉·迪埃斯特（Isabella d'Este）、卡特丽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身处同一个时代，却任由祖国威尼斯政府操纵，枉费一国女王地位的威尼斯女子。那位听众的调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除了在当代仍属于少数的男女平等的民主国家之外，纵观人类悠久历史，女性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场合，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那样，自己站在权力的顶峰，另一种是作为站在顶峰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近距离地接触权力。

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会发生吗？倒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Siena）、卢卡（Lucca）都号称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僭主统治。

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高位重者来判断。比如说著名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帕齐家族企图暗杀的不是佛罗伦萨的元首，而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类似的事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就不曾发生。

16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曾经秘密地向某位职业

杀手询过价。杀手根据要求制作了清单，详细地列出了暗杀土耳其苏丹、西欧各国要人每一位所需的经费和报酬，提交给“十人委员会”。

既然是威尼斯政府要求的“报价单”，本国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会榜上有名。不过，倘若是其他的国家找杀手，他们的名单上绝不会漏掉当时大国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威尼斯政府的哪位要人会成为暗杀的对象呢？

之所以会暗杀权力者，是因为预期到此人之死将会改变其国家的政治方向。可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设定非常之巧妙，从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代，无论国内或国外，威尼斯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元首从当选到去世，可以终身保持其地位，向国民以及外国君主显示与其头衔相符的权威。然而，如果不能获得每6个月更换一次的6位元首辅佐官半数以上的同意，再贵为元首，还是无权提出任何一条议案。

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元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唯有在会场演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例子证明，有说服力的演说会左右众人的决定。不过，和其他议员一样，元首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如果是在共和国国会表决，它是2000票中的一票，在元老院的话，则是0.5%。哪怕是决定最机密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元首的意志，也只占了1/17的分量。

连一国的元首，其权力都受到这般的限制，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只有半年或一年，期满后必须经过与任职时间同样长短的休职期，才能再选。这些人就更没有大权在握的可能。最有权利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3位委员长则是每个月轮换。通常由10名委员加上元首，以及6名元首辅佐官组成的“十人委员”，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议案，为了慎重起见，会另外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20位议员，总共37个

人共同商议决定。

对于这种组织机构的国家，政治暗杀完全丧失了意义。因为不管谁被杀，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要想改变威尼斯的政治方向，如果不将共和国国会的所有议员，也就是掌管政治的威尼斯所有贵族杀个精光，阴谋就不算得逞。为了避免一人独揽大权，威尼斯共和国用尽了各种办法。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政治暗杀，从未在威尼斯出现的理由，正在于此。

在威尼斯，没有谁需要护卫或贴身保镖。元首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有仪仗兵随从，但与当今君主们的随从相比，这些仪仗兵作为装饰的意味更为浓厚。威尼斯也有警察，但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日常的治安。当危急事态发生时，则是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国内没有军队驻守的国家。国民被禁止携带武器，因此政府也不例外，当然也没有必要。无论地位高下，人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走在街上，这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女性怎么可能在政治发挥她们的影响力呢？首先在威尼斯国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想做点儿什么，只能去国外发展。不过，4位身处异乡而且都有政治机会的威尼斯女性，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像引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那般的人物。（卡特琳出生于佛罗伦萨，后嫁于法国王室，是法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王后。）

数百年来没有机会出场的威尼斯女性，即使遇上施展本领的舞台，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吧。事实上，威尼斯的男人也不喜欢他们的女人涉及政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464年，威尼斯贵族巴尔博（Balbo）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是史上第一位成为教皇的威尼斯人。新教皇有一位妹妹名叫伊莉莎白（Elisabetta），嫁给了同为威尼斯名门的泽诺家族。

因为有一个权高位重的哥哥，伊莉莎白变得热衷于政治。按照威尼斯的规定，但凡有人成为教皇，他在世期间，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即使当选为元老院议员，也不得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此重视政治自主性的威尼斯政府，对于伊莉莎白的表现，当然是很不高兴。

然而，与教廷对立，在政治上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当时还有大敌当前，花10年时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势不可挡，威尼斯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因此，尽管恼怒万分，政府对锋芒毕露的伊莉莎白，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终于等到1472年。教皇保罗二世刚去世，“十人委员会”便立即决定将伊莉莎白·泽诺流放到伊斯特里亚。数年后，伊莉莎白总算从乡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却无法摆脱被放逐国外的命运。离开伊斯特里亚，去了罗马的她，一直到1480年死去，都没有机会再踏入祖国一步。

从伊莉莎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何与她同时期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会那样顺从。

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高贵身份，与塞浦路斯国王结成政治婚姻。国王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先于她辞世，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因此成了统治塞浦路斯岛的女王。但她却按照威尼斯政府的旨意，乖乖地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了祖国。提笔至此，我一面感叹威尼斯政府令人咋舌的外交手腕，一面也不禁联想，如果换作是伊莎贝拉·迪埃斯特或者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她们大概不会就那么心甘情愿地任由

祖国摆布。

16世纪，取代崩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兴起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有一位王后，名叫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pello）。她是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第二任妻子。有关比安卡·卡佩洛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我要说的是，被大公万般宠爱的比安卡，完全拥有影响大公的力量，可是作为大公夫人，她的能力只用在装饰打扮和耍小女人手段上了。

元首夫人的礼服

元首的礼服

贵族小姐的婚纱

贵族夫人正式场合的服装

同样，13世纪的匈牙利王妃托玛西娜·莫罗西尼（Thomasina Morosini）在政治上也是无所作为。

这3位女性都是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作为一国的公主嫁给异国之王。没有政治抱负，似乎是威尼斯女性共通的特性。

切齐利娅·巴福

不过，还是有一个例外，切齐利娅·巴福（Cecilia Baffo）就是一位有趣的女子。

切齐利娅与上述的3位女性一样，身上也流着威尼斯贵族的血液，但她没有公主的身份。更特别的是，她嫁入的不是基督教国家的王室，而是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是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

切齐利娅12岁时，随父亲航行爱琴海。途中，他们乘坐的船遭遇海盗袭击。被土耳其海盗俘虏的基督徒，无一例外地全被当成奴隶贩卖，男人们戴上枷锁，被用作加莱船划桨手，女人们或为小妾，或为家奴。不过，海盗的头目留下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但没有把她放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竞卖，而是献给了苏丹的一位王子。

切齐利娅·巴福改信伊斯兰教后，有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努尔·巴努（Nurbanu）。她在塞利姆王子（Selim）的后宫生活了29年，其间诞下一子。彼时，正值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给西欧造成极大威胁的时代。切齐利娅所生的孩子，是有“伟大的苏丹”之称的苏莱曼大帝（Sulayman I）的长孙。

威尼斯政府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切齐利娅的事情。在她入宫一年后的1538年，威尼斯元老院向土耳其宫廷送去了证明切齐利娅·巴福是威尼斯贵族之女的书信。

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去。新苏丹由塞利姆王子继位，这意味切齐利娅终于熬出了头。

在君主专制国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意外的脆弱，生死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贵为皇太子之母，但作为新苏丹的一个王妃，切齐利娅的地位还不能说是绝对安泰。

随着新苏丹塞利姆进驻君士坦丁堡，他的后宫佳丽们也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托普卡普皇宫（Topkapi Palace）。切齐利娅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后面跟着150名宫女和众多的奴婢。见惯了苏丹宠妃出行场面的君士坦丁堡民众，也被这大阵仗惊得目瞪口呆。切齐利娅一行人的奢华气派远

远压倒了其他3位王妃和众多的臣妾。

切齐利娅成了后宫的新主人。先帝的妃子们已经被她流放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这群人将过着清苦的生活，哀怨地度过余生。新苏丹的生母也早已不在人世。从今之后，切齐利娅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任何人的脸色了。当年的美少女，此时已经41岁。

说起苏丹的后宫，后世的人们大概会把它想象成一座香艳而华美的花园。事实并非如此。与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关系相比，苏丹的后宫更是一个被命运和实力所操弄的残酷世界。

4位王妃的顺位，基本上以其所生的皇子的年龄排序。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在庞大的后宫中，有人到死都没见到过苏丹一面。无论是太子之母，还是干苦力的奴婢，归根结底都是奴隶。她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命运完全由着苏丹的性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切齐利娅尽管拥有皇太子母亲的身份，但年纪已过40的她，眼见着一个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奴被送进后宫，心中肯定万般不是滋味。

对于来自威尼斯的她而言，后宫的生活条件应该并不舒服。如果看过按当年的模样建造的托普卡普皇宫的后宫就会发现，其豪华程度远不及同时代威尼斯贵族的宅邸。土耳其后宫贴满金箔的墙壁和开满郁金香的花园再美，也美不过由本土特雷维索的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负责建造、壁画出自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之手的威尼斯贵族家的别墅。

尽管土耳其是一个强劲的军事帝国，但在16世纪，西欧的文明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尤其是威尼斯，更是当时处于西欧最前端的文明之国。

话说回来，12岁开始就住在土耳其的切齐利娅，应该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托普卡普皇宫装饰得再怎么金碧辉煌，终究是游牧民族建造的东西，与西欧的宫殿有着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帐篷，而不是西欧人概念中的殿堂。

后宫的女人们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便偶尔有出门游船的机会，也得坐在几乎看不见外面的栅栏里。西欧人把这种栅栏称为波斯式。如果是上街，则得乘坐四面遮掩得厚厚实实的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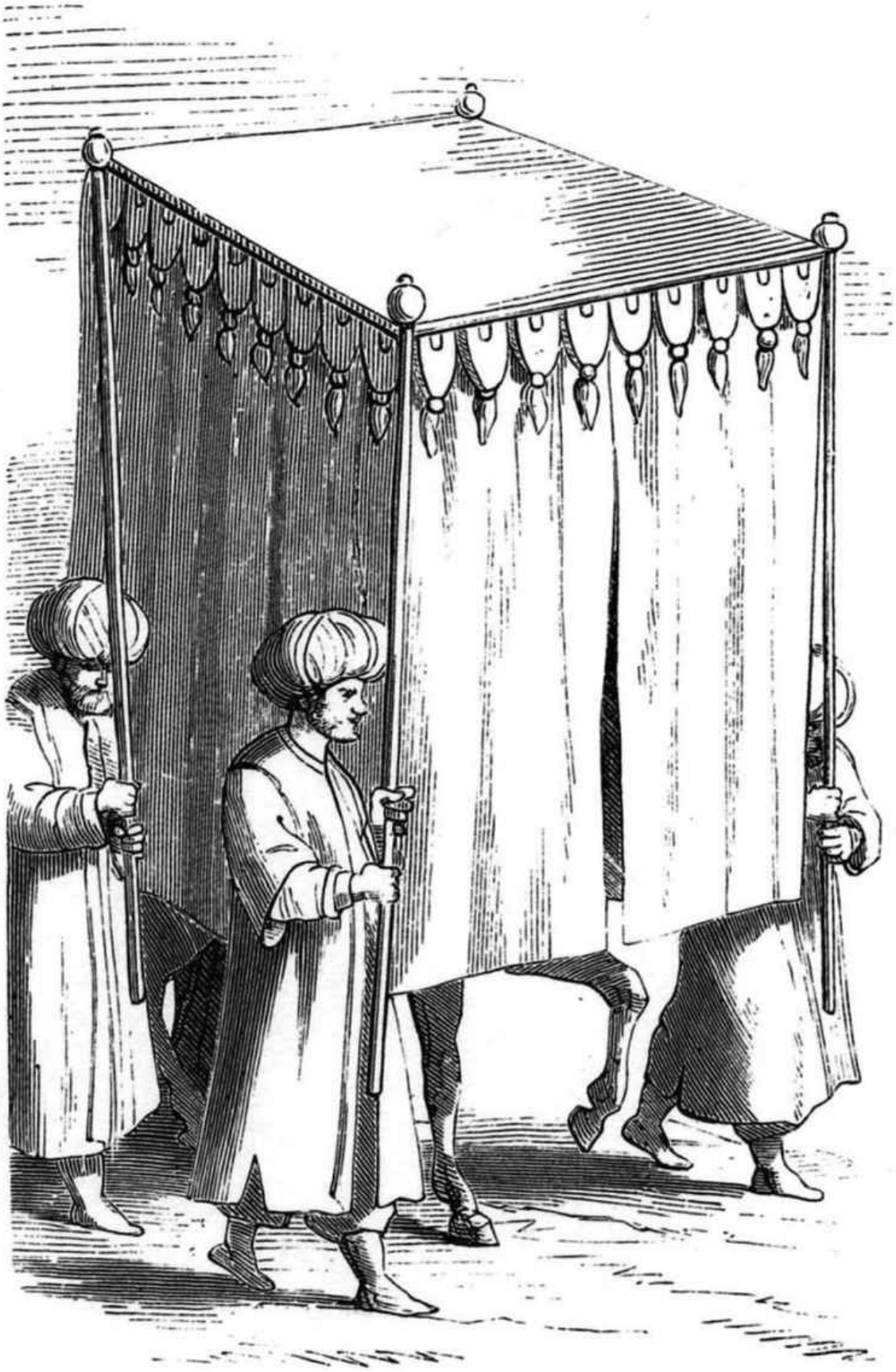
苏丹的宠妃

苏丹后宫的女人

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僚”的女人们，尽管无趣之极，却个个貌美如花。尤其是素以美貌闻名的高加索女性，向来被视为瑰宝，因此苏丹的后宫里有很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女奴。

不过，土耳其有一样东西，绝对可以傲视西欧，那就是珠宝。这是他们从被消灭的拜占庭文明中唯一继承的遗产，也许是因为珠宝正好符合土耳其人的趣味吧。托普卡普皇宫收藏展上所展示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饰品，足以让当今的人们震撼不已。相信当年后宫的女人，唯一不缺的就是珠宝首饰。有意思的是，它还成了住在后宫里的切齐利娅与绝不可能见到苏丹王妃的威尼斯大使之间的媒介。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我们无法了解双方的秘密联络是从何时开始的。唯一清楚的是一位销售珠宝的名叫姬莱亚的犹太女子，帮忙替大使给宫里的切齐利娅送信。



刚开始可能都是送些小礼物。像是包在威尼斯特产的花边手绢里的威尼斯杏仁饼、来自穆拉诺（Murano）的镂金小香水瓶等。不管是什么礼物，通过珠宝商人的中介，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塞利姆苏丹在世期间，这种联系从未暴露过。

大使的目的非常清楚，他希望通过切齐利娅，了解土耳其对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这一带通商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策。一旦察觉到苏丹有意采取敌对行动，可以尽早地将消息通报给祖国。

那个时期的切齐利娅究竟能派多大的用场，其实是一个疑问。苏丹塞利姆不仅违反《古兰经》的清规戒律喝酒，简直就是一个酒精中毒者。据说他最擅长的技艺，就是大口大口把葡萄酒当作啤酒似地灌下肚。因不理国政，甚至有传言说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尽管侍奉在君王身旁，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沉湎于酒色的丈夫，切齐利娅又能做些什么呢？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政权，全都掌握在从苏莱曼大帝世代起便担任宰相的索库鲁（Mehmed Sokollu）一个人的手里。

不过，切齐利娅似乎还是收集到了一些情报。她所提供的这些消息，对于想方设法收集情报的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而言极其重要。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土耳其攻占威尼斯领地的军事行动。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突发奇想，决定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占为己有。

塞浦路斯归属威尼斯已经一个世纪。对于塞利姆的这个决定，宰相索库鲁并不赞成，无奈苏丹一意孤行。面对专制君王无穷无尽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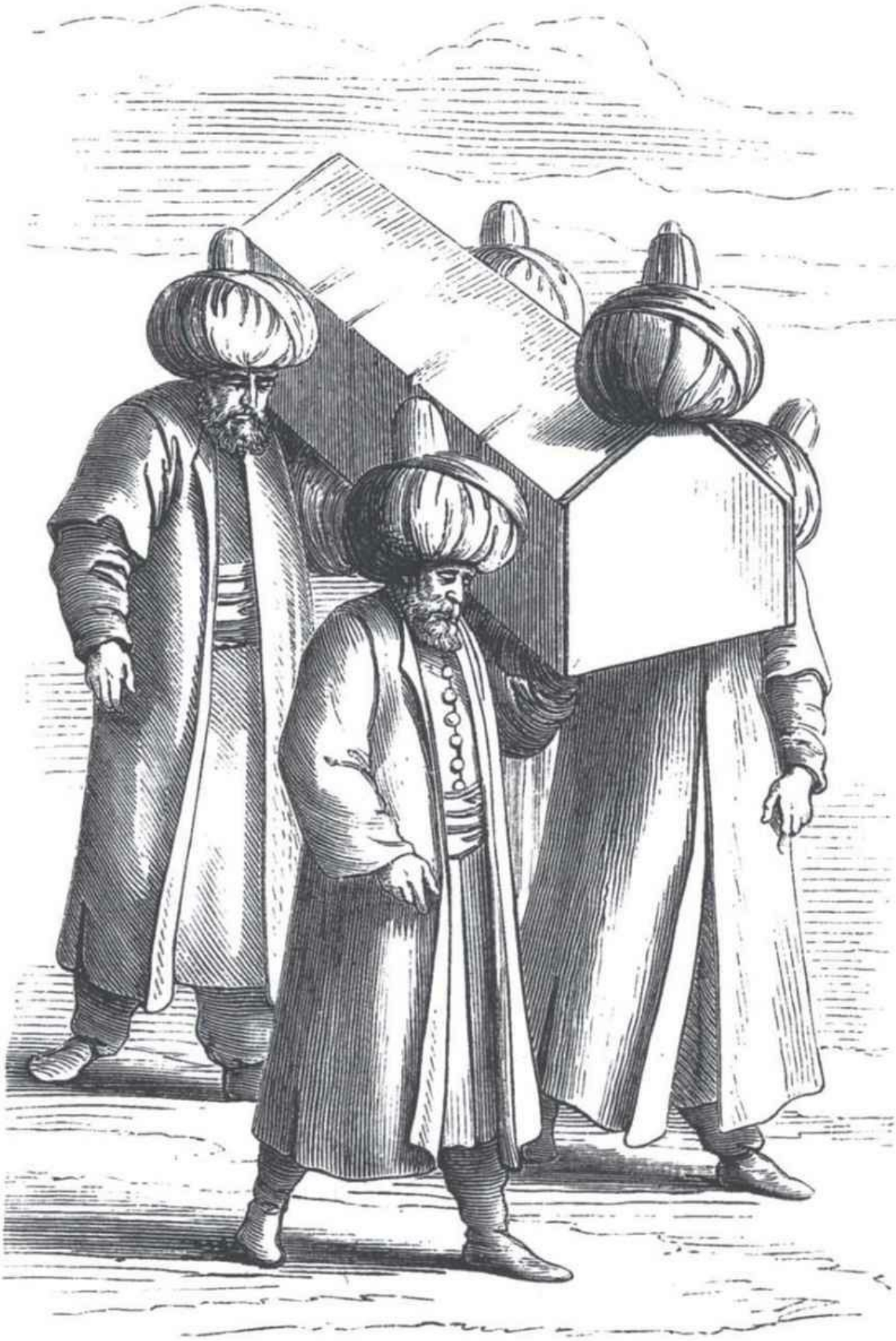
区区一个王妃，更是无能为力。在土耳其大军的强攻下，威尼斯位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事及商业基地沦陷。

紧接着是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这是一场威尼斯期待的战争，结果轮到土耳其变成了输家。但在之后提议讲和的，反而是赢家威尼斯。

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苏丹去世了。这个酒鬼在狂饮之后去洗澡，结果滑倒在浴室，头部受到了撞击。

继位的新苏丹是切齐利娅的儿子穆拉德（Murad）。即将迎来49岁的她成了太后。

名副其实地成为后宫女主人的切齐利娅，首先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原本在后宫最深处的寝宫搬到了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这里从此成了太后专区。



从出口处往里，沿着长长的走廊是各妃子的房间。切齐利娅占据着好地形，监视着妃子们的一举一动。苏丹的寝宫就在后宫附近。如果他要从寝宫去后宫旁边被称为“迪旺”的房间与大臣们开会，必须经过切齐利娅的房间。这样，苏丹进出后宫，不得不出于礼节去母亲那里请安。因此，切齐利娅对土耳其帝国的各种事务了如指掌，甚至有传言说，太后其实就在隔壁的屋里旁听会议。

切齐利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对苏丹的影响力超过自己的女人出现。为了不让儿子专宠某人，她不停地将年轻貌美的女奴送进后宫。有着一半威尼斯血液的新苏丹，性格平稳，喜爱组装各种各样的钟表以及创作绘画。儿子的这般喜好，应该是母亲喜闻乐见的。苏丹穆拉德将他精心绘制的图画集册成书，这也是土耳其出版的第一本艺术书籍。

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依然通过女珠宝商保持着联系。与之前不同的是，切齐利娅成了太后，外国大使可以堂而皇之地献上礼物。镶有精工雕刻镜框的威尼斯镜子，或者是当时连西欧男子的服装上都不可缺的威尼斯花边等。这些价值昂贵的礼物，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于威尼斯和切齐利娅而言，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唯一碍眼的便是宰相索库鲁。自苏莱曼大帝起侍奉了三代苏丹的这位宰相，性格平和，少有狂热性，做事务实得力。尽管是众所周知的亲威尼斯派，可是当两国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土耳其的利益。勒班陀海战后，他对来访的威尼斯大使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从你们手中夺走塞浦路斯，等于是斩断了威尼斯的一只手臂。你们在勒班陀海战中消灭了土耳其的海军，那不过是剃了我们的胡子。被斩的手臂不会再

生，但胡子会长得比以前更浓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后常常在苏丹耳边嘀咕说宰相该死。要找个莫须有的理由，一般都是以背叛之类的罪名。不过这对索库鲁不见效，因为没有人会质疑辅佐了三代君王的宰相的忠诚度。于是，切齐利娅改口称宰相插手专属苏丹的火药买卖，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还拿出交易的清单作为证据。这让苏丹不得不相信太后所言属实。如此精细周到的布局，想来不是后宫内可以完成的，多半是有人在宫外筹划操办好之后，再将物证交给切齐利娅。这样一弄，宰相自然是难逃一死。

在例行的阁僚会议上，被蒙在鼓里的宰相正在和大臣们商议国事。突然大门被推开，一名黑人奴隶冲了进来。他举起手中的半月刀，朝着坐在中央的宰相直直地砍了下去。索库鲁来不及吭一声便一命呜呼。在座的大臣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得呆若木鸡，等他们缓过神要抓捕杀人犯时，从隔壁房间走进来的苏丹，却命令他们不得动武。对苏丹的一番说辞，大臣们虽然半信半疑，也只能唯命是从。

之后，索库鲁的冤案得到了昭雪。君士坦丁堡的民众私底下纷传此事是太后欲掌大权所一手酿成的悲剧。不过，从出入托普卡普皇宫的大臣，到凡事都很敏感的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没有任何人怀疑威尼斯共和国与这件事情有干系。

威尼斯方面包括最机密的文件资料在内，自然不会出现任何相关的内容，只不过在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000达克特，作为向苏丹的母后赠礼。“十人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正好处于宰相被杀风波稍稍平息之后的微妙时期。当然，历史学家们绝不会据此就把威尼斯与索库鲁的死联系起来。但是在切齐利娅作为太后在

世期间，以及她儿子在位期间，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是历史事实。

1583年，切齐利娅·巴福去世，她是以努尔·巴努的土耳其名字去世的，享年57岁。在土耳其，无论是苏丹之母，还是后宫奴婢，奴隶就是奴隶。她墓碑的位置在当时就鲜为人知。然而，威尼斯的民众似乎没有忘记这位到死都没有能见到祖国的威尼斯女子。人们创作了一些民谣，唱着切齐利娅的故事。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撰写人物传记，不管主人公是男或女，要么是人物本身极具魅力，要么是其周遭的环境有趣，否则无从下笔。对于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当然是主人公这项两条件兼备。在我曾经写过的女性人物中，伊莎贝拉·迪埃斯特和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卢克雷齐娅·波吉亚（Lucrezia Borgia）属于第二类，来自威尼斯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同样如此。[1]

切齐利娅·巴福的生平事迹，则属于历史“秘话”，因此史料极少，不可能写成传记。仅靠这点儿资料，甚至无法将她归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型。在威尼斯共和国超过1000年的历史中，包括“秘话”在内，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也只能找出两位，而且她们都完全受制于威尼斯的男人们。正因为如此，在以雷恩教授为代表的威尼斯历史研究学家的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女人们。

学者们写的威尼斯通史，如果用报纸的版面做比喻，就像第一版和第二版，再加上文化版，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观察历史。之所以加上“文化版”，是因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一个国家的文

化，其分量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可谓是旗鼓相当，同样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这类历史著作中，没有家庭、社会的栏目。想看“家庭版”的威尼斯历史，得有人写一本诸如《从日常生活看威尼斯历史》般的书籍。至于“社会新闻”，更是需要耐下性子，从各类历史书籍中翻找散落的片段，将它们拼凑起来方能成文。

威尼斯贵族的服装

政府官员的官服

威尼斯上流社会的女性外出服

即将出嫁的贵族女子的服装

我以为，少了“家庭版”和“社会版”，就不算完整的历史。有关“社会版”，我会另找机会再述。这里写一些“家庭版”的事情。尽管威尼斯的女性上不了头版或第二版，在“家庭版”中，她们可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威尼斯女性，难道就只能足不出户，埋首家事吗？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们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有社会地位。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威尼斯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正式场合。因为威尼斯的男人们，无论地位高低，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社交便成了女人们重要的工作。

翻看拥有共和国最高地位的元首们的经历，便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人从事过海外贸易。14世纪几乎是所有人，15世纪占4/5的比例，到了16世纪仍然有3/5的元首，曾经漂洋过海做过买卖。这说明男人们因生意关系，常常是数年不归家。他们一般要到40岁左右才返回陆地，如果出身名门，便会从政。

回到威尼斯的男人们，照样日理万机。贵族必须出席在每周日举行的共和国国会。如果当选为元老院议员，还得参加每周两到三次的定期会议。那些身居高位的“十人委员会”委员、各部委的负责人，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另外还有每周三次以上的会议。

光这些例会就足够让人应接不暇，倘若遇到紧急情况，更是无休无眠地连日出勤。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似乎不必如此顶真，间中露个脸敷衍一下即可。可是当年的威尼斯人可没有那么自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缺席者将被课以高额的罚款。与其先相信议员们的良知，然后再抱怨低下的出席率，不如定出规矩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在威尼斯人的概

念中，有从政权力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威尼斯贵族的妻子，与丈夫相处的时间，明显要少于其他国家的贵夫人。

再说，丈夫们回到陆地，并不代表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可能会作为大使被派驻海外。威尼斯是最早向重要的其他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除此之外，也有人会担任军职，前往中东或北欧等散布在各个地区的威尼斯领事馆。通常情况下，赴任的男人们都是只身前往，用现代语言就是“单身赴任”。也有人带着儿子或侄子同行，但几乎没有人偕妻子或女儿赴任，除非是要在外面生活很久。在这一点上，各国情况比较相似，不过，威尼斯统治阶层出门在外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尽管丈夫们忙得不见人影，可是外国的王公诸侯、东方的商业伙伴等各路人马，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威尼斯。无论家宴还是元首主持的国宴，为宴会添色加彩的任务便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上。没有哪个女性会因为丈夫不在而缺席，她们会请亲戚家的男性陪同前往，哪怕是女子一个人单身出席宴会，也不会遭人议论。在15世纪初兴起、16世纪后大为流行的由少年们组成的“裤子俱乐部”，有一项义务就是陪伴贵夫人出行。这为丈夫常常不在家的妻子提供了便利。

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越多，就越会打扮自己，人也的确会变得更美。威尼斯的女性向来以时尚著称，或许是因为她们有较多的机会受到男人们的赞美。即使是没有宴会的日子，她们也会和伴游的男子一起出门散步。黄昏时分，在圣马可广场、圣斯特凡诺广场（Campo Santo Stefano）、圣玛利亚福莫萨广场（Santa Maria Formosa）、圣保罗广场，到处都是身着华服的女人们。广场边的小路上，开着一间间精致的服饰店，摆放着的全是令女人们心动不已的东西。

据说在威尼斯没有买不到的高价布料。从产地来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而被意大利人称为大马士革织锦的缎子、来自叙利亚贝鲁特的贝

鲁特天鹅绒，到绸缎薄纱、东方布料、威尼斯产的厚质金线织花锦、佛罗伦萨产的丝织品，应有尽有。

威尼斯产的丝织品的图案，出自圣马可教堂的彩绘玻璃的设计师之手，服饰人物画，由专业画家绘制。威尼斯最著名的产品当属风靡整个欧洲的花边。由于花边的成功，甚至有人按照其模样制成玻璃饰品，作为立在衣领上的装饰品。

珠宝商，当然也是时尚圈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从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到紫水晶、托帕石、玛瑙……各种宝石，琳琅满目，有求必应。其中波斯产的珍珠，尤其受到威尼斯女性的喜爱，她们所佩戴的珍珠项链，总是令其他国家的女性羡慕不已。

在威尼斯，宝石不仅用来制作项链、戒指，还常常直接缝在厚面料的衣服上。唯有耳环，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盛行。萨努多（Marin Sanudo）在《日记》1525年12月6日的这一篇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叙：

“真是可悲！金色的小环下面吊着大颗的珍珠，像黑人那样挂在耳朵上。所有的人里，只有我这位亲戚戴这种玩意儿，她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堪。”

看来与萨努多这位严谨的年代记作者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女性，是一位最早尝试佩戴耳环的勇敢之人。萨努多的悲鸣，没能阻挡耳环的人气。不久后，这种原本属于黑人的饰品，在威尼斯呈爆发性地流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威尼斯女性的发型也有所改变。15世纪时流行长发，以彩带或网罩束起。进入16世纪后，则流行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配以镶嵌珠宝的发簪，装束益发趋向奢华。还时兴用各色的丝绸做成具有东方色彩的头巾，反映出威尼斯与东方的密切关系。

为了有一头梦想的金发，妇人们戴着无顶的宽边帽，坐在露台上忍受暴晒。晒过后的头发金中带红，被称为“威尼斯金发”。女人们为了美丽在所不惜的努力，是男人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身边从来不缺天然金发美女的德国男人，对此也赞不绝口。也许是天然的金发容易给人一种金属般的冰冷感，而“威尼斯金发”则显得更为柔软妩媚。

当时的化妆术与当今极其相似，这里就不展开了。每当读到年代记的作者们指责那时的女性化妆过浓，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威尼斯女人们不管男人们说三道四，一心不乱地坐在镜子前，为一个美妆用尽心思的画面。这个场景与现在是何等相似。

比较特殊的，是威尼斯女性热衷于对乳房的装饰。她们向来以大胆敞露胸口而闻名。哪怕是到了露无可露的极限，也不过是用薄纱或蕾丝，象征性地遮掩一下。这种举止，自然会引来那些性格保守的男人们的非难，女人们自然也没把他们的指责当成一回事。

话说回来，男人们的非难，的确情有可原，因为露胸是模仿妓女的装扮。据说是出于防止同性恋行为的考虑，政府当局允许妓女裸露上身站在妓院的窗边。这般姿态吸引男人的目光实属正常，没想到的是贵妇们也乐于效仿。

未订婚的女子外出服

“裤子俱乐部”的制服（威尼斯年轻人服装）

底层娼妇的服装

将头发晒成金色的威尼斯妇人

正如提香（Tiziano）、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威尼斯女性个子虽然不高，但丰满圆润，风情万种，穿低胸的衣服应该是很美的。那种能让乳房显得丰满、坚挺的紧身胸衣，最早就是威尼斯女性发明的。而将香水抹在胸口，更是她们最极致的美丽表现。

从妇女们的趣向中，也可以看出威尼斯凭借海外贸易，成了东西文化融合之地。豪华的服饰、宝石、香水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薄纱、头巾则是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方霸主的土耳其帝国的特色。对金发的憧憬，可能是与北欧交流的结果。锦上添花的威尼斯特产的花边，竟然参考了娼妓的风俗。在18世纪巴黎时尚兴起之前，威尼斯的时尚不仅是对意大利，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女性。对于女人们的这种狂热，男人们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展颜欢笑，终究还是由着她们的性子。毕竟，威尼斯的女人们，是重要的公众人物。

萨努多在《日记》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述：1526年1月17日，元老院就“取缔奢侈委员会”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提案内容有关妇人们过长的裙子，希望通过法律来规定裙长。由于威尼斯妇女个子不高，所以喜欢穿长裙，好让自己显得高大一些，结果变得有点儿走火入魔，裙子长得离谱。

擅长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在这个议题上绝对是门外汉。有人主张裙边拖地的长度应该是半个布拉乔奥（braccio，90厘米；古意大利长度单位），又有人认为1/4布拉乔奥（45厘米）已经足够。议员们忍俊不禁，在笑声中投票表决。最终，1/4布拉乔奥胜出。想来开完会回家的议员们，势必会遭到太太们的横眉冷对。当然，女人们是不会屈服的，她们垫高了鞋跟，对抗法律。

威尼斯的女人们气宇轩昂地引领着欧洲时尚潮流，那男人们又如何呢？适逢文艺复兴鲜花盛开的时代，同一个时期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地

的男人们流行穿紧身裤和丝绸上衣，外搭宽松的短披风，须眉们的争奇斗艳，不输红粉。但是在威尼斯，流行似乎只属于女人和年轻男子。除了元首和年轻人，男人们的穿着依旧很保守。1497年，一位德国人在参观威尼斯共和国国会之后，留下这样的记录："议员们个个身高体壮，身着及地的黑色长袍（toga），头戴黑色无檐小帽，短发，长须。"

与个头娇小的女性不同，威尼斯男性身材比较高大，长年的海上生活又让他们练出一身健壮的体格，带有拜占庭色彩的长袍，想来是很适合他们。

长袍是威尼斯贵族的官服，根据官职，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元首在正式场合穿的是金线织花的长袍和大斗篷。冬天时外面再披一件被称为皮草之王的白色水貂（ermellino）的小披风。根据每个元首的喜好，元首服在质地、图案或纽扣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基本形状从1473年以后，300年间没有改变。元首戴的帽子，称为Corno（角），它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之冠，代代相传，款式更是经久不变。

元首的服饰之所以特别豪华，是因为他象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和财富。出于同样理由，政府要求驻外大使们，必须穿得比其他国家的大使更加考究。当时威尼斯的大使在国外，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大使，几乎享有同等的地位。

除了元首之外，唯一享有终身任职的是圣马可监督官（Procurator di San Marco），尽管这是一个有威信没有实权的无薪名誉职位，但他们的官服是最高级的紫色。

另一方，位居权利中枢的"十人委员会"的3位委员长、国家监察官（Procurator di Comune），以及非贵族出身的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秘书长（Cancelliere Grandee）的制服是红色的长袍。各部会大臣的官服是紫

红色，元老院议员则是黑色。黑色长袍不限于议员们，其他贵族，以及那些并非是贵族的医生、律师、官僚们都能穿。大学的教授和大商人们在工作场合，更是清一色的黑色长袍。

夏天时长袍只有一层塔夫绸的内衬，天冷了就在里面加一层皮毛，束上腰带。长袍的面料种类繁多，有毛织品、天鹅绒或是绸缎。不过，对于意大利其他地方流行的诸如插着羽毛的帽子或带花边的领子等，威尼斯男人们则是完全没有兴趣。在服装方面，他们还是相当保守。

话说回来，那些名字尚未出现在共和国国会议员登记名单上的不足20岁的年轻男子倒是一点儿不保守。“Compagnie della Calza”直译为“裤子俱乐部”或“紧身裤俱乐部”，名称来自他们作为制服的紧身裤。紧身裤的左右腿或者是上下两截的颜色不同。这些俱乐部的年轻人们留着齐肩的长发，戴着黑色的无檐帽，穿紧身的小马甲，模仿妇人的打扮，刻意地露出里面白色的丝绸衬衣，单边的肩膀上神气地披着内衬白色丝绸的朱色长披肩。少年的风流调侃，丝毫不逊色于美第奇家族的男孩或教皇的侄子们。与其他国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的似乎是权力越大，穿着越朴素。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在威尼斯，成年男性就不用说了，连已婚的女性以及年轻男子都拥有充足的社会活动场所。不可随意抛头露面的，唯有未婚的女性。在威尼斯，未婚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一样。

女孩们在家中接受教育。所谓的教育，不过是学一些简单的读书写字，其余就是刺绣和乐器，只有舞蹈是请专门的老师上门指导。学习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姿态。

有些家族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为男孩授课时，允许女孩们同席。不过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并非一般的现象。总体而言，威尼斯女性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像曼托瓦（Mantova）公爵夫人伊莎贝拉·迪埃斯特那样拥有极好教养的女性，即使在历代元首夫人中，也难找出一位。

要在威尼斯寻找有教养的女性，大概只有被称为“政妓”（Cortigiana）的高级妓女。“Cortigiana”原意指宫廷的女人，可见，仅是肉体之美是远远不够的。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还要能吟诗作赋，才配得上“政妓”这个称号。换言之，她们的首要工作，是与绅士们做精神层面的交流，而那些只求肉身的男人，则会被视为不懂风雅，没有资格与“政妓”交往的粗人。

美第奇家族中深具学识教养的“豪华者洛伦佐”曾经对能够熟练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赞不绝口。除了她之外，韦罗妮卡·弗兰卡（Veronica Franca）、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等女诗人，都是这门风雅行业中的翘楚。

在已婚的妇女和政妓都能堂而皇之出入公共场所的威尼斯，唯有未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而且阶层越高，越受拘束。反倒是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行动都相对自由。

贵族家的女儿，甚至不能轻易地出门。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去教堂。不过这种时候，也必须有仆人陪同，还得戴上不知能否看见外面的厚重的白色面纱遮住面孔，直到在教堂的祭坛前跪下，方能掀开面纱的一角。年轻男子见到姑娘，萌生爱意的机会，要么是在教堂惊鸿一瞥，要么是偶然望见躲在姑娘家窗帘后面的倩影。

尽管极少相遇，年轻男女还是会产生恋情。或许正因为是这种状态，才更加浓情蜜意。然而，要成全一段感情，却相当不易。因为婚姻

被视为两个家族间的事情，通常都是经第三方介绍，或者是由双方的父亲决定。如果双方的家长能爽快答应，当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姑娘家因子女众多，家长无法为女儿准备充足的嫁妆，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只要男方能够说服双亲，准许他迎娶与自己阶级不同、嫁妆不足的姑娘。麻烦的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亲事。遇到这种情形，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年轻男子都会采取非常的手段。在威尼斯，非常的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街上，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心爱的姑娘的面纱，拥抱、亲吻她。第二种办法是在教堂中抢走她的手帕。

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丢了手帕的苔丝狄蒙娜遭到奥赛罗愤怒的谴责。如果有人认为奥赛罗不应该为一条手帕大动干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威尼斯贵族妇女的手帕，是用精美蕾丝编制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有些甚至会在角落绣上姓名的缩写。洒着香水的手帕，宛如贴身之物，如果丢失，落到其他男人的手上，等于是对此君情有所钟，事情非同小可。

话说回来，采取非常手段，毕竟是违法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1489年，曾经发生过一位坠入爱河的男子在他友人的协助下，在教堂抢走了心仪姑娘手帕的事件。尽管这6位年轻人都是名门、豪绅之子，结果还是没有躲过两个月的牢狱之灾。类似事件在1530年也曾发生，肇事的两位年轻人最终被处以流放国外4年的刑罚。抢手帕容易，之后的麻烦却不小。

不管间中经历怎样的波折，能够结婚的女子总是幸运的。当时结不了婚的姑娘的归宿只有一条，进修道院。有不少姑娘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加入修道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可是，因家里节省嫁妆而被牺牲掉的女孩也为数不少。她们哭哭啼啼的，连同微薄的捐款一起，被送进修道院。当时在威尼斯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传出令人蹙眉的修道院内

部风纪紊乱的丑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群被强迫做了修女的姑娘们的反抗行为。

上文提及的托斯卡纳大公夫人比安卡·卡佩洛，因为与继母的关系不和，家里打算把她送进修道院。当她察觉此事后，在恋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遇见了对她迷恋不已的大公，成为大公的情人，最终修成正果，在大公妻子死后，当上了第二任大公夫人。比安卡有着不凡的美貌和刚硬的性格，因此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姑娘，在刚被送进修道院时，也曾尝试抗拒，但终究无法逃离修道院的深墙高院，在此终了一生。

贵族阶层的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女子结婚，无论她父亲是穆拉诺玻璃厂的工匠，还是国有造船厂的职工，因为贵族的血统取决于父系。但凡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男孩，哪怕其母是平民，只要他本人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0岁时便能无条件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加入威尼斯贵族的行列。在历代共和国元首中，就有好几位娶平民之女为妻的例子。

贵族家的女儿，也没有规定非得嫁给贵族。不过让女儿下嫁，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选择余地因此变得更小。

以文化灿烂的15、16世纪为分水岭，随着已婚女性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修道院内的丑闻也呈正比例地增加。在那个教皇都有私生子的时代，教皇、枢机主教们的侄子、侄女们都在罗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1551年曝光的丑闻，却让连称不上虔诚信徒的威尼斯人也为之震惊不已。

在朱代卡岛的众多修道院中，有一处聚集了大约400名修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势力雄厚的修道院。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有一位神父几乎每天都出入此地，他是来聆听修女们忏悔的。由于告诫从来都是神父的职责，所以，谁也不会对进出修道院的神父说三道四。痛恨修道院丑闻的威尼斯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年轻英俊的神父担任此职，而负责朱代卡岛修道院的神父既不年轻，也不是美男子，因此，风纪委员会并没有特别留意。

渐渐地，神父成功地俘获了前来忏悔的修女们的心灵和身体。在全体女性的集体中，最初只要搞定几个听话的，之后便易如反掌。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包括修道院长在内，这些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处子们，全都变身为任凭男人玩弄的世俗女子。

以往修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刺绣和编织蕾丝，如今成了她们乐此不倦的工作。卖掉这些东西赚来的钱，可以购买美酒佳肴，取悦男人。昂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出现在每晚的餐桌上，山雉肉、生蚝、明虾等山珍海味摆满了餐盘。

修女们像奴隶般地侍奉着神父。准确地说，她们比奴隶还低下。因为奴隶只会做被命令的事情，而她们却争先恐后地主动地奉献自己。如果神父命令某位修女裸露身体，她会非常自豪地脱去黑色长袍，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修女们，不用命令，便纷纷地宽衣解带。倘若令她们一丝不挂地跳舞，每个人都会像喝醉了一般狂舞起来。反抗的修女则在神父命令之下，被剥光衣服捆绑住身体，用苦行用的粗重的草绳狠狠地抽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那位神父，修道院中又出现了其他几个男人。这些人都是经神父介绍而来。院内的淫乱变本加厉。怀孕的修女，按照神父的指示堕胎，将死婴埋在庭院的深处。不堪忍受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此事。修道院对外界的来访采取了非常小心的态度，即便是经常来探望的修女们的近亲，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神父和修女们度

过了19年的快乐时光。

此事最终是怎样被警察发现的，法院的审判记录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有人密告，也许是出入修道院的哪个男人泄露了口风。总之，事情暴露之后，震惊朝野，政府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的内阁会议。

神父立即遭到逮捕，修道院长以及几位年长的修女也被关进监狱，受到严格的审讯。神父被处于绞刑并焚尸。在圣马可小广场的两根圆柱间接受行刑的神父，一直到死都不停地大叫着说修道院院长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还是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其他的修女们则离开威尼斯，分别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终老。从此之后，威尼斯警察自然是对修道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修道院内的丑闻虽然有所收敛，却没有被杜绝。

与女孩相比，男孩从小就有很多机会与外界接触。他们在5岁之前，由母亲照顾，这个时期的孩子，不分性别都是以玩耍为主。过了5岁之后，则会由父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进行初级的教育，这个时候的男孩和女孩依然是同样的待遇。7岁时，男孩子开始上学，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从13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的学校已经用阿拉伯数字教授算术。这些子弟们将来都会从事海外贸易，因此除了文法，算术当然也属于必修科目。

孩子们在14岁前上的这种类似于现在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学校都是私立的，这些由贵族或大商人资助建成的私塾，任何人都可以入学，至于要付多少学费，因没有史料无法得知。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不是纸制的，而是铺上蜡的木板，因为纸张实在是太昂贵了。如今我们从美术书上看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画都是经过放大的，其实真正的原作都是精密地画在一张小小的纸上，缝隙中密密麻麻地写着细小的文字，可见纸张在当时是多么精贵。

孩子们到14岁为止的教育，用现代语言说，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目除了文法、算术之外，还包括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教育程度相当高。由于没有阶级之差，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同处一堂，校园内的热闹景象非同一般。当时的人曾经有过以下的记录：

“老师刚离开，教室里顿时骚动了起来。班上的优等生此刻成了攻击的对象，饱受拳打脚踢。他们在书桌间追逐不停，也有人躲在一旁吃着栗子。蜡板成了游戏画板，先前写在板上的维吉尔（Vergilius）、西塞罗（Cicero）的文章消失无影。有人用纸片折成小船；有人抓了苍蝇把它关进小箱子里。有人跑到在外面抓了只鸡，让它在教室里不停地啼叫。偷偷带来学校的铅弹珠，这时候也正大光明地在教室中丢来丢去。有人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红涂在脸上，有人扭打在一起，咬着对方的脚不肯松口。

“老师在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老实。有人每隔一小时，便要去一趟厕所，考验着老师的耐性；有人在老师坐的椅子中间黏上无花果的叶子；有人算准老师来教室的时间，躲在门后面，拿棒子敲打推门而入的老师。老师要求朗读阿里奥斯托（Ariost）的作品，有人却存心背诵奥维德（Ovidius）的诗歌。

“下课后走出教室的学生们，仿佛是一群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像码头卸货工人般地大声争吵，狂野的模样令人难以想象。要等彻底疯过之后，才会返家……”

到了14岁，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开始发生不同的改变，主要由父亲的职业所决定。也就是说，14岁之后他们接受的是实地训练。如果少年的父亲是大使或领事，他会伴随父亲前往赴任之地；如果父亲是商人，他

就会像马可·波罗一样，跟着父亲踏上商业之旅。如果是造船工或玻璃工的儿子，则会在父亲的工房当助手。随便提一句，造船和制作玻璃，是在威尼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两种职业。

就算是那些没有特别机遇的贵族子弟，也可以利用国家制度，担任海外商船的石弓手，实地学习航海以及商业技能。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商船从船长到划桨手，每个人都有权利携带与地位级别相应的货品上船，等货品在目的地被销售后，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习商业技巧。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年轻人而言，去海外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通过实地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交、航海以及经商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对世间动态冷静的观察以及分析综合的能力。

威尼斯的大学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参加实地训练。他们进入专门学校和大学继续深造。所谓的专门学校，是威尼斯共和国以培养官僚为目的而建的国立学校。在第五章中曾经提及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大权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行政事务则由被称为“Cittadino”的非贵族市民担任。除了最高阶的秘书长之外，各个部委都会有秘书官、书记官等各种事务官员。这些官僚，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国家公务员。

掌管政治的贵族，除非担任特别任务，否则通常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行政官员不仅有薪资保障，而且是终身雇用，他们是共和国中拥有最稳定职业的一群人。行政官职多为世袭，而且必须在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

政府用高薪从国外聘请教授教学，每天学习的时间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有时候还会临时增加特别的课程，学业相当繁重。学生的学费全免，但必须完全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拉丁语在当时是世界共通的国际语言，共和国国会、元老院以及各部委的正式记录均以拉丁文写成。会议内容首先用威尼斯方言的意大利语速记，随即便翻译成拉丁语留档保存。因此，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拉丁语能力，根本无法担任书记官。除此之外，发给外国的公文也是用拉丁语书写。

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还必须有一些懂得希腊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人才，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都是与威尼斯有商贸关系的。这些人不仅要会说流利的外语，而且还必须熟悉那个国家的情况。在某个外国人的记叙中曾经提及，威尼斯派到国外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平民同行，指的就是有这类相关知识故担任辅佐官的人。

16世纪中期，有一位将人们的旅行记录汇集成书的人物，名叫赖麦锡（Ramusio），属于官僚阶级。负责出版此书的，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马努提乌是威尼斯著名的出版商，名声享誉欧洲。与他合作的大多数写手，都是官僚出身，可见，当时行政官僚的平均知识水平高于贵族。

在一个任何人都可能培养出对学问的热情，而且也有机会学有所用的社会，进大学深造的目的就变得非常之明确。中世纪的大学，是学习法学、神学和医学的地方，因此只有立志成为律师、神职者和医生的人才会去那里读书。虽然从事这3种职业并不一定要具备大学毕业的资格，但实际上拥有学历还是非常有利。

直到15世纪初为止，威尼斯都没有大学。想进大学的年轻人，就得去意大利本土帕多瓦留学。从14世纪到15世纪，继本土的维罗纳、特雷

维索成为威尼斯的领地之后，帕多瓦也归属于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决定，将帕多瓦大学——这所与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齐名的学校打造成威尼斯的最高学府。

大学崇尚学术自由，不受任何来自宗教或世俗的权力机构的影响。从全国招聘而来的优秀教授中，包括遭受宗教界打压的伽利略·伽利雷。而像他这般有争议的人物，在大学教师中并非特例。

有优秀的教师，就会聚集优秀的学生。除了威尼斯之外，还有很多从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波兰等外国来的留学生。

那么威尼斯政府的要职，是否都被这些“大学毕业生”占满了呢？倒也不尽然。1343年当选为元首的安德烈·丹多洛，作为威尼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元首，的确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在他之后的元首中，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元首的情况如此，贵族的升学状况想来也相差不远。或许这正体现了威尼斯人重视实地教育的理念。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双璧，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但凡造访过这两座城市的人，大多都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佛罗伦萨建于阿诺河畔，而威尼斯是建于海上，两座城市在其他方面的迥异风格都会让很多人颇感不可思议。即使是不懂建筑史或美术史的人，也能轻易地看出其中的差异。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个都市出于同样目的而建的建筑物，便能立刻

看出威尼斯与佛罗伦萨风格的不同。威尼斯的元首官邸与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兴建的共和国的市政厅。威尼斯的元首官邸内设有元首的住所、各部委厅、国会议事堂、法院，甚至还有监狱。而在佛罗伦萨，除了法院和监设在附近的巴杰罗宫（Bargello），可以说共和国几乎所有的中枢都在韦奇奥宫内。

威尼斯元首官邸

佛罗伦萨韦奇奥宫（旧宫）

那么，两者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呢？佛罗伦萨的市政厅，简直就像一

座堡垒要塞。它一楼的窗口的位置造得很高，而且很小，装有铁栅栏，给人一种拒之千里的感觉。顶层建着很有堡垒特色的守护围墙，如果用中世纪的战术，从护墙的洞口往下倒热油或射箭，没有人能够靠近楼房。从防卫的角度来看，这种建造方式可谓是万无一失。

我并不是说韦奇奥宫不美，尽管有戒备森严之感，它仍然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在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唯有教堂能够讲究美观的造型。所以，除了市政厅之外，包括美第奇家族在内的那些分布在旧城各处的豪门大宅，虽然非常气派，但在建造时都添加了堡垒的功能。佛罗伦萨人在防御外敌之前，首先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内敌的侵害。

另一方的威尼斯市政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相对于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外墙不加任何修饰的原石，威尼斯元首官邸的外墙上，则贴着玫瑰色和白色的大理石。

除了外观，两者内部的设计也迥然不同。

威尼斯元首官邸的一楼是长长的回廊。如今这里聚集了卖明信片等各种旅游产品的小店，原来是帮人代笔的地方。墙边还设置了石头长椅供市民休闲之用。不过也有一些人曲解了政府的好意，竟然在此聚众赌博，曾一度让官员们伤透了脑筋。

官邸的二楼也看不到一整排紧闭的窗户，同样是通透的回廊。葱球花般造型的威尼斯哥特式拱门，接连不断，宛如精美的蕾丝花边。

官邸的最高之处没有护围墙，只有一种被称为梅里特（蕾丝）的装饰。这种装饰似乎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由于梅里特纯粹出于美观，因此从这里往下倒热油，只会洒在二楼或一楼的拱门上，完全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威尼斯的市政厅并不是为了防御而建。其松散的结构，大概连小偷

都能轻易地入内。而这正恰恰呈现了威尼斯人无须防范内敌的幸运。

威尼斯作为政治权力中枢的元首官邸都如此开放，统治阶级的居所，更不用造得铜墙铁壁，肯定是以美观和舒适优先。大运河两岸林立的豪宅，便是最好的证明。从最古老的月牙形拱门，到葱球花造型的窗口，还有模仿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虽然房屋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少有所变化，但每一座建筑所呈现的开放感和优雅的造型却始终不变。如果有人质疑说房屋临河而建，所以才安全，那么不妨观察一下面向小巷的地方，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一处类似于堡垒般的建筑。

两地大宅的内部设计装潢，同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天花板高高垂下的烛台，佛罗伦萨是用黑铁制的，威尼斯则采用本地特产的玻璃。由几种淡颜色的玻璃拼制的烛台呈花束状，烛火透过玻璃，散发出彩色的光亮。

佛罗伦萨人家的地板，是在石砖里渗入油脂，而威尼斯人却是铺上色彩缤纷的东方大理石，漂亮到令人不忍盖上地毯。威尼斯的房屋多窗，阳光充足，显得明亮有朝气。墙上到处挂着威尼斯特产的镜子，想来是为了让房间看上去更加宽敞明亮。

威尼斯人对庭院的讲究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人。在佛罗伦萨，人们只要走几步到城外，便能享受大片的绿意。他们的庭院虽然有美丽的长廊围绕，可是院中只是随便铺几块不起眼的石板。周遭不缺草木，才会有这种漫不经心的奢侈。

相反，水上人家的威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布置自家的庭院，再小的地方，也会植草养花，再摆些小石雕用以点缀。这样，家中的每一间房子都能望见葱葱的绿色。如果从上空鸟瞰佛罗伦萨的旧城，会发现它少有绿荫，反倒是海上之城的威尼斯，绿色点点，让人不由得对他们的努力敬佩不已。

当今的威尼斯，依然是一座雅致的城市。在400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这种其他都市少有的优雅、宁静的气氛，势必让到此的外国人倍感珍贵，他们把威尼斯称作“魅力之岛”。从东方来的旅人，会从威尼斯的街景中看见自己国家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些东方元素与欧洲文化的水乳交融，让这座城市又带有别样的异国风情。

话说回来，最能感受到威尼斯异国情调的，恐怕还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人们。街头巷尾，绑着各色头巾的阿拉伯、土耳其的商人们，仿佛在自己的国土一般，从容且专注地谈着生意。如果身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耳边会充满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奇妙的外国语言。运河上划着贡多拉的黑奴，布料店、珠宝店堆着的绚丽多彩的东方商品，还有那一排排细长的圆柱撑起的轻巧、秀气的住家窗口等，都让外来的西欧人啧啧称奇。当然，还有那些赏心悦目、甜美性感的威尼斯女人。

提供服务的骑士

威尼斯女性甜美性感的形象，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要感谢她们自己发明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18世纪时，因喜剧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作品而闻名欧洲，但在此之前已经在威尼斯出现，只不过那时尚未成风而已。这个制度叫“Cavaliere Servente”，直译就是“提供服务的骑士”。

但凡女人，都希望有一个能干的丈夫。然而，能干的男人，大多没有时间。这似乎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实。因此，那些与能干的男人结婚的妻子们，常常是还来不及细细享受幸福的时光，就不得不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有不少女人就此认命，乖乖待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

务。她们也许是值得称赞的贤妻良母，可是过度温顺的表现往往会令丈夫感到无趣。有才华的男人娶乏味女子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丈夫去哪儿妻子都形影相随，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为了解丈夫工作的女人，大多会以此为傲。要让她们放弃炫耀的机会保持沉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威尼斯贵族的工作是政治与经商，无论哪一项，都必须以保守秘密为前提。如果有个多嘴的妻子同行，难保不会影响丈夫的信誉。

可是，妻子独守空房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向来对人性有着深刻、敏锐洞察力的威尼斯男人们，不会相信女性在不接触异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十足的女人味，因此大大方方地认可了“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如果没有丈夫们的认可，这种风俗根本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持续那么长久。

根据威尼斯的记录，“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工作如下。不过，这是18世纪制度已成熟定型后的记录。

“早上，估算着夫人们起床的时间，前往她的房间问候。一面与夫人商量着她今天所穿的衣服和佩戴的珠宝，一面等着她打扮收拾妥当。如果夫人要去教堂做弥撒，骑士便陪她前往，一路上小心地呵护。夫人想去购物，骑士也会一同前往，从男人的角度给出建议，让她尽快地拿定主意。（骑士们）也常常陪夫人们用餐，在沙龙的聚会上表现得从善如流。陪夫人们打牌、下棋，一起去舞会、剧场，直到夜里夫人回房就寝，才告辞离去。

“总之，提供服务的骑士们，必须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最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夫人，替她们的丈夫尽责尽力。当夫人因家中琐事而心烦不已时，耐心地聆听她的倾诉，为她打气，时而给出诚恳的意见，时而谈些轻松的话题，让她尽量忘记烦忧。这不是一份轻松、简单的工作。”

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制度啊。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一个十分忙碌的丈夫的妻子，想解忧消闷，要么是去教堂向神父忏悔，照他的指示祈祷10次，要么就是和其他女人一起家长里短，除此之外，别无途径。即便是那些有社交机会的女性，想连日里受到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女王也办不到。可是，在威尼斯，数以千计的女性享受着这等待遇。

对她们的丈夫而言，这一定也是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不但可以安心地将妻子留在家中，而且不必向这些骑士们支付报酬。对于这些担任骑士角色的年轻贵族而言，这份工作也不是一份纯粹的无薪服务。每天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势必会让这些年轻人早早地打消对异性所抱有的无谓的憧憬。

的确，很多情况下，骑士与情人的界限难以划清，因此产生的爱情悲喜剧，势必接连不断。不过，只有那些不懂女人心的人们才会对此忧心忡忡。对女人而言，有没有肉体关系都不算什么大事。要保持美丽和活力，靠的不是偶尔的肉体接触，而是来自男性不间断的赞美之词和细心的呵护。

中世纪的法国骑士精神，最为著名的就是无私地向上帝和贵妇奉献。然而，遥远的爱意，又能够对女人起到多少实质的帮助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骑士精神，不仅让女人幸福，连其丈夫也一并受惠，同时又让年轻男人接受了人生教育。作为女人，我对世间只谈法国骑士精神，不提威尼斯骑士，深感不平。

话说这么有趣的制度，竟然成为喜剧嘲讽的主题，甚至将之视为男女伦理的堕落而饱受非难。喜剧往往放大了现实。的确，在18世纪，男人也流行戴假发，化妆，往脸上点痣，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提供服务的骑士”都像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如果把一种流行看作整体的话，那么若干年前的我们人人都得成为嬉皮士。18世纪时的威尼斯

男人虽大多戴假发，但不化妆，更不点痣。

观看佛罗伦萨派画家的作品，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远近法、解剖学等理论知识。而威尼斯派的画作，却让人忘却一切深奥的问题，单纯地享受赏画的乐趣。威尼斯的女人，犹如她们国家的绘画，浑身上下皆是活色生香。

我想，以后大概不会再论及威尼斯的女性。因为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中，她们从未改变。在城邦国家走向终结的时代，当威尼斯的男人们面对法国、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等大国的纷纷崛起，为保卫共和国而誓死奋斗之际，女人们仿佛置身事外般地，依然保持着她们一贯的美艳和妩媚。对于威尼斯男人而言，相比那些关心政治、经济的聪明女子，这样的女人或许才是理想的伴侣。

---

[1]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几位女性的事迹，详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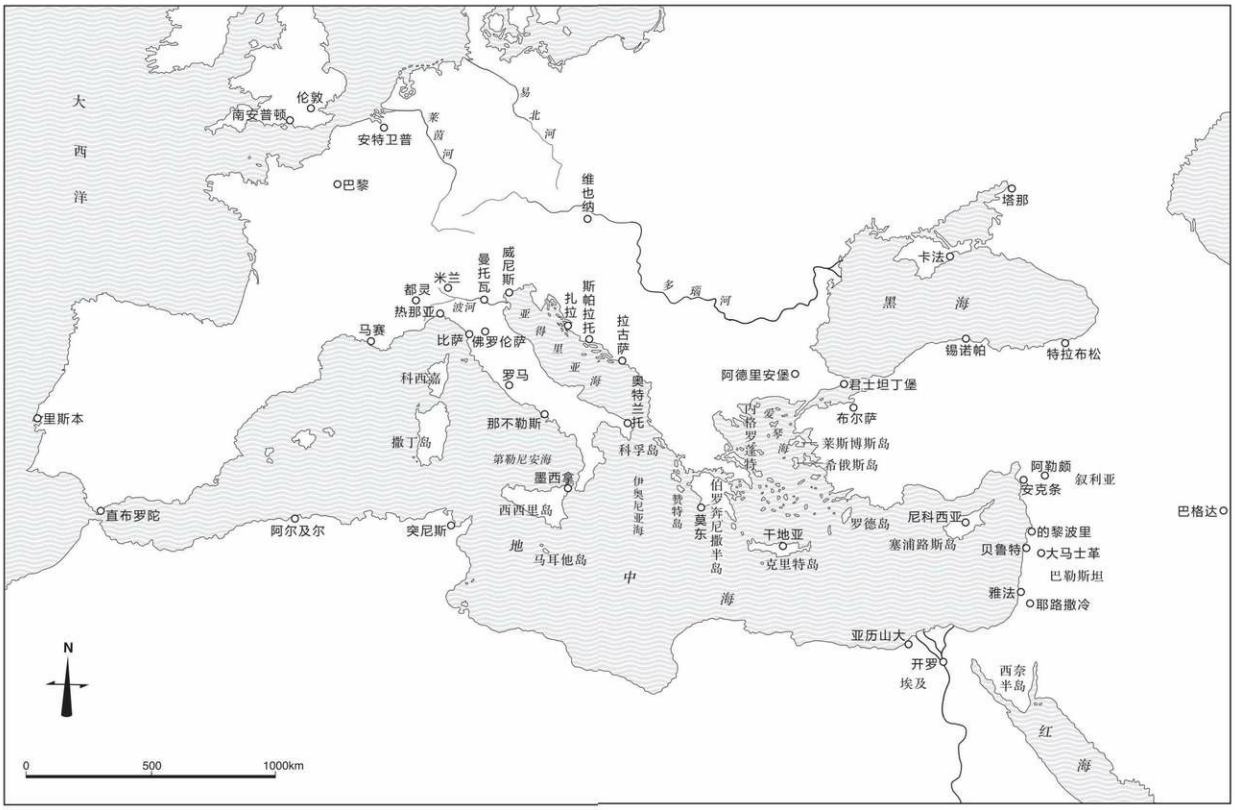
罗辑思维

海都物语
威尼斯一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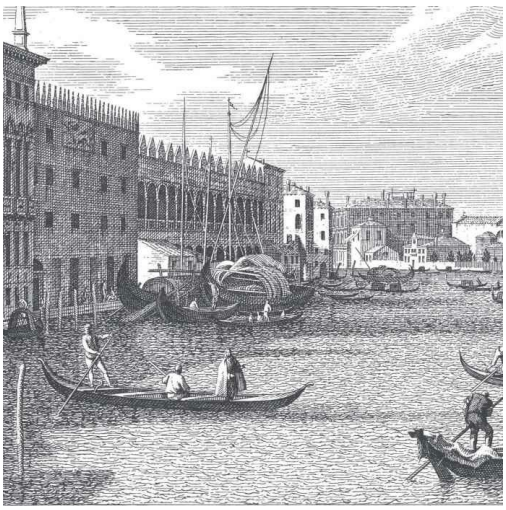
下册

【日】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大西洋
伦敦
南安普顿
安特卫普
莱茵河
易北河
巴黎
维也纳
塔那
卡法
黑海
多瑙河
威尼斯
曼托瓦
米兰
都灵
热那亚
波河
马赛
比萨
佛罗伦萨
亚得里亚海
扎拉
斯帕拉托
拉古萨
奥特兰托
锡诺帕
特拉布松
阿德里安堡
君士坦丁堡
布尔萨
里斯本
科西嘉
罗马
那不勒斯
撒丁岛
第勒尼安海
墨西拿
科孚岛
爱琴海
莱斯博斯岛
希俄斯岛
阿勒颇
叙利亚
安克条
直布罗陀
阿尔及尔
突尼斯
西西里岛
伊奥尼亚海
赛特岛
伯罗奔尼撒半岛
莫东
于地亚
克里特岛
罗德岛
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岛
的黎波里
贝鲁特
大马士革
巴勒斯坦
巴格达
地中海
马耳他岛
雅法
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
开罗
埃及
西奈半岛
红海
N
0
500
1000km

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那是1978年，我初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即曾经的君士坦丁堡。我对土耳其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大巴扎（Grand Bazaa），而是海军博物馆。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海洋国家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方面究竟保存了怎样的历史资料。

不料，马不停蹄地奔到那里，竟然大门紧锁。询问过站岗的水兵才知道博物馆早已关闭，而且没有再开放时间的预告。我千里迢迢来到伊斯坦布尔，不进去看看栅栏后面的那栋白色房子，岂能转身离去。想当年，土耳其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东地中海霸权，虽然未能实现征服整个地中海的宏伟大愿，但毕竟与威尼斯——西班牙联军轰轰烈烈地打了一场勒班陀海战。那间白色的大房子里，一定存放着相关的史料。于是，我撒了一个谎，说自己是专程从日本来的研究土耳其历史的学者，请他们无论如何通融一下。一周后，我获得了参观的许可。

按对方指定的时间，我来到博物馆隔壁的海军办公楼，身上除了带着照相机，还有素描本，以备馆内禁止摄影。不一会儿的工夫，走过来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官，说是奉命为我带路。我跟着军官往博物馆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他向持枪站岗的卫兵很正规地敬了一个礼。军人们训练有素的仪态，让我愈发地相信会与珍贵的史料相遇。

没想到，视线仅仅转动了180度，我的调研便结束了。博物馆之所以建得那么大，原来是为了摆放苏丹出游时乘坐的几艘御船。馆内既没有以前的加莱船模型，也没有航海器具和航海图，海军基地的要塞简图等就更不用提了。寒碜的展品，与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简直是云泥之别。难怪这里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人投诉抱怨。

无论如何，礼貌还是要顾及。我尽量专注地去聆听军官的讲解，煞有介事地参观了苏丹母后专用的四周装有百叶窗的船舱等展示。全程大概没超过15分钟，其间，没按过一次相机快门，笔记本上没写一个字。

走出博物馆，我独自一人，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为笔下的主人公，威尼斯的男人们感到悲哀。

土耳其终究是一个陆军国家。距离海军博物馆不远的陆军博物馆的陈列品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兴盛史的图解，到代表其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的景象；一排排穿着形形色色军服的人偶，各种缴获的武器和旗帜……无不自豪地显示着昔日的荣光。馆内一遍遍地播放着曾经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的军歌，展出内容相当丰富。与之相反，威尼斯的海军博物馆的馆藏十分齐全，却从来没有建过陆军博物馆，只是在元首官邸的一个角落展放了一些武器而已。

海军国家的威尼斯，与陆军国家的土耳其为敌。面对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同的民族，应该是让威尼斯的男人们苦不堪言。贸易立国的威尼斯，需要其他国家的存在。然而，这个依赖他国生存的国家，在15世纪

下半叶，遇上了能够自给自足，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土耳其。

“所谓的良知，是被动一方的说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通常是不以良知而行动的。”

——摘自当年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

土耳其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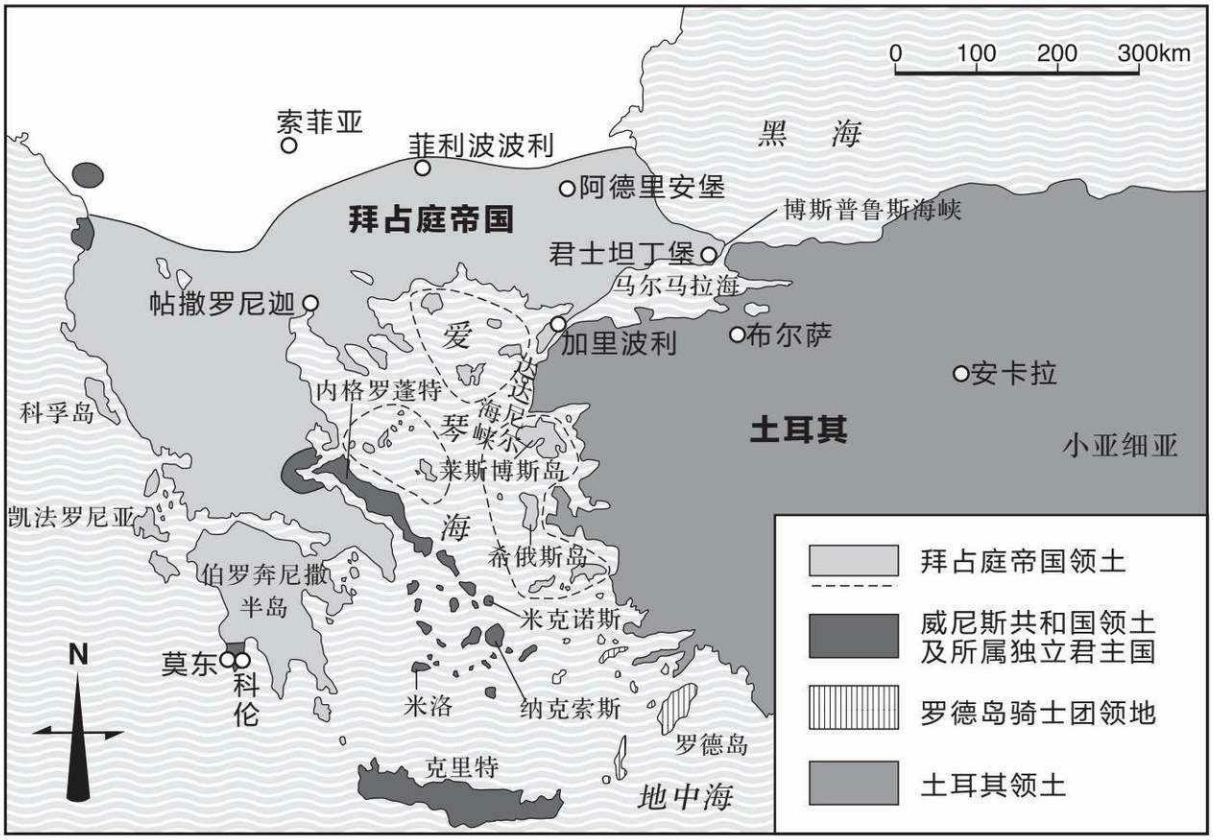
1300年前后，奥斯曼王国在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一点点地成长起来。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东临蒙古帝国，西临拜占庭帝国，处于夹缝中的小王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28年后，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西端位于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布尔萨（Bursa）。他们之所以向西扩张，是因为东面的蒙古帝国势力强大，而西面的拜占庭帝国则国势衰弱，当然是先从弱者下手。

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布尔萨，成了土耳其人第一个正式的首都。虽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但那个时期的土耳其人，还无法对西欧海洋强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构成直接的威胁。对于制海权至上的海洋国家而言，土耳其人的版图再怎么扩大，只要它不具备占据海岸线的力量，就不算是真正的对手。

可是，26年之后的1354年，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Gallipoli）。加里波利可不在亚洲的境内，虽然处于边陲，却是不折不扣的欧洲领土，而且还是连接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海港城市。警报声传到了威尼斯。那一年，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向元首和元老院送去了以下报告：

“拜占庭帝国，面对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威胁束手无策。除了土耳其之外，无论是威尼斯、塞尔维亚，还是匈牙利，只要是基督教国家，拜占庭似乎都愿意对其俯首称臣。”



1340年的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Impero Bizantino”）

这是威尼斯方面有关土耳其的最早史料。在知道君士坦丁堡会在百年后陷落的我们后人看来，这是一份预示了当时历史趋势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历史上无视先贤良言的现象屡屡发生。那么，接到这份报告的威尼斯政府，是否重蹈覆辙，对马特奥·韦尼耶（MatteoVenier）大使拉响的警报，也是充耳不闻呢？的确，威尼斯政府没有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土耳其的崛起。

事实上，威尼斯政府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来自驻外使馆的报告。有证据表明，他们立即向君士坦丁堡下达了指令，要求使馆人员今后密切注

意土耳其的动向。威尼斯政府没有马上行动，而是静观其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拜占庭帝国内部的问题。尽管帝国百废不举，但拜占庭人极其厌恶常逼迫他们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西欧人。如果让他们放弃东正教屈居于罗马教廷之下，他们宁愿不要西欧的支援。所谓的只要是基督教国家都愿意臣服，不过是帝国内一部分人的想法。即使在受到外敌直接威胁时，大多数拜占庭人依然不减对天主教的敌意。从120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拉丁帝国开始，一直在其背后帮助其支撑了60年的威尼斯，对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第二点原因是经济。10年前，教皇解除了长久以来不许与穆斯林交易的禁令。威尼斯香料的主要市场因为“解禁”，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来往此地的威尼斯商船，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尽管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但只有极少的驻扎兵力，威尼斯想对付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对方的存在不至于影响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也无心动手。

威尼斯人天生缺乏无限制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他们观念里，扩张领土，是一种浪费精力、不切实际的行为。

可是，土耳其民族却不同。仅仅在5年之后的1359年，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攻占巴尔干地区。这一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的军队从亚洲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带登陆欧洲，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城下，却一筹莫展。3年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沦陷。翌年，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整个色雷斯地区成了土耳其的领土。

1365年，土耳其王朝将首都从布尔萨迁往菲利波波利，向世人显示，他们的根据地不再放在亚洲，而是要立足于欧洲。

没过多久，与色雷斯邻接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甚至拜占庭帝国纷纷动摇。保加利亚与名义上是拜占庭属国的马其顿变成了土耳其的附属国，同意向其缴纳年贡和履行军事义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被迫答应每年向苏丹皇宫进奉年贡，并且在苏丹远征时，由拜占庭皇帝本人或者是皇族的成员率兵随行。

话说回来，贵为荣耀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沦为土耳其实质上的附属国。于是，皇帝亲自前往匈牙利，请匈牙利国王提供军事支援。可是匈牙利国王以自己是天主教徒，必须忠于罗马教廷为由，拒绝出兵。无奈之下，皇帝转道前往罗马。

两年前刚结束“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的状态，班师回朝罗马的教皇，此时根本没有能力召集西欧十字军东征，但他的态度却十分傲慢，坚持要拜占庭帝国先皈依天主教，再谈派兵。绝望的皇帝只好在罗马接受了洗礼。

然而，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立刻发现要放弃东正教，只能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朝廷、东正教会到民众都一致表示，如果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冕低头，他们宁愿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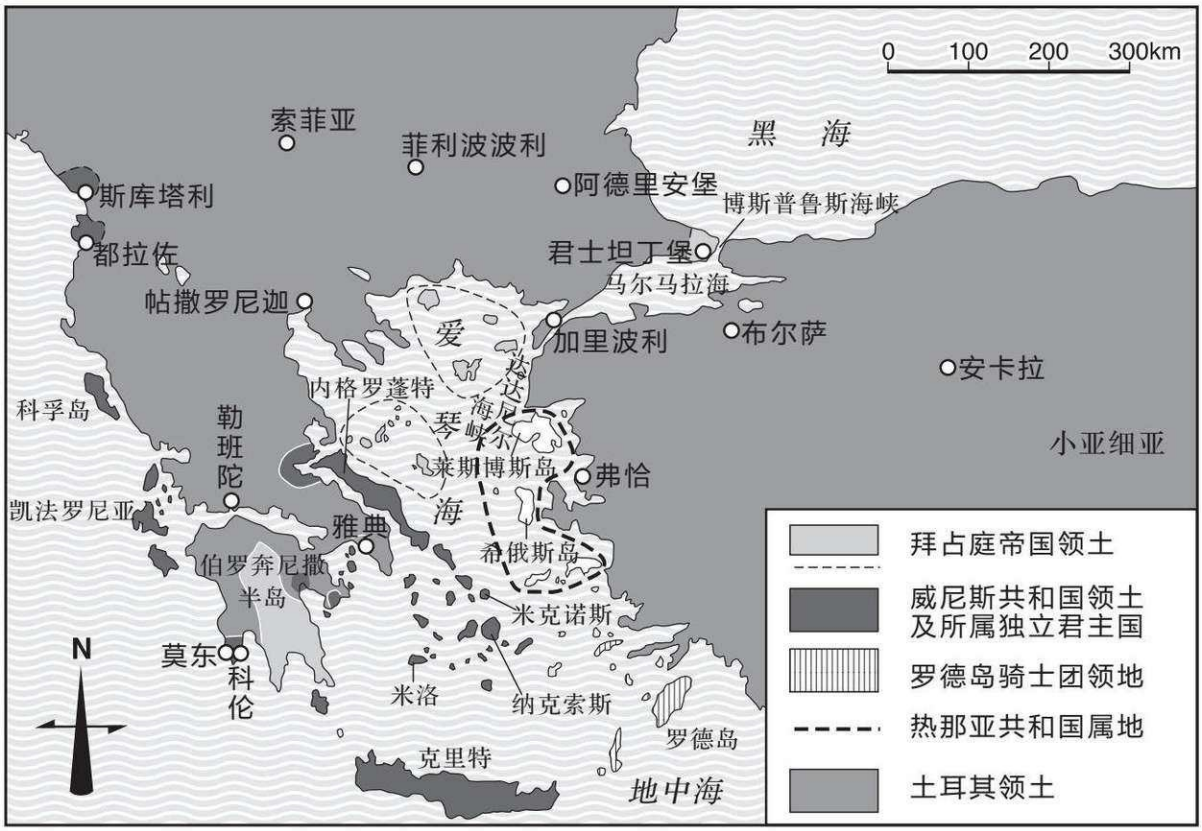
翌年，即1370年，亲威尼斯派的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发出了援军的请求，却遭到了皇太子及其派系的反对，他们力推热那亚。由于拜占庭朝廷内部的矛盾，接到请求的威尼斯一方，还来不及商议对策，援军一事便没了下文。

其实，就算拜占庭朝廷内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向威尼斯求援，那个时期的威尼斯也没有这个余力。

虽然土耳其大军不断在陆地上推进，可是对海洋国家的威尼斯而言，控制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才是关键，因此热那亚才是他们眼下最大的敌人。正如第六章“对手热那亚”所述，经过1380年那场戏剧性的逆转，地中海两个海洋国家的长年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威尼斯打赢了战争，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根本无力再与土耳其打仗。

而那个时期的土耳其军队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仿佛不知“失败”二字。

1385年，保加利亚的索菲亚（Sofia）沦陷。



1402年的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Impero Bizantino”）

1387年，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今塞萨洛尼基）沦陷。

拜占庭帝国不断趋向土耳其属国化。皇族之间为新皇帝人选争执不休时，竟然是由土耳其的苏丹出面，一语定乾坤。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被皇帝奉为上宾，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要求拆除君士坦丁城墙，而且实际破坏了部分城墙的，正是这位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jezid I）。

威尼斯也深感形势不妙。政府对即将赴任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做出指示，如果抵达目的地后，见到的君主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而是土耳其苏丹时，该如何应对等。

在所有人的眼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宛如风中残烛。1402年拜占庭

帝国的势力范围，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之外，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统治的公元6世纪，拜占庭拥有北非、中东以及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意大利全境和南西班牙的辽阔疆域。就算不与那段全盛时期相比，单是从1300年到1400年的100年间，就有大片的领土不断流失。虽然这是新兴民族对决古老帝国的结果，多少还是令人唏嘘。

可是，那些相信历史呈阶段性发展的人们，常常会为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现象而困惑不解。1402年，势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一件令绝望的人们欣喜若狂的事情发生了。

由苏丹巴耶济德亲自率领的土耳其大军，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Ankara）迎战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队，结果输得一败涂地。苏丹被俘，其手下军队在蒙古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如云消雾散般消失殆尽。土耳其军向来以残暴著称，蒙古军则更胜一筹。据说蒙古军扫荡过的地方，狗不叫，鸟不鸣，娃不啼，一片死寂。

因苏丹被俘，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土耳其即刻产生了内部分裂。三年后，帖木儿死去，蒙古帝国迅速瓦解，而土耳其的内斗仍然没有结束。

那些屈服于土耳其淫威之下的各国，没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竖起造反之旗。虽然无反攻之力，但再也没有国家履行缴纳年贡和军事任务的约定。

这种“休战”状态，直到土耳其的内斗平息为止，整整持续了20年，风中残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获得了一线生机。人人都相信，土耳其的威胁已不复存在。由于对手热那亚的退败，牢牢掌握着东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开启了所有商船队的航线，专心致力于商业贸易。里亚尔托桥一带交易活跃、人来人往，不愧为东起巴格达西至伦敦的世界经济圈的中

心。除此之外，威尼斯在那个时期开始实施向意大利本土扩张的计划，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本土”

“Terraferma”直译是“不动的土地”，如果意译，似乎只能译成“本土”。它指的是与欧洲大陆相连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以现代人对本土的认知，很难理解当时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它为“Continente”（大陆），反而特地造出一个专门用语“Terraferma”。我想，这是因为对威尼斯人而言，他们的根据地始终是浮于潟湖之上的威尼斯岛，四面的大海就是他们的城墙，而海墙对岸的Terraferma，只有属地的意义。

就在不久之前，仍然有历史学家针对威尼斯在15世纪初实施的本土扩张政策提出过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海运国为寻求安定的陆地生活而做出的改变。如果威尼斯人当初不是把精力投入“本土”，而是专心致志于海上，应该能抵挡住土耳其的攻势。

这种妄加评断是后世在看待历史时常犯的错误。对于威尼斯的转型之说，卢扎托（Luzzatto）教授已经从经济面给出了充分的反证。而与土耳其的冲突，也不是威尼斯全力以赴地发展海上事业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之后的篇章里做详细的解析。威尼斯共和国在15世纪时，之所以推行“本土”扩张政策，有两个切实的理由。

我反复强调，威尼斯可以自给自足的资源只有鱼和海盐。除此之外的所有物品倘若不向外采购，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当然会希望在自己的国内找到像面粉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供应源，而不是去依赖远方的希腊或南意大利。再加上当时因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为确保粮食的供应而时刻绷紧神经的威尼斯政府如果

发现附近有货源地，肯定会积极争取。这种急迫感，最终还是来自经济上的需求。

威尼斯是依靠中介贸易而存在的，西欧与东方通过它彼此相连。保证来往于东方商业基地与威尼斯之间的航线安全，即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一向被威尼斯人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连接威尼斯与西欧之间的陆地交通要道的安全性，也非常重要。政府必须保证往来于西欧各地的威尼斯的商人们没有安全上的忧患，防止道路因某国君主的一句话就被封锁，导致威尼斯与西欧间的物流中断。

换言之，决定威尼斯商业兴衰的关键，不仅是东方航线安全与否，而且与通往西欧的陆地安全息息相关。

可是，当时的意大利北部，主张领土扩张的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与反对扩张的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Scaliger）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战争不断。1380年的基奥贾战役，让威尼斯深深地领教了强敌在侧的危险。他们一直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打破这种危险的状态。真正的好时机出现在1402年，那一年也是土耳其在东方大败给蒙古人的一年。

1402年，米兰公爵维斯孔蒂猝死。他生前一直主张领土扩张，野心勃勃地企图控制整个意大利北部乃至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中部。族主之死照例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动乱，这为威尼斯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威尼斯的本土扩张政策，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虽然威尼斯按惯例，以雇佣兵组成陆军，不过与其说靠军队征服，不如说是北意大利的各个地区，自愿希望成为威尼斯的行省，而威尼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请求更为妥当。以往专制的米兰公爵要求这些地方完全归属自己，但威尼斯共和国则是除了市长和警察总长的人选之外，几乎全部由地方自治。

通过这种方法，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在5年的时间里，从贝加莫（Bergamo）扩张至弗留利（Friuli）。原本15万左右的人口，加上扩张

的土地后，一气增长了10倍左右。享受着海陆两面完全通商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经济实力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这里，介绍一段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和文化哲学家）也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著名的演说。据说这是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说的。这位元首非常精通经济，那些喜欢罗列数字的日本大臣们与他相比，想必会自叹不如。摩契尼哥的谈话中透露了当时威尼斯统治阶级的理念，颇耐人寻味。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原本1000万达克特的国债，减至600万达克特。

出口总额1000万达克特，基本与进口总额持平，由此产生的利润约400万达克特。

国有造币厂每年制造120万达克特金币、80万银币。由于金币的含金量长期稳定，因此，威尼斯的货币是最有信誉的国际货币。

威尼斯市内的房产价值总额超过700万达克特，一年的租金收入达到50万达克特。

公正的法律，名闻遐迩。犯罪外国人甚至愿意在威尼斯受审。

45艘大型加莱船及其1000名船员，始终保持出海的状态，超过300艘的200安弗拉（Amphora，约120吨）级以上的大型帆船，配备了8000名船员。总数高达3000艘40安弗拉至200安弗拉（24吨——120吨）级的小型帆船，雇用了1.7万名船员。

造船工人超过了6000名，包括帆布在内的丝绸、棉布的纺织工人多达1.6万人。

年收入在700达克特——4000达克特的威尼斯市民人数超过了

1000。（除去房租，一年只要15达克特——20达克特，即可在威尼斯维持日常生活。）

元首摩契尼哥继续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威尼斯将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必须避免无谓的战争。

“倘若国家时刻处于战时状态，那么今日有一万达克特的人，明天可能只有1000，拥有两栋房子的人，只剩下一栋。”

如果其他国家都和威尼斯有相同想法的话，老元首摩契尼哥或许就能如愿以偿。然而，无论是15世纪的土耳其、米兰，还是进入16世纪后崛起的西班牙、法国，以及已成为东方大帝国的土耳其，都是属于无须他者也能维持自身运转的陆地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同一时代竞争是威尼斯的灾难。

托马索·摩契尼哥的演说发表于1423年。当时，能够做出如此正确统计的国家，在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洲唯有威尼斯。另一个工商业国家佛罗伦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经济观，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然而，尽管那些大国的经济势力劣于威尼斯，但它们在人口上却拥有威尼斯10倍以上的优势。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

事实上，在极力主张回避战争的摩契尼哥去世前的一年，土耳其终于摆脱了长期内斗的局面，再次进入了攻势。1422年6月，土耳其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虽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凭借固若金汤的城墙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最终苏丹穆拉德只能放弃围城，鸣金收兵，但这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两年之后，拜占庭便屈服于苏丹的威胁，重新接受了中止了20年的缴付年贡和承担军务的条件，再一次走向土耳其的属国化的道路。

6年后的1430年，向来把目标锁定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而对南方采取友好态度的苏丹穆拉德，突然向帖撒罗尼迦发起了进攻。地位犹如马其顿首都的帖撒罗尼迦，43年前一度臣服于土耳其，后因土耳其在1402年败给蒙古人，势力衰退，才重新回到了拜占庭的手中。在君士坦丁堡被围、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帖撒罗尼迦向威尼斯提出了托管的请求，之后它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奉行据点主义的威尼斯，能够拥有帖撒罗尼迦，已经相当满足，所以马其顿全境依然属于希腊人。人口稀少的威尼斯，不可能像古罗马那样，向被其征服的地区输送大量的本国国民加以防守，维持统治。威尼斯能做到的，只是海上的警卫。但土耳其却从陆地上对帖撒罗尼迦发起了攻击。

曾经有过沦陷的经历，而且又将统治权交给他国的地区是非常容易被征服的。少数威尼斯人的勇敢抵抗，终究是白白地浪费了生命。话说回来，尽管只有短短7年的时间，帖撒罗尼迦毕竟是威尼斯的领土。1430年的这场战争，是威尼斯与土耳其在战场上的首次交锋，它让威尼斯深切地体会到战争规模的改变。苏丹一声令下，便可调集相当于威尼斯总人口的大军，这就是威尼斯将要面对的劲敌。

威尼斯政府立即向土耳其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派去了和谈特使。同年，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威尼斯以帖撒罗尼迦换取了在土耳其全境内完全自由通商的权益。同时，苏丹也正式承认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到黑海所有基地的主权。

这项友好通商条约在之后的16年间更新次数多达9次。期间出现了

一批靠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首都之间的贸易一跃成为大富豪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还开设了两家银行。虽然开创近代银行业务的是威尼斯人，但进出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银行的土耳其顾客，也不在少数。

穆罕默德二世

土耳其民族，本质上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不擅长经商，这一点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阿拉伯人不同。因此，以威尼斯人为首的西欧人掌控他们不拿手的生意买卖，至少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无法容忍的事情。而威尼斯人似乎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双方有共存共荣的可能。事实上，在夺取帖撒罗尼迦之后，土耳其虽然远征至巴尔干，却从未派兵侵犯过威尼斯。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现实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往往无法了解对手的非理性行为，因为他们自己是务实、理性的。他们总认为对方不会做出鲁莽的行动。

“现在，属于伊斯兰教的时代！”“大帝东征，我们西征！”在土耳其宫廷里，有一位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热心于阅读希腊人和罗马人传记，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而威尼斯政府那张高效、灵敏的情报网络，并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1448年10月，以非凡的才能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登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位成熟稳重的45岁的皇帝，以性格温厚、作风绅士而闻名。

不到三年，1451年2月，19岁的穆罕默德继承了土耳其苏丹王位。穆罕默德二世其实是前任苏丹穆拉德的第三个儿子，但由于两位兄长都相继死去，因此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王位。

即使在人的平均寿命不长的那个年代，19岁仍然算非常年轻。相对于先帝穆拉德，威尼斯共和国等西欧国家，似乎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已故的苏丹穆拉德是一位有着古代武士气质的人物。他喜欢和士兵们一起用餐，与他们打成一片。就算惩罚士兵，也罚得人心服口服，因此在军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与他国交往时，他也信守诺言，一旦缔结条约或协定，绝不反悔。对于一度攻城未果的君士坦丁堡，自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缴纳年贡为条件，双方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穆拉德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动。

穆拉德不会平白无故地使用残酷的手段。他在位30年间所发生的战争，几乎全是出于防卫。他也完全满足了威尼斯希望的通商自由的要求。对于威尼斯共和国而言，穆拉德是一位“讲道理”的对手。

而接任穆拉德的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性格正好与其父相反，这一点在日后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刚继位时，穆罕默德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捉摸不定，在军队中没有太高的威信，与大臣们关系也不怎么融洽。此外，他在跟随父亲一起作战的年代，不曾立下过值得一提的军功。因此，西欧方面认为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位软弱、平庸的人物。

穆罕默德二世在继承了广阔领土的同时，也接受了土耳其民族的发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所爆发的同族之间的叛乱等棘手问题，这让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威尼斯人对局势做出了以下判断：

穆罕默德二世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同族间的团结。因此，他不可能犯下与邻近诸国为敌这样愚蠢的错误，应该会在一段时期内与各国保持

友好的关系。

威尼斯人想当然地得出这个结论，认定新苏丹暂时不会对威尼斯发起军事行动。

然而，19岁的年轻人的行动，完全与威尼斯的预想背道而驰。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杀害了自己所有的胞弟。然后，他给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每一位官兵都增加了双倍的薪水，以此笼络军心。之后，他便率军前往安纳托利亚平定叛乱。

虽然不能说大获成功，叛乱还是暂时被压了下去。穆罕默德不打算陷入长期的内战，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他当时只想压制住反叛军的势头，至少这个目的是达成了。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对邻近国家展开了外交攻势，其高明的手段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人。他毫无异议地继续维持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向安拉、先知和《古兰经》宣誓，会绝对遵守与拜占庭皇帝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就在安纳托利亚的问题告一段落后，他立刻向土耳其全境发出了征集工匠1000名的通告。此时，距离他继位不过短短的10个月。

苏丹召集工匠的命令，不仅传至君士坦丁堡，甚至远播至爱琴海诸岛。人们陷入不安，纷纷猜测其中的理由，却没有任何人言中。乐观的人估计苏丹可能是要在阿德里安堡建造宫殿。土耳其苏丹尽管拥有辽阔的领土，生活穷奢极侈，可是居住的地方，却像是一个异形帐篷。

甚至连土耳其的大臣们最初都不知就里。因为朝中有亲西欧派，如果他们了解情况，凭威尼斯政府的情报收集能力，早就该打探到了消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情况下，人们时而不安、时而乐观

地度过了1451年的冬天。

进军君士坦丁堡

翌年，1452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动。他们从欧洲、亚洲各地聚集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威尼斯才明白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真正意图。

原来他是打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欧洲一方的山丘上建造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区段只有660米宽。在位于亚洲的一侧，已经有一座要塞，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的，现在，孙子要在海峡的对面，再筑一座堡垒。

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提出了抗议。他表示，当初在亚洲一侧建城堡时，当时的苏丹事先征求了拜占庭方面的许可。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通报，明显违反了条约。皇帝的抗议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即将建造的堡垒，就在拜占庭帝国的境内。可是，年轻的苏丹只是冷冷地笑着，赶走了皇帝的信使。拜占庭之后又派去了两位使者，结果都没能活着回来。

堡垒从4月15日起动工。整个工程动用了总共5000名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工人，另有三位大臣分别负责要塞三边三座塔楼的建设。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工事进展突飞猛进。

进入8月后，穆罕默德二世亲临现场，视察工事。他先从首都阿德里安堡抵达加里波利，然后从那里乘坐加莱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没有海军的拜占庭帝

国，只能看着土耳其苏丹如入无人之境。

意为欧洲之城的堡垒“鲁梅利·希萨勒”（Rumeli Hisarı）于8月31日完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实属罕例。威尼斯派遣特工潜入内部打探，终于让西欧方面得以一窥真面目。堡垒的设计利用山坡到海峡岸边的斜面，呈三角形建筑平面，明显出自西欧人之手。

至于苏丹建堡垒的目的，早在地点公布的时候，人们便十分清楚了。其目的之一是作为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备用的退守基地，目的之二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线。

拜占庭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箭靶，其他像威尼斯、热那亚等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往于黑海沿岸城市的商船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穆罕默德二世在原有的位于亚洲一侧的堡垒和新建的堡垒都安装了大炮，而且擅自决定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凡不听从停船命令的船只，会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事实上，的确有三艘没有按照命令企图通过海峡的威尼斯加莱商船遭到了来自两岸炮火的猛烈攻击，其中的两艘船侥幸逃脱，一艘被击沉，活着的船员被押送到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的面前被斩首。

看到这份史料时，我最初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虽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以急速闻名，但毕竟是近200名划桨手全力划船，当时的大炮命中率并不高，怎么可能轻易地击沉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呢？

可当我亲自登上“鲁梅利·希萨勒”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才发现潮流速度比想象中的更急。因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异，以及海水

盐分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如同湍急的河水，在起风的日子甚至会掀起汹涌的白浪。即便是配备现代动力的船只，如果船型较小的话，从黑海往下的速度也快如飞箭。相反，从马尔马拉海往黑海方向航行的船只，却慢如静止。如果换作120吨到200吨级在当时属于大型的加莱商船，除非运气好遇上顺风，否则的话，哪怕是拼死划行也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箭靶。穆罕默德二世对长久以来支持君士坦丁堡的西欧人实施的恐吓达到了效果。

被强征通行税的西欧商人们或许可以暂且忍耐，而形同接到征服宣告的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却是国家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任由年轻的苏丹肆意妄为而坐以待毙。自穆罕默德父亲的时代起，20年来拜占庭的皇帝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欧乞求支援，有人甚至亲自出席天主教公会议，极力说明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必要性。

但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东西方教会必须先统一，否则无法说服各国君主加入十字军。

迫切需要援军的皇帝，其实也愿意以改宗信仰天主教的形式统一东西教会，但国内的人民不答应。

“如果要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低头，不如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宁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头巾淹没，也不想见到天主教神父们的帽子”等激烈的言辞四处扩散，显示了当地民众反天主教的情绪。除了民众，在拜占庭帝国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就算是东西教会统一，西欧方面是否真的会派兵支援。事实上，迄今为止真正站出来做出反击的，只有国境直接受到侵害的匈牙利王国。

然而，皇帝已经没有犹豫和怀疑的时间，因为年轻的苏丹力排众臣的反对，执意不改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决心。

如果以理性判断，土耳其当时并没有非打君士坦丁堡不可的理由。尽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管辖的领土只有城内一片。城墙外虽然建有堡垒，可是拜占庭完全没有派兵防守的能力。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都市。各国的商人们拥有各自的社区，信徒们在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中堂堂正正地为他们的信仰讴歌。这些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土耳其人也因此充分地享受到了利益。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是在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当然是一个伊斯兰教帝国，而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心怀大愿的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有绝对的理由。而那些心存异议的亲西欧派的大臣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从。

穆罕默德二世派一位大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指挥大军。其目的是牵制当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攻击时无力派兵支援。拜占庭的外围首先被堵住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频频派出使者向西欧告急。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虽然以文化教皇著称，但他连迎接使者的态度都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同一个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君侯相争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正忙于将英国人赶出法国领土，根本顾不上去抗击异教徒；英国因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分裂，爆发了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西班牙同样处于内战之中。而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各地之间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

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威尼斯更为可靠。于是，他向威尼斯政府连连发去了求援信。然而，威尼斯政府的答复永远是千篇一律：因为北意大利的战争，威尼斯无法单独派出援军，如果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愿意参加，威尼斯可以考虑派出部分军队。连每次信尾的附注也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无法派兵，但威尼斯在经济上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指示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随时向皇帝提供支票。

元首摩契尼哥临终前千叮万嘱不要卷入无谓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威尼斯还是深深地陷进了“本土”的战争之中。尽管威尼斯政府当初推行向“本土”扩张政策，并非受领土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了确保陆上的道路权。但是，一旦拥有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必定会刺激到国境周边的国家。更何况，威尼斯又是经济位居西欧第一的大国。

与强国为邻而感受压迫的小国，为了不遭受大国侵略会拉帮结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威尼斯不得不以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姿态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深陷“本土”泥沼的原因。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的那段演说，其实是一场选举演说。在罗列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言中提及的“Messel”，是“先生”的意思，就像英国称首相是“Mister”。

“我的继任者将影响共和国的前途，或为它带来光明，或引入黑暗。请各位在选择时，务必慎重行事。你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推举Messel马林·卡拉贝洛，我也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气质，非常适合出任这个时期的元首。Messel弗朗西斯科·本柏是一位高尚的人物，Messel雅可莫·特列维森亦是如此。Messel安东尼·孔塔里尼、Messel法斯丁·米迦勒、Messel阿尔本·巴杜尔，皆是贤明之人，都有资格当选元首。

“然而，呼声很高的Messel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推举他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强硬的性格。如果是这位荣誉感极强、无法忍受屈辱的先生出任元首，威尼斯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摩契尼哥之后说的，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如果威尼斯发生战争，一万达克特的财产将变成1000，两栋房子只会剩下一栋。留下这番话的摩契尼哥于1423年辞世。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果真如他所言。因为接任他当选为元首的，正是那位性格强硬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主张威尼斯在外交上应该体现经济大国风范的福斯卡里，获得了多数有权者的支持。他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到最后不仅丧失了民心，甚至失去了同仁的支持，被迫下台。但不可否认，他的影响力长期左右着威尼斯国家的发展。

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一流海军力量的威尼斯，陆军的水准只属于三流。因此，在“本土”战中始终处于劣势。摩契尼哥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性格强硬的人物，不适合出任元首。他的观点耐人寻味。世间所谓的好战派，并非其本人喜欢打仗，不过是比一般的人争强好胜而已。

不过，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是必需的，哪一场又是无谓的，其实是无法评判的，只有涉入深浅的程度之分。如果国家处于兴盛期，所谓身逢盛世，手中握有主导权，处世相对容易。相反，当国力进入衰退期时，时代不再属于自己一方，立场变得被动，主导权丧失，处境就比较艰难。因此，相较于兴盛期的领袖，衰退时期的当政者们的智慧和能力更被人们所期待。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行事被动，如果要评判的话，也只能看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被动的时代。

这种看清事实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威尼斯无法从“本土”的战乱中脱身，而风起云涌的东方局势，又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对应。

一直用支票应付拜占庭皇帝的增援请求的威尼斯政府，在1452年8月，向克里特岛驻守舰队的副提督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Gabriele Trevisan）下达了出兵的指示。特雷维桑率军火速从克里特岛赶往科孚岛，在那里接受了本国派来的援军和军费后，随即前往内格罗蓬特，以护卫即将起航的希腊定期航线商船的名义，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商船的希腊定期航线的终点站是君士坦丁堡。这一点，土耳其是知道的。为了不让土耳其发现舰队出动，威尼斯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个时候，“鲁梅利·希萨勒”即将完工，而威尼斯商船遭击沉的事件尚未发生。

可是，没过多久，土耳其便公然地开始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起准备。甚至有消息称阿德里安堡正在建造前所未有的大炮。经实验证实，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而建造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大炮具有炸开直径两米大缺口的破坏力。

这一年的11月，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前往罗马商讨东西教会统一的伊希多洛斯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认可回到了拜占庭。

12月12日，皇帝亲自出席了东西教会统一后的首次弥撒。然而，希腊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西欧的援军已经出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十一世唯一能做的防守准备，就是紧急修复城墙和调配粮食。

从1452年年末到1453年年初的整个冬季，相较于积极地做着攻城准

备的土耳其一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

1453年1月末前后，希俄斯岛的岛主热那亚人乔瓦尼·杰士汀尼（Giovanni Giustiniani）及其军队所乘坐的军船，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这位著名将军的到来，皇帝欣喜万分，立即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防军总司令。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和卡法也派来了两艘加莱军船，再加上年底前已经到达的威尼斯船队，这就是全部的援军了。

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守军一方军力，详情见下：

威尼斯——5艘

所属热那亚方——5艘

克里特岛（威尼斯方）——3艘

意大利海港安科纳——1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艘

法国普罗旺斯——1艘

共计16艘

再加上拜占庭海军的10艘战船，总共不过26艘的海军战斗力。相比之下，土耳其方面派出了近百艘战船封锁了海面。

防守一方的海军用粗大的铁锁封锁住金角湾的入口，然后据守在金角湾中，以有限的兵力保卫着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不被攻破。

西欧人擅长海战，操纵船只的能力远远高于土耳其人，因此面对人

数近4倍的敌人，依然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可是，陆军的差距实在是令人绝望。

4773名的拜占庭兵，加上2000名外国雇佣军，总共7000名陆军。尽管能得到一些市民的帮助，但是因害怕土耳其的攻击而弃城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包括妇和女儿童在内，攻城战之前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在3万到3.6万左右。

攻方的土耳其，仅正规军就超过了8万人。再加上那些被战利品所诱惑自愿加入的人们，总数高达15万人。这是向来统计精准的威尼斯方面的推测，若按照希腊人的记录，土耳其大军有30万人。

4月6日开始的攻城战，不是本章节叙述的重点，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我想说的是，直到5月29日失陷，君士坦丁堡以如此薄弱的军力，竟然抵抗了53天。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土耳其的大炮攻击，以及用陆地行船的方式穿过加拉太，将船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进金角湾的惊人战术。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不可被撼动的意志。可以说，这就是曾经抵挡住多次攻城战（仅土耳其就有过两次）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终究沦陷的主要原因。

最终没有一个西欧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派兵支援，但那些参战的个人却表现得相当英勇。杰士汀尼身负重伤；威尼斯大使吉罗拉谟·米诺（Girolamo Minot）和儿子以及6位国人一起，在胜利者苏丹的面前被处死。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被俘的威尼斯人，仅贵族就有47人。还有一些人在沦陷时跳入海中，游到威尼斯的船边，侥幸获救。

战死或被处决的威尼斯人中，还包括多芬、奎里尼、洛雷丹、科纳、莫契尼哥、特雷维桑、韦尼耶、孔塔里尼等威尼斯名门家族的成员。

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3天的大掠夺中，威尼斯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达克特，而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富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全部家产也不过20万达克特。热那亚商人也遭受了40万达克特以上的巨大损失。

其他的意大利海洋都市国家安科纳和马尔菲，虽然经济损失不比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但蒙受的打击同样沉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不再称那些有钱人为富豪，而是改口叫他们“见证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人”。

拜占庭的灭亡

最早得知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西欧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沦陷后的第六天，成功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以及克里特岛的8艘船抵达了威尼斯领地的内格罗蓬特。他们向负责东地中海安全的威尼斯舰队总司令雅各布·洛雷丹（Jacopo Loredan）报告了情况。之后，克里特岛的三艘战船，经爱琴海南下返回克里特。另外两艘损害不太严重的威尼斯战船，在内格罗蓬特休整数日后，经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返回祖国。

在战船离开内格罗蓬特之前，雅各布·洛雷丹已经派出叫作“Clipper”的快船，前往威尼斯报告。带着第一手情报的快船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6月29日，距离君士坦丁堡沦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可见，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最快也仅限于这个程度。

司令部官员雅各布·洛雷丹写的报告，送到了正在开会的“十人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包括元首在内的威尼斯政府的首脑们，第一次得知了拜占庭皇帝战死、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及威尼斯幸存者们的名字。政府

立即向全市公布了消息，元首官邸被来打探亲人安否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然而，除了侥幸逃生的战船的报告之外，政府没有更多的确切情报，因此也无法给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复。

次日早晨，威尼斯火速派使节前往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等西欧诸国，就连正在与威尼斯交战的热那亚和米兰也没有落下。当然，威尼斯更不会忘记向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国国王以及西班牙国王报告消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通过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逃往克里特岛、罗德岛的人们，消息陆续在西欧传开，匈牙利和俄国也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方面得知了相关的情况。

整个西欧为之震撼。甚至是那些一直担心拜占庭帝国要灭亡的人们都没有料到那么快帝国就迎来了结局。西欧人高估了君士坦丁堡难攻不落的历史，也低估了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

然而，我们不能讥笑这些在事发之后才感到震惊的人们。日本某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政治的一寸之先是黑暗。"言下之意，是无法预料下一步的走向。历史的进程同样如此。后世之人回望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因后果，但这并不代表就能够体会和传达当时人们的心境。今天我们看来很多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一点儿都不是必然。历史上因总司令的猝死或军中暴发传染病而一夜之间改变战局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将之称为"奇迹"。而更奇的是，类似的"奇迹"屡屡不断。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以此来指责当时的人们不在事前做好准备，却有欠公平。早在400年前，当拜占庭面临诺曼人威胁时，就已经向威尼斯讨救兵。可见，国体虚弱不是新问题。威尼斯大使向政府提交"面对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束手无策"的报告，也是100年前的事情。如果非常的状态持续百年，它就成了常态。在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们看来，即便是握有主导权的穆罕默德二世，都不一定能打破这个"常态"。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才会让西欧人犹如晴天

霹雳。

无论如何，拜占庭这个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国家从此在地球上消失的事实，对所有人，哪怕是没有因此产生经济损失的人们，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对于西欧人而言，古罗马是他们的母体。如今，一个被公认为古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国家彻底消失了。尽管拜占庭帝国的衰败日趋明显，昔日的荣光不再，但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城市。

西欧人相信，只要去到君士坦丁堡，就能够找到自身文化的根源。不过，实际造访过那里的人仅在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座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带有双头鹰标志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憧憬。现在，它被来自东方的土耳其民族，一个非基督教文明圈的异教徒国家夺走了。西欧人的沉痛，不言而喻。巧合的是，壮烈捐躯的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同名，这更令人唏嘘不已。

威尼斯的对策

西欧国家中最早得知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也是最快做出因应对策的国家。与那些与东方没有直接关系，大可沉浸于悲愤之中，高喊着组织十字军讨伐异教徒的国家的处境不同，威尼斯人还需依靠与东方的贸易为生。

7月4日，两艘战船回到威尼斯。政府即刻命令船长阿尔维斯·迪耶多前往元老院，做情况说明。很遗憾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会议资料，只有一份当时担任战船医生的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所写的记

录。巴尔巴罗的记录内容详细、文笔冷静，日后被认定是关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可靠的资料。想来船长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巴尔巴罗的记录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船只向来有归国后提供详细报告的习惯，估计船长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开往威尼斯航行期间完成了报告书。

深感事态严重的威尼斯政府，开会讨论至深夜。其间，除了健康原因无法久坐的人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席。当天的会议上便决定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很快地就付诸行动。

威尼斯政府首先向驻守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总督，以及勒班陀的代理长官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他们加固防卫设施，储备粮食，以防土耳其军队的袭击。

同时，火速派特使送信给临时靠港在内格罗蓬特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命令他率舰队在爱琴海巡航，务必保证这一片海域的制海权。

洛雷丹另外还接受了两项命令。一是派快船去塞浦路斯岛，向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国王转达威尼斯政府的决心，威尼斯一定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伤害。二是为去君士坦丁堡赴任的新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准备好船只，让他可以随时出发。马尔切洛原本是作为驻拜占庭帝国的大使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赴任的。当他离开威尼斯，抵达内格罗蓬特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于是只好在当地等候政府的指示。现在他的身份变成了出使土耳其的大使。

7月12日，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接到了以下命令：

第一，接令后立即从内格罗蓬特出发，前往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宫殿。

第二，派特使送去1200达克特，这是政府拨出的作为购买献给苏丹的贡品费用。希望马尔切洛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

第三，转达威尼斯政府无意终止在1446年与苏丹穆拉德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意向，并且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说明，参加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威尼斯人，纯属其个人行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此深表遗憾。

除了以上的命令之外，政府还指示马尔切洛，如果苏丹拒绝按照以往的条件更新条约的话，必须向政府汇报，不能擅自做出决定。相反，如果苏丹同意条件不变再续契约的话，必须以交还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商船，以及所有在押的威尼斯市民为前提。

对于土耳其势必要求的人质的赎金，政府保证支付。但不能暴露此事，要让对方相信赎金是由人质家属支付的。

以上便是威尼斯政府迅速做出的应对土耳其的东方政策。不过针对国内和西欧，仍然有成堆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需要增强海军的力量。政府用征税所得（向有产阶级征收某类所得税，是威尼斯政府急需资金时的惯例）向国有造船厂订制了50艘军用加莱船。此外，对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提出了协助的要求。

其次是遗属的安置。7月17日，元老院批准前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特的一个儿子登上“亚里孟达”号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失踪的双亲和兄长。如果确认被捕，就支付赎金将他们带回祖国。除此之外，米诺特之子还肩负着帮助其他威尼斯市民打探亲属消息的任务。

对于那些已确认战死的国人的家属，政府也没有忘记给出相应的补偿。尽管在苏丹面前说的是“纯属个人行为，深表遗憾”一套话，可是在国内，政府必须向人民显示这些牺牲者是死得其所。民众们对遗属们都深表同情，政府以发放“遗属年金”的方式，回应民意。

7月18日，元老院决定，向在战役中与入侵金角湾的土耳其战舰同归于尽的雅各布·库克（Jacopo Cook）船长的家属支付抚恤金。库克的儿子获得终身“遗属年金”，他的女儿们在出嫁时，将由国家代付嫁妆。

8月28日，米诺特大使已遭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元老院决定，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000达克特的嫁妆，如果是进修道院，则发放300达克特作为给修道院的捐款。米诺特的遗孀和儿子们，每人将获得25达克特一年的终身年金。

9月18日，元老院再次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指挥船上所有战死的船员家属发放年金。

10月12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另外两名战死的船员发放年金。

10月17日，向另一名证实已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年金。

11月24日，元老院决定，由国家出资，赎回帕斯夸莱·安东尼奥（Pasquale Antonio）。安东尼奥曾是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船上的主力战士，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遭俘，后来被土耳其人卖作奴隶。

12月10日，元老院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家属发放350达克特。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勇敢顽强的指挥官，沦陷后被俘。因家族无力支付全部赎金，所以不足部分由国家承担。

12月28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3名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终身年金。

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仅是1453年所做的决定，之后不断有新的抚恤政策出台。政府之所以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是因为要在证实战士阵亡或被捕之后，才能对其家属做出补偿。被俘的人们的赎金在1000到2000达克特之间，像雅各布·孔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这种连土耳其人都久闻其名的富豪，赎金甚至高达7000达克特。国家对有能力支付赎金的家族，一律不给予援助，也不向战死的富裕贵族阶层发放遗属年金。

在对东方的土耳其以及国内的遗属做出相应对策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针对西欧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

继6月30日派特使去罗马向教皇报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皇帝战死的消息之后，7月18日，威尼斯再次派人去向教皇说明向苏丹派遣大使的理由，再三强调威尼斯绝不是向土耳其妥协，派遣使节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威尼斯以西欧方面迟早会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需要各国的共同协作为理由，恳请教皇出面调停，结束与米兰等国的战事。翌日，即19日，威尼斯又派特使去那不勒斯向阿拉贡王说明了意大利境内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做谈和的中间人。

8月8日，威尼斯政府与教皇派来的卡瓦杰尔（Carvajal）枢机主教就终结战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0日，威尼斯政府向各国传达了有意出席终战谈和会议的声音。

10月12日，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召开“和平”会议。威尼斯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与此同时，动员所有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进行游说工作，以防教皇改变心意。

在此期间，土耳其周边的各国纷纷参拜苏丹的消息，传到了威尼

斯。那些使节们祝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希望今后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苏丹一一接见了各国的使节，承诺土耳其不会侵略他们的国家。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向各国提出了交纳年贡的要求。热那亚人所属的希俄斯岛6000达克特，莱斯博斯岛（Lesbos）3000达克特，塞尔维亚王1.2万达克特，特拉布松皇帝2000，战死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位胞弟管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人每年一万达克特。拒绝交纳年贡的，只有威尼斯和圣约翰骑士团。

此外，为恢复君士坦丁堡原有的人口数量，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行强制人口迁移。消息很快就被威尼斯政府所知，他们判断穆罕默德二世的这个举动，是准备将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往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攻城战之前因大批人的逃离，已经减至3万到3.5万。经历了战争以及战后的屠杀之后，人口数量再次大幅降低。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也成了奴隶。据说，苏丹从君士坦丁被带回阿德里安堡的少年们，大多在军队接受训练成为士兵。长相特别俊俏的，成了宫廷中的侍童，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在苏丹的寝宫，陪伴对男色也有兴趣的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少年因拒绝伺寝而掉了脑袋。

苏丹宫廷的侍童

堡返回阿德里安堡时，身后跟着两列奴隶队伍。当走在最前面的骑着战马的苏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丘之中时，队伍后面还有人甚至尚未走出城门，可见被迫为奴的人数之庞大。

女人们的命运，大抵与少年相似。长得漂亮的，被送进苏丹或者是大臣、高官的后宫。既不貌美也不年轻的，则成了土耳其人的家奴。

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空城，并非言过其实。毕竟有太多的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仅靠亚洲来的土耳其人移民不仅数量不足，都市的机能也无法正常运作。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强制那些已经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移居君士坦丁堡。城中居民的结构因此形成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2：1的比例。为了安抚这些非土耳其人，苏丹允许他们在基督教堂做礼拜。但由于城中以索菲亚大教堂为首的大多数教堂，都陆续被改建成清真寺，基督徒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地在挤在仅存无几的教堂里。

时间到了1454年的春天。威尼斯政府在前一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4月18日，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总算与土耳其签下了友好通商条约。

苏丹承认威尼斯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通商、通航的自由权，条件是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人必须缴纳所得的2%的关税。由于在威尼斯领土内行商的土耳其人也需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关税，再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因此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政府不算妥

协。

除此之外，如果一方的商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遭遇海难，双方有交还船只、船员、货物的义务。在对方领土上死去的国民的财产，必须送返本国，不得就地接收。

在条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威尼斯政府便对特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除了绝对保证威尼斯通商和通航的自由之外，还必须争取到威尼斯大使常驻土耳其首都的权利。对于后一项的要求，也获得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首肯。

从签署的条约内容来看，威尼斯不仅成功地再次确保了以往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甚至连拜占庭帝国曾给予其的权利也大致被保留下来。唯一失去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享受治外法权的权利。

这份友好通商条约，充分显示了威尼斯与土耳其的不同立场。自由通商和通航，对于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绝对条件，而非商业民族的土耳其对此并不重视。与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的数量相比，在威尼斯境内从事商业、需要缴纳2%关税的土耳其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

此外，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双方均有派大使常驻的权利，但真正落实这条规定的只有威尼斯一方。在收集情报以及保护在对方境内的同胞安全的问题上，威尼斯比土耳其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威尼斯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出特使，而且往往是一些地位较低，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能力而被任命的非土耳其民族的犹太人。对于外国的使节，威尼斯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外交官特权，而土耳其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便毫无顾忌地将对方的大使关进牢里。

一个国家重视外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它无法单凭军力与他国抗衡。从15世纪中叶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负责威尼斯外交领域的，始终是共和国最优先的人才。虽然客观、冷静是外交官所必需的资质，但这些威尼斯外交官们精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一直是后世研究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我介绍一段雅各布·德·兰古斯奇写的报告，作为范例。兰古斯奇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的副官，与大使一起就通商条约与苏丹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2岁，身材匀称，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威严，难以亲近，不苟言笑，小心谨慎，不带偏见。言出必行且无所畏惧。

“渴望像亚历山大王那样享有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安科拉（Ciriaco D'Ancora）和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诵读罗马史。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的著作，以及教皇们的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王与伦巴第王的故事。通晓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详知意大利地理。他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埃涅阿斯生活的土地，教皇的居所、皇宫的所在地、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他渴望统领天下，对地理和军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还有，他会巧妙地提出诱导性问题。

“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威尼斯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当然，威尼斯最后还是搞定了这位棘手的人物。洛伦佐·维多利代替马尔切洛，出任威尼斯驻土耳其的首位大使。

在西欧方面，威尼斯同样成功地从战争的泥沼中脱身而出。在与穆罕默德签署条约的9天前，4月9日，《洛迪和约》（*Treaty of Lodi*）签署。长达23年的北意大利战争终于画上了终止符。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的5个大国以彼此制衡的形式建立起和平体系。这种势力均衡战略一直持续至现代，而世界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洛迪和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现实中结成的国家同盟，往往不是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源自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是因为眼下没有对立的必要，先签下和约，以防万一。

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与威尼斯结成同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威胁。而土耳其愿意与威尼斯缔结和约，是因为暂时不想与它为敌。只有威尼斯真正意识到结成同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即便是缔结了盟约，威尼斯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由于避开了东西两方战事，威尼斯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繁荣。然而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容易引起西方“友好国家”的妒忌。至于东方的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价值观大不相同的国家，与其交往，威尼斯始终是步步为营。

9年的时间过去了。威尼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本土”获得的属地因政府的善政形势稳定，保证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连接西欧通路的安全。

在东方一侧，与全力经营君士坦丁堡市场因此一蹶不振的热那亚相比，将市场分散到埃及、叙利亚的威尼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用多久时间，便重新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威尼斯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成了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的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仍然健

在，仍然不停地叫嚣：“时代变了！西方征伐东方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东方向西方进军的时代！世界应该是一种宗教、一个帝国、一位君主！”

土耳其的西进

在穆罕默德二世看来，既然已迁都君士坦丁堡，以此地作为大本营，那么原本属于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当然都该属于自己所有。那些缴纳年贡的王侯们，等于承认自己是苏丹的附属国，那么，宗主国征服附属国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周边各国以缴纳年贡换取不受侵犯，对穆罕默德二世是说不通的。

位于东部的锡诺帕（Sinope）、特拉布松很快就被苏丹征服，西面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也成了土耳其的领土。所幸匈牙利人骁勇善战，才使得东方的基督教世界一息尚存。

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不能幸免，每年向苏丹缴纳高额贡金的旧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两位君主，面对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同样束手无策。雅典、科林斯（Corinth）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少年们被送进土耳其军团，女人们成为奴隶，存活下来的男人们，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填补首都人口的空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发生过几次黑死病，在防疫措施齐全的威尼斯都深受其害的那个时代，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土耳其的人口更是大幅度递减。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土耳其便从征服地区强制移民，补充人丁。

西北方的匈牙利勇敢善战，西南方也出现了一位英雄。他就是被教

皇称赞为“基督教世界的骑士”的阿尔巴尼亚的君主斯坎德培（Skanderbeg）。斯坎德培年轻时，曾经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生活。在得知父王，即阿尔巴尼亚国王去世的消息后，斯坎德培便逃出皇宫，回到了祖国。

斯坎德培手上握有两个“武器”：一是熟知土耳其人，二是阿尔巴尼亚多山的地形。凭借这两个强有力的武器，斯坎德培利用全面的游击战术，击退了穆拉德、穆罕默德二世两代苏丹的军队；以数千人的兵力，抵挡住了10万大军。打正规战，不赢即是输。而游击战则是只要不输，便是胜利。

一直到1468年死去，斯坎德培为阿尔巴尼亚奋战了整整24年。他的英勇事迹，连对手土耳其都惊叹不已。据说当土耳其军攻占了他墓地所在的教会后，士兵们掘开他的坟墓，将其遗骨切成小段，用皮绳系在颈上来辟邪。

威尼斯政府一直在经济上向匈牙利国王和斯坎德培提供援助。由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经费只能通过教皇转交，而且表面上还必须做出与匈牙利王以及斯坎德培反目为仇的姿态。威尼斯就是用这种方式，享受了9年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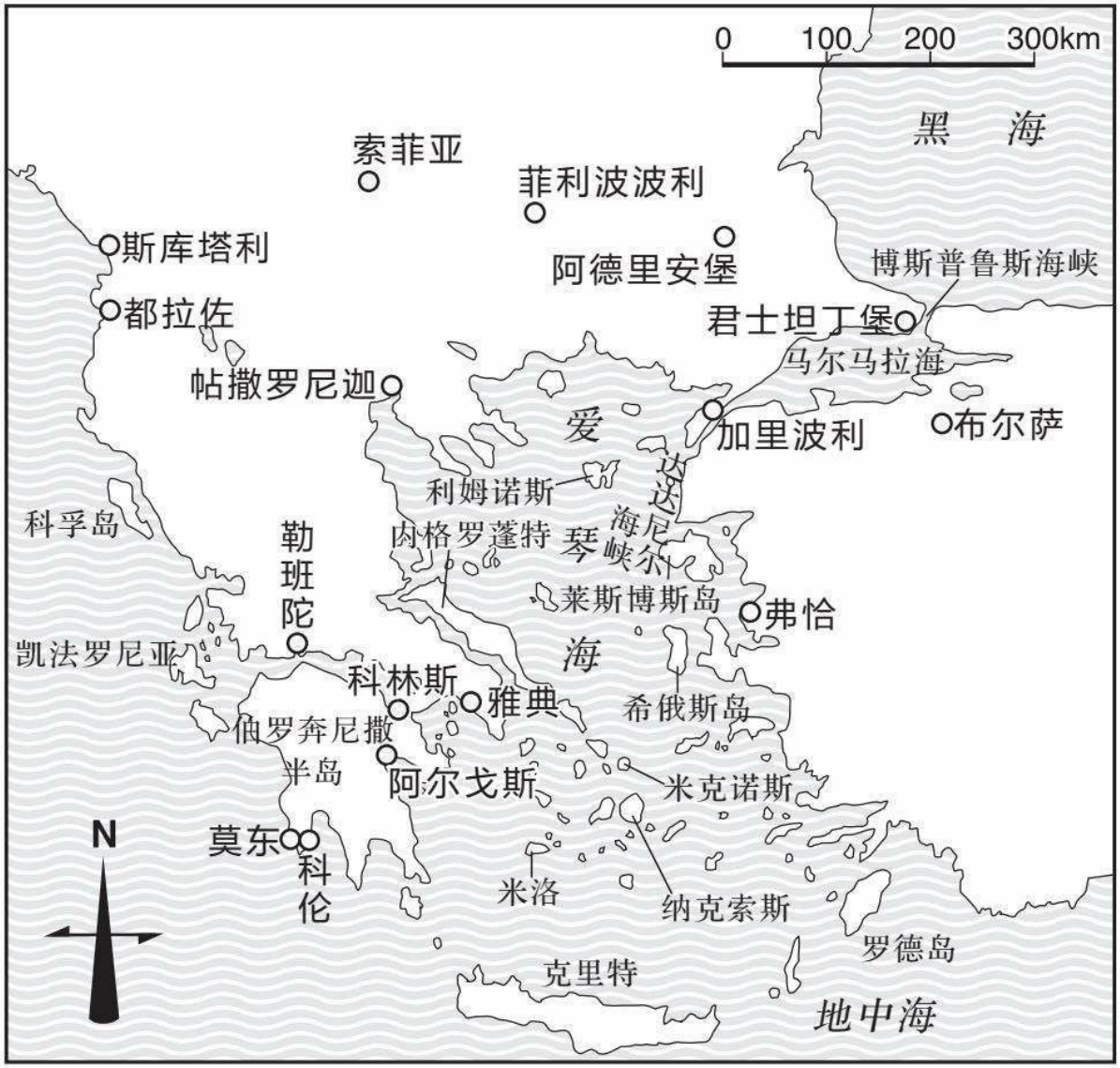
“和平”开始出现阴影是在第八个年头的年中前后。1462年7月，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多科尼科·巴尔博（Domenico Balbo）向政府发去一封信件。

那个时期，苏丹对于寄往国外的信件，无论公文还是私信，都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要送出真实的情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巴尔博大使依然想方设法，把土耳其正在达达尼尔沿岸加里波利组建舰队，9月将会行动的情报，传给了祖国。大使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又报告了另一个情况：出入苏丹宫廷的威尼斯人逐渐遭到排

挤，而佛罗伦萨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威尼斯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命令爱琴海舰队的海军统帅率舰队北上，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域待命。不过，还特别加了一条指示，只要土耳其没有直接攻击威尼斯的领土，舰队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爱琴海及其周边

苏丹很快就得知了韦托尔·卡佩洛（Vettor Capello）率领舰队移动的消息。他召见威尼斯大使巴尔博，解释说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威尼斯领土，而是热那亚。大使闻讯后立刻派出快船，通知卡佩洛统帅。没想到，土耳其人的动作更快。报信的快船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便遇上了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大舰队。从战斗力看，卡佩洛的舰队，再加上停靠希俄斯岛的另一支威尼斯舰队，完全能够战胜土耳其。可是，他们刚接到对方不打算攻击威尼斯的情报，而且也没接到政府的

指令，所以威尼斯海军只能按兵不动，看着土耳其舰队从自己的面前驶过。

翌年，即1463年，归属热那亚200年以上的莱斯博斯岛沦陷。海军力量较弱的土耳其派大军登陆，摧毁了岛上坚固的要塞。岛上的5000名士兵和两万名普通人，终究无法抵挡8万人的土耳其大军。沦陷后，一般的平民仍然可以留在岛上生活，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被迫加入土耳其军团，文化人以及上流阶层的人们则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还带走了800名少男少女供自己享用，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希腊世界第一美女的特拉布松皇帝的小姨子，同时也是莱斯博斯领主的妻子。以领主为首的300位重要人物最初以投降换取了性命。可是后来穆罕默德二世又改变了主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为庆祝胜利，苏丹举办了宴会。在受邀的意大利人中，不仅没有热那亚人，竟然连威尼斯人也被排除在外。

更严重的是，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土耳其的情报收集能力，逐渐赶上了向来以掌握高质量的情报为傲的威尼斯。

间谍们

从情报网的组成而言，威尼斯既有常驻的大使，也有大量活跃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因此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优势。而土耳其一方没有设立驻外大使馆，甚至连商馆都要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在这一点上，两国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威尼斯获取情报的途径，要么是靠国民的爱国心，要么是靠金钱收买间谍。相较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却无须花费什么心思，便有情报送上门。

苏丹穆罕默德的情报来源有4个：

第一个来源是拜访土耳其宫廷的西欧的文化人。意大利南部出生的古代研究家奇里亚科·安科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种类型的学者，只要给他们接触、研究古代遗迹和文物的机会，往往不会去介意提供机会的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奇里亚科不仅能够自由地进出罗马教廷，而且从穆拉德时代起，便获得了出入苏丹宫廷的自由。之后又遇上一个热爱古代史的穆罕默德二世，奇里亚科在宫廷里更是如鱼得水。苏丹赐予奇里亚科土耳其全境的通行证，让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投入研究。奇里亚科本人可能没有当间谍的打算，但他讲述的有关西欧的事情，以及在土耳其境内的所见所闻，对于苏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苏丹攻打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意大利人在土耳其的军营观看了战斗。向年轻的苏丹教授古希腊、罗马史的也是他。

虽然这位学者无意，但实际上却扮演了类似双重间谍的角色，因为教皇以研究费的名目，给予他经济上的援助。在罗马，他大概会像在苏丹的宫廷里那样，向教皇介绍土耳其的局势。话说回来，奇里亚科提供的情报价值不高，不涉及绝密的内容。不知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核心，还是他觉得这种危险的行为与自己真正的目的不符。总之，这种程度的情报泄露，对于威尼斯无伤大雅。

苏丹获取情报的第二个来源是拜占庭人，尤其是东正教的教士们。这些人原本就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君士坦丁堡遭攻击时，西欧人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更加深了这种仇恨。有些教士曾经跟随皇帝去西欧求援，当时教皇和西欧国家君主们冷淡的态度，令他们刻骨铭心。除了情感上的缘故，为了让东正教能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也是他们不得不接近苏丹的原因。

然而，这些希腊人能够提供的情报，内容也相当有限。威尼斯向罗马教会都不透露国家机密，更何况是这些东正教的教士。

情报的第三个来源，则是叛徒的密告。这些人不是威尼斯市民，而是威尼斯在海外基地的居民。他们背叛威尼斯的动机各异，或者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为了获得丰厚的酬金。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人为了接近苏丹，献上威尼斯基地的要塞图；有人则愿意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土耳其制造与威尼斯同样的军舰。

尽管这类人数量不多，但由于内容涉及威尼斯的机密，因此一旦发现，威尼斯立刻会派杀手除掉告密者。这也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威尼斯打击最大的，是第四个情报来源。情报提供人的背后有佛罗伦萨撑腰，手上有美第齐家族提供的大量的资金，是相当麻烦的对手。

1460年，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代（Benedetto Dei）以雇员的身份，进入威尼斯大商人吉罗拉谟·米迦勒（Girolamo Michele）在君士坦丁堡的店铺。位于威尼斯租界的店铺原本就是大使馆与本国政府的中转站，再加上吉罗拉谟显赫的地位，出入店铺的大多是威尼斯有头有脸的人物。贝内代托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打探到的消息传给了苏丹。他的行动虽然很快就被察觉，但是佛罗伦萨的间谍与苏丹宫廷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由于贝内代托身份的暴露，不再有来自威尼斯居住区的情报。然而，他对于穆罕默德二世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因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通过贝内代托，仍然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关威尼斯的情报。

贝内代托·代从事间谍活动源自他的信念。他的祖国佛罗伦萨是一个盛产纺织品的国家。可是佛罗伦萨没有海港，只能通过威尼斯人才能将纺织品销往东方。佛罗伦萨曾多次出手想拿下海港城市比萨，却因为

比萨人的顽强抵抗而屡屡遭挫。当得知是威尼斯在暗中援助比萨之后，当地爆发了反威尼斯的情绪。威尼斯在经济上不容他国超越的抑制政策，以及向“本土”扩张领土的行径，令佛罗伦萨忍无可忍。而打击威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去和土耳其打仗，以致于无法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市场。这样，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境内的行动会更加自如，佛罗伦萨商人便能取代威尼斯商人，在东方市场拔得头筹。

这是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同样也是贝内代托·代的希望。美第奇家族利用与威尼斯结盟的关系，尽可能地打探各种情报，传送给贝内代托，并且每年拿出5000达克特的巨款，让他购买贡品献给苏丹，以及贿赂大臣。这对贝内代托·代取得苏丹的信任，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威尼斯大使在报告中所言，在土耳其，若不行贿，简直寸步难行。土耳其官员喜欢受贿向来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送钱能解决问题，对威尼斯倒不是什么难事。令威尼斯大使深感绝望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对佛罗伦萨，尤其是美第奇家族表现出的好感。与威尼斯不同，佛罗伦萨与土耳其没有领土接壤，因此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对于佛罗伦萨这个形式上为共和制，实际僭主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国家，相当地欣赏。

领袖喜欢与领袖对谈。而作为威尼斯政府的代表，与苏丹进行交涉的却是大使。哪怕大使出身贵族，再怎么聪明能干、长袖善舞，说到底仍是一位公务员，而不是君主。贝内代托·代所代表的却是无冕之王的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稍后将登上历史舞台，被誉为“豪华者”的洛伦佐·美第奇，是穆罕默德二世最为欣赏的人物。相比之下，极力排斥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像“豪华者洛伦佐”那样巨星般的君主。

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贝内代托·代存在的危险。曾经一度考虑暗杀他。但想到在背后指使的佛罗伦萨的意图，就算是杀了贝内代托，他们还是会派其他人来。于是威尼斯放弃了暗杀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意

大利境内佛罗伦萨人的身上，并且去拦截土耳其与佛罗伦萨之间往来的信件。他们多次成功地拦截了贝内代托送出去的情报，不过，却没有能够阻止来自佛罗伦萨方面的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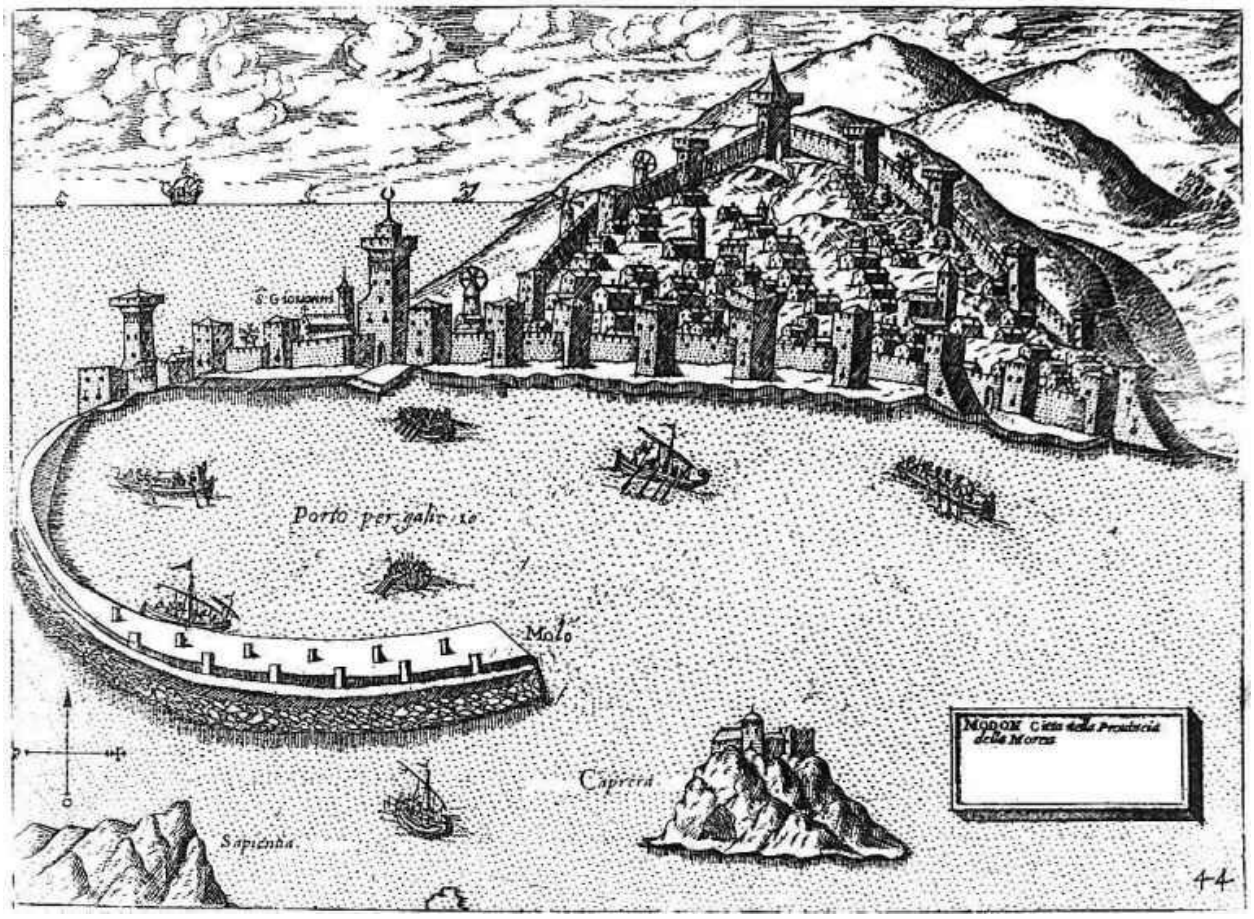
就这样，逐渐疏远的威尼斯与苏丹宫廷的关系，在没有任何起色的状态下，迎来了1463年。

3月，穆罕默德二世突然召见威尼斯大使，向他提出严正的抗议。原来有一个土耳其人偷了10万阿斯普隆（Aspron，相当于2000达克特），逃到了威尼斯属地的莫东。莫东的总督不仅拒绝土耳其引渡罪犯，甚至还贪污了半数的赃款。大使闻讯后，震惊不已，向苏丹表示会立即展开追查，不日后再来报告结果。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待大使的报告。4月3日，土耳其大军在苏丹的命令下南下，攻克了威尼斯的属地阿尔戈斯，并且大肆抢劫了同属威尼斯领土的勒班陀、莫东周边地区。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回旋的余地。威尼斯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放弃在海外的基地，要么迎战。经过激烈的讨论，元老院决定接受土耳其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威尼斯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可以获得同盟国支持。

5月，海军在总司令洛雷丹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发。继海军之后，由费拉拉公国的君主艾斯特（Este）侯爵率领的陆军雇佣军团，在威尼斯船队的运送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



莫东港口和城市

与此同时，威尼斯开始着手和匈牙利商讨结盟。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匈牙利国王，而是先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进行交涉。这两个国家为国境线的问题产生纷争，如果矛盾不解决，匈牙利国王不可能全力投入对土耳其的战争。

威尼斯政府的特使在台面上，说了一通基督教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异教徒的侵略之类的大道理，台面下用金钱收买了皇帝，成功地中止了日耳曼攻打匈牙利的行动。9月，威尼斯与匈牙利联手对抗土耳其的同盟正式成立。此时，阿尔巴尼亚的“基督教世界的骑士”斯坎德培仍然健在。

在西方运作的同时，威尼斯也没有忘记东方。通过驻当地的大使，

威尼斯请求统治叙利亚、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马穆鲁克王朝曾经派使节去恭贺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可是土耳其之后的领土扩张政策，引发了他们强烈的不安，因此让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并不困难。

除此之外，威尼斯还派遣特使前往波斯。不过，这次他们希望波斯王参战，而不是保持中立。作为回报，威尼斯海军将帮助波斯王攻克小亚细亚的沿岸，当然还有金钱援助。说服波斯王的工作也相当顺利。

威尼斯的计划一旦全面启动，土耳其便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事实上，战况也的确对威尼斯有利。

在洛雷丹的指挥下，威尼斯海军轻而易举地夺回了阿尔戈斯。没有一艘土耳其的军舰敢从达达尼尔海峡出海挑战，威尼斯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可惜，还是没能夺回莱斯博斯岛。由于岛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的陆军从海上登陆，从陆地发起攻击，而威尼斯并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的艾斯特侯爵率领的雇佣军团，面对擅长陆地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毫不畏惧，奋勇作战。反倒是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的大军，因屡屡遭到斯坎德培的阻击，久攻不破，士气渐渐变得低落。同盟军军不仅守住了威尼斯的属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对被土耳其占据的城镇发起了攻击。

而此时的西欧竟然再次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完全是源于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个人的狂热，各国君主是被动卷入其中。现实主义的威尼斯，宁愿相信与土耳其有利害冲突的埃及、波斯，哪怕他们是异教徒，但对于和土耳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西欧君主们的高谈阔论，却十分怀疑。威尼斯人表示，在其他国家没有动作之前，绝不参加十字军。没想到，各国这次竟然行动了起来。于是，威尼斯决定遵从教皇的指示，元首亲自率领舰队，到达了集合地的安科纳港。结

果，这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因庇护二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基督教世界中站在抗击土耳其第一线的，最终只有事关国家存亡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

话说这三个国家虽然善战，却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土耳其方面也不怎么顺心如意。北边有匈牙利军深入波斯尼亚，西边的斯坎德培令他们束手无策，不仅是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疲于四处征战的士兵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雪上加霜的是，苏丹的健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年仅33岁的穆罕默德二世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肥胖。也许是体重影响了心脏，他甚至连骑马都很困难。这位曾经不知疲倦、征战各地的剽悍男人，待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中的托普卡帕皇宫足不出户的日子越来越多。威尼斯政府断定，眼下正是谈和的好时机。

1465年2月，威尼斯大使保罗·巴尔巴里戈（Paolo Barbarigo）前往苏丹宫廷，与宰相商议停战和谈的可能性。会谈中，宰相指责威尼斯共和国不应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开战，大使则反驳威尼斯是迫不得已。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土耳其还是释放出“有名誉的谈和”不是不可能的信号。

7月，威尼斯及其同盟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威尼斯要求归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基地和莱斯博斯岛。匈牙利国王则要求土耳其正式承认匈牙利在波斯尼亚的地区已经既成事实的控制。对此，土耳其迟迟不肯做出回应。双方的交涉进行到11月，突然被中止了。谈判中止的主要原因是埃及派特使前往威尼斯，转达了埃及苏丹打算从原本中立的立场改为倾向威尼斯的意图。除此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利用土耳其人不断扩大的反威尼斯的情绪，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关进监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举动，也促使威尼斯做出了中止谈判的决定。

翌年，即1466年，穆罕默德二世再次亲自率军讨伐阿尔巴尼亚。就在他出征之前，威尼斯接到了潜伏在敌营的间谍的报告，说穆罕默德二世的肥胖症逐渐有所改善。恢复了健康的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打算一鼓作气拿下阿尔巴尼亚，但超过3万人的土耳其正规军，还是不敌斯坎德培和威尼斯区区4000人的联合军。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斯坎德培，极力避开平原作战，集中所有的兵力在山间打游击，成功地击退了强敌。

穆罕默德二世不仅打了败仗，连首都都难以返回。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黑死病爆发，整个宫廷不得不转移到色雷斯的山区避难。穆罕默德二世怒不可遏，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脑袋不保。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商人们，岂是被关进监狱就能了事。他们一个个被杀，尸体被扔在街上，不准掩埋。就连与土耳其没有战争的热那亚人，以及一直关系友好的佛罗伦萨人，都不幸被卷入其中，惨遭杀害。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穆罕默德二世便一扫心中的阴霾。1468年1月，斯坎德培去世了。这对土耳其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威尼斯却是噩耗。

斯坎德培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由于长期的同盟关系，威尼斯非常清楚，阿尔巴尼亚人的骁勇善战，与斯坎德培个人的才华和威信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威尼斯人也不是山民。所以，元老院还是决定，重启与土耳其的和平谈判。

在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会见了威尼斯派来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也对他赠送的礼品郑重地表示感谢，可是却以特使没有他本人颁发的通行证，不具备使节的身份为由，拒绝谈判。特使不愿就此罢休，终于苏丹改口，称如果威尼斯放弃与匈牙利王国的同盟，宣告与它为敌，

土耳其可以考虑谈和。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倒不是威尼斯对匈牙利国王有情有义，而是在斯坎德培死后，少了同盟国威尼斯打不了仗。谈判之事只好作罢。

不过，在1468到1469的两年里，威尼斯的领土没有受到土耳其的攻击。这是因为苏丹为平息安纳托利亚的叛乱远征去了亚洲。到了1469年年末，威尼斯收到不祥的情报，说小亚细亚在制作大量火药，并且征兵10万。加里波利、君士坦丁堡等地的造船厂，也在加紧建造大型军舰。

有关建造军舰的情报，是分析了与热那亚人有贸易来往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后，做出的判断。热那亚人购买了大量的涂料，而要找出涂料的买家，并不是什么难事。

另一方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外散布消息，谎称舰队的目的地是黑海。不过，威尼斯没有上当。他们得到了情报，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向北而是往南，舰队规模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共有250艘战船。威尼斯预测土耳其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属地的内格罗蓬特。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的尼科洛·卡纳莱（Nicolo Canale）率领35艘加莱战船，即刻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内格罗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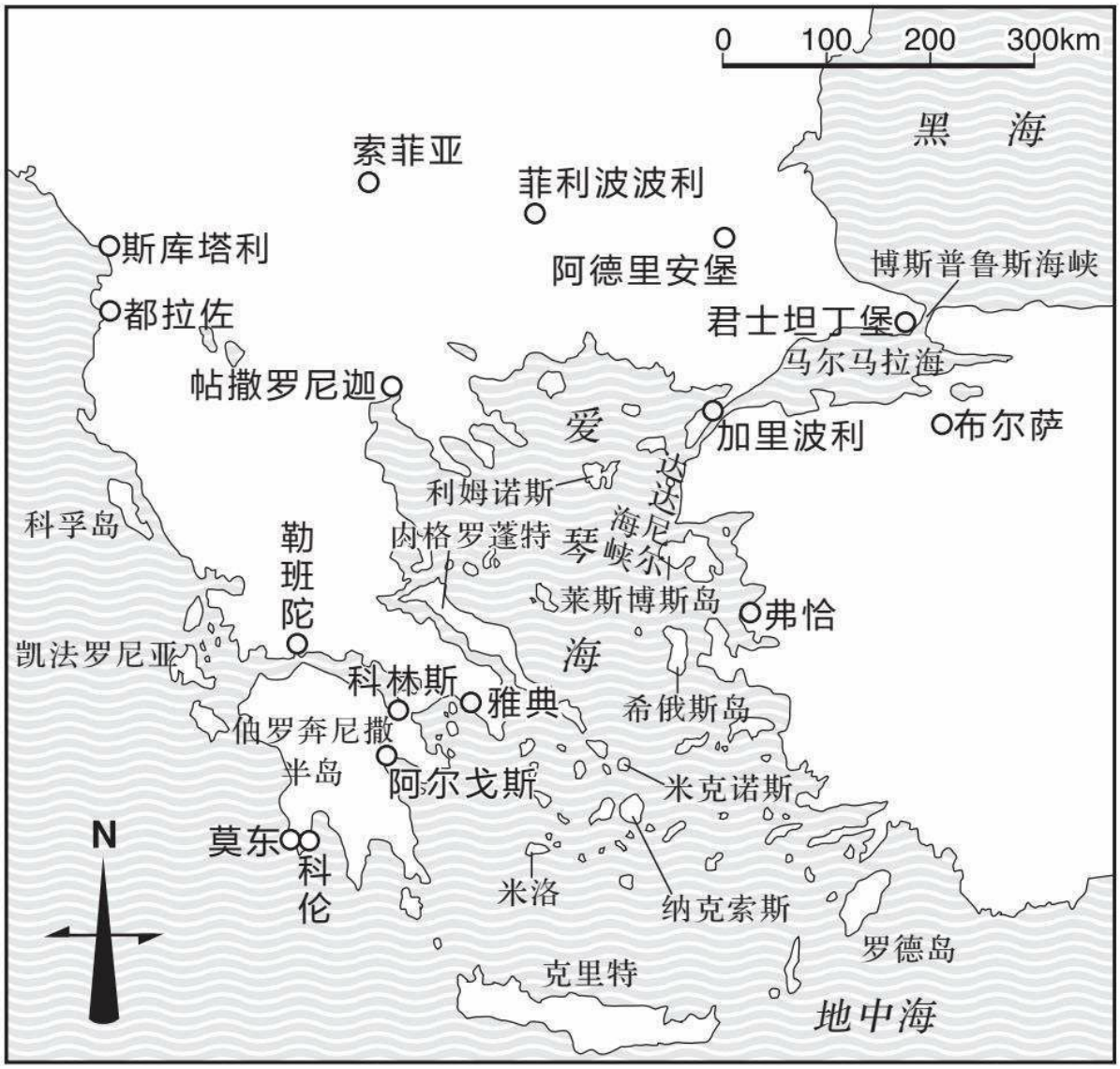
内格罗蓬特攻防战

内格罗蓬特是一座在雅典的北方，位于爱琴海上的岛屿。虽说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也有克里特岛的2/3大。它与希腊本土之间仅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以至于看上去像本土的延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这里自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整整持

续了270年。

走希腊定期航线的商船船队，从威尼斯起航后，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进入地中海，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然后就会在内格罗蓬特做第一次靠港停留。海峡风平浪静，据说当年前往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船队就是选择在此集合的。正因为条件良好，内格罗蓬特成了前往君士坦丁堡、黑海的商船的最佳中继站，同时也是希腊物产的集散地。

有计划且持续性地维系贸易线路，向来是威尼斯政府极其重视的问题，并将之视为国家繁荣的关键。因此对威尼斯而言，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克里特岛。当地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与驻君士坦丁堡、埃及的大使，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平起平坐。时至今日，岛上依然保留着很多威尼斯殖民时期所建造的要塞，当年威尼斯共和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穆罕默德二世首次亲征威尼斯所选定的目标就是这个内格罗蓬特岛。



内格罗蓬特及其周边

为了威尼斯的一个基地，土耳其动用了超出常规的大军，可见穆罕默德二世势在必得的决心。总数12万人的土耳其陆军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由马其顿，沿着陆地一路南下。同时，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的250艘军舰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据潜伏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威尼斯间谍的报告，海面上船桅的数量如森林般茂密。

而防守一方的威尼斯军队，陆军战斗力几乎为零。这么大一个岛屿，不可能做到全面的防守，以当地的威尼斯市民和自愿参战的希腊人的数量只能采用据点式防御。主力全部集中在内格罗蓬特最大港口的面对海峡的要塞，由当地总督负责指挥作战。

在海军的数量上，威尼斯也处于劣势。相较于土耳其250艘战船，威尼斯连同53艘加莱船在内，统共才71艘。不过，威尼斯毕竟有悠久的海上通商传统，相反，土耳其人则海上经验不足。他们虽然使用了大批被征服的希腊人充当水手，可是战斗力大概只有海洋国家的威尼斯、热那亚的1/5到1/4。因此71艘战船对抗250艘战船，应该是绰绰有余。

当然，这是海战时两军实力的差距。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极力避开海上作战。而威尼斯的海军总司令尼科洛·卡纳莱，却是一个和穆罕默德性格完全相反，缺乏临机应变能力的人物。

1470年6月初，接到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的报告的卡纳莱，派快船出海侦查，如果对方以60艘为一组，组成舰队，说明有挑战之意。不料，侦查船看到的土耳其舰队却是紧紧挤成一团，犹如提防骑兵袭击的步兵。闻讯后，卡纳莱司令官决定让从克里特岛过来的援军，在距离要塞不远的另一个港口待命。就这样，毫发无损的土耳其海军，6月15日抵达内格罗蓬特，与已经到达的陆军顺利会合。

亲临前线指挥的穆罕默德二世，没有浪费时间，在6月25日发起了第一次的总攻。到底是长年以来作为威尼斯的重要基地，内格罗蓬特军民的防守相当坚固，土耳其损失了1.6万人的兵力，30艘战船被烧毁。30日发起的第二次总攻，再次以失败收场。7月5日和8日的强攻，依然未果。守军们士气高涨，因为他们坚信强大的威尼斯海军马上就会赶来救援。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他在风平浪静的狭窄海峡上用小船搭起了舟桥。尽管岛上的守军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可是没有来自海上攻击的土耳其军还是完成了舟桥的建设。

岛上的守军在要塞的塔顶上挂起了黑旗，督促海军加入战斗。从塔顶往下看，通过临时建造的舟桥运过来的一排排大炮，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齐刷刷地对准着城门。海面上，一艘威尼斯的战船不忍岛上的同胞受难，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擅自冲向敌人的阵群。就在城墙上的守军眼前，这艘战船犹如闯进马蜂窝般似的被土耳其的军舰打得稀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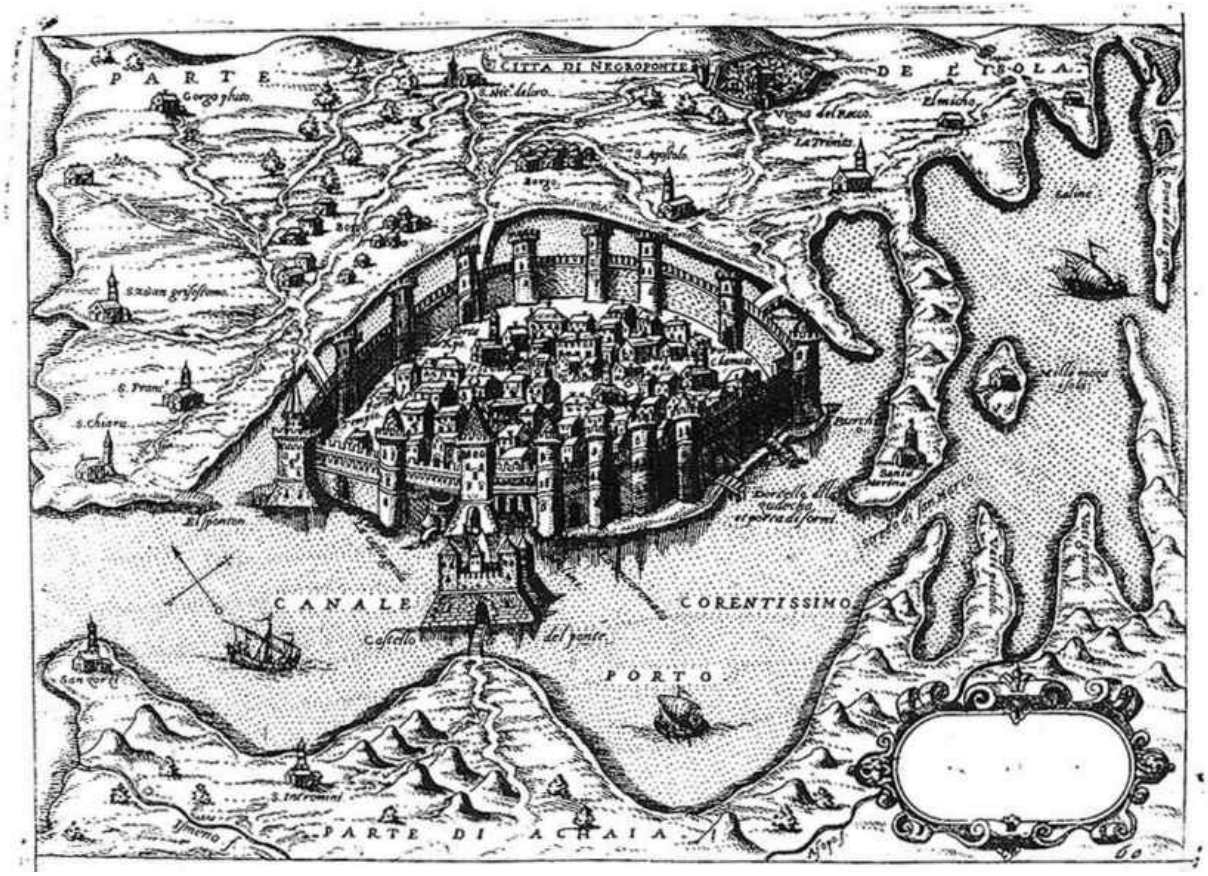
7月11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第五次总攻。穆罕默德二世从要塞中逃出来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城墙的薄弱之处，于是集中火力不断狂轰。本国海军的按兵不动，敌人不分昼夜的炮击和耶尼切里军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军歌，令守军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翌日，即12日，在得到土耳其人不斩首的承诺之后，总督决定投降，内格罗蓬特终于陷落。它面临的是土耳其人已形成惯例的屠城。

就在同一天，洛雷丹率领的23艘战船和韦尼耶指挥的16支船队，相继到达内格罗蓬特。可是当这些卡纳莱司令盼望已久的援军抵达时，已经沦陷的城中，土耳其人正在对以总督为首的威尼斯要人们处以极刑。

穆罕默德二世遵守了不斩首的诺言，将威尼斯一方要人们的身体锯成两截。年轻的威尼斯人及其他西欧人，还有一些地位尊贵的希腊人都被当作奴隶，带往君士坦丁堡，女人们也难逃为奴的命运。

因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巨大，连与苏丹保持友好关系的佛罗伦萨都高达40万弗罗林（起源于佛罗伦萨的一种欧洲货币），另外还有700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传统上与东方没有贸易往来的佛罗伦

萨的损失如此，威尼斯的受害程度，一向以正确统计闻名的威尼斯政府，这一次也无法估量。



手绘内格罗蓬特地图

7月26日，城陷两周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留下两万兵力留守内格罗蓬特，率领舰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陆军部队像以往一样，押着两列长长的奴隶队伍，从陆地回国。

未战已败的威尼斯海军，此刻面临是否迎战土耳其海军的抉择，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政府的命令。顺便提一句，威尼斯政府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是在7月30日。

如果返航的土耳其舰队向追踪而来的威尼斯海军开火，威尼斯方面一定会和他们结结实实地打一场海战。可土耳其海军无意开仗，它们组

成密集型的队形，一心一意向北航行。见此情形，威尼斯舰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另一派则认为，为确保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实力。类似的争议，往往是时间拖得越长，保守派就越占上风。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于是，土耳其海军一路顺风顺水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胜利回国。

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在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之后，震惊万分。陆军战力不足是在预料之中，但他们相信海军应该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面对优秀的威尼斯海军，无法突破封锁的土耳其海军，终究会疲于作战，放弃攻击。谁也不相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防线竟然就被彻底攻破。

威尼斯政府决定解除尼科洛·卡纳莱总司令的职务。接任的莫切尼戈受命再次组成舰队，随身带着召回尼科洛·卡纳莱的命令，火速从威尼斯出发。

在卡纳莱尚未回到威尼斯之前，“十人委员会”已经开始就其犯下的罪状进行审议。从舰队的指挥官和船员，很多人都出面指证，不满他的指挥能力。不过，审判还是等到卡纳莱归国之后，才正式进行的。在听完他的辩白之后，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其有罪的140票，无罪的28票，弃权35票。最终，卡纳莱以救援内格罗蓬特不力和错失歼灭土耳其海军机会的罪名，被判有罪。

尽管罪名成立，但由于卡纳莱既没有叛国，也没有临阵脱逃，罪不至死。他被终身流放到一个叫波尔托古鲁阿罗（Portogruaro）的小渔村，并罚没全部薪金。罚没薪金的一半上交国库，一半用来支付内格罗蓬特阵亡者的家属年金。

尼科洛·卡纳莱被判刑之后，各国君主纷纷出面为他求情。卡纳莱

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曾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国的大使，各国联合召开的十字军、和平谈判等会议上，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尼科洛·卡纳莱可以说是最为外国人所知的威尼斯人。然而，威尼斯政府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改变判决，甚至再也不愿意任用这类国际知名度很高的知识精英充当指挥官，而是选择那些尽管默默无闻，却有海军经验的人。以这个标准新选出的海军总司令皮耶托·莫切尼戈不负众望，重整了因不战自败而军心涣散的威尼斯舰队。

然而，威尼斯渴望和平。除了痛失内格罗蓬特之外，与土耳其7年的战争中大批精英的牺牲也让国家不胜负荷。再加上斯坎德培死后，不擅于陆地战的威尼斯不得不站在防守巴尔干地区的最前线。

威尼斯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和谈的机会，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君主。在他的宫廷中，类似将战败的指挥官斩首示众，杀掉不顺眼的宰相等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土耳其宫廷内找不到能够影响他的人物。就算是其生母，虽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终究只是后宫里的一个女人。穆罕默德的母亲原本是基督徒，作为奴隶被送进了后宫。地位卑微的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影响大权在握的儿子。而穆罕默德二世那些包括希腊公主在内的妻妾们，同样如此。

可是，有一个人是这位强势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尊重的女性。她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的妻子、塞尔维亚公主玛拉。玛拉自己没有孩子，穆罕默德二世算是她的义子。尽管身处土耳其的后宫，但玛拉始终保持着基督徒的身份。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基督徒能在重重障碍下继

续保持信仰，据说就是玛拉向穆罕默德二世进言的结果。威尼斯政府设法接触到了这位女性。

玛拉立刻将威尼斯的意图转达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示，如果威尼斯有意，土耳其愿意接受和谈。并通过玛拉，向威尼斯送去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

威尼斯政府任命尼科洛·库克（Nicolo Cook）和弗朗西斯科·卡佩罗（Francesco Capello）为特别使节。这两人都有长期在土耳其境内经商的经验，是公认的土耳其通。

政府向特使明确指示了谈判的条件。土耳其必须保证不侵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区域的领土，交还内格罗蓬特。如果对方答应归还，威尼斯共和国将分5次共支付25万达克特。这是威尼斯的底线。内格罗蓬特沦陷还不到三个月，威尼斯已经派出特使与土耳其谈和，可见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停战。

抵达君士坦丁堡的两位特使，首先礼节性地拜见了苏丹，然后与宰相进行谈判。宰相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必须将所有爱琴海的岛屿“归还”土耳其，每年交付10万达克特的贡金以换取在爱琴海一带通商的权利。

面对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两位特使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回答说，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威尼斯宁愿选择丧失“本土”所有的领土。

苏丹闻讯后，震怒之下没收了特使们的通行许可证。特使之一的卡佩罗不久便在君士坦丁堡病故，另一位库克乘坐渔船逃到雷母诺斯岛（Lemons），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商船回到祖国，向政府报告了谈判破裂的经过。

没想到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土耳其方面竟然主动提出了停战的谈判。土耳其使节带着玛拉的引荐信，搭乘威尼斯的商船来到威尼斯，转达了穆罕默德二世提出的停战条件：威尼斯“归还”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爱琴海所有领土，转让科孚岛和支付5万达克特的年贡。

威尼斯政府不得不承认，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完全没有对话的基础。把守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威尼斯当然不可能放弃，以克里特岛为首的位于爱琴海各个基地，对于通商国家的威尼斯同样至关重要。就是靠这些“小站”连接起的“高速公路”，威尼斯商船才可能在海上自由通行。

至于缴纳年贡，尽管威尼斯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威尼斯向来都不是问题。威尼斯领土虽小，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凌驾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上的强国。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停战条件，实在让威尼斯没有回旋的余地，谈判再次以破裂而告终。两次的交涉未果，让威尼斯政府意识到，只要穆罕默德二世活在这个世界上，威尼斯就不会有好日子。

试图暗杀

暗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在威尼斯与土耳其尚未交战的1456年就已经开始。从1456到1479年的23年间，威尼斯曾经策划了14次暗杀行动，除了一次之外，其余的行动都属于杀手的“毛遂自荐”。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从希腊的船员、天主教的教士、佛罗伦萨出生的贵族、来自克拉科夫（Krakow）的波兰人、阿尔巴尼亚的外科医生兼理发师，威尼斯的经济实力，吸引来各路人马。有关这些“毛遂自荐”者的资料，都登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档案中，对那位教士甚至清楚地列出

了他暗杀所需要的详细经费。从“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只记录了一次详细的预算和支出来看，威尼斯对这种自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他们不信任这些杀手及其暗杀手段，或者是顾忌失败后的风险。不过，“十人委员会”唯一表示出积极态度的，是1471年的暗杀计划，因为刺客是苏丹的御医。

雅各布·达·加埃塔（Jacopo da Gaeta）是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Gaeta）的意大利人。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认为犹太人的律师或医生会通过职业给基督徒带来不良的影响，下令驱逐犹太人。雅各布因为父亲是犹太人的缘故，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离开意大利之后，雅各布去了土耳其。土耳其人由于不擅长医术和经商，因此非常欢迎这方面的人才。雅各布成了苏丹穆拉德的御医。穆拉德死后，他继续侍奉穆罕默德二世。身为御医，自然是要和苏丹如影相随。雅各布在苏丹的敞篷里，目睹了包括攻打君士坦丁堡、内格罗蓬特等在内的各种战斗。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位御医无比信赖。尤其是在他30岁后身体开始肥胖，连骑马都有问题以后，这位犹太御医更是成了他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知雅各布用了什么方法，他配制的药对治疗肥胖非常有效。因此，他不仅享有高额的俸禄，而且还获得苏丹赐予的“帕夏”的称号（pas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从来都是独自用餐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允许与他同席（虽然不能同食）的就是雅各布。对于爱喝葡萄酒的苏丹，雅各布也是宫中唯一一位从健康的角度而非《古兰经》戒律，予以劝阻的人物。

雅各布·达加埃塔与威尼斯方面的接触缘来已久。根据现有的资料

记载，双方的交往是从1457年威尼斯向他馈赠30布拉乔奥（braccio，古意大利长度单位）的红丝绒开始的。之后，威尼斯大使又陆续向他赠送过几次礼品。特别是从1463年威尼斯遭苏丹宫廷冷落之后，大使与雅各布见面交谈几乎成了威尼斯接触土耳其宫廷的唯一渠道。

这位犹太医生亲近威尼斯，并非只是看中豪华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威尼斯是西欧诸国中，唯一没有接受教皇反犹太政策的国家。

雅各布为什么会在1471年计划暗杀苏丹的动机至今不明。不过，威尼斯政府很清楚，土耳其宫廷中对雅各布的得志颇感不快的大有人在，更何况他是一个犹太人，生死予夺全在苏丹的一念之间。也许是雅各布做了权衡，如果穆罕默德二世猝死，必然会引发宫廷大乱，倒不如自己动手，反而容易应对局势。不过，他却无法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威尼斯方面，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威尼斯人。

1471年9月，佛罗伦萨人兰多·德利·阿尔比齐（Landol degli Albizzi）带着雅各布的信件来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判断此事需要绝对保守秘密，于是先将兰多藏在了深受信赖的曼托瓦驻威尼斯大使的宅邸里。之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前往大使家中，向兰多打听详情。兰多·德利·阿尔比齐来自佛罗伦萨名门阿尔比齐家族。因为与美第奇家族斗争失败，阿尔比齐家族遭到放逐。与分散在意大利境内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同，兰多流亡到了君士坦丁堡。由于佛罗伦萨牢牢地被美第奇家族掌控，兰多很难回国。可是，也正因为阿尔比齐家族的复兴已经无望，回归故里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通过雅各布的信件以及兰多的说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了解了以下情况：

雅各布·达加埃塔将在第二年，即1472年3月到5月底之间，毒杀穆

罕默德二世，酬金一万达克特。除此之外，由于雅各布事后必须放弃所有的财产逃离君士坦丁堡，因此还需要2.5万达克特的补偿金。总计3.5万的达克特在事成之后支付。雅各布提出的“暗杀费”，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毛遂自荐”者的要求。那些杀手们索取的金额，最高也没超过500达克特。

不过，“十人委员会”还是一致接受了雅各布开出的价格。对他提出的希望获得威尼斯的市民权和以后居住在威尼斯市内的要求也一并答应。兰多也提出了希望在事成之后，每年获得500达克特的年金，对此，委员们也表示同意。另外他们还答应兰多，会想办法说服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帮助他重返祖国。

一个月之后，带着威尼斯回复的兰多乘坐威尼斯的商船悄悄地离开了威尼斯。可是，到了克里特岛之后，他便失去了音讯。他究竟是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杀，还是在抵达君士坦丁堡后遇害，威尼斯始终没能搞清楚。而穆罕默德二世，在1472年5月之后，仍然活着，那位犹太医生，仍然担任着御医，一直到1481年以后才断了消息。据说他是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的混乱中被杀的。

暗杀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幸，由于相关的记录被“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机密收藏，至少消息没有被泄露出去。

外交尝试

尽管与土耳其的战争打打停停，但只要两国不解除敌对的状态，就无法避免威尼斯在商业上继续蒙受损失。面对严峻的局势，威尼斯不能

坐以待毙，他们决定不惜任何手段打击土耳其，迫使对方改变强硬的态度，重新坐回谈判桌。

由于土耳其始终避开海战，威尼斯无法与它正面交锋，所以必须找到能够打陆地战的伙伴。除了早已结下同盟的匈牙利之外，与波斯共同作战的体系也开始了运作。当年波斯王乌宗·哈桑（Uzun Hasan）赠送给威尼斯元首的由翡翠和黄金制作的器皿被保留至今。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体现了波斯愿与威尼斯联手的诚意。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落入威尼斯的圈套。他不会愚蠢到全线开战，同时去对付西边的匈牙利、南边的威尼斯和东边的波斯。只要军舰不驶出达达尼尔海峡，威尼斯就奈他莫何。土耳其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私底下与匈牙利签订了紧急停战条约。

从匈牙利的角度而言，由于地处西欧基督教世界抗敌的最前沿，只要坚持与土耳其作战，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威尼斯和罗马教廷金钱上的援助。如果土耳其人侵入国境，自然是要拼死抗争，倘若没有，停战歇息一阵反倒是好事。当时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君主，军队都采用了雇佣兵制，面对土耳其提出的有利的停战条件，他立即表示了同意。这样，穆罕默德二世便能专心致志地去对付东边了。

1472年10月，土耳其做好了对波斯发动战争的准备。5日，土耳其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波斯方面前进。12日，穆罕默德二世乘坐的御用船，也渡过了海峡。苏丹出征这一次带上了长子和次子，留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只有年仅12岁的三子。另一方的波斯军队，也从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出发，向西挺进。

土耳其派出了正规军10万，再加上非正规军，人数高达19万。而波

斯军队只有5万的兵力。

这个消息来自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报告，他是作为威尼斯的特使，去波斯商谈同盟事宜的。在缔约之后，泽诺并没有回国，而是随波斯国王一同出征。不用说，他的行动当然是出于威尼斯政府的指令。

据说，土耳其和波斯两位东方国的君主都是根据占星术来决定作战行动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占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波斯王乌宗·哈桑得到的是令他十分欣喜的吉兆。占卜预言似乎很准，战事的初期，形势对波斯军相当有利。深入不毛地带的土耳其大军，不仅遭遇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还得面对军粮不足的问题。这次打得不是攻城战，两军在库尔德斯坦（Kordestan）辽阔的荒地上，边打边移动。险恶的地形和亚洲冬季严酷的气候，让非正规军占多数的土耳其军队举步维艰。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波斯军，利用他们擅长的骑兵战术，赶在对手之前抢占优势，趁机歼灭那些与大部队走散的土耳其兵。

然而，巧妙的奇袭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经历了严冬的土耳其军队，士气并未消减，年过40的统帅穆罕默德二世，与生俱来的敏锐加上岁月的历练，让他越发成熟、智慧。他之所以组成大军，应该是事先估算过兵力的折损。

1473年8月，隔着幼发拉底河，土耳其和波斯两国的军队首次正面交锋。从波斯军的阵营望过去，土耳其红底上一轮白色新月的旗帜如海浪般翻腾不息。当这股红旗的浪潮向波斯一方涌来之时，宣告战斗正式开始。

战斗持续了8小时，土耳其军队最终大获全胜。大叫着愿付赎金的俘虏们话音未落，头已落地。只有那些波斯的工匠和学者幸免一死。穆

罕默德二世打算将君士坦丁堡完全打造成一座土耳其帝国的首都，眼下正需要这些技术人力。波斯王哈桑在军队节节败退时临阵脱逃，总算是保住了一命。虽然他承诺威尼斯特使一定会再打一场雪耻之战，不过威尼斯却开始与波斯拉开了距离。

铲除了东面的敌人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精力转移到了西面。这一次他本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军队兵分两路离开了首都。由于和匈牙利国王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不过，土耳其依然极力回避海战，从达达尼尔海峡没发出一艘战舰。

由骑兵组成的土耳其骑兵团，经过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从北面进入了位于威尼斯“本土”北方的弗留利，在当地大肆掠夺和杀戮。

骑兵团的指挥官伊斯肯德尔贝克，有着热那亚人的父亲和希腊人的母亲。他本人在年轻时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在这位原基督徒率领下的土耳其骑兵团，像疾风一般势不可挡。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威尼斯人可以看见几十公里外被烧毁的房屋冒起的阵阵浓烟。土耳其人烧杀抢劫之后又像风一般地消失，却给威尼斯人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因应弗留利居民的要求，威尼斯政府派兵前往当地，这也是威尼斯首次在“本土”常驻军队，以防土耳其的攻击。

土耳其的另一支部队，是以步兵为主的8万大军。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据点斯库塔利发起了攻击。斯坎德培在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之后，威尼斯通过派遣代理长官，以及海上补给，维持着当地的安定。土耳其人这一次决定一鼓作气拿下这里。

不料，第一次的斯库塔利攻防战，以威尼斯取胜而告终。穆罕默德二世任命的土耳其军司令官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是苏丹的男

宠，当然性取向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此君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这对于威尼斯是一个幸运。尽管当地疟疾流行，在威尼斯代理长官安德烈亚·洛雷丹（Andrea Loredan）临机应变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人团结一致，奋勇抗战，熬过了一个半月的围城战。土耳其对打了败仗的将军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一律斩首，唯独对帕夏仅以降职惩处。

时间来到了1475年1月6日。威尼斯元首官邸大厅撤下开议会时所用的椅子，腾出空间，举办盛大的舞会，欢迎那不勒斯国王的弟弟阿拉贡王储费德里克（Federic）一行。夜半酒酣之时，内务长若无其事地走到元首背后，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当时的元首是皮耶托·莫切尼戈，他在内格罗蓬特陷落后，曾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重整士气，成功地夺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

听完内务长的耳语之后，莫切尼戈也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席。隔壁的房间里，苏丹的义母玛拉派来的使臣正在等候，他向元首转达了苏丹谈和的意愿，并带来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供去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威尼斯使节使用。

元首立刻悄悄地通知了“十人委员会”和6位元首辅佐官。从宴会上直接坐到会议桌上的高官们，个个都是一身华服，但每个人的神色都很凝重。穆罕默德二世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他真正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大家不得其解，因此当晚的会议上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这场在宴会边上的房间里进行的秘密会议，除了出席者之外，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就连阿拉贡王储这位以手腕高明著称的政治家，也没发现觉察出一丝异样。他对元首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下榻之处。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十人委员会“陆续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元老院。就这样，原有的情报得到重新梳理，又有新的消息传来，委员们终于搞清楚了苏丹的动机。原来穆罕默德二世不仅在攻击斯库塔利的行动中失利，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

波斯王试图东山再起，匈牙利国王也对土耳其摆出了攻击的姿态。还有比土耳人更残暴的斯拉夫族的瓦拉其亚人（Valachia），他们用尖木桩戳死人的暴虐行径，连土耳其人也不寒而栗。

在西欧方面，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各国开始商讨组建十字军讨伐的议题。米兰和佛罗伦萨都表示愿意各自拿出10万达克特作为军费。尽管威尼斯不相信东征会成行，但土耳其人不比威尼斯了解西欧各国并不团结的内情，他们对此还是心有余悸的。

最后，当接到消息说穆罕默德二世因最宠爱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a）在前一年去世而郁郁寡欢时，“十人委员会”做出了派遣谈和特使的决定。

可是，当特使吉罗拉谟·佐尔齐（Girolamo Zorzi）见到穆罕默德二世之后，却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土耳其的和谈条件与以往几乎没变。依然是要求威尼斯“归还”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并交纳15万达克特的年贡。无奈之下，佐尔齐特使以需要与本国政府商议为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要求。对此穆罕默德二世欣然答应，甚至给出了6个月的宽限期。

不料，还没过6个月，土耳其军就向黑海方面进发，攻占了卡法和塔那。这两个城市分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东方贸易的最前沿基地。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长期以来还是通过此地，与黑海沿岸以及俄国维系着商业的往来。

被土耳其人断了黑海通路的威尼斯，更不能将爱琴海诸岛拱手相让。在失去黑海、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市场只剩下叙利亚和埃及。威尼斯绝不能失去作为这条商业航线上转运基地的克里特岛。权衡之下，只能放弃与苏丹谈和。

翌年，即1476年，善战的匈牙利人从西面，威尼斯人从南面，联手

抗击土耳其。特别是那些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临海基地，威尼斯利用高效的海上补给，一次次夺回了失地。而对手穆罕默德二世则一直待在君士坦丁堡。因为担心被行刺，他甚至很少离开托普卡帕皇宫。

时间来到1477年，由伊斯肯德尔贝克率领的土耳其骑兵团从北面逼近威尼斯的“本土”。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另一支大军从南面，再次向阿尔巴尼亚发起进攻。不过，土耳其人这次的斯库塔利攻城战，依然遭到了威尼斯守军的顽强抵抗，再次以失败告终。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仿佛只有匈牙利和威尼斯孤军奋战，而东方的波斯王乌宗·哈桑终究没能东山再起，在这一年离世。

年末，威尼斯“十人委员会”收到重大情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与其女婿匈牙利国王马泰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合谋，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谈和。

一旦匈牙利脱离战线，单凭威尼斯根本无法抗敌。再加上拥有南意大利领土的那不勒斯国王如果投靠土耳其，威尼斯等于是在亚得里亚海出口的两侧同时受敌。为了避免被彻底孤立，威尼斯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匈牙利、那不勒斯与土耳其缔结同盟。

元老院决定重新开启与土耳其的谈判。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保住科孚岛、莫东和科伦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二是保证商业活动的自由。其他一切皆可以让步。特使带着这份悲壮的密令，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1478年2月开始的这场艰难的谈判，因苏丹亲自出征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而中断，缔结和约一直要到一年之后。其间，威尼斯的和谈特使也从最初的托马索·马利皮耶罗（Tomaso Malipiero），换成了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谙熟东方贸易的克里特岛出生的乔瓦尼·达里奥（Giovanni Dario）。

选乔瓦尼·达里奥作为谈判特使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这位殖民地出生的威尼斯市民，对于贸易是威尼斯的命脉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在谈判过程中，这位擅长土耳其语的精明商人，死守底线，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此外，苏丹亲自率领12万大军，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未果，或许也为谈判增加了筹码。

终于，在1479年1月25日，两国签署了停战条约。详细内容如下：

威尼斯承认已经被土耳其攻占的内格罗蓬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部分以及包括斯库塔利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一带归属土耳其。

土耳其再次确定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莫东和科伦两大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属于威尼斯。

威尼斯每年向苏丹支付一万达克特，以获取在土耳其境内的贸易权。此外，土耳其准许威尼斯派大使常驻君士坦丁堡，以及建立享受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居住区。

土耳其完全保证威尼斯在土耳其全境内同通商及航行的自由。

威尼斯向苏丹赔款15万达克特，作为以前在土耳其境内开采明矾矿时未付专卖权的补偿。其中的10万达克特分两年付清。

对那些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在对方国家去世的国民，威尼斯与土耳其都有义务将其财产归还祖国。

双方宣誓，决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不援助对方的敌人。

再三抵抗住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最终还是被威尼斯人舍弃。明

矾的专卖权因为以前有付给教皇的先例，现在付给苏丹勉强说得过去。至于每年一万达克特的通商费，是关税之外新增的税金，实际上就是年贡，所以历史学家们才会将之称为威尼斯建国以来最屈辱的条约。

姑且不论那些已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威尼斯至少保住了斯库塔利之外的其他海外基地，并且守住了通商自由这一条最后的底线。每年的“通商费”土耳其最初要求的是15万达克特，最后在威尼斯以明矾专卖权名义做一次性的补偿条件下，成功地减到一万达克特。对提出暗杀苏丹计划的御医都能爽快答应支付3.5万达克特酬劳的威尼斯，只要能确保商业市场的活跃，向苏丹缴些苛捐杂税都是值得的。

然而，这只是基于威尼斯自身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决断。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无须依赖贸易的国家看来，与土耳其讲和的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叛徒。从罗马教廷、意大利各国，到对土耳其战争毫不关心的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本身都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和的匈牙利，群起而攻之，交相指责威尼斯为了金钱，没有节操地向基督教的敌人屈服。

在持续了16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双方曾经6度尝试停战，由于谈判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他国家并不知情（只有一次被米兰大使察觉）。为了保守秘密，威尼斯可谓是费尽心思，派遣的谈判特使都是以商人身份出行。威尼斯商人进出君士坦丁堡实属平常，因此，纵使各国心有存疑，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然而一旦两国签订了条约，便不再有什么秘密。那些等到和约正式公开之后，才了解情况的国家，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和约生效之后，威尼斯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与此同时，将斯库塔利的领土权交给土耳其。对于那些包括奋勇抵抗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人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苏丹予以他们选择去

留的自由。当地的威尼斯人可以返回祖国，阿尔巴尼亚人则面临着是否留下做苏丹子民的选择。这些成了难民的人们，全体选择远走他乡。

山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人，不会选择在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居住，他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与故国有相同地形的地方。乘坐着威尼斯船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的山区地带。时至今日，这一带依然仍然有不少地名后面带有“Albanese”（阿尔巴尼亚）的发音。那里当初就是厌恶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聚集的村落。除了阿尔巴尼亚难民之外，还有不少家园被土耳其占领的希腊人。在这些由难民开发而成的地区内，人们至今都不说意大利语，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或阿尔巴尼亚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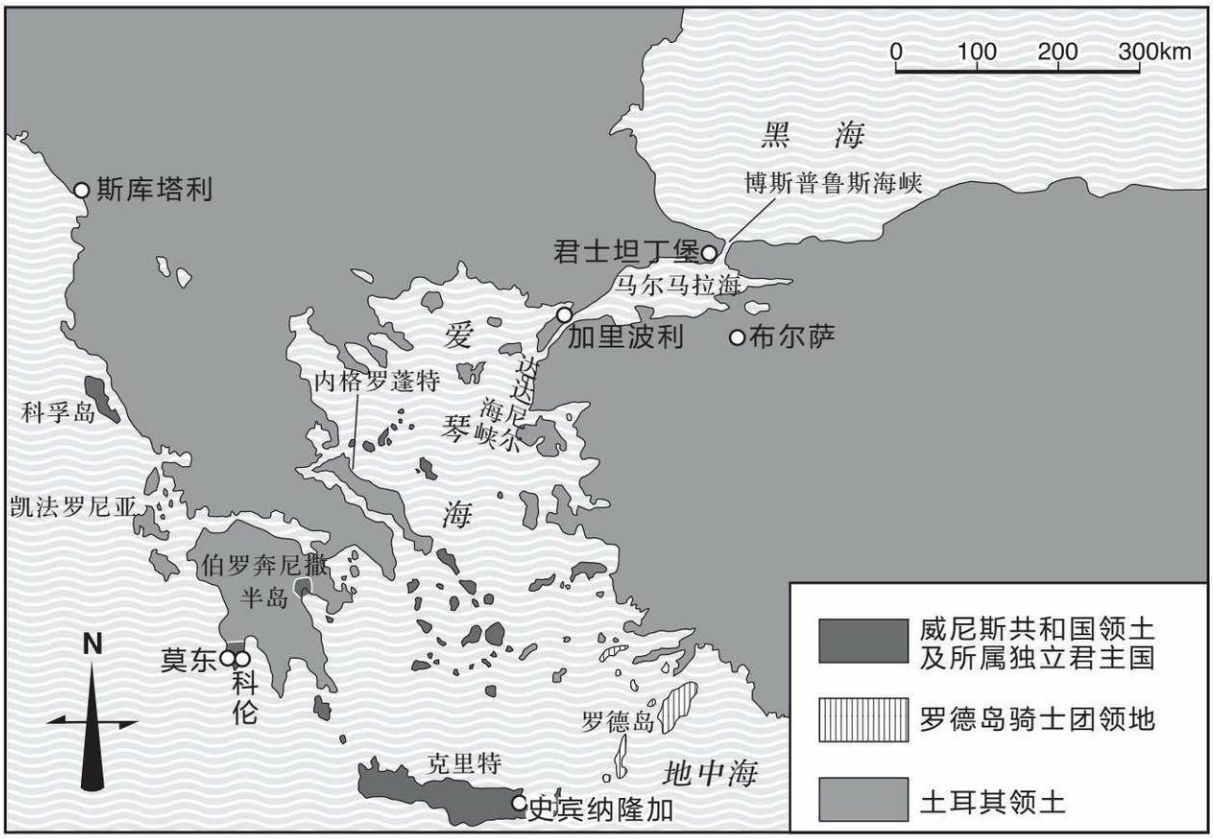
对于这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政府在他们移居时发放了年金，补偿他们所做出的牺牲。经历了三次攻城战之后，斯库塔利的男性从原来的1600多人，锐减至450人。

无论如何，持续了16年的交战状态，终于结束了。来往于希腊、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定期商船航线重新开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上任初始，便要面对那堆积如山的各种事情。大使馆的再建、组织翻译人员、安排仓库和码头等，要填补16年的空白，即便是对处理这些事务向来得心应手的威尼斯人来说也绝非易事。威尼斯政府对于再次重返君士坦丁堡的重视程度从他们派遣的大使人选中可见一斑。

在接到和约签署的报告之后，威尼斯政府随即任命参事官皮耶托·韦托里（Pietro Vettori）为停战后第一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皮耶托·韦托里在阿尔巴尼亚战争中被土耳其俘虏，元老院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由当时正被关在君士坦丁堡监狱的他担任大使。就这样，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皮耶托·韦托里，直接就进了大使馆。他在按照正常程序选出的大使巴蒂斯塔·格里蒂（Battista Gritti）抵达君士坦丁堡正式上任之前一直

履行着大使的职责。

对于那些访问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们，威尼斯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因为顾忌各国的舆论，半夜三更才敢让他们上岸。土耳其的使节团一行，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了威尼斯。他们那一身充满异国风情的装饰，令威尼斯的百姓们啧啧称奇。虽然威尼斯与这个东方国家渊源深远，但大多市井小民却从未涉足过土耳其境内。



1480年势力分布图（摘自G.OSTROGORSKY“Storia dell’Impero Bizantino”）

缔结和约后第一次来到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带来了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他希望威尼斯政府派一位优秀的画家去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将“文化大使”之大任交给了当时威尼斯声誉最高的画家的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画家本人及其同行的4位助手的全部费用由国库支付。

时年50岁的詹蒂利·贝利尼将5年前开始的元首官邸的壁画修复委托给弟弟，于9月3日搭乘威尼斯的船只前往君士坦丁堡。从8月1日土耳其使节抵达的时间推算，威尼斯方面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各种绘画工具，可见他们非常呵护这份刚刚修复的关系。

从1479年9月末到1481年1月末，詹蒂利·贝利尼在托普卡帕宫内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位威尼斯画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不过，通过当时也

在苏丹宫廷内的另一位威尼斯人焦万·马里亚·安丘艾罗（Giovan Maria Angiolello）的记录，可以确定贝利尼除了为苏丹及其家族画肖像之外，还创作了其他的作品。

安丘艾罗是在内格罗蓬特沦陷时被土耳其俘虏，后来成了苏丹次子穆斯塔法的侍从。穆斯塔法死后，他又在穆罕默德二世身边侍奉多年。因此，安丘艾罗的笔记是了解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时期的苏丹宫廷的最可靠资料。

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除了肖像画之外，还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私人寝宫画了春宫壁画。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壁画被继位的巴耶济德涂刷销毁，其他肖像画也被卖到市场上，大多数作品从此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现由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收藏的那张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与其他画作一起在市场上销售，最初是由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买下，带回威尼斯。之后几经易手，在19世纪末传到一位英国贵族的手中。贵族去世后，其遗孀将此画捐赠给了国家画廊。这幅落款时间为1481年1月15日，有着贝利尼签名的作品，准确地刻画了人物面部的表情。年逾半百的穆罕默德二世面貌清瘦，年轻时的忧郁神情依稀可辨。

穆罕默德二世似乎非常喜欢这位威尼斯的画家。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可以直接向这位专制的君主提出任何意见。那么，深受厚待的贝利尼为何在皇宫只住了一年半，便返回威尼斯了呢？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予以证明，不过按照安丘艾罗的说法，是某一件事情促使贝利尼做出了归国的决定。

穆罕默德二世肖像（詹蒂利·贝利尼作）

有一次，贝利尼给穆罕默德二世看自己的作品，他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场面。穆罕默德二世凝视画面一阵之后，先开口对画家巧妙的工笔赞赏一番，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画中有误。人被斩首的瞬间，血

管、神经会因条件反射而向内收缩，但贝利尼却画成向外伸展。面对苏丹敏锐的观察力，贝利尼惊讶万分，一时无言以对。也不知苏丹是如何理解了画家的沉默，他令侍从带进来一个奴隶，就在贝利尼的眼前，砍下了奴隶的头，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贝利尼决定离开托普卡帕皇宫，返回祖国。穆罕默德二世赐予这位威尼斯画家土耳其帝国骑士和黄金锁，以谢其功。3个月之后，苏丹驾崩。

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犹如天降神恩般狂欢不已。罗马举行了3天的庆祝大典，教皇邀请各国的大使参加弥撒，感谢“基督的敌人之死”。除了西欧，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之后，两度受到土耳其攻击的罗德岛，甚至是埃及的统治者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去世前不久，刚率军登陆亚洲，当时大家都猜测，土耳其大军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叙利亚和埃及。

除了亚洲之外，另外还有一支在与威尼斯谈和之后出兵的土耳其军队已经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Otranto）。所幸，在接到苏丹的死讯之后，军队停止前进，撤回君士坦丁堡，没有给当地造成重大的伤害。

针对土耳其的种种动作，威尼斯信守条约，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在土耳其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准备进攻奥特兰托时，威尼斯迅速派出60艘加莱战船，紧随左右，一旦发现对方有北上攻击威尼斯的迹象，便立即开战。紧盯不放的威尼斯战船，直到确认对方的目的地是奥特兰托之后才放心离去。虽然苏丹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宣誓信守和约，不过，威尼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专制的君主。

继承穆罕默德二世皇位的巴耶济德与威尼斯再次确认了和平条约的成立。作为伟大的开创者的继承者，往往面临因前代不断扩张而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处理国内事务的巴耶济德，让威尼斯享受了20年的和平。

与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对决，令威尼斯感悟到时代潮流的改变。15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人，也许会怀念一个世纪前与热那亚人的决战。当时的争斗再怎么激烈，毕竟两国的情况相似，价值观也接近。在同等条件下的双方相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是看谁能充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在这方面，威尼斯显然比热那亚擅长，因此他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然而，土耳其则完全不同，胜负靠的不是士兵质量，而是数量。善于运用大炮的穆罕默德二世诚然是一位天才，但终究是凭借着千军万马取得胜利。苏丹一声令下，便能召集起相当于威尼斯男子总人口的大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尼斯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规模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将制海权视为国家命脉的威尼斯，是通过占领战略要地来控制附近的海域。可是一旦有大军从陆地向这些据点发起进攻，威尼斯海上防御再强也是无能为力。因此，威尼斯改变了以往挖渠引海水护城的方法，代之以将半岛切开，使城堡孤立于大海之中，利用四面环海的地形作为防守。像克里特岛东部的史宾纳隆加岛（Spinalonga）、科孚岛等一些地形上允许的战略要地，全都改建成了海上城堡。要塞临海一边的城墙原本就比靠近陆地的一边造得单薄，现在索性直接建在海里。这些孤立于海中的城堡，比建在陡峭山峰上的要塞更难攻破。这一点在之后与土耳其军作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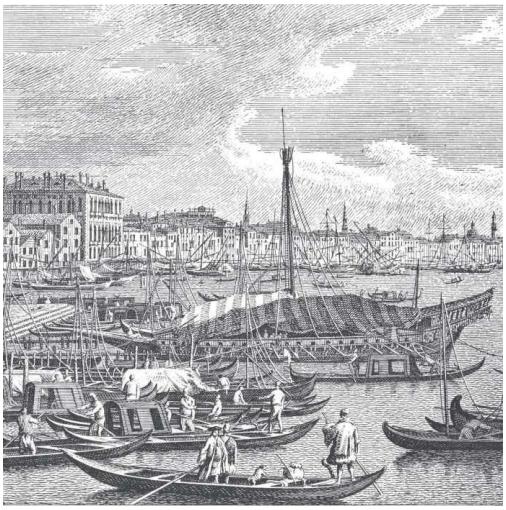
尽管威尼斯想尽各种办法，但仍然无法摆脱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与海洋国家相比，陆地型国家对土地的执着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哪怕只是扩张了一丁点儿的领土，也会令他们感到异常满足。面对这种欲望和实力都很强大的对手，威尼斯无计可施，唯有见机行事。

自1463年开始的250年间，威尼斯与土耳其有70年处于交战状态。威尼斯共和国靠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机应变，总算撑了过来。世界正发生巨变，城邦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东方和西方都迎来了中央集权的大国时代。威尼斯就像一位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小船的船夫，左躲右闪，提心吊胆。

话说回来，在与穆罕默德二世签订和约10年之后，威尼斯再次以一贯的行事方式，没用一兵一卒，便成功地合并了塞浦路斯岛，填补了因失去内格罗蓬特而出现的海外基地的漏洞。

（作者注：有关塞浦路斯的合并，请参考《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第四章）

第九章
朝圣之旅



符腾堡（Württemberg）伯爵有一次对多明我教派的修士施密特（Schmidt）说：“世界上有3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人们推荐。第一是结婚，第二是战争，最后是朝圣。”

时值1480年。意大利米兰公国的官吏桑多·布拉斯卡（Santo Burrasca）终于如愿以偿，即将动身前往圣城。

无论是眼下还是在500年前，有职在身的人想请长假，都得呈交申请。桑多因为要离开半年以上，所以必须找好这段时间的代职人。除此之外，考虑到旅途中死亡的可能性，于公于私，身后事都得交代清楚。工作上，他决定了职位的继承人，私人财产则指定由兄长埃拉斯莫（Erasmo）继承。桑多·布拉斯卡35岁，独身，日后担任派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不过在去朝圣前，他还只是一介小官僚。桑多·布拉斯卡以去圣地朝圣为由提交的休假申请，于3月28日获得批准。之后的故

事，皆来自于他的旅行日记。

先去威尼斯

4月29日出发的当天，布拉斯卡所居住的教区的神父为他举行了弥撒。随后，其兄弟和朋友一路送行至帕维亚。布拉斯卡的兄弟以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官吏。他们不仅擅长拉丁语，也懂希腊语，算是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行人顺道参观了意大利最美修道院之一的帕维亚修道院，当晚住宿当地。

4月30日，布拉斯卡和送行的人们聊天打发时间，等待着从当地出发，沿波河南下开往威尼斯的船只。

5月1日，接近正午时分，布拉斯卡登船，就此与兄弟、朋友告别。船上大多的乘客都是从米兰去威尼斯做生意的商人。船离岸之后，商人们拿出上等的玛尔维萨（Malvasia）葡萄酒和食物与布拉斯卡分享。这些习惯于旅行的人们，准备向来都很周全。当晚，乘客们在河岸边的村落住宿。

5月2日，布拉斯卡在克雷莫纳（Cremona）下船，去拜访当地的友人。估计航船是为了那些在克雷莫纳有生意的乘客作短暂停留，布拉斯卡便利用这个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当晚，他住在曼托瓦侯爵领地内卡萨尔马焦雷（Casalmaggiore）。

5月3日，布拉斯卡中途独自下船，参观了圣贝内代托修道院（San Benedetto）之后，在当地投宿。次日清晨，他乘坐雇用的小船赶上了大船。

5月4日，他住在费拉拉。这里是艾斯特公爵所属的领地的首府，有

许多优美的宫殿。布拉斯卡再次利用其他乘客谈生意的间隙，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包括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宫殿在内的城中各处景点。

逗留威尼斯

5月6日，航船抵达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基奥贾。

5月7日，顺河而下的航行至此结束。直到正午时分才等来顺风，航船乘风扬帆，驶向威尼斯。

下午3点，抵达威尼斯。这是桑多·布拉斯卡平生第一次看见威尼斯。他将借住于友人家中，直到6月5日。因为他预计搭乘的加莱船尚未做好武装的准备。布拉斯卡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观光游览威尼斯城。

以上是桑多·布拉斯卡在其游记中所记录的内容。实际上，他和其他朝圣者这一路都是被威尼斯共和国的观光政策牵着鼻子走。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的国度。商人对于任何可能赚钱的买卖都有兴趣。去圣地路途漫长而且随时可能会遭遇延途匪徒的侵害，然而朝圣从来就是西方基督徒的梦想。而海洋国家的威尼斯有很多船，完全可以将朝圣作为一盘生意来经营。

于是，喜欢“行政主导”的威尼斯，举国上下积极地投入了朝圣观光事业。首先，他们张贴12世纪末教皇颁布的特赦令：但凡在耶稣升天节造访威尼斯，参拜安放在当地的圣遗物的教徒，可以获得“完全赦免”。

当年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相争至末期之时，威尼斯曾经出力提供了

双方会谈的场所。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别赐予威尼斯提供“赦免”的特权。除了修道院、教堂之外，拥有此特权的城市，唯有罗马和威尼斯。

罪得赦免，可以吸引来很多虔诚的信徒，因此产生的利益不言而喻。1480年的耶稣升天节是5月11日。桑多·布拉斯卡当然不会错过，他敬拜了圣遗物，并且在日记上写下“完全赦免”。

这还不算完。继耶稣升天节之后，还有圣灵降临节、耶稣圣体节等，每隔10天就会赶上一个节日。节日期间，圣遗物向民众开放，圣马可广场上会举行盛大而且充满异国情趣的游行。威尼斯贵族们陪同着每一位来自西欧各地等待搭船的朝圣者参加庆典。威尼斯的这项政策，深得朝圣者的好评。

中世纪时盛行崇拜圣人的遗物和遗骸。这对那些没有供奉圣遗物的教堂、修道院的经营相当不利。不过，威尼斯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拥有的圣遗物，无论质或量在西欧都是名列前茅，据说仅次于罗马。

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期间，尽情地饱览了那些神圣的遗物。

他在圣安东尼奥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Antonio de Padua）敬拜了福音书作者之一圣路加的腕骨、十二使徒之一西门的脚骨、圣女乌苏拉（Ursula）的腿骨、耶稣所戴的荆棘冠上的一根刺以及钉耶稣的十字架的木片。

之后又去圣救主堂（San Salvatore）敬拜殉教者圣西奥多（Theodore）的身体、圣西斯笃（Sisto）的头盖骨、使徒圣安德烈的手腕和使徒巴多罗买的腕骨。除此之外，还有圣克里斯托弗（Cristoforo）的牙齿、圣乔吉奥（Giorgio）头盖骨的一部分和腕骨等。

如果要追究这些东西的真伪，事情就没法讲下去了。日本之前不就因为圣撒母耳的手掌还是手臂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吗？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参拜的圣遗物的数量，大概有上述所列的4倍之多。

话说回来，威尼斯政府为逗留当地的朝圣者所准备的观光内容不只是宗教活动。朝圣者还可以参加世俗的庆典，参观世俗的建筑。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记录：

“我去看了在利多海滩举行的“威尼斯与大海的婚礼”。元首面对大海叫着“我要和你结婚！”，然后将手中的戒指丢入海中。这个仪式象征了威尼斯与大海密不可分的关系。无数的贡多拉上面坐着身着华服的男男女女，他们跟随着元首的绯红色御用大船，景象宛如一幅美丽的壁画。

“我还参观了造船厂。它是国有的，兼做存放炸药和大炮的仓库。在这里，可以看见所有类型的船只。5间大屋里摆满了兵器。另外两间大屋内，有很多女人正在织帆布。这座造船厂每年花费的材料和人工费的总和据说要20万达克特。边上还有正在兴建中的新船厂，听说竣工后可以同时建造100艘大型加莱船。场面非常之壮观。除了威尼斯，没有任何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造船厂。

“只要有空闲，我便会去圣马可教堂。教堂内从下至上全是马赛克镶嵌画，美到无以言表。我还参观了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和相邻的圣洛克大会堂，也参加了在圣巴尔托洛梅奥教堂为众多在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举行的例行弥撒。弥撒用德语，不少来自德国的朝圣者也加入了其中。

“我去了元首官邸，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一句话，真是精彩绝伦。最顶层有一个巨型大厅，元首的座椅面向大海。大厅的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油画。有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所作的皇帝与教皇的和解，以及由真蒂莱·德·法布里亚诺（Gentile de

Fabriano）创作、詹蒂利·贝利尼修复的海战画。这些画作中，贝里尼家族两兄弟乔凡尼和詹蒂利所绘制的壁画堪称压卷之作。”

桑多·布拉斯卡所见到的那些作品在1577年的火灾中被烧毁。如今我们看到的墙壁或天花板上的丁托列托、委罗内塞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作。

话说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不愧是一位官员，他对威尼斯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似乎特别感兴趣。在参观国会大厅时，他注意到国会是由25岁以上的贵族男子所组成；参观元老院会议厅时，他甚至记下了座椅的数量，而且还提及国外来的公文，就在此处宣读的细节。也许他本人就是负责誊写米兰公国写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文等事务吧。对“十人委员会”房间的记录，他非常准确地点到了这个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机关的特征。

参观元首官邸，会有专人负责导览。与今日不同，当时政治、行政、司法都在官邸内运作，所以只能选没有会议的日子或时段向朝圣者等外国游客开放。位于官邸内的监狱自然是挂上了“闲人免入”的牌子。

由官员而不是专业导游陪同参观的场所除了元首官邸还有造船厂。这并非是针对产业间谍，而是为了防止军事间谍。哪个国家都不会愚蠢到向外国人公开所有军事上的细节部分。由专人导览，就是为了巧妙地避开一些敏感的地方。

当然，逗留威尼斯的朝圣客并不全是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威尼斯人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在圣马可广场，为普通的游客举办了各种珍奇的表演。许多人第一次看见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还有灵活地用脚吃饭喝水的无臂女人等。这些节目让外国游客们既感到惊奇万分，又为日后回国有了谈资而兴奋不已。不少人还好心地赏

钱给表演者。

如果想登高眺望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可以去圣马可的钟楼。想去看威尼斯著名的玻璃工坊，可以搭乘来往于穆拉诺岛的专船。由于制作玻璃需要用火，因此常有火灾发生。为了防止大火蔓延至市中心的街区，从13世纪开始，威尼斯将所有的玻璃工坊，都迁移到了穆拉诺岛。

各种观光活动中，受到所有游客（无论知识精英或平民百姓）热捧的莫过于观赏从海外归来的威尼斯舰队的雄伟场面。

桑多·布拉斯卡见到的是出征6年归来的海军统帅安德烈亚·洛雷丹率领的舰队。洛雷丹是斯库塔利防守战的指挥官，在抵抗土耳其的战役中，他率领的军队顽强抵抗住了兵力在10倍以上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在前一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历经16年的战争，威尼斯人可谓是刻骨铭心。不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威尼斯人几乎倾巢出动，涌向港口，迎接战士归来。

加莱军船一艘接一艘地驶进港口，高高的桅杆上飘扬着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绯色的威尼斯国旗。摆放在港口的整排大炮齐鸣礼炮，轰隆隆响彻云霄。这一切，看在桑多·布拉斯眼里，简直就是古罗马凯旋式的重现。

有那么多喜闻乐见的观光项目，一个月的等船时间转眼即逝。当初那些紧赶慢赶抵达威尼斯后，被一个月后才能出发的现实弄得沮丧不已的朝圣者们，也一扫心中的郁闷，因为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参拜圣遗物，充满异国风味的威尼斯的美丽景象，让他们心满意足。当然，威尼斯人也十分满足。朝圣者们逗留一个月所带来的利益十分可观。不过，真正体现威尼斯精神的并不是这些华丽的场面。

在圣马可广场、里亚尔托桥以及斯基亚沃尼河岸等外来游客首先会造访的景点，不论白天或黑夜，每天都有两人一组的巡逻员。这些被称为“托洛马利奥”的男人，不是警察，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务员，专门为外国观光者特别是朝圣者服务。

威尼斯设有德意志商馆等为各国商人服务的咨询机构，所以外国来的商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但朝圣者却无法利用这些设施。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有朋友家可以借住的游客毕竟在少数。因此，当“托洛马利奥”遇见外国来的朝圣者时，常常会主动向前礼貌地询问：“需要为您提供帮助吗？”

这些工作人员通常两人一组，会讲德语、法语和英语3种语言。因为朝圣者中来自这3个国家的人数最多。

在没有酒店预约制的那个时代，朝圣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住宿问题。巡逻员们基本上看一眼客人的装束，就能估计出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过出于礼貌起见，还是会先问一下大概的预算，然后根据客人的回答，带去相应的旅店。

对于那些想尽量节省的朝圣者，巡逻员会介绍他们去只要捐一点儿善款略表心意就可以住宿的修道院。朝圣者们身上都带着故乡所属教会的神父写的介绍信，所以不会有被当成流浪者的误会，教会的介绍信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的护照。

如果是经济上稍有宽裕的朝圣者，会被介绍到二、三流的旅馆。威尼斯政府非常重视住宿设施的卫生和安全，所以哪怕是等级略次，客人同样能够安心入住。各地区的卫生员，每周去旅馆做一次例行检查，从被褥到厨房，角角落落都不放过。而旅馆方面，则有义务将每天住宿的客人名单提交给负责的官员。

至于那些出手阔绰的客人，巡逻员们自然会推荐他们去外国国王、大臣等要人们下榻的最高级的酒店。根据1355年制定的旅馆公会法，被列为高级酒店的有“英国女王馆”“法国之盾馆”“马耳他十字馆”“白色狮子馆”。

这些酒店不是以西欧惯用的数字来做房间号，而是像日本和式旅馆似的每一间都有一个名字，例如“国王房”“太阳房”“天使房”等。

尽管酒店的主人几经更换，但酒店本身却经久不衰。18世纪末造访威尼斯的歌德、19世纪初的司汤达，都下榻于“英国女王馆”。

客人们在被推荐的旅馆，心满意足地度过威尼斯的第一个晚上之后，大概都会为翌日清晨突如其来的访客而感到吃惊。来人正是昨天遇见的那位会说客人家乡语言的巡逻员，他是为帮助客人采购旅行用的必需品而来。这项服务没有对象之分，不管是住在高级酒店的有钱人，还是睡在修道院大通铺木床上的小老百姓，统统都能享受到。

除了个别狂热的教士之外，很少会有所谓经验丰富的朝圣者。大多数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远行，对航海、前往中东沙漠地带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不太清楚该带些什么物品。如何配置长达6个月的旅行装备，就需要有专家给出温馨提示。巡逻员们会带客人去专门销售旅行用品的商店，此类商店在威尼斯有将近20家之多。

由于船上和沙漠的晚上都会很冷，因此首先要买的就是能裹住全身的大而厚的毯子。颜色上没有特别讲究，随个人喜好。不过专家往往会建议客人避免金、银线编织的毯子，因为太显眼会被当作有钱人，招来沿途歹人的勒索。选好毯子之后，接下来是衬衣。朝圣者大多爱干净，

专家一般都会让他们多买些备用。想要有一个舒适的长途旅行，床单、擦手巾、餐巾之类也都是不可欠缺的物品。

一些没有坐船出门过的朝圣者，甚至会提出买床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威尼斯观光局公务员，巡逻员们会很和善地告诉他们买一条垫被足矣。老实说，要是人人都带张床上船，哪有摆放的地方。当然，这种话公务员只会放在心里，绝不会硬邦邦地脱口而出。

“如果是垫被，您回到威尼斯后，可以转手卖出。”专家又给出了一条建议。

在威尼斯有买卖二手商品的店铺，甚至还有出租旅行用品的店家，租金是1.5达克特。朝圣用的床垫与现代的西式弹簧床垫不同，反倒像一床棉被，可以折叠。

还有一样东西是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设有很多抽屉的小柜子。柜子是用来存放私人用品的，所以门上带锁，而且容易搬运。由于使用方便又有纪念价值，大多数朝圣者都会把柜子带回故乡，因此很少会出现在二手商店。另一个必需品是小脸盆，虽然目的是为了洗脸，结果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呕吐。不过，朝圣者们通常是要在上船之后才会明白这一点。

食品的采购也十分重要。尽管朝圣费用中包括了船上以及在圣地朝圣时的所有餐费，吃的东西算不上是必需品，不过每个人的口味迥异，何况在船上无所事事，难免会有嘴馋的时候。市场上火腿、意大利香肠、腌肉、芝士等适应长途旅行的腌制食物应有尽有，客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另外还有烤得很硬的饼干、糖渍水果、坚果等经过脱水处理的小吃。英国人爱吃的培根当然也是有卖的。

饮料也是需要考虑的。助消化的帕多瓦产的葡萄酒、防暑的含果实的糖浆、晕船时喝的生姜糖浆，都是巡逻员推荐的，而且还不忘温馨地提醒说糖浆得兑水喝。

也不知是不是打算吃培根煎蛋，有人希望买新鲜鸡蛋。于是，巡逻员建议他们买活鸡带上船。为了提供生鲜肉类，船上有关动物的笼子，活鸡可以养在边上。

买了各种东西，出发前放在哪里呢？这一点也无须担心。只要告知出发的日子，届时店老板会把商品送到港口。这些店铺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不能出售黑心商品，也不能漫天要价。如有不满，朝圣者还可以向他们专用的法院提出申诉。巡逻员与旅馆、商铺之间也不会有利益勾结，因为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是要被判死刑的。

采购完生活用品，剩下来要买的，就是最重要的船票。船票需要在决定了乘坐的航船之后才可以购买。

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之后，通常会有两艘朝圣专用的船停泊在斯基亚沃尼码头。船员们成群结队地站在码头上，口中不停地吆喝，招揽客人。1480年这一年，只有一艘朝圣船。虽然一年前威尼斯结束了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但之后土耳其军又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攻打罗德岛等动作不断。考虑到东地中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威尼斯政府决定当年只发一艘朝圣船。这里说的一艘是指朝圣专用船，除此之外搭商船去圣地的朝圣客年年都有。无论如何，我们的桑多·布拉斯卡先生无须为挑选船只而烦恼，他坐的船是由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Agostino Contarini）担任船长的大型加莱船“孔塔里纳”号（Contarina）。

从孔塔里尼船长的姓氏便可以知道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威尼斯贵族。其兄长安布罗基奥（Ambrogio）是威尼斯的驻外大使。威尼斯的贵族家庭，通常只有一到二个儿子参与政治，其余人都经商。

与其他贵族子弟一样，阿戈斯蒂诺也是从20岁开始出海，常年来往于东地中海。桑多·布拉斯卡坐船的那年，阿戈斯蒂诺年近50，已经是被人们叫作“西风阿戈斯蒂诺”的航海老手。那以后，他又连续驾驶了16年的船，将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们运往圣地。

接下来，我介绍一段文字，是1458年参加朝圣的帕多瓦的骑士卡波迪利斯塔（Capodilista）所写，内容涉及我们很关心的费用问题。

“如果打算享受一段悠闲的船旅，每个人必须准备60达克特。其中，从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往船票是35达克特——40达克特（含船上的餐费以及出入国关税），抵达巴勒斯坦后，需支付15达克特给当地的穆斯林，作为参拜圣地、圣遗迹的费用。另外，在圣地逗留20天左右的费用是由朝圣者本人负担，因此一共至少需要60达克特。”

60达克特的费用，会不会让很多朝圣者望而生畏呢？倒也未必。因为35达克特是一等舱的船费，船上另外还有二、三等舱，费用大约在20达克特——25达克特之间，还有更便宜的15达克特的舱位提供。不过，付给朝圣地穆斯林政府的15达克特是不能少的。基督徒们朝拜圣地的虔诚之心，与当地穆斯林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当地人在这件事上是绝不会向基督徒打折送优惠的。

有趣的是，桑多·布拉斯卡的朝圣费用，与22年前的卡波迪利斯塔竟然完全一样。

布拉斯卡指出，如果想保持绅士的姿态，做从容的旅行，至少需要携带150达克特。其中的50达克特作为生病等不测时备用，另外的50达克特——60达克特付给船长。

看上去费用似乎比22年前上涨了35达克特——40达克特，如果查其明细，便会发现，除了包含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回船票（当然含餐费）和出入国关税之外，1480年的费用中还包括在圣城的参拜费（这部分依然是付给当地的穆斯林官员）以及在巴勒斯坦20天的驴子费，即交通费。所以，费用不仅没有上涨，反而比以前更便宜了。

费用的减少，估计是与威尼斯人组织团体朝圣旅行有关。以往的个别支付改成一次性统一付款，降低了成本，换言之，就是打了团体折扣朝圣者也省去了不少麻烦。除此之外，威尼斯还为希望环西奈半岛（Sian）的朝圣客，准备了“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途经西奈半岛、开罗，抵达亚历山大港。然后在亚历山大坐船返回威尼斯。这条路线的费用，另外需要支付23达克特。

减少旅行者的负担，尤其是手续上的麻烦，是决定观光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打算去朝圣的人，必须事先准备3种证明。

第一是所在教区的神父签署的证明，相当于朝圣者专用的护照。

第二是罗马教皇颁发的朝圣许可证。如果没有这张许可证，朝圣者们因参拜圣迹而获得的宗教赦免都是无效的，所以教皇的许可证是朝圣者必备的文件。

第三是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都在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因此基督徒朝圣，必须得到穆斯林国家的通行许可，也

就是“签证”。第二和第三种证明，威尼斯政府可以代为办理。朝圣者大多不了解异国状况，又有语言障碍，擅长处理这些事务的威尼斯人愿意帮忙，的确让朝圣者们轻松了很多。至于第一种的“护照”，是在自己居住地办理的，倒不是什么难事。

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同类活动相比，威尼斯策划的朝圣事业，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们专门出台了“朝圣事业法”，明确规定了船上限载的人数，其目的是为防止超载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船内食品质量的监督，以及武装士兵与医生必须随船同行等。威尼斯人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为保证旅客出行的安全与舒适而做出各种努力。

如果朝圣者不幸在途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将视当时的情况，尽量妥善处理遗体，并将死者的遗物送返给其家属。船长必须依照死亡的日期，退还剩余的旅费。如果是法国人的船，情况就大不同了。由于没有法规，旅行中死亡的人的遗物通常都会归船长所有，至于退还余款，就更不能指望了。

威尼斯之所以能在朝圣这项中世纪最盛大的观光事业上200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正在于此。而作为竞争对手的马赛，最终却远远地落后于威尼斯。

其实，马赛在地理上是有优势的。姑且不论德国人，英国、法国人要去朝圣，肯定是从马赛上船方便。虽然从威尼斯或马赛出发，海上的日程没有多少区别，但从马赛走，可以省下横断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意大利北部这段陆地行程。更何况，马赛的船费还比威尼斯便宜一成。

然而，大多的朝圣者，甚至是法国人，都愿意选择从威尼斯上船。那个时代最好的广告宣传，是客人的口口相传。深谙此道的威尼斯人的

商业运作，明显是发挥了功效。

启程

过完6月1日的基督圣体节之后，朝圣船的周边随即热闹了起来。一批批的行李被运上船，开船日定在6日。桑多·布拉斯卡也不时地来码头看热闹，他发现这次有90人乘坐“孔塔里纳”号前往圣地，其中包括他的主人米兰公爵的伯父日内瓦主教，以及列曼主教和4位英国贵族等高贵人物。那位令符腾堡伯爵犹豫，不知是否该推荐他去朝圣的多明我派修士施密特也在同一条船上。

在那一次的朝圣中，有三位朝圣者的旅行日记留存下来。一位是桑多·布拉斯卡，一位是修道士施密特，还有是一位法国的无名氏。

（以下叙述为三位朝圣者的视角）

6月6日。早晨6点，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的目送之下，“孔塔里纳”号离开了港口。海上微风徐徐，船长下令三根桅杆上都挂起船帆。不久，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出现了伊斯特拉半岛的山影。伊斯特拉半岛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拥有波拉和波雷奇（Parenzo）两个优质的港口。下午4点左右，船行驶了大概有90海里，大家都相信今天能够抵达波雷奇。

不料，风向突然转成西罗科风。这股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逆风，让原本一路乘风破浪的航船，顿时变得举步维艰。

6月7日，依然刮逆风。船只能顶着逆风迂回航行。傍晚时分，朝圣

者们齐声合唱圣歌，水手们也随声应和。

6月8日，早晨5点，航船总算靠近了波雷奇港。水手们迅速降下船帆，划桨手们全力以赴地将船划进了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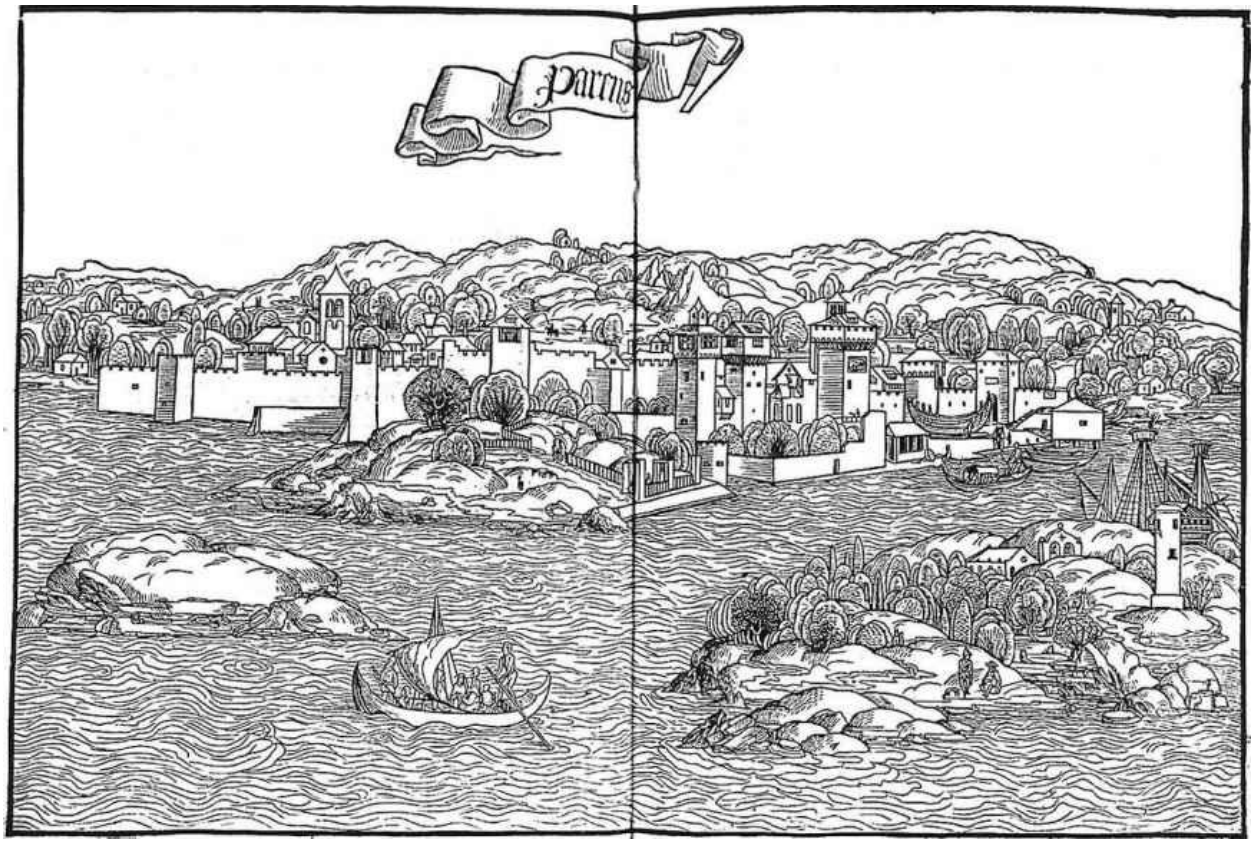
我们被告知将在波雷奇停留到周六。虽然淡水和新鲜的食品的补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是不少朝圣者因逆风航行而感到不适，需要调整休息几天。不需要休养的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参拜了航海者的守护神圣尼古拉教堂。我和桑多·布拉斯卡也加入了参拜者的队伍。

6月10日，傍晚时分，船离开了波雷奇。夜里，船靠划桨前行。翌日早晨，终于升起了船帆，刮的还是逆风。整整一个晚上，不知有没有走出40海里。

接近中午时分，一位划桨手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据说他的妻儿死在了威尼斯的隔离医院。他似乎染上了黑死病，很快就不行了。海葬亡者之后，船长和朝圣者们一起举行弥撒，祈求上帝保佑，不要被传染上黑死病。

6月14日，抵达了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扎拉。这里面向大海，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非常气派。它曾经被匈牙利国王统治过一段时间，如今再次成了威尼斯的领地。从海上眺望这座雄伟的城市，朝圣者们无不为之感叹，大家都希望能上岸参观。然而，扎拉的威尼斯代理长官却以船上可能有黑死病的理由，拒绝旅客上岸，连船长也未被获准上岸。

刮起了顺风，船继续前行。傍晚，从船的左舷方远远望见斯帕拉托城。无数的海豚围着我们的船，乘客们纷纷涌上甲板观看这珍奇的景象。水手告诉我们，这是幸运即将降临的前兆。但愿如此。



波雷奇（随朝圣者同行的素描师、木版画）

6月16日，太阳升起后，发现船的前后方聚集了比昨天更多的海豚，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沉入海中，着实可爱。就在距离莱西纳岛还有5海里的时候，又刮起了西罗科风（东南风）。附近海域多暗礁，继续航行会有危险，船长决定抛锚。乘客们下船，有人在海礁间戏水，有人在附近采集香草，享受岸上的时光。

6月18日，风向改变，升起船帆，沿着莱西纳岛航行。顺风时须尽量赶路，船没有停靠莱西纳的任何城镇，直到日落后抵达科尔丘拉岛。

就在靠港收帆时，发生了事故。收帆时，应该一面慢慢降下帆桁，一面折起帆布，但这次因为水手动作过猛，帆桁砸到了站在下面帮忙折叠帆布的弓弩手的头上。事情发生以后，船长严格指示，当船进港或遇到风向转变，需要升、降船帆时，乘客们必须集中在船尾安全处。类似的不幸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米兰
0 100 200 300km
N
威尼斯
波雷奇
费拉拉
波拉
西尼亚
比萨
拉文纳
佛罗伦萨
亚得里亚海
扎拉
安科纳
希贝尼克
斯帕拉托
莱西纳
科尔丘拉
罗马
拉古萨
卡塔罗
布德瓦
乌尔齐尼
斯库塔利
那不勒斯
阿马尔菲
巴里
都拉佐
布林迪西
发罗纳
奥特兰托
特拉帕尼
巴勒莫
墨西拿
科孚岛
普雷韦扎
帕特拉斯
西西里
圣塔莫拉
凯法罗尼亚
锡拉库萨
赞特岛
伊奥尼亚海
科伦
马耳他
莫东

6月19日，为了补给淡水和食粮，船会在科尔丘拉岛停靠至正午。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镇上的圣方济会修道院。院长虽然已经70岁，但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曾经长期旅居耶路撒冷，给了我们这些朝圣者很多鼓励。接近正午时，修道院长亲自驾驶小船送我们回到加莱船上。

海面上吹起了凉爽的波南脱风（西风），晚上9点左右便抵达了距离科尔丘拉70海里的拉古萨。

6月20日，全体乘客上岸。拉古萨是一座景色优美、防守坚固的城市。它位于两座山的山谷之间，两面依山，另外两面临海。铺着石子的街道，非常美丽，感觉有点儿像威尼斯。

我们参观了街上的大教堂，建筑虽然不大，却很精美。教堂中陈列着许多银制镀金的圣像，显示了这个城市的富足。圣遗物也很多，被安放在银制的供桌上。拉古萨是一个共和制的独立国家，但他们现在必须要向匈牙利王、那不勒斯王和土耳其的苏丹缴纳年贡，据说一年的总额是2.5万达克特。

6月21日，黎明之前，全体人员在船上集合。海上吹着对航行绝好的西风。离开拉古萨之后，风越来越强，仅靠中央桅杆的一张大帆，船便像箭一般地飞快地掠过了卡塔罗、布德瓦（Budua）、安提巴里（Antibari）等威尼斯领地，已经归属土耳其的斯库塔利地区那些高山也渐渐从视野中消失。航行至深夜，大概走了250海里。

6月22日，晚上继续航行。在天亮前两小时，风速开始减弱。三根桅杆上都挂起了帆。在太阳升起之时，抵达都拉佐。这里也是威尼斯的领地，不过归阿尔巴尼亚地区管辖。都拉佐是一座古老的城镇，是古罗马时代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的起点，衔接着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的阿皮

亚大道。从埃格纳提亚大道可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恺撒、布鲁图都是由此向东行军。

正午过后，停了一阵子的海风再次吹起。感谢上帝，是西风。水手们立刻升起所有的船帆。船沿着土耳其领地的发罗纳左岸一路南下。发罗纳是土耳其最西端的基地，那里停泊着上百艘战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心中祷告，希望风刮得再强劲一些。船行至距离拉古萨200海里左右，进入奥特兰托海峡。一路至此，是在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中航行，之后就是伊奥尼亚海了。

就在接近黄昏、改吹西南风之际，两艘土耳其的帆船从发罗纳方向渐渐朝我们的船逼近，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有和平条约。和约中规定，当土耳其军队要求停船时，威尼斯必须服从命令。遇到这种情况，有和约在身的威尼斯人也许没事，我们这些非威尼斯人可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虽然阿戈斯蒂诺船长承诺会保证乘客的安全，大家还是忐忑不安。倒不是威尼斯人的话不可信，而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穆斯林究竟在想些什么，会做出怎样的行动。

所幸，海上及时地吹来西罗科逆风。“孔塔里纳”号被风推着朝意大利方向移动。土耳其人操控船帆的本事不如威尼斯人，他们的船没有往西，而是被吹到西北面去了。眼看着越漂越远的土耳其船，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前画十字感谢上帝。

6月23日，恼人的逆风依旧。船在后退，从水平线上竟然可以看见意大利的群山。水手们吃力地操控着船帆，结果又被吹向东面，回到了距离发罗纳30海里之处。我们乘坐的是加莱船，船高近似于帆船，因此受风的阻力也大。正逢施洗者圣约翰节的前夜，全体朝圣者向圣约翰祷告，愿他能保佑我们不受异教徒的攻击。

6月24日，夜半时分，也许是圣人听见我们的祷告，改吹东北风。次日早晨，船已经接近科孚岛，从这里开始就是希腊了。最重要的，是

这里属于威尼斯的领海，风向转顺。

不久，负责近海警备的威尼斯加莱军船向我们驶近。依照惯例，引导我们的船前往科孚岛的港口。夜晚，抵港。

这里不仅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海军基地，也是负责附近海域防御的海军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港口整齐地停泊着22艘加莱战船。

舰队总司令维克多·索拉佐（Victor Sollazzo）似乎并不赞成我们继续前行。他为我们能够毫发无损地通过发罗纳外海感到侥幸。因为就在不久前，土耳其刚派出64艘战船北上去增援发罗纳防守舰队。另外，由350艘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自上一年的12月开始，向罗德岛发起攻击。总司令虽然没有强迫停止旅行，但他建议我们最好认真商议。

回到船上后，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由个人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前进。日内瓦与列曼的两位主教决定中途折返，另外还有20位朝圣者也决定就此止步。

我已习惯了旅途，而且很少晕船。更何况回路未必安全，旅费又已支出，所以决定相信神的慈悲，继续这趟旅程。既然能躲过发罗纳的危险，或许也能够避开罗德岛的危险。不过，船上还是有1/3的朝圣者放弃了前行。

我们向索拉佐总司令报告结果，他要求继续前行者在科孚岛等待7天。因为从克里特岛开来的加莱船即将抵达，等听完他们的报告后，再做出港的决定。

克里特岛来的船于6月30日抵达。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罗德岛外海附近，两艘威尼斯船因没有听从土耳其降下船帆的要求而遭逮捕，不过随即就被释放。闻讯后，阿戈斯蒂诺船长和我等朝圣者决定向东进发。

由于发生了不少事情，没有余暇观赏风景。科孚岛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岛屿，四处开满了鲜花，茂密的冷杉树勃勃生长，延伸至海滩。它让我想起了米兰的科莫湖（Lake Como），时不时会将此地当成故乡。

7月1日，众人完祷告后从科孚岛北端的港口起航。从海上眺望高高矗立于岩石之上的雄伟的城堡，威风凛凛，犹如凌驾于大海之上，不愧为威尼斯重要的基地。三艘加莱船从港口引导我们行至三海里之外的外海。风力微弱，当我们通过30海里远的科孚岛南端时已经入夜。

7月2日，午夜之后，风力增加。船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行，至清晨大约已开出100海里。凯法罗尼亚岛（Cephalonia）从我们眼前飞快地掠过，那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地，8年前归属土耳其。紧接着，赞特岛（Zante）也从左舷侧一望而过，这个岛目前还属于威尼斯。一路顺风顺水，到黄昏时，已经驶出约220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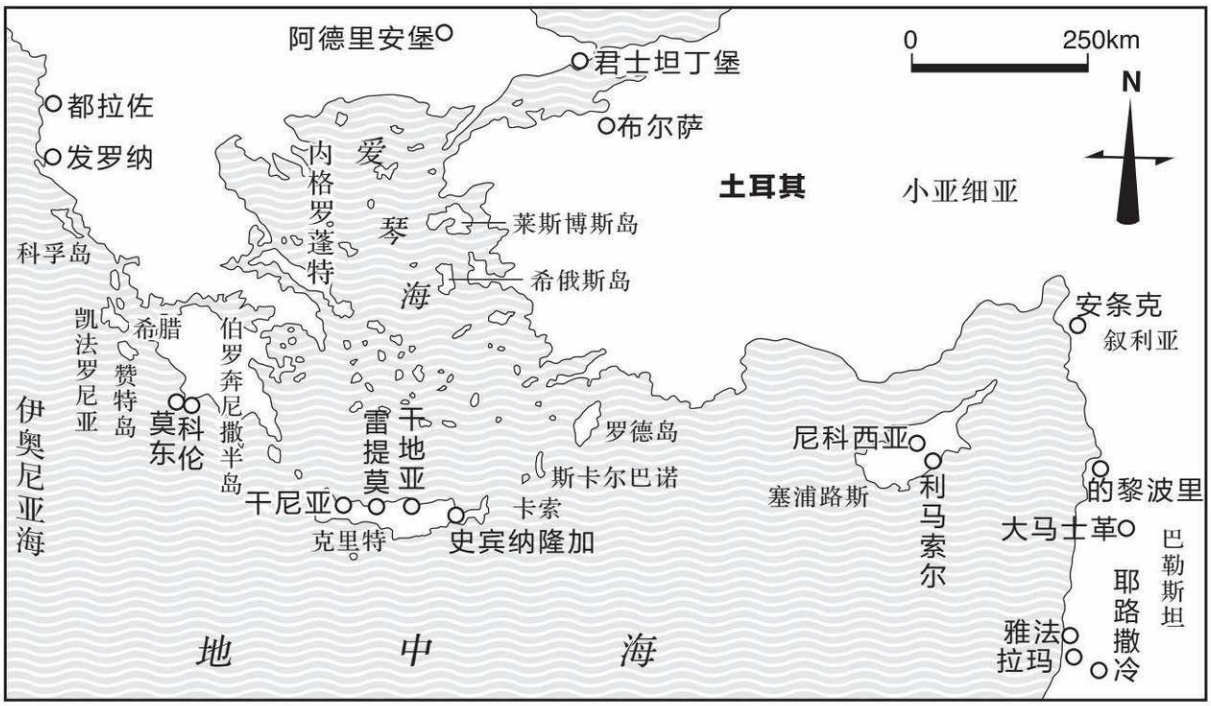
7月3日，一整天未遇劲风。船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行至傍晚只航行了80海里。

通过近一个月的船上生活，我发现乘客们的情绪，完全是随着船速上下波动。顺风满帆、船如飞箭时，众人心情开朗，相互包容、友爱，也没有人抱怨食物不好。大家在甲板上学习水手行走的姿势，享受着海上的时光。

可是，一旦风向逆转、风力减弱而影响船速，或者强风吹击，导致船身颠簸，乘客们立即变得烦躁不安。有人怀疑早餐供应的玛尔维萨葡萄酒是假的，有人不满备餐的速度太慢，甚至有人竟然指责水手偷了他带上船的母鸡生的鸡蛋。

其实，这种时候应该安静地思考，或者弹弹鲁特琴（Lute）、阅读

书籍来度过。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船顺时，亲如兄弟；不顺时，翻脸成仇。所幸，还是有不少学识之人。他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常常交换各自的经验，谈些熟悉的话题。如果将这些谈话汇总起来，定是一本精彩的书籍。



东地中海周边

7月4日，早晨8点，总算到达了莫东港。莫东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它与附近的科伦是威尼斯重要的基地，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从地中海开往黎凡特（Levant，即东地中海）的船只，来或去都必须在此地靠港。“孔塔里纳”号会在这里停泊两日。

这座港口小城建造于平地之上，坚固的城墙环绕四周。无论是码头的建造，还是修船厂的设备，都相当完善。港口建有长堤以抵挡外海的侵袭，可供百艘船只避难或等候顺风。堤防上设有很多的风车，可以用来磨小麦粉。城中的防卫似乎固若金汤。这里与土耳其的领土仅三英里（约4.8公里）之隔，自然是需要做好万全的措施。这里由威尼斯元老

院选出的代理长官负责治理。

7月6日，黎明之前，划船离开港口后，立即升起了船帆。海面刮起屈拉蒙塔那风（北风）。虽然算不上是顺风，好在威尼斯水手操舵技术娴熟，没有人晕船。一天一夜，大概航行了130海里，航线为东南方向。

7月7日。接近正午时，船经过切利戈岛（Cerigo），据说这里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王后海伦的故乡。在古希腊的诗歌中，海伦就是在附近的吉切里咯小岛上举行献祭仪式时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拐走的。我们的船也从吉切里咯岛经过，现在是一个无人岛。

船继续向东南方航行了一阵之后，依稀可见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的西端。这座岛自1204年以来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最上等的葡萄酒玛尔维萨便产自于此。这里还盛产小麦，以人口众多、要塞坚固闻名。其中，首府干地亚（Candia）、西部的干尼亚（Canea）及其东面的雷提莫（Retimo）和最东边的史宾纳隆加，向来以攻克不破著称。

从右舷眺望着克里特岛的远山，至翌日清晨，船行百海里。

7月8日，划桨与船帆交替使用，一昼夜又航行了100海里。

我们乘坐的大型加莱船，左舷和右舷都有长形的木椅。每张木椅上坐着三位划桨手，人手一桨，俗称“特雷米”。起风扬帆时，划桨手可以休息。由于船桨是固定在木椅上的，从船头眺望，整艘船宛如张开翅膀的大鸟。船在出港时依靠船桨划行，即使是顺风也如此。

船帆是被称为拉丁帆的三角帆，架在三根桅杆上。根据风向，需要不断地转换帆的方向，或因风力大小，更换尺寸、厚薄不同的船帆，驾驶这样的船是一项很辛苦的作业。三角帆没有固定于桅杆之上，因此每

次交换船帆，都得升降桅杆。

如果使用四角帆，则可省下这些功夫。帆桁固定在桅杆上，只需要根据风力的强弱，调整船帆的宽窄。既然如此，那为何不选用四角帆呢？主要是因为它有在逆风中无法前行等缺点。地中海风向多变，即使遇上顺风，时间也持续不长。在逆风中航行，还是可以迂回前进的三角帆有利。

此外，带船桨的加莱船，比仅依靠帆的帆船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海风，船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滋味一定不好受。

7月9日，清晨时分，我们的船距离克里特岛的首都干地亚大约4海里。克里特犹如一艘长船，干地亚正好位于它的中间地带。船长下令降帆、抛锚，派书记官坐小船前往港口报告说船上乘客和船员无人染上黑死病，并向港口官员申请登陆许可。

过了一会儿，很多克里特人驾着小船而来。他们告诉我们，岛上之前流行黑死病，已经死了两万人。不过，近一个月内，再没有人因黑死病死亡。我们获准登陆，将在此停留4天。除了补给粮食和淡水之外，自科孚岛之后，再也没有踏上土地的乘客和船员，都需要做调整休息。众人为能上岸而欣喜万分。

克里特岛对罗德岛那边的战况非常了解。据说从海陆两地发起进攻的土耳其军队，频频使用大炮，城墙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圣尼古拉塔也被击毁。不过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带领岛民顽强抵抗，已杀敌5000。

干地亚宽广、富饶、秀美，四周建有城墙，港口入口也有塔楼。塔楼的高度正对准海上船只的船腹位置，上面挖出一排排的洞穴，洞口露出的大炮，让人不寒而栗。要从海上攻打这里，近乎妄想，不愧为威尼斯最重要的基地。

克里特岛首府干地亚

克里特岛属于威尼斯的领地，政治运作方式与本国相似，也有辅佐总督的委员会。岛上居住着许多威尼斯人，他们在很早以前便移居此地。这座岛屿在古代时就相当繁荣，最为著名的就是米诺斯王（King Minos）的统治时代。

7月13日黎明前后，离开干地亚港。正当顺风，且不断增强，一昼夜前进了250海里。卡索岛（Kaso）、斯卡尔巴诺岛被飞快地甩在身后。卡索是一座无人岛，斯卡尔巴诺岛则属于威尼斯领地。

7月14日，依旧受好风眷顾，船飞如梭。罗德岛从左舷侧闪过，船向东前行。航道距离罗德岛70海里，不会遭遇土耳其战船。众人虽然都在心中祈祷安全，但是当朝圣者必经之地的罗德岛从视线中消失时，还是哀痛莫名。

罗德岛归圣约翰骑士团所有。骑士团创立的目的就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治疗疾病。他们所在的罗德岛，自然是朝圣者的必到之处。如今，那里正遭受着异教徒的炮火攻击。船上所有的朝圣者都跪在甲板上，祈祷上帝保佑那些勇敢的骑士们。

7月15日，风势减弱，所幸仍是西风。从船左舷一侧，土耳其属地的小亚细亚依稀可见，连绵的山峦宛如烟云般漂浮于水平线之上。船朝着塞浦路斯岛的方向，一路向东航行。今天走了170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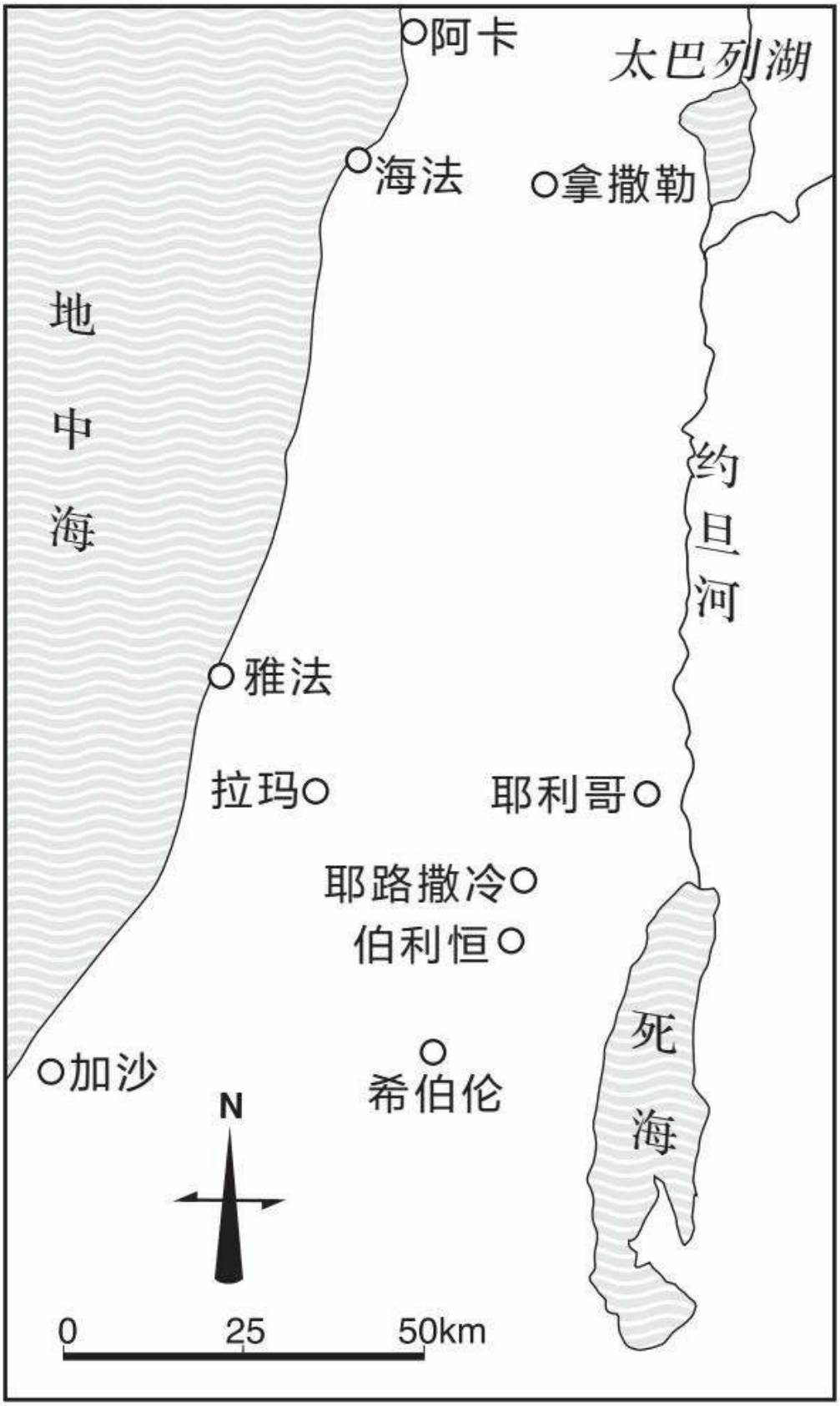
7月16日，接近正午，与正在塞浦路斯近海巡逻的威尼斯舰队擦身而过。我们的船开往塞浦路斯岛南端海角之一的阿斯普罗。进入海湾后，当地居民吹喇叭、敲大鼓欢迎我们的到来。代理长官甚至登上“孔塔里纳”号，向船长打听西欧的各种情况，并与我们同船，一起前往50海里外的利马索尔（Limassol）。

利马索尔是塞浦路斯岛南方最大的城市。它刚经历过土耳其的攻击，虽然守住了城池，但整个街道满目疮痍。我们将在这里停留到星期二。

7月19日，黎明之前，出港。顺风，一天航行了170海里。

船长待我如子，他今天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忠告。由于长途的旅行，我疏于清理胡子，船长说最好就让它这样留下去。没有胡子的人，有可能被阿拉伯人当作男色的对象，因此，他建议我在朝圣途中不要剃须。不仅是我，船上其他年轻的朝圣客们似乎也收到了同样的忠告。

7月20日，幸遇顺风。无须降下船帆，或转动它的方向，一气航行了100海里。当目的地雅法（意大利语读贾法）的身影出现在水平线上时，朝圣者们不约而同地跪在甲板上，唱起了“Te Deum laudamus”[1]。


阿卡
太巴列湖
海法
拿撒勒
地
中
海
约
旦
河
雅法
拉玛
耶利哥
耶路撒冷
伯利恒
死
海
加沙
希伯伦
N
0
25
50km

下午两点左右，进入雅法港。乘客们急着下船，却被船长阻止，在拿到通行许可证之前，绝不能上岸。众人无奈，只好待在船上等待。在这片异教徒的土地上，没有通行许可的基督徒，连上帝都无法保佑其安全。异教徒实在是太反复无常了。为了尽快地获得许可证，船靠港后，船长立即将书记官送往拉玛（Ramah）。等书记官拿到许可证回来，大概需要三天左右。

这几天，不断有阿拉伯人划着小船来兜售食品。这似乎是当地的习惯。托他们的福，上不了岸也有足够的东西吃。船长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各种巴勒斯坦特产的水果和食物。

7月24日早晨，翘首期待的通行证到了。和通行证一起来的，还有几十头骆驼和驴子，它们是我们前往圣地的交通工具。

晚上9点，终于下船。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洞穴，这里原来是十字军时代基督徒商人用来做仓库的，现在变得又破又脏。阿拉伯的官吏，像点牲口似的一遍遍地数着我们的人数，随身行李也在此时运到。等到所有手续结束，已是深夜，今晚我们就睡在洞穴。总算是体会到厚重的长毛毯的好处了。

雅法由建造方舟的挪亚的儿子所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的200年之前，它是巴勒斯坦重要的港口城镇，来自西欧的船只在此聚集，想来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那些旧时代的建筑，如今大多已成废墟。从断壁残垣之间，依然可一窥昔日的兴盛景象。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只有船码头。对穆斯林而言，这里除了提供来自西欧的朝圣者上下船之外，一无是用。城中还有两座残留的旧塔，那里24小时都有穆斯林站岗监视。

7月25日夜晚，向拉玛出发。它距离雅法12英里（约19公里）。我们每人骑着一头驴子。驾驭驴子仅靠一根缰绳，刚开始时大家都不适

应，手忙脚乱。

为我们带路的，是专门为朝圣的基督徒服务的翻译兼导游，称为“迦塞拉”。这些人是当地的居民，据说他们的祖先当年接受了使徒圣多马的施洗。

从雅法出发大约走了4英里（约6.4公里）路程左右，看见两座破旧的城塞，像是十字军时代的产物。走到距离拉玛一步之遥处，导游令我们下驴，因为按规矩，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徒步前往。

很幸运，附近有一所基督修道院。我们受到了修道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将在此停留两天，直到完成向穆斯林支付税金的事宜。晚上，我们席地而睡。虽说这是朝圣的惯习，但真的很不舒服，我半边的肩膀疼痛难忍。

拉玛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但人家稀少，生活状况似乎并不太好。这里的果物丰富多彩，传说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夫的诞生地。

7月27日，接近正午时分，众人跨上各自的毛驴，前往目的地耶路撒冷。走到拉玛城郊外一英里（约1.6公里）之处，导游提醒我们，这一带靠近异教徒的墓地，千万要小心。如果在墓地周边，做了什么令异教徒不满的举动，他们的报复是很可怕的。我们一行人绕道而行，连大气都不敢出。

从拉玛出发，走了15英里左右（约24公里），遇上一群带着长枪和弓箭的穆斯林人。他们等候在此，是打算向没有通行许可证的人勒索通行税。导游出示许可证，并说了些什么，那群人似乎发现不能胡来便让我们顺利通过。

我们骑在驴背上，在空旷萧瑟的山地中一路颠簸。快到半夜时，大

家翻身下驴，一边眺望着月光照耀下的山峦，一边吃饭。歇息了三个小时后，一头接一头的驴子排成长队，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两小时后，在荒凉大地的尽头，终于出现了圣城耶路撒冷的身影。圣墓教堂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们所有的朝圣者，情不自禁地跨下驴背，双腿跪地。不知是谁开始了祷告“Lauda Jerusalem dominum…”（“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神……”），众人跟着念诵，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祷告结束后，没有人再骑驴，大家拉着各自的毛驴，一步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距离耶路撒冷还有9英里（约14.4公里），开始不断望见圣迹。我们参拜了耶稣复活后和门徒们一起享用面包的地方，获得赦免7年又40天。

在圣城朝拜圣迹所获得的赦免，分完全赦免和7年又40天两种。

7月28日，日落两小时之后，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朝圣者们通常会入住附近的圣约翰宿舍，那里吃饭、睡觉都在地上，很不方便。没有将葡萄酒带下船的人只有白水喝。我和另外几位朝圣者，受孔塔里尼船长之邀，去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修道院住宿，这里曾经是耶稣与圣母马利亚住过的地方。

当晚，大家被告知要尽早休息，为明天开始的朝圣备足体力。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建于平地之上，大小与帕多瓦接近。它很美，没有环城

的要塞。城中唯一个旧要塞，是基督徒统治时代比萨人建造的，剩下的就只有所罗门圣殿的墙壁。

居民家的屋顶和我们的房子不同，是用泥土铺成坚固的平顶。过节时，穆斯林们会在屋顶上庆祝，女人们随着音乐跳舞，男人们则在一旁观赏，他们绝不会男女共舞。演奏音乐的乐器，与西欧的乐器大抵相似。

这里的集市十分有趣。道路两旁的店铺，密密麻麻，采光良好的屋顶可以遮挡烈日和雨水。置身其中宛如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集市根据店家所卖的商品种类，分成若干区域，卖丝绸的集中在一片，卖珠宝的店家则在边上的一条街上，还有从各式布料到成衣都有销售的店家。整个集市弥漫着刺鼻的香料味。

卖食品的区域简直就像节日的米兰市场。食材应有尽有，被烹调成各种食物，客人根据个人喜好，买了就可以吃。阿拉伯人大多不在家用餐，因此每当午餐或晚餐时分，这里便人潮汹涌，景象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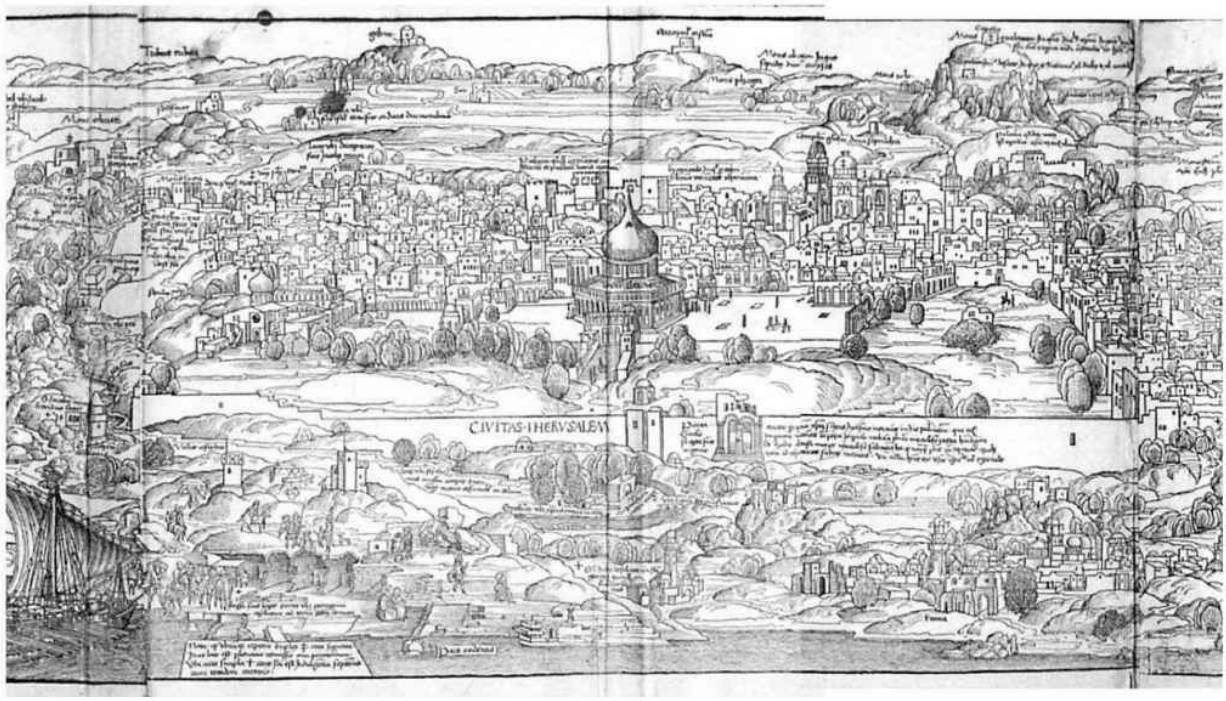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衣着与我们大不相同。男人们包着各色的头巾。头巾是麻制的，宽且长，摊平简直可以做台布。他们穿长至足部的白色袍子，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因为不穿袜子，他们的鞋子都是布制的软鞋。

女人们用白布从头裹到脚，就像套着一个布制的四角箱子，仅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她们用黑纱遮住整张脸，连眼睛都看不清，所以也不会知道她们的皮肤颜色，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沾着黑色污垢的指甲。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穆斯林以一种奇妙的准则生活。他们不喝葡萄酒。不过，这只限于人前，私底下还是喝的，而且喝的量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

傍晚时，从被称为宣礼塔（minaret）的塔楼上传来响亮的声音，提醒人们祷告的时间到了。于是，哪怕是正走在路上的人，也会就地跪下，向天空张开双手，然后对着地面磕头100次。看起来真有点儿像讨钱的乞丐。

他们总是穿着被压瘪了的鞋子，因为他们进家门前有脱鞋的习惯。进清真寺礼拜时，也必须先脱鞋，将鞋子拎在手上才能入内。就连进餐，也是盘腿坐在地毯上吃。



耶路撒冷

有趣的是他们的孵小鸡方法。我们是靠母鸡孵蛋，他们则是把五六十只蛋放入大锅中，周围烧上火，等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从锅中取出鸡蛋。过了一会，小鸡仔就从蛋中破壳而出。这里的女人似乎不从事生产，因为这类事情都是男人们在做。

这些穆斯林的信仰，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土耳其人相似。他们都很敬重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最终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正义的圣人，但只承认他是上帝派来的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们会将耶稣当作先知而膜拜。我就曾亲眼看见，伊斯兰教教徒脱了鞋子，进入耶稣诞生的洞穴朝拜。

不过，说起圣墓的由来、各各他（Golgatha）山上钉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则会摇头大笑，说耶稣基督是先知，才不会去做那般苦恼的事情。

朝圣

7月29日，太阳升起，住在修道院或宿舍的人，都起身开始准备。在修道士和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全体朝圣者出发去圣城。首站是圣斯德望门（Stephen's Gate，新教译为“司提反”）。

循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十字之路”（Via Crucis，又译为“苦路”）前行。走了一会儿，导游告诉我们，古利奈人西门就是在此地替耶稣背十字架。再往前，来到了圣母马利亚看见士兵鞭打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而悲痛不已的地方。这里原本建有教堂，在异教徒统治后遭到破坏，如今只留下一堆废墟。

随后来到彼拉多官邸（House of Pilate）。这里有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据说彼拉多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向清白无辜的耶稣宣判了死刑。官邸的附近，有一间矮小的房屋，是马利亚学校的遗址，圣母的少女时代在这里学习写字。沿着房屋对面的道路向前，看见了希律王（Herod Great）昔日的宅邸，如今里面住着穆斯林，无法入内。

去了彼拉多家的旧址。耶稣就是被带到这里，受到鞭打，被迫戴上荆棘冠，穿上白衣。我们一行人在此祷告，获赦免7年又40天。

参观犹太教圣所，走过大卫见到天使的地方。据说在韦斯帕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皇帝进攻耶路撒冷屠城时，犹太教的宝物被带去了罗马，如今存放在拉特兰·圣乔凡尼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

远远眺望了所罗门圣殿，当然不是所罗门时代的建筑。据《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的作者弗拉维斯·约瑟夫斯（lavious Josephus）称，所罗门圣殿曾经历5次重建和5次破坏。不过，年轻时的耶稣将玷污神殿的人们驱逐出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除此之外，还参拜了圣母诞生地、圣安娜的墓地等。圣母的母亲圣安娜的遗体已被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移往君士坦丁堡，虽然圣物不在当地，但仍然可获完全赦免。

在橄榄山的半山处，参拜了供奉圣母马利亚的教堂，圣母的遗体安葬于此，获完全赦免。

教堂的边上有一个大洞穴，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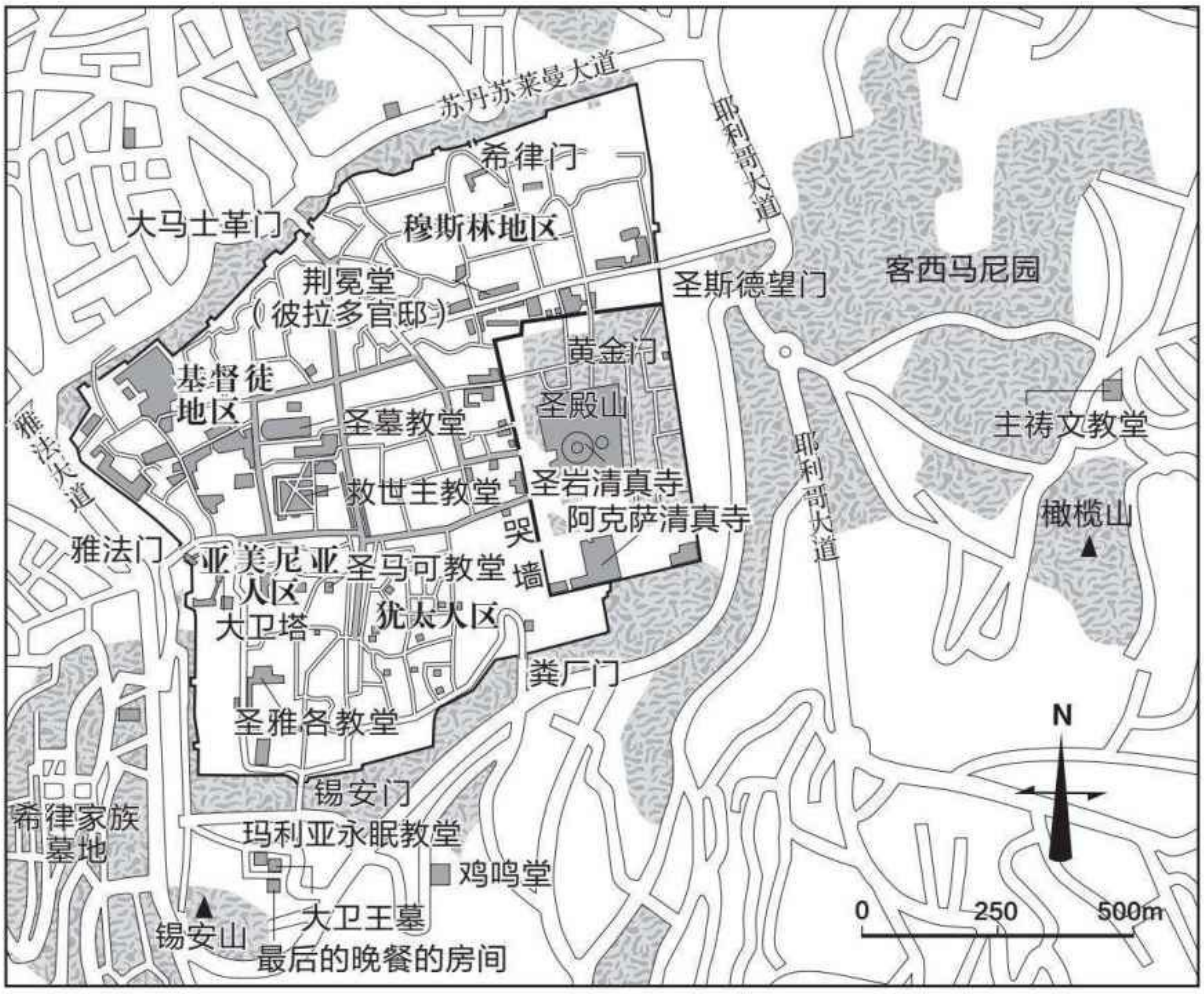
沿着橄榄山往下走，有一片叫作“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果园，这里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地方，四周一面全是橄榄田。在犹大亲吻主耶稣的地方，朝圣者用带来的石头堆成一个坟头，赦免7年又40天。

沿着左边继续下山，便是圣母马利亚的升天处。参拜这里，也获得7年又40天的赦免。

在基督升天的山丘上，有一块黑色的硬石，上面留有耶稣的足迹。石头被供奉在圆形的小礼拜堂中，获完全赦免。山上耶稣传道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耶稣站过的大理石台。之外，我们还朝拜了多处圣

迹、耶稣所行神迹的场所。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许多地方都缺乏保护和修缮，沦为野猫窝。

在基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房间里，有一张长长的木桌。守护这里的修道士们招待我们吃晚餐，人人都想坐耶稣坐过的那个位子。在此获完全赦免。



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周边

同船来回的朝圣者们在圣地停留的最长许可期限是20天，这段时间，大家都是一起行动。白天由导游兼翻译带着去参拜圣迹，夜晚返回指定的宿舍休息。集体参拜活动是从早晨到中午，下午至傍晚的时段，

可以自由活动。有人在圣所一心一意地祈祷，有人则在街上闲逛，参观集市。

20天里有三个下午是不准自由活动的。大家下午先回宿舍休息，用过晚餐之后再进城，参加深夜在圣墓教堂（Santo Sepolcro）举行的祷告。

进入圣墓教堂前，穆斯林监视官又向赶牲口似的，要求众人排成一列，清点人数，收取参拜费。圣墓教堂是圣城中最神圣的遗迹，异教徒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收的费用最高，进入教堂的人数也设置了上限。

圣墓教堂的原址，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遗体带回后，埋葬的洞穴。如今，这里包括教堂前的广场都铺设完整。信徒们进入教堂后，大门会从外面锁住，直到翌日早晨。

教堂呈长方形，正中央是一个铜制的圆顶大厅，与罗马的圣玛利亚·罗丹塔教堂（万神殿）很相似，穹顶的中央开了一个圆洞，用于采光。这里雨水稀少，这个办法尤其可行。我抬头仰望，看见了群星璀璨的夜空。

待朝圣者们就座之后，锡安山修道院的修道士开始举行弥撒。弥撒采用的语言有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祷告时当然是拉丁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用拉丁语念诵。

弥撒结束后，朝圣者们每人会分到一根蜡烛。众人手持燃烧的蜡烛，口中唱诵着祈祷词，排成一列，在主教的带领下，参拜教堂内的每一处圣所。很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参拜圣墓教堂自然能获得完全赦免。

原本的裸石洞穴现在里外都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大理石。这是为防止信徒们把石头带回去做纪念。如果人人都撬走一块石头，圣迹就会消

失。

这里还有4世纪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发现的圣十字架，为了防止信徒亲吻时咬它，左右两旁各站着一位修道士负责看守。

参拜这些圣迹时，朝圣者们都脱下鞋子，赤脚膜拜。所有的参拜结束之后，众人仍留在教堂祷告，直到天明。在圣地的20天中，圣墓教堂的礼拜总共举行了三次。

圣墓教堂

第二次是从朝圣者中选出7位，组成守护圣墓教堂的骑士团，我很荣幸被选为其中的一员。骑士的任命仪式庄严而虔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代理人以剑献祭。

耶路撒冷的圣迹分别由基督教4个教派：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以及埃塞俄比亚教管理。其中圣墓教堂由西欧的天主教管理，髑髅地[2]则由希腊东正教管理。

结束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朝圣之后，我们一行转道伯利恒（Bethlehem）。从耶路撒冷至伯利恒，大约7英里左右（约11.2公里），大家骑着毛驴，排成一列前往目的地。途中看见一口水井，这是三位王（一说是东方三博士）来拜望诞生的耶稣时，天使现身的地方。再往前走了一会儿，便是旧约中先知以利亚（Elijah）的出生地，如今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伯利恒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它是基督的诞生之地。圣诞洞的遗址上是圣方济派管理的修道院，里面还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圣迹也覆盖了大理石，应该是为了防止信徒从此地挖土所做出的对策。

教堂墙上的马赛克壁画美轮美奂，让我不禁想起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天花板上镶满了金色与蓝色交错的马赛克，仿佛茫茫大漠的星空。教堂中摆放着人偶，牛羊和牧羊人围绕着小耶稣与圣母马利亚、圣约瑟，边上站着前来朝拜耶稣的三位王和三匹骆驼，再现了耶稣诞生的场面。参拜者获完全赦免。

仿效带着礼物去朝拜耶稣的三位王，我们朝圣者也捐献了一些善款给向这座主诞生的教堂。有人奉献1达克特，有人是4达克特，按各自的能力尽心意。也有拿不出钱的人，献上了自己亲手做的木制十字架。我们还参观了教堂中的圣杰罗姆[3]的洞穴。

我们参拜了圣母喂婴儿耶稣母乳的地方，边上是耶稣所行神迹之处。没有奶水的母亲，只要将杯子放在那里，乳房很快就会发胀，挤出奶水。我们还去了天使告示马利亚带着圣子前往埃及，以躲避希律王迫害的地方。

离开伯利恒之后，再度骑上摇摇晃晃的驴子，顶着酷暑，前往希伯伦（Hebron）。附近有很多《旧约》中的圣迹，途中还会经过上帝创造亚当的地方。希伯伦有亚当、亚拉伯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妻子夏娃、撒拉、利百加、拉结的墓地。

在犹太的山间行走非常辛苦，这里土地荒凉、多乱石，四周几乎见不到树木的影子。当年施洗者圣约翰、圣撒迦利亚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传道的。

再度回到耶路撒冷的我们准备前往约旦河。但48位团员中，有一半以上都不想去。因为锡安山的修道士、孔塔里尼船长以及导游都告诫我们，前往约旦河的道路艰险，荒山峻岭、暑气逼人，还可能遭遇贼人的袭击。据说歹徒会分几组，埋伏在耶利哥（Jericho）的山谷中偷袭朝圣者。所以，很多人都决定留在耶路撒冷。

我决定一切交给上帝，前往约旦河。一行人带着露营的装备和粮食从圣城出发，同行的还有导游、几位修道士以及搬运行李的穆斯林。

为了避开暑气，我们选择在傍晚出发，每行两小时的路程就会下驴休息一阵。道路狭窄多碎石，一次只能一人通行，地面泛着红色。

翌日，抵达耶利哥平原。由此向前两英里左右（约3.2公里）有一座山，是基督修行40天的地方。山中有几处利用修行洞穴建成的小教堂，但如今不见人影。

继续在荒地上行走，来到供奉施洗者圣约翰的教堂，约旦河就在它的前方。教堂已残破不堪，施洗者约翰就是在此为耶稣施以洗礼。参拜，获完全赦免。

抵达约旦河畔后，众人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只穿着内衣跳进河里。忍受了一路的炎热，此刻在水中无比舒畅。大家全身浸泡在河水中，只把头露出水面，谁也不想再上岸。我们饮着河水，洗刷手和身体，还有人用小瓶子装盛河水。修道士和导游担心贼人袭击，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众人只得匆匆上岸穿衣。

约旦河不是什么大河。水流缓慢，水质浑浊，河床的淤泥有齐膝之高。河水自北流向死海。死海上蒸发出的水气，宛如天空中飘浮的云朵，海水盐分重，带着苦味，沿岸没有任何植物，所谓不毛之地说的就是这种地方吧。

回耶路撒冷的途中，顺道去了伯大尼（Bethany）。那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Magdalene）匍匐在耶稣的脚边祈求宽恕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三英里左右（约4.8公里）。耶稣行神迹，一度使其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的墓地也在此。不远处是马大的家。如今拉撒路的家保存完好，但马大的家已成朽败不堪。

伯大尼盛产上等的水果，耶路撒冷市场上见到的水果，据说一半来自此地。耶稣大概也是住在这里，每天来往于耶路撒冷吧。

回到耶路撒冷后，在圣墓教堂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彻夜礼拜。我替无法前来朝圣的父母、兄弟以及好友们深深地祈祷。

耶路撒冷的12天仿佛转眼即逝。明天将要告别圣城，踏上返回意大利的旅程。

归途

8月8日，天亮之前，大家各自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一行中，有两位英国人将走“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环绕西奈半岛，然后经由开罗前往亚历山大，再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船返回。除了这两位离队之外，团员中也没有人因病倒下。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地在船长、导游、修道士们的带领下，骑着毛驴循着来时的路途，经由拉玛，于翌日傍晚抵达雅法。

8月10日，“孔塔里纳”号的船员们，驾着小船来雅法港迎接我们。海面上漂浮着旗帜，水手们吹着喇叭，敲着大鼓，弹着鲁特琴，好像是庆祝我们逃脱了恶魔的掌心。回想这一路经历，多少还真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无论如何，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全体平安而归。

8月11日，傍晚时分，船离开雅法港。顺风，仅靠船帆航行。8月15日抵达塞浦路斯岛。船长的兄长安布罗基奥·孔塔里尼先生驻塞浦路斯岛大使的三年任期正好届满，将与我们同船回国。在大使先生做归国准备的期间，我们朝圣客乘空闲，上岸参观塞浦路斯岛。大家骑马前往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

在尼科西亚，朝圣团中的一位伙伴介绍了他的好友与我认识。他这位朋友亦出生于米兰，是一位富裕的商人，长年居住塞浦路斯，在当地有很多的生意。我们在尼科西亚的数日，就住在这位商人的家中。还荣幸地受到了女王的接见。塞浦路斯女王卡特丽娜出生于威尼斯，因此，这里实际上就是威尼斯的领地。

也许与女王的出生地有关，塞浦路斯岛的街道上，有很多美丽的威尼斯式建筑。除了丰富的水果，这里还以出产最上等的葡萄酒、海盐和棉花著名。这里条件得天独厚，宛如人间天堂，唯独天气炎热，令人难以忍受。这里的人都穿短袖，外面披件长衣。去朝圣的航程中，只在岛

上的南端做了短暂停留，所以我不想被酷暑吓倒，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尽情游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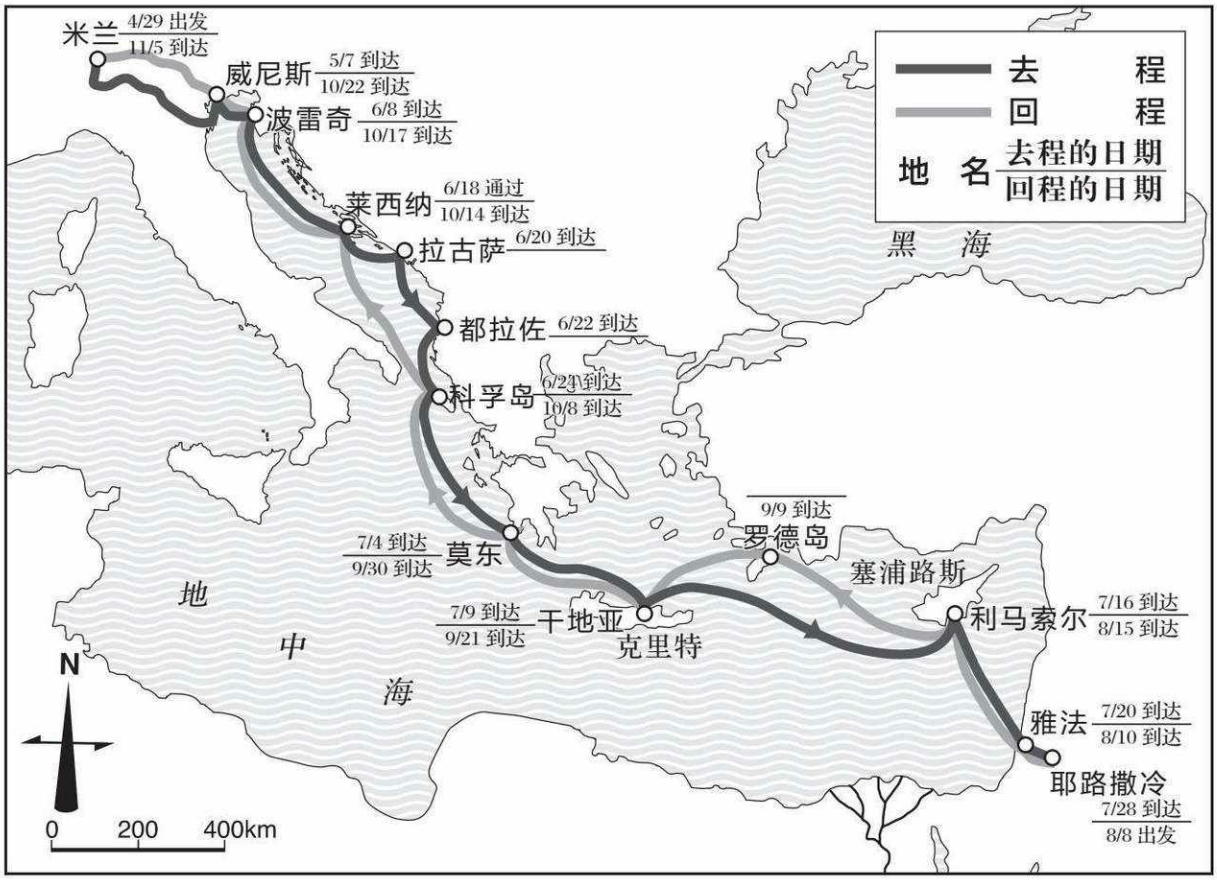
塞浦路斯岛据说是维纳斯的诞生地。被称为“爱之城”的古城已经塌了半边，不知道古代的爱情习俗是否还在。我还去参观了盐田。那里由威尼斯人经营，管理得十分完善。除岩盐之外，西欧使用的盐大多来自此地。盐田面积之大，若不是目睹，简直不敢相信。

回到港口，我们的加莱船出了大事。两位朝圣者因岛上特有的高温而不幸身亡。其他人虽然上了船，但大多都染上了热病。

有一位名叫西基思蒙多的德国骑士，受不了高烧的痛苦，疯狂地用短剑刺向自己的身体，导致三处重伤，最终因出血过多而死。另外还有一位德国骑士，也想模仿同乡的行为，被赶来的船员拦下，没有得逞。船员捆绑住他的双手，让他安静休息，结果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在了床上。有一位得了热病的水手，不堪痛苦打算跳海，所幸被同伴阻止，保住了一命。

我也未能幸免。一回到船上，就开始发高烧，整整6天，苦不堪言。那几天，海上无风，船速缓慢，连储存的淡水都开始发臭。我想喝水，拿起杯子放到嘴边，发现杯中竟然有虫子在游动。

水是腐坏的，空气也是腐坏的。船虽然离港，却航行得慢慢腾腾。同行的法国朝圣者说，塞浦路斯岛是邪教女神维纳斯的诞生地，从马赛出发的法国朝圣船从不在此靠港。威尼斯船无视禁忌，连异教的女神都尊崇，所以上天才会惩罚威尼斯人。



桑多·布拉斯卡的朝圣路线（1480年）

祸不单行。来时在科尔丘拉发生的不幸事件，再次发生。更换船帆时，因操作失误，掉落的帆桁砸死了一名水手。这位水手不仅技艺高超，为人也相当和善，对朝圣者们关怀备至。他的死让船员和全体乘客都深感悲痛。

大家为这位水手以及去世的两位德国骑士举行了海葬，将三人的遗体沉入海底。海上的葬礼远比陆地上来得庄严肃穆。另外三位在上船前就死去的朝圣者则被安葬于塞浦路斯岛上。在这趟旅程中，加上去程时疑似黑死病死去的水手和两位被帆桁砸死的水手，共有7人死去。孔塔里尼船长曾经说过，航海绝非儿戏。真是令人痛彻的真理。

离开塞浦路斯岛后，一路不遇顺风。虽然可以划桨推进，但如此高温之下，不能让划桨手过分疲劳。因此，船就这么走走停停向西挪动。

由于在塞浦路斯岛时得知罗德岛依然处于土耳其军的包围中，所以船不会在那里靠港。

可是，就在我们的船绕开罗德岛往西移动时，遇上了从罗德岛出发，带着最新情报开往塞浦路斯岛的威尼斯军舰。对方确认了我们船上飘着的威尼斯朝圣专用船的旗帜之后，迅速扬帆划桨向我们靠近。他们告知了最新战况，建议我们停靠罗德岛。

原来土耳其军队终于放弃攻击，解除包围圈，撤离了罗德岛。7月27日发起最后的总攻未果的土耳其军队，从8月6日起开始撤退，一直到8月27日全军离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塞浦路斯停留之时，土耳其7万大军已经在开始撤退了。岛上拼死抵抗的600位骑士中，有200人战死。而他们的对手，则损失了1.2万名以上的士兵。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停靠罗德岛，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在不会摇晃的土地上走走，或躺在凉爽的树荫下休养生息。船改航北行。这一带的海底多岩石，是有名的海难多发地。如果风向不定，经验再丰富的水手，也难以驾驭船只。

据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结束朝圣从耶路撒冷返回的途中，在这一带也受苦于不定的风向。后来，海伦娜把从耶路撒冷带回的钉耶稣时所用的钉子扔进波涛汹涌的海中，大海便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眼前的海，哪里看得见波涛，无风的日子竟然已经持续了16天。

但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船长说海水不动是因为船上有约旦河的圣水。他要我们仿效1200年前海伦娜母后的做法，将圣水倒进海里。

这是我们冒着炎炎酷暑，忍着毛驴的颠簸，好不容易汲取的圣水，要全部倒入海中，实属不舍，可是连日在无风无浪的海上飘荡，也很折

磨。于是，那些带着圣水的朝圣客们，拿出小瓶走到船舷边，同时将圣水倒进了海中。水手们像他们平时玩纸牌时那样，发出阵阵的叫喊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海上男儿们都深信，约旦河的水会给船带来坏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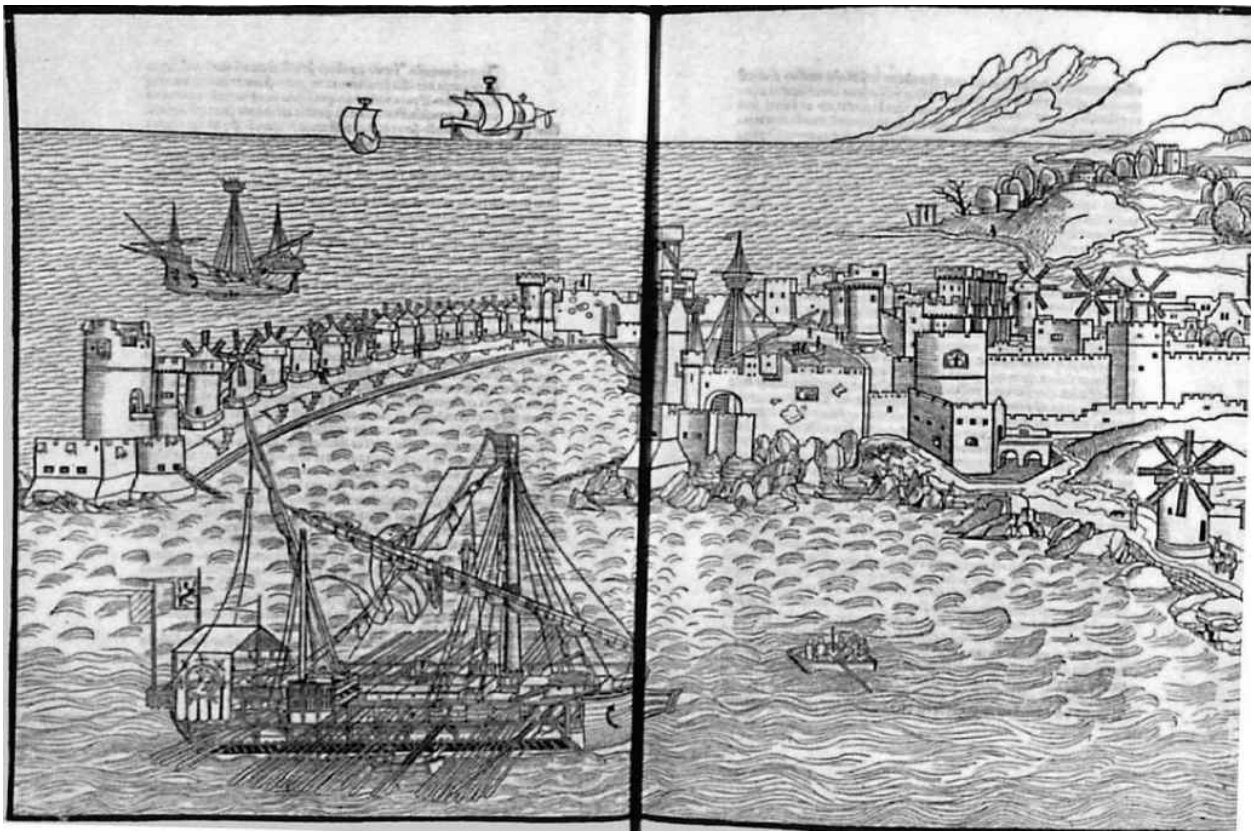
不知是不是约旦河水倒入海中的效果，过了一阵子，海面上吹起了南风，我们终于抵达了罗德岛。时值9月9日。

罗德岛历史悠久，尤里乌斯·恺撒和提比略皇帝都曾在此住过，向来以风景优美闻名。

如今的岛主是赫赫有名的圣约翰骑士团，团员们均是西欧各家名门的子弟。船预计停靠三天，我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游览岛屿。

首先，我们去骑士团团长之城，参拜了安放在那里的圣遗物。其中有一根耶稣被强迫带上的荆棘冠上的刺，非常珍贵，被安放在银台的水晶箱中。每逢圣礼拜五（基督受难日）的正午至下午3时，这根刺会奇迹般地绽放花朵。据说它曾经刺进了耶稣的额头，所以是唯一一根会开花的荆棘。

参拜完圣遗物，去街上观光。街市虽然不大，却井然有序。这里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攻防战，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残垣断壁四处可见，特别是遭到土耳其大炮轰炸过的城墙，更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骑士们的指导下，岛民们已经开始着手修复，以防敌人再度来袭。



罗德岛

港口地势开阔、建造精良。宛如两只手臂环绕着港口的堤坝上，整齐地排放着一列风车，光是望着它们缓缓地转动就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引领我们参观岛屿的，是一位米兰出生的骑士。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位骑士不仅能手握武器与异教徒战斗，还擅长医术，为朝圣者们治疗病痛。这位文文静静的年轻绅士向我们谈及攻防战况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他人的故事。

岛上的居民们也十分勇敢。他们将女性、孩子和老人送往内陆避难，留下壮丁与骑士团齐心协力，誓死守卫家园。街道上四处散落着土耳其军发射的石弹，城墙上被火药炸开的一个个洞口，让我们这些不曾亲历战争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惨烈。

9月13日，原定在今天离开罗德岛，但等众人登船，船帆打开之后，风向突然转成西北西，只能在船上度过一晚。翌日傍晚，船总算出

港。风力极弱，抵达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港时，已是9月21日。

为了装运玛尔维萨葡萄酒，我们的船将在克里特岛停靠3天。威尼斯政府规定，朝圣专用船去程不得以商业目的靠港、停泊。回程则不禁止。待酒装船完毕，我们出发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方向，在9月的最后一天，抵达岛南端的威尼斯基地。

离开莫东基地后，船一路北上，于10月8日到达科孚岛。和克里特岛、莫东岛一样，有关南意大利普利亚的海港城市奥特兰托今年8月遭土耳其军攻击的消息，在科孚岛也传得沸沸扬扬。奥特兰托的城主和大主教被土耳其兵的半月刀斩首，很多居民惨遭杀害，还有8000多人沦为土耳其人的奴隶。

土耳其军队撤离奥特兰托，是在我返回米兰的两个月之后，即翌年1481年1月，所幸那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当我还在与奥特兰托咫尺之遥的科孚岛上的时候，讲到土耳其人的残暴，当地人个个惊恐万分，就连一向冷静又与土耳其缔结了和约的威尼斯人也火药味十足地进入了临战状态。据说他们在科孚岛的大堡垒中存储的弹丸、武器和粮食，足以应付三个月的围城。

离开气氛紧张的科孚岛，我们的船往北行驶没多久，便遭遇暴风。巨浪迎面扑来，船头仿佛直接插入了海中。海水渗进船上的每一个角落，浸湿了所有的东西。

水手们忙着与暴风雨搏斗，而我们这些乘客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尽力气抓住固定的东西。有人不断地呕吐，可谁也没有余力伸出援手。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在暴风雨中更换船帆，场面惊心动魄。

首先，从帆桁上换下离开科孚岛时因风力不大而悬挂的被称为“雅

提蒙奈”的大三角帆，换上面积稍小的“德尔撤奥罗”。但风越刮越猛，附近又没有可以避难的港口，水手们只好再降下“德尔撤奥罗”，换上更小的三角帆“巴巴费戈”和小四角帆“柯基纳”，将它们绑在三根桅杆中的其中两根之上。只要风没有大到吹断桅杆的程度，水手们还是希望靠船帆来操控船只，抵挡暴风雨。

然而，我们遇到的暴风雨实在太猛，最后还是不得不降下所有的帆，船在巨浪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晃。降帆虽然避免了桅杆折断的危险，但是在大风大浪中仅靠船桨的划行，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这时，船长提议，如果能熬过这场风雨，我们就去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朝圣，大家都表示赞同，并决定捐款。

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位于科孚岛以北约20英里（约32公里）之处，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教堂中以水手的守护教堂而著名。暴风雨过后，船在最先见到的海港抛锚，我们派代表前往教堂，其他人则在船上等候。

参拜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捐出善款表达感谢之后，船继续向北航行。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发现船尾处出现一道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持续了4个小时。水手们说，这是圣母马利亚降临的征兆，幸运马上就会到来。

两天后，奇迹再度发生。这次是出现在船尾和桅杆两处，还是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水手们告诉我们，这是圣母马利亚、圣尼各老和圣艾尔摩之火（St.Elmo's Fire）。

10月14日，抵达莱西纳。至此，漫长的旅行只剩下亚得里亚海的最后半程。我们将在这里停靠两天，等待海面恢复平静。其间借宿圣方济派的修道院。

在一路所遇到的修道院中，对朝圣者最为友善亲切的是以巴勒斯坦为首的东方的各地修道院。在一些清苦的地方，修士们会将寝室提供给客人，自己则睡在饭堂的餐桌上。他们不仅对朝圣者，只要是基督徒，不论贫富，都会一样受到热情的款待。

10月17日，到达伊斯特拉半岛的波雷奇。从这里到威尼斯大约只需要一昼夜。漫长的旅途走到这里，似乎有种已经结束的感觉。我们全体朝圣者与船长及其水手们一起前往供奉船员的守护圣人圣尼古拉（Nichola）的教堂，举行了平安远航归来的感恩弥撒。这是威尼斯水手们返航归国的惯例。弥撒通常都是在抵港前举行。

不知是弥撒时圣人碰巧不在，还是他没有听见我们的祈祷，海面上西罗科风吹个不停。从波雷奇往威尼斯，正好和这股西南风背道而驰。船长估计逆风还会持续数日。既然终点已经在望，也就不在乎多等几天。他决定等西罗科风过后再离开波雷奇。一些急着赶回去的朝圣，可以乘坐小船，不过要沿着海岸多绕一些路。我和其他几位朝圣客决定先走一步，坐小船也是一种体验。

到达威尼斯是在10月22日。从海上望见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它的璀璨，它给归人的心灵抚慰，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平安归来的如释重负，再加上最后几天小船上的劳顿，我像死去般地昏睡了整整三天。

（朝圣者视角的叙述结束）

回家

桑多·布拉斯卡是在11月5日回到米兰的。35岁的他，在抵达威尼斯

后足足睡了三天才恢复体力。经过如此的长途跋涉，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观光的兴致，可是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一路上又在帕多瓦、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停留，没有错过归途的风景。在维罗纳，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的遗迹。最后，他在米兰的近郊，和特地前来迎接他的兄弟、朋友们会合，可谓是春风得意人归来。

另一位与桑多·布拉斯卡同行的朝圣者德国的修道士施密特，可就没那么高兴了。当他回到故乡乌尔姆（Ulm）时，竟然听说亲朋好友已经相传为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他，举行了葬礼弥撒。可见当时德国信息传递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而且准确性也很成问题。

话说布拉斯卡和施密特的这一趟朝圣，光是去程坐船的日子就有45天，在雅法上岸后走陆路前往圣城朝拜，之后再回到雅法上船，其间又用了22天，而回程在海上更是长达72天。真正是万水千山，漫漫长路。如果再加上他们往返于故乡与威尼斯之间，以及在威尼斯的等船时间，难怪桑多·布拉斯卡在出门前必须指定职务代理人。

在从威尼斯出发的朝圣者中，居住米兰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程算是最便捷的，但他在4月29日出发，到11月5日才回到故乡。像来自德国的施密特，或是法国的朝圣者，恐怕还得再加上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位在耶路撒冷与朝圣团分开后，环西奈半岛，再从亚历山大港返回的走“特别行程”的英国人，前前后后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又没有事故发生，还是可以缩短海上时间的。有记录证明，从威尼斯到雅法的航行只用了34天。不过，无论是持续顺风，还是无灾无难，概率都相当低。因此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去圣城朝圣，至少需要6个月。

桑多·布拉斯卡的圣城朝圣游记，于1481年2月在米兰首次出版，距离他旅程归来才3个月的时间。不难想象，再次做回官吏的布拉斯卡，

一定是每天都废寝忘食地修改、校对着文字。这本书在1497年第二次出版，1519年发行了第三版。

撰写圣城朝圣记的，不光是桑多·布拉斯卡，仅从1458年到1498年，就有3位英国人、4位法国人、7位德国人和11位意大利人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旅行日记。那么，他们留下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他们想以某种形式把自己的体验保留下来，其次是希望给日后去朝圣的人们作为参考。事实上，很多去朝圣的人，随身都会带着先行者的著作。第三个动机则是为了那些想去朝圣却因为种种理由无法成行的人，让他们通过书本实现梦想。包括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在内的旅行书籍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不外乎是鉴于以上的理由。

这些“旅行记”通常都配有素描插图。桑多·布拉斯卡的书中也有一些不算漂亮的插图。在同类作品中，两位德国人撰写的书中插图，堪称精华。在那个没有摄影器材的年代，这两位在不同时期分别从威尼斯出发去朝圣的德国贵族，一位带了手绘师，另一位则带上版画师同行。

通过画匠们的笔端，15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街景、朝圣专用船“孔塔里纳”号的模样，波雷奇、扎拉、拉古萨、莫东、克里特岛的干地亚、罗德岛、塞浦路斯岛等朝圣船停靠的港口城市，以及上岸后的雅法、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圣墓教堂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许正是因为德意志人的这种追求，才促成了20世纪摄影产业的发达吧。当然，这只是我小小的异想天开而已。

这里，做一个郑重的声明。上文摘录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记”，有部分内容并非原作。因为许多在15世纪末的基督徒眼中稀松平常的事情，对20世纪的现代人而言却是相当陌生。所以，有关这部分以及航海的一些内容，我是参考了其他朝圣者的笔记和当时的航海记录，模仿桑多·布拉斯卡的笔调改写的。

另外，“旅行中”随处可见的祷告文，除了我简单地带到的两处，其余部分全都做了删除。这些旅行笔记，对如今打算去朝圣的信徒们已没有实用的价值，当然也许会有人想了解在圣地的各处具体应该吟诵哪一段祈祷词，不过考虑到大多读者都和我一样不是基督徒，最后还是决定删除。

话说1480年，正是以花都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花朵绚丽绽放的时代。在精神和经济上推动这股文化思潮的关键人物、人称“豪华者”洛伦佐，时年31岁，恰是风华正茂。在这位事实上的君主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共和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优雅、最幸福的时期。

这一年，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35岁。接连创作了《春天》（*La Primavera*）和《维纳斯的诞生》（*Lanascitadi Venere*）。虽然这两幅画算不上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15世纪末最杰出的画作。

莱昂纳多·达·芬奇，28岁，与波提切利同在佛罗伦萨。他正在画《博士来拜》（*Adorazione dei Magi*）。

而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卡普雷塞（Caprese）的乡间，5岁的米开朗基罗大概正和顽皮的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比卡普雷塞更靠近佛罗伦萨的奇昂第（Chianti）地区的某个村庄，11岁的马基雅维利正跟着附近的神父学习拉丁语和算术。这位日后开创了政治学的文艺复兴巨匠，彼时还是一个常常逃课的少年。

同一个时期，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另一座文艺复兴代表城市威尼斯，贝利尼家族掀开了威尼斯绘画史的新篇章。家族成员中的詹蒂利·贝利尼，此刻正以文化使节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皇宫，

为土耳其苏丹作画。他是威尼斯政府根据土耳其苏丹的要求，作为威尼斯最优秀的画家被派去土耳其的。至于威尼斯画派第一人的提香，当时还是三岁的孩子。

另外还有一位人物，虽然在1480年尚未出生，但既然讲到文艺复兴，就不能不提他的名字。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 Sanzio）是在三年之后的1483年出生的。

细数以上这些璀璨的名字，让人感觉1480年似乎是一个远离朝圣，充满华丽的异教色彩的年代。事实上，这股现实主义的风潮，在之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我之所以挑选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朝圣活动论述，不是想证明非宗教时代下，人们依然可以保持虔诚的信仰。

简单说，圣城朝圣这个宗教现象即使受到外力的阻挠，依然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一旦与威尼斯人扯上关系，就不再是纯粹的朝圣，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性、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组织旅行团观光，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这一点才是我想证明的。

当然，向大家介绍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日记，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原来圣城朝圣可以积攒那么多的赦免。朝圣后再度回到职场的桑多·布拉斯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驻外大使。他终生未婚，热心慈善，不做坏事，活到77岁，于1522年去世。想来他朝圣所存下的免罪权，大部分都不曾使用，应该是带着天堂里有自己一等席位的信念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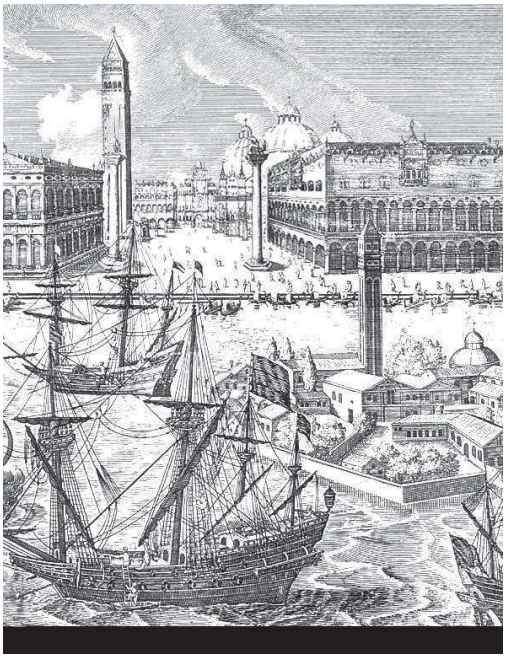
---

[1] 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赞美你”，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圣歌之一《感恩赞》的第一句歌词。——译者注

[2] 髑髅地源自拉丁语Calvaria的翻译，即各各他山丘。——译者注

[3] 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又名耶柔米，《圣经》拉丁语版的翻译者。——译者注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胡椒危机

就在16世纪还有几个月就要到来的1499年7月，威尼斯共和国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因为一条刚收到的消息骚动不已——葡萄牙的船队绕过非洲的南端，横渡印度洋，到达了加尔各答（Galcutta）。

发现了前往印度新航线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刚出炉的时候，内容相当混乱。最初从开罗传来的消息中，竟然把葡萄牙船队的船长说成是哥伦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渐渐地有所修正，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

称葡萄牙船队离开了加尔各答，而来自里斯本方面更明确地指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已在7月10日返航。

面对不可动摇的事实，可想而知里亚尔托商业街所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在过去的300年里，威尼斯凭借着地中海航线的优势，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而香料又是支撑威尼斯贸易最主力的商品。手里拿着记录前一天商品最终批发价日报（我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的商人们，不停地讨论着此次事件给今后带来的影响，直到交易时间结束也久久不肯散去。

如果《里亚尔托日报》刊登的内容不只是商品价格一览，而是像《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样话，相信1499年7到8月之间的头版头条，连日都会出现以下字样：

葡萄牙发现印度新航线！

葡萄牙舰队有意封锁红海？

胡椒危机！威尼斯经济面临灭顶之灾！

政府火速召集元老院会议！

政府考虑暂时关闭里亚尔托市场！

编年史作者，同时也是里亚尔托常客的银行家吉罗拉谟·普留利（Girolamo Priuli）形容威尼斯当时的情景“如同没奶吃的婴儿”。

随着达·伽马的英勇事迹逐渐清晰，乌云罩顶的里亚尔托分化成乐观和悲观两派。

乐观派认为，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往返一次需要两年的时间。虽说可以通过不断的航行来缩短时间，但毕竟距离太远。达·伽马船队的13艘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风险如此之高，最终葡萄牙会放弃这条航

线。因此，它对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普留利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包括他在内的悲观派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反驳：“葡萄牙人势必会继续使用这条航线。以他们的航海技术，迟早能将时间缩减至目前的一半，途中的损失也会不断地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须通过中间商，可以直接向印度人采购廉价的商品，不必像威尼斯商人那样交易过程几经转手，支付多重关税。因此，以威尼斯人主导的地中海贸易前景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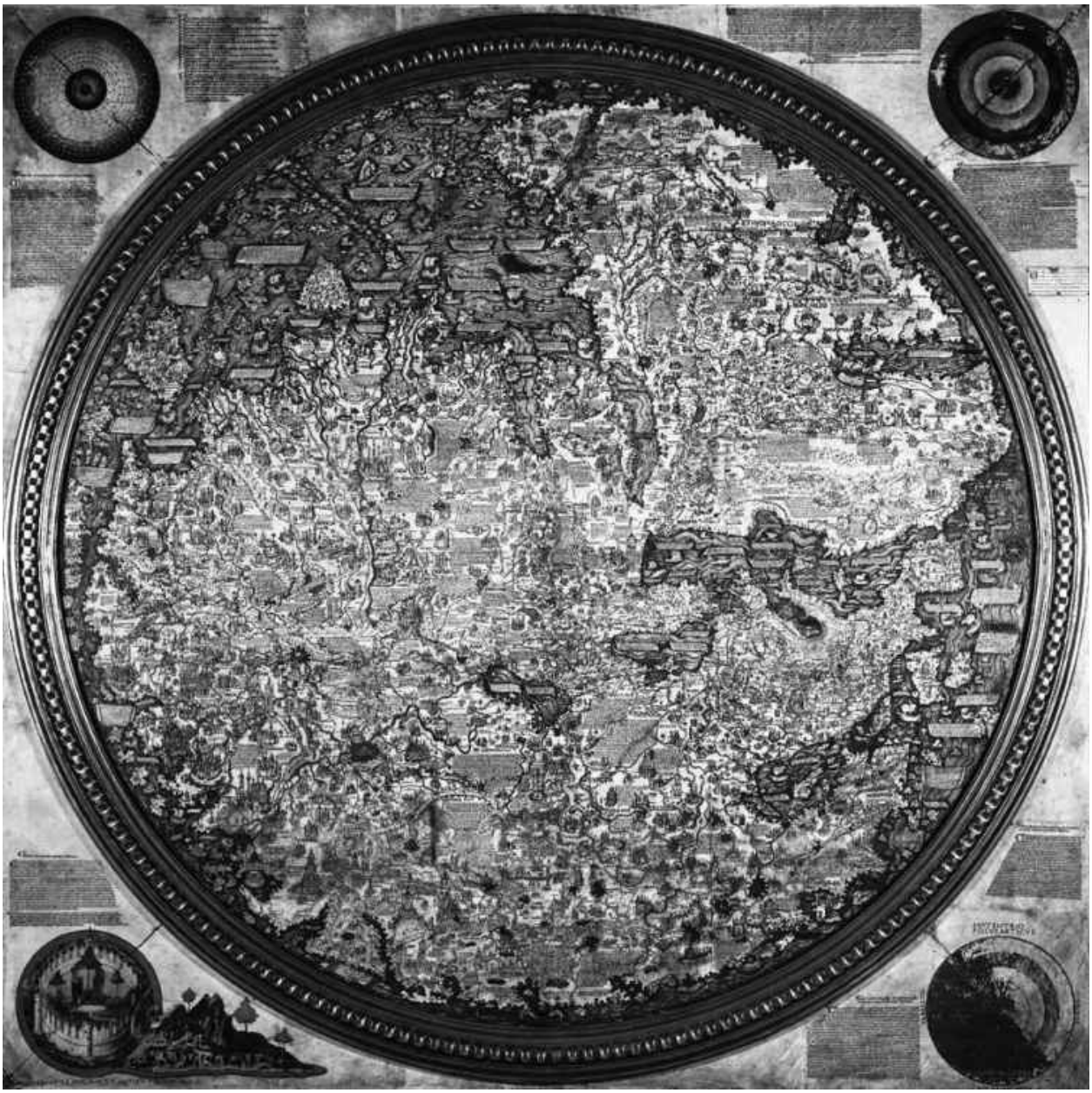
然而，普留利等悲观派们的预言，只说中了一半。虽然葡萄牙没有放弃新航线，但威尼斯的经济也没有因此毁灭，仍然以一贯的方式接受了这场挑战。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严格地说是发现西印度洋群岛的1492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这场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事件的确改变了西欧以往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地中海为中心，威尼斯在其中始终扮演着主角，但从今往后，舞台转向大洋，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主导权。然而，将威尼斯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潮流，又实在是过于简单化。

航海者们

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并非是横空出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壮举，亦非偶然，基础从200年前就已经打下。让鸡蛋立起来，只是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未知世界的航海，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绝对需要运气。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麦哲伦，他们都属于幸运的男人。

越是接近未知的世界，就越需要精准的地图。最早的近代地图，是在14世纪初期，由一位威尼斯的神父和一位贵族，以及一位定居威尼斯的热那亚制图工匠共同制作而成。这张涵盖了中东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位置的地图，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依然相当的准确。三位制图人的本意，旨在为基督教进攻伊斯兰世界助力，尽管愿望没有实现，但这张地图的出现，却成了近代地图、航海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弗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为南）

进入15世纪初之后，威尼斯在制作地图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热那亚人也擅长地图绘制，但由于他们欠缺共同体意识，根本没有想过让地图成为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活跃于海上的葡萄牙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葡萄牙地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威尼斯制作，或由威尼斯人复制的。

15世纪制作的地图或航海图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视野向外伸展了许多。其中，威尼斯穆拉诺岛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更是复苏了自古代以来便中断的世界地图的制作，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最新的知识。毛罗修士不仅认真地学习古代地图，详细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记述，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的帮助。

在与毛罗相识之前，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已经绘制过两张航海图。他的主业是威尼斯商船上负责警卫的战士。由于职业的缘故，比安科不仅对黑海沿线的塔那、贝鲁特、亚历山大、希腊诸岛了如指掌，对北非沿岸地区也是烂熟于心。他曾经7次跟随走佛兰德斯航线的威尼斯商船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

有一张海图是他在伦敦绘制的。地图上“巨大的确实存在的岛屿”，甚至出现了美洲的形状。从未涉足大西洋群岛的比安科的这份丰富的想象力，可能是在与那些乘坐威尼斯商船从里斯本到南安普顿的大西洋专线的葡萄牙领航员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

然而，要挑动起人们的冒险之心，仅靠地图、海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字记录。诸如旅行记之类有过实际经历的人们的叙述，会点燃起那些尚未成行者心中的火焰。在这方面，威尼斯始终走在前列。西欧最早的游记全集就是威尼斯在1550年出版的。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新世界的记述。最初问世的，是威尼斯贵族阿尔维泽·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手记。他本人

的经历，是许多因缘巧合而踏上未知之地的威尼斯人的典型例子。

1454年，阿尔维泽搭乘佛兰德斯固定航线的威尼斯商船去伦敦做生意。商船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里斯本的途中，为等待顺风而临时靠港。在那里，阿尔维泽见到了葡萄牙王子的家臣、日后被称为“航海王亨利”的男人。这种见面，属于友好国之间惯有的礼节性拜访，话题通常以商业为主。而那一次与葡萄牙人的谈话，却深深地吸引了时年22岁的阿尔维泽，激发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过，谈话之后，阿尔维泽还是按计划从南安普顿上岸，在伦敦办完事情后，返回了威尼斯。

第二年，阿尔维泽带着在非洲可能会热销的货物，再次登上佛兰德斯航线的商船。这一次，他在里斯本下船，换乘葡萄牙的船，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到达塞内加尔（Senegal）。当地的酋长相当“友好”，一匹马可以换到9——14个原住民。黑人奴隶在里斯本很有市场，但阿尔维泽赚到的不仅是金钱，这次经历让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又过了一年，阿尔维泽再次乘坐葡萄牙的船，在他的建议下，航行的目的地将再往南延伸至冈比亚（Gambia）。不料，途中遭遇大风袭击，船偏离了航线，结果偶然地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之后，阿尔维泽·达·莫斯托在里斯本居住了10年，专营欧非贸易。他将同胞从威尼斯带来的商品以及葡萄牙本地的货物卖到非洲，再购买非洲的土特产带回里斯本销售。其间，他把自身的经历记录下来，内容还包括葡萄牙水手们转述的所见所闻。

结束10年的海外生活之后，阿尔维泽返回祖国，开始忠实地履行威尼斯贵族应尽的义务，后半生一直担任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公职。他曾经参加过对土耳其的战役，当选为元老院议员，指挥过舰队，也出任过海外基地要塞的司令官。阿尔维泽在工作之余，将迄今为止收集的资料

整理成册，有关非洲赤道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自他手。

除了非洲，在14世纪末期，还有一位威尼斯人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人名叫卡洛·泽诺（Carlo Zeno），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的英雄卡洛·泽诺的弟弟。卡洛曾在1358年时担任过固定商船队的指挥官，来往于佛兰德斯航线。之后，因为出任莫东——科伦总督时犯下的恐吓罪而遭到追诉，从此不再担任公职。

在佛兰德斯航线上任职时，卡洛从英国水手那里听到了各种见闻，引发了他向西远航的冒险心。被剥夺公职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卡洛留下的旅行记录中，对拉布拉多（Labrador）的爱斯基摩人的房子、皮划艇的描述十分准确，应该是确定目睹过这些事物。他还提及有一个修道院用热泉取暖、煮饭，这块土地日后被证实就是格陵兰。

不过，格陵兰是否是由卡洛·泽诺所发现，至今无法定论。因为这份记录是在150年后，当赖麦锡计划编纂游记丛书时，在泽诺家的书库角落里发现的，因此，很难判断说内容没有经过后人的添补或修正。卡洛本人从北大西洋旅行归来后不久，便在1400年去世，估计是没来得及公开发表游记。

与北美洲有关的，还有一位。他虽然不是威尼斯人，却有一个威尼斯的名字，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卡博托年轻时便移居威尼斯，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孩子也出生在威尼斯。1472年，卡博托在威尼斯的居住时间满15年，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的市民权。他经营香料生意，常常来往于穆斯林统治地区，他在书中还提到曾经去过麦加。1493年，卡博托在瓦伦西亚（Valencia）的卡博托，遇见了途经此地，正要赶回去向西班牙国王及女王报告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

哥伦布告诉卡博托，自己找到了去往印度距离最短且最好的航线。可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在东方与印度商人有过接触的卡博托，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看出哥伦布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当地产品以及原

住民，都不是真正来自印度。而且他也不相信，往西航行只要那么点儿时间，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作契丹（Cathay）的中国。

不过，与哥伦布的相遇，还是激励了卡博托。虽然他和哥伦布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有新大陆的存在，但他认为，哥伦布所说的地点，不是通往亚洲的最佳航线。如果地球是圆的话，横穿纬度最高的大洋，由此从陆地南下至Zipangu（日本），从那里继续往南到盛产香料的岛屿，才是最有效率的航线。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卡博托选择以英国为起点。因为以前在南安普顿时，他就听说英国西部的渔夫自100多年前开始就在爱尔兰近海捕鱼，他们十分了解北海的航线。卡博托决定征集水手，并效仿哥伦布的做法，向国王请求资金上的赞助。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七世。也许是因为玫瑰战争已结束，可以腾出精力来考虑国家建设，热衷于振兴商业的亨利七世答应卡博托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卡博托将家人从威尼斯接到布里斯托（Bristol），正式着手进行远航的准备。英国国王承诺，如果在大洋彼岸发现了新土地，当地居民不是基督徒的话，土地将赐予卡博托。至于资金方面，国王则是推荐商人们提供。

可是，英国人天生疑心重，1497年出发的卡博托的探险队，最终只有一艘船参加，船员加上两位布里斯托的商人代表，总共才18个人。或许是上帝怜悯这支形单力薄的船队，海上一路通畅，35天后他们发现了特拉诺瓦（Terra Nova，即纽芬兰岛），卡博托将英国、罗马教会和威尼斯的国旗插在岛上。之后，他们沿着陆地继续南下了300里格（League，约2000公里）。距离日后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越近，卡博托就越是确信他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大陆。然而，现有的装备，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航行，一行人决定先返回布里斯托。

无论是迎接船队远航归来的布里斯托商人，还是得到探险成功报告

的英王亨利七世，当然还包括卡博托本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就是亚洲的某处。这一次，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决定资助卡博托中断了的前往中国的探险，让他实现途中停靠日本，最终到达香料群岛的远航计划。翌年，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卡博托船队中的航船增加到了5艘。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任何船或人归来。

过了一阵子之后，去大洋彼岸新大陆的话题便在英国销声匿迹。继任亨利七世的新国王亨利八世对寻找新大陆也没什么兴趣。乔瓦尼·卡博托留在布里斯托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 Caboto）虽然握有父亲遗留下的横渡大洋西行的全部资料，可惜形势不尽人意。结果，他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

塞巴斯蒂亚诺在西班牙做了30年的总领航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总、研究航海历史记录，再配合气象观测，为远航大西洋的西班牙船队制定航线。气象观测要到16世纪中期，才成为航海技术的主流。1508年时的塞巴斯蒂亚诺，不知道是在哪里学到的气象观测的知识。如果是来自父亲的指点，那么其父乔瓦尼·卡博托的航海技术水平显然是远远超过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同时代的航海者。

也许是塞巴斯蒂亚诺·卡博托厌倦了书桌上的文案工作，他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组织船队探险的计划。他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证明，完全有可能发现通往契丹（中国）的最佳航线，唯一欠缺的就是资金。塞巴斯蒂亚诺拥有威尼斯市民权，所以才会向威尼斯共和国提出资金援助的要求。

威尼斯政府收到塞巴斯蒂亚诺的申请后，令因编纂游记丛书而与塞巴斯蒂亚诺有书信往来的赖麦锡，先对计划进行评估，最终由委员会做出决定。不久，人在西班牙的塞巴斯蒂亚，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回复，威尼斯拒绝赞助，理由是计划不切实际。

威尼斯原本就不是一个突出个人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正好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发现新航线，热那亚人始终领先于威尼斯人一步。

然而，哪怕是被外国人抢先了一步，但只要威尼斯判断事情有利可图，政府和个人必同心协力，赋予其实际的意义。尽管开发新商品的速度迟缓，但将其产业化的能力，威尼斯却是一流的。他们重视共同体利益，一切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个人创造力十足，但背后无国家支持的外国商人，常常会被威尼斯陷于不利的处境。

威尼斯之所以对大西洋航线始终态度消极，既不是由于国力衰退，也不是国民丧失了进取之心，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渡大西洋，不会对胡椒生意带来实质的效益。

达·伽马船队从印度归来的消息让威尼斯人惶惶不可终日。相较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让里亚尔托商业区的威尼斯商人们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满载香料而归，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远洋船带回了印度人，但没带回一粒胡椒。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对所谓的殖民帝国完全没有兴趣。如果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旅行记，就会发现两者的着眼点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如何占有新土地。不管怎么说，世界的确已经发生变化，进入了西欧各国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扩张势力范围的时代。1542年发现的群岛被命名为菲律宾，就是源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不是对任何无利可图的事情都毫不关心。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收集情报似乎成了他们的习性。1550年出版的题

为“航海与旅行”的游记丛书中，竟然收录了关于当时与威尼斯毫不相干的日本的内容。

编纂这套丛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Battista Ramusio），是决定威尼斯重大事项的机构、大名鼎鼎的“十人委员会”的书记官。他的编文周到缜密、公正客观，水准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出版人。这套游记丛书共计6卷，如果按照当今的装帧方式，每卷都超过了1000页。下面我将介绍全集的目录，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威尼斯人所关注的范围。

第一卷

*莱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本名哈桑·瓦赞（Al Hasan Al Wazzan），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非洲见闻。

*阿尔维泽·德·莫斯托、佩得罗·辛特拉（Pedro de Sintra）、迦太基提督安诺内（Annone）、无名葡萄牙领航员等人的非洲西海岸航海志。

*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M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的非洲航海记录。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本人提交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统领的有关他两度远航新世界大西洋沿岸的报告。

*洛多维科·达·瓦尔泰马（Lodovico da Varthema）来自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旅行记。

*希腊人扬波罗的印度洋航海记。

第二卷

*安德烈亚·柯撒里（Andrea Corsali）寄自印度的两封书信。

*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的埃塞俄比亚旅行记。

*赖麦锡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关于尼罗河洪水的对谈。

*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主帅尼亚尔霍斯（Niarchos）的波斯湾航海记。

*威尼斯商船船长有关印度孟买、波斯湾、红海的旅行报告。

*奥多阿尔多·巴尔博萨（Odoardo Barbosa）有关东印度的记述。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有关从红海至中国一带的各王国、城市和居民的记述概要。

*尼科洛·达·孔蒂（Niccolo da Conti）、吉罗拉莫·桑多·斯特瓦诺（Girolamo Sando Stefano）的东南亚旅行记。

*麦哲伦（Magallanes）有关环球航行的报告。

*赖麦锡关于胡椒贸易的考察。

*路易·洛佩斯·维拉洛博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的太平洋航海记。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等耶稣会传教士寄自日本的

5封书信。

*胡安·巴罗斯（Juan de Barros）关于亚洲的5篇纪文。

第三卷

*马可·波罗的亚洲旅行记。

*海顿·阿尔梅诺（Hayton Armeno）关于波斯的历史。

*乔瓦尼·马利亚·安杰耶洛（Giovanni Maria Anjoiello）、无名商人、霍萨瓦·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安布罗焦·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等的波斯旅行记。

*艾伯特·肯培塞、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等人关于莫斯科的著述。

*西吉斯蒙德·冯·赫尔本斯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报告。

第四卷

*古罗马人阿利亚诺（Agliano）的环黑海航行记。

*乔治·因特力阿诺关于高加索人生活的报告。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关于西多族的记述。

*皮耶托·奎里尼（Pietro Querini）、克里斯托弗·菲奥拉万特（Cristoforo Fioravante）、尼科洛·米迦勒（Nicolo Michele）等人的挪

威航海及其海难记。

*卡博托父子的大西洋航海记。

*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波斯旅行记。

*卡洛和安东尼·泽诺的格陵兰岛发现记。

*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的蒙古人领地游记。

*奥多里科·达·波尔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两篇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

*亚历桑德罗·瓜尼尼（Alessandro Guagnini）和马泰奥·米科奥波的东欧报告。

第五卷

*彼得·马特·丹吉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所著的关于新世界的十章概要。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所著的西印度群岛史概要。

第六卷

*费尔南多·科尔特斯（Fernando Cortez）的关于墨西哥的三份报告。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和迭戈·戈多伊（Diego Godoy）关于危地马拉的报告。

*西班牙无名商人关于墨西哥人的报告。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等人的墨西哥探险记。

*弗朗西斯科·拉乌劳的加利福尼亚湾探险记。

*科罗纳多、安东尼奥·德·门多扎（Antonio de Mendoza）、马可修道士、费尔南多·德·阿拉孔（Fernando de Alarcon）等人有关北美（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探险报告。

*西班牙无名骑士、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Francisco De Xerez）、佩德罗·皮萨罗（Pedroo Pizarro）关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秘鲁的报告。

*亚马孙流域探险记。

*法国人的北美（现加拿大）探险记。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等人的北美东岸探险记。

*切萨雷·费代里奇（Cesare Federici）等人的北美旅行记。

*荷兰人的三次北海航海记。

以16世纪中叶的编纂水平，这套游记丛书的内容可以说几近完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可或缺的哥伦布本人所写的航海记没有能够被收录其中。当初，赖麦锡四处寻找文稿，结果还是徒劳无功。这里面的情况

比较复杂，一来是西班牙政府顾忌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形势，不想公开哥伦布的航海记；二来是因为原稿已经遗失，仅剩下封面和其中的两页。即使是复制本（应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概要）也是到1825年才问世。赖麦锡编纂这套丛书时，哥伦布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从复制本轻易转手来看，哥伦布的后人对此似乎不怎么在乎，因此不会像卡博托那样与赖麦锡书信往来，沟通相关事宜。

尽管游记丛书中没有出现哥伦布，但威尼斯政府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并非一无所知。威尼斯驻西班牙的大使秘书官皮萨尼曾将哥伦布的航海记复本概要作为绝密文件送回本国，后来元老院议员兼武将的编年史作者马利皮耶罗（Malipiero），又把内容浓缩成两页，写进了自己所著的《年代记》中。

威尼斯政府对一粒胡椒也没带回的哥伦布都派了间谍去打探消息，更何况是对满载而归的瓦斯科·达·伽马舰队。葡萄牙国王公开发表的那些消息，威尼斯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自己派人火速去了葡萄牙。

乔装成商人的威尼斯间谍帕斯奎诺（Pasquino）刚到葡萄牙，就因佛罗伦萨人的告密而遭到逮捕，后经威尼斯大使背后斡旋，很快被释放。出狱后的帕斯奎诺，表面上做着生意，暗地里不断地收集情报送回威尼斯。

帕斯奎诺的报告巨细靡遗。从达·伽马船队离开里斯本和归来的具体时间、船队的船只种类、船员人数、航线及其风向、船只的损失状况，到抵达加尔各答后印度人的反应、当地采购香料的实态，一应俱全，甚至连带回的香料的种类及其数量都有记录。帕斯奎诺还提到，达·伽马船队往返耗时16个月的航程（去程12个月，回程4个月），有可能缩短到8到10个月。

也不知道葡萄牙国王是否了解帕斯奎诺的真实身份，在接见时告诉帕斯奎诺，今后如果埃及的苏丹不肯卖香料，威尼斯可以来里斯本采购，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葡萄牙计划每年向印度发40艘船，同时也在考虑征服印度。

有关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详细情况之所以为后世所知，并非是因为他留下了航海记，而是在达·伽马在归国后，在里斯本做生意的佛罗伦萨商人向本国做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长期无人问津，一直到它被收录进赖麦锡编纂的游记丛书中，达·伽马远航的事迹才广为人知。但是，早在书籍出版的半个世纪之前，威尼斯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非常详细且准确的情报。也就是说，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威尼斯在资讯方面完全没有落后于人。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自己没有组织远洋船队呢？难道他们没有征服殖民地的野心吗？那么对大西洋航线的消极态度姑且说得通，但无法说明他们对非洲航线的忽视。与葡萄牙前往印度航线的船队相比，当时的威尼斯在规模上明显更具有优势。倘若再加上他们的组织能力，葡萄牙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威尼斯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远洋航行。

站在后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人们，认为当时威尼斯的不作为，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可是，如果东地中海的市场情况真的是那么令人绝望的话，威尼斯应该无暇去纠结是否在远洋技术上落后，必定会全力以赴地开辟非洲航线。胡椒之于威尼斯经济，就像婴儿之于母乳一般重要。事实上，地中海的贸易不仅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形势相当好。至少葡萄牙人并不是由于西欧香料短缺的原因，而开始积极开辟非洲航线的。

300年来始终是威尼斯贸易主力商品的香料，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的交易渠道大约有以下4条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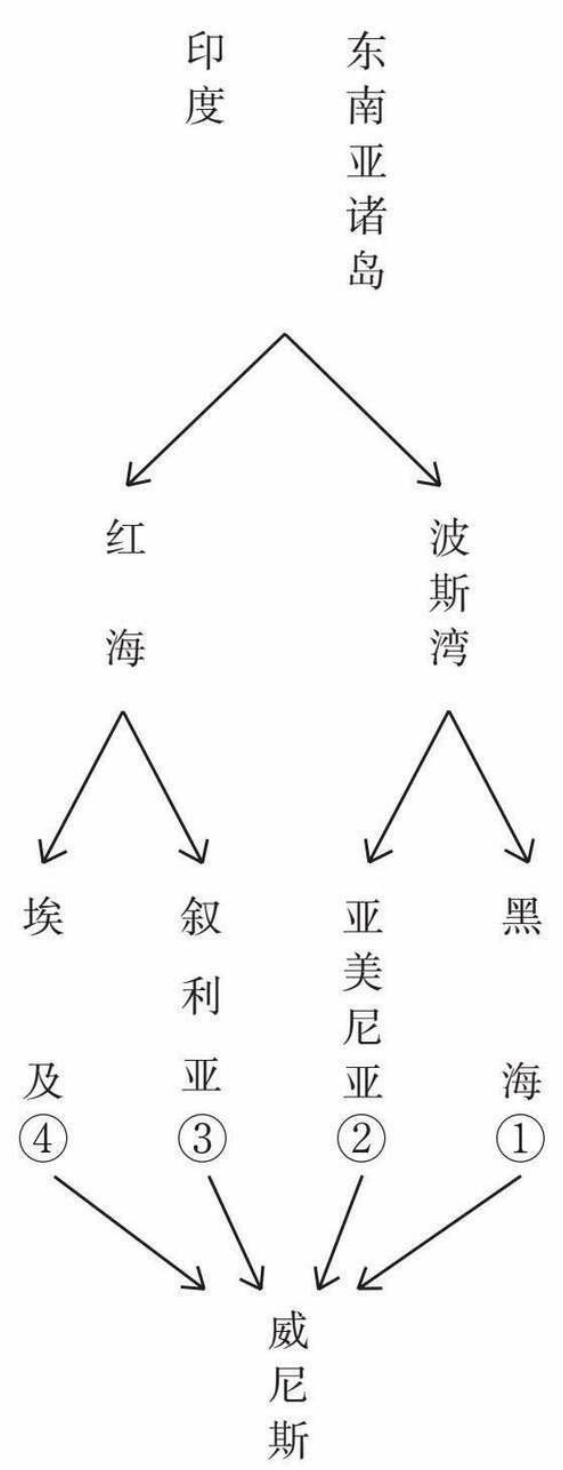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①和②两条路线由于盗贼的出没而越来越不安全。安全系数降低意味着风险增大，商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虽然威尼斯商人没有撤离黑海沿岸的塔那、特拉布松等地，但在这些地方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皮草和小麦等，从远方的波斯运来的商品几乎已经消失无影。

③和④路线中的利比亚、埃及，由于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相对比较安全。1400年之后，这两条商路不仅运送东南亚群岛的香料，还有来自中国的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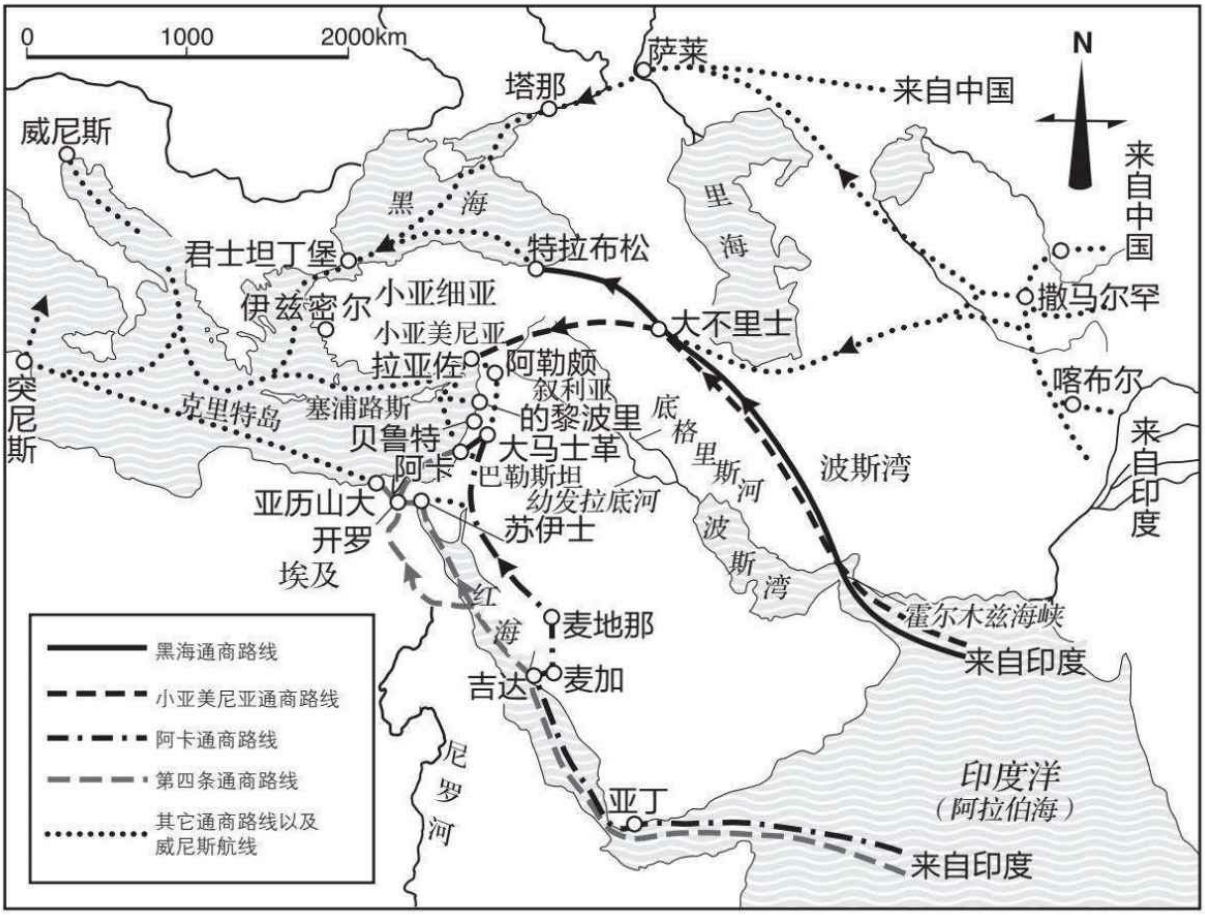
话说回来，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控制了包括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地区，可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如今的伊朗）却没有威慑力。换言之，经过巴格达的这条商路，无论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大马士革或阿勒颇（Aleppo），还是穿过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登陆，经大不里士前往黑海，都无法保证安全。最好就是避开波斯统治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一带。

不管怎么说，经由红海的③和④两条商路所运输的货品，无论是从质或量上，还是远远地超过了①和②路线。红海线路还兼有前往麦加的朝圣功能，对穆斯林商人也十分便利。

从印度运来的商品，在吉达（Jeddah）港卸货。结束朝圣后，穆斯林商人们便组成庞大的商队（caravan），穿越沙漠北上。人数之多，据说仅走出麦加城门就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当商队行至苏伊士附近时，分成两队，往北的前往大马士革，往西的则经过开罗前往亚历山大。



威尼斯香料贸易路线



香料之路

迎接穿越沙漠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开辟的叙利亚商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不仅是香料的集散地，也是威尼斯商品的输出地。尤其是帖木儿帝国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大马士革的很多工匠被强制迁移至撒马尔罕，叙利亚对威尼斯的依存度因此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威尼斯工业的发展在刚起步时，就是为了满足叙利亚的需要。叙利亚商路前往地中海的出口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

基于上述理由，保证红海商路的安全，对于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条线路虽然总体上比较安全，但还是会出现种种麻烦。穿越沙漠的大商队即使有武装士兵护卫，但对那些骑着阿拉伯快马如疾风般袭来的贝都因人强盗还是防不胜防；埃及苏丹善变捉摸不定，再加上红海沿岸地

方土豪们对埃及苏丹并非那么驯服，他们坐地起价，随意征税，这些问题都给威尼斯商人稳定商品成本带来了障碍。

到142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威尼斯向埃及提供武器，协助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亚丁（Aden）在内的整个红海地区。这不仅减少了红海航线的风险，从此也不必被迫停靠亚丁港，支付高额的关税。若无靠港的需要，阿拉伯的商船可以直接前往吉达。

埃及苏丹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沙漠霸主贝都因人。这一连串形势的变化，都促进了商品成本的降低，所以威尼斯才会把通商的主要地区，锁定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因为这样，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没有让威尼斯的经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威尼斯人而言，犹如当今的纽约、伦敦对于商界的重要性。经营大宗贸易的商人或银行，都会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哪怕是那些没有条件派专人常驻的中等商人，也会花钱委托代理人处理商务和收集情报，否则就没法在亚历山大做生意。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领事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活动经费都远远地超过驻开罗的大使馆。

威尼斯在亚历山大有两间大商馆。虽说建馆的目的为商用，但建筑物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美学品味，它们被誉为亚历山大最美的建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仅拥有一间商馆，加泰罗尼亚人和刚参与地中海贸易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的据点都只有巴掌大。

由于是在异教徒土地，商馆的四周围起高墙，墙上是被威尼斯人称为“花边纹样”的阿拉伯独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元首官邸等建筑中看到“花边纹样”。

商馆中心区域的中庭，种有草木，装置喷泉，这也属于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进出不绝的商品放在拱门相连的回廊上，边上的房间有的作为仓库，有的则是谈生意的会客室。楼上是短期停留亚历山大的商人的宿舍，长期在当地的商人，大多会在商馆附近寻找独立的空间居住。为了防止火灾，厨房和面包作坊都设在楼上，另外还有理发室，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商馆还设有教堂。虽然馆内属于治外法权，但只要苏丹一声令下，这个权利随时都可能作废。为了保护基督徒不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伤害，馆内人员在夜间和伊斯兰教休息日的星期五，都不得外出。除了亚历山大，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内，威尼斯在所有的商业重镇都设有类似的商馆。

所谓交易，就是以物易物。单向进口的商业形式既不健全也没有持续性。就像叙利亚需要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一样，埃及与威尼斯之间同样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威尼斯向埃及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德国人卖到威尼斯的铁、黄铜、铜和银器，以及意大利生产的纺织品、威尼斯特产的玻璃制品等。小型的携带式指南针也很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不过他们主要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穿越沙漠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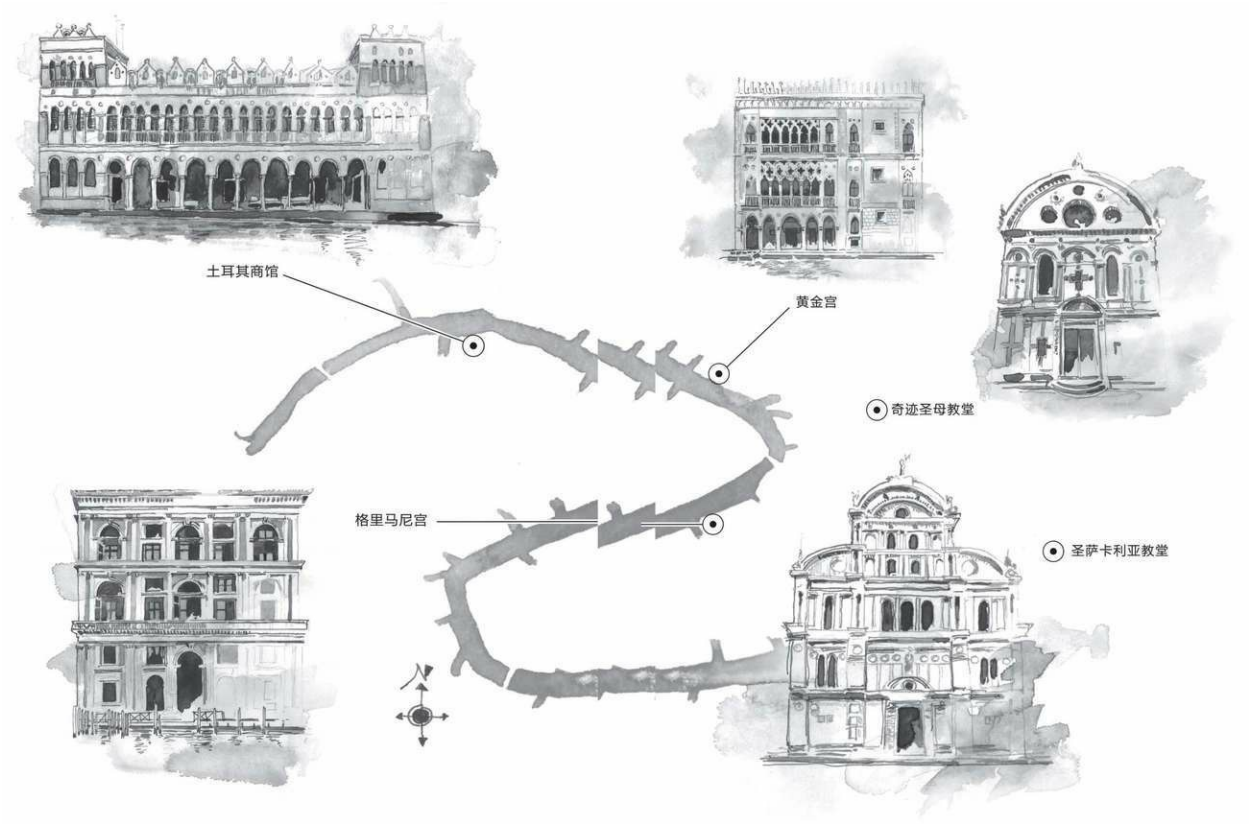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商品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独家销售，热那亚、加泰罗尼亚、马赛等地的商人们也做着同样的买卖，只是商品种类的比重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威尼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并非是源自商品的特殊性，而是将通商贸易彻底地系统化、组织化，这才是他们的独到之处。

前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威尼斯固定航线，以每年初冬返港的日程一直在稳定地运转着。船队通常由10艘商船组成，另有加莱战船负责保驾护航。安全且有规律的贸易是威尼斯人为自己定下的通商原则。

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政府的管理具体到每一条船，每一个商人。设立于各商业重镇的威尼斯大使、领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领袖保持密切地联系，保护和监督在当地的本国商人。

可是，如果政府的“行政指导”做过了头，又会抑制个人的活动。因此，还需要有变通性。比如说威尼斯的海商法规定，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必须由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负责运输。但如果固定商船队的负荷过重，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可以先用帆船将香料从亚历山大、贝鲁特运往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改换加莱商船运回威尼斯。

有法可依，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心感。但过分的循规蹈矩，就像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出现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预防“动脉硬化”的问题。



15、16世纪威尼斯的建筑风格

威尼斯政府张弛有道的政策，为威尼斯商人在伊斯兰世界成为最受信赖的商业伙伴起到了帮助，任谁都愿意与守时的人打交道。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占据地中海贸易总量的2/3到四3/4，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纯粹的经济思维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哪个生意人可以保证自己只和观念相近的民族打交道。无论叙利亚还是埃及，掌控红海这条商路的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专制君主苏丹，而且这些国家信仰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保持共存共荣的商业关系，苏丹在理性上是认同的，但他的理性，时不时会被愤怒代替。

苏丹的这种“伊斯兰的愤怒”一旦爆发，即使是在商馆内享有治外法

权的威尼斯人，照样会遭遇入狱、商品被没收等无妄之灾。但凡要求他们像威尼斯保证境内的穆斯林商人的权益一样，保证威尼斯人的商业自由和人身安全，当权者总是回应称此乃真主的意志。与穆斯林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再小的事情也是谨慎地对待，尽量不让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1442年，在巴勒斯坦亚阿卡经商的威尼斯市民皮耶罗·马切洛（Piero Marcello）因叙利亚人在生意成交后迟迟不肯付款，一怒之下将这名叙利亚人绑上了船。马切洛驾驶着这艘与朋友共有的帆船在贝鲁特靠港上岸。他不仅没有释放叙利亚人，还以谈生意的名义，将10名穆斯林骗上船，一口气开到罗德岛，把这些人卖给了当地人做奴隶。

威尼斯政府闻讯后，立刻宣布判处马切洛绞刑，并悬赏4000达克特的奖金活捉马切洛，交出尸首的人也能获得2000达克特。同时，火速派特使赶往开罗，要求勃然大怒的苏丹释放所有因受牵累而遭逮捕的威尼斯人，恢复威尼斯在当地享有的商业特权。双方交涉的结果一切如威尼斯所愿。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北非。当时正在北非沿岸航行的威尼斯商船遇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不仅船被拖到他们的根据地罗德岛，船上的10位穆斯林乘客全被卖为奴隶。

保护乘客的安全是船长的义务。于是，威尼斯政府下令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立即出动。抵达罗德岛的威尼斯舰队，在港口一字排开，船上的大炮齐齐对准要塞，逼着骑士团要么释放穆斯林，要么开战。不用说，威尼斯的船和乘客最后都平安归返。

很不幸，世间的事情并非因为做得有道理便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威尼斯的举动，遭到了基督教各国的非难，他们斥责威尼斯为了利益，毫无节操地勾结异教徒。从高举消灭异教徒大旗的圣约翰骑士团，到出没

于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的海盗船，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袭击威尼斯的商船。为固定航线的商船队保驾护航的威尼斯加莱战船除了要对付北非的专业海盗，还得提防同为基督徒的船只，在没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绝不轻易地靠近做礼节性的拜访。

其实，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如果摆出强硬的姿态，能够解决问题，威尼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控制红海商路的埃及的苏丹，一直盘算着提高香料的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甚至威胁说不到要求的价格，绝不出手。对此，威尼斯方面以价格不合理而断然拒绝。

拒绝了苏丹要求之后，威尼斯政府首先令国民将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财产或投资全部转移到克里特岛和莫东岛，除了外交人员之外，当地的商人及其家属全体撤往克里特岛。待苏丹无法再以没收财产或扣留人质相要挟时，威尼斯政府这才向所有到港的威尼斯商船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要立即卸下带来的货品，见机行事，而且必须在船上进行交易。

结果，1430年出海的商船队只带回了少量的香料，但是在第二年的1431年，船队则是满载胡椒而归。

当然，专制君主的欲望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便偃旗息鼓。被称作哈里发的埃及苏丹不断地尝试着去控制香料市场。遇到这种情况，威尼斯既做出过反抗，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不过即使妥协，威尼斯人也会死缠烂打，能多争取一分算一分。与苏丹交涉的威尼斯大使，顾不上讲究什么体面，毕竟这件事关威尼斯商品的库存量。

最终，威尼斯按照苏丹提出的价格签下了210大袋的胡椒。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的集市自由购买胡椒。210大袋的胡椒，仅是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集市采购的数量的1/10。

为了解决两种采购价之间的差额，威尼斯政府以税金的形式向亚历山大的商人们征收，这样，胡椒的价格就不会因为对苏丹的妥协而受到波动。

如上文所述，威尼斯人对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保证红海航线的相对安全，可谓是不惜余力。从1420年到1440年，威尼斯市场的胡椒批发价成功地下降了50%。每大袋胡椒40达克特——50达克特的市价，直到15世纪末都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调整。威尼斯就是以这个价格每年向西欧运送2万吨到4万吨的香料。顺便提一句，由于胡椒是香料市场的大宗商品，因此，香料整体价格的波动是以胡椒价格为指标。

这就是15世纪末期，以达·伽马为代表的葡萄牙向南，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向西，为寻找香料而探索未知世界的时空背景。那时的西欧不仅不缺香料，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牢不可破的垄断体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让地中海变成少人问津的边陲。

危机

既无法自给自足，又人口稀少，仅靠国民的智慧和意志力这两种资源存活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应对所有考验的方法史。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省略了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逐一叙述过于复杂，恐怕没人有这个耐心阅读，更主要的是我自己的脑袋先会麻痹。虽说历史的复杂性是其最精彩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提炼、整理还是必要的。

看着这些整理出来的“考验”，我时常会想，若是换成其他国家，大概会惊慌失色、骚动不已吧。根据当时的记录，威尼斯人面对种种困境时，同样也会六神无主，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安慰，看来保持沉着冷静在

任何时代都不容易。

不过，威尼斯在手足无措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地会走出一条阳关大道。人无法预知前景，只有等待幸运的降临。然而，等待也需要有忍耐的体力。威尼斯之所以能承受住西班牙、葡萄牙的挑战，靠的正是他们的“多元化经营”。

1499年对威尼斯是一个难熬的大凶之年，两件坏事接踵而至。

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的胡椒，不到威尼斯年交易量的1/50，因此他的远航事迹再怎么令人震惊，事实上也不能左右里亚尔托的市场价格。真正的威胁是同年爆发的对土耳其的战争，它很快就在第二年撼动了里亚尔托市场。

破坏维系了20年和平关系的，不是逢战必遭受损失的威尼斯，而是陆地型国家土耳其。已经把希腊全境完全纳入囊中的土耳其，无法忍受伯罗奔尼撒半岛先端的一小块地区仍然属于威尼斯。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的两个海军基地——莫东和科伦。

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两只眼睛。威尼斯开往东方的固定航线商船队，出亚得里亚海之后，会依次停靠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它们等于是威尼斯铺设的海上“高速公路”的两处驿站。正如科孚岛和克里特岛是必停港一样，莫东和科伦也是威尼斯的所有航船必须停靠的港口。因此，当这里受到攻击时，威尼斯明知战争对己不利，还是不得不挺身而出。

威尼斯国内原本就没有为应因战争而设立常备海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无法立即调集大量的舰队。他们的常备海军，只有那些驻守在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等海军基地，负责周边警卫的舰

队。所以，一旦发生状况，不可能指望国内组成新舰队迅速赶来支援，通常都是动员国内或各个基地等待出港的军舰，或者是正好在附近海域保护商船队的护卫舰，组成临时的作战舰队。这一年，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向护卫舰下达了集结令。

这样一来，那些按规定必须有护卫舰才能出海的固定航线的商船泊在码头，动弹不得。其他船只还是可以航行，但仅限于走固定航线的运输胡椒的商船，进货量因此几乎降到了零。与前一年1498年每大袋胡椒56达克特的单价相比，1500年上涨到100达克特。威尼斯垄断香料市场80年，凭借的就是将每大袋胡椒的单价维持在40达克特到50达克特之间的本事。胡椒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它人照样能够存活。突然上涨的价格导致购买量下降，这个结果给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元老院连日举行会议，就是否解除护卫舰集结令，或者在无法解除的情况下，商船队是否能够单独出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编年史作者萨努多的记载，手里拥有胡椒库存的和没有库存的议员形成对立的两派。在里亚尔托商圈，甚至传说舰队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家族因这次骚动赚进4万达克特。

1501年2月，里亚尔托市场的代表商品胡椒的批发价已经飙升至130达克特。元老院终于做出决议，准许商船队在没有护卫舰的情况下出港。一个月之后，胡椒的价格回落到62达克特。

但葡萄牙的挑战，从那个时期开始，已经对里亚尔托市场造成了威胁。1500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大舰队前往印度洋。他们攻击了非友邦的加尔各答，还击沉了一艘在印度洋上满载着香料的阿拉伯船。这个事件的影响，在1502年的秋天显现而出，当时威尼斯胡椒的价格，又上升至95达克特。

在胡椒价格上升的同时，印度洋通往红海航线的安全性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过这条航线运输的香料数量减少。威尼斯的胡椒价连

续几年在100达克特，居高不下。

同样因为销售量减低而受到影响的埃及苏丹为了一举弥补损失，提高了亚历山大市场的香料售价。威尼斯分析涨价后的香料无利可图，于是中止了当年的固定航线。

话说回来，在不得不对抗葡萄牙的挑战的问题上，埃及和威尼斯倒是利害相一致的。尽管双方围绕胡椒价格有所冲突，威尼斯还是派遣特使前往开罗，与苏丹认真地商讨了对策。

向来信奉先尽人事再待天命的威尼斯人，请苏丹去要求印度王停止与葡萄牙的交易。虽然印度王与苏丹有多年的贸易来往，但在葡萄牙大炮威胁下，也不敢点头答应老朋友的要求。

在和印度交涉的同时，威尼斯又怂恿苏丹威胁罗马教皇，如果葡萄牙不撤出印度洋，他们就破坏圣城耶路撒冷，让欧洲的基督徒无法前去朝圣。可惜，这招也没奏效。因为葡萄牙国王迅速派特使去见教皇，强调苏丹绝不会破坏为他带来莫大利润的圣城。有关这一点，将朝圣旅行产业化从中获利的威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打着这种幌子去胁迫教皇，看来一向精明的威尼斯人多少也是有点儿黔驴技穷了。

倒是苏丹更实质性向威尼斯提出了武器和技术支援的要求。为了把葡萄牙船队驱除出印度洋和红海，穆斯林需要改造船的构造。尽管他们的船体量大而且坚固，却不敌装有大炮的葡萄牙舰船。在大炮制造技术上，埃及要远远地落后于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

对于埃及的请求，威尼斯却不能轻易地答应。葡萄牙开拓香料市场，以不让穆斯林染指为由，获得基督教世界的一致好评。身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威尼斯如果借异教徒之手对付葡萄牙，势必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

最终，威尼斯政府还是拒绝了苏丹的请求。不过内心期盼埃及战胜葡萄牙的他们，暗地里向苏丹出谋划策，要他向土耳其购买大炮，从希腊招募船员。当然这些台面下的工作，是由威尼斯商人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

就这样，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埃及舰队，从红海驶向印度洋，在与葡萄牙人的海战中，首战告捷，第二场却输得一败涂地。祸不单行的是，埃及为重组新舰队从土耳其采购了大炮和建材，运输船在南下东地中海的途中，被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抢劫一空。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印度洋和红海成了葡萄牙人的天下。威尼斯迎来了最糟糕的事态。

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和解，开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固定航线的商船队再次得以自由航行，可是却没有来自红海的货源。第二年，前往亚历山大的商船仍然没有运回任何胡椒。威尼斯政府开始考虑苏伊士运河。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远至古代，古书中就有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热衷于此的记载。威尼斯人这时也想起了古人的构思，只要在同样的地点打通运河，连接起地中海与红海，就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以威尼斯海军的力量，不仅对付葡萄牙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代替阿拉伯人夺取红海的制海权。

威尼斯计划承担所有建设费用，而且当时的意大利有着代表工学最高水准的技术人才。然而，这项原本轮不到雷赛布[1]主持就能提前实现的远大计划，终究因遭到埃及苏丹的坚决反对而破灭。苏丹反对的原因是担心运河开通后，威尼斯会跳过他直接向印度采购。

就在威尼斯想方设法寻找对策之际，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大本营，在安特卫普（Antwerp）设立分支，开始慢慢地渗透进香料市场。而另一方的威尼斯，1505、1506连续两年没有胡椒货源，市场形同关闭。当然，胡椒也不是颗粒无收。企图全面封锁红海的葡萄牙，始终未能攻下

扼制红海口的亚丁。既然入海口不在葡萄牙人的手里，就会有少量的香料进入威尼斯。只不过这点儿数量对于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实在是杯水车薪。

1506年，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最大客户的德国商人决定将胡椒的采购地由威尼斯转往安特卫普。在德国人之前，英国人、法国人、佛兰德斯人已经做了变更。无论如何想保住与德意志的生意的威尼斯，考虑从里斯本入货，再在威尼斯出售的可能性。可是，这种交易方式，有两个大问题。

首先，葡萄牙的香料价格过于昂贵；其次，是失去东地中海市场。东地中海不仅是威尼斯进口香料的市场，同时也是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

面对不利的形势，威尼斯政府设立了直属元老院的“通商五人委员会”（Cinque Servizi di Mercanzia），负责重新审视威尼斯的经济与产业现况。

少了胡椒的威尼斯，犹如没奶喝的婴儿，实际上已经处于断奶的阶段。委员会在对形势做出判断之后，决定振兴国内产业，为嗷嗷待哺的孩子找到替代的乳汁。所幸，威尼斯重整旗鼓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委员会同时也研究了各种新方案，试图找到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莫斯科经里海，绕过鞑靼人的居住地，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但由于从北边进入印度的道路过分艰险，计划遭到了否决。也有人提出移植胡椒树苗，在地中海的岛上进行栽培。但是在看过东南亚岛屿的气象记录后，移植案也不了了之。威尼斯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通过陆路到过苏门答腊、爪哇岛和锡兰（斯里兰卡），对当地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正所谓祸不单行。除了商业技术，威尼斯人剩下的资源，就是高超的外交艺术。可是就在经济面临困境的当口，他们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误，导致整个欧洲与威尼斯为敌。

1508年，康布雷同盟（League of Cambrai）成立。主要成员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向来以分化敌人而出名的威尼斯，这次犯了一个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错误是，往往认定对方与自己的思路相同，不会轻举妄动地做出鲁莽的行为。威尼斯人一战丢掉了800年以来他们所有的努力成果。"

康布雷同盟宣战的正式理由是：威尼斯奉行侵略主义，放任自流将给欧洲带来危险。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威尼斯拥有最大面积的海外领土，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其势力无人能比。不过，威尼斯直辖统治的地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自治。威尼斯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通商路线的安全。

然而，对于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势力，并且已经成功拿下南部的那不勒斯和北部米兰的法国、西班牙各国而言，唯一作为实质的独立国家存在的威尼斯是一个眼中钉。而教会因意大利中部的领土问题与威尼斯有冲突，也趁机加入了反威尼斯联盟。

在意大利独立的问题上，威尼斯与罗马教会原本是同一阵线的。将教会推往敌人一方，是威尼斯外交的败笔。罗马教会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军力，但它能让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敌对国得到堂皇的借口，让战争成为名正言顺的圣战。所以与教会打交道，务必得小心翼翼。史料中记载

了这样一段插曲：

某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皮萨诺见面。话题依旧围绕着罗马涅（Romagna）地区两个城市的归返问题。皮萨诺像以往一样，摇头不肯答应。被激怒的教皇咆哮："既然如此，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小渔村。"

面对盛怒的教皇，威尼斯大使冷冷地回答："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也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

不久之后，在联盟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的教皇答应加入康布雷同盟。威尼斯大使的错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警示：外交上必须恪守分寸，有些话只能放在心中，绝不能脱口而出。这位令米开朗基罗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势头正如日中天的尤利乌斯二世，在神职界的起步就是从乡间的一介神父开始的。

战争的最初阶段，威尼斯还处于优势，但之后的阿纳戴罗（Agnadello）战役却输得一败涂地。即使在香料进口量跌倒谷底时也少有波动的政府国债，这一年的价格暴跌了50%。当时认为威尼斯800年的成果毁之一炬的，肯定不只马基雅维利一人。

不过，两年之后，威尼斯在军事上，尤其是外交上逆转局势，他们首先成功地说服教皇脱离了同盟，紧接着又分化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又更成功地与德国、教廷和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

结果，在领土上与威尼斯最有利害冲突的法国，非但没有占领意大利，反而被扫地出门。威尼斯一点一点地重新收复了大部分被夺去的领土，国债也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价格。地中海贸易的漫长冬季，眼看着就要结束。

卷土重来

世事难料，永远猜不到谁会是你的福星。为威尼斯重振东地中海贸易助力的，竟然是它的老对手土耳其和新对手葡萄牙。

葡萄牙之所以能将威尼斯赶出香料市场，靠的不是它的商业竞争力，而是用武力阻断了威尼斯的进货渠道。

事实上，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市场的香料，其高昂的价格正如威尼斯人所形容的那样违背了贸易常识。葡萄牙国王的商业逻辑和操作，与埃及苏丹如出一辙，垄断货源，就是为了抬高价格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种做法，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行得通的。德国、法国、英国的商人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卖家，才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香料。然而，购买力并不如葡萄牙所预期的那么理想。其实，就算是购买力增大，葡萄牙也没这个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形同国有企业的模式。也就是说，利益越赚越多的，始终只有国王一个，其他人都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一旦遇到有效运用资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的弊端即刻暴露无遗。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传统上就是一个非万不得已，绝不企业国有化的民族。虽然获取商业通路，需要仰仗海军及外交等国家力量，但买卖商品，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就像走固定航线的商船，船是国有的，但每次出海，都是以竞标的形式，租用给个人。甚至国家银行，也一直到16世纪末才设立，而且担任银行总裁的并不是国家公务员，而是三年合同制的经理人。在威尼斯，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作为国家整体，却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总之，威尼斯与葡萄牙两国的商贸观念相差甚远。威尼斯希望通过稳定、合理的价格，来延续并扩大市场，因此需要持之以恒的国家方针和个人的自由竞争。而葡萄牙人只是想方设法干掉对手，然后牟取暴利。香料贸易原本就利润丰厚，现在葡萄牙的路线少了层层中间商，就算是有海路遥远的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可是葡萄牙人却以惊人的高价销售，难怪当时的威尼斯商人指责说他们牟取暴利。

编年史作者、银行家的吉罗拉谟·普留利等悲观派在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时曾经预言威尼斯的经济将在葡萄牙人的挑战之下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换位思考，如果是威尼斯发现了新航线，葡萄牙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按照这些悲观派的思路，葡萄牙在封锁红海断绝威尼斯进口路线的同时，会系统性地降低非洲航线的成本，再加少了中间商的费用，可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就算是威尼斯重振地中海贸易，在价格上也无法和葡萄牙竞争。

现实主义者的错误，就是以为对手会和自己有同样模式的思维和行动。当然，这次错估葡萄牙，对威尼斯而言是犯了一个愉快的错误。

葡萄牙是否能垄断香料市场，取决于他们封锁红海的军事力量。因此，任何军事上的威胁，都意味着对垄断体制的威胁。土耳其在1516、1517年相继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这个比过去的马穆鲁克王朝更强劲的对手，让葡萄牙绷紧了神经。虽然威尼斯并不乐见宿敌的势力不断扩大，但土耳其牵制住葡萄牙，却让威尼斯有机会振新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是为了控制麦加，在宗教上也成为伊斯

兰世界的领袖。完全掌控红海地区，当然就成了它的主要目的。土耳其派精锐部队常驻红海入海口的亚丁切断了葡萄牙原本就不算完整的红海封锁线，红海通商路线，得以被再次开启。

葡萄牙与土耳其的争斗不仅在红海，为了保证印度洋的制海权，葡萄牙与波斯王联手共同对付土耳其。葡萄牙虽然因此掌控了波斯湾，但作为与波斯王的交换条件，葡萄牙必须将印度运来的相当一部分香料由原先的非洲航线改为经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卸货。

经由波斯湾运送的商品，集散地在巴格达。在这里集中的香料，大多会运往需求量大的地中海流域。即使国与国对立，商人们在赚钱问题上，还是很有共识的。结果，葡萄牙千辛万苦运来的香料，有一部分就这样去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而在那里等候的正是威尼斯商人。威尼斯政府在得知波斯线路重开之后，立刻在阿勒颇设立了与亚历山大规模不相上下的商馆。

葡萄牙人帮忙的事情还真不少，其公务员的走私行为也让威尼斯从中得利。葡萄牙的船长、船员们一向不满国家拖欠他们的薪水，土耳其的出现，更增大了海上的风险，不能准时拿到薪水使得船长和船员们的负担变得日益沉重。于是，船员们将一部分货物偷偷卖给穆斯林，货物通过红海，最终又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

成功救活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降低了香料的价格。那些带着本国产品去安特卫普换取香料的欧洲各国的商人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威尼斯市场。眼看着情况不妙的葡萄牙这才急着调整价格，但受制于其商业模式，实行得并不顺利。

中间商多，是地中海贸易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上、下家之间距离较短，风险相对较低。但如果遇到中央政府影响力不足，地方土豪各自

为王，设立层层关卡、随意征税，商品就不可能在低价位销售。相反，如果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些非法的苛捐杂税便会减少，流通成本因此降低。与从前的马穆鲁克王朝相比，土耳其是一个中央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这对贸易商们当然是件好事。而葡萄牙由于运输航线漫长，途中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损失，这也是他们无法大幅降低香料价格的原因之一。

从1517年起步、1530年进入正轨的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发展到1550年前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半个世纪前那段黑暗的日子恍如隔世。

从麦加出发的由20万商人和30万头骆驼组成的超大商队，仅为红海商路，就带来了3万吨——4万吨的香料。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又完全回到了达·伽马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情形，当然，在数量上也远远地超过了里斯本。胡椒交易活跃，意味着其他商品的流通性同样向好。在这个时期，一些需求量大的产品威尼斯已经可以在本国生产，迄今为止对工业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而其对手葡萄牙，不仅没有发展工业，甚至连国家的独立都岌岌可危。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

话说回来，虽然葡萄牙没能够长期垄断香料市场，但威尼斯独占市场的风光也不再来。16世纪中叶，波斯、红海、非洲三条通商线路并存。保留非洲商路是因为一旦与土耳其开战，波斯和红海商路势必瘫痪。所以，威尼斯通过采购香料专用的形式，维持着非洲线的运转。

在地中海贸易正式复兴之前，为保护地中海贸易，威尼斯政府曾在1519年出台法律规定，从里斯本采购的香料要比来自东方的多支付3%的关税。这条法律在1570年被废除。1570年是土耳其进攻塞浦路斯的一年，翌年，则是勒班陀海战发生的一年。

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在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统治之下，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版图包括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南美洲、非洲沿岸以及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部分南亚地区。在欧洲部分，西班牙不仅拥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支持，而且掌控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立王储代理统治。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拥有史上最强的陆、海军战斗力，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整个世界能够和菲利普二世一比上下的，唯有土耳其的苏丹。从爱尔兰到东欧、多瑙河、地中海、波斯湾、苏门答腊，都是两大势力较量的战场。

从1530年开始，土耳其开始着手苏伊士运河的建设。他们和欧洲人一样，也燃起了对亚洲的野心。和当初威尼斯人企图打通运河不同，土耳其已经控制了埃及，因此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成功与否，只看土耳其的决心。

威尼斯对此事非常关注，甚至派间谍打进内部，查探进展情况。威尼斯和土耳其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目的不同，前者为了商业，后者为了军事，但都迫切需要利用地中海通往印度洋，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不过，土耳其人在年底中止了运河建设，因为与波斯打仗需要资金。

土耳其重新开始运河建设是在1586年。那一次的进展速度比较快，但再度因对波斯的战争而中断。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筹集经费建设殖民地，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通过非洲航线振兴香料贸易。因为精明的威尼斯人在复苏地中海贸易的同时，导致了非洲航线的衰败。

西班牙国王于1584年正式提出的方案，详细如下：

抵达里斯本的所有香料，交由威尼斯独家销售。

国王保证每年从非洲运来的香料总量，不低于三万吨。

给予威尼斯低于他国的关税优惠。

从里斯本到威尼斯的运输船，由西班牙舰队护送至西西里岛。

威尼斯向国王支付的手续费，只需要支付1/3的现金，剩余金额分6个月付清。

其实早在5年之前，威尼斯就觉察到国王的这份心思，但正式提案的魅力，还是超出了想象，让他们感到难以抗拒，不过还是不敢贸然答应。政府指示“通商五人委员会”严格检讨提案的风险性，在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后，元老院又进行了数次谨慎的商议。

提案中最没有问题的是，由西班牙舰队护送威尼斯商船至西西里岛。威尼斯在西地中海的军事基地网，原本就不如东地中海一带来得完备，能省去舰队的护卫，当然是再好不过。

第二个魅力是关税的减轻。当时威尼斯向土耳其所缴纳的关税，远高于土耳其同盟国的法国。

然而，提案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仅靠非洲航线，是否能承载如此庞大的香料数量。对于威尼斯人的这个疑问，西班牙国王对威尼斯大使肯定地回答道：只要威尼斯的财力、造船以及航海的技术，投入西班牙的航海事业，便能解问题。国王的言下之意，只要威尼斯愿意接受西班牙的军事保护，市场可以扩展至亚洲，甚至新大陆。这对威尼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接受西班牙保护，意味着独立的主权受到撼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件事视为万事开头难的好例子。有人批评16世纪的威尼斯人缺少他们祖先的进取精神，12世纪时威尼斯因为加入了拜占庭帝国的伞下，才得到了发展。而进取心的缺失正是导致威尼斯衰败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互惠互利关系的成立，必须得保证提供对方最需要的东西。拜占庭帝国给予威尼斯零关税的优惠，威尼斯则以海军保护回报。而威尼斯能够给西班牙的财力、商业、造船、航海技术，没有一项是西班牙必不可缺的，这些只属于锦上添花。一旦专制君主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找在这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代替。

就算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双方的商业合作一旦开启，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东地中海的贸易。否则，加上地中海线路采购的香料数量，势必会供大于求，导致胡椒价格暴跌，影响整个香料市场的经济。何况，谁也无法保证可以彻底阻断通过红海或波斯湾进口的香料，葡萄牙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威尼斯就算是垄断了里斯本的市场，它原本在东地中海贸易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

地中海市场对于威尼斯而言，不仅只是香料的进口地，同时也是销售德国、意大利以及本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居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这4个城市的威尼斯人家庭，多达4000户以上，他们早已在东方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虽说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举国投资成功获利，国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实即便那一次的投资失败，损失也是有限的。更何况，菲利普二世提出合作建议时，正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计划可能实现的时期。

威尼斯政府拒绝了西班牙国王的建议，他们的决定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是明智的。

在遭到威尼斯拒绝之后，菲利普二世又陆续向米兰、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商人提出了相同的方案，结果一律被拒。

直到1586年，合伙人总算出现。这是一个以富格尔家族（Fugger）为首，由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人共同出资，为香料生意特地创建的国际投资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富格尔，公司在安特卫普、吕贝克（Lubeck）、米特尔贝格（Mittelberg）、汉堡、威尼斯都设有分支。

1591年，商业活动正式运作，大量的香料抵达吕贝克和威尼斯。起步相当不错的生意，没多久便出现了停滞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在三年前的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气焰高涨的英国海盗比以前更为猖獗，不仅是大西洋航线，甚至连非洲航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受此影响，经由里斯本销售的胡椒价大大高于威尼斯市场，就连富格尔公司的股东们都承认从威尼斯采购更符合经济利益。他们原本是卖香料给里亚尔托市场，结果反倒成了买家。

西班牙国王与德意志商人垄断香料市场的野心，因17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崛起，终于化成一团泡影。这就是是威尼斯人决定抽身离去后事态发展的结局，没有任何人对他们当时的拒绝表示异议。

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受到致命性打击，是在进入17世纪之后。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荷兰人将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做到了当年葡萄牙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不是通过封锁通商路线，而是用直接统治产地的方式，来掌控香料市场。威尼斯的衰退并非因为落后于大航海时代，无法因应殖民帝国的崛起，才是他们走向末日的第一步。

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香料贸易无论如何还是支撑了一个多世纪。但有些商品却很快便败下阵来。

首先是糖。中世纪时糖的主要供货源，来自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岛经营的大农庄。1470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他们使用大量的奴隶和燃料在当地进行甘蔗的栽培。进入西欧的马德拉产的蔗糖，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1490年，也就是达·伽马发现新大陆的10年之前，威尼斯与安特卫普两地的蔗糖批发价只有以前的1/3。之后，当马德拉群岛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时，巴西出现了。

糖市场的失利，对威尼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1489年和平合并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便计划大规模地振兴制糖业。所幸，他们立即把塞浦路斯改成了棉花种植地。当地原本就生产棉花，所以只是将生产重心从糖变成了棉花。

塞浦路斯的棉花生产量很快就增加了三倍。时值德国棉纺织业兴起，所以原料不愁销路。1571年塞浦路斯岛落入了土耳其手中，但土耳其人不擅长经营。在整个16世纪，塞浦路斯岛的棉花，始终是经里亚尔托市场的威尼斯人之手销售的。至于新大陆的棉花进入西欧市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威尼斯不生产仅做转手贸易的染料，也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商品之一。这是一个伴随着纺织业的日益发展，需求量在西欧市场不断上升的商品。

染料中需求最大的是红色，它是从寄生在希腊橡树、山毛榉上的虫子身上提取。几百年来，一直是由威尼斯从希腊、克里特岛进口，在西欧销售。进入16世纪后，人们发现一种叫“布拉吉莱”（Brasile）的树也可以提取红色染料。这种红色的树木产自南美，其中巴西是最大的产地。巴西国家的名字就是源自这种红木。16世纪下半叶，巴西生产的染料，垄断了整个西欧市场。

白银和黄铜（铜锌的合金）也是从市场败退下来的商品。它们的主

要产地是德国和匈牙利，以前一直都是集中在威尼斯市场交易。威尼斯商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以突尼斯为主的北非地区，与穿过撒哈拉沙漠而来的商人交换黄金，剩余的部分则是经过埃及，去往印度，以换取香料。这种贸易形式，直到葡萄牙人从非洲直接带来了黄金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从北方产地过来的白银集中在威尼斯，威尼斯商人就有机会将它们销往南方或东方，继续赚取利润。可是，自1580年开始，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将德国银逐渐逼出市场。美洲白银的进口量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达到了高峰。威尼斯再也不是白银的重镇，市场转移至安特卫普。

美洲白银的大量出现，不仅把威尼斯挤出了白银市场，也导致西欧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350年到1520年之间，金银的价格几乎没有波动，金币的含金量保持稳定。直接用于交易的银币的含银量多少有降低的迹象，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到了16世纪末，变化突然增剧，波动前后的国家财政的数据差距甚远，简直没法做对照比较。当时做数据统计的只有威尼斯一个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统计的话，想来情况也差不多。

145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1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93年——1达克特金币=200苏尔多银币（含银量减少近2/3）

威尼斯1500年的国库收入为115万达克特，157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既是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不落反升的最好证据，也显示了美洲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保持了近300年稳定的经济的冲击。

有失必有得。威尼斯在失去部分传统商品市场的同时，也开辟了新市场。当然除了从糖变成棉花之外，他们还找到了其他的替代商品。

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将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归结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土耳其帝国的强大这两个点之上。不过，正如香料市场的变迁一样，这两大要因带给威尼斯经济的并非全是负面的影响。

首先，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陆续发现，威尼斯长年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热那亚作为国家已丧失了独立性），以及逐渐成为新对手的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注意力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让原本就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威尼斯，有了更多的机会。再加上西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活跃，为大洋贸易与地中海贸易提供了一个两者共存共荣的空间。

其次，土耳其帝国的兴盛，对威尼斯威胁虽大，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威尼斯重新收复了香料市场的失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10万左右，到1580年已增加到70万之多。帝国鼎盛时期首都人口的增量，意味着财富也在不断地积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土耳其人对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商品中包括了威尼斯生产或者是中介的商品。

不仅是土耳其人，因工业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的西欧人，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非生活必需品。

东、西两方国情虽然不同，但对物质的需求一并上扬，而且还能保证供给。东方由于是强大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流通过程简单、安定。而西方则是因为产业的发展。在供方和需方都富足的情况下，交易的胜负，便取决于对市场动态的判断力和迅速且有弹性的行动力。在这两方面，威尼斯人从来都是佼佼者。

丝绸，是需求量暴增的产品之一。大量的丝线从波斯运集到阿勒颇，然后经威尼斯商人之手，运往德国位于法兰克福、科隆的丝绸产业中心。在那里制成的成品，再循着原料运来的反方向路线，回到东方。不过，大多数成品的终点站不是波斯，而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丝绸产业也很活跃，有关这点我会在稍后展开。威尼斯使用的丝绸原料并非来自东方，而是产自北意大利的一种更为轻柔的丝线。制成的成品同时出口东、西两方。

除了丝、棉之外，16世纪时需求激增的还有葡萄酒和葡萄干。玛尔维萨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香槟。其主要产地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玛尔维萨以及威尼斯移植成功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玛尔维萨葡萄酒向来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所爱，但因为价格昂贵，需求量一直有限。随着航运风险的减少和生产效能的提高，在15世纪末时，威尼斯成功地将南安普敦的批发价降到原来的一半，市场的购买量自然增大。

葡萄干原本是威尼斯商人去希腊各个产地收购的。自从他们有计划地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开发成供货产地之后，生产量得到大幅的提升，价格也逐渐下降。葡萄干主要销往英国。不过，究竟是英国人爱吃的鸡蛋布丁和磅蛋糕（Pound cake）中必须加葡萄干，威尼斯人因此增量生产以降低价格，还是威尼斯人卖的葡萄干便宜，英国人才放进了甜食，这个因果关系，我倒是没有调查过。

通商与工业及其他

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非但没有被急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吞没，反而在综合实力上，更胜于经济飞跃期的14、15世纪。威尼斯的成功，靠的不是贸易的多样性，而是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当贸易垄断已经变得不可

能的16世纪，威尼斯致力于手工业的振兴，充分激发并有效地运用了潜能。

在16世纪之前，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始终将经商视为贵族的天职，甚至对同时期积极从事丝、毛纺织业的佛罗伦萨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虽然也对本国的手工业做些投资，但几乎不参与经营。他们更愿意自己驾驶着船，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买卖商品。进入16世纪，当发展工业变得必要时，那些所谓贵族的事业乃贸易之类的话，统统被他们扔在了脑后。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性格。

1506年，当香料贸易陷入危机时，威尼斯政府成立了“通商五人委员会”，提出了在经营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方案，政府降低了原料的运输费和关税，并推出开拓原料新市场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威尼斯工业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其中呈飞跃性进步的，当属毛纺织业。以前，威尼斯在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两大生产基地，甚至在远方的德国也有加工厂。威尼斯主要是向这些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和销售成品。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政局变化，为威尼斯带来了机会，不仅本国的生产量增加，而且发展成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可以说是一团糟，以至于对形势悲愤不已的马基雅维利奋笔疾书地写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哲学杰作。正如他的作品所示，当时的意大利不断遭到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瓜分，沦为欧洲的战场。威尼斯也被卷进了康布雷同盟的战争。所幸，浮于潟湖上威尼斯之城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

而在其他国家，战火破坏了工厂，原料及成品的流通完全停止，工人们失去了工作，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毛纺品产量大幅减少。不安的

政治局势，让资本家们失去了投资的欲望，工人们丧失了劳动的意愿。拥有资本的人属于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不能轻易地移居外国，而那些没钱一身轻的劳动阶层随时可以远走他乡。大量的工人从伦巴第、托斯卡纳来到威尼斯。

这些外来劳工愿意移居威尼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几乎没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第二，政局稳定，无须担心内乱。

第三，可以确保原料的供给，以及成品的销售。

第四，政府鼓励发展工业。

就这样，威尼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引进了技术人才。

借这些熟练技工之力，威尼斯的毛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威尼斯1516年的毛纺品年产量是2000匹（pezzo），50年后（1565年）年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两万匹。再4年后（1569年）产量记录继续更新至2.6万匹。到1598年，产量以每年平均9.6%速度持续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同一个时期，西班牙的羊毛产量超过了英国，原料的运输成本因此降低，威尼斯的毛纺织业，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除了毛纺织业，在16世纪欣欣向荣的另一个行业是丝织品工业。劳工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至16世纪末，从事丝织品工作的劳工数量，据说已经超过了造船行业的木匠和油漆工。工人数量增加的原因和毛纺织业如出一辙。

制造肥皂，是16世纪威尼斯急速发展的第三项产业。对肥皂需求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比不爱洗澡的古罗马人，更懂得讲究清洁了吧。这个想象还是挺让人愉快的。话说回来，粉状的肥皂溶于水之后，就是一个对付敌人攻击的利器，滑溜溜的肥皂水让人伸不开拳脚。威尼斯的加莱船，常备有相当数量的粉状肥皂，它们不是给船员洗澡用的，而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说不定警察向示威队伍发射的水枪中也掺有肥皂水。

也不得不提一下玻璃制造业。这个行业与造船业向来是威尼斯的传统产业，16世纪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除了水杯、吊灯这些主要产品之外，穆拉诺岛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沙漏钟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外国传教士送给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们的沙漏钟，说不定就是威尼斯制造的。除此之外，随着水晶镜子的技术开发，威尼斯镜子的生产更是供不应求。由于镜子产量的节节攀升，从业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564年时，镜工们脱离玻璃工会，单独成立了镜工工会。

眼镜的普及，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特色。据说早在13世纪时，穆拉诺岛已研发出镜片，不过根据史料记录，眼镜的制造许可，是14世纪初颁发的。最早的一张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画，创作于1352年，如今保存在威尼斯附近的修道院，画中人物是一位枢机主教。

眼镜从研发到普及大约用了200年，其中大半的时间，也许是用于镜片制造技术的成熟。进入16世纪以后，戴着眼镜或手中拿着眼镜的肖像画变得不再稀奇。到了16世纪末，又出现了望远镜。

玻璃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产业。它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教堂的窗户用的是打薄的大理石，一般的民居，则是贴一块布料。当时能装玻璃窗的（虽然厚的像一排排瓶底），只有政

府的建筑物和少数的大富人家。16世纪以后，玻璃窗的使用逐渐增加，据说威尼斯的每一个区必定有一户装有玻璃窗户的人家，想来人们一定会感觉屋内的生活，要比以往舒适许多。

提到玻璃工业的中心穆拉诺岛，就不得不说一下花边工业的中心布拉诺岛。如果观赏16、17世纪的画作，我们会发现，除了裸体画之外，几乎每张绘画中都出现了花边。花边工业在高峰时期时，布拉诺岛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穆拉诺岛。

当然，16世纪的威尼斯也不是人人都忙于振兴地中海贸易或手工业。提香、丁托列托、保罗·委罗内塞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富于感官魅力的威尼斯画派，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迎来了黄金时代。

作为文化事业的分支，技术水平堪称欧洲最高水准的当属威尼斯的出版业。与艺术不同，出版行业属于企业，它在16世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版业作为对威尼斯多元化经济贡献颇丰的产业之一，我觉得有必要花点儿篇幅介绍一下。

众所周知，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世纪中叶，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这项技术引进威尼斯是在20多年之后。威尼斯最早的印刷书是西塞罗[2]的文集，总共耗时4个月，印数100本。之后文集再版，虽然印刷的时间与初版相同，但数量增加至600本。显然，印刷的效率高于誊写。

威尼斯出版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与毛、丝纺织业一样，最初都是因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技工之力。这些出版行业的人才选择移居威尼斯的理由，也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相差无几。

不过出版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威尼斯之所以选择西塞罗的作品作为最初印刷的书籍，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的阅读兴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要满足读者这一需要，首要条件是必须处于一个容易获得手抄原本的环境。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之前，逃亡意大利的枢机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带来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威尼斯国立图书馆就是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而成的。

然而，单是有机会阅读原本还不足以出版古典书籍。要出版古代典籍还需要有能够校对原本中错误的有识之士，而且多多益善。所幸，威尼斯在这类人才的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出版业同样兴旺发达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

不过，出版业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言论的自由。当时的言论自由，意味着摆脱宗教上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威尼斯肯定比同时代的罗马要来得自由。其自由程度甚至胜过佛罗伦萨、米兰和巴黎。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共和国长久以来一直极力排处罗马教廷权力的干涉，可谓是国家的传统。因此，只要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唱反调的内容，哪怕是教廷的禁书，统统能在威尼斯出版。

路德、马基雅维利，还有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均能在威尼斯找到。色情书籍在威尼斯不仅没有被禁，反而遍地开花。可以说大众文学的兴起正是从威尼斯起步的。除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承认了出版权这一概念，至于著作权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自1495年起的97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出版了1821种新书，其中的447本是在威尼斯出版的。相较之下，出版量位居第二的巴黎只有181本。威尼斯出版业顶峰时期的16世纪后期，威尼斯113家出版社在50年里，合计出版新书高达4416本，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话说回来，一味出版新书，并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出版社要

健康运转必须要有大量的书籍再版。威尼斯出版界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拥有再版20次以上书籍的出版社超过了50家，10家以上的出版社拥有数本再版了40次以上的书籍，更有甚者手中握有再版132次的常年畅销书。

说到威尼斯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一位为威尼斯出版界奠定了根基的人物——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通过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大家了解威尼斯出版业兴盛的原因。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印刷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刚开始时，印刷本依然无法摆脱手抄本的影响，以精美的大开本居多。这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传统生产手抄本的修道院中印刷的缘故吧。印制精美的书籍价格自然非常昂贵。不过，修道院出版的书籍，向来有一群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又基本上是担任神职的学者，无须自费购买，因此这些出版物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阿尔杜斯却是一家没有特别惠利享受的私人企业。从内陆本土移居到威尼斯的技工阿尔杜斯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唯有开发新读者群体，印刷本才有未来。在没有大学附属出版社的那个年代，新读者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出版社的印象，阿尔杜斯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设计了标识。社标由海豚与船锚组成，海豚代表出版的速度，船锚则代表内容的正确。

接下来，阿尔杜斯出版了“袖珍本”（口袋书）。大开本的书籍既不方便携带，价格又过于昂贵，而袖珍本正好相反，容易携带而且价格便宜。

然而，小型书的印刷，面临着一个问题：在大开本书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哥特式字体，纸面缩小后则变得不易辨认。于是，阿尔杜斯发明了

一种如今称为Italic的斜体，解决了小型书的文字识别问题。

阿尔杜斯出版社的标识

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最先作品是维吉尔[3]的诗歌集。由于书本小巧玲珑，价格只有大开本的1/8，它迅速成了学生们喜爱的畅销书。

和现代的口袋书不同，当时书的封面用的是硬板纸，制作软封面，

成本反而较高。

这是因为当时不少的藏书家们，有欣赏封面的爱好。他们通常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定制封面，统一藏书的风格。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兴趣，出版社会销售没有装订的书籍，读者买下后，再请装帧师用毛皮或者是豪华的布料，甚至是银质的浮雕制成封面，装订成册。

这样一来，那些希望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本书，不想把钱花在封面上的读者的需求就难以满足。当时的软封面，真是软绵绵的，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功效。哪怕是想用普通的牛皮纸做个封面，也得另外找人装帧。为了免除读者此类的困扰，阿尔杜斯社的低价版口袋书索性使用硬板纸封面装帧。

阿尔杜斯以口袋书、斜体字体、硬板封面的三点组合，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并获得了许可。不过，还是很快地就被其他出版社效仿。无论如何，这种低价书的出现，对扩大读者群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阿尔杜斯在商业上的创意源源不断。他还策划了出版全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1480年，阿尔杜斯首先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相继推出了贺拉斯[4]、索福克勒斯[5]、欧里庇得斯[6]的全套文集。除了通常本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拉丁语对照本，广受知识分子的好评。阿尔杜斯也没有忽视现代文学，基本出齐了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a）等人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出版目录提供给读者，目录中除了自家出版的书目之外，还收录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如果自己的书在某家出版社出版，既能显示身份，又保证销量，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有兴趣与它合作。伊拉斯谟[7]在1507年主动与阿尔杜斯接洽，并于第二年出版了7年前他在巴黎出版的《格言集》。

阿尔杜斯社出版的《格言集》销量大好，截至16世纪末已再版132

次，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在阿尔杜斯出版社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张招工广告。这张广告用考究的拉丁语书写，伊拉斯谟也帮忙修改过文字。自己也是一流知识分子的老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大概是想以此当作招聘考试吧。

> 来者不拒。阿尔杜斯希望您简短说明来意，尽早归去。如果您有心像赫拉克勒斯解救疲惫的巨人阿特拉斯一般向我们伸出援手，不胜欢迎。这里有许多工作适合有此志向的人们。

1515年，阿尔杜斯辞世，遗体周围堆满的不是鲜花，而是他生前出版的书籍。在阿尔杜斯奠定的基础之上，威尼斯出版王国的声誉又继续保持了100年。

劳资关系

所有的产业都蓬勃发展的威尼斯是怎样处理劳资关系的呢？这不禁令现代人感到好奇。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探寻威尼斯当时是否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划分的劳方与资方开始。

不仅是在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由一群以资本投资及其有效运用为首要目的的男人们所组成。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均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运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无疑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但如果涉及资本家是否直接参与经营，以及因此产生的劳资关系的问题时，由于各个业种的情况迥异，无法一概而论。那么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尔特（Guild，同业公会）是不是在威尼斯也占有主导地位呢？事实上这方面也是根据各行业情况不同，再加上威尼

斯特有的国情，同样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

唯一可断言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远远少于对发展贸易的支持。尽管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有产阶级的关注转向了工业，政府对此也给予积极的鼓励，但依然存在着不少法律上的限制。这也许是因为威尼斯政府为了吸引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所以才会更着重于人才的保护和培育，而对投资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最典型的是丝绸纺织业的例子。根据威尼斯的法律，要成为丝织厂的持有人，除了需要充足的准备金外，本人还必须会操作纺织机器。这项规定将行业的从业人员清楚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原料、订购成品的商人，另一类则是纺织工人。

当然，尝试着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说手握订单的商人以固定的月薪买断工人的生产力。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遭到丝织业工会的投诉。工会在向政府的申诉中强调，如果将技工变成纯粹领钱干活的劳工，不但影响外来优秀人才的引入，而且让已经在威尼斯定居的技工们失去进取心，最终会导致丝织业的衰退。结果，工人们胜诉，丝织业工会决定，薪资按产出量决定。

第二次的尝试是由工人一方发起的。那些经济上变得富裕的技工们用手中的闲钱投资购买了纺织机，甚至有的人拥有30台之多。有了多余的机器，就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摊薄薪资。这些技工企业家们，向掌握订单的商人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相较于其他工厂织1布拉乔奥的丝绸30苏尔多到32苏尔多的工资，他们只需要16苏尔多到20苏尔多。

对此，商人们当然是不胜欢迎。但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工人们可不答应，他们向政府提出了控诉。按威尼斯政府的规定，每一个织丝工所拥有的纺织机，最多不能超过6台。由于丝织业的发展迅速，产量激

增，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条规定的存在。然而，不管是否被人遗忘，法律终究是法律。在威尼斯，只要没有修改的必要，哪怕是没人关注的法规，依然有着其法律效力。元老院做出了旧规不变的决定。第二次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环境之中，威尼斯丝纺业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从1493年的500人，到1554年时已经超过了1200人，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蓬蓬勃勃的景象与日渐式微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对照。由于工人数量增长过快，甚至让商人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于是，政府修法要求技工必须自己负责货源，而且每个工人不能有超过两台的机器。

与丝织业相比，毛纺工业则显得更资本主义化。这可能和毛纺织物从原料到成品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有关。工会的成员由拥有资本的商人构成，独立的劳工工会一直要等到1539年才成立。另外，由于制作毛线是在家庭内完成，干活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她们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毛线完成后的包括染色在内的5道工艺都有各自的独立组织，工作场所也各不相同。不过，除了染色工可以同时接受不同货主的订单之外，其余工种的工人们都是为同一个货主，即同一个资本家干活。因此，货主对产量的管理比丝织品行业要来得容易。不过资本家直接控制生产，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1556年，便发生了罢工事情。

早在两年前，毛纺工人就以原材料和物价的上涨为由，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实际上他们是不满订货的商人们一面不肯加薪，一面却不断要求增产。

可是，接到申诉的政府委员会，又以典型的官僚作风，将皮球踢给了其他部门。等不到音讯的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罢工。

究竟是谁领导了这场罢工，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组织者的能力非常了得，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发起罢工，而且整个过程展现出

牢不可破的团结力。

当时，威尼斯与叙利亚签订了一大笔合同，毛纺品的需求量正值高峰时期。威尼斯码头上停泊着大量的商船，万事俱备，只等工厂送来产品。

罢工发生在最后一道工序。货主们对着只差一口气的产品无计可施。任他们怎么央求，工人们不是借口称要询问同伴是否愿意，就是直接要求涨薪，也有人索性以工作量太大力不从心为由，一口回绝。商人们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会引发其他生产环节上的工人们的罢工。

这一次，轮到货主们向政府提出上诉，说威尼斯毛纺织业将面临崩缺。政府似乎也有同感，特地提高层级，由负责国家重大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出面，代替“通商委员会”商议对策。

“十人委员会”向罢工的所有工人发出指示，令他们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可是命令却不见效。工人们既没有破坏机器、烧毁在港口等货的商船，更没有组织游行队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政府不能强制他们劳动。

眼见着形势僵持不下，为了不再蒙受更大的损失，货主们又向“十人委员会”提出招聘外国劳工的申请。可就在委员会审议申请的过程中，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工人们接受增产，货主们同意加薪。并且决定日后调整薪资时，由劳资双方各派4位代表，组成8人委员共同商议。这不正是今日的劳工参与企业经营吗？

威尼斯的工会

被称为“基尔特”的中世纪工商业的同业公会，经济学家们认为它对

近代工业的发展有三大负面影响：第一是对新技术的引进态度保守；其次是限制了会员人数；第三是不遵守市场供需的规律。不过，16世纪的威尼斯的工会，并没有出现学者们指出的这些问题。

首先，威尼斯政府对引进新技术及其合理化的使用，表现积极。为了鼓励创新，在1474年出台了10年专利权的法律，建立起一套专利制度。

16世纪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某家呢绒制作厂，考虑购买能让毛料更为轻盈的机器。厂里的工人担心因此失去工作，便向政府提出了反对购买新机器的申诉。政府对此做出的判断是，允许厂方购买机器。但今后这道工序上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明确标示出手工或机器制造。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和工会都不反对合理化的生产。比如说蜡烛工厂，就是由工会主动展开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不过，威尼斯所追求的合理化，重点在于改善产品的质量，并非是大批量的生产。

16世纪的确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物质需求均有上升的时代，但在规模上，与日后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威尼斯各项产业之所以能从竞争中胜出，主要靠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产品制造者的水平，更是以质取胜的关键。很幸运，16世纪的威尼斯拥有大量自信、能干的技术工人。

其次，至于学者们非难的行会会员人数受限的问题，在威尼斯不仅没有发生，而且政府和工会双方都尽力地去增加人数。倒不是因为威尼斯政府特别保护工人，也不是工会成员对同业者非常友爱，主要是由于增加工会及其会员的数量，大家都有利可图。

对政府而言，可以解决士兵不足的问题。确保海军主力舰加莱战船

的划桨手数量，从来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以往是以每个行政区为单位，实施征兵制。然而，各区的经济状况有别，征兵出现了不少弊端。经济好的区域，可以花钱买壮丁，凑足数量。相反，那些穷区不仅有达标的压力，还要面临本地人被其他区雇走的窘境。为解决问题，政府废除了行政区征兵的制度，改以工会为单位，根据各工会的经济能力，规定相应的征召数。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隶属某个工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入伍参军人人平等。至于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可以加入与同业公会性质不同的组织“大会堂”（Scuola）。这种慈善团体在威尼斯有6个，工会成员也允许参加。

政府向各个工会指定划桨手的配额，其效果等同于在当时尚未普及的征收直接税。对工会的设立及其人数的增加，政府之所以始终报以宽容的态度，其真正的理由便在于此。出于同样的理由，另一方的工会也深知限制会员人数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威尼斯的“基尔特”完全没有封闭的倾向。

最后，“基尔特”三大罪最后一条的不遵循供需规律，我想就不用说明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不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威尼斯怎么可能在近百年里保持每年10%左右的成长率呢？

总而言之，威尼斯工会对于安定中产阶级和稳定国内形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反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却因为不肯答应毛纺织工人建立工会而频频发陷入政局不安。

无论是谁，都有害怕失去的东西。因此只要稍稍满足人们自治的欲求，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经提及威尼斯的中产阶级虽然没有统治权，但在他们自己的行会内部，他们就可以做主人。威尼斯工会会长的选举制度与共和国元首的选举方法如出一辙，负责国政的贵族们可以加入工会，但不允许担任重要职

务。其他国家的工会内部经常出现的政治斗争现象，在威尼斯工会不曾发生。

意大利语中有“peccato mortale”一词，意为“重罪”或“死罪”，犯罪者死后必下地狱。有时候也诠释为“千万做不得，不能昧着良心”等。

我一直在想，对威尼斯人来说，低效运用资本大概就属于“重罪”。耶鲁大学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学者洛佩兹曾经说过，威尼斯人以私人企业的精神经营国家政治。

13、14、15世纪的威尼斯人之所以将重心放在海外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主要仰赖于贸易，这是资本运用最有效的方法。16世纪他们依靠振兴国内产业，促使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同样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运作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乃商业之道。那些指责16世纪的威尼斯人丧失了海洋民族精神的说法，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爱上了感觉很帅的男人，在遭冷落后怨气冲天的无知少女。

不可否认，海上男儿的确很帅。甚至连海盗看上去都那么有型。然而，从前的威尼斯人并不是因为热爱大海才出海远航，而是去海上更符合其经济利益。

与祖先相比，16世纪的威尼斯人的海洋气息可能是淡薄了不少，但和威尼斯共和国衰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进取之心。正是靠着这番进取心，他们才能摆脱16世纪初如同婴儿断奶般的困境，重新站立起来。

威尼斯共和国衰退的首要原因是一个城邦小国，却不得不面对君主制大国的崛起。在那个时代，城邦小国一个个陆续地走下了历史舞台。曾经与威尼斯同样蜚名四海的佛罗伦萨，还没撑到16世纪中期，共和国

体制便于1530年灭亡。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4个海洋国家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中支撑到最后的一个。

---

[1] 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苏伊士运河开凿者。——译者注

[2] 西塞罗（Cicero），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3] 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著名诗人。——译者注

[4] 贺拉斯（Horatius），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5]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6]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7] 伊拉斯谟（Erasmus），中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所谓强国，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16世纪的威尼斯外交官弗朗契斯科·索拉佐在任期届满的归国报告中留下了以上这段话。在经济上，威尼斯凭借着特有的商才及组织化的运作，经受住了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但在政治和军事面却无力挽狂澜。威尼斯必须承认，时代变了。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辉煌灿烂的城邦国家，不以拥有土地为根基，而是通过手工业交易，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质胜于量的时代。城邦国家的个人生产力非常高，以人口10万到20万左右的威尼斯为例，他们创造的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人口1600万的土耳其

的国民总收入。再看佛罗伦萨，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法国、英国的国王，那些国家连仗都打不起来。

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代的土耳其、西班牙、法国，还不懂得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

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重量级的国家开始苏醒。这些大国都是君主制，一旦遇上贤能的君主，便会迅速地发展壮大。16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国家的开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贤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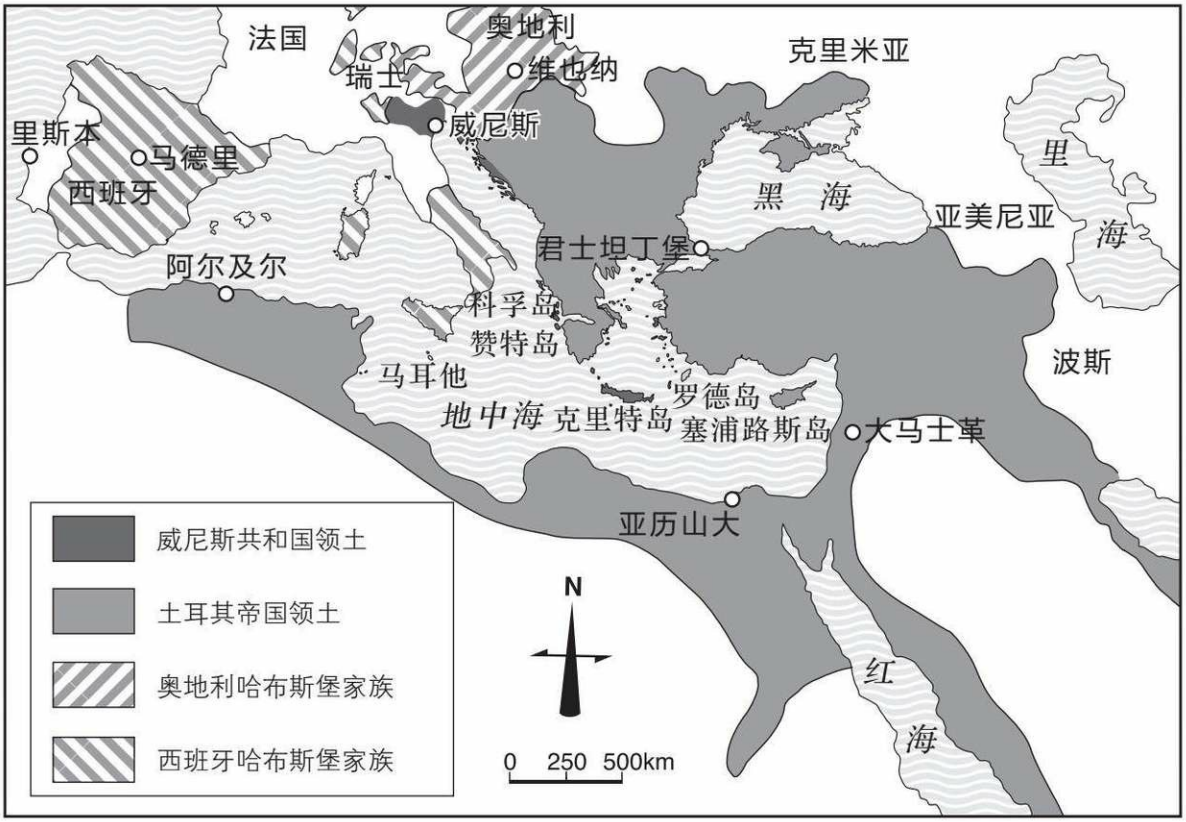
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卡洛斯（Carlos I）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

1519年——卡洛斯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拥有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以及东洋和新大陆，被称为史上首位国际领袖。

1556年至1598年，在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迎来了顶峰时代。

另一方，东方大国土耳其，自1517年占有麦加之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在红底白色新月五角星国旗之外，又添了一面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新月五角星旗。在1520年至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代，土耳其的领土西起蒙古，东至波斯湾西岸，北自克里米亚，南延伸至维也纳城墙，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法国在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两国媲美的英明君主，但由于中央集权日益增强，国家实力雄厚，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全国土地都适宜耕种，在非常时期，可以保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它高达1600万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卡洛斯时代的德国与西班牙两国人口总和，才能与之匹敌。尽管内乱不断，但在西欧能与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唯有法国。



16世纪的欧洲势力图

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实施君主专制成了强国。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摘下有色眼镜，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万恶的制度。不可否认，君主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还是有不少优点，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最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首先，事情由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时间短。实施政策时，只要命令控制系统组织得当，指令可以传输至末端，并且具有共和制所欠缺的高度的权威性。此外，君主以下的人各司其职，无须太多的政治全才，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以16世纪为界，共和制色彩浓厚的城邦国家不断消失。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无法对抗逐渐壮大的周边国家，还因为其政府的执政能力不

如君主制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资源的浪费增加，而浪费又将导致国力的衰退。原本就没有土地基础的城邦国家，本就欠缺浪费资源的本钱。这些小国，一旦开始出现衰退，国力就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不消说阻挡，甚至连减缓跌落的速度都极其困难。

佛罗伦萨共和国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在共同体合议制遭遇挫折之后，改为美第奇家族僭主制，之后又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找到一种高效的政治体制。终于在1530年，共和国体制如夜空中一瞬绽放的烟花，消失无影，变身为一个以美第奇家族为王的君主制国家。

佛罗伦萨从城邦国转变为领土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之后，其地位降至一个中等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如果威尼斯也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外港，想来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威尼斯并没有沉沦。

兰克[1]曾经指出，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得到了与18世纪的英国政体同等的赞赏。18世纪的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因其高效受到了各国的赞誉和关注，那么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应该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获得了他国的肯定。

然而，与18世纪的英国不同，16世纪的威尼斯面对既有优秀的君主，又有高效体制的君主制大国的崛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褒奖的体制，并不是威尼斯人有心而为之。

期待提高执政能力

与寻求他国保护的热那亚共和国，或者是变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同，威尼斯共和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共和政体。倒不是因为威尼斯人在意识形态上信仰共和，而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自己最合适。想要在政体不变，国家实力又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抗衡急速壮大的君主国，至少可以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寻找对策。

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的部分章节。这里，请容我再重复一次。

“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

在这段文章中，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6世纪的共和国所直面的困境。在他去世的三年之后，其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果然应验了他最后一段的预言。

那么，既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又没有亡国的威尼斯，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呢？

正如“政治的技术”一章中所述，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城邦国家全盛时期已经针对在共和制前提下提高执政能力，推出了最初的方案。那是在13到14世纪由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主导的行政改革。通过这场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改革，确立了日后掌管政治的统治阶级，这些人被称为贵族。

不过，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的贵族，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对臣下的审判权，甚至与平民之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资产差异，所以贵族只是一个从政者的代名词。这次改革对确立威尼斯国内的统治阶级，即建立起一支政治专家的队伍，贡献不菲。这些政治专家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由20岁以上的男性贵族组成。由于贵族是世袭，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威尼斯贵族注入大量新鲜血液，是在1381年对热那亚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后。很多为这场举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人晋升为贵族，获得了共和国国会的席位。不过从那以后，除了极少数功勋显赫的人物之外，很少再有新血输入。在威尼斯推行本土扩张的15世纪上半叶，维罗纳、帕多瓦等新属地的地方名士们，虽然能享受自治权，却鲜有机会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完好地运作了200年。也许是因为从30岁以上的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的、成员不足200人的元老院适当地弥补了国会决议速度迟缓的缺陷。国会由1500到2000名议员组成，做决定的时间自然会慢一些。

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为止，元老院始终拥有极大的权力，国家的

重要事项，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审议和决定。虽然那时也有总理府、内阁以及“十人委员会”，不过总理府和内阁主要负责提案，而“十人委员会”在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谍报工作和调查重大犯罪。

进入16世纪之后，这种运作模式的效率明显不足。相较于专制君主在听完大臣们的意见后，即刻拍板决定的速度，200人的元老院决议，还是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何况，做决定时决策者以及知情者越少，就越能保守秘密。在讲求秘密和速度的16世纪，威尼斯需要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若想维护政体，就必须拿出违反政体精神的勇气。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能力发挥至最大的一条途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引来他国的监视，威尼斯的改革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们只是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整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元首：1人

元首辅佐官：6人

“六人委员会”：6人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3人

共计：16人

“六人委员会”是在1400年新设立的机构，由内阁中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的部长们组成的工作小组。除了元首是终身制之外，元首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以前是一年任期，16世纪后缩短至半年），六人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同样也是6个月，“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则是3个月做一次交替。由这16个

人组成的权力中心叫作“内圈”，在它的外部，另外还设有“外圈”机构。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7人

内陆部：5人

“四十人委员会”委员长：3人

国家监察官：3人

共计：18人

任期均为一年。内陆部主要负责内陆本土属地的管理。四十人委员自古就有，以制衡元老院为目的，主管财政和司法。每一个委员中会安插一名国家监察官，负责监视委员会权限过大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某一个委员会，威尼斯共和国独有的官职，任期一年，人选由共和国国会选出。

除了“内圈”和“外圈”的34个人之外，再算上军队最高司令官、派遣去外国交涉重要事项的特使，约40个人组成了16世纪后威尼斯共和国的实际政府。也就是说，200人的元老院精简至约40人。

威尼斯这次政治改革，将权力集中，手段非常之巧妙。外国的间谍们很久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打探元老院审议的方案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政改后元老院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开会时仍然有众多的议案需要讨论，因此也比较容易转移外人的视线。

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五章“政治的技术”的内容，一定会提出质疑：无论任期是6个月或一年，这些人核心人物原本不都是有职在身的吗？而且不是要经过与任期时间相同的休职期之后，才能再选吗？

没有错，这次政改并没有触及这条共和制最根本的制度。

那么，6个月或一年就必须人选交替的规定，如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又怎么能达到这次改革所指向的迅速决策和保守秘密的目的呢？其实，法律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除了元老院议员之外，其他所有的官职都不允连任，必须经过休职期。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卸任后，不许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事实上，元首辅助官在结束6个月的任期之后，随即当选为六人委员会委员，卸任后又成为“十人委员会”委员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传递。

在一个委员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委员都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任期。因此，根据职务的任期长短，有人可能会离开“内圈”一两个月，但几乎不会发生连“外圈”的职位都轮不到的事情。所以，威尼斯政府始终能够在同批人马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这种模式，既能避免政局陷入危机，又防止了一人权力独大的弊端。与此同时，通过经验成熟的少数人执掌政权，建立起一个高效且保密的组织机构。

曾著书讨论威尼斯政体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进入40人核心集团的很好的仕途范例。

加斯帕罗于1483年出生于曾经出过元首的孔塔里尼家族。在30岁之前，他做过学问，也帮忙过家族的生意。他在精神层面上倾向于路德派，其两位好友都进入了修道院，然而，他却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政治。加斯帕罗独身，进入政界时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

在担任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职务之后，36岁的加斯帕罗被选为波河灌溉事业的负责人，因工作表现优秀受到了嘉许。翌年，他作为特使被

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卡洛斯身边。那次的沃尔姆斯（Worms）之行，使加斯帕罗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归国后随即当选为内陆部的委员，进入“外圈”。

紧接着，加斯帕罗再度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待完成任务归来时，六人委员会已经为他准备好位子，加斯帕罗正式成为“内圈”的一员。

在那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加斯帕罗的经历就是最典的型权力更迭。“十人委员会”委员长卸任之后，随即当选为元首辅佐官，基本一直处于“内圈”。虽然有暂时离开“内圈”的情形，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外圈”。以这个仕途往前走，只要再出任过海军司令和陆军参谋，之后十有八九会当选共和国元首。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他的仕途突然中断了。

原来，加斯帕罗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召唤。教廷看中他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皇帝的信赖，二是独身。成为枢机主教的加斯帕，因此不得不离开共和国的中枢。与任命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为首相的法国，或者是常常聘请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政治顾问的西班牙不同，威尼斯政府决不允许与教廷有关的人员兼任政府官职。对于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离去，一位隶属“内圈”的成员，曾经叹息称是威尼斯的损失。

不过，人在罗马教廷的加斯帕枢机主教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受教皇的委托处理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冲突，成功地缓和了两派间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反宗教改革派的狂热信徒对威尼斯的憎恶情绪。威尼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伊斯兰教教徒和平相处。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了宗教改革派以及反改革派同仇敌忾的抨击。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这番努力，对于祖国威尼斯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帮助。

说回掌握威尼斯实权的40位威尼斯男人。除了元首和“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之外，其他人的着装完全没有特殊性。

元首因为代表着威尼斯的富贵和权威，所以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戴华丽的服装，另外三位委员长由于负责重大的审判，为了方便在街头请愿、申诉的民众辨认，所以有穿红色长袍的义务。其他委员们则清一色地穿黑色长袍。这种黑色的托加（Toga）不仅是贵族，商人、律师和医师通常也穿，外观上丝毫看不出差异。我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曾经提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情况相反，在威尼斯往往是权位越高，装饰越朴素。而且除了元首有置装费之外，其他人都是不拿薪酬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以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对抗高效运作的君主国，就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交由30到40个人处理。正如威尼斯极其排斥一人独揽大权，他们也几近神经质地预防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个大约40人组成的实际政府，他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成员也在40人以下的“十人委员会”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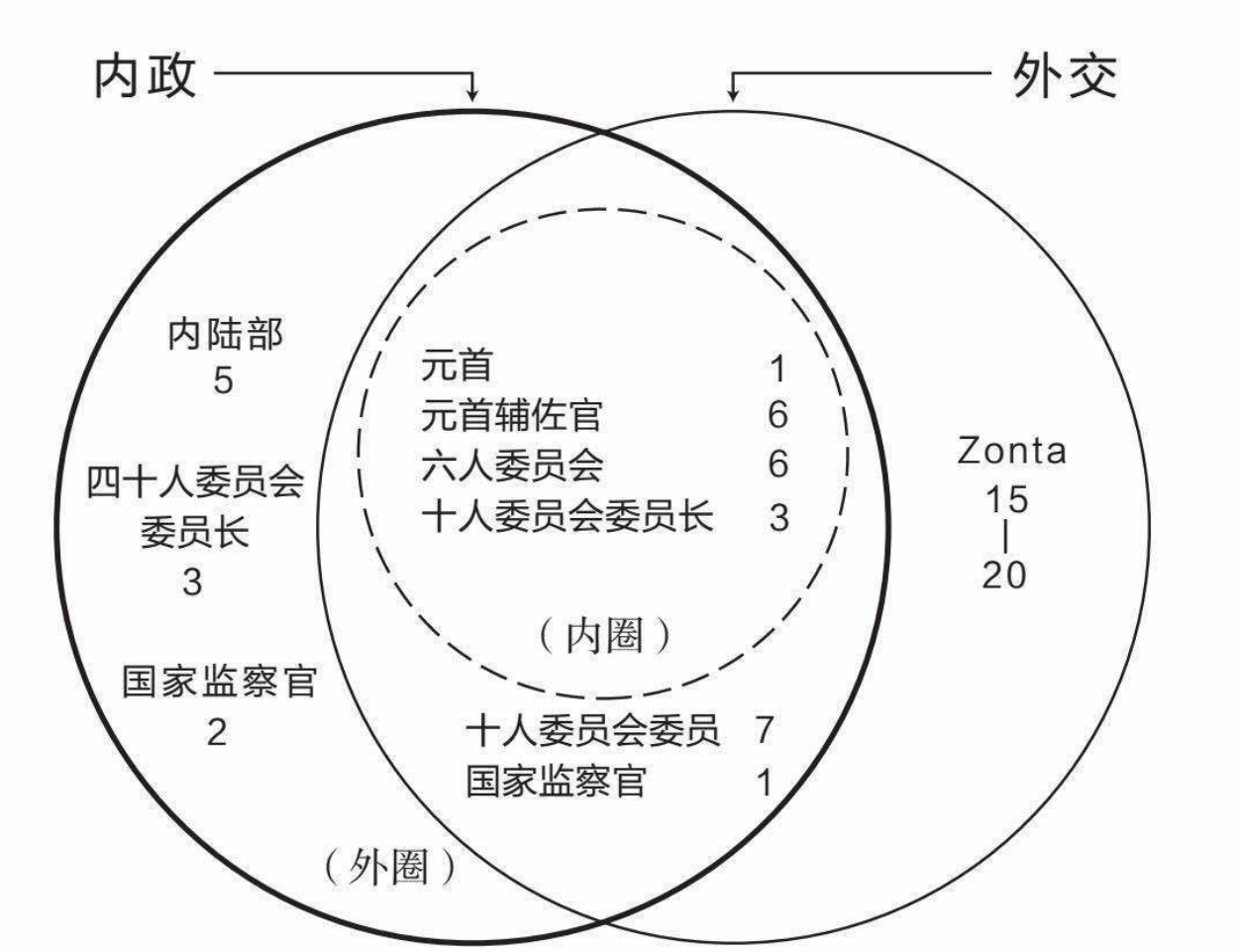
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反政府的叛乱。“十人委员会”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时间是1310年。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与反政府阴谋有关的情报，并以此为据对叛国者进行审判和裁决。可是在元首法利耶之乱后，威尼斯很幸运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件，“十人委员会”似乎可以关门歇业。但建立起的机构，不能轻易地将它废除。“十人委员会”收集情报的高超能力和优秀的实绩，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性。在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这些情报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这和CIA（中央情报局）长官必定列席美国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样的道理。

“十人委员会”虽然名称里有“十人”，其实成员除了10名委员之外，

还有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再加上一名国家监察官，总共是18人。监察官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人”的委员会。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项，除了18位委员之外，还必须另外加入“Zonta”。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翻译“Zonta”这个威尼斯词语，总之就是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15到20个人，他们大多是有过大使、特使或者军队司令等经验丰富的议员，共同商议决定。这是为了维持公平公正，避免将决定权交给极少数人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外交上的问题，“六人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到场。上述“Zonta”的成员人数从15到20人，就是看“六人委员会”是否需要出席。16世纪的威尼斯的公文中，常常会出现“十人委员会”“Zonta”的字眼，实际成员大约是40人，都是30岁以上的男性。

简单地说，前述的“内圈”和“外圈”的40人主要负责国家内政，而“十人委员”和“Zonta”加起来也差不多是40人的集团，主管外交。但现实中，负责内政和负责外交的最高领导，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其实也多有交叉重叠。



威尼斯的内政和外交

元首、元首辅佐官、“十人委员会”的10名委员，通常都同时隶属两个机构，“六人委员会”也经常参与其中，因此，属于“内圈”的委员，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国家最高机密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内圈”和“外圈”的分别，主要是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基本上是由“内圈”单独拍板定案。总而言之，威尼斯政府的中枢是由重叠部分占2/3的两个机构组成的。

“十人委员会”可以说是16世纪威尼斯政体的头脑。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的马可·多纳托（Marco Donato），当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16世纪时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灵活机动地展开外交工作的实例。

例一：

事情发生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率领德意志、西班牙联军，进攻教皇的属地帕维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罗马涅总督的身份，在前线指挥守军防御，奋勇善战。欧洲诸国眼看着卡洛斯势力不断膨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同样，威尼斯也不乐见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

当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手下亲信自然是以佛罗伦萨人居多。某日，教皇身边第一红人的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找来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询问威尼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元老院审议，直接与教皇结成反皇帝同盟。大使火速派特使回国汇报此事，威尼斯政府“内圈”即刻做出了答复，给大使的文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可。”

事不宜迟。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迅速展开活动。3月3日，帕维亚战役刚结束，威尼斯便派特使秘密前往法国，向日后被称为“科涅克（Cognac）同盟”的缔结，迈出了第一步。3月8日，带着同样使命的特使，秘密出访英国。3月9日，驻米兰的威尼斯大使收到政府指令，要他去向米兰大公打探是否有加入同盟的意愿。同样的指示，也发

给了驻守其他相关国家的大使们。

4月，在公开承认米兰属于斯福尔扎（Sforza）大公的条件下，双方进入了正式的谈判。5月、6月，在米兰、巴黎、君士坦丁堡，秘密的谈判同时进行。之所以会有君士坦丁堡，主要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法国要求土耳其加入。元老院一直到7月才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例二：

1540年8月18日，“十人委员会”以元首的名义，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了绝密指示。两年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在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败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因此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进行和谈。

给大使的密令是这样的：

> 相信阁下已经收到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苏丹接受元老院的条件缔结和约，是最好不过的结果。这里，“十人委员会”和“Zonta”决定附加以下条件。
>
> 如果拥有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苏丹向负责谈判的阁下要求割让纳夫普利亚（Nauplia）和玛尔维萨，我们赋予阁下放弃两城其中之一的权力。倘若苏丹坚持两城都要，否则不签约，我们允许阁下全都放弃。

和谈成功了，不过是以最后放弃两城的条件换来的。“十人委员会”在没有与元老院以及国会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放弃两块海外基地的决定。

例三：

这也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有关。威尼斯、西班牙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战情似乎朝着威尼斯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断了和谈的念头。1572年3月，即勒班陀海战胜利的5个月之后，威尼斯以元首的名义，要求教皇批准威尼斯处决俘虏，以打垮土耳其人的士气。可是刚到6月，他们便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打探土耳其谈和的可能性。对西班牙怀有敌意的法国，对此事颇为积极。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十人委员会”又决定维持现状，暂缓和谈事宜。原来，打赢勒班陀海战后，西班牙信心大增，正积极准备再组联合舰队挑战土耳其。不料，这个希望终成了泡影。1572年的9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正式与土耳其开始谈判的命令。同意大使可自由购买价值5万泽其诺金币（Zecchino）的礼品，赠送给对方负责谈判的官员帕夏；可以提高塞浦路斯的年贡金的条件，要求对方归还塞浦路斯岛。

土耳其虽然败了海战，但他们对威尼斯的处境却了如指掌。谈判进行得异常困难。“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内部出现了应该把事情转交元老院商议的声音。尽管塞浦路斯岛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但威尼斯实在是不情愿正式表示放弃。毕竟塞浦路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纳夫普利亚、玛尔维萨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委员因此认为塞浦路斯岛的命运不能交给不足40人的小集团，于是，委员会就决定权是否交给元老院做投票表决，结果只有两票赞成。

和谈毫无进展。11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指示，可以不考虑归还塞浦路斯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们又一次就决定权是否移交元老院做表决，这一次也只有三票赞成。

元老院被告知此事，是在1573年的3月，那是签订和约之后的事了。在塞浦路斯岛正式成土耳其领土的消息公开之前，威尼斯造船厂几乎天天都有新军舰下水，水手的招募也没有停止，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威尼斯的市民也都以为仗会继续打下去。

以上三例都是与威尼斯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不过，对那些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常常不通过元老院及国会，擅自处理。

威尼斯共和国收集情报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源不断。教廷收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女就是其中一例。“十人委员会”决定向元老院隐瞒这个消息。文件之所以不公开，并非是威尼斯人担心风声走漏会影响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此文件可以作为牵制教廷的工具。

按规定，任期届满归国的大使会在元老院做例行报告，但事前必须将报告的草稿提交“十人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时会立即指出不能公开的内容，有时候则将整张报告搁置一段时间。11月份写的报告，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公开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说，驻法国大使在归国报告中，提及法国存在反国王的势力。“十人委员会”禁止公开这段内容，一直到这股势力掌握了法国的大权之后，才同意向元老院报告。曾经的反对势力主政后，自然是不会忘记威尼斯当初为他们保守秘密，这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元老院看似被架空，但像其他国家经常出现的权力之争，并没

有在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之间发生。这也许是和“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自元老院有关。大概是议员们想到自己将来也有进入委员会的可能，所以就不争一时意气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威尼斯的政治家们对于保守秘密在政治及外交上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共识。

虽然马可·多纳托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废除“十人委员会”。

由于负责内政的“内圈”“外圈”和负责外交的“十人委员会”“Zonta”的成员有2/3重合，所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大约在60人左右。人员精简至此，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势必增大。成员轮流换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部门都由经验成熟者运作，因此与以往相比，不仅是对每一位人选的审核，而且对机构整体能力低下的防范也更为严格。

岗位轮流制使得一个人可能长期处于权力的核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威尼斯通过任职期短以及强制休职的规定，将风险成功地减至最低。然而，为了对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这项制度在执行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正因为如此，人才的选拔，便成了共和体制的生命线。在威尼斯，既设有专门监管贵族阶层的贵族监察委员会，同时还有国家监察官制度，可是，仅仅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威尼斯选举元首的程序，已经在第五章中做了介绍，这里就其他议员、委员们的选举，做些说明。正如选元首一般，威尼斯的选举方式不是单纯地从数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而是首先要选出拟定候选人名单的成员。威尼斯人认为，首先要有客观的候选人提名，才可能实现最终选举的公平公正。

威尼斯选举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可以投赞成票，也能投反对票。这点和现代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人，要在反对票不高于赞成票的前提之下，才算当选。否则，哪怕赞成票第一也是白搭。

由于可以投反对票，所以不可能起立或举手表决，威尼斯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为投票者保密。

我们以共和国国会为例，来看看选举的具体流程。包括元首在内，元老院议员、国家监察官、“四十人委员会”、元首辅助官、海外殖民地总督以及基地的城主、陆军参谋、海军总司令、参谋等官员，都是通过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年中至少有20次选举，多时更高达40次。每周的星期天定期召开会议。

首先，在会议日的前一天，即星期六，在里亚尔托桥周边张贴公告。

星期天，会议在元首官邸内最大的共和国国会议事厅举行。待全体议员到齐之后，大家按顺序走向元首及其辅佐官就座的议长席前，那里摆着一个大箱子，每个人将手伸进箱子里拿一颗小球，如果球是金色的，代表此人成为候选人提名小组的成员。如果摸到的球是银色的，表示没有资格提名。为防止有人作假，金球上巧妙地刻有印记。

拿到金球的人在议长席前面的一排位子依次坐下，直到满36人为止。由36个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以座位的顺序分成4个小组，在4个房间内进行候选人提名。等4份候选人名单出炉后，便开始选举。

议长报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超过千名以上的议员，便要离席一次去投票箱投票。白色的球代表赞成，绿色的表示反对。除了投票者本人之外，没有人会知道他投的是白色还是绿色。整个投票过程反复多次，直到所有候选人的表决票投完为止。实际上，候选名单不只4份，另外

还要加上元老院和“核心小组”的提名。如果是改选半数以上的元老院议员，投票的次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但迅速有序的威尼斯国会选举场面，每每让外国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

国会的普通议员有提名权，代表所有贵族皆平等这个共和体制最根本的理念。但是像元首辅助官、总督、舰队司令等重要的官职，实际上大多是以元老院、“核心小组”的提名决定人选。

选举过程中，禁止任何发言。为了杜绝拉票活动，拟定候选人名单和投票都必须同一天内完成。

赞成及反对票一并作为当选标准的威尼斯特有的选举方式，常常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比如说，在1500年和1509年，当元老院议员进行半数改选时，由于反对票数高于赞成票，元老院提名的候选人几乎全体落选。政治和军事的失策，通常会是导致议员们落选的原因。1500年是因为前一年与土耳其开战，而1509年则是由于外交上的失误而引发康布雷同盟战争。编年史的作者普留利和萨努多都将当时的状况比喻成政权交替。

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根据规定，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有资格参选元老院议员，不过，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再选的职务。在候选人几乎全部落选的那两次，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经验不足，但家族中有人战死，或者是本人骁勇善战的新人。想来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不信任投票。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政体正因为凭借着高效的运作，才能够与当时的君主国抗衡。正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的政体可以说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所

倡导的理想政体，即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混合的政体。

根据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理论，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代表了民主制，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代表了贵族政治，而元首，则是在保留了终身制这个优势的同时，又剔除了世袭这个缺陷的改良型君主制。这三种体制相融相合形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无论是加斯帕罗的理论，还是在现实中都证明了这个政体，多数不会恃众横行，少数不会滥用特权，元首不会利用其地位和名声推动君主专制。

威尼斯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源自他们一贯秉持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就像“十人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所说的：“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

尽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包括庶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起来抗争。其理由是威尼斯的法律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利益分配上更趋于公正。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浪潮中，威尼斯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比拟的。类似异端审判这种极端的现象从未在威尼斯出现过。

威尼斯的医疗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对黑死病的预防处理措施，便可证明这一点。虽然医院经常会用“不治”等讽刺词来作为院名，实际上医术还是相当高明。曾经在日本传道的沙勿略，在远赴东方之前，就是和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一起在威尼斯的医院学习过医术。

威尼斯也是第一个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明确区分的国家。当时其他的国家，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医生兼任理发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外科医生是理发师兼任的。而在威尼斯则没有外科内科之分，医师都属于同一个行会。理发师另有行会，除了拔牙之外，禁止任何医疗行为。威尼斯的医生们除了在毕业时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之外，另外每年还要接受一次鉴定考试。

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的远航船，必须要有懂内科的随船医师。而同时期的英国船，还处于剃头匠充当船医的水平。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不少教授都有过船医的经历。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医院进行实习，然后随船走四方。和威尼斯的商业、外交一样，远航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地教育场所。船长的餐桌上常常会看见船医的身影。

威尼斯派驻海外基地或内陆本土行省的官员，以公正清廉著名。在中饱私囊的贪官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威尼斯统治下的属地民众，在面临可能其他国家统治的抉择时，大多都愿意归属威尼斯。这种倾向在同属天主教的意大利行省尤其明显。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那些抛弃败北的威尼斯向法国、德国敞开城门的城镇，不到10年又纷纷转投回威尼斯的怀抱。其中理由除了厌烦了大国间的争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多民众比较喜欢威尼斯的管理体制。在威尼斯，官员一旦受贿，便是死罪。

外交向来是与经济技术齐量等观的威尼斯另一项重要的资源。在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做法，便是威尼斯首开先河。这些大使们卸任归国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元老院做情况汇报。报告通常都写的很长，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听取报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十分投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大使的经验，哪怕是那些尚未经历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有成为大使的可能性，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获得宝贵情报的好机会。

同样，写报告的人也相当认真。因为元老院对归国报告的评价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仕途。像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那样在归国后随即被提拔进入核心的例子，并不少见。

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在出版中。虽然19世

纪中期佛罗伦萨曾经出版过一次，不过眼下正在出版的才是完整版。目前（1980年）已经出版的9本包括有关英国、德意志、法国、西班牙的报告，之后还会有土耳其、意大利诸国的篇章问世。这些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和中东地区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总而言之，在那些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可行性技术的人们看来，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制运作效率可圈可点。然而，这种威尼斯式的体制，虽然有利于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的全能型政治家，却不如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造就专业型行政官僚。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才华与艺术相通，主要靠天赋。因此，对于那些成不了优秀政治家的人们，至少要让他们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威尼斯的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相当欠缺。威尼斯共和国不仅缺少产业或行政上的专家，就连专业的海军人才都没有。

不过，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即培养政治家的机构还能充分发挥实力的16世纪，上述的问题尚未成为明显的缺陷。为威尼斯共和制投下阴影的，是其他两个问题，一是血缘，二是贵族阶级内部贫富差距的固定化。

威尼斯的光与影

首先从第二个固定化问题说起。

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在威尼斯，即使没有资本的人也有

机会从事买卖，并借此积累本钱。政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安排了作为商船弓弩手的位置，通过海上锻炼获得商业和航海的技术。这些人不仅有薪水的保证，还可以利用经商的权利逐渐储蓄资本，如果在海上工作4年以上，甚至有机会晋升为船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东山再起、败者复活的机会。这项措施对与促进贫富之间的相互流通，防止贫富差距固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

然而，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为了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模式，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以海上贸易为主的15世纪相比，16世纪是一个国内手工业蓬勃成长壮大的时代。对那些没落贵族而言，工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只有做技工。可是，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都有着靠技艺为生的自尊，贵族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其间。在贵族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顶梁柱的事务官的职务。但是在贵族负责政治决策，平民负责行政事务的体制之下，贵族再怎么迫切地希望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事务官。

“无地自容的乞丐”

唯有贵族阶级在精神、物质两面都不匮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和政体正常的运作。深谙于此的威尼斯政府，积极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没落贵族的救济政策。可是，由于经济结构所制，东山再起的机会逐渐减少，这类救济政策，在现实面前显得有心无力，最终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慈善福利。这些被称为“Barnabotti”的没落贵族，只能在有钱贵族经营的工厂或农庄担任管理员，甚至还有人沦为乞丐。不同于一般的乞丐，这些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用黑衣遮住脸，只在眼睛的地方开两个小洞，人们称他们为“无地自容的乞丐”。

适者生存，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威尼斯，这些贵族还要负责国政。如果是贵族的嫡子，必须从事繁忙而且无薪的政务。在败者复活的可能性减少，没落贵族的弱势地位固定化的同时，投票中“买票”“卖票”的迹象逐渐明显起来。

不过，所谓的“买票”“卖票”，不存在金钱交易，“卖票”者在元老院议员选举时给某人投赞成票，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收入多、支出少的宗教界的推荐。正因为程度不算严重，所以还不至于动摇体制根基。威尼斯境内的神职，不允许大主教、教皇自作主张，向来是由政府提出4位候选人，然后再让教皇选择其中之一。

在当时，神职收入丰厚，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帕多瓦大主教的年收入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拿最高薪酬的元首持平。其实，元首的薪水相当于活动经费，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公事消费，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个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人担任与罗马教廷有关的神职，整个家族的男性都不能参与相关教廷的决议，不过相较于沦为乞丐，这点儿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有人因为是贵族家的嫡子而吃尽苦头，也有人因为成不了贵族而愤愤不平。威尼斯的贵族只看父系血统，母亲一方的家族哪怕是穆拉诺岛

的玻璃工人或者造船工、商人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作为贵族进入政界。

在这一点上，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国家就相对宽松许多。作为私生子，仍然能凭借能力和幸运，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生子遍地的教廷就不用说了，哪怕是那些君主国家，对庶出子也没有严苛的限制。但是威尼斯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化，坚持采用嫡子世袭制。虽说贵族的利益不如从前，可是被这项制度排除在外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挽回失地的机会。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ritti）和他儿子的经历，就是威尼斯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光与影的对照。

元首古利提

经提香之妙笔，其肖像画流芳百世的古利提，出生于1455年。在家中完成基础教育之后，他被送往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由于父亲早逝，古利提由祖父养大，曾经跟随担任大使的祖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生活过。他是一位语言专家，除了生活过的三个国家的语言之外，还懂拉丁、希腊和土耳其语。

1480年，25岁左右的古利提开始频繁出入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过将当地的小麦销往本国的转手贸易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妻子是威尼斯名门之一的文德拉明（Vendramin）家的女儿，两人诞下一男二女。除此之外，他与在君士坦丁堡行商时结识的希腊女子还生了三个儿子。

古利提和土耳其宫廷的重臣们交情不错，更与宰相结为好友。但是

在1499年，土耳其与威尼斯爆发战争时，古利提因间谍嫌疑而遭到土耳其方面的逮捕，罪名是一手制造了不久前发生的土耳其造船厂火灾。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史料记载，不过古利提被判了死刑。

安德烈·古利提不仅头脑聪慧，有良好的教养，还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魅力十足的性格甚者连男人都为之倾倒。除了其好友宰相艾哈迈德（Ahmed），苏丹巴耶济德也十分喜欢他。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土耳其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求情，古利提终于逃过一死。

苏丹不仅释放了古利提，为了尽早开始两国的和平谈判，还将他送回了威尼斯。1503年签订的土耳其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就是古利提一个人几度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中斡旋达成的。缔结和约之后，他当选为“中枢集团”的成员，之后一直留在威尼斯，轮流在多个岗位上任职。

1508年，康布雷同盟战争爆发。古利提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威尼斯的陆军总司令是由外国雇佣军的将领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便成了威尼斯一方的最高长官，掌管战斗总指挥以外的一切事务，主要工作是控制金钱的流向，以及监督雇佣军是否履行契约等。如果总司令发生意外，参谋长必须负起代理之责任，指挥战斗。

康布雷同盟战争中威尼斯出师不利，首战阿尼亚德洛（Agnadello）战役便一败涂地，威尼斯的陆军部队简直溃不成军。之后又因为雇佣军队长们之间意见不合，使得对手更是势如破竹。他们占领了帕多瓦，烧毁了梅斯特雷（Mestre），威尼斯只剩下海水这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参谋长的安德烈·古利提根本顾不上制定什么防守策略，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整编因战败而军心涣散的陆军队伍。

首先，他组织打游击战，借此重建士兵们的信心。当这个战术逐渐出现成果时，他强烈要求政府发送军费。钱一旦到位，立即打响了夺回帕多瓦的战役，不仅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还收回了被占领的维琴察和布

雷西亚（Brescia）。军队以及当地的市民因此士气大振，当皇帝军队对帕多瓦发起总攻时，经过安德烈·古利提重整之后的陆军部队彻底改头换面，奋勇抗敌。

话说回来，防御战打得还是相当辛苦，古利提甚至一度被法国军的大将捕获。不过他很快就与这位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将军打成一片，待对方放下警戒心后，骑马逃出了敌营。后来他又成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的俘虏，结果不仅获得国王的青睐，竟然还受邀成为刚出生的公主的教父，见证洗礼。就这样在磕磕碰碰、时好时坏的状态下，古利提逐渐练就了掌控军队的本领。他与士兵们睡同一个帐篷，吃同样的伙食，成功地抓住了那些原本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的心。

战争结束之后，古利提继续留在内陆，因为他被选为本土的总督。就在那个时期，原先被占领的内陆领土，陆陆续续地重新归属威尼斯，不久之后，局面便完全恢复到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

或许是因为本土局势逐渐稳定，1514年，古利提当选为海军总司令。由于在他任职期间威尼斯海军没有打仗，所以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他指挥战斗的能力。和平时期海军统帅的主要任务，一是强化与同盟国海军的共同作战体系，二是负责从威尼斯延伸至塞浦路斯前线的海军人员和物质的调配，有效地运用平常开支高达10万达克特军费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介武将能胜任的。

1517年，古利提当选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两年后，再次出任海军总司令。1521年，他出任本土属地的最高领导（当时本土已经完全回到了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然后在1523年，68岁时当选为元首。

安德烈·古利提当选元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对他高傲的态度颇为反感，更愿意选择另一位性格谦和的候选人安东尼奥·特隆。他们拉帮结派，以古利提在土耳其有三名私生子，不适合担任共和国元首为由，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当选。然而，认可古利提能力的人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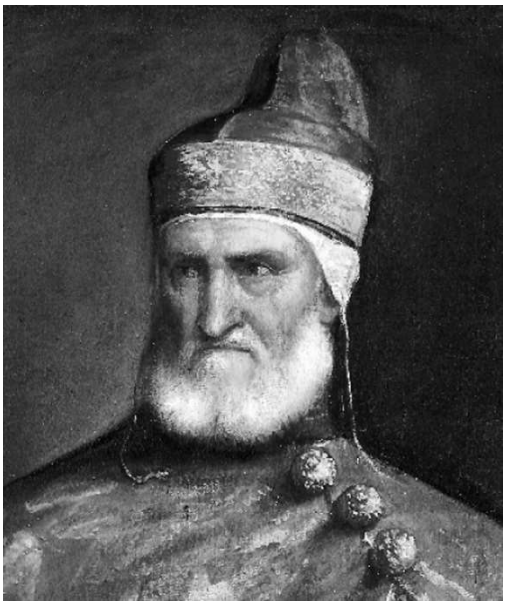
少，经过三次反复投票，安德烈·古利提总算是获得当选所需的25票，成了元首。

在担任元首的15年间，古利提汲取君主制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树立起一个威尼斯共和制理想的元首形象尽心竭力。即使为了在下文中即将讲述的他最心爱的儿子，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歪曲法律；发生粮荒时，他将自家库存的小麦粉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投放市场，缓解了国库的压力。

古利提一向认为，威尼斯的独立是建立在列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发起的战争是最没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对土耳其、西班牙还是法国，他都尽量采取协调路线，避免战争。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问题，处理内政古利提也是一位老手。当他判断需要内部正反两派相互牵制时，会存心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鼓励反对的声音。

有才华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安德烈·古利提也不例外，表现之一就是喜好华服。作为共和国富裕和权力的象征，威尼斯对元首的服装原本就有所要求，在他的影响下，之后300年的元首服基本上都是以豪华风格为主。

古利提的服装款式种类多样，以应对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祭日时，是一袭纯白绸缎绣银色图案的披风，在招待西班牙大使的宴会上，又以金线织花的及地长袍现身，豪华绚烂的装扮，每每让外国使节们赞叹不已。古利提身材高大，蓄雪白胡须，器宇轩昂的气度想来是压得住任何锦衣华服。提香虽然也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君主卡洛斯画过肖像，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比安德烈·古利提更适合成为这位巨匠笔下的主人公。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肖像（提香绘）

这里再介绍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法国输给德意志、西班牙联军，法王被卡洛斯一世监禁后，西班牙大使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古利提，并且大力宣扬神圣罗马帝国势不可挡，要威尼斯抛弃距离亡国不远的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家签署同盟协定。对此，安德烈·古利提答道："我与两位国王都私交匪浅，着实左右为难。请容我为胜利的国王庆贺，为不幸的国王流泪。"古利提舌绽莲花般的托词，简直堪称外交辞令的杰作。不仅卡洛斯皇帝没有找过威尼斯的麻烦，在狱中闻讯此事的弗朗索瓦一世在被释放之后，终身不忘这句箴言。

1538年12月，83岁的安德烈·古利提辞世。他是在得知威尼斯输给土耳其不久之后去世的。生前极力想回避这场战争的这位元首，终究还是没能了却心愿。

古利提在去世前数日，召见了伯纳多·纳瓦吉洛（Bernarudo Navagero）。受政府委托正在执笔共和国历史的纳瓦吉洛，也常常为重要人物撰写悼词。听说元首要听一下自己葬礼上的悼文，纳瓦吉洛急忙起草了一份，在元首的枕边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古利提只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这样吧。"5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儿子

阿尔维塞·古利提（Alvise Gritti）是元首古利提的庶出子。安德烈·古利提与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希腊女子之间生有三子。性格温和的长子乔治，以经商为业，在出生地土耳其平稳地度过了一生。次子洛伦佐作为父亲的私人特使，负责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沟通，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阿尔维塞是小儿子，与其两位兄长同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前期教育之后来到意大利，在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据说父亲安德烈最疼爱这位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聪明好强的小儿子。安德烈与正妻所生的儿子，早在安德烈因帕多瓦防守战而一举成名为“威尼斯的古利提”之前，便不在人世了。

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即使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尼斯，也可以像他父亲那样大有作为，而在意大利其他国家，庶出子成为一国之君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阿尔维塞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唯一阻挡他实现抱负的，就是威尼斯法律不承认非婚子女的贵族身份。

贵族的庶出子，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在政府机构做个书记官之类的事务官。而阿尔维塞却不能忍受这种拿一份固定收入，终日坐在书桌前的工作。他决定回君士坦丁堡寻找其他机会。作为父亲，安德烈贵为共和国最高之长，对儿子的处境束手无策，而阿尔维塞本人的政治信仰，也不接受为一己私利而践踏共和国体制的事情。

回到君士坦丁堡定居后的阿尔维塞，从事威尼斯和土耳其两国贸易。他向威尼斯出口土耳其的小麦，又向土耳其进口威尼斯物产，后来还做了土耳其军队的御用军火商，很快便成为土耳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在商才上，他似乎也深得父亲的真传。阿尔维塞与宰相易卜拉欣

·帕夏（Ibrahim Pasha）结为好友，甚至苏丹苏尔曼大帝也非常喜欢与这位年轻人同餐共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的阿尔维塞·古利提身份近似双重间谍。但他不是游走于两国之间，以绝密情报换取金钱的那种间谍，反倒像一个情报交换中心，让两国彼此了解对方的情况。像他这类人物对于预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无知往往比熟悉更加危险。

当然，情报交换中心要起到作用，当事国双方的领袖必须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土耳其的苏丹是苏尔曼大帝，而威尼斯则是信奉势力均衡政策的安德烈·古利提元首及其“核心小组”。

1528年，苏尔曼大帝攻打维也纳时，阿尔维塞·古利提与之同行。这场战争，唤醒了阿尔维塞沉睡多时的政治野心，发掘了他的军事才能。翌年，阿尔维塞受苏丹之托，作为指挥官率军队攻打匈牙利。他不负众望地成了战场上的英雄，并且在战事结束后，再次接到苏丹的任命，负责处理刚占领下的匈牙利战后工作。

威尼斯人肖像（提香绘）

1531年，一个传闻令威尼斯人震惊，现任元首的儿子改宗信奉了伊斯兰教！虽然那时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战事，但对于威尼斯而言，土耳其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尽管威尼斯向来有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的传统，但这只是国家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方针，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而言，威尼斯人都是天主教徒。阿尔维塞·古利提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威尼斯一大丑闻。

安德烈元首似乎在事前就接到了儿子的报告。他在信中规劝儿子打消改宗的念头，不要过分涉入土耳其宫廷。这些信件的副本时至今日依然保存。话说回来，父亲除了忠告几句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要说在选拔人才上讲求实力主义，当时的土耳其的确比威尼斯更适合阿尔维塞。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整个土耳其帝国只有苏丹一个主人，其他人皆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后宫女奴所生，再加上土耳其禁止本国人为奴，可见他至少有一半的血液不是来自土耳其。

苏丹的家臣们几乎也都是奴隶。苏丹每隔几年就会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定期征召10岁左右的男孩。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那些身体健康、心智聪慧的孩子会留在宫内，继续接受精英式教育。剩下的则去军队锻炼。那支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精锐陆军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就是由这批人组成的。他们禁止结婚成家，只效忠于苏丹一人。这些狂热的反基督教的战士们，原来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

可以说，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由非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土耳其民族的起源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之所以会不时地出现反苏丹的动乱，主要就是因为纯种土耳其人对混血或非土耳其人的统治，感到不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除了一个主人其余都是奴隶，则意味着奴

隶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生死大权捏在苏丹的手里，但没有像威尼斯那种非嫡子不可的规矩。话说回来，再怎么机会平等，土耳其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阿尔维塞·古利提以基督徒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改宗后的阿尔维塞似乎有心获取匈牙利的王位。

没过4年，阿尔维塞·古利提突遭斩首，消息很快传到了威尼斯。他究竟为何而死，至今也没有找到真相。但是儿子的早逝的确让做元首的父亲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据说，那些对傲慢不逊的安德烈·古利提一向没有好感的人们，在那段日子也都尽量避免在会议上发表刺激的言论。

当然，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例子。不过，即使没有他那般的政治野心，却因为庶出子的身份而无法施展才华的年轻人在威尼斯应该为数不少。也许很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可惜就是这样被埋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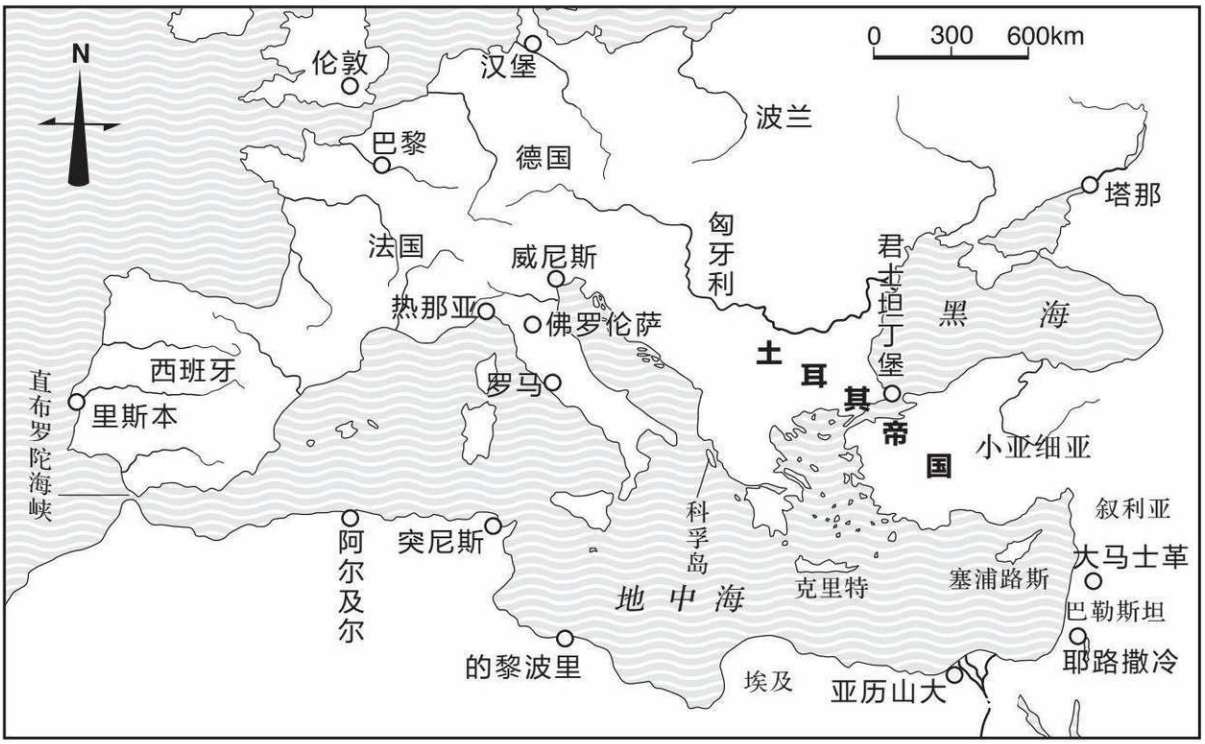
16世纪下半叶，曾经针对威尼斯统治阶级的世袭制度有过两次提案，希望能够向那些非嫡子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两次建议，都是由原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提出，可见是暗有所指。可惜，提案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世袭制平稳地运作了200年，才孕育出安德烈·古利提这般的杰出领袖。改变一个绩效相对不错的制度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16世纪的威尼斯并不缺乏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人选，那些以共同体为先、个人私利在后的“嫡子”们大有人在。

大国崛起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君主论》主要讲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而《论李维》则是有关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论李维》全名“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10年”，有的译本将它翻译成“政略论”，不仅与原名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我认为意译成“共和国论”会更贴切一些。

面对当时祖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分裂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大概是深感仅一种政体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就君主国与共和国做了分别的论述。



地中海及其周边

然而，同时代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马林·萨努多，甚至是以批判政府著称的吉罗拉谟·普留利，都不像以马基雅维利为首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那样，尝试去探索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只针对威尼斯的共和制进行论述，对自己国家政体的正确性，似乎没有丝毫怀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能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

作，而这些威尼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只剩下作为史料的价值。

但是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时，同时期的威尼斯，虽然出现过很不受人民拥护的元首，却鲜有人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哪怕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也没有类似的诉求。在城邦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潮流之下，威尼斯坚守共和政体的优秀执政能力，得到了包括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们在内的其他国家人们的赞许。

那么，威尼斯是如何以此作为武器，展开对外政治的呢？关键点就是元首安德烈·古利提提出的——均衡列强的势力。

在这场艰难的政治游戏中，威尼斯用了法国这张王牌。法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大国，但它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对统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急速势力扩张倍感威胁。因此，威尼斯才将目标锁定于法国。不依附强国的荫庇，而是与更弱的国家联手，防止强国不断壮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威尼斯一向奉行的传统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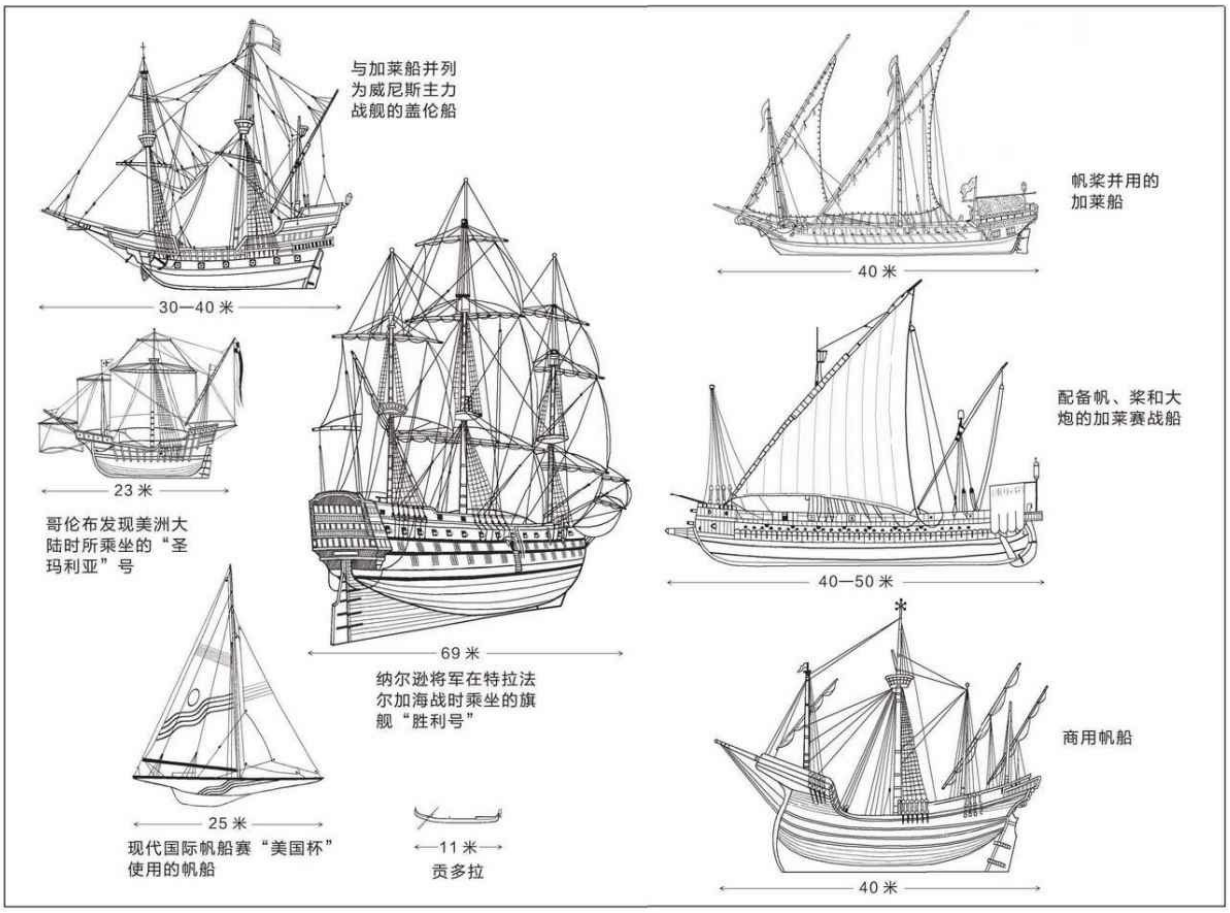
然而，这场均衡势力游戏，对威尼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威尼斯需要西班牙来共同抵抗土耳其，同时又需要借法国之力抗衡西班牙。可是威尼斯又无法效仿法国为对抗西班牙与土耳其结盟，因为威尼斯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这样，威尼斯在与列强们同桌玩角力游戏时就不得不比别国背上更多的包袱。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一段他与法国首相同时也是枢机主教乔治·昂布瓦兹（Georges d'Amboise）的对话。两人因外交谈判而相识。

枢机主教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马基雅维利反驳说：“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马基雅维利口中懂政治的意大利，那时除了威尼斯之外的土地正遭受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蹂躏。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最终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军事能力，是资源的储备。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尽管守住了国家的独立性，但还是深切体会到缺乏资源的悲哀。



各种船型长度比较图

从15世纪到16世纪，威尼斯的商船，按照合理化原则，逐渐将主力的加莱船改成称为“盖伦”（Galleon）的大帆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成本，解决战舰不能随时护航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因不断发展的火炮等武器。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商船依然保持着首屈一指的实力，威尼斯的军船还是以传统的加莱船为主力。自1460年之后，加莱军船在船尾安装了大炮。由于火器在海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装载更多的武器，又出现了一种船身与帆船等高的大型加莱赛战船（Galleasse）。从15世纪后期开始至整个16世纪的威尼斯舰队便是由加莱军船和运载军粮的帆船，以及加莱赛战船所组成的。

不过，当时的大炮命中率较低，而且换炮弹所用时间过长，不像铁炮可以三列并排轮番轰击。但将铁炮搬上战船又很不现实。所以当时战

船上的大炮与其说是用来击沉敌船，不如说靠发出的巨响声和激起的水柱，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发射距离短是大炮威力不足的另一问题。英国纳尔逊将军时代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海战，仍然是近距离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优势的还是依靠划桨控制船只的传统加莱船。因此，如果纯粹比较海军战力的话，主要是看舰队中加莱战船的数量。威尼斯海军除了传统的加莱军船，又增加了加莱赛战船。

根据1423年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著名的以“遗言”形式留下的史料，当年威尼斯所拥有的加莱战船是45艘。到1499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加莱战船的数量增加至60艘。

虽说威尼斯采取了以防守海外基地为主的战略，可是80年的时间，仅增加了15艘军舰，增长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同时也证明靠这些数量的战船数量已经足以对付当时的土耳其海军。

可是，1538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第三次战争时，威尼斯虽然派出了82艘军舰，还是无法凭一国之力对抗土耳其海军。因为土耳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埃及、北非一带，他们收编了那些以阿尔及尔、突尼斯为中心的海盗，因此海军力量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那一年，威尼斯海军是与罗马教廷派出的27艘战船，以及西班牙的49艘战船组成联合舰队，勉强与土耳其海军打了一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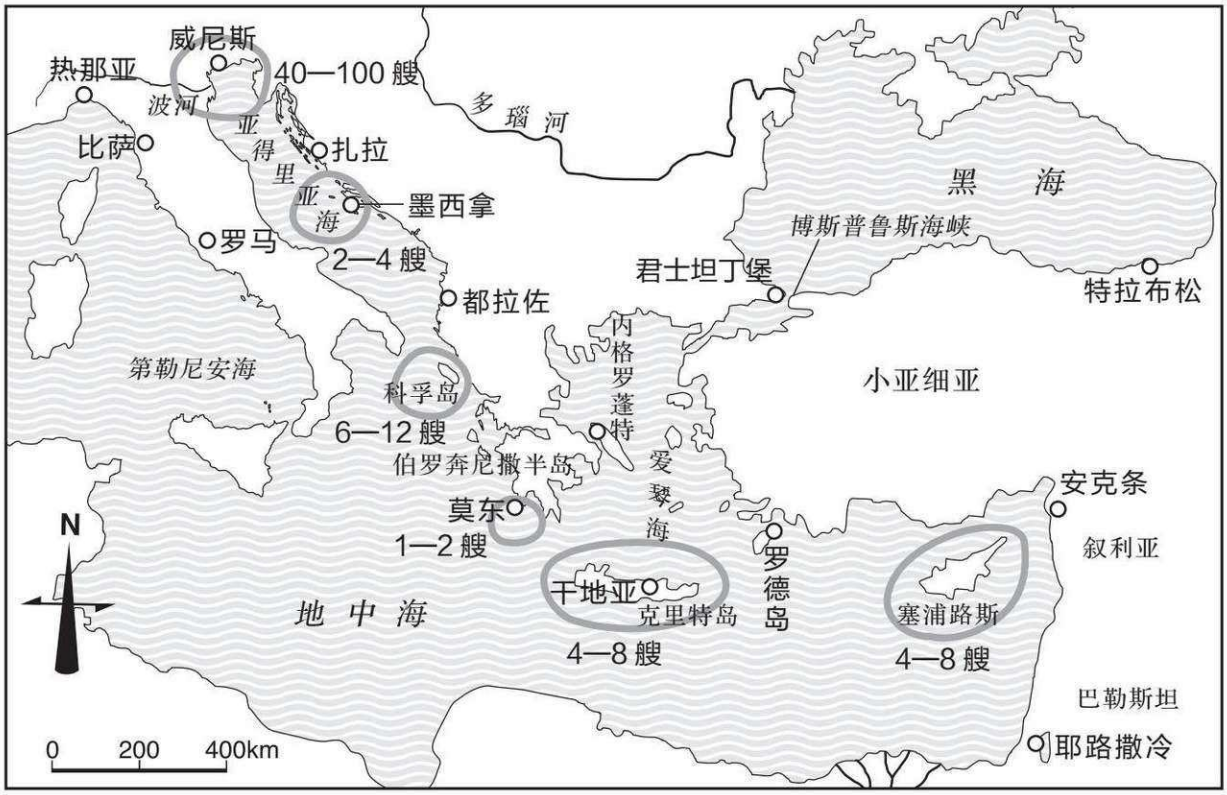
1571年发生的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派出了104艘加莱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共计110艘军舰。加上西班牙、教廷以及其他基督教诸国派出的98艘军舰，总共208艘，才差不多与土耳其海军的规模持平。

威尼斯海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继续保持着位居基督教世界海军国之首。然而，在地中海世界却只能属于二流。为什么威尼斯在与之息息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不能成为海上军

事强国呢？

难道是财政的问题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威尼斯战船的武装化成本很高。武装指的不是大炮等武器，而是人力所需的费用。包括划桨手在内，全体成员都是通过募集而来的自由人，所以必须支付薪水。而土耳其可以用奴隶或者是从占领地强征而来的划桨手，西班牙同样也是无视民意，强行要求其占领下的南意大利地区的居民充当水手。与它们相比，威尼斯既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权力。



威尼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分布图

第二，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的最大区别在于通商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换言之，海上悬挂着威尼斯国旗的商船，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商船的航行安全，威尼斯必须付出

庞大的军费来维护从本国到塞浦路斯岛的基地网络。

负责亚得里亚海警卫的舰队，不包括传令船和补给用的货船，仅常驻的加莱战船就有8艘。其中的6艘驻守科孚岛，另外两艘则以达尔马提亚的莱西纳为据点，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

负责希腊警卫的战船有一艘驻守莫东岛。1499年，威尼斯一度失去莫东岛时，这艘战船并没有因此撤离，而是编入了驻守科孚岛的舰队。

除此之外，克里特岛近海有4艘战船，塞浦路斯岛也有4艘战船常驻。

以上只是平常时期的军舰数量，一旦发生战争，不管哪片海域都会同时增强兵力。1538年以后，平时的军船数量也达到了战时的规模。威尼斯的造船厂始终有40艘加莱战船待命，一旦出现战情，随时可以出动。这些没有冬休期的常驻舰队的船员，包括划桨手在内个个都是彪悍的海上高手，因此，他们的薪资也比较高。

威尼斯在军费上的高昂支出，对于打仗时才组舰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大国本身的存在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必常设舰队，但威尼斯为了保护航线的安全，却不得不由始至终地绷紧神经。与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时，穆斯林海盗袭击威尼斯商船，完全是合情合理，两国一旦签订和约，威尼斯又会被基督教一方视为叛徒，遭到反伊斯兰先锋的圣约翰骑士团近似海盗般的掠夺。

除了舰队之外，海外殖民地以及基地的维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地日常的费用需要靠本国的支援，连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盛产葡萄干的赞特岛，也都无法完全保证自给自足，耕地面积稀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更加困难。以小麦产量为例，各

地区能保持自给自足的时间情况如下：

斯帕拉托——5个月

卡塔罗——6个月

希贝尼克——以当地产海盐交换，勉强维持自足

科尔丘拉——4个月

这些作为威尼斯“高速公路”中间站的港口城镇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威尼斯除了要负担城塞、守军的日常开销以及港口的维护费之处，每年还必须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具体金额是：

卡塔罗

斯帕拉托——3000达克特

卡塔罗——3900达克特

科尔丘拉——2000达克特

扎拉——8000达克特

像威尼斯这样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又必须为了经济与他国维系友好关系的国家，唯有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处。

威尼斯的国库每年必须花费庞大的费用来保证航线的安全。除了常规海军舰队以及基地费用之外，还要加上发生战争时的额外资产，也亏得威尼斯人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能长期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换言之，威尼斯是通过高额的军费以及人工费用，换取了经济的繁荣。所以说，威尼斯沦为二流海军国的原因，既和财政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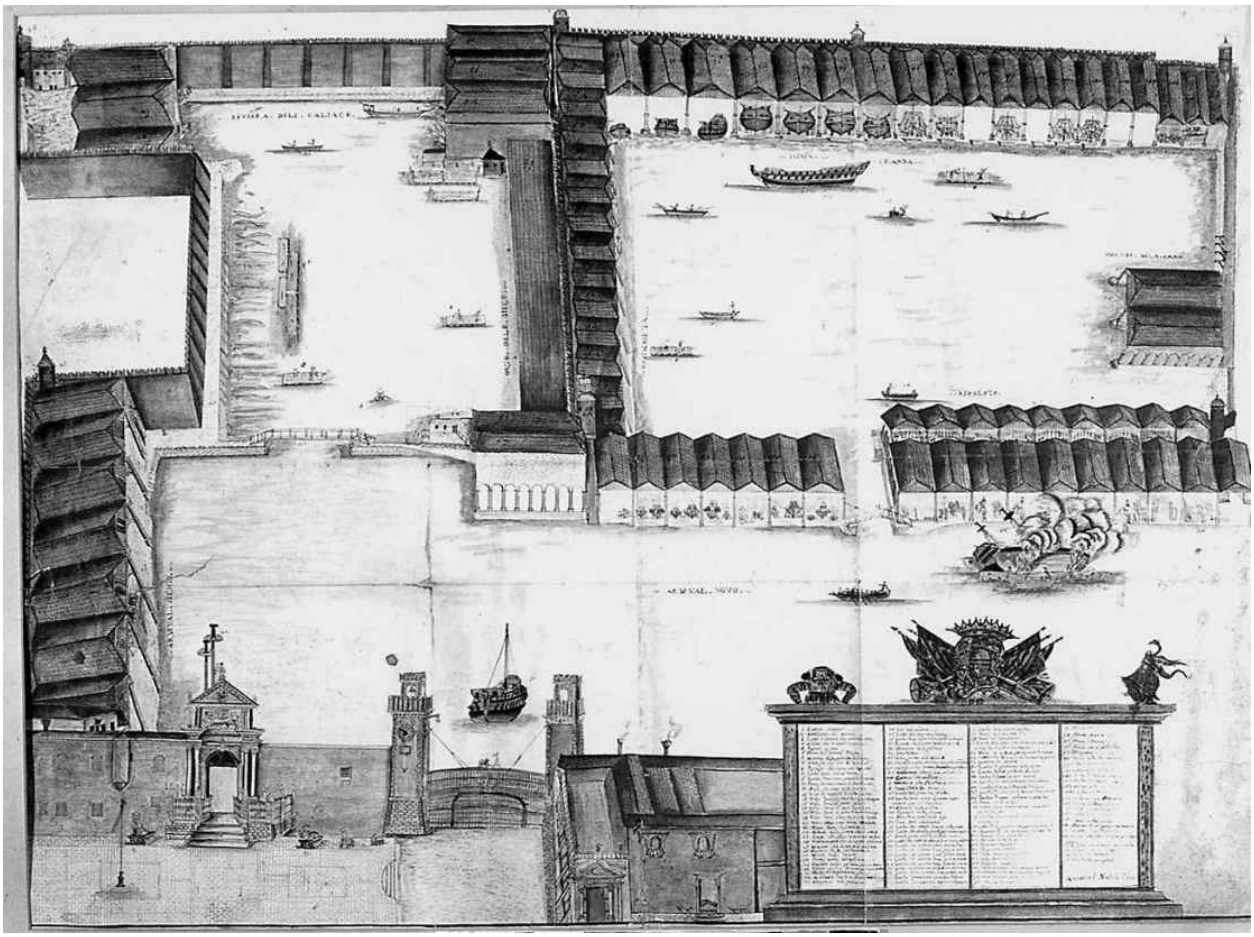
如果不完全是财政上的问题的话，难道是造船的能力不如土耳其吗？对于这个质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是”。16世纪的威尼斯国有造船厂的供给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海军的任何需要。

假若从海上去威尼斯的话，进入港口之后，右手边就是国有造船厂。自1473年扩建了第三造船厂之后，整个生产规模，比但丁在《神曲》中咏叹的13世纪时期的工厂增加了两倍。

船厂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平时的员工人数维持在2000人左右，

非常时期则会增加至3000人。就算在最和平的时期，人员也没有低于1000以下，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由于船厂还兼有武器库的功能，火药库也设在其中，因此四周筑有高墙，是四面环海没有城墙的威尼斯岛上唯一的城壁。工厂采用类似于现代的流水线作业，将大量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不同类别的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的经营管理由共和国国会选出的贵族们担任，主要负责监管从各地采购来的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船只的库存数，以及支付工人的薪水等。造船技术人员则由平民担任，被称为“造船厂总督”的技师长相当于统领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指挥。总督手下有数位工头，他们每人各承包一艘船的生产，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战事发生时，他们大多会在自己建造的船上负责航行中的船体维修。



国有造船厂（17世纪绘制）

造船技工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与贵族的女儿通婚。在不设近卫军的威尼斯，根据情况需要，他们还充当元首的仪仗队，发生紧急事态时，负责警卫共和国政治中心元首官邸的，也是这群在“造船厂总督”率领下的工程师们。

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引以为傲，收入始终可以保持在中流以上的水平。他们处于国有造船厂的金字塔顶尖，下面分别是熟练工和学徒，这些平民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经营者的组织。

船身在第二、第三造船厂生产，最后送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造船厂进行组装。第一造船厂内分门别类地设有几个仓库，可以推着船身从它们前面移动。首先去绳索仓库，装上所需的绳索之后，继续将船身推往

大炮仓库，在那里装上大炮，然后再去石弓库、火药库。待组装完船帆，船锚搬上船后，整个“流水线”作业就算是大功告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有统一的规格，连划桨手坐的长木条板凳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帆布是由附近的国有工厂提供之外，其余零部件全都在船厂内生产，通过这种拼装方式提高整个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

完工后的船存放在工厂的船坞内，上有屋檐遮盖。这些随时可以下水的船只，在土耳其海军尚未发展强大的15世纪中叶，常有25艘在库，15世纪末期增至50艘，在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备用数高达100艘。

这100艘全部是用于军事的加莱战船，除此之外，还有4到10艘的大型加莱船、8艘小型加莱船，以及16艘快速传令船，共计134艘船。其中的25艘在船坞内处于下水状态，只要水手们到齐上船，即可起航出港。其余的船只在干船坞中待命，但也必须保持10天之内能够出港的机动状态。

可是，现实总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完美。16世纪的威尼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西班牙海军，以及保护商船免遭穆斯林海盗的袭击，每年需要有40到60艘的新船下水出海。战情吃紧时，比如像勒班陀海战的前夕，威尼斯在两个月之内建造了100多艘加莱军船。

威尼斯缺乏的不是造船的能力，他们缺的是水手。

16世纪中叶，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如下：

西班牙——800万

葡萄牙——100万

德国——1000万

法国——16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100万

威尼斯（包括内陆本土）——145万

英国——300万

土耳其（埃及、北非除外）——1600万

很明显，威尼斯的人口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威尼斯也不像土耳其船有奴隶可用，威尼斯的奴隶最多不超过数十人，而且担任的是装饰性大于实际性的贡多拉的划船手。当时，罪犯也可以充当划桨手。不过由于威尼斯社会安定、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人力供给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欧洲的罪犯以宗教犯居多，作为反宗教改革中心的西班牙，因此受惠不浅。当然，西班牙本身的领土面积，就不是威尼斯所能比拟的。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君主可以凭借其权威和权力从众多的属国强制征召水手，而威尼斯共和国只能依靠志愿者。

海军与陆军不同。陆军只要指挥官一声冲锋令下，士兵们大抵上都能成为战斗力。而海军就连划桨手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好的划桨手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和希腊诸岛，他们熟悉水性、体魄强壮，能够胜任这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地区向来是威尼斯招募水手的主要市场，可是自从土耳其频频在陆地上发起攻击之后，水手的供给规模日益缩减。

内陆本土属地的居民也是人力资源之一。不过这些意大利北部的男子大多不太熟悉水性，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冬天也要在海上巡逻的军舰上的工作，只能作为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内待命的预备船的船员。

当然，如果事态紧急，也就顾不上挑三拣四。这些不熟悉水性的男人们会按照出身地，分配在同一条船上，指挥官也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豪绅名士担任。这种编制方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来自加尔达湖地区（Garda）的水手，他们操控船只以及作战的能力，可以与那些出身于威尼斯但没有什么海上经验的工匠们媲美。

1576年黑死病暴发之后，人手不足的问题日益恶化。原本船的两侧各有三人一排的划桨手，每人手持一桨，整个船上总共有25到28排划桨手。现在不得不改为三名划桨手共持一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会影响船速，但因为是生手与老手搭配共同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人技术不稳的问题。

不足的还有打仗的战士。自从战船上安装了大炮，武器从石弓变成火枪之后，威尼斯战船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发射武器的命中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加莱战船打的是肉搏战，基本上靠人多取胜。西班牙战船除了划桨手之外，另有百名战士，相比之下，威尼斯战船最多才60人，有时候连这个人数也凑不齐。

缺乏人力一直是威尼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如此，为了维护商船航行的安全，不得不战。威尼斯的一位大使曾经说过：“没有贸易传统的国家，不会诞生海军。土耳其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如果按照这位大使的思路，不要说土耳其，就连西班牙也不是传统的贸易国。可事实上，16世纪时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正是这两个非传统海运国的陆地国家。

在16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苏丹曾经对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听说贵国曾经与大海结婚。如今，能娶海为妻的应该是我们土耳其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威尼斯人。”

威尼斯不得不承认，以一国之力注定无法对抗土耳其。就在同一时期，统领西方大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洛斯正在摧毁海盗盘踞的巢穴，力图将势力扩张至北非。而在罗马教廷内部，不能再放任异教徒土耳其肆意妄为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威尼斯共和国，三方商议组成联合舰队对抗土耳其。三方各自派出的军力如下：

皇帝——82艘

威尼斯——82艘

罗马教廷——36艘

按照以上的协定，地中海世界将出现一支前所未有的超级舰队，当时的土耳其海军也无法与之匹敌。然而，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同盟国之间便产生分歧，差一点儿连同盟都结不成。

卡洛斯皇帝主张进攻北非，另一方的威尼斯则主张目标锁定东地中海。最后在教皇调停之下，双方同意先歼灭土耳其海军再决定目标。

在舰队总司令的人选上，也是一波三折。西班牙力推自己的海军总

司令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对此坚决反对，因为此君是海军雇佣兵。多里亚先受雇于法国国王，之后又被西班牙挖角，为当时完全欠缺海军战术的西班牙导入了热内亚海军的传统和丰富经验，使得西班牙海军初具规模。他是一位能干的将领，但雇佣军首领说到底是以自己的船及其船员为资本赚取金钱，不可能为雇佣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力。在这方面，陆军部队不得不使用雇佣军的威尼斯深有体会。

当时一心想对付西班牙的法国，不仅与土耳其结盟，甚者与北非的海盗也结下密约。卡洛斯为了封杀法国，暗中策划拉拢绰号为巴巴罗萨（Baba Aruç，红胡子）的海盗头目。这位巴巴罗萨是希腊出生的原基督徒，当时还担任土耳其的海军总司令。情势如此错综复杂，威尼斯当然是不肯冒风险把自己国家的海军命运交给缺乏信用度的雇佣兵队长，他们希望由威尼斯海军统帅出任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然而，形势不等人。土耳其吞并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意图越来越露骨，那些被编入土耳其海军从此有了正当身份的穆斯林海盗的行径日益猖狂，而威尼斯又无力独自对抗土耳其。如果按照教皇提出的折中方案，让完全不懂海战的陆军将领乌尔比诺（Urbino）公爵担任总司令的话，更是百害无一利。处于弱势立场的威尼斯，最后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建议。不管怎么说，安德烈·多里亚至少是名一流的海将。

威尼斯舰队如约在6月中旬抵达集合地点的科孚岛。军力同样是依照当初的约定，仅加莱战船便派出了82艘。教廷麾下的舰队，在威尼斯、安科纳、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各港口完成武装之后也陆续抵达。这些船大部分是威尼斯提供的，因为教廷几乎没有自己的海军。以基督教对抗异教徒的名义组成的舰队，不能没有教廷的参与，所以当初双方约定威尼斯提供战船，教廷负责提供士兵。不过，教廷在征召人员方面似乎也能力有限，最终只有27艘抵达科孚岛的舰队，而不是说好的36艘。

希贝尼克

另一方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却迟迟不见踪影。甚者有一度总司令多里亚去向不明。舰队就这样在科孚岛度过了6月，眼看着7月也将过去。

土耳其当然不会不知道基督教诸国正在组成联合舰队。由海盗头目巴巴罗萨率领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一路攻下位于爱琴海流域的所属威尼斯的岛屿，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斯达（Souda）、干尼亚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土耳其的5万大军从陆地上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们不仅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基地，而且进攻波斯尼亚，攻打了希贝尼克。面对土耳其海陆双管齐下的攻击，在科孚岛苦等的威尼斯舰队，束手无策，此时又出现了皇帝卡洛斯打算明年再出兵的传言，威尼斯人心中对西班牙的满腔怒火变得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舰队终于抵达科孚岛。可是他只带来了49艘军舰，远少于约定的82艘。舰队只需要一周的时间便能整装出港，可是多里亚却按兵不动，在那儿胡乱消磨时间。原来，海盗巴巴罗萨和卡洛斯皇帝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可是威尼斯并不清楚其中的详情，他们只是隐约听说皇帝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海盗对皇帝给出的条件并不满意，而皇帝也不肯答应他们交出突尼斯的要求。因此，威尼斯判断海盗依然会留在土耳其，不会和皇帝合作。

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强大的压力之下，安德烈亚·多里亚总算是下定决心出兵。可是就在联合舰队离开科孚岛的9月25日，总司令接到皇帝的密令，指示他不能打一场只让威尼斯获利的仗，而且如果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

离开科孚岛的联合舰队，摆出战斗阵型。走在最前面的是71艘帆船。这是因为帆船不用船桨，速度受海风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难以掌握，所以，地中海上有帆船先行的惯例。帆船舰队由威尼斯、西班牙混合组成，因此两国各有一名将领负责指挥。

排在帆船后面大约两海里左右的，是担任前锋的教皇舰队，指挥这支27艘加莱战船舰队的将官是受雇于教廷的热那亚人格里马尼。

紧跟其后的便是主力的西班牙舰队。它们包括了热那亚、西西里、那不勒斯、马耳他、摩纳哥等国的25艘战船，以及安德烈·多里亚带来的22艘战船，指挥官自然是安德烈亚·多里亚。

后卫舰队是清一色的威尼斯加莱战船，总共65艘，由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卡佩洛率领，所有战舰的舰长也都是威尼斯人。

排在最后面的是17艘威尼斯战船和两艘西班牙战船。它们不是预备

舰队，而是负责监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因此出海航行没多久，便与大部队分开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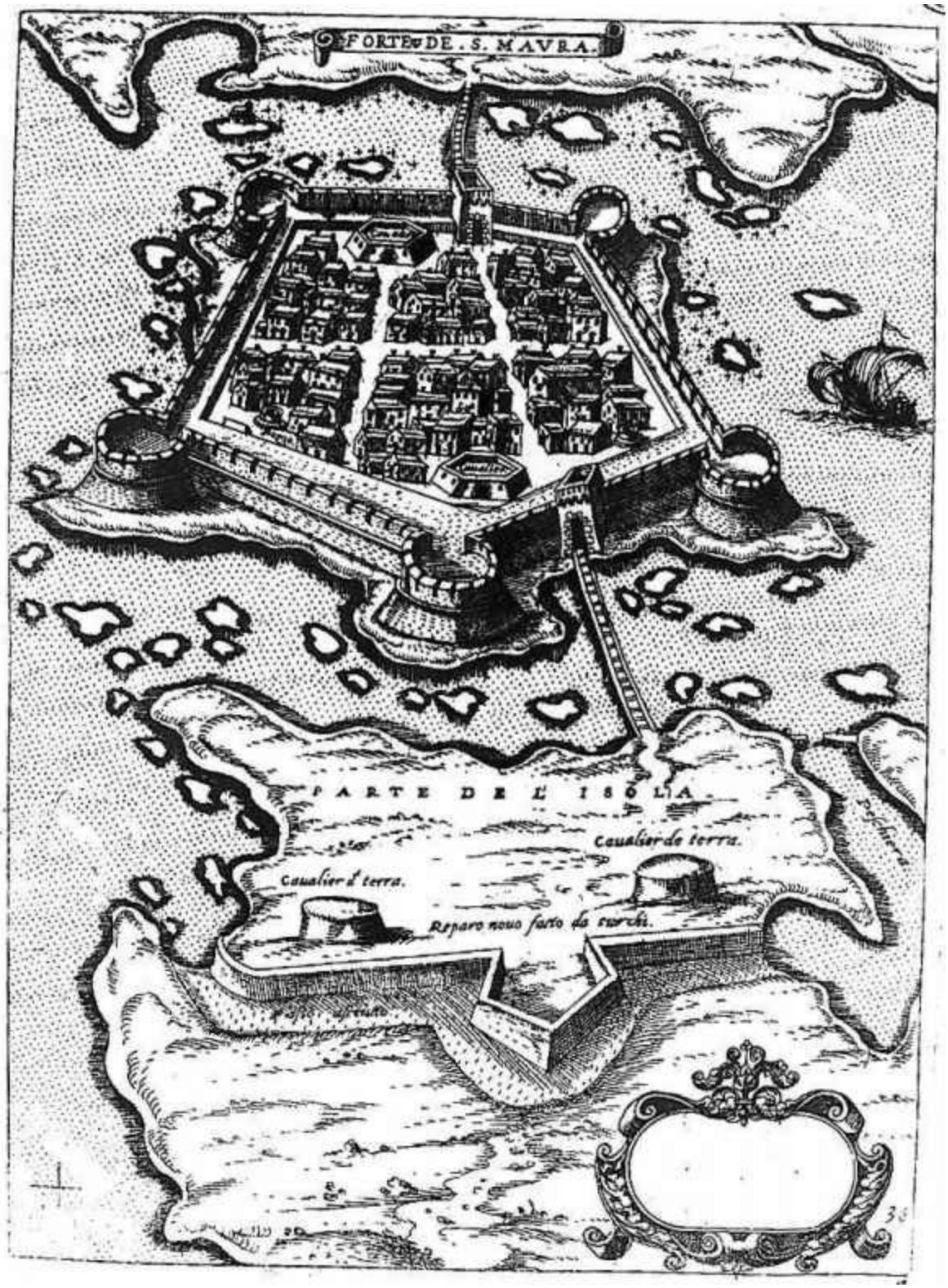
139艘加莱船加上71艘帆船，完全是基督教世界史无前例的阵容。威尼斯旗舰上斗志昂扬，从舰长到厨子人人摩拳擦掌，终于可以向土耳其报一箭之仇。

舰队在接到侦查船传来的土耳其海军出现在普雷韦扎近海的报告之后，决定向南航行。

普雷韦扎位于希腊西海岸，入口狭窄，从边上经过很少会有人注意。一旦进入其中，眼前豁然开朗，宛如蓝色湖泊般的大海，无边无际，似乎容得下1000艘船畅游其中。难怪当初沿岸航行的威尼斯船只会把这里当作重要的避风港。威尼斯人在狭窄的入港口两侧建起碉堡，以防海盗抢占这块风水宝地。

不过，普雷韦扎也有缺点，它的四周皆为平原。威尼斯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同样位于港湾深处但面积小于普雷韦扎的卡塔罗建造要塞，就是因为卡塔罗背靠陡峭的山崖，易守难攻。相反，一旦土耳其大军从陆地发起攻击，普雷韦扎便成了网中之鱼。只因为如此，这里早就脱离了威尼斯的掌控。

南下追击土耳其海军的联合舰队接到报告，得知对方已经进入普雷韦扎。可当他们到达附近海域时，土耳其舰队躲在港湾，完全没有出来迎战的意思。联军舰队的几艘战船更是逼近入口，还是没能诱敌出动。土耳其一方从港口两侧的碉堡中发射大炮企图击沉战舰，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前往圣塔莫拉岛（Santa Maur），而且是在夜间航行。谁也搞不清楚他目的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避而不战。


FORTE DE . S. MAVRA.
PARTE DE L' ISOLA.
Caualier de terra.
Caualier d' terra.
Reparo nouo fatto da turchi.

圣塔莫拉岛要塞

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离开了普雷韦扎，可在那里按兵不动的土耳其舰队却出现了异情。土耳其的派来督战的大臣们，逼着总司令巴巴罗萨开战，否则就向苏丹报告。于是，巴巴罗萨带着舰队离开海湾，紧追南下的联合舰队。

土耳其舰队的前锋，由巴巴罗萨的左右手多拉格指挥，巴巴罗萨本人坐镇中央，后卫则由阿尔及尔的船队担任。所有的指挥官都是海盗，战斗力也稍逊于联合舰队。他们在圣塔莫拉岛附近追上了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将前、后卫的指挥官叫上旗舰，说附近没有避难的港湾，在此海战相当危险，还是走为上策。然而，格里马尼和卡佩洛两位将领一致主张迎战。威尼斯舰队的总司令卡佩洛的态度更是强硬，表示即使其他舰队不打，威尼斯舰队也会自己开战。

见说服不成，多里亚只好下令升起战旗。可是，眼见着敌人舰队已经出现在水平线上，他却命令改变阵型，让实力强大的威尼斯舰队从后卫绕到与敌人相接的左翼，弱势的教廷舰队转到右翼。就在换阵型的当口，风向突然改变，这下帆船舰队彻底被孤立开来。

土耳其舰队见势立即扑向帆船舰队。威尼斯帆船多为大型帆船，面对好像大群蚂蚁般袭来的土耳其船舰，多少还能抵一阵，但这孤军奋战的情景却让威尼斯加莱战船上的官兵怒火中烧。卡佩洛和格里马尼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总司令多里亚出击的命令，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音讯。就在这时，总司令指挥的主力舰队突然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绕到帆船队的后方，朝着敌军的方向驶去，结果什么也没做，就这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卡佩洛换乘传令船拦下多里亚的旗舰，责问他为何还不展开行动，多里亚一语不发，带着他的舰队又绕了一大圈。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战船忍无可忍，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冲向正在围攻帆船的敌阵中，但随即陷入包围，激烈的肉搏战之后，全体官兵阵亡。

直到这时，总司令多里亚才发出了命令，但是命令的内容却是撤退，下令后他随即带着主力舰队撤离。由于土耳其舰队是从右侧包抄帆船舰队，他们便从敌军的左侧往北逃离，紧跟其后的是教廷舰队。威尼斯舰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一同撤出了战场。逃离中，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受到敌军的追击，不得不边打边撤，最后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和西班牙的一艘帆船成功地逃出重围，在科孚岛与大部队会合。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场败仗。尽管船和人损失都不太严重，可是威尼斯和罗马教廷自然是不肯放过总司令多里亚，最后还是卡洛斯皇帝出面为其辩护。据说，安德烈亚·多里亚从此以后只要听到普雷韦扎的名字，便火冒三丈。

威尼斯对西班牙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由于威尼斯舰队没有遭受到多少伤害，莫契尼哥随即代替生病的卡佩洛出任海军司令。国有造船厂还是全线开工，照常生产，因此其他国家都相信威尼斯会继续和土耳其打下去。

然而，威尼斯比谁都清楚，靠自己一国之力斗不过土耳其。“十人委员”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密令，以放弃纳夫普利亚和玛尔维萨两个基地为条件，势必与苏丹签下和平条约。

1540年，两国秘结和约之事公开化，基督教诸国异口同声地谴责威尼斯离经叛道。然而，威尼斯和之前法国与土耳其结盟的动机并不相同，那些责骂威尼斯缺乏宗教心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是因为他们不像威尼斯需要担心商船航线的安全。

实际上，在普雷韦扎海战中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威尼斯。大获全胜的土耳其海军天下无敌的神武名号威震地中海，从此以后穆斯林海盗更加所向披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沿海地带饱受他们的肆虐，无一幸免。以往只有4到6艘加莱战船负责沿岸的警卫，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巡逻船若少于10到12艘根本抵挡不住土耳其的攻击。大多数船只见到土耳其船便仓皇逃走，直到1571年为止，基督教诸国有30年以上的时间都不敢再跟土耳其人在海上交锋。在这30年里，飘扬着土耳其帝国国旗的船只俨然是地中海的主人。

无力单独对抗土耳其的已经不再是威尼斯一国，就连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的卡洛斯，面对海盗的横行霸道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打击穆斯林海盗的根据地——阿尔及尔。

1539年，在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下，65艘加莱战船、100艘帆船和300艘小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运载了2.5万名陆军，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登陆，卡洛斯亲任陆军指挥。不料，超级大国的皇帝竟然铩羽而归。对此，法国人拍手叫好，伊斯兰方面更是意气风发。

姑且不论陆军的人数，皇帝御驾亲征只派出65艘加莱战船的西班牙已经算不上一流的海军国家。之后由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建立的那支闻名天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实是因为一次实战也没打过才“无敌”。1588年，终于开战，遇上海盗出身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率领的英女王伊丽莎白舰队，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西班牙战败、穆斯林海盗旁若无人般地横行地中海的形势下，威尼斯一如既往地保证着中立。他们既没有跟随卡洛斯去攻打阿尔及尔，也没有介入圣约翰骑士团守卫马耳他的战役。威尼斯人靠严密的军事防守、对海外基地的援助，以及被强国视为屈辱的谨慎且柔软的外交，维

持了国家的和平。当时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和土耳其人谈判，有如二人互掷玻璃球游戏。当对方猛力掷球过来时，我们非但不能还以同等力量，还得小心失手砸碎了玻璃球。”“我们必须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同时保持友好的关系，让土耳其相信，我们有难时，菲利普和马克西米利安一定会予以援助。同时，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抗衡西班牙、德意志也有助益。”

然而，苏莱曼大帝并非等闲之辈。他非常了解威尼斯在西欧的地位，知道自认为天主教世界世俗最高领袖的卡洛斯一世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对威尼斯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不满意。

苏莱曼大帝本人虽然不是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但也不能说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像他那般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人，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自身利益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他可以超然地尊重理想主义者，蔑视现实主义者。当土耳其攻下罗德岛，面对浴血奋战后放下武器的圣约翰骑士团，苏莱曼大帝准许他们离开，尽管这些以基督骑士之名的战士们对异教徒从不留情。但是对那些为了本国利益而战的威尼斯人，苏丹却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所谓的骑士精神，难道只存在于骑士之间吗？

不管怎么说，苏莱曼在世期间，威尼斯的“玻璃球游戏”虽然玩得惊险环生，总算是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然而，自1566年开始，这场玩了46年的游戏，换了对手，新苏丹是以酗酒而闻名的塞利姆二世。为了争取他的信任，其手下的宰相、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些人原本都是基督徒，赤手空拳地好不容易在伊斯兰世界打出一片天下，谁也不想因改朝换代而失去原有的权力。是享受荣华富贵还是人头落地，全在苏丹一念之间，臣子们都急于做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吸引这位除了能饮酒之外鲜有建树的苏丹的注意。

当时的土耳其虽然国土辽阔，但内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换言之，没有什么为了保卫帝国而战的需要性。而那时的西欧却是烽火连天，西班牙与尼德兰地区在打仗，法国国内新旧教徒之间爆发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因此判断，现在出手攻打威尼斯，欧洲诸国不会有余力相助。苏丹对大臣们的提案也很有兴趣。不过，他对塞浦路斯的关注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产地。

威尼斯很快便察觉到土耳其方面的异动，但他们无法自己解决，于是向教皇庇护五世（Pius V）提出了组建对抗土耳其联合舰队的请求。在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进行内部调整的大形势之下，庇护五世却满腔热情地要保卫和振兴传统的天主教精神，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伊斯兰教。据说，他因此还拒绝吃肉只吃鸡蛋。这样一位教皇自然是不会反对结盟的。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因匈牙利问题刚和土耳其达成协议，鲜有出兵的可能；法国由卡特琳·德·美第奇摄政，整个国家血雨腥风，正处于两年后爆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前夕。环顾四周。最后能依靠的，只有普雷韦扎海战中让威尼斯尝尽苦果的西班牙。不管怎么说，在地中海世界，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利害关系还是一致的。

进军勒班陀

在教皇的积极推动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答应参战。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威尼斯担任主力，二是由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这位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是指挥普雷韦扎海战的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和其伯父一样，吉安德烈亚也是以海军雇佣兵为业，担任西班牙舰队的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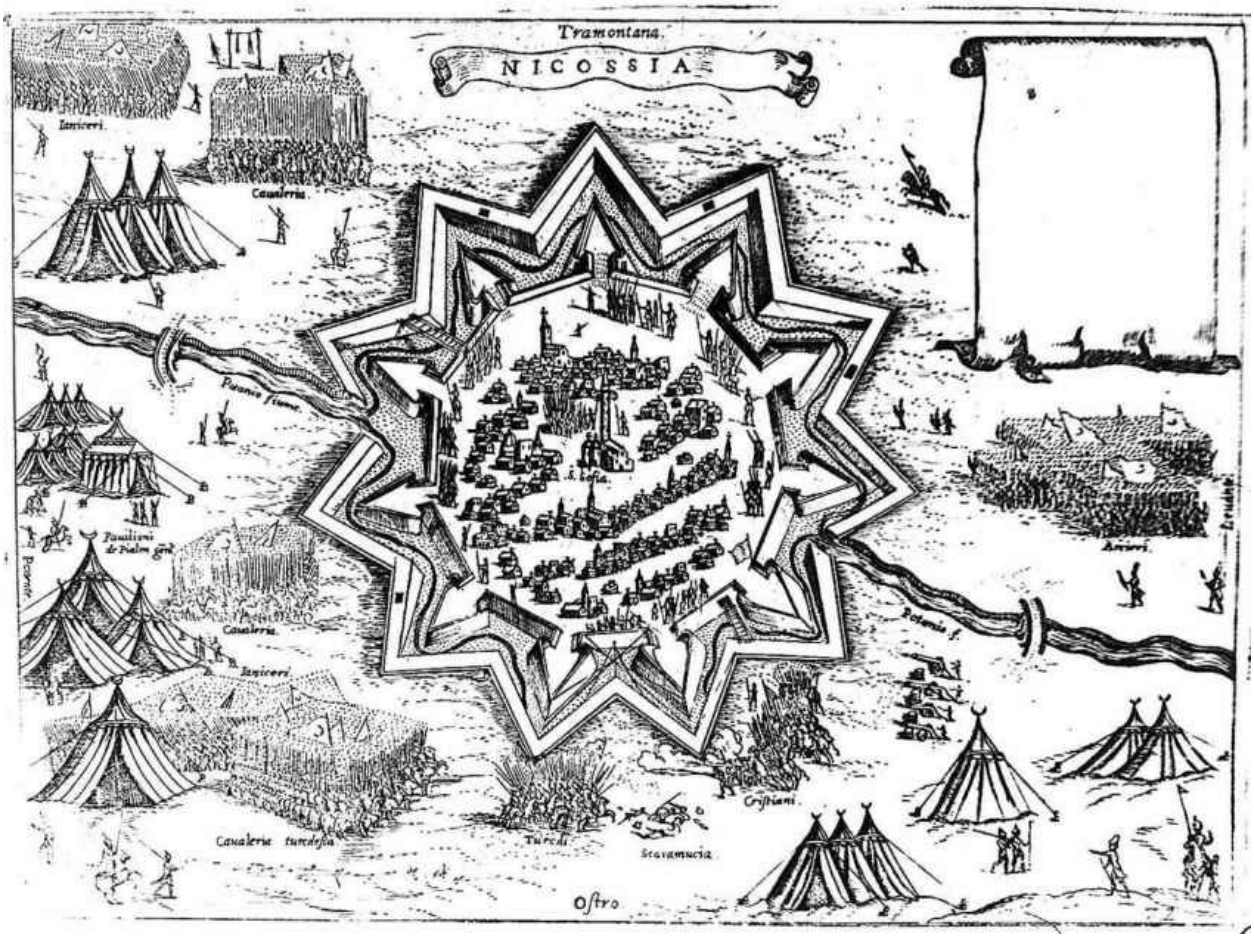
对于菲利普二世的提案，威尼斯无法接受，尤其是舰队总司令的人选，如果是吉安德烈亚·多利亚，势必会遭到整个共和国议会的反对。谈判因此触礁。

可是就在1570年6月，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60艘加莱战船，再加上满载着陆军的大帆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塞浦路斯岛的海面，登陆的士兵高达10万人，总指挥是苏丹的大臣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 Pasha）

被迫迎战的塞浦路斯守军，包括500希腊兵在内总共才4000人，剩下就是当地的居民。威尼斯派出先遣舰队携带补给物资，成功在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登陆。与此同时，政府下令130艘加莱战船在副帅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Sebastiano Venier）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港。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指挥官马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也接令，率军火速前往科孚与韦尼耶的舰队会合，共同商议作战计划。

8月4日，两支舰队在科孚岛汇合。然而在南下亚得里亚海的途中，感染上传染病的船员们不断死去，根本不可能前往塞浦路斯岛和土耳其大军作战。

这时候，同盟结成的谈判一拖再拖，迟迟未有结果。教皇频频催促西班牙赶紧出兵，教廷舰队总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亲自前往威尼斯做说服工作。但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威尼斯一方也坚决不答应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



塞浦路斯岛首都尼科西亚

面对意志坚定的教皇，不能再敷衍的菲利普终于下令让吉安德烈亚·多里亚率舰队往东。可是当他们抵达克里特岛斯达港，与威尼斯舰队会合之后，吉安德烈亚对教皇任命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大为不满，并且以威尼斯舰队目前状况无法在月底前行动为由，不肯继续东行。

包括西班牙舰队在内，当时的斯达港聚集了180艘加莱战船、12艘加莱赛战船，足以对付正在包围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海军。或许是接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密令，吉安德烈亚按兵不动，而另一方的威尼斯舰队的确也因为传染病的蔓延大大削弱了战斗力。

千方百计找到克里特岛居民充当划桨手，总算凑齐了人数的联合舰

队，在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岛不久，便闻讯塞浦路斯岛的首都尼科西亚沦陷。从9月8日土耳其大军登陆算起，尼科西亚苦苦支撑了三个月，参加护城战的所有威尼斯贵族都壮烈战死。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岛近百年，如今除了最大港的法马古斯塔之外，全部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

尼科西亚沦陷的消息，使得原本就互不信任的联合舰队成员间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威尼斯的指挥官们主张哪怕塞浦路斯不保也必须狠狠教训土耳其，而另一方的吉安德烈亚却表示不会为了所谓的荣誉而战。至10月，相持不下的双方终于决定，由马可·奎里尼率领21艘加莱战船，再加上2500名士兵，前往法马古斯塔救援，其余舰队向西返航。马可·奎里尼的援军，途中受到海盗乌鲁齐·阿里（Uluj Ali）指挥下的土耳其机动舰队的阻击，终究没能接近法马古斯塔。

1570到1571年的冬天，联合舰队的三方轮流在威尼斯、罗马、马德里，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以下4点：

一、总司令的人选

二、副帅的人选

三、同盟军的战略目标

四、经费中各国的负担比例

威尼斯坚决反对西班牙推荐的吉安德烈亚·多里亚，西班牙也不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而对于教皇提出的折中人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行。

让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出任副手，威尼斯和西班牙倒是没有特别的异议。不过，考虑到万一总司令有个三长两短，副总司令会立即补缺，两国对这位誉满天下但没有海战经验的陆军将领还是不放心。于是增加了一条补充条件，如果柯隆纳代任总司令一职，所有作战计划都必须和另外两国的指挥官协商后才能决定。

在选定战略目标上，情形又回到普雷韦扎海战的当初，西班牙依然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还是不肯让步地坚持重心应该放在东地中海。威尼斯政府的代表表示，如果无法在东地中海狠狠打击土耳其，威尼斯舰队绝不前往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代表也不示弱，回应说那年内就不可能组成联合舰队。

威尼斯国内一致认为，既然国家已经承担下同盟军的主力，就没有理由帮助菲利普二世去和法国国王争夺领土。因为那个时期，法国也很露骨地表现出他们对阿尔及尔的野心。

同盟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对手土耳其反倒通过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打探威尼斯和谈的可能性。威尼斯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放弃没有信誉的西班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才是上策。“十人委员会”为此专门派遣密使去君士坦丁堡，探究土耳其宫廷的真意。怀疑威尼斯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的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急速赶往威尼斯，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极力宣扬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的种种不利。其实，没有柯隆纳的劝说，威尼斯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也很清楚，解决国家危机，最终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进入5月之后，同盟谈判的各项条款终于出炉。

总司令人选最终由西班牙推荐的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出任。时年26岁的唐·胡安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即菲利普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战场经验仅限于镇压西班牙境内摩尔人的反叛，对海战更是白纸一张。威尼斯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再坚持下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无论如何，唐·胡安好过吉安德烈亚·多里亚。

在前述的附加条件之下，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担任副司令。他还兼任教廷舰队的总司令。

威尼斯舰队的统帅是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参谋长由生性冷静的海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担任。另一方的西班牙舰队，司令官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参谋本部也全是菲利普二世的心腹。

战略目标最终没有确定。不管是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土耳其主力海军出现在哪，就在哪交战，后续行动待海战后商议。联军集结地决定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Messina），那里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西班牙负担经费的11/18，威尼斯负担7/18。1571年5月25日，盟约签订。

此时的法马古斯塔，依然在苦苦支撑。但威尼斯的补给船因为遭到土耳其舰队的封锁，始终无法靠近。乌鲁齐·阿里指挥的土耳其舰队甚至还袭击了克里特岛的各个港口，不仅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也危在旦夕。另一边，土耳其陆军向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等威尼斯的基地不断地发起攻击，联合舰队的出征，成了威尼斯眼前唯一的希望。

勒班陀海战

威尼斯舰队最早抵达墨西拿。教廷旗下的战船也在6月初完成了准备，等总司令柯隆纳到达后，即可出发前往集合地。

根据协议，教廷旗下的战船应该由威尼斯提供，了解威尼斯窘迫的教皇庇护五世改向托斯卡纳大公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12艘加莱战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作为君主国再生的佛罗伦萨认为这是一个向教皇

卖人情的绝好时机，于是答应提供舰队所需的船只和士兵。这支满载着身穿华丽骑士服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名门子弟的船队，从里窝那（Livorno）出发，经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港之后，于7月初到达墨西拿。

一直令威尼斯人忐忑不安，不知会不会出现的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并没有爽约。他跟随多里亚指挥的舰队从西班牙出发，先在热那亚稍作停留，然后前往那不勒斯，从那里走海路到达了墨西拿，时间是8月23日。

各国舰队全体到齐。地中海夏末阳光照耀下的墨西拿港湾，布满了威风凛凛的战舰。除去非纯粹用于战斗的帆船，各国的加莱战船数量如下：

西班牙舰队：西班牙、马耳他——17艘

那不勒斯、西西里——36艘

热那亚——22艘

共计75艘

罗马教廷舰队（包括非属西班牙的意大利诸国）：23艘

威尼斯舰队（包括6艘加莱赛战船）：110艘

共计：208艘

即使扣除了托斯卡纳大公援助教廷的那一部分，数量还是与当初西

班牙负担11/18，威尼斯负担7/18的约定相差甚远。这一次，照章办事的依然是威尼斯，违反协定的依然是西班牙。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没资格指责西班牙。威尼斯船虽多，兵力却不够。除了大批人死于传染病之外，也没办法动用留在本国待命的5000人，因为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亚得里亚海，正不断地攻击达尔马提亚沿岸的港口，靠少量的船舰去接人，恐怕不敌土耳其海军，但倘若抽出大量的战船，又会耽误联合舰队从墨西拿出港的时间，反倒成全了菲利普二世的心意。

左右为难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不得不接受唐·胡安的建议，允许西班牙的战士登上他的舰船。其实，威尼斯很担心士气不协调，不要说是西班牙人，就是那些西班牙旗下的意大利士兵，威尼斯都不愿意接受。然而，要武装起110艘加莱战船和体积更庞大的加莱赛战船，光靠不足1万的自己人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他们只能和4000多外国兵同舟共济。

包括划桨手在内，据称有5万兵力的联合舰队中，西班牙人占了两万，威尼斯人一万，其余都是外国军团，其中包括880名德国人，以及多名法国出身的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员。

出发前必须决定阵型，为此联合舰队在墨西拿岛上连日举行作战会议。如果舰队不按照既定的阵型航行，等遇上敌情再布阵，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总司令唐·胡安一反传统按国籍划分阵型的做法，将各国的战船混编在一起。这是为了防止相互猜疑和憎恨的威尼斯与西班牙士兵之间爆发纷争，让各国并肩作战有助于加强凝聚力。

按惯例帆船队先行，6艘载有大炮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紧跟其后。全军分为三个编队，右翼前锋是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多里亚旗下的53艘加

莱船，另外再加上24艘威尼斯加莱船、两艘萨伏依公国（Ducato di Savoia）的船以及数艘教廷的战船。位于阵型中央的当然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的旗舰，右边是教廷舰队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的舰队，左边是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的舰队。主力舰队的后面，是由那不勒斯圣·克罗齐侯爵（Santa Croce）指挥的35艘战舰。这支由威尼斯、教廷、西班牙混合组成的机动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当某一个侧战线出现问题时，可以随即赶去增援。

最后出港的是位于阵型左翼的后卫舰队。由威尼斯舰队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除了两艘那不勒斯船之外，其余的51艘均为威尼斯的战船。

所有战船于9月28日离开了墨西拿港。

从8月23日唐·胡安抵达墨西拿直到出发的这1个多月里，其实也是风波不断。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们一直主张出征应该延长至翌年的春天，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不适合航行。威尼斯人对此当然是坚决反对，教廷舰队也不答应。最后，还是唐·胡安在9月12日一锤定音，下令出发。得知此事的菲利普二世急忙写信给兄弟要他谨慎行事，但国王的信抵达墨西拿时，舰队已经出海。威尼斯就是从那时候才发现，唐·胡安这位对大海一无所知的年轻贵公子，其实是一个意外之宝。

激战

从墨西拿港出发的联合舰队绕过位于长靴型意大利靴尖处的卡普利亚地区，进入伊奥尼亚海。之后，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穿过亚得里亚

海的出口，经科孚岛，到达希腊的西海岸。在这里，他们听说法马古斯塔于8月18日陷落。

塞浦路斯岛最大的港口，在拼死苦战4个多月后，终究还是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守城军指挥官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被活生生剥皮，再浸泡到海水中，惨绝人寰，其余的威尼斯贵族也全部死于酷刑。噩耗不仅让威尼斯人义愤填膺，整个舰队都燃烧着向土耳其复仇的怒火。

没过多久，侦查船便送来报告称，土耳其舰队停泊在勒班陀。闻讯后联合舰队随即向南航行，经普雷韦扎海湾，穿过凯法罗尼亚岛与奥德赛岛（Odysseus）之间的狭窄海域，来到通往勒班陀的帕特雷斯湾的入口处。

联合舰队在此举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由于报告称敌军的船舰数量多于他们，多里亚以及其他西班牙的参谋们再次提议撤退返航，但柯隆纳和威尼斯的将官们主张开战。延期派与主战派各持三票，最终，总唐·胡安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1571年10月7日。黎明之前，联合舰队的战舰堵在帕特雷斯湾入口，开始排兵布阵。前锋在右翼，主力在中央，后卫在左翼。呈半月形的阵型左右侧分别由两位最富经验的战将把守，左翼是巴尔巴里戈，右翼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6艘加莱赛战船，平均两艘分给三组编队，位于加莱战船的前方。一旦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喷出火焰，便是战争开始之时。

另一方的土耳其舰队，此刻正离开勒班陀，转向帕特雷斯湾的出口。统帅阿里·帕夏决战到底的决心一点儿不输给联合舰队的唐·胡安总司令。土耳其舰队的右翼，是由绰号为“热风”的海盗夏拉克指挥的53艘战船，对阵联合舰队的左翼；中央是统帅阿里·帕夏率领的94艘主力舰，意大利出身的海盗乌鲁齐·阿里指挥65艘战舰位于左翼，对阵多里

亚指挥的联合舰队的右翼。

相较于联合舰队的208艘战舰，总共有212艘战舰的土耳其舰队在数量上处于优势。这正是阿里·帕夏敢从安全的勒班陀离开的原因。当然，战无不胜的土耳其舰队也没把基督徒放在眼里。

就在联合舰队布完阵型，土耳其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之际，唐·胡安走下旗舰，换乘快速船，从一排排列队的舰船经过，大声鼓舞着将士们的斗志。贵公子一身华丽的铠甲，在秋日的阳光下光彩夺目，军心为之振奋。

临近正午，当两军接近到炮弹射击范围时，所有的战船都降下旗帜，唐·胡安的旗舰上高高地升起了带着耶稣画像的旗帜，不用说，这是教皇赐予的祝福。紧接着，各艘船都升起了十字架，全体士兵跪在甲板上祈祷，在胸前画着十字，向上帝忏悔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也算是一支十字军。教皇许诺将给全体讨伐异教徒的战士特别的赦免。也许这个瞬间，正是反抗宗教改革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所有人都放下了心中的杂念，唯有满腔的斗志。

当两军接近到只有一海里的距离时，6艘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同时开火，历史上加莱战船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勒班陀海战正式打响。

400艘加莱战船激烈冲撞的海战，最终由基督教联合舰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舰队，一直将海盗夏拉克指挥的右翼逼到浅海，经过几轮激战，成功地全歼敌军。

总司令唐·胡安指挥的主力舰队，虽然是借了预备军之力，才打乱了敌人的阵型，但最终还是成功抢占下对方的旗舰，统帅阿里·帕夏战死。惨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之后，从左翼到中军纷纷升起了胜利的

基督教旗帜。

然而，吉安德里亚·多里亚的表现，给原本完全的胜利抹上了一道败笔。他的舰队应该从右侧封杀敌军左翼，不知为何却绕到对方的背后，土耳其舰队的左翼在指挥官乌鲁齐·阿里巧妙的指挥之下，成功地撤离了战场。不过，乌鲁齐旗下的65艘战船也没能完好无损地全身而退。多里亚舰队中的24艘威尼斯战舰和另外几艘意大利船，无视指挥官的命令，冲进了撤退中的敌舰群，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不管怎么说，多里亚的错误，使得联合舰队最终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一些历史学家将此解释是菲利普二世一直在暗中策反乌鲁齐·阿里倒戈，接收国王密令的多里亚，存心放了他一条生路。

当然，基督教联合舰队无疑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捕获敌舰117艘，70艘损失严重的战船被烧毁，俘虏超过万名。土耳其舰队阵亡者高达8000人。

在战死的土耳其人中包括统帅阿里·帕夏、身负重伤两天后死亡的右翼指挥官“热风”、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团长，以及希俄斯岛、内格罗蓬特、罗德岛、纳夫普里翁、莱斯博斯岛的诸位总督。海盗同样死伤惨重，“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儿子也难逃一死。除此之外，统帅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和多名土耳其宫廷的高官被捕。大量在土耳其船上带着锁链划桨的基督徒奴隶也因为勒班陀海战的胜利而重获自由。

话说回来，基督教一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阵亡者超过了7500人，仅威尼斯人就有2500。包括因重伤不治在翌日身亡的左翼舰队指挥将官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内，有26位威尼斯贵族战死，他们几乎都是战船上的船长。在这次战争中，威尼斯人可谓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当带着捷报的船只拖着土耳其海军的战旗，进入威尼斯港口时，掀起一片欢呼的声浪，这是威尼斯市民久违的欢呼。

虽然威尼斯人既不是狂热的教徒，也没有种族歧视，但政府仍然担心人们控制不住情绪而去袭击土耳其人，于是特地把土耳其人收容在一个宫殿内，外加警卫防守，结果这成了日后建立土耳其商馆的契机。

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带给欧洲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彻底消灭土耳其海军，他们反而在乌鲁齐·阿里的指挥下大干快上，在翌年又重新组建起一支超过160艘战船的大舰队。但勒班陀的胜利，用事实证明无敌的土耳其海军，并非战无不胜，基督教世界一扫长期以来面对土耳其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上的正面影响，绝对不能小觑。

如果是土耳其赢得勒班陀海战，或者联合舰队像普雷韦扎战役时那样未战先散，欧洲人势必会输掉整个地中海。总司令唐·胡安的不辱使命和成千上万壮士们的热血，阻挡下了土耳其的步伐。

勒班陀以后

一旦形势有所转机，通常人们都会想到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海战前结盟的困难相比，海战后大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盟内的整合相对容易。

首先，所有人都认定唐·胡安是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对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继续担任副总司令，也没有异议。

由于各国均分到了缴获的土耳其战船，经费短缺的问题迎也刃而解。在缴获的117艘船舰中，西班牙获得59艘，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各有27艘，剩下的则分给了萨伏依公国、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等。当年的冬天，各国都忙着修理缴获的战船，既没有造新船的时间，也没有这

个必要。海战前手头窘迫，不得不找托斯卡纳大公帮忙的罗马教廷，如今也成了拥有27艘战船的海军国家。

威尼斯因为有大批土耳其俘虏，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过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之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的效率极高。根据当时一位舰长的记录，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人，其次就是奴隶，这些人比不习水性的北意大利志愿兵好用很多。

面对海战后的种种良机，威尼斯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向唐·胡安许诺了摩里亚（Morea）的王位，打算以实质性的东西，继续激发这位贵公子的才能和热情。摩里亚是当时伯罗奔尼撒的名称，其大半的领土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把敌人的国土当作礼物听似荒唐，不过只要有一支像样的陆军队伍，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倒也不是不可能。唐·胡安对此相当心动。

唐·胡安作为勒班陀海战的英雄，尽管声名大噪，但毕竟是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同父异母的兄长菲利普二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海战之后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威尼斯提出的摩里亚的王位，对唐·胡安应该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时间刚转到1572年，他就立即通知同盟军开往墨西拿。

只是一谈起舰队的目的地，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像之前一样势不两立。西班牙主张前往北非打击海盗，威尼斯则坚持应该去东地中海歼灭土耳其舰队。唐·胡安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先帮助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占领据点，替代失去的塞浦路斯，但没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首肯。紧接着，唐·胡安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首先在春季由西班牙舰队单独进攻阿尔及尔，5月之后再转向东地中海。结果国王那里还是没有回音。

此时，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了100艘加莱战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新任参谋长索兰佐（Soranz）率领25艘加莱船前往墨西拿去迎接总司令唐·胡安。与此同时，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书率

领13艘教廷战船正南下墨西拿；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36艘所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的舰队，也从那不勒斯出发驶向墨西拿。前往集结地的另外还有两艘马耳他的战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麻烦比前一年少了许多，没有人对联合舰队的第二次出征提出质疑。

在作战会议上，唐·胡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圣·克罗齐，以及代替在科孚岛待命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出席的威尼斯参谋长索兰佐等各国将领，决定将出港日定在6月14日。可是，5月1日教皇庇护五世的去世，却在这时给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舰队出发的两天前，唐·胡安突然宣布战事无限期延期。大为震惊的柯隆纳和索兰佐向其追问理由，刚开始唐·胡安不肯作答，后来架不住众人的相逼，含含糊糊地承认是菲利普二世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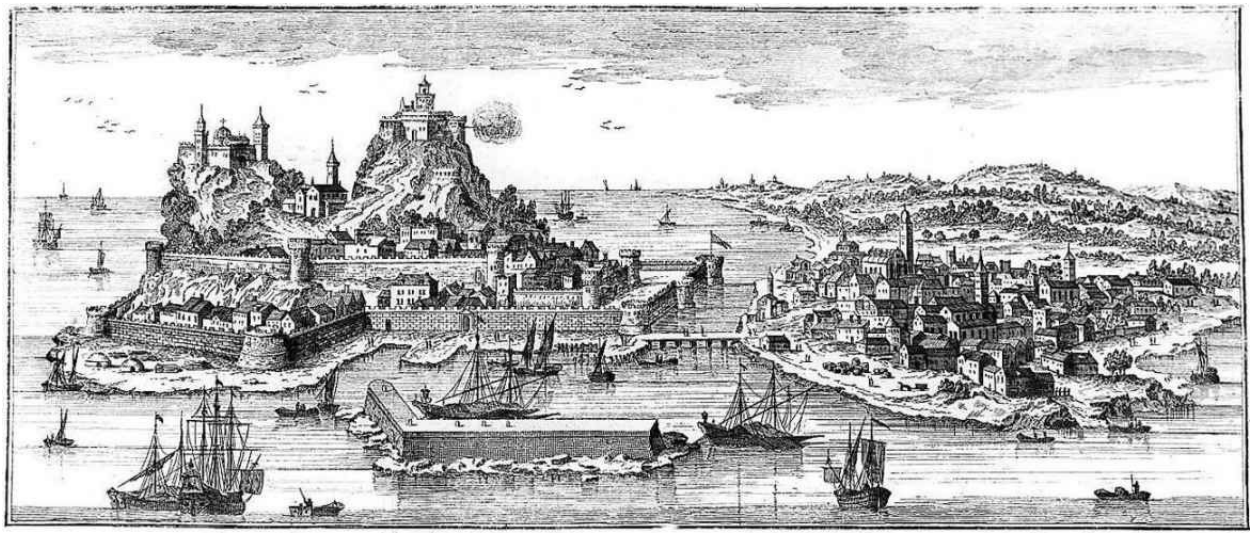
唐·胡安本人似乎也不是很了解菲利普二世在此时叫停战争的真意。唐·胡安答应提供9艘西班牙战舰，由柯隆纳带领威尼斯等舰队前往东地中海，自己则留在墨西拿，为攻打阿尔及尔做准备。柯隆纳嫌9艘船不够，希望唐·胡安能借给25艘。他很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对西班牙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靠他们自己争取。在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唐·胡安最后同意提供22艘加莱战船、1000名西班牙士兵和4000名意大利士兵。

22艘西班牙战船、12艘教廷战船（扣除1艘坏船）、索兰佐带来的25艘威尼斯战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总共有134艘，再加上从克里特过来汇合的船队，就是一支超过140艘的加莱军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规模不比勒班陀，但足以对付土耳其海军。最后，众人决定留下调集士兵上船比较耗时的15艘西班牙战船，其他船只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斗敌的机会。

7月15日到达科孚岛的舰队，与在那里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会合之后，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的前端，改向东航行。这时，传令船赶来报告称，唐·胡安率领剩余的船只已经离开了墨西拿，原来菲利普二世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柯隆纳与将军们商量，该返回科孚岛等待唐·胡安还是继续前行。

威尼斯方面担心已经出发的舰队再折回根据地，军心有可能涣散。毕竟科孚岛在设施和安全上都好过西西里岛墨西拿。不想错过机会的威尼斯海军主张继续东行，柯隆纳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决定让传令船去给唐·胡安送信，让其追赶大部队。

8月4日，舰队抵达威尼斯属地的开俄斯群岛。在那里，他们闻讯乌鲁齐·阿里指挥的160艘土耳其战舰出现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附近。从开俄斯群岛开往玛尔维萨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基督教联合舰队迅速决定下开战的阵型。这一次还是采取了勒班陀海战时的混合阵型，由于威尼斯战船占多数，所以以三艘威尼船和一艘西班牙、一艘教廷船相配的形式。位于中央的主力舰队是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和西班牙舰队司令唐·安德烈亚德，左右翼的指挥官分别是威尼斯舰队的参谋长卡纳莱和索兰佐。



科孚岛要塞

乌鲁齐·阿里似乎觉察到基督教联军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里久久不肯出来，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但他们很明显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策略，零星打斗之后，乌鲁齐·阿里再次带着舰队撤回了玛尔维萨。这次冲突，土耳其损失较大，失去了7艘加莱战船。

这时候，一直是主战派的柯隆纳突然改变了主意，称唐·胡安应该已经抵达科孚岛，舰队也该撤回那里或者附近的海域。乌鲁齐·阿里从事海盗业多年，对地中海了如指掌。如果他想避开联合舰队的监视，带着56艘战舰抢先一步去攻打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舰队得赶紧撤回与总司令会合。虽然威尼斯的将官们极力反对，但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是罗马的贵族，像他那样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而言，所谓的合议制，不过是君主在拿不定主意时征求一下意见用的。一旦主子心意已定，下人唯有服从。威尼斯不得不听从柯隆纳的命令，往科孚岛方向撤离。

离开开俄斯群岛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群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到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舰队只好继续北上，在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是与唐·胡安及其舰队相遇。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怪舰队没有在科孚岛等他，扬言要治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唐·安德烈亚德于死罪，甚而要求威尼斯像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登船。威尼斯方面不肯从命，辩解说勒班陀时因为人手不足，才允许西班牙士兵登船，情有可原，现在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威尼斯的拒绝是有充分理由的。勒班陀海战时，总司令官唐·胡安与时任威尼斯舰队总司令的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而且因为某次事件两人公开翻脸。

当时，威尼斯因为战斗力不足，不得不允许一部分西班牙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作战。但这些西班牙士兵并不买威尼斯舰长的账，韦尼耶担心影响战斗，于是杀一儆百，将6名最不听话的西班牙士兵吊死在桅杆上。唐·胡安对事前没有报告便自作主张杀了自己手下的韦尼耶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他出席作战会议，换由后来在海战中战死的指挥左翼的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代替。

虽然韦尼耶的举动遭来司令官的勃然大怒，但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打那次事件以后，西班牙士兵便对威尼斯舰长唯命是从，再也不敢胡闹了。

由于威尼斯政府当时希望乘勒班陀胜利之势，一举歼灭土耳其海军，最终还是换下唐·胡安不喜欢的韦尼耶，改由性格温和的福斯卡里尼出任司令官。司令官可以换人，但军心不能被搅乱。为了防止两国士兵间再出现冲突，威尼斯方面这一次坚决拒绝了唐·胡安的要求。

唐·胡安这一次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为了彰显尊严而感情用事。司令官和威尼斯之间的矛盾，让夹在中间的柯隆纳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双方决裂，他最后提出了让其麾下教廷的士兵移到威尼斯战船上，再让西班牙士兵登上教廷的舰船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因士兵大移动，白白地浪费了10天的时间。之后虽然舰队出征前往希腊海，但由于乌鲁齐·阿里的巧妙躲避和天候不佳，他们没有遇见大战的好机会。在零星地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舰队又重新返回科孚岛。

10月20日，联合舰队正式解散。唐·胡安率领西班牙舰队返回墨西拿，柯隆纳带着教廷舰队也离开科孚岛前往罗马。尽管菲利普二世向教皇承若，下一年会派出更强大的舰队，但威尼斯完全不相信西班牙国王的保证。

无力回天的威尼斯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指令，正式开始谈判。1573年3月7日，停战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一直相信威尼斯会继续抗战的西欧诸国同声谴责威尼斯的背叛行径。

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然而，热衷于结盟的法国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遭到千夫所指。法国和土耳其约定，在法国陆军向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西班牙将会派遣300艘加莱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前往地中海，从陆海两地夹攻西班牙。和西班牙一样，法国也看中了阿尔及尔。为了达到目的，法国人不惜使用离间计，让威尼斯与西班牙反目。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赴任途中，竟然在威尼斯停留了两个月，引发西班牙的不信。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也受政府指示，积极地拉拢威尼斯加入对抗西班牙的阵营。

但地中海世界的形势容不得威尼斯与西班牙为敌。他们不会愚蠢到自掘坟墓，去加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实则高度危险的同盟。威尼斯人只希望与土耳其谈和，他们以半年前发生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为理由，巧妙地躲过了法国人执拗的劝诱。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对于法国人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结果证明，威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夹攻西班牙为目的而结成的土耳其——法国联盟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法国侥幸避开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非难。而威尼斯由于想法与行动过于实际，反而遭到各国的厌恶。

正如前文“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中所述，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在经济面经受住挑战，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君主制大国纷纷崛起，国家外交及军事靠力量和数量说话的大背景之下，威尼斯饱受了资源贫乏者的无奈和悲哀。

“所谓强国，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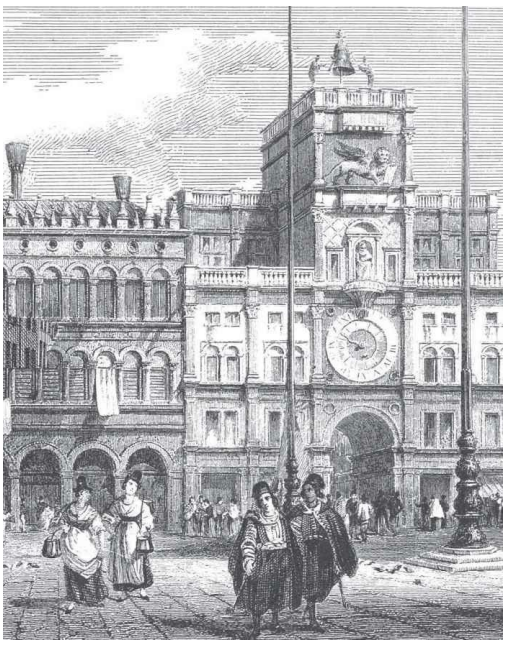
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本章节开头引用的索拉佐大使的这段话，道尽了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直面的现实。

---

[1]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17世纪初期，外交官兼历史学家的保罗·帕鲁塔（Paolo Paruta）在其著作《论成熟的政治生活》（*Della perfe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是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君主国或共和国将国家目标锁定于军事活动，不断重复战争，热衷扩大版图的行为，绝不是达成目标的途径。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靠征服众多的他国国民，而在于能否以正义统治自己的国家，确保国民的和平与安全。"

完全是无懈可击的论述！

比保罗·帕鲁塔早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政治生活的终极目标，在于个人、国家和权力。"短短的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政治的认

知，发展“成熟”至此，真是不可思议。而那些通过与大海结婚的祭典，将海洋占为己有的威尼斯人，在17世纪时变身为家庭主义者，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威尼斯人保罗·帕鲁塔的想法，那么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所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而且能成为超越时代的政治哲学的经典，是因为他不是在论述理想，而是要揭开现实的真面目。17世纪的威尼斯，也许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到达了期望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的心境，然而，其他国家正处于勃勃成长、一心一意向成熟迈进的状态，这对威尼斯何其不幸。单方面提出和平宣言，和平是不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17世纪是巴洛克时代，也是西欧君主制国家全盛的世纪。虽然西班牙进入了衰退期，法国却迎来了路易十四的时代。英国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之后，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奥地利帝国控制了匈牙利。俄罗斯起步稍晚，但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出现，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打下了根基。

巴洛克时代的欧洲是树立王权统治的时代，也是战争不绝的世纪。尽管西欧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陆，但是在这样一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提出和平宣言的威尼斯终究无法逃避战争。17世纪的威尼斯人被迫在战争中度过了一个世纪。

对抗教廷

威尼斯在17世纪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与罗马进行的。虽然双方并没有动刀动枪，却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威尼斯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战争。

进入17世纪之后，在前一个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处于守势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开了近乎疯狂猛烈攻击。监狱里充斥着被视为异端的囚犯，女巫审判的恶行让那些虔诚无比的基督徒们都心生厌恶。

在以耶稣会（Societas Iesu）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观念里，那些与他们信仰迥异的人们的灵魂是迷失的。要将这些不幸的灵魂从恶魔的手掌中解救出来，靠近上帝，只有鞭挞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相信，这正是自己作为基督教战士的使命。

然而，这种身负使命感的人们的残暴行为往往比普通人来得更彻底，更持久。为了防止卷入这场肆虐西欧的危险风暴，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慎重且强韧的对策。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尽管同属天主教，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权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长期以来一直位于潟湖边缘的格拉多。从那里行船到威尼斯本岛，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虽然1451年主教座堂迁移至本岛，但被禁止设在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附近，而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国有造船厂、帆布工厂林立的城堡区，即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会场（Biennale di Venezia）的所在地。

像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动的大主教从其主教宫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几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举行活动都得像出差一样，从大老远的郊外进城。圣马可教堂作为祭典威尼斯守护圣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属于元首个人的礼拜堂，实际上则是威尼斯全体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罗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是多么不乐意让教会势力的大本营放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威尼斯还有一项异于其他国家的规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

是神职人员，教皇也不能随意任命。主教或枢机主教的人选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选人名单，教皇只能从这4人中挑选一位。这是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职人员利用天主教会的威信和权力做出背叛祖国的行动。威尼斯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在中世纪时巧妙地躲过了席卷欧洲的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谨慎小心挑选高级神职者的威尼斯政府，当然是更不会让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触民众的神父了。在被称为“Parrocchia”的教区中每区都有一位神父，他们是由教区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罗马教廷时常会以信仰的虔诚度不可信为由，对这种选举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议，威尼斯政府对此向来是置若罔闻。自12世纪开始启用的行政区（Contrada）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出任行政区的长官均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区至代替教区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神父影响力的扩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离。

在当时，宗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相当普遍，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宰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门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当选为主教或枢机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员绝对无法靠近权力的核心。这项硬性规定因此也出现了副产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敌为枢机主教的获选人，如果运气好恰巧被教皇选中，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对手赶出政府的核心组织。

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教会财产不免税，必须缴纳税金。顺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冈在意大利境内的不动产依然需要缴税。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将教会财产立为课税的对象，而且用法律来限制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团体中擅长经营的人似乎不少。他们既懂得运用现有的资源，又会开拓新渠道，教会财产始终能保持有增无减的状态。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赠也是很大一笔收

入。

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往往是一个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问题。向帮助穷人的教会捐献善款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离的立场，一个过于富足的教会，并不是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对于仅靠课税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信仰圣马可或圣洛可等被称为“大会堂”的6个慈善团体，以及各自拥有守护圣人的职业工会，吸纳了大部分的捐款。为了进一步抑制教会的经济增长，威尼斯本国很早便出台了限制教会扩大不动产的法律。

不过这条法律并没有在意大利内陆本土的行省实施。也许是因为与浮在海上的本国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积相对宽裕，所以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既然没有必要性，这类刺激教廷的神经的事情自然是不做为好。

然而，以17世纪为界，行省教会的土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16世纪初期开始，威尼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海上贸易一边倒的模式逐渐转向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发展。到17世纪时，农业已经成为威尼斯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包括国政在内，威尼斯人从事任何事业，向来是秉持着经营私人企业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农庄经营也不例外，他们在行省的那些农庄有着很高的生产量，即使到了17世纪，威尼斯人在企业化上的天赋丝毫也没有衰退。

眼看着威尼斯人的农庄办得红红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属的农庄自然不甘落后。这些教士们原本就有经营的头脑，依样模仿对他们实

在不是什么难事。不用多久，他们的农庄便发展到与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威尼斯人无法比的优势，他们可以信徒捐献的形式进行“增资”。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对手，仅从经济面考虑，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严肃对待，更何况还有影响政治的问题。于是，威尼斯政府决定，在行省也执行与本国同样的法律，行省教会扩大不动产的行动因此受限。然而，这条法律挑动了罗马教廷的神经。这就是1606年教廷对威尼斯所发动的“战争”的真正原因。

想要彻底的贯彻政教分离，司法独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规定，哪怕是神职者，只要是在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罪行，必须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职人员即使隶属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1603年，威尼斯政府审判行省两名犯罪的神职人员的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既然神职界的犯罪都在本国裁定，世俗界的审判，当然是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当时肆虐整个欧洲的异端审判，也存在于威尼斯。不过与其他国家审判员全部来自神职界不同，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并且规定未经帕多瓦大学法学部的答辩，判决结果一律无效。帕多瓦大学向来以学风自由著称，甚至聘请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挤的人物担任教授。以这种形式进行审判，结果自然不会让主宰异端审判的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满意。在威尼斯从未出现过女巫审判，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启蒙主义者发出赞赏，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主义或主张，而是1000年来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体质”而已。

威尼斯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与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谙与信仰不同的人们共存共荣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国内，无论是出入德国商馆的威

尼斯老主顾德国人，还是来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腊人则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期犹太商人也为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他们被准许在威尼斯境内居住，参与威尼斯企业的经营，在新旧犹太人隔离区内（Ghetto）自由地举行犹太教仪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馆为大本营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在威尼斯也从来出现过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这种“体质”，不仅给当政者们建立政教分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地基，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业的兴隆。因为只有在包容异己的大环境中，才会产生言论的自由。

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笔下那些丰腴的裸体画，在威尼斯深得人心，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去做什么修饰。而在同时期的罗马，米开朗基罗的耶稣裸体画的局部被水蓝色颜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处都被刻意地盖上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绚丽多彩、自由奔放的罗马，如今笼罩在非黑即白、严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下。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个异数。

威尼斯人并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为业，但凡坐过帆船或渔船遭遇过风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涛怒海中的无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时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着许多朴素的画作，它们都是人们在平安渡过灾难之后，为感谢上帝而捐献的，名为“感谢恩赐”。在捐画人中，渔夫、水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这显现了陆地上的人们与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风貌。

威尼斯人对宗教界最高领袖的教皇其实并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们一贯反对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纪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海上改为陆地，但这个立场依然不改。然而，当时的罗马大权掌握在以耶稣会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内部也到处是坚决排斥异己的人物。

有一次，罗马的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曾

经对威尼斯大使莱昂纳多·多纳（Leonardo Donà）说："如果我是教皇的话，一定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话，会对这个处置一笑了之。"

1605年，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成了教皇保罗五世。翌年，大使莱昂纳多·多纳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这两位都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男人。

在多纳就任元首三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国下达了全面禁止圣务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违反天主教会的法律，自作主张地审判了两位神职者，以及颁布法令限制境内的教会增长财产。

"禁止圣务"（Interdett）是破门前的一种处罚，教皇禁止辖下的神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所有仪式。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坚持主张世俗间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应服从于任何权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圣务有违教会法的抗议信。威尼斯人观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相信政教分离绝对没有有违背耶稣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内的所有教会照常进行圣务，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

在威尼斯本国，除了所属耶稣会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在内陆本土却遭到了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动警察来强行举行弥撒。耶稣会被赶出了威尼斯境内，所属人员禁止从事传教活动，直到半世纪之后的1657年，他们才被准许回到威尼斯，但传教活动则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复。

强势的罗马教廷似乎也没料到威尼斯会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让他们以为可以再一次组成康布雷同盟，西欧各国齐心

协力以军事行动对付威尼斯。然而，经历过宗教改革的1606年，与1509年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是各国对此的反应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据地，当仁不让地站在教廷的一边，但英国、荷兰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暧昧的态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着要派遣军队远征威尼斯，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武的能力。

针对教皇禁止圣务的惩罚，威尼斯在采取形而下的应对的同时，也堂堂正正地展开了形而上的神学理论论战。主持辩论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前启蒙主义者之称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其稍后出版的著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历史》中，他对1545——1564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的引发反宗教改革派卷土重来的宗教会议进行了批判。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萨尔皮为共和国顾问，并支付定额的薪水，让他负责神学论战。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应付，神学上的问题还是请这个领域的专家出马比较有利。保罗·萨尔皮是当时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里多托·莫罗西尼”的常客。“里多托”是威尼斯方言，意为沙龙，设在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安德烈亚·莫罗西尼的宅邸，因此称得名。“沙龙”的聚会上，经常能见到元首多纳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持续了一年的禁止圣务的处罚，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许是因为呼应了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主义运动，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非常关注这场威尼斯与教廷的“战争”，对它的解决办法怀着浓厚的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教廷不仅没有能够让威尼斯给神职人员予治外法权和撤回教会财产增长限制令，就连恢复耶稣会在威尼斯境内的宗教活动以及免除保罗·

萨尔皮职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唯一的让步是在对限制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法。只要教会的敛财手段不太过分，政府便不会去深究。事实上，在之后的10年中，这条法律一次也未曾执行过。

时至今日，在西欧依然会经常听到“anticlericalism”一词，如果要翻译的话，大概叫作“反教权主义”。不过，它的含义不同于新教所提倡的信徒应当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奉教皇为至高无上的教廷的主张，当然也有别于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观点。

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观念中，无论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政治与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教廷支配世俗界的问题上，他们与新教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面对新教徒介入政治时，他们立刻又变身为反新教主义。站在反教权主义的角度，这种变化并不矛盾，是首尾一贯的。

耶稣基督在其短暂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话语。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时也最不被后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纪的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浑然不觉。也许是耶稣的继承者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教诲，才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

说到问题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后人不是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只是承认它与其他宗教拥有平等的地位，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原本处于反体制立场的基督教会，一旦被纳入体制内，立刻从被害者摇身一变成加害者，耶稣主张的政教分离的深刻寓意，被彻底地抛在脑后。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中世纪，不知道有多少鲜血以神的名义而白白流淌。消灭异端的公会议、十字军运动以及教皇派与保皇（帝）派之间的恶斗等，均

是不容他者的狭隘精神的体现。而自诩拥有上帝“专利权”的教廷，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会不失时机地强化其对世俗的影响力。宗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狱这个无人能反证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非常懂得巧妙地运用这个利器来增强对善男信女们的控制。在影响民众这一点上，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老手。

将人们从这种窒息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华和运气，但他从来没说过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样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举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职者。主张政治从宗教中独立，认为教廷应该迁往瑞士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但在稍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却因为无视神意的最高权威，其著作被视为恶魔之书。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热的地区都禁止出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罗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将其作品列为禁书。圭契尔迪尼的书籍由于是写给子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逃过了与马基雅维利齐名榜上的一劫。

虽然没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点名，但作为国家，威尼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单上始终“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等反教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威尼斯。在拿破仑拒绝大主教加冕，自己亲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就是由来自世俗界最年长的元首辅助官主持。

在常驻威尼斯的教廷所属机构写给罗马的报告书上，罗列着长长的书名和人名，那些书都是被教皇定为禁书却在威尼斯公开销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国家被怀疑为异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难。

启蒙主义旗手之一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威尼斯存在着与其独断、专制的政治形态（寡头政治）理应毫不相容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绝对自

信。”

也许威尼斯无法孕育出莱昂纳多·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般的人物，但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保障，乃尊重个人自由”的姿态，这是不是很像一位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讨伐海盗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不幸），治国终究不能只靠自由等高尚的精神来支撑。威尼斯与教廷之间因信仰自由而起的“战争”虽然引来了西欧诸国知识界的关注，但当事情解决之后，威尼斯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知识分子们完全没有兴趣的低次元的问题——海盗。

被称为Uskok（难民）的这些海盗，原本并非以此为生。他们是在土耳其攻占匈牙利时逃离家园，躲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山区的。那里是一片没有耕地、树林和淡水的荒蛮之地。

海盗们的根据地在一个叫作西尼亚的贫穷村落，位于威尼斯航船必经的补给港波拉和波雷奇所在的伊斯特拉半岛东部，西望威尼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逃过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生死大事的威尼斯的严密监控，是因为威尼斯的航船在波拉或波雷奇补给之后，下一站会在扎拉或斯帕拉托停靠，位于港湾深处的西尼亚正好成了航线上的一个死角。再加上移居那里的难民多为基督徒，威尼斯因此对他们比较客气。

不过向来对难民、亡命者采取理解态度的威尼斯，却被这群难民海盗弄得有些焦头烂额。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由于找不到其他的生计，索性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干上了海盗的行当，对于同为天主教徒

的威尼斯商船一样毫不手软。和异教徒有生意往来的威尼斯商船，给了海盗充足的理由。

当然，他们也不放过土耳其的商船。由于商船频频受害，土耳其的苏丹特地知会威尼斯政府，称要派舰队前往亚得里亚海为商船护航。

勒班陀海战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和平协议，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各自的近海，由各自的舰队负责防护，并保证对方国家的船只在此海域的航行安全。亚得里亚海可谓是威尼斯的前庭，绝对不能让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派舰队进入。因此，为了向土耳其保证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安全，威尼斯必须对海盗采取行动。

然而，这群难民出身的海盗由于是打着反异端、异教徒旗号的天主教徒，所以从不缺后援。首先是企图合并匈牙利因而与土耳其帝国相争的奥地利，其次是主导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国王辖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他们对海盗除了袭击异教徒的土耳其船只之外，还对被教廷视为异端的英国、荷兰，以及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与教廷保持距离的威尼斯商船下手的行径，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因此，威尼斯要击退海盗，首先得从断绝这些国家对海盗的援助下手。

1615年，以雇佣兵为主力的威尼斯陆军，越过的里雅斯特（Trieste）附近的威尼斯和奥地利之间的国境线，侵入奥地利领地。紧接着，威尼斯舰队向那不勒斯王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发起攻击，以优秀的航海技术在当时逐渐崭露头角的来自英国、荷兰等国的水手也参与了这场战斗，成功地打败了海盗。

1617年，奥地利、西班牙与威尼斯讲和，保证不再向海盗提供支援。那时候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都面临着其他重大问题，没工夫与威尼斯动真格。而另一方的罗马教廷，也在海盗袭击了教廷辖内的安科纳港的船只之后，不再公然支持海盗。教廷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势力都不比奥地利和西班牙，因此只要它保持沉默，威尼斯就无须担心。

不过，断了后援，并不等于能一网打尽海盗。这群最多不超过千人的海盗集团利用巧妙的战术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他们手上只有一些小船，通常只配有6到8支船桨，最大不超过12支，极少有16支船桨的船只。每支船桨配一名划桨手，唯一的一张船帆几乎不用，除非是遇到特别好的顺风。尽管船只落后，但乘船的人数大约是船桨数的3到4倍，每划一小时便做一次人员交替，船速远远快于威尼斯的加莱船，并且长距离航行中也不需要停船休息，据称一昼夜可行驶百海里。而威尼斯的船只，只有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小船不仅受风浪的阻力较小，再加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形错综复杂，还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悬崖峭壁的狭缝之间。遇到情况时，能轻易地撤退至附近的小沙滩上，弃船逃进山中，威尼斯舰船再怎么紧追不舍，也无济于事。负责消灭海盗的威尼斯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在向元老院报告时指出，即使在最适合航海的季节也很难阻挡海盗们的行动，在冬季更是一筹莫展。

非常了解自己力量薄弱的海盗们，绝不进行正面海战。因为一旦开打，威尼斯海军大型加莱战船或帆船上的大炮会把他们轰个稀巴烂。所以，他们始终利用大炮打不到的船身低矮的小船打游击战。那些散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出海口或小岛边上，等待顺风或补充淡水的商船都是海盗们最好的攻击目标。还有那些虽然没到沉没的地步，但在陆地附近发生海难的船只也十分之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冒出15艘左右的小船，像蚁群围攻受伤的甲虫一般，从货物到人员，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总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海盗们不愁掠夺品没有销路。

威尼斯意识到传统的加莱军船打击海盗的效果欠佳，他们改用一种称为“fregata”的小型军舰组成舰队，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顺便提一句，巡洋舰（frigate）的词源就是来自fregata。

在小型舰队的打击之下，海盗的气焰有所收敛。但他们杀害威尼斯

舰队的司令后煮食其心脏的行为激怒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将活捉的海盗全数斩首，把他们的首级一排排挂在圣马可广场的回廊上示众。然而，没过多久，海盗的人数又回到之前的规模。他们是从哪里补充力量的呢？的确有不少罪犯为了逃避威尼斯、达尔马提亚等地方的法律制裁而加入海盗，但数量还是不够，难民特有的多子现象，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奉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权威，视海盗业为奉献之正业，并将此作为唯一目的的命运共同体。

那些被海盗俘虏交付赎金后得以回到祖国的威尼斯人，以及直接负责打击海盗的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的报告，可以让我们一窥这“难民”海盗集团的独特生活形态。

抢劫后回到西尼亚港的海盗们，按照皈依上帝时的方式，一路从码头跪到教堂，拖着血肉模糊盖的膝盖进行弥撒，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抢夺无信仰者的工作，神父让这些海盗像虔诚的骑士一样膜拜圣体。待仪式结束之后，才各自散去。

在西尼亚有圣方济派和多明尼哥派两座修道院。海盗们将他们收入的1/10归为修道院，在卖掉抢来的货物后，会主动捐钱给修道院，而这些大部分的捐款，都忠实地履行了当时什一税的惯例，将1/10的收入上交给罗马教廷。

山贼或海盗在大肆掠夺归来之后，通常会彻夜狂欢，但这种景象不会出现在“难民”海盗的生活中。他们将那些死于海上，或者被俘处死的人们的家庭奉为荣誉家庭，遗属在共同体的帮助下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为了防止战斗力的减少，失去丈夫的女人立刻会有其他男人迎娶。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接受海盗技能的训练，大人们甚者会往刚学会走路的幼孩身上丢掷石头，让他们习惯于忍耐疼痛和流血。

在这个以海盗为唯一生活手段和唯一信仰的共同体中，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各司其职，没有谁游手好闲。共同体对那些外国过来的逃亡者

一律不问经历，统统欢迎。因此，任凭威尼斯海军再怎么围剿，共同体的战斗力不曾减少到600人以下。

这些难民海盗的抢夺范围，曾经一时扩张到300海里外的海域。尽管威尼斯的海运业还不至于因此被摧毁，但在顺风时航行两天就能抵达的海域，竟然有海盗在大肆抢劫，威尼斯人自然是义愤难平。

在成功地阻断了奥地利、西班牙和罗马教廷对海盗在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支援后，为对付这群数量不足1000的敌人，威尼斯派出了17艘加莱战舰，对海盗的根据地西尼亚进行了封锁。其实以前威尼斯也有过类似的封锁行动，但因为做得不彻底，每次都让对手突破了防线。然而，这一次威尼斯是下定决心，誓将海盗一网打尽。面对威尼斯的重拳出击，难民海盗再狡猾终究难敌，共同体因此一蹶不振。从1618年到1619年，威尼斯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夺回了一度曾岌岌可危的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可是，地中海方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1645年，威尼斯再次投入了对土耳其的战争。为了尽量延长1571年勒班陀海战后与土耳其签订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做了许多被西欧诸国视为屈辱的外交工作。但他们煞费苦心换来的不过是70年的和平。

克里特岛攻防战

地中海世界史上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牺牲最多的著名的克里特岛战役，从1645年开始至1669年结束，整整持续了25年。然而，在战争爆发的起初，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预计到这场仗竟然会打得如此漫长。

25年说来简单，但它是1/4的世纪。一个25岁的青年，25年后变成50岁的中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都在此期间度过。17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进入了缓慢的下降阶段，15年前黑死病爆发减少了1/3人口的重创尚未被平复，如果可能的话，威尼斯共和国一定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当然，对于满足于当下生活的威尼斯人的和平愿望，其对手是不会在乎的。匈牙利战线不顺，北边又面临新兴崛起的俄国威胁的土耳其，如今还能像全盛时期时那样确保统治地位的疆土只剩下地中海世界。

土耳其向来把东地中海当作自家的庭院，而属于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宛如坐在庭院中央的唯一异类。更何况克里特岛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它就不能完全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因此土耳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易地放过这位“外人”。

对于另一方的威尼斯共和国而言，克里特岛是其作为海洋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在地中海剩下的最后一块堡垒。

自1204年威尼斯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获得克里特岛后，400多年来为保护这块海军及贸易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付出了无以数计的金钱和鲜血。土耳其在15世纪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去了内格罗蓬特，16世纪又抢占了塞浦路斯岛，但对威尼斯人誓死捍卫的克里特岛，始终不曾表露出征服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威尼斯的反天主教态度和经济上的衰退，让土耳其判断它既得不到教廷或西班牙等国的支持，也没有单独防御的军事能力，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时候拿下克里特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开战的起因是一件偶发的事件。1644年秋，从圣城麦加朝圣归来，经埃及亚历山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商船在航行至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时，遭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连人带货被洗劫一空。圣约翰骑士抢劫异教徒船只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以罗德岛为根据地的年代，其累累战绩远非那些“难民”海盗能及。根据地移到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

依然初衷不改，这一次他们袭击的土耳其商船上包括由黑人宦官长带领的苏丹后宫女眷。

带着意外收获返回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为了补给淡水和释放土耳其船上克里特岛出身的划桨手，途中停靠克里特岛南面的小渔港。由于威尼斯不想刺激土耳其，对骑士团停靠克里特岛并不欢迎，所以骑士们也避开威尼斯警备舰队的监视，停靠在岛的南边。克里特岛的主要城镇，都集中于自然条件良好的北边一侧，因此当威尼斯人发现马耳他骑士团时，已经是船入港20天之后了。威尼斯方面要求骑士团立即离开，对方也很配合。然而，看着马耳他船远去而松了一口气的威尼斯舰队长，并不知道那船舱里藏着苏丹后宫的女眷一行。

苏丹易卜拉欣闻讯后大为震怒。去麦加朝圣的后宫妃子被掳走，不仅是他个人，伊斯兰教的尊严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被召进托普卡帕皇宫，集体聆听苏丹的抗议。刚开始时，苏丹的怒火直对马耳他，并没有殃及池鱼。威尼斯驻土耳其的大使乔瓦尼·索拉佐（Giovanni Sollazzo）在1644年12月20日的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各国大使面临怒火中烧的苏丹时做出的不同反应。

首先，法国大使表示第一次耳闻，荷兰大使随即应声附和。苏丹大声呵斥说他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团受到西欧各国的保护，并且做出斩首的手势，以至于法国大使的翻译吓得差点儿晕倒过去。不过法国大使由始至终保持冷静，回答苏丹说马耳他距离法国遥远，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威尼斯大使也表示马耳他是独立的国家，从未接受过威尼斯的支援。而荷兰大使更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称，荷兰人不是天主教徒，与马耳他骑士没有半点儿关系。

众人相互推卸责任，说着说着，矛头竟指向了威尼斯。苏丹指责威尼斯让马耳他船连日停靠克里特岛，完全是背叛土耳其的行径。

索拉佐大使觉察到对方是在为开战找借口，于是想尽办法补救。他

向苏丹呈上克里特岛总督送来的公文，证明威尼斯当局除了向马耳他船提供淡水补给，以及解放了船上48名克里特人奴隶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不知。但土耳其方面不相信在岛上停靠了20天马耳他船，能躲过威尼斯的监视。他们坚持认为威尼斯人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们犯下的有辱苏丹的罪行，是存心包庇。

12月27日，威尼斯、法国、英国的大使们达成共识，确认土耳其意在克里特岛。1645年1月3日，土耳其宰相对几次要求见面进行辩解的威尼斯大使，干脆地回了一句话："事已明了，无须再谈。"

尽管威尼斯以渎职之罪处死了没有发现马耳他船靠港的舰队长，但面对土耳其不为所动的态度，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里，每天都会出现苏丹的身影，大量的舰船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中。但直到这个时候，土耳其仍然公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马耳他。

威尼斯政府也没闲着。在驻君士坦丁堡的乔瓦尼·索拉佐大使以及克里特岛实质的总督（本国派往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Andrea Corner）接二连三的催促之下，拟定了克里特防守策略。元老院向柯纳发出指令，要他在加固现有要塞的同时，在战略要地建造新的堡垒。1645年1月4日，装满小麦和大米的船开往克里特岛，同船载有2500名士兵和技术人员。紧接着在2月10日，又向克里特送去了10万达克特的军用资金。

然而，政府的这些动作，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克里特岛当地深感战争迫在眉睫的人们看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相较于索拉佐、柯纳的紧急报告，威尼斯国内的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土耳其人攻打马耳他的说辞。但凡愿望越是强烈，就越会把所有的问题往好的方面解释，希冀和平的威尼斯人，选择相信他们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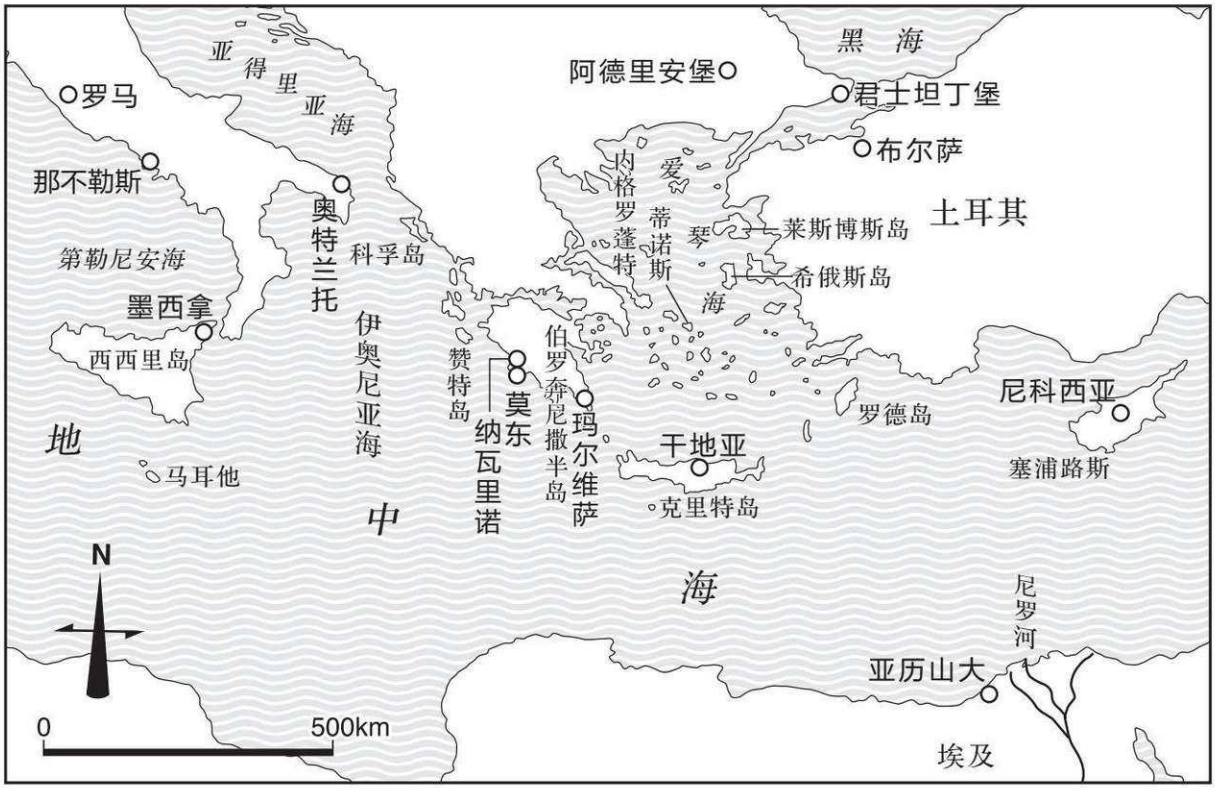
2月和3月转眼过去，土耳其依然不改对马耳他的宣战。克里特岛的

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从来没相信过土耳其人的这套，他巡视全岛，检查要塞的装备和粮仓储存量，向各个据点分配包括希腊雇佣兵在内的士兵，马不停蹄地做着战斗的准备。

1645年4月30日，载有80艘加莱军船和250艘运输船，加上5万士兵所组成的土耳其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朝着达达尼尔海峡方向南下。由于土耳其声明是去攻打马耳他，作为友好国家，威尼斯大使也不得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参加出征仪式，以示致意。

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土耳其领地的岛屿之外，还停靠了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在当地补充淡水、粮食，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在蒂诺斯岛充分休息后，一路不疾不徐行驶的土耳其舰队，在6月13日早晨，突然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外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和德军也在此决一死战的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中央，岛屿呈横条状地由西向东延伸，宛如一艘停泊在海中的航空母舰。从达达尼尔海峡穿过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一直往南便能抵达这里。不过，号称目的地是马耳他的土耳其舰队为掩盖其真正的意图，特地绕到远离克里特岛的外海，然后才改往西航行，经过克里特岛，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的纳瓦里诺（Navarino），并在那里停泊了数日。从纳瓦里诺再往西行驶5天便是马耳他，所以也难怪威尼斯人侥幸地以为克里特岛逃过了一劫。



中央、东地中海及其周边

但土耳其舰队离开纳瓦里诺后，一路往东南方，即调头往回走，三天后，出现在克里特岛西部干尼亚的外海。

在现代仍被称为“威尼斯港”的干尼亚，是威尼斯一个重要的要塞城市，港口还建有14座船坞的造船厂。城墙上四处安装着大炮，正好对准船腹的位置。虽然土耳其拥有大量的战舰，但从颠簸的海面上开炮，命中率终究不如陆地。土耳其人并不笨，他们没有从海上发起正面攻击，而是利用众多陆军的优势，从距离干尼亚15公里的海滩登陆，从陆地向干尼亚进攻。

与宿敌有长年战争经验的威尼斯人也预料到这一点，在土耳其军队可能会登陆的地点建起了要塞。土耳其军登陆的这一天，守卫这座要塞的是指挥官维亚焦·朱利亚尼（Viaggio Giuliani）及其手下的60名士兵。5万大军的土耳其人根本没把区区60人防守的要塞放在眼里，他们连大

炮都没用，派了2000士兵带着短枪便发起了冲锋，其余部队则留在原地等着看好戏。

眼见着敌人围攻过来，维亚焦·朱利亚尼没有犹豫，立刻下令取出要塞中所有的火药埋在各处，60位守军连同靠近城墙的500名土耳其士兵，与要塞一起被炸得灰飞烟灭。朱利亚尼迅速地做出自爆决定的原因，在全体官兵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不想让完整的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吧。

土耳其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威尼斯属地克里特岛的首发情报，加上圣托德欧岛（St. Todero）守城官兵壮烈自爆的事迹，给威尼斯本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1000年漫长的历史中，威尼斯人曾经几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再次被唤醒。

政府一改之前温吞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元老院向各国君主发出救援的请求，富裕阶层被征收特别税，造船厂日夜赶工，60艘加莱战船接二连三地下水。同时，在内陆本土行省募集士兵，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也纷纷来到威尼斯集合。

不过，威尼斯在外交上努力却没有见效。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这些收到威尼斯求援的国家，都在交战中，再加上17世纪以后地中海的重要性骤然下降，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派兵支援。不过，宰相黎塞留去世后，刚进入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答应提供军舰和10万达克特的经济援助，结果钱到了船却没有到。

最终，威尼斯得到的实际支援是教廷派来的5艘加莱战船及其士兵、马耳他骑士团的数艘战船，以及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派来的士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国、荷兰人的基督徒海盗志愿加入抗击穆斯林的队伍，但由于人数有限又不定时，所以很难算作真正的战斗力。

威尼斯海军每年投入保护克里特岛的军力是，60——70艘加莱战船，5——6艘加莱赛战船，30——40艘帆船。由于海军另外还有负责亚得里亚海的警卫和为商船护航的任务，因此这个数字已经是威尼斯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尽管威尼斯能派出的军力不大，但与其他国家派来的援军数量相比，实际上几乎就是威尼斯一国孤军奋战。

其他国家的将官们参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在克里特岛防守战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常常产生不统一的步调，就是因为威尼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会派来支援，因此难以拒绝教廷派来的武将所主张的战法。

而另一方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大军，越过圣托德欧岛要塞的废墟瓦砾，沿着陆路逐渐向干尼亚逼近。守军部队由威尼斯贵族那瓦吉罗（Navagero）指挥，加上行政长官柯纳的儿子带来的300援军，总共也不到1000人。所幸，军队得到了希腊原住民的帮助，再加上干尼亚原本就是要塞，所以还是挺过了一段时间。

可是，土耳其军队在城墙脚下挖坑埋火药炸开了城墙，而守军唯一可依靠的海上援军由于战术的不统一，迟迟不见踪影。在城墙被炸得几乎体无完肤，城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月22日，威尼斯军队以保证士兵生命的唯一条件，向土耳其军队开城投降。历经两个月的攻防战，守军等于全灭，土耳其一方也损失惨重，有两万人战死。但不管怎么说，土耳其还是拿下了攻占克里特全岛的前线基地，接下来就是一路向东进军。

继干尼亚之后，土耳其的第二个目标，是干尼亚以东20公里处的斯达。斯达是东地中海流域最好的港口，时至今日，希腊海军仍然在使用，四周禁止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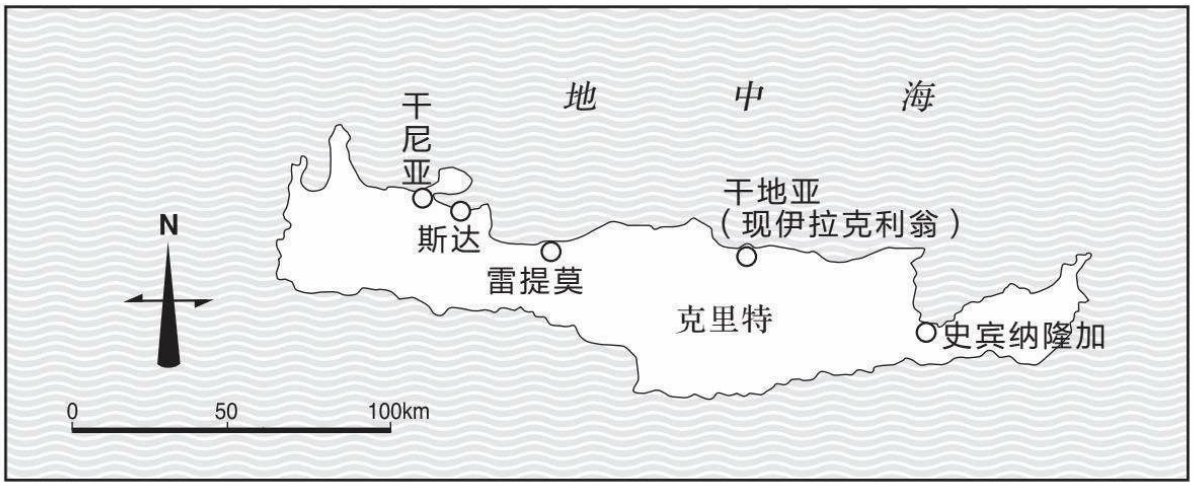
干尼亚与斯达之间有个半岛挡住了大风大浪，形成了一个宽阔、宁静的港湾。港湾的中央碰巧有一个小岛，威尼斯就地取材将它建成了防

守要塞。

作为防守克里特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斯达平时就有加莱战船驻守。可是，在港湾内待命的舰队司令卡佩罗，为了和抵达赞特岛的教廷舰队会合竟然带着一半的舰队出了港。

卡佩罗的行动激怒了行政长官柯纳，之后将卡佩罗送上了审判台。结果，斯达靠剩下的40艘加莱船、4艘加莱赛战船和10艘帆船，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在没有飞机的年代，孤立于海上的要塞有着绝对的优势，即便四周的陆地都被占领，只要守住要塞，威尼斯舰队在宽阔的海湾中的行动就不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斯达和位于克里特岛东端的另一个孤立于海上的要塞史宾纳隆加，共同坚守了25年。

时间来到了1646年，克里特岛攻防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威尼斯意识到仅靠防守各个要塞城市，保不住克里特岛。虽然每次攻城都会让土耳其军遭受损失，但他们终究还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拿下一座座城市，最后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海上要塞。于是，威尼斯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海军的优势，切断土耳其的补给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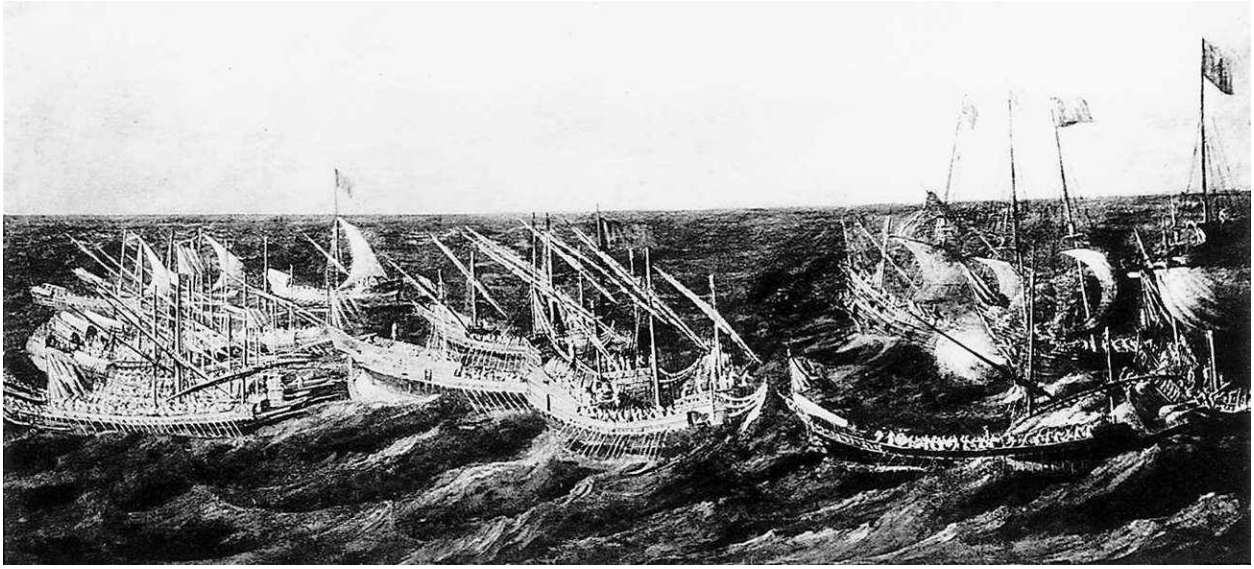


克里特岛

采取人海战术的土耳其军队，人多粮食的需求也多。克里特岛虽然有丰富的橄榄树和葡萄酒，却不盛产小麦。除了食物，军队还得补充弹药，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军队必须依靠本国送来的军火补给才能继续作战。

3月，22艘战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特内多斯岛附近，等待着准备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运输船队。那一次由于遇上黑海海流和强劲的北风，没能够封锁住海峡，放走了大部分土耳其船只，但之后成功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将补给线从君士坦丁堡分散至希俄斯岛、罗德岛、伯罗奔尼撒的玛尔维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

此时的威尼斯仿佛重新回到了贵为东地中海女王的黄金时代。那些已经在陆地上安身立命，经营手工业和农庄的贵族们，似乎想起了祖先的荣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海军的队伍。士气高涨的景象，不禁让人以为威尼斯暌违200年重新拿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1651年、1655年、1666年，威尼斯不仅赢得了与土耳其正面交锋的海战，连那些小规模的零星战事也没让对手捞到便宜。如今，偷偷摸摸遁入港口，海上相遇立马逃跑的竟然是土耳其舰队，这情景放在150年前绝对是不能想象的。



克里特岛攻防战中对峙的威尼斯和土耳其舰队（17世纪的绘画）

威尼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达25年的克里特岛攻防战，前后10任海军总司令有5位战死，牺牲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几乎耗尽了全国之力。

攻防战打到第三年的10月，雷提莫陷落。第四年，即1648年初夏，土耳其向位于克里特岛中央的首都的干地亚[如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lion）]发起了总攻。6000名守军，对阵4万土耳其大军。土耳其史的权威哈马曾经评价称“不要说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干地亚反复那么多次的战斗，流淌了那么多的鲜血，耗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干地亚攻防战持续了22年。威尼斯之所以能长久抵抗，在于他们掌控着制海权，而土耳其却因为军粮补给的不足，无法连续地实施包围。

也就是从1648年开始，土耳其改用扩大战场的策略以分散威尼斯投入在克里特岛的军力。他们袭击了亚得里亚海东岸所属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所幸，在克里特岛没怎么获得岛民帮助的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得到了当地居民不遗余力的支持，战事发展颇为顺利，不仅击退了土耳其的攻击，甚至扩张了领土。

另一方的干地亚攻防战仍在持续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宣告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的终结。然而，恢复了和平的欧洲，仍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支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威尼斯。可见欧洲的中心已移至北方，威尼斯倾全国之力投入的这场战争，对那些大国而言，只是一场对其不构成威胁的局部战役。

10年过去了，干地亚仍在苦苦支撑。克里特岛攻防战一直打到第15个年头，欧洲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对威尼斯发出了赞赏。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结束了长年交战之后总算是腾出精力开始关注在东

地中海与穆斯林奋战的威尼斯。

威尼斯在15世纪饱受各国的嫉妒和憎恶，16世纪时夹在大国之间，缝隙中苦求生存发展成经济大国，却因为与土耳其缔结和约而遭到变节之唾弃。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它的经济完全进入衰退期的17世纪，却受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赞誉。威尼斯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正面评价，大抵鉴于政治安定、与宗教的关系，或者经济强大等客观的事实，但收获如此大规模的发自肺腑的喝彩，还是史上第一次。

加入威尼斯军队去克里特打仗，成了欧洲的年轻贵族、骑士们的一种流行，尤其是自诩为骑士精神起源地的法国人特别踊跃。也许在这些年轻贵族的心目中，这是展现勇气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些义勇兵的加入对威尼斯而言，未必都是好事。

克里特攻防战中的威尼斯军力，是由威尼斯人与雇佣兵混合组成。罗马教廷每年都会派四五艘的军舰来支援，威尼斯由于在战争最初阶段因双方意见的不合而吃尽了苦头，所以这次决定教廷的舰队也必须和雇佣军一样，听从威尼斯将官的指挥。

正因为威尼斯人掌握了克里特战役的指挥系统，持久战方针才能够彻底地得到贯彻。对于三面都被敌人包围，只剩下靠海一边的干地亚，威尼斯也绝不贸然出击，一切以防守为上。由于靠海的一边出入自由，因此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雇佣兵们，不少人都会在没有战事的冬季回国做短暂的休息。

话说回来，持久战的作战方式非常沉闷，需要无比的耐心。打得酣畅淋漓的是纵横东地中海的海军，他们接到命令，但凡见到敌舰必定出击。而陆军需要的则是坚忍的耐力。这让那些来自欧洲的义勇兵们大为不满。他们原以为每天都能挥舞着刀剑，与伊斯兰教教徒做英勇的搏斗，没想到天天不是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就是赶走来袭的敌军。对一些地位高贵的义勇兵的抗议，威尼斯指挥官们也只能成全他们的心愿。

那些威风凛凛出城的义勇兵们，几乎还来不及在敌人面前发挥基督骑士的精神，便被凶猛的土耳其大炮轰得逃回了城里。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在冬季返乡，基本上都再也没有回到克里特。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数百名义勇兵来到克里特，其中还包括千里迢迢从瑞典来的骑士。可见当时威尼斯悲怆的战况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敌对的双方也曾经努力尝试停战。在1653年之前，威尼斯曾两次呼吁停战，土耳其也在1656年提出过一次，每一次交涉都是由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充当调停者。威尼斯的条件是每年支付使用费，但克里特岛必须留给威尼斯，而土耳其却决不让步地要求威尼斯完全放弃克里特岛，三次和谈，每每以破裂收场。

威尼斯还企图暗杀苏丹易卜拉欣。这件事情比秘密和谈更不能被外人所知，因此有关计划只出现在“十人委员会”的机密文件中。不知道是不是和威尼斯有关，1648年，易卜拉欣在后宫被杀。但由于继位的皇太子年纪太小，实际掌握大权的大臣们坚持在克里特岛问题上必须遵照先帝的遗志，于是，战争便成了克里特的宿命。

1677年，克里特攻防战迎来第二十三个年头。迄今为止对人员死伤不计血本的土耳其，似乎终于痛感要做一个了断，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

在该年的5月至11月之间，土耳其发起32次总攻，威尼斯守军出击17次。埋在城墙下的地雷，不包括未爆弹，仅爆炸的就高达613颗。威尼斯一方3600人战死，其中400名是指挥官，而土耳其的死者人数超过了两万，城墙沾满了浓稠的鲜血。守卫军用过的手榴弹，时至今日仍陈列于伊拉克利翁（干地亚现称）的博物馆。这些用黏土烧制成的弹丸直径在17厘米左右，里面塞满火药，上面开了一个小口引出导火线，原理和炸药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干地亚再次挺住了狂轰滥炸。仗打到冬季，双方都已经

筋疲力尽，自然地进入了休战期。

1668年春，攻防战再度开始。威尼斯港每个月都有满载着补给物资的船队开往干地亚，但召集士兵却不是威尼斯人的强项。法国贵族率领的500名援军的到来，对于好不容易才凑齐5000人的干地亚守军，仿佛久旱逢甘霖。可是这些高贵的骑士们期待的是华丽的战斗，对持久战完全没有兴趣。12月16日，骑士们在高扬的喇叭声中冲出城外，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可惜死伤惨重，犹如昙花一现。

要塞城市干地亚

1668年年底，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拜见教皇克雷芒九世（Clement IX），向教皇提交了一份当年威尼斯送往克里特岛物资清单，详细见下：

974000达克特现金

最新派往干地亚的士兵8700人，工兵2000人

加莱船划桨手1000人

火炮手222人

修理城墙、船舶、大炮等技工60人

小麦及其他粮食16万司泰亚（1司泰亚=80升）

大炮41门、枪支、火药2879000磅（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

导火线73万根

铅弹9万颗

铁、木材、军装（包括内衣、鞋子等）

以上是1668年一年威尼斯为防守干地亚所消耗的军费，合计总金额为4392000达克特。据说教皇看到这个数目时，惊愕到说不出话来。当时威尼斯的年收入大约在300多万达克特，虽然欧洲各地的义勇兵源源不断，各国的国王、王妃、贵族等响应教皇的号召，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威尼斯已经到了极限。

第二年秋天，法国、德国、马耳他的骑士，以及教廷派来的援军照例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之后，离开了克里特，守卫干地亚的只剩下区区3000名威尼斯军人。面对这群势单力薄的士兵们不屈抵抗，城外的土耳其阵营中流言四起，称“那些不是人，是25年来死去的威尼斯人的幽灵在打仗”，以至于将官们忧心忡忡生怕影响士气。自春天起便没有停止的战斗的守城威尼斯官兵们，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看上去的确是更像一群鬼。

正因为这惨不忍睹的现状，促使干地亚守军总指挥、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做出了投降的决定。莫罗西尼25岁即克里特战役刚开始时便参加了战斗，之后的25年一直在克里特战场上度过。如今已经50岁的他，仍然独身，大概实在是没有时间结婚吧。

停泊在干地亚港的旗舰上，聚集了全体指挥官。海军总司令莫罗西尼向众人表明了决定，指出继续战斗对威尼斯造成的伤害会比给敌人的更多。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将官们心中五味杂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莫罗西尼一样，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克里特战场。在听完每个人的意见之后，莫罗西尼派人去向土耳其军总司令传达了终战谈判的要求。

和谈交涉向来是由政府主导，但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心意已决，一人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军人直接进行停战谈判，还是威尼斯史上头一遭。待元老院接到报告时，莫罗西尼与土耳其已经就降服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见下：

威尼斯共和国放弃克里特，但仍拥有克里特岛上斯达、史宾纳隆加和卡拉布扎三座要塞，以及三港口的免费使用权。

土耳其不向威尼斯索求战争赔款。

土耳其承认威尼斯所获得的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领土。

土耳其准许守军带走国旗、武器及其他所有东西，并保证全体人员安全撤退。

1669年9月26日，在撤退的莫罗西尼一行队伍中，还夹杂着很多不想做土耳其臣民而离开故乡的克里特岛难民。直至今日，伊拉克利翁的中央广场还看得见威尼斯式的喷水池，水池边上有一间供奉圣马可的教堂。圣马可是威尼斯的守护神，可见当年的威尼斯人将克里特当视为祖国的一部分。

在守军撤退的同时，威尼斯政府向北、西、南方向派出特使，给诸国的君主送去克里特陷落的消息。在这份以威尼斯元老院名义发出的公文中，威尼斯表示国力已至极限，无法再继续维持战争。以往威尼斯与

土耳其缔结和约，每每被斥责为叛徒、唯利是图的商人，唯有这次，从教皇到各国君王，不仅没有责难威尼斯人的屈服，反而为他们高声喝彩。

经历了克里特攻防战之后的威尼斯，满目疮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悲惨状态，他们只获得了名誉，而这也是不再遭受妒忌、憎恶和责难的17世纪的威尼斯人，唯一的回报。

14年之后的1683年，因事先没有与政府商议便擅自开城投降而遭到抨击降至闲职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再次当选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

同年，奥地利、波兰联军击退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之后，鼓动教皇转守为攻，加上与土耳其争夺黑海的俄国，组织反土耳其同盟，威尼斯也收到了特使送来的参加同盟的邀请。

威尼斯人决定加入同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这次保持中立，下一次土耳其人来犯时，不会有任何基督教国家会伸出援手。应俄国的要求，威尼斯派出了13名国有造船厂的工头，为俄罗斯打造舰队担任技术指导。

在西有奥地利——波兰联军，北有俄国、南有威尼斯同时攻击的形势之下，土耳其作为陆军国家，自然是将军队的主力放在北面和西面，南面临海的防守相对薄弱。于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收复了圣塔莫拉岛、纳瓦里诺等丧失多年的领土。在开战第二年的1685年，他们又成功地收复了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这两个基地是威尼斯商船队途中必经的停靠港，16世纪初期被土耳其攻占。暌违两个世纪，威尼斯总算失而复得。同年被收复的地区还包括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紧接着，威尼斯

海军在第二年又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曾经的基地。

加入同盟军的其他国家也战绩斐然，将土耳其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波斯尼亚。威尼斯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乐观者，认为照这个势头，收复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指日可待。

之后，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在海陆两面继续进攻，先后攻下了帕特雷斯、勒班陀和科林斯。

1687年8月11日，正在审议议案的共和国国会，听说带着捷报的船只已进入外港利多，破天荒地决定暂停会议，全体人员前往圣马可港口迎接胜利消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之情。元老院之后又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为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制作铜像，周围以土耳其军旗装饰，放置在“十人委员会”的会议室。

莫罗西尼的军队势如破竹，攻陷了米斯特拉（Mistra），拿下斯巴达，征服了雅典。遗憾的是，在进攻雅典时威尼斯军队击毁了被土耳其军当作火药库使用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与那些优秀的祖先们相比，莫罗西尼的英勇气概毫不逊色，但缺少了些美学意识。17世纪的威尼斯人似乎还忘记了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反英雄主义。

1688年3月，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希腊战场，得知自己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的消息。两年后他回到祖国，尽了三年的元首职责之后，再次披甲上阵。一年后的1694年，他于纳夫普里翁附近的战场死去，享年75岁。

除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恩里科·丹多洛之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是第一位同时担任共和国元首和海军总司令的人物。威尼斯政府授予这位英雄连恩里科·丹多洛都不曾享有的荣誉，在元首官邸

被称为“投票之门”的大厅中，建了献给他的凯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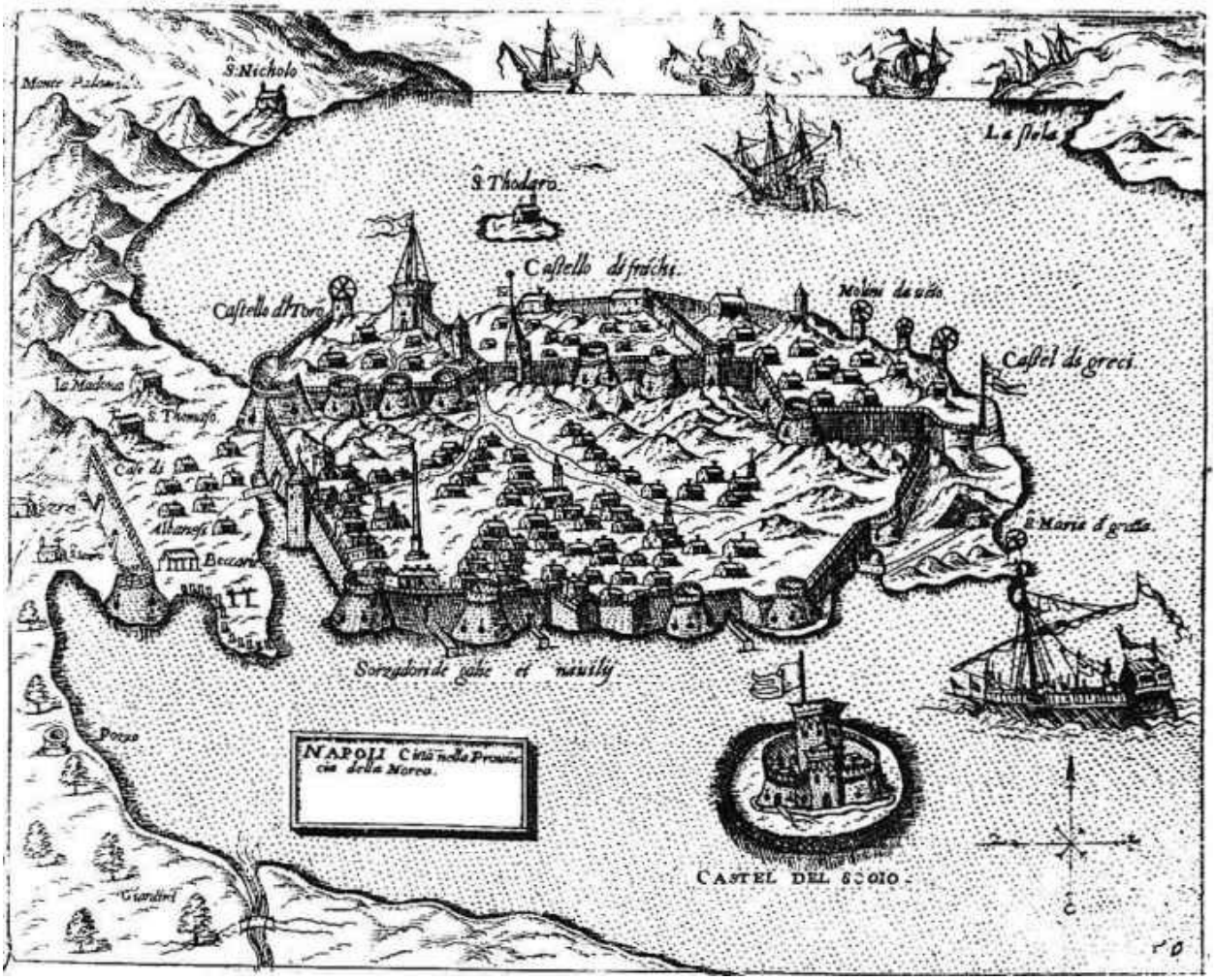
元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

同盟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9年终结。奥地利帝国因为西班牙王位

的继承问题，欲将重心转回欧洲，不想和土耳其再纠缠下去。交战双方签署了被称为“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几乎得到了莫罗西尼收复的所有失地。

必须承认，莫罗西尼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土耳其时运不济。18世纪以后的威尼斯，已经没有充分的人力以及经济资源，继续运用和发挥这份好运。当土耳其完成对奥地利的军事报复、与俄国的讲和，再度将触角伸向爱琴海时，威尼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1714年，硝烟再起。科林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莫东、科伦、圣塔莫拉，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甚者连克里特岛的两个基地斯达和史宾纳隆加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在希腊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威尼斯，最终靠死守科孚岛，总算保住了亚得里亚海被称为“威尼斯湾”之声誉。那场激烈的科孚岛保卫战，是威尼斯共和国打的最后一场最像样的战争。



纳夫普里翁城塞

盛者必衰之理

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国家的衰退归结于国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为何会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当我们在阅读完各种有关古罗马兴衰的历史书籍之后，脑海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句“骄奢者不长久，犹似春夜一梦[1]”。而像我这样的人，更会生发疑问：为何会变得骄纵？事实真是如此吗？

盛者必衰，不只适用于平家，此乃历史之规律。

“远者，求考异国史例，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此等人皆因悖逆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又不听贤人良言规谏，不悟天下兵革将起之警兆，不恤民间愁苦，遂致骤亡旋灭。”[2]

出现上述的问题，那么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过对于威尼斯，我实在不能赞同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堕落来评断其衰败的观点。因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乐而不淫，接纳善言，悟察警兆，体恤民情，但他们终究还是不能逆转盛极必衰之规律。威尼斯的衰败应该另有原因。

善于见机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质。根据周边的形势，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强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走向没落的理由。

直到15世纪为止，威尼斯是一个海运国，以海上贸易为生。进入16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扩张，以及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威尼斯的经济不能再继续贸易独大。

向来注重资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应因形势转向工业投资，从而促使以毛纺织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业，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

当然，海上贸易在当时还是获利不薄的行业，所以威尼斯并没有从海运一股脑倒向工业，但经济结构转为多元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到了17世纪，荷兰、英国日益活跃，新大陆以及亚洲不断的殖民化，导致地中海世界越来越被边缘化。靠海上贸易已经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弃了男孩子满14岁之后便作为商船的石弓手，进行实地学习的传统，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断退化。

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水手。尤其是荷兰人，在整个17世纪拥

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员全是荷兰人的话，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险费，即货物总价的5%。但船员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货价8%——10%的金额，保险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纪，威尼斯通过定期商船队的方式彻底分散了风险，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于无须保险制度。与那些年代相比，17世纪的威尼在海运和贸易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商人们对这两项事业的投资也越来越迟疑。

对于国人传统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没有袖手旁观。为振兴和提高航海技术，威尼斯在1683年创立了国立商船学校。然而，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必要性的行业，国家再怎么鼓励支持，总归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最终只能以西欧最早的商船学校这一点自我满足一下。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经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力图使海运和贸易起死回生。1602年，刚刚开始出入亚得里亚海的荷兰以及英国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却以商品必须在威尼斯进行交易和必须使用威尼斯国籍的船只运输为条件，拒之千里。结果，当时海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荷兰、英国的商船在亚得里亚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转至独立国家拉古萨、教廷属地安科纳，以及奥地利帝国领地的的里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热心于贸易振兴的托斯卡纳大公，将其辖下的里窝那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荷、英两国的商船。威尼斯的关税收入因此在10年里减少了40%。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在经济活力减退时采取保护主义，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继海运业之后，从1620年左右开始，威尼斯的工业竞争力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1602年时年产量曾经达到3万匹的毛纺织业，到1631年只有8000匹。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而德国人向来是威尼斯传统上最大的客户。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62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消费趋向大

众化，手工精细但价格昂贵的威尼斯制品，不敌廉价的英国毛织品。即使在高级面料的领域，也被法国人迎头赶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装的时尚中心从威尼斯转向巴黎。

当然，16世纪有惊人发展的威尼斯工业，也不是到了17世纪就统统变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业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丝绸工业，依然保持着最高级的制造品质。

不过，当竞争对手们利用来自殖民地的金、银原料铸造成金银货币，直接用货币与土耳其交易时，不产金、银的威尼斯，只能维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卖出自己的商品，再买进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形势下，原本就剩余不多的商机因此一次次与威尼斯人擦肩而过。一旦人们对竞争力低下的工业失去了投资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无回天之力。

所幸，威尼斯人优秀的企业化能力经久不衰。在农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命脉之时，他们再次将此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完善灌溉系统，根据土质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并不断进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内陆行省的农庄，变身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除了小麦、大米之外，威内托（Veneto）地区大面积地种植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以玉米粉原材料的玉米糊成了民众的主食。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威尼斯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1630年爆发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国内的人口从15万减少至10万，直至1700年代的中期，仍然只有14万左右，之后则呈现负增长。相反，内陆本土属地却从1600年代中期时的150万增长至200万。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手工业逐渐转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于农业变成了威尼斯的经济支柱。唯有石头和海水的威尼斯岛内缺乏先天条件，农业只能放在内陆发展。

本土特雷维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贵族们的“villa”，将它们译作“别墅”其实有点儿词不达意。这些美丽的建筑，由大师帕拉第奥设计，屋内的壁画出自委罗内塞之手，显然主人没有将这里只当作休闲使用。距离大屋不远处是农庄雇工的住家，从那里可以听见主人客厅中传出的维瓦尔第（Vivaldi）的乐曲。庄园内还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最上层往往是空荡荡一片，用来晾晒农作物。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经济思维模式，不断地转换投资配置，国家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这种随机应变的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投资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方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威尼斯人的确是与以往不同了。但他们并不是变得骄奢，而是随着投资对象的不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所谓导致亡国的民族精神的堕落更为可怕。如果是骄奢淫逸，那么还是有办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一旦民族的灵魂染上疾患，便无药可救，盛者，必然衰败。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败与投资标的转变，大有关系。

在以海为生的时代，威尼斯社会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固定化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动性。

“有限合资公司”和“海上融资”制度的有效运作，让那些资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海运或经营贸易。贫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学习航海和商业技术。只要稍稍积攒点儿本钱，便可以购买商品带到停靠港销售，再用卖货的所得买进胡椒等商品，这类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销路的。很多身无分文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属于国有，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个人也享有平等机会。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对“败者复活”提供了最理想

的社会制度。

然而，当经济重心转向工业，继而变为农业之后，没有资产的人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无论是发展手工业还是农庄，留给无产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当一名雇员。“败者复活战”的消失，意味着富人将变得更富，而穷人脱贫的机会则越来越少。在海洋时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垄断行为，正不断地侵蚀威尼斯社会。

垄断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竞争，社会的上下流动性变得迟缓，贫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终导致国家活力的下降。当这种状态形成之后，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尽管威尼斯当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贫民的数量不减反增。本国14万的人口中，有两万人的生活需要靠社会救济。

这种动脉硬化般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既不会务工也不会种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属于管理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是共和国的大脑。然而威尼斯的政体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拥有经济能力才能从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数在正式场合需要维持体面的职务有报酬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奉献。

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大多居住于圣巴尔纳巴（San Barnaba），因此被称为“Barnabotti”。这群人中包括不少从克里特岛撤退来的贵族。遗憾的是，17、18世纪的威尼斯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别固定化，会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穷贵族靠卖选票应付窘迫，富贵族靠买选票集中权力。而那些通过金钱获得权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领导层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17、18世

纪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战争而失去的男性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补充。在过去，一个家庭有10个孩子并不稀奇，哪怕没有足够的财产分给每个孩子，只能留给长子一人，需要自谋生路的孩子们，还是能够找到各种机会。然而，经济重心转向农业之后，谋生的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出生率自然随之降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结婚。人们对于未来甚少期待，更关注于眼前的所有，难免会变得消极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还是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力不再。

兼任海军总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纪以后精神构造转移的一个体现。尤其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愿望，因此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在威尼斯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上，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并非没有先例。由于陆军靠的是雇佣军，所以国家最高的军队长官是被称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军总司令。在这个头衔尚未出现的年代，就有元首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例子。比如说10世纪时征服亚得里亚海、取得制海权奥赛罗二世，以及13世纪初率领威尼斯军队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建立起东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网的恩里科·丹多洛。然而，正如当时没有“海军总司令”的官衔一样，这些都是在共和国在形成期才有的现象。

当威尼斯独特的政体稳定之后，元首与海军总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这条不成文规定沿用了500年。因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尽量地分散权力和权威。不过，元首中曾经担任过海军总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数。海军司令的职责除了指挥打仗之外，还包括确保补给线、与基地所在国保持良好关系等非军事性任务，唯全能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在出任过驻外大使和海军总司令之后当选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为元首之后，就不能率军打仗了。

虽然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大量牺牲，但威尼斯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人

才去分担权力及权威。哪怕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为元首，事实上更多人因为奔赴战场反而错失了当选的机会。

威尼斯人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向来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始终禁止公开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敌人的各类军旗，刻意淡化率军打仗的武将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坏。在当时的欧洲，唯一没有在重要的广场建立英雄铜像的只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威尼斯不仅允许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甚至为其塑像歌功颂德。铜像边上装饰着缴获的土耳其军旗，下面的台座上，还特地用拉丁语铭刻“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伯罗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许这只是仿效古罗马共和时代元老院向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赠予“Africanvs”（非洲者征服）称号的一种褒奖形式，但在威尼斯超过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而且当时莫罗西尼还在人世。在他死后，更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凯旋门。在这一连串动作中，唯一还显现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铜像和凯旋门均放置于元首官邸内，并不有建在圣马可广场，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玄关的船码头。

17世纪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终不能忘记克里特岛防守战的那段心酸记忆。之后莫罗西尼率军横扫仇敌土耳其的战绩，的确让众人一泄心头之愤，以纪念碑的方式记住胜利的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没有享受过绝对优势，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拿着简单的会话帖，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努力寻找商机，与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证件的异族打交道，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遇上战争，更是死伤无数，造多少纪念碑都不够用。对于非贵族出身的牺牲者，威尼斯共和国会向其遗属发放“遗属年金”作为补偿。而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被尊称为Nobile的贵族们，牺牲则是他们的义务之一。

尽管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牺牲的补偿，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尔

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道德力量可远及遥远的海外公民”。

在威尼斯为贵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塑像、建凯旋门的百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国终结的10年前，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反英雄主义的国家，在颂扬英雄时将走向没落。因为英雄主义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无偿奉献的人们的一种自我陶醉。

17世纪初期，威尼斯学者帕鲁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权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张。然而，与愿望相悖，威尼斯人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利益，几乎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仗。

当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后的堡垒，丧失西欧经济的主导权，甚者连反个人英雄主义气概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品尝和平果实的境界。18世纪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宠爱，过了盛开的花季迎来岁月静好的女子，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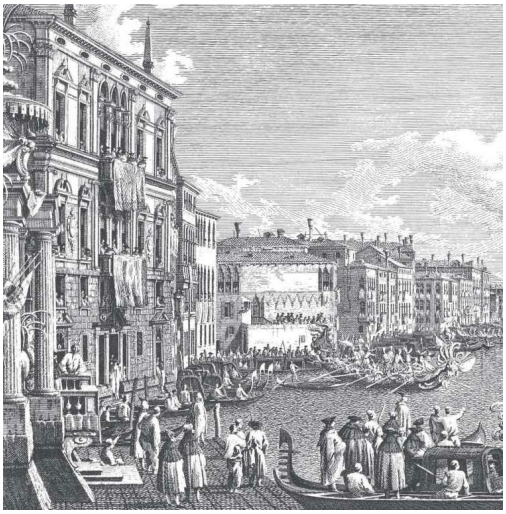
我打算将这个时代命名为“维瓦尔第的世纪”。

---

[1] 此句为《平家物语》开篇诗中的一句。平家为日本中世纪一大武士家族，盛极一时，后被源氏所灭。——译者注

[2] 此段话出自《平家物语》第一卷。——译者注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早在十字军东征前的11世纪，威尼斯已经是西欧屈指可数的观光国家。在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后的伊斯兰势力扩张时期，以威尼斯为起点的朝圣旅行，一直到16世纪中叶，始终兴旺不衰（伊斯兰大获全胜后有过短暂的停止）。在第九章“朝圣之旅”中对此已做了详细的叙述。

不过，那个让我边写边乐的“朝圣之旅”时代，与接下来要讲述的18世纪的威尼斯观光产业，有两个截然不同之处。

第一，朝圣旅行团中虽然不乏王侯贵族、大财主，但主流是一般民众。相较于单纯的游览，以朝圣为目的观光活动，更容易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将旅游事业作为国家方针的威尼斯，在为游客服务上用足了功夫。比如说，在游客出没的主要场所，两人一组的翻译兼导游的服务小组（每个人都会说两种不同的外语）定时巡逻，为那些语言不通、无亲无故的朝圣客提供帮助。

第二，中世纪的威尼斯，并不是观光的目的地，它只是前往巴勒斯坦的起点和终点站。当然，视朝圣为营利产业的威尼斯人，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开放圣遗物，并且通过教皇向参拜者给予特别的赦免；兜售朝圣船上、途中以及到达圣地后必备的生活用品，想方设法地让朝圣客们把钱留在威尼斯。尽管威尼斯人不遗余力，但在当时没有谁会为了游览威尼斯专程从英国、德国、法国等地远道而来。

然而，到了18世纪全盛时期，情况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宗教改革，大多数西欧人失去了为寻求赦罪不惜千辛万苦地去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热情。但少了朝圣的纯旅行，对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无论在经济或精神上仍然难以承受。

因此，18世纪威尼斯观光事业的服务对象，换成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良好，并且具有知识教养的精英阶层。这些推崇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对于顶着圣地巡礼名义的旅行，向来有些抗拒，如今少了宗教色彩的观光活动，精神上变得更为自由，何况威尼斯本来就是一个即使没有赦罪特典，仍然值得一游的地方。于是，威尼斯变成了旅游的目的地。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旅行也算是另类的圣地巡礼，歌德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为代表的18世纪社会精英人士，常常会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歌德是一人旅，也有三两好友结伴而行，甚至有人带着随从游历四方。

纯粹以文明文化“朝圣”为目的旅游，毕竟人数有限。所幸，当时英、法、德等强国的社会精英们，似乎相信必须经历过意大利旅行，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绅士，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这大概也属于一种另类的“赦免”。

总而言之，18世纪时造访威尼斯的主要游客，是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人士，因此威尼斯也相应地改变了待客的手法。在17世纪之前，对那些抵达威尼斯后一筹莫展的朝圣客，两人一组的巡逻员会主动上

前，用其家乡的语言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种令客人又惊又喜的导游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如今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虽然不是人人都会说意大利语（像歌德那样会说威尼斯方言的属于特例），但他们总有对应的办法，不至于手足无措地迷失在街头。威尼斯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只需要展现威尼斯原本的特色。

威尼斯对于这些游历意大利全境的游客而言，只是旅途中的一站，但他们对于威尼斯的历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是见证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的最后一批外国人。比歌德晚了30年的司汤达，见到的是已经是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威尼斯。

那么，这些在威尼斯人还当家做主的时代来访的外国人，他们眼中的威尼斯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在没有公路连接内陆与威尼斯岛，更没有铁路的共和国时代，来自欧洲北部或西部的游客，唯一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无论是翻过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南下首站抵达维罗纳的德国人，还是穿过法国南部经热那亚进入意大利的法国、英国人，到了帕多瓦之后，都得改走水路前往目的地。当时的帕多瓦和维罗纳都还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在参观完欧洲第二古老的帕多瓦大学之后，游客们乘坐“博其罗”（Burchiello）沿着连接帕多瓦与威尼斯的布兰塔河顺流而下。“博其罗”并不是观光船，它有点儿像公交巴士，所以乘客也是形形色色，既有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也有经常需要出门的神父、修道士，甚至还有娼妓。船分上下两种舱位，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自然是选择房间宽敞明亮、视野良好的上等仓。房间的墙上挂着威尼斯制的厚实的丝绸挂毯，地板上铺着地毯，上面摆放着有丝绸坐垫的椅子和桌子。为了那些带着侍从的客人，船舱内另外还设有小小的仆人房。

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慢节奏的河川旅行未尝不是乐事。船上备有好酒好菜，让这些在故乡习惯享受的旅客也无可挑剔。他们还没见

到威尼斯，似乎已经在威尼斯贵族的家中做客。

从房间两侧的大窗户眺望船外，景色美不胜收。威尼斯贵族们的别墅集中于布兰塔河的两岸，这些出自帕拉第奥等设计师之手的建筑，正门都朝向河面，绿色的庭院围绕着白色的大理石房屋，壮观且优美。一排排华美的屋宇，令游客们目不暇接。

作为国有的“公交巴士”，“博其罗”在别墅群附近设有“车站”，因为别墅的主人们也喜欢利用“博其罗”来往于帕多瓦与威尼斯之间。如果有游客想利用停船的间隙，上岸参观一下大宅，完全不必担心主人家会拒之千里，反而是由于想看的宅邸太多无从选择，往往只能作罢。不过，有一件东西似乎是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非看不可的，那就是在很多人的游记中盛赞的保罗·委罗内塞的壁画。

随便提一下，如今仍然可以乘坐“博其罗”，它已经完全成了观光用船，航运期在5——9月。船舱内外的设计让人很难联想到18世纪时的优雅模样，服务更不值一提。不过从贴着河面航行的船上眺望两岸美丽的别墅群，还是能体会到200年前游客们的赞叹。屋主们大概在建造前就计算过视角，准备好让河上的人们仰头惊叹吧。

出了布兰塔河的河口富西纳（Fusina）便是潟湖，也就是大海了。在河川中航行遇逆风，可以用马匹在河两岸拉船，进入大海后只能靠船帆助力。看似一片汪洋大海的潟湖水面下，流淌着来自河川的水流，推动船驶向威尼斯。之所以沿着潟湖中血管般密布的运河航行，是因为只有这片水域的深度能够行船。大多数不了解情况的旅客们看见船升起船帆便兴奋无比，仿佛已经出了亚得里亚海。

不过，在潟湖上突然看到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即便是那些知晓自然科学的人们也会情不自禁。歌德说：

“没错，命运簿上属于我的那一页就是这样写的：1786年9月28日，

傍晚，德国时间5点，离开布兰塔河进入潟湖的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威尼斯。稍后我将站在那块土地上，尽情观赏这个美丽的岛屿，这个海狸共和国。”

海狸小巧玲珑却很勤奋，不愧是歌德，妙语如珠。

“博其罗”满载着心潮澎湃的旅人们，沿着潟湖的水流前行，然后犹如小溪汇入大海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朱代卡运河。这条连接威尼斯城与朱代卡岛的宽阔运河，和其他运河一样都是天然水道，如今仍然可通行数万吨级的船只。进入朱代卡运河后，“博其罗”即刻向左，朝圣马可码头方向驶去，船的正前方出现了元色官邸的玫瑰色墙壁，这里就是海狸共和国的正面大门，左则便是张着嘴巴的大运河河口。

无论是中世的朝圣客、18世纪的精英人士，抑或现代的旅行团，踏上威尼斯土地后，首先会前往投宿地。在土地有限的威尼斯，除了少数富豪之外，一般人家都不会有多余的房间，再加上贵族家很难让客人寄宿（其原因将在下文中表述），因此，哪怕在当地有熟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入住酒店。

早在1355年，威尼斯便出台了旅馆法，还建立了旅馆公会，接待外国人相当得心应手。住宿设施种类齐全，既有王侯贵族下榻的高级酒店和商人们利用的商务旅馆，也有提供给朝圣客的几乎免费的住处。18世纪造访威尼斯的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数会选择“白色狮子馆”“法国之盾馆”“英国女王馆”“马耳他十字馆”“雄鸡馆”“人鱼馆”等最高等级的酒店，歌德就是住在“英国女王馆”。

威尼斯高级酒店的分布，在1797年共和国灭亡后的20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司汤达在1815年造访威尼斯时虽然也住在“英国女王馆”，但那个时候大运河两岸的贵族宅邸已纷纷易主，以1822年达涅利酒店

（Hotel Danieli）的出现为转折点，从此以后贵族宅邸改建的酒店，代替了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老牌酒店。

被奥地利占领之后，威尼斯贵族在各方面都走向没落，既没有像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那样为方便卸货在运河边建造房屋的必要性，也失去了维持豪宅的能力，所以不得不脱手变卖宅邸。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威尼斯的高级饭店聚集在大运河沿岸，像达涅利、格瑞提（The Gritti Palace）、欧罗巴（Hotel Europa）等酒店，延续至今。

不过在贸易优先于观光的旧时代，高级酒店的景观的确差强人意。由于位于城中，视野统统被小运河对岸与酒店高度相同的的建筑物遮挡住。19世纪上半叶，高级酒店在大运河沿岸兴起，“英国女王馆”“白色狮子馆”等皆沦落为三流酒店。威尼斯经济轨迹的推移，可以从酒店的分布变化上窥见一斑。

说回18世纪。在那个时期来到威尼斯的游客们，最先被吸引的是踏出酒店，脚下便是运河，还有那像黑色水鸟般穿梭于河面上的贡多拉。

当时的贡多拉，和如今所见略有不同。虽然流线型的造型和漆成黑色的船身古今不变，但那时的船上还多了一个叫作“felze”的小船舱。船首和船尾各有一名划船手，速度肯定比现在一个人划要快很多。18世纪也是贡多拉作为实用交通工具，而非旅游道具的最后一个世纪。

对于那些习惯了马车叽嘎声的人们，在水上乘坐贡多拉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某位法国的旅人在其游记中曾经感叹，坐过贡多拉之后，再坐马车不免生出几分犹豫。

运河是给游客们的另一个惊喜。傍晚抵达圣马可码头后，直接进入酒店的客人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无论之前是否对运河有所耳闻，每个

人都会被眼前蛛网般密集的运河所震撼。有游客叙述说，身处威尼斯城中，不会觉得它的特别，巴黎、里昂都是沿河而建的城市。然而想到每一步都是踩在海上，顿时感觉大不同。

当时的威尼斯还是共和国时代。建国时树立起的“水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的传统思想犹存，填运河造地的行动尚未开始，威尼斯人仍然在为调节海水与河水的流量，时刻绷紧着神经。与如今相比，当时运河之水更流畅，也更澄净。

在运河如蛛网般密布，跨河的石桥设计成拱形以便船只通行的威尼斯，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人出行都是利用贡多拉，或者步行。贡多拉清一色漆上黑色，没有身份之别，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游客们印象深刻。还有那些唯恐开会迟到遭罚款的议员们急匆匆穿过圣马可广场，奔向元首官邸的景象，在当地实属平常，但看在北方的欧洲游客眼里，却是十分的新奇。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些知识精英们对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兴趣。

威尼斯唯一允许外国人参观的政治活动就是国会选举。千名以上的议员井然有序地进行复杂且次数繁多的投票，看得参观者们目瞪口呆。不过，这些看客们大多也是来自统治阶层，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表面看似民主的选举，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

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贵族数量锐减，内部的贫富差距固定化，买票卖票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威尼斯共和制曾经充分地发挥了功效，正因为有一大批能力和财力兼备的人组成统治阶层，然而到了18世纪，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

尽管形势今不如昔，但只要不反对国家体制，威尼斯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还是足够令同时代的外国旅行者刮目相看。那些来自启蒙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游客们，面对威尼斯出版业的自由兴旺，在自叹不如的同时大肆采购，可又担心书籍寄回故乡会为自己招来麻烦，不得不暗度陈

仓，将书籍寄往随从的老家。

在威尼斯，言论同样是自由的。任何想表达意见的人，都可以去圣马可广场，站在石阶上畅所欲言。旁听者大约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情形与现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有点儿相似。

对于威尼斯的信仰自由，某位法国旅行者曾经写下这一段记录：

“在威尼斯也有宗教审判，然其利爪已被剪断，形同虚设。宗教法庭的神职法官们，凡事都必须征得政府派来的另外三位法官的同意。倘若提议稍稍过激，只要政府派来的法官中有一个人起身离开，提案便遭彻底否定。

“神职者在威尼斯无法发挥其所长。任何威尼斯市民，一旦从事神职，便丧失了所有担任公职的权利，可谓是贤明的政治。这种做法也有利于神职者，因为那些喜爱宁静生活的人，只要选择了神职，就不会再受尘世间的干扰，不像其他国家，得遁入修道院才能拒绝公职。”

然而，令外国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的威尼斯，竟然限制本地人尤其是参与政治的贵族们，与身份地位显赫的外国人密切来往。

像歌德那样连导游都不雇用，只身一人游走四方专注于旅途风情，压根没打算结交当地权贵的人自然是无所谓限制，但很多游客还是希望认识些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当地贵族。所以，当他们听说没有机会时，不禁会叹息威尼斯贵族的封闭性。“可以在咖啡馆或街上交谈，但几乎不可能受邀去家中做客。”

威尼斯政府非常担心本国贵族中的一些不满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起反体制运动。以前，西班牙大使和法国大使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图，

虽然两次行动都在事前被镇压，没造成大碍，但从此之后政府的监管变得更为严格。危险的思想可以阅读，人与人的接触却不被允许。这个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的规矩，大概也是进入衰退期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吧。

在威尼斯以贸易为主的时代，这种事情既无法禁止，本国的统治阶层也无意勾结外人反对体制。到了以农业为主的18世纪，生活得以自给自足，但与外国人交流的必要性却因此降低。

在威尼斯，大概没有比驻外使节更无聊的工作。虽然外交官的特权受到完全的尊重，不必担心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却不能与当地的上层阶级交往。无奈之下，这些外国大使们只好轮流设宴，自娱自乐。所以，那些身份尊贵的游客们的到来，不仅受到他们自己国家大使的热烈欢迎，也让他国的使节们喜悦万分。

令外国游客们更诧异的是，威尼斯的男人不得亲近，女人倒是毫不设防。

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中，曾经介绍过16世纪的威尼斯已婚女性享受的自由和未婚女子受到的拘束，以及因家里为省下嫁妆钱等非宗教理由，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不幸的姑娘们的种种反叛。

然而，进入18世纪后，女性无论结婚与否，哪怕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修女们，几乎都能够自由地享受人生。

已婚女子可以完全地享用第七章中提到的“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甚至有人在结婚时就将这条写进了契约中。未婚女子的自由度虽然无法与人妻相比，但可以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后，谁知道她是已婚或未婚呢？

18世纪时的修女们，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以隐晦的方式去争取自由。

修女们可以在叫作“Parlatorio”的会客厅里尽情地与访客们交谈，没有人干涉，也没有时间限制（虽然中间还是隔着一条铁栅栏）。修道院还有当时最流行的饮料咖啡、热可可供应，条件堪比华丽的沙龙。

探访修道院的客人准许着光鲜的衣裳，不想露脸的人，在狂欢节等节日期间可以戴着面具。而被访的修女们虽然用白色丝巾裹住长发，但身上的衣服只要是白色的，哪怕袒胸露背也没有问题。来自北方的旅客们见此情景，不禁惊呼：“宛如我们国家上演的古代剧中的女主角。”

18世纪的修女服的款式相对简单，再加上又是白色，让男人们无法不对那清纯的装束下若隐若现的身体，心往神驰。

约修女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见面，其实也不算难事。在假面节期间，只要乔装打扮一下便能蒙混过关。据说威尼斯最古老的三家修道院还争相为教廷派驻的大使提供情妇呢。

要说最让这些精英游客们痴迷的，还属威尼斯的女演员和女歌手。自17世纪下半叶起，戏剧和歌剧开始在威尼斯盛行，18世纪时，威尼斯已经成了西欧的戏剧中心，名角们自然也是深得人心。读过森鸥外[1]翻译的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大概都记得书中有关观众痴迷女高音安侬齐雅达的描述吧。市面上销售着大量类似今日明星照片的演员画像，游客们常常会买下带回家乡。

这里介绍一段趣事。1786年2月26日，大约是歌德造访威尼斯半年之前，位于圣马可广场的咖啡馆“弗洛里安”（Caffe Florian）的主人瓦伦提诺·弗洛里安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撤除刚刚颁布的禁止女性出入咖啡馆的法令。他的理由是店里没了女客，连男性客人也不愿光顾。结果，政府坦率地接受了意见，反省不该妨碍店家的正常营业，很快便废除了法令。不仅是咖啡馆，威尼斯女性甚者还能自由地出入赌场。

由于普通女性享有众多的自由，类似于日本艺妓的职业娼妇“政

妓”的存在性因此变得越来越稀薄。16世纪初时“政妓”的人数超过了一万，到了18世纪，不仅人数锐减，而且素质也明显下降。16世纪造访威尼斯的达官贵人，包括蒙田（Montaigne）在内，都会专程去向这些名闻遐迩的女子致敬，但在18世纪的游人笔记中，却找不到相关内容。他们并非完全不涉足那种地方，只不过更多的是单纯的肉体交往。这些女子再怎么姿态优雅，终究是娼妇。

出身和教养兼备的贵族女性，出身和教养不输前者却让人有种遥不可及的修女，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同时活跃于社会，“政妓”们的风头自然是不比从前。

在18世纪不断增长的自由女性们，待客方式也非常有趣。她们不会准备山珍海味，将屋子点得灯火通明，以博取北方客人的赞叹。访客通常会经过若干昏暗的房间，来到客厅坐下与女主人清谈一番。尽管对话的内容十分充实，但其间享用的食物只有西瓜和咖啡。以豪华著称的威尼斯贵族女性，生活竟然如此简朴，这是客人们始料未及的。

与全盛时代相比，威尼斯当今的经济的确式微。然而，客人经过的那些未点灯的屋子里，随意摆放着的一个雕像，都能在伦敦市中心换一间房子；女主人抽屉里藏着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大抵不会输给法国女王。作为同性，我认为她们那种云淡风轻的待客方式是真正体现了女性的自信。

话说回来，游客们并不是把焦点全放在这类事上。虽说旅行是有教养的绅士不可欠缺的行为之一，但著名的观光地总归还是要去的。游客在威尼斯停留的时间，少则8天，长则一个月。相较于如今的大众旅行时代，当时游客们游览的地方更多，内容也更扎实。虽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将珍品、古迹统统收集在一起的博物馆或美术馆，观赏起来比较麻烦，但他们应该比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

和如今一样，当时圣马可等教堂都向游客开放。如果想观赏各个教

堂所收藏的宝物，即使没有本国大使的介绍信，但凡和教堂的神父通融一下，基本上都不会遭拒绝。参观是免费的，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捐些善款。

无论是圣马可教堂圆柱上的马赛克画，还是那座摆放在教堂正门前四座青铜马像，都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虽然有人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东西混居一堂、缺乏统一感颇有微词，但1204年作为战利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那4座青铜马像，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拿破仑似乎也有同感，这位法国将军在征服威尼斯之后，向法国送回的第一件战利品就是这4座马像。

元首官邸也可以自由参观，只要不是正在开会的房间便无须特别的许可。为了防止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游客们迷路而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官邸专门有人负责导游。这些精英游客总体人数不多，政府雇几个导游应该不会花费太多。

在共和国尚存的时代来到威尼斯的这些旅行者们，虽然无法见识开会时的场面，不过能够近距离地看见出入元首官邸的威尼斯的政治家们，也算是一种补偿。

那些身穿黑色长袍，或者是以颜色区分职务的红色、紫色长袍的海狸的后裔们，带着法国流行的银色假发，但几百年来戴在威尼斯男人头上的黑色贝雷型帽子，既不能丢，也不能滑稽地顶在假发上，所以很多人只好拿在手上。参观元首官邸无须费用，只要付给导游一点儿小费即可。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是游客的必到之处。那时不像现在装有电梯，众人必须沿着螺旋式楼梯，一步步爬到楼顶。当时的钟楼里还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用来囚禁外国重要囚犯的房间，游客们要经过那里才能到达顶楼。

从钟楼的顶端眺望浮在海面上的威尼斯街道，景色应该与今日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街道自16世纪完成建设后，时至今日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有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游客们可以见到停泊在钟楼正下方的圣马可码头和对面斯基亚沃尼河岸的加莱船和帆船，也许还能够望见从码头起航前往利多外海或者是朱代卡运河上，大小帆船张满风帆一路向前的勃勃英姿。甚至有人可能会和像歌德一样，因为幸运地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威尼斯舰队而感动不已。

那些在5月造访威尼斯的游客们，可以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很幸运地见到“威尼斯教”最大的祭典仪式——海婚节。

当然，这些有文化知识的游客们，都很清楚威尼斯早已不是海洋国家。以现实的眼光来看，这种以婚礼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大海属于威尼斯的祭典，实在是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在18世纪，至少还是能够体会到形式上的乐趣。

共和国元首从潟湖乘船前往利多，将象征婚姻的戒指投入海中。他的御用船叫“布奇托罗”（Bucintoro），每隔10年便重新打造一只。红色与金色相间的御用船，迎着春天灿烂的阳光，航行在蔚蓝的大海之上，这个场面足以让来自北方的旅人们心旷神怡。

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下令将“布奇托罗”毁之一炬。如今我们只能从存放于海军博物馆的模型和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绘画中去想象它曾经的辉煌和美丽。在共和国灭亡后造访威尼斯的司汤达、拜伦、乔治·桑等文豪们，应该和我们有着同样的遗憾吧。那些在共和国余命尚存的年代来到威尼斯的人们，即使没有遇上“海婚节”，还是可以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里，见识到这艘壮观的元首御用船。

说到18世纪以后的游客们最大的遗憾，非国有造船厂莫属。被称为“Arsenale”的造船厂，如今既不是船厂也不是军火库，因为设有意大利海军办事处，所以没有开放全域。18世纪的游客们比我们幸运。船厂

的规模虽然不能与海上强国的时期相比，但仍然在造船，也存放着武器。对于这座史上著名的“Arsenale”，各国精英游客们谁都不会错过参观的机会。

法国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的名士夏尔·德·布洛斯（Charles de Brosse）在1739年来到威尼斯时，造船厂正在建造18艘大型帆船，47年后歌德在参观造船厂时，也看到了制造工程，还登上了载有88门大炮的帆船。对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经历羡慕不已吧。歌德的观后感也很有意思：“这里，早过了全盛时期，却保留着最美妙的部分，宛如一个古老的家族。”

共和国灭亡后，改头换面的还有圣马可广场。尽管它的变化程度不及造船厂，但歌德和比他晚来30年的司汤达，两人看见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景象。圣马可教堂的东、北、南三面没有什么改动，但广场西侧一带的建筑物是共和国时代结束之后建成的。原本位于圣马可教堂正对面供奉圣吉米尼亚诺的教堂，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盖起的宫殿形的建筑，是拿破仑的行宫。

虽然18世纪时，美术馆尚未出现，但游客们并不缺乏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公开展示的地方除了元首官邸、各教堂之外，各行业公会的大会堂里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甚至个人的收藏品也可以参观欣赏。去人家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介绍信，大多的主人都会表示欢迎。也许是因为来访的旅行者人数不多且身份高贵，所以主人家并不介意这些陌生人进入家中。随便提一句，威尼斯城中不设军队但良好的治安情况也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上文提到的法国名士布洛斯曾经写过一本威尼斯艺术品的目录，其中的数量和质量，远远高于当今。翻看这本目录，会发现有不少东西如今被收藏在卢浮宫或是伦敦国家美术馆。它们有的是在拿破仑占领威尼

斯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有的则是被那些经济窘迫的贵族们卖给了英国人。当时的英国，其强势的地位犹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威尼斯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完善，但后人能欣赏到的艺术品完全不能和18世纪的前人相比。

在共和体制健全的时代，艺术品禁止流往国外，哪怕收藏者有变卖的需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奎里尼家族曾经打算将一件传家宝卖到国外，那是一座古罗马时代制作的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全身雕像。“十人委员会”闻讯后，派人去奎里尼家，对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何事的主人家说：“十人委员会祝愿马库斯·阿格里帕一路平安，也祝奎里尼大人您旅途顺利。”

奎里尼不得不拆下雕像的包装，就此作罢。他不能为卖掉一件古董而被驱逐国门。

威尼斯政府在防止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流失的问题上相当敏感，对当代艺术品的态度倒是非常宽松。不重视当代艺术，也许是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的通病吧。正因为如此，其他国家收藏的18世纪的威尼斯绘画作品的数量，要远高于威尼斯。

随着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三位巨匠的出现，威尼斯画派在16世纪迎来了黄金时代。尽管之后盛世不在，但威尼斯画派在18世纪时，仍然引人瞩目、人才辈出。乔瓦尼·巴蒂斯塔·蒂耶坡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绰号“卡纳莱托”的安东尼奥·卡纳列（Antonio Canale）、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这些画家的作品，绝对值得任何一流的美术馆为他们专辟一室。

除了蒂耶坡洛的作品以古代为主题，卡纳莱托、隆吉、瓜尔迪这三位画家的焦点都锁在威尼斯。如果说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着重表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精神力量，那么，18世纪的这三位画家只专注于

威尼斯的景色风光。这和威尼斯从强国变成观光地多少是有点儿关系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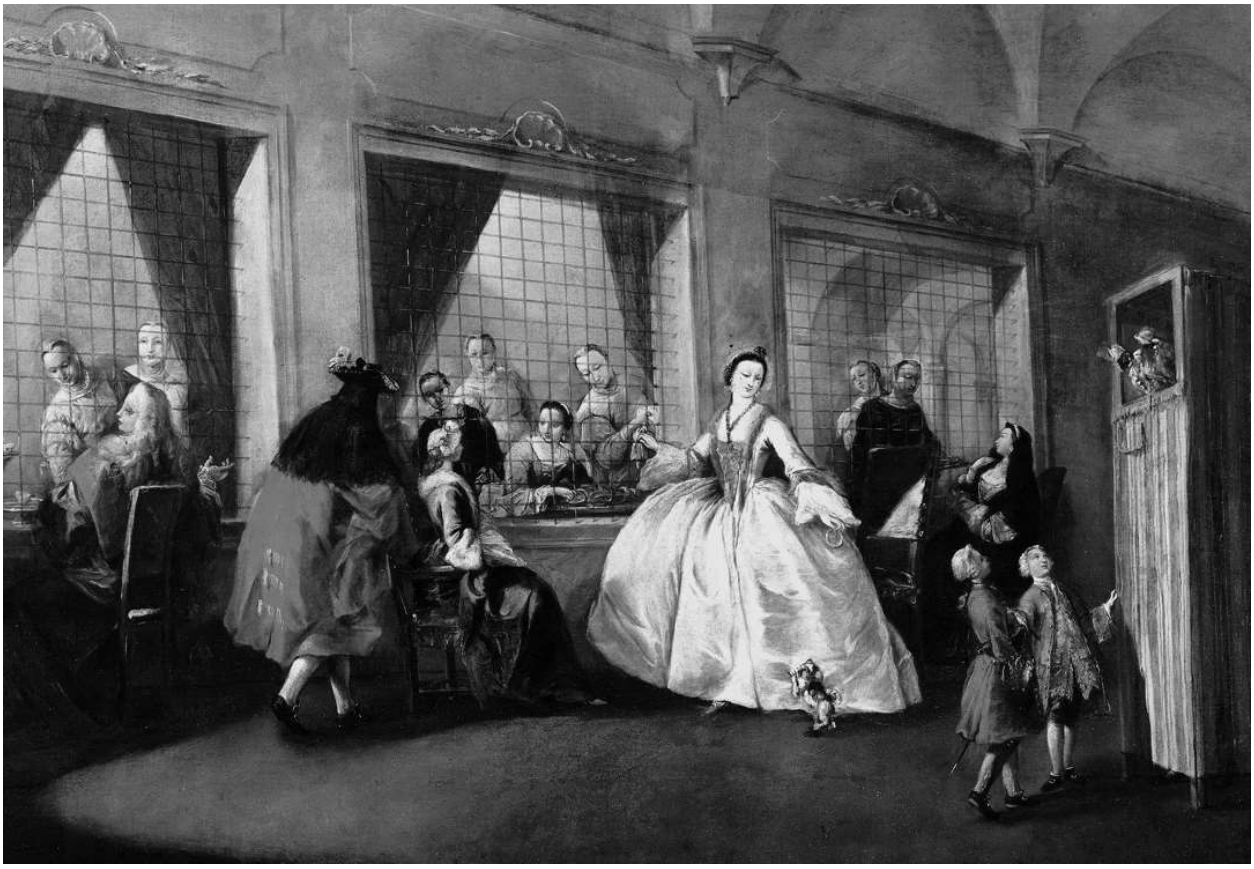
从海上看到的元首官邸（卡纳莱托 绘）

卡纳莱托的作品是因英国人的追捧而闻名的。作为当时的经济大国，很多英国人为了成就绅士教养来到威尼斯。在没有照片和明信片的年代，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会买下准确描绘威尼斯街景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作为旅行纪念带回故乡。

由于这些身份地位高贵的游客们在威尼斯通常会和本国的大使见面交流。发觉国人这个喜好的英国大使史密斯便开始做起了卡纳莱托的经纪人。就这样，大量卡纳莱托的画作，经史密斯之手流向了英国。

史密斯的买价似乎很低。原本有人问津就很开心的卡纳莱托，随着作品销路越来越好，逐渐心生不满，打算跳过史密斯，自己直接卖画。1739年造访威尼斯的法国人布洛斯在其文章中曾经提及，由于需求过

大，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卡纳莱托的作品。作品价码的不断上升，给了卡纳莱托自信。1750年，他带着数张画作，渡过多佛海峡前往英国。



修女院会客室的风景（瓜尔迪 绘）

卡纳莱托的英国之行大获成功。在旅居英国10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伦敦、牛津为主题的风景画。如今，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可以欣赏到他的部分作品，不过英国王室和贵族收藏了更多的画作。如果要举办一个卡纳莱托全部作品展览会的话，英国肯定是首选之地。

瓜尔迪比卡纳莱托年轻15岁，同样出生于威尼斯，也同样是一位擅长描绘威尼斯风情的画家。不知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卡纳莱托受外国人欢迎，还是比卡纳莱托更受本国人的喜爱，瓜尔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威尼斯。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作品并列挂在起居室，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画风的不同。如果将卡纳莱托的画比作是光，瓜尔迪的画便是影。卡纳莱

托笔下是安静的，而瓜尔迪则是流动的，更接近浪漫派。

在我对威尼斯历史尚不熟悉的时期，比较偏好瓜尔迪的作品，他的画有一种诱人进入未知世界的魅力。然而，在我即将完成威尼斯历史，看着它走过一生的当下，却喜欢上了有明信片之嫌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也许是因为此时的我，已是满心的感怀，对那些引人入胜的东西，多少是有点儿不能承受了。

另一位画家隆吉，一生都在画着同胞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透着温暖，时而也带点儿嘲讽，但在感情上还是相当克制，尽量以平静笔调描绘着威尼斯的风俗。隆吉生前并没有引起多少外国人的关注，因此，留在本国的作品多于上述两位画家。不过在共和国灭亡之后，其作品也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如今的我们能目睹那些幸运保存下来的遗迹，便感到十分之满足。但18世纪的游客们要求的可不止这些，因为那时的威尼斯还是鲜活的，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呈现，比如说音乐和戏剧。

音乐和戏剧融合一体的歌剧，据说在1600年前后诞生于佛罗伦萨和曼托瓦。大约在10年之后，歌剧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Claudio Monteverdi）应威尼斯政府之邀来到当地。在他的指导下，威尼斯歌剧很快成了欧洲的前锋。

原本只属于宫廷余兴的歌剧，1637年首次在剧场公开上演，只要付钱买票，人人都可欣赏。这种公共剧场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威尼斯，一来是因为共和国没有宫廷，二来是威尼斯人向来有全民自由参加祭典的传统。到17世纪末期，威尼斯共有17家剧院，其中至少有4家每季都有歌剧上演。仅14万人口的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剧院，真是让人既惊讶又羡慕。顺便提一句，如今的威尼斯城只有一家剧院。

乔装的男女（隆吉 绘）

17世纪是威尼斯歌剧鼎盛时期。不过，相较于故事情节和音乐，那时的观众们似乎更爱不断变换的舞台布景。各种幻想、战斗、船难的场面以及诗一般的田园风景……许多威尼斯人因为喜欢看舞台从而爱上了歌剧。威尼斯的舞台设计在欧洲大名鼎鼎，不少设计师甚至受聘前往巴黎、罗马、维也纳等地。卡纳莱托的父亲就是一名舞台设计师。

维瓦尔第肖像

进入18世纪后，歌剧依然人气不减，单独的音乐演出也逐渐多了起来。威尼斯能够成为欧洲一流的音乐国家，是因为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父亲是圣马可教堂的小提琴手，他本人也是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由于担任神职工作，又有一头红色的头发，所以被人称作“红发神父”（Prete Rosso）。维瓦尔第一生中写了40余部歌剧，但他最大的才华是在器乐

体裁，特别是协奏曲的创作。

维瓦尔第在当时就颇有名气，巴赫演奏过他创作的曲目。1716年，阿姆斯特丹还出版了他的乐曲集。他本人也曾经受邀去罗马、曼托瓦、佛罗伦萨等地演出。

此外，维瓦尔第还担任过类似音乐学校校长的职务。威尼斯自古以来有4家大医院，医院属下还有孤儿院。维瓦尔第的工作就是教导孤儿院的女孩们学习音乐。这个音乐学校从17世纪末期开始得到国家的援助，学生们无论是器乐或声乐都演技精湛，吸引了所有到访威尼斯的游客。

在演唱歌曲的女孩中后来诞生了数位明星，因为有贵族的后援，不少人都成了成功的歌手。这些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们，通常只有去大户人家或修道院做佣人的黯淡未来，但如果有一些音乐上的才华，嫁入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学生们都学得非常认真。作为老师的维瓦尔第想来也会为这群勤奋、优秀的女弟子们而感到骄傲吧。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就是被其父亲送来威尼斯，在这类音乐学校学习技艺的。

以维瓦尔第为代表，阿尔坎格罗·科莱里（Arcangelo Corelli）、阿尔比诺尼·托马索（Albinoni Tomaso）、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等作曲家的活跃，使得威尼斯乐派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威尼斯也成了西欧音乐的一大中心地。相信日后来到威尼斯的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必定在音乐上获取了甚多的经验。

在18世纪与音乐同时迎来全盛时期的，还有戏剧。它同样是面向公众售票。

剧场的内部设计，与今日欧洲的歌剧院基本相似，但一楼中间的座

椅只提供给庶民女子，其他人都站着观看。威尼斯剧场没有特别的贵宾席，贵族的包厢也都是统一设计。当然位置越往上，票价就越便宜。开幕前的剧场，热闹非凡。小贩们殷勤地兜售着糖煮苹果、梨子等小吃，也有人把茴香水、咖啡、冰淇淋、橘子、甜甜圈、干栗、南瓜子等各种零食放在一个篮子里，提着它在剧场里跑来跑去。

大幕拉开后，小贩们不再吆喝，但场内仍是一片喧嚣。挤在舞台前排的贡多拉船夫们，但凡演员登场，必大声鼓掌叫好，澎湃的激情让包厢里的老爷太太们也乐不可支。这也成了威尼斯剧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大特色。

贡多拉的船夫们不是真爱戏剧。剧作家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对这些不得不在剧院外等候客人的苦力们心生怜悯，特地在舞台边划出一块区域，供他们免费观赏。阅人无数的船夫们，对剧情的反应敏锐且准确，据说带给哥尔多尼不少灵感。

除了画家卡莱纳托、作曲家维瓦尔第，喜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也是一位为18世纪的威尼斯文化带来光辉的人物。哥尔多尼出生于威尼斯的医生家庭，成年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去大学学习法律。在写剧本不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法律工作为经济并不富裕的哥尔多尼挣得了生计。不过，他还是常常逃课跟着剧团四处巡演，看来是天生热爱戏剧。

在哥尔多尼出现之前，意大利盛行插科打诨的“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演员大多戴着假面，台词基本上是靠当场发挥。

哥尔多尼摒弃了即兴表演的旧习，要求演员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于长期的剧团经验，哥尔多尼熟知每个演员的才能和性格，因此演员很快就能记住他写的台词。没多久，剧团便正式委托哥尔多尼编写剧本。1749年，年过40的哥尔多尼与剧团签订了一年8部剧本的合同，剧本费是450达克特。按照合同中的金额，哥尔多尼的年薪大概能

够与蒙特韦尔迪（Monteverdi）相媲美。不过，在18世纪，剧作费尚未独立计算，估计哥尔多尼最终无法拿到全额。

哥尔多尼肖像

时至今日，哥尔多尼的作品仍然是米兰皮科洛剧场（Piccolo Teatro）的保留节目，日本也上演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哥尔多尼的戏剧比现实更接近现实，即使人物戴着面具亦不失自然之性。歌德在威尼斯观赏过哥尔多尼的戏剧之后，不禁感叹："我终于可以说，我看到了一出喜剧！"

在精彩好戏渐少的当今，唯有歌德的文字，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18世纪威尼斯剧场之中，感受剧作家、演员、观众融为一体的那种幸福的氛围。他在《意大利游记》中那段对威尼斯剧院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说是对18世纪威尼斯戏剧以及哥尔多尼成功原因的最佳诠释。歌德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人们又成为戏剧赖以生存的基础。观众参与演出，与舞台上的剧情水乳交融。白天，他们是买方和卖方，是乞丐、贡多拉船夫、接生婆，律师及其对手，在广场、小路，贡多拉上、大屋内，大声叫喊、发誓、悲鸣、推销叫卖、唱歌游戏、亵渎神灵，自有不同的生活。当夜幕降临，人们走进剧院，观看和聆听他们白天的生活。通过艺术再现的日常，显得温文尔雅，虚构的故事和面具使其脱离了现实。但戏中所呈现的风土人情，又再次拉近了观众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舞台上的一切，观众们像孩子般兴高采烈。他们不断地大叫，鼓掌喝彩、放声大笑，从清晨到夜晚，不，应该说从午夜到午夜。对他们而言，人生即是如此。"

有趣的是，不仅是喜剧，观众在观赏悲剧时同样反应激烈。当威尼斯悲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卡洛·戈齐（Carlo Gozzi）的作品在剧场上演时，中间出现暴君交给儿子一把剑，令其杀死站在边上的妻子的场景。台下的观众突然发出抗议，大叫着："岂有此理！"由于抗议的声浪过大，戏被迫中断。观众们要求暴君收回利剑，这戏还怎么演下去！情绪激动的

观众弄得台上的演员们手足无措。这时，扮演儿子的演员站出来对着台下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请各位暂作忍耐。

当时在场的歌德，一定是笑得乐不可支。他在文中写道："从剧本的角度而言，那一段与整体内容相悖，既奇怪又愚蠢。所以，我愿意站在感觉敏锐的观众们一边。"

对喜剧或悲剧，感觉敏锐的不仅是站在剧场一角免费观看的贡多拉船夫和挤得水泄不通三楼的平民观众，那些优雅地坐在一、二楼包厢里的贵族、富豪们，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能反应还是一样的。如果剧情无聊，众人便开始说话聊天，忍无可忍时，会拿起手中的扇子敲打扶手。贵为元老院议员，照样会不顾及周围的看客，大声长叹："今晚的戏真是令人绝望！"，然后噼里啪啦地踢开椅子，拂袖离去。

面对这些挑剔的观众，威尼斯的剧作家和演员们，势必是战战兢兢。话说回来，观众们倒不是否定虚构，但虚构的情节必须有说服力，能让大家陶醉其中。在威尼斯时每晚都去观戏的歌德，几乎每每都会在剧场遇见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任大使的夫人玛利亚·奎里尼。这位超级戏迷的贵夫人，在1795年从巴黎寄给威尼斯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也经常去看戏。巴黎的观众和威尼斯的观众大不相同，演出中没有人会说话，从头至尾，每个人都很规矩、安静。"

奎里尼夫人的信，让我想起曾几何时听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说过的一段话："在罗马和米兰，人们去看电影的心情是不同的。米兰人为了提升修养而进电影院，罗马人则为了寻求快乐。所以，两地人对剧情的反应相差甚远。"

除了上述的内容，威尼斯另外还有两项令18世纪的北方游客们兴趣盎然的特色活动——赌场和狂欢节（Carneva）。今日的游客也有机会

体验这两项活动，不过规模已经很小，成了单纯的娱乐，不像那个时代，虽然内容有些负面，却韵味十足。

威尼斯人不是在18世纪才突然迷上赌博的。水手们会以赌博来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海上日子。16世纪时，有人写信给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的儿子，告诫他不要参与船上的赌博。可见，威尼斯人和赌博的关系缘来已久。政府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曾经在元首官邸一楼的回廊上摆上闲坐的石椅，没想到有人曲解了这份好意，在此聚众赌博，让官家伤透了脑筋。不过，在威尼斯人有很多正事要忙的那个年代，赌博基本上还属于怡情的程度。

1638年，威尼斯开设了第一家合法的赌场。这家由贵族马可·丹多洛（Marco Dandolo）经营的赌场位于圣莫伊塞桥附近，通称“圣莫伊塞赌场”（Ridotto di San Moisè）。Ridotto的意思接近于“沙龙”，进入18世纪后，此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威尼斯。和剧院一样，赌场的持有人大多是贵族。

进入赌场豪华的玄关，首先经过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沙龙。在那里，有咖啡、热可可、奶酪、葡萄酒等饮料提供，不打算赌博的人可以就地坐下喝饮品，聊聊天，倘若脚步继续向前，里面便是一间间令人心跳加速的游戏房了。

每张赌桌上都坐着一位贵族主持赌局，力保全过程在优雅的气氛中进行。庶民也可以玩，不过他们另有专属区域。和剧院不同，赌场因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威尼斯规定，贵族赌博时必须戴上假面。

与外间人声鼎沸的沙龙不同，房内非常安静，只听得见切牌的声音。在奇异的白色面具掩盖下，赌客们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他们摸牌的

手看出些端倪。大把大把的金钱在桌面上移动，一夜之间，有人输掉了帕拉第奥设计的华美别墅，也有英国地主耗尽了一年的意大利旅费。

黎明来临，有些赌客会散步去里亚尔托的早市，释放一夜的疲劳。威尼斯警察的记录中没有跳河自杀的记载，也许当时的赌客们都有着坦然接受命运的格调吧。话说回来，当时在欧洲，威尼斯赌场的高额赌注是十分出名的。

说到狂欢节，感觉和威尼斯的剧场的气氛非常接近。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同一时期进行，两者都是演出，只不过嘉年华的舞台更大，是整个威尼斯城。

基督教国家的嘉年华会通常都在新年过后的1月6日主显节（Epifania）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旬斋节（Lent）当日，长达两个月之久。当节日接近尾声，即从“肥美的星期四”到“肥美的星期二”的一周左右，狂欢节进入了最高潮。

在18世纪的威尼斯，狂欢节从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便已经开始，持续至12月15日。戏剧节也同时开幕。不过，这个阶段的狂欢节活动只限于下午举行，其余时间的作息一如平常。除了清晨早市休业之外，店家依旧是上午8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政府机构正常上下班，咖啡馆营业至午夜12点。不过，从下午1点开始，人们可以乔装打扮，戴上面具。

从12月15日开始至圣诞，为了表示宗教上的敬意，乔装和剧场演出一律禁止。狂欢节活动在圣诞节结束后的第二天重新开始，直至四旬斋节。狂欢节再开之后，人们可以终日戴着面具，穿奇装异服，店家等照常开门做生意。大白天戴上面具，哪怕只是去街角买个面包，也绝不会被人耻笑。黑夜降临后，各个剧院竞相打出人气剧作家和演员的招牌，争夺观众，这是剧场最卖座的时节。

18世纪威尼斯的狂欢节，进入四旬斋节后还不算完，只是欢乐的气

氛相对收敛一些。四旬斋节结束后便是复活节，复活节后的一个月则迎来耶稣升天节。虽然这是全体基督徒的一个节日，但对共和时代的威尼斯而言却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也是与大海结婚的“海婚节”。

在“海婚节”前后的15天里，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个大展示会场。广场四周的回廊下临时搭建的摊位鳞次栉比，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身兼理发师和牙医两职的手艺人也在此设摊，替人修剪头发，拔掉坏牙齿。各家剧场自然是当仁不让地重新拉开了帷幕。直至1786年，圣马可广场的四周除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一侧之外，另外三边尽是由新古典派的圆柱围成的回廊。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是剧场的舞台直接搬到了广场。人们挖空心思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别人的模样，在广场上漫步游逛。5月和10月，是海上威尼斯最美丽、最舒适的季节。

如果只想做一个纯粹的看客也绝对不会无聊，光是看看那些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人们，便足够有趣。除此之外，大运河上有加莱船比赛，甚至还专门设有女子赛程。狮子、犀牛、大象纷纷登场，连气球都上场助兴。威尼斯人在作秀这一领域同样做得彻头彻尾，毫不含糊。

一年中有6个月尽情享乐的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色还是乔装。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扮成任何模样，有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土耳其、印度或阿拉伯人。不过，最受众人喜爱的，当属威尼斯喜剧中常常出现的丑角“阿莱基诺”（Arlecchino）、“潘特莱奥内”（Pantaleone）的装扮。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得弄得如此隆重，威尼斯人的乔装，其实很简单而且费用不高。

首先，要有一件长至脚踝、能裹住全身的黑色斗篷。这种棉质的黑色长袍威尼斯人一年四季都穿，所以谁家都不会缺。另一件不可或缺的道具就是白色假面。面具用几层白纸制成，用石膏粘住后剪出形状，鼻子像鸟嘴一般突起，只露出眼睛的部分，遮住上半张脸。年轻的女孩子，偏爱戴仅遮住脸中央的黑色假面，然后再覆上白色的丝绸盖住其余

的部位。

披上黑色斗篷、戴上白色面具之后，再用叫作“包塔”（Bauta）的黑色丝绸面纱从头盖到下巴。“包塔”通常垂到肩膀，可以裹住上半身，头上则戴着拿破仑喜爱的双角横向左右两侧的二角帽。

这样，乔装就算完成了。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装扮，不少人会根据偏好再另配装饰。

威尼斯式的面具，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接近于理想的装束。它没有男女之别、阶级之分，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可以消除年龄上的差别。在允许乔装的时期，戴上面具的渔夫可以自由出入贵族的宅邸，良家妇女可以混在妓女中间拉客，平素道貌岸然的元老院议员可以公然地将手伸进比孙女年纪还小的女孩的胸口，名闻遐迩的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可以在贡多拉的船舱里，拉上窗帘与贵族夫人幽会……只要戴上面具，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无须担心招惹是非。一旦隐藏住自己的身份，人生顿时变得轻松、多样。

在超过千年的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曾经几度创造了“神话”。上升期时对国家独立的执着，全盛期时巧妙的政治和外交，然后是18世纪在西欧人心目中树立起的极乐之都的印象，这些神话，几乎都接近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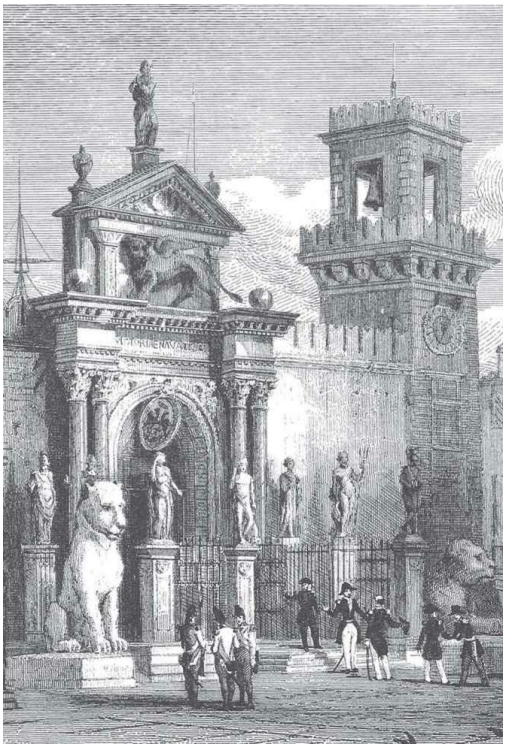
在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以及当时北方游客们留下的文字中，18世纪威尼斯的快乐并没有那种因末日将至而爆发的自我毁灭般的放纵，不过是充满了轻薄的欢愉，而这种氛围在每一个时代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如果说盛极必衰是不抗拒的历史规律的话，至少应该像威尼斯那般优雅地老去。犹如一个克服了种种病痛、试炼的老人，威尼斯以平静的姿态，迎接死亡。

---

[1] 森鸥外：日本大正至明治时期的文学家、翻译家。——译者注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1786年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在其《意大利游记》有关10月7日的这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圣朱斯蒂娜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Giustina）举行的弥撒。每年的今天，元首都会亲自出席这场庆祝（勒班陀海战）战胜土耳其人的弥撒。

教堂前的小广场边上，停泊着一艘艘元首及其贵族随从们乘坐的金色彩船。穿着特色服装的船夫们，手划着红色的船桨，神职者们和各行会的会员们手持点燃蜡烛的银质烛台，聚集在运河岸边，广场上挤满了

民众。在众人等待中，船上放下铺着地毯的栈桥。首先下船的是穿紫色长袍的法官们，紧接着是同样长衣曳地的元老院议员队列，最后出现的是头戴无边金黄色帽子，身穿金缕长袍，外披白色水貂短披风的老元首，后面跟着三位帮他提着衣摆的随从。

壮观的场面，与门上插着土耳其军旗的教堂相得益彰，宛如一幅构图、色彩绝佳的古代织锦画。

这个仪式，在我这个北方逃亡者的眼里，是那么的生动、喜悦。

在我们国家，再庄严的仪式，人们也身着活动自如的短装，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仪式，不过是持枪列队。如果场面弄成这般花团锦簇，一定会让人感到错愕。然而，这一切在威尼斯是那么的和谐，长衣属于和平且华美的庆典。

元首身材修长。也许有病在身，多少有些体弱之感。尽管身着重装，但动作稳健，不失尊贵。他看上去像众人的祖父，慈祥、和善。帽子下面的头巾遮盖着世上最美的银发，与那身华美的衣裳相映生辉。

元首身后跟随着50位身穿深红色长袍的贵族，几乎都是美男子，没有一个不协调之人。他们身材高大，头也大，很适合银色的假卷发，五官突出、肤色白皙，但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苍白。这些人看上去聪明自信、落落大方，而且全身散发出优雅、愉快的气息……”

可是，就在三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大革命的前一年，奥克松（Auxonne）连队，新加入了一位未满20岁的士官，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91年3月，结束了5年驻法大使任期的安东尼奥·卡佩洛（Antonio Capello），为履行卸任大使的义务，向元老院做了归国报告。

卡佩洛指出，路易十四时代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起因。无论何种政体，当权者均不能掉以轻心。在分析革命后的法国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发展时，卡佩洛认为，当下的法国，王权被剥夺，贵族遭敌视，所以不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但也并非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民主制。他断言，法国目前虽然有国民议会，但是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

目前的法国被一群相信破坏是走向社会建设唯一途径的人们，以及充满仇恨和嫉妒心的狂热分子所操控，除了国库的赤字，一切都在被消去之中。这种找不到出口的状态下，埋藏着向外宣泄的危险。卡佩洛对在场的元老院议员说道：

“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正积极地通过缔结友好关系或结盟来防卫国家的安全。虽然有违我们的本意，但威尼斯共和国不能再继续保持绝对中立的基本外交政策。在这种状态下，我想问问诸位，此刻是不是应该重新认真地思考？在冷静分析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之后，重新思考孤立主义是否真的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良策？”

卡佩洛非常明确地告诉议员们，互派大使并不等于安全，对法国充满敌意的英国，也在法国派驻大使。然而，大多数的议员都选择相信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法国的革命势力不会长久。

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是最省心的事情。结盟需要军力。但重新武装军队，经济、精神上都有压力。18世纪末期的威尼斯海军，虽然规模变小，但逐渐向近代化发展，陆军则由于100年没有战争，形同解散。这百年来，威尼斯始终奉行的是非武装、不结盟政策。卡佩洛的警示，显然是没有起到作用，共和国政府再次决定维持基本国策。而同一时间，在北方由英国主导的反法联盟逐渐形成。

1791年6月，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携王妃、皇太子逃离皇宫，却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又被送回巴黎。卡佩洛的后任阿尔维泽·皮萨尼（Alvise Pisani）大使接连不断地向政府发出了法国形势急变的报告。

然而，10月刚上任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却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路易十六的亲笔信。国王在信中表示期望一如既往地保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威尼斯政府对此欣然接受，并承认了国王所派遣的大使的身份。

11月，一份希望威尼斯加入反法同盟的机密文件通过威尼斯驻都灵（Torino）的大使传回国内。由于与法国一山（阿尔卑斯山）之隔的皮埃蒙特（Piemonte）的局势日趋紧张，为保卫这个意大利最前线地区，萨伏依王室、罗马教廷、那不勒斯国王、西班牙国王以及奥地利皇帝结成了反法同盟。然而，威尼斯拒绝加入，再次重申了绝对中立立场。

1792年4月，路易十六根据国民议会的要求，正式向奥地利宣战，国际对立公开化，开战后，法国节节败退。

8月，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遭民众袭击。国王一家在国民议会的保护下幸免于难。一路搜寻国王的群众企图冲进威尼斯大使官邸。皮萨尼大使告诉众人："王不在此，悉听尊便。"强硬的态度呵退了暴徒，官邸免遭洗劫。

事件发生9天之后，普鲁士军队突破法国国境，法国国内的混乱再度加剧，马拉（Marat）、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人取得了领导权。然而进入9月后，法国在战场上转败为胜，得知消息的威尼斯共和国再次重申中立立场，使得驻巴黎的大使皮萨尼的处境变得颇为尴尬。各国大使已纷纷撤离巴黎回国，深感危险的皮萨尼在英国大使撤回伦敦后，也决定暂时移至伦敦避难。为了表示威尼斯没有撤回大使，大使官邸内佣人、家具一切不动，另外还留下了数位情报官

员，佯称大使去了乡间休养。从那之后，有关法国方面的情报只好从伦敦、法国两地传往威尼斯。

同一个时期，在威尼斯国内，元老院议员弗朗切斯科·佩萨罗提出，为保证国家在混乱的时代得以生存，威尼斯至少应当重新武装军力。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11月，一年前开始筹划的以对抗法国为目的的意大利联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次向威尼斯发出了加盟的邀约。当威尼斯知道那不勒斯国王的背后是法国长年宿敌的英国之后，他们生怕刺激法国，拒绝加盟，并再次向各国宣告了威尼斯非武装、中立的唯一立场。

时间来到了1793年1月。在前一年已遭逮捕和审判的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威尼斯的情报官员向政府做了全程报告，内容正确、冷静、详细，极具威尼斯情报的特色，比狄更斯的小说更为精彩。不过，当这份报告在元老院被诵读时，议员们无不显露出本能的厌恶，但政府最终没有对此做出正式的表态。3月，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提出更换大使官邸门上的旧徽纹，威尼斯政府倒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换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

4月，因路易十六遭砍头而愈发同仇敌忾的欧洲各国，从四面八方向法国发起了进攻。4.5万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从阿尔卑斯山一侧，西班牙的5万大军从比利牛斯山脉一侧，西北方面是英国和荷兰的7万联军，东北战线则是奥地利——普鲁士的10万联军。恐怖政治气氛笼罩下的法国，雪上加霜地面临四面楚歌的状态，革命的势力如同风中残烛，岌岌可危。然而，威尼斯政府依然不改中立的立场。佩萨罗再次强调军备的重要性，虽然这一次附和他的人有所增多，但最终没能动摇元老院的决定。

5月，从法国逃至皮埃蒙特却仍感危险的普罗旺斯伯爵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了前往威尼斯所属的维罗纳避难的请求。时年39岁的普罗旺斯伯爵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殁后，其侄路易十七在狱中被保王党奉为国王，他自任路易十七的摄政。威尼斯政府同意伯爵以个人身份进入维罗纳，并向各国解释称纯粹基于人道立场。这位普罗旺斯伯爵就是日后逼迫拿破仑退位，重新复辟王朝的路易十八。

不到一个月，法国国民公会向威尼斯提出严重的抗议。威尼斯坚称出于人道才准许伯爵个人入境，不理法国的抗议。

不料，两年后的1795年6月，路易十七的死亡被确认，流亡在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竟然自行宣布登基。虽然登基仪式只是在他借住的宫殿的一角，草草地走了一个过场，出了宫殿仍然被称为伯爵，但还是给威尼斯带来了麻烦。不过，政府除了禁止当地的贵族进宫祝贺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

对于自称王位继承人的人物，正与法国交战的欧洲诸国是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英国派大臣麦卡特尼（McCartney）前往维罗纳，奥地利也火速将驻皮埃蒙特的大使，调往新国王身边。法国在获悉各国正图谋复辟王朝后，国民公会以及掌握实权的督政府（Di re c toi re e xé cu ti f）不断地向威尼斯发去了抗议信。如果按照法国的要求，威尼斯交出“叛国者”普罗旺斯伯爵，势必会得罪英国、奥地利，但继续任由伯爵留在境内，又会招来已经逼近意大利边境的法国军队。就这样模棱两可地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元老院终于在1796年4月投票决议。

根据投票的结果，赞成普罗旺斯伯爵离开维罗纳的156票，反对47票。于是，政府派使节前往维罗纳，向伯爵说明威尼斯的苦衷，要求他离开威尼斯领地。

伯爵及其一行在当月的21日离开了维罗纳。由于伦敦和维也纳方面在那时尚未向伯爵提供明确的收留地，他们只能先去因斯布鲁克暂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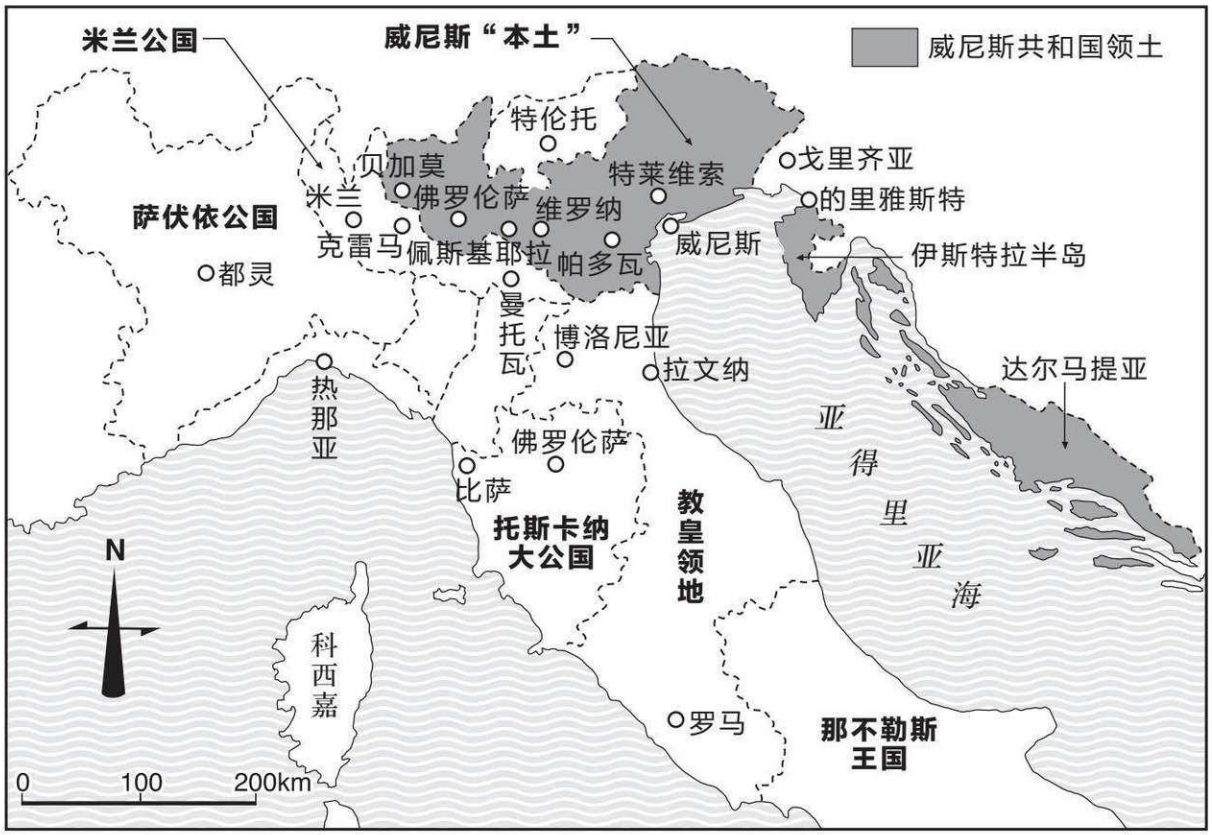
从此，路易十八开始了辗转各地的流亡生活，18年之后才得以进入伦敦。

不过，从结果上来说，普罗旺斯伯爵正是因为离开了威尼斯属地才保存了性命。就在他离开维罗纳的一个月前，位于尼斯（Nice）的法国军部，任命年仅26岁的拿破仑为意大利战线的总司令。法国军队因这位出身于科西嘉岛的年轻将军而彻底改头换面。

18世纪末，除文化之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皆沦为三流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唯有情报收集能力依然保持着全盛时期的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预测到拿破仑·波拿巴日后的出人头地。军官学校时期的拿破仑成绩并不优秀，而且出生于不久前还属于意大利的科西嘉岛。一直要到1795年10月以后，巴黎人才知晓了这位有着拗口名字的年轻军官。拿破仑有机会担负总司令之大任，可以说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当时督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打算和情妇约瑟芬（Joséphine）分手，但又觉得始乱终弃有损男人的风度。也许是为了补偿已年过30的情妇，巴拉斯决定替她安排好归宿，于是找上了拿破仑。

不愧为倜傥的法国人，巴拉斯让前女友带过去的嫁妆，是法军负责意大利战线的司令官一职。那个时候，不要说是心不甘情不愿出嫁的约瑟芬，就连巴拉斯本人也没看出拿破仑的真正价值，否则也不会如此提拔这位日后令自己失势的科西嘉男人。年轻的拿破仑对年长自己6岁的约瑟芬迷恋不已，但同时也是位野心勃勃的男人。总司令的地位给了他一个登场展示本事的绝佳机会。



18世纪的北意大利

拿破仑接掌的意大利战线的法国军队，无论在装备还是士气上都不如对手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但他没有片刻的犹豫。

1796年4月10日，上任才20天的拿破仑便与奥地利帝国军，在已成为法国领土的热那亚西部，展开了首次交锋。历经5天的战斗，最终法军取得胜利。法军乘胜追击向东败退的奥军，一直打到都灵附近。因战败而乱了阵脚的萨伏依公国，于4月27日单独与拿破仑缔结和约，法国轻轻松松地便获得了都灵。

士气高涨的法军，继续向东挺进。5月10日，在米兰附近再次与奥地利对战，结果又成了赢家，5月14日占领米兰。

与米兰公国边境相连的威尼斯行省，之前便涌入了大批米兰的难

民，此刻更是因为战争将至而动荡不安。奥地利军队不断地向国内撤退，如果法军紧追不舍，势必会侵入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

尽管拿破仑被孤立于米兰领地内，但他却要求威尼斯政府开放威尼斯所属的克雷马（Crema）让法军通过。另一方的奥地利军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根据威尼斯与奥地利签订的条约，威尼斯必须答应奥军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威尼斯政府，唯一做出的对策，就是选出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本土总司令，派其前往内陆。然而，当选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虽然肩负保卫本土行省安全的大任，手中却既没战略也无战力。

在福斯卡里尼到达法军参谋本部之前，拿破仑已先抢先一步找上了威尼斯。于是，克雷马地区年轻的代理长官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Giovan Battista Contarini）便成了第一位与拿破仑接触的威尼斯共和国的代表。而就在数日前，孔塔里尼刚和奥地利军队的司令官就奥军通过克雷马达成了协议。

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来自威尼斯名门孔塔里尼家族。这个家族自1043年以来，800年间出了8位共和国元首。这位贵公子在和拿破仑见面之前便预感到，和此人打交道，不会像与贵族出身的奥地利军司令那样能达成君子协定。他写给元老院的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自己必须破釜沉舟。"

负责国境周边地区的孔塔里尼，当然不会知道那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法国将军在意大利战开打之前对下属官兵说了什么。拿破仑是这样说的：

"士兵们！诸位眼前一望无际的土地，就是富饶的意大利。你们能

征服它吗？能打赢吗？明天的胜利，将补偿诸位今日的付出！”

拿破仑一向擅长笼络军心，士兵们也不负司令官的期望，愈战愈勇，如今已逼近威尼斯领地。奉拿破仑之命，先去谈判的副官对孔塔里尼说：“如果贵国不肯答应法军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只好靠自己去争取。”

接见威尼斯地方官的拿破仑，从头至尾都显出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对此，孔塔里尼在报告中写道，不知拿破仑是天生沉默寡言，还是存心露出不悦之色，抑或是过于疲劳。

面对沉闷不语的拿破仑，孔塔里尼若无其事地说：“将军看上去非常疲倦。”

“是的，我累极了。”拿破仑答。

接下来的两人对话，不是交谈，而是变成询问。拿破仑不改神色，抛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

“奥地利军队东行走的是哪条路线？是不是进入了克雷马？”

孔塔里尼回答说除了几位来访的军官，其余人都严守军规，有秩序地从城墙外走过。

对于孔塔里尼含含糊糊的回答，拿破仑没有深究，改口问，如果派传令兵从此地到下一地，两城之间多长距离，需要多久时间。孔塔里尼依然闪烁其词，尽量不给出准确的答案。

不知拿破仑是否看破了对方的意图，紧接着开口索要威尼斯共和国的内陆地图。孔塔里尼呈上克雷马周边的地图，佯称手中只有这份。

拿破仑话锋一转，问两年来一直包庇普罗旺斯伯爵的威尼斯，为何

在法国军队反败为胜的当口，将伯爵驱逐出境。孔塔里尼答，威尼斯共和国是最早承认大革命后法国新政府的国家。拿破仑指出威尼斯除了普罗旺斯伯爵，还准许旧政权的其他人物入境避难，孔塔里尼对此回答说：

“我共和国是尊重自由的国度。但凡以个人身份，在不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之下，任何国家的流亡人士皆予以接受。此乃我国的传统。”

拿破仑继续咄咄逼人地质问孔塔里尼，为何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的威尼斯要让法国的敌人奥地利军队通过克雷马。孔塔里尼解释称威尼斯保持中立的立场，与奥地利之间以前便有着双方军队互通对方领地的协定。就在这时，懒洋洋地歪坐在椅子上的一名副官，突然跳起来大声叫着，威尼斯必须在奥、法间二者选一，禁止奥军通过威尼斯领地。孔塔里尼转身朝向说话的人，心平气和地说：“作为威尼斯的市民，我唯有听从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命令。”

答完话再次转向正前方的孔塔里尼，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他猜想拿破仑会暴跳如雷。不料，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位身材瘦小、披着一头齐肩乌黑长发的年轻将军，只是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会谈结束后，拿破仑将孔塔里尼送出门外，表现得彬彬有礼。孔塔里尼心里清楚，这位将军是在强压怒火，装腔作势。

虽然会谈全程都用意大利语，孔塔里尼仍然感到筋疲力尽。会说法语的孔塔里尼事前便提出用法语交流，但拿破仑还是选择了意大利语。他本人当然是毫无问题，但其手下的法国副官们的意大利语，并没有达到可以应付正式会谈的程度。拿破仑的用意让孔塔里尼心中感到隐隐的不安。

拿破仑

不过，这位克雷马地方官也没时间去深究，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不管协议有无，都得让法军通行的现实。所谓通行，并非是单纯地走过路

过，军队的宿营地、粮草的调度，都得由同意放行的一方提供。依照规定，所需费用由通行的军队支付，不过孔塔里尼认为，法军大概不会像奥军一般遵守规定。若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威尼斯内陆本土，被不断向蒂罗尔（Tirol）撤退的奥地利军队和穷追不舍的法国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心急火燎的各地方官员频频向元老院和本土总司令福斯卡里尼发出请示，可是无论元老院或福斯卡里尼，只告诉他们向两军表达中立的立场，尽量缓和事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势高涨的法军愈发地横行霸道，而节节败退的奥军也渐渐地丧失了保持绅士风度的耐心，他们竟然占领了所属威尼斯的要塞佩斯基耶拉（Peschiera）。都灵、米兰已被法国军队所占领，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而威尼斯又始终不变的保持着中立，不利的形势逼得奥地利孤注一掷。

面对奥军和法军在自己土地上的恣意妄为，威尼斯方面除了口头抗议，无所作为。最后，将奥地利人赶出了佩斯基耶要塞的，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法国人。为攻下意大利境内奥地利帝国硕果仅存的要塞曼托瓦，法国军队必须先拿下其北侧的佩斯基耶拉要塞，断绝对方的援军输送线。

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奥地利和法国两军，谁也不再把坚称非武装非同盟的威尼斯放在眼里。与此同时，逐渐重整军心的奥地利军队，为防止曼托瓦陷落，开始南下。福斯卡里尼见到拿破仑，正是在这个事态紧急的时刻。

5月29日，福斯卡里尼终于在布雷西亚的法军作战指挥部见到了拿破仑。这位根本不管威尼斯地方官是否批准，俨然以占领军的姿态，将

指挥部设在当地的法国将军，倒是非常客气地迎接福斯卡里尼的到来。福斯卡里尼以威尼斯共和国本土总司令的身份，向拿破仑递上一份费用清单，上面记载着法军从克雷马到布雷西亚通过时给当地带来的损害以及粮草和住宿设施等费用。

拿破仑接过了清单。可还没读到一半，便怒气冲天地将它扔在桌上。

“对这一张破纸，我根本没必要回答！克雷马到布雷西亚距离甚短，拿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损害来说事，用心何在！这不过是威尼斯仇恨法国的表现。包庇普罗旺斯伯爵，把佩斯基耶拉交给奥军，种种行径都证明了威尼斯对法军的敌视。此仇必报！我会烧了维罗纳，捣毁威尼斯!”

吓得心惊胆战的福斯卡里尼，只好灰溜溜地退去。

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不敢无视拿破仑的怒气。福斯卡里尼追赶着行动迅速的法军脚步，于6月1日在已经移至佩斯基耶拉的法军指挥部，与拿破仑第二次见面。

正在用餐的拿破仑，一改先前的态度，热情地邀请福斯卡里尼共餐。饭后两人移步别室，正式开始会谈。福斯卡里尼首先向拿破仑表示了威尼斯共和国无意改变与法国友好关系的立场。拿破仑回答说：

“每当有事发生，威尼斯便声称与法国关系良好。然贵国总是口是心非。若真有诚意，就应该赶走境内的奥地利军队，向他们宣战。

“普罗旺斯伯爵一事也令人失望。两年来，法国督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你们置若罔闻，直到我们大军逼近才将他驱逐出境。我已向巴黎建议向威尼斯宣战，现在等候回音。事态严重至此，你们竟然还拿那点儿小小的损失来说三道四，真是可笑至极！”

拿破仑的这一番话刺伤了福斯卡里尼的自尊心。福斯卡里尼家族的名望虽不及孔塔里尼家族，但也是在34年前的1762年出过元首的豪门。然而，他强调的非武装、中立，只有在对方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福斯卡里尼再怎么以法律做盾牌，对拿破仑毫无效果。这位本土总司令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向元老院做个详细的报告。但元老院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既定路线的勇气。

除了法国，奥地利也开始发难。他们指责威尼斯的非同盟政策，是威尼斯人利己主义的表现。一旦上层态度改变，让原本就因战况不利而陷入苦境的下层士兵们更有了蛮横的底气。饱受奥地利军队祸害的威尼斯本土居民将不满全部朝向既没心也没力保护人民的政府。仿佛是嘲笑元老院的无能，拿破仑派手下部队包围了威尼斯共和国行省的首都维罗纳。法国军官们将大炮口对准城墙，提出了以下要求：

第一，打开城门让法国军入城。第二，允许法军在流经城墙一边的阿迪杰河（Adige）的桥上设营。第三，每天提供1.2万名法国士兵所需的葡萄酒、面包、肉以及战马的饲料。费用按照当地市价支付。

这不是对友好国家的请求，是对占领区下达的命令，完全不给宽容的期限。按他们之前的行径，所谓的支付费用，其实就是强行征收。稍后，法国人又提出找2000名农民帮忙设营。对法国人的种种要求，维罗纳只能照单全收，因为对方扬言倘若不从，便动用武力。正值6月收割期，光是召集农民已经够伤脑筋，不料法国人再追加一项，要求调度2000支长枪。

福斯卡里尼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去见拿破仑。这位法国将军倒是很罕见的一派好心情。他告诉福斯卡里尼，2000支长枪的意思其实就是借维罗纳现有的枪支用一阵子，不必多虑。午间的招待宴席上，拿破仑继续滔滔不绝。他声称威尼斯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悠久，只要奥地利军撤出威尼斯领地，法军也会离开。法国人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意大利，使其脱离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重新回到意大利人的手里。拿破仑的这一席话，

让福斯卡里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随即向政府送去了一份相当乐观的报告。

不过，那些威尼斯的地方官员们，凭他们平素和法国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根本不相信拿破仑兴头上说的那套。他们有种不好的预感，法国人会想方设法地讹诈威尼斯。

地方官们的预感，在拿破仑心情大好的两天之后得到了印证。他在给巴黎督政府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拿出500万或600万金币的话，我这里有最适合的办法可以达成。"

无论这位科西嘉岛出生的年轻将军心情是好是坏，面对内陆本土最重要的城镇维罗纳实际被占领的事实，威尼斯政府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6月6日，元老院总算向前迈出一步，通过了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案。赞成119票，反对17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便要求重启军备的主张，用了17年的时间，终于成为大多数人的心声。政府火速调回负责希腊海域警卫的海军，决定征收特别税以重建陆军部队。

政府的紧急呼吁，唤醒了市民们的危机意识。在民众的积极配合之下，政府很快便征收到130万达克特的税金，随即向达尔马提亚、伊斯特拉等地区发出了募兵令。

可惜，这一切都做得太迟了。有了金钱和士兵，却找不到使用这些资源的将才。长达百年的和平，让威尼斯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运筹帷幄的人才。

此外，原来因失去必要而自然衰退的陆军，如今虽然决定重建，可是连重建的目的都无法确定。说是为了自卫，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不只是潟湖岛周边，究竟以哪里为界限，各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

威尼斯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坚守潟湖岛屿，背水一战的经验。一次

是14世纪末期对抗热那亚，另一次是16世纪初期的康布雷同盟战争。两次危机威尼斯都成功地度过，可是那时的威尼斯以贸易为生，只要确保国家的独立性，损失的船只可以再造，失去的商机可以利用他人的资本重新开拓。然而，18世纪的威尼斯变成了以农业为主轴的国家。农业以土地为本，而海中之岛是没有土地的。

由于大多数元老院议员都在内陆本土拥有经济地盘，无论如何不肯割舍。自拿破仑出现之后，这些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位于内陆的农庄不保。所以，他们的主张盖过了那些防御重心应该放在威尼斯本岛的声音。

防卫线及其重心尚未明确，紧急动员令倒是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

首先，政府在威尼斯本岛各行政区，针对15到60岁的男子进行了人口调查，结果如下：

圣马可区——6443人

城堡区——10676人

卡纳雷吉欧区——9430人

多尔索杜罗区——7635人

圣保罗区——3194人

圣十字区——4863人

总计：42241人

从上述的对象中挑选出可以长期服役的男子，再加上从利多等外岛来的志愿者，实际兵力大约在一万左右。一万兵力以百人为单位分成各班，每个班由两名贵族和两名市民担任指挥，负责守卫各自的居住区附

近。威尼斯所属的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水手们也陆续抵达威尼斯，这些被称为“斯基亚沃尼”的船夫们，与威尼斯共和国休戚与共的历史经久。

威尼斯为确保饮用水量，补足粮食库存，在从外海通往潟湖的三条重要水路利多、马拉莫科和吉奥贾部署下满载大炮的舰队。积极备战的景象，看似威尼斯又重新找回了当年众志成城、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可惜，独缺元老院下达明确的指示。

这些议员们围绕着“自卫”的定义，反反复复地讨论，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因此当内陆行省提出要像本岛一样投入备战时，政府只能让他们暂且不动等候命令。

另一边，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正一步步向前推进。他们通过对米兰到维罗纳一带的实质占领，成功地切断了曼托瓦与蒂罗尔之间的连线，将准备南下支援曼托瓦部队的奥地利援军，牢牢地钉死在加尔达湖的北面。同一个时期，与拿破仑交涉成为唯一任务的威尼斯本土司令官，也从福斯卡里尼改换为年纪更轻的主战派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Francesco Battaglia）。

新官上任便遭遇狂风暴雨。7月，刚抵达布雷西亚没几天的巴塔利亚，便收到了拿破仑满纸怒气的来信。

“中断军队补给，你们居心何在！改善街道的治安和医院的设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我的保证。阁下的前任为此做出了努力，难不成这是他被更换的理由？

“请立即告诉我阁下的打算，告诉我阁下的立场。与威尼斯始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士兵，因无法在威尼斯领内得到充分治疗而死

去，在街上惨遭不明杀手的杀害，对于这些事实，阁下做何感想？

“如果阁下不能维持威尼斯领地的治安，不能改善医院的管理，不能顺利调度军粮，我们将不得不以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希望阁下不负我的期待和好意。波拿巴”

医院的怠慢、军粮的拖欠，都是当地民众对压迫他们的法军做出的抗议。对此，巴塔利亚非常清楚，拿破仑大概也心里有数。街头不断有法国士兵无端被杀，也是居民们所为。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威尼斯共和国向来不靠武力统治内陆行省，他们的武器是“善政”。400年来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的行省人民，缺乏在军事强压之下的忍耐和顺从性。不过，巴塔利亚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元老院给他的唯一指令，就是一切尽量保持稳定。

他首先召来医院和调度军粮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改善现状。然后，给拿破仑写信，回答他的质问。军粮调度缓慢，主要是因为供给地区大多沦为战场或是因军队通过而变成荒地。医院的治疗能力目前已是极限。至于治安问题，则因为当地四面环山，杀人犯一旦逃进山中，便很难抓捕。写完信后，巴塔利亚令副官将它送给人在卡斯提奥内（Castiglione）的拿破仑。

拿破仑看完信后并没有大发雷霆，但明显是强压火气。他背对巴塔利亚派去的副官，眺望着窗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是军人。军人喜欢实话实说。富饶的布雷西亚，不可能没有钱。换作是我的话，立马能征收到200万。所以，巴塔利亚司令的回

信，我不能接受。反法的行为一再持续，他是不是一点儿不在乎内陆的城镇会像热那亚一般化为灰烬呢？”

副官急忙做出辩解，但毫无效果。

“据说威尼斯国内重新开始武装军队。若真如此，就是以法国为敌。目前奥地利人正大举南下，贵国肯定是见机行事。

“我会击退奥地利。然后，让威尼斯人支付这场战争费用。因为是你们放奥地利军通行。”拿破仑的语气斩钉截铁。

副官鼓足勇气反驳：“威尼斯共和国从未允许过任何国家的军队在境内通行，奈何本国不具备阻挡奥军的军力。”

拿破仑第一次转过身，直视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副官，说道：“请转告总司令，明天傍晚在维罗纳见面。我会提前到达那里。”

副官说不能立即答应。没有本国政府的许可，威尼斯的行政官不能任意走动。

“告诉他这是我的希望，是拿破仑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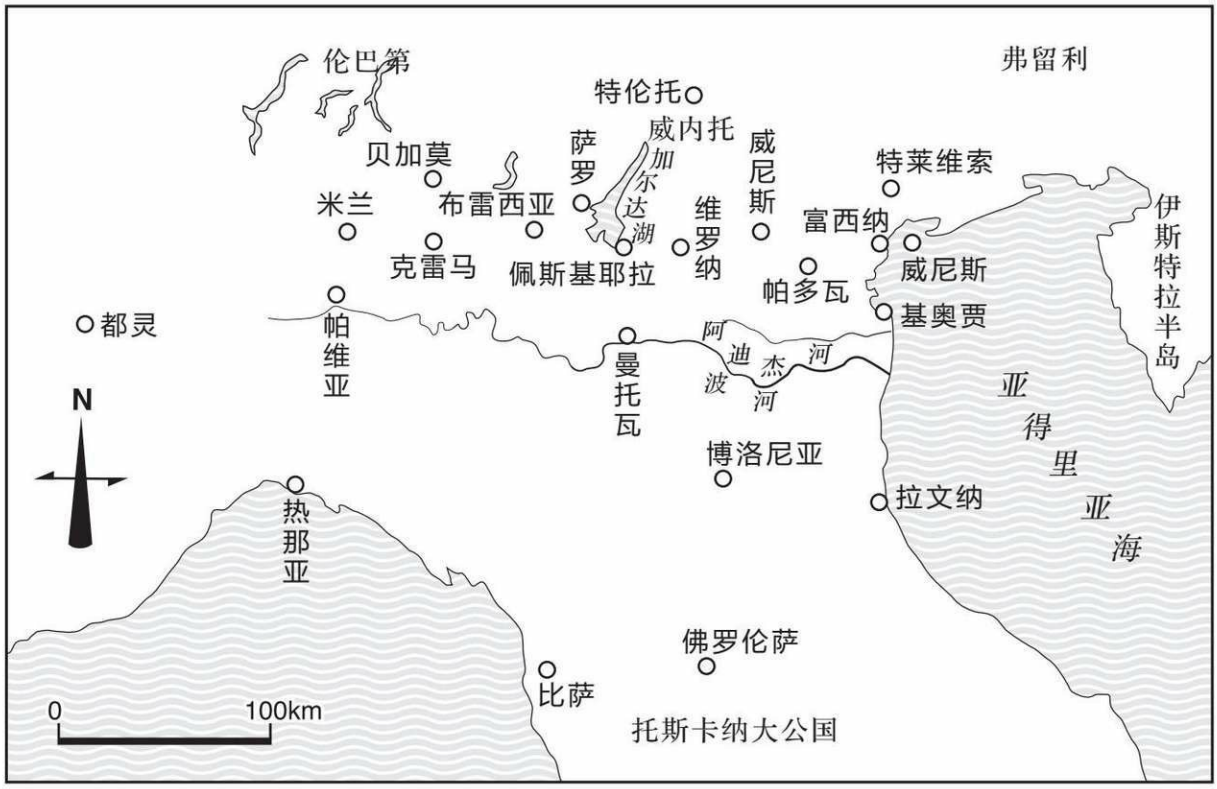
巴塔利亚听完副官的报告，虽然打算向政府呈报此事，但鉴于时间紧迫、事态严重，最终他自行决定出发前往维罗纳。抵达目的地的巴塔利亚，被告知拿破仑在附近的佩斯基耶拉，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那里。

正在要塞外视察大炮阵地的拿破仑，听说巴塔利亚已到，便离开簇拥着他的人群，走到巴塔利亚的身边，两人就在阵地上边走边开始了会谈。那一天是7月23日。

拿破仑照例省去了一切寒暄，直奔主题。巴塔利亚也一早做好了洗

耳恭听的准备，会谈成了拿破仑的独角戏。

“威尼斯国内目前进行的全面军备，绝对是针对法国。当初奥地利军在阿迪杰河布阵时，威尼斯没有任何行动。为军备征收新税和募捐，威尼斯人同仇敌忾，矛头一致对向法国。元老院开会时将法国人描述成面目狰狞的坏蛋，并向市民大肆地宣传。



意大利北部

“无端杀害法国士兵的事件不绝，军粮调度迟缓，此类对法军不逊的行为，在维罗纳和布雷西亚尤其严重，而且在阁下上任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面对拿破仑露骨的发难，巴塔利亚只能报以苦笑。

拿破仑老话重提：“任由奥军占领佩斯基耶拉，允许普罗旺斯伯爵躲在境内长达两年之久，威尼斯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是对法国的侮辱。

伟大光荣的法兰西，绝不会容忍这种粗暴的行为。”

巴塔利亚默默地听着，不做任何辩解。拿破仑继续说：

“如果我有心要占领贵国的内陆地区，相信你们应该清楚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就像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不仅法国军队能获得充足的物资，数量甚至可以多到送回巴黎。敌人的东西，都是战利品。”

拿破仑平静、客气的语调，反倒让巴塔利亚心惊肉跳。他只好再搬出那一套他本人也不相信有效，而且拿破仑也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说辞，进行辩解。没等他说完，拿破仑便打断说：

“请转告贵国政府，48小时内解除国内动员令，一切恢复原状。否则我将对威尼斯共和国宣战。督政府给我一张空白委任状，威尼斯的问题，全权交由我处理。”

巴塔利亚称这应该是威尼斯政府与法国大使之间交涉的问题。拿破仑驳斥，大炮炮口对准法国人，是不能容忍的侮辱行径，法国军队已忍无可忍。他向巴塔利亚强调，这种事情原本只需派手下送封信，但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尊重，才特地与代表威尼斯政府的阁下会晤商谈。

历经两小时的会谈，巴塔利亚唯一得到的收获，就是将48小时的期限延长至6天。

但接到巴塔利亚报告的元老院，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命令巴塔利亚转告拿破仑，威尼斯的军事武装仅用于自卫；二是按照拿破仑的要求，以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向市民宣传法国士兵是友军。

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是主战派，对于除了让步还是让步的政府，打心底里有些瞧不起。但如今他身处谈判的第一线，比任何人更能深切

地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原本冷嘲热讽的语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惜任何手段，也要阻止拿破仑的决心。

好机会终于来了。约瑟芬将从巴黎来探望丈夫。这位波拿巴夫人无论生长环境还是在精神层面都属于旧体制，而且深受丈夫的宠爱。所以，当拿破仑提出要在布雷西亚迎接妻子时，巴塔利亚感觉是天赐良机。

巴塔利亚把布雷西亚城中最优美的威尼斯式宫殿作为约瑟芬下榻之处，宫内的角角落落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备下的餐饮，足以保证客人夜夜享受18世纪威尼斯奢华的宴席。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不少制作精美、价格高昂的礼物。

抵达布雷西亚的波拿巴夫人显然是相当满意。她欣喜万分地告诉前来问候的巴塔利亚，这里让她几乎忘记了一路上难以忍受的暑气。巴塔利亚没有忘记使命。他以大革命后的法国男人绝对没有的优雅姿态，不失时机地请求约瑟芬转告她丈夫对威尼斯高抬贵手。当晚，拿破仑也抵达布雷西亚。

约瑟芬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也没有此等天赋，不过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想来应该会在拿破仑的枕边为威尼斯美言几句。拿破仑虽然深爱约瑟芬，但他绝不是被爱人左右的男人。他不远万里从巴黎唤来妻子，短暂相聚数日，便又动身前往帕多瓦战场。而大费周章、殷勤待客的巴塔利亚，从这位将军那儿得到的回报只有一句话：

“感谢阁下对妻子的热情招待。”

想来，巴塔利亚大概也希望像丈夫走后再度红杏出墙的约瑟芬那

样，把拿破仑抛在脑后，找些其他乐子。所幸，为应付南下的奥地利军，拿破仑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挥师向北，不再紧逼威尼斯放弃军备。这算是给巴塔利亚唯一的慰藉。

就在拿破仑北上之时，驻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派人给政府送来一份密信，称在土耳其的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诸国大使们应各自政府的要求，正积极筹划结成反法同盟，并希望威尼斯加盟。同时，法国大使也提出了法、威两国结盟的建议。大使请求政府做出指示。

无巧不成书。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威尼斯政府收到了普鲁士发来的加入奥地利——普鲁士反法同盟的邀请。如此重大且敏感的问题，自然需要谨慎以待。按程序应该在元老院审议，但考虑到议题的机密性和紧迫性，最后改由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六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即政府“核心小组”拍板决定。拿破仑的4万大军正虎视眈眈地盯在身后，在决策之前，绝不能让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觉察出任何蛛丝马迹。

“核心小组”最终的结论是拒绝所有的结盟邀请。曾经饱受他国非难的威尼斯的积极外交政策，如今完全失去了活力。

元老院在接获报告后，公开发表正式声明，称威尼斯将继续保持非武装、不结盟的中立路线。这也等于是向拿破仑证明了威尼斯的军备纯粹出于自卫，不再让他有找碴儿的机会。

当重新整编后的奥地利军队开始南下，另一边把布雷西亚、维罗纳威尼斯领地当作战壕的法国军队，派兵布阵准备迎战的当口，威尼斯共

和国的决策者们置身事外地坐山观虎斗，当然他们的内心都希望奥地利赢得胜利。

从蒂罗尔南下的奥地利军队，兵分三路，从西向布雷西亚、维罗纳、阿迪杰河附近发起进攻，并对从西向东延伸的三处法军“战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拿破仑暂时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亲赴前线指挥。

7月31日，两军首次交锋。激战两个多小时后，奥军撤退，所幸尚存实力。

8月3日，两军再次开打，战斗持续至夜晚，双方都有一万人以上战死。翌日，不肯罢休的两军开始了第三场战役，结果还是没决出高下。

8月5日，第四次战斗结束，法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拿破仑的胜利不仅让威尼斯大失所望，也给意大利各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雇用多位英国顾问的那不勒斯王国，应国王要求在港口增加了英国的船只；罗马教皇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反宗教的法国革命势力已兵临城下。一早与法国结下同盟的托斯卡纳大公此时的地位也从盟友降为属臣。

威尼斯内陆各行省的情况更是糟糕。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犹如占领军一般，强行征收军粮，需要的屋舍随时占用，完全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市政厅的公用资金凭一张波拿巴将军的手谕，即可全数没收，士兵掠夺民财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威尼斯的当权者们失去了最后的一份平静。这些人几乎都在内陆拥有农庄，原本心理上的恐惧变成了肉体上直接的疼痛。尽管结盟的话题再次浮上台面，但在这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冷静地去倾听和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法国与西班牙结盟的消息，让威尼斯陷入了更大的不安。而元老院对此做出的行动，竟然是通过驻法的威尼斯大使和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就拿破仑针对中立的威尼斯犯下的不法行为向巴黎的督政府提出抗议。对拿破仑的战果心满意足的督政府，自然是不会理睬的。

陷入动荡的威尼斯政府，甚至忽略了巴塔利亚在8月22日送来的机密情报。情报称由于担心英国的反法行动，以及土耳其反奥行动的进一步激化，奥地利与法国有意停止意大利战线。巴塔利亚在信中警告，如果威尼斯不设法促成两国的停战，处境将比现在更为险恶。

9月，奥地利、法国两军继续交战，总体上法军处于优势。威尼斯的内陆领土几乎全域沦为战场。无论是在法军或奥军占领的地区，粮草、军需品的调度，皆由军队直接下达命令，就算如此，拿破仑还是不断指责当地居民偏向奥地利。事实上，相较于强行推行革命路线的法国人，不喜欢激进行为的威尼斯共和国民众的确对奥地利人多一些好感。深知内情的巴塔利亚如今最担心的不是如何躲避拿破仑的非难，而是实质沦为法军占领区的各村镇的动向。当地针对威尼斯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众声称不能保护属下行省人民免于外敌欺凌的政府，没有资格做统治者。

11月，决定意大利战线命运的战役持续了三天。进入冬季后，气候条件变得恶劣，来自北方的奥地利军队打算利用体能上的优势一举歼敌。法国军队一度陷入苦战，在拿破仑的英明指挥下，最终还是扭转乾

坤赢得了胜利。巴塔利亚派进法国军队的卧底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军指挥官卓越的才能。这几天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都证明了波拿巴将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位勇敢的士兵。”

在1796年即将结束的12月，法军的势力圈已经扩展到西起热那亚、东至威尼斯最东边属地的弗留利，短短9个月的时间，便控制了北意大利全域。威尼斯除了潟湖中的本岛之外，其余领土都在法国军队的统治下，如此迎来了1797年。

冬期休战的惯例，让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总算喘上一口气。但刚进入3月，各地方官员们便不断传来有关当地局势不稳的报告。

从很早之前开始，威尼斯本国便存在着一股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势力。但只要贵族即统治阶层不介入，政府不会出面干涉。有一个名叫斯巴达的男人经营的咖啡馆就是这批人士的聚集点。然而，在4万法国大军包围下的内陆出现革命思潮，问题的严重性远远高过本岛。巴塔利亚要求政府向本土派遣警戒兵力，政府却以眼下不宜做出任何刺激法军的举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束手无策的巴塔利亚，眼睁睁地看着令他惶惶不安的预感变成现实。

3月14日，贝加莫首先举起了反叛之旗，“自由万岁!”的声音在城中回荡。高叫着解放贝加莫的人们袭击了市政厅，醉心于革命思想的激进者们，不断向其他观望或不安的民众灌输法国人是解放军的想法。由于城内和城外两边事前已经谈妥，所以当法国军队整装列队完毕的一刻，城门骤然大开，迎接军队入城。市政厅高塔上，取代了威尼斯共和国旗帜的法国国旗在风中骄傲地飘扬。新成立的革命委员掌控了市政，那些隶属威尼斯的旧人马，不是被赶出城外，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贝加莫的骚动，很快波及至威尼斯所属的伦巴第地区。19日，布雷西亚发生暴动。巴塔利亚在被囚24小时之后，被带到城外一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最终被驱逐出境。25日，萨罗（Salo）暴动。28日，克雷马反叛。距离威尼斯本岛相近的地区由于作为威尼斯行省的历史长久，除了维罗纳出现一些骚动之外，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均不改对威尼斯的忠诚心。

被赶出布雷西亚，不得不转至维罗纳的巴塔利亚，在仔细分析了那些叛乱城镇的情况之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开始时都由少数的大革命拥护者煽动，然后靠法国军队进驻维持秩序。以萨罗和克雷马为例，中间曾发生过赶走拥法派、宣誓重新归属威尼斯的逆转，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法军大炮之下。

巴塔利亚以法军干涉内政为由，向拿破仑发去了抗议信，却杳无音讯。他不肯罢休，再次向政府提出派遣大使级别的特使直接去见拿破仑的要求。

被委任为特使的佩萨罗和柯纳均来自享誉欧洲的名门，但拿破仑根本没有会面的意思。两位特使不得不跟随着这位精力充沛、穿梭于各战线上的将军的脚步，追了三天，总算在戈里齐亚（Gorizia）见到了拿破仑本尊。

对特使们指出的问题，拿破仑用一句“法国无意介入威尼斯共和国内政”便打发了过去。他友好地接待了特使，同时又提出苛刻的要求，称将奥军彻底赶出意大利需要6个月的时间，威尼斯要么提供战时每个月百万法郎的军费，要么和法国结盟。

元老院在听完火速回国的两位特使的报告之后，惊愕不已。有部分议员认为事情发展至此，索性与法国缔结同盟。对此，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因为和法国结盟，就意味着与英国、奥地利为敌。这不仅会给东地中海贸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达尔马提亚、科孚岛等希腊岛屿极有可能落如海军力量强大的英国人手里。同时，也给奥地利攻占伊斯特拉地区有了绝好的借口。持续至深夜的会议最终得出结论：如果钱能解决问题，就用钱解决。

其实，威尼斯人很清楚，拿破仑这是趁机敲诈勒索，因为奥军实际上已经被赶出了意大利。拿破仑将原本向东的战线，改向朝着维也纳的东北方推进。意大利战线上的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为保卫首都已调回国内。在征服了北意大利之后，拿破仑接下来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攻打奥地利，而这笔军费他要威尼斯人埋单。

同样，拿破仑也很清楚，法国大革命后，很多法国人的资产都流向了威尼斯的银行，而且英国人在威尼斯也有不小的投资。

然而，作为近代银行先驱的威尼斯人，任凭拿破仑再怎么威胁，他们也不会挪动银行存款转为它用。正因为有这个信用保证，佛罗伦萨、热那亚甚者是土耳其等敌对国家的民众才会安心地将钱存在威尼斯银行。拿破仑要求的军费，只能设法在国内筹集。

威尼斯内陆行省的农庄，长期以来因其高效的经营而获利巨丰，甚至可以向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军事基地提供经济援助。但那里如今已经成为战场，不可能再向本国提供资金。政府除了征收资产税之外，还考虑另外征收所得税。

当威尼斯煞费苦心地筹钱之际，在莱奥本（Leoben）对峙的法军与奥军的两军统帅正在谈判。由奥地利方面提出的谈判从4月5日开始，直至4月9日。双方以言和为前提，首先达成了停战6天的协议。停战期间，两军再就今后的走向做进一步的交谈。虽然威尼斯想方设法地打听

谈判的内容，但除了知道停战与言和的结果之外，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4月14日，带着拿破仑信件的副官，突然抵达威尼斯，并且以拿破仑的名义要求立即与政府官员见面。由于第二天是圣礼拜六，依照传统，官员们将暂停政务，参加宗教活动，因此提出将见面时间改为周日，但拿破仑的副官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威尼斯在“波拿巴将军要求24小时之内答复”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改变惯例。

翌日，以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为首的政府主要官员们集聚于官邸的阁僚会议室。副官进屋后，没有任何寒暄，甚至拒绝入座，站着向众人宣读拿破仑的信。

“在威尼斯共和国内陆行省，‘全体武装起来，杀死法国兵！’的声浪此起彼伏。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名法国士兵遇害。难道你们以为我深入德国境内的时候，就没有权力使人们尊敬世界上一等民族的士兵？难道法国士兵们会一直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同袍们的血绝不会白流。高贵的复仇行为，必定为每一位法国士兵增添勇气。我派遣的副官，可能是和平的使者，也可能是战争的使者。你们如果不下令彻底解除内陆本土的武装，不交出杀害法国士兵的头目，战争不可避免。

“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境，已不再受到土耳其的威胁。应该说，不存在任何敌人的威胁。除了各位的妄想之外，再次军备没有一点儿正当性。这个明显视法国为敌的武装，限你们在24小时之内解除，我不会给更多的时间，如今不是查理八世的时代。[1]

“如果我不得不违反法国政府的意志发动战争，那也是因为你们针

对法国军队采取武力，奖励杀害法国士兵所致。即使内陆的土地荒废，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罪不在我。当地的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法军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了将他们从威尼斯政府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们会感谢我们的。”

拿破仑的这封通告，在随后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又被宣读了一遍。议员们的反应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其忍受这般耻辱，不如据守潟湖抗战到底，另一派则认为事到如今唯有屈服。最终的投票结果，赞成屈服的156票，主战派42票。然而，政府首脑们还是采取了拿破仑最不能容忍的拖延时间的手段，给他发去了一封辩解信。信中称内陆本土发生的抗法运动，并非是威尼斯政府许可的武装，威尼斯对法国的友好之心从未改变。

威尼斯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由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秘密组织的号称三万人的抵抗组织。既然没有承认，也就无法下令解散。所以，他们认为拿破仑最终会接受这个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理由。

根据谍报机关的报告，巴黎政府内部对拿破仑的支持率只有50%，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巴拉斯的态度暧昧。威尼斯政府一面拖延着时间应付拿破仑，一面展开了对巴黎督政府的游说活动。

接到政府密令的驻法大使奎里尼，立刻安排与巴拉斯见面，巴拉斯当场接受了威尼斯的请求，可就在第二天，巴拉斯便改口说不能介入太深。奎里尼在错愕之余，判定这是巴拉斯要钱的暗示，于是送去了10万法郎。根据奎里尼的报告，巴拉斯只收了7万。

收了钱的巴拉斯结果什么也没做。不过如果要指责的话，或许更应该指责威尼斯大使的无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巴拉斯与拿破仑之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大使竟然一无所知。由于巴拉斯收

下的是支票，所以当威尼斯政府在确认此人无用之后，立刻要求银行中止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是显示出了威尼斯人一贯作风。

在内陆本土一边，令拿破仑恼火万分的事件连连发生。4月17日，维罗纳市民掀起了反法运动，虽然6天后被法军镇压，但遍及本土全域的抵抗运动在政府发布了与法国的友好声明之后，依然不绝。

随着当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法军的镇压也变本加厉。威尼斯市民遭流放，有反法嫌疑的人一律处死，在弥撒时对革命颇有微词的神父也被杀害。就在这风声鹤唳之时，发生了一件真正让拿破仑震怒不已的事情。

在威尼斯共和国1000年的历史中，除了9世纪初遭到查理曼之子丕平率领的舰队侵入潟湖以外，从来没有让任何国家的军船进入潟湖内。在威尼斯一手掌控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年代，很少会有外国军船靠近威尼斯。虽然有明文规定，如果外国军船胆敢进入潟湖，不听从退去劝告，威尼斯会击沉船舰予以反击，但实际上类似的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即使在威尼斯失去了制海权的17世纪，在亚得里亚海上长驱直入的英国、荷兰的船只，也从来没有存心去挑战威尼斯的法律。也许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出于同为海洋国家之间的尊重。那些外国军船一律停泊在利多外港，只有船上人员能进入威尼斯。

可是，法国人却不吃这套。4月20日，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通过威尼斯潟湖与外海之间的屏障利多港时，无视威尼斯方面要求他们退去的警告。照章办事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下令发射大炮，击沉了“意大利解放”号。包括舰长在内的4名船员战死，其余人员都成了俘虏。

拿破仑对威尼斯政府派来的两位特使暴跳如雷，要求威尼斯交出杀人犯，打开监狱，没收英国人的资产，又称自己手上有8万大兵和20门

大炮。

“立即解散‘十人委员会’！解散元老院！我要做威尼斯共和国的阿提拉，这个国家已经过时，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一番话令两位特使胆战心惊。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戏言，拿破仑随后占领了维琴察和帕多瓦。威尼斯政府再次派出了特使，拿破仑拒不接见，反倒向威尼斯送去特使，逼他们选择和平或战争。拿破仑所谓的和平，其实就是投降。因为他要求废除共和国，即改变威尼斯现有的国家体制。

4月30日傍晚，拿破仑的特使抵达威尼斯。接到最后通牒的威尼斯政府，紧急召开阁僚会议。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元首等主要官员们反复商讨，难以下定论。他们仿佛忘记了时间，但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就在这个时候，从帕多瓦沿水路逼近布兰塔河河口富西纳的法国军队，已经在附近调度船只。守卫河口的警备队长请求批准开炮，政府令他暂时按兵不动。平素向来冷静沉着、不轻易骚动的市民，到底也在家坐不住了，众人纷纷涌向广场、桥头。过了半夜，高层会议终于得出了结论：交由共和国国会决定。元首卢多维科·马宁（Ludovico Manin）喃喃自语地说：“今夜，睡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得安宁。”

5月1日，原本是元首访问修道院以示敬意的祭日。按照共和国的传统，这一天会停止政务活动。但情势迫在眉睫，共和国国会召开会议，谁都不会感到诧异。

马宁元首首先发表演说，向议员们说明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要求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务必以保护威尼斯城的完整和市民的生命作为首要

考量。

威尼斯国会会议厅的正面是丁托列托绘制的壁画，穹顶是委罗内塞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四周的画像出自威尼斯画派诸位画家之手，描绘着共和国历史一个个荣光的场面。这间蕴藏深厚历史的庄严高贵的大议事厅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哀鸿。

虽然人人心情沉重，但鉴于长年的惯性，投票过程依然井然有序。最终结果，598票赞助“和平”，7票反对，14票弃权。

然而，拿破仑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正式宣战，比国会表决的结果来得更快。法、奥两军统帅在莱奥本的和谈，决定了威尼斯的命运。

宣战书全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

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帕耳马诺瓦作战指挥部1797年5月1日

法兰西共和国第五军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总司令官波拿巴

宣告

当法军全力以赴于抗敌前线，后方只留有少量部队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采取了哪些行动？

一、利用这段时间，在内陆组织4万军力，加上来自本国的斯基亚沃尼连队，据守各个要塞，企图截断法军大部队与后方留守部队间的联系。

二、从国内向这些武装组织派遣军事顾问，并运送枪支弹药和大炮。

三、在内陆，但凡欢迎法军的人皆遭逮捕，而那些敌视法国的人则获得善待。3个月前被普留利地方官逮捕的14名谋杀法国士兵的头目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在威尼斯国内的广场、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充斥着侮辱法国人的言语，他们被叫作“雅各宾份子”“无神论者”。

五、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的居民被要求拿起武器，加入其他来自国内的军队再度敲响“西西里晚钟[2]”，企图重现‘意大利是法国人的坟墓’。

六、在威尼斯共和国境内的教会，每逢弥撒，神父们便暗示信徒对法国发起十字军运行。在这个国家，罗马教皇辖下的神职者们，首先得服从共和国的政策。

由此可见，他们的言行反映了政府的意志。

攻击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在各个城市中印刷、分发、张贴，煽动人心。在这个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宣传不正代表了共和国政府对我们的敌意吗？

七、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这是共和国政府的阴谋。法国人的鲜血四处流淌，在理应安全的国道上，法军的信使、补给运输车遭受袭击。

八、在帕多瓦，一名法连队长被杀，其手下两名士兵也未能幸免。在卡斯提奥内——德莫里，一队法国士兵被解除武装后遭杀死。从曼托瓦至莱尼亚诺（Legnano）、卡萨诺（Cassano）至维罗纳的道路上被杀的法国士兵达200人之多。

九、两队北上准备与主力会合的法军在基亚里（Chiari）遭威尼斯军阻截，两军交锋，所幸我们英勇的士兵没有让敌人达到目的。

十、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瓦莱焦（Valeggio）和德森扎诺（Desenzano）。

十一、在复活节的第二天，维罗纳的各家各户以敲打大门上的金环为信号，屠杀了当地所有的法国人，连住院的伤者和刚出院在城中疗养的人也未能幸免。他们身上多处遭短剑刺伤，尸体被抛入阿迪杰河中。当日牺牲的法国士兵高达400人以上。

十二、维罗纳近郊的3个要塞，连续8天遭受威尼斯军队的攻击。所幸我援军及时赶到，击退了胆小怕死的乌合之众，并俘虏3000余人，其中不乏威尼斯的高级将官。

十三、赞特岛的法国领事馆遭到当地亲威尼斯派的居民焚毁。

十四、威尼斯的军舰不仅庇护奥地利的运输船，还向准备攻击奥军船的法国军舰“拉·勃留恩”号开炮。

十五、仅装载三四门小炮、40名船员的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元老院院的命令下被击沉于威尼斯港。

这艘军舰年轻有为的罗杰舰长，在军舰受到来自要塞和威尼斯军舰两边炮击时，命令全体船员进入船舱，于弹雨中独自一人登上船台，向凶手呼吁，试图制止他们的狂暴行为，却立刻被炮弹打中。船员们见状泅水逃生。威尼斯海军的6艘快艇，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用长枪刺死他们。有一名数处受伤、鲜血染红了海水的法国士兵，拖着虚弱的身躯好不容易平安地游到岸边，抓住了要塞墙壁上一根突出的木桩，可是要塞的司令亲自掰开了他的手。

鉴于上述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总司令波拿巴，根据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128条12款所赋予的权限，决定付诸行

动。

总司令命令：

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离开威尼斯。

驻内陆本土的威尼斯政府人员24小时内全数离去。

法军全体指挥官当严防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在任何地方升起。有关军事行动的详细指令，将直接向指挥官们下达。

波拿巴

威尼斯政府彻底慌了手脚。他们按照拿破仑的要求，将“十人委员会”的3名委员长和击沉法国军舰的指挥官关进监狱，释放了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以示屈服。

当时威尼斯海军还有184艘军船健在，但主张据守潟湖坚决抵抗，等待形势转变的贵族，不到总人数的一成。

8年后发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英、法两军的军舰都在30艘左右，可见184艘不是一个小数字。虽然它们不全是战舰，还包括运输和传令船，但按照当时法军的规模，威尼斯海军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何况，威尼斯还拥有潟湖这个外国人极难攻入的天然屏障。

但这一切都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贵族们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便是乞求拿破仑宽限时间，好让那些斯基亚沃尼雇佣军离开威尼斯，以此改变拿破仑的心意。但拿破仑只将期限延长至5月14日。

5月12日，圣马可广场四周的回廊上挤满了民众。他们在前一天看布告得知国会今日开会，在会议开始的9点之前便赶来等待消息。没有

人吵闹喧哗，大家带着不安的神情，默默地看着那些从他们眼前经过，步入元首官邸的贵族们。

总共600人的威尼斯国会议员，有537位出席会议。那些缺席者也许是吓得躲在家中，不打算履行“贵族”应尽的义务。按规定，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场取消会议，择日重新召集。不过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计较规章制度，会议如期进行。

这是自13世纪末葛登尼哥改革以来，500年未曾间断过的“Maggior Consiglio”（共和国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这个时刻，千年来曾经无数次迎接红色圣马可金狮旗凯旋的圣马可码头上，那些不要报酬也愿意参战却被遣返的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登上了送他们回家的船。

国会议事厅内正在对威尼斯共和国无条件投降的告市民书的内容进行斟酌。突然，传来隆隆的炮声，以为法军来袭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有人大声呵斥“丢人现眼！”那些慌不择路的人才不得不坐回位子。

炮声是在船上整齐列队的斯基亚沃尼水手们鸣放的礼炮，向圣马可码头上飘扬的共和国国旗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得知炮声真相后，总算放下一颗心的议员们也完成了投票。赞成512票，反对20票，弃权5票。威尼斯共和国宣布废除传统的共和制，改施民主制。

威尼斯共和国宣告灭亡。

走出元首官邸的贵族们，归心似箭。他们穿过面色凝重的人群，一

语不发，低着头匆匆离去。不用说明民众们也知道结果，前所未有的事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Viva La Liberta（自由万岁）！”广场的一角突然传来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但很快又消失在茫茫的静默中。

当另外一个声音“Viva San Marco！Viva La Repubblica！（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再度打破沉默时，人群中响起了无数个“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的声音。这声音像海浪般涌向圣马可教堂前的升旗塔，又追随着高高举起的圣马可金狮旗，流向四面八方。

几位留在官邸处理投降事务的贵族们闻声后，不禁又担惊受怕，唯恐民众违反贵族们的决定，起义抵抗法军。于是，他们下令在圣马可码头和里亚尔托桥上架起了大炮。

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庸人自扰。正如那些亚得里亚东岸的水手们离去时，向1000年来生死与共的威尼斯共和国鸣放最后的礼炮，这些手无寸铁的威尼斯平民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共和国致意，告别。

仿佛从湖泊注入多条河川的水流，圣马可广场的声音，绵延不断地在威尼斯城中流淌。

“圣马可万岁！”

“共和国万岁！”

---

[1] 查理八世的时代，指18世纪末的法国人，不会像15世纪末的先祖那样，愚蠢到让对方拖延的时间。——作者注

[2] 西西里晚钟（Vesper Sicilian）：指13世纪时西西里居民以教堂晚祷的钟声为信号，发起暴动并驱逐统治当地的法国人的事件。——作者注

后记

4天后的1797年5月16日，4000名法国士兵进入威尼斯城，在圣马可广场的中央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牌子。这片从未被外国武装军队踩踏过的土地，开始接受法国人的统治。

同年10月18日，《坎坡·福尔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签订。法国和奥地利瓜分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内陆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的岛屿归法国所有，部分内陆领土和威尼斯城，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领地。

10月19日，奥地利军队取代撤离的法军，进驻威尼斯。

1805年12月26日，拿破仑皇帝将威尼斯纳入其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

1814年5月30日，拿破仑失势，威尼斯再度被奥地利占领。

1866年11月4日，威尼斯并入统一后的意大利，直至今日。

简略年表

公元	威尼斯共和国	其他各国	日本
452	为逃避匈奴王阿提拉，移居潟湖		古坟文化全盛时代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500		东罗马帝国全盛期	
538	出现威尼斯人活动的文献		
568		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	
	威尼斯成为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形式上的属国		
589		隋朝统一天下	
593			推古天皇立圣德太子为摄政王
600		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	
618		唐朝建立	
697	威尼斯共和国选出第一位元首		柿本人麻吕作为宫廷诗人活跃的年代
700			
701			大宝律令完成
756		撒拉逊帝国分裂	
794			迁都平安京（京都）
800		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加冕	
810	击退查理曼大帝长子丕平（驼背丕平）的进攻		

811	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庭帝国签署协议，威尼斯从而获得在两帝国境内的通商权——河川贸易时代		继续派出遣唐使
828	圣马可遗骸自亚历山大运至威尼斯——成为守护圣人	诺曼人（维京人）活跃时期	
843	威尼斯建都	法兰克王国分裂——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起源	藤原氏开启“摄关政治”
900			
907		唐朝灭亡	
962		奥托一世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000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获得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海洋贸易时代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源氏物语出现
1082	负责拜占庭帝国海上防卫因而获得免除关税和设立商业基地的权利		
1086			院政时代开始
1096		十字军东征开始	
1099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征服耶路撒冷	
1100			平氏家族崛起
1023	威尼斯舰队大胜埃及		
	商业网络扩展至巴勒斯坦地区		
1047	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关系恶化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	保元之乱 平治之乱
1085			平氏家族灭亡
1087		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	
1092			镰仓幕府成立
1200			
1203			北条氏开始执权政治
1204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女王		

1206		蒙古帝国建立	
1250		马穆鲁克王朝建立	
1258	第一次对热那亚战争		
1261		拜占庭帝国复国	
1271	马可·波罗一行启程前往东方		
1274			蒙古军进军日本（1281 年再度进军）
1279		元朝统一中国	
1291		十字军运动终结	
1295	第二次对热那亚战争		
1297	元首葛登尼哥实施改革		
1299		奥斯曼—土耳其建国	
1300			
1310	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失败	教皇“阿维尼翁之囚”时期	
1323	实施共和国国会议员世袭制		
1333			镰仓幕府灭亡
1338			室町幕府成立
1339		英法开始百年战争	
1348		黑死病流行	
1350	第三次对热那亚战争		
1355	元首法利耶政变——失败		
1368		明朝建立	
1378	第四次对热那亚战争——胜利		
1400	获得本土行省		
1453		土耳其帝国消灭拜占庭帝国百年战争结束	
1454	《洛迪和约》签订		
1455		玫瑰战争开始	
1467			应仁之乱开始
1470	内格罗蓬特被土耳其占领——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		

1479	与土耳其谈和		
1492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8		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线	
1499	第二次对土耳其战争		
1500			
1501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抵达巴西沿岸	
1503	与土耳其谈和		
1508	康布雷同盟战争爆发		
1517		土耳其统治麦加	
1519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22		麦哲伦环球航行 宗教改革	
1530		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	
1538	普雷韦扎海战——第三次对土耳其战争		
1540	与土耳其谈和		
1543			葡萄牙船队漂流至九州种子岛
1549			沙勿略开始在日本传教
1558		英国进入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1571	塞浦路斯岛被土耳其抢占勒班陀海战——第四次对土耳其战争		
1572		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	
1573	与土耳其谈和		
1575			长篠之战
1587			丰臣秀吉颁布禁教令
1588		西班牙无敌舰队遭英国海军歼灭	
1600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关原之战
1603			江户幕府成立
1606	教皇颁布禁止圣务处罚威尼斯		

1618		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	
1620		“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	
1629			幕府实施踏绘（踩踏圣母像）基督徒受难时代
1633			幕府颁布锁国令
1645	克里特岛防守战开始——第五次对土耳其战争		
1660		英国王政复辟	
1669	与土耳其谈和		
1683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收复战——第六次对土耳其战争		
1699	战争结束		
1700			
1701		普鲁士王国建立	
1713		《乌得勒支条约》签订	
1714	第七次对土耳其战争——第二次摩里亚之战		
1716			德川吉宗出任幕府将军
1775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	
1783		巴黎条约签订，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7			宽政改革开始
1788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生效	
1789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2	威尼斯确定非武装中立路线		
1793		反法同盟成立	
1796		拿破仑战争开始	
1797	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俄罗斯人登陆库页岛

参考文献

这里所记载的史料和学术著作反映了我非专业学者的身份，它们并没有囊括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文献。之前在查阅十字军史料时，那浩如烟海般的数量曾令我瞠目结舌。有关威尼斯的史料数量虽然不及十字军，但也足够丰富。因此，如果有人想做更深入的研究，对于19世纪前的内容，只能不厌其烦地将西哥纳（Cicogna）和索兰佐（Soranzo）的研究文献中所参考的资料一遍。（可信度高的资料，一定会附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一栏中）

CICOGNA.E.A., Saggio di bibliografia veneziana, Venezia, 1847 SORANZO.G., Bibliografia veneziana（Aggiunta e continuazione del Saggio di Cicogna）Venezia, 1885

因此，这里所记载的仅是我阅读过的史料。如果它们不是意大利人所著，我首先会找翻译成意大利语的，没有意译本，便选择英译本。遇上那些连英译本也找不到的资料时，只有咬紧牙关，一手捧着原著，一手翻着字典，一字一句啃下来。相较于理解程度，这种方式对阅读速度的影响更大。鉴于懂英、法、德语的日本人远多于擅长意大利语的现实，我在此添加了原文的书名。顺便提一句，或许是因为撰写意大利历史的原作者们都会意大利语，对译本做过校对，所以翻译成意大利语的有关书籍，质量往往都相当精良。

至于日文译本的资料，有一些我手中没有，有一些则因为翻译得不够好。另外还有一部分，比如像清水广一郎教授翻译得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的著作等作品，在我阅读时日本尚未出版，

所以这里我会列出我参考的版本，并在旁边注上日文本译名。

最后，必须介绍一下对我影响深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弗雷德里克·雷恩（Frederic Chapin Lane）教授的学术著作。

《威尼斯，海之共和国》（*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是1973年雷恩教授73岁时出版的著作。这位将一生奉献给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从大学退休之后，将曾经发表的众多论文整理汇集，撰写了这本通史。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知识量，与10年前决定开始写作、通过5年快速学习而完成的我的作品，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然而，了解诸多的历史事实，并不等于能够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整理、统合、运用资料的历史观。雷恩教授的著作基于海量的史料之上，同时又具有良好平衡感的历史观。它绝对是一本可以与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的《十字军史》、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他的时代》比肩齐名的有关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名著。

读过雷恩教授这本著作的读者，势必会发现它对我的影响以及关注点的不同。教授重在经济，我则偏向于政治。作为学者，雷恩教授自然是关心历史的“结果”，而我则更多是追寻“过程”。

无论如何，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雷恩教授是我重要的引路人。每当我绕了一圈远路再返回正途时，手提煤油灯的教授总是在那里等着我，为前面黑暗的长路带来光明。可是没过多久，我又会脱离正轨，步入“歧途”。教授三言两语带过的朝圣，我竟然以“圣地朝圣的套餐旅行”为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整章。叙史时的“绕道”，是我个人写作的心得，相信它有着不可小觑的效果。

在写作的5年间，我的书桌上曾经堆放过各式各样的参考书籍，但

从头至尾始终放在案头的，唯有雷恩教授所著的《威尼斯，海之共和国》。

13年前的1968年，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岛（San Giorgio Maggiore）举行。在会议休息的间隙，担任大会主席的教授向我推荐了6本研究书籍，这6本书就是我书写《海都物语》的开始。

（于1981年冬）

原始史料

ANONIMO（著者不明），*La Cronaca Veneta, detta Altinate, di autore anonim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III, Firenze, 1845.

AUTORI VARI（著者多数）: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I. Le testimonianze dei contemporanei*, a cura di A. Pertusi, Milano, 1976;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II. L'eco nel mondo*, a cura di A. Pertusi, Milano, 1976; *L'interdetto di Venezia del 1606 e i Gesuiti*, a cura di P. Pirri, Roma, 1959; *Nunziature di Venezia (1533-1535)*, a cura di F. Gaeta, Roma, 1958;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a cura di E. Albèri, Firenze, 1839-63;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a cura di A. Segarizzi, Bari, 1912-16; *Relazioni d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a cura di L. Firpo, Torino, 1965-.

BARBARO, D., *Storia Venet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II, II, Firenze, 1843.

BERCHET, G. & CECCHETTI, B., *Viaggio di un ambasciatore veneziano da Venezia a Costantinopoli nel 1591, di Cavazza Gabriele*, Venezia, 1886.

BORGHI, L., *Storia Segreta* (*1512-151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II, II, Firenze, 1843.

BOSCHINI, M., *La carta del navegar pitoresco*, a cura di A. Pallucchini, Venezia-Roma, 196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Roma, 1594-1602.

BRASCA, S. & CAPODILISTA, G., *Viaggio in Terrasanta di Santo Brasca* (*1480*) *con l'Itinerario di Gabriele Capodilista* (*1458*), Milano, 1966.

BROSSES, C. de, *Viaggio in Italia*, Bari, 1973 (*Lettres familières écrites d'Italie en 1739 et 1740*, Paris, 1931).

CANALE, M. da, *Cronaca dei Veneziani, Dalle origini al 127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III, Firenze, 1845.

COMMYNES, Ph. de, *Memorie*, Torino, 1960 (*Mèmoires*, Paris, 1925).

CONTARINI, G., *Opera*, a cura di L. Contarini, Paris, 1571.

CONTARINI, P., *Diario del viaggio da Venezia a Costantinopoli di M. Polo Contarini che andava bailo per la Repubblica Veneta alla Porta Ottomana nel 1580*, Venezia, 1856.

CORIO, B., *Historia di Milano*, Padova, 1646.

DANDOLO, A., *Chronica per extensum descripta*,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XII, I, Bologna, 1938-40.

DELLA VALLE, P., *Viaggio in Levante*, Firenze, 1942.

GABRIELI, F., *Storici arabi delle Crociate*, Torino, 1957.

GIUSTINIAN, A., *Dispacci di Antonio Giustinian ambasciatore veneto a Roma dal 1502 al 1505*, a cura di P. Villari, Firenze, 1876.

GOETHE, J. W., *Viaggio in Italia*, Firenze, 1948 (「イタリア紀行」相良守峯訳, 岩波書店, 1960).

GUICCIARDINI, F., *Storia d'Italia*, Bari, 1967.

LAS CASAS, B. de, *Giornale di bordo di Cristoforo Colombo* (*1492-93*), Milano, 1973.

MACHIAVELLI, N., *Opere complete*, Milano, 1961 (「マキアヴェリ (君主論・政略論)」会田雄次責任編集, 中央公論社, 1966).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Dall'anno 1457 al 1500*, 〈Storico Italiano〉 VII, I, Firenze, 1843.

MOROSINI, A., *Historia veneta ab anno MDXXI usque ad annum MDCXV*, 〈Degl'istorici delle cose veneziane, i quali hanno scritto per pubblico decreto〉, a cura di A. Zeno, Venezia, 1718-22.

MOSTO, A. da Ca' da, *Le Navigazioni Atlantiche*, Milano, 1929.

PARUTA, P., *Historia Vinetiana*, Venezia, 1605; *Historia della guerra di Cipro*, Venezia, 1615; *Opere politiche*, a cura di G. Monzani, Firenze, 1852; *Discorsi politici*, a cura di G. Candeloro, Bologna, 1943.

PIO II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I Commentarii*, a cura di G. Bernetti, Siena, 1972-76.

POLO, M., *Il Milione*, Novara, 1967.

PRIULI, G., *I Diarii (1494-1512)*,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XXXIV, III, Bologna, 1912-38.

RAMUSIO, G.B., *Navigazioni e Viaggi*, Torino, 1978-.

ROSACCIO, G., *Viaggio da Venetia a Costantinopoli, per Mare, e per Terra, e insieme quello di Terra Santa*, Venezia, 1598.

SANUDO, M., *I Diarii (1496-1533)*, Bologna, 1969-70.

SARPI, P., *Opere Complete*, Milano-Napoli, 1969.

SORANZO, G., *Diario del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Venezia, 1866.

VALIER, A., *Historia della guerra di Candia*, Venezia, 1679.

VECELLIO, C., *Habiti antichi e moderni di tutto il mondo*, Paris, 1859.

VILLEHARDOUIN, G. de, *La conquista di Costantinopoli*, Torino, 1962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38).

后世的研究著作

AUTORI VARI (著者多数): *Il Mediterraneo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500 alla luce di Lepanto*, a cura di G. Benzoni, Firenze, 1974; *Navi e civiltà. Archeologia marina*, a cura di G.F. Bass, Milano, 1974 (*A history of seafaring, based on underwater archaeology*, edited by G.F. Bass, London, 1972); *Storia della Civiltà Veneziana*, Firenze, 1955-65;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XV secolo*, Firenze, 1973-74.

ALMAGIA', R., *Planisferi, carte nautiche e affini dal secolo XIV al XVII esistenti n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Monumenta Chartographica Vaticana〉 I, Città del Vaticano, 1944.

AMARI, M.,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Catania, 1933-38.

ARMAO, E., *In giro per il Mar Egeo con Vincenzo Coronelli*, Firenze, 1951.

BABINGER, F., *Maometto il Conquistatore e il suo tempo*, Torino, 1957 (*Mehme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 München, 1953); *Le vicende veneziane nella lotta contro i Turchi durante il secolo XV*,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Quattrocento⟩, Firenze, 1957; Lorenzo de' Medici e la corte ottoman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XXI, Firenze, 1963.

BELIN, F.A.,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avec la Turquie*, Paris, 1867.

BELLONDI, V., *Documenti di Storia Veneziana Tratti dall'Archivio dei Frari*, Firenze, 1902.

BELTRAMI, D.,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I 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Padova, 1954; *La penetrazione economica dei veneziani in terraferma. Le forze di lavoro e la distribuzione della proprietà fondiaria nelle campagne venete nei secoli XVII e XVIII*, Venezia-Roma, 1961.

BENVENUTI, G.,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Milano, 1977.

BERENGO, M., *La Sosietà veneta alla fine del settecento*, Firenze, 1956.

BERTELE', T., *Il palazzo degli ambasciatori di Venezia a Costantinopoli e le sue antiche memorie*, Bologna, 1932.

BESTA, E., *Il senato veneziano*, Venezia, 1899.

BONO, S., *I corsari barbareschi*, Torino, 1964.

BORGHERINI SCARABELLINI, M., *Il magistrato dei Cinque Savi alla Mercanzia*, Venezia, 1925.

BORSARI, S., *Il dominio veneziano a Creta nel XIII secolo*, Napoli, 1963; *Studi sulle colonie veneziane in Romania nel XIII secolo*, Napoli, 1966.

BOUWSMA, W.J., *Venezia e la difesa della libertà repubblicana*, Bologna, 1977 (*Venice and the Defence of Republican Liberty*, Los Angeles, 1968).

BRAUDEL, F., *Civiltà e Imperi del Mediterraneo nell'età di Filippo II*, Torino, 1965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La vita economica di Venezia nel secolo XVI*,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Rinascimento⟩, Firenze, 1958.

BRAUDEL, F., JEANNIN, P., MEUVRET, J. & ROMANO, R., *Le déclin de Venise au XVII*ème *siècle*,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Venezia, 1961.

BRUNETTI, M., *Venezia durante la peste del 1348*, 〈Ateneo Veneto〉 XXXII, Venezia, 1909.

CADDEO, R., *Storia marittima dell'Italia dall'evo antico ai nostri giorni*, Milano, 1942.

CAIZZI, B., *Industria e commercio della Repubblica Veneta nel XVIII secolo*, Milano, 1965.

CAPPELLETTI, G.,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enezia, 1850-55.

CASSANDRO, G., *La formazione del diritto marittimo veneziano*, 〈Annali di Storia del Diritto〉 XII-XIII, Milano, 1968-69.

CERVELLI, I., *Machiavelli e la crisi dello stato veneziano*, Napoli, 1974.

CESSI, R., *Rialto. L'isola, il ponte, il mercato*, Bologna, 1934;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Milano-Messina, 1944-46; *Le Origini del Ducato Veneziano*, Napoli, 1951; *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 il problema adriatico*, Napoli, 1953.

CIPOLLA, C., *Storia delle Signorie Italiane dal 1313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6; *Storia delle Crociate*, Varese, 1967.

COGO, G., *La guerra di Venezia contro i Turchi (1499-1501)*, 〈Nuovo Archivio Veneto〉 IX & XI, Venezia, 1899-1900.

CONCINA, E., *Le trionfanti armate venete*, Venezia, 1972.

CRACCO, G., *Società e Stato nel Medioevo Veneziano*, Firenze, 1967.

DAVIS, J.C., *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 〈Johns Hopkins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LXXX, II, Baltimore, 1962.

DONAZZOLO, P., *I Viaggiatori Veneti minori. Studio bio-bibliografico*, 〈Memori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 XVI, Roma, 1929.

DUDAN, B., *Il diritto coloniale veneziano e le sue basi economiche*, Roma, 1933; Il dominio veneziano di levante, Bologna, 1938.

ERCOLE, F., *Da Carlo VIII a Carlo V. La crisi della libertà italiana*, Firenze, 1932.

FANFANI, A., *Note sull'industria alberghiera italiana nel Medio Ev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935.

FRANCHI, A., *Storia della pirateria nel mondo*, Milano, 1969.

FUGAGNOLLO, U., *Bisanzio e l'Oriente a Venezia*, Trieste, 1974.

GIBBON, E., *Storia della decadenza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Torino, 1967 (「ローマ帝国興亡史」中野好夫訳，筑摩書房，1977).

GILBERT, F.,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 in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Florentine Studies〉, edited by N. Rubinstein, London, 1968;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Gasparo Contarini*, 〈Action and Convic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ssays in Memory of E.H. Harbison〉, edited by T.K. Rabb & J.E. Seigel, Princeton, 1968.

HAMMER, J. de,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936-44.

HEERS, J., *Il commercio nel Mediterraneo alla fine del secolo XIV e nei primi anni del XV*,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XIII, Firenze, 1955.

HEYD, W., *Le colonie commerciali degli italiani in Oriente nel Medioevo*, Venezia, 1866-68; *Storia del commercio del Levante nel medioevo*, Torino, 1914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 Leipzig, 1886).

HILL, G., *A History of Cyprus*, London, 1940-48.

KENWORTHY, J.M., *Freedom of the Sea*, London, 1928.

KRETSCHMAYR, H., *Geschichte von Venedig*, Stuttgart, 1934.

LAMANSKY, V., *Secrets d'Etat de Venise*, St. Petersbourg, 1884.

LANDSTRÖM, B., *La Nave*, Milano, 1962 (*Skeppet*, Stockholm, 1961).

LANE, F.C.,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Baltimore, 1944; *Economic Meaning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Compas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III, Lancaster-New York-London, 196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London, 1973 (*Storia di Venezia*, Torino, 1978).

LEVI, C.A., *Navi da guerra costruite nell'Arsenale di Venezia*, Venezia, 1896.

LEVI PISETZKY, R., *Storia del Costume in Italia*, Milano, 1964-69.

LEWIS, A.R., *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A.D. 500-1100*, Princeton, 1951.

LOPEZ, R., *I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veneto-turca nel 1463*, 〈Archivio Veneto〉 serie V, XV, Venezia, 1934; *Storia delle colonie genovesi*, Bologna, 1938; *La Rivoluzione Commerciale del Medioevo*, Torino, 1973.

LOT, F., *L'art militaire*, Paris, 1946.

LUZZATTO, G., *Documenti finanziar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Padova, 1929;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ova, 1945;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Venezia, 1961; *L'economia veneziana dal 1797 al 1866*, Firenze, 1961; *Il debito pubblico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Milano, 1963.

MANFRONI, C.,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na dalle invasioni barbariche alla battaglia di Lepanto*, Milano, 1970.

MARANINI, G., *La Costituzione di Venezia*, Venezia-Perugia-Firenze, 1927-31.

MAS LATRIE, M.L. de, *Histoire de l'île de Chypre sous le règne des princes de la Maison de Lusignan*, Paris, 1855.

MAZZAROTTO, B.T., *Le feste veneziane. I giochi popolari, le cerimonie religiose e di governo*, Firenze, 1980.

McNEILL, W.H., *Venice: the hinge of Europe*, 1081-1797, Chicago, 1974 (「ヴェネツィア——東西ヨーロッパのかなめ、1018-1797」清水廣一郎訳，岩波書店，1979).

MERRIEN, J., *La vita di bordo nel Medioevo. Dai Vichinghi alle galee*, Milano, 1973 (*La Vie quotidienne des Marins au Moyen Age. Des Vikings aux Galères*, Paris, 1969).

MICHAUD, A., *Storia delle Crociate*, Milano, 1941.

MICHIEL, G.R., *Origine delle Feste Veneziane*, Milano, 1829.

MIOZZI, E., *Venezia nei secoli*, Venezia, 1957.

MOLMENTI, P., *La Dogaressa di Venezia*, Torino, 1887; *Sebastiano Veniero e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Firenze, 1899; *La storia di Venezia nella vita privata*, Trieste, 1973.

MOSTO, A. da, *I Dogi di Venezia nella vita pubblica e privata*, Milano, 1960.

MUMFORD, L., *The Ctiy in History*, New York, 1961.

MURATORI, S., *Studio per una operante storia urbana di Venezia*, Roma, 1959.

NISSATI, G., *Aneddoti storici veneziani*, Venezia, 1965.

OLSCHKI, L., *L'Asia di Marco Polo*, Firenze, 1978.

OSTROGORSKY, G., *Storia dell'Impero Bizantino*, Torino, 1968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tes*, München, 1963).

PANETTA, R., *I Saraceni in Italia*, Milano, 1973; *Pirati e Corsari turchi e*

barbareschi nel Mare Nostrum, Milano, 1981.

PAPADOPOLI, N., *Le monete di Venezia*, Venezia, 1893-1919.

PARADISSIS, A., *Fortresses and Castles of Greece*, Athens-Thessaloniki, 1972-74; *Fortresses and Castles of the Greek Islands*, Athens-Thessaloniki, 1976.

PASTOR, L. von, *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 Medio Evo*, Roma, 1958-63 (*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Freiburg, 1901-31).

PETROCCHI, M., *La politica della Santa Sede di fronte all'invasione ottomana (1444-1718)*, Napoli, 1955.

PIERI, P., *Intorno alla politica estera di Venezia al principio del Cinquecento*, Napoli, 1955; *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 Torino, 1970.

PIRENNE, H.,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 Medioevo*, Bologna, 1972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 Age*, Paris, 1963).

PRETO, P., *Venezia e i Turchi*, Firenze, 1975; *Peste e società a Venezia. 1576*, Vicenza, 1978.

PULLAN, B.,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Oxford, 1971.

RANKE, L. von, *Venezia nel cinquecento, Con un saggio introduttivo di Ugo Tucci*, Roma, 1974 (*Venedig im sechzehnten Jahrhundert und im Aufgang des siebzehnten*, 〈Sämtliche Werke〉 XLII, Leipzig, 1878).

RENOUARD, Y., *Le città italiane dal X al XIV secolo*, Milano, 1975 (*Les villes d'Italie de la fin du X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Paris, 1969); *Gli uomini d'affari italiani del Medioevo*, Milano, 1973 (*Les hommes d'affaires italiens du moyen âge*, Paris, 1968).

REUMONT, A., *Della diplomazia italiana dal secolo XIII al secolo XVI*, Firenze, 1857.

ROBERTI, M., *Magistrature giudiziarie veneziane*, Venezia, 1911.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912-25.

RUNCIMAN, S., *Storia delle Crociate*, Torino, 1966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54);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453*, Milano, 1968 (「コンスタンティノープル陥落す」護雅夫訳，みすず書房，1969).

SANTORO, L., *Le galere*, Roma, 1973.

SAPORI, A., *La mercatura medievale*, Firenze, 1972.

SELLA, 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enetian Woolen Industry.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London, 1968.

SENECA, F., *Il doge Leonardo Donà: la sua vita e la sua preparazione politica prima del dogato*, Padova, 1959.

SIMEONI, L., *Le Signorie*, Milano, 1950.

SISMONDI, S. de, *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Paris, 1809-18.

STELLA, A., *Chiesa e Stato nelle relazioni dei nunzi pontifici a Venezia*, Citta del Vaticano, 1964.

TASSINI, G., *Il libertinaggio a Venezia dal secolo XIV 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Venezia, 1968.

TENENTI, A., *Venezia e i corsari*, Bari, 1961.

TENTORI, C., *Della legislazione veneziana sulla preservazione della laguna*, Venezia, 1792.

TRINCANATO, E.R., *Venezia minore*, Venezia, 1948.

VALERI, N., *Venezia nella crisi italiana del Rinascimento*,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Quattrocento〉, Firenze, 1957; *L'Italia nell'età dei principati. Dal 1313 al 1516*, Milano, 1969.

VALSECCHI, F., *L'Italia nel seicento e nel settecento*, Torino, 1967.

VENTURA, A., *Nobiltà e popolo nella società veneta del '400 e '500*, Bari, 1964; *Considerazioni sull'agricoltura veneta e sulla accumulazione del capitale nei secoli XVI e XVII*, 〈Studi Storici〉 IX Roma, 1968.

VISCARDI, A., *L'Italia nell'età comunale*, Torino, 1966.

作者所发现的日本人撰写的研究著作

斎藤寛海『中世後期のターナにおける奴隷売買の実態』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33 号 , 1975.
清水廣一郎『中世ガレー船覚書』一橋論叢 76 巻 6 号 , 1976;『ジェノヴァ・キオス・イングランド――中世地中海商業史の一側面――』南欧文化 3 号 , 1976.
陣内秀信『都市のルネサンス』中央公論社 , 1978.
平川祐弘『芸術にあらわれたヴェネチア』内田老鶴圃 , 1962.

文艺复兴的故事
04

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日】盐野七生－著　李艳丽－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目　录

序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后记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译者跋
返回总目录

序

在意大利愉快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却在一个偶然邂逅的人[1]怂恿之下写出了第一部作品，那就是这本书。学习与执笔的时期是我29岁到30岁的时候。我记得这本书先是在《中央公论》[2]杂志上连载的，大概是第二年吧，又集结出了单行本。

第二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这个没有经过杂志的连载，而是专为出版单行本新写的，是我在写完本书之后马上撰写的作品。因为一写完本书，我便立刻开始着手写《优雅的冷酷》了。尽管如此，它摆上书店的柜台已经是我32岁以后的事情了。

第三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出版后的第二年就早早开始动笔的《神的代理人》。同本书一样，它先是在杂志上连载，而后出版了单行本，那时我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都是我20多岁到30岁出头时写就的。

对于这些作品，如果要让撰写的本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多年后重读的感想，那就是“微苦笑”[3]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三部作品都清晰地体现出“青年时代撰写”的特征，里面有些负面的东西让我觉得肩膀很吃劲。总之，就是有的地方会让我看到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然而，如果说一切现象都具有两面性是一种正确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写作也可能转变为正面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说是当时填满我胸中的想法一举喷出而成的作品。

我从前就不是大家通常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过了思春期进入青年时代后，我越来越讨厌当时日本社会中充斥的那种不冷不热的氛

围。什么“大家都很和睦”之类，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的日本精英都深信不疑地认为，只要大家和睦，社会便会因此进步，我对他们尤其厌恶。我的这种想法是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的历史相“对抗”之中产生的吧。

因为无论我写的是女人还是年轻的男子、成熟的男人，对象虽然变了，但是作为写作者的我，心中充满了感受，我想把这些告诉日本人——好孩子是无法生存的。在古代的欧洲，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些坚强的人。这种想要倾吐的心情简直就好似我自己就是等待被喷出的岩浆一般。

在我还是姑娘家的时候，读过安德烈·纪德[4]的一个作品，书名不记得了，他这么写道：

“托尔斯泰这座山，你站在山脚下也看得见。但是，当你登上托尔斯泰这座山后，你能看见在他的对面耸立着一座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山。”

本书与《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看得见的山。所以，舞台都集中于我当时居住的罗马与意大利各地。这是即便闭上眼睛也能区别分明的土地，所以我选了它作为故事的舞台。

于是，当我爬到山顶，进入我眼帘的是对面高耸着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登上这两座山的成果就是收获了《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接着，当我登上这些山之后，进入我视野的是远方绵延不断的古罗马山脉。等我又花了15年的时间将其一一登遍之后，我发现夹在文艺复兴与古代之间的中世纪尚未沾手。于是，我决定还要登上能够体现1000多年的中世纪的“三座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1000年中海盗与海军的故事，就是我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5]的这部作品。罗马和平[6]时代崩溃后，地中海成为从北非袭击而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海盗而建设了海军与其对抗的南欧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第二座山，虽然也属于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剧烈冲突，但这是从北欧向中东、近东攻击而来的基督教徒与为之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7]。

第三座山是正在准备的作品，题目尚未确定，所以在此还不能写上[8]。这三部作品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海都物语》，凭借这四部作品，我认为大概可以“问鼎”漫长的中世纪的要地了。

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以“青年时代撰写的三部曲”为开端的我的作家生涯，也因为登上了眼前出现的一座座山而进行了下去。也就是说，这个“三部曲”成为作为历史作家的我的起点。

诚然，青年时代的作品存在着那个年纪的缺陷，但是我没有去改正它。因为我觉得年轻时候的那种气势就那么被保留着更好，因为在年轻的不成熟中也有其相应的好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神灵栖息于琐碎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哪怕是一次，我也拒绝撰写所谓“一册书通晓世界史”“简明西方史”之类的书籍。因为我认为要描绘出历史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类世界，快速地总结是不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简单的归纳是对努力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不敬。

因此，我每次都会严谨地写好细节，就是因为这个，最后变成了厚厚的一册书。对于购买了我的书又读了它的您，我常常觉得很愧疚。但是，请您念在“真理就存在于细节之中”而原谅我吧。非常抱歉，我的态度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

又及：

因此，这本书描绘的是生存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的四个女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女人常常被描绘成男人的牺牲品。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没有沿用这一观点。也许从一开始，作为著者的我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

另外，虽说是活在500多年前的女人们，对我而言，却完全没有遥远时空的隔离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 Este），是一个让人不愿意与之交朋友的个性强烈的女人，与我有一点儿相似。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Lucrezia Borgia），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伊莎贝拉相反的女人，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身为长女，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

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9]那样的悍妇，就是我的模样。虽然明白对自己不利，却依旧奋勇前进的那一点，也是我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10]一章，其实我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但我还偏偏用一章的篇幅写她，这是因为我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这一章与后来的《海都物语》也串联起来了。

就这样，当我回想起撰写本书时的情形，恍如隔世。等今年过完生日，我就成为后期老年人[11]了，时间真是无情啊。

盐野七生

2012年春

[1] 这个人指日本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参见本书后记。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错误之处，恳请专家指正。下同，略。

[2] 《中央公论》是日本的月刊综合杂志，1887年创刊，现今依旧发行。

[3] “微苦笑”一词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俳人久米正雄（1891——1952）造出来的词语。

[4] 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伪币制造者》《如果种子不死》等。1947年6月，纪德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1月，因“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 《ローマ亡き後の地中海世界》，［日本］新潮社，2008——2009年。本书的中译本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田建国、田健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6] 罗马和平（Pax Romana），指罗马帝国的统治领域（地中海世界）内的和平。公元前27年元首制度建立之后，一直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再没有陷入长时间内战，境内相对安宁。18世纪，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五贤帝时代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时代”，造出了一个拉丁语“Pax Romana”，“罗马和平”由此广泛流传开来。

[7] 《十字军的故事》日语版本为《十字軍物語》，［日本］新潮社，2010——2011年。

[8] 此处指的是《皇帝フリードリッヒ二世の生涯》，［日本］新潮社，2013年。

[9]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1463——1509），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女杰、女性领主。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庶出女儿，斯福尔扎家的领主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ian 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姐姐。

[10]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1454——1510），15世纪塞浦路斯（Cyprus）的女王。她出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名门贵族科尔纳罗家，与塞浦路斯国王詹姆斯二世结婚成为王后。她1474年继承王位，至1489年一直统治塞浦路斯。

[11] 日本将65——74岁的老人称为“前期老年人”，将75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后期老年人”。

萨伏依公国
米兰
伦巴第
皮埃蒙特
米兰公国
威尼斯共和国
曼托瓦侯(公)国
威尼斯
热那亚
费拉拉公国
米兰多拉
费拉拉
热那亚共和国
博洛尼亚
伊莫拉
卡拉拉
卢卡
弗利
佛罗伦萨
里米尼
佛罗伦萨共和国
佩萨罗
乌尔比诺
锡耶纳
托斯卡纳
佩鲁贾
科西嘉
奥尔维耶托
斯波莱托
亚德里亚海
维泰博
教皇国
罗马
撒丁
那不勒斯
贝内文托
巴里
布林迪西
那不勒斯王国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卡拉布里亚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
西西里
叙拉古
N
0
100km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Nec spe nec metu.”

（无望无惧。）

达·芬奇所绘素描，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家谱

埃斯特家族

- 莉查塔·德·萨鲁佐（1429年结婚）
- 巴里西娜·马拉特斯塔（1418年结婚）
- 吉利奥拉·德·克拉拉（1397年结婚）
- 尼科洛三世（1383—1441）
  - 西吉斯蒙多
  - 埃莱奥诺拉·阿拉贡
  - 埃尔科莱一世（1431—1505）
    - 伊波利托（1479—1520）（枢机主教）
    - 朱利奥（1478—1561）
    - 费兰特（1477—1540）
    - 安娜·斯福尔扎
    - 阿方索一世（1476—1534）
    -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米兰公爵）
    - 贝亚特丽斯（1475—1497）
    -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曼托瓦侯爵）
    -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1474—1539）
    - 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
    - 卢克雷齐娅
  - 波索（1413—1471）
  - 莱奥内洛（1407—1450）

贡扎加家族

- 芭芭拉·冯·勃兰登堡
- 卢多维科（1414—1478）
  - 玛格丽塔·迪巴维耶拉
  - 费代里科一世（1441—1484）
    - 乔凡尼·斯福尔扎（卢克雷齐娅的第一任丈夫）
    - 马达莱娜
    - 乔凡尼
    - 古意德巴多·蒙特菲特罗（乌尔比诺公爵）
    - 伊丽莎白（1471—1526）
    - 西吉斯蒙多（枢机主教）
    -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1466—1519）
      - 基娅拉
        - 吉尔伯特·德·蒙潘西尔
        - 查理·德·波旁（1482—1527）
      - 帕奥拉（1508年生，修女）
      - 伊波利塔（1503年生，修女）
      - 利维亚（1504年生，夭折）
      - 费兰特（1507年生）
      - 埃尔科莱（1505年生）（枢机主教）
      - 玛尔格利塔·帕莱奥洛戈
        - 费代里科二世（1500—1540）
        - 费代里科（枢机主教）
        - 路易吉（诺瓦拉公爵）
        - 埃莱奥诺拉·蒂·奥斯特利亚
        - 古利埃尔默一世（1538—1587）
        - 卡泰丽娜·蒂·奥斯特利亚
        - 弗朗切斯科三世（1533—1550）
        - 阿方索·德·阿瓦洛斯
        - 伊莎贝拉（1539年生）
      - 玛格丽特（1496年生，夭折）
      -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乌尔比诺公爵）
      - 埃莱奥诺拉（1492年生）

= 婚姻关系
| 嫡子
‖ 庶子

政治与美

传说的诞生，只需要一张素描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评述。历史上的人物经常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人物也不例外。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就是一位因其部分传说而被广为人知的女性，这些传说已远远超出了她真实的全貌。

我们对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了解，始于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内的达·芬奇为她绘制的素描，其次是雅各·布克哈特[1]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描述。这些艺术作品和历史资料在500年后的今天，在人们描绘她的肖像时依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对夫人的判断，几乎全部依赖于在这位美丽的夫人庇护下而硕果累累的艺术家与著述者。另外，夫人自己的书信中则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任何事情所动摇，沉着冷静，总是以观看恶作剧的态度应对事务的和蔼可亲的女性形象。这个宫廷很小很软弱，其金库也经常空空如也，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们，例如本博[2]、班戴洛[3]、阿廖斯托[4]、贝尔纳多·塔索[5]却都将他们的作品送入宫中。自古乌尔比诺[6]宫廷瓦解（1508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还能有如此高雅的社交集会了……伊莎贝拉夫人对艺术可以说独具慧眼。夫人虽然力量微薄，但看过她的集萃目录的艺术爱好者，无一不深受感动的。”[7]

布克哈特不仅在日本，在欧洲也很有权威。1903年英国人朱莉娅·卡特赖特出版了专著《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曼托瓦公爵夫人》，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伊莎贝拉的比较全面的传记。著者非常忠实于

布克哈特的观点，即认为伊莎贝拉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文艺复兴艺术的资助者。

另外，1968年9月迎来了第五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奖”，对从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来的在文化、政治、科学等各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一并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我们对伊莎贝拉的印象。

可是，根据现今依旧保存于曼托瓦的她与别人来往的大量信函、摩德纳[8]保存的费拉拉年代记、威尼斯保存的萨努多[9]日记、梵蒂冈古文书库中的史料，以及通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曼托瓦古文书馆的馆长卢齐奥[10]所进行的精密的学术研究，一个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知的伊莎贝拉形象浮现了出来。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并没有度过这样一种虚有其表的漂亮而完美的人生。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复杂的政略和大大小小权谋之术构成了这个旋涡，而在其中生存就是他们的命运。今天的女人们，从出生到去世大都和政治没有关联，这与伊莎贝拉那个时代的女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幸或不幸，都是因为伊莎贝拉出生于一个中等贵族之家埃斯特家。后来，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她不像身为教皇女儿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从一开始就是在万众瞩目的环境中出生的。可是，伊莎贝拉的自尊心并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她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她自己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从15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中。据马基雅维利[11]称，15世纪的意大利有四大势力——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以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12]之死为分界点，佛罗伦萨最先脱离了意大利。接着，同年，通过成为教皇的亚

历山大六世而增强了势力的教会总部，罗马兴起。然后，仅仅在数年之中，以外国势力进攻意大利为导火索，米兰、那不勒斯相继脱离，只剩下威尼斯与罗马两大势力的意大利，开始无休止地受到德国、法国与西班牙的威胁。最后，终于在1527年爆发了罗马劫掠[13]，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画上了句号。两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意大利举行了加冕仪式，西班牙的黑白两色[14]涂盖了意大利原本丰富的色彩。

这就是伊莎贝拉生存的时代。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贝亚特丽斯[15]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这两个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吞并的对象，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与和她命运相同、置身于政治中的其他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相比——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卷入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尽管从正面进行了对抗，之后却落荒而逃；维多利亚·科隆纳[16]躲避于宗教之中——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从来也没有忘记用冷静的双眼去观察现实。这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天生的政治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具有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贯穿了她一生的激情大胆的气魄和立足于精准的现实主义之上的理性精神。当有了这些东西的支撑时，权谋术数也会变得非常美丽，有一种艺术之美。

通过对艺术家的保护，她一直想要成为美之友，而且也被公认如此。通过她的一生所体现出的朝气蓬勃的大胆气魄与精准的现实主义理性精神——这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其说她是艺术的保护者，毋宁说她就是美之友。伊莎贝拉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她一生都没有超越那个时代，但是也没有被历史的洪流卷走，至今还能久久打动我们内心的也正是这个原因。

姐姐与妹妹

意大利的北部，波河[17]缓缓流经的这片艾米利亚平原，与佛罗伦萨附近的丘陵连绵起伏的风景完全不同，这里甚至连地平线都能够一览无余。四处矗立的白杨树在冬天落尽了树叶时，人们常常可以透过树干之间的间隙看到一个巨大的金黄色太阳正在缓缓下落。由南而来的道路在临近渡河的地方分了叉：蓝底白字的路标右边写着费拉拉，这是伊莎贝拉的出生地——埃斯特家族统治的城市；左边写的是曼托瓦，这是她的出嫁地——贡扎加家族管辖的城市。

我是在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图书馆里找到费拉拉年代记的。这座城市16世纪时曾经是费拉拉公国的领地之一，后来在正统埃斯特家绝迹之后，分家移居至摩德纳进行统治，所以埃斯特家族的史料几乎都保存于摩德纳。如今，这里成了意大利引以为自豪的赛车法拉利与玛莎拉蒂的城市。当我在距离试行跑道不远处的古老的石砌古文书馆里追溯着15世纪时用费拉拉方言撰写的年代记和已经变成墨色的信函时，那些准备参加蒙扎[18]、蒙特卡洛[19]与大奖赛[20]的赛车也在反复进行着试车。赛车的引擎发出如虎啸一般的轰鸣声，震得玻璃窗簌簌发抖。

根据那些佚名的笔者所写的费拉拉年代记，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于1474年5月18日出生，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21]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埃莱奥诺拉[22]的长女。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出生，而后三个弟弟又相继出生。

父亲埃尔科莱公爵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甚至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认可。在当时的意大利诸国中，他以文艺复兴式的政治统治闻名。

虽然处于被大国包围的中等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条件困难的环境中，但埃斯特家族一直保持着尊重文艺趣味的家风。宫殿中以皮萨内洛[23]、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24]的壁画做装饰，在旧宫殿阳台的墙壁上是雅各布·贝利尼[25]绘制的示巴女王[26]访问所罗门王的场景。此外，费拉拉还有当时意大利最为完备的大学，那里的教授在整个意大利都很有名。他们常常是宫廷里会谈的中心。在宫廷偶尔举行的音乐会上，母亲弹奏竖琴，伯父莱奥内洛[27]弹奏吉他，弟弟阿方索演奏小提琴，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弹奏鲁特琴[28]。伊莎贝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母亲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可爱活泼的金发少女很早就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一直是宫廷里的小明星。比她年幼一岁的贝亚特丽斯，一头黑发，还有一双散发着深邃目光的黑眼睛，总是胆怯地注视着她。据说在那不勒斯的母亲那一方的阿拉贡家族中混有阿拉伯血统，贝亚特丽斯的身上就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

1490年2月，16岁的伊莎贝拉与邻国曼托瓦国主弗朗切斯科·贡扎

加[29]侯爵结婚。年轻的侯爵26岁，虽然在意大利贵族中属于长相不佳一类，但是他有着十足的男性魅力。他体格健壮，身材高大，脸上胡须浓密。他扁平的鼻子遗传了祖母的血统，是勃兰登堡公爵[30]家特有的。本质上，他是一名军人，马匹及马上的枪战才是他最钟爱的事情。在当时的意大利，他也是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另外，他也是一位翩翩君子。他有着活泼的北意大利性格，十分健谈，对待女人温柔殷勤，这也是贡扎加家族的传统——尽管还不至于说，因为是曼托瓦所以才有了威尔第的歌剧《弄臣》[31]的舞台。与歌剧里的侯爵相比，弗朗切斯科很爱妻子，像普通男人爱着年轻的妻子一样。

新婚的第一夜是如何度过的，谁与谁出席了婚礼，这在当时一般的贵族家里都会有所记载，但他们却违反了这个常规，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据说伊莎贝拉对亲近的女官说过，作为丈夫的弗朗切斯科充分完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的职责；伊莎贝拉作为妻子，也回报了应有的态度。听说她是得意扬扬地讲述这些事情的。以应该有的态度回报，这在她的一生中从未改变过，因为伊莎贝拉不是那种因为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本性的女人。

伊莎贝拉嫁到曼托瓦家的第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也结婚了，对方是绰号为“伊鲁·摩洛”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32]。他虽然只是摄政，却完全无视身为正公爵的侄子，是真正君临米兰公国的统治者。伊鲁·摩洛在10年前曾经向伊莎贝拉求婚，但是因为一个月前伊莎贝拉与曼托瓦侯爵定下了婚约，所以由妹妹贝亚特丽斯顶替订婚。因为这是出于针对米兰的宿敌威尼斯共和国而与费拉拉结成友好关系的政治联姻，所以伊鲁·摩洛对这个替换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而答允了。

1491年的冬天，伊莎贝拉随同要结婚的妹妹前往米兰，她第一次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当时，米兰这座城市号称有着欧洲最繁华的宫廷，

因实际的统治者伊鲁·摩洛的婚礼而沸腾。庆祝和祭祀的监督由达·芬奇及布拉曼特[33]担任。在伊莎贝拉写给留在曼托瓦的丈夫的信件中，表现出她对当时景象的震惊。她说，米兰的整个城市是曼托瓦与费拉拉无法比拟的大都会。接连不断举行的舞会、华丽而优雅的宫廷人，如此巨大规模的豪华让人对伊鲁·摩洛的权力深信不疑。

作为主角的新娘是以往总是躲在姐姐的背后、存在感淡薄的贝亚特丽斯，今天终于被推到了舞台的正前方。她迷上了这座豪华宫廷的中心——比她年长20岁的丈夫。伊鲁·摩洛也在众人的面前展示了这个年轻新娘的可爱。贝亚特丽斯在那几天之间突然就蜕变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变美丽，但她孩童般的面孔上已经充满了魅力，在黯淡之光中沉睡已久的黢黑眼瞳，现在因为收获满满的幸福而变得自信，开始焕发出光彩。此时的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只因一个月之差，她与10年前的幸运失之交臂。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

得到释放的贝亚特丽斯，看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伊鲁·摩洛也被这个热情奔放、自然随性的妻子深深吸引住了。

充满自信的贝亚特丽斯开始着手分开10年来待在丈夫身边的情妇——被称为米兰公国背后的女王，甚至连达·芬奇都给她画过肖像的美丽的切奇利娅·加莱拉尼[34]。首先，她至少成功地将其逐出公开场合的宴会。

贝亚特丽斯做的第二件事是向姐姐伊莎贝拉炫耀自己的幸运。80件最新款式、用黄金与珠宝镶饰的豪华礼裙，许多宝石都是一介小国曼托瓦侯爵夫人难以企及的东西。

对此，伊莎贝拉以独特的优雅穿着进行反击。清新素丽的装饰衬托出天鹅绒质地礼服的厚实感，这些与伊莎贝拉白皙而丰满的身材是非常匹配的。她一生穿戴都很时尚，后来，巴黎路易十二的宫廷女官们为了追赶伊莎贝拉兴起的流行风尚，甚至请求她寄来穿上相同款式礼裙的玩偶。伊莎贝拉并不是那种天生的丽人，但大家从来都认为她是美人。她选择礼裙的热情几乎就像在搞政治一般热心。

可是，最让伊莎贝拉接受不了的是贝亚特丽斯招揽了像达·芬奇与布拉曼特这样的大艺术家。慢慢地，对于妹妹的邀请，她开始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绝参加。与妹妹抗衡的方法只有一个。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曼托瓦都完全不是米兰的对手，伊莎贝拉剩下的只有以自身为资本了。因极高修养而小有名气的她，需要加倍提高自己的名声，晚年时期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极负盛名的“极高修养的曼托瓦侯爵夫人”就是从此时打下了基础。

婚后，伊莎贝拉重新捡起被中断了的学问。她将费拉拉大学的旧师格里诺[35]请到了曼托瓦，讨论希腊、拉丁等古典文学与历史，以及中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在她周围聚集的学者及文艺爱好者之间的谈话都使用特殊的语言，这种圈内的交流若不是她沙龙里的一员，是听不懂

的。

与连续生了好几个女孩儿而沮丧不已的伊莎贝拉相比，两次都生了男孩儿的贝亚特丽斯似乎被允许做任何事情，但她也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她的丈夫伊鲁·摩洛。虽然是米兰的实际统治者，但正宗的米兰公爵却是侄子加莱亚佐·斯福尔扎[36]，米兰公国的第一夫人是相当于贝亚特丽斯外甥女的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因此每当出席公众宴会时，她都不得不落后于外甥女一步，这对于贝亚特丽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

贝亚特丽斯的心思与丈夫伊鲁·摩洛长年以来的野心完全一致，长年的摄政让伊鲁·摩洛慢慢地构建起篡夺公国的基础。米兰的民心也完全远离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公爵，这位公爵似乎综合了斯福尔扎家族与维斯孔蒂家族[37]性格上的缺陷，只对马匹、猎犬和女人感兴趣。而且，就连罗马教廷也在伊鲁·摩洛的掌控之中。1492年，在伊鲁·摩洛与其胞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的扶持下，罗德里戈·波吉亚以亚历山大六世的身份登上了教皇之位。

现在的障碍只有来自公爵夫人的娘家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的反对。必须将其摧毁，这成为伊鲁·摩洛的目标。对于贝亚特丽斯而言，那也是母亲的娘家，她也回忆起年幼的时候在那不勒斯宫廷里度过了8年的时光，但是这些事情对现在的她已经完全不成为束缚。

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王国索求上至古代的安茹家[38]的继承权。伊鲁·摩洛为了摧毁阿拉贡王族而利用了这一点。以允许法国军队顺利借道米兰公国领土为交换条件，这也正是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大利悲剧的根源、外国军队入侵的导火索。

1495年，那不勒斯被法国军队征服的同时，伊鲁·摩洛也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可是，对于被尊称为米兰公爵夫人的贝亚特丽斯来说，人生的巅峰却没延续多久就匆匆结束了。丈夫伊鲁·摩洛的新情妇的出现让她抓狂。一天夜里，城堡里同往常一样正在举行舞会，贝亚特丽斯自然是喧闹不休的舞会的中心。突然，她感到一阵剧痛，大家将她抬进了卧室。深夜，她产下一个死婴，而一小时之后，她也死了，在她的22岁生日即将来临前。

与力的相遇

意大利诸国在法国军队的身上第一次见识到了大国的权威。外国军队入侵意大利，让他们立刻感到自己身处危险境地。尤其对于刚刚成为正统米兰公爵的伊鲁·摩洛来说，他明白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个局面现在必须由自己去收拾，因为法国国王正通过与奥尔良公爵[39]结婚的瓦伦丁·维斯孔蒂[40]这层关系向米兰公国索取权利。

意大利迅速团结了起来。1495年3月，包括教皇、威尼斯、米兰、曼托瓦及其他城市在内，成立了反法同盟。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作为该同盟的总司令官从曼托瓦出发，他将公国的政务都托付给了妻子。

这对于伊莎贝拉来说，是自觉对政治产生兴趣的最初机会。与军人传统的贡扎拉家族不同，政治家埃斯特家族的血统在她的身体里苏醒。年轻的公爵夫人以缜密的心思和冷静的判断力处理着政务，在听取了丈夫的参谋们的一切意见后，曼托瓦的领地内没有一处不在夫人的掌控之中。每个市民无论何时都可以求见夫人，她也主动地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伊莎贝拉就这样慢慢地学习治国的所有事务。

另一方面，丈夫弗朗切斯科斩获了他人生中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荣誉。7月，在塔罗河战役[41]中，弗朗切斯科率军大胜法国军队，查理八世历尽千辛万苦逃回法国。整个意大利都因这个胜利的捷报而沸腾了。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现在已经成了“意大利的自由”的英雄，曼托瓦也沉浸在无比喜悦与自豪之中。在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而建造的维多利亚圣母堂里，宫廷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42]绘制了《胜利的圣母马利亚》[43]，现收藏于卢浮宫。弗朗切斯科因此获赠2000达克特的特别奖励，而伊莎贝拉也获赠1000达克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红包”令伊莎贝拉大喜过望，钱尚未到手便向威尼斯订购了礼裙与首饰。

可是，因为这样一点儿成功便高兴万分的伊莎贝拉的面前出现了两个男人，几乎将这喜悦一扫而尽。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一流的

人物，一个是妹夫伊鲁·摩洛，另一个是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这两个人，伊莎贝拉明白了真正的政治世界。

被称为伊鲁·摩洛而不知其权势之衰退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似乎也以1497年妻子贝亚特丽斯之死为转折点，运势开始走低。这一次，法国推出路易十二来逼迫米兰。

尽管如此，伊莎贝拉依旧信任伊鲁·摩洛的力量。在她的头脑中，曾经豪奢的米兰宫廷与国主伊鲁·摩洛光彩夺目的满满自信仍记忆犹新。再加上她经常想到自己本可以成为婚礼的女主角，却因为一个月之差而失去了机会，被妹妹取而代之。妹妹死后，这两人的关系也变得特别亲密，往复的信函更加深了伊莎贝拉对伊鲁·摩洛的爱恋与信赖。对一度想先拱手让出米兰而后再收复米兰而绞尽脑汁的伊鲁·摩洛，伊莎贝拉曾去信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那我将率领军队前去帮助你。"

可是，伊莎贝拉这种多情善感的预见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与路易十二的外甥女结婚，已经不再是米兰的同盟。米兰的仇敌威尼斯自不必说，不仅假装不知道，还去帮助法国。那不勒斯在5年前为赶走伊鲁·摩洛也出了力。所以，伊鲁·摩洛完全是孤立的。1500年，他在法国的逼迫下交出了米兰，成为俘虏，晚年死于法国领地内的洛什城堡[44]。

伊鲁·摩洛的没落让伊莎贝拉抛弃了幼稚的想法。即便在前一年丈夫弗朗切斯科因为伊鲁·摩洛的阴谋而被解除担任多年的威尼斯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职务时，她也没有动摇对伊鲁·摩洛的信赖。但是这一次让她明白，对于政治，任何信任和亲近的感情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在米兰没落后，曼托瓦受到来自北部的法国的威胁与来自南部的切萨雷·波吉亚的恫吓。虽然是中等程度的国家，但曼托瓦位于意大利半

岛的要害之处。如果不穿过曼托瓦，那么无论从南边还是北边，都不能纵横半岛。出于这一点，它注定成为诸国必争之地。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也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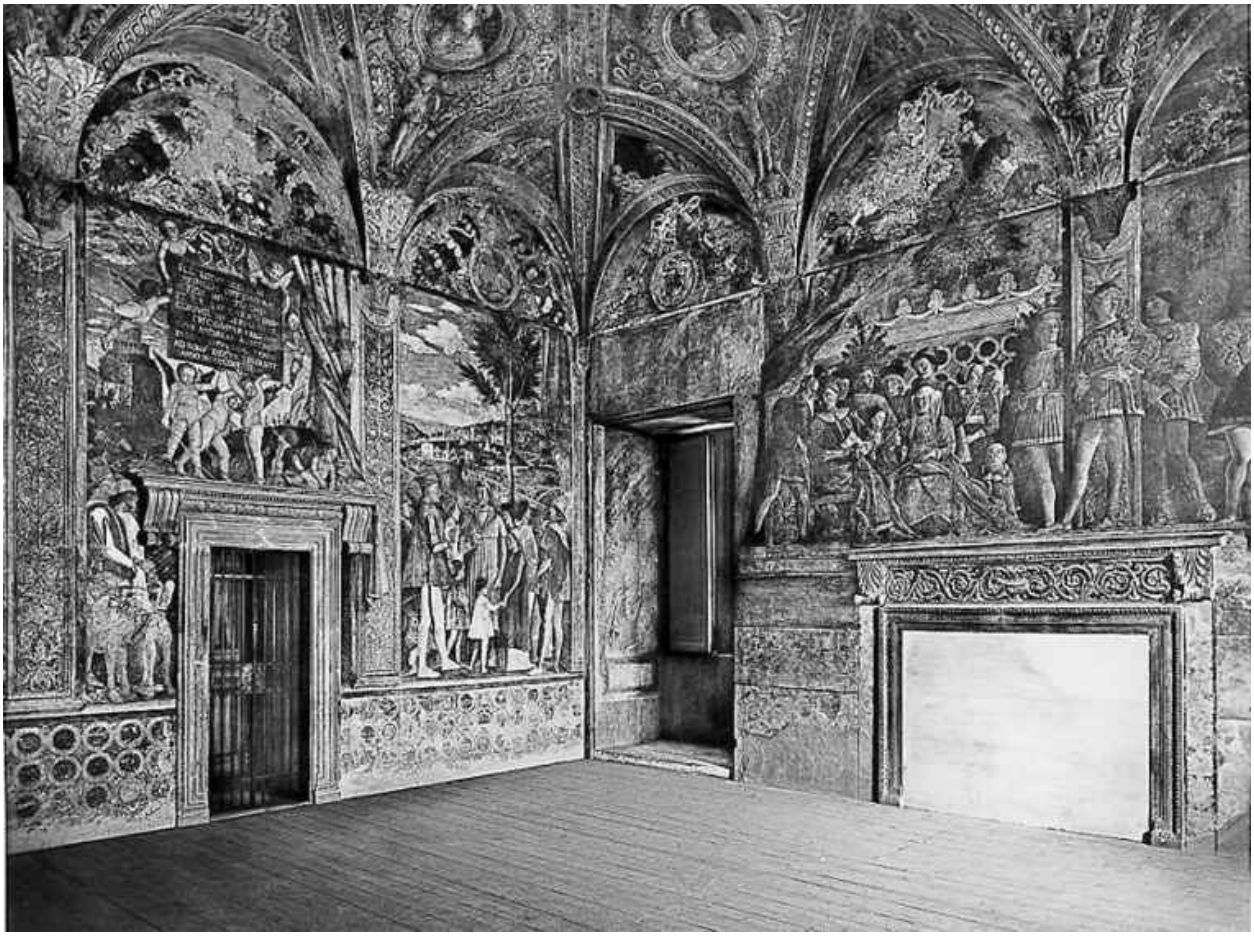
在米兰逐渐走向没落之际，伊鲁·摩洛的两个情妇——切奇利娅·加莱拉尼与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逃到了伊莎贝拉的身边。她亲切地迎接了这两位著名的“爱的技能者”。对于切奇利娅·加莱拉尼，她附上了自己写的推荐信，送往法国国王的宫廷。而卢克雷齐娅则带来了伊鲁·摩洛写的一封推荐信。这是用拉丁语书写的讲究排场的推荐信，直译为：“她爱的技能总让我十分欣喜。”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带着这张证明辗转而来。

米兰宫廷没落后，逃至曼托瓦的何止伊鲁·摩洛的情妇们，还有诗人尼科洛·达·柯勒乔[45]、镂金匠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46]。1499年年末，达·芬奇也在从米兰到威尼斯的途中经过曼托瓦。自从一年前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给伊莎贝拉看了达·芬奇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之后，伊莎贝拉就羡慕不已。所以，得知达·芬奇来访，她欣喜若狂地迎接了他。

在滞留曼托瓦宫廷时，达·芬奇主动拿起了画笔。他绘制的是穿着日常服饰、披散了一头金发、没有佩带任何宝石等装饰品的伊莎贝拉的身形，这幅画现在保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伊莎贝拉希望达·芬奇画的并不是这种素描画，而是真正的肖像画，但是她的请求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伊莎贝拉给达·芬奇展示了她收集的众多艺术品，但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著名的“新婚的房间”（Sala degli sposi）中曼特尼亚绘制的著名壁画也毫不关心。达·芬奇对曼托瓦唯一感兴趣的是被称为意大利最好的曼托瓦产的马匹。

伊莎贝拉在那之后也数次写信给达·芬奇，请他绘制肖像画，甚至

还调动曼托瓦驻佛罗伦萨大使出面请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一次回复。1506年，伊莎贝拉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佛罗伦萨的时候，虽然拉斐尔[47]去了乌尔比诺不在佛罗伦萨，但她见到了佩鲁吉诺[48]、洛伦佐·迪·克雷蒂[49]等艺术家。可是，达·芬奇因绘制壁画《安吉里之战》[50]失败而心情郁闷，正在菲耶索莱[51]专心研究水力学，所以根本就不愿见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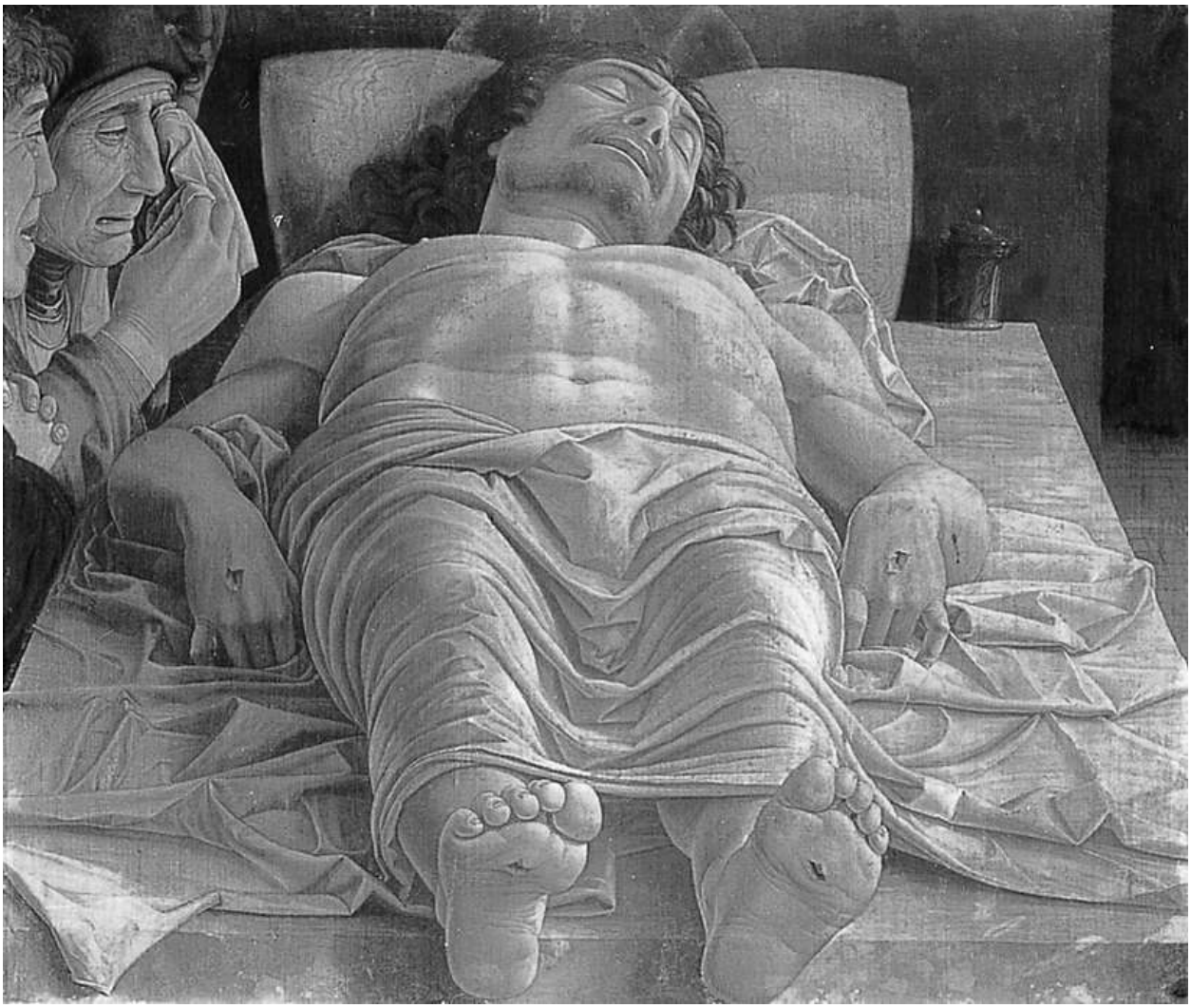
新婚的房间

忽视伊莎贝拉的人不止达·芬奇一个。与此同时，她也请求乔凡尼·贝利尼[52]绘画，并且多次支付了订金，但威尼斯的乔凡尼没有传来一点儿消息。1504年，伊莎贝拉对这种持续了两年的情形大发雷霆，她写信给乔凡尼说：“如果不还钱或者不画画，那我就把一切情况告诉威尼

斯总督[53]。”纵然是乔凡尼也只得回信了：“侯爵夫人，我收到了订金，但是我是那种做事非常迟缓的人，真的已经尽力了。画作我会尽快送去。”数月后，画作被送达曼托瓦。伊莎贝拉非常高兴并一直珍藏着，但可惜这幅画在1627年之后就流失了。

在历史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卢多维科·伊鲁·摩洛的著名艺术资助者。但是，与前两名相比，伊莎贝拉持有的财力显得十分微薄。曼托瓦的国库经常亏空，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她甚至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宝石。不过，她对于当时作为艺术资助者备受称赞的自己的修养与趣味显得过于自信，这使得她在最初的时候，连对待自己身边的来自费拉拉宫廷的诗人阿廖斯托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阿廖斯托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古典名诗《疯狂的奥兰多》的作者，但当时在伊莎贝拉的沙龙里，现在看来那些都是三流枢机主教诗人之间，他几乎被淹没和忽视了。阿廖斯托曾在诗中褒扬过伊莎贝拉，还将诗集献给了她，但这对于不得不依赖于费拉拉宫廷以获得生活资本的诗人来说，也只能说是情非得已。

不受伊莎贝拉重视的艺术家还有曼特尼亚。曼特尼亚虽然是意大利北部著名的一流画家，但当时他的地位是曼托瓦的宫廷画家。所以，就算他为伊莎贝拉绘制肖像画也不足为奇，可是奇怪的是，他现今却没有留存下一幅画作。这是因为伊莎贝拉不喜欢他那有些冷峻的写实主义画风。在现今留存下来的她写给亲戚乌尔比诺公爵夫人伊丽莎白[54]的信中写道，她不要曼特尼亚给她作肖像画，所以希望派一个乌尔比诺宫廷画家到曼托瓦。根据她的这一请求被派到曼托瓦的画家是乔凡尼·桑蒂[55]，著名的拉斐尔的父亲。他是一个优秀的风景画画家，伊莎贝拉似乎对他很满意。[56]



曼特尼亚画《哀悼基督》

其实在当时，以曼特尼亚的名声足以被邀请至罗马。伊莎贝拉也厚待了他，据说在他死的时候，伊莎贝拉个人替他偿还了生前的所有债务。伊莎贝拉只不过不想保留曼特尼亚用冷峻的写实主义之笔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很多年后，消瘦而老丑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57]在拉斐尔的画笔下展现出一副安然的姿态。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比培育艺术更为重要的是要世间都知道“曼托瓦侯爵夫人的艺术沙龙”。只有通过这个才能超越她作为一介小国的侯爵夫人的地位。只是，聚集于此处的多是一些需要贵族支持的

艺术家，像达·芬奇那种受到很多人邀请的艺术家，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她虽不遗余力地收集着艺术品，但那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书斋罢了，最终她也没能超越一个“小型收藏家”的格调。

1500年，对伊鲁·摩洛来说是毁灭之年，但对切萨雷·波吉亚来说，却是运势急速上升之年，对伊莎贝拉则是公私两方面都非常忙碌的一年。

先是5月份的时候，她生下了期盼已久的男孩儿，取名为费代里科[58]。而在选择洗礼的教父上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首先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59]。皇帝与弗朗切斯科有着多年的友情。为了不得罪皇帝的政敌法国路易十二，这个选择的理由被说成是为了庆祝稍早之前皇帝的孙子诞生之喜事，皇帝的孙子就是后来的查理[60]。伊莎贝拉当然想象不到，这个刚出生的皇帝的孙子后来对意大利，对她自己的儿子带来了多么重要的影响。第二个教父选的是枢机主教圣塞韦里诺。他虽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关系密切，但尚有潜在的势力。最后一个教父是现任教皇的儿子，在当时以不可匹敌的势力与才华而最令人敬畏的切萨雷·波吉亚。切萨雷在接到这封充满了喜悦的信件的同时也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弗朗切斯科与伊莎贝拉都不是单纯到接到他的信就会得意忘形的人。曼托瓦非常清楚这个男人的危险性。那时，费拉拉驻罗马大使写给伊莎贝拉这么一封信：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对教皇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看起来，公爵也非常清楚自己对坚强的精神与名声的欲望。可是据我判断，他虽然很擅长征服，治理和固守的手段却少得可怜。前几日，教皇对我说：“公爵虽然是一个异常优秀的男人，但若受到侮辱，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经常对公爵说：‘罗马是一个自由的都市。’于是，公爵这么回答我：‘那对于罗马来说是件好事啊。可是我要教会他们：罗马市民还是不要使用那样的自由才更合算。’”马基雅维利口中的“寡言而经常行动的男人”，对于曼托瓦

而言是一个极其毛骨悚然的存在。

1500年7月，切萨雷的野心逐步付诸实践。首先，他在梵蒂冈宫殿里杀害了妹妹卢克雷齐娅的第二任丈夫、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家的庶子阿方索。之后，那不勒斯马上被与波吉亚联手的法国征服，切萨雷控制了罗马涅地区。数周后，波吉亚家又提出了刚刚成为寡妇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在安娜·斯福尔扎死后一直独身的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之间的婚事。但埃尔科莱公爵与阿方索对此都毫无兴趣。得知这一消息的切萨雷让妻子——法国贵族家的女儿夏洛特·德·阿尔布雷[61]的亲戚，也就是埃斯特家的保护者、法国的路易十二强迫他们答应。埃斯特家再也不能拖延答复了。1501年8月，婚事谈妥。

卢克雷齐娅的婚礼结束后不久，一封信函让整个曼托瓦都感到恐慌。那是来自切萨雷·波吉亚的信件，他提出了贡扎加的继承人、两岁的费代里科与他女儿的婚事。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切萨雷的企图。曼托瓦非常慎重。根据以往的事例，显而易见，无论教皇的近亲现在有多么大的势力，也不能保证将来。可是切萨雷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尚十分健壮，更不知死期何时。伊莎贝拉与弗朗切斯科决定尽量拖延婚事，同时也要非常小心不能惹怒切萨雷。面对切萨雷接连不断的催促，曼托瓦侯爵提出了条件：将弟弟西吉斯蒙多[62]升级为枢机主教。这对拥有枢机主教任命权的教皇，也就是波吉亚来说，意味着最后一张王牌。罗马对此没有回复。

为了让曼托瓦调转这一要求的矛头，切萨雷这回提出的条件是在结婚的时候退还巨额的礼金。对此，伊莎贝拉回复如下：“现在曼托瓦的国库中可没这么大的一笔钱款，里面有的只是我的宝石。但是从年纪尚轻还很喜欢佩戴宝石的女子身上夺取宝石，就算15年后儿子结婚时再归还，到那时人都老了，早已过了喜欢宝石的年纪了。真正的绅士怎么可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就此，切萨雷再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在那期间，曼托瓦周边的公国也陆续被切萨雷征服。1503年6月，由达·芬奇担任技术总监的切萨雷大军征服了斯波莱托，侵入了乌尔比诺领地。乌尔比诺公爵与夫人伊丽莎白逃至曼托瓦。同月21日，切萨雷进入乌尔比诺城，将宫廷里的所有东西洗劫一空。接着佩鲁贾[63]、锡耶纳[64]、比萨、卢卡[65]也被切萨雷悉数收入囊中。

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到曼托瓦避难的三天后，伊莎贝拉得知自己从前在公爵收藏品中见过的米开朗琪罗制作的维纳斯与丘比特的雕像都被切萨雷连同其他艺术品带去罗马了。那是她一直以羡慕的目光远眺的东西，所以特别想要得到它们。那个时候，她正在建造一间自己的藏品室。于是，在这个念头的催促下，她迫不及待地给罗马的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向切萨雷请求。数周后，切萨雷的家臣将雕像送至曼托瓦。喜出望外的伊莎贝拉为了表示致谢和庆祝战争的胜利，向切萨雷赠送了狂欢节上使用的100个面具，以及她满怀温柔女性情感所写的信函。此刻的她好像毫不在意被驱逐出国而寄身于曼托瓦的乌尔比诺公爵的痛苦心情。切萨雷立刻回了信，这也是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信的结尾处没有署名罗马涅公爵，却代之以调侃的“来自你年轻的弟弟，切萨雷”。他比29岁的伊莎贝拉小一岁。

1503年8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梵蒂冈宫殿里短期患病之后突然去世，切萨雷也几乎同时躺在了病床上。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们是被下了毒，但实际是患了疟疾。在得知教皇的死讯后，整日因切萨雷担惊受怕的意大利诸国都欢欣雀跃起来。

切萨雷在父亲死后将罗马涅地区拱手献给了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可是他在前往那不勒斯途中却仍难逃脱被捕的命运，之后被押送至西班牙。世态炎凉，法国与那不勒斯也纷纷转过头去对他不再理睬，就连罗马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便忘记了他。

可是，仍有很多人没有忘记切萨雷·波吉亚，伊莎贝拉就是其中的一个。18岁时因为父亲即位教皇而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28岁时又因父亲之死而没落，这个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都搅和了一通的个性鲜明的男人，曾是波吉亚支持者的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就连称得上是反波吉亚派的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66]也不得不承认切萨雷的行动力及其人格魅力。尽管素未谋面，伊莎贝拉却对他印象深刻。

悲剧的间奏

无论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不伦之恋的禁忌都是不可触犯的，更何况还是别人引起的爱情纠纷。在一个阴谋与亲属之间的争斗属于家常便饭的时代，不伦之恋必然会以悲剧的形式来结束，这就是它的宿命。

首先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的不伦之恋。切萨雷·波吉亚在1507年死于西班牙之前，从心底里关心的只有妹妹卢克雷齐娅。当四处散发的苦苦请求帮助哥哥的信件全部落空时，安慰绝望中的卢克雷齐娅并与她亲切商量的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他们两个人都处于拥有相互稳固的协作关系的埃斯特家族兄弟姐妹的外围，并且两人都不太能理解沉浸于深厚修养氛围中的埃斯特家族。

以往，对于弗朗切斯科的女性交往经历，伊莎贝拉都假装不在意。10年前，一个女子生下了丈夫的孩子而公开了恋情。但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所以根据当时的风俗，她选择了无视，但这次的对手是她的弟弟阿方索的妻子。她非常爱这个弟弟，而且她也很清楚弟弟爱着妻子。当丈夫在波河河畔与卢克雷齐娅相会并将她带回曼托瓦城附近时，伊莎贝拉并没有感受到嫉妒或是愤怒，只有轻蔑。

弗朗切斯科与卢克雷齐娅的关系，究竟是单纯的亲密还是有更深的

感情，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不久之后，两人不再通信，因为在他们之间传递信函的男人不知被谁谋杀了。阿方索派人杀害的嫌疑很快就被洗清了，也找不到伊莎贝拉指使的证据。

还有一个恋爱的悲剧，发生于1505年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这场真实的悲剧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让埃斯特家族处于灰色的阴霾之中。

当时，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嫁到埃斯特家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官安杰拉·波吉亚[67]。她与伊莎贝拉同父异母的弟弟、年轻俊美的朱利奥[68]相爱了。爱上美丽的安杰拉的不只有朱利奥，还有另一个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可是，对于枢机主教的爱恋，安杰拉断然拒绝说："你的一切都比不上朱利奥那双美丽的眼睛。"为此愤怒嫉妒得发狂的伊波利托在数日后的费拉拉城外，与几个家臣一同袭击了急匆匆地孤身一人回城的朱利奥，用手指抠掉了他的双眼。

受伤的朱利奥向哥哥阿方索诉说了这件事。可是，伊波利托是基督教枢机主教，所以就算是阿方索也无能为力。更让阿方索担心的是，在处置枢机主教的事情上，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会如何刁难费拉拉，因为费拉拉从不掩饰与法国的密切关系，而被尤利乌斯二世视为永远的眼中钉。费拉拉是教皇册封的公国，正如曼托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册封的一样。阿方索命令朱利奥必须忍耐，并且恢复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关系。

怀恨在心的朱利奥向另外一个哥哥费兰特吐露了心思，同情他的费兰特与朱利奥计划了一个谋杀阿方索的方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实施的勇气，一拖再拖。就这样，计划被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获悉，他紧急通报给当时正前往南意大利而不在费拉拉的阿方索。阿方索急忙返回费拉拉。费兰特跪在哥哥的面前请求原谅而被捕，朱利奥则逃到伊莎贝拉身边。伊莎贝拉为自己的弟弟们发生这起事件伤心不已。她虽然暂时让朱利奥避开了追捕者，但非常清楚这是没有用的，她能做的只有努力请求

将死刑稍微减轻一点儿，至少减成终身监禁。只是，这么做的只有伊莎贝拉一个人。

处刑之日来临了。在费拉拉城前的广场上，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个埃斯特家的兄弟及其附和的家臣都被带了出来。在众人的目光下，先是家臣们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后轮到埃斯特家的兄弟时，国主阿方索公爵感念手足之亲，免除了二人的死刑，宣告终身监禁。人群中响起了如释重负的欢呼声。

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人分别被幽禁于城堡角落里一个白塔之中的上下两个房间，通往房间的入口被墙土牢固地封住，除了偶尔前来传达事务的人以外，禁止任何人会见。房间的上方只开了一个洞，餐饭由此传递。过了一阵，他们可以从面向费拉拉城外的窗户，眺望远方的人们往来的情形。又过了一段时间，上下两个房间被打通，变成一个可以互相联络、通风良好的大房间。26岁的费兰特在被幽禁了37年后病死于牢房之中，而25岁的朱利奥在费兰特死后还活了19年，他在这座塔中足足待了56年，直到他去世的两年前才被释放了出来，真正是半个世纪的执念啊。在这一期间，阿方索死了，埃尔科莱二世也死了，已经到了孙子阿方索二世的世代了。费拉拉的年代记中是这么结语的：“当这个老人从塔中走出时，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正是半个世纪前最流行的款式。”

深受打击的伊莎贝拉在这场悲剧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到访费拉拉，可是出于对娘家的深厚感情，后来当阿方索与教皇等人相继发生对立时，她总是帮助弟弟，帮助埃斯特家。阿方索也从这个姐姐的身上感到了超越任何人的真挚情谊。

曼托瓦的防卫

1509年夏天，伊莎贝拉·德·埃斯特35岁，正当韶光年华。可是这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件事将她置于一生中最大的试验场，将她从以往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扔进现实的政治斗争的热浪之中。但忍耐过这场考验后，她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并获得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应有的地位。

通过各种各样的史料将这漫长而错综复杂的一年架构起来后，事件的大致经过可以追溯如下：

在1508年10月，威尼斯共和国依靠强劲的势力背景，开始明目张胆地显露出对罗马涅地区与伦巴第[69]地区的野心，得知这一情况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侯爵等结成了同盟，对威尼斯宣战。此时，常年任职于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一反其以往的立场，第一次站到了反威尼斯的阵营中。

1509年4月，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此同时，教皇的军队在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70]的指挥下进军罗马涅。5月，威尼斯军队在各地的战役中遭受彻底的败北。威尼斯统治下的都市维罗纳[71]、维琴察[72]、帕多瓦[73]全部被同盟军占领。这个重创可称得上是“威尼斯在这800年间获得的东西全部失去了”（马基雅维利）。不过威尼斯的实力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击垮的，7月，威尼斯军队反攻，首先夺回了帕多瓦。

事件发生在8月8日的夜间，指挥帕多瓦包围军队的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在大意的、毫无防御的睡梦中遭到了敌人的奇袭。根据历史学家奎恰迪尼的说法，“侯爵几乎是赤裸地从窗户逃跑，后来被假装帮助的百姓抓住。他向百姓请求愿意支付高额赎金，但是他们根本不理

会，将他交给了威尼斯”。弗朗切斯科豪华的日常服饰与3000匹优良的曼托瓦马匹都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这一紧急通知在当天的半夜过后传达到了曼托瓦。伊莎贝拉简直要晕了过去，她立即派特使急速赶往当时受教皇之命在马切拉塔[74]担任枢机主教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多之处，让他马上回曼托瓦帮助遭遇如此不幸的自己与国家。这个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也传到了罗马，本来就易怒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这下更是怒火中烧，他“将头上戴着的贝雷帽扔到地上后，一边用可怕和不敬的语言叱骂圣人，一边怒吼着——你这个圣彼得的混蛋！”

伊莎贝拉再也没有闲工夫继续在宫廷中和女官们数落弟媳的长短，至于在教堂向神明祈祷或是依靠占卜术，那都是无用的。她日夜思索着能有效收拾这一不幸局面的办法，首先做了以下决定：1.守住曼托瓦，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更不能落入比敌人更为棘手的同伴的手中；2.营救丈夫弗朗切斯科，但是不能花费巨大的代价；3.通过势力或奸诈的计谋进行复仇。

曼托瓦本是一介小国，如今国主被擒，威尼斯势必乘此良机谋取曼托瓦，而同盟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路易十二、教皇亦不可信。更直白地说，这些所谓的同伴甚至比敌人更可怕，更棘手。总之，谁也不能信。

曼托瓦的市民们通过伊莎贝拉迄今为止摄政的实绩，充分了解侯爵夫人的深思熟虑与坚定的行动意志，全体人员都同意追随她，追随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点儿胜出希望却依然直面巨大困难的她。她首先召集了曼托瓦全军，紧接着向全体市民下达了布告：“中止全国的一切活动，男女皆穿朴素服装，全国厉行节约，这些最先在宫廷内实施。农民也要准备拿起武器，全国都要奋进，让侯爵在归国之际看到和从前一样的曼托瓦。”税金的设定与以往一样，于是，在这不幸的一年中能够提

高税金的就只是没有义务拿起武器的犹太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

另一方面，伊莎贝拉继续写信，想借助外部势力来营救丈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波旁公爵[75]、萨沃亚公爵[76]、蒙费拉托[77]侯爵、佛罗伦萨长官、锡耶纳与卢卡等地方的统治者、巴伐利亚公爵、勃兰登堡公爵等人、美第奇枢机主教、阿拉贡与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匈牙利国王，此外还有土耳其的苏丹[78]。

当然，伊莎贝拉明白在这些人之中，向教皇求救是最好的方法。事

发还不到一个月，她就派遣卢多维科·布洛涅罗为特别使节前往罗马，这一举动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非常满意。教皇向布洛涅罗转达了意思："侯爵夫人依赖于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我把夫人当作女儿一般对待。"但是他也没有隐瞒自己对其夫弗朗切斯科并无好感，这是因为他以前就很不喜欢弗朗切斯科亲近外国势力的策略。教皇真正的想法是将外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为此从一开始就没有摧毁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的意图。在适当的场合，将威尼斯拉入自己的阵营才是重要的，在此之前，弗朗切斯科一个人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伊莎贝拉也非常清楚教皇打的如意算盘，正因为非常清楚，反而对教皇寄予了解救丈夫的希望。比起法国与德国皇帝只是瞄准曼托瓦的想法，教皇的考虑显得更为深远，不如乘此良机，也许能使丈夫的问题被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

伊莎贝拉的判断是正确的，路易十二并不同情弗朗切斯科的不幸。他对费拉拉大使说："可别想用我这里的威尼斯俘虏与弗朗切斯科交换，就算不是最重要的俘虏，我也不会拿去交换的。"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他立刻给伊莎贝拉送来这么一封信："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忠告，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守卫曼托瓦，我决定派100个法国士兵过去。"

伊莎贝拉非常担心法国派来的军士将成为征服曼托瓦的开端，但是其实她更害怕这会让威尼斯找到进攻曼托瓦的借口，毕竟曼托瓦与威尼斯的国境接壤。

特快信使飞奔至巴黎。"陛下，我衷心感谢您的好意。只是，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现在国民与家臣们都在非常忠诚地帮助我。倘若我接受了陛下的好意，那么在宣誓效忠的国民看来，这就成了我对他们不信任的证明。曼托瓦，将由曼托瓦的国民来守卫。"在这种危急关头绝不能树敌，无论是谁。于是她同时也寄给了法国王后一封信，一封完全改变了语气的想要博取女性同情的信。"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恐怕我只

有死路一条了。请王后体谅体谅维持这种没有丈夫的生活的辛酸，对于女性来说，这真是比死还要痛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得知路易十二要求向曼托瓦派兵之后，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立即向伊莎贝拉转达了将要派遣德国军队驻扎曼托瓦的意思，而她也给皇帝送去了相同态度的信，拒绝了派兵。

另一方面，被威尼斯拘捕的弗朗切斯科在最初之时还高傲地忍耐其境遇。当他作为囚犯进入威尼斯的城市时，等得不耐烦的市民们用讥讽的语气向他打招呼：“欢迎曼托瓦侯爵。”对此，他这么回答道：“在这里的是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不是曼托瓦侯爵。曼托瓦侯爵是身在曼托瓦的我的儿子费代里科。”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丝毫没有要释放他的迹象，弗朗切斯科开始焦躁起来。他开始写信给妻子，无助地说道：“请代我向神明祈祷。”

伊莎贝拉也非常担心丈夫的身体。她向威尼斯派去了照看丈夫的仆人与医生，还有给他排忧解闷的乐师与小丑，但都被威尼斯遣返了回来。为了能够让丈夫获得良好的待遇，在送衣服的时候，她甚至还谎称“我们夫妇以前就很尊重威尼斯，对威尼斯很有好感”，但威尼斯丝毫不予理会。受此冷遇的伊莎贝拉十分窝火，她给罗马大使写信说，这实在是太无礼了，请如实转告给教皇。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国库日渐亏空，伊莎贝拉还必须按照威尼斯的要求，支付丈夫及家臣们作为俘虏的滞留费用。不仅如此，威尼斯就连看管俘虏们的威尼斯警卫的薪水也要她一同支付。更让她头疼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与威尼斯开战为由向她索取军费。皇帝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都说：“那个百家恶魔生出来的家伙，让全世界都变得贫穷。”因皇帝的索求苦不堪言的伊莎贝拉向教皇请求：“请转告皇帝，曼托瓦已经没有可支付的金钱了。”可是，教皇却对曼托瓦大使回复道：“就算我转告也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成为皇帝转向我索求军费的好借口。”无奈之下，伊莎贝拉变卖了自己的宝

石，总好过提高税金。

然而，最令她悲伤的是，丈夫弗朗切斯科开始对她产生了怀疑。心力交瘁、身心俱疲、动不动就生病的弗朗切斯科怯弱了，甚至在前来会面的威尼斯总督面前哭泣着乞求释放自己。然后，他相信了传入威尼斯的流言，说伊莎贝拉与娘家埃斯特家结盟后完全依附于法国，所以根本不希望释放自己的丈夫。

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向教皇倾诉，请教皇向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解释清楚。教皇因为认可以往伊莎贝拉对待德国皇帝及法国国王的态度，便向威尼斯派遣了使节，向弗朗切斯科阐明了伊莎贝拉的立场，但是弗朗切斯科依旧心存疑虑。

其间，在罗马也逐渐兴起了要求释放弗朗切斯科的运动。枢机主教们纷纷向教皇提出了请求书，并逮捕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以此作为交换弗朗切斯科的条件。可是，大使是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个方案失败后，伊莎贝拉提出了方案：请皇帝、路易十二、教皇同时派遣使节到威尼斯，要求释放公爵。但路易十二回复说，这至少要等到占领帕多瓦之后再谈，所以这个方案也失败了。

最终，伊莎贝拉深切地感受到，能够依靠的只有罗马。战役之初，教皇开除了威尼斯的教籍，当她察觉到威尼斯希望教皇解除除籍的动向后，并没有忘记请求教皇以此作为释放丈夫的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加快已经订了婚的女儿埃莱奥诺拉[79]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的婚事进程。乌尔比诺公爵没有子嗣，所以将外甥收为养子。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80]的外甥，也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伊莎贝拉想通过这样的姻亲而稍微增进一些与教皇的关系。

12月，沉浸在父亲不幸的悲伤中的埃莱奥诺拉嫁到了乌尔比诺。婚后，滞留于罗马的埃莱奥诺拉与乌尔比诺公爵一有机会便向教皇请求释

放弗朗切斯科，但教皇每次都像炸了的炮仗一样，对着外甥乌尔比诺公爵怒吼道：“你小子是想学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吗？”尤利乌斯二世对亚历山大六世受儿子切萨雷摆布的做法非常厌恶。

对这个总是因为弗朗切斯科一事受到反复烦扰，而且难以沟通的尤利乌斯二世，请求的时候可得需要小心翼翼。有的时候，教皇会出席罗马举行的赛马会。每每优秀的曼托瓦产的马匹获胜的时候，民众都会欢呼喝彩“曼托瓦！曼托瓦！”教皇也非常高兴。这时，伊丽莎白与埃莱奥诺拉心想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分别向教皇请求释放弗朗切斯科。教皇也因为心情好而答应下来，但只说不要着急。

150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威尼斯军队集结了全军之力对扎营在波河河畔的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发起了总攻。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立刻向路易十二派去信使，告知在自己提出请求之前，法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向曼托瓦派军。紧接着，曼托瓦发布了全国紧急动员令，农民和商人都拿起了武器。守卫城墙的全军还接到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下达的这个指令。“就算威尼斯军队将侯爵强行押至城墙之下，说如若不打开城门就杀了侯爵，也绝对不能开城。比起一个侯爵，哪怕是本国的国主，守住曼托瓦才是最重要的。”

威尼斯军队入侵曼托瓦的行动功败垂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率领的费拉拉军队拥有阿方索擅长的近代兵器，一举击破了威尼斯军队，使其沉入了波河之底。

在罗马，教皇也终于有所行动。1510年2月，教皇与威尼斯之间开始交涉。教皇首先提议：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总指挥官，然后予以释放。不言而喻，这一方案达成的基础是教皇与威尼斯一致默认要共同将法国赶出意大利。威尼斯同意了。可是这一次，伊莎贝拉却成了反对者。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曼托瓦将会遭到德国与法国的

肆意践踏。不能给任何一方找到侵略曼托瓦的借口，伊莎贝拉出于这样的担心，自然持反对意见。只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得不第一次站在教皇的对立面。

果然，她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得知教皇与威尼斯之间的动作——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军队的总指挥官之时，他开始暗示曼托瓦将其继承者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德国。身为母亲的伊莎贝拉心痛不已，10岁的费代里科是她最疼爱的儿子。而且，将费代里科送到德国当人质，在政治上也绝对不是最好的计策。伊莎贝拉立刻向曼托瓦驻德国大使送去了指令。“如果皇帝开了口，这一人质事件将会使得曼托瓦全体人民为此克服的困难与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以请转告皇帝，我们绝对不会答应。而且要强调，这是最终回复，绝对不会改变。”

伊莎贝拉的难题源源不断。威尼斯虽然将弗朗切斯科变成总指挥官，但并不信任他。随时都可能被公爵背叛的威尼斯，要求伊莎贝拉将儿子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意思是，只有当费代里科被送到威尼斯时，弗朗切斯科才能成为威尼斯总指挥官，然后才能被释放。伊莎贝拉当然拒绝了这一屈辱的要求。于是，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让妻子代替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无论将妻子带到威尼斯还是法国，或者是世界的尽头都没关系。”威尼斯没有理睬他，他们认为弗朗切斯科的这个提议一定是因为喜欢拈花惹草的他想要把糟糠之妻赶走。

5月，威尼斯出现了示威游行。圣马可广场[81]上聚集了市民，弗朗切斯科被一片高呼“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民众簇拥其中。

这个消息马上传到了法国宫廷。路易十二立刻派特使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到曼托瓦，要求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法国。伊莎贝拉先是找理由推托：“儿子尚幼，前往巴黎路途遥远，不堪重负。”得知推托不过

后，她一改态度，强硬地回道："费代里科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儿子，对于曼托瓦国民来说，他还是当今的国主，肩上可是承担着凝聚整个曼托瓦团结的重任。我既然不答应皇帝的要求，自然也不会答应法国的同一要求。"法国特使维斯孔蒂出于个人对伊莎贝拉的尊敬之情，回避了强硬的话，将其所述进行了平淡的转告，没有触怒路易十二。

但是，同样的要求，这次由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了。伊莎贝拉给丈夫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我不想听你的要求。就算将费代里科送去威尼斯，你的自由又能得到多少保证呢？反而可能会被利用，因而被延迟释放。如果事情发展成那样，那么将会给法国军队侵入曼托瓦提供绝好借口。皇帝与法国国王都放弃了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你却又提出来。法国特使进入曼托瓦城时，我谨慎到甚至让他卸掉武器。请耐心等待下。我和你的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两个人会尽全力保卫曼托瓦与你的安全的。"这封信在弗朗切斯科此前的疑虑之上又点了一把火。他一边哭着一边喊道："你这个淫妇！我弟弟什么也不知道。"然而，伊莎贝拉完全无视丈夫的怒火。

她考虑得非常清楚。首先，她反对丈夫通过成为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而获得自由，因为这将给所有敌人提供入侵的借口。其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丈夫的自由。她的这个看起来像是打小算盘的想法，在教皇与威尼斯，现在又加上了曼托瓦的家臣中评价很差。伊莎贝拉完全是孤立的。教皇毫不顾忌地对她发了火。"那个淫荡的侯爵夫人，自己统治得有趣，根本不希望释放丈夫。"

可是，事态渐渐地向着有利于伊莎贝拉的方向发展。对于她的想法——如果不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那么任何交涉都是无用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首先做了让步。他开始盘算，与其让弗朗切斯科成为威尼斯的总指挥官，不如成为教皇军队的总指挥官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他下命先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博洛尼亚的乌尔比诺公爵之处，然后等到弗朗切斯科被释放时再将其送去威尼斯。但是，伊莎贝拉又拒绝

了。教皇又一次同以往一样大发雷霆，怒喝道：“等侯爵释放后，无论愤怒的他对妻子做什么，我都再也不会伸手帮助了。我以前还派使节去威尼斯帮她解释，真是赔本生意。”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很快就不得不压下他的怒火。因为皇帝给伊莎贝拉送去了这么一封信：如果将费代里科交给威尼斯，那么德国军队将立即南下。教皇再次让步了。他提出了条件：将费代里科送到罗马教皇的身边，并且只要威尼斯希望，就一直将他留在罗马。伊莎贝拉终于同意了。这个同意是建立在两个约定上的：一是绝对不会将费代里科交到威尼斯的手上，二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

伊莎贝拉赢了。这一年，虽然被教皇和丈夫唾骂，但没有引起曼托瓦的战事。德国与法国都没有找到能够作为入侵意大利的借口。曼托瓦的国境守住了，无论是对威尼斯还是对其他国家。儿子被送去罗马作人质，这一点只能忍耐。虽说是人质，但因为是自己的同盟方，所以还能接受。整个欧洲都对她寄予了赞美与认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对她表示了认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说：“我简直被她迷住了。”法国的路易十二也毫不吝惜地称赞她的勇气，甚至连威尼斯人都说：“没有比侯爵夫人那个方法更好的了。”

7月16日，弗朗切斯科从大约一年的囚禁生活中恢复了自由之身。他前往博洛尼亚与当时正在那里的教皇会面，途中到达里米尼[82]时，伊莎贝拉派来的使者正在那里等候着他。使者对他说明了这一年来伊莎贝拉的辛苦。等到全部听完后，弗朗切斯科将自己戴的镯子摘下交给使者，让他转告自己对妻子的感谢。

在曼托瓦，终于结束了一切而松口气的伊莎贝拉，现在作为一个母亲担心起儿子的安危。这是儿子第一次离开她的身边。10岁的费代里科并没有那么悲壮地离开前往罗马，而且他还见到了途经博洛尼亚的父

亲。母亲每天都给罗马的儿子写信。

被送到罗马的费代里科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可以一览罗马郊外风景的美丽的贝维德雷别墅作为住所，受到了根本不像人质的厚待。他常常在阿莱蒂诺[83]的向导下去游览罗马的街道。彼得罗·阿莱蒂诺，这个后来成为威尼斯娼妇们的首领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言论人之一的男人，作为10岁少年的老师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尤利乌斯二世非常喜欢这个少年，让拉斐尔给少年创作肖像画，毫不吝啬地让他观赏梵蒂冈的艺术品。在费代里科天真无邪地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尤其觉得《拉奥孔与儿子们》[84]雕塑像很了不起。

成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即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像新教徒那样的见解，即认为精神的东西与肉体的东西之间不存在纠葛。那充其量是不具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分析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北方新教徒式的看法，是萨伏那罗拉[85]对其夸大的评价，也是对当时教皇们的堕落一言以蔽之的理由之一。在意大利，这两种东西在人的身上得以调和共存。换言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从30岁的后半到40多岁，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更加深刻地融入这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之中。

在确保丈夫的自由与曼托瓦的安全之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改换了敌人，将威尼斯换成了法国。教皇首先瞄准的是与法国关系密切的费拉拉，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统治的费拉拉。这一次，她千真万确地不得不应对这场亲属间的战斗。

1511年，教皇的军队从博洛尼亚向着费拉拉进军，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与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弗朗切斯科被释放后就被教皇任命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如今，自己的丈夫与女婿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这让伊莎贝拉痛苦不堪。教皇军队很轻松地拿下了费拉拉的领地摩德纳与米兰多拉[86]，但阿方索拼死也想守住费拉拉。

伊莎贝拉又一次变卖自己的珠宝，贿赂了医生。她让医生写下了诊断书：作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而加入费拉拉进攻战役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因为此前俘虏生活过度疲惫而患病，不能继续执行军务。伊莎贝拉的计划成功了，毫不知情的丈夫被撤离战线。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前来支援费拉拉的法国军队成功地将教皇的军队赶回了博洛尼亚。眼看时机成熟，伊莎贝拉提议休战，还提出需要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大使们在曼托瓦就这一事件进行会谈。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野心未能得逞，被击溃的军队返回了罗马。

8月，在曼托瓦召开了由伊莎贝拉组织的会议，欧洲各国的大使们与意大利各国的代表汇聚一堂。已经37岁的伊莎贝拉依旧充满了魅力。她不仅具有闻名整个欧洲的修养和知性，而且，在中年时原本活泼而机敏的性格更获得了成熟与精炼，使得她浑身透出一种优雅的气质。代表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几乎被伊莎贝拉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她还有更深远的考虑。在会议的间隙或者晚上接连不断地举行舞会与音乐会，从曼托瓦宫廷里精挑细选出的美女们华丽地点缀其间。

会议按照伊莎贝拉的意图进行着。费拉拉正是因为没有可靠保障，

才变成今日这个现状。再加上米兰自1499年以来，隔了11年之久才回到斯福尔扎家族的手上，回到贝亚特丽斯与伊鲁·摩洛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的手上。米兰完全是意外的收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者都希望将米兰公国送给孙子卡洛斯，但是遭到了教皇的坚决反对。威尼斯与其他意大利诸国也都赞同教皇的意见。利用了这一对立，马西米利亚诺才得以进入米兰城。当然，这也受到了伯母伊莎贝拉巧妙的帮助。

在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正处于垂死之际。1513年2月20日，这个因为自己的感情而实话实说，常常会因为过于愤怒而暴粗口的充满人性的教皇，这个将教会变得强大，努力保卫意大利不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唯一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去世了。教皇理解并赞同伊莎贝拉，认可了她，尽管他常常会怒喝其为淫妇。但伊莎贝拉却没有理解尤利乌斯二世崇高的志向，对她而言，统一意大利等与她完全没有关系，曼托瓦与费拉拉才是重要的。所以，与得知教皇死讯而欢喜的阿方索·德·埃斯特一样，她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儿子费代里科就能回到曼托瓦了。

那时，伊莎贝拉正住在米兰宫廷。为了帮助外甥马西米利亚诺即位米兰公爵，也为了直接从德国、西班牙等国获得保障以保卫费拉拉的平安，她重施故技，调动了美女女官。

成为米兰公爵的马西米利亚诺虽然年满19岁，但是长期以来瑞士的流亡生活在这个青年的身上落下了惨痛的阴影。他怎么也不会笑，只有对着侏儒和小丑时，他才会显示出好像一个孩童的兴趣，和他们在一起才会开心。至于统治米兰公国之类对他完全没有吸引力，他的一些古怪的举动不是让人们感到惊异，而是觉得可怕。伊莎贝拉对这个外甥也没抱任何期望，她考虑的是，既然可能近期就会失败，那就必须提前做好之后的准备。

可是，那个时候，让她困扰不堪的是自己的女官们与滞留于米兰的

各国大使之间的绯闻。此前在曼托瓦成功的这个方法，现在在米兰却有点儿过头了。伊莎贝拉不得不解雇了一个女官，她与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之间的流言传得太厉害。这个女官被送到戈伊托[87]附近的一个修女院，在那里作为总督的情妇生活着。

听到这一传闻的弗朗切斯科大怒。他给伊莎贝拉去了一封信。“对这样一个什么都自以为是的妻子，我深感耻辱。”弗朗切斯科自从因妻子的计谋而被撤离战场起，就变得体弱多病而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于是，他非常不痛快地盯着妻子浮夸的政治行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忘不了在自己被俘期间妻子的做法。作为一国国主姑且不论，即便从个人感情来说也是无法释怀的。于是，他的不满便在此时爆发了。伊莎贝拉立刻写了回信。“米兰发生的丑闻，确实可以说是我的责任。但是，这是我为了曼托瓦，为了费拉拉而做出的举动。比起一个丈夫娶了怎样的妻子来说，你更应该向我表示感谢。就算你爱我，敬重我，对迄今我所做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回报得了。”（1513年3月11日）在这封信中，她没有像以往那样署名“你的妻子伊莎贝拉”，而代之以“曼托瓦侯爵夫人”。

伊莎贝拉失去了丈夫的爱，在失去的同时，她自己也切断了对丈夫的爱。现在曼托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丈夫弗朗切斯科正将自己疏远国政，而40岁的她对政治也感到一丝疲惫。她决定出去旅游，前往向往已久的罗马。

罗马是一个大都会，古老富饶而又十分繁华，这一切立刻俘获了伊莎贝拉。因为新教皇利奥十世[88]曾邀请过她，所以这一次整个梵蒂冈都对她相当热情。伊莎贝拉在罗马找到了她所有的旧友。以前出入曼托瓦宫廷的毕比印纳[89]成了枢机主教，诗人本博也在。在到达罗马之后的6个星期中，她一心埋头于游览古罗马的遗址与梵蒂冈。

以前从克里斯托弗·罗马诺及本博等人的口中，从儿子费代里科年轻感动的语言中幻想出的罗马，直到此时，伊莎贝拉才第一次亲眼看见。她也见到了《廷臣论》[90]的著者卡斯蒂利奥内[91]、毕比印纳称赞的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92]、优雅完美的拉斐尔的壁画。本博、毕比印纳枢机主教、萨多莱托[93]、卡斯蒂利奥内为她做了向导。拉斐尔也很高兴为她向导了自己亲自担任发掘指挥的“提图斯浴场”[94]与尼禄的“黄金宫殿”[95]遗址。其间，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她举办舞会及音乐会。梵蒂冈以她为主宾上演了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卡兰德利亚》[96]，教皇也出席了。

1515年的狂欢节临近了。可是，想要观看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丽的罗马狂欢节的伊莎贝拉，迫于丈夫的命令不得不回国。教皇希望她留在罗马的关怀也落空了，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罗马。在抵达曼托瓦的当夜，她立刻给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写了一封信。“为了履行对丈夫的义务，我现在回到了曼托瓦。但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的无聊生活更让我无法忘记在罗马的梵蒂冈那间大厅和那些无与伦比的日子。我的身体虽然回到这里，但心依然留在那里，留在了罗马。”

可是，伊莎贝拉并没有时间去无尽地感伤，因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利奥十世教皇开始扶植自己的美第奇家族。乌尔比诺的国主即前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突然被逐出乌尔比诺公国，乌尔比诺交到了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97]的手中。尚在病中疗养的朱利亚诺从前与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及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关系亲密，所以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两个月后，朱利亚诺死了，教皇立刻让其外甥洛伦佐·德·美第奇[98]继任乌尔比诺公爵。到了这个时候，教皇已经完全忘记了对伊莎贝拉的友情。他将前任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即伊莎贝拉的女儿驱逐出境，没有丝毫犹豫。

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他的孙子查理五世（他也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马上即位，全权统治德国、西班牙、荷兰及那不勒斯。法国进入了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99]的时代。

3月，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垂死躺在床上。29日的早上，他传唤了公证人。他将曼托瓦侯国的继承权交给了费代里科，另外两个儿子埃尔科莱与费兰特分别得到8000达克特的年薪。他给进入修女院的两个女儿以3000达克特的陪嫁金，给两个庶出的女儿每人400达克特。给妻子伊莎贝拉一份属于她个人的财产，保证每年能获益1.2万达克特。他向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与乔凡尼·贡扎加托付了遗言执行的责任，请他们在费代里科年满33岁之前对国政给予协助。女儿埃莱奥诺拉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对流亡的他们一家每年给予6000达克特的资助。吩咐完了之后，弗朗切斯科让人叫来妻子与孩子们，向站在床铺周围的他们辞行。他把自己的头发给了费代里科，对他说要好好治理国家。最后，他见了伊莎贝拉。他将孩子们托付于她，告诉她自己信任她的知性与才能，所以非常安心。然后，他在僧侣朗读《圣经》的声音中平静地死去。

伊莎贝拉悲伤不已。她人生的所有记忆，无论是好或坏，都是与弗朗切斯科这个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最后的几年，虽然这对夫妇失去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被互相牵挂的深刻亲情相连。她委托罗马的拉斐尔设计丈夫的墓，不过因为拉斐尔的突然离世未能实现。

整个欧洲都对伊莎贝拉寄予了同情与安慰。教皇利奥十世在送去一封充满了善意温柔的信函同时，还将伊莎贝拉的友人同时也是教皇的秘书官彼得罗·本博派去曼托瓦。来自各国的吊唁不断，其中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送来一封充满了乞求原谅的悲伤心情的信函。她自己也躺在病床上，就在弗朗切斯科去世的3个月后，卢克雷齐娅也死了。

伊莎贝拉现在完全掌握了实权。费代里科年纪尚轻，两个小叔子人

品也很好，而且都支持伊莎贝拉。外国来的信息都由她的友人——教皇特使弗朗切斯科·吉艾利卡提送来。还有来自伦敦的亨利八世[100]的宫廷、来自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的宫廷的消息。这些消息准确地显示即将进入诸国兴起的新时代。尽管伊莎贝拉明白意大利外部的这种急速变化的情势，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她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费代里科当上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她从未怀疑过教会势力的影响力。1521年，这个愿望在卡斯蒂利奥内的强劲后援下实现了，伊莎贝拉大喜过望。按照教皇的要求，她制作了费代里科署名的誓约书作为对教会的忠诚的证明，与梵蒂冈的重要文书一同收藏于保险箱。可是，在后来卡洛斯的大军逼近罗马的时候，伊莎贝拉又非常惊慌地想要取回这个文件。

在任命费代里科的同时，利奥十世给伊莎贝拉出了一道难题——将乌尔比诺侯爵一家驱逐出曼托瓦。伊莎贝拉断然拒绝驱逐她的女儿及伊丽莎白，侯爵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辗转于威尼斯与维琴察。像是穷追猛打一般，教皇接着又明示了将费拉拉变成教会领地的意图。因为此前伊莎贝拉拜托罗马的卡斯蒂利奥内打听教皇的意图，所以秘密信函紧急送到了她身边，这让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恶报接连不断，自己依赖的法国军队被赶出了米兰，而且还是费代里科指挥的教皇军队与皇帝一方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101]联合才战胜了法国军队的罗特莱克。这个消息让罗马的教皇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他想让美第奇枢机主教成为米兰公爵。而伊莎贝拉与此相反，她支持的是伊鲁·摩洛与贝亚特丽斯的次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似乎所有的事情教皇都得偿所愿了，但是5天后，教皇在狩猎时感染风寒，当天傍晚就死了，时年45岁。谣传他是被人下了毒，但真相并不清楚。

利奥十世在身后留下了30万达克特的欠债。不仅如此，教会的宝石、金子、教皇的三层皇冠[102]、主教们的头冠、银制的餐具、用来装饰西斯廷教堂[103]的昂贵的挂毯等，全被抵押了。威尼斯大使写下："没有一个教皇像他这样在坏名声中死去的。"曼托瓦大使给伊莎贝

拉写了这么一封信：“利奥十世像一只狐狸一般紧紧地抓住了权力，像一头狮子一般治理，并像一条狗一般死去。”

费拉拉的阿方索如释重负，赶紧制作了纪念章，刻下了“Ex Ore Leonis”（虎口余生）。乌尔比诺公爵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返回曼托瓦，向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借了金钱与军队前往乌尔比诺。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在市民们的欢呼声中，他重新回到了乌尔比诺。

罗马劫掠

1527年“罗马劫掠”的舞台静静地却没有停滞地逐渐被搭建完成，时代的风云人物一个又一个在此地汇聚。

那时，有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前来拜访曼托瓦。他是基娅拉·贡扎加（Chiara Gonzaga）与吉尔伯特·德·蒙潘西尔（Gilbert de Mompensier）的儿子，伊莎贝拉的外甥查理·德·波旁（Charles de Bourbon）。这个后来给意大利带来深重灾难的英俊贵公子，他那朝气蓬勃的高贵精神与优雅举止给伊莎贝拉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虽然他与查理八世的侄女结婚而获得了波旁姓氏，可是在妻子死后，他被王太后路易斯·德·萨瓦[104]算计并挤出了宫廷。卡洛斯将他迎接到自己的身边，让他负责西班牙——德国联合军的指挥。就这样，查理·德·波旁怀着对自己著名的伯母的深深敬爱之情离开了曼托瓦。

费代里科·贡扎加

意大利暂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教皇克莱芒七世[105]自1523年即位之际起，继承了伯父利奥十世的政治方针，他一方面与卡洛斯的政治手腕进行着较量，另一方面推进与弗朗索瓦一世的交涉。克莱芒七世在维持西班牙与法国两大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谋求自身教会势力的壮大，卡斯蒂利奥内作为教皇的特使被派至西班牙宫廷。这些举动，让伊莎贝拉不得不重视卡洛斯的存在。于是她将年满17岁的第三个儿子费兰特送到了西班牙宫廷，与以前将长子费代里科送到巴黎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一样，是出于相同的想法。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但她只关心儿子们，女儿们根本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尽管父亲视她们为掌上明珠。长女埃莱奥诺拉因为从前的婚约而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但对另外的两个女儿，她为了节省陪嫁金而送她们进了修女院。当时，父亲弗朗切斯科哭了，母亲伊莎贝拉却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三个儿子在伊莎贝拉的关心下得到了最高等的教育，茁壮成长的儿子们在大君主的宫廷里也被认可了才能而受到重用。

当弗朗索瓦一世最终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在伊莎贝拉的身边发生了一件令她悲伤不已的事情。她最疼爱的长子费代里科表现出对母亲的违抗。大约20岁的时候，他恋上了一个名叫伊莎贝拉·博斯凯蒂（Isabella Boschetti）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情人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费代里科决定与她正式结婚。可是，他17岁的时候已经订婚了，对方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后裔蒙费拉托侯爵的女儿玛丽亚，这个婚约才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可是，如今费代里科为了情人，在城外不远处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让她居住在那里。这座由朱利奥·罗马诺[106]设计的美丽宫殿被称为“茶之宫”（Palazzo de l Tè）。此外，他还向教皇请求与玛丽亚的婚约无效。整个曼托瓦宫廷开始围绕伊莎贝拉·博斯凯蒂这个中心运转起来。城堡中的伊莎贝拉常常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华丽的年轻人们围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乘坐着马车熙熙攘攘地通过，自己身边却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儿子常常只是为了听取意见而来，不想母亲再插手国政之

事。孤独的浪潮一下子向自己扑打过来，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自己老了，那时她51岁。

不过，她可是被人文主义学者称为“罕见的不死鸟”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她一点儿也没有就此老去的想法。在人生的大海之中，她决定再一次起航。为了次子埃尔科莱能晋升为枢机主教，她再赴罗马。1525年春，她出发前往罗马，旅途中还在打听着弗朗索瓦一世与皇帝军队的战况。

罗马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枢机主教毕比印纳、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拉斐尔都死了，卡斯蒂利奥内去了西班牙。不过，教皇的秘书官萨德莱托、保罗·焦维奥[107]、吉埃里卡提还在。在政治情势紧张的局势中，教皇克莱芒七世也不能将曼托瓦弃之不顾。教皇虽然答应任命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一职，可一谈到具体日期，教皇却只是顾左言右。伊莎贝拉打算在埃尔科莱戴上红帽子之前决不离开罗马。她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在她的沙龙里进行文艺知性的交谈之余，还常常乘坐马车游览阳光普照下的古迹。

1526年1月，皇帝军队在帕维亚战役[108]中大败，连弗朗索瓦一世自己都沦为俘虏，他在答应放弃对那不勒斯的法国继承权后被予以释放。5月，对已经强大起来的卡洛斯势力感到恐惧的教皇发起号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法国结成了反卡洛斯同盟。但是，曼托瓦根据伊莎贝拉从罗马发来的指示，并没有参加同盟。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是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认为曼托瓦会加入，可是费代里科并没有动静。教皇想要拿出从前的誓约书，不料已经被伊莎贝拉千方百计地从梵蒂冈的金库里盗取了。这件事获得了整个意大利的好评。因为，比起批评伊莎贝拉的道德（偷盗，而且是以金钱收买人员）与人性（让儿子背负背叛者的污名）来说，这可是出于更为重要的政治

目的的行动。

曼托瓦的费代里科也秘密地与卡洛斯交换着信息，达成了秘密协议。双方约定，由曼托瓦向皇帝军队提供军队及大量的军需品，并允许皇帝军队借道曼托瓦的领地。伊莎贝拉母子背叛了意大利。

当得知曼托瓦侯爵永远都不会行动之后，教皇暴跳如雷。可是，事到如今，想要进攻曼托瓦已经是预料外的紧急事态，只能放任不管了。

9月，罗马遭到了皇帝一方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的袭击。其情形被到达罗马以来一直住在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看得一清二楚，因为科隆纳军队就是在这个宫殿的前面集合的。教皇逃往圣天使堡[109]，他许诺撤销同盟。可是，当科隆纳的军队撤回后，教皇便召来了教皇军队，将科隆纳的军队驱散一清。

11月，德国——西班牙联合军与1.2万名德国雇佣兵一同，在弗伦茨贝格[110]的指挥下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不久，弗伦茨贝格患病，改由查理·德·波旁指挥。曼托瓦的费代里科接连不断地给伊莎贝拉送去信函，请她火速回国，至少要离开罗马。他非常担心身在罗马的母亲的安危。可是，伊莎贝拉待在罗马没动，因为皇帝军队的指挥是外甥波旁公爵，而且三子费兰特也被卡洛斯委任负责皇帝的一支队伍，再加上埃尔科莱的红帽子还没有到手。伊莎贝拉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想到半年后会发生令罗马毁灭的恐怖事件。

1527年5月，波旁公爵到达维泰博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教皇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危机。很多察觉到危险的市民们开始将贵重物品运送至圣天使堡，或者埋到地下。得知市民们开始向罗马城外避难，教皇下令将逃出城外者处以死刑，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罗马所有的城门都被封锁了。只有伦佐·迪切里（Renzo di Ceri）率领的少量兵士守卫城墙。“这天早上——法国大使杜贝莱写道——我与教皇一同度过。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心中的恐惧。教皇请伦佐再集结1000名士兵。但是，这

在经济上来说，对于现在的他是不可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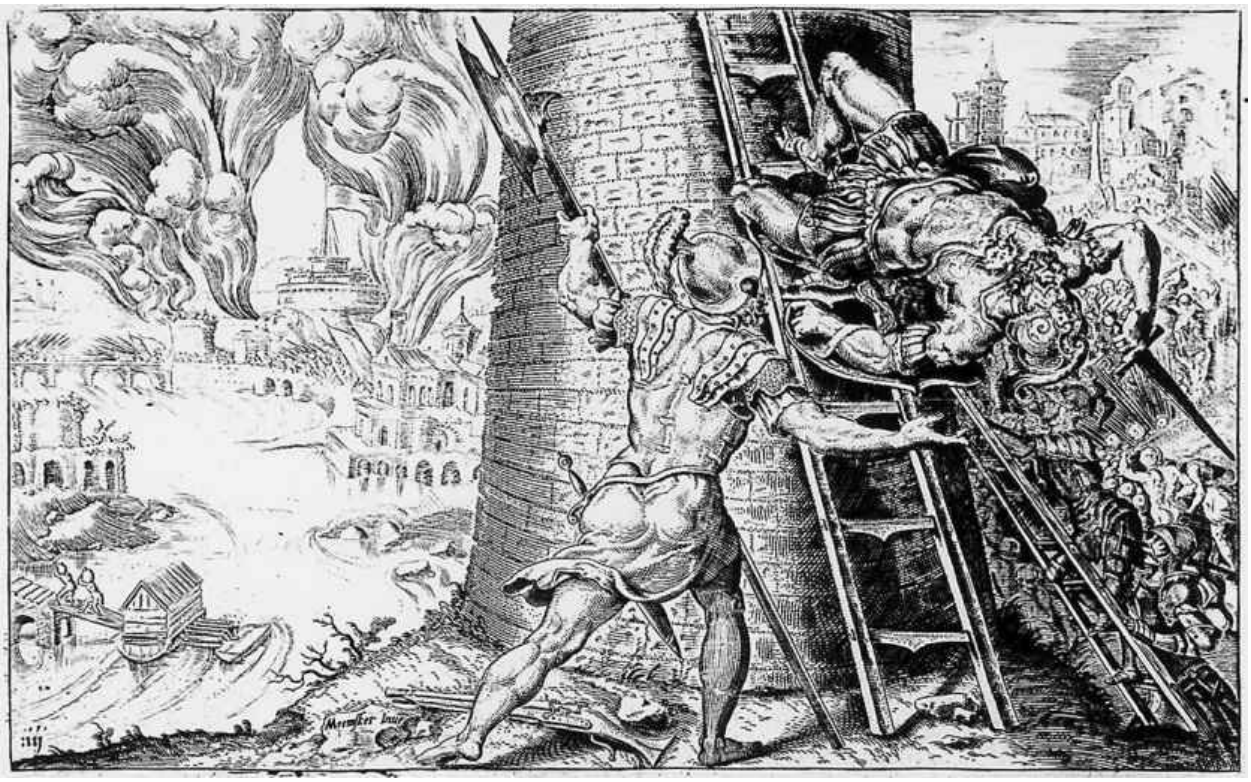
教皇想通过任命新任枢机主教来摆脱这一经济困境。以每人支付4万达克特的方式，5位枢机主教获得了任命，其中也有埃尔科莱·贡扎加。周围的人都反对，举出费代里科的背叛、波旁公爵与费兰特的事例，但是对于教皇来说，就算不能换来4万达克特，他心中还藏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为最坏的事态来临时做的准备：一旦发生什么事，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不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吧。

5月5日，波旁公爵率领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抵达罗马城墙之下，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红帽子也到了科隆纳宫殿里的伊莎贝拉手中。伊莎贝拉的愿望至此终于实现，但她也没有料到此时已无法从罗马脱身。她秘密地派使者至波旁与费兰特的阵营，向他们转达自己的希望：请他们在占领罗马之后也能保障她所在的宫殿的安全。波旁公爵向她送来了安全保障的约定。于是，伊莎贝拉立刻下令在宫殿外修建防御栅栏。在修建期间，人们也察觉到伊莎贝拉身边很安全，就都跑来向她乞求保护。伊莎贝拉没有拒绝。不过，那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因为“身为一个公爵的女儿，就得像一个公爵的女儿一样生活”的认识，也就是出于上级对属下具有保护义务的责任感。于是，罗马的上流市民与贵族们陆陆续续来到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身边避难，加上此前已有的人，合计达到了3000人。所有的准备都完成了。伊莎贝拉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1527年5月5日夜间，皇帝军队通过了马里奥山脉[111]，在罗马城墙的正下方布下阵营。午夜，号角吹响，袭击开始了。攻击点在梵蒂冈的山丘上、门塔与圣灵大教堂之间，低矮的城墙部分成为瞄准的目标。皇帝军队的士兵们虽然躲避于台伯河上白色的烟霭之后，但是从城墙上方防守的伦佐的军队与从圣天使堡发射出来的大炮的强大火力，将他们蜂

拥而至的队伍击散开来。

波旁公爵身穿银色的甲胄护卫住身体，英姿飒爽地骑在马上指挥着城墙上的军队，夺走靠在坎波桑托（Camposanto）附近城墙上的梯子，叱咤着激励跟随他的将士们，自己还亲自站到城墙上。全军看到他的样子，都欢呼胜利。就在那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旁边的人听到了波旁公爵的叫喊："啊，圣母马利亚，我要死了！"他从城墙上滚落下来，奥朗热（Orange）公爵为他盖上自己的披风，让士兵们将他送到附近的教堂。在死前的半小时，查理·德·波旁一直在说着这样的胡话"向着罗马！向着罗马！"然后就咽气了。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

皇帝军队在得知敌军司令官的死讯后，斗志激昂，士气重新高涨，终于攻破了圣灵大教堂的城墙，军队一拥而入。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教皇正在梵蒂冈中，伏在圣彼得像的膝盖

上。他看见梵蒂冈的瑞士卫兵们与入侵军队的对抗，然后他听到罗马街上响彻的叫声：“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侍从们引导教皇从秘密通道去往圣天使堡，13个枢机主教跟随着教皇。保罗·焦维奥将自己的大红色披风给教皇披上，自己则以白色上衣吸引敌人的注意，并拉起了圣天使堡的吊桥。迟到的老枢机主教阿尔梅利尼在门阀降落之后才匆匆赶到，被人用吊篮给拉了上去。还有一个迟到的枢机主教普奇（Pucci），因为恐惧与疲惫几乎是半死的状态，是从窗户给人拽上去的。英法的大使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后来被伦佐救助。但是，那些负责梵蒂冈警卫任务、护卫教皇而奋战的瑞士雇佣兵，在这天的战役中全部阵亡。时至今日，去梵蒂冈游览的人还能在那里见到身穿鲜艳制服、担任警卫工作的瑞士雇佣兵们。他们有一年一度特定的悼念日，那就是纪念500年前，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进行抗争，为了守卫梵蒂冈而全军覆没的他们的朋友们的忌日。

早上五点半，战斗越过了关口。德国军队集结于百花广场，西班牙军队则在纳沃纳广场扎营。费兰特·贡扎加看守着通往圣天使堡的桥梁。无秩序的、现在已经变成强盗一族的德国雇佣兵与粗暴的西班牙士兵们袭击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市民，甚至连妇女与孩子也不放过。掠夺与破坏持续进行着，教堂与祭坛也受到洗劫。来不及逃跑的枢机主教们，被卡住脖子拉着到处转。

奥朗热公爵将住所移至梵蒂冈，这至少能够抢救出教廷珍贵的古文书与贵重物品。可是，法兰德斯产的挂毯与拉斐尔的画稿都被偷了，雇佣兵们将拉斐尔的湿壁画房间变成了马棚。大型金质的康斯坦丁[112]十字架，从圣彼得的门口不知被运到了什么地方，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遭到了盗窃。对于这个完全失去了秩序的军队，连西班牙自己都被震惊了。卡洛斯的“办务官”加提那雷向皇帝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整个罗马都被毁坏了。圣彼得教堂与教皇的宫殿现在也都变成了马棚。我们的队长奥朗热公爵虽然想要努力挽回士兵们的秩序，但已经变成了强盗的雇佣兵们不再听从指挥。德国的雇佣兵们更是如此，所谓对教会没有一点

儿尊敬的路德教徒就是这样一种人，和我们所认为的野蛮人一模一样。所有的贵重物品与艺术品都被大肆破坏，都被偷走了。”

伊莎贝拉从科隆纳宫殿俯视着这一切，听到了垂死之人发出的呻吟、女人们的悲鸣。从圣天使堡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恐惧不已，不知自己是生是死。她所寄予希望的波旁也没有发来任何消息，没有一个人前来救援。

当宫殿前的广场将要沉浸于暮霭中时，在黄昏隐约的微亮中，只见一个身穿黑、红、白皇帝军队颜色服装、戴着头盔的骑士从广场斜穿奔来。大家都凝神屏息。骑士来到了宫殿的门前。就在那时，伊莎贝拉的女官，也是她的亲戚卡米拉·贡扎加惊喜地欢呼起来，说是哥哥亚历山大来了。她立即放下绳索，将他从窗口拽拉上来。伊莎贝拉看到这个男性亲戚后松了一口气。亚历山大向伊莎贝拉报告说，波旁公爵在翻越城墙的时候死了，现在他的遗体被安置于圣天使堡，教皇与枢机主教们都逃到了圣天使堡。他的话音未落，西班牙骑士唐·阿方索·德·科尔多纳便到了。他对伊莎贝拉说，昨天晚上阵亡的波旁公爵命令他守卫她的宫殿，但是因为战事混乱一直来不了。伊莎贝拉与其他人听了这些之后，稍微缓解了点儿担忧。而后，等到晚上10点的时候，费兰特本人也到达了。在那之前，他无法离开他的岗位。自从三年前儿子赴西班牙之后，伊莎贝拉就没有见过他，看到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伊莎贝拉满心喜悦地迎接了他。

之后的7天，罗马全市遭到了无情的掠夺与毁坏。枢机主教们的家自不必说，就连卡洛斯的外甥、葡萄牙大使的家也未能幸免。费兰特在宫殿的前面重新修建了防御栅栏。

因为这场“罗马劫掠”，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一大中心地罗马化为了废墟。每年的狂欢节上，华丽的假面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平日里也熙熙攘

攘的科尔索大街现在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有时候，喝醉了的变成强盗的德国雇佣兵们会高声喊叫，时不时迸发出枪声，将躲藏在倒塌的墙角里的人们吓得半死。尽管如此，大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算好的。夜晚，当夜色的黑暗将一切都笼罩起来的时候，人们的恐惧达到了顶点。谁也不敢说出“夜”这个字，因为他们听到的不是“夜”而好像是“死”[113]。

从科尔索大街进去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科隆纳宫殿，对于在那里避难的人们来说，“夜”与“死”听起来就是同义词，加上饥饿的痛苦更是如此。为了填饱3000人的肚子，伊莎贝拉搜集来的粮食已经差不多见底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伸出干瘦的胳膊乞讨一丁点儿的食物，场面十分悲惨。可是，那些裸露着丰满的白花花的肉体，穿着豪华的衣服，戴着宝石，将头发时髦地盘起来的贵妇人，平日里脸上一副好似布施了很大的恩惠一般，习惯于只让信徒亲吻他们的戒指的位高权重的圣职者们，态度傲慢的宫廷人等，连他们也都扑向那一点点面包的场景，更如同人间地狱。

周围的人们从这凄惨的地狱中看到，唯有伊莎贝拉一人似乎很安然的样子。但其实她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因为皇帝派的科隆纳公爵将他自己的宫殿提供为住所；皇帝军队总司令官波旁公爵是她的外甥，虽然阵亡了；儿子费兰特是皇帝军队的队长，因为这一切，她的安全获得了充分的保障。

可是，宫殿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这帮失控的军队，对于“罗马”这个词语只意味着财富与财宝聚集地的从北部而来的德国雇佣兵来说，科隆纳与波旁的名字都毫无意义，更不要说只是一个队长贡扎加的名字，又能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呢？要说有什么好的期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伊莎贝拉非常明白这个情况。她也知道，那般优雅而美丽建造起来的罗马宫殿，如果遭到疯狂的袭击，将会片瓦不留。这让她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吧。再加上通过儿子费兰特，她想必也听说了那些出生于欧洲北部的新教徒是如何破坏罗马市街与罗马艺术品的劣迹的。

罗马，没有几个词语能够像这个词语一般让人感到性感而丰富。耶路撒冷，每当人们说起这个名字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悠长的感觉；罗马与它不同，在2000年中一直给人们以另外一种感觉。

更不要说，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罗马是她一生中憧憬的都市。每当她决定要打开局面、寻找方策时，总是将腿迈向罗马。只有罗马，才是能够引起她造访兴趣的唯一都市。就是这样的罗马，现在正遭受着不懂美的价值的德国雇佣兵泥腿的践踏。连教皇也不得不逃出罗马，亡命于奥尔维耶托[114]。处于“罗马劫掠”这一象征意大利文艺复兴终结的巨大事件之中的伊莎贝拉，无论对这场悲剧留下怎样哀伤的悼词，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吧。于是，作为具有高度修养的艺术的理解者与保护者，她的名字因此坚定不移；布克哈特也一定无法拒绝诱惑，一定会将她说过的话放在那部名著中进行介绍。

可是，在这恐怖的一个星期内，伊莎贝拉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封信。那是写给曼托瓦的费代里科的。她只是平淡地记述了她所听到的罗马城里与梵蒂冈内发生的事情、科隆纳宫殿修建防御栅栏的事情、从宫殿里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枪声与女人的悲鸣之类。只是，在信的最后一行，她诙谐地加上：“今天的餐饭好像也只有涂了大蒜的面包。”从中看不见恐惧，也看不见担忧，只有站在彻底的现实主义之上的合理精神与大胆无畏的微笑。不过，另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伊拉斯谟[115]留下了这样的话：“罗马并不是一个只有基督教徒的城市，而是贵族的高贵精神与缪斯[116]居住的，好似我们全体人员的母亲一样的地方。此次，我以深深的哀悼之心收到这个悲伤的消息。”（写给萨努多的信）

晚年

迈过50岁门槛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开始投掷她人生中决定最后胜负的骰子。都说“曼托瓦侯爵的价值很少”，在过于著名的母亲之下，玩世不恭的儿子费代里科只是在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怀中寻求慰藉，并不值得一提。伊莎贝拉的决战对手是“罗马劫掠”之后几乎贯穿了意大利历史的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他的意志。她冷静地计算着卡洛斯的实力，在不让对方察觉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实力来为自己做必要的准备。

“罗马劫掠”事件使得天主教帝国的皇帝卡洛斯受到了舆论的谴责。皇帝明白不能总将教皇放置于如此屈辱的状态之中，必须求得和解。现在，问题转移到了卡洛斯这边。

不过，挫败了法国的野心并将那不勒斯与米兰都收入囊中，可以说卡洛斯获得了完美的胜利。1529年8月12日，他第一次将脚踏进意大利的国土——热那亚，为了实现他长年的期望——在罗马，让教皇用双手为他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可是，意大利人并没有忘记两年前的“罗马那桩恐怖事件”。出于这一考虑，教皇与卡洛斯会见的地点选择了罗马与热那亚中间的博洛尼亚。意大利各地的贵族们陆陆续续前往博洛尼亚。伊莎贝拉没有理由错过这一机会，11月，她也带领着那些美丽的女官前往博洛尼亚。

伊莎贝拉此行的目的有三个。首先，将曼托瓦的侯爵地位升级至公爵；其次，如果顺利的话，以当今米兰公国的国主、外甥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病体为由，将米兰与曼托瓦合并；最后，因为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的费拉拉公国与历代教皇之间关系不和，所以希望借卡洛斯的力量进行消解。为此，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之间经常信函来往，商量计策。

1529年11月，在16位枢机主教的陪伴下，教皇克莱芒七世与另一位也是威风凛凛的、在盛大队伍陪伴下驾着马的卡洛斯，先后进入博洛尼亚城。从这个时候起，西班牙风格的黑白色服饰取代了迄今色彩鲜艳的

文艺复兴风格。这似乎也象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崩溃。

翌年2月2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经教皇之手，光辉灿烂地戴到了卡洛斯的头上。每天晚上，贺宴舞会不断。在那之间，伊莎贝拉的愿望基本也都一一实现了。公爵晋升一事已经获得了卡洛斯皇帝的许诺。不过，关于米兰公国合并一事，因为皇帝对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亲爱，而没有希望实现。费拉拉与教会之间的和解也完全达成了。卡洛斯在加冕仪式之后，不顾教皇的反对，立即将阿方索·德·埃斯特叫到罗马。阿方索是卡洛斯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唯一认可的具有统治能力的男人。3月初，急忙赶到罗马的阿方索与教皇和解了。

但是，这一次，伊莎贝拉的女官们又发生了绯闻。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骑士们为了她们而争斗，结果一个晚上死了14个人。伊莎贝拉不得不火速带领女官们离开博洛尼亚。尽管如此，年轻的卡洛斯皇帝依然对伊莎贝拉从心底里怀着善意与近乎尊敬之情。他夸赞了她的儿子们，据说在西班牙的宫廷里，卡斯蒂利奥内一直向他讲述伊莎贝拉的事情，于是他答应在归途中顺便去一下曼托瓦。

3月25日，顺路经过曼托瓦的卡洛斯将费代里科晋升为公爵。长子获得了公爵的头衔，次子埃尔科莱升为枢机主教，三子费兰特已经被送至卡洛斯的宫廷，这时伊莎贝拉的身边传来了消息：代替奥朗热公爵指挥皇帝军队的费兰特攻陷佛罗伦萨。被视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这一年瓦解了。

皇帝在离开曼托瓦之前，为费代里科订下了婚约。曼托瓦公爵已经30岁了，17岁的时候与当时8岁的玛丽亚订了婚，但是他为了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向教皇请求婚姻无效，并获得了许可。无效的理由据说是玛丽亚的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指使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预谋毒杀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也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如今，曼托瓦现任国主费代里科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彻底放弃

了自己成为公爵夫人的念想。

那时，皇帝传来了话，选定的新娘是朱莉娅公主[117]。她是阿拉贡家族中唯一生存的王室女儿，相当于费代里科的表姐。朱莉娅长得很难看，而且已经40岁了。费代里科就连假装接受也不愿意，但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却建议他结婚。她打的算盘是，朱莉娅是一个又丑又老的女人，所以不可能给费代里科生下孩子，而且他也不会爱上她。这样一来，自己的孩子就能成为继承者。伊莎贝拉默不作声地看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这一举动，没有采取行动，她在等待着时机。

可是，这个时机却来得意外的早。年幼的蒙费拉托侯爵从马上摔下来，突然去世了。于是，继承权就转到了女儿玛丽亚的身上。感到一切都提早了的是费代里科，他赶紧向教皇与皇帝寄去信函，请求说他有不能与朱莉娅结婚的理由。因为之前与未婚妻玛丽亚的婚姻无效的手续还没有办好，所以与朱莉娅的订婚是无效的。皇帝与教皇都大为震惊，不过还是将决定延期了。接着玛丽亚也去世了，而继承者这次变成了她的妹妹玛尔格利塔。

到了这个时候，伊莎贝拉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年轻的继承者玛尔格利塔的身边，来自各地的求婚蜂拥而至。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希望女儿与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结婚，米兰公爵也是如此希望的。伊莎贝拉首先去说服母亲侯爵夫人。在伊莎贝拉出色的外交面前，侯爵夫人根本不是对手。伊莎贝拉甚至说，“只要女儿同意的话”，立刻将费代里科派到玛尔格利塔的身边。在费代里科巧妙的求爱下，玛尔格利塔被俘获了。她说：“如果不能与费代里科结婚，那我就去当个修女。”伊莎贝拉同时还向教皇和皇帝采取了行动，贿赂了听取费代里科忏悔的牧师，让他在复杂宗教的教义之上编写戏剧。其理由是：因为之前婚约无效时的忏悔不合教理，所以婚约无效不成立。对此，教皇与皇帝都不得不同意。而且，订了婚的姐姐死后由妹妹替代，这样例子也不是很少见。1531年7月，费代里科·贡扎加与玛尔格利塔的婚事对外宣布。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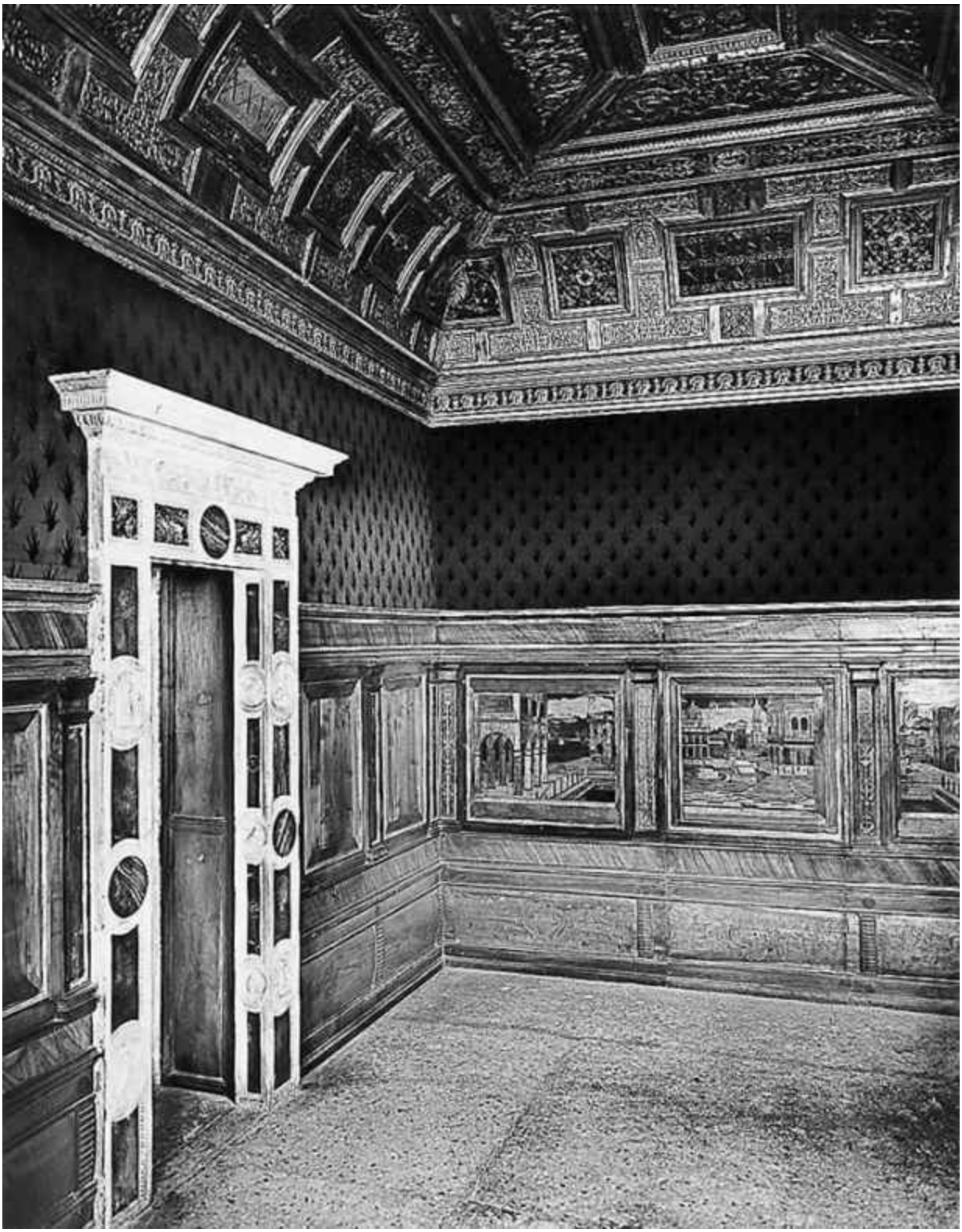
月，年轻的新娘到达曼托瓦。三年后，蒙费拉托侯国与曼托瓦公国合并。

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10年的情人费代里科为了这桩婚姻抛弃了她，虽然不至于被流放，但她留下了孩子们后离开了曼托瓦。伊莎贝拉也许胜利了，但她在这10年来的敌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特征。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儿子费代里科的婚事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政治行为。年近60岁的她，在去世前的9年中，很多时候都在自己的书斋里静静地度过。宫殿中有两个被称为“洞穴”（GROTTA）与“书斋”（STUDIOLO）的房间，里面用收集而来的众多艺术品点缀着，虽然小却有一个面向中庭的大窗户，充足的阳光就从那里照射进来。

1534年，弟弟阿方索去世。接着，米兰公爵、乌尔比诺公爵以及与她同时代的人，几乎都不在了。世代变更，但伊莎贝拉深以为豪的精神独立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衰弱的迹象。虽然女儿埃莱奥诺拉、儿子埃尔科莱等人已经成为维多利亚·科隆纳[118]的沙龙中热心的一员，但是，伊莎贝拉与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宗教般清洁的精神结合”完全无关。

正如书斋的入口处挂着的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所显示的一般，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的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她虽然对维多利亚·科隆纳彬彬有礼，但那并非尊重她的“高贵的精神”，而是因为维多利亚的外甥是当时最有势力的阿方索·德·阿瓦洛斯（Alfonso d’Avalos）。如同伊莎贝拉期望的那样，这个西班牙贵族后来与伊莎贝拉的孙女结婚了。



伊莎贝拉的“书斋”

最后的几年，伊莎贝拉将热情都倾注于一个名叫索拉罗洛（Solarolo）的小地方的统治上。她如其所愿地对这个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小城市进行管理，进行清晰的行政区划，征收合理的税款。现在从博洛尼亚往里米尼去的路上，稍微偏离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小镇，镇上的中心广场被称作贡扎加广场。

她的这一统治受到了高度评价，人们都称赞道："这是一位应该生为女王的女士。"可是，这其实也是伊莎贝拉被儿子费代里科从曼托瓦国政中隔离出来后对寂寞的逃避。但是，她没有抱怨，也从未想过取代儿子，因为她觉得已经为曼托瓦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即使到了这个年纪，她依旧是一个快活的，而且非常时髦的女人。

1537年6月，伊莎贝拉仅有的几个同世代的朋友中的一位、老友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到曼托瓦来拜访她。在他滞留的5天中，参观了她那个现在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曼特尼亚、柯勒乔、贝里尼、提香[119]的绘画，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希腊的大理石像及古罗马诸多的雕刻上都印满了她的回忆。本博与依旧拥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精神的伊莎贝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带着这个深刻的印象，他离开了曼托瓦。数日后，伊莎贝拉的儿子埃尔科莱收到了来自本博的一封信。"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贤明和幸福的女士。"

两年后，1539年2月13日，伊莎贝拉去世，时年65岁。

---

[1]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2] 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

[3]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1485——1561），意大利小说家。他出生于北意大利，在帕维亚大学学习后，成为多米尼克会的修道士。他喜欢冒险而具有野心，对政治与军事有兴趣，侍奉于埃斯特家族与斯福尔扎家族。他曾入军籍，后任主教，专心于学问与创作。

[4] 卢多维科·阿廖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早期写有讽刺诗和《列娜》《妖术》等风俗喜剧。他的代表作长诗《疯狂的奥兰多》对欧洲的叙事长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1493——1569），意大利诗人、宫廷人。

[6] 乌尔比诺（Urbino），位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虽然是山间的一个小城市，但它以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被称为艺术之街。“乌尔比诺历史地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 引文选自日译本《世界の名著45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中央公论社，柴田治三郎译，1966年。柴田治三郎（1909——1998），日本文学研究者、德国文学家、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有著作《莫扎特——与命运斗争的永远的天才》及译著多部。

[8] 摩德纳（Mod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内，是摩德纳省的首府。

[9] 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1466——1536），威尼斯贵族、历史学家、政治家。

[10] 亚历山德罗·卢齐奥（Alessandro Luzio，1857——1946），出生于意大利的圣塞韦里诺——马尔凯，是一位记者、历史学家和意大利档案学者。

[11]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1513年出版名著《君主论》。

[12]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最盛期的领主。他虽然没有公爵的头衔，却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具有卓越的政治、外交能力，在调整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利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民众慷慨大方，拥有极大的支持，也是一个著名的学问与艺术（尤其是文学）的赞助者。

[13] 罗马劫掠（Sacco di Roma）指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arl V）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在教皇国的罗马进行杀戮、破坏、抢夺、强奸等事件。

[14] 此处的黑白两色指代西班牙服装。

[15]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Beatrice d’ Este，1475——1497），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妻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女性。

[16]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意大利佩斯卡拉（Pescara）的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16世纪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琪罗艺术交流甚深。

[17] 波河（Po），横穿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它的源头为阿尔卑斯山脉，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总长逾650公里。

[18] 蒙扎（Mo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伦巴第区，在米兰的东北方向，距离约15公里。蒙扎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心城市，其纤维业与出版业等工商业发达。该城市有著名的蒙扎运动（F1赛事之一），此外还有收藏了象征意大利王位的伦巴第铁王冠的蒙扎大教堂（Duomo of Monza）、蒙扎公园与王宫（Royal Villa of Monza）等观光地。

[19]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四地区之一。“蒙特卡洛”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查理三世之山”，在其统治期间命名。它拥有国营赌场、高尔夫球场、美术馆、豪华酒店等设施，举办众多的艺术节与体育节。

[20] 大奖赛（Grand Prix），意为大奖、最高奖励，是对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内的最优秀者授予大奖的奖励。

[21] 埃尔科莱·德·埃斯特（Ercole I d’ Este，1431——1505），费拉拉公爵。自1445年起，他在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宫廷里接受了15年的教育，培育了高度的修养，后来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艺术资助者。

[22] 埃莱奥诺拉·阿拉贡（Eleonora Aragon，1450——1493），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Ferdinando）一世的女儿，1473年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结婚。

[23] 安东尼奥·皮萨内洛（Pisanello，1395？——1455？），15世纪活跃的意大利画家，哥特式代表画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纪念章作家。

[24]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2——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画家。

[25] 雅各布·贝利尼（Jacopo Bellini，1400？——14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出生于威尼斯。

[26] 示巴女王，《圣经·旧约》中出现的女王，示巴古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

[27] 莱奥内洛·德·埃斯特（Leonello d’ Este，1407——1450），费拉拉侯爵（在位时间：1441——1450）。

[28] 鲁特琴，拨弦乐器，主要指中世纪至巴洛克时期欧洲使用的古乐器总称。

[29]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一世·贡扎加与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的女儿玛格丽塔·迪巴维耶拉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即位曼托瓦侯爵，1490年2月12日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女儿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更新了贡扎加家与埃斯特家的传统同盟关系。

[30]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祖母是芭芭拉·冯·勃兰登堡（Barbara von Brandenburg，1423——1481），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家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卢多维科三世·贡扎加的妻子，丹麦王妃多罗西娅（Dorothea）的姐姐。

[31] 《弄臣》（Rigoletto）是威尔第作曲的三幕歌剧，1851年在威尼斯凤凰剧院（Teatro La Fenice）首次上演，被称为威尔第中期的杰作。

[32]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1452——1508），米兰公爵，15世纪至16世纪米兰的统治者。他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四子，绰号是“伊鲁·摩洛”。据说“伊鲁·摩洛”的名字来自像“摩尔人”（柏柏尔人）一样黑的意思，引申为黑心肠。他曾统帅瑞士军队，是达·芬奇的早期资助者。

[33] 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

表建筑家，对后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

[34]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Cecilia Gallerani，1473——1536），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爱妾。据说她是达·芬奇《抱银鼠的女子》的原型，是一个擅长拉丁语、会作诗、能够辩论哲学的才女。

[35] 格里诺（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人文主义教师，出生于意大利维罗纳（Verona），在佛罗伦萨等地创办了古典语的寄宿制学校。1492年，他被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聘为家庭教师，在费拉拉大学教授修辞学。他完成了三段式的人文主义教育课程，为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制定了方向。

[36] 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1468——1494），米兰公爵（在位时间：1476——1494），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个妻子博纳·迪·萨沃亚（Bona di Savoia）所生的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皇后比安卡·马里亚·斯福尔扎（Bianca Maria Sforza）的哥哥。他7岁的时候因父亲被暗杀而继承了米兰公爵的封号，叔父卢多维科摄政，掌握实权。

[37] 维斯孔蒂家族是意大利的贵族门第，在13世纪，家族中出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ius X，1210——1276，在位时间：1271——1276），确立了对都市国家米兰的统治权。1395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受皇帝认可，成为米兰公爵。15世纪后，其统治权移交于斯福尔扎家族。

[38] 安茹家是法国统治安茹地方的贵族门第，具有四个系统。其中第三个系统安茹家族是法国国王家族卡佩家的支流，在意大利被称为Angiò家族。当金雀花家族被没收了在法国的领地之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于1247年被封为安茹伯爵，从而以查理为祖先的安茹家族重新成立。查理于1246年成为伯爵，1266年即位西西里国王。因此，其家谱也被称作安茹——西西里家族。查理虽然失去了西西里，但是子孙却继承了那不勒斯的王位。14世纪，这一家谱中还出了匈牙利波兰国王。

[39] 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法国公爵之一，在法国公爵爵位中属于级别特别高的一种，以其最初的封地奥尔良命名。这一称号主要授予王室的亲王。

[40] 瓦伦丁·维斯孔蒂（Valentine Visconti，1366？——1408），奥尔良公爵（瓦卢瓦）的路易一世（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的王后，是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与第一任妻子伊莎贝尔·德·弗朗斯的女儿，出生于米兰。伊莎贝尔是法国国王让二世的女儿，奥尔良公爵路易是瓦伦丁母亲的表弟。路易十二以瓦伦丁的血统为根据，要求维斯孔蒂家族的继承权而引起了意大利战争。

[41] 1495年7月6日的塔罗河战役是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与法国军队在塔罗河岸（福尔诺沃附近）发生的激战。同盟军死者3000人以上，法国军队未足200人。以往的意大利战役中，死者都很少，而此次塔罗河战役则是意大利第一次杀戮与流血的战役。

[42]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帕多瓦派的代表。1450年，他应卢多维科·贡扎加侯爵的邀请移居曼托瓦，1460年后成为曼托瓦侯爵家的宫廷画家。

[43] 此幅作品于1496年绘制，是为了纪念1495年塔罗河战役，由弗朗切斯科二世委托作者为曼图亚的一个圣母小教堂而创作。画中间的是圣母马利亚，左边跪着的是曼图亚的侯爵，右边跪着的是他的夫人，圣母的披风被拉开，象征保佑他们战争胜利。上面的棚架装饰着水果和各种鸟。此画于1798年进入卢浮宫。

[44] 洛什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谷（The Loire Valley），是中世纪建造的古堡，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查理七世即位之前的居城。

[45] 尼科洛·达·柯勒乔（Niccolo da Correggio，1450——1508？），诗人、制作人，也曾是战士、宫廷人，对费拉拉的歌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46] 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Gian Cristoforo Romano，1456——1512），艺术家、雕塑家。

[47] 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ti，1483——1520），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代表画家、建筑家，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美术三杰”。拉斐尔所绘画的画以“秀美”著称，画作中的人物清秀，场景祥和。

[48] 佩鲁吉诺（Perugino，1448？——152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派（Umbria）的代表画家。1481年，他应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邀请，参与梵蒂冈宫殿西斯廷教堂的壁画装饰工作。

[49]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1459？——1537），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曾对达·芬奇产生影响，后反受达·芬奇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其画作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容貌相似。

[50] 《安吉里之战》（Battaglia di Anghiari），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府的大会议室（容纳500人）中达·芬奇制作的壁画。很多研究者认为此画现在依旧保存着。其中心部分经卢浮宫博物馆中的彼得·保罗·鲁本斯摹写而广为人知。1504年，达·芬奇受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委托开始制作壁画，与此同时，在其壁画的对面，米开朗琪罗正制作《卡希纳之战》（Battaglia di Cascina）。

[51] 菲耶索莱（Fiesole），位于佛罗伦萨北部4公里开外300米海拔的山丘上，现今依旧保留着伊特鲁里亚（Etruria）——罗马时代的遗迹。

[52]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威尼斯派的第一代代表画家。

[53] 威尼斯总督（Doge），指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国家的元首。

[54] 伊丽莎白·贡扎加（Elisabetta Gonzaga，1471——1526），意大利曼托瓦侯爵贡扎加家的女儿，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的教养与美德兼备的贵妇人。

[55] 乔凡尼·桑蒂（Giovanni Santi，1435？——1494），乌尔比诺的宫廷画家。

[56] 《哀悼基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曼特尼亚的画作（1480），原题为“Cristo morto”，是曼特尼亚的代表作之一，收藏于米兰的布雷拉美术馆（Pinacoteca di Brera）。

[57]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时间：1503——1513），著名的艺术爱好者，资助了拉斐

尔、米开朗琪罗等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委托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重修西斯廷教堂，让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58]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公爵（在位时间：1519——1540），蒙费拉托（Monferrato）侯爵（在位时间：1536——1540）。

[59]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澳大利亚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493——1519）。他因奠定了家族隆盛的基础而被称为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他勇武而身材高大，也是艺术的保护者，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骑士。

[60] 查理即查理五世（1500——1558），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519——1556），作为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516——1556）而被称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

[61] 夏洛特·德·阿尔布雷（Charlotte d’Albret，1480——1514），法国贵族阿兰·德·阿尔布雷与弗朗索瓦丝·德·沙蒂永的女儿。她在法国王室里长大，是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的妻子安妮·德·布列塔尼的侍女，据说是一个知性的美女。1499年，她与切萨雷结婚，当然这是切萨雷与路易十二为了加强同盟的政治婚姻。

[62] 西吉斯蒙多·贡扎加（Sigismondo Gonzaga，1469——1523），1505年12月1日被尤利乌斯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

[63] 佩鲁贾（Perugia），意大利中部城市，位于罗马以北、台伯河上游的山地丘陵。

[64] 锡耶纳（Siena），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南部大约50公里处，是一座中世纪古城。

[65] 卢卡（Lucc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区的西北部，由超过4公里长的城墙围住的城塞都市，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诞生地。

[66] 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友人。他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等优秀历史书，被称为“近代历史学之父”，是美第奇派的重臣之一。

[67] 安杰拉·波吉亚（Angela Borgia），相当于切萨雷与卢克雷齐娅的表妹，不过，其父相当于卢克雷齐娅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外甥。作为父亲政治外交的棋子，卢克雷齐娅被多次出嫁，安杰拉是她嫁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时带的侍女。

[68] 朱利奥·德·埃斯特（1478——1561），埃尔科莱的第七子，是埃尔科莱与妻子的侍女伊莎贝拉·阿尔杜伊诺生下的庶子。他是一个拥有美丽眼睛的美男子，这也是后来他的悲剧的起源。

[69] 伦巴第（Lombard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西北部，首府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

[70]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1490——1538），意大利军人，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1503年即位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其伯父。1508年，他与埃莱奥诺拉·贡扎加结婚，育有五子。

[71] 维罗纳（Vero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Veneto）大区的西部。

[72] 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文艺复兴时期优秀的建筑家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亲自建造的美丽的城市。

[73] 帕多瓦（Padov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经济与通信的中转地。

[74] 马切拉塔（Macerata），意大利共和国马尔凯大区的一个城市。

[75] 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法国公爵之一，在波旁王朝之前，由波旁家族世袭。

[76] 萨沃亚公爵（Duca di Savoia），1418——1860年间萨沃亚家族在统治萨瓦时使用的世袭君主称号，现在是萨沃亚家族的一种礼仪称号。

[77] 蒙费拉托（Marchesato del Montferrato），位于意大利波河沿岸的皮埃蒙特南部与都灵东部的侯国或侯爵领地。

[78] 苏丹是伊斯兰世界里的君主称号之一，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权力（者）、权威（者）。

[79] 埃莱奥诺拉·贡扎加（Eleonora Gonzaga，1493——1570），意大利曼托瓦公爵家的女儿，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一世的妻子。她与母亲一样，热衷于文艺振兴，与彼得罗·本博、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托尔夸托·塔索等人文主义者亲交。

[80] 吉多贝多·达蒙泰费尔特罗（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1472——1508），意大利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他与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的妹妹伊丽莎白结婚。婚后，他因无性能力而没有子嗣，但妻子没有同意与他离婚。

[81] 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威尼斯的中心广场，被回廊式建筑包围，拥有总督府、圣马可教堂等建筑，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82] 里米尼（Rimini），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一个城市。

[83] 彼得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作家、诗人。

[84] 《拉奥孔与儿子们》（Gruppo del Laocoonte），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是一组用大理石制作的古希腊雕像。

[85] 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佛罗伦萨神权共和国领导。

[86] 米兰多拉（Mirandol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摩德纳县，在费拉拉以西约44公里外。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城塞都市，自14世纪以来4个多世纪都是米兰多拉公国的首府，世代由皮科家族统治。

[87] 戈伊托（Goito），曼托瓦近郊的一个小镇。

[88] 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13——1521）。他为美第奇家族出身，喜欢华丽的活动，在他的治理下，罗马的文艺复兴文化迎来了最盛期。

[89] 贝尔纳多·多比奇·达·毕比印纳（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1470——1520），枢机主教、喜剧作家。

[90] 《廷臣论》（Il Libro del Cortegiano），卡斯蒂利奥内的代表作，1528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描写了上流阶级的社交术及教养，长期被欧洲上流阶层视为有教养人的规范。

[91]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1478——152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作家，因《廷臣论》一书闻名。

[92] 《创世纪》，梵蒂冈宫殿内西斯廷教堂天井上的米开朗琪罗的绘画作品，是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表艺术作品，1508——1512年制作。

[93] 雅克·萨多莱托（Giacomo Sadoleto），利奥十世的秘书。

[94] 提图斯浴场（Thermae Titi），公元80年由第十代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罗马的埃斯奎利诺山丘上建造的罗马浴场。

[95] 黄金宫殿（Domus Aurea），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代皇帝尼禄建造的大宫殿，公元64年在罗马大火之后建造起来，所以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

[96] 毕比印纳在乌尔比诺创作了喜剧《卡兰德利亚》（La Calandria），由当时被称为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家吉罗拉莫·真加进行编剧上演。它当时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意大利语表演的，是一出好色与滑稽的戏剧。

[97]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1479——1516），意大利的贵族、政治家，佛罗伦萨的僭主。

[98]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1492——1519），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僭主（1516——1519年保有其权力），乌尔比诺公爵。

[99] 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er de France，1494——1547，在位时间：1515——1547），瓦卢瓦王朝第九代法国国王。因父亲的表哥路易十二去世时没有子嗣，所以弗朗索瓦作为后继者于1515年即位。他扩大王权，奠定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基础，是法国最初的文艺复兴的君主。

[100]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都铎王朝（the Tudors）第二代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1509——1547），爱尔兰国王（在位时间：1541——1547），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次子。

[101]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1460——1523），米兰公爵。

[102] 三层皇冠是象征罗马教皇地位的皇冠，因其三段重叠的造型，又被称为“三重冠”。

[103] 西斯廷教堂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的名字“西斯廷”便是来源于当时的教皇之名“西斯都”。西斯廷教堂是罗马教皇的私用经堂，也是教皇的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

[104] 路易丝·德·萨瓦（Louise de Savoie，1476——1531），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沃亚公爵菲利贝托（Filiberto）二世是她的同胞弟弟，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三世是她的异母弟弟，路易十一的王后夏洛特·德·萨瓦是她的叔母。

[105] 克莱芒七世（Clemens VII，1478——1534），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23——1534）。他出身于美第奇家族，曾经在教皇利奥十世的手下担任枢机主教，发挥了才干。但当他即位教皇以后，被卷入了动荡的国际情势，酿成了罗马劫掠的悲惨事件。

[106] 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499？——1546），文艺复兴中期的建筑家、画家。1513年时，他是拉斐尔工作室里最重要的人物。

[107] 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2），意大利医生、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圣职者。他留下了很多名人传记、意大利战争记录。

[108] 帕维亚战役于1525年发生于意大利的帕维亚城。意大利与西班牙（帝国联合军）共同作战，在帕维亚城外米拉贝洛巨大的狩猎场攻击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的法国军队。

[109] 圣天使堡（Castel Sant’ Angelo），位于台伯河畔，古罗马地区的最西端，有数条桥可通往台伯河西岸。由贝尔尼尼设计的这座桥可说是巴洛克式装饰艺术杰作。

[110]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忠实军人，德国雇佣兵师团的诞生之父。

[111] 马里奥山脉，意大利最高的山脉，海拔139米，环绕于罗马城的西北侧。

[112] 康斯坦丁（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年）。

[113] 意大利语“夜”：Notte。“死”：Morte。发音相近。

[114] 奥尔维耶托（Orvieto），位于意大利共和国翁布里亚大区泰尔尼县，是建造在山丘上的要塞都市，现在还留有16世纪时在罗马劫掠中逃跑至该地的教皇克莱芒七世建造的井的遗址。

[115]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荷兰出身的人文主义学者、天主教的神甫、神学者、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愚人颂》等。

[116]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9个女神，体现了古代希腊时代对诗歌艺术的完整理解。

[117] 朱莉娅·德·阿拉戈纳（Giulia d’ Aragona，1492——154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伯母。

[118]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诗人。她与米开朗琪罗交换诗歌，艺术交往深厚。

[119]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画家，威尼斯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Aut Caesar aut nihil.”

（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

平托瑞丘绘，梵蒂冈的“波吉亚寓所”壁画

卢克雷齐娅家谱

女
罗德里戈（1503—1527）
因凡特·罗曼诺（1498年生）
（将卢克雷齐娅与仆人佩德罗所生儿子作为自己的孩子加入户籍）
罗德里戈·波吉亚（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
瓦诺莎·卡塔奈
女
伊莎贝拉
杰洛尼玛（1470年生）
佩德罗·路易斯（1463—1488）（第一任甘迪亚公爵）
圣职者的孩子虽说是亲生孩子，但在官方不被认可，所以成为庶子。
杰弗里（1481—1516）
桑夏·阿拉贡
阿方索·德·埃斯特（费拉拉公爵）
阿方索·阿拉贡（比谢列公爵）
罗德里戈（1499—1512）
卢克雷齐娅（1480—1519）
乔凡尼·斯福尔扎（佩萨罗伯爵）
胡安（1476—1497）（第二任甘迪亚公爵）
夏洛特·德·阿尔布雷
切萨雷（1475—1507）
吉罗拉莫
卡米拉
路易斯（1500—1553）
阿方索二世（1533—1597）
埃尔科莱二世（1508—1559）
伊波利托（1509—1572）（枢机主教）
埃莱奥诺拉（1515—1575）
亚历山大（1514年生，夭折）
弗朗切斯科（1516—1527）
（三个孩子）夭折

历史与女人

罗马的夏天非常热，却总让人感到有股清爽的气流通过。微风穿过梵蒂冈的石砌建筑物，从深邃的窗口吹进来，轻轻拂过灼热的肌肤。这个季节里到访的众多游客，无一不是为了参观米开朗琪罗的壁画而匆匆奔赴西斯廷教堂，而位于教堂左拐处的“波吉亚寓所”[1]则显得十分冷清。

那里有平托瑞丘[2]描绘的波吉亚家族壁画像。左手边，站在圣·卡特里娜前面的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壁画上右边的人物是弟弟杰弗里[3]及妻子桑夏[4]。最右边的是身穿时兴的土耳其风格服饰的哥哥胡安[5]。在下一个房间入口处的墙壁上，画着身穿教皇礼服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不过，唯独不见长兄切萨雷。

俯瞰中庭，喷水池中水花四溅，身着黑色僧服的人在一旁来来往往。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而500年前，卢克雷齐娅从这个窗口远眺到的是同壁画描绘一般的山野。对于她而言，这是铭刻了她一生的房间。

最初，她与第一任丈夫佩萨罗伯爵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举行的。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比谢列公爵[6]也正是在这个房间里，被她的亲哥哥切萨雷所残杀。为了与第三任丈夫阿方索·德·埃斯特举行婚礼而前往费拉拉的当天，她与教皇父亲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做了最后的道别，之后再无相见。并且，因为教皇父亲之死、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深感绝望的切萨雷也被囚于此屋。壁画上她的肖像，曾经被熠熠生辉、五光十色的宝石装扮着。现如今，在头部和胸部曾镶嵌有宝石的地方却只留下凄惨的凹印。唯有她那甜美的容颜，至今未减分毫。

卢克雷齐娅拥有一头金色长发，却从不盘发，只随意地散在肩头。正是这样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女人，一生与波吉亚家族，尤其是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哥哥切萨雷纠缠不休，她的悲剧也始于其父教皇的即位。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相比之下，卢克雷齐娅太过于平常了。她虽然拥有教皇之女的地位，在罗马教会这一权力中枢的培育下长大，却最终没能成为舞台上的女主角。她拥有天生的美貌及受男性爱慕的女性美，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父亲及兄长的势力来强调自我。她是一个无所欲求的女人。

按说卢克雷齐娅至少也能嫁给地方贵族，安稳地过着贵妇人的娴静生活。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一生竟会如此悲剧。这个看似平凡的女人最大的不幸，皆因整个人生都未曾脱离她那过于非凡的父亲和兄长的控制。

歌德曾说：“了解女人就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果想要深刻认识某个时代，那就得好好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些为卢克雷齐娅作传的作家，兴趣也全然不在她的性格特点，而是在叙述她的同时也叙述了她周边的人群。也就是说，在描写男性的时候，有可能忽略女性；但是，在描写女性的时候，却不能不写男性。正因为如此，虽是描写女性，却绘出了一幅更近似于历史真相的画卷。卢克雷齐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人。在意大利作家之中，就数玛丽亚·贝隆奇[7]撰写的卢克雷齐娅传记最为细致，其标题亦记为“卢克雷齐娅及其时代”。历史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的她，其父亲及兄长才是众人的兴趣所在，毕竟他们都是历史上极富个人魅力的第一流的男人们。

波吉亚家族的人们

1492年7月25日夜间，或是26日的凌晨吧，性格软弱而且晚年爱听信谗言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留下的只是一堆毫无头绪的难题。

在意大利的外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天主教诸国不禁深感压迫。但是，对于罗马教皇来说，比起土耳其帝国，更为现实的威胁是眼前的西欧天主教诸国，也就是逐渐强大起来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专制国家势力的抬头。这些国家虽然在其成长为一个帝国的过程之中利用了教会的势力，现如今却对意大利燃起了更大的领土野心。

在意大利国内，教会亦处于各大势力的夹击之中。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四大势力为保持各方势力均衡，一致认为要尽量抑制教会势力。

罗马教廷已经无法掌控其领地罗马涅地区，该地逐渐被野心勃勃的威尼斯共和国所侵蚀。在罗马市内，奥尔西尼[8]、科隆纳[9]、萨韦利（Savelli）等豪族，因为背后有着牵制教会势力的各列强的支援而肆意横行，教会对此却无计可施。

教会的势力一落千丈。教廷已然成为意大利内外列强利用的一个机构。虽如此，关于教皇继任的阴谋却在险恶地进行着。瞄准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与米兰的伊鲁·摩洛联手，将他的胞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推举为枢机主教；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则成了那不勒斯派的朱利亚诺·罗韦尔[10]枢机主教的后盾。威尼斯静观其变。佛罗伦萨则因为四个月前洛伦佐·德·美第奇之死而失去了重要的外交政治家，无计可施。教皇之位的争夺俨然成了斯福尔扎与罗韦尔两大枢机主教势力的交

锋。

当时只有37岁的斯福尔扎毕竟太年轻了，罗韦尔则因行为粗鲁、政治目的过于明显而受人厌恶。二者之间脱颖而出的是同为枢机主教的罗德里戈·波吉亚[11]。身为西班牙人的波吉亚也并不是没有劣势，因为对于格外讨厌外国人当教皇的意大利枢机主教们来说，“加泰罗尼亚[12]人”这个词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

拥有强大的米兰公国势力背景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与那不勒斯王国联手；作为英诺森八世的第一近臣朱利亚诺·罗韦尔，拥有着政治势力上的支持；而波吉亚又拥有什么能够一较高下的法宝呢？

那便是金钱。具有枢机主教中第一资本家经济实力的波吉亚，将自身最大的财产——对现实的冷静判断与计算——大胆地投入一个个要点之中。34年来，他担任着枢机主教之中最重要的职位副大法官，由此获得的经验也让胜利的天平向他倾斜。自认年纪太轻的斯福尔扎这一次放弃了自己成为教皇的念头，波吉亚便笼络斯福尔扎作为自己的强力后援，这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处。

得知波吉亚这一动向的罗韦尔暴跳如雷，而波吉亚的阴谋也渐渐浮出表面。在英诺森八世临死的四天前，就在这位绝望的躺在病床上的教皇面前，波吉亚与罗韦尔之间的争执爆发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般地站在教皇的面前——波吉亚瞪着罗韦尔——就能向您表现出谁是副大法官了吧。”“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罗韦尔也大声地吵嚷着——就能看出是谁不敬畏您了吧。”（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的信）

教皇死后8天，8月3日早上，23名枢机主教出席，召开了第一次教皇选举秘密会议。

卡拉法[13]获得了9票，波吉亚7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到两票。

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尚未显现出效果。斯福尔扎派将票投给了年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到有效票数的2/3，所以延期至下一次表决。聚集于圣彼得广场等待结果的罗马市民们也纷纷散去。

第二次教皇选举会议按照惯例，仍在西斯廷教堂召开。

卡拉法9票，波吉亚8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了一票。

斯福尔扎派严守约定，井井有条地将选票全部投给了卡拉法。虽说才早上9点，夏天的罗马已暑气炎炎。信使们接到未有定论的消息后，便飞驰于意大利国中。马蹄扬起的尘烟，白茫茫一片，久久地笼罩在圣彼得广场之上。第三次，仍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依照惯例，自下一次选举会议起，只能向枢机主教们提供面包和水。此时，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在拉取选票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金币被巧妙地藏匿于大量的美术品及银器之中，偷偷地从波吉亚的宫殿运至斯福尔扎家中，纳佩堡也作为礼物送给了斯福尔扎。不仅如此，波吉亚约定，在即位之际任命斯福尔扎为副大法官，政治上亦与斯福尔扎联手。这一切，都在8月10日至11日间完成。于是，斯福尔扎派原本投给卡拉法的选票转投给了波吉亚。胜负已定，波吉亚17票，超过了有效票数的2/3。得知这一结果的罗韦尔感到大势已去，乘夜逃回自己在奥斯蒂亚[14]海岸边的城堡。

8月11日的早晨，罗马的市民们在圣彼得广场上眺望着。当新教皇被选定时，那拉丁语的宣告声让此前涂固的窗台处的砖头剥落得更为厉害。[15]“枢机主教罗德里戈·波吉亚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即位教皇。”

真正的贵族不会讨论市民的道德等问题，开始关心市民的道德之

时，就是贵族阶级没落之日。新教皇罗德里戈·波吉亚正是秉持这种真正的贵族之心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西班牙瓦伦西亚（València）附近的哈蒂瓦（Xàtiva）是波吉亚家族的领地，罗德里戈便出生于此。其家族的飞跃始于1455年伯父即位教皇。教皇加里斯都三世在即位之时，分别授予两个西班牙外甥以要职：哥哥佩德罗·路易斯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弟弟罗德里戈任枢机主教，并且马上升为副大法官。赐封还不仅仅如此。当时的记录中还记载了教皇将主教区中最富裕的地区赐予了外甥。从那时起，罗德里戈的才智慢慢地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只有25岁的他，还稍微显得有些稚嫩。

聪明过人的罗德里戈，在枢机主教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不仅如此，面对当前事态，他还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沉着冷静。就在三年后伯父加里斯都三世去世之际，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同以往一样，在教皇去世之际发起了暴动。哥哥佩德罗·路易斯决定逃离无政府状态的罗马，罗德里戈将孤身一人的哥哥送出罗马城后返回了梵蒂冈，静静地祈祷着，任由暴徒掠夺。但是，没有一个暴徒能够将手伸向那样镇静的他。外表看似平静的他，一想到哥哥在逃亡途中被奥尔西尼杀害，心绪就沸腾不已。

亚历山大六世

此后，34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在这期间，四位教皇相继即位而后过

世，而他依旧是副大法官。罗德里戈一直坚忍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时刻来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他的势力与经济能力也愈发强大起来。

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罗马，罗德里戈并不像僧侣那样封闭自己，而是过着王公贵族一般的生活。他喜欢狩猎，豪华的祭典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至于学问与艺术，对于他而言就像对于很多文艺复兴人士一样，不过是家常便饭。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特地赞助和支持学问和艺术的发展，从而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很贵族式的，可以说这一点是他，也是波吉亚家族的特征。他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算在豪华的宴会上甚至是礼拜堂内，他都自然不拘。

这正是波吉亚教皇“堕落的真相”。虽被同时代及后世戏称为“最性感的基督”，可生性厌恶伪善的他，毫不在意来自敌对方的宣扬及新教徒对他的责难，任由所有流言蜚语自生自灭。然而“历史总有一天，会对这光辉的生涯给予正当的评价”（胡安·洛佩斯[16]），即便在同时代的人之中，也并不只有洛佩斯一个人这么认为。

当然，如果想要对这位“最性感的基督”那过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责难的话，一一列举事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北方的新教徒来说，让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的是，教皇在作为一个圣职者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梵蒂冈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团体，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是天主教会和其他大型宗教所共通的宿命。这一本质在现代也没有丝毫改变，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强烈要求政治性的时代。可是，从所有的层面上来说，无论是在宗教、政治还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欲望上，这个被称为“能够在自己出生的年代里生存下来的男人”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是一个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人。

28岁的时候，随同教皇庇护二世[17]出席曼托瓦会议的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朴素的农村姑娘瓦诺莎。他们之间的恋情此后整整持续了30年。即使后来二人之间已不再有两性关系，可在他的心中，对瓦诺莎的

爱情与尊重也从未消失。早已成为别人妻子的她，被枢机主教波吉亚请到罗马，为他生了四个子女：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可是，孩子们一出生便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波吉亚的表妹阿德里安娜·米拉的身边抚养。在波吉亚的宫殿旁边，波吉亚为瓦诺莎构建了一个家。她在那里除了等待波吉亚的来访和偶尔去看望孩子们外从不抛头露面，做了一辈子教皇背影里的女人。

与瓦诺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生于罗马贵族之家的朱莉娅·法尔内塞[18]。她在枢机主教波吉亚成为教皇的数年前就是他的情人。“美丽的朱莉娅”拥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美，芳龄不足20的她将年近60的波吉亚对女人的思慕与宠爱集于一身，享受着华丽丽的、受人注目的地位。

根据波吉亚的安排，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米拉的儿子奥尔西诺·奥尔西尼举行了名义上的婚礼，但人们背地里都称她为“基督的新娘”。她的哥哥亚历山大通过妹妹的情人教皇的帮助当上了枢机主教，后来又成为保罗三世，坐上了教皇的位子。

提到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性不受约束、大胆追求肉体享乐的生活，就不得不提他那几个私生子的名字。

长子佩德罗·路易斯生于1463年，不知生母为何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西班牙，成为一名将军。他深受费迪南多国王器重，不仅被国王封为甘迪亚公爵，还与国王的侄女订了婚。可是命运弄人，本可以承载父亲所有期待的他却在父亲即位教皇的4年前英年早逝。

其次是瓦诺莎生育的4个孩子。父亲即位教皇那年，切萨雷17岁，胡安16岁，卢克雷齐娅12岁，杰弗里11岁。

当时切萨雷尚在比萨大学念书，依循那个时代“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入神职，三子从军事”的惯例，这个学校里面的优等生已经是潘普洛纳[19]的主教了。不过，在他的同年级学生之中还出了一位枢机主教，

那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即后来成为利奥十世的乔凡尼·德·美第奇。然而，同才华横溢的切萨雷相比，这位后来的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岂止是落后一步，经常不得不退让波吉亚家族三分。

遗传了波吉亚家族修长体态的三子胡安，着装极其时髦，是当时罗马社交圈里的主角。或是连坊间也流传着关于他那些散漫放纵行径的话语，竟使得略有耳闻的教皇父亲为之吃醋。不过，父亲想让他代替死去长子的位置，对他也是爱护有加的。

再说说有着长长的金发、青灰色眼睛的卢克雷齐娅，在父亲即位教皇之后，便住进了梵蒂冈教皇宫近侧的宫殿，通过西斯廷教堂可以随意往来。与卢克雷齐娅同住的，一个是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儿子戴上了最大的绿帽子的女人——阿德里安娜·米拉，卢克雷齐娅自1480年4月出生以后就一直与她居住在一起；另一个则是父亲的新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

对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来说，探望这个奇妙组合的三个女人居住的宫殿是非常快乐的。至于让女儿卢克雷齐娅与自己的情人居住在一起的事情，教皇似乎没有一点儿担心。不仅如此，在一些罗马高级妓女们出入的晚宴上，他也泰然地偕女儿一同前往，这正是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即位教皇后的亚历山大六世想要更加有效地利用他的女儿，因此早已许配给西班牙一个贵族的卢克雷齐娅不得不再婚。年幼的杰弗里暂时无法在任何决议中发挥作用，不过在数年后，他也成了教皇政略上的一个砝码。

就这样，波吉亚的子女们，尤其是备受教皇关爱的瓦诺莎生育的四个孩子，无一幸免地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

白色婚姻

即位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雷厉风行。在5天后召开的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将迄今为止他所担任的瓦伦西亚大主教一职任命给儿子切萨雷。与此同时，他决定将时任蒙雷阿莱大主教的外甥乔凡尼升为枢机主教。切萨雷不仅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还被赋予了西班牙最高宗教职位的资格。梵蒂冈的其他要职也都被波吉亚家族所垄断。当时费拉拉的大使给埃斯特家送去了这样一封信："新教皇为了当新教皇，彻底实施了亲族主义，亲党占满了整个教廷。"

从这时起，亚历山大六世开始了他"重振教廷威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最初他的关注点在外交政治，直到查理八世率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后，他才幡然醒悟到要搞军事政治。那就是，教廷一方面要突破迄今为止来自意大利内部四大势力的压制，另一方面还要分割四大势力以获得鹬蚌相争的利益。

米兰（伊鲁·摩洛）+法国势力，体现为梵蒂冈内部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的强势；那不勒斯（费兰特国王）+罗韦尔枢机主教的后援，也让奥尔西尼家族在罗马市内横行霸道，而这些都在威胁着教皇。至于宗教上的问题，自萨伏那罗拉以来对教廷统治的残暴和腐败的问题抨击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不过，对于没有强大势力做后援的波吉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重振一落千丈的教廷威信，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依靠扶植亲戚（亲信）来巩固教皇地位也就成了非常必要的手段。

曾经在选举亚历山大六世中充当了主要角色而以功臣自居的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如今发现自己当初打错了算盘。因为他自认为完全在自己掌控中的新教皇，却露出要与他的政敌那不勒斯结成友好关系的迹象。对教皇的意图完全不明白而感到十分不安的他，从原本以为能够掌控主动的一方，一下子翻转为被对方控制的一方。而这一点，阿斯卡尼奥竟尚未察觉，这正是亚历山大六世的老练之处。为了达成哥哥伊鲁·摩洛的野心，阿斯卡尼奥也就是米兰这一方，现在无论如何都

要将教皇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于是，刚满12岁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成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她的结婚对象被选取为相当于伊鲁·摩洛及阿斯卡尼奥的表弟的乔凡尼·斯福尔扎。这个亚得里亚海畔的佩萨罗的小领主之前曾与曼托瓦侯爵的妹妹马达莱娜·贡扎加（Maddalena Gonzaga）结过婚，妻子过世后就孑然一身了。

1492年10月中旬，佩萨罗伯爵被邀请至罗马，秘密地商谈了结婚事宜。至于卢克雷齐娅与那个西班牙贵族之间的婚约则花了3000达克特就解除了。

在阿斯卡尼奥的策动下，婚约极其隐秘地筹备着，但是那不勒斯也并非没有察觉。费兰特国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眼下，法国对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已昭然露骨，米兰与教皇又日益亲近，这对他而言是不能置之不理的问题。那不勒斯方面也立刻提出了婚约。切萨雷入了神职，胡安将要继承长子之位，所以对剩下的杰弗里提出了与阿拉贡王室的女儿结婚的议案。杰弗里才11岁。阿斯卡尼奥一得知那不勒斯方面的动静，就立刻感到仅仅依靠婚约是不可靠的，于是急忙推进结婚的进程。但是教皇提出了条件。他考虑到卢克雷齐娅年纪尚小，所以要求在婚礼过后一年才将女儿正式嫁过去。

1493年，新一年的春天，佩萨罗伯爵兴高采烈地来到罗马，成为拥有巨额陪嫁金的教皇的女儿、年轻貌美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为了不逊色于梵蒂冈的豪华，他在来罗马之前向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借来了引以为豪的精工制作的金质胸章。不过，后来在婚礼上，这引来了曾经看到过这一胸章别在曼托瓦侯爵胸前的曼托瓦和费拉拉大使们的嗤笑。

6月12日的早晨，在平托瑞丘已经开始描绘壁画的梵蒂冈的波吉亚房间里，婚礼开始了。教皇由8位枢机主教环绕着从客人中间穿过，等他一入席，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曼托瓦侯爵金质胸章的女婿便入场了。阿斯卡尼奥与自己的第一心腹费德里科·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交换了胜利的目光。新娘的两位哥哥，切萨雷身穿简单的主教服，静静地站着，胡安则完全与其相反，身穿当时最流行的镶嵌着豪华宝石的服饰，吸引了一众女宾的视线。在两个不大的房间内，有150余名宾客出席，简直再无立锥之地。

波吉亚寓所

新娘入席了。没有佩戴宝石的服装，映衬出卢克雷齐娅的美丽和未经世故的青涩。她静静地走到教皇父亲的跟前，那轻盈的步子，没有让

人感到一丝政治联姻的重负。在她的身后跟随着黑人少女奴隶，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俗。然而，人们将视线齐刷刷地投向了紧随其后入席的教皇的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那妖艳的身姿。她那琥珀色的肉体，简直要溢出来了；那走路的样子，也带着一丝轻佻。婚礼简单地结束了，之后是观看戏剧，宴会持续至次日早晨。席上的花魁不是卢克雷齐娅，而是朱莉娅，是哥哥胡安。祝福的彩纸糖故意朝着女宾那袒露的胸脯深处，在一片华贵的娇声中撒开。

6月13的早晨，卢克雷齐娅终于将筋疲力尽的身躯横放于睡床上。脱下的新娘礼服被扔在一旁。房间依旧是昨日婚礼之前的那个房间，睡觉时也依旧是一个人，生活上也毫无变化。同往常一样，她与阿德里安娜·米拉、朱莉娅·法尔内塞持续着三个女人的生活。

通过女儿的“白色婚姻”[20]，教皇封住了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的嘴巴。他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召集了枢机主教会议，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同时，他还任命伊波利托·埃斯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等13名新枢机主教。这么一来，阿斯卡尼奥的势力仅仅在人数上就已经被反超了。阿斯卡尼奥再次被教皇如愿以偿地设计了。

同年，胡安·波吉亚继承了死去的哥哥佩德罗·路易斯的封号，成为甘迪亚公爵。继而，他替代哥哥前往西班牙结婚。次年，年仅13岁的杰弗里也与比他年长三岁的阿拉贡国王的庶出女儿桑夏[21]在那不勒斯结婚。

到了这个时候，佩萨罗伯爵才终于有点儿不安起来。约定的一年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新婚妻子却依旧和睦地与另外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教皇没给任何音信。卢克雷齐娅与朱莉娅的关系很好，对于这个与自己一样年轻却更华美的父亲的情人，卢克雷齐娅没有一丝嫉妒。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为嫉妒而痛苦过。

在教皇的宠爱之下，居住着三个女人的宫殿理所当然地成为盛大的

社交中心。对于那些携带着请愿书希望转交给教皇的访客，卢克雷齐娅总是无法拒绝而接受下来。不过，时间长了之后，她常常在最爱的舞会中忘记那些信函，而将它们遗落在房间的角落里。

佩萨罗伯爵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打算无论如何都要将妻子卢克雷齐娅带回佩萨罗。如果不这样做，他觉得这场婚姻好像就不了了之了。教皇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但是又提出了条件：不仅带上卢克雷齐娅一个人，还要带上阿德里安娜与朱莉娅两个女人一起离开。当时，罗马市内黑死病肆行，所以教皇心中盘算的是为了避难而允许卢克雷齐娅她们离开极短暂的一段时间。他向阿德里安娜下达了维系“白色婚姻”的指示。可是，这个佩萨罗短期避难的计划结果却让三个女人在佩萨罗滞留了很久，完全违背了教皇原本的意图，因为正好遇上查理八世率领法国军队侵略意大利这一重大事件。

1494年成为意大利“最悲惨时代的元年”（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侵入意大利的法军不可思议地受到了热烈欢迎，查理八世继续意大利南下之行。

当时，可以说除了被法国瞄准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外，在领导者中几乎只有亚历山大六世一人明白法军的入侵有多么危险。他运用了一切外交手段，力图改变查理八世征服那不勒斯的意志。可对于这个丑陋的小个子法国人而言，脑中全是成为伟大的查理曼大帝[22]后继者的妄想。此外，在教廷内部，依靠法国势力的斯福尔扎派的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自不必说，就连曾经是那不勒斯派的罗韦尔现如今也倒戈于法国。所以，亚历山大六世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与他亲近的奥尔西尼家族也很可能像罗韦尔一样发生叛变。这对教皇而言，无异于在罗马城中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两年前曾是劲敌的罗韦尔与阿斯卡尼奥联手了。先是罗韦尔接近查

理八世，召集宗教会议以此逼迫波吉亚退位，并向法国进言应当重新选举新教皇。其理由是两年前教皇的选举是在行贿下产生的。听取这一建议的查理八世派来的使者，正是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

来到梵蒂冈的阿斯卡尼奥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间持续了一场6小时单刀直入的会谈。单刀直入的会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今会谈的双方就是两年前教皇选举中的买卖者。可是，教皇拒绝了法国派这一强制性的提议。“教皇不是法国国王的奴隶”，在这场会谈结束之后，教皇对费拉拉大使也坚定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11月末，教皇将二度前来胁迫的阿斯卡尼奥监禁于圣天使堡。12月，奥尔西尼家族同预料的一样投靠了法国。守卫罗马的只剩少数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的士兵，罗马变成了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城市，教皇只能默许法国军队入城。亚历山大六世此时深切地感受到教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是强有力的军备。他的这个愿望后来由切萨雷实现了。

那年的最后一天，查理八世进驻罗马城。持续了6个小时的军队行进，在法国国王进入下榻之处圣马可宫殿（今威尼斯宫殿）之后依旧没有停止步伐。法军一如既往地开始掠夺，甚至连卢克雷齐娅的母亲瓦诺莎家都没有放过。教皇波吉亚透过梵蒂冈的窗户，默默地看着法军掠夺的景象，看着阿斯卡尼奥大摇大摆地走出圣天使堡。

切萨雷·波吉亚

1月6日，查理八世带着胜利者的炫耀，进入了梵蒂冈。这是为了与

教皇的第一次会面。会面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迫教皇认可法军对那不勒斯的征服，二是召开宗教会议。可是，当查理八世在梵蒂冈的房间里与亚历山大六世一对一谈判时，查理八世在政治上完全不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面对教皇天生的感性外交，原本要求的两件事竟被不经意地敷衍带过，甚至连国王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第一次会面就这样在天主教国家的国王对教会首领的公式访问中结束了。教皇赐予查理非圣职者最高的金制玫瑰赏赐，查理对此也十分满意。

然而，亚历山大六世对法军驻扎罗马的既成事实感到十分可怕。尽快将其驱逐出罗马城成为首要问题。他无奈地接受了法国国王的以下要求：1.允许法军借道教皇国。2.将附带养老金的人质、滞留于教廷的土耳其王子杰姆与教皇的亲生儿子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作为人质进行交付。不过，切萨雷作为人质只有4个月的期限。

1月28日，查理八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作为人质的切萨雷也与国王并肩前行。在其身后的10匹马背上摇摇晃晃地驮着19件行李，上面用饰有切萨雷徽章的美丽的黑色天鹅绒覆盖着。不过，在这19件行李之中只有两件是他的东西，其他的17件装的都是些破烂货。道路行进不久，驮了那两件行李的马匹便悄悄地脱离了大部队，躲藏了起来。当天夜里的歇宿之处是罗韦尔的领地韦莱特里（Velletri）。到达住处后，夜里大家都入睡了，19岁的切萨雷轻松地走进查理的房间行晚安之礼。他又跟国王友好地说了一会儿话，才回到给他安排的房间。

次日清晨，巡查人质情形的查理家臣发现白色床铺上扔下的枢机主教的猩红色圣袍，切萨雷已无影无踪。

查理立刻写信向教皇抗议。“枢机主教干了坏事，简直是太坏了。”这是现存书信的直译。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王来说，写得多么幼稚啊。当时即便在意大利，小国的外交官也不会写出如此幼稚的文章吧。在查理提笔写下这封抗议信的时候，切萨雷已经到了罗马。他与教皇父亲秘密会见之后又离开罗马，两日后抵达斯波莱托。得知这一

消息的查理向斯波莱托市提出了交还切萨雷的要求。但是，斯波莱托市却做出了如下回复：“枢机主教已经离开，随行仆人两名，马仅三匹。当您认为影在此处时，人却已笑着到了彼处。”教皇也只声称：“到处也找不到枢机主教，我们也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啊。”

2月5日，在徒劳了8天之后，查理只能放弃，继续向那不勒斯出发。两天后，那些装了17个破烂货行李的马匹一行，在随从的牵引下愉快地回到罗马。一直到3月末，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切萨雷的去向。

因为儿子的逃跑闹剧而变得一身轻松的亚历山大六世迅速开始反击。在教皇的号召下，意大利诸国纷纷响应。法军入侵的肇始者伊鲁·摩洛、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加入其中。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

轻取那不勒斯后沉溺于胜利之中的查理，一听说这个同盟成立的消息，“为了不成为征服之地的俘虏”，便急忙命令全军返回法国。归途中，查理希望与教皇会面，但亚历山大六世回避了，他向防守坚固的奥尔维耶托、佩鲁贾出发。无奈之下，查理及其军队急行至绵延的阿尔卑斯山，距离上次为侵略意大利翻过阿尔卑斯山尚不足一年。可当翻越亚平宁山脉后，法军在塔罗河岸遭遇了由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两相交锋，法军一败涂地。查理八世也舍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友军，在艰难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逃回了法国。法军在此次入侵中给意大利留下了一个礼物，那就是被称为“法国病”的疾病。当然，法国人自己是不会使用这个名称的，他们将这一羞耻的疾病也就是性病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

在佩萨罗眺望着亚得里亚海的卢克雷齐娅迎来了15岁。从罗马一同

前来的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二人，早已厌倦了佩萨罗的单调生活而返回了罗马，只剩下卢克雷齐娅孤身一人留在佩萨罗。摆脱了法国威胁的教皇父亲开始着手将女儿唤回膝下。对于迅速察觉出米兰衰败迹象的教皇而言，没有必要再与米兰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当教皇在罗马一心一意想着对付查理的对策时，佩萨罗伯爵一方面作为教会的军人接受着俸禄，另一方面又投靠了米兰。在教皇的强烈要求下，卢克雷齐娅由丈夫陪伴，于6月16日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教皇身边，那时教皇滞留于佩鲁贾。之后，当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她与教皇父亲回到了罗马。

次年，亚历山大六世开始真正着手切断女儿与佩萨罗伯爵之间的关联。佩萨罗伯爵大为震惊，他在罗马、佩萨罗、米兰之间奔波着试图改善事态，却都徒劳无功。他寄希望于米兰的伊鲁·摩洛与阿斯卡尼奥两人，但他们都不愿因此加深与教皇的恶劣关系，所以对他的苦苦哀求置若罔闻。可是，在天主教的教义中，离婚是不被认可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难办好。梵蒂冈的档案馆为了查到适合的条文而忙碌了起来。就在匆匆翻查书页之中，一年也就过去了。

1497年，著名的萨伏那罗拉的论敌、僧侣马里亚诺·达·杰纳扎诺（Mariano da Genazzano）被教皇派遣至佩萨罗，目的是让佩萨罗伯爵承认“与卢克雷齐娅的婚姻，因为丈夫的性无能而有名无实”。面对老练的僧侣马里亚诺的逻辑，佩萨罗伯爵不堪招架。绝望之下，他请求一周的宽限。他策马至米兰，打算与伊鲁·摩洛商量一下。

正当米兰的伊鲁·摩洛伯爵取笑佩萨罗伯爵“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要不要试试看找别的女人在证人席上做证？”之时，一直都在罗马愉快生活的卢克雷齐娅，突然有一天在驾马远行的途中躲进了一座修女院。即便父亲下了命令，她也不愿外出。可是，想要逃离这场离婚喜剧的她，最终还是在婚姻无效的文书上签了字。走投无路的佩萨罗伯爵现在的担心是，结婚时教皇为卢克雷齐娅支付了三万达克特的陪嫁金。那年年末，当得知不用偿还这笔款项时，他在确认自己作为性无能的丈

夫的文书上也签下了名字。

黑暗之中

卢克雷齐娅在修女院里躲了8天。6月14日，她的母亲瓦诺莎将波吉亚的亲戚邀请至自家的庭院，举办了一场初夏的晚宴。这是一个家族内部的孩子们的聚会。众人围绕在这位依旧十分美丽的母亲身旁，享受了一个甜蜜而美丽的夏夜。

脱去主教圣袍的切萨雷穿着一身普通人的服饰，同往常一样，毫无贵族的华丽。不过那精心裁剪的服装，将他竹节似的修长身躯显衬得淋漓尽致。他皮肤微黑，头发乌黑，一双略带青灰色的大眼睛里总透射出深邃的目光。唯有那性感的黑胡须及埋藏其中的嘴唇，勉强将他那稍稍一动就会显得严峻的容貌软化了一些。

晚宴上最华贵艳丽的人当属胡安，他在去年被父亲从西班牙召回。当时打算重组教皇军队的教皇父亲任命胡安为“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承载了父亲无限期望的他却在指挥与奥尔西尼的作战中铩羽而归。不过，他对这场战役的失败毫不介意，将妻子留在西班牙后，自己回到罗马依旧十分快乐地生活着。在罗马傲慢横行的他屡屡和阿斯卡尼奥发生冲突，不过，不得不忍让的一方常常是阿斯卡尼奥，谁让胡安集教皇父亲万千宠爱于一身而权势盛极一时呢。那个初夏的夜晚，衣裳华丽的胡安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他将一个戴着面具的陌生男子拉到了身边。至于这个面具男子是谁，对于席上的其他人来说完全是个谜。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感到不安或是奇怪。大家窃窃私语的大概也只是胡安热情的同性之爱吧。

杰弗里也与妻子桑夏一同回到罗马。这名来自那不勒斯的女子，一

头黑发，热情似火。不满足于年幼的丈夫的她刚到罗马便与切萨雷发生了关系，甚至当胡安从西班牙回来后，两人也发生了关系。她与叔伯之间发生的绯闻，令教皇烦恼重重。

半夜时分，众人纷纷告别瓦诺莎后就各自回家了。深夜里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波吉亚的一家人缓缓地散着步，朝着梵蒂冈宫殿的方向归去。当走到台伯河畔快到宫殿时，胡安说想要一个人再去呼吸一下夏夜里的凉气，身边只带了一名马夫，便同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骑着一匹马离开了。大伙儿都说，这太危险了，至少带上武器吧。可是，他只是笑着说马上就回来。此时罗马家家户户早已关窗入睡，幽暗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一些墙面上镶嵌着的圣像前仍点着长明灯外，剩下的只有茫茫黑夜里的恐怖暗影。胡安就消失在那黑暗之中。

第二天在梵蒂冈宫殿内，教皇一早就为筹备那不勒斯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忙碌不停。直到过了晌午还不见胡安身影，教皇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因为胡安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他留宿于妓女的家中，为了不被人看见他从妓女家中出来，直到傍晚才回来——所以教皇心想这次大概也是那样的情形。可是，夜幕降临，依旧不见胡安回来。教皇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西班牙籍的禁卫军冲向了街头。所有的道路上都奔跑着武装的西班牙士兵，吓得市民们差点儿以为奥尔西尼或科隆纳的军队袭击罗马来了。有人发现了甘迪亚公爵的马夫，可是他已经快要咽气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就死了。所有人的心中都浮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一个睡在台伯河畔的船中的船夫被带了过来。这个叫作乔治的船夫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6月14日的晚上，他同往常一样睡在船中，却被一种异样的动静吵醒。那是来自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医院方向的两个男人发出的响声。他们谨慎地环顾四周后走到河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骑着一匹白马过来，马鞍后面驮着一个被绑着的人，左右两边还有两个马夫扶

着。他们在河岸边停了下来，骑士调转马头，发出指示。男人们从马鞍上卸下那个不能动弹的身体，投入河中。船夫清楚地听到骑士向男人们确认是否投进了河中。“是的，主人。”男人们回答道。骑士再次调转马头。缓缓流淌的河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浮着，那是顺水流去的死者身上被风吹得鼓鼓的披风。男人们朝尸体扔了石头。骑士再次下令让男人们清除掉泥土上留下的痕迹，众人这才离去。夜晚恢复了宁静。

船夫说自己不敢去报告，是因为他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最后也都被深埋于黑暗之中。

听到此处，教皇瞬间虚脱了。他怎么都不能相信。其他人的心里都已明白那不祥的预感终究还是发生了，唯独教皇不愿相信。于是，台伯河的全面搜索开始了。300艘船撒下渔网，数千支火炬把台伯河照得透亮。河畔两岸，夜如白昼，直至天明。次日中午，甘迪亚公爵的尸体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被打捞了上来。他双手被缚，全身9处伤痕，喉咙处被深深地剜了个口子，这被定为最终致命伤。他身上的佩剑和钱包中的30达克特仍在，披风里浸满了泥沙。公爵的尸体被运送到圣天使堡，脱去肮脏的衣服洗净身躯后，换上公爵的礼服，胸前佩戴上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徽章。那年，他只有21岁。

当天傍晚，在大约120支火炬的照明下，一支由亲族、僧侣、贵族紧随左右的送葬队伍，穿过寂寥无声的人群，从圣天使堡朝人民圣母教堂行进。“从城堡敞开的一扇窗户中，人们似乎听到在那幽暗的窗户背后，教皇哀号着失去的儿子的名字。”（萨努多）

教皇痛苦不堪，犹如自己受到拷问一般，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事发5天后，他一脸憔悴地出现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这真是莫大的打击！”教皇一口西班牙口音，声音低沉得时断时续，“我从心底里爱护着公爵。如果一切能够恢复原样，该多好啊。虽说都是因为自己造的罪孽而遭到报应，但那般惨死实在是太可怜了。”他哭了。然后，他环视了枢机主教继续说道：“我想实行教会内部的重组并废除亲族主义，

以后教会的职位只授予那些适合的人才。”这时，教皇的语气已经恢复了坚定，并立刻任命枢机主教科斯塔（Costa）为改革主管。

其间，教会的警察继续进行搜查。首先追查当天夜里与胡安在一起的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却连其生死都不得而知。嫌疑犯的名字被一个一个地列了出来。

第一个嫌疑人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他的暗杀动机非常明显，世人皆知他与死去的胡安关系不和。而且，现在在教会中处于孤立状态的米兰派除了暴动之外难成其他气候。所以，当法国再度将野心对准米兰时，米兰无论如何都要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而甘迪亚公爵正是反米兰派的先锋，这就构成了暗杀动机。此外，公爵最后消失的地点正巧在阿斯卡尼奥的宫殿附近，这无疑也加深了他的嫌疑。警察搜查了其宫殿宅院，但一无所获。最后，教皇宣布阿斯卡尼奥清白无罪。

第二个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他在奥尔西尼战役中与甘迪亚公爵同行，战败被俘后，甘迪亚公爵置其不顾独自逃跑了。所以，警察怀疑他怀恨在心，遂生谋杀之念。可是，众所周知，乌尔比诺公爵性格温厚诚实，所以他也洗清了嫌疑。

至于常常受人嘲笑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佩萨罗伯爵，事发当时被证明身处米兰，所以无罪。杰弗里因为妻子与自己的哥哥通奸而怀恨谋杀了胡安，这个嫌疑也不成立。树敌众多，甚至可以说周围全是敌人的甘迪亚公爵暗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十一天，7月5日，教皇突然宣布停止搜查。与此同时，波吉亚家族的人被隔离于梵蒂冈之外。杰弗里与桑夏被命令返回那不勒斯。22日，切萨雷也离开了罗马，出席那不勒斯国王的加冕仪式，原本这一天他准备与死去的胡安同行的。

当意大利全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起梵蒂冈秘密暗杀时，当坊间的传言“为了展示他还是一个网罗民众的渔夫，亚历山大六世用渔网将自己的孩子打捞了上来”[23]慢慢平息时，也就是事件过去8个月后的1498年2月22日，人们第一次在暗杀者的名单中看到了切萨雷·波吉亚的名字。当天，费拉拉公国驻威尼斯情报官阿尔贝托·德拉·皮尼亚（Alberto della Pigna）向埃斯特公爵寄了这样一封信：“根据我获得的最新消息，甘迪亚公爵之死是其身为枢机主教的哥哥所为。”

好奇的眼光重新投向了波吉亚家族。事件发生之后的所有情况，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过去的8个月中没有一点儿关于切萨雷的传闻，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传言他的暗杀动机有这么6条：1.因为与弟媳桑夏的关系而对胡安产生嫉妒。2.因为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恋导致兄弟间产生纠葛。3.因嫉妒教皇父亲对胡安宠爱有加。4.事发之际，教皇曾说过：“我知道是谁干的。”5.母亲瓦诺莎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刻面会教皇，而后教皇发布了停止搜索的命令。由此看来，瓦诺莎知道谁是暗杀者。6.切萨雷从那不勒斯归来后，教皇只让他行吻手礼，也没有跟他说话。可是，就上述1、2、3条而言，可能是当时大量逃进威尼斯的奥尔西尼党羽所做的恶意煽动，所以这三条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以切萨雷的性格来说，显然不是那种因为女人会产生嫉妒之心遂去杀害弟弟的心胸狭隘之人。可是，在这个22岁的“美丽而神秘的男人”心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根据他那雄伟的野心及势在必行的坚强意志，以及后来他继承了弟弟的一切，除了甘迪亚公爵头衔的情况来看，很可能被视为当时并不罕见的兄弟间暗杀案中的一例。对此，史学界至今依旧意见分歧。不过当时，至少教皇父亲表现得十分明显，认为凶手是切萨雷。即便如此，教皇还是想努力保护波吉亚家族。

阿皮亚古道[24]的附近，伞松林立，四周寂静无声，圣西斯特修女院就坐落在那一带。卢克雷齐娅深居于修女院高高的土墙之中。对她来

说，哥哥的惨死及父亲一手酿成的使丈夫蒙受耻辱的离婚喜剧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温柔亲切的哥哥的惨死虽然令她十分悲痛，但是她放弃了深究。她开始觉得，当自己的身边再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唯一能够保全自己的方法只有逃离。

每天都在不安与寂寞之中度过的卢克雷齐娅，很自然地将视线停留于身边唯一一个男子身上。这个名叫佩罗托·卡尔德龙（Perotto Calderon）的年轻人是教皇父亲的一个仆人，也是教皇与卢克雷齐娅之间的信使。在安静的修女院里，她将自己交给了这个热情英俊、身材高大的仆人。

这件事当然瞒不过教皇与切萨雷的眼睛。卢克雷齐娅怀上仆人的孩子的消息令他们非常愤怒，而街头巷尾的纷纷议论又让他们焦头烂额。一天，在梵蒂冈，就因为佩罗托跟切萨雷顶了几句嘴，怒不可遏的切萨雷便拔刀追向佩罗托。在教皇的面前，他将佩罗托的颜面砍得鲜血四溅，仆人就此消失了。数周后，台伯河中发现了一具手脚都被捆绑着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的卢克雷齐娅面不改色。三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教廷的悲剧

切萨雷开始慢慢地将他建立王国宏图伟业的野心付诸实践。在那不勒斯，阿拉贡王国富饶但不安定的国情尽收他的眼底，这让他看见了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不过，长年对那不勒斯虎视眈眈的法国是切萨雷不能轻视的对手。于是，他一方面写信请求教皇打探路易十二的动静，另一方面，为了更加接近王权，他试探性地向阿拉贡王室提出与国王嫡出的女儿结婚。因为就算他能与桑夏之类的庶出女儿结婚，也是毫无意义的。联姻作为整个伟业的第一步，他又谋划着让妹妹卢克雷齐娅与阿拉

贡王室的王子结婚。对方是桑夏的哥哥阿方索，和桑夏一样也是庶出。简单会谈后，结果很明显。对于阿拉贡王室来说，把与王权密切相关的嫡出女儿嫁入波吉亚家族，尤其是嫁给切萨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至于庶出王子与卢克雷齐娅结婚倒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能够借此加深与教皇的关系，阿拉贡王室也乐意至极。

1498年7月，在梵蒂冈举行了一个只有家族内部成员参加的婚礼。无论这场婚礼有着怎样的背景，卢克雷齐娅都是幸福的。她的新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但是具有开朗温和的南欧人性格。和美丽动人的妹妹桑夏一样，他也有一张精致漂亮的面孔，是个十足的美男子。在这场婚姻中，阿拉贡王室的阿方索得到了比谢列的领地和公爵的封号。但是他并不想就此回到领地，而是在罗马的社交界中尽情享受作为教皇女婿的高贵地位。他们两个人住进了卢克雷齐娅居住至今的宫殿。倘若二人能够就这样过下去，一生不再与波吉亚家族发生关系，也许会非常幸福。可是，切萨雷并没有就此罢手。

一个月后，23岁的切萨雷终于脱下猩红色的圣袍，佩上了宝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宣布自己将放弃枢机主教的神职。同时，他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里昂附近的瓦朗斯（瓦伦蒂诺）领地及公爵的封号。为了从教皇那里得到离婚许可，路易十二对教皇的这个儿子不得不给予厚待。因为只有与妻子离婚，路易十二才能与查理八世的遗孀——大富翁安妮·布列塔尼再婚。

现如今已是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手持教皇的离婚许可书，离开深秋的罗马前往法国。为了试探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真意，他策划着与从小就生活在安妮女王宫廷中的阿拉贡国王之女卡洛塔联姻。看着在秋日温柔的阳光中身穿镶着金色花边的白色绸缎上衣，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的切萨雷骑在雄健的苇毛马上的美丽身影，教皇十分满意。他指示切萨雷也必须像这样威风凛凛地驾马进入法国，好让年幼的孩童们心生敬慕。

秋去冬来，眨眼已是翌年春意阑珊的5月，法国使者带着切萨雷结婚的消息来到罗马。新娘是纳瓦拉国王的妹妹，路易十二的表妹夏洛特·德·阿尔布雷。在法国宫廷，切萨雷已经知晓路易十二征服那不勒斯的坚定决心，因此法国国王不希望切萨雷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结婚。于是，他立即改变了方针，舍阿拉贡而取法国，直接与路易十二的表妹结婚。从这时起，切萨雷的视线瞄向了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涅及托斯卡纳。这对于卢克雷齐娅而言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可是，她对此尚一无所知，只与丈夫过着和睦的日子。

梵蒂冈又开始听到久违的笑声。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教皇父亲也感到十分满足。就在那时，法国信使带来的切萨雷婚礼的消息，更使整个梵蒂冈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巴黎出发的信使连续不断地换乘快马，4天后到达罗马时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住了。可是忧心忡忡的教皇迫不及待，特别赐予一把椅子给还未喘过气来的信使坐上，让他面对面地连续汇报了7个小时。

信使首先汇报了国王与女王都出席了婚礼，并圆满结束，之后的宴会非常精彩。新婚的第一夜，路易十二也亲自出席，当了见证人。只是新郎切萨雷每次结束后都要对国王使个信号，直到第六次，就连国王也豪爽地笑了起来，说切萨雷比自己还要“精彩”。包括卢克雷齐娅在内，在场的人都爽朗地笑个不停。当夜，为了庆祝切萨雷的成功，梵蒂冈大摆宴席直至深夜。

可是，卢克雷齐娅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切萨雷成功的政治联姻让教会与法国拉近了关系，对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来说，无疑是法国的乌云开始笼罩那不勒斯上空的前兆。乌云也压迫着波吉亚身边的这位来自那不勒斯的比谢列公爵，深感不安而情绪失控的他，有一天没有与妻子说一句话便悄悄逃回那不勒斯了。卢克雷齐娅神经质地笑出声来。“佩萨罗伯爵与比谢列公爵，我的丈夫们都逃离了梵蒂冈。”那时

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盛怒之下，教皇将桑夏遣回了那不勒斯，并对那不勒斯国王说："自己的东西还是自己保管的好。"女儿的悲伤也得想个解决的办法才行，于是教皇委任女儿为教会领地斯波莱托的执政官，希望因被丈夫抛弃而蒙羞的女儿能够向世间展示即便她一个人也能做好一个执政官，并让弟弟杰弗里同行。

丈夫逃跑5天后，8月8日，卢克雷齐娅一行出发前往斯波莱托。对于被丈夫抛弃的19岁的卢克雷齐娅和一直遭受妻子桑夏背叛的18岁的杰弗里，教皇以一个父亲的关爱，细心周到地安排了队列，同行的贵族和女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为了让身怀六甲的卢克雷齐娅旅途轻松，父亲还特别为女儿准备了饰有美丽绸缎的轿子，轿子里放了两个绸缎靠垫。当轿子从教皇站立的阳台下通过时，卢克雷齐娅与杰弗里都高高举起宽檐帽向父亲告别，卢克雷齐娅的金发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教皇看着从自己眼底下渐行渐远的姐弟俩，再三挥手道别，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方肯从阳台上离去。

得知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最终落入路易十二的手中，那不勒斯预感法国的下一个矛头将指向自己而深陷绝望。这种绝望几乎可以形容为："如果教皇抛弃了阿拉贡，那么依靠的就只有土耳其了。"为了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阿拉贡王室准备将逃回来的比谢列公爵送回妻子的身边，以稍稍平息教皇的怒火。9月中旬，比谢列公爵无奈地前往罗马。但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见教皇，只在罗马城墙的四周徘徊了一阵后便直接去了斯波莱托。即便如此，丈夫的归来还是令卢克雷齐娅欢天喜地。她扔下斯特莱托的政务，和丈夫一起去纳佩城堡，只为了两个人享受美丽的翁布里亚的秋天。

10月4日，卢克雷齐娅和丈夫返回罗马。5天后，她诞下一个男婴，取了一个与祖父相同的名字：罗德里戈。

此时，切萨雷正与米兰的路易十二的军队相呼应，稳健地推进征服罗马涅地区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经决定斩断与阿拉贡的关联。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将法国与威尼斯作为后盾。为此米兰已经被牺牲掉了，接下来就必须牺牲那不勒斯的阿拉贡。

6月末，梵蒂冈遭到雷击，教皇受伤。虽无大碍，卢克雷齐娅和从那不勒斯赶回的桑夏一同在梵蒂冈住下，悉心照料教皇。

7月15日，比谢列公爵同往常一样到梵蒂冈看望妻子与妹妹，并与教皇共进了晚餐。闲聊一会儿后，他离开梵蒂冈，这时已是半夜1点。在一个仆人的陪伴下，他从教皇住处的阳台下面通过，正打算横穿圣彼得广场。1500年时，从欧洲各地到罗马的朝拜者特别多，而那些贫穷的朝拜者就常常睡在圣彼得教堂的屋檐下。就在比谢列公爵正要横穿广场的时候，突然，几个黑影从那片看似正在熟睡的人群中跃起，瞬间包围了公爵。黑影拔出身上的佩剑，朝着公爵冲了过去。公爵原本就很擅长剑术，自然没有逃跑的念头，也拔出了佩剑。无奈黑影人数众多，公爵的披风被斩断，落在了地上。他上衣的金质徽章掉了，衬衫也被砍破了，鲜血直流。最后，公爵伤痕累累地倒下了。因为过于恐惧而发不出声的仆人这时才终于反应过来，他奔向梵蒂冈，敲响大门大声求助。一听到这个声音，正准备将倒在地上的公爵拖上马背的暗杀者们扔下公爵仓皇而逃。当梵蒂冈的卫兵赶到时，暗杀者们早已跑得不见踪影，只听到他们远去的马蹄声。

卫兵们将脸色惨白、浑身是血的比谢列公爵抬回了梵蒂冈。就在不久前，他还在这里与妻子和妹妹享受着快乐的时光，而她们此时还在继续闲聊。奄奄一息的公爵艰难地说出自己是被谁的手下砍伤的，听到那个名字的卢克雷齐娅发出了绝望的悲鸣。

卢克雷齐娅无法将身负重伤的比谢列公爵带出宫殿，她向震惊而又恐惧的教皇恳求，将丈夫搬至梵蒂冈宫殿内的一个房间，并安排了16名信任的卫兵守卫着，又立刻传唤了那不勒斯大使，让他火速请那不勒斯

国王的御医到罗马来。之后，她与桑夏两个人平静地陪伴在丈夫左右。

次日清晨，这一事件已传遍整个罗马。虽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暗杀的主谋是谁，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

比谢列公爵被安置于“波吉亚寓所”里休养，脸色苍白，发着烧，不过意识还清醒。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将临时赶制的床铺搬进了同一房间，睡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丈夫的一日三餐都是她们用军用炉子在这个房间里烹饪出来的，这样可以防备遭到意外的毒杀。而且在隔壁房间住着那不勒斯的医生随时听候差遣，房间外由教皇信任的卫兵及公爵的几个家臣守护着。

一个月快要过去了，年轻的公爵逐渐康复，已经能够走到窗边了。卢克雷齐娅对整个事件只字不提，全心全意地守护在丈夫身旁。她甚至向那不勒斯国王转告说，等公爵再稍微恢复一点儿，自己就带他一同回那不勒斯。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公爵现在也只信赖妻子，夫妻之间此刻才产生了真爱。两人无话不谈，唯有一个名字被他们努力避开了。

8月18日，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受教皇传唤，她们将比谢列公爵一个人留在了房中，穿过两道门去见教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守卫在房外的士兵与医生瞬间都被抓捕了。当切萨雷的“右手”唐·米凯洛托[25]进入房间并从里面锁上了房门后，尘埃落定。不一会儿，两个女人回来，看见房门外站着陌生的武装士兵。唐·米凯洛托向二人说明了情况，称公爵自己一不小心摔死了，她们想再看一眼遗体的请求也被无情地拒绝。比谢列公爵的遗体当夜便被秘密地埋葬了。几日后，卢克雷齐娅丝毫不顾教皇父亲的哀求，一个人带着儿子罗德里戈离开了罗马，前往纳佩城堡。

离开罗马

在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下，切萨雷实现了教皇父亲壮大教会军队的梦想。从身披猩红色圣袍的主教摇身一变成了佩剑骑士，前后形象真是对比鲜明。“教皇军队总司令”带来了军事统治力和“教会的旗手”的地位，政治权力也掌控在自己手中。切萨雷相继征服了伊莫拉（Imola）、法恩扎（Faenza）、弗利、佩萨罗与罗马涅。这让周边的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公国拼命地想打探出这位刚满25岁“寡言却极有行动力的男人”（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现在任何人都清楚，教皇已完全被儿子的绝对影响力左右了。

但是，切萨雷明白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以防年迈的教皇父亲突然辞世，从现在起就必须推进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意大利的其他公国，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费拉拉以及曼托瓦。对威尼斯，他以前就已经频频传递了这个意图；而对佛罗伦萨，他也表现出依靠的样子，巧妙地隐藏了征服托斯卡纳地区的终极野心；至于曼托瓦，他打算通过让自己的女儿与曼托瓦侯爵的儿子结婚而达成同盟。

将卢克雷齐娅从纳佩城堡唤回罗马，则是为了对付最后剩下的一个公国费拉拉。这回的结婚对象是费拉拉的国王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

但是，对于被挑中的埃斯特家来说，简直就是“被狮子盯住的狐狸”的心境。当时与威尼斯比肩、堪称完美的费拉拉和曼托瓦的信息网全部被调动起来，因为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怀疑在这个结婚提议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不仅他，就连曼托瓦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在拼命地收集信息。一日之间，无数封信从罗马发出，为的是彻底调查有关切萨雷、教皇以及卢克雷齐娅周围的情况。

另一方面，费拉拉也做好各种逃避的必要措施，通过官方大使宣称阿方索公爵已经与法国的某个遗孀订婚。但这是白费心计。因为罗马方面传来回音——那样的话就换成与次子费兰特结婚，但是需要附赠摩德纳和雷焦领地。这对于费拉拉而言，就是将国家分割为两半的意思。而且费拉拉公国是教会的封土，如果教皇有意向，甚至可以征收整个国家。埃尔科莱公爵选择了长子的婚姻，况且他还收到了来自路易十二的要挟（路易十二受波吉亚之托），已经无路可逃了。

阿方索·德·埃斯特

其间，在梵蒂冈架起信息网的费拉拉与曼托瓦捕获了意外的消息。

结婚的提议显然是出于切萨雷的政治意图，但是与前两次婚姻不同的是，教皇父亲对此颇感兴趣。为女儿的不幸而深感痛心的教皇认为，无论从门第还是从性格来看，阿方索·德·埃斯特都是最适合女儿的丈夫。而卢克雷齐娅也非常希望离开罗马。

得知这一消息的埃尔科莱公爵并没有坐以待毙。狐狸虽然是狐狸，但是他可是只老狐狸。为了抬高陪嫁金，他立刻特派一名熟悉二者经济状况的家臣作为大使前往罗马。从1500年年末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一直到举行婚礼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的交涉几乎都集中于此。

然而，教皇想看见女儿的笑颜，便答应了埃尔科莱的所有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尽情地赞美埃尔科莱是“伟大的公爵”，赞美阿方索是“最俊美的青年”，伊莎贝拉是“罕见的知性与美德、美丽的融合”。可是，唯独切萨雷非常讨厌顽固的埃尔科莱公爵。“简直就像个商人。”他鄙夷地说道。接着，教皇为了清理干净即将出嫁的女儿过去的情史，甚至将从前的仆人佩德罗与卢克雷齐娅生下的孩子因凡特·罗曼诺（Infante Romano）改成切萨雷的孩子，还在别的咨文中登记为自己的孩子。

1501年年末，一切准备就绪。卢克雷齐娅的嫁妆以30万达克特成交。10万达克特现金、纳佩城堡及另一座城堡、罗马涅的小领地，就连宝石与服装也价值7.5万达克特。此外，教会还赠予费拉拉诸多优惠与保障。埃尔科莱牢牢抓住了这些证书和契约。以卢克雷齐娅前两次婚姻来看，每次都不过3万达克特陪嫁金；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时获得了2.5万达克特的陪嫁金，可见这一次是多么大的破例。

终于，费拉拉派遣埃斯特家的四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及次子费兰特到罗马迎接新娘。

1502年1月6日，罗马难得下了一场雪。那天早上，卢克雷齐娅在她

住了20年的宫殿里吃了在罗马的最后一顿早餐。梳妆之后，她去了儿子罗德里戈的房间。孩子还在睡梦之中，她没有唤醒这个不得不留在罗马、留在教皇父亲身边的孩子，就出发前往梵蒂冈。

教皇早已在屋子里等候多时。卢克雷齐娅跪在父亲的面前，低头沉默不语。大家都出去了，屋内只留下他们两个。过了一会儿，切萨雷被唤了进去。

临行的时刻到了。埃斯特家的伊波利托及费兰特通知即将出发。卢克雷齐娅由切萨雷、伊波利托搀扶着双臂站起身来。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再一次回头看了看父亲。教皇用西班牙语说道："放心去吧。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来信。"然后，似乎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懂，他用意大利语又重复了一遍。

雪开始下了起来。一行人在雪中出发了。卢克雷齐娅在一边哥哥，一边伊波利托的护送下，驾马前行。教皇踏着碎步从一个窗口移到下一个窗口，目送她的离去。父亲与女儿此后再也没有相会。

当一行人终于走完了一天，快要到达当夜的住宿地时，切萨雷突然与妹妹告别。卢克雷齐娅一直以为哥哥会送自己到住宿地，这出乎意料的离别让她说不出话来。切萨雷与伊波利托道别后，径直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这时，卢克雷齐娅才第一次感到离开罗马的痛楚。

费拉拉

位于波河下游广袤土地上的费拉拉公国，冬季严寒，几乎每天傍晚，河面上蒸腾起的雾气就将这里笼罩得白茫茫一片。有时候，整个小镇从早到晚都被白雾包裹着。为了抵抗严冬的酷寒，本地人除了爱喝葡

萄酒外，还喜欢口味极重的菜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性格粗鲁，勇敢而又狡猾，所以只有冷静而老奸巨猾的统治者才能驯服他们。

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作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统治者既需要具备统率公国内麻烦的小领主的能力，又因费拉拉与大国威尼斯共和国边境接壤而需要具备机敏的外交手段。作为统治者，埃尔科莱公爵不仅拥有这些才能，并且他知道如果要十二分地发挥君主的能力，首先需要的就是金钱的力量。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外界称他为吝啬鬼。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年之中定好在某些日子亲自走访领地内的富翁及商人之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数目的捐赠。在费拉拉的年代记中就记录了诸如从谁家那里得到了20只鸡，又从谁家那里得到了奶酪与三桶橄榄油之类的事情。

可是，即便在背地里嘲笑埃尔科莱公爵吝啬，儿子们也都竭尽全力地依赖着父亲生活，没有一个人怀疑公爵的执政能力，费拉拉也在公爵的统治下秩序井然。公爵对费拉拉出身的萨伏那罗拉非常沉迷和崇拜，建造了大量的修道院。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宫廷中悠闲地让人演出了许多风流喜剧。就在临死前，他还让人演奏竖琴，边用手打着拍子边听着，看上去悠然自得。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继承了埃尔科莱这种性格的是长女伊莎贝拉及四子伊波利托。关于嫁给了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伊莎贝拉的事情，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写过了。不过，对于嫁入埃斯特家的卢克雷齐娅来说，伊莎贝拉是一个相当不好对付的小姑子。一个单字署名“僧”（Il Prete）的信使将罗马的消息、卢克雷齐娅前往费拉拉的旅途中的消息、结婚后的费拉拉宫廷里的消息，但凡与卢克雷齐娅有关的消息都悉数汇报给伊莎贝拉。

四子伊波利托是枢机主教，但更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修养良好，头脑冷静，在父亲去世后成了哥哥阿方索的得力助手。次子费兰特与庶出的三子朱利奥都是天生的美男子，但不过都是平庸的宫廷贵族，

此二人后来设计谋杀哥哥阿方索的阴谋也以失败告终。对既做不成坏事也做不了好事，也就是像他们这种什么都成就不了的人而言，文艺复兴可是非常严峻的时代。

成为卢克雷齐娅丈夫的阿方索，是当时贵族公子之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第一任妻子安娜·斯福尔扎早逝之后，他在21岁的夏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某日正午，一个赤身裸体的青年只在背上负了一把宝剑，穿行于费拉拉的中央广场上，把这里的人们吓得四处逃窜。这个赤裸的青年正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阿方索。当时整个广场就像被捅了马蜂窝一般骚乱不堪，而他镇定自若地穿过人群，后面还跟着几位正在吵吵嚷嚷的朋友。”阿方索与朋友打赌自己能赤身裸体地穿过中央广场，于是他赢了。可是得知这一消息的父亲埃尔科莱大发雷霆：“简直放肆！”听闻父亲暴怒，阿方索吓得不敢回城，直接逃往曼托瓦的姐姐家。在父亲怒火平息之前，他就悠然自得地住在姐姐家中。

阿方索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小提琴演奏得比专业人员还要内行。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所痴迷的是旅行与大炮。他在出发旅行的时候，总能上报最合适不过的理由与目的地，于是连布克哈特都表扬他为了打开眼界而出游。但实际上，那些往往都成为冒险的流浪之旅。当然，结果他确实大开了眼界，所以他非常讨厌像一个贵公子出行一般带着众多仆人。像他那样对自己强健的身躯充满了自信的人，有时觉得连护卫都是多余的，所以总是尽量少带人，基本就带两三个仆人，悄悄地出发。遇到不得已需要顾及体面而不得不携带众人一行的情况，他也只妥协在出费拉拉城之时装个样子，等到一离开领地，便马上将众人赶回去，依旧只带两三个人去旅行。这种性格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自己成为公爵时也没有改变。

讨厌宫廷，厌恶社交宴会，用餐时只喜欢一个人的他，在旅行途中立刻结交了许多朋友，都是些士兵、渔夫或者商人。曾经有一次，他本打算去西班牙的，却在港口结识了两个威尼斯海军船长，便神迷一般跟

着他们的排桨船，追逐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当时，威尼斯公国可是将亚得里亚海视为自己国家的海洋，为了保守秘密甚至不能制作海图。当他们得知同行之人正是费拉拉的国主时，顿感问题棘手。万幸的是，两个船长只是在监狱里关了一阵。

在不外出旅行的时候，阿方索会在手工制作坊里待上一整天。他一坐到车床前面就哪儿也不去，摆弄那些铁铜之器，但正是他的大炮后来成为费拉拉军事的骄傲。当他既不出游也不摆弄大炮时，便从宫廷的窗户眺望广场上的人群。为了看到更多的民众，他甚至不顾恶臭，将最热闹的鲜鱼市场特意开在了自己房间的窗下，常常边看窗下的风景边吃饭。

作为君主，他的才能足以让人信服。虽然他做事不像弟弟伊波利托那般喜欢讲排场，但他坚强的意志及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力，使得费拉拉公国变得强大起来。他首先认可的就是妻子的哥哥切萨雷。埃尔科莱公爵信奉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势力均衡政策，即列强共存路线，切萨雷·波吉亚则持反对意见，这使得他获得了阿方索的认同。切萨雷势力全盛期时，父亲埃尔科莱尚在位，所以两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切萨雷对阿方索准确的远见及现实主义赞不绝口，称其为“我们新的一代……”。认可阿方索人品的不仅是切萨雷，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也对他褒赏有加。再到后来，卡洛斯皇帝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尊重的人也只有他一个。

他对待卢克雷齐娅的态度，与之前她的历任丈夫也完全不同。在她的出嫁一行即将进入费拉拉城的前一天夜里，大家正在临睡前闲聊的时候，忽然听到窗下传来了马蹄声。从博洛尼亚起就陪伴在一旁的本蒂沃利奥[26]公爵从窗口往下一看，大叫了起来：“是阿方索公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卢克雷齐娅急忙用手捋了捋头发，整了整衣服。费兰特从门口飞奔出去时，阿方索已经下了马。他抱着弟弟的双臂说：“啊，你带我去新娘的那边吧。”费兰特还没来得及接话，二人就来到了卢克雷

齐娅的跟前。卢克雷齐娅灿烂而略带羞涩地微笑着，迎接她那位无视常规而突然来访的丈夫。阿方索一直盯着卢克雷齐娅的脸看着。然后，他似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做了初次见面的寒暄。在这场不拘常规的两个多小时的会面中，阿方索对卢克雷齐娅说："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她也答应了。他希望她明白，成为他妻子的，不是以波吉亚为背景的卢克雷齐娅，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卢克雷齐娅。从第一次起至此后20年的婚姻生活，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可是，像阿方索这种类型的男人很难让女人理解，就连卢克雷齐娅最终也都没有真正理解他。

婚礼过后的次日上午，卢克雷齐娅从甜蜜的倦怠中缓缓眯开睡眼，身旁的阿方索已经不见身影。客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早早起来的伊莎贝拉周旋于各国大使之间，完成了政治会谈。而此时，卢克雷齐娅仍在床上享受着懒觉，即便在费拉拉这种寒冷的空气中，她也没有改变罗马式甜美的懒觉习惯。拖拖拉拉了许久，已经快到晌午了，她才传话准备简单的早餐，在慵懒的心情中慢慢梳妆打扮起来。

婚礼后持续的狂欢会上，她尽情地享受着自己最喜欢的活动——舞会。舞会季一结束，她又回到了无聊的日子中。她的丈夫阿方索依旧埋头于旅行加大炮的生活，频繁出入于她的宫廷的只有女官们的心仪对象费兰特与朱利奥。她每天早上很迟才起床，慢悠悠地梳妆打扮之后，在自己的礼拜堂做弥撒，然后吃早餐。她会见几个客人，与女官们聊会儿天，或者挑几件新做的衣服。有时，她会朗读圣人的故事或西班牙的爱情诗歌，有时，她会从匣子里取出从前的信函看看，日子就这么打发过去了。她常常会想起与已死去的比谢列公爵的婚姻生活，那时候他常常陪在她的身边。

夏末，她产下了一个7个月大的死婴，那一阵子卢克雷齐娅的身体非常虚弱。某天傍晚，切萨雷忽然来到费拉拉城，他是来看望妹妹的，随从仅有13名骑士。他在热那亚与路易十二会面之后急行至费拉拉。躺

在病床上的卢克雷齐娅看到前来探望的哥哥，欣喜万分。那天夜里，埃斯特家的宫廷人只见到兄妹俩整夜在城中的回廊里走过来走过去，用瓦伦西亚方言交谈甚欢。次日清晨，切萨雷同来时一样，突然离去。留下来的卢克雷齐娅在哥哥走后再次躺倒在病床上。

那段时间，诗人埃尔科莱·斯特罗齐[27]慢慢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位天生残疾而不得不拄拐的费拉拉诗人，却有着贵族式的优雅。他立刻将卢克雷齐娅那颗单纯的心操纵自如。阿方索本就希望妻子的宫廷中有些文艺的氛围，所以对诗人的自由进入宽容大量。诗人会陪着卢克雷齐娅去修道院，有时还被委托去威尼斯挑选新做的衣服。后来，他甚至担当了她与恋人们之间的爱情传递桥梁。

在卢克雷齐娅的健康状况终于有所恢复的那年仲秋，从威尼斯来了一位美男子彼得罗·本博。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一个完美的宫廷人。在当时被誉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的贵公子”的本博迅速征服了卢克雷齐娅的沙龙。他在费拉拉结识了大量的朋友，有斯特罗齐、萨多莱托、阿廖斯托。在他们的烘托下，卢克雷齐娅的身边即刻洋溢出文艺的氛围。

彼得罗·本博

当笼罩在城市上空一整个冬天的白雾散去，4月的一个春日，斯特罗齐给卢克雷齐娅看他写给本博的一封信。信中充斥着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美貌极尽赞美之词。看到这封信的她，很喜欢那些将自己描绘得十分美丽的辞藻。第二次，在信函封口之前，她取了一张空白的信纸，亲自写上彼得罗·本博的名字。她只写了名字，就将信纸塞进了信封。身边的女官们看着她这种耍弄人的小把戏，都嗤嗤地笑了。不难想象，收到这封信的本博，心里一定会对卢克雷齐娅萌生愉快的亲近感。两个人的爱情由此产生了。

俨然已经成为每年的定例活动，阿方索又离开费拉拉外出旅行去了。他走后，卢克雷齐娅与本博之间的感情也急速升温。本博不在宫廷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信函频繁往复，而传达者往往就是斯特罗齐。卢克雷齐娅用西班牙语给本博写信，或者抄写西班牙的歌曲。其实最初的时候，那些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但是有一次本博在来信中写道："可爱的西班牙语的甘美，是托斯卡纳语中所没有的东西。你就用它，用你生下来就会的西班牙语书写吧。"于是，卢克雷齐娅就用西班牙语来写信了。对于出嫁至费拉拉以来总感到自己与稳健的埃斯特家风格格不入而丧失了自信、变得不安的她来说，用母语写信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恢复自信、找回自我的方式。如果本博在自己的身边，她觉得宴会也罢舞会也罢，甚至连服饰穿着都变得流畅自然起来。信函也从"我的彼得罗"起句，结尾只署名FF。FF是拉丁语"Firmitas Fidelis"，意为"矢志不渝"。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在这个夏天，在父亲的离世与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的浪潮中被冲走了。8月，伊波利托枢机主教带来的教皇父亲的死讯，让卢克雷齐娅坠入了绝望的深渊。身披孝服的她，蹲坐于黑幔笼罩的房间里，既不点灯，也不吃不喝不睡。

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彼得罗·本博立即赶了过来。当他看到茫然蹲坐在地上的卢克雷齐娅时，将刚踏进房门的脚又缩了回去，默不作声

地回去了。然后，他送来这么一封信：“现在你的哭泣，虽然是为父亲大人的离去而悲伤，但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想到今后在埃斯特家中的地位艰难。我这么写，也是提醒我们两个必须稍微注意一下了。可是，我们必须坚强地生存下去，尤其是你……”

对于醉心于彼特拉克的这位诗人来说，以往的卢克雷齐娅不外乎缪斯中的一人。然而现在，诗人想全身心地温暖她，鼓舞她，安慰她，不再是作为诗人得到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热爱的女人。

在旅行途中获知教皇死讯的阿方索，也急忙折回费拉拉。面对惊慌失措的妻子，他也什么都没做，但也没有像本博那样写信给卢克雷齐娅。相反，在以父亲埃尔科莱为首的世间对波吉亚——现在已成为所有人的敌人的、“恶”的代名词——冷眼相待之时，在路易十二说“卢克雷齐娅对阿方索公爵并不合适”之时，他不允许有人动妻子一根手指。这就是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情。

可是，似乎是为了忘记父亲去世的悲伤，到了秋天时分，卢克雷齐娅对于本博的爱恋已经变得毫不顾忌四周的眼光了。她让人用自己的黑色天鹅绒制作了西班牙式的豪华披风赠送给本博，据说是为了能够从城堡的窗户里早一点儿辨识出前来的他。诸如“你的爱是那印在我手背上的吻，甜蜜得快要让我窒息……”“我的心为了爱的答复，热烈地渴望吻上你的嘴唇”“我手背上的你的吻，比以往任何一个和我接过吻的男子都要温柔，都要甜蜜”之类的信函连续不断地送给本博。

这样的举动对于现在已经不再惧怕波吉亚这个名字的人们来说，显然成为一段明目张胆的绯闻。于是，阿方索借口外出狩猎，前往本博居住的费拉拉的郊外。相见之后，不知二者之间究竟进行了怎样的交谈，总之，三天后，本博离开了费拉拉前往威尼斯。

恋情结束了。第二年，本博出版了一本咏叹至高无上的爱的诗集《阿索拉的人们》[28]，献给了卢克雷齐娅。

1503年夏天

因为波吉亚家族的没落，卢克雷齐娅在费拉拉被逼得狂乱不已。而我们正是通过贵族们的悲惨结局才看到了古典悲剧的本质，并且这些不幸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突发的。

1503年夏天，当最后一个地区乌尔比诺被征服后，罗马涅地区完全处于切萨雷的统治之下。他也获得了罗马涅公爵的称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伊鲁·摩洛的手下在米兰的宫廷生活了17年，既不拘泥于曼托瓦也不逗留于威尼斯，每天都在佛罗伦萨研究水力学的达·芬奇——这位众人争相聘请的博学之人——主动请缨侍从切萨雷。切萨雷向达·芬奇颁发了空白委任状，任命他为技术总监，称他为“我的阿基米德”，并允许他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是切萨雷27岁，达·芬奇50岁时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与切萨雷会面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切萨雷对佛罗伦萨非常苛刻，又秘密地窥视着整个托斯卡纳，因此马基雅维利与他的交涉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就从“这个拥有完美才能的男子”的身上看到了《君主论》的具象体，一个对于意大利的悲剧——“能够将刀刃从伤口处拔出”的人，也就是能够消灭今日分裂状态之根源的人。马基雅维利认为，“既为民众所畏惧又能为民众所敬仰，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的”，除了切萨雷之外别无他人。由此诞生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理想的统治者必须具备狐狸（冷静的现实主义）与狮子（大胆的魄力）两个特质。

“对我而言，只有敌人或者朋友，没有中立。”切萨雷对马基雅维利如是说。切萨雷的未来，无论在谁的眼里看来都是辉煌的。他轻而易举

地镇压了雇佣兵队长等人的暴动，还是运用了艺术“完美的欺骗”的手法（保罗·焦维奥），最后当然是杀了他们。他事先通过个别谈判以破坏其团结，然后将全员招待于一堂全部杀掉。他无情地将敌人斩尽杀绝。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卡在教会咽喉的骨头”（奎恰迪尼）的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也被他彻底打进冷宫。

切萨雷行动向来敏捷而果断。因为这样的他，最后整个意大利被搅得晕头转向。一日，他为了见路易十二而来到热那亚。次日，他为看望妹妹去了费拉拉。而后一日，他又去巡视罗马涅地区的伊莫拉与乌尔比诺。接着，为了与法国国王谈判，他马上前往佛罗伦萨。就在那一期间，他还愉快地去打猎。然后在接下来的8天里，他都去向不明，服侍左右的人宣称他生病了，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各国的情报官不得不常常向他们的君主写信道歉，因为他们无法追踪到切萨雷的行踪。可是这个时候，他为了与教皇秘密会见，已经到了罗马。“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他就这么在自己军队的大旗上写出了他大胆的魄力。拉丁语的“恺撒”用意大利语来读的话，就是“切萨雷”。切萨雷的宏愿眼看就要实现了。

可是，悲剧突然间降临了。那个酷热的夏天没有一丝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水开始腐臭，疟疾肆虐了在酷暑中煎熬的罗马城。当时的记录中写道：所有枢机主教的宫殿都变成了医院。能够死在屋檐下的人算是命好的，很多人死在道路的石阶上或者连水都喷不出的喷泉旁边。没有办法处理遗体，只能任由尸体遍地。而当尸体腐烂后散发出的臭气开始浸染城中时，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们到处恐惧地喊着：黑死病[29]、黑死病。但其实那不是黑死病，其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恶性疟疾。

先是佛罗伦萨的大使死了。紧接着，教皇的外甥乔凡尼·波吉亚枢机主教也死了。得知外甥的死讯，已经72岁的教皇为自己越来越衰弱的

肉体深感疲惫。凡是能够离开罗马的人全都抛弃了罗马，枢机主教们也逃向自己在郊外的别墅，各国的大使与情报官们分别向自己的君主请求离开罗马。

教皇与切萨雷都意识到离开罗马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切萨雷，他准备前往罗马涅。可是为了纪念8月11日教皇即位11周年，二人都必须留在罗马。出于对他们这一情况的考虑，8月4日，此前担任教皇秘书官的现任枢机主教阿德里亚诺·达·科奈特在他郊外的别墅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午餐会。

8天后，8月12日，教皇发高烧、呕吐，病倒了。次日，切萨雷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躺在了病床上。

人们都说，这是波吉亚家族没落的开端。甚至有传言说，原本用来杀害枢机主教的毒葡萄酒被教皇直接误饮了，切萨雷则兑水喝了毒葡萄酒。威尼斯传来了消息："8天前出席午餐会的其他枢机主教们也都倒下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奎恰迪尼、保罗·焦维奥、萨努多以及后来的雅各·布克哈特都相信这个毒杀的传言。

但是，当时的记录官与年代传记作者们没有留下一个与毒杀有关的字眼儿。"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是黑死病的疾病而死亡。教皇与切萨雷公爵也倒在了病床上，有时候间隔了一段时间后突然高烧与呕吐，这与其他病人的症状完全相同。"卡塔奈、科斯塔比利、比卡尔[30]等人留下的记录中写道：Febbre terzana（发烧持续约三天，当时的用语称"疟疾"）。后代的历史学家帕斯特、路奇奥等人都站在反对毒杀说的立场。因为要杀死一个72岁的老人根本不用花费近两周的时间，而且午餐会上同席的枢机主教们之中最年长的几位都没有死。无论如何推测，在所有的记载中都显示他们两个人完全是恶性疟疾的症状。虽然毒杀说能让波吉亚家族的悲剧更具戏剧性，可如果对此认真调查的话，可以知道其真实性的证据是非常薄弱的。

8月12日倒下的教皇与晚一天倒下的切萨雷，时而发热时而打寒战。8月14日，医师们给教皇进行放血治疗。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放血被视为唯一的治疗方法。放血后的教皇依旧高烧不退，他筋疲力尽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而衰弱得像死人一样的切萨雷同样被医师团团围住，灼热的高烧反反复复地折磨着他，令他恶心得厉害；而每次发热带来的头疼更让切萨雷痛苦得满地打滚。大家都认为他的病情比教皇父亲还要严重。

就算在反反复复的发烧期间，切萨雷也很担心教皇父亲的病势。他心里念叨着：趁还来得及一定要救活我，奥尔西尼、科隆纳的复仇很危险，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法国都不能信任。

枢机主教们各自回家，静观情势变化。而此时各国的情报官们笔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这二人时时变化的病情，信使们带着这些信函快马加鞭，马蹄扬起的白烟消散在意大利国中。真是不眠之夜啊。

然而，比起大家都认为病情更严重的切萨雷，年迈的教皇仿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发病后的第六天，8月18日的早上，他希望在病房里举行弥撒。弥撒过后，教皇进行了忏悔，拜领了圣体。晚钟时分，众人为濒死的他举行了涂香油的圣礼，整个病房被乌云般的沉默笼罩着。当夜，亚历山大就死了，因为他那颗衰老的心脏再也不能承受更高的病热了。

教皇之死立刻通知了楼上房间里的切萨雷。可是，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他，连从病床上起身的力气都没有。马基雅维利后来写道：“他对我说，‘父亲死时，我必须能接手一切事务。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所有的事情，也制定好了对策。可是我没有想到，父亲死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垂死边缘’。”如今，父亲撑到自己恢复健康的最后期望也破灭了。一切都结束了。

替代苦苦挣扎于重病之中的主人守护梵蒂冈的唐·米凯洛托，此刻他那让敌人都羡慕不已的忠诚充分发挥了出来。首先最重要的是保护梵蒂冈不受暴徒的掠夺，于是他下令关闭梵蒂冈与圣天使堡的所有大门，然后将梵蒂冈内所有贵重物品都搬到切萨雷病房的临近房间。以史为鉴，此刻即便是侍从们也不能信任。教皇的病房里除了床上横躺着的遗体外几乎空空如也，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好后，他按照切萨雷的命令第一次对外宣布了教皇的死讯。

另一方面，教皇的遗体由教会的礼仪官也是冷静的记录者、斯特拉斯堡出生的德国人比卡尔转移至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给遗体洗净穿上教皇的礼服，安放于插了两根蜡烛的铺着紫色锦缎的桌子上。紧闭着的房间闷热极了，纹丝不动的烛火成了唯一的守灵者。

次日清晨，遗体被运往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枢机主教没有一人出席。葬礼上甚至连祈祷所用的《圣经》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圣歌队也急急忙忙地唱完歌了事。卫士们还在为争夺火炬而相互高声谩骂着，出席的僧侣们都害怕地逃进了圣具室。

在接受民众的最后告别时，安放于窗户对面的遗体在炎热的天气里渐渐腐烂，变得乌黑的尸体开始肿胀并散发着恶臭。在教堂中排着队的民众也害怕得浑身战栗。可是在看热闹的从众心理催使下，毛骨悚然也变成了麻木，络绎不绝的队伍一直排到了下午。尽管如此，教皇的遗体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完全变得不忍目睹，被人盖上了布。

将近夜半，几把零星燃着的火炬组成了寂寞的送葬队，朝梵蒂冈附近的墓地走去。除了一个主教及其辅祭之外，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随从。下葬的时间到了，可教皇那肿胀的尸体却怎么也装不进预备好的棺材，最后还是两个身强力壮的掘墓人用脚好不容易将他踹进了棺材。而每次要将尸体的一部分塞进棺材时，尸体都会弹起，这个残酷的场景在火炬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惊悚。棺材的盖子终于盖上了，落葬结束。送葬者熄灭了火炬，在沉默中匆忙离去。

在短短的15天之前，切萨雷还正在荣光之中逐渐地实现他的宏愿，但现在重病的他却只能躺在床上，连站都站不起来。他感到世界在崩塌。虽然倚靠父亲的地位背景和凭借自己天才般的政治头脑与军事能力筑造起波吉亚家族这座势力宏大的建筑，但是其基石是薄弱的，势力也尚未成熟。不管怎么说，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教皇突然离世，与此同时，自己也身患重病，这些不幸让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首先发动暴动的是乌尔比诺和佩鲁贾。不过，罗马涅地区是绝对忠诚于切萨雷的，这个地方即便在后来切萨雷处于最恶劣的境遇之时也没有叛变。而且切萨雷尚肩负着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官衔，这是让敌人无法忽略的。

可是，枢机主教团必须赶紧选举出新教皇。切萨雷想要选出对其有利的新教皇，但他的身体状况也只允许他想想而已。而且，作为军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司令官，如果继续在罗马滞留，都违反了选举会议的**传统**。于是，枢机主教团以**传统**为由要求切萨雷离开罗马，切萨雷坦然接受了。但这是他犯的第一个失误，因为留在罗马虽不至于说对波吉亚家族多有利，但至少可以努力选出不持有敌意的任期较长的新教皇。而且当时他的军队已经行进到距离罗马100公里开外的奥尔维耶托。高烧不仅烧坏了他的身体，还让他敏锐的头脑与冷静的判断力也变得迟钝了。

9月2日，切萨雷离开罗马前往纳佩城堡。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大使们一直送他到纳佩城堡的墙外。他躺在一顶由8个仆人抬着的拉上了大红色窗幔的轿子里，消瘦得判若两人，脚已经浮肿了，仍处在头疼欲裂的痛苦之中。轿子后面跟着的是头一回没有驮着主人切萨雷的那匹骏马，马背上面用镶嵌了公爵徽章的黑色天鹅绒罩着。

9月16日，秘密选举会议在罗马举行。在枢机主教中，法国派也还是推举了时任鲁昂大主教和深得路易十二信任的昂布瓦斯（Amboise）

枢机主教。昂布瓦斯是由亚历山大六世升级为枢机主教的，所以对切萨雷来说是有利情况。西班牙派则推举其他主教，而威尼斯派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可惜他们不知道后来因此招来了祸患。就在三者互相牵制的格局中，9月22日，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31]被选举为庇护三世新教皇。以80岁的高龄当选新教皇的他早已是久卧病床之人，谁都明白这只是过渡时期的选举。对波吉亚深感同情的庇护三世，对他那形同枯槁的身体委以教皇之位确实过重了，即位仅26天便去世了。

切萨雷从纳佩返回罗马，先是滞留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的宫殿。之后，为了避开满大街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奥尔西尼一党，他又在圣天使堡待了一阵。切萨雷为下一次秘密选举会议赌上了自己的命运。他掌握了至今忠实于波吉亚名字的西班牙人枢机主教12票，相当于总票数37票的1/3。

10月29日，他前往梵蒂冈，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会面。他开出的条件是：波吉亚的票数将在秘密选举会议上投给罗韦尔，罗韦尔则确保他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及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罗韦尔答应了这个条件。

切萨雷一直凝视着罗韦尔的眼睛。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很多人背叛。并且就政治而言，情感永远不会是真实的居所，它只存在于有效性之中。这一点他完全清楚。可是，这两个人之间，在迄今为止的行动中都有一种互敬的感情。倘若将这两个人伟大的而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合而为一的话，意大利之后的悲剧或许是能够避免的。可是，就算现在罗韦尔对切萨雷表露的是真实的态度，而且也在谈论着切萨雷的女儿与自己外甥的婚事，但他从未忘记过这11年来波吉亚家族让他尝尽的所有苦头，从未停止过对波吉亚家族的憎恨。信任罗韦尔是切萨雷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失误。他赌输了，在政治上彻底落败了。数日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即位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尤利乌斯二世

切萨雷不得不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尤利乌斯二世对他的态度也在一天一天改变，甚至还公开宣称罗马涅应当属于教会。可是，这次的失误对他来说过于大了些。他的举止变得就连旁观者都觉得“完全失去了从前的公爵的样子”（马基雅维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他向尤利乌斯二世申请前往罗马涅的通行证，想借此从奥斯蒂亚经海路到达利沃诺，在那里，凭靠对自己忠诚的罗马涅军队东山再起。那个时代的男子，一般习惯于重新来过。只是，对现在的切萨雷来说已经欠缺了一些东西。在奥斯蒂亚准备乘船的那一瞬间，他被尤利乌斯二世的追捕者逮捕。被送往罗马的切萨雷，在梵蒂冈中被称为“波吉亚寓所”的曾经是自己家的房间里受到了客人一般的接待。可这其实是监禁。迄今为止，从来与他无缘的绝望、苦恼、泪水一下子蜂拥而来。超人的精神开始解体。

那个时候，切萨雷听说他的家臣唐·米凯洛托、塔代奥·德拉·沃尔佩[32]被佛罗伦萨军队俘虏，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依旧保持忠诚，他们都认为比起投降于佛罗伦萨军队，不如选择俘虏之身。切萨雷也听说罗马涅的民心依旧在自己这一边，可是如今被捕的状态加之法国路易十二对自己的离弃，令他感到万念俱灰。于是，他接受了教皇提出的交换条件：放弃罗马涅军队则恢复其自由之身。就此，他也放弃了对意大利所有的宏图展望。

翌年，1504年2月，恢复自由的切萨雷离开了梵蒂冈。他将罗马这个对他来说记录了荣誉与耻辱的首都扔在身后，去那不勒斯投靠波吉亚家族以前的亲密友人——西班牙王国的那不勒斯总督贡萨洛·德·科尔多瓦[33]。可是，万万没想到前往那不勒斯成为他的第三个也是最终的失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以其幕后指使谋杀甘迪亚公爵胡安·波吉亚的罪名，命令将切萨雷送还西班牙。以勇将著称的总督科尔多瓦重情重义，对切萨雷也尊敬不已，尽管心中苦苦挣扎，可他没法违背国王的命令。

5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被科尔多瓦请去。科尔多瓦提议说，街上有一些可疑之士徘徊，所以还是在他的城堡里比较安全。切萨雷相信了他。两个朋友一边共进晚餐，一边愉快地交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科尔多瓦将切萨雷送到了寝室，又在那里聊了会儿天。切萨雷对贡萨洛·德·科尔多瓦说自己想要休息了，让他也回去休息。可是朋友摇了摇头说："因为我接到命令，要我待在你的身边，不许睡觉。"切萨雷面色惨白，大叫一声："圣母马利亚，我被出卖了！"

8月20日，一艘扬起了白色船帆的帆船在阳光的沐浴下，从那不勒斯港口朝西班牙起航。

青春之死

身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十分担忧哥哥的处境。她给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当权者写了信，苦苦哀求释放切萨雷，向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请求将切萨雷送至费拉拉。可是，教皇一边看着罗马的费拉拉大使带来的她的信，一边说"埃斯特家并没有这个打算吧"，并不将信函当作正事。那个时候，费拉拉的国主埃尔科莱正处于垂死边缘，埃斯特家也不能无视教皇的意愿而接受卢克雷齐娅的请求。路易十二给她送来了一封亲切礼貌的回信，但是，已经放弃了切萨雷的法国国王的回信不过是对女性的外交辞令。同时，教皇在写给埃尔科莱的信函中明确表示，根本不会考虑将切萨雷安置于法国的领地内。他在给埃尔科莱的信中甚至还这么写道："不用管那个和尚的私生子了。"卢克雷齐娅请求至少让自己领养失去了监护人的年幼的孩子们，但最终也只有公文书上成为切萨雷孩子的因凡特·罗曼诺被允许领养，也不是在费拉拉，而是由附近的卡尔皮（Carpi）的一个小领主抚养。与比谢列公爵生育的孩子罗德里戈则被送往巴里的伊莎贝拉·阿拉戈纳[34]的宫廷。但是，对于尚未与卢克雷齐

娅获得后嗣的阿方索来说，这也不得不说是合理的处置。

卢克雷齐娅这样的担忧与恳求，结果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理睬。人们都觉得这是年轻而不懂事的女孩子的行为。事实也如此，她所做的事情都是感性的，缺乏慎重考虑，马上就要24岁的她却依旧只是个“永远的少女”。

在这段时间，温柔地安慰、支撑卢克雷齐娅的，是她的小姑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丈夫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作为曼托瓦国主的弗朗切斯科并非傻瓜，他非常清楚卢克雷齐娅的所作所为都是幼稚而徒劳的，可是生性善良的他看到这个美丽而无依无靠的女人那么拼命地为哥哥想办法时，内心被打动了。而且卢克雷齐娅也一直都需要在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个让她安心倚靠的男人，一个可以温柔地包容自己的男人。

弗朗切斯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人，但是他的身上具有现实的男人的魅力。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浅黑色的精壮肌肉，微微睁开的眼睛散发出温柔的目光，他那个扁平鼻子反而让人觉得亲切。他骑马时的身姿和那匹曼托瓦产的马一样挺拔，甚至比雕塑还要美丽，沉稳而大气地渐渐驰去。他爱饮葡萄酒，像爱着女人一般。

两个感性的人亲近起来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曼托瓦距离费拉拉很近，两人又是亲戚关系，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是，就这样，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这次帮助二人传递书信的联络人是诗人斯特罗齐，书信中使用的全是假名。弗朗切斯科使用的是居伊，卢克雷齐娅使用的是巴尔芭拉，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是卡米洛，其弟伊波利托枢机主教是提古利诺，弗朗切斯科的妻子伊莎贝拉是蕾娜，而斯特罗齐是吉罗。信函的传递路线是：从卢克雷齐娅传送给斯特罗齐，斯特罗齐转给居住于曼托瓦的他的弟弟，然后由弟弟转给能够自由进出曼托瓦宫廷的亲戚乌贝尔特，再递到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的手上。从弗朗切斯科发出的信函则是通过相反的路径到达卢克雷齐娅的手上。信函大多都是关于切萨雷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信函往来：“卡米洛明天早上出发去法

国。”1506年的秋天，在波河的河畔，两人相会了，弗朗切斯科甚至将卢克雷齐娅带回了曼托瓦城。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私底下议论着两人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都以谈论切萨雷为名而毫不在意。至于阿方索，他不是那种嫉妒心外露的性格；伊莎贝拉也出于自尊心对此不闻不问，却只是蔑视二人。

弗朗切斯科听了卢克雷齐娅的恳求之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教皇及西班牙国王送去了请求释放切萨雷的信，可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复。卢克雷齐娅每天都心事重重的，直到有一天费拉拉终于收到了一条让她雀跃的消息。

1506年10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成功地从关押地、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城堡中出逃。6年前，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切萨雷将发疯的雄牛一头一头地击倒，最后仅仅用刀背就击倒了第六头牛，使得罗马群众为之狂热。当初年轻的体力好像在他的身上又复苏了。逃亡的一个多月后，避开了追捕者而消失了踪迹的他，在12月3日，出现在妻子的娘家纳瓦拉的首都潘普洛纳。卢克雷齐娅得到的消息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切萨雷获得自由的这个消息，不仅卢克雷齐娅，整个欧洲都为之欢呼。人们传言，以那不勒斯为立足点瞄准意大利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准备将军队交给切萨雷管理，苦于应对威尼斯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任命切萨雷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等等。但是教皇、西班牙国王和法国的路易十二根本没有将一只鹰招揽到自己怀里的意思。切萨雷最后留在了纳瓦拉，就这一点已经让卢克雷齐娅高兴万分了，她立刻写了一封喜悦的信函汇报给弗朗切斯科，并在修道院里做了感谢上帝的弥撒。

转年到了1507年，卢克雷齐娅也还是过着平静的日子。4月，阿方索将国政托付给她，自己一如既往地旅行去了。那段时间的某一天下午，在城堡中的一个房间内，人们围着卢克雷齐娅，热闹而活跃地杂谈

着。就在那时，城门之前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精疲力竭的西班牙人。他下了马，对卫兵简单地通报：“切萨雷·波吉亚公爵去世了。”

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给了卢克雷齐娅，她一动不动地僵在人们的视线之中。等她开口时，就激动地迸出诅咒上帝的话来。“当我越是试图取悦上帝，他对我的考验就越发严酷！我真是要更加感谢上帝吧，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这般考验我。”[35]

切萨雷的那个西班牙仆人被传唤了进来，由他说明了情况。切萨雷在纳瓦拉与表哥等人与当地的一伙豪族斗了起来。不知怎的，切萨雷脱离了伙伴，只自己一个人被敌人团团围住。午夜过后，他最终负伤而死。敌人将他的武器及铠甲都剥了下来，将赤裸的他丢在黎明时分的冰冷地面上便逃走了。同伴发现切萨雷的尸体时，已经是早上第一束阳光照射四周，天边泛白之际。

卢克雷齐娅默默地听着，一直保持着微微低头的姿势。人们看着那样的她，都十分佩服她坚强的意志。但实际上，卢克雷齐娅的苦闷与绝望只是被封在内心深处，不再表露在外而已。数日后，埃斯特家的人也罢，宫廷里的人也罢，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哭泣。她与往常一样生活，白天也处理丈夫留下的国政事务。可是，到了晚上，附近房间的女官们听到她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用西班牙语的瓦伦提亚方言自言自语。

12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卢克雷齐娅39岁了，嫁至埃斯特家也快满18年。生育的孩子们，除了三个男孩儿夭折之外，还有四个健康的孩子。长子埃尔科莱二世后来与法国国王的女儿结了婚，次子伊波利托也成为枢机主教，建造了著名的埃斯特庄园[36]，现今依旧保留于罗马郊外的蒂沃利[37]，里面拥有众多美丽的喷水池。

可是，波吉亚家族却非常凄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及哥哥切萨雷去

世之后，1512年，卢克雷齐娅与比谢列公爵所生育的孩子、小公爵罗德里戈在其收养地巴里去世，年仅13岁。卢克雷齐娅出嫁到费拉拉的那天，他尚是在襁褓中的婴儿。自从那天她与睡梦中的儿子告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每年她都会把比上一年稍大一点儿的孩子的衣服送往巴里，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4年后，她最小的弟弟杰弗里，一个一直躲在背后的乡村贵族，在那不勒斯走完了一生。第二年，母亲瓦诺莎也逝于罗马。剩下的只有已经死去的哥哥胡安留在西班牙的家人，以及在法国长大的切萨雷的女儿，此外就只有卢克雷齐娅领养到的费拉拉的庶子们。其中没有一个人遗传了光辉的父亲或哥哥的风貌。

切萨雷·波吉亚，可以说，这个哥哥给卢克雷齐娅带来了几乎所有的不幸。可是，她非但没有因此怨恨，反而比谁都更热爱，更依赖哥哥。在这个哥哥去世后，她似乎第一次获得了平和的时间。这个时期，费拉拉虽然与罗马之间进行着苦战，但是作为国主夫人，她什么也没做，也不要做任何事，只要躲在丈夫阿方索这棵大树的背后就行。因为与两个前夫相比，阿方索具有相当出众的气量与对妻子的爱。卢克雷齐娅也不再寻求情人，在这12年间，她接连不断地生了5个孩子。

然而，尽管是悲剧人生，但是可以说，卢克雷齐娅真正意味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间吧。她是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亡的，在与波吉亚家的荣光及其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1519年年初，这一年，卢克雷齐娅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正处于第十次孕期。在曼托瓦，长期身患“法国病”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也处于濒死边缘。到了3月，昔日卢克雷齐娅信中所写的那个“我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秘密的人”的男人也进了黄土。

6月14日，她早产了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这个看起来非常虚弱的早

产儿，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能活得长久。她立刻决定进行洗礼。在昏暗的灯光下，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被取名为伊莎贝拉·玛丽亚。

可是，作为母亲的卢克雷齐娅却躺下不动了。到了次日，她依旧头疼欲裂，发热厉害。她那美丽的长长的金发因为碍事，在她倒在病床后第一次被剪短了。她双手僵硬，头往后仰，痛苦的脸上已失去了血色。不一会儿，她的鼻子里喷出了血。这个状态间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次，持续了一个星期，周围人都能看出她苦苦挣扎的样子。对于医师的忠告，不管什么她都接受，药也勉强地喝了下去。阿方索一直陪伴在这样的妻子身边，但他没有握住她的手给她力量，只是在病房中焦虑地来回走动。无论是谁前来商谈政务，都被他怒骂赶走。

6月22日，在任何人的眼中看来已经无可救药的卢克雷齐娅喝下一碗浓汤后，说要给教皇写信。深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她，现在的担心是教廷与埃斯特家之间反复加剧的不和关系。

在罗马，费拉拉大使与利奥十世会面了。他说道："教皇圣座[38]，公爵夫人的健康情况非常糟糕，对于这封信不能亲笔书写，她表示非常抱歉。"教皇的心中也许浮现出昔日在比萨大学里曾是同窗的切萨雷以及后来波吉亚家的荣耀与没落。他开始阅读卢克雷齐娅的信。

"自从两个月前我度过了严重的妊娠期后，在神明的帮助下，14日的黎明，我得到了一个女儿。我祈祷着，从此我的健康就能恢复了吧。可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恶化了。我们的创造者已经赐给我女儿这个礼物，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几个小时后大概就远离尘世了吧。

"忏悔与圣餐都已经结束了。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便罪孽深重也想向教皇圣座请求。为了赐予我贫瘠的心灵以精神的宝物，请圣座以慈悲之心，在圣座神圣祝福的同时，也为我向神明祈祷调停和解。然后，对于不得不留下来的我的丈夫与孩子们，请在赐予神明保佑的同

时，也赐予圣座宽广的慈爱……”

看完这封信，教皇默默地画了个十字，做了祝福。

两天后，卢克雷齐娅显得十分安详，但是已经没有了意识。当天夜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后去世了。

尽管从临终的卢克雷齐娅那里收到如此情深意长的为了丈夫与孩子们的请求，但不到两年，教皇就与费拉拉宣战了。她所做的事情，再次以徒劳告终。

---

[1] “波吉亚寓所”（Borgia Apartment）是梵蒂冈宗座宫殿内的一组房间。

[2] 平托瑞丘（Pinturicchi，1454——151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

[3] 杰弗里·波吉亚（Gioffre Borgia，1482——152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人、政治家。

[4] 桑夏（Sancia of Aragon，1478——1506），出生于那不勒斯的北部地区，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庶出女儿，据说是一位黑发的性感美女。

[5] 胡安·波吉亚（Juan Borja，1476——1497），西班牙的第二任甘迪亚公爵。

[6] 比谢列公爵（1481——1500），阿方索·阿拉贡。他是那不勒斯前任君主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和现任君主的侄子，杰弗里美丽的妻子桑夏是他一母同胞的妹妹。

[7] 玛丽亚·贝隆奇（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著名历史作家。

[8] 奥尔西尼（Orsini），意大利贵族家庭，是中世纪意大利和罗马复兴中最有影响力的王侯家庭之一。

[9] 科隆纳（Colonna），是意大利非常古老及显赫的贵族家庭，可追溯到12世纪，其原籍在罗马附近的科隆纳镇，家族姓氏由此而来，历史上曾出过一个教皇和许多枢机主教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科隆纳家族与奥尔西尼家族的世代仇隙严重影响着罗马的政局，直到1511年罗马教皇颁布训令，两大家族的对立才停止。

[10]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Guiliano della Rovere），即尤利乌斯二世。

[11] 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Rodrigo Borgia，1431——150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间：1492——1503），加里斯都三世的侄子。

[12]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2世纪时是西班牙边境的一个伯爵领地，现为西班牙自治区，首府是巴塞罗那。

[13] 卡拉法（Carafa）家族是那不勒斯的名门贵族，后来分支移居罗马。

[14] 奥斯蒂亚（Ostia），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罗马第十区，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

[15] 在秘密选举会议进行时专门将窗户封闭起来的砖墙，在选举结果产生后则被推倒。

[16] 胡安·洛佩斯（Juan López，1455？——1501），教廷掌玺院长（在位时间：1492——1496），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96——1501，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任命）。

[17] 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458——1464）。1459年，他召集欧洲诸国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提出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十字军东征。

[18] 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1474——1524)，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爱妾之一，被称为“美丽的朱莉娅”（Giulia la bella）。

[19] 潘普洛纳（Pamplona），西班牙东北部城市，10世纪到16世纪初期的纳瓦拉王国首都，现为纳瓦拉大区首府。

[20] 白色婚姻（nozze bianca），指无两性关系的婚姻。

[21] 桑夏是阿方索二世与情妇生下的女儿。

[22]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后人称其为查理曼。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引入了欧洲文明，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

[23] 语出自圣纳扎罗（Iacopo Sannazzaro，1456——153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那不勒斯，仕阿方索王家，擅长拉丁诗文，创作有《渔夫之歌》《维吉尔的诞生》等作品。

[24] 阿皮亚古道（Via Appia），现存罗马街道中最有名的一条，又称为“街道的女王”，公元前312年开始修建。

[25] 唐·米凯洛托（Don Michelotto，？——1508），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是切萨雷的朋友，他最信任的亲信。

[26] 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教皇代理，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博洛尼亚实际的统治者家族，13世纪时显露头角，在桑特（1445——1462）及乔安尼二世（1462——1506）时最为繁荣。1506年，他受尤利乌斯二世所率教皇军队攻击，而被驱逐。

[27] 埃尔科莱·斯特罗齐（Ercole Strozzi，1473——1508），出生于费拉拉，是佛罗伦萨的斯特罗齐家的分支，费拉拉宫廷诗人，其作品受到高度评价。

[28] 阿索拉（Asola）是威尼斯领地的城市。《阿索拉的人们》（Asolini）被认为是向卢克雷齐娅咏叹爱情的诗集。1503年左右，卢克雷齐娅向彼得罗赠送了一束头发，现收藏于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Ambrosiana）美术馆。

[29] 即鼠疫。

[30] 约翰内斯·比卡尔（Johannes Burckard，1445——1506），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出生的德国人，是主教、教廷书记长、教廷礼部官员。他的日记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但是，因为他过分的想象力而描写很多男女乱交关系与杀人等绯闻，可信度很低。他对波吉亚家的描写相当恶劣。

[31] 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Nanni Todeschini Piccolomini，1439——1503），庇护三世（在位时间：1503年9月22日——10月18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在佩鲁贾学习法学，22岁时任锡耶纳大主教、枢机主教。皮科洛米尼家是13世纪时兴起的锡耶纳的贵族，经营贸易与银行业。文艺复兴时期出了庇护二世与庇护三世两个教皇。

[32] 塔代奥·德拉·沃尔佩（Taddeo della Volpe，1474——1534），出生于伊莫拉。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文武双全的人物。

[33]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1453——1515），西班牙国王的将军。据说他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伟人形象的原型。

[34] 伊莎贝拉·阿拉戈纳（Isabella d’ Aragona，1470——1524），米兰公爵吉安·斯福尔扎的王妃，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与伊波利塔·玛丽亚·斯福尔扎的长女。他被认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原型，拉斐尔也为她作过肖像画。

[35] 卢克雷齐娅说这番话是有背景的。根据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曾钰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的说明，当时她在流产之后，按照萨伏那罗拉的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祈祷仪式，为自己的许多罪孽寻求宽恕。

[36] 埃斯特庄园（Villa d’ Este），位于意大利蒂沃利的埃斯特家的庄园，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占地4.5公顷的巨大的园内，建造了小提琴喷水池、多产的女神、百喷水池等500多处喷水池，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庭院，被称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喷水庭院。

[37] 蒂沃利（Tivoli），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拉齐奥大区罗马县。自古罗马时代起，它就是著名的疗养地，建有哈德良皇帝与众多贵族的庄园。

[38] 原文使用的是“猊下”，指代高僧、硕学、宗教神职者的首领。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La virago d’Italia”

（意大利的女杰）

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藏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家谱

穆佐·阿滕多洛·斯福尔扎（1369—1424）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比安卡·玛丽亚·维斯孔蒂（1423—1468）
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
卢多维科·（伊鲁·摩洛）（从侄子手中夺取公国）
博纳·迪·萨沃亚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1444—1476）（1466年成为米兰公爵）
吉安·加莱亚佐（被叔父伊鲁·摩洛抢走公国）
安娜
阿方索·德·埃斯特
比安卡
马克西米利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雅各布·费奥
卡特丽娜（1463—1509）
乔凡尼·德·美第奇
奥托维阿诺
切萨雷
科西莫·德·美第奇（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
乔凡尼（1498—1526）（黑队的乔凡尼）

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为故土而战，

无人相助，众叛亲离。

我远方勇敢的王啊！

你何时才能

全副武装，策马驰骋到我身旁。

那一声“法国”的呐喊，

震惊全世界。

意大利势力，

轰然扫地。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与故城命运相连，

与粮秣大炮金币，还有

众多兵士，

同生共死。

除我之外，又有何人？

能掌管这座城塞，

对着圣油[1]式起誓。

除我之外，无人能信！

因为，谁想尝

那背叛的滋味。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如果那个教皇儿子——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

在这之后也想留在弗利，

那他最好改换职业。

当个泥瓦匠甚好，

随时能修补城市。

因为在我狂怒之时，

可能会彻底地

破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选自16世纪初，罗马涅地方的小曲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

外城墙已经被攻破了。敌兵越过外城墙与内侧的城塞之间护城河上的两座防栅后，又通过了用一捆一捆木柴加急建造起来的桥，就像蜘蛛的幼虫一般开始攀登内城墙。

城塞之中原本还有3000名守军，但是对于爬上城墙的进攻者，他们本应集中开火的炮筒却没有打出几发炮弹。其间，进攻者中的一人攀上了四座塔中一座塔的屋檐，成功地夺取了旗帜。进攻者看到这一幕都振奋不已，斗志激昂，势不可当地涌入了城塞。

城池已经困守了将近一个月，此时敌军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侵入呢？城塞的主人、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虽不能确定原因，但她依旧命令守军在敌人入侵路线的近旁点燃炸药，试图以此阻止敌人的入侵。可是她的命令并没有被传达下去，城塞四座塔中的两个守卫队长与雇佣兵队长之间达成了背叛女主人的协议。因为3000名守军中的大部分都是以金钱雇来的雇佣兵，在有胜利希望的战役中尚能奋勇杀敌，一旦

出现衰败之势，那么雇佣兵队长就只会考虑自己团队的利益。

看到对自己的命令毫无反应的队长们，卡特丽娜这才如梦初醒。在这之前，她还站在城墙之上，身穿铁制的胸铠，外面套着暗黄色的袍子，手持宝剑，叱咤鼓励着守军。有两三次，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她也不曾后退一步。

可转瞬间失去了大半士兵的她，身边只剩下几个部卒。大势已去，身陷绝境，城墙上已然失去了防卫。无奈之下，她决定躲进位于城塞四座小塔中心位置的大塔，继续最后的绝望的防卫。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

手持宝剑、身穿黄色袍子的卡特丽娜跑上塔内的螺旋楼梯，后面跟着少得可怜的士兵。夹杂在黑色铁甲之中的黄色，瞬间吸引了在守军的默认下涌入城塞的敌兵的视线。还来不及关上门，敌人便一下子涌到了中心塔的入口处。那狭窄的50厘米左右宽、连窗户也没有的螺旋楼梯变成了地狱，为了保护伯爵夫人而将敌人从楼梯上踢落的士兵们，与从下往上犹如洪水一般涌来的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站在死者的尸体上砍杀着，敌我已难分辨。受伤的士兵身上，又垒起了被一击倒下的别的士兵的尸体。临死前的呻吟声与盔甲兵器的相接声回响于整座塔中。

可是，不论敌兵倒下多少，后援部队都源源不断。不知不觉中，卡特丽娜的部队开始被迫退向楼梯的上方，再上方。二层已经完全落入了敌手，不得不退到了塔的顶层。对于亲自与敌人砍杀，手也负伤的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逃脱的方法，更不要奢望能够守住这块地方了。但她并没有完全绝望，甚至做好了与塔一同化为灰烬的准备，于是她命令点燃炸药库。她的期望是，在炸药库周围的木柴捆燃烧的时候，敌人可能会因为害怕爆炸而退出塔，而她则在那时寻找逃出敌人包围的机会。

最终，她的打算落空了。木柴燃烧的烟雾上升到楼上，楼梯里虽然弥漫烟雾，但浓烟之中的敌人却在火还没烧到炸药时就把火灭了。被浓烟笼罩的守卫主人的士兵们丧失了最后的斗志。

进攻部队的总司令官是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他在军队成功侵入城塞时就部署好了军队，下令不许一个人从城塞中逃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悠闲地离开军营回到了城里。但当他看到城塞的一角升起了白旗，就立刻骑马返回护城河畔。随从吹响了号角，传达了切萨雷

希望与伯爵夫人对话的意向。塔的顶层的小窗上出现了伯爵夫人的身影。切萨雷骑在马上，对她郑重地说，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流血悲剧，请她交付城塞并降下城塞的渡桥。卡特丽娜沉默不语。此时进攻军的两个法国队长紧逼在她身后。明白自身处境的她，已经无力抵抗了。

半夜，火把照着道路，总司令官切萨雷与法军司令官达莱格莱进入了城塞。战役结束了。切萨雷军队的450名死者、法国军队的700名死者都还放置在城塞之中。从那些尸体中穿行而过的切萨雷，径直进入塔中的一个房间。在那里，卡特丽娜站在数名侍从与女官的中间。切萨雷走近她的身边，既没有胜利者的骄傲，也没有对失败者的轻蔑，只是举止郑重向她简单说明了将她俘虏的意思。卡特丽娜一言未发。

过了一会儿，她那负了伤而虚弱的身体，在切萨雷与达莱格莱的左右搀扶下走出了城塞。从崩塌的城塞之中，从横躺的尸体之间走出的她面无表情。那是1500年1月12日夜间的事。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时年37岁。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是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具有教廷势力的背景；他刚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成为亲戚，受到了国王的全面资助，权势可谓如日中天。唯独有一人挡在了切萨雷的面前，那就是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当全意大利的男子对切萨雷束手无策只能屈服时，她虽然战败又是一介女流，可她的勇气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的赞扬。马基雅维利说，当时有很多人创作了赞颂她的歌曲，在街头巷尾传唱，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本章开篇的那一首《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不仅仅是意大利人对卡特丽娜毫不吝惜掌声，法国人，他们深信自己才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尊敬美丽而勇敢的女子——的继承者，也被这位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的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及其展现出的勇敢深深地迷住了。法国为这个最为棘手的女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因此激赏她，为之着迷。

对于这些法国人来说，成为胜利者的切萨雷所使用的手段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出于两件事情，他们对波吉亚的不满爆发了。首先是切萨雷将卡特丽娜从城塞之中直接带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且在那天夜里与第二天一整天，都只有他与她两个人待在房间里。对一个战败者、一个失去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行为，简直亵渎了他们奉为信条的骑士精神。全意大利的舆论都谴责切萨雷的这一行为。“可怜的伯爵夫人啊，连作为女人的自尊也被伤害了。”可是，当事人切萨雷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对于想要的女人，哪怕是别人的东西也要抢过来变成自己东西的他来说，骑士精神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12岁，浑身散发出成熟与美丽，甚至从一开始就对他赤裸裸地表现出轻蔑态度的女人，他只不过无论如何都想把她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已，并且实践了。“如果城塞所有的守军都能像她一般英勇，那么城塞也许就不会沦陷了。”切萨雷对曼托瓦大使这么说道，实际上他也是被卡特丽娜的魅力所迷住的人中的一个，只是被迷住的方式不同而已。就算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也一点儿不会想要去尊重她，切萨雷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当然，没有人知道卡特丽娜自己对此有何反应，责难切萨雷的行为并留下这些记录的都是男人。然而，女人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卡特丽娜被切萨雷关在他的房间内，旁人一律不得进入。这让法国士兵们对卡特丽娜愈发同情，而对切萨雷也愈发不满，队长达莱格莱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一个。因为伯爵夫人是被法国士兵俘虏的，所以他认为她的在押理应安置于法国国王的身边。而且，根据法国的法律，战时不能俘虏女人，所以他主张她不是波吉亚的俘虏。可是，切萨雷先是接到了教皇父亲杀死她的命令，后又接到将她押送至罗马的命令，所以不能同意达莱格莱的主张。切萨雷与达莱格莱之间持续协商。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作为法国国王的俘虏，委托教皇波吉亚监管。

法国士兵的第二个不满是关于赏金。当时，因为在城塞攻击中遇到了未曾预料的强烈反击，所以切萨雷布告说，生擒伯爵夫人者赏赐一万

达克特。可是后来，切萨雷本应对直接俘虏卡特丽娜的两个队长赏赐两万达克特的，却仅仅给了一成的赏金。队长们要求全额。他们甚至说，如果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全额，就杀死卡特丽娜。对此，切萨雷以在城塞最后沦陷之前都没有俘虏伯爵夫人为由，最多只肯支付4000达克特而不再让步。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笔巨款了，队长们接受了这个数字。这对于想要通过归属于法国国王，从而有机会利用相应的法国法律免除俘虏之身的卡特丽娜来说，意味着断绝了最后的希望。后来，马基雅维利这么写道：

“伯爵夫人，被法国以4000达克特卖给了瓦伦蒂诺公爵。”

切萨雷任命西班牙人贡扎罗·德·米拉芬特斯为沦陷的弗利和伊莫拉的总督，之后率领全军1.5万名士兵于1月23日离开弗利前往罗马。在那个雾霭蒙蒙、晨光微弱的清晨，人们聚集在切萨雷一行通过的广场上，想再看看曾经是自己的领主而现在身为俘虏的卡特丽娜。只见她穿着黑色的绸缎衣服，头上罩着面纱，骑着白马。切萨雷与达莱格莱骑着马护在她的左右，她身后跟着的两个老仆与两个女官也都骑着马。连一直都很憎恨卡特丽娜，在她奋起组织防御切萨雷之时拒绝听从指挥的弗利市民们，在看到自己的女主人如此面目全非的样子时，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他们的感叹更多些。所谓民众之类，都是不负责任的家伙。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也因他们的呼声湿润了双眼，一一报以应答。被称为“弗利的夫人”，在丈夫里亚里奥[2]死后12年间君临该国的她，现在失去了一切。100年前，斯福尔扎家族从罗马涅的一个农村豪族崛起。祖先写下军人光辉的历史，最后登上米兰公国的王座，自由自在地掌握了权力。如今，祖辈留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精神由这位卡特丽娜画上了句号，因为米兰公国的蛇与木棉花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徽章被法国王室的徽章所取代了。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

给洛伦佐·德·美第奇送去这封信的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美而又最残忍的女人。后来，她对切萨雷·波吉亚也说：“我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在她的身上，奔腾着斯福尔扎家族那宝剑横空出世的血和魂。

今日，对于具有男性性格的女人的评价非常苛刻。大胆而勇敢的女人被人们称为女杰或女强人，不过是一种很戏谑的称呼。但当时这种词语完全没有轻蔑的意味，相反是一种赞叹之语。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的女杰”——美丽、残忍而勇敢的女人。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男人眼中，她是一个勾起无数男人征服欲的充满了魅力的女人。

这样的卡特丽娜广受追捧。就像今日的肖像写真店[3]一般，当时弗利的街上有很多大量复制她的肖像画的商店，据说其肖像画非常畅销。她身边的作为佛罗伦萨特使而被派到弗利的马基雅维利也说过，他的朋友请他购买伯爵夫人的肖像画并尽快送达给他。

可是，她这样的人气也是出于她对敌人不让丝毫的勇气，虽身为女流却令男人自愧不如。特别是当她从谋杀丈夫的那些人手中逃脱，再次将国家收复于自己的手中；与一代枭雄切萨雷·波吉亚对决之时的勇敢，显示其作为女中豪杰足以名垂青史的资格。

尽管如此，对于“意大利第一夫人”（Prima donna d’Italia）这一评价也并非没有一点儿异议。当然，当时没有一个女人像卡特丽娜·斯福尔扎那样处于政治的前沿。在那样艰难的时代里，至少在丈夫死后12年中，她坚守了弗利与伊莫拉。可是，她作为君主的政治才能却不得不逊色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4]相较之下，伊莎贝拉的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君主，但也并非那么不济，而且还活得久了一些，所以她没有卡特丽娜那么幸运，得到更多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

可是，对于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女人的政治才能，也不得不承认其作为女人的局限性。只考虑曼托瓦、费拉拉两国安全的伊莎贝拉和为了守护弗利、伊莫拉而不瞻望时代新潮流，并鲁莽地与切萨雷对决的卡特丽娜，将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尤利乌斯二世等人相比，与他们那种贯彻极善至恶的雄壮的政治相比较，大概可以明白文艺复兴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男人的时代了吧。历史上有过男人的时代与女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

即便如此，伊莎贝拉“不流血”的政治中所见的“狮子与狐狸的结合”的成熟，是卡特丽娜所没有的。卡特丽娜不像狐狸，而更像狮子。在这一点以及其生涯的悲剧性结束上，可以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而且，就像切萨雷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人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青春很美，特别是，那不是将青春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那就更美丽了。

卡特丽娜便是这种青春之美，并且她还努力使自己变得更美。为了保持修长的体形，她非常注意饮食。在对同时代的女人们评价时，对于拥有深厚修养同时被认可美貌但身材稍显雍容丰满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如此说道：“曼托瓦侯爵夫人那么胖还毫不介意。”

1515年，卡特丽娜死后6年，她的一个亲信卢卡托尼奥·库帕诺伯爵整理出卡特丽娜夫人的“美的处方笺”。此人是她最小的儿子，即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个军人“黑队的乔凡尼”[5]的部下。对于这位在“罗马劫掠”前，对犹如怒涛一般南下的德国——西班牙军队进行抵抗的唯一意大利军人“黑队的乔凡尼”，诗人塔索赞美他为“意大利的剑、盾与自豪”。在库帕诺伯爵整理的这份处方笺中，我们选择几项来看看。

首先，要想使肌肤变得美白而润滑——将新鲜鸡蛋的蛋白煮熟，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祛除脸上的雀斑——将鹭鸶的喙切成碎末，加葡萄酒煮，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消除眼部疲劳——将河鱼的脂肪在太阳下暴晒，再用蜂蜜搅拌，涂在眼部周围。为了让头发生长速度加快——待三叶草的叶子与根腐烂后，与米糠一起煮，再用水与醋搅拌，使用过滤后的水洗头。为了让手变得美丽——将苦杏仁的果实清洗干净，切成碎末，在水中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将水扔掉，再将两个白芥末与四个萨拉逊[6]芥末切成碎末，加鲜奶油搅拌，涂在手上或手指上，慢慢地靠在火上，一直靠到红色的水分渗出，剩下的脂膏形成白色的黏土状，冷却后洗净……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卡特丽娜的手十分美丽，这是有口皆碑的。她就是这般细致地记录了有关美容、健康等内容，甚至还有堕胎的方法。

可是，正是这个处方笺，第一次将巴黎宫廷推广到整个欧洲的社交界。这是因为，卡特丽娜通过第三次婚姻与卡特丽娜·德·美第奇，也就是后来在法国实行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7]的凯瑟琳·德·美第奇[8]成了亲戚。后者将处方笺带进了法国宫廷，从巴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宫廷与社交界。所以，卡特丽娜的时尚在很多年间影响了全欧洲的贵妇人。她不仅这样成了当时贵妇人的流行先驱，还是流行的创造者，她的美貌必然吸引了众多男人的视线。听说来到罗马的弗利的使节们每次在拜谒教皇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首先要问："如今伯爵夫人还依旧那么美丽吗？"对于美丽而勇敢的女人的赞美，只要真正的男人活着，也许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乡野武夫的崛起

空荡荡的房间里，墙壁上没有半点儿壁挂装饰，光秃秃的一片，墙

上仅有的窗户也很小。在一张很大的木桌上，摆着很普通却非常丰盛的食物和葡萄酒。吃饭时，归来的男人们将武器扔在一旁，随便坐下，拉过盘子便吃。二三十人在吵吵嚷嚷中填饱了肚子后，衣服也不脱倒头便睡。这个只经过简单分割，连大门都没有的宽敞房间里，四处摆放着床铺，男人们就躺在连床单都没有的铺上，呼呼大睡。其中一些男人在吃猪蹄时眼睛就瞄上了上菜的女人们，刚一填饱肚子就将女人们强行按倒在床上，开始填补其他的欲望。另外一些没有吃完的男人豪爽地笑着，烤全猪的脂肪在火上滋滋地滴着油，一旁经过仔细检修的武器被火光映照出幽暗的光泽。这里的一切都在理所当然地重复着。“Lo sforzo”（洛·斯福尔扎，意思是心想事成者）是穆佐的绰号，后来又成为阿滕多洛[9]一族的姓氏——斯福尔扎。上面那段话描写的就是斯福尔扎家族的日常生活，距离1500年卡特丽娜与切萨雷对决败北大约100年。当时，罗马涅偏僻的乡村科蒂尼奥拉（Cotignola）的豪族阿滕多洛仍保留着中世纪风格的粗野与奔放，与近邻纷争不断，因而老百姓在工作时武器从不离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阿滕多洛一族粗野地发展着自身力量，女人也不例外。在与科蒂尼奥拉地方的仇敌帕索里尼一族家常便饭般的争斗中，女人也是手持武器的，哪怕是在她们不间断的孕期。

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最初主要由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来的外国人构成，不过很快就被意大利人所取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可能性都是打开着的。

1382年的一个傍晚，阿滕多洛家中一个名叫杰克莫的人，像往常一样在耕田。忽然远处传来笛声和鼓声，有人在大喊：“村民们，扔掉锄头到我们这里来吧！扔掉你们的锄头去找寻自己的幸运吧！”这是著名的雇佣兵队长波尔特里诺·达·帕尼卡雷的士兵们，在他们的后面已经跟随了一些想要扔掉锄头的百姓。被称为“穆佐”的杰克莫听到了，他想了想，然后将锄头扔向旁边的橡树，心里做了决定：如果锄头掉了下来，

那么就像以往一样继续做个农民；如果锄头挂在了树上，那么就扔掉锄头跟他们一起走。锄头挂在了橡树上，没有掉下来。于是，穆佐悄悄地回到家，偷走了父亲的一匹马，追随他们的队伍而去，那时他只有13岁。

两年后，穆佐成为斯克鲁齐奥队长的侍童回到了科蒂尼奥拉。这一次，他已不再是偷父亲的马匹了，而是问父亲讨了四匹马与武器盔甲，然后带领着20多个弟兄，再次离开了科蒂尼奥拉前往战火纷飞的地方，前往命运等待他的地方。

10多年后，这个有着半个农民身份的穆佐被取了一个绰号：洛·斯福尔扎。他须发浓密，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双粗糙的手，长了一个鹰钩鼻子，长相显得很粗鲁，为了方便常年戴头盔而将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很短。身为雇佣兵队长的他的价值之高，引得米兰与佛罗伦萨为了他而争持不下。他与四个教皇、四个国王都战斗过。

米兰城之塔[10]

在拥有军人的优秀才能的同时，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狡猾习性。他虽然不会写数字，但从来没有搞错过，也从未拖延支付士兵薪水。他这种对于金钱严谨而朴实的作风让银行家们非常信任他。他自己的财产自不必说，即使在战败时也有很多人愿意借钱给他。对于部下，他能记住每个士兵的名字，从不疏忽；虽然他是个严肃的长官，待人却非常公正，因而赢得了人心。

他不会写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也是在一次被俘后于牢狱中学会的。虽然字迹幼稚，但那是他自己的。尽管如此，他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让人为自己翻译成意大利语进行学习。他的秘书只雇用僧侣。因为在当时，出于宗教原因，僧侣被允许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进出，所以常被当成间谍使用。

婚姻对他来说，同打胜仗一样，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他没有同为他生了5个孩子的情人露西娅（Licia da Terzan）结婚，直到50岁时才与那不勒斯国王的遗孀乔安娜结婚。

至此，他的生涯也很快迎来了终点，在5年后的战场上。佩斯卡拉河在大雨过后河水陡涨，他在行军渡河的途中伸出手想要救助一个侍童，却因为身上穿戴的甲胄太重致使马失去了重心，掉进了河里。这位穆佐·斯福尔扎就是卡特丽娜的曾祖父。

1/4个世纪过去了。以自称为“幸运女神的丈夫”的著名雇佣兵队长皮奇尼诺之死为界，即便是百姓出身的武夫，也可以仅凭自身的手段就能扶摇登上一国之主宝座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对于“幸运女神”，一般的说法都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但是后来马基雅维利说：因为幸运之神是女神，所以要想将其纳入手中，就必须像将女人弄到手一样支配她才行。

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终于开始形成列强之间的均衡状态，已经

不再是轻易就能诞生一个新雇佣兵队长国家的状态了。其中，穆佐的儿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谨慎地使用了幸运及自身的才能，收获了米兰。1441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成为米兰共和国实际的国主，与菲利普·玛丽亚·维斯孔蒂的庶出女儿比安卡·玛丽亚结婚。接着，他在1448年维斯孔蒂去世之后一度与威尼斯共和国对抗，但很快就倒戈，成为米兰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与维斯孔蒂的正妻玛丽亚·迪·萨沃亚[11]及其娘家萨沃亚公爵家[12]相战。在胜利之后，他以解放者的姿态接受了米兰的欢迎。那是1450年的事情。米兰封其为公爵，共和国变成了公国。虽然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百姓的长相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弗朗切斯科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自信与沉着成就的君主的威严。

正如马基雅维利与布克哈特所指摘的那样，他是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最为匹配，并且出色地加以运用的典范。

可以认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通过连续16年的统治，强固了米兰公国的基础，将其变成意大利的四大势力之一。

他的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在22岁时继承宝座，这之后的10年中，可以说矛盾不断发生。他虽然在内政与外交上都算不上特别卓越，但也发挥了相当才能。可是，不可控制的欲望却像失去了掌舵的大船一般。当时，有一个家臣被活活地装进箱子，当作一具尸体给埋了，还有一个臣子只因为与他的情人说话便被砍了双手。在当时的费拉拉年代记中，记录他为“拥有欲望与才能之力的怪物”。

为了改善自1450年以来与萨沃亚公国之间的关系，他力排母亲的反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女儿博纳[13]结婚。他从这场婚姻中获得了5个孩子，另外还有5个庶出的孩子。在嫡出的子女中，吉安·加莱亚佐后来虽然成了国主，却被其摄政的叔父伊鲁·摩洛夺取了政权；比安卡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还有安娜，她成为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第一个结婚对象。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

卡特丽娜出生于1463年，是庶出。

在当时的意大利贵族社会，嫡出与庶出的孩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在继承家业的场合中，嫡子优先。当然，嫡子被实力雄厚的庶子所取代也是常有的事。据说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兰特也是庶子出身。

可是，与这些相比，更重要的特征是男子与女子具有完全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教导。女子与男子一样爱好拉丁语、希腊语的学问，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在卡特丽娜快到11岁的时候，因为她的婚事，她的名字忽然开始往来于罗马和米兰之间。对方是时任教皇的西斯都四世的外甥、罗马第一实力者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当然，在这个婚约的背后，交织着当时意大利政界特有的策略。

首先，对于罗马而言，事事皆与教皇关系不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主权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早已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想将很久以前起就与美第奇家族有亲密关系的米兰斯福尔扎家族拉拢到罗马这一方来。其次，新娘卡特丽娜带来的作为陪嫁金一部分的伊莫拉领地，美第奇家族垂涎已久。因此，教皇想将领地变成自己外甥的地盘，以挫败洛伦佐的野心。显然，教皇从这个婚约中看到了以上两个政治目的同时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斯福尔扎家族的公爵不仅希望将米兰收入囊中，还野心勃勃地打着旁边的伦巴第的主意。就为了这一点，他也必须与教皇搞好关系。于是，订婚很简单地达成了。

可是，在婚礼之前，米兰发生了一场不幸，这在斯福尔扎家族和卡特丽娜的记忆中留下了深远的阴影。这一事件与两年后佛罗伦萨发生的著名的“帕齐阴谋”[14]成为15世纪意大利的两大暗杀事件。

1476年12月末，自春天起便南征北战而离开了米兰的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同往年一样，为了与家人一同过圣诞节，正准备返回米兰城。正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军营里收到了一个急件。报告说米兰城中他的房子发生了火灾，被烧光了。他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而不知所措，但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了。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伦巴第，冬季酷寒。队伍缓缓地行进于笼罩在雾霭之中的灰色伦巴第平原上。忽然，公爵的头顶飞来三只乌鸦盘旋不去。侍者们再三驱赶这不祥的鸟儿，可乌鸦依旧不肯离开公爵的头顶。公爵对此也心生厌恶，他勒住了马，双手合在一起，犹豫着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原路返回。犹豫之际，马儿又开始跑了，公爵也没有强行阻止自己的坐骑向前，众人又继续前进。

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之前偶然遇到的事情往往会被视为预兆。但若什么事件也没有发生的话，大家又会完全忘记之前偶发的事情。正是这一次，米兰公爵的预兆应验了。

暗杀公爵的阴谋早已在6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以在米兰开设了辩论术私塾的科拉·蒙塔诺[15]煽动学生为开端。他对学生们强调，伟人只出生于共和制之下。在今天的米兰这种君主制下，优秀的人才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所以，每当米兰公爵的队伍通过私塾的前面，他总要说："僭主一日不倒，米兰就无法拯救。"他征引古罗马的事例，赞扬暗杀恺撒的布鲁图[16]与卡西乌斯[17]。被他煽动起来的是兰普尼亚尼[18]、维斯孔蒂[19]、奥尔贾蒂[20]三人。在这四个人之间，暗杀公爵的念头一天比一天高涨。但是，从心底里相信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暗杀只有22岁的奥尔贾蒂一人。对于另外三个人来说，对公爵的私愤才是他们参与这次阴谋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科拉·蒙塔诺。他以前曾经在公众的面前受过鞭打的刑罚，所以对米兰公爵非常怨恨。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被前任公爵弗朗切斯

科·斯福尔扎宣告死刑，是现任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赦免了他。可是，只要米兰还是在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下，那么他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另外一个是卡洛·维斯孔蒂，他对被斯福尔扎合并的当今维斯孔蒂家族的现状非常不满。并且，他对妹妹在受到米兰公爵的诱惑后又被抛弃寄予的同情变成了愤怒，为谋杀阴谋点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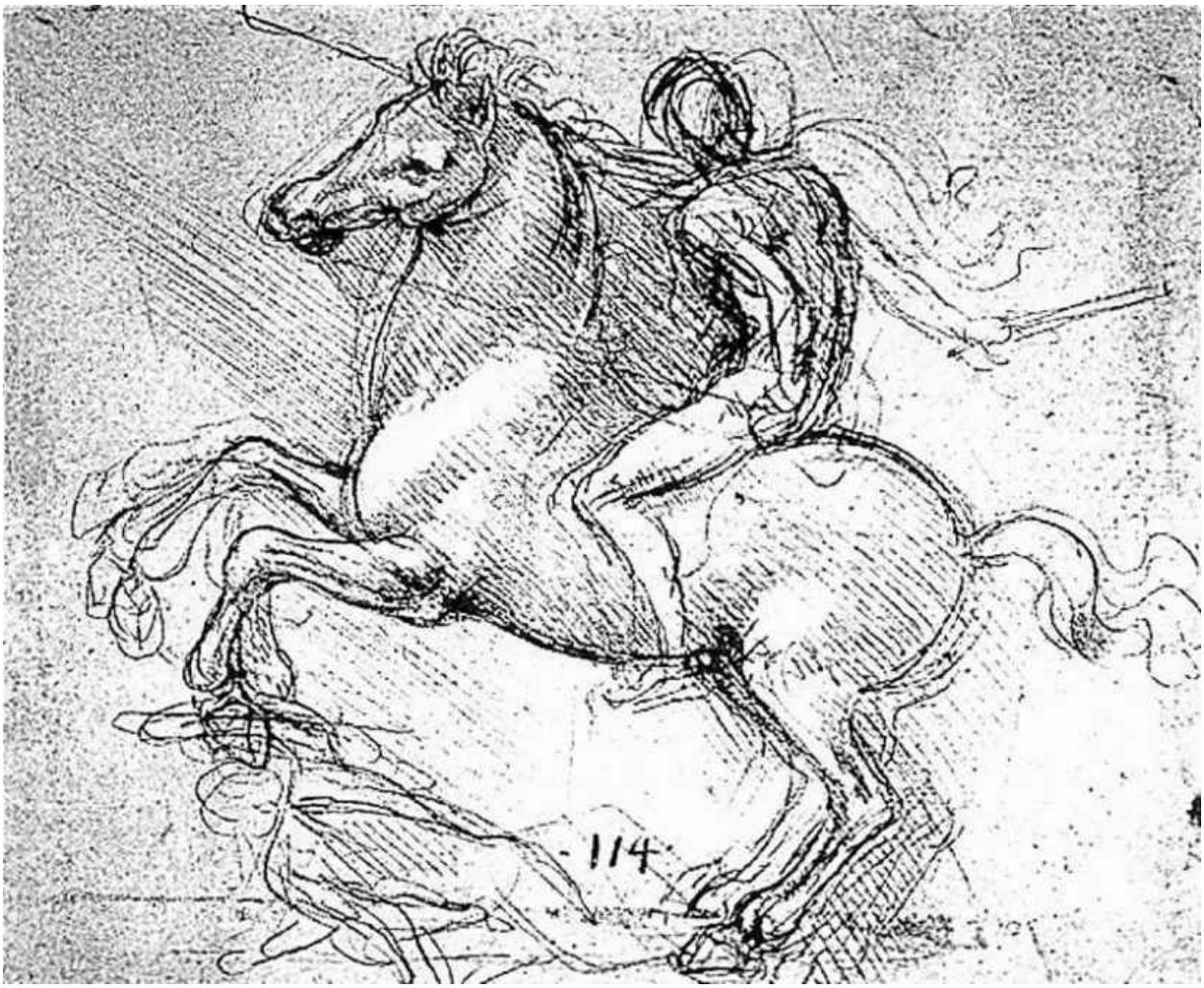
除去只煽动而并不参加实际行动的蒙塔诺以外，三个人多次在兰普尼亚尼的家中为实施暗杀做着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选定场所。城内的警备周全，几乎没有下手的可能。狩猎的时候也很危险，所以不能采用。他们最后想出来既能够确保公爵出席，又被大批群众包围，使得事情能够顺利进行的机会，就只有教会的节日了。实施谋杀的时间与场所定为圣斯特凡诺节[21]，在举行弥撒的圣斯特凡诺教堂。决定日的那天，他们集合于纪念米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布罗焦教堂的植物园，发誓若背叛计划就等同于叛国。

到了圣诞节的次日，终于等到了实施行动的日子。将近正午时分，带领着公爵前往教堂的队伍，渐渐地通过城市的中心地带。从早上开始就将城市包裹得白茫茫的雾霭散去了，太阳微弱的光芒照射在15世纪初被穿戴着五颜六色的金银丝线刺绣服饰的骑士一行身上。尤其是米兰公爵的随行者，其装备之奢华在当时的意大利远近闻名。从远处看去，那支队伍好像是一条蠕动着的闪闪发光的蛇。

一行人通过了狭窄的石板路，两旁的房屋都很矮，几乎每个人家都只有一层或两层，屋檐从两侧戳出来，节日的人群熙熙攘攘。贵族、医生、公证人、圣职者们给马和驴子套上了或华丽或简陋的骑具，来来往往。披着深色斗篷的贫穷的民众东跑西蹿，不过，女人们还是在衣服上稍微增添了几分色彩。

他们分散地站在公爵的队伍将要临近的道路两旁。米兰公爵跟在护

卫兵及侍从的后面骑马前行。年轻的32岁公爵身材高挑，穿着华丽的衣服。民众看着他的身形，说不上是赞美还是敬畏的心情。就算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在骑马前进的公爵自己的心中，也许正偷偷地感到不安。因为他本来在出发之前听从公爵夫人的建议，在衣服的里面穿上了胸甲。可是他觉得看起来很胖，就脱掉了。人们只注意到骑马前进的公爵脸色阴暗、视线黯淡。从人群中发出低声细语："多么严肃的一位先生啊。"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的草图）

圣斯特凡诺教堂的前面也聚集了想要一睹公爵的群众。三个暗杀者早已到达此处，只待伺机而动。兰普尼亚尼在衣服之下从头到脚都用甲胄包了起来，与同样武装起来的奥尔贾蒂一同躲在教堂入口的右侧吵吵

嚷嚷的人群之中。维斯孔蒂则与事先雇用的三个职业杀手躲在了入口的左侧。看到维斯孔蒂后，公爵的仆从克里奥觉得很可疑，因为那天在公爵的侍从中本不应该有这个人出现。克里奥后来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以前维斯孔蒂出入过米兰宫廷，所以这个仆从见过他。克里奥是先出城，在教堂里等待着主人的。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确认周围有没有可疑之人，公爵的队伍就临近了。马蹄声响起，仿佛在挑衅暗杀者。人声鼎沸，公爵骑着马从分成两路守候着的护卫兵中间穿过，下马将缰绳交给黑人仆从后，安静地走向教堂入口。正在那时，从圣歌队的席位中传来一句圣歌："荣光转瞬即逝"（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就在那个时候。兰普尼亚尼用双臂撑开一条道，叫喊着"让开，让开！"跳到了公爵的面前。然后，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左手持帽，好像是要请求什么似的，跪在了僵住的公爵面前。突然，他将一把藏在袖子里的短剑与他的身体一同朝着公爵的腹部顶了上去。公爵踉跄了一下。可是，兰普尼亚尼的第二下击中了公爵的喉咙。奥尔贾蒂也紧接着刺中公爵的喉咙、左胸与手臂。维斯孔蒂撞上背部与肩膀，数次都集中撞到了公爵。公爵"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只稍微呻吟了一下。

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护卫兵们甚至都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听到包围着公爵的暗杀者旁边的群众"死了""死了"的喊声。可是，只有距离公爵最近的黑人仆从，从逃跑的暗杀者之中发现了被女人的裙子下摆勾住而绊倒的兰普尼亚尼，用矛枪刺中了他。从背后被刺中背部的他，口吐鲜血倒在现场。

暗杀的现场陷入了极大混乱中——被流血惊吓得哭喊的女人、四处逃散的群众、好不容易才搞清事态而去追捕犯人的护卫兵们。唯有公爵与兰普尼亚尼两具尸体横陈于血海之中，谁也没有工夫去理会尸体。僧侣们一下子逃进了圣具室。直到教堂内的声音都消失后，他们才把公爵

的尸体运进圣具室，脱去被血浸透的衣服，洗净身体。公爵的身上有15处伤口，但是，第一击的短剑上似乎涂抹了毒药，所以他们认为公爵没有感觉到后来伤口的疼痛就死了。

暗杀事件立即传遍了大街小巷。除了逃走的两人，受雇的职业杀手们被活活地斩去四肢，吊在面向街道的城墙上，甚至还能听到他们最后绝望的呻吟。

兰普尼亚尼的尸体被绳索拖曳着，一条街一条街地示众，持续了三天，石板路上黏附了血和肉。最后已经辨不清人的形貌了，仅剩的一条腿还被挂在了城墙上。维斯孔蒂在数日之后被逮捕。经过拷问，他全盘招供，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年轻的奥尔贾蒂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他先是逃到了父亲身边，却被了解了情况的父亲赶出家门；而后他逃到一个主教的家，躲在床底下。但是，当他得知经过门外的群众的欢声是为了拖曳他的同伴兰普尼亚尼的尸体时，他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全自己。可是，在数日后被捕的他，经过了严刑拷打，骨碎肉绽时，只有他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罪过，也没有失去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自豪。临死之际，依旧很壮丽。煽动者蒙塔诺被米兰驱逐出境。逃到那不勒斯国王身边的他，后来在与那不勒斯国王交战的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命令之下，被处以绞刑而结束了一生。

本打算仿效古罗马事例的他们，重蹈了布鲁图与卡西乌斯的命运，只是又一次成为证明暗杀君主并不能改变政权分毫的案例罢了。

可是，这次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暗杀事件对于世情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号称意大利最强国的国主被杀，而且还是在教堂中发生的。全欧洲都向遗孀博纳给予了同情，因而年仅8岁的后继者吉安·加莱亚佐的即位也很顺利。

卡特丽娜的婚礼也照常举行。父亲死后才4个月，宫廷尚在服丧中。从父亲惨死的巨大创伤中尚未恢复的14岁的卡特丽娜从米兰出发，前往罗马举行婚礼。

罗马

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用剑征服了米兰。那么，罗马的里亚里奥家族，也就是卡特丽娜的夫家里亚里奥一族，是用什么征服了罗马的呢？

这一族的崛起始于1471年8月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成为教皇西斯都四世。57年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出生于热那亚附近一个贫穷的渔夫之家。9岁的时候，他进入弗朗切斯科派的修道院，而后在帕多瓦、博洛尼亚、帕维亚、锡耶纳、佛罗伦萨以及当时最好的大学获得哲学神学的学位，再之后被选为弗朗切斯科派[22]的总会长（Padre General）。

1467年，他由弗朗切斯科派的总会长升为枢机主教。在他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之时，连购买礼服的钱都是朋友们凑给他的，这才好不容易出席了任命仪式。僧侣时代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弗朗切斯科派修道士，直到4年后，成为教皇的他一改当初的节俭生活态度，同时将自己的政治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基雅维利在关于他的部分写道：教皇这一地位究竟能够实现多少事情，他是显示其可能性的首位教皇。

当时的罗马，道路狭窄肮脏，四处充满恶臭，完全是疫病的温床。传闻1475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在访问罗马后对西斯都四世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绝对成不了罗马之王的。在这么狭窄的街道上，就算是两边

屋里的女人们扔石头，也能将你的士兵们驱逐出去。”这句话仿佛深深打动了教皇。他立刻开始了罗马街道的规划，道路被拓宽并尽量改成直道相连，其中也含有消除疫病隐患的目的。如今的罗马市就是在西斯都四世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23]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斯廷教堂，都是他命令建造的。当时罗马最有名的画家们——曼特尼亚、佩鲁吉诺、波提切利[24]、基尔兰达约[25]、菲利波·利比[26]都接到邀请为教皇作画，梅洛佐·达·福尔利[27]也在其列。他为西斯都四世及其外甥们制作的肖像画现今依旧保存于梵蒂冈绘画馆内。

可是，就算是被称为“亲族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位展现了怎样将重用近亲做到极致的教皇。据说他有15个外甥，不过在历史上留有记录的只有其中的4个：后来成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枢机主教、集教皇的期望于一身却在28岁时早早离世的彼得罗·里亚里奥[28]枢机主教、其胞弟吉罗拉莫伯爵，以及最年轻的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29]。

在这4个外甥中，教皇最宠爱妹妹比安卡的两个儿子：彼得罗与吉罗拉莫兄弟，其宠爱程度甚至令马基雅维利等人深信此二人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偷偷觑觎下一任教皇之位的彼得罗死后，弟弟吉罗拉莫更将舅舅教皇的宠爱集于一身。

吉罗拉莫获得了“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教会的旗手”的称号，不仅一手掌控罗马的军事与政治权力，还是圣天使堡的城主，连司法权都几乎成了他的玩物。这位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被罗马市民畏惧地称为“大教皇”（Arci Papa）。

而作为这位里亚里奥伯爵妻子的卡特丽娜，在罗马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华的时期。教皇西斯都四世特别喜欢他这个年轻优雅又十分活泼的外

甥媳妇，还经常批评吉罗拉莫伯爵对妻子过于冷淡了。教皇身边很久没有贵族家的年轻女孩儿了，所以卡特丽娜作为罗马宫廷的第一夫人，在所有的娱乐活动、音乐会、节日、宴会上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愉快地过着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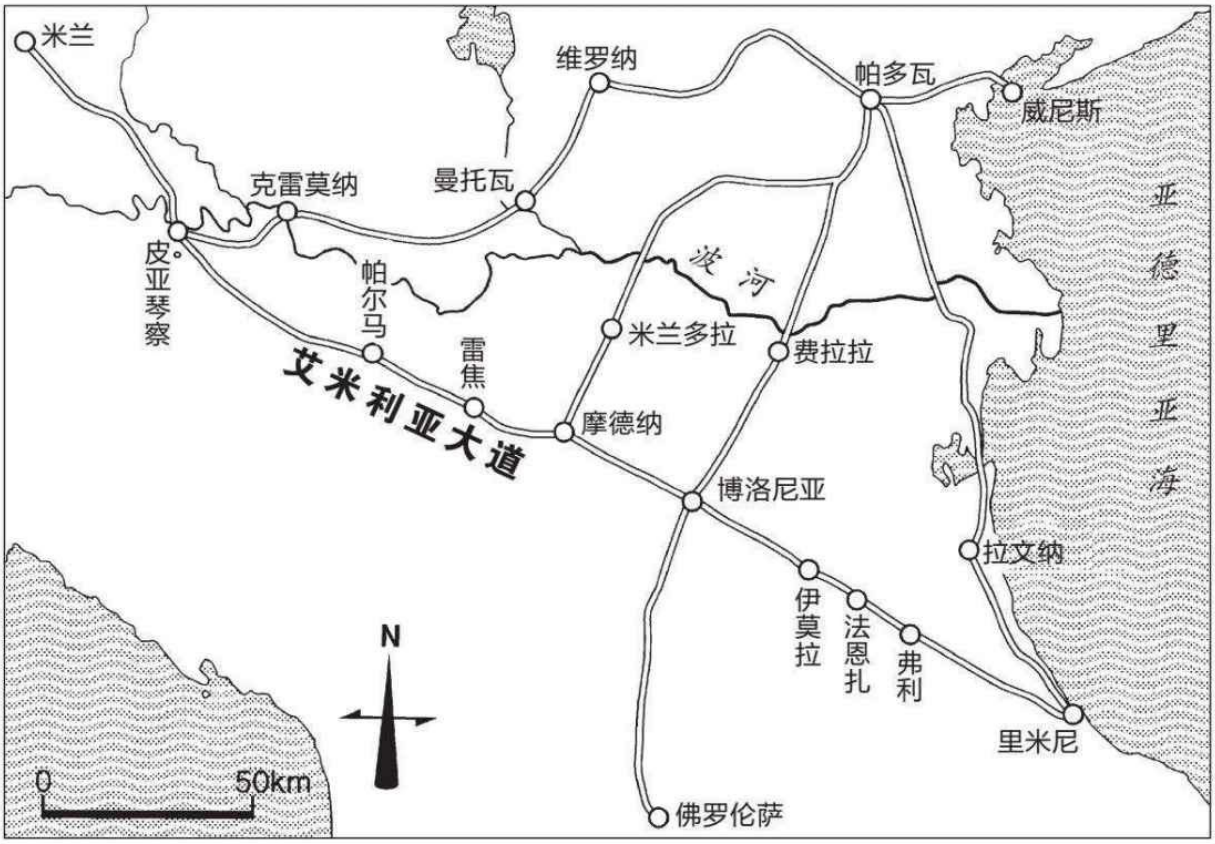
据说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被教皇舅舅叫到罗马与卡特丽娜结婚之前，是萨伯纳市政府里的一个文书员。对于境遇的突然改变，他自然是想将之变得更为稳固。只是对于没有受过教育而行为粗暴的他而言，在实现自己野心的道路上选择的敌人实在是过于强大了。对手是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像切萨雷·波吉亚那般幸运，才干上也远远不及切萨雷。

西斯都四世与外甥们

这次暗杀事件的手段虽然拥有精致的趣味与优雅，但性质却极其凶残暴戾与大胆鲁莽。如此鲜明的对比，更让“帕齐阴谋”出色地描绘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格。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激发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与艺术家的想象。

可能有人不能理解怎么能够将阴谋评价为出色，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25年后，在塞尼加利亚[30]发生的对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的阴谋中，经切萨雷巧妙而大胆处理后，阴谋者被统统杀光。这样的切萨雷被

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家保罗·焦维奥评价为“欺骗的杰作”。如果切萨雷那么做是有必要的，就应该超越单纯的善恶判断并果断实行，而且其做法所具有的艺术美感也足以让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这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根源所在——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抛弃了狭隘的伦理束缚。



艾米利亚大道及周边

被称为“大教皇”的里亚里奥伯爵在罗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一切事情，但他也有一些不安。他通过与米兰公爵的女儿卡特丽娜的婚姻而获得了伊莫拉领地，但他非常清楚，这块地从很久以前起就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垂涎之物。此外，他还了解到美第奇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距离伊莫拉仅仅13公里的法恩扎[31]。如此一来，在他以伊莫拉为据点而将势力延伸至罗马涅地方的野心面前，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国主、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势必成为最大的障碍。他的这种想法，

与以前就对德·美第奇的政治不满的舅舅西斯都四世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便是将美第奇家的兄弟洛伦佐与朱利亚诺扳倒，再在佛罗伦萨树立亲教皇派的政权。剩下的就只是在佛罗伦萨找到适合执行该计划的人了。

帕齐家族就算在佛罗伦萨众多的名门望族之中也是第一流的门第，长期以来，甚至有着比美第奇家族还要重要的地位。可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逐渐掌握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统治权，这让帕齐家族产生了巨大不满并与日俱增。

帕齐家族的长者雅各布·德·帕齐对于本族的困境也不知应如何应对，而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对美第奇家族这种深刻的怨恨，让他无法忍耐再待在佛罗伦萨，便来到了罗马。

在他滞留罗马期间，凭借其所从事的银行家职业，得到了很多出入教廷的机会。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获取教皇西斯都四世的信任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待在教皇的身边也需要相当的胆识。教皇、里亚里奥伯爵、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三人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秘密会谈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最著名的“帕齐阴谋”就是这样从教廷的内部发起了。1478年，复活节临近，一切准备就绪。

以教廷为幕后并布置得十分周详的计划，却在4月26日，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实施时彻底失败。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朱利亚诺，但只刺伤了洛伦佐的手。这不过是确认了佛罗伦萨市民的心完全站在美第奇的一边罢了，罗马方面的意图完全失败了。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天起，里亚里奥伯爵将开始夜不能寐的日子，因为他要提防弟弟被杀害而自己活下来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复仇。10年之后，执着的洛伦佐终于成功实现了复仇。

打倒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失败后，里亚里奥伯爵将眼光瞄向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此时，费拉拉与以前关系不和的威尼斯共和国之间拉起了共同战线。但是，以仁政闻名的费拉拉埃斯特家的长者埃尔科莱公爵对被教皇逐出教会毫不在意："就算被开除基督教的教籍，对我作为费拉拉的国主也没有丝毫的妨碍。"他还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对教皇势力增大毫无兴趣的其他意大利诸国的援助。威尼斯与罗马之间曾经交换的秘密条约——将费拉拉归属于里亚里奥伯爵，将摩德纳、雷焦归属于威尼斯——就这样不为人知地夭折了。里亚里奥的野心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说，都受到了挫败。

现在只有弗利及伊莫拉成为自己的领地，而他不得不感到心满意足。而这两个领地之间还夹了一个洛伦佐的奸细据点法恩扎，这个恶劣条件也让他束手无策。他这种无处发泄的郁闷和不满，便只能朝着罗马的科隆纳一党爆发了。听说罗马城每天都会沾染上某个科隆纳家族人的鲜血。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然而，教皇近亲的势力只有教皇在位期间才能得势。1483年的冬天，教皇的宿疾痛风恶化，里亚里奥伯爵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敌人众多并不是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但是，面对敌人只是顾此失彼稍加攻击而不能彻底消灭，则可能招致别人怀疑他作为统治者的能力。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那段时间，每天只能用支离破碎的发狂般的残忍伪装着自己。

对于这个残忍的每日酗酒的丈夫，卡特丽娜慢慢地冷眼旁观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比起丈夫，她更关心自己家的事情。她认为至少要努力改善自己与丈夫的仇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关系，对于暴发户的丈夫，她那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意识在此时开始孕育于胸中。

8月12日，教皇西斯都四世去世。卡特丽娜与丈夫及三个孩子在罗马市内的阵地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紧接着，枢机主教团发来了命令：在新教皇选举之际，里亚里奥伯爵必须驻留于罗马城外。里亚里奥遵循了这一命令，带领全军离开了罗马。

可是，卡特丽娜根本不打算服从这一命令。她拒绝的理由是圣天使堡的主人不需要服从枢机主教团的指示，在选出新教皇之前，作为城主有义务守护城塞。当然，这也合情合理。但她其实是担忧自己的家族因庇护者西斯都教皇之死而变得前途暗淡，所以为了能够让选出来的新教皇稍微对自己有利一些，就只能凭借圣天使堡向新教皇施加压力。她对枢机主教团的回答如下：“西斯都四世全权授予我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为城塞的城主，并不从属于枢机主教团。因此除了下任教皇外，城塞不能交付给任何人。”卡特丽娜在给出这一答复之后立即采取了行动。

那天，罗马市民度过了充满惊奇的一天。伯爵夫人率领了150个士兵占领了圣天使堡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台伯河从城塞前流过，河岸上不断地聚集起群众。他们因据守于这座被称为“统治圣天使堡的人将统治罗马”的难攻不破的城塞城主是女人而狂热不已。人群之中响起了称赞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呼喊：“公爵！公爵！”

卡特丽娜站在圣天使堡的石砌回廊上巡视着，从那里可以眺望眼前流动的台伯河，河的对岸是整个罗马，右边则是梵蒂冈。这个时候，指挥着守卫兵们的卡特丽娜美丽的身影上闪烁出格外残忍的美。

可是，背叛就出在身边。首先是枢机主教团的首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为了自己的野心，抛弃了亲戚里亚里奥家族。他物色好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下任教皇。在枢机主教中赞成他意见的还有拉斐尔·里亚里奥、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他们两个人也是卡特丽娜在枢机主教中的亲戚。枢机主教团通告说，如果不交出圣天使堡，就不召开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他们向卡特丽娜递交了强行通告之后，又开始与她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进行其他的交涉，命令里亚里奥将圣天使堡交给枢机主教团并带领家族离开罗马，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他们给出的条件是：如果执行，枢机主教团将支付给里亚里奥8000达克特，并确保弗利与伊莫拉的领地权。金币堆在了里亚里奥伯爵的面前。

当收到消息称丈夫接受了一切要求时，卡特丽娜醒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反抗是没有用的。25日的夜里，她离开了城塞。她在追赶丈夫前往弗利的途中得知选出了新教皇英诺森八世。这位新教皇齐伯[32]在西斯都四世的时代，是其反对者中最右翼的一个。而且，新教皇选举的幕后人乃是罗韦尔，这使得里亚里奥家族的前途看不见一点儿光明。

返回弗利的里亚里奥一家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虽然里亚里奥伯爵努力想成为一位好君主，但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教皇外甥地位的他，这样的努力为时已晚。他为了抓住民心而使用怀柔政策，或者采用强硬的镇压政策，但没有一样能够彻底执行。要统治已经习惯了几个世纪无政府状态的罗马涅地方民众，对于他而言，是过于沉重的担子。此外，他还必须考虑比这更为棘手的外敌。

1488年1月，他最大的敌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女儿马达莱娜与教

皇英诺森八世的儿子弗朗切斯凯特结合了。联姻意味着里亚里奥伯爵的两大敌人——罗马与佛罗伦萨缔结了稳固的关系。对于前教皇亲族主义下提拔的近亲，没有一个新教皇会对他们有好感，更不要说对罗马涅地方虎视眈眈且不忘杀弟之仇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了。不难推测，他与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获得领地的教皇联盟，从而瞄准里亚里奥伯爵的领地。拔除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作战根基，就在达成联盟时完成了。然后，只要时刻注意伯爵领地内的动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弱点，使之集中于反里亚里奥就可以了。弗利市内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奸细网络，向佛罗伦萨的洛伦佐汇报的信息骤然增加了。

里亚里奥伯爵为了俘获民心，首先强行实施了减税。他废除了被称为“达奇”的关税，这是在他还持有资产期间完成的。可是，积蓄的资产总有用完的一天。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的他，减税政策自然没过多久就停滞了。里亚里奥伯爵因为他那愚蠢的政治，只使得民心更加远离他。那个时候，担任征收税款、缴纳国库之职的奥尔西犯了一桩侵占事件。本就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不开心的里亚里奥在公众面前严厉地责骂了奥尔西，奥尔西吓得浑身发抖，深信自己一定难保平安。队长潘塞奇与伦奇两人正巧前来请求支付薪水，也因伯爵的不高兴而遭殃，被怒斥了一顿赶回去了。

看中这三人的是洛伦佐·德·美第奇。通过完美的信息网，弗利的情况逐一进入了洛伦佐的耳朵。在此之前，他计划了很多次暗杀里亚里奥的阴谋。虽然那些计划全都失败了，但他依旧执拗地寻找机会。佛罗伦萨向这三个人秘密地送去了金钱与武器。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仿佛像乘上了一艘大船一般充满了干劲儿。

三个阴谋者迅速开始了行动。奥尔西的一家甚至决定全体加入计划，准备在暗杀伯爵成功的同时，他们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而举行暴动。现在剩下的就是要尽量寻找里亚里奥伯爵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过，这一点也解决了。伦奇有一个外甥是伯爵的侍童，所以双方约定，

等到晚饭后伯爵一个人的时候，侍童就从城内的窗口发出信号。

1488年4月14日的傍晚，在衣服底下全副武装好的阴谋者全体集合于城前的广场上。那一天是广场的集市日，所以广场上挤满了正准备关上店门的商人、农民和急急忙忙购物的人们。阴谋者们就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只时不时地与伙伴交换下确认的视线。他们等待着侍童的信号。就在那时，他们看见了侍童从城内的窗口挥动着帽子的信号。转瞬间，奥尔西、潘塞奇、伦奇三人离开了人山人海的群众。城门的守卫兵在城市的势力者奥尔西与军队的两个队长的面前，只保持了直立不动的姿势。三人很顺当地进了城。

里亚里奥伯爵在城内自己的房间里吃了晚饭后，正悠闲地倚在窗户上，与两个秘书与侍从谈笑。看到奥尔西进了房间，他还很高兴地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还清被我侵吞的全部金钱了。"奥尔西一边说着，一边靠近伯爵，装作要下跪的样子，却从袖子底下抽出藏着的短剑，刺向伯爵。伯爵伸手想挡，可第二击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叛徒！"伯爵大喊，并用桌子当作盾牌想要逃跑。听到他的这一声，早已躲藏在屋外的潘塞奇与伦奇比他的动作还要快，一拥而入，哪还给他逃跑的机会。二人一把抓住准备逃跑的里亚里奥的头发，重重地将他摔在地。倒在桌子底下的里亚里奥，瞬间被短剑刺成了蜂窝，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死时42岁。

被吓得呆若木鸡的秘书与侍从，这时候才终于回过神来。"伯爵被杀了！"他们大喊大叫着跑出了房间。听到呼喊，4个侍从跑了过来。可是，这个时候广场上伺机多时的阴谋者们早已蜂拥入城，城内瞬间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伯爵夫人卡特丽娜连跑出自己房间的时间都没有，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并结束了。她刚毅地将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孩子们护到身旁，用椅子将房间的门抵住，但这些都是徒劳的。城内与广场上充斥着暗杀者的喊声："自由了，自由了！伯爵死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别丈夫的遗体，她与孩子们便成为暗杀者的俘虏了。

好看热闹的广场上聚集了群众，奥尔西与潘塞奇从两侧挟持着卡特丽娜，从中徒步穿过。在卡特丽娜的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在了地上，发出了声响。那声音是暗杀者们把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从城内的窗户扔到广场上发出的。有人叫了起来："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向我们征收苛税的家伙！"广场上的群众随着那喊声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蜂拥着冲到了尸体的旁边，剥去伯爵的衣服，拖着赤裸的伯爵尸体在广场上绕圈。在这疯狂的喧闹声中，卡特丽娜被带到了奥尔西的家中。

意大利的女杰

卡特丽娜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自我的女性。谋杀者们沉醉于成功暗杀里亚里奥的喜悦之中，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俘虏卡特丽娜之前短暂的间隙里，卡特丽娜已经派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去拉瓦迪诺城塞（Ravaldino）求见城主托马索·费奥（Tommaso Feo）。这个家臣带着她下达给城主的命令，告知了伯爵遭遇暗杀的事情，并命令托马索·费奥在坚守城塞的同时以伯爵夫人的名义火速向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与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请求救援。

被俘在奥尔西家中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僧侣们的轮番游说。阴谋虽然成功实现了，但是谋杀者们这才注意到，他们唯一倚赖的后盾洛伦佐·德·美第奇并没有丝毫动静。他们开始不安起来。然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在终于完成10年来的复仇后，打算隐瞒自己才是阴谋的幕后黑手。

他很担心自己的一点点举动会为一则来自威尼斯信息的传闻——“伯爵暗杀戏剧的真正作者是洛伦佐·德·美第奇”——提供证据。甚至当三个主谋在暗杀成功之后向洛伦佐写信请求保护时，洛伦佐也没有写一封回信，假装与他们毫无关联，彻底抛弃了已没有利用价值的三个人。

面对洛伦佐的冷酷，三个人绝望了。要将阴谋变成既成事实，不论怎样都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后盾。他们转向教会寻求帮助，弗利是教皇封土的国家。他们认为，通过成为教皇的直辖领地，就能守住自己获得的实权。为此，将切塞纳[33]的总督也是司祭的萨韦利设置为弗利政府的首席长官。不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让遗孀卡特丽娜主动将弗利呈献给教皇。为了说服卡特丽娜，僧侣们这才轮番前来拜访。对于那些一边称呼她为“我的妹妹啊”，实则巧言令色想要说服她侍奉天主的僧侣，卡特丽娜根本不予理会。她叫来了奥尔西，好像扔弃什么东西一般，只说：“带到一边去，我连他们的脸都不想看见。”即便如此，她开始考虑，如果在罗马教廷下达决定通知之前事情没有了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能回到自己的手中了。

谋杀者们正为卡特丽娜的刚毅大伤脑筋之时，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首先是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以米兰公爵的名义送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书，从米兰出动军队也只是迟早的问题。再加上，与弗利城临近的城塞城主托马索·费奥向里亚里奥家族发誓忠诚，更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交付城塞更没有半点儿可能。不安的他们想到的唯一法子就是把伯爵夫人卡特丽娜带到城塞前，让她来交涉。于是，卡特丽娜在谋杀者的包围之下被带到了城塞前。听到伯爵夫人有话要说，托马索·费奥站到了城墙之上。卡特丽娜请求他交出城塞，但托马索只一味拒绝。

于是，卡特丽娜将计就计。她对奥尔西一伙说自己进城去说服城主，但他们一伙人并不相信她。卡特丽娜继续说道：“你们的手上不是有我6个孩子作为人质吗？只要给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定会说服城主回来的。”托马索·费奥也趁机说，只允许伯爵夫人一个人进城。司祭

萨韦利首先同意了，奥尔西等人虽然焦虑万分，却也只能勉强应允。

城塞里从护城河的上方降下了渡桥。卡特丽娜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近城塞，过了渡桥。当渡桥被拉起的时候，牵拉的铁锁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正当那时，卡特丽娜一下子转过身来，两手做成拳头状，将大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间挥动着。就算不是贵妇人，这也是十分下流的动作，意思是性交，是在极端侮辱对方时的骂人手势。奥尔西一伙看到她这个动作自然怒不可遏，可是他们仍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他们按照约定，像傻瓜一样一直等着。

进入城塞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城主托马索·费奥的热泪相迎。他们马上就坐上了餐桌。卡特丽娜也忘记了两天来的俘虏生活，大快朵颐，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入睡了。

按照与卡特丽娜的约定，一直在城塞外等着卡特丽娜回来的谋杀者们，这才醒悟到自己上当了。他们大声威胁着，但那种虚张声势卡特丽娜只当耳旁风。奥尔西一伙无奈之下只能就此返回城里。

第二天，谋杀者们将卡特丽娜两个年长的男孩儿带到了城塞前，试图通过孩子要挟她。

被剑顶着的孩子们哭泣着呼唤母亲。

城墙上出现了卡特丽娜的身影。她赤着脚，披散着头发。奥尔西说，如果她不出城塞，就杀死这两个孩子。对此，她的答复正是马基雅维利等所有历史学家都在传述的一句话。

从从容容的卡特丽娜，一下子掀起裙摆，大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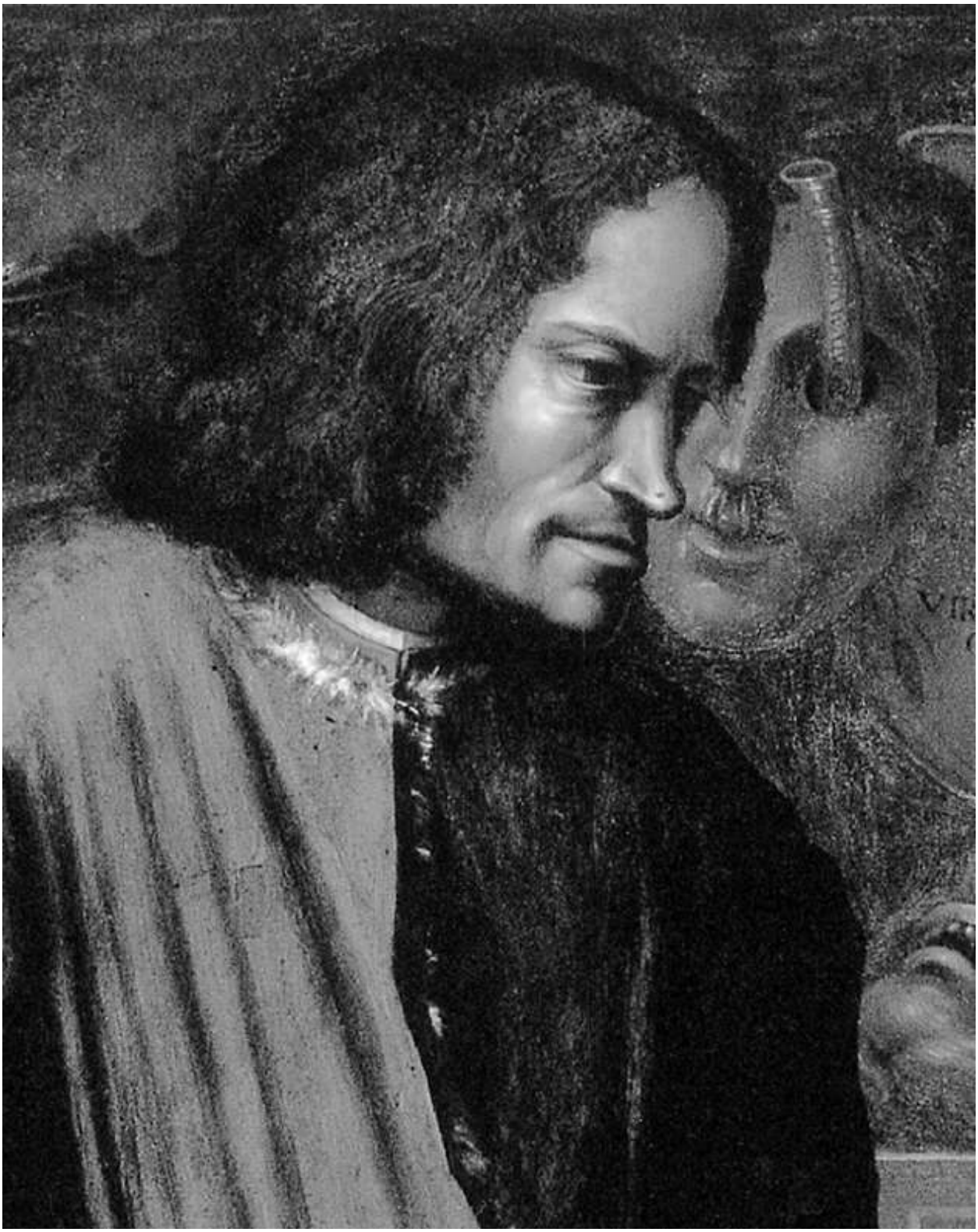
“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

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都懵了。

25岁的美丽伯爵夫人的这一胆量，让张口结舌的奥尔西一伙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完全呆若木鸡，因为从城塞发射出的炮弹就落在了他们身边。一众狼狈地逃回城内。

卡特丽娜并没有抛弃她的孩子们。在她被俘的时候，她告诫因为恐惧而哭喊的孩子们一段广为人知的话："这之前都没有杀你们，所以你们应该明白，这以后也不会有危险的。而且，你们不也流着以勇猛著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血吗？"卡特丽娜只是想先拔除敌人的爪牙，以此挫败谋杀者的意图。对于她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对于从未认为自己受过弗利市民们极大支持，也并不期待他们极大支持的卡特丽娜来说，最为幸运的是谋杀者不仅优柔寡断，而且真正的敌人罗马教皇与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如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所记录的那样，当时大家都认为里亚里奥暗杀事件只不过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与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为了占有弗利，好将它送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弗朗切斯凯特·齐伯而演的一出戏。



洛伦佐·德·美第奇

在这样的舆论面前，教皇与洛伦佐都不能随便地出手干预。特别是洛伦佐，虽然在背后支持了暗杀阴谋，但在暗杀成功之后就擦擦嘴巴，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所以，暗杀者奥尔西等人就变得孤立无援了。

抓狂的他们周旋于市民之间，向他们说明几天后教廷就将送来金钱与援军，所以在那之前必须攻击城塞，至少也要稍微破坏些城塞才行。

可是，民众对情势的洞察非常敏锐，没有一个人打算行动。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一直对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心存敬畏的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在米兰斯福尔扎的督促下，终于准备行动了。

卡特丽娜指望娘家斯福尔扎的救援而争取时间的计策成功了。29日，丈夫被杀的15天后终于传来了情报：米兰军队已经逼近弗利8公里之外。不仅有米兰的军队，还有博洛尼亚、曼托瓦以及费拉拉的援军，总计1.2万名。

得知这一消息的弗利民众当即决定了立场。先前被称为解放者的奥尔西等人，立刻变成了被讨伐的暗杀者。而给予谋杀者毁灭性打击的是罗马教廷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咨文宣布，被暗杀的里亚里奥伯爵长子奥托维阿诺[34]为弗利的正统国主，遗孀卡特丽娜为其正式监护人。

那天半夜过后，奥尔西、潘塞奇、伦奇及参与了阴谋的所有人，拖家带口，逃离了弗利。他们起初逃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切尔维亚[35]，但威尼斯没有接纳他们。不得不离开的众人，开始了一生流亡的命运。

另一方面，在拉瓦迪诺城塞等待时机而待了13天的卡特丽娜心里明白，米兰军队的到达也就意味着她的胜利。按说应该沉浸于喜悦的她却显得过分冷静。她拒绝让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如果高兴得过头而将米兰军队迎进城里，那么在1.2万人的铁蹄之下，弗利城是不可能保全平安的。当时的军队不能按时领得薪水，所以在征服地进行掠夺被视为理

所当然的权利，获得了半公开的认可。对于米兰军队来说，一定也是计划着在到达弗利后进行掠夺的。卡特丽娜明白这一点，所以拒绝了援军进入弗利城。丈夫死后，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将民众的感情挽留于她的一边。

然而，就算是真诚出于对民众的关心，在她时常和平民划清界限的贵族心里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排斥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因为她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

根据以往的经验，卡特丽娜明白所谓亲族是根本靠不住的。尤其是自己的弟弟加莱亚佐虽为当今米兰国主，但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叔父卢多维科·伊鲁·摩洛手中。她甚至连娘家斯福尔扎家族都不相信，如果以米兰送来的援军为后盾，让军队驻扎于弗利，那么，小国弗利在这种形势之下势必变成大国米兰公国的属国。情况恶劣的话，还可能被吞并。这才是卡特丽娜最为担忧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男性国主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打着这儿的算盘，所以哪怕是亲族也不得不提防。8天后，在没有表露出一点儿真正意图的她的出色外交下，米兰全军非常平和地再次返回北部。

1488年4月30日，这一天正是卡特丽娜执政的第一天。在四周米兰军队的将军们的随从下，卡特丽娜骑马出了城塞，进入弗利城，胜利而归。半个月前，那些一边拖拽着丈夫的尸体一边大声喊叫“奥尔西！奥尔西！”的民众，此时又朝着马上的她喊道：“卡特丽娜！卡特丽娜！奥托维阿诺！”

搜捕暗杀者的行动开始了，三个主谋早已逃跑，只抓住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奥尔西的父亲及几个女人。这个85岁的老人被施以极其残忍的刑罚。老人在屋中被捕后，头颈上被拴了绳索，前胸的衣服敞开着，袜子只剩一只，双手捆在后背上，被士兵连推带搡地带到了街上。他被判处

了死刑。被带到广场上的老人，脚被士兵拴在马上。在广场上用圆石子铺成的石板路上，马将活生生的老人不知拖曳了多少圈，老人终于死了。同暗杀者对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所做的行为一样，老人的尸体从城内的窗口被投到了广场的石板路上。

但是，女人们都被无罪释放了。卡特丽娜似乎不想再执拗地搜捕暗杀者了。以卡特丽娜后来的残忍来看，此时她的复仇是如此简单，令人有点儿不可思议。不过，卡特丽娜好像并不怎么爱她那个被杀的丈夫。他比她年长17岁，只是一个粗鄙的暴发户，尤其是晚年的时候经常生病而心情不好的他与卡特丽娜的生活，对于卡特丽娜来说并不是那么愉快。一年前，米兰大使以她弟弟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建议她访问米兰。自从她结婚后，连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卡特丽娜对大使所说的话都记录于大使写给公爵的信函中。为了将拒绝邀请的卡特丽娜的话传达给米兰公爵，维斯孔蒂大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写着信，那时，卡特丽娜悄悄地走了进来。她流着泪请求再也不要以米兰公爵的名义来邀请自己——因为如果丈夫认为是我太想去米兰而在背后搞动作，让公爵来邀请我的话，那我会被苛待的。她婚后的生活情形，便是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出来了。埋藏于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的丈夫的坟墓，卡特丽娜活着的时候从未去拜祭过。

一名青年倚靠在窗边，绯红色的缎子上衣外，一件金色锦缎制作的短披风轻轻地披在肩上。女子将椅子拉近到青年男子的身边，上身穿了一件轻柔的白色缎子的短袖，松松地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面对着男子。佛罗伦萨的大使普奇向美第奇报告说，当他进入弗利城的一个房间时，二人在黄昏柔弱的光线中浮现出的身姿犹如绘画一般，美得令他在一瞬间静止而不能移动。

卡特丽娜恋爱了。

柔美的肉体，年轻得无法抑制冲动的大胆和热情，安静的举止中灼人的目光，她对这个比自己年轻10岁的雅各布迷醉得不能自拔。

可是，这场热烈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过多的障碍。刚满18岁的雅各布·费奥，虽然是卡特丽娜独一无二的忠臣托马索·费奥的弟弟，但其身份却是死去的里亚里奥伯爵的侍童，与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的身份天差地别。

这场恋爱的传闻不仅流传于弗利的大街小巷，还远传至米兰与佛罗伦萨。米兰的伊鲁·摩洛甚至发来信函，强硬地命令卡特丽娜注意自己的行为，提醒她现在丈夫刚刚去世，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她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引起局势动荡的动作。

对于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失去米兰的支持将意味着全面孤立，可是她继续装聋作哑。为爱情疯狂的她，非但没有接受叔父的忠告，反而好像在1490年秘密结婚了。为了与爱人维持关系，卡特丽娜也过于忠实自己的心了。最先得知结婚消息的是佛罗伦萨方面。对此，不仅米兰，连罗马教廷也大吃一惊。弗利的正统国主是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作为遗孀的她担任了摄政。法律规定，当她与其他男人再婚时将失去摄政权。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依旧作为弗利事实上的主权者而留下了，这成为征讨弗利的绝好理由。

无论米兰、佛罗伦萨与罗马如何执拗地进行调查与质问，卡特丽娜仍旧隐瞒结婚的事实。那个时候她的书信，让人充分体会到一个在危险中求生、恋爱的女人的气息。面对外部时表现得如此强硬，连一步都不肯退让的卡特丽娜，在情人的面前却是个保守的女人。为了情人，她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甘愿冒失去国家主权的危险，坚决地秘密结婚了。继而，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际，她向国王求得了法国男爵的称号。

可是，要让雅各布珍视卡特丽娜这般深切的爱情，他未免太不成熟

了。他慢慢地滥用起她的爱情——俨然是一国之主，出城的时候若没有大批侍从跟随，他就不肯出去；国家财政大权也一手独揽，其骄横权势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

不过，比起这个，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对卡特丽娜怀有强烈的嫉妒心。他决不允许她与其他男人单独待在房间里，即便那个男人是家臣，他也必须在场。在公开的宴席上，也从没有过雅各布不在卡特丽娜身边的情况。国政也变成由卡特丽娜讲述，再由雅各布进行确认的样子。有一次，那不勒斯的将军卡拉布里亚公爵访问弗利，雅各布不离卡特丽娜左右，这件事成了整个意大利的笑料。

不管怎样说，卡特丽娜是一位有官方立场的女性。形势演变成不得不发生什么了。

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16岁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很自然地，在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肆意摆布母亲的雅各布的怨恨。

一天，在全体家臣都在场的宴席上，雅各布稍微取笑了一下奥托维阿诺。就在那时，在奥托维阿诺心中积聚起来的不满便向着雅各布爆发了。愤怒的雅各布刚一站起来，就对少年掴了一巴掌。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卡特丽娜。她坐在那里，脸颊上涌起了血丝，眼泪汪汪。但是，她只是嘴唇直哆嗦，没有说出一句话。从那时起，家臣们对奥托维阿诺的同情变成了对雅各布的憎恨。

两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家臣们被雅各布抢占了权力，便越来越憎恨他。特别是已故伯爵里亚里奥的家臣盖第兄弟等人，在奥尔西暴动之际对卡特丽娜保持了忠诚，现在是奥托维阿诺身边的重臣，他们对雅各布的愤怒尤为强烈。于是，为解救不幸的伯爵夫人与奥托维阿诺，以盖第兄弟为首的重臣们开始设计刺杀雅各布。

1495年8月27日，当《圣母颂》的钟声响起时，黄昏微弱的阳光将灰色的矮矮的石头街道晕染上一层金色。卡特丽娜正要返回即将沉没于暮色之中的弗利城。那天她与两个年长的儿子及雅各布一同去狩猎，天气非常好，收获了许多猎物。就连大批陪同的护卫兵与女官们也很愉快，一行人唱着歌，穿过了通向市街的基法诺伊亚城门，来到了莫拉提尼桥。

可是，那里埋伏着谋杀者们。乘着马车的卡特丽娜最先通过了。接着，骑马的两个儿子也过了桥。最后是雅各布骑马来到桥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男人窜了出来，堵在了他的马前，是安东尼·盖第。受惊的马前蹄悬空，雅各布刚想拉住缰绳时，安东尼·盖第二话不说，拔出短剑便撞了上去，剑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腹部。雅各布禁不住踉跄了一下，缰绳脱了手。此时在一边等待的多米尼克·盖第一把夺下了缰绳，跨上马，压在受了伤的雅各布身上跑了。多米尼克·盖第策马跑进了附近的圣贝尔纳多教堂[36]，等待多时的两个僧侣与其他谋杀者的剑如雨点般刺进了马与雅各布的身体。临死的痛苦呼喊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的尸体被直接扔到了井里，这时他刚满24岁。

听到第一次声响的时候，卡特丽娜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从乘坐的马车中下来，取了护卫兵的马，骑马跑向城塞。

护卫兵们与谋杀者之间的砍杀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安东尼·盖第大喊道，这次的暗杀是受伯爵夫人之命。不久，他们开始呼喊：“奥托维阿诺！卡特丽娜！”这一呼声由盖第兄弟带头，朝着城堡前的广场，一条街一条街地扩散开来。

一到广场，安东尼·盖第就向聚集的群众说明，这次谋杀是按照伯

爵夫人及奥托维阿诺殿下的命令执行的。可是，有的人并不相信，他们去城塞向伯爵夫人询问安东尼·盖第所言是真是假。卡特丽娜传见了他们，可是，恋人被杀的悲伤与愤怒，令她说不出话来。她目光呆滞，手攥成了拳头，嘴里好不容易迸出了一句话："谋杀！混账东西！"听到这个回答，先前还站在广场中央的安东尼·盖第等谋杀者们现在成为士兵与群众到处追赶的对象。

次日夜里，雅各布的尸体被运往圣哲罗姆教堂，以骑士的身份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席上，沉浸于巨大悲伤之中的卡特丽娜公布了她与雅各布·费奥正式婚姻的事实。

接着，卡特丽娜开始了疯狂的复仇。她首先抓捕了受了伤的安东尼·盖第。他赤裸着身体，头颈被吊在大教堂的阳台外，尸体在那里挂了三个月。弟弟多米尼克虽然逃跑了，但另一个人却因受拷问而全盘招供。包括2个僧侣在内，7个谋杀者全部被带出广场，被一圈圈地捆起来后再由飞驰的马拖曳到雅各布被杀的桥上。紧跟其后的士兵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地痛骂谋杀者，被搞得精疲力竭。在城堡前的广场上，雅各布的侍从处决了谋杀者们，有两个还未咽气的僧侣也和其他鲜血淋淋的尸体一样，被悬吊在安东尼·盖第的尸首旁。或许在今天，人们对这样的残酷可能还抱有厌恶感，可是，后来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王朝制定了三个F作为治理民众的三大原则，即Farina（小麦粉）、Festa（祭祀，庆典）、Forca（绞首台）。当时的民众经常将第三个F与第二个F等同看待，观看沾满鲜血的裸体刑罚之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欣赏。

就算此时卡特丽娜停止因恋人被杀而泄愤的行为，这些动作也足够残忍了，可是一切还没有结束。她早就派了刺客去刺杀那个唯一逃脱成功的多米尼克·盖第，同时，将他留下来的身怀六甲的妻子与三个孩子带到城塞，在那里杀害了他们。哥哥安东尼·盖第的家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5岁的长子被砍了头，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与他们的母亲都被活活地扔进城塞中的枯井，被锁上了井盖。奥尔乔利、马尔克贝利

等人虽然出身名门，却也无法避开她的怒火。参与了阴谋的全体人员的家人与亲戚、女人与孩子统统被杀光。“给我赶尽杀绝到家谱的尽头！”

卡特丽娜的这个命令被冷酷地执行了，连她自己也说：“今日处决这个，明日处决那个，面不改色地宣判极刑。人数之多，连我自己都不能一一记得名字了。”在十余天里，40人被处以死刑，50人被投入监狱。弗利城中，被拖走的女人与孩子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就连整个罗马涅地方都对之不寒而栗。她的极端残忍不仅让罗马涅地方哑口无言，就连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教皇责难了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随心所欲的态度。在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写给米兰公爵伊鲁·摩洛的信函中，以及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写给米兰公爵的信函中都能看出当时的舆论一致谴责卡特丽娜过激的行为。

在此之前一直将卡特丽娜作为半个女人而轻视的弗利人，受到了严重打击。看似因恐惧而恭顺不已的弗利民众中，也有人对她慢慢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甚至在500年后的今日，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弗利市，据说母亲在责骂孩子的时候还会告诫：“卡特丽娜伯爵夫人来了。”

卡特丽娜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因恋人被杀而愤怒得忘记了一切，做出了肆意的愚蠢行为。她那近似疯狂的复仇，使得处境较之从前愈发艰难。对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意图，不能放松警惕；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动向也不能忽略。威尼斯的游击队以前允许弗利的前国主奥尔德拉菲（Ordelaffi）流亡至拉文纳，试图利用他们达到对罗马涅地方的野心，这些游击队也经常对弗利的周边造成威胁。

在周边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至少国内都应该凝聚于其座下。可是，家臣们对于卡特丽娜的忠诚心也开始动摇了。现在他们好不容易能够聚集在一起，可以说，那是出于对她的畏惧心理。

可是，没有什么比长子奥托维阿诺的背离更伤透一个做母亲的心了。已经快要20岁的他，虽然是正统国主，但至今都没有获得行使实权的机会。并且，他的婚姻大事也是由母亲一手给回绝了。米兰的伊鲁·摩洛为曼托瓦贡扎加家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及其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所生爱女提亲，罗马方面为教皇女儿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前来提亲，她都根本不予理睬。特别是关于卢克雷齐娅的婚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恳切地拜托她，可是卡特丽娜强烈地抵触这个曾经与乔凡尼·斯福尔扎——与自家同姓的斯福尔扎家——同床共枕的女人，拒绝让她与儿子结婚。这又引起了教皇的怒火。至此，如果奥托维阿诺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男人的话，就可能将母亲作为对手，引发什么重大的事件。可是，身材肥胖的他只是个跟在女人们屁股后面跑的无能之辈。

普通的母亲会为儿子的结婚而高兴，但卡特丽娜不同。对于她来说，儿子结婚就意味着自己将失去权力。

弗利，地处由北至南纵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节点上。当时，比起翻越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山脉，从米兰经摩德纳、博洛尼亚，穿过伊莫拉、法恩扎、弗利，到达里米尼、佩萨罗与亚得里亚海岸，从那里再进入内陆，来到乌尔比诺、佛罗伦萨及罗马，这样的路径才是主要路线。由此可见，弗利虽然是一个小国，却非常重要，它之所以被称为罗马涅地方的门户，原因也就在于此。

可是，小国毕竟是小国。卡特丽娜作为这个贫穷小国的国主，经常为金钱所困，不得不制造武器以出售，或者将士兵借给他国以赚钱。

1494年10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米兰的伊鲁·摩洛请求卡特丽娜允许法国军队借道弗利。但她明白，这个叔父不仅从自己年轻的弟弟正宗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那里夺取了实权，还抢走了他公爵的爵位；法国军队的入侵，就是叔父为了掩护野心而进行的设计，是叔父一手引导的。她对伊鲁·摩洛老奸巨猾的政治手段早已怀有戒心。卡特丽娜对叔父的要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给予答复。可是，法国军队

为了到达佛罗伦萨，无论如何都要从她的弗利领土上借道。换言之，这意味着弗利的伯爵夫人的动向对于法国军队的正面敌人——那不勒斯国王与罗马教皇而言，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局势。罗马赶紧派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前往弗利，那不勒斯也派了卡拉布里亚公爵到她的身边。

这一瞬间，卡特丽娜变身为商人，她掂量着依附哪一方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米兰与法国方面的使节、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的使节连日来交替前来拜访，请求卡特丽娜的答复。她虽然没有拒绝会见，但是都不给予明确的回答。不久，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终于提出了提供1.6万达克特的条件，卡特丽娜便定下了主意。为了金钱，她暂且假装附和罗马和那不勒斯，私底下则允许法国军队秘密通过。因为对于她来说，米兰依旧相当于庇护者，伊鲁·摩洛的意愿不可忽略。

自那之后过了5年，1499年7月，一个年轻的佛罗伦萨人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到达弗利。他就是时年30岁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派他与弗利的女国主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就其长子奥托维阿诺出任佛罗伦萨军队职务一事进行交涉。从上一年起，奥托维阿诺就率领了一支军队，与佛罗伦萨军队一同参加了比萨攻防战。但是，从那之后，在关于契约的续约上，因为弗利与佛罗伦萨之间对雇佣兵费用的异议而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首先，对于卡特丽娜来说，每年1.7万达克特的收入是不可忽略的金额。而且，就算没有表露在外，但弗利对佛罗伦萨一直持有好感，是非常愿意继续执行雇佣兵契约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方面打算将雇佣兵费用降至每年1万达克特。可是，如今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两个共和国因为比萨战役而关系恶化，所以卡特丽娜的城塞对佛罗伦萨而言，在与威尼斯的对抗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基雅维利接受的指示就是，既要尽量减少雇佣兵费用，又要维持与弗利的友好关系。这是一项非常困

难的任务。对于马基雅维利个人来说，这也是30岁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

更不用说对手是以残忍、勇气、胆量而闻名的当代歌剧的女主角。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信心满满地前往弗利也是自然之事，可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登台却是以伯爵夫人的全胜而告终。

7月16日，马基雅维利抵达弗利。他立刻提出与伯爵夫人会面。夜里10点，他在城堡中一个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与这个著名的女人会面了。卡特丽娜已经36岁却依旧美丽苗条的身体上披着华丽的衣服，那凛然的美貌让头脑冷静的马基雅维利仿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次日，为交涉而登上城堡的他，首先为城堡内佛罗伦萨人的人数之多吃了一惊。他更无法理解在会谈的场所中为什么要列坐米兰宫廷的家臣。伯爵夫人的心思究竟是在佛罗伦萨一方还是在敌人米兰一方，他根本判断不出。

显然，年纪尚轻的马基雅维利不能理解卡特丽娜的这一策略。卡特丽娜对马基雅维利总是很亲切温和，让他安心。但是，她对交涉的事件却一点儿也没接受的意思。在那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城堡向米兰运出武器与人马。马基雅维利渐渐变得焦虑起来，陷入了卡特丽娜的算计中。

6天后，卡特丽娜对依旧强力主张“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了与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准备着做任何事”的马基雅维利，轻轻地还了一句：“与其继续讨论事情，不如找出共同点更为合适吧。”要之，在雇佣兵费用的问题上要互相让步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只得妥协，在佛罗伦萨指示他的1万达克特之上又增加了2000达克特。

24日，协议签订。马基雅维利在这第一次外交官的经历中清楚地看到了被大国包围的小国政治的真实情况。在那之后，他对弗利的伯爵夫

人也怀着深刻的敬爱之心，称其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

在国政方面发挥了巧妙才干的卡特丽娜也是一个一定要爱上某个人，一定要由某个人来爱她才能生存的女人。

在马基雅维利访问弗利的三年前，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由众多侍从跟随的男人出现在弗利的卡特丽娜面前。那是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的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他的祖父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祖父是兄弟。可是，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正宗国主——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皮埃罗逃出了佛罗伦萨，所以在那之后，乔凡尼与哥哥洛伦佐的出头之日也到来了。这个乔凡尼作为大使，被送至罗马涅地方的要塞——弗利。

29岁的他虽然没有贵族的称号，却是出身于比贵族还要贵族的美第奇家族。与此前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人相比，他具有自由民主的态度，而被称为“民众之人”（Il Popolano）。但是，他那贵族式的优雅与细腻的举止、深厚的修养，依旧诚实地体现出他出身于名门之中的名门。

他也被称为“美男子”（Il Bello）。我们从现今留存于佛罗伦萨的瓦萨里[37]的肖像画中也能感受到他优雅而纤细的外貌，湿润而性感的嘴唇，甜蜜的眼睛，垂在头颈上美丽的卷发，是与嫡系洛伦佐·德·美第奇或者弟弟朱利亚诺的托斯卡纳情调——尖刻而生硬的风貌迥异的。比起他们，他更像波提切利笔下的男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

此外，这个年轻的公子还非常多情。以前，他曾经因为某个贵妇

人，甚至用剑对准了皮埃罗·德·美第奇。不久，年长他4岁、依旧美丽而热情的卡特丽娜与他产生了爱情。

乔凡尼在卡特丽娜安排好的城塞中住下了，卡特丽娜平时也更喜欢住在城塞里。可是，在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关系不好的时期，佛罗伦萨大使与弗利统治者之间的爱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获得周围的祝福。米兰的伊鲁·摩洛命令博洛尼亚的米兰大使火速查明二人之间关系的真伪，顺便也威逼卡特丽娜自己做出回答。

卡特丽娜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忽略对于她来说现在唯一的庇护者、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而擅自行动。她语言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是没有叔父大人的允许是不会结婚的，若是听信博洛尼亚地方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传闻，那么自己已结了十余次婚了。

可是，婚礼还是秘密举行了。将所爱的男人一直作为情人，对卡特丽娜来说是做不到的。不同于之前那个出身于侍童的雅各布，她与乔凡尼的婚礼在门第上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必须考虑政治上的因素——米兰的伊鲁·摩洛、威尼斯，以及意图从罗马涅地方的名义主人转变成实际主人的波吉亚教皇。在那个时代，以她一个小国国主的地位，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与所爱的男人结婚的。

卡特丽娜的这场婚姻，在官方方面继续隐瞒着。不过，似乎没过多久，就借孩子出生的机会，独独获得了叔父伊鲁·摩洛的认可，尽管是秘密地。1498年7月，佛罗伦萨市对卡特丽娜及其孩子们授予了佛罗伦萨市民权，但是在文件中完全找不到乔凡尼的名字。

他们在弗利的城塞中秘密而幸福地经营着二人世界。1498年4月，一个男孩儿出生了，取了伊鲁·摩洛的名号。这个取名为卢多维科的孩子，在后来父亲去世后，与父亲一样也被称为乔凡尼。

在卡特丽娜诸多的子女中，这个孩子是唯一一个继承了母亲血脉的孩子，后来他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军人。他有一个绰号是“黑队的乔凡尼”，其由来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全部身穿黑色的军服。

可是，卡特丽娜这场最后的恋爱，也没有维系很久。乔凡尼·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在儿子出生数月后，在与佛罗伦萨军队共同作战的比萨战场上，因病无奈归来。据说他患的是美第奇家族遗传的胃病。他去了弗利附近的温泉疗养，病情并不乐观，但卡特丽娜国政紧张，不能脱身。

正巧那时米兰公爵的使节抵达弗利，他的信函中显示出她艰难的立场。“抵达弗利后，我立即拜访了公爵夫人，可是夫人似乎马上要出发去什么地方。夫人说她去郊外的城镇散散心就回来。但是我派人秘密进行了探访，她似乎是去了圣皮埃罗的温泉看望乔凡尼·德·美第奇。他的病情非常糟糕。”最终，卡特丽娜还是遭遇了丧夫的不幸。乔凡尼死在了匆匆赶来的卡特丽娜的怀中。他的遗体被运回佛罗伦萨，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墓地。

乔凡尼死后，为了他留下来的儿子即后来的“黑队的乔凡尼”，也应美第奇家族的希望，卡特丽娜公布了与他的婚姻状况。现在还留存着当时制作的刻有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德·美第奇字样的纪念章。这个斯福尔扎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意大利名门之中的名门的结合——诞生的“黑队的乔凡尼”及其后代都非常出色。他的儿子科西莫（Cosimo）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升为公国时的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国[38]的公爵，其子孙遍布整个欧洲的王室。在法国，从亨利四世起一直延续到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在西班牙，一直延续到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英国，一直延续至查尔斯二世[39]。

敌人——波吉亚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曾这般断言的卡特丽娜，终于遇到了让她心脏受到击打的时刻。1499年的夏天，切萨雷·波吉亚终于有所行动。那是她对年轻的对手马基雅维利展开出色外交仅仅几个月后发生的事情。她虽然是一介女流，却以一国之主的身份在12年里坚守了国家。对于这样的卡特丽娜来说，以往的对手都是轻量级的。她用镇压政策一一平息了领地内的阴谋、叛乱与游击战；而与那些大型的外敌如佛罗伦萨、罗马教廷、威尼斯等，暂时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他们，她以巧妙的外交小谋略处理了至今的一切事项。可是，这次的敌人是一个大人物，卡特丽娜必然感到自己头一次遇到了难关。

在回到开头那场战斗的场面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事情的经过。当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的猩红色圣袍被宝剑取代后，他通过婚姻成为瓦伦蒂诺公爵，背倚教皇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教会势力，又接受了妻子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以再度征服教会领地的名义征服了罗马涅地方，意欲将其作为建立自己王朝的开端——他的这种野心终于开始付诸实践了。对于意大利来说，遇到了同5年前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入侵时相同的危机。

但是，与上次相比，情况有所不同。第一，5年前的彼时，查理虽然具有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最终也将米兰公国的伊鲁·摩洛升级为正统公爵，但他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一点儿野心，只有那不勒斯王国占据了他的头脑。对于这位查理，意大利的其他诸国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托瓦，与他至少都是对抗的关系。

但是这一次，情况逆转了。那不勒斯王国虽然依旧是被瞄准的目

标，但米兰的伊鲁·摩洛成为对米兰公国要求继承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此外，通过罗马教廷的呼吁，英国国王、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与路易十二结盟；意大利诸国——与斯福尔扎家族处于仇敌关系的威尼斯自不必说，就连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也与教皇的行动一致。孤立一人的是5年前矜夸老练政治全盛的米兰公爵伊鲁·摩洛。“打倒斯福尔扎”的标语不仅是路易十二的，而且成为全意大利的呼声。瞄准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路易十二，抱有征服罗马涅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以及巩固二人背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整个意大利在这三人的面前，只能任由摆布。伊鲁·摩洛将全部精力都投在了防卫战，耽误了政治军事上的交涉。为了东山再起，他断然舍弃了米兰，逃到了德国。

轻易就将米兰攻陷的法国军队，终于按照与教皇的约定，将矛头对准了罗马涅，以援助切萨雷。

罗马涅——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这块地方，分立着11个小国。它从前曾经是教皇的领地，但在教皇长达70年的阿维尼翁俘虏时代[40]，大小豪族们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虽然从教会获得了教皇代理的名义，但常常延迟缴纳地租，事实上已经从教会完全独立出来。如何处置不恭顺的他们，对于历代教皇来说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除了著名的仁政国家费拉拉与乌尔比诺，其他国家都实行苛政与镇压，百姓的不满没完没了。

可是，这是站在全意大利的立场上的情形。对于成为众矢之的的罗马涅诸侯们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作为罗马涅的咽喉，弗利因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第一个攻击地。这也意味着卡特丽娜将迎来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她首先使用了外交手段，试图打开这一局面。使节携带着拖欠多年的地租前往罗马。但是，抵达罗马的弗利使节结果只吃到教皇的闭门

羹，亲戚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虽然从中斡旋，但也被教皇无视了。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曾经倚靠过死去的丈夫的佛罗伦萨，以及向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请求援军都失败了，卡特丽娜站在或是逃跑或是驻留应敌的岔道口上，已经完全孤立无援了。

很多人看到卡特丽娜在深秋的罗马涅原野上骑马奔驰的身姿，看到她在领地内的各城塞里进行整备以及指挥前线的身姿。特别是与弗利城相连的拉瓦迪诺城塞，为了能够在那里固守城池与敌人对战，运入了粮草、枪支、大炮、武器以及大量马匹。这座城塞对卡特丽娜而言，是有很多回忆的地方。在第一任丈夫被暗杀之后，她成功地进入城塞而重新统治国家；在艰难的国政间隙中，她与第二任、第三任丈夫也是在这座城塞中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时光。现在，她又选择将这座城塞作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场所。

为了准备防卫战，农业用水停止供应。可能成为障碍的树木被全部砍掉，农民们也被强迫在4个月内搬到市内。卡特丽娜命令每个市民都要承担若干百姓的住宿，但是她忽略了因为这件事引起的市民不满，而只专注于加固城塞。她的这一做法，后来被马基雅维利写进了《君主论》的“城塞有益或无益”一章中。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卡特丽娜来说，不引起民愤比加固城塞更为安全。绝对称不上仁政的卡特丽娜，因为对民众实施专制政治而使得民众的心完全离开了她。

但是，卡特丽娜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她的黑色缎子的衣服上，法式天鹅绒帽子的下面露出松松扎起的金色发辫；佩戴男式腰带，腰里挂着一个装满金币的袋子，准备用来散发给士兵们以示鼓励；手持长剑，话语也很少，或是徒步或是骑马奔走于士兵之间。美丽的伯爵夫人的身姿充满了残忍的美丽，令人恐惧却又心醉沉迷。卡特丽娜就这样等着切萨雷的到来。

11月9日，切萨雷·波吉亚率领1.5万人的大军终于从米兰出发了。大军通过了曼托瓦侯爵的领地，首先朝着伊莫拉前进。伊莫拉的民众觉得，只要能够将他们从迄今为止的灰色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者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他们向卡特丽娜发誓忠诚的舌根尚未干燥之时，又一致去迎接切萨雷了。11月25日，切萨雷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进入了伊莫拉城。接着，号称罗马涅地方最强战略工事之一的城塞也在15天后沦陷。

伊莫拉沦陷的消息给卡特丽娜以极大的打击，从未顾虑到一丝一毫民众意志的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好胜之人，只是给行政委员会会长送去了这么一封质问信。“弗利市民是打算对抗瓦伦蒂诺公爵，还是准备效仿伊莫拉市民？”长老们将答复带到了城塞，毕恭毕敬地坐在这位女国主的面前，但是回复的内容却与她暗自期待的大相径庭。“我们认为，与此前推翻了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这次又战胜了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法国军队进行对战是毫无意义的。”接着，他们还劝说，就算卡特丽娜此时回避应战，拱手让出弗利，但在教皇去世、切萨雷随之倒台时，她仍有机会再次回到弗利。

但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因为他们对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们的统治已经厌烦透顶了。并且，他们还听说切萨雷对沦陷的伊莫拉给予了宽厚的待遇。卡特丽娜再也不想听他们的意见了，她觉得与其被虚伪的忠诚背叛，还不如让他们自由选择，她也不再期望市民们的协助。此时，弗利实际上在切萨雷进攻之前就已经敞开了城门。

可是，卡特丽娜还没有放弃。因为有第三任丈夫的关系，她把儿子们与重要的证件及珠宝等一起托付给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她一个人与七拼八凑起来的2000名士兵备战绝望的防卫战，在城塞里闭门不出。她依旧寄期望于叔父伊鲁·摩洛东山再起，还有姐姐的婆家——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援助。她心想着要尽量拖延时间，其间，叔父与姐夫一定会派援军来的。

1499年12月19日，一大早就下起了雨。下午，切萨雷进入了弗利城。他骑着白马，在甲胄的外面套着丝绸衣服，头上戴着插了白色翎毛的黑帽。在他的身后，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官伊弗·达莱格莱也骑着马前进，后面跟随着弗利的高官们。在1.5万名大军的后面热热闹闹地跟着当时战争的附属物——酒店老板、厨师及妓女组成的人群。弗利的民众还给广场上的铜像穿上了教皇的礼服，以示欢迎之意。弗利的市民们家家户户都对切萨雷及全军提供住宿。

切萨雷在轻取伊莫拉之后，也准备一口气拿下弗利。他也得知，一度舍弃米兰的伊鲁·摩洛在瑞士获得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秘密援助，准备回归米兰。如果伊鲁·摩洛采取的行动对处于米兰的路易十二有所威胁的话，可以预见路易十二将对现在服从于自己的法国军队下达返回的命令。所以，他想在那之前攻下弗利。切萨雷必须加快速度了。这个时候，他也使用了他一贯的手段——弃力攻，主协商。

一天早上，在远离市街的城塞前忽然响起了喇叭，于是，城塞的塔上出现了数名士兵。喇叭手忽然大声喊道："公爵阁下想与伯爵夫人谈话！"此前一直骑在马上的切萨雷在那时下了马，站在城塞对面的护城河岸上。城垛上显露出卡特丽娜的身影。这个今天已成为监狱的城塞的城墙，高不足10米，从城墙上方向下面的护城河对岸喊话，感觉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

护城河的对岸站着刚才提到的头戴插了翎毛的黑帽子的切萨雷，他将帽子低低地拿在手里，优雅地低下了头。卡特丽娜面对他，也毫不示弱，和和气气地弯下了腰。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英雄与女杰的相会，当时，切萨雷24岁，卡特丽娜36岁。

"夫人，"切萨雷开始说道，"您应该知道所谓国家命运是一种如何善变的东西。我听说您在罗马的时候对历史非常有兴趣。现在，正是使

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了。在此，我不会解释我的目的与现在的形势，因为想必您是完全清楚的。我只是希望表示我对您的尊敬，请您了解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令您不幸与悲伤的想法。

“我会向教皇请求，保证您及令郎们受到良好的待遇。您可以搬到罗马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您喜欢的地方。我自己打算成为这一约定的保证人。如此，您与跟随您的很多人都将避免可能遭遇的灾难，避免这场腥风血雨。以前您是全意大利著名的英勇之女、贤明之女，但您是否知道现在的您被称为鲁莽而疯狂的女人？夫人，请听取我的请求，考虑开城投降吧。”

卡特丽娜站在城塞上听着，面不改色地说道：

“公爵阁下，运气是帮助勇士而抛弃懦夫的。身为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不论遭遇怎样的不幸，我都决然地准备将这不幸的轨迹一直画到我人生的终点。我也知道，国家命运是怎样一种容易改变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玷污作为我的心灵支柱即我祖先的名字，则是非常可耻的。您说，您不想告诉我您内心的目的，那是因为您并不想听我对那个目的做出的回复吧。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仍然怀有善意的心情。但是，我不能相信刚才以您的名义或是以教皇圣座的名义做出的那个承诺。您是否知道，世间认为波吉亚的话没有多少价值，对于为了儿子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的教皇又是多么不信任吗？正如您对我所做的行为一样，人们并不认为篡夺本国国主的地位是正当的。我具有守卫自己的力量，而您也不是没有进攻力的将军吧。至此，我决意以捍卫斯福尔扎家族的声名来回答您的善意，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卡特丽娜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再次向切萨雷亲切地弯了下腰，便从城墙上消失了。

二人的会面，后来还有过两次，但结果都与第一次一样。特别是第三回合，对着卡特丽娜热情演说的切萨雷身边落下了一颗按照她的命令

发射的警告炮弹。切萨雷再也不能维持他那优雅的骑士风度，急急忙忙地逃回城中。

就在这几次会面之间，阴云密布，好似要下雪的弗利也迎来了新年。尤其那一年是1500年，新年的狂欢比起其他年份都要盛大。广场上到处生起了火，在那周围陈列的桌子上，市民们将准备好的美酒佳肴摆得满满的。围攻的士兵们大吃大喝，特别是那帮酩酊大醉的法国士兵还在桌子上与妓女们跳起舞来。

可是，在法国士兵们尚未从宿醉中醒来的第二天清晨，对着城塞的炮击便开始了。在那之前虽然也曾经炮击过数次，但正式攻击此时才开始。城塞的周围到处安置了炮台，军马四处奔跑；足有一个人张开双臂那么宽的巨大弓箭，发出嗖嗖的声响，朝着城塞之上的守军射去。

围攻已达半月。外部的城墙渐渐被攻破了。但是，被四座塔包围的城塞安然如故。不仅如此，从城塞向包围军发射的炮击常常命中。这是因为树木都被砍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城塞的视线。法国士兵开始焦躁起来，毕竟米兰和伊莫拉都轻易地获取了，反而一个女人却让他们感到如此棘手。

可是，卡特丽娜很从容。她将远远围住城池，只会大声吵嚷的包围军当成一帮傻瓜，将炮弹打进他们的正中。当时的炮弹不像现在的炮弹里面填满了炸药，一碰就会爆炸，而是用炸药将普通的铁蛋——那个东西价格也很昂贵，或者普通的石蛋发射出去。所以仅仅是依靠发射出的力量来进行破坏的。现在，弗利的美术馆还保留着很多直径约30厘米的大炮弹和直径约10厘米的小炮弹。就算城墙被很多这样的炮弹击中，也只有那块地方会被打坏。卡特丽娜打进敌阵的炮弹也是这种。而且，她做了一个举动，更是把他们当成傻瓜耍。

那天，包围军们看到从城塞里飞出的炮弹，都大吃一惊，因为在石蛋的表面上用黑笔写了这么一句话：

“请慢慢发射大炮，否则你们的睾丸将被撕碎哟。”

当时的年代记里这么记录着：敌兵目瞪口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就连当时留下了最为精准的日记的威尼斯人马林·萨努多也赞赏了卡特丽娜从容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但似乎就连他也有点儿难为情，在写到“coglioni”（睾丸）时用“c”代替。因为“coglioni”在用来指代那个地方的词语中也是最下流的俗语。可是，这并不能将卡特丽娜看成一个特别下流的女人。以当时的风潮来看，这个词语不是下流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萨努多之外的年代记的作者们没有一个写成“c”的，而留下了“coglioni”。可是，作为一个女人说的话，还是有点儿大胆过头了。

10天过去了。城塞没有显露出一丝沦陷的迹象。法国士兵们的焦躁现在变成了对切萨雷的不满，且日益高涨起来。他们已经不再出城参加攻击了，切萨雷却也放任不管。

1月12日的早上，切萨雷向弗利的全体市民下令，收集尽可能多的木柴。瞬间，木柴堆成了一座山。他命令排列10座大炮，面对山那边的城塞同时并连续发射炮弹。在这样的掩护射击之下，士兵们将收集而来的木柴捆堆积于蓄满水的护城河中，一直堆到接近水面。随后，那天早上从拉文纳驰来的两艘船刚刚抵达弗利，就搁浅于木柴捆造成的浅水中。跨过护城河的渡桥造好了。之后，就只需等待在接连不断的大炮的集中炮攻下，连接这座匆忙赶造出来的渡桥的城墙倒塌了。这是一场2000守军与1.5万进攻者的战役，意味着胜败已分。

那天是周日。做好这些准备返回城里的切萨雷，在午餐席上称赞了同座的队长们的功劳，然后说道：

“看着吧，星期二，卡特丽娜就将在我的手里了。”

“为时过早。”法国队长回道。

“那么，我赌300达克特。”

“好！我也赌300达克特。”

其他队长们也都一致附和。

切萨雷只微微笑了一下。在此，切萨雷想要一决胜负的心理战获得了圆满成功。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总司令官的话通过队长们的嘴巴瞬间传遍了军中。在城里玩乐的法国士兵们也纷纷加入攻击队，高昂的气氛充斥于全军。

在炮火的集中攻击下，山那边的城墙上出现了两个缺口。城塞中的守卫兵们想要加固那两个缺口，却因为无数的炮弹与箭而无法靠近。沙尘笼罩了周围一片地带，在它的掩护之下，进攻者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而后就形成了多人群体，渡过了用木柴捆搭成的桥，成功地侵入城塞。从包围之日算起，这是第二十五天。

一个女人

“冤枉啊，冤枉！不是我！”4月的一天，从梵蒂冈内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卡特丽娜的喊叫声，站在门外都能听得到。切萨雷也在那个房间里，还传唤了三个弗利的证人，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亲自审问卡特丽

娜，因为卡特丽娜成了指使这三人去毒杀教皇的嫌疑人。

事情要追溯到上一年11月。每天，卡特丽娜都在弗利拼命地推进对切萨雷的防卫战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罗马的圣天使堡的牢狱中新关进了三个弗利囚犯。

其中一个名叫巴提斯特·德·梅道拉的，自称持有他的主人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写给教皇的信函。信的内容是伯爵夫人向教皇恳求和平解决战争。

可是，仅就这个信函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这封信被密封于一个夸张的信封里，而且上面还用红色的毛线布包了起来，这令人觉得奇怪。根据被捕的德·梅道拉的陈述，这封信的由来及传递是这样的：卡特丽娜把写好的信放在一个死于鼠疫的人的胸前，放了很长时间，浸透了毒。当教皇伸手取信阅读的时候，毒就会传染到全身而病倒。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死去。他说，伯爵夫人严命他亲自交到教皇的手中。这个夸张的封装是为了不让送信人中毒而做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失去了教皇这一后盾的切萨雷势必没落，卡特丽娜也就能保全自己国家的安泰了。

当德·梅道拉带着这封信抵达罗马时，遇到了旧友克里斯特弗洛·巴拉托罗内。这个男人以前曾是里亚里奥家的家臣，在吉罗拉莫死后，因为冒犯了卡特丽娜的情人雅各布而逃到了罗马，但他一直很希望再次回到弗利。他想做点儿什么来获得伯爵夫人的认可，从而再次加入臣子之列。所以，他想着若是对德·梅道拉的事情能够助一臂之力的话，这将成为他复职的绝好机会。德·梅道拉也出于旧友的关系而信任了这个男人，两个人一起前往梵蒂冈，请求拜谒教皇。

可是，侍从传话说要他们明天再来一趟，于是他俩当天便回去了。但巴拉托罗内对这件大事兴奋极了，对弟弟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个弟弟不巧正是教皇的护卫兵，而且胆小的他当夜值班的时候表现得很不

安。经队长一询问，他就全盘托出了。这三个弗利人立刻被逮捕，当即被投入圣天使堡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

毒杀教皇的阴谋仅仅作为阴谋，也是胆大包天至极的，何况谋杀者是那个与教皇的外甥结婚，见识了教皇在位时其近亲的权势，而后在教皇去世时又切身体会到他们悲惨没落的卡特丽娜。可以推测，她因为担心切萨雷对自己的威胁，所以想通过成功谋杀其父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而摆脱危险。

当时的教皇就如同现世之神，可不像今日这般不把教皇看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11月末的时候，在教皇给佛罗伦萨共和国发去的信函中，将卡特丽娜写成“那个制造不幸的女人”“斯福尔扎的蛇是恶魔的手指尖儿”。

教皇刚开始时打算处死卡特丽娜，但后来又改了主意，对切萨雷下令将她抓捕并带回罗马。当时的历史学者、年代记的作者们都留下了字句：“夫人策划了毒杀教皇。”（马基雅维利、威尼斯大使书简、布尔卡特）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它可能会被保罗·焦维奥赞美成“最完美的阴谋”。

可是，这里面并非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作为毒杀的手段来说，这过于幼稚，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而且，携带信函的德·梅道拉在弗利宫廷里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臣子，不能让人相信卡特丽娜会将此等大事交付于他。

第二，从事情败露到卡特丽娜被押送至罗马之间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可以理解，这是为了掩盖发现了阴谋。但是在那之后，又过了三个月，依旧没有公开；而且，卡特丽娜在那期间获得了客人般的待遇，被安置于梵蒂冈内的贝尔维德宫，到了4月下旬才突然开始审判。通过这些情况，也让人怀疑这可能是波吉亚家族一手“捏造”的谋杀案。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内，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关于这一阴谋的教廷文件。对于毒

杀教皇的阴谋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文件，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

此外，连教皇亲自出马进行审问的审判，最后也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据说将错就错的卡特丽娜采用了大声暴露该事件的战术，波吉亚一方才终止了持续审问。

可是，真相就像萨努多带有几分嘲弄语气写的那样，对于亚历山大六世来说，卡特丽娜虽然是一个女人，却危险至极。她拥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表亲；她在枢机主教中有三个有势力的亲戚：斯福尔扎、罗韦尔、里亚里奥；她因为第三任丈夫的关系，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有深厚的渊源。亚历山大六世似乎很担心将卡特丽娜释放自由后，她可能会与他们呼应，采取报复行动。

特别是卡特丽娜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将适用于法国的法律——不能在战场上将女人捕获为俘虏，这样的她是以托付于波吉亚教皇的形式被带到罗马的。在形式上，她不是教皇与切萨雷的俘虏。

对于这样的她，不能像对待昔日法恩扎的国主曼弗雷迪（Manfredi）一样，简单地杀死再投入台伯河就解决了。可是，也不能永远将她安置于贝尔维德宫。根据曼托瓦大使的通信，虽说是俘虏之身，但卡特丽娜挥金如土。而且，按照亚历山大六世方面的说法，她还曾经试图逃跑。要找一个尽可能价廉且能长期安置的场所，在罗马除了圣天使堡外别无其他。但是，要进入这个地方，就必须有相当合理的理由。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制造这个理由才演出了一场毒杀教皇嫌疑的审判。他们都在嘲笑亚历山大六世居然如此害怕一个女人。

无论怎样，都不能在她没落之后将其处决，但若给她自由又十分危险，最终只能将她软禁起来——卡特丽娜的入狱完全证明她是怎样一个大人物。譬如，卡特丽娜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是西斯都四世的外甥，弗朗切斯凯特是英诺森八世的儿子，但他们没落后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们。受到与他们相反待遇的就只有这位卡特丽娜，还有后来的切萨雷·波吉亚。

5月25日的夜里，仆人们看到在切萨雷的来访之后，伯爵夫人坐在椅子里放声大哭。接着，在次日的半夜时分，卡特丽娜被悄悄地从贝尔维德宫转移至圣天使堡，只允许她携带从弗利带来的两个女官同行。

从那时起，她大约在圣天使堡待了一年，其间情形不为人知。只有从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信件中提到她的一部分内容，从她那两个待在佛罗伦萨的儿子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才能稍微了解到一些。

传说被投入圣天使堡的人中没有一个生还者。不难想象，监禁于这座城塞中的卡特丽娜尝到了何等绝望的滋味。连最初在信中写道“夫人的坚强意志力强大得简直如同恶魔一般”的曼托瓦大使，在不久之后对她的印象都变成“深陷苦闷之中的夫人，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具有崇高的自豪感的人一旦沦落为屈辱之身，则因其自豪感而愈发感到苦闷。卡特丽娜也不例外。

让被捕的卡特丽娜痛苦的虽然是其屈辱的处境，但令其悲伤的却是两个年长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他们两个的薄情。以前，这两个男孩儿获得了比萨主教的席位，但现在，连长子奥托维阿诺都没有挑起国主的责任与气概，结果竟然向被俘的母亲请求尽力帮助他获得枢机主教的红帽子。

此外，母亲获释所需的活动资金，竟说以后再也不会送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耗费自己的财产来帮助母亲。面对这两兄弟的无情，跟随卡

特丽娜的司祭弗特纳提气愤不已：“我只能认为是恶魔夺去了他们的感情与记忆。”他是那之后对卡特丽娜最忠诚、最尽心尽意的一个人。

就这样，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最骄傲也是最悲情的一年——1500年过去了。

1501年6月20日，一个法国骑士骑马来到了梵蒂冈宫殿。他对守卫报上了名字——伊弗·达莱格莱，申请与教皇紧急会面。

在会面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伯爵夫人应当适用于法国的法律，即不能在战场上俘虏女人。可是现在，伯爵夫人竟然还被监禁于圣天使堡，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法国国王，应当立即释放伯爵夫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已经逼近维泰博的法国军队将有所行动。

伊弗·达莱格莱自弗利攻击战之后，就对勇敢而美丽的卡特丽娜念念不忘。当时，他对切萨雷强行将卡特丽娜带回罗马的意志无情地妥协了。但是这一次，当他在征服那不勒斯的过程中听说了卡特丽娜悲惨的境遇后，就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在他强硬的谈判中，教皇首先妥协了。但是，切萨雷一直到最后都强烈反对释放卡特丽娜。尽管如此，已经征服了大半个罗马涅地方的他，在距离实现野心已经很近的时候，也不能割裂自己与最重要的后援者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也不得不默认释放卡特丽娜。

不过，波吉亚一方提出了条件。首先，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决议，卡特丽娜必须放弃对弗利及伊莫拉的主权，并将之转让于切萨雷·波吉亚。卡特丽娜必须在教皇的咨文上亲自签署名字。其次，必须支付2.5万达克特的赎金。在支付其中的2000达克特之时，伯爵夫人才

将得以释放。

法国骑士得到了这一结果后，急忙赶往圣天使堡。当他见到已经等候在房间内的伯爵夫人时，看到她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容颜时才放下了心。但当他听到她开始说话，便为她巨大的变化而刺痛了心。

这位老将已经看不到在一年半前认识的那位意大利最高女杰的痕迹了。虽然她还保留着凛然的贵族女人的气质，却不是曾经被称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那般大胆无畏的女杰，而变成吧嗒吧嗒掉着眼泪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的妩媚女人了。

卡特丽娜答应支付赎金，可是，在放弃弗利主权的咨文上，她怎么也不肯点头。只有回到弗利，她忍受这段屈辱的时光才有意义。

在近旁能够听得见圣彼得罗大教堂晚钟的一个房间里，从高高的小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已经黯淡了许多。薄暮笼罩在坐在椅子上的伯爵夫人和跪在一旁继续想要说服她的老将身上。卫兵拿来了烛火。

10天后的一天夜里，几个骑马的士兵悄悄地出了圣天使堡的大门。只见士兵们簇拥着一个骑在马上的女人的身影，那是时隔一年半重获自由之身的卡特丽娜。当一行人开始跨越圣阿格内塞桥时，此前一直勒住马监护他们一行人的一个骑士这才扭转马头离去。11年后的1512年4月，伊弗·达莱格莱与名将加斯东·德·富瓦[41]率领的法国军队一同浴血于拉文纳战场，死在了那里。

获释后的卡特丽娜住进了身份担保人——拉斐尔·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得知她被释放的消息，整个罗马都沸腾了。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门前，常常看得见很多身穿各种颜色服饰的侍从与马夫，他们正在等待宅邸内拜访卡特丽娜的主人们。前来祝贺卡特丽娜获释的大

部分都是从前受过西斯都四世厚待的人或者是奥尔西尼一派的人，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只是单纯想要见识一下这个著名女人的来访者。

大约在7月中旬的时候，教皇终于下达命令允许卡特丽娜离开罗马。因为她在1498年时取得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权，所以此后她将寄身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虽说是寄身，但事实上，她已经完全获得了自由。

数日后，她获得一个消息，称至今依旧对释放卡特丽娜耿耿于怀的切萨雷似乎在她的途中安排了刺客，所以她在半夜里乔装打扮，偷偷地沿台伯河而下，从海路取道佛罗伦萨，离开了罗马。

以前，丈夫乔凡尼·德·美第奇还健在的时候，卡特丽娜曾说过："我的第二故乡在佛罗伦萨的城墙之中。"现在，她就处于当时从未想到过的境遇中——每天都看着佛罗伦萨的城墙。抵达后不久，她受到了佛罗伦萨市民们的狂热欢迎，可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与俘虏时代不同的痛苦在等待着她。

远亲兄长洛伦佐·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私吞了其亡夫的遗产，所以她必须争取为自己与乔凡尼生的孩子也是她最小的儿子乔凡尼留下遗产。为了金钱而产生的亲族间丑陋的内斗，让她越来越筋疲力尽。

接着，她遭遇了更为深刻的亏空。对于央求母亲给予金钱的两个大儿子，1502年7月，卡特丽娜写了封信："在我的肩膀上有24张嘴巴和5匹马、3头骡子。为了养活他们，我甚至变卖了珠宝。"

可是，翌年，她遭遇到的重大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切希望。

1503年8月，教皇波吉亚死了。以前被驱逐的罗马涅地方的诸侯们，纷纷回归到原来的领地。卡特丽娜也赶紧让长子奥托维阿诺带领家

臣们急速前往弗利。可是，到达博洛尼亚的奥托维阿诺却折了回来，因为家臣们带来了信息：弗利与伊莫拉，特别是伊莫拉现在对切萨雷十分忠诚，而憎恨卡特丽娜的暴政，所以根本没有欢迎里亚里奥家族再次成为国主的意思。

即便如此，卡特丽娜也没有放弃。她以奥托维阿诺与威尼斯贵族之女结婚的条件，向威尼斯请求军事援助。可是，威尼斯虽然答应了此事，但在实施上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只让她等着。就在这一期间，罗马下达了最终决定。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罗马涅作为教皇国，对于归属尚未确定的弗利及伊莫拉，也坚决认定由教会直辖。

卡特丽娜做梦也没有想到，对自己及孩子们来说相当于亲戚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竟然对自己做出如此冷酷的行为。可是，枢机主教会议上下达了经过认可的教皇咨文，那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比任何人都期待这位新教皇即位的卡特丽娜，之前的一切幻想被击得粉碎。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因波吉亚家族的没落而掀起的全意大利的亢奋，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剩下的只是既成事实。至于希望以主权者的身份回归弗利的卡特丽娜悲壮的誓愿，也逐渐从人们的口中消失了。

尾声

“敬爱的伯爵夫人，正如我们看到您所写的众多信函那般，在您与我们一同跨越这个充满了困难与危险的时代里，您祈愿能够获得神灵的帮助，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都认为，您从神灵那里获得了指导，神灵们给予了您有效的建议与一切美好的灵感……我祈

祷您能够永远怀有这颗充满了仁德的心灵。我非常感谢您能够向我征求意见，我也希望派遣一个信徒或者僧侣到您的身边，以帮助实现您的委托。对于您对我的期望，今后我也将向神灵祈祷。”（萨伏那罗拉写给卡特丽娜的信，所署日期为1497年6月18日。）

卡特丽娜在其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在失去了国家和家族一切的时候，第一次听取了这个激情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忠告。从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搬到里卡尔迪宫[42]以后，默默生活的她，周围突然弥漫起宗教的香火。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日往夜来，这些看起来就是卡特丽娜晚年主要关心的事情。后世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在评论晚年的她时，认为她最终获得了圣灵的恩宠。虽然她是一个异教性质的文艺复兴的人物，但还是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结束了一生。

可是，这其实是夸大了。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所谓甜美温柔的事情，不是神灵的恩宠，而是金钱、权力与爱情。当失去这三者时，失去将其作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可能性时，她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就像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1509年5月29日傍晚，佛罗伦萨城的人们被突然传来的圣洛伦佐教堂的钟声吓了一跳。广场上与路上的人们停下了脚步，他们得知在那一天，那个在9年前曾经一个人面对切萨雷，让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的“意大利第一女杰”去世了，享年46岁。

卡特丽娜甚至没有被允许安葬于美第奇家族的墓地，也就是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亡夫旁边。主张为她举行1000次弥撒而奔走的是她晚年唯一的朋友——司祭弗特纳提。

---

[1] 圣油也称为圣膏油，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30章22——25节，原料主要有香肉桂、菖蒲、桂皮和橄榄油。今已不限定橄榄油，任何植物油皆可。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

[2]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1443——1488），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伊莫拉君主（在位时间：1473——1488）。

[3] 肖像写真店，是一种使用于明星肖像的照片、印画纸。

[4] 卡特丽娜虽然主持国政12年，但并不受百姓的爱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虽然治国时间短，但拥有很高的声誉。

[5] 乔凡尼·德勒·邦德·内雷（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1498——1526），意大利的雇佣兵队长，美第奇家族中的一人。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的父亲，本名乔凡尼·德·美第奇。因在意大利战役中勇敢地抵抗查理五世的皇帝军队，后来被赞为“文艺复兴最后的雇佣兵队长”。利奥十世去世时，为表哀悼之意，他佩戴了黑带，所以被称为邦德·内雷。他的军队全部戴着黑色的绸带，枪上也绑了黑色的枪旗，因而他被称为黑队长。1526年，他在战役中患败血症去世。半年后发生罗马掠夺时，人们都感叹说，如果他还活着，就不至于变成这样了。

[6] 萨拉逊（Saracen），中世纪时在欧洲世界中指代伊斯兰教徒的语言。

[7]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8月24日，法国的天主教大量杀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8] 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的母后。

[9] 穆佐·阿滕多洛（Muzzo Attendolo，1369——1424），15——16世纪统治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国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始祖。他作为那不勒斯公国的雇佣兵队长建立了功勋，获得了“斯福尔扎征服者”的称号。

[10] 米兰城之塔，指米兰公国的要塞——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11] 玛丽亚·迪·萨沃亚（Maria di Savoia，1411——1469），据说她深居于为她建造的城堡中，仆人都是女性。因为丈夫握过她的手，所以她都不洗手，以表示对丈夫的爱。

[12] 萨沃亚公爵家，欧洲贵族之一，开拓了萨沃亚，获得王号，成为撒丁岛国王，最终成为意大利的王室。1003年被封为萨沃亚伯爵，1416年升级为萨沃亚公爵家族。

[13] 博纳·迪·萨沃亚（1449——1503），萨沃亚家的王族女儿，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任妻子。1476——1480年，她担任未成年的儿子的摄政。

[14] 帕齐阴谋，1478年，佛罗伦萨的帕齐家准备暗杀其对手、美第奇家族的领主洛伦佐·美第奇。阴谋于1478年4月26日，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弥撒仪式上实施。美第奇兄弟遭到了袭击，弟弟朱利亚诺被杀害，哥哥洛伦佐负伤逃脱。暗杀者帕齐家的领主等近100人被处以极刑。与帕齐家族交好的教皇西斯都四世被激怒，攻破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王国同盟宣战（帕齐战争）。洛伦佐直面危机，亲自与那不勒斯国王会见，因此感动了那不勒斯国王，成功缔结和平。

[15] 科拉·蒙塔诺（Cola Montano，15世纪上半叶——1482），人文主义教师，鼓吹罗马共和政体的理念与杀害暴君。

[16] 马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共和政体

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7] 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公元前87？——前42），罗马共和政体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8] 乔凡尼·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Giovanni Andrea Lampugnani，？——1476），米兰贵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兰普尼亚尼家族在米兰的地位很高，乔凡尼担任了数项公职，是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近臣。乔凡尼兄弟从地方的大修道院借贷了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大修道院院长去世后，继承者认为土地的借贷无效，强行命令其退出。兰普尼亚尼家族向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说明了情况，但政府没有介入此事。

[19] 卡洛·维斯孔蒂（Carlo Visconti，？——1477），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对凌辱了妹妹的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心怀不满。

[20] 吉罗拉罗·奥尔贾蒂（Girolamo Olgiati，1453——1477），米兰公国的政府官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他在阴谋者之中属于激进派。与其他人不同，他并没有对米兰公爵有怀恨之念。他告白说，是老师蒙塔诺教育民众奋起，为自由政体而杀害暴君。

[21] 圣斯特凡诺是《圣经·新约》中的人物，犹太人基督教徒（36年左右去世）。他是基督教第一个殉教者，即为了信仰而牺牲了生命。他的纪念日有8月3日及12月26日。

[22] “弗朗切斯科派”，13世纪时意大利兴起的天主教修道会的总称，广义上由“第一会”（男子修道会）、“第二会”（女子修道会）、“第三会”（在俗会）组成，现在其活动遍及全世界。

[23]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 Popolo），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文艺复兴初期式样的教堂，拥有波波洛广场，与波波洛门相连。教堂内有著名的切拉西礼拜堂（Capella Cerasi）以及贝尼尼和卡拉瓦乔的珍贵作品，是罗马馆藏艺术品最丰富的教堂之一。

[24]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他画的圣母子像非常出名。受尼德兰肖像画的影响，波提切利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

[25] 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15世纪下半叶活跃于佛罗伦萨，以宗教画为主。

[26] 弗拉·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期的画家，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代表画家。

[27] 梅洛佐·达·福尔利（Melozzo da Forlì，143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画风接近翁布里亚画派。他是第一个成功实现缩短远近法的人，是15世纪杰出的壁画画家，也是弗利画派最重要的人物。

[28] 彼得罗·里亚里奥（Pietro Riario，1446——1474），由西斯都四世任命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佛罗伦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

[29] 拉斐尔·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1461——1521），由西斯都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

比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9——1499）。

[30] 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位于意大利的中东部马尔凯大区的安科纳，是面临亚得里亚海的疗养地，6世纪时发展成为拉文纳五大城市之一，进行东方贸易。

[31] 法恩扎（Fae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陶器生产地，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了锡釉陶器烧制技术，为欧洲的陶艺做出了重要贡献。

[32] 齐伯即英诺森，因其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齐伯（Giovanni Battista Cibo）。

[33] 切塞纳（Ces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因马拉泰斯塔家族而繁荣起来，开设了欧洲最古老的市民图书馆马拉泰斯塔图书馆。18世纪至19世纪，这里出了三位教皇。

[34] 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Ottaviano Riario，1479——1533），伊莫拉与弗利的君主（在位时间：1488——1499）。

[35] 切尔维亚（Cerv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拉文纳，深受威尼斯的影响。1274年起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盐贸易。

[36] 圣贝尔纳多教堂（Chiesa di San Bernardo），位于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市内的菲耶索莱与塞提涅亚诺山丘上。该教堂于15世纪时建造，与旧修道院相连，是一座由当地居民建造的巨大花岗岩式建筑，教堂的音响效果奇妙无比。

[37] 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矫饰主义时期（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建筑家。

[38] 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ucato di Toscana），16世纪至19世纪北意大利的国家，托斯卡纳大区的前身。

[39] 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1630——1685），王政复古期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在位时间：1660——1685）。

[40] 阿维尼翁俘虏时代指基督教的天主教、罗马教皇之座，从罗马移至阿维尼翁的时期（1309——1377年）、阿维尼翁教皇（Avignon Papacy）时代。

[41] 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1489——1512），内穆尔公爵（duc de Nemours，1507——1512）。从母亲一方来说，他相当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1511年被任命为米兰总督。

[42] 里卡尔迪宫（Palazzo Medici-Riccardi），原美第奇宫殿，1444年由米开朗琪罗设计建造。美第奇家族移居皮蒂宫殿后，此处便归里卡尔迪家族所有。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Prima veneziani, poi cristiani.”

（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

提香画，收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1]

---

[1]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以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闻名的美术馆。它1591年向公众开放，是欧洲最古老的近代美术馆之一，1982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佛罗伦萨历史区域的一部分。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家谱

科尔纳罗家族

马克·科尔纳罗（1336年殁）
（威尼斯共和国总督）
安德烈·科尔纳罗（1380年殁）
（骑士）
乔治·科尔纳罗（1410年殁）
（威尼斯海军提督）
安德烈（1473年殁）
（塞浦路斯岛大庄园园主）
马克（骑士）
菲奥伦扎·克里斯波
（拿骚公爵的女儿）
阿格奈斯
比安卡
乔治（1524年殁）
（骑士）
（圣马可的行政长官）
马克
（枢机主教）
弗朗切斯科
（枢机主教）
吉罗拉莫
雅克
（圣马可的行政长官）
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1454–1510）
保罗·凯佩罗
伊丽莎白
保罗·本多拉明
（元首之子）
科尔奈莉亚
马克·丹多洛
比奥兰特
路易·萨沃亚
夏洛特·吕西尼昂
（1442–1487）
海莲娜·巴列奥略
乔凡尼
（1458年殁）
耶路撒冷女王
伊莎贝拉
（1191年，塞浦路斯国王）
古意德
阿尔梅里克
雅克二世（1440—1473）
（雅克·伊鲁·巴斯特鲁德）
吕西尼昂家族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雅克三世
（1473—1474）

水上之都

1468年7月30日早上，卡泰丽娜被一反常态的乳母的惊叫声吵醒了。自从一个月前为婚礼做准备，她从帕多瓦的修女院被唤回威尼斯父亲的宅邸以来，还没有这么早被叫起过。好像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宅邸中慌乱的动静都传到了她面向运河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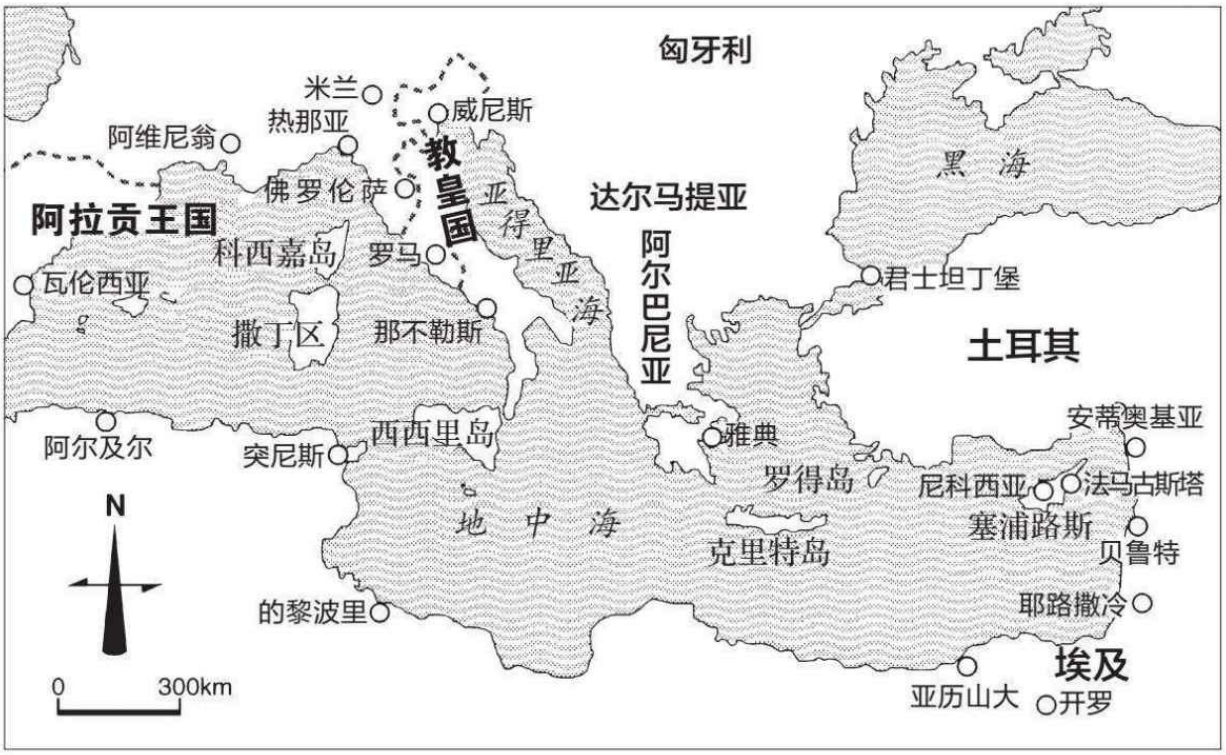
卡泰丽娜这才想起，今天是她的婚礼日。

母亲菲奥伦扎[1]进了房间。母亲与乳母好像都受到了惊吓。看着母亲进进出出，朝拿着服装与头饰进来的仆人下了无数次命令，刚满14岁的卡泰丽娜再也隐藏不住她的惊讶了。尽管如此，她还是顺从地让仆人给她化好妆，站好。她伸开两臂，一动也不动地让仆人们给她穿好衣服。在内衣的外面勒紧铁制的紧身胸衣时，她也很娴静，但在穿厚重的大马士革产的白色衣服，连乳母也不得不过来帮忙摆弄这夸张的服装时，她再也憋不住嗤嗤地笑出声来。就在衣服从头上套下去的瞬间，柔和的光芒穿透了眼前落下的厚厚绸布，让人闻到了一股上等丝绸特有的甜美芬芳。卡泰丽娜心中那颗总是非常快乐的少女心，感受到了这一切的骚动都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自豪感，这让她笑个不停。给她梳着头的乳母不知是不是因为激动的原因，将梳子卡在了头发上。她那慌慌张张的滑稽样子令卡泰丽娜又咯咯地大笑起来。

等到珍珠头饰佩戴好，梳妆打扮终于完成时，已出嫁的三个姐姐也进到房间内。母亲、姐姐们还有乳母跟仆人们围着完成新娘装的卡泰丽娜，一起发出华贵矫饰的声音，称赞她的美丽。当乳母不无骄傲地说“真像一位女王啊！”，嫁给了威尼斯一流贵族丹多洛家[2]、本多拉明家[3]和卡佩洛家[4]的姐姐们也都羡慕不已地附和着，祝福妹妹幸运地

嫁给塞浦路斯国王。

在仆人与姐姐们的簇拥下，卡泰丽娜由母亲牵着手，来到了大厅。只见在那里等待她的父亲马克身穿白貂裘皮[5]镶边的长款威尼斯贵族礼服，弟弟乔治身为家中嫡子，也披着少年人的短款斗篷，站在父亲的旁边。作为走遍地中海的巨商，常年在海上经受锻炼的这个一家之主——马克·科尔纳罗健壮的身躯里此时充满了喜悦。按照威尼斯贵族的传统，他在此迎接女儿。常年生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的威尼斯商人，为了能够在船上传递消息，养成了特有的拉长了尾音的口音，此时这个声音便将萦绕于她身边。“科尔纳罗家可是出过元首的门第，而你母亲的娘家拿骚[6]贵族也是与东罗马帝国[7]颇有渊源的家族。嫁到塞浦路斯王室的你，还接受了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养女的名誉，这样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有损于女王的称谓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地去吧。”父亲的这番话，唤起了卡泰丽娜心中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28岁年轻俊美的塞浦路斯国王，对那个有着丈夫等候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塞浦路斯淡淡的仰慕之情。



1500年左右的地中海周边

正在那时，一个跑进大厅的侍从更让沉浸于幻想中的她欣喜不已。侍从兴奋地说，威尼斯城简直就同“仙萨”[8]一般热闹。紧接着，管家恭恭敬敬地报告：“总督阁下的御用船只刚刚抵达了。”

出发的时刻到了。这艘由总督派来的御用船停靠在科尔纳罗家大门的石阶上，载着威尼斯贵族中门第最好，长得也最漂亮的40个贵妇人，她们将与卡泰丽娜一同前往举行婚礼的总督府[9]。正值早上退潮时分，运河的水位很浅，大理石的石阶下露出了绿色的苔藓。卡泰丽娜由乳母牵着手，慢慢地朝船走去。船身雕刻精致，涂成金色；船内及房檐用绯红色的毛毡装饰；船头飘扬着绣有圣马可狮子图案的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卡泰丽娜白色而弱小的身姿，就站在这艘御用船的中央。这时，御用船左右两侧的桨手们一齐将橹投入水中，一排金色的橹整整齐齐地将深绿色的水划了开来。

就像点了信号似的，在御用船的周围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贡多拉队伍也缓缓地开始在水上滑行起来。这支行驶在水面上的新娘队列不久就航行至大运河[10]，此处可以看到左边的里亚尔托桥[11]，然后向右拐弯，沿着大运河下游向河口的圣马可码头前进。为了庆祝共和国的女儿卡泰丽娜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婚礼，大运河两岸的大宅邸那些威尼斯独特式样的美丽窗口，都用垂下来的豪华挂毯华丽地装饰着。人们为了一睹华丽船队的主角卡泰丽娜的身姿，将两岸宅邸的窗口都挤得满满的。深绿色的水面上静静地驶过金色与绯红色的御用船，载着装扮美丽的贵妇人们。好似从旁照应一般，御用船前后左右都跟随着贡多拉船队，简直就像一张绚烂豪华的大型地毯覆盖在大运河的水面之上，慢慢地随波流去。

文艺复兴的时代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在财富及权势上比大国西班牙、法国更占据优势的时代，尽管它只是一个都市国家。当然，它与其他意大利诸国如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米兰公国不能相提并论。通过统治东地中海，从10世纪左右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财富，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的手中之后，渐渐暗淡了荣光。即便如此，威尼斯也足以被美化成当时世界的宝石盒。更恰当一点儿说，15世纪是长年积攒起来的财富开始向外吐出的时期。在这个水上都市，排桨船与帆船上飘扬着绯红色旗帜，上面用金线刺绣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徽章圣马可狮子，满载着财富与力量，渐次到达又继续扬帆出航，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驶去，那里是当时被称为“东方”的莱万特海（东地中海）。当时，里亚尔托桥还不是用石头建造的，是用木头建造的；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怀疑的纯黑色的贡多拉，当时也是用金色或银色、象牙色的丝绸及刺绣装饰的，就是那样一个盛大华丽的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贡多拉之所以用纯黑色统一起来，是出于威尼斯共和国在1584年提出的一个通告。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在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不得不退出地中海统治权，因而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黑色贡多拉也许

是“文艺复兴时代之花”威尼斯缓慢衰退的先兆。

突然，从圣马可钟楼传来了清澈的钟声，久久回荡于广场上空。这是通告婚礼的队伍现在正出了大运河的河口，将要抵达码头。百姓都想一睹为快，从总督府的玫瑰色墙壁外奔向码头。出了大运河，水上婚礼队伍在海洋上铺开了一面华丽的地毯般的船队，向着码头缓缓地从左面绕过去。那时，总督府的柱廊里排列着的奏乐队一齐吹响了号角。码头左右列坐的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分别身穿代表各自官职的礼服。圣马可教堂[12]的行政长官、红色长外衣的十人委员会[13]的委员们、身穿带有黑色天鹅绒领子的长外衣的元老院议员队列，还有身穿紫色长外衣的政府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些神态庄严地列坐的高官面前，14岁的卡泰丽娜身穿白色衣服，按照当时的新娘习惯将长长的金发披散于后背，走了下来。在响彻的庆祝钟声中，她在队伍的簇拥下朝总督府大门行进。在穿过了卡尔门[14]的镀金大门时，一群白衣少女唱着歌欢迎新娘。队伍从她们中间穿过，她进门登上台阶。

当新娘进入大会议场[15]时，早已等候多时的人群中响起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壁画及天花板装饰的大会议场中，人头攒动，年代记中称人数多得几乎将大门都挤坏了。人群让开一条通道，新娘从中穿过走上台阶，元首就在正对面安坐着。然后，元首赐予她一张自己右前方的椅子。作为卡泰丽娜丈夫塞浦路斯国王的代理人，婚礼那天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被派遣至威尼斯的特使密斯特希尔，已安坐于她的对面，也就是元首的左侧。总督克里斯托福·莫罗[16]一身正装：披着用金线刺绣的披风，戴着被称为“号角”的总督礼帽。政府的高官们列坐于总督的背后。

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莫罗总督向大使递去一枚金戒指。大使作为新郎代理人，恭恭敬敬地将它戴在了卡泰丽娜的手指上。礼毕。

可是，卡泰丽娜并非就此出发去塞浦路斯岛的丈夫身边。因为塞浦路斯国王雅克[17]不久将要前来迎接她，所以她暂且返回父亲的宅邸。之后，为国王随时可能迎接她的那一天，在威尼斯利多[18]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着。可是，那一天迟迟不来，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背后活跃着威尼斯与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上的政治谋略。位于利多高地上的圣尼科洛修女院的窗口背靠威尼斯城，面向亚得里亚海，所以是最先看到船只结束地中海航海后开往威尼斯的地方。卡泰丽娜在此等待着由亚得里亚海北上而来，插着淡蓝色与银色的塞浦路斯王室旗帜的船只，一边被修女们称为“王后陛下”，一边虚度着不认识国王的日子。这种不安与焦虑的只是等待的日子，结果竟过了漫长的4年。当乳母注意到主人不再像从前一样欢笑的时候，卡泰丽娜已经到了18岁。这个年纪在当时，只要是良家女儿，就没有一个不嫁作人妻的。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

在地中海的东面，几乎与中近东国家接壤的地方中有一个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它是继西西里岛[19]、撒丁岛[20]之后的第三大岛。白色的地表上趴着橄榄树林，深邃的绿色峡谷，空气中溢出丰盈的阳光。岛的周围环绕着碧蓝色的大海与击打岩壁四溅的白色浪花。古希腊人将这座美丽的岛屿视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21]的诞生地。

如果有哪位读者想要通过比较近期的书籍正确了解塞浦路斯历史的话，我想您只要阅读乔治·希尔的《塞浦路斯岛的历史》[22]这本书就足够了。这本书撰写了塞浦路斯自创建至1571年的历史，即塞浦路斯从威尼斯的手中到最后沦为土耳其殖民地那年止。

可是，在此我并不想像希尔的书那样做精准的学术性的历史叙述。

我想选用的是威尼斯历史学家马利皮埃罗的书，尽管他有一点儿历史事实叙述的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因为这本用威尼斯方言记载的年代记作者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与这一章的女主角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是同时代的人物。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作为元老院议员，同时还担任了海军要职，理应精通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最后，在他那部至今都被认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年代记》（Annals）中所体现出来的他那冷静而严峻的观点，可以视为当时富有教养的威尼斯人的典范。根据这些理由，我想马利皮埃罗的书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角之一的威尼斯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东方的。

《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

“我觉得在此叙述从前的人所写的基督诞生之前的塞浦路斯岛王国的历史有点儿多余……所以，我决定只写在古代人所写的东西中看不到的却被人们记忆，留下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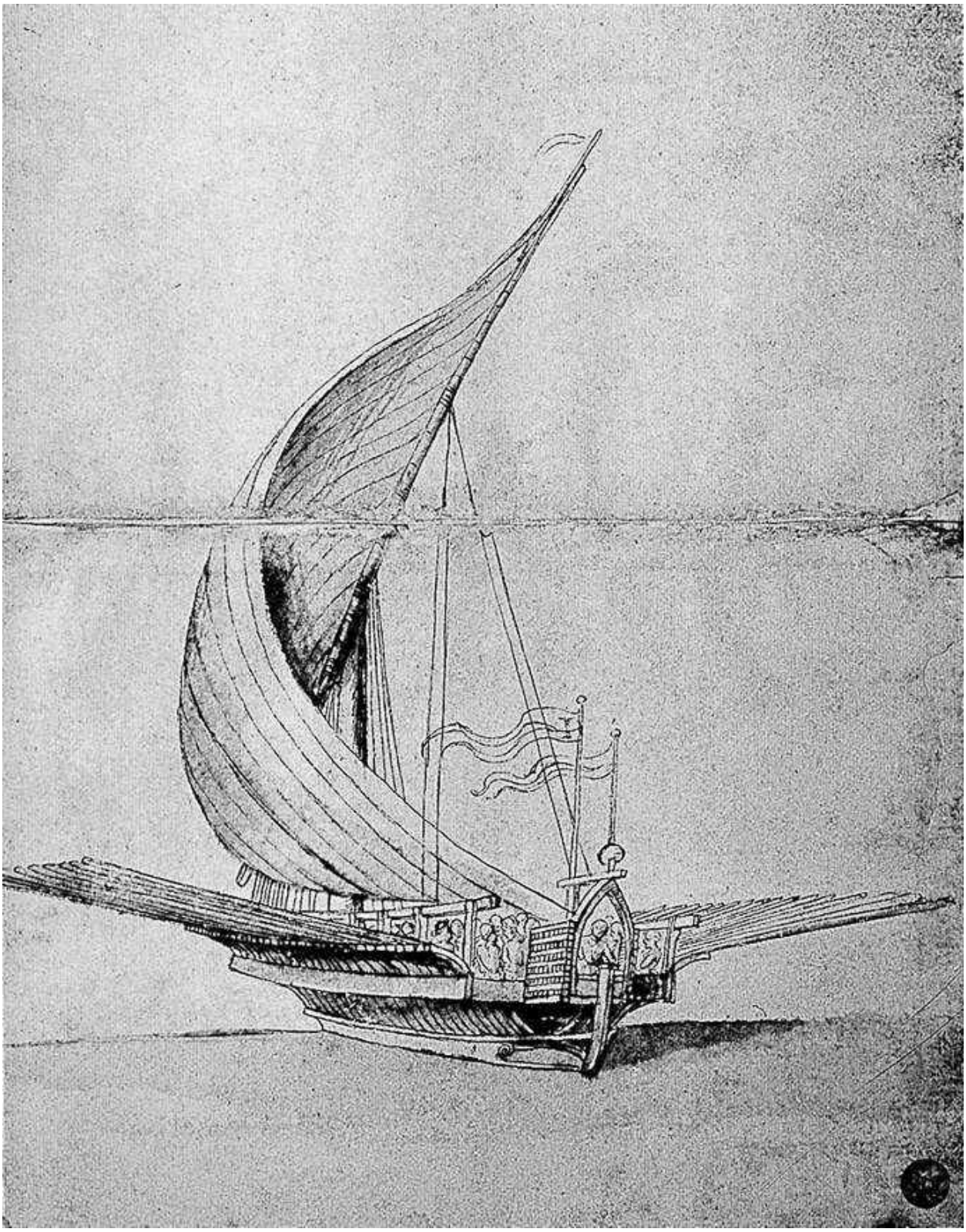
“塞浦路斯岛将信仰改变成基督教的事情，根据古代的记录，那是通过手持圣马太[23]抄写的《圣经》的圣巴拿巴使徒[24]的传教。此后，过去了很多年，该岛连续17年深受大旱之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后漫长的36年中，该岛成了无人岛。

“在君士坦丁大帝[25]的时代，大帝的母后海伦娜[26]在耶路撒冷发现了我们神圣守护者（基督）的神圣十字架，她在归途中路过塞浦路斯岛马佐特地方的巴西罗伯特莫，在那里的奥林匹斯山[27]上建造起教堂。那座山现在也还被称为‘十字架山’（Monte della Croce）。母后将这座教堂中的神圣十字架的木头收起了一片。从那时起，下起了雨。于是，离开岛屿的人们都回来了，接着，其他人也回到了岛上。可是，海盗带来了灾难，于是人们跑到君士坦丁大帝那里，请求他派给他们一个

能够保护岛屿的统治者。皇帝赐予了一个贵族公爵的地位，派遣他与很多‘斯特拉迪奥提’（即希腊骑士）一同来到岛上。他们的家族也跟随着来到此地。为了维持这些‘斯特拉迪奥提’，向岛民征收租税……从这时起，塞浦路斯在公爵及其家族、东罗马帝国皇帝之下被统治了880年。这一统治一直延续到1190年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德[28]来到岛上为止。英国国王本来是前往援助耶路撒冷国王古易顿的，可是，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所以理查德国王决定攻击塞浦路斯的统治者伊萨克。[29]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伊萨克曾经抓住了王后与国王的妹妹，意图侮辱她们。国王从利马索尔[30]港口上岸，在这里与伊萨克进行了战斗。战胜的“狮心王”理查德从此成为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可是，他立刻将岛屿卖给了圣殿骑士团。骑士团一开始的时候统治还算顺利，但最后却以惨淡收尾。

“当时骑士团非常辛苦地统治了岛屿约一年，最后因为与塞浦路斯的岛民发生了争执而被杀死了大部分，流血事件还波及了岛民。无奈之下，骑士团放弃了统治，离开了岛屿。他们将岛屿以10万达克特卖给了吕西尼昂家族的居伊[31]，因为居伊在这之前刚刚失去了耶路撒冷的领地。从他开始，塞浦路斯王国诞生了第一位拉丁人统治者。他将自己的宫廷与耶路撒冷众多的拉丁人贵族一起移居此地。在这之后，他又活了三年。在他死后，1194年由弟弟阿尔梅里克继承了王位。阿尔梅里克是一个相当威严的男人，在这个男人的统治下，岛屿的情况转好……他向教廷申请，认可从此以后的塞浦路斯将成为一个王国，其统治者为国王。这一申请得到了批准，他戴上了王冠。过了不久，他迎娶了拥有耶路撒冷女王称号的伊莎贝拉作为王后，由此他也获得了耶路撒冷的王号。他是第二个拉丁人统治者，第一个拉丁人国王，统治了15年。在他死后，由儿子乌格继承王位并承袭了耶路撒冷的王号，又统治了13年。其后，乌格的儿子恩里克继承了王位，但他14岁就死了，没有留下继承人，所以母亲的表兄安提阿[32]的贵公子乌格来到塞浦路斯，当了国王……（1285——1361，延续了三个国王的统治。）

“接着，他的儿子、绰号为‘valente’（葡萄牙语，意为“勇敢的”）皮埃罗当上了国王。在他统治的时代，塞浦路斯很繁荣，法马古斯塔[33]港口居住了众多人口，城市变得漂亮起来。塞浦路斯开始了大买卖，与叙利亚也开始了贸易。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一个居住于法马古斯塔的叙利亚人通过贝鲁特航线的商业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收益的一部分在法马古斯塔建造了圣皮埃罗·保罗教堂。这个教堂被认为是最美丽的教堂，至今依旧用作野燕麦（Avena fatua）的仓库，但不知他是出于何种善心而建造的。这个皮埃罗国王针对不信任他的人组建了一个军队，很快又召集了岛内诸多勇敢的骑士，排桨船、商船等各种船只有100多艘。国王率领他们征服掠夺了亚历山大[34]，又征服掠夺了叙利亚一带靠近海岸的土地以及土耳其的土地。在实施了这么多伟大的事业之后，国王前往罗马。国王在罗马期间，将塞浦路斯的管理交给了洛卡斯伯爵，可是他背叛了国王的信任。国王得知了他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王后艾莱诺拉同谋的事情。国王回到塞浦路斯后召集了贵族审判所，按照国家的法律，对向国王宣誓了忠诚却伤害了其尊严的洛卡斯伯爵问罪。虽然他对自己的所有物——王后已经判处了苦役之刑，但是贵族审判所却判定伯爵无罪，反而将通知了这件事的国王的执事判定为有罪。国王心里非常生气，对塞浦路斯人变得非常残酷，并侮辱了他们及他们的女人。国王派人建造了一所极其残酷的监狱，用于对塞浦路斯人的报复。岛民们不能就这般地顺从暴君，他们策划了阴谋，将国王杀死了……可是，从这时起，塞浦路斯的实力开始衰退了。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贵族审判所下达了不恰当的判决。



排桨船（拉斐尔的素描）

“在国王皮埃罗之后，儿子佩林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11年。母后艾莱诺拉将法马古斯塔港交给了热那亚人，他们在那里榨取了塞浦路斯的巨大财富。她还送给热那亚人用6艘排桨船装着的金银珠宝。可是，根据神的裁判，这些排桨船在航海的途中沉入了大海……就这样，热那亚人大约统治了法马古斯塔90年。与他们作战的皮埃罗国王的弟弟雅克·路金亚诺成了俘虏。

“在他被俘于热那亚期间，佩林国王死了。于是，塞浦路斯的家臣们准备选一个新国王。他们仔细考虑的结果就是将正统的王位继承者雅克从热那亚召回。雅克作为塞浦路斯国王回来的时候，以交付热那亚人法马古斯塔及其周围2莱加（约10公里）为条件。

“这个国王雅克一世大约统治了20年，他完成了与热那亚人战役中几乎被毁尽的岛屿重建。他还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尼科西亚[35]城塞，在城塞中修建了一座宫殿。1399年，他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伊亚诺斯。这个国王统治初期还是很好的，可是，后来岛屿遭遇了旱灾、蝗虫灾害、鼠疫之磨难。最后，苏丹挑起了战争。苏丹用大舰队将大批马穆鲁克人[36]送到了塞浦路斯。他们上了岛，在巴西罗伯特莫与国王的军队进行了战斗。国王战败，成了俘虏，1426年被送往开罗。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马穆鲁克人奔走于全岛，在烧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之后才离开。国王必须支付赎金，除了一次性支付的数十万达克特之外，每年还要交付地租，这个地租一直延续至今日。国王终于回到了岛上，而后，在1432年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乔凡尼[37]，他娶了希腊的海莲娜[38]为妻子。这个专制君主的女儿与国王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夏洛特[39]。这个国王的女儿与表哥萨沃亚[40]公爵的儿子贵公子路易[41]结了婚。乔凡尼国王去世的时候，路易公爵当上了国王，那是1460年的事情。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庶出的王子（即雅克二世）。这个男人篡夺了路易公爵的王位，之后统治了岛屿12年。他拥有英俊的容貌、强健而高大的身体。虽然从其力量及智慧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人，但他运气很好，眨眼间就获得了王冠……”

马利皮埃罗的《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到这儿才刚刚触及本卷的主题。从妹妹及其丈夫的手中夺取王位并拥有英俊容貌的这个男人，正是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结婚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年代记》中记述了在这之后年轻而大胆的国王雅克，被夹在大国威尼斯共和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境遇。威尼斯为了维护在地中海的现行制海权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土耳其则为了与这样的威尼斯分庭抗礼而开始了在地中海的可怕行动。雅克二世是如何守护一个小国塞浦路斯的独立的；他死后，作为遗孀的王后卡泰丽娜统治了动荡的15年；在威尼斯巧妙的外交下，塞浦路斯最终被并入威尼斯的过程；被禁止离开岛屿的王后后来的生活……《年代记》就这样一直写到1495年。

“私生子雅克”

“私生子雅克”，这是塞浦路斯的岛民带有亲切感情称呼成为卡泰丽娜丈夫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的绰号。出身于法国波尔托十字军骑士的名门、吕西尼昂家族的他，成了最后的国王。

1458年，乔凡尼国王在指定了下任王位继承人为女儿夏洛特之后死了。夏洛特当时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与葡萄牙王子结了婚，丈夫已经去世了。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儿子。当时18岁的这个儿子富有年轻人的朝气，大胆而聪明，国王也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但是父王也察觉到他那非同一般的野心，为了避免嫡出的女儿在继承王位时发生纠纷，他生前安排了这个庶出的儿子雅克担任尼科西亚（Nicosia）大主教。他认为，如果能够保证雅克在宗教界飞黄腾达，那么可能就不会触

动他对王冠的野心。

继承了王位的夏洛特对身边这个虽说是庶出但比她大两岁的野心家哥哥感到深深的不安。那个时候，她已经定了与表哥萨沃亚家族的路易的婚事。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她继承王位之后立刻下令逮捕哥哥。可是，这个18岁的大胆青年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雅克在6个非常亲密的家臣陪伴下，他们也是跟他同年代的朋友，在深夜里悄悄地翻过了尼科西亚的城墙。只有雅克一个人是骑着马的，其他6个人都是徒步逃跑到海边。黎明前，一艘小船载着这7个大胆无畏的开朗青年离开了岛屿。哥哥逃脱几天后，夏洛特通过来自开罗的商人得知，雅克与家臣们在经过了亚历山大后前往开罗与苏丹会面。

那个时候，雅克在苏丹的面前做了一番长篇演讲。

“按照塞浦路斯王室的历史，比起女人继承王位，虽然是庶出但是年长的男人的我，成为国王才更合情合理。而且，塞浦路斯与埃及很近，允许法国人国王（指路易）来做塞浦路斯的国王。我想对于埃及的苏丹来说，这绝不是聪明的方式。如果我坐上了王位，我保证永远与埃及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有一天我破坏了这一约定，就算让我在基督教教会的祭坛上强奸犹太女人，我也不会拒绝的。”

这番话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他巧妙地博得了苏丹的同感与同情。当时的埃及正是马穆鲁克王朝的时代。记录中写道，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苏丹对这位塞浦路斯国王的私生子——从前十字军骑士的后裔，而且是天主教教会的大主教——的极端异教徒的言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最后他断言说，可以强奸而且是在教堂神圣的祭坛之上强奸犹太女人——那是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哪怕只是碰到一点儿就会觉得受到玷污的犹太女人。苏丹一边大笑着，一边从椅子上站起，走到他的面前。苏丹将这个青年称为自己的儿子，甚至在开罗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给予了非同一般的厚待。此外还约定，他将登上塞浦路斯帮助雅克实现野心，将王位从妹妹的手中夺过来。

在此，我必须要说明的是，雅克主张基督教王国的王权。为了获得这一认可，他为什么找到了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苏丹？尽管地理上来说比较接近。当然，他作为塞浦路斯人，必须考虑到塞浦路斯所处的历史及地理的情况。即因为每年持续向埃及的苏丹缴纳地租，所以不知从何时起，苏丹在塞浦路斯岛内的权威变得高大起来，现在塞浦路斯已经处于不能忽视埃及的想法的处境了。另外，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埃及是除了波斯之外地理上最接近的强国。可是，雅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非基督教式行动，还有别的原因。天主教的教义——那才是雅克真正的敌人。如前所述，可以从雅克的语言中看出这一点。

首先，雅克在苏丹的面前称自己为男人。这种说法在大多数记录和年代记中都有所记载。他说自己虽然是庶出，但是个男人；男人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的。也许他的这一主张是符合规律的，但并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并不承认庶子，只承认向神发誓、由神认可的正式结合而生下的嫡子。按照这一观念，庶子只是罪恶结合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要被赐封为神的仆人——骑士称号，第一项资格就必须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不具有成为骑士资格的庶子，竟要继承骑士地位之上的王位，这在天主教教义中是荒唐的事。无论是幼子还是女人，只要是神认可的正式婚生的嫡子，就具有正统继承权。可是，在伊斯兰教徒的世界里并不这么认为，女人也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在没有嫡出的男子的情况下，庶出的男子也具有继承权。雅克虽然在事实上身为王子，但并没有正式加入户籍，所以被称为私生子。他之所以向异教徒苏丹寻求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其次，天主教教义即罗马教会不承认他的权利，那么他就不能获得其他基督教国家君主的认可。这是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神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托付给了教皇。皇帝及国王们具有保护神所认可的国内教徒的义务。所以，皇帝或国王首先必须获得神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教皇的认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所以由教皇举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教皇将皇帝或国王、贵族等一国的统治者逐出教籍，那么，那

个国家的人民则不再有义务服从这个统治者。这是因为，作为基督徒的国民只有义务服从教皇这个神的代理人认可的统治者。当时凌驾于统治者之上的天主教教会的武器——逐出教籍——的威力就在此处。根据二者的这一关系，即教皇与皇帝及其他统治者之间的纠纷关系，正是中世纪后期使得欧洲发生动摇的皇帝派对教皇派长期斗争的历史。

此处所示的是天主教世界，没有年轻的雅克插入野心的余地。因为他是神不认可的因罪恶结合而生下的庶子，所以教会也不会承认其正统性。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由教会认可其权威的基督教国家君主们的否定。这使得曾经的十字军骑士后裔雅克在祖先的敌人、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中寻求理解自己主张的对象。只是，以庶子的身份却可以就任大主教职位，有趣地体现出天主教教会灵活的现实性。

即便如此，基督教诸国之中的意大利都市国家默认了雅克的野心。因为比起天主教教义来说，意大利认为享受自己现世的权利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成为国王之后的雅克脱离了伊斯兰教徒之国而想要依附于基督教国家之时，他选取了意大利。自己的祖先吕西尼昂家族明明是法国血统，他却选择了意大利，而且是意大利中以现实性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共和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直奔其现实性而去。与雅克的策略相反，嫡出的夏洛特后来被逐出塞浦路斯的时候，先是向罗兹岛[42]上的罗兹骑士团，而后又向罗马教廷寻求帮助。

1459年，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次子路易结婚。

1460年，在开罗的苏丹宫廷内，每日尽情享受迷人日子的雅克其实并没有沉溺于其中，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的到来，也一定没有疏忽夏洛特的新丈夫路易在塞浦路斯岛内不受拥戴的情况。

然后，到了9月，他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大大小小80艘船满载着马

穆鲁克士兵，从亚历山大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得到苏丹援助的雅克的指挥下，4年内战开始了。雅克已经20岁了。他一登上塞浦路斯岛，就对两年前自己逃出塞浦路斯时就跟随着的那6个家臣委以重任，对其中一个名叫弗拉·朱利亚诺的僧侣授予了自己放弃的尼科西亚大主教的职位。

1461年，眼见形势不利的夏洛特逃出了塞浦路斯岛，经过罗兹岛后，前往罗马向教皇请求援助。丈夫路易也逃出了岛，但没有与妻子同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萨沃亚。他此生再也没有见到妻子，终老于此地。如此，全岛几乎都归于雅克的统治之下，只有藏匿于地处岛屿的叙利亚一侧的塞浦路斯第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港的热那亚人持续了抵抗。等到1464年8月这个地方也沦陷后，内战才终于结束了。岛民们带有亲切感情称呼的年轻的“私生子雅克”成功地将王位收入囊中。

成为塞浦路斯国王的24岁的雅克，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王冠的分量，就不得不面对诸多难题。首先，是从祖父那代起就向埃及的苏丹缴纳5000达克特地租。不惜予以帮助他实现野心的苏丹也没有开口说“你可以不用再缴纳地租了”。其次，这个祖父成为俘虏的时候需要支付的赎金，是向当时在塞浦路斯经商的威尼斯人借来的。这笔钱款非但没有偿还，还常常拖欠利息。理所当然地，执塞浦路斯经济牛耳的正是国王的债权者威尼斯商人。

从前，威尼斯商人的仇敌热那亚商人的势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差不多控制了法马古斯塔港。可是，国王自己在内乱中成功地将抵抗的热那亚人从法马古斯塔港赶了出去；他们的祖国热那亚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相比，内政不稳，因而没有余力去援助身处殖民地的本国国民。所以，现在热那亚商人也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问题集中于如何应对威尼斯商人，并且是针对其中势力最强的科尔纳罗家族。塞浦路斯王室的最大债权者是塞浦路斯岛内最大的砂糖园经营者威尼斯人科尔纳罗，这个科尔纳罗是卡泰丽娜的伯父

安德烈。安德烈·科尔纳罗的背后是当时号称莱万特（Levante）海上最强的海军势力的威尼斯共和国，而可怕的土耳其正开始威胁这个莱万特海的王者威尼斯。对于年轻的国王雅克与小国塞浦路斯来说，即将开始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决定了此后塞浦路斯的历史。

莱万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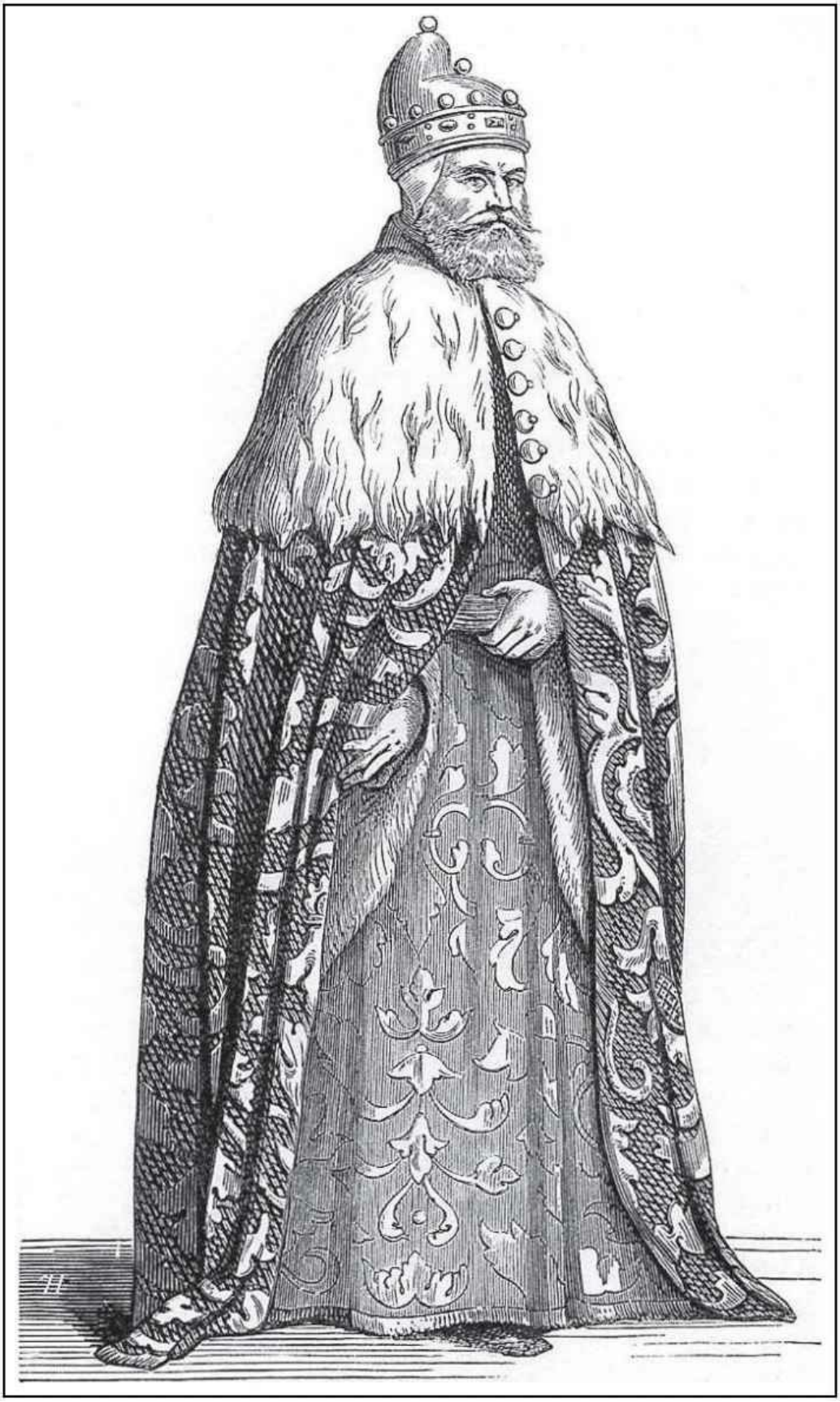
对于从1460年至1464年间“私生子雅克”强行夺取王位事件，威尼斯共和国在表面上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静观形势的发展，所以没有伸手援助被赶出塞浦路斯的夏洛特女王。在从罗兹岛前往罗马的途中，夏洛特的船受到了威尼斯海盗的袭击，全身被剥得精光。对于她的抗议，共和国只是官方表示了遗憾之意。同样，他们也没有帮助新国王雅克，只不过对这个青年的大胆气概好像抱有不小的好感。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目的的人是比较宽容的。当初同夏洛特联手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后来投奔到雅克的门下，共和国对此是默认的。对于严重监视着本国在海外的商人们行动的威尼斯来说，默认即意味着认可。只不过，当时以务实的政治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对这个私生子国王的认可并非单纯地持有好感，冷静的计算才是这个共和国行动的根基。

首先，夏洛特再婚的对象是出身于萨沃亚公爵家的路易公爵，萨沃亚家族通过女儿伯纳斯与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父亲）的婚姻，与米兰公国成为亲戚。而地中海的威尼斯的仇敌热那亚，当时属于米兰公国的领地。虽说夏洛特下台，被赶出了法马古斯塔港，但是萨沃亚、斯福尔扎两个家族的野心是想通过现今依旧拥有不小势力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热那亚商人重新拿回塞浦路斯，从而获得在地中海贸易中的踏板。夏洛特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任何借口，这令威尼

斯感到十分幸运。况且，雅克的后盾是开罗的苏丹。对于与埃及保有良好贸易关系的威尼斯来说，夏洛特所寻求援助的、承认她权力的罗马教会及米兰公国，那些国家与威尼斯在经济贸易上往来甚少，所以威尼斯更重视与地中海贸易中的商业对手埃及搞好关系，因此才认可了私生子雅克的王权。

但是，雅克也不能将注意力都放在欧洲的形势上，东地中海那个时候突然变得骚动起来，因为土耳其将其首都迁移至君士坦丁堡后，渐渐显露出对希腊诸岛的野心。他不得不对被伊斯兰教徒们包围着的塞浦路斯的未来担心起来。1466年的秋天，他派遣特使到威尼斯，传达了以下事项：1.对土耳其提出联盟建议；2.对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商人提供特权保证；3.请求对自己的婚姻提出建议。

对此，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在11月11日对特使做了如下答复：接受国王的提议，为达成对抗土耳其的联盟，将提供6艘排桨船及500匹马。另外，在国法上正式认可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经济上及司法上享有特权。关于第三点，则建议与东罗马帝国的后裔托马索·帕莱奥洛戈的女儿结婚。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威尼斯还没有考虑到让国王与威尼斯的女人结婚的事情。



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礼服

翌年，上面的前两项都付诸实践。而第三项，对于结婚的事情，国王心中尚未做出决定。可是，一个没有预想到的建议却促成了婚事。那是当时在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中与国王最为亲近，而经济上亦具有强大势力的安德烈·科尔纳罗提出的。他向国王提议，国王的结婚对象可以考虑自己的侄女卡泰丽娜。承诺的好处是：将自己与自己的弟弟即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两人此前借给王室的钱款纳入赠给侄女的10万达克特陪嫁金之中。一个贵族子女之所以能够破例有这么高的陪嫁金，其原因正在于此。

可是，接受了提议的国王被吸引的是下面这一点。安德烈·科尔纳罗将自己的意向汇报给祖国威尼斯政府，威尼斯表示这个婚姻是促进应对塞浦路斯政策的好机会。于是，将新娘卡泰丽娜收为共和国的养女。由此，元老院决议，成为姻戚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后具有对付外敌、保护塞浦路斯王国的义务。至此，雅克国王也不得不下决断了。在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面前，小国塞浦路斯王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安全委身于某个大国。1468年的春天，国王派特使密斯特希尔去威尼斯，让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举行婚礼。7月30日，总督列席，举行了仪式。

至此，故事才刚刚回到本章开头的婚礼的场面。作为共和国的养女嫁给塞浦路斯国王的卡泰丽娜的豪华婚礼背后具有上述如此复杂的情况，这是充满了自豪的喜悦而且十分年轻的她所完全不了解的。

一年过去了。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丈夫的卡泰丽娜，没有收到一封塞浦路斯的来信。那是因为身处塞浦路斯的雅克国王对这个婚姻的关心开始淡漠的缘故。国王看到岛内的威尼斯人突然腰杆子硬了起来而体味到塞浦路斯的独立性受到了侵犯的威胁，这是一种在以往的

经济统治之上又触及了其王权势力而带来的权力危机感。再加上现在执掌塞浦路斯宫廷的国王直属的家臣们，也就是当初跟随雅克的那6个家臣都出身于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加泰罗尼亚，他们显然也不愿见到岛内威尼斯人的势力壮大。

留意到国王对于威尼斯的不安以及家臣们的敌忾心的，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那不勒斯也清楚塞浦路斯岛作为莱万特贸易据点的重要性，所以那不勒斯想在热那亚衰败之时取代独占莱万特贸易的威尼斯势力。对于在爱琴海上的威尼斯战役中获胜的土耳其苏丹，那不勒斯国王送去了祝贺战胜的信函，甚至还写道，那不勒斯可以从陆上进攻威尼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通过塞浦路斯国王的那6个家臣中的一个——那不勒斯人利佐·德·马林，偷偷地向国王雅克提议与阿拉贡家族的王室女儿结婚。

那不勒斯的这些举动，不可能逃过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威尼斯情报网的耳目。在察觉到这些信息后，1469年5月18日，威尼斯向塞浦路斯国王递交了对其不履行结婚的抗议，称国王对待共和国养女的冷淡态度可视为针对共和国的行为。

国王对这份抗议的回信，至今都没有人发现。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乔治及弗洛里奥·布斯特隆（Florio Bustron），对此都没有提及。也许，国王对那不勒斯有相应的计划，所以对这封抗议信忽视不管吧。婚礼如果没有实际举行的话，按照天主教教义，可以通过解释的方式认定为婚约无效。

可是，莱万特海形势的紧迫性越来越严重了。1453年，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沦陷而灭亡，这对欧洲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不安。在他们尚未从中恢复过来的1470年，雅典附近的内格罗蓬特公国[43]最终也落入土耳其的手中。虽然靠近陆地，但是内格罗蓬特岛的沦陷显示出陆军国家土耳其具有真正的海军实力。这对迄今为止掌控了莱

万特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受到巨大冲击的重大事件。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莱万特海上的政治与外交，从这一年起发生了变化。

因内格罗蓬特沦陷而受到打击的，并非只有将该岛作为本国海军基地的威尼斯。异教徒袭击过后不久，意大利诸国就觉得要团结起来。那不勒斯送给威尼斯海军10艘排桨船以作为援助。但同以往一样，意大利诸国的团结仅仅以迹象就告终了。那一年的12月，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再加上罗马教廷理应结成的对土同盟，也在不知不觉间不了了之。意大利诸国间非同一般的竞争意识，也使得这次同盟不能实现。唯有威尼斯，依旧被置于应对土耳其的正前方。

占领君士坦丁堡，称霸希腊诸岛，再加上这次内格罗蓬特的沦陷，土耳其迈向霸权的稳健步伐，对于在地理上相当于基督教国家最前线的塞浦路斯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不得不改变以往在威尼斯与那不勒斯之间权衡利弊的政策。站在十字路口的他，基于莱万特海域的既存势力而选择了威尼斯。1471年的春天，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重新提议建立对土同盟，并赠送了塞浦路斯的特产砂糖。接着，在翌年夏天，国王派特使去威尼斯迎接妻子来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特使因此事抵达威尼斯的时候，9月19日，威尼斯政府在接受国王的这一提议之上，向国王做出了如下官方答复：他们获得了土耳其正在为达达尼尔海峡[44]大海战做准备的情报，所以，让塞浦路斯所有的排桨船做好在冬天应战的准备，并将在翌年春天与威尼斯舰队合并，还计划从那不勒斯、罗马送来战舰。此外，任命特使安德烈·布拉加丁为王后卡泰丽娜的塞浦路斯随行者。布拉加丁特使不仅具有护送王后到塞浦路斯的任务，还要在航路途中顺道去罗兹岛，对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下达彻底执行对抗土耳其的命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感受到身边土耳其威胁的威尼斯对此做出了慎重的考虑。

1472年9月26日，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从婚礼那天起，过去了4年的岁月。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只是等待丈夫邀请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漫长的4年。虽被人尊敬地称为王后，但没有一个人比她自己更能体会在那样被称呼的身躯里所感受到的空虚。她也一定感到了被丈夫遗忘的妻子的不安与焦虑。一切都在她这个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着。关于她的这4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年代记作者们都没有提及一句。她不仅是被丈夫遗忘，也被所有人遗忘了。出航之日，曾经记录了4年前那场豪华婚礼的年代记作者们再次让卡泰丽娜登上了舞台。

这一天，为了送别前往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威尼斯总督在威尼斯政府的高官及贵族们的陪伴下，从圣马可码头一直来到了利多。来自塞浦路斯的三艘排桨船与威尼斯的四艘排桨船正在利多港忙碌地准备出航，这是跟随王后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舰队。各船的桅杆上已经准备好要升起的帆，可以随时扬帆起航。船长及乘务组全员各就其位，射手排列于船的栏杆处，领航员站在船头，舵手也站在其位，桨手每三人一列，各自的手里握好了橹。这个队伍一共有23列。在总督及全员站在港口的目送中，卡泰丽娜在布拉加丁的服侍下上了船。桨手们将橹摆成水平，长达7米的橹阵，从船的两侧一齐伸出的样子就像一只瞬间飞起的大鸟。而下一个瞬间，橹阵一齐沉入水面，桨手们开始有节奏地切割水面，7艘排桨船就这样渐次出了港。一离开港口，桨手便放慢了划桨，慢慢地鼓着风的帆高高扬起。船队眼看着加快了船速，南下亚得里亚海。

同15世纪时向着莱万特海出航的其他众多排桨船队一般，乘载卡泰丽娜的这支船队也沿着威尼斯船队常用的航线。从威尼斯出港的船队，首先停泊于当时属于威尼斯领地，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伊斯特拉半岛

（Istria）的普拉（Pola）。在那里装载好水及食物后，从达尔马提亚（Dalmazia）沿岸而下，到斯巴拉托（Spalato）再次补给水与食物。下一个停泊港是科孚岛（Corfù），在这里与其他威尼斯商船队会合，也是为了防备海盗而组成一个大船队，离开亚得里亚海后终于进入地中海。在下一个停泊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南端的摩德纳，大船队相互告别，各自奔赴目的地。军船队前往克里特岛（Crete），一些商船队回到爱琴海前往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船继续开往黑海的诸城市。其他的商船队在通过克里特岛之后前往叙利亚以及埃及。

卡泰丽娜的船队在摩德纳与其他船队告别后向东航行，这是为了去一下罗兹岛。在停靠罗兹岛的数日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大使们，与该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会面，商谈了土耳其对策。在这一站结束之后，船队开往贝鲁特，从贝鲁特到塞浦路斯的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只有几日的航程。

在长达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当船队抵达塞浦路斯岛时，本国威尼斯已经到了海风逐渐变凉的时候。这是出航在外的商船队为了在本国度过寒冬，满载着东方的奇珍异宝陆陆续续回到威尼斯的季节。冲着这些商船，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们带来购买商品的金袋与用来售卖的本国特产，一下子琳琅满目地出现在威尼斯城里，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那一带呈现出异国风情的热闹，也是在这个时候。可是，在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充足的阳光依旧将空气熏染得暖洋洋。

在塞浦路斯举全岛之力的盛大欢迎之中，抵达法马古斯塔港的卡泰丽娜接受了国王的迎接。当她通过铺上了金色毛毡的栈桥后，第一次站在塞浦路斯的土地上。聚集于港口的塞浦路斯岛民们情不自禁地感叹：“阿佛洛狄忒回到岛上了！”那天的卡泰丽娜美丽极了。比中等身材还要矮一点儿的她，乳白色的肌肤、丰腴得快要溢出来的体态；一头当时被称为威尼斯式金发、被太阳晒成亚麻色的长发；熠熠生辉的黑眼

睛，让人联想到希腊人血统的高鼻梁的脸庞；再加上安详的举止，具有当时吸引男人们眼睛的威尼斯女人的典型美。她从法马古斯塔港前往位于岛屿内陆的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并在那里举行了正式的王后加冕仪式。由32岁的魁梧丈夫守护着，完全忘记了4年等待之苦的卡泰丽娜在这块土地上，认识了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与表哥马克·本博。这让她觉得很有信心。可是，处于幸福巅峰的卡泰丽娜心里唯一觉得黯淡的就是，她看到了庶出的孩子们：在丈夫身边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那只不过是很小的阴影罢了。虽然她从当时的大都会威尼斯迁移至小国塞浦路斯，但是“东方”又是另外一个文化圈。基督教国家的塞浦路斯岛是一座混杂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古老而充满了甜美官能色彩的漂浮于地中海上的岛屿。

法马古斯塔之乱

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第二年的夏天慢慢地来到了。还有几个月，卡泰丽娜就要过完她在地中海的第一年生活。可是，岛外的莱万特海的风浪并不见平息的迹象。土耳其、佩鲁贾、埃及、威尼斯、那不勒斯，还有其他国家也纠缠不清——各地战役，而后缔结和平条约——总是交换着对象进行着。固定的敌对关系大约只有威尼斯对土耳其，其他诸国则随意地更换敌人与同伴，处于一会儿争斗、一会儿和好的状态。

塞浦路斯感到越来越不能作为的形势。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承认雅克王位的，除了对于基督教国家塞浦路斯来说本应是敌人的土耳其、佩鲁贾、埃及，也就只有威尼斯了。前女王夏洛特的丈夫的老家萨沃亚公国及其亲族米兰公国，理所当然的是反雅克的急先锋，佛罗伦萨与那

不勒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针对土耳其甚至准备组建十字军的庇护二世之下的罗马教廷，断然拒绝承认他这个国王。不仅如此，还厚待前来罗马寻求援助的夏洛特，尽力助其复归王位。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都追随罗马的这一态度。塞浦路斯的王冠晃晃悠悠，只靠雅克的才能与势力支撑着。岛外与岛内都是如此。

可是，让这种微妙的均衡在一瞬间崩溃的时刻来了。7月7日，因为病名不清的急病，国王雅克二世死了，年仅33岁。关于国王所患病名，在塞浦路斯人记载的年代记与威尼斯的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一句话，只有拿巴杰洛写下的“Flusso di ventre”，直译就是“从腹部流出”。我们无法知道这在今日属于什么病。关于国王的猝死，虽然有传言说是夏洛特派的毒杀，但那只是单纯的流言，没有任何证据。可是，在这种局势不稳之中的国王之死，成为针对塞浦路斯的阴谋与煽动的导火索。而这对于威尼斯来说，意味着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绝好时期到来了。因为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土耳其帝国之际，塞浦路斯越来越具有军事及商业的意义。

婚后尚不足一年便失去了丈夫的卡泰丽娜，那时候已经怀孕7个月了。国王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如果卡泰丽娜生下的孩子是男孩儿，那么将由他来继承王位；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儿或者死亡，那么王位继承权由两个庶出的男孩儿中的年长者获得；如果他们都死了，王位由吕西尼昂家族中与国王雅克关系相近者继承。在上述任何情况中，王后卡泰丽娜至死都保有塞浦路斯主首[45]的权力。”在这之后，国王的遗嘱还记载了指定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为摄政，命家臣们协助他和王后的执政。

雅克国王临死之际，在王后的面前宣誓忠诚的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们，随着时日迁移，开始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们借协助王后卡泰丽娜的名义逐日扩张其势力，针对岛内的威尼斯人。

就好像呼应岛内的这些动向似的，岛外的夏洛特首先采取了行动。

她从滞留地罗兹岛派遣使者去见埃及的苏丹，告知国王雅克死后，这次王位应该属于自己，请求认可自己的权力。但是，埃及与威尼斯在贸易上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且就威尼斯在莱万特海上的海军实力来说，埃及也不希望与威尼斯制造事端，所以拒绝了她的请求，而且在几乎同一时候，接见了抵达开罗的王后派来的使节。这说明比起前女王夏洛特，埃及更认可的是成为王后的威尼斯女人。

可是，夏洛特并没有因为这第一阶段的失败而气馁。她还向当时处于罗兹岛近海的威尼斯舰队的提督莫切尼格[46]送去了信函，主张自己是王位的正统权力者。对此回信的提督，也就是在一年后成为共和国总督的提督莫切尼格，可以说他的回复具体地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观点。“所谓国家并不是靠法律来获得的东西，而是靠宝剑与力量（美德）获得的，像您这般贤明的女士却不明白，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雅克国王凭靠他的宝剑与力量赢得了塞浦路斯。那样的他，将王位留给了卡泰丽娜王后生育的孩子。对于塞浦路斯而言，您与王后，哪一位的权力才更正当是不言自明的。”夏洛特的计划至此挫败。

但是，塞浦路斯宫廷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岛内的威尼斯人势力扩张惊人，令家臣们坐立不安。国王去世后还没到两个月，8月24日，正在海莱斯彭特斯[47]海面准备与土耳其军队进行海战的提督莫切尼格，接到了本国威尼斯元老院下达的这个命令：“留下4艘或6艘排桨船以监视土耳其军队，率领其余舰队直达塞浦路斯。”

在提督接到这一命令的4天后，卡泰丽娜王后在塞浦路斯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接着，在9月16日，在法马古斯塔港口内外都停满了威尼斯大舰队之中，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提督莫切尼格列席，为刚刚出生的孩子举行新国王雅克三世的加冕仪式。塞浦路斯岛内，因为这个已故国王雅克二世的孩子的加冕，一时间似乎流露出平和的气氛。10月6日，

威尼斯政府对滞留于塞浦路斯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指示，将5艘排桨船留在塞浦路斯，率领其余舰队回到任地摩德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摩德纳，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从长年的海军生活引退，向后任交卸。根据本国的这一指示，莫切尼格与威尼斯大舰队一同离开了塞浦路斯。对于阴谋者来说，这正是绝好的时机。

威尼斯并不知道，在大约10天以前，两艘武装好的排桨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不勒斯港。指挥这些排桨船的是塞浦路斯岛担任最高司法职务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他非常隐秘地与那不勒斯国王商讨着策略并开始实施行动。11月10日，排桨船抵达塞浦路斯的圣乔治港[48]，将大主教一行放下之后，绕到法马古斯塔港，秘密地停泊于港外。大主教一行也从陆路前往法马古斯塔。12日，抵达法马古斯塔的大主教好像单独会见了塞浦路斯宫廷的家臣们。威尼斯驻塞浦路斯大使巴尔巴罗感到这个大主教的行动非常可疑，便向本国政府紧急通报可能有事件发生。

大使的预感应验了。两天后，从1473年11月13日到14日夜间，爆发了著名的史称“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叛乱。

大主教在滞留那不勒斯期间，与那不勒斯国王策划了阴谋。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1.杀死摄政会议中涉及的威尼斯人。2.解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海军武装。3.驱逐威尼斯政府驻塞浦路斯的政府相关者。4.剥夺王后卡泰丽娜的权力，使她承认以下事项，即让先王雅克的庶出女儿与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结婚，并给予阿方索王位第一继承权“王太子”之位。这一点正是目的所在。

由此，阴谋者由两派人构成。一派是受到那不勒斯国王后援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以及最初就跟随先王雅克的利佐·德·马林等6人，他们是塞浦路斯宫廷的新进家臣。另一派以前曾经是夏洛特派，后来臣服于雅克，成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元老重臣。他们在雅克死后，再次展开与前女

王夏洛特之间的联系。这两派得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后援，在掀起反威尼斯的叛乱上达成了一致。

13日夜间爆发的这场叛乱，在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以及其他威尼斯人留下的记录中记载如下：

大主教与利佐·德·马林在那天半夜过后，进入了王后卡泰丽娜的房间。正要就寝的王后因他们的闯入惊吓得连声音都还没发出，守卫她的御用医生刚要抵抗就被利佐杀死在面前，甚至几乎就倒在卡泰丽娜的怀中。与此同时，察觉到王宫内不安的氛围，摄政也就是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及他的侄子马克·本博赶紧前往卡泰丽娜的住处。他们刚一进入王宫就被利佐杀死了，通过王后房间的窗户就能看见尸体躺在庭院的泥地上。王后被带走了，出生还不满三个月的幼王被阴谋者们从母亲卡泰丽娜的手中夺走。

一切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在停泊于港口的威尼斯排桨船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结束了。当他们注意到情况异常时，王后与幼王已经落入了叛党之手，岛内的威尼斯政府束手无策，相关者们也同样处于不能动弹的状态。

王后被带到停泊于法马古斯塔港外的那不勒斯的排桨船上，让她在那里与那不勒斯国王的特使会面。特使要王后亲笔写信向威尼斯本国传达：认可那不勒斯王子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女儿的婚姻，授予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王太子”称号。另外，杀害安德烈·科尔纳罗等人，是对他们平日里的贪婪行为进行的个人报复，而不是政治暗杀。这些都是王后卡泰丽娜被他们逼迫写的内容。她在有关伯父暗杀的事情上，按照阴谋者的所说写了信，但是在庶子们的婚事及其王位继承权上，只摇头拒绝。年幼的儿子连同塞浦路斯王室的印章被掳走了，出于担心，身为母亲的她才不得不有所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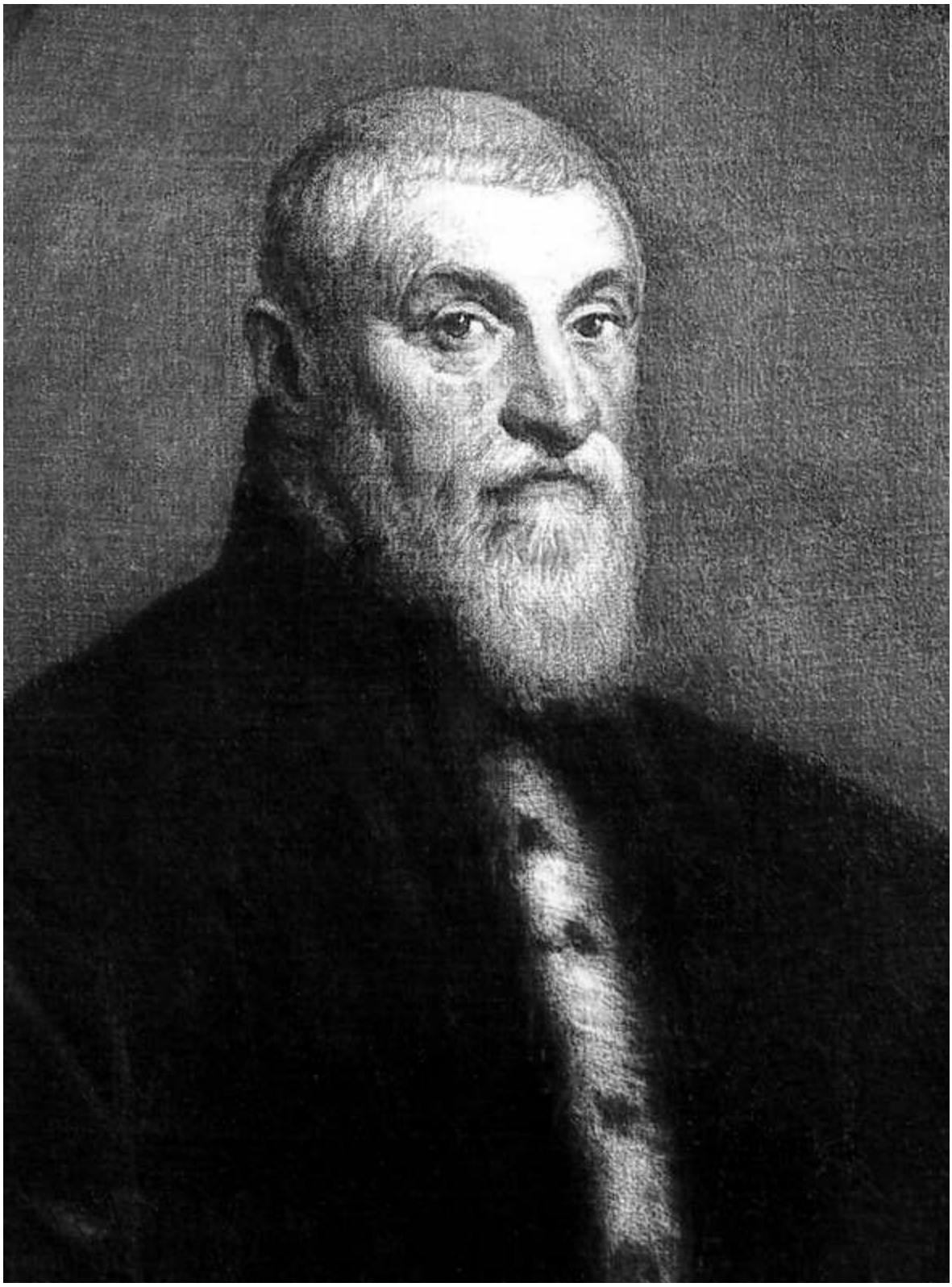
如果这是发生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身上，那她一定会做出令人

吃惊的举动。可是，这个威尼斯女人卡泰丽娜与之不同。她是很像威尼斯女人的女人——享受着被保护的甜美的官能喜悦，是典型的威尼斯女人——完全不懂政治策略。

她的监护人后盾——威尼斯，行动向来慎重而敏捷。

原本预定在摩德纳向后任交卸的提督莫切尼格，在接到报告说两艘那不勒斯的排桨船正在逐渐靠近塞浦路斯之后，立即派遣了两艘排桨船开往塞浦路斯，以便打探那不勒斯的动静。然后，当大使巴尔巴罗从塞浦路斯发出的紧急报告到达本国威尼斯时，克里特岛的总督也向本国发来报告说塞浦路斯好像突然发生了异常状况。接到这些情报的本国政府向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指示，莫切尼格与后任的交接延迟，重新从自己的舰队中任命参谋长索朗佐为指挥官，率领8艘排桨船火速开往塞浦路斯。11月23日，自叛乱发生起第九天，威尼斯排桨船队到达了法马古斯塔港外。连同港内停泊的5艘排桨船在内，总共聚集了15艘排桨船队。威尼斯的这一阵势与那不勒斯的两艘排桨船之间形成了对峙状态。

可是，对于王后与年幼的国王被俘为人质，威尼斯无计可施，能够做的只有收容被阴谋者驱逐的巴尔巴罗大使及岛内威尼斯人。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

在这期间，阴谋者们为了向岛民显示他们爱戴的王后是自由的，于12月5日让她骑着马环绕广场，还去了教堂。威尼斯方面依旧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不过，那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2月15日，自叛乱发生后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个月，那天，阴谋者内部的矛盾爆发了。从前是塞浦路斯王室的重臣、现在依旧在策划着前女王夏洛特王位复归的罗卡斯伯爵和托利波里伯爵一派，与自“私生子雅克”国王从开罗逃亡时起就跟随着的、在国王死后与那不勒斯国王合作、力图排除威尼斯势力的利佐等人，即所谓新进家臣一派的对立发生了激化。

一直在慎重地等待时机的威尼斯当然不会错过阴谋者内部的这一分裂。威尼斯与本国政府、摩德纳的提督莫切尼格取得联系，终于采取了决定性行动。12月31日，700名士兵登上了法马古斯塔，首先成功地将王后及幼王从俘虏之身解救出来。而分裂之后不能采取统一行动的阴谋者们，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刻分成了两派逃跑了。利佐乘坐排桨船迅速逃出港外，托利波里伯爵等人也从陆路逃出了岛外，然后逃往夏洛特等待着的罗兹岛。指挥了塞浦路斯登陆战的参谋长索朗佐并没有穷追逃亡的阴谋者，而是以威尼斯的力量控制了塞浦路斯全岛的要塞。

翌年2月3日，由50艘排桨船组成的大舰队陪伴着，提督莫切尼格抵达塞浦路斯。他看到了一个完全处于威尼斯控制之下、已经恢复平稳的塞浦路斯。来不及逃跑的是阴谋者中不那么重要的几个人物，都被处以刑罚。但是，对于尼科西亚大主教则以圣职者不能被处以极刑为借口，将其护送回威尼斯。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对王后卡泰丽娜送去了平定叛乱的祝贺信，同时，对于因为处理这一事件而延迟引退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撤离塞浦路斯的命令。莫切尼格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将塞浦路斯统治的全权及10艘排桨船交给参谋长索朗佐之后，向着摩德纳出发了。

这场著名的法马古斯塔之乱的阴谋，就这么以失败告终了，只是为后来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提供了合适的名目而已。图谋将莱万特海统治的重要据点塞浦路斯吞并的威尼斯共和国，在此处下了巧妙的第一步棋。

大国的政治

1474年，正是这一年开启了之后15年间卡泰丽娜短暂的幸福统治。通过武力介入镇压了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威尼斯共和国，终于朝着合并塞浦路斯王国的野心开始推进实际的步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军事上，塞浦路斯已经彻头彻尾地被殖民化了。将王后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只是为了维持独立国家的外观，实际的目的是利用她而已。后代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将这15年视为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第一个时期。

在协助本国的养女王后执政的大义名分之下，威尼斯共和国对塞浦路斯实施的内政干涉，在其冷酷性、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周全性上，可以说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最强盛国家之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本质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威尼斯出色地维持了政治与武力的均衡，有效地灵活运用，一旦察觉到异常情况，就立刻派遣大舰队，凭借其威力摆脱困境。所以，以其威力为背景展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足以作为一个大国对待小国的政治的案例——历史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大国凭借武力对小国进行内政干涉的艺术佳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是出于对人性的考虑，都不是什么难题，难的只是将敏捷果断的军事行动与政治进行巧妙的调和而已。这是在所有的时代里被人们称为“智慧”的东西，在所有的时代里可以操纵历史现实的东西。

法马古斯塔之乱中，威尼斯的武力介入并非出自王后卡泰丽娜的援军请求，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中也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请求援军。这是

威尼斯方面以王后结婚时签订的契约之一——守卫塞浦路斯王国不受外敌侵犯——为盾牌进行的擅自介入。

在法马古斯塔之乱被镇压之后的15年中，对于不具备任何正当法律性的威尼斯的做法，当时的舆论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威尼斯受到了以罗马教廷为首的责难攻击。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了。支撑威尼斯这一做法的最大原因在于，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异教徒土耳其的威胁。诚然，地中海上最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但是，当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等到土耳其正式表现出兴趣时，已经是从此时起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塞浦路斯戏剧性地在法马古斯塔进行了最后的攻防战，落入了土耳其的手中。所以，所谓针对土耳其的这一理由，在15世纪下半叶的这个节点上，不过是威尼斯所高举的大义名分罢了。

而且，当时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们，例如至今依旧被高度评价为冷静而正确记述的萨努多、马利皮埃罗、拿巴杰洛等人，以及其他各种威尼斯政府的公文书里都确信，威尼斯合并塞浦路斯是共和国出于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后对他国实施的恩惠之一，因而塞浦路斯是非常幸运的。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们都公然责难本国威尼斯的做法。根据他们对塞浦路斯合并的记载，可以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吧。这是大国国民的局限性，似乎无论在什么时代也不会改变。此处不过是抹杀了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的存在罢了。

威尼斯一边让武装的排桨船舰队停留于港内，一边对塞浦路斯王国进行彻底的内政干涉。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发布了以下布告：

【内政】此后，塞浦路斯王国除了王室之外，与威尼斯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接受相同的政治机构。即，在幼王与王后之下，为协助王后执政设置两个行政官，名为“顾问”。他们每人每两年进行一次轮换。另外，

设置担任实际行政的行政官与领事各一人，任期也是两年。财政上，设置了两个财务官。军事上，塞浦路斯国内的最高决定由一个参谋长执行。另外，设置一个队长担任塞浦路斯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的警卫。如此，总计8人的官员都由威尼斯派遣，由威尼斯人担任，塞浦路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制度与克里特岛等其他威尼斯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相同。威尼斯政府对派遣至塞浦路斯的这8人严令，无论对岛民发出何等布告，都要以王后的名义进行。

【军事】威尼斯政府对接任莫切尼格之职的新任提督格里蒂（Andrea Gritti）给予了以下指示：从摩德纳、克里特两个海军基地时刻注意塞浦路斯的形势，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以防在出现万一的情况时能够立刻开往塞浦路斯。当察觉有异常情况时，不需要向本国政府报告；全权授予提督处理，可以依据提督的判断展开行动。

【外交】在格里蒂接受指示的同时，威尼斯驻那不勒斯大使也接到了本国政府的文件："关于法马古斯塔的阴谋，威尼斯的解释是，这是在尼科西亚大主教个人意见之下实施的事件。根据那不勒斯与我国的友好关系，也完全明白那不勒斯王国是绝对不会介入这般事情的。请如此转告给那不勒斯国王。"转达这样的话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外交辞令，但是因为两国毕竟没有开战，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参与了阴谋。国王回复如下："那不勒斯王国只想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平安发挥作用。"共和国政府即刻回应："如果那么担心塞浦路斯的话，那么从今以后，除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外，请不要向塞浦路斯开进一艘船。"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对于塞浦路斯的野心就此被遏止。威尼斯对米兰公国也进行了同样的交涉。如此，威尼斯遏制了意大利之中对塞浦路斯野心最大的两个大国的行动，两国在海军实力上来说都不是威尼斯的敌手。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敏捷的武力介入，使得背后的两国刚一开始行动就被打击了回去。罗马教廷以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名义对威尼斯这一强制做法表示了不满。但是，这对一直以来就明智地与教会划清界限的威尼

斯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如此一来，所有的方向都被威尼斯进行了加固，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要说在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对她有救命之恩，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是一个威尼斯人。当时，控制威尼斯人的思想，正如“十人委员会”中某一无名委员的发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至少威尼斯政府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15年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想了。

威尼斯将刚刚出生的年幼的国王雅克三世及其母亲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强行统治塞浦路斯尚不足一年，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1474年8月26日，在迎来了一岁生日的两天后，卡泰丽娜的儿子、年幼的国王夭折了。按照先王雅克二世的遗嘱，接下来的王位继承权将传给先王留下来的庶子中7岁的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的话，那么将传给另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了的话，则从吕西尼昂王室中选择亲缘关系最近的那个。无论如何，王位都由吕西尼昂家族的人继承。先王虽然确保了自己的妻子王后卡泰丽娜在其生涯中贵为塞浦路斯第一女性的地位，但是没有提及一句王后继承王位。因此，威尼斯就此失去了统治塞浦路斯的名义。可是，在土耳其帝国的强势崛起下，威尼斯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希腊殖民地。而现在，塞浦路斯作为莱万特海的最前线，军事、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目前以莱万特海上贸易为生的威尼斯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塞浦路斯。

另一方面，当年幼的国王夭折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内四处引起了骚动。大部分岛民出于对美丽而不幸的王后卡泰丽娜的同情，对失去了独子的王后宣誓忠诚；但也有一些岛民因为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侵犯而不安，对威尼斯的反抗情绪日益加剧。再加上一些少数派，虽然人数少，但问题是他们是反卡泰丽娜派的岛民。塞浦路斯宫廷中的重臣们大多属于此派。他们处于威尼斯人王后之下，害怕那越来越强大

的威尼斯势力，担心一步步朝着威尼斯殖民地化方向发展的塞浦路斯的将来。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其原因也与一年前法马古斯塔之乱失败的原因相同。塞浦路斯王室的世袭家臣们构成的一派，乘此机会再次向前女王夏洛特献计复归王位。曾经直属于先王雅克的新进家臣一派则打算推戴先王留下的庶子们。

在这种分散的反卡泰丽娜势力与反威尼斯势力的状态下，是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的。岛内四处接连不断地发生着小规模冲突事件。

岛内的这些动静被威尼斯驻塞浦路斯行政官逐一汇报给本国政府。9月，威尼斯政府向他们下达了如下指示："对于反威尼斯派与在王后的统治之下依旧热衷于谈论塞浦路斯独立的岛民，绝密制作这两派的所有塞浦路斯人名单，火速送至本国政府。"不久，塞浦路斯宫廷中的一个重臣在王后的名义下被押送去威尼斯，还有一人被驱逐到国外。

因此事件，塞浦路斯宫廷内发生了动摇，在尚未平息的10月末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向那不勒斯、米兰与罗马派遣特使，在正式告知雅克三世死亡的同时，递交了如下通知："国王死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埃及等异教徒势力的威胁以及其他一切叛逆行为的危害。"

与其说这是一个请求了解的通知，不如说是领土宣告。对塞浦路斯没有直接野心的罗马教廷，表面上给出了赞成的回答，但是内心并不希望将塞浦路斯交给教会不能指挥的威尼斯之手，而是希望塞浦路斯接受与教会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或者国家的统治。所以，虽然给威尼斯大使回复赞成的意见，但背地里又秘密地联系那不勒斯与罗马两大国家，意图推进反威尼斯同盟。

威尼斯很快就察觉到这一动向，对驻塞浦路斯参谋长索朗佐下达了严令："由威尼斯排桨船舰队封锁塞浦路斯岛周边海域，任命两个驻扎塞浦路斯的参谋长一直待在王后的身边不许离开，掌管塞浦路斯的全部

政务。另外，塞浦路斯全岛的城塞只交给完全忠诚于威尼斯的人之手。”按照这一指令，塞浦路斯近海的海上警备又追加了4艘排桨船，总计15艘威尼斯排桨船在平常监视着塞浦路斯的周边情况。此后，进入塞浦路斯港的船只几乎只有威尼斯的军舰或商船了。

可是，希望彻底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样的行动乐此不疲。同年11月，决定派王后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不过，只冠以个人名义。虽说如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们除了王后父亲到来的消息之外，同以往一样，还接到了按本国政府的决定方针对塞浦路斯进行管辖的指令。

翌年2月，马克·科尔纳罗到达塞浦路斯。马克虽然清楚本国政府派遣他的任务——协助确立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势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他首先想做的是改善女儿卡泰丽娜的艰难处境。卡泰丽娜也因为父亲的到来打起了精神。她第一次想对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表述自己的想法。以下录入的三封相同日期撰写的书信，显示了先是由养父威尼斯共和国赐予了王冠，而后又被剥夺了王冠的王后卡泰丽娜对于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傀儡的苦闷心情。

第一封信是1475年4月14日王后致威尼斯总督的，这封拉丁语长信看起来是书记官做的笔记，内容概括如下：“我本来祈祷，父亲的到来可以改善一些我作为王后的地位待遇，可是依旧同从前一样。不仅如此，威尼斯行政官们甚至拒绝修改以往的方针。所谓以往的状态，就是说对塞浦路斯岛民发布的通告都是他们制定的，我只是在送给我的文件上签名罢了。而送到我这边来的公文书也是先送给他们的，之后理应再还到我这里的，却连一次都没有执行过。对于塞浦路斯人的赏罚也是如此，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们本是被派来协助我这个王后的，可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协助者，简直就是凌驾于我这个王后之上的执政者。可以说，塞浦路斯的现状就是由他们实行了统治。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

此。我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两个仆人服侍着饮食，根本就没有王后该有的公开宴会；在去做弥撒时，也没有像样的队列。我就算想要做这些事，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也没有条件。我本来应该有每年一万达克特的养老金，但是他们连那个都不给我。我恳求总督阁下安排他们回到作为王后建议者的立场吧。”

第二封信也是王后致总督的。在用威尼斯方言亲笔书写的这封信中，她首先解释了自己另外亲笔写信的原因。因为考虑到书记官好像与威尼斯行政官们串通，所以第一封信在送给总督之前可能就已经被他们撕掉了。接着，她同第一封信里表现的一样，继续进行了申诉，最后说到威尼斯人行政官们在执政之际中饱私囊，并举了一个例子：以将塞浦路斯的自由民众卖给奴隶商人为名目，将其逮捕。他们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支付高额的赎金，这不仅让岛民感到人心惶惶，还导致塞浦路斯王国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另外，她还控诉连王后自己都不能自由地在岛内行动，这不仅仅损害了王后的尊严，而且完全将王后置于奴隶同等的地位。

上述两封信的结尾都署名为“您的女儿、王后卡泰丽娜”。卡泰丽娜并没有理解将她作为养女的共和国的真意。她单纯且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署名“您的女儿”，共和国就会听取她的诉说。相比之下，身为威尼斯贵族也曾经从事过共和国政治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虽说也是想要通过申诉改善女儿的处境，但作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现实视野令他采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

第三封信是马克·科尔纳罗致总督的：“这封信大概与王后的两封信同时到达威尼斯了吧。如果您认为她的两封信是在我的忠告下所写，那真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如此，我作为威尼斯的国民，作为对威尼斯共和国最忠诚的自己，证明信中所述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块土地上的王后实在是境遇悲惨，只有4名仆人和2位女官服侍。她的衣食起居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只有胳膊长的桌子上吃饭。她每天被分发当日的费

用，窘困得连10达克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我的其他几个女儿虽然嫁的不是王室，只是威尼斯的贵族之家，但她们的生活都比王后的现状要好很多。我自己在到达这块土地后，向威尼斯行政官们请求改善王后的困境，但是他们只声称前任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做不了。我看不下去王后的困境，甚至拿出了自己带来的300达克特。我担心将王后置于这般现状之中，将会引起敬爱王后的塞浦路斯人对威尼斯的敌对感情，甚至在威尼斯共和国推进对塞浦路斯王国的政策上可能产生重大的阻碍。因此，我才斗胆决定写信给您。”署名为“威尼斯人、马克·科尔纳罗”。

对于来自这对父女的申诉，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只是对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下达了每年保证支付给王后8000达克特年金的指示，至于其他申诉的事项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还继续下达了其他的指示，吩咐王后身边的人注意，为避免年轻遗孀的王后犯错误，包括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内，任何男人都不得与王后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像这般将塞浦路斯全岛设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威尼斯依旧不能放心。正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及其政体，是在对“人”本身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意大利其他诸国逐渐没落的时代，威尼斯以其现实主义的政体获得了与罗马教廷相同的坚如磐石的势力。

1476年10月30日，威尼斯的总督府内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这是由十人委员会的10个委员及总督、6个总督代理组成的17人“十人委员会”，与以往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样，又增加了23个长老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将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庶出的三个孩子，再加上法马古斯塔之乱时败北而流亡的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以及其他塞浦路斯的8个重臣的家属带到威尼斯来居住。被称为行动危险的重臣家族一开始列出了25个，最后集中于8个家族。这俨然成了人质。要将至少在

表面上是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塞浦路斯人设置为人质而带到威尼斯来，为了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需要召开重要的秘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赞成15票，反对14票，弃权11票。因为差距太小而重复了两次投票，但结果都与第一次相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重大决议延期了一个月才实施。一个月后，提督洛雷当（Lorédan）接受了“十人委员会”名义的极其秘密的指示。所示如下：“让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马里耶特·帕特拉斯[49]及庶出的王子与公主，再加上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等8个重臣的家属，乘坐排桨船至本国。在船上给予客人的待遇。但是，必须时刻监视着，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死亡。”这使得塞浦路斯全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对于惊恐的王后卡泰丽娜的恳求，带着本国政府的命令抵达塞浦路斯的提督洛雷当也只回答说这是履行任务。

次年一月，感慨着不幸的塞浦路斯人抵达威尼斯。塞浦路斯将他们在威尼斯经营的砂糖贸易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提供给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遗孤，让他们住在威尼斯市内的修道院里。重臣的家属们则自理生活费，也住在威尼斯的市内，被禁止私自出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威尼斯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逃脱，尤其是受到岛民爱戴的正统王位继承人国王雅克的两个遗孤与跟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订婚的雅克的女儿，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残酷的。两个王子后来与婢女成亲，只是在威尼斯的下层百姓中间终其天年；但是，在那不勒斯国王再三请求之下获得自由的公主，在两年后，被公布死于帕多瓦的修女院，死因不明。

可是，通过将主张王冠之权的人远远地隔离塞浦路斯，将反威尼斯的重臣们的家属控制为人质，威尼斯掐掉了塞浦路斯王国内可能引起骚乱的苗头。塞浦路斯在威尼斯这般强制政策下，虽然暂时保持了平静，但是岛外的动静却并非如此轻易就能压制住的。幼王死后，威尼斯强行让王后卡泰丽娜坐上了王位，在之后的15年中，也不得不持续实施了武

力威压。另一方面，与土耳其之间也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战斗与讲和，威尼斯一共有8次将它的大舰队停满了塞浦路斯的港口。正因为果断地实施了这些措施，那些反威尼斯的阴谋都破产了。

1475年8月，获悉前女王夏洛特与那不勒斯的4艘船开往亚历山大。共和国政府立即派遣数艘排桨船，乘载了150名克里特士兵前往塞浦路斯。

1476年6月，获悉那不勒斯国王派给儿子阿方索一艘大船及500名士兵，命其前往埃及；夏洛特则在罗兹岛等待时机。共和国政府在命令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所有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的同时，对罗兹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递交了如下警告："倘若骑士团对夏洛特采取协助行动，那么共和国以后就会将骑士团视为敌人。"对于深感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罗兹岛来说，除了屈服于威尼斯的胁迫外别无他法。

1477年8月，获悉夏洛特与埃及的苏丹之间频频联络。提督洛雷当从摩德纳海军基地率领全舰队开往塞浦路斯。

同年12月，获悉夏洛特到达埃及，受到苏丹的热烈欢迎。提督洛雷当率领24艘排桨船前往塞浦路斯。同时，停泊于莱万特海上的所有威尼斯国籍的船只，不论是商用还是军用都接受了全副武装的命令，被编入洛雷当指挥的舰队。

此前两个月前，共和国元老院通过议案，认为威尼斯的100家贵族具有承担保卫塞浦路斯的义务，命其移居塞浦路斯，但由于塞浦路斯的财政困难而暂时搁置。

1479年，获悉夏洛特与岛内数名家臣联系，计划在岛内掀起叛乱。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克里特基地派遣舰队开往塞浦路斯，同时全权委派提督洛雷当处置全体阴谋者。阴谋者们在洛雷当的拷问及审讯之下全盘托出。在预定叛乱的那个日子里，全体被处以绞刑。18年以来，被剥夺王

位的前女王夏洛特辗转于罗兹岛、罗马及意大利各地，最后甚至流落到埃及。为了夺回王位，她精力充沛地持续行动着，可这次失败彻底浇灭了她最后的热情。现在，连那不勒斯国王、埃及的苏丹也对她置之不理。离开埃及的她，在穷困潦倒之中，8年后死于罗马，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享年43岁。不过，这位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而没能拥有王国的女王的坟墓，被安置于梵蒂冈内。

1479年秋天，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抛弃夏洛特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正在悄悄地接近王后卡泰丽娜，策划着王后与他那身在埃及的儿子阿方索的婚事。王后虽然是威尼斯人，但没有尊严与实权，卡泰丽娜对此抱怨不满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当察知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一动向之后，威尼斯并没有通知王后任何消息，只是在岛的周围加强了舰队，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王后身边一举一动的监视。然后，将他们认为参与了策划的总理大臣费卡尔德传唤至威尼斯进行会谈，总理大臣自此再也没有回到塞浦路斯。

1483年1月，获悉两艘大船及500名士兵从那不勒斯出发开往莱万特，因遇到了恶劣天气，漂流至希腊海岸。共和国挑选了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年代记的著者）为海军将领，委派他掌管摩德纳与群岛之间的爱琴海海域。但是，马利皮埃罗海军将领的真正任务是监视希腊海岸上的那不勒斯船队的动向。

当时的服装

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提督

土耳其的苏丹

土耳其士兵

1487年1月，威尼斯虽然以前就知道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之间可能要发起战争，但是直到那一年才终于确证——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了。接着，似乎要证明这个行动似的，威尼斯接到土耳其军队提出为补给饮水及食物而要将船队停靠于塞浦路斯的申请。威尼斯立即下令，除了将两艘排桨船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作为警备之外，全舰队在海军将领托莱比桑的指挥下直达塞浦路斯。托莱比桑还接到了以下命令："为补给饮水及食物，每次只允许8至10名非武装的土耳其士兵登上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军官，无论何种方式，都禁止登岸。"可是，威尼斯政府的这一担心幸亏是多余的，因为土耳其在当年及次年，都没有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动由8万名士兵及120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的动向成为迫使威尼斯共和国改变对塞浦路斯政策的事件。虽然同以往一样，继续维持着王后表面统治独立王国的外观，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安心地将其作为殖民地了。威尼斯共和国打算扔掉其长年使用的伪装——迈向"塞浦路斯合并"之路。

1487年2月21日，全体元老院议员被召集于威尼斯总督府。当然，这是秘密会议。议题说明如下："要解除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威尼斯共和国合并。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圣马可的狮子旗飘扬在塞浦路斯的上空，明确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的领土，那么，根据现有的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中尊重相互领土主权一项，可以保护塞浦路斯的安全。"对于塞浦路斯合并的决议，大多数议员都持赞成态度，通过了议案。可是，尽管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王国，要强制推行塞浦路斯的合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态度，尤其是不能忽视自古以来就与塞浦路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埃及苏丹的意向，不能采取强制政策。虽然通过了塞浦路斯合并决议，但是下定决心命令提

督执行却拖延了很久。他们在等待一个不会给人以强烈的合并印象而能付诸实施的机会。

在秘密地举行决议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首先做好了三个布局。第一，通过大使向埃及苏丹透露，与其将塞浦路斯交给我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不如归属于威尼斯，这对双方更为有利。第二，在从威尼斯派到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之中，让王后卡泰丽娜的亲戚、尼科洛·莫切尼格与乔凡尼·康塔利尼两个人回到本国的任地。第三，同以往一样，即派遣舰队。元老院通过了在塞浦路斯增强大规模军备的议案，选举弗朗切斯科·普利乌利为新提督，对新提督下达指示：为了防备塞浦路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而能够立即、迅速采取行动，时刻预备好40艘排桨船。威尼斯就这样等待着实施合并塞浦路斯这一重大事件的时机的到来。

最后的反抗

一年过去了。王后卡泰丽娜尚不知晓任何情况。那不勒斯方面也只是感觉到威尼斯对塞浦路斯似乎要采取某种最终的行动。他们开始思考，如果就这么放任下去的话，将永远失去获得塞浦路斯的机会。对于那不勒斯国王来说，塞浦路斯完全归属于威尼斯则意味着那不勒斯势力想要进入莱万特海的任何道路都将被封死。

此前那不勒斯王国意图通过已故的雅克二世的庶出公主与自己的儿子结婚的手段获得塞浦路斯，但是公主被威尼斯带去作为人质，后来又死在了帕多瓦的修女院里，这使得他们的计划受到了挫折。还有一个手段是，以让儿子阿方索成为前女王的养子为条件，从而帮助夏洛特复归王位。但是这个手段也因为威尼斯敏捷的军事行动而失败。而且，夏洛特已经死于罗马。

因为这些失败，那不勒斯国王失去了手里所有的棋子。为了实现对塞浦路斯的野心，他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选择了王后卡泰丽娜。这是自9年前起就开始的秘密行动，但因被威尼斯完美的情报网所洞察而不得已中止，如今旧话重提。相同的事情再一次回笼，这首先就是一个不利因素。再加上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个策略撞上了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警戒最完善的时期，这就更加不幸了。对于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恰当的合并塞浦路斯借口，只是等待着的威尼斯来说，以那不勒斯国王为首的阴谋者们正是应当欢迎的客人吧。阴谋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唯有卡泰丽娜一无所知。

至此，利佐·德·马林再次出场。在1473年的法马古斯塔之乱中，曾是主谋之一的他，在之后的15年中，一边逃避着威尼斯政府严厉的追捕，一边不停地周游地中海，周旋于那不勒斯、开罗、罗兹岛的各当权者之间。1476年，他的整个家族都被作为人质押送至威尼斯，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反威尼斯的执念。1487年，加上从开罗被召回的王子阿方索，费兰特国王、利佐·德·马林在那不勒斯进行着有关王后卡泰丽娜与阿方索婚姻的策略。利佐的任务是获得王后的承诺，确保从开罗的苏丹那里获得对于该计划的认可及援助。只要一得到王后的同意，就从那不勒斯与亚历山大火速派遣军舰开往塞浦路斯。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将急忙操办婚礼事宜了。

翌年，利佐首先出发去埃及，他成功地获得了苏丹对该计划的全面赞同。并且，苏丹还赐予他作为自己的大使。接着，利佐秘密前往塞浦路斯。这是在威尼斯严密监控之下的岛屿，他在王后身边的一个女官的帮助下秘密地见到了王后。卡泰丽娜对这个婚姻的话题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已经34岁的她，仅有过不足一年的婚姻生活，而且那还是15年前的事情，在那之后就是连绵不断地涌过来的难题与徒有虚表的女王的生活。她的心里开始倾向于与年轻的25岁阿方索王子的婚事。可是，对于威尼斯人的卡泰丽娜来说，答应这桩婚事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威尼斯。利佐虽然没有从犹豫不决的王后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但他觉得很

有希望，欣然地期待着。

王后与利佐的会面，当时似乎没有被威尼斯方面所察知。但是，回到亚历山大的利佐，在街上遇到了威尼斯领事。他没有注意到领事，但领事绝对不会忘记威尼斯的这个重要监视对象。他立即向提督普利乌利汇报。此外，他还向提督报告，为了说服王后打算第三次前往塞浦路斯的利佐所乘的船只是法国籍，而船上并无载运货物。

商船上没有载运货物，这当然是奇怪的现象。接到亚历山大领事汇报的提督普利乌利将全舰队进行了伪装，从克里特岛海军基地开往塞浦路斯。但是，并不是直接开往塞浦路斯，而是停泊于能够看得见塞浦路斯岛最高山的山顶的海面上，等待时机。当太阳将要从克里特岛方向的水平线降下去，落日快要触及海面的时候，眺望员发现从西面的海上驶来一艘圆形商船，大叫了起来。排桨船立即包围了商船，提督命令商船停船。提督带领了一支武装队伍乘船过去，向商船船长说道："我知道这艘船上载了一位客人，请说出这位客人的名字。不说的话，就将船长及船员全部绞死。"船长因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受到很大的惊吓，马上就坦白了。利佐·德·马林从亚历山大乘上了船，在塞浦路斯下了船。王后与利佐原计划让商船在这附近的海域等待4天，在第四天的傍晚时分，海岸会发出信号。看到这个信号后，就驾驶小船去海岸边迎接利佐。

终于到了第四天，提督只留下了船长和一个船员，然后将这艘法国船上的其他所有船员全部转移至舰队中的排桨船上，让自己的部下中的威尼斯人乘上了这艘法国商船。等这些行动完成后，提督自己也移步法国船，命令全舰队撤离塞浦路斯岛海岸，使人看不到船影，在那里待命。那天的黄昏，落日将海面一瞬间染得金黄。金色的海面上，只听见远去的舰队整齐的划桨入水声。日落之后的大海，红得像是葡萄酒。此时还没有看到海岸发出信号。月光将海面映照成一片银色时，提督命全船熄灭灯火，从塞浦路斯海岸向叙利亚方向的海域移动。商船的后背映着月光，漂浮于黑暗中泛着银光的海面上，海岸上不见一盏灯影。在夜

晚清凉的空气与沉默的苍穹下，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当月亮快要升到正空时，提督及全员都清晰地看到幽暗的海岸上灯光一闪一灭。商船也立即回应了灯光暗号，将小船放到海面。提督命令这艘船上唯一留下的一个船员（他是与船长一同留下的），不许发出一句声音，然后把他放到小船上。在桨声中，小船离开了。对于任何人来说，没有比小船回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更长的等待了。好不容易等到小船返回，横靠于法国船边。顺着船上垂下的绳梯，利佐登上了商船。他对着前来迎接他的一言不发的船长愉快地说道："一切都非常顺利，而且能够平安回到船上，我真得向神灵感谢。"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船长的身后现出提督的身姿，隐藏在一边的威尼斯士兵们向利佐猛扑上去。与利佐同行的塞浦路斯贵族托利斯坦·基布莱也被同时抓捕。在提督的面前，对这两人反复进行了严刑拷打。利佐与托利斯坦都不得不和盘托出这个以王后卡泰丽娜与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的婚事为主轴的反威尼斯阴谋。

等到利佐与托利斯坦全部坦白完毕，他们被排桨船押送前往威尼斯。这是一场戴着手铐脚镣的海上旅行。当他们乘坐的船到达科孚岛附近时，托利斯坦·基布莱一想到在威尼斯等待他的凄惨命运就忍无可忍。他吞下了藏在自己戒指中的金刚石粉末，在经历了数日的剧痛之后死在了船上。

1488年10月17日，单单护送利佐一个人的排桨船到达威尼斯。由"十人委员会"中的委员特别组成了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查，再次重复了拷打与审问。在总督府内的十人委员会室，在全体委员列席的面前，利佐再次坦白阴谋的全部内容。没有宣判刑罚，就直接将他关押进总督府内被称为"达巴索"的地牢。地牢中有48个单间，每间由高2.45米、宽2.55米、深5米的石头建造而成，用于床铺的长2.5米、宽74厘米的木制台子是唯一的家具。地牢的单间在一侧的墙壁上开了一扇小窗，窗上镶着铁栅，隔出3厘米的方格间隙。屋内的光线就靠走廊里的灯从

这个小窗投射进来。

最先知道这一阴谋失败消息的是开罗的苏丹。利佐被提督逮捕后，法国商船的船员们立刻被释放了，但威尼斯并不知道其中混了一名利佐的秘书。释放后逃到罗兹岛的秘书，在那里用法语将事情经过写成信件，通知给开罗的苏丹。苏丹见信大怒，虽然这场失败的阴谋并不是他自己主动开始的。他更愤怒的是，威尼斯对拥有苏丹大使资格的利佐的处置。苏丹将导致这场阴谋失败开端的通风报信者——亚历山大的威尼斯领事打入了监狱。

现在，开罗的苏丹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那不勒斯国王知道这一情况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威尼斯政府对迄今为止各个阴谋背后的那不勒斯国王、开罗的苏丹、罗兹岛都没有派遣使节或发送信函以示抗议或警告，而代之以在利佐到达威尼斯的第五天，即10月22日，“十人委员会”进行了表决。表决的事项是一年前元老院已经通过的决议，就是那件绝密的、暂时搁置的“塞浦路斯合并”议案，现在终于要付诸实施了。出席者14人全部投了赞成票。决议的内容如下：“提督普利乌利将少数排桨船留在基地作为保护，率领剩下的全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当舰队在全岛布置完毕警备之后，提督与王后卡泰丽娜会面，以威尼斯共和国的名义对王后建议交付塞浦路斯王国，并建议王后回归威尼斯。这两项建议毕竟都要王后自己同意接受才可以，所以，为说服王后，十人委员会派遣王后的弟弟、科尔纳罗家族的一家之长、乔治·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但是，假如这些措施都不起作用，王后依旧持拒绝态度的话，那么，提督无论采取何等武力行为，都具有全权去执行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决议。”对提督普利乌利下达如上命令的16天之后，乔治·科尔纳罗从威尼斯出发去塞浦路斯。至此，王后卡泰丽娜以及塞浦路斯王国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另一方面，被关押在威尼斯总督府地牢中的利佐，在戒备森严与隔

离的每一天中，根本就不知道塞浦路斯正在发生着什么。要了解这之后的利佐的情况，就只能通过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撰写的著名史料《总督们的生涯》（*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了。因为，能有机会了解威尼斯政府最高机密的人，唯有萨努多。其他的年代记作者们，连塞浦路斯的乔治与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两个人也完全无从打听被押送回威尼斯的利佐的消息，所以也没有办法记录。萨努多是如何知道重要机密的，并且能够自由记录下来，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前文提到的他的著作也是代表作《日记》明白——这部一直记录到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的著述，被收藏于共和国的机密文件室，也不能自由出版。今天，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或者说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么，被认为不可或缺的萨努多的这部记录，在当时对肩负起共和国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发挥了教科书般的作用。

根据萨努多的记述，利佐在地牢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同样居住在威尼斯土地上、作为人质从塞浦路斯被押送至此的他的家族，就算知道利佐的境地，也没有办法见到他，甚至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生死。在无法自杀的严密监控之中，利佐并不知道王后卡泰丽娜被逼迫将塞浦路斯转让给威尼斯。王后答应了转让，在她离开威尼斯的两个月后，即1489年5月13日，利佐最终被宣判死刑。但是，死刑并没有被立即执行。在此之后，他又不得不忍耐了两年半的地牢生活。对于其他国家的家臣的处置必须慎重，特别是具有苏丹大使身份的利佐，在紧急关头时还有留他活口的必要。

终于到了14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萨努多也没有写明具体日期——运河上印着CDX[50]记号、时刻准备接受“十人委员会”指示的待命的贡多拉，静静地划进运河。贡多拉的船长受到了“十人委员会”的传唤。命令船长极其隐秘地将利佐押走。船长下到了地牢。利佐赤着脚，被斗篷裹着身体，麻袋从头套下，被盖得严严实实的。船长将那样的他带到了总督府中的十人委员会的武器室。利佐以前就一直要求在公众面前执行自己的死刑，就算被带到这间武器室，他也不停地主张这一要

求。可是，“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沉默不语。在暗淡的武器的光阵中，放了一个箱子。利佐两手被缚，站在箱子上面。屋梁上吊着一根钢绳，将他的头绕了一圈。箱子被踢倒了。尸体被装进袋子，运往穆拉诺岛[51]。在岛上的圣克里斯托弗教堂的后院挖了一个坑，尸体就连着麻袋一起被扔了进去。

对于公开宣称利佐病死于牢中的威尼斯，开罗的苏丹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因此与威尼斯断绝国交却并没有持续长久。在土耳其的威胁面前，将威尼斯转为敌人将对埃及产生巨大的不利。威尼斯甚至连这一点都计算好了。可是，不管怎样，事情结束了。威尼斯通过巧妙分析政治形势，完全做到了先发制人。

“塞浦路斯合并”

塞浦路斯的冬天是从内陆开始的。所以，连位于首都尼科西亚的王宫在秋天结束的时候都必须搬迁至海岸边的法马古斯塔。当然，因为是地中海的岛屿，所以不像威尼斯的冬天那么寒冷。即便如此，也许是习惯吧，宫廷一般都会在春来之前待在法马古斯塔。

1489年，卡泰丽娜小小的宫廷也像往年一样来到了法马古斯塔。可是，这一年对于卡泰丽娜来说不同寻常。迄今为止，从王宫的窗户向外看着港内停泊得满满的威尼斯排桨船，王后都会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依仗；但是现在，她觉得那是从自己的周围将她捆绑起来的巨大而可怕的存在，令她不安。

这种不安的感觉，她觉得是从上一年的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从那天托利斯坦的妹妹也是自己的女官艾莱娜将利佐带来的那时开始。她想起利佐当时熠熠生辉的眼睛，低沉而激动的声音，逼近自己而

不放弃说服自己的身姿，头发中已见白发斑驳。看着他，听着他的话，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抵达塞浦路斯时，认识了来到船上迎接自己的亡夫的身边跟随着的那位年轻俊美的青年利佐。她虽然被第三次前来的他给说服了，但那时也很不安。不过，那个时候的不安是自己在选择人生之际所感受到的一种情绪高涨的不安。

将那种情绪高涨的不安变成现在这种可怕的不安的是艾莱娜带来的利佐被捕的消息，消息在威尼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哥哥托利斯坦也被捕了，艾莱娜吓得浑身发抖，紧紧依偎着卡泰丽娜说道："我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王后陛下也与我一同逃跑吧。他们知道王后陛下答应了婚事。"可是，那个时候她还不想跟随艾莱娜一同逃亡罗兹岛。她只单纯地认为，祖国威尼斯是不会对自己的养女做什么坏事的。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员们的态度也同以往一样，对她十分殷勤。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内容，她只是感到他们明明知道却一言不发的冷酷。直到这个时候，卡泰丽娜才注意到，宫廷里的女官们在她未察觉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大部分都被换成了新面孔。尽管如此，还剩下一些她从威尼斯出嫁时就跟随着的女官们。也许是因为亲如骨肉的年轻的艾莱娜去了罗兹岛的缘故，这个冬天，她觉得特别寂寞。

卡泰丽娜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去艾莱娜所在的罗兹岛，可是她依旧很犹豫。

1月24日清晨，法马古斯塔港的人们吃惊地看到从朝霭中驶来大批船只。当霭雾消散，只见港内港外都停满了大舰队。绯红色的布上刺绣了圣马可的狮子旗，一面面飘扬在排桨船的桅杆上方。它们将冬日的地中海特有的深邃而暗淡的天空，渲染得鲜明而华丽。

就在那个时候，王宫的卡泰丽娜被告知提督普利乌利来访。打扮完毕，进入会客室的卡泰丽娜认出了熟悉的提督身边坐着弟弟乔治，大吃一惊。虽然已经17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是卡泰丽娜并没有忘记一群姐妹之中唯一的弟弟乔治的面容。提督向太过于意外而说不出一句话的她，

照例郑重地致以问候，然后退下。之后，只留下他们姐弟两个。

弟弟马上开始了劝说。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决定合并塞浦路斯王国。因为除了合并之外，不能保护塞浦路斯不受任何外敌侵犯。王后回归威尼斯之后，也依旧受到女王的待遇，每年有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保障。讲到这儿，弟弟忽然压低了声音："十人委员会知道一切。姐姐答应与敌国的王子结婚的事情，现在又想逃到罗兹岛的事情都知道。"然后他继续说道，威尼斯共和国会将这次王后的行为视为对共和国的背叛，但是这取决于王后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卡泰丽娜无法掩盖她的动摇。"对于已经习惯于住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作为女王生活的我，先是赐予我王冠，而到了现在又要我归还。威尼斯的诸位难道不满于在我死后将塞浦路斯收入手中吗？王位是我死去的丈夫留给我的东西，我怎么会有抛弃它的想法。至少等我死后……而且，想想岛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卡泰丽娜哭泣着。有一小段时间，屋内一直沉默着。眼下，港口的喧嚣虽然没有传到建造于高处的王宫里，但是停满港口的圣马可的狮子旗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弟弟并没有打算结束对话。他继续说道："姐姐，比起塞浦路斯，您更应该考虑祖国威尼斯。因为，在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未知，政治形势又如此困难之际，谁也不能保证您不被赶出塞浦路斯。也不能说，塞浦路斯人对这段漫长的被女人统治的岁月不感到羞耻。要解除这个不知什么时候降临到姐姐您身上的危险，只有一个决定与一个方法。没有儿子的您，只有将王国转让给威尼斯，回归威尼斯。在姐姐您刚继承王位的时期，形势不像今日这么困难的时期，共和国帮助了您，让您满意地统治了王国。但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周边已没有一方安全之地。当所有的征服欲望都瞄准这个王国的时候，元老院才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就算您没觉得危险，去年夏天如果没有共和国军队的援助，塞浦路斯恐怕已经落入土耳其之手了吧。姐姐您也许会逃跑或者被捕，成为奴

隶，被押送至君士坦丁堡。现在这个时期，哪怕一点儿小错误都可能导致重大后果，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并不是无用功。所谓幸运，是来自各个方向，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即便是朋友，也并不一定只在做好准备的时候才来帮助好运的。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之间路途遥远，但是大海更大。这一点请您好好考虑。

“将王国赠予共和国，姐姐您的名字将会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年代记与记录的作者们也会把一个女性市民成就的伟大决心，写成共和国成就之中最美丽的东西吧。就算您在塞浦路斯居住了很长时间，也应当表现出您是生育了您的国家的一员、是那个城市的一员、家族的一员。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威尼斯都没有像今天这般等待她（他）的到来。哪怕威尼斯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我想也要对生育了自己的城市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更何况那个城市是被称为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威尼斯。

“迄今为止，姐姐您身为女王，能够幸运地持续统治，都应该想到是共和国的恩惠。如果您拒绝了这样的共和国的请求，那就是恩将仇报。到那时，共和国可能会认为您的拒绝并非出于您自己的意志，而是因为我的想法。如果变成那样的话，威尼斯全城都将憎恨我，科尔纳罗家族也将无法逃脱这些报复吧。但是，如果姐姐接受了共和国的请求，那么不仅对您自身，对科尔纳罗家族都将带来好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将因何时使用、如何使用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获取最后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神灵为了考验他的仆人的好坏，则试验仆人。在这试验的面前，无论怎样祈祷或牺牲，都是无用的，只能执行神灵所期望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威尼斯人来说，难道不应该认为，威尼斯这一最伟大、最美丽的都市所期望的东西正是与神灵的期望相一致的吗？”乔治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

卡泰丽娜流着泪听着，好不容易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也努力像你一样考虑。只是，威尼斯共和国之所

以得到这个王国，并不是出于我的意志，而是出于你的力量啊。”

卡泰丽娜只说了这几句话便借口还有其他事务，离开了席位。她疲倦至极，丝毫没有感受到和弟弟久别重逢的激动感情。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卡泰丽娜过得异常忙碌。她必须将塞浦路斯全岛的主要城市一座座地进行巡视。为了向岛民表示，这是塞浦路斯的王后卡泰丽娜根据自己的意愿将王国转交给共和国的。她穿着以前埃及苏丹送给她的用白貂裘皮制作的女王长袍，与提督普利乌利一同维持着赋予她作为王后的最后仪式。她必须头戴王冠，进入尼科西亚、赛里纳斯与利马索尔这些城市，出席广场上举行的仪式，将曾经升起的塞浦路斯王室吕西尼昂家族旗帜降下，代之以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在这之后，从城市里走出来的卡泰丽娜的头上已没有了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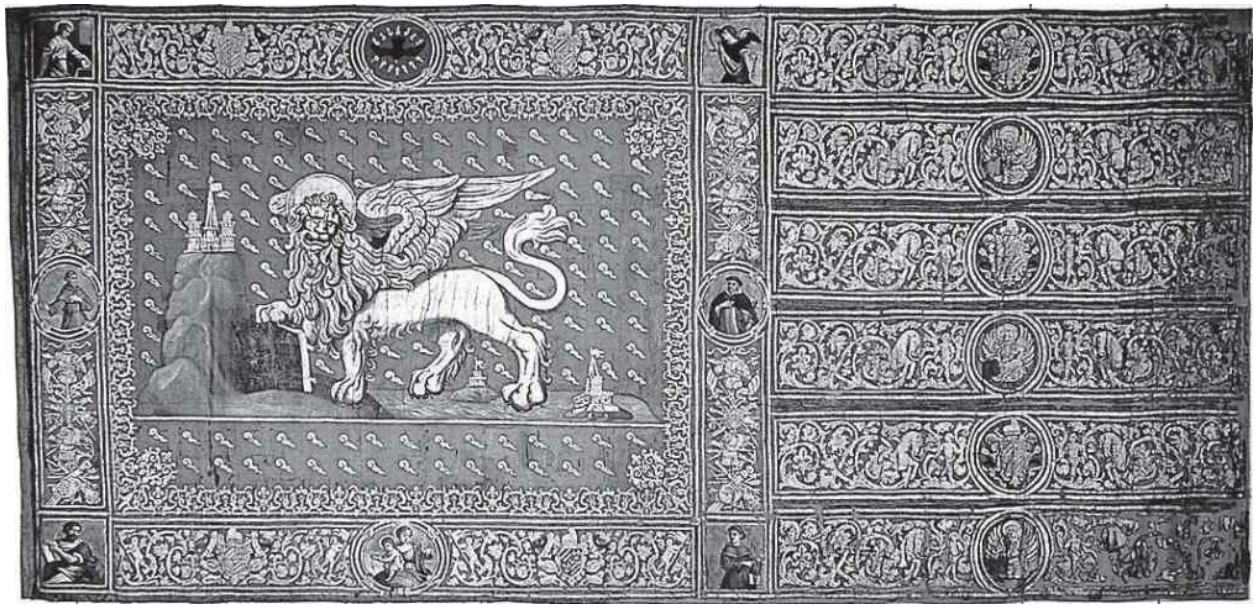
2月26日，在法马古斯塔举行了最后的仪式。卡泰丽娜在这一天穿上了好似丧服一般的黑色刺绣服装。在她的座位前面，淡蓝色的质地上绣着银线与狮子的吕西尼昂王室的旗帜被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绯红色质地上绣着金色圣马可狮子的旗帜，高高地飘扬于俯瞰港口的上空。那个时候，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依次发射起礼炮。仪式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塞浦路斯岛从这时起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两周后，卡泰丽娜永远地离开了塞浦路斯。从她18岁时成为王后来到这个岛以来，已经过去了17年。

归乡

到了6月，亚德里亚海上回旋着从达尔马提亚山峰吹来的风。所以，经由亚得里亚海来到威尼斯的船只，比起秋天来船速自然会慢得

多。卡泰丽娜在经过了舒畅的漫长海上旅行之后，所乘坐的船只抵达威尼斯的利多港时，已是从塞浦路斯出发3个月后的6月6日了。在利多港，总督助理前来迎接。他转告说，今晚请在圣尼科洛修女院里休憩，明早总督及政府高官都会前来迎接，一同前往威尼斯。总督到利多迎接她属于国宾待遇。卡泰丽娜在圣尼科洛修女院——曾经在去塞浦路斯之前度过了4年的这所修女院——迎来了时隔17年后在威尼斯的第一个夜晚。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翌日，大海有点儿汹涌的迹象。不过，初夏的威尼斯的天空毕竟还是黯淡。圣马可教堂前的旗杆上，巨大的绯色与金色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在海风中高高飘扬。广阔的圣马可广场与港口附近的小广场上都挤满了人，周围建筑物的柱廊下也被广场上溢出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为了一睹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的到来而汇集在一起的。

钟声开始敲响。从钟楼的上方，从时钟塔的上方，在初夏的威尼斯辽阔的天空中，响起了清澈的声音。那时，从排列于港口左边的军舰上传出轰鸣的礼炮声。女王到达了。

用金色与绯红色装饰的总督的礼仪船“殿下礼舟”[52]笔直地驶进圣马可码头。“布琴特洛”是一艘长34米、宽7米、高8米的排桨船，整个船身涂成金色，用绯红色的天鹅绒帐篷罩着。船首飘扬着威尼斯的国旗——圣马可狮子；从船舱处伸出左右各21根涂成金色的桨，每一根都由4个桨手握着，有节奏地切入水面。在这个“殿下礼舟”的帐篷里，并排坐着卡泰丽娜与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53]。总督夫人及威尼斯贵族的名门富人们竞相奢华地列坐于周围。在外围则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在这艘豪华船的周围围绕着同样装饰华丽的贡多拉，它们将“殿下礼舟”包围了起来，形成一个扇形，向着码头前进。贵族夫人百人、政府的高官及大贵族百人，在这一天伴随着卡泰丽娜从利多一直同行至威尼斯，当时的记录对他们一行做了描述。从抵达圣马可码头的“殿下礼舟”走下来的卡泰丽娜受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威尼斯贵族的欢迎。她穿着一件低胸黑色天鹅绒衣服，按照塞浦路斯的习惯，用白色的面纱将头罩了起来。头上的塞浦路斯王冠勉强压住被海风掀弄着的面纱。

队伍以卡泰丽娜及总督为首，通过了小广场，在那右边是总督府，进入了圣马可广场。一行人在此止步，因为要在圣马可教堂的正面举行仪式。卡泰丽娜的弟弟乔治·科尔纳罗因对共和国做出的种种功绩而被与卡泰丽娜并排站着的总督封为“圣马可骑士”（Cavaliere di San Marco）。

这个仪式结束后，一行人进入了圣马可教堂。在那里举行转让仪式。首先朗读事先制作好的证书，上面写着卡泰丽娜怀着巨大的喜悦将塞浦路斯王国赠予威尼斯。然后，总督起身，赞美女王卡泰丽娜深思熟虑的决定及其对威尼斯的美好感情，最后对赠予塞浦路斯王国表示了感谢。接着，卡泰丽娜与总督在塞浦路斯转让证书上相互签名。在这些结束之后，卡泰丽娜走向祭坛，总督也跟随其后。卡泰丽娜伸开双手，将她头上的王冠摘下。她用双手托着王冠，献给了总督。那时，列席的人们看到从卡泰丽娜袖子里露出的白色蕾丝在教堂微弱黯淡的金光之中若隐若现。总督接受了王冠，仪式完毕。

此后的三天，作为共和国国宾的她，旅居于当时访问共和国的宾客使用的客房——费拉拉公爵宅邸。这个宫殿在1621年以后成为土耳其商馆[54]，今天依旧使用这个名称。在那三天里，昼夜不断的正餐与舞会，没有让她得片刻空闲。卡泰丽娜沉浸于其中，尚未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忘记塞浦路斯，威尼斯的华丽让她只觉得十分开心。被人们称为“女王陛下”，自己也在那个中心里。因为，在没有爵号的威尼斯贵族女人之中，只有她，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女王。

结束了费拉拉公爵宅邸的三天国宾生活，卡泰丽娜搬到弟弟乔治的宅邸。乔治在父亲去世后搬出了圣保罗[55]的宅邸，在大运河沿岸的圣卡夏诺地区（San Cassiano）建造了豪华宅邸。这座宅邸至今都被称为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从费拉拉公爵宅邸出来，面向里亚尔托桥，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就位于同侧稍微下游的地方。隔着大运河，还能看见对岸美丽的“黄金宅邸”[56]。

来到威尼斯的第二个星期，6月20日，卡泰丽娜迎接了总督巴尔巴里戈派来的使节。使节带来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由共和国政府决定、经总督认可的有关于她今后的事项。即，她一生都拥有阿索洛[57]地区的领主地位，从这块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每年得到8000达克特的养老金。另外，可以像以往一样，世代沿用吕西尼昂王室的封号。因此，今后既可以称呼她为塞浦路斯、亚美尼亚、耶路撒冷女王，还可以增加一个阿索洛夫人的称号。由此，决定了卡泰丽娜的第二个人生。

然后，这张证书上的各项决定都是有背景的。首先，姑且不论阿索洛的领主仅限于她一代，而且所谓领主，也只是徒有虚名。依旧设置了威尼斯行政官，守卫兵也由威尼斯安排。不仅如此，还给他们增加了新的任务——经常在卡泰丽娜的身边进行监视，不让被威尼斯合并的塞浦路斯岛民寻得名分——为挽回独立而策划反威尼斯阴谋。切断他们与他

们所谓的“被软禁的塞浦路斯女王”之间的联络，这才是威尼斯方面的目的。

詹蒂利·贝利尼[58]画《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59]

其次，关于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事情。在证书上写着，即便在阿索洛收益较少的情况下，也将保障这笔金额。可是，以往的收益从来没有少过这个数字的。其真正的意思是，为了防止卡泰丽娜财政过于丰腴而设置了手闸。之后，养老金也被威尼斯规定在当年用光就是一个实证。

表面上，共和国对她似乎供奉了最高礼节。但是，卡泰丽娜的真实境遇是，位于美丽的高地却过着被软禁在距离威尼斯50公里开外、处于充分监视之下的阿索洛豪华的囚徒生活。尽管如此，卡泰丽娜本人并没有注意这个内幕，就算她注意到了，也不会对那样的事情有所关心的。这个女人总是非常欣喜地签上名字：“卡泰丽娜，塞浦路斯、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女王，阿索洛夫人。”

此处，我想对卡泰丽娜离去之后的塞浦路斯稍微做点儿记录，后世

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作为威尼斯对塞浦路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

威尼斯派去了巴尔达萨雷·托雷比桑任第一届总督，在他下面安排了7个行政官。在威尼斯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的经济状况似乎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或许因为这个，民心也沉稳了下来，没有制造阴谋或掀起叛乱。

威尼斯通过这些措施，成功地实现了塞浦路斯的内政管理，但是面对岛外的莱万特海上土耳其势力的增大，却没有突围的路径。自卡泰丽娜转让塞浦路斯大约百年后，土耳其终于公开了对塞浦路斯的野心。从1570年7月24日到翌年8月16日，是历史上著名的法马古斯塔攻防战，战役非常惨烈。当时，相对于塞浦路斯与威尼斯4000人的混合防卫军，土耳其实际的进攻者为7.5万名。战败的防卫军，无论女人或孩子都被杀害。队长马卡托尼奥·布拉加丁因为拒绝投降，最终被活活剥皮，作为战利品被献给了土耳其苏丹。此时，作为基督教国家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塞浦路斯完全屈服于土耳其帝国。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将威尼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的塞浦路斯作为舞台。在萨努多的《日记》里记载了1508年，克里特岛总督克里斯托福·摩洛在从塞浦路斯返回的船上妻子去世的情况。奥赛罗是一名黑人，摩洛这个名字中也含有黑人或者皮肤黑的人的意思。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只将海军晋升为本国的贵族来巩固政权。提督的职务不仅有特别的权限，而且很有名誉，他们在退休之后，很多人成了共和国的总督。这与殖民地的总督是相同的情况。外国人或者黑人，是绝对不可能当得上的。不知道莎士比亚是确信“摩洛”这个名字带有黑人的意思，还是他明明知道，但为了特意强调威尼斯的异国情调而使用了黑人呢？

不管怎样，土耳其夺去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造成了重创。在长达5个多世纪里，掌控了莱万特海及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势力，自此以后，轰然崩塌。而后，在1645年至1669年的24年岁月中耗费了1.26亿达克特经费，在死者多达10万人的克里特岛攻防战中败北之后，威尼斯

将地中海的主权彻底让给了土耳其。发现了新航线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发展，虽然对威尼斯的衰退产生了少许影响，但是让威尼斯衰退的真正敌人可以说是土耳其。因此，为了摒除土耳其的威胁而全力以赴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海上的世界第一发达国家，却只能让步于后进新兴之国如西班牙与葡萄牙，见证它们进入新世界去摘取荣誉。

诗人拜伦后来将这场克里特岛攻防战咏叹为威尼斯的《伊利亚特》[60]。法马古斯塔攻防战也同样是悲怆的结局，既然成为诗人美丽的题材，那么其势力也到了尽头。其他国家的诗人是否将其写成了诗歌不得而知，但是这两大攻防战令威尼斯人也为它凄美的结局而落泪。当初以巧妙的策略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那个透彻的威尼斯合理主义，去哪里了呢？

同一时期逗留于威尼斯的法国人乔曼·杜·贝雷在观看了威尼斯第一大节日“仙萨”——总督与海之女神的婚礼——这场炫耀威尼斯海洋势力的节日活动之后，写下了这般讽刺的话：“Ces vieux cocus vont èpouser la mer. Don’ t ils sont les maris, et les Turcs les adultères””（这些鳖幻想着跟大海女神结婚，却不知他们威尼斯人虽成了丈夫，但土耳其人才是真正的情人）。

终焉

有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

只认识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位优雅而快活的妇人，与曾经当了15年之久的塞浦路斯女王，与在阴谋与叛乱的恐怖中生存下来的人是同一个人。被12个女官与80个贵族簇拥的卡泰丽娜，是那个小小的宫廷的中心，愉快地度过华贵的每一天。阿索洛在所有的意味上来说，都与塞浦路斯不同。与有着干燥的空气、炙人的阳光、温润的地中海风，光与影清晰的塞浦路斯相比，位于北意大利高地上的阿索洛处于布伦塔河[61]与皮亚韦河[62]两条清流之间，清澈的空气与茂密的树林非常赏心悦目。在欧洲，塞浦路斯至17世纪末都盛产与今日香槟一般地位的芳醇的葡萄酒，阿索洛附近是没有强烈香气的格拉巴酒[63]的著名产地。

卡泰丽娜在阿索洛度过了她之后的21年余生。她觉得只要自己的小宫廷是快乐而华丽的就足够了。因为她没有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那种期待艺术氛围的野心，所以无论是什么客人，她都欢迎。如果没有客人了，她甚至会自己亲自去威尼斯寻找。威尼斯共和国在举行什么重大宴会时，也都会邀请她。而且，在那样的场合中，总是给卡泰丽娜预备第一席位。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丈夫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一同访问威尼斯是在1481年，那时她还在塞浦路斯。但是，在1493年米兰公爵夫人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1502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访问招待宴会上，卡泰丽娜都出席了。甚至她还在威尼斯举行的宗教仪式上露面，那个场景被制作成绘画，现在挂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64]。1500年詹蒂利·贝利尼绘制的《十字架的奇迹》[65]中将当时46岁的她那肥胖的身姿暴露无遗也是一个实证。总之，她就是个爱四处露面的女人。

她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从塞浦路斯抵达威尼斯时所受到的国宾级礼遇、获赠阿索洛地区，以及后来在威尼斯宴席上处于第一席位，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自己表示的敬意。她并不知道，威尼斯真正的意思在于向世间显示，合并塞浦路斯乃是女王卡泰丽娜出于对执政困惫的主动转让。而且为了合并后能够顺利统治塞浦路斯，威尼斯判断，对卡泰丽娜

的境遇做如此华丽的安排更为有利。

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宫廷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的历史中稍有留名，那是沾了诗人彼得罗·本博的光。本博也是卡泰丽娜的亲戚，他那部可以称为恋爱论的《阿索洛的人们》[66]就是在这个卡泰丽娜的宫廷内写成的。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在阿索洛举行的一个女官的婚礼宴会上，三个贵族与三个女官关于爱情进行了一场讨论。据说女王也参加了，但她并没有发言。这场社交会话分成了三个部分：1.什么样的爱情是正确的，什么样的爱情是错误的。2.女人与毁灭，爱情与痛苦。3.情欲恋爱与精神恋爱。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好而正确的爱情，是对美的无止境渴望，在神灵的面前神圣而永不泯灭。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

可是，当时最美丽的女人与具有高度修养的上流夫人们都是本博的朋友，他甚至还做过臭名昭著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情人，后来虽然育有三个孩子却依旧凭借天生的社交才能升到了枢机主教。这位俊美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而他撰写的与他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著作，特别是这部《阿索洛的人们》只能说是陈腐的女性社交界的产物。不过，这倒成为了解卡泰丽娜周围情况的资料。就是这个本博，没有把作品捧给卡泰丽娜，而是献给了他曾经的恋人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1501年7月10日，总督府里召开了内阁会议。总督因为风湿病犯了而缺席。他对作为圣马可教堂的行政长官乔治·科尔纳罗骑士的代理人巴提斯特·莫罗西尼与路易·马利皮埃罗、检察长尼科洛·多尔费因三人提出了要求，让他们全都披着黑色的斗篷出席会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被允许发言的他们发布了一个消息——今天早上4点，乔治阁下的姐姐、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在胃病发作的3天后病逝，享年56岁。他

们是为了通知这个消息才来到内阁会议的。因为总督缺席，所以由评议员路易·普利乌利代表全体内阁陈述了对女王之死的哀悼之词。接着，内阁会议决定为死去的女王敲响12下圣马可教堂的钟声。

当天下午，元老院也收到了卡泰丽娜的讣告。于是，决议在两天后的12日，由乔治·科尔纳罗担当丧主举行葬礼，内阁会议及元老院议员全体成员、威尼斯大主教及其他主教，以及其他众多贵族都必须列席。

当天夜里，其实已经到了次日凌晨时分了，“雨啊风啊，大如鸡蛋的冰雹好似在空中绽放的火花一般，变成可怕而猛烈的暴风雨”。在这暴风雨之中的守灵夜，卡泰丽娜的遗体用弗朗切斯科宗派的修女服包裹着，装在灵柩里被抬往圣卡西亚诺教堂（Chiesa di San Cassiano）。灵柩的旁边只跟着两个僧侣及手持十字架与烛台的两个少年，没有一个亲戚。从弟弟乔治的宅邸到这座教堂，从后门抄近道不足50米。这条狭窄的小道，宽度只有一个人伸开双手的幅度，小小的送葬队匆匆忙忙地穿行于其中。风雨太大，蜡烛刚从屋里出来便被吹灭了。暴风雨中只听得僧侣忙碌的祈祷声与棺材在拐角处碰撞的声音。刚一到圣卡西亚诺教堂，淋成了落汤鸡的僧侣与少年，还有搬运棺材的两个壮工就将棺材放下，消失了踪影。教堂里的人见没有一个亲戚或政府官员同行，便也只是出来迎接了下就消失了。在宽敞的教堂的黑暗之中，只有一个被丢弃的她的棺材。

次日清晨，在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放了一夜的卡泰丽娜的棺材被抬往举行葬礼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67]。葬礼排头行进的是大十字架与威尼斯大主教、斯巴拉多大主教、费尔特司教、莫切尼格修道院院长等威尼斯宗教界的高位圣职者们，各自身穿光彩炫目的金银色圣袍，后面跟随着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他们也身穿了表示各自官职的最正式的礼服。再后面是唱着赞美歌的圣歌队。在毕恭毕敬抬着棺材的几个侍从的后面并排跟着丧主乔治·科尔纳罗与总督的代理，最后是科尔纳罗家族的全体成员及其亲戚，以及其他威尼斯贵族的队伍，延绵相续，没有

尽头。棺材用镶饰了金色花边的黑色天鹅绒罩着，上面摆放着20年前自从卡泰丽娜让出塞浦路斯以来一直收藏于圣马可教堂里的宝物——塞浦路斯的王冠，仅限于今天，将它从那里取了出来。

为了让这支华丽而肃穆的送葬队从肉类市场（今天的鲜鱼市场）的岸边渡过大运河，到达对岸的圣索菲亚区，大运河上仅在今日排满了小船，在上面铺设了厚木板，架出来一座桥。送葬队从上面缓慢地走过。从这里开始，送葬队里加入了威尼斯各宗派的僧侣和修女，他们手里的那些多得无法计数的烛台与火把将火光映在早上的运河水面上，显得变幻无常。

在举行葬礼仪式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里特别设置了祭坛，棺材就安放在那上面。跟随着送葬队前来的人们全体就席。葬礼由威尼斯大主教主持，《威尼斯史》的作者安德烈·拿巴杰洛[68]念了悼词。仪式就此结束，列席者全部散去。

漂亮的伪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卡泰丽娜·卡尔纳罗的一生就是被威尼斯这样的伪善所鼓动，所粉饰了。伪善，若是那些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伪善”的人做出了伪善的行动之后，岂止是没有作用，那散发出来的俗不可耐的臭气甚至能令人们纷纷中毒。可是，对此心知肚明的人们，他们所做出来的伪善，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可以说具有艺术的美感。文艺复兴的时期的威尼斯人所具备的如此坚强的精神，在500年之后的今天，只残留为回响于地中海上空的哄笑罢了。只有拥有自由的精神与敏锐的感觉的人才听得见那洪亮的哄笑。

---

[1] 菲奥伦扎·克里斯波（Fiorenza Crispo），卡泰丽娜的母亲，是锡罗斯岛的领主尼古拉斯·克里斯波（Nicholas Crispo）的女儿。

[2] 丹多洛家，威尼斯贵族。在威尼斯共和国时代，丹多洛家族中出了4个统领。

[3] 本拉多明家（Vemdramin），威尼斯贵族，建造了世界最古老的赌博俱乐部——本拉多

明宫殿。

[4] 卡佩洛家（Cappello），威尼斯富裕的贵族。

[5] 白貂裘皮（Ermellino），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礼服被称为“王者的毛皮”。

[6] 拿骚（Haus Nassau），发祥于德国西部莱茵地域的欧洲贵族、皇室。虽然只有一代，但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7] 东罗马帝国，指4世纪左右实行东西分裂统治以后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域。

[8] 仙萨（Sensa）是威尼斯语，在意大利语中意味着“ascension”(升天），祈愿永远的繁荣。在威尼斯，它是庆祝海的女神与元首结婚的最大的节日。

[9] 总督府（Palazzo Ducale），兼元首的官邸、官厅。

[10] 大运河（Canal Grande），威尼斯运河，将城市分成S型的两部分。

[11] 里亚尔托桥（Ponte di Rialto），威尼斯大运河上架设的四座桥梁之一，也被称为“白色的巨象”。

[12] 圣马可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意大利威尼斯最有名的大教堂，拜占庭式代表建筑。它面向圣马可广场，与总督府相连。建筑内金碧辉煌，祭坛上有镶嵌了2000颗宝石的屏风。

[13] 十人委员会，1310年至1797年间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机构，负责情报、谍报。与总理府的成员一起构成十人委员会，合计17人，但称为“十人委员会”，任期一年。

[14] 卡尔门（Porta della Carta），位于总督府和大教堂之间，又被称作纸门（Porta della Carta）。

[15] 大会议场，国会会议场，共和国国会，可容纳1000——2000人。

[16] 克里斯托福·莫罗（Cristoforo Moro，1390——1471），意大利政治家、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在位时间：1462——1471）。

[17] 雅克二世·德·吕西尼昂（Jacques II de Lusignan，1438？——1473），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西里西亚——阿美尼亚国王（在位时间：1464——1473），被称为“私生子雅克”（Jacques le bâtard）、“大主教雅克”（Jacques l’ archevêque）。

[18] 利多（Lido），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南面的细长岛屿，也称为利多岛，是威尼斯市的一部分。

[19] 西西里岛（Sicilia），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南方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西西里洲。

[20] 撒丁岛（Sardegna），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面、科西嘉岛以南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它在地中海是仅次于西西里亚岛的第二大岛，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撒丁里洲。

[21]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

[22]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A History of Cyprus, George Hi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1948，I, II, III）。

[23] 圣马太（Matthew the Evangelist），《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人物，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

[24] 圣巴拿巴使徒，《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初期基督教教会成员，十二使徒之一。

[25] 盖乌斯·弗拉维乌斯·瓦勒留斯·君士坦丁（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因其再次统一帝国、发展了专制君主制而被称为“大帝”。

[26] 海伦娜（Helena，246/250？——330），古罗马帝国的皇后，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基督教会的圣人。

[27] 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坐落在希腊北部，近萨洛尼卡湾，是塞萨利区与马其顿区间的分水岭。其米蒂卡斯峰高2917米，是希腊最高峰。为了与南面相邻的“下奥林匹斯山”相区别，它又称“上奥林匹斯山”。奥林匹斯山是奥运圣火精神源头，是古希腊成为欧洲文化发源地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西方文明起源之地，也是希腊神话之源。

[28] 理查德一世（Richard I，1157——1199），金雀花王朝第二代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1189——1199）。其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其勇猛而被称为“狮心王”（Richard the Lionheart），被视为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模范。

[29] 1184——1191年，塞浦路斯总督伊萨克·科穆宁曾脱离拜占庭而独立。

[30] 利马索尔（limassol），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又名“莱梅索斯”，塞浦路斯南岸城市，傍阿克罗蒂里湾。

[31] 居伊·德·吕西尼昂（Guy de Lusignan，1159——1194），吕西尼昂伯爵的儿子，法国骑士。他与耶路撒冷女王西比勒·德·耶路撒莱（Sibylle de Jérusalemm，1160？——1190）结婚而成为耶路撒冷国王。1190年西比勒死后，伊莎贝拉成为女王，但居伊没有放弃王位。他在1192年获得塞浦路斯后才放弃了王位。1194年去世后，由哥哥继承塞浦路斯王位，以后持续了吕西尼昂皇家的塞浦路斯王国。

[32] 安提阿（Antiochia），土耳其南部的小城市安塔基亚（Antakya）的古称。公元前300年左右，由古叙利亚王国的塞琉古（Seleukos）一世建设为首都，后来成为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一代基督教会的中心地。

[33] 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塞浦路斯东部法马古斯塔地方的主要城市，位于海湾的中央部，是塞浦路斯水位最深的港口。

[34] 亚历山大（Alexandria），仅次于开罗的埃及第二大都市。公元前332年，由希腊国王建造而成。

[35] 尼科西亚（Nicosia），塞浦路斯首都，位于塞浦路斯岛美索里亚平原中部，濒临派迪亚斯河，北依横越岛国北岸的凯里尼亚山脉，西南同青松苍翠的特鲁多斯山遥遥相望，海拔约

150米。

[36] 马穆鲁克人（Mamlūk），指伊斯兰世界里奴隶出身的军人。

[37] 乔凡尼，即让二世·德·赛普勒斯（Jean II de Chypre，1418——1458），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国王（在位时间：1432——1458）。在继承塞浦路斯国王称号之前，他具有名义上的安蒂奥基亚公爵称号。

[38] 海莲娜（1428——1458），东罗马帝国巴列奥略王朝的王室女儿之一。

[39] 夏洛特·德·吕西尼昂（Charlotte de Lusignan，1444——1487），塞浦路斯女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女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女王（在位时间：1458——1464）。

[40] 卡萨·迪·萨沃亚（Casa di Savoia），统治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及法国、法语圈瑞士一带的边境伯爵贵族。

[41] 路易·德·萨沃亚（Louis de Savoie，1436——1482），法意国境的萨沃亚家族的公子，与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结婚后，获得塞浦路斯共同统治者的王位（在位时间：1459——1464）。

[42] 罗兹岛（Rhodes），位于爱琴海南部安纳托利亚半岛沿岸的希腊领岛。

[43] 内格罗蓬特公国（Lordship of Negroponte）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封建主在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之一，领有今希腊优卑亚岛。1204年由塞萨洛尼基王国国王孟菲拉侯爵博尼法斯将其新领地优卑亚岛分封给佛兰德斯贵族而建立。全岛于1470年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服。

[44]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将与地中海相连的爱琴海，以及与黑海相连的马尔马拉海相连接的狭窄的海峡。

[45] 主首（Signora），对已婚者、年长者的称呼。

[46] 拉扎罗·莫切尼格（Lazzaro Mocenigo），出身于威尼斯共各国的活跃于17世纪的提督，意大利第70届总督，即彼得罗·莫切尼格（Pietro Mocenigo，在位时间：1474——1476)。

[47] 海莱斯彭特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

[48] 圣乔治港（Porto San Giorgio），是亚得里亚海最大的渔港及观光港，历史上有诸多名人在此休假，比如拿破仑的弟弟。

[49] 马里耶特·德·帕特拉斯（Mariette de Patras，？——1503），塞浦路斯国王让二世的希腊人爱妾，雅克二世的母亲。

[50] CDX（Consiglio dei Dieci），意大利语，意为“十人委员会”。

[51] 穆拉诺岛（Murano），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本岛的东北方向，在马拉尼运河沿岸的岛屿。

[52] 殿下礼舟（bucintoro），指威尼斯总督所乘坐的排桨船。在1798年威尼斯共和国被拿破仑灭亡之前，在每年复活节时举行的仪式（与大海的婚礼）上，总督都会乘坐该船出港，在

亚得里亚海上进行表演。其中第四艘、1729年处女航的总督船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宫殿一般豪华，长35米，高8余米，配备了168个桨手及40多个船员。总督的椅子安置于船舱后方，船首装饰着代表了正义的剑与天平。不过，这艘船在1798年拿破仑征服威尼斯时被破坏。

[53]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1420——1501），威尼斯总督（在任时间：1486——1501），是第七十三任总督马尔科·巴尔巴里戈的弟弟。

[54] 土耳其商馆（Fondaco dei Turchi），13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式样的商馆，1621——1838年为土耳其商馆。这是共和国准备的商馆，供土耳其人及波斯人用于住宿、商品仓库、交易场所。19世纪修复，现为市立自然博物馆。

[55] 圣保罗，威尼斯6个地区中最小的一个区，可以眺望大运河，拥有圣保罗教堂、美丽的宫殿及市场。

[56] 黄金宅邸（Ca’ d’ Oro），面对威尼斯大运河的宅邸中最美丽的一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外壁使用金箔与各种色彩的装饰而被称为黄金馆。该宅邸由威尼斯贵族孔塔里尼建造，该家族在1043——1676年间出了8个威尼斯总督。

[57] 阿索洛（Asolo），位于威尼斯以北60公里外的丘陵地带。它是古罗马人建造的城市，现在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这座城市虽小，却因为很多著名人士喜爱它而闻名世界。

[58] 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派的画家。威尼斯的文艺复兴美术迟于佛罗伦萨，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迎来黄金时代。

[59]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Procession of the True Cross in Piazza San Marco），1496年，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0] 《伊利亚特》（Iliad），据说是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古希腊诗歌作品。

[61] 布伦塔河（Brenta），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全长174公里。

[62] 皮亚韦河（Piave），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在注入大海的河流中，是意大利国内第五条长河。

[63] 格拉巴酒（Grappa），意大利特产蒸馏酒，白兰地的一种，酒精度为30——60度，是意大利很受欢迎的一种餐后酒类。

[64]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Gallerie dell’ Accademia），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美术馆，1750年由当地画家乔凡尼创建的美术学院发展而来，现在主要收藏了14世纪至18世纪威尼斯派绘画，尤其是威尼斯派的第一代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等人的代表作。

[65] 《十字架的奇迹》（Miracolo dell Croce），创作于1500年，现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6] 《阿索洛的人们》（Gli Asolani），关于柏拉图式爱情的三篇散文。

[67] 圣阿波斯托利教堂（chiesa dei santi apostolic），11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罗马风格的代表建筑物。

[68] 安德烈·拿巴杰洛（Andrea Navagero，1483——1529），著名的人文学者。

后记

1966年11月，由于阿诺河[1]泛滥，佛罗伦萨遭遇了大洪水。淫雨连绵，水量增加，山里面流出的水流与满潮时大海的逆流，正好在老桥[2]一带相会，溢出的河水形成浊流，袭击了整个城市。

3天后，我从罗马出发，到达佛罗伦萨。潮水已经退去了，可是，与水一同流出的重油，在距离墙面5米高的上方留下了鲜明的黑色印迹，清晰地显示出这场洪水的威势。城里面臭气熏天，热的食物只有咖啡。其中，很多学生正忙碌着将美术品搬运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抢救那些埋在烂泥里的古书。

我参加了由普莱维特利教授指挥的负责国立古书馆的小组。那个组里女学生很多，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她们从泥地里挖掘出大量的古书，将其分为手稿与印刷书，一页一页地仔细清洗，在中间夹上吸水纸。这样的作业每天都在持续着。就在这进行期间，我渐渐地清楚了一个月前粕谷先生邀我写一本《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这个题目应该如何开始着手梳理了。如果只是阅读现代人撰写的历史书，那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可是，那样一来，与用英语、德语、法语所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书就没什么差别了。怎样才能做到不通过后世人的过滤镜而直接迫近那个时代生存的人呢？那就是，只能通过亲自查阅尽量多的原始资料。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在此期间从未间断地给予我温暖的鼓励与建议的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以及编辑部的塙嘉彦先生，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对于经常前来与我相会，每次都给我提出宝贵忠告的林达夫[3]先生，也表示感谢。我记得，在从先生位于藤泽[4]的家中告辞出来的归途中，因为太清楚自己的无能了，身体甚至簌簌发抖般的战栗。

我也绝对不会忘记感谢荻原延寿[5]先生。他通过自己的撰写经验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历史学家也能允许想象。"先生的这句话，在我撰写期间，犹如远雷一般在我的头脑中隆隆作响。

我在意大利的学业，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蒙雷阿莱[6]的枢机主教、贝隆齐女士[7]等，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意大利的朋友们的名字。所以，我就只留下一个人的名字，献上我简单的谢意——茱塞佩·西莫奈[8]。

1969年3月1日于东京

盐野七生

---

[1] 阿诺河（Arno），流经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河流，全长240公里，注入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2] 老桥（Ponte Vecchio），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上的桥梁，正如其名字的意大利语表述，它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梁。

[3] 林达夫（1896——1984），日本思想家、评论家，著有《文艺复兴》等西方精神史、文化史、文明史方面诸多著作。

[4] 藤泽，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

[5] 荻原延寿（1926——2001），日本历史家，著有《远崖》等诸多著作。

[6] 蒙雷阿莱（Monreale），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巴勒莫。

[7] 贝隆齐（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文学界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与丈夫于1947年创立了意大利最权威的文学奖Strega奖，对年轻文学家寄予了厚望。

[8] 1970年3月，盐野七生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概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的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后离婚）。

参考文献

[缩略符]

A. S. 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 S. L.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N. A. =Nuova Antologia

S. P. R. =Atti e memorie della Reale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e provincie di Romagna

所有资料尽量使用发行年份较新的资料。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料

■ 当时的记录、年代记

ALBERI, E.,*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durante il secolo XVI*, Firenze, 1839——1863.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2——1854*: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Giovan Pietro Cagnola*(1023——1497)*; 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Ciovanni Andrea Prato*(1499——1519)*; Cronaca di Milano scritta da Ciovan Marco Burigozzo*(1500——1544)*; Degli Annali Veneti dall'anno 1457 al 1500 del Senatore Domenico Malipiero, ordinati ed abbreviati dal Senatore Francesco Longo;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Milizia*

Italiana dal XIII al XVI secolo raccolti negli Archivi della Toscana e preceduti da un discorso di G. Canestrini; 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 dal 1492 al 1503 di Francesco Matarazzo detto Maturanzio; Memorie perugine di Teseo Alfani dal 1502 al 1527; d'ARCO, C.,*Notizie di Isabella Estense moglie a Francesco Gonzaga, aggiuntivi molti documenti inediti che si riferiscono alla stessa Signora, all'istoria di Mantova ed a quella generale d'Italia*;*Documenta aliquot quae ad Ronani Pontificis notarios et curialespertinent; Sommario della Storia d'Italia dal 1511 al 1527 composto da Francesco Vettori.*

BEMBO. P.,*Opere complete*, Milano, 1808——1810.

BURCHARDI, J.,*Diarium sive rerun Urbanarum commentarii ab Anno*

MCDLXXXIII ad Annum MDCI, Paris, 1883——1885

CONTI di FOLIGNO, S. dei,*Le storie dei suoi tempi dal 1475 al 1510*, Roma, 1883.

CORIO, B.,*Historia di Milano*, Venezia, 1554.

FRANCO, G.,*Habiti d'huomeni et donne Venetiane con la processione della Ser. ma Signoria et altri particcolari cioè trionfi feste cerimonie publiche della nobilissima città di Venetia* , Venezia, 1617.

GUICCIARDINI, F.,*Storia d'Italia*, Roma, 1968; Ricordi, Milano, 1951.

INFESSURA, S.,*Diario della città di Roma* (1294——1494), Roma, 1890.

JOVII, P.,*Opera quotquot extant omnia illustrata*, Basel, 1578.

Machuavelli，N.，*Opere complete*，Milano，1960——1965；《マキアヴェリ》（《世界の名著》第16卷，会田雄次责任编辑，《君主論》池田廉译，《政略論》永井三明译），东京，1966。

PII II PONTIFICI MAXIMI,*Commentarii rerun memorabilium quae temporibus suis contigerunt*, Frankfurt, 1614.

PLATINA, B.,*Vita Sixti VI*, Venezia, 1562.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Editio Palatina》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733:*Marini Sanuti Leonardi filii patricii veneti 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 (1421——1493)*;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Venezia*na scritta da Andrea Nacagiero, Patrizio Veneto.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Editio Altera*G. Carducci &V. Fiorini, Città di Castello-Bologna, 1900——:*Il diario romano di Gaspare Pontani* (1481——1492);*Iacobi Volterrani Diarium Romanum ab Anno MCCCCLXXIX ad Annum MCCCCLXXXIV*;*Diario de Sebastisno de Branca Tedallini* (1485——1524);*Diario di Antonio de Vascho* (1480——1492); PRIULI, G., I*Diarii* (1494——1512);*Diario Ferrarese dall'anno 1409 fino al 1502 di autori incert*; ZAMBOTTI, B.,*Diario ferrarese* (1476——1504);*Johannis Burckardi caplle pontificie magister ceremoniaru mLiber notarum ab Anno MCCCCLXXXIII ad Annum MDVI*.

SAMUDO, M., I *Diarii* (1496——1533), Venezia, 1879——1903.

VECELLIO, C.,*Habiti antichi e moderni*, Venezia, 1598.

■ 后世历史学家的著作

BURCKHARDT, J.,《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世界の名著》第45卷，柴田治三郎译），东京，1966。

CIPOLLA, C.,*Storia delle Signorie Italiane dal 1313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Società e costume.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5.

GREGOROVIUS, F.,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m V bis zum XVI Jahrhumdert*, Stuttgart, 1886——1896.

LAMANSKY, VI.,*Secrets d'Etat de Venise*, St. Petersbourg, 1884.

PASTOR, L. von,*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Freiburgi. Br., 1901——1930.

PORTIGLIOTTI, G.,*Rinascimento. Porpora, pugnali, etère*, Milano, 1924.

ROMANIN, 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852.

SISMONDI, S. de,*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Paris, 1809——1818.

关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AMADEI, F.,*Cronaca Universale della città di Mantova*, Mantova, 1954——1957.

BACCHELLI, R.,*La congiura di don d'Este*, Milano, 1931.

BALDINI, M.,*Don Giulio d'Este. Poema drammatico*, Modena, 1930.

BELLONCI, M.,*Lucrezua Borgia*, Milano, 1939;*I segreti dei Conzaga*, Milano, 1963.

BONGIOVANNI, G.,*Isabella d'Este marchesa di Mantova*, Milano, 1939.

CARTWRIGHT. J.,*Isabella d'Este marchioness of Mantua*, London, 1903.

CONIGLIO, G.,*I Gonzaga*, Milano, 1967.

CROCE, B.,*Curiosità storiche*, Napoli, 1921.

FRATI, G.,*Giuochi ed amori alla corte di Isabella d'Este,A. S. L.III, IX, XXV,*Milano, 1898.

LUZIO, A.,*Isabella d'Este e il sacco di Roma*, Milano, 1908;*La Calleria dei Conzaga venduta all'Inghilterra*, Milano, 1913;*Isabella d'Este e i Borgia,Connuovi documenti*, Milano, 1916;*Isabella d'Este e la corte sforzesca,A. S. L. III, XV, XXVIII*, Milano, 1901;*Isabella d'Este nei primordi del papato di Leone X e il suo viaggio a Roma nel 1514——1515,A.S.L.IV, VI, XXXIII*, Milano, 1906;*Isabella d'Este e Francesco Gonzaga promessi sposi,A. S. L. IV, IX, XXXV*, Milano, 1908;*La reggenza di Isabella d'Este durante la prigionia del marito. 1509——1510,A. S. L.IV, XIV, XXXVII*, Milano, 1910;*Isabella d'Este di fronte a Giulio II negli ultmi tre anni del suo pontificat,A. S. I.IV, XVII, XVIII, XXXIX*, Milano, 1912;*Federico Conzaga ostaggio alla corte di Giulio II,Archivio della Reale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IX*, Roma, 1886;*Precettori di Isabella d'Este*, Ancona, 1887;*Isabella d'Este e Giulio II,Rivista d' Italia*, Milano, 1909;*Isabella d'Este nelle tragedie della sua casa,Atti e memorie della Reale Accademia Virgiliana*, Nuova V, Mantova, 1912;*La Madonna della Vittoria del*

Mantegna,*Emporium*, Bergamo, 1899;*I ritratti di Isabella d'Este*,*Emporium*, Bergamo, 1900.

LUZIO, A., & RENIER, R.,*Delle relazioni d'Isabella d'Este Conzaga con Ludovico e Beatice Sforza*,*A. S. L.II, VII, XVII*, Milano, 1890;*Francesco Gonzaga alla battaglia di Fornovo(1495)secondo i documenti mantovani*,*A. S. I.*V, VI, Firenze, 1890;*MantovaeUrbino. Isabellad'EsteedElisbettaGonzaganellerelazionifamigilarienellevicendepolitic* Torino, 1893;*Illussod'Isabellad'EstemarchesadiMantova*,*N.A.LXIII, LXIV* & *LXV*, Firenze-Roma, 1896;*LaculturaelerelazioniletterariediIsabellad'EsteGonzaga*,*GiornaleStoric XL&XLII*, Roma-Torino, 1899——1903;*GaradiviaggifraduecelebridamedelRinascimento*,*IntermezzoI*, Roma, 1890.

MALAGUZZI-VALERI, F.,*LacortediLudovicoilMoro. Lavitaprivatael'arteaMilano*, Milano, 1913.

关于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ADEMOLLO，A.*AlessandroVI, GiulioIIeLeoneXnelcarnevalediRoma. 1499——1520*, Firenze, 1886; Lucrezia Borgia e la verità，*ArchivioStoricoProvincialediRoma*, Roma, 1887.

ALVISI, E.,*CesareBorgiaducadiRomagna. Notizieedocumenti*, Imola, 1878.

BACCHELLI, R.,*LacongiuradidonGiuliod'Este*, Milano, 1931.

BALDINI, M.,*DonGiuliod'Este. Poemadrammatico*, Modena, 1930.

BELLONCI, M., Lucrezia Borgia, Milano, 1931.

BENDEDEI, N.,*LetteraalponteficeAlessandroVIperglisponsal diLucreziaBorgiaconAlfonsod'Este*, Ferrara, 1889.

BELTRAMI, L., (POLIFILO),*LaguardarobadiLucreziaBorgia*, Milano, 1903.

BOSCHI, G.,*LucreziaBorgia*, Milano, 1929.

CAMPORI, G.,*Unavittimadellastoria, LucreziaBorgia,N. A.II*, Firenze, 1866.

CAPPELLETTI, L.,*LucreziaBorgialastoria*, Pisa, 1876.

CATALANO, M.,*LucreziaBorgiaduchessadiFerrara*, Ferrara, 1920.

CHIAPPINI, L.,*GliEstensi*, Milano, 1967.

CIONINI, N.,*AngelaBorgiaeunapaginadellastoriasassolesedelsecoloXVI*, Modena, 1907.

CROCE, B.,*LaSpagnanellavitaitalianadurantelaRinascenza*, Bari, 1922.

DELL' ORO, I.,*IlsegtetodeiBorgia*, Milano, 1938.

DE ROO, P.,*MaterialforahistoryofpopeAlexanderVI*, Bruges, 1924.

FELICIANGELI, B.,*IlmatrimoniodiLucreziaBorgiaconGiovanniSforzasignorediPesaro*, Torino, 1901.

FERRARA, O.,*IlpapaBorgia*, Milano, 1953.

FRIZZI, A., Memorie per la storia di Ferrara, Ferrara, 1791——1809.

FUSERO, C.,*CesareBorgia*, Milano, 1958;*IBorgia*, Milano, 1966.

GANDINI, L. A.,*LucreziaBorgianell'imminenazdellesuenozzeconAlfonsod'Este,S. P. R.*, Bologna, 1902.

GATTI, B.,*LetterediLucreziaBorgiaaM. PietroBembodagliautograficonseruatiinuncodicedellaBibliotecaAmbrosiana*, Milano, 1859.

GREGOROVIUS, F.,*LucreziaBorgia. Secondodocumentiecarteggideltempo*, Firenze, 1874.

LUZIO, A.,*Isabellad'EsteeBorgia. Connuovidocumenti*, Milano, 1916.

MEDIN, A.,*IlDucaValentinonellamentediNiccolÒMachiavelli,RivistaEuropea*, Firenze, 1885.

MENOTTI, M.,*IBorgia. DocumentiineditisullafamigliaelacortediAlessandroVI*, Roma, 1917.

MORSOLIN, B.,*PietroBemboeLucreziaBorgia,N. A.LII*, Firenze, 1885.

PEPR, G.,*LaPoliticadeiBorgia*, Napoli, 1945.

PORTIGLIOTTI, G.,*IBorgia*, Milano, 1913.

SORANZO, G.,*StudiintornoapapaAlessandroVIBorgia*, Milano, 1951.

WIRTZ, N.,*ErcoleStrozzipoetaferrarses,Attiememoriedelladeputazioneferraresedi*Stori Ferrara, 1906.

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BERNARDI, A., (NOVACULA),*Cronacheforlivesi*, Bologna, 1896.

COBELLI, L.,*Cronacheforlivesi*, Bologna, 1874.

ALLODOLI, E.,*GiovannidalleBandeNere*, Firenze, 1929.

ALVISI, E.,*CesareBorgiaducadiRomagna. Notizieedocumenti*, Imola, 1878.

AMADORI, C.,*LaCaterinaSforzadiP. D. Pasolini*, Forlivesi, 1894.

BELLONCI, M.,*LucreziaBorgia*, Milano, 1939.

BONDI-SOLIERI, B.,*MadonnaCaterinadiForli*, Faenza, 1955.

BRASCHI. A.,*CaterinaSforza*, Bologna, 1965.

BURRIEL, A.,*VitadiCaterinaSforzaRiario*, Bologna, 1795.

CERATO, M.,*CaterinaSforza*, Roma, 1903.

CIAN, V.,*CaterinaSforza*, Torino, 1893.

COSTA, P.,*LamentazionidiCaterinaSforzaRiario*, Lugo, 1932.

FUSERO, C.,*CesareBorgia*, Milano, 1958.

GALLI, R.,*ImolatralaSignoriaelaChiesa*, Bologna, 1927.

MARINELLI, L.,*CaterinaSforzaalladifesadeisuoidomininellaRomagna,S. P. R.IV*21&22, Bologna, 1932.

MASI, E., Caterina Sforza,*N. A.II,CXXIX45*, Roma, 1893.

MEDIN, A.,*IlDucaValentinonellamentediNiccolòMachiavelli,RivistaEuropea*, Firenze, 1885.

MONCALLERO, G. L.,*Documentiineditisullaguerradi Romagnadel1494,Rinascimento*, Firenze, 1953——1955.

MONTI, A.,*LaroccadiRavaldino. CaterinaSforzaeGiovannidalleBandeNere,ForumLiviiII1——2*, Forli, 1927.

MORSIANI-QUADALTI, D.,*Delluogodov'emortalacontessaCaterinaSforza, signorad'ImolaediForli*, Bologna, 1880.

OLIVA, F.,*VitadiCaterinaSforza*, Forli, 1821.

PASOLINI, P. D.,*CaterinaSforza*, Roma, 1893;*NuovidocumentisuCaterinaSforza,S. P. R.*, XV, Bologna, 1897.

PEPE, G,*LapoliticadeiBorgia*, Napoli, 1945.

RENIER, R.,*CaterinaSforza, GazzettaLetteraria*30——31, Torino, 1893.

RICOTTI, E.,*StoriadellecompagniediventurainItalia*, Torino, 1847.

ROSSI, G.,*VitadiGiovannide'Medici*, Milano, 1833.

SALTINI, G. E.,*CaterinaSforza,A. S. I.*, Firenze, 1894.

SANI, S.,*CaterinaSforzaeilDucaValentino,VitaNuova*, Bologna, 1925.

VILLARI, P.,*Ni c co lòMa chiave l liei soui te m pi*, Fi ren ze, 1877.

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2——1854:*DegliAnnaliVenetidall'anno1457al1500delSenatoreDomenicoMalipiero ordinatiedabbreviatidalSenatoreFrancescoLongo*III; GAGNOLA,*Questose'lPiantodeNegroponte; LapersadiNigroponte; PerditadiNegroponte, scrittaperFratelacopodellaCastellana*.

BUSTRON, F.,*CronacadiCipro*, Mas-Latrie,*CollectiondedocumentsinèditssurI' histoiredeFrance*, Paris, 1879.

COLBERTALDO, A.,*IstoriadiCaterinaCornerreginadiCipro,BibliotecaMarciana*, Venezia.

CORNET, E.,*Leguerredeivenetinell'Asia*, Wien, 1852;*LetterealSenatodiGiosafatteBarbaro*, Wien, 1852.

LUSIGNANO, S.,*HistoriadiCipri*, Bologna, 1573.

BAILLY, A.,*LARépubliquedeVenise*, Paris, 1946

BATTISTELLA, A.,*UnnuovodocumentosullʼacquistodiCiprodapartedellaRepubblcadiVenezia*,

LettereedArtiLXXX, Venezia, 1920——1921.

BOSIO, I.,*HistoriadellasacraReligioneetIII. maMilitiadiSanGiovanniGierosolimitano*, Roma, 1619.

BROWN, H. F.,*StudiesinthehistoryofVenice*, London, 1907.

CENTELLI, A.,*CaterinaCornaroeilsuoRegno*, Venezia, 1892

CERONE, F.,*LapolticaorientaledíAlfonsod'Aragona,Archiviostoricoperleprovincie Napo. &XXVIII*, Napoli, 1902——1903.

CESSI, R.,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enezia, 1942;*UnfalsoeroedellarivoltadiFamagosta,AttidelRealtelstitutoVeneto*, Venezia, 1911.

DUDAN, B., II dominio Veneziano di Levante, Bologna, 1937.

FORCELLINI,*Straneperipeziediunbastardodicasad'Aragona*, Napoli, 1915.

GHINZONI, P.,*GaleazzoMariaSforzaeilRegnodiCipro,A. S. L.VI*, Milano, 1879.

GUERDAN, R.,*L'orodiVenezia*, Milano, 1967.

HILL, G.,*AhistoryofCyprus*, Cambridge, 1940——1948.

LANE, F. C.,*Venetianshipsandshipbuildersofthe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LOREDANO, G. F.,*Historie de' Relusignani*, Henrico Giblet, Venezia,

1653.

LUZZATTO, G.,*StoriaeconomicadiVeneziadel IX al XVI secolo*, Venezia, 1961.

MAGNANTE, G.,*Documenti mantovani sulla politica di Venezia aCipro,ArchivioVeneto-TridentinoVIII*, Venezia, 1925;*L'acquistodell'isoladiCiprodapartedellaRepubblicadiVenezia,ArchivioV 5 &6*, Venezia, 1926.

MANFRONI, C.,*StoriadellaMarinaItalianadallacadutadiCostantinopoliallabattagliadiLepa* Roma, 1933;*IcolonizzatoriitalianiduranteilMedioEvoed ilRinascimento*, Roma, 1933.

MARANINI, G.,*LaCostituzionediVenezia*, Venezia-Firenze, 1927——1931.

MAS-LATRIE, L. de,*Histoiredel'iledeChypresouslerègnedesprincesdelaMaisondeLusignan*, Pairs, 1855;*Nouvellespreuvesdel'histoiredeChypre,Bibliotêquedel'écoledeschartes*, Paris, 1871——1874;*Documentsnouveauxservantdepreuvesal'histoiredeChypre*, Paris, 1882.

MOLMENTI, P.,*StoriadiVenezianellavitaprivata*, Bergamo, 1910——1911.

SIMONSFELD, L.,*CaterinaCornaro,ArchivioVenetoXXI*, Venezia, 1881;*Civiltàvenezianadel' 300*, Firenze, 1956;*Civiltàvene-zianadel' 400*, Firenze, 1957;*CiviltàVenezianadelRinasc-imen -to*, Firenze,

1958;*TrattatodeltitoloregiodovutoallaserenissimaCasadiSavoiainsiemeconun*
Torino, 1633.

插图来源一览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素描》，达·芬奇画，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胸像》，克里斯托弗罗·罗马诺作，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Scala, Firenze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肖像》（《斯福尔扎祭坛画》局部图），作者不详，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Archivi Alinari/Giraudon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肖像》，同上。

《新婚的房间》，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哀悼基督》，曼特尼亚画，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Scala, Firenze

《费代里科·贡扎加肖像》，提香画，普拉多美术馆（马德里）© Scala, Firenze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私人藏品，©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伊莎贝拉的“书斋”》，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圣凯瑟琳的议论》局部图），平托瑞

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基督的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托瑞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波吉亚寓所》，梵蒂冈美术馆内©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切萨雷·波吉亚肖像》，作者不详，威尼斯宫美术馆（罗马），© Scala, Firenze

《阿方索·德·埃斯特肖像》，提香画，帕拉提那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彼得罗·本博肖像》，拉斐尔画，布达佩斯国立美术馆（匈牙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尤利乌斯二世》（《将赫利奥多罗驱赶出神殿》局部），拉斐尔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肖像》，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意大利）© Foto Giorgio Liverani di Liverani Monica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澳大利亚）©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米兰城之塔》©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肖像》，波拉伊奥罗画，乌菲齐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画，都灵皇家图书馆（都灵/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西斯都四世与外甥们（局部）》，美洛佐·德·弗利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肖像》，波提切利画，西斯廷教堂（梵蒂冈）©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洛伦佐·德·美第奇肖像》，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Giraudon

《乔凡尼·德·美第奇》，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提香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排桨船》，拉斐尔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礼服》，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肖像》，丁托列托画，卢浮宫博物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土耳其的苏丹》《土耳其士兵》，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科雷尔美术馆（威尼斯），© Museo Corre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詹蒂利·贝利尼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译者跋

女性与合理主义

“文艺复兴”原本是欧洲的一种文化现象，即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Renaissance在现代日语中一般使用音译“ルネサンス”，不过此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使用了“文芸復興”这个汉语词，将文艺复兴时代称为“復興期”。这个译词不单指文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使用。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作者盐野七生，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女性。这让笔者在阅读之前首先涌现的疑问就是：日本人写欧洲史？还是女性写作？在现代出版极度繁盛的状况之中，一个日本女性写作的欧洲史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她为何要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她笔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一

盐野七生青年时代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些重要事件：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1968年，美国将小笠原诸岛归还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以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达到顶峰。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是“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海外旅行放开、四大公害疾病暴发

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

盐野七生顺着海外旅行的热潮到了意大利。她在日本的学习院大学文学系攻读了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1963——1968年游学意大利。1966年9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与中央公论社的总编粕谷一希先生相遇，受其邀请开始撰写《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作品刊登于1968年4月、6月、9月号上。

这就是一个日本女性写意大利的开始。1970年3月，盐野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约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虽然他们后来离婚了，但茱塞佩·西莫奈是盐野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后记中唯一留下名字的意大利朋友。此后，诸如《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等，佳作频出。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一写就是15年，一年一本。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女性，在78岁的2015年时依旧勤奋地写出了《希腊人物语1：民主政治的开端》。

本书是盐野写作生涯的开端之作，不仅对于“作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撰写的《优雅的冷酷》《海都物语》等作品的引子，也早已种在了此书中。

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讲了四个女人的故事，四个女人在人际关系上有所关联，但这个关联在叙述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处理得亦很淡泊，所以基本可以将四章视为四个独立的故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

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这个美丽的女人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自身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的饵食，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所以，当丈夫被俘虏时，她向教皇、法国皇帝等一切有声望的人求救，但是她坚守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他们以解救丈夫为借口而将铁蹄踏上自己的国土，哪怕被威胁杀了她的丈夫。她亲历了罗马劫掠，将美貌的女官当作政治交际的工具，营造了她那间今日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

第二个女人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因为声名显赫的亚历山大教皇父亲与切萨雷哥哥的缘故，她成了典型的“被男人左右命运”的女人，而左右她的正是女性最为关心、最为痛心的“婚姻”。美貌绝伦的她不得不成为棋子，出嫁了三次。在这一期间，她有过抗争，也有过与他人的恋爱与不伦。波澜万丈之后，她与第三任丈夫和睦相处，为家族添子传宗。她的生命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所以尽管是悲剧，她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在与这个名字的荣光及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第三个女人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是个太不寻常的女人，一个拥有阿滕多洛乡野武夫的血统、美貌与英勇兼备，勇敢之处甚至可以用悍妇来形容的女人。她最著名的事迹恐怕就是站在城塞上，面对着以她

的两个孩子为要挟的敌人，从从容容地掀起裙摆，大声喊道："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可是，如果不是这般强悍，又有谁能保卫弗利？在众叛亲离、无所依赖之际，谁能奋勇而起，为故土而战？如果卡特琳娜的对手不是叱咤整个意大利的切萨雷，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她的命运也许能够被改写。这位意大利的女杰，对待敌人的报复极其残忍，可那个前提是敌人杀害了她的丈夫与恋人。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那是一种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的特点——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不是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

晚年的时候，她忽然从一个异教徒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默默生活。不过，这不是"回归"，而是在失去了金钱、权力与爱情之后，无可选择或者说已经一败涂地之际，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们也是如此，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第四个女人是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与前三个女人相比，她的生平显得十分黯淡，尽管她贵为塞浦路斯女王，却是一生都被威尼斯共和国所操纵的傀儡。她在十四岁的豆蔻年华举行了只有丈夫代理出席的婚礼，在等待了四年之后才终于前往塞浦路斯，到年轻英俊的丈夫身边。可惜，这样美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便因丈夫突然患病离世结束了。这之后，在威尼斯共和国成功地平定法马古斯塔之乱之后，她以被解救的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在威尼斯强大的军事及政治干预下，当上了美丽的地中海风情的塞浦路斯岛的女王。这一当便是十七年。丈夫过早离世，儿子一岁便夭折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该如何熬过漫漫长夜？她也曾经有过反抗，但与其说是反抗威尼斯，不如说，她对新的婚姻、新的生活有所憧憬。当塞浦路斯毫无悬念地被威尼斯成功合并后，她交出了女王的王冠，以贵宾身份回归威尼斯，成为优雅而快活的阿索

洛夫人。

卡泰丽娜是一个单纯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无论威尼斯怎样将其作为政治布局中的一个棋子，她也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丈夫、国家与生活的模式。所以，至于她是不是棋子，就不具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因为她本人根本无所谓。

三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女人们》选取的就是最为著名的这四个女人，她们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处世，各人虽自有活法，却依旧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的书斋入口处挂着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Nec spe nec metu）。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教皇父亲及哥哥掌控了命运，但她对他们的感情并非憎恨，反而是亲切的、相当崇拜的。就像作者在前言中写她自己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大多数的

女性对于政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卷入其中，看得都比较次要。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与周围的人。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曾真正投身于战场之上，虽然落荒而逃，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赞扬。她的一些“下流”的话语与行为，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低俗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盐野说自己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只是因为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笔者以为，卡泰丽娜是普通女性的一类代表，胸无大志，只希望拥有小小的平静的家庭幸福，并没有什么不好。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当时的她们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行为，走过了一生。谁也不能说，换一种人生对她们来说就更为合适。

然而，女性有着“女人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宏大视野，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周围的小圈子的安危，不能瞻望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奥二世等人相比，是微小的存在。那些男人被认为贯彻“极善至恶”[1]的雄壮的政治。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们，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是男人的牺牲品。作者从一开始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在此书中，卢克雷齐娅与卡泰丽娜的命运或许会让人有所质疑，但如果从她们对“命运”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憎恨，而只是接受的一点来看，接受即意味着一定的合理性。

写女人的故事，大多会令人联想到性爱，带有暧昧的幻想。《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描绘，毕竟是以“历史”为重心的传记类小说，但作者已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她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理解，那就是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

伊莎贝拉才华横溢，虽然因为机缘错失了与米兰公国的执政者伊鲁·摩洛的婚姻，在妹妹死后，她与伊鲁·摩洛关系亲密，但并无出轨行为。她对丈夫的情人们（其中还有著名的卢克雷齐娅）并无过多的烦恼，反而为她两个弟弟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女仆而产生纠纷痛苦不堪。

卢克雷齐娅的性爱向来是世间饶有兴味的谈资。她结了三次婚，还有数个情人。但是比起这些，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她与教皇父亲，与哥哥切萨雷的乱伦。可是，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完全不见这些闲言碎语。当然，书中描写了她的父亲、兄弟与妯娌之间的一些关系。不过，字面相当干净。

卡特丽娜一章描写了一场战争与一个阴谋，没有任何花边绯闻。至于从威尼斯远嫁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在婚前默默地等待了四年，在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婚姻之后便成为一个寡妇。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养女，她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被禁止与任何男性往来。15年后，当她刚要被利用于一场婚姻而心中若有期待时，这个计划又被威尼斯政府粉碎。

因此，四个女人的人生与作者精辟的指摘似乎是联系不起来的，但是作者的指摘却并没有错。她的对象应该是在说此书中的男人们，尤其是切萨雷或亚历山大教皇。

四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之后作者又写了40多年，出版了《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等60余种作品。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故事，它有一个前缀“文艺复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代表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盐野在《文艺复兴是什么》一书中，以设问——回答的形式，通过佛罗伦萨、罗马、基安蒂的格列韦、威尼斯四个城市，分别描绘了文艺复兴每一个时期的特点。这本书最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是澄清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换言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个分离的问题。不能说文艺复兴因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它是不完整的。在该书的结尾，作者将“文艺复兴是什么”的“什么”落在了“慧眼”与“克己”两点上。

慧眼的意思就是“发现”。本着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怀疑”，去重新看待，就能看到很多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意思。作者的解释是这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是人。人具有善恶两个属性，所以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不能将责任转嫁到恶魔的身上，所以要自我约束，要有坚强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所见作者崇尚的文艺复兴的坚强个性，尤其是她钟爱的切萨雷·波吉亚，也许就是这个解释的体现。

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给读者的体会就是，即便像亚历山大教皇、波吉亚家族那般乱伦、滥杀与残暴，像卡特丽娜那般强悍与残忍，他们的品格也是受到世人高度评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性恶”“狡猾”并不是贬义词，反而是赞美之词。盐野在一篇题为“恶的建议”的文章中说：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大家都是善人，都很正直，不论怎样、不论到什么时候都好像一个中学生，实在没有出息。”[2]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

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的人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在那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的可能性都是打开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在高度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需要向外、对世界发出声音，而这方面的日本外交，在盐野的眼中，显然是很欠缺的。“在美国有一个笑话，说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四种人。美国哲学家、英国作曲家、德国喜剧演员、日本花花公子。因为花花公子需要具有以最小投资获得最大利益的才能，而日本的外交官往往与之相反。”[3]她的这一认识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粕谷一拍即合，《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受邀之后的半年即写出150页，而后变成了一本书。

译者[4]乙未秋于沪上

---

[1] “极善至恶”的日语原文为“善悪の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这个词语大概是尼采的用语，或者是《道德的谱系》（1887）的姐妹篇书名。尼采否定了以往的传统道德奴隶道德（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的善恶标准，而追求古希腊那种超越了善恶观念的人的形象，意图树立起肯定坚强生存的道德。

[2] 参见盐野七生、山崎正和《恶的建议——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悪のすすめ——善の無知より悪の狡知に学べ》），载《諸君》12（1），1980年1月，第148——162页。

[3] 参见盐野七生《一个出版人的死》（《ある出版人の死》），收入藤原书店编辑部编《名伯乐——粕谷一希的世界》（《名伯楽 粕谷一希の世界》），东京，藤原书店，2015年。

[4] 李艳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京大学学术博士。

文艺复兴的故事
05

盐野七生

优雅的冷酷

——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日】盐野七生－著　赵文莞－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致读者
引子
第一部分 红衣（1492——1498）
第二部分 剑（1498——1503）
第三部分 流星（1503——1507）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返回总目录

N
萨伏依公国
都灵
米兰
阿斯蒂
伦巴第
蒙费拉托侯国
米兰公国
威尼斯共和国
帕多瓦
威尼斯
曼托瓦
热那亚
费拉拉公国
热那亚共和国
费拉拉
博洛尼亚
罗马涅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共和国
托斯卡纳
乌尔比诺
锡耶纳
马尔凯
锡耶纳共和国
翁布里亚
科西嘉
亚得里亚海
教皇领地
罗马
撒丁岛（王国）
坎帕尼亚
那波利
巴里
那波利王国
布林迪西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卡拉布里亚
巴勒莫
西西里（王国）
0
100
200
300km
15 世纪末的意大利

科莫湖
贝尔加莫
米兰
洛迪
克雷马
帕维亚
皮亚琴察
帕尔马
热那亚
维琴察
特雷维索
维罗纳
帕多瓦
威尼斯
曼托瓦
费拉拉
摩德纳
博洛尼亚
亚得里亚海
伊莫拉
拉文纳
法恩扎
弗利
切塞纳
里米尼
圣马里诺
卢卡
比萨
菲耶索莱
佛罗伦萨
佩萨罗
法诺
塞尼加利亚
安科纳
波吉邦西
乌尔比诺
圣吉米尼亚诺
阿雷佐
卡斯泰活城
锡耶纳
科尔托纳
古比奥
马切拉塔
马焦内
法布里亚诺
皮恩扎
卡梅里诺
皮奥恩比诺
佩鲁贾
阿西西
福利尼奥
特雷维
厄尔巴岛
奥尔维耶托
斯波莱托
托蒂
科西嘉
维泰博
奇维塔韦基亚
布拉恰诺湖
第勒尼安海
罗马
奥斯提亚
切萨雷的势力分布图
罗马涅公国领地
保留教皇领地的名义，
实则为切萨雷支配下的领土
切萨雷的势力所支配的地域
N
卡普阿
那波利
伊斯基亚岛
索伦托
卡普里岛
0
60
120km
180km

切萨雷·波吉亚
同时代作家保罗·乔维奥的《伟人传》插图

切萨雷·波吉亚的佩剑

波吉亚家的主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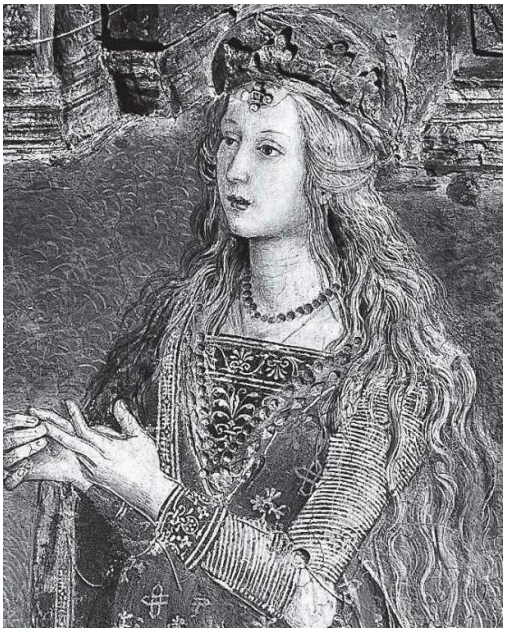
切萨雷·波吉亚（1475——1507）

母亲瓦诺莎·卡塔内

父亲罗德里格（1431——1503）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弟弟胡安（1476——1497）
二代甘迪亚公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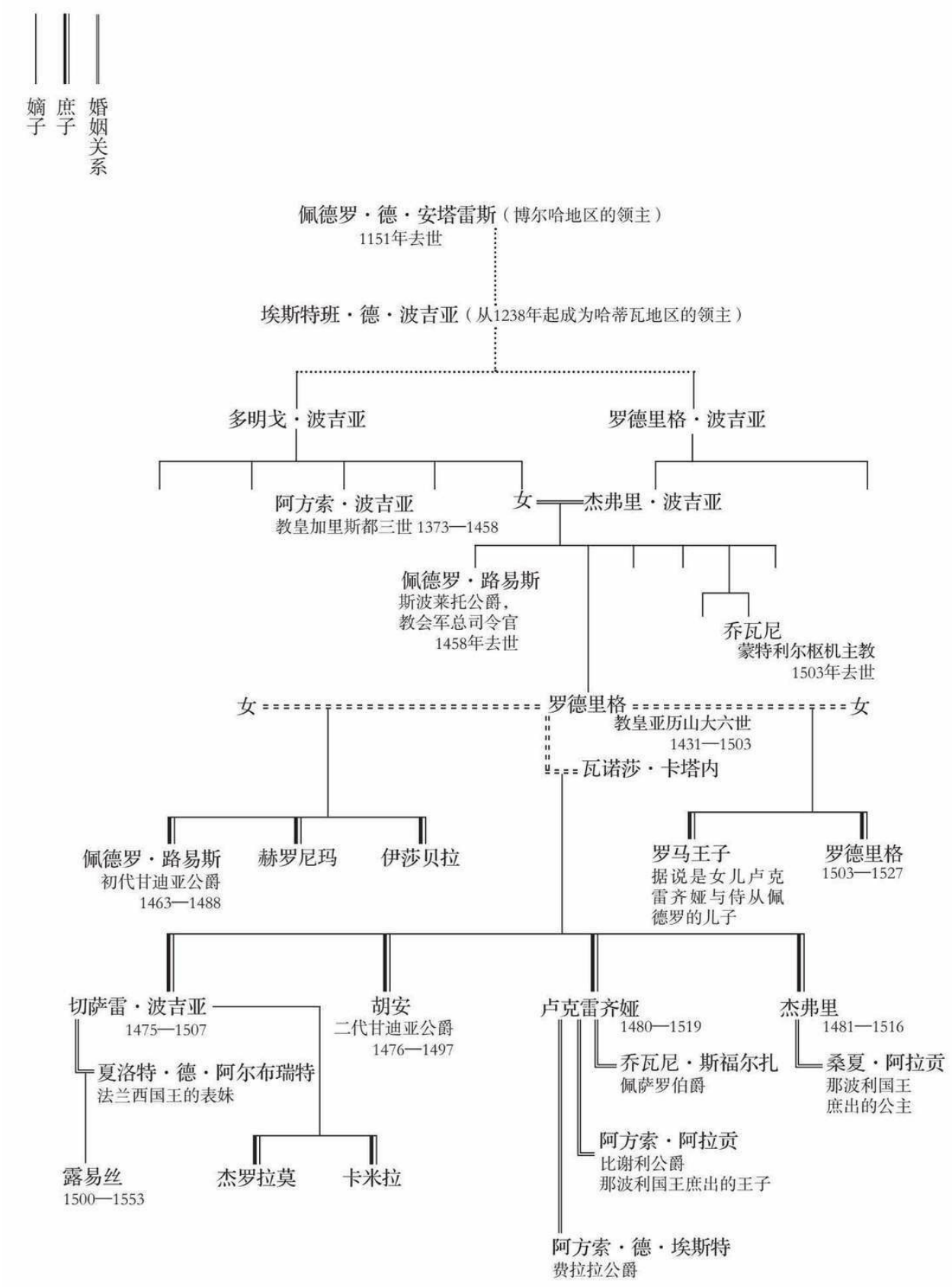
弟弟杰弗里（1481——1516）



妹妹卢克雷齐娅（1480——1519）

波吉亚家的关系图（主要人物）

圣职人员不被允许结婚，因此教皇的子女全部被视为庶出


嫡子
庶子
婚姻关系
佩德罗·德·安塔雷斯（博尔哈地区的领主）
1151年去世
埃斯特班·德·波吉亚（从1238年起成为哈蒂瓦地区的领主）
多明戈·波吉亚
罗德里格·波吉亚
阿方索·波吉亚
教皇加里斯都三世 1373—1458
女
杰弗里·波吉亚
佩德罗·路易斯
斯波莱托公爵，
教会军总司令官
1458年去世
乔瓦尼
蒙特利尔枢机主教
1503年去世
女
罗德里格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1431—1503
女
瓦诺莎·卡塔内
佩德罗·路易斯
初代甘迪亚公爵
1463—1488
赫罗尼玛
伊莎贝拉
罗马王子
据说是女儿卢克
雷齐娅与侍从佩
德罗的儿子
罗德里格
1503—1527
切萨雷·波吉亚
1475—1507
胡安
二代甘迪亚公爵
1476—1497
卢克雷齐娅
1480—1519
杰弗里
1481—1516
夏洛特·德·阿尔布瑞特
法兰西国王的表妹
乔瓦尼·斯福尔扎
佩萨罗伯爵
桑夏·阿拉贡
那波利国王
庶出的公主
阿方索·阿拉贡
比谢利公爵
那波利国王庶出的王子
露易丝
1500—1553
杰罗拉莫
卡米拉
阿方索·德·埃斯特
费拉拉公爵

致读者

——值此“新人新作三部曲”以文库本形式再度面世之际

当年的我正全身心投入享受在意大利的生活，丝毫未曾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偶然结识的友人建议下，于29至30岁期间经过学习研究，执笔写下了自己最初的文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1]，其最初刊载于《中央公论》杂志，大致在其后的第二年被整理成书出版面世。

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2]下笔时间紧随其后，未经过杂志刊载，直接单独成册。即在写完《女人们》后，我便着手撰写了《冷酷》一书，但这本书最终面世于书店，已是我32岁时候的事情了。

再次转过年后，我早早地就开始动笔撰写自己的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部作品与《女人们》相同，先刊载于杂志，后于我35岁之时单独成册出版。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末尾到三十五岁之间所写下的作品。

而时隔多年再次品读，在我这个写下了这些文字的作者本人来看，用一句话来概括感想的话，只能是“不尽如人意”几个字。这三部作品过于鲜明地体现出的“新人新作”的特征，让我倍感不妥，其中令我最为在意的缺点是我在文中经常流露出的过于片面地强调自我主张。但世间万物皆有正负两面，换个角度来想，我的这种写作手法也有可取之处，当年充斥于我内心的想法皆是借由这样的写作才得以一举迸发而出。

从以前开始，我就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好孩子”，而随着经历青春期成长进入青年人的行列后，更是对当时充斥在日本社会中的那种温暾氛围越发厌恶。我认为社会宣扬的所谓与人为善、其乐融融什么的都是一派胡言，也非常讨厌当时一心相信这种气氛能够推进社会发展的所谓日本精英们。而当这样的我与西欧尤其是古代西欧历史相“对决”之时，心中所想便一气倾泻而出。

写作中的我仿佛就是亟待喷发而出的岩浆，不管笔下所写的是女性、青年才俊抑或是成熟男性，无论对象如何变换，在我心中所迫切想要展示给日本人看的都是同一个念头，“当个老实人是没法子活下去的”“在古代欧洲曾有如此顽强不屈的人存在过”。

虽已无法忆起书名，但年幼时曾拜读过一部作品，安德烈·纪德在其中写过如下的话：

“人们从山脚下即可望见名为托尔斯泰[3]的山峰，但只有登上了这座名为托尔斯泰的山峰，方能看到其对面还矗立着一座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4]的山峰。”

而无论是《女人们》《冷酷》抑或《神的代理人》，都是我可以从山脚处看到的山峰，三本书的故事舞台普遍集中于罗马和意大利。我当时居住于此地，闭上眼都能明了笔下的每个事件所发生的场景，故而才选择了这些内容下笔。

而当我攀上了山峰，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高耸在前方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继续向上攀登的成果，便是《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两部作品的出版。随后，立于山顶的我所看到的，是一条通往远方的名为古罗马的绵长山脉。经过十五年的翻山越岭，我恍然发现自己所写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那漫长的被夹在文艺复兴与古罗马之间的中世纪。自然而然地，我随即转而去攀登最能代表这漫漫千年中世纪的三座山峰。

第一座山峰，是一本名为《罗马灭亡之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作品，以地中海为舞台，讲述了千年之间围绕着海盗与海军所展开的故事。在罗马帝国支配下的和平崩溃后，地中海地区便成为从北非袭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而组建海军迎头对抗的欧洲南部之间激烈战斗的舞台。

第二座山峰，虽然同样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间的激战，却是围绕着从欧洲北部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及与之迎战的伊斯兰教徒间发生的十字军故事。

第三座山峰，是我现在正在筹备的作品，因为书名还未确定，无法在此详细讲述。但在我心中，这三部作品加上已经出版的《海都物语》共四部作品，将使我构想的“登顶”漫长中世纪主峰成为可能。

这样一路走来，我那从“新人新作三部曲”开始的作家事业，在一次次攀登展现在眼前的高峰后不断前进，也就是说，“三部曲”成为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坦白来说，年轻时候的作品难以避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没有对此进行修改，因为我更想要原样保留下年轻时候的气势，毕竟源于青涩的不成熟也是有其美好之处的。

我始终深信细节之中得见神迹，故而至今为止一直拒绝写作“一册读懂世界史”、“西洋史手册”之类的作品。要讲述历史这一复杂的人类世界，若是只图省事妄想简短总结，只会离事实越来越远。而在我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做寥寥数语一言概括，就是对曾经拼命生存的前人们的最大不敬。

但也正因如此，我总是致力于写全所有细节，最终导致了每一册作品都比较厚重。对于购买并阅读我的作品的读者们，虽然我一直觉得很抱歉，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并理解我的“细节之中得见神迹”这一想法。而最后可能还需致歉的一点就是，我的这种作风恐怕是到死都不会

改变了。

再启

但凡作者都会有所谓的“青春的一册”。作品的主人公是年轻人，而作者写作时也尚且年轻，读者通常也正值大好青春，《优雅的冷酷》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即使是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日截稿的情景。写完原稿上的最后一行文字才豁然发现天已破晓的我，打开窗户沐浴着微弱的晨光，深深地吸入了清晨清冷而新鲜的空气。那是7月7日的清晨，我恰在那一天迎来了自己31岁的生日，伴随着完成写作的满足感，我郑重地向自己宣告“你已于今日成人”。

话至此处，已无须多言，作品自会说明一切。而曾断然忘却自己的女性身份，全情投入于描绘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的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是毕生难忘的体验。

2012年春，在阔别已久的祖国日本。

盐野七生

---

[1]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女人们》。——译者注

[2]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冷酷》。——译者注

[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28——1910），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译者注

[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1821——1881）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代表作有《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译者注

在我来看，比起思虑周全，迅猛果断更为可取。究其原因，是在于命运之神是位女神，要想将其据为己有，就只有打倒她，冲撞她。

比起冷静处事的人，命运更愿将胜利赐予这样的人们。

也就是说，命运犹如女子一般是年轻人的朋友。正是因为年轻人不会瞻前顾后，而总是极其迅猛大胆地将她征服。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引子

在罗马的一位贵族家中，珍藏着这样一把宝剑。

这把剑，因其做工极其精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誉为“剑之女王”。剑身上的金银饰物制作精湛，被鉴定是出自有名的细金工艺大师埃尔克雷·德·费德里之手。而饰物的样式设计，有人主张说是出自米开朗琪罗，也有人主张是出自拉斐尔，然而，从这把剑的制作时期来推断，一般认为是平图里乔的作品。

根据这把剑上的装饰判断，其用途并非为了斩人饮血，更像是为了在仪式中佩带，抑或单纯只是为了让定制者时不时拿在手中把玩。

这便是切萨雷·波吉亚的宝剑。

在基督教世界中，他的身份是教皇的儿子——这在基督教义中被视为异端，但与此同时，他却对当时代表俗世间最高权威的教廷不屑一顾，将罗马教会彻彻底底踩作了垫脚石，为了自己建立王国一统意大利的野心，自愿脱下曾一度披上的枢机主教红衣，并在同时舍弃了终身的安定与荣誉，而这正是之后五百年间，史学界一直斥他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梅菲斯托菲勒斯[1]的理由。

然而对他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史学界，在维克多·雨果的戏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及多尼采蒂的同名歌剧中，我们了解到文学与音乐领域也是这般看待他的，甚至还有名为《波吉亚家的毒药》的电影被制作上映。

然而，梅菲斯托菲勒斯的魅力是不灭的。

就连伯特兰·罗素也曾说："遗憾的是，比起善良的人，我们从恶人身上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而切萨雷，在其生前却从来没为自己做过任何的辩解。他是一个极少述说自己的男人，唯有作为有效策略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恶行稍作解释。

切萨雷唾弃解释自己这种示弱行为，唯一一次将自己尚不成熟的野心借助历史典故示于人前的，便是这把宝剑。

略粗的银质剑柄上镀有一层金箔，雕金工艺与镶嵌其上的各色宝石，为它的美丽赋予了生命。剑柄顶端的剑首处理成了一个精致的镂空圆形金饰，在其中央有一颗小小的星星，那也许是一颗代表他自身的恒星。在剑柄与剑身之间，有两片各向左右弯曲的新月形护手，其正中镶嵌有一枚三角形碧绿色宝石，其上雕刻着代表他们波吉亚家族纹章的一头红色公牛，护手上还用银字刻有这样一句话：

"CES.BORG.CAR.VALENT"

（瓦伦西亚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

据此铭文我们可以得知，这把剑是在他担任枢机主教时期，也就是在他18岁到22岁期间制作完成的。

靠近护手一侧大约三分之一的剑身镀有金箔，宽阔的剑身正反两面均被一分为二，分别相应地雕有四幅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而这些图案与拉丁文字，也许就是根据切萨雷自己的希望所特别定制的。

正面的第一幅，描画着在布置好的祭坛上按照仪式被神化了的公牛，下面刻有"D.O.M.HOSTIA"（神是最崇高伟大的，在此献上牺牲[2]）。捧着献祭供品的纯洁少女们半裸身体，在公牛四周跳着华美的舞蹈，周围还刻有如下文字：

“CUM NUMINE CAESARIS OMEN”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可以被解释为，与通往恺撒伟大力量的前兆同在。切萨雷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拉丁语中的恺撒一词在意大利语中的读音，而根据剑身上体现出他与古罗马将军尤利乌斯·恺撒在名字上的共同之处，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恺撒大帝的后继者。

而第二幅图案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猜测，那上面雕刻着卢比孔河的渡口。

“IACTA EST ALEA”（骰子已经掷出了），其上还刻着尤利乌斯·恺撒留名青史的这句话。从以上两幅图案中，能看到他坚信力量必将带来胜利。

翻转剑身，我们能看到与正面图案中宣扬的力量获得胜利所不同，背面的这两幅强调的是，对在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生命之赞美。首先是其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恺撒的凯旋。在随风飘扬的军旗中，在为凯旋送上祝福的诸神中，加入了“FIDES”（信赖）。并且在下方刻有这样的文字：

“FIDES PRAEVALET ARMIS”

即，信赖远胜过武器。

最后的一幅图案，是由虎头海雕展翅环抱着的，安置于崩塌的圆柱之上的地球，圆柱下方有鹿横卧，因渐渐恢复和平的四周而欣喜，为表祝贺而翩翩起舞延展至图案的结束。

但是，只有着短短三十一年人生的切萨雷，还未走完正面第二幅图案便不幸去世了。那么接续其后，雕刻在剑身背面的那份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对生命的赞美，自然也就在与他无缘的情况下结束了。

[1] 梅菲斯托菲勒斯Mephistopheles），又译作梅菲斯特、梅菲斯、墨菲斯托，它的来源可能有两种，一是来源于古希伯来文，原意为“破坏者”“骗子”“恨恶光者”，一是源于希腊文，意为“不爱光的人”“不爱浮士德的人”。在19世纪歌德的歌剧作品《浮士德》（Faust，1832）中有提到梅菲斯托菲勒斯作为恶魔与魔术师之间的契约者，是引诱人类堕落的恶魔，自称为地狱之王路西法效忠。——译者注

[2] 牺牲：这里指古代祭祀或祭拜用品，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供盟誓牲畜均被称为牺牲。——译者注

第一部分
红衣（1492——1498）

15世纪末的意大利

第一章

正值夏日的傍晚，高塔在广场上投下了修长的黑色阴影。锡耶纳城的田园广场由十一条小路汇集而成，有如一条条河川最终汇聚成的湖泊。晚风穿过石板路，朝着广场中心吹来，为这个扇形的广场渐渐带来了一丝凉爽的气息。工匠与商人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为了晚饭前的片刻小憩，从各条小路上三三两两地聚集而来。

但是，广场上还有着尚未结束一天活动的人——几个年轻人还在跑着马。五天后的8月16日，将要召开由锡耶纳市主办的派力奥赛马节比赛。为了这比赛，这一天的广场从午后便一直回响着响亮的马蹄声。而且，最近两三天骑手们陆陆续续从意大利各处到达了此地，不只田园广场周围，就连锡耶纳全城都热闹兴奋了不少。在锡耶纳城，派力奥赛马节是一项历史悠久、年年例行不落的节日。

当然，对于意大利的君主和有名的贵族子弟们来说，这正是炫耀不惜花重金买来的骏马，以及测试自身马术的绝好机会。

“潘普洛纳！”

在练习终于快要结束的时候，人群中一人策马而出，围着广场快马飞驰，高呼着向年轻人奔去。打招呼的是佛罗伦萨大富豪普契家的次男，他呼唤的是终于放慢黑马脚步的年轻人，切萨雷·波吉亚。因为切萨雷担任着西班牙潘普洛纳地区的主教，在他求学的比萨大学同窗中，他便有潘普洛纳这个别名。

“已经差不多可以了吧，肚子都饿了。”

普契似是对这位爱马的朋友非常无奈，调侃着说道。切萨雷则以微笑回应，与他并排着策马同行。只身着浅灰色紧身裤和白色衬衫的切萨雷，晶莹的汗水从脖颈一直流到了胸前。年轻的两人边嬉笑着边往回走，突然，切萨雷提起“怎么没有看到美第奇家的马啊”，他口中的这位乔凡尼·德·美第奇也正是他们的同窗。伟大的洛伦佐家的次男所拥有的马，明明与自己的爱马一并被誉为优胜候补，今天却没有出现在广场上。

“那家伙可是枢机主教，现在一定在罗马呢。不过就算人在这里，那家伙也肯定是不会自己来骑马的。”

“他是胖子嘛。”

年轻的两人无所顾忌地玩笑着，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广场尽头，普契说着“明天见”便离去了。

剩下独自一人的切萨雷，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罗马这个词上。乔凡尼是为参加推选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才去的罗马。前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于十一天前逝世，至今尚未选出新任教皇。而想到罗马，便想到了当枢机主教的父亲罗德里格·波吉亚。

出了广场，骑着马正要进入银行上街的切萨雷，与要赶着进入广场的侍从碰上了，连同朋友米凯雷也在。侍从非常激动地交给他一封书信，说道：“主人，这是您在罗马的父亲大人的来信，快马加鞭刚刚送到的。”切萨雷顾不上下马便立刻打开了父亲的来信，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父亲熟悉且粗重有力的字迹，“致我亲爱的儿子，主教切萨雷阁下”，他从这行开始一口气读完了这封内容简洁的信。

“米凯罗特！”翻身下马的切萨雷对身旁的米凯雷·达·克雷利亚用的是惯常的爱称。和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切萨雷一样，同为西班牙人的米凯雷与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现在也同为比萨大学的同窗，两人的关

系既是主仆也是朋友，更有着胜似兄弟的深厚感情。切萨雷说，信上写的是作为枢机主教的父亲在今早被正式选为教皇，所以自己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尽快赶到罗马。之后他轻咳一声接着说："可惜不能再参加赛马了，苏丹是匹好马，我本来有绝对的自信能够获胜呢。所以米凯罗特，你骑苏丹去比赛吧。苏丹虽然不好驾驭，但你一定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虽然围着广场跑十圈才是终点，但到第二圈为止一定要跑到最前面。那匹马有些高傲，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跑，要是被其他马匹包围，就会生气地朝右边跑。"

切萨雷又接着提了好几点需要注意的事情给友人，且都是与马相关的，而他的朋友只是边微笑边默默地听着。

回到住处，满身汗水的切萨雷也没有休息，只披了外衣斗篷便又上了马。没听侍从夜路危险还是明早出发的劝谏，只是交代侍从明天跟上即可后，就奔出了锡耶纳的城门。

即使经过托斯卡纳的丘陵地区，他也没有停下，继续快马加鞭地赶路。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终于了悟这种能将自己燃烧殆尽的热情是因何而起，并为其找到了命定的方向。虽然此时心中尚不清楚这种感情的本质，但却明白它是因父亲即位教皇一事而生。而直到他了悟这种能将自己燃烧殆尽的热情缘由，并找到命定的方向，还是在几年之后。

黄昏时分，四周的景色犹如铺满黄金一般，闪烁着柔和的光芒，而切萨雷，正在这光芒中御马疾行。从锡耶纳到比萨，大约100公里的路程，骑快马不到五小时距离。当注意到丘陵对面林立的高塔就是圣吉米尼亚诺时，切萨雷突然感到了强烈的饥饿感。路程刚走了三分之一，夜幕已开始降临。笑着自己这突然而来的饥饿，他并未进入城镇，而是推开了路边小酒馆的门，那里平时以田间工作归来的农夫平民们为主要客源。

那是1492年夏天，切萨雷·波吉亚17岁生日前一个月的事情。五天

后，在去往罗马的路上，他接到了米凯罗特驾驭的苏丹在锡耶纳的赛马比赛中获胜的消息。

第二章

3月微风和煦，在特韦雷河[1]的河水都已渐暖的罗马，蔚蓝的天空也变得更加深邃。关于到达罗马后的切萨雷，我们能获得的最早史料就是在第二年，即1493年的这个春天。史料是摩德纳主教，即费拉拉公派遣的驻梵蒂冈大使乔凡尼·薄伽丘，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之间往来的书信。

这天，薄伽丘骑马穿过特韦雷河上的桥，向着教皇宫殿方向走去，但却并不是为了觐见教皇，他要去的是位于教皇宫殿与圣安杰洛城堡正中间的司铎殿[2]，切萨雷就住在那里。去年8月末，切萨雷被继任教皇的父亲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自那以来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大使及贵族们便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切萨雷不但是时下“神的代理人”（教皇）的儿子，且身负瓦伦西亚大主教之职，是西班牙裔高层神职人员中的一员，费拉拉大使薄伽丘也无法继续无视这位有势力的新人了。

但是，那一天的薄伽丘并没能与这位教皇的儿子会面。当他进入接待室时，即被管家告知今日的会见已结束，主人在准备外出了。从接待室往里面的房间望去，那里的几位客人也正在纷纷道别。薄伽丘不得不回去等待下次见面的机会。

正在准备走出玄关的时候，他遇见了迎面走来的切萨雷。薄伽丘甚至没能马上认出来。他所熟悉的切萨雷，是在正式场合身着朴素主教服的人，而那天的切萨雷却穿着俗世的服装。天蓝色紧身裤和天蓝色短上衣，从袖口处露出了白色花式衬衫，一袭紫色短斗篷，优雅包裹着17岁的切萨雷那富有活力的躯体。

走近跪地等待的薄伽丘，切萨雷对这位意大利强国之一费拉拉公国的大使尚有印象，对这位大主教边伸出手边说道：“我正要去打猎。”

于是两人并肩走下了玄关的石阶，切萨雷的马夫早已牵着马嚼子在那里恭候多时，年轻的瓦伦西亚大主教单手扶着马鞍就翻身上了马，随后示意薄伽丘也上马，途中可与他同行。

大主教与同为主教的薄伽丘大使边谈笑边朝特韦雷河的方向行去，清爽的微风从并排骑马走着的两人身旁吹过。在他们身后，当天同去狩猎的年轻人们，有说有笑地跟着，比切萨雷小一岁的弟弟甘迪亚公爵胡安也在其中。

大使薄伽丘把以上这些与切萨雷相处的事情，如实写给了主人埃尔科莱公爵，随后写道“通过瓦伦西亚大主教的言谈举止，能明显看出他是继承了君王血脉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生长环境与所接受的教育，更使他成为真正具有贵族精神的人物”。信的结尾处又写道：“但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与神职者比却又相去甚远。”

就如薄伽丘所记录的那样，切萨雷在罗马的生活，与其说是神职者，不如说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托父亲即位教皇的福，成为瓦伦西亚大主教的切萨雷，光年收入就增加到了16000达克特[3]。想过怎样的生活，全凭他的意愿。

那时候的切萨雷，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宗教以外的事情上。

首先是身体的锻炼。切萨雷把大主教必须履行的教会仪式义务缩减在最小范围，但对跑步、摔跤甚至是各种武艺，却犹如不知厌倦一般。对于那时肆意挥洒汗水，被同辈的年轻人所包围，有着明朗、年轻笑容的切萨雷，年代记作者卡塔内在记录中如此评价：“荷马式大笑[4]一般的人。”

其次，他的兴趣是打猎。虽然打猎也是能够锻炼身体的方法之一，但与之相比，他对打猎本身的关注则更接近疯狂。出色的马、威武的猎鹰、优秀的猎犬，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切萨雷灰色的眼眸更是闪烁出光芒。马要从当时有名的优良马匹产地曼托瓦选取，而为了寻求猎犬，甚至把自己的家仆派去德国。切萨雷常常兴奋地对当教皇的父亲叙说自己所拥有的宝马良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则颤抖着肥硕的身体边听边笑。

罗马近郊凡是能称为原野的地方，没有一处能逃过切萨雷的马蹄。瞄向被猎犬逐出的猎物，他那从飞奔的马背上射出的箭，精准地命中逃窜的目标。惊恐的动物也都屈服于猎鹰那王者似的威猛之下。切萨雷骨子里带着绝不甘人后的本性，就算是狩猎，他也从没有输给过同行的任何一个人。日日过着这种太阳下的生活，就连冬季皮肤也晒成古铜色的切萨雷，被前面提到的薄伽丘评价为“giocondo”（享乐主义）。

另一项他极为热衷的爱好就是对周身穿戴的研究。他非常用心地挑选衣服、武器和宝石，总是率先追求当时的流行，并拿来作为参考，还会自己花心思来创新。

那时候，使罗马更添异教色彩的是土耳其王子杰姆的存在。这位年轻的土耳其王子，是1453年率军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父亲死后因继承权争斗输给了哥哥巴耶塞特，从君士坦丁堡逃到虽然距离最近但已变成基督教国度的罗德岛。罗德岛的掌权者是由十字军衍变成的圣约翰骑士团，最初他们大喜过望，想不到这种重要人物竟然会自投罗网。但随后发生了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新苏丹巴耶塞特为了让对方留下弟弟杰姆，答应每年支付4万达克特。条件则是由接管方将弟弟杰姆保护起来，且让他有生之年不得回到土耳其帝国。从那时起，这位流亡的年轻王子便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法兰西国王、匈牙利国王、那波利国王、威尼斯共和国还有罗马教廷，都盯上了杰姆的年金和作为人质的价值，为了将其得到手而相互

争夺。杰姆第一个流亡目的地的圣约翰骑士团，其成立经过与现状都与罗马教会有着很深的渊源，故而罗马教廷在前教皇英诺森八世时，得以如愿以偿地接管了这名人质。于是王子杰姆就这样留在了罗马，居住在教皇宫殿中。虽说是人质，待遇却完全没有人质般的不快。这位土耳其王子，在这对他来说犹如异教大本营的罗马，又是打猎又是演奏音乐，也不愁上等的美酒食物，还可以自由地找女人来服侍。如此这般的日子，在切萨雷到罗马之前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

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哥哥巴耶塞特，一边完全按约定给教皇支付着年金，一边不得不效仿基督教徒那样采取慈悲宽大的方式对待弟弟杰姆这个反叛者。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中留存着这样一封让人发笑的信。这封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写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是用拉丁语写的：

土耳其王子杰姆

“土耳其帝国苏丹，长久以来，念及作为人质的可怜弟弟的境遇，总是颇为烦恼伤感。日日苦思如何能于此境地中将其拯救，最终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将杰姆从尘世间的各种苦难中解脱出来，平安地送往天国，才能彻底救赎他的灵魂。若教皇愿协助达成心愿，将会赠予30万达克特作为谢礼。”

收到这封信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想必也忍不住笑了。但是教皇并没有如土耳其苏丹所愿，让王子杰姆从世间苦难中解脱出来。

究其原因，亚历山大六世对人质的利用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如果说保留人质是为了牵制敌人，那么一般人们只会想到敌人进攻时，以人质来要挟敌人。而他考虑的则是，一旦土耳其苏丹有侵略基督教国家的举动，就让杰姆从罗马率大军攻去君士坦丁堡。他十分清楚，现在的土耳其宫廷内部，尚有不少家臣对前苏丹之子杰姆心有所向。

这位亚历山大六世的外交手腕，对继承伟大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遗志、努力实现土耳其帝国统一的现苏丹巴耶塞特的侵略欲望，还是有着几分牵制作用。经过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已有几人意识到了十字军远征行为的愚蠢，首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后就是这位亚历山大六世，他是首位提出与异教共存的罗马教皇。但在仍有大量狂热信徒盲信于派遣十字军的这个时代，站在教皇的立场上，他的这个想法绝不能公然地表示出来。

杰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究竟与何种策略相关联着，虽然他在罗马生活得很自在，但常年的异乡生活也难免使他染上了一丝忧郁。在王子杰姆周围散发着充满东方风情、慵懒惬意的异教氛围，对喜好新鲜事物的罗马上流子弟们来说有极大的魅力。他们争相穿上了土耳其风的服装，教皇的儿子们也没有例外。在教皇宫殿内“波吉亚的房间”中，挂着由平托瑞丘亲笔绘画的波吉亚家族众人的肖像画，其中胡安就穿着土耳其风服装。切萨雷也紧跟这个潮流，当时的记录显示，就连在正式的宴会上，他也是以卷着白色头巾的土耳其风格服饰出席，这让那些从阿尔

卑斯以北各国到访的笃信基督的人非常反感。

切萨雷自父亲即位教皇后，便从大学退学了。但是有博洛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父亲在前，他还是特意请求当时在比萨大学有很大权势的美第奇家当家皮耶罗，将大学时代的两位恩师派到罗马来。然而到了罗马，令两位教授困扰的是，他们想要给切萨雷教授神学，弟子却只对体育和狩猎很上心，对神学连看都不看。尽管如此，他们的罗马之行也不是无果而终的。因为对弟子切萨雷的尽心尽力，教授们后来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

切萨雷虽对年轻人喜好的各种事物都抱有兴趣，但唯独对神学毫无兴趣。这时候的他，被曼托瓦大使形容为“想要成事，但却没有相应的头脑”，被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恶评为“没有学问、艺术素养的无脑男人”。

---

[1] 特韦雷河Fiume Tevere）：英文通常音译为台伯河（Tiber River），是仅次于波河和阿迪杰河的意大利第三长河，源出亚平宁山脉富默奥洛山（Fumaiolo）西坡，向南穿过一系列山峡和宽谷，流经罗马后，于奥斯提亚（Ostia）附近注入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译者注

[2] 司铎殿Palazzo dei Penitenzieri），原称德拉罗韦雷宫（Palazzo Della Rovere），1480年由罗韦雷家族中的红衣主教多梅尼科·德拉·罗韦雷（Domenico della Rovere）兴建。1492年亚历山大六世贿选即位，欲阴谋杀害反对他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后德拉罗韦雷宫归于亚历山大六世，改名司铎殿，因切萨雷的母亲瓦诺莎·卡塔内（Vannozza dei Cattanei）在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情妇生下切萨雷之前，曾是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的情妇，推测改名约是出于此由。——译者注

[3] 达克特：当时欧洲通——译者注

[4] 荷马式大笑：源出《荷马史诗》中所写的诸神豪放爽——译者注

第三章

罗马的夏日，毒辣的阳光照在建筑物的石墙上，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到了这个季节，切萨雷的生活也渐渐变得像点模样了。在驻梵蒂冈大使的通信、年代记和记录中，他的名字出现次数也增多了。随着亚历山大六世迎来教皇即位一周年，即将要发挥老练政治手腕之际，切萨雷也一改往日华丽放浪的罗马社交界新人形象，开始将自己作为教皇第一亲信来行事。所有人都有所察觉，教皇在对这个儿子的事情上一定有着自己的打算，但没有人能预测出教皇的意图。在众人的密切关注中，切萨雷出席正式仪式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

5月5日，与教皇共同出席在人民圣母教堂举行的弥撒。在从梵蒂冈出发到教堂的队列里，紧跟在教皇的身后。

6月12日，出席妹妹卢克雷齐娅与佩萨罗伯爵乔瓦尼·斯福尔扎的结婚仪式。

3日后，由弟弟甘迪亚公爵胡安与妹夫佩萨罗伯爵相伴两侧，骑马出城迎接到达罗马的西班牙王特使迪亚哥·洛佩慈·德·哈罗威进城。

像这样，切萨雷在宗教活动、政治外交的舞台上，经常伴在教皇父亲的身边，详尽学习父亲老练的政治家处事方法。62岁的教皇将带在身旁的17岁儿子以大主教的身份介绍给各国要人，并将他们呈上来的政治公文交给他翻阅。有教皇对儿子切萨雷的如此待遇在前，所有人都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早在3月，曼托瓦大使普洛尼罗给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信中就写道：“瓦伦西亚大主教恐怕要穿上红衣的事情，在这边已经都传开了。”数月后费拉拉大使薄伽丘也就相同的情况写信给

费拉拉公爵。

红衣，是代指枢机主教。红衣和红色的帽子，被称为“教会的君主们”，是在罗马天主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们的代名词，就如同三重冠代表教皇，紫衣则代表皇帝一样。

不过，没有人把这则传言当过真，教皇要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的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就算是在枢机院之中，也没有一个枢机主教直接提起过这个传言。

在天主教教义中，想要将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每一个出生的孩子，教义只认可由神圣结合所出生的嫡子，这之外的关系，都是恶魔行径，而之后出生的孩子，只能当作恶魔作为的结果。若是让这“结果”成为训导善良基督教徒的枢机主教，教会就有大麻烦了，而若只是安插在大主教以下的职位，在当时实力至上主义的背景下，还是可以被默认的。在拥有实力且严守天主教教义的俗世君主中，也存在庶子出身而获得王位的人，如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塞浦路斯王雅克等人。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也是，上一代博尔索公爵即是庶出。

而第二个问题是下面这点，天主教教义不允许圣职者娶妻。这不只是为了让信仰生活更完美，同时也有防止教会财产流失的考虑，因此不论怎样，圣职者都是不被允许有所谓的神圣结合。所以切萨雷对罗德里格·波吉亚来说虽然是嫡子，但对亚历山大六世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来说只是恶魔作为的结果。因为他是精神上治理善良基督教徒的“神在现世的代理人”——教皇。

这位“现世神”教皇通过恶魔行为获得了孩子，而这孩子若是在教会中获得拥有即位教皇资格的枢机主教地位，将会令天主教颜面扫地。

所以，虽然历代教皇都育有子嗣，且孩子们能得到“亲族主义”的待

遇，但却当不上枢机主教，能当上枢机主教的最多也就是侄子们。庶子出身最终当上教皇的只有克莱门特七世。他是因帕齐的阴谋在娶妻前便遇害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庶子，父亲死后便被朱利亚诺的哥哥“伟大的洛伦佐”收养入籍，正式成为嫡子。日后他借助法定的兄长、实为堂兄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力量成为枢机主教，再作为克莱门特七世即位教皇。

从这些事情看来，没有人会相信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的传言。

但是，亚历山大在世界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25岁便获得哲学、神学、教会法等学位，被美誉为建校以来难得一见的才子，学识渊博，任职仅次于教皇的副教宗一职达三十四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亚历山大六世比任何人都清楚天主教会为何物。

9月19日，教皇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当着被召集来的枢机主教们的面，他发表了一份教皇诏书，要求枢机主教们认可。

“瓦伦西亚大主教是公正婚姻所生的嫡子。父亲是多明尼柯·达利纳诺，母亲是瓦诺莎·卡塔内。两人一同在此证明。”

没有一个枢机主教不知道瓦诺莎·卡塔内这个名字。她作为教皇波吉亚十几年来的情人，生育了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四个孩子。而名义上的父亲达利纳诺是她曾经的丈夫。对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枢机主教们现在连怀疑的余地都没有，就在他们眼前成了现实。且不说枢机主教会议中的五分之二已经归于教皇波吉亚的势力下，单就这份诏书来说，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教皇一句也没有提让切萨雷当枢机主教的话。枢机主教会议最终以赞成者起立的投票方式通过了这份诏书。然而在同一天，教皇通过秘密文书的方式发布了另一份教皇诏书。其内容如下：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证实，瓦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波吉亚是自己担

任圣罗马教会副教宗、阿尔巴诺主教时，同有夫之妇于1475年9月14日所生的孩子。”

另一边，被轻易利用为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之事做嫁衣的反教皇派枢机主教们，不想对此保持沉默。但是，对于没有各自出身国后援的他们来说，力量尚且不足，而教皇也没有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第二天，也就是9月20日，教皇再次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并发表了十三位新任命的枢机主教的名单。人名被一一读出，其中出现了刚满15岁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和教皇现情人茱莉亚的弟弟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的名字。最后，瓦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的名字也被念了出来。

枢机主教们哑然地相互对望，随即也意识到他们被剥夺了全部反对的机会和理由。

教皇通过下面两点方法便完全封住了他们的嘴。

第一点，将新任枢机主教均等地分配给各列强，没有给予分配的只有那波利王国。

佩劳德……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古罗拉尔……法兰西王国

卡鲁巴加鲁……西班牙王国

摩顿……英吉利王国

格利玛尼……威尼斯共和国

鲁纳特……米兰公国

法尔内塞、切萨利尼……罗马

埃斯特……费拉拉公国

克什米尔……匈牙利、波兰共和国

以上这些成员再加上切萨雷等另外三位枢机主教。这样一来，那些总想按自己意愿利用罗马教会的列强君主，便可通过掌控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枢机主教职位，扩张在罗马教会内部的势力，对于如此的变动他们当然毫无怨言。

第二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所选的新任枢机主教都是在学识、人格、才能全方面优秀的人才。格利玛尼作为神学者已在后世留名，圣乔治则以法学大家而闻名，佩劳德、鲁纳特作为拉丁文学者都被各自的君主所重用，甚至15岁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也在之后展现了非凡的才能。而被认为仗着是教皇情人弟弟的身份才当上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后来则作为保禄三世成为教皇。当时对波吉亚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和年代记作者们，就上演的这场新枢机主教任命闹剧的意图表示批判，但对其结果却不得不表示肯定。

就这样，刚刚18岁的切萨雷终于穿上了红衣，成为“教会的君主”。因为他同时继续任职瓦伦西亚大主教，今后的切萨雷便是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用意大利语被通称为“红衣情人”。结束枢机主教认证仪式，从中走出来的切萨雷，被佛罗伦萨大使达·克雷评价为：“本该气宇轩昂的枢机主教，却欠缺庄重感。要说的话，就是太不成体统了。”

但是，被认为太过年轻的切萨雷也渐渐明白了政治的奥妙。他注意到，教皇先前的新枢机主教任命，并不只是单纯地想将作为儿子的自己强行升任枢机主教，更是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西班牙出身。年轻的时候，罗德里格·波吉亚被即位教皇的叔叔加里斯都三世招来意大利，虽说这之后一直在意大利成长，教皇的出生国家也还是西班牙。直到20世纪的今天，罗马教皇厅在他之后也就只有阿德里安六世一位外国人教皇。由意大利人之外的外国人成为教皇，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教皇波吉亚只亲近西班牙出身的人，不只会让意大利人枢机主教们反感，更会招来欧洲其他各国的集中刁难。

而且，为削弱在波吉亚被选为教皇时从中协助过他的阿斯卡尼奥·

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因选举一败涂地而更加反对波吉亚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的力量——这两位分别有米兰公国、那波利王国支持，并确保和增强波吉亚教皇的独立性，教皇被赋予的任命枢机主教权是有效的武器，通过任命对自己效忠的新任枢机主教来实质性地削弱旧势力。

马基雅维利就波吉亚教皇如下写道：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唯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能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做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这一方面。”（《君主论》[1]）

但即使被马基雅维利评价为“在历代教皇当中，最能充分证明教皇拥有了金钱与武力，究竟能够发挥多大力量”的亚历山大六世，要实现这点，也不得不等待儿子切萨雷的成长。切萨雷不关心教皇父亲的期待以及各列强君主和支配者的看法，身着红色法衣也任其在风中翻飞，恣意潇洒。不喜佩戴枢机主教另一个代表物红色帽子的他，却倾心于身披红色斗篷。这也许是因为斗篷会让他产生变成了古代罗马将军的错觉。

---

[1] 译文参见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君主——译者注

第四章

“悲惨时代的第一年。”这是史学家圭恰迪尼在后来回顾1494年时所说的话。

中世纪末期，欧洲的局势风起云涌。随着自由城邦这种独立形态的发展，使工商业极度繁盛，从中获得的巨大财富绽放了绚烂的文艺复兴之花，而由此君临欧洲的意大利，也随着历史的洪流毫不例外地遇到了如何建立专制统一国家政体的这道难题。早在这之前，意大利各地的小国便有被并吞入强国的情况，但对于被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等各列强以及罗马教皇厅所分裂的意大利来说，国家一统的道路还很漫长。

与此相反，一直以来被意大利人蔑称为乡下人的法兰西、德意志与西班牙，则通过确立各自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进而掌握实力，扩张领土的野心使其谋划到了内部小国纷争不断的意大利头上。而这之外更不容忽视的威胁，则来自势力已扩张至东地中海的土耳其帝国。

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前半叶，意大利被迫着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方式。但也正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诞生了文艺复兴的两大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

然而，悲惨的时代也好，混乱的世纪也罢，在此出生的人们，最终也只得在其中生活下去，切萨雷·波吉亚也不例外。正是在此时，红袍加身、攀升到能继承教皇地位的他，在心中渐渐产生了无法安于现状的念头。法兰西军于1494年，即圭恰迪尼所说的“悲惨时代的第一年”，入侵了意大利，这件大事使刚满19岁的切萨雷首次直面动荡的现实。他在

那时，第一次学到真正的学问，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

被众多的历史学家称为意大利近代起点的这次法兰西军入侵事件，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说，是摩尔人[1]也就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策略所致。也有人说，是因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功利心所致。还有人认为，是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对教皇波吉亚的仇视心理造成的。虽说以上哪个说法都没错，但真正的原因，则是以上三种原因杂糅在一起发酵而成的后果。

斯福尔扎家兴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位能力卓越的佣兵统领、睿智的国家君主，他成功地获得了米兰公国的统治者地位。在他故后，其子加莱亚佐·马里亚在位时遭暗杀，留下了小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执政，其伯父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摄政。然而这位别称为摩尔人的米兰公国的实权掌握者，并不满足于屈居摄政之位。他同弟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一起，等待从侄子手里谋夺公爵爵位的机会。凭借多年的摄政实绩，比起吉安加莱亚佐公爵，米兰民心更倾向于他这一方。可以说在米兰公国内部已不会对他构成阻碍。问题出在那波利王的态度上，他的女儿下嫁的正是吉安加莱亚佐公爵，自然不会让摩尔人的这一阴谋得逞。于是，摩尔人便把目光锁定在了主张拥有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身上，想要利用这个法兰西人去搞垮那波利的阿拉贡王家。

那么，说到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边。犹如中世纪骑士传说读多了的这位国王大人，一心想要效仿查理大帝[2]的伟业，而他效仿的方式便是外国远征。他主张那波利王国的王位继承权应由安茹家后世子孙中的一人，也就是他自己所拥有。而第三个原因，关于罗韦雷枢机主教的事情则稍后再说。总之，掌握了这些导火索的法兰西军，一直在等待着入侵意大利的时机。而后，这个时机终于来临了。

1494年1月25日，被世人所熟知的老练的政治家那波利王费迪南多

逝世，王位理应由嫡出的王子阿方索二世来继承。早在上一任教皇英诺森八世时期，罗马教会便已认可了当时是卡拉布里亚公爵的他继承王位。但是，法兰西国王从中加以干涉，声称只有法兰西国王才拥有王位继承权。这位法兰西国王的抗议，与其说是针对那波利，不如说是针对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的一方，即拥有新王任命权力的罗马教皇。教皇如果认可阿方索，法兰西就将入侵意大利，这便是查理八世发给教皇的威胁。

但是，教皇主意已定，完全没顾虑过法兰西人会不会真打进那波利。4月18日，教皇任命蒙特利尔枢机主教即自己的侄子乔凡尼·波吉亚为教皇特使，出席那波利国王的加冕仪式。驻罗马的法兰西大使知道此事后十分震惊，亲法派的枢机主教们则强迫教皇召开枢机主教会议，这一日的会议持续了八个小时。斯福尔扎、鲁纳特、圣塞维里诺、科隆纳、萨韦利等枢机主教们，接连不断地就承认那波利王的危险性激烈追问教皇。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作为众所周知的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幕后老大，却一直待在奥斯提亚的城堡里，并未出席枢机主教会议。

但是教皇的想法并未改变。长达八小时的枢机主教会议结束后，他马上发表了面向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君主的诏书，承认阿方索二世为那波利国王。紧接着，公布以前由那波利提出，阿方索庶出的公主桑夏同教皇小儿子杰弗里之间的联姻也已正式敲定。罗马与那波利的这次结亲彻底激怒了法兰西国王。

之后的4月24日，发生了枢机主教罗韦雷逃亡事件。一直是那波利派的罗韦雷，为了打倒波吉亚，甚至不惜舍弃那波利王，转与法兰西国王勾结，然而煽动枢机主教们的策略却以失败告终。罗韦雷深知，教皇已看穿他与法兰西国王间的关系，必定不会再批给他枢机主教离开罗马所需的许可，便依靠逃亡成功离开了罗马。到达热那亚的他，通过摩尔人的援助进入法兰西，在阿维尼翁与查理重新取得联系，在里昂同查理会面。罗韦雷向查理再三强调应该召开新的宗教会议，通过会议，逼迫

靠贿选成为教皇的波吉亚退位。而法兰西国王查理看到这个提案能让自己成为宗教改革者，他的名利心使他蠢蠢欲动。自此，罗韦雷枢机主教、摩尔人、查理八世三人的作战行动正式开始。摩尔人与查理两人先前的目标还只是那波利王国，通过罗韦雷的加入，矛头完全转向了罗马。

查理八世

另一方面，罗马的亚历山大六世得知罗韦雷枢机主教逃亡的消息，感到事态在渐渐恶化，但是事后去追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他将罗韦雷逃走后留下的奥斯提亚城送给了奥尔西尼一族，并令其占领城市。对于教皇来说，掌控奥斯提亚城至关重要，因为这座城市能确保罗马到那波利间的海路畅通。两周后，教皇特使蒙特利尔枢机主教，便经由位于特韦雷河口的奥斯提亚城抵达那波利，为阿方索二世举行了加冕仪式。数日后，13岁的杰弗里与15岁的桑夏也完婚了。

查理八世开始在格勒诺布尔集结士兵的传闻，越过阿尔卑斯转瞬间传遍了意大利全境。因传闻而紧张起来的意大利诸国，紧跟着便不得不迎接查理的使节。不只是意大利，连欧洲列强也接连收到了查理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征服那波利王国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作为十字军远征的基地，用于夺回置于异教徒之下的圣地耶路撒冷。”

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这个理由，除了当时以狂热信仰的宗教政治支配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萨伏纳罗拉和他这一派的少数人以外。

紧接着，法兰西要求意大利诸国对法国的意图进行协助，包括领土通过的允许，与兵力、资材的提供。对这位国王的要求，米兰公国自不必说，将女儿嫁给摩尔人的费拉拉公国的埃尔科莱公爵与曼托瓦侯爵也约定全面协助。东地中海地区，只顾得上防御土耳其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只能默许查理的行为。伟大的洛伦佐死后，被美第奇家与萨伏纳罗拉一派的争斗搞得社会动荡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成了连态度都无法决定的状态。尚未开战，意大利等同于已在查理面前敞开了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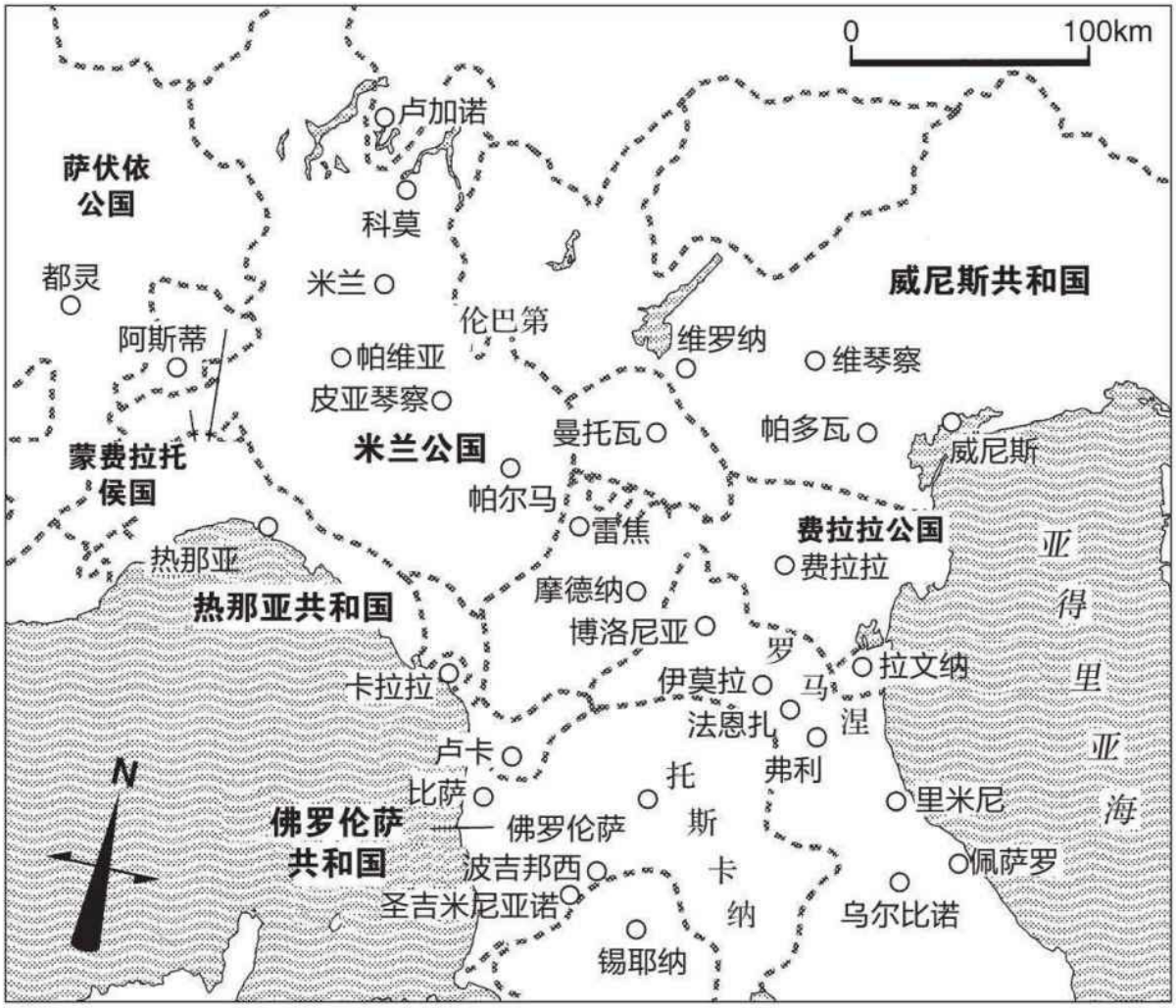
罗马教皇厅也接见了查理的使节。查理对教皇仅要求其承认自己的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并在强调这是十字军远征的第一步的前提下，还记得追加要求——暂时让渡土耳其王子杰姆的看管权。如果教皇拒绝这些要求，法兰西国王将召开宗教会议，以逼迫教皇退位。这已经是十足的

威胁了。

教皇对现在还沉醉在十字军远征梦想中的查理十分无奈，但是这个笨蛋却拥有力量。在没有实力的时候，只能使用政治技巧作为对抗的手段。而所谓政治技巧，在此时，即是没有实力的人为了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力量而使用的方法。

教皇在没有给查理使节以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将其糊弄回去后，7月14日同那波利国王会面。然而，在绝望的防御战中全力抵抗的那波利，回复说已无暇为罗马防御出力了。而为了请求军事援助，教皇又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派去了使节，所带回的答复也没有任何能让教皇安心的地方。费迪南多国王的回答是没有理由反对查理的十字军构想，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因为前些年同斯福尔扎家族中的女子结婚，所以与摩尔人很亲近。就连在意大利的诸国中，唯一一个足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立场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向教皇递交了认可查理行动的声明。对于收到这些消息的教皇来说，所剩下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那便是拖延时间，至少到阿尔卑斯降雪的时候。

但是，查理是急性子。8月23日，法兰西军终于向着格勒诺布尔出发了。9月3日，翻过阿尔卑斯进入萨伏依公国领土。9月5日，进入都灵城。9月末，总人数9万的大军进入了阿斯蒂。查理在这里受到了摩尔人及其妻子贝亚特丽切的欢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也出席了。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从此地开始伴查理同行。10月14日，到达帕维亚。再四天后，查理进入了皮亚琴察。在这期间，通过奥尔良公爵路易得到了那波利海军在拉帕洛战败的汇报。在那之后又接到了被软禁在帕维亚的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的死讯，一直等待这个时刻到来的摩尔人，匆忙回了米兰，至此，他想成为米兰公爵的野心终于实现了。



15世纪末的意大利北部

在皮亚琴察，查理接受了教皇派来的特使的访问。主要内容是表示可以重新考虑查理提出的十字军远征计划，希望他改变征服那波利的想法。查理虽然拒绝此请求，但却对特使表示希望与罗马教皇一同出席当年的基督诞辰祭。

教皇不得不想办法对付这位麻烦的巡礼者，他对全体枢机主教发出了罗马的召集令，不听命前来的人将被剥夺圣职。然而，依然是无果而终。罗韦雷一如既往在查理身边暗中活动，将查理的意图示意给枢机主教们，让他们不要遵从教皇，而要遵从枢机主教领袖[3]的阿斯卡尼奥·

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斯福尔扎、罗韦雷两位枢机主教的背后有法兰西大军做后盾，至此，非亲法派的枢机主教们开始动摇了。

更让教皇陷入窘境的，是科隆纳家的军队夺取了奥斯提亚城。9月18日，占领这处要地的科隆纳军队在城中升起了法兰西的国旗，自此切断了那波利与罗马的关系。

意大利人战战兢兢地迎接穿过伦巴第进入罗马涅区域的法兰西军。总人数9万的大军，尽管加入了瑞士士兵、加斯科尼人和德意志士兵等不同国籍的佣兵，也还是被统一在法兰西国王意志下的军队。与意大利人见惯了的、为金钱所驱使的小规模佣兵队完全不同。

那么，指挥如此大军的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所有人都抱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的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查理八世容貌的记载。记载显示，这位22岁的年轻国王，个子矮小、体格瘦弱，大脑袋与又短又细的腿很不协调，他骑马前行的画像显得非常滑稽。

“威尼斯大使科塔里尼写道：法兰西国王相貌丑陋。脸是扭曲的，两只大眼睛斜视着，无法判断到底是在看哪里。下垂的鼻子特别大，厚厚的嘴唇总是半张着。同人说话时，还有随意抖动身体和晃动脑袋的习惯。”

对于生来便崇尚威武、赞颂人体古典美的意大利来说，无论怎样的小国家，像查理一样的君主都不可能保持这个地位，更何况他还沉醉在骑士传说和十字军远征的理想中。然而，这个丑陋的小男人，如今却将对自己的才能颇感自豪的意大利君主们置于脚下。这是为什么？意大利人用自身的牺牲，得出了这个疑问的答案。

11月，在罗马涅，又传出了那波利军被法兰西军击退的报告。而当月的第一天，在佛罗伦萨，面对恐慌的民众，萨伏纳罗拉的说教点燃了火焰。

“这才是神降下的宝剑，预言已经应验，挥下的皮鞭，这正是神所降下的愤怒的试练。”

美第奇家的地位，在多明我派僧侣的面前动摇了。11月9日，佛罗伦萨市民蜂拥而起，城中响彻“人民！自由！降下球（美第奇家纹章）！”的叫喊声。美第奇当家皮耶罗与弟弟乔凡尼枢机主教，变装后逃出了城。激动的民众冲入美第奇家的宅邸，抢夺艺术品与贵重物品。

在罗马，教皇的处境愈发窘迫，与法兰西军相呼应的科隆纳、萨韦利的豪族也一直在蠢蠢欲动。

11月8日，查理进入卢卡城。在此等候的教皇特使皮科洛米尼枢机主教请求觐见却遭到了回绝，只得到了国王的传话：“期待在永恒之城与教皇见面。”

11月9日，查理进入比萨城。国王在此同萨伏纳罗拉会面。萨伏纳罗拉称呼查理为“基督教徒之王”，赞美国王是神为了解放意大利和改革教会而选中的人。美第奇也将托斯卡纳各地的城堡献给了查理。如此逢迎拍马的意大利人，令法兰西军自己都感到吃惊。

11月17日，查理进入佛罗伦萨城。佛罗伦萨的民众向着入城的国王欢呼：“法兰西，万岁！”在此，查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者，要求此后每年要上供12万盾[4]年金。

15世纪末的意大利中部

11月22日，查理面向全体基督教徒们发布了宣言。内容为以下两点：第一，征服那波利之后，将进行十字军远征。第二，责令不当其位的教皇波吉亚退位，并将召开宗教会议以选出新任教皇。

召开宗教会议，对教皇波吉亚来说是一种威胁。他能即位教皇，是通过收买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一派才成功的，因为触及了被严令禁止的“神职买卖”，他极力想要回避宗教会议。他拜托与法兰西王关系较近的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在两人之间调停。就连枢机主教提出的将切萨雷作为人质交给科隆纳的这一条件，教皇都已接受。切萨雷被当作人质，送

到了聚集在罗马南部的科隆纳一党的大本营。然而，真正的幕后之人则是一心反对波吉亚的罗韦雷枢机主教，斯福尔扎的调停只得以不成功收场。

11月28日，查理从佛罗伦萨出发，12月2日，进入锡耶纳城。在这里，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皮科洛米尼总算得以与国王会面，但是却没有效果。查理只单方面地口出狂言，要求打开罗马的城门，否则便要武力进城。

在罗马的教皇，因全部的对策都失败了，而一时陷入了回天乏术的绝望中。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圣塞维里诺、鲁纳特等枢机主教们认为，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和法兰西大使关在圣安杰洛城堡，并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收到法兰西国王的强硬抗议后，教皇只得将他们释放。与此同时，查理的大军已经快来到这附近了。

12月10日，为保卫罗马而来的那波利军到达了罗马，但也仅有五千步兵，千余骑兵。保护罗马的只有他们和奥尔西尼一党，但是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奥尔西尼。

在同一天，查理进入维泰博城，还是一如既往地兵不血刃。就这样，罗马教皇厅的领土接连不断地为查理的前进方向敞开了道路。

所有人都预想到了罗马的命运，民众争先恐后地逃走，各国大使也都接到了本国发来的保护本国在住居民的命令。

那波利王阿方索建议教皇逃离罗马，并以年金5万达克特为条件承诺在加埃塔的城市要塞中保护他。然而教皇拒绝了这个提议。人们接连几日都看到，被任命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们骑着马从圣伯多禄广场跑过，身后扬起白色的沙尘。被任命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有斯福尔扎、圣塞维里诺、佩罗、皮科洛米尼等等，全部都是亲法派的枢机主教。

12月17日，法兰西军进入奇维塔韦基亚。翌日，为了预防万一，整个梵蒂冈的仆人们从早上开始便匆忙将贵重物品转移保管，枢机主教们的马匹也都整备完善以随时待发。第三天，即12月19日，在蒙特马瑞奥的丘陵上首次出现了法兰西士兵的身影。骑马在山丘上来回走动，向梵蒂冈方向张望的小队的身影，从教皇的房间也能看得很清楚。罗马的人们，被抛到了恐怖的最底层，教皇要从罗马逃跑了的谣言也四散开来。确实，到了23日，教皇好像也首次倾向于逃亡的意见，逃去威尼斯是当时的主流意见。然而，与其说教皇是在逃向西班牙还是威尼斯间犹豫不决，不如说是逃亡本身已经不能成行了。海路被盘踞在奥斯提亚的科隆纳势力所阻断，陆路上包围罗马的法兰西军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维泰博到奇维塔韦基亚，再到布拉恰诺，稳步前进的法兰西军大部队，距罗马仅有70公里远。查理于此向教皇派出了使节。

“罗马市内的那波利军队即刻从罗马撤退，并为此准备相关的通行许可证。如果拒绝条件，就请做好不惜让法兰西军在罗马市内战斗的准备。”

在身负这份通告的使节向罗马出发的同时，以往以那波利王名义服役，侍奉于教皇身边的奥尔西尼一党，正向查理表示恭顺。

12月24日，迎接查理的来使后，梵蒂冈的恐怖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罗马的市民代表请求会见教皇，表态施压：

“两日之内，如果不能与法兰西国王达成一致协议，我们就打算打开罗马的城门迎接国王了。”

接见过法兰西使节与罗马市民代表后，亚历山大六世便遣散了他人。在教皇宫的回廊里，教皇独自一人抱臂而立，一袭白色长袍被冬日的晚霞染至绯红。望着一动不动的教皇的沉重背影，有所顾虑而一直并未靠近的近侍们，现在也不得不上前告知教皇，法兰西国王使节要求再

次会面。教皇拿到了国王发来的书信，上面如是写道：

“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请将罗马所有的城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只是要求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没有一丝对教皇或者教会不利的想法。”

读完这封信后，教皇许久未发一言。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教皇下达了命令，传唤那波利军的队长觐见。教皇当面向这位队长下令，命其将那波利军撤出罗马，不过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请求更为贴切。立刻察觉到教皇这个命令真意的队长，用激动的口吻说道：

“您是要舍弃那波利了吗？”

然而教皇却没有一句辩解，队长因愤怒颤抖着退下了。

这之后，教皇给国王写了回复。在国王所有要求之中，承诺打开罗马城门，让那波利军从罗马撤退，并授予法兰西军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这几项。而就十字军远征、交出王子杰姆和召开宗教会议这几项，则丝毫未涉及。教皇让使节拿着这回信，回到法兰西国王的驻地。随后再次释放了关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条件只有一个，返还作为人质待在科隆纳军队中的切萨雷。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教皇留下切萨雷一旦回来就马上通知他的命令后，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当晚，那波利军离开了罗马。

痛苦的基督教诞辰祭总算过去了。

从翌日开始，梵蒂冈突然开始忙碌了。不只为了准备法兰西王的迎接仪式和选择接待的人员，让查理住在哪里也成了大问题。罗韦雷、斯福尔扎两位枢机主教主张让查理住在教皇宫中，而对此感到困扰的梵蒂冈一方，不得不尽早决定哪里才是最合适的场所。秘书官们就此向教皇寻求建议的行为，让教皇很是生气。

他说道："你们这些人让我的脑子都乱了。你们随便决定让那些法兰西人住在哪里吧！"

法兰西王的住所选定在了圣马可宫殿（现在的威尼斯宫殿）。并反复向查理强调不要让军队进入梵蒂冈特韦雷河以西的区域。

27日，法兰西军的先锋部队开始进入罗马。

1494年12月31日是查理进入罗马城的日子。这天的早上，教皇厅的庶务官员、留下了诸多详细记录的年代记作者、德意志人——布鲁卡鲁多，为商榷仪式等各方面事项，被教皇派遣到国王身边。这一天在他的记录里是这么记载的：

"国王表示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罗马。并且在3公里的这段距离里，我被安排一直跟在国王的身后行进。他在这期间不断地向我提问，诸如面对教皇应该采取怎样的礼仪，如何接触切萨雷枢机主教比较合适等。"

法兰西军是从下午三点开始进入罗马，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国王从人民大门入城是在七点的时候。在大门前，有罗马市民的代表上前迎接，并为国王献上了罗马全市所有城门的钥匙。

行进的第一方阵，是从瑞士和德意志的步兵开始的。随后紧接着的是五千的加斯科尼人的弓箭手。再之后是五千人的法兰西骑士一个团，各自都带着三名侍从。在他们后面的，是被六百人的亲卫队包围着的、骑马前进的国王。国王查理后面紧跟着罗韦雷和斯福尔扎两位枢机主教，他们的后面是科隆纳、萨贝利两位枢机主教，科隆纳一党紧随其后。沿着拉塔大道（现在的科尔索大道）径直走过，接连不断的行进大军仿佛没有尽头，罗马市民对此吃惊万分。而更加让他们震惊的，则是看到由马匹拉着的三十六门大炮从眼前经过的时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着从眼前经过的大军，不断欢呼着："法兰西！科隆纳！温克

利！”温克利是圣伯多禄·尹·温克利的枢机主教罗韦雷的俗称。

查理进入圣马可宫殿之后，宫殿周围立刻围起了两千骑兵的警卫，除此以外市内其他重要地点，法军也都是全副武装，并且有两门大炮架在了特韦雷河的岸边，而炮口则准确地瞄准着梵蒂冈。

从教皇宫的回廊也能看清楚直到晚上还在持续进城的法兰西大军。熊熊燃烧的火炬的火焰浮现在眼前，犹如巨大的黑蛇在爬行。“法兰西！科隆纳！温克利！”的呼声此起彼伏，随着特韦雷河上的风吹拂而来。

教皇站在寒冷的风中，定睛看着远处光芒中的骚动。切萨雷站在父亲的背后。但是与教皇父亲静谧的眼神不同，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专注凝视的目光，锐利好似不会看漏任何事物。此时的父子二人，正考虑着同一件事情。

---

[1] 摩尔人：本指在11—17世纪创造了阿拉伯安达卢西亚文化，随后在北非作为难民定居下来的西班牙穆斯林居民或阿拉伯人，是西班牙人及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在此代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他在孩提时代发肤皆黑，因而获得“摩尔人”的诨名。下文提及的摩尔人均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代称。——译者注

[2] 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这位法兰克国王通过（英）查尔斯大帝、（德）卡尔大帝的名字被世人所熟知。800年于罗马，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他死后不久法兰克王国就出现分裂，843年他的三个孙子各自为王，帝国一分为三，成为后来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雏形。

[3] 枢机主教领袖：是教皇之下最高职位的人，有枢机衔，由教皇任命，受权力和教皇差不多，只是不可任命总枢机主教、枢机主教，更改罗马天主教会法典，拥有/使用教宗纹章（以枢机主教领袖纹章代替）及教宗牧徽（以枢机主教领袖牧徽代替），发教皇敕令（以枢机主教领袖诰令代替）。——译者注

[4] 盾：当时欧洲大陆通用货——译者注

第五章

法兰西国王究竟想把教皇怎样？不只是意大利，就连欧洲各国也都关注着查理的下一步行动。事实上，如今的教皇就是法兰西国王的俘虏。由于害怕法兰西军进城掠夺，罗马市民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与查理的“不能进入特韦雷河以西地区”的这条约定，现也已成为一纸空文。在如此情况下，教皇断然拒绝了近臣们要他到圣安杰洛城堡避难的恳请，没有从教皇的居所教皇宫离开，而保护他的亲卫士兵也仅仅不超过一千人。

1495年1月2日，切萨雷被教皇父亲任命为特使，前去拜访查理，他的任务不只是带去教皇的提案，更是去侦察敌情。法兰西国王态度冷淡地迎接了教皇的儿子。随后只是把以前对教皇提出的要求重提一遍。不只如此，以前国王的最大要求只是认可他的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否则就以召开宗教会议相要挟。而现如今国王在被身边的罗韦雷等枢机主教们一直煽动着，召开宗教会议的要求反而更加迫切。并且还进一步要求，将罗马的要塞圣安杰洛城堡交给国王。若是一一答应，恐怕教皇就将在他漫长的人生中，迎来最为微妙、危险的时刻了。

对于切萨雷带回来的国王要求，教皇只给出了暧昧的回答，但唯有让出圣安杰洛城堡这一项坚决地拒绝了。随即，法兰西军的三十六门大炮一字排开架在了特韦雷河的岸边，炮口都对准了圣安杰洛城堡的方向。见到此状况的教皇，亲自带领着切萨雷、蒙雷阿莱、卡拉法、奥尔西尼、圣乔治、帕拉维西尼等六位枢机主教，转移到了圣安杰洛城堡。随后，向随时可能开火的法兰西军传达道：

“你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并不只是会杀了我，更是会破坏在这里的

圣者和殉教者的圣遗物啊。”

大炮最终没有开火。

然而，教皇表面上一副断然拒绝的态度，背地里却并没有断绝与法兰西国王之间的联络。尽快让法兰西军离开罗马，才是对教皇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切萨雷、帕拉维西尼和瑞阿里奥以及其他成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们，同查理持续交涉着。在此期间，查理出席了在罗马大寺院举行的弥撒，对在那里的圣遗物献上了恭敬的礼拜。而另一方面，发生了罗马的犹太人教堂被法兰西军烧毁的事件。

1月15日，教皇与国王之间终于达成了协定。在查理要求的事项中，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被认可了，奥斯提亚将归还给罗韦雷枢机主教。并且约定，到十字军远征为止，杰姆王子交由法兰西国王看管，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切萨雷枢机主教将作为教皇使节待在国王身边。说是使节，实际是人质。教皇甚至还加上了一项，将国王的两个近亲任命为枢机主教，查理认可了这个事项。但是，这其中丝毫没涉及查理以前要求的三大事项，即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十字军远征计划、为改革教会召开宗教会议。知道了这些的亲法派枢机主教们震惊又愤怒。特别是罗韦雷，怒火中烧到了要国王亲自安抚的程度。然而查理难以按捺明日将要与教皇初次会面的兴奋，完全没有余力去倾听枢机主教们的请求。在绝望的他们之中，斯福尔扎、鲁纳特两位枢机主教向着米兰出发了，唯有罗韦雷不得不跟在查理身边。

第二天的16日，将国王的威严展现十足后，查理进入了教皇宫。教皇从圣安杰洛城堡通过秘密通道，回到教皇宫等他。亚历山大六世，甚至穿戴了三重冠的教皇第一礼服。他周围还有红衣的枢机主教成排地簇拥着教皇。来到教皇面前的查理，不假思索地下跪，接着三度亲吻了教皇的指尖，并且战战兢兢地亲吻了伸出来的手上的戒指。而后，查理总算开口了：

“我，在此向基督十二使徒代理人的教皇陛下献上服从与忠诚。如同我的祖先法兰西国王们曾经献上的一般。”

胜负已分。选择在自己的地盘决胜负的教皇一方获胜了。面带温暖笑容、全身散发着喜悦的教皇让查理起身，边说着真诚的话语，边拥抱了身体颤抖的他。

第二天，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西国王举办了庄严的弥撒。进入教堂的时候也毕恭毕敬地手蘸圣水的查理，谢绝了特意准备的最前排位置，坐在了最年长枢机主教的下一个席位。

25日，教皇和查理出席了在圣保罗教堂举办的弥撒，从圣彼得大教堂到圣保罗教堂的这段距离，二人甚至并肩骑马而行，看到此景的罗马人民都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在两人身后，跟随着各国大使和枢机主教们，法兰西军的将军们也夹在队列中。

28日是查理出发的日子，没有被教皇承认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的他，依旧没有放弃征服那波利。他从住所圣马可宫殿出发，去梵蒂冈向教皇告别。教皇对查理照旧称呼为“我的儿子”，在接受了查理的感激后，又带他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此外只叫来了切萨雷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三人究竟在此说了什么，只是没过多久，走出来的查理几乎是热泪盈眶的。

出发的时间到来了。国王骑马走在充斥着法兰西军队的圣彼得广场上，骑的正是切萨雷送给国王的六匹马中的一匹。在马上，国王再一次向教皇致敬，而站在露台上的教皇，则庄严地挥着祝福的手势回应。查理驱马前进，在国王左侧的是骑马跟在旁边的切萨雷，在他们身后的随行人群中，还看到了土耳其王子杰姆慵懒的身影。

带着两名人质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背对罗马城墙，顺着拉丁大道前进。这条道路对查理来说，是条唤起感动的道路。究其原

因，那便是这条路在229年前，同样是他的祖先安茹的查理为征服那波利南下时所走的路。随着骑马前进，查理越发欢快，然而，与国王并排骑马走着的切萨雷却甚少言语，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行人到达马里诺后，迎接他们到来的，是一则让查理欣喜异常的消息。那波利王阿方索二世将王位让给儿子费迪南多，逃去了西西里岛。阿方索二世还是卡拉布里亚公爵的时候，因在奥特朗托对抗土耳其军取得胜利，被评价为意大利第一军人。对于这样的对手，查理果然还是有些畏惧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位昔日的猛将究竟是发生了怎样的心境变化。抛弃了那波利王国的他，迁到西西里岛，终生待在那儿的修道院里闭门不出。另一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王位的年幼的费迪南多，在竭尽全力进行防卫战之前也逃跑了。逃到了位于卡普里岛西北部的伊斯基亚岛上。

突如其来的逃跑发生在查理和他的军队愈发轻松地离开马里诺之时。在此之前，谁都知道队伍之中有十九个大箱子，在侍从牵着的马背上驮着，装饰得十分奢华，因其黑色天鹅绒遮盖上绣着切萨雷枢机主教的纹章，众人皆知这十匹马和大箱子归属于谁。而此时，没人察觉到这其中驮着两个箱子的一匹马，被带着悄悄远离了队伍，被藏在了道路旁的草丛里。驮着其他十七个箱子的九匹马儿，照常跟着欢快的法兰西人一起继续行军。

这天晚上的投宿地是罗韦雷枢机主教的领地韦莱特里，国王与两名人质被安排下榻于罗韦雷的宅邸。切萨雷将国王送到他的寝室，并同国王稍作闲谈后，方才回到了安排给自己的寝室。

夜半时分，一个马夫装扮的男人悄然离开了宅邸，却没有人察觉到。国王的守卫兵们因行军的疲惫，和即将轻易征服那波利的前景所带来的安心感，不停眨着犯迷糊的眼睛，任谁也没有发现佝偻着背走路的这个男人。郊外，有两个男人正在等待。附近的阴影中，可以看到三匹马安静地站在那儿。有两匹马分别各驮着一个箱子。扮成马夫到达此地

的男子同等待的两个人会合，悄声交谈后，三人随即跳上马，缓慢助跑后全速策马飞奔出去，将陷入沉睡中的城镇留在了他们三人的背后。乔装成马夫的正是切萨雷，而等待他的两人分别是他的朋友唐·米凯罗特和另一名随从。去向罗马的道路左侧是夜晚的海洋，策马奔驰的切萨雷脸上一直洋溢着年轻爽朗的笑容。

第二天早晨，来查看人质枢机主教情况的查理家臣，只看到了被丢弃在白色睡榻上的红衣。切萨雷枢机主教的逃亡事件即刻被禀告给了尚在卧榻上的国王，国王勃然大怒，四散搜寻的家臣们个个胆战心惊，屋宅和城镇中都一一严密排查，却毫无所获。接到没有找到切萨雷任何踪影汇报的国王，盛怒之下命令将枢机主教的行囊全部烧毁。切萨雷那十七个奢华的大箱子被搬到庭院中，为方便点火打开了盖子。这个瞬间，所有人都突然看向国王。暴怒的国王查理气得浑身发抖，只结巴着吼了一句“都给我滚！”就回了屋。十七个大箱子里，装的全是破烂儿。

这时的切萨雷，早已回到了罗马，但为慎重起见，没有靠近梵蒂冈和自己的宫殿，只是在教皇厅官员弗洛里斯家中藏着。据传当日曾同教皇父亲秘密会面，而两天后，他已经在斯波莱托了。

被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愚弄，怒火中烧的查理下令将韦莱特里地方官施以绞刑，还一度下令烧城。虽然最终在罗韦雷枢机主教的请求下更改了命令，但依然给在罗马的教皇送去了强硬的抗议书。

教皇对其的回复则是：“哪里都找不到枢机主教，我这边很是担心。”

与悠然回复的教皇相比，罗马市民代表们则很是慌张。罗马市立即送了三位代表到查理身边，试图解释切萨雷枢机主教的作为与他们全无半点关系。数日后，有切萨雷逃到了斯波莱托的消息传到查理耳中，他对斯波莱托市提出交出切萨雷的要求，但斯波莱托的回答却是如下内容：

“枢机主教偕两个随从，一队仅三人轻骑，早已说说笑笑地离开了。要是觉得他现在还在这边，下次你们连主教的影子都抓不到了。”

2月5日，浪费了八天时间的查理，放弃再找切萨雷，向着那波利出发了。两天后，侍从牵着之前驮着装破烂儿的十七个箱子的马匹一行，欢快地回到了罗马。之后直到3月末为止，再没有关于切萨雷的消息传出。

轻易征服了那波利的法兰西军，要想沉浸在这美丽港湾的享乐生活中是很容易的。擅自加冕为“那波利、西西里岛、耶路撒冷之王”的查理自不必说，连法兰西士兵们也每日持续地纵情享受着宴会。在法军之间，流行为到手的那波利女人画肖像画，国王自己也为其数量众多的收藏而得意。然而被征服的那波利人民，也没有从法兰西军那里受到特别巨大的损害。不论怎么说，那波利人已经习惯了对各种征服者迎来送往。女人们尽可能多地从法兰西人身上榨取金钱，肖像画家们也乐于同她们合谋。那波利王国的家臣们也是如此，表面奉承着查理，背地里则与在伊斯基亚岛上的那波利王保持着联系。而街头巷尾都在传唱着嘲笑弯脚、大鼻子国王的小曲儿。

这期间，发生了让法兰西人的欢乐蒙上阴影的事情。首先是另一名留下来的人质，王子杰姆的死亡。法兰西一方刚开始还想要隐瞒这件事情，但马上又发表声明，说是因为从罗马出发前被波吉亚下毒而死的。但是第二件发生的事情，彻底唤醒了查理的沉醉，那便是以针对法兰西国王为目的的大同盟的结成。因儿子切萨雷的逃跑变得没有负担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始了复仇之战。教皇的提议，得到了意大利各国的赞同，就连为法兰西军入侵带路的米兰的摩尔人也出声支持了，意大利各国在历史上少有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再加上对查理的做法开始感到反感的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4月12日同盟正式成立。

于是查理慌了。对他来说，为了不让自己在所征服的土地上被俘虏，除了抓紧回法兰西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即使这样，全军一半的人

员还是在蒙庞西埃将军的指挥下留下来守卫那波利。

5月20日，查理匆忙地离开了那波利，罗韦雷枢机主教也同他一起离开。亚历山大六世回避了查理想要在罗马与教皇会面的请求。5月27日，率领着二十人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在威尼斯和米兰增援的一万军队的守护下，教皇朝着奥尔维耶托进发了。身后的罗马，有莫顿、帕拉维西尼两位枢机主教作为教皇代理留守。前方的奥尔维耶托，则有切萨雷在等待，他之前便担任着隶属于教皇厅的奥尔维耶托总督职位。

另一方面，于6月1日到达罗马的查理，受到了作为教皇代理的两位枢机主教毕恭毕敬的欢迎。所有人都担心查理会不会为了教皇的欺骗而复仇，然而法兰西军这次却一反前日，安静又低调。查理也只是参拜了圣伯多禄大殿。两天后，查理和他的军队就这样离开了罗马。

在奇维塔韦基亚，教皇再次避开了查理的会面请求。6月5日，教皇这次率领全教皇厅的人去了佩鲁贾，这次真可被称为是欢快的逃避之行。而查理的结局早已明显可见，在锡耶纳和比萨，所到之处受到了与之前截然相反的冷淡待遇，查理立即掉转方向往北疾进而去，也放弃顺路去佛罗伦萨，就连等在波吉邦西的萨伏纳罗拉那对国王落实教会改革的热情演说，也丝毫没能阻拦查理的步伐。国王只是一味地想要尽快与在阿斯蒂的奥尔良公爵军队汇合。

然而，到了福尔诺沃附近的塔罗河岸时，遭遇了埋伏于此的同盟军，同盟军总司令是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而法兰西军方面，像败兵一样舍弃了重兵大炮，兵力也仅有来时的一半约万余人。讽刺的是，在历史上作为塔罗战役闻名的这场战斗，仅在一个小时里便分出了胜负。查理抛弃了自己的战利品、士兵和友方军队在内的一切，才最终翻过了阿尔卑斯山逃回了法兰西。而这，距离为入侵意大利而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留在那波利的另一半兵力，在后来同那波利王国军的战斗中也被全部消灭了，大多数法兰西士兵就这样葬在了意大利。查理和他的法兰西军送了两件礼物给意大利。第一个，是对

意大利现状的危机感，然而这件真诚的礼物，只传达给了为数不多直觉敏锐、思维不受外物束缚的人。而另一件礼物，却转瞬之间便席卷了全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

那样礼物在当时被叫作“法国病（梅毒）”，如今则被称为“性病”。

第六章

当时，在风波秘闻接连不断的波吉亚家族中，最为神秘的便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三男胡安了。一般来说，父亲都会为孩子的将来尽心谋划，亚历山大六世在他们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于孩子们抱有超乎寻常的期待，尽自己所能为其铺路。

长男佩德罗·路易斯，其生母在史料上并无记载。因西班牙出身的父亲对出生国的乡愁，他很早就被送到西班牙并作为费迪南多国王的武将被予以重用。与国王的侄女订了婚，身处于西班牙宫廷高层，背负着父亲期待与希望的这位甘迪亚公爵，却在父亲即位教皇的四年前英年早逝。次男切萨雷，生母是教皇波吉亚最爱的人瓦诺莎·卡塔内，她还生育了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三个孩子。切萨雷在教皇父亲的大本营罗马教皇厅中，被看作是父亲的后继者，很早便入籍圣职。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便是胡安。胡安在哥哥佩德罗死后即位成为甘迪亚公爵，并娶了哥哥的未婚妻唐娜·玛丽亚·恩里克斯，一人肩负起了父亲在已逝哥哥身上未达成的期待。当然，他的继承之所以这么顺利，也是得益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想和罗马教皇进一步拉近关系。

1493年8月，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一年前，胡安乘船向西班牙出发了，目的是去拜见西班牙国王并完成婚事，从罗马到奇维塔韦基亚走陆路，而之后到巴塞罗那为止是率领四艘桨帆船船队走海路。借着这个重要的机会，教皇给了胡安一封家书，这封用他们家族间常用的巴伦西亚方言所写的家书，内容满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作为父亲的关爱之情。从文中挑几点来看，首先在实际生活方面，有关于应该如何同桨帆船船长讲价，连金额也有所涉及，给太多会被觉得好糊弄，给太少会被认为太吝啬。信上还写了在巴塞罗那登陆时该带哪位家臣，并指定了每

一天该带何种装饰品。宗教方面，提到要时常虔诚地向圣母祈祷，要作为良好的基督教徒去生活。关于夫妻生活，则叮嘱平常要与妻子同食同寝。更告诫他要踏实过日子不要夜游，忠告他不要沾染赌博。在最后结尾处，甚至加上了对美容的担心，建议他时常戴着手套，因为西班牙人很重视手的美感。而胡安在那时才刚刚17岁。

船上的事情因为没有史料所以不得而知。但是，刚刚在巴塞罗那登陆，胡安立马就把父亲信中所写的所有事情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月月末，西班牙国王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共同出席了胡安的结婚仪式，但完成了义务的胡安不久便将新娘丢在了一边。这座魅惑的港口城镇，完全不缺乏能让他享乐的因素。比起在宫廷中老实地待在国王和重臣面前，胡安更喜欢与同辈的年轻人一起游戏人间。跟随胡安的家臣们叹息着将这些通报给了在罗马的教皇，从西班牙送到罗马的所有信件都是叹息这位甘迪亚公爵的乖戾状况，而从罗马送回西班牙的全部信件都是对儿子的忠告和斥责的内容，最终连切萨雷都不得不写信劝解胞弟。11月，切萨雷给胡安的信中如下写道：

“吾弟，吾等兄弟均应时常亲吻教皇陛下普降威光的大地，并应时常为那位替你我着想、养育你我的陛下虔心祈祷。吾等理应为他所用，并为使他满意而不断努力。这也是为教皇陛下明了吾等无尽感激的微小尝试。”

只是，18岁兄长的忠告最终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而此时的罗马，没人相信胡安的婚礼实际已经举行过了，但在12月4日的信中，胡安向教皇父亲宣称已经完成婚礼。一段时日后，年轻的公爵同夫人从巴塞罗那搬到领地甘迪亚。那里有父亲曾经为佩德罗·路易斯所准备的城堡。然而，这座宁静小城市的生活让胡安感到无聊得要死。即使如此，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还是留在了西班牙。

查理八世的法兰西军入侵意大利的惨痛教训，使亚历山大六世强烈体会到了弱者被动而凄惨的处境，进而筹备起扩充教会麾下的军事力

量。首先第一步，矛头直指罗马豪族们，他们盘踞在罗马近郊且势力强大，甚至时常因势威胁教皇。特别是奥尔西尼一族，他们将距罗马仅50公里的布拉恰诺作为据点，实际支配着罗马北部，是被圭恰迪尼评价为“卡在教会喉咙的骨头”的豪族之中最强的一支。

1496年春天，甘迪亚公爵胡安被教皇召回罗马。教皇任命他为教会军总司令官，将实现自己的心愿这一重任寄托给了他。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胡安将不得不成为波吉亚的利剑。同年6月，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甘迪亚的领地，从西班牙出发去了罗马。

回到意大利的胡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渥待遇，不再是对待教皇其中一个儿子的态度，而是接待罗马教会大人物的态度。前来迎接胡安的是作为教皇特使的切萨雷，而教皇父亲也对到达罗马的他给予了满怀喜悦的热烈欢迎。12月26日，胡安在圣伯多禄大殿被正式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官、教会的旗手职位，由亚历山大六世亲手赐予元帅杖及三幅旗帜。这三幅旗帜，一幅是画有圣彼得钥匙的教会旗帜，另一幅是波吉亚家族绘有牛纹章的家族旗帜，而第三幅旗帜是绘有甘迪亚公爵以雷光劈裂山峰纹章的家族旗帜。切萨雷则在旁，一一将物品交到教皇父亲手中，再由其授予弟弟胡安。

教皇诏书经由枢机主教会议审核通过，为对奥尔西尼攻略战的开始起了个好头。对胡安的军事才能略有几分不安的教皇，将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费罗作为副将安排在他身边。送到罗马的战报显示，奥尔西尼的要塞被接二连三地攻下，教皇为此欣喜若狂。不只教皇，全体梵蒂冈都在为甘迪亚公爵的胜利欢腾雀跃。然而这之中只有一人疏离于庆祝胜利的喧闹之外，独自体味着自己苦涩的心情，此人便是切萨雷。他时常假借狩猎之名骑马远行，每每这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朝着战场的方向前行。很多人曾在战场上目睹过切萨雷的身影，独自伫立于高丘之上，遥望弟弟胡安指挥着军队战斗。高丘可同时俯视左右两方军队，曾有一次切萨雷被敌人发现并追赶，好在他有快马良驹才得以脱

险。

然而，因接连不断的捷报而眉开眼笑的教皇，脸上渐渐阴云密布了起来。胡安的军队绞尽脑汁也没能攻破布拉恰诺城堡，打败躲在其中誓死抵抗的奥尔西尼一族。布拉恰诺城堡引以为豪的是以护城河水为基础构成的铁壁防御，而指挥守卫这座城堡的是一名女子，名为巴尔托洛弥娅·奥尔西尼。她在城中高塔上悬挂法兰西国旗，对满载士兵渡河而来的教会军船只毫不留情地准确炮击，逐一将其击沉，战况随即逆转。教会军同时遭遇从两岸而来的攻击，腹背受敌而不能后退重整阵容，只得节节败退。此役死者800人，副将乌尔比诺公爵受伤被擒，胡安虽然勉强逃脱，奥尔西尼军却借着胜利的气势直追到了罗马城下，教皇只得向奥尔西尼提议讲和。第二年2月和解达成，奥尔西尼将每年支付给教皇厅5万达克特，相对应的，讨伐奥尔西尼的教皇诏书则宣布作废，这让教皇颜面尽失。通过达成和解，濒临罗马城下的奥尔西尼军队撤退，并返还了俘虏。奥尔西尼就乌尔比诺公爵的释放向胡安索要了高额赎金，却被其视作不见，公爵不得已只能自己设法筹钱解决。

随后，亚历山大六世将从奥尔西尼处所受的屈辱，转向了支配罗马南部的反波吉亚派，想要在与他们的战役中一雪前耻，目标是奥斯提亚城堡。这座固守特韦雷河河口的要塞，因在查理八世入侵时被承认为罗韦雷枢机主教所有，而插上了法兰西国旗，由与罗韦雷关系很近的著名海盗莫纳尔多及其部下守卫。同上次相同，指挥军队的还是教会军总司令官甘迪亚公爵胡安，然而，这次接连传到教皇耳边的，却全是胡安和麾下军队的惨淡战况。因愤怒与屈辱涨红了脸的教皇只得向一名西班牙将军寻求帮助，而在他和他的副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的面前，要攻陷奥斯提亚的要塞简直轻而易举。

戴着枷锁的海盗首领被押在阵前，胜利归来进入罗马城的西班牙将军受到了市民热烈的欢迎。在他旁边，因再度出征而越发暴露自己无能的胡安却毫不在意，犹如自己才是胜利者一般，骄傲自负地与之策马并

行。心中苦涩难咽，却不得不为这位西班牙人的胜利表现出欢喜的教皇，上前迎接并授予“复活祭的棕榈”以庆祝他的胜利。然而，西班牙的将军却索要“黄金玫瑰”。这对教皇来说，无疑是让反复受辱的心更添新伤。“黄金玫瑰”是教皇能授予俗世的最高奖赏。如果此次是教会军总司令官胡安赢得胜利的话，的确理应赐下此等殊荣，但对于区区一介武将如此重赏却过于隆重。然而教皇不得不满足这个西班牙人的愿望，因为世人皆知这次胜利真正的功劳归属于谁。圣伯多禄大殿正中，为这位西班牙武将举行了盛大的“黄金玫瑰”授予仪式，出席的众人脸上，大多浮现出了轻蔑的冷笑。他们笑话的不只是竟也列席仪式的胡安，更是在嘲笑竟然派这种男人出阵的波吉亚家族全体。切萨雷也出席了仪式，他的眼神直直地盯着胡安。而胡安却跟在西班牙人身后，若无其事地旁观对方从教皇手中接受“黄金玫瑰”。切萨雷没有笑，唯有眼底闪烁着比轻蔑更幽深、炽盛的光芒。西班牙将军正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的家臣，在那波利一带威名远扬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将对波吉亚家族此后的盛衰影响重大，且早已成为与切萨雷的一生紧密相关的人物。

1497年6月7日清晨，接到教皇发来的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命令书的枢机主教们聚集到了梵蒂冈。当着他们的面，教皇公布了一份有待他们通过的诏书，其上写有教皇将认可那波利王国的新王王位继承权。去年，年幼的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去世了，由于并未留下可以即位的王子，导致其身故后王位争夺异常激烈。诸多王位竞争者中，已故年幼国王的伯父，费德里科稳健而顺利地向着王位这个目标巩固着自己的地位。但在法兰西还固执地盯着那波利的王冠时，费德里科当务之急便是让教皇承认他的王位继承权。为达目的，他向教皇提出了一项交易，以贝内文托的土地来交换教皇对其王位继承权的承认。而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枢机主教们，不单知道这桩王位继承权背后涉及的土地交易，或多或少还察觉到了教皇想秘密将领地交给儿子胡安的谋划。

但教皇是将波吉亚家族的两大绝技——胁迫与怀柔——使用得炉火

纯青的代表人物，在他面前，枢机主教们完全不是对手。只有一位年岁很高的皮科洛米尼枢机主教，指责教皇波吉亚的“亲族主义”并明确提出反对，但就连他也马上亲口改变了自己的说辞，因为皮科洛米尼自己也是借着伯父庇护二世才升任枢机主教的。就这样，枢机主教会议通过了教皇的诏书。两天后，枢机主教切萨雷被任命为教皇代理，将前往那波利参加新王加冕仪式。

兄弟俩预定7月初从罗马动身向那波利出发。哥哥是作为教皇代理去参加新王加冕仪式，而弟弟则是为接手贝内文托的领地做自己的公国，而后两人应在9月回到罗马，之后胡安的预定是陪伴妹妹卢克雷齐娅去向西班牙。教皇有意让女儿同丈夫佩萨罗伯爵离婚，因为继续与米兰的斯福尔扎保持亲密关系对波吉亚来说绝不会有任何好处了。而胡安还向着辉煌的荣升道路前进着，对于一心想将他培育成波吉亚之剑的教皇父亲来说，面对他在战场上的种种丢脸行径，只得继续忍耐下去。因为波吉亚家族抛开胡安，再没有合适的男子可以胜任此职，切萨雷是圣职人员，而幺弟杰弗里还年岁太小。

与围绕在弟弟胡安周围华丽快乐的喧闹相反，哥哥切萨雷的心境很是复杂。作为甘迪亚公爵，胡安在西班牙宫廷的地位日渐稳固，这次又得到了贝内文托的领土，同时入手的还有那波利王国重臣的位置。当那波利时局动荡之时，胡安所要走的路很大可能是通向那波利王位的。恐怕作为父亲的教皇，也认为这一天说不定会真的到来。胡安的前途，有无限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切萨雷是身负红衣的身份。教皇将这个声名实力俱佳的儿子，选为波吉亚家族在教会中的继承人，在加里斯都三世、亚历山大六世之后继承波吉亚家族的传统。同时拥有幸运的家世和自身的“才能”的切萨雷，将在枢机主教中获得极大影响力，十有八九会过上不逊色于帝王的优渥生活。安定的地位、富足的生活、受众人尊重的立场，这便是被誉为“教会的君主们”的枢机主教拥有的。不能正式结婚这种事

情，对男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不便。所以，追溯到今天为止的教会的漫长历史中，得到枢机主教位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放弃这件红衣。

然而切萨雷的目光却越过身着红衣狂喜的人们，一直看向更高的位置。但是，他的视线却被严酷的现实割断了。虽然能够升任至枢机主教，但他却与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波吉亚家的教皇们，无论是加里斯都三世还是亚历山大六世，都是正式婚姻里所降生的嫡子。与此相比，切萨雷的出生，不要说是正式了，在天主教教义中是被双重否定的存在——不能够结婚的圣职者的私生子，这便决定了他野心的最远界限。

虽然通过教皇父亲的力量成功升任了枢机主教，但升任枢机主教时因天主教教义这座屏障所引起的那场闹剧，使他不可能再前进到更高的位置上了。这是无论亚历山大六世的力量多强大，运用多么巧妙的策略，都不可能实现的。切萨雷无法坐上“圣彼得的宝座”，教皇的三重冠也绝不可能在他头上闪耀。俗世第一地位的宝座，连一个微笑也不曾赐给过切萨雷。

作为父亲的教皇也深知儿子的这个立场。但是，作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有着必须守护天主教教义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场。对此束手无策的教皇，只能让切萨雷成为枢机主教中最有权威、最富有的人，这是教皇所能做到的极限。而亚历山大六世丝毫没有想到，这些对于即将迎来22岁生日的切萨雷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第七章

瓦诺莎的宅邸坐落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十分靠近皇帝图拉真努斯和皇帝提图斯的浴场遗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曾忘却对这位为自己生育了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四个孩子的昔日情人的深厚体恤。这座柏树环绕的美丽宅邸，犹如教皇对满足于半生都作为波吉亚情人隐于暗处的瓦诺莎所表达的感谢之情。

这一年6月14日的傍晚，这座终日寂静、恍若无人的宅邸大门敞开，迎来了几位衣着华贵的客人，他们应宅邸女主人瓦诺莎邀请，前来参加家族内部晚宴。这场晚宴是母亲瓦诺莎的一片苦心，为月内就要出发去那波利的儿子们——切萨雷与胡安举办的。除了因被政治策略愚弄而感到厌恶，躲在修道院里不出来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家的兄弟们和他们最亲近的人们都来了。犹如要享受初夏甜美的夜晚一般，宴席被设在了庭院之中，众人围绕在依然风韵犹存的母亲身边，气氛融洽而和睦。

切萨雷没穿法衣，而是穿着俗世人的服装，虽非艳丽色彩，但这身剪裁精良的衣服完美展现了他紧致修长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黑色的秀发，蓝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深邃的光亮，唯有性感的黑色胡须和其下的嘴唇，才使他面色严肃的清秀容貌稍显温和。

聚会的焦点是胡安。对自己一帆风顺的将来深信不疑的他，完全不在意曾经在战场上的失败，心情愉悦至极。将妻子留在西班牙独自在罗马生活的他，过得十分快活。

最近犹如集全部父爱于一身的他，变得不可一世，态度傲慢的他总

是与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起冲突，而不得不忍耐退让的总是阿斯卡尼奥。这一夜，在大放光彩、汇聚众人视线的胡安身旁，紧跟着一位没见过的假面男子。在座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约莫是这数月中一直待在胡安身边的那位年轻男子。尽管如此，人们也没有感到不安或奇怪，只是在悄悄议论，那恐怕是胡安正热恋中的不伦对象。

最小的弟弟杰弗里携妻子桑夏一同出席。热情的那波利黑发姑娘桑夏对年幼的丈夫很不满意，一到罗马立刻与切萨雷亲近了起来，而胡安自打从西班牙回来便也同她有了来往。

临近午夜，人们陆续向瓦诺莎告辞各自回去了。波吉亚家的众人朝住处梵蒂冈的方向走去，舒爽的夜风中，众人缓步而行。就在快走到梵蒂冈的特韦雷河边，胡安表示想再独自感受下夜晚的空气，便与假面男子同骑一马，仅带着马夫离开了行列。众人建议最好带上武器以防不测，但他却只是笑着说会很快回来。此时的罗马街道昏暗，路上人影全无，家家门窗紧闭。除了稀稀落落的街灯发出的暗淡光亮与其下的灯影，城市整体都被笼罩在瘆人的黑暗中，而胡安的身影就消失在这黑暗之中。

第二天，教皇在梵蒂冈从早上就开始忙碌，那波利新王加冕仪式的磋商持续了整个上午，而胡安一直没有出现。教皇虽然有些担心，但他之前有过类似行径——不想被人看到自己从留宿的妓女家中出来，故意待到傍晚仍未归家，所以教皇认为这次也是类似缘故。然而，暮色降临后，甘迪亚公爵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教皇已掩饰不住不安的情绪。亲卫队的西班牙士兵们奔上街头，穿梭在大街小巷中的武装士兵甚至让市民们以为是奥尔西尼或科隆纳的军队前来袭击罗马。终于，甘迪亚公爵的马夫被发现了，却已是身受重伤的濒死状态，还没有问出任何情况就死了。所有人的心里，都预感到了胡安已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一名船夫被带来了，自称是在特韦雷河岸边停靠的船中过的夜。名叫乔尔乔的这名船夫，讲述了以下的经过：

从6月14日到15日的这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船里睡觉，却被奇怪的响声吵醒了。他看到两个男人从斯基亚沃尼医院旁边的小路拐了出来，两人边走边小心翼翼地四下查看。稍过片刻，又有一名骑着白马的男人走近，马鞍后捆着个人，一边跟着一个马夫扶着。他们在河边停住，马夫们听从骑士的命令，将一动不动的人从马鞍上解下来投入了河中。船夫称，明确地听到了骑士询问随从是否已顺利将人投入河中，随后马夫们回答“是的，主人”。河水缓缓流淌，有什么东西浮上了水面——是死者系的斗篷乘风而起，马夫们朝斗篷投了石块，接着又听从骑士的命令消除了地上的痕迹，随后一行人朝着圣贾科莫医院的方向离开了。

船夫说他本没想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毕竟至今为止没少遇到这种事，而事件最终都会被淹没在黑暗之中无人知晓。

这个瞬间，教皇呆滞了，他无法相信。其他人都意识到自己的预感是对的，只有教皇不愿去相信。但最终，他还是下令在特韦雷河展开捕捞。当夜，三百艘船结网搜寻河底，数千只火把为其照亮，特韦雷河两岸一夜通明亮如白昼。

翌日将至正午时分，甘迪亚公爵胡安的遗体从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被捞了上来。衣服还是原样，两手被缚，全身有9处伤势，致命伤是喉咙处深深割出的大伤口。短剑佩带在原处，手套也别在腰间，钱包中的三十达克特原封未动，斗篷内侧裹着许多河泥。

胡安的遗体被搬到了圣安杰洛城堡，脱下污秽的衣服，清洗了身体后，穿上了公爵的正装，胸前佩戴教会军总司令官的纹章。这时的他只有20岁。

这一日的傍晚时分，送葬行列朝人民圣母教堂出发了。在亲族、神职人员、贵族们的围绕下，被一百二十只火把的光照亮着，在无声聚集而来的群众中间，送葬行列离开了圣安杰洛城堡。这时候，透过城堡开

着的窗户，人们听到了教皇在黑暗中哭喊儿子名字的声音。

甘迪亚公爵遇害的消息转瞬就传遍了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欧洲各国的大使们，都纷纷忙着给自己的君主提交详细的情报。

而旋涡中心的教皇，好似自己受到拷问一般痛苦万分，三天不眠不食。事件发生的五天后，他以憔悴的面容出现在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

“最难以忍受的打击，”断断续续听到教皇的西班牙口音在低吟着，“我从心底爱着公爵，总想着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回到以前该多好。然而，就算再想着这是自己所犯罪孽的报应所致，如此悲惨的死法也太过……”

话至此，他哭了。随后环视了在座的枢机主教们，继续说道：

“我想要对教会内部进行重新编排，废止亲族主义，今后教会的职位要赋予与之相应的人。”

这时教皇的语调已经平稳镇静多了，当即任命枢机主教科斯塔为改革负责人。

这期间，教会警察的搜查还在继续。首要追查那天夜里与胡安在一起的假面男子。但是，就连此人是生是死也没能确认。随后嫌疑人的名字被一个个列举了出来。

首先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可以说他有完全的暗杀动机。他与死去的胡安之间的不合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现在的米兰公国派几乎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已经无可救药地在教会中被孤立了。当法兰西将第二次展露的野心指向米兰的时候，米兰非常需要与教会搭建友好关系，因此有足够的动机暗杀反米兰派领军人甘迪亚公爵。并且，公爵最后消失的地点正好是在阿斯卡尼奥的宫殿附近，也让他的嫌疑加深了。

对宫殿内部进行了搜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教皇公开表示了阿斯卡尼奥的清白。

其次是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他在同奥尔西尼交战的时候与甘迪亚公爵同行，战败后公爵置被俘的他于不顾，因此被认为对公爵的逃跑怀恨在心。但是，众所周知，乌尔比诺公爵性格温厚诚实，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因嫉妒妻子卢克雷齐娅与亲哥哥胡安之间的不伦恋情，在事件最初便多次被提到的佩萨罗伯爵，也被证明当时人在米兰。同样，被认为因妻子桑夏被哥哥抢走而怀恨的小弟弟杰弗里也是清白的。树敌过多，更确切地说是到处树敌结怨的甘迪亚公爵被暗杀的真相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第21天的7月5日，教皇突然公开表示停止搜查，同时让波吉亚家的所有人都从梵蒂冈撤离，杰弗里与桑夏出发去那波利。22日，切萨雷从罗马出发，踏上了本应同过世的胡安同路的旅途，去往那波利出席国王加冕仪式。

全意大利、全欧洲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了梵蒂冈发生的谜一般的暗杀事件上。“亚历山大六世为了向人们显示自己是得人如得鱼的人，将自己的孩子用网捉住了。”[1]

在事件过去了8个月的1498年2月22日，当坊间流传的谣言消散的时候，我们首次发现了作为暗杀主谋出现的切萨雷的名字。这一天，驻威尼斯的费拉拉公国情报官艾伯特·德拉·皮尼亚寄给埃斯特公爵的信中如下写道：

“根据我听人说的新情况，甘迪亚公爵之死大概是其当枢机主教的兄长所为。”

好奇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波吉亚的身上，事件发生后的种种事情又再次被人们提起。在这8个月里，一次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切萨雷名字的

谣言，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而暗杀的动机有如下几条：

（1）因弟妹桑夏引起的切萨雷对胡安的嫉妒；

（2）因妹妹卢克雷齐娅引起的兄弟间爱的纠葛；

（3）切萨雷对教皇父亲给予胡安宠爱的嫉妒；

（4）事件发生后教皇所说的“我知道是谁所为”的话；

（5）母亲瓦诺莎在事件发生后与教皇见面，而教皇宣布停止搜查就是在这之后，一定是瓦诺莎知道暗杀者是谁；

（6）面对从那波利归来的切萨雷，教皇只让他行了亲手礼而没有与他说话。

以上这些就是使人们传出流言的原因。

但这终归是人们的传言，而之所以能留存到现在，也是因为年代记作者们将这些坊间传闻记录了下来。事件的当事人们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大使们的书信中没有找到新的事实。并且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调查波吉亚家的众人，特别是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周围的时候，本该留下最为可信记录的教皇厅书记官、德意志人布鲁卡鲁多，其日记中缺少自那事件当天即6月14日之后的一段时间的记录。从那时开始到五百年后的今天，被好奇心驱使的众多学者们翻阅了各种古文书库中的资料，却依然没能发现任何一点关于事件主谋是谁的决定性史料。

---

[1] 将自己的孩子用网捉住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地区布教的时候，遇到的西门（之后的圣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说道：“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西门与安德烈立刻扔下了网跟随耶稣走了。之后在耶路撒冷，耶稣身背十字架复活，当再次在弟子们面前现身的时候，耶稣指命西门为“我羊群们的牧羊人”。根据耶稣的话语，西门成为第一代教皇，即圣伯多禄（意大利语中称圣彼得）。罗马梵蒂冈内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名字由此而来。因此以后的教皇们被称为得人得鱼者，即圣彼得的后继者。另外，在意大利语中以“Pastore”（牧羊人）作为教皇代称使用的情况很多。——译者注

第八章

1498年夏季，自甘迪亚公爵胡安被暗杀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与情报官们意识到，最近一直没有看到切萨雷枢机主教的身影。暗杀事件之后波吉亚一家就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为了骗过几乎将监视波吉亚当首要之务的大使们，切萨雷从4月开始逐渐不参加宗教仪式等官方活动，仅出席非官方活动，不久后连非官方活动也不再出席，只窝在自己的宫殿和教皇宫内父亲的私人房间。他在打什么主意？所有人都想打探这位年轻枢机主教的动静，但此时的切萨雷不仅在社交界销声匿迹，就连他喜爱的狩猎也不再参加。从教皇贴身侍从口中打听到，切萨雷与教皇两人时不时会进行长谈，众人也排除了切萨雷是因病静养的可能。并且，使他们更显可疑的另一个事实，是自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来，实际上已断绝了往来的法兰西与罗马教会间，有了新的转机。在法兰西前国王查理死后，由奥尔良公爵路易作为路易十二世继承了王位。而最近，有几个好似国王使节的法兰西人造访了罗马，其中大多都拜访了教皇与切萨雷。事到如此，才第一次令密切关注教皇和切萨雷的大使们捉到了一丝事件的苗头。然而，波吉亚家的这两个人并没有给予他们发现真相的时间。

7月17日，教皇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在被召集来的枢机主教们面前，切萨雷请求发言。身着一身红衣红帽的他站起身，用平静但果断的语调说道：

“即使身着红衣，但我的内心却时常为现世俗务所吸引。只是因为教皇阁下的愿望，我才至今为止留任圣职。”

切萨雷在奉还枢机主教职务的同时也舍弃了瓦伦西亚大主教的职

位，宣言要降归俗世。面对其他那些面面相觑的枢机主教，教皇表示自己已认可这位瓦伦蒂诺枢机主教的决定，随后的投票以枢机主教全体赞成通过而告终，切萨雷脱去了红衣。萨努多[1]在他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曾经，有过枢机主教阿雷利亚为当修道士而请求脱下红衣的事情，但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被多数的反对票阻止了。而这次则是全员都赞成了。神之教会如今是何等堕落啊。”

众人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牵动整个教会为之行动的毫无前例之事的主角，是这个即将要迎来23岁生日的年轻人，而教皇也总算发觉自己只不过是能给这个儿子提供助力的存在。但是没人能想到任何对策，毕竟除了切萨雷，没人会舍弃枢机主教的名誉和总额超过35000达克特的年收入。那么，切萨雷以舍弃了红衣的代价，想要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在人们开始臆测与谣传之前，切萨雷早已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去年的夏天，作为教皇代理出席那波利国王加冕仪式的切萨雷亲眼见识了富饶广阔的阿拉贡王国。占据那波利往南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还有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三分之一以上的阿拉贡王国，与其广阔的疆域相反，切萨雷目睹了其内政极度混乱的状态。并且由于弟弟胡安的去世，切萨雷得到了国王转赠的贝内文托领土，正式成为那波利王国的一员。切萨雷将实现野心的希望，首先押到了那波利王国上。

阿拉贡王家的命数将尽。在老练的政治家费迪南多国王死后，受困于国内众多小领主的反抗，被搞得焦头烂额的王室中，再未出现一位能够重拾王室权威与实力的支配者。想要最快接近那波利王国王权的方法，是与现任国王的嫡出公主结婚，而与像桑夏一样的先王庶出公主的联姻是行不通的。切萨雷盯上了卡洛塔公主，而他为此所准备的棋子是自己的妹妹卢克雷齐娅，已同佩萨罗伯爵离婚的卢克雷齐娅就这样被许诺要嫁给桑夏公主的哥哥比谢利公爵阿方索。但是，当时的卡洛塔公主

却不愿与切萨雷结婚。没有预想到切萨雷会放弃枢机主教职位的公主，因为不想被人们称呼为“枢机主教夫人”（也就是情妇的意思）而拒绝了他，同时国王费德里科二世也不喜欢波吉亚通过结婚来染指王权。切萨雷的野心眼看就要遇挫了。

不过，他一边持续探听着那波利的态度，另一边还把目光投向了法兰西。如果是面对在韦莱特里因切萨雷的逃亡事件而咬牙切齿查理八世，切萨雷大概没法开口提出请求。但对于波吉亚来说幸运的是，法兰西已经变为路易的时代了。

新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在继承王位后考虑要离婚。想要与路易十一世的公主——患有佝偻病的让娜·德·瓦卢瓦离婚，同已故查理八世的未亡人安娜·德·布列塔尼结婚，所图的是安娜所拥有的布列塔尼公国这个巨额的嫁妆。但是，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想要成功离婚非常困难，必须想办法让以往的婚姻无效化，此外还需要教会之首教皇的认可，而路易接近教皇的目的就在于此。

波吉亚对这样的路易提出了条件：为切萨雷准备领土和新娘。路易接受了这个对双方来说互惠互利的条件。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占据着路易的内心，他想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而这对波吉亚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利之处。现如今卢克雷齐娅已经与斯福尔扎家族一员的佩萨罗伯爵离婚，同斯福尔扎家族已毫无关系。如若能除去米兰公国的当家摩尔人，还能击溃一直以来在教会中实力强大的摩尔人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的背后势力。在这一点上，路易与波吉亚有着相同的利益，在始终贯彻着利己主义的男人们之间，妥协是时常可行的。

路易十二世

就这样，路易与波吉亚之间达成了协议。密使频繁奔波于巴黎与罗马之间，协议在商议中被一一逐条确认，切萨雷希望路易在法兰西的宫廷内招待他，而路易也追加了希望让自己的心腹鲁昂大主教乔治·昂布

瓦兹成为枢机主教的要求。波吉亚一口应诺，主教的红帽将会由自己去法兰西时随身带去。

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所遗留的记录中，在以上协议内容外还额外添加了九个条目，日期是切萨雷奉还枢机主教职位的前一天，即7月16日。

（一）基督教徒的国王（法兰西国王的代称）约定将费德里科国王的女儿嫁给切萨雷阁下；

（二）将赠予切萨雷法兰西国内的瓦朗斯与图尔[2]的领土，保证其获得公爵爵位的同时能从两地得到全部收入；

（三）国王同时承诺将出资精心挑选三百枪骑兵赠予阁下，如有必要还可以增加兵力；

（四）约定有3万达克特的终身年金；

（五）当征服伦巴第地区成功时将赠予阁下阿斯蒂领地；

（六）赐予法兰西宫廷承认的圣米凯尔骑士团的骑士称号；

（七）当切萨雷阁下不在罗马时，国王将派遣一千名士兵保证教皇阁下的安全并承担全部费用；同时国王承诺将尽义务从各方敌人处守护教皇阁下的安危；

（八）许诺在没有教皇许可时，不会针对那波利王国采取任何行动；

（九）最后，教皇希望能让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和雷蒙德·佩劳德枢机主教回到罗马，彼此尽释前嫌，像弟弟一样温暖地迎接他们。

以上条目全部以国王之名约定。

切萨雷在脱去红衣之前早已完成了上述所有的准备。并且，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记录下来，但第三项法兰西将给予切萨雷军事援助这一点，在未来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就这样，因为担任瓦伦西亚的大主教而被称呼为瓦伦蒂诺枢机主教的切萨雷，现在成了瓦朗斯领主，巧合的是法语的瓦朗斯与意大利语瓦伦蒂诺发音相近，故切萨雷竟仍然是用瓦伦蒂诺公爵来称呼。没人能够知道当时这位年轻人的心境如何，只是有一段时间，切萨雷会在署名为瓦伦蒂诺枢机主教后用力划掉，再重新写上瓦伦蒂诺公爵。

为了将切萨雷接到马赛，国王派遣的六艘桨帆船正向着意大利行进，与此同时在罗马，教皇则忙着为儿子的法兰西之行做准备。写好了路易十二世的离婚承认书，给鲁昂大主教的红帽也准备妥当。给切萨雷的服装当然是精心安排的，罗马的裁缝店总动员，全罗马的绢布、锦缎以及缝有金线银线的豪华料子被一夜之间扫荡一空，这之上仍然不足的部分则现从威尼斯订购。几十匹宝马良驹也从曼托瓦运达，跟随切萨雷去法兰西的随从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

1498年10月1日，切萨雷出发的日子。这天正是罗马最美的秋日，切萨雷的面容仿佛历经岁月的黄金酒杯那雕刻有致的浮雕纹理，在柔和的阳光下形成了美妙的光影调和。和父亲做了出发前的最终告别的他，回到了在圣伯多禄广场等待他的一行人之中，白色缎子金线绲边的上衣，黑色天鹅绒斗篷，同是黑色天鹅绒的贝雷帽上插着白色的羽毛。看着在秋天暖阳中骑着鲜亮栗色鬃毛马的儿子飒爽的英姿，教皇很是满足。随后从阳台探出身子朝向儿子嘱咐，到了法兰西也要像现在这样威风凛凛地骑马进城。

随行的一队人马如影随形地跟在切萨雷身后，其中看到了唐·米凯罗特的面容。此外还有约三十名贵族，数百人的仆从、侍童、马夫、乐

师等，外加二十几匹骏马、十二驾马车和七十头驮行李的骡子，记录中还留有切萨雷怀揣着满满20万达克特上路的信息。

10月3日，六艘桨帆船驶出奇维塔韦基亚港。切萨雷站在先行的咆哮号船头上，斗篷被风吹拂着向后飘动，长发被猛烈的海风吹得上下飞扬。黑色紧身裤包裹着的双腿平稳地站在甲板上，单手用力攥着贝雷帽，目不转睛地遥望远方目的地所在的海平面方向。

---

[1] 萨努多（Marin Sanudo il Giovane，1466—1536），威尼斯外交官，年代记作者。著有威尼斯历史与现状等著作，其中尤以1496年至1533年的《日记》最为世人所知，是从文化、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对当时社会全面记录的一本著作。——译者注

[2] 图尔（Tours）：现法国中西部城市，中央大区（Région Centre）安德尔——卢瓦尔省（Indre et Loire，37号省）的省会。在当时的瓦卢瓦王朝后期（1462年3月），包括路易十一世和查理七世在内的法兰西皇室家族来到卢瓦尔河谷，此后的一个世纪内，图尔成为法国的皇室之地。——译者注

第二部分
剑（1498——1503）

切萨雷的势力分布图

第一章

秋日将尽，平安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咆哮号带领着五艘桨帆船驶入了马赛港口。对切萨雷来说，这是首次外国之行。根据路易十二世的命令，法兰西宫廷高官及贵族代表们以国宾待遇前来港口迎接，还有其他许多为了向教皇的儿子致礼而前来的教会人士。为缓解漫长航海旅行带来的疲惫，切萨雷在马赛停留了数日，之后经由罗讷向亚维农出发。切萨雷华丽的一行人让法国民众们真是大开眼界，这位从他们憧憬的意大利远道而来的年轻贵族及其一行人身上，处处散发着文明的香气与都市的考究。

在与罗马教会关系匪浅的亚维农，还有更加盛大的欢迎仪式等着切萨雷，而且波吉亚的宿敌罗韦雷枢机主教也将在此处出席迎接仪式。通过路易十二世的调停，罗韦雷表面上已同教皇言归于好，并被教皇任命为驻亚维农大使。这只老狐狸嘴上说着前嫌尽释，手里也确实舍得下血本，为了切萨雷的迎接仪式竟自掏腰包出了7000达克特。在此地停留了十余日的切萨雷一行，而后又朝着瓦朗斯出发了。

瓦朗斯为迎接新领主而一时喧嚣，为迎接瓦伦蒂诺公爵，这座古老的小城仿佛要将城市金库挥霍一空。单拿一次宴会为例，宴席上逐道传上的菜肴堆积如山，根据遗留下来的记录显示宴席菜品包括：28只烤全鸡、24只番茄炖兔、168只白鹌鹑和24只黑鹌鹑串烧、16只鸭子、28只雏鸠、37只山鹬、6只仔兔、6只斑鸫、6只云雀、12只孔雀、10只烤野鸡、两扇烤牛腿、两扇烤小牛腿、150千克的腌渍肥肉、煮羊舌冻12碟，此外还有鹑肉酱、蛋糕、馅饼、英式布丁，还有意式馄饨、杏仁、柑橘、糖点心、葡萄、李子、海枣果实、石榴……葡萄酒更是多到喝不完，切萨雷年轻旺盛的食欲被极大地满足了。

切萨雷在此收到了法兰西国王来函，告知将于12月18日在卢瓦尔河附近的希农接见他。切萨雷及其一行当即从瓦朗斯出发，离开了里昂地区。

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为了要如何迎接切萨雷而犹豫不决。要带着全宫廷的人前去迎接吗？不行，这样对待作为瓦朗斯公国领主又是自己臣下的切萨雷太过于隆重，更何况这只是他踏入世俗的第一步。那么在城里等他？不行，这样又在对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儿子的礼仪上欠妥当。最终，路易选择了居中的方法。

切萨雷到达的当天，国王指名让心腹昂布瓦兹担任到城门外迎接的职务，而自己则带着宫廷内的其他人外出打猎。而后，想要在离入城还有2公里的地方来一出最初的邂逅，佯装偶遇正往入城方向走着的切萨雷。然而，结束匆忙狩猎的路易到达偶遇地点的时间太早了，还完全看不到切萨雷一行人的身影。路易和他的家臣们又不能站在野外这仅有的一条路上，只得躲在附近的林中悄悄等待。感觉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总算从道路远方听到了人马的嘈杂声，只见切萨雷一行不慌不忙地缓步前来。蹲在树林里，透过林间缝隙望见队列走过的路易，总算能从林子里出来了。

俨然一副狩猎归来偶然相遇的场景，路易与家臣们边高声笑着边敲打着武器弄出声响，走近切萨雷一行人。切萨雷早已驻马等待他们，他注意到国王正在这一群穿着狩猎服、打扮随意的人当中，于是命令自己的家臣们下马。走近切萨雷的国王发现，这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直视着自己。

“不好意思，我正好打猎回来，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公爵您这一行人。”国王接着说道：

“我将在城内恭候，长途旅行真是辛苦了。”

切萨雷对此简短地表达了谢意，路易便带着家臣们快马回到了城里。路易本还担心，如果切萨雷面对国王的时候下马回话，自己该如何应对，现在看来全是白费心思了。年轻人面对在马上同自己说话的国王和其身后诸多骑马的家臣时，丝毫没有要从马上下来的意思。待国王及其一行远去后，切萨雷他们慢慢前进。当日午后如约入城之前，全员又进行了整备。

对于进入图尔城的切萨雷一行，威尼斯大使在给祖国的报告中有如下描写：队伍由驮着华丽衣箱的骡子群打头阵，随后是24头驮有武器的披着华丽马衣的骡子，分别披着代表法兰西王国颜色的红黄两种马衣，其中12头是黄色呢绒，10头装饰着金色锦缎的马衣。在这些被随从牵着的骡子后边跟着马匹。气派的骏马们分别装饰有银色的缰绳、西班牙风格的金色流苏、德意志制造的闪亮马具、黑色天鹅绒和锦缎的马衣。这之后跟着18个骑马的侍童，其中16人着锦缎流苏上衣，披深红色天鹅绒斗篷，另两人身着全套金色绉纱风格的绢织华贵服饰。再后面有60人的随从，清一色穿着黑色天鹅绒外服，配有金色项链，还有两头体态健壮的骡子驮着贵重物品箱子，里面装有华贵宝石、献给国王的礼物，大概还有认证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离婚的教皇诏书、圣遗物等。在这之后紧接着的是罗马的贵族们，还有到城外迎接的国王代理昂布瓦兹和法兰西宫廷里的人带路前行。

终于，切萨雷的身影出现在了城门下。他在18人的亲卫兵中心，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显得尤为高人一等，胯下宝马披着缀有宝石和金色锦缎的马衣，毛色油光水滑。切萨雷身穿法兰西风格的衣服，宽大的黑天鹅绒左袖口上缝着12根金线流苏，右袖上金线织花锦缎不松不紧地缠绕到肘部，胸口上佩戴有闪闪发光的钻石纽扣，无法估价的华贵项链与之相映生辉。紧身裤和长靴都是黑色锦缎制成，头戴黑色锦缎贝雷帽，帽子边缘镶有两朵雕工精巧的红宝石百合熠熠生辉，百合正是法兰西王家的纹章。为了探听切萨雷的动静而来到法兰西的米兰间谍给摩尔人的密报中写道：“这是人类所能见识到极致的美与财富的结合。”“哪怕是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没有谁曾这样进入罗马的城市。”威尼斯大使也如此写道。但是，此情此景竟还有一样欠缺的东西，那就是军队——切萨雷唯一尚未拥有的东西。

路易将脸抵在城堡窗户上看着切萨雷入城的盛况。这队华丽的队列缺少什么，当时的切萨雷十分清楚，但路易在那时却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国王只是对超越了公爵身份的这份气派大为震惊。路易拿到了证明自己至今为止的婚姻无效的教皇诏书，在20天后举行了与先王查理的未亡人安娜的结婚仪式，国王的心腹昂布瓦兹也顺利地带上了枢机主教的红帽子。

切萨雷转瞬间便征服了法兰西宫廷。寡言的他只要是自己没心情便基本不与人交谈，而国王以下的宫廷内外都努力地向他示好。国王待他犹如自己的儿子一般，时常带在自己身边。米兰的间谍在报告了切萨雷日常的活动细节后，结尾处加上了“本世纪最出色的男性”的形容。抢先到达亚维农，在国王身边迎接切萨雷的罗韦雷枢机主教，不光嘴上说着恭维的话，连给教皇的信中也如此写道：

“教皇阁下，我不能再对瓦伦蒂诺公爵在当地的卓越成功闭口不谈了。公爵的年轻朝气、谨慎认真、机智聪明等，以及公爵那被主赐予的身体与精神，完全征服了法兰西宫廷的所有人。公爵得到了国王的最大的赏识，受到包括国王在内所有人的尊重。我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实乃众人心声。”

在这周围的喧嚣之中，只有切萨雷一人没有失去冷静。一边尽力为获得寄住在安娜王妃宫殿里的那波利公主卡洛塔的芳心而努力，另一方面打探着路易的真实用意。切萨雷发现路易也和查理八世一样没有放弃征服那波利的意图。波吉亚在罗马时推测到路易正在策划攻取米兰，然而在这里，切萨雷察觉到国王的真实心意是先夺取米兰，进而征服那波利。米兰公爵摩尔人感到危险正在逼近，便拼命游说那波利国王，但国王还是一如既往不愿让女儿嫁给切萨雷。事到如今，这件事对切萨雷来

说也无关紧要了。最初想让卡洛塔公主嫁给切萨雷的国王路易现在也好像无心再促成这桩婚事了，切萨雷也舍弃了那波利。他将目光转向了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地区。为此，他下决心与法兰西，即拥有武力的路易拉近关系。那时的他，心中丝毫没想过已跟那波利王子结婚的妹妹的事情。

路易“以国王的名义起誓”，与教皇订立了约定，必须为切萨雷再找到一位新娘。这件事很快便敲定了，这个人选就是夏洛特·德·阿尔布瑞特。她的兄长是纳瓦拉王国的国王，因为纳瓦拉王国与各王室之间的姻缘关系非常多，作为教皇儿子的对象不仅是无可挑剔，更是有很大好处的联姻。纳瓦拉国王也接受了法兰西国王的提议并给出了条件。条件的第一条是，让国王拥有神职的弟弟升任枢机主教。第二条，夏洛特放弃纳瓦拉王国的继承权。但是，在丈夫死后又无子嗣的情况下，还可以将瓦朗斯公国的继承权归还给她。切萨雷因没有自己的领地，又是不能被正式承认的教皇儿子的这一耻辱出身，又在这里被迫品尝了苦楚。

1499年5月10日，在昂布瓦斯的城堡里结婚仪式结束了。这个结婚仪式对切萨雷来说很重要，有着决定今后方针的意义。而这意义就是指契约的成立——切萨雷·波吉亚及其亲族、同盟者等所有人，要协助路易十二世进攻米兰公国与那波利王国，而路易则约定要协助切萨雷在意大利的行动。

结婚仪式由国王与王妃担任新郎双亲的职责，虽不是特别盛大，但却充溢着用心筹备的亲切氛围。仪式之后的宴席上，国王显得比新郎切萨雷还要高兴。这之后紧接着的骑马射枪比赛中新郎也出场了，从新娘手中接过授予胜利者的月桂树头冠，收获了人们欢快的庆贺呼声。

切萨雷在最初的夜晚没有忘记向法兰西宫廷里的人们提供话题。对当时的支配者阶级来说，结婚是政治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若不圆房，政治的效力就不能算是被发挥出来了，因此有必要为是否圆房而立证。这一夜的证人是国王与王妃，加上因为有圣职者必须参与的惯例，昂布

瓦兹枢机主教也在场，共计三人。根据为教皇快马加鞭送去的报告——教皇身在罗马，非常担心婚礼的过程，切萨雷先是当着三人的面完成了一次，之后每完成一次都给国王打暗示，当数到第六次的时候，就连国王也笑着说："比我还出色。"

即便如此，法兰西国王尤觉在当时称赞尚不足够，还额外给在罗马的教皇送去了书信，写道：

"瓦伦蒂诺公爵与我那时候相比多了四次。两次在夜宵前，之后还进行了六次。"

而这一切却是伴随着抗议与骚乱完成的。信仰虔诚的基督教徒无法认同国王给予堕落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儿子的优待，奋起抗议的巴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新婚之夜在如潮汐一般若隐若现的"恶魔之子"、"恶魔之子"的喊声中进行着。

九天后，佩戴有金贝壳装饰的银肩章、身披纯白缎子长斗篷跪地的切萨雷被正式授予圣米凯尔宗教骑士团成员荣誉。切萨雷得到的这一殊荣，是自中世纪起、以漫长历史传统为荣的宗教骑士团中原本只能授予正统婚生嫡子的骑士名誉。

数日后，举行了盛大的血统认定仪式。切萨雷与他的子孙今后将被允许使用法兰西王家的身份与百合纹章。这位教皇私生子出身的原枢机主教，在未来将以切萨雷·波吉亚·德·弗朗西亚之名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亲族、瓦朗斯公爵。

路易想尽早品尝到从这位原枢机主教那里所获得的好处，至少趁机先把米兰得手，而若是像查理那时候等反法兰西同盟结成就晚了。教皇方面看起来也对此并无异议，1494年法兰西军入侵时始终持反法兰西立场的亚历山大六世，如今也转为以儿子的立场优先，尽自己之力辅助。话虽如此，教皇却仍是任命了自己的侄子——蒙雷阿莱枢机主教为特

使，命他走访意大利各国，鼓吹曾经的反法兰西同盟意识，当然行程中也包括米兰。波吉亚家族只想利用路易一段时间，只要达成了切萨雷的目的，之后的路易就毫无用处了。而当那刻到来，反法兰西同盟将立刻活动起来。持有表里双重牌面的纸牌游戏，这是即将迎来24岁的切萨雷的游戏，它还有另一个正式的名字，叫作政治。

然而，新婚宴尔的年轻妻子夏洛特却完全不了解丈夫的脑中究竟做何打算，她所知道的切萨雷只是个俊美健硕且对妻子细心呵护的年轻人。在结婚仪式四日后，丈夫将领地交由一名家臣管理，在昂布瓦斯的城堡里只两人相伴却仍不觉乏味。享受着这样的时光，年轻的妻子倍感幸福，她觉得两人就像一对忘却了世间烦恼的普通爱侣，沉浸在只有彼此的世界里。

但是对夏洛特来说，自己与丈夫的两人时光转眼就结束了。5月20日，路易十二世终于踏出了进攻米兰的第一步，切萨雷也在其随行之列，准备向里昂出发的丈夫希望妻子可以同行。于是，随后国王与军队在里昂等待时机的两个多月，成为夏洛特与切萨雷一同度过的最后时光。终于在一天清晨，切萨雷将自己在法兰西领地的一切权限交给了刚满17岁的妻子后，骑马奔赴前线。一段时间后，夏洛特知道自己怀孕了。

9月9日，切萨雷到了格勒诺布尔。在这次战争中，他几乎无事可做。在翻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一拥而入的法兰西军队和从东边绕道过来的威尼斯共和国军双面夹击下，米兰的抵抗很快消失了。摩尔人带着20万达克特的金币逃跑了，逃向有姻亲关系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求援。10月6日，切萨雷陪同国王路易进入米兰城，教皇特使蒙雷阿莱枢机主教和罗韦雷枢机主教也随行在旁。意大利的君侯们向国王送来胜利的庆贺陆陆续续地被送达米兰城，其中有摩尔人的岳父——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以及曾在塔罗战役中将查理打败的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在米兰大教堂被授予米兰公爵称号的路

易，毫无顾忌地在意大利亚君侯们的面前表现出了对切萨雷的宠信。对波吉亚的存在感到毛骨悚然的君侯们，无法从路易与切萨雷身上移开他们不安的视线。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在给他妻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们有必要更加注意瓦伦蒂诺公爵的动静。"

在米兰雄伟壮丽的城堡中，切萨雷即使被衣着华丽的宫人前呼后拥，也没有忘记与自己分别的妻子，时常派人给妻子送去礼物，可口的点心、威尼斯产的衣服料子以及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等，不一而足。而后，也曾于意大利获得高位之时，想将妻子从法兰西接来，却没能实现，只从夏洛特处得到了因病无法前来的回复。而夏洛特也曾一度请求丈夫回到法兰西，但切萨雷是不可能接受的，随着他对意大利的野心一步步实现，切萨雷再也无法离开这里了。不过，夏洛特所谓因病无法前往，却并非出自她本意。从路易十二世对切萨雷产生戒心的那刻起，夏洛特便从事实上成为人质，她甚至不能离开法兰西去兄长所在的纳瓦拉生活。后夏洛特产女，取名为露易丝，而这个从没见过父亲一面的女儿，在伊修丹的城中陪伴着夏洛特默默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第二章

终于，切萨雷迎来了首次出阵的时刻，路易曾许诺在法兰西攻占米兰公国成功后，就会对切萨雷提供援助。开始行动的切萨雷把最初的目标指向了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涅。当然，无论是怎样的征服，发兵之时都需师出有名。不过这对于有个教皇父亲的切萨雷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对教皇领土内肆无忌惮僭越称王的小领主们进行镇压，收复教会在地方应有的权力，这在基督教国家中是毫无争议的，更何况教皇领土内罗马涅地区列国分立、秩序混乱，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罗马涅的小领主们均是在被教会授予“教皇代理”的官衔后，方能统管地区治理，故代替教会进行统治的他们有义务向教会缴纳一定金额的岁贡。然而，教皇所代表的教会权威自阿维尼翁之囚[1]时代起便大不如前，领主们也不复往日教皇代理的恭顺谦卑，半世纪以来没有人上交岁贡，也无人愿意服从教皇了。而费拉拉公国虽也是由教皇分封的封地，但经历了埃斯特家族数代的善政，确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体制，成为教会也无法简单出手干涉的状态。但是，实力并不如埃斯特家族的罗马涅小领主们则需另当别论，历代教皇为了降服他们不惜软硬兼施，但均告失败。而当罗马周边有着科隆纳、奥尔西尼这样棘手的豪族时，教皇更是无暇管制远方罗马涅小领主们的横暴。当时教会国家的软弱无力放任了小领主们的统治，马基雅维利在书中评价这些领主为“不知执政之道，只知一己私欲”的家伙。提升罗马教会的权威、镇压僭越横暴的领主，切萨雷抓住了这无人能非难的两点，让自己的出兵做到了师出有名，剩下的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领主们发布宣战声明即可。而教皇诏书就位后，最后一项准备也完成了。

伊夫·达勒格莱指挥下的三百枪骑兵，第戎所指挥的加斯科涅与瑞

士的步兵四千，这些兵力由路易十二世出借，切萨雷负担费用。此外还雇佣了阿基里·蒂佩尔提和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的军队，意大利、西班牙士兵混编的军队则由著名的佣兵队长维特罗佐·维特里指挥。切萨雷担当的就是这支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拼凑而成的佣兵军队的总指挥。

1499年11月5日，路易十二世要求曼托瓦和博洛尼亚两国认可切萨雷的军队在其领土内通行自由。两日后，路易将米兰公国交付给部下意大利武将特里武尔齐奥，自己率领全部家臣返回法兰西。

11月9日，切萨雷从米兰出发。意大利各国都想看看这位原枢机主教作为军队统领的能力如何，在他们的密切关注中，切萨雷和他的军队踏上了1500年前尤利乌斯·恺撒从高卢去往罗马曾走过的行军之路。皮亚琴察、帕尔马、雷焦还有摩德纳，切萨雷将最初的攻击目标锁定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伯爵夫人的领土弗利和伊莫拉。选择最先进攻她的领土的理由有两点，弗利是罗马涅地区军事要冲，属地势上的必争之地，而米兰的摩尔人的退败又使得斯福尔扎家族在意大利内部日渐式微。然而，波吉亚也不是完全没有误算，卡特丽娜虽为女性，但却是位不能轻视的敌人。作为24岁切萨雷首战的对象，这位36岁却仍然貌美的女中豪杰可以说是相当难对付的对手，而这在尚未交战之前就已有征兆。

11月17日，切萨雷进入摩德纳后即接见了等候在此的两名博洛尼亚使节，他们带来博洛尼亚准予切萨雷军队行军过境的许可。有了这份博洛尼亚领土内通行自由的许可，切萨雷本可继续行军，但他当日却将军队丢在摩德纳，只带了几个随从就急匆匆地向罗马出发，快马加鞭地在翌日一早就到达了梵蒂冈。当时所有人都不理解切萨雷为何如此行事，不过根据后续发生的事情推测，他那时应是收到了教皇的急报。急报是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预谋毒杀教皇而计划暴露的事情，她的家臣带着需教皇亲启的书信来到罗马，但在尚未递交书信前就被逮捕，并一五一十全部坦白了阴谋。据交代，毒杀计划是想让教皇感染鼠疫发病而

死，这封“教皇亲启”的书信为了附着细菌曾置于因鼠疫而死去的人胸膛上，而由红色毛织布严密卷着的封套则能保护送信人不致被细菌感染。布鲁卡鲁多的记录写道，“这样的阴谋已构成了重罪”，《弗利年代记》和浦瑞里的《威尼斯年代记》也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而曼托瓦的情报官卡塔内更是于当月的21日、24日、26日三次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汇报，马基雅维利也提及了此事。但是也有一些年代记作者认为这件事是波吉亚为了将针对卡特丽娜的意图正当化而故意捏造的。

无论真相如何，四日后的21日，切萨雷再次回到了摩德纳。23日，军队再次拔营启程，朝着艾米利亚大道前行，遥望远方便是高塔林立的城镇——伊莫拉，第一个要攻打的卡特丽娜治下的要塞。

“拥有最强精神和胆识的她，毫无疑问是意大利的第一女性。”曾被《威尼斯年代记》作者如此称赞的卡特丽娜，正用毕生决战的气魄等待着切萨雷。卡特丽娜的祖父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与同时代那位蒙托内的布拉乔[2]的威名不相上下，从一介佣兵队长一步步当上米兰公爵。她对自己身体里流着的血有着强烈的骄傲，绝不能允许自己输给所谓教士的儿子。而正是这份骄傲支撑着她度过波澜壮阔的前半生，父亲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在她13岁的时候被暗杀，而后虽然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外甥吉罗拉莫·里阿里奥结婚，但丈夫却在她24岁时被家臣暗杀，第二任丈夫贾科莫·菲欧也死于暗杀，当时她对此事的复仇甚至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身边人只有美第奇家族出身的第三任丈夫是正常的病逝而终。让儿子靠边站，卡特丽娜作为实质上的当家统治着领土，她有着不输男人的御马之术和身披甲胄也无法掩盖的修长健美的身躯，心境也犹如古代的亚马逊族[3]一般，爱与憎两种情绪以同样的热度燃烧于胸。而交战时那异于常人的胆识，在第一任丈夫被暗杀时便已展露无遗。当反叛的贼人们在城堡外面挟持着她的孩子，威胁她在黎明之前交出城堡，否则就杀掉孩子的时候，站在城堡上面的卡特丽娜不慌不忙地掀开裙子，接着高声地喊着回话：

“蠢货们，你们就没想过孩子之类的，以后我还不是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吗？”

哑口无言的贼人们空张着嘴，完全中了她拖延时间的计谋，早已记不得要杀死孩子了。

然而这位“女强人”却不懂得政治。十三年的统治只是在镇压和恐怖中维持，民心早已尽失，面对前来的切萨雷，伊莫拉的民众们毫无反抗地就打开了城门。

11月25日，切萨雷率领军队，被民众“解放者”的欢呼声簇拥着，进入了伊莫拉城。这个消息对卡特丽娜来说很是打击，她立刻将伊莫拉的市民人质处以绞刑。但这对切萨雷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得到了伊莫拉，这里的要塞尚未被攻破。以守卫坚固而闻名的这座要塞，现在是由留守的将军纳尔多指挥防守。切萨雷先是在要塞周围布满火炮队列，随后对其进行劝降，所给出的条件是不追究一切罪责，如有意愿可将其收为自己的部下。但纳尔多拒绝了降服，战斗随即开始。要塞的守卫虽然很坚固，但在大炮的轰炸之下，守备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12月8日，认为已时机成熟的切萨雷以不想再增加死者数量为由，再次向其劝降。纳尔多请求宽限三日以做考虑，三日内若没有从弗利来的援军就交出要塞。切萨雷随即命令停止攻击，静候约定之期。然而，卡特丽娜正忙着为弗利的防守战做准备，根本不可能回应纳尔多的援军请求。至此，伊莫拉已完全臣服于切萨雷。12月13日，教皇特使蒙雷阿莱枢机主教带来了教皇对战争胜利的祝贺，并宣布伊莫拉今后将正式归于教皇治下。切萨雷格外优待了投降的将军纳尔多，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部队。但纳尔多唯独做不到在阵前与旧主卡特丽娜伯爵夫人交战，故回复说自己的生死去留任凭切萨雷处置，只希望能暂时不上战场。切萨雷没有强求。后来，答应在切萨雷手下效力的纳尔多与唐·米凯罗特一起成为追随切萨雷的部下中最忠诚的一员。

切萨雷带领军队顺着艾米利亚大道南下，奔向下一个攻击目标弗利——卡特丽娜领土的都城。另一方面，卡特丽娜打算将紧邻弗利城的拉瓦尔迪诺城堡作为迎击敌人的地点，两千士兵在她的总指挥下固守城池，但这终究也不过是由佣兵集结而成的军队。面对显而易见的战斗结果，她还是拒绝了切萨雷提出的讲和条件——交出城堡便保证她后半生安享年金的平稳生活，反而是将孩子们和宝石等贵重物品全部交付给第三任丈夫的本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后，独自一人誓死要将这场绝望的防御战进行到底。但是，受到伊莫拉前例的打击，先发制人的卡特丽娜叫来了弗利的长老们。她向这些对着伯爵夫人毕恭毕敬的长老发问道，是想对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进行抵抗，还是要效仿伊莫拉的例子，长老们的回答是后者。他们为卡特丽娜的暴政所苦，并且听闻了切萨雷对伊莫拉民众的宽大处理。事实上，弗利也是同样在切萨雷面前打开了城门，而卡特丽娜则越发依仗城堡的防卫。萨努多在他的《日志》中将弗利民众投诚的行为评价为“就如同卖淫一般”。而马基雅维利则写道，要是卡特丽娜认真思考过防御战争的话，比起投入精力坚固城堡，不如尽力地确保民心。

12月19日，傍晚时分，切萨雷被步兵队簇拥着进入了弗利。他骑着白马，盔甲外披着绢布披风，那天下着大雨，雨滴顺着一贯插着白色羽毛的贝雷帽檐滴滴答答地落下。在迎接切萨雷的城市长老中，还包括卡特丽娜最为信任的亲信努迈，而他现在将自己的家作为落脚点提供给切萨雷以示欢迎。

翌日天气晴好，火炮的队列向着卡特丽娜固守的拉瓦尔迪诺城堡的方向一字排开，而后在切萨雷的一声令下，逐一点火开炮。大炮的余音尚未消散，弓箭就朝着城墙上的守备军们一齐放出。数日之间，这样的情景循环往复，直至基督诞辰祭。虽然士兵被允许在诞辰祭期间休息，但主将却无休息之理。这一日的切萨雷骑马来到了环绕城堡的护城河边，随从吹响小号，向伯爵夫人传达了想与之谈话的意向。卡特丽娜在城堡上现身了，切萨雷随即翻身下马，手上低拿着插有羽毛的贝雷帽，

像邀舞一般优雅地低下了头，卡特丽娜也像是不想输了气势一般，微微弯腰还他以典雅的行礼。切萨雷搬出各种理由对她劝降，从可以给她名誉地位保证她的安全，到不要再重复无谓的牺牲。但是卡特丽娜却昂然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说自己已决定跟随着命运的脚步前进，就算等待在前方的是死亡。第一次的会谈就这样决裂了，尽管如此，切萨雷依然没有放弃通过劝降她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占领的想法。

数日以后，他再次来到护城河边。然而卡特丽娜的身影这次却并没有出现在城墙上，相反有一副吊桥降到了护城河上，她边走近吊桥边温柔地邀请他来桥上谈话。切萨雷也正有此意，但当他刚要迈步踏上吊桥的时候，铁索相碰撞的可怕声音响了起来，吊桥在他的眼前被向上收了起来。差一点他就掉到圈套里了。因事关重大而失去冷静的卡特丽娜的家臣们，在得到她的命令之前就过早地收起了吊桥，切萨雷才侥幸逃过一劫。“女人总是能教会你一些事”——深刻领教了这句古老谚语的切萨雷跳上马，满面愤怒脸色铁青地骑马回了大本营。

从这天起，对话便不再是语言，而是以武器代之。大炮连日里不停地开炮，连续15日炮击持续不停，尽管如此城堡还是固若金汤。切萨雷向全军发出布告，活捉伯爵夫人者赏金10000达克特，杀死她的给赏金5000达克特。但是，面对在意大利首次遇到的如此认真的抵抗，对战斗感到厌倦了的法兰西士兵们已经不想再离开城镇去重返战线了。然而切萨雷对士兵们放任不管，这期间他在忙着从拉文纳调配两艘船只，从城镇各处收集成捆的劈柴，再将劈柴捆埋入护城河，并在其上面固定好船只，打算搭建吊桥，大炮的炮口也都全部调整为朝向一处以集中炮火。将这些都准备妥当的切萨雷回到城镇中吃午餐，在席间他说道：“几天后伯爵夫人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我可以拿300达克特做赌注。”一个法兰西队长大笑着应下了这300达克特的赌注，其他队长也都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赌局，而这正中了切萨雷的谋划。总司令官如此自信的态度透过赌局瞬间扩展至全军，连留在城镇中的法兰西士兵们也都争相奔去阵地，全军都弥漫着速战速决的气势。

向着城墙一处瞄准集中火力，这在战术上取得了双重成功。第一是通过这种攻击可以在制作吊桥时阻碍守备军的干扰；第二是可以打破城墙，确保攻入城堡的道路。1月12日，这天成了拉瓦尔迪诺城堡和它的女主人卡特丽娜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固守城池抵抗的最后一日。午后，根据切萨雷的信号，开始了对城堡的突入。

最终的战况激烈骇人，卡特丽娜甚至亲自挥着沾血的刀奋战，直到最后一刻都未曾放弃战斗。在算不上宽敞的城堡中，有至少四百，或根据法兰西的记录有七百名士兵战死，城墙中到处都回荡着受伤士兵临终前的呻吟。最终的投降也并非卡特丽娜所愿，而是手下队长的叛变。入夜时分，卡特丽娜最终被切萨雷的部下抓获，并于午夜将至之时，由切萨雷和他的副将伊夫·达勒格莱一左一右地押出城。

当晚和次日全天，切萨雷带着卡特丽娜在私室闭门不出。舆论沸腾了，说这是对失去自由的高贵女性的侮辱行为，然而切萨雷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将这位最具女性魅力的美丽亚马逊女战士作为自己首战大捷的战利品，对彼此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待遇。

这是切萨雷作为武将闯过的第一关——成功攻下弗利，而且还是在率领着分为四个国籍分别从各地召集来的佣兵队的基础上。然而，仅仅征服则毫无意义，作为征服地的统治者，不得不做的事情堆积如山。

首先，切萨雷严禁自己的军队对占领地进行习以为常的战后掠夺，违反者就算是将领也要判死罪。此举意在拉拢民心，进而将征服的土地一个一个地变成将来自己王国的一部分，为了那个时刻，民众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对于战败君主的东西，可以没有顾虑地抢夺，即使如此，无论是在伊莫拉还是弗利，无关身份，任意一个市民都有向他提出反对和不满的权利。就这样，他小心约束着部下，仔细监控着占领地的各个角落。

第二点，切萨雷只将占领土地的总督和要塞守将替换上自己的部

下，并不插手这之外的城市代表委员会和长老的位子，跟从前一样，还是将行政交于他们自行管理，弗利和伊拉莫的总督则任命自己的心腹拉米罗·德·洛尔卡担任。

23日早晨，切萨雷离开弗利，向着下一个目的地佩萨罗出发。同一万五千人的军队随行的还有被切萨雷和伊夫·达勒格莱夹在队伍中间、披着土耳其风格的黑色面纱骑马同行的卡特丽娜。被誉为“意大利第一女性”的这位女性的前方，只有被幽禁在圣安杰洛城堡的不幸等待着她。结束幽禁之后，被释放的她去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待了九年后去世，再也没能看到弗利这片土地。

率领军队离开弗利的切萨雷，在到达蒙特费欧雷城镇的时候被信使快马追上。信件是由守卫米兰的特里武尔齐奥将军发出的急件，致跟随切萨雷的全体法兰西士兵的命令，命他们紧急赶回米兰。有情报显示，曾一度抛下米兰逃走的摩尔人接受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援助现已占领了科莫，并顺利地逼近了米兰的城外，企图夺回米兰。特里武尔齐奥打算暂时先撤出城外，在提挈诺地区为援军到来争取时间。

切萨雷对此毫无办法，在他静止的视线中，四千三百人的法兰西士兵带着他们自己的武器乃至大炮离去了。虽然法兰西士兵在人数上占比少，但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精英，切萨雷想要只靠剩下的这些士兵继续战斗是行不通的，他的第二目标攻占佩萨罗在此被迫无奈地终止了。在这之后，切萨雷虽也时常展示出他天才的大胆行动，但从未鲁莽行事。只要时机到了，佩萨罗早晚要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当下暂且先回罗马，现在的他除此外也确实别无他法。

---

[1] 阿维尼翁之囚：13世纪末时基督教（实指罗马教廷）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集团，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到了“阿维尼翁教皇”时，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教廷也由罗马迁往靠近法国边境的城市阿维尼翁，教皇势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后世的历史学家将此时的教皇称为“阿维尼翁之囚”。——译者注

[2] 蒙托内的布拉乔是一个人的代称，即安德烈亚·弗Andrea Fortebracci，1368——1424），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省的蒙托内地区，是一名没落贵族出身的雇佣兵队长，与弗朗切斯

科·斯福尔扎有过同袍之谊，彼此声名不相上下，拥有自己独到的军事战术见解。因家族发源壮大于蒙托内，且安德烈亚为家族最为人知的一员，故被人称为蒙托内的布拉乔，家族在之后还对该地区有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译者注

[3] 亚马逊族：亚马逊一族是一个谜一样的女战士族，她们与无数希腊英雄在不同的传说之中。根据习俗，男人是不能进入亚马逊人的国境的，但亚马逊人每年都会到访高加索的戈尔加利安斯（Gargereans），为的是传宗接代，在这个联婚盛会上生下来的女婴都会交由亚马逊一族养大成人。每一个亚马逊女战士长大成人时都会烧掉或切去右边乳房，以便投掷标枪或拉弓射箭。——译者注

第三章

当切萨雷忙于与卡特丽娜在弗利交战的同时，在罗马的亚历山大六世举办了重大的宗教仪式——恰逢第1500回的基督诞辰祭。

转过年就迎来了公元1500年，这对基督教徒们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一年，从欧洲各地前来罗马朝拜的巡礼者们日渐增多，随着复活节的临近，整个罗马甚至都要被人群所淹没了。巡礼者们大多身着粗制的白色巡礼服，拄着未经加工的粗树枝充当拐杖，四处参拜罗马市内的大教堂与教会。包括被誉为罗马四大教堂的圣彼得、圣母马利亚、圣乔万尼、圣保罗教堂在内，个个教堂中终日回荡着他们咏唱赞美歌的声音，而在圣彼得广场，为了听取教皇的教诲聚集的巡礼者据说有两万人之多。对他们这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们来说，在圣地耶路撒冷被异教徒侵占之时，罗马是仅存唯一的圣地。

切萨雷对这些从北方前来、一贫如洗却仍说着庄严死板的话语的巡礼者们，态度冷漠又反感。而他的表态并非是视若不见的忽视，反而是通过自己无言的行动释放着暗藏敌意的挑衅。

2月26日，为庆祝首战告捷而返回罗马的切萨雷和他的军队惊扰民众无数。亲卫队统一穿着整齐的黑天鹅绒制服，在其队列正中的切萨雷也同样身着黑天鹅绒服饰，但颈上配有亮闪闪的银项链，胯下白色骏马着实打眼。这位原枢机主教的一行人好似要冲散巡礼者一般前进着，巡礼者们也只好一边向神叹息着祈祷，一边让出了道路。而切萨雷一行则跟随着出来迎接的枢机主教们，沿着科尔索大道行进，通过密涅瓦神殿、鲜花广场，绕过罗马的市中心之后，走过特韦雷河上的桥，在圣安杰洛城堡前整备队列，最终走向了教皇宫。

3月9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废弃了统治弗利与伊莫拉的卡特丽娜及其儿子的执政权，并发布诏书将其继承权赋予了切萨雷。

3月29日，切萨雷在圣彼得大教堂接过教皇亲手赋予的“黄金玫瑰”，同时被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官，授予“教会的棋手”称号、旗帜与元帅杖。

翌日，巡礼者们不得不再次向神叹息着祈祷，因为他们被迫目睹了一场最为厌恶的古罗马式的凯旋仪式，而且还是为教皇的儿子——舍弃了光荣的枢机主教身份的切萨雷所举行。这一日，效仿古代罗马将军的凯旋，队列由十一辆装饰华美的战车打头阵，绕纳沃纳广场一周后，在罗马的中心列队游行直到梵蒂冈前面。在装饰有描绘着尤利乌斯·恺撒胜利的盾牌的十辆战车后面出现的，是手握四匹白色骏马缰绳的切萨雷在战车上昂然的身姿。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道路尽头成群的民众，而是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数日后，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参拜的巡礼者们又看到了让人惊奇愕然的一幕，教堂正前方的广场上围起了低矮的木栅栏，罗马当地的市民们也三三两两聚集而来，好奇询问后得知这竟是狂欢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栅栏里面六头公牛被逐一放出。当凶猛狂暴的公牛为了从栅栏里出来，猛然发飙地撞上栅栏的时候，周边的民众们就欢呼着从栅栏边上散开，但又会很快回到栅栏边上，发出声音或是扔东西来激怒公牛。扬起的沙尘覆盖了整片地区，切萨雷的身影在沙尘深处出现，骑茶色骏马，上身穿白色宽袖衬衫、领口大开，下着灰色紧身裤，武器仅有手上的一柄枪和腰间别着的一把短剑。

描绘有公元1500年当罗马的主要教会和巡礼者们的图画

公牛们霎时齐向切萨雷袭去，蹄声震天、尘土飞扬。公牛猛然的攻击掀起了一片浓重沙尘，紧贴着栅栏的民众们只能看到在尘土中若隐若现的举枪瞄准的切萨雷和马匹的上半身。间或有公牛狰狞的黑脸从尘埃中间显露出来，伴随着钢枪入肉的钝声，随后人们能看到一头牛静止不动了，下个瞬间，便随着巨响应声倒地。最后清晰留下的，只有四溅的鲜血把周围的土地染得犹如血海一般。

几乎一息之间，第二头公牛也被打倒了。接着是第三头。切萨雷的双颊逐渐变得潮红，头发因沾染尘土略有发白，额发下的双眼炽热如火，而瀑布般流下的汗水令薄灰色的紧身裤颜色更加深重。第四头公牛头撞在栅栏上死了，从眉间溅出的鲜血飞散到了围观的人群中。随后是

第五头。被血染黑的地面，不复开始时那样的尘土飞扬，切萨雷胯下骏马的马蹄现在也清楚可见。

沙尘散尽，在紧张得吞咽着口水的人们的守望中，切萨雷定睛看着最后一头公牛。这头公牛从一开始就很醒目，通体漆黑油光发亮，比之前任何一头牛都高大凶猛。现在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时刻，公牛将尖角直指切萨雷所骑骏马的侧腹，深深低下头，边用前蹄刨着地面边喘着粗气。切萨雷将枪丢到一旁，转而拔出了剑。公牛冲了过来，扬起了新的尘土，人们透过沙尘听到了受到尖锐一击后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映入民众眼帘的，是脖子受到刀背重击后倒在圣彼得大教堂石阶下的公牛那巨大的身躯。一瞬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知晓如何享受这种娱乐的罗马民众们的反应狂热十足。但切萨雷却对他们视若无睹，仅仅手握着拔出的剑，俯视着死掉的那头公牛。

对远道而来的巡礼者来说，罗马就像是恶魔的巢穴一般，他们在教堂祈祷的声音也渐渐带有了疯狂的势头。在他们看来，6月29日在梵蒂冈的落雷以及教皇因此而头部两处受伤，全部都是神所降下的惩罚。而圣彼得广场被牛血染红的三个月后所发生的事件，更让虔诚的信众心生恐惧，犹恐最后审判之时就快要降临——这一次流淌的不再是公牛的血，而是人类的鲜血。

这段时间，卢克雷齐娅的丈夫比谢利公爵为自己在罗马的立场日渐不安。生活在教皇身边的他明显察觉到，以切萨雷法兰西之行为转折点，曾经友好的罗马与那波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早在一年以前，他就曾像卢克雷齐娅的第一任丈夫佩萨罗伯爵一样骑马逃离过罗马。但那时，受托于那波利王的请求“现在绝不能损坏教皇的心情”，而不情愿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卢克雷齐娅对此非常欢喜，她对这位南国贵公子做派的美男子很是痴迷。然而，已经育有儿子罗德里格的这对夫妻，在这之后婚姻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7月15日的夜半时分，比谢利公爵离开了教皇宫。他是去看望妻子

卢克雷齐娅和妹妹桑夏——她们为照看教皇病情而暂时搬到了教皇宫——并与她们及教皇一起愉快地共进了晚餐。之后，公爵在一名侍从相伴下，横穿圣彼得广场，突然从黑暗之中现身数名贼人对公爵发起袭击。公爵虽立即迎战，但势单力薄，很快就身受重伤倒下。直到这时，因恐惧而动弹不得的侍从才总算回过神，跑回教皇宫拍门求救。贼人们正要将公爵掳上马背带走，但看见闻声而出的卫兵身影，便就地丢下公爵逃跑了。待到卫兵们赶到倒地不起的公爵身边时，只能听见贼人们骑马远逃的马蹄声。

公爵被抬进了梵蒂冈里教皇居所的其中一间屋内，右臂和左侧大腿受了重伤。看到丈夫这般凄惨的模样，卢克雷齐娅一声呻吟就昏了过去。宫殿上下因这突如其来的凶事变得惶恐不安，教皇也胆战心惊，当即将自己的亲兵们派去临时病房，守卫动弹不得的公爵。

第二天一早，这件事在罗马已是众人皆知。当日，威尼斯大使卡佩罗就此事如此写道：

“竟无一人提及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指使的？梵蒂冈的相关人士们自不必说，就连各国大使也都闭口不谈，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答案。在此时的罗马，关于事件的传闻一直不断衍生，只是所有人都决口不提这个人的名字。”

大约是得益于尚且年轻，或更多得益于同居一室的卢克雷齐娅和桑夏她们的贴身照顾，为了以防万一有人毒杀，一日三餐的饮食均是由她们亲手料理，比谢利公爵恢复得很快，已经可以离开病榻自己走到窗边了。但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18日傍晚，公爵突如其来的死讯震动了整个罗马。

这一日的下午，卢克雷齐娅和桑夏蒙教皇召见，要经过两扇门去到教皇个人的房间，不得不暂时离开公爵的病房。眨眼的工夫，守卫病房的教皇士兵和医生便被抓了起来，唐·米凯罗特进入了病房，关上了房

门。稍后回来的卢克雷齐娅和桑夏看到的只有门外那些从未见过的武装士兵，面对她们二人，唐·米凯罗特说明道“公爵不幸摔落地面身亡了”，而她们想要亲见一眼遗体的请求也没有被允许。数日前，教皇叹息着说的“要发生的事儿，早晚都会发生”好似预言般被印证了。

已经没有人再避讳造成这起惨剧的主谋者的名字，只是，关于他的动机，又催生了无数个版本的传言。传言中，是因为切萨雷对妹妹抱有不正当的恋慕之情而导致对公爵的嫉妒，或是因无法同那波利公主卡洛塔结婚的切萨雷对那波利王家的怨恨所致。对于这些传闻，切萨雷制作出了以下的公开解释：

“因为比谢利公爵在筹备谋杀我的计划，所以这次的事件属于正当防卫。”

然而，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们并不相信那些儿女情长、爱恨情仇般的传言，他们的职业要求冷静的观察。他们逐渐开始理解切萨雷这个马上要到25岁的男人了，他是挣脱了自古以来桎梏世人的宗教性良知与道德、伦理之枷锁的，完全自由的男人，他是为达目的只因合理性和现实的有效性做判断决定、不择手段的男人，这才是切萨雷这个男人的本质。在他们向本国的君主和政府发去的汇报中，就谋划此次暗杀事件的切萨雷的动机，进行了四项可能的推测：

（一）消除不利于巩固自身在罗马立场的威胁目标。特别是比谢利公爵，其同坚持反抗教皇的科隆纳一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对舍弃了那波利的切萨雷来说，与那波利王族保持关系不只是没有好处更是失去了意义。关于卢克雷齐娅，还有更多其他可利用的方式。

（三）为了迫使教皇彻底且无反转余地地转向提携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法兰西。教皇曾因最爱的女儿卢克雷齐娅同那波利王家成员成婚，

而无法轻易下决心反对那波利。

（四）为了向有意征服那波利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展示自己的忠诚。

无论如何，比谢利公爵的死对切萨雷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教皇父亲对切萨雷的这种做法虽不可能不清楚，但作为父亲，面对已日渐成熟，甚至自己也无可奈何的儿子，在畏惧的同时仍伴有深切的爱。

第四章

在南方的罗马因切萨雷的古罗马凯旋仪式、西班牙式斗牛以及暗杀妹夫比谢利公爵等事件而人心惶惶的同时，在北方的米兰，法兰西在逐渐夺回优势。曾一度策划准备夺回米兰的米兰公爵摩尔人吃了彻底的败仗，自己也成了法兰西军的俘虏，至此，归属于意大利五列强之一的斯福尔扎家的米兰，完全屈服在了法兰西之下。而曾被誉为权谋术数大家的摩尔人则将作为囚徒，在法兰西的罗谢渡过其人生的最后十年。

摩尔人的没落对切萨雷来说则意味着行动的重启。切萨雷可以再次期待法兰西军的援助，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的战略计划。但是，由于没有任凭自己调遣的士兵，军事行动并不能立即开展。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兵不血刃的策略。在人们仍对血腥的比谢利公爵暗杀事件没完没了地议论的时候，切萨雷已在毫不松懈地为第二次的征战稳步地做着事前准备。

第二次征战的目标包括切塞纳、里米尼、佩萨罗、法恩扎。第一次的行军攻下了弗利、伊莫拉，第二次切萨雷将完整地拿下罗马涅，继而是部分马尔凯地区，首先瞄准的是切塞纳。

位于弗利和里米尼中间的这片领地，世世代代由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所支配，直到1465年马拉泰斯塔家的正统血脉断绝后，这里才成为教会的直辖领地。不过，这片土地也毫不例外于罗马涅地区的混乱，迪贝蒂家族和马蒂内利家族两家分立纷争不断。切萨雷正是盯上了这一点，同时秘密地向两家泄露情报，称教皇似乎颇为关注对头的家族。迪贝蒂家和马蒂内利家完全中了计，对彼此的憎恶与焦急开始摆上了台面。某个周日的早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举行弥撒之时，憎恶令两个家

族的人们忘却了身处何地，因一点小事就演变成了流血事件。事件很快传到了罗马教皇厅，两家的当家被召唤来到罗马，教皇表示神不允许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了，并建议双方接纳切萨雷为新任领主。虽然他们都不想让切萨雷成为领主，但更加不能忍受的是对方家族得到势力。8月2日，根据教皇诏书宣布，切萨雷成为切塞纳的领主。就这样，足不出户，切萨雷就掌握了一个国家。

随后的切萨雷仿佛不知疲倦，在第二次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不得不做的事情至少还有三件：第一，在攻打里米尼、法恩扎的同时封锁威尼斯的动作；第二，编制属于自己的独立军队；第三，筹备为了实现军事构想所必备的军费。

首先是第一点，必须慎重制定针对威尼斯的对策。只靠暗杀一两个领导者，不可能在政治上使这个坚固的共和制国家有任何变化。威尼斯彻底贯彻现实主义的政治，并拥有地中海贸易带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当时意大利境内最为强大安定的领地自居，傲视群雄。对于波吉亚家族来说，一举一动都不得不考虑到威尼斯，小心避免与之为敌。更何况，作为切萨雷第二次征战目标的里米尼和法恩扎，也是想要扩张势力的威尼斯所瞄上的地盘，毫无疑问，这个强国会反对切萨雷的举动。而对刚刚起步的切萨雷来说，现实不允许他在无视威尼斯共和国反对的前提下一意孤行。只要得到威尼斯的默认，对切萨雷来说就是成功。

面对这个以拥有老练外交而闻名的强国，波吉亚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案。强硬的一面是乘人之危——利用威尼斯的现状。当时威尼斯所面对的是在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开端、大肆扩张势力的土耳其帝国，迫不得已担起了守护累范特（东地中海）海域的责任。对于威尼斯人来说，靠贸易生存的他们，视累范特海域为本国内海，对于这个国势式微的前兆，也只能满怀悲伤地接受。被希腊沿岸殖民地不断驱赶的他们，在这一年的6月连海军基地迈索尼也失守了。作为在累范特的两大海军基地，与克里特岛同等重要的莫东（今称迈索尼）的陷落，给威尼

斯人心里投下了灰暗的阴影。“在威尼斯人的心中，莫东相当于威尼斯的门户，战败的消息令所有人都陷入了无声的失落中”，年代记作者萨努多在这一日以悲痛的文笔如此写道。当时的威尼斯人将自己比作基督教世界的城墙，誓死抵抗土耳其帝国，同时指责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对抵御异教徒毫无作为。然而，若累范特被土耳其攻下，利益受损的只有威尼斯，因而欧洲诸国对威尼斯所提倡的十字军远征也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付诸行动的意思。在基督教世界中，威尼斯最后能倚仗的对象只有罗马教皇了，而切萨雷注意到了威尼斯的困境。利用教皇的身份令其十字军远征的构想不至破灭，从而牵制威尼斯，并趁其不得不专注于防卫土耳其之时，将攻占里米尼、法恩扎变成既定事实——这便是切萨雷构想中强硬的一面，而同时，他也在谋划着怀柔的计策。

6月29日，在梵蒂冈的教皇曾因落雷受了轻伤，在探望的众人中，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卡佩罗也在。当前来探望教皇的大使准备告辞之时，切萨雷对他说要送他回家，于是两人便一同退出了教皇的房间。在梵蒂冈宽敞悠长的长廊下，切萨雷亲近地挽着大使的手臂，向大使一侧偏头边走边低声说道：

“大使，这次的事情让我非常震惊。一想到那样的不测若当真发生了，就止不住地心慌。上天虽未真的降下不测，但事发当时，我心里有一瞬是把您当作父亲一般依仗的啊。”

老练的外交官卡佩罗稍稍俯视着这样的切萨雷，回答道：

“公爵，您真是聪慧过人哪。十分清楚您自己失去教皇陛下后，立场上会是如何的艰难。”

大使卡佩罗将与切萨雷的如上对话汇报给本国政府，还写道切萨雷想获得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地位，以及下任教皇可能会是威尼斯出身者的推测等，而这些被视为波吉亚对威尼斯的好感度的表现。

8月8日，教皇将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法恩扎的曼弗雷迪以及佩萨罗的斯福尔扎家进行了除名处置，威尼斯没有提出任何抗议。数日后，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切萨雷贵族称号，同时将威尼斯市内的一处宫殿赠予他以作贺仪。至此，切萨雷准备的第一阶段——对威尼斯策略暂且完成了。

第二点是军队。8月23日，切萨雷同法兰西缔结秘密协议，作为切萨雷在法兰西征服那波利时随军战斗的回报，在此次切萨雷的军事行动中，法兰西国王承诺重新派遣伊夫·达勒格莱并麾下三百枪骑兵和两千步兵予以援助。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切萨雷早就没有了依仗法兰西的想法，他渴望拥有的是一支听命于自己、可以任意调遣的军队。切萨雷召集到了当时全意大利最为优秀的武将们，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以及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从切萨雷首次出战便追随左右的——维特罗佐·维特里，还有佩鲁贾的领主詹保罗·巴利奥尼，再加上阿基里·蒂佩尔提。全体兵士总数达一万两千人。

切萨雷最后的难题便是筹款。谋大事者断不会蔑视金钱，因为他深知其重要性。切萨雷能支配教会的财产，但此次甚至动用了打着十字军远征的名义，从阿尔卑斯以北的虔诚基督教信徒们手中筹来的军费，尚且捉襟见肘。不得已又额外任命了十二位新的枢机主教，新枢机主教们或多或少地向教皇捐赠了12000至两万达克特不等的款项。几经周折，军费才算凑齐了。

9月30日，切萨雷检阅了自己的军队。他看着队列中旗手高举着饰有切萨雷专属纹章的旗子，尚不十分满意，因这军队不是完全归他个人所有。他的军队与以往相同还是由佣兵队集结而成，这也实属无奈，无法顾及个人感受是否满足。

第二天一早，切萨雷在队长们的簇拥中，率领军队离开了罗马。但此次行军目的地的准确位置只有身为总司令官的切萨雷自己知晓，连队长们也未被告知。向北，军队只是一味地向北前进。

在深秋的翁布里亚山谷行进时，淅淅沥沥的雨静静地从天空飘下，士兵们冒雨继续朝亚得里亚海方向前进，相继越过了福利尼奥、斯波莱托、阿西西这些建在丘陵上的城镇。但在越过阿西西后，全军一度有四天没有接到切萨雷的行军命令，一直滞留原地。秋雨将停，行军却不再继续了，在大家心生疑惑之时，不知是谁传出了里米尼到手了的消息——军队行程尚未过半，里米尼却已被切萨雷攻陷。

紧邻亚得里亚海的城市里米尼原本是在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的支配下的，这个有着半世纪前名震意大利的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血脉的男人，从先祖处继承到的却只有残酷的性格，在里米尼早已人心尽失。潘多尔福能一直保有支配者的地位，仰仗的是后盾威尼斯共和国，而共和国更远的谋划是立他为傀儡领主进而控制里米尼。但现在，民众对于丧失后盾的他的憎恶到了濒临爆发的边缘，他已孤立无援。切萨雷非常了解里米尼的现状，在让军队待命的四天里，切萨雷向他提出了议和，作为让渡里米尼的回报，保证潘多尔福及家族的自由并向其支付年金。潘多尔福迎来了奥利弗瑞卿——从切萨雷取得切塞纳时使归为切萨雷家臣一员，签署完犹如买卖契约一般简单的议和条约后，于同日乘上了开往威尼斯领地切尔维亚方向的船，几乎无人察觉到这位领主的逃亡。在船上，潘多尔福想起自己的爱犬被遗忘在城中，此时他才像发疯了一般给留下的家臣写信，请求他们找到爱犬后送还给他——这成了他给家臣发出的最后一道公文。

二十天后，切萨雷率军进入了里米尼城，一路毫无抵抗，仿若他只是骑着马从特韦雷河走到了亚得里亚海。

佩萨罗的领主乔瓦尼·斯福尔扎此时也对切萨雷逼迫而来的军队的铁蹄声心生畏惧。只是，对于作为妹妹卢克雷齐娅第一任丈夫的佩萨罗领主，切萨雷却没有向对待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那样提出讲和。不仅如此，佩萨罗伯爵的应对也是十足的惊慌失措，他向邻近的圣马里诺共和国送去了如下的信件，却并不是索要大军支援。

“向您恳求派遣的，仅仅是五十名武装步兵，只要这样就一定可以获胜，日后我定当加倍重谢。古语有云患难见真情，请一定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可惜的是，圣马里诺共和国非但没有对他表现出友情，反而给切萨雷送去了贡品。佩萨罗伯爵也向乌尔比诺的蒙特费罗公爵请求了援军，被蒙特费罗公爵以自己也正身处危险为由拒绝了，向曼托瓦侯爵贡扎加的请求也是徒劳无果。最终，他向威尼斯共和国送去了一份提案——向威尼斯让渡佩萨罗，以此为代价，希望共和国能为他提供平稳度过余生之处。然而，威尼斯十分冷淡地回复，要是在以前还好说，如今，即将被切萨雷的铁蹄踏过的佩萨罗对威尼斯来说毫无价值。无计可施的佩萨罗伯爵最终只得向意大利诸国发去了悲壮的声明：

“我和我的全体家臣已经有了准备，无论结果怎样也不会离开半步。我以及我的家族将作为佩萨罗的领主誓死捍卫到底。”

但与此同时，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逃亡的消息扩散开来，佩萨罗的民众唯有冷漠地守护着自家这位胆怯的领主。11日的夜半时分，佩萨罗伯爵像猫一般悄无声息地逃出了城。似乎仓促间连行李都没打包，到达梅尔卡泰洛的伯爵给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写信，请求其帮忙准备换洗的衣物。四天后，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指挥下的先头部队以切萨雷的名义占领了佩萨罗。10月23日，切萨雷自己只带着四百人的亲卫队便兵不血刃地进入了佩萨罗。

沿亚得里亚海岸继续推进的切萨雷，下一个目的地是法诺。中途途经一座要塞，切萨雷军中一名队长詹保罗·巴利奥尼的仇敌在此收押多年。知道巴利奥尼复仇心切的切萨雷找到了守城的负责人，命令他引渡囚犯。负责人拒绝了，但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被负责人的回答激怒的切萨雷下令攻城，要塞转瞬间便被炮火洗礼，周围的人家也被烧杀抢掠、家毁人亡。见此情景的法诺赶忙放弃抵抗，打开了城门。

迄今为止怀揣不安、默默围观切萨雷行动的人们，经此残酷一役，总算是清醒了过来。人们的关注又都重新集中到了这个年轻男人的身上，曼托瓦侯爵向自己的岳父费拉拉公爵送出了如下的信件：

“费拉拉公爵殿下，对于这次我们共同的危机，望能明示您的考量。公爵殿下，您是我们之中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我们不能再对陆续被套上绞刑架的人熟视无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终有一日会轮到我们自己。”

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对这封信的回复，依然只是建议静观现状。但是，开始畏惧切萨雷实力的并不单单只有曼托瓦、费拉拉两个国家，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方面将马基雅维利派往法兰西，希望通过路易十二世的力量尽量牵制波吉亚，另一方面通过切萨雷的奥尔西尼队长和维特罗佐队长做中间人，以期获取切萨雷对其领国不侵犯的保证，同时博洛尼亚通过马尔维奇队长，乌尔比诺通过巴利奥尼队长也对切萨雷谋求了同样的保证。对这些人，切萨雷如其所愿给予了保证。但其实，哪个国家都无法真的安心相信切萨雷的保证。

在几乎次次都无须交战、城门不攻自破的切萨雷面前，终于出现了力图誓死抵抗的人们，那便是将历经四个月之久的法恩扎攻防战。

地处弗利与伊莫拉之间的小国法恩扎，其现任领主是年仅15岁的少年阿斯多·曼弗雷迪。与其他罗马涅小国不同，法恩扎在制度上施以善政，年少的领主也广受民众的爱戴。此次危机来临之时，民众不仅同情阿斯多，还自发联合齐心抵抗切萨雷。阿斯多获得的支持并不仅因他的年少，他悲剧性的遭遇更令民众感到同情。他的父亲加雷奥托作为武将亦作为诗人曾盛名远播，娶了罗马涅本蒂沃利奥的女儿弗朗西斯卡为妻，但却深爱着在费拉拉相识的绝世美人，这位情人是一位修女。当妻子察觉到了他极力隐藏的这位情人的存在时，悲剧便开始了。某一日，因嫉妒而发狂的妻子将丈夫邀来自己房间，令待命的杀手将其杀害。事件自然无法作为单纯的家庭悲剧来处理，罗马涅很快便伸出了它具有野

心的黑手。另一方面，反对残忍的领主夫人的家臣们同反罗马涅势力团结起来，渡过了领土分裂的难关。但真正令法恩扎杜绝了分裂风险的，却是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经由他的周转调停，使当时年仅3岁的阿斯多从此与母亲分别，继承了法恩扎领主的地位。民众对年幼且充满黑暗悲剧色彩的他十分同情，长老们也怀着仿若对待亲生儿子的爱护之情教导辅佐着阿斯多。像是要回报他们的关爱一般，阿斯多成长为一名英俊坚毅的少年。对于这位少年，教皇的除名状以及剥夺教皇代理称号都毫无用处，法恩扎的民心一致地团结在少年的身上，对切萨雷来说，他是比上千的士兵更难对付的敌人。

11月中旬，切萨雷离开佩萨罗，于当月19日到达法恩扎城外，当即开始炮击，进攻部队的指挥官被任命为维特罗佐和因在伊莫拉一役中表现优异被收至切萨雷麾下的纳尔多。战斗以攻城军的优势作为开局，切萨雷也亲自坚守头阵，命令如飞箭般快速地飞向各队队长。但是，守备军的防守十分坚固，就这样耗了十多天。紧接着，大雪携着寒冷袭来，毫无遮蔽的攻城军霎时陷入了苦战。11月末，切萨雷下定了打持久战的决心，他的作战方案是封锁所有通往法恩扎的大小道路，包围城镇将其孤立。随后只留下封锁作战所必需的军队，其余的人则准予在基督诞辰祭获得休假，休假结束后的他们则将与封锁法恩扎的士兵们轮值。安排妥当的切萨雷在巡视完伊莫拉、弗利、里米尼之后，在切塞纳同众人会合，一同庆祝基督诞辰祭。托他的福，这个小镇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的圣诞节。

切萨雷与麾下的队长们齐聚一堂，开怀畅饮，也没有错过各种消遣的机会，一晚上他不是跳舞，就是在飘雪的广场同士兵和百姓们一起欢闹，当地的年代记作者们将当夜发生的事情逐一记录了下来。在切塞纳的人们看来，切萨雷和维特罗佐他们这些年轻人与街上的平民女子们嬉闹的笑声，仿如生命之源富含活力。1500年，对切萨雷来说十分充实的一年，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第二年，即1501年，直到3月，法恩扎的坚守仍是未退一步，曼托瓦处还通过隐秘途经送来援助。切萨雷通过法恩扎的保护者威尼斯共和国提出了议和，条件中作为法恩扎开城的回报，将任命阿斯多·曼弗雷迪为枢机主教，并保证给予5000达克特的终身年金。阿斯多或者说是他的亲信拒绝了这个条件，并在回复威尼斯元首阿戈斯汀·巴巴利哥的信中以阿斯多的名义写道，只要威尼斯不对法恩扎见死不救，自己便打算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然而，法恩扎的人们似乎对严峻的现实知之甚少，政治中并无同情可插足之处。

4月，切萨雷最终向全军发出了决战的指令。他有必胜的自信，从费拉拉前来的埃斯特家的阿方索和伊波利托的兄弟听命滞留在己方阵营，激烈的炮击已把连接城镇和要塞的大桥轰断，通过前期的战斗，城市也完全落入攻城军掌握，剩余的只有阿斯多固守的要塞。20日，下达了第二次的攻击命令，但要塞并未在当日被攻陷，而切萨雷麾下损失的士兵已超过了四百。面对这难缠的抵抗，切萨雷咬牙切齿地对前来做客的阿方索·德·埃斯特说道：

“要是能统领一支像法恩扎人一般的军队，征服全意大利简直是易如反掌。”

之后又进行了两次类似的强攻。4月25日，要塞终于挂出了白旗，弹尽粮绝的守城军投降的唯一条件，就是保证阿斯多·曼弗雷迪的自由。

切萨雷实现了他们的希望，并且对城池陷落后法恩扎民众的安全也给予了保障，承诺只在此地驻屯最低数量的军队，甚至军事之外的要职仍按现状留给法恩扎人自己担任。

当日午后，唐·米凯罗特率领五百士兵打开了要塞的城门。同时，按切萨雷的约定，攻城军全部撤离城镇。同日夜里，家臣们流着泪，目送着阿斯多和他的弟弟乔凡尼·埃万杰利斯塔两人走出要塞，站在胜利

者切萨雷的面前。根据议和协定，他们兄弟二人已获自由，可以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然而，他们却置家臣的忠告于不顾，留在了切萨雷的身边。阿斯多并不把这位年长自己10岁的切萨雷当作是恐怖的敌人，反而对其产生了近似崇拜的感情，着魔般地渴望留在切萨雷的身边，亲身感受他那耀眼无畏的生存方式。在其后的一年里，无论切萨雷前往何处，这对曼弗雷迪兄弟坚持追随左右。但切萨雷却始终不能忘记法恩扎民众对阿斯多的赤胆忠心，若想将法恩扎完全变成自己的所有物，阿斯多的存在只会是障碍。1502年6月9日，在法恩扎陷落大约一年多后，在罗马的特韦雷河上，漂浮着兄弟二人脖颈缠有绳子的尸体。

4月26日的夜里，法恩扎攻防战大获全胜，已结束全部战斗的报告送到了罗马。教皇丝毫不曾掩饰自己的喜悦，在接受各国大使们祝贺的访问时甚至一度喜极而泣。至此，罗马涅各地区已全部臣服于切萨雷，教皇正式任命切萨雷为罗马涅公爵。

第五章

领兵两年，切萨雷陆续征服了伊莫拉、弗利、里米尼、佩萨罗、切塞纳、法诺以及法恩扎等地，现在终于等来了扯掉镇压违制小领主这层遮羞布的时机，他获封的罗马涅公爵爵位，象征其已将连接意大利半岛南北的重要道路艾米利亚大道一带收入囊中。在他领国的北方，盘卧着政治手腕高超、难以对付的曼托瓦和费拉拉公国，两国在君主国中虽只是中等规模，但也拥有不可轻视的实力，切萨雷深知对待他们必须慎重行事。再向北还有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更远方已被法兰西支配的米兰公国，切萨雷已无法再向艾米利亚大道以北的边界拓展出半寸疆土。既然北路不通，唯有南行——他渴望着能在教皇父亲在世期间亲手统一意大利，并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切萨雷意欲将自己狭长的罗马涅、马尔凯领土南扩至罗马，而佛罗伦萨与博洛尼亚两国正好横拦在其中。感到切萨雷的威胁日渐逼近，胆战心惊的两国忙向法兰西的路易十二世寻求帮助，而对于切萨雷急速膨胀的势力，路易十二也倍感忌惮，哪怕助他上位的正是路易十二本人。相对的，切萨雷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博洛尼亚也不是佛罗伦萨，而是法兰西。只是眼下，他的实力还远未成熟到能与法兰西为敌，不得不万事忍耐退让。

切萨雷与路易间的关系耐人寻味，纵观古今也并不多见，彼此间以礼相待，一派兄友弟恭的友爱模样，却不放过任何能利用或压制对方的机会。路易称呼切萨雷为“我最挚爱的兄弟”，切萨雷则继续以“切萨雷·波吉亚·德·法兰西”（即“法兰西的切萨雷·波吉亚”）来署名。相互欺骗，却同时深知对方不会相信自己的伪装。虽然按常理来说，切萨雷应该对西班牙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却不适合作为

实现他野心的协助者。费迪南多对宗教狂热到直接以天主教君主[1]自称，而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的功绩令其自信心膨胀，不但对十字军远征多有关注，甚至对波吉亚教皇的做法指手画脚。同理，切萨雷亲近路易自然并非因为对法兰西抱有好感。自然，切萨雷之于路易也仅仅是可利用之人，利用他教皇儿子的身份和新近展露出的武将才能。故而路易可对区区罗马涅地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却忌惮切萨雷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博洛尼亚，无论从地理位置抑或历史传承角度来看，都是罗马涅公国当之无愧的首都，以拥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而闻名，学术氛围与教会文化并存，有着悠久的历史。支配着这座城市的是被任命为教皇代理的本蒂沃利奥家，势力范围算不上强大，过去在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乌尔比诺等近邻诸国之间，通过灵活的外交保住了一方之主的地位。但现任领主老乔凡尼，在对待新上台的君主切萨雷上已犯了两点失误。第一点是对有亲戚关系的法恩扎的阿斯多·曼弗雷迪提供了秘密援助。另一点是在法恩扎攻防战期间，拒绝了切萨雷让渡博洛涅塞堡的要求。傻子都看得出，若是切萨雷能够占据这座由众多要塞构成的小城，法恩扎的防卫战根本耗不了那么久。而以上这两点，切萨雷都没有忘记。

法恩扎陷落的第二天即4月26日，切萨雷向博洛尼亚派去了使节，重新要求让渡博洛涅塞堡。27日，回复尚未到来，他便命维特罗佐队长率领一队人马在博洛涅塞堡周围烧杀抢掠。威胁十分奏效，吓傻了的本蒂沃利奥立刻向当时身在丰塔纳别墅的切萨雷派出了使臣同意让渡，博洛涅塞堡就这样成了切萨雷的囊中之物。

但是，切萨雷其实是想打博洛尼亚本身的主意，事到如今，能够制止他进军的只有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果然，路易看重博洛尼亚在征服那波利时可作为士兵驻屯地的价值，承诺以此为交换条件保护博洛尼亚。根据路易的仲裁，本蒂沃利奥和切萨雷之间达成讲和，切萨雷放弃

吞并博洛尼亚，作为交换，本蒂沃利奥在未来三年间要为切萨雷提供百人的武装士兵和三百匹战马，还须派出本族的一名男丁率三千士兵追随切萨雷的军队。博洛尼亚并不是切萨雷唯一遇到的挫折，在他与下一个目标佛罗伦萨之间，也横着一堵难以翻越的高墙。

因惧怕切萨雷逐渐南下的铁蹄，佛罗伦萨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但切萨雷自知尚不能将野心公之于众，并未挥军直指佛罗伦萨，而是将当前的目标定为皮奥恩比诺。此时正值1501年的春天，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在混乱动荡与束手无策中挣扎。比萨战役导致的经济、军事两方面的疲乏，使佛罗伦萨失去了昔日的威势，再加上他们注定要与美第奇家族为敌，后者正在千方百计恢复往日的权势地位，即使失去了伟大的洛伦佐这位家族的顶梁柱，美第奇依然执拗地等待着回归佛罗伦萨的时机，他们仍具备经济实力，更有威尼斯的支持作为后盾。美第奇也没有忘记打点波吉亚和法兰西，分别向双方奉上了礼金，两边也都默认地收下礼金。二人之所以不顾佛罗伦萨市民的感受接纳美第奇家族，是想借其对付佛罗伦萨共和国，每逢遇事，切萨雷和路易就把美第奇家族亮出来，刺得佛罗伦萨共和国阵脚大乱任其摆布。

切萨雷的军队持续南下。佛罗伦萨共和国一面加固着菲伦佐拉的要塞，一面向切萨雷派去使节，辩称并非有意对抗。在此时的切萨雷眼中，佛罗伦萨共和国已滑入了衰退的边缘，如同将熟的果实任其采撷。但前有一堵名为路易的高墙阻拦去路，后有洞察法兰西意图的教皇父亲来信告诫时机未到不可轻举妄动。然而，忍耐对于老人来说容易，对年轻人却是煎熬，切萨雷明知现在必须等待时机，但却无法忍受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佛罗伦萨。更何况，他还必须顶着压力安抚部下的怨恨，奥尔西尼与美第奇有亲缘关系，故对佛罗伦萨抱有敌意，而维特罗佐更是与之有杀兄之仇，他的兄长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佣兵队长一职，却被冠以叛贼污名处死。

切萨雷向佛罗伦萨共和国要求在其领国内部通行的自由，但同时，

他的军队早已深入到佛罗伦萨领土内的穆杰罗。三名使节给切萨雷带来了如下的许可回复：

“通行许可要求，切萨雷的军队须分成各小队按不同路线行军，严禁靠近设有要塞的地区，并且，禁止维特罗佐和奥尔西尼两名队长及被驱逐在外的佛罗伦萨人（暗指美第奇）从领土内部通行。”

读了回复的切萨雷面不改色，只令三名使节稍候。片刻之后，使节们收到了切萨雷新提出的要求。

新要求的四点内容令佛罗伦萨人十分震惊：（一）与切萨雷签订契约，雇他为佛罗伦萨佣兵队长；（二）不得回应皮奥恩比诺的支配者发来的任何援助请求；（三）交出维特罗佐选中的六个人作为人质；（四）恢复美第奇家族的执政地位，或重组一个切萨雷认可的新政府班底，佛罗伦萨必须二者选其一。切萨雷提出上述要求后，明知不可能就此拿下佛罗伦萨，还是命令军队向着佛罗伦萨市区的方向前进。身在罗马的教皇又再度发来书信，劝说现在攻打佛罗伦萨为时尚早。但切萨雷对此又岂会不知，此时击溃佛罗伦萨的后果就是激怒远在法兰西的路易，但面对如此傲慢的佛罗伦萨，不教训教训实在是出不来这口恶气。

切萨雷全军已抵达坎比·比森齐奥营，阿诺河近在咫尺，军马啼鸣可闻于佛罗伦萨市内。5月15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终于向切萨雷抛出了订立同盟的契约，佛罗伦萨共和国愿雇佣切萨雷为佣兵队长，下辖三百士兵，年薪36000达克特。花大价钱把自己的敌人变成自家的佣兵队长，为保存大国佛罗伦萨的政府体面，这份外交文书可算是费尽了心思。然而在其背后，是佛罗伦萨以为法王路易提供兵力、助其征服那波利为条件，费了大工夫才换来的路易弹压切萨雷的约定。

契约签订的两天后，佛罗伦萨政府收到了切萨雷撤出坎比驻地的通知，但糟心事儿还没结束，因为切萨雷又追加了两点要求：要求提前支付9000达克特的年薪以及额外提供大炮，对此，佛罗伦萨也只能忍气吞

声地答应。不过此时，佛罗伦萨的人们还不知道，切萨雷已准许了抛弃一切投奔自己的维特罗佐为其兄长复仇的恳求，也不知道切萨雷将自己离开后的事情全权交由维特罗佐决断，坎比、西尼亚、恩波利、波吉邦西等城邦就这样直面了维特罗佐的复仇之火，遭受了愤怒的劫掠破坏。一纸不谨慎的外交文书，令佛罗伦萨政府深刻领悟到，这暂时的安全到底是花了多大的价钱。

离开佛罗伦萨的切萨雷，挥军南下第勒尼安海，目标皮奥恩比诺。这个小国并厄尔巴岛在内，曾一度受比萨支配，现归于阿皮亚诺一族的手中。对切萨雷来说，得到这片土地，意味着亚得里亚海到第勒尼安海这片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狭长地带将任自己支配，同时确保获得一座海港。更妙的是，厄尔巴岛本就是一座天然要塞。

切萨雷的军队日渐接近，领主雅各布却还在期待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能派出援军，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会踏上一艘注定要沉的船。雅各布托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向法兰西国王转达申请援助，对此，主教的回复是："我会为你向上帝祈祷的，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终于绝望的雅各布将一切托付给弟弟，拖家带口逃去了热那亚。切萨雷的军队稳步占领了城镇和周边地区，厄尔巴岛也简单地到手了。但是此时，身在前线的切萨雷收到了罗马的来信，是教皇父亲的信，命切萨雷速回罗马，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已决定开始征服那波利，并要求切萨雷随军参战。阿皮亚诺战况大局已定，切萨雷决定遵从父亲的话，他将后续战斗交由维特罗佐负责，只率一队人马返回了罗马。而此时正艰难固守城池的阿皮亚诺，将在三个月后最终陷落。

路易十二世由于太过忌惮切萨雷，而在意大利上投入了过多精力，以致在政治上犯了重大失误，被另一位竞争者爬上了法兰西的领地。

去年11月，西班牙与法兰西双方在西班牙格拉纳达曾达成一份协定。这份被称为格拉纳达协定的内容是关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与法兰

西国王路易将如何瓜分那波利王国。那波利的阿拉贡王室被击溃后，首都那波利和其周边作为王国交于法兰西，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以及西西里岛作为公国交于西班牙。同时约定，西班牙、法兰西两国将分别独自同那波利王战斗，不相互援助也不共享战线。至于向那波利开战的理由，依然还是冠冕堂皇的以确保十字军远征基地为名义。

1501年6月17日，法兰西军以杜比尼为总司令，在罗马近郊排兵布阵。几乎在同一时间，西班牙军队在科尔多瓦的率领下进入了罗马。离开前线阿皮亚诺飞奔回罗马的切萨雷也在当夜带着一队人马入了城，其中包括伊夫·达勒格莱并旗下的法兰西士兵。

23日，法兰西军总司令官杜比尼带领着队长们前来梵蒂冈拜访教皇，受到了壮观华丽的迎接。

两天后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格拉纳达协定被正式承认。与此同时，梵蒂冈发布诏书，以阿拉贡家向土耳其帝国请求援军之故予以制裁，剥夺阿拉贡家在那波利的王权，转而授予西班牙、法兰西两国国王。虽说在面临家族倾覆之际，慌不择路的那波利国王费德里科向土耳其的苏丹寻求援军确是事实，但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借口罢了。

明明始终对1494年查理的入侵持强硬的意大利主义，但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政治立场，现在却已消逝不知去了何方。只是，政治中容不下感伤，这份感伤已化作筹码支付给了法兰西，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为实现心中宏图，必须与法兰西联手方能成功。但是，波吉亚并不只是支付代价，而是也看透了利益，并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死，而这次的情况，最终无论是哪一方留下，对于那波利来说都是外族人。只要留下的一方无法像曾经的腓特烈二世或阿拉贡家的国王们那样完全意大利化，意大利人迟早会将其驱逐出去。费迪南多抑或路易，空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并不能将所征服之地作为大本营开创出新世界，与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征服者的理想型相差甚远。而有朝一日，当切萨雷几乎掌控了亚平宁半岛之时，那波利王国便会像成熟

的果实一般，自然地落入他的手中，之所以认同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割那波利王国的深意，就在于此。

而此时的切萨雷在自己的宫殿中足不出户，罗马竟没有人见到过他的身影。不过，不在人前现身，不代表他停止行动全无作为，真相是他正夜以继日地忙于对占领地的治理。在罗马涅，条条政令逐一被快马送到担任总督的近臣拉米罗·德·洛尔卡手中，在博洛涅塞堡，征服后的对应政策逐步落地实施，而其他地区也日渐步入正轨、政令通达，就连还没有攻下的皮奥恩比诺，也提前制定了治理政策。

但即使正在亲力亲为地稳固自己在征服地的地位，此时切萨雷的内心却波涛汹涌难以平静。明明要做的事已堆积如山，却必须为了随法兰西军队作战而回到罗马，必须浪费掉这之后的时间，必须为了路易发挥自己那被他所称赞的军事才能。切萨雷感到愤怒，却依旧只能忍耐，现在的他依然不能拒绝路易的要求，只得再次作为佣兵队长为他卖力。

第一个离开罗马向着那波利王国前进的是西班牙军队。数日后，法兰西军队也在圣安杰洛城堡前列阵，接受了教皇的祝福后走出了罗马的城门。不过，切萨雷尚未下令军队开拔。

法兰西军出发的当天，一则情报传到了罗马。那波利将防守大本营定在了卡普阿，配置了三千五百名士兵，由勇将法布里奇奥·科隆纳指挥。随后的情报，是另一名武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负责防守街市，而国王正躲在阿韦尔萨城堡中。切萨雷此时才终于动身，率领着含四百亲卫在内、总计一千五百名的士兵，离开罗马奔赴前线。

切萨雷率军到达卡普阿的时候，法兰西军队的主力已攻破了城市外墙。总司令官杜比尼在切萨雷到来后，将后续战事交托给他，带领全法兰西军南下攻向那波利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

一千五对三千五，注定是一场激战。切萨雷向卡普阿降下了雷霆之

怒，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哪怕是女人和孩子。铁蹄踏过之处，战火纷飞、家毁人亡，黎民的号啕尽数被熊熊大火吞没殆尽。

7月24日，卡普阿陷落了。这是16世纪最为悲惨的城池陷落，街道的石缝中淌着的鲜血未干，征服者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四处抢掠，死里逃生的妇孺在恐惧中目睹了一切，根据当时的记录，至少有四百人的尸体被弃置城中无人理会，慈悲心被铁蹄一同踏碎。

主将法布里奇奥·科隆纳受伤被俘，以15000达克特为交换，从切萨雷军中与科隆纳家族敌对的队长保罗·奥尔西尼手中逃过一死。但其他俘虏在第二天全部被处以了绞刑，除了被抓到的女人们。女人们被带到了切萨雷的面前，他自己从其中挑选了最为美貌的四十人，剩下的交给了部下们随意处理。

以历史学家圭恰迪尼为首，达·康提等年代记作者们纷纷对切萨雷口诛笔伐，称其是残忍的化身。确实，这是切萨雷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在战场上毫无顾忌地展现出自己最为残忍的一面。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若是不得不手染鲜血，倒不如干脆将全身浸于鲜血之中。

卡普阿的陷落决定了那波利战役的形势。费德里科国王于8月2日逃至伊斯基亚，虽抱着在此等待土耳其援军的打算，但那终究只是奢望。翌年的3月，他将王权让给路易，拿着换来的微薄年金、伯爵头衔与边境的领地去了法兰西，后于1504年在图尔去世。并称意大利两大家族的米兰斯福尔扎家与那波利阿拉贡家的两大当家人，最终不得不在敌人法兰西的土地上，一人被囚、一人隐居，在屈辱中了结残生。

8月末，在早已被法兰西军队完全侵占的那波利，切萨雷收到了法兰西国王路易祝贺大捷的来信，随信附有20000达克特金币，用以支付他作为佣兵队长的酬劳。9月中旬，切萨雷带着自己的军队，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离开了那波利，重回罗马。义务总算是完成了。

[1] 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多国王与其妻子伊莎贝拉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主”称号，并用以自称。他们于1469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结婚，实行王国共治并最终建立了西班牙王国。他们见证了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格拉纳达。——译者注

第六章

从那波利回到罗马的切萨雷，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下一步的行动中——讨伐势力已渗透到罗马近郊的豪族们。已效忠在他麾下的奥尔西尼家逃过一劫，这次的靶子是一直与教皇唱反调的科隆纳、萨韦利两家族。过去曾与这些豪族们交好的阿拉贡王家已没落，且此时法兰西军队驻扎在罗马附近，正是讨伐的绝好时机。肃清罗马豪族，可确保波吉亚大本营的平安，那么在将来，切萨雷便可安心地离开罗马了。

科隆纳家自不必说，在那波利战败时，已因家族牵涉过深而元气大伤，萨韦利一众的抵抗也不成气候。罗马以南的冈多菲堡、罗卡迪帕帕、塞尔莫内塔等豪族们的据点，接连不断地被切萨雷攻陷。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被分成了两个公国，一个分给了卢克雷齐娅与被害的比谢利公爵所生的孩子罗德里格，另一个赐予了风闻是卢克雷齐娅私生子的“罗马王子”。就这样，无视世人的谴责，罗马市内外的教会领地成为波吉亚家众人的私有财产。

此时在梵蒂冈最为人热议的话题，就是教皇女儿卢克雷齐娅的第三次婚姻。自从第二任丈夫比谢利公爵被暗杀后便窝在奈比的卢克雷齐娅根据兄长切萨雷的希望，决定与费拉拉公国的嫡子阿方索·德·埃斯特结婚。妹妹的婚姻是切萨雷对费拉拉公国的计策。与罗马涅公国接壤的费拉拉公国，拥有不可小觑的势力，切萨雷暂时还不想与之为敌，便打算通过两家联姻与其结成同盟。但是，费拉拉一边最初却想要逃避这次联姻，卢克雷齐娅两任前夫的悲惨末路让埃斯特家众人却步。不过，老练的政治家、费拉拉的当家人埃尔科莱判断，迎娶教皇的女儿对埃斯特家族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费拉拉也和罗马涅地区的所有公国一样，领土受封于教皇，与教皇保持友好关系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另一方面，对

切萨雷来说，只要北境巩固了，就可以安心地瞄准南面地区。再加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因女儿的婚姻不幸而感伤，对其倍加关怀的心境，加速促成了此次联姻。

谋划这次政治婚姻的虽然是切萨雷，但联姻敲定后，就将后续推给了教皇父亲，他可不耐烦筹备嫁妆那一套琐事。然而，埃尔科莱派来罗马的两名婚使，可不敢撇下切萨雷自作主张，一到罗马两人就申请了面见切萨雷，但却一直未蒙召见。时日一久，特使们愈发焦躁，开始对切萨雷的态度感到异常不安。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终于，在某日等来了切萨雷的侍从，口称公爵召见。时值正午，特使两人迅速穿戴整齐，跟随引路的侍者，在罗马清爽的秋日中步行前往切萨雷的寝殿。进入司铎殿的特使们原以为要在玄关附近的会见室等候，没想到却被仆从们引着穿过中庭一路深入，竟无人阻拦询问。而登上阶梯，踱过长廊，朝右可以眺望到圣安杰洛城堡的时候，两人才恍然惧由心生，方忆起关于切萨雷的种种残酷传闻。

仆从行至一屋前停步，打开门，引两人进屋。屋外的正午阳光和清爽空气与屋内的昏暗光线和靡靡甜香之间的反差太过分明，特使们一时间呆住了。微微敞开的厚重窗帘间透进薄光，为房间带来了些许光亮，卧床位于正中高高架起，薄纱的床帏左右垂下，阴影中一个男人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们意识到那就是切萨雷了。

切萨雷知道特使们进来了，但还是懒洋洋地靠在床背上，并未起身。浅灰色紧身裤包裹着美好的腿形，右腿弓起，右臂懒散地搭于其上，宽松的白衬衣袖口散乱地敞着，左腿随意地伸在一侧。

片刻过后，两名特使适应了屋内的微弱光线，方才发现，卧床另一侧还跪着一个女人。乌黑的长发垂至腰际，恰有微光透过薄纱打在她的脸庞，略显苍白的面容美得令人窒息。她忘我地仰望着切萨雷，仿佛生

怕错过男人任何微小的意图。

服侍于侧的绝美女人，与对女人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径直看向特使们的切萨雷，如此情景让两位老练的外交官失去了一贯的冷静，被这一甜美与残忍交织的画面俘获，陷入了原始欲望的旋涡。

失神的两人已全然忘记了拜访的初衷是要探寻切萨雷的真意，含糊地转达了主君埃尔科莱公爵的问候即退下了，事后才意识到没能从他嘴里敲出只言片语。两人复又提出会面申请，得到的却只有冷冰冰的拒绝。对于切萨雷来说，召见强国费拉拉特使仅仅是义务，见过就算交差了。

数日后，特使二人方听闻，会见当日侍奉在侧的女人是个哑巴，在给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送去的报告文书中如此写道：

“切萨雷公爵拥有最为理想的女人——不能说话的女人。”

得不到切萨雷召见，无可奈何滞留罗马的人并不只有费拉拉的特使们。从里米尼而来的两位市民代表，未获切萨雷召见已两月有余。从司铎殿外的路上能看到切萨雷办公室窗户投出的灯光，偶尔窗上会映出他高挑的身影，虽然无从得知他在房间里究竟在做什么，但灯光时常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白天通常要与教皇共商事宜，故而可供他独自思考制订计划的时间，只能是晚上。他需着眼广阔的罗马涅公国全局，需让上至队长下至士兵的所有家臣高效工作，还需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情报了然于心，同时小心经营与路易十二世的关系。对于新任君主的切萨雷来说，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他手下的秘书们也是夙兴夜寐，信马就如箭在弦上随时待发。

被赞为“纳言敏行”的切萨雷每次迈出自己的办公室时，其所作所为必会引起全罗马上下的瞩目，各国情报官和年代记作者们永远不会缺少能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材料。为筹备卢克雷齐娅的婚礼，当时的罗马频频

举办各式宴会舞会，切萨雷既是主办人，也是场上无限风光汇聚的中心。每逢盛会，在又惊又喜的教皇父亲眼里，年仅26岁的他仿佛不知疲倦般地纵情享乐。其中，10月30日夜间在他宫殿召开的宴会尤为特别，让以布鲁卡鲁多为首的年代记作者们兴奋讶异。当晚到场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们络绎不绝，更有教皇莅临，借布鲁卡鲁多的话来说，还预备了五十名“世界最古老职业的女人们”，以庄重奢华开局的宴席，在夜半之时卸下了假正经的伪装，彻底化为了荒淫无序的盛筵。

切萨雷令人在大宴会厅中央摆上了一排高立的烛台，命女人们脱去衣服，要她们在不碰倒烛台的前提下，逐一依次绕过后跑到自己身边，最快到达的人将可与自己共度春宵，女人们为这句话爆发了娇媚的欢呼。片刻后，随着开始信号的发出，女人们跑了出去，向上盘起的秀发、佩戴在颈间耳上乃至手臂上的宝石，与白皙的肉体一同摇晃。一时之间欢声四溢，不只是在旁观赏的男人们，为了不让烛台倒下，边跑边躲避四溅烛火的女人们更是娇呼连连。竞赛结束，安坐于椅上的切萨雷面前，蜂拥着簇成一团的肉体们，已无法分辨哪具身体才是第一名。直到特韦雷河上泛起白色的晨雾之时，当夜的盛筵都没有结束。

进入12月，埃斯特家的两名公子抵达罗马，他们肩负着护送新娘卢克雷齐娅前往费拉拉的职责。梵蒂冈突然繁忙了起来。这次的婚姻是卢克雷齐娅第一次离开身在罗马的父亲身边，为了远嫁到费拉拉的女儿，新娘的所有嫁妆几乎都由教皇亲自过目。

某一日的傍晚，晚霞依然弥漫着柔和的气息，罗马冬季特有的清新空气开始一点点染上茜红色，跨过特韦雷河通往司铎殿的路上，受邀前来参加舞会的宾客们鲜衣怒马、欢声笑语。这是切萨雷为了要远嫁的妹妹，在罗马主办的最后一次舞会，主宾是卢克雷齐娅和埃斯特家的公子，宾客们不只枢机主教，各国大使、高官们以及罗马的贵族们，几乎全员都受到了邀请。以暗影中的教皇宫为背景，当晚从司铎殿所有窗户流泻出的光辉，映射在特韦雷河的水面上，灿烂有如灯火海洋。

大宴会厅里挤满了陆续到来的客人，教皇姗姗来迟，带领着枢机主教们进入大厅，对下跪迎接的人们逐一给予了亲切的回应。他的脸上情绪外露，仿佛喜极而泣，但人们的视线，几乎全集中在了切萨雷身上，即使他仅仅跟随在父亲身旁一言未发。

音乐响起了，是叙事曲。坐于高位的教皇遣立于自己身侧的切萨雷去跳舞，于是切萨雷转身退下，朝大厅中心被众人簇拥着的妹妹走去。卢克雷齐娅接受了兄长的邀请，两人被舒缓甜美的音乐环绕，翩然起舞。当晚，切萨雷全身素白，纯白紧身衣顺畅地包裹着修长的双腿，缎子上衣罩着他宽厚的胸膛，在灯火下，白缎斗篷随着舞动映出柔和光芒，唯一的装饰是头上的天蓝色贝雷帽，以及帽檐上由紫色宝石做成的宝剑饰物。一袭白衣配上他勤于锻炼晒出的古铜色面容，使已近26岁的切萨雷比平时看上去更加年轻。

身材高挑的兄长轻松地带领着将将及其肩头的妹妹共舞，妹妹则完全将自己交由哥哥，随他翩翩起舞。切萨雷俯视着这样驯顺的她，眼中闪出温柔的光芒，嘴边刻下迷人的微笑。比兄长年幼5岁的卢克雷齐娅身穿红色丝绸制的盛装，与黑发古铜色皮肤的兄长成鲜明对比，有着金色长发和雪白肌肤的她与这红色相映生辉。常理来说，宴会的主人已经开舞，其他人便可相继进入舞池，但此刻，却没有人打算一同起舞，他们环绕大厅而立，仅仅目视着切萨雷和卢克雷齐娅这对舞伴舞向大厅中央。而兄妹二人仿佛陷入了幻境，世界中只余彼此，一舞至死方歇。

十天后，卢克雷齐娅离开了罗马向着费拉拉出发。

到了1502年，这是切萨雷得以将野心变为现实的第四个年头，此时占据他脑海的是博洛尼亚、曼托瓦、托斯卡纳及马尔凯。其中，博洛尼亚因路易的反对，还没办法顺利拿下。而实力不容小觑的曼托瓦，切萨雷打算为自己在法兰西的两岁女儿和曼托瓦公爵一岁的长子费德里科订下婚约，以联姻结盟。剩下的就只有托斯卡纳和马尔凯了，除去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全境和乌尔比诺等小国集结而成的马尔凯地区，共同成为

切萨雷第三次出征的目标。

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表现出了想要南下意大利的征兆，切萨雷的征程无法立即成行。虽然皇帝的真意是要牵制仇敌法兰西国王在意大利势力的扩张，但其实南下意大利的名义对他来说几乎信手拈来。毕竟，自中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罗马教皇，地位称号与职责所在相辅相成。所以，探访罗马教皇、视察意大利各国等，均可成为正大光明南下的理由。然而，皇帝要是来了，最麻烦的还是切萨雷。为了让皇帝留在遥远的德国，他甚至将以往过节一笔勾销，和法兰西国王互通有无。幸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意大利诸国而言，影响力已不如从前。皇帝的南下，不仅是波吉亚，连那波利分割协定已近破灭的法兰西和西班牙，也同样不赞成。皇帝本人则表示，就算你们反对，只要意大利诸国有人接纳他，他就必将南下。最终，威尼斯共和国的反对成为摧毁皇帝决意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一向关系不好的皇帝相比，威尼斯与法兰西和西班牙走得更近，站在了现任教皇波吉亚这一边。于是，皇帝军队的南下被彻底否决了。

但是，仍有一个理由让切萨雷滞留在了罗马，征服了那波利的西班牙与法兰西两国围绕二分统治案产生了争执，波吉亚的预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了现实。对切萨雷来说，这虽然是他期盼的结果，却来得太快了，那波利并不是他现阶段能吞下的目标。话虽这么说，但对事态发展的关注也不能松懈。他不能离开罗马，只同教皇父亲一起去了一趟皮奥恩比诺，在那里也没有停留太长时间。

但是，长期引而不发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再想要抑制就绝非易事了。

第三次征程被严重延期了的切萨雷，丝毫未曾想过要终止行动。只不过，取代以往的野外行军扎营，这次的征程是在他的办公桌上展开的。

目标是比萨和阿雷佐，切萨雷用两个计策打开了局面。第一个是利用麾下的秘密情报员，煽起佛罗伦萨和比萨两个共和国间长久以来的敌对情绪，让比萨误以为佛罗伦萨想吞并自己，并将比萨市民的舆论转向“与其被联合军攻击，最终屈服于仇敌佛罗伦萨，还不如选择波吉亚”的方向。第二个策略就是武力威胁，切萨雷将在心中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燃着复仇之火的维特罗佐用于此处，让军队像上次一样奏响死亡的乐章。但驾驭这名猛将需时不时地收紧缰绳，若任其肆意妄为，托斯卡纳将会燃成一片废墟。

5月末，比萨的市民代表造访了罗马，请愿由切萨雷保护比萨。对比萨觊觎已久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此大吃一惊，但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说是无能为力，事实是意大利的这两大共和国一直互为掣肘，从未尝试联手统一行动，切萨雷深知并利用了这一点。

6月7日，阿雷佐在维特罗佐的面前打开了城门。数日后，瓦尔蒂扎纳全域已由切萨雷的部下所掌控。至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在切萨雷势力的海洋中被孤立了。

了解一个地区的现状并加以利用和煽动，未动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就对佛罗伦萨形成了包围的切萨雷，正一步步地摆脱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控制。

成功走到这一步的切萨雷，终于能在四下军马的嘶吼中生存下来了。

第七章

1502年6月12日，切萨雷仅带四百名亲卫队士兵便离开了罗马，他的精锐之师集结在斯波莱托，两军会师后沿路前行收编士兵，部队如滚雪球般一路不断壮大。同时，切萨雷在自己的领地罗马涅公国广发布告，命所有家族必须每家出一人参军，这即是后来被马基雅维利所提倡并沿用至今的近代国家军队的核心——征兵制度的原型。与使用金钱雇佣士兵所组成的佣兵制相比，征兵制是彻底的改革，这使从军不再是“职业”而是“义务”。

但切萨雷的征兵制尚是雏形，他的军队主力，目前也只能是维特罗佐和雇佣兵队长们带领的佣兵部队，从路易十二世手里借来的士兵也同样是拿了报酬才干活的佣兵。不过，切萨雷正在一点点地改变这个现状，并希望将来自己军队的士兵，能够全部出自征兵制。这件事无法急于求成，究其原因，自古以来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争，都是职业的雇佣兵与雇佣兵间的厮杀，而一般市民对战争知之甚少，甚至缺乏最基础的训练。唯一的例外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军。将所有筹码都押在海上的威尼斯，只从本国市民挑选海军成员，与采用佣兵制的他国陆军完全相反。威尼斯人对军队的思考方式与其他意大利诸国全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历任元首，几乎所有人都是海军提督出身，拥有常年海上服役经历。但是，对当时一般的国家和支配者来说，切萨雷的这个构想完全不合常理。只有一人，而且是在此之后十年才出现的将其付诸现实的人，切萨雷的妹夫——费拉拉的阿方索·德·埃斯特，在加入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陆军战斗的时候，临时采用了征兵制。

在当时，察觉到改革征兵制度即能改变意大利的，只有年仅26岁的切萨雷、25岁的阿方索，以及33岁的马基雅维利三位年轻人。

切萨雷的军队翻过翁布里亚丘陵不停向前，然而此次真正的战略目标，依然无人知晓。各国的情报网以及士兵们大多以为目标八成是卡梅里诺，而切萨雷心中却另有打算，并早在暗中完成了谋划。

乌尔比诺公国，1502年。

后世有卡斯蒂廖内的著作《宫廷人》，赞颂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为“意大利的光芒”，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现今还藏有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为这位“文武双全之伟人”亲笔绘制的肖像画。距离1502年已去世二十多年的他，身背庶出名分，于学术上造诣高深，作为武将，才能表现仅次于杰出的名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在他的统治期间，小小的乌尔比诺公国因学者和艺术家们繁花似锦的成就，闻名于整个意大利，尤其是由费德里科创设的图书馆，甚至据传其藏书种类和珍贵程度超越了美第奇家族。与其他危机四伏的意大利宫廷相比，乌尔比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温和平静令人忘却危险的宫廷氛围，包括文学家、音乐家在内，近五百余人寄身于这个远离纷争的宫廷。意大利的贵族和君主们很看重这种氛围，纷纷将其子弟托付于此，费德里科也毫无保留，向留学生们悉心传授完美的教养与武艺。

公国的家臣与民众们对领主信赖有加，在他的统治下乐享安稳的生活，当他作为佣兵队长远征在外，会为了减轻他的担忧而自发自治。而当他身在公国，每天最常见的风景，就是民众们对独自一人上街散步的公爵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在他的时代中，意大利的君主和统治者们无人有胆量如他一般，可以毫无防备地上街散步。

但伟人如他，在弥留之际，将年幼的儿子和公国的未来托付给了自己的挚友——著名的佣兵队长罗伯特·马拉泰斯塔，未曾想到几乎与此同时，受托的这位也死在了博洛尼亚的床上，并且巧合地也将自己的国家里米尼托付给了费德里科。

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

费德里科的儿子圭多巴尔多在父亲去世时年仅10岁，精神和躯体同样纤细的少年在宫廷之中被小心地呵护成长。在乌尔比诺宫殿宽阔的台阶上，在留有浓重中世纪风貌的古比奥街道的石板路上，总能看到他那陷入沉思四处漫步的身影。如今，圭多巴尔多年过三十方与曼托瓦侯爵的妹妹伊丽莎白·贡扎加完婚，暂未有子嗣，虽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佣兵队长，但更偏好在自己的宫殿里欣赏艺术品和书籍。他热爱文雅讲究的生活，为人温和厚道，以慈悲为怀，在当时动荡的大势中，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国家，主要是仰仗先父遗泽。此外也因他本人性格实在温和，从不说他人是非，也从未结过任何私仇，公国的民众们对于费德里科的这个儿子总是爱护有加、关怀备至。

他和波吉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甚融洽。1496年冬，他作为甘迪亚公爵的副将随军参战，一度因战败被俘而被切萨雷置之不顾。而随后发生的甘迪亚公爵暗杀事件，他曾被列入嫌疑人之列。自切萨雷起兵伊始，乌尔比诺公爵就时常作为切萨雷麾下的佣兵队长随军出征，但从未立过显著战功。

6月中旬，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从教皇处收到一封来信，内容是要求为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军队提供武器和兵粮，及准许军队途经乌尔比诺领地，便于其攻打卡梅里诺。此外，来信称会将切萨雷的顾问德·罗利斯主教送至佩鲁贾，公爵针对此事的回复送至佩鲁贾即可。圭多巴尔多自认已免于一难，对上述要求当然是全盘接受，当即将以心腹多提为首的两名家臣送到了佩鲁贾。多提一行人受到了主教热情的接待，向其展示出了乌尔比诺公国对切萨雷的恭顺后，获准前去斯波莱托觐见切萨雷，临行之前还得到了乌尔比诺公国将安全无虞的保证。

20日晚，圭多巴尔多正在乌尔比诺郊外的村庄安然地享用着晚餐，此时，满身泥泞的哨兵来到他的近前，报告说切萨雷及军队正一路朝着这边前进。但从斯波莱托到乌尔比诺要跋涉80公里的山路，圭多巴尔多

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只是一笑了之。但紧接着，第二名哨兵也到了，这次的报告让圭多巴尔多慌了神，报告称切萨雷早已到达了卡利，恐怕明早即可进入乌尔比诺的城镇。随后第三名哨兵到达，报告称乌尔比诺已被切萨雷的军队包围了。这样的行军速度简直令人闻风丧胆，更何况切萨雷不仅以神速翻过了亚平宁山脉，还是在夜间行军。

当切萨雷到达诺塞拉的时候，发令全军改变行军路线，不再向东进攻卡梅里诺而是改道北上。翻越亚平宁黑色山峦的行军途中，切萨雷始终走在全军的最前方，跋涉35公里，于入夜之时进入了卡利，先头部队的两千士兵刚刚占领此地。虽然全军在此稍作休整，但切萨雷和他的队长们可没有休息，他给部下们详细部署了进攻乌尔比诺的战略。军队再次出发，先头部队于夜半时分已进入了费尔米尼亚诺，距乌尔比诺城仅10公里之遥，随后陆续到达的军队，对乌尔比诺渐渐形成完全包围之势。奇袭，常常是制胜的不二法门。

犹如被晚餐的饭桌追赶一般，圭多巴尔多快马加鞭回到乌尔比诺城，此时城里早已得知了敌人来袭的消息，惊恐的民众骚动不安。圭多巴尔多一进入城堡即被仓皇失措的家臣们团团围住，他们异口同声地控诉毫无防御准备的领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的恐惧不断升高。有人主张积极防守，但圭多巴尔多表示必须要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因为去嫂子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处做客而不在城中。最终他决定带着作为养子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逃跑，他劝说大家“只要我出逃，乌尔比诺公国全体都可获得保全”，家臣们对此只能以泪洗面默默听从。舍弃了自己美丽的宫殿连同收藏在内的美术品，他带着养子和少数几名随从，暂且逃向了圣莱奥的要塞。

但那里也早已落入了切萨雷之手。于是他们乔装成百姓逃去曼托瓦，对于身患痛风的圭多巴尔多来说，潜逃之行异常艰辛，历经七天才最终踏上了曼托瓦的土地。

在圭多巴尔多逃跑数小时后，切萨雷在黎明曙光普照大地之时进入了乌尔比诺城，弓箭握于单手，胯下战马因行军而满身泥泞，恭迎他入城的家臣们与市民代表面色沉重，但全无抵抗。他径直占据了公爵所居住的城堡，稍事休息后，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接受重臣和市民代表呈上的象征投降和服从的决议书，针对市民发布公告，称将保证全体市民的安全，承诺军队不会出现暴行，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可照常进行。不过，虽然切萨雷原样保留了全部的市民代表，但圭多巴尔多的心腹政府要员却一个没留进行了全员置换，军队倒是没进入乌尔比诺，而是驻扎在费尔米尼亚诺。

乌尔比诺民众一度对切萨雷宽大的处理方式深感意外，以为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残酷的现实就被摆到了他们的面前，因为过于了解切萨雷的谋略行事，多提等三名家臣被处以死刑。

切萨雷对乌尔比诺发起的这次闪电战，彻底震惊了周边诸国。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曼托瓦，乃至因迎娶了卢克雷齐娅而本应安心的费拉拉，一时之间都开始热衷于同切萨雷搞好关系。而拿不出利益交换资本的小国，只能提着心吊着胆，在国内为所欲为惯了的小领主们，现在个个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卷铺盖逃跑。

在切萨雷进入乌尔比诺城的三天后，圣马里诺共和国与切萨雷的代理人拉米罗·德·洛尔卡缔结了归降协议。随后，卡梅里诺也落入了切萨雷之手。为攻下卡梅里诺，他派出了手下的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卡梅里诺的领主瓦拉诺更情愿议和，但深知切萨雷心思的他也清楚这是白日做梦。乌尔比诺陷落一个月后的7月20日，卡梅里诺也被攻破了，但不同的是，切萨雷对丝毫不得民心的卡梅里诺领主一族处置得非常彻底，借用当时年代记作者的话来说，领主和他的三个儿子被用“瓦伦蒂诺式”的方法杀死了，即快速准确地彻底绝断被征服地君主血脉的方式，其中三人能确认是经由唐·米凯罗特之手丧命。

此次战略胜利意味着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包围已近完成，面对此番

形势，佛罗伦萨共和国也被迫必须要认真地思考对策了。

切萨雷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了使节，在要求履行先前协议的同时，禁止其对逃亡的乌尔比诺公爵进行援助。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震惊于切萨雷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为与他交涉，匆忙派出两名特使，首席特使是弗朗切斯科·苏德里尼主教，次席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书记官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此次交涉的过程，可从二人与佛罗伦萨政府间互通的二十五封书信中尽数得知。

6月24日深夜，刚刚到达不久，连正式官服都没来得及穿的两名佛罗伦萨特使就接到了来自切萨雷的首次会谈通知，二人在乌尔比诺城堡内的一间房屋稍作休息等候会面，城堡已被切萨雷征用为宿舍，供其数名心腹和近卫队队员居住。片刻后，身着长至脚面的黑色天鹅绒长袍的主角切萨雷现身了。阻止了特使二人尚未出口的照本宣科般的外交辞令，切萨雷的口气一上来就十分严厉明确，他谴责佛罗伦萨不想履行去年5月签署之协议的态度，表示自己有生以来从未被如此慢待，接着说道：

“如果佛罗伦萨希望成为我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若是相反，恐怕从此刻开始，我将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处理与佛罗伦萨国境相接壤的领土问题，我个人自然是希望尽可能地减少针对领土范围和领土安全方面将面临的冲突。”

对此，两位特使尽力解释试图化解他的控诉，表示共和国政府一直在为了与公爵维持友好关系而持续地努力着。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切萨雷斜后方的烛台，火光跳跃中，切萨雷眸中一道光亮闪过。

“我希望你们对我有足够的信任，只有在被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我才有可能协助你们解决问题，一切都有的商量。但相反，若是得不到信任，恐怕我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免受贵国威胁，将被迫继续推行我的作战计划。我太清楚贵国是如何评价我的了，半句好话也没有，别说好话

了，甚至骂我是杀人犯。”

趁着特使两人哑口无言，切萨雷又讽刺地说道：

“我深知两位经验丰富、行事谨慎，但还是有句话不得不说，我非常讨厌你们的政府，无法让人信任，十分有必要来点改变。”

两人十分震惊地看着切萨雷的脸，这样的话连法兰西国王都不曾说过。紧接着，切萨雷继续用严苛有力的声音说道：

“政府就应该善于改变。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你们的政府能够遵守约定，或者，二位就尽快将我对这种做法已经忍无可忍的事情转告贵政府。一言以蔽之，想要作为朋友的我，还是想要作为敌人的我。”

两位佛罗伦萨人只是反复地向他抗议说自己的政府是优秀的，并极力澄清佛罗伦萨人行事认真，绝不偷奸耍滑，切萨雷笑了笑：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凭什么认为你们的话足以影响我自己的判断？”

两位佛罗伦萨人仍未放弃，他们进入了正题，解释道，要想获得佛罗伦萨的信赖与友情，只要将身在佛罗伦萨的维特罗佐阁下召回即可。但是，切萨雷的态度没有丝毫动摇，他的声音越发低沉严苛，脸颊反而渐渐浮起了微笑。

“你们是等不来我赐予这个恩惠的。要说为什么，不仅仅是佛罗伦萨不配，更是你们现在的这些佛罗伦萨人不值得我下这个命令。”

反正，切萨雷声称自己与托斯卡纳的事情毫无关联。

“确实，维特罗佐是我的部下，但我可以发誓，发生在阿雷佐的事情同我毫无关系。”

继续说着话的切萨雷的眼神，尖锐得像是要刺穿他们二人一般，但

脸上的微笑却愈加深沉了。

“不过，对于佛罗伦萨人所失去的，我并不感到可惜也是事实。不止如此，甚至我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满意的。”

两位老练的外交官被切萨雷的气势压倒了。即使是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也有着与法兰西国王交涉的经验，然而对他们来说，切萨雷却比国王还要难以应付。当晚持续了两小时的第一次会谈，以切萨雷如下的一句话而宣告结束：

“我不是为了施加暴政而生，正相反，我是为了消灭暴政者而生。”

第二次会谈本应该安排在次日，但直到晚八点两人都未得到切萨雷的任何联系。即使这样，伺机而动的两位特使还是想方设法与切萨雷麾下的朱利奥和保罗——两位奥尔西尼家族出身的佣兵队长，取得了联系，向与佛罗伦萨有着深厚关系的奥尔西尼家的这两名队长拜托，希望无论如何能帮忙安排与切萨雷的会面。最终，他们等来了会谈的通知。

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会谈依然毫无进展，切萨雷的强硬态度一如既往毫无改变。两位特使表示，自己并不能全权代表政府做决定，必须向本国政府充分说明情况后方能得到进一步指示，为此希望得到四天的宽限。快马去向佛罗伦萨政府报告，得到指示后再返回乌尔比诺，这个过程最快也要四天。切萨雷同意了。这个指示将决定接下来的事态演变，是和平，抑或战争。

时间紧张，骑马回佛罗伦萨的任务不得不由次席特使马基雅维利来担任。从乌尔比诺出发前往佛罗伦萨的路上，他骑马走过夏季的山道，亲笔将萦绕在头脑中的想法写在了给佛罗伦萨政府的通信上，内容大致如下：

“这位君主是个气概不凡的伟男子。手持武器，英勇善战，兼具宽

广胸怀，为了荣誉与征服不辞辛劳、不畏苦痛、不惧危险。无论面对任何挑战或突发事件，都能立即掌握状况并制定对策。有最为优秀的意大利人做臣下，并被他们所仰慕。更为难得的是，他那一路稳步撷取的令人敬畏的胜利，都在被无上的幸运庇护着。”

而孤身一人留在切萨雷身边的苏德里尼，使出浑身解数多方打探，试图挖出这个男人的真实意图，却是白费了力气，切萨雷绝不会将自己的真意轻易示于人前。军队总是整装待发，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却无人能提前知晓，目标只存于切萨雷一人心中。

数日后，佛罗伦萨送来了回复。此时已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的佛罗伦萨，得知唯一能制约切萨雷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正亲自奔赴意大利，选择的应对是姑且先争取些时间。在切萨雷要求的事项当中，支付36000达克特的年金以及宣誓归顺这两项，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并且，佛罗伦萨还固执地想要将对他们来说十分棘手的维特罗佐从阿雷佐驱逐出去。

7月7日，法兰西国王随开往那波利的军队一同，翻过阿尔卑斯，进入了阿斯蒂。随即，利用国王的身份介入了切萨雷对佛罗伦萨的交涉，声称自己也要从后者那里获得高额的年金，并对切萨雷要求的宣誓归顺表达了不满，得到支持的佛罗伦萨最终得以降低了年金的金额。现在的切萨雷在遭遇法国国王的时候，局面依然离势均力敌相差甚远，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法兰西大军压境之时。而就在他们为协议内容争论不休的同时，法兰西军队的先头部队也在不断地南下。

直到7月20日，新的协议方案最终达成。佛罗伦萨一方只需履行支付18000达克特年金的义务，切萨雷一方则必须召回身在阿雷佐的维特罗佐及其军队。时至今日，横在切萨雷面前的高墙，看上去似乎还是那么的厚重。

第八章

为了取得政府指示，马基雅维利将苏德里尼留在身后，离城一路骑马朝佛罗伦萨奔去，而另一名佛罗伦萨人恰好与他擦肩而过，踏入了乌尔比诺城门。这名身穿本色麻布长袍的老者，登上入城的石板坡道，径直朝宫殿的方向走去。老者斑白的长发和胡须遮去了大半的面容，虽然脸庞布满深深的皱纹，但是长眉斜飞入鬓，双目炯炯有神，在包裹全身的长袍之下，还隐约可见这个年纪少有的强健肌肉，走起路来也是十足的稳当，唯有从长袍袖口露出的双手稍微显露出他的年龄——手背上有已些许突出的静脉血管。

老者来到公爵所居住的城堡门外，向守卫表示想要拜见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阁下，没有推荐信和介绍信，甚至连自荐信也没出示，老者只是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在仆从入内禀报期间，老者就站在门边等待。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他的面前走了过去，随后，好似队长的强壮男子们身着体面的盔甲，高声交谈着出了宫门，没人回头去看站在门旁的老者。只有一个骑马进门的年轻男子，在下马把缰绳甩给马夫的瞬间，直直地看着老者，撞上了同时看向自己的老者的视线。

通报的人回到门口，告知老者主人说要见他。老者被引入美丽的宫殿之内，路上与许多年轻人擦肩而过，他们无一不散发着朝气的活力。

走过长长的走廊和台阶，最终到达了深处的一个房间，侍从向看似没人的屋子禀报了老者的到来后，关门退下了。房间并不十分宽敞，在曾于各式奢华宫殿行走的老者看来，这里近乎俭朴。没有任何装饰的白

色屋顶，由古怪的黑色粗柱子支撑，至于家具，房间里除了有个炉火已经熄灭的石砌暖炉外，就只有一张厚实的栗木做成的修道院风格的大长桌，和两把同样木质的椅子。其中，老者的目光被桌子上的东西吸引了过去，桌上有一张大大的亚平宁半岛中部地图，好似有人在此工作一般，地图上放着一杆羽毛笔。

老者不再研究地图，抬起目光，发现房间还连有一个阳台，通向阳台的门外冒出了几片常春藤的叶子，极目远眺则能够望到翁布里亚的山峦。此时，老者方注意到，有一位青年正隔着门旁唯一一扇打开的窗子，在对面直直地打量自己。老者走到门边，由白色石膏修饰的细长的阳台出现在眼前，那里站着两名青年。

其中一人，即一直看着老者的青年，靠在阳台扶手上，身穿毫无缀饰的浅灰色上衣与同色紧身裤，生长茂盛的常春藤枝叶爬满了屋顶，阳光照下来，将点点绿荫洒在了年轻人古铜色的脸庞和浅灰色的衣服上。另一个青年之前好似在说着什么，身体面向灰衣青年，现在也转向了老者，老人回想了起来，这就是自己在宫门处遇到的年轻人。两名青年年龄相仿，看上去都十分俊美，但灰衣青年一方，全身散发着坚决与威严的气息。

站在阳台门口的老人，静静地，朝灰衣青年弯腰行礼。青年在阳台上仅有的一把木制椅子上落座，向老人显示了身份，并顺带介绍了身边的另一名青年。

“米凯雷·达·克雷利亚，我的家臣。”

老人立即意识到这位就是以唐·米凯罗特之名而出名的男人，切萨雷那恶名昭著的左膀右臂。乍听到这个传闻中常和死亡相连的名字，老人的表情毫无变化，与其说毫无变化，倒不如说像是被激起了好奇心一般，看着这年少俊美的杀人犯，平静地向他也行了一礼。从这天起，老人便留在了切萨雷的身边。

两个月后的8月18日，切萨雷领土内，上至地方长官、城防守将、队长、佣兵队长、将校，下至一般士兵，均从身在帕维亚的公爵切萨雷处收到了一封布告：

“现通告要求各地区，须为我最亲爱的友人建筑技术总监列奥纳多·达·芬奇，保证各地区的通行自由，并提供尽善尽美的接待。他即将按照我的指派，出发巡视公国内的所有要塞，对此，各方务必竭尽全力协助其完成任务。此外，公国内所有的城堡、要塞、设施及相关的各种土木项目，技术人员在开工前或建设中都需咨询并听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意见。若是有人胆敢违反我的命令，哪怕是我的得力爱将，也请做好承受我的怒火的准备。”

在历史上，天赋领域各不相同的天才们，彼此相遇并相互协助发挥才能的例子并不多见。列奥纳多是思考的巨人，而切萨雷则是行动的天才。列奥纳多在现实的彼岸上独自悠悠踱步，与之相反，切萨雷在现实的河流中骑马昂然前行，但两人在精神深处却有着共同之处——对自己才能抱有的自负，拒绝不被自己承认的，抛弃不被自己需要的，完全地遵从自己的内心，这使他们得以通向完全的自由，哪怕是神圣宗教与伦理道德也无法束缚的自由。只是，竭尽全力维持自己通往极端怀疑主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活用到现实世界，是一件需要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的难事，而这二人恰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列奥纳多·达·芬奇绝不仅仅是《蒙娜丽莎》的作者，从他留下的数量众多的手稿中能看出，他的研究成果涵盖领域广泛，但其中他本人最看重的却是国土规划，当时来看，能在这方面助他实现理想的人物，只有势力强大的“君主”。拥有现实视野的列奥纳多，敏锐地察觉到了共和国制度的缺陷。

拥有自由的地方便无法产生秩序。

——出自列奥纳多手记

他于早年就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佛罗伦萨共和国，被誉为伟人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不仅没有足以实现他理想的势力，甚至连理解他的能力都没有。离开故土的列奥纳多，转而依附于当时公认实力最强的米兰的摩尔人，但是，长达十几年的旅居米兰随着摩尔人的没落而被迫中断了，“公爵失去了国家、财产以及自由，他全部的事业都戛然而止了”。

因有感公爵摩尔人的没落所写下的语句，同样也是在叹息自己理想的被迫中断。离开米兰后的列奥纳多选择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因土耳其帝国的威胁而常年被迫坚守城池，同时拥有着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不同的坚固的共和体制，列奥纳多寄望于其雄厚财力和宏大气魄，提出了使用河流阻止土耳其军队入侵的宏伟方案，但不成想方案却胎死腹中，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返回了佛罗伦萨。

列奥纳多从心底认定切萨雷是理想的君主，切萨雷对列奥纳多来说不是作为赞助者，而是作为可以共同实现自己理想的朋友。列奥纳多从切萨雷身上找到的，是可以为达彼此心愿尽施各人所长的同时，携手实现共同目标，这是他在洛伦佐、摩尔人以及威尼斯身上都未曾寻到的。

而切萨雷是刚上台不久的君主，必须要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首先要修筑城堡和要塞，然后是对历经战火的城镇整顿、运河修筑以及道路建设，领土处处如白纸亟待描绘。列奥纳多的才能对切萨雷来说，无比珍贵。

列奥纳多和切萨雷，这两个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对方的才能和自己的所需。这里完全不存在艺术家寻求保护人，或赞助者吹捧艺术家的关系，这里只存在着如何利用对方达成自己的理想这一冷酷的个人意志。与保护和援助相比，与居高临下的施舍相比，这二人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诚实与美妙。

这样的关系，只有在完全明确自己目的的人之间方能存在，进而诞生出真挚的互相尊重。26岁的切萨雷与即将迎来50岁的列奥纳多，对彼此就抱有这种难得一见的真挚之情。

自乌尔比诺与切萨雷的第一次会面之后，列奥纳多就留了下来，主要参与城堡设计和武器研制等工作。同时，列奥纳多对珍藏于有名的乌尔比诺公爵图书馆内的两部阿基米德古抄本兴趣浓厚，但其中只有极少的几个感兴趣的段落，可供他誊抄到自己的手记中。

再次从阿雷佐返回的维特罗佐与切萨雷均应允了列奥纳多，助其寻找阿基米德的其他古抄本，切萨雷通过帕多瓦主教的门路，维特罗佐负责核实出现在博尔格·迪·圣塞波尔克罗的线索。

列奥纳多于8月1日抵达了佩萨罗，停留期间探访了当地图书馆。后从佩萨罗沿亚得里亚海岸一路北上，一周后到达里米尼，他当时在手记中写道“一路走来的景象，正如在里米尼看到的泉水一般，各种各样的瀑布最终汇于一泉，合奏出统一的和谐乐章”。再度出发，沿艾米利亚大道北上，进入了切塞纳，他在这个切萨雷的公国都城额外停留了一段时间。切萨雷想按照一国都城的规格，将城市好好修整一番，为此要修建一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长达20公里的运河，要在市区建造对应的大型港口，意在与威尼斯之间建立海上交通，列奥纳多对这个规划十分上

心，停留在此便是为了视察工程进度。9月6日，抵达切塞纳蒂科，以切塞纳为起点的运河，将在此处流入亚得里亚海。前文提到切萨雷广发的通知，就是为了他此次视察旅行而发布的，在这里，列奥纳多不只负责建造运河，还研究了城市整体的防御策略。

在列奥纳多外出视察期间，切萨雷结束了在伦巴第的停留踏上了返程。为了攻打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他将下一次大本营定在了伊莫拉。伊莫拉不仅离博洛尼亚很近，还有1499年被他攻破收入囊中的坚固要塞，作为进攻的据点再合适不过。10月，切萨雷将列奥纳多召至身边。在这里，列奥纳多一边绘制着伊莫拉周边的精密地图，一边监督修整城堡要塞，同时还在为预防万一发生的包围战做准备、研究对策。切萨雷将自己居住城堡内的一室赐予列奥纳多用以起居，两人几乎每日都在一处并肩工作。故而在即将爆发的可怕危机中，列奥纳多得以平静地在最近距离，旁观切萨雷被危机侵袭并渡过难关的全部过程。而至于另一个同时在切萨雷身边的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列奥纳多却未与其有何深交。

到了1503年，与切萨雷频繁的行动相反，列奥纳多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留在伊莫拉的城堡，根据切萨雷整理好的资料继续埋头工作，为了切萨雷，更是为了自己。

列奥纳多绘制的伊莫拉地图

不过，列奥纳多在伊莫拉的宁静生活，最终也是一朝尽毁。8月18日，恰巧是切萨雷为列奥纳多发表布告一年后的同一天，身在罗马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逝世了，紧接着，波吉亚家族急速没落。教皇父亲过世的时候，切萨雷也重病在床无法起身，悲剧在此拉开了帷幕。

突来的变故中，罗马涅公国对切萨雷的忠诚并未变质，尽管如此，

伊莫拉全城还是在一夜之间兵荒马乱，面目狰狞的士兵在城中四处游走，这里已无列奥纳多的容身之地。当切萨雷在罗马被捕的消息传到伊莫拉后，列奥纳多最终决定离开。和一年前来到这里一样，他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

这之后的列奥纳多辗转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等地，始终没能找到足以代替切萨雷的君主，在离开切萨雷身边的第十六年，在遥远的法兰西土地上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切萨雷短暂的一生中，曾与两位伟大的文艺复兴人物有过交集，马基雅维利与列奥纳多。马基雅维利被切萨雷的理念点亮了思想的火花，以他为原型，写下了《君主论》。但列奥纳多对切萨雷却没留下只言片语，同摩尔人没落时一样，连一句叹息的话语都没有留下，流传至今的只有与切萨雷共事时一起署名的几张地图和一些土木工程设计草图。

约五百年后的1967年，在马德里国立图书馆的书库深处有了新发现，即后来被称为《马德里手稿》的列奥纳多的设计草图与随身手记。同手记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他与弟子的一些衣服，其中包括一顶斗篷，后来被推测是切萨雷·波吉亚的斗篷。

第九章

经过马尔凯地区的乌尔比诺一役，意大利诸国个个胆战心惊，生怕切萨雷的马蹄下次就会踏向自己。而对波吉亚的军队束手无策，将路易十二作为唯一能够阻止他的力量，当成救世主一般迎入意大利的，并不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一家。与切萨雷已势如水火的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自不必说，其他那些被他逐出领国的小领主们，也因独木难支而纷纷聚集到米兰，寻求法兰西国王的帮助。路易十二刚一进入米兰城，就被手持礼物大献殷勤的请愿者们团团围住了。

当时的米兰，有被从佩萨罗驱逐出来的乔瓦尼·斯福尔扎伯爵，有唯一从切萨雷剑下逃脱的卡梅里诺的瓦拉诺族人吉昂马利亚，还有从寄身之所曼托瓦前来的、面色苍白的原乌尔比诺领主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费罗公爵。当然更少不了带着昂贵的礼物从博洛尼亚前来的乔凡尼·本蒂沃利奥领主的两个儿子，人人皆知博洛尼亚会成为切萨雷的下一个目标，还有意欲进一步加强亲法的外交政策、直接带着上供年金前来觐见国王的佛罗伦萨特使。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看似保持中立，选择了向米兰同时派出外交官与间谍的政策方针，这个政治老练的国家，决意在场外观察法兰西国王将如何对待切萨雷。

集中到米兰的小领主们，为了反抗切萨雷这一共同目标而空前地团结，并期望法兰西国王能加入他们的阵营，与其说是期望加入，不如说没有国王加入的他们将一筹莫展。这些人组成了反切萨雷同盟军，一致推举深受波吉亚威胁的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担当最高指挥。曼托瓦侯爵以威尼斯陆军总司令官的身份担任同盟军佣兵队长一职，即是出自默不作声的威尼斯的计谋，目的是不必亲自动手便可消灭波吉亚，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回觊觎已久的罗马涅与马尔凯地区。威尼斯

隐藏着真实意图，继续对法兰西和波吉亚两方隔岸观火。

而此时的乌尔比诺，苏德里尼正在与切萨雷进行最后的会谈，在马基雅维利离去后，佛罗伦萨特使苏德里尼孤身一人却仍然在坚持游说。同时，已归于切萨雷手下工作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忙于研究推敲攻打敌方城堡的战术。而在秘密派往路易十二处的特使返回乌尔比诺后，切萨雷与苏德里尼的交涉突然有了进展，他将维特罗佐从阿雷佐召回，同时命其向佛罗伦萨归还已占领的城堡要塞。虽然让一心向佛罗伦萨复仇的维特罗佐接受这个结果并非易事，但切萨雷谎称维特罗佐的领地卡斯泰洛城有被攻打的危险，将他骗了回来。虽然并非对小领主们在米兰的动作全然不知，但他却并未自乱阵脚，愚蠢地急忙跑去路易身边被看热闹可不是他会做的事。

在路易进入意大利的二十天后，切萨雷结束与苏德里尼的交涉，终于踏上了觐见路易的行程。7月25日，身穿耶路撒冷宗教骑士团制服的他骑马向米兰出发，随行只有四名士官。3天后，切萨雷到达费拉拉城堡，探望卧病在床的妹妹卢克雷齐娅。数小时后，他复又上马，随行人员增加了几名，卢克雷齐娅的丈夫阿方索·德·埃斯特也随同切萨雷，从费拉拉出发一并沿艾米利亚大道北上前往米兰。

在米兰，路易亲切地接见了请愿者，对于所赠礼物也一概欣然接受，使他们更添上了一层期待。此时有消息报切萨雷将要前来，人们等不及要看路易会对他采取怎样的态度。

8月5日，国王带着家臣们出城迎接切萨雷，得知此事的人们，当即表示自己也要去迎接他，纷纷跟在了国王一行人身后。驱马前来的切萨雷与国王在米兰城门外不远处相遇了，两人的再会令看热闹的众人哑口无言，宛如父子久别重逢一般，夸张地相互拥抱亲吻脸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切萨雷目不转睛地盯着路易，始终面带微笑，路易则是双臂挽过切萨雷的脖颈，反复地亲吻着他，犹如不敢置信他终于来到了自己身边一样，每次切萨雷作势拉开拥抱，路易都要再次抱上去，在目瞪口呆

的围观人群面前，两人就这样反复了数次。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并排骑着马入了城门。

而自打进了米兰城堡，见识到了国王给予切萨雷的特殊待遇后，原本对国王有所期待的众人，现在就只剩下了唉声叹气。路易为切萨雷在城中准备了房间，还因他没随身携带替换衣物，特准切萨雷可从自己的服装中随意挑喜欢的穿。整整一天，路易始终不离切萨雷左右，尽管其他人被允许列席，却只能呆呆看着他们二人亲密无间，半句话也插不上。然而还不只是这些，路易的款待一直持续到了当天深夜。切萨雷的晚餐是由国王亲自选定的最高级美味，而晚宴后当切萨雷已先行告退，还想继续交谈的路易，竟穿着睡衣直奔切萨雷的房间谈天去了。尼科洛·达·柯勒乔给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写道："无论如何，都像是对儿子或弟弟一般的热情款待。"伊莎贝拉的丈夫曼托瓦侯爵也在给妻子的信中叹息道："两人相互拥抱亲吻，表现出的举止真个兄友弟恭。"

向法兰西国王抗议切萨雷的专横粗暴，期盼他倾向于反切萨雷一方的罗马涅和马尔凯的小领主们，看到此番景象纷纷陷入绝望，陆续离开了米兰，反切萨雷同盟的构想也再无人提及。他们中最后离开米兰的是曼托瓦侯爵，身为反切萨雷同盟主要发起人的他，在如此境况下，若不改善与切萨雷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安心回国。不过，曼托瓦侯爵并不是一般小领主的角色，他与切萨雷之间完全可以达成共识。切萨雷提出的条件是，曼托瓦侯爵不得再给予乌尔比诺公爵任何援助，并让曼托瓦侯爵的长男费德里科与切萨雷身在法兰西的女儿露易丝订婚。第二个条件是就以前提过的事情建立明确约定，哪怕婚约双方还都是两三岁的孩子。曼托瓦侯爵接受了条件。谈妥了这些后，他终于能出发离开米兰了。

对周围来回变幻的臆测与失望置若罔闻，切萨雷与路易之间复又确立了新的秘密协定。切萨雷一方的义务是，在法兰西军下次进攻那波利时，亲自指挥一万人的士兵援助处于劣势的法兰西军，不过义务只有三

年的履行期限。路易一方，会借给切萨雷三百名枪骑兵，此外不光认可他对博洛尼亚的任何行动，甚至也认可他在其他地区自由的行动（但暗中把佛罗伦萨排除在了名单外）。

从乌尔比诺出发奔赴米兰的时候，切萨雷身穿耶路撒冷宗教骑士团制服的举动，并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蕴含了他缜密的心思。

如此穿着不是因为切萨雷相信路易的友情，只是因为路易是法兰西的国王。切萨雷可以对意大利小领主们视若无睹，但对路易，却不能让他抓住任何把柄，进而打压自己的野心。比起千万的辩解，不如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天主教会的发展而奉献一生的宗教骑士团成员，路易察觉出了切萨雷无言的表态，当然不会愚蠢地戳破他的伪装，路易在心里也是有过计算的。

告别路易归来的切萨雷，将大本营设在了伊莫拉。理由有二：第一，伊莫拉距离下一次的目标博洛尼亚很近。第二，这里的要塞非常坚固，这是他在三年前攻击弗利、伊莫拉的时候亲身体验过的，在当时给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信中，被他形容为“完美的防御”。特别是这第二个理由，对还没有专属自己的正式城堡的切萨雷来说，防御层面的因素是最首要的考虑。但是，令人们感到震惊惶恐的是，切萨雷甚至将罗马涅公国的政府和法院都迁移到了伊莫拉，这表明他有意将伊莫拉当作都城。但是，伊莫拉位于他现有领土罗马涅的最边境，没有人会把都城设在国境附近，这即表明，切萨雷只是将现在的国境当作暂时的。人们对于他的这一宣言，各自加以解读并各有所动。

博洛尼亚是除费拉拉以外唯一剩下的教会领国，也是教会领地事实上的都城，在时刻逼近的切萨雷的威胁面前，领主本蒂沃利奥家族尚且举棋不定。究其原因，此前的博洛尼亚一直处于法兰西国王的保护下，切萨雷也曾因此一度打消了攻占的念头。但不成想，这次切萨雷却挑明了要进攻博洛尼亚，并在临近的伊莫拉按部就班地做着战前筹备。即使惊慌失措的本蒂沃利奥向路易追问，法兰西国王也还是表示对博洛尼亚

的保护将一如既往，并立下了证明法兰西和博洛尼亚友好关系的字据。虽明知在没有路易认可的情况下，切萨雷并不能进攻博洛尼亚，但本蒂沃利奥却因此变得更加困惑不已。艾米利亚大道似乎一夕之间变得车水马龙，在伊莫拉城门处运送军马武器的队伍络绎不绝。

不过，本蒂沃利奥的困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罗马教皇处发来了诏书，称本蒂沃利奥家族已被剥夺教皇代理的官职，族长因苛政和教唆教皇敌人之罪被告发，限十五天内接受传唤，到罗马教皇厅受审。收到这份诏书的本蒂沃利奥面色惨白，但后面还跟着更为致命的一击，法兰西国王令使者送来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文书，内容是让他们将博洛尼亚返还给教皇厅。

遇到来自教皇与法兰西国王的双面夹击，本蒂沃利奥进退两难，好在拜其不好不坏的统治所赐，未曾招致民众的憎恶，故而博洛尼亚上下达成一致，决定迎击这场基本没有希望的战斗。如果没有之后即将发生在切萨雷身上的夺走了他全部势力的事件的话，可想而知，博洛尼亚必将会被他的铁蹄踏为平地。让当家的老乔凡尼·本蒂沃利奥心中大石得以落下，让这一年意大利的冬季为之震惊的，便是切萨雷麾下佣兵队长们的叛乱。

首先，在讲述叛乱军的构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虽然各有说法，但大体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恐惧”——这些佣兵队长基本都是一国之主，即使大多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国，然而切萨雷一路攻占的国家恰恰都是些小国。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惧怕被切萨雷毁灭的命运总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特别是当同僚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的悲惨例子出现后，这种恐惧更加深了。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法兰西国王路易认可了切萨雷可自由攻占各个小国，但至少知道路易轻易地就认可了其对乌尔比诺的进攻。他们不得不认识到，即便自己是在切萨雷麾下效力，也不一定绝对安全的事实。

“憎恶”——他们或多或少都生于将门之家，家族传统代代传承。整个意大利的佣兵队历来由两方势力相较高低，过去是斯福尔扎和布拉乔，现在是维特里派和奥尔西尼派。这些以将门传承为自豪的男人们，看到宗教世家出身的切萨雷，一个一个地将举世皆知的武将家系从意大利版图上连根拔起，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自豪，在切萨雷面前似乎一文不值。

“蔑视”——当下气势如虹的切萨雷，依靠的是教会的力量。在意大利的历史中，天主教会国家，或是本体正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罗马教皇厅的圣职者们，他们巧立名目借机扩张教会势力的行为屡见不鲜，国民们对其的反感已根深蒂固。自中世纪以来，世人早已习惯于厌恶教会政治，嘲笑圣职人员，这些感情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已深入骨髓。不过意大利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在罗马教会及其圣职人员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有共同之处的人性之镜，发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故而切萨雷是教皇的儿子，是庶出的出身，这些对于佣兵队长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大家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但是，教皇的儿子以教会势力为靠山作威作福，这一点就让他们在感情上十分不能接受。

佣兵队长们对切萨雷的恐惧、憎恶、蔑视日益难以压抑，自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在被打倒前先将对方打倒。正如叛乱者中的其中一员詹保罗·巴利奥尼所说，在“恶龙择人逐一吞噬”的情况下，别无他法，只有在自己被龙吃掉之前，吃掉那条龙。

接下来，将一一列举参与了叛乱的佣兵队长们。

维特罗佐·维特里——他作为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与在当地任地区主教的弟弟朱利奥共同维护统治地位已长达四十年之久，他曾在法兰西国王麾下任职，是一名能力出众的佣兵队长，对于这一点他曾经的对手反阿拉贡、反波吉亚势力深有感触。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后，维特罗佐和兄长保罗一同受佛罗伦萨共和国雇佣担当佣兵队长职务，在随后的比萨战役中，他的兄长遭诬陷，被佛罗伦萨以叛徒之名处死，故而为了

报仇的维特罗佐自切萨雷起兵伊始就作为臣下追随左右。维特罗佐的军队被称为是切萨雷军中最为优良的一支，不过，这位稀世良将的身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缺点，即对愤怒、憎恶、残忍的情感缺乏自控能力。虽然切萨雷是在利用维特罗佐对佛罗伦萨的复仇心，亲手煽动了其在阿雷佐和瓦尔蒂扎纳所施加的暴行，但切萨雷也不得不承认，最终的后果已超出了自己的可控范围，一个曾垂泪恳求自己准其向佛罗伦萨报杀兄之仇的舍生忘死的臣下，竟然会那般凶残。而更糟的是，根据切萨雷和佛罗伦萨之间所交换的协议，维特罗佐必须要交还阿雷佐。因此，维特罗佐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复仇心无从发泄，反而恨上了自己的主上。切萨雷当然懂得，对敌人无须妇人之仁，下手应毫不留情，但在维特罗佐肆无忌惮的杀戮面前，切萨雷的做法已近乎优雅仁慈了。不过，平日里的维特罗佐性格率性而正直，颇得切萨雷的喜爱。

奥尔西尼家——在与美第奇家拥有亲缘关系的罗马名门望族中，有两人参与了这次叛乱，帕隆巴拉的领主保罗·奥尔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在科隆纳、萨韦利相继被切萨雷彻底打垮后，奥尔西尼一族全靠担任切萨雷佣兵队长的上述两人才幸免于难。奥尔西尼至今仍对五年前与甘迪亚公爵的一战印象深刻，虽然那时是奥尔西尼大获全胜，但他们不觉得波吉亚会对这件事情一笔勾销。虽然身在切萨雷的阵营，却始终不能安心，生怕自己会是切萨雷的下一个目标。此外，拉提诺枢机主教的庶子保罗和奥尔西尼枢机主教的侄子弗朗切斯科二人，对于同样出身庶出却一步登天的切萨雷，有着抹不去的反感。

詹保罗·巴利奥尼——身为佩鲁贾的领主，自出生以来他已闻遍了血腥的味道。在佩鲁贾，巴利奥尼家虽一次也没能完全掌权，但在几个有实力的家族中，却总是能确保首席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终年不断的家族纷争。砍杀事件和背叛犹如家常便饭，即使是走在路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有可能拔刀相向。哪怕是教皇厅出面调停，也无法消却他们家族之间的仇恨，这座被美丽的绿色丘陵所包围的古老伊特鲁里亚城市，置身其中却只觉残忍如地狱。1500年7月，就连詹保罗自己，也被

卡梅里诺的领主巴拉诺一族及其他反对派联手算计，整个家族几乎没留下活口。这位身负军事才能、胆识过人的年轻男子，十分清楚波吉亚对自己的国家佩鲁贾所抱有的野心，叛出切萨雷的阵营对其兵戎相见，对他来说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选择罢了。

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想要了解这位佣兵队长的性格和境遇，我们只需翻看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八章“关于凭借暴行跻身君主之列的人们”中，写到他时所列举的一小部分即已足够。书中写道，奥利维罗托在幼年时，被自己的舅父费尔莫领主乔瓦尼·福利亚尼收养，将他养育成人，成年后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佣兵队长，前往保罗和维特罗佐兄弟身边受训。然而，如期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将后，他想要的却更多了，他妄图将费尔莫据为己有，这背后自然是有着维特罗佐的支持。下了如此决心的他，给舅父写信称，打算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希望有幸能得到舅父的召见。并且，为了让人民知道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将率百人骑兵队威风凛凛地造访，这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舅父的声誉着想，希望能获得舅父和人民正式而庄重的欢迎。他的舅父闻讯而喜，就这样将外甥迎了回来。数日后，奥利维罗托举办宴会，邀请了舅父及费尔莫的所有达官贵人。宴会将尽，他将话题转到了波吉亚身上，在大家皆欲对此各抒己见之时，他却从席位上站了起来，表示这种话题应该在别室秘密地讨论，旋即将大家请到了另一间房间。当舅父和客人们纷纷落座重新开始交谈的时候，他的手下们从藏身的角落里窜出袭向众人，第一个被杀死的毫无疑问就是他的舅父。在场的全员都被杀害后，趁着惶恐不安的民众正六神无主毫无反抗之力，奥利维罗托跳上了马，带着手下占领了整个城市，费尔莫就这样落入了奥利维罗托手中。像费尔莫这样临近亚得里亚海，暂时不会遭到切萨雷侵略的边境之国，领主奥利维罗托执意加入这次叛乱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同关系亲近的维特罗佐共进退。

这五个人就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叛乱“马焦内之乱”的主谋者，他们与切萨雷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你来我往上演了好一场大戏，情节跌宕

起伏精妙绝伦，充分展示出了何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明主良将。而我们恰好幸运地拥有马基雅维利，此次事件中最值得信赖的证人，来为我们还原事实经过。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于1502年6月作为大使首次接触切萨雷，同年10月，再次作为佛罗伦萨大使被派到了切萨雷处，此次他独自出使并担当首席大使。故而在接下来发生叛乱的三个月里，他一直就在切萨雷近旁，得以详尽见识了切萨雷的种种应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马基雅维利寄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五十四封报告书里，内含包括此次叛乱事件在内的众多年代记文稿及手记，是了解此次叛乱的最为珍贵的史料。此外，在叛乱事件告一段落后，马基雅维利又重新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瓦伦蒂诺公爵杀害维特罗佐·维特里、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以及格拉维纳公爵的方法叙述”。关于事件的再次描写，表露出切萨雷的做法确实令马基雅维利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时也有着他想记录自己关于事件看法的目的。不过，比较两份史料，能够发现在记述上有着微妙的不同。例如，得知手下的佣兵队长反叛，在报告书中的切萨雷完全不动声色，在《叙述》中则是“充满了不安”。恐怕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是，报告书是不含主观想象，仅仅客观地将事发当日的每一刻逐一记录下来，《叙述》则相反，不是站在冷静的外交官或记录者的视角所写，而是在事发后隔了一段时日，更接近史学家的角度所写出的文章。即处于事发当时与事后全局的不同观察角度的差别，因此出现前后描写的微小不同并非有误。

更何况，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只提交报告书就足够了，他还必须代表佛罗伦萨与切萨雷进行外交，而这是绝对不允许加入自己的想象的，冷静地了解状况才是他最为首要的任务。了解了两份记录出现差异的原因后，就能明白这两份文字，均是此次叛乱事件的重要证言。报告书中切萨雷是被背叛的一方，而在《叙述》中他成为背叛的一方，不过，当时的切萨雷其实是两者兼具的。而闻名于后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哲学

思想，正是他从此时的切萨雷身上学到的，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再次回顾此次叛乱是有必然性的。

第十章

1502年10月6日，一名身受重伤精疲力竭的男人来到了伊莫拉的要塞，男人几乎是从马上跌落下来的，气力仅能支撑他说出一句“给公爵殿下”。很快，这名男子被侍从们抬到了切萨雷的面前，男人用仅存的一口气说道，他带着教皇的信从罗马出发前来伊莫拉，途中被詹保罗·巴利奥尼的手下袭击，同行的其余三人均被当场杀害，其中一人随身携带的教皇书信也被夺走了。只不过教皇提前就顾虑到万一遭遇意外的情况，准备了信件的副本由自己携带。

自己一心逃跑，虽然也身负重伤不过最终还是成功逃脱追杀，随后从百姓手中买了马，一路支撑着总算到了这里。说着，男人递出了信件，切萨雷几乎是一把抢过来，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9月28日，隶属于切萨雷的佣兵队长们在托迪集结，共同决定将不参加切萨雷的下一次军事行动，并进一步，达成了要彻底倾覆切萨雷的共识。切萨雷本人拿到这份情报后，务必尽快制定出对付他们的手段，先发制人，将其全部赶尽杀绝。”

但其实数天前，叛乱方面第二次会议已在马焦内举行，再过不了几天，切萨雷就是不想知道这事都不行了。根据截获了教皇书信的巴利奥尼的提议，他们迅速地集合了起来，地点定于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在马焦内村的城堡。出席者包括主人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在内，还有以下五名切萨雷麾下的佣兵队长：

保罗与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家的两名代表

维特罗佐·维特里——卡斯泰洛城领主

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费尔莫领主

詹保罗·巴利奥尼——佩鲁贾领主

以及，在切萨雷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的锡耶纳领主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的代理人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

博洛尼亚领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的代理人即他的儿子赫尔墨斯·本蒂沃利奥。

再加上国家已经被切萨雷夺取，逃往威尼斯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的侄子奥塔维亚诺·伏列哥索。

全家族都被切萨雷杀害了的卡梅里诺领主瓦拉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贾马里亚·达·瓦拉诺。

以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焦内集会”的参加者，不过，此次叛乱的主导权被彻底掌握在切萨雷麾下的奥尔西尼、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这些佣兵队长的手中。之所以拉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入伙，是想借民众对圭多巴尔多的同情，为他们的叛乱博得世人的同情和理解。在马焦内聚集的所有叛乱者，在要将他们共同的敌人切萨雷彻底击败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10月7日，由出席者全员签名，马焦内同盟宣告成立，同时意味着对切萨雷的宣战公告正式发表。在伊莫拉的切萨雷发现教皇父亲写给他的信被拦截夺取，是在这之前的一天。同盟成立当天，与反叛军遥相呼应，乌尔比诺公爵的旧臣夺下了领地内最坚固的要塞圣莱昂，切萨雷配置在此的守备军舍弃要塞，退败到了佩萨罗。四日后，杜兰特城堡被维特罗佐的军队攻陷，第二天，巴利奥尼的军队又占领了卡利，布比奥、费尔特罗等地也都掀起了叛乱的浪潮，转瞬间就将切萨雷的士兵一个不留地彻底赶出了乌尔比诺。

而另一边，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正专心地研究对策。首先，他让分散在罗马涅各地的军队集结到最亲近的三名西班牙人队长的所在，即唐·米凯罗特、雨果·德·蒙卡达、拉米罗·德·洛尔卡三人手中，想通过他们保住佩萨罗和里米尼之间的海路交通。三名队长被交付了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然而，被叛乱军在15日先发制人，趁着切萨雷军队尚未做好作战准备，于卡尔马茨发起了进攻。战斗以切萨雷军的惨败告终，唐·米凯罗特受伤，雨果·蒙卡达被奥尔西尼部队俘虏，只有拉米罗·德·洛尔卡一个人撤退到了法诺。法诺、佩萨罗、里米尼、切塞纳，以及切萨雷领地罗马涅公国的诸多城镇虽然还在切萨雷的支配下，但失去了乌尔比诺公国领地、福松布罗内以及卡尔马茨，等同于罗马涅公国的一半已落入了叛乱军之手。同时，博洛尼亚的三千军队从北面逼近了伊莫拉。

至此，叛乱军意图将切萨雷孤立在艾米利亚大道正中地区的预谋，在不到十天内就成功了。切萨雷若想向北求助于身在米兰的法兰西军，则有博洛尼亚拦在中间，若想逃去罗马，则陆路、海路均已被截断。此外，和拥有约八千正规军及三千杂牌军，军队总数可达万人的叛乱军相比，被孤立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手里，只剩下四百人的亲卫队和两百人的枪骑兵，至于切萨雷新近组建的罗马涅国民军，八字还没一撇，在眼下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刻，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要叛乱军从艾米利亚大道南北两面双向夹击，无论伊莫拉的要塞有多坚固，相信过不了多久，切萨雷就会彻底落败。然而，叛乱军一方也不是没有缺陷。

首先，在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统率全军，即叛乱军无法在一人的指挥下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维特罗佐虽然是优秀的军人，但却没有纵观大局的眼界与知人善用的能力，奥利维罗托之流更是无法纳于考虑范围内。在参加“马焦内集会”的小领主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已根深蒂固，正是这种不统一造成了最终的失败。第二点，他们采用的协商制乍一看是很合理，但事实是缺乏最高统帅与相互间不信任所造成的权宜的结果，当遇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与之相比，陷入困境的切萨雷唯一的优势便是他自己说了算。第三个缺

点，在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喊着要打倒切萨雷的激进派（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坚决主张要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打到底，但稳健派却是明面上表示赞同，背地里却偷偷摸摸地各自联络切萨雷谋求讲和。锡耶纳领主佩特里奇虽然派了两名代表前往马焦内，但二人却深知主君的意图是比起作为同盟的一员，更愿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博洛尼亚的乔凡尼·本蒂沃利奥更是老奸巨猾，虽也派儿子赫尔墨斯去了马焦内，却还在通过关系亲密的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与罗马教皇保持着联络。甚至奥尔西尼家族也是如此，借助枢机主教的弟弟——教会军佣兵队长朱利奥作为中间人，探索着与波吉亚议和的手段。叛乱方在马焦内的同盟成立不久的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战果，却没有继续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边的切萨雷，在因启用西班牙裔队长造成了最初的军事失败后，已开始着手实行第二个对策，具体应对可被概括为三点。第一，争取时间，也就是通常在这种事态下总被奉为上上策的策略，尽可能地拖延敌人，延缓其发起最终决战的日期。他对于叛乱者中带头的自己那几位老部下的秉性了若指掌，也很清楚他们所谓的团结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切萨雷决定，先从同盟的一隅开始击破。他挑中了独自一人留守奥尔西尼宫廷的罗伯特·奥尔西尼，一通花言巧语过后，这位除了优雅别无他长的年轻人“骑士奥尔西尼”就被彻底笼络住了。切萨雷声称：他们于布里奥尼拦截的教皇书信是伪造的，对于世代均是坚定的教皇派，且作为自己的部下表现也异常优异的奥尔西尼家族，若当真亲手清除，无异于自断臂膀，于自己又有何益呢？此次的事情实在是个令人遗憾的误会，若是能够再度归于旗下，承诺将在自己与教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给予更多的领地，甚至也可以有更高的酬劳。年轻的罗伯特被主君的这些话感动了，当即主动请缨担当说客，负责游说反叛的奥尔西尼家族。13日，罗伯特启程前去伊莫拉。

但与此同时，切萨雷却在加强军备力量。向米兰送去使者，请求派遣五百名加斯科涅士兵和一千八百名枪骑兵，此外还希望从瑞士募集一

千五百名佣兵，从米兰募集三千名法兰西士兵，费用全部由切萨雷负担，他的金库直接与教会金库相连，在军费上从不吝惜开销。如此这般，一边为募集士兵向各地派出使者，一边大修城堡巩固城防，以伊莫拉要塞为首，下至领国内各大小城镇，到处都在不知懈怠地加固城池，此时在身旁协助他的就是同在伊莫拉的建筑土木总监督列奥纳多·达·芬奇。

在为平叛软硬兼施的同时，切萨雷还必须分心关注近邻诸国的种种动向。他对外巧妙地营造出一副被背叛的君主的形象，意在将自己的立场和行动正当化，在借此形象成功令法兰西国王路易兑现其援助承诺后，又想要利用他完全镇压住意大利各国的反波吉亚浪潮。其中，费拉拉公国因与其妹卢克雷齐娅的联姻而与波吉亚成为亲缘关系，也不可能违背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意思站在敌对的一方。曼托瓦侯国则因娶了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伊莎贝拉为侯爵夫人，此番也一如既往明确地表示将与费拉拉公国共同进退。故而，与罗马涅公国国境接壤的费拉拉和曼托瓦两国，无须切萨雷担心。

问题是出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两个共和国身上。切萨雷最为担心的，就是因自己无视威尼斯的觊觎，强行将里米尼和法恩扎纳入自己公国的行为，会招致威尼斯在眼下加入反波吉亚阵营，攻打自己的后果，不过他同时也并不想得到这个可怕大国——唯一不受法兰西国王势力影响的意大利国家——威尼斯的援助。对切萨雷来说，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动作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切萨雷却也知道，被逐出国家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因切萨雷的强烈要求，无法继续待在姐夫贡扎加侯爵所治理的曼托瓦，现在被威尼斯接手保护了起来，甚至攻击圣雷奥要塞的公爵旧臣们还曾高呼“圣马可、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圣人）。在面对重要的威尼斯对策上，他使用了教皇这张底牌，在叛乱爆发后，罗马教皇直接请求威尼斯对切萨雷予以援助，但是，慎重的威尼斯共和国对此并未做明确表态。只是在10月12日，向身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派去了使节，宣称威尼斯完全没有参与攻打圣雷奥城，并且也毫无庇

护援助乌尔比诺公爵的意思。切萨雷诚挚地迎接了使者，并表达了对共和国如此厚待自己的感谢之情。但其实，此时的切萨雷早已得知威尼斯将一度解雇了的曼托瓦侯爵贡扎加再次聘为陆军总司令官，也知道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在暗中活动，意图离间法兰西国王与波吉亚。

在切萨雷实施第二步战略的同时，叛乱军的脚步也顺利地逼近到了切萨雷身侧，就如取得乌尔比诺公国一样，他们又从切萨雷手中夺取了圣马里诺共和国并宣布了独立，现如今，佩萨罗、里米尼也被迫与叛乱军决一死战，濒临陷落。叛乱军提出的“让我们亲如兄弟”的口号，刹那间席卷了罗马涅全境，连战连胜的叛乱军将乌尔比诺还给了圭多巴尔多，将法恩扎、里米尼交给了威尼斯，剩余的土地在叛乱军内部二次分配，叛军们亲近威尼斯到了连叛乱成功后的对策都通报给了对方的地步。

不过，孤立无援被困伊莫拉的切萨雷，仍在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明确得知威尼斯不打算对自己动手后，他最后需要解决的难题就剩佛罗伦萨共和国了。而佛罗伦萨的日子，自叛乱爆发之日起就没安稳过，北有切萨雷·波吉亚，东、南、西三个方向则被叛乱军包围。正常来说，一直视自己为眼中钉的切萨雷被部下造反，理应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叛乱军一方可是有着奥尔西尼家族和维特罗佐·维特里，前者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并一直在为了复辟这个佛罗伦萨最为惧怕的敌人出谋划策，后者是叛乱主谋却心心念念不忘与佛罗伦萨间的仇恨。此外，还有如佩鲁贾的巴利奥尼、锡耶纳的佩特里奇之类与佛罗伦萨互为敌对的领主们加入叛乱军，对佛罗伦萨来说，无论如何这次叛乱的动向都让人挂心。但不管是叛乱方或切萨雷哪边占上风，佛罗伦萨能采取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就是中立。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唯一仰仗的保护者法兰西国王，现在也依然站在波吉亚一边的时候，更不可能自己倒向反切萨雷的阵营。

根据佛罗伦萨和法兰西迄今为止的关系判断，切萨雷方面认为佛罗

伦萨是同阵营，但是他不仅不期待这位同盟的援军支援，更是只要对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已谢天谢地了。不过切萨雷倒是存着心思，想利用当下佛罗伦萨的恐慌，以那份到现在都没谈妥的佣兵契约做盾牌，实现自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内站稳脚跟，再进一步将其从内部瓦解据为己有的企图。

想挑出一个同切萨雷旗鼓相当，能来执行这项艰巨交涉任务的特使人选，是非常困难的。当前大势要求这位特使，一方面要尽量隐藏佛罗伦萨的意图，不给予会贻人口实的许诺，另一方面却需要尽可能多地探寻切萨雷的真意，非熟练外交官不能为，然而，若是任命太过重要的官员担当特使，就会显得佛罗伦萨对切萨雷以及此次的事态过于重视。最终被挑中的是33岁的共和国政府书记官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他因前次出使乌尔比诺而与切萨雷结识，这为他的任命额外增加了一个有利条件。

10月7日，马焦内叛乱宣言正式发布的前一天，接受政府任命的马基雅维利将随从和行李甩在身后，快马加鞭赶到了伊莫拉。他于傍晚6时到达后，直接申请会见切萨雷，并被当即准许，随后身着行装的他就径直出现在了切萨雷面前。切萨雷接过马基雅维利呈上来的共和国政府文书，让他在椅子上小坐，自己自行阅读。片刻后，切萨雷向马基雅维利询问他为何而来，马基雅维利答说是为了表达佛罗伦萨共和国对罗马涅公爵的友好态度而来。对此，切萨雷回以愉悦的笑声，说自己没有为美第奇家族的复辟提供过援助，从我们各自和法兰西国王的友好关系来看，我们双方之间关系好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自己不想以拜托的方式获得共和国的帮助，而是建议共同携手，是因为眼下合作对自己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双方来说都有好处。他说，若是放任威尼斯借着帮助乌尔比诺公爵，在罗马涅地区大肆扩张势力，有麻烦的不正是你们嘛。接着还说，叛乱军早晚会被击败，“就是群无能的废物！”这是切萨雷当晚唯一近似泄愤的话。随后的三个月里，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保持着交涉，他愈发确信了切萨雷将会获得胜利。在此次与马基雅维利会面后的两周

时间里，切萨雷的立场明明越来越差，但在佛罗伦萨特使马基雅维利的面前，却终究没有让他领悟到自己的真实的意图。

但是，仅有一次，在叛乱爆发未满两周的10月20日，切萨雷在马基雅维利面前被窥探到了内心。当时，各地战败的消息陆续传来，切萨雷静候多时的军力扩充成果却久等未至，即使有少数的军队已到达伊莫拉，但关键的法兰西援军和瑞士佣兵却尚未抵达。当天夜里八点，同意了马基雅维利与自己见面请求的切萨雷，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道：

“他们（叛乱军）的士兵，竟然还自称为白衣士兵，这不就和无意义是同义词吗？”接着，对自己那些发起叛乱的旧部下，他的嘴里第一次蹦出了责难的话语。

“我不想虚张声势，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越是了解他们，我就越无法尊重他们，即使维特罗佐在我手下表现良好屡立战功，我也从不认为他是个拥有远大理想并能为之付出行动的男人。我如此认为并不是因为他患有法国病（梅毒），而只是，他只适合攻击那些毫无防备的国家，劫掠那些只知道逃跑的人，以及做出像这次一样无耻的背叛。”

马基雅维利不由得插嘴道：

“公爵，您从没有真正地信任他们。”

但是，转瞬之间他又意识到此刻的自己作为特使，是站在威尼斯立场上的，当即表示这句话不是出于特使之口，只是作为马基雅维利个人所说，他继续说道：

“因为即使当他们还是您的同伴之时，其所作所为也只是会给您带来不好的结果。”

马基雅维利后来自豪地称，当天夜里他与比自己小六岁的切萨雷相

谈尽欢宛如至亲。当天这场夜谈将近两小时方告结束，切萨雷从座位上起身向屋外走去，在房门口回头看了看目送自己的马基雅维利，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会事事留心，静待属于自己的时机到来。"

虽然马基雅维利几乎每隔一两日就能与切萨雷来上这样一场会谈，但他还是渐渐意识到切萨雷从不会触碰最为关键的话题。"打算如何对待陷入困境的佛罗伦萨？""打算与法兰西国王在今后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些马基雅维利最想知道的事情，切萨雷连一丝可探寻的线索都不曾泄露。马基雅维利发现想要理解这位年轻的君主，只凭他个人以往的经验完全行不通，他在写给佛罗伦萨友人的信中，拜托对方帮忙弄到一本普鲁塔克的《英雄列传》，友人布欧纳克鲁西对这个委托送回了如下回复：

"我在佛罗伦萨找了找普鲁塔克的《英雄列传》，但没地方卖这本书。你还是忍忍吧，不然就只能再麻烦我跑一趟威尼斯了。不过你可知，像你这种凡事都爱麻烦别人的人，是要被人喊作该死的家伙的。"

不过切萨雷所说的"自己的时机"却迟迟未来。流亡到威尼斯的乌尔比诺公爵已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回归公国，同时瓦拉诺家族的贾马里亚也接受了奥利维罗托的援助，以期夺回原有领地卡梅里诺，而在伊莫拉的切萨雷，身边只有一千八百名枪骑兵，主力援军法兰西士兵和瑞士佣兵都不见踪影，报告称他们刚进入费拉拉的领土。但是，切萨雷依然在等待时机，同时他也没有停止行动。他的工作多到无暇睡眠，白天他到处视察新到士兵整编军队，并且对于四处筹兵的使者、与国王交涉的使节、打探各地动态的情报官等等属下，还要在派出前准确下令，于复命时听取回报。

他也从来不吝惜这些必要行动所带来的开销，这令时常感到佛罗伦萨政府给自己支付的费用不足的马基雅维利，在给政府的报告书中讽刺般地如下写道：

“别的国家花两年时间都花不完的钱，公爵在十几天里就用完了。”

切萨雷所有的决断，都是在自己脑子里独自决定的，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也没有人能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

夜晚，切萨雷办公室的灯总是一直亮到深夜。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的书记官阿加比多关系融洽，从两人经常谈天的房间，能望到高悬在远处的切萨雷办公室的窗子，修长的黑色身影缓缓地在窗边走动。阿加比多对马基雅维利说道：

“您看，我的公爵殿下像那样来回走着呢。那扇窗子映照出的身影在慢慢走动的时候，我们就都在休息。但过不了多久，当身影停止走动，就该轮到我们家臣行走甚至奔跑啦。”

终于，切萨雷所等待的“自己的时机”来到了。10月25日，奥尔西尼家族第一个撑不住了。保罗·奥尔西尼为了寻求议和，递出了前来伊莫拉拜访切萨雷的通报，身份是马焦内同盟全体人员的代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其他人与这个保罗相仿，也开始各自向切萨雷提出议和，佩特里奇的代理人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本蒂沃利奥家的使者纷纷为此前来拜访他，双方的共通之处是，想借议和狮子大开口，将叛乱军迄今为止在军事上的胜利战果卖个好价钱。

对于他们的访问，切萨雷命令家臣们要表现出由衷的欢迎，但与此同时，切萨雷却对马基雅维利说道：

“今天是保罗，明天又是枢机主教，他们在将我的名誉彻底破坏之后的现如今还敢说我们是朋友，奢求我的原谅。他们就打算这样戏弄我。”

对于带头发起叛乱却又反过头来议和的这批老部下，切萨雷表面上对于失而复得的友情毫不拒绝欢喜异常，大大减缓了他们的担忧，背地

里却丝毫未改之前的方针，随着军队从各地陆续到来，他的战前准备愈发完善。

像切萨雷这般的男人，对于曾一度羞辱过他的人与事异常记仇，很难忘怀。作为其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是知道谅解这种美德，也知道有时这是很有效的处事方法，但是这位瓦伦蒂诺公爵，虽然深知凡事均应采取最优办法解决，但唯有受到耻辱之时有必要另当别论。教皇可以任谣言四起还平心静气，而其子切萨雷却不仅要灭掉谣言，更是要进一步毁掉生产谣言的那颗头颅才肯罢休。

第十一章

10月25日，一个深秋的傍晚，保罗·奥尔西尼一行二十来人进入了伊莫拉的城门，他受马焦内同盟全权委托，作为大使前来。而他的兄弟罗伯特·奥尔西尼为促成双方议和，早在十多天前就已来到了切萨雷处打探前路。保罗刚一进城就碰到了他，被吩咐在原地稍候，罗伯特本人则前往要塞传报，回来后罗伯特对保罗说：

“公爵阁下表示想要尽快接见你。”

听了这话，保罗也顾不得更换行装梳洗休整，急匆匆地就直奔要塞去觐见切萨雷。

保罗边走边用手整理散乱的衣服，他以为切萨雷会像往常一样等在房间里，万万没想到刚跨过要塞的吊桥，就看到了切萨雷本人站在那。在这位曾经的主君面前，他习惯性地就跪了下来，事先本准备好要说的对等的交涉言辞，已不知忘在哪了，他的口中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乞求原谅的话语。切萨雷没让他把话说完，就面带喜色神采奕奕地走近他，拥抱着保罗将他从地上扶起。保罗不敢直视他，嘴里不停嘟囔着祈求原谅、为自己辩解的话语，切萨雷边对他点头回应，边拥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向要塞内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塔楼。罗伯特在一旁瞠目结舌，目睹全程却插不进一句话，不过好在旋即返回的切萨雷家臣称主君有令邀他同去。这天夜里，保罗被切萨雷赠予了很多礼物，从华丽昂贵的东洋布匹，到高大俊美的骏马一双，不胜枚举，而且依切萨雷之令，保罗及其一行被安排住进了伊莫拉最好的旅店。

切萨雷当然知道，保罗·奥尔西尼虽然打着马焦内同盟全权大使的

名号前来，但实际上能代表的只是奥尔西尼和锡耶纳的佩特里奇这两个家族。他也知道，叛乱军的主力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等等势力，虽暂且同意了与切萨雷进行议和，但事实上都是等着看切萨雷的议和条约后再做决定。

三天后，10月28日，议和条约商定完成，教皇和法兰西国王两人担当保证人，条约内容逐一如下所示：

（一）反抗教皇的两位奥尔西尼家的枢机主教，其所有的罪责将得到教皇的宽恕，他们的财产、地位将与名誉一起得到永远的保护。

（二）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将免受责罚，效忠于他发起叛乱的旧臣们也一并免责，他们将均会得到教皇的宽恕与祝福，同时保证乌尔比诺公爵可自由选择喜爱的住处。

（三）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等身为切萨雷旧部的佣兵队长们，将被赦免背叛教皇与教会军总司令官之罪，可保留与教皇代理同等的地位及其治下领土的永久所有权。根据个人意愿，也欢迎再次归入切萨雷麾下，作为佣兵队长为其效力，酬劳与往日一致甚至还有上调可能。不过，是否归队全凭自愿，绝不会强加一定要为教皇和切萨雷效力的义务。

（四）叛乱军必须返还从切萨雷手中夺取的罗马涅、乌尔比诺、卡梅里诺等地领土。

（五）在切萨雷认为必要之时，叛乱军一方的家族须派出一位嫡子至切萨雷身侧随侍，以示诚意与服从。

条约内容大致如上文所示，只是与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在上述基础上额外添加了一条，是切萨雷与博洛尼亚间缔结佣兵契约，使双方关系更近似于他与佛罗伦萨。最后，约定在这份条约签署后，任何不履行

的一方都将被其他全员当作敌人来对待。条约被保罗带回与全员商议，因为切萨雷早在上面签上了名字，所以当全员同意并签署完毕后，条约将当即生效。

两天后，保罗·奥尔西尼带着条约从伊莫拉出发，首先去向乌尔比诺，虽然切萨雷依旧一副好心情的样子送走了保罗，但他的书记官阿加比多却对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

“眼下他们对这个条约接受与否，已无关紧要。如果接受了，算是为我的主君多个选择，就是拒绝了，我的主君也早就自己谋划好了出路。”

第二天，法兰西人和瑞士人的援军到达了伊莫拉，切萨雷将他们安置到了法恩扎。几乎与此同时，想受雇于切萨雷的小领主们也陆续从意大利各地来访伊莫拉。根据马基雅维利记载，切萨雷在扩充军队上豪掷6万达克特并没白花，也没有乱花，对于违反契约的武装军队，在没有完全准备妥当前，切萨雷是一分钱也不打算掏。这时候的切萨雷，在嘴上说着和平，手上的动作却描绘着战争。

切萨雷巡视挤满了伊莫拉的各部军队，检查即将派去法恩扎的法兰西佣兵的装备，他现在拥有的大炮质量与数量可与整个意大利相匹敌。马基雅维利据此说道：“所谓守土，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爱护臣下，睦邻友好。”显然，对于现如今想放弃却又不得不借助佣兵制的切萨雷来说，只有这位年轻的外交官能理解他的理想。

11月8日，天气已略有寒意，当晚马基雅维利像往常一样与切萨雷会面。为配合繁忙的切萨雷，会谈定于夜里一点，切萨雷与瑞士佣兵一同度过了整个白天，现下看上去有一些疲倦。马基雅维利进入房间的时候，切萨雷的两条腿还伸着，直直地搭在桌子上，即使看到进来的是马基雅维利，切萨雷也没有改变姿势，只是照常请他入座。

这天夜里，就像马基雅维利每每写在报告书中的一般，发挥着“伟大的避实就虚”能力的切萨雷，丝毫不提政治与外交，只拿曼托瓦当家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做话头，聊他此次复被威尼斯共和国启用担任陆军佣兵队长，夸他是个优秀的男人，也是自己的好友之一，随后不经意地转向马基雅维利说道：

“假如佛罗伦萨共和国雇佣我作为佣兵队长的话，会拿什么作为报酬呢？”

听到这个问题的马基雅维利很开心，也就爽朗地回话道：

“不管给什么报酬，比起受雇于人，我们的共和国肯定还是更想当雇主。”

切萨雷说道：“哎呀，这么说来佛罗伦萨是容不下我的呀。”

随后，两人毫无顾忌地相视一笑。

另一方面，在临近法诺的卡尔托切托，马焦内同盟的全部人员聚集在此，围绕着保罗·奥尔西尼带回来的条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说有教皇和法兰西国王担当保证人，但毕竟是切萨雷制订的条约，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质疑条约能否顺利执行，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根本就是圈套。维特罗佐、巴利奥尼、奥利维罗托等人是反对派的急先锋，因为即使这份条约不是圈套，内容对他们来说也是过于严苛。根据条约，仅就第四条“叛乱军必须返还从切萨雷手中夺取的罗马涅、乌尔比诺、卡梅里诺等地领土”一项，就意味着叛乱军，尤其是前面提到的三位急先锋将失去一个月以来的全部战果，三人听了这条气得直哆嗦，极力反对这份议和条约。不过这也无可厚非，维特罗佐帮助乌尔比诺公爵将乌尔比诺公国内切萨雷的势力清除殆尽，巴利奥尼距拿下佩萨罗仅一步之遥，而奥利维罗托则不仅想借协助卡梅里诺领主贾马里亚复位，趁机把卡梅里诺吃到自己碗里，还在分心看着锅里的里米尼。至于乌尔比诺公爵和贾马

里亚二人，毫无战斗力的人没有发言权，故而弱小的两人成为最初的牺牲者，刚刚复位，却又要被放逐了。

11月9日，距他们轰轰烈烈地朝切萨雷举起反旗之日起恰好一个月后，地点也是相同的马焦内的奥尔西尼城堡，已不知道是第几次的会议再一次地召开了，与形单影只的切萨雷正相反，他们所谓的人多势众在此刻终于暴露出了最大的缺陷。因与切萨雷之间已单独制订了佣兵契约，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首先离开了反叛军阵营。不久后，奥尔西尼家族也单独与切萨雷达成了协议，紧随其后的还有通过代理签订协议的锡耶纳的佩特里奇。绝望的维特罗佐一路快马加鞭直奔乌尔比诺，妄图说服公爵圭多巴尔多加入反对一方。但是，对这位往日里排斥自己、不拿自己当同伴的维特罗佐的提议，公爵仅称以自己的力量抵抗也是无用的挣扎，便伤感地拒绝了。同一时间，切萨雷目前军备日渐增强，甚至其势力已胜于往日的传闻也在反叛军间流传开来，最终巴利奥尼和奥利维罗托也相继在条约上签了字。议和条约提出已快近一个月了，即使维特罗佐从始至终对其坚决反对，但终究孤掌难鸣已无力回天。

11月27日，保罗·奥尔西尼带着全员的署名到达了伊莫拉。

迎接他的切萨雷十分满意，向签署众人的诚意致谢，即便是对一直反对到底的维特罗佐也表示“我们的交情就像是兄弟一般”，不但没有责难他，反而是给予了更胜于他人的赞赏。虽然切萨雷面上不动声色，但他确实在此刻感到了，等待多时的时机已然来临。维特罗佐送来的信中，写着如下的内容：“自己对公爵的忠心从未更改，即便是此次的事情，也绝无侮辱公爵之意。”而佩特里奇和奥尔西尼，仿佛是怕只有谢罪的信件还不足够，又分别派遣了两名使节到伊莫拉，提议推举切萨雷为“托斯卡纳国王”，切萨雷对此只回应说“自己并未考虑过这种事情”，不过切萨雷也还是对他们每个人都饱含谢意盛情款待。至此，人们终于感到这场自马焦内叛乱结盟伊始，历时已有两个多月的血腥叛乱，在此终于迎来了和平的信号。不过，同主演的“伟大的避实就虚”做派不同，

他的臣下可是正直得多，阿加比多对关系亲近的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

“这些叛徒们，伤害了我们，时至今日竟然还在巧舌如簧，妄想让我们忘却当初的伤害。”

12月2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与切萨雷的议和正式生效。本蒂沃利奥与切萨雷缔结了为期八年，年金12000达克特的佣兵契约，他们一族在博洛尼亚的教皇代理地位被再次认可，但同时本蒂沃利奥的儿子被建议应从波吉亚亲族当中挑选妻子。切萨雷暂时将博洛尼亚从敌人的名单中划掉了。

这次的叛乱给切萨雷带来了很好的教训。他现在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迄今为止他所得到的一切，件件都是靠着教皇父亲的在位方能到手。而此次，也正是因为教皇父亲的影响，法兰西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才没有对绝境中的切萨雷落井下石，事已至此，对切萨雷来说，十分有必要考虑下父亲身故后的局面了。“所谓守土，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爱护臣下，睦邻友好”，他绝不甘心理想终生遥不可及无法实现，故而，对于他来说当下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在父亲身故之前将理想变为现实。首先，他要实现“睦邻友好”。

这些国家包括费拉拉、曼托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费拉拉和曼托瓦两国已利用姻亲关系确保了利益一致，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则是利用业已签订的雇佣契约得以打入了内部，至少在博洛尼亚这边是成功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他最为在意其动向的威尼斯共和国，只要能在威尼斯老练又实际的政治方针中找到彼此利害关系的一致之处，就有互相妥协的可能。之所以改变了对博洛尼亚的策略，也是出于利害关系的转变。但佛罗伦萨的情况还略有出入，切萨雷要求的佣兵报酬过于高昂，而且不同于教会领地博洛尼亚，拥有光辉传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可能将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交给这种危险人物。对于佛罗伦萨屡次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种态度，切萨雷对马基雅维利也不免嗤笑为难，“时至今日，真不知你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不过，切萨雷也并未过多地执念于与佛罗伦萨的一纸契约，从他和法兰西国王的关系，以及法兰西国王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来看，佛罗伦萨现在还不需要他担心，更何况他的领土在一步步地将佛罗伦萨包围在其中。恰逢此时，比萨的长老们再度来访切萨雷，重提拜托切萨雷保护比萨市的请求，同时，向西班牙国王申请的援助也到位了。接见这些使节们的间隙中，切萨雷还在关注着签署议和条约的维特罗佐，毕竟发起叛乱后复又来议和的是对方，他就没想过要主动去接洽，只摆出一副理应对方善后的态度。曾耐心等待时机到来的切萨雷，现在也未心急，依然继续等待着时机的进一步成熟。

而在这之前不久，乌尔比诺公爵的代理即他的侄子奥塔维亚诺·伏列哥索也到了伊莫拉，想方设法终于为自己的叔父找到了一条出路。切萨雷给出了如下的折中方案，如果公爵同意，可以放弃现有婚姻关系（主动放弃乌尔比诺统治权的基础上），来换取教皇任命的带有年金的枢机主教职位。但切萨雷回绝了公爵想留在故土乌尔比诺的请求，哪怕是作为切萨雷属下代理官员的身份也不可以。

乌尔比诺公爵最近的日子过得甚是绝望，本来借由维特罗佐他们的帮助得以复国，但没高兴几天，也还是因为他们急着要和切萨雷议和而被抛弃，眼下不得不再次放弃自己的国家。而以枢机主教职位为诱饵的离婚，也在公爵夫人伊丽莎白的哀求下没能成行，反对这件事的不只是伊丽莎白一个，她的兄长曼托瓦侯爵也同样反对。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看破了这是切萨雷的计谋，若是乌尔比诺公爵为了一个枢机主教的职位就和他妹妹离婚，绝对会离间乌尔比诺与曼托瓦间的姻亲关系。但是，乌尔比诺公爵向威尼斯的求救也落空了，公爵提出的条件是将乌尔比诺公国让渡给威尼斯，以此为代价，恳请威尼斯保证为他准备年金和别的领土，但共和国异常冷漠，仅回复称对现状完全不感兴趣。现在，乌尔比诺公爵能选择的出路所剩无几，曾经的同伴马焦内同盟已舍弃了他，要么是再次逃亡，要么就是与家臣一同与切萨雷抗争到底，出路唯有这二者选其一。他很犹豫，召集了所有家臣，问询他们的意

见。家臣们虽然敬爱公爵的为人，也想要尽可能地保护他，但同时也知道切萨雷的实力，他们无言以对，只能怜悯地望着这位被打入困境谷底的善良君主的脸。

但是，决断的时刻逼近了。昨日的同伴也就是今天的敌人，保罗·奥尔西尼带领着军队到达了乌尔比诺，要求圭多巴尔多尽快离开此地。为与家臣作别，圭多巴尔多再次将他们召集到一起，他为自己而叹息，竟招惹上这么一位无法与之为敌的男人，并且接着说道：

“你们在瓦伦蒂诺公爵手下要尽忠职守，希望至少能坚持到主愿意改变我们命运的那一刻为止，毕竟，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说罢，他就出城再次踏上逃亡的旅程，将一众含泪目送的家臣与民众留在了身后，这一天是12月8日。因为顾忌切萨雷，曼托瓦和威尼斯都未曾接纳逃亡中的乌尔比诺公爵，此时伸出援手的是维特罗佐，当初是他强拉圭多巴尔多加入叛乱军阵营，而现在自己也同其他叛乱将领一样舍弃了他，对此深感内疚的他将圭多巴尔多接到了自己的领地卡斯泰洛城。

卡梅里诺的归还倒是十分干净利落，没有任何人对贾马里亚的立场感到同情，更何况全靠奥利维罗托的帮助他才得以复国。现在既然已被奥利维罗托舍弃，他自然是毫无反抗之力，立即接受了切萨雷的条件，以年金3000达克特为交换出让了手中的一切，还自觉地在奥尔西尼的撤离要求送到前便离开了卡梅里诺。

接到报告得知圭多巴尔多公爵已离开乌尔比诺的当晚，拒绝了马基雅维利的会面申请，切萨雷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寝室内，但并未就寝，从还亮着的窗户外能依稀看到他来回走动的身影。伊莫拉从四天前就下了雪，至今未停，隔着纷飞的大雪，他修长的身影较以往更加模糊。随着会面的机会愈发减少，马基雅维利近日也渐渐心绪不宁了起来，5日那天虽得以觐见，但距离再上一次的会面已十日有余。这天夜里，马基雅

维利借着与好友阿加比多说话的名义，依旧从房间窥视着远在高处的切萨雷办公室的窗子，但心中预感也许有什么大事就快发生了。四日前，随风雪一同造访马基雅维利的还有感冒和高烧，而当晚的切萨雷依旧是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并没有召见马基雅维利的征兆，马基雅维利也就只能继续隔着风雪望望切萨雷，看着马基雅维利痛苦的样子，阿加比多说道：

“你还是回去休息为好，看这个架势，到明早为止我的主君应该会一直那个样子了。”

马基雅维利听从他的建议回了住处，不过叮嘱阿加比多，如果发生什么大事，务必要立刻联系自己。

第二天，12月10日，切萨雷最终做了决定，离开伊莫拉。凌晨4时向全军发布了行军命令，故而一早，伊莫拉的城门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军队，首先是先锋部队的骑兵，紧接着的是步兵，随后是被亲卫队骑兵簇拥在其中的切萨雷，他已将伊莫拉的防守交给了从费拉拉借调的六百名士兵。出城军队的最末尾，跟着一顶女官围绕的肩舆，其上坐着一位美丽的贵妇人，她名为多萝西娅，是被切萨雷驱逐出国的原里米尼领主马拉泰斯塔的庶出女儿。两年前，切萨雷对多萝西娅一见钟情，不顾她已与威尼斯佣兵队长卡拉乔洛缔有婚约，命部下在她由乌尔比诺至威尼斯出嫁的途中将其劫下，那之后她就成了切萨雷的所有物。

切萨雷率军在法恩扎与法兰西军汇合后，一路朝着弗利前进，当天夜里便在弗利扎营。夜里，全军的队长们接到了明日向切塞纳出发的指令，不过到了切塞纳之后要往哪里走，依旧无人知晓。

11日午后，全军进入了切塞纳。被感冒和佛罗伦萨政府迟迟没送到的资金拖累，马基雅维利没能同切萨雷一起出发，三天后他才在夜里赶到了切塞纳。

然而，全军到达切塞纳已有一个多星期了，切萨雷依旧没有发布出发的指令，大家猜测可能是在等落后的大炮，但是大炮到达后，总司令官切萨雷还是没有命令下达，人们不免感到意外又好奇，相互猜测着，公爵阁下是不是想要在这里过完基督诞辰祭。欢快的气氛在士兵们之间扩散开来，充溢着整个切塞纳，但这其中有一个人却焦躁得坐立不安，那就是马基雅维利。他知道在20日的晚上，切萨雷召集了法兰西佣兵军的所有队长，只是不清楚这是所为何事，心急地在切萨雷的秘书和各种人之间打听。阿加比多说，自己只是听切萨雷吩咐去给法兰西军支付至今为止的报酬，而且据他所知，其他人也对实情知之甚少。马基雅维利费尽心思，总算是从一名法兰西队长处打探到了佣兵们即将要返回米兰，但是，新的疑惑紧随其后，为何切萨雷要忽然放弃占其军力三分之一的法兰西军呢。22日早上，三千三百名的法兰西、瑞士佣兵离开了切塞纳，顺着艾米利亚大道原路返回了米兰。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马基雅维利困惑不已的事情，切萨雷下令，将刚刚从佩萨罗回来的拉米罗·德·洛尔卡关进了城堡的地牢。一直以来，德·洛尔卡都是公认的切萨雷亲信中的第一人，甚至被切萨雷任命为罗马涅公国的行政长官。为打探这件事的真相，马基雅维利三番五次地申请与切萨雷会面，但全部都以事务繁忙为由被拒绝了。掌握了切萨雷与自己设立的民事裁判所官员会谈这一情报的马基雅维利，25日再次申请了会见，但这次，切萨雷则表示要庆祝基督诞辰祭，依旧拒绝了他。

基督诞辰祭的第二天早上，从节日气氛中回归日常工作的切塞纳居民们，在广场上发现了自己的行政长官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从头到脚被斩成了两半。整个城镇陷入了恐慌。

马基雅维利在后来对此次事件给予了如下的解释。

“在公爵开始征服罗马涅地区的时候，他早已知道这片土地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理，诸多无能的前任统治者们只知掠夺，别提团结上下了，

简直是将臣民们逼向了分裂的边缘，故而这片土地才如此的纷争不断，暴力横行。公爵深知若想让这片土地重归安宁，恢复君主的威信，必须有良好的统治方可成功，因此才将这个冷酷的男人拉米罗·德·洛尔卡派来了罗马涅，并赐予了他极大的权柄。没有辜负公爵的期望，这个男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统一了罗马涅上下，使一切归于和平，还赢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但公爵却也极其惧怕民众的厌恶，忧虑着如此大的权力声望集于德·洛尔卡一人将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他在领国内设立了民事裁判所，指派了优秀的长官，并在各个城镇安置了偏向自己的律师。

“他知道之前严酷的统治或多或少都会招致民众的厌恶，故而利用裁判所，从点滴小事中平复民怨，渐渐收拢民心，向民众传递出一种此前严格到了残酷地步的统治并非出自切萨雷本意，而是生性冷酷的行政长官独断专行的印象。接着，公爵抓住机会，在某个早晨，将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斩成两半，放在一块板子上，与一把沾满血的刀一起丢到了切塞纳广场。看着这凄惨又少见的奇景，民众在感到满足的同时，也留下了战栗的记忆。”

马基雅维利对此评价为“切萨雷式政治的技术精髓”。但是，若只为杀鸡儆猴，大可不必非在此时动手。切萨雷正式对外发表的公文称“对于堕落的施行苛政之人，这是最为健全的裁决典范”，但是同一时间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说的，却是“拉米罗·德·洛尔卡与马焦内的叛乱军有所勾结”。

至此，下令让法兰西军返回米兰，和处决拉米罗·德·洛尔卡，这两者之间一定是有共通之处才能说得通。而联结两个事件的就是切萨雷个人最大的野心——建立自己的国家。

诸位切莫忘记，切萨雷这个男人，从不为了单一目的而行动。早在他人还在伊莫拉的时候起，就已经考虑着如何反过来利用这些背叛自己的小领主们了。在他看来，被部下背叛的君主，是个非常有利的立场。

在保罗·奥尔西尼作为议和使者前来拜访他的时候，切萨雷已打算将这次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转嫁给拉米罗·德·洛尔卡，对叛乱者们并没有怎么责难。他就这样一边在嘴上说着原谅，一边在心里根本没想过要履行任何一份议和条约。他打定主意，绝不主动召请叛乱的部下们，而是要等着对方邀请自己，没过多久他就等来了邀请。前叛乱军们攻下了塞尼加利亚，给切萨雷来信说希望将此地献给他，在切塞纳的切萨雷收到了这封信，意识到自己等待的决胜时机已在眼前。对他来说，让法兰西军返回米兰，与自己带着女人同行的用意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营造出平和的气氛，以麻痹维特罗佐众人。他还存着私心，想此次不借助法兰西国王一兵一卒，只依靠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属下决胜负。处决拉米罗·德·洛尔卡同时也是为了让身在塞尼加利亚地区等待的他们能够安心而付出的牺牲，倘若拉米罗·德·洛尔卡真的与他们有所勾结，绝不会那样自投罗网地回到切萨雷的身边。

基督诞辰祭的次日清晨，当罗马涅的民众还在围观被展示出来的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感到震惊恐惧却又暗暗满足的时候，切萨雷已经身在自己军队的最前列，离开了这座城市。若说此时切萨雷队伍中仍有法兰西士兵，也只有他的妹夫达伯特枢机主教旗下的那一百五十名枪骑兵而已。

而另一方面，接到了切萨雷的命令，称将在塞尼加利亚约见他们的维特罗佐众人，也正各自带着军队陆续赶向那里。

曾任职于切萨雷麾下却举旗造反的五个人中，此番来了四位，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以及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两人，只有詹保罗·巴利奥尼一人称病未从佩鲁贾出来。

28日，切萨雷到达了佩萨罗，已身在塞尼加利亚的佣兵队长们的使节正等候在此，据使节所说，塞尼加利亚所有地区已全部占领完毕，只有一处要塞除外，要塞统领称想将要塞直接献给切萨雷本人，故而唯有等待公爵亲自驾到。切萨雷会真的相信他们的这番说辞，真的相信他们

这番招待毫无隐情？就连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在给丈夫曼托瓦侯爵的信中都是这样写的：

“据我所知，这四名佣兵队长好像只是谎称要将塞尼加利亚献给公爵，实际则是准备将他与全军一起埋葬在那里。”

但是切萨雷却接受了他们的邀请。12月30日，他从法诺的城堡给在塞尼加利亚等待的佣兵队长们送去了一道指令，通知自己明日将到达的同时，命令他们的军队要撤到距离塞尼加利亚城外4公里的地方，并指示除正门外，其他所有城门都要关闭。

接到这封来信，佣兵队长们的态度开始动摇。绝望的维特罗佐几乎发了疯，想要逃跑，在保罗·奥尔西尼的劝说下才打消念头，奥利维罗托则强烈反对将军队撤出城外，四人中唯有奥尔西尼家的两人保持乐观。切萨雷似是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况，追加了一封单单给奥尔西尼的信，表达对与他们相见的期待，并写道会保证全员的安全。通过保罗的劝解，他们才总算恢复了镇定，维特罗佐和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格拉维纳公爵的军队，按照切萨雷的指示，从城市撤出退到了城外4公里的地方，只有奥利维罗托在城里留下了自己的一千名步兵和一百五十名骑兵。

当天夜里的法诺，切萨雷叫来了八个心腹，对以唐·米凯罗特为首的这八个男人下达了一道密令。命令下达后切萨雷即让部下们离去了，召来仆人，吩咐其去告诉多萝西娅到寝室里等他。

1502年12月31日，一个周六的早晨，切萨雷命令其六千五百人的军队出发。军队从法诺南城门开拔，跨过梅陶罗河，朝塞尼加利亚前进，队伍最前方是五百人的骑兵队，紧接着是一千人的步兵队，切萨雷被紧随其后的亲卫队簇拥在正中，身着盔甲骑马前行，冬日清晨的光照下，他的面容有别于往日，活像是一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假面。

一段时间后，军队到达了米萨河边，从这里已能望见对岸塞尼加利亚的城墙，队伍在此处悄悄分散，各自潜伏待命，只有前锋的五百骑兵队和一千步兵队，加上切萨雷及其亲卫队继续沿河流左转前进。河流中段有一座吊桥，骑兵队行至桥前，自动左右分立，势同据桥而守，步兵队径直从中过桥，进入了对面的城门。一旁的切萨雷端坐于马鞍之上，脊背直挺，纹丝不动地注视着他的士兵们。

没过多久，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就赶到了近前，他们只带着一百人左右的骑兵队。随后，维特罗佐也赶到了，对于他的描写，我想让给马基雅维利。

“维特罗佐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完全不做防备。他身披镶有绿边儿的斗篷，整个人散发着伤感的氛围，犹如已预知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一般。他的这幅身姿，甚至就像是个拥有德才却被命运所抛弃的男人，散发着别样的人类之美。据他人所说，此番前来塞尼加利亚觐见公爵之前，与家人告别时，他表现得就像是人生最后的一次出发一样，对侄子们说：‘愿你们将来不要时常回想家族的不幸，而是要时刻谨记家族的品行。’”

看到急急忙忙赶来的维特罗佐，切萨雷那刚刚还如银白假面一般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而当他调转马头，朝向维特罗佐的时候，面容已恢复到了往日的古铜色。眼见维特罗佐为了迎接自己下马，切萨雷也下了马，两人亲切地相互拥抱。看到此景，奥尔西尼家的两人也下了马，将跟随他们的骑兵队留在后方，两个人走上近前，四人数次相互交换拥抱。然而就在同时，切萨雷的家臣分别两人一组，装作若无其事地靠近到三名佣兵队长的身边，而三人均未有所察觉。看到手下已各个就位的切萨雷，将视线投向了唐·米凯罗特，他接到主人的眼神示意，过桥进城去寻找奥利维罗托。很快，米凯罗特就发现了待在自己军队中的奥利维罗托，走上前称公爵派自己前来同他打招呼。奥利维罗托最初有些犹豫，不知该如何回复公爵才好，但米凯罗特再三强调奥尔西尼和维特罗

佐也同公爵都在一处后，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米凯罗特的提议。当奥利维罗托被米凯罗特带出城门的时候，切萨雷与其他三名佣兵队长正要一起过桥，看到他出现在桥边，切萨雷摆出一副很是怀念的样子迎着他走了过去。

四名佣兵队长与切萨雷一同来到城门前，欲要就此告别，他们表示想先回到自己在城外的军队中，明日一早再来觐见公爵。但是，切萨雷还是面带喜色，态度中含着久违不见的想念，一定要他们领着在塞尼加利亚到处转转，熟悉熟悉自己的住处，还说几个人应该约在一起再喝上两杯。一瞬间，佣兵队长们相互交换了眼神，而就是这一瞬间的踌躇决定了胜负。

四名佣兵队长接受了切萨雷的邀请，在进入城门的他们背后，吊桥静静地升了起来。住处已提前安排妥当，是伯纳迪诺·达·帕尔玛家的宅邸，切萨雷同四人一起来到了此处，随后这五个男人走了进去。

穿过宅邸正中的大厅后，面前的房间呈狭长形，切萨雷快步走到了这条狭长空间的另一头，登上短台阶，当踏上第二、三节台阶时，他向后转过身来，确认四人是否都已全部进入了房间。他的眼神顺势投向了后方的唐·米凯罗特，与这位家臣始终盯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汇聚到了一起，两人之间流动着只有彼此能明白的言语。随后，不知米凯罗特打了个什么暗号，一瞬间八名男子袭向四位佣兵队长，每一位都被两个男人从身侧扑倒。在被按倒的时候，保罗·奥尔西尼还向着切萨雷大声呼喊，但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切萨雷沉默地看了一眼武器被收缴、身体被制住的四人，转过身，背对着他们登上剩下的台阶，身影没入房门消失不见。

几刻钟后，切萨雷从宅邸的后门离开，跳上马率兵去攻打了奥利维罗托的军队，对方还在休息，丝毫不知主人已遭遇不测。奥利维罗托的士兵们被困于塞尼加利亚，无法出城逃跑，只得单方面地被动挨打。切萨雷确认战况后，仅在城里留下一队人马，就带着其他士兵出城攻击留

在城外的维特罗佐军队，将其驱散后，再次返回城镇。此时，城里已到处都是敌兵的尸体，在路过这般场景的同时，一条条尖锐的命令也正从他的口中陆续传出。

冬季的白昼很短暂，但在短暂的白天过去，漫漫长夜里切萨雷依然还有必须要处理的工作，那便是对背叛者的裁决。他叫来了唐·米凯罗特。

深夜十点，灯光昏暗，维特罗佐和奥利维罗托被带了过来。切萨雷询问他们，对背叛一事是否认罪，但其实对他们来说，除了认罪也别无他法了。两人被判处死刑。维特罗佐在最后对切萨雷说，希望能向教皇传话，恳请宽恕自己至今为止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让自己的灵魂得救。切萨雷看着维特罗佐，沉默不语，这个男人最后的姿态让他回想起过去，自己说过的关于对主、对曾经的自己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事物极其厌恶的话。而现在，看着这个男人，这份厌恶之情，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流窜。切萨雷下令执行死刑。

背靠着低声喃喃祈祷词的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则早已泣不成声，他像小孩子一样哭个不停。粗套索从横梁上垂了下来，两人被并排押到台上站着，绳索套住了脖颈，祈祷和哭声一下子都停止了。

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两人的处刑被延期了，在罗马教皇将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及奥尔西尼余党逮捕归案之前，他们都一直被关在牢房里。

深夜两点，马基雅维利见到了切萨雷，切萨雷带着舒畅的表情对他说道：

“能够消灭自己的，同时对你们来说也是敌人的对手，真是可喜可贺。”

随后他接着说：

“被消灭了的，是令意大利不和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不禁问道：

“意大利？”

切萨雷目光如炬，直直地盯着马基雅维利说：

“没错，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只存在于诗人的辞典之中。在马基雅维利所结交的所有人当中，无论地位高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从口中说出过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意大利，只见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那波利人，却从未见有意大利人。

不过，对于切萨雷来说，期望一统意大利却并不是由使命感而生的宏愿，仅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这个男人，根本不需要将自己寄托于所谓宏愿这种弱者才需要的武器。而马基雅维利的理想与切萨雷的野心刚好一致，人人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所谓使命感，从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尖锐审视来看，就如同满口胡言一般不可信任。马基雅维利认为，比起使命感更加值得信赖的东西，是人类的野心。

第十二章

1503年1月2日，切萨雷率领全军离开塞尼加利亚。在离开时，切萨雷命军队带着还活着的那两名俘虏走过挂着维特罗佐和奥利维罗托尸体的广场，同时也走过众多面含恐惧敬畏的塞尼加利亚民众。而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这两名俘虏是被绑在军马拉着的炮台上走完的全程。

一旦行动开启，切萨雷就立刻变得仿佛不知疲倦为何物，他接下来的目标是要一鼓作气将参加马焦内叛乱的全部成员斩草除根。切萨雷的利剑直指向了奥尔西尼家族、佩鲁贾的詹保罗·巴利奥尼、朱利奥·维特里、锡耶纳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等，这些自以为逃过一劫的叛乱余党。

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则在罗马忙着清理奥尔西尼的残党。1月2日，奥尔西尼家族长老即叛乱主谋老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被关押进了圣安杰洛城堡地牢，他的被捕为此次大规模的报复拉开了序幕。

被这对父子吓得大惊失色的，不仅是参与这次叛乱的当事人，塞尼加利亚事件令整个意大利都为之一惊。威尼斯共和国将大军集结至国境线上的拉文纳，甚至与波吉亚关系良好的费拉拉、曼托瓦和博洛尼亚，也都分别给军队下达了随时待命的紧急命令。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虽然写信祝贺切萨雷成功镇压了叛乱军，但心里其实并不踏实，路易甚至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与波吉亚是否交往过深以致养虎为患。他觉得自己给了切萨雷太多的自由，这位教皇之子虽然极富魅力，但在不久前还只是个红衣主教，连专属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拥有。在那波利的法兰西军一直受西班牙压制，势力无从扩张之时，切萨雷越是快速扩张，就

让他越发的不满。一向认为意大利半岛迟早是自己囊中物的路易，惊讶地发现自己认定的手下切萨雷竟然挡住了自己的前路。塞尼加利亚事件让路易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遇见了真正的对手。

切萨雷自然也觉察到了路易心境上的这般变化，但无奈于彼此巨大的军事力量落差，依然不能与之为敌，反而是要自制地不给对方任何出兵的理由，而这就限制了他疾风一般的行动能力。

2日深夜，切萨雷率军队进入了科里纳尔多城区。第二天一早出发，向萨索费拉托前进。4日进入萨索费拉托城，与追赶维特罗佐军残党的己方军队会师，后者虽然给叛乱军造成了沉痛的打击，却并未能将叛乱军全歼，部分败逃的士兵逃往了佩鲁贾。

5日，从卡斯泰洛城传来了维特罗佐的弟弟——朱利奥主教已带着维特里家族全员逃往佩鲁贾的报告，报告称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也同在逃亡之列。然而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再次传来消息，称佩鲁贾的詹保罗·巴利奥尼逃向了锡耶纳，去投靠佩特里奇，于是维特里一家和乌尔比诺公爵又得接着跑，到了原定目的地都来不及休息，继续马不停蹄地逃向锡耶纳。

6日早上，卡斯泰洛城和佩鲁贾的市民代表先后抵达萨索费拉托拜访切萨雷，两方均是为了将领主逃跑后的国家献给切萨雷而来。代表们费尽心思讨好切萨雷，主动投诚乞求保护，期望能逃过切萨雷的复仇之刃。

切萨雷对他们解释说，背叛身为教会军总司令官的自己，就等同于背叛位于教会之首的教皇，故而才会以教皇的名义制裁叛乱者。随后，切萨雷打着将卡斯泰洛城和佩鲁贾返还于教会的名义，向实则是献给自己的两座城池各指派了一名队长。切萨雷还顺势与佩鲁贾缔结了军事同盟，强迫对方义务为他提供五百名步兵与领国内要塞的自由使用权。

仅惩处反叛教皇的首恶，而对其治下的领国不伤分毫，切萨雷是这么宣布的，实际执行上也是这么做的。提出这种看上去极其正当的处置原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以法兰西国王为首直至意大利诸国的各方势力对他提出苛责的手段。

随着部队的不断收归整编，又新加入了五百名重装骑兵、八百名轻骑兵、六千名步兵，切萨雷的军队总数几乎扩充到了一万五千人，他带着这支大军终于奔向了最后一位叛乱者，盘踞在锡耶纳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7日傍晚，军队已进入了阿西西城镇。

此刻的锡耶纳，佩特里奇正费尽心思研究对策。在加入马焦内同盟的人当中，就属他的政治手腕最为老练，可不会像维特里和巴利奥尼一样犯傻，什么也不做就逃跑。首先，他处置了二十名看上去倾向于切萨雷的家臣，全部关入牢中，还处死了其中三名，竭尽全力营造出一种将与切萨雷抵抗到底的架势。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背地里向罗马和阿西西派出使节，向教皇宣誓忠诚，对切萨雷言必恭顺，在外交层面上施展着浑身的解数。

但是，8日的晚上，切萨雷在阿西西召见锡耶纳政府派来的特使时说道：

“我的本意绝非要推翻历史悠久、世代传承的锡耶纳，我想对付的仅仅是与我有私仇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只要锡耶纳将他驱逐出去则可保和平安宁，但若是打定主意要与他共担守土之责，还请莫怪我将不得不付诸武力侵犯贵国领土。”

在接到切萨雷的宣告后，锡耶纳集体陷入了恐慌，共和国政府中也分生出两种意见，坚决同切萨雷对抗到底，或是驱逐领主潘多鲁夫。在田园广场上，聚集着支持佩特里奇的市民们，他们高喊着“狼、自由、潘多鲁夫！”，气势十足。狼是锡耶纳的纹章，也是锡耶纳的代名词，就如同圣马可代表威尼斯，百合代表法兰西一样。然而，现在喊得欢的

这群人，很快得把话咽回嗓子里了，据报告称切萨雷已率军攻入了锡耶纳领内的卡斯泰洛城。随后的18日，锡耶纳的人们得知先前被逮捕的两位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在唐·米凯罗特的指挥下，被送去了那个世界。四天后，在圣安杰洛城堡，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追随两人脚步，被“自然死亡”了。

两则讣告传播的期间，切萨雷也丝毫没有停止向锡耶纳进军。锡耶纳的人们感到军队已近在眼前，政府委员会建议佩特里奇选择逃亡，与此同时，向切萨雷送去使节，传达已决定放逐佩特里奇之事。

1月24日，协定生效。

“在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离开锡耶纳的同时，罗马涅公爵将命军队退出锡耶纳领土。锡耶纳共和国政府将维持以往的统治，无须变更，但不得向逃亡者（指佩特里奇）打开城门。佩特里奇的财产受到保护，将由他的家族继承。”

在此，切萨雷十分慎重地只谋求驱逐佩特里奇个人这唯一的成果。毕竟，对于并非教会领地的锡耶纳来说，切萨雷假借的宗教大义行不通。而且他也看出，法兰西国王路易对自己的动作异常紧张，是不会允许他对锡耶纳下手的。但若是路易为了压制切萨雷而选择帮助佩特里奇的话，切萨雷也绝不能将佩特里奇单独做例外处理，参加马焦内叛乱的全员都必须被处刑示众。

锡耶纳共和国的代表与切萨雷已达成了协议，但佩特里奇并没有放弃，同时逃亡中的巴利奥尼也主张继续抵抗。切萨雷命军队深入推进到锡耶纳的皮恩扎，此处距离锡耶纳城仅相隔40公里，并在同一日，给锡耶纳政府委员会发去了最后通告。

“在此向神明起誓，若到黄昏为止还没有将佩特里奇驱逐出城，我们将视锡耶纳全体市民等同于佩特里奇个人，并将展开相应的军事行

动。”

到了这个地步，锡耶纳的人们也不再犹豫了。被切萨雷强行送了一张通行许可证的佩特里奇，与詹保罗·巴利奥尼一同向卢卡逃亡，然而竟逃过了切萨雷已伸展到卢卡的势力，从维亚雷焦顺海路奔去了法兰西，寻求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帮助。

但是，切萨雷果然所料非空，1月10日，他忍不住对还在自己身边的马基雅维利说了如下的刻薄话：

“咱们的老板法兰西国王，绝不会舍得让我碰一下锡耶纳呀。”

同年的3月29日，通过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干涉，潘多鲁夫·佩特里奇又作为锡耶纳的领主大摇大摆地荣归故里。

1月28日，切萨雷结束了全部马焦内相关的善后工作，踏上了返回罗马的路程，但他就好像是自发主动地要看遍意大利中部的每一寸领土一般，命军队以一种与之前行事神速成鲜明对比的、难以想象的缓慢速度行军。230公里的道路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进入罗马时已是2月末。

在罗马的切萨雷，紧闭宫门，过着只偶尔外出打猎，几乎不与任何人见面的日子。但其实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迎来了至关重要的决断时刻。

他已拥有了包括圣马里诺、乌尔比诺、费尔莫在内的罗马涅公国，在他精准的治政方针之下，这个新王国凭他调配，按部就班地稳定发展。民心完全被他所掌握，国土建设也完全在他所托付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掌控之下，雄伟计划日渐成真。而更进一步，反向利用了马焦内叛乱的他，顺势借助教会的旗帜成功镇压了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地区。意大利中部几乎全部的领土，都在他的势力辐射范围内，北至罗马涅、

南至罗马在内的拉齐奥地区，他逐渐将占意大利半岛三分之一的地域变成了自己的所有物。现在仅剩完全被切萨雷的势力所包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他将下一个目标正式转向了佛罗伦萨。

但是，这将不可避免地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产生冲突，从以往的例子来看，可以预测到路易的强硬反对。若是切萨雷满足于罗马涅公国，满足于只是继续担当教会军总司令官，这个比较别致的佣兵队长一职的话，说不定路易会睁一眼闭一眼地就此放过他。但是，切萨雷看得却更为高远。佛罗伦萨之后，他将目标定在了那波利王国，若是能拿下那波利王国，几乎等同于拿下了整个南意大利，届时，费拉拉、曼托瓦以及博洛尼亚都将不在话下，唯余一个威尼斯共和国。先对威尼斯动手，还是暂且与威尼斯合作将法兰西人从米兰赶走，此时的切萨雷看上去更倾向于后者。证据在于，威尼斯共和国大使与他会面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

只是，眼下当务之急的还是与法兰西的关系。切萨雷终于正式开始着手，准备脱离对他事无巨细干涉不断的路易，然而，此刻的他依然弱小，无法单独抗衡法兰西国王。若想真正地甩掉法兰西，只得与其他强国联手，最终，切萨雷选择替代法兰西的国家是西班牙。

这个想法令教皇欣喜若狂，自年轻时来到意大利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教皇愈发沉浸在对故国的乡愁之中，对儿子的这个决定他是完全赞成。不过，切萨雷却并非因为与父亲有同样的乡愁而选择西班牙，他想要与这个新兴国家联手，完全是基于合理的判断。切萨雷与家人聊天时，会使用瓦伦西亚方言，他也曾按照西班牙风俗举行斗牛仪式，但就像他喜爱佩戴法兰西风格的贝雷帽，却不喜欢法兰西人一样，与父亲不同，他对西班牙并没有额外多一份感伤的关注。

抛开军事力量不谈，切萨雷的理想正在稳步地实现着。而他的军队，先不论是由意大利各国混编而成，同样因优秀而发光，就连威尼斯的陆军，在军队素质上，现在也比他的军队逊色不少。由罗马涅公国内

征兵而来的士兵，负有固定期限的军务义务，整体军事素质也在稳步提升。根据切萨雷将征兵军作为自己军队主力的想法，他们在装备上也得到了优待。为了让此前一直是平民的他们能拥有身为兵士的骄傲，切萨雷为其配置了统一的漂亮军服，军服胸口上绣有“Cesar”字样，即切萨雷的名字，全部兵器都是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眼光特别配置。

1498年7月17日，切萨雷脱去了枢机主教的一袭红衣。自执剑而起的1499年秋，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达到了现在的成就。与法兰西国王的关系日复一日地冷淡，取而代之的是与西班牙的日渐亲近。从无领土也无一兵一卒出发，他那以王国创立为名的野心，已在这位27岁的年轻人眼前，笔墨鲜明地展开了磅礴画卷。他的气魄，正如他命人刻在所属军队的旗帜上的座右铭：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

第三部分
流星（1503——1507）

第一章

1503年，夏。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迎来了72岁的寿辰。自即位教皇起，他在这个位置上已度过了十一个年头，而最近这段时日里，教皇快速地衰老了，甚至已寻不见往日那位老练政治家的一丝影子。他已不再向任何人掩饰，自己想早日看到儿子切萨雷取得成功的欲望，甚至还向威尼斯大使宣言说要让切萨雷成为国王，就连对法兰西国王的轻视态度也变得异常露骨，与之相反的，是肆无忌惮地公然亲近西班牙国王。

对切萨雷来说，父亲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他所期望见到的。即便是他已决意与法兰西国王撇清关系，但也需巧妙行事，他的立场不如教皇父亲一般自由，绝不能在确立新同伴前就将旧伙伴变成敌人。因此，他甚至可以与法兰西国王的佣兵队长乔凡尼·乔尔达诺·奥尔西尼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的佣兵队长尼科洛·奥尔西尼间和平共处，即使他十分想趁此机会将奥尔西尼一党彻底击败，但是不能给法兰西国王与威尼斯共和国这两个大国与波吉亚家族为敌以口实。故而对他来说，教皇父亲的这个将他横跨罗马涅、马尔凯地区的领土统合建立成亚得里亚王国的设想，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他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小王国；其次，若王国真的成立，会明显地刺激到法兰西国王以及与这个新王国国境相接的威尼斯。这个经教皇之口而出，由威尼斯大使扩散开来的传闻，被切萨雷彻底否决了。同时，他也在背地里筹备着与西班牙的同盟。

7月，切萨雷再次开始了行动，与唐·米凯罗特相伴，照惯例只带了极少数人员随行。他从奇维塔韦基亚沿海路到达皮奥恩比诺，与任当地总督的唐·米凯罗特分别，接着乘船去往比萨。此行是去当地视察因阿

诺河泛滥而引发的洪灾，与他同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负责统筹洪水后的灾后重建。随后，他出发去向罗马涅地区。作为教会军总司令官，他不能缺席8月11日的教皇即位十一周年纪念庆典，所以必须尽快完成对横跨罗马涅、马尔凯的整个领国的视察。切萨雷最终在7月将尽之时，到达了罗马。

悲剧，突然降临。

这年夏天，罗马一直在酷暑中苦苦熬着。没有一丝凉风，太阳的光芒犹如针扎般难受，不知何时起水质开始腐败，随即疟疾肆虐而来。依当时的记录来看，所有枢机主教的家都变成了病院，但其实能在屋檐下死去的人还算是好的，得不到照顾的病人们，甚至就死在了路边或已干涸的喷泉边，无人认领，尸体散落各地腐烂败坏，街市尸臭冲天。就连在特韦雷河上的岛屿台伯岛医院也不例外，前去求治的病人们，即使是人就倒在了跨河大桥上，医生们也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前去救助。吓怕了的人们口中，念叨着“黑死病，一定是黑死病”之类的话，但这其实并不是黑死病，从症状来看仅仅是疟疾，只不过是非常恶性的疟疾。

在上层中，最初因病去世的是佛罗伦萨大使亚历山德罗·布拉奇，随后是教皇的侄子乔凡尼·波吉亚枢机主教，侄子的死讯让教皇对自己日渐衰老的躯体更感疲惫。为了抵御外界的暑热，教皇宫的全部窗户都已紧紧关闭，在侄子死去的第二天，教皇在其中一间阴郁的室内，对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这样说道：

“看着这些在罗马出现的病人，以及每天都会死去的他们，我仿佛感到精力也从自己的身体里被抽出去了一般。”

看着死人堆积如山，感觉自己也快病了的，并不只有年老的教皇一人，能离开罗马的人已全部都舍弃了此地。枢机主教们都逃去了郊外的别墅。就连各国的大使与情报官们，也向各自的君主和政府申请离开罗马的许可。教皇和切萨雷也认为有必要离开罗马，特别是切萨雷，想尽

早再出发去罗马涅，但是教皇即位十一周年纪念日的8月11日迫在眉睫，两个人都无法离开。曾任教皇秘书官，现任枢机主教的阿德里亚诺·达·科尔奈托，于8月4日在他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为无法离开的二人举办了奢华的午餐会。

八天后的8月12日，教皇因为高烧和恶心先病倒了，第二天，切萨雷也因为同样的症状卧病在床。

人们普遍认为，波吉亚家族的没落是从此刻开始的。传闻中，教皇本想在葡萄酒中下毒谋杀枢机主教，但却自己错饮了那杯酒，切萨雷则是喝下了掺水的毒酒。根据威尼斯大使的报告，“两位病倒的真正原因，是于八日前阿德里亚诺枢机主教家举行的宴会，当日出席的全部人员事后都病倒了，第一个发病的恰巧就是阿德里亚诺枢机主教”。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吉奥维奥、萨努多等人，以及后世的布克哈特都相信毒杀的说法。

但当时在罗马的记录者和年代记作者们，却连一个毒杀的字眼都没有留下。“有那么多的人，都被这个不是黑色病却致死率不亚于黑死病的病症夺去了生命，就连教皇和切萨雷公爵也都卧病在床，症状是时不时间隔出现的高烧与恶心，与其他病人的症状完全一样。”卡塔内、科斯塔比利、斯布尔卡特等写下的这些，即是当时被称为“每三日一次高烧（三日疟）”的疟疾的标准症状。在佛罗伦萨、曼托瓦、费拉拉各国大使的报告之中，症状也与疟疾相一致。后世以帕斯托、卢西奥、伍德瓦德为首的历史学家们纷纷站出来反对毒杀说。

世间有名的、被誉为波吉亚秘用毒药的“坎特雷拉”，在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得到过证实。虽然不能妄下断言这种毒药就是有名无实，但确实也并没有史料能证明其曾真实存在过。而能追溯到的最早出现的关于波吉亚家族使用毒药杀人的记录，却是在1503年他们没落后才第一次出现，随后，在19世纪又经法兰西罗曼派文学者们之手被传说化了。

但即使是查阅在当时的意大利对毒药最为熟悉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十人委员会的独门记录，也能看出其对毒药的调和与运用都是极其不成熟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以他们做参考，可以得出所谓世间有名的波吉亚家的毒药，恐怕指的是教皇和切萨雷两个人的头脑。更何况，只是杀害一个72岁的老人竟花费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并且在午餐会中同席的枢机主教们，年龄更为高迈的那几位却没有死去。在此基础上，所有关于他们两人症状的记录都显示是最为恶性的疟疾。综合所有资料来看，不难发现，两人死于波吉亚家传毒药的毒杀说，虽然能为他们一族的悲剧更添戏剧效果，但其真实性的根基却是十分薄弱。

8月12日病倒的教皇和第二天卧床不起的切萨雷，病症反复，时好时坏。8月14日，医生对教皇采取了放血疗法。放血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治疗方法，然而，教皇依然高烧不退，精疲力竭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而切萨雷被医生包围着，几次衰弱地挣扎于濒死边缘，灼热的高烧反复侵袭他，恶心的症状异常严重，而每当头痛伴随着高烧一同袭来，切萨雷就只能在病床上痛苦辗转。唐·米凯罗特从皮奥恩比诺赶来，趁着他能按住切萨雷的期间，医生们总算是得以给他进行了放血治疗。切萨雷被交递来袭的如野兽一般的发疯与近乎死一般的弥留状态反复折磨，所有人都认为与教皇相比，他这边才更是重症。

但即使是在不定时侵袭的高烧与头痛间隙，切萨雷也还是恢复了一小段时间的正常精神状态。清醒中的他，只是一味地担心着教皇父亲的病情，而自己则是必须要在还来得及之前，赶快痊愈。不知何时到来的奥尔西尼和科隆那的复仇极其危险，而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法兰西也无法信任。

枢机主教们都各个躲在家中观望形势，各国大使和情报官们则在随时记录着二人的病情变化，带着这些情报的信使们马蹄飞扬，将属于8月的白色灰尘散落到了整个意大利。

然而，年老教皇的身体却比病症严重的切萨雷更早地到达了极限。

发病起的第六天，8月18日早晨，他希望在病房里进行弥撒，弥撒过后，教皇进行了忏悔，领受了圣体。在晚钟敲响之时，众人为几近濒死的他举行了涂抹香油的圣礼，浓重的沉默吞噬了整间病房。当天夜里，亚历山大六世逝世，他衰老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高烧。

教皇的死被立即通知给了其楼上的切萨雷，但是自身也正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他，没能从病床上起身。

“他对我说过，”马基雅维利在之后写道，“他说：‘我从以前开始，就思考过父亲死时将会发生的所有事情，也确定了种种对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父亲真正去世的时候，我自己也处在生死的边缘。’”

但是，现在，他最后的希望，希望教皇父亲至少能够坚持到自己治好为止的愿望也破灭了。

根据以往各位教皇逝世时的先例来看，每当教皇去世的时候，必须最先要做的便是从暴徒的掠夺中守护教皇宫，此次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团结在切萨雷周围的、效忠于他的年轻人们身上了。指挥由唐·米凯罗特担任，他将被称为教皇宫之门的大门和圣安杰洛城堡的大门紧紧关闭，接着，押住担任教皇代理的枢机主教的逼问，威胁要是敢说个不字就刺破喉咙从窗口扔到特韦雷河里去，从而拿到了教皇宫藏宝室的钥匙。随后，他们将藏宝室里的金币、宝石以及其他房间的众多贵重品，都搬到了切萨雷病房附近的房间。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即便是往少了计算，加起来也不会少于30万达克特，就连教皇的病房也几乎被搬到空无一物，床榻上只剩遗体横躺在上面。当这一切行动结束后，切萨雷才下令对外公布教皇的死讯。

在另一方，根据教皇厅礼官布尔卡特的指示，教皇的遗体被移到了称为鹦鹉大厅的屋子里。接着，进行遗体的清洗整洁工作，并为其穿上教皇的正装，最后将遗体安放在铺着紫色锦缎的台案上，两旁分立一盏

烛台，蜡烛的火光平静地燃烧，在紧闭的闷热房间里半点不带晃动。遗体旁侧，没有一个陪同的人。

翌日一早，遗体被转移到了圣彼得大教堂。这场最终的弥撒，以枢机主教为首的高位神职人员无一个人参加，就连葬礼祈祷时所必需的《圣经》，都不知道被谁放在哪里，遍寻不着。唱诗班的圣歌唱得仓皇失措，卫兵们则高声咒骂着互相争夺火把，列席的修士们都害怕地逃进了圣器收藏室。在骚乱中，布尔卡特不得不在三位不知名人士的帮助下，将教皇的遗体移到有格挡、比较安全的另一侧。

为了在下午接受民众的最后告别，教皇的遗体一直放置于格挡另一侧，而因为炎热，遗体在此期间也在持续不断地腐败，变得发黑膨胀，形态狰狞，甚至散发出了恶臭。在圣彼得大教堂里排队告别的民众，身体因恐惧而颤抖，但也许是因为群体性的猎奇心理作祟，告别的队列持续到了黄昏都没有走完。但最终，不知道是谁，为已经腐败到不忍直视的教皇遗体轻轻披上了遮盖。

夜半时分，在微弱的火把照耀下，冷清的送葬队伍朝着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墓地走去，除了一位主教和他的助祭之外，只有极少的一些人随行。下葬的时候，教皇膨胀了的遗体却无论如何也装不进早已准备好的棺材，最后是靠着两个力气大的搬运工，用脚踩着才勉强塞了进去。地下墓室的石墙上插有火把，火光摇曳，将每次按压都会弹起的尸体的丑陋全貌映照得更为骇人。最终费尽力气，棺材的盖子被盖上，下葬也结束了。出席的人们将火光吹灭，在沉默之中快步离去，墓地出口的铁门，在他们的背后发出瘆人的声响渐渐闭合。

第二章

仅仅十五天前，切萨雷的野心看上去还近在咫尺，现如今，他却仿佛能听到自己的野心逐渐崩塌的声音。教皇父亲突然过世，自己也被重病侵袭数次濒死，更糟的是疏远法兰西、亲近西班牙的策略只进行到了一半，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他的不幸。法兰西、西班牙这两方势力，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他真正的同伴，更何况还有威尼斯存在，这个意大利强国于教皇在世期间，一直恪守着令人生畏的沉默，这三方列强，时刻关注着失去了教皇后盾的切萨雷，而其他意大利诸国则期盼着他能紧追教皇的步伐同样病死。

在如此危机面前，容不得切萨雷露出一丝破绽，他必须对外表现出主导大权依然在握的样子，即使失去了教皇父亲这一后盾，在教皇刚刚过世后的他，状态也还没到需要绝望的地步。

首先，他依然是教会总司令官，依然站在一个无法令枢机主教与他国统治者无视的地位上。

第二点，他拥有罗马涅。整个公国团结在他任命的家臣周围，上下一心忠心耿耿。

第三点，他拥有军事力量。据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所说，切萨雷拥有九千名步兵、两千名枪骑兵，以及两队武装完善的大炮部队。

第四点，是他在拥有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还拥有忠于职守、值得信任的心腹。以唐·米凯罗特为首，切萨雷拥有一批为了主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诚家臣。

第五点，在教皇死后被转移到圣安杰洛城堡的将近30万达克特的教会财产，如今还掌握在他的手中。此外，即使过去于公于私都花钱如流水的公爵，在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银行里，依然还存有50万达克特的资金。而无论他打算开展什么行动，这些钱都随时可以调用。

即使再怎么想瞄准这次机会消灭切萨雷，只要考虑到以上这几点后，各国也没有那么容易出手了。他们边期盼着切萨雷的死期，边窥视着事态的发展。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枢机院。8月19日，亚历山大六世逝世的第二天夜里，枢机院在密涅瓦神殿召开了会议，十六名枢机主教齐聚一室，做出决定要求切萨雷于黎明时分交还圣安杰洛城堡。但是，在同一天夜里，城堡守官却回绝了主教们的劝告，身为切萨雷家臣的城堡守官拒绝的理由，是只有新教皇才有权索要圣安杰洛城堡。

第二天，枢机主教会议在同一场所再次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目的，是为了在选举新教皇的秘密会议召开前，将切萨雷驱逐出罗马，但唐·米凯罗特突然带着一队武装骑士闯了进来。面对举剑逼迫他们撤回提案的唐·米凯罗特，切萨雷在比萨大学时代的恩师，现在已成为索伦托枢机主教的雷莫利诺·达·莱里达，眼中含着泪水想劝说他就此回去，他对于与切萨雷是同窗的唐·米凯罗特来说，也同样是恩师。

枢机院无法驱逐切萨雷，但教皇选举一事又迫在眉睫，于是他们将规劝切萨雷离开罗马一事交付给了威尼斯大使。21日，接受了委托的大使杰斯汀安前往梵蒂冈与切萨雷会面，然而切萨雷横卧在病床上，接见大使时甚至因为太过衰弱而几乎无法说话。始终没有消退的高烧让他的双眼充血，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拒绝枢机院劝告的言语，一眨眼工夫，他的额头上就满是汗水。杰斯汀安在最终的报告中写道，完全没有想到公爵会病得如此之重。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希望切萨雷死去的围观者们，开始等得不

耐烦了，相继采取了行动。首先打头阵的，是奥尔西尼的复仇之战。向着罗马进军的他们，最先尝到了切萨雷军队的强力反击，唐·米凯罗特率领着军队精锐，炮轰了位于蒙特·焦尔达诺的奥尔西尼大本营，他们的城堡毁于切萨雷军的大规模炮击。但是，敌人并不只有奥尔西尼，西班牙国王的佣兵队长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也率领他的势力北上罗马。而在米兰的法兰西国王，派出了本为支援那波利的法兰西军，听从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指挥挥军南下，不断地接近着罗马。

数日之内，罗马就涌入了这几方不同的军队势力，法兰西军队、奥尔西尼军队、与那波利的西班牙军队串通的科隆纳军队，以及切萨雷的军队，彼此形成了相互敌视、相互角力的局面。罗马市内各处都在不间断地发生着冲突，“科隆纳”、“奥尔西尼”、“波吉亚”等呼声，像相互竞争一般在街道中不停回荡。其中，科隆纳军队因为有着在那波利处于优势的西班牙为后盾，态度尤为强硬。但是，唐·米凯罗特绝不能容忍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同奥尔西尼联手，进而取得主导权。他与一年前就开始随军的切萨雷幺弟杰弗里携手，在普罗斯佩罗军队的前线附近配置了军队。

但最终，谁都无法阻止科隆纳和奥尔西尼两方势力在面对共同的仇敌波吉亚时达成共同战线，这让切萨雷感到了威胁，他想要扯断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起法兰西国王的佣兵队长奥尔西尼一党，他选择收买西班牙国王麾下的科隆纳势力，作为交换，切萨雷决定归还自己曾经夺下的科隆纳所拥有的罗马郊外的城堡。普罗斯佩罗接受了这个条件，在波吉亚、科隆纳的联合军面前处于劣势的奥尔西尼于24日撤出了罗马。

此时，威尼斯共和国采取了行动。若是切萨雷在罗马的立场继续变强的话，窥视着罗马涅地区的他们将很难再有所行动，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枢机院中的反波吉亚派系。当得知切萨雷那本在罗马涅地区的军队，现已悄然抵达了位于罗马100公里外的奥尔维耶托时，枢机院决定与威尼斯采取一致行动，此番的中间人在上回的威尼斯大使基础上，又

增加了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和位于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四名大使。

25日晚，他们与切萨雷在教皇宫内的一个房间进行了会面。切萨雷虽依然无法从病榻上起身，但这次已可身着教会军总司令官正装会见众人。靠着背后叠落的数个靠垫，他才勉强在病榻上支撑起身子，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围在他的周围，随时准备帮衬，在卧榻的旁边站着的唐·米凯罗特则直瞪着大使们。若是单看这个场景，很像是王者在召见被征服一方的代表，但会面的内容却与之完全相反。

大使们首先都表示，自己前来只是为了传达枢机院的意愿，但同时也传达了各自国家君主们的意见与枢机院是相一致的。紧接着，向切萨雷告知了枢机院的决议事项，即“在举行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期间，为了保护选举会议的自由，罗马将不能有任何武将存在”，枢机院以此条法律或者说是传统为由，规劝切萨雷离开罗马。

时间在漫长的寂静中流逝，所有人都等待着切萨雷的回答。变得面色苍白的切萨雷想要站起身来，但就在这一瞬间后，他无力地倒在了靠垫堆上。甩开跑过来想要搀扶他的秘书官阿加比多的手，他用勉强挤出的声音表示，因为自己重病在身，只能拒绝枢机院的劝告。但即使切萨雷可以无视那些反波吉亚的枢机主教们，无视他们组成的枢机院的决议，却无法无视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列强。在此时，切萨雷认为与其用武力压制枢机院，不如通过让步来笼络他们。1500年后的切萨雷，不曾拥有尤利乌斯·恺撒曾在翻越卢比孔河时的魄力。

8月30日，枢机院与切萨雷之间达成了协定，首先要保证切萨雷教会军总司令官的位置，其次选举新教皇时，要尽可能推选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或者至少选择索伦托枢机主教。但同时，不只是切萨雷的军队，科隆纳、奥尔西尼等军队也要一齐撤出罗马6公里外。9月1日，驻扎在蒙特马瑞奥的切萨雷军队遵从协定离开了罗马。第二天，切萨雷自己也离开罗马，出发去向内皮的城堡。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的大使

们将切萨雷送到城外，他横卧在八名侍从抬着的肩舆上，被严重的头疼折磨得痛苦不堪，鲜红帷幔的遮挡下，依然可见他身形消瘦同往日判若两人，只有双脚因浮肿略微显得结实些。切萨雷的爱马身披饰有公爵纹章的黑色天鹅绒马衣，第一次同主人分开行进的它紧紧跟在肩舆之后。

切萨雷刚刚到达内皮城堡，还没来得及舒缓旅途的疲惫，就被接二连三到达的坏消息轮番打击，以乌尔比诺和佩鲁贾发生叛乱为首，各地迎接旧主复位的风潮愈演愈烈。

圭多巴尔多公爵→乌尔比诺。

詹保罗·巴利奥尼→佩鲁贾。

还有以下这些接受了威尼斯援助的其他领主们，也都陆陆续续撒着欢地返回了旧有领土。

雅可波·达比亚诺→皮奥恩比诺。

贾马里亚·达·瓦拉诺→卡梅里诺。

乔瓦尼·斯福尔扎→佩萨罗。

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里米尼。

维特罗佐·维特里的侄子们→卡斯泰洛城。

圣马里诺共和国也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个消息让缠绵病榻不得起身的切萨雷气得咬牙切齿。

但好在，罗马涅公国内的主要城镇，切塞纳、弗利、法恩扎、伊莫拉等，依然效忠于切萨雷。这些地区为抵御威尼斯的游击队，封锁了街道，而弗利和伊莫拉，更是全员一致通过了市政会决议，拒绝旧主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复位。

但是，切萨雷却在此时选择了最为无用的策略，他打算在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将西班牙枢机主教们的票都转投给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借此再次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修好，此举只能被认为他已经因重病失去了天赐的敏锐判断力。路易同意了这份利益交换，他向意大利各国，特别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共和国，发出了不得入侵切萨雷领国的警告，并在同时禁止对谋求复位的领主们进行援助。但自从法兰西国王在那波利处于劣势后，他的禁令已无法让意大利诸国唯命是从了，只有在指着法兰西保护才能过活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面前还算有点效力，而威尼斯则根本对禁令视而不见。

而另一边，在切萨雷离开罗马后，枢机主教们为了出席秘密会议陆陆续续地都来到了罗马。

9月3日，时隔十年没有回来过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抵达罗马。

6日，逃亡西西里岛长达五年的科隆纳枢机主教也回到了罗马。

9日，拉斐尔·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进入了罗马城。

10日，在西班牙的阿拉贡枢机主教之后，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也带着路易十二世对秘密会议的期待与鲁昂的大主教乔治·昂布瓦兹一同到达了罗马。过去三年间，斯福尔扎持续不断地支持着昂布瓦兹，才终于换得从法兰西的囚禁生活中解脱，重获眼下的自由。

16日，秘密会议，即为了选出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召开了，三十七名枢机主教齐聚一堂。但现场形势却十分混乱。法兰西派推选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威尼斯派推选罗韦雷枢机主教，切萨雷则再度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西班牙派推选卡瓦哈尔枢机主教。而这三者之间的竞争，经由威尼斯从中周旋，又变成了意大利、西班牙联合派与法兰西派的对决。在两派相互僵持中，9月22日，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作为庇护三世被选为了教皇。身在内皮的切萨雷对这位新教皇表示

欢迎，因为他是一位认真的圣职者，不从属于两个派系的任何一方，并且其伯父是曾经的教皇庇护二世，与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曾十分亲近。但是，由于新教皇庇护三世已有八十高龄，同时还身患病症，所以很明显，他只是多方周旋下的临时选择。

即便如此，庇护三世对切萨雷到底是很同情的。当威尼斯准备派阿尔比亚诺指挥官率大军奔袭内皮进攻切萨雷时，他准许了切萨雷为自保希望返回罗马的请求。并且在10月1日，发出教皇诏书抗议威尼斯，命其停止针对罗马涅持续不断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同时，教皇对费拉拉大使说了以下的话语：

“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对公爵感到同情。然而现在，那个年轻人还是重病在身呢。”

10月3日，切萨雷回到了罗马。他此行只带了二百五十名骑兵和五百名步兵，并对理应稍后赶来罗马会合的大军基本不抱希望。一个半月以前，在教皇父亲刚刚过世时，他尚且手握一万两千人的军队，然而如今他的大军已几乎不复存在。威尼斯政府用高额酬劳为诱饵，外加对切萨雷的困境大肆宣扬来煽动军心，很快就使法兰西、瑞士及意大利籍的佣兵队率先舍弃了切萨雷，投奔到了威尼斯的军队。即使切萨雷在情急之下，匆忙与奥尔西尼达成了佣兵契约，但威尼斯对奥尔西尼出了更高的价格，切萨雷订下的契约转天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接着在14日，切萨雷的军队彻底解体了，西班牙国王正式对外发布王命，因为切萨雷为与法兰西国王相交好，现禁止西班牙人在切萨雷手下担任任何军事职务，违反者将被处以死刑。雨果·蒙卡达等一众在切萨雷手下效力的西班牙勇将们因此舍弃了切萨雷，大多转而加入了驻扎在那波利的西班牙军队。

接二连三的变故下，切萨雷已陷入窘境，精锐之师不复存在。即使是此般境地，依然有小队士兵愿意追随他前来罗马，但这些人基本是从罗马涅百姓中征召而来，虽然他们对陷入绝境的主人誓死效忠，但这支

根据切萨雷的理想创建起来的军队尚不成熟，若是没有娴熟的作战部队和佣兵队长带领，几乎不能发挥战斗力。

同时，奥尔西尼、科隆纳以及阿尔比亚诺率领的威尼斯军都在逐渐逼近罗马。

切萨雷意识到，再这样继续留在罗马很可能会有危险，但想返回有自己军队驻扎的罗马涅也并非易事，他现在相当于已被各方势力围困在了罗马，陆路被威尼斯的势力所阻断，而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桨帆船船队，也被威尼斯收买了。

10月15日，切萨雷勉强自己披上战甲，发起了绝望的进攻。率领着在罗马城外仅存的军队出击，却遭遇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奥尔西尼与威尼斯两军的反击，交战不久即不得不败逃撤退。切萨雷逃回了教皇宫，但这个地方也只是宫殿而非要塞，面对已经追击到了罗马市内的敌人，算不上安全。因病骤然消瘦的切萨雷，唯有双眼依旧闪烁着光芒，他在唐·米凯罗特的搀扶下穿过地下通道，逃到了防守坚固的圣安杰洛城堡。

三天后的18日，一个令切萨雷大为震惊的巨大噩耗降临了圣安杰洛城堡，庇护三世逝世了。这位对切萨雷表示同情的教皇，仅仅在位二十六天就结束了他短暂的任期。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担心会再有新的危机来临，纷纷向切萨雷进言，劝他乔装成神职人员逃亡。对此，以剑为杖支撑起身体，晃晃悠悠站起来的切萨雷，几欲吐血一般地只说了一个字：“不！”

教皇庇护三世过世后，众人对切萨雷的敌对态度再无半点遮掩。10月24日，在威尼斯的元老院会议上，元首说道：

“大家想必都知道，我们政府的意图就是要得到罗马涅地区。为达此目的，我们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把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神的敌人，瓦伦蒂诺公爵彻底消灭。”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威尼斯确实有所策划，想在暗中支援法恩扎和弗利各自的旧主曼弗雷迪和奥德拉弗复位，把这两位推举成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再借机渗入威尼斯势力，只是弗利并没让威尼斯如愿以偿。

此般境遇下，切萨雷只得将自己的运势赌在下一次的教皇选举上。西班牙出身的十二名枢机主教均效忠于切萨雷，相当于总数三十六票中的三分之一都掌握在他手中。如果能利用这些选票，成功选出对自己抱有善意的教皇，也许他还能再次朝着自己的野心出发。对切萨雷来说，下一次的教皇选举至关重要，或是逃脱死地，或是万劫不复，唯有这两种可能的结果之一。

10月29日，切萨雷率领十二名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在教皇宫的一间房间内进行了会面。切萨雷提出的条件，是以在秘密会议上将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的十二张票全部投给罗韦雷，来交换对方当选后，保证自己教会旗手的称号与教会军总司令官的地位不变，保证自己罗马涅公国领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罗韦雷接受了，同时他又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另增加了一条，切萨雷在法国的3岁女儿露易丝，要同自己的外甥乌尔比诺公爵家的后继者弗朗切斯科·马利亚订立婚约，只有波吉亚、罗韦雷两家联姻，方能在未来互相扶持。

28岁的切萨雷，拖着仍然衰弱的身体精疲力竭地倚在椅背上，直直地盯着在他眼前的这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的侧脸，对方晃着羽毛笔正奋笔疾书，看上去面色红润，完全不像是已有60岁的人。迄今为止，切萨雷已体验过了数次同伴的背叛，也十分清楚，在政治面前，真理不是由感情和伦理道德所决定，而是寄生于利益交换之中。然而，当他面对这位向自己表现出十足诚意的罗韦雷时，却大大低估了对方受波吉亚一家迫害，十一年间卧薪尝胆深埋于心的仇恨。最终，协定在切萨雷、罗韦雷和作为证人的十二名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的共同签名下成立了。

11月1日，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作为尤利乌斯二世即位为教皇。新任教皇由于太过感动，全程几乎都呈现出一种失神的状态，就连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都不太能一个人平稳地登上去。

切萨雷用自己的力量，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成功推上了光荣的宝座，这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但与其说他是输在了赌运气上，倒不如说是输在了政治短视上。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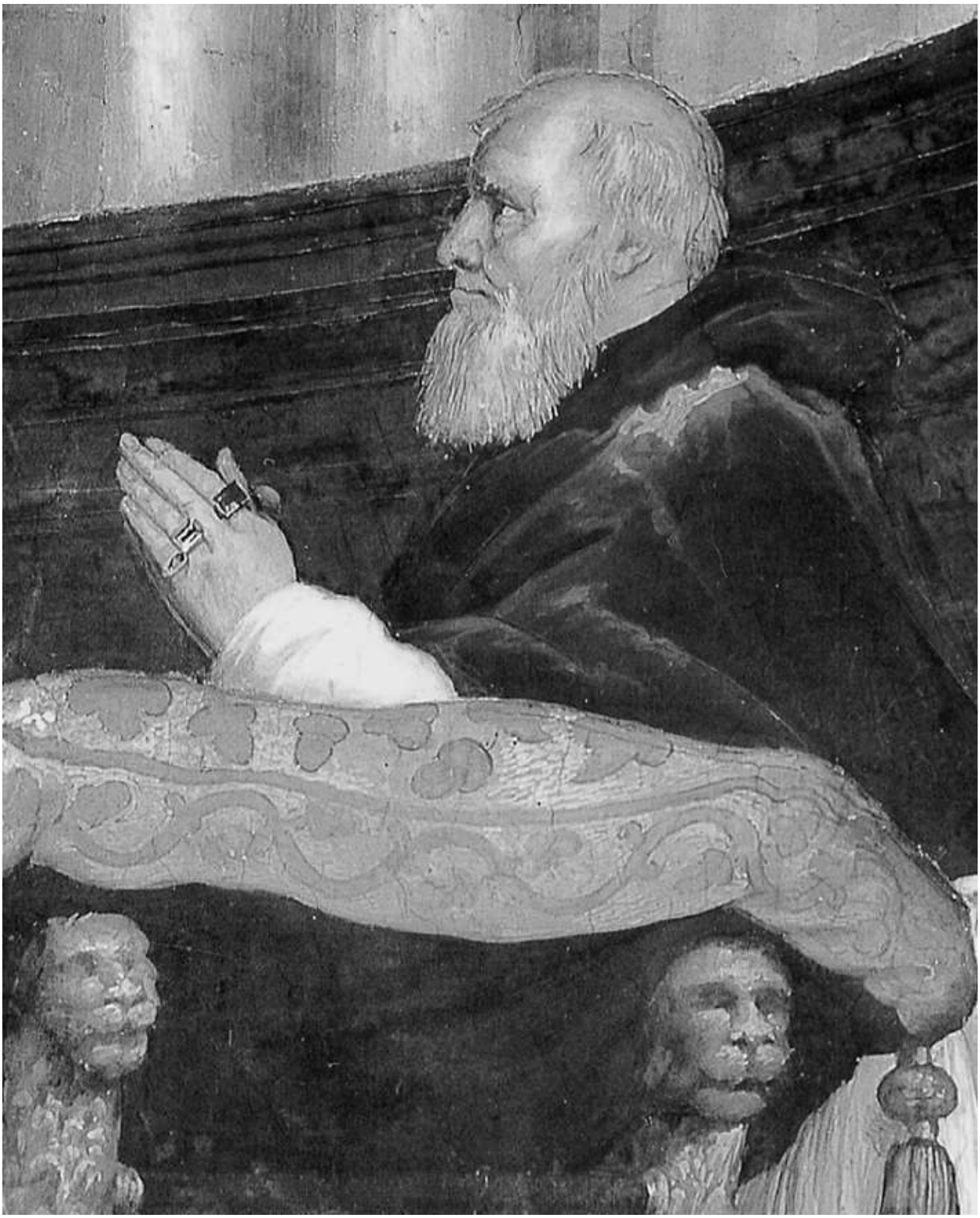
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自称“我把切萨雷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疼爱”，同时建议切萨雷前来他无偿提供的教皇宫一隅专心养病恢复身体，而会把新教皇的鬼话当真的，也就只有切萨雷一个人了。

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被派驻罗马，关于新任教皇对切萨雷百般示好的真意，他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点，是为10月29日与切萨雷签署的那份协定做做表面文章。第二点，是为牵制威尼斯的势力，遏制其持续向罗马涅地区的渗透。最后，是为着切萨雷眼下仍然还掌握着的罗马涅地区的军事要所和民心。马基雅维利还附加上了一句，教皇尤利乌斯一直在伺机等待着消灭切萨雷的机会。

卧病在床的切萨雷完全不知情的是，教皇私下里对威尼斯的大使却是这样说的：

“这位为了权势可算是坏事做尽，看看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后他的惨状。当敌人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唯命是从，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自由了。”

然而，把这句话充分付诸行动的并不是当时的教皇，而是威尼斯。威尼斯的下一手伸向了法恩扎和弗利，对于刚刚即位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来说，压制威尼斯的侵略成了当务之急，但实际上，他也是束手无策。曾在名义上属于教会的军事力量，完全是由切萨雷个人构建而成，而切萨雷只是空有教会军总司令官之名，军队照旧是建立在佣兵制度之上。更何况，刚刚即位的尤利乌斯并不富裕，在金钱方面也无法与威尼斯相抗衡。



尤利乌斯二世

切萨雷很清楚尤利乌斯的这个弱点。在教皇选举之前的10月29日，

他们二人缔结协定的时候，切萨雷所考虑的利益交换，一个能在政治上吸引尤利乌斯的筹码，就是自己作为武将的才能，切萨雷认为尤利乌斯不可能不需求自己的力量。

而在教皇尤利乌斯看来，若是只作为一介佣兵队长，切萨雷的才能确实是他渴望至极、梦寐以求的，但他并不认为切萨雷会是只满足于佣兵队长地位的男人。要是现在不管不顾地拿切萨雷来对付威尼斯，迟早能看到他向教会举起反旗的那一天。

但是，尤利乌斯二世身边确实没有可靠的军事人才，他虽然有女儿，但却没有儿子，外甥们当中也并无合适的人选，唯一一个要继承乌尔比诺公爵家的外甥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韦雷，眼下还太过年少，其他亲族也是如此。尤利乌斯二世与伯父西斯都四世一样都是贫民出身，一生中都没能遇到擅于军事的甘为他们效力的左膀右臂。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尤利乌斯，正在对波吉亚家族的憎恶与对切萨雷的军事才能的认可这两种感情之间摇摆不定。

探查到了教皇真意的马基雅维利，对本国政府提议，应与罗马教皇联手，共同对抗逐步侵略罗马涅的、对双方都极具威胁的威尼斯共和国，而鉴于罗马与佛罗伦萨都没有优秀的武将，是否可以请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作为佣兵队长，用他来担任对威尼斯作战的指挥官。

亲眼看见切萨雷将自己最大的敌人尤利乌斯推举成了教皇，对如此愚蠢的举动，马基雅维利表示“与过去的公爵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对于这个时期的切萨雷，他的评价几乎可以说是痛下针砭毫不留情。但是，十年后，在他所著的《君主论》的最后，马基雅维利却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时常想起，是否曾经透过某个人，看到了神为意大利投下了一束名为赎罪的光芒，但遗憾的是，那人未及攀升到荣耀的顶端，就已被命运所抛弃。”

然而在十年之前，尚未著成《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关于利用切萨雷的军事才能压制威尼斯的提案，却并不是为了挽救切萨雷，完完全全是为了在面对威尼斯共和国时总是处于劣势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所着想。但是，被认为在那时就已预测到八年后的威尼斯对罗马、对康布雷同盟之战的马基雅维利，此时的这个大胆提议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就夭折了。因为，佛罗伦萨政府首先就不同意，佛罗伦萨在畏惧切萨雷能力的同时，也对法兰西国王有所顾忌。而且，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无法完全抛却对波吉亚家的憎恶。

另一方面，切萨雷的健康刚恢复到可以骑马的程度，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虽然依旧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外加时不时袭来的头痛会使其痛至面部扭曲，但他已下定决心，要回到罗马涅再一次重头来过。切萨雷从热那亚的银行取出金币，再次招兵买马，后又向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申请通行许可证，声称要作为教会的武将再次征服罗马涅和马尔凯地区，成功后会将领土悉数交还给教会。教皇正对威尼斯势力在旧教会领地的罗马涅、马尔凯两地区的蛮横行事大为苦恼，痛快地给予了切萨雷许可。

得到教皇许可的切萨雷，立即给军队下达了命令，主力部队在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的指挥下，经陆路跨过托斯卡纳向罗马涅前进。因为健康状况还无法承受远路的行军，切萨雷自己是同五百名士兵一起，经奥斯提亚乘船去向里窝那，预计两军在比萨附近会合。为此，洛伦佐·莫提诺在奥斯提亚的港口忙着为船队做准备。

11月19日，送走了唐·米凯罗特一行人，切萨雷骑上骏马向奥斯提亚出发了。

但令切萨雷没想到的是，在自己离开罗马后，威尼斯大使又有了新的动作。正逐步侵蚀罗马涅的威尼斯，对于教皇同意切萨雷前去罗马涅的事情十分震惊，于是指派大使接近教皇，游说他关于切萨雷的危险性。本来就对放切萨雷回罗马涅感到犹豫的教皇，很快就被说服了。

教皇向各国送去了如下的诏书：

“教会领地理应归属于教会，而非切萨雷·波吉亚的私有领土。此番授予切萨雷的许可，是教皇在被胁迫下所发。”

教皇在送出诏书的同时，还派出了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拦截切萨雷。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到达奥斯提亚的时候，切萨雷正准备上船。枢机主教向切萨雷传达了教皇的意思，作为教会的一介武将，切萨雷无权将罗马涅地区各城堡要塞据为己有，要求他必须出示将这些让渡给教皇的证明。而切萨雷回绝了。

得知此事的教皇立即禁止了他的出航。虽然切萨雷表示出了让步的姿态，但教皇却对此不为所动。26日，尤利乌斯二世在自己即将举行教皇加冕仪式前，下令逮捕切萨雷。坊间开始流传，尤利乌斯终于向波吉亚发起了复仇行动。

切萨雷被秘密押解到罗马后，住进了他与父亲曾在教皇宫生活时住过的房间，那里已被人称为“波吉亚的房间”，虽然是对待客人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是监禁。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1月30日传来消息，唐·米凯罗特指挥的军队，在向罗马涅进发途经托斯卡纳境内时，遭遇了詹保罗·巴利奥尼指挥的佛罗伦萨军，并于激战后落败。在听到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竟然都被佛罗伦萨军俘虏的消息后，始终对教皇要求交出罗马涅城池一事持拒绝态度的切萨雷，终于撑不住了。

12月2日，在教皇宫紧挨着教皇寝室的其中一个房间内，一位面色惨白的男人坐靠在长椅上。房门被打开，另一位高挑消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如鬼影般三两步就飘了进来，对坐在长椅上的男人弯下腰，跪地行礼。坐在长椅上的男人站起身来，踌躇了片刻之后，走向了跪在地上默默无言的男子，接着，说出“公爵阁下”几个字，搀着对方的手臂将其扶起。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是因切萨雷而被迫屈辱地几次三番逃亡的

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而跪在他身前的男人，正是为了与教皇和解前来向他求情的切萨雷。圭多巴尔多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间有亲族关系，教皇也打算让他代替切萨雷担任教会军总司令官的职务。最终，圭多巴尔多同意为其说情，条件是切萨雷需归还在占领乌尔比诺时当作战利品夺走的物品，并对无法归还的物品进行赔偿。

第二天夜里，切萨雷通过圭多巴尔多向教皇提出，自己将让渡罗马涅所有城池，用以交换自己与唐·米凯罗特等被佛罗伦萨军所俘虏的家臣们的自由，教皇答应了这个条件。

然而，切萨雷所不知道的是，早在八天前，圭多巴尔多就已对曼托瓦大使说：

“教皇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公爵，现在，只是为了保护教皇的名誉，暂时保持沉默。”

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则更加率直，他在给本国政府的信中如下写道：

“教皇想要消灭公爵，却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依靠自力征服罗马涅，话虽如此，他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罗马涅被威尼斯夺走。故而，对于教皇来说，在被消灭之前，切萨雷还有利用价值。

教皇向罗马涅各地都派出了使节，递送教皇诏书，号令他们交出城池。但没想到，面对教皇使节，各地城池守官均给出了不看到主君被释放就绝不开城门的回复。尤其是切塞纳的守官迭戈，甚至将其中一个教皇使节吊了起来。这些举动激怒了教皇，他叫嚷着要将切萨雷戴上手铐脚镣，扔进圣安杰洛城堡的地下牢房去，在众多枢机主教们的劝说下，才总算没有付诸实践。

而另一方面，被关在“波吉亚房间”的切萨雷却像个旁观者一样，享受着无所事事的快乐。

12月14日的午后，切萨雷曾经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前来拜访，切萨雷并没在房间内，他被引到了中庭与之会面。枢机主教在柱子后的阴影中看到，冬日暖阳照射下的中庭里，切萨雷与看守自己的一名侍从围坐在棋桌前，桌子周围还有另两名侍从旁观这场比试。一段时间后，好像分出了胜负，下棋的侍从站起身来，说道：

“公爵大人，您总是如此的强大。”

对他们，切萨雷只是回以微笑。

侍从们离去之后，切萨雷依旧坐在原处一动不动，身体深深地埋在椅子里，只仰着头，似是为了晒晒阳光，眼睛则是一直闭着的。

枢机主教在之后与科斯塔比利会面，谈到切萨雷时叹息道：“就像是对世间的一切都已不再在乎了。”

没人知道，处在孤独沉默之中的切萨雷，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只是，现在的切萨雷，既无法回到拒绝对教皇投降，始终对自己保持忠诚的罗马涅，也无法拯救忠实于自己的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他们经受着严酷的拷问，但宁愿被囚禁也不背叛自己的主君。而切萨雷本人，连唐·米凯罗特依教皇之令被秘密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就关在距离他所在的教皇宫极近的圣安杰洛城堡牢房的事情也不得而知。就这样，这一年——1503年便就此结束了。

转过年的1月3日，西班牙军在那波利的加埃塔与法兰西军交战，大获全胜，法兰西被迫就此完全退出对那波利的权力争夺，而这让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决意亲近西班牙国王。

1月28日，切萨雷打破了近两个月的漫长沉默，再次与教皇缔结了

协定。根据协定，切萨雷将在卡瓦哈尔枢机主教的监视下被转移到奥斯提亚，并在那里度过四十天的时间，若是在四十日之内罗马涅各城池向教皇投降，则切萨雷可重获自由，若是罗马涅依旧拒绝投降，则切萨雷将再次被带回罗马，关进圣安杰洛城堡牢房终身服刑。

2月14日，教皇招待切萨雷共进午餐，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双方内心的想法，但至少从表面看来，午餐会是在和睦的氛围中结束的。第二天夜里，切萨雷便离开了教皇宫，乘船沿特韦雷河去向奥斯提亚。

但是，罗马涅各处城池在教皇使节面前依旧毫不屈服，各地守官们反复强调交城的前提是切萨雷公爵已获得自由，教皇的愤怒爆发了，而这些愤怒被悉数发泄给了在奥斯提亚等待的切萨雷。切萨雷给罗马涅的家臣们写了信，让他们按照教皇命令交出城池，绝不能对教皇兵戎相见。收到切萨雷的书信后，伊莫拉、切塞纳、贝尔蒂诺罗的城池才终于被交还给了教皇。

4月19日，切萨雷重获自由之身。他等不及从那波利前来迎接他的船只到达，骑马迎着来船的路线跑到了聂图诺，与来船会合后乘船去向了那波利。

此时那波利的实际掌权人是西班牙总督科尔多瓦，他的军事才能出众，被称为“伟大的元帅”。切萨雷还是枢机主教的时候便已与他相识，此次前去那波利，就是为了投靠这个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友人。

科尔多瓦热情地迎接了切萨雷。而自4月28日，切萨雷拜访卡斯泰尔诺沃城堡以来，这位人至中年的成熟武将科尔多瓦，便一直很喜欢与雏鹰一般的年轻人交谈。这让因担心切萨雷的安危，从罗马跟到那波利的两位枢机主教倍感宽慰，这两位其中一位是切萨雷的伯父卢多维科·波吉亚枢机主教，另一位是切萨雷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这期间，切萨雷一直客居在他伯父的宅邸。

切萨雷向科尔多瓦表示，想要在西班牙国王手下谋得军职为其效力。他提议可以由皮奥恩比诺登陆，先夺回比萨，再据此进攻法兰西的同盟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科尔多瓦接纳了他的想法，并约定会对他进行援助。

得到承诺的切萨雷，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分别提出自己最后的一笔金币，开始编制军队，科尔多瓦借出的桨帆船船队也在同时做着准备。但是，切萨雷真正目的在于罗马涅，他给留在罗马涅地区的家臣们秘密地发出了待命的指令。

5月25日，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就差最后一步率兵登船。这天夜里，以街上有疑似刺客的可疑人员徘徊为由，科尔多瓦向切萨雷提出邀请，为了安全着想建议他同自己一起留在城堡中过夜。切萨雷也认为在出发前，有必要对至今为止科尔多瓦的亲切表示感谢，故而接受了邀请。两个男人共进了晚餐，席间两人开怀畅谈，亲密无间。科尔多瓦看着切萨雷，就如同看到了自己往日的荣光、力量与年轻时的梦想，都原原本本地具象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一般。

到了就寝的时候，科尔多瓦将切萨雷送到他的寝室前，又接着聊了一会，直到切萨雷表示自己已经想要休息，科尔多瓦可以离开不必继续作陪了。但是，他的朋友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自己已从国王那里接到命令，要不眠不休地待在他的身旁。切萨雷的脸霎时白了，他呆立原地，口中不受控制地喊出了几乎不成词语的声音。

切萨雷并不知道，曾一度放他自由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后悔了，为了再次摧毁切萨雷已与西班牙国王勾结，早在五天前的5月20日，教皇在罗马对西班牙大使表示：“我想我们双方都不会乐于见到切萨雷重获自由。”此时已征服了那波利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正要将野心伸向亚平宁半岛，自然是不会放过向教皇卖人情的机会。再加上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倒切萨雷机会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在利用反法兰西政策这一诱饵接近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所有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毁灭切萨雷

的命令下达。

从5月25日的午夜开始，切萨雷就被幽禁在了卡斯泰尔诺沃城中的塔内。这座塔就位于港口附近，右手边是桑塔·露琪亚之塔，左手边可以遥望到紫色烟雾缓缓升起的维苏威火山。这个那波利港口被一塔一山左右环抱，沐浴着耀眼的阳光，各式船只从这里驶向地中海，又不断有船只从各处返航，日日都是热闹非常，喧闹声直达遥远的高塔之上。

而在塔上的切萨雷却已经不想再见到任何人了。总督科尔多瓦虽然几次登上高塔，但切萨雷都只是直直地盯着对方的脸，闭口不言，他的双眼燃烧着愤怒与憎恶，令科尔多瓦难以承受。其实在最初，科尔多瓦也没有要背叛切萨雷的意思，在接到国王的命令时，他的内心万分苦恼。但当他得知这件事的背后，不只有西班牙国王，同时还有教皇参与其中的时候，科尔多瓦便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另外一个经常来拜访切萨雷的人，是教皇的使节。使节前来，是为了逼迫切萨雷交出罗马涅最后仅剩的弗利。教皇几次下达命令，但位于弗利的拉瓦尔迪诺要塞守官们均不曾服从，向切萨雷贯彻了曾宣誓的不变的忠诚，到现在也不肯交出要塞，然而教皇和威尼斯也对他们无法轻易出手。切萨雷这边，也是一直拒绝着教皇使节的让渡劝告。

另一方面，在罗马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为了找出惩处切萨雷的理由而费尽了心思。切萨雷并没有像被法兰西国王俘获的摩尔人那样，在战争中输掉成为俘虏，而且他也并没有对教皇发起过反叛，教皇若仍旧执意处置他，就只有让他背负杀害教会相关人员这一罪责了。本想让唐·米凯罗特站出来指证，在亚历山大六世任期内去世的枢机主教们是被切萨雷下令所毒杀的，但无论米凯罗特受到如何残酷的拷问，都没有屈服。教皇无法从唐·米凯罗特口中获得想要的证言，他自始至终声称那些枢机主教们全部是自然死亡，再怎样拷问都不会从他这里得到任何其他的答案。但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不能轻易地就随便杀掉切萨雷，由于他辉煌的过去，众多民众都知晓他的存在，也在关注着他的下场。

此外，对教皇来说，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的意向也不能完全无视。教皇领悟到，要想惩处切萨雷，必须要有相应的理由，然而想找到一条合情合理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困难。

春去夏至，在盛夏的8月15日，切萨雷终于对教皇的命令屈服，给弗利的城堡守官写去了一封书信。

“幸运的女神，恐怕已对我十分愤怒了。”

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书信紧接着就只写道：

“到了如今，我想要重获自由的方法，就只剩下交出要塞这一条了。”

8月强烈的阳光，毫无顾忌地抛洒在弗利这座位于平原上的城镇。民众们为了避暑纷纷聚集在广场回廊上，他们当中已有人感到不可思议，聊着自昨夜起要塞就一直大门紧闭，武将与士兵们也不似往常进进出出。突然，一个人跑进了广场，听闻要塞中吵吵闹闹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变故，乘凉的人们争先恐后，来到了要塞护城河边。

就在这时，在人们的注视中，城门被粗暴地打开了，随即吊桥降到了护城河上。一匹骏马飞驰而过，骑在上面的武将正是城堡守官贡萨洛·德·米拉芬特斯，身穿黑色盔甲的他将长枪架在大腿上，视线直视正前方，像征服者一般凛然地骑马跑过。紧随其后的是弗拉卡索、拉弗、纳迪等，这些被称为切萨雷心腹中的心腹的武将们穿着盔甲骑马跑过。在他们的后面是举着印有代表切萨雷旗号的文字“Aut Caesar aut nihil”（不为恺撒，宁为虚无）军旗的队伍，驻扎在这座要塞的两百名骑兵，全员都陆续走出了城门。这支骑兵队集结成队伍，一起离开要塞时，一声声高喊着“公爵！公爵！”，喊声在弗利城镇的房屋之间反复回荡。

他们虽然为了被囚禁的主君切萨雷交出了要塞，但却拒绝了教皇的

邀请，拒绝为新任主君效力。全员达成一致，要尽可能抵达主君所在的那波利。

但即使如此，切萨雷依然没能再次获得自由。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推测出了教皇的用意，已下令将切萨雷押送回西班牙，将以杀害自己家臣甘迪亚公爵胡安的主谋罪名，对他进行审判。

8月20日，那波利港口，一艘沐浴在阳光下的白色帆船向着西班牙出发了。而这正是米拉芬特斯交出要塞后的隔天。

被关在圣安杰洛城堡地下牢房的唐·米凯罗特在这之后又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囚禁生活，直到1506年4月才终获释放，虽然释放他的交换条件是要担任佛罗伦萨军的佣兵队长，但他很快就消失了，关于他在这之后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章

在西班牙南部，从瓦伦西亚南行至阿利坎特的路上，在路途正中间会经过波吉亚家的领地哈蒂瓦。波吉亚家族最初生活在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纳附近的博尔哈，后南下定居在了哈蒂瓦，作为这个地区的领主发展壮大。整个家族均秉持武将传统，代代侍奉阿拉贡王家，与王族结为姻亲，一度在阿拉贡王国的宫廷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波吉亚家族的飞速发展，是从阿方索·波吉亚离开哈蒂瓦去罗马教皇厅任职，于1455年成为加里斯都三世教皇时开始的。随后，罗德里格·波吉亚被自己的伯父加里斯都三世召唤，离开哈蒂瓦去往意大利，并于1492年作为亚历山大六世也登上了天主教教会领袖的宝座。

虽然波吉亚家族已跻身于欧洲政界中心，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是无法忘记故乡哈蒂瓦。教皇曾命阿拉贡国王将包括哈蒂瓦在内的甘迪亚地区独立为公国，由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甘迪亚公爵统治此处，来保持与西班牙的关联。但是，甘迪亚公爵胡安于1497年被暗杀，之后都是由胡安的妻子玛丽亚·恩里克斯与被留下的孩子两人守护着这片土地。

但切萨雷，如今却是以囚犯之身踏上了这片祖先的土地。虽然在家族成员之间用瓦伦西亚方言交谈，也拥有许多西班牙出身的朋友与家臣，但这还是切萨雷第一次踏上西班牙。他在阿利坎特下船，最初是被押着穿过哈蒂瓦送到了瓦伦西亚，这里是曾经他担任枢机主教时所管辖的教区。但是，切萨雷没有被允许逗留在哈蒂瓦或是瓦伦西亚。没过多久就继续被押送南下深入内陆，被关进了阿尔瓦塞特近郊城镇钦奇利亚的城堡中。

城堡远离城镇，矗立在高约700米的山丘之上，从这座外观粗犷近似于摩尔人风格的城堡放眼望去，仅有一处森林，其他都是光秃秃的山脉，奉国王之命前来监视切萨雷的城堡守官加百利，体格据传像大力士一般健壮。给予切萨雷的三间大房间位于这座城堡的最顶层，一名从意大利开始就跟随着他的侍从与他共同生活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秋天过去了。城堡石墙被内陆特有的猛烈寒风呼啸袭过的冬天也要过去了。切萨雷居住的房间十分宽敞，即使他想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屋中走来走去，也不会在空间上感到不便，但空气只能透过被割裂成小格子的窗户进入，他也无法走到室外再次沐浴阳光。屋子的白色水泥墙像是修道院的样式，屋内也只有粗木家具，切萨雷在这里过着寂静又沉默的日子。

另一方面，在外面的世界，释放切萨雷的请求和运动一刻不曾停歇。他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和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不知疲倦地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及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进行着游说。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受人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所托，接连向教皇、西班牙国王乃至法兰西国王请愿释放切萨雷。而在西班牙方面，切萨雷的管家雷奎伦佐陪同主人一同登上西班牙的陆地后，就立即奔赴梅迪纳·德尔·坎波觐见西班牙国王和女王，递交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所写的请愿书。此外还有切萨雷的内兄，以国王的名义从纳瓦拉向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女王伊莎贝拉派去使节，为释放切萨雷活动。还有两个女人，切萨雷的妹妹卢克雷齐娅和妻子夏洛特，也都给法兰西国王、教皇以及西班牙国王和女王送来了近似于哀求的书信。

但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并没有听从他们的请愿。至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不只是无视请愿，还将从法兰西境内的切萨雷领地收缴来的年贡全额没收，甚至连本该由国王支付的与夏洛特结婚时的10万达克特的陪嫁也不再履行。此外还大规模收回本来赐予切萨雷的领地，只留下了瓦朗斯的公爵领土和其他一些小领地，甚至

还在暗中限制他身处法兰西的妻子夏洛特的行动，防止她跑去西班牙。

因为教皇他们的强硬态度，各种不吉利的传闻扩散开来。有的说，胡安的遗孀玛丽亚·恩里克斯将起诉切萨雷暗杀了自己的丈夫，有的说，国王费迪南多似是打算将切萨雷作为暗杀拥有阿拉贡王家血统的比谢利公爵的主谋者处以死刑，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不好传闻的共通点，都在于女王伊莎贝拉才是切萨雷获释的最大障碍。

这位女王去世两个月后的11月11日，一则传闻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说西班牙国王已释放瓦伦蒂诺公爵，并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予了他。留在意大利的波吉亚派们狂喜异常，但可惜的是这是个误报。即使如此，这一类的传闻还是没完没了地被反复传播。甚至教皇都一度听闻并相信了费迪南多国王已将西班牙全军交付切萨雷，即将进攻意大利版图的传闻，西班牙驻罗马大使不得不紧急跑去梵蒂冈向教皇阐明原委。

但是，被囚禁在钦奇利亚冷清的城堡内的切萨雷对这一切动向都不得而知。春天即将结束，从非洲大陆吹来的热风，让空气日复一日地燥热起来。城堡守官加百利前来查看这名囚徒的状况，切萨雷请守官来到窗户近前，说是从这里望见的山脉有可疑的火光飘了过来。守官走近了窗户，一瞬间，切萨雷扑向了他，用尽全身力气掐住了他的脖子。守官痛苦地拼命挣扎，他的脸憋得通红，但是几乎是两倍于切萨雷强壮的守官，还是一边挣扎一边像头牛一样吼叫了出来。喊声引来了城堡的武装士兵，切萨雷松开了守官，边微笑着边对他们说：

“听说他力量很大，我只是想要验证一下而已。”

城堡守官因疼痛和愤怒涨红着脸，带着士兵们急匆匆地走下了楼。

1505年夏，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切萨雷从待了将近一年的钦奇利亚城堡被转移到了位于梅迪纳·德尔·坎波的莫塔城堡。

梅迪纳在阿拉伯语中是“都市”或者“街道”的意思。曾统治过这里的摩尔人给这片地区留下的不仅是名字，还为这个距离马德里200公里的城镇染上了自己浓重的色彩。这里盛产骏马与健壮的公牛，沙色石头砌成的房屋一间挨着一间，中央广场聚集着从各地前来的商人，买卖交易热闹非凡。一年前女王伊莎贝拉尚未去世时，她的宫殿就是在这里。

切萨雷被移送的这座莫塔城堡，城池坚固、气势磅礴，傲视众生一般地矗立于世。城门处两边各有一个圆柱形石塔，从这里左右展开的高大石墙，将城堡与街道一斩为二。城墙外围环绕有深深的护城河，即便是在现在这样的暑热之中，也照样注满了水。小小的窗户和枪眼将城堡墙体分割成无数个小方块，从窗户和枪眼望出去会有种错觉，会觉得这座莫塔城堡就如同一头巨象，扑通一下凭空地坐在了沙色街道与无垠山野之间。这里的城堡守官是卡德纳斯，但还另有一位塔皮亚，专为监视切萨雷而来。切萨雷被关在了城堡中最高的一座靠近城墙的高塔顶层。

梅迪纳·德尔·坎波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直系继承人乔凡娜与其丈夫菲利普，以及年幼的王子们共同居住的地方。其中刚满5岁的一位王子，就是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

当时的西班牙王家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分裂的西班牙经由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王国费迪南多的婚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还时日尚短。这个统一的新兴国家，在朝着下一代世界最强国的道路迈进的同时，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不断上演。

虽然费迪南多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育有几名王子和公主，但都接连夭折了，最后只有一位被人们戏称为“发疯的乔凡娜”的公主，她有个喜欢躲在王宫的厨房里一言不发的癖好。此外，几乎尽人皆知的一点是，她对自己那被美誉为“美男子菲利普”的俊美丈夫有着超出常规的嫉妒心。

女王伊莎贝拉在世时，即使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所有事情也都能相

安无事地正常运转。但在女王去世后，费迪南多国王与公主的丈夫菲利普之间突然开始飘散出不安的气息。菲利普以亲生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势力为背景，从母亲勃艮第的玛丽那里相继得到了法兰德斯全部地区以及法兰西的一处领土，现在还代替妻子摄政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多将这个年仅27岁的野心勃勃的女婿看作自己的强敌。而菲利普则认为，根据自己已有的势力来看，只要国王一死，他就可以继承整个西班牙王国了。所以这两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被囚禁着的切萨雷。

受命统治那波利的科尔多瓦总督野心勃勃声名远播，国王对他也同样不太放心，因而曾考虑过是否要让切萨雷统率军队，牵制科尔多瓦。所以国王想要将一度转移到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切萨雷，再次调回自己宫廷所在的瓦伦西亚附近。对国王来说，将切萨雷放置在自己身边是一举两得，既得到了能代替科尔多瓦的优秀武将，又为抑制菲利普王子的动作增添了力量。

当然，菲利普拒绝了国王的这一请求。野心勃勃的他已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会与国王费迪南多兵戎相见。到了那个时候，切萨雷对菲利普来说将非常有用。

1506年9月7日，距切萨雷被转移到莫塔城堡已过一年有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再次率军前往那波利。十八天后，年轻的菲利普王子因病突然去世。费迪南多认为现在可以放切萨雷自由了，而对切萨雷来说，现在也正是他重回历史舞台的绝好机会。

但是，切萨雷却没能忍耐地等到国王归国。在高塔之上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他，对这些事情和进展全然不知。通过进出城堡的一名祭司，他与贝纳文特伯爵相识，但这位伯爵是死去的王子菲利普一派，也就是卡斯蒂利亚派的首领，即便切萨雷想要了解国王费迪南多的动向，贝纳文特伯爵也只会让他愈发地疏远国王。在反费迪南多派的贝纳文特伯爵看来，与其眼睁睁看着切萨雷落到国王手里，还不如趁着国王不在将他

放跑更好。伯爵与他这一党派为了帮助切萨雷脱逃，提出要让武装士兵入侵城堡，但切萨雷只期望能得到一根长绳索。

10月25日，夜半时分，一团黑影悄悄接近城墙，利用阴影遮蔽自身的是四匹马和两个人影。夜空中虽然闪烁着繁星，但天空高悬的尚是细长的新月，暗淡月光下四周仍是一片黑暗。

这时，高塔上窸窸窣窣地放下了一根绳索，紧跟着，一个男人顺着绳索滑了下来，正是切萨雷的侍从。随后的瞬间，一道惨叫划破夜空，绳索太短了，侍从留下那一声惨叫之后便落入了护城河之中。

切萨雷发现，贴着塔壁降下的这根绳索在半途就到头了，下方是张嘴迎接着他的漆黑的注满水的护城河。但是他并没有迟疑，将身体攀上还在晃动的绳索，快速地沿着墙壁滑了下去。但是，塔皮亚的儿子听到刚刚的惨叫声后，立即召唤了卫兵，城堡随之骚动了起来。切萨雷正下方已布满了卫兵，但视力所及之处能看到，脚下的土地与护城河仍有一段距离，同时，手执武器的卫兵们，陆续从塔的入口蜂拥而来。已经再无他法的切萨雷，像弹簧一样在塔壁与空中来回晃动了两三下，下个瞬间，他在空中放开双手，从非常恐怖的高处远离城墙向护城河跳了出去。

被摔在地面上的切萨雷动弹不得，等在旁边的两个身影快速地围了上来，随即把他拽上了马。两人一左一右将缰绳拉住，递给伏在马上一动不动的切萨雷后，也分别上了马，甩开鞭子，从两侧夹住切萨雷所乘的服帖的马，三匹马就这样如风一般离去了。

20公里的道路，毫不停歇，追兵点燃的火把仿佛一直在他们后方闪现。切萨雷几乎在疼痛中失去了意识，但紧握缰绳的手却从未松开。

终于到达了维拉龙，贝纳文特伯爵的领地。一行人在这里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照料切萨雷的伤势，他从塔上跳下来的时候，左半身落地

承受了重创，左臂骨折。而这里距离潘普洛纳还有遥远的路途，在逃去那里之前，即便是很短时间的休养，对切萨雷来说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隐蔽地休憩了数日。

终于，到了该离开维拉龙的时候了。此处距切萨雷的内兄纳瓦拉国王的领土，即使是东北方向的直线距离，也还有大约400公里路程。不过，追兵自然也能预测到切萨雷会逃往纳瓦拉，一定会在必经之路上展开拉网式的追查。他们不得不选择迂回的路线，先北上翻过坎塔布连山脉，然后出海沿海岸向东前进，再穿过巴斯克地区进入纳瓦拉境内。

贝纳文特伯爵为切萨雷提供了三匹健硕的马以及两名可靠的领路人，马丁和米格尔，并且还为他准备了足够多的金钱。三名旅行者在国王的领国内部逃亡，为避开西班牙国王手下的追兵，他们各自装扮成了买卖小麦粉的商人。

严酷的11月到了，寒冷的空气刺痛着皮肤，马儿都被狂风吹得打晃。切萨雷一行人无时无刻不担心惧怕着埋伏，日复一日在危机与平安间往复。穿过巴利亚多利德，越过阿米斯科，走过迪阿拉·德·坎波斯那片乌鸦成群的寂寥林荫道，他们进入了坎塔布连山脉，道路从这时开始渐渐陡峭。他们在走私者常走的林间密道上悄无声息地跑着，偶尔会遇到赶着骡子的平民，天空低沉阴云密布，终于有一天开始降雪了。三个旅行者在雪中艰难前行，怜悯着精疲力竭的马匹，他们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历经数日，小心保护自己免遭狼和豹的袭击，在大雪中又露宿了无数个夜晚后，他们总算得偿所愿地翻过了山脉。此时的道路也主要以下坡为主了，但当快接近桑坦德的时候，切萨雷和马丁所骑的两匹马倒下了。米格尔提出，让伤势还没有痊愈的切萨雷用自己这匹尚且能骑的马。但切萨雷在稍作思考后，命令米格尔就这样骑马先走，早点到达桑坦德，去准备能渡过卡斯特罗·乌尔迪亚莱斯的小船。米格尔受命后骑马离去了，在他的身后，切萨雷与马丁也再次出发，只是这次是徒步前

进。

又过了一段时日，大海的气息包裹住了他们，紧接着，灰色的海面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冬日的寒风扬起白色的浪花，波浪碰撞出海水的泡沫，大西洋在他们的面前延展开来。潮湿的海风吹打着切萨雷的脸颊，他全身沐浴在海风中，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当切萨雷正欲将欢喜的目光投向站在他身后的马丁时，他感到了剧烈的头痛，虽然想要忍耐住这让他精神恍惚的疼痛，然而他所能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依靠在身旁的树木上。

切萨雷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他正被马丁的手臂搀扶着。有一种恐惧在他的心中不断扩张："不会是患上了梅毒吧？"对于这种恐怖的病症他知之甚详，病人发病后会逐渐变成废人，两三年后就会死去。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即便自己很早以前确实患上过梅毒，也并没有完全根治，但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复发。况且三年前自己还得了严重的疟疾，梅毒应该已经消失了才对。但是，随后他又想起了，被囚禁在莫塔城堡的时候，曾爆发过两次严重的头痛。那么，曾经患有的梅毒，现在又再次复发了吗？但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完全看不出症状的。对于这个首次袭来的恐惧念头，切萨雷从内心坚定地否决了这种可能，头痛若不是因为疟疾，就一定是脱逃时的跌伤所致，他深信只可能是这二者之一导致了头痛。

另一方面，米格尔总算想方设法地成功雇到了小船，要知道在这样的坏天气里，船夫们是十分不愿出海的。只是，由于为此事花费了重金，引起了一名船夫的怀疑，将此事报给了城镇的守备部队。很快，守备队的武装兵便赶到了城镇。眼看逃亡的成功近在咫尺，为了提前庆祝，他们三人决定在城镇的餐馆饱餐一顿，守备队闯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和三只烧全鸡与大份烤肉搏斗，却不得不停下来接受守备队队长的盘问。大概因为逃亡的切萨雷被悬赏了1万达克特赏金，还是死生皆可，盘问持续了很久。不过，最终队长认可了他们的说辞，相信他们三

人是买卖小麦粉的商人了。守备队撤走了，但是料理店的主人和雇工们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记得这三个人，特别是其中一个，身材瘦高，披着黑色长斗篷，绝不摘下斗篷的头巾，以此来刻意隐藏面容的男子。他的左手，偶尔会从斗篷下露出来，好像受伤了似的用绷带捆绑着，并且总是奇怪地一言不发。只是有一点，这个男人的言谈举止有着超乎常人的气度，而另两个人则看上去像是家臣一般。当守备队长再次询问时，他们如是说道。

不过那时的切萨雷与两名领路人早已乘船出海。大海一片荒芜，像是随时都会掀起狂风暴雨，为了安全，船只只敢在能远远望着陆地的海域行驶。此时头已不再疼痛，并且成功逃离了守备队监视的切萨雷，就连掺着冰冷海水的海风，也甘之如饴。

他们三人在卡斯特罗·乌尔迪亚莱斯上岸，用尽各种办法也没能搞到马匹，最后在城镇近郊的圣基亚拉修道院换来了三头骡子。三人只得骑着骡子上路，这段旅程对于眼看纳瓦拉领地就近在眼前的切萨雷来说，缓慢得无法忍受。当走过巴斯克地区，踏上连接都城潘普洛纳的道路时，就已正式踏上了纳瓦拉的国土——逃亡终于成功了。

1506年12月3日，国王在潘普洛纳的宫殿中，非常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靠的妹夫，一个精疲力竭、变得像恶鬼一般的切萨雷站在他面前。两年的囚徒生活，再加上一个多月的艰险逃亡之旅，让曾经被誉为“本世纪最俊美武将”的切萨雷·波吉亚已英俊不再。脸颊消瘦干瘪，被任其随意生长的胡须包裹，脸色枯槁发青，只有炯炯发光的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国王对他的到来给予了热情迎接，嘱咐切萨雷要优先休养，他坦率地听从了建议，这之后的一整天里，都深陷在安稳的沉睡中。

第五章

纳瓦拉王国靠近法兰西和西班牙国境的比利牛斯山脉，被北面的比利牛斯山脉和南面的埃布罗河夹在中间，就像是个被挤出来的王国，切萨雷宣告自由的书信正从这个国家的都城潘普洛纳发出。

“在经历了众多苦难后，主已将我从囚禁中解放出来，他赐予我自由，给予我决心。我的秘书费德里科在代我递交这封书信的同时，将为各位传达更多详细信息。我于12月3日到达潘普洛纳，现在我身在此处，与纳瓦拉王国高洁的国王及王妃在一起。”

这封书信被送到了意大利各地，从身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伊波利托·德·埃斯特枢机主教，到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以及在罗马的众多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

费德里科12月7日从潘普洛纳出发，21天后这个消息传遍了意大利，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骚乱。卢克雷齐娅几乎欣喜若狂，而意大利尚存的那些亲波吉亚派，特别是罗马涅的民众们，直到现在仍口耳相传着切萨雷定会回归意大利。最为震惊的还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厅与威尼斯共和国由于争夺罗马涅地区而矛盾频发，民间传言没有优秀武将可用的教皇将会在对威尼斯作战时启用切萨雷，而这让教皇勃然大怒，等切萨雷的秘书费德里科一到罗马，教皇立刻下令将他抓捕。而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对切萨雷的这个自由宣言则毫无回应。

但是，任何战争都需要金钱，然而，现在的切萨雷却并不富有，所以他不能由自己发起战争。不过，世界上总是会有挑起战争的人，愿意

为此出钱的人也是哪个时代都不会少。切萨雷拥有军事才能，又处在年仅31岁的壮年，对一个男人来说，想要东山再起并不算晚。他感到自己眼前的世界再次变得明亮开阔，学生时代曾是自己绰号的城镇潘普洛纳——他在这个美丽的城镇充分地享受着春天。一边从容不迫地休养身体，一边尽可能多地参与室外活动，头痛也像是彻底将他遗忘了一般，再没有来困扰过他。虽然偶尔会被前所未有的疲惫感侵袭，但他纤细干瘪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长肉，在沐浴了西班牙强烈的阳光后，苍白的脸色也恢复成了往日紧致的古铜色。骑马兜风的切萨雷，脸上重新出现了曾经的年轻笑容。

让切萨雷再次奔赴战场的时刻来临了。当时的纳瓦拉王国正处于十分微妙的立场，这个小王国的命运，因关系越发险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国王而动荡不安。在被安排与西班牙公主结婚的儿子菲利普死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明确地选择了反西班牙立场。在皇帝与西班牙国王之间，围绕着欧洲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现在已经完全摆上了台面，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也与皇帝联手，站在了反西班牙的立场上。而与法兰西国王关系走得很近的纳瓦拉国王，自然也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敌视，由于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西班牙与法兰西开战，自己必将首当其冲，对纳瓦拉来说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决心要粉碎纳瓦拉王国的西班牙国王，此番下令由博蒙特伯爵率领前军。根据当时的记录，博蒙特虽然个子很矮，但他大胆勇猛的英姿在西班牙却是屈指可数。两年前，博蒙特伯爵以比亚纳的要塞为据点，与纳瓦拉国王手下的军队已摩擦冲突不断。比亚纳城镇位于埃布罗河北部，与坎塔布连山脉相连接，不过这片土地有卡斯蒂利亚地区做后盾，战争所必需的武器、马匹以及士兵和粮食均唾手可得，作为对纳瓦拉的前线基地，守卫可以说是相当坚固。纳瓦拉国王决定对比亚纳发起攻击，切萨雷领取了这项任命，与国王一同参加了比亚纳的攻击战。在比亚纳的要塞前布阵的纳瓦拉军队，有五千步兵、一千骑兵、两百枪骑兵、一百三十名炮兵和弓箭手，总数六千三百三十人。切萨雷负责指挥

的是由两百枪骑兵和五百骑兵组成的前卫部队，其他士兵所组成的主力军队则由国王亲自指挥。

1507年3月11日夜，激烈的暴风雨来袭，从三个方向围攻要塞的攻城军均遭到了打击，营帐被大风吹飞，火把燃起的火光飘零于夜空，惊惧的马匹齐鸣，扯断了缰绳，疯狂地四散奔逃。仓皇的士兵来回奔走，有人想要制服逃窜的马匹，有人想要收捡被踢散的武器。闪电将天空劈裂开来，将这混乱的一切，连同背后屹立着的要塞，照得犹如白昼一般闪亮。

接连十天的攻防战，已让坐困城中的军队受到了惨痛的打击，城堡守官博蒙特伯爵察觉到这次暴风雨将会是一次绝好的反击机会。要塞的大门被从内侧打开了，随即，手持武器的两千名骑兵一涌而出，随后还跟着几乎相同数量的步兵，伯爵自己则在城墙的上方布阵，指示着炮击。被突然的暴风雨袭击，又受到敌兵的来袭，纳瓦拉军的士兵连重整旗鼓的时间都没有，全军全线崩溃。

一直忙于重整队伍的切萨雷，此时身披盔甲手执权杖，突然发现己方士兵正朝着自己大批溃败奔逃而来，敌军则紧随其后追杀不休。下一个瞬间，众人听到了立于原地的切萨雷发出了激烈的声音：

“牵马过来！”

被牵过来的乌黑骏马桀骜不驯，切萨雷像挑战一般跳上了马，但即使主人已骑在它的背上，黑马依旧躁动不安，两三次地将前蹄扬到空中，在马背上的切萨雷一面抓着缰绳一面俯视着侍从吩咐道：

“我会在此拦截敌军，你快去国王那里，告诉他，队伍整编好了就立刻带来会合。”

他扔掉了权杖，但就在此时，已经被遗忘了的剧烈头痛竟然再次袭

来，切萨雷紧抓着马鞍，想要忍过这让他快要失去意识的疼痛。敌我双方的叫喊声犹如轰鸣的波涛，忽远忽近地包围着马背上的他，听着这些声音，他拔出了剑，下一刻，他踢向马腹催其奔跑。

任黑马狂奔的切萨雷，不知踢散了多少敌军或是友军，直冲进了敌方阵营的正中央，只有十二名骑兵跟在他身后。尽管如此敌军还是被他撕开了一个口子，似是一瞬之间，切萨雷就砍倒了一名骑兵和两名步兵，之后是两名骑兵，接着又是两名骑兵。切萨雷穿着黑色盔甲骑着黑马的狂暴身姿，在闪电的光照下，瞬息闪现复又瞬间消失。

但敌军很快重整了队伍，近两百名骑兵和步兵包围着切萨雷，但四周却完全看不到同伴的身影，他一个人被留在了敌军的海洋。

在城墙上的博蒙特伯爵，注意到了下方原野中的战斗，那名身穿黑色盔甲的骑士奋力厮杀，犹如一头受伤的雄狮。但他并不知道那人是谁，即使问身边的人，也没人见过这名骑士。

切萨雷被逐渐逼到了山丘之上，这里四处都是滚石，骑马非常凶险。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骑兵，但步兵们却一边远远围住他，一边缩小包围圈。射向胸膛的弓箭，一声脆响后就被铁制的护胸弹开，但紧接着长枪刺中了大腿，切萨雷虽然用剑砍断了枪，断掉的枪尖却还深深地扎在大腿上。绕到背后的敌人用枪刺中了黑马的后脚，马儿高声发出了悲鸣一般的嘶叫声，抬起了前脚，就在这时，一支箭划过天空朝他射来，下一个瞬间，切萨雷发出了令人胆寒的低吼，那支箭射中了他的右眼。马儿因再次被刺中而倒地，同时切萨雷也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盔甲碰地发出了钝响。这个声音就仿佛是暗号，包围着切萨雷的士兵们一拥而上，像蚂蚁噬象一般，杀害了切萨雷。那一刻，刀枪剑戟密集得就如同天空坠下的暴雨。

倒下的切萨雷，右手上还握着剑，左手紧拽着已经一动不动的黑马的缰绳。一名敌兵剥下了他的头盔，扎在他右眼上的箭轻响一声折断

了，头盔下面出现了一张苍白的面孔，额头上留着痛苦的印迹，右眼已血肉模糊，只有左眼大大地睁开着，眼中灰色的光芒越来越弱，最终消失了。

敌兵们对尸体本身毫不关心，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令人吃惊的华丽盔甲上。他们争相从尸体身上扒下盔甲，夺走佩剑，就连盔甲下的白色衬衫和浅灰色紧身裤也没放过。但当贴身衣物都被扒掉的时候，他们也着实被尸体身上无数的伤痕吓到了，数来竟有23处，全身的伤口还往外渗着血，将白色的、浅灰色的破碎贴身衣物染成殷红。敌兵们为收获的精致盔甲与佩剑欣喜异常，将尸体丢在原地，有说有笑地返回了要塞，他们大多都是无名于历史洪流的普通人，唯有一位留下了姓名，就是射箭的库希梅内斯·噶尔西亚·德·阿古雷多。

博蒙特伯爵发现了士兵们带回要塞的盔甲与佩剑，斥责了他们，随后亲手拿起沾满了血污泥土的物件仔细端详，盔甲胸部的位置上刻有银色的字迹，“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

大惊失色的伯爵赶忙命人将尸体搬运过来，但是士兵们还没爬上山丘，就不得不原路折返，纳瓦拉的国王和官兵已经聚集在那里了。

在山丘上，纳瓦拉国王俯视着妹夫那已不成形的遗体。昨夜，在切萨雷冲进敌阵之后，国王方得以重整队伍，但仅仅是勉强收拢队伍撤退，完全没有余力追在切萨雷之后给予支援。完成了队伍的重整撤退后，国王也曾带着官兵四处寻找着失踪了的切萨雷，但直到漫长的夜晚转为黎明之时，才发现躺倒在山丘的岩石上的切萨雷。

遗体流出的血液已经凝固，连着一个个的伤口，绘成了一片血河。国王伸出手，将还睁着的左眼轻轻合上，随后脱下身上朱红色的斗篷，覆在横躺着的遗体之上。

六名骑士默默地出列，左右各三人并列，用肩膀将覆着朱红色斗篷

的遗体抬起。国王紧随其后，无人出声，这条沉默的送葬队列，向着逐渐染上玫瑰色的东方天空，缓慢前行。

透白干净的晨光流转在队列四周，似乎在暗暗窥视着朱红色斗篷的内里。切萨雷仰面向上被骑士们抬着，苍白的脸颊和身体两侧垂下的手臂露在外面，春日里寒冷的晨风，静静地吹拂而过。

参考文献

书信、公文、其他原始资料

图书馆（Biblioteca）

ヴァティカン、ローマ、ヴェネツィア、フィレンツェ、ボローニャ、パドヴァ、ペルージア、モデナ、ヴェローリ

古文书馆（Archivio）

ヴァティカン、ボローニャ、フィレンツェ、ミラノ、ヴェネツィア、マントヴァ、ファエンツァ、イーモラ、ペルージア、シエナ、リミニ

当时的记录、年代记、历史著作

尽量选择发行年份最新的著作。

ALBERI, E., *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durante il secolo XVI*, Firenze, 1839-63.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2-54: *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Giovan Pietro Cagnola* (1023-1497); *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Giovanni Andrea Prato* (1499-1519); *Cronaca di Milano scritta da Giovan Marco Burigozzo* (1500-1544); *Degli Annali Veneti dall'anno 1457 al 1500 del Senatore Damenico Malipiero, ordinati ed abbreviati dal Senatore Francesco Longo*;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Milizia Italiana dal XIII al XVI secolo raccolti negli Archivi della Toscana e preceduti da un discorso di G. Canestrini*; *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 dal 1492 al 1503 di Francesco Matarazzo detto Maturanzio*; *Memorie perugine di Teseo Alfani dal 1502 al 1527*; d'ARCO, C., *Notizie di Isabella Estense moglie a Francesco Gonzaga, aggiuntivi molti documenti inediti che si riferiscono alla stessa Signora, all'istoria di Mantova ed a quella generale d'Italia*; *Documenta aliquot quae ad Romani Pontificis notarios et curiales pertinent*.

BERNARDI, A. (NOVACULA), *Cronache forlivesi*, Bologna, 1896.

BURCHARDI, J., *Diarium sive rerum Urbanarum commentarii ab Anno MCDLXXXIII ad Annum MDVI*, Paris, 1833-85.

CONTI di FOLLIGNO, S. dei, *Le storie dei suoi tempi dal 1475 al 1510*, Roma, 1883.

CORIO, B., *Hoistoria di Milano*, Venezia, 1554.

D'AUTON, J., *Chroniques de Louis XII*, Paris, 1889.

GIOVIO, P., *Illustrium virorum vitae*, Firenze, 1551.

GIUSTINIAN, A., *Dispacci*, Firenze, 1886.

GUICCIARDINI, F., *Storia d'Itala*, Roma, 1968.

GUICCIARDINI, L., *Storie fiorentine dal 1378 al 1509*, Bari, 1931.

INFESSURA, S., *Diario della città di Roma*（1294-1494）, Roma, 1890.

MACHIAVELLI, N., *Opere complete*, Milano, 1960-65;『マキアヴェリ』（「世界の名著」第16巻，会田雄次責任編集，「君主論」池田廉訳，「政略論」永井三明訳），東京，1966.

NOTAR, G., *Cronaca di Napoli*, Napoli, 1845.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Editio Palatina》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Milano, 1733: *Marini Sanuti Leonardi filii patricii veneti 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1421-1493）;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Veneziana scritta da Andrea Navagiero, Patrizio Veneto*.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Editio Altera》 G. Carducci & V. Fiorini, Città di Castello-Bologna, 1900-: *Il diario nomano di Gaspare Pontani*（1481-1492）; *Iacobi Volterrani Diarium Romanum ab Anno MCCCCLXXIX ad Annum MCCCCLXXIV*; *Diario de Sebastiano de Branca Tedallini*（1485-1524）; *Diario di Antonio de Vascho*（1480-1492）; PRIULI, G., *I Diarii*（1494-1512）; *Diario Ferrarese dall'anno 1409 fino al 1502 di autori incerti*; ZAMBOTTI, B., *Diario ferrarese*（1476-1504）.

SANUDO, M., *I Diarii*（1496-1533）, Venezia, 1879-1903.

后代历史学家的著作

ADEMOLLO, A., *Alessandro VI, Giulio II e Leone X nel carnevale di Roma. 1499-1520*, Firenze, 1886; *Lucrezia Borgia e la verità*, 《Archivio Storico Provinciale di Roma》, Roma, 1887.

ALVISI, E., *Cesare Borgia, duca di Romagna. Notizie e documenti*, Imola, 1878.

BELLONCI, M., *Lucrezia Borgia*, Milano, 1931.

BELTRAMI, L., *Leonardo e il porto di Cesenatico*, Milano, 1903.

BENOIST, C., *César Borgia, l'original du Prince*, 《Revue des Deax Mondes》 XXXVI (1906); *Le Machiavelisme avant Machiavel*, Paris, 1907.

BERNALDEZ, A.,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na Isabel*, Madrid, 1878.

BONARDI, A., *Venezia e Cesare Borgia*, 《Atti della Regia Deputazione Veneta di Storia Patria》, Venezia, 1909-10.

BRION, M., *Le Pape et le Prince*, Paris, 1953.

BURCKHARDT, J., 『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柴田治三郎訳), 東京, 1966.

CARACCIOLO, A., *Un ratto di Cesare Borgia*, Napoli, 1921.

CERRI, D., *Borgia, ossia Alessandro VI Papa e i suoi contemporanei*, Torino, 1873.

CHERRIER, C., *Historie de Charles VIII*, Paris, 1868.

CINELLI, C., *Pandolfo Colle nuccio e Pesaro ai suoi tempi*, Pesaro, 1880.

CIPOLLA, C., *Storia delle Signorie Italiane dal 1313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 *Società e costume.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5.

CROCE, B., *La Spagna nella vita italiana durante la Rinascenza*, Bari, 1922.

DELL'ORO, I., *Il segreto dei Borgia*, Milano, 1938.

DE ROO, P., *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 Bruges, 1924.

DUPRE'-THESEIDER, E., *Niccolò Machiavelli diplomatico. L'arte della diplo mazia nel '400*, Como, 1945.

ERCOLE, F., *Da Carlo VIII a Carlo V. La crisi della libertà italiana*, Firenze, 1932.

FELICIANGELI, B., *Il matrimonio di Lucrezia Borgia con Giovanni Sforza signore di Pesaro*, Torino, 1901.

FERRARA, O., *Il papa Borgia*, Milano, 1953.

FUSERO, C., *Cesare Borgia*, Milano, 1958; *I Borgia*, Milano, 1966.

GALLI, R., *Imola tra la Signoria e la Chiesa*, Bologna, 1927.

GALLIER, A., *César Borgia, duc de Valentinois, et documents inédits sur son séjour en France*, Paris, 1895.

GARNET, J.L., *Caesar Borgia. 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12.

GASPERONI, G., *Saggio di studi storici sulla Romagna*, Imola, 1902.

GREGOROVIUS, F.,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m V bis zum XVI Jahrhundert*, Stuttgart, 1886-96; *Lucrezia Borgia. Secondo documenti e carteggi del tempo*, Firenze, 1874.

LAMANSKY, Vl., *Secrets d'Etat de Venise*, St. Petersbourg, 1884.

LA TORRE, F., *Del conclave di Alessandro VI PP. Borgia*, Firenze, 1933.

LEONETTI, A., *Papa Alessandro VI, secondo documenti e carteggi del tempo*, Bologna, 1880.

LETI, G., *Vita di Cesare Borgia*, Milano, 1855.

LISINI, A., *Relazioni fra Cesare Borgia e la repubblica senese*, Siena, 1900.

LUZIO, A., *Isabella d'Este e Borgia. Con nuovi documenti*, Milano, 1916.

MARINELLI, L., *Caterina Sforza alla difesa dei suoi domini nella Romagna*, 《S.P.R.》 IV, 21 & 22, Bologna, 1932.

MEDIN, A., *Il Duca Valentino nella ment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Rivista Europea》, Firenze, 1885.

MENOTTI, M., *I Borgia. Documenti inediti sulla famiglia e la corte di Alessandro VI*, Roma, 1917.

OLLIVIER, M., *Le pape Alexandre VI et les Borgia*, Paris, 1870.

ONIEVA, A., *César Borgia*, Madrid, 1945.

PASOLINI, P.D., *Caterina Sforza*, Roma, 1893; *Nuovi documenti su Caterina Sforza*, Bologna, 1897.

PASTOR, L. von, *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Freiburg i. Br., 1901-30.

PEPE, G., *La politica dei Borgia*, Napoli, 1945.

PIERI, P., *Intorno alla polittica estera di Venezia al principio del '500*, Napoli, 1934; *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 Torino, 1952.

PORTIGLIOTTI, G., *Rinascimento. Porpora, pugnali, etère*, Milano, 1924; *I Borgia*, Milano, 1907.

RICOTTI, E., *Storia delle compagnie di ventura in Italia*, Torino, 1847.

RIDOLFI, R., *Vit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Firenze, 1954.

RODRIGUEZ VILLA, A., *Crónica del Gran Capitano*, Madrid, 1908.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852.

SABATINI, R., *The Life of Cesare Borgia*, London, 1912.

SACERDOTE, G., *Cesare Borgia*, Milano, 1950.

SISMONDI, S. de, *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Paris, 1809-18.

SOLMI, E., *Leonardo*, Firenze, 1923.

SORANZO, G., *Studi intorno a papa Alessandro VI Borgia*, Milano, 1951.

TOMASI, T., *Vita del duca Valentino*, Montechiaro, 1655.

TRUC, G., *Rome et les Borgia*, Paris, 1929.

VILLARI, P., *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 Milano, 1927; *La storia di Gerolamo Savonarola e dei suoi tempi*, Firenze, 1926.

WOODWARD, W.H., *Cesare Borgia*, London, 1913.

YRIARTE, C., *César Borgia*, Paris, 1889; *Autour des Borgia*, Paris, 1891.

插图来源一览

图片3　切萨雷·波吉亚的侧脸，保罗·乔维奥著作《伟人传》（1575年）中的插图，©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à Culturali)

图片4　切萨雷·波吉亚的肖像，阿尔托贝洛·梅隆内绘，阿卡德米亚·卡拉拉美术馆（贝尔加莫/ 意大利）©Scala，Firenze。

因诺琴佐·达·伊莫拉，博尔盖塞美术©Archivio Fotografico Soprintendenza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di Roma

因诺琴佐·达·伊莫拉，博尔盖塞美术馆（罗马）©Archivio Fotografico Soprintendenza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di Roma

基督的复活与做弥撒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平托里乔绘，梵蒂冈美术馆©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图片5 圣卡塔丽娜的提议，平托里乔绘，梵©Archivi Alinari, Firenze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圣卡塔丽娜的提议，平托里乔绘，梵蒂冈美术馆©Archivi Alinari, Firenze

乌菲兹美术馆，乔瓦娜收藏（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作者不详，温莎城堡王室收藏品（英国）©2001, Her Majes ty Queen Elizabeth II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洛伦佐·克雷蒂绘，弗利市美术馆（弗利/意大利）©Foto Liverani di Liverani Monica, Forlì

罗马七大教会，安托万·拉弗雷利，罗马出版资料馆（Gabi netto delle Stampe di Roma）©Istituto Nazionale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拉斐尔·桑西绘，乌菲兹美术馆©Scala，Firenze

赛迪·第·提托绘，维奇奥宫（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自画像，皇家图书馆（都灵/意大利）©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温莎城堡王室收藏品（英国）©2001,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博尔塞纳的弥撒，拉斐尔·桑西绘，梵蒂冈美术馆©Ar chivi Alinari, Firenze

文艺复兴的故事
06

盐野七生

神的代理人

【日】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致读者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返回总目录

致读者[1]

当年我在意大利，很享受生活，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后来邂逅了一个人，在他的劝说下，我写了第一部作品——《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学习和写作花去了我从29岁到30岁这段时光。记得这部作品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刊载之后，大约在第二年结集成书面世。

其后我便立即开始写作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这本书未经杂志刊载，一气呵成直接出了单行本。但书在书店上架时我已过了32岁。

此后的第二年，我早早开始动笔写作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本书与《女人们》一书一样，先在杂志刊载后再发行单行本，其时我已年过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完成于我30岁前后的这段岁月。

作为作者，我久违地重读了这些作品。读后的感想，一言以蔽之，是微微的苦笑。其原因是这三部作品都明显带有“习作”的特征，紧张而僵硬，不时出现咄咄逼人的写法。不过，任何现象都是由正反两面构成的。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正面的东西。原因是，说这些作品在当时使我得以一吐胸中块垒也未尝不可。

我从来就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好孩子”。过了青春期进入青年时代以后，我对充斥当时日本社会的不温不火的气氛愈发感到厌恶。我想大家相处得不错，为什么还要满嘴谎言呢？所以我十分讨厌当时那些日本精英，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社会已经进步。我的这种想法，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历史的“对决”中喷发了出来。

总之，尽管我描写的对象从女性、年轻人到成熟男人不断变化，但

我一心想把“做好孩子就无法生存”、“古代欧洲生活着如此强悍的人”之类的想法灌输给日本人，仿佛自己也是即将喷发的岩浆。

我做姑娘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书名忘记了，安德烈·纪德[2]在这本书中写道：

人们在山脚下就能望见托尔斯泰这座山。不过，登上这座山后，人们又会望见对面耸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座高山。[3]

《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望见的山，人物的活动舞台也集中在我当时居住的罗马和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情景我闭着眼睛也了然于胸，我选择把这里作为舞台。

当我登上这些山峰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前面高耸着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海都物语》和《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这两本书就是我登上这两座山峰的成果。这时，古罗马又像是遥远而延绵不绝的山脉一样进入我的视野。我花了15年时间踏遍了这些山脉。之后我却发现，还有夹在文艺复兴和古代之间的中世纪未曾涉足。于是，我又去攀登三座体现千年中世纪历史的高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千年故事，主角是海盗与海军。这部作品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因为罗马治下的和平崩溃以后，地中海成为北非袭来的海盗与建立海军奋起抵抗的南欧之间激烈冲突的舞台。

第二座山，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激烈冲突的故事。不过，这是从北欧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和奋起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

第三座山，是现在准备写的作品，名称尚未确定，因而我在这里还

写不出来。我想，这三部和已成书的《海都物语》，一共有四部作品。我借此可以登上漫长中世纪主要地方的巅峰了。

似这样，我的作家生涯从“习作三部曲”起步，靠着攀登眼前的一座座山峰走了过来。说起来，这“三部曲”就是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的确，早期习作有其缺点，但我没有去纠正，我认为保留年轻时的气势是件好事。年轻的不成熟自有它的长处。

我相信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拒绝了唯一一次要我写作“世界史一册通”、“西方历史早知道”之类书籍的约稿。因为我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人世间，靠草草的归纳不可能逼近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简单地归纳历史，会对不住孜孜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

因此，我连细节都写得十分扎实，写成了一本厚书。我总觉得对不住买书读书的读者。不过请相信，真理就是：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我的这种风格恐怕至死难改了，真是抱歉！

再说几句。

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或是一切思想，越是从中心向边缘展开，其纯度就会越高。日本是基督教世界里的边缘，因而日本的基督教纯粹而认真，颇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基督教信徒中多有优秀人物。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普通日本人对自己心目中的基督教徒，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他一神教的教徒，都心怀尊敬之情，感觉他们与自己不同，信仰认真，人品优秀。

然而，我来到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他们创造了文艺复兴却没有改革宗教，对宗教有点不认真。也正因为如此，不能不说他们具有直视人性现实的卓越能力。

我写这本《神的代理人》，是想告诉那些一直憧憬基督教的认真的日本人，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以为，我有足够的对信仰的尊重之心，而且尊重与直视现实之间并不矛盾。

还记得奥逊·威尔斯[4]在电影《第三人》中的一句台词吗？

“在和平的瑞士只诞生了鸽子和钟表，但在同一时代出了猥琐而凶悍的波吉亚之流的意大利，却诞生了了不起的文艺复兴！”

这本《神的代理人》描写了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四位罗马教皇。希望你读了这本书后能够明白这一点：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人的，而宗教改革是德意志人的。

话虽如此，我在二三十岁时，似乎也只是情绪高涨而已，按当时一位批评家的说法，我也就是“只有知道的人知道”罢了。

岁月无情。从那时起，时光流逝，到今年的生日，我将进入后老年时期。我现在感到，作品中情绪的勃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如今，我的情绪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爆发式地喷射，而会渐渐地喷发。这种喷发可以宣示我的存在，却已对人畜无害，就像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5]一样。不过，我对伪善依然保持着逆反之心。

盐野七生

写于2012年春

---

[1]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译者在翻译时对很多人物、地点等做了页下注释说明，后文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编者注

[2] 安德烈·纪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帕吕德》《背德者》《伪币制造者》，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

[3] 大意如此的这段话出自纪德1908年所写《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演员，作品曾获奥斯卡及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多个奖项。代表作品有《公民凯恩》《奥赛罗》《福斯塔夫》等。《第三人》（The Third M）是由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导演、威尔斯等主演的一部惊悚电影。

[5] 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喷发活动活跃。它的高度在海拔3200米以上，是欧洲海拔最高的活火山。

耶稣对门徒西门说：

“你是彼得（磐石）[1]，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恶魔）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就这样，曾经的一介渔夫彼得在使徒中的主要地位得以确立，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服从耶稣基督即上帝指定的在地上的代理人彼得。相传彼得于公元67年在皇帝尼禄[2]位于罗马梵蒂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的竞技场殉教。遵照耶稣“建造在这磐石上”的语录，人们在彼得的遗体上建起了圣彼得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

从那以后，作为第一任教皇彼得继承者的历代教皇就一直把三重冠[3]和天国钥匙的组合图案作为纹章，手上戴着渔夫戒指发号施令，并用同一只手为人赐福。直到今天，教皇进入教堂的时候，唱诗班都要唱“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似乎这已成为教皇的主题歌。

---

[1] 耶稣为西门起名彼得。彼得在希腊文中作Petrus，与petra（岩石）发音相近。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天主教会认为他是第一任教皇。

[2]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以及爱好艺术的一面。

[3] 教皇的皇冠，镶有宝石和珍珠，上下三重叠立，形似蜂房，后部有两条用银丝织成的垂

片，顶部有小十字架。

0
100km
N
萨伏依公国
都灵
米兰
伦巴第
威尼斯共和国
蒙费拉托侯国
米兰公国
帕多瓦
曼托瓦
威尼斯
热那亚
费拉拉公国
热那亚共和国
博洛尼亚
费拉拉
罗马涅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共和国
托斯卡纳
乌尔比诺
锡耶纳
马尔凯
锡耶纳共和国
翁布里亚
科西嘉
亚得里亚海
教皇国
罗马
撒丁
坎帕尼亚
那波利
那波利王国
普里亚
第勒尼安海
奥特朗托
卡拉布里亚
巴勒莫
墨西拿
西西里
叙拉古

图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图2：庇护二世（平图里乔画）

序曲

过度的禁欲往往会成为狂热信仰的温床，原因是肉体虽会因为禁欲生活而消瘦衰弱，但想象力却会活跃起来。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东西皆为正义，会在现实中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尽皆视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看中了自己，自己必得实现上帝的意图。他们在心里燃烧着这样的使命感。

中世纪的欧洲人发起了十字军运动。当时最严厉地告发天主教会堕落的两个人燃起了欧洲人的狂热之火。这两个人出自法兰西的克吕尼修道院[1]，这里以戒律严格而闻名。

事情发生在11世纪结束的前几年。一个自称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名叫隐者彼得[2]的修士造访了身在罗马的教皇乌尔班二世[3]。彼得哀叹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力陈欧洲的基督教徒应该立即奋起夺回圣地。他的雄辩立即感染了教皇。乌尔班二世以前就对前任格列高利七世[4]向异教徒发起圣战的思想有着共鸣。他自己是法兰西诞生的第一位教皇，功名欲使他圣战的热情更加高涨。教皇与彼得两人都出身于克吕尼修道院，尽管地位悬殊，但竭尽全力派遣军队夺回圣地的想法却完全一致。乌尔班二世称赞彼得是预言者的再现，承诺在下一次宗教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并且准许他在欧洲各地布教，向众人宣传这个计划。

得到教皇的全面支持后，彼得立即奔赴意大利和法兰西，在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他坚信不疑这是上帝的启示，说话语气激昂。他瘦骨嶙峋，只用一件破衣遮体，骑着一头驴子，帽子也没有，赤裸着双脚，虔诚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布教。不论是对国王还是对贫民，他说教的态度都同样坚定，摄人心魄。

“忏悔吧！拿起武器吧！”

听他说教的人无不被他这呼喊声所感动。这种感动渐渐汇成狂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形成了一种基础。人们甚至迫不及待地期盼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拿出方案，发出宣言。

1095年11月27日，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召开了宗教会议。来自各地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城市，据说仅高级神职人员就超过400人，显示了彼得宣传工作的非凡成果。城里的教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教皇的演说于是改在露天广场进行。教皇开始了他的演说。

> 这是上帝所愿（Dio lo vuole）！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你们胜利的欢呼！这是对基督战士信仰和勇气的鼓舞！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你们的象征，你们要在胸前和臂膀上佩戴鲜红的血色十字章，证明你们已经对它发过神圣的起誓！

人们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狂热的群众狂呼不已：

“上帝所愿！”

“上帝所愿！”

出发定于第二年的8月15日，这一天是圣母升天的祭日[5]。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光荣的任务，在出发前回到自己的故乡，召集尽量多的同志。

从这一天起，十字军的狂热搅动整个欧洲近两百年之久。说这一切源自两个克吕尼修道院的法兰西人的狂热信仰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确，他们发挥了点火者的作用，但这一点就着的烈火，却是在漫长的中世纪中逐渐积蓄起来的。

历数善良的人们所犯的种种罪孽，然后把他们打入恐怖的地狱，这可是基督教会最拿手的伎俩。一边挑起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一边又不停地使他们眼前浮现出可以升入天堂的幻境，这样的做法效果更好。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是如何以严格的戒律来束缚人的呢？神职人员辩解说，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已经颓废，但仅凭这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一个人哪怕本质是好的，但如果说不改变即是罪孽，这个人也得担罪。何况告发者又出自修道院。如果所有的罪名和赎罪办法形成的戒律均出自一人之手，那多少还能编织得符合逻辑一点。可戒律是在几个世纪中由很多人鼓捣出来的，已经变成了凭常识无法想象的怪物。

比如，在修士搞的这种“刑法”中，以私通和奸淫为由的冒渎神圣、杀人等罪孽用40天至7年的苦行就能赎清。但在歇斯底里的教会戒律中凡事皆罪，即便并未杀人，如果历数一般人所犯之罪，他也得苦行300年，一辈子也赎不清。如此一来，人们甚至连死都不能放心，活着的时候就得在地狱的噩梦中饱受折磨。

这让人真的很为难，于是教会同意代偿。只要向教会缴纳了相当于苦行的代偿金，教会便可认定相应的赎罪。不动产也可以用于代偿。教会利用信徒的恐惧确保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取之不尽。

然而，无钱又无土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神职人员又似乎很懂得“民法”。

“用自己的钱包支付不起，便要用自己的肉体支付。”

这使得鞭笞的苦行正当化。著名的圣多明我[6]以其出色的配合与忍耐，6天之内接受了30万次鞭笞，赎清了一个世纪的罪孽。很快，希望接受鞭刑的人变得大有人在。

进入11世纪以后，乌尔班二世以前的各任教皇已经恩准，凡是从军

参加对异教徒圣战的人也可赎罪。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也宣布，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孽均可得到特赦。这意味着，如果能杀死异教徒，便可获赦一切罪孽。就连那些善良的人对此也都毫无异议，他们既无足够的金钱和土地做代偿，身体受鞭笞又觉痛苦，对去天堂亦感绝望。更何况那还是上帝所愿呢！向圣地进军的许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的所有罪孽尽皆得以赦免，他们的心中升腾起与异教徒决战的勇气。

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几个发起十字军的原因。但所有原因中，上面所说的原因最令我们后世难以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夺取战略上和商业上都毫无价值的巴勒斯坦。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狂热，不考虑那狂热是如何孵化出来的，人们就无法理解十字军。他们根本没有从前面进军的人们肉体毁灭的失败中得到教训，而重复着同样的失败。尽管如此，他们既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对十字军东征产生怀疑，像恶魔附体的猪群一般，从前面猪群坠落的悬崖上一个接一个倒栽葱地跳下去。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有超过200万的欧洲人这样前赴后继，东罗马帝国的一项记录中这样写道："这简直就像整个欧洲在倾巢出动。"

席卷整个欧洲的十字军狂潮在第八次东征以后渐渐平息。后世的人们把自那时起往后250年的岁月称为"文艺复兴时代"。

一

罗马，1458年，夏季。

这天深夜，教皇宫殿中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集合前来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枢机主教[7]们休息用的18顶帐篷连成一片，刚才一直

不断的说话声也已沉寂了。只有那立在大厅一隅的烛台把淡淡的光亮投向这片帐篷。

这份静谧再次让一直沉湎于书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8]枢机主教想起夜已阑珊。他站起身来打算去熄灯。这时，他听到自己的帐篷外面悄然响过一阵衣服摩擦的窸窣声。罗德里格急忙从帐篷的间隙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黑影快步远去。从那颇具特征的走路姿势来看，黑影显然是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罗德里格知道，黑影钻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帐篷。

“看来法兰西派的作战会议还没有结束啊。”

熄了灯躺在被窝里的罗德里格嘴里无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在黑暗中圆睁着双眼，第一次感到自己现在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这次教皇选举了。

前任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9]于两周前的8月6日去世。此后，似乎只有罗德里格一个人远离选举后任教皇的谋划旋涡。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卡利克斯特教皇是罗德里格的伯父和最大的保护伞。他的死对刚满27岁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仅在两年之前，罗德里格还在博洛尼亚享受学生生活的时候被招来罗马，被伯父任命成为枢机主教。紧接其后，他被任命为教廷枢密院副院长（vice cancelleria），这更使罗德里格在枢机主教中名列榜首，在罗马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皇。然而，在枢机主教中罗德里格最为年轻，并不具备适合这个地位的足够实力。在教皇选举会议上，他也几乎没有发言。以前，前教皇派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也鲜有发生。通常，所谓选举新教皇，也就是前教皇的反对派策划从自己一派中选出新教皇，旧势力卷土重来。

但是，从16日开始，教皇选举会议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白热化态势，人们不能再对超然的罗德里格漠然视之了。第四次投票已经结束，却没有一个枢机主教能够得到12票这个当选教皇所必需的2/3的票数。得票最高的人也没有超过5票。教皇选举会议的惯例是在选出新教皇以前，

枢机主教不允许与外界交流。因此，18位枢机主教已经连续三天被隔离在教廷宫殿的一隅。在这里，大厅的一部分被用作会场，在另一部分支起帐篷，用于吃饭睡觉。

当然，在形势混沌的教皇选举会议中，也会有比其他候选人略为有利的枢机主教。他们是鲁昂的枢机主教纪尧姆·德斯图特威尔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10]。经过几轮投票，票数逐轮集中于这二人。可以预料，他们中的一人必定会当选为新教皇。推举鲁昂枢机主教的法兰西派和推举锡耶纳枢机主教的意大利派都在竭力活动，力争把尚未确定选谁的枢机主教拉入己方阵营，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罗德里格的耳畔也有很多神秘兮兮的耳语声。

“鲁昂的枢机主教是法兰西皇室出身。要是他当上教皇，获得法国国王的强大支持就有了保障，教廷的工作一定顺利，教会的权威也会提高。”

“如果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那无异于把罗马教会出卖给异教徒。那个自称是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家伙，一定会把自己的同伙塞满圣彼得的殿堂。”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20个月前才刚刚当上枢机主教。千万不要忘记，以前他是德意志皇帝的宰相。那是个偏好德意志的家伙，谁又能断言他不会把教廷迁往德意志。”

“让那个乡下贵族出身的穷人当教皇简直就是疯了！况且，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还有痛风病，看那身体，莫不是想让我们护理病人吧？”

法兰西派把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作为选举参谋，但西班牙人罗德里格并没有只听他们的一面宣传。意大利派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威尼斯的枢机主教带领下四处活动。只是意大利派对法兰西派只是攻其一点：

“千万不要忘记‘阿维尼翁之囚’[11]啊！”

教皇受制于法兰西的屈辱时代过去尚未满百年，除法兰西人以外的教会人士仍对此记忆犹新。最近，法兰西王的言行每每背离教会，煞有介事且毫无忌惮。意大利派强调，如果在这里把法兰西人选为教皇，明摆着法兰西王对教会的压力就会剧增。他们还有如下的理由。

在三任以前的教皇尤金四世[12]时代，巴塞尔公会议[13]的纷争动摇了基督教世界，是谁收拾了残局？年轻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当初是反教皇派的先锋，但他不久后醒悟，不畏以前伙伴的高声责难，不惜德意志皇帝心腹的地位，堂堂正正地来到教皇面前，乞求饶恕自己犯下的罪孽。为了报答尤金四世以基督之德宽恕了自己，他努力为教皇派与巴塞尔公会议派的和解而奔走。从那时开始，他进入了神职界，起先担任助祭。他为基督教世界抛尽私心，除了他，还有谁配登上圣彼得的宝座？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枢机主教中也许确实比谁都穷，当枢机主教的经历也只有20个月，但是，他在担任德意志皇帝的宰相期间，积累了几乎与欧洲所有君主进行外交交涉的经验。后来在担任主教期间，他也曾做过罗马教廷的外交官。他的政治才华众所周知。他不谋私利、清正廉洁的人品也为世人所知。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是一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古典方面教养深厚，写得一手拉丁语美文，这在他诸多的著作中都能见到；他知识丰富，涵盖了整个历史和地理方面，这些都使他配得上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称呼。其他任何枢机主教能具备他那样的教养吗？

在相互争抢18票的两派之间，罗德里格的票算在法兰西派一边。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世时与法兰西关系亲密，所以侄子罗德里格也被当然地视为法兰西派。事实上，他在这三天的选举中，也是把自己的一票投给

了鲁昂枢机主教。但是，面临明天早晨的第五次投票，罗德里格的想法开始与前三天完全不同了。

西欧基督教世界将何去何从？当下的罗马教会内外交困，究竟要靠什么渡过难关呢？教会内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国力不断增强的欧洲各国不仅企图把世俗权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采取行动试图把统治扩展到神职领域。在这方面，教会对法国国王比对谁都须警惕。因为法国国王今天仍在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主权，对包括教廷领地在内的意大利表现出明显的领土野心。德意志拥有神圣罗马帝国[14]皇帝的头衔，对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皇帝虽然一时力衰，但德意志的各路诸侯却反而因此羽毛渐丰。近来各地的隐者和修士活动猖獗。他们谴责教会已经堕落，博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未经教会的正式认可，他们已被身边的民众奉为圣人。尽管他们的势力还很微弱，但罗德里格认为，这些力量与图谋统治教会的君主结合之日，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时。

然而，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造成的威胁更甚于这些内部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号称第二罗马的拜占庭帝国[15]首都君士坦丁堡5年前刚被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6]攻陷，人们仍旧记忆犹新。从那以后，土耳其势力对希腊的进攻也未曾停歇，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眼看就要陷落。今年以来，雅典、科林斯业已陷落的消息恐吓着西欧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都用恐怖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异教徒。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靠十字军？11世纪时，靠着“上帝所愿”这一句话，整个欧洲便会闻风而动，现在的一切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能指望15世纪的基督教徒身上还有那时的宗教狂热，时代变化了。

思考到这里，罗德里格忽然想起了两年前与锡耶纳枢机主教的一段对话。当时，罗德里格刚刚当上枢机主教，通过伯父卡利克斯特教皇的

引荐认识了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两人开始了亲密交往。教皇相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让他做年轻侄子的导师。西尔维乌也是卡利克斯特三世提拔起来的枢机主教。25岁的罗德里格认为，比自己年长一倍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对他十分尊敬。艾伊尼阿斯也喜爱这位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喜欢与他平等对话。有一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道：

> 基督教世界像是一具没有头脑的躯体，就像没有法律、没有首脑的共和国一样。冲着那高傲的称号或辉煌的肖像，人们也许对教皇和皇帝表现出敬意。但教皇和皇帝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并且谁也无心服从于他们。各国自有君主，每个君主都只追逐自己的利益。想把如此不统一的众多国家统一到同一面战旗之下，该需要怎样的雄辩才能做到啊？就算把他们聚到了同一个阵营里，又有谁能充当他们的统帅、维持怎样的秩序呢？又有怎样的军纪才能统领他们呢？如此庞大的军队，谁又能养得起呢？有谁能理解他们那复杂多样的语言吗？有谁能统率他们那更加不同的风俗习惯呢？又有谁能够把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热那亚人和阿拉贡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及波西米亚人融为一体呢？如果只有少数人从军参加这场圣战，他们一定会被伊斯兰教信徒消灭。相反，即使有很多人从军，他们也一定会由于自身的规模和混乱而同样被消灭。

两年后的今天，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这番话又一次回响在罗德里格的心头，两人产生了共鸣。也许这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能找到道路，解决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内外重要问题。他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才能，只有他才配坐上面临危机的罗马教会的首脑宝座。

罗德里格的心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他也不能忘记，鲁昂枢机主教曾经许诺，伯父死后为他做后盾。罗德里格必须保护因卡利克斯特教

皇而转运的波吉亚家族。不论是鲁昂的枢机主教还是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教皇，他都要避免招致新教皇的反感。他决定明天早上投票时投出一张白票，视这轮投票的结果再确定自己的态度。随后，他陷入了属于年轻人的沉睡之中。

一大早天气就很炎热。总是散在梵蒂冈背后蒙特马瑞奥山上吃草的羊群，今天也躲在了树荫下，从教皇宫的回廊看过去，宛若灰色斑点一动不动。盛夏的罗马，一切似乎都在阻止时间的脚步，只有教皇宫的一隅还有动静。枢机主教们身着大红枢机主教袍，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身穿黑色教袍的低级修士有的在收拾餐桌，有的在准备马上就要使用的会场，忙碌地穿梭往来。

通知开会了，红衣人群一齐走向会场大门。

就要进门的时候，罗德里格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碰到了一起。这位枢机主教身体消瘦，个头不高，稍稍拖着脚步，抬头对个子高出一截的罗德里格说道："还在继续学习古罗马史吗？"

"是的。我把书都带到这里来了。"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对这位年轻人把异教书籍带到这里的求知欲是表扬好还是提醒好，毕竟这里是决定基督教世界重大事项的地方。不过，转眼间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善意的微笑。两个人的对话仅此两句。

罗德里格后退了一下，让这位年长者先进。他伫立在门边，望着只能用一副穷相来形容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瘦小圆躬的背影走向自己的座席。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鲁昂的枢机主教。鲁昂主教个头与他相仿，仪表堂堂，自信满满，颇具王者风范。

这位法兰西人目光盯着罗德里格的脸，微笑着，再次用搭在他肩上的手用力按了一下。罗德里格微微低了一下头，退后一步，鲁昂枢机主教的教袍下摆飘动着，他走进了会场。

议长席位于正面祭坛的前面，各位枢机主教的座席以此为中心左右排开。从右边起，各人按年龄顺序分两边落座。年龄最大的鲁昂枢机主教碰巧和年龄第三的锡耶纳枢机主教相邻而坐。年纪最小的罗德里格坐在左边的最下边。从他的座席朝左前方看，可以看到并排坐着的两位枢机主教。

坐在议长席上的多梅尼奇[17]枢机主教向分坐两边的枢机主教们宣布开会。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摘自《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段祷告词在全体枢机主教的阿门声中结束。第五次投票旋即开始。枢机主教在选票上写下自己心仪之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正前方，面向祭坛叩首之后，把选票投入箱中。全体投票结束后，计票的修士打开票箱，把选票堆在桌上开始计票。决定基督教世界最高首脑的主教选举会议气氛紧张，连纸票摩擦声都能听到。计票完毕，议长宣布计票结果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9票，鲁昂的枢机主教6票，白票3票。”

会场上一片凝重压抑的沉默。5：5的均衡终于被打破。枢机主教们一动不动，像冻在了自己的席位上，所有人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安地四处扫动，好像要读懂彼此的脸色。

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就是坐在末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

主教。他的声音响起，似乎要撕裂这沉闷的空气。

“我把我的一票投给锡耶纳的枢机主教！”

这句话刺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胸膛。鲁昂枢机主教站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目瞪口呆。罗德里格再次重复道：“我的票投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枢机主教！”只是这次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

突然，会场骚动起来。10：6，还有两票便可决定乾坤。枢机主教们的嘴里纷纷发出语无伦次的叫喊声和低吟声。其中，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的声音盖过了众人：“议长，我要提出休会动议！”

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属于法兰西派。为了摆脱明显的劣势局面，他想先休会，为重新制定策略赢得时间。然而议长多梅尼奇驳回了他的请求，说道：“教皇选举会议的规则是一天投票两次。所以，今天之内必须再投一次票。”

这样一来，大势已定。上船要趁早，哪朝哪代都有生怕落后的人。另外两位投白票的枢机主教几乎同时喊出了声：“我也投锡耶纳枢机主教一票……”

12票！

紧张的空气为之一变。枢机主教们快步跑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席位前，纷纷道贺。新教皇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一还礼，喜悦的泪水顺着他那瘦削的脸庞扑簌簌地往下流。一直坐在邻席上的鲁昂枢机主教也跪在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面前，向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道贺。新教皇向鲁昂的枢机主教伸出了手，将他扶起。两人拥抱在一起，一位泪流满面，另一位表情僵硬、面色惨白。

新教皇不能总是和前来道贺的老伙伴们在一起，他得穿上事先备好的教皇袍，办事的修士已捧来了教皇袍。

很快，身着纯白教皇袍的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再次出现在枢机主教们的面前。议长多梅尼奇宣布，新教皇选定庇护（拉丁语为Pius，皮乌斯）二世为自己的名字。庇护二世头戴白帽，身穿白色教袍站在那里，头戴红帽、身穿红色教袍的枢机主教们跪在他的面前。希腊人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代表他们发表了贺词。新教皇欲要答谢，眼里却又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蒙圣心垂爱，我得以继承神圣使徒的职分。在此艰难时代，我当遵从圣心完成教皇大任。每想到此，我就感到会被这一重任压垮。我内心贫乏，还盼大家相助！”

罗德里格跪在众位枢机主教身后，望着一边流泪一边答谢的新教皇，心情一片爽朗。他想起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经说过的话：

> 虽说我是贵族，可我的父亲不得不在米兰公国做职员，否则就活不下去。我在青年时代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锡耶纳上大学时，我买不起所需要的书籍，总是向朋友借来，每天夜里抄写。有时抄着抄着睡着了，惊醒后发现蜡烛燃着了衣袖，惊慌失措，急忙抱起书就往外逃。先是把书放到安全的地方，再来扑灭袖子上的火。

现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已经登上了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宝座。罗德里格觉得他就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8]，觉得他在某些地方与斯福尔扎公爵相似，公爵从一介佣兵队长起家，如今成了当今意大利四强之一米兰公国的领主。斯福尔扎依仗刀剑得到了公国。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仅以自己的头脑为武器，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

在当时的意大利，单凭自己的本事走遍各地把握运气的佣兵队长比比皆是。同样，想要出卖自己头脑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接受各地宫廷和

有钱人的保护，活跃在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佣兵队长被称为“冒险家”，斯福尔扎是他们中的出人头地者。与此相似，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可谓是“人文主义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罗德里格想得入神，新教皇的一句话使他回过神来。

……忘记我吧，忘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接受我吧，接受庇护二世！

正是这个时候，一团阴云在罗德里格的心头升起。他竟然让人们忘掉那个经验丰富、对人的本性有着尖锐而深刻洞察的知识分子——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么，抛弃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之后，庇护二世究竟打算如何呢？

图3：庇护二世与两位枢机主教

然而，此时庇护二世和枢机主教们正要走出大厅，根本没有谁顾及罗德里格的不安。他们正向那扇在教皇选举会议期间紧闭的、把他们与世隔绝的大门走去。在教廷人员的一片欢呼声中，大门打开了。他们走出那扇门，朝圣彼得广场的方向渐行渐远。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为得到新教皇第一声祝福汇集而来的罗马民众。

不一会儿，欢呼声像潮水般响起，伫立在教廷宫深处一动未动的罗德里格也听到了这欢呼的巨浪声。新教皇庇护二世带着枢机主教们站在阳台上，回应着民众的欢呼。

“锡耶纳！锡耶纳！”

“万岁！锡耶纳！”

欢呼声经久不息。1458年8月19日，53岁的庇护二世迎来了辉煌的一天。

二

基督教世界迎来了庇护二世的登基，他们欢呼雀跃，寄予了很大期望。虽然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北的法兰西派冷冷清清，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19]给自己这位曾经的宰相寄来了发自内心的贺信，祝贺他的荣升。意大利人也对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教皇表示欢迎，他是著名的诗人、史家和老练的外交官。他著书立说，批判精神广为人知。他们为在前任教皇西班牙人卡利克斯特之后，本国人再度成为教皇而感到喜悦，这种喜悦的狂潮席卷了意大利全境。他们抱着巨大的期待看着这位新教皇开始自己的统治。新教皇没有使他们失望，相反比他们预料的更早地稳定了局面。这甚至让他们感到惊讶。

庇护二世没有按照惯例在登基后立即任命新的枢机主教。每位教皇都是通过激烈竞争才得以当选。没有一个教皇会指望教皇选举时的反对派在自己即位后能协助自己，因而他们即位后都会立即任命几位新的枢机主教，借以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巩固自己作为教皇开展工作的地盘。然而，庇护二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请求枢机主教们帮助他、协助

他。不论是对为他的当选创造了契机的罗德里格，还是对反对派鲁昂枢机主教，庇护二世的态度都没有变化，让这两人分别担任了要职。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庇护二世的清贫。新教皇大幅削减了教廷的日常经费。他规定，一天的伙食费为7达克特[20]。可那是一个有着250人的大家庭啊！人们开始把教廷称作“罗马修道院”。

在民众的赞扬声中，多少有些失望的也许是那些人文主义者了。他们自认为庇护二世是自己的同伴，满心期待他的即位会给自己带来黄金时代，就像尼古拉斯五世[21]那样的时代。那时，保护文艺的风潮盛行，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22]的赠礼是罗马教会授意的伪作，而他却也得到了尼古拉斯五世的保护。然而，这位新教皇冷冷地拒绝了他们希望得到援助的愿望。非但如此，他竟然还说什么“要用基督教的教理修正哲学思想，要让哲学的批判和疑问在教会的权威面前沉默”！

尽管这样做让合理主义者大失所望，但却让谴责教皇堕落、要求改革教会的笃信者大为满足。当他们得知庇护二世十分崇敬14世纪著名狂热宗教者锡耶纳的卡特丽娜[23]和27年前被处以火刑的贞德[24]后欣喜若狂。这两位女性虽然没有被教会认可，但在民众中间却被称为圣女，广受信仰。

庇护二世终日勤于政务，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不但备受痛风和胆结石这些老毛病的折磨，还被时时袭来的咳嗽弄得痛苦不堪，然而他没有停止工作。大家看着他的身影心痛不已。

10月10日，庇护即位已近两月，他召开了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让在座的枢机主教们大惊失色。

基督教世界现在面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以来的最大危

机。第一，对付异教徒土耳其的袭击迫在眉睫；第二，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中有背叛教会的动向；最后，鼓吹改革教会的人与日俱增。我已下定决心，发起十字军，一揽子解决教会所面临的这些艰难问题。

首先，我们率领军队打进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这样可以解决第一个难题。其次，让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这样可以把他们重新聚拢在教皇之下，像以前十字军时代那样恢复教会对他们的权威。这场圣战将巩固所有基督教徒的精神和物质安全，教廷将为此付出一切。教廷表现出的这种热情，就是给主张改革教会的人以响亮回答！

庇护二世接着说道：

说服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是我作为教皇的职责。我想在曼托瓦召开动员大会。我不会在罗马等待君主们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来，我要拖着带病之躯前往半道上的曼托瓦迎接他们。他们将感受到我的热忱！

首先赞成这个计划的是贝萨里翁枢机主教。接着又有两位枢机主教表示同意。其他14人则沉默不语，罗德里格·波吉亚也在其中。他和其他枢机主教不是完全不知道庇护二世在当枢机主教的时候就常把十字军计划挂在嘴上，庇护二世曾以长于洞察时事而闻名，他们根本没有想象他会把这事当真。高级神职人员出于自身的地位，过去也有很多人倡导十字军东征，然而他们十分清楚，要实施这个计划困难重重。

翌日，教皇向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君主发出了邀请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正式公文。庇护二世把出发离开罗马的日子定在了1459年1月。根据教皇的希望，鲁昂的枢机主教和罗德里格也在同行的6位枢机主教之列。

1月22日，庇护二世一行出发离开了罗马。考虑到教皇的病体，也为了给撂下国事、千里迢迢翻过阿尔卑斯山赶来曼托瓦的君主们以足够的时间，教皇一行缓缓北上。旅途中，庇护二世也在为曼托瓦会议的成功而尽力。即使在斯波莱特逗留期间，他也给自己曾任德意志皇帝宰相时交往亲密的诸侯写信，说服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他给萨克森、蒂罗尔两位公爵，勃兰登堡侯爵，以及乌兹堡、班堡、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康斯坦茨等城市的代表都写了信。

2月。教皇一行到达阿西西和佩鲁贾，一路上大受欢迎。这一天，在全体居民的欢呼声中，庇护二世一行走进了他的出生地科尔西尼亚诺城。自从少年时代离开这座小城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回到故乡。现在，庇护二世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者回到了幼时记忆中的小城。想到这里，庇护二世热泪盈眶。双亲已经故去，几乎再也没人认识他的族人了。第一个教少年庇护二世认字的老人还健在。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教皇指着小城教堂的大门对身旁的罗德里格说："我经常在那里跟农家的孩子玩抢当教皇的游戏。基本上都是我当上教皇，在大家面前模仿教皇祝福的样子。每次都被神父赶走。"

为了报答故乡的热情欢迎，教皇把这个小城指定为教区，命令翻建教堂，并改建整个城市。市民们为了纪念他的好意，也把城市的名字改为皮恩扎，意思是庇护之城。

2月底，教皇一行到达锡耶纳城。这座锡耶纳共和国的首府沸腾了起来，欢迎本国诞生的教皇。庇护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忆起当年贫困但却充满年轻活力的情景，甚至使他一时忘却了病痛。不过偶尔也有些事情让他苦笑。一天，一位老妪求见教皇，她自称是安杰拉。教皇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人是谁，后来才想起来，她竟是教皇年轻时爱恋的一位有夫之妇。教皇23岁时写的爱情故事，也是他的处女作《辛西娅》（Cinthia）便以这位安杰拉为原型。30年后的今天，面对念

叨旧情的老妪，教皇一脸困惑地说：“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祈祷吧！祈求上帝忘掉我们年轻时犯的错吧！”

教皇必须马上回到现实。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匈牙利、波西米亚的国王们和勃艮第、奥地利、勃兰登堡等诸侯国的使节已经陆续抵达锡耶纳。他们只是来向教皇转致君主们的问候，并没有一位君侯明确答复会亲自参加曼托瓦会议，但也没有人来通报不参加会议。教皇只能一边继续旅程，一边等待他们前来参加预定6月1日召开的会议。

教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了锡耶纳，在即将到达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候，受到了以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的公爵长子加列阿佐·马里阿·斯福尔扎的迎接。16岁的贵公子带着华美的骑士团前来接驾，使庇护二世阴郁的心情略为好转。

4月25日，教皇一行抵达佛罗伦萨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日日赛马，夜夜舞会。其中格外豪华的排场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出钱安排。面对隆重的欢迎，庇护二世却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另有原因。美第奇家族的当家人科西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虽然搞了如此豪华的欢迎活动，自己却称病不出，一次也没有来见教皇。

庇护二世拖着病体，靠着轿子翻过亚平宁山脉，穿过博洛尼亚、费拉拉，终于在离开罗马4个月后的5月27日到达了曼托瓦。

在城门前，教皇受到了曼托瓦侯爵的欢迎，接受了侯爵献上的城市钥匙。在走过鲜花铺就的路面时，排列在两边的民众把欢呼声和花瓣雨洒向教皇。然而，庇护二世在曼托瓦没有发现一位君主或一位全权大使。

教皇被迎进侯爵的宫殿，他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冲天的怒气

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接见了自称几天前就来到了曼托瓦的德皇使节。但在看到使节面孔的那一瞬间，更大的愤怒使他僵直。凭自己多年给德皇当宰相的经验，他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位使节在德意志政府里有多么卑微。使节递交了德皇的信函，信里说，由于国事繁忙他根本无法出席曼托瓦会议。

“岂有此理！”庇护二世怒火中烧。很快，他向所有君主发出了第二封会议邀请函。“请务必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出席。如果实在不便出席，至少请派遣拥有交涉权的全权大使前来。”

教皇把德皇的使节以及从锡耶纳跟随自己而来的各国使节统统打发回去。在事先确定的6月1日那天，庇护二世宣布曼托瓦会议开幕，主持弥撒，向上帝起誓一定要执行会议的决定。出席会议的君主只有东道主曼托瓦的君主路德维科·贡扎加侯爵一人。

两个月过去了。其他君主或全权大使连影子都未出现。庇护二世待在盛夏的曼托瓦，根本不想挪窝。“我不能就这样泄气。我抱有崇高的理想，只是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要靠别人才能干成。”

枢机主教们冷冷地望着庇护二世。教皇把自己写的亲笔信交给鲁昂枢机主教，让他前去说服法国国王。然而，枢机主教只是把教皇的亲笔信迅速呈送给了国王，背后却毫无忌惮地公开说：“这么幼稚的计划，真不像话！难道想一个人对付土耳其军队不成？”

枢机主教中积极支持庇护二世的只有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受教皇指派，他穿梭往返于曼托瓦和威尼斯、匈牙利、波西米亚之间，忙累不已，人们却对他说三道四：“他从希腊流亡过来，所以才热心于此。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受益的就是他了。”

7月28日，庇护二世向全体君主发出了第三封集合令。这篇公文的末尾写道：如不遵从教皇之命，将予以开除教籍的处分。然而，情况并无变化。大国的君主们固执己见，根本没有行动。

德意志。教皇庇护二世原来认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会赞成自己，所以对他期望最高。庇护二世做宰相时德皇十分器重他，经常感谢他，说得益于他的帮助，帝国才得以维持。德皇与葡萄牙公主的婚姻也是因为他这位宰相才得以实现。庇护二世甚至撰写了《腓特烈三世皇帝传》（*Historia rerum Frederici III Imperatoris*）。德皇与庇护二世之间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庇护二世当上教皇之后，给德皇写了亲笔信，说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世俗领袖，德皇应该率先参加圣战。然而，腓特烈三世却始终用“国事繁忙”这句话来敷衍他。德皇别有用心。他对匈牙利抱有野心，不满于教皇承认马蒂奥·科尔维诺[25]为匈牙利国王。何止不满，德皇甚至向匈牙利国王宣战了。教皇在曼托瓦接到这个消息，抑制不住愤怒的言语：“多么无耻！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入侵，还要在真心抵抗的匈牙利背后捅刀子！这哪里是查理大帝[26]继承人的所作所为啊！”

为了让腓特烈三世觉悟到自己的皇帝职责，庇护二世把自己亲自祝圣[27]过的圣物——剑和帽子送了过去，可依然没有效果。德皇我行我素，照旧只是派位卑言轻的使节前来，企图让教皇改变决心，直到秋天临近也没有派来全权大使。

法兰西。其实力堪称基督教世界的老二，国王查理七世[28]比起找借口逃避的德意志皇帝要坦率得多。他提出了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条件：撤销庇护二世已经承认那波利王国现任国王费迪南多[29]的王权，转而承认法兰西王族一员安茹家族的王权。教皇以民心在费迪南多一边为由

毫不让步，阿拉贡王族的费迪南多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现已意大利本土化。

英吉利。当时，英吉利正处于玫瑰战争[30]的高潮之中。派来的使节甚至请求教皇调停本国的内乱，遑论参加十字军。庇护二世不得不断念，不再要求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勇将狮心理查[31]的国家参加十字军。他说："法国根本没有参加的意愿，英国想参加也干不了。"

威尼斯。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国度，政治上奉行彻底的现实主义。一位佚名政府委员记录在案的发言中有一句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

土耳其的强大给威尼斯带来的现实损失大于其他任何国家。威尼斯曾经垄断了东方贸易，但因土耳其军队的来袭，他们逐渐丢失了分布在东地中海的通商基地。这让依存于贸易的威尼斯面临严重危机。

不过，威尼斯永远不会忘记算计。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在地中海东部海域黎凡特自由的经济活动。他们无法拥有领土。13世纪初，靠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们一度夺得了君士坦丁堡。但威尼斯的国民不足20万，他们知道靠这点人口很难统治拥有800万人口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因而主动放弃了那次机会。他们放弃了领土野心，而选择了保障通商的权利。土耳其帝国则在继续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并未关闭与威尼斯通商的门户。非但如此，作为通商对象，土耳其显示了优先选择威尼斯进行通商的姿态。在威尼斯看来，如果能与黎凡特的实际主人土耳其签订通商协定，就能再次立身于东西方之间，垄断贸易。他们正在试着进行交涉。威尼斯在想，交涉结果确定之后，再诉诸十字军这个最后手段也不为迟。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已经逐步统治了这个共和国。佛罗伦萨算计之高明并不在威尼斯之下。威尼斯在黎凡特的垄断体制已经开始动摇，佛罗伦萨图谋取而代之，正在接近土耳其苏丹。他们向苏丹派出使者，

通报了庇护二世的十字军构想，并让使者告诉苏丹：“威尼斯似乎很想参与，但教皇再热心，只要控制着威尼斯周边的我们和米兰公国仍与他们为敌，威尼斯就将无法行动。”

这就是欧洲大国的态度。而中小国家的君主只看大国的脸色行事。

在此期间，听说要召开曼托瓦会议，东方陆续派来了求救的使者。使者不只来自受到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拉古萨，还来自塞浦路斯、罗德岛、莱斯沃斯各岛。为了表明事实，说明形势急需紧急救援，拜占庭帝国皇帝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32]还押来了16个土耳其俘虏。这些异国风格的来访者满足了曼托瓦民众的好奇心，却使庇护二世更加痛心不已。

时间已过8月中旬，曼托瓦首次迎来了一位君主特使，勃艮第侯爵菲利普派来了使者，侯爵一直以来就对十字军表现出热情。侯爵违反了自己亲自出席的约定，派了自己的侄子来，但其带来的亲笔信却让庇护二世十分开心：“我承诺，如果其他君主也都共同行动，我将奋起参加捍卫基督教的战斗！”

年迈多病的勃艮第老侯爵的誓言再次点燃了庇护二世的希望之火。一个月后的9月17日，这位君主终于出现在庇护二世的面前。入城仪式在米兰公国主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骑士队列护卫下隆重举行，教皇身边那些消沉已久的人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奢华的兴奋了。

随着这位名望最高的武将君主的到来，意大利其他君主一齐来到了曼托瓦。蒙费拉托侯爵、那波利王子、费拉拉公爵，佛罗伦萨、卢卡、博洛尼亚、锡耶纳和热那亚的代表们，还有里米尼的僭主[33]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和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等当时最卓越的佣兵队长。最后到达的是离曼托瓦最近的威尼斯派来的大使。

9月26日，庇护二世在曼托瓦等待了4个月之后，终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一上来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演讲从下面这段话开始。

> 曾经流淌着乳汁和蜂蜜的圣地，我们的幸福之花盛开之地，主耶稣经常布教的所罗门圣殿，主耶稣出生之地伯利恒，主耶稣接受洗礼的约旦河，主耶稣流血的各各山，主耶稣安息的陵墓，这一切，现在，都在敌人手中！没有他们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参谒这些圣地！
>
>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去想这些昔日被夺走的地方了。我们不能把失去圣地归罪于祖先。我们不是也把东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拱手送给了土耳其吗？……
>
> 土耳其人所做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却在沉睡！我们甚至还在自相争斗，放任土耳其人为所欲为！基督教徒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操起武器，血腥争斗，却没有一个人奋起抗击冒渎我们的上帝、破坏我们的教堂、意欲断绝基督圣名的异教徒！所有人都远远躲开，漠不关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
>
> 你们还相信，如今现实发生的不幸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化。你们相信和平会回来吗？你们还企望要喝我们血的那些异教徒会带给我们平安吗？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了希腊后不但没有满足，还把剑锋刺向了匈牙利，能祈望这样的人带来和平吗？抛弃你们那安眠的日子吧，直到穆罕默德厌倦了图谋成为胜利者、征服王的野心！否则，胜利只会成为他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台阶。他不会停下来，直到欧洲的全体君主屈服，直到基督的《圣经》毁灭，直到伪预言者的法术笼罩全世界……

教皇庇护二世的激情演讲还在继续。他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说教，只有参加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才能完成对上帝的义务。他最后说

道：

……啊，如果戈德弗雷和鲍德温、尤斯塔斯、雨果、波希蒙德、坦克雷德[34]，那些曾经号令大军、奋勇夺回耶路撒冷的勇士还在，他们一定没有二话！只需我的前辈乌尔班二世振臂一呼那是“上帝所愿”，他们便会挺身而出！

可是你们，我的演讲已经到了最后，你们却缄默不语。不，恐怕你们还有人在想，这个教皇正在说教，要把我们送上战场，把我们抛到敌人的刀锋之下。有人在想，这就是僧侣的伎俩，把别人置于危险境地，自己却一指不染。

可是，我的孩子啊，你们不能那样去想！为了贯彻对上帝的信仰，也为了坚守圣彼得传承下来的精神，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最好的事情！……让我们自己高举旗帜奋勇向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高举主的十字架前进吧！让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冲向异教敌人，夺回我们的幸福吧，为了耶稣哪怕去死！……风餐露宿、突破封锁线、钻过敌人的刀锋，一切为了基督教！

第二天开始研究讨论十字军构想的细节。11月底，继德意志、法兰西的全权大使之后，勃兰登堡公爵、萨克森公爵、蒂罗尔公爵也纷纷抵达。教皇于1460年1月14日宣布结束持续了3个多月的曼托瓦会议，于4天后的18日向全体基督教徒颁布了教皇教谕，宣布了会议决定在今后3年中筹建十字军、抗击土耳其的工作安排。教谕有如下内容。

每个礼拜日的弥撒均应向上帝祈祷十字军的成功。

凡参加军队满8个月者均赐予完全免罪的权利。

全体神职人员收入的1/10，世俗民的1/30，犹太人的1/20应作为义务缴纳给十字军基金，教廷将率先垂范。

修道院及所有宗教团体的人员每十人须承担一个士兵8个月的费

用。

翌日，庇护二世离开曼托瓦前往罗马。为了开曼托瓦会议，他离开罗马已逾一年。

他对前来送行的各国君主和大使们说："希望你们回国后努力实现我们在这里做出的决定。上帝保佑着你们！"

这时，离开"上帝所愿"一句话便能发动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十字军，350年的岁月已经流逝，离最近的第八次十字军也过去了将近200年。

三

庇护二世回到罗马后，首先做的事是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这样的做法背离了有良知的人们对他的期待。法兰西派枢机主教在曼托瓦并不配合，这使庇护二世痛切感到了在教廷内部巩固自己地位的必要性。为了组建十字军，罗马教廷本身必须首先统一起来。这个想法使他重蹈了历代教皇的覆辙：大量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而这样任人唯亲、大搞派系人事的做法，早已臭名昭著。

1460年春，有12人接到了新枢机主教的任命，其中有9名意大利人和3名外国人。在9名意大利人新枢机主教中，有庇护二世19岁的侄子和曼托瓦侯爵刚满17岁的弟弟。如此一来，除了去世的3人，枢机主教团由原来的14人一举增加到了26人，法兰西派成为少数派，庇护二世确立了自己的地盘。

然而，罗马之外的情况却不会那么轻易地按着教皇的希望发展。尽

管教皇屡次发去亲笔信，甚至满含深意派去特使进行说服工作，德皇一味敷衍的态度却一如既往。非但如此，德皇竟然通过自己弟弟担任大公的奥地利，在背后向举国抵抗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发起了进攻，还为的里雅斯特挑起了与威尼斯的土地之争。法国国王也一如既往，仍旧执拗地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王权。他在曼托瓦会议上承诺7万达克特的十字军资金，一任时日延宕，也不见运过阿尔卑斯山来的丝毫动静。

图4：穆罕默德二世

这两大强国君主的态度让庇护二世很失望。但德法两国的神职人员

并不恭顺，对他来说则是更大的打击。他们不但拖延缴纳义务规定征收的什一税，对教皇让他们说服各自君主的命令也置若罔闻。长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与其紧跟远在罗马的教皇，不如紧跟近在眼前的君主，这样对他们更有利。

“正因为如此，也为了唤醒全欧洲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十字军！”庇护二世在悲痛地呼喊。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勃艮第侯爵一个人，只有他写信向罗马表示了一贯的合作态度。

意大利各国都有各自的考量，对教皇提倡的圣战态度暧昧。威尼斯共和国分裂成和战两派，政策尚未统一，在静观事态的舆论背后，继续摸索与土耳其签订协定的路径。佛罗伦萨共和国反倒乐见自己商业上的敌国威尼斯败给土耳其。米兰公国在威尼斯全身心防御土耳其之时趁隙策划领有热那亚。那波利王国对出入地中海怀有野心，却常遭威尼斯的阻碍。它对威尼斯的国难高兴都来不及，遑论出手相助。其他中小国家也都同样德行。即便是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现在也想躲避教皇的征税令，与昨日的欢迎态度有了天壤之别。曼托瓦会议聚首后还不到一年，欧洲各国便再度分崩离析。

在罗马，庇护二世迎回了空手而返的各路特使，跌入了绝望的渊底。尽管他被咳嗽折磨得痛苦万分，炽热的理想却在心中燃烧。没有一个君主站出来，资金也筹措无望。但如果自己就此止步，又会有谁来接着干呢？基督教世界又会走向何方呢？虽然处在绝望的谷底，强烈的使命感又一次给了他力量。庇护二世找到了一条路，去打开这四处碰壁的局面。

他要与敌人对话，给苏丹穆罕默德写信，先礼后兵。这样既可以避免人们的不幸又能达到目的。庇护二世想到这里，随即叫来了秘书。

苏丹阁下：

请你在读这封信前不要做出决定，请先读信，然后三思。

阁下所奉之伊斯兰教亦承认预言者基督的尊严。然而，阁下仍在用武力威胁着欧洲及位于其前沿的意大利。但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奴隶。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已武装起来，军马跃跃欲试，士兵枕戈待旦，准备着迫在眉睫的战斗。资金也准备充足。阁下若率军侵略意大利、匈牙利及其他欧洲之地，千万不要以为将会同女人打仗。在那里等待你们的将是披挂铠甲的战马和男人！要想战胜他们，需要最强的力量和最大的勇气，需要尽善尽美的准备。

阁下也千万不要指望基督教徒的内斗。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我们会存小隙而共同奋起。请阁下铭记这样的历史事实：对古罗马人来说，夺取意大利半岛难于征服全世界……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阁下抛弃征服基督教世界的想法，那也并不是难事。实现你的想法，既不需要武器资金，也不需要军队舰船，只要有一点点水就可以办到。只要阁下用这一点点水接受洗礼，举行基督教的祭典，信奉《圣经》就行。如果阁下做到了这些，大地上的任何君主将不能凌驾于阁下的荣誉和权势之上。我将册封你为希腊和东方的皇帝，把你现在非法所得的权力和领土正式授予阁下。我将把阁下作为粉碎侵害罗马教会权威者的重要力量。我会像我的前任斯德望[35]、阿德利安[36]和利奥[37]把丕平[38]和查理大帝召唤到身边那样，把希腊帝国委托给阁下，你就是他们的解放者。这样，在教会范围内我也对阁下的贡献给予了回报。

这和平是多么丰盛啊！宛如诗人们讴歌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再现。豹可与天使共存，牛可与狮子同住，剑被镰刀取代，铁被铸为犁锹。田园得以精耕，丰稔的果实使大地生辉。村落和城市得以再建，上帝曾经失落的乐园又将复苏。修道院得以重建，里面满是为神圣上帝奉献的僧侣。在伊斯兰教统治下无法成就的和平，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将轻易实现。

阁下是苏丹，我是教皇。从历史上看，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并非

异想天开之事。正如让法兰克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克洛维[39]、向匈牙利人布教的斯德望、指引伦巴第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吉尔福斯、让罗马人悟到上帝的君士坦丁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能够把土耳其人领向基督教。如果阁下同意我的意见，整个东方都将同时接受基督。

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和决心，全世界就能重现和平。这个人就是阁下！阁下应该充满勇气，下定决心。

向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学习吧！我在此起誓，届时上帝将助我授予阁下我在此向阁下承诺的崇高荣誉！阿门！

1460年7月1日
罗马教皇庇护二世

55岁的教皇满怀热情，忘却病痛，用优美的拉丁语写去了这封亲笔信。刚满30岁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信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懂拉丁语，他一定读了这封信。穆罕默德二世23岁就攻陷了号称东地中海最大都市的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崩溃。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大无畏征服者，但是，披露他内心活动的史料却不见一件传世。

但有一个确凿的事实，罗马教皇庇护二世从未收到过他的回信。

教皇不得不放弃使用语言十字军。他再下决心，一定要成功组建一支使用武器的十字军。可是，君主们一味逃避，为筹措资金而征收的特别税也无法收缴。人们纷纷议论道，在这样的现状中，庇护二世本人怕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想受挫吧。然而，就在这议论声中，庇护二世的脑海里生出了一个新方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宗教信仰，要把他们集合到十字军旗下，首先

必须让人们领悟出已丧失的信仰之心。庇护二世坚信这一点。在第二年的1461年，他宣布将锡耶纳的卡特丽娜列为圣人。这位生活于14世纪的神秘思想家为把教廷从阿维尼翁召唤回罗马竭尽了全力，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道，是当时意大利人气最高的人物。她属于多明我会派，与圣方济各派是仇敌，以前也常有人发起运动，要把她列为圣人，都因圣方济各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庇护二世在提高人们信仰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他想在发起自己理想中的十字军之前，对基督教世界两大势力之一的多明我会派采取怀柔政策。圣方济各派的创始人方济各已被列为圣人，现在多明我会派也将有自己的偶像被正式列为圣人。把这两位圣人奉为意大利的两大守护圣人，可以使两派均感满意。教皇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愿望。圣方济各派与多明我会派的对立表面上暂时消失了，圣女卡特丽娜的册封受到了民众狂热的欢迎。

庇护二世从这次成功中获得了力量，第二年上演了更大规模的宗教剧。在这场宗教大戏中，他祭出了圣安德烈的头骨。拜占庭皇室成员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3年前流亡罗马时带来了这副头骨。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个叫摩里亚的地方，那里的专制君主被土耳其推翻。这位专制君主认为，圣安德烈是十二使徒之一圣彼得的弟弟，他的头骨比任何宝石都能卖出好价钱，就把它包了来。他的算计没有错，庇护二世给他的年金是6000达克特。

1462年的复活节是4月11日。借用当时一位编年史作家的话说，那天的罗马“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时代，展现出了一派奇妙的景象”。

教皇事先派去了三位枢机主教，将安放在纳尔尼城的这件圣物运到罗马。教皇亲自带领全体枢机主教在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迎接圣物。为了这一天，朝觐者从全欧洲蜂拥而来，人群把台伯河两岸挤得水泄不通。在万人瞩目之下，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双手恭敬地捧着安放在金色软

垫上的圣物，将它交到了庇护二世的手上。庇护二世面向灰色的小头骨，用他那惯常使用的优美拉丁语开始了演讲。

> 啊，您终于来到了这里！恐怖的土耳其夺去了您神圣的安身之所，但您终于回到了使徒之长、您的哥哥圣彼得的身边。……您的兄长用他那神圣的鲜血使罗马成为圣城，罗马将会用对圣彼得同样的爱迎接您的到来。您回家了！……守护我们吧！我们即将奋起面对土耳其的野蛮。请您和兄长圣彼得一起守护我们吧！

群众在哭泣。尤其是其中从匈牙利远道而来的朝觐者，他们想起了拼死抗击土耳其的祖国而痛哭流涕。

天下起了雨。道路立刻变成了泥海。庇护二世坐在教皇专用的鎏金座轿里，双手恭敬地捧着头骨，将圣物送进圣彼得大教堂。

枢机主教们听从教皇之命，徒步紧随其后。他们个个身着华丽的枢机主教正装，泥浆无情地飞溅到他们身上。家家户户都用毛毡装饰了窗户，汇集在道路两边的人群撒着花瓣。枢机主教的后面跟着主教们的队列。他们的身后是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40]华丽的制服队列。在装扮成天使的孩子们的赞美诗歌声中，灰色的头骨被静静地送进了圣彼得大教堂。

群众挤满了宽阔的大教堂内廷。教皇庇护二世转过身来，背对圣物，向群众发表讲话。

> 土耳其是圣安德烈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捍卫基督教不受土耳其人的威胁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如果基督教君主们响应他们的牧羊人教皇的这个呼声，整个基督教会将充满喜悦。圣安德烈正是因为向哥哥圣彼得求得了帮助，才得以来到圣彼得的所在地罗马。

激动的群众中爆发出参加十字军的宣誓声。声音撼动着教堂内庭，环绕着泪流满面、伫立不动的庇护二世经久不绝。

一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至少对庇护二世是个奇迹。在意大利发现了明矾矿藏。明矾是毛纺染色不可缺少的原料，以前都依赖于从土耳其进口。

发现者很快被召来。此人自称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做明矾采购生意，因土耳其军队入侵而回到了祖国意大利。他说，有一次他去托斯卡纳野外，发现一片岩石地带，石上生长的小草同他曾经在小亚细亚明矾矿脉上见到过的一样。他试着舔了一下那白色的石头，有咸味，再用火试，便知是明矾矿石无疑。他满怀信心向教皇报告了这个发现。

教皇狂喜。消息立即遍传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没有必要再花高价向敌人购买了，我们手里有明矾啦！销售明矾的收益，可以用作十字军的资金。”

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各城市都被授予交易权，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负责经营此项事业。据说教廷通过明矾矿业获得的收益每年以10万达克特计算。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年多。1463年秋天，来自威尼斯的飞毛腿带来的报告震惊了罗马教廷：莱斯沃斯岛陷落了！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6年后，塞尔维亚于1459年陷落。第二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卡拉几亚陷落。又过了一年，锡诺普于1461年沦陷。特拉布松也于1462年沦陷。土耳其陆军力量几乎按一年一个国家的

速度扩张领土。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的波斯尼亚，土耳其即驻有15万大军，这证明了土耳其陆军力量的强大。奥斯曼土耳其[41]这个源自小亚细亚的帝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指挥下，在10年的时间里就把从黑海到爱琴海的几乎所有土地收入囊中。

欧洲的君主们都承认土耳其陆军力量强大，成就了这些业绩。但他们一直认为拥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欧洲海军力量仍然占有优势。可是这次莱斯沃斯岛陷落的消息，不能不让他们意识到土耳其终于要出没于海上了。欧洲现在还很放心，认为有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挡住了土耳其的陆路。然而，一旦土耳其拥有投送大军能力的大舰队，欧洲就将永无宁日。莱斯沃斯陷落时的惨状也使教皇十分激愤。

土耳其舰队穿过赫勒斯滂海峡[42]南下，耀武扬威地从停泊在莱斯沃斯岛港外的威尼斯舰队鼻子底下通过，在莱斯沃斯岛上登陆。卡佩洛指挥的威尼斯舰队拥有29艘加莱船[43]，但没有本国政府的命令不能行动。他只好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铁蹄在瞬间蹂躏了这个海岛，岛上驻守着以自己的同胞热那亚人为主的意大利人。遭受磔刑[44]的意大利人超过百人，行刑故意放在威尼斯舰队的眼前。受刑者排成一队，站在舰队对面的悬崖之上。他们流淌的鲜血在南国秋天的强烈日照下也无法干涸。船上的威尼斯人为流血的同胞哭泣，呼喊着要为他们报仇。海面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未受磔刑的岛民都被卖为奴，十多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被带进了苏丹的后宫。据传穆罕默德二世对女性不太有兴趣，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在后宫终其一生，死时仍是处女。

这就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给的极其严厉的答复。他非但无视教皇庇护二世那流利的拉丁语说教，而且毫不手软。他在征服了锡诺普、特拉布松、波斯尼亚以后，继而在庇护二世的同胞意大利人统治的莱斯沃斯岛制造了这出惨剧。这是苏丹对教皇明目张胆的挑战。庇护二世忘却

了自己的病痛，他自己要做十字军的统帅。即便扶着别人的肩膀，他也要为十字军打先锋。以前已组建过八次十字军，可教皇没有一次身先士卒。庇护二世要做前任没有做过的事。他要像那些御驾亲征的古罗马皇帝那样，亲自统率十字军。这个念头在教皇庇护二世的心头燃烧。

威尼斯也终于挺身站了出来。稳健派的马利皮耶罗已经去世，元首已经换成了克里特岛总督、明了东地中海形势的克里斯托弗·莫罗。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秉持静观形势的态度，这次真正使它改变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威尼斯向来对自己的海军力量拥有绝对自信，但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容自己小觑。于是骤然间，使节开始频繁往返于罗马与威尼斯之间。

庇护二世一直主张威尼斯舰队对运送十字军兵力必不可缺，威尼斯的这个变化比什么都让他高兴。教皇将亲率十字军的消息震动了威尼斯舆论，促使元首同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击了莱斯沃斯岛惨案的强硬派领袖、海军将领卡佩洛在议会上泪流满面地请求元首亲自出征。这一举动使得尘埃落定。威尼斯政府立即开征神职人员收入的1/10、犹太人收入的1/20、世俗人收入的1/30的十字军税，同时申请为十字军提供一支由40艘双层加莱船组成的舰队，配备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

庇护二世从这一举动中获得了力量，他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罗马教会遂下决断，决心采取行动，并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9月23日，距莱斯沃斯陷落还不到一个月，庇护二世向汇集而来的全体枢机主教，进而向在他们身后的全体基督教徒发表讲话。

> 我作为教皇已经下定决心，亲自担任圣战的统帅。也许你们会问：这位病魔缠身的老人想干什么？僧侣上战场能有什么作用？枢机主教和神职人员在前线又能怎样？你们还会问，为什么不待在教堂里，把战争交给行家？但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正像他们所谴责的那样，我们耽于快乐，热衷金钱，嗜好

奢华。我们肥胖如猪，出行时骑着健马，华丽的披风迎风飘舞，头戴宽大帽檐的红帽，趾高气扬。我们豢养猎犬，说话像喜剧演员，却不做一件坚守信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高级神职人员在民众眼中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神职人员，但我们的生活过于奢侈。这就是我们惹起民众憎恨的原因，也是他们不愿意听我们认真诚实地说话的原因。

那么，你们知道如何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任吗？知道留住想要离去的人们的方法吗？我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弃一切，像祖先那样筚路蓝缕。……只有重新燃起对信仰的热情，蔑视死亡，找回寻求殉教之心。……只靠忏悔、向民众说教、否定快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为践行主基督遗言而殉教的使徒中间去。……

如今，异教徒土耳其人正在迫害东方的基督教徒。当此之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言自明，我们无须问主“去哪里”（quo vatis）。高喊“我去”要比命令别人“你去”诚实万分！我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长，你们是高位神职人员，你们也要跟我一起从军。

即使是那些君主，当他们的导师和父亲、罗马主教、基督的代理人——我这个衰老的病人都将奋起率军，恐怕他们也会为留在家里感到耻辱吧。我知道上前线对我来说有多么残酷，也许死亡会早早地降临于我。但我已打算把一切交给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给这衰老的肉体注入力量。自然，拿起剑去厮杀，我们太弱，那不是神职人员的作用。向摩西[45]学习吧！以色列人民战斗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高地上为之祈祷。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山顶上，我都要为上帝的胜利和信仰的自由而祈祷！愿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庇护二世的演讲结束时，一位狂热的枢机主教高声呼喊道：“这就是圣灵的声音！我也去！教皇陛下，只要你一直对天呼唤！”

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鲁昂枢机主教等法兰西派也缄默不语。罗马教廷同意了庇护二世的决心，正式决定服从。全体基督教徒把教皇当作自己的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庇护二世的决策就是他们的决策。

教皇庇护二世得到了威尼斯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又获得了枢机主教会议的认可。他很快便在罗马召集会议，实质性地讨论如何使十字军走上正轨。阿尔卑斯山以北仍然只有勃艮第侯爵的使节，但意大利各国都派来了代表。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的一切都会根据庇护二世的想法进行，不料半路上杀出了佛罗伦萨。教皇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佛罗伦萨人不可告人的想法是让威尼斯独家承担起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从而让威尼斯人的血流干。"

佛罗伦萨共和国代表在会上坚持说本国政府的指示未到，根本不打算参加讨论。他们要求单独面见教皇。他们说："威尼斯一直寻找机会，想要重新插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摩里亚。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只会让威尼斯获利。一旦再度取得摩里亚及其周边的希腊，他们的下一个野心就是转而侵略意大利，威胁教会的独立。"

庇护二世回答道："这是多么狭隘的政治啊！土耳其是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我也知道威尼斯的本意。但是，土耳其人的残酷要比威尼斯人的商业心计更难忍受。"

会议一直持续到那年的年终，达成基本一致后散会。决定事项如下：

勃艮第侯爵应于明年5月1日前率兵1万前往乘船地点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提供40艘军用加莱船、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此外，教皇庇护二世提供10艘加莱船；每位枢机主教各提供1艘加莱船；费拉拉公爵、曼托瓦侯爵、美第奇家族、博洛尼亚市、锡耶纳共和国和卢卡市有义务各提供2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有义务准备8艘大型帆船。

教皇非常认可米兰公爵作为统帅的才能，他也是教皇最为依赖的武将。可是，他却以下次组建十字军时一定率军参加为由，巧妙地逃避了教皇让他参加十字军的请求，只承诺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带3000士兵参加十字军。

这样，大势初定。会议还决定，各路人马于明年8月15日圣母马利亚升天节那天在乘船地点威尼斯和安科纳集合，从那里一路奔赴前线，杀向君士坦丁堡。教廷宣布所有参加者完全免罪，同时开始在全欧洲招募十字军志愿者。

这次会议之后不过数月，1464年春有消息传到欧洲，说希腊人在摩里亚发动叛乱，被8万土耳其军队彻底剿灭。这使一贯与庇护二世颇有共鸣的勃艮第侯爵改变了想法。侯爵来信说希望延期两个月出发。他还在第二封信中写道，自己由于高龄不能从军，将派庶子一人领兵300前来。庇护二世闻讯大惊，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拼命让侯爵回心转意，但只是徒劳。勃艮第侯爵这次变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胆小，背后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在动作。人称“好人”（le Bon）的勃艮第侯爵就此趴了下来。

坏消息接踵而至。正当威尼斯举全国之力抗击土耳其时，米兰却乘机夺取了热那亚。这个消息使教皇对米兰公国的利己行为感到愤怒，同时也使他感到失望，不能再指望本该由热那亚提供的那8艘大船了。

饱受高烧和痛风困扰的庇护二世有着坚定的决心。医生说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竭力予以阻止，但却未能改变教皇要在安科纳港等待威尼斯舰队的决心。出发的日子定在了6月18日。他任命侄子皮科罗米尼[46]为教皇代理，在教皇不在期间代行教皇工作。有消息说，听说庇护二世率十字军远征的消息后，来自欧洲各地的志愿者络绎不绝地奔向威尼斯和安科纳。勃艮第侯爵的改变和德法两国君主不参战虽已成为事实，但过去也有过先例，第一次十字军在没有一个君主参加的情况下成功征服

了耶路撒冷。庇护二世没有绝望。只要元首率领威尼斯大舰队行动，与威尼斯交往亲密的费拉拉、曼托瓦、卢卡、博洛尼亚的军队也会行动，米兰公爵之子率领的士兵也会到来。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罗德岛、塞浦路斯各岛也会奋起响应。众多的志愿者正陆续聚集而来，这是庇护二世最大的希望所在。

1464年6月18日，出发的那一天终于来到。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做了庄严的弥撒之后出发。他首先乘船，接着乘轿横跨意大利半岛，向俯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安科纳进发。庇护二世换乘等在台伯河上的船只之后，根本不想立刻坐下。他一直伫立在那里，眺望着渐渐从眼前远逝的罗马城。他的嘴里流出了如歌的话语：

“再见啦，罗马！我不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但是，庇护二世并不知晓。

庇护二世不知道，为了开始同威尼斯进行媾和谈判，土耳其苏丹派出的特使正在沿亚得里亚海北上！

四

“是罗德里格在那儿吗？”

波吉亚枢机主教刚从街上回来，正在房间门口同教皇的医生说话，听到床幔后面传来的声音，赶紧向病床走去。床幔从床架四面重重地垂下，遮住了光线，床上幽暗。庇护二世躺在床上。他朝过来的罗德里格

伸出了无力的手。罗德里格跪在地上，亲吻了教皇手上的戒指。没等罗德里格站起身来，庇护二世便问道："没有吗？威尼斯方面还没有什么消息吗？"

"是的，陛下。已经派去三拨儿使节了，但还没有收到威尼斯舰队起航的报告。"

听了回答，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接着问道："勃艮第侯爵那边也没有什么说法吗？米兰的军队呢？"

罗德里格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庇护二世因愤怒和绝望而发抖，但声音却很微弱。"再次派人去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君主那里，让他们速速赶来安科纳，告诉他们，不服从教皇命令者开除教籍。"

接着，教皇声音柔和地说："辛苦你了！你负责管理已经汇集到这座城里来的十字军志愿者吧。他们多是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已经不能指望法兰西枢机主教的配合了。罗德里格，你是西班牙出身，只能靠你去统率他们了。"

罗德里格点点头，走了出去。教皇庇护二世目送着他的背影，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自从皮科罗米尼、贡扎加两位枢机主教上任之后，罗德里格·波吉亚就不再是最年轻的枢机主教了。但他仍像年轻人一样自由奔放，在曼托瓦会议期间同有夫之妇谈情说爱，闹得庇护二世不得不亲自出面劝诫。不过，这个年轻人在现在这种时候却比其他人都冷静。他忠实地帮助着庇护二世，庇护二世心里感到很舒服。在正式场合之外，教皇经常只叫他的名字罗德里格。

波吉亚枢机主教回到办公室。他并没有打算立即开始工作，而是伫立在窗边思考着什么。他的眼下是亚得里亚海那反射着盛夏阳光的蓝色波浪。他站在那里并没有眺望大海。他一脸严肃，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同那个搞恋爱、喜狩猎、爱奢华的波吉亚枢机主教判若两人。

考虑到病魔缠身，庇护二世在和枢机主教们离开罗马后，一路行进缓慢，直到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他们才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安科纳城。盼望参加十字军的群众从欧洲各地聚集于此，他们用狂热的欢呼迎接教皇一行。而安科纳市民却好像觉得即将大祸临头，沉默着以冷眼相迎。教皇及其一行住进了这座城市的主教公邸，那里定为他们的住处。公邸位于海岬的尽头，离城中心稍有距离。那里是意大利唯一一处可以看见海上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太阳每天早晨从希腊方向的海上冉冉升起，傍晚又在威尼斯方向的海平面上缓缓落下。这座城市让人感受到东地中海的空气，在古罗马时代即以去往东方的港口而闻名。

庇护二世决定把这座城市作为十字军远征的集结地，他在这里等着君主们和各共和国代表按照与他的约定，率领各自的士兵和战船前来会合。出发远征的日子定在圣母升天日的8月15日，与350年前第一次十字军出征是同一个日子。然而，教皇来到这里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既没有看到部队扬起尘土由陆路而来，也没有见到应由海路而来的舰队的影子出现在海平面上。

面对这样的情形，枢机主教们开始动摇，人人抱怨。庇护二世却制止他们道："我在曼托瓦等待他们，在罗马等待他们，最终他们还是来了。我准备在安科纳再等下去。"

可是，威尼斯打从开始就是只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才行动的，眼下就要与土耳其进行媾和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加入庇护二世的十字军，甚至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加入。他们认为，只要与土耳其媾和即可。即使媾和不成功，同教皇联手也只会束缚自己的行动，羁绊自己的手脚。教皇不谙东方的形势，空有一腔宗教热情。甚至有人在威尼斯议会上公然叫嚣："如果教皇待在家里，多少也会有一点值得我们去爱他的地方。"

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都学着勃艮第侯爵背叛了教皇。同样，意大利各国也都与根本不打算践约的威尼斯为伍了。米兰、费拉拉、曼托瓦，甚至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都没有派来一兵一船。更有甚者，在教皇卫队通过佛罗伦萨时，握有佛罗伦萨主权的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竟然找碴儿想阻止他们通行。

响应庇护二世的净是些无名的下层民众。教皇到达以前，这些民众就纷纷奔赴安科纳集合，他们几乎挤满了整个城市。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只是些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和无赖，既无头领，又没有钱，更没有武器。这里面甚至还有厌倦了乡里贫困生活，带着全家赶来的农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是去参加圣战。我们需要什么，上帝就会奇迹般地赐予我们。耶稣会为我们带来面包和鱼。"

这群肮脏不堪的人满大街晃荡，好似城市就是他们的。安科纳市民向他们投去憎恶的目光。双方的对立日益恶化，到处打斗，盗窃不断。这些十字军志愿者中还有妇女儿童，生孩子的事也不鲜见。住处不足，饮水和食物也开始告急。连日来，市民和外来者都拥到罗德里格这里诉苦、提要求。遵照教皇之命，上边为确保住所和食物拨下了钱，但市民们直接就揣进了腰包。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拿到钱后也纷纷出城，把志愿参加十字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这对病魔缠身的教皇不啻为致命打击。庇护二世的病情急剧恶化。现在，他已衰弱至极，上床躺下也已很不容易了。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痛苦折磨着59岁的庇护二世，他日夜高烧不退。

进入8月以后，庇护二世的病情看上去有所好转。尽管仍有高烧，但他偶尔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听到威尼斯舰队已经出发的消息后，他的病情才略见好转。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作为教皇特使前往威尼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威尼斯元首莫罗勉强答应前往安科纳。然而，威尼斯原本承诺派40艘三层加莱船参战，后来减为5艘，最后只派出一支12艘普通的单层加莱船队。不管怎么说，枢机主教的热情还是成功地迫使威尼

斯元首履行了他与教皇先前的约定。米兰公爵曾经预言道：“元首是出发了，但他一定会很快掉转船头。”他虽然没有言中，但莫罗元首率领的舰队却在爱沙尼亚无端停靠，空耗了很长时间，并不曾想要直接前往安科纳。

8月12日，终于有消息说威尼斯舰队靠近了安科纳。庇护二世掩饰不住喜悦，当即给五位枢机主教派了船，让他们前去迎接威尼斯元首。然后，他让人把自己挪到窗前，好尽早亲眼看见舰队进港。

但是第二天，庇护二世的病情突然恶化，脉搏微弱，时而说着胡话。他想从床上起来时会粗暴地推开医生。年轻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有时也得帮着医生让教皇躺下。

威尼斯舰队当天下午抵达安科纳。但只有前去迎接的枢机主教乘坐的船停靠在港口栈桥旁，舰队在港外抛了锚，元首和其他威尼斯人也根本没有打算上岸。

尽管如此，威尼斯舰队到达的消息还是传到了病床上的庇护二世耳中。不过，无人知晓他是否听明白了。第二天，庇护二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高烧不退，精疲力竭。

第三天就是圣母升天祭日的前一天。庇护二世笃信圣母马利亚，这才把十字军出征的日子定在了圣母马利亚的升天祭日。明天就是出征的日子了，可教皇的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

这天夜已过半，只有罗德里格一人留在教皇的病房里。刚才，其他的枢机主教也还都挤在这里。医生说，教皇的病情稍有稳定，今晚大概过得去了。于是枢机主教们便权且各自回自己住处去了。众人散去后，

除了罗德里格枢机主教外，病房里只有一位医生守候在角落里。教皇看上去睡得很安详，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

突然，罗德里格好像听见教皇说了些什么，他快步驱前。教皇紧紧抓住罗德里格的手，双目圆睁望着半空中，大声喊道："开窗！把窗户打开！"

"夜风会吹到御体的。"罗德里格慌忙答道。

然而庇护二世不断喊叫着同样的话，似乎已经认不出罗德里格了。

罗德里格只好放下教皇，不得已打开了窗户。夜风突然吹进来，蜡烛熄灭了。月光照进房内，房间里一片白色的幽光。

开好窗户，罗德里格转过身来，吃惊地看到庇护二世已经坐在床上。他的目光越过窗口望着海上。

这时，叫声从庇护二世的嘴里迸出。

"看啊！那边，海上，大舰队已经来啦！主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四周是旗帜的海洋！那是红色镶金的威尼斯旗！成百上千的加莱船的大军团啊！我看见了老鹰图案，那是德皇啊！那里还有百合图案，法国国王也来啦！大家都来啦！我看见了战马！米兰公爵就在那里！大舰队啊！大舰队终于来啦！教皇得去迎接他们！我是他们的统帅！我要站起来！……"

听到庇护二世的话，罗德里格也不由得朝海上望去。可是，海面上洒满月光，仿佛铺上了一张银色的丝绢，一片寂静。那里波澜不惊，看不见一艘船。

罗德里格伫立在那里，身体由于悲伤而微微颤抖。庇护二世仰天倒在了他的眼前。

翌日，威尼斯元首莫罗得知教皇的死讯后上了岸。他同枢机主教们协商，没花多少时间便达成一致。会谈之后，元首立即登船，率领加莱船队回威尼斯去了。枢机主教们也各自分头回罗马去了，他们要参加新教皇的选举会议。庇护二世的遗体定于第二天运往罗马。

最后一位相信圣战的教皇去世了，最后的十字军也随之化作一场虚幻。

---

[1] 克吕尼修道院（Abbaye de Cluny/Cluny Abbey）位于法国克吕尼，由亚奎丹（Aquitanine，又称亚吉田）公爵——“敬虔者威廉一世”（William I，the Pious）建于910年，并指定法国人伯尔诺为首任院长。该修道院存续至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0年。该院严守本笃所定规则，成为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克吕尼改革）的中心。

[2] 隐者彼得（Pierre L’Ermite，？——1115），11世纪末法兰西北部亚眠的天主教司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重要人物。

[3] 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约1042——1099），1088——1099年在位，他致力于扩大教皇权力，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继承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遗志，完成了教会改革。

[4]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约1015——1085），1073——1085年在位。他是克吕尼改革派，进行了一系列教会改革，为提高教皇权力、实现天主教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奋斗一生，被认为是教皇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5] 圣母升天的祭日：即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 of Mary）。天主教相信耶稣的生母马利亚死后灵体同被上帝接进天堂，在8月15日这天纪念圣母马利亚“荣召升天”。又译圣母安息节、圣母升天瞻礼。

[6] 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 Garces，又称圣道明，1170——1221），西班牙天主教会修士，1215年于法国图卢兹创立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多米尼科派或布道兄弟会），1217年获教皇批准。该教派标榜提倡学术，传播经院哲学，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

[7] 枢机是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8] 罗德里格·波吉亚（Roderick Llanccio I de Borja/Rodrigo Borgia，1431——1503），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侄子，曾任枢机主教、教廷枢密院副院长，于1492年被选为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教皇（Pope Alexander VI，1492——1503年在位）。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世俗化教皇的代表人物，爱财好色，为波吉亚族繁盛及确立教廷军事独立而战，把意大利带入战火之中，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负恶名的教皇之一。

[9] 卡利克斯特三世（Pope Callixtus III，1378——1458），1455——1458年在位，是第一位西班牙籍的教皇，波吉亚家族的开创者。

[10]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曾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接受大学教育。他是人文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和学者，于1442年被德皇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并被留任秘书。1445年受任神职，曾任的里雅斯特和锡耶纳主教、枢机主教，1458年被选为教皇，是为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1458——1464年在位。他于1459年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倡议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未获欧洲各国君主响应，他本人于1464年去世。

[11] 13世纪末，罗马教廷与法国及西欧各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空前激烈。1305年，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教廷选出法籍主教任教皇，是为克雷芒五世。新教皇惧怕意大利人反对，一直未去梵蒂冈，并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意边境意大利一侧的阿维尼翁（今属法国）。此后70年间，先后有7人在阿维尼翁担任教皇，历史上称这些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1376年，为平息内乱、稳定局势，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并再行三重冠礼，宣布自己为正统罗马教皇，从而结束了阿维尼翁教廷时期（Avignon papacy）。

[12] 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e/Eugenius IV，约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

[13] 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s），又称“普世会议”，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最早的七次会议由东西方教会共同承认，一般也译作“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教皇尤金四世于1431年召开巴塞尔公会议，与会者要求限制教皇权力，尤金四世又企图解散会议。他于1438年将会议迁往费拉拉，1439年又迁至佛罗伦萨。同年，尤金四世被留在巴塞尔的参会者罢黜。后来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使希腊与罗马教会暂时取得一致，教皇的权威才得以恢复。这次会议史称巴塞尔——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1431——1445）。

[14] 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o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从中世纪起延续了8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的称号，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由教皇加冕称帝，以后由历代国王兼任皇帝，作为世俗最高统治者，和精神界的教皇相并列。1806年弗朗西斯二世辞去皇帝称号，帝国灭亡。

[15] 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395年狄奥西多一世死后，由罗马帝国分裂而成的东都帝国，因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拜占庭而得名，是一个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皇帝制国家。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为最盛期。1204年因拉丁帝国成立而一度中断，1261年恢复帝国，后因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而衰落，1453年灭亡。

[16]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位苏丹，军事统帅。1444——1446年及1451——1481年两度在位。他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并迁都于此，改名伊斯坦布尔。他开疆拓土，励精图治，以“征服者”（Fatih）著称于世。他通晓多种语言，大量研读文学、历史、哲学和军事学著作，凭借其辉煌的文治武功成为世界史上有影响的一代雄主。他生性残忍、狂热，但又关心文化事业。

[17] 多梅尼奇，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对于未能找到某些人名、地名等的相应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8]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意大利著名的佣兵队长。1450年，米兰公国任命他为米兰公爵。米兰公国在他的统治下有了迅速发展，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

[19]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1525年在位。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实力人物。1502年创办维藤贝格大学。

[20] 达克特（de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21] 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Nich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

[22]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约272——337），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年在位。他即位后收拾乱局再次统一帝国，营造新都君士坦丁堡，巩固了拜占庭帝国的基础，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调停基督教会内的纷争。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被称为大帝。

[23] 卡特丽娜（Saint Caterina de Siena，1347——1380），天主教多明我会在俗修道女。她于1376年作为佛罗伦萨代表去阿维尼翁。她认为意大利要恢复和平，教皇返回罗马至关重要。1461年被教皇庇护二世封为圣人。她留有300多封书信，被认为是初期托斯卡纳文学的杰作。

[24] 贞德（Jeanne d’Arc或Jeanne la Pucelle，1412——1431），英法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雄。她出身于一个虔信宗教的农民家庭，1428年受到救国的启示从军，1429年重创英军，解放英军包围下的奥尔良。1430年被英军俘获，翌年在鲁昂的宗教裁判中以“巫女罪”被定为异教而遭受火刑。1920年被天主教追谥为圣女。

[25] 马蒂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匈牙利国王，1458——1490年在位。他建立了王家常备军队，推行中央集权化。他奖掖文化之士，招聘意大利建筑家及文化人，使布拉格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中心。

[2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约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经济生产等方面有杰出建树，引入欧洲文明，发展文化，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27] 祝圣（consecration），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之一，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特定仪式，诵念规定的经文，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

[28] 查理七世（Charles VII，Le Victorieux，1403——1461），法兰西国王，1422——1461

年在位。

[29] 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 I，1423——1494），那波利国王，1458——1494年在位。

[30] 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王位的内战，爆发于1455年。因两家族的家徽分别为红玫瑰和白玫瑰而得名。1461年以后约克家族掌握霸权，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即位，与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结婚，内战告终。此后封建贵族势力衰微，进入绝对王政时代。

[31] 狮心理查（Richard I，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年在位。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与埃及的萨拉丁作战，获英武之名。后在远征法国时战死。

[32] 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Thomas Palaiologos，1409——1465），拜占庭帝国帕里奥洛加斯王朝流亡皇帝，1453——1465年在位。

[33]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34] 均为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原注

[35] 教皇斯德望二世（Pope 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在位期间与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交好，为他加冕，并为其子施洗，创下教会为皇帝或国王加冕的先例。他接受丕平三世赠送的土地，成为第一位统治教皇国的教皇。

[36] 教皇阿德利安一世（Pope Adrian I/Hadrianus I，700——795），772——795年在位。他为保住教皇国的领地而寻求查理大帝的支持，于781年为查理大帝之子丕平加冕为意大利王，法兰克王国成为教皇国的保护者。

[37] 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750——816），795——816年在位。为得到查理大帝的保护，他于800年加冕查理大帝为“罗马人皇帝”，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

[38] 丕平三世（Pippin III，约714——768），法兰克王国国王，751——768年在位。751年逼迫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退位，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教皇扎迦利派大主教为他行加冕礼。此后，教皇斯德望二世又亲为他及其诸子行加冕膏油礼。754——756年，丕平两次远征意大利，迫使最后一位伦巴第国王投降。为答谢教皇支持他篡夺王位，他将拉文纳至罗马的大片土地赠予教皇，这些土地成为教皇国的基础。这件事史称“丕平赠礼”。

[39] 克洛维（Clovis，466——511），法兰克国王，481——511年在位。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他消除了部族的对立局面，统一全法兰克，改信正统天主教，奠定了王国发展的基础。

[40] 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aint John），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是历史上由教皇组织的三大骑士团之一，成立于1099年。起初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保护及救护朝圣者、照料伤患。曾在耶路撒冷建有医院，并以附近施洗约翰教堂的名字命名。该团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先迁往罗德岛（1310——1532），后迁马耳他（1530——1798），故有“罗德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称呼。

[41]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Turkish State），奥斯曼一世（Osman I，1258——1326）于1299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伊斯兰帝国。1453年定都伊斯坦布尔，16世纪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达到全盛期，其时掌握地中海制海权，版图也最大。17世纪末因受俄国侵略等原因而走向衰落。一战中战败，1922年为土耳其革命所推翻。

[42] 赫勒斯滂海峡，是达达尼尔海峡的旧称。

[43]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44] 磔刑，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矛刺死的刑法。

[45] 摩西（Moses），以色列民族的最高领袖。相传于公元前13世纪受上帝启示率领同胞迁出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将十诫传授给民众。

[46] 皮科罗米尼（Francesco Todeschini Piccolomin，1439——1503），庇护二世的侄子，22岁时成为锡耶纳主教及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是为庇护三世（Pope Pius III），在位仅26天。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图5：亚历山大六世（平图里乔画）

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中间镶着一块1米见方的圆形石头，石上镌刻着：

> 1498年5月23日，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1]受到不公正判决，在这里与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一起被处以绞刑，复被处以火刑。历经4个世纪之后，我们对他们饱含缅怀之情，立此纪念。

这出戏的主要人物如下。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格·波吉亚：1431年生于西班牙，后来到意大利，就学于博洛尼亚大学。25岁时被其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任命为枢机主教。翌年升任职位仅次于教皇的要职——枢密院副院长。1492年61岁时被选为教皇。

这位教皇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可以说在基督教会史上臭名昭著的教皇。处死萨伏那罗拉也是他的劣迹之一。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1452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在多明我会的修道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1491年39岁时，升任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院长。1494年，他乘法国国王查理八世[2]入侵意大利之机流放了美第奇家族，成功建立了人民政府取而代之。他努力在佛罗伦萨建立神权政治。

这位修士激烈攻击和谴责当时的教皇和教廷，被认为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先驱者。新教人士因此对他不吝赞美之辞，称他为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良心。

卢卡·兰杜奇：佛罗伦萨药材香料商人。在托尔那博尼大街开有一家经销香料和药材的小商铺。他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的日记。

这出戏的角色只是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之间的往来书简和教皇诏书、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以及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3]的日志。

舞台是罗马和佛罗伦萨。

时间从庇护二世去世后30年的1495年到1498年的四年之间。

序幕——1494年

1月25日，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去世。法国国王主张那波利王位继承权。

3月1日，萨伏那罗拉预言，上帝的鞭子将抽打在业已堕落的意大利身上。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顾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反对做出决定，承认先王嫡子阿方索二世成为新的那波利国王。

4月24日，法兰西派枢机主教的首领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4]逃离罗马，流亡法国。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主张那波利王位的继承权却被无视，怒火中烧。米兰公国摄政“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5]）觊觎正式的公爵宝座，一心盼望阻碍其阴谋得逞的那波利阿拉贡王室没落。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在教皇选举中一败涂地，对波吉亚教皇也满怀敌意。这三个人开始了反波吉亚教皇的谋划。

此时，法国国王已开始在格勒诺布尔集结大军的传言传遍了整个意大利。

6月15日，法国国王的特使带着国王的要求抵达罗马，声称为筹建十字军远征的基地必须征服那波利王国。如果教皇坚持不认可此事，法国国王将率领全部军队进入意大利，武力征服那波利，进而召开公会议，要求教皇退位。

对此教皇认为，阿拉贡王族在那波利的统治已经扎下了根。现在，法国国王主张过去安茹家族的王权，这在既成事实面前毫无正当性可言。而且，现任苏丹巴耶济德[6]与前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现在并无侵略欧洲的意图，欧洲没有理由前去远征。于是，教皇全面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要求。

8月23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全军从格勒诺布尔出发，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

查理八世同时要求意大利境内各共和国和君主国，准其在各自的领内自由通行，并向法军提供所需物资。

9月5日，法国军队进入都灵城。

10月14日，法军进入帕维亚城，“摩尔人”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在9万法军面前，意大利各国醒悟到抵抗将是徒劳的，便纷纷向法国国王表示恭顺。如此一来，教皇陷入困境。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向惊恐万状的民众布道。

>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淌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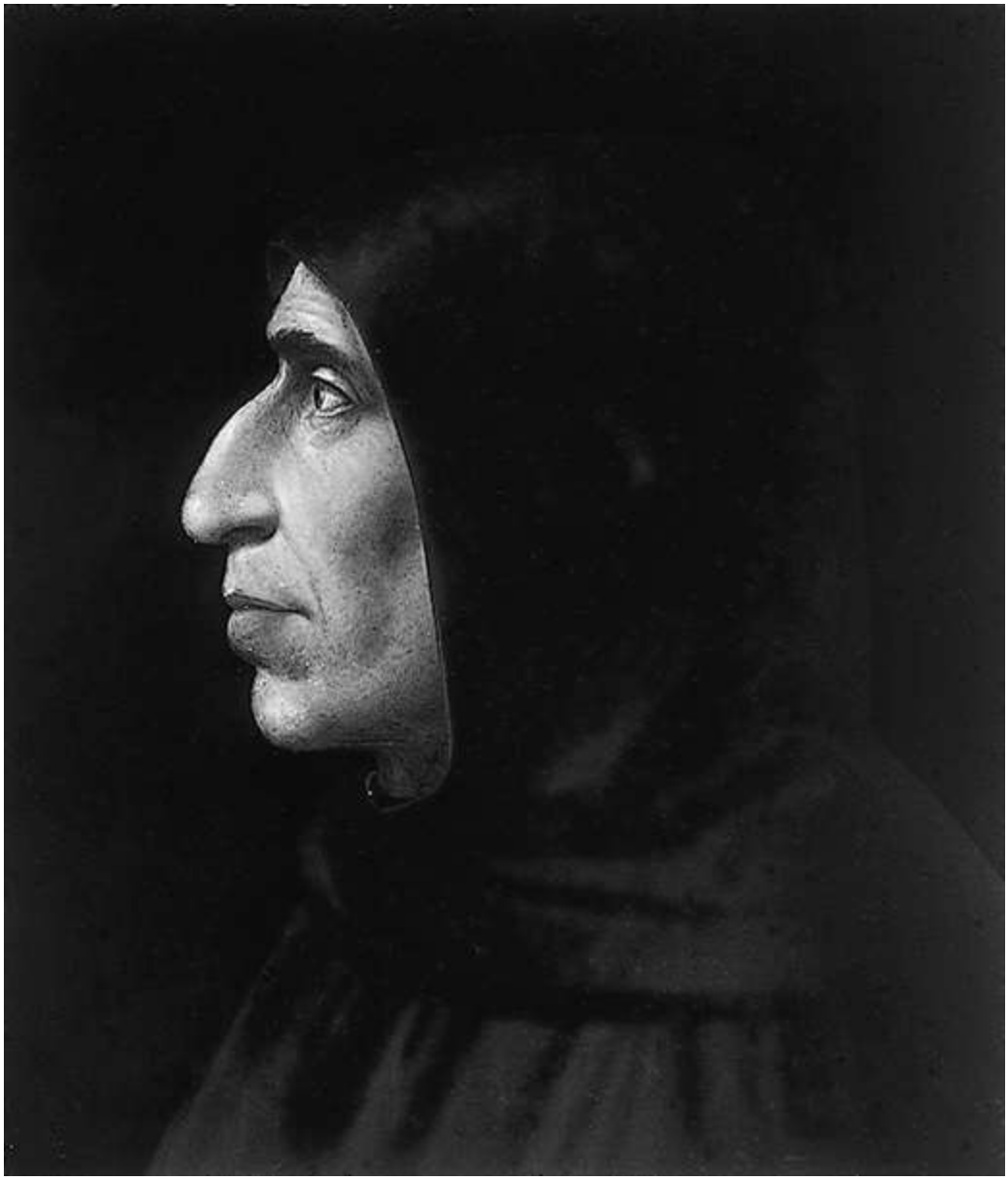


图6：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从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处在了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

11月8日，在萨伏那罗拉的狂热崇拜者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的煽动下，佛罗伦萨市民成功驱逐了美第奇家族。

与此同时，教皇不断向法国国王派去特使，却连国王的面都见不到。教皇试图阻止法军前进的策略皆以失败而告终。

11月9日，法国国王进入比萨城。在这里，他会见了以佛罗伦萨特使身份前来的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对法国国王说：

> 基督徒的国王啊，你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你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你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
> 不过，国王啊！如果你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你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你，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你！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你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

11月22日，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波利之后我将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
>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军驻军十多日，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

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12月10日，法国国王进入教廷领土维泰博，兵不血刃。

12月15日，法军逼近罗马的消息传来，惊恐的罗马市民开始逃难。

12月18日，法军大部队越来越近，离罗马只有70公里。教廷宫内忙成一团，要将贵重物品搬至圣安杰洛城堡。

12月23日，罗马完全孤立，罗马的豪族权贵相继倒戈。

12月24日，罗马市民代表会见教皇，追究教皇使事态发展至此的责任。由于恐怖日益逼近，枢机主教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纷纷倒向法国阵营。教皇身边只剩下六位枢机主教和千余名近卫兵。

下午6时，法国国王下达最后通牒："打开罗马城的所有城门，不准抵抗！"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终于向法国国王屈服，差人送去认可国王要求的回信后自嘲道："法兰西人只是用白垩在要征用为住处的房子上画个标记，没费吹灰之力。就管这场战争叫作'白垩战争'吧。"

12月31日，法国国王在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等的陪同下，在罗马市民的一片欢呼声中进入罗马城。

沿台伯河岸边整齐排列着36门大炮，教皇在炮口瞄准之下迎来了新的一年。

一 1495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495年7月7日。早晨，特急信使带着福尔诺沃战斗的捷报抵达罗马。同盟军与法军昨天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是法军溃逃，因而对我们而言，好歹也算是一场胜利。原本可以取得彻底胜利，但意大利军照例由佣兵队长组成，他们贪恋敌军丢弃的物品，拼命抢夺而不去追击敌人，从而未给敌军以致命一击，致使法国国王逃匿。

尽管如此，教皇对这个捷报还是感到相当高兴，午餐时甚至让人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西班牙葡萄酒。与教皇共进午餐的有卡拉法、洛佩斯、切萨雷、蒙雷阿莱、圣乔治、帕拉维西尼六位枢机主教。他们在危急时刻都没有抛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回首想来，这一年过得似乎挺长，实则很短。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正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这场战争像是“白垩战争”，又像是“刀切黄油”那般简单。然而，把他逐出意大利亦非难事。从国王与教皇一对一见面的那一瞬间起，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便瓦解了。22岁的查理不是63岁老辣外交家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能在永恒之都罗马见到教皇这位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这让查理激动不已，使他从一个率领9万大军的国王变成了一个易动感情的朝圣者。他甚至没有感觉到，教皇天才的外交技术已经使他那些十字军远征、召开公会议逼迫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以改革教会、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等等的要求不了了之。不过，国王似乎并未放弃征服那波利。他于1月底率全军出发，离开罗马，向那波利进发。他的运势似乎从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首先，为牵制教皇而带走的人质切萨雷[7]枢机主教逃脱了。教皇托了这个19岁大胆儿子的福，行动恢复了自由。他旋即开始了复仇之战，号召各国结成反法同盟。各国都对法国国王如此轻松地征服意大利感到嫉妒，教皇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切。因而教皇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响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了同盟，甚至连引狼入室、把法国国王招进意大利的罪

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也加入了同盟。意大利其他各国也全部加入了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影响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改变支持法国国王的态度，传过话来表示不参加这个同盟。

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查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慌失措，从征服那波利的醉梦中清醒过来，决定紧急返回到法国。已经传来了同盟军正在集结的消息。5月20日，国王从那波利出发，急行军北上，他甚至没有在佛罗伦萨歇个脚。一直在波吉邦西等候的萨伏那罗拉向国王鼓噪说，如果国王不再来意大利，不推行上帝命令的教会改革，灾难将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但这也没能使慌张的国王缓解一下心情。

但是，刚翻过亚平宁山脉，他们就遭遇了同盟军，结果只剩下没有全军覆没。今天下午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说，查理抛掉了所有的行李，甚至自己一方的士兵，好不容易到达阿斯蒂，与奥尔良公爵路易指挥的友军会合。他气都没喘一口，当即翻越阿尔卑斯山而去。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对意大利来说实在是毫无颜面的一年。法国人还留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老百姓管它叫“法国病”[8]。这种病由法国大兵传染给那波利女人，再由这些女人传染给意大利男人。这病还无药可治，也没有别的办法。听说法国国王自己也患有这种不体面的疾病。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16日。这几天，梵蒂冈的宫殿中天天在传一件事，说教皇终于开始解决萨伏那罗拉这位佛罗伦萨修士的问题了。传言起于一件事。一连几天卡拉法枢机主教都被教皇叫去密谈。卡拉法枢机主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者，人们知道这位高级神职人员过去就与萨伏那罗拉关系不错。

不过，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萨伏那罗拉的态度会相当严厉。回顾这一年，无论是在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方

面，还是在如何应对意大利的政治方面，这两个人的立场都处处针锋相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21日。今天教皇把我召去执笔一封口述的信函，这是一封给萨伏那罗拉的信件。亚历山大六世像往常那样用低沉而具穿透力的声音慢慢口述。我在旁边记录，却抑制不住意外的想法。这封信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颠覆了整个梵蒂冈的预料。这封信字面平稳，含意却相当复杂。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问候真正的儿子并带去祝福！

我从多人得到的信息得知，在主的葡萄园里劳作的农夫中间，你是格外勤奋的一位。我祝福你，并赞美把这种恩惠带到人们心田的万能的上帝。

我毫不怀疑，靠着把这种恩惠带到人间的圣灵，你可以把上帝的言语传播到基督教民中间，并让它们结出百倍的果实。从以往的经历中我明白，你秉持着这种自觉和目的，因为你是在通过说教启示民众，而这只是在为上帝服务。

不久前我刚得知，你在与民众的正式讨论中，预言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并说那不是你自己的预言，也并非来自人类的知识，而是上帝的启示。

这原本是属于我这个牧羊人的义务，我想尽快与你本人晤面，从你这位上帝选中的人的口中直接聆听一次上帝的启示。为此，我希望你能到访我处，权当服从。服从是我们基督教徒最高的神圣德行。我将怀着父爱和基督徒之爱迎接你的到来。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7月21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回信：

向教皇陛下祝福，亲吻神圣的御足！

服从上司之命乃尽人皆知之事。正如《路加福音》所说，“听命于汝者即听命于我者”。但我知道，那是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言语上的服从。正如陛下的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有过的先例……

造访从未亲眼见过的罗马是我长期以来的热切期望。我一直想参拜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教堂，瞻仰圣人遗物，恭敬地接受陛下的祝福。如今，教皇陛下赐命予我这个无名鼠辈，又燃起了我的这一热切期望。

然而，我前往罗马尚有诸多障碍。我接到陛下的命令诚惶诚恐，欣喜万分，但却不能从命。这并非出于我的意志，而是由于几件迫不得已之事，我愿在此不揣冒渎向陛下解释。

首先，发烧和痢疾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尤其是今年，疾病久拖不愈，我的胃和其他器官均已衰弱，已不堪劳顿。医生甚至说，如果不立即停止一切布道和学习活动，我的生命也许不能长久。

第二，上帝通过我把这座城市从流血事件和恶习中解放了出来，把它建成了一座和谐和依神圣法律治理的城市。但无论是在市民中，还是在外人中，还有很多人对此心怀不满。他们正在执拗地寻找机会以回到从前。由于总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便将愤怒毫无理由地转移到我的身上。因此，他们屡屡阴谋对我使用毒药和刀剑。如果不带护卫，我甚至不能安全地走出修道院。我去见法国国王时，热爱自己共和国的市民组成了卫队，我受到了他们的严

密保护。即便如此，走出国境还是令我担心。

我相信上帝，不想去试探上帝。我的判断是，必须谨慎加谨慎，丝毫不能懈怠。《马太福音》有云：“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

第三，上帝已着手的这座城市的改革尚未完成，为了取得完美成果，需要我日日努力，一旦懈怠，立刻就会遭到伺机破坏的恶人毁坏。谨慎而诚实的人们也在说，我去罗马，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莫大的损失。想必教皇陛下也不会因我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未能从命而感到不快。因为我离开这座城市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但愿我能够尽早地以宽松的心情造访罗马，去实现教皇陛下的期望。

我曾在公开场合预言过意大利灭亡和完成教会改革是将来所要发生之事。教皇陛下说想听我亲口说这些事。如果是那样，尽可以去读我所写的东西。一俟印刷完成，我将立即奉上一部。书中所写均为上帝之命。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放在契约柜中，上帝不允许将它打开展示给该死之人。也有人说我是伪预言者，不过他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我的预言成真。他们会怕得发抖，他们会遭到毁灭。

最后，愿陛下接受我充满诚意的解释，理解我强烈的服从之心。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5年7月最后一日
教皇陛下忠实的儿子、卑微的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4日。今天，佛罗伦萨大使邦西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回信。

教皇问大使道："我的信是私人信件，回信要大使亲自带来吗？"

大使稍稍惶恐地答道："萨伏那罗拉对我们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物。"

教皇的目光在大使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让大使退下，命站在一旁候着的我念信。我开始念信。在念信的过程中，我心里涌出了一个想法：一句话，这封信不过是一堆谬论。

萨伏那罗拉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是不是认为罗马不知道他在写这封信的三天前进行了长时间布道的事实？其次，他说敌人太多，自己出不了佛罗伦萨国境。可是，他却去了卢卡。他不来罗马，还引用了相信上帝但不可试探上帝、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等《圣经》上的文句来辩解。总之，他似乎想说自己不是胆怯而是谨慎。然而，这只证明了《圣经》的文句通过不同的解释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就像星象占卜适合于任何人一样。

这位修士也过于傲慢了，他竟说离开佛罗伦萨违背上帝的意志，还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甚至对教皇说，如果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会寄一本书来让教皇读。这样，他尽管在信中把自己说成是无名鼠辈，是卑微的仆人，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内心。

我念完了信，教皇双手抱在胸前，闭着双眼，沉默良久。然后他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修士不是傻瓜。他像是在故意耍滑头。狡诈还要看你这滑头能不能耍到底，你有没有这份冷静和决心。如果没有，那你就是自取灭亡。如果你没这份自信，倒不如当个傻瓜好些。如果换了圣方济各，那他一定会马上赶来罗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000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

上教坛，人们便忘却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需要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只有法国国王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路线。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重返意大利，结果一定会使佛罗伦萨从中受益。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Consilio Maggiore）制度，这正是民众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人民政府的胜利和骄傲所在。

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法国军队撤到阿尔卑斯山背后以来，只有不加入同盟的佛罗伦萨四面受敌，人们不是没有担心。但是，他今天的话打消了这种担心。最近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诏书（致多明我会两个修道院——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儿子致以问候和祝福！

我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现在教会的首长。只要上帝圣恩不断，为基督教的繁荣和发展，为坚持信仰、救赎、和平，对那些把上帝的忠告不可理喻地改得晦涩难解而随意利用之人，我将不惜给予任何处罚，哪怕是动用叱责之鞭。我要竭尽全力击溃独断专行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隐藏在单纯朴素的面纱之后。

所有这些往往产生于民众之中，产生于神父和修士之中，产生于分派、异教徒和风俗的变革之中。为了不使整个教会的领导和平安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些恶例导致他人的错误，我在此表示我的谴责之意。

我已经知晓布道修士会所属的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所干的以

下行径：

（一）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二）企图把意大利的种种趋势引向狂热信仰的方向。

（三）在没有任何符合教理的证据且违反教理的情况下，向民众宣布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差遣。

（四）他自称曾与上帝对话。如果说话如此简单轻易，就与任何异教徒所说无异。这项看不见的使命需要由奇迹或《圣经》、圣典来证明。

（五）他说，如果他欺骗了众人，就等于差遣他的上帝和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也欺骗了众人。这是一个可怕可憎的逻辑，需要进行驱魔。

（六）他说不相信他傲慢断言的人都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如果放任他撰写、散布愚蠢言论而不予以惩罚，不仅会纵容伪信仰愈发大胆妄为，还会让他们以改革堕落的表面形式使恶弊渗透到真正的信仰之中。

我已一忍再忍了很长时间，等待着他从自己无聊的预言者的使命感中醒悟，等待着他自己撤回他那会使信徒动摇的、貌似预言者的不公平言论。……

最后我不得不苦恼地说，我背叛了我自己对他的信任。我亲自给他写了信，命他造访罗马，与他亲切见面，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真相。可是他不但不服从我的命令，还利用我的信，在不识字的信徒们面前肆无忌惮地进行更为大胆狂妄的说教。这比给我写信寄书更让我痛苦。

可是，我本人在这个时期不得不埋头于恢复意大利和平这项艰难的工作之中。于是，我决定把萨伏那罗拉的问题交给多明我会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塞巴斯蒂亚诺·马吉修士解决，由他们在自己的修会中根据会规进行审判和处罚。

我严命你们要让萨伏那罗拉对服从之德有所醒悟，而不要给他以开除教籍的处罚。也就是说，要让他服从得到我的信任来处理这一问题的会长的任何命令。

在决定如何处置这一问题之前，禁止萨伏那罗拉修士向民众布道或讲解教理。

希望其他修士把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作为自己的正统统帅，服从他的决定，而不要重犯萨伏那罗拉的恶例。

命多米尼科·达·佩夏修士、托马索·普西尼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于9日内出发前往博洛尼亚，遵会长之命，移居佛罗伦萨以外的其他修道院。

对以上所有命令不得提出异议。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9月8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9月8日。今天完成了教皇诏书的口述笔记工作。诏书的文字委实严厉。不过这有其内情。负责萨伏那罗拉问题的多明我会高层都与萨伏那罗拉有着共鸣。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人卡拉法枢机主教与教皇之间反复商量的结果。教皇处在这一立场不能一直采取温和态度。教皇的方法是表面上严加斥责，把问题交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人去实际处理，而不去彻底追究萨伏那罗拉。

波吉亚教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原文太长，此处沿用原文文体，仅译大意）

致受到祝福的教皇陛下，亲吻圣足！

昨日，我们修道院也公布了教皇陛下信函。教皇在这封诏书形式的信函中将我们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归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还命最受我信任的三位修士前往博洛尼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吉洛拉莫所说、所写、所正式布道的事情违背了教理，会把上帝的教会卷进丑闻。信中把我交给了伦巴第修士会的会长处置。

接到此信我诚惶诚恐，这封信是教皇陛下为拯救教会和我们这些修士呕心沥血的证据。

可是同时，我害怕人们的恶意会蒙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陛下，这使我非常痛苦。陛下分别对我提出了几点指责，也请允许我逐项向陛下做如下解释，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过于冗长。

（一）首先，您说我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那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我从来没有说教过任何反教理之事和《圣经》未载之事。假如我说过什么，我十分愿意在教会，亦即在教皇陛下的面前悔改。

可是，要说我做的事反教理，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不把民众引向坏的方向，预言未来就不是恶。正如《圣经》所记，上帝通过预言者做事。因而，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存在，且从未被禁止过。

（二）您说我企图将意大利各种形势的变化引向狂热信仰。

这也是不实之词。我从5年前，应该是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进行着同样的布道。也就是说，那已是意大利的各种情况发生变化之前的事了。

（三）您说我说过自己受到上帝的遣使。

这同样也是不实之词。我没有这样说过，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在我写的那些谁都能读懂的读物中，我只是说我与所有的布道师一样，受上级神职人员派遣而来。这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我只受上帝驱遣。

（四）您说我说过我与上帝有过对话。

如同佛罗伦萨市民所知，我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即使我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圣经》、教理还是俗法都没有对说自己与上帝对过话的人有所惩罚，所以这点也必不为罪。相反，如果有哪部法禁止这样说，那才是错误的。

（五）您说我说过，如果说我的布道错误，那么上帝和基督也都错了。

我并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这样说，只是作为假设而言。因为我的说教并非我的创造，我只是讲了《圣经》中所记载之事。我说，如果我说错了，那基督也说错了。这也为罪吗？

（六）您说我说过，不相信我布道的人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过。我说的是，已经知道我的话是受上帝的启示，却又不信我的话，这是已不再享有上帝恩惠的证据。我没有说那样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七）您说我说了、写了一些愚蠢之事，如果放任自流云云。

佛罗伦萨人都知道我没在说愚蠢之事。会有2000、3000，1万个证人证明我的说教都已成为佛罗伦萨救赎和改革的力量。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证明，这一切不是我之所为，而是上帝立我为中间人所为。

（八）陛下说您一直在忍耐着，等待我从自以为是的预言者的态度中觉醒。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预言者，也没有说过自己是预言者的门徒。

不过，即便我说过这样的话，也会因为预言了未来就必须受到惩罚吗？如果是那样，以赛亚[9]、耶利米[10]，甚至连主耶稣基督都得受到惩罚。而且，虽然预言没有立即实现，也不能说做出预言的人是伪预言者。这些预言者的预言终其一生也未实现。预言的实

现必须等待。而我相信我的预言一定会实现。

（九）陛下写道，我所说的话引起了教会内部的动摇。

陛下，由于我的说教佛罗伦萨实现了和平，不仅佛罗伦萨，整个意大利都知道这一点。充斥着杀人、阴谋、背叛的佛罗伦萨已然消失，一个统一的国家诞生了。佛罗伦萨如此统一、强大，就连法国国王南下途中经过佛罗伦萨时都不得不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佛罗伦萨这样阻挡住法国国王的力量，恐怕法国国王和他的军队早已把整个意大利变成了火海。

如果相信了我的说教去行事，意大利必不会如今天这样遭到如此破坏。如果更多的意大利人听从了我的说教，他们就会预知意大利今天的屈辱，为得到和平而打开救赎之路。因为听从了我的说教，人们就会懂得悔改是意大利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整个意大利都应该感谢上帝通过我做这些事。因为人们如果能像佛罗伦萨那样懂得只有悔改才是救赎之路，意大利就能规避战乱。因而，任何人都会认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

（十）陛下说我不但不服从陛下之命云云。

这件事缘于我在上一封信中解释过的原因。我如今不能去罗马是因为三个原因：健康原因；敌人太多无法到佛罗伦萨以外的地方去；我现在离开佛罗伦萨对其不利。陛下似乎还未收到我的上一封信，我感到吃惊。

我的敌人很多，正应了那句话：讲真话者树敌多。一切都是设计陷害我的人谋划的。如果陛下认为有必要，可以派陛下信赖之人前来佛罗伦萨调查，一切将会大白于天下。

如果调查证明我错了，我愿在修道院、在公开场合或面对全体市民修改、收回我说过的话。我匍匐在陛下脚下发誓，我将遵从陛下和圣罗马教会所下之判决。

1495年9月29日

陛下的儿子、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0月5日。今天收到萨伏那罗拉的信件。我在教皇面前念了这封信。教皇听后让我请来碰巧来梵蒂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让他也看了这封信。看完信后，枢机主教的表情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教皇说道："陛下，您这下可以理解萨伏那罗拉并不反教会吧。"

教皇用平时那种平稳的语调回答道："是吗？卡拉法枢机主教，你也那么想吗？"

教皇接着说道：

"萨伏那罗拉在信中的反驳，着实写得含混不清。他一方面否定我对他的批评，说他并未说过那些话，另一方面却又使用了"即使如此"的说法。打个比方来说他的逻辑：自己没有偷面包。即使偷了，那也是为了拯救苦于挨饿的家人。这种辩解既不正确，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点放一放。

"第一，他说，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从未被禁过，所以不构成反教理。这话说得不错。但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他相信自己就是预言者，这样的反驳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第二，他似乎想说，他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在意大利诸般情况发生变化之前就已讲过，所以他对意大利形势的变化没有责任。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对他那话说了多少年没有兴趣。我的问题是他所说的话对现状起了怎样的作用。

"第三，他说他不记得说过自己只受上帝驱遣的话。这实在是幼稚的托词。所谓'只'，是也包括上帝在内的意思。那不就等于说他是受上帝驱遣的人吗？

"不用再一一指出他反驳的含混之处了。那第四条也是，他说

他没有明确说过与上帝有过对话，这真是徒劳。读了他所有这些反驳，我的眼光无法离开这样一个事实：他彻底相信自己是受到上帝驱遣的预言者。他在第六条里写道‘我知道我的说教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在第七条里他写道‘上帝立我为中间人’。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理解或是理解不了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并没有否定预言者。但在当今基督教世界里，什么人都叫预言者，这可怎么行？如果很多人都随意称自己是预言者，去直接鼓动民众，人类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如果他经过圣罗马教会内部审查获得认可则不打紧。萨伏那罗拉无视了这一点。不过，即使无视了这一点，他如果没有给民众造成恶劣影响，使他们动摇，我也不会认为是一个问题。但他并非如此。

“总之，他在这里的言论明显是反教会的。他就像在自掘坟墓。他说如果相信他的说教去悔改的话，意大利会免遭今天的破坏。但是，如果只是悔改就能使法国国王不率大军入侵意大利，那我情愿悔改一百次！

“可实际上，由于他过分宣扬悔改，反倒给法国国王灌输了本可以不说的多余之事，而且他还不打算停下来。

“我不想对他这个预言者是真是假下判断。但我要祈祷，但愿他的预言不中。因为我认为，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我的职责就是要努力避免他的预言言中而使意大利遭到破坏，人民遭受痛苦，即使那是上帝降临的考验。

“我，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圣彼得的继承人、受主耶稣全权委托的教皇，握有对自己下属之一萨伏那罗拉修士严厉处罚的充分理由。”

卡拉法枢机主教脸色铁青。亚历山大六世见状笑道：“卡拉法，不必那么担心。我不会那么急躁。萨伏那罗拉不是在最后几行中说，他要遵从教会的审判吗？”

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懂得等待的人。论能力、权

力、财力，在枢机主教中他可是数第一的，但他在时机确实到来之前，从不觊觎教皇宝座。他一直等了34年。现在，他不会把已经清一色染成萨伏那罗拉颜色的佛罗伦萨彻底推向敌人一方。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儿子并致以祝福！

在上次以教皇诏书形式发出的书简中，我花费了很多篇幅对佛罗伦萨市民由于你的说教而产生的困扰表示了遗憾，并说明了遗憾的原因。因为在你的说教中，一面断绝对真理的欲望、忽视对德行的赞扬，一面又以圣灵的启示预言未来，暗示其永恒性，并妄下断言。这样的做法会使单纯朴素的民众远离圣罗马教会的救赎和服从精神。

在你的布道中，与其讲预言者、预言力之类，不如讲只有和谐和平才是第一位的。而且，现代的形势不是单靠你所说教的那些教理性的内容所能解决。非但如此，我应该说，你所说教的那些东西甚至在完全平稳的时期都极易成为不和谐的根源，在当今这样不确定、不稳定的时代，这些就更加靠不住了。我知道众多的灵魂处于危机之中，我出于义务写了那封信。为把你叫来审判问罪，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才给了你那样的命令。

但是，不久前我与圣罗马教会的几位枢机主教谈了话，又从你的信中得知，出于一个良好基督教徒、一个笃信者之义务——服从精神，你愿意对自己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服从圣罗马教会的审判。我非常欣喜地欢迎这一点。我开始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并非你恶意为之，而是你过于热衷于收获主的葡萄园中的成果，凭着单纯的心情，未经充分思考之所为。不过，你的这种做法否定了人类社会的经验。

正如你认为我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一样，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

的问题。我决定再次给你写信，也是对你来信的回复。

我命你依照神圣的服从之德行事。今后停止一切布道说教。不论是面对民众、是在修道院内，抑或是在秘密集会的场合，都不允许你说教。我由衷希望你能服从这道命令。

不过，这不是无限期禁止。你现在没有士兵环绕就不能出门。这样虽然安全、踏实，但这种状态与神职人员很不相称。等这样的状态改变之后，等你能够到罗马造访我，那时就解禁了。你的解禁或许得等到我经过深思熟虑，对你的未来做决定的时候；或许得等到我选派胜任而诚实的人到佛罗伦萨你那里去的时候。

如果你按照我所希望的做到这些，那时，我会让诏书中的那些命令统统失效，好让你和平地工作下去。

1495年10月16日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6日。家业繁忙，好长时间连教堂都没能去。今天，我觉得能够听到久未聆听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便去了圣母百花大教堂。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登坛布道了。前几天，11日、18日、25日，他又开始了布道。听说他今天还要布道。

可是，登上布道坛的是多米尼科修士。听他的解释，萨伏那罗拉不得不停止布道，点名让他前来代讲。多米尼科修士布道结束后，人们一边走出教堂，一边窃窃私语。听他们说，身在罗马的教皇让萨伏那罗拉修士停止布道。夏天就听人传言说教皇给萨伏那罗拉写了信。难道禁止布道与那封信有什么关系？可就算如此，那教皇为什么要命令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呢？对我这样既和宗教界人士又和政府官员均无深交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这件事。不光是我，其他很多人似乎也都闹不明白。甚至有人这样说：波吉亚教皇

在罗马过着像皇帝一样堕落的生活，而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佛罗伦萨以其清廉的私生活获得了人们的尊重，教皇嫉妒他的声望。也许真是那样。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最神圣的教皇陛下：

对我们这个处在混乱和危机之中的共和国来说，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的存在和教诲是最大的希望，他可以防止现状更加恶化。……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修士是一位真正善良的人，他有着高尚的私生活，行为无可指责。他信仰完美，布道卓越。所有这些，都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愿意倾听他的布道，倾听他对未来的预言，愿意按他的所说行事，就像旧约《申命记》[11]中所记摩西的情况一样。

因此，如今他在这个国家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了。……

然而，有那么几个人嫉妒他的德行，企图扰乱我们的平安。可能这些人向陛下进了谗言。人类中总有一些人心理变态，把好人想得很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只有我们佛罗伦萨人才是萨伏那罗拉最合适的证人。……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我们佛罗伦萨人需要他，需要他这位献身上帝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布道。我们的城市，因为他而懂得了悔改，知道了要为上帝而奉献。

对这样的民众来说，没有比禁止他布道，比听不到他布道更加悲哀的事情了。

因而，全体市民向陛下表示深深的谦恭之意，并愿您将慈爱赐给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让他能够像以前那样引领我们的城

市。……

陛下听进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我们政府人员、受到佛罗伦萨共和国全体市民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赞美和感激。……

全城和全体市民向教皇陛下表示由衷的谦恭之意和衷心的恳望。

于市政厅
1495年11月13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1月16日。教皇给萨伏那罗拉的信已经发出一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今天，教皇宫收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写给教皇的信。我感到这是萨伏那罗拉不写，而让政府替他写的回信。

我在教皇面前念这封信的时候，教廷法院副审判长诺莫利诺主教也在场。诺莫利诺很年轻，才33岁，教皇很器重他的才华。听完信后，教皇没有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个字的感想，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凝视了一瞬间。他也只是望了一下教皇。然后，教皇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和诺莫利诺走出来，在回廊里交谈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意见一致。

我们认为，佛罗伦萨政府的信就像给萨伏那罗拉出了一份身份证明，但对消除教皇对他的疑虑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倒一定会让教皇加强对他的监视。那封信充分表现出佛罗伦萨已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相反，那封信不但没有打消反而肯定了教皇的担心，即萨伏那罗拉与佛罗伦萨在政治上的关系。

然而，即使如此，佛罗伦萨人还是不懂人类社会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善良的人、清廉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好领袖。

二 1496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少男少女蒙着头巾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连孩子们的玩具都抢。听说这是崇拜萨伏那罗拉的行动。

“看那些小修士！”

大人们吃惊地窃窃私语。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来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清除已经堕落的习惯”。

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6日。今天是狂欢节。直到去年还是按传统过的节，孩子们玩掷石块的游戏，在路上逢人就讨钱，用讨来的钱瞎胡闹。但今年看不到这些了。也许是因为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教，让人们改掉这些陋习的缘故。今年的狂欢节不但没有玩危险的掷石块游戏和讨钱取乐，而是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大约有6000人吧，都是些少年，年龄从五六岁到16岁之间，他们按照佛罗伦萨的四个区分别列队，前面举着自己的区旗游行。每个人手里拿着橄榄枝，口中不断呼喊着口号：“基督万岁！我们的女王处女马利亚万岁！”

沿街的大人们十分感动，流着泪欢迎少年队伍，大家纷纷议论道：“这、这个新变化才是上帝的所为！”

我觉得，这一幕简直就像曾经的耶路撒冷场景的再现，人们簇拥在基督周围，赞美着他：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你以上帝的名义降临！

萨伏那罗拉的弟子多米尼科修士率领的这支少年队列来到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时，教堂内外已经挤满了人，但男女分处不同的地方。男人的一边比较安静，有些来看新鲜的人。而女人的那一边哭叫声和欢呼声大作，热闹非凡。

少年们在人群中四处走动，为穷人化缘。人们竞相响应，还有人投出了金币。除金币以外，还有人捐出了真丝头巾、银匙、钩花手帕、台布，琳琅满目。没有一个人舍不得。所有人都想把身上戴的一切献给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听说光是金币就募集到300达克特。

我写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内心所感。我的几个儿子也加入了“萨伏那罗拉少年兵”。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7日。今天是四旬节[12]的第一天。听说萨伏那罗拉要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我便去听讲。在去教堂的路上，我的脑中一闪：教皇禁止他说教，这事究竟怎样了呢？可是进到教堂，里面的情形让我十分惊讶，便忘掉了这个问题。

宽敞的教堂里挤满了人，动弹不得。特制的台阶沿墙向上排去，上面坐了许多少年。这临时搭建的看台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女人一排排坐在少年对面的临时看台上，人数惊人。

他们开始合唱圣歌。少年唱完一段，女人接着唱下一段，循环反复。人们听到这歌声，个个心荡神驰，不禁泪下。男人站在地上，里面有人曾经出入于美第奇家，教养很高。他们也很受感动，说这是上帝所为。

现在还在四旬节期间，只要萨伏那罗拉一直布道，这样的场景

就会延续下去。如果那样，今后每天都会发生像今天早晨佛罗伦萨很多家庭都发生的事情——孩子们清晨起床，自己去教堂，到母亲去的地方，同她们一样听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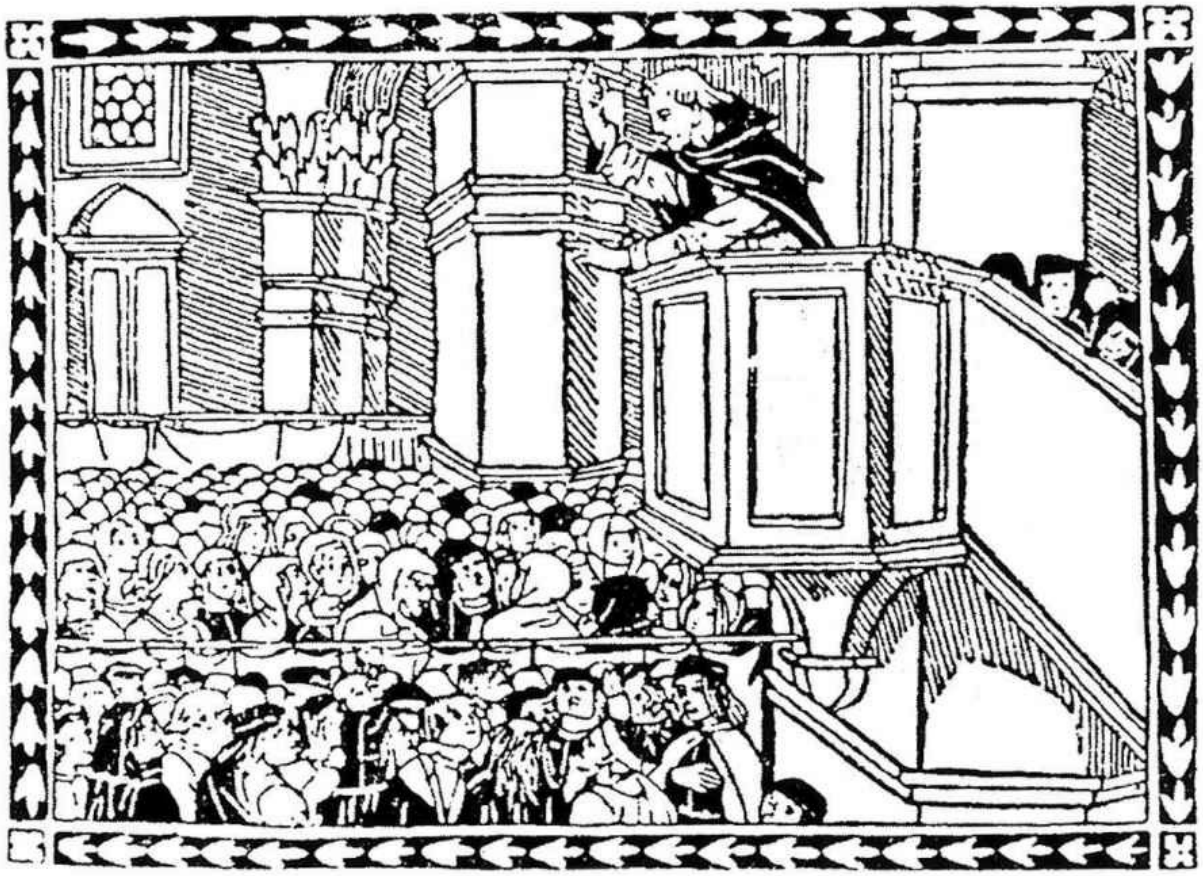


图7：萨伏那罗拉在布道

我还在想着这些，萨伏那罗拉在武装信徒的簇拥下走进了教堂。群众中响起巨大的欢呼声。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信徒的护卫下登上布道坛。群众一齐向他欢呼，他环视大家，作为回礼。他的眼睛宛如燃烧的炭火。群众看见他的眼神，安静了下来。在热气蒸腾的沉默中，响起了萨伏那罗拉那一贯高亢的声音。

“修士们！难道你休息了吗？为什么不上战场去救助你的士兵？

“我的孩子们！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去战场，但我在战斗，在

保卫这座城市！上帝垂爱，城市保住啦！

“修士们！你怕死吗？

“我的孩子啊！我当然不怕死！如果怕死，恐怕就不会来到这里。因为我走上这个讲坛就置身于比以往更大的危险之中！……

“我的孩子啊！我应该服从上峰的命令吗？可是，上峰不能命令我违反我的信仰。

“教皇不能命令我违反基督教徒的爱和福音书。教皇恐怕也不会那样做。但如果他真的命令我那样做，那么，我会这样回答：

“你现在不是牧羊人（pastore，指教皇），你也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是一个走错了路的人。《圣经》中也写道：‘服从别人，更须服从上帝！’……

“哦，上帝啊！我祈望和平！我想安稳地生活！但你把我带到了外面。你的光芒让我觉醒！我想休息，但无处休息。我想沉默，但无法沉默。你的话，燃烧着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假如我没有登上这个讲坛，我可能已经成为骷髅！”

听众在哭泣。人们的感动甚至要使教堂爆炸。萨伏那罗拉继续说道：

“少年啊！你们才是我的希望、上帝的希望！你们会治理好佛罗伦萨，因为你们没有像父亲那样沾染恶德。

“大人们把关于我的事误告罗马。如若不是那样，那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遵从我的教诲。我在此预言，你们大人的罪过将使鞭子抽打在身。不信上帝的人将在战争和瘟疫中灭亡！

“市民啊！如果你们活着却不敬畏上帝，如果你们活着却不爱今天的自由政体，你们就将被上帝灭亡！幸福和救赎只会赐予你的孩子们！”

萨伏那罗拉结束了第一天的布道。大家走出教堂，泪流满面，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一位难得的人！他是预言者！这样的声音不绝

于耳。我找到还在哭泣的妻子一起回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少年们从修士那里获得了勇气，他们成群结队，像洪水一样在市内流窜，抢夺奢侈品和女人的装饰品。就连在家门口打牌玩的人，听见了少年来的声音也都急忙逃回家中。这几天路上女人的服装也明显朴素起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城里满是少年。他们聚集在城墙附近、饮食店前，麇集在马路上。城里到处都能见到他们。如果有人对抗他们，生命可就危在旦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8日。这几天出现了黑死病的兆头。但愿不要太严重。

今天是四旬节第三个礼拜日，我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那里已经聚集了14000到15000人。他一出现在布道坛上，“基督万岁”的声浪简直就要冲破教堂大门。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真正的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从谴责罗马的堕落讲起，然后预言上帝鞭子的恐怖，最后让大家悔改去接近上帝。布道开始的部分使听众十分震惊和十分恐惧，我在这里不能不记下来。

“我只能认为《旧约》中阿摩司[13]预言里肥壮的母牛意味着罗马的娼妓。那么，罗马到底有多少娼妓呢？1000人？太少了。10000人？对罗马而言这也太少了。14000人？还是太少了。罗马的

娼妇，就是居住在那里的所有男人和女人！

“他们统治着上帝的教会，让教会蒙羞，把教会变成了娼妇们的畜舍。我要把它变成猪圈和马厩。这样要比变成娼妇的畜舍更合上帝之意。不过，当上帝的愤怒之剑降临时，他们就将灭亡。那时再悔改也是徒劳的，上帝已经不会宽恕他们了。

“我们佛罗伦萨人，不，是居住在罗马以外的所有人，当真要服从罗马教廷的命令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服从他们违反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的命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6日。雪下了一整天。到傍晚积雪已有半布拉乔奥[14]（约30厘米）厚。农作物要深受其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是棕枝主日[15]。萨伏那罗拉修士让少年们排起节日的队列。少年们人人手执橄榄枝，头上也装饰了橄榄叶，他们手拿着一拃（spanna，约20厘米）长的十字架沿街游行。这些少年大约有5000人，此外还有大群少女加入了队伍。她们也手捧橄榄枝，头戴橄榄叶做的花冠，手拿十字架。所有人都穿着白衣。

这些少男少女队伍的后面跟着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官和同业行会[16]的委员。他们后面还跟着很多男人，再后面是从未有过如此多数量的女人。在佛罗伦萨，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节日游行。在昨天下雪的土地上行进着白色衣衫的队列，队列中点缀着红色的十字架和绿色的橄榄叶，人们像是在观赏既庄严又美妙的幻境。

游行队伍到达萨伏那罗拉布道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时，修士们手

捧主耶稣的画像，也从对面圣马可修道院的路上走了过来。画像上画的是主耶稣在棕枝主日骑着毛驴去耶路撒冷的景象。人群中爆发出“基督万岁！”、“我主万岁！”的欢呼声。那声音听上去不仅是游行队伍里的人在欢呼，简直就是全城在欢呼。

教堂里，看台一直搭建到高窗户之下，少年和女人像往常一样坐在看台上。看台上坐不下的人站在地上，教堂中挤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这时，萨伏那罗拉登上布道坛，声音更加高亢。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根据福音书，主耶稣就这样把圣彼得指定为自己的代理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于是，教皇也是基督的代理人。

“但是，我们无须服从教皇所下的所有命令，如果这些命令根据的是错误的信息，命令将没有效力。如果这些命令违反了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那就绝对必须反抗，就像圣保罗曾经反抗过圣彼得一样。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回答上司：你错了。你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不过是一个犯了错的普通人。

“谁不知道，教皇给我发来了诏书，那是为了支援我的敌人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敌人，他们到处说我的坏话，企图陷害我！谁不知道，让我去罗马不但会把我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还会把佛罗伦萨的市民和自由也拖入危险的境地！我们的敌人企图放逐真正的宗教，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

“但是我不能不认为，教皇被我们敌人的策略蒙骗了。所以，我没有选择服从已经受骗的教皇，而宁可选择不服从。

“你们可能会问，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会怎样。我会这样回答：我将在大的方面获得胜利。然而，在小的方面，也就是对我自身而言，我会被凌迟处死。

“不过你们不必担心。因为这个小的方面，这一切，最终也将为捍卫我所遵从的上帝的教理发挥作用。教理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不是教皇的工具，我将战斗到底！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幻觉，我看到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横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鲜血从十字架上汩汩流出。无信仰的人在高兴地用那鲜血沐浴，基督教徒似乎在旁边犹豫是否用血沐浴。

“突然，黑暗笼罩了大地，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火与箭从天而降。这是上帝愤怒的鞭子。沐浴鲜血的人和在边上犹豫的人统统遭到了灭亡。

“我的孩子啊！亲爱的佛罗伦萨市民啊！悔改吧！看哪，上帝的愤怒之剑马上就要刺向你们！逃出罗马吧！抛弃罗马吧！只有这样做，只有悔改并祈求上帝宽恕，才是救赎我们之路！”

布道就此结束了，萨伏那罗拉修士在四旬节的最后布道结束了。我浑身颤抖不止，走出了教堂。我碰到几个熟人，他们是药材香料行会的委员，似乎也是来听布道的。其中一人对我耳语了一番，让我的身体像冰一般冷了下来。

“萨伏那罗拉是真正的预言者。他的预言正在不断地变为事实。政府委员会收到了佛罗伦萨驻米兰大使寄回的报告，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已经表示要再次进攻意大利。听说威尼斯已经开始集结大军，以防不测。”

这个可怕的传言在我从圣母百花大教堂走到近在咫尺的领主广场的瞬间，已经传遍了整个城市。在领主广场，人们忘了回家吃节日大餐，三五成群低声交谈，充满担心和恐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3日。今天是复活节。教皇上午做了弥撒，向汇集在圣彼得广场的群众赐福。可他结束后并未休息，而是度过了十分繁

忙的一天。

教皇首先接见了佛罗伦萨大使。会见时，教皇用从来不曾有过的严厉激烈的言辞，谴责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这个政府是全意大利唯一一个不想参加反法同盟的政府，这个政府还在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贝基大使闻言不禁退缩。

下午，教皇叫来了14位事先接受了邀请的多明我会神学家，讨论了萨伏那罗拉的问题。说是讨论，其实是教皇向神学家咨询，看能否依照教会法把多明我会的佛罗伦萨修士会划给伦巴第布道修士会。

对此，几乎全体神学家都回答说在教会法上做不到这一点。其理由在于，佛罗伦萨修士会过去是独立的，黑死病流行时人数骤减，不得已才归属了伦巴第修士会。但如今，修士人数增多，萨伏那罗拉想要建立独立修士会的想法无可指责。且不论是否可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另行组织新的修士会，都没有理由仅让其划归伦巴第修士会。教皇好像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不过，关于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说、在出版物中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两位神学家认为正确以外，其他12位均回答说，身为布道师，萨伏那罗拉的越权行为已足以对他进行处罚。神学家们的意见是，修士不应对政治说三道四，他的教理过于独断。教皇至少在教理上有了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5日。教皇仍旧不打算行动。对于教皇，教廷里形形色色的猜测满天飞。同情萨伏那罗拉并与他有共鸣的人说，波吉亚教皇还没有放弃说服他的希望。他们从理性上不能理解萨伏那罗拉的说教，但理解他的心情。他们认为教皇的想法大概也是这样。

我实在不相信这样的人。但他们在教廷内部占据了多数，而且卡拉法枢机主教也站在他们一边。洛佩斯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积极的

一员。

另外还有一派谴责教皇的做法温暾无力。他们是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反对萨伏那罗拉有其明显的个人原因。现在，法国正在主张对米兰的领有权，对他的亲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最要提防的就是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一旦法国国王受萨伏那罗拉的煽动入侵意大利，首先遭殃的就是“摩尔人”的斯福尔扎家族。

不过，以我的观察，亚历山大六世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也不想属于某一派。教皇想走第三条道路，首先要使法国国王不进攻意大利。他不是那种受到个人攻击就会生气的人。罗马还没有一个因为写了谴责、中伤教皇的打油诗而受到处罚的先例。也许他心里所想只是保卫意大利不受外敌侵略和维持教会秩序。

萨伏那罗拉说教皇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蒙骗。这话不对。教皇让人把萨伏那罗拉所有的布道内容逐一记录下来，寄到罗马。是我在教皇面前念的这些记录，这不会有问题。教皇还通读了萨伏那罗拉的所有出版物。

情况都这样了，他为什么还不行动呢？我离他最近，连我都很难想象教皇的内心。是因为心情上仍然感到教廷内的萨伏那罗拉派尚很强势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2/3的市民加上妇女和儿童都信奉萨伏那罗拉的缘故呢？教皇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也许所有事情都是他判断的素材。

萨伏那罗拉把自己比作反抗圣彼得的圣保罗。但是波吉亚教皇很像圣彼得，并不狂热。他不似基督的大门徒那样是一个善良的人。何况圣保罗并没有为把自己的说法坚持到底而动用外国军队。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0日。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这样下去，我很担

心庄稼的收成。小麦粉已经涨价了。

今天，我作为药材香料行会委员之一参加了萨伏那罗拉在市政厅大议会会场的布道演讲会。修士为何会在这种政治场合布道，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政府人员、同业行会等共和国的代表都来参加了。我只在这里记录一下萨伏那罗拉布道中让我们震惊之处。在对佛罗伦萨的政治进行了一番说教后，他提高声音说了下面一段话：

“人们会谴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说这个修道士想要钱，想要成为专制君主，想要得到红帽子（指枢机主教地位）。就让我来回答他们吧：如果我想要那些东西，就不会穿着现在身上的这件破修道衣。我不想要俗界的荣誉！

“哦，上帝啊！我不要主教的头冠、不要红帽子！同样是红帽子，我只要你们献给圣人的那顶。我要去赴死，我要红帽子，要那顶染着鲜血的红帽子！”

听到这些，连我都觉得这不是真的。听着萨伏那罗拉的话，我感到是不是为了让他沉默，教皇已经跟他说要给他枢机主教的地位。布道结束后，我正要走下台阶，朋友卡博尼走过来对我说：

“好像教皇跟这位修士说要给他当枢机主教。今天早上我老婆去忏悔，听忏悔教士说，有一个多明我会的教士受教皇之命来佛罗伦萨，向萨伏那罗拉打听他对升任枢机主教的想法。大概萨伏那罗拉当场拒绝了。”

这可是令人恐怖的事情。早就听说过波吉亚教皇用重金贿选教皇的传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教皇是会很容易干出用红帽子收买修士这种事情的。罗马真是令人恐怖的地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31日。这几天愚蠢的流言充斥教廷，说教皇请萨伏那罗拉当枢机主教。理由是法国国王再度入侵意大利的传言不断，教

皇担心，便采取这个策略切断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的关系。

就算这个传言是事实，以下两点也实在根据不足。首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处境已经不像1494年法军入侵时那样孤立。如今只有佛罗伦萨一家站在法国一边，其他各国都表明了态度要与教皇统一步调，共同抗法。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应该说相当轻松，不必要孤注一掷。其次，明摆着的，萨伏那罗拉那么强调反罗马的态度，根本不会接受这类请求。看人眼光独到的教皇应该比谁都看得透。

所以，在罗马没人相信这个流言，即使在同情萨伏那罗拉的人中间，也只认为佛罗伦萨流传这个是件愚蠢之事，把它当成一个笑柄。[17]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9日。雨下个不停。这样的雨会打掉橄榄的果实，葡萄的收成也肯定好不了。城内已经出现了粮食不足的兆头。

共和国的财政似乎也到了不容乐观的地步。每年还得向法国国王进贡12万弗罗林[18]。先不说这。有喜讯传来，说法国国王得了一子。好像这是他的第一个男孩儿。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天是萨伏那罗拉布道的第一天，这次布道将要持续到12月底。我家业繁忙，没空去听。在托尔那沃尼大街开店以后我更加忙了。妻子和儿子们说要去听，我就让他们去了。

同一天的日记：

这些天总有少年团伙列队跟着萨伏那罗拉，他走到哪里队伍就跟到哪里。我见过他们，所以我知道这事。今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这些少年袭击年轻女子，揪下了她的头饰和钩花领子。这下可真的要引起公愤了，听说萨伏那罗拉也在训诫少年，禁止他们使用暴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30日。出奇迹啦！出奇迹啦！

和往常一样，圣母马利亚画像是专为佛罗伦萨画的。今天画像完成，在修士和少男少女的队伍护卫下进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门。就在这时，我看见使者骑着马高擎橄榄枝，穿过圣弗莱蒂亚诺门，沿着阿诺河边的道路向市政厅直奔而去。

守护圣像的队伍停了下来，很快就有很多人围住了骑马使者。人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使者高声答道："满载小麦粉的船开到利沃诺港啦！大风吹跑了企图阻止船只入港的威尼斯士兵，货正朝这边运来。"

听说是常驻法国的佛罗伦萨商人们担心祖国发生粮食危机，便雇用了法国船，装满小麦粉运往祖国。可是，利沃诺港驻有威尼斯兵，船进港不得。今天早晨刮起了大风，船顺风自然进了港。守备在那里的威尼斯兵对强风无可奈何，货物成功地卸下船来。

这完全是上帝所为！决定派人送圣像那天，船从马赛起航；圣像到达佛罗伦萨那天，船进了利沃诺港。这是圣母马利亚要拯救佛罗伦萨的证据！

这个消息让整个佛罗伦萨沉浸在欢呼声中。骑马使者几乎是被喜悦的人们扛着来到了市政厅。使者的话转眼就被人们口口相传，瞬间传遍各处。教堂的大钟响起，就像过节一样。所有人都放下手上的活计，奔向教堂。

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向对上帝感激涕零的人们说道：

“我的市民啊！好好记住吧！上帝总会向值得的人赐予救济和恩惠的！”

现在的佛罗伦萨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给法国国王的年贡钱和连年不断与比萨作战的经费，国库即将破产。我们还苦于恶劣天气造成的粮食不足。因为黑死病和名为法国病的怪病流行，医院也都挤爆。这些惨痛还不够，意大利各国在周边敌视着佛罗伦萨，把佛罗伦萨当成了意大利的叛徒。

在这些困难之中，我们佛罗伦萨人所能依靠的，只有预言者萨伏那罗拉。人们得知援助物资抵达后，异口同声地说：“修士的布道已经救了我们！”

亚历山大六世给托斯卡纳、拉齐奥所有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的教皇诏书：

致下列修道院里的我的孩子们：

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

维泰博圣马利亚格拉迪修道院

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

锡耶纳圣灵修道院

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

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

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皮斯托亚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普拉托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卢卡圣罗马诺修道院

蒙泰普尔恰诺圣艾格尼丝修道院

佩鲁贾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科尔托纳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萨索圣马利亚修道院

致以上所有修道院的布道修士、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祝福！

作为教皇，我有义务欢迎为提升和广布我们神圣的信仰而进行的有效改革。……故做出如下决定，以谋求对修道院机构之改良。

……

即把迄今为止一直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的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锡耶纳圣灵修道院、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等圣多明我派的修道院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划出，与前述修道院另行组成新的布道修士会。由于新的修士会由托斯卡纳和罗马全境的各圣多明我派修道院组成，故定名为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

任命奥里维埃洛·卡拉法枢机主教为第一任会长，两年后由全体修士选举会长。所有会长任期两年。会长如在任期中死亡，则由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院长担任6个月的临时会长，负责领导新会长的选举工作。……

会长是教皇的代理，所有修道院和全体修士有义务服从之。以往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一切自由，在新的修士会中具有同样意义。……

我希望，你们将会以基督徒的德行和宗教界人士的首要义务——绝对服从的精神接受这次改良。我在此明示，对不服从者将处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特此命令。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6年11月7日
执笔L·波德卡塔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1月26日。今天妻子去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布道，领了一份文书回来。她看不懂，便让我念并解释给她听。妻子说，听说教皇想阻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又新组建了修士会，从而削弱萨伏那罗拉的院长权力。教皇还曾以枢机主教为诱饵，多么可怕的时代啊！这份文书可能是萨伏那罗拉给教皇的答复，特记录于此。

“我也绝不会向这些针对我的处置退让。为了即将光耀的十字架的胜利，我不会停止我该做的事情。我对教皇组建新修士会的命令回答如下：

“我不服从不是出于我作为修道院院长的权力。我属下的全体250名修士已决定反对教皇之命。我一个人又能怎样呢？我不能做违反他们愿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正确。”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2月2日。萨伏那罗拉不但没有服从教皇诏书，甚至没有打算停止已被禁止的布道。亚历山大六世的这一招又一次以徒劳而告终。

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派甚至对成立新修士会的教皇诏书评价不好，认为那样对萨伏那罗拉太有利。以亲萨伏那罗拉而闻名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被任命为会长，以后的会长又要通过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选举确定，连萨伏那罗拉都有可能当选。正如萨伏那罗拉自己所说，即使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也不管用，教皇诏书已经完全归于无效。

但真的就是徒劳吗？仔细想想，使人数度认为徒劳，这本身不也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策略之一吗？如果顺利，没有比这更好，即使徒劳而终，这个徒劳也并非无效。我开始认为，这不正是教皇的深意所在吗？

大概有很多人都认为教皇正在努力。常听人说到他多么有耐心，但我却做不到把他看得那么单纯。

按我的想法，亚历山大六世到现在都不想对萨伏那罗拉采取决定性的动作，是因为不想让他变成殉教者，不能让他成为民众支持却被权力牺牲的人物。

仅凭萨伏那罗拉以前的言行，教皇就可以制裁他。然而，即使消灭了萨伏那罗拉，佛罗伦萨民众仍有可能继续信奉他，甚至会使他们更加信奉他。教皇一心想把佛罗伦萨从法国那边拉过来，让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各国统一步调，而这样的方法对教皇实现这一意图绝非有效之策。

不过，如果在危险较少的时期，重复徒劳、耐心等待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可是现在不同，也许法国国王就要翻越阿尔卑斯山再度入侵意大利了。在佛罗伦萨，那个修士的高声尖叫变得越发疯狂了。

三 1497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25日。1蒲式耳小麦粉已经涨到3里拉14索尔多[19]，而且小麦粉的数量还很少。今天，有个卖面包的女人在出售小麦粉和面包的格拉诺广场上被人杀害。杀人者是附近的农民。他杀人后抢走了面包，可是回到家一看，饿着肚子等面包的孩子已经饿死。绝望的农民留下面包，自己上吊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6日。今天妇女们涌到格拉诺广场，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为抢到面包和小麦粉，人人都争先恐后。又有一个女人被群众踩踏而死。还有几个女人被救出时已半死不活。多么悲惨的事啊！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狂欢节起源于异教，我们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

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队伍中央抬着多纳泰罗创作的幼年耶稣像。耶稣像由4位天使护卫，画像中的幼年耶稣左手拿着野蔷薇花冠，右手做着为人们祝福的手势。

许多人跟着耶稣像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大家不断唱着圣歌。白衣少年走在队伍两侧，手捧银盘，向聚集在道路上的人们化缘，所有人都争先响应着少年。

游行队伍来到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大金字

塔似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7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刻。听人们传言说，还有从僧尼庵没收的薄伽丘的《十日谈》。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佣兵凉廊[20]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点起了火。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金字塔，火焰冲天而起，四周充满烟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塔楼上钟声大作，全市教堂的大钟跟着响起。群众高声欢呼，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织在一起，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9日。为了商讨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四旬节期间的弥撒事务，我在教皇身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工作终于做完，心情轻松下来。除我以外，教皇好像也是这样。两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前天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事情。

我说：“陛下，听说佛罗伦萨发生的那事被叫作‘烧毁虚荣’。还听说当时在点火前，有一个威尼斯商人请求用4万达克特买走全部物品，但他不但被当场拒绝，还被当作堕落的典型追得满大街跑。

“不过我怎么也不理解，佛罗伦萨如今正苦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一片面包都会死人，为什么却非要胡乱地烧掉昂贵的抄本和艺术品呢？我觉得如果卖给那个说要买去的威尼斯人，就能买回小麦粉了，要多少就能买多少。”

教皇道："弗洛里德，也许是你还年轻，理解不了。但我若是处于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也会像他一样做的。好好想想，在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中挣扎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特意搞什么'烧毁虚荣'呢？好好想想，他明知堆积成山的艺术品可以变成面包，却为什么要拒绝呢？原因在于，为了彻底贯彻他是受上帝之命的说法，他需要这样做。

"有道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21]。这句话点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萨伏那罗拉这人把这句话与'烧毁虚荣'结合起来，十分巧妙地操纵了民众。他成功地让民众相信了真正的救赎不是靠小麦粉，而是靠饿着肚子的祈祷。

"但是，不只靠食物活着这句话说的是不只靠食物，而不是说活着不靠食物。可对萨伏那罗拉来说，说不靠食物更合适，因为人在饿着的时候要比吃饱的时候更容易狂热。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萨伏那罗拉以前说过，哪怕全世界毁灭了他也不会屈服吗？这句话感动了人们，人们都说多么真挚的思想，多么高洁的人品啊！可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一个多么自私残酷的人啊。换成我，如果世界要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毁灭，那我一定会赶紧收回那样的思想。

"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者那类人的可怕之处，是为自己所主张的主义殉葬的那类人的危险之处。我坚信，要用一个民族的毁灭去换取的思想是绝对不存在的，更不要说要用世界的毁灭去换取了！"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

佛罗伦萨。2月12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日，我去听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布道从始至终都是对教廷的激烈抨击。超过1万人的听众也都像沉浸在深深的大海中一样听着布道。

"听听上帝的话吧：我尽了努力给你圣洁的修道衣，你却连碰

都不碰一下。

“圣水盘里没有圣水，却溢满着傲慢。秘迹被用金钱买卖。淫欲把你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娼妓。你比畜生还要下等。你是可憎的妖孽。

“过去你们多少有点以此为耻，可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此为耻，人们毫不掩饰这些罪过。

“过去神职人员称自己的孩子为侄，现在却公然直呼其子而毫不隐讳。

“简直就跟坐在所罗门的椅子上一样，让有钱人的希望成真，心善而没钱的人却会被赶出罗马。

“罗马教会啊！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的丑陋。你已臭气熏天。你哭泣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相信上帝的人会进攻而来，灭亡罗马、灭亡意大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

听完萨伏那罗拉布道回来的途中，我去了领主广场，在那里见到了同业行会的同人。据他说，昨天晚上市政当局要在格拉诺广场专给穷人发放面包，结果发生哄抢，有一男一女被群众踩踏而死。我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心情晦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9日。这几天教廷里的空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至今一直是多数派的萨伏那罗拉同情者们开始对萨伏那罗拉逐渐反感。过去这些人一直说并非不懂得他的心情，但见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变为露骨地反对罗马教会，他们也许感到火已开始烧到了自己的脚下。就连这一派的领袖卡拉法枢机主教这些日子也不再在教皇面前为萨伏那罗拉辩护了。

但教廷内部也并没有就此拧成一股绳来反对萨伏那罗拉。在年轻主教中萨伏那罗拉的同情者似乎还拥有隐形的势力。

就算是这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前使出的所有策略都以失败而告终，他究竟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今年1月起，大军开始在里昂集结的流言就不绝于耳。人们都说，法国国王正在专心准备下一次入侵意大利，这个情报确切可靠。传言说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之间经常交换信函，而为他们传递信件的正是敌视教皇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如果这个传言属实，那么3年前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历史将再次上演。

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口实法国国王要多少有多少，尽管在我们看来都不正当。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米兰公国继承权，还有，既然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还从佛罗伦萨收取年贡钱，他就有义务保护佛罗伦萨不受外敌侵略。现状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地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1日。今天，意大利各国驻罗马大使收到教皇发来的邀请，在梵蒂冈会谈。议题毋庸赘言，就是再度确认各国对反法同盟的态度。威尼斯、米兰、那波利等强国以及所有其他加盟国，一致同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法。

佛罗伦萨是唯一没有参加同盟的国家。会议决定对佛罗伦萨进行个别交涉。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派遣特命全权大使前来。看来现实主义者亚历山大六世打算选择其他道路，而不采用以往处理萨伏那罗拉问题的方法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4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昨夜抵达罗马。他与教皇开始了会谈。教皇说：

“我已经不再想追究3年前把法军引进意大利的那些人的罪责了。建立在意大利各国势力均衡之上的和平和其他的一切都因为这一事件而面目全非。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重建由此而改变了的今日之意大利。挑起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现在也已经明白了此事。除了你的国家佛罗伦萨以外，其他各国也都理解了重建意大利的必要性，明白了要重建就不能让法军进入意大利。

“所以，请佛罗伦萨重新考虑坚持与法国国王结盟的问题。我想请你们回到我们这边来。你们不也是好好的意大利人吗？法国人就让他们待在法国好了。”

布拉奇大使试着进行反驳，说佛罗伦萨绝对需要比萨，只有法国国王承诺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教皇继续说道：

“我经常同威尼斯大使见面谈话，为的是打探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的可能性。威尼斯也赞成这样做。就把比萨给你们吧。

“不过，这样做我需要有确切的证据。我不要空话。我要佛罗伦萨废除与法国国王同盟关系的确切证据。此外，我已经命令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活动，而佛罗伦萨政府却还在放任他继续布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强词夺理和辩解之类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想请你们明白这一点，哪怕只是粗略的明白。”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8日。晚上8点，全市钟声大作，通知大家紧急集合，说是被驱逐的皮耶罗·德·美第奇率兵前来，要夺回佛罗伦萨。骑兵加步兵兵力共约2000人，已经从锡耶纳出发上路了，正在靠近佛罗伦萨城郊。

许多市民武装起来，加强了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22]的防守。时间在紧张的沉默中流逝。未几传来报告说敌人撤退，说美第奇所期待的里应外合没有成功，不得已撤退了。灾难暂时离去，市民们放下心来，留下警卫骨干，各自回家去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29日。以前从没见过教皇如此震怒。教皇难得发火，但在见了前来报告美第奇失败的紧急使节后，语气粗暴地命人召来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刚刚赶到，教皇就劈头盖脸一阵怒吼。

“蠢货！简直就是疯了！单单指望城里美第奇派起义就敢发兵，你们的眼光也太令我失望了！死去的“伟大的洛伦佐”有这么一群蠢儿子，也够可怜的！

“听着，你给我记住，我一点也不同情被驱逐的美第奇家族！以后绝不允许为所欲为。你去监督你那愚蠢的哥哥，不要让他再干这样的傻事。如果再犯同样的事，那就是你的责任！”

不满20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全身发抖，一句话也不敢辩解，速速从教皇面前退下。他走后教皇仍不能平息怒气，在我面前重重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般地继续说道：“蠢货！我都知道佛罗伦萨内部反萨伏那罗拉派开始行动了。但那可不是亲美第奇的。假如美第奇企图武力回归，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与萨伏那罗拉派联手反抗。事情刚刚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就来添乱！”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4日。听说昨天政府要求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我想，今天是耶稣升天节[23]，是他最后一次布道了，便来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听他布道。听众人数一如既往，肯定超过15000人。萨伏那罗拉开始讲话。

“人们说我就要被开除教籍了，而我正盼望着这样的开除！

“上帝啊！让处罚快快降临吧！我不怕！上帝就在我的身后！哪怕我被开除了教籍，我的声音也会响彻全世界！罗马教皇已被上

帝抛弃，他的开除教籍到底有什么价值？我又为什么要服从？”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有一群男人，用脚把地跺得山响，开始大声扰乱萨伏那罗拉布道。萨伏那罗拉没有害怕退缩，继续布道。这群人把偷偷带进来的武器举在手上，向布道坛冲去。教堂里顿时乱作一团。然而，信徒们一边“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地叫喊着，一边集结起来保卫布道坛。平时护卫萨伏那罗拉的人已经拔出了剑。这让那群无赖无从下手。但他们仍然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嘴里不停地谩骂萨伏那罗拉。

这种事还是头一遭。简直像是回到了教皇派和皇帝派[24]的时代。萨伏那罗拉已无法继续布道了。他回修道院去了。他走下布道坛，信徒们围在他的周围护卫，女人们也高喊着“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流着泪跟在后面，把他送到修道院。

闹事的这帮人自称是“愤激派”、“无良派”，人们也这么叫他们。听说他们把我们这些萨伏那罗拉的信徒叫作“痛哭派”和“修士同伙”。[25]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灵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人。萨伏那罗拉的听众中，有10多岁的少年，再就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和各个年龄层的女人们。相比之下，这里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感到像要被挤到教堂的墙角里。

可是，这帮年轻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我确实没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布道时见过这些人。萨伏那罗拉平时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灵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我们为这愚蠢之言惊讶不已。

萨伏那罗拉受到如此无情的非难却被禁止在佛罗伦萨的所有教堂布道，那他究竟还能做什么呢？萨伏那罗拉让多米尼科修士和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代他布道，但这两人没有他那样有魄力。

这位可怜的萨伏那罗拉，即便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不能布道，就印刷了书面材料，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每天妻子忏悔时带回来的书面材料，成了联系我们与这位预言者的唯一纽带。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13日。根据罗马收到的一系列信息，佛罗伦萨萨伏那罗拉派的绝大多数已开始动摇。教皇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迈出了决定性行动的第一步。今天教皇命我记录了开除教籍的诏书。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致佛罗伦萨圣蒂西玛·安农齐阿塔、圣母诺维拉、圣十字、圣灵各修道院：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孩子并致祝福！

最近几年来，我从神职人员和世俗界的很多人士那里听说，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用他的狂热思想煽动佛罗伦萨民众，蛊惑朴素的民众之心。

当然，我怀着极大的担心和悲哀之情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同时希望他能醒悟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从他那危险的做法中回头。我希望他能够理解真正的灵魂之朴素，回归基督，觉悟到对圣罗马教会的神圣服从精神。我一直等待到现在。为此，我给他寄去了亲笔信和诏书形式的信函，请他按照基督徒的最高义务即神圣的服从精神，前来罗马，与我就他的思想和他所说的对他的不实诽谤交换意见，并命他暂时停止包括书面形式的布道。

但是，萨伏那罗拉无视我的命令。我仍然在听取他的申辩，继续等待。然而，他非但没有停止背叛我的行为，反而愈加顽固地拒绝服从。……

我负有作为圣彼得继承人和基督代理人的义务，因而我决定命令你们的修道院和每一个人服从下述决定。即，选择某个节日在所有教堂公布将萨伏那罗拉修士开除教籍的处罚，同时公布他违反教皇即使徒命令的理由，让众人认识到，不服从我的命令将会受到与他同样的开除教籍之处罚。

同时，要使众人认识到，凡听已被开除教籍的萨伏那罗拉布道、阅读他写的东西、与他说话以及企图给他帮助的人，不论神职界人士还是俗世之人都将受到教皇给予的开除教籍处罚。……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7年5月13日

执笔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祝福教皇陛下并亲吻圣足！

我的主君啊！什么原因让您对您的仆人如此震怒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我之所为又带来了什么恶果吗？就算是不怀好意的人诽谤我，我的主君啊，为什么不在相信那些诽谤之前讯问我呢？为什么连我说的都不听呢？

您认为我让教皇陛下——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蒙羞，冒渎了上帝，已经追究了我的不敬之罪，我两年来一直受到弹劾。

但是，几千，不，几万人都愿意做我无罪的证人。而且，我写的书籍和文件也可以证明我的无罪，尽管它们散在各处。……陛下认为我布道时所讲和写在书里的东西不一致吗？我想请您把它们之间的差别明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多么鲁莽、多么疯狂的头脑才会干

出这样的事情呢？陛下至今还没有注意到坏人的恐怖和恶意，我感到不可思议。……

感谢上帝吧！我还没有疯狂到、没有傻到利用一切机会让陛下——基督的代理人蒙辱的地步！……

不久，我的题为“十字架的胜利”一书就要出版。书里讲的是坚守信仰的心得体会。通过这本书，您一定能够了解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来救我，只能等待上帝来救了，只能等待上帝惩罚诽谤我的恶人那一时刻的到来。待到这一切实现的黎明，他们也会悔悟自己的罪过。

衷心尊敬陛下！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7年5月20日
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佛罗伦萨政府似乎也因教皇强硬的态度而张皇失措。今天，已经派来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和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两人来见教皇，请求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

但教皇似乎已经根本不想再听他们的辩解。我在旁边，觉得再辩解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整个事情的知晓程度超出了包括萨伏那罗拉在内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想象。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他的出版物、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亲萨伏那罗拉派和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势力分布及变化情况、佛罗伦萨市民的动向等等，他让人搜集了所有的这些情报。说不定，他比住在佛罗伦萨的人还了解佛罗伦萨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教皇，萨伏那罗拉写那封内容与布道天差地别的信函进行辩解也好，佛罗伦萨大使们的辩解也好，都属徒劳。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8日。今天，城里几乎所有教堂都公布了开除萨伏那罗拉教籍一事。理由是他违背了基督徒的首要义务——服从之德。只有圣马可教堂没有公布这事。

虽说是礼拜日，但人们都没有回家，大家站在广场、路边，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话题。像我这样的人，不甚了解的事情太多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今天，妻子拿回来一份印有萨伏那罗拉申辩的材料。尽管规定不能阅读被开除教籍者所写的东西，但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央求下，我便念给他们听了。那上面这样写着：

“这次开除教籍是无效的，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人类都属无效。因为这是教皇依据我们的敌人所虚构捏造的事项决定的。

“我平时一直服从于罗马教会的判断。即使现在，我也十分愿意履行服从的义务。但我不应服从违反上帝之法和基督徒之爱的命令。在我们的上级不配上帝赋予他的地位时，我们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你们眼下可以一边继续履行向上帝祈祷的义务，一边做好准备，世界的终结就要到来。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向全世界揭示和传播真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教皇的儿子被杀害后投进了台伯河。傍晚来店里的顾客说了这个传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19日。教皇的三儿子、教会军总司令甘迪亚公爵[26]被暗杀了，到今天已经过去了5天。公爵死后，教皇很颓丧，几乎整整3天不吃不睡。这两三天，在旁人看来，他回到了以前。可是，话少多了。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父亲并亲吻圣足！

众多的奇迹，诸多之上帝所为、赞美的话语，著名人物的理性和教诲都已经证明，只有人的由衷信仰才能安抚和慰藉他的灵魂，哪怕他是因了众多殉教者的血而复苏之人。

只有超越理性和感性，委身于上帝的力量和宽容，才能坚韧地忍受和度过所有不幸，进而把苦恼变为喜悦。《圣经》上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使正义消灭。"

正义与为信仰而生的人同在。正义只能存在于信仰之中。

只有生活在信仰的喜悦之中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没有信仰，任何人都不会平安。"无信仰者无平安。"（《旧约·以赛亚书》）

教皇陛下，神圣的基督徒之父啊！陛下的悲伤很快就会变为圣洁的喜悦，上帝会无限宽容我们的罪过。任何慰藉与这种信仰相比都是表面的、空虚的。"时光恨短。"（《新约·哥林多前书》）进到永恒的世界里吧。只需一个信仰，就能使我们进入那个遥远的世界。我之所说均为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手所触之后才明白的事情。为使主基督永驻内心，为了避开永劫的惩罚，甘心忍受迫

害和不幸吧，落入生之神和怒之神的手中是可怕之事。

陛下啊！把所有信仰都当作拯救吧。……不要听无信仰者之言。只有上帝，才会让受苦恼折磨的灵魂充满喜悦。……

我们基督徒的父亲、神圣的教皇陛下，是谦逊基督徒之爱让我写了这封信。对于贤者无须更多的言语。我所热望陛下的只有一件事：听从上帝的话吧，把信仰当作唯一的慰藉吧！“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慰藉。”（《新约·哥林多后书》）衷心期望陛下多自珍重。

于佛罗伦萨
1497年6月25日
教皇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亲笔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29日。萨伏那罗拉的亲笔信让人思虑良多。第一，有一种看法是相信他所写的，认为这封信是因他由衷同情处在悲痛之中的教皇而写。教廷在心情上同情萨伏那罗拉的那一派人是这样想的。与此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萨伏那罗拉狡猾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知道教皇的苦恼，要乘机说服对方。持这种想法的当然是反萨伏那罗拉派。

不过，无论哪种看法都不能让我信服。如果出于同情，那说服意识也表现得过于强烈了。但萨伏那罗拉所写触及了基督教的真髓。可是同时，这封信与他以前所写的出版物和说教的东西，在腔调或是态度上又有太大的差距，这也是事实。教皇本人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今天傍晚，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亚历山大六世当时这样说道：“大使，反复谈多少次我的想法都不会改变。佛罗伦萨必须早日断绝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应该回到我们意大利人这边

来，一道确立意大利的和平。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我决定再拉他一次。请佛罗伦萨政府方面做他的工作，让他尽早到罗马我这里来。我负责保证他的旅途安全和逗留罗马期间的安全。如果通过我和他之间的充分交谈，他理解了我的立场，愿意与我配合，我会撤销开除教籍的处罚。”

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现出了放心的表情，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要马上向国内报告，很快退了出去。

亲萨伏那罗拉派说，教皇被萨伏那罗拉来信所感动，改变了态度。但这事不能那么简单地断定吧。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长于读懂人心。他能准确地读懂人们在一人独处时的心情和处在群体中时的心情。甚至可以说，亚历山大六世迄今为止的成功，靠的都是他的这个才能。

教皇必定心中有数。他一定是因为深刻了解萨伏那罗拉这个人，才打算再次尝试仅有的一点可能性，从而不让他成为殉教者。这是我的想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5日。安提拉家有一个人被抓，美第奇派的阴谋暴露了。听说这个叫兰伯特的年轻人交代了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全部阴谋。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是贝尔纳多·德尔·内罗、詹诺佐·普奇、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乔凡尼·坎皮、尼科洛·里多尔菲，个个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实力家族。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0日。美第奇派的阴谋在城里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既有人说阴谋真有其事，也有人说那只是兰伯特·安提拉熬

不过严刑拷打，讲出了熟人的名字罢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5日。共和国政府连日讨论如何处置谋反的5个人。听说已经宣布属于反国家罪，要判处死刑。

兰伯特招供的人名不只这5个人，还有其他的人。但听说他们早已逃亡，只有这5个人没有逃跑，应政府的传唤出了面。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15日。10天前佛罗伦萨败露的美第奇派阴谋案中离奇情节太多。

首先，根据兰伯特·安提拉的交代，阴谋的安排似乎是这样的：8月15日夜里把皮耶罗·德·美第奇秘密带进佛罗伦萨，趁此机会城里的美第奇派与皮耶罗带来的士兵里应外合，袭击并放火烧掉反美第奇派实力人物的房屋，占领市政厅，一举夺得佛罗伦萨的政权。

可是，这个计划本身过于大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会成功。在回答教皇的问题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称对此完全不知情。

其次是被追究反国家罪的那5个人。

贝尔纳多·德尔·内罗，75岁，是佛罗伦萨政府中的实力人物之一，经验丰富，甚至担任过市政厅的长官，在萨伏那罗拉问题上被视为稳健派的领袖。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左右手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是政治上的宿敌。对他的判决是知情不报。

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以佛罗伦萨第一绅士而闻名，与美第奇家是姻亲，曾与皮耶罗·德·美第奇过从甚密，但此人在市民中并

无人气。不过，他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之一。审判中说他抱有企图，从而接近萨伏那罗拉。

乔凡尼·坎皮，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在民众中间自然并无人气。

詹诺佐·普奇，一个尚未成熟的普通之人。

尼科洛·里多尔菲，里多尔菲家族的当家人，与美第奇家是姻亲，也是稳健派人物之一。

就在这个案子吸引了人们的视听之际，萨伏那罗拉却躲在修道院里撰写题为“十字架的胜利”的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7日。180位共和国实力人物被召来开会，从早晨直到深夜。议题是如何判决。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等人主张当然要判死刑，并没收财产。但似乎也有相当多的人为这5人辩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1日。今晚对5人执行了死刑。我在路上碰到护送棺材回家的洛伦佐·托尔纳博尼家的人。我并未觉得特别悲哀。

听说他们5人提出了上诉。圭德·安东尼奥·韦斯普奇主张，这是萨伏那罗拉制定的新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他们有权上诉。但这一主张没有被接受。我觉得这一点有些悲哀。

可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这也是其中之一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23日。凡是自己挑头决定的事情，自己就要去捍卫，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萨伏那罗拉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根据他出力协助制定的新法律，即使是被政府委员会宣判有罪的国事罪犯，也可以向人民提出上诉。他们5人被判有罪，自然会提起上诉。但上诉却被驳回了。这样，无视被认可的上诉权就成为事实。政府花了很长时间第二次讨论了是否受理上诉，其后便立即执行了死刑。听说这是因为主张上诉权的是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韦斯普奇，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担心反萨伏那罗拉派造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瓦洛里亲自指挥300名士兵，在执行死刑的巴杰罗宫周围警戒，以牵制被告家属的行动。

瓦洛里4年前在驱逐美第奇家族时就相当活跃，现在又把宿敌贝尔纳多·德尔·内罗判了死刑，似乎已经把佛罗伦萨政府攥在了手里。对萨伏那罗拉而言，这个案子使自己的崇拜者瓦洛里掌握了政权，愤激派势力减弱，他内心窃盼的事情得以实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4日。没收了死刑犯的财产。在武装士兵的警备之下，各家都没有发生不测事件，真是万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7日。今天，一群少年拥到市政厅，要求政府委员会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听说少年们请愿要求重开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布道活动。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16日。很多市民被认为与上次的美第奇阴谋有关联而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其中还有一直关在监狱里的安提拉。他坦白了一切，从而没有像那5人一样被处以斩首之刑。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年夏天开始流行黑死病，到了秋天也不见减弱，真是一筹莫展。粮食危机似乎终于有所缓解，刚让人心头轻松一下，这传染病就来了。佛罗伦萨市政当局也苦无对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因黑死病死去的几乎全是男人。尤其是一家之主。而女人和孩子却个个活蹦乱跳。人们在传，说原因在于是否有坚强的信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2月25日。今天是基督的圣诞节。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做弥撒。前一天的深夜弥撒加上今天上午的两场弥撒，萨伏那罗拉一共做了三场弥撒。之后，他在节日游行队伍的前面，领着队伍环绕圣马可广场游行。

然后，他转向聚集的人群，告诉大家，他将在明年2月11日七旬节的主日重新开始布道。

“敬畏上帝的人啊！信仰笃深的人啊！我无所畏惧！我将遵从主之命，在七旬节的主日再次回归我的职责。”

四 1498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月6日。罗马的冬季很丰饶。松树枝叶繁茂，形成了一片片墨绿的色块，里面储存着阳光。还没有剪毛的羊臃肿着身子，辨不出头在哪里，远远看去，像许多毛球一会儿滚到一起，一会儿又散开去。

没有风。同秋天不一样，天空就像罩了一层极薄的纱巾，细细地折射出灿烂的阳光。

站在这座蒙特马瑞奥山上，可以看到台伯河泛着银光，在梵蒂冈的建筑和圣安杰洛城堡对面蜿蜒流淌，画了一个大大的蛇形。台伯河对岸，在远远的雾霭中，万神庙巨大的穹隆、耸立着古罗马遗迹的帕拉蒂诺山和斗兽场庄严肃穆。

今天，教皇结束了上午的弥撒，说午餐前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命我陪同他到蒙特马瑞奥山去散步。他拖着白色教皇衣袍裹着的重实的身体缓慢走着。我慢一两步跟在教皇身后。散步的时候，教皇和我之间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弗洛里德，你多大了？”

“33岁了，陛下。”

“正好是我一半的年龄啊。那个佛罗伦萨的修士多大岁数了？”

“好像45岁。”

“是吗，是我和你中间那代人。”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吗，那个修士的布道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只为一件事而存在，那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死法。他把马尔西利奥·费奇诺[27]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28]这些佛罗伦萨一流知识分子和佛罗伦萨之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他的崇拜者，而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就是个中的原因。

“我饱受萨伏那罗拉的批判，不过我却更喜欢另外一句话。那是古代犹太人说的一句话：‘死狮不如活狗’[29]。

“这样一眼望去，罗马尽收眼底。望着望着，我们会觉得，许多人在历史中沉浮消逝，他们的死离我们并不遥远。辉煌壮烈的死，饱含怨恨的死，由于使命感而自己选择的死，这样的死都浮在历史的表面。

“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曾经见过狮子之死。他在担任枢机主教的时代，是位洞察力非常敏锐且有教养的人。可是，自打坐上圣彼得的宝座那天起，过强的使命感使得他思想僵化。他提倡十字军东征遭到失败，自己也因愤怒和绝望变得疯狂，最后死去。[30]

“他的死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在那以前，我也憧憬着辉煌的悲剧般的死。但我现在已经不那样想了。我认为人不能去求死，而只能接受死。

“人的一生，谁都会有一些想要做完的事情。我也希望完成几件事情后再去死。可是，如果半道上上帝说你的生命终结了，我肯定会放下已经开始的工作，去听从上帝召唤，而不是叹息工作未完，诅咒自己的命运。

“当然，我会像狗一样活到那天的到来。我做不到经常念着必将到来的死而自虐。当死亡拍我肩膀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给他。但在那之前我要活着，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

“因为像狗一样活着，所以我不用为‘好死’或是如何死之类的事情操心。哪怕倒毙路旁，或是死于非议，或是死后受到后世的谴责攻击，这些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重要的是绝不能焦躁。担心自己所做的事可能徒劳，害怕半途而废，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人，最后都会变得焦躁、想不通，那才是危险的事。‘死狮’多数就是这种人。

“你刚才说萨伏那罗拉45岁，这是最危险的年纪。如果是你这个年纪，想做的事情虽然堆积如山，但理出了头绪，工作也就开始

进入正轨。这个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感到老脸皮厚，也不会害怕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徒劳，会不会半途而废，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会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速度使用剩下的时间。怀疑自己的工作，可以防止自己变得狂热和自以为是，我甚至认为这反倒是好事啊。

“可是，萨伏那罗拉的年纪，是急躁表现最强的年纪。这很自然。但是有些人能够迈过去，有些人却迈不过去。

“‘死狮不如活狗’，这话说得多么乐观。不过，说这话的人可能已经沉到了历史的渊底。

“弗洛里德，你选择什么呢？可能还是死也要当狮子吧？”

我没能回答上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7日。听说政府委员会的各位昨天去了圣马可修道院，跪在萨伏那罗拉面前，亲吻他的手，请求他重新开始布道。这是每年这时的例行仪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今年的萨伏那罗拉已被开除了教籍，所以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听说圣母百花大教堂今天早上开始搭建听众临时看台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0日。这几天连续酷寒，今天早上阿诺河终于上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1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开始布道。

很多人都前去听讲。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去了。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去听。他们说："且不论对错，教皇做出的开除教籍处罚还是要尊重的。"我也没有去听布道。

最近一个时期，黑死病退了些，也就是不时死一两个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5日。这几日我左想右想，究竟要不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可是，为了继续把日记写下去，我想还是应该去听听，便决定像往常一样去听他布道。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心里释然了。

萨伏那罗拉今天布道时说了下面的话。今天的听众似乎比以前少，但热情反倒高涨。

"好的君主也好，好的神职人员也罢，不过是上帝为统治百姓而使用的工具。所以，如果这些高级神职人员远离了上帝，就甚至连工具也不是了，成了破铁片。我们有必要服从这些破铁片吗？

"我被开除了教籍。不过，我不认可破铁片做出的处罚。有谁说过教皇就不会犯错吗？他只听我们的敌人对我的诽谤，并依此决定开除我的教籍。我将不理会这个决定！害怕被开除教籍的人啊！我要说：只有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诲才是重要的！

"啊，上帝啊！如果我做过请求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事情，就让我下地狱吧！就让我的罪永劫不复吧！

"主耶稣啊！你见过许多人下地狱而死。在罗马，有人的儿子被杀害了（指教皇之子甘迪亚公爵）。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被处了死刑。

"佛罗伦萨的市民啊！不要把你的目光从真相上挪开。上帝正张开双臂等待着我们！悔改吧！靠近上帝吧！阿门！

"主耶稣啊！你为帮我们赎罪而死。我请求你，让我为捍卫你

的教诲，为捍卫你所选择的百姓——佛罗伦萨人的信仰而去赴死吧！”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8日。六旬节的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

图8：圣母百花大教堂

“为什么罗马教皇要对我如此残酷打击呢？是出于宗教立场吗？不，不是的！是因为他要搞垮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他想当独裁者君临佛罗伦萨共和国，而我是他的障碍。

“然而，这是一个要在凡界推行正确生存方式的人所应该做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教理的做法吗？难道不是对福音书所提倡的基督徒之爱的一种反动行为吗？如果是这样，他才是一个异教徒，

才是一个邪教的同伙！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他，才是一个正在做着反对上帝神之王国的事情，他与恶魔勾结，让真正的信仰堕落。一定要把他这样的邪教同伙驱逐出基督徒的世界！”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2日。今天上午，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教皇对萨伏那罗拉重新开始布道的消息十分震怒，佛罗伦萨政府知道后很担心，命大使前来解释情况。但是，教皇打断了大使的辩解，语气粗暴地说：“这是对权威的反逆和挑战。连土耳其人都不曾如此激怒过我。”

接着，教皇谴责佛罗伦萨政府放任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活动，他中断了会谈站起身来，撂下了一句话：“萨伏那罗拉修士想布道就让他去好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会接受他的那套做法。”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5日。亚历山大六世太现实了，一切由着愤怒的性子率性而为。今天应教皇要求与佛罗伦萨大使开了一个会议。参会的人有卡拉法枢机主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洛佩斯枢机主教、教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罗马市总督、教皇秘书长阿德里亚诺，还有我自己。佛罗伦萨方面有布拉奇、邦西两位大使。以上是参会人员。

教皇向两位佛罗伦萨大使谈了面对外敌，意大利各国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希望唯一不愿加入联盟的佛罗伦萨废弃与法国的同盟，与意大利各国采取统一步调。为此，教皇承诺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以使佛罗伦萨满意。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禁止其布道，表明了他毫不让步的立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5日，五旬节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说道：

“所谓法，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事情向好的方向引导。所以，法必须与理性和基督徒之爱相一致。如果法的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好的，那么，法是好是坏就看它会带来怎样的果实。

兄弟姊妹们啊！基督教的教理是上帝为让我们有正确的生活方式而赐予我们的。而我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又是怎样的处罚呢？那是生活方式不正确的人所做的处罚。也就是说，那是恶魔做出的处罚。只要恶魔不喜欢，他就会开除你的教籍。如今，教皇心血来潮就可以轻易把我开除教籍。这样的开除教籍有价值吗？值得尊重吗？回答是明确的：没有价值！应该不予理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6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数似乎不少，但街上所见更多的还是萨伏那罗拉的信奉者。女人们几乎全部穿着朴素庄重的服装，孩子们也听从修士之命剪短了长发。他们每天去教堂，即使在没有修士布道的日子里也去，他们以忏悔为乐，以忏悔为荣。

难道这不就是正确的、好的生活方式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6日。教皇今天发布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圣母百花大教堂领袖的，命令他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布道活动。另一道是给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给佛罗伦萨政府委员会的诏书：

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教皇的祝福！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这个坏儿子所散布的毒害。他置我的苦恼于不顾，仍在你们的城市里继续他那狂妄言语和不逊行为，殊欠考虑。

我不能放任将民众之心置于危险境地的现状，命他来罗马，又命他暂停布道。

但是，他没有遵守我的任何一条命令。我接受了卡拉法枢机主教的请求，在让他意识到不从者将被开除教籍的前提下，新组建了包括圣马可修道院在内的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以建立新秩序。然而，他对此也未服从。

他如此执拗地连续数次冒渎圣罗马教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神职界惩戒处罚的底线。出于保护民众灵魂和捍卫基督教精神的考虑，我下决心给予了他开除教籍的处罚。

我已经宣布，佛罗伦萨共和国内的主要教堂都要在节日和祭祀日公布对萨伏那罗拉给予开除教籍处罚的决定，不论男女，不论神职人员或俗界，也不论任何会派，所有人均要把萨伏那罗拉作为异端嫌疑而被开除教籍者加以对待。即，不得与他说话，不得听他布道，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其他事务方面与他发生联系，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施以帮助，不得在任何场合访问他。

但是，直到现在他仍厚颜无视我的命令和说服，执拗地卖弄着他的固执与无耻。他继续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布道，其言行越发狂热，对自己欺骗民众、冒渎基督教信仰和圣罗马教会权威的罪行不

思悔改。更有甚者，他已经被开除教籍，却仍旧参加祭祀日游行和举行弥撒，甚至为基督教徒主持圣餐礼。

可悲的是，朴素的民众受其蒙蔽，请他布道，与他说话并给予他帮助。

佛罗伦萨市过去一直忠诚于圣罗马教会。我也为确保这座城市的和平和安全尽了力。因此，我不能对这件不祥事件佯装不知，不能采取让时间来解决问题的态度。

故而，出于教皇的当然义务和考虑，出于我自身对圣罗马教会的尊重和献身精神，我敦促佛罗伦萨政府自觉遵守服从之德，并严命如下：

在充分切实的保护之下将萨伏那罗拉押送至罗马。我并不希望这个罪人死去。在他来到我处，并改正了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将以父亲一般的心情欢迎他。如果无法将他押送来罗马，则请将他关押在可靠之处，加以严密监视，不让他与任何人见面，以避免发生不祥事件。

如果万一——我不认为会发生此种事态——你们政府蔑视我这道命令，为捍卫圣罗马教会的权威和尊严，我只能认定你们违反教皇命令，帮助因异端嫌疑和有害言行而被开除教籍者；并禁止佛罗伦萨全市举行一切弥撒仪式。请你们认识到，我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保罗大教堂
1498年2月26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举行弥撒，还亲手为汇集而来的众人举行了圣餐礼。然

后他登上布道讲坛。他左手拿着《圣经》，高举右手喊道："上帝啊！如果我活得没有真实灵魂，如果我的话不是你所赐予，就让雷电在这里、在这一瞬间劈死我吧！"

萨伏那罗拉说着，他那脸庞因高昂的精神而生辉，他那强烈的信仰也似乎传递给了我们。他，才是真的预言者！听众中发出了"预言者"的呼声，像旋风一样席卷四处。

吃完午饭后，民众聚集到广场上。四支祭祀队伍从四个方向进入领主广场。广场上，收集来的奢侈品像去年一样多，不，比去年更多。这些奢侈品堆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只等着点火。萨伏那罗拉举着基督像从圣马可教堂方向走进广场，一支手持橄榄枝和红色十字架的白衣队伍跟在他的身后。这时，圣歌一齐唱响。

异教的书籍、绘画、雕刻、镜子等奢侈品堆起的小山被点着了火。这是第二次"烧毁虚荣"。人们跪在地上，手画十字，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祈祷。

但是今年有人在捣乱。愤激派和无良派的人麇集在广场周围，一边嬉笑一边看着"烧毁"仪式。他们中间有几个人高声大笑、嘲讽，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只死猫扔进神圣的"烧毁"大火中。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僧衣风格的衣裳，头发剪得很短。相比之下，他们故意穿着以前那些色彩绚丽的服装，头发也留到了肩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今天是四旬节第一天。从今天起，萨伏那罗拉开始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谴责了罗马教皇，谴责了佛罗伦萨的愤激派，说他们与教皇勾结。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又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在布道的最后说，明天将在圣马可教堂布道。他说，教皇已经禁止他在佛罗伦萨主教堂布道。他说他已经给教皇写信做了解释，但教皇根本听不进去。他说，考验恐怕就在近期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女人们哭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日。连日来，萨伏那罗拉把场子搬到了圣马可教堂继续布道。可我有买卖，布道这些天早晚都离不开店铺。妻子和孩子们都去了。听他们说，最近布道时反萨伏那罗拉派捣乱得越来越厉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7日。今天听传言说，教皇给政府委员会发来了诏书，威胁说如果再不让萨伏那罗拉闭嘴，就将开除整个佛罗伦萨的教籍。可怜的修士哟，被敌人给包围了！

正在广场上聊着，正巧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路过。我和他家都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也就是邻居了。这个青年人马上就要29岁了，已被内定两个月后就要到佛罗伦萨政府第二秘书厅担任书记官了。这是一个脑瓜很好的年轻人。他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说："我想明天就给驻罗马大使贝基写封信，到时候我想写上，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讲的，是先认定教皇和罗马教会堕落，然后再予以谴责。这种做法符合时下的流行，但很难认为这会有什么效果。"

人群中有人点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传说他属于愤激派，看来真是如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7日。今天早上，贝基和邦西两位大使来访梵蒂冈，见到了教皇，带来了佛罗伦萨政府对教皇诏书的复函。据说他们是昨天晚上到达的。我当场念了复函。复函说萨伏那罗拉已经不再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了。复函最后说，他们拥护萨伏那罗拉的教诲，认为教皇的处置是根据错误信息做出的。也就是说，佛罗伦萨政府委婉拒绝了教皇诏书命他们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并把他押送来罗马，或者隔离起来的要求。我念完复函时，教皇说道："大使，你们的政府给我送来了一封不愉快的信。我可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根据错误信息，在全然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判断。那个修士布道时的言论、他的出版物，我全部读过。我还见了听过他布道的人，听了他们的反映。我为了解真实情况做了不懈的努力。"

邦西大使想为萨伏那罗拉辩护。在现任的三位驻罗马大使中，他打开始就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人。

"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所讲的教理从根本上是正确的，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这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指责他所讲的教理基础。问题是他的说法。

"你们不妨想想在现代社会布道的重要性和布道师立场的重要性。布道难道不是联系民众的唯一途径吗？而且，布道还是同时接触众多民众的唯一途径。与一对一的忏悔相比，布道的重要性不可限量。这里就涉及布道师的责任问题。

"仅仅教理基础正确是不够的。不论如何去讲，能把握和理解其根本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其他大多数人则朴素单纯，他们向哪个方向行动，取决于布道的方法。他们会忘掉根本，却会对布道所使用的方法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布道师还必须对如何讲道负责。而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方法具有煽动性，他并未感到自己的责任。对意大利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两位大使不会不知道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又开始调动军队的传

言吧。我想请你们转告佛罗伦萨政府，立即禁止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及其他任何教堂布道。

“我还不会把他定为异端，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1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二个礼拜日。我在圣马可教堂听萨伏那罗拉布道。

“哦，修士啊！有人说教皇是地上的上帝，是基督的代理人。可是，上帝和主基督都把我们当作孩子和兄弟去爱，为我们考虑而下命令。可是，教皇的所作所为正与上帝相反。他给你的命令还要服从吗？如果服从，你的行为就违反了上帝的意志。

“恶劣的教皇会像狐狸一样登上权力的宝座，会像狗一样活着和死去。我只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愿只听上帝的声音而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7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专为女人布道。妻子去听了。她说，萨伏那罗拉为了使汇集而来的女人们安静地听他布道，对她们说：

“你们想让自己的儿子当主教吗？又有谁有勇气把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心肝宝贝扔进那个堕落的世界呢？来吧，一起向上帝祈祷吧！

“上帝啊！我们不祈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也不祈求痛苦和烦恼。请你把你的心赐给我们吧！把你的爱心赐给我们吧！把力量和慈爱之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即将袭来的不幸。我们在等待着，只等你的爱在地上发扬光大之时的到来。

“如今，恶人的力量越来越强。他们企图扼住我们的呼吸。

啊，除了哭泣，我已无能为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9日。教廷内部已经完全成了反萨伏那罗拉派。卡拉法枢机主教和洛佩斯枢机主教曾经同情萨伏那罗拉。但他们积极赞同成立的托斯卡纳——罗马新布道修士会未被萨伏那罗拉理睬。从那时起，他们二人开始明确站到了反对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上。其他心里拥护萨伏那罗拉的人如今不但不愿再为他辩护，反而对他满口谴责之词。

罗马市内的气氛也是清一色的反萨伏那罗拉、反佛罗伦萨。市民们用石块砸佛罗伦萨大使的住处，还连续发生了其他的捣乱事件。为了确保大使的安全，教皇甚至派了一支教廷近卫兵队伍前去警卫。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0日。今天收到了萨伏那罗拉3月13日写的信函。这么久才收到这封信，是因为这封信并不像往常那样通过大使传递，而是个人私底下送来的。我赶紧把信交给教皇。

萨伏那罗拉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值得祝福的人：

我看到几个教会牧羊人的恶劣案例，看到因为他们而堕落的教会恶劣地把羔羊驱赶进地狱。所以我认为，捍卫上帝的名誉，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纠正堕落的生活，唤回基督教的纪律，只有这些才是我的使命。

可是，就在我付诸行动的时候，罪恶深重的恶人们却事事妨碍我的工作。因此，我为了保护民众而强使他们走上了“窄门”[31]（《马太福音》）。最近我的烦恼和苦恼几乎使我害病，却没有人给我安慰、给我力量，也没有人给我帮助。

其实，我本期待教皇陛下能救我，能与信仰之敌战斗，可是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反。陛下拒绝保护无辜的我，一点也不考虑我提出的诸多理由，尽管我本不打算用那些理由请您原谅我的原罪。我所提出的理由别无他意，只是阐明了我在布道时所讲教理的真实性，阐明了我对教皇陛下和圣罗马教会的由衷的服从意志。

非但如此，陛下还偏听了我的敌人之言。陛下与我同为基督徒，陛下是最高牧羊人。得到陛下的帮助是我置身于神职界的一项权利，但我的等待成为徒劳。

总之，恶狼如今已对我愤怒得发狂。现在我只能认为，上帝为了惩戒强者，而把弱者送去了地狱[32]（《哥林多前书》）。我只能祈求陛下认可我为遂行上帝之言而饱尝的苦恼和忍耐。

如今，我将仿基督之例，决不追求荣耀[33]（《约翰福音》），只是怀着由衷的希望等待死亡。

愿陛下珍重！

于佛罗伦萨

罗马历1498年3月13日

耶稣基督所不取之仆人[34]（路加福音）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亲笔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8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三个礼拜日。听说萨伏那罗拉很快就要暂停布道了。全家一起去了圣马可教堂，聆听他的最后布道。萨伏那罗拉好像又瘦了一圈，但表情和声音同以前毫无

变化。听众似乎也和以往一样多。他登上布道坛说道：

“每当走下这个布道坛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对自己说：已经不想再说话了，不想再布道了。把今后交给上帝，自己想住口了，想安静地生活了。

“可是，每当我登上这个讲坛，我就抑制不住自己。在讲坛上讲述上帝的所为，就像燃烧正旺的火焰，灼烧着我的骨骼、我的灵魂。我灭不掉这火焰。我感到上帝和圣灵已把我的灵魂点燃，我要开口说话。

“可是，一旦走下布道坛，我又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不想再布道了，我要和平地生活。然而我做不到。一登上这个讲坛，我的舌头就停不下来。我藏不住上帝赐给我的那些话语。

“哦，上帝啊！你不畏惧任何人，不担心他们的脸色和心情。你会在你所希望的时候提示真相。哦，圣灵啊！你为何要让我痛苦？你为何要像大海上兴风作浪的大风，卷起巨浪向我袭击？

“可是，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到。把一切交给上帝吧！上帝是高手，他会考虑如何安排被他当作工具使用过的人。预言者耶利米在上帝不需要他的时候殉教。我也在等待同样的命运。上帝啊！就按你所喜欢的那样去做吧。再苦，也是地上的苦。越苦天堂里的花冠就会越大。

“昨晚第3时（9时许），政府委员会的5位使者到我这里来，让我暂停布道。我问他们，你们是奉主子（signori，政府委员）之命而来的吗？他们回答说是。我说，既然如此，我也要与我的主人（signore，上帝）商量后再回答你们。现在，我想在这个讲坛上回答他们。请听好了！

“上帝同意了。但是不要搞错，上帝只同意了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没有同意。他同意我中止布道，但没有同意我停止为带给你们平安以及正确和圣洁的生活而努力。

“近期会有新的恶魔般的洪水袭击佛罗伦萨。但上帝会在洪水中送来另一个人，来惩戒恶人，保护你们不受堕落生活之害。我现

在已经不能布道了，我只能祈祷。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哦，上帝啊！不要把你的未来、你的誓约推迟太久！”

以后，我们将有一段时间听不到萨伏那罗拉布道了。不过，据说最忠于萨伏那罗拉的人多米尼科修士会代他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继续布道。我们还听说，萨伏那罗拉过去的布道内容由一个叫洛伦佐·维奥里的人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将陆续出版。开始部分已经出版，卖得飞快，连在德意志都有人阅读。

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搞不明白。为什么罗马教皇，那位统治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基督代理人，会如此讨厌、如此强硬地禁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呢？萨伏那罗拉究竟是真正的预言者，还是假借上帝之名的伪预言者呢？我觉得我心里的这个疑问不但总也抹不掉，相反却越来越大。

我更想知道他这个预言者是不是比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更加正确。如果我能得到启示，我想，我这不安的心绪便会镇定下来，我会由衷地欣然接受他的布道和弥撒，也不用拿写日记什么来作为安慰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3日。以前都是佛罗伦萨大使常来求见教皇，而教皇一概拒绝，根本不见。今天双方终于举行了会谈。

布拉奇大使报告萨伏那罗拉已停止布道，说教廷和佛罗伦萨已恢复了关系。但话刚开头，教皇就一脸不悦地打断了他。

“大使，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的事我已知晓。但多米尼科修士在继续布道，内容同萨伏那罗拉讲的一样，这是为什么？而且，萨伏那罗拉只是停止了布道，他还在圣马可教堂主持弥撒，领导祭祀队伍。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此这般，一点都没有响应我的要求。

“大使，听说佛罗伦萨政府里有人批评我，说我出于政治企图

才把萨伏那罗拉搞成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我和萨伏那罗拉同为神职界人士，必须以宗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且不论教皇是否正确，现状是教皇具有治理教廷领土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皇必须考虑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的政治问题。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另外，关于所谓的宗教方式，大使，我想真的没有必要也向你解释神职人员的义务吧。神职人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上级。基督指定彼得做自己的代理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以后的每一任教皇都被认定为彼得的继承人。天主教会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天主教会因为服从上级而得以成立。上级也许会有不合理、不正确的命令，但必须服从。正因如此，我们才把服从说成是基督徒的德行。

“修道院是干什么的呢？在修道院修行就是为了忍受不合理的卑微工作，把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奉献给上帝，然后获得上帝赐予的愉悦。修士最应该领悟服从之德。如果厌恶这样做，那他尽可离开修道院。教皇不会要求世俗之人具备这样的德行。

“萨伏那罗拉是属于多明我会的修士。我是统治包括多明我会在内所有会派神职人员的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接着向大使反复强调了两点：禁止萨伏那罗拉手下的修士布道；执行教皇把萨伏那罗拉押送到罗马的指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6日。今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

首先，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匆忙请求会见教皇，他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一封信，信中提议召开公会议让波吉亚教皇退位。

几乎与此同时，安插在佛罗伦萨市内的一个密探通过加急邮递送来了萨伏那罗拉致欧洲各国国王信件的抄件，这封信不只是给法

国国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送来的给法国国王的信件是从一个佛罗伦萨人的身上搜到的，此人行动诡异，十万火急地要赶往法国，遭到了枢机主教的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手下的怀疑，在米兰公国境内抓捕了他。萨伏那罗拉的信是写给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英吉利国王、匈牙利国王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每封信的行文大同小异，其开头如下：

“复仇的时候来到了！上帝希望我面对全世界，把新的秘密、把教会濒临危机的情况告诉你。圣彼得的船如今已行将沉没，因为你的怠慢而即将沉没。

“教会已经从头到尾充斥了不祥之物。然而，你非但没有伸出手去拯救教会，甚至还对玷污教会的罪魁祸首毕恭毕敬。上帝因而不得不把教会长期置于没有牧羊人的地方。

“现在我转达上帝赐予我的话语。这个亚历山大不是教皇。他通过买卖神职而获得了今天的地位，他把神职卖给付钱的人。除此之外，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我断言，他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不相信上帝的人，是散布不信仰上帝的罪魁祸首。

“现在，是让他毁灭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召开公会议，在会上逼他退位。我向你传达上帝的这条命令，由你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上帝将以奇迹向你宣示此言的真实性。”

最后，萨伏那罗拉用适合于每位国王的话语结束每一封信。

首先是写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35]的：

“如果皇帝还记得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和帝国拥护圣罗马教会的作用，就应该率先站出来拯救教会于危难之中。”

在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世[36]和女王伊莎贝拉的信中，他先提到了1492年开始在西班牙的肃清异教徒一事，然后写道：

“你们所取得的对异教的那场胜利，对上帝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啊！但是在你们巩固外周的时候，教会的基础开始崩溃，整个教

会行将崩溃。”

萨伏那罗拉最期待、最早写信去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写道：

“你浪费了上帝赐予的许多机会。只要你不对意大利进行神圣的征服，上帝将给予你比其他任何人都可怕的惩罚。你不妨想想上帝已经惩罚了你，让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你拥有‘基督徒之王’的大名。那是上帝赐予你的。上帝还赐予了你圣剑。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选中你做复仇旗手的缘故。你不能与堕落的教会同流合污。为了完成你的任务，无论有多少障碍、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你，你都必须跨越过去！”

在给英国国王亨利七世[37]和匈牙利国王乌拉迪斯拉斯二世[38]的信写到结尾部分时，密使说已没时间抄录抄本了。不过，内容应该大致都一样吧。

念完这封信的时候，房间里除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外，还有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卡拉法枢机主教、洛佩斯枢机主教等人在场。大家都沉默不语，等着教皇说话。我甚至想教皇不定会爆出怒吼。然而，亚历山大六世面色涨得通红，抓住椅子扶手的那只手只是瞬间颤抖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他立刻转向我，问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与萨伏那罗拉之间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络的。我回答说，我们有准确的情报，是从2月底开始的。

就说了这几句，教皇便像往常一样，态度郑重地同枢机主教们打过招呼，走出房间，到他的私人房间去了。

房间里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在思考，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已经决定，公会议的召集权在教皇，教皇有义务每10年召开一次公会议。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才6年，他并没有义务召开公会议。

1497年1月，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针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答复以一票之差承认国王有权召集公会议。这是事实。所以，对教皇亚

历山大六世而言，联系到1494年法军的入侵，法国国王的动向最令他担心。其他的，如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匈牙利国王等都与他有着友好的关系，因而他并不认为他们会轻率到因为这封信就会行动起来。英王则远在天边。考虑到敌视教皇的罗韦雷枢机主教已逃亡法国，问题还是在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动向。现在，萨伏那罗拉写给法国国王的信已经捏在教皇的手里。

我第一次觉得萨伏那罗拉这个家伙很可怜。如果这封信是受罗韦雷枢机主教煽动的结果，那么，他为什么如此信任罗韦雷枢机主教呢？对罗韦雷枢机主教而言，萨伏那罗拉等人并没有多大意义。罗韦雷是一个政治家，为了推翻波吉亚，他可以利用一切。而且，罗韦雷枢机主教是事事与萨伏那罗拉所属的多明我会作对的方济各会的实力人物。

我对萨伏那罗拉会轻易相信别人感到惊讶。在意大利的各位君主中，他最信任的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和米兰公爵“摩尔人”。对于费拉拉公爵我们可以理解，毕竟萨伏那罗拉自己就是费拉拉人，公爵本人也是出名的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可是这位米兰公爵，为了探知萨伏那罗拉的言行，竟然派出大使与他接近。萨伏那罗拉认为公爵是自己的崇拜者，什么都写给他，什么都跟米兰的大使讲。这一切罗马洞若观火，而他却浑然不知。

萨伏那罗拉大概现在还在佛罗伦萨的修道院里等着法国国王的回信呢！他还不知道信已在罗马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早上，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迪·布里亚说，要用“火的考验”向萨伏那罗拉挑战。

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声称上帝将会用奇迹予以证明。他还说什么“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

际证明一下吧。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燃烧着的大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他便承认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8日。今天，多米尼科修士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宣布接受弗朗切斯科修士昨天发出的挑战。他说：

“上帝的教会需要改革。但不破不立。佛罗伦萨也只能在如今堕落混乱、情况最差的时候才能再次绽放花朵。不信上帝之人终将在基督的面前害怕、发抖、毁灭。这一切将在我们的眼前实现。

“我们多明我会的神圣领袖萨伏那罗拉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处罚是无效的。不服从教皇的命令不等于犯罪。

“昨天，无信仰之徒、教皇的走狗方济各会用“火的考验”来挑战我们多明我会。我当然要奋起应战！正如吾师萨伏那罗拉所说，上帝保佑我！”

多米尼科修士结束了这场布道，来到市政厅。据说他签下了名字，明确表明要进行“火的考验”的意图。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30日。今天，方济各会的隆迪奈里修士也终于签了字。方济各会一直坚持挑战的对手必须是萨伏那罗拉而未让步，所以签字拖到了今天。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两派派代表进行“火的考验”。方济各会的代表是隆迪奈里修士，多明我会的代表是多米尼科修士。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日。多明我会修士和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世俗人等300多人聚集在圣马可教堂，进行了弥撒和祭祀游行。萨伏那罗拉走在前面，领着游行队伍走出教堂，绕教堂前广场一周，把萨伏那罗拉写的印刷品散发给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印刷品上写道：

“我想亲自走入火中，但我还有太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要忘记，我们是不得已才回应无信仰者提出的这个不正当挑战。

“不过，即使我走进火中，上帝一定也会让我毛发无损地走出来。上帝也一定也会保佑多米尼科修士和其他所有信仰笃深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日。今天，痛哭派（萨伏那罗拉派）的人闯到市政厅，催逼政府委员会尽快进行“火的考验”。这群人中有男女老少，人数很多，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我也带着全家挤在里面。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4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做了很久未做的布道活动。他的布道时不时被聚集在圣马可教堂的听众狂热的欢呼声所打断。当萨伏那罗拉说到他自己想走进大火的时候，听众全体起立，高呼：“我也去！我要跟随导师一起去！”现场气氛热烈。

我们相信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我们现在刚刚看到上帝选择他做使徒的证据。萨伏那罗拉的预言已经被4年前的法军入侵所证实。上帝的鞭子落在罗马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正确的一方是受到开除教籍处罚的萨伏那罗拉，而不是上帝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这样的证据现在即将昭示于世。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喜悦啊！对信仰而

言，这难道不是胜过一切的明证吗？

近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暴行明显加剧。但当看到多米尼科修士从火中走出而毫发无损，他们一定会对他坚强的信仰惊恐万状。教训他们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证明我们正确信仰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5日。佛罗伦萨大使邦西与教皇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是应佛罗伦萨的请求举行的。大使知道教皇熟知佛罗伦萨的情况，所以很快进入核心话题。

“教皇陛下，我国政府想知道陛下对‘火的考验’的看法如何？”

“我不赞成这件事。不但不赞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还感到非常不愉快。因为这是在试探上帝。这是基督徒不应有的不恭行为。”

“陛下，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这个事态，那就是陛下赦免萨伏那罗拉，解除对萨伏那罗拉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便可以命令属下的修士从‘火的考验’中收手。”

教皇苦笑道：“大使，明知你们的政府要为把我逼到今天的地步负最大责任，你还要说这样的话吗？”

邦西大使也不退让。

“陛下，我也预料到您不可能赦免萨伏那罗拉。既然如此，能不能请您命令方济各会收手呢？这件事是他们引起的。”

亚历山大六世不作声看着大使的脸，说了句“无可奉告”，便结束了会谈。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6日。听说今天一大早，政府委员会的代表造访了圣马可修道院，通知他们第二天7日举行“火的考验”。胜利的日子终于要来了。我感到现在就已经看到，今年的棕枝主日（4月8日），庆祝信仰胜利的人群挤满了整个佛罗伦萨。

但是，政府已经议定，如果多米尼科修士被烧伤，萨伏那罗拉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离开佛罗伦萨。我也越发强烈地感到，一切就看明天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6日。我一直在考虑定于明天举行的“火的考验”。梵蒂冈没有一个人相信两个修士中的任何一个能够从火中走出而不受伤、不烧着衣服。烧死的可能性更大。萨伏那罗拉一直称教廷的空气堕落，罗马大概真的像萨伏那罗拉所说的那样堕落了。

尽管如此，预言者也够可怜的，为了让民众满意，必须搞出奇迹。可那不是自己开的头吗？后事当然得自己料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7日。一大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旋涡。痛哭派认为胜券在握，期盼尽早看到结果。而愤激派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没有人在工作。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进行“火的考验”的领主广场。

领主广场的入口全部被封锁，三个主要入口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卫着，禁止市民携带武器入场，女人和儿童也不得入场。武装士兵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周围加强了警戒。城门紧闭，驻屯在佛罗伦

萨境内的佣兵也被禁止移动。

广场上已经为“火的考验”搭好了台子。台子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台子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约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修士通过的通道贯穿中央，宽约2布拉乔奥（1.2米）。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

时间定在第17点（正午时分），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上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挤满广场的人群前来回走动戒备着。

首先，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从圣十字教堂方向列队走进广场。入场时既没有高唱圣歌，也没有祈祷的声音，十分安静。他们全都穿着自己独特的深棕色修道衣，扎着绳子做的腰带。这些方济各会修士们在事先隔开一半的佣兵凉廊里靠近市政厅的一侧就座。

紧接着，多明我会的修士从圣马可教堂的方向入场。他们排着两列整齐的队伍，唱着圣歌。在大约250名修士的黑色僧衣队列中央，多米尼科修士身披火红的天鹅绒长袍，手上捧着巨大的十字架。人们看见萨伏那罗拉修士手捧十字架上的基督像紧跟其后。修士队伍走完后，接着走来了许多人，手拿火把和蜡烛。他们都是衷心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人。多明我会修士入场后绕广场半圈，在方济各会修士已经落座的佣兵凉廊的另一半就座。佣兵凉廊以中间做好的格栅为界，一边坐满了穿深棕色衣的方济各会修士，另一边坐满了穿黑僧衣的多明我会修士。入座完毕的多明我会修士在最前排做了一个祭坛，多米尼科修士把大十字架安放在上面，然后跪在十字架前祈祷。其他修士围着他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时，佣兵凉廊周围也有武装士兵在警戒。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迟迟不见动作。首先是方济各会的修士提出了抗议，说多米尼科修士的装束太夸张，不知道他在衣服下面还穿着什么，没准儿施了魔法，要让他脱去衣服。多明我会修士们商量后，多米尼科修士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一个同修的衣服。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走进火中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中，便又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只能用于让信徒崇拜和圣餐仪式，多米尼科修士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走进火中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明我会修士一定会做出让步。然而他们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搞“火的考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与政府委员们协商。他们久久不出，看起来这两派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出来，却不料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然后又进了市政厅。这样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发出抗议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时间，又等了3个多小时。空气紧张起来。担任警戒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继续等待。代表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

快到下午第10点（5时左右）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几个坐在有顶篷的佣兵凉廊里的多明我会修士站起来高喊：“奇迹！奇迹啊！这是上帝不希望‘火的考验’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愤怒理所当然。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教派去了：

“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

“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人们已经不分愤激派和痛哭派了，反倒是痛哭派的人对他更加愤怒。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在佣兵凉廊里，修士们也开始用脏话相互谩骂。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骂多明我会修士是胆小鬼、骗子。多明我会的修士也毫不示弱，嘴里叫骂着叫花子、狗、呆瓜。修士在神职人员中是最下等阶层的僧人，与主教比是教养低下的人。我想今天算是亲眼见识了。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委员们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个委员赶在出事之前，跑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的考验”！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像来的时候一样排成二列纵队，唱着圣歌，向通往圣马可教堂的出口走去。群众怒从心头起，冲向修士的队伍。暴风雨般的怒吼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涌去。为了保护多明我会修士不受群众袭击，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守在队伍的前后左右。队伍这才好不容易通过圣母百花大教堂，回到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圣马可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痛哭派的人们高喊：“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愤激派的人们也在喊：“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

两派群众同样愤怒。

民众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当天夜里，城里实施了严格警戒。痛恨萨伏那罗拉的群众要杀掉他的传言在不断扩散。所有道路上都点着通红的火把，市民也被禁止外出。马路上行走的都是排队警戒的武装士兵。这一夜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过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8日。民众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做完星期日上午的弥撒后，多明我会的修士刚走上布道坛，一群人就像雪崩一样拥进教堂，把修士从讲坛上拖下来。他们个个手里都拿着棍棒和匕首，踹开了排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的听众。一个冲进来的人叫道："滚吧！滚到好哭的上帝那里去吧！"

教堂里一片混乱。女人们哭喊着。大家争前恐后涌向大门。冲进来的人把听众赶出教堂后喊道："去圣马可，去圣马可！"

来做弥撒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进来，连想逃跑的人、少年还有女人都抓起了石块。

群众沿着拉尔加街[39]走过美第奇宫前，向圣马可广场而去。眼见得群众队伍在不断壮大，每条巷子都有人走出参加进来。有个老人，大概打算去做弥撒，唱着圣歌走过群众的前头。很快，他就被几个男人围上了。

"还没有厌倦吗？你这个伪君子！"他们谩骂老人。老人被他们一棒打死了！悲哀啊！

到了圣马可广场，群众越来越多。人人都在喊："点火烧圣马可！把那些修士熏出来！"

在圣马可教堂里做弥散的人逃了出来。修士们跑到隔壁的修道院里，关上入口大门，在后面架起路障。

群众中拿武器的人渐渐多起来，修道院的围墙又高又坚固，里面至少有250名修士，还有30多个老百姓。他们似乎已下了决心，为保卫萨伏那罗拉不惜一战。他们有充足的武器。间或还有几个修士在修道衣外面穿上胸甲，爬上墙头，向在广场上喊叫的群众射箭，吓唬他们。

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到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家去！"群众呼应着这个声音，开始向城中心跑去。他们想袭击被称为萨伏那罗拉左膀右臂的瓦洛里的家。大家知道，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一定会在萨伏那罗拉身边，应该只有家属留在家里。

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或许是听到了墙外的喊声，或是担心修道院防守薄弱，再或是打算去集合自己的手下，他化装后走出修道院回家去了。群众包围他家时，他前脚刚进家门。群众在钉着铁钉的厚重大门前高叫。这时，政府委员差来的使者到达，向他传达了让瓦洛里去市政厅的命令。瓦洛里跟着他，打开大门走了出来。他在卫兵的护卫下，在远远围着他的群众的一片嘲讽声中向市政厅走去。就在这时，一群全副武装骑着马的人跑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处决的那5个人的亲属，现在要来报仇了。他们骑在马上同时刺出了数杆长矛。一度把佛罗伦萨政府玩弄于股掌中的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妻子从窗户里看见这个场景，发出一声惊呼。一支箭飞来，扎进了她的胸膛。群众从门口蜂拥而入，跑到楼上，用枕头捂死了睡在那里的幼儿——瓦洛里的外甥。然后是一阵抢掠。

群众因首次的血祭而亢奋起来，根本不知道停手。被视为萨伏那罗拉派主要人物的安德里亚·坎比尼、保罗·索德里尼、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家挨个遭袭被抢。但他们已经提前逃走，无人死亡。

一来二去，夜幕降临了。群众抢得高兴了，便再次汇聚到圣马可广场，开始攻击修道院。有人要点火烧门，有人绕到修道院后侧，尝试翻墙。但修道院防守坚固，修士们一边高呼“基督万岁”，一边把来犯者挡了回去。

在反复攻守的时候，大约在第4点（夜里11时左右），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带着一队武装士兵来到现场。看代表们的脸，几乎都是愤激派的人。代表叫出了修士，传达了政府的决定，要把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个手下护送到市政厅去。退到里面去的修士久久不出。这期间，修道院内外又打了起来。愤怒的政府代表再次派使者进入修道院传话，要萨伏那罗拉到市政厅报到。结果使者也久久出不来。

快到第6点（午夜1时左右）的时候，圣马可修道院的大门终于被砸开，群众像雪崩一样涌进去，与抵死防守的修士展开了激烈的

肉搏。仅是攻入的群众，就死了15到20人，伤了100多人。

也许是已无力抵抗下去，到了第7点（午夜2时左右），两个修士和先前被派进去的使者走了出来。两个修士向政府的代表说道："如果你们保证把这三个人安全带到市政厅，我们就交人。"代表答应了。

不一会儿，萨伏那罗拉、多米尼科和西尔维斯特罗三人来到了修道院门口。卫兵立刻围到了他们身边。铐上手铐脚镣的声音尖厉地传向四周。他们穿过人群，向市政厅走去。

这三个人，在群众的怒骂和嘲讽声中被带走了。一个死者母亲模样的人一边发出鸟一样的悲鸣，一边抓住萨伏那罗拉的手腕，扯破了袖子。有人在踢他们的腿，还有人叫道："去死吧，瘟神！"

被押走的时候，只有西尔维斯特罗低着头。萨伏那罗拉修士和多米尼科修士两人被带走的时候高昂着头，目视前方，不改凛然之态，毫无胆怯的样子。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9日。萨伏那罗拉持续统治佛罗伦萨长达4年，但他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力。

民众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个个善良、聪明机灵，一旦感到事情会危及自身，马上就会变得胆小怕事。

可是，当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群体，性格就会大变，且变化多端。刚才还是一群温顺的羔羊，瞬间就会变成一群狂奔的野猪；刚才还在彬彬有礼地因幸福而落泪，转瞬就会不顾一切地大吵大闹，结果闹出人命。

如果你看不起民众的这种动物性，为此而叹息，那究竟会怎样呢？只能正视现实。

为某一件事激起民众的狂热并非难事，因为民众总有一种狂热

的欲望。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狂热持续下去，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本身不错。不但不错，依靠民众的支持还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方法。但是，一旦政权到手，就需要改变这种方法。对于民众，要先给他们一勺蜜，然后把他们牢牢地关进笼子里。民众满足于蜂蜜，便不会在意束缚他们的笼子。

萨伏那罗拉错在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说自己并无权力欲望。当然，民众开始时会把没有权力欲望的他推倒权力的宝座上去。但是，他不也顺势登上了权力宝座吗？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脚底下的基础脆弱，强烈的自信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轻飘莫名，难道不是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紧急使节深夜抵达，告知了法国国王的死讯。我把这个报告送给已经进了寝室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掩饰不住喜悦。

对教皇而言，这是继萨伏那罗拉倒台的又一个喜讯。这一定给了他更大的满足。萨伏那罗拉的武器是三寸不烂之舌，可是法国国王却拥有真正强大的武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亚历山大六世看上去心情格外好，当即传上早上求见的佛罗伦萨大使。

邦西大使转达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意思，称以前在萨伏那罗拉事件上一再处理不妥，对此表示道歉，说这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大使还说，佛罗伦萨政府拟依照共和国法律对已被捕的萨伏那罗拉及其两个门徒进行审判，特请教皇批准。最后，大使

说由于每年支付法国国王巨额贡金和旷日持久的比萨战争的耗费，佛罗伦萨财政已濒于危机，请求暂免向教会缴纳相当于年度收入1/10的所谓“什一税”。

对此，教皇做了如下回答：

“我将以由衷的喜悦接受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原谅你们的过去吧。我觉得，佛罗伦萨市民就像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孩子。

“对他们三人的审判，眼下先交给政府处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神职人员。我还是要求政府尽快将他们押送到罗马来。

“关于什一税，我很难立即答复。但是，看在已经觉悟的佛罗伦萨人的分上，我不会为难你们。也许你们的请求会被接受。”

佛罗伦萨大使得到教皇这样的答复退了出去，一副放下心来的表情。

但我觉得，亚历山大六世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主要是关于什一税的那段话。如果仅对佛罗伦萨一国免税，其他各国不可能沉默不语。以前，教皇曾许诺过要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条件是佛罗伦萨参加意大利同盟。可是比萨人坚决主张自立，威尼斯又一如既往地反对这样做。亚历山大六世是在对此事态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向佛罗伦萨许诺的。我觉得，在什一税问题上佛罗伦萨人会再吃空心汤圆。看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相当坏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0日。今天第21点（下午4时左右），三名犯人被从市政厅里的监狱移送到了巴杰罗宫。看着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被人押送，人群中甚至无人落泪。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3日。听说法国国王7号那天死了。这么说，那天的暴雨就是他的死讯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9日。今天，我在市政厅内大会议场旁听了对萨伏那罗拉的审判。他已经亲笔写下，自己不是预言者，自己传道的东西全都不是根据上帝的启示，审判时还宣读了这份东西。萨伏那罗拉承认了这些，他还坦白了一些事情，这些事同我们在他布道时听到的完全相反。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些，惊愕不已，胸口在作痛。我想到我们努力构筑的东西竟然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还不得不亲眼见证自己如此搭建起来的东西崩溃坍塌，成为碎片瓦砾……

我一直盼望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希望它能够成为正确生活的好榜样，通过遵守正确的法律，以正确的生活方式使佛罗伦萨繁荣起来，希望在我们国家教会也能够重得新生，能够改变无信仰者之心，使国家获得好人得到尊敬的力量，从而成为上帝的国度。

可是，这些愿望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感觉不到愤怒，只感到特别悲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2日。圣母百花大教堂公布了教皇的赦免。我们佛罗伦萨市民在萨伏那罗拉被开除教籍之后仍然在听他布道，参加他所主持的弥撒，因而也是有罪的。今天，因着教皇的特别仁慈，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4日。修士倒台后逃往国外的人中，在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之后，还有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保罗·索德里尼。他在逃亡地卢卡被刺客杀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0日。政府委员会向袒护萨伏那罗拉而被逮捕的23名市民宣布了处以罚金的刑罚。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处以100、200到1000弗罗林不等的罚金，罚金共计1.2万弗罗林。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日。今天，23名市民在交付罚金后被释放了。牢里只剩下三个可怜的修士了。

为萨伏那罗拉布道，曾经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搭了临时看台，这看台后来几乎成为常备设施。今天，根据政府的命令，彻底拆掉了这些看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日。今天从第15点（上午10时左右）到傍晚，很多人都听到了从巴杰罗宫里传出的惨叫和呻吟声，是在拷问那些修士。

听说，上刑是捆上手腕吊起来，然后再把人突然降下来，说这是最轻的一种刑罚。但萨伏那罗拉以前身体就弱，这样的刑罚怕也经不住。在审问中他翻供，昨天还说自己不是预言者，第二天就不

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声称自己受上帝派遣，供词前后不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3日。教皇今天必须做出决断。

佛罗伦萨政府拒绝了教皇让他们把萨伏那罗拉押送来罗马的要求。教皇一再要求，但答复总是一样。而且，他们还传话过来，希望教皇任命特使去佛罗伦萨，在当地进行审判。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反萨伏那罗拉的愤激派掌握了佛罗伦萨政府的权力。他们害怕让萨伏那罗拉活着，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东山再起，所以想尽早除掉他。如果把萨伏那罗拉押送罗马，教皇顶多把他关进圣安杰洛堡的监牢。他们摆脱不了一种不安：教皇在位时间所剩无几，萨伏那罗拉不定哪天就会出来，恢复原来的地位。所以他们不想把他送到罗马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理由判处萨伏那罗拉死刑。佛罗伦萨的审判一拖再拖，就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得编造出一个理由。可是，这很难做到。萨伏那罗拉对国家并没有反叛行为，用世俗的法律衡量，他没有一点的犯罪事实。这样他们才考虑不把他送到罗马而采用教会法来审判。于是，他们请求教皇派特使来佛罗伦萨。

这回教皇似乎有了什么用意。都过去了十多天，教皇也不见佛罗伦萨大使，在与他的心腹说话时也绝口不提这件事。我们只能想象教皇的内心想法。

我想象，教皇是在考虑对萨伏那罗拉死亡的责任问题。根据眼下的事态，派遣教皇特使就意味着萨伏那罗拉死亡。根据教会法，异端、分派、反叛之罪都构成死刑。

佛罗伦萨政府想通过这个办法把萨伏那罗拉之死的责任转嫁给教皇。教皇当然知道这种事。他是在考虑，明知如此却又响应，这样做是否是上策。

教皇的心腹大患查理八世已经死去。奥尔良公爵路易[40]继承了法国王位。因而保持与佛罗伦萨的友好关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紧迫。话虽如此，向意大利五大国之一的佛罗伦萨政府施以恩惠，把它拉在自己一边，也是十分有好处之事。

这中间，萨伏那罗拉只是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不过，这不就是跌下权力宝座的人的命运吗？

如果萨伏那罗拉要搞出点奇迹的话，与其让天下雨，不如自己穿越大火。民众喜欢看让他们手上捏把汗的杂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这几天，群众拥到政府和巴杰罗宫，骚动不已，他们高呼："杀死修士！"

他们对一拖再拖的审判已经失去耐心。这帮人多么浅薄，竟想早点看到人死。

萨伏那罗拉似乎已经意识到今有一死，在牢里专心写作。据说他写的东西是背着监视他的人，让在监狱里工作的人一点点带出来的。看守中也有尊敬这几个修士的人，他们在帮他做这件事。他写的东西题目是"上帝啊，怜悯我吧！"（Miserere Mei.）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8日。教皇终于下了决断，任命多明我会会长乔亚基诺·图里亚诺和主教兼罗马教会法庭副审判长弗朗切斯科·洛莫利诺为教皇特使。尽管洛莫利诺还很年轻，才36岁，但教皇很欣赏他在教会法方面的见识，所以任命他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9日。今天，为了审判萨伏那罗拉，罗马派来了教皇特使。他们是多明我会会长和伊莱尔达的主教。前去迎接他们的群众齐声高呼："消灭修士！埋葬假预言者！"

两位特使看了一下群众，没有回答，走进了市政厅。听说他们在市政厅随即开始了审问。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礼拜日，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

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他的双手捆起来。在吊起他之前，主教向他问话。

"你昨天坦白说，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告诉人们听到了，还扬言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都是一派胡言。你能在这里承认你昨天交代的吗？"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不承认，自己就是预言者。

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立刻被高高吊起。我们坐在听众席上，听到头顶上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

当天的公审就此结束。萨伏那罗拉被放下来，他疲惫虚弱的身体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根本没有顾及离席的审判长和我们旁听的人。这一幕像烙在了我的眼底一样，挥之不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门徒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被判死刑，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圣罗

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先处绞刑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23日的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即开始了行刑准备。我傍晚路过那里的时候，已经准备完毕。

从市政厅的狮子像前到广场中央建起了一个廊道。在木板搭成的廊道末端，是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圆台，中间立着很粗的木柱，高极了。柱子顶端钉着一根横木，正像一个十字架。

一旁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修士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了。"众人附和着说："是啊，是啊。"也许是听到了这话，一个官员从市政厅里走出来，命人削去横木以上部分的木柱。大约是想把架子做成T字形，使之看上去不像十字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3日。我从人们的传言中听说了三个修士昨晚的情况。据说，得知判决后，弗朗切斯科·西尔维斯特罗吓得晕了过去。他已是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皮耶罗·卡波尼等佛罗伦萨有实力市民的忏悔神父了，但还是在狱中供出了经常与萨伏那罗拉来往的市民名单。与仍然信奉萨伏那罗拉的多米尼科修士相比，他彻底动摇了。

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听到宣判时却表情喜悦，像是被邀请过节一样，还说为什么不让他活着接受火刑，那样可以尝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尝到为他殉教的喜悦。他把送给他的晚餐吃得一点不剩，给自己担任院长的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修士们写了封遗书。遗书中写道：请为我们这些为上帝的教诲而赴死的人祈祷，请好好阅读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

萨伏那罗拉听到判决时既不喜也不悲，只是在无声地祈祷。晚饭上来了，他动也没动，说自己要让灵魂强大，而不必让肉体强壮。他要让脑子清楚，去做好赴死的准备。

教皇特使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请让他见见另外两

个修士。他同被带来的两个修士一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也因此不再恐惧，拿出了勇气。之后两个人又被带回了各自的牢房。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回去后便倒下进入了梦乡。

行刑当日，教皇特使、政府高官、佛罗伦萨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走出市政厅，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的考验”那天还多。其他所有会派都派了神父前来参加。现场鸦雀无声。

三个修士被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个修士被剥去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

西尔维斯特罗修士首先被推上廊道。廊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柱，上面钉着一根横木。横木左端挂着的绳圈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脖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他的身体。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修士的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还剩中间一个吊架，轮到萨伏那罗拉了。对信奉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将会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等等。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甚至连祈求上帝宽恕的话、上帝为何要抛弃他的话、向上帝倾诉哀叹的话都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大失所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图9：萨伏那罗拉的死刑执行

绞刑架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事先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他们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尸体掷石块儿，要把尸体砸下来。他们发出了欢呼声。落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为的是不让任何东西落到信者手里。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哪怕只是一小勺。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维琪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阿诺河。不过，听说还有少数人没有抛弃对萨伏那罗拉的信仰，他们偷偷躲在下游等着，准备捞拾漂下来的东西。就算是骨渣，在宽阔的阿诺河里能捡到吗？骨灰也一定溶到水里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6日。今天我路过广场，在黄昏的光线中，看见就在他们被火葬的地方，有几个身穿黑衣的女人悄悄跪在地上祈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萨伏那罗拉覆灭了。用憎恶和好奇的眼光看着他死去的，是那些曾经把他奉为上帝使者的同一拨民众。

那天，教皇始终沉默着听完接到的报告。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一个认真但不成熟的男人的一生结束了。"

仅此而已。两位特使来报告时，教皇也是专注地听着他们长长的汇报，听完后只是感谢了二位的辛劳，没有谈其他感想。他又回到了平常的工作状态。不知情的人见他这样也许会觉得，从来就没有过萨伏那罗拉这么一个人。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两人互不相容。

萨伏那罗拉在布道和著作中都说，基督徒的信仰表现为排斥、打击和消灭异教徒。

可是，亚历山大六世是唯一一位认可所有宗教存在和信仰自由并予以实践的教皇。1492年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格拉纳达时，伊斯兰教徒可以逃到非洲，但犹太教徒却无处可去。接受他们的正是刚刚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决定把罗马中心的一块地给他们做居住地，让他们住下来。在那里，犹太人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犹太教会堂。犹太教徒们在基督教大本营和教廷所在地罗马生活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还要安稳。教皇还毫不犹豫地让一个受到好评的犹太医生当了自己的侍医。

在对待伊斯兰教徒方面，教皇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关系友好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保护犹太人和与土耳其交好，是萨伏那罗拉谴责

亚历山大六世的理由之一。可是，教皇并没有单纯指望与苏丹巴耶济德的友好关系。他曾从教廷财政中拿出很大部分的金额分数次援助匈牙利。匈牙利与土耳其接壤，地处保卫基督教国家的最前线。

萨伏那罗拉的理想是在佛罗伦萨建立以基督为王的神权政治。根据他的观点，哲学、文学、美术统统无用，只有真正献身于上帝的人才能搞政治。其结果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从事政治。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说，他是想把全世界都变成修道院。这句话正戳中他政教合一的意图。

亚历山大六世的想法则与萨伏那罗拉完全相反。他大概是第一位考虑政教分离的教皇。意大利的不幸在于它分裂成了众多的君主国和共和国，而教廷也占了其中1/7的领土。这样，岂不成了一统于君主之下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饵食了吗？为了避免被鲸吞，只能把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变成一个统一的世俗国家，从而对抗各国。如此一来，像以往那样拥有世俗领土的教廷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到了那时，教廷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发挥真正意义上的教会作用，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个半吊子。

不过，亚历山大六世想靠自己的儿子来实现这个意图。这就遭到了人们的谴责，说他为自己儿子的显达而牺牲了教廷。教皇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显达，这是事实，教皇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从来不用使命一词，这种人也实在罕见。他也知道，自己的个人野心与意大利的利益是一致的。教皇把实现自己意图的事托付给了甘迪亚公爵。不幸的是，甘迪亚公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无能；而幸运的是，他遭到了暗杀。如果有其他能够实现教皇意图的人出现，情况又会怎样呢？教皇一定会竭尽全力援助此人。

教廷与意大利过于紧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亚历山大六世出生在西班牙，是外国人，他比意大利人的教皇更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缺陷。这与只考虑佛罗伦萨一个国家改革的萨伏那罗拉相比，存在着规模上的无限差别，在方向上则完全相反。

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破坏自己担任首脑的教廷，破坏拥有世俗权力的圣罗马教会。他首先想让教廷国家完全世俗化，再用它的力量把整个意大利统一成一个世俗国家。这样，圣罗马教会就会因为失去世俗领土而丧失世俗权力。萨伏那罗拉试图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而亚历山大六世却要将二者分离。

不过，很少有人了解教皇这个大胆的意图。我曾经有一次这样问教皇："陛下，听说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一版再版，还翻译成了德语和法语。在历代教皇中，有人亲自执笔写下自己的想法，也有人雇佣学者（umanista）写作。陛下，您想选择哪种方法呢？"

亚历山大六世面露微笑回答道："人心脆弱。写和说自己做的事情，人们总会心情高涨，或者为自己辩解。自己写会看不到现实，雇人写就更不用说了。人一旦开始为自己辩解，便将一事无成。"

附记：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的书信留存至今。我的翻译尽量忠实，但用省略号省去了中间重复较多之处。书信原文是以当时的公文形式用拉丁文写就。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也确有其物。我从众多编年史作家中选择了他，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是市井之人，我认为他最能坦率表达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他的日记从1450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516年。他自己曾经写道，1450年时他14岁。因而我所写的这个事件应当发生于他五六十岁的时候。但由于他是市井之人而非知识分子，其对事件以外其他事情的叙述失之简单。因此，我或引用萨伏那罗拉的布道集和著作，或以当时佛罗伦萨人的通信为材料，以他的日记为主线，增写了很大的篇幅。

另外，说说我所引用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他在自己的布道中，几乎每次都要重复同样的主旨。我只尽量选择翻译了其中不同的内容。但是，重复即效力，即便不谈当今的宣传广告方法和政治宣传手段，这点也应该不难理解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的日志则完全是我的创作。这个人物确有其人，曾为教皇秘书。后来似乎他作为教皇的亲信之一，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的手下工作。不过，也许是学习波吉亚父子的结果，他们的亲信中没有一个人留有日记之类的记录。没有他们的日记，写作便较为困难。于是我以当时的编年史、各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提交给教廷的报告等为素材进行了创作。

最后，关于波吉亚家族的所谓恶德和堕落，请参见拙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第二部“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和《优雅的冷酷》。本书的内容聚焦于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方面，未能详述其“恶德”。

---

[1]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但同时反对文艺复兴运动，视人文主义者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4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他被处以火刑。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Bartolomeo Flodido）时任教皇秘书官。本书引用的他的所谓日记，是本书作者根据有关史料创作的，并非他本人留下的日记。

[4]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1443——1513），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1471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称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503——1513年在位。

[5]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il Moro，1452——1508），绰号“摩尔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次子，于1494年成为米兰公爵，1494——1499年在位。他曾赞助了达·芬奇等艺术家。

[6] 巴耶济德二世（Bayezit II，或译巴耶塞特二世，1447——1512），土耳其苏丹，1481——1512年执政。

[7]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情妇瓦诺莎

（Vannozza de Catanei）的私生子，曾任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

[8] 法国病，指梅毒。据信梅毒最先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西班牙，再蔓延至西班牙控制的那波利。法军入侵那波利时，从那波利妓女那里感染了梅毒，在军中形成暴发性疫情，并将此病带到欧洲内陆。梅毒后来在意大利及欧洲迅速蔓延。意大利人认为该病由法国人带来，称为“法国病”。

[9] 以赛亚（Isaiah），《圣经》人名，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以赛亚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0]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人名，公元前7世纪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耶利米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1] 《申命记》（Deuteronomy）是《旧约》的第5卷，记述了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对以色列人的3次讲话。其中的最后一章记述了摩西之死。

[12]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Lent），基督教的斋戒节期。据《圣经》载，耶稣于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40昼夜。教会为表纪念，规定棕枝主日前40天为此节期。教徒在此期间一般于星期五守大斋和小斋。节期内教徒不举行婚配，停止娱乐活动，增加祈祷和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施慈善，为基督复活做准备。东方教会的四旬节期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类似于此，棕枝主日前50天称为五旬节期，前60天称为六旬节期，前70天前称为七旬节期。

[13] 阿摩司（Amos），《圣经》中的人名，为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先知，事迹见《旧约·阿摩司书》。

[14] 布拉乔奥（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15] 棕枝主日（Palm Sunday），又称“圣枝主日”、“主进圣城节”，时间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不久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手拿棕枝的群众欢迎。此节日即为纪念此事。教堂在这一天多以棕榈枝装饰。

[16]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和14个中小行会。

[17] 关于此事，可信的历史学家不是予以否定，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就连狂热的萨伏那罗拉派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eri）也只是引用了部分布道内容，而未及其余。只有几位信奉萨伏那罗拉的人在他被处死后不久写下的几份手稿里，记录了这件事。萨伏那罗拉也没有明确地在布道中说过教皇有此请求。——原注

[18]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为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19] 中世纪早期，西欧常用的商业流通介质是一种小银便士第纳尔（denarius），12第纳尔等于1索利达斯（solidus，意大利语称为索尔多，soldo），20索尔多或240第纳尔为1里贝拉

（libra，意大利语称为里拉，lira）。

[20] 佣兵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座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有许多雕塑作品。

[21] 《圣经》格言。《旧约·申命记》中摩西所言，后为耶稣引用。据《新约·马太福音》载，耶稣传道之初，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禁食40天。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答道："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后来人们用这句话表明，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22] 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Porta San Piero Gattolino），即佛罗伦萨后来的罗马门。

[23] 耶稣升天节（Feast of the Ascension），亦译"主升天节"、"耶稣升天瞻礼"，基督教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据《使徒行传》，耶稣于复活后第40日乘云升天。教会规定复活节后第40日为此节日。

[24] 教皇派（Guelf，音译"归尔甫派"），12——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别，成员多为银行家、商人和作坊主，代表意大利工商业主的利益。该派为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封建主的皇帝抗衡，而与罗马教廷的势力联合。皇帝派（Ghibellini，音译"吉伯林派"）的成员则多为大封建主，他们力图保持封建特权，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势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处于教皇派的控制之下，而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多处于皇帝派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两派的对抗使意大利许多城市间发生残酷混战。

[25] 从1497年开始，萨伏那罗拉日益卷入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纷争。佛罗伦萨市民也根据其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自动分裂为下列派系，使佛罗伦萨陷于骚乱之中：愤激派（Arrabbiati）激烈反对美第奇家族及萨伏那罗拉以贵族政治的路线建设共和政体的做法；白党（Bianchi）对萨伏那罗拉毫无同情，但拥护平民政体；灰党（Bigi）继续效忠于美第奇家族；无良派（Compagnacci）抵制萨伏那罗拉对他们私生活的干涉；痛哭派（Piagnoni）又被称为所谓的修士同伙（Frateschi），他们视萨伏那罗拉为先知，构成了萨沃那罗拉的党派。

[26] 甘迪亚（Gandia）位于西班牙东部地中海西岸，15——16世纪曾是重要的文化和商业中心。首任甘迪亚公爵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路易吉·波吉亚（Pier Luigi de Borgia，约1460——1488）。路易吉早逝后，爵位由其同父异母弟弟乔凡尼（胡安）·波吉亚[Giovanni（Juan）Borgia，约1476——1497]于1493年继承，成为第二任甘迪亚公爵，他还是塞萨公爵、那波利治安官、圣彼得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以及教会军统帅，1497年遭谋杀。

[27]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等。

[28]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出身于米兰多拉的贵族家庭，曾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和费拉拉大学学习，后去佛罗伦萨，结识哲学家费奇诺，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精通多种语言，熟悉古代文献和各种哲学学说，其讲演稿《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

[29] 犹言“好死不如赖活着”。

[30] 此处指上一章“最后的十字军”中的主人公教皇庇护二世。

[31]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到走向灭亡和永生的两个门和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西方语言中，“窄门”、“窄路”含有正门正路、永生之门的意思。

[32] 《新约·哥林多前书》：“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33] 《新约·约翰福音》：“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34] 指对主人不忠的仆人，见《新约·路加福音》。

[35]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36] 费迪南多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oh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多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多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波利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la I，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多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他遂以“天主教徒费迪南多”著称。

[37] 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的创立者，1485——1509年在位。

[38] 即亚盖隆王朝的乌拉迪斯拉斯二世（Vladislaus II，1456——1516）。他是波西米亚国王（1471——1516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1490——1516年在位）。

[39] 拉尔加街（Via Larga），现在的卡乌尔街（Via Cavour）。

[40]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1498——1515年在位，被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他于1465年未满3岁时成为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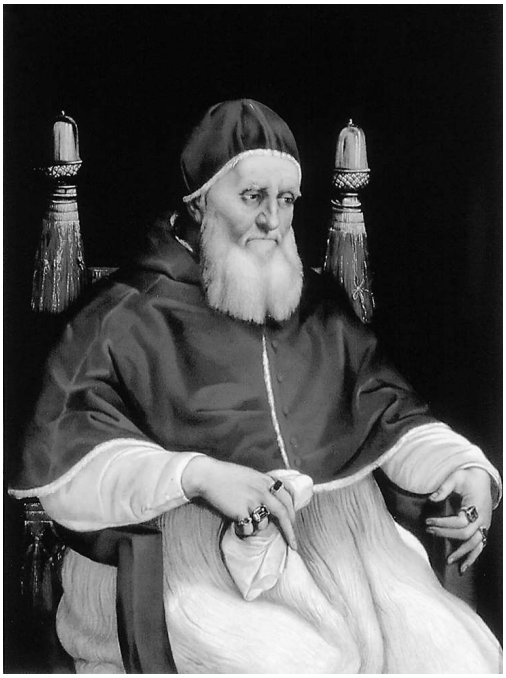


图10：尤利乌斯二世（拉斐尔画）

单凭动机纯粹、认真、不利己这些理由，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结果时会变得惊人的宽容。这使我心情黯淡。

这种人作为个体看是一个善人，值得尊敬。但是，如果他拥有可以影响很多人生活的地位和权力，我们能不看结果而单单称颂他动机纯粹吗？不自私就是好的免罪符吗？

一

1506年8月26日清晨，罗马的所有街道突然被群众挤得混乱不堪。人人都向圣彼得广场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议论着那天早晨像旋风一样传遍罗马的奇怪传言。只要有人说点什么，群众就会齐声发出爽快的笑声。狭窄的马路两边拥挤地排列着房屋，笑声在这些房屋的石壁之间回荡。被这笑声惊起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旦他们知晓了原因，又会急忙穿上衣服，加入到奔跑的群众中来。

“听说教皇要去打仗啊。”

“跟土耳其人打吗？”

“不是，听说是去进攻基督教徒。”

“那一定是野蛮人[1]啦？”

“不对不对，是进攻意大利。”

“哦？”

对话被笑声淹没。

罗马民众已经习惯了教皇的女儿带着豪华的队伍出嫁和教皇的儿子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凯旋。教皇亲自参加狂欢节和出席宴会也已经不会引起他们的惊讶了。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原本应该是做弥撒、赐福予信徒的和平之人，可现在却要亲率大军攻打基督教徒，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大事，难怪惊动了不会轻易吃惊的罗马民众。当他们得知这无害于己时，也是绝对要去看看热闹的。群众中混夹杂着妇女儿童，想到那可以免费看到的精彩节目，他们眼睛发亮，你推我搡地跑过架在台伯河上的大桥。

圣彼得广场上，500名骑兵已经整队完毕。他们从头到脚裹着铁甲，手持长矛，是一队武装到马匹的重装骑兵队。每一个骑士都把头盔的护脸铁板翻上去，摆出骑在马上待命的姿势。他们的旁边，各带着一个佩戴简单铁头盔和胸甲、手拿弓箭的步兵。执马缰绳的马夫没有武装，他们每个人身旁都放着一个大口袋，里面塞满了骑士——马夫们的主人的所有日常用品，从磨砺武器的油、换洗衣服到餐具，应有尽有。不用拽缰绳的时候，他们就要背着这个大口袋跟着走。看着这1500人，实际参战的只有1000人的队伍，广场上远远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惊愕的声音：“人太少了吧！就这点人还想打仗？”

12年前，罗马市民曾经见识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的9万大军，他们当然会有这样的感想。整装待发的骑士们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在等候大将。

这位大将还在眼前的圣彼得大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此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获得成功。他还是教皇，不能只自己一个人祈祷，还要为枢机主教、各国大使和佣兵队长们做弥撒。

祈祷战争胜利的弥撒结束了。圣彼得大教堂的门朝里打开，发出了沉重的声音。这声音犹如口令，骑士们一齐下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2]的身影出现在通往教堂的石阶上。高高的教皇皇冠和金线缝制的长披风，使清晨的教皇看上去更加魁梧。教皇皇冠下面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表情严肃地看着周围。骑士们一齐单膝跪地。甲胄的铁片相互碰撞发出钝响，瞬间压倒了一切。挤满广场四周的群众骚动起来，交头接耳说“教皇的教衣下面也穿着铠甲呢”。他们纷纷跪在地上。枢机主教们身着红色披风，呈扇形排在教皇左右，这时他们也跪了下来。只有教皇和他的坐骑站立着。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面对跪地的骑士和对面的群众，用右手大大地画着十字，以上帝、基督和圣灵的名义为他们赐福。他左手拿着银十字架。在照耀广场的朝阳映照下，十字架闪着银光。大家一齐画着十字，合唱阿门。

终于要出征了。坐骑被牵到石阶下，尤利乌斯二世穿着这身衣服上马，走在全军前头，从广场出发了。他的随从举着巨大十字架走在前面。20位枢机主教骑着马跟随其后。除了在尤利乌斯二世出征期间留守罗马教会的拉法埃洛·里阿里奥枢机主教和因老、病不能同行者以外，全体枢机主教都上了前线。各国大使跟在枢机主教的后面。他们本以为要常驻教廷，却不料要随军作战，个个惊魂未定。再后面是秘书、书记、仪典官等教廷使役。跟在这帮与打仗毫不相干之人后面的，才是重装兵团。

队伍上了前面的桥，跨过了台伯河，左边能看到圣安杰洛城堡要塞。队伍沿着河边的路走了一会儿，便进入了市内的小巷。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路两边所有的窗户。尤利乌斯二世在大十字架的先导下策马通过科尔索大街，他的脸上神采奕奕。枢机主教们不情愿却又不得已地跟在

后面，他们把厌恶的表情藏在红色的宽檐帽下。同他们相比，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精神抖擞，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都63岁了，却好像返老还童，回到了20岁。

穿过科尔索大街，来到了人民广场，这里的北面便是拱卫罗马的城墙。罗马市民的代表已经来到城门下送行。由于没有先例，面对教皇，市民代表不知道说为他祈祷武运的话是否合适，便含含糊糊地与就要离开罗马的教皇寒暄。尤利乌斯二世下马，拉过大十字架，庄严地为自己不在罗马期间的罗马市民祝福。

教皇再度上马，同队伍一起走出城门，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朝正北方向行进。队伍走过米尔维奥桥，再次渡过蜿蜒的台伯河。自此开始，就要走卡西亚大道了。在走入卡西亚大道前要做一件事。出征仪式已经结束，市民代表的问候仪式也已经结束，不需要继续穿戴这热死人的教皇皇冠和沉重的披风了。尤利乌斯二世摘冠脱衣，只剩了白帽和教皇服。他继续策马前行，愈发精神焕发。

盛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照晒着。但在古罗马时代建起的卡西亚大道两旁，浓绿的伞松成荫，凉爽的风吹拂着。苍松之间，闪动着身穿白衣的教皇和身穿红衣的枢机主教的身影，兵队中的甲胄和长矛不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黑光，队伍一路向北，渐行渐远。

这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打的旗号是收回圣罗马教会的领土，完全出乎意料，使人们惊讶不已。但这却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即位3年来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借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就是，教皇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于此。与其说他深思熟虑，不如更准确地说他是因为种种原因才隐忍至今。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出生在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是贫穷的剪毛匠。他与被称为“修士伯父”的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进了修道院。后来，这位修士伯父成为西克斯图斯四世[3]教皇，匠人儿子朱利亚诺的运道也就此打开。他在28岁时接手伯父当枢机主教时的教区，当上了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崭露头角。不知道为什么，西克斯图斯四世更看重并重用热那亚附近小有名气的里阿里奥家的外甥，而不是自己的罗韦雷家族。西克斯图斯四世曾经在里阿里奥家当过家庭教师，因为这个缘分，他成功地把妹妹嫁了过去。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个忍耐时期。

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的时候，以前一直执罗马牛耳的里阿里奥家族的外甥们立刻失势。朱利亚诺巧妙钻营，成功地把同乡奇博扛出来当上了教皇，成为英诺森八世[4]。他与波吉亚命中注定的对决这时表面化了，后者的实力一直被认为在枢机主教中名列第一。朱利亚诺给了一直觊觎教皇宝座的波吉亚当头一棒。他蔑视旦夕祸福的里阿里奥家族那些和他有表亲关系的人，迁出自家宅邸住进了教皇宫殿。朱利亚诺的得意持续了6年，自己和别人都以为下一任教皇的宝座非他莫属。

然而，波吉亚也不是会就此退缩之人。他享受狩猎，跟几个女人生了孩子，悠然自得地等待时机。1492年，在英诺森八世死后的枢机主教会议上，波吉亚在关键时刻击败自信满满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当选，成为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他致力于打倒波吉亚的11年努力的开端。为了打倒宿敌波吉亚，他煽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引法军入侵意大利，图谋借此力量召开公会议，把波吉亚教皇踹下马。这一企图失败后，他马上利用萨伏那罗拉，甚至要掀起一场反波吉亚运动。

眼看打倒波吉亚的计策将要悉数失败，幸运突然降临了。1503年夏天，亚历山大六世得了疟疾病倒。他的儿子切萨雷也在同时因为同一种

病卧床不起，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使朱利亚诺非常幸运。他从自我流放之地阿维尼翁回到了阔别10年的罗马。他没有放过大好时机。亚历山大六世的继任者庇护三世只当了26天的教皇便去世了。庇护三世去世后，威尼斯共和国为了阻止法国人出任教皇而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罗韦雷有预谋地笼络住了那些西班牙人枢机主教，他们的选票原先都捏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中。靠着威尼斯的支持和西班牙人枢机主教的选票，他登上了教皇宝座，成为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加冕仪式当天，他因过于激动而昏厥，被教廷官员们抱着走上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阶。

尤利乌斯二世即位后，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切萨雷·波吉亚。他们二人之间有约定，切萨雷派的12位西班牙人枢机主教将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把票投给罗韦雷，而罗韦雷当选后将确认切萨雷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和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这个约定无人不晓，欧洲各国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心观望着，看这两个宿敌能否和解。尤利乌斯二世打开始就不打算遵守这样的约定，人们却无法谴责不遵守约定的尤利乌斯二世，因为错在切萨雷一方。他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错误地观察和判断了人的感情。设局骗人后毫不内疚，波吉亚父子和尤利乌斯二世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

波吉亚知道设此骗局是个罪孽，只把它看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有效手段。可是尤利乌斯二世不是这样，他毫不怀疑地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认为，为了教会的独立和荣耀，必须打倒波吉亚。于是，做枢机主教时对波吉亚的私愤，在他当上教皇、成为尤利乌斯二世后极其自然地转变成为公愤。切萨雷·波吉亚被抓了起来，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上。这种做法使人觉得，如此一来，尤利乌斯二世便可以将出身于传统西班牙贵族、优雅举止背后充满着权力感觉的波吉亚父子置之脑后了。

第二个问题是威尼斯共和国，它为自己当选教皇出过力。威尼斯早早便利用切萨雷倒台的机会，将势力渗透进了博洛尼亚。里米尼和法恩扎已经落入威尼斯之手。尤利乌斯二世不打算承认这事，但在竞选教皇时欠了人家的情，又不能轻易与强国威尼斯为敌。自己即位甫定，在势力尚立脚不稳之时更是如此。尤利乌斯二世现在只能对威尼斯不断入侵博洛尼亚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波吉亚还是把已恢复秩序的教会领地留给了尤利乌斯二世。当然，波吉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教会。他原本是想把那里变成实现自己野心的中心地区。波吉亚消灭了教会领土内不顺从教会的小僭主，自己却半道儿倒台。结果，尤利乌斯二世一股脑儿继承了波吉亚的所有这些遗产。这是欧洲各国谁都知道的事。尤利乌斯二世继承了前任的遗产，他心里当然还想对内对外宣示自己具有光大这份遗产的力量。在即位后两大问题中，他已经首先解决了波吉亚的处置问题，剩下的就是威尼斯问题了。如果尤利乌斯二世展示出了自己作为教皇领土主人的实力，威尼斯恐怕也会对现在这样无视尤利乌斯意愿的露骨侵略行径有所收敛吧。这就是尤利乌斯二世在即将迎来即位第3个年头时的想法。

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都是教会领土内的国家，以前一直由巴利奥尼和本蒂沃利奥以教皇代理（vicario）的名义分别统治着。巴利奥尼在切萨雷手下当佣兵队长时发动叛乱。其他造反的佣兵队长都在塞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处死，只有他侥幸逃脱，当上佩鲁贾的主人，恢复了元气。博洛尼亚在本蒂沃利奥的统治之下，切萨雷原本要攻打这座城市，但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反对而未果。尤利乌斯二世要显示自己与波吉亚不同，显示自己是一位想教会所想而且具备实现能力的教皇，这两个地方是绝好的进攻目标。

图11：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

尤利乌斯二世下手很快。他请求法国和威尼斯等国援助这次进攻，但答复尚未到达，他即于1506年8月17日秘密召集枢机主教会议，并在会上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枢机主教们几乎全体反对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但尤利乌斯的决心毫不动摇。21日，请求曼托瓦侯爵、乌尔比诺公爵等人出兵的教皇急使离开罗马。26日，他便亲率500名骑兵从罗马出发了。由于他行动太快，法国国王未及深思便承诺派遣援军，威尼斯无奈也不得不采取中立立场。欧洲各国接到了教皇御驾亲征的通知，还在犹豫这是真是假，尤利乌斯二世这厢已经启程离开了罗马。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在夏日阳光之下行军的尤利乌斯二世一行。

教皇一行出了罗马的北城门，当天行进了30公里，第一夜在福尔梅洛度过。教皇几个月前刚刚结婚的三女儿费丽契阿就和她的丈夫乔凡尼·奥尔西尼住在这个地方。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儿子，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女儿。

第二天住在内皮。这块地方原来是波吉亚的，现在收为教皇的领地。

第三天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奇维塔卡斯泰拉纳，佛罗伦萨的使节马基雅维利已在那里等候。教皇要求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援军，还要借用佛罗伦萨的佣兵队长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马基雅维利肩负的任务就是设法巧妙地回避这些要求。在尤利乌斯二世看来，佛罗伦萨并不像威尼斯那样让他在意，它的暧昧态度也没有太扫他的兴。

第二天，8月30日，队伍抵达这些天来走过的最大城市维泰博。晚上，在火把的照耀下，由大十字架开道，教皇头戴皇冠入城，他在这里逗留了4天。这期间他并没有休息。他派了两位大主教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劝说他们和平献城。另一位大主教也出发去了米兰，催促法国的援军。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则向计划前来会合的瑞士佣兵支付了预付款。

9月4日，队伍出发前往著名葡萄酒产地蒙蒂菲阿斯科尼。

5日，教皇及其一行照例于黎明前两小时出发，许多附近的农民跪在路的两旁，他们半夜起就在路旁等待，希望看上一眼教皇的英姿，得到他的祝福。傍晚时分，队伍进入了奥尔维耶托城。奥尔维耶托是建在悬崖绝壁上的小镇，被称为教廷领土的要塞。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在这里看看对手对自己出招的反应。反应何其迅速，竟让这位教皇有些得意忘形。当天深夜，派往佩鲁贾的费莱里和乌尔比诺公爵来到了驻地。他们和巴利奥尼之间关于和平入城的谈判成功了。号称冷酷无情的巴利奥尼

在听说教皇御驾亲征之后，似乎也拿不出什么防卫手段了。紧跟着，巴利奥尼也来到了驻地。

巴利奥尼是来接受教皇提出的所有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教皇的要求是，以保证巴利奥尼及其家族的人身安全为条件，巴利奥尼把佩鲁贾的全部要塞割让给教皇，把儿子们送到教皇亲戚乌尔比诺公爵的宫廷做人质，还要亲率150名骑兵，与教皇军队一起进攻博洛尼亚。巴利奥尼接受了这些要求。谈判成功后，巴利奥尼跟着乌尔比诺公爵再次出发回佩鲁贾，准备迎接教皇入城。

捷报接连而至。教皇早就要求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出兵了，现在他发来了同意出兵的回复。法国国王送来了回信，对派遣援军不感兴趣，但这已经扫不了教皇的兴了。佩鲁贾已经屈服，尤利乌斯二世按捺不住早一天入城的欲望。

教皇一行从奥尔维耶托出发，沿着山间小道一路向北急行军。9月10日，抵达特拉西梅诺湖畔的村庄卡斯蒂廖内。村子小得连同行的枢机主教都不够住，尤利乌斯二世却说要住上几日。枢机主教们原本就很不情愿出征，这下更是牢骚满腹，教皇却视而不见。佩鲁贾就在湖对岸20公里的地方。根据同行的教廷礼宾官的日志，尤利乌斯二世对这次古怪行动的解释是，他想赶在礼拜天这个教会节日进入佩鲁贾城。

9月13日，期盼中的礼拜日来到了。教皇一行前两天就渡过了特拉西梅诺湖，住在离佩鲁贾15公里的科尔齐亚诺村，做入城准备。

佩鲁贾入城仪式豪华而庄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身穿最高礼服，他头戴教皇皇冠，身穿白缎底金丝绣的长披风，身后跟着一身红衣的众枢机主教。骑兵队在山城佩鲁贾城门前待命，教皇只带极少的近卫兵入城。

在城门前，8位市民代表献上了城门钥匙。城中教堂的大钟鸣响，

尤利乌斯二世穿过为迎接他这位征服者而紧急建起的凯旋门，最先走进了主教堂（cattedrale）。在这里，教皇向全体市民发布公告，宽恕了他们与僭主巴利奥尼一道犯下的不服从教会之罪，希望他们以后在教皇任命的代理费莱里枢机主教的主持下重新做人，成为教会的好孩子。

尤利乌斯二世为和平征服佩鲁贾而得意。几天后，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通过自己这一派的布道修士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布了教皇方针。

第一，在教会的领导下，建立意大利境内秩序。

第二，让圣罗马教会的权威、荣耀和秩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

第三，率领十字军抗击土耳其，把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能够在现已沦为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基督天主教弥撒。

这是多么勇敢的宣言啊！人们用欢呼声欢迎这个宣言，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与教皇同行的佛罗伦萨使节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道：教皇和全体枢机主教组成的罗马教廷首脑悉数在此，如果詹保罗·巴利奥尼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将作为成大事者而名垂青史。马基雅维利为了这句话，在以后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天主教派的史家斥为无礼的无信仰者。

9月21日，教皇一行离开了停留了8天的佩鲁贾，等待他们的是征服博洛尼亚这第二道关口。22日，他们进入古比奥城，这里已经是乌尔比诺公爵的属地。25日，教皇一行翻越亚平宁山脉著名山口福尔洛，进入乌尔比诺城。教皇原本就与乌尔比诺公爵是亲戚关系，又把自己最爱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收为养子，这位养子也已被确立为下一任乌尔比诺公爵。民众用热烈的欢呼迎接教皇入城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尤利乌斯二世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公爵被誉为文艺复兴艺术精华荟萃的美

丽宫殿[5]，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同博洛尼亚和法国的谈判之中。他再次派出特使前往博洛尼亚和米兰，劝博洛尼亚同意和平入城，催米兰派遣约好的援军。他打算在乌尔比诺这个安全之地等待回复。

尤利乌斯二世一直势如破竹，这回却头一次有人阻挠。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这只老狐狸面对教皇御驾亲征这样前所未闻的大事也并未像巴利奥尼一样茫然自失。他和66岁的妻子、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吉尼芙拉对担任教皇特使的大主教态度冷淡。这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接到大主教交涉失败已经踏上归途的消息后，没等他们到达，便不顾周围的强烈反对，当即决定出兵。

29日，他们照例黎明前出发，杀奔马切拉塔。这一带尽是山路，不巧又遇坏天气，风雨交加，小路泥泞，队伍行进中马蹄打滑，险象环生。到了30日，就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放弃晚饭后的行军。即使这样，行军仍未停下。在圣马力诺附近，他们甚至在森林里宿营。这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来的使节抵达宿营地。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国王让米兰总督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8000名士兵已经出发。法国国王还说，希望明年四旬节时来博洛尼亚拜访教皇。教皇对此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援军出发的消息使他极其高兴。此前他还十分担心法军是否会同意前来，现在不用担心了。这样一来，进攻博洛尼亚可说是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尤利乌斯二世放心地出发了。

人们通常会取道西北到里米尼，再直接转入艾米利亚大道。这种走法最方便，但免不了要进入威尼斯的势力圈。尤利乌斯二世想避免同威尼斯发生麻烦，便从山间难走的小道一路向北走去。他禁止将士去碰威尼斯境内的一草一木，违者处死。10月1日，队伍在一个叫作萨维尼阿诺的穷村庄过了一宿。他们来到艾米利亚大道，沿大道穿过平原，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于10月2日进入了切塞纳城。切塞纳是切萨雷·波吉亚创

立的罗马涅公国的根据地。尤利乌斯二世一行面对切萨雷派残党的游击战，颇感烦恼。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来了。他们来转达市政府的意思，说博洛尼亚市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平度日，满足于现状，教皇并没有什么理由前来进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就算是和平，也没有比上帝统治下的和平更好。此时，教皇所率领的军队有曼托瓦、乌尔比诺、佩鲁贾来的援军，加上教皇的500名近卫骑兵、300名瑞士步兵、100名阿尔巴尼亚兵，人数已达2500人。教皇刚才又接到通知，法国援军几天后便可抵达摩德纳。

然而，这几天大雨倾盆。枢机主教们都认为这样的天气不宜行军，但尤利乌斯二世听不进去，于10月8日离开了切塞纳。他甚至提前了午饭的时间，沿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奔向弗利。

弗利曾为切萨雷尽忠到最后，整个城市都散发着切萨雷·波吉亚的统治气味。尤利乌斯二世一行在这里受到了切萨雷余党游击战的重大打击，甚至连教皇的私人物品也被抢走。

尤利乌斯二世进入城寨，表情苦涩得像嚼了条虫子。等着他的是本蒂沃利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可以打开博洛尼亚的城门，但你不能带兵前来，拿了年贡金的未付部分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去。

尤利乌斯二世没事都会发火，这时气得满脸通红，嘴里不断地蹦出粗俗的骂人话。在场聆听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一个个表情一本正经，心里却暗自高兴，感到了一种恶作剧般的喜悦。尤利乌斯二世怒从胆边生，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当即差人去通知，开除本蒂沃利奥的教籍，如果9天之内博洛尼亚市民不改变想法，就对全市处以禁止圣务（interdetto）的处罚。一旦被禁止圣务，全城便不能举行弥撒仪式，也不能进行忏悔，新生儿也会因为不能接受洗礼而不能成为基督徒，人死了也会因无法接受临终祝福而摆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

尽管如此，本蒂沃利奥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在策划重金收买经艾米利亚大道南下而来的法国军队。法军在这个诱惑面前陷入深深的迷茫，停在了半道上。尤利乌斯二世得知了法军延误的原因后不免大为震怒，紧急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去了使者，表示抗议。路易十二原本就不乐见教皇的力量过于强大，便答复尤利乌斯二世说，他有心践约，但士兵们中了风。这又一次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再次派人去说，如果不守承诺，他将向全欧洲的君主公开法兰西国王不诚信的行为。这回轮到路易十二愤怒了，说如果那样他要撤回军队。使节们内心祈祷不要殃及自身，急急忙忙地数度往返穿梭于一南一北两个狂人之间。路易十二好不容易才下令命法军进军，尤利乌斯二世也离开了弗利。

弗利、伊莫拉和摩德纳，这三个城市沿着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字排开，依次相隔30公里、34公里和39公里。从弗利到伊莫拉，在平原上走只有一天的行程。不过两地之间的法恩扎属于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尤利乌斯二世顾忌威尼斯，决定绕开法恩扎。为此他们只能走亚平宁山脉北端的山间小道。枢机主教和教廷官员已经被以前的艰难行军搞怕了，坚决反对这样做。最后决定，这些人可以沿艾米利亚大道行进，穿过法恩扎，在伊莫拉与教皇会合。军队、教皇心腹跟着尤利乌斯二世。各国大使也跟着教皇，他们不知道教皇会干什么，出于职责一刻也不能挪开视线。马基雅维利也在其中。

尤利乌斯二世一行没有沿艾米利亚大道朝西北行进，而是取道西南。到卡斯特罗卡罗以前的路还算平坦。但是离开卡斯特罗卡罗，过了莫迪里亚诺以后，行军便越来越困难了。前不久天气恶劣，山里的小道吸水后膨胀开来，难走的地方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下马步行。因为下雨水量增加，他们渡过的危险溪流有10条之多。力气大的侍从两边架着教皇往前走。晚上借宿在山谷间的小村庄，第二天早晨继续行军。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走过马拉迪、帕拉佐洛这些村庄，人们的疲劳也开始加

剧。所有人都开始嘟嘟囔囔地叫起苦来。尤利乌斯二世也苦于自己痛风的老毛病。尽管如此，63岁的教皇仍然一边高声朗诵维吉尔[6]的诗句，鼓励着一路跟随他的人，一边翻山前行。

10月20日，他们才好不容易进了伊莫拉。如果走艾米利亚大道，那30公里的平坦大路有一天也就够了。可是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花了5天的时间才走完了130多公里的山路。在这几天里，穿过法恩扎到达伊莫拉的枢机主教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从伊莫拉到目的地博洛尼亚只有34公里的距离。尤利乌斯二世没有休息便立刻整编军队。他不懂军中实务，要请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当参谋。曼托瓦侯爵被任命为总司令，尤利乌斯二世也兼不了军队司令。本来，这个职务应由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担任，但公爵爱生病，无法胜任。

11月1日，教皇在去做万圣节弥撒的途中，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本蒂沃利奥带着老婆孩子亡命米兰了。

乔凡尼·本蒂沃利奥面对教皇开除教籍的处罚毫不退缩。许多神职人员畏于教皇禁止圣务的处罚，离开了城市。虽然如此，他也毫不屈服。他抚慰恐惧不安的市民，对教皇寸步不让。然而，在他得知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法军已经进入摩德纳以后，终于决心逃亡。他从法军那里领到通行许可证，逃亡米兰得到许可后，便弃博洛尼亚而去。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立即到伊莫拉拜谒了教皇，表示同意无条件开城，并请求解除禁止圣务的处罚。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代表们，他心情舒畅。博洛尼亚不是像佩鲁贾那样的小国，而是教会领土内最大的城市，连切萨雷·波吉亚都没能得到它。如今，这座城市自行表示恭顺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得意之情可想而知。

然而，博洛尼亚的百姓大难刚去，才放下心，眨眼间灾难又到。已

经到达摩德纳的法国军队在盯着他们。法国大军离开了米兰，但在抵达博洛尼亚以前得知自己已经派不上用场，很是生气。按照当时的习惯，在没有给足报酬的情况下，掠夺征服地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却坚信，教皇授予了法国国王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国王支援为圣教会服务的教皇天经地义。教皇压根儿就没打算向法国付钱。不付报酬，还不能抢掠，法国士兵的不满也不难理解。

法军离开摩德纳，开始在博洛尼亚近郊出没。博洛尼亚市民大为吃惊，紧急加固城墙，关闭通过运河流入市内的莱诺河的水闸，把河水灌进法军屯兵的旷野。法国兵扔掉行李大炮逃命去了。这给了法军一个很好的发泄不满的理由。法军再度编队杀了回来，传话过来说要大肆掠夺博洛尼亚全城，并对市民大开杀戒。市民们慌了手脚，赶紧派代表到伊莫拉见教皇，请求设法调停。尤利乌斯二世说，为了让法国兵老老实实接受现状，你们就得付钱。教皇还说，可以给大将查理·安布瓦兹8000达克特，给士兵1万达克特。博洛尼亚市民只得接受这个忠告，别无他法。就这样，法国兵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11月10日，尤利乌斯二世梦寐以求的博洛尼亚入城日终于到来。离开罗马时还是日头热辣灼人的盛夏，而现在，秋天已经在田野、森林和城墙的石头上投下了浓浓的秋影。从穿过平原的艾米利亚大道上望去，一个月前历尽千辛万苦走过来的亚平宁山脉，峰顶也已经开始雪光闪耀了。尤利乌斯二世乘坐的轿辇在前行。他怕骑马进入征服地会造成过于耀武扬威的印象，便按照教皇的仪仗乘轿入城。

城门前，市民代表已经在等候。他们宣誓效忠教皇，献上了城市钥匙，然后为教皇做先导，开始走进城门。可教皇的轿辇却一动不动。他们担心又发生了什么事惹怒了教皇，便走了回来，一看事情不是那样。尤利乌斯二世只是想跟左右手说一声，让人把走在前头的大十字架拿过来。一阵嘈杂声之后，响起了尤利乌斯二世那洪亮的声音：

“我以上帝的名义入城！”

队伍动了起来。银色的大十字架开道，尤利乌斯二世正装坐在八抬大轿上前行。20位红衣正装的枢机主教骑马跟在后头，再后面是教廷高官和各国大使以及曼托瓦侯爵率领的重装骑兵，一行人鱼贯入城。意大利的小国居民已经习惯了征服者的入城仪式。征服者总是不断变幻，居民们有着足够聪明的脑子，今天用欢呼声迎接这个征服者，明天又会用比昨天更热烈的欢呼声迎接他的敌人。尤利乌斯二世在夹道欢迎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行进，很是满足。“尤利乌斯万岁！向意大利之父致敬！向为博洛尼亚带回自由的人致敬！”共有3000达克特的银币和铜币抛给了欢呼的群众。这些天，伊拉斯谟[7]和丢勒[8]都应该在博洛尼亚，不知道这两位北国之人会如何看这样的场景。

第二天，教皇带着比昨天更大的队伍去全市的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做弥撒。博洛尼亚市有权势的市民全都毕恭毕敬地参加了弥撒。在弥撒仪式上，尤利乌斯二世再次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公开发表了宣言，内容如同他在佩鲁贾发表的极具勇气的宣言。

进城的目的达到了，但市政改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利乌斯二世想把博洛尼亚变成像佩鲁贾一样的教皇直辖领地。当然，绝对不能允许本蒂沃利奥回归。过去，教会领地都由取得教皇代理人官名的僭主统治。后来，切萨雷成功地用世俗国家的形式将教皇领地统一起来。但切萨雷倒台后，各地又渐渐恢复了原来的形式。尤利乌斯二世的意图是，名称可以仍是教皇代理，但要通过让神职人员坐镇的办法在所有教会领土上建立由教皇直辖的统治体制。博洛尼亚应该成为实现尤利乌斯二世意图的典范。

原来的政府委员会由17位市民组成。现在创建了的新委员会，由40位市民组成，扫清了本蒂沃利奥一派的人。以前，政府委员在僭主本蒂

沃利奥手下负责市政，而从现在开始，市政委员要在教皇任命的费莱里枢机主教的领导下工作。尤利乌斯二世攻下佩鲁贾后，任命费莱里担任了那里的教皇代理。现在他把费莱里叫到博洛尼亚来，另派枢机主教去了佩鲁贾。费莱里枢机主教在当时被认为是尤利乌斯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

翌年2月22日，尤利乌斯二世在市民们恭敬的欢送之下离开了博洛尼亚，回归罗马。他的心快被巨大的满足感撑破了。他的铜像将由米开朗琪罗于近期完成，很快就要作为此次远征的纪念碑，安放在博洛尼亚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的正门之上。制作铜像并非由博洛尼亚市民发起，而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提议的。他一贯以神圣罗马教会的守护者自诩，这件事也是他这种心情极其自然的表达。

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有了这种心情，冬季的旅途也不以为苦。依旧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顾忌，他避开了穿过法恩扎和里米尼的路线。不过，拿下博洛尼亚的成功给了他自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选择山间小道绕大弯子，而是做做表面文章绕开法恩扎，在切塞纳蒂科取海路去罗马。他于一个多月后的3月27日到达罗马。

尤利乌斯二世选择了复活节前一周“棕枝主日”举行班师罗马的仪式。他不能像武将凯旋那样驾驭四匹白马的战车，但他也没有乘坐轿辇，而是骑着白马，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头，直到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民众还是像欢迎凯旋将军那样欢迎教皇。在金融业者富杰尔捐献的凯旋门上书写着一行大字：“Veni，Vidi，Vici.”（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过）。

这是古罗马将军尤里乌斯·恺撒给祖国罗马的元老院捷报中的话，是历史上的名言。恺撒名字的英语发音是朱利阿斯·西萨，而朱利阿斯的意大利语发音就是尤里乌斯。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平时难得有好心情，近来开心的日子却总是接连不断。各国大使见惯了尤利乌斯二世不苟言笑、性情乖僻的样子，纷纷惊讶地向国内报告他这几天的情形。4月4日，传来的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死讯，这让这位教皇更加开心。

切萨雷从西班牙的监狱里逃了出来，参加了寄身地纳瓦拉王国的军队，在与西班牙国王军队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战死。尽管尤利乌斯二世知道切萨雷已经失势，但这个年轻人只要活着，就是他的心头之患。当初抓住切萨雷时没收了他奢侈的服装，其中有一件绿色披风和一双同样颜色并有绣花的精美长靴。4日那天晚上，尤利乌斯二世穿戴上了这些服装，整夜爽得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二

现实主义者长于形势判断，却总是认定对手不会像自己一样犯傻，他们往往会在这时出错。威尼斯共和国便是这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威尼斯人很自负，认为自己守卫在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最前线。的确，自从半个世纪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土耳其的侵略行径越发露骨。还不到30年，土耳其军队就于148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登陆，屠杀了1.3万居民，活剐了大主教和城市首脑。这个事件不仅给当时的欧洲各国带来了深刻的恐惧，也给现代欧洲人留下了抹不去的黑暗记忆。因而，在威尼斯人看来，自己只有被感谢的分儿，完全没有理由遭到憎恶。事实上，尽管威尼斯已经转为守势，但如果没有威尼斯海军在东地中海警惕防守，欧洲对东方恐怕早就不设防了。

但是别人可不这么想。别人认为，威尼斯投入全部力量防卫黎凡特海域，这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吗？威尼斯人自己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首要动机。但接下来，其他国家认为，威尼斯只需关心海上就够了，并不需要在陆地上扩充力量。然而威尼斯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海上，背后陆地（terra　ferma）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不过，威尼斯的真正意图不仅是要扳回在黎凡特的劣势，还把周边国家也当成了自己侵略意图的直接目标，所以这个辩解在周边国家听起来只是一个借口，缺乏说服力。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列强只把亚平宁半岛看成是扩张势力之地，对他们来说，威尼斯只是一个单纯的竞争对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当时给一个臣下写信说："威尼斯人这样画他们的狮子[9]：两只脚踏在海里，一只脚踏在陆地，最后一只脚踏在山地。"他所指的踏在海里的两只脚，其立脚点在东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陆地一只脚的立脚点在罗马涅和伦巴第，山地一只脚的立脚点便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土特伦托、特雷维索等维罗纳以北地区。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16世纪初，城邦国家威尼斯的势力范围之广大在当时已经无人可及。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下面这些内容。

包括塞浦路斯、克里特在内的黎凡特海（东地中海）；

对亚德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

在意大利北部，除威尼托以外，还领有贝加莫、克雷莫纳等伦巴第地区的大城市，威尼斯海军甚至驻扎到了热那亚港口附近；

威尼斯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在意大利中部以拉文纳为根据地，还拥有法恩扎、里米尼这两座罗马涅地方的城市。

除此以外，1508年春天，马克西米利安借着要在罗马举行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加冕仪式的名义企图南下意大利，威尼斯予以迎头痛击，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阜姆各城。4月，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媾和，约定神圣罗马帝国把这些城市的领有权转让给威尼斯，各城则每年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缴纳年贡金。可是，马克西米利安的进路受阻，不得不放弃在罗马举行加冕仪式的计划，直接从特伦托撤了回去，马克西米利安因此对威尼斯陡增敌意。

不仅是德皇，各国都以各自的理由对不断强大的威尼斯产生不安，心怀敌意。

黎凡特因与各国没有利害关系尚不成问题。

对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引起了罗马涅和马尔凯，即教皇领地以及西班牙的不安，前者在东海岸拥有城市，后者统治了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部意大利。

在伦巴第地区，威尼斯与领有米兰和热那亚的法国有着利益矛盾。

在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西班牙对意大利南部的野心已使威尼斯忍无可忍。

威尼斯还要把罗马涅地区的两座城市归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与尤利乌斯二世产生了正面冲突，教皇一心要把教会领土变成自己的直辖地。

反威尼斯的趋势在这样的状态中渐渐酝酿起来。

法国和西班牙首先动手了。1507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会晤。费迪南多的妻子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妻子死后他与路易十二的侄女再婚。这两位国王刚

刚成为亲戚关系。

一年以后，被威尼斯打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参加进来。至此，欧洲三列强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统一了步调。后来，其他国家也参加进来，并于1508年12月签订了同盟协议，正式成立了同盟。同盟协议签订于康布雷。这里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摄政、后来被称为荷兰的一个地方，同盟被称为“康布雷同盟”。加盟的各国早早就确定了威尼斯战败后的战后处理事宜。这并不是因为策划得如何好，而是因为如果不事先决定好战后处理事宜，到时就会有未参战国家跑出来争抢利益的危险。

西班牙国王将取得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

法国国王将取得贝加莫、克雷莫纳、布雷西亚以及原米兰公国领土而现为威尼斯所占有的所有领土。

德皇将取得洛维莱特、维罗纳、帕多瓦、维琴察等威尼斯领土以及伊斯特拉半岛。

匈牙利国王将取得达尔马提亚、克罗西亚等原属于匈牙利而现被威尼斯统治的城市。

萨伏依公爵将取得塞浦路斯。

费拉拉公爵和曼托瓦侯爵将收回曾经是两国领土后来为威尼斯所占的地方。

教皇将把博洛尼亚的里米尼和法恩扎收入囊中。

这时，同盟尚未最终决定对威尼斯开战。人尽皆知，威尼斯的军力

不容小觑。而更重要的是教皇尚未决定是否参战。同盟各国的战备情况也参差不齐。

教皇是否参战对同盟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教皇参战，比什么都能让基督徒士兵放心，而且可以使开战名正言顺。然而，同盟国的君主们并没有为了让教皇参战去花费多少精力。他们十分清楚，多年来尤利乌斯二世的心中已对威尼斯多有不满。他们对教皇参战持乐观态度，已经提前在战后处理事宜中把教皇的那份算了进去。不过毋庸赘言，教皇的动向毕竟是左右康布雷同盟动向的关键所在。

而身处罗马的尤利乌斯二世仍在迷茫之中。尽管他已经三令五申，但威尼斯仍旧死死捏着罗马涅的两个城市不放手。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强国，把博洛尼亚和佩鲁贾加起来，也不能和威尼斯相提并论。如果与康布雷同盟各国统一行动，便会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今后会很危险。1508年过去了，尤利乌斯二世的态度还是难以确定。

威尼斯也没有对事态袖手旁观。威尼斯号称拥有当时最好的情报网，对各国的动向以及战斗力和备战情况无所不知。他们估计战争在所难免，但打起来只要各个击破，这仗还是可以打的。法军已经完成备战。德军备战迟缓，他们需要从一年前的战败中重新站起来。西班牙军队中现在无人能够替代勇将科多巴，因而并非那么可怕。威尼斯判断，这些国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不可能统一行动，只要与挑起战争的国家单打独斗，并在此期间使用外交手段离间各国，便可分别与他们单独媾和。这就是威尼斯考虑的战略。

对于教皇，威尼斯认为，他不会为罗马涅区区两个小城就干出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的蠢事来。威尼斯判断，自己就是意大利第一强国，现在米兰公国、那波利王国已不复存在，自己是意大利各国中唯一能够抗击外国势力的国家。教皇不会借助外国的力量消灭威尼斯。如果失去

了威尼斯这块盾牌，就等于把通往罗马的大路拱手交与别人。威尼斯人也自然毫不掩饰自己特有的高傲感。

一天，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皮萨诺，照例要求威尼斯归还罗马涅的两个城市。皮萨诺的答复却仍然和以前一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情大坏，高声怒骂道："要是这样，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渔村！"

威尼斯大使用平静的口吻回答道："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了。"

尤利乌斯二世愤恨地瞪着大使。可是这个威尼斯人连眉毛都没抖一下。

3月过半，教皇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这天天气晴好，海上风平浪静，尤利乌斯二世享受着垂钓的乐趣。小船上除了船老大，只有他和威尼斯大使皮萨诺。大使和教皇背对而坐，也在垂钓。突然，尤利乌斯二世回头说道："威尼斯政府为什么不向我建议，让某一位威尼斯市民来统治里米尼和法恩扎呢？"

问的人和被问的人都明白，所谓某一位威尼斯市民就是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威尼斯大使皮萨诺也回过头来冷冷地答道："我们共和国绝对不会把一个市民放到国王的位置上。"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没有发怒，两人继续背对背钓鱼。第二天，教皇一大早就回了罗马。

一回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立即召集了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但没

有让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科尔内罗和格里马尼二人出席。大多数枢机主教还是反对加入康布雷同盟。但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动摇决心。第二天的3月23日，教皇向各国发出诏书，宣布参加康布雷同盟。

威尼斯这才悟到事态紧急，4月4日传来话说要把里米尼和法恩扎归还教皇，但为时已晚。4月27日，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开除教籍的布告首先谴责了威尼斯以往的不诚实行径，接着列举了威尼斯的恶行：侵占、干涉内政、傲慢、掠夺，最后要求威尼斯于24天之内归还抢夺的地方，并交出侵占期间的全部年度收入，否则就将对威尼斯城及威尼斯全境的所有地方，以及让威尼斯人避难或藏匿威尼斯人的城市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处罚。布告最后宣布，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因威尼斯的这些大罪而将其视为主耶稣基督的敌人，视作全体基督教徒的敌人，他们应该沦为奴隶。

一旦被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惩罚，即使经过最后的审判也不可能得救，注定会下地狱。这样做还不能使教皇息怒，他当即把这份开除教籍的布告印刷了600份，发往全欧洲。

威尼斯终于落到要以一己城邦国家之力对抗整个欧洲的地步。佛罗伦萨市民博纳科尔西说，威尼斯人只能靠弥撒和祈祷的力量了。然而，威尼斯人传统上有着很强的反教会主义倾向，他们动员了所有资源来应对这件大事，唯独没有求助于弥撒和祈祷。他们把弥撒和祈祷交给了女人去做。

威尼斯人对战斗力有着自信。他们那穿着红白军服的9000步兵以精锐而出名，是步兵军团的核心。威尼斯大炮的质量远在号称最完备的法国之上，他们用铁炮弹代替当时常规的石炮弹，再次让各国对威尼斯雄厚的财富瞠目结舌。威尼斯拥有最高水平的轻骑兵。只有重装骑兵被认为质量逊于别国。指挥这5万总兵力的是1503年对法战争和1508年对德

战争的胜利者、以性格激越而闻名的巴尔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和老练谨慎的老将军皮蒂利亚诺伯爵。不过，这些军队都是雇佣兵。威尼斯的海军从来不用佣兵，全部依靠本国国民。但在陆军方面，威尼斯也摆脱不了当时意大利的习惯。

全军向与米兰的界河阿达河进军。

同盟军总帅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担任。他是圣罗马教会的保护者，被教皇授予了与基督的敌人威尼斯作战的荣誉。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也是总帅。他的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再次得到了确认。这两位都说要亲自出马。在意大利，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之后，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即表态参加康布雷同盟，佛罗伦萨也以获得比萨为条件加盟。这些国家的军队统一在教会军队的名头之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被任命为总指挥官。

在此期间，威尼斯曾再三请求向教皇归还里米尼和法恩扎，并支付迄今为止的全部岁入，但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开除教籍布告中曾经提到必须于24日以内归还云云，这是从教皇的立场考虑而做的粉饰。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有几个人被威尼斯雇去当佣兵队长。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逼迫他们退还已经收下的8000达克特订金，退出了威尼斯军队。

战斗打响了。开始时，战况有利于威尼斯军队。教皇21岁的侄子弗朗切斯科·马里阿·德拉·罗韦雷率领的教会军队在罗马涅苦战，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德皇帝尚未赶来，教皇在罗马只能一个劲儿地咬牙切齿。

到了5月战局突变。法国军队终于同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意大利军队会合，一起出战了。路易十二御驾亲征，手下有米兰总

督查理·安布瓦兹和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指挥的实权交给了饱经战争的强者，意大利老将军特里武尔齐奥，总兵力有4万人，外加50门大炮。

其时，威尼斯沿阿达河布阵，但两位将军因战术问题发生对立。达尔维亚诺主张应立即渡过阿达河进军米兰，打击立足未稳的法军。而皮蒂利亚诺伯爵则坚持应向后撤，把前线放在奥利奥河岸一线。两人互不相让，最后不得不从遥远的后方威尼斯国内做出决定。元老院采纳了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的意见。威尼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没有采用进攻型战法，而是采取了防御反击型战法。全军撤掉阵地向后退去。

法军从米兰出发，顺利渡过阿达河。

法军的动向立即被威尼斯军队发觉。但由于时值半夜，皮蒂利亚诺伯爵按兵不动。

5月14日，历史上以阿尼亚代洛战役而闻名的战争拉开了大幕。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会战，不如说是混战。威尼斯军队本该在奥利奥河岸布阵，但却没有巩固横向阵地，而是考虑元老院不要舍弃克雷莫纳的意思往纵向布阵，战线很长，而且把部队分开散布在奥利奥河的左右两岸。大炮都还没来得及布阵。等元老院想放弃克雷莫纳时，为时已晚。

当时枪的射程是100多米，弓箭是60到70米。如果能有一位能力强的将军指挥，行动迅捷，骑兵就将是战斗的主角。威尼斯军队的轻骑兵前锋由达尔维亚诺指挥，法军则由特里武尔齐奥指挥。双方在阿尼亚代洛原野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轻骑兵战。威尼斯军队趁着优势向前挺进。

然而，由于威尼斯步兵是纵向的长蛇阵，赶过来需要时间。特里武尔齐奥命令法军的步兵出动，包围了威尼斯的轻骑兵。在后方布阵的威尼斯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根本没有紧急派出援军去救达尔维亚诺，而

是带着尚未与敌人交手的残军向维罗纳退去。这场战斗从下午1点打到4点，尽管轻骑兵和步兵英勇作战，结果还是以威尼斯的惨败而告终。被敌人包围的达尔维亚诺负伤被俘，多位队长战死。

威尼斯及法国两军均未在此役中投入全部的战斗力。威尼斯和法国分别有兵力5万和4万，但实际投入战斗的，威尼斯方面只有600名轻骑兵和7400名步兵，法国也只有2600名骑兵和11000人的步兵。两军在前线分别配备了25%和40%的军力，只有16%的威尼斯军队和34%的法军参加了实际作战。单从这个数字看，我们不得不说法军比威尼斯军队更高效地投入了较多的兵力。

向东撤退的那些威尼斯士兵未染战尘，说是残兵，却一半以上毫发未损，看不出半点败军之相。然而，其内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却不为人所见。那就是士兵们的士气。威尼斯陆军过去从未在任何大战中战败过，这在用钱雇来的佣兵心理上影响巨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位统率力极强的指挥官，威尼斯军队不可能渡过难关。可是，达尔维亚诺已经不在了。威尼斯在这场阿尼亚代洛战役中不仅输了战术，也输了战略。

意大利的悲剧在于，威尼斯不是败给了外国法国，而是败给了与查理·安布瓦兹为伍、妙用战术、冲锋在前而同为意大利人的特里武尔齐奥。

威尼斯尝到了遭受打击的滋味。里亚尔托桥一带平时总是活跃着谈生意的人群。但自从战败的消息传来的那天起，这里一改平常，只能看见男人们三三两两散在各处，脸色阴沉地悄声说话。从希腊、阿拉伯和土耳其远道而来的商人们一脸不解地望着这番光景。

共和国政府也在沉痛的气氛中不断开会。改变方针已不可避免，他们一边继续作战，一边把主要力量转向外交战。

首先要阻止德军南下与法军乘胜会合。威尼斯打算把前一年战胜德意志后获得的地方归还给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以此为条件与他媾和。然而，皇帝担心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以阿尼亚代洛胜利为基础在意大利建立起决定性的势力，认为自己也不能落后，因而对威尼斯的请求充耳不闻。

在此期间，威尼斯相继丢掉了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决定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居间媾和。7月2日，六位特使抵达罗马。他们个个出身于威尼斯顶尖豪门，并在政府担任要职。按照受开除教籍处罚者的惯例，这六个人入夜后才好不容易进了城门。进城后他们立即请求谒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传话接受请求。次日一早，六个人进了教皇宫。宫中传话让他们在等候厅等待。左等右等，总不见有人来带他们去谒见教皇。这六个威尼斯人坚持着。第一天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都仍是这样的等待。这六个人一边等待，一边因愤怒和屈辱气白了脸。可他们想到祖国所处的境地忍了下来。

第六天是7月8日，多纳托一个人终于被招进了会见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他。教皇表情严峻地对特使说：要让教皇出面居间媾和，威尼斯必须先实施以下各条。

向全世界谢罪。

放弃在意大利境内所拥有的所有领土。

向德皇归还所占的全部德意志领土。

放弃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放弃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的人事权。

免除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修道院等课征的税金。

尽管六位特使有相当大的交涉权，但这样的条件，他们也无法交涉。他们请示了国内。但威尼斯政府也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十人委员会[10]甚至有一个委员发言说：与其接受这些条件，不如派50名特使去土耳其，请求土耳其派遣援军更好。

阿尼亚代洛战役以来，尤利乌斯二世心情格外的好，他甚至对贡扎加枢机主教说，如果威尼斯为十字军远征提供50艘加莱船，倒是可以同意他们。

尤利乌斯二世的好心情也没有持续多久。7月17日，威尼斯军队开始反击，成功夺回了离威尼斯市区仅有30公里的帕多瓦，并决定以帕多瓦为最后防线严防死守。他们已经不能把战事全部交给雇佣兵了。威尼斯的年轻人全部上了前线，贵族平民一视同仁。元首儿子和大贵族子弟反倒坚守在最前线。连500名海军士兵也加入了防卫军。此外，帕多瓦市民和周边的农民也都自发前来支援。皮蒂利亚诺公爵担任防卫军总指挥，他这次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8月10日，德意志、法兰西、教皇、费拉拉、曼托瓦的军队组成了进攻部队，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亲任总帅。部队在离帕多瓦5公里的地方布阵，并决定于9月3日开始总攻。从时间上看，联军似乎悠然自得，不那么着急，但实际上他们在等法军大炮的到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进攻方意料的事情。防卫军游击队趁夜袭击了睡梦中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并俘虏了他。失去了有才能的武将曼托瓦侯爵，对进攻方是一个重大打击。在罗马，尤利乌斯二世本来就因担心战况而心神不定，听到这个消息后雷霆震怒，不禁丑态百出，失态得不像教皇。

“你这个圣彼得的蠢猪！”（Porco San Pietro！）

9月3日，大炮齐发，攻防战开始了。防守方也以炮击回敬，间隙里还派出骑兵扰乱敌军。

9月15日，攻击愈加猛烈，但防守方趁夜修好了崩塌的城墙。

9月20日，西班牙兵首次攀上城墙，但即刻成为箭矢之的，瞬间死亡250多人。

9月26日，第二次攻城未遂。

9月29日，西班牙、德意志两军士兵第三次成功攀上城墙。但他们刚上城墙便被逐一扑杀。其间一连多日，每到夜晚防守方便四处出没打游击，扰得进攻方睡不成觉。

进攻方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德意志皇帝请求身在米兰的法国国王派骑兵出马。路易十二拒绝了这个请求。这样一来，进攻方内部的不统一表面化。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大为光火，于10月1日撤围打道回府。进攻一方的军队瓦解了，威尼斯终于守了下来。

共和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但它没有趁势转守为攻，而是将此作为一个和平解决的好机会。威尼斯人还没有乐观到陶醉于帕多瓦防卫战胜利的地步。他们冷静地看到了本国战斗力的极限。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也变了。比较在帕多瓦攻击战中吃了败仗的德皇，教皇开始担心在阿尼亚代洛战役中获胜的法国国王，他的势力已经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了。一直保持事实上中立的西班牙在此期间也已在以那波利为中心的意大利南部确立了自己的势力。到了这个时候，尤利乌斯二世才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意大利的独立得到保障，罗马教

会才有可能独立。进一步说，防御土耳其少不了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如果再逼迫威尼斯，他们一旦绝望，便有可能去接近法国或西班牙，可能会武力反对教皇。当时，尤利乌斯二世对曼托瓦大使如是说：“消灭了一个威尼斯，还得再建一个威尼斯。”

法国国王得知教皇转向，立即寄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在此关头拯救威尼斯，就像在我的胸口插上一把匕首后把我抛弃一样。”

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已下定了决心。

转年到了1510年2月15日，从去年7月起就一直逗留罗马的六位威尼斯特使全盘接受了教皇提出的媾和条文。威尼斯将：

归还罗马涅地区的里米尼和法恩扎，并割让拉文纳和切尔维亚。

承认并尊重教皇的权威。

以拉文纳和阜姆一线为界，放弃该线以南亚德里亚海域的独家制海权。

对国内神职人员免税。

给予国内神职界以治外法权。

不得援助教廷的敌人。

而教皇一方只是解除了对威尼斯开除教籍和禁止圣务的处罚而已。

2月24日，罗马举行了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仪式。六位威尼斯代表身着红色官服，毕恭毕敬。他们跪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外，聆听坐在里面教皇宝座上尤利乌斯二世尖锐的嘲讽，然后进入大教堂，面对枢机

主教簇拥下的教皇，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实施媾和条文，之后他们签了字。

尤利乌斯二世让海洋霸权者屈服了，他的得意可想而知。除了多纳托留下以外，其他五位特使就要回国了。五位特使第二天来向教皇道别时，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伟大的大使们啊！直到昨天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恶劣，你们不觉得难以置信吗？你们应该来找我。很遗憾，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动用了武力。千万不要忘记，站在教皇一边安全，今后也是这样。现在媾和成功了，你们再也不会缺少我的祝福啦！"

六位威尼斯人默默地听着，心情复杂。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知道，签字仪式9天前的2月15日，威尼斯政府内部处理重大事务的十人委员会已经绝密地形成决议：此次媾和是在暴力之下强加于己的，威尼斯拥有不履行条文的权利。而威尼斯市民则更加直率。他们在里亚尔托桥头贴出了耶稣基督的来信，训斥尤利乌斯二世，要他更像教皇的样子，当好牧羊人。

把自己吹嘘成驯狮人的尤利乌斯二世对此类风评根本不往心里去。他经常带着心腹兴高采烈地到建筑工地和制作工场。当时，布拉曼特[11]指挥兴建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从一年前开始投入了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的创作，而拉斐尔也在专心致志地创作教皇宫的壁画。

看着这些艺术家工作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一大享受。教皇认为，这一件件作品都是圣罗马教会的荣耀，都是自己为确立这些荣耀竭尽全力的纪念碑。

三

“尤利乌斯二世出身贱民，对这家伙要常用棍棒！”

“一想起法国人，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第一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所说，第二句话出自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口。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从威尼斯变成了法兰西。尤利乌斯二世最希望维持教会的独立。他已弄明白了，教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意大利的独立。而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如同往来于自家一样，这让尤利乌斯二世难以忍受。

法国国王也没有认输。法国本想彻底打败威尼斯，而且很有可能做到。不料尤利乌斯二世半路杀出来，执意与威尼斯媾和，妨碍了法国国王，使他满腹怨恨。于是，国王禁止法兰西全境的神职人员访问罗马，禁止他们服从尤利乌斯二世，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教皇的舆论运动。

在罗马，法国人枢机主教个个都想开溜，尤利乌斯二世对全体枢机主教下了禁足令。克莱蒙枢机主教斗胆违令企图逃走，结果临逃跑前被抓住，关进了圣安杰洛堡。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要求释放他，教皇拒绝道：难道你们也想进圣安杰洛堡吗？法国大使提出了强烈抗议。可尤利乌斯二世指着大门只说了一句话：趁现在还没什么，赶紧给我回去！且不谈枢机主教，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必须保障大使的人身安全。后来，尤利乌斯二世曾对威尼斯大使说道：“法国人想把我当成他们王国的一个神父。可我毕竟是教皇，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这一点。”

可怜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滞留罗马的法国人。本国国王与教皇对立，他们夹在中间逃不掉，心情极差。威尼斯大使在信中说，这些人走在街上，表情如同死人一般。

冲突在所难免。意大利民众刚刚感到康布雷同盟国对威尼斯的战争终于平息，不到半年，又被卷入了新的战争。

可是，以强国法兰西为对手，又怎么打这场仗呢？自从与威尼斯媾和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际。

教会军。切萨雷·波吉亚出山前并无这支军队。切萨雷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做后盾，靠着他个人的军事才能，建成了这支独立的战斗力量。可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动手扳倒了切萨雷，具有战斗力的教会军也随着它的缔造者一道消亡了。在尤利乌斯二世的时代，教会军不过是一支凭借教皇权威召集起来的如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这些意大利中小国家军队的集合体而已。

佛罗伦萨从来都不是军事强国。虽说它战胜了比萨，那不过是经过了延绵不绝的苦战，最后因比萨遭遇饥馑而屈服的结果而已。佛罗伦萨还在传统上亲法。果不出所料，佛罗伦萨政府派出马基雅维利对路易十二说：佛罗伦萨对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采取中立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

费拉拉公国。这个国家死心塌地地站在法国一边。它在军事上强于佛罗伦萨。因为它原来为教会领土，历代教皇都想着要收回。出于无奈，费拉拉只好与教皇的宿敌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以牵制教皇的行动。这是费拉拉一贯的国策。

曼托瓦侯国。被威尼斯俘虏的侯爵重获了自由。在他被俘期间，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守住了国家，并为丈夫的获释竭尽了全力。她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亲姐姐，在丈夫被俘后掌握了实权。但在打仗方面究竟能指望她多少，却非常值得怀疑。

乌尔比诺公国。公爵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因而它不折不扣地站在教皇一边。但公爵的身体太差。

既然现实如此，那就只有依靠罗马的豪族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了，尽管谈不上可以信赖他们。

威尼斯军队。威尼斯燃烧着对法国的复仇之念，一开始就赞成尤利乌斯二世的这个计划，表示全面支持。可是，威尼斯的陆战能力已经衰弱得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不是别人，正是附和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打仗的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他后悔了，但后悔于事无补。在现实情况下，还不能缺少威尼斯的战力。

除了上述所说的各国以外，还有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但他们没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是不会动的。法国国王的条件已经让教皇害怕，他不想重蹈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苦思冥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使用瑞士兵。他们的战斗力尽人皆知，而且瑞士人生来不懂政治。即使借用了他们的力量，也不用担心事后他们会对意大利的政治指手画脚。他立即把锡永的主教斯基内尔叫到罗马。这位主教在瑞士同胞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奉行着已经落伍的中世纪思想，认为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皇帝是基督教界地位最高的俗人，他们应该合作治理基督教世界。在他看来，法国国王之辈只是服从教皇的角色。这位主教发誓尽全力为教皇组织佣兵，并赶回了瑞士。很快，主教传来捷报，说已经募集到6000士兵。教皇需要先行向他们支付6000达克特。

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先用这些兵试着打打。枢机主教们纷纷反对，认为这样做过于大胆。但他却说自己将身先士卒，并说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有自信。

兵贵神速。在与法国大军交锋之前，教会军必须攻下法国的卫星城费拉拉。

1510年8月9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表诏书，宣布开除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教籍，剥夺他的统治权。这是宣战布告。尤利乌斯二世制订了下面的作战计划。

威尼斯军队进攻法军占领的维罗纳，瑞士军队进攻法国在意大利的基地米兰，并在法国占领下的热那亚发动市民暴乱。乌尔比诺公爵被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率领教会军与部分威尼斯军队协同进攻费拉拉。

8月17日，教皇做了这么一点决定后从罗马出发。他只带了少量近卫兵，从奥斯提亚乘船向奇维塔韦基亚进发，目的是监督从海上增援热那亚叛军的舰队。他向奉命一同出征的枢机主教发出指令，命他们在维泰博集结待命。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维泰博一看，原本应该全员到达，却少了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他们逃到米兰去了。教皇暴怒，命他们到博洛尼亚集结，不来者撤销其枢机主教职务。教皇本想就是拖也要拖着这帮人，可是枢机主教们过惯了奢侈生活，一路上因为住宿等等不断抱怨。教皇担心因此拖延行程，他想早日赶到博洛尼亚，于是决定枢机主教各自任选道路前往博洛尼亚。

尤利乌斯二世只带了建筑家布拉曼特和少量卫兵，经奥尔维耶托到亚得里亚海，从安科纳由海路到里米尼，再从里米尼沿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前行，于9月22日一鼓作气进入博洛尼亚。与前次不同，这次不需要考虑威尼斯而绕道，所以没吃什么苦便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虽说教皇精神挺好，但他毕竟年已67岁，一定相当疲劳。

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博洛尼亚后，坏消息接踵而至。首先，枢机主教们应该全体到齐，可是除了先前的两个法国人枢机主教逃亡以外，又有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三个有实力的枢机主教不

见了踪影。他们也逃去了米兰。又传来消息说，进攻维罗纳的威尼斯军队苦战不胜；热那亚的市民叛乱也在苦战；教皇最为期待的瑞士军队，也因为德皇接受了法国国王的请求阻止其南下而撤了回去。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侯爵传话过来说因病不能上前线。这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不啻为重大打击。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年纪尚轻，且无甚武将之才，尤利乌斯二世本想把实际总指挥权交给身经百战的曼托瓦侯爵。而侯爵的病是他妻子伊莎贝拉的一个阴谋。她不愿意具有武将之才的丈夫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便收买医生写了张重病诊断书交给了教皇。教皇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些坏消息让尤利乌斯二世既生气又绝望，而接着传来的报告却让他惊恐不已。报告说，法军在查理·安布瓦兹的指挥下和本蒂沃利奥一伙杀出了米兰。这是法国国王的故意为难，他要让被教皇放逐的本蒂沃利奥回归博洛尼亚。国王知道博洛尼亚市民中有人不满教皇统治，欢迎旧主本蒂沃利奥回归，这是他的一项策略。尤利乌斯二世可谓四面楚歌。

恰在此时，教皇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每天躺在床上打寒战，牙齿咯吱咯吱地打战不止。即使如此，他还有劲把威尼斯大使叫到病房，威胁说如果威尼斯援军不能如约于明天渡过波河，他就反戈倒向法国。当晚，尤利乌斯二世高烧更甚，威尼斯大使的报告让我们知道了当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的情况：

> 教皇成宿抓扯毯子和床单，大声喊叫：“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啊！”接着又喊道：“我要去打法国人！法国混蛋，我要一个人去揍你们！”他后面又喊道：“给我毒药！给他们撒上毒药！”就这样，教皇成宿狂怒，彻夜未眠。

枢机主教们已经开始考虑下一届的教皇选举，法军已经开到离博洛尼亚西北5公里远的地方，身在军中的本蒂沃利奥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倒

计时。

可是到了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安静了下来，烧也奇迹般地退去，尽管还是卧床不起，但话已经说得清楚了。他首先全力以赴应对已经逼近的法军。他在考虑争取时间，以退军摩德纳为条件，向法军派出了和谈使者。法军指挥官查理·安布瓦兹那基督徒式的犹豫救了濒临危机的尤利乌斯二世。尽管安布瓦兹是奉国王之命，但心里还是不愿意对教皇剑拔弩张。尤利乌斯二世的和谈请求正是绝好的理由，他把军队退到了摩德纳附近的卡斯泰尔弗兰科。

教皇的感冒还没有好透，看上去很虚弱。他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让秘密谈判的人员往来于自己和查理·安布瓦兹之间，并等待威尼斯军队前来增援。前不久，教会军开始围攻被称为费拉拉护城河的米兰多拉，但战果不尽如人意，尤利乌斯二世一直牵挂这事，但威尼斯援军不到，他也毫无办法。他躺在床上，每晚让人朗读但丁的《神曲》，此外就是听取从罗马一同前来的布拉曼特谈他对新建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扩建中的教皇宫的想法。

从这时开始，尤利乌斯二世蓄起了胡须。说是蓄须，只是没有剃去生病期间长长的胡须而已。但当人们问到他蓄须的原因时，他却回答说：不把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就绝不剃须。在拉斐尔画的画像上，尤利乌斯二世蓄着长长的白胡，但此前的他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

拖着拖着，威尼斯的援军赶到了。马上就是基督的圣诞节了，尤利乌斯二世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他坐着主持了圣诞节的弥撒。

12月29日，尤利乌斯二世突然提出自己要去米兰多拉战场。身边的

人都想教皇是不是疯了。眼下是最冷的隆冬时节，教皇还是病后之躯，大家都十分反对他这样做。但尤利乌斯二世不听劝告，坚持说自己坚决要去。舆论沸腾了，说这是大丑闻。如果对方是异教徒还好说，可同为基督教徒，以拯救他们为己任的教皇却要进攻他们，这当然成为问题。上一次远征博洛尼亚和佩鲁贾时，说是出征，但实际并未打仗，因而谴责声并不高涨。尤利乌斯二世罔顾这一切。在进攻费拉拉前必须先攻下米兰多拉，教会军花了这么长时间却未攻下。教皇认为自己亲上前线肯定会对扭转沉闷的战局起到作用。他寸步不让，最后决定等过了年再去。

1511年1月2日，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带着毫无兴趣的科尔内罗、阿拉贡、伊斯巴莱斯三位枢机主教和布拉曼特，以及照例不能离开教皇左右的各国大使，冒雪向米兰多拉进发。米兰多拉位于波河方向往北50公里的地方。这一带虽是平原，但因为地处大河波河流域，必须数次渡过小河才能到达。费拉拉就在米兰多拉正东60公里的地方。河流已经冻结，随着不断向北行进，人们感觉雪越下越猛。教皇的轿夫和随行人员的马匹喘着粗气行进在飞雪之中。

米兰多拉是一座小城，14世纪初开始由皮科家族统治，皮科家族拥有皇帝代理的资格。这个家族出过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每代人都有很高的教养，家族中还有人写过一本萨伏那罗拉传记。这里离费拉拉很近，与埃斯特家族在文化爱好的兴趣方面也相近。埃斯特家族把米兰多拉看作自己的卫星城，靠他们的援助，米兰多拉把自己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寨。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同族的亚历山德罗在这里指挥着400多名士兵和包括一般市民在内的防卫军，顽强抗击着教会军的进攻，坚守城池。而且，还有法国军队承诺近日前来增援。

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米兰多拉，听从了心腹的进言，首先决定把住处安在8公里外康科迪亚一户农民的大宅子里。他想了解战况的所有细节，要求第二天去前线视察。教皇穿上胸甲，外面套上教皇的白衣，再紧紧裹上用黑裘皮领和裘皮里子做成的白色披风，扎着羊毛头巾，脸庞消瘦，满面胡须。他站在没膝的雪中，眼珠滴溜溜地四处观看。借曼托瓦大使的话说，这情形活像一头白熊。他以这样的仪表检阅了在雪中列队的队长们，还对大炮的位置等提出了要求。他还视察了在城墙附近挖掘战壕的现场。这时，风雪交加，下起了暴风雪。士兵们的身体也因寒冷而不听使唤。他们的身躯在暴风雪中影影绰绰，幽灵般地蠕动着。教皇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尤利乌斯二世还在士兵中间蹒跚走动，向他们打招呼。他感觉到这才脚踏实地，眼睛里闪现出光芒。

尤利乌斯二世结束对前线的视察，不再愿意待在安全的康科迪亚，说要把大本营搬到前线去，还说大本营本该在前线。总指挥乌尔比诺公爵被撇在了一边。心腹们没辙，便决定把教皇的住宿地，按教皇说就是大本营，搬到低矮山丘上的圣鸠斯提纳修道院，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墙。但这里太小，容不下教皇一行的全部人马。于是决定科尔内罗、阿拉贡两位枢机主教和教皇侍从与教皇一起住进修道院。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们回到后方的农家睡觉。

修道院的大厨房成了“大本营”。教皇刚恢复健康，难熬严寒。他整日待在厨房的大暖炉旁。厨房的一角是马厩。尤利乌斯二世披着裘皮披风，连头也裹着。他把椅子挪近火边，眼珠朝上盯着队长们，对以优势兵力进攻却毫无进展的围攻战很是光火。白天好不容易打破了城墙一角，当夜就被防卫军修好。尤利乌斯二世认为这是队长们指挥不力，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窝囊废！胆小鬼！怕死鬼！懒蛋！”他在火旁蜷着身子，嘴上凶狠地骂着。“这么无能，不配叫武将！去告诉士兵，如果他们干得再好

点，就不用搞什么有条件和谈了，而是让他们无条件地掠夺。”

队长们听得垂头丧气，连教皇最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也不例外。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教皇，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教皇骂得对，而是因为没有比这个厨房更暖和地方好待了。只有刚到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没挨尤利乌斯二世的骂。尤利乌斯二世似乎也对这位向佛罗伦萨政府求来的大名鼎鼎的佣兵队长礼让三分。

雪仍在不停地下，战斗在雪中持续。防守一方毫无士气低落的迹象。他们知道教皇在这里，但明知如此却照样炮击修道院，毫不手软。乌尔比诺公爵劝尤利乌斯二世说，这里危险，请转移到后方去。尤利乌斯二世回答道：“先看炮弹是不是会落到这里，然后再说要不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你这蠢货！”

然而，在此后不久的1月17日，炮弹真的直接击中了教皇的寝室。房顶被掀掉，房顶上的粗横木落下，与教皇同在一个寝室的两个侍从一个被当场砸死，一个被砸成重伤，生命垂危。幸运的是教皇没受一点伤。大言不惭的教皇这下也胆战心惊，同意转移到后方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的驻地去。

第二天，教皇又回到了修道院。对方很了解教皇的行踪，再次集中炮击修道院。但这次不论谁说什么，尤利乌斯二世都不为所动。

意大利人中有较多的人不把教皇放在眼里，但法兰西人可能是因为信仰笃深，关键时刻下不了狠手。米兰多拉防卫军一日三秋盼来的法军指挥官安布瓦兹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兰西人。他已经到了离米兰多拉30公里的地方，国王也下了死命令，不准他丢失这个战略要地。但他却在此按兵不动，告诉国王说他正在与教皇和谈。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时间快点过去，教会军在他到达之前攻陷米兰多拉才好。

米兰多拉防卫军已经陷入了疲劳困顿的状态。守城战已经坚持了很久，可是请的援军却迟迟不到。他们知道援军就在附近，于是更加绝望。城墙到处都遭到破坏，来不及修复。

1月20日，这天是援军到达的最后期限，城里终于派出代表到教皇这里乞降，条件只有一条，即保证居民和将士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始时教皇拒绝答应，说居民的性命好说，但他不肯保证防卫军将士的性命。但在枢机主教和己方队长们的恳求下，教皇改变了主意。他说可以保证市民和将士的性命和财产，但是要让亚历山德罗·特里武尔齐奥等防卫军的几个重要队长来当俘虏，米兰多拉要支付2万达克特作为教会军的战争费用。教皇紧接着又加上了一条，说钱可以分期支付，但要皮科家的儿子做人质，直到支付完毕。

尤利乌斯二世为此次胜利而欣喜若狂。这时，防卫军士兵的撤退和城市的清理尚未完毕，从里面顶着城门的栅栏尚未拆除。他等不及了，从城墙被毁坏的地方架梯子爬上去，进了米兰多拉城。他在城里徒步看了一圈。居民们心情复杂地远远看着他，表情疲惫已极。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把象征处于教皇保护之下的精美指环授予这座城市，留下800名士兵以保卫这座城市不受法军侵犯，然后他迅速离开了米兰多拉。他的心已经飞到了费拉拉。

费拉拉公国表面上是教会领土内的一个国家，但作为一个实际独立的国家，它历史悠久，政绩卓著，是意大利中小国家的翘楚，具有一流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水平，其素质不逊于欧洲列强。埃斯特家族长期的贤明统治深得人心。教会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小城米兰多拉，想攻下费拉拉简直是天方夜谭。枢机主教们异口同声反对进攻费拉拉，但尤利乌斯二世仍不甘心。教会军的队长们同意继续战

斗。他们也知道攻不下费拉拉，但作为佣兵队长，就算结果难料，只要打仗就能赚钱。于是，打下米兰多拉后，教皇的军队马不停蹄地向费拉拉进发了。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也很清楚，费拉拉绝非佩鲁贾、博洛尼亚所能比，更不用说米兰多拉了。当然，法国国王的撑腰也很重要。为此，他打算离间法国和费拉拉，遂向路易十二请求媾和。但是路易十二知道教皇在同费拉拉交战，做出了拒绝的答复。教皇旋即又向费拉拉出招要离间其与法国的关系。他的做法实在拙劣，遭到了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无情拒绝。尤利乌斯二世对这个失败很恼火，着力加强攻击军的战斗力。为了筹集战争费用，他任命了8位新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团反对这样做，认为此举违反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于1503年以废止波吉亚教皇的恶例为由制定的枢机主教任命权限法。但尤利乌斯二世心里已根本不再顾忌这些了。在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提议召开讨论费拉拉问题的会议，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都答应派代表参加，而教皇却对由1500名骑兵和9000名步兵组成的教会军自信满满，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

2月11日，对教皇有利的查理·安布瓦兹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70岁老将军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这位将军是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伺候过的主人也不计其数。这位经验丰富的佣兵队长是意大利人，对向上帝的代理人弯弓搭箭毫无顾忌。5月，特里武尔齐奥率领新编的1万多人的法军精锐部队从米兰出发，沿艾米利亚大道奔袭200公里，转眼间逼近博洛尼亚。

图12：阿方索·德·埃斯特

尤利乌斯二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了解特里武尔齐奥将军的性

格。教皇立即指示乌尔比诺公爵集合军队，加固博洛尼亚城墙。他召集市民代表，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服从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的领导，作为教会统治的国家，希望全体市民不要辜负教皇的期待，奋起抵抗法国，保卫城市。代表们发誓听从教皇的教诲。办完这些事以后，尤利乌斯二世于5月14日离开博洛尼亚，去拉文纳暂避一时，免做法军俘虏。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的5月21日，博洛尼亚市内发生反对教皇的叛乱。许多市民对过去神职人员的统治积怨已久，本蒂沃利奥和阿方索·德·埃斯特的煽动为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形式，而对法军迫近的恐惧燃起了这场大火。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得知消息后赶紧乔装打扮，趁早溜之大吉。乌尔比诺公爵和他的军队就像嗅到狼味的羊一样，扔下大炮等所有辎重，四散而逃。23日，特里武尔齐奥率法军同阿方索·德·埃斯特和本蒂沃利奥一道在市民的欢呼中进入博洛尼亚城。时隔四年半之后，本蒂沃利奥再次成为博洛尼亚的统治者。

民众为叛乱的胜利而狂喜。他们卸下了在圣白托略教堂正门上睥睨博洛尼亚达3年之久的尤利乌斯二世铜像，在城里四处拖着跑，然后把这件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铜像砸成了碎块。很快，大炮制作技术的头号高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导溶化了这尊铜像，制成了一门结实的臼炮。在意大利语中，大炮是阳性名词，臼炮却是阴性名词。于是，费拉拉公爵用女人的名字“朱莉娅”给这门炮起了名。

尤利乌斯二世在拉文纳得到了这个消息，这给了他最大的打击。接着，他又接到米兰多拉也向反教皇派开城的消息。这两件事意味着他前功尽弃，也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各国尤其是他的敌人都鄙视他。他觉得人们在说，看到了吧，教皇就得像个教皇的样子。在个人的感情上，

尤利乌斯二世悲哀地看到了自己最钟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和最信赖的枢机主教阿利多西的仓皇失态。

可是，把博洛尼亚推到敌人一边的罪魁祸首正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

尤利乌斯二世最初任命的教皇代理是费莱里枢机主教。他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态度，对博洛尼亚市民采取了镇压政策。这就刺激了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历来富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博洛尼亚市民，很快叛乱一触即发。尤利乌斯二世感到震惊，把费莱里召回罗马，派去了另一位枢机主教。但这位枢机主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博洛尼亚再次气氛紧张。尤利乌斯二世不得已又一次派去了教皇代理。这次是号称尤利乌斯二世头号心腹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但阿利多西也采取强硬政策，比起前两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尔比诺公爵注意到了这一点，把阿利多西抓了起来，戴上锁链押到了教皇那里，向教皇投诉他的恶政。这一事件让博洛尼亚民众驱散了心头的阴霾。然而，教皇不但为阿利多西打开锁链，还任命他为博洛尼亚大主教。民众觉得自己被出卖，在神职人员的严厉统治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绝望的人很容易变得激进。

尤利乌斯二世的错误在于忽视体察民心，忽视根据民心采取果断措施。而这两点是做上层人物的首要条件。我们不得不说，尤利乌斯二世缺少了这两点。谁都能做到果断处置敌人和无能之辈，但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舍弃自己人或有才之人，即使明知必须那么做。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舍弃了被称为心腹中心腹的洛尔卡而得到了罗马涅的民心。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并非那么有才能，尤利乌斯二世仅仅因为他最忠于自己便不采取严厉措施，从而丢掉了博洛尼亚。不过，政治艺术（arte）是一种素质，并不是任何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便能具备。

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和乌尔比诺公爵前后脚到了教皇所在的拉文纳。枢机主教一到教皇面前就伏在他的脚下，请求饶恕自己的罪过。在座的乌尔比诺公爵数落枢机主教的不是。这次又是尤利乌斯二世斥退侄子而护着阿利多西。这挑起了公爵内心对阿利多西的憎恶感。第二天，两人在路上偶遇。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对乌尔比诺公爵过分谦卑地打着招呼。20岁的公爵失去了自制力，口中喊道“叛徒！现在是你还债的时候了”，上去把他砍了。枢机主教受了致命重伤，一小时后便死去了。公爵直接骑马回乌尔比诺去了。这一事件让教皇的心腹和其他枢机主教暗地里大为欣喜。他们本来就不认可阿利多西，而且讨厌他。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人悲从中来，他体会到了同时失去最钟爱的侄子和最信赖的部下后的绝望感觉。

尤利乌斯二世无事可做了，除了回罗马以外，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尤利乌斯二世离开了拉文纳，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事情正在里米尼等着他。5月28日清晨，里米尼主教堂圣方济各教堂的大门上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则声明，呼吁于9月1日在比萨召开公会议。声明的主要内容为：教皇有权召开公会议，他曾在即位时发誓要召开公会议，但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实现誓言。不得已，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与有志的枢机主教共同决定召开公会议。请教皇派出代表或是亲自出席。全体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出席，不必等待教皇的判断，希望各位出席。有9个人在声明上署名，他们都是所谓的有志枢机主教。

声明一定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

尤利乌斯二世的自尊心受到了彻底伤害。同时，他也被抛入了超乎寻常的危险之中。这次公会议的意图无疑就是消灭尤利乌斯二世，德法两大强国都支持召开此次会议。

6月27日，身心俱疲的尤利乌斯二世掩饰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罗马。原本该是凯旋入城的，现已不是那么回事了。教会军自然消亡的消息已经传开。尤利乌斯二世好像要成心挑战罗马民众，不，应该是挑战全欧洲嘲讽的目光，他坚决要求戴着请卡拉多索[12]打造的三重冠走向圣彼得大教堂。3年前，教皇曾经在博洛尼亚入城式上荣耀地戴过这顶三重冠，它价值5万达克特，它上面的黄金和宝石闪闪发光，体现了教会和教皇的尊严。

但是，与教皇一起行动的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13]在日记上对这一天的记述只有一行字：

“我们艰难而徒劳的行军就这样结束了。”

四

身处绝境却能发挥不屈精神，这是尤利乌斯二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侥幸往往帮助他渡过难关，侥幸让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拯救他于危难之中的常常是他的敌人，而不是自己人。

召集比萨公会议是在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和平、进行教会改革、讨论十字军远征土耳其的计划这些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没过多久，后援国的步调便紊乱了。法兰西人路易十二出于传统的基督徒式的犹豫不想再逼教皇，他首先把特里武尔齐奥召回了米兰，而此时特里武尔齐奥正在博洛尼亚大干一场，风头正健，眼看就要进军罗马。紧接着，路易十二提出与教皇交涉，条件是承认本蒂沃利奥，并与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和解。这样便开了个头。接下来，在声明上联署的9个枢机主教

发生了分裂。先是加列托、科尔内托[14]、卢森堡的三位枢机主教声称不记得曾在声明上签过字。而后发生了伊波利托·德·埃斯特枢机主教根据其兄费拉拉公爵的深谋远虑也回到了罗马教皇身边。剩下的只有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和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这5个人。洞察力敏锐的威尼斯这时已经做出了判断，认为比萨公会议必将流产。

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想与企图对教皇宝座动手的人对话。这些人还想要教皇派代表出席比萨公会议，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不彻底打败无视教皇威严的比萨公会议派及其背后的法国，尤利乌斯二世便夜不能寐。挫败比萨公会议的最佳手段就是教皇也召集一个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出手反击了。

1511年7月25日，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布告，昭告天下翌年4月19日将要召开教皇主持的公会议，地点定在罗马的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布告的正文言辞激烈，表示只有教皇才有权召集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并未放弃这个权力。布告接着谴责比萨公会议派是在搞分裂活动。布告还列举了会议议题：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协调，重建教会道德的办法，研究同意十字军计划。这些都与比萨公会议的议题一致。布告又在其后加上了与异端及分裂活动斗争的条目。比萨公会议开会的日子定在9月1日，在此之前抛出召开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宣言，明摆着尤利乌斯二世是在挑战。

可是，此后不到一个月，尤利乌斯二世于8月17日突然病倒，病因直到今天也未弄清楚，或许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身心疲劳所致吧。开始他还在病榻前召见各国大使。到了20日他已经气力全无，连药都不想拿了。25日，传出了绝望的消息。

罗马开始准备应对教皇死后将会发生的混乱。高层神职人员和贵族

的宫殿大门紧闭，尤利乌斯二世的亲戚们在宅邸前架起了路障。枢机主教们待在家中等待，当然是在等教皇的死讯。

尤利乌斯二世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他接受了涂油礼，解除了对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禁止圣务的处分，谢过了侍从和佣人的服务并给了他们赏钱，原谅了因刺杀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而断绝了关系的乌尔比诺公爵。做完了这一切，教皇仰卧在病榻上不再动弹。白色的长髯盖住了他瘦骨嶙峋的面孔，他眼睑紧闭，半开着干燥的嘴唇。尤利乌斯二世进入了昏睡状态。

礼宾官帕里德写道："我的日志就此终结了。"

3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4天傍晚，一直死一样的尤利乌斯二世忽然睁开眼睛，认出了在身边忠心服侍他的帕里德，说想吃点什么。帕里德奔到在隔壁房间待命的医生那里。医生来到病房，在帕里德的耳边说给他吃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一大盘水果端了进来。盘中有西洋李子、核桃、草莓、尤利乌斯二世爱吃的桃子，还有醋腌小洋葱。教皇在病榻上微微抬起身子，虚弱地把手伸向水果。他先是嚼出果汁咽下去，吐出渣滓，然后又喝了很多水，再后来他躺下睡着了。过了不久，教皇醒来，又想吃东西。这回他吃了一枚鸡蛋和少量卷心菜，一个苹果和少量腌肉片，还吃了他喜欢吃的桃子。他很虚弱，一点一点地吃完了这些食物。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起初，这样的吃法让他很难受，甚至呕吐。但渐渐地，他开始有了精神。

过了两三天，尤利乌斯二世的病已痊愈，至少旁人看上去是这样。

再说比萨公会议，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欧洲各国君主派遣

的代表和神职人员的到会情况也极其糟糕。是出席尤利乌斯二世宣布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还是出席由皇帝和法国国王支持的比萨公会议，各国君主和神职人员都为此而感到迷茫。比萨公会议派判断教皇的病已经绝望，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要勉为其难地抢时间。他们把开会的日子从原定的9月1日推迟到了11月1日。这又让尤利乌斯二世走了一回运。

大病初愈的教皇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才能把法国势力逐出意大利。这件事既关系到能否消灭比萨派，也关系到他赌上教皇权威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能否成功。尤利乌斯二世还没有这么乐观，相信单靠教皇号召的精神力量就能办好所有这些事。他希望自己具有足以对抗法国的力量。但是，教会军已经有名无实，如果威尼斯也改变了昔日的做法，那他就只有一条路，即与其他强国结盟。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新兴国家西班牙。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迅速响应教皇，很快向罗马派来特使，协商结盟之事。结盟的理由是拥有天主教徒称号的西班牙国王要保护罗马教会和教皇。但不消说，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于赶走法国人后实现其对意大利的领土野心。尤利乌斯二世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要以西班牙之毒去攻法兰西之毒。

西班牙国王承诺为实现教皇意愿提供全面的军事援助。作为条件，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要承认西班牙对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意大利的领有权，而这连波吉亚教皇都未承认过。

图13：皇帝马克西米利安

1511年10月4日，“神圣同盟”正式起步，参加的国家有罗马教廷、西班牙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两个星期后英国也传话表示参加，瑞士也加入了同盟，只有德皇持保留态度。尤利乌斯二世判断，德皇碍于康布

雷同盟无法走出反法这一步，便未再勉强。他知道，皇帝总是会倒向形势有利一方的。教皇自信这次一定会成功。

此时，身在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念头。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欲望，想在拥有基督教世界世俗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地位的同时，再兼具精神界最高统治者教皇的地位。但从他以往的性格来看，他无疑着意于从各地流进教廷的巨额金钱。皇帝根据尤利乌斯二世两次病情判断他的死期将近，决定等他死后立即动手。皇帝的计划非常远大，但他想出来的实施手段却离奇古怪。

女儿劝丧妻之后孑然一身的父亲再婚，皇帝便给在荷兰摄政的女儿玛格丽塔写了一封信。

> 为了取得教皇对我晋升三级修士的批准，我想明天把古尔克主教朗派去罗马。如果获批，教皇死后我升登教皇宝座就会方便点。我就要成为主教了，你也得向对待主教那样对待我、尊敬我。……我打算近期开始做枢机主教们的工作。有二三十万达克特大概也就够了。不过，你要对此事绝对保密，尽管这个秘密近几天内也许就不再是秘密。总之，得有很多人在这件事上配合我，我也得为每一个“赞成”付出巨额金钱。
>
> 你的好父亲、下任教皇马克西米利安亲笔
>
> 9月18日
>
> 又及：
>
> 教皇又发烧了，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吧。

如果只有这么一封私信，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不过是父亲与劝自己

再婚的女儿开个玩笑，给她一个幽默的答复。可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前，皇帝给心腹部下列支敦士登元帅发去了这样的公文：

高贵、亲爱、忠诚的元帅：

我知道，你已经把我曾经告诉过你的心愿放在了心上。兼任教皇的念头在我的心里已牢牢扎下了根。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高贵、更卓越、更美好的想法了。

你可能也知道，现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久前得了濒死之病，罗马甚至有人以为他已经死去。现在机会绝佳，恐怕你也能想象出教皇的死期已近。听说他只能吃少量食物，还都只是水果，而且只想喝水。他快不行了。

我想派古尔克主教去罗马，为得到教皇宝座而去活动。但没有资金他什么也干不成。根据我的测算，要想让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们和其他罗马实力人物帮助我们实现计划，需要30万达克特。

不过，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如今我在金钱方面并不强大，只好向富杰尔借钱。我命你做的就是这件事。请你尽快面见雅各布·富杰尔密谈此事，让他在罗马富杰尔银行准备30万达克特。利息定为10万达克特，用我的宝石做抵押。这件事一办好，古尔克主教便可行动。

从我拥有的宝石中，包括我最值钱的宝石在内，装上4箱去做抵押，再加些皇帝的饰品。这些都不属于帝国，而是属于我的哈布斯堡家族。等我当上教皇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如果富杰尔想知道还款方式，请你这样回答：

30万达克特本金加10万达克特利息可按下述方法偿还：下次国会将指定富杰尔为皇帝领地年贡金（包括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缴纳的税金在内）的收款人，另加西班牙国王每年的缴款。如果这些款项还不足于解押，可以把我当上教皇以后收入的1/3用于还款，直到还清本息。

交涉之事全部交给你了。即使富杰尔不接受我的请求，你也不

要灰心，要反复交涉。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坐失良机。一旦交涉成功立即告我。

听说罗马的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都不希望下任教皇是法国或西班牙人。情况对我有利。机会这么好，我不想向法国开战。

1511年9月16日

这个远大而愉快的计划很快就夭折了，原因实在简单，富杰尔最终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对于贷款情况判断的准确性，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不及富杰尔。富杰尔是一个懂得保守秘密的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黄粱美梦没有成为人们的笑柄。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皇帝持保留态度，但这对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并非致命。他成立了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有了自信。他首先着手破坏会期已经迫近的比萨公会议。

10月24日，尤利乌斯二世宣布，以反教皇阴谋罪对比萨派的5个枢机主教予以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个处罚与其说对派代表参会的君主和神职人员有什么影响，不如说打击了被定为开会地点的比萨市民。如果他们被定为有罪，那么提供帮助的人也将与其同罪。选中比萨作为开会地点，一是因为这里在一个世纪前曾经召开过公会议，二是因为这里是亲法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土。然而，这对比萨人来说麻烦至极。

不久，参加公会议的人就开始陆续来到比萨，有4位枢机主教，2位大主教，14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和几位神学家。弗朗切斯科·波吉亚枢机主教病重缺席，不久后去世。出席者除了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两位枢机主教和一位神学家外，全部都是法兰西人，并非来自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都带着法国士兵警卫，反映出形势的严峻。德皇当初与法国国王联名成为比萨公会议的后援国，但来人中竟无一位德皇代表，其原因是富杰尔拒绝了贷款，也不见教皇将死的征兆，皇帝便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亲法方针，开始接近教皇，禁止德意志人参会。

比萨市民也开始消极对抗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向他们出租旅店和会场，在佛罗伦萨市政府的说和下好不容易才落实了食宿。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威胁要禁止比萨全市的圣务活动。市民们开始了积极反抗。

11月1日参会者来到作为公会议会场的主教堂（duomo）时却发现，这里已被路障围得铁桶一般。他们只好将会场转移到了卡瓦雅尔枢机主教下榻的圣米开尔教堂。这个教堂很小，比萨市民嘲笑道："教堂太小，但对比萨公会议来说却又太大。"常驻比萨的神职人员拒绝参加会议。会议需要两位市民代表，但无人愿做。公证人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躲了起来。好不容易从附近硬拉来两个人算是市民代表，这会才开起来。神学家介绍比萨公会议主旨的演讲一结束，会议便决定延期到11月5日再召开。

佛罗伦萨政府一筹莫展，派特使马基雅维利去向路易十二世请求，希望把会议挪往别处。但法国国王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佛罗伦萨开出条件，比萨市民不必参会，神职人员也一样，这才拿到了主教堂的使用权。会议总算于11月5日在主教堂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宽敞的教堂里，算上刚刚够格的侍从，总共也只有50人。到了9日，法国卫队的大兵与比萨市民发生了武力冲突，起因是法国兵欺负了一位市民。愤怒的民众涌到参会者下榻的地方闹将起来。

佛罗伦萨出动士兵暂时平息了骚乱，但参会者面对一片喊杀声心生恐惧，决定把原定于14日举行的第三天的会议提前到12日，并将以后的会场转移到米兰，12月13日终于在米兰召开第四天的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像狐狸逐兔一样紧追不舍。等公会议的参会者到了米兰，迎接他们的是市民满是憎恶的冰冷目光，较之比萨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利乌斯二世已对米兰处以禁止圣务的处分。米兰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虽有统治者的威权，但会议不可能得到常驻米兰的神职人员和民

众的配合。违反教皇意志的人和帮助他们的人，如果是俗人则会被开除教籍，如果是神职人员或修道院则不但会被开除教籍，而且还要没收其收入和财产。教皇的这个布告给了比萨公会议派致命一击。参与者们终于离开了意大利，转到法国里昂去了。结局如何，谁都料想得到。

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冷眼看着这一切，投入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为了向世界宣示自己才是拥有主持公会议正统权利的教皇，他必须开好这次公会议。

半年前，尤利乌斯二世被绝望摧垮，于6月底回到了罗马。在此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甚至被认为将不久于人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联合西班牙、威尼斯、英国、瑞士成立了神圣同盟，孤立了法国。且不论他这样做对意大利是否有益，他成功了。等着比萨公会议的只能是自生自灭的命运。德意志皇帝尽管没有迈出加盟这一步，却也没有采取反教皇的行动。那年年底，尤利乌斯二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不屈精神的成果。

五

加斯通·德·富瓦出生于1489年，那年22岁。他的家族肇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西西里的一位领主卡尔卡松伯爵，后成为德·富瓦伯爵领地的领主。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的表弟，现任内穆尔公爵。他留着娃娃般的短发，双唇的曲线和蔼可亲，下巴上略有胡须。他面庞清癯，但身躯却不似面庞，骨骼发达，肌肉健壮。他已超越自己的年龄，具备了武将的孔武。只是当时他还没有国际声望。

这位年轻人让68岁的尤利乌斯二世胆战心惊。

路易十二为与神圣同盟的军队对决，派这个年轻人去了意大利，让他在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门下接受了两个月完整的司令官教育。

1512年1月，威尼斯军队进攻布雷西亚，拉开了神圣同盟军对法作战的大幕。25日，威尼斯军队与市民里应外合，夺得了大部分城区。

另一方面，以西班牙人拉蒙多·迪·卡尔多纳为总司令的西班牙与教会联军于26日兵临博洛尼亚城下。2月2日，躲进布雷西亚要塞做最后抵抗的法国驻军已被逼得即将投降。身在罗马的教皇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半夜里召来威尼斯大使，留了他两小时之久，与他分享喜悦。打下布雷西亚意味着从东面打开了通向米兰的道路。在教皇看来，攻陷博洛尼亚也已经近在眼前，这样可以从东面和东南面一气攻入米兰，瑞士军队也会从北面攻过来。尤利乌斯二世很兴奋，似乎已经荡平了法国人。

加斯通·德·富瓦身在费拉拉附近的菲纳莱，他得到西班牙和教会联军逼近博洛尼亚的消息后，在雪中奔袭45公里，于当夜进入博洛尼亚城。他在博洛尼亚接到了更为紧急的消息：布雷西亚陷落了。

联军也知道德·富瓦进了博洛尼亚，并判断他必定会收复布雷西亚。但在隆冬的雪中率领大军行军，他将不得不取道平坦的艾米利亚大道。联军的战术是后退到博洛尼亚西北40公里的摩德纳，在那里伏击法军。

认为德·富瓦要收复布雷西亚的判断正确，但加斯通·德·富瓦没有选择走艾米利亚大道。

他断然决定只留下18000兵力的1/5坚守博洛尼亚，率领剩下的全部军队悄悄出了博洛尼亚城，向正北进发。道路难行，河流纵横，每河必渡。时间就是胜利。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艰难行军，一路上叱咤激

励。说起来是法国军队，但也不全由法兰西人组成，其中一半是意大利人雇佣兵，再就是连孩子都闻风丧胆的德意志佣兵[15]。这是所谓混成军团，一般的指挥官统一不了这帮难搞的家伙，德·富瓦却让这帮人顶着困难强行军。

1万多法军渡过大河波河，三天奔袭180公里。大军于2月17日清晨抵达布雷西亚城下。威尼斯军队猝不及防，企图靠大炮击退法军。法军迅速潜入城里，加斯通·德·富瓦命令骑兵扔掉战马，全员步战。城里狭窄的道路纵横交错，大炮失去了威力。激烈的巷战持续了两天。19日夜，布雷西亚重新回到法国人手中。城中留下了6000多具尸体，死者多为布雷西亚市民。

加斯通·德·富瓦让士兵处置城市。这是对布雷西亚人的惩罚，他们呼应威尼斯军队，向法国统治者举起了反旗。这也是对忍受艰难行军、奋勇作战的法军士兵的犒赏。其结果明若观火。意大利人佣兵满足于抢劫和强奸，可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却不满足于此。

他们掠夺后放火烧房，强奸后把人大卸八块。他们把幼儿的尸体用大钉子杂乱地钉在城门上，称那城门是凯旋门。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在罗马听到布雷西亚陷落的消息，得知那里的惨状后悲愤交加，从他颤抖的嘴唇里迸出几个字：“赶走野蛮人！赶走野蛮人！”

一向以优柔寡断而闻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这回似乎也下定了决心。瑞士军队现在就要奔米兰南下了。西班牙军队也在向比利牛斯山的纳瓦拉直奔而去。如果拿下纳瓦拉，他们将潮水般地涌入法国。英国国王意欲登陆诺曼底，德皇也已经动摇。路易十二要在一切尚未动作之前与教皇一决胜负。

3月22日，加斯通·德·富瓦接到了国王发出的决战命令。他考虑了决战地点，把目光投向了拉文纳。这样的考虑显示出加斯通·德·富瓦不仅是优秀的战术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法国国王的意图是决战胜利后直捣罗马，驱逐教皇，扶植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取而代之，然后乘胜进攻那波利，把西班牙势力从意大利赶出去。而要实现这个意图，这次的决战就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成为名副其实的决战。打这一仗首先要引蛇出洞，把同盟军全军引诱出来。为此又必须先与同盟军的后勤部队威尼斯共和国短兵相接，打击同盟军的补给基地拉文纳。同盟军不能失去拉文纳，他们定会倾巢出动。打赢这一仗，不但可以在军事上打击同盟军，还可以将同盟军与其后勤部队威尼斯一分为二。同盟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重组整编工作。拿下拉文纳就等于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路。这一点已为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战例所证实。这位刚满23岁的年轻人眼光精准，出于战略考虑选择了拉文纳作为决战的战场。

法军离开米兰后于4月3日到达距离拉文纳30公里的科蒂纽奥拉。为了提高士兵的士气，激起他们的欲望，以备决战，加斯通·德·富瓦允许士兵在费拉拉的大炮运到之前对附近进行掠夺。他们一边掠夺，一边对拉文纳施以零星攻击。

守卫拉文纳的是勇将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指挥的1500名步兵和少量的骑兵，他认为只需支撑到援军到来。

4月9日，运抵的大炮在城墙下一字排开，攻城战正式开始。德·富瓦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却一直把目光瞄向背后。

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晨出现了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德·富瓦留下1000名步兵拖住拉文纳守军，同时命令全军调头向后。大军移动需要时间，如果同盟军不失时机地突然袭击，胜利就将属于他们。可惜同盟军

在离拉文纳5公里的容科河对岸停了下来。他们不再前进，并开始挖战壕。战壕挖了整整一天。法军趁此工夫轻易地调转方向，摆好了阵形。当天夜里，同盟军还在继续挖着战壕。法军推平了容科河的河堤，在20米宽的河面上紧急建造了一座渡桥。步兵在黎明前首先开始过桥。

1512年4月11日，复活节。这天清晨，被称为16世纪上半叶最惨烈战役的拉文纳会战拉开了大幕。

法军拥有的兵力为1900名重装骑兵，3000名轻骑兵，18000名步兵，其中包括5000名德意志佣兵，总数达到2.3万人，另配备有50门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拿手的最新式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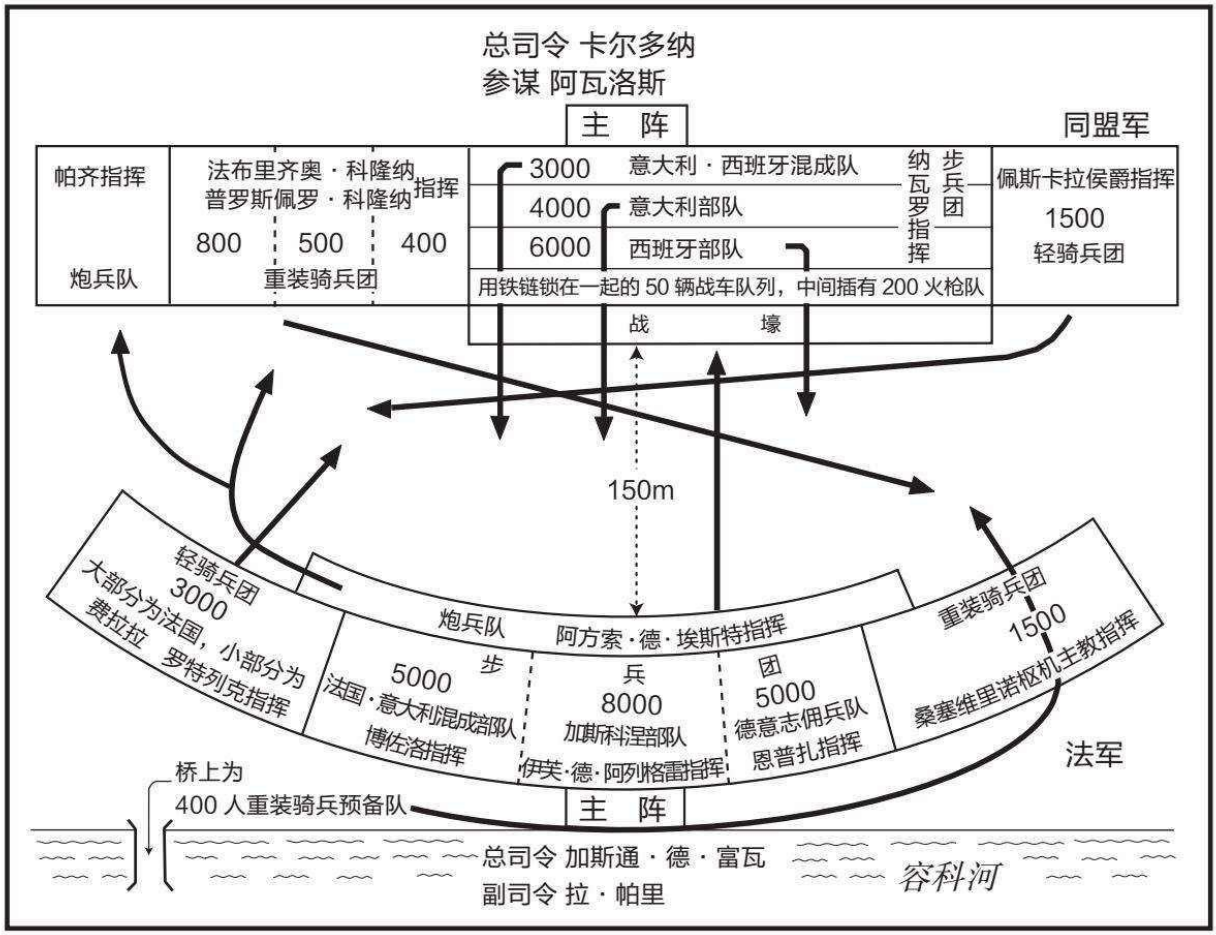


图14：拉文纳会战

同盟军拥有的兵力为1700名重装骑兵，1500名轻骑兵和13000名步兵，共计1.6万人，另有24门大炮。

指挥这些部队的班底也由当时最了不起的武将组成。法军的指挥班底中有切萨雷·波吉亚著名的副将伊芙·德·阿列格雷、罗特列克、拉·帕里、后来闻名遐迩的步兵专家费德里科·达·博佐洛、雅各布·恩普扎、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有人高马大、身穿黑光闪耀的盔甲亲自指挥重装骑兵的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法军的总指挥是加斯通·德·富瓦。

同盟军方面也将星如云，不可小觑。佩德罗·纳瓦罗、后来成为名将的23岁的费迪南多·阿瓦洛斯、佩斯卡拉侯爵、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同盟军方面也有一位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

他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代理人。不过，与加入武将行列的老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相反，36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身穿僧衣，骑在白马坐骑上，一脸的不情愿。同盟军的总指挥是继声名远播的贡萨洛·德·科多巴之后当上那波利总督的拉蒙多·迪·卡尔多纳。

容科河沿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包像细浪一般四处隆起。平原的尽头便是大海。两军在这片平原上摆开了阵势。

同盟军面向容科河布阵。炮兵部队从右翼开始沿隆起的土包一字排开。接着是分成800人、500人和400人的三队重装骑兵团。前方的中央是战壕，最前列有铁链相互锁着的50辆二轮战车，其间配有200人的火枪队。后面一排是6000名西班牙步兵。第三排是4000名意大利步兵。第四排是3000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混成步兵。所有士兵人人持枪。大本营设在这些部队的后方。阵形的左翼由1500名轻骑兵守卫。

法军背对容科河布阵，可谓背水一战。法军在左翼布置了3000名轻骑兵，与同盟军的重装骑兵对峙。中央布置了步兵团，与同盟军步兵团成对抗之势。敌方步兵团的队形为横队，法军则为纵队，从左开始依次为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的混成部队、8000名加斯科涅步兵、5000名德意志佣兵。法军的大本营也设在步兵团的后方，右翼由1500名重装骑兵守卫。此外还有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在容科河桥上待命。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炮兵部队的位置变化最大。同盟军炮兵配置在右翼，而法军把大炮布置在全军的最前方，炮兵数量也多得吓人。

法军首先开始前进。他们并不齐头并进，而是呈扇形前进。两军相距150米时，法军大炮开火了，同盟军的大炮立即应战，战场上响彻了震耳欲聋的炮声。但两军都未受到多少炮火打击，倒是持续前进的法军挨了更多的炮弹。同盟军的步兵则匍匐在地躲避炮击。

就在这时，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法军炮兵部队从前方绕过己方的轻骑兵，斜刺里迂回到了敌人右翼。这样做需要移动50门重炮，他们的速度惊人。大炮移动后与敌方大炮形成了交叉的角度，并且与敌人近在咫尺，效果立竿见影。同盟军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受到了来自前方和侧翼的集中炮击。战马疯了似的狂暴，这样下去重装骑兵不及交战便会全军覆灭。骑兵们大声呼叫："让我们出击！"

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急忙派人去大本营，请求总司令卡尔多纳和副司令纳瓦罗批准他们出击。可他们两人都不同意，说是要等待时机反击。可是，这时任何人都无法让骑兵原地不动了，骑兵们愤怒地吼叫着。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一马当先，率领第一重装骑兵队的800铁骑首先发起了冲锋，吼声震动大地。他们向敌人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发起了攻击。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也毫不迟疑，亲自指挥第二、第三重装骑兵队紧随从斜刺里杀向战场的第一骑兵队。重装骑兵从头到脚全身都用钢铁盔甲裹得严严实实，1700人和1500人的两支铁流发生了激烈冲撞。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装甲车战队正面相撞。长矛在空中飞舞，盔甲铿然相撞。每个骑兵后面都跟着一个步兵，他们根本无法冲入敌阵。平原之上高高地卷起了一团铁色旋涡。这里成了中世纪之花——重装骑兵最后和最大的演兵场。

战况白热化。谁都能看出，大炮是战斗的真正主角。费拉拉公爵大炮的炮弹越过重装骑兵离去后的空地，从匍匐在地的步兵团头上掠过，向同盟军的轻骑兵砸去。1500名轻骑兵被炮击激怒，在佩斯卡拉侯爵的指挥下，向费拉拉公爵的炮兵队冲了过去。但在摧毁敌人的炮兵之前，他们不得不对付横刺里杀过来的两倍于己的法军轻骑兵。这是一场1500骑对3000骑的战斗。于是，在战场的左右两翼，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分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法国步兵终于动手了。5000人、8000人、5000人的三队形成整体，在战场中央向前推进。法军受到同盟军火枪队的猛烈射击，士兵

纷纷倒下，但他们没有停止前进。法军推进到敌人战壕附近，随即转入冲锋。有些士兵被推倒跌入战壕，有些成功冲入战壕对面的战车队中。

同盟军的步兵接受法军的挑战，他们站了起来。首先，第一排的6000名西班牙士兵冲向5000名德意志佣兵。紧接着，4000名意大利士兵也冲到了两倍于己的加斯科涅步兵面前。第四排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混成军团也立即冲向了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组成的混成军团。两军步兵分三处激战，同盟军始终占据着优势。法军开始后退。这时，率领加斯科涅步兵的伊芙·德·阿列格雷看到了自己带来充任副将的儿子被拽下马来，又被步兵用长矛刺穿了身体。绝望的老队长正要单枪匹马冲入敌人步兵的海洋，一发炮弹飞来，把他连人带马炸上了天。

整个战场分为三处仍在激战，左边是轻骑兵的战斗，中央是步兵的战斗，右边是重装骑兵的战斗。轻骑兵战斗的胜负已见分晓，敌人两倍于己，同盟军方面顶不住了。步兵的兵力虽少，同盟军还是压了上去。重装骑兵已在决死一战了。头盔打飞了，满脸鲜血，士兵们仍在战斗。进入肉搏战后，长矛派不上用场，所有人都扔掉长矛，用剑相互砍杀。渐渐地，同盟军一点点地被压了下来。加斯通·德·富瓦见状，便命令在容科河桥上待命的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出击。他们过桥后沿着河堤绕过自己人的背后，挺着长矛冲向正在用短剑激战的同盟军重装骑兵的侧面。这是最终制胜的一招。1700名同盟军重装骑兵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身负重伤，当了俘虏。法军的1500名士兵也半数战死。

战斗形势终于明朗。同盟军在步兵方面占据优势。轻骑兵和重装骑兵也都分出了胜负。同盟军总司令卡尔多纳命令仍在恋战的残余骑兵撤退。

步兵还在酣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骑兵撤退后的战场中央。两军整

好队形，不断冲击。每次两军分开时都会留下许多尸体，反复冲击后尸体堆积如山。两军挪开位置后又多次相互冲击。同盟军步兵英勇善战，然而不幸的是，自己一方的炮兵部队已经被打散，失去了战斗力，而敌方费拉拉公爵的大炮依旧威力不减。现在，已经没有了骑兵这个障碍，炮弹便集中射向步兵团。炮弹的命中率相当高。炮弹在整齐的阵形中四处开花，每次爆炸都会炸飞成堆的士兵。

英勇善战的同盟军步兵也胆怯了。法军步兵见状立即展开攻势，开始了惨烈的肉搏战。同盟军步兵二队受到全面压制。6000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步兵队扔掉长矛，手拿短剑冲向敌阵，打退了敌人。副司令纳瓦罗在这场战斗中受伤被俘。失去了指挥官的西班牙步兵仍然没有放弃战斗。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总司令卡尔多纳已经向切塞纳退却了。

广阔平原上的战斗只剩下这一处了。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西班牙步兵的作用非常显著，就连德意志佣兵也都快被压制下去。

见此情形，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率领轻骑兵鲁莽地冲进了敌阵，他大概想胜得更加完美。西班牙士兵虽被冲得七零八落，但还是砍断了他的马腿。德·富瓦倒栽葱摔下马来。狂怒的西班牙士兵成群地压过来，把他埋在下面。德·富瓦大喊自己是西班牙国王的表弟，但这也已经徒劳。西班牙步兵这才整好队伍，堂而皇之地从敌人面前退去。

战斗结束了。激战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4点。14000名士兵的尸体掩盖了平原，其中1/3是法国士兵的尸体，2/3是同盟军士兵的尸体。同盟军士兵多半是被炮弹炸死，有很多尸体没了头颅，没了胳膊和腿，景象十分惨烈。法军士兵几乎都是被长矛或短剑刺死。两军后来也没弄清楚负伤的人数。武将之中，法军牺牲了加斯通・德・富瓦和伊芙·德·阿列格雷，同盟军方面佩德罗·纳瓦罗、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费迪南多·阿瓦洛斯因身负重伤而被俘。法军武将中指挥步兵的费德里科·达·博佐洛

身负重伤。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也负了伤，殷红的献血从缠在大腿的布上渗出。

未受伤而被俘的只有一个人，乔凡尼·德·美第奇[16]枢机主教。他逃晚了一步，被敌军的步兵包围了。敌兵全都满脸怒气，只要有一个人亮出长矛，所有人就会一齐刺过来。枢机主教那肥胖得跟年龄不相符的身体骑在姿势优雅的白马坐骑上，他没有逃跑的意思，也没有装腔作势，只是静静地俯视着他们。就在这帮士兵见状胆怯的一瞬间，负了伤的博佐洛冲了过来，救出了枢机主教，把他交给了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一身铠甲的桑塞维里诺用一脸轻蔑的表情迎接这位枢机主教，说道："欢迎，枢机主教大人！"

这位俘虏用温和的口吻回答道："我还没吃饭，肚子饿了。"他于一年之后成了教皇利奥十世。

夜色降临。拉文纳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围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通·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纳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纳城。胜利者加斯通·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举行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们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情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同盟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向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纳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17]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同盟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枢机主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德·埃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000人的大军尚存3/4。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同盟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0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纳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把罗马涅这个传统上反教会思潮最强的地方拿到了手，却不懂得去好好利用。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纳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做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5月2日傍晚，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队伍出了梵蒂冈，越过台伯河，穿过罗马市中心，向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而去。

尤利乌斯二世毅然决定，在战时体制下按期举行公会议。明天就要开会了，教皇循例在前一夜进行巡游。希腊骑兵队在前面开道，一队步兵手持长矛紧跟其后，接着是身着官服、威风凛凛的教廷高官、枢机主教们的家属和罗马市民代表，后面才是尤利乌斯二世。只见他身着纯白色的教皇袍，身披金色披风，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三重冠，坐在红绸幔帘的轿辇里。瑞士佣兵身穿华彩制服护卫在轿辇两侧。身着红色正装的枢机主教团跟在教皇后面，100名手持火枪的武装士兵殿后。大炮排列在拉特拉诺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以备不测。

罗马市民惊讶地看着巡游队伍。20天前大家还在为法军压境而胆战心惊。在法军随时都会出动的情况下召开公会议，真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想的却是，正因如此才要断然召开这个会议。他这样做并非因为如果不能按去年7月宣布的会期召开会议将有损于教皇的威信。如果他在这样不稳定的形势下宣布延期一年开会，谅谁都不会指责。那么，他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召开公会议呢？

此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右手持剑，左手拿十字架搞政治。但目

前右手的剑折断了，不能用了。他只能把以前一直拿在左手的十字架换到右手，不，应该是用双手高举过头，起码是在拿到新剑以前，要靠这一招决定胜负。尤利乌斯二世从不认为可以永远靠十字架去对付舞剑的对手。他相信这一点，这方面他过于意大利人了。

那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住在了拉特拉诺教堂。第二天是1512年5月3日，教会史上第18次公会议开幕，这也是在拉特拉诺教堂召开的第5次公会议。全体人员正装出席。出席会议的有教皇、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者以外的16位枢机主教、12位大主教、70位主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阿戈斯蒂诺等主要会派的领袖3人，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作为市民代表的罗马市议会议员、贵族代表等。罗德岛骑士团员身着十字军军服列队肃立，胸前印着大大的白色十字架。他们受教皇之命担任此次公会议的名誉卫兵。白、金、红、黑，这些绚丽的色彩浮现在宽阔的拉特拉诺教堂之中。

会议首先举行了弥撒仪式，由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主持。接着，阿戈斯蒂诺派领袖艾智德用庄重的拉丁语发表演说。他强调了教会的危机，说明公会议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拉文纳会战的失败是上帝对诉诸武力的警告，今后必须回到用十字架谋求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方向上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尤利乌斯二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听这些神学家演说的。他耳朵虽然听着，心里肯定在想权且听听无妨。艾智德的演说结束后，法尔内塞枢机主教以教皇的名义发表演说，希望本次公会议取得成果。开幕式就此结束。

5月10日，公会议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开始按例由格里马尼枢机主教主持弥撒。神学家扎内接着发表演说。他论述了土耳其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团结在教皇和罗马教会之下。轮到尤利乌斯二世发表演说了。听着教皇讲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正统性以及尽早进行教会改革的必要性，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感到满足，同时禁不住窃笑。

格拉西承担了这次公会议的全部事务工作，掌管会议进度。但对他而言，照顾远方来的神职人员、推动会议顺利进行这些事并无太大辛苦。公会议的不断成功推进当然给了他满足感。让帕里德最感辛苦的是把不善座谈、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劝上讲坛。演讲稿是教皇的第一秘书、历史学家西吉斯蒙多·德·孔蒂用漂亮的拉丁文写成。尤利乌斯二世5天前就开始坐立不安，变得神经质。他手里拿着草稿，反复多次地练习演讲。帕里德担任听众一角。每次练完，帕里德都得谈他的感想，语调庄重了，声音再压低点就好了，这里应该再强调一点，等等。最后，他必定会说，“我在罗马待了40年，从没有听到过如此完美的教皇演说”，来为教皇鼓劲。因而，他今天听正式讲演时，觉得可笑至极。尤利乌斯二世听到拉文纳战败的消息都没有慌乱，但必须发表演说时却是如此地沉不下来。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5月17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匈牙利人枢机主教主持的弥撒结束后，多明我会的领袖托曼·达·维奥发表演说。他从神学高度谈了教皇召开公会议的正统性，相反把比萨公会议定位成异端。接着宣读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亲笔信，表示要全面参加神圣同盟，承认教皇权威，紧跟教皇。紧接着朗读了西班牙国王写来的相同主旨的亲笔信。两位国王都说要正式派遣国王代理前来参加拉特拉诺公会议。之后，会议决定下一次会议将于12月3日召开，而后散会。会期中止的表面理由是要避开夏天，但真实原因却是要等待更多的外国人参加会议。没有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参加，便称不上是万国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强行举行的拉特拉诺公会议以惊人的速度体现出了它的效果。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前一直对威尼斯心存敌意，从而下不了决心断绝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看到拉特拉诺公会议取得进展后变得不安起来，感到自己一个人被甩下了。他首先撤回了加入法军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佣兵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接着，他又同意瑞士步兵团过境并补给军粮，这在以前一直受到禁止。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突然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同盟军已经在意大利重新整编，瑞士军队也加入进来；而自己却不得不用少了战斗力强大的德意志佣兵的残军与之对决。英军虽在诺曼底登陆了，实际上他们苦于酷暑、雨水和痢疾，什么也做不成。路易十二接到英军登陆诺曼底的消息时却惊慌失措。西班牙军队也开始侵犯比利牛斯方面的国境线。法国本国遇到了危险，已不能把战斗力全部投入意大利了。

5月底，18000名瑞士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维罗纳集结后立即从周边进攻米兰。教会、西班牙和威尼斯同盟军同时向罗马涅进军。热那亚也在弗莱格佐的指挥下爆发了反法起义，法军逃遁。6月，乌尔比诺公爵指挥的同盟军轻而易举地收复了拉文纳、里米尼和切塞纳，并于13日在本蒂沃利奥再度出逃后进入博洛尼亚城。在此期间，瑞士军轻松占领了布雷西亚、克莱莫纳。同盟军拿下了帕尔马后向皮亚琴察进军，渐渐从东面和东南面收紧了进攻米兰的大网。法军一退再退。6月22日，瑞士军占领被称为米兰大门的帕维亚。同盟军和瑞士军在此会合，开始协同攻打米兰。

事态的急剧变化使得在米兰的法国人进退失据。民心极度浮动，靠城墙防守也已不可能。他们只好让军队躲进斯福尔扎城堡。宫人和神职人员逃往阿斯蒂。当了俘虏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趁乱成功逃脱。先前，拉文纳战役被俘的其他武将也都由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斡旋或支付了赎金纷纷获得自由。只有他由于路易十二的命令未重获自由。

不久，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米兰市内。躲在城堡里的法军士气眼见得低落下来。等呀等呀，他们终于盼来了路易十二让他们撤回本国的命令。他们迅速行动，全部撤出了斯福尔扎城堡。他们在阿斯蒂带上法国人和本蒂沃利奥等所有亲法人物，经由都灵，一路朝阿尔卑斯山而去。就这样，6月28日，意大利境内的法国势力被一扫而光。

尤利乌斯二世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滂沱，他看着偶然进入房间的忠诚礼宾官的脸喊道："帕里德，我赢啦！帕里德，我赢啦！"

当天夜晚，整个罗马的所有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物的墙上都成排成排地装饰了火把。庆贺的礼炮声从圣安杰洛城堡响起，民众成群结队在全城迤逦而行。这次庆典的理由是波兰人战胜了鞑靼人。可是谁都知道，他们庆祝的是教皇战胜了法国人，教皇这样的人物表面上不能庆祝对同为基督教徒的胜利。

法国人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是处置意大利境内与法国狼狈为奸之人。

7月4日，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为表示悔改之意抵达罗马。依他的性格，即使被开除教籍都不会在乎。但他明白，现在法兰西势力已被消除干净，能否与教皇搞好关系关乎费拉拉公国的存亡。他必须表示悔改，首先请教皇解除对他的开除教籍的处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和表兄曼托瓦侯爵贡扎加都曾得益于他释放俘虏的努力，他们向教皇做了工作，有斡旋之劳。

罗马民众已经知道他的大炮在拉文纳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必定不会用普通的办法对他解除开除教籍处分。费拉拉公爵将身着罪人之服，脖子上绕着绳子，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受到鞭笞的谣言四下传开。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群众的期待落空了。阿方索·德·埃斯特来到了罗马，并没有穿着罪人之服，脖子上也没有缠绕绳子，而是被迎进圣彼得大教堂，庄严地接受了尤利乌斯二世为他举行的解除开除教籍处分的仪式。

可是，等他到了教皇宫却气氛骤变。尤利乌斯二世对他说：放弃费拉拉吧，我把阿斯蒂的领地给你。阿斯蒂是一块小领地，大小还不及费拉拉的1/20。阿方索来罗马时已打算一般的事情能忍便忍，但这一条他接受不了。他拒绝了。教皇发怒了。尤利乌斯二世不但没有忘记拉文纳会战中的大炮，还对阿方索怀有诸多不满：费拉拉公爵一直奉行亲法政策，还娶了他的宿敌波吉亚教皇的女儿为妻。波吉亚没落以后，尤利乌斯二世表示那桩婚姻可做无效处理，阿方索却不愿放弃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继续以妻子相待……教皇认为这位36岁的男人在意大利君主中出类拔萃，这反倒增强了教皇对他的憎恶。尤利乌斯二世提到费拉拉后一步不让，阿方索一再恳求却毫无用处。最后，阿方索·德·埃斯特说“请给我一些时间”，请求准许他离开罗马，教皇没能同意。

费拉拉公爵知道再在罗马待下去也不会有用了。7月19日，在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的帮助下，他化装后趁着夜色逃出了罗马。愤怒的教皇向教会军下令，占领了费拉拉领内的摩德纳和雷焦。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想同教皇对话，派秘书阿里奥斯托[18]去了罗马。阿里奥斯托创作了《疯狂的奥尔兰多》，这部杰作为意大利文学史增色不少。尤利乌斯二世对阿里奥斯托暴怒，说要像狗一样把他扔进台伯河，吓得这位大作家也不得不逃离罗马。

紧接着费拉拉，教皇又把怒气撒向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制裁它的理由是长年的亲法政策、不参加神圣同盟、同意在比萨召开公会议等等。在西班牙军队的威胁下，佛罗伦萨无计可施。终身正义旗手[19]索德里尼[20]逃亡了。9月14日，共和国在与西班牙军队同行而来的美第奇族人面前打开了城门。美第奇被萨伏那罗拉的人民政府流放18年之后重回佛罗伦萨。尽管保留了共和国的政体，但施行的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政治，这已昭然若揭。

扫除法兰西势力以后的意大利被分割如下。

以那波利为中心包括西西里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归于西班牙国王。意大利北部归于米兰。“摩尔人”卢多维科的遗子马西米利亚诺结束了在瑞士的12年流亡生活，回到了米兰，重建起公爵领地。而威尼斯则把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方捏在了手中。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涅、马尔凯、翁布里亚等地则完全归入教皇的统治之下。除此以外，教皇还把从费拉拉抢来的摩德纳、雷焦以及原属米兰公国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弄到手里。巧妙地依附于教皇的曼托瓦侯国自不必说，连费拉拉公国也保住了平安。因为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策划的计谋，尤利乌斯二世要把费拉拉全境变成教会领土的主张没能行得通。德皇和西班牙国王对教皇的进一步强大感到不安，她便撺掇他们反对教皇这样做。伊莎贝拉的娘家是费拉拉的德·埃斯特公爵家族。

佛罗伦萨已经处在教皇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了。

看上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取得了胜利。法兰西势力已被扫出意大利，教皇领地得到扩大，成为500年前卡诺萨伯爵夫人玛蒂尔达捐赠土地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张。法国国王在赌上教皇威信的神圣同盟和拉特拉诺公会议面前一败涂地，就连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自己实现了历代教皇没有实现的愿望，尤利乌斯二世的自信和满足必须以某种形式流传后世。受到教皇的委托，米开朗琪罗全力以赴投入了以摩西雕像为中心的宏大墓地的建设之中。

六

“陛下，这让我很为难。有正经八百的医生在，不能找那些怪里怪气的人。”

“帕里德，我让你做你就做。医生不足为虑。他们一天到晚只是无聊地要我不要吃得太多，晚上要早睡，不要操心太多，有用的事情一件也没做。不管他们！”

“但是陛下，您只是有些疲劳，不是生病。今年夏天您叫占卜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位占卜师保证陛下还能好好地活3年。从那以后陛下更加精神。”

“啊，不过帕里德，我想穷尽各种手段试试。我想一定要试试那人调制的长生不老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去死会死不瞑目的。”

11月，在深秋的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注意到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当初为赶走法国势力而拉进来的西班牙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起巩固的势力。他们不仅在意大利南部随心所欲，还横行于意大利北部，如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言行也变得傲慢起来，引起了大家的憎恶和反感。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对意大利、对罗马教会都必为大患。这就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痛的原因。

但是，他亲手削弱了意大利境内仅剩的强国威尼斯。法国也被他下手赶走了。事已至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又被逼到了不得不借助其他外国军事力量的境地。他把目光放在了剩下的唯一能与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德意志身上，打算再次以毒攻毒。

11月4日，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完工仪式的3天之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特使马修·朗抵达罗马。他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一头金发，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不拘小节，全然不懂精致的乐趣。教皇以最高荣誉欢迎接待了他。罗马气候温暖，在教皇宫后面的观景宫里，夜夜飨宴，朗诵诗歌，演出戏剧。之后，一定会有漂亮的年轻人扮成缪斯女神，歌唱教皇与皇帝联盟的胜利。日耳曼人醉成了一摊烂泥，由那扮女装的少年伺候着他。宴会在波吉亚教皇时代并不稀罕，但波吉亚教皇和尤利乌斯二世教皇两者的宴会有一个重大区别。尤利乌斯二世不邀请任何女人，而是让美少年们男扮女装，化装成女人。当时很多编年史都有这样的记录，说他虽已有三个女儿，但还是因这方面的兴趣而闻名。因为这个原因，他似乎每次都会原谅反复失策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走运的是，这个日耳曼人也有同样兴趣。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希望与皇帝联合战斗，皇帝提出了下列条件：由教皇担任仲裁角色，消解皇帝与威尼斯的不和；皇帝放弃对维罗纳、维琴察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一次性支付25万达克特；皇帝放弃帕多瓦、特雷维索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每年支付年贡金3万达克特。皇帝承诺，不承认分派（法兰西），支持教皇与之彻底对决，向教皇提供全面军事合作以对抗教皇视作敌人的任何势力。皇帝在条件中点出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名字，但没有明确点出西班牙，他还掖着藏着对抗西班牙的初衷。

然而，听了教皇的这些说法，威尼斯大使未请示国内便当场表态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理所当然，尽管这些领土原本属于皇帝，但几个世纪以来，这四个城市实质上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何况威尼斯在与德意志的战争中获胜，没有付钱和支付年贡金的道理。但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把德意志拉到自己一边，没有理睬威尼斯的抗议。

皇帝特使还在担心是否已经得到威尼斯的同意，教皇就急急忙忙强拉他于11月19日签订了教皇与皇帝的同盟协定。皇帝特使咬上了从主教

一口气提拔成枢机主教的饵。24日，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古尔克主教、皇帝第一心腹马修·朗被正式任命为枢机主教。25日，教皇在波波洛圣马利亚教堂庄严的气氛中宣布了表现教皇和皇帝之间牢不可破友好关系的同盟成立。以西班牙、威尼斯为首的各国自然以怀疑的目光关注事情的发展。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12月3日，中断一时的拉特拉诺公会议再次开会。例行的弥撒和神学家演说结束以后，已成为枢机主教的朗宣读了皇帝通喻。通喻将拉特拉诺公会议以外的一切公会议列为异端，称皇帝将成为世俗君主全面支持和服从教皇的典范。10日是拉特拉诺公会议的第四天会议。这天的会议整天都在谴责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会议再次公布了51年前路易十一关于绝对服从教皇、放弃在法兰西境内神职人员任命权的书简，这封书简曾让时任教皇的庇护二世感动得落泪。如此一来，路易十二的不诚实便大白于天下，以德意志、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各国形成一致，决定把法国国王定为教会的敌人和教皇的敌人。一时间，教皇让法国国王退位、让英国国王加冕成为法国国王的意图四下流布，甚至使英国驻罗马大使欣喜若狂。

在一般人眼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所向无敌。人们认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扫除了法国势力，成功召开了拉特拉诺公会议，统一了以皇帝为首的世俗君主。在教皇的权威光环之前无人能敌。民众，尤其是意大利民众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感情变为感谢和崇拜，这是以往任何教皇都不曾享受过的。

然而，这骗不过了解情况并具备敏锐洞察力的人的眼睛，尽管他们人数极少。这些人知道，尽管尤利乌斯二世还在继续非常危险的输赢赌博，但他最终会把自己逼进无路可走的境地。可怜的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以感谢上帝让拉特拉诺公会议获得成功为名，巡视了罗马市内外的教堂，沿途被成群结队欢呼的民众簇拥着。

但他的内心却与此相反，灰暗而消沉。他巡视了圣彼得镣铐教堂、圣十字教堂、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和城外圣洛伦佐大教堂，并在每个教堂下榻一宿。在这次巡视中，教皇有一个悲切的愿望，他想通过步行，多少为自己增加一些体力。但事与愿违，等他好不容易熬到圣尤西比奥教堂那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能继续巡视了。第二天，他躺在叫来的轿辇里回到了梵蒂冈。从那天开始，可怕的怀疑和绝望开始日夜折磨着他。

69岁，治世9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尤利乌斯二世下定决心拉到自己阵营的皇帝跑去了米兰。尤利乌斯二世充分信任朗，把他提拔成为枢机主教，朗却非但没有留在罗马，相反却跑到米兰，跟在新公爵身边寸步不离。这表明，皇帝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米兰把势力扩大到意大利北部。而意大利南部也日益染上西班牙色彩。

另外，一个刚满12岁的少年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老教皇的头上，这就是在西班牙茁壮成长的卡洛斯。卡洛斯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皇子菲利普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所生。他既是皇帝的孙子，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外孙。菲利普已经去世。这个12岁少年理所当然地领有了西班牙和德意志，以及包括当时的低地国家(paesi bassi)，后来被称为荷兰、比利时在内的广阔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土地包括了除英国、法国、北欧以外的欧洲全境。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衰弱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愿意以后自相残杀。人们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他们的真意只是想扎扎实实地巩固意大利南部和北部，不让法国势力插手。事已至此，尤利乌斯二世不得不面对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

以毒攻毒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但如不十分注意，准备用来攻毒的毒

便会不知不觉地侵害全身。摆脱这种危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快制作抗体，别无他法。

尤利乌斯二世自打治世之初就一直认为，波吉亚教皇是使用以毒攻毒之法的达人，在现状之下他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很自负，认为即使跟宿敌采取同样的办法，自己的目标也并不一样。波吉亚家族的这对父子——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让意大利摆脱外国而独立的目的是为切萨雷建立自己的王国，实现自私的野心。而尤利乌斯二世的目的则是为重建罗马教会的权威。他甚至为此而感到自豪。

波吉亚在1500年为支援尚无军事力量的切萨雷，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引入了意大利北部。后来切萨雷以罗马涅公国为基础，致力于加强教会军，开始依靠教会军的力量统一意大利。波吉亚没有第二次引入外国势力。也就是说，波吉亚父子已经开始制作抗体，不断从以毒攻毒的做法中蜕变出来。

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忘了制作抗体，他必须不断使用新毒。

1506年为了征服博洛尼亚他引入了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

1509年为了与威尼斯作战，他再次引入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德意志、西班牙、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进入“康布雷同盟”时代。

1511年为了与法国和费拉拉作战，他又引入了西班牙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和瑞士，进入了“神圣同盟”时代。

1512年他脑子里想着要与西班牙作战，引入了德意志势力。

只要看一眼敌国和盟国的名单，人们就会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政策感到惊讶：频繁换毒，支离破碎。昨天的盟友成了今天的敌人，昨天的敌人又成了今天的盟友。如果算上小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极富使命感的人会为世人所赞赏，但危险和错误往往会伴随这样的人。的确，从狭义上讲他们没有利己之心。但是，他们一心想着要为崇高的使命奉献一己之身，因而没有迷茫和迟疑，容易刚愎自用、头脑发热，并因此错观现实。所以，他们的方法虽然大胆，但做事不连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人如果出于利己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他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因而在行动过程中总是会疑这疑那，不会刚愎自用、头脑发热，不会误判现实。他们的做法也大胆无畏，但都能按统一的政策去做每一件事。他们以有效为先，自然是这样的结局。这时，成功与失败便为运气所定。波吉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命运不济，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暴卒，切萨雷同时得了重病。

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单是不得不与宿敌波吉亚采取同样做法这件事，就已使他十分恼火。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失败以后，就更是如此了。波吉亚没有去动威尼斯和费拉拉，他把这些意大利强国当作可用以对付外国势力之毒的抗体。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削弱了这些国家，现在想制作抗体，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作为基础。尤利乌斯二世的焦虑和绝望感每天都在使他的肉体不断衰弱。

基督圣诞节结束的那天，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前来看望卧病的教皇，给他打气道："陛下，您一定要长寿，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呢。"

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这番话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但尤利乌斯二世却气得浑身发抖，怒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的话，也会为我赶走西班牙人的！"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在忠诚的心腹之一、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面

前却更加坦率。第二天，教皇要起来。帕里德去扶他，听到尤利乌斯二世自言自语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我会从头开始重新来过……”

虽然格里马尼和格拉西两人在心情上有冷暖方面的差异，两人却有着同样的感慨。人的本性难移，即使上帝再给尤利乌斯二世10年时间，尤利乌斯二世也会重蹈前面9年的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虽然因为焦躁和绝望而备受煎熬，但却没有失去为罗马教会的荣耀和独立献身的自负。他依然坚信，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只有在教皇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教皇要让意大利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但是，在那些不拘泥于宗教观点的同时代人看来，这个想法不啻为痴心妄想。马基雅维利，甚至同情尤利乌斯二世的圭恰迪尼也都做出了否定的判断。

任何人都很难冷静地界定自己所属的，不，应该是以自己为首长的组织所能做到的边界。波吉亚教皇做到了。他懂得只有政教分离才是同时拯救罗马教会和意大利的道路。他因此才全面支持儿子切萨雷建立王国的野心。360年后的1870年，在萨伏依公爵、加富尔[21]、加里波第[22]三人面前，梵蒂冈第一次挂起了白旗，意大利完成了统一。[23]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意大利不可能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不管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如何相信罗马教皇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作用，说穿了，即便在当时，他的做法也只能是一个时代错误。

时间走到了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日复一日，几乎离不开病榻了。从全意大利请来当时最高明的八位医生也搞不清他的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筹莫展。所有人都认为教皇这次是挺不过去了。曾经强健的尤利乌

斯二世日见消瘦，这甚至在他身边始终守护的人看来都很明显。

只有教皇还在顽强求生。当他得知长生药没有效果后，又让人祈祷，又让人占卜。在此期间，他还在病房不断接见各国大使，宣布开春后要派军征服费拉拉，指示定期向瑞士支付佣兵薪酬。他眼睛塌陷，白色的胡须蓬生，但充满怒气的声音却一如既往，不见衰弱。与以前不同的是，那声音听上去很空虚，就连最卑微的佣人听到后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怕得发抖了。

进入2月以后，感恩节的喧嚣达到最高潮。15辆二轮马车模仿战车的队形，满载着市民通过尤利乌斯二世房间的窗下，市民们不断发出欢呼声：

“尤利乌斯！意大利的解放者！尤利乌斯！罗马教会的胜利者！”

没有人知道尤利乌斯二世听到他们的声音后的心情如何。第二天，教皇把帕里德·格拉西召进病房，用往常没有的和蔼语气对他说：“我的一生好像要接近终点了。我要感谢上帝没有像对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样赐我暴死。葬礼可以简单，但不要慢待我的遗体。米开朗琪罗造了墓，但如果遗体处理不好，那就太惨了。”

诚实正直的帕里德努力设法给教皇鼓劲。但尤利乌斯二世衰弱地摇摇头，只是重复了几遍先前说过的话。看上去，前教皇波吉亚死后来不及收尸，遗体腐烂的一幕萦回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月19日，帕里德因事务性工作来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用手指指枕边的玛尔瓦西亚酒瓶，让他一起喝一点这种原产于希腊的白葡萄酒。这让礼宾官感动不已。帕里德知道，枢机主教们已在为下届教皇选举开始活动。他给教皇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葡萄酒，泪水不禁扑簌簌地从他的面颊上滚落。尤利乌斯二世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始终忠于自己的帕里德。两个人已经不再说话，房间里沉默着，飘满了玛尔瓦西亚酒的醇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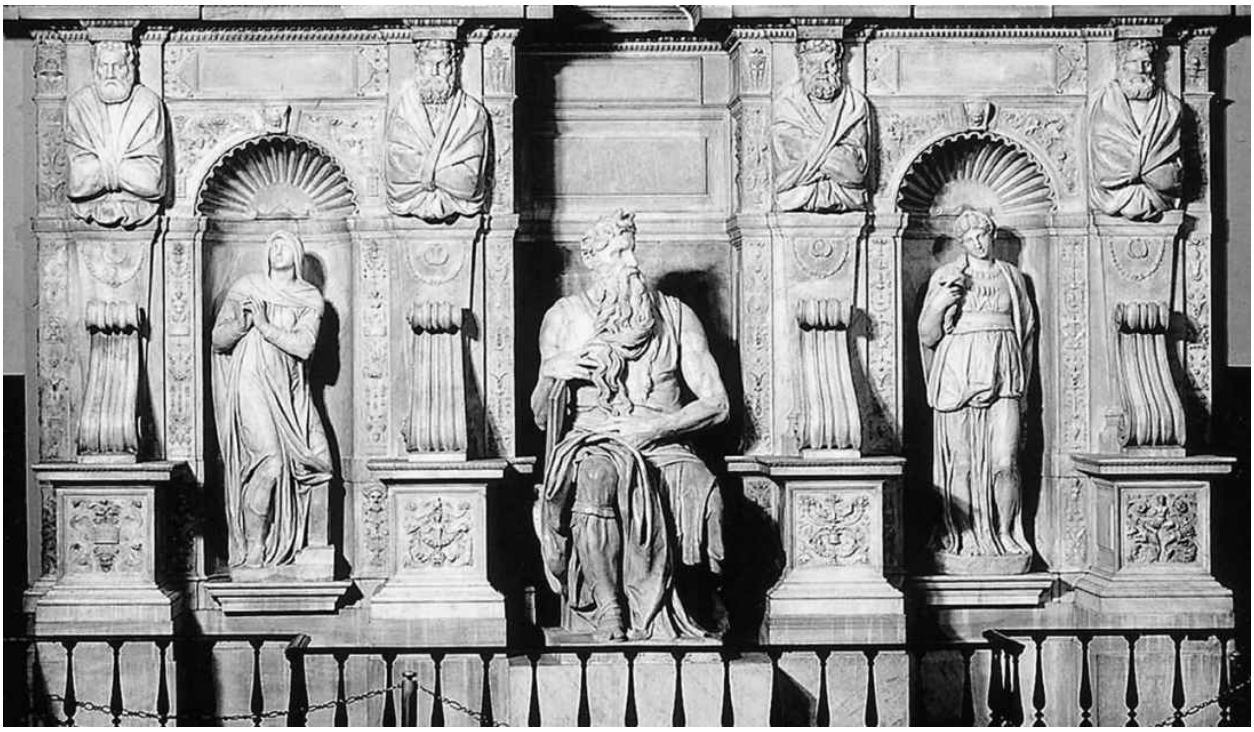


图15：尤利乌斯二世之墓（局部，中间是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摩西像）

第二天是2月20日，尤利乌斯二世让人写了最后一份教皇诏书，命令继续拉特拉诺公会议，并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工程。诏书完成之后，他接受了涂油礼。全体枢机主教被召集到病榻周围。尤利乌斯二世就像在公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样，用庄重的拉丁语对他们说，自己是没能治理好基督教世界的最大恶人，希望大家原谅他。他个人可以原谅反对自己的比萨公会议派的枢机主教们，但作为教会之长他不能原谅他们。他将衷心祈祷他们能有悔改之心，愿上帝饶恕他们。

接着，尤利乌斯二世改用意大利语说，希望授予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佩萨罗教皇代理地位。他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的语气。聆听此言的枢机主教们表情相同，但内心各有不同。有人洒下同情的泪水，但大部分人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说话。

第二天清晨，帕里德发现尤利乌斯二世已经躺在病榻上像睡着一样

去世了。

过了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于1516年去世。又过了3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去世。尤利乌斯二世在世时只有12岁的少年卡洛斯，就这样在短短6年之后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

1527年，罗马遭到了卡洛斯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德意志联军彻底的破坏和掠夺。这是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为悲惨的事件，被称为“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从此以后，除了仅剩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整个意大利归入了西班牙的实质性统治之下。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当时以充满苦涩的悲情，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政治做了这样的批评：

“致命的同盟，致命的武器。”

---

[1] 野蛮人（Barbari），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原注

[2]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本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

[3]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4] 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乔凡尼·巴蒂斯塔·奇博（Giovanni Battisita Cibo）。

[5] 乌尔比诺的前任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6]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他学识渊博，开创了华丽典雅的叙事诗文学。著有被称为拉丁诗典范的《埃涅阿斯记》，以及《牧歌集》《农事诗集》等。

[7]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他在天主教会内批判其制度，但与宗教改革派保持一定距离，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驱。著有《愚人

颂》等。

[8] 丢勒（Albercht Dürer，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试图将后期哥特式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结合起来，在风景、静物、人物、宗教画中体现了极强的写实力和思想性。作品有油画《四圣图》《自画像》和版画《启示录》等。

[9] 威尼斯的国徽是圣马可的狮子。——原注

[10]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了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国家权力。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11] 多纳多·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建筑家，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提升到最高水平。

[12] 卡拉多索（Caradosso，本名Cristoforo di giovanni Matteo Foppa，1445——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金匠、雕刻师，曾为米兰公爵、匈牙利国王和罗马教廷服务。

[13] 帕里德·格拉西（Paride de’Grassi/Paris de grassis，1470——1528），1504年起任罗马教廷礼宾官，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服务，负责教廷礼仪及起草条约文件方面的工作。1513年起任佩萨罗主教。格拉西日记记录了两任教皇有关日常宗教仪式、来访者、教廷事件等方面的事项，具有史料价值。

[14] 19世纪前塔尔奎尼亚的旧称。

[15]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16] 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1475——1521）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89年14岁时成为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利奥十世（Pope Leo X，1513——1521年在位）。

[17]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他是在“帕齐的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18]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供职于费拉拉宫廷，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多次出使罗马和其他城邦。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是其代表作，诗中将富于神话色彩的骑士冒险故事与现实生活事件编织在一起，使叙事与抒情、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严肃与诙谐融为一体，对欧洲的叙事长诗有深远影响。另外，他还作有《讽刺诗》及5部喜剧等作品。

[19] 正义旗手（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1293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法令》规定的共和国行政长官的名称。正义旗手任期为一年，1502年政体改革后改为终身制。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改回一年任期制，1532年被废止。

[20] 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1450——1522），1502——1512年执政。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医药家族。1502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他执政温和，对外倚重于法国。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势力帮助下复辟，他被流放国外，直到教皇利奥十世上台才被允许回到罗马。他在罗马直到去世。他的二弟是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他的大弟保罗·索德里尼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主要人物。

[21]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22]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23] 1870年9月10日，意大利王国对教皇国宣战，9月20日，王国军队攻入罗马，教皇国灭亡，教皇避居梵蒂冈。1929年教皇与意大利签订条约，梵蒂冈成为主权国家。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模拟可以在圆形剧场里上演的古罗马式表演剧

图16：利奥十世（拉斐尔画）

在后台

“嘘——您的声音太大了，朱利亚诺先生！请安静，请安静！”

“你说什么！没想到你会像个滑稽小丑一样挡住我的去路。是不是教廷不再用瑞士卫兵，而改用滑稽小丑啦？”

“果真像您所说的话，梵蒂冈就会笑声不绝，我们也该涨津贴了。高兴起来，我会一次吃下40个鸡蛋给你看。可是很遗憾，事情不是那样的，可怜的马里亚诺还要不情愿地在这里站岗。跟您这位辉煌新教皇陛下的弟弟比起来，我就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贱民，岂敢挡住您的去路！陛下正在与格拉西礼宾官阁下商讨重要事项，吩咐我们不要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我来也是有要事相商的。你去通报，就说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从佛罗伦萨来到此地。”

“这很为难，美第奇先生。啊，格拉西阁下，您来得正好……”

“外面闹得厉害，陛下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呀，这不是朱利亚诺先生吗？”

“长官，如果您说，而不是这个滑稽小丑说，里面正在商议重要事项的话，我就等着。你也被召来了？那八成是给法国国王或是西班牙国王写诏书的事了。”

“不，不是这些政治事务……”

“那么，是宗教会议？”

“不，跟会议也没关系。是宗教方面的事务……”

“教皇的工作，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重要事情了。请放我进去吧。”

“哦，是朱利亚诺啊！你又瘦了，不注意身体可不行啊。朱利亚诺，你真没用。进来吧，把门锁上。”

“教皇陛下，您是第一位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到现在还在因为喜悦而沸腾。他们对美第奇家族的感情似乎也更好一些了。以前那些暴政者、僭主的背后坏话现在也都烟消云散了。为了不失时机，我特来请示陛下……”

“兄弟啊，人们都知道，我们兄弟三人中你最诚实。这就足够了。在当今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我们不能太露面。就你现在的身体，往返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也够呛。你留在佛罗伦萨，专心考虑如何确立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我在罗马要做的事情都快堆成山了。”

“明白了。摊在桌子上的是什么图呀？”

“哦，是这个吗？这是4月11日举行巡游的规划图。从圣彼得大教堂出发，去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拜祭后再回来。刚才正做着新教皇例行拜祭巡游的规划呢。”

“陛下，这些事是礼宾官格拉西的职责，应该交给他去做。不让见您的重要事项就是这事吗？”

“朱利亚诺，这不值得你那么生气。我们美第奇家的孩子都是在父亲的身边、在艺术家的包围中长大的，爱美是我们所受的教育。父亲自己也写诗。作为他的儿子，我也想自己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教皇利奥十世的巡游就是教皇出钱、写剧本、导演并主演的利奥十世的艺术作

品。”

“哥啊，不，教皇陛下，社会不会允许那样做。现在，对罗马教会的评价落到了地，教廷发生的一切、教皇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百倍后传到阿尔卑斯山北边去。请注意自己的行为啊。”

“感谢你的忠告。不过我有我的考虑。现在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反罗马教会的动向。

“但是，朱利亚诺，我不是像波吉亚那样靠收买，也不是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靠骗人当选教皇的。选举是干干净净的。我没有用一个弗罗林。有枢机主教反对我，说我37岁太年轻。秘书比比埃纳就去跟他们说，虽然我年轻，但却有不治之症，活不久的。这种活动不礼貌但却很有效，说服了他们。

“不过，期盼和平的气氛主导着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已厌战，人人都想和平。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治世就像接连不断的暴风雨。我不喜欢争斗，这就是我如此容易地当选的原因。我想让人人都享受和平。我自己快乐，同时也要让他们快乐。”

“那倒是啊！您的病怎么样啦？”

“现在维持得还不错。教皇选举会议的时候可真是难受啊。我来罗马是被人用轿子抬来的，会议期间还不得不做了外科手术。这老毛病真让人郁闷啊，厉害的时候连坐着都很痛苦，而且还会向周围散发出恶臭味。比比埃纳到处说我来日无多，在当时的状态下谁都会相信的。

“可是，当选教皇以来却身体情况极好，真是讽刺啊。3月19日的登基仪式也没延误，第二天是棕枝主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还赤脚上街，为贫民洗脚，亲吻他们的脚，做了符合基督代理人身份的礼仪之事。”

“在佛罗伦萨，人们对那件事评价很高。大家都很感动，纷纷表示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首长教皇亲自这样做过。”

“是吗？我当时也很开心呢。”

“陛下，为什么不把如此高雅的行动做下去呢。这可比带着豪华的巡游队伍满大街走更能抓住民心啊。”

“你不懂人心。如果光这样做，罗马就会成为修道院。人们会感动一时，但很快就会厌倦。光这样做，我自己也难得其乐呀。

“罗马就是一个剧场，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什么戏都可以上演的剧场。这里没有观众，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外国人和旅行者开始会自以为是观众，但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当成戏中人物。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剧场。

“小弟啊，既然是上帝的赐予，那就好好享受我的统治吧。这剧不知道是悲还是喜，反正都一样。我想笑着结束这一切。”

“陛下，我无话可答。请允许我退下。”

“朱利亚诺，你要注意身体啊。现在，哥哥皮耶罗已经去世，复兴美第奇家族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

“最后，我有一个请求，请让我把马里亚诺带走吧，教皇身边放一个小丑，外面传闻不好听。”

“很遗憾，这事不能听你的，演戏少不了小丑。”

“那么，陛下，我已经没有更多的事了，告辞了。”

“真没想到会冒出这么一场戏。格拉西，快点继续。说到哪儿啦？”

“说到沿途警卫的事了。”

“对、对。格拉西，我还是反对你的意见。沿途布置武装卫兵，是在张扬武力，不行的。”

“但是陛下，万一……”

“不会。不要布置警卫。我想当天发布一个禁止携带武器令就足够啦。”

“陛下还是骑马……”

“那当然。就跟一年前在拉文纳会战中当俘虏时一样吧。尽管你说教皇应该乘坐轿辇，但还得让大家看到我的年轻。而且，那匹马是妇女骑用的，不太烈，正适合我。”

“教皇陛下，我马里亚诺走在哪里啊？”

“你啊，你好歹也是个修士。是啊，俗界的队伍后面跟着的是神职界的队伍，第一排是抬银十字架的人群。你就加入那群人吧。”

“陛下，五大旗手的顺序如何安排？”

“格拉西，还是把罗马市放在第一个吧。接着是条顿骑士团[1]、圣约翰骑士团，把教会军总司令的两个旗手放在最后。乐队的制服已经做好了吧。”

“真不愧是拉斐尔！制服已经完成，红白绿相间，胸前缀有美第奇家族的家徽，鲜艳无比。瑞士佣兵队的制服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红黄蓝相间。色彩上可以争奇斗艳。”

“值得期待！这只有在罗马才得一见。”

“这次的华丽巡游一定会史无前例。民间也开始在陛下经过的沿途建造多处凯旋门。听说银行家齐吉将建造一个更加豪华的凯旋门，陛下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也要献上凯旋门呢。”

第一场 基督教祭祀队列

1513年4月11日。清晨的罗马温暖宜人，晴空万里，熏风微拂，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这是罗马的春天，是丰稔的艳阳天。被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面认真而阴沉的人斥之为“恶魔老巢罗马的异教徒祭奠”就要在这一天热烈上演了。

街面任由市民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去装饰。有钱人在自家门口的道路上建造起了豪华的凯旋门。不那么有钱的人今天取下挂在墙上的装饰布，抖掉灰尘，熨平皱褶，从窗户垂下，把粗糙的石墙装点一新。连装饰布也没有的人，便把月桂树叶编起来装饰窗框，还有人把像是从古罗马遗迹盗掘来的壶和破损的雕刻摆放在自家门前。一分钱都没有的人也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打扮起来，在夹道的人群中做一个群众角色，跃跃欲试。

圣彼得广场上，巡游队伍已经准备完毕，按游行的顺序站好待命。队伍一字排开太长，便像花蛇一样盘旋起来，挤满了整个广场。队伍并不整齐。有人让伙伴为自己整理甲胄，有人在叱责马夫，还有马在嘶鸣，一片嘈杂。巡游的负责人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在这片嘈杂中四处跑动，找到每个方阵的领头人，告诉他们行进距离等事项，落实最后指令。只有马里亚诺，今天一脸奇特的表情，两手抓着银质大十字架的一角。利奥十世在花蛇盘的中央，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教皇一等礼服的

目的是保暖，他现在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燥热。

上午第11点（清晨6点左右），背后的圣彼得大教堂敲响了钟声，全市教堂的钟声跟着响起。游行队伍出发了。贾尼科洛山传来了礼炮的轰鸣。

游行开始。200名来自希腊和阿美尼亚的精锐步兵开道。他们个个皮肤微黑，表情僵硬，面无笑容。他们手持亮闪闪的长矛，排成四列纵队肃然行进。下面走过来的是在教廷和枢机主教手下当差的低级公务人员组成的方阵。他们穿着表示自己职业的服装，排成四列纵队。公证人穿着黑色长袍，长长的黑色三角帽垂到左肩，他们绷着脸以显示威严。佣人们身穿主人发给的华丽的应景服装，色彩斑斓。他们在沿途人群中发现美女，便会媚笑着盯着她们。花匠们则像挺着长矛一样挺着巨大的剪刀行进。厨师也不能少。他们戴着雪白的大围裙，腆着硕大的肚子蹒跚前行。看着他们的样子，群众中发出一片笑声。

乐队走过来了。全员身着白红绿三色制服，这是教皇色，后来成为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在胸前白色的地方，绣着六个红色圆球，那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乐队大概有上百人。长笛、号、大小鼓演奏着节奏欢快的曲子，拨动人心，活跃气氛。

游行队伍走出圣彼得广场，渐渐远离钟声不断鸣响的圣彼得大教堂。队伍来到大教堂背后，跨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方的大桥。桥下是被歌颂为黄金的台伯河，河水缓缓流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过得桥去，队伍走进了第一座凯旋门。这座豪华的凯旋门是锡耶纳的僭主佩特里奇家族敬献的，由专程从锡耶纳调来的华丽织锦拼成。门的正面挂着绢丝带，上面写着“献给和平使者利奥十世”。

队伍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人刚刚通过凯旋门，全市所有事先被关闭的喷泉便一齐喷出了红葡萄酒。那是教皇赠送给全体市民的礼物。女人们立即拿出大坛子，一个劲儿地去接酒。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摆出一副大

人面孔，拿着木杯左跑右挤，帮着母亲。男人们不用像女人那样去操心明天，满足于把葡萄酒灌进胃里，弄得满脸酒水。还有人大概是已经喝多了，把廉价杯子放在一边，坐在喷泉旁边，沐浴着溅起的葡萄酒飞沫。沿街群众一动不动，盛满了葡萄酒的坛子在他们头上一个接着一个地传递着。每次酒洒出来弄湿了衣裳，年轻的女人便会抱怨。这时，旁边就会有人把她的屁股拍得啪啪响。女人发出哀叫，人们发出哄笑，一片嘈杂。

队伍走过圣安杰洛桥，进入狭窄的路，向纳沃纳广场进发。12人的马队走了过来，离着乐队十来米远。这是教廷的飞毛腿信使队伍，他们身着红色上衣和黑色的紧身裤，排着两列纵队，人人手中高举白黄相间的教廷旗，旗帜迎风飘扬。信使队伍的后面是以罗马教区旗帜为先导的13人旗手队伍。他们全部身穿白色服装，两列纵队策马行进，手里举着佛罗伦萨、那波利、威尼斯、米兰等大主教教区的旗帜。罗马大学的旗帜跟在他们的后面。这面旗帜在红底上印着黑色的小天使图案，罗马大学的学生代表骑在马上将旗帜高高擎起。这应该是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只见他头戴白色学生帽，帽子的前端像鸟喙一般尖尖突出。他身上的白色披风盖住了马背。不知是谁向他掷去了鲜花，掷花人一定是位年轻姑娘。

五大旗手隔着一段距离走了过来。他们全副武装，铠甲护身。不愧是大旗手，他们手举的巨大旗帜迎风飘扬，人们从路两边三楼的窗户都能用手摸到。这些旗手骑着漂亮的阿拉伯马走了过来。最前面的是罗马市的代表。他举着古罗马帝国的军旗，深红底上用金丝绣着老鹰和金字S.P.Q.R.（罗马元老院及市民之意的拉丁语缩写）。旗手是罗马名门望族切萨里尼家族年轻的当家人。他模仿古罗马将军，身穿铠甲，外披深红色披风，披风盖住了胯下马匹的肚子。第二位旗手是条顿骑士团团长，他手举白底黑十字的大军旗。第三位走过来的旗手是圣约翰骑士团团长（他们的根据地曾在罗德岛，被称为罗德岛骑士团，后来迁至马耳他岛，遂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他手里举的是深红底的白十字旗帜。

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朱利奥·德·美第奇[2]（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是这个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只见他左手拽着马缰绳，用铠甲的右腹部位顶起这面大军旗。在他那黑色铠甲的胸部，佩有一枚罗德岛骑士团独有的十字图案，颜色白得抢眼。最后是教会军总司令的军旗，这面白底大旗上印着教廷纹章，中央是一把圣彼得大教堂钥匙的图案。后面走过来的是罗马教会旗手，他们手举军旗，威风凛凛，淹没在一片金色海洋之中。面对这一切，人们只有傻看的份。

五大旗手走过去以后，队伍的队形突然改变。教廷马厩饲养的教皇御用马队登场了，共有9匹马和3头骡子。这些马匹毛色纯白，穿着红底绣金的马衣，一旁跑着身穿清一色红衣的可爱的马夫。今天充任马夫一角的都是罗马贵族子弟。马队过后走过来的是两位身穿同样红色服装的少年，他们手里捧着镶满宝石的白缎带，另有两位少年手捧着三重冠，上面的宝石光芒闪烁。这些都是罗马教会的宝物，宣示着教皇的地位。这两件宝物牢牢吸引了沿街群众的目光。人们感叹着，低声议论着：真了不起啊。教廷的112位高级官员的队伍跟在少年和马队的后面。他们披着红色披风，披风四周用带有黑色斑点的白色貂皮镶着边。他们排成两列，表情威严。他们后面又是一队乐队。乐手们穿着拉斐尔设计的鲜艳制服，热闹的音乐让群众开始沉静下来的心情再次激昂起来。

游行队伍在纳沃纳广场的入口通过了凯旋门，绕着这个古罗马竞技场遗迹走了3/4圈，经过名为玛德玛宫的美第奇宫殿（现为上议院）前，走进了拉达大街（现为科尔索大街）。群众再度被乐队振奋起来。接着，他们的视觉又淹没在了华丽色彩的洪水中，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贵族们骑马上场了。教廷脚下的罗马和利奥十世出生地佛罗伦萨的名门佼佼者全体出动，总人数达到了二百多人。罗马一方有科隆纳、奥尔西尼、萨韦利、孔蒂、桑塔克罗切、加埃塔尼、切萨里尼。佛罗伦萨一方有美第奇、萨尔维亚蒂、索德里尼、托尔那博尼、斯特罗齐、普奇。所

有家族都由家长领队，男人们排成四列纵队行进。他们在帽子上高高地装饰着五彩缤纷的羽毛，身着各式各样的华丽服装，与服装搭配着颜色的披风从肩上披下，被风吹得鼓胀起来飘在身后。那感觉，简直就像色彩缤纷的丝带配在一起，把珠宝箱打翻在上面。

接着登场的华美队伍比起前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各国驻罗马大使的队伍。举着自己国家国旗的旗手走在每位大使前面。他们代表着各个王国和共和国，庄重严肃，与其说华丽，不如说壮丽。首先走过来的是教廷国内各城市的大使。博洛尼亚、奥尔维耶托、斯波莱托，国虽小却打着漂亮的旗帜。接着，大国的队伍走了过来，大使们骑在马上，身后跟着几个随从。佛罗伦萨共和国白底红百合国旗走过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海上霸主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这面在红底上用金丝绣着圣马可狮子的国旗，在蓝天中迎风飘扬。接着，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大使走了过来。最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高举着威严老鹰图案的国旗骑马走来。拥挤在街边的群众首先为眼前彪悍的马匹感到惊讶，接着更是被马上大使漂亮的着正装的身姿所惊倒。最后，他们仰望巨大的国旗，发出了阵阵惊叹声。

俗界队伍由两位年轻的君主骑马殿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由于给伯父、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服丧，穿着一身黑色天鹅绒衣服。教皇侄子、20岁的洛伦佐·德·美第奇跟在他的后面，他代替病弱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参加游行。只见他紧紧拽着正在嘶鸣的骏马的缰绳，憋得满脸通红。

游行队伍刚刚走进拉达大街，就见到一座壮观的凯旋门。那是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敬献的，八根纯白柱子并列，其间安放着希腊和罗马诸神的雕像。这一带正好地处他的宅邸（现首相官邸）前方。凯旋门的正面写着大字：“维纳斯统治过，战神统治过，现在到了雅典娜的时代！”所谓维纳斯的统治，是指以绯闻而闻名的教皇波吉亚——亚历山

大六世的治世，战神的统治指御驾亲征的前教皇罗韦雷——尤利乌斯二世。雅典娜自然是指新教皇美第奇——利奥十世，他背负着依靠智慧带来和平时代的期待。但是，在紧跟着出现的第二座凯旋门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战神时代已经结束，雅典娜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与维纳斯永远同在。”

凯旋门多达15座。其中仅有佛罗伦萨敬献的一座不带任何异教色彩。门上安放着十二使徒像，饰有描绘基督一生的绘画，正面在美第奇家族家徽下面写着这样的文字：“献给天降使节教皇利奥十世赞颂您伟大名字的全体市民敬赠”。

从拉达大街到远远望得见的斗兽场，一路上古罗马遗迹散布左右。人们在这条路的两边搭起了三层看台。能坐在上面观礼的人即使是罗马市民，也都多少有点钱，其他还有外国人。不过，看台有很多断开的地方，那是为举家出动的老百姓开放的。

俗界的游行队伍走过去以后，轮到了神职界。首先，银质大十字架静静地出场。抬的人要么是修道院的守门僧，要么是圣具室的管理僧，都是最下级的僧人。他们三人一组轮流替换。接着走过来的是驮着弥撒祭坛的白马。8个少年僧在上面撑着洁白的华盖。沿街有人赶紧在胸前画着十字。下面走过来的是清一色黑色队伍，与前面走过去的白色形成对比。他们共有24人，个个遮住面孔，只留出双眼，黑色僧衣拖到脚下裹住了全身。他们排成三人纵队，手举大蜡烛前行。在明亮的阳光下，实在映不出蜡烛的火光。但默默的黑色方阵足以营造出异样的气氛。这些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救济会会员。救济会为死后无钱举行葬礼的贫民免费承办葬礼。

他们的后面是神学校学生，人数超过百人。学生们身着黑、红、白、蓝各色制服，个个脸上透着青春气息。群众的心情也便归于平静。

跟在后面的是250人的大方阵，一眼望去便能看到罗马教会的各个位阶。首先是修道士，接着是祭司、主教，后面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阿戈斯蒂诺派等各个会派的领袖，再后面是威尼斯、亚历山大城派来的总主教，最后是大主教。大家分别穿着表示自己位阶和会派的僧衣，主教及以上地位的人骑在马上，头戴高达30厘米的白绢制成的主教帽。总主教和大主教身穿豪华的金丝镶边深红色披风，带着两个随从行进。

人们以为队伍就要结束的时候，被称为教会君主的枢机主教们走了过来。枢机主教共有24人，在天主教会里都是高级神职人员，地位仅次于教皇。他们个个身披红色大披风，头戴金丝刺绣的白色绸缎主教帽，按照年龄排序，二人并排骑马前行，每人带有8个侍从。佩特里奇、萨乌里、阿拉贡、科尔内罗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枢机主教是利奥十世当选的原动力，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是他们的头目。一个月前在教皇选举中败下阵来的长老里阿里奥走在今天枢机主教队伍的最后。

接着，神职人员的队伍中骑马过来了一位俗界人士。他就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沿街的群众都认识他。他是君主，也是大炮技术专家，在拉文纳战役中打败了教会军，受到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位费拉拉公爵还是著名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丈夫。新教皇解除了对他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今天也前来参加游行。这位君王以不屈服于历代教皇而闻名，但不知何故，却在教廷脚下的罗马民众中颇有人气。他身披金丝织花锦缎披风在群众面前走过。群众对这位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沉稳的意大利第一君主报以热烈的掌声。瑞士佣兵队紧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过来。他们身着米开朗琪罗设计的鲜艳的黄蓝红三色制服，铠甲闪着银光。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组织了这班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让他们充当教廷卫士。这些人足以使罗马人感受到异国情调。他们右手持枪，枪缨丝毫不乱，步伐整齐，显出一派北国人的规矩。

队伍走完了片刻。瑞士卫兵队走了过去，人们知道教皇就要过来。他们期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道路的那头出现了金丝装饰的白色绸缎华盖。今天的主角出场了。华盖由8位罗马市民撑起，教皇利奥十世骑在优雅的土耳其白马上，身穿白缎礼服，披着金丝绣花织锦大披风。沿街群众一齐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和平！和平！”（Pace！Pace！）有人起了音，立刻成为全体大合唱。有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在鼓掌，人都快要掉下来。坐在看台上的外国人也都纷纷起立，拼命鼓掌。

利奥十世充血的脸在沉重的三重冠下涨得通红，他那肥大的脸庞上大汗淋漓。然而教皇两眼发光，笑着享受着这一切。他左手拉着缰绳骑马慢行，向路两边的群众挥动右手，送去教皇的祝福。群众把白色、红色的花瓣和绿色的月桂树叶雨点般向他洒去。转眼间华盖顶上积满了花瓣和树叶，中间因此受压凹了进去。随从们早已有所准备，有人事先就带着长杆。他们不时地从下面捅捅华盖。于是，积压的花瓣和树叶从华盖的前后左右洒落而下，教皇一下被这美丽的花帘掩住。

道路被挤出的群众占据变窄。有个女人拼命鼓掌，靠近得手都快要碰到教皇的马了。还有人冲着走过来的教皇高举起斟满葡萄酒的杯子，张开大嘴一饮而尽。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利奥十世越发高兴，骑在马上，挤开这些民众继续前行。

教皇身后有两个随从手拿银质大壶，一边走一边大把抓出银币抛向沿街的群众。鼓掌声立即消失在了兴奋的欢呼声中。男人们高举双手，试图用手掌接住银币。女人兜起围裙，期盼银币落进。孩子们巧妙地钻进大人的腿脚之间，迅速捡起落在地上的银币，紧紧攥在手里。随从抛得快活，到斗兽场附近时，偌大的壶中满满的银币都见了底。一个近侍跑回教廷，抱着一个装满了银币的口袋赶回来补充。

长长的游行队伍走到了最后，400名教廷近卫骑兵队走在最后。这些重装骑兵全身披挂，排成四列纵队，扬尘而来。他们走过去后，沿街的群众好一会儿没动窝。他们自己也像是累到了极点，耳畔响着远处传来的欢迎教皇的欢呼声。

利奥十世的游行队伍在罗马大街上一次次掀起欢呼和鼓掌的声浪，到达目的地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教皇最后才到达，弥撒在等着他主持，他无暇擦去汗水。利奥十世一改刚才的笑脸，脸上显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顺利完成了庄严的弥撒，就像生来就是教皇一样自然。

向上帝的祈祷结束后，接着是感谢上帝的餐食。在因美丽而闻名的拉特拉诺教堂的回廊和中庭里，满桌的酒菜在等着客人享用。教皇带领众人走了进来。大家见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罗马各地区的代表也受到了参加游行的全体人员的招待。然而，他们旺盛的食欲敌不过源源不断端上来的菜盘数量。有很多菜几乎没有人动过，在桌面上走过场就被撤下，直接递给了事先被叫来等在后门的罗马贫民区的代表。今天，罗马的穷人一定会一边喝着教皇御用的葡萄酒，撕食平常见不到的烤全鸡，一边为宽仁为怀的教皇干杯。

午后的几个小时，罗马变得一片静寂。这是午睡的时间。老罗马人把这吃饱喝足后的午睡随性地解释为上帝的恩赐，必须好好享受，就是头上响起大炮也不会起来。利奥十世虽是佛罗伦萨人，却在24年的枢机主教生活中染上了满身的罗马习气，自然少不了午睡。那天的午后，整个罗马睡着了。

一直到下午5点多，游行队伍才动起来，踏上归途。与来时顺序一样，绕斗兽场半圈，一路来到威尼斯广场，从这里开始没有按原路走拉达大街，而是向左拐去，穿过鲜花广场，取道跨过台伯河。教皇想让更

多的人看到游行队伍，队伍根据这一愿望选择了这条路线。

游行队伍一路行进，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来的时候。队伍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凯旋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悬着地毯和挂毯，家里的雕像尽其所有摆放在门口，圣母马利亚像的旁边放着美神维纳斯。无论是游行的人，还是观看的人，对这种基督教和异教的混合没有感到丝毫的奇怪，也没有感到愤怒。相反，面对这些欢欣鼓舞的民众，他们甚至为异教和基督教的这种奇妙和谐而感动。

当游行队伍终于在花雨、欢呼和掌声中来到鲜花广场时，春日的太阳已经落下。此时，安装在全市建筑物墙上的火把一齐点燃，火星在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中猛烈飞溅。鲜花广场周围云集着高级饭店和枢机主教们的宅邸，此时此地成了火的背景。因夜幕降临而略显轻松的教皇在火光之中，一边继续把祝福和微笑送给群众，一边向梵蒂冈行进。在过台伯河时，犹太人地区的代表等着教皇，要感谢他承认犹太人的宗教并允许他们居住在罗马。利奥十世兴致很高地接受了这些“基督徒的敌人”的致意。

游行队伍回到出发地圣彼得广场后就地解散。祭祀日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但教皇还想看看罗马，说当晚要住在景观好于教皇宫的圣安杰洛城堡。

罗马已化作一片灯海，从这里的阳台上可以一览无余。教皇利奥十世扭过头来对身边的费拉拉公爵说：“看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后，我完全明白了当教皇有多么愉快！既然是僧人，自然谁都想当教皇。”

巧妙使用灯火是古罗马以来的意大利传统。客人们先前担心教皇会让大家半夜起来，享受出色的火的艺术。但现在已没有必要担心了。利奥十世欣赏了一会儿浮在灯火海洋上的罗马，然后一边说看到灯火一处

处地熄灭未免寂寞，一边离开了阳台。他向紧急为他布置的枢机主教佩特里奇的房间走去，一边看着跪在两旁人们的脸说："好吧，诸位，今天的节目还满意吧？"

第二场 政治与外交——来自外国记者

威尼斯共和国驻罗马大使马里诺·佐尔济的报告

1513年11月23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诸位元老院议员：

教皇即位即将一周年了。探知这位教皇的心思，对我们这些驻教廷大使而言，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工作。刚开始时，我感到他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的又是享乐惯了的美第奇子弟，颇有些小瞧他。可是后来我却不得不承认，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他。平时，他跟谁都能直率而亲切地交谈，不过一旦触及政治核心的话题，他便会不动声色地巧妙岔开话题。当然，有时他也会坦陈意见，我们也不能总是打探内幕。他那被尊称为"豪华者"的父亲洛伦佐·德·美第奇生前曾说过："我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狂人，一个是贤人，第三个是老实人。"他分别道出了三个十来岁人的性格特征，说得非常妙。

那么，能否从教皇的心腹探知他的心思呢？我曾经试过，但不能指望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是公认的教皇第一心腹，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比教皇年长5岁，是教皇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他对教皇忠心耿耿，并在选举教皇时有功，被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然而，尽管教皇喜欢他的文学才华和优雅的社交手腕，但却似乎很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知道他作为枢机主教的才干如何。教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明说政治思想值得怀疑。这样的看

法较为稳妥。

下面谈谈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众所周知，他体弱多病，而且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实人，一个与政治野心无缘的人。我们再谈谈洛伦佐。他是已故皮耶罗的长子、教皇的侄子。皮耶罗被自己的父亲评价为狂人。洛伦佐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人，有足够的政治野心，却没有实现野心的才干。首先，他完全不具备军事能力。这样，就算教皇利奥十世发扬教廷传统，任人唯亲来支持这两位，我们也难料教皇力量所能施展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教皇大概也会力所不逮。总之，我们似乎并不需要担心出现第二个切萨雷·波吉亚。（这两位美第奇家族的平凡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位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墓”。）

最后，还有一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教皇的堂兄弟，新任命的枢机主教。他现在正在帮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两个人，专心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内政，更多的时间不在罗马，在教皇的政治方面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响。不过他在国际政治方面如何作为还是未知数。教皇心腹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大概就是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去猜测教皇的心思。眼下他努力把和平教皇的印象推到表面。他不仅宽恕了比萨公会议派那两位被尤利乌斯二世开除教籍的枢机主教，解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又对同样被开除教籍的费拉拉公爵做了无条件的宽大处理。

关于教皇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当下他公布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中立政策。在会见我们的时候，教皇经常说，无论如何必须避免战争，这就是新教皇政策的基本面。前两天他还说：“我是个懒人，尽量待着不愿意动。我要享受和平治世。”

教皇甚至对德意志皇帝的大使开玩笑说：“这次的教皇应该取名安杰洛（Angelo，天使），而不是利奥（Leone，狮子）。”

不过，尽管我认为教皇的话肯定表达了他的内心所想，但在我

看来，他不是不动，而是不能动，这一点他自己十分理解，所以才会有前面的说话口气。西班牙势力死死压制着南方，法国国王也不知何时又会对北方的米兰生出夺回失地之心。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即使他不是教皇，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不幸的是他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来吞下由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种下的苦果。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1月6日

今天是主显节[3]，很热闹。早晨收到了元老院的信函。赶紧按照指示，假装若无其事地申请觐见教皇。我想这大概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大使的注意，会见时没有其他人在场。

教皇看了我提交的信函，似乎非常惊讶，说："贵国情报之准确已有定评，不由得我不信。"

尽管他有所预料，但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如此执着于再次征服米兰，还是颇感意外。为此，他想拉拢西班牙国王。教皇说，让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两个外甥中的一个与法兰西公主蕾娜塔结婚，用米兰和热那亚当嫁妆。条件是法国国王早就要求的西班牙国王放弃那波利。但西班牙国王根本没有那样的想法。费迪南多是个老狐狸，他也许会承诺放弃那波利，让外甥同法兰西公主结婚，同时得到米兰和那波利。这就是问题，我也有同感。

今天的会谈到此结束。我推测，教皇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历代教皇的政策，不会让意大利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同时得到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即米兰和那波利。这个决心是确定的。一旦陷入那种状态，罗马就会孤立。而不但对罗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那都将是致命的。波吉亚教皇为把这两个国家送给切萨雷而斗，尤利乌斯二世为了把这两个国家归入教会领土而战。他们都失败了。教皇美第奇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不能让这两个国家

的王冠在同一个人头上闪耀。教皇应对法国国王的下一步行动，需要我们今后予以进一步关注。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3月10日

今天，我被教皇邀去玩牌。一起去的有科尔内罗、阿拉贡、萨乌里三位枢机主教。我没有一起玩，只是被邀请去参加这种内部的游戏。我判断是教皇想要得到我们的情报，便瞅了个机会，把你们知会我的事情向教皇咬了耳朵。西班牙国王不会真的接受放弃那波利的条件来成就这段姻缘。这好像使教皇很高兴。但是，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担心，如果教皇放下心来，便越发不再行动了。我害怕这个担心就此变成现实。我认为，对我们共和国而言，不是要我们自己行动，而是要让教皇行动，这才是上策。所以，教皇迟迟不做决策让我很担心。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曾经半开玩笑地管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叫谨慎者，但愿那不是优柔寡断的意思。

于罗马

马里诺·佐尔济

1514年3月21日

今天傍晚了解到，教皇决定把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派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去当特派大使。我的看法是这样：尽管西班牙和法国国王暂时搁置了那桩婚姻，但却签订了未来一年的停战协议。面对这个事实，就连那位“谨慎者”也终于坐不住了。不过，派遣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的正式理由只是改善自前教皇以来一直不好的法兰西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枢机主教此行肩负什么具体使命，我却未能打探出来。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4月2日

教皇决心离间法国和西班牙，连日来我越来越强烈地确信这一点。至于教皇究竟对西班牙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我们只能确认教皇与西班牙大使会晤频繁，细节完全不详。对法国国王而言，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是国王多年来悬而未决之事，教皇一定会把居间调停作为条件。我们探查的结果是，已经得到确证，教皇已向法国国王提出了让国王路易十二与英国国王的妹妹玛丽·都铎结婚一事。据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已经明白此事。

马里诺·佐尔济
于罗马

1514年9月16日

9月1日开始与教皇在罗马北边原野同行狩猎。在这里，收到了罗马转送过来的消息，说年轻的英国公主与年迈的法国国王已顺利举行了婚礼。教皇心情非常好，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桩婚事还是因为连日来猎获颇丰，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狩猎是教皇热衷的事情之一，我们外交官向教皇申请会谈甚至要看当天狩猎的成绩。老百姓都知道这一点，在他所到之处大加欢迎。每次狩猎，教皇总要穿上老百姓风格的猎装，套上长靴，骑马出行。随行的枢机主教们也没有一个穿教服。教廷这样移动着，我们这帮来自各国的大使，即使不爱好狩猎也不能不同行。

可是，教皇长得很丑，穿上猎装越发没了光彩。他的头很大，脖子粗短，两条细瘦得不成比例的腿支撑着肥硕的上半身。他有着很大的脸庞，浮肿泛红，两眼极度近视，溜圆暴出，不得不频繁使

用眼镜。他如果不穿白色的教皇服，就同那些遍地都是的低级僧人毫无二致。他的相貌就与画在讽刺画中的修道僧一模一样。他那肥实紧绷的白手，既不是思考者的手，也不是行动者的手。

不过，不知道是教皇了解自己肉体的丑陋，还是他天生的性格使然，他一点也不造作掩饰，不论是与驻地附近的居民，还是与护林人，他都能一视同仁地轻松聊天。有人来哭穷，他就命人给钱，有老百姓家的女儿没有嫁妆，无法出嫁，他也给钱。听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用去50达克特。有人进言说，那些人中肯定有人说谎。教皇却说，那也不会全部都说谎，依旧我行我素。教皇身后随从的腰间也总是挂着塞满银币的皮袋。猎获的猎物，在回来的途中也会全部送给沿途夹道欢迎他的老百姓。

尽管利奥十世被认为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和最丑陋的，但因为他的这种做派，却使他在老百姓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于马里亚诺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月10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死讯似乎也打击了心情一向很好的利奥十世，让他不时沉默。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怜的公主，四个月就成了寡妇。”当他得知继位者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时，他又自言自语道：“法兰西年轻人对意大利可不是吉利事啊。查理八世、加斯通·德·富瓦，在意大利引起动乱的总是二十来岁的法兰西人，但愿这次不再这样。”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月30日

今天，教皇决定送给朱利亚诺15万达克特，并另花4万达克特向德意志皇帝买下摩德纳送给这位新婚宴尔的弟弟。罗马盛传，朱利亚诺被迫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姨妈，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菲贝尔塔·迪·萨伏依结婚，这些是向他表示歉意的象征。无法想象这样就能使年轻的野心家弗朗索瓦一世变得老实，但利奥十世教皇似乎还没有放弃不结盟政策的想法。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6月30日

今天傍晚，我和教皇之间难得地发生了争论，争论内容是27日我们共和国与法国签订的同盟协议。教皇谴责我们共和国的政策是远交近攻。我也明确地说："首先考虑本国利益理所当然。按目前的情况，米兰由德意志皇帝保护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统治，事实上与皇帝的领土无异。我们威尼斯共和国的北边和西边快要被宿敌德意志包围了。而且，继承西班牙老国王费迪南多的卡洛斯，同时也是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第一继承人。这样下去，除了现在已经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北部成为卡洛斯的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弗朗索瓦一世想对斯福尔扎动手，就让他动手不是更好吗？"

教皇仍然怒气冲冲地说："最最优先的是避免战争。"

"陛下，我们揣测陛下的深意是要一边坚持不结盟政策，一边在背地里离间列强，让它们相互孤立。但是，这种现实路线没有考虑到出现狂人的情况。万一出现狂人，这路线马上就会受阻，存在风险。"

"大使，您究竟想让我做什么？您以为现在的教廷还有力量满足你们的愿望吗？它的军事力量甚至不如小国。相比之下，欧洲列强却越来越强大。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具有远大构想的政治家，

只要有能力强的外交官就行了。”

我没有逼教皇放弃历来的政策，只是想说，如果一心只考虑避免战争，反倒会被卷进战争。看上去，教皇最后还是不想放弃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想法。

于罗马

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1515年8月，弗朗索瓦一世率领35000法军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列强紧急结成联盟迎敌。教皇最终也参加了进来。

3万名瑞士兵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西班牙军队在那波利总督卡尔多纳指挥下，杀向与法国共同作战的威尼斯军队。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指挥的斯福尔扎军队死守米兰，教会军因总司令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疾病缠身而改由洛伦佐代理指挥。教皇并不信任年轻侄子的军事才能，把指挥实权交给了乌尔比诺公爵，派他去防守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

指挥法军先头部队的是意大利人佣兵队长、身经百战的强者老特里武尔齐奥将军。他避开与联军中最强的瑞士军硬碰，袭击了斯福尔扎军。科隆纳队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计可施，结果连自己也成了俘虏。教皇在罗马得到这个消息，面对如此过分的丑态，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惊呆了。

这个胜利就像是白捡的一样。初战告捷让弗朗索瓦一世心情大好。他离开都灵南下了。而联军被士气大振的法军一攻，暴露出了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有名无实。与威尼斯军队对阵的西班牙军队原地不动。至于教会军，连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都在通敌。9月13日，唯一一支像样的军队瑞士军不得不同压过来的法军决战，会战地点在马里尼亚诺平原。

法军35000人，60门大炮在阵前一字排开，由国王亲自指挥。瑞士步兵之父锡永枢机主教指挥3万瑞士军与之对战。战斗打响，法军骑兵队卷尘冲杀过来。瑞士军队排成传统方阵向前冲去，令人胆寒。两军从正面激烈相撞，形成激战态势。瑞士兵分成团组，埋头冲锋。他们专攻法军的马匹，骑士一旦落马便蜂拥而上，杀死落马者。法军动摇了，顾不上巩固阵型。他们不分方向，自顾逃窜。弗朗索瓦一世见状亲自驱马，一边大声呵斥，一边阻止士兵逃跑。

瑞士军队总指挥锡永枢机主教认为胜利在握，马上派飞毛腿信使带上捷报，驰往罗马向教皇报捷。

1515年9月17日

> 今天早上教皇有请，我去了梵蒂冈。我们共和国出身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也收到教皇的传请。我们二人一起会晤了教皇。教皇用平静的口吻说："昨天夜里，锡永枢机主教传来了法军失败的战报。我通知你们，请你们承诺不向任何人泄露。"
>
> 我和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心情灰暗地退了出来。可是，不知道从何处泄露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罗马。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等人狂喜，瑞士卫兵走到哪里都昂首挺胸。而住在罗马的法国人和威尼斯人走到哪里脸上都像死人一般。
>
> 于罗马
>
> 威尼斯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然而，这场战斗还有后半场。就在国王费力重整不稳的队伍时，达尔维亚诺队长指挥的威尼斯骑兵队出现在黄昏之中。腹背受敌，再厉害的瑞士步兵也动摇起来。达尔维亚诺指挥骑兵队有着欧洲第一的定评。而指挥重整后的法军骑兵的又是身经百战的骁将老特里武尔齐奥。两支队伍对进退两难的瑞士军队发起了进攻。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杀

戮。天暗了下来，只觉得平原上瑞士兵的尸体越堆越高。特里武尔齐奥将军后来曾经这样述怀："迄今为止我打了18场战役，但跟这次相比，那些都如同小孩打架。"

这是自夸为百战百胜的瑞士步兵的第一次完败。

1515年9月18日

早晨收到了两封信。我立即穿好官服去了梵蒂冈。侍从塞拉比卡强调教皇还在睡觉，不能叫醒。我没有退下，而是对他说："不叫醒他于你不利啊。"教皇一边扣着衣服的扣子，一边走进了房间。我马上开始对他说："教皇陛下，借用主基督的话说，恶善互为表里。昨天，陛下给了我一个恶而虚假的消息，今天我还给您一个善而准确的消息。瑞士兵被打败了。"

"如果是这事，我昨夜就知道了。不过，不是说失败并不惨重吗？"

"陛下，究竟谁的报告准确呢？请看这份东西。"

说着，我把刚收到的元老院来函和与法国国王同行的威尼斯驻法大使寄来的信函递到教皇面前。

教皇读完之后似乎十分震惊，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说道："第一封信是元老院的。写第二封信的人我认识。他的报告不能不信。"说完，又自嘲地继续说道："难道要我投入国王的怀抱祈求慈悲吗？"

我给他打气，说威尼斯共和国一定会做您与法国国王之间的中间人，不要过于丧气。但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下午我才知道，瑞士卫兵们义愤填膺，不知道他们见到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会做出什么来，我这两三天也不打算接近梵蒂冈了。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9月20日

我不得不以苦涩的心情来写这份报告。我太疏忽了。利奥十世在马里尼亚诺会战开始前就已经发出了秘密指令，一旦战败就立即去法国国王那里乞和，准备已经就绪。中间人是他刚结婚的弟弟朱利亚诺妻子的娘家，也是法国国王母亲的娘家萨伏依公爵家。马里尼亚诺到罗马路途遥远，等报送战果的飞毛腿信使到达后再派使节到马里尼亚诺法国国王那里去求和，不如事先就把使节派到会战的战场更合理。一旦败局确定，使节可以立刻跑到国王那里去。利奥已经这样做了。

18日早上我叫醒了他，这是事实，但我却不是第一个叫醒他的人。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被人叫起来过，收到了法国国王同意和平谈判的承诺，并放下心来再次上床。我是第二次叫醒他。没想到，他在我的面前厚颜无耻地演了一出被吓破胆的假戏！即便是第一次详细听到瑞士兵战败的惨状，也不该那样捉弄人。我真后悔还给他打气，彻底被他的假戏给耍了。

于罗马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1515年9月25日

今天，法国特使抵达罗马，带来了法国国王的和谈条件。国王的条件有以下三个：教皇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的主权；割让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给法国国王。教皇和法国国王似乎都打算单独媾和，完全不顾各自的结盟者西班牙、瑞士、威尼斯。就算教皇无视打了败仗的西班牙和瑞士，我们可以不去看，但马里尼亚诺战役获胜的机会是我们威尼斯骑兵创造的，法国国王对我国毫不顾忌，真是岂有此理！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于罗马

1515年9月30日

梵蒂冈突然开始行动起来了。法国国王的特使快马加鞭往返于教皇与国王之间。但谈判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完全被置于局外，没有办法打探交涉进展的消息。

我们知道教皇急于和平。瑞士军队再忠诚于教皇，也是出来挣钱的农民集团，出师不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倒戈到法国国王一边。西班牙军队也已经撤退到了罗马，如今教皇没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止他们逃往那波利。在这样的状况下，趁着一切未定与法国国王讲和，会非常有利。

然而，法国国王在马里尼亚诺会战中大获全胜，把意大利北部弄到了手，却为何如此轻易就答应了教皇的邀约呢？坦率地说，我很难理解这一点。也许弗朗索瓦一世也与查理八世、路易十二等历代法兰西国王一样，属于那种我们意大利人难以理解的人种：把教皇逼上了绝境，却在关键时候显出基督徒式的犹豫，不能痛下杀手。

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教皇毕竟是人；但对他们法兰西人来说，教皇无论如何都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

教皇明天出发去维泰博，这是去与法国国王会面的第一步。在通知我们使团时，利奥十世这样说道："听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赞美意大利文化的欣赏者。我想把列奥纳多、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三个人一块儿带去。"

这个策略是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0月13日

今天，双方代表谈妥了媾和协定。教皇接受了法国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法国国王则加上了保护佛罗伦萨共和国境内的美第奇家族一条，又指定签字地点须在罗马。为此，上午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会上始终笼罩着险恶的气氛。几乎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反对，认为这是屈辱的媾和。对此，教皇说道："我们应该坦率承认无奈的事实。"

教皇提出意向，不在法国国王指定的罗马签字，而是去博洛尼亚，在那里与法国国王见面。

枢机主教们反对道："不能再向俗界的国王低头了，应该让他来罗马。"

"国王不会真的毫无防备地来罗马。与其让他率领大军前来，不如不让他进一步深入意大利。为此，我们把会见的地点定在博洛尼亚，这是国王所在的米兰和我所在的罗马的中间位置。这才是上策。"

教皇一锤定音，说服了枢机主教们。

尽管如此，许多枢机主教还是不满于把美第奇家族的事情作为一项媾和条件，叹息说教皇染上了裙带主义（nepotismo）的恶习。

于维泰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1月30日

教皇一路旅行轻松舒缓，他与科尔托纳、阿雷佐一道，见到狩猎场便绝不放过享乐的机会。今天，教皇一行进入佛罗伦萨。他是当地出身的第一位教皇，又是他即位后第一次返乡，整个佛罗伦萨市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当今名声最高的艺术家雅各布·桑索维诺[4]

和他的弟子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5]的作品，以及欢迎演出都非常出色，光彩夺目。教皇心情很好地欣赏了这一切。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于佛罗伦萨

1515年12月8日

教皇带着14位枢机主教，于今天到达博洛尼亚。听说法国国王也已从米兰出发。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0日

法国国王已经抵达距博洛尼亚3英里的地方。今天，教廷礼宾官格拉西前往国王处，就其与教皇的会见仪式进行磋商。法国国王主张一切按法兰西方式进行。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1日

上午11点，弗朗索瓦一世率领骑兵队到达博洛尼亚西北门圣菲利切门前。20位枢机主教身着红衣，正装出迎。国王一到，他们便立即脱帽行礼。最年长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拉丁语转述了教皇的口信：国王根据教皇之愿亲自前来，令人高兴。法国国王也脱帽行礼，用法语做了回答。国王一行没有武装。他们在枢机主教们的引导下径直前往住处。在那里，国王同比比埃纳、萨乌里、美第奇、

奇博四位枢机主教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他们立即来到位于同一幢建筑中的大厅。

图17：弗朗索瓦一世

教皇已经头戴三重冠，身着一等礼服，在宫廷人员、我们这些外交使团和其他众多人员的簇拥下坐在了枢机主教们的前面，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带着重臣们入场了。

可是，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地板滑得要命。我自己也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滑了一下，头差点就撞上了柱子。法国国王昂首挺胸走进大厅，他也在地板上滑了脚。如果没有格拉西敏捷地从旁扶他一把，他一定会一屁股跌下。国王打了个趔趄。国王虽然蓄着胡须，但终究还是个21岁的年轻人，眼看着涨红了脸。教皇看着这一切，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担心，反而浮现出调皮的笑容。没准儿把地板擦得比平时更滑还是教皇的主意呢。即使不是他的主意，他也应该知道。

法国国王像女人一样由格拉西拉着手，走到教皇跟前。他把拿在手上的帽子扔在一旁，跪在了教皇的脚下，亲吻着教皇的鞋尖儿。教皇伸出手去扶起国王，并拥抱了他。然后，法兰西国王站在教皇面前，用母语起誓忠于教皇，接着赞扬了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力陈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今天伟大的意大利文化。他的话句句夸张。利奥十世用拉丁语简短答谢。就这样，胜利者法国国王再次承认了失败者教皇的地位高于自己，复制了查理八世与教皇波吉亚的先例。

接着，教皇向国王一一介绍了枢机主教、宫廷人员和外交使团中的每一个人。法国国王在我面前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达尔维亚诺队长表示了哀悼，说这位勇敢武将的死，不仅是威尼斯损失，也是法兰西的损失。国王在教皇从罗马带来的艺术家面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弗朗索瓦一世尤其与其中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挨得最近，像是他的一介粉丝。

媾和签字仪式将于14日举行。

于博洛尼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2日

法国国王心情很好，在博洛尼亚逗留期间，十分享受。教皇向国王赠送了礼物。那是一副镶有宝石的金十字架。这件宝物原来归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所有，枢机主教死后转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手，教皇死后归了教廷。这副精美的十字架价值1.5万达克特。国王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件礼物，向教皇表示了感谢。法国国王向教皇提出请求，想要拉奥孔[6]群像。教皇轻易答应了这一请求。我当时也在场，很怀疑教皇是否真的愿意放手。这组群像发掘于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时代，一直被视为梵蒂冈的至宝。根据后来了解到的事实，利奥十世叫来了雕塑家班迪里奥内，命他再雕刻一组一模一样的群像。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3日

今天早上，在博洛尼亚的主教堂举行了教皇主持的弥撒。法兰西国王以及他的全体随行人员一同参加。

弥撒祈祷结束领圣体时，一位法国武将走到站在祭坛前的教皇面前，突然匍匐在教皇脚下，用母语高喊："宽恕我吧！宽恕我吧！我反逆教皇，罪孽深重啊！"

利奥十世亲切地拉着这位趴在脚下哭喊者的手，把他扶起，并把圣饼赐给他，甚至还拥抱了他。见此情景，其他法国人也都纷纷高喊"宽恕我吧"，争先恐后地拥到教皇面前，争相亲吻教皇的脚尖。教皇将他们一一扶起，把圣饼放进他们口中，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了他们。坐在第一排的国王也说："我们谁都不希望反逆教皇。这一切都是针对前教皇尤利乌斯敌视法兰西的态度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为。"

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在法兰西人看来感人至深，而在我们意大利人看来却是滑稽可笑的场景。法兰西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换作我们肯定会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开始就不要对教皇开战！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4日

教廷和法国之间的媾和协议签了字。我们原以为教皇只为签字而来博洛尼亚。然而，协议的内容令我们彻底惊讶，就连参加签字仪式的枢机主教也都个个目瞪口呆。协议条款完全变了样。

首先是教皇与法国结盟，而不与其他国家结盟这一条。这一条保留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却没了踪影。

第二，保留了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主权的内容。

第三，皮亚琴察、帕尔马两座城市归法国国王所有的条款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国王放弃对这两座城市的权利，甚至要将摩德纳、雷焦这两座城市归还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虽然教皇失去了花了4万达克特从皇帝手上买来送给弟弟朱利亚诺的摩德纳，但费拉拉公爵毕竟是意大利人，这两座城市没有成为法国领土。

第四，保留了法国国王保护美第奇家族这一条款，后面又加上了把教皇侄子洛伦佐封为法兰西贵族的内容。

最后，这是最令我们震惊的条款，协议确认了法国国内的神职人员任命权归教皇，法国国王承认在法国国内教皇权力至上。历代法国国王一直与教皇争夺这项权力，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是失败者，却如此轻易地承认了这一条款，这实在令人费解。而且，法国国王在签字的时候心情极好。人们不得不承认利奥十世外交手段之精

湛！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5日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离开博洛尼亚去了米兰，满脸洋溢着满意的神情。枢机主教团一直把他送到城门前，态度显得过分恭敬。他们对教皇外交的不满现在已然烟消云散。

据闻法国国王任命查理·德·波旁为米兰总督，新年之后将率领全军回归法国。

教皇18日离开博洛尼亚，预定在佛罗伦萨探望病重卧床的弟弟朱利亚诺，并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和狂欢节，于2月底回到罗马。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6年2月10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元老院诸位议员：

在狂欢节最喧嚣的高潮中，教皇把我召去。从他那假装若无其事的口吻中，传递出了他的意向：教廷想与我们共和国结成友好同盟。我得到了确切证据，足以解开几天来我的心头疑问。

在我看来，由于与法国国王结成了友好同盟，教皇利奥十世将被迫改变自己一贯坚持的不结盟政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得知这个同盟后燃起了满腔怒火。他给教廷驻西班牙大使写信说，教皇的政治是脚踏两只船，他的反法旗号根本是假货。大使把这封信给教皇看时，教皇也认为必须采取对策。于是我开始比平时更加留意打探教皇的动向，收集情报。

利奥十世采取的政策从不结盟一下子变为结盟，而且与所有列强都结成了友好同盟。我国是最后的一个。与法国国王媾和协定第一条的后半部分，即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这一部分，在签订协议时候被删去了。因而，即使法国国王知道结盟一事，也不能提出抗议了。

这样，教皇改变了政策，分别与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德意志皇帝、英国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结成了友好同盟。据我探听到的消息，除了我们威尼斯以外，还没有谁注意到教皇的这一做法。各强国的国王都还以为只有自己同教皇结成了同盟关系。

事已至此，我作为威尼斯大使，只能回复教皇说，将向祖国的元老院报告，为尽早实现结盟而努力。威尼斯不能自己一个国家被孤立，那将比什么都危险。

不结盟政策与泛结盟政策，是既有区别又无区别的一回事。

我有时也在自问自答：这位利奥十世教皇，究竟是一位非凡的干才，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懒鬼、胆小鬼，一个前所未闻的饭桶呢？

于佛罗伦萨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第三场 阴谋

罗马暗夜深邃。巨大的遗迹沉重地耸立着，阴影中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火光。那是牧羊人为度过寒夜而点起的篝火，却让人以为是夜里的强盗，瞬间打起冷战来。进入市区，壮丽的教堂和贵族、高级神职人员、银行家的豪华宅第鳞次栉比。但这只是大街上的景象。从那里拐出一步，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道路狭窄曲折，像迷宫一般蜿蜒。道路两侧，家家户户都用木头挡板把窗户关得紧紧。即使屋里点着灯，光

线也不会泄露出来。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穿着黑色的长披风，像蝙蝠那样贴在墙上，不要说你能认出他来，就连注意到他怕都很困难。迷宫走到尽头，是一个小广场，那里有教堂，喷泉汩汩地发出声来。这种地方，往往外边看着不起眼，进到里面却是豪华得令人惊讶的宅邸。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宅第也是这其中之一。那天夜里，天空中挂着淡淡的春月，溶溶月光温柔地照白了半个喷泉。

这天，刚满26岁的枢机主教骑着马一口气来到这里。罗马夜里的黑暗并没有让这位枢机主教感到阴森和恐怖。他用随身带着的教皇特别通行证，轻易地敲开了紧闭的城门。进城后，就是他闭着眼睛也都认识的路。随从打着火把，沿着弯弯曲曲的黑暗道路走在前面。枢机主教策马驰去，看那阵势，赶上随从并非难事。马蹄声在两边房子的石墙上激起高高的回声，传向远方。

同两个月前逃离罗马时相比，他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如今，教皇已经承诺让他回归锡耶纳，那可是他的夙愿。密友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受教皇差遣，来到他的流亡地真扎诺，转达了教皇请他回罗马相商的话，甚至给了他安全保证书。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为此而狂喜。送走两位枢机主教后，他根本没有心情继续留在科隆纳家族保护下的安全之地真扎诺。他想快点回到罗马与教皇谈判，一刻也不愿耽误。科隆纳劝他谨慎为好，他根本听不进去，只带了一个随从便走夜路奔罗马而来。他进了罗马城门后，其实是想直接去梵蒂冈。但深夜造访还是让他犹豫起来。他想，还是明天早上拜会为好。

因为没有事先得到主人到达的通知，佩特里奇家正门的大门紧闭。随从拼力用嵌在巨大门扉上的铁环敲打着。年轻的枢机主教骑在马上，一边等着开门，一边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一轮已经变淡的月亮还挂在天际，这轮月亮从出了罗马南边真扎诺的科隆纳城堡就一路陪伴着他走夜道来到这里。他又把视线停在了喷泉上。这时，他感到对面教堂阴影下的柱子后面有个东西瞬间动了一下。可是，年轻的枢机主教内心兴奋，

根本没有在意，很快忘记了这事。

巨大的门扉从里面打开，发出沉重的声音。主人突然回到宅邸，门卫十分着慌，絮絮叨叨地说着赔罪的话。佩特里奇听也不听，骑着马进了宅邸。他在围着中庭的回廊一隅下马。家丁拿着烛台走了过来。主人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家丁小跑步跟在后头，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宁尼和西庇奥内了。"

枢机主教闻言停住了脚步。他想起了自己在离开罗马前曾对这两位秘书和执事说过，让他们去锡耶纳。刚才瞬间萌生出来的疑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枢机主教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早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驱马越过台伯河奔向梵蒂冈。今天，他穿的是枢机主教的红衣正装，还带了五个随从。

教皇宫的大门当即打开。他把随从留在那里，一个人被引进教皇的私人房间。在等待大厅里，萨乌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已在等候。两位年轻的枢机主教跑向刚刚进来的密友身边，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佩特里奇即将实现夙愿。很快，三个人一同被引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教皇已经坐在那里候着他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跪在教皇面前，亲吻他的脚尖，准备感谢教皇此次充满理解的提议。

就在这时，教皇宝座左右的门被打开，一队武装近卫兵冲了进来。士兵们立即把四扇大门紧紧关上。近卫兵队长走到惊讶无语的枢机主教面前说道："我奉教皇之命，前来抓捕佩特里奇和萨乌里两位枢机主教！"

两位枢机主教面色苍白，科尔内罗也已面无血色。队长理也不理，向士兵们发出了信号。两位枢机主教的胳膊被士兵们从两侧架起。他们

面无血色，一句话也未说就被带走，甚至连回头看一眼教皇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走过城墙里的通道，被分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房。

圣安杰洛城堡是在哈德良[7]皇帝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里面有很多牢房。关押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牢房叫作“圣摩洛哥”，在这些牢房中条件最为恶劣。牢房只有两米见方，土墙粗糙，不在地下却像地牢一样，没有窗户，光线进不来，换气也不够，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奇特的臭味。关押萨乌里枢机主教的牢房也好不到哪里去。厚厚的木门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身后关上，响起了沉重的上锁声。黑暗中只剩下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个人。他像在做白日梦一样，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利奥十世接到队长的报告，说已经顺利把两位枢机主教关进了监牢。他扭过脸来对面色苍白、兀自动弹不得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说：“我们基督教徒把古罗马人当作堕落的贱民消灭掉了。可是，古罗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都在干着。战争、杀戮、阴谋、奢侈，除了暗杀在世的皇帝这一件事以外，我们什么都干了。而这件事情，现在也因这两位枢机主教毒杀教皇的阴谋被做到了。让我们祝贺1500年前就为我们展示了全部人性的那些伟大的异教徒吧，科尔内罗阁下！”

已经处变不惊的罗马民众对这次的事件也不寒而栗。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是一位年轻的美男子，华丽的活动总少不了他。尽管他在枢机主教中地位轻微，但在一般老百姓中却大名鼎鼎。毒杀教皇未遂的罪名与这位喜欢华美的枢机主教实在不相配。

阿方索·佩特里奇是以老奸巨猾而闻名的锡耶纳僭主潘多鲁夫·佩特

里奇的次子。锡耶纳与邻国关系恶劣，与佛罗伦萨动辄发生争执便是一例。处在萨伏那罗拉影响之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以后，锡耶纳就不惜代价支持美第奇回归。皮耶罗多次策划以武力回归，每次都是从锡耶纳出发，而每次失败后又都返回锡耶纳。

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代，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也很差，佩特里奇曾经一度遭到切萨雷·波吉亚的驱逐。到了尤利乌斯二世时代，教皇对遭受前教皇波吉亚打击的人统统给予优待。教皇的这一方针使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有所好转。当时才20岁的阿方索受惠于此，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波吉亚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第奇家族，也同样得以回归佛罗伦萨。

1512年，长年以来执掌锡耶纳的父亲潘多鲁夫去世，由哥哥波格塞继承。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乔凡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当时，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出于以往两家的关系，带领年轻的枢机主教们为美第奇的当选尽了力。

然而，美第奇完全统治了佛罗伦萨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与锡耶纳的关系又开始恶化。新僭主波格塞完全没有继承父亲的政治能力，其恶政甚至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他进而不顾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开始接近那波利的西班牙势力。这引起了教皇利奥十世的关注。据同时代史家圭恰迪尼说，利奥十世希望由教皇派的人物来统治夹在教会领土与佛罗伦萨中间的锡耶纳。很快，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就来了。锡耶纳市民代表对波格塞的恶政感到绝望，跑到罗马向波格塞的堂兄弟拉斐尔主教告状，请他面见利奥十世时向教皇陈情。于是拉斐尔主教把他们带到了利奥十世面前。

不久，由200骑兵和2000步兵组成的拉斐尔主教的军队在佣兵队长维特里的指挥下杀奔锡耶纳。佛罗伦萨军队同时南下。波格塞·佩特里奇遭到南北夹击，市民又在市内起义，他无能为力，抛下锡耶纳亡命那波利去了。同时兼任格罗塞托主教的拉斐尔·佩特里奇就这样轻而易举

地成为锡耶纳的僭主。这事发生在1515年，利奥十世的谋略成功了。

然而，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得知此事后大怒。为美第奇家族和利奥十世个人出了那么大的力，这算哪一出的做法！他怒火中烧，对平时关系就不好的堂兄弟拉斐尔的成功尤为光火。从这时开始，回归锡耶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杀掉利奥十世的想法便占据了枢机主教的整个胸膛。起初，他想在狩猎的时候趁教皇一人独处时动手。为此，他整日短剑不离身。但这样做危险很多。教皇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少，即使有机会，杀掉他以后也可能立即被发现。

枢机主教思路枯竭之时，一个妙计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利用教皇的病下毒。教皇的老毛病是肛门痔漏。这个病时常发作，发高烧，患部发出恶臭，不得不经常做外科手术治疗。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教皇虽然可以起来玩牌，但他身体发热，患处部位特殊，无法消解不快的感觉。教皇已经延请多位著名医生治疗过，但效果不佳，只好干等病痛高潮过去。一旦病痛高潮过去，身体就会像无病一样健康，可以沉溺于狩猎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妙计就是派自己的心腹外科医生去做教皇的侍医，在为患部做手术时给他涂上毒药。不需要去另找外科医生，他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外科医生维切里当时已年逾五十，他起初以擅长胆结石手术而闻名，但治疗性病使他在整个意大利声名鹊起。性病开始流行于20年前法军入侵时，因为由法国人携入，因而叫作法国病。这种病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洲，统治阶级也不能幸免。维切里与另外一位医生一起，开始用水银治疗这种性病。他的患者中有埃斯特枢机主教、曼托瓦侯爵、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英国驻罗马大使等人。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外科医生几年前把根据地放在了锡耶纳，老僭主潘多鲁夫对他有知遇之恩。说起来，他就是佩特里奇家族的侍医。枢机主教的目光盯上了他。

外科医生说手术时将毒药涂在患部不会起效，只能将它混在口服药

里。他答应去当教皇的侍医。这位医生既有钱又不缺名声，不知道他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参与到这个鲁莽的阴谋中来。是因为以前与佩特里奇家族的关系使然呢，还是对教皇侍医这个当时医生的最高地位怀抱野心呢？不管怎样，他们开始了活动，图谋让维切里当教皇侍医。教皇也知道这位外科医生的名气。开始时打算同意，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教皇的心里有一个想法，如果让著名的性病医生当侍医，人们就会怀疑他也有性病。无端遭人猜疑太无聊，但教皇还未完全排除延聘这人的想法。

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边继续活动要把心腹外科医生送去做教皇侍医，一边却愚蠢地寻找合谋来干这件本该是一个人干的事情。

乌尔比诺公爵首先浮现在了他的脑子里。公爵是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在对法作战中，现任教皇把指挥权交给了他，他却去通敌，促成了教皇与法国在博洛尼亚的和谈。此后，他却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教皇解决了法国问题后立即向乌尔比诺派兵，驱逐了公爵，扶植自己的侄子洛伦佐成为新公爵。教皇在弟弟朱利亚诺死后，一心要把洛伦佐培养成复兴美第奇家族的旗手。但洛伦佐毫无政治军事能力，无法确保自己的地位，一直在与流亡中的原乌尔比诺公爵打仗，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愚蠢地选择了这位甚至被法国国王遗弃的原乌尔比诺公爵作为合谋者。

第二个合谋者是西班牙。西班牙一直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教皇利奥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西班牙立即参与了枢机主教的图谋，但它并未全面参与，只是借兵给枢机主教选中的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队长波金泰斯塔，所需费用自然要由枢机主教承担。

第三个合谋者是那些反利奥派的枢机主教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首先向关系最亲近的萨乌里枢机主教挑明了此事。这位萨乌里枢机主教受

到教皇的关照，教皇把最丰饶的教区给了他，按理他不应对教皇有任何不满，不知他为何还要参与此项阴谋。究竟是与佩特里奇长年的交情使然，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大胆在内心起了作用的缘故呢？

萨乌里、佩特里奇和利奥十世分别出身于热那亚、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顶级著名家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托了父亲的权力和财富的福荫，没有什么宗教倾向却进入了神职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枢机主教，没吃过什么苦便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但是前两人与利奥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个差距甚至超过了20岁与41岁之间的年龄差距。自从美第奇家族被萨伏那罗拉逐出佛罗伦萨以后，利奥十世有着9年之久的不幸时代。其中有好几年，他都带着鲁莽的哥哥皮耶罗和善良却无能的弟弟朱利亚诺辗转于乌尔比诺、锡耶纳和罗马之间，饱尝流亡的辛酸。在经济上，美第奇家族全无了往日的气象。而那两位年轻人家底殷实，工作就是游走于罗马社交界。利奥与他们虽然同为上流社会出身，他们之间也会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根本的差异。随着审问的进展，萨乌里以外枢机主教的名字逐渐明朗，我们下面再说。

总之，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计谋是让外科医生维切里下毒，教皇一死立刻让乌尔比诺公爵和西班牙军队武力占领锡耶纳，让同谋的枢机主教选出其中一人做新教皇，从而实现回归锡耶纳。与一个人搞暗杀相比，这个计谋更为周到。但是，同谋越多，计谋泄露的危险就越大。

教皇利奥十世从那时起起了疑心。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不懂得谨慎行事，他放话说一定要收回锡耶纳。这事传到了教皇的耳朵里。枢机主教经常去那波利，借口是探视卧病在床的哥哥波格塞。这进一步加深了教皇的怀疑。那波利是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的据点。不过，教皇此时对阴谋还一无所知，只是怀疑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他开始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身边展开秘密调查。

枢机主教很快有所察觉。他以在罗马花钱太多要回锡耶纳为由离开了罗马。但他没有向北去，而是往南走，进了科隆纳统治下的真扎诺城，在那里重新开始与那波利联系。他身在实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的领地里，教皇亦不能轻易出手。利奥十世为了把枢机主教叫到罗马费尽周折，枢机主教也回过一次罗马，很快又逃也似的回到了真扎诺。教皇终于在1517年4月15日夜里逮捕了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逮捕没有在佩特里奇的宅邸进行，两个人分别被骗出来，直接被投进了圣安杰洛城堡的牢房里。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审问秘书宁尼和执事西庇奥内。但这两人都很坚强，面对主人的东窗事发死活没有开口。然而过了一天，宁尼和枢机主教之间从1516年8月到1517年3月的8封信摆在了宁尼的面前。不知道是佩特里奇家的什么人，在得知二人被捕后想保自己过关，交出了这些信。一心为主的宁尼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他一边考虑主人，一边交代，不知不觉露出了马脚。每到这时，审问官就会穷追不舍，想跑也跑不掉。

4月18日，审问官搞清楚了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21日，审问官又弄明白了他与乌尔比诺公爵联系的细节。4月27日，作为证据的信件增加到了18封。外科医生维切里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信中。这让教皇心里生出了警惕。这不就是想当侍医的那个外科医生吗？审问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从这时开始，执事西庇奥内已无法回答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审问便自然地集中在了最贴近枢机主教的秘书宁尼身上。

5月2日，宁尼熬不过确凿的证据和拷打，交代了利用外科医生毒杀教皇的阴谋。直到这时，教皇才知道险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事件。5月4日，萨乌里、里阿里奥、索德里尼[8]、卡斯特列吉四位枢机主教作为同谋一事浮出水面。对宁尼的拷问就此告一段落。这一切都是在高度

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对教皇动向极为敏感的外交使团都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一切都已查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逮捕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占据教皇利奥十世心头的不是对毒杀的恐惧。只要不让那个外科医生接近自己，就不会有问题。他怕的是与西班牙之间发生问题。老朽的费迪南多国王于前几年去世，17岁的卡洛斯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教皇害怕这位年轻国王不但会向佩特里奇提供兵员，而且会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行动。无论如何要在国王行动之前解决佩特里奇的问题。但是，枢机主教身在科隆纳的城中，不可能派近卫兵去抓人。于是，教皇想了一个计谋，派平素与佩特里奇关系良好的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去找佩特里奇。教皇在信中说，在选举自己为教皇以及在此之前，佩特里奇都帮过大忙，自己不会把佩特里奇弃之不顾，承诺将在15天之内恢复锡耶纳的主权，作为条件，佩特里奇必须断掉与西班牙的关系，回到教皇膝下。教皇在保证枢机主教回到罗马后人身安全的文件上签了字，西班牙大使作为保证人也签了字。

佩特里奇彻底相信了这一切，连相识相知的西班牙大使都署了名呢！他只想到锡耶纳回归即将实现，却把毒杀教皇的事情忘到了脑后。佩特里奇骑马奔驰了40公里夜路，回到了罗马。

5月19日，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其他的枢机主教参加了会议。他们老早得知了两位枢机主教被捕的消息，会上个个脸色苍白。会场上一片沉默。教皇要求发言。他说，通过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的交代以及审查信函证据，现已查明毒杀教皇的阴谋。教皇说明了迄今为止的审问经过。他点名说主谋是佩特里奇，同谋是萨乌里、乌尔比诺公爵和外科医生维切里，但没有提及其他枢机主教和西班牙。他说，这一切

都要追究到底，毫不手软地让责任人偿罪。在一切决定以前，则让这两位枢机主教待在圣安杰洛城堡。教皇最后说，这是对最高地位者的反叛之罪，为公正处理此事，任命洛莫利诺、阿科尔蒂、法尔内塞三位枢机主教为审判官。对枢机主教这样的地位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而言，枢机主教团便能做出裁定了。

教皇利奥十世冷静而严厉的话语一结束，不管有没有切身记忆，所有人都因为恐怖而两腿发抖。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参与阴谋，人们也完全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牵连。

枢机主教们散去后，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内容与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所说的一样。说明过后，西班牙大使提出了抗议，说教皇做出了安全保证，却又逮捕了佩特里奇，还要大使来做保证人，此种做法不正当。教皇面不改色地说道："你也可以忘掉对罪犯做出的保证啦。"

其他大使沉默无语。当天夜里，教皇秘书官本博[9]和萨多莱托[10]两人彻夜无眠。他们要给各国君主准备教皇诏书。大使们也同样一宿未睡，他们同样忙着写详细报告，告诉国内发生在罗马的这起教会内部的阴森事件。

第二天开始陆续有人被捕。逗留在佛罗伦萨的外科医生维切里被抓，当天夜里被押送到利沃诺，第二天便由海路押解到了罗马。此外，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亲戚和波金泰斯塔队长也遭到逮捕。对被捕者的拷问日夜进行，连礼拜日和节日也不放过，为避免外国干涉，需要尽快结案。

5月21日，教皇宣布，两位枢机主教全部坦白，但他没有谈到坦白的内容。让两位枢机主教开口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动刑。他们不习惯屈辱而悲惨的境遇，只是让他们尝尝滋味，他们便受不了了。萨乌里枢机

主教甚至连没被问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5月25日，枢机主教会议开会。会上，教皇讨论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事情，这让参与此事的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4天后的29日，教皇再次召开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开始入座。这时，审判官之一的阿科尔蒂要求与教皇个别面谈。两人便到隔壁房间谈话，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会场里的枢机主教们开始坐不住了，大家不安地望着教皇和阿科尔蒂消失于内的那扇门。近卫队长和两个士兵进了那间屋子。枢机主教们越发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审判官之一的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二人被教皇叫去。两人刚进房间，近卫队长就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身边走去。同时，教皇铁青着脸走出房间，把门锁上，粗声大气地命令礼宾官格拉西让枢机主教会议散会。枢机主教们猜测莫非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被逮捕了，他们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教皇对他们简短地说明道：两位枢机主教已交代，事情已经搞清楚了，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是共犯，他参与阴谋的条件是毒死利奥后选他当教皇。

下午，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教皇最后说，鉴于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的地位、经历以及70岁的年龄，我不会让他进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狱，而会给他配上侍从，让他留住在教皇宫的某个房间里。

外交使团和罗马市民十分震惊地接受了里阿里奥被捕的事实。他可不是佩特里奇和萨乌里那样的小人物。自从他17岁被伯父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以来，已经有53年担任枢机主教的资历，既是长老之首，又是枢机主教团长。但是，他年龄虽长，却是一个性格上的凡人，只拥有巨大财富。每当他要在罗马上街时，都会带着400个随从列队缓行。他所缺的只是教皇的三重冠。他多次尝试当选教皇，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次被认为当选的可能性最高，却败在了年纪跟他儿子一样年轻的美第奇手下。他之所以答应了佩特里奇，这也是一个原因。

6月3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出于恐惧和想了解事实的愿望赶到了梵蒂冈。流言正在传播，说其他枢机主教的罪行也都一一查明，只是不知道是谁。会上公布了三位枢机主教的亲笔供词。当天的会议只做了这一件事。

6月4日，传言流布，说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被转到了圣安杰洛城堡，人们惊讶不已。在教皇宫的一个房间里，有人向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的这个命令，他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也不能独立行走，被卫兵们扛着通过城墙里的通道送进了圣安杰洛城堡。在那里，让他透过缝隙看到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用绳子捆着脖子，绑在牢房里的情况。于是，他交代了一切。在此之前，面对三位审判官的审问，他一直强调，自己虽然知情，但没有把年轻人的话当真。

6月8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这天，外交使团也同时受到邀请，并要求他们在枢机主教会议会场隔壁的房间里等候。

教皇利奥十世面对已经入席的枢机主教们冷冷地说道："现已查明，在座的枢机主教中还有两人有罪。"

枢机主教们面色惨白。教皇接着说："这两个人都是我所信任并给予优厚待遇的人。我的心里感到非常孤独。他们知道这个阴谋，虽然没有积极参与，但却放任不管，打算阴谋成功后享受成果。

"我希望他们自己坦白。我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请自己交代吧。如果有罪的人还想躲在暗处，那就只好交给司法处理了。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仁慈，另一条是审判，由他们自己选择走哪条路。"

没有一个人动弹，也没有一个人开口，还有人在环视周围，面色苍

白。

终于有一个枢机主教站起身来发言说，为了不使有罪的枢机主教在全体枢机主教面前出丑，请教皇允许一个人一个人地走到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尖。有罪者可以在这时低声向教皇坦白。教皇同意了这个方法。

枢机主教们在座位之间排成了队列。科尔内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在静静地亲吻了教皇的脚尖后走了过去。轮到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了。他跪下身去亲吻了教皇的脚尖，然后伸出双手扶住教皇的肩膀，在他的耳边耳语道“祝您平安”，便要走过去。教皇用眼神阻止了他，然后说道：“你是罪人。”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面色苍白地否认。但教皇仍旧盯着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顶不住了。他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坦白自己有罪。

见到这番光景，站在队列后边的卡斯特列吉跑了出来，同样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叫道：“您发发慈悲吧！”

利奥十世只说了句“原谅你们吧”，然后让他们发誓今后不再犯，要求他们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得离开罗马。两位枢机主教每人被罚款12200达克特。其他枢机主教请求教皇不要让外交使团知道今天的事情。

枢机主教会散会后，教皇立即召见了外交使团。教皇只说又查明了两个枢机主教有罪，但没有点名。

各国大使当然想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都严格封口。最早知道两人名字的依旧还是拥有完备情报网的威尼斯大使，佐尔济大使在枢机主教会议的当天傍晚便向祖国的元老院送去了报告。能力很强的费拉拉大使科斯塔比利也花了15天时间才了解到两人的名字。其他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枢机主教逃亡后才推测是他

们二人。

尽管得到了教皇的原谅，但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他于6月20日夜里出逃。为了缴纳罚金，他甚至变卖了银质餐具。他化装后只带了两名随从，先逃到了蒂沃利，从那里经阿布鲁佐、布里亚一路南逃，终于找到了一艘船，沿海路向北逃到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认可了他的流亡，教皇也就默认了此事。

就在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逃亡的几个小时以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也以健康为由，向教皇申请换个居住地，得到教皇的许可后，离开罗马去了帕莱斯特里纳。但他似乎也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于几天后逃出了教皇领土，去了科隆纳统治下的丰迪请求保护。科隆纳派人报告教皇，说他不同意索德里尼滞留。但教皇却回复说，不必如此，就让他待在那里好了。

作为文人枢机主教，卡斯特列吉以其名字科尔内托闻名遐迩，他写有纪行文。人们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参与阴谋。他出身于低级阶层，靠着野心和文才爬到了枢机主教的位置，难道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他与教皇的关系不好但也不坏。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索德里尼的情况。他以学者和外交官闻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皮耶罗·索德里尼随着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而倒台，逃到了亚得里亚东海岸边的拉古萨，当时这里还是威尼斯领土。教皇即位后马上原谅了他，并把他召到罗马，表示了宽大的态度。但索德里尼心中反美第奇的感情并未消散，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把人一脚踹倒在地，再去抚摸他的头，就是狗也不会高兴的。

那三位枢机主教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情况怎样呢？不论是在梵蒂

冈，还是在罗马街头，人们一见面谈的全是这个话题。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宫廷里，也无人不在谈论这个话题，掀起了救人运动。可怜的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因为已确定是主谋无疑，不管是亲戚还是在家乡锡耶纳，没有人出面为保住他的性命而行动。西班牙当然摆出一副假装不知情的样子。强国的国王也站出来参加了抢救萨乌里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法国国王甚至向罗马派了特使，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救萨乌里的命。这似乎是因为枢机主教的娘家借钱给法国国王的缘故，其实这是枢机主教的出身地热那亚做工作的效果，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威尼斯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则积极参与了抢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

总体来说，大家都持乐观态度。利奥十世教皇即位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宽恕。外交使团也都认为，教皇肯定会让他们三人认罪，然后宽恕他们。

6月22日，在这样的气氛中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上午10点，除了两位生病的以外，全体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共13人出席会议。教皇入场，落座后立即命三位担任审判官的枢机主教宣读起诉书。

法尔内塞枢机主教讲了起诉佩特里奇、萨乌里、里阿里奥三位枢机主教的理由。会场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枢机主教代表站起身表示，我们的三位同事的罪行明确，我们将进行投票来确认其有罪，但恳请教皇陛下对这三人大发慈悲。

这时，始终一言未发的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请求发言："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告知对包括三位枢机主教在内的全体罪人的审问内容。请允许我不参加投票。"

"你可是位有尊严的人。"教皇讽刺道。

"陛下，我既不是个有尊严的人，也不是个傲慢的人。我只是想在

做出决定以前，让自己能充分理解和接受。”

教皇说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话有道理，便命在座的审问官公布全部审问记录。

审问官一直在宣读记录，直到夜里10点仍在继续。连续12个小时，所有枢机主教没有一个人走出过房间，谁也没有吃饭，一直在听着宣读。教皇肥硕的颈项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却没有离开过座位。人人筋疲力尽。

审问官终于念完了审问记录，开始无记名投票。全体人员投票同意起诉理由。

接着，由教皇秘书官本博宣读判决书。枢机主教们坐在座位上，个个神情疲惫。他们随着判决书的宣读，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那声音既不像叹息也不像呻吟，好似波浪一般扩散开去。这次的判决比想象的更严厉。

有罪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剥夺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以及给予高级神职人员的所有特权，被判没收财产，接受俗界法律的审判。教皇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首长，同时又是当时定都罗马的教皇国的主人，因而所谓根据俗界法律的审判，仍然由教皇进行。但在俗界的法律中，即使不是异端者，也有被判处死刑的。枢机主教们当然也懂得这些，他们都觉得佩特里奇已经没救了，但萨乌里和里阿里奥弄得好还有救。半夜11点，枢机主教会议在凝重的沉默中散会。

当天夜里，夜已经很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告知了判决结果。他们从睡梦中被叫醒，在火把的火光下，收去了挂在他们胸前的金十字架，这种十字架只有枢机主教才允许佩戴，同时剥下了

他们的红衣、披风和帽子，换上了黑色的教衣。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了，也不是大主教、主教了，已经降为普通的祭司（prete）。三个可怜的前枢机主教浑身颤抖，面无人色。

开始行刑了。

佩特里奇家雇佣的波金泰斯塔队长已经于6月19日被处以绞刑。然而，处死这个十恶不赦的人，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27日清晨，一列令人恐惧的队伍走出圣安杰洛城堡，在罗马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往庞特广场而去。沿途道路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走在前面的是行刑人的家属，女人和孩子从头到脚裹着黑色衣服，只露出眼睛，徒步前行。接着是同样打扮的成年男人，他们是行刑人。再后面过来的是没有华盖的载货马车。车上立着两根粗粗的柱子，上面各绑着一个半裸的男人，他们是佩特里奇的秘书宁尼和外科医生维切里。马车上还有行刑人的助手，他们不时从炭炉中取出烧得通红的钳子靠上犯人的皮肤。犯人的衣服被烧着，肉被烧得发出可怕的吱吱声，烧烂的肉飘出异样的臭味。每烙一次，两个犯人都会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然而，他们的惨叫声很快就淹没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只要与自己没有关系，再残酷的事情都会被这些群众当作热闹来看。手持长矛的骑兵队忙着驱赶涌向囚车的群众。

广场在台伯河对岸，与圣安杰洛城堡遥遥相对。绞刑架已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就绪。行刑台上有两根柱子，柱子上跨着横木，横木上垂下两根绳子，每根上面都挽着一个套圈。宁尼和维切里二人被拉下马车，架到行刑台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和严刑拷问，这两个人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身体也已变形。外科医生维切里在绞索套上脖子时大喊冤枉，想对群众说点什么。黑衣行刑人立即勒紧了绞索，声音消失在他的喉咙里。接着，绞索向上吊起，一切结束。宁尼接着被拉上了绞刑台。

他没有出声，被吊起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一位修士放在他眼前的十字架，好像要把它吃下去一般。

两具尸体很快被放下来。广场由刑场变为肉铺。每人的尸体被分尸四块，鲜血淋漓的八块人肉又被挂到了行刑台上。

6天后的7月4日夜里，已经沦为一介祭司的原枢机主教佩特里奇在睡梦中被叫了起来。牢房外站着一排士兵，城堡的头头传话给他，说赎罪的时候已到，并让他做最后的忏悔，祈求上帝的宽恕。但原枢机主教却大叫道："命运要消灭我的肉体，灵魂得救了又能怎样！"

原枢机主教被带到了另外一间大牢房里。埃塞俄比亚人罗兰德体形巨大，以前的牢房放不下他，所以才造了这间大牢房。佩特里奇虽然现已降为普通修道僧，但他曾经是枢机主教，由身为基督教徒的行刑人来执行死刑会是他的耻辱。因而选择了伊斯兰教徒罗兰德来做行刑人。在如此残酷的时代，人们却没有忘记这种纤细的关怀。

在大牢房里，城堡的头头再次规劝原枢机主教忏悔。可是，佩特里奇气得发抖，更加激烈地说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一块黑色头巾蒙住了他的头。黑人走了过来，在犯人的脖子上缠上红色绢带，勒紧后打上了结。

又过了12天，7月17日早上，原枢机主教里阿里奥被提出牢房，带到了楼上的大房间里。在那里，担任审判官的三位枢机主教向他传达了教皇的五项条件。

（一）坦白罪行并公开认罪。

（二）完全服从教皇，今后不再进行政治活动。

（三）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准离开教皇指定的地点。

（四）向教廷缴纳15万达克特罚金，分三次付款，第一次立即支付，第二次在圣诞节时支付，最后一次在复活节时支付。

（五）教廷没收里阿里奥宫殿。

全体枢机主教以及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葡萄牙、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作为实施上述条件的保证人。

里阿里奥原枢机主教接受了全部条件，只是提出在支付第一次的5万达克特罚款之后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拉斐尔·里阿里奥不但是巨富，他长期担任枢机主教，亲戚中还出了两位教皇——伯父西斯克图斯四世教皇和侄子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因而他在交友方面受惠匪浅。在支付罚金缺钱的时候，他也不缺借钱给他的朋友，光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一人就借给他5万达克特。

7月27日，教廷礼宾官格拉西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当面向被叫出来的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留他一命并予释放的命令。然后，里阿里奥直接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进了教皇宫。在教皇私人礼拜堂的祭坛前，他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服从教皇。接着，他被带到教皇的私人房间里。年迈的罪人颤巍巍地跪下，想要去亲吻教皇的脚尖。利奥十世把他扶起来，亲切地拥抱了他。老人老泪纵横，为自己的轻率而道歉，忏悔了自己的罪过。教皇对他说："恢复你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吧。"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阿里奥脱下了身上的黑色教衣，换上了红色的枢机主教服。他随后被带到了教皇让人准备好的教皇宫内的居室中，教皇的心腹之一比比埃纳曾在那里住过，墙上挂着拉斐尔的壁画，还配

有漂亮的浴室。

我们再看看萨乌里枢机主教的情况。从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处死的那天起，他就从一直关押的牢房被转到了一间稍好的牢房里。他被罚2.5万达克特，数目似乎很少，但没有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利奥十世对这位朋友的处置比对里阿里奥严厉很多。

萨乌里也从圣安杰洛城堡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到了梵蒂冈。年轻的他也许对以这一身普通修道僧的打扮进入教皇宫感到屈辱，走路时眼睛只看脚下。他也被带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萨乌里匍匐在教皇脚下，亲吻教皇的脚尖，忏悔自己受到了佩特里奇和恶魔的蛊惑。教皇面无表情地说道："实在无法相信你。"萨乌里慌了起来，还想辩解说自己的忏悔发自内心。教皇用手制止了他，说道："如果有很多人求情，我才会原谅你。"教皇也在梵蒂冈给了原枢机主教萨乌里一个房间。

被逮捕的多达10人，除了积极推动让外科医生维切里当侍医的一个教廷官员被判刑6年外，其余的人尽皆释放。

这起让罗马、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密切关注的毒杀教皇未遂案就这样结案了。利奥十世教皇作为教廷内部事件处理了这个案件，丝毫没有提及西班牙。不消说，这自然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萨乌里在梵蒂冈做了短暂逗留后，于9月去了撒比纳。他似乎在那里得了疟疾，以带病之身回到罗马。判决8个月以后，萨乌里在母亲和兄弟的守护下去世。教皇命令以枢机主教的规格为他举行了葬礼。

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在梵蒂冈住了数周，接受了教皇和朋友的来访，教皇狩猎时也一道前往，回来后还参加了枢机主教会议。教皇仍然亲切地待他，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了。对这位已经辞去枢机主教团长的老

枢机主教而言，罗马已经今非昔比了。1519年，他得到教皇的准许，去了那波利。在那波利，总督以流亡君主的待遇接待了他。他在那里离开了人世。他在遗言里交代把一切留给罗马教会，并指定教皇的堂兄弟美第奇枢机主教为自己的代理人。他的遗体被运到罗马，并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卡斯特列吉流亡威尼斯后频频给英国国王和费拉拉公爵等人写信，反利奥的热情高涨，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利奥十世刚一去世，他就出发去了罗马。可是自从那天起，他就断了消息，据传是被贪钱的仆从杀掉了。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从流亡地赶回罗马，发疯似的阻止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当选教皇。阻止成功后，他立即要求重审毒杀教皇案。然而，重审的结果与以前一样。同时，还查出了他在流亡时与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一起干的反教会阴谋。他因此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整个阿德利安六世[11]时代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他的出狱还得益于另一位美第奇教皇（朱利奥·德·美第奇）的宽恕。这真是一个讽刺。1524年，这位文化人枢机主教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去世。

图18：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后世教廷销毁了这个案子的全部记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了

解相关情况，这都得益于各国大使的报告和被释者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教廷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也贡献良多。他在未被允许列席会议时，喜欢从钥匙孔窥视现场情况。

场间休息时的闲聊

“真是风和日丽啊！教皇陛下，说这是冬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伦萨不也是这样吗？”

“是啊，早上还出太阳呢，过了中午就会阴下来。不过，满山坡的葡萄地，周围的橄榄树林，路边的扁柏林荫，实在令人不舍啊。”

“想念故乡了？”

“是啊，当然啦。”

“你也可以回去看看啊。你回国后，我把你安排在圣马可修道院吧。你原来就是修士嘛。”

“陛下又拿我开涮了，修士、修士地笑话我。”

“哈哈哈哈，你得感谢我，只拿你开开玩笑。你是给我父亲理发的，萨伏那罗拉刚被处死，你就受到感动，马上加入了多明我会。我们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可是托了那个狂人之福的。你可是他的人哦，我们没让你改变信仰，每年还给你800达克特的年薪。我们没有理由这样把你扶起来呀。

“而且，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人们认为教皇优待修士出身的小丑，评价极差。可以让你请请假啦。”

“不，不，饶了我吧，别再说了。不过，我这个修士出身的马里亚诺还很有名咧！连外国都知道。”

“堕落罗马的榜样！”

“太倒霉啦。我在教皇陛下蹒跚学步时就认识您了，给您当聊伴，写菜谱，虽然偶尔开开玩笑，可从来没有做过被人说的那么坏的事情啊。说我是小丑，真是意外。”

“不光是你，如今的罗马一切都堕落了。”

“是那样吗？从贾尼科洛山眺望罗马，这座城市很繁华，很了不起的呀。

“街道漂亮，大学了得，连外国人都坐不住了，都想成为罗马的学会会员。教皇亲自收集的昂贵抄本堆满了图书馆，谁都能读。这是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们都顺从罗马的时代。教皇爱好音乐的名声甚至传到了西班牙。戏剧流行，欢宴连日。在这里都能听到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的锤声，景气了得。教皇陛下治世以来，人口也增长了三成，听说已达到了8.5万人了，大部分还是罗马市民以外的外国人。罗马简直成了欧洲的首都，而不单单是教皇国的首都。”

“这可需要钱啊。”

“教皇陛下挥金如土也很出名啊。这儿有一个故事啊。一直都说万神庙黄绿色大门是铜制的，但民间到处在传，说从颜色上看那大门上一定含有很多黄金。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传说不灵了，说如果大门真的含金，哪怕是一点点，利奥都不会放过的。”

“哇，哈哈哈哈……罗马人嘴不饶人啊！”

“不，教皇陛下，不光是罗马，佛罗伦萨人在这一点上也不差啊。

听说弗朗切斯科·维托里大使曾经讲过，让利奥手上有100达克特，那可比让石头飞上天还难哪。”

“把我说得这么难听啊！我是这么浪费的一个人吗？”

“教皇陛下，还不能说您就不是。只要有人说需要钱，不管他是谁，您都会大方地给钱。为了上演一出戏，您会一下子给出去100达克特，这样根本存不住钱啊。”

“没想到被你说教了一回。不过，我在佛罗伦萨学会了精致的情趣，来到罗马后学会了花钱。所以，父亲只是搞垮了美第奇银行，我这个儿子却要搞垮教廷啊。”

“父子一起败家，要说痛快，也没有什么不痛快的。”

“这也不是为了痛快，学问和艺术这玩意儿就是费钱。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的。画画的赚了钱，社会地位提高了，就连公证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进画家的作坊（bottega）当学徒。这样一来，那个领域就会天才云集，就会开出最美丽的花朵。乔托[12]从一个羊倌成长为受到国王邀请的成功画家，在这方面也是先驱者了。如果一个放羊的都能如此成功，任谁都会勇气倍增。拉斐尔像神一样葬在了万神庙里，可没有人觉得奇怪。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才能和努力得到充分的回报，就开不出文化的花朵。”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议论，说教皇陛下不是古罗马皇帝，却像古代皇帝一样花钱。”

“所以我不是说我在罗马学会了花钱嘛。而且现在，宗教变得非常吸金，远非银行之类可比。赫利索洛拉斯[13]就曾说过，圣彼得和圣保罗比罗马皇帝更有钱。如果尼禄皇帝知道了这些，他会多么羡慕这二位啊！然而，这不能长久。”

“陛下是在说那个德意志人修士……”

“路德吗？我很担心，因为他，进账的钱会不会减少。”

“教皇陛下，您这样说，那位马丁·路德[14]会越发翘尾巴了。”

“哪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啦。”

“您不能过分诚实。您只要表示出这样的态度就好了：应该再少花点钱，您真的在担心他们的运动……教廷内部也有不少人在说，教皇只是把那些事情当作修士之间的争论来看的。”

“那不会。大家苦苦相责，我虽然知道是徒劳，但不还是在不久前写了开除教籍诏书吗？

“不过用一句话来说，他们搞的运动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德意志对意大利统治的一种反逆，而意大利的理性统治现在遍及整个欧洲。那个德意志修士给我寄来了一本书，题为“基督者的自由”，还附有他写的一封信。很遗憾，我就是想读也读不懂。他的拉丁语太差劲了，信中有如今的罗马换了土耳其人看都会作呕之类有趣的句子。我读了这封信。如果换作我们，一定会想，如果还是一个神学家的话，就不能把拉丁语这个欧洲的共通语写得再好一点吗？不过他们大概会说内容重于形式。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忘了书名。书中很亲切地把各种改革方法一一做了提示。其中有教育改革一项。作者认为，医学系的改革应该交给医生，其他学系必须首重《圣经》讲义，似乎在说意大利的大学就是因为光研究希腊、罗马文化才堕落的，要让我们回归《圣经》。

“总之，他们搞的运动只是对意大利理性文化的反逆，内藏嫉妒，认为意大利理性文化的特色就是脱离宗教，并据此行使着领导权。我说嫉妒，是因为大凡改革运动、抵抗运动什么的，根子里都流淌着嫉妒的感情，即使当事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哦，是那样吗？可是，在阿尔卑斯山北面，不管是君主还是像我们一样的老百姓，可都是赞成他们的。”

“这就是那个德意志修士的聪明之处。他首先对知识阶层讲神学，说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面前一律平等，并将此诉诸人文主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的主流。他还说不需要联系基督和每个教徒的神职人员，也就是不需要罗马教会。

“他们给统治阶级下的饵就是，没有必要服从教皇。只要君主拥有正确的信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君主只要信仰《圣经》，拥有同样信仰的人就应该服从君主。这能让君侯们不高兴吗？

“最后是大众。大众并不关心神学问题和对俗界的统治权什么的。用钱说话，他们最容易理解。因为不存在炼狱，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缩短在炼狱的时间，拿钱给主教举行弥撒。当然，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出钱去买缩短炼狱之苦的赎罪券。由于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也就都是主教了，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向集中了神职人员的教会支付什一税了。人，谁都不愿往外拿钱。如果人们不倒向他们，反而怪了。

“向往意大利是德意志传统的民族感情。但他们又憎恨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人。他们所做的这些正好与这种感情相吻合。叫他们不要被意大利人骗了，他们会很容易听进脑子里。跟王权稳固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相比，德意志人吃过很多亏。说穿了就是钱的问题。他们对钱的怨念很深。而且，卡洛斯又被选为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年轻的卡洛斯看来，选帝侯[15]，尤其是实力强大的撒克逊选帝侯都倒向了路德派，他也就不能拿出强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了。运动乘隙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他当选皇帝，也无计可施。卡洛斯可能还有一个心计，那就是也许可以用路德对付教皇。这让路德很幸运。亚历安德罗特使在信中哭诉道，用任何武力都不可能将路德押送到罗马。我觉得特使真可怜。”

“这个人真不简单，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德意志蠢货。”

“也许他是无意识地想到了这些手段，利用了客观情况。我也很佩服他。我甚至认为他所说的在逻辑上也是对的，只是除了一件事……”

“教皇陛下，您怎么又……教皇陛下总是被他说得一钱不值……而且我还听说，他主张主教也可以结婚。”

“他的确说过要把教廷烧个精光。他在给我的信中写过，我自己就是堕落的教会制度的牺牲品，应该在更加清廉的时代当教皇。在布道中，他把我说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这些事，随他去吧。

“可是，照他的想法，神职人员有妻子也不奇怪了。全体基督徒在看不见的基督面前是平等的，全都是主教。所以，神职人员不能结婚才是怪事。相反，结了婚，了解了常人的烦恼，原来单纯的导师主教就能在指导方法方面有血有肉。根据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主教思想，站在超越个别的立场上，主教不是某几个人的父亲，而是所有人的父亲，所以，他不应该结婚。但是，他们不承认这样的神职阶层，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而且，如果要说不存在炼狱，那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没有人见到过。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搞弥撒来缩短在炼狱的痛苦时间了。赎罪券原本的意思是让一些人的灵魂得到慰藉，他们在禧年[16]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圣地朝圣。而现在，赎罪券却变成了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费用的来源。他们主张不需要豪华教堂，他们的愤怒也可以理解。同时，也就没有必要购买赎罪券了，赎罪券正是以减轻炼狱之苦为名而出售的，他们并不承认这种痛苦。至于什一税，名义上是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十字军的军费，但从最后一次十字军算起已经有250年了，这期间什么都没有做。似这样，出钱的人也会很生气的。

“这样，神职人员的作用大幅减少，钱也就很难筹到。这可是扼住

罗马脖子的最佳办法。”

“这不是又把事情搞大了吗？而且，如果路德派是对的，事情可就更大了。”

“即使说他是对的，也只是说逻辑上是对的。尤其是现在，他们还没有组成党派，只是一场纪律不严明的运动，所以能把不满现状和有疏远感的人全都卷进去。他们目前风头正健，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尽管他们说可以不服从教皇，但是应该服从拥有同样信仰的王侯。可是，连以前长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教皇都无用了，人们还会认为王侯就有用吗？还有，那些认为跟自己信仰不同就拒绝服从王侯的人民，王侯会轻易同意放走他们吗？问题出在具有同样信仰这一点上。这一点迟早会导致争斗。”

“教皇陛下，我自打出生就信奉上帝，信奉主耶稣。即使没有做坏事我也会忏悔，而且每个礼拜日我都会给圣母马利亚供上一支蜡烛。教皇陛下也是每天早晚祈祷。我们的这种信仰与他们的信仰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主张，只有看不见的教会才能救济我们，意思是主基督与每个信徒都直接相连。因为人类原本罪孽深重，只有唯一无罪的上帝、基督和圣灵才能救济人类。他们这样说，是把人性视为恶的缘故。但让我说，同他们正相反，我只看到人性善的一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要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与基督结合，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路德派相信，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意志力和判断力。

“但是，天主教的视野更加全面，认为人性包括善恶两面。不把人性简单地规定为恶，而是既承认性善的一面，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所具有的弱点。人们往往容易失去意志力，判断力也不够。现实中这样的人占多数。为了这些人，最好还是要有中介者，这就是看得见的教会，也就

是地上的教会。

“马里亚诺，德意志这个国家，现在天气怎样啊？在罗马，阳光灿烂啊。”

“大概在下雪吧。听卡埃塔诺说，即使不下雪，天也是阴沉沉的，雾气很大，人稍微走远一点，看上去就像一个灰色的影子。”

“能不能幻想一下，在那样的国家，雾气后面一定会有什么呢？也许你会坚信上帝的正义和爱统治天下的时代就要来临。在我国，阳光照耀着每一个角落，能够看透一切。他们那儿是乐观的，可我们这儿却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

“教皇陛下，您经常说一些很难的事情，我听不懂。有什么我能懂，但在他们那儿却行不通的事情吗？”

“他们说不承认圣人圣者。因为崇拜圣人违反《圣经》教诲，应该统统排斥。”

“这可怎么得了！我生在佛罗伦萨，受到城市守护圣人、施洗者圣约翰和生日圣人圣马里亚诺的守护，还受到理发师的守护圣人圣托马索的守护。出门旅行时只要向圣克里斯托弗洛祈祷一下，他就会庇护我的整个旅程。丢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只要向圣安东尼奥许个愿，就能很快找回。所有这些圣人都不行了吗？他们可都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圣人哪！”

“不光是圣人，他们还断然排斥圣像崇拜，尽管圣像和圣坛还被允许。”

“那么，壮丽的教堂和祭祀游行也不许吗？”

“不允许的。不过马里亚诺，你进到万神庙里面看过吧。围着里面

的墙壁有很多壁龛，在建造了万神庙的古罗马时代，里面安放着丘比特、维纳斯等等的神像。可是到了基督教时代，这些神像遭到了破坏，壁龛成了空洞。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徒开始把自己的上帝和圣人像放了进去。在丘比特的地方放上了基督像，在原来摆放维纳斯像的壁龛里安放了圣母马利亚像。这样，所有壁龛都换掉了古代异教的诸神，而放满了基督教的上帝和圣人像。这就是民众的信仰啊！这与人类的感情吻合得那么自然。

“豪华的教堂也是一样。对住在简陋房子里的老百姓来说，壮丽的教堂远离自己贫穷的世界，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地上天堂和奢华之中。教堂谁都能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是人们的这种感情装饰了历经数百年才建成的教堂。所以，不能简单地断定说，华丽的教堂不适合上帝居住。

“所以，天主教把这些当成了拯救信仰的根本手段。人心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变弱。我认为，壮丽的教堂、让人感到基督和圣人就在身边的雕像和绘画，以及神妙的音乐，它们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品。”

“他们的做法多么严厉阴森啊！感觉就像把色彩丰富的绘画涂成了灰色。”

“跟他们相比，我们天主教就阳光多了。生前说了好多基督教的坏话，快死的时候一脸醒悟地忏悔，死去时灵魂得到了慰藉。但是德意志人却死板地接受了这一切。过于死板，就只能让人愤怒了。”

“说起来，意大利语中的骂人话大部分都跟耶稣有关[17]啊。什么“猪一般肮脏的贵妇人”（porca madonna）、什么“淫妇的儿子”（figlio di corneto）……不胜枚举啊。”

“如此紧张、严格而阴沉的结果，但愿不会是只爱天而憎恨人吧。乍看上去很自由，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不过，教皇陛下，德意志人如此蛮横，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怨言吗？”

“我们意大利人不可以有怨言，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我们的民族创造出了‘善意是地狱里的铺路石’这样的谚语。我们深知善意行为最容易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逆反起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罔顾现实的民族，成为只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的民族。现在你会认为人性本恶了吧。所以，要用纪律来约束人们，对违反者只有严惩。我们也要成为同样憎恶意大利人的人。

“马里亚诺，今后的世界会逼迫你做出选择：是殉教还是胜利。到了那个时代，将不再需要人们故作深刻，也不需要人们冷静地观察现实。那是一个阴森的世界。”

第四场 罗马的狂欢节

西班牙大使唐·迭戈·洛佩兹走出教皇宫的大门，他走路粗野，非常愤慨。他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见到教皇。教皇正在观看化装游行，说一切与政治、宗教有关的事情，请一律等到狂欢节结束的2月12日以后再谈。更有甚者，有话传来说，如果大使也想观看，可以为他在教皇所在的阳台上摆上座位。唐·迭戈·洛佩兹愤然拒绝了。

洛佩兹带着西班牙国王兼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赋予的特别使命来访教廷。路德派的运动已经把阿尔卑斯山北面搅得不得安宁。为了应付这场运动，需要早日建立西班牙和教廷的共同战斗体制。大使认为，其他事情可以随便，但有关这件事，教皇应该放下一切来接见自己。大使不曾想会遭到拒绝，他怒不可遏。自打1492年格拉纳达解放以来，西班牙人就有一种自负，认为自己站在抗击异教徒的最前线。一定

要给国王写报告，告诉他教廷不可依靠。西班牙大使气得直咬牙，等着人把马牵来。马转眼就被牵来了，但是马夫大概是在等待主人的时候酒喝高了，他两眼通红，仰脸望着主人，那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快活事。西班牙人冷不防用拿在手上的细鞭子狠狠地抽在了马夫的脸上。马夫很快察觉到主人的不快，但自己并没有过错，只是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马夫捂着脸蹲下身去。西班牙大使看都不看他一眼，疯一样地扬鞭抽马，在空无一人的圣彼得广场上飞奔而去。化装游行的群众人声鼎沸，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好像是在欢送大使，从远处传来，又消逝在远处。

利奥十世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阳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化装游行队伍的出现，听到西班牙大使愤然离去的消息，他面不改色，只说了句“西班牙人如此单调，真没辙啊”。

今天在教皇身边的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他身穿华丽的俗装，浅黑色的年轻面庞上现出威尼斯人讥讽的微笑。听了教皇的话，他冷冷地回答道：“真黑啊！”

又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个信号，等待很久的化装游行队伍开始走过圣安杰洛桥。队伍从卡比托利奥出发，向着终点纳沃纳广场缓缓行进。为了让教皇观赏，队伍专程绕远经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桥上也挤满了群众。虽然还在2月，但天气已经暖和起来，没有一个人蜷着身子。

乐队担任先头部队，队伍整齐划一。虽是上午，但队伍中已有人喝多了，时不时跑调，冒出些奇妙的乐音。每到此时，群众就会发出笑声，迸出激励的话语：你这小子，认真点儿！跟在后面的是独眼巨人的队伍。他们两人一组，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肩上成为巨人的造型，他们穿着长黑袍，戴着纸糊的头，头上画着一只巨大的眼睛，着实吓人。看见他们成两列纵队走过来，母亲怀里的幼童吓得把脸埋在母亲的胸口不敢

看。巨人后面是一群身穿白色短衣、手持金黄色弓箭的丘比特。这群怕还不能称为少年的小孩子们一边行进一边向道路两边的观众射去金黄色的小箭。月亮女神狄安娜骑着马出现在他们身后。罗马老城区特拉斯泰韦雷地区选出的平民姑娘扮演着裸露肌肤的狩猎女神。只见她体态丰腴，俨然一尊雕像中才得一见的古代女神，观众中发出一片赞叹声。一群仙女跟在狩猎女神后面，一边跳舞，一边走来。她们薄纱轻裹着上半身，几乎透出了肌肤。在她们的后面是多达160人的一群年轻人，像是在追逐着舞蹈的仙女们。他们手中拿着意大利各地的旗帜，一边行进，一边一齐向天空抛去，旗帜落下时又敏捷地接在手里。

化装队伍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前，稀稀拉拉地有人向阳台上的教皇送去问候，然后向左拐去。教皇兴致勃勃地回应着。年轻人跳着舞走过去以后，走过来的是几辆没有华盖的马车，上面载着各色各样打扮成异国风格的人。这是被古罗马帝国打败了的国王和女王们，其中还有身着深红底金色衣服的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头戴金色月桂冠的尤利乌斯·恺撒紧贴着克莉奥帕特拉。见到这一幕，围着教皇挤满阳台的枢机主教、教皇心腹和各国大使发出了一阵哄笑。教皇利奥的小丑马里亚诺修士用他那一副穷酸相的身体扮演着古罗马最伟大的将军，还把身体靠在克莉奥帕特拉膝上腻来腻去。教皇说难怪从一大早起就没见到马里亚诺……之后他便笑得说不下去了。再后面走过来的是马车队伍，每辆马车上都坐着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位。罗马老百姓扮演着诸神。经常微服私访、了解罗马民情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向教皇一一介绍说，扮演丘比特的是鲜花广场旅馆的老板，扮演战神马尔斯的是孔塔里尼家的仆从……

化装队伍的最后是载着酒神巴克斯的马车。马车四面都装饰着仿制的葡萄串和葡萄叶。拉车的驴子不肯走，每当这时，沿街群众中都会跑出来几个人，嘿嗬嘿嗬地热闹地推车。酒神靠近时，观众发出一阵笑声。有人一边笑一边仰头朝阳台上望去，阳台上也有人哧哧地偷笑。酒神一只手举着巨大的葡萄酒杯，坐在那里肥胖的肚子显得碍事。他硕大

的脑袋上带着葡萄叶冠，无论是谁看都觉得太像利奥十世了。这一定是故意而为的。酒神回应沿街群众欢呼的动作，活脱脱就像教皇利奥十世向众人祝福一样。教皇从阳台上探出身子，把眼镜贴近眼睛，表情吃惊地望了一会儿，旋即笑了出来。刚才一直忍住笑和禁不住在偷笑的人，听到教皇的笑声放下心来，也毫无拘束地笑出声来，久久停不住。这天化装游行的费用由罗马市承担，教皇也出了钱。

这一天是“肥胖礼拜四”（giovedi grasso）。再用不到一个礼拜，狂欢节就要结束，进入四旬节了。在持续40多天的四旬节期间，人们要谨慎饮食，清洁身体，认认真真地迎接复活节。一个礼拜内要摄取维持40多天的营养，因而在1月6日主显节开始的狂欢节最后一个礼拜里，人们要尽量多吃，尽量多喝，能闹就闹，来迎接狂欢节的最高潮。这一天，教皇御赐的肉和葡萄酒送到了罗马的贫民区。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上面有6个小球，每户得到了六杯葡萄酒和六块肉。

供应给教皇和贵客的午餐要奢侈一些。菜品是根据马里亚诺写的菜谱制作的，有炸野鸡排、孔雀肉肠、整烤塞馅阉鸡、用新鲜的奶酪蛋黄和烈性葡萄酒调制的奶油。大家评价说，只有烤全鸡味道比较一般，其他两道菜和奶油却是精制的最好美味。

午餐结束后，富人穷人都做同一件事——传统罗马人雷打不动的午睡。街上暂时安静了下来。不用说不眠不休的劳作，这时的罗马就连玩耍也不会再有了。

太阳开始下山，人们开始恢复活力。大街上戴着假面的男男女女穿梭往来，应邀参加晚会的人们开始陆续抵达贵族和富人的宅邸。然而，这天晚上的教皇宫却是一片寂静。利奥十世听从了大夫希望他不要再胖的忠告，决定一天只吃一顿饭，这天吃了丰盛的午餐，就不再吃晚餐了。晚上，在教皇的私人房间里举行音乐聚会，桌上只有一杯葡萄酒。

西班牙、法兰西、威尼斯、费拉拉还有犹太人的音乐家都参加了聚会，大家把手拿鲁特琴[18]的教皇围在中间。这些音乐家都是从各国请来为教堂的弥撒做音乐的，他们从教廷领取年薪，陪伴喜欢音乐的教皇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这天晚上，音乐家们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教皇将向最好的作品颁发奖金。选拔时每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教皇也发表自己创作的曲子，因而也有一票。

演奏从费拉拉音乐家开始。舒缓的叙事曲从敞开的大门流过等候大厅，传到走廊，连在礼宾官格拉西工作的秘书室都能听见。不光在这一天教皇宫会门洞大开，每当教皇宫举办音乐会和上演戏剧时总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不打招呼便进来听。这个惯例在教皇利奥十世治世期间从未被打破过。格拉西的作用只是把进来的人带到等候大厅，提醒他们在那里静静欣赏。即使是老百姓，也能在这时看到教皇的身影，他深深地坐在椅子里，垂头闭眼，不时随着音乐小声哼唱。

当天晚上的胜出者是犹太音乐家，他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投票。他的作品采用了古代犹太旋律，教皇也十分感佩，除了发给他奖金以外，甚至还赐给他美第奇的姓氏。

第二天凌晨，梵蒂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锤声惊醒。由于圣彼得大教堂的新建工程，人们已经习惯了雕石刻的声音。但是，这天锤声轻快，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会惊讶莫名。圣彼得广场上第一次建起高高的木看台。以前，在基督教的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任何仪式，都要在木栅栏围起来的范围内进行。教皇说，这样一来，观众人数受到限制，后面的人也看不见，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根据教皇的愿望，人们第一次在广场上建临时看台。锤声轻快是因为敲打木头的缘故。除了正面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右侧的教皇宫外，看台在东、南两个方向围了起来，把广场弄得像个方形竞技场。那天，要在这里举行骑马夺

旗赛。

上午，11点还不到，看台已被人们挤得无处插针。大教堂前，人们背对教堂，把石台阶坐得满登登的，连只猫都别想钻过去。时间一到，教皇便带着枢机主教们出现在了教皇宫的阳台上。这个阳台是教皇向信徒祝福的地方，而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观战。观众看清了教皇，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鼓掌也送给这天节目的资金赞助人。

骑士从教皇宫大门走进赛场，他们分成红白两队，每队各30人。骑士们铠甲护身，头盔上装饰着染成各队颜色的羽毛，迎风飞舞。最后入场的是双方的指挥官。红军大将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白军大将是教皇的侍从塞拉比卡。两位大将的头盔上有更多的红白羽毛，与羽毛同色的长披风一直垂到马背。

两军向教皇行礼后分东西对阵。各军中央均由大将及骑士数人簇拥守护着红白大旗。其他则是游击队，武器是长长的芦苇。这种武器很容易就会折断，手抱长芦苇捆的仆从跟在骑兵队伍的后方，一旦看到主人的武器折断，他们必须马上急速上前换上新的武器。

骑马战在震天的欢呼声中开始。两军相撞，尘土飞扬，武器折断的咔嚓声响成一片。仆从们在马匹的缝隙中间奔跑穿梭。红白交织，一片混战。被击打后飞到天空中的羽毛轻轻飘荡。有的骑士武器虽断但气势不减，骑马撞向对方。落马的人发出悲鸣。观众也狂躁起来。有人在下注赌输赢，自己一边的大旗一有倾斜，便会仰天大声叹息，而一旦敌军大旗被围，马上就会拥抱邻座的人，大声欢呼，一片嘈杂。指挥官是两军的大将，但在如此混战中，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时想起了什么似的挥舞一下红白指挥棒。红军大将根本不像是个枢机主教。他非常有能力，一见白军大本营薄弱，立即把大旗交给手下护卫，率领五骑杀向敌阵。白军大本营一心注意游击队的战斗，猝不及防，立时慌乱起来。白军大将塞拉比卡被敌军冲撞了坐骑，摔下马来。白军怯阵。红军大将趁机夺得敌军大旗，发出胜利的欢呼，奔回自家阵营。红军骑士簇拥着大

将狂奔。夺得敌军大旗后与自家的大旗并排起来的一方为胜方。白军骑士不服输，于是紧追不舍。红军骑士受阻。红军的枢机主教大将觉得用芦苇武器不过瘾，挥舞着长长的红色指挥棒朝追赶过来的敌军呼呼打去。这是违规行为，但狂热的观众并未注意到。白旗终于在一片嘈杂的欢呼声中像耷拉着脑袋一样被插到了红旗的前面。红军获胜。捏了一把汗的观众发出叹息，松了一口气。教皇看得满脸通红，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得到彻底满足的观众中，很少有人去关心牺牲者。那天，共有3人死亡，4人负伤，5匹马倒下。伤员中有白军大将塞拉比卡。死者均为落马后被马蹄踩踏致死。

礼拜六又是食肉日。虽然不是什么暴食前的运动，拉达大街上还是要举行各种赛跑活动。

这条大街有近2000米长，笔直地连接着人民广场和威尼斯广场，每到狂欢节都要举行赛跑活动。现在这条街已经不叫拉达大街了，而叫科尔索大街（Via del corso，赛跑大道之意）。赛跑的起点是人民广场，终点在威尼斯广场绕场一周后的地方。

赛跑前选手要亮相。那天，小丑、年轻人、老人、犹太人、黑人、外国人，还有马匹都要赛跑。各类选手分别乘满了没有华盖的马车。马拉着马车，绕威尼斯广场一周，然后缓缓走过笔直的大街，向起点人民广场而去。拉达大街很宽敞，路两边今天又已经挤满了不请自到的老罗马人观众。路两边所有房子的窗户上也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教皇也不例外。除了格拉西之外，其他很多人也都劝阻教皇，说教皇参加次数过多的话，传到外面不好听。但利奥十世只是付诸一笑，并不理睬。他亲自安排在面朝威尼斯广场的圣马可宫观看比赛。圣马可宫

是历代威尼斯人枢机主教的居所。教皇让科尔内罗枢机主教邀请了自己。利奥十世生性讨厌偷偷摸摸地享乐，与其躲在窗户后面偷偷看，不如堂堂正正地在阳台上观赏。观众们很快认出教皇，爆发出欢快的欢呼声和掌声。教皇还为各组的优胜者拿出了赏金。

马里亚诺在小丑的马车中间，他是这种场合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一身修士的打扮，看上去却像假扮的。他的胸前吊着一块写着“狂人之王”的牌子。年轻人的马车好似满载着一车漂亮的半裸雕像，他们都是罗马各地区选拔出来的选手。接下来的是老人马车。说是老人，但因为有60岁的年龄限制，他们都在60岁以下。他们老当益壮，不逊于年轻人。他们爱好赛跑，每到狂欢节，都会肌肉跳动，热血沸腾。娼妇们的马车装饰着不知道是谁赠送的花体字，写的是“献给带给我们幸福的女人们”。载着犹太人的马车跟在她们的后面。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毫无屈辱地在基督教大本营罗马这座剧场里享受着出演特色人物的快乐。同为异教徒的黑人也是一样。他们几近裸体的肌肤发出黑色的光泽。身着盛装的女人守在家家户户的窗前，眼睛偷偷追逐着他们。接下来是载着常驻罗马的外国人选手的马车。除了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西班牙这些在罗马有居住区的外国人以外，还有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斯堪的纳维亚的外国人，国籍多样化也表现了国际都市罗马的特色。马匹走在最后。人们牵着漂亮的阿拉伯马和号称意大利最好的来自曼托瓦的马匹走了过来。赛马是当天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些马没有骑手驾驭，让它们放开了跑，虽有马夫跟在后头，但马匹还会时常冲进观看的人群中，每年都有人因此受伤。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保障安全什么的。

那天整整一天，罗马的这一角都会在狂热中度过。在声援、欢呼和热烈的气氛中，葡萄酒杯觥筹交错，糖果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教皇利奥十世最喜欢看见人们欢天喜地。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一天了。

1521年的狂欢节不久就要结束。不分老幼贫富，人人脑子里一心只

想着贪婪地享受快乐。狂欢节以后就要进入四旬节了，一切生活都会受到严格的约束。在狂欢节期间，圣彼得广场也连日举行娱乐活动，天天人满为患。这里还进行各地区的步兵对抗战，生鸡蛋就是武器。有人违规把稍硬的煮鸡蛋带进了场，整个广场满是哇哇的抗议声和笑声。广场上还进行了斗牛表演，也少不了各地区间的足球对抗赛。足球赛是佛罗伦萨的一项传统活动。举行足球赛是罗马民众献给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的礼物。晚上也有晚上的活动。在教皇宫和贵族富人的宅邸里接连不断地举行着戏剧、舞会和夜宴。不管什么活动，结束时都会像决定好的一样走向街头。与老百姓同乐时，假面和化妆没了差别，小范围的快乐成为更大范围的快乐。

人们在期盼中迎来了狂欢节的最后一天——食肉的礼拜二。那天从一大早开始，人们就开心地交头接耳，说晚上化装了的人群将会挤满拉达大街。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们也将戴上假面化装参加，这让教皇羡慕不已。利奥十世也想隐身参加，但身边的人严肃指出说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阻止，他这才勉强断了念想。作为交换条件，他将到银行家齐吉位于拉达大街中段面朝大街的宅邸，从窗户里观赏化装的人流。

教皇为了持续观赏到深夜，那天比平时多睡了午觉。他兴高采烈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换上一身最朴素的教皇服，微服去了齐吉府邸。他从后门进去，占据了二楼窗前的位置，等待着狂欢节最后的欢乐。守候在身边的只有彼得·本博和萨多莱托两位秘书官。这两人都是那时天下顶尖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当时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写的教皇诏书和信函相当漂亮，甚至被各国宫廷作为拉丁语范本。利奥十世45岁，本博50岁，萨多莱托40岁。在等待之中，这三个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狂欢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在我看来，从结果上说，弄清起源是不可能的。好似自从人们有了痛苦，便一直试图把它忘掉一样。”

“也许是那样，陛下。狂欢节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在这以前久远

的过去，是有隆冬节的。”

“萨多莱托，你怎么想？”

“我对陛下深刻的洞察力敬畏不已。酒神是唯一一个不代表人类之德的神，但民众对他的支持似乎不逊于代表人类之德的奥林匹斯诸神，以酒神为主神的狂欢节似灭不灭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听说在希腊时代，狂欢节期间不允许抓人。到了罗马时代，在狂欢节期间，奴隶和主人的位置要颠倒过来，主人要穿上奴隶的衣服，做饭做菜，说是在生的享受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假面被更多地用来消除平日里身份地位的差别。”

“还有这样的传说，多米提安努斯皇帝[19]脱去长袍，摘掉月桂冠，戴上了普通人在狂欢节戴的帽子。”

“这样一来，假面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都想变成别的什么人，谁都无法彻底抛弃这种欲望。但是戴上假面，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不但能变成另外一个人，还能变成另外几个人。只要换换假面就行了。满足这个欲望极为简单。”

“这就是当演员啦。每个人都具备当演员的才能。戴上假面，就能扮演平日里不可能做的角色。观赏的人明明知道是假，却很享受这种假。化装，充满了戏剧要素。”

“是吧。不过，通俗地说，只要戴上假面，就可以忘记羞耻，疯狂吵闹。只有教皇没有这个权利，不公平啊。”

“陛下，那是自然的。狂欢节认可的这种疯狂吵闹的正当性，从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时代开始就被禁止了。教皇就是禁止的罪魁祸首。但罗马似乎总是异教的，尽管兼任罗马主教的教皇多次发出禁令，加以谴

责，也不见效果，狂欢节延续了下来。不过，基督教开始逐步战胜了这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最后的异教事物，549年，在大竞技场举行了最后一次赛跑。此后罗马便陷入了沉默。从那时开始直到8世纪结束，罗马都没有娱乐的记录。”

“9世纪、10世纪开始渐渐恢复了一些，到了11世纪，狂欢节以‘自由节’‘疯狂节’的名目复活了。人需要有疯狂时间。”

“圣人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严厉的谴责也没有奏效啊。”

“不给人时间疯狂，他整个一年中都会邋邋遢遢有点疯。这也不太好。”

“天主教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四旬节前一周定为狂欢节，把时间和古代节日巧妙地吻合起来。”

“这是我们的祖传本领。”

“由此产生了古代异教与基督教的混血儿——罗马狂欢节。”

“是的。不过，直到15世纪下半叶教皇保罗二世开始下力气抓，狂欢节才盛行起来。”

“是啊，没人出钱是不行的。”

“只要费用有个目标就好办了。意大利人是一个天生不缺戏剧元素的民族。尤其在罗马，有自古以来的传统。罗马的狂欢节出名，也是当然的发展结果。”

时间在闲聊中逝去。大街上不知不觉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竞相戴上了自己心仪的假面。表情丰富的假面是向摩德纳订的货。还有人只把眼

睛用白色假面掩住。船型马车满载年轻姑娘通过时，道路两侧的窗户里洒下了更多的糖果和纸片。化装群众的人流就像一条五彩缤纷的大河缓缓流淌，人们左碰右撞，相互融化。这人流看上去似停非停，似动非动。

有人扮成古罗马皇帝。有人扮成枢机主教，一边从他身边走过，一边向沿街的群众送去祝福，那架势比真的枢机主教还要好。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化装成小丑上了街。如果今天他们碰上了假枢机主教，就得走过去跪在他面前行礼。笑声和奏乐声震耳欲聋。土耳其苏丹追逐着圣母马利亚，奥林匹斯诸神跑过来保护马利亚。肥胖的基督看着这一切呵呵地笑着。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很不严肃地搅和在了一起。不过，异教与基督教的这种混合中有一种东西让人觉得，只有宽容才符合自然。

突然，有人发出了哀号。大家一齐朝那个方向望去。原来是死神穿着黑衣，挥舞着巨大的镰刀，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白得发蓝的头盖骨假面在从头裹到脚的黑衣里格外醒目，令人恐惧。死神展开黑衣，好像要把人们包进去一般。他挥舞着闪着银光的大镰刀，呼呼作响，像是在切割空气。孩子们大声哭着，四处逃散。就连大人们，包括皇帝、枢机主教、圣母马利亚、土耳其苏丹，还有不死的奥林匹斯诸神也都显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躲着死神。人们逃走了，死神在无人的街道的中央放肆地走过。女人们赶紧在胸前画十字，男人们按照习俗赶紧摸着自己的睾丸祛灾。在齐吉家窗前观赏的三个男人苦笑着，也如法炮制一番。

就在这时，台伯河对岸放起了烟花，好像要吹走人们的忧愁。一炮接一炮的烟花爆炸声让人心情爽朗。光亮和色彩洒满夜空，把人们的心情从死神走过时的阴沉中拉了回来。欢声再度响起，假面重又活动起来，充满了生气。人群戴着色彩丰富的假面复又流动起来。糖果满天飘撒，到处爆发出欢笑声。烟花大大地散开再熄灭。

“没有比地中海世界对人性更为宽容的地方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开心地活着，不用为原罪意识而苦恼。

“我不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缺少人类与生俱来的开朗和对死亡的平静。我无意批评北方人的生活方式。我只是觉得自己在那里无法生存。”

本博和萨多莱托对利奥十世的这番话很有同感，不停地点着头。

此后不到10个月，1521年12月1日，利奥十世去世了。再过不到10天就要迎来他的46岁生日了。在今天看来，他可能死于急性肺炎，好像是在狩猎的地方着了凉。他几近猝死，连最后的忏悔都没有来得及做。按照天主教教义，他躲不过要去炼狱的命运了。

他治世期间不但花费了450万达克特，死时还留下了将近70万达克特的债务。债权人名单如下：

比尼、斯特罗齐两家银行	200000 达克特
加迪银行	32000 达克特
里加索里银行	20000 达克特
教皇侍从塞拉比卡	18000 达克特
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	80000 达克特
里多尔菲、兰戈尼两枢机主教	确切金额不详
普奇枢机主教	150000 达克特
阿梅里尼枢机主教	150000 达克特

债权银行都是趁利奥十世即位时进入罗马大赚其钱的佛罗伦萨银行，枢机主教也都是托他的福爬上了枢机主教的地位，获得了巨大收入来源的佛罗伦萨人。他们利用与教皇的亲近关系获取了巨大利益。比尼和斯特罗齐两家银行因借钱给教皇导致它们濒临破产，普奇和阿梅里尼两位枢机主教也把全部财产借给了教皇。教皇突然去世，他们的脸都变绿了。他们从利奥十世的年龄考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早逝。当时的编年史这样写道："利奥十世吃掉了三代教皇：前任尤利乌斯二世的储蓄、自己在位期间的收入和让下任可支出的那份钱财。"

受到牵连的不光是债主。装饰三重冠的宝石、十二使徒雕像、银质大花瓶、从地毯到挂毯，凡是能成为借款抵押物的东西均未能幸免。教廷当局得知如此惨状后，何止是脸色变绿，他们简直绝望了，人人坐立不安。为了救急，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方案，要卖掉特拉西梅诺湖。可是，这个湖只适合狩猎，不可能轻易会有买家。

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会产生尽量节约以渡难关的想法。教皇葬礼上用的蜡烛也不是新的，而是从先前去世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过的中间拨出了一部分。连葬礼都是如此，造墓更是梦想。尤利乌斯二世生前就让米开朗琪罗为自己营造了宏大的陵墓。但利奥十世不这样。作为罗马教会之长的教皇，他对自己的纪念碑是否流传后世毫无兴趣，不可能为自己准备好陵墓。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留存至今的陵墓，是他去世20多年后，在保罗三世教皇时代才好不容易成形的。

尽管伊拉斯谟的讽刺与嘲笑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位美第奇教皇却热爱伊拉斯谟的这种精神。他还坦然地接受了路德的谴责与弹劾。他如此地自信自己的优越性，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随着他的辞世，罗马和意大利从世界史主人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文艺复兴时代结束了。

使文艺复兴消亡的最后一击，发生在利奥十世教皇死后6年的1527

年。皇帝卡洛斯派来的大军对罗马进行了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和掠夺。

这次“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主角不是身为天主教徒的皇帝，而是在入侵罗马时成为群盗的路德派信徒德意志佣兵。对他们这些纯正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来说，罗马正如路德所谴责的那样，是连异教徒土耳其人都恶心的堕落与颓废之都，是正义之民替上帝予以神罚的头号对象。这给了被欲望冲昏头脑的群盗以大义名分。罗马在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胜利欢呼声中化作废墟。

在以后发生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和意大利都未扮演主角。用司汤达[20]的话说，过于严厉之事不符合意大利人的气质，请尽早转到西班牙去吧。在那个时代，神职人员严禁假扮成俗人，俗人也严禁假扮成神职人员。那时，西斯廷礼拜堂壁画上米开朗琪罗画的裸体基督像，以及教廷收藏的腰间用蓝色颜料画了一圈腰布的古代裸体雕像，都只是用无花果叶形状的石片遮住性器。意大利人富于文艺复兴精神，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正义之民，也干不出宗教裁判所和猎巫那样的事来，而这些却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后面的时代。

就像预感到这天会到来一样，利奥十世死后第二天，在老百姓贴匿名信的地方——帕斯奎诺石雕像[21]的胸前贴出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把罗马借给你！”

---

[1]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全称为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修道会，又称条顿骑士团，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1190年由日耳曼人创立于巴勒斯坦阿卡，最初为医护性质的慈善团体，1198年改为军事修会，次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是中世纪三大骑士修道会之一（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2] 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1478——1534），“豪华者”洛伦佐之子、1478年死于“帕齐的阴谋”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他于1513年成为枢机主教，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523——1534年在位。

[3] 主显节（Epiphany/Baptism Day），基督教综合性节日，又称耶稣受洗节。教会规定每年1月6日，即圣诞节后的第12天为主显节，以庆祝耶稣曾向世人显示其神性，并纪念耶稣受洗及迦拿婚宴。

[4]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5]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兴盛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创作了大量的壁画和祭坛画。代表作有《施洗约翰的诞生》《阶梯上的圣母马利亚》等。

[6] 拉奥孔（Laokoon），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阿波罗的祭司。他识破了希腊人的木马攻城计，女神雅典娜派巨蛇缠死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群像是以此为题材的著名群雕像。

[7]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janus Hadriannus，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他改变了前代皇帝图拉真的征外政策，致力于内部治理，下令修筑了著名的不列颠省长城（哈德良长城）。

[8] 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Francesco Sodelini，1453——1524），佛罗伦萨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二弟，当时罗马教廷的主要外交家之一和教廷文艺复兴的形象人物。1503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帮助下成为枢机主教。后卷入谋害教皇利奥十世的阴谋活动中，阴谋败露后于1517年自我流放，1521年返回罗马。

[9] 彼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对近代意大利语的形成有很大贡献，对音乐和戏剧也颇有贡献。曾任教皇秘书，1542年成为枢机主教。

[10] 雅各布·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拉丁语诗人，出生于摩德纳。后成为教皇利奥十世的秘书，忠于教廷，勤勉努力，于1536年成为枢机主教。

[11] 阿德利安六世教皇（Pope Adrian VI，1459——1523），出生于荷兰，1522——1523年在位。他在晚期经院哲学领域著述甚丰，1517年任枢机主教。

[12] 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先驱。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造型力创造出划时代的绘画风格。作品有《圣弗朗西斯科传》《圣母和救世主传》《两约翰传》等。

[13] 赫利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5——1415），希腊学者、外交家、教师、翻译家。他把荷马及柏拉图的著作译为拉丁语，是中世纪末期将希腊文学传入欧洲的先驱者。他教授希腊语，著有欧洲第一本希腊语法书。

[1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家。1505年入奥古斯丁会研习神学，1507年任神父，1512年任维藤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撰写《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1年与教廷公开决裂。他在神学上强调因信称义，提倡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将《圣经》译为德文。

[15] 选帝侯（kurfürst），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拥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定帝国重要事项特权的诸侯。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立了七选帝侯制。

[16] 禧年（Jubilee Year，又译“圣年”），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定期举行赦罪、朝圣等特殊庆祝活动的年份。据《旧约圣经·利未记》，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每间隔49年后的第50年为圣年，是可连续两年不种不收的大安息年，被视作大喜之年，故名。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300年颁布通谕，规定每百年一次禧年，是为基督教禧年之始。1350年，教皇克雷芒六世接受瑞典圣女布丽吉达关于每50年一次禧年的建议，举行了第二届禧年。教皇保罗二世又于1470年宣布每25年举行一次禧年。此外，为纪念耶稣33岁时殉难，罗马教会曾于1933年和1983年举行过“非常禧年（小禧年）”庆祝活动。

[17] 下文提到的“猪”是“污秽”、“蠢陋”之物，人不能“犯奸淫”，这些都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言论，故有此语。

[18]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19] 多米提安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nus，51——96），罗马帝国第11代皇帝，81——96年在位。

[20]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是其代表作。

[21] 帕斯奎诺石雕像（Statua di Pasquino），位于罗马的一尊并无艺术性的石雕像，以其著名的讽刺作用而闻名，象征言论自由。传说这尊石雕像发现于一位因批评教皇出名、名叫帕斯奎诺的裁缝家附近，遂以命名。民众可以匿名方式在雕像上贴涉及诽谤、政治、宗教或只是抒发心情等内容的各种纸条。1509年起，这些评论被收集起来，整理后于来年年初加上插图出版，成为批评和讽刺社会的作品，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参考文献

缩略符号

ASI =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RIS =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关于四位教皇的历史记载

原始资料——当时的记录、年代记、历史著作

ALBERT, E., *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durante il secolo XVI*, Firenze, 1839-55.

BEMBO, P., *Opera historica*, Basel, 1567.

BURCHARDO, J., *Diarium sive rerum Urbanarum commentarii (1483-1506)*, Paris, 1883-85; *Liber notarum (1483-1506)*, 《RIS》 XXXII 2, Bologna, 1907-42.

CIACONIO, A., *Vitae et res gestae Pontificum Romanorum et 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Cardinalium*, Roma, 1667.

COMMYNES, Ph. de, *Memoires*, Paris, 1903.

CORIO, B., *Historia di Milano*, Padova, 1646.

DE GRASSIS, P., *Diarium*, Wien, 1882.

GIOVIO, P., *Vitae illustrium virorum*, Basel, 1576-77.

GUICCIARDINI, F., *Storie Fiorentine dal 1378 al 1509*, Novara, 1970; *Storia d'Italia*, Bari, 1967;『リコルディ——政治と人間をめぐる断章』永井三明訳，東京，昭和45年.

INFESSURA, S., *Diario della città di Roma*, Roma, 1890.

MACHIAVELLI, N., *Opere complete*, Milano, 1960-65;『マキアヴェリ（君主論・政略論）』会田雄次責任編集，東京，昭和41年.

NARDI, J., *Istorie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Firenze, 1888.

PRIULI, G., *I Diarii (1494-1512)*,《RIS》XXIV 3, Bologna, 1912-41.

SANUDO, M., *I Diarii*, Venezia, 1879-1903.

SIGISMONDO dé CONTI di FOLIGNO, *Le Storie de' suoi tempi dal 1475 al 1510*, Roma, 1883.

VARCHI, B., *Storia Fiorentina*, Torino, 1852.

VASARI, G.,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utori e architettori*, Firenze, 1927.

第二史料——后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庇护二世

多著者共作（TRECCANI 版），*Storia di Milano* vol. VII & VIII, Milano, 1956-57.

ADINOLFI, P., *Roma nell'età di mezzo*, Roma, 1881.

BASCHET, A., *La Diplomatie Vénétienne*, Paris, 1862.

BELLONCI, M., *Lucrezia Borgia*, Milano, 1960.

BURCKHARDT, J.,『ブルクハルト（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柴田治三郎責任編集，東京，昭和41年.

CIPOLLA, C., *Le Signorie dal 1300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 *Società e costume.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5.

COPPI, A., *Discorso sopra le finanze di Roma nei secoli di mezzo*, Roma, 1847.

ERCOLE, F., *Da Carlo VIII a Carlo V. La crisi della libertà italiana*, Firenze, 1932.

GREGOROVIUS, F.,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n V bis zum XVI Jahrhundert*, Stuttgart, 1886-96.

HEFELE, C.J., *Histoire des Conciles*, Paris, 1907.

HOLLIS, C., *Il Papato*, Milano, 1964.

MARCORA, C., *Storia dei Papi*, Milano, 1961-66.

MÜNTZ, E., *Les antiquités de la ville de Roma aux XIV, XV et XVI siècles*, Paris, 1886.

PASTOR, L. von, *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 Medio Evo*, vol. 1-4, Roma, 1950-61.

PIERI, P., *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 Torino, 1970.

RANKE, L. von, *Storia dei Papi*, Firenze, 1965.

REUMONT, A., *Della diplomazia italiana dal secolo XIII al XVI*, Firenze, 1857.

RODONACHI, E., *Rome au temps de Jules II et de Leon X*, Paris, 1912.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912-25.

SISMONDI, S. de, *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Paris, 1809-18.

VALERI, N., *L'Italia nell' età dei principati dal 1343 al 1516*, Milano, 1969.

VILLARI, P., *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 Milano, 1895-97.

庇护二世

ATIYA, A.S., *The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38.

BABINGER, F., *Maometto il conquistatore*, Torino, 1967.

BARONI, G.M., *Pio II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Roma, 1936.

CAMPANO, G.A., *Vita di Pio II*, 《RIS》 III 3, Bologna, 1964.

CARUSI, E., *Preventivi di spese per la spedizione contro il turco al tempo di Pio II*, 《Archivio Muratoriano》 16, Bologna, 1922.

CASANOVA, E., *Un anno della vita privata di Pio II*, Siena, 1931.

CASTELLINI, A., *I due grandi animatori della Crociata: S. Caterina da Siena e Pio II*, Siena, 1939.

CRIBELLI, L., *De expeditione Pii papae II adversus Turcos*, 《RIS》 XXIII 5, Bologna, 1950.

FRUGONI, A., *Incontri nel Rinascimento. Pagine di erudizione e di critica*, Brescia, 1954.

GAETA, F., *Il primo libro dei Commentarii di Pio II*, L'Aquila, 1966.

GIBBON, E.,『ローマ帝国衰亡史』村山勇三訳，東京，昭和26年.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ASI》 VII 1 & 2, Firenze, 1843.

MANFRONI, C.,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Milano, 1970.

PAPARELLI, V.G.,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Bari, 1950.

PICOTTI, G.B., *La dieta di Mantova e la politica dei veneziani*, Venezia, 1912.

PII II PONTIFICI MAXIMI, *Commentarii rerum memorabilium quae temporibus suis contigerunt*, Frankfurt, 1614; *Opera omnia*, Basel, 1551; *Lettera a Maometto II*, Napoli, 1953.

PLATINA, B., *Vita di Pio II*, 《RIS》 III 3, Bologna, 1964.

SCHIVENOGLIA, A., *Cronaca di Mantova dal 1445 al 1484*, 《Raccolta di cronisti e documenti storici lombardi inediti》 II 121-194, Milano, 1857.

VOIGT, G.,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als Papst Pius der Zweite und sein Zeitalter*, Berlin, 1856-63.

亚历山大六世

多著者共作（OISCHKI 版）, *La vita privata a Firenze nei secoli XIV e XV*, Firenze, 1966.

ACCADEMIA D'OROPA , *Alessandro VI e Savonarola*, Torino, 1950.

CAPPELLI, A.,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Modena, 1869.

CRIVELLUCCI, A., *Del governo popolare di Firenze (1494–1512) e del suo riordinamento secondo il Guicciardini*, Pisa, 1877.

DALL'ORO, I., *Papa Alessandro VI*, Milano, 1940.

DELABORDE, H.F., *L'expedition de Charles VIII en Italie*, Paris, 1888.

DE ROO, P., *Material of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 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s*, Bruges, 1924.

FERRARA, M., *Prediche e Scritti di Girolamo Savonarola con annesso saggio bibliografico*, Firenze, 1950; *Savonarola*, Firenze, 1952.

FERRARA, O., *Il Papa Borgia*, Novara, 1969.

GEIGER, L., *Alexander VI und sein Hof*, Stuttgart, 1920.

JOHNSTONE, M.A., *The life in Florence in the 15th century*, Firenze, 1968.

LANDUCCI, L., *Diario Fiorentino dal 1450 al 1516 continuato da un anonimo fino al 1542*, Firenze, 1969.

LEONETTI, A., *Papa Alessandro VI secondo documenti e carteggi del tempo*, Bologna, 1880.

LUOTTO, P., *Il vero Savonarola ed il Savonarola del Pastor*, Firenze, 1900.

MAGNI, V., *L'apostolo del Rinascimento*, Firenze, 1939.

MATARAZZO, F., *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 dal 1492 al 1503*,《ASI》XVI 2, Firenze, 1851.

OLSCHKI, L., *Bibliotheca Savonaroliana*, Firenze, 1898.

PEPE, G., *La politica dei Borgia*, Napoli, 1946.

PORTIGLIOTTI, G., *Un grande monomane: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Torino, 1902.

RIDOLFI, R., *Studi Savonaroliani*, Firenze, 1935; *Vit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Roma, 1952.

ROEDER, R., *Savonarola. A study in conscience*, New York, 1930.

SANUDO, M., *La spedizione di Carlo VIII in Italia*, Venezia, 1873-82.

SAVONAROLA, G., *Le lettere*, Firenze, 1933; *Prediche e scritti commentati*, Firenze, 1952; *Opere*, Roma, 1955.

SCHNITZER, J., *Savonarola. Ein Kulturbild aus der Zeit der Renaissance*, München, 1924.

SORANZO, G., *Il tempo di Alessandro VI Papa e di fra' Girolamo Savonarola*, Milano, 1960.

VILLARI, P., *La stori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e de' suoi tempi*, Firenze, 1930.

尤利乌斯二世

BALAN, P., *Gli assedi della Mirandola di Papa Giulio II nel 1511 e di Papa Giulio III nel 1551 e 1552 narrati secondo i più recenti documenti*, Mirandola, 1876.

BONARDI, A., *Venezia e la lega di Cambrai*, 《Nuovo Archivio Veneto》 VII, Venezia, 1904.

BROSCH, M., *Papst Julius II und die Gründung des Kirchenstaates*, Gotha, 1878.

CARDO, G., *La lega di Cambray*, Venezia, 1895.

DUMESNIL, A.J., *Histoire de Jules II*, Paris, 1873.

FANTI, J., *Imola sotto Giulio II*, Imola, 1882.

FRATI, L., *Le due spedizioni militari di Giulio II tratte dal diario di Paris de Crassis*, Bologna, 1886.

FUSERO, C., *Giulio II*, Milano, 1965.

GIUSTINIAN, A., *Dispacci (1502-05)*, Firenze, 1886.

HONIG, R., *Bologna e Giulio II*, Bologna, 1904.

LUZIO, A., *Isabella e Giulio II. 1503-05*, 《Rivista d'Italia》 XII 2, Roma, 1909; *I preliminari della lega di Cambray concordati a Milano ed a Mantova*, Milano, 1912; *Isabella d'Este di fronte a Giulio II negli ultimi tre anni del suo pontificato*, Milano, 1912.

RODONACHI, E., *Histoire de Rome: le pontificat de Jules II*, Paris, 1928.

VARALDO, O., *Sulla famiglia Della Rovere*, Savona, 1888.

利奥十世

ADEMOLLO, A., *Alessandro VI, Giulio II e Leone X nel Carnevale di Roma*, Roma, 1967.

BORGATTI, M., *Castel S. Angelo in Roma. Storia e descrizione*, Roma, 1890.

CHAMBERS, D.S., *Artists and patron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1970.

CLEMENTI, F., *Il Carnevale Romano nelle cronache contemporanee*, Città di Castello, 1938-39.

DANDOLO, T., *Il secolo di Leone X*, Milano, 1861.

DE GRASSIS. P., *Il diario di Leone X*, Roma, 1884.

DE ROOVER, 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 (Mass.), 1963.

FERRAJOLI, A., *La congiura contro Leone X*, Roma, 1919.

GNOLI, D., *La Roma di Leone X*, Milano, 1938.

GUALINO, L., *Storia medica dei Romani Pontefici*, Torino, 1934.

LUZIO, A., *Isabella d'Este e Leone X*, 《ASI》 XLIV, Firenze, 1909.

LUTERO, M., *Lettera a Leone X*, Torino, 1970;『ルター（キリスト者の自由、他)』松田智雄責任編集，東京，昭和44年.

MARINI, G.B., *Degli Archiatri pontifici*, Roma, 1784.

MONDOLFO, G.U., Pandolfo *Petrucci Signore di Siena*, Siena, 1899.

NITTI, F., *Leone X e la sua politica*, Firenze, 1892.

PICOTTI, G.B., *La giovinezza di Leone X*, Milano, 1927.

PIERACCINl, G., *La stirpe dei Medici di Cafaggiolo*, Firenze, 1924.

ROSCOE, W., *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Leo the Tenth*, London, 1806.

WINSPEARE, F., *La congiura dei Cardinali contro Leone X*, Firenze, 1957.

插图来源一览

图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2：当选庇护二世教皇的艾伊尼阿斯·皮科罗米尼（局部）平图里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3：韦基耶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Roger-Viollet,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4：詹蒂利·贝利尼画伦敦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ary, London

图5：基督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图里乔画梵蒂冈泥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6：芙拉·巴托洛梅奥画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7：引自萨伏那罗拉演讲集

图8：摄影：松藤庄平

图9：作者不详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0：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12：多索·多西画德斯特美术馆（摩德纳/意大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3：丢勒画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54

图14：作图：峰村胜子

图15：圣彼得镣铐教堂（罗马）© Scala, Firence

图16：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7：弗朗索瓦·克卢埃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8：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盐野七生作品：文艺复兴的故事（全六册）
[日]盐野七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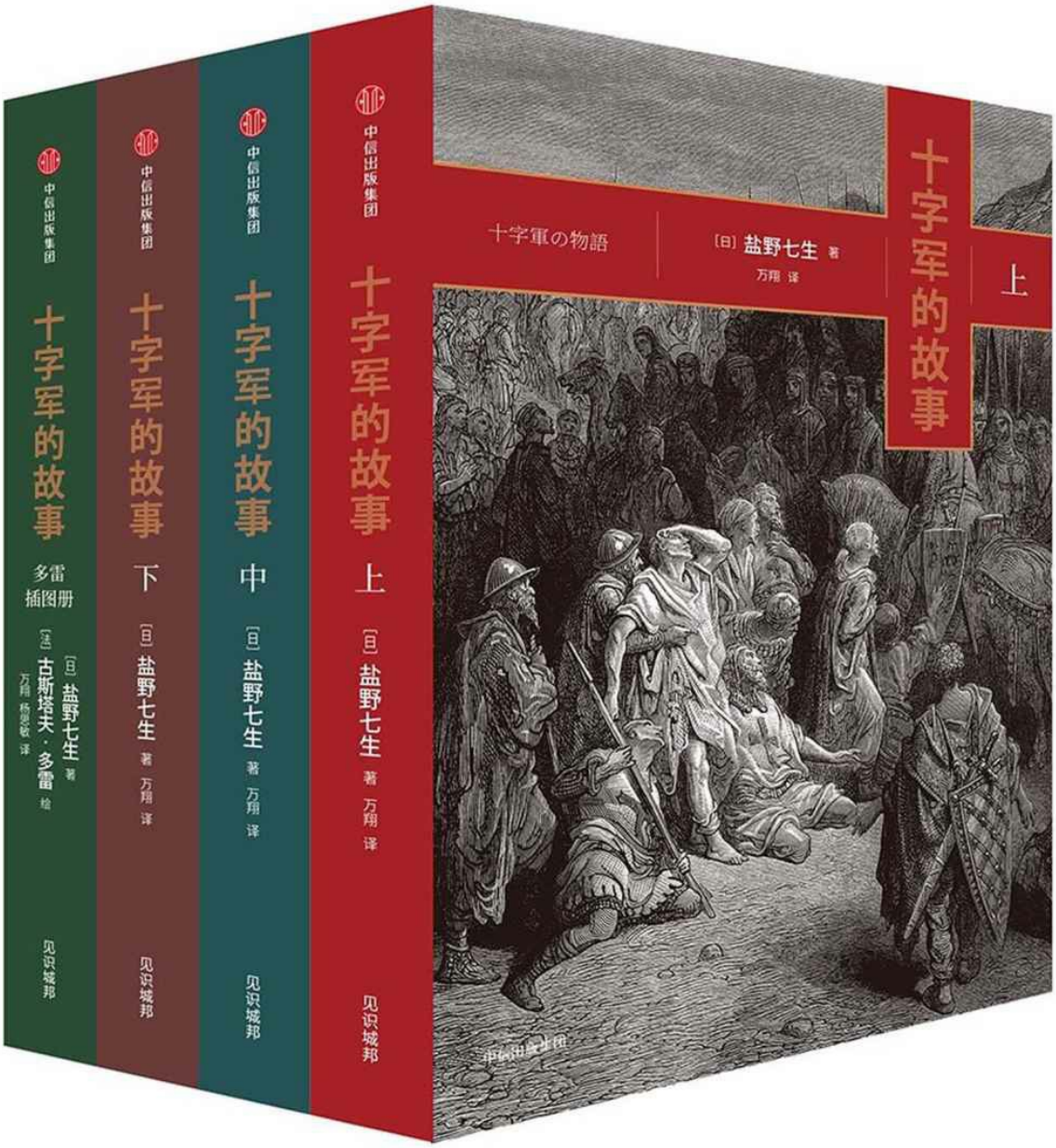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中信出版集团
十字军的故事
多雷
插图册
[日] 盐野七生 著
[法] 古斯塔夫·多雷 绘
万翔 杨思敏 译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
十字军的故事 下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
十字军的故事 中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
十字軍の物語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十字军的故事 上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见识城邦
上
十字军的故事
中信出版集团

十字军的故事：全四册

[日]盐野七生 著
万翔 杨思敏 译

中信出版社

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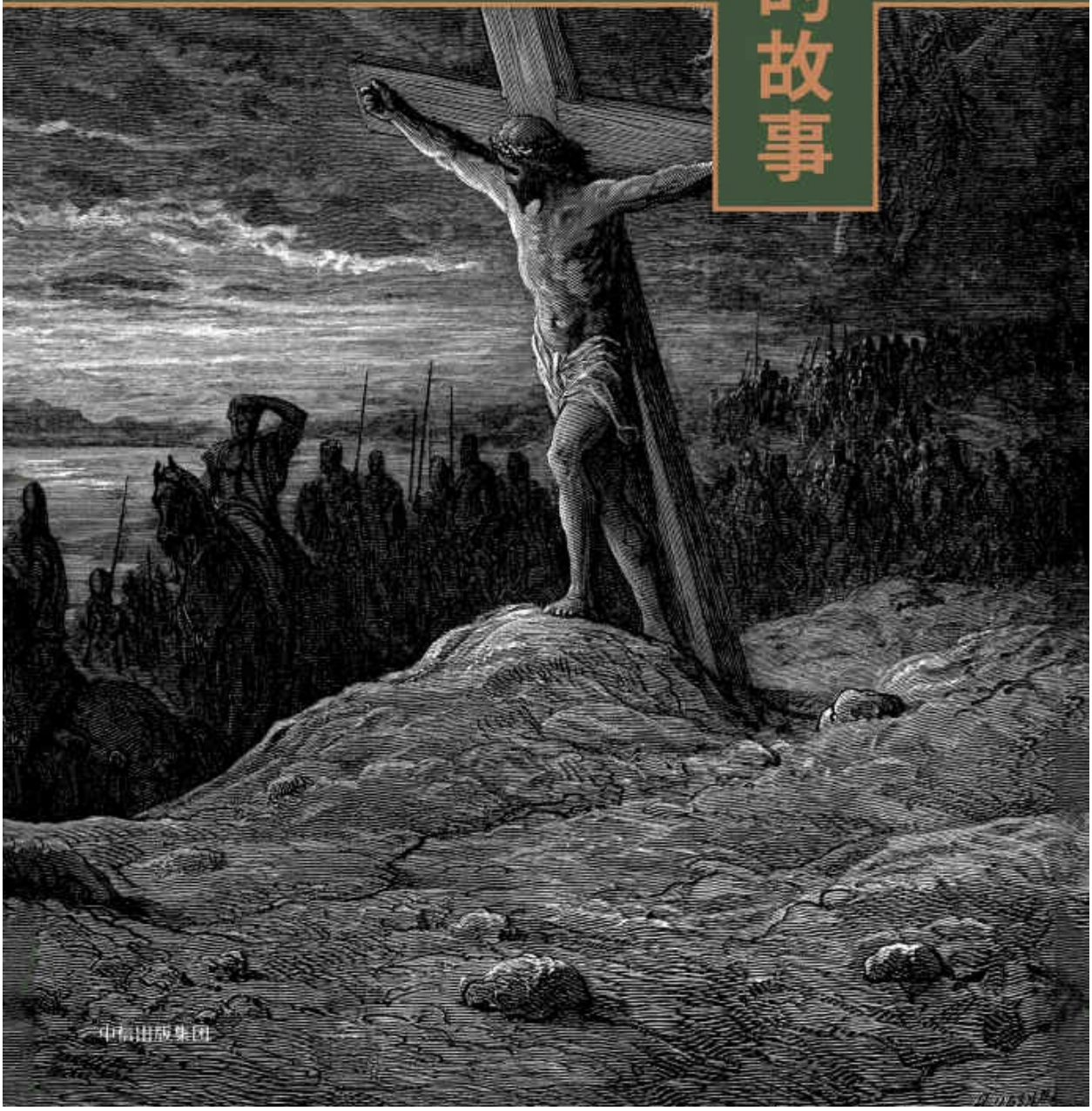
十字军的故事绘图版
十字军的故事 上
十字军的故事 中
十字军的故事 下
返回总目录

十字军的故事

十字軍の物語

[日] 盐野七生 著
[法] 古斯塔夫·多雷 绘
万翔 杨思敏 译

多雷
插图册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盐野七生致读者
穆斯林向朝圣路上遇到困难的基督徒伸出援手
夜夜受冤魂惊扰的富尔克
隐士皮埃尔，在法国各地呼吁圣战
“神的期望”
愤怒的匈牙利人挥剑阻挡十字军的去路
攻占布拉迪斯拉发的十字军
被东方的奢华震撼到的十字军战士
戈德弗鲁瓦穷追皮埃尔所率领的贫民十字军
尼西亚攻防战
将一千名穆斯林士兵的首级扔进尼西亚
先行者的末路
鼓舞士气的神职人员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率领的勇猛无畏的十字军
战斗结束后为阵亡将士做法事的神职人员
翻越陶鲁斯山脉的十字军
打响安条克攻防战
波埃蒙多半夜爬上绳梯
攻陷后的杀戮
巴托罗缪，挑战“火的试炼”
一路同行的基督
遥望耶路撒冷，十字军战士感动不已
忍受干渴之苦的十字军
第二次总攻，以失败告终
出现在橄榄山上鼓舞士气的圣乔治
带头攻占耶路撒冷的戈德弗鲁瓦
在意外发现的十字架面前感动落泪的十字军战士

拜访胜者戈德弗鲁瓦的穆斯林城市领主
在阿尔苏夫攻坚战中，穆斯林一方企图利用达布奈斯胁迫十字军
在清真寺避难依然被杀害的穆斯林
200名英勇战士对抗2万敌军
挽救幸存骑士生命的阿勒颇领主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之死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圣贝尔纳面前宣誓率领十字军东征
为十字军发起的筹款运动
康拉德率领的德意志军暴尸小亚细亚山野
南德的卡林兹亚伯爵贝尔纳德和他的部队在乱石中遇难
在战场上孤立无援的法国国王路易
被风沙吹散的叙利亚军队
身负重伤等待死亡的战士们
被俘虏的西欧女性
萨拉丁的出场
在“真十字架”面前祈愿胜利，奔赴战场的战士们
圣殿骑士团团长雅克·德·莫莱壮烈牺牲
倾撒在殉教战士尸体上三夜的奇迹之光
感恩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导师
阿克攻防战
理查违背留命诺言，杀害投降的伊斯兰士兵
被伊斯兰大军围困坚决不退让的理查和他的士兵们
基督教骑士和伊斯兰教骑士之间的马上枪术比赛
坚强的女性
阿尔苏夫围城战，十字军和伊斯兰军队之间的交锋
冲在最前方如狮子般行动迅速的理查
狮心王理查夺回雅法
布隆德尔听到理查的声音
元首丹多洛向聚集在圣马可教堂的市民宣传十字军的必要性
十字军灵活运用的诸多攻城设施
皇帝阿莱克西斯被一位亲属缢杀
穆尔祖弗洛斯向丹多洛提出讲和
第四次十字军入驻君士坦丁堡

少年十字军
聆听吟游诗人吟唱的十字军主题的法国大众歌曲
出现在山那边的十字架
向犹太山野进发的第五次十字军
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走向死亡的战士
签订停战协议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前去拜访苏丹
没有杀害一人的十字军
在先祖墓前宣誓加入十字军的战士们
告别家人
祝福
在歌声中远离故乡的战士
奔赴战场
第七次十字军出征
法国国王路易踏上埃及的国土
胜利之后十字军战士来到教会向上帝表达感谢之情
最高司令官被斩首示众，落入敌方的女性们悲愤至极
接受洗礼的穆斯林
看到前面来救援的船队，十字军战士欣喜若狂
十字军在河边打捞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士兵的遗体
法国国王路易被俘
被押送至埃及的十字军战士
在埃及过着牢狱生活的骑士们
苏丹摩尔达姆之死
噩耗
归来的十字军
女苏丹
马木路克王朝苏丹的暴虐
“圣路易”之死
绝地反击的人们
留在战场上的神职人员
被遗弃在异教地区的圣墓教堂

追念亡者
聆听归乡老兵讲述故事的孩子们
旅行家萨努德将东方地图赠予教皇
面对塞尔柱军队的侵犯，皇帝帕里奥洛格斯主张抗战到底
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前鼓舞士气
摩尔人最后的国王撤离格拉纳达
勒班陀海战
返回总目录

盐野七生致读者

当我最初计划写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四卷历史故事时，我想的是把其中第一卷用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1883，法国版画家——译者注）的版画做插图，但最终我没有那样做。30年前的我，还没有开始写关于十字军的故事，我所关心的也不是中世纪的十字军，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也就是在那时候，我遇到了多雷的版画。

在我造访威尼斯的旧书店时，读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弗朗索瓦·米肖的《十字军的历史》，该书的配图，就是生活于该世纪后半叶的古斯塔夫·多雷的版画。我所读的意大利语译本于1941年在米兰出版，书中有百余幅插图。虽然那时的我并不关心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却也为这些精美的插图而倾心。

此后30年间，我都不能忘怀这部著作。写完文艺复兴的故事，我的注意力转到了古罗马。完成《罗马人的故事》，我把兴趣转到中世纪：首先以《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二卷本，书写了中世纪1000年间南欧基督教世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立；再用本书叙述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与中近东整个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决，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当我开始挑战十字军东征这一内容的时候，自然回忆起多雷的版画，总希望能以他的作品来装帧我的一册书。

多雷的版画，完全是为了米肖作品的插图所作。这种在日本称为“木口木版”的木版画方法，是先用自来水笔描摹出原画，再在上面勾勒出浓淡不同的细墨线，阴影部分由雕版师加以精巧的补缀再现，最终

印刷出来。多雷的版画几乎都是这样完成的——他绘制的《圣经》《神曲》《堂吉诃德》等版画插图，奠定了其作为19世纪世界著名美术家的地位。

然而，在原书中，多雷的版画都是搭配米肖原文的。现在我要在不采用米肖原文的情况下出版绘图本，又该怎么做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之后，我决定这样做：

首先，在左右对开的绘图本的左面页，全部是多雷的原画，而右面页则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页以一幅地图介绍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在全局的位置，下半页则对插图进行简要的解说。历史和地理知识就这样融为一体，通过对开页面的小小空间，达到了我的目的。

于是，通过插图本，我把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图像化了。应该说，这种图像化也是简略化的处理。我无法保证读者仅通过阅读插图本，就能达到将十字军东征历史尽收眼底的程度。毕竟，十字军东征是世界两大宗教之间的冲突。拙作也不是提供教科书般的视角。如果要理解十字军东征对后世所造成的善恶两方面影响，就必须详细考察这一事件是如何开始，如何进行，以及如何结束的。

那么，这插图本与之后《十字军的故事》（上、中、下册）的关系，就像意大利歌剧的序曲、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一样了。

随着帷幕缓缓落下，幕前演奏的序曲便告一段落。再随着帷幕渐渐升起，第一幕适时开始。

如果读者以为我只重视多雷的插图，而忽略米肖的文字，那恐怕就是对我的误解了。出于学术原因，当代学者早已对米肖的作品不屑一顾。但在这位200年前生活在法国的基督徒笔下，对十字军的态度是非

常连贯的。米肖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成长，那个思想和社会都十分激荡的时代里，对宗教和民族之类概念的把握跟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同。在我看来，米肖有相当多的客观描述，这点跟200年后今天，因为顾忌宗教因素影响而笔法迂回的很多作者截然不同，可以说是如实直书。

多雷的插图则是完全基于米肖的作品而绘制的。如果说米肖的历史是紧扣十字军的英勇气概而作，多雷的版画就刻画了十字军最强的对手萨拉丁，和十字军中最大的英雄狮心王理查，这两个完美的形象。

因此，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有读者翻看了这本绘图本的《十字军故事》，只要他不是过于极端，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快的感觉。

那就让我们愉快地欣赏这部序曲吧！

穆斯林向朝圣路上遇到困难的基督徒伸出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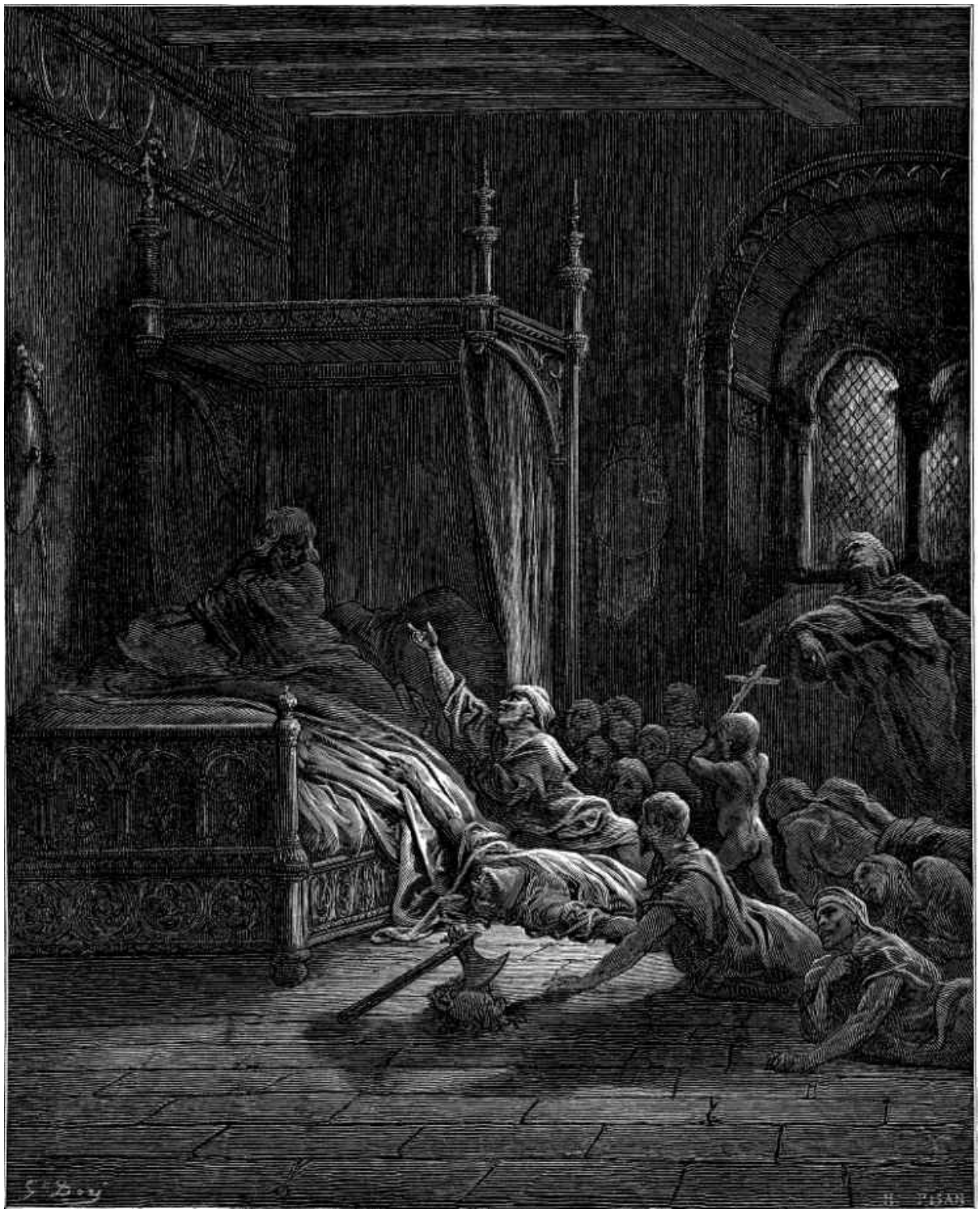
G. Doré
Pantagruel de Doré

《古兰经》是穆斯林心中的圣典，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去麦加朝圣的经历，这是他们的重要义务。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穆斯林应当理解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行为。

然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不承认其他偶像真实性，从这一点来看两者都是坚定的。倘若要过分强调这一点的话……

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由一神论拥护者打着宗教的旗号掀起的一场战争。

夜夜受冤魂惊扰的富尔克


S. Boy
H. PISAN

安茹伯爵富尔克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将自己的妻子们一个个杀死，对领地的民众也是百般苛待。在11世纪中叶的法国，他的罪恶行径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讽刺的是，这样的恶棍竟然也会过上夜夜被冤魂惊扰、苦不堪言的日子。为此，他不辞劳苦从法国西北部出发前往中近东的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朝圣之路。

抵达耶路撒冷后，安茹伯爵富尔克和其他朝圣者一样穿着简陋的朝圣服跪地朝拜，归途中他还一路向贫穷的朝圣者施以馈赠，直至回国。

不久之后，安茹伯爵富尔克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朝圣之旅。这一次他购买了很多基督徒的信物，还有穆斯林眼中微不足道的圣遗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又将这些物品全部送给了教皇。鉴于安茹伯爵富尔克的种种善行，教皇赦免了他之前所犯的罪恶。安茹伯爵富尔克感激涕零，于是又开启了第三次朝圣之路。

在当时的西欧，安茹伯爵富尔克的故事被当作“浪子回头”的经典佳

话广为流传，即使是恶贯满盈的人只要去朝圣就能得到救赎。

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开始于这个故事之后的半世纪。

隐士皮埃尔，在法国各地呼吁圣战

G.D.

“Hermit”一词被翻译成隐士，这里的隐士和修士有所不同。修士（frate）往往通过在修道院的集体生活加深对上帝的信仰，而同样以接近上帝为终极目标的隐士选择生活在沙漠中的洞穴或者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因此，对于正常社会中的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隐士往往会产生过激的反应。

在耶路撒冷停留了9个多月的皮埃尔想必也目睹了穆斯林对基督教朝圣者的某些蛮横行为。倘若将其视为一神教的集体魔怔过不了多久便会释怀，然而作为隐士的皮埃尔却对其产生了一种近乎执念的愤慨，而这股愤慨在返回欧洲之后进一步发酵。皮埃尔四处呼吁：要想解除基督徒在圣地所遭受的迫害，就必须征服圣地。

热衷于扩大基督教影响力的罗马教会忠心耿耿地信奉着皮埃尔的箴言。高举“神的期望”这一旗帜的十字军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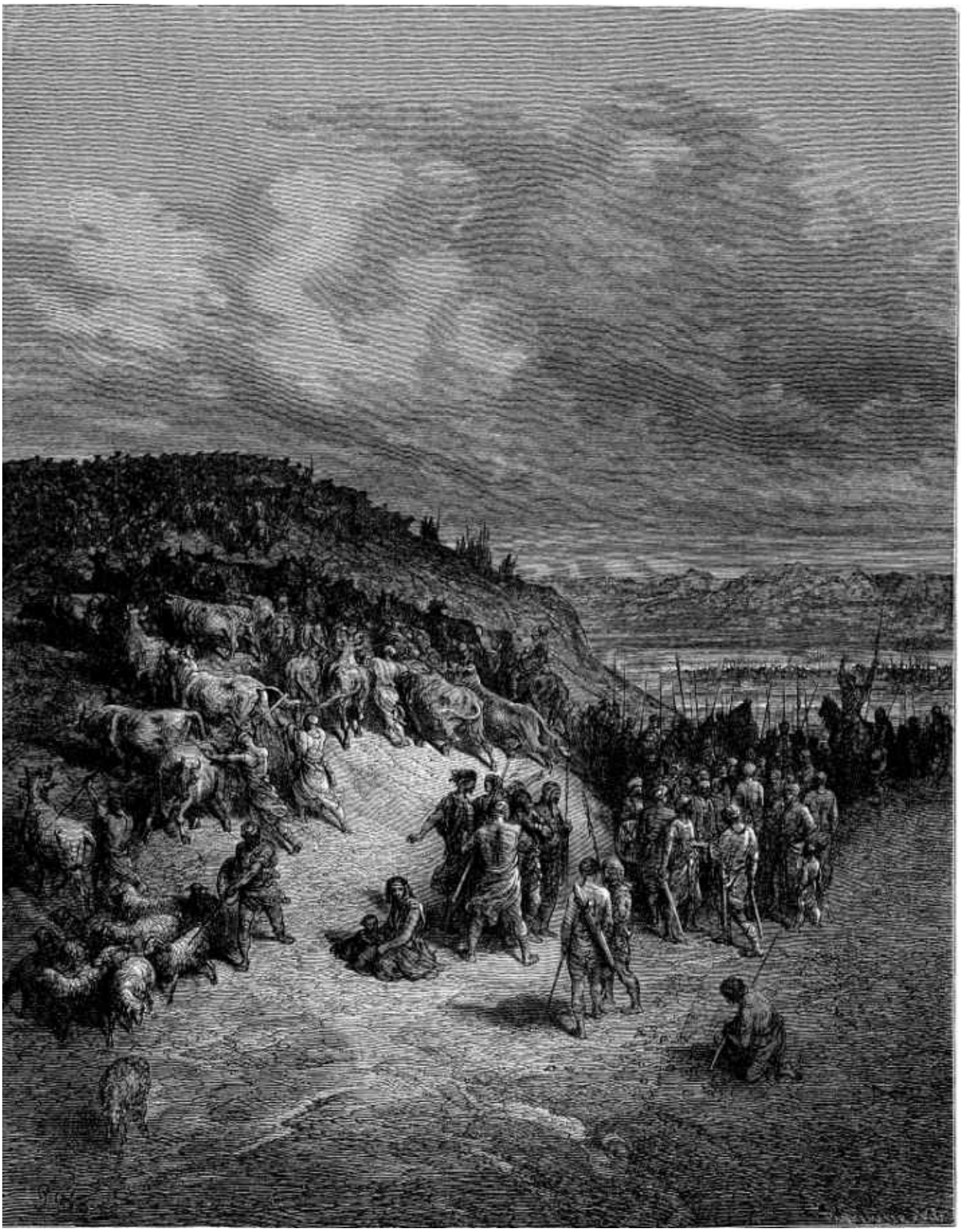
“神的期望”

这句话的威力超乎常人所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深信日复一日的小罪恶必将让肉体在死后堕入地狱。

然而，罗马教皇向信徒们承诺，只要加入皮埃尔组织的以夺回圣地为目的的十字军，之前所犯的罪行可以全部免除。为确保死后能在天堂有一席之地，很多人不惜抛家舍业，跟随十字军跋山涉水前往遥远的东方。

很快，十字军的气势就到达了法国，之后又跨过莱茵河蔓延至德意志，甚至越过多佛尔海峡直逼英国。没有被这股狂热的气势波及到的也只有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和身处战火中的西班牙人，还有和中近东世界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诸意大利海洋城市国家。

愤怒的匈牙利人挥剑阻挡十字军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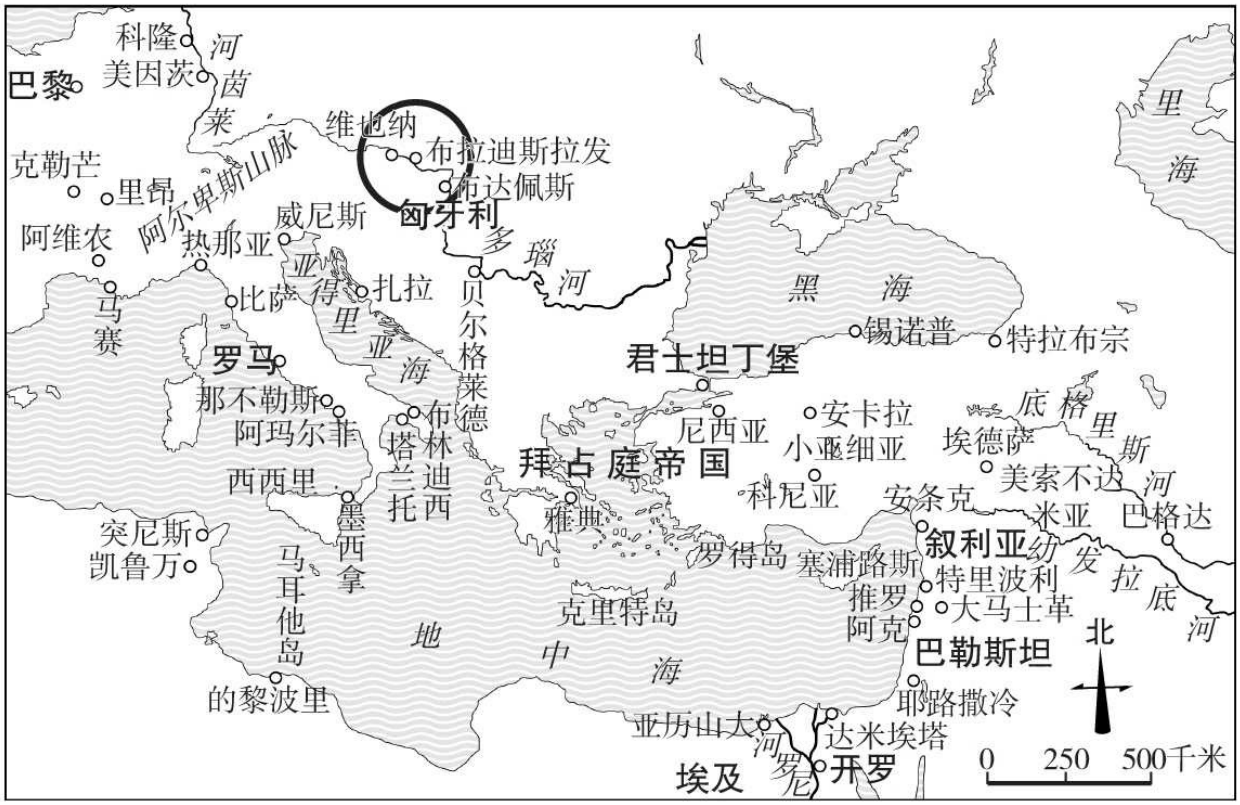


隐士皮埃尔煽动起来的十字军队伍囊括了各个阶层的人，农民、没有主人的骑士，甚至还有女人和孩子，规模达10万人之多。然而，这支队伍既没有军备也没有充足的粮草，说到底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过，但凡追随十字军的人都被看成是基督教的勇士。也有人认为其他基督徒理应对十字军的正义之举施以援手。

可是突然之间涌来10万多人的队伍，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又毫无纪律可言。沿途的百姓连正常通行都成问题，这种影响早已超出了打扰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是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同为基督徒，匈牙利人却用武力抵制十字军队伍的原因。

攻占布拉迪斯拉发的十字军

Dor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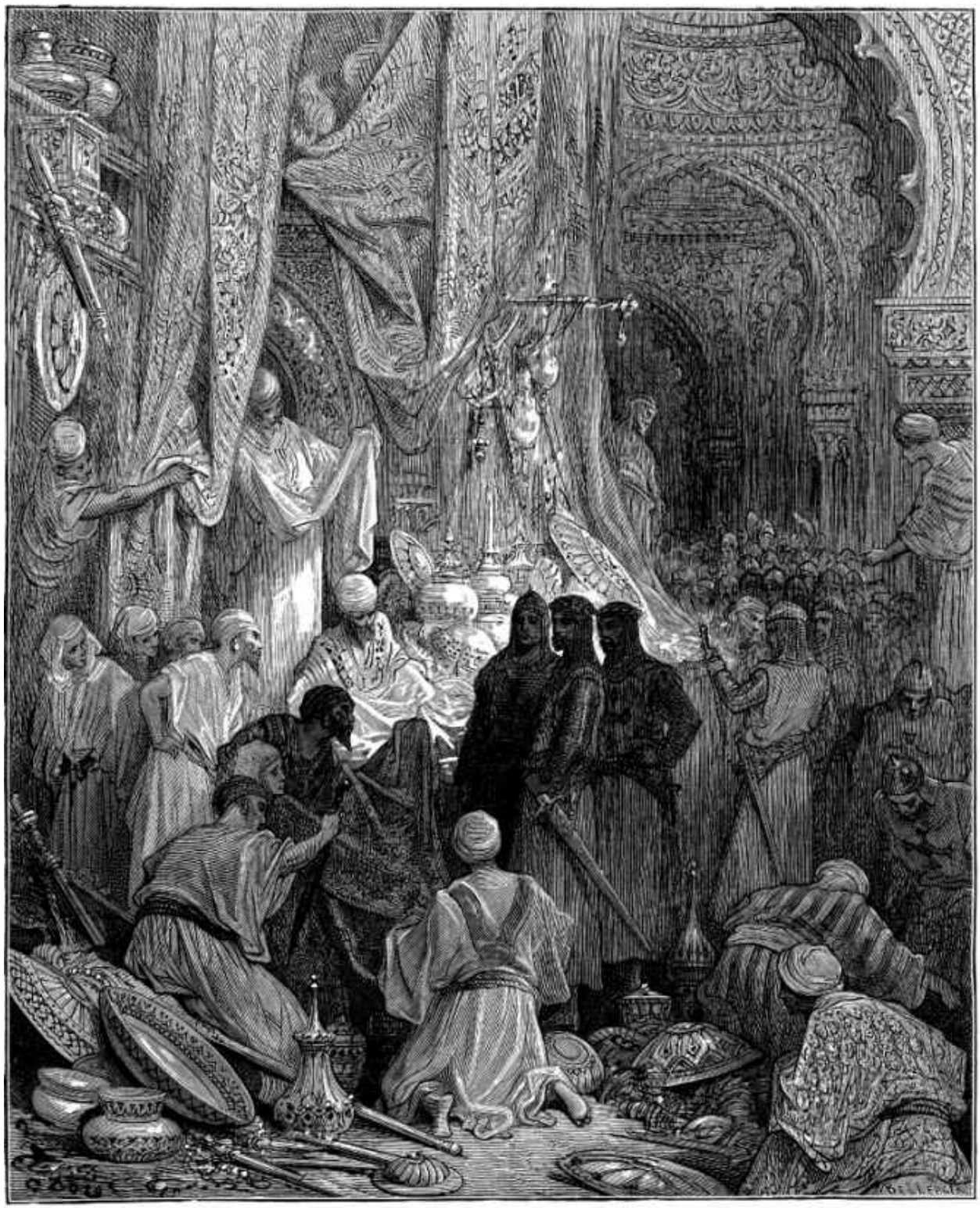
皮埃尔率领的贫民十字军原以为能得到援助，当期望落空时他们的愤怒被点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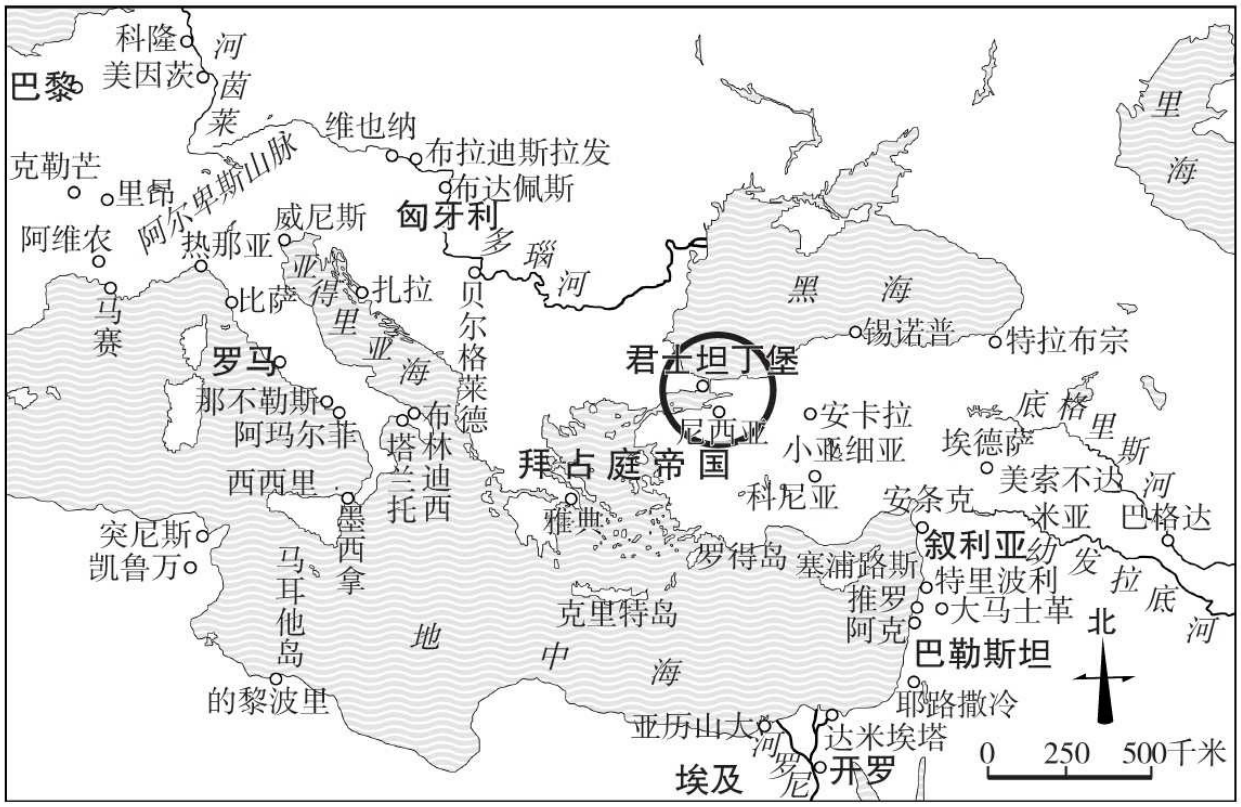
于是在和穆斯林的战斗打响之前，愤怒的战士抛开十字军的名号先和自己人发生了争执。

倘若军队要远征，事先了解兵站的补给情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可是纵观十字军历史，对兵站的关照极其欠缺，这一点实在难以置信。既无法从当地调配，又不想花钱购买，那么依靠武力夺取也就成了他们的惯用手段。

因而，最先厌恶十字军的就是远征途中遇到的中欧和东欧的基督徒。

被东方的奢华震撼到的十字军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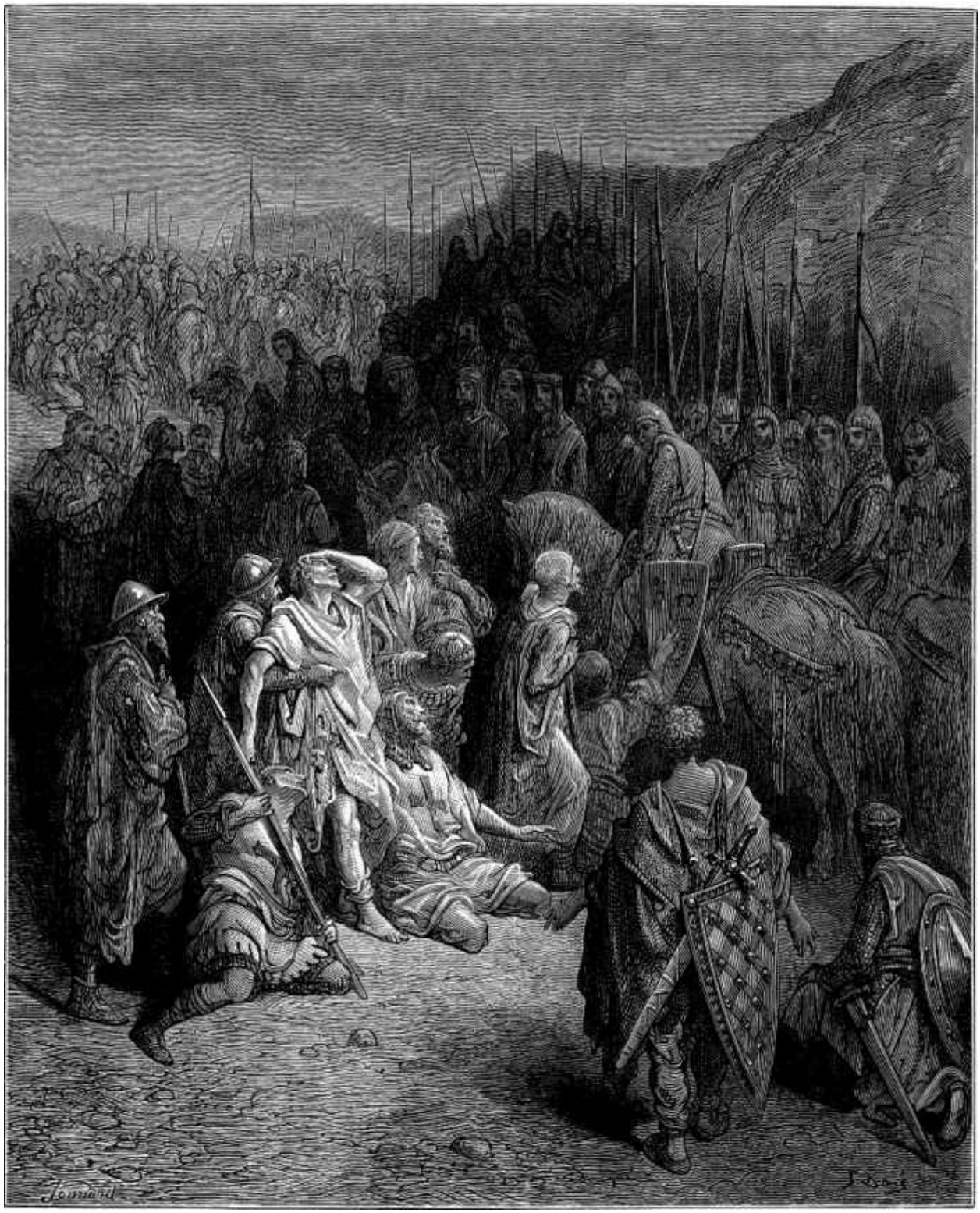
在皮埃尔率领的贫民十字军开拔数月之后，由封建诸侯率领的骑士十字军也从欧洲出发了。在法国，诸侯的地位仅次于国王，他们率领的是一支正规军队，训练有素并且军备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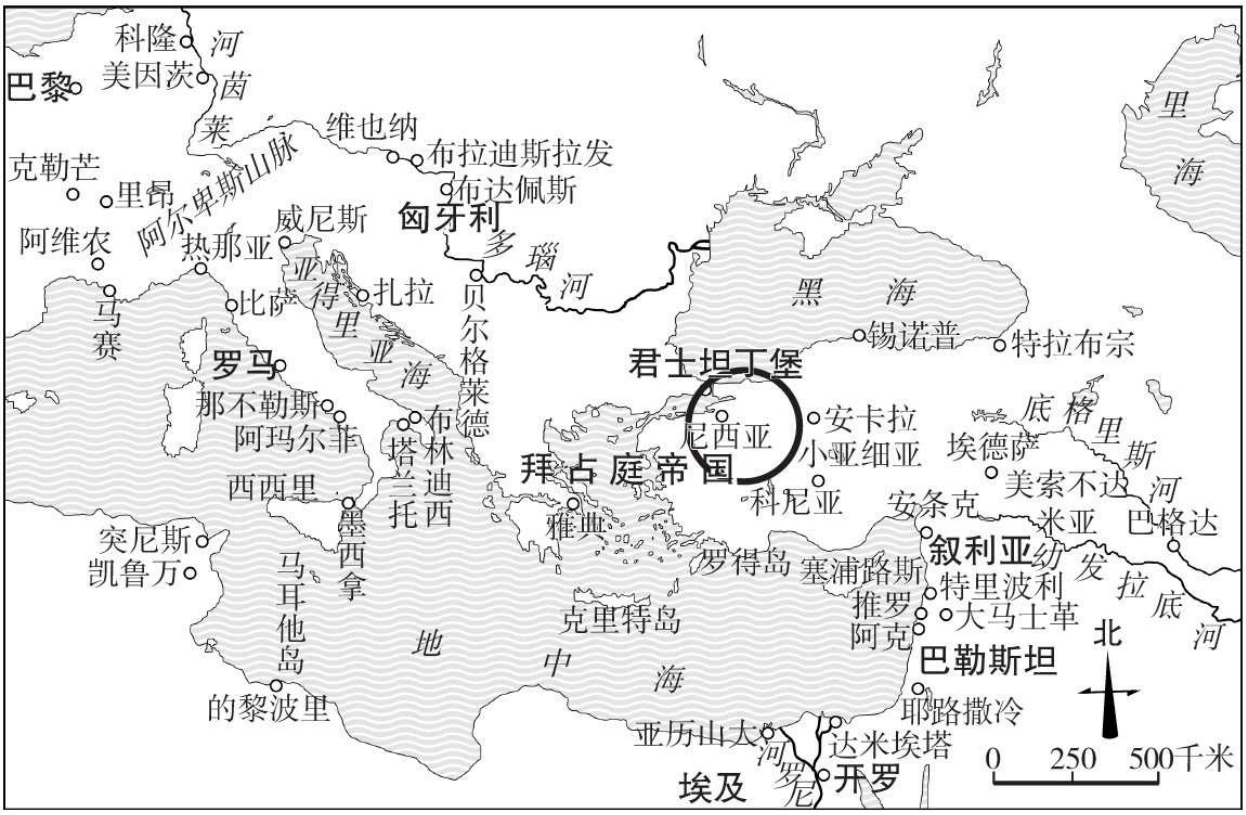
这支正规军队完全具备强行调配粮草的实力，但是在经过中欧和东欧时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不允许皮埃尔以及他所率领的贫民十字军进入首都，却对诸侯率领的十字军敞开了城门。

话虽如此，骑士十字军的普通士兵只能在城外野营，只有诸侯以及地位较高的骑士才能进入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于是，进入城内的诸侯以及骑士们得以目睹东方的奢华场面。相比当时（11世纪末）的东方，欧洲完全就是乡野山村。

戈德弗鲁瓦穷追皮埃尔所率领的贫民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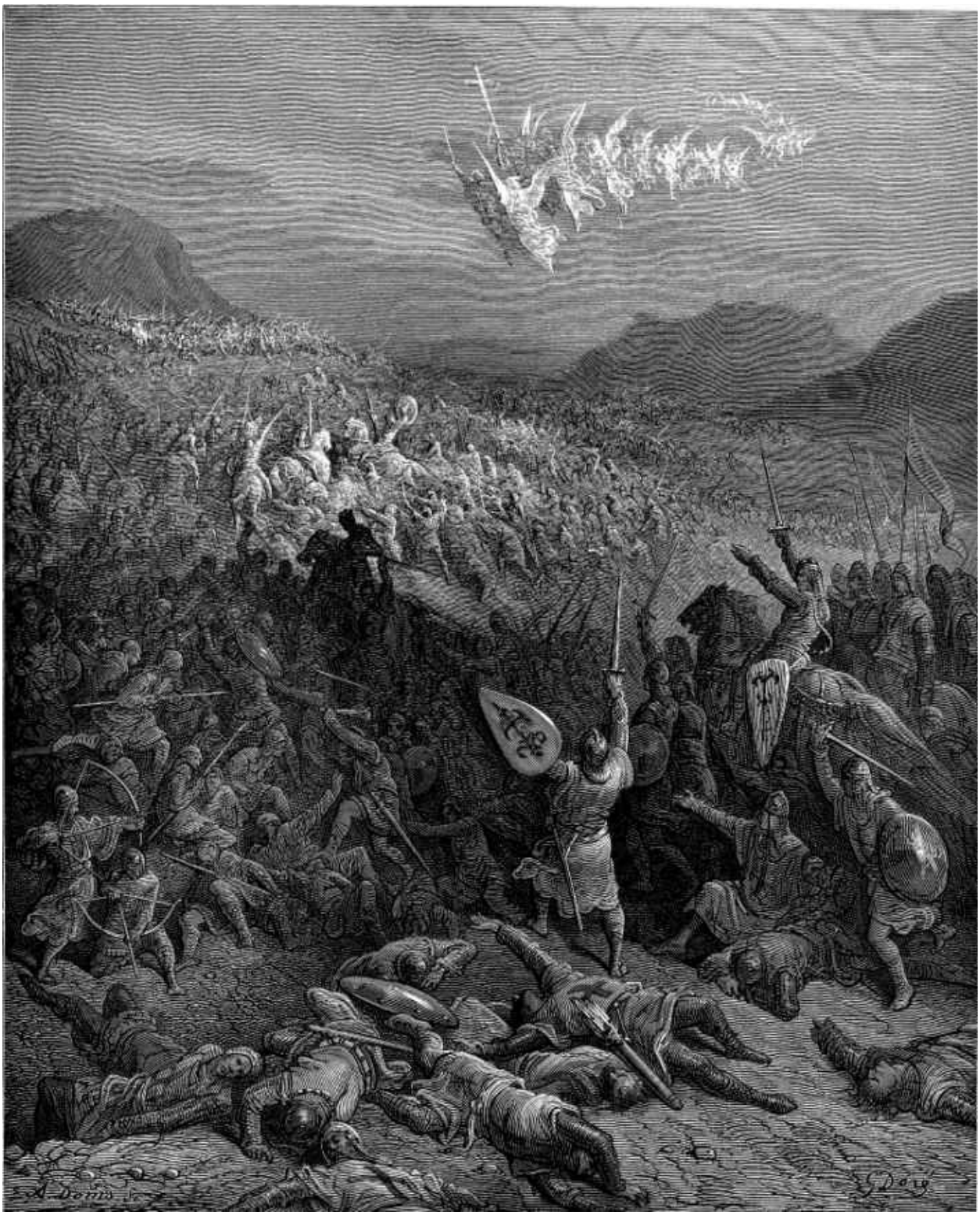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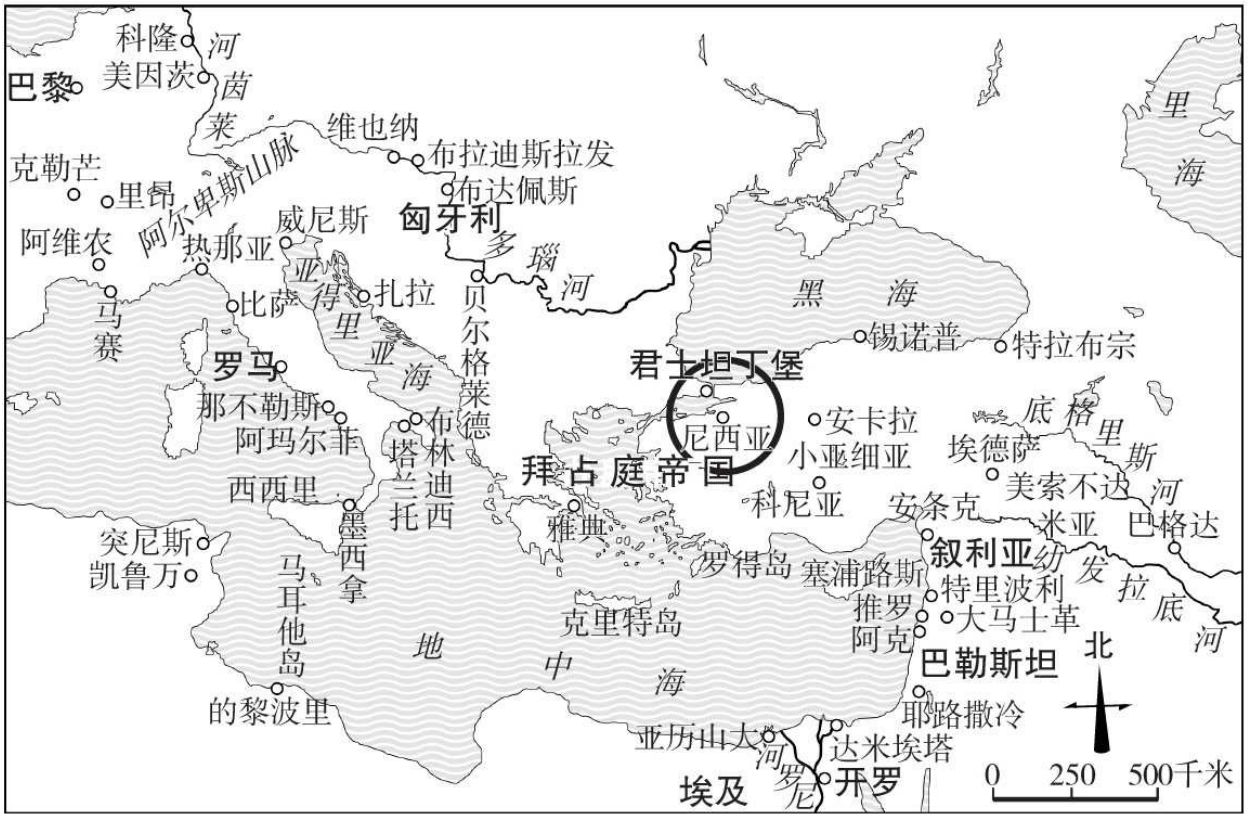
在封建诸侯率领的十字军中，正值壮年的主帅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拥有法国东北部广阔的领土地，杀敌勇猛，行事慎重，在士兵当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同时还有坚定的信仰，是率领十字军的最佳人选。

皮埃尔率领的贫民十字军的目标仅仅是圣地，虽然到达了小亚细亚，但最终被诸侯率领的正规十字军收编。

从此以后，第一次十字军指的就是欧洲诸侯和骑士们组成的十字军。

尼西亚攻防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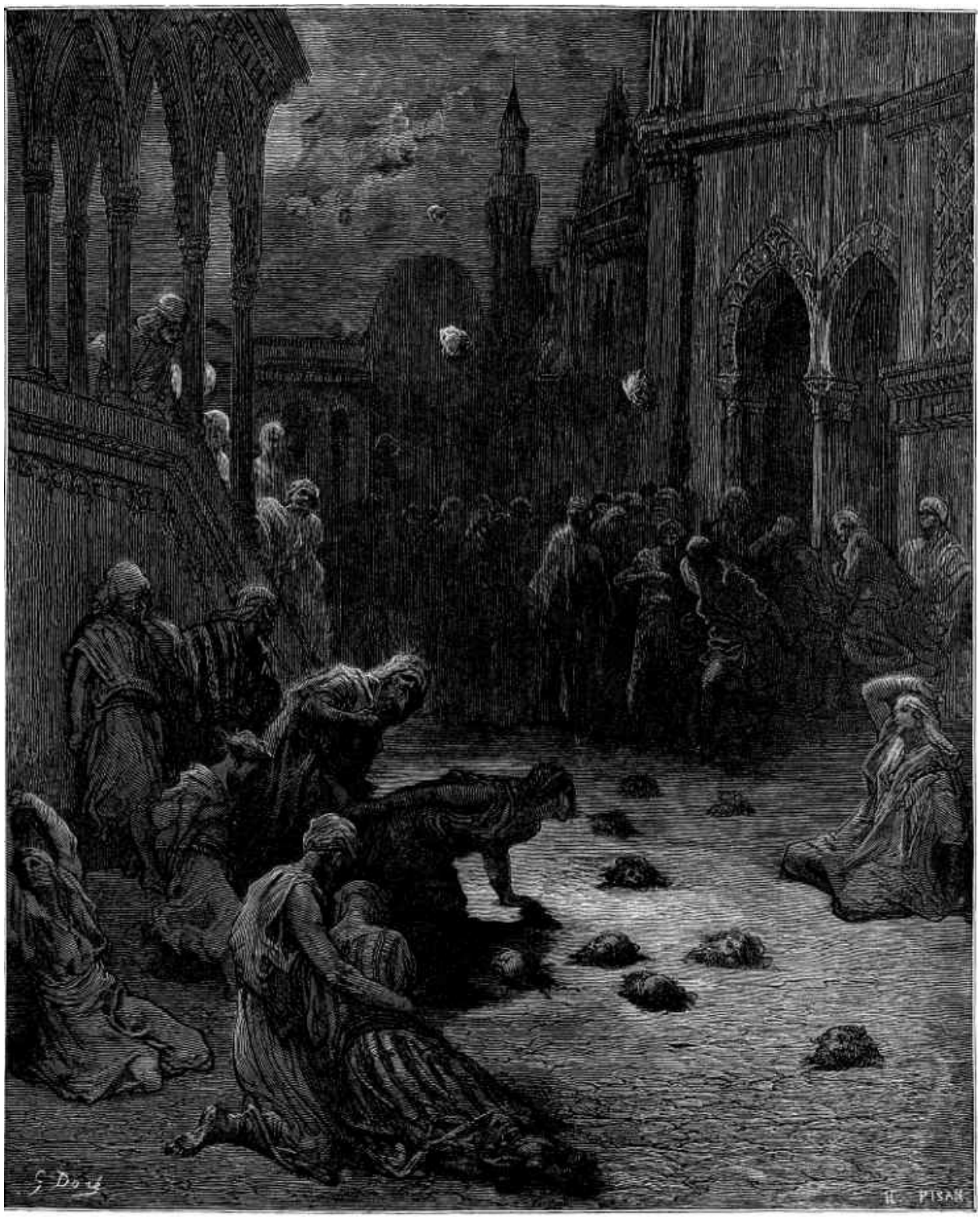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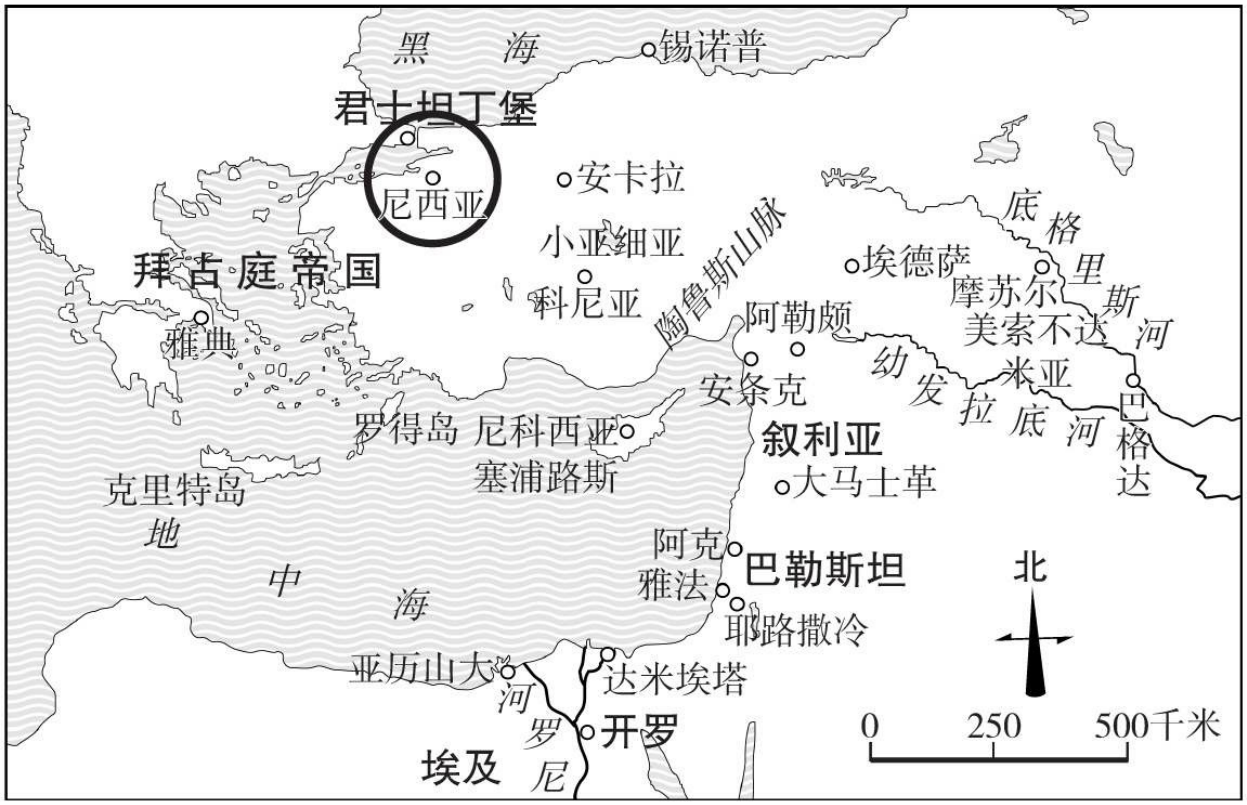
进入小亚细亚其实也就来到了伊斯兰世界。如果将巴格达视作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话，那么从拜占庭帝国抢占来的小亚细亚就是其边境地带。因此，小亚细亚的防卫就交给了伊斯兰世界的新兴民众——塞尔柱人。

作为新兴民众的塞尔柱士兵的勇猛之名广为人知。因此，十字军刚一踏入小亚细亚就遭到了迎头痛击。

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是最早承认基督教合法性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集各地主教，召开第一次公会议的城市。因此，这里的防守十分坚固，加之有勇猛的塞尔柱士兵守护，不可能轻易被攻破。再者说，十字军也不可能莽撞攻入尼西亚，很容易腹背受敌。

将一千名穆斯林士兵的首级扔进尼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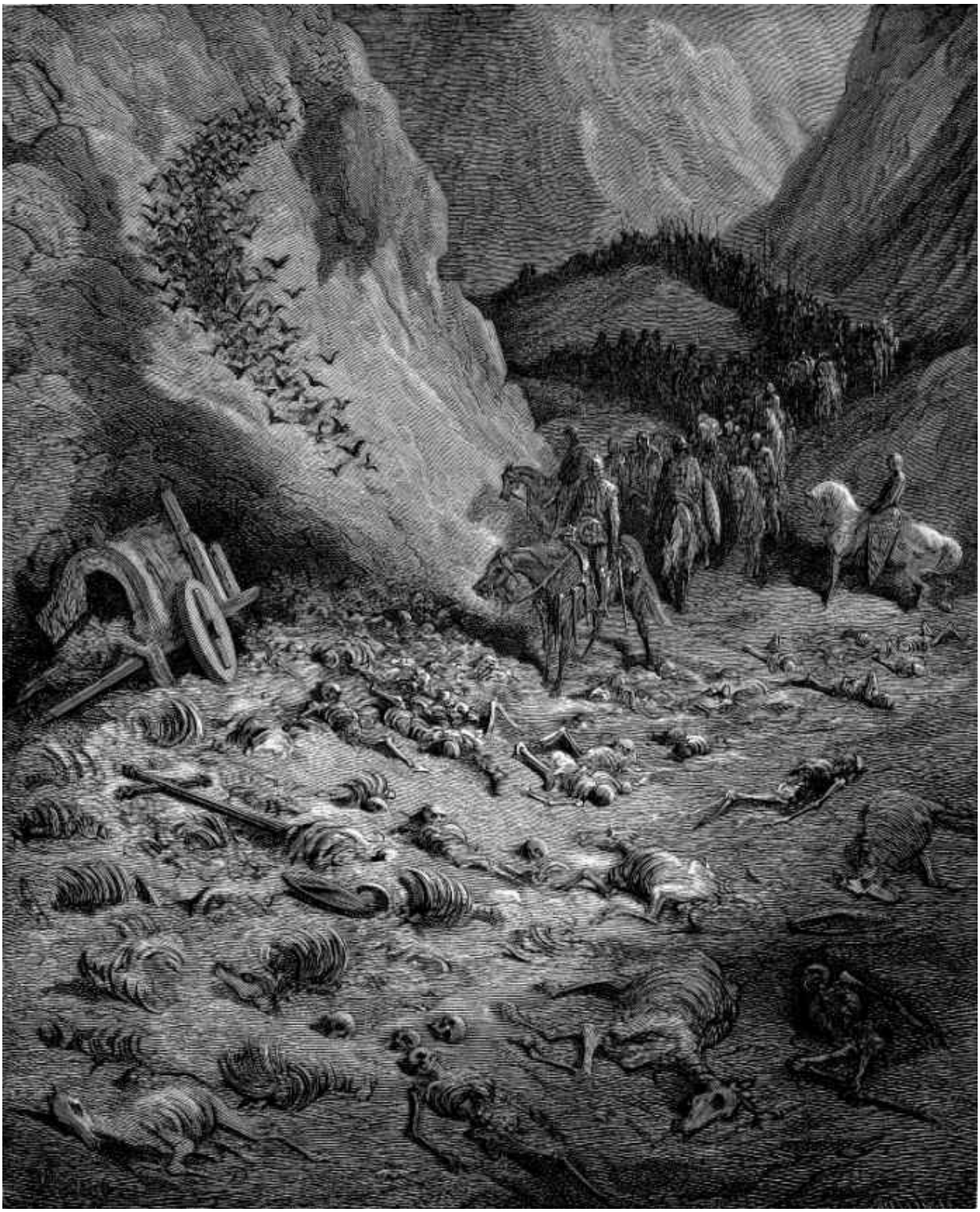

G. Doré
R. PI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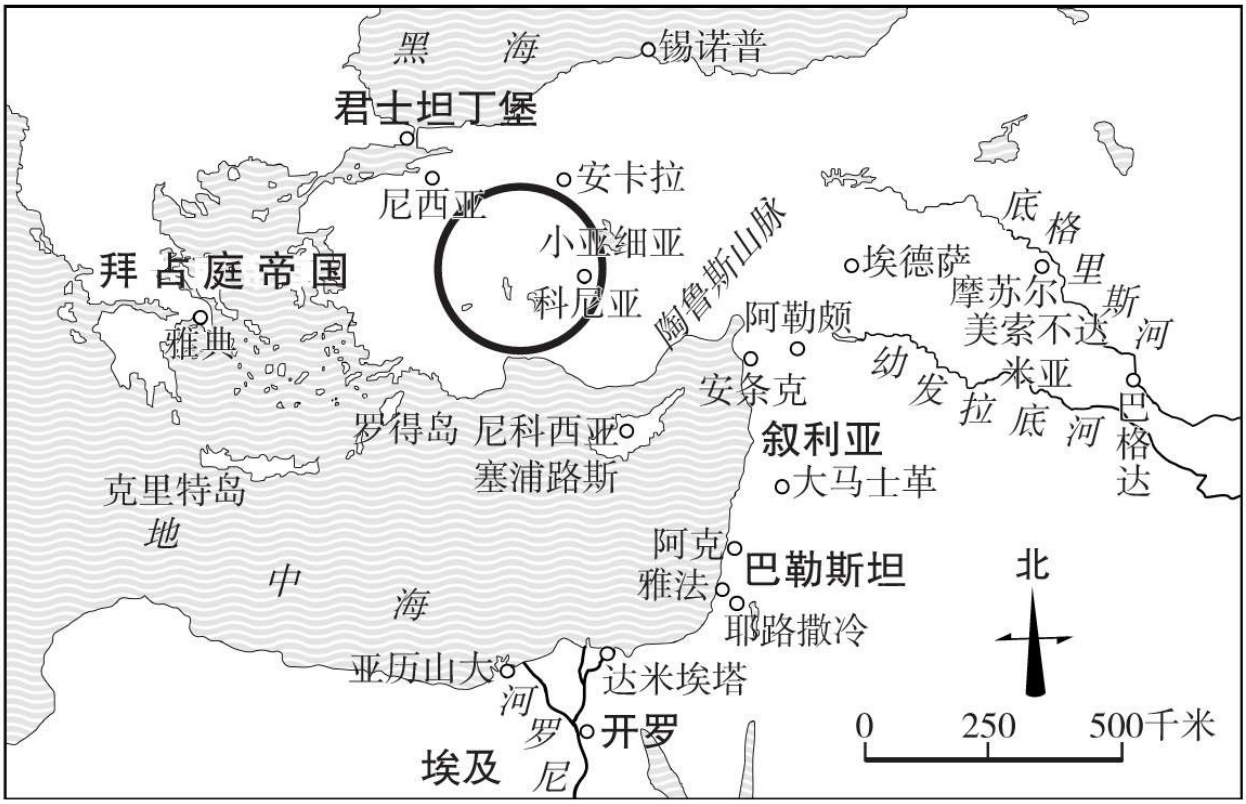


尼西亚有坚固的城墙做掩护，基督教士兵和穆斯林士兵在城墙周围展开激战。持续的激战让两方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十字军一方割下战败士兵的首级，一半扔进尼西亚市内，另一半装进口袋送到拜占庭帝国皇帝手中。

经过此事，拜占庭帝国皇帝深信只有穷乡僻壤的野蛮人才能做出如此恶劣的行径，继而提高了对中世纪北欧人野蛮之力的戒备。

先行者的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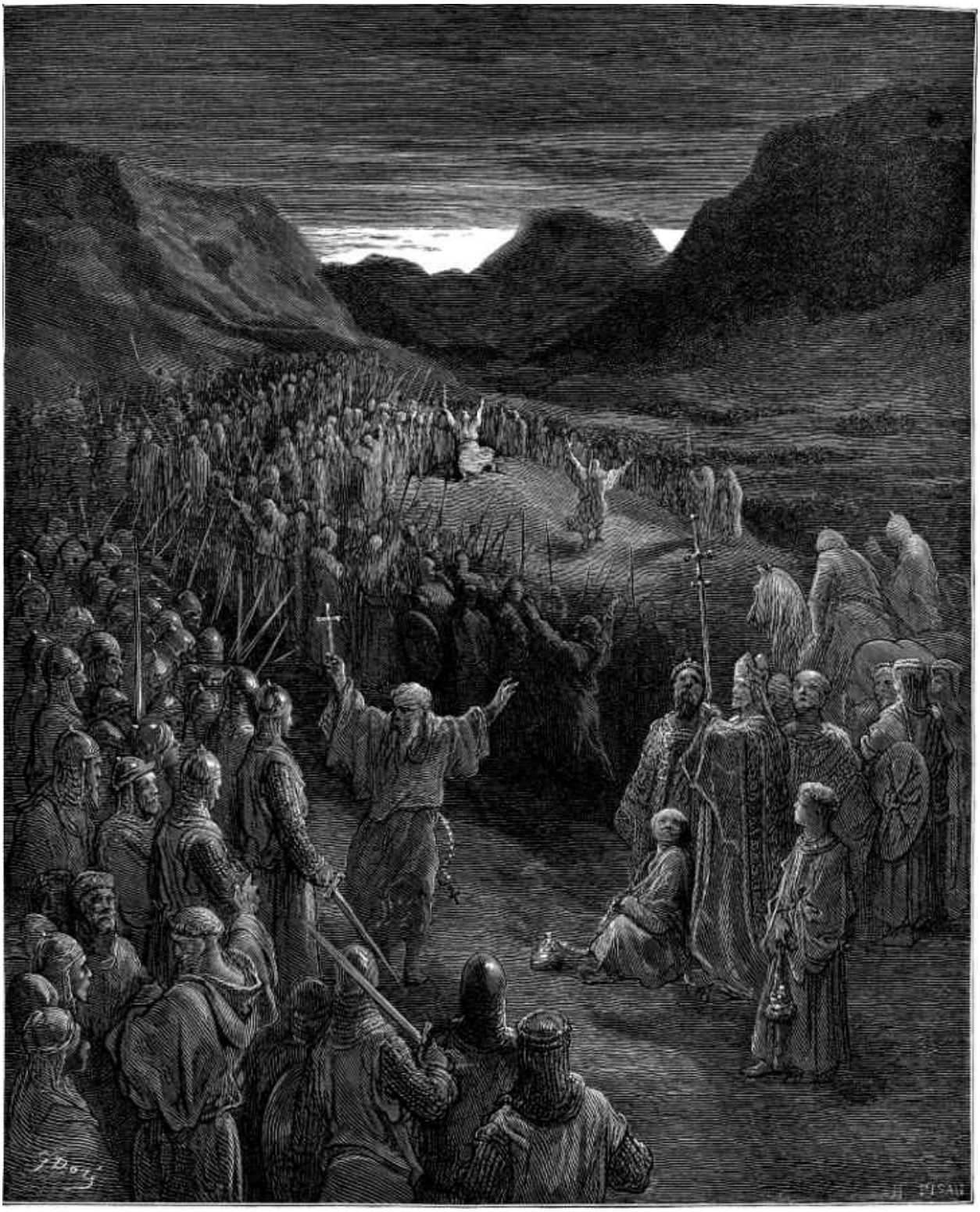


皮埃尔率领的十字军虽为乌合之众，但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大部分人不知总结反思只是一味地向前冲，中途倒下的不在少数。

有些人遭到当地穆斯林的袭击命丧黄泉，还有一些人在饮水和食物无法得到保障的异国他乡迷失了方向，最终迎来死神的召唤。有说法称，当初从欧洲带领出来的10万人在从东欧前往小亚细亚的途中就已经锐减到2万人。

由此可以说，封建诸侯率领的十字军是踏着基督徒同伴的尸骸一步步走向圣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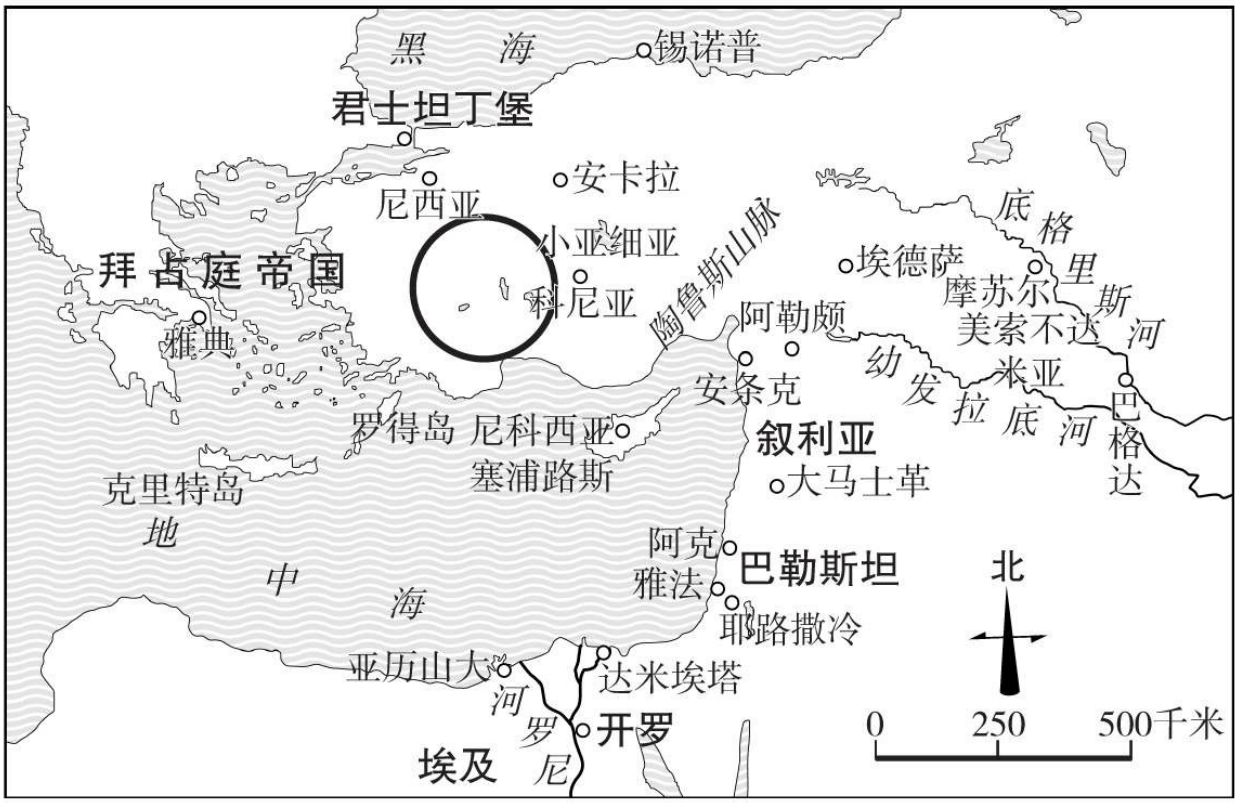
鼓舞士气的神职人员



基督徒在十字架面前宣誓加入十字军，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对手是穆斯林，那么所有的战斗都是“圣战”。

假如是普通的战斗，开战之前在战士面前鼓舞士气是司令官的职责。在十字军中，这一职责是由司祭或者修士来履行，而赋予这些神职人员权威的正是身着华丽教袍的主教或者大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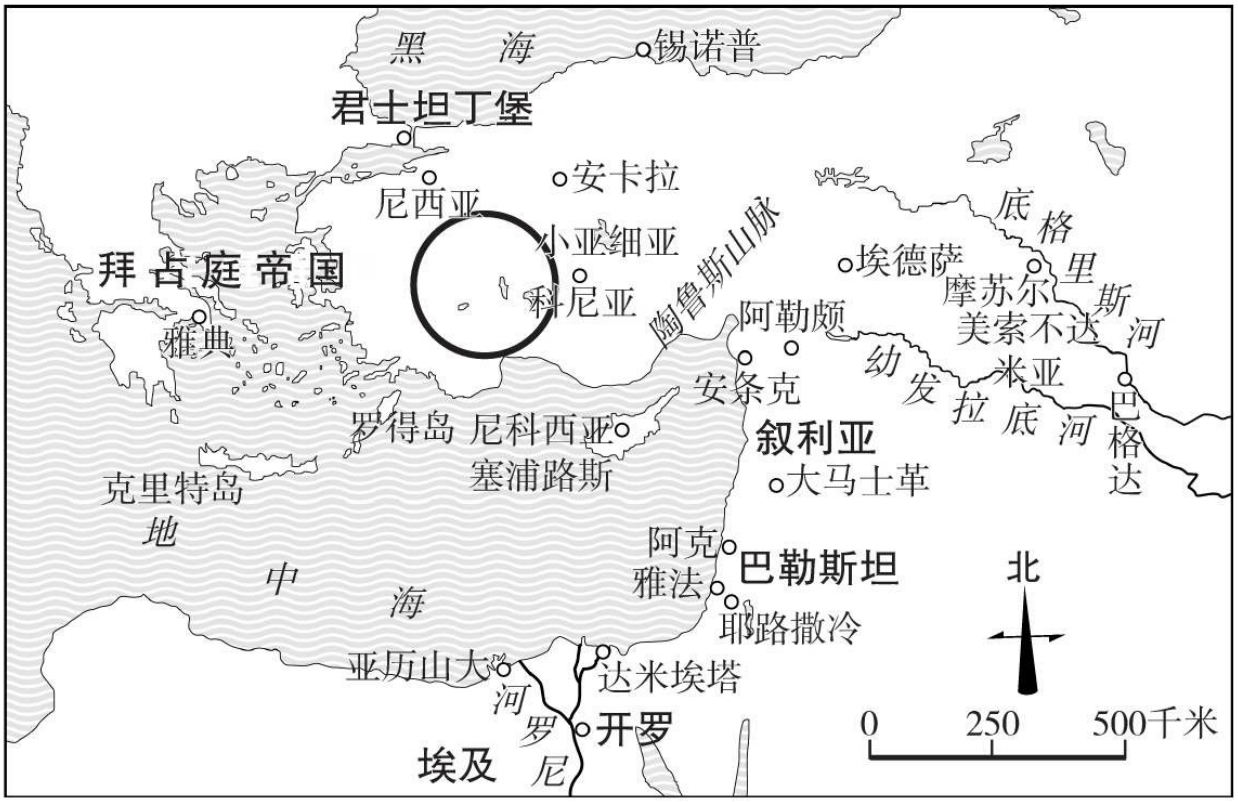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率领的勇猛无畏的十字军



从小亚细亚的西北部穿越到东南部对于十字军来说是一次强制性的艰难的行军。

战士们早已习惯了和平时期的马上枪术比试，这一次的战斗虽然和平日里并无不同，但却被视作神所期望的战斗。面对以勇猛著称的拜占庭帝国的穆斯林士兵，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率领的十字军也表现出同样勇猛无畏的气概。

战斗结束后为阵亡将士做法事的神职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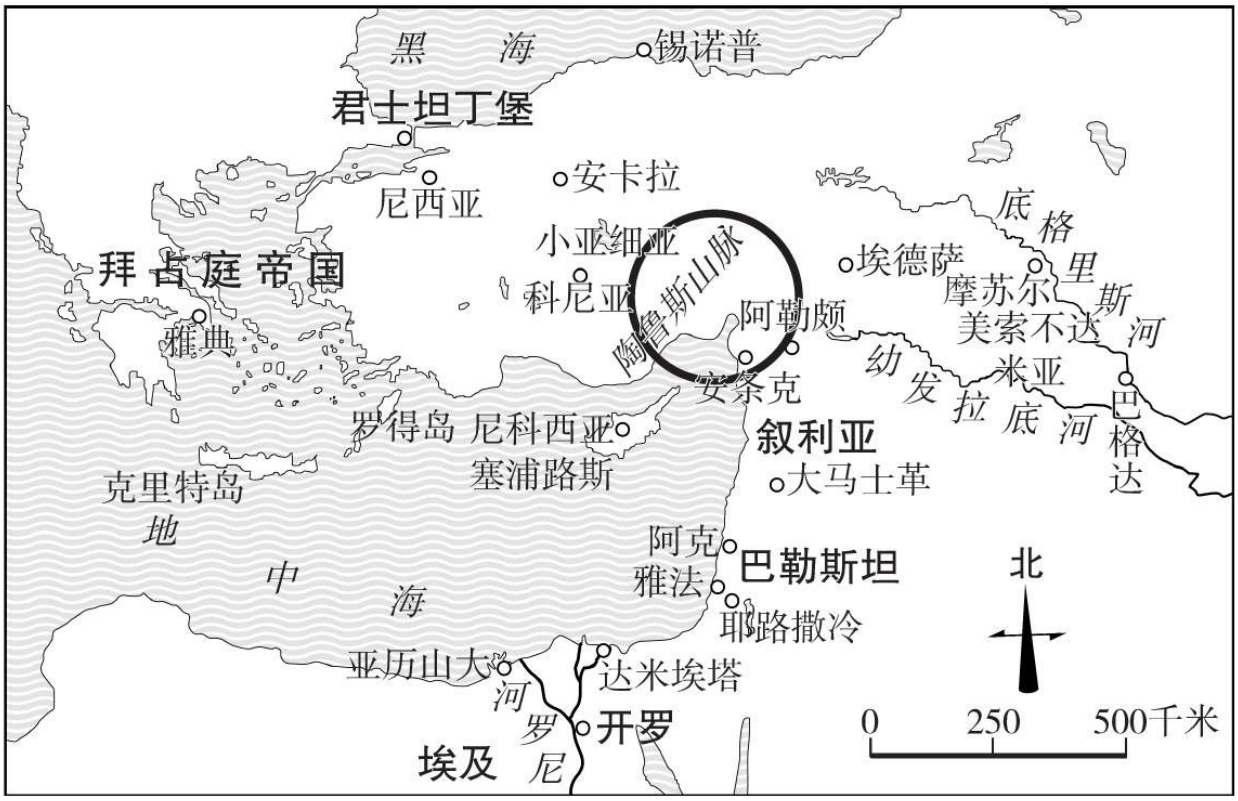
与十字军同行的大量神职人员中除了普通的修士，还包括不少地位颇高的主教，他们的职责就是在开战前鼓舞士气，此外还会在战斗结束后为阵亡的将士做法事，安抚亡灵。

另一方面，十字军是为神和基督教而战斗的。所以在战场上阵亡的将士被誉为“殉教者”，而非“战死者”。

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在“鼓舞士气、战斗、做法事吊唁”这一流程的循环往复中向东方进军的。

无论是在攻方基督教还是守方穆斯林的记载中，对于阵亡将士的称呼都是“殉教者”。

翻越陶鲁斯山脉的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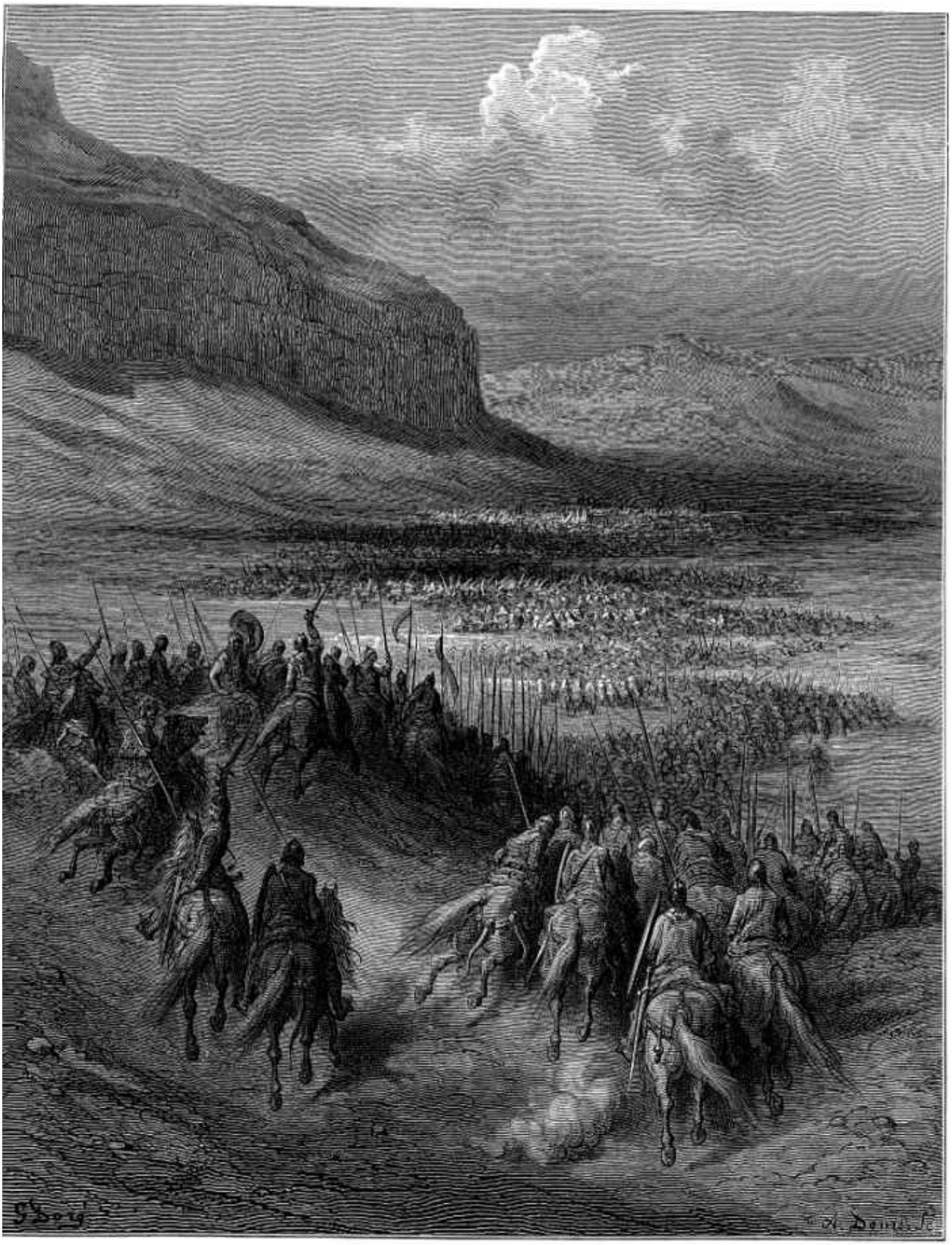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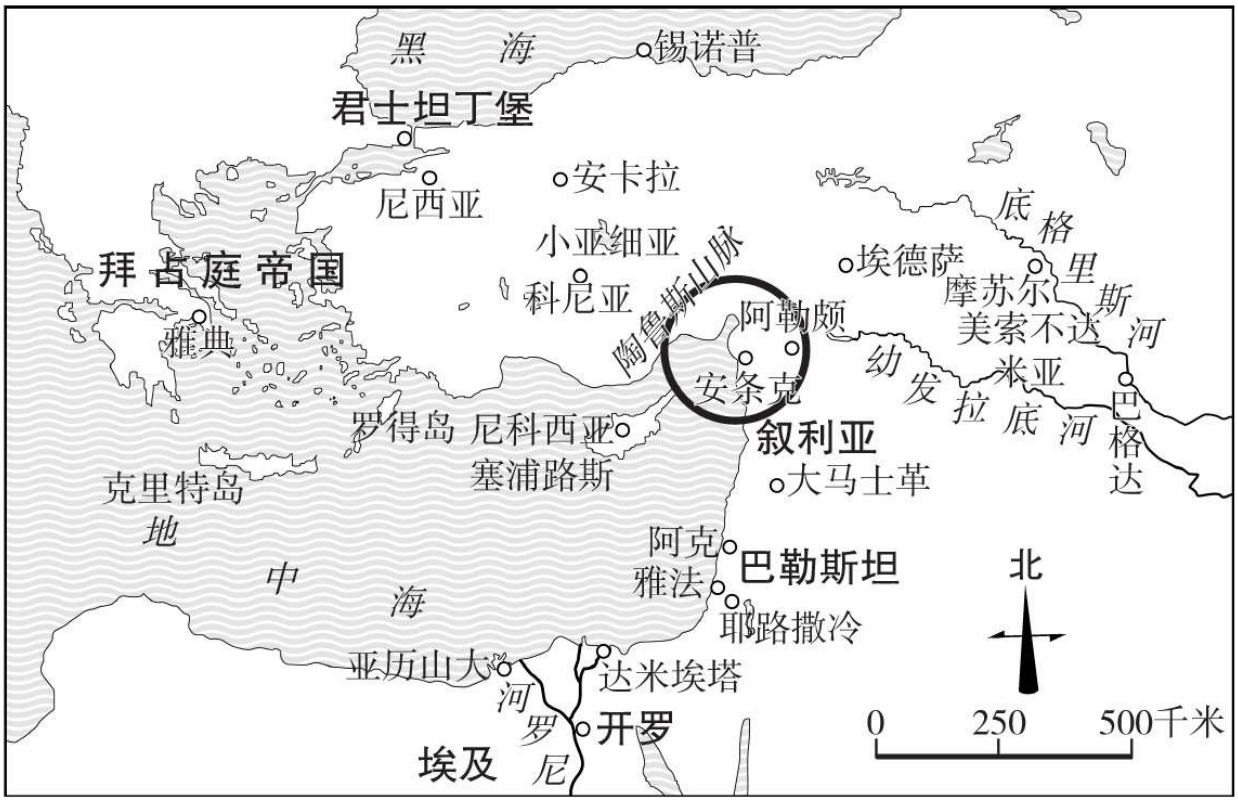
想要从小亚细亚前往叙利亚，就必须翻越横亘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和地中海之间的陶鲁斯山脉。

虽说是山脉，但比起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也算不上什么难关。但是先前穿越小亚细亚时历经数战，再加上身处敌占区军队补给无法得到保障等实际问题，不少士兵和战马实在无法继续前行。

但是，试想前方就是叙利亚，穿过叙利亚就是耶路撒冷，这样或许会给士兵们带来继续前行的力量吧。

打响安条克攻防战


G. Doré
A. Doms. S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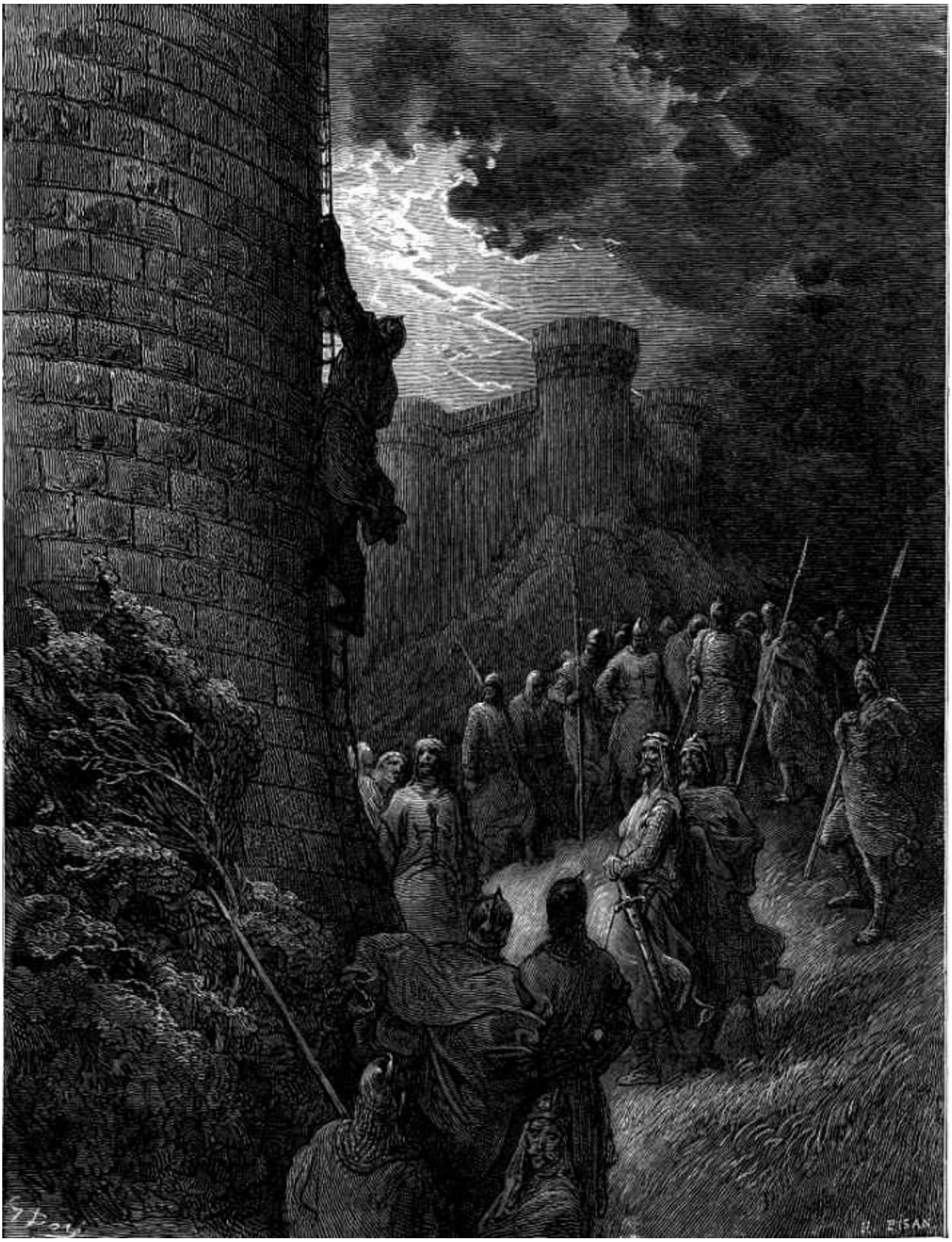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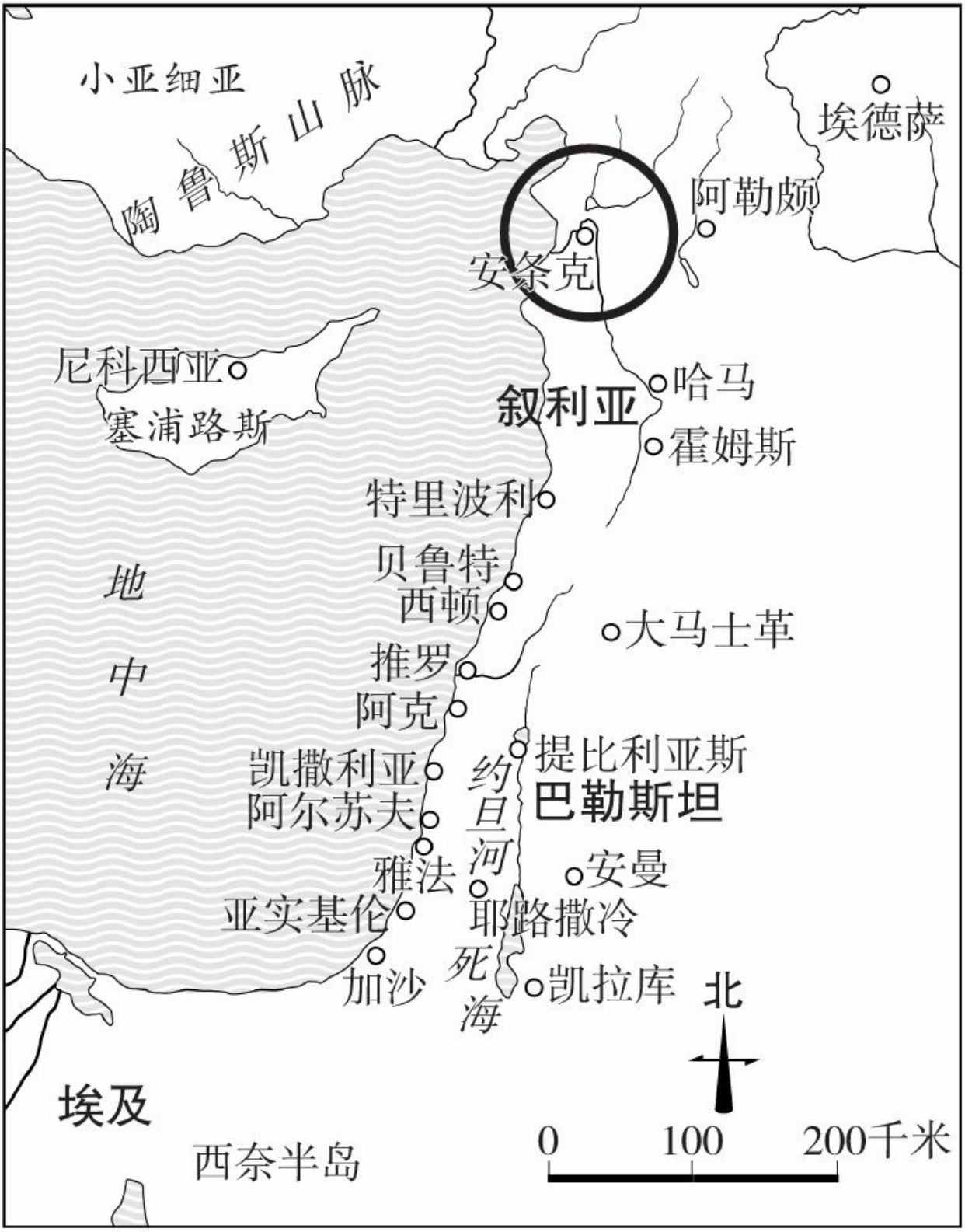
当地中海还是内海的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的安条克并称罗马帝国三大城市。进入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时代，安条克又和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并称三大城市。

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十字军时代中叶，安条克均由穆斯林控制。历经数百年，这座国际城市的传统与实力逐渐累积，其防卫体系也日渐完备。

但是，安条克是前往耶路撒冷的必经之地。因此，对于十字军来说，能否攻下安条克决定着远征的成败。

波埃蒙多半夜爬上绳梯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是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众多诸侯之一，他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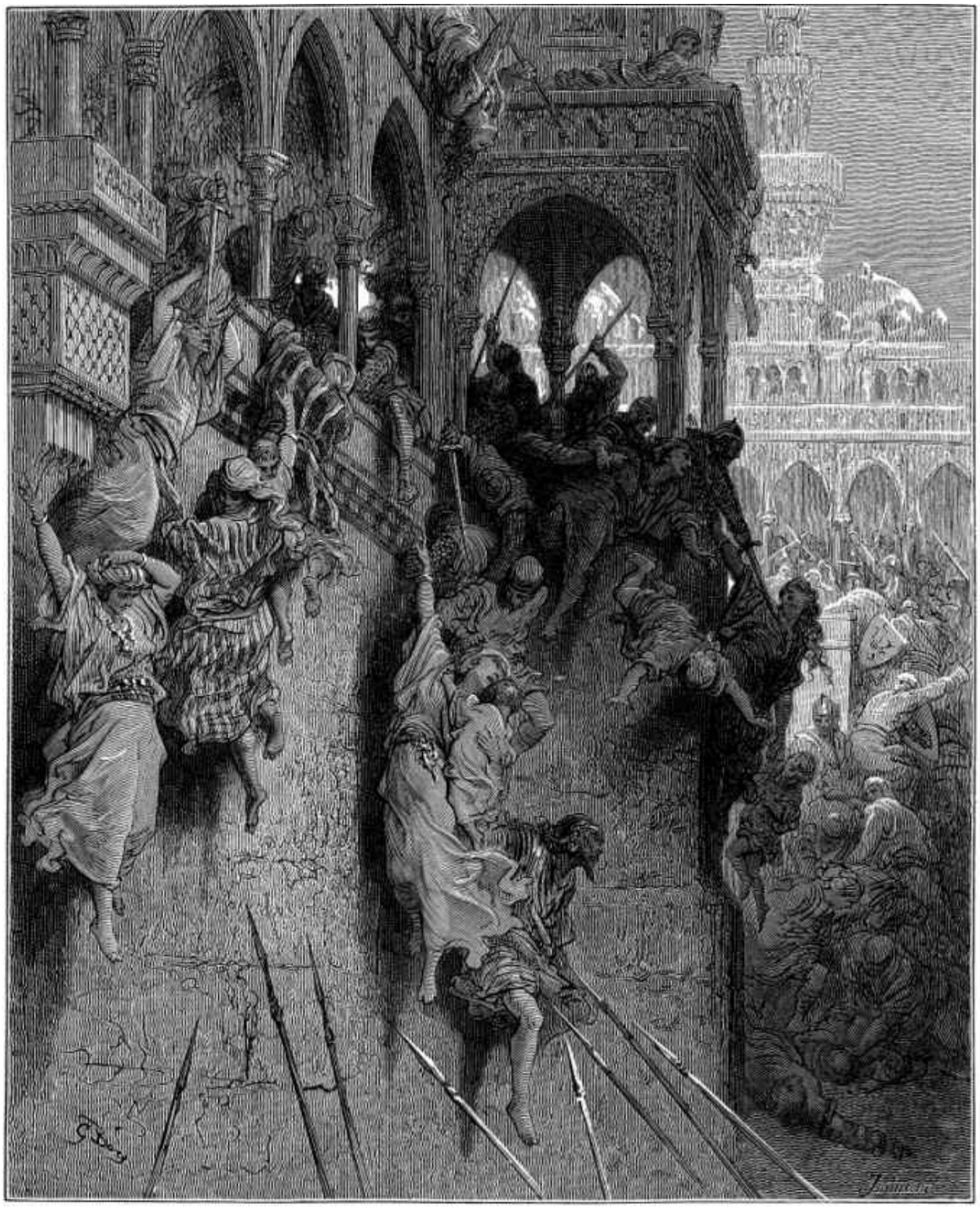
后到达的骑士占领了巩固城墙要地的一座塔，由此改变了防守坚固的安条克的命运。他们打开了城门，蓄势待发的战士如洪水一般涌入城内，之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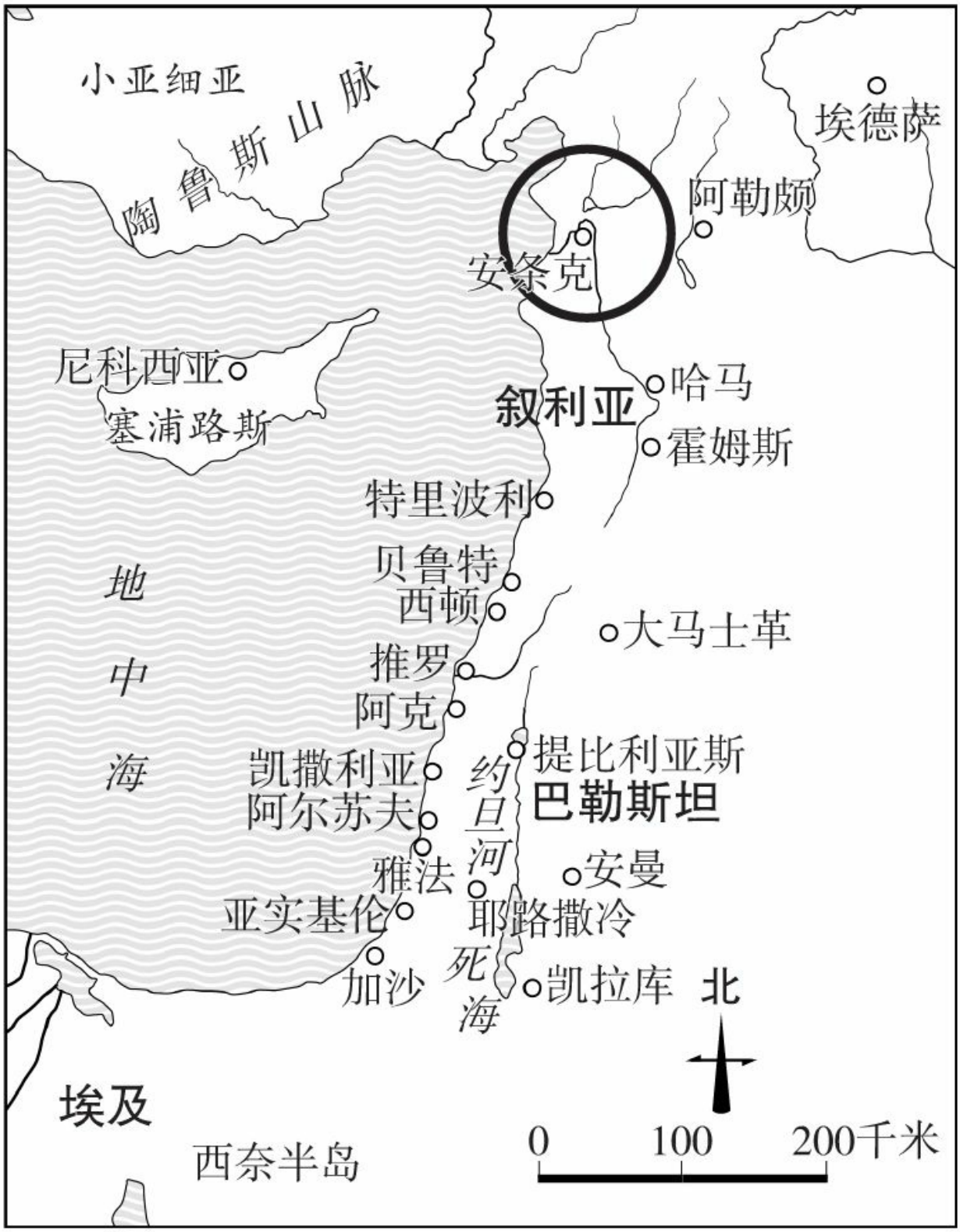
经过8个月的激战，安条克城终于被攻破。正因为是历史较为久远的城市，所以防御工事相对完备，城墙非常坚固。安条克城的总督是塞尔柱人，攻防战刚一打响他就将城内的基督教居民赶了出来，只留下清一色的穆斯林全力应战。

在这8个月中处于攻方的十字军也经历了各种考验，粮草不足、诸侯擅自行动、谣言四起、穆斯林方面的假意讲和等等。

安条克的成功攻陷对于十字军来说是克服多方阻力取得的首次胜利战果。

攻陷后的杀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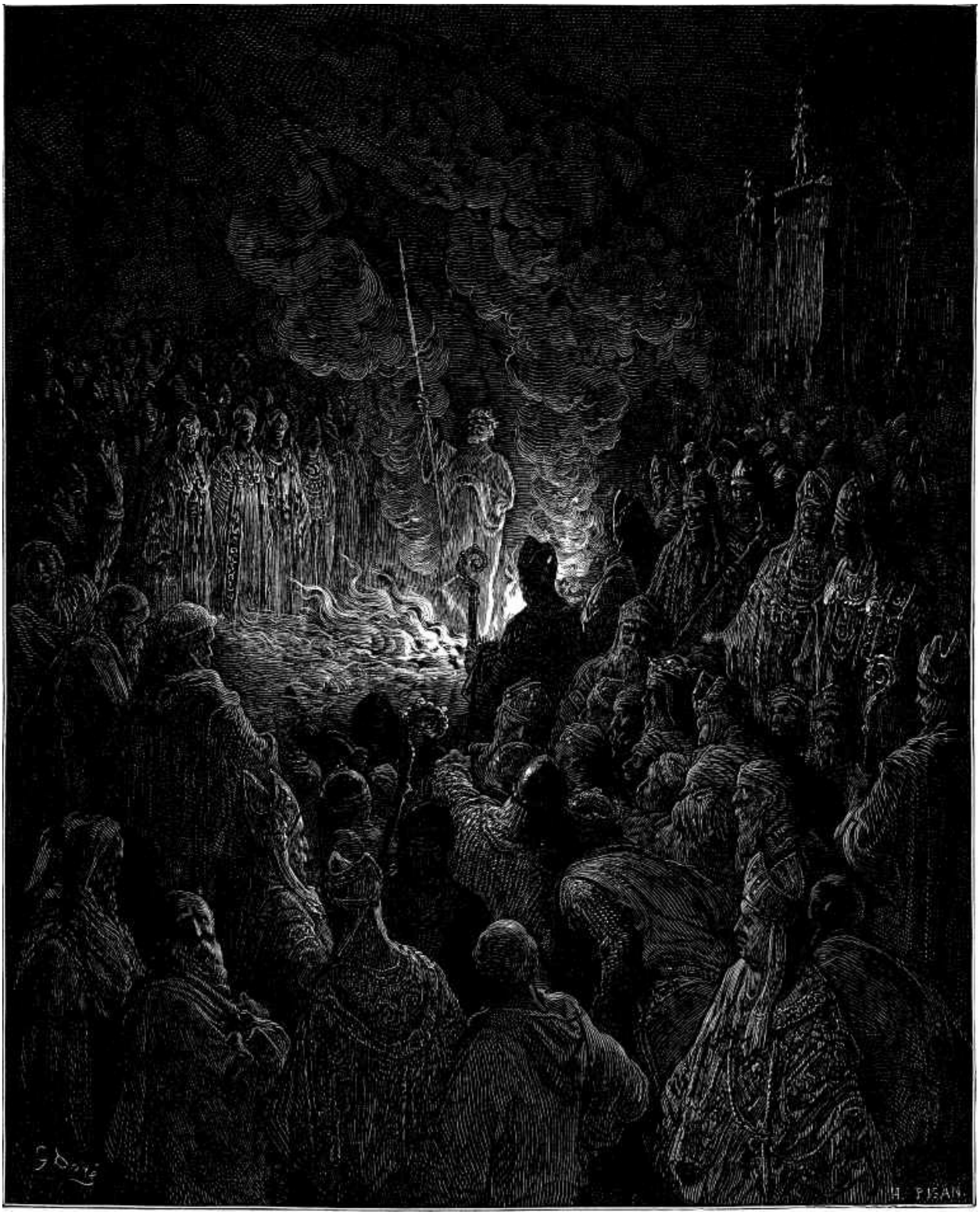
经过8个月的鏖战最终取得胜利。安条克城被攻陷后，普遍认为留

在城里的都是穆斯林，十字军入城后对战败的穆斯林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

十字军的战士，连同在十字军之后到来的朝圣者对安条克城内的居民挥起了屠刀。罗马教皇对外宣称用沾染穆斯林鲜血的双手夺回圣地是神所期望的事情。于是十字军的战士以及朝圣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杀害穆斯林。

通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由此打开。

巴托罗缪，挑战“火的试炼”


G. Doré
H. PISAN.

为了向神证明自己所言的真伪，赤脚从燃烧的火焰中走过这一仪式

在基督教中被称为“火的试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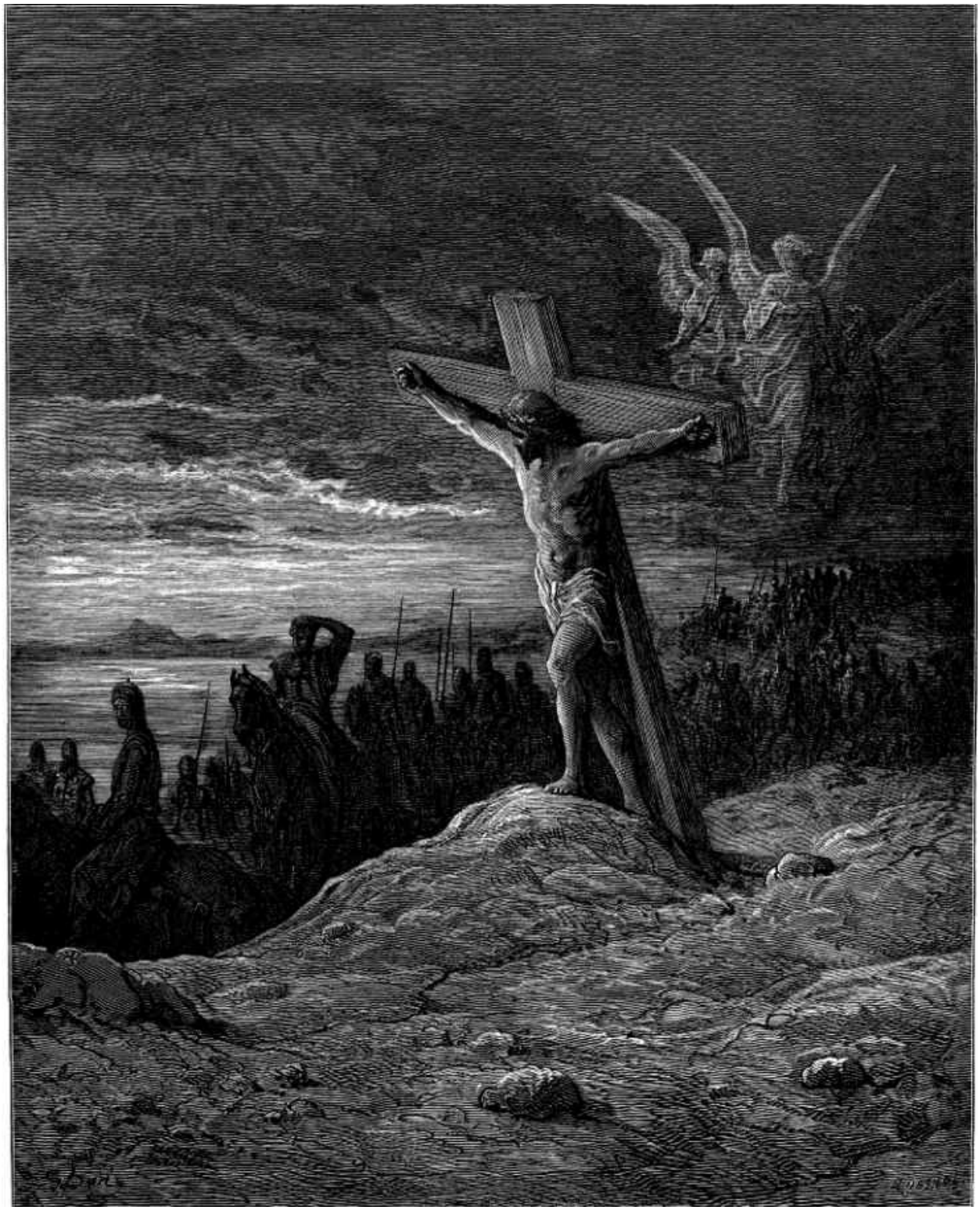
安条克攻防战持续了8个月之久。作为攻方的十字军也历经了焦灼迷茫的8个月。倘若此刻出现奇迹，惶惶不安的人们一定会视为救命稻草紧抓不放。传言称有人发现了刺进耶稣基督腹部两侧的“神圣之枪”的尖端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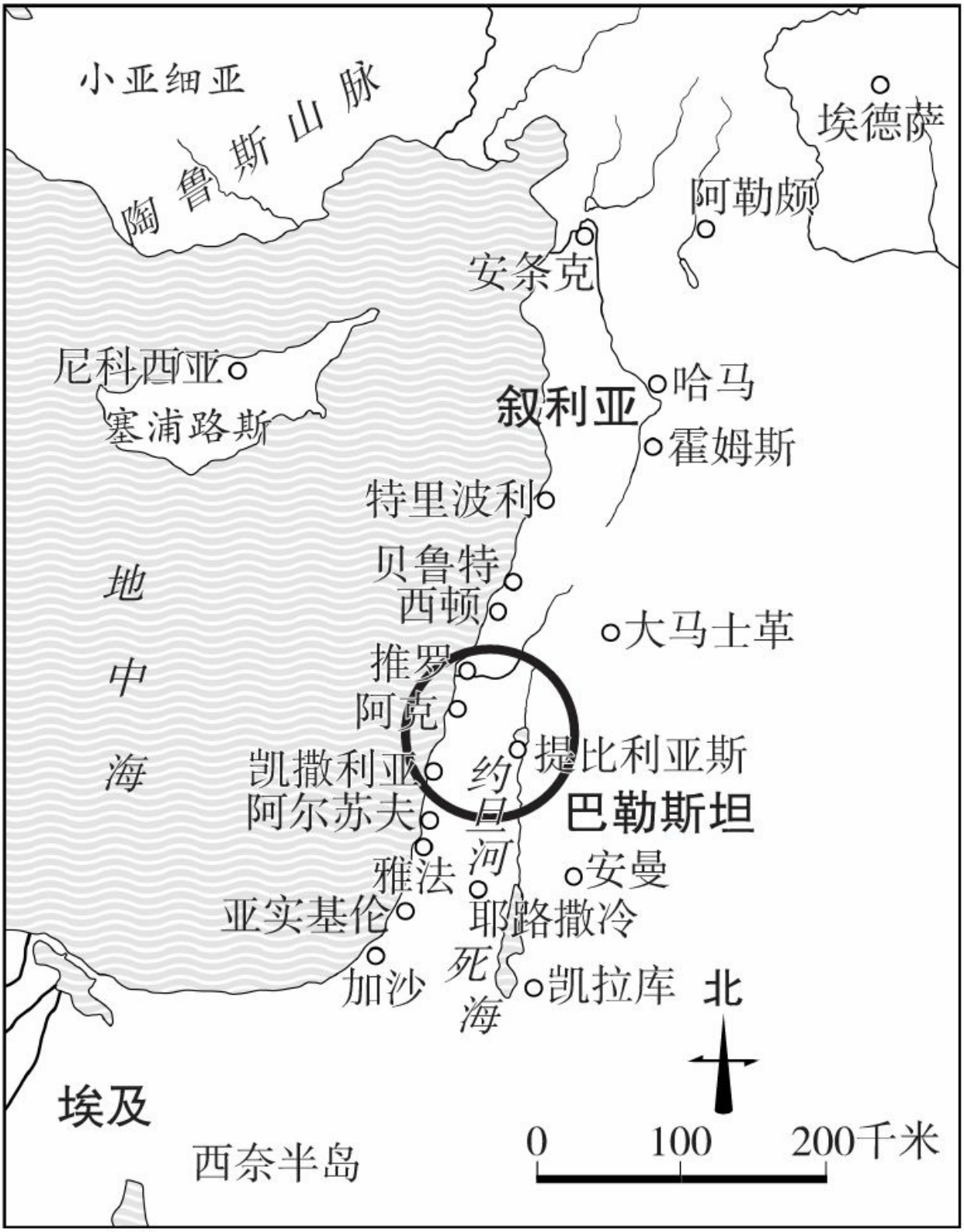
此人正是跟随十字军前来朝圣的巴托罗缪。“神圣之枪”的出现的确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对“圣枪”的真伪提出质疑。为了向神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巴托罗缪赤脚从燃烧的火焰中走过，结果被严重烧伤，9天后痛苦死去。

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现如今“神圣之枪”仍被恭恭敬敬地保存在亚美尼亚和瑞典的教会之中。众所周知连希特勒本人也想要拥有这把决定胜利的“圣物”——“神圣之枪”。

一路同行的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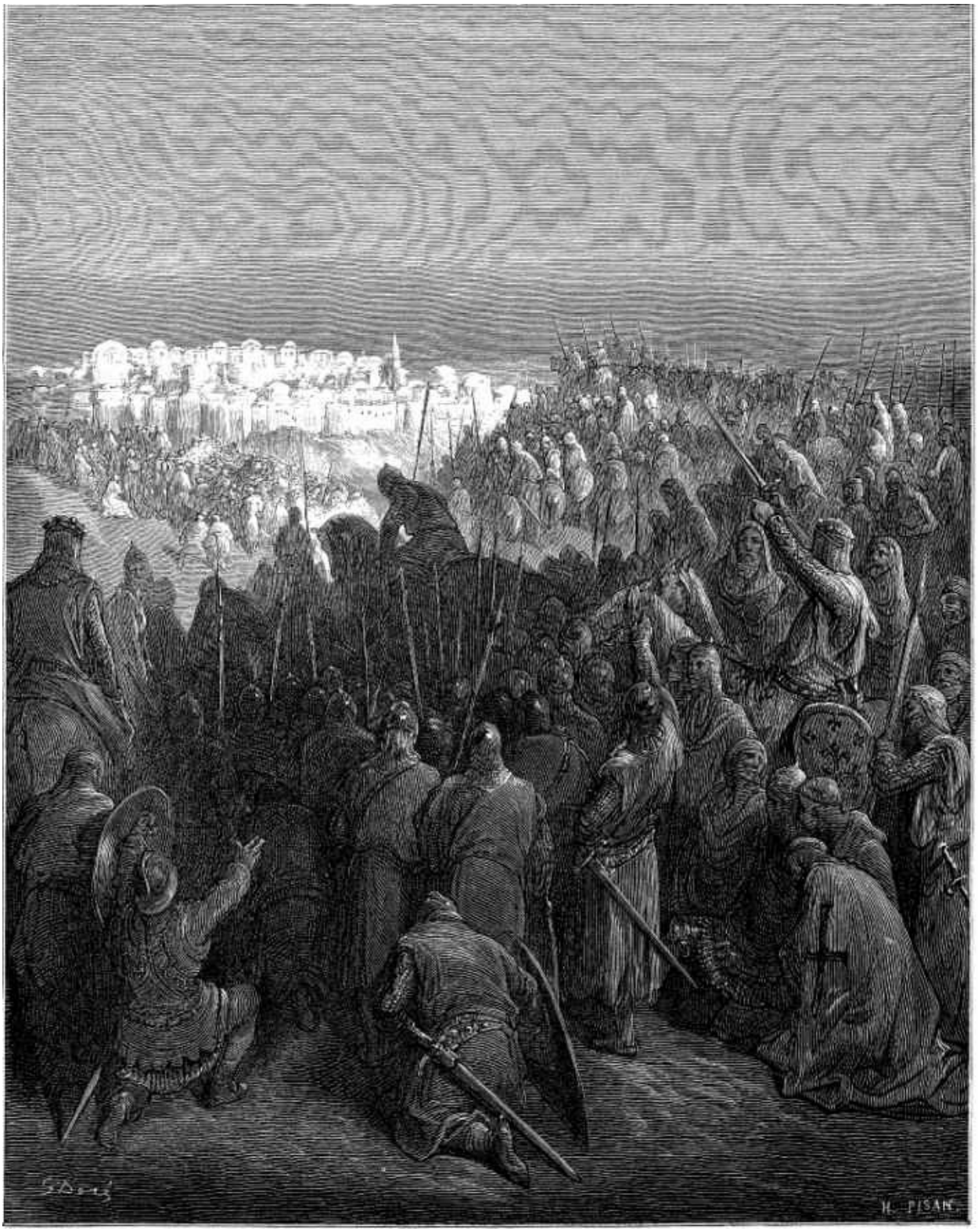
攻克了安条克城这个最大的难关，十字军的队伍逐渐向远征的最终

目的地耶路撒冷进发，至此诸侯之间的争执逐渐消失，士兵的凝聚力以及朝圣的决心更加坚不可摧。

相信耶稣与他们同行的信念也许就是支撑十字军以耶路撒冷为最终目的地一路南下的坚定力量吧。

这个身影就是他们在故乡欧洲的教堂里所见到的十字架上的耶稣，会和天使一同出现。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有这样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遥望耶路撒冷，十字军战士感动不已


G. Doré
H. PI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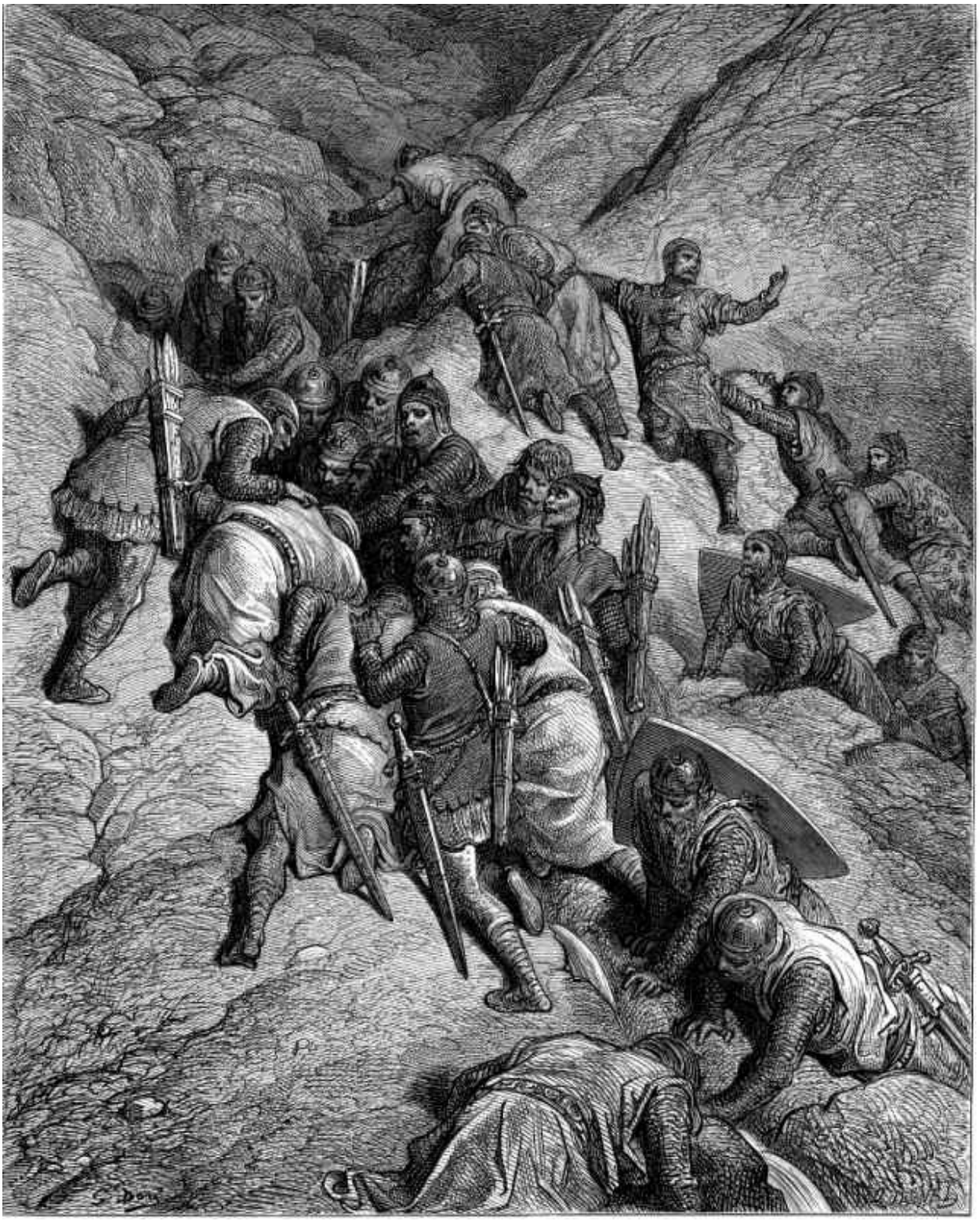
从北欧不远万里而来，途中历经种种磨难，遥望圣城耶路撒冷的刹那间流露出的感动之情也是理所当然。如果从离开欧洲那天算起，至此已经经历了三年的岁月。

可是，这一时期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大多是穆斯林。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登天的地方，是圣城。基督徒来犯，穆斯林当然会做好防卫。

然而，令准备对抗到底的穆斯林大为震惊的是，十字军并没有立刻攻城，而是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十字架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向城墙靠近。

第二天，十字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城之战。

忍受干渴之苦的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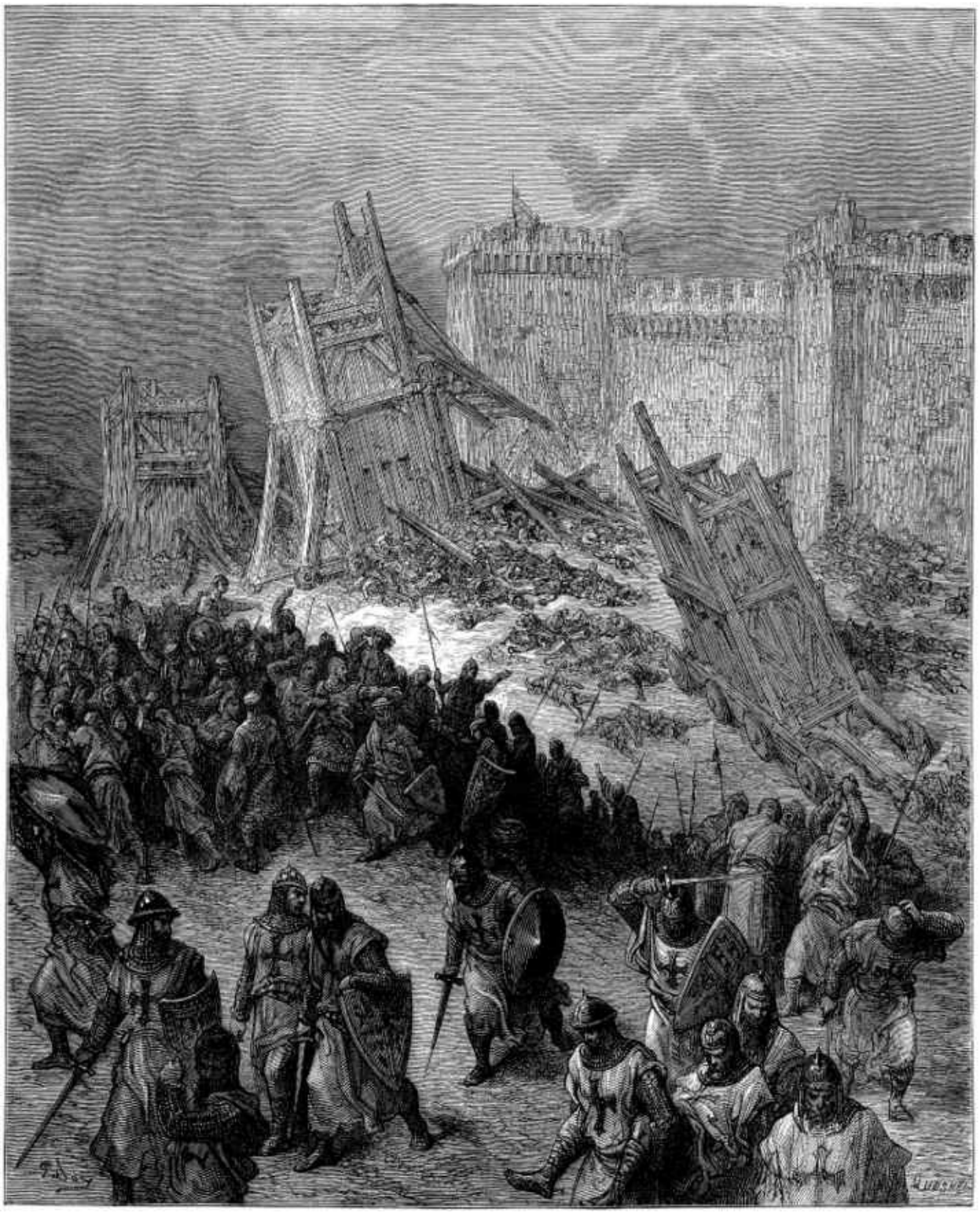

G. Doré

小亚细亚
陶鲁斯山脉
埃德萨
阿勒颇
安条克
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
叙利亚
哈马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地中海
推罗
阿克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巴勒斯坦
阿尔苏夫
雅法
安曼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加沙
死海
凯拉库
北
埃及
西奈半岛
0
100
200千米

以诸侯率领的骑士为主力的第一次十字军，在军队组织方面并不成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诸侯各自为政，擅自行动，甚至没有兵站的概念，与地势气候相关的知识储备存在不足。坦率地说，他们甚至还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等待他们的是水资源的严重匮乏。欧洲人见惯了终年水量充足的大小河流，而中近东内陆地区的气候、地势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考验。纵使守卫耶路撒冷的埃及人长官没有在水井中投毒，水资源匮乏的问题仍旧是十字军的心头大患。据说在十字军的众多殉教者之中，相比在和穆斯林的战斗中遇难的战士人数，远征途中因为饥渴而丧命的人数更多。

第二次总攻，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采用了在欧洲战场上偶尔使用的攻城方法。这

是一种古代罗马军队经常运用的一种作战方式，即建造一座和城墙等高的木塔，用相等的高度消除在城墙外由下而上进行攻击的不利因素。在古代，欧洲和中近东都归属于罗马帝国，只是控制中世纪中近东的穆斯林大概早已遗忘了这一古老的作战方法。

然而在中世纪，人们还没有完全灵活掌握这种作战方法。另一方面，作为防守的一方也无法尽早看破敌方的漏洞。因此，耶路撒冷的围城战就演变为持续的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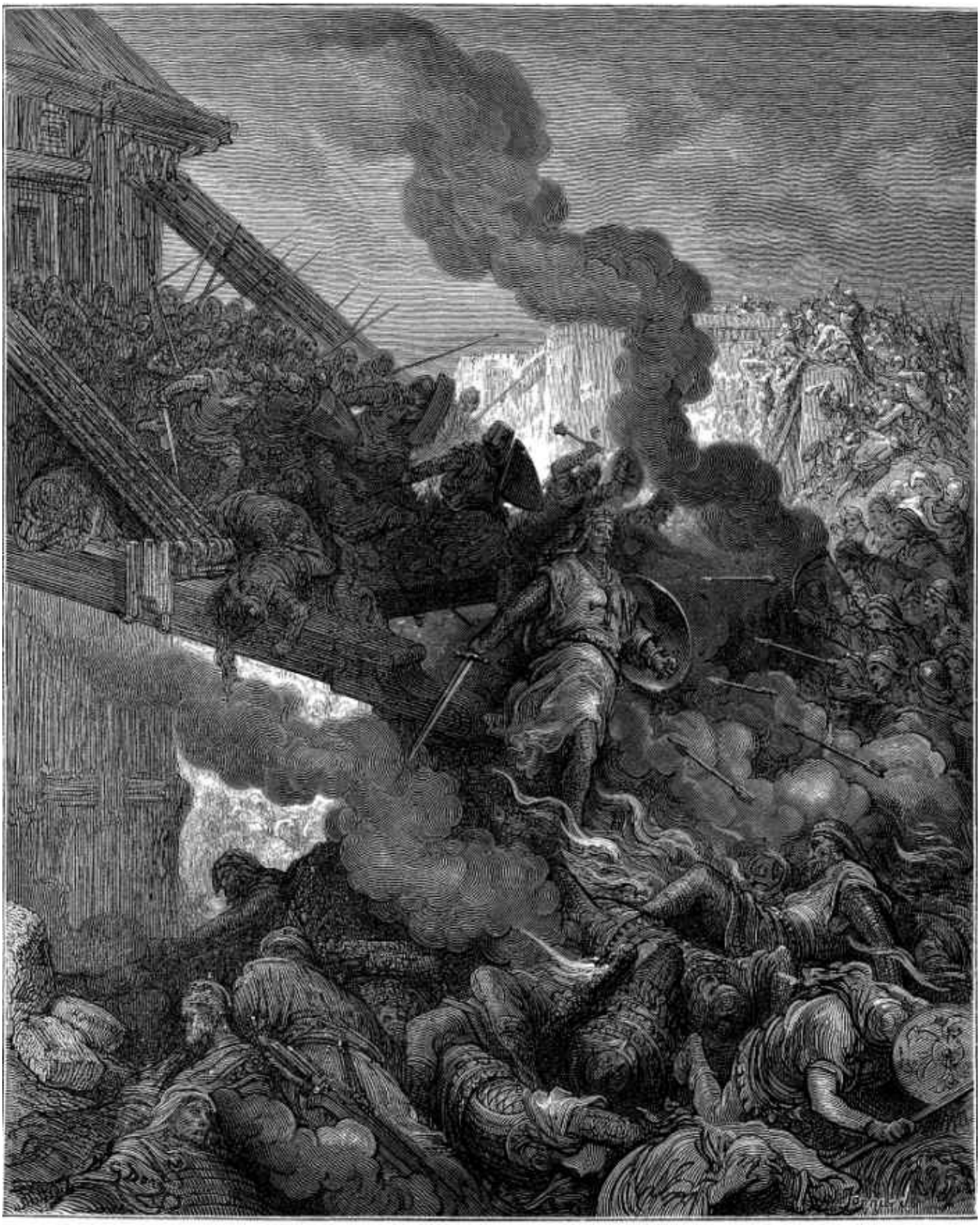
出现在橄榄山上鼓舞士气的圣乔治

在无休止的战争中人会越来越期待奇迹的到来，更何况这不是普通

的战争，是“圣战”。尤其是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战士，都会有产生与神、基督、天使并肩作战的遐想。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神所期望的事情。

圣乔治之后虽然成为了大英帝国的守护圣人，但他原本就来自中近东，因为杀了欺凌百姓的恶龙而被看作是战斗的守护圣人。因此，圣乔治是鼓舞耶路撒冷攻城战中的十字军战士的最佳圣人。

带头攻占耶路撒冷的戈德弗鲁瓦



第一次十字军的大将军戈德弗鲁瓦·德·布永和其他有着敌对意识的

诸侯不同，即便是最普通的士兵也对他敬重有加。作为一方的总司令，一般会在后方主持战局，而他却经常在前线冲锋陷阵。

在耶路撒冷围城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通过攻城塔的吊桥最先站在敌方城墙上的就是他。守城有穆斯林士兵看到这一瞬间产生了胆怯退缩之意，丝毫动弹不得。趁着这个空隙，基督教士兵高喊不能让总司令孤身奋战，顺势涌入城内。经此一战，耶路撒冷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提起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人们大概会联想到画卷中描绘的中世纪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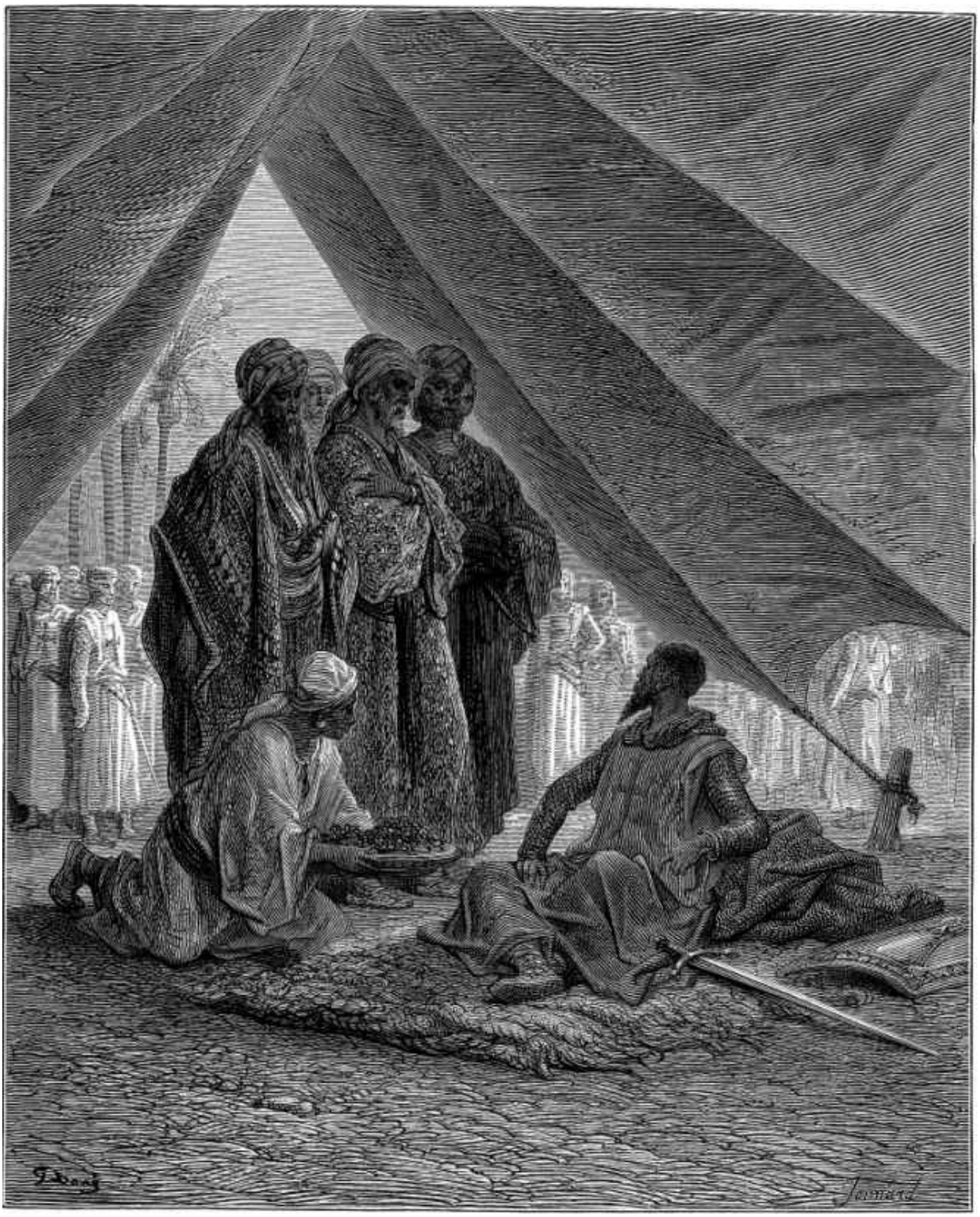
在意外发现的十字架面前感动落泪的十字军战士

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战士们发现了隐藏在居民家的十字架。虽说

任何十字架都是“神圣的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的地位非同寻常。因为这个十字架乃是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人们称其为“真十字架”。因此对于教徒们来说，这个十字架比用黄金或者白银做的十字架更有价值。通过汲取众人的虔诚信仰，完好保存历经千年的木制十字架等等事件的可信度无须深究。

然而，就是这些在十字架面前感动得泣不成声的十字军战士，却在攻陷安条克后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住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所谓的“解放圣地”，其实就是在攻守两方战士血流成河的大前提下一步步完成的。

拜访胜者戈德弗鲁瓦的穆斯林城市领主



小亚细亚
陶鲁斯山脉
埃德萨
阿勒颇
安条克
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
叙利亚
哈马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地
中
海
推罗
阿克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巴勒斯坦
阿尔苏夫
雅法
安曼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凯拉库
北
埃及
西奈半岛
0
100
200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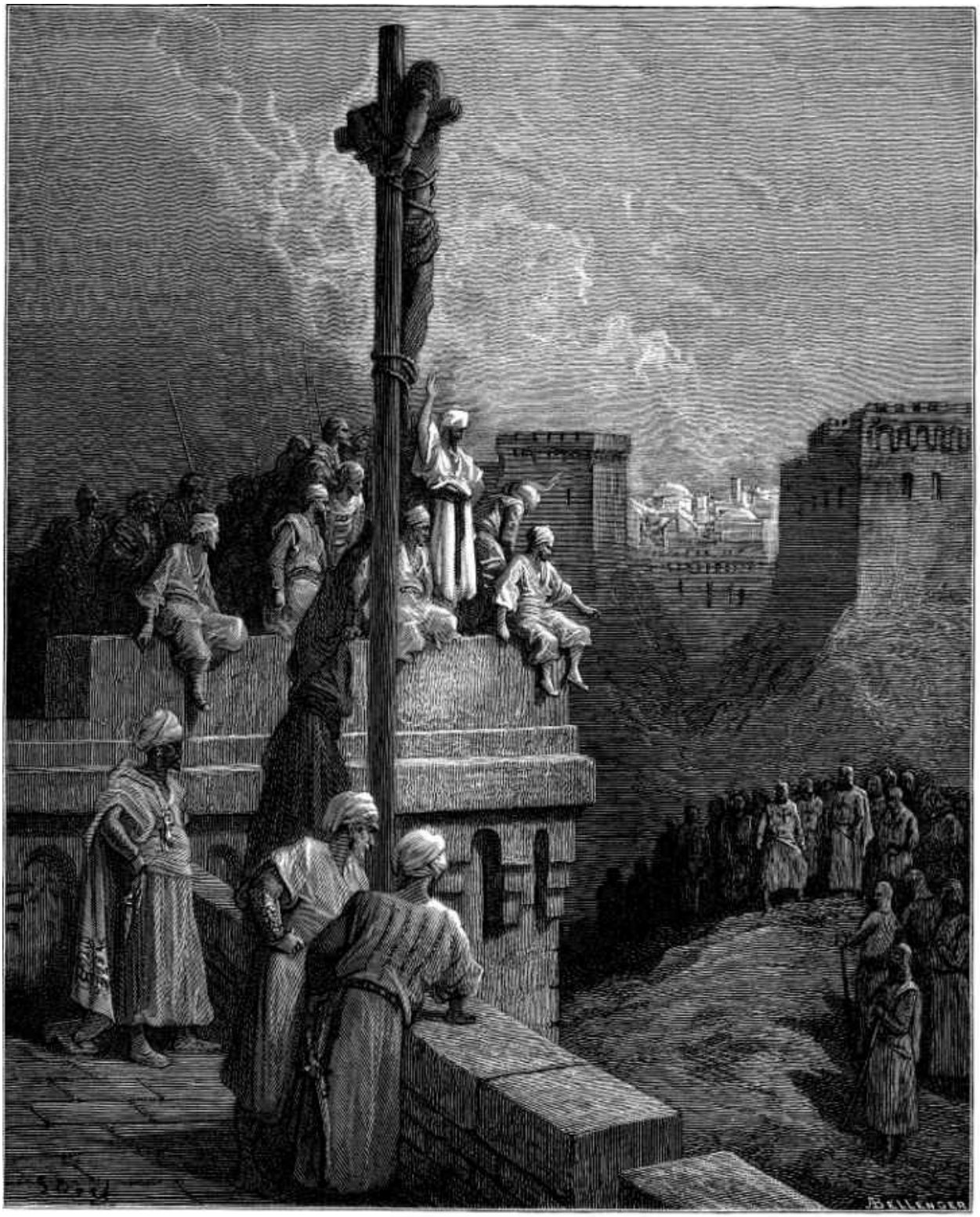
当基督教军队强势来袭时，穆斯林一方并没有意识到第一次十字军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由北欧诸侯发起的抢夺财富攻占领地的侵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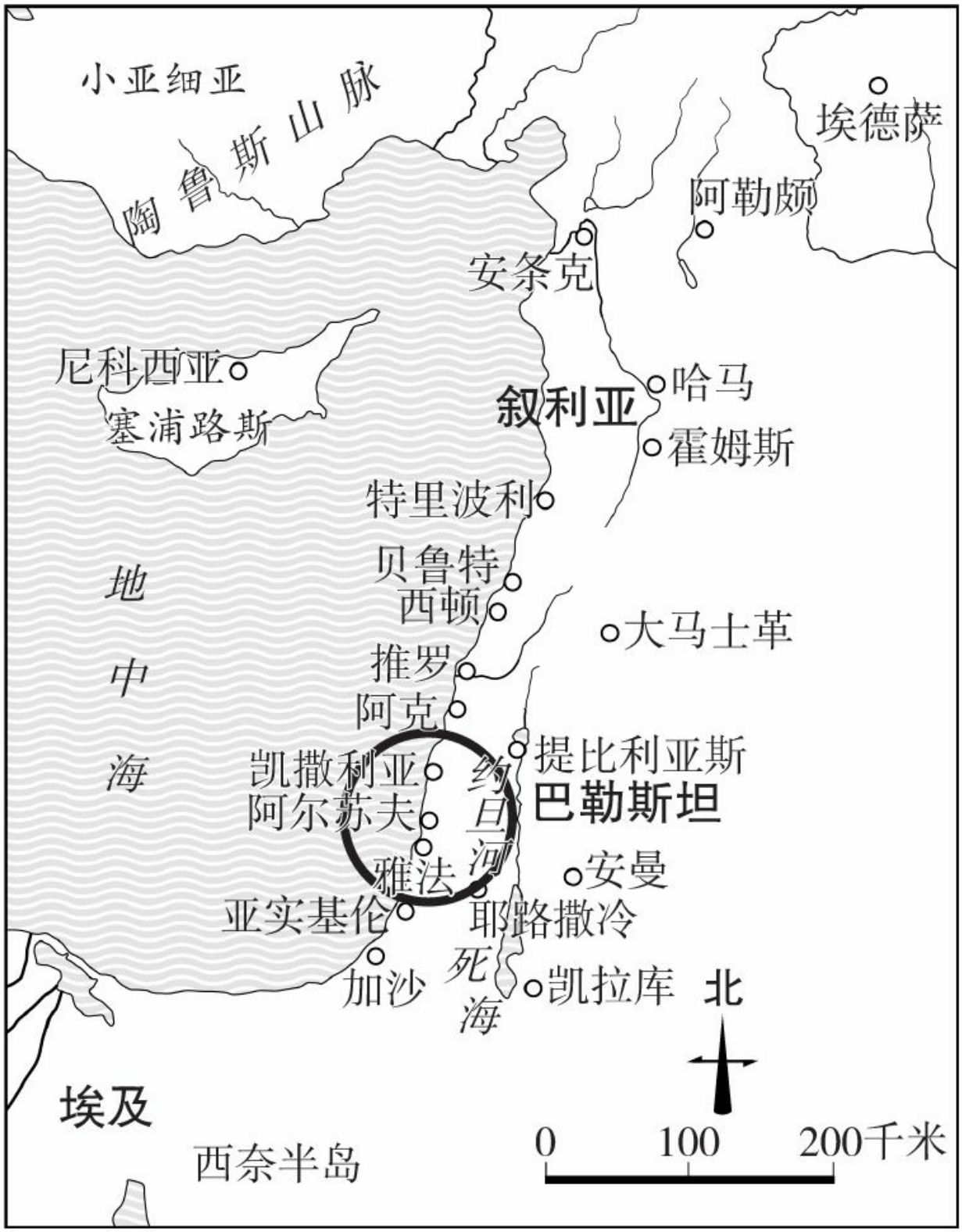
所以，周围的穆斯林城市领主纷纷去登门拜访戈德弗鲁瓦，他们一边把盛满金币的银盆当作礼物进献给戈德弗鲁瓦，一边承诺之后每年都会缴纳供奉以此请求不要攻打自己的城市。

想必戈德弗鲁瓦听后一定难以置信，如果应允了领主们的请求何来十字军东征一说。虽然被断然拒绝，但众人都对戈德弗鲁瓦的彬彬有礼以及坦率的品格印象深刻。

总之，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此刻就是耶路撒冷的国王。

在阿尔苏夫攻坚战中，穆斯林一方企图利用达布奈斯胁迫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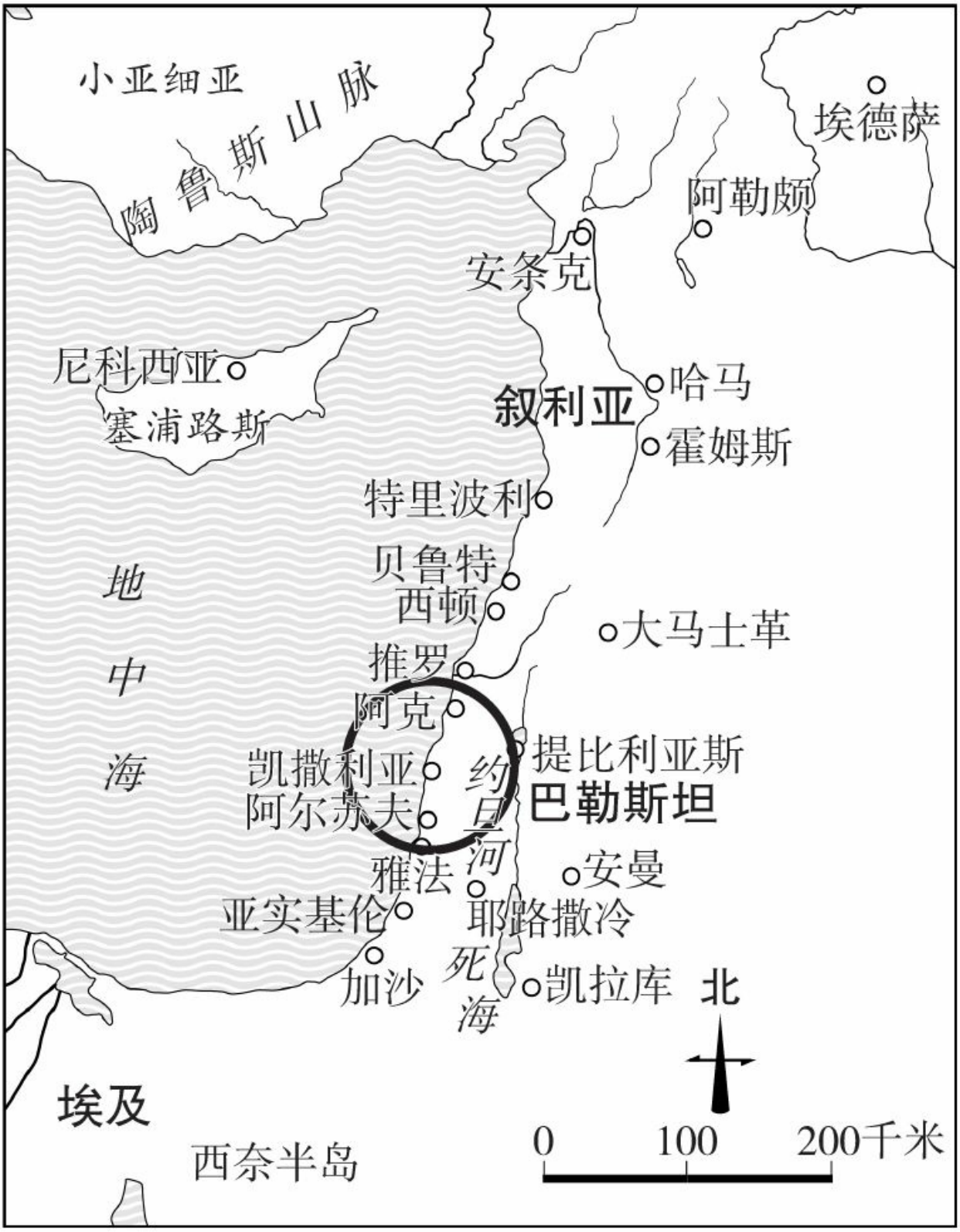
在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气势并没有衰减。鲍德温在兄长

之后向南向北攻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十字军所到之处都有“真十字架”的影子，通常在战场后方鼓舞士气。

或许是得益于“真十字架”的庇佑，十字军一路所向披靡，穆斯林一方使出各种手段仍不能阻止进攻。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将俘虏的十字军骑士吊在城墙上，胁迫十字军撤退。

但是，被俘虏的骑士达布奈斯却高声呼喊：“不要管我，继续进攻。”穆斯林一方被达布奈斯的精神感动便主动释放了他。而此时，十字军还没有攻陷阿尔苏夫。

在清真寺避难依然被杀害的穆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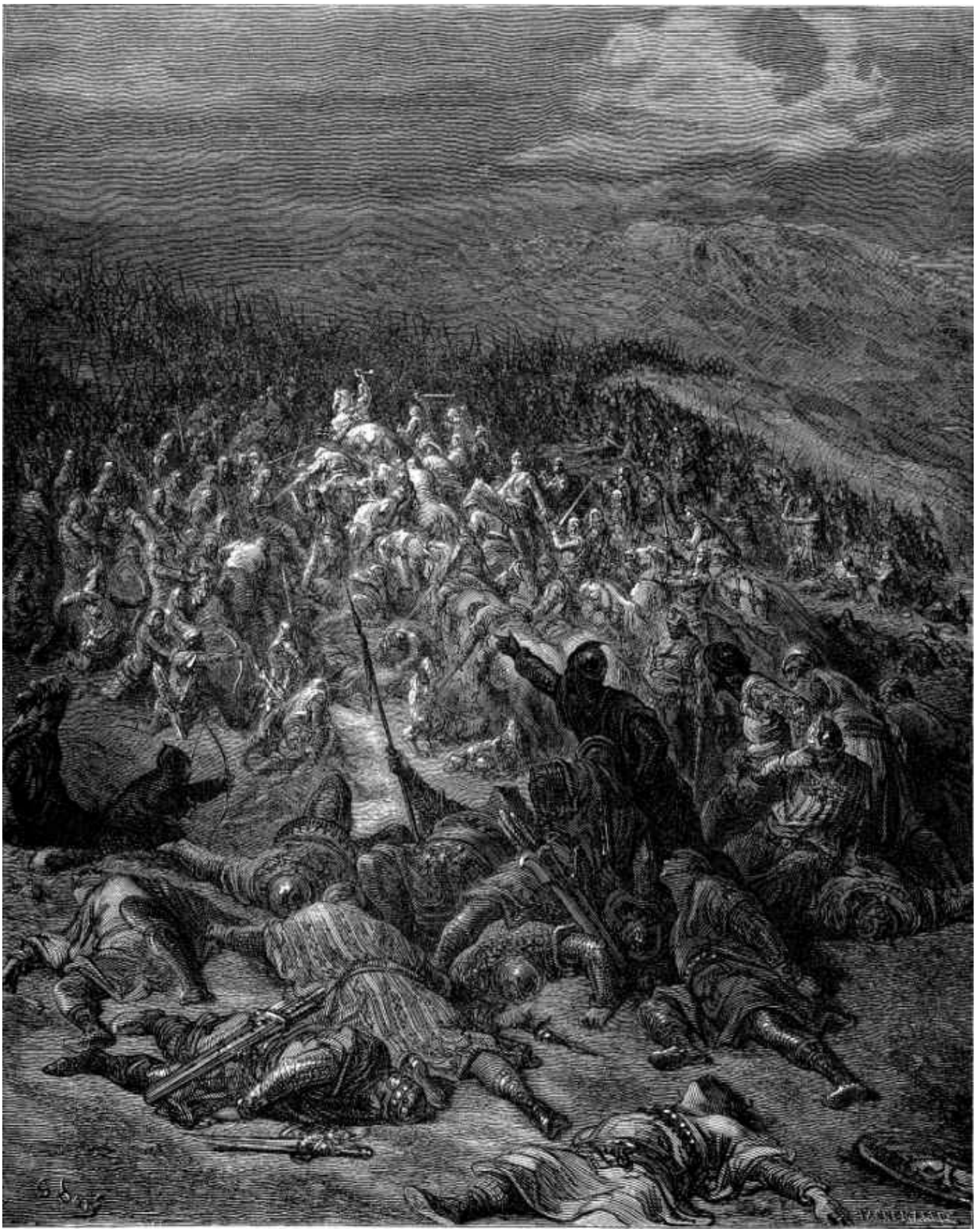
从古代繁荣至今的海港城市凯撒利亚也在十字军的猛烈攻势下沦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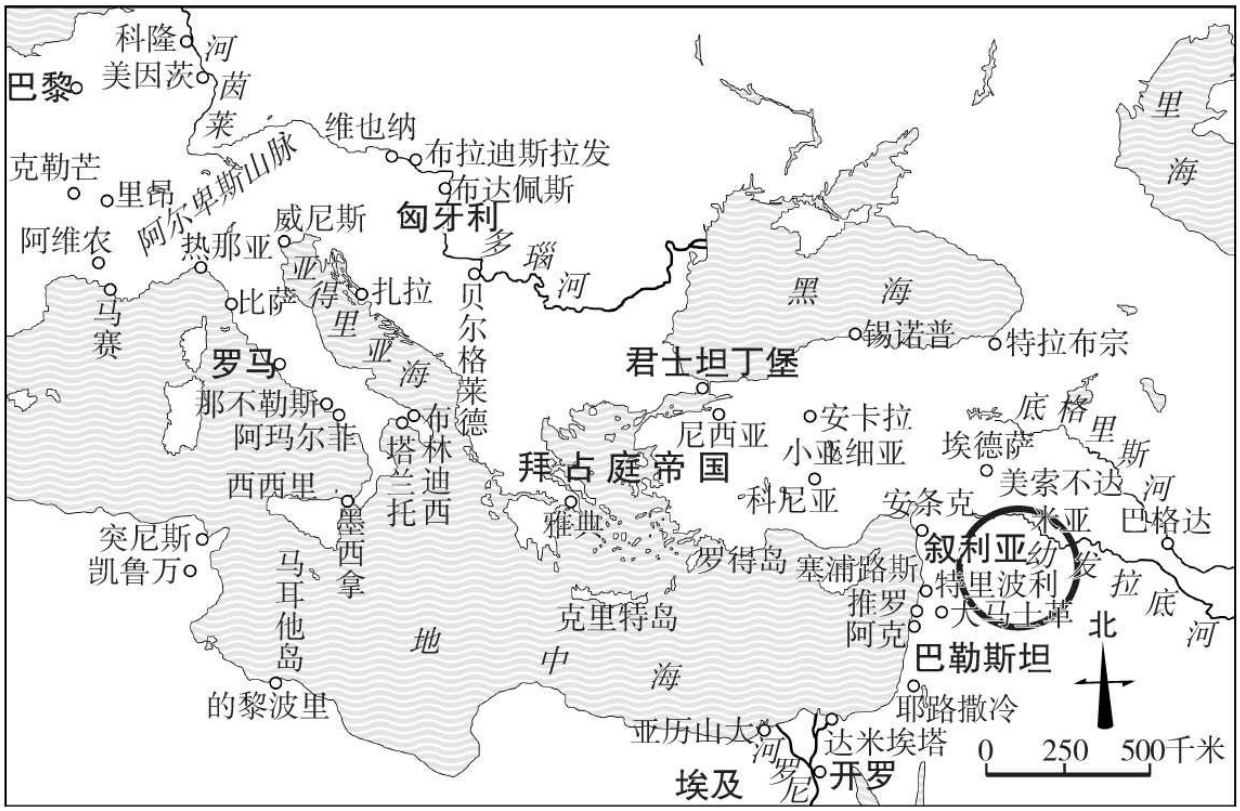
了。安条克、耶路撒冷沦陷后的屠城事件在凯撒利亚再次上演。

中近东地区的穆斯林将十字军视为不留活口的杀人狂魔。

然而，绝望最能激发人的斗志。穆斯林一方受到意外攻击，不断被逼往绝境，反攻的斗志逐渐高涨起来。

200名英勇战士对抗2万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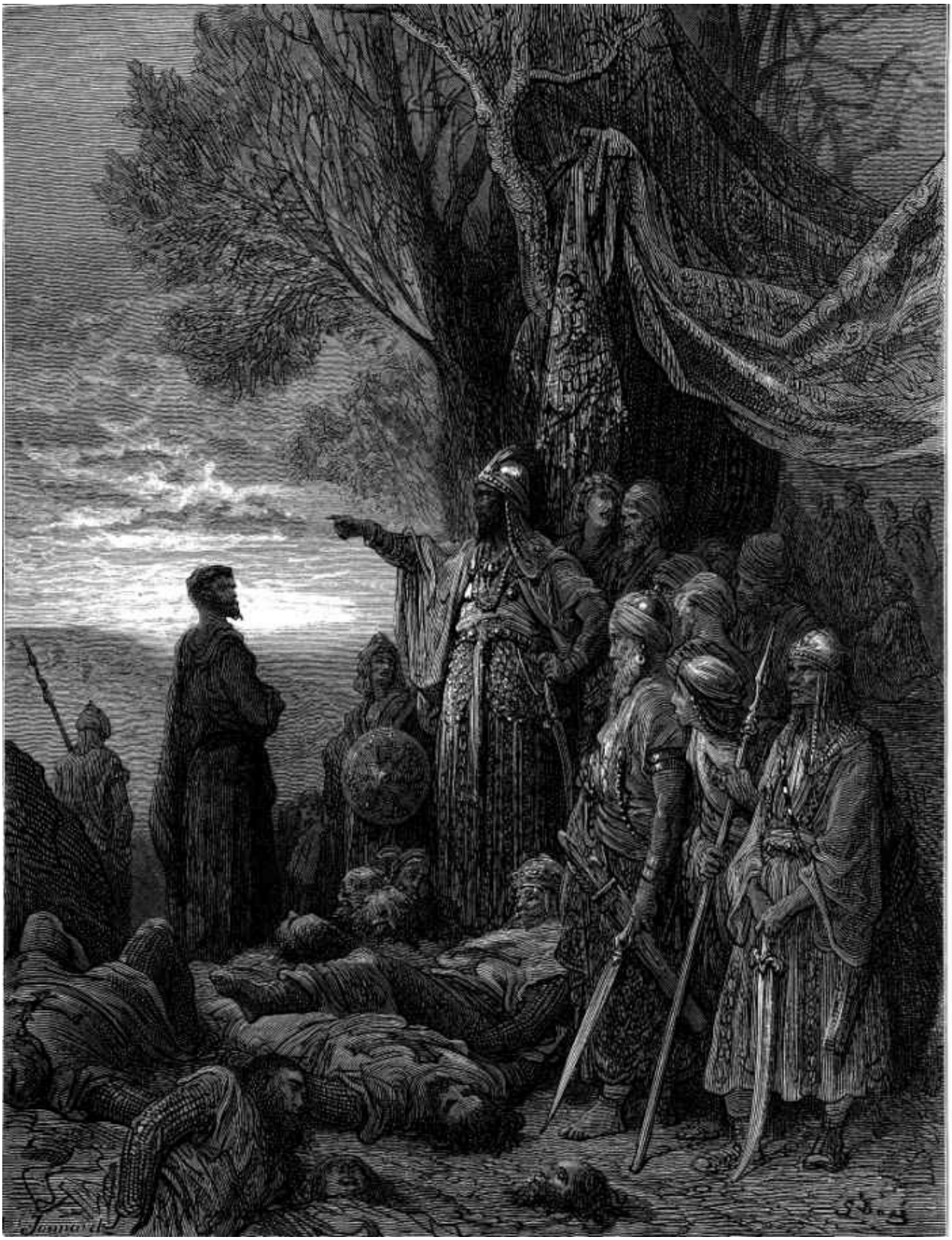


公元1100年之后，基督教徒一方与穆斯林一方的武力冲突再次升级。十字军的行动范围不断扩大，南至西奈半岛，东至幼发拉底河。

于是，中近东的穆斯林不再以部族纷争为借口继续容忍十字军对领地的侵略。

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十字军一方的阵亡战士越来越多。他们被称为“殉教者”而非“战死者”，也就是死后一定能升入天堂的人。

挽救幸存骑士生命的阿勒颇领主



无论在哪个时期，相比看到穆斯林就杀的基督徒，穆斯林的宿命似

乎更加人性化。

虽然是伊斯兰教的习惯，但想要活命恢复自由身就必须上缴赎金。悲哀的是，那些被视为无力上缴赎金的兵卒和普通朝圣者只能落个被俘虏的命运。而他们最终都会当作奴隶卖掉，无需任何理由。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之死

G. Doré
A. Doms

戈德弗鲁瓦·德·布永是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被选出来的第一代耶路撒

冷国王。由于此前奋力拼杀耗尽元气，即位一年后便去世了。随后，他的弟弟鲍德温继承王位，以鲍德温一世之名在位18年。

这一时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由北至南统一了分散的埃德萨伯爵领地、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以及耶路撒冷王国，进一步确立了势力范围。其中，将贝鲁特到加沙的海港城市群的支配权收入囊中，标志着耶路撒王国的权威走向巅峰。

鲍德温是一位难得的拥有雄才大略的君王，遗憾的是在征服西奈半岛途中不幸去世。鲍德温死后的那段时间正是所向披靡的十字军的低迷期。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圣贝尔纳面前宣誓率领十字军东征

穆斯林一方夺取了埃德萨伯爵领地，开始威胁到中近东地区的十字军势力。

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埃德萨伯爵领地是守卫十字军国家的要塞。如果埃德萨失守，位于西侧的安条克将会最先暴露在敌军眼前。这一事件给东方的十字军迎头一击，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对此无法坐视不管。

为了对此次打击做出回应，第二次十字军在西欧集结完毕。这一次军队的领导者不再是诸侯阶级，而是由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率领。

在第二次十字军中代理罗马教皇行使权力的是修士贝尔纳，不久之后因其不朽的功绩被纳入圣人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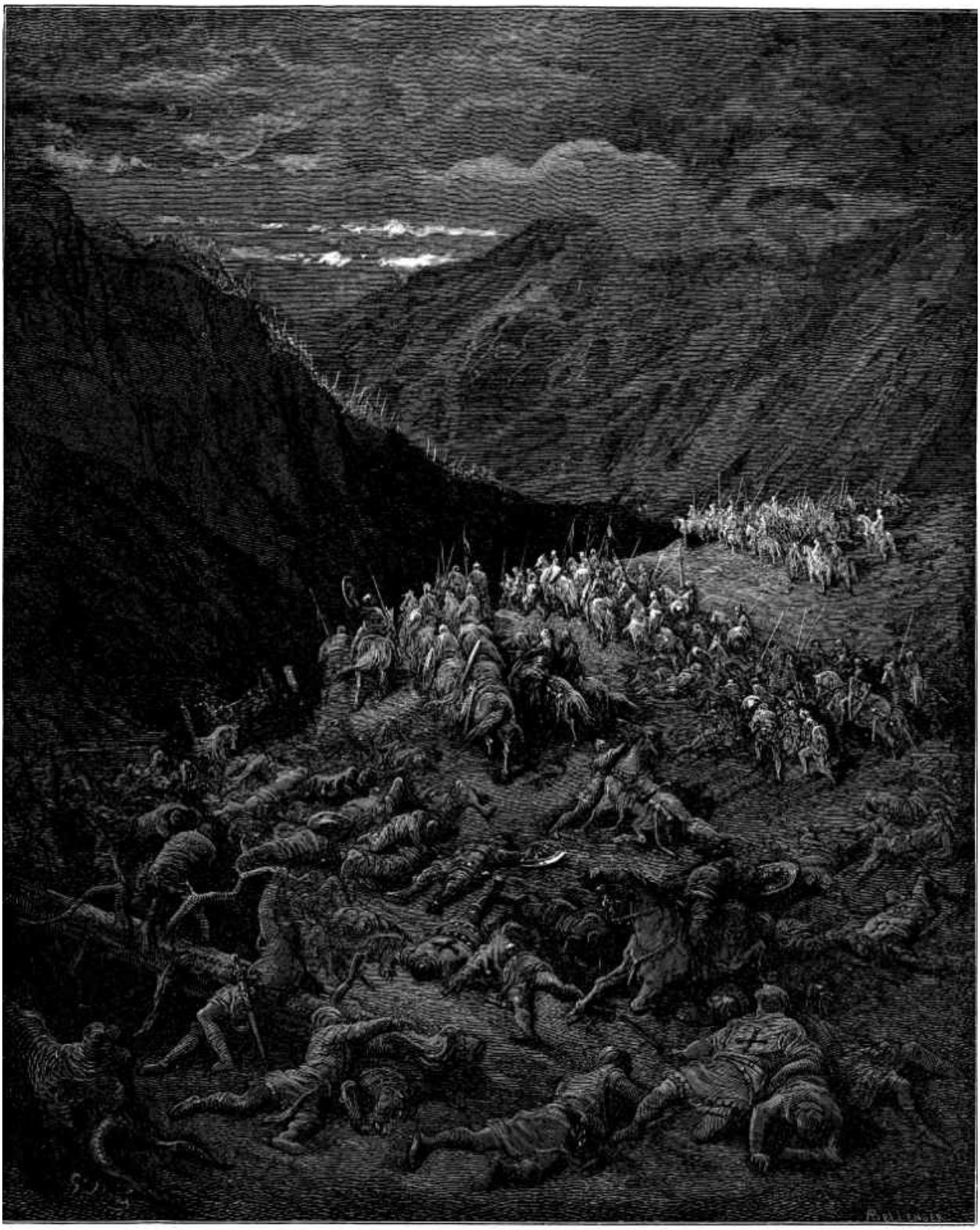
为十字军发起的筹款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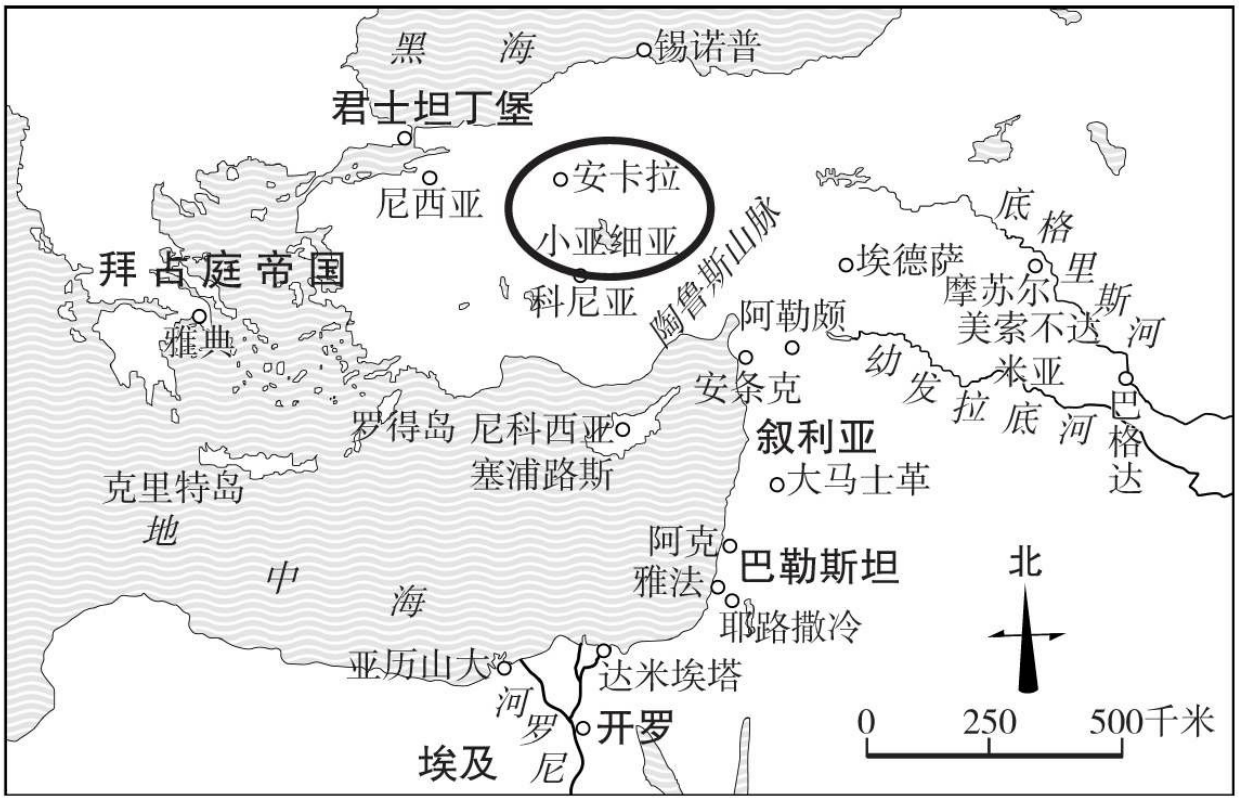
相比第一次十字军，第二次十字军的发起者不再是一介隐士，而是在法国最大修道院修行的贝尔纳。响应此事的也不再是封建诸侯，而是位居诸侯之上的法国国王路易和德国皇帝康拉德。为十字军发起的筹款运动遍及全欧洲。

由此看来，第二次十字军是基督教世界自上而下推出的一支比第一次规模更为庞大的十字军队伍。其目标不仅是夺回埃德萨，还要在此之上巩固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势力。

临海一侧由新兴的海洋城市国家意大利为十字军国家提供补给，因此完成这次出征的目标绝不是痴人说梦。

康拉德率领的德意志军暴尸小亚细亚山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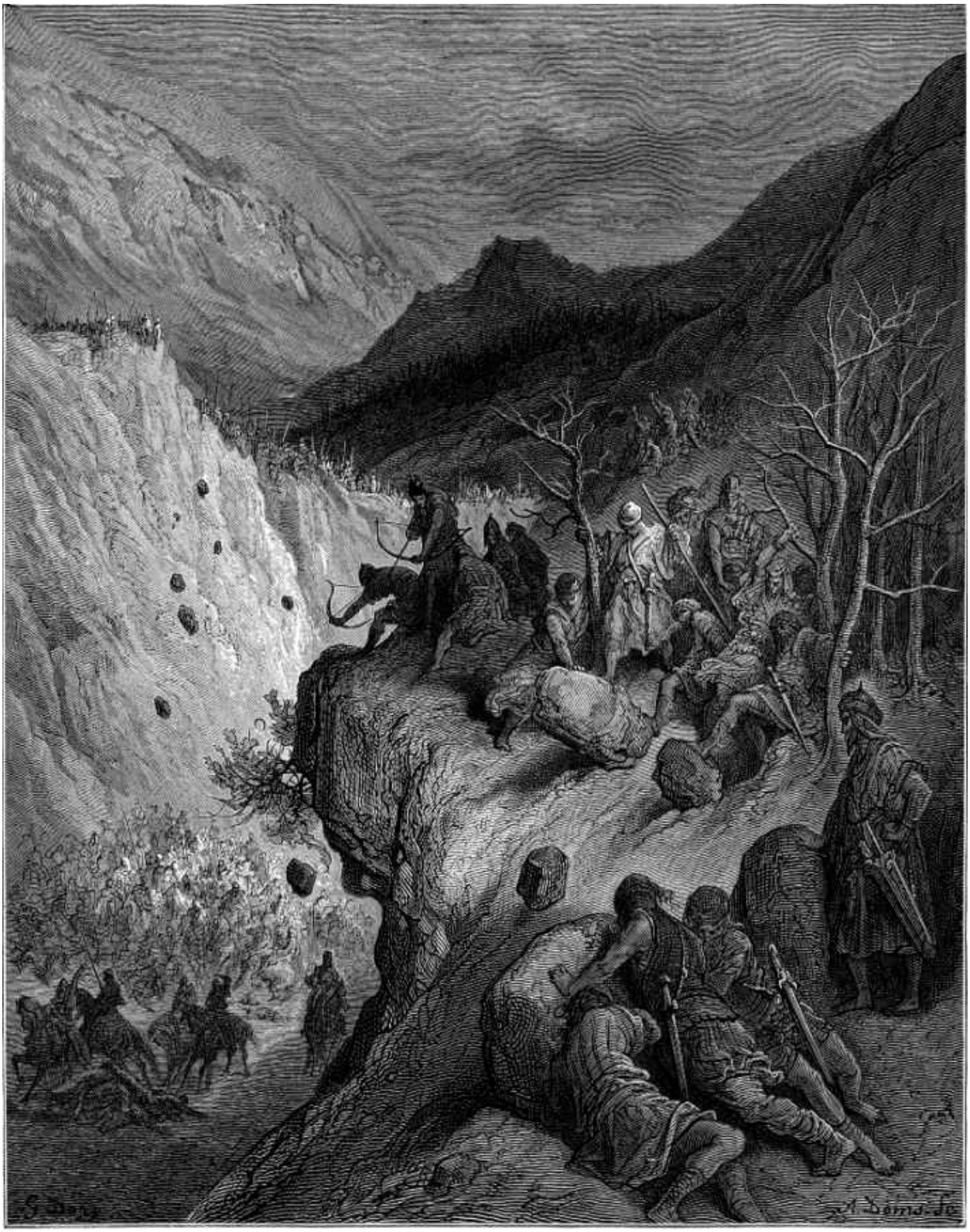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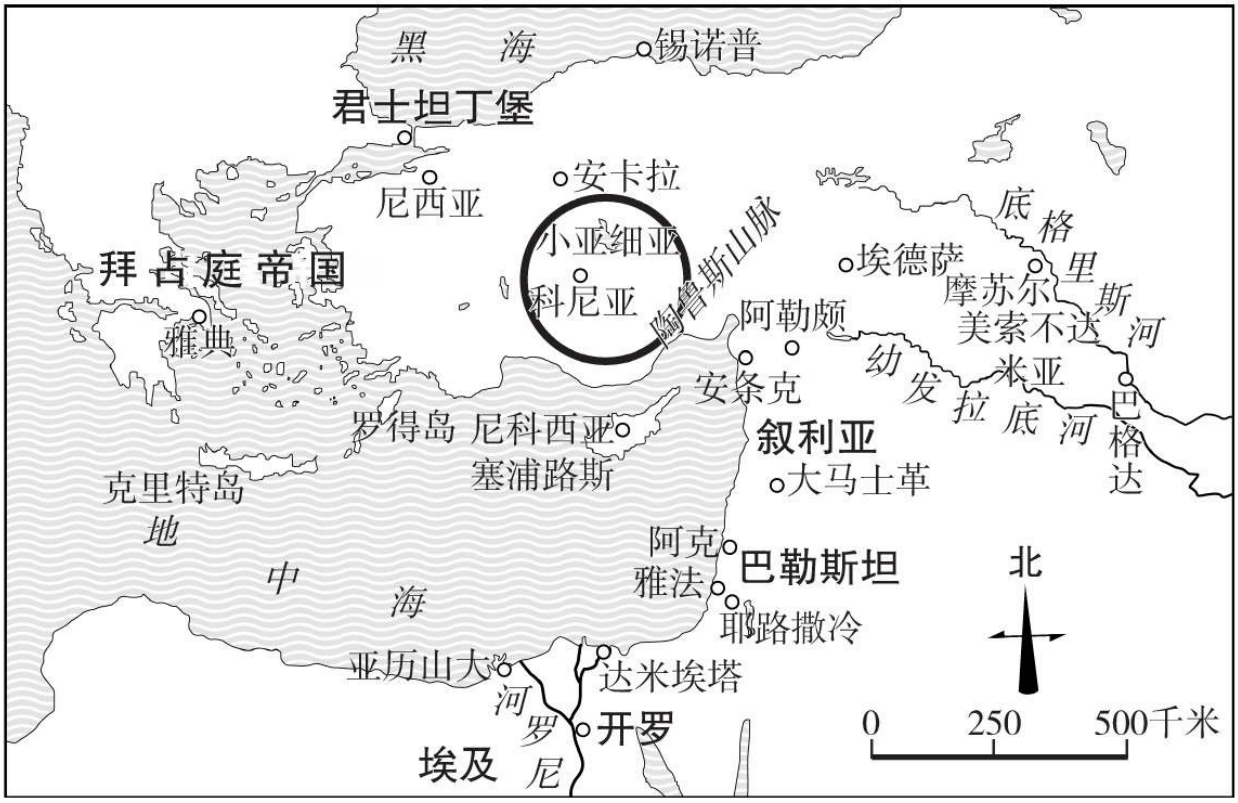


在伊斯兰世界存在着类似于旧族和新族的民族等级差别。阿拉伯人是正统的穆斯林，伊斯兰世界在先知穆罕默德布教之后已经过去了500多年，其势力迅速扩大。受教条主义影响，刻板强硬的阿拉伯民族被新兴的塞尔柱穆斯林取代。

小亚细亚是从欧洲前往东方的的必经之地，这片土地归塞尔柱人所有。第一次十字军经过小亚细亚时历经磨难，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在途经小亚细亚时也被塞尔柱战士的游击战戏弄了一番。

南德的卡林兹亚伯爵贝尔纳德和他的部队在乱石中遇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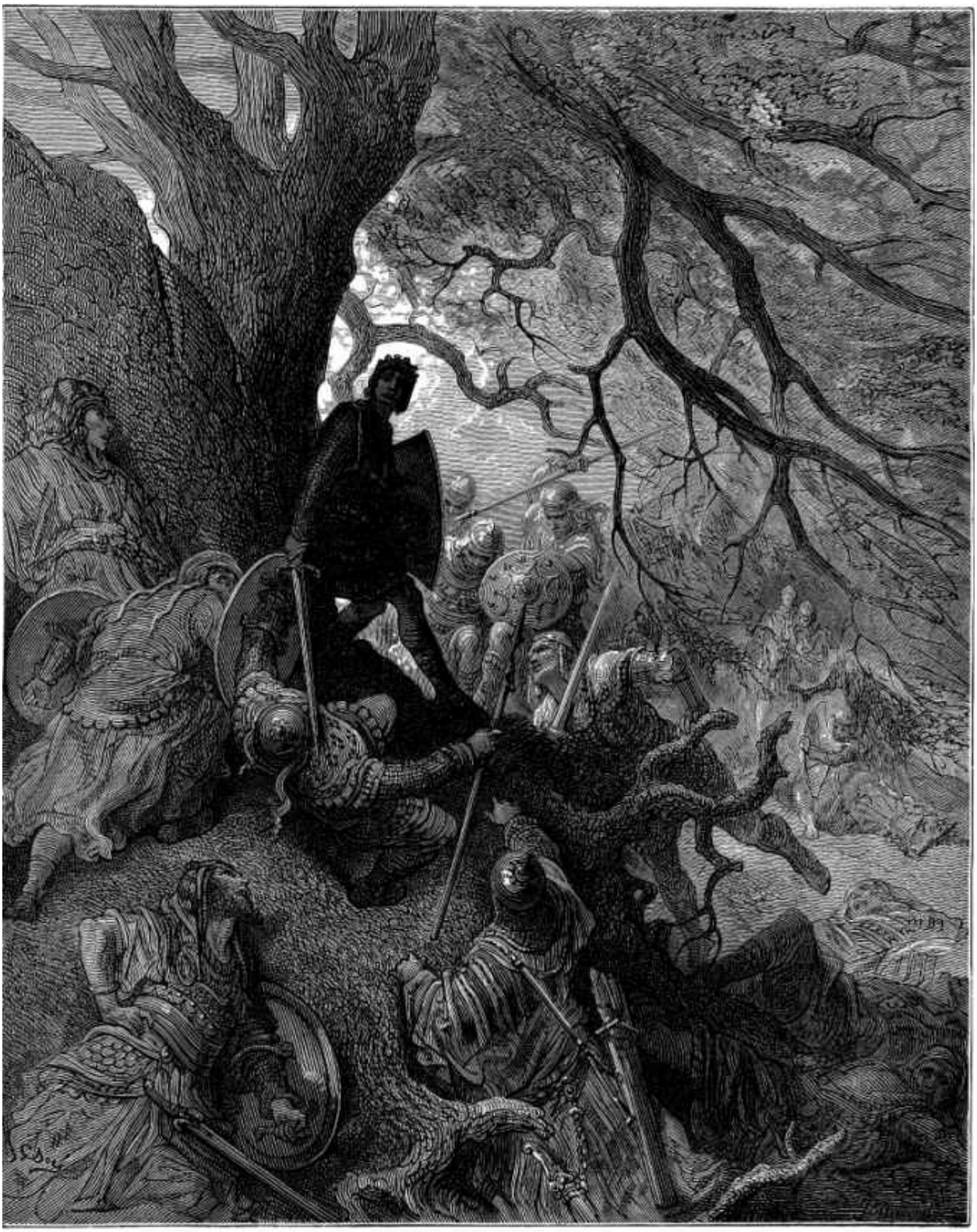
皇帝和国王率领的十字军都是精锐部队，却出乎意料地被塞尔柱士兵戏弄一番。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懈怠，这在第二次十字军中尽人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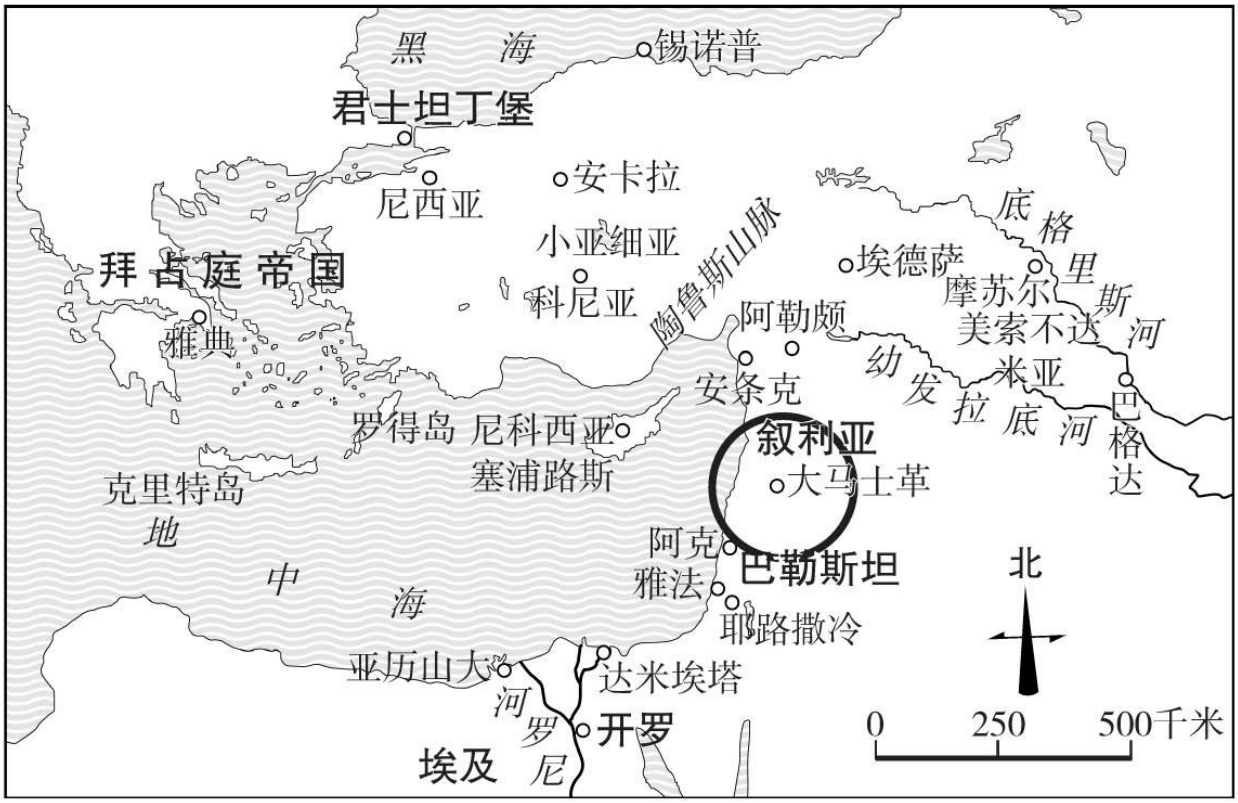
拜占庭帝国自身并不具备强悍的军事实力，因此希望借十字军之手收复被伊斯兰一方夺走的领土，而第一次十字军将精力用在了建设了自己的国家上，所以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如愿。

为此感到焦虑的皇帝在第二次十字军经过小亚细亚时，未能及时提供合适的引路人。即使是精锐的部队倘若迷了路自然无法发挥实力，于是便被敌方的游击战戏弄了一番。

在抵达圣地之前，第二次十字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的士气也陷入低迷阶段。

在战场上孤立无援的法国国王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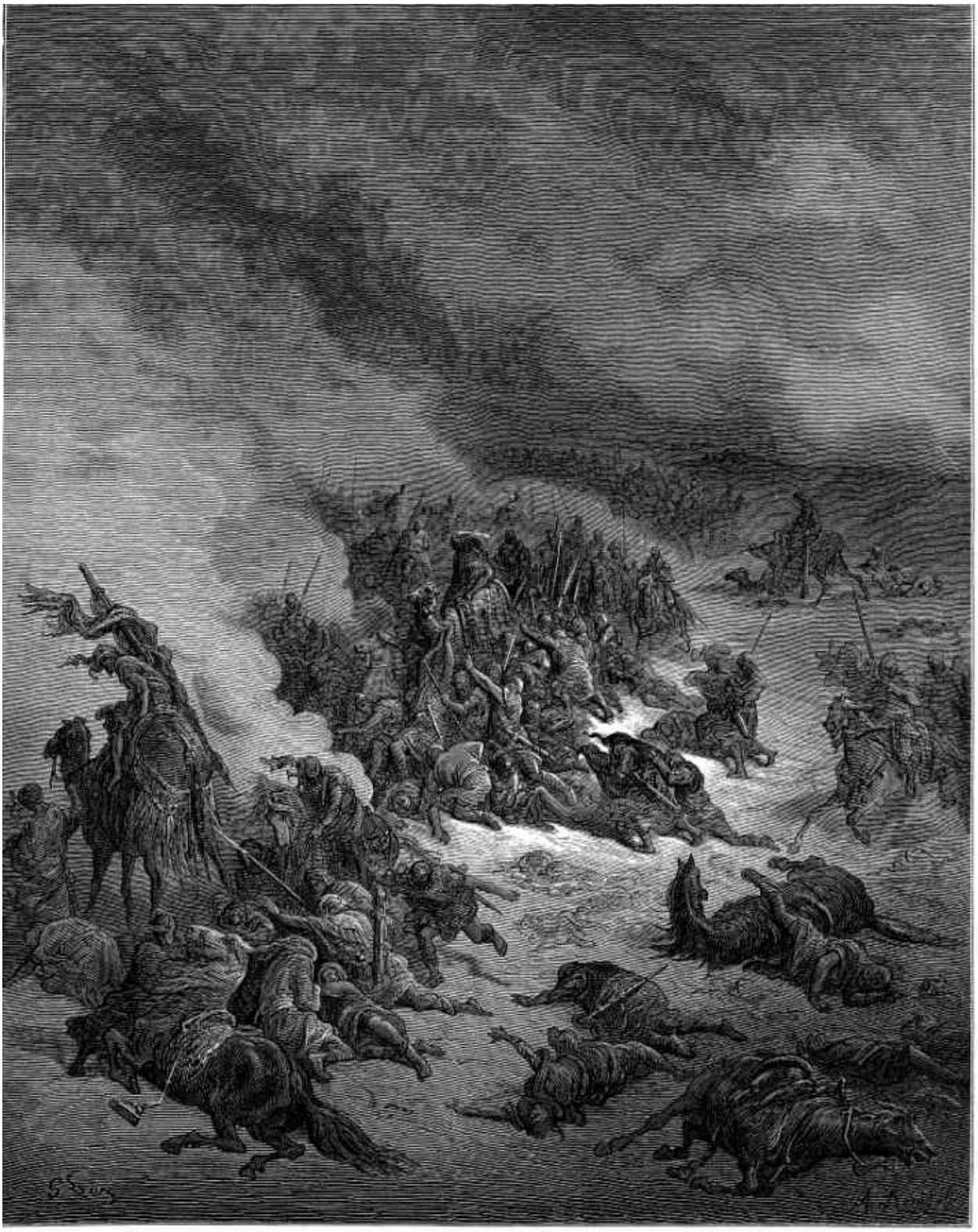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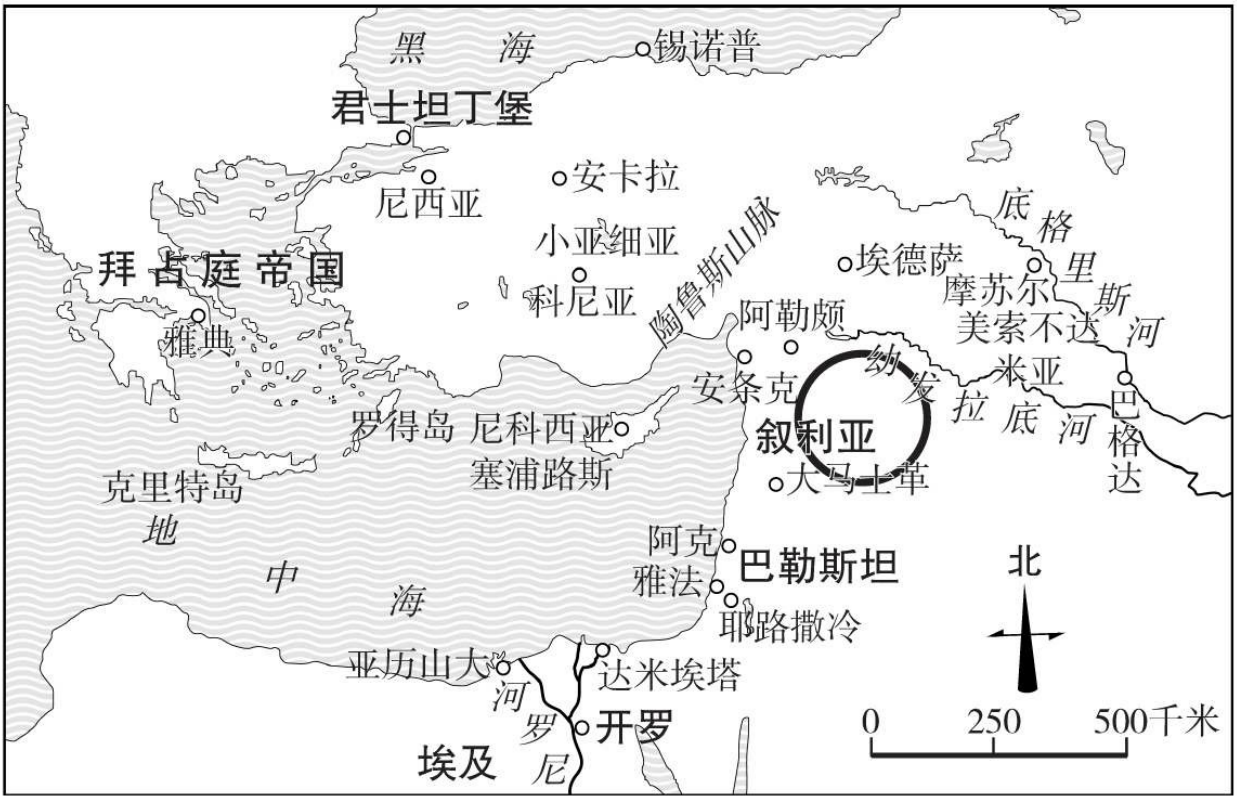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在途经小亚细亚时损失惨重，跟随其后的法国国王路易在小亚细亚代价并不比神圣罗马帝军少。唯一不同的是，康拉德负了伤，路易被敌军袭击一时间孤立无援，却不顾伤势继续战斗。

总而言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是西欧基督教世界佼佼者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带领下第二次十字军最终抵达圣地。

然而这两位最终决定的不是夺回埃德萨，而是攻占大马士革这个更大的目标。因为是皇帝和国王，相比埃德萨这样的小城市，大马士革作为一个大都市可能更能满足两位的野心。

被风沙吹散的叙利亚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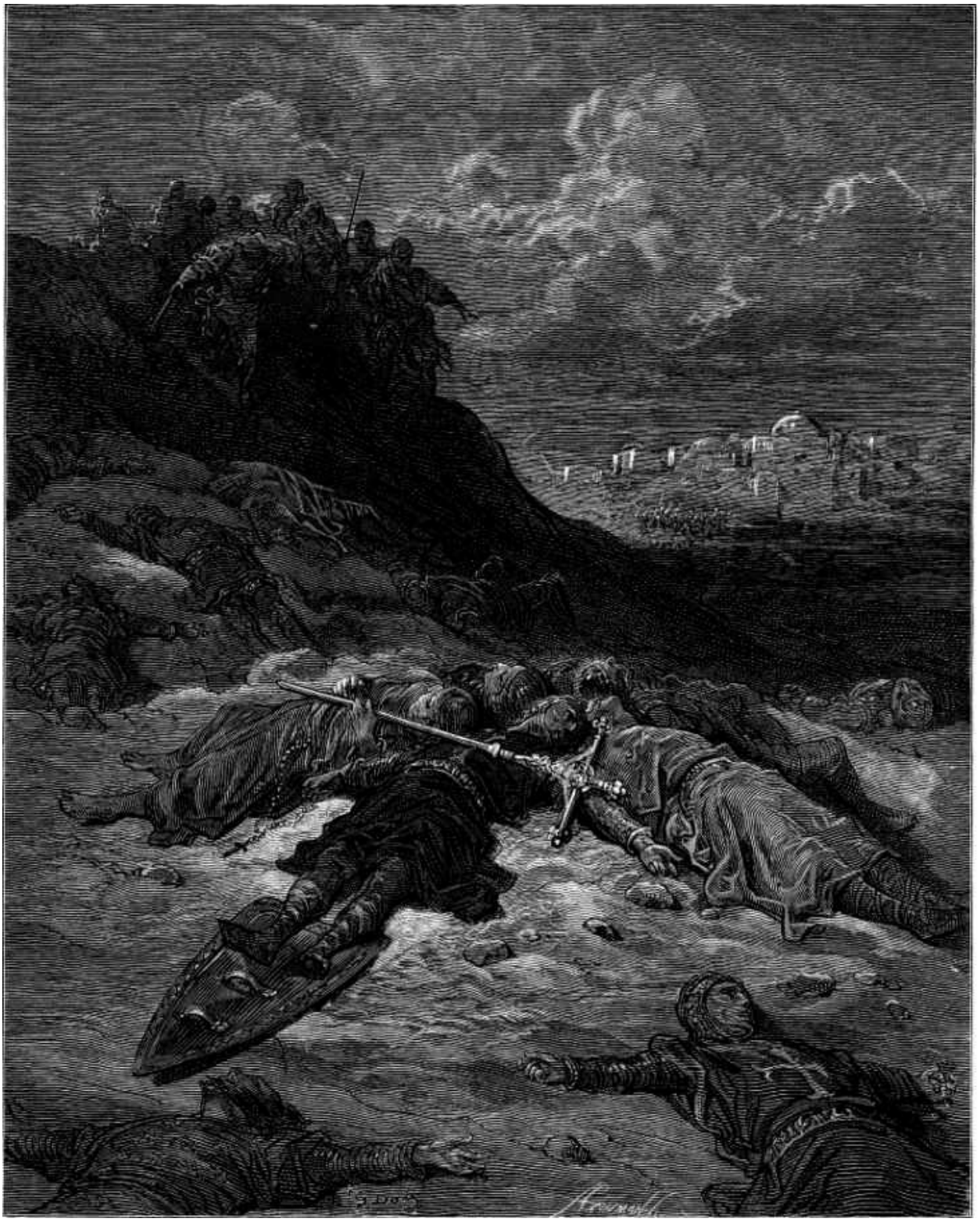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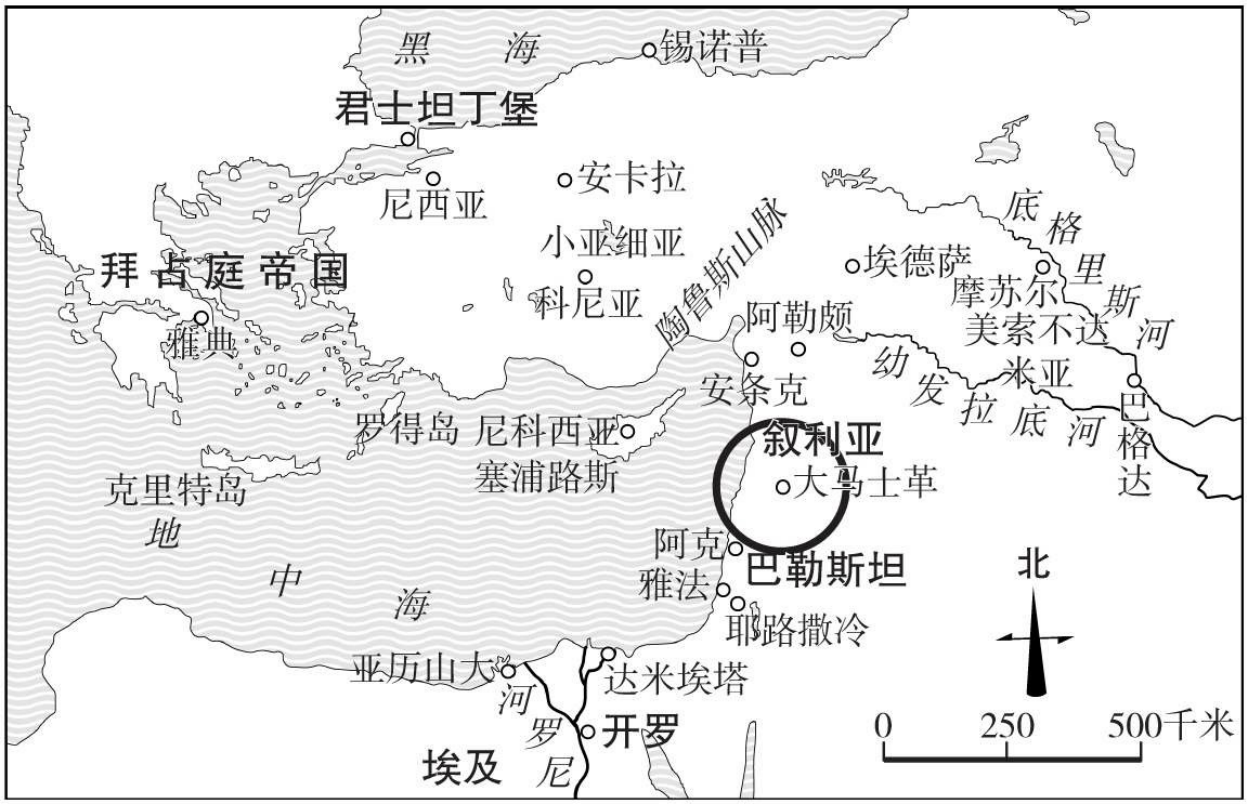
如果对中近东的历史略有了解就会明白攻陷大马士革是难上加难。

首先，大马士革从古至今都是大都市。在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从阿拉伯半岛不断向北扩展的时代，首都就设在大马士革。之后伊斯兰教的势力又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将巴格达建为首都之前，大马士革一直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想要攻陷这样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市绝非易事。

首战顺利拉开帷幕，迎击的叙利亚军队在沙漠中遭到狂风侵袭，被吹得七零八散。风沙和宗教无关，纯粹是自然而来。

身负重伤等待死亡的战士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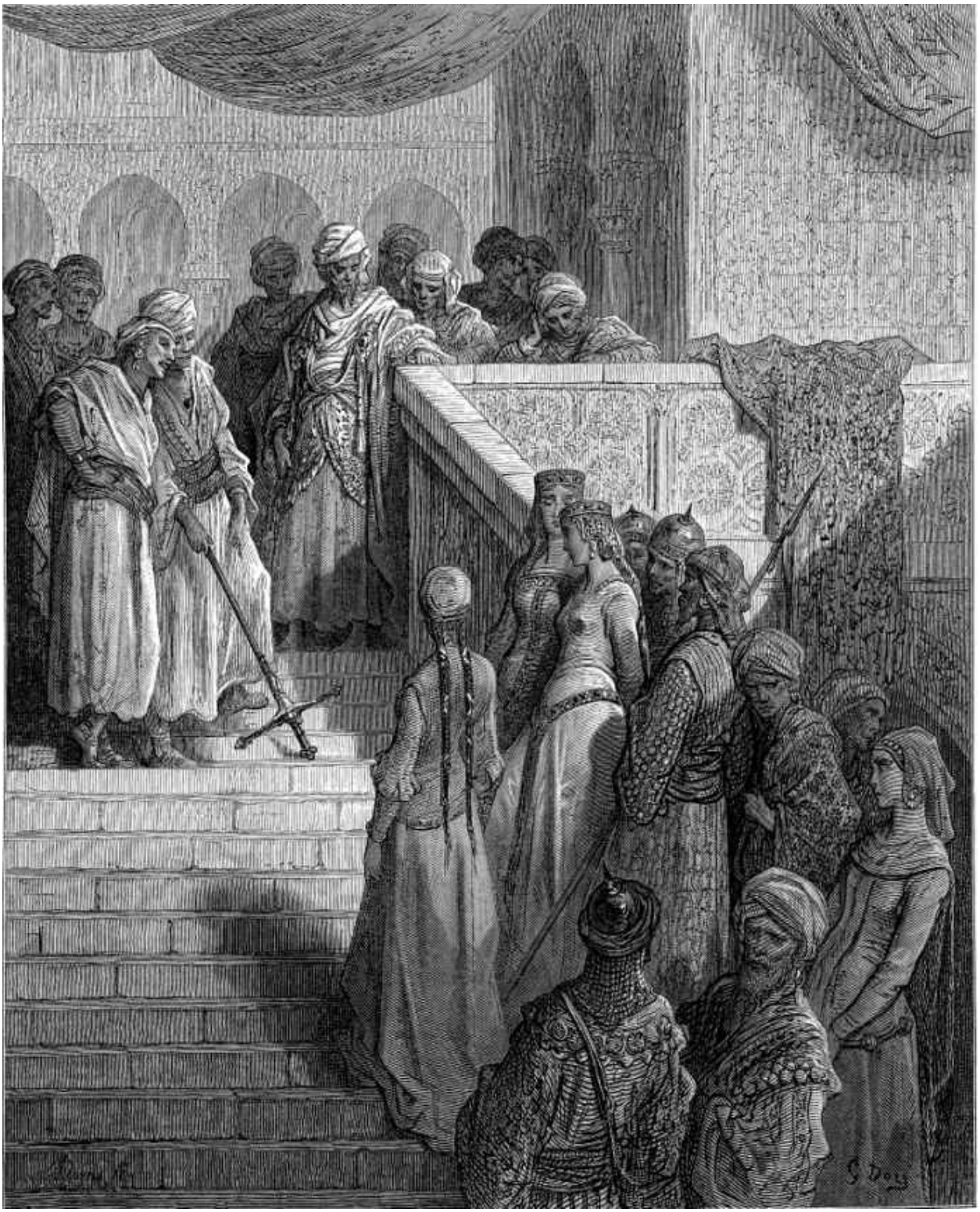
由第二次十字军掀起的大马士革之战最终以惨败收场。不计其数的神圣罗马帝国战士和法国战士将生命交付在了远离国土的东方山野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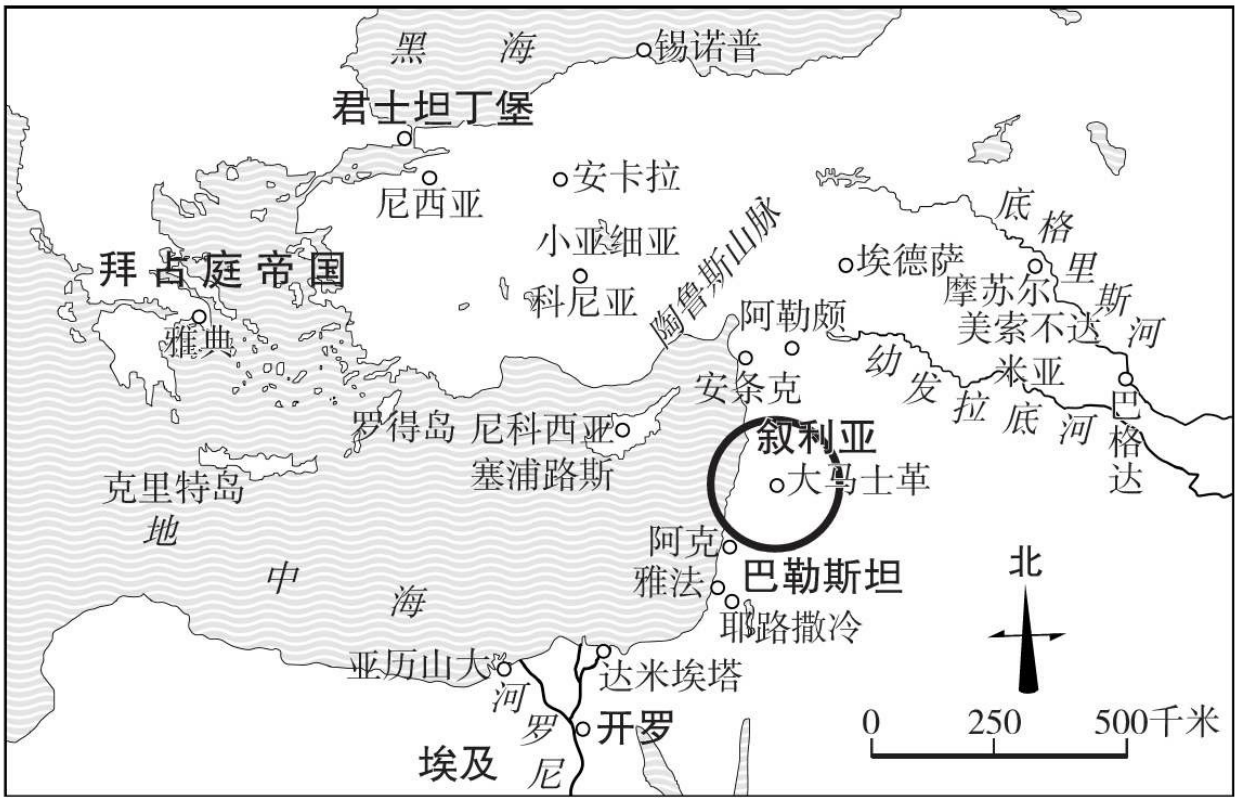
神圣罗马帝皇帝康德拉和法国国王路易均以身为一国之主不宜在国外长期逗留为由，率领残余部队匆匆返回欧洲。

作为十字军后盾的罗马教皇没有承担战败责任的意愿。他认为：胜利是上帝的亲善者的争斗，失败是上帝的忤逆者的争斗。

十字军要直接面对伊斯兰一方不断加深的仇恨本就不易，而此次的失败更加削弱了东方十字军的势力，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被俘虏的西欧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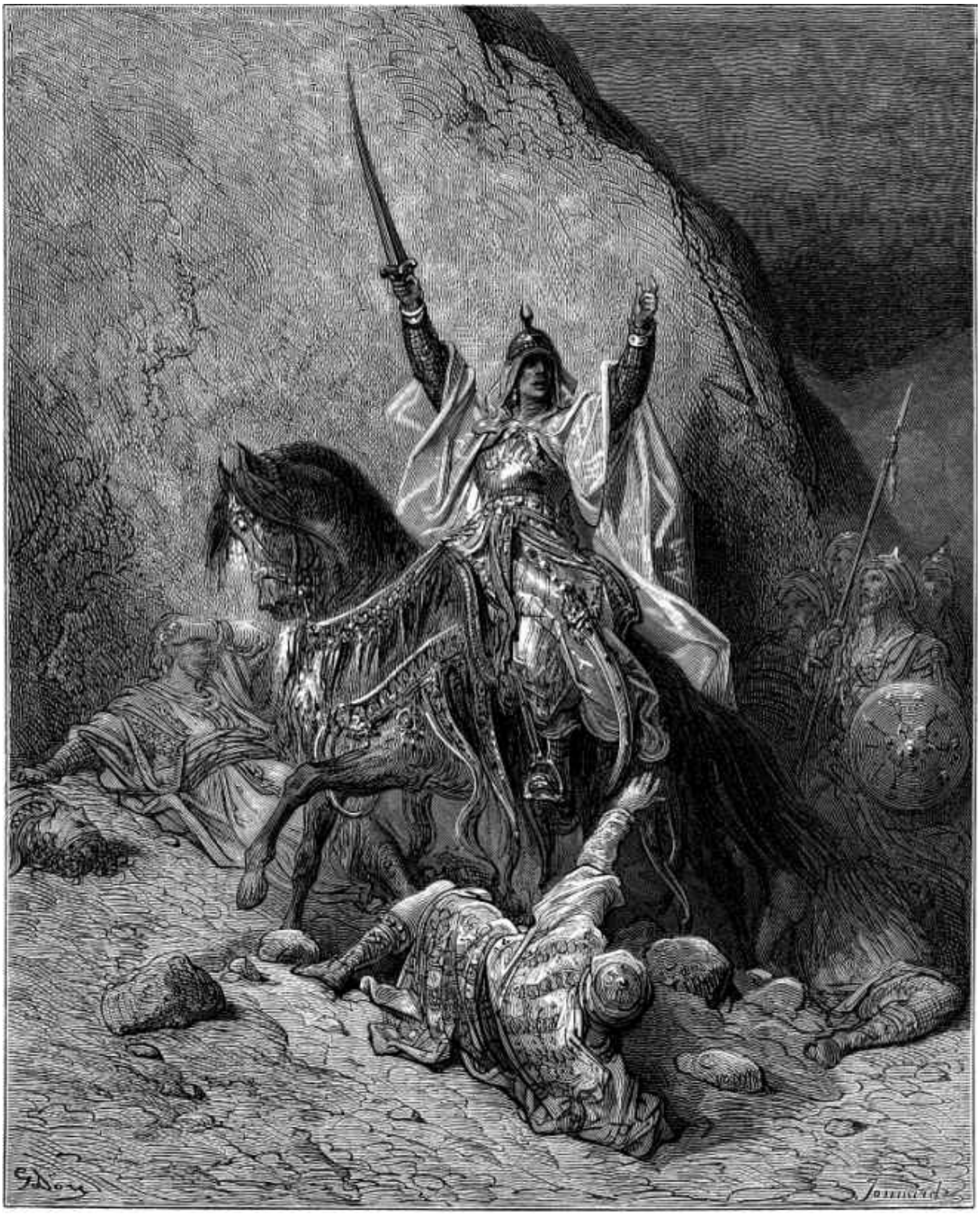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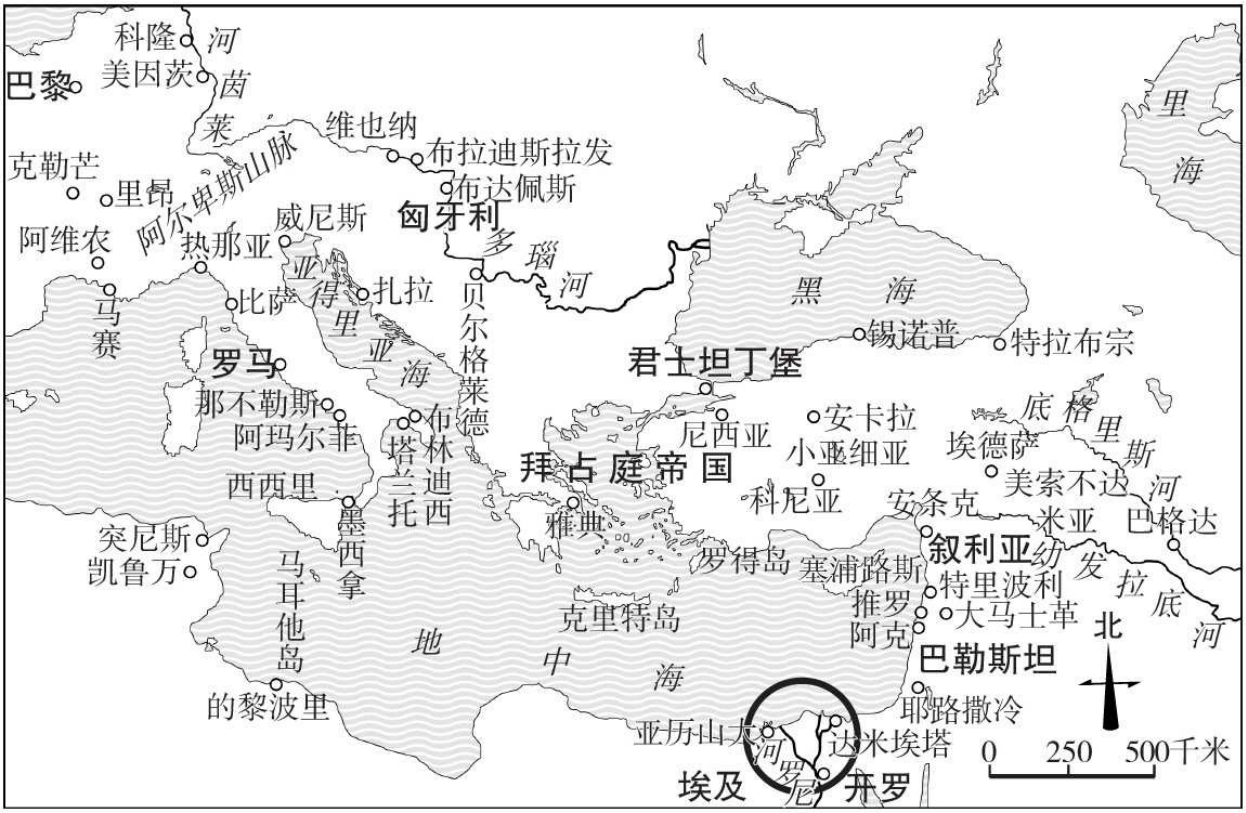
第一次十字军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她们大多是朝圣者和妓女。而第二次十字军中的女性大多身份尊贵。

在第二次十字军的东征队伍中，法国国王路易将王后阿奎丹的埃莉诺尔带在身边。既然王后来都来了，自然少不了陪同侍女们。每每遇到十字军战败，这些女性就会沦为伊斯兰一方的俘虏。

穆斯林男性俘虏到欧洲女性，而且还是宫廷女性自然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但是伊斯兰世界有用金钱换得自由的习惯。于是，身份尊贵的女性因此获得自由，而那些无法支付赎金，也没有人出钱为她们赎身的女性的命运则由此被改变。《古兰经》禁止穆斯林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所以这些女性被强迫信奉伊斯兰教，最终沦为某领主或者将军的泄欲工具。

萨拉丁的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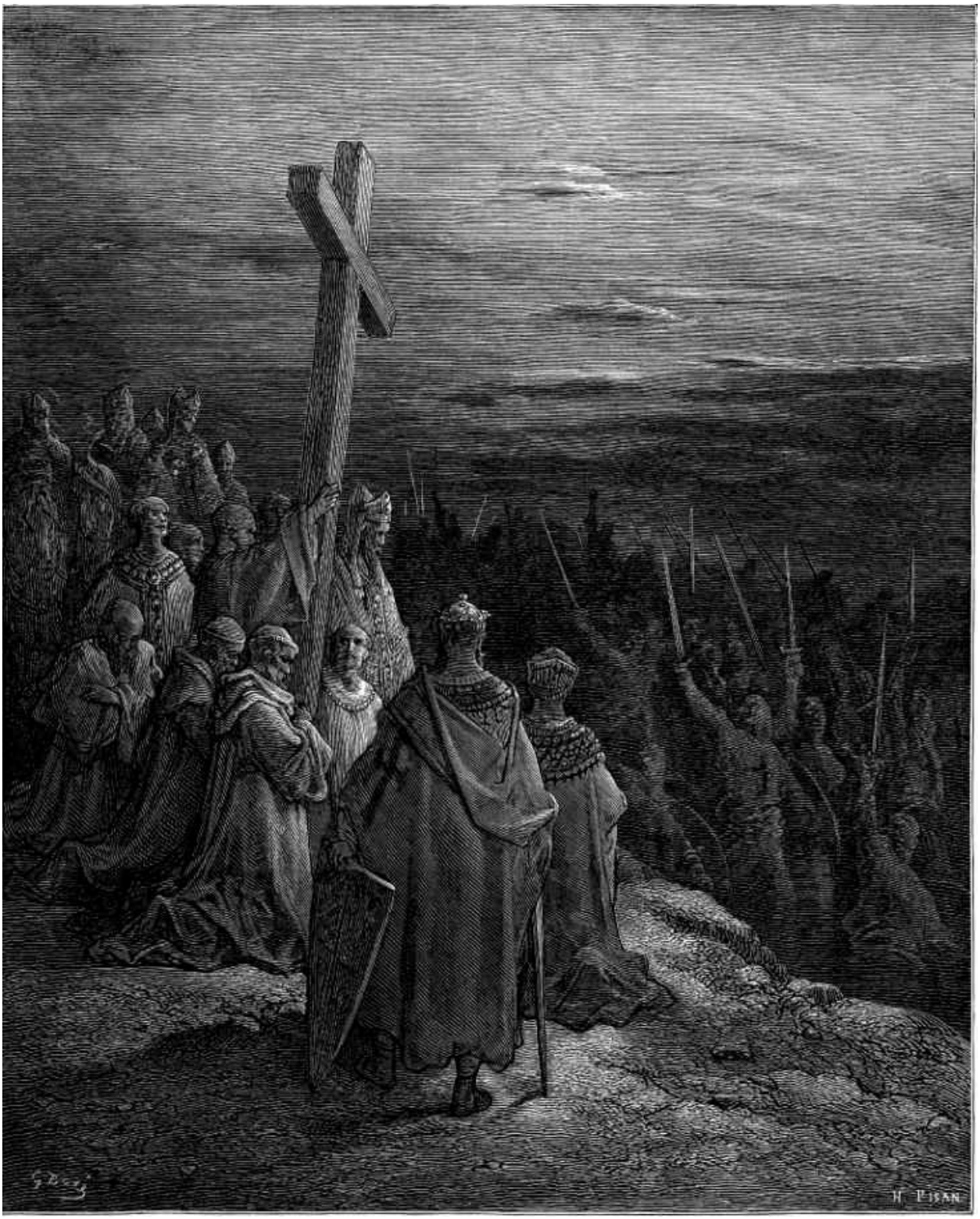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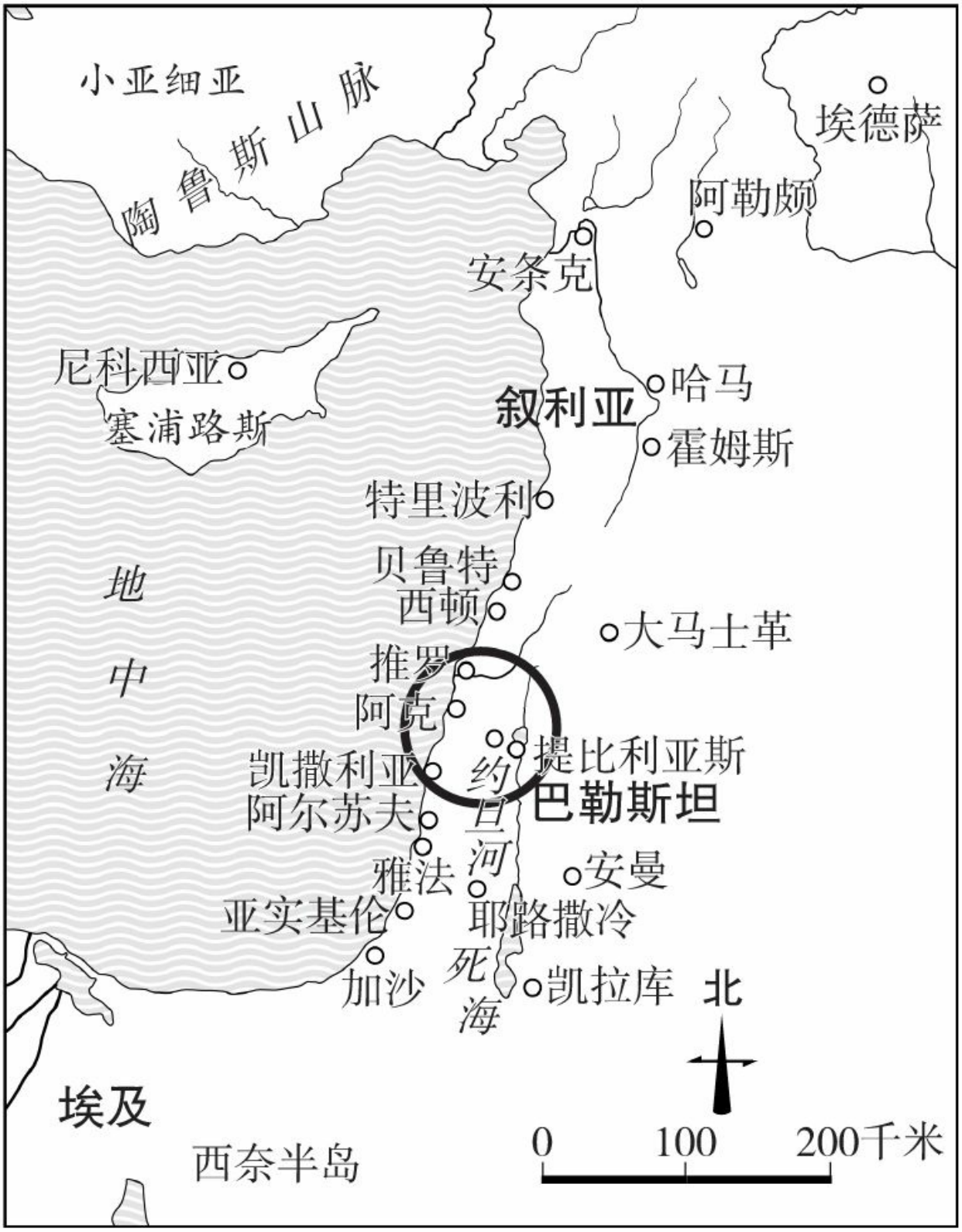
中近东穆斯林被十字军驱逐出长期安居乐业的城市，说到故土被侵之恨他们心中的愤怒是一致的。此外，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也证明了基督徒并非无人能敌。然而，各部族之间相互对抗的利己主义阻碍了穆斯林的群起反击。

但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东方十字军国家的并非只是敌方的利己主义。为保护基督徒而创立的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这两大宗教骑士团，也为挽救危难中的十字军国家做出了贡献。倘若伊斯兰一方一直维持着分散不统一的状态，那么十字军国家的命运也许会因此改变。

然而，伊斯兰一方迎来了萨拉丁的出场。萨拉丁高举“武力吉哈德”的大旗成功地统一了伊斯兰各方势力，他本人也仿佛站在伊斯兰阵营的最前面。

在“真十字架”面前祈愿胜利，奔赴战场的战士们


H. PI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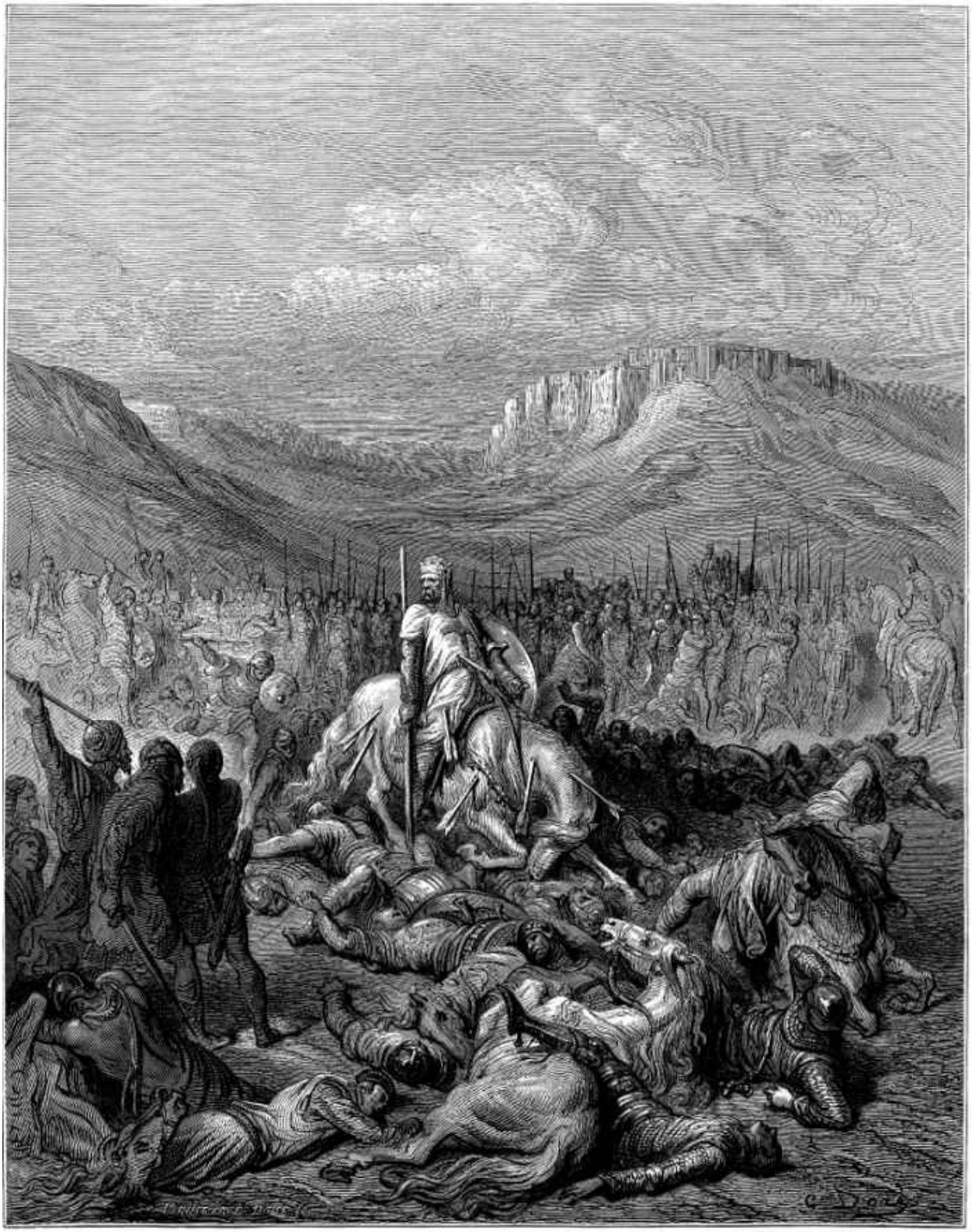
确立在根据地埃及的地位和势力之后，萨拉丁以夺回耶路撒冷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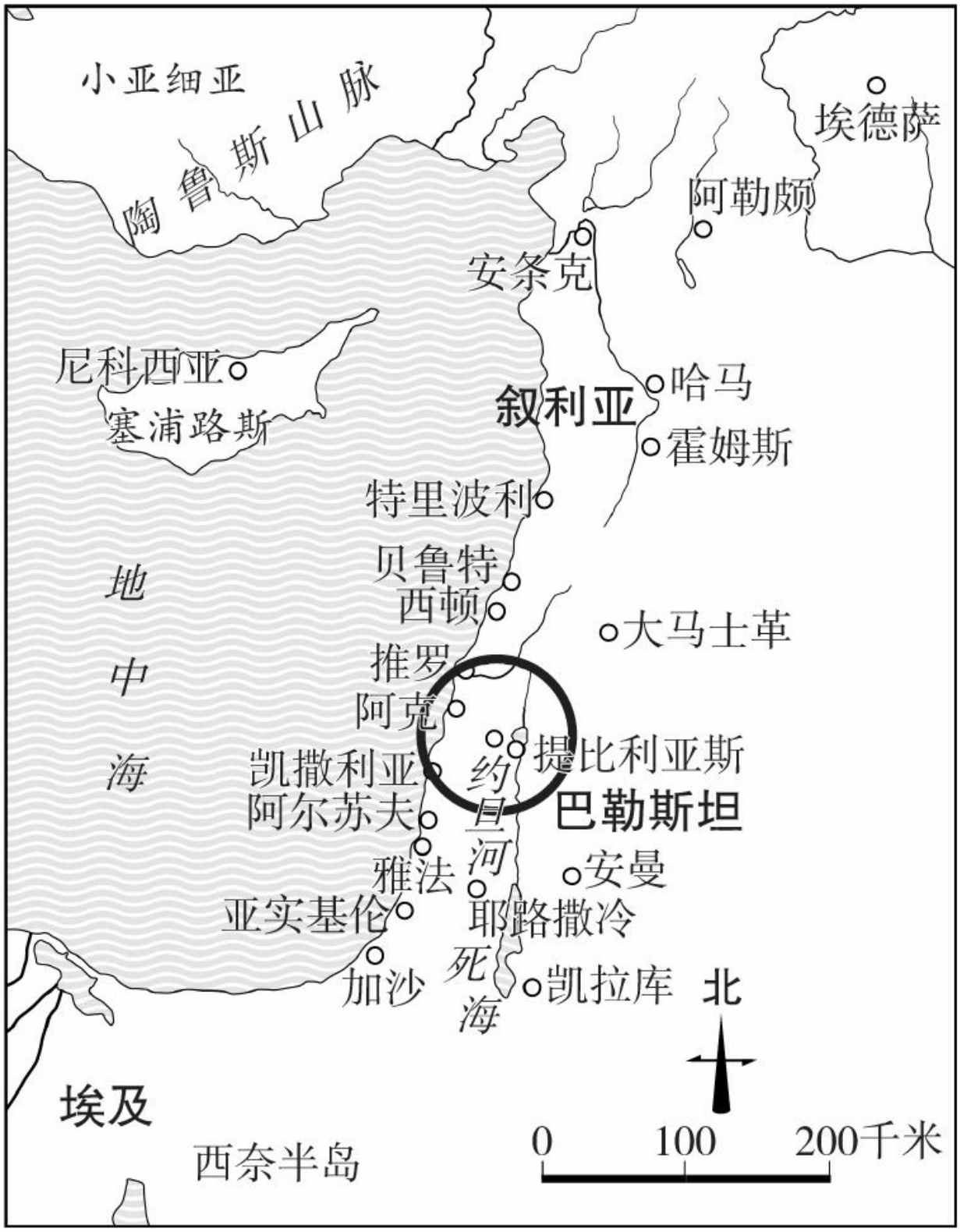
标一路北上，并将大马士革作为前线基地。

另一方面，耶路撒冷国王也动员了以宗教骑士团为主要战斗力的东方基督教势力发起反击，将阿克作为大后方。从大马士革前往耶路撒冷的萨拉丁军队在途中计划防范敌方来袭。与十字军同行的“真十字架”在这场决战中仍然没有缺席。

萨拉丁以“武力吉哈德”之名成功地将穆斯林势力凝聚在一起，此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战略和战术。利用将敌人逼入困境直至灭亡的作战方法，在赫赫有名的哈丁战役中大获全胜。“真十字架”、耶路撒冷国王以及大主教都落入萨拉丁之手。

圣殿骑士团团长雅克·德·莫莱壮烈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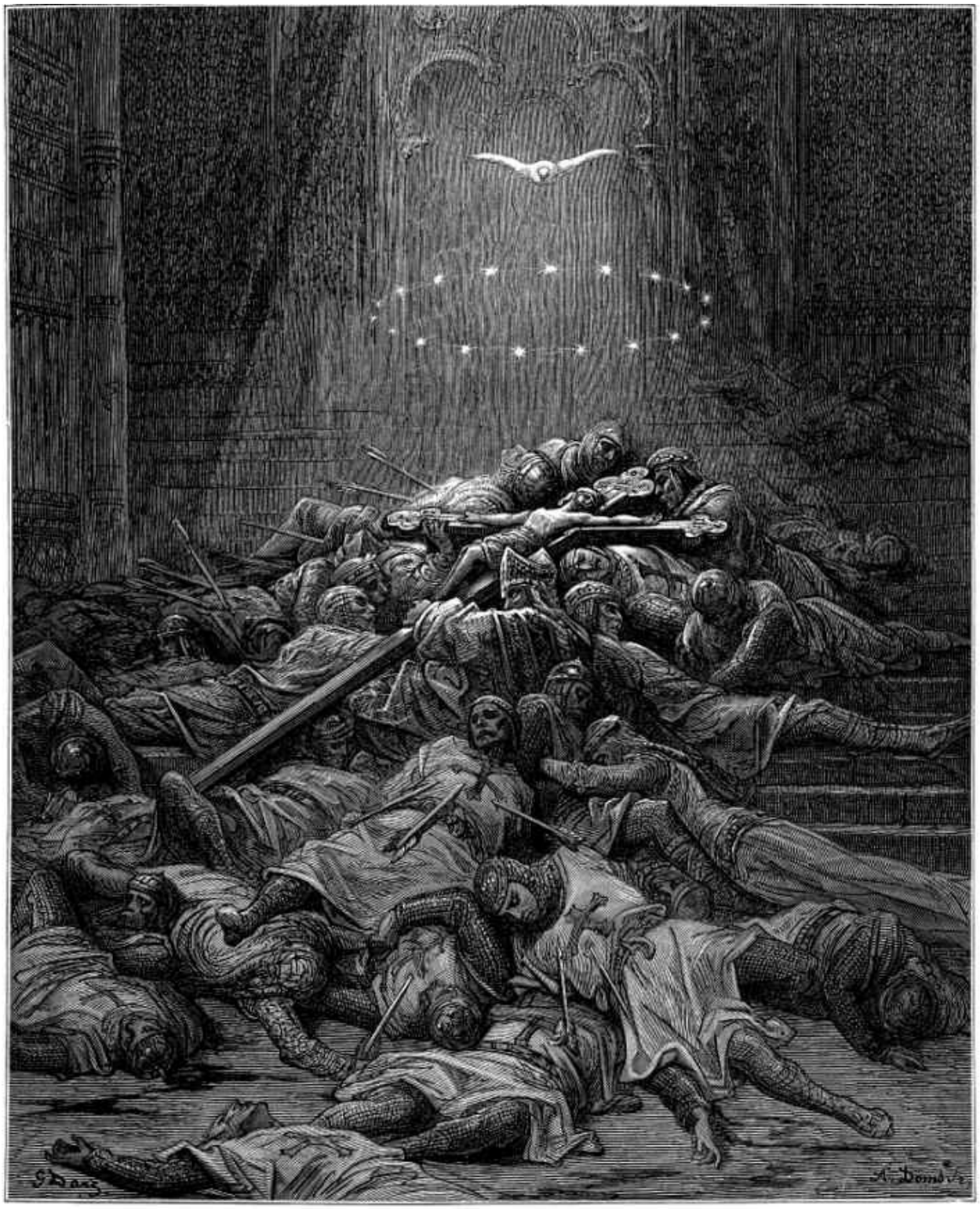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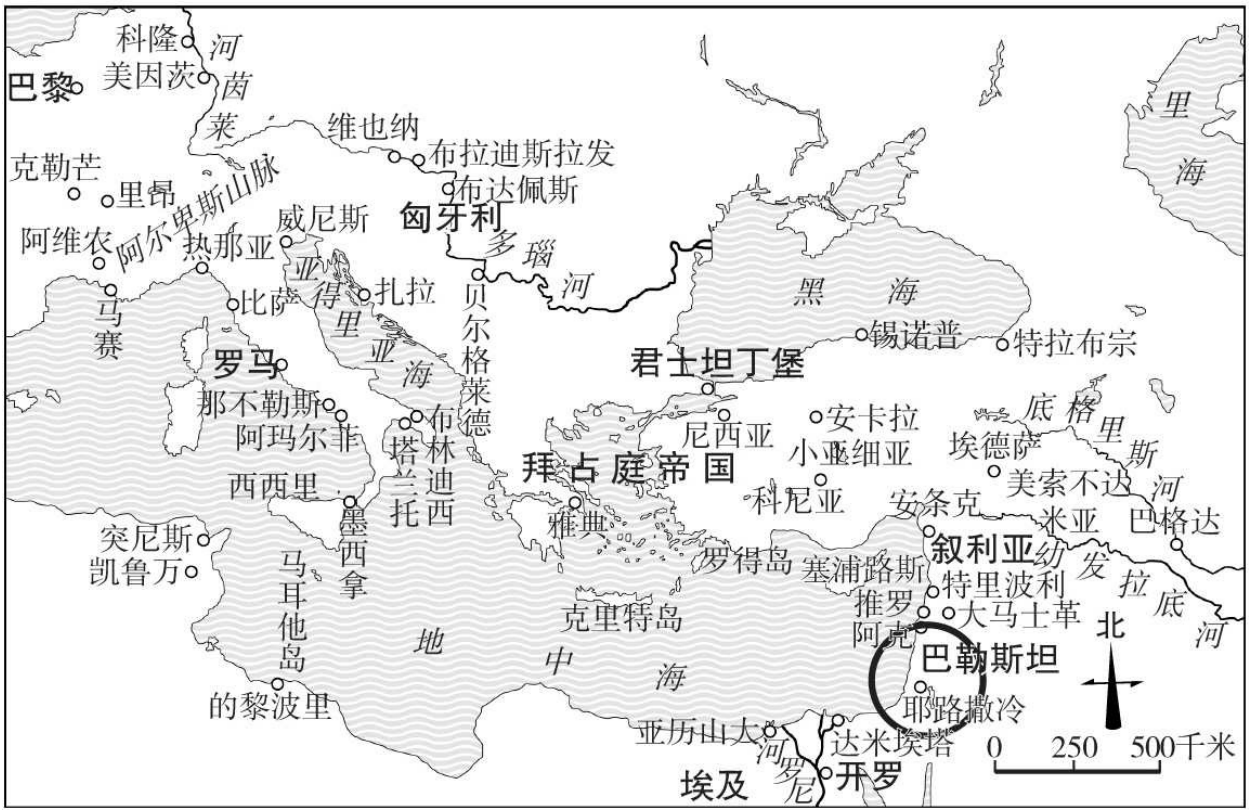
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十字军国家将所有兵力投入到哈丁之丘的

战场，最终惨败而归。决定战争输赢的并非每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如果从士兵的个人实力来看，以打倒长期驻扎在东方的穆斯林为唯一目标的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一方明显占据绝对优势。说到底决定哈丁战役胜败的是总司令的战略眼光。

萨拉丁最终没有杀害被俘的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耶路撒冷国王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危害。

倾撒在殉教战士尸体上三夜的奇迹之光


E. Dantz
A. Do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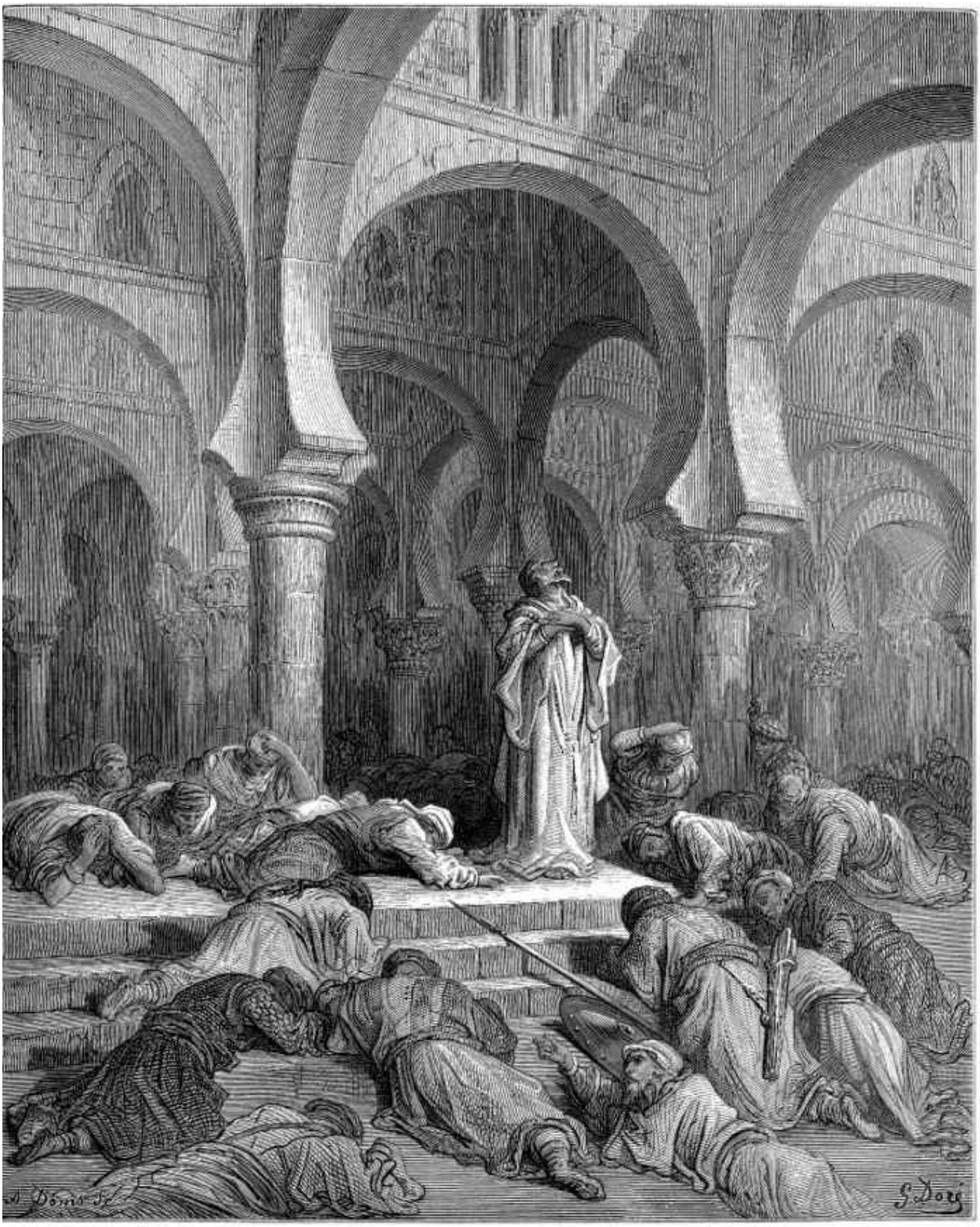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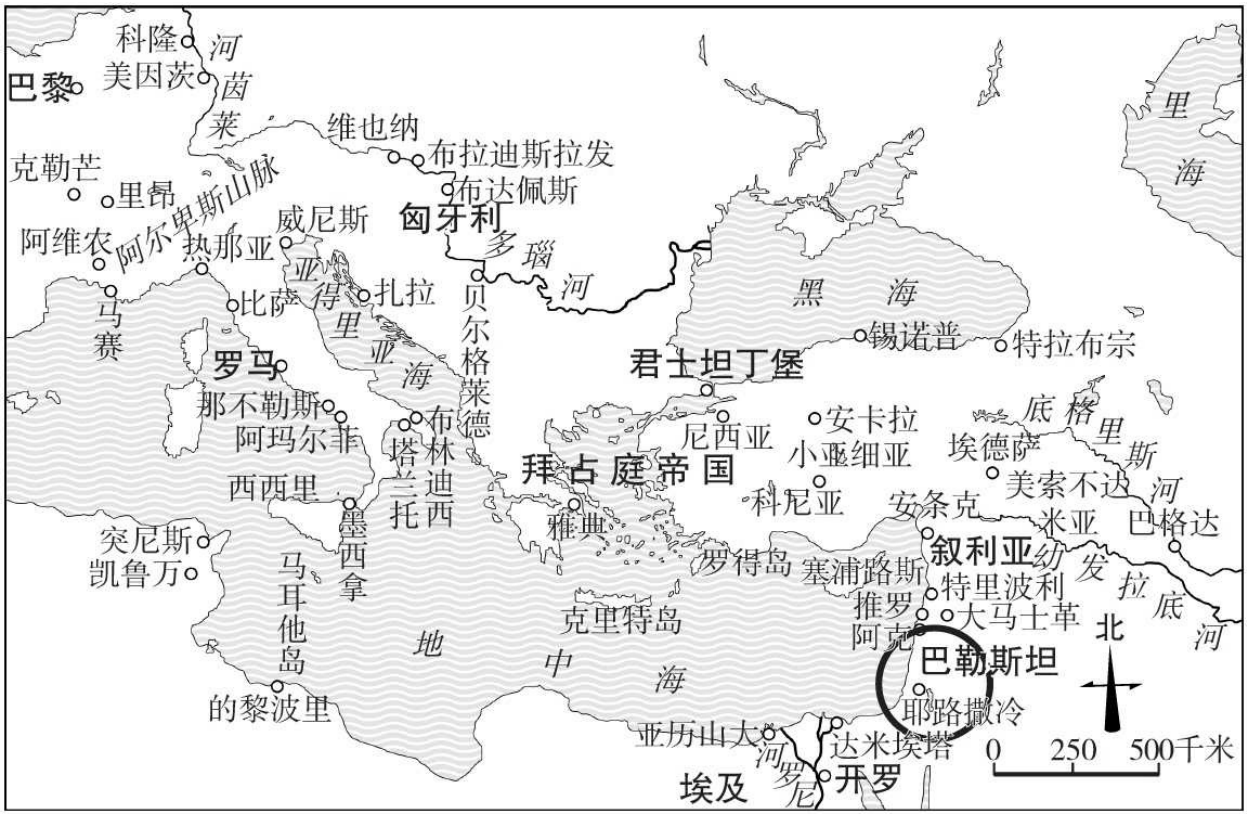
哈丁战役胜利后，萨拉丁将被俘的基督徒中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全部处死，无一幸免。就连想要通过上交赎金躲过一劫的圣殿骑士，萨拉丁也没有手软，收了赎金后将他们尽数杀尽。

通过高举“武力吉哈德”大旗统一伊斯兰各方势力的萨拉丁由此深知宗教的力量。虽然同为宗教骑士团，萨拉丁对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如此大的敌意，圣约翰骑士团以“医疗骑士团”这一别称广为人知，兼具医疗和战斗两大功能。而圣殿骑士团仅仅以打倒伊斯兰势力为唯一目标。

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在哈丁战役失败之后，纵使耶路撒冷已经沦陷几乎没有任何防御的时候，仍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感恩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导师


G. Doré



阔别8年之久的耶路撒冷，又重新回到了伊斯兰一方。其间无人管理的清真寺以及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导师也都重新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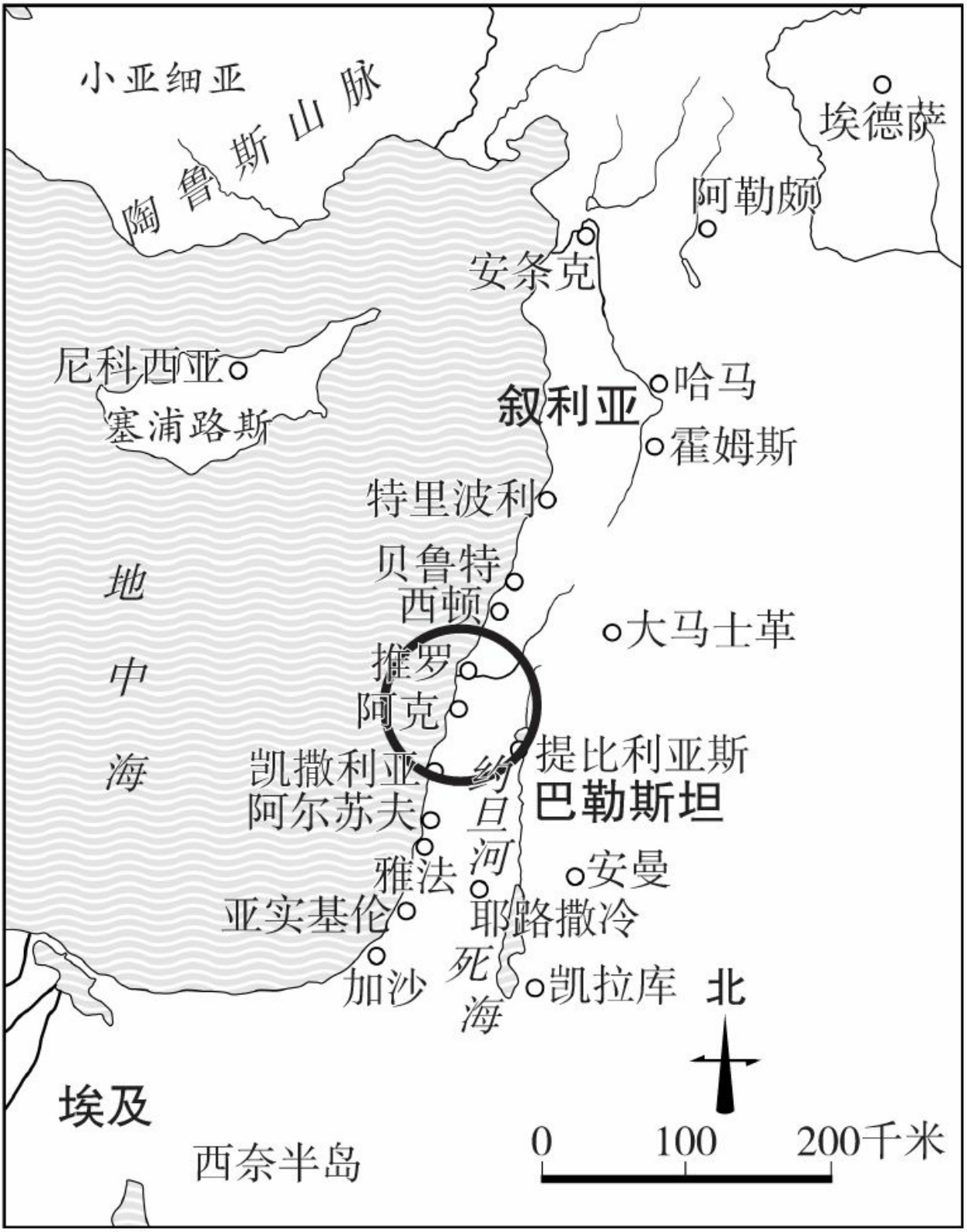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的遗失绝非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基督教一方仍然占据着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安条克、特里波利及推罗三座城市。圣城耶路撒冷的重新回归将东方的基督教势力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这一重大事件在西欧全境引起强烈社会震动。

为了尽快夺回耶路撒冷，新一代十字军顺势而生。参与其中的有以“红胡子”为人熟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还有在东方地区以狮子般勇猛迅速的行动而闻名的“狮心王”理查一世。

被誉为十字军史上的一朵“奇葩”的第三次十字军，由此开始了迈向东方的征程。

阿克攻防战

G. Doré
Jonnard



被撒拉丁逼退到安条克、特里波利、推罗一带的中近东基督徒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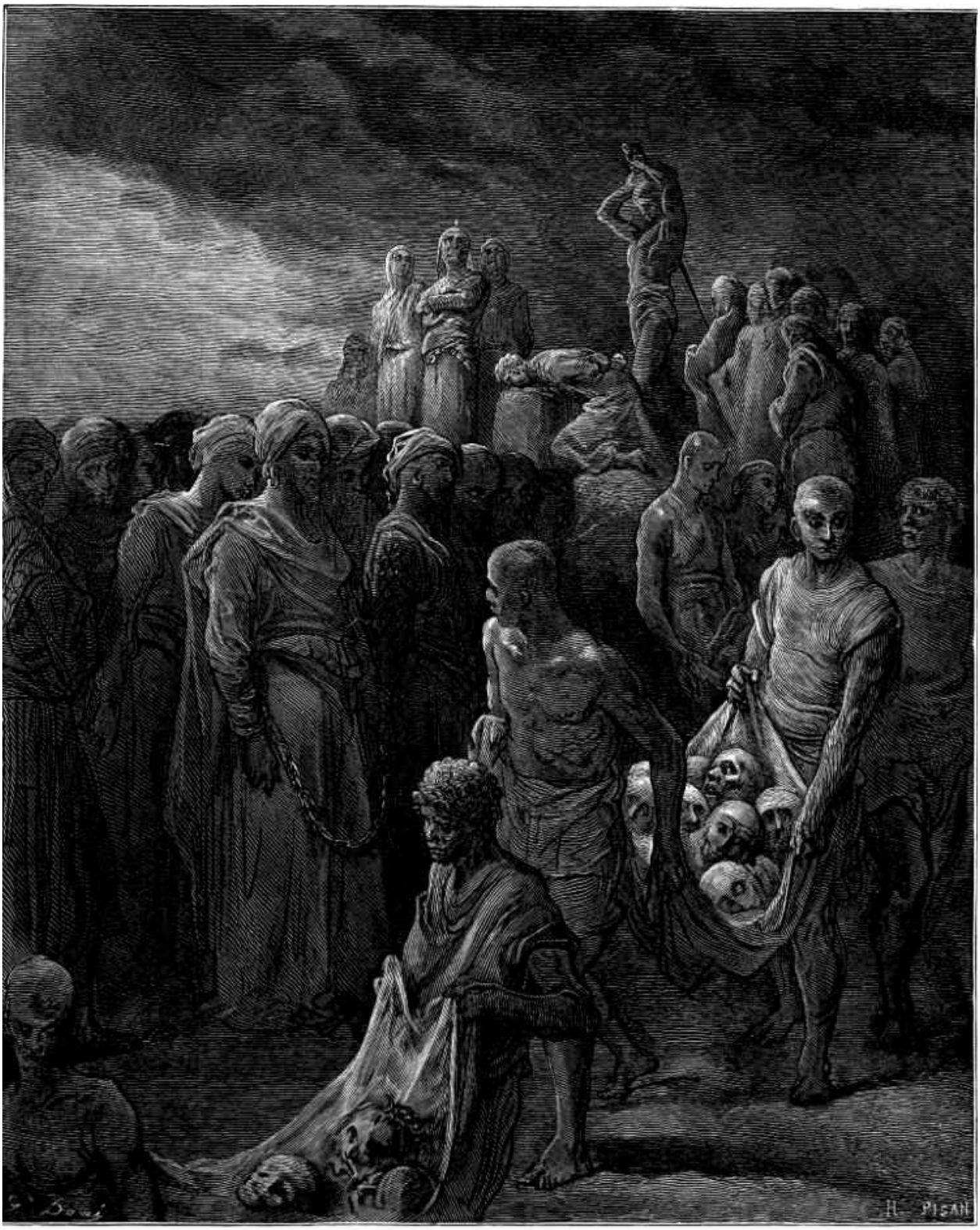
最后的力量拼死一搏，再次进犯阿克城。阿克是一座海港城市，最适合接受来自西欧的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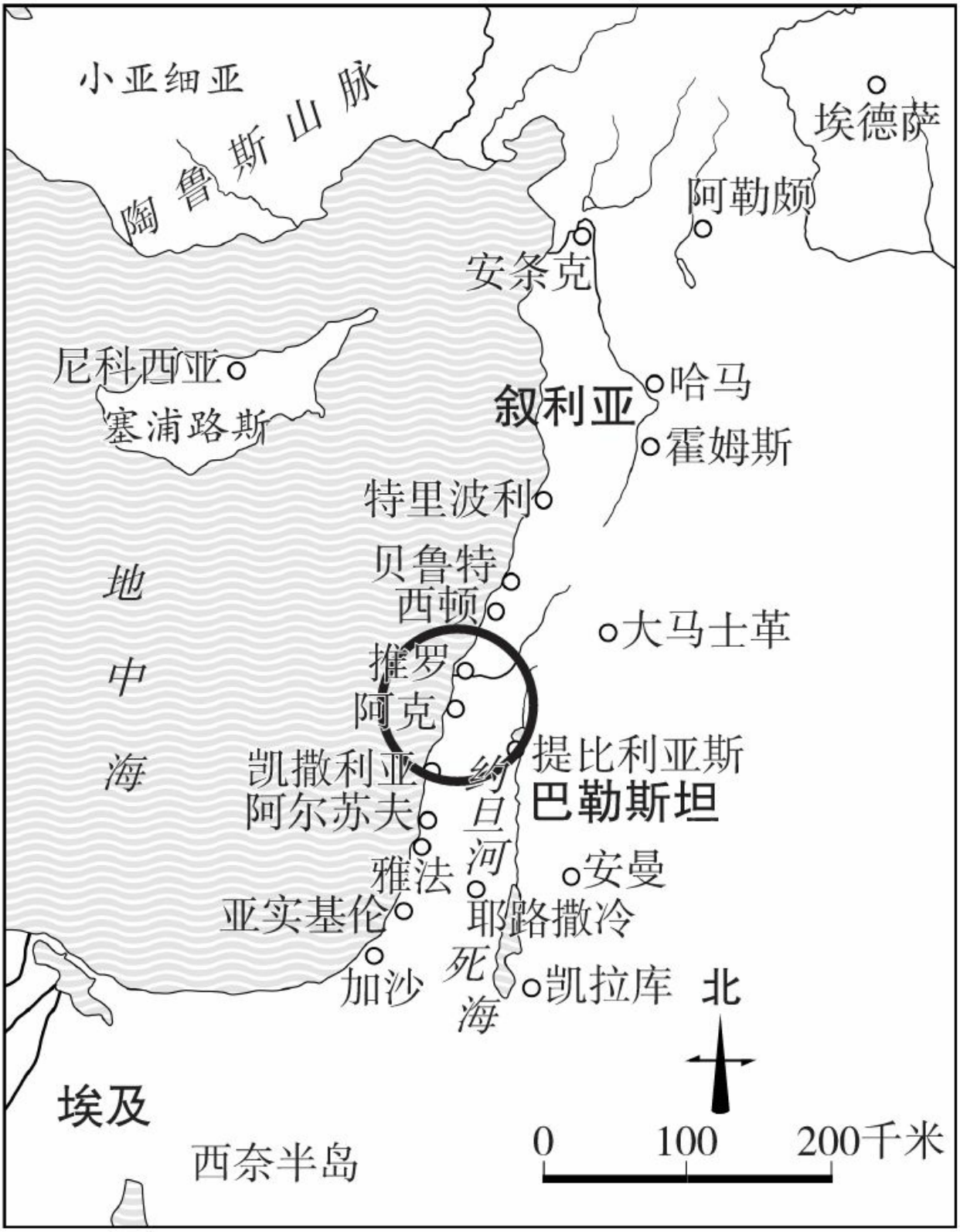
在第三次十字军中，选择陆路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在小亚细亚渡河时不幸溺亡。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最终到达了阿克城。东方的基督教士兵在阿克城即将攻陷的时候迎来了两位国王，在猛烈的攻势下阿克城最终攻陷。

看到阿克城最终攻陷，参与十字军的目的已然达到，腓力·奥古斯都很快踏上归途。所以，只有斗志昂扬的理查一世最终留在战场上。

萨拉丁和理查一世两人的单独对决即将开始。

理查违背留命诺言，杀害投降的伊斯兰士兵


H. PISAN



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基督徒每每征服一座城市就将城内的穆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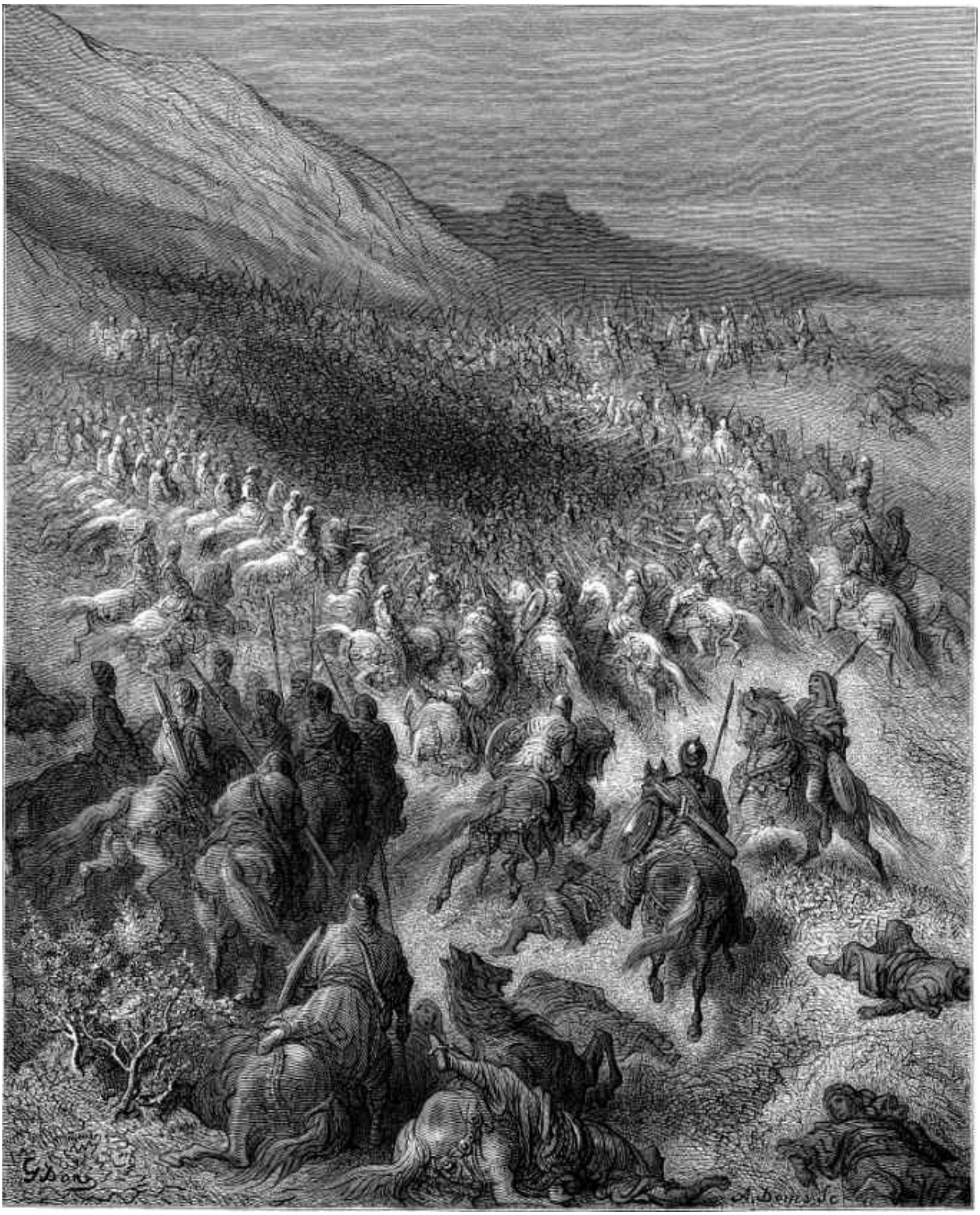
全部杀害，在他们看来此举并无不妥。也没有事先承诺保留穆斯林的生命，然后在武装解除后将其杀害的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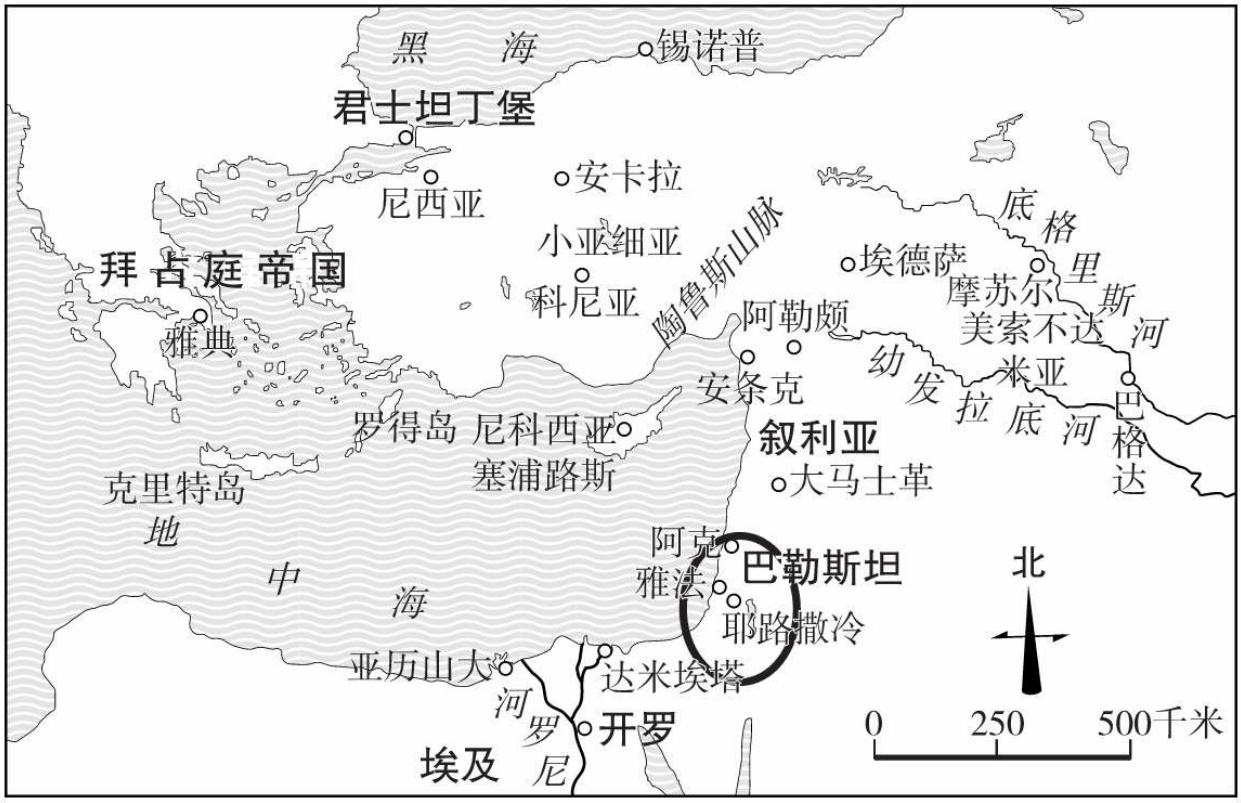
萨拉丁虽然将宗教骑士团，特别是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全部杀害，但是却遵守诺言，没有杀害通过交付赎金保命投降的耶路撒冷居民。

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最初答应守卫阿克城的穆斯林，只要投降就留下他们的性命，最终却违背诺言趁着穆斯林解除武装时将他们全部杀害。

在此之后，伊斯兰一方也学会了基督徒的这一手段。

被伊斯兰大军围困坚决不退让的理查和他的士兵们


G. Doré
A. Dereu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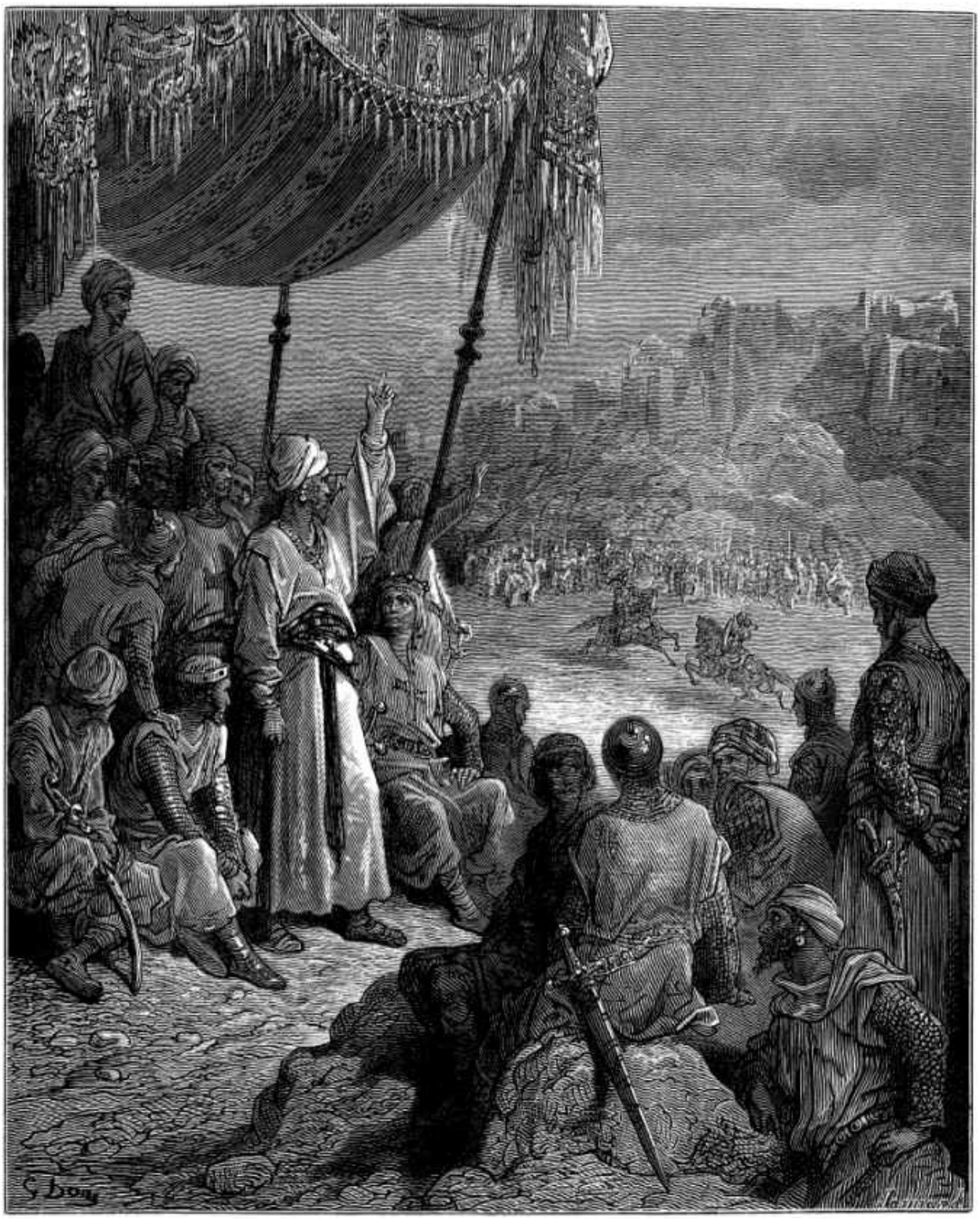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无论是基督教的士兵还是伊斯兰的士兵，都在身为战士的自豪感的驱使下英勇战斗。

萨拉丁和想要重夺失地的理查两人之间的战斗，在一进一退中持续着。

这一时期，萨拉丁54岁，早已身经百战。

而另一方的理查35岁，战无不胜。

基督教骑士和伊斯兰教骑士之间的马上枪术比赛



纵观十字军历史，战斗并非唯一主题。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交流也时有发生。不可思议的是昨天还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转脸之间竟然可以相互交流。

由十字军一方提出的“马上枪术比赛”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马上枪术比赛”发祥于欧洲，起初由欧洲来的十字军一方指导伊斯兰骑士。一番汗流浃背的比试之后，双方还会一起进餐，聊天，尽管穆斯林禁止喝酒但他们有的还是会推杯换盏。在伊斯兰一方有这样的记录：这些欧洲男人是我们的奴隶。言语之间似乎没有嫌恶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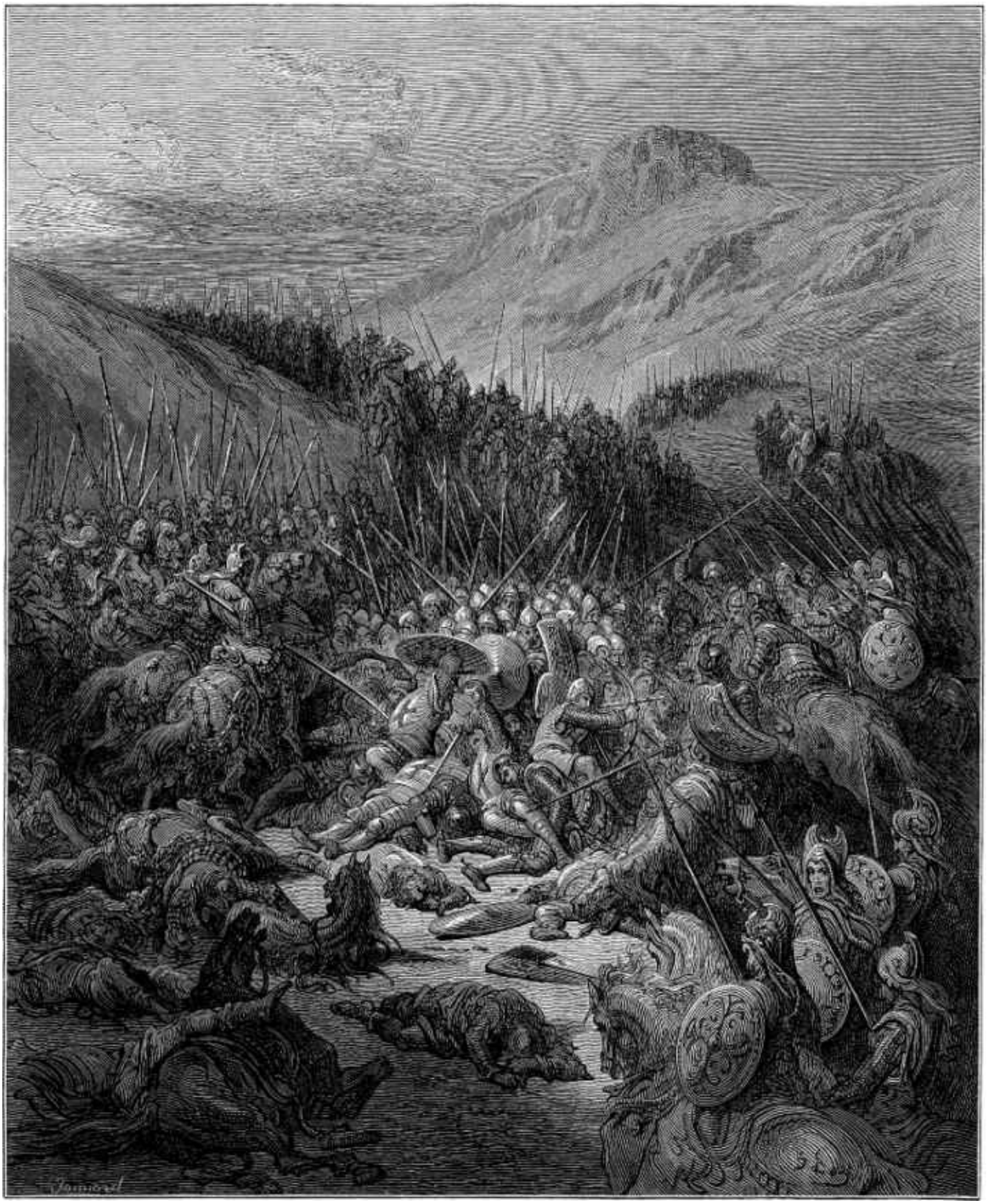
他们用什么语言交流？十字军一方有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伊斯兰一方也有通晓拉丁语或者法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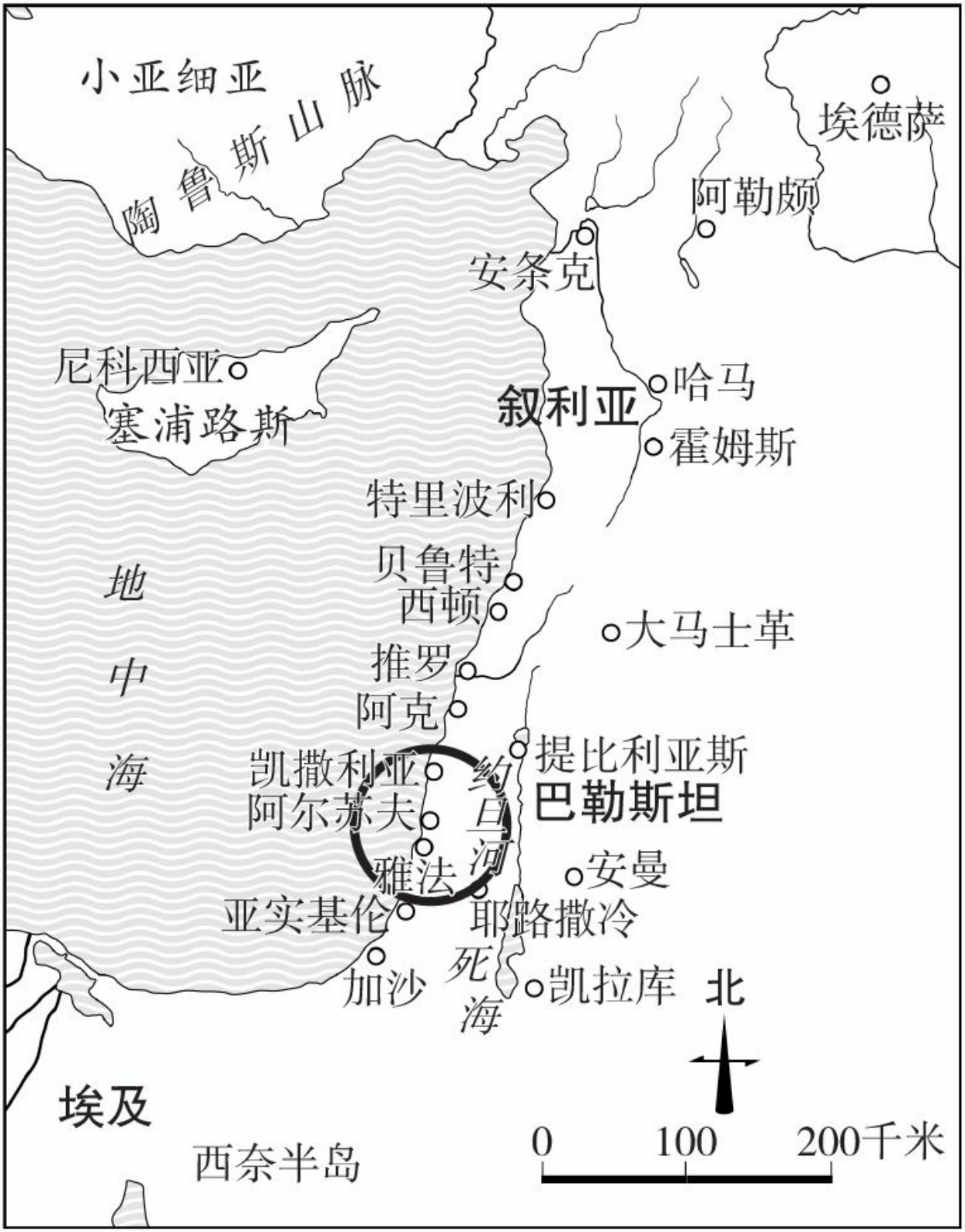
坚强的女性

伊斯兰教一方的记录中出现了有关全副武装参加战斗的基督教女性的描述。她们从头武装到脚，灵活驾驭战马，战斗气势丝毫不输男子。记录中还有这样充满钦佩之意的描述：等到下了马摘下头盔，才发现原来她们是女性。

攻打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也会受到伊斯兰势力的威胁。倘若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女性大概也要持剑自卫。那个时代正是骑士们大受追捧的中世纪。性格刚强的女性即使身披铠甲持枪舞剑，但终究没有抵抗之力。为什么这么说？她们要么被杀害，要么侥幸活着充当男性的泄欲工具。

阿尔苏夫围城战，十字军和伊斯兰军队之间的交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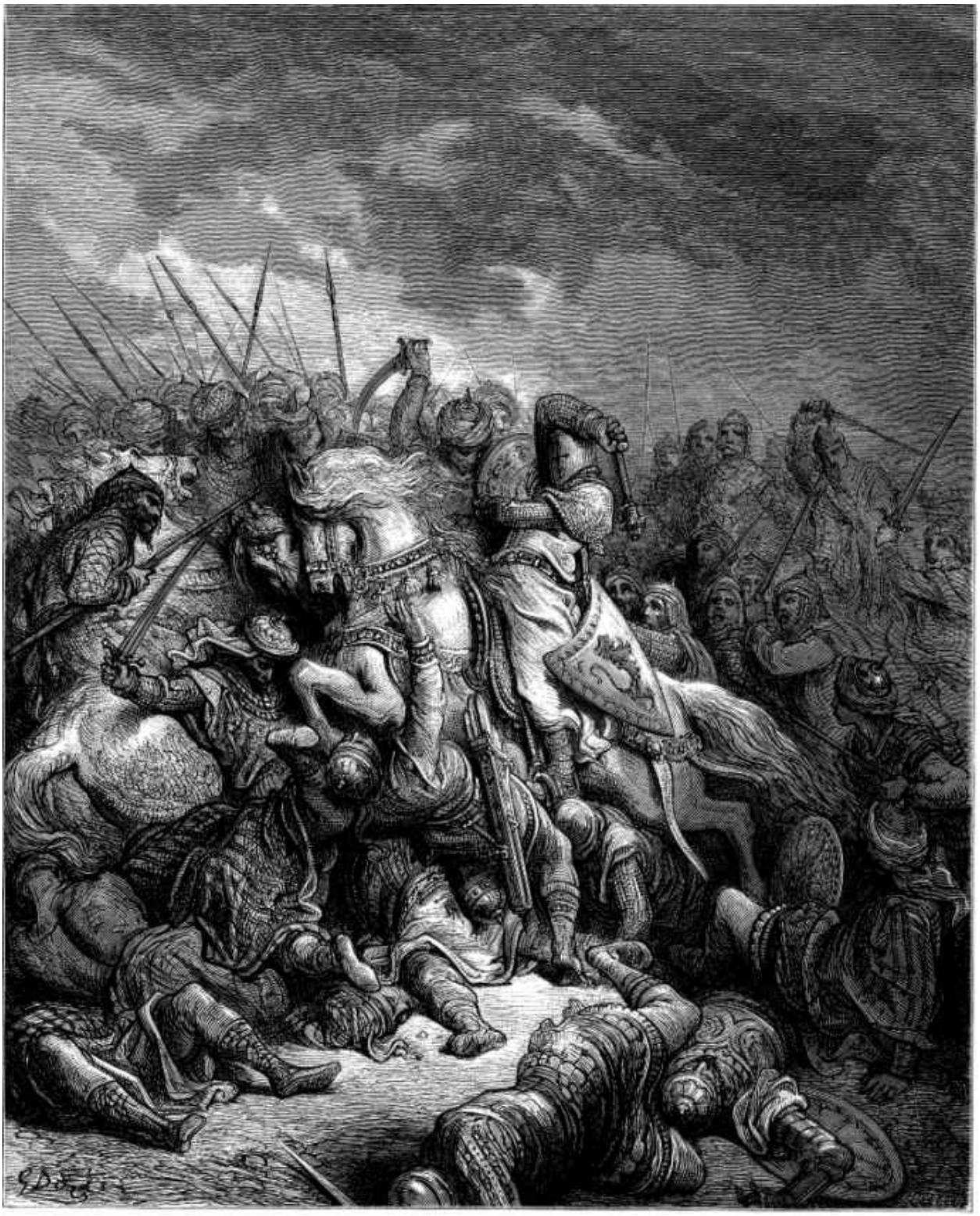
阿尔苏夫是一座海港城市，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顺着河流沿岸的内

陆就能到达耶路撒冷。

对于理查来说，重新夺回落入萨拉丁手中的耶路撒冷是他最大的目标。而攻陷阿尔苏夫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萨拉丁率领的伊斯兰军队和理查率领的十字军在阿尔苏夫周围展开了正面交锋。在双方的连续激战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出让步。

冲在最前方如狮子般行动迅速的理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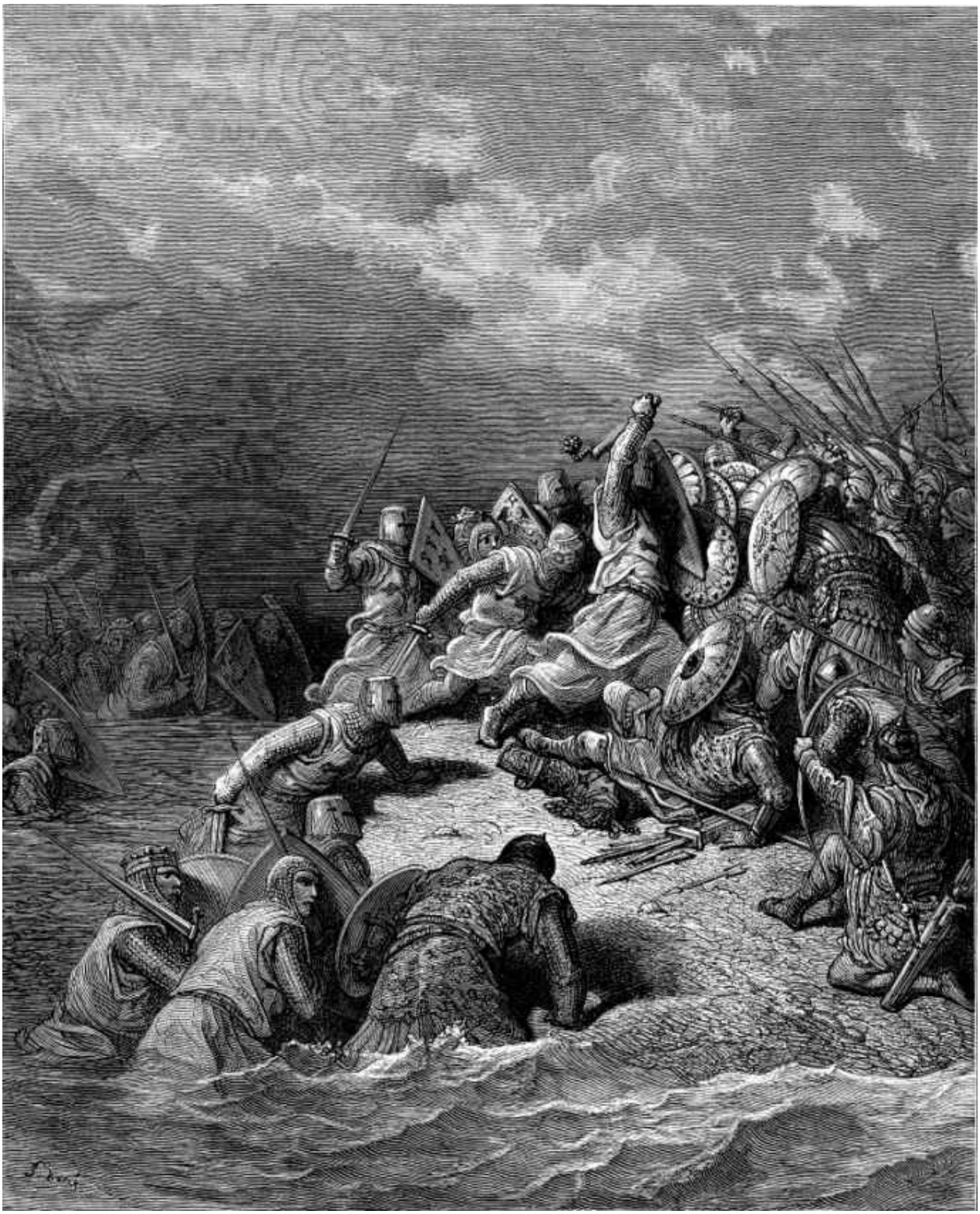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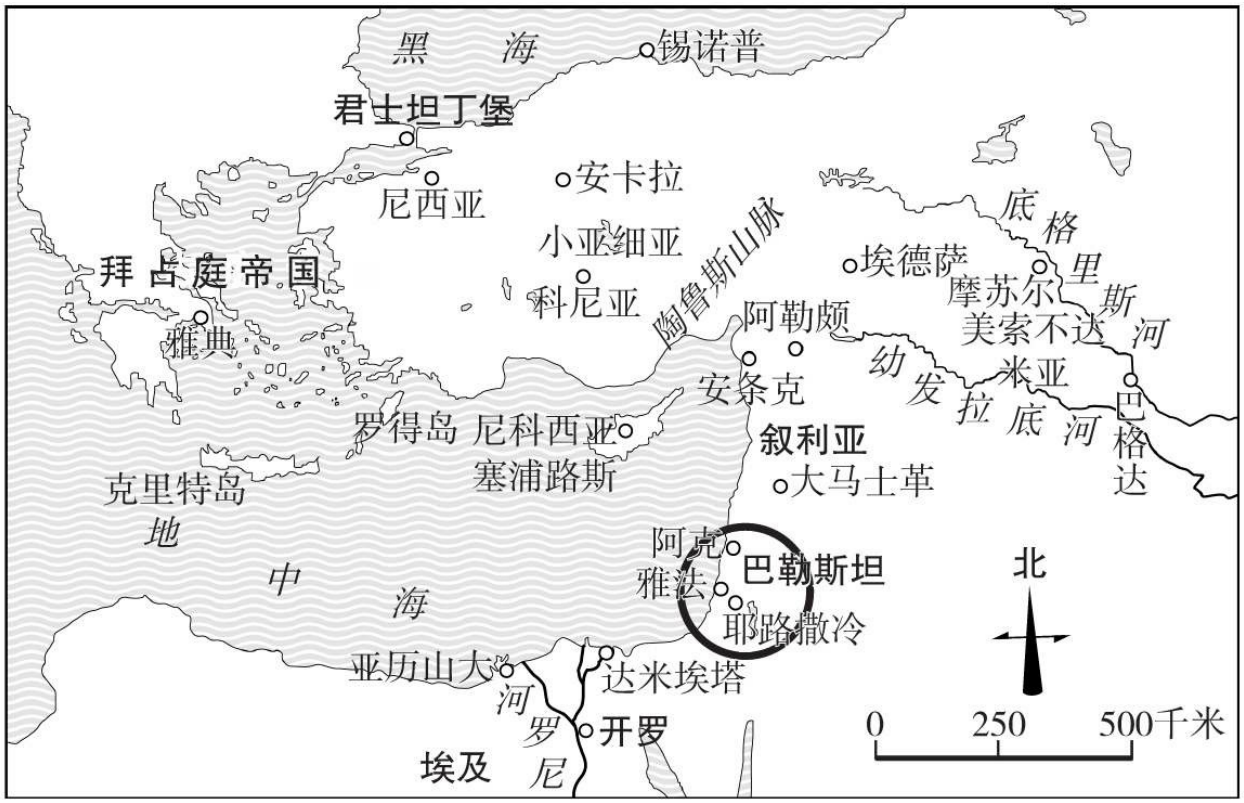
据说“狮心王”这个别称来源于敌方穆斯林士兵之口，并非基督徒所起。在中世纪，东方一带对狮子的尊崇尤为热烈。

事实上狮心王理查违背总司令应该在后方指挥战斗的常识，自始至终站在最前线奋勇杀敌。敌方士兵被理查的气势折服，不知不觉间让出一条道路。伊斯兰一方的史家如此记载。

相比在中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名望，狮心王理查似乎在同时代穆斯林心中的名望更高。

狮心王理查夺回雅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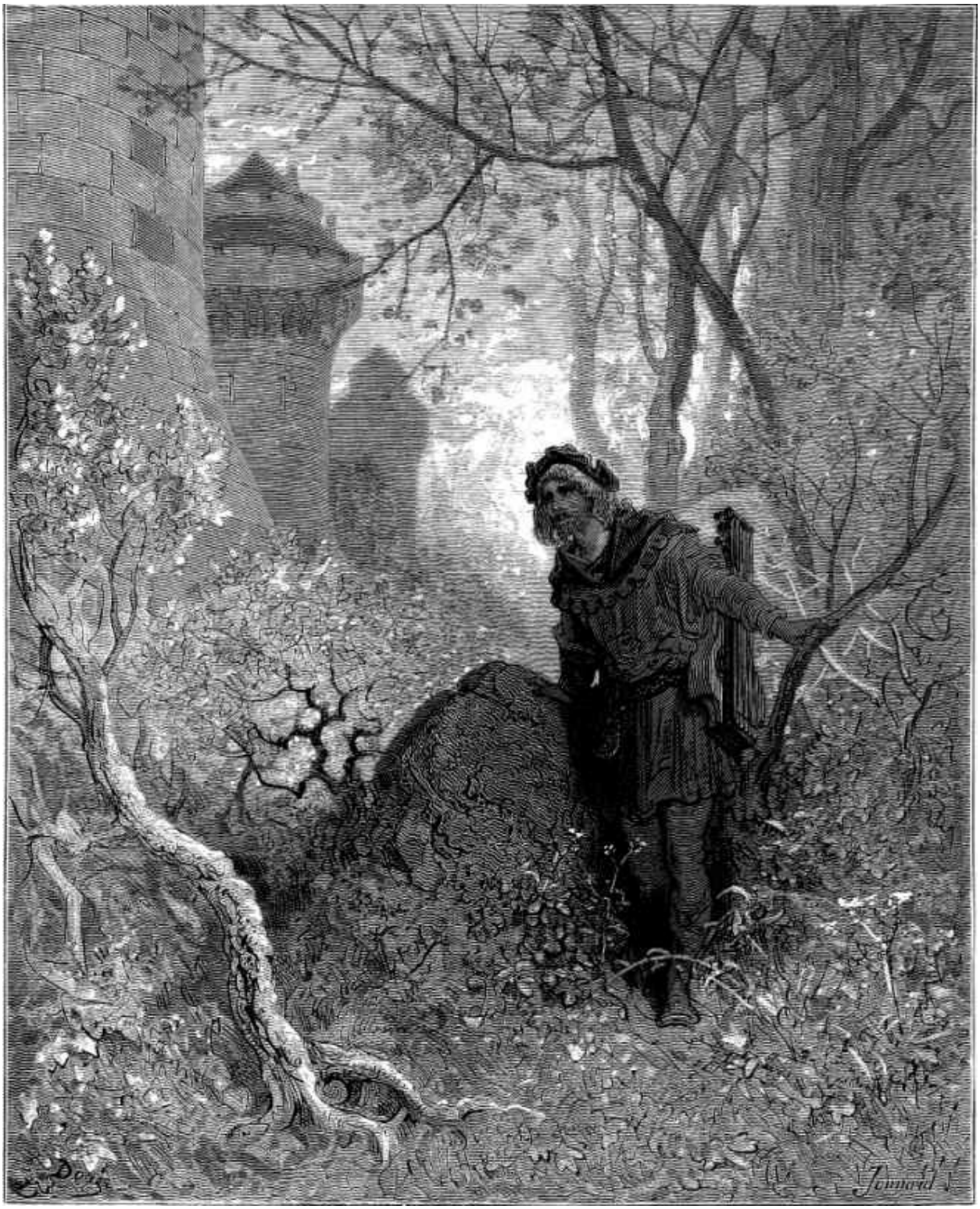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拥有狮子心的男人”，即使从马背上下来依旧势不可挡。无论是作为骑兵还是步兵，似乎并无不同。

作为总司令，理查勇猛有余谋略不足，然而就是凭借着一腔勇猛果敢成功征服敌方士兵，继阿尔苏夫之后又攻陷了雅法。如此，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一步之遥。

布隆德尔听到理查的声音



理查贵为一国之王。当巴勒斯坦一带的战争正值白热化阶段时，从英国传来了理查之弟约翰与其派别势力骚动的消息，不断有使者前来请求理查尽早回国。

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回国的理查向萨拉丁提出讲和。令人意外的是，两人之间的讲和顺利达成。萨拉丁虽然断然拒绝了理查提出的归还耶路撒冷以及“真十字架”的要求，但却承诺不再侵略海港城市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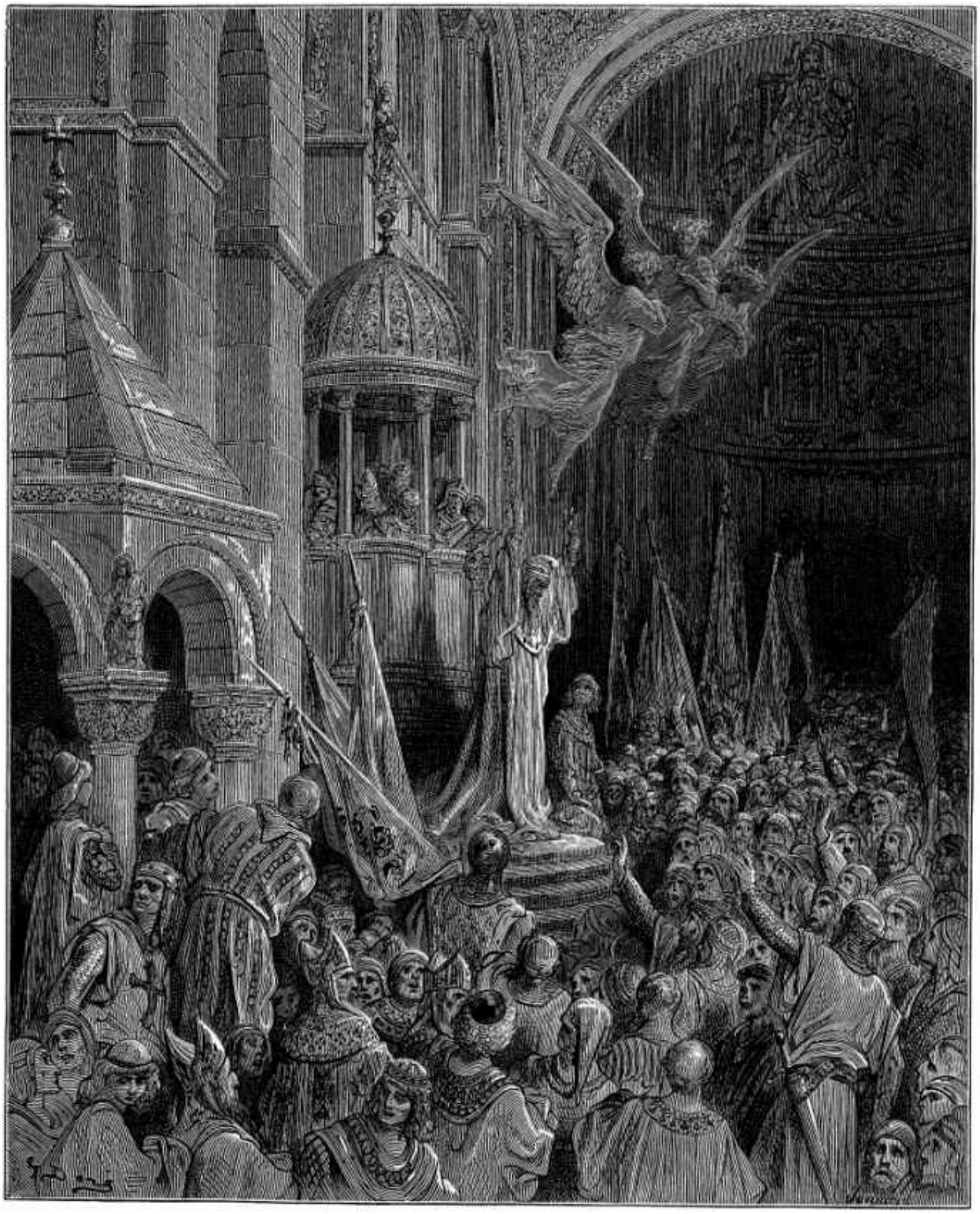
终于踏上归途的理查却经历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没有被穆斯林俘虏却稀里糊涂地被基督徒俘虏。一时间陷入居无定所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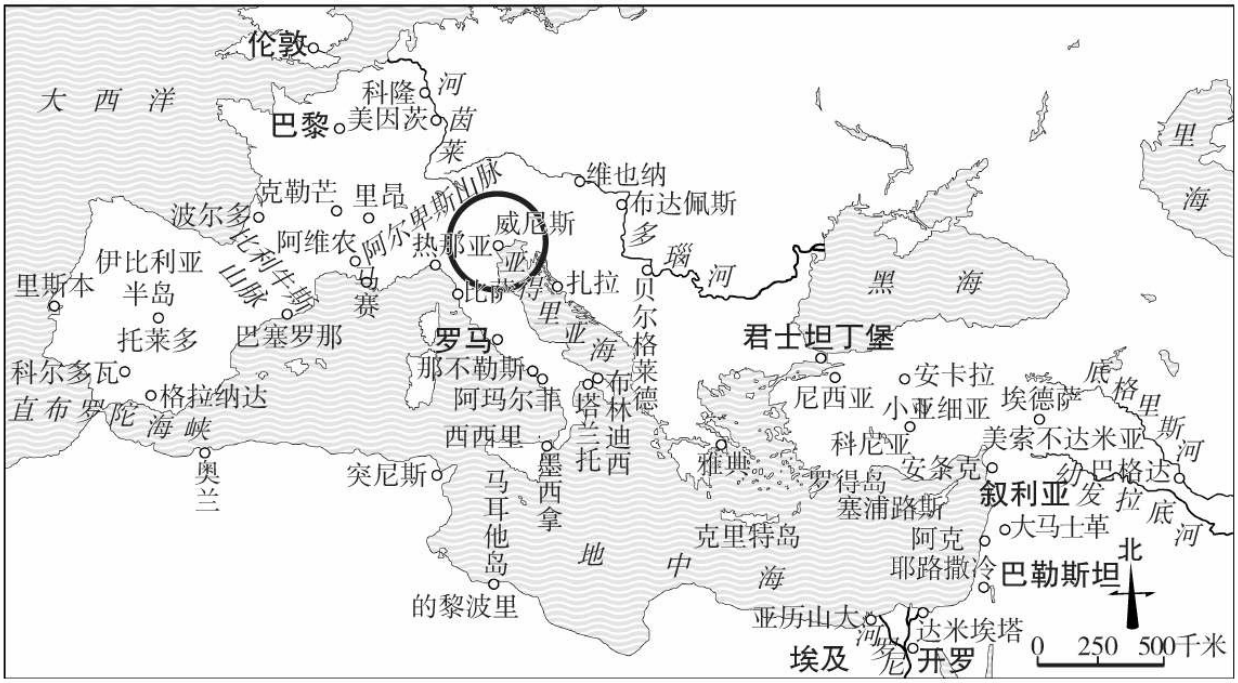
了解到这一状况的是偶然路过的吟游诗人布隆德尔，当他听到从城堡塔上的屋子里传来的歌声后，确定唱歌的人就是理查。

这位吟游诗人在巴勒斯坦逗留期间与理查相识，还曾在理查面前唱歌。从塔上的屋子里传来的歌曲是布隆德尔创作并赠予理查，也是理查爱唱的歌曲。

母亲埃莉诺尔了解到理查的被困之地后四处奔波，最终促使理查被平安释放踏上归途。踏上英国国土的狮心王理查的脸庞在所有以罗宾汉为主人公的电影末尾都会出现。

元首丹多洛向聚集在圣马可教堂的市民宣传十字军的必要性





理查回国之后第三次十字军退出历史舞台，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十字军势力因此度过了十余年和平岁月。

然而这一期间的太平并非得益于萨拉丁遵守与理查之间的约定。这位伊斯兰英雄在理查出发不久之后便与世长辞，倘若狮心王的归期稍微延后一段时间，也许就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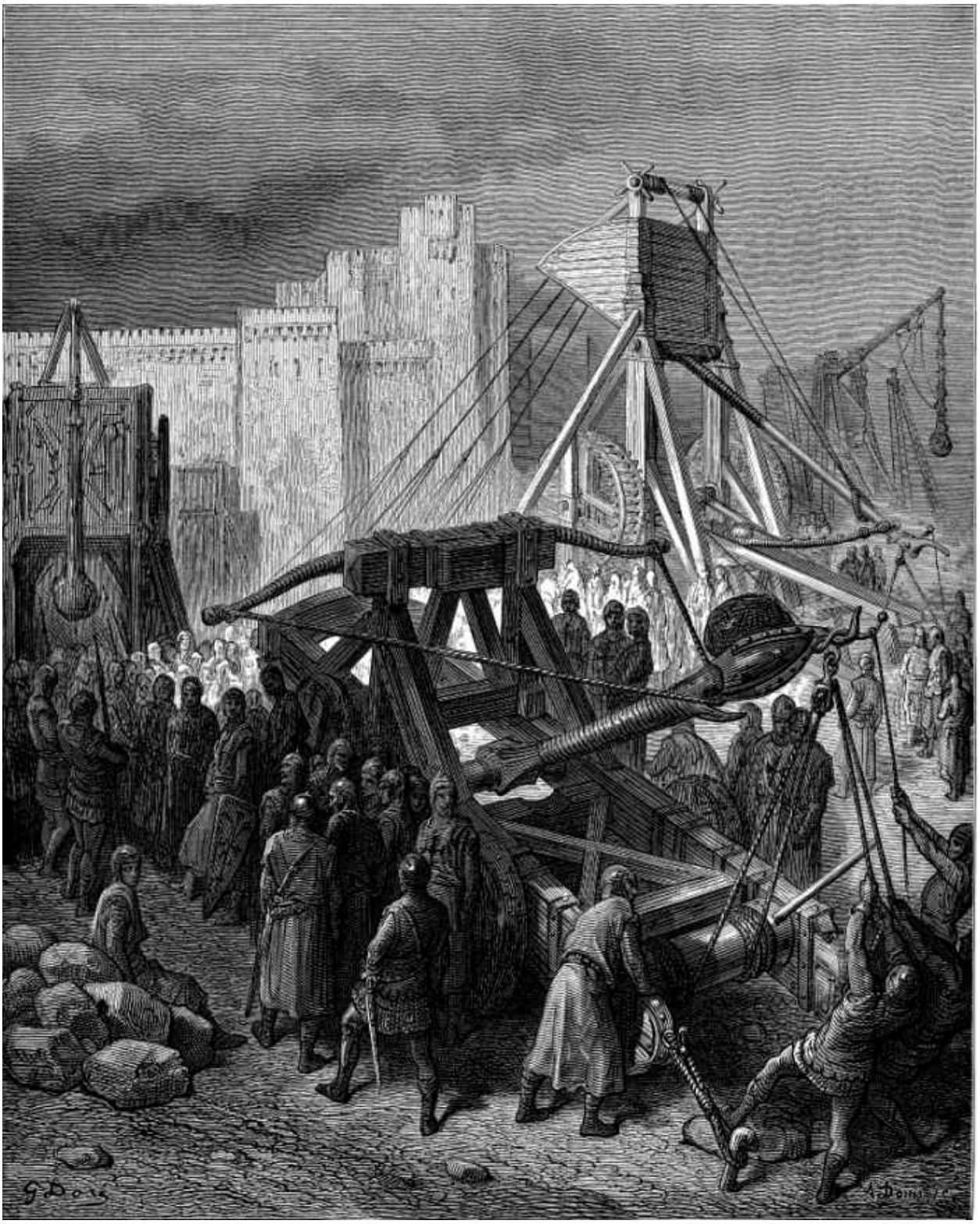
一代英雄与世长辞后必然会引发的继位之争使得伊斯兰一方无暇主动出击，东方的基督教势力因此度过了一段和平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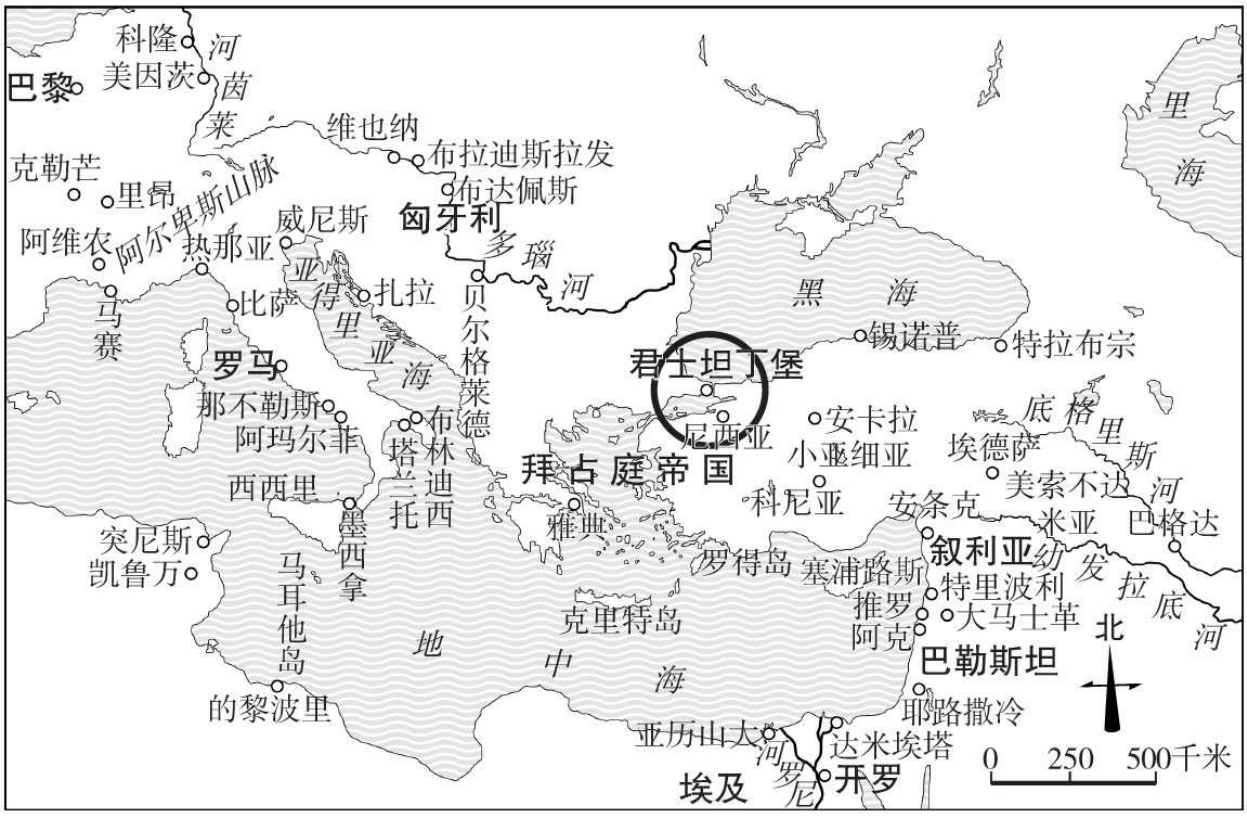
受这方面因素影响，第四次十字军将目标设定为拜占庭帝国，而不是巴勒斯坦。

另外，为了扼制迄今为止在海上运输和补给方面较为领先的十字军的对手比萨和热那亚，第四次十字军将逆转的机会给了威尼斯。

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英国并非海运国家，想要横穿地中海除了依赖意大利海洋城市国家之外别无他法。

十字军灵活运用的诸多攻城设施


G Dor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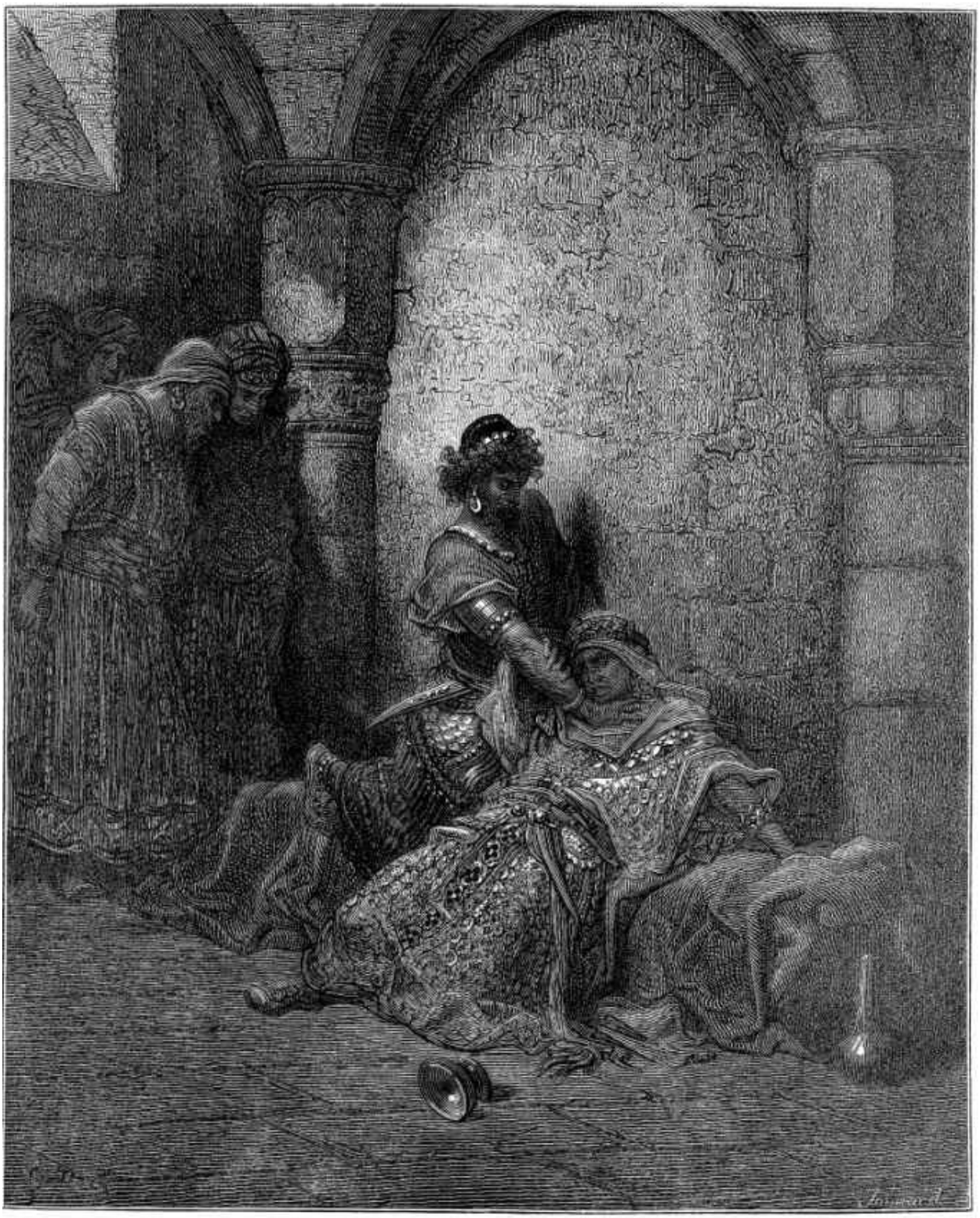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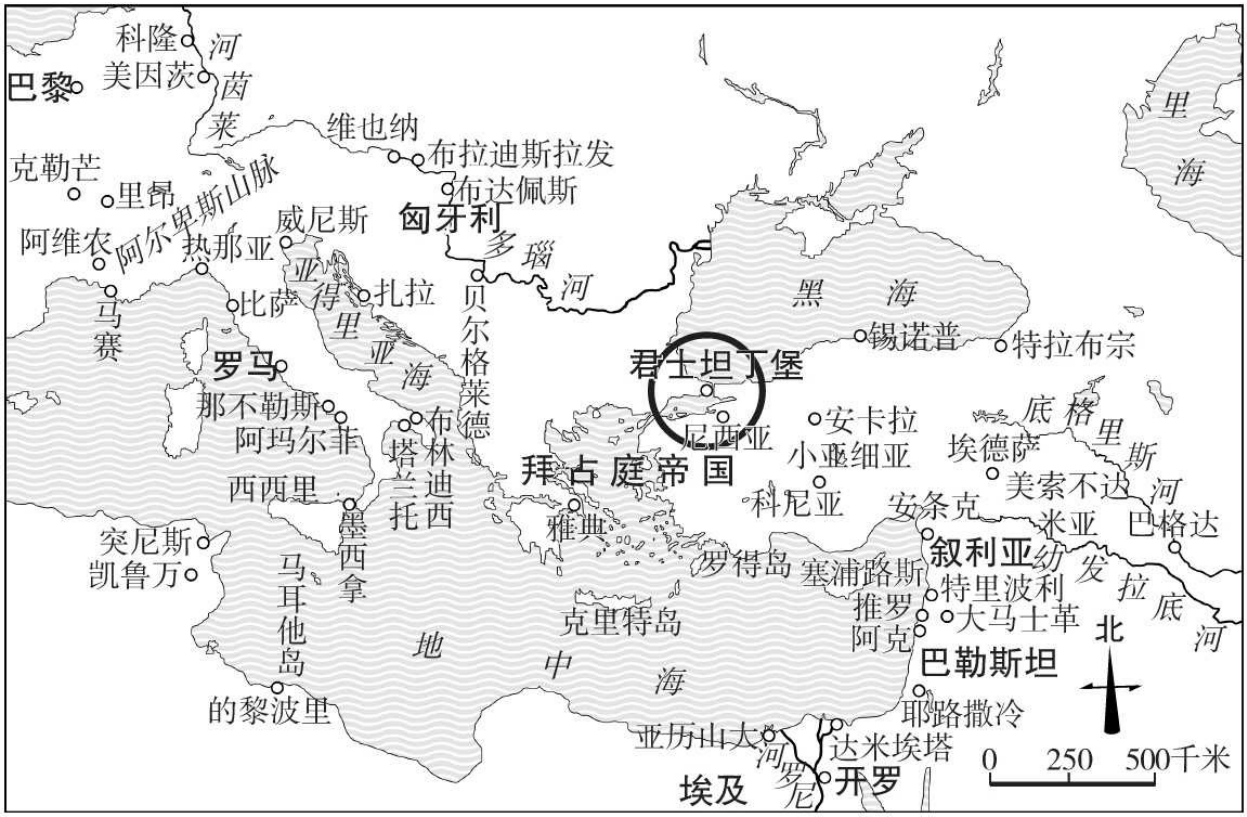
当威尼斯真正加入这场战争时，攻陷大都市必须具备的大型攻城设备也由当地制造改为本国制造完成后运往当地。这些工程是在掌握一定造船技术的前提之下才能完成的。

威尼斯共和国是城市国家，人口稀少，相当于法国和英国这样的领土型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对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要求较高。

建城900年以来，无论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如何脆弱，至少在此之前伊斯兰势力都没能攻陷君士坦丁堡。要想攻陷君士坦丁堡，必须从海陆两方面发起合理有效的攻击。

皇帝阿莱克西斯被一位亲属缢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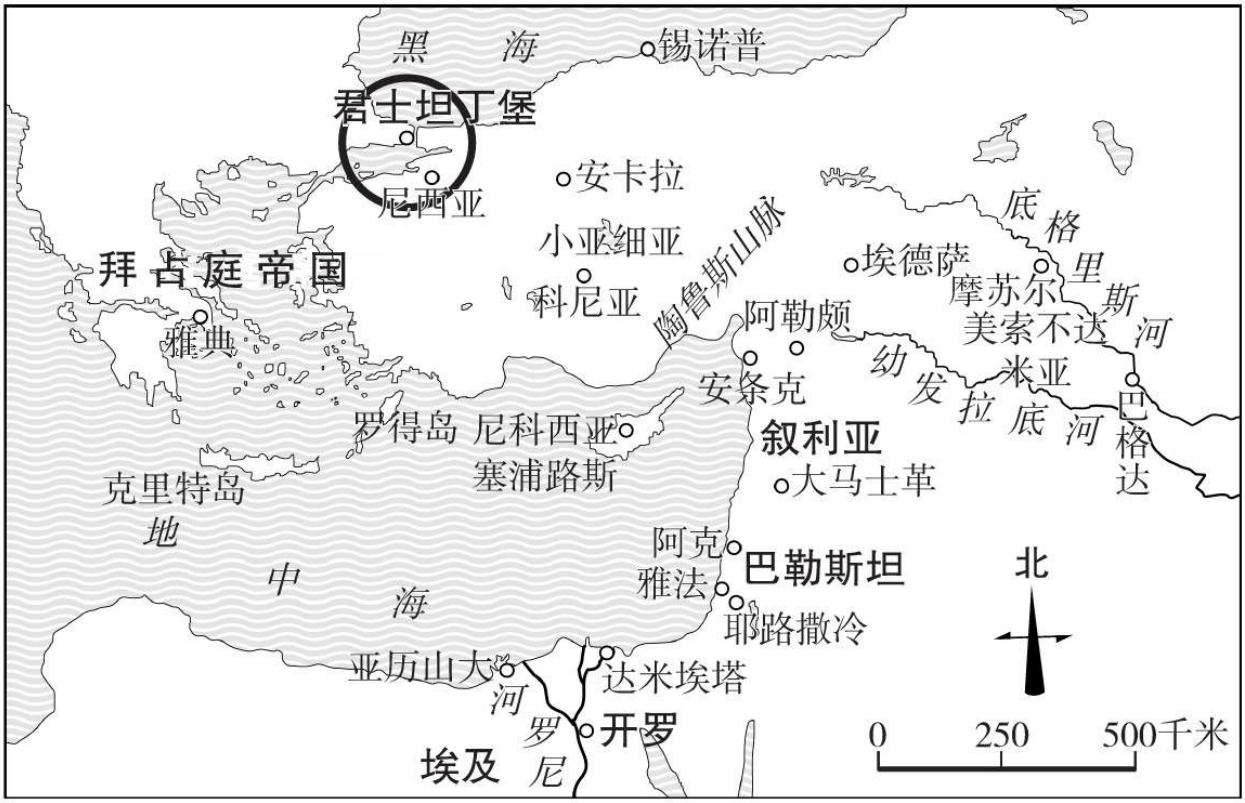




国家体制日渐虚弱，内因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外因。换而言之，国内的纷乱正是导致国家体制虚弱的罪魁祸首。拜占庭帝国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早已成为一种传统，如今已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随着第四次十字军的强势来袭，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全面爆发。

皇帝阿莱克西斯和父亲深陷囹圄，还被驱逐出国，于是他们向威尼斯求救。虽然最终得以回国，但却即刻被亲属杀害。又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一时陷入风雨飘摇的状态。

穆尔祖弗洛斯向丹多洛提出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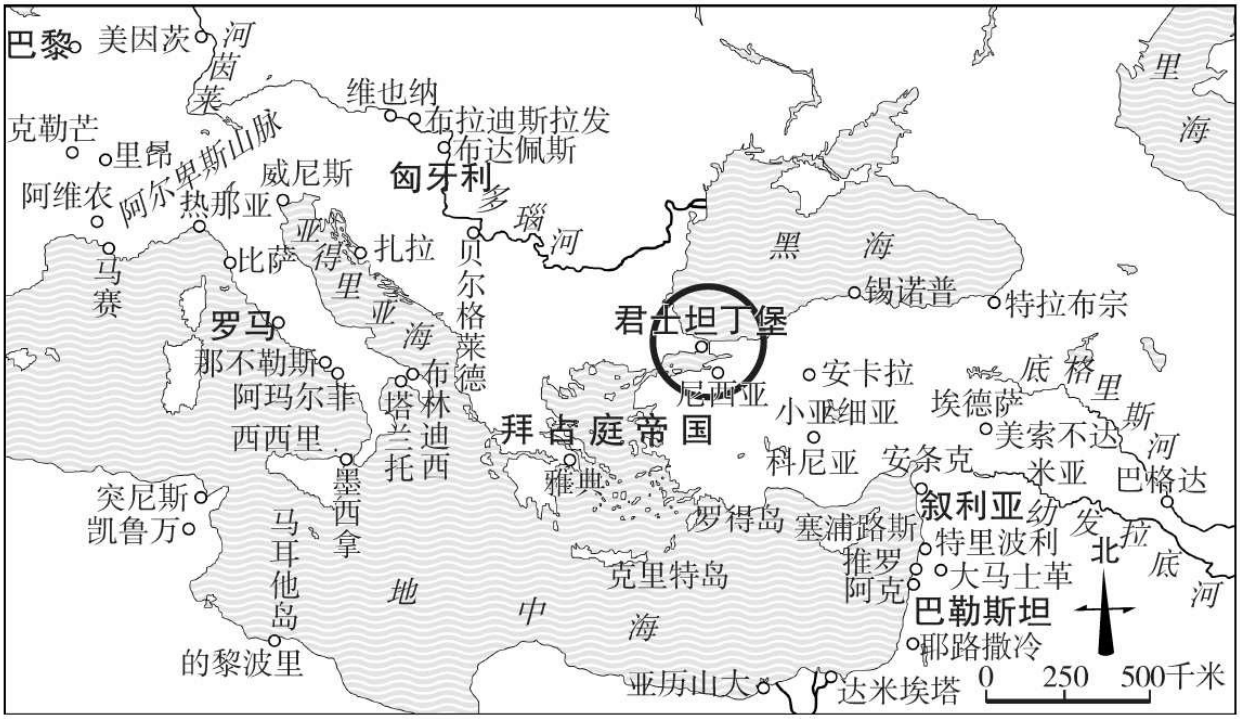


杀害阿莱克西斯夺得皇位的穆尔祖弗洛斯最初坚持抗战到底。第四次十字军连日以来的攻击，让这个男人的强硬坚持逐渐土崩瓦解。

登上皇位的穆尔祖弗洛斯向第四次十字军的总司令丹多洛提出会谈请求。此次会谈一方站在海边，另一方站在船头，威尼斯的元首丹多洛断然拒绝讲和。表面上是拒绝与利用不正当手段夺取皇位的人进行交涉，实际上想借机消灭拜占庭帝国。逐渐失去君士坦丁堡普通民众支持的穆尔祖弗洛斯最终被赶下了皇位。

皇位篡夺者穆尔祖弗洛斯连夜携家眷逃往小亚细亚。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由此悬空。

第四次十字军入驻君士坦丁堡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进入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并不是从敞开的城门中友好入城，而是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虽然希腊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有所不同，但说到底不都是基督教吗？如此严厉批评十字军的历史研究者不在少数。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丹多洛虽然被开除教籍，但不久之后便被恢复。参与战争的法国诸侯也没有受到任何责难。

拜占庭帝国是希腊人的国家，希腊人视又称欧洲人的拉丁人为野蛮人，嫌恶至极，因此拒绝和拉丁人的天主教产生任何瓜葛。

另一方的拉丁人也对希腊人嗤之以鼻。当被伊斯兰势力逼至窘境，自己一方没有反抗，难道只能求助于西欧？

此外，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秘密向伊斯兰一方传送迄今为止的十字军的信息，这件事西欧方面早已知晓。

这一时期正值13世纪初期，西欧的天主教教徒对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教徒的印象要比现在复杂得多。

少年十字军

拜占庭帝国倒台，“拉丁帝国”登场，耶路撒冷依然归属于伊斯兰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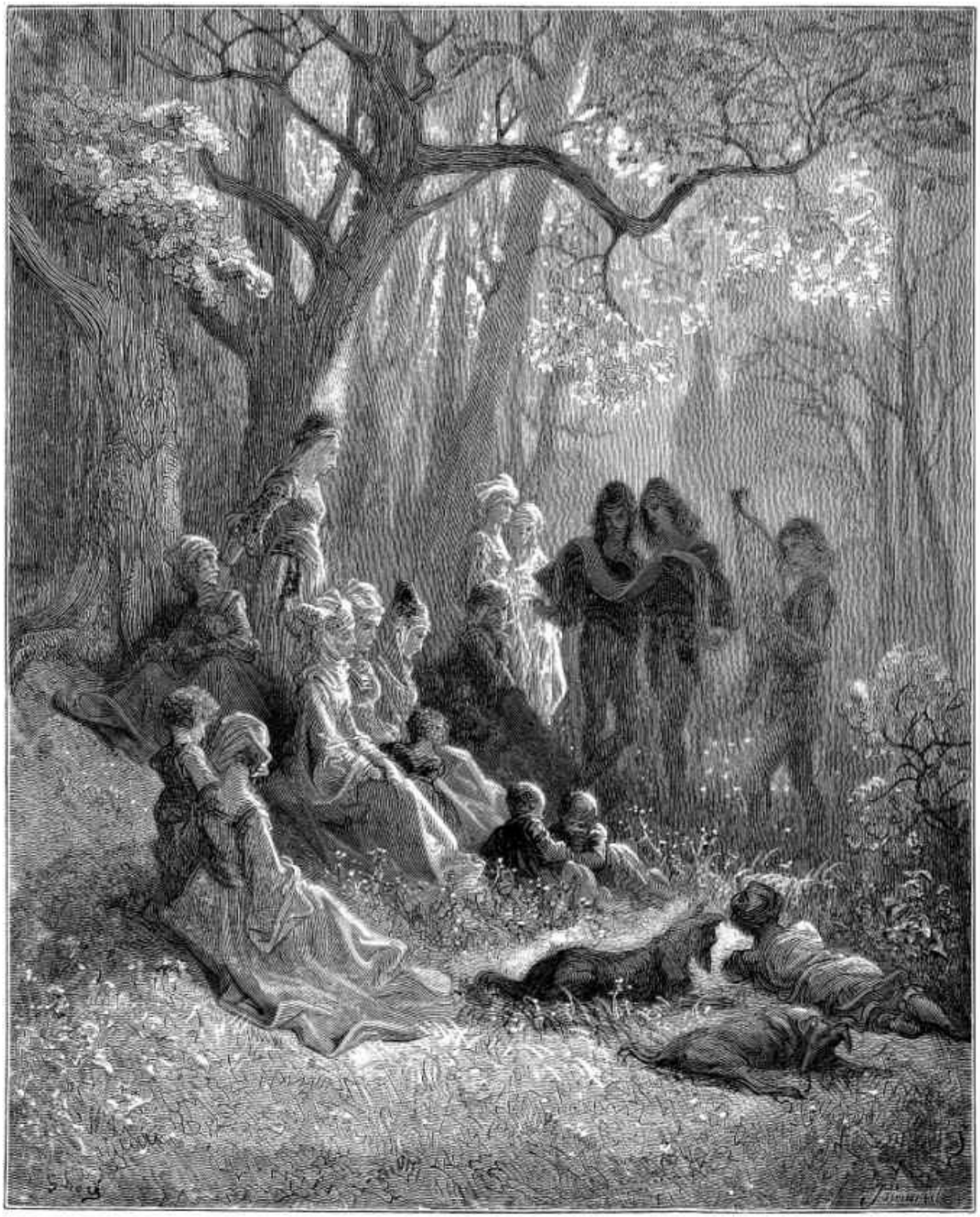
在各地争先大规模兴建主教大堂的欧洲，圣城耶路撒冷的不幸并不能凝聚信徒们的信心，反而让他们陷入愁苦之中。

在当时的欧洲，一场类似第一次十字军的民众规模的圣城解放运动以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向周围漫延。其中，由少男少女自发组成的少年十字军就诞生于这场运动之中。

然而这些挣脱父母的怀抱从法国南部港口乘船前往巴勒斯坦的少年，要么在中途倒下要么被拐卖，少年十字军最终走向瓦解。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狂热信仰造成的恶果，诸侯对坐以待毙的现状的不满呈现出井喷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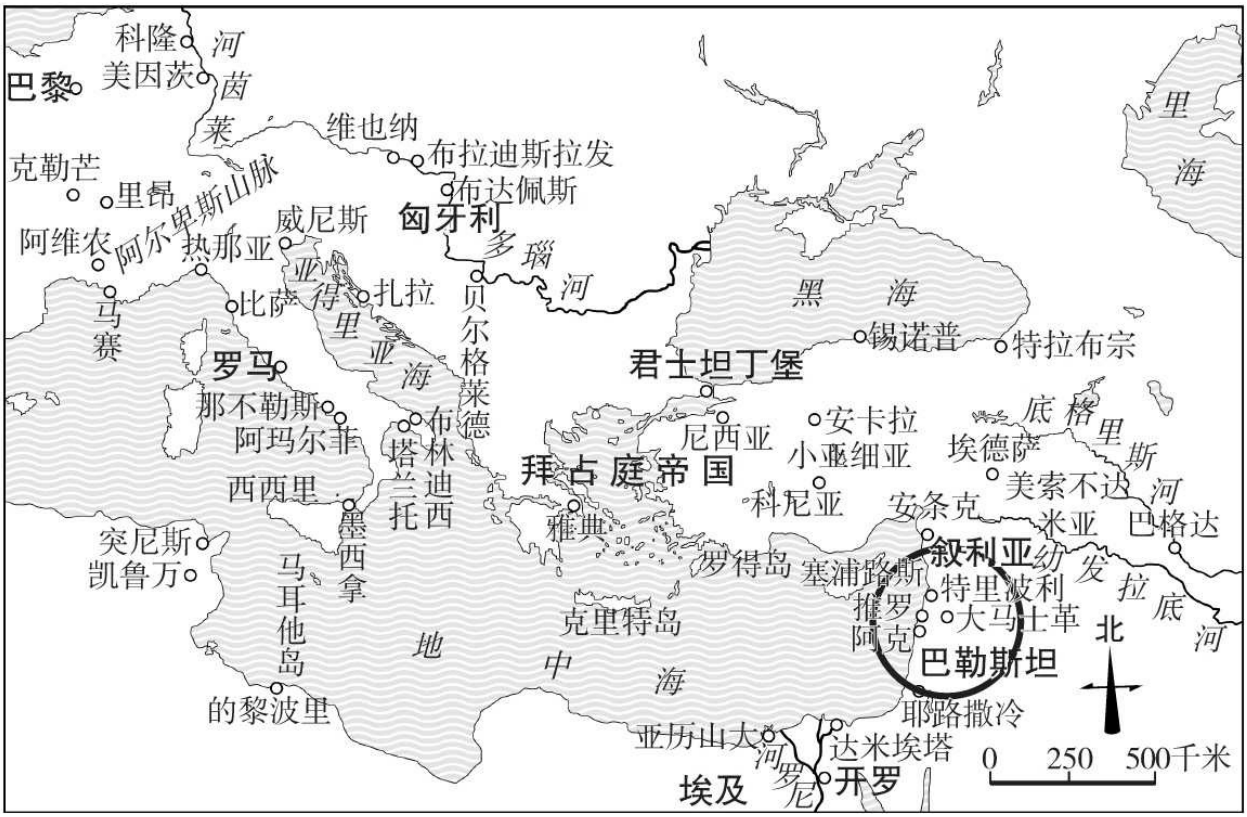
聆听吟游诗人吟唱的十字军主题的法国大众歌曲



这一时期，法国大众歌曲在西欧全境广为流传。歌曲中饱含在伊斯兰教桎梏下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悲痛与哀叹，以及对近处的东方基督教骑士不懈努力的赞美。

我有一张收录这些歌曲的唱片，歌词和曲调还不错。13世纪之后出生的多数欧洲人聆听了这些歌曲，思绪大概会飘往遥远的东方。

出现在山那边的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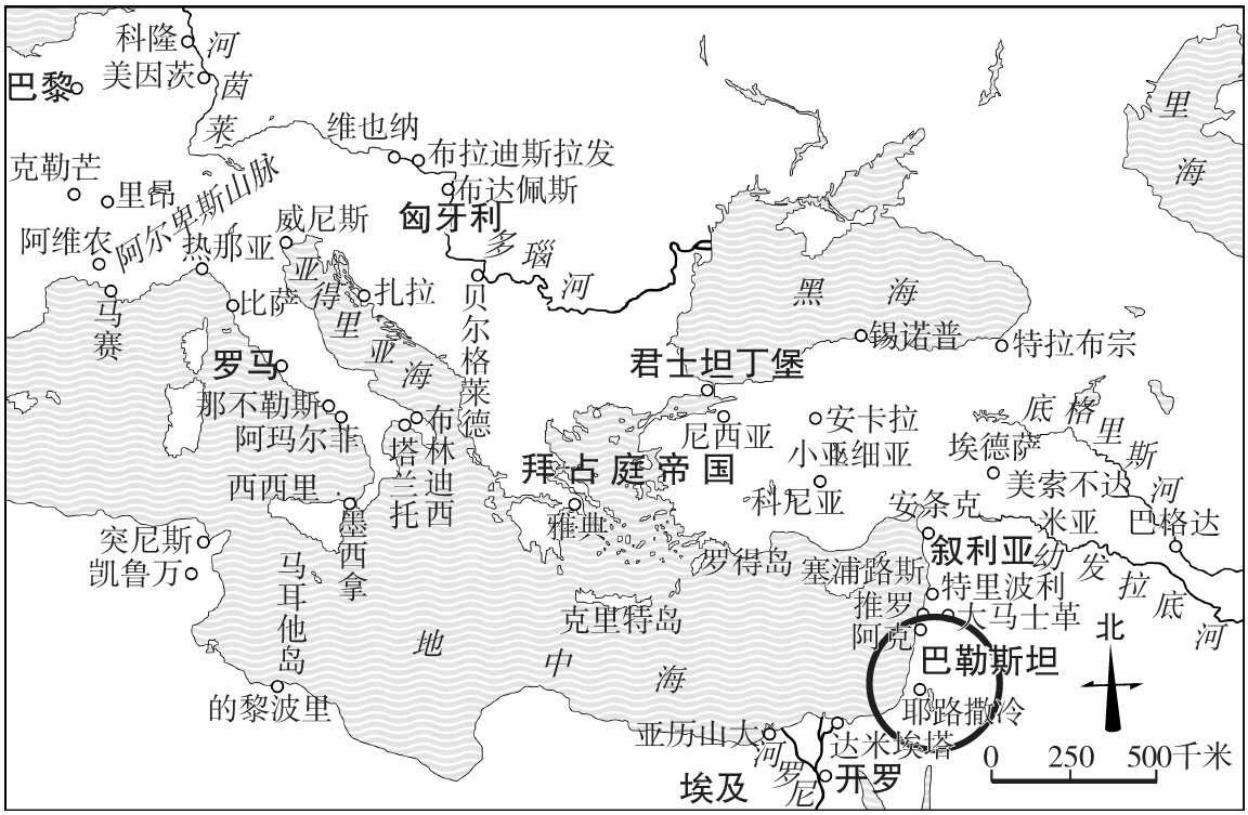


对耶路撒冷不闻不问是上帝绝不允许的，这种信念在东方基督徒之中日益扩散。

这一时期，山那边出现巨大光芒十字架的传闻在人群中四处流传。听到传闻的人认为解放圣城是上帝所期望的事情，为此终日惶惶不安。所谓奇迹其实就是人们内心愿望的外在表现。

与其等待西欧派兵支援倒不如自己解决问题，于是以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基督徒为主体的十字军应运而生，这一次是第五次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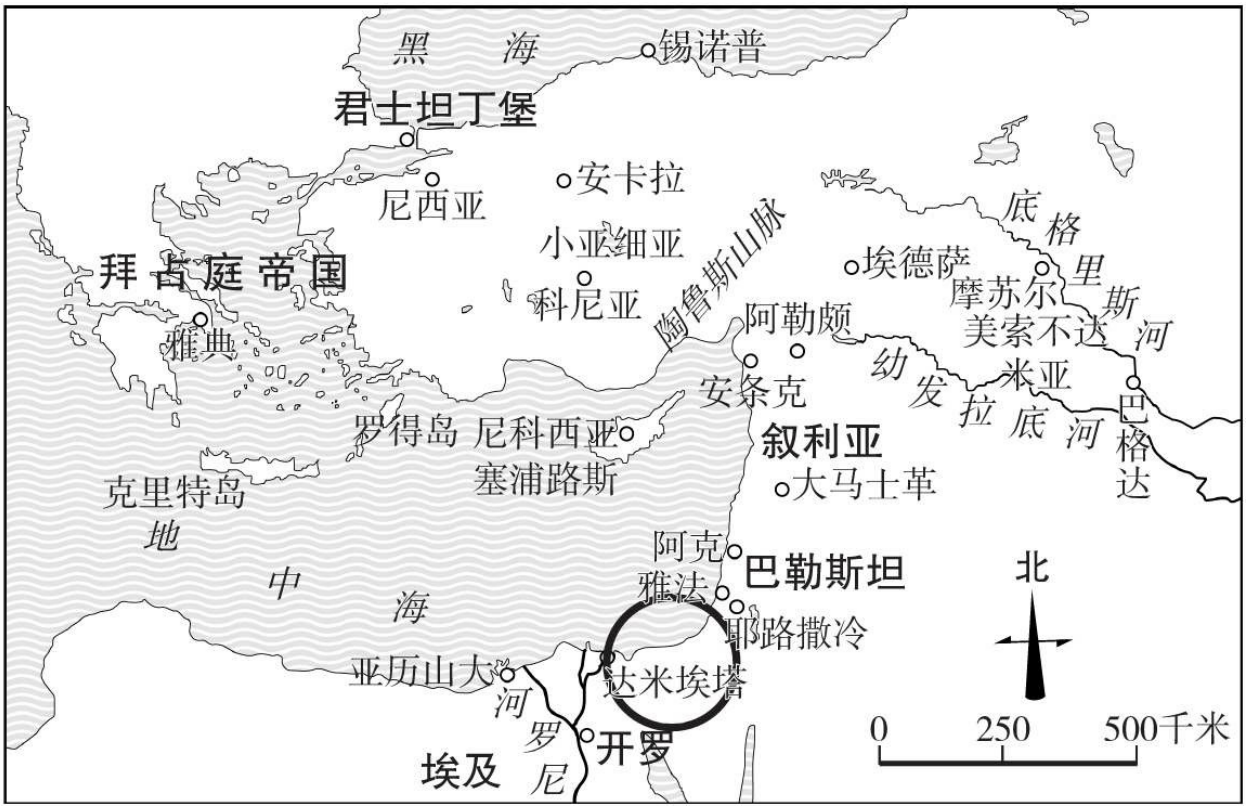
向犹太山野进发的第五次十字军



第五次十字军没有牵扯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英国这些西欧强国，也没有国王和诸侯的参与。这次的十字军是由居住在东方的基督徒组成的一支十字军。

匈牙利、波兰、挪威的骑士们听到十字军建立的消息纷纷从欧洲赶来参加。因此，第五次十字军中既有金发碧眼体格高大的欧洲白种人，也有上百年来一直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徒。

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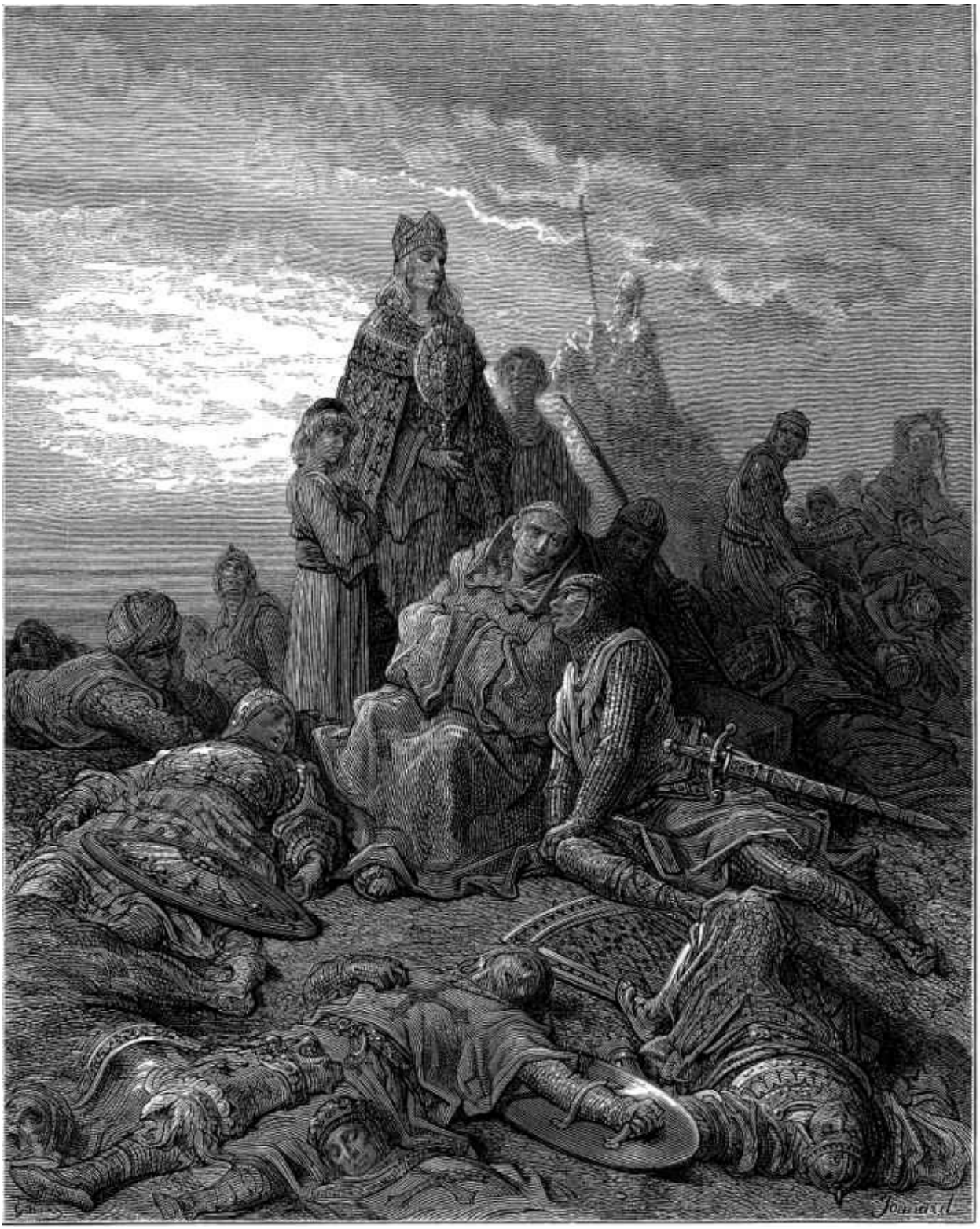
将圣城耶路撒冷从伊斯兰教手中解救出来是第五次十字军每一位战士的终极目标。如果要解放圣城，上帝一定会全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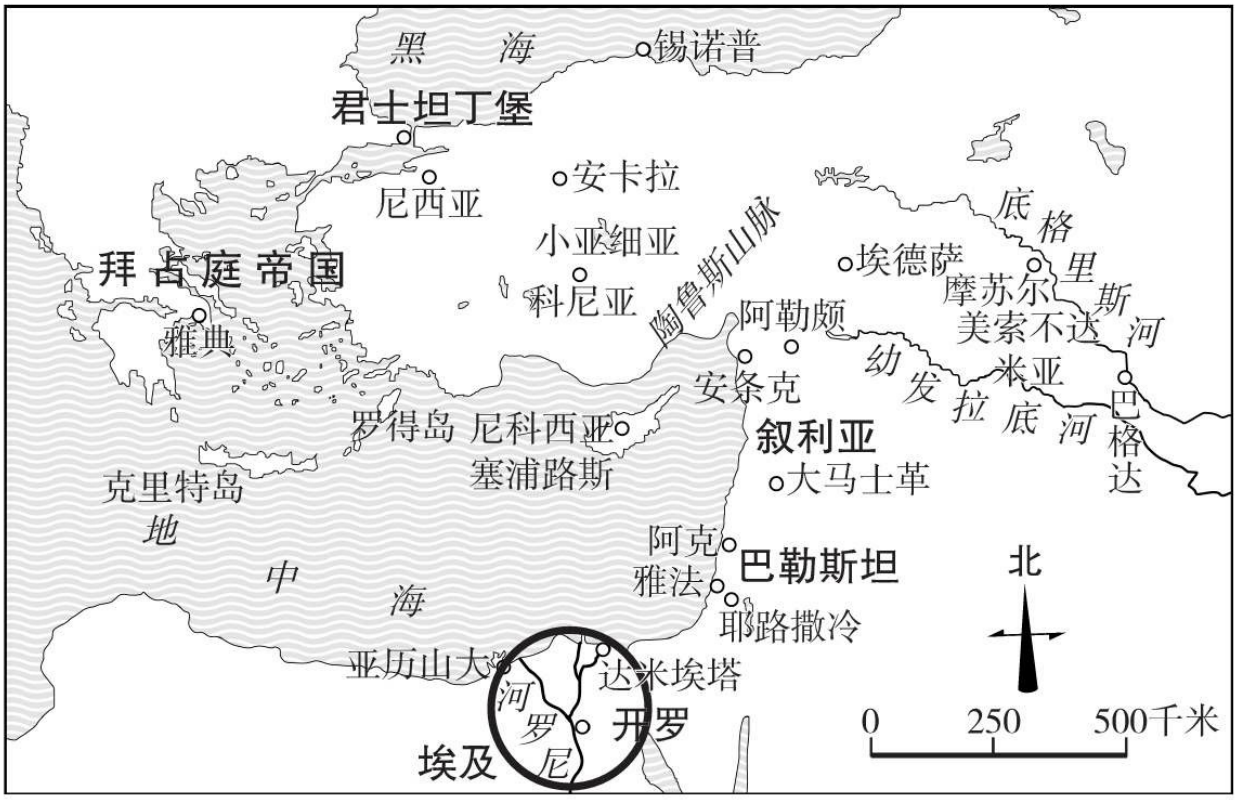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一时期正是13世纪前半期，中近东内陆地区已经扩展到面向地中海一侧的十字军国家东侧，其中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仍然被埃及开罗的苏丹所控制。

想要夺回耶路撒冷就必须攻打埃及苏丹，因此第五次十字军的队伍便开往埃及。

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想要前往埃及就不能绕过尼罗河。

走向死亡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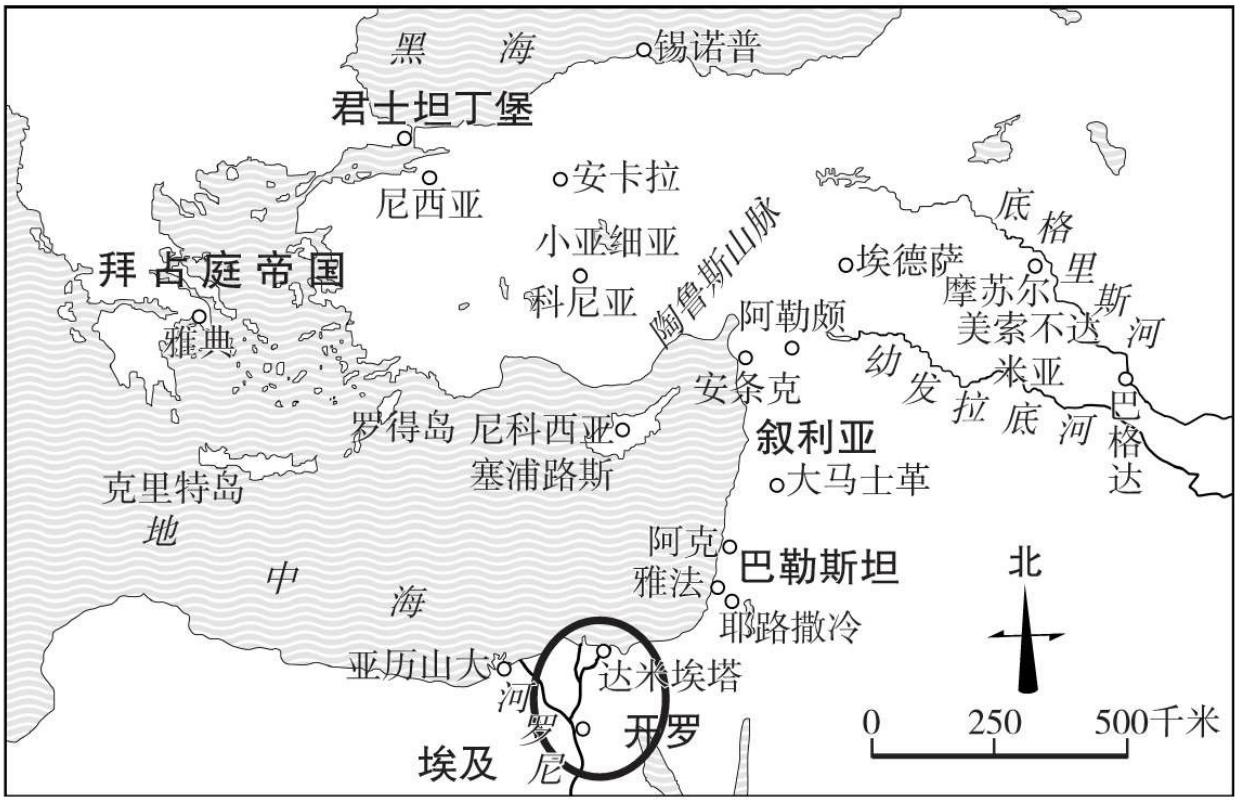
与其说和第五次十字军对决的是埃及军队，倒不如说是尼罗河。

第五次十字军成功攻陷了面向地中海的达米埃塔，但却在从达米埃塔前往开罗的途中被尼罗河的凶险深深震撼。

尼罗河下游一带由广阔的三角洲构成，古希腊人为这片三角洲取名“δε′λτα”。一旦踏入这片区域，纵横交错的运河、支流以及沼泽地随处可见，稍有不慎就会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埃及苏丹派遣的伊斯兰军队对国内的侵略。

不断有人倒下，对于经常出现在战场上的神职人员来说，他们能做的就是告慰亡魂，传达上帝的宽恕。

签订停战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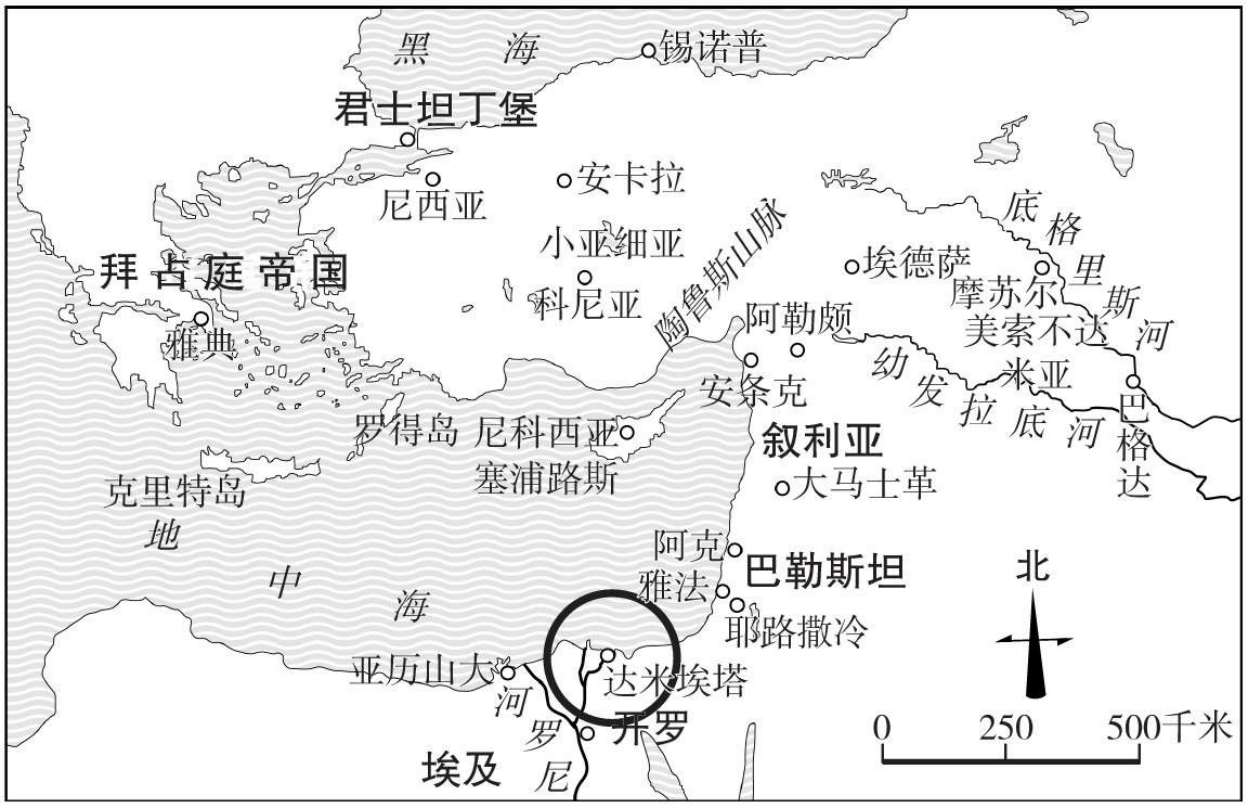


最终，第五次十字军在尼罗河遇到重重困难，甚至无法靠近开罗只能撤退。

在和苏丹签订的停战协议中，十字军战士平安撤退，不过要放弃已经占领的达米埃塔。

因夺回圣城这一目标而发起的第五次十字军，却在与耶路撒冷相距甚远的埃及以失败告终。歌颂十字军故事的法国大众歌曲还是一如既往地扣人心弦。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前去拜访苏丹



第五次十字军虽然成功攻下达米埃塔，但在那之后尽是艰苦卓绝的战斗，虽然对于其中的具体经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时期曾确实出现了一位意大利修士。单靠为迈向死亡的战士传递神的宽恕这一方式无法让人满意，于是这位修士独自一人去拜访对方司令官的营帐。

这位修士告诉苏丹，想要获得内心的安稳就要甘为上帝的使者，想必苏丹也觉得不可思议。修士还表示，要想结束战争拥抱和平，就应该放弃现在的信仰加入基督教，面对这样一位年轻修士，穆斯林将士们的情绪有些激昂。然而，苏丹微笑着命令手下人将这位修士平安护送至基督教的军营。

死后被纳入圣人之列的方济各意识到此次的规劝是失败的，于是不再做类似的尝试。然而，直到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的宗教代表每年都会聚集在阿西西举办一次祈愿和平的集会。

没有杀害一人的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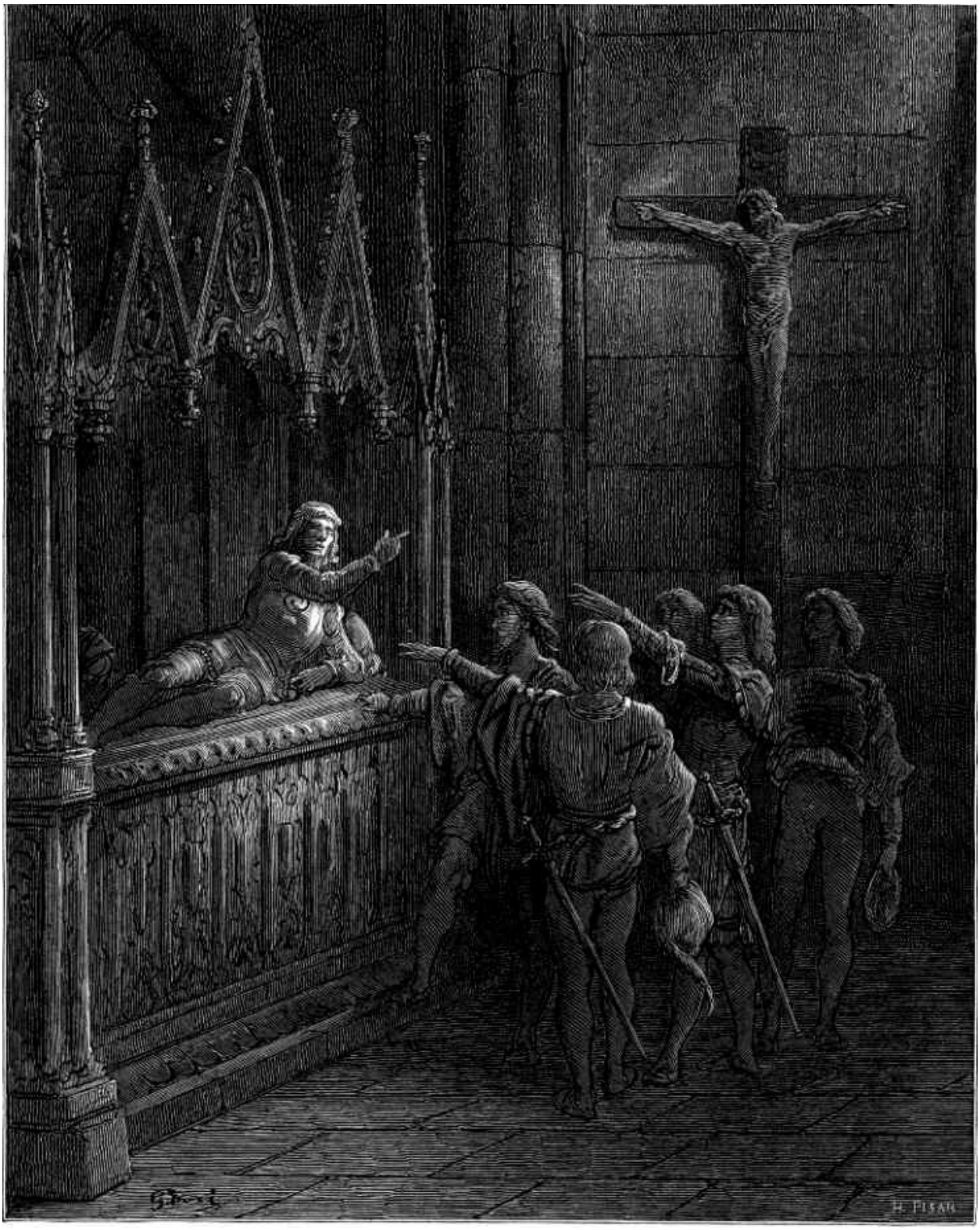
古斯塔夫·多雷为米肖的著作《十字军的历史》画了100多幅插图，但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领导的第六次十字军这一部分的描述中，却不曾有一幅插图。无论米肖是否给予高度评价，书中关于这部分历史的插图确实一张也没有，或许相比启蒙主义时代的米肖，古斯塔夫·多雷是一位无比虔诚的基督徒。

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是唯一一次没有以流血为代价就达到目标的十字军。通过和埃及苏丹的直接交涉，也就是所谓的外交手段，成功取得了穆斯林占据的三座圣城，耶路撒冷、拿撒勒和伯利恒。此外，伊斯兰一方与基督教一方还达成了10年之内互不侵犯的条约。在朝圣路上，人人都是自由的，基督徒可以朝圣，穆斯林也可以朝圣。

由被开除教籍的皇帝腓特烈所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在东征的途中没有杀害一位穆斯林，为此罗马教皇并不承认此次行动，视罗马教皇为指导者的诸多西欧基督徒也不承认此次十字军。600年之后的多雷也没有为这段历史画出一幅插图。

关于腓特烈相貌的描述，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里介绍的这尊雕像，而这尊雕像也遭到了某位狂热的基督徒无情的摧毁。

在先祖墓前宣誓加入十字军的战士们


H. PISAN

虽然苏丹履行了和腓特烈之间缔结的条约，但是10年之后东方基督教的势力又恢复到缔结条约之前的状态。在西欧基督教世界，希望通过军事实力压制伊斯兰势力的声音占绝大多数。于是，第七次十字军就此诞生。

第七次十字军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亲率，由于此次十字军发起于十字军的主流国家法国，因此这支军队集结了欧洲全境的王室、诸侯和骑士们，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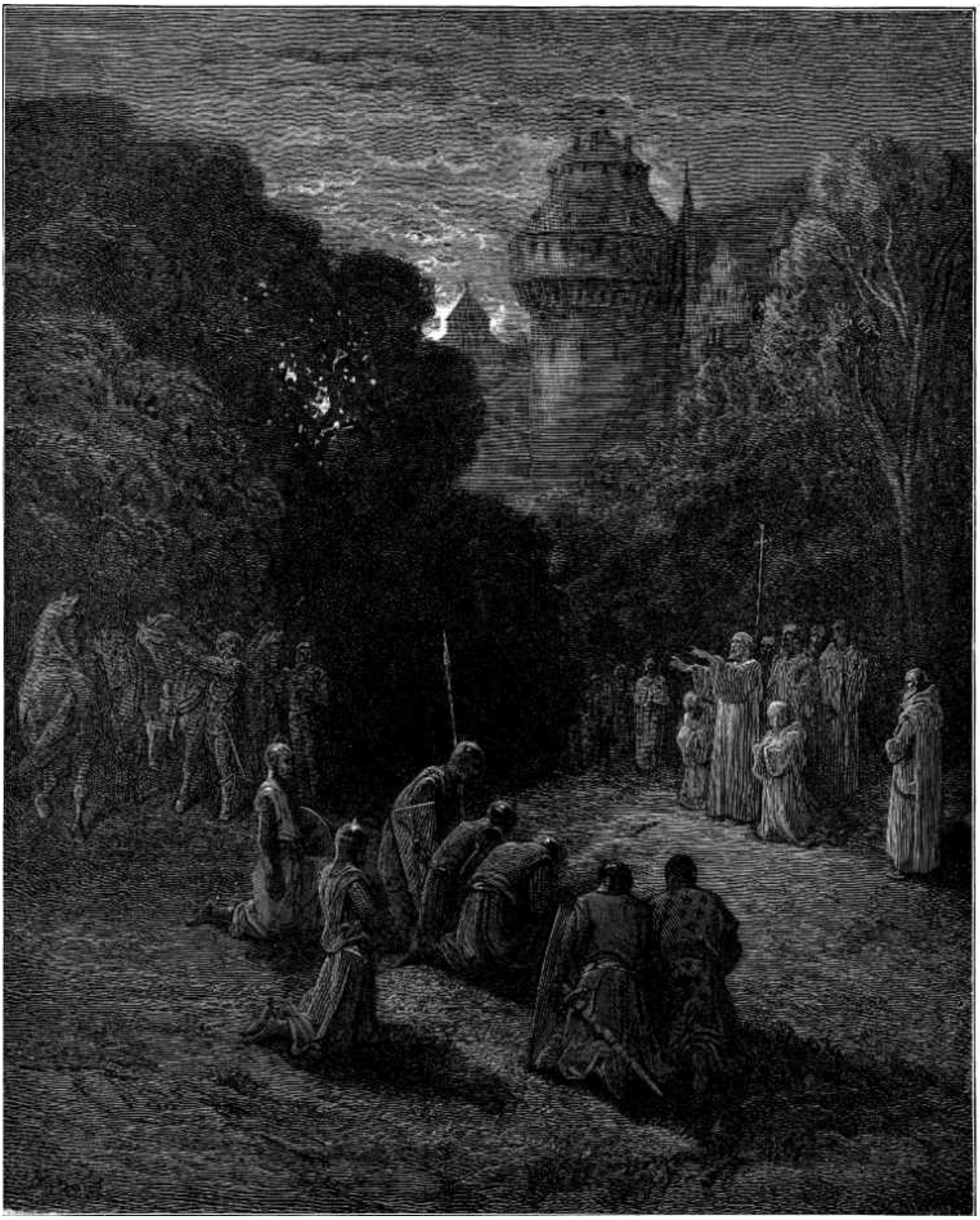
从第一次十字军到当时的第七次十字军，大约已有150年的历史。据说当时的西欧骑士大多无家可归，祖上也没有人参加过十字军。如果有的话骑士们也没有必要特意跑到主教面前宣誓参加十字军，直接在自己先祖的墓前宣誓就可以。

告别家人

对于参加十字军的战士们来说，出发之前和家人告别是必要的仪式之一。

而这种告别并不只是单纯和家人告别，还要去怀抱着死去的耶稣的圣母马利亚像前进行告别。通过这种方式向圣母马利亚传达势必要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城的决心。中世纪，圣母信仰兴起且不断扩大。

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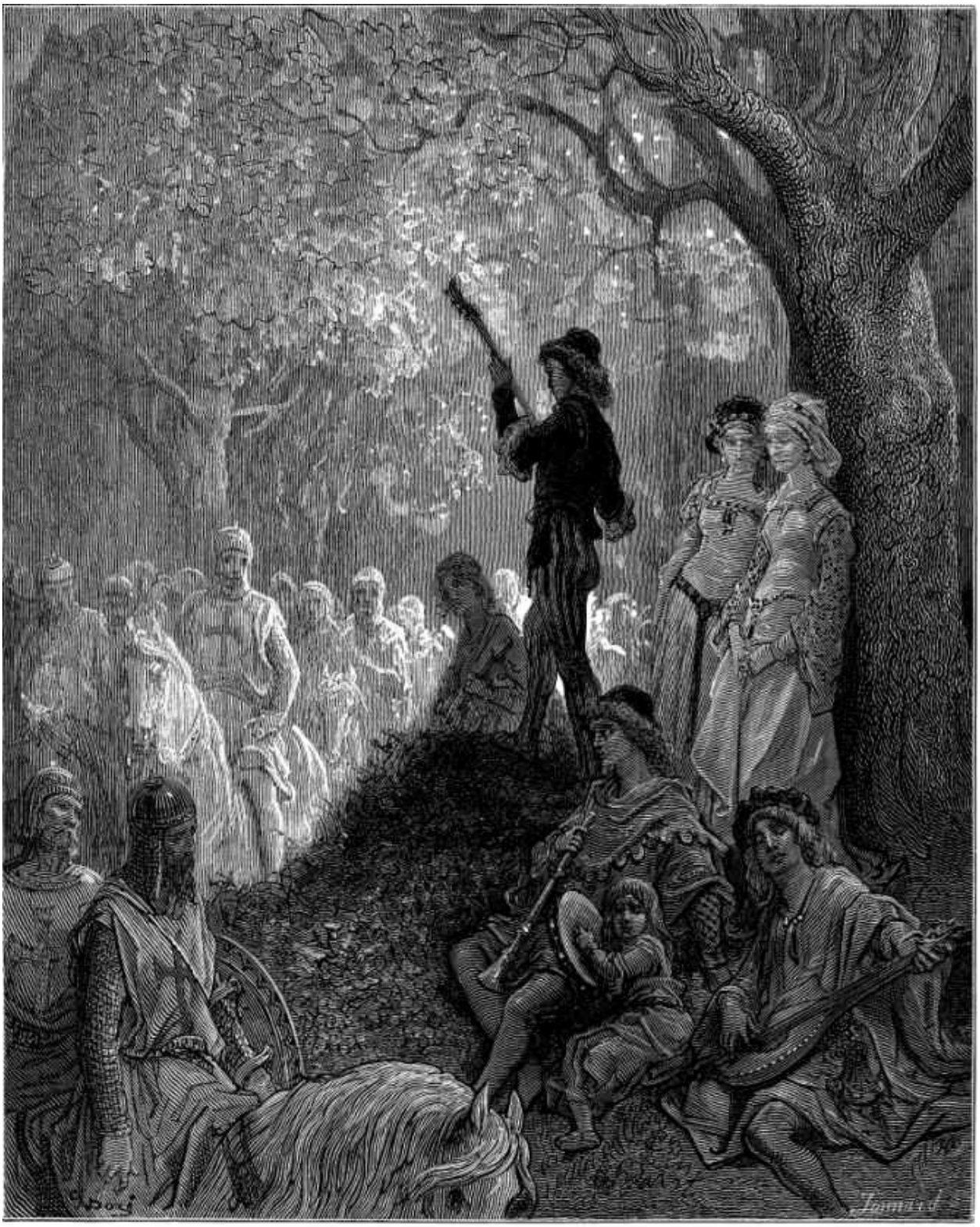
向宣誓参加十字军，之后前往东方的战士传达神的祝福是主教和司祭的重要工作。

十字军的参加者都是“神的战士”，要完成“神所希望的事情”。对于他们参加的“神圣的远征”来说，经由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传达神的祝福是不可或缺的仪式。

皇帝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正因为缺少这一仪式，即使取得了战果也无法得到承认，同时也和“神圣的远征”没有关系。

换而言之，只要是十字军就必须取得罗马教皇的认可。法国国王路易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在这方面做得无可挑剔。

在歌声中远离故乡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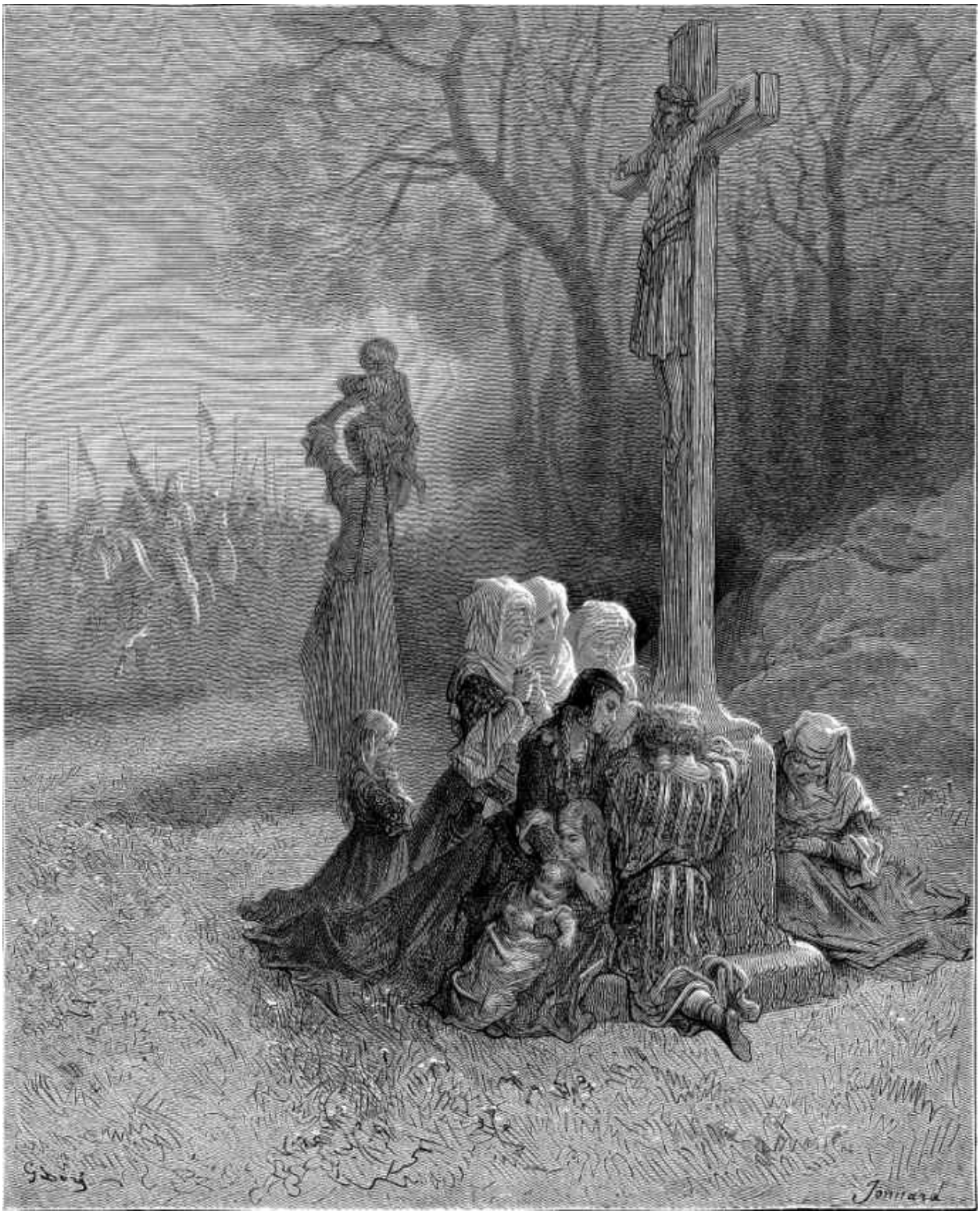


欧洲全境参加第七次十字军的人以法国南部的艾格莫尔特为集合点开始集结。

虽说是“神圣的远征”，但对于前来送行的人说哀伤之情远远大于喜悦。表面上在尽量克制，然而内心早已翻江倒海。

这一时期广为传唱的讲述十字军故事的法国大众民谣大多都是哀伤的基调。

奔赴战场



妻儿、姐妹只能把对出征的丈夫或者兄弟的牵挂之情寄托在上帝身上，西欧的很多地方都在不断上演插图所描绘的场景。无论是法国人、德意志人又或者英国人对于这种牵挂之情都深有体会。

能够做到欢欢喜喜送走出征者的大概只有将一生都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又或者是和出征者没有血缘关系的路人吧。

第七次十字军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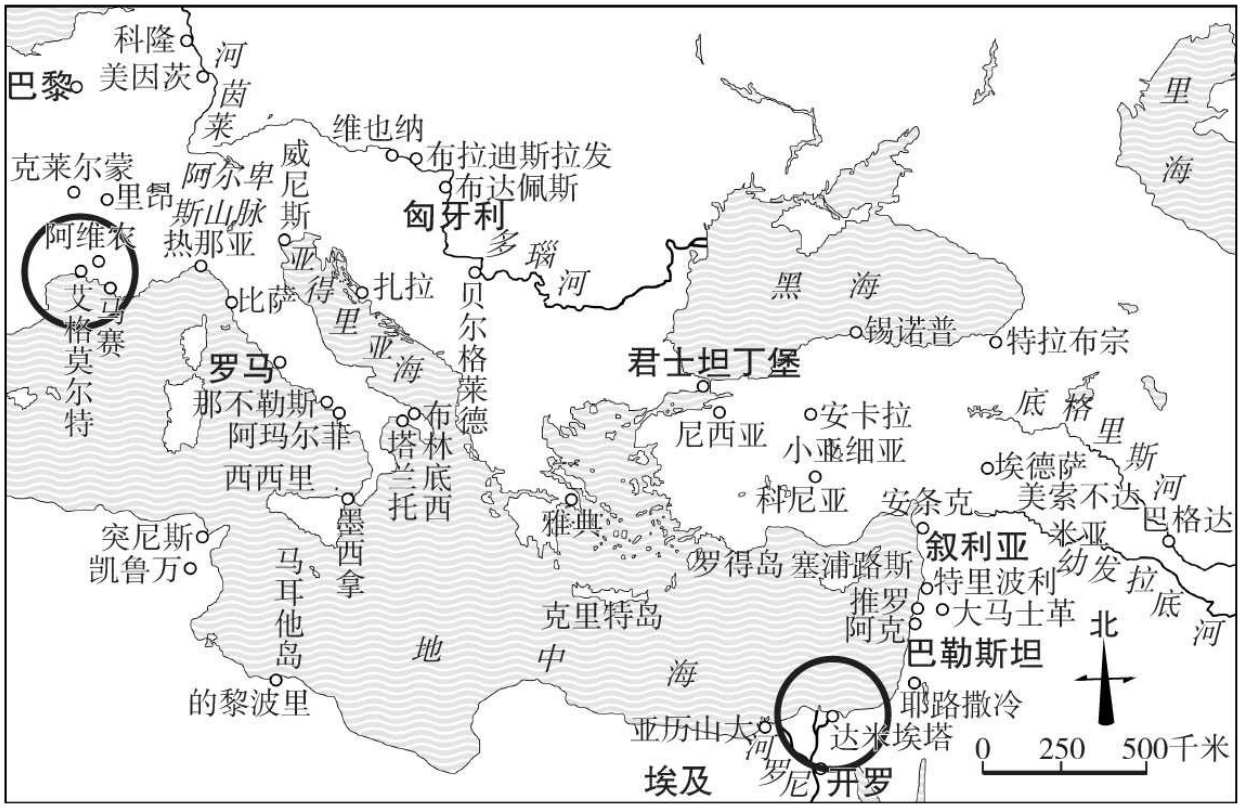
Doré
Jonnard

多雷为第七次十字军创作了很多插画。也许是因为第七次十字军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之后最为悲壮的远征，其中凝聚了西欧基督徒太多的泪水。

法语是描述十字军历史的官方语言，由此不难推断出十字军的主力基本都是法国人，此次东征也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亲自率领。西欧以及东方的基督徒们对此次十字军东征寄予厚望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当时的法国并没有海洋运输的传统，因此海港船只这些理应自己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匮乏。于是便对法国南部的艾格莫尔特进行大规模改造后将其变为一座海港，船只问题依靠具备所有大型船只的海洋城市国家热那亚得以解决。

法国国王路易踏上埃及的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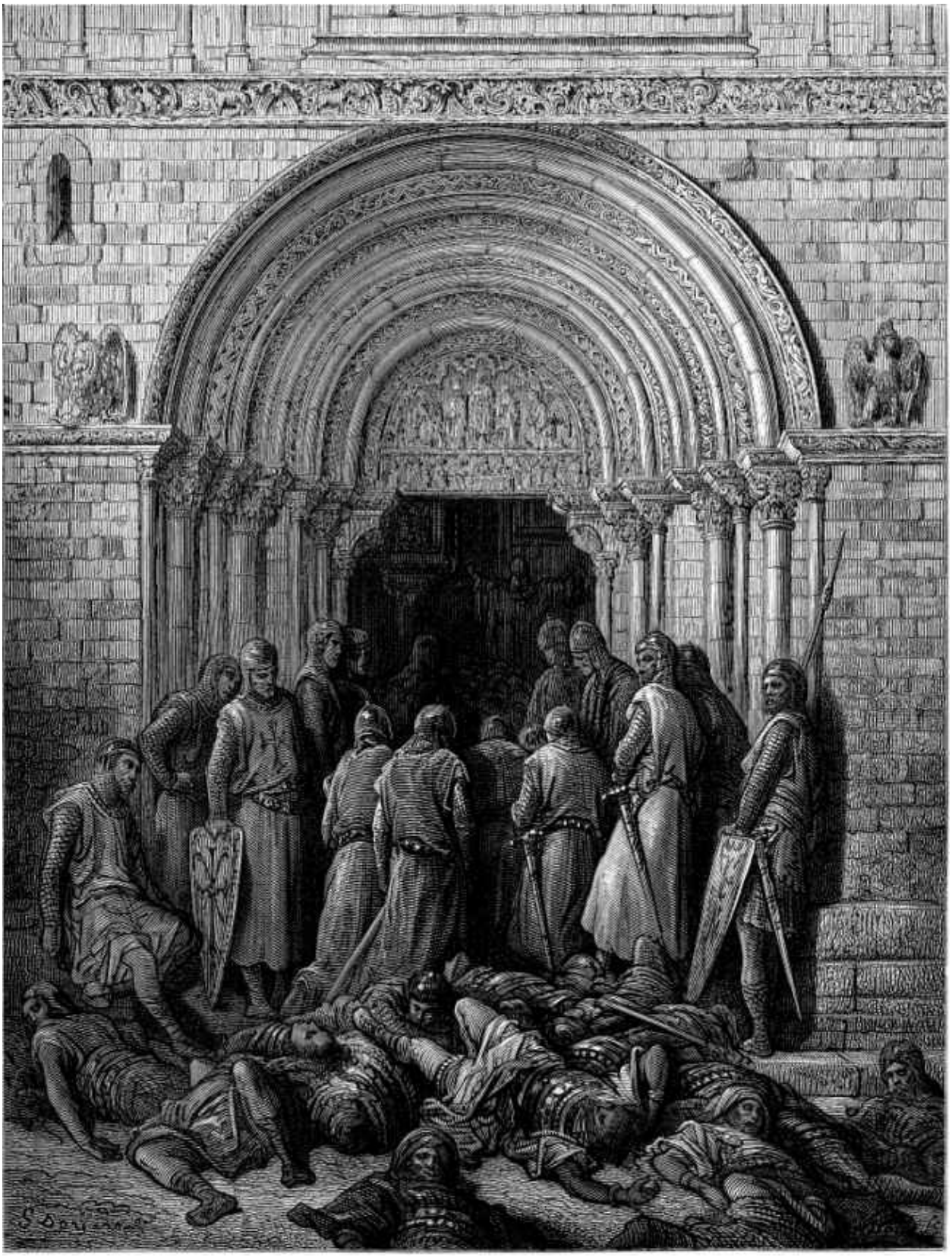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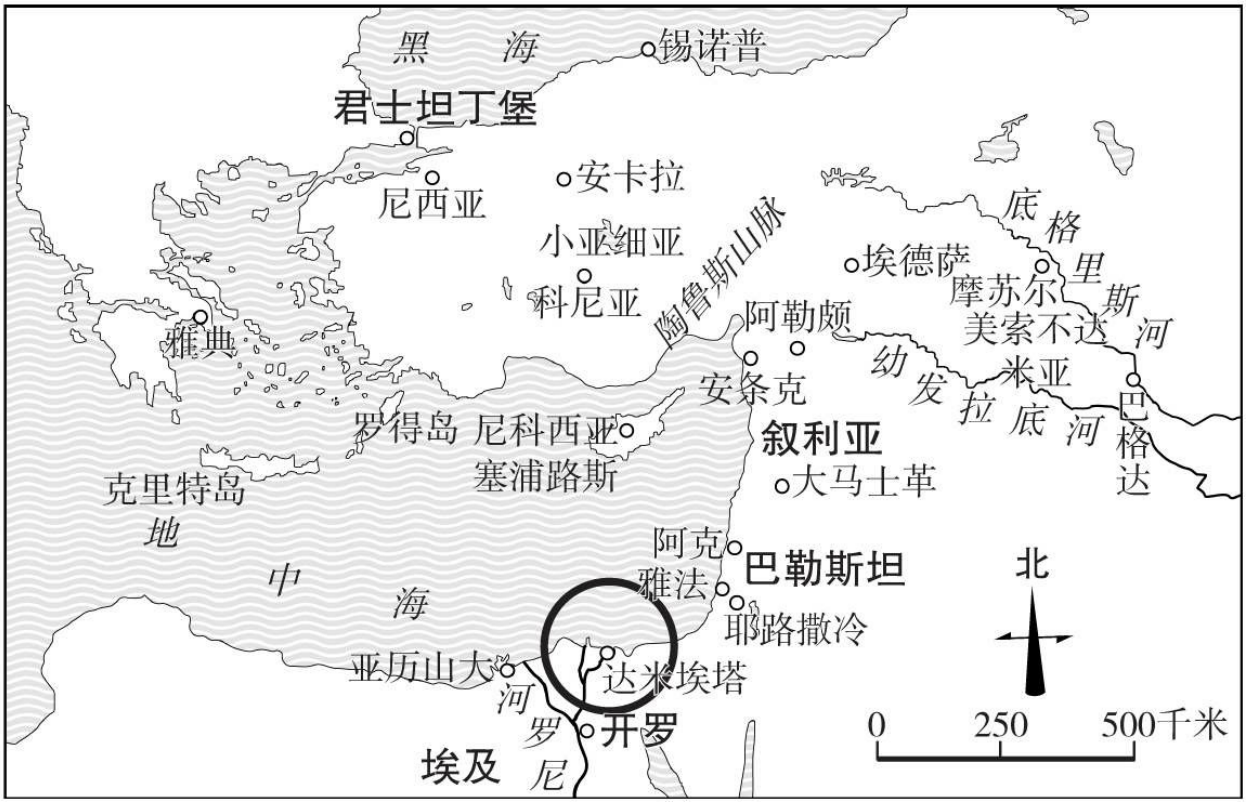
如同30年前的第五次十字军一样，第七次十字军的目的也是通过打击埃及苏丹，从而削弱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影响力。

从战略角度来看，两次十字军东征并无不妥，只是30年后站在埃及土地上的路易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尼罗河的威力。

法国国王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是经罗马教皇认可的“神圣的远征”，这一点和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东征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此次东征有着上帝全方位的庇佑，而路易本人也是一位热情而又虔诚的基督徒，这一点众人皆知。

胜利之后十字军战士来到教会向上帝表达感谢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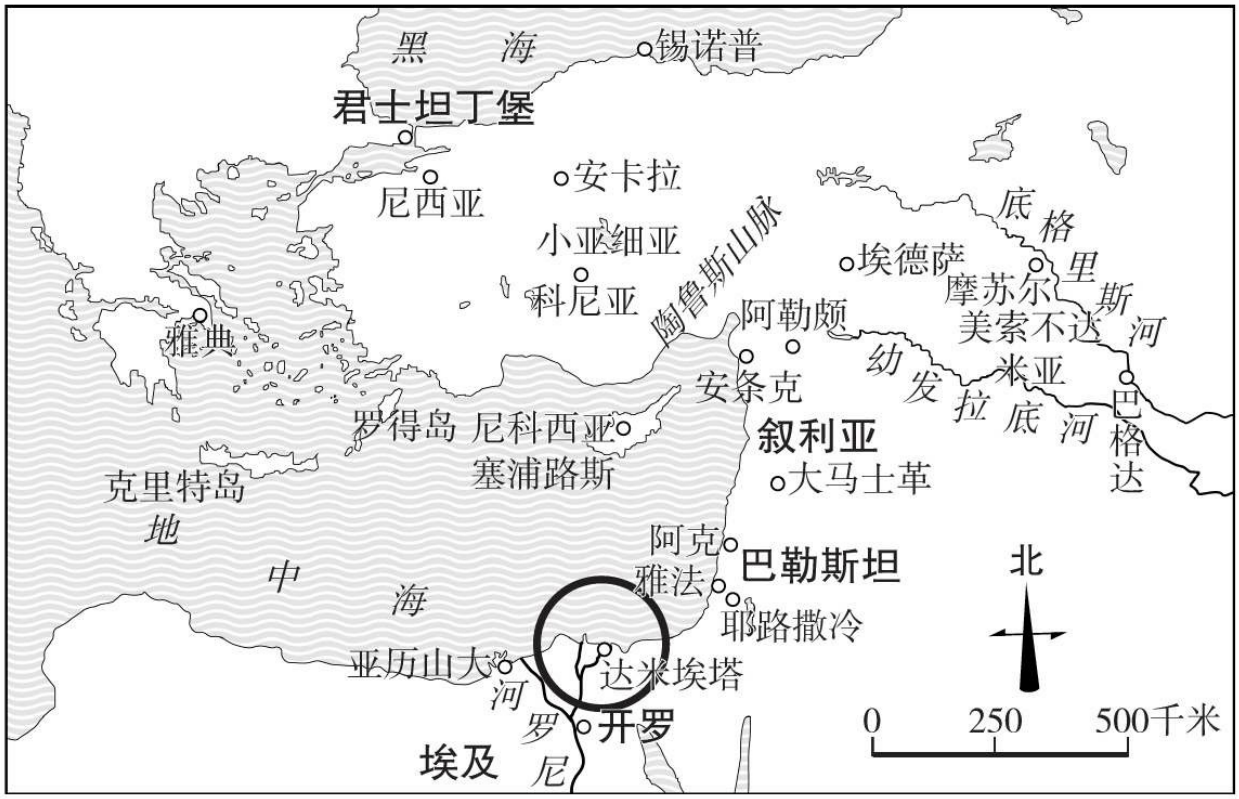




登陆地点达米埃塔之前的攻坚任务简单告一段落。从东方的十字军诸国聚集来的第五次十字军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胜利，因而从欧洲出发的声势浩大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究其原因，达米埃塔面朝地中海，极易方便海上补给。

然而，达米埃塔是埃及的领地，也是穆斯林居住的城市。想要敌方开门投诚显然不可能，因此只能通过屠杀守城的埃及战士达到战略目的。成功攻陷达米埃塔的十字军战士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来到城内残存的教堂里，集体合唱《感恩曲》（Te deum），借此表达对上帝的感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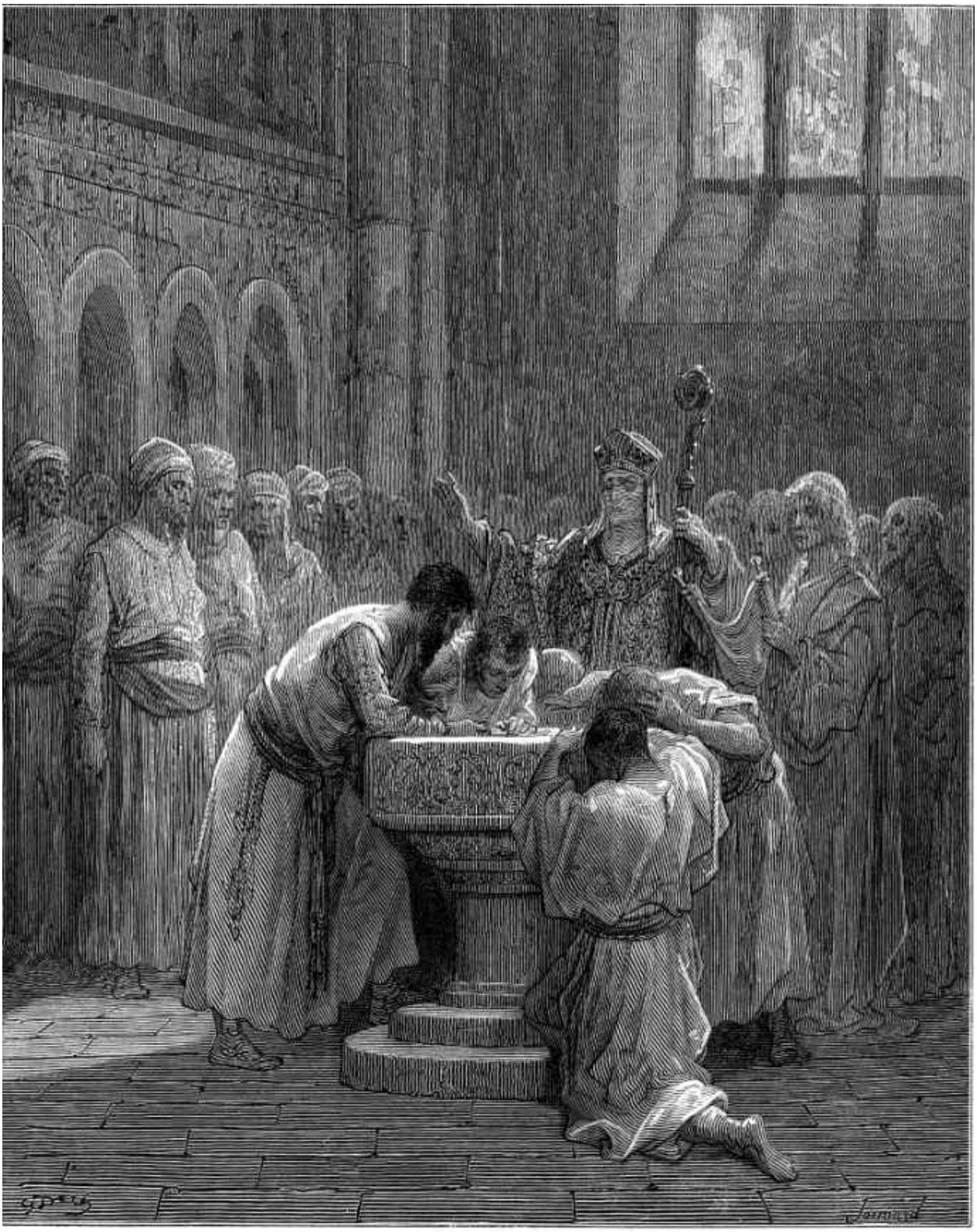
最高司令官被斩首示众，落入敌方的女性们悲愤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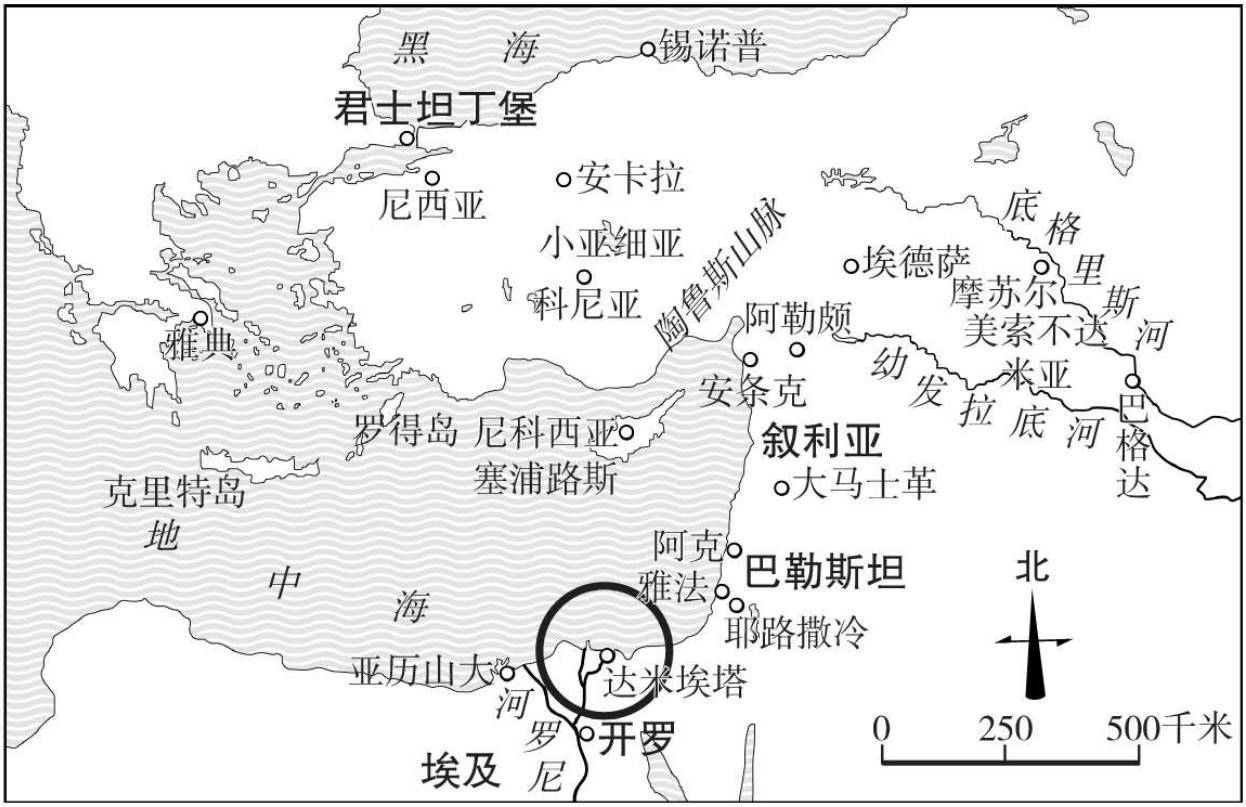


达米埃塔的成功攻陷是以穆斯林血流成河为代价实现的。十字军东征是以杀戮异教徒穆斯林而展开的一场“战争”，中世纪的虔诚的基督徒对此深信不疑。

像这一时期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那样的基督徒直至现在也是少数派。

接受洗礼的穆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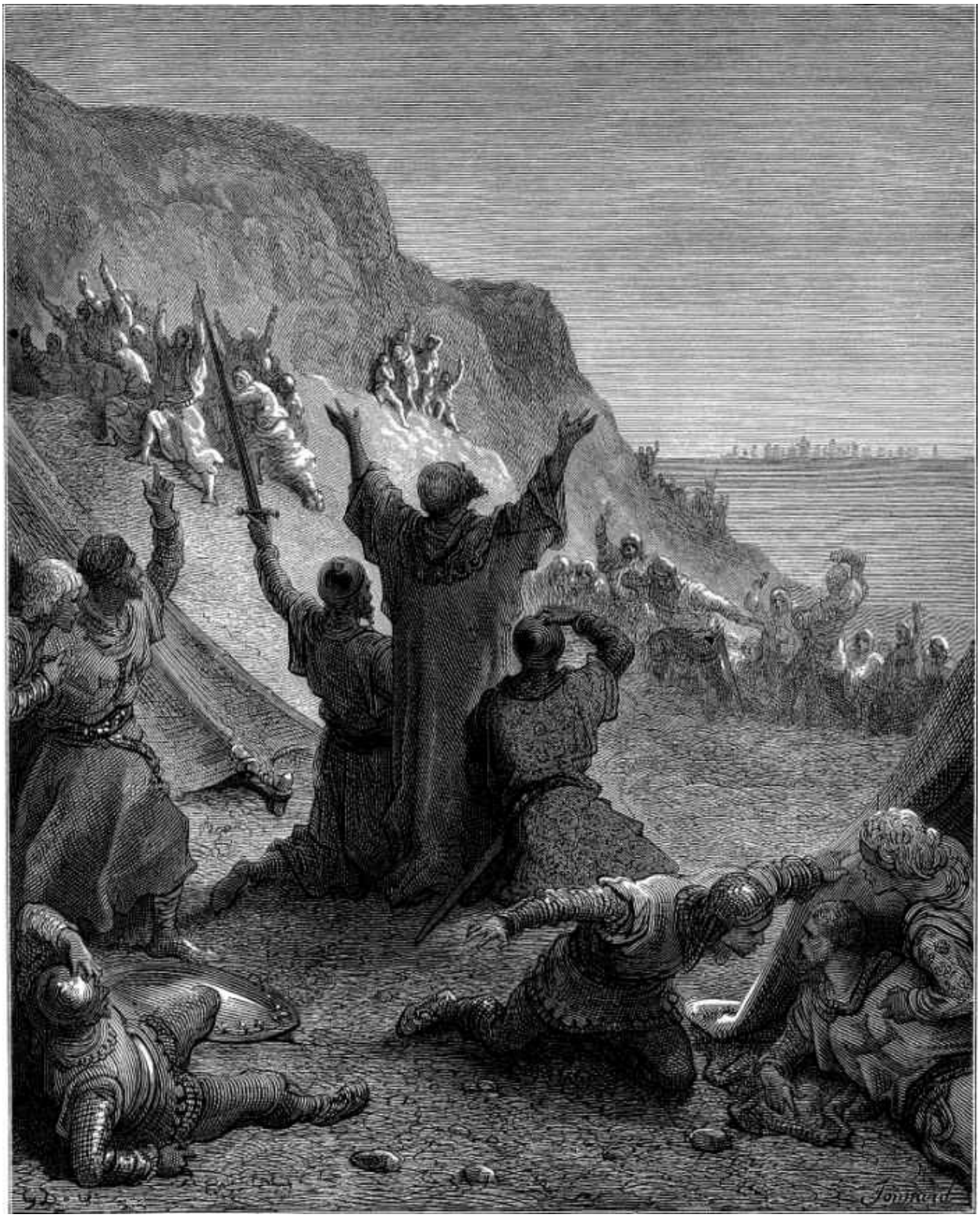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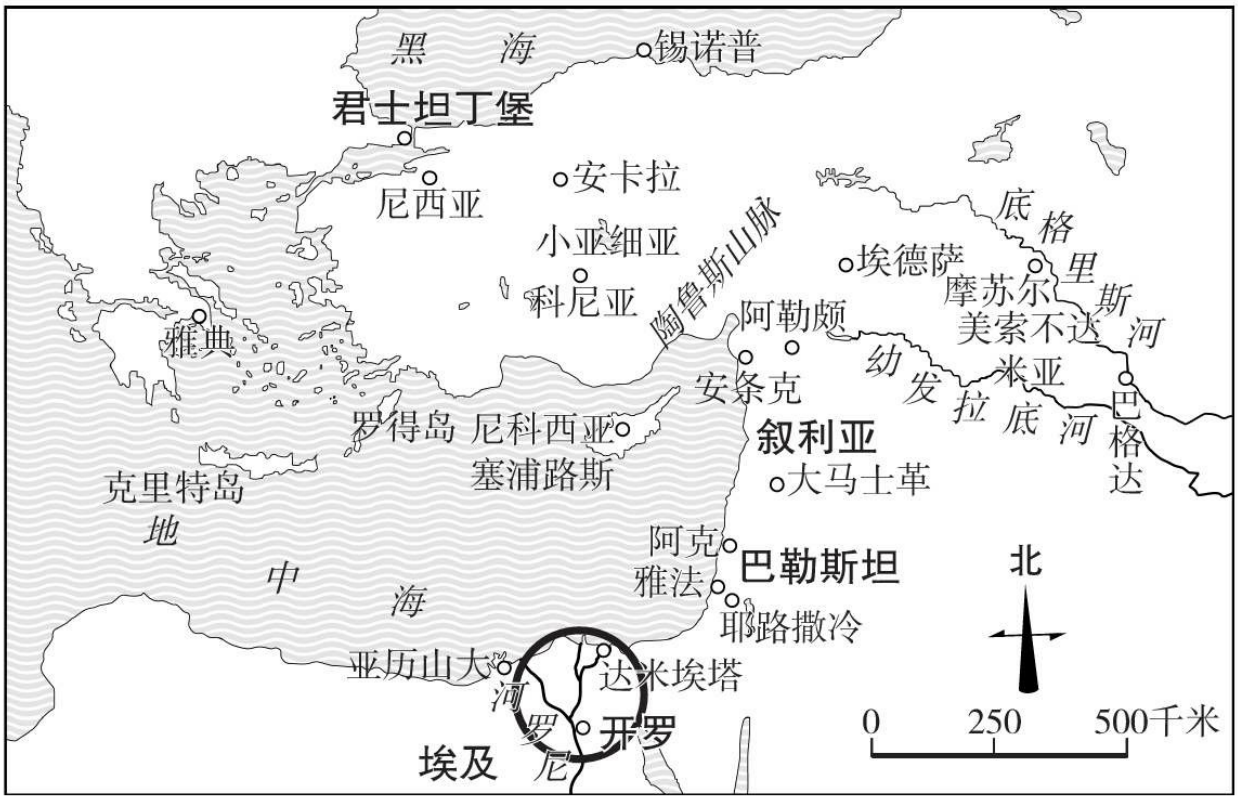


和信奉选民思想的犹太教不同，基督教比较重视对异教徒的传教，因此也格外看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无论是想要从绝望中脱身还是被迫信仰新的宗教，只要是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正确的信仰就会受到欢迎。在攻陷的达米埃塔，和十字军同行的神职人员异常忙碌地为希望加入基督教的穆斯林进行洗礼。

然而，很多研究者表示，纵观十字军200多年的历史，从穆斯林转变为基督徒的人数远不及由基督徒转变为穆斯林的人数多。原因是，基督教一方成为俘虏的人数比伊斯兰一方成为俘虏的人多。

看到前面来救援的船队，十字军战士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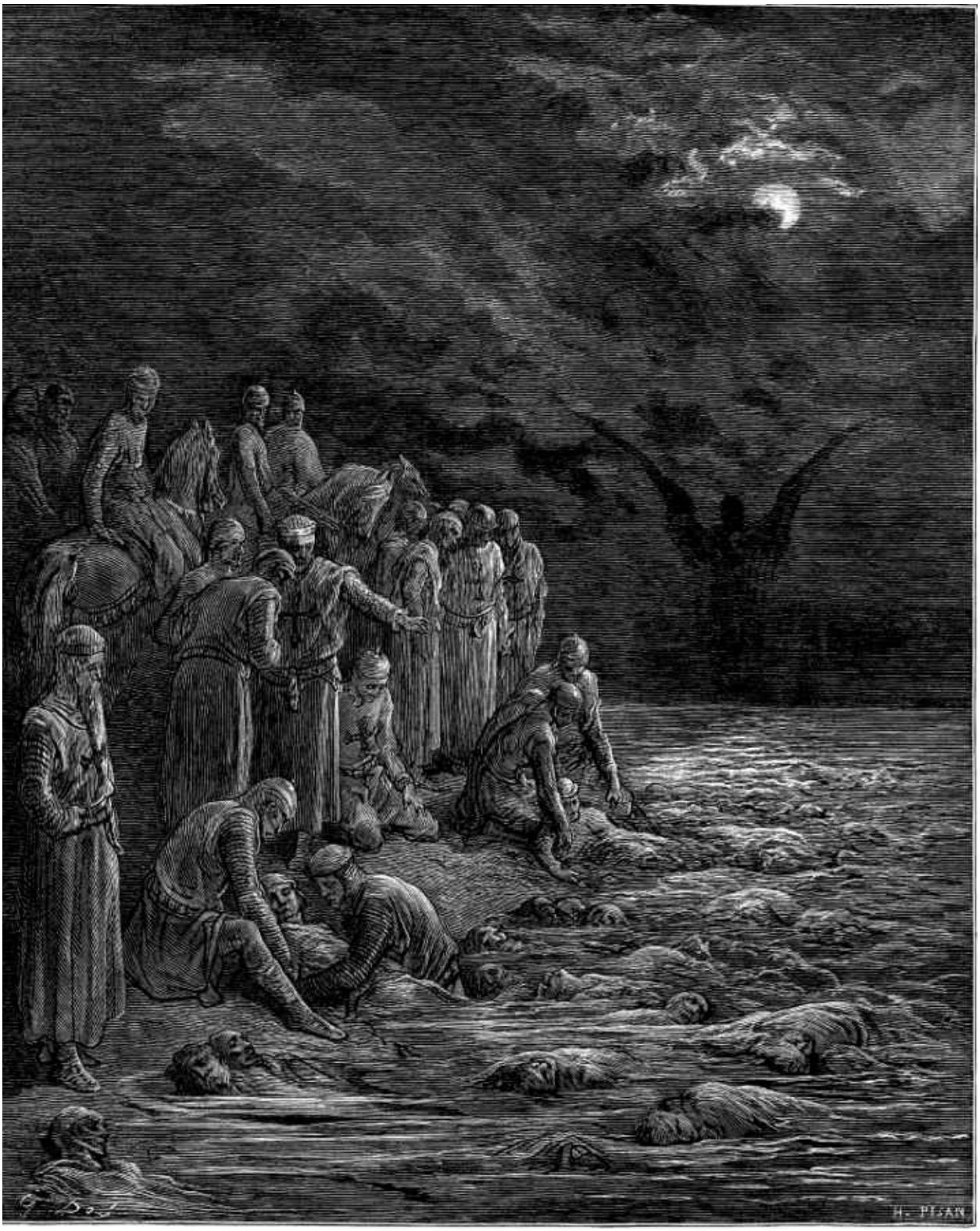
顺利攻陷达米埃塔的第七次十字军朝着开罗方向继续前进，不料麻烦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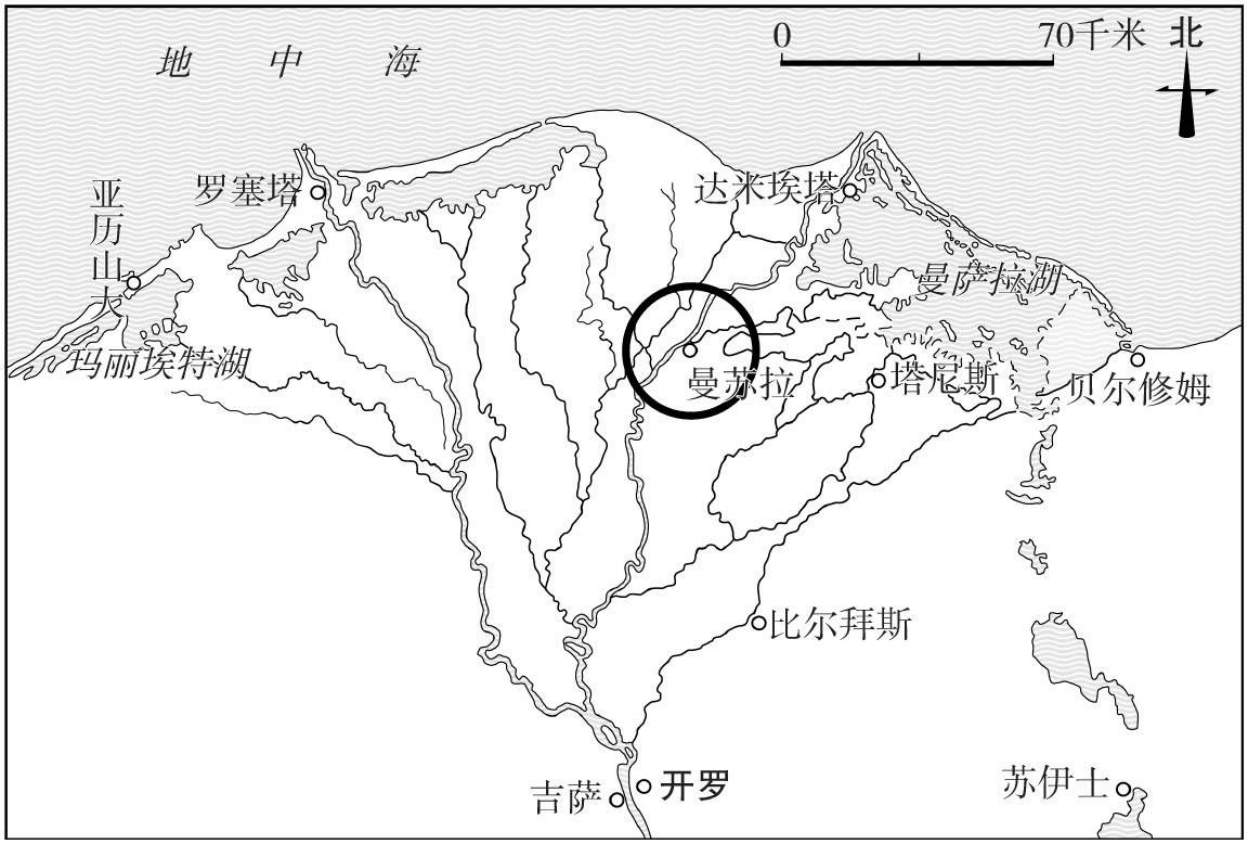
尼罗河并不是一条直接汇入大海的河流，下游地区是一片广阔的三角洲，纵横交错的运河和支流影响着每天的水流变化。昨天还是陆地的区域到了早晨就会变成一片沼泽，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御敌迎击的埃及军队对这一带的地势早已了然于胸，而对于从来不曾见过如此广阔的三角洲的北欧士兵来说，因深陷困境补给中断而命丧于此也是理所当然。

热那亚的船员对尼罗河的情况同样不甚了解，但驾船技术却很高超。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补给，第七次十字军的远征也许很早就会落下帷幕。

十字军在河边打捞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士兵的遗体


H. PI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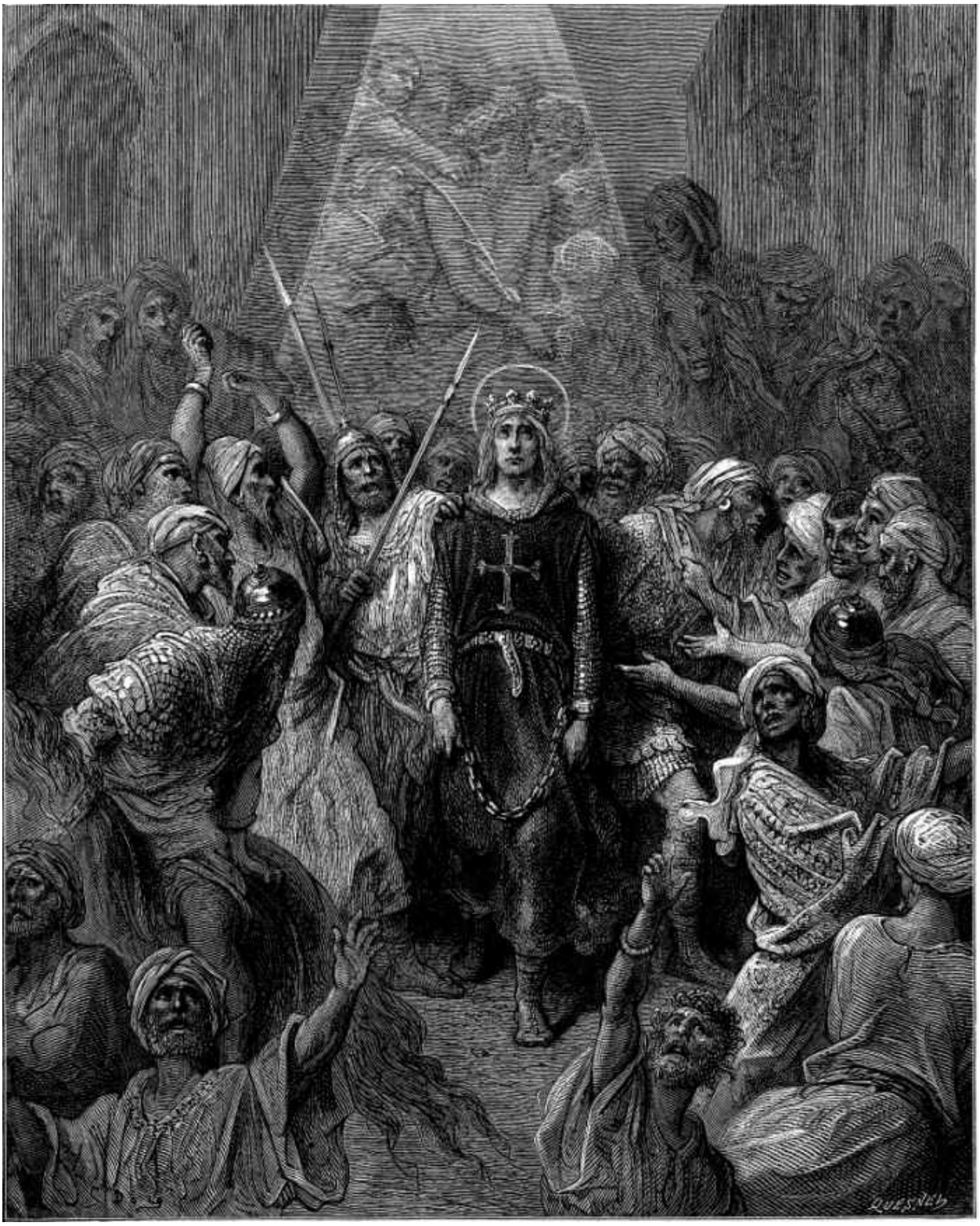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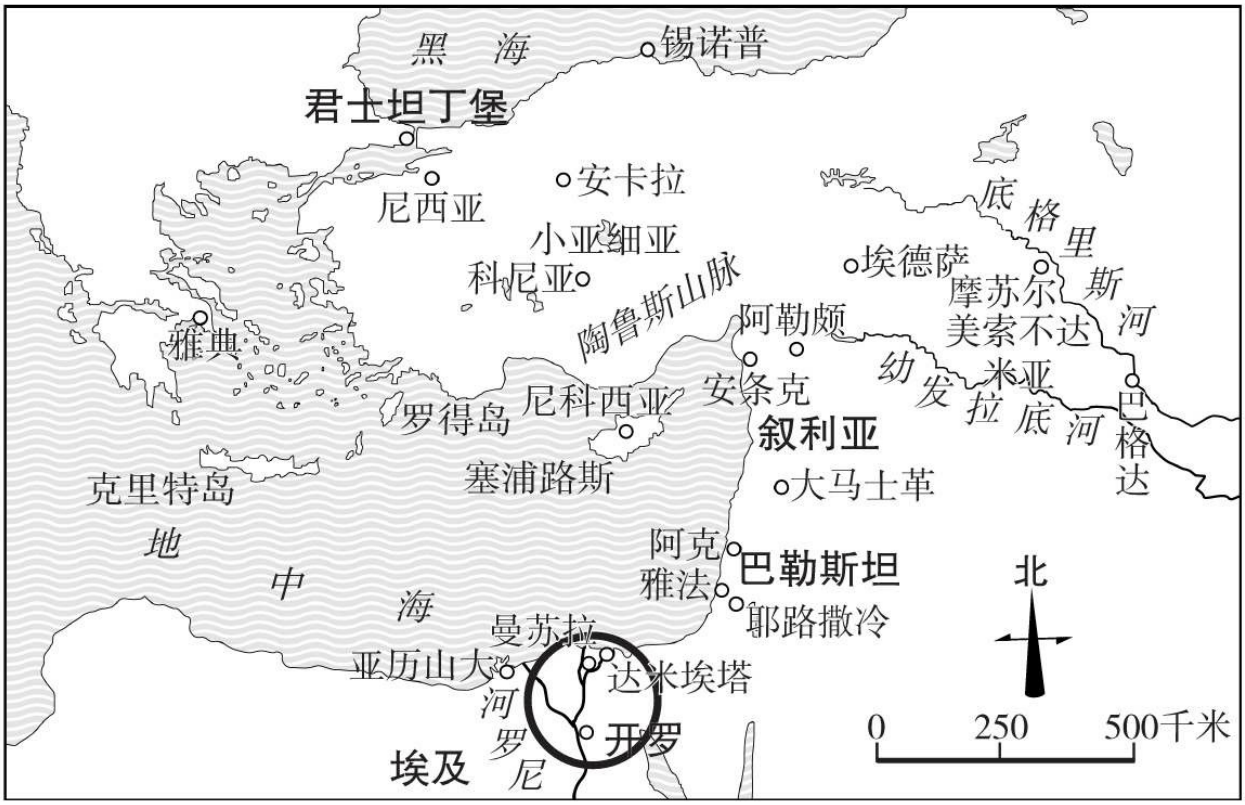
阿尔图瓦伯爵是法国国王路易的弟弟。在参加此次十字军的英国人当中，索尔兹伯里伯爵也是一位地位颇高的贵族。相比法国国王率领的大部队，两位伯爵率领的先行部队在位于达米埃塔和开罗之间的曼苏拉的攻城战中一败涂地，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巷战中被埃及军队和当地居民围追堵截直至全军覆没。

曼苏拉是尼罗河沿岸的城市。获得胜利的穆斯林将阵亡的十字军战士的尸骸全部投入尼罗河之中。

尸骸漂流到下游就被打捞上来，最终以“殉教者”的名义安葬。

法国国王路易被俘


QUES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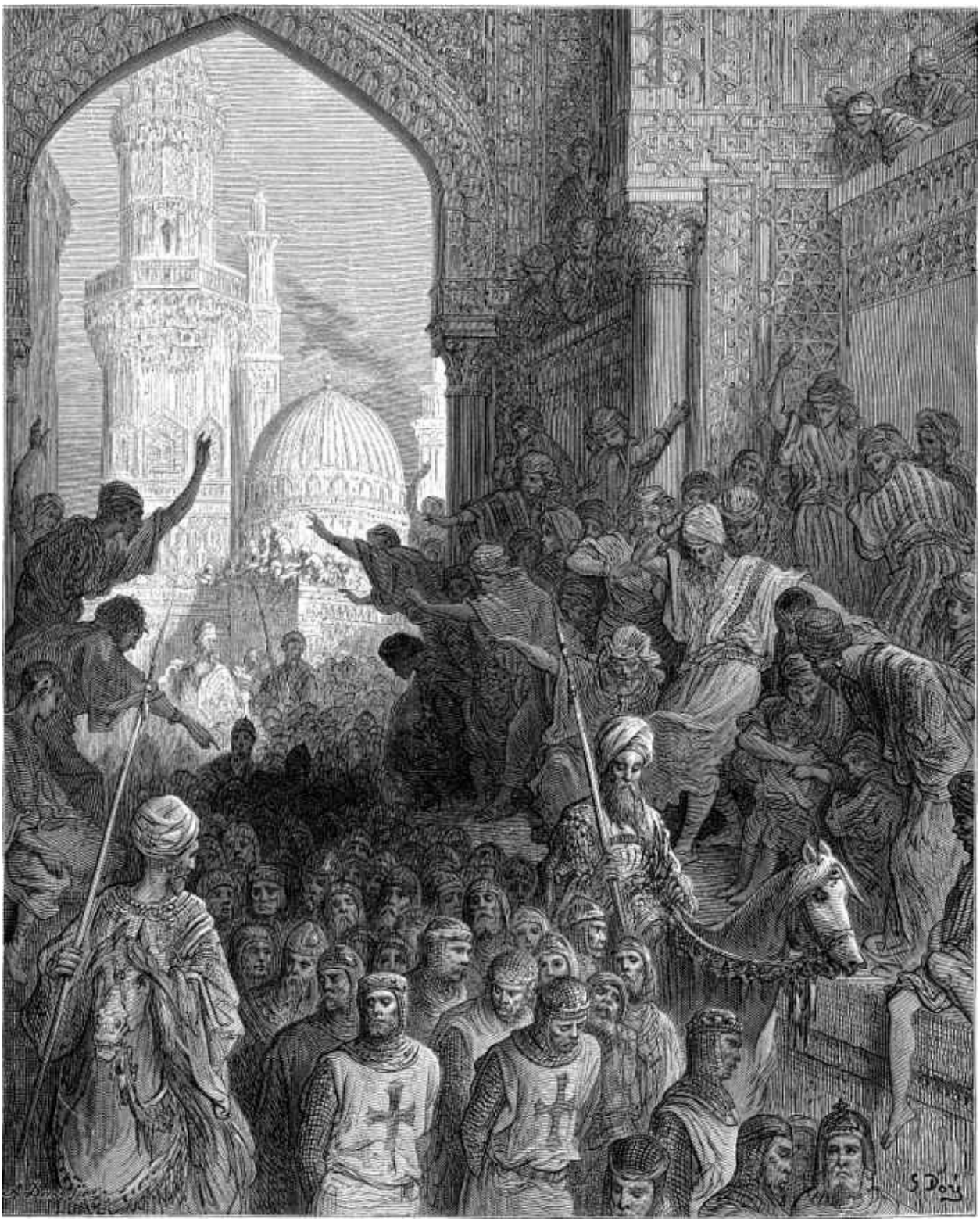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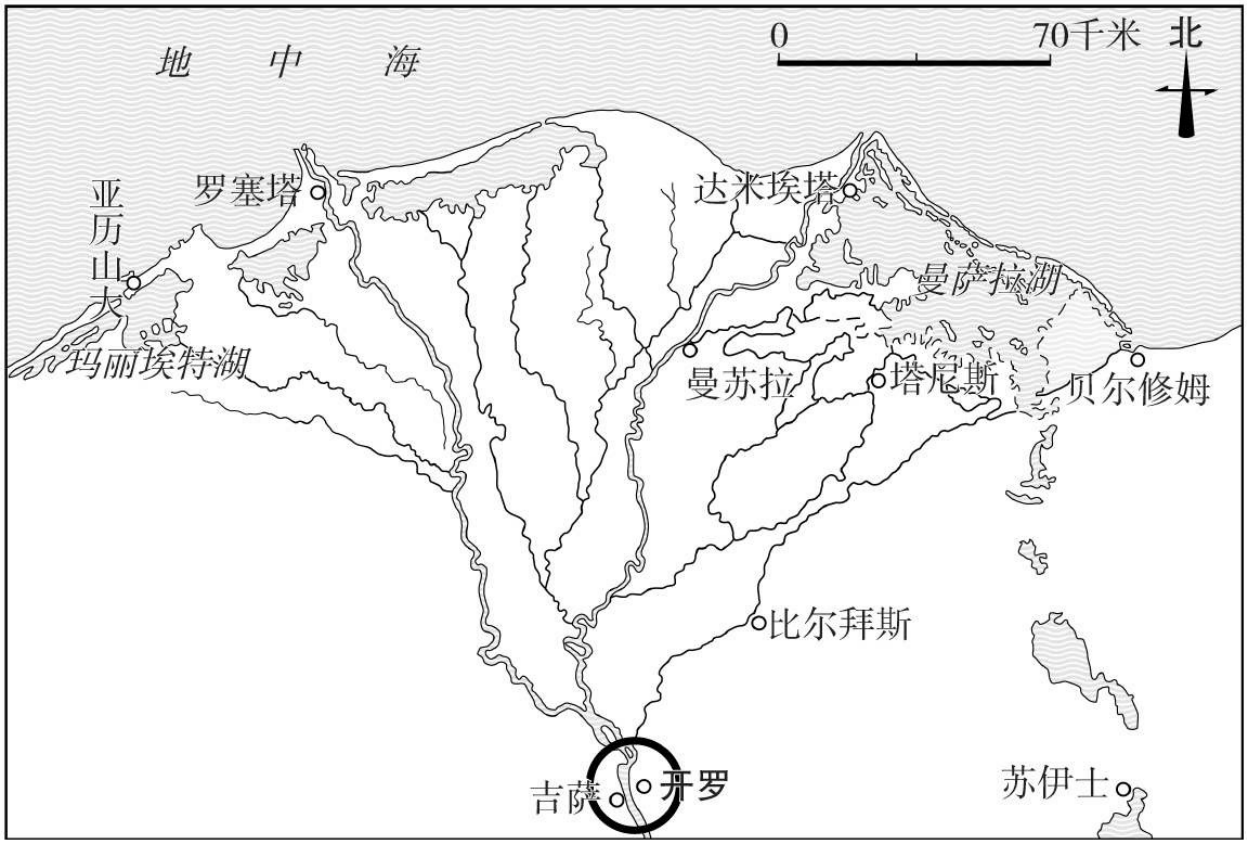
在曼苏拉吃了败仗的第七次十字军放弃进攻开罗，打算原路返回。然而却在撤退的过程中受到敌方攻击，法国国王路易被捕。另外国王的一位弟弟也被敌方俘虏，就连当初以一种无尚荣耀的自豪感加入十字军的众多贵族也落入敌手，十字军一时陷入无人指挥作战的窘境。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国王是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而伊斯兰世界不仅俘虏了法国国王，还俘虏了王室全部成员，如此战绩怎能不让人欣喜若狂。

埃及苏丹将这些位高权重的战俘视为宾客一般安置在总司令的宅邸，并由伊斯兰世界管理女性战俘的宦官（阉人）负责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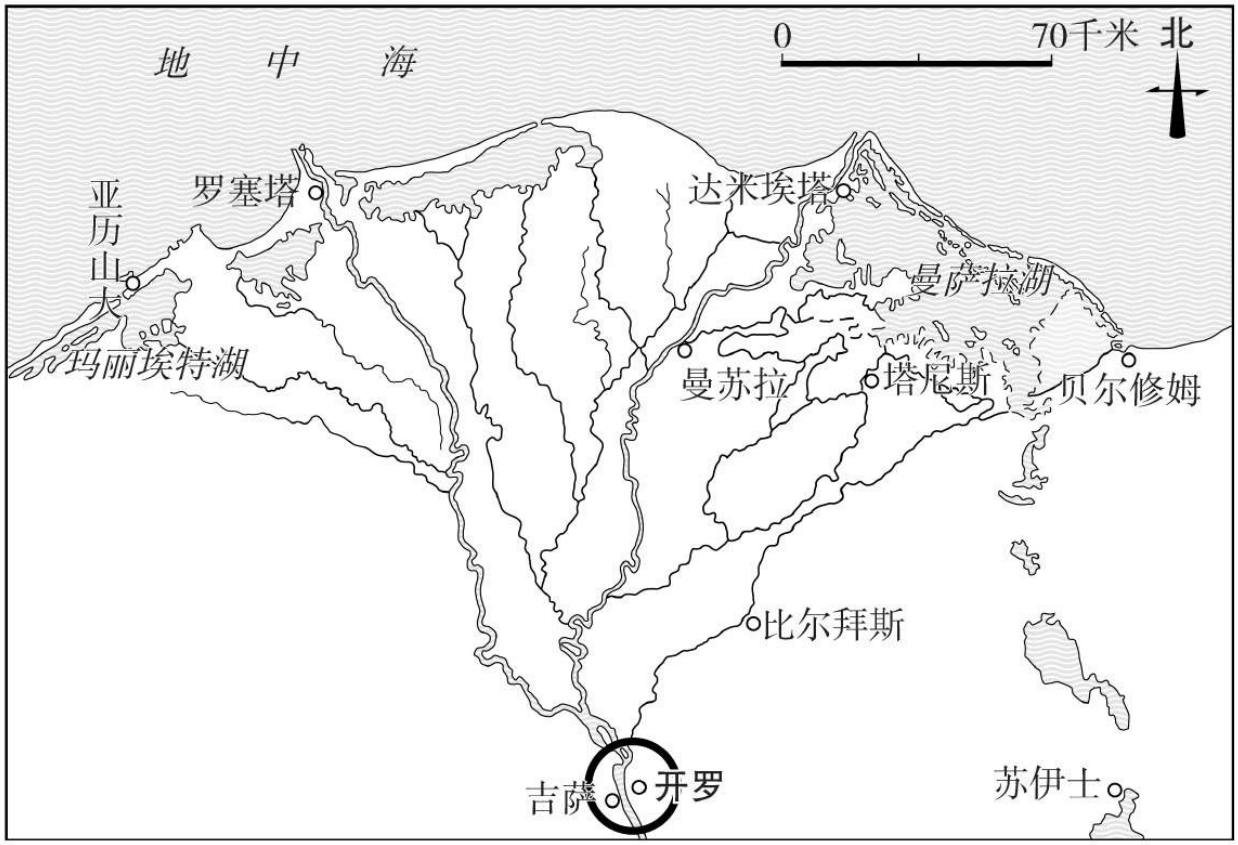
被押送至埃及的十字军战士





从军事角度来看，在敌人眼皮底下撤退本就不是一件易事。而第七次十字军中负责指挥作战的人都已经沦为敌方的俘虏，其部下的骑士们几乎尽数被俘。由于战俘人数众多，在激战中遭到毁坏的曼苏拉无法收容如此庞大的战俘群，只能将他们押送到开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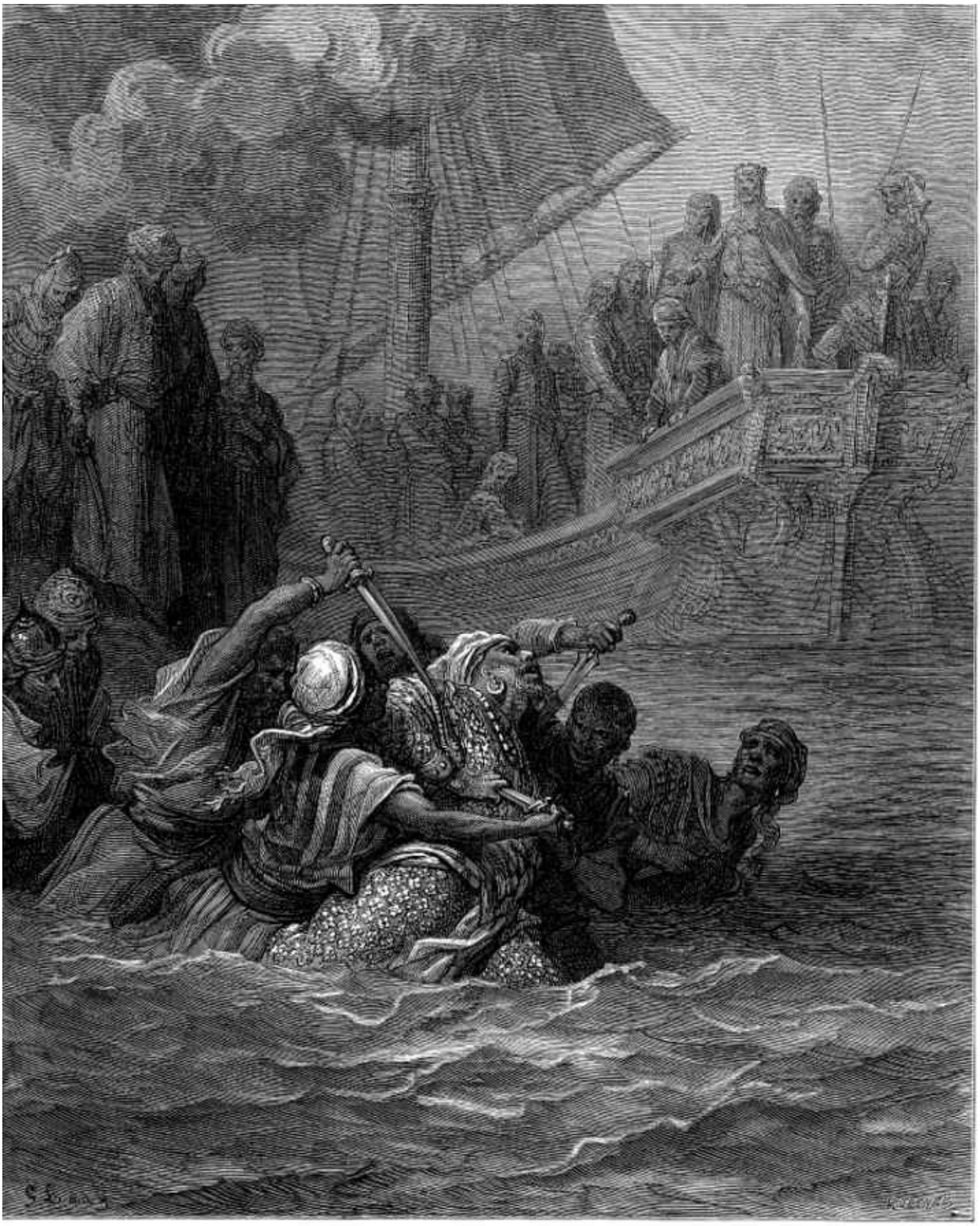
在埃及过着牢狱生活的骑士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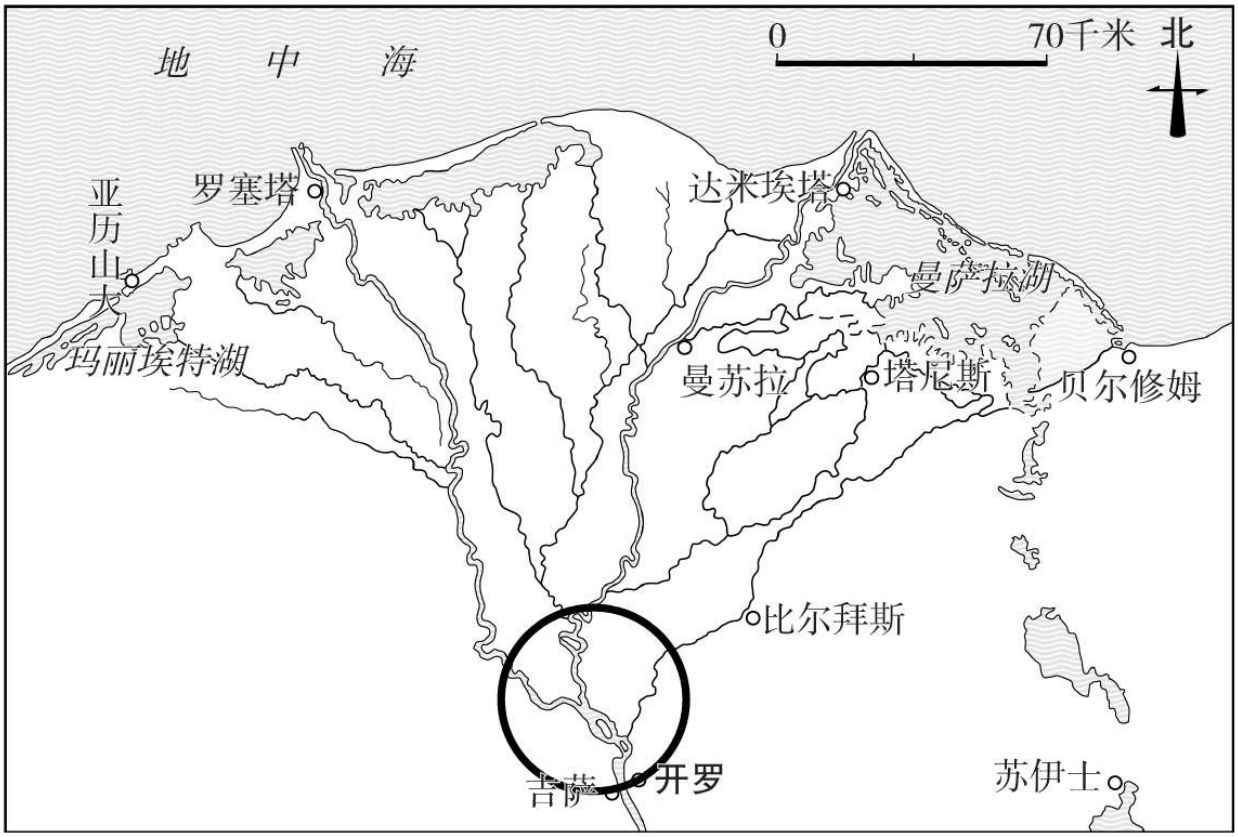


国王、国王的弟弟以及宫廷高官虽然沦为阶下囚，但还是被关押在与其身份相配的地方。其他俘虏则被关押在能够容纳他们的地方，毕竟人数达两万之多。

与十字军同行的神职人员在被俘之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斗之前鼓舞士气，向阵亡的战士传达上帝的宽恕。如今沦为敌方俘虏，他们所做的就是抚慰战士内心的焦灼与不安。

苏丹摩尔达姆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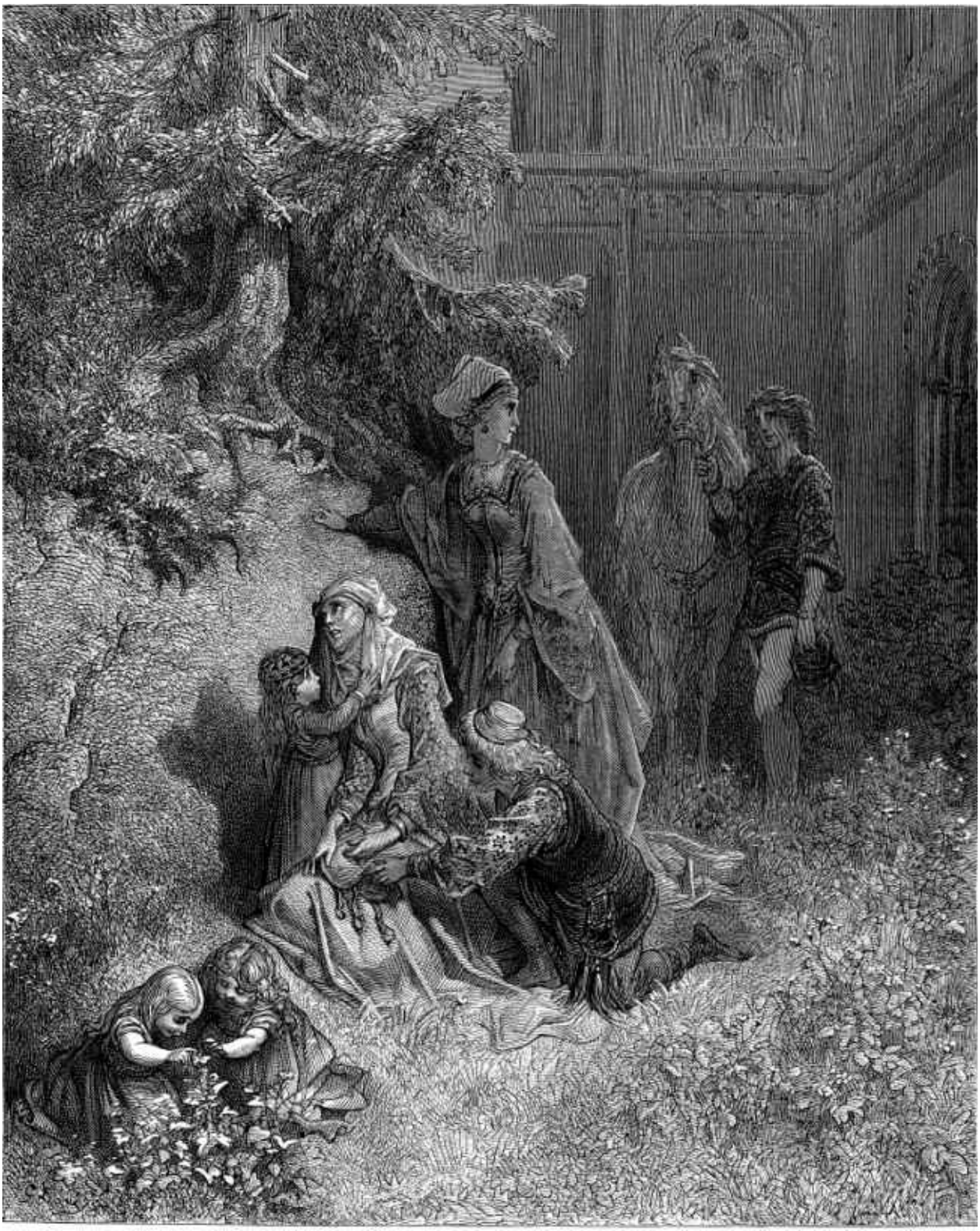


在和宗教毫无瓜葛的社会，失败可以引发内部关系决裂，而成功之后内部关系决裂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一时期的埃及正处于后者所引发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形势变动对于第七次十字军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倘若可以支付巨额赎金，国王、国王弟弟还有诸侯就可以被释放。此外，国王还在此基础上额外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为其他俘虏调集并交付赎金。

俘虏们乘坐前来迎接的热那亚船只即将离开时，杀害了敌方负责交涉的苏丹。为了避免招惹麻烦，热那亚的船员自然迅速地扬帆起航。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无法把握胜利，在这一点上穆斯林和基督徒有着相似之处。

噩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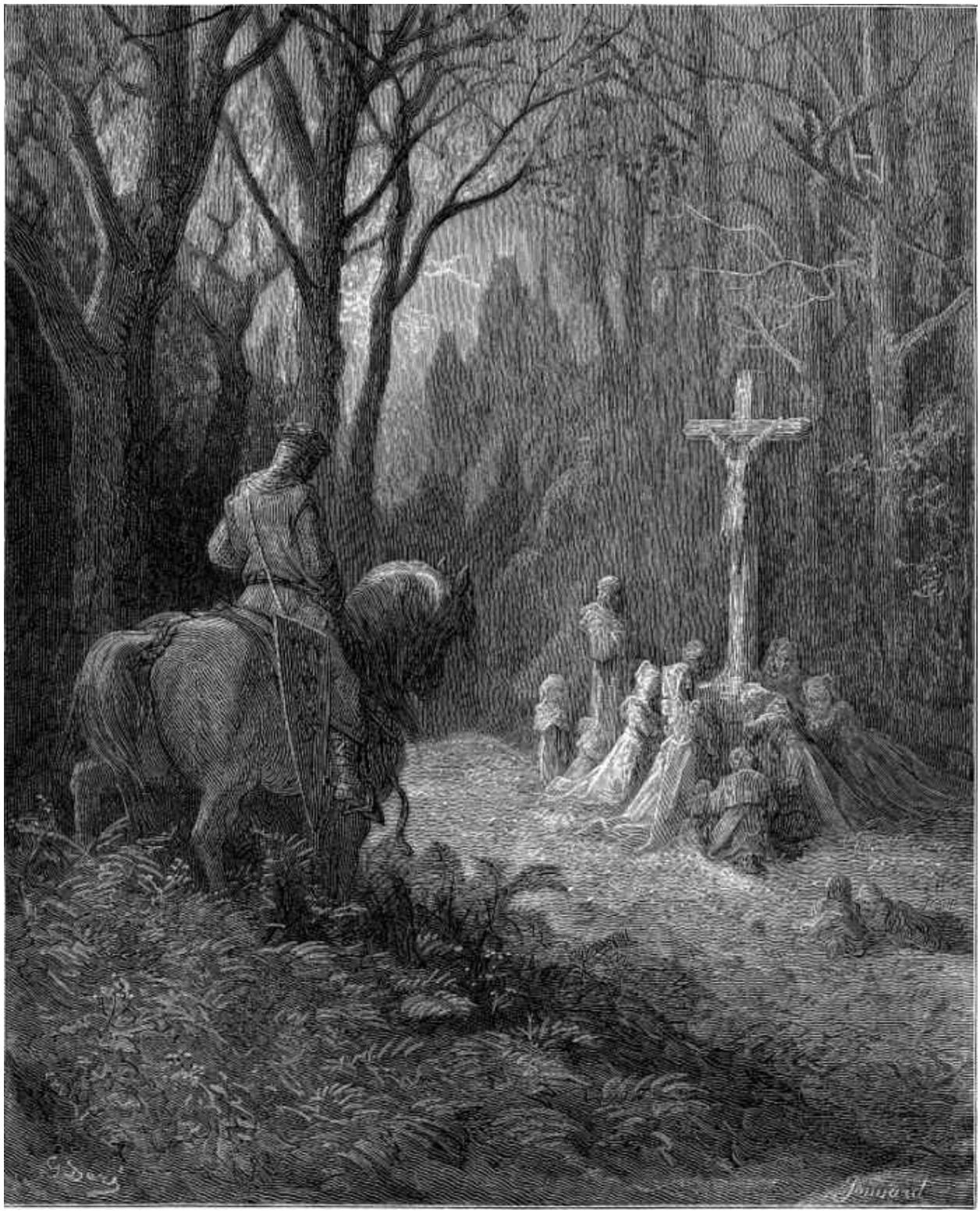


关于第七次十字军惨败的消息最初是由几个随从传回法国的。身为骑士的主人被俘后，几位随从便失去立身之所，当他们乘坐热那亚船只返回法国后，立即向主人的家人传达了第七次十字军惨败的噩耗。

他们郑重而又准确地告诉人们，第七次十字军的战士全员被俘。

就这样，第七次十字军的远征情况自下而上在欧洲境内传播开来。

归来的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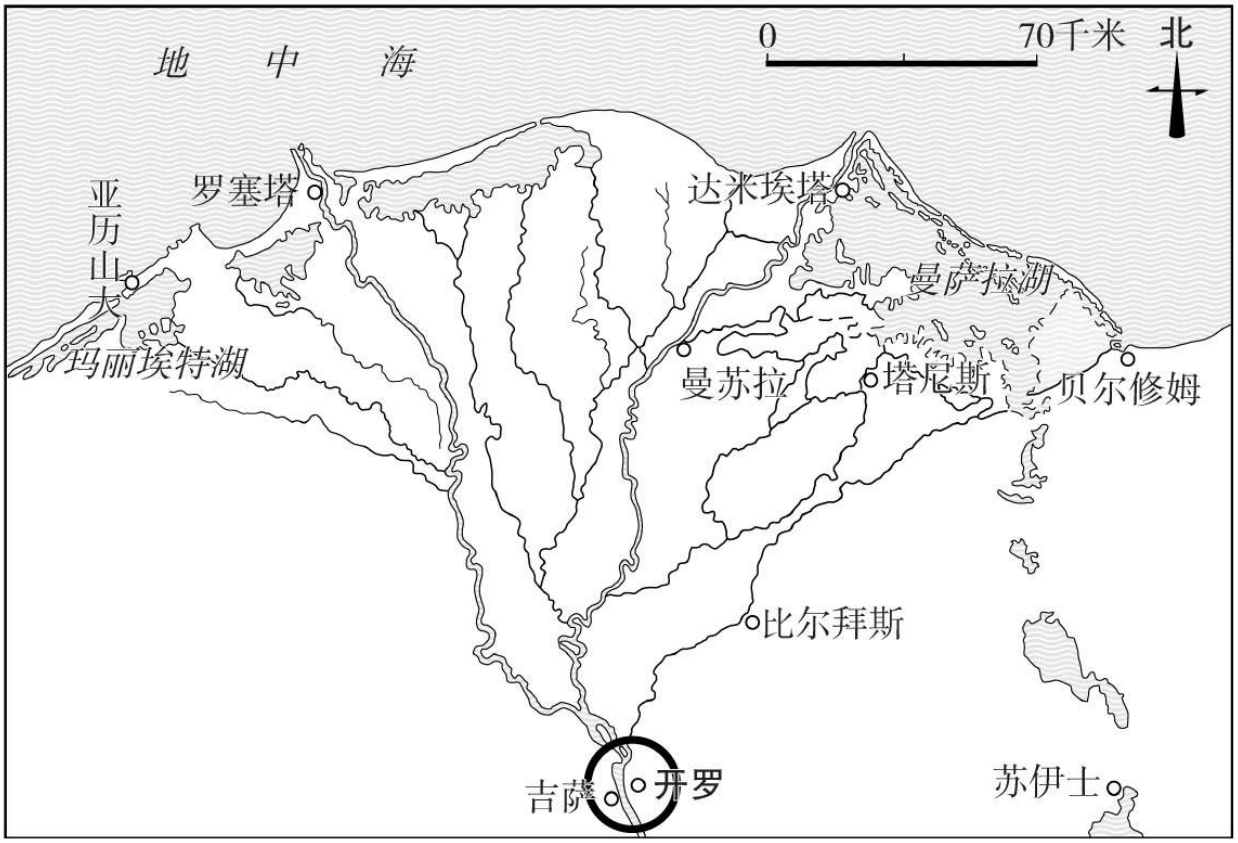


不久之后逃过逮捕的骑士们纷纷回国，随后安茹伯爵和其他诸侯陆续回国。

随着他们的陆续回国，第七次十字军以惨败告终的真相很快传遍了整个西欧。

由于赎金还未全部交付，虽然已经恢复了自由但此时国王并没有返回法国。路易九世对战争策略不甚了解却有着高尚的品格，他表示如果不能看着部下恢复自由他是绝不会离开巴勒斯坦的。

女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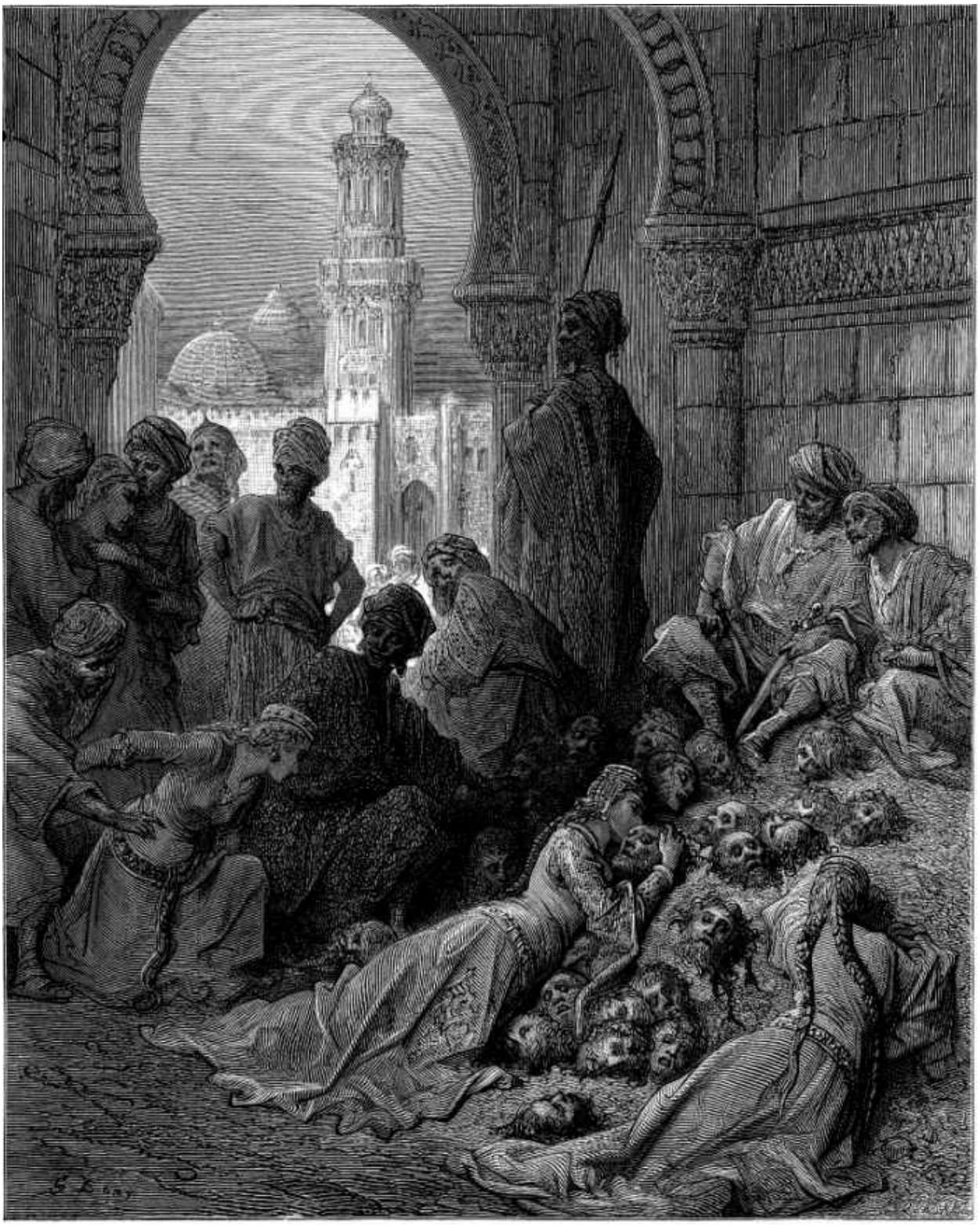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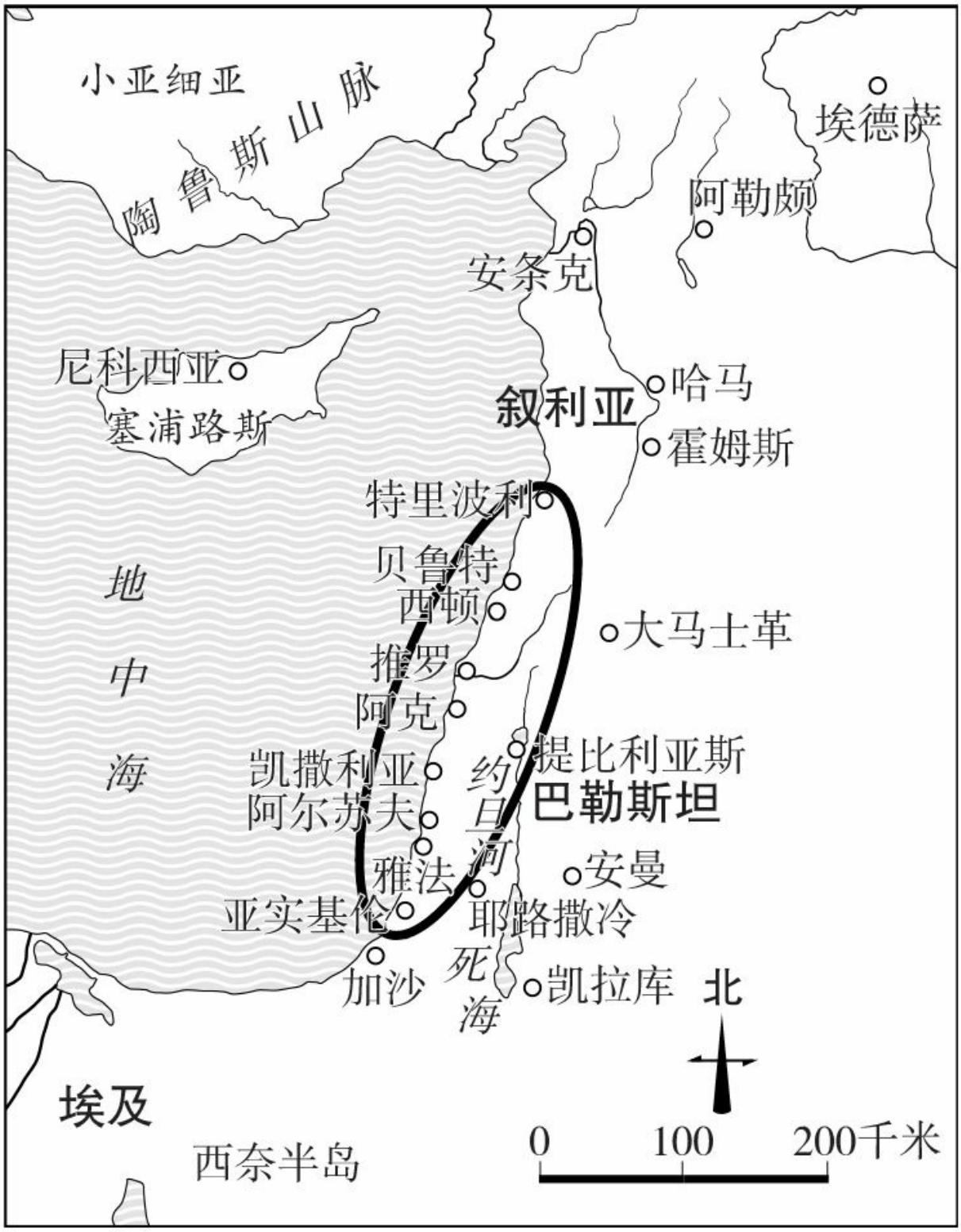
第七次十字军的惨败让西欧大为震惊，这一事件也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护城墙上看到敌人就会战栗不止。

好在埃及境内的继承者之争可以让基督徒们暂且放松一阵。在伊斯兰世界女性地位较低，但这一时期的埃及极为混乱，女性俘虏竟然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苏丹。

虽然这一时期的混乱是日渐衰弱的国家的致命伤，但是作为战胜国这也是一个孕育新生力量的机会。中近东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支配权由萨拉丁创立的阿尤布王朝移交给马木路克王朝。马木路克王朝是由奴隶出身的军人创立的，所以又称“奴隶王朝”。

马木路克王朝苏丹的暴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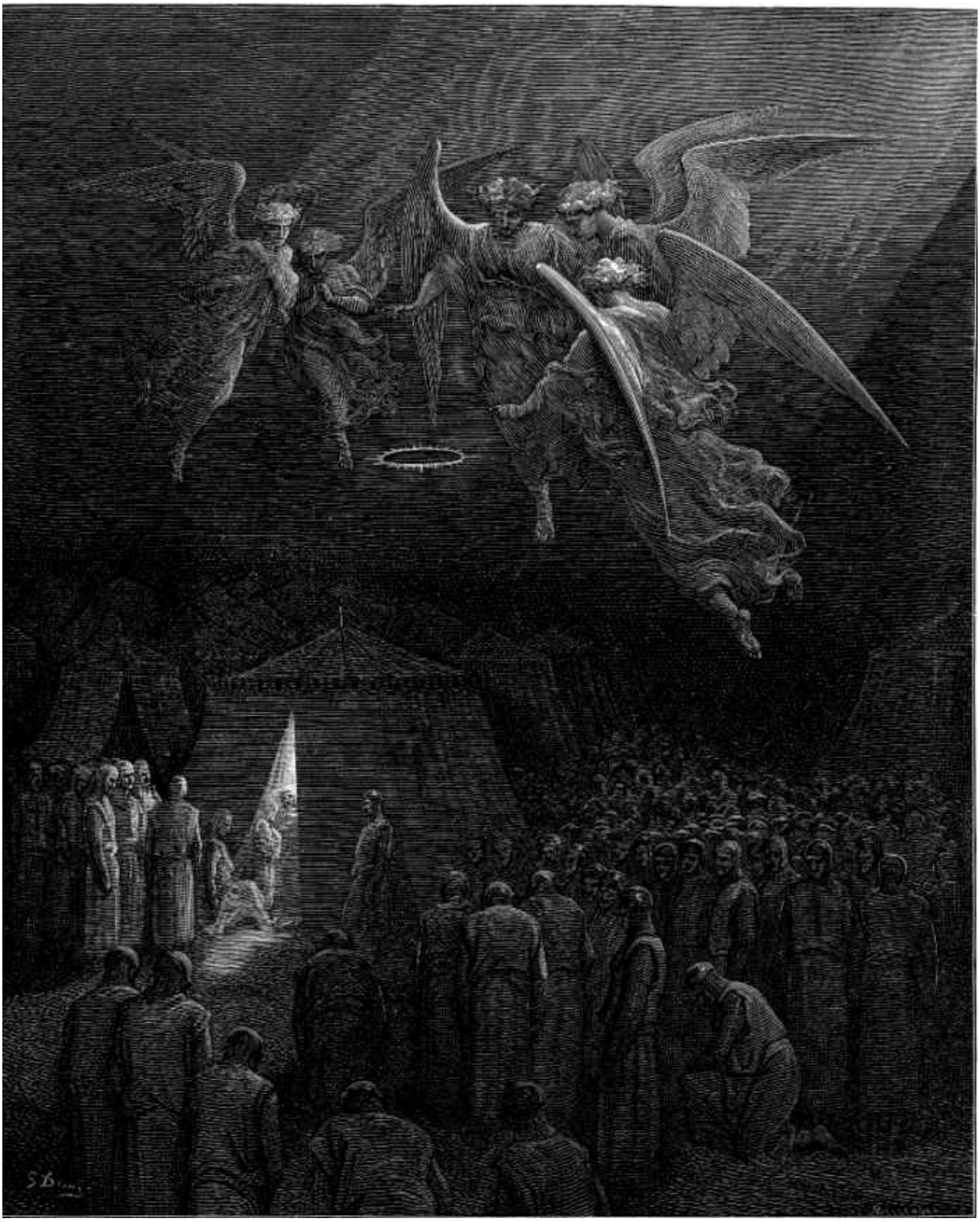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遵守着只要投降就可活命的约定，然而马木路克

王朝的苏丹并没有遵守这一约定。说起来，狮心王理查才是创造先例的人。

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之所以会对地中海沿岸的十字军城市采用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由于第七次十字军的惨败，西欧援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

在这种形势下，基督徒们历经200多年建立起来的城市、要塞、农田都划归到伊斯兰势力之下。但是，在伊斯兰一方看来这只不过是把失去的土地收复而已。

“圣路易”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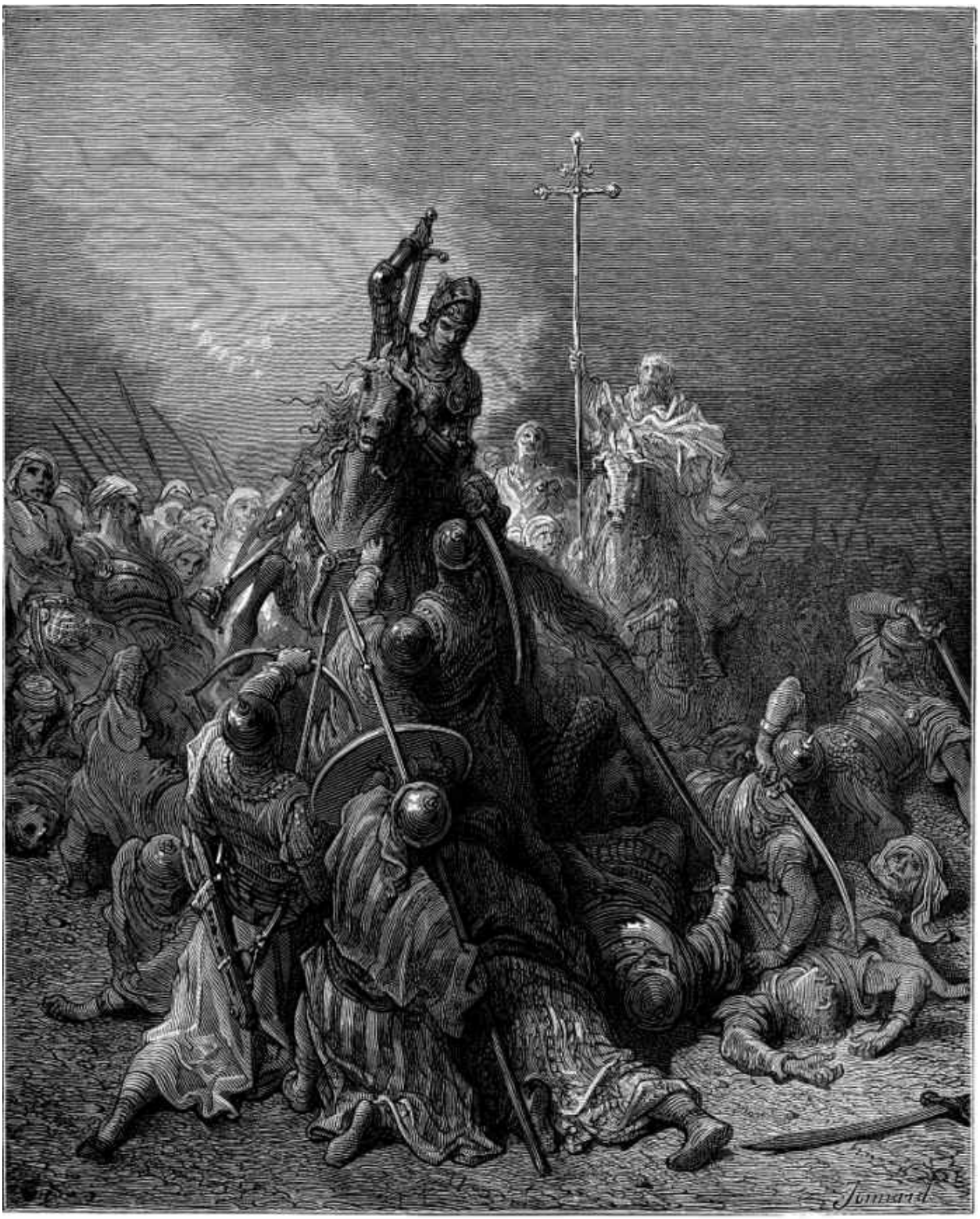
从东方传来的关于巴勒斯坦圣城困境的消息让信心满满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决定再一次率领十字军东征。于是就出现了第八次十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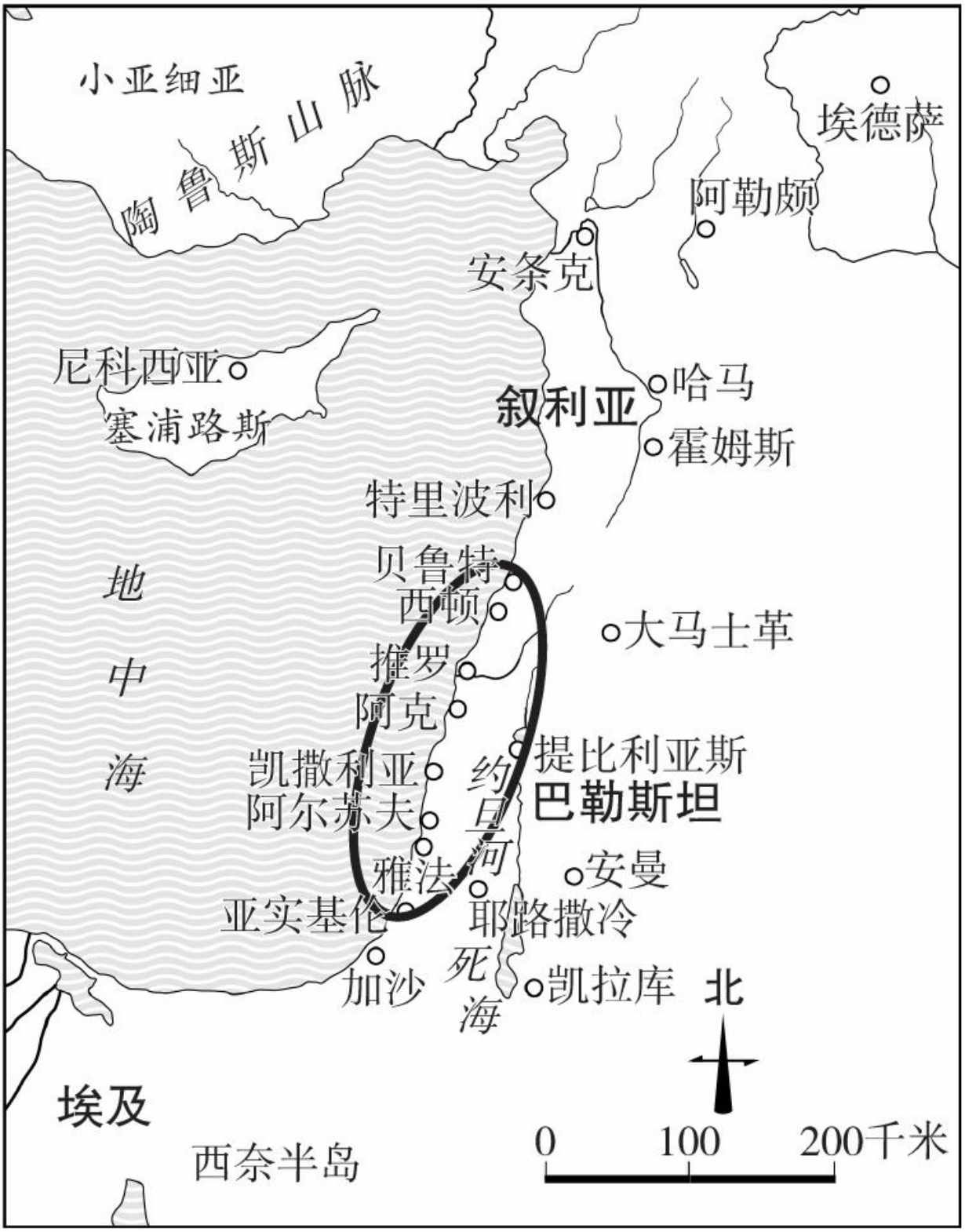
登陆地点定在突尼斯。在击败了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后，十字军确立了通过陆路前往埃及的目标。第八次十字军依然由法国国王率领，西欧各地的贵族纷纷响应，此次的军队阵容丝毫不输第七次。出发地和上次相同，仍然是法国南部的艾格莫尔特。当然，第八次十字军的远征获得了罗马教皇的许可。

但是，由于登陆后不久国王就与世长辞，路易九世的弟弟便和突尼斯最高指挥官缔结条约，十字军一方主动撤退，第八次十字军就这样草草收场。这也是西欧势力最后一次以十字军形式进攻伊斯兰世界。

随后，路易九世被纳入圣人之列，称作“圣路易”。

绝地反击的人们


Jonnard



第八次十字军以失败告终，西欧的援军短时间内无法到达，而巴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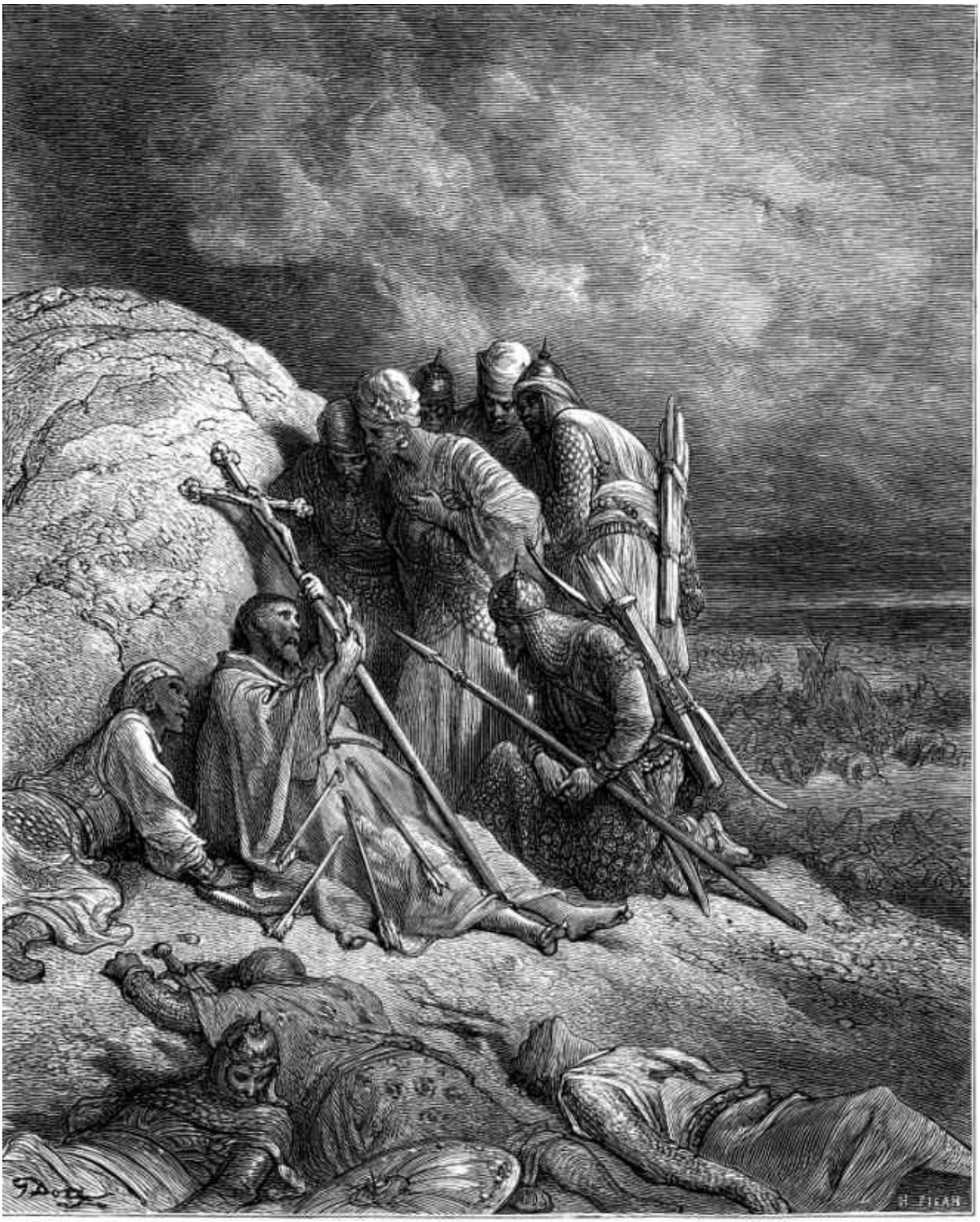
斯坦一带的十字军势力却没有放弃战斗。或许应该说他们处于一种想放弃却又无法放弃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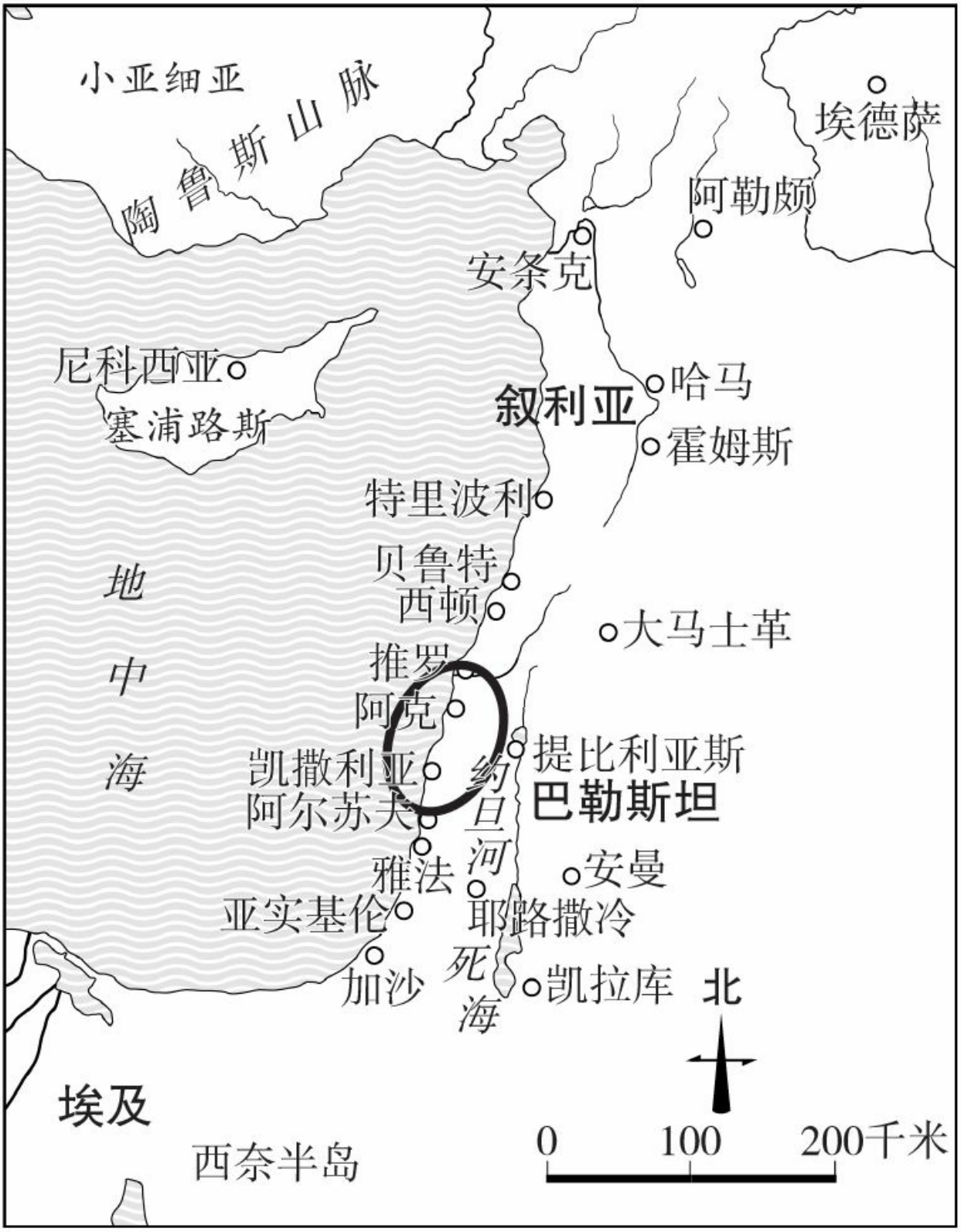
这些人或者跟随十字军或者以朝圣之名来到这里并且定居下来，经过200多年这里的土地早已成为他们自己的土地，如果离开这里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同时也将无国可归。

此外，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而创建的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以及条顿骑士团这三大宗教骑士团的团员如果返回西欧，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面对马木路克王朝伊斯兰军队的猛烈攻击，这些基督徒们发起了绝地反击。

留在战场上的神职人员


G. Doré
H. Fisar



虽然西欧的王侯们选择放弃，但是正因为是十字军发起者，所以基

督教会依然留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身边。

说起来，耶路撒冷已经不在伊斯兰的控制之下。耶路撒冷的牧者也长期驻扎在唯一留有基督教教会的阿克，所谓的牧者也只剩下虚名而已。但凡和伊斯兰一方进行战斗修士必定同行，但仍以失败告终。穆斯林宣称“要把基督徒一个不剩地全部扔进地中海里”，这样的豪言壮语逐渐变为现实。

被遗弃在异教地区的圣墓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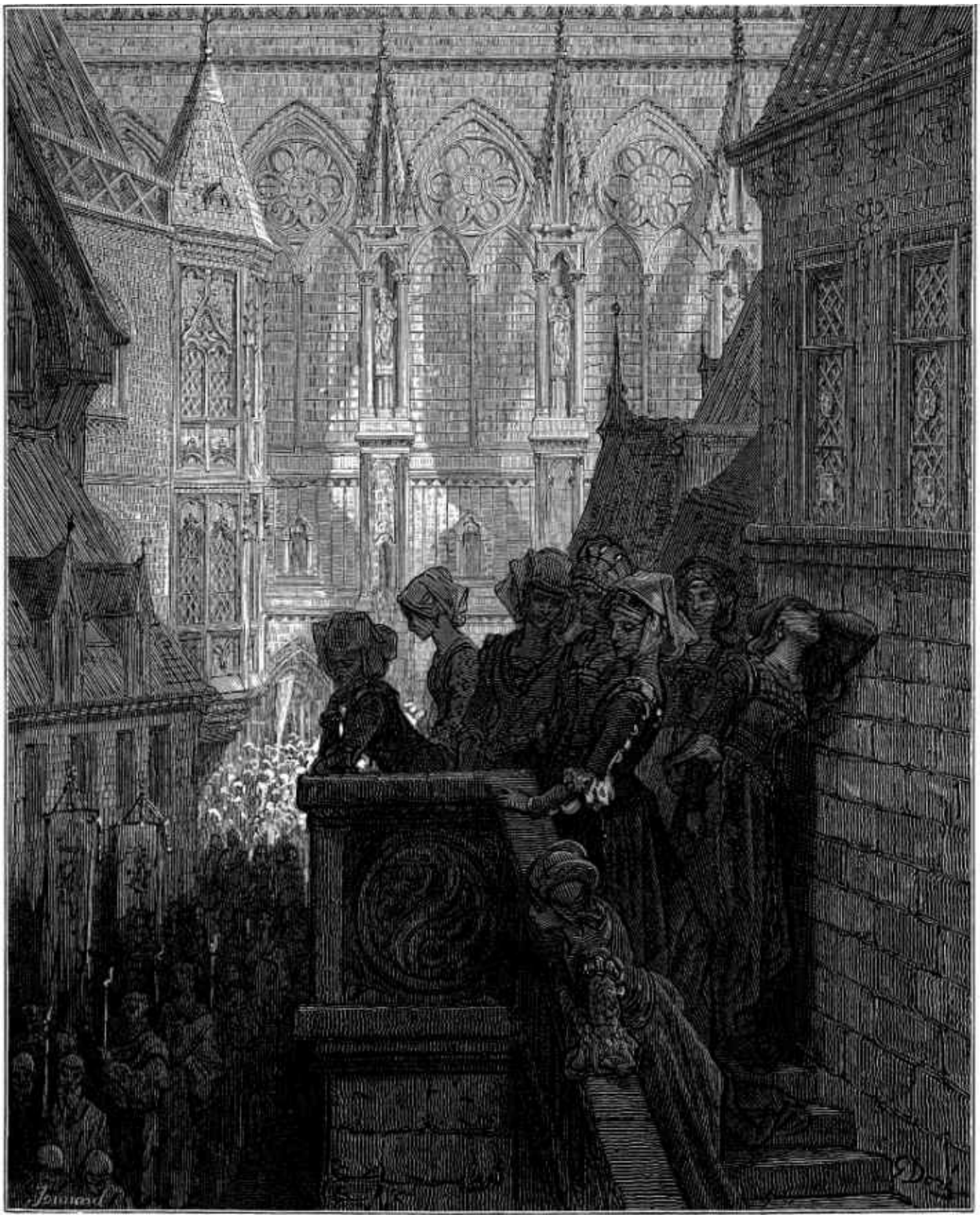
公元1291年，十字军东征终于落下帷幕。东方的基督徒最后的安身

之所阿克也在猛烈的攻势下落入敌方之手。此时距离第一次十字军已经过去了200年。

古斯塔夫·多雷没有描绘阿克城沦陷时的凄惨情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种深刻的哀痛是无法忘却的。

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离去后保留下来的圣墓教堂建立在基督墓之上，在基督徒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圣地。关于这一段历史，多雷只描绘了圣墓教堂的情景。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想法一定会引起大多数基督徒的共鸣。

追念亡者



此时距离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已经过去了200年，在曲折中求生存的十字军国家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欧洲人必定会因此感到悲痛。

站在信心满满的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倘若追逐耶稣足迹的朝圣之旅难以成行，那么就无法获得朝圣所带来的免罪。由此产生的悲痛和恐惧让他们不得自由。

罗马教廷迫切需要对策来解决眼下的恐慌。于是决定，无论是去罗马朝圣还是去耶路撒冷朝圣都会获得上帝的宽恕。

这就是延续至现代的“圣年”的开端，所谓“圣年”是指前往罗马朝圣的人数激增的年份。

十字军国家在1291年灭亡，最初的“圣年”是1300年。

聆听归乡老兵讲述故事的孩子们

东方的十字军国家灭亡之后，向西欧人讲述往日荣光和悲惨的就只有苍老的十字军士兵了，那些故事里饱含着他们对过往的追忆。

遗憾的是聆听这些故事的除了女人就是孩子，其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逐渐淡漠。

旅行家萨努德将东方地图赠予教皇

G Doré
Pannard

这位若望二十二世是14世纪前半叶的一位教皇。十字军国家灭亡后不久，基督徒始终无法放弃返回东方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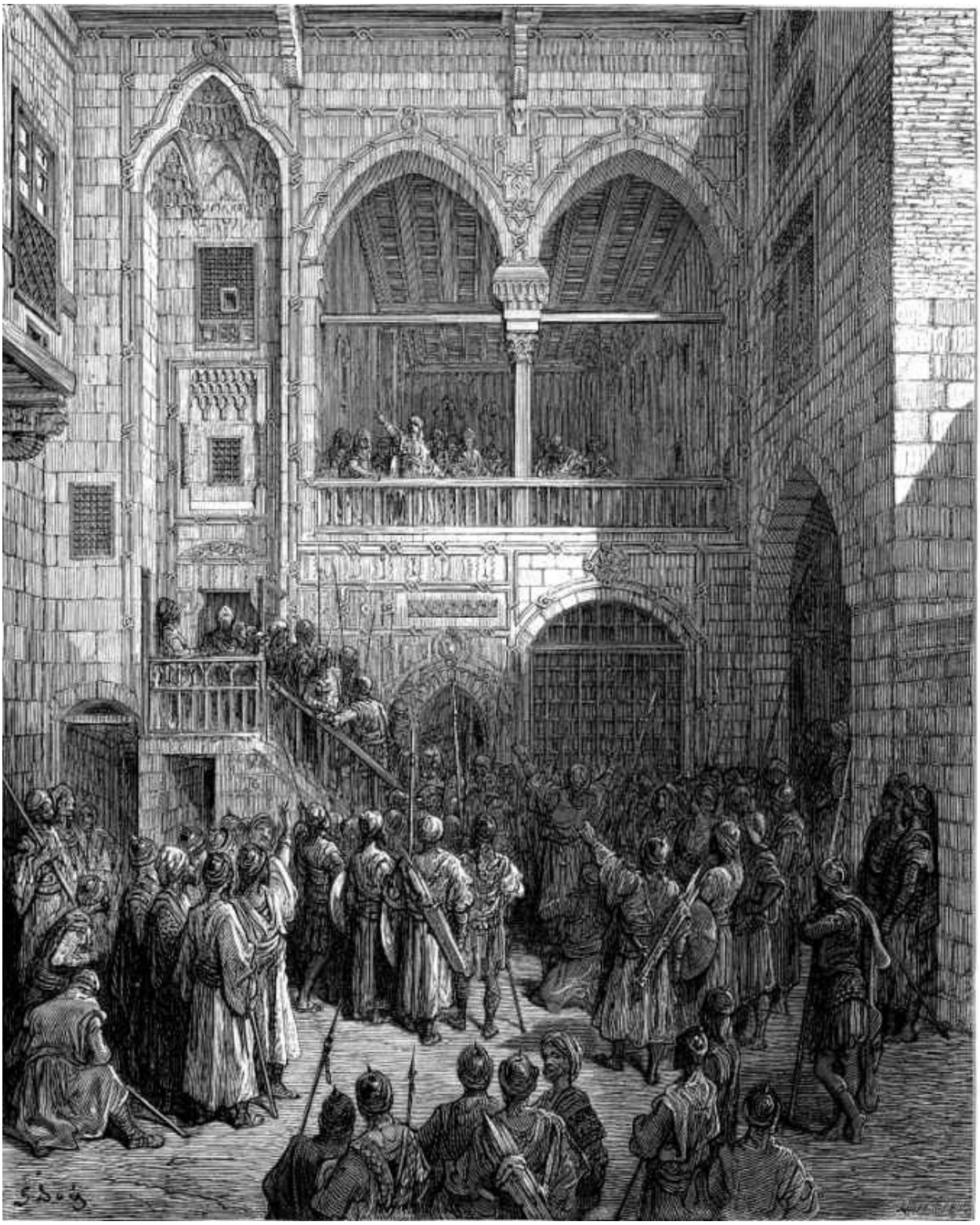
令人惋惜的是罗马教皇的势力日渐衰弱。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开始在欧洲内部积蓄实力，掌权者对十字军并不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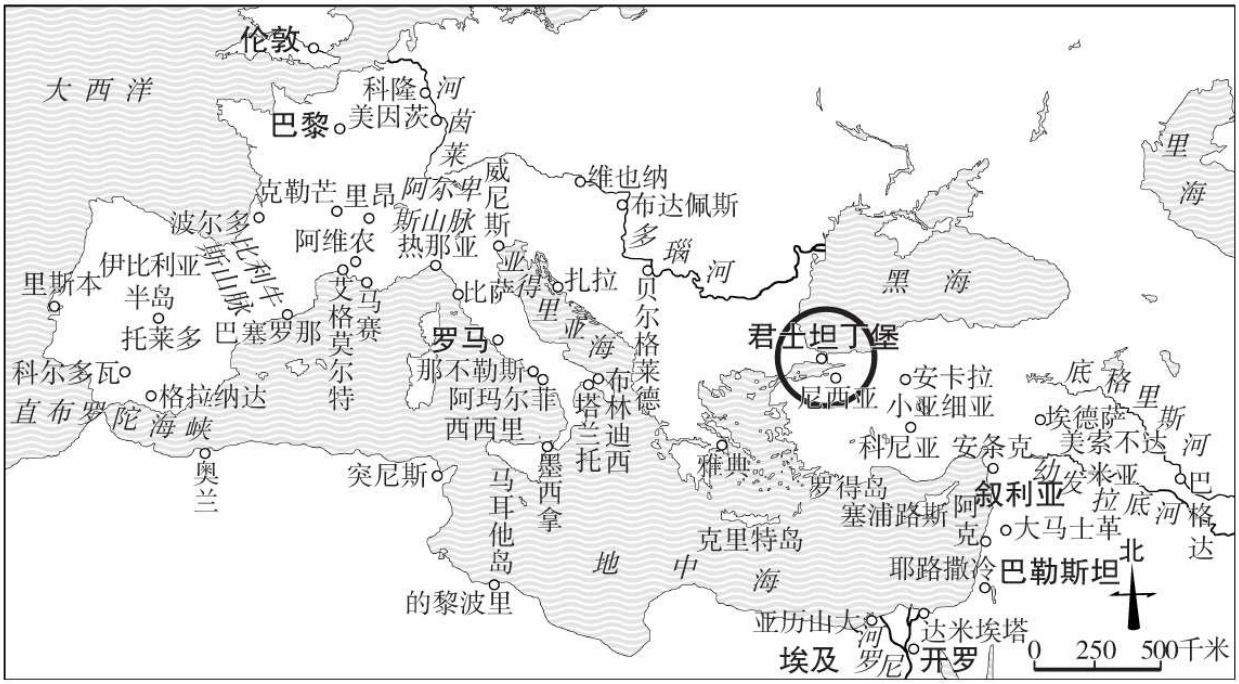
然而，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中断。虽然宗教、军事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但经济层面的往来却因此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

其中威尼斯人的经济头脑最为出众，就连朝圣行为也被商业化，我曾在《海都物语》称其为“朝圣旅行套餐”。

此时的西方正在迈向文艺复兴时代。

面对塞尔柱军队的侵犯，皇帝帕里奥洛格斯主张抗战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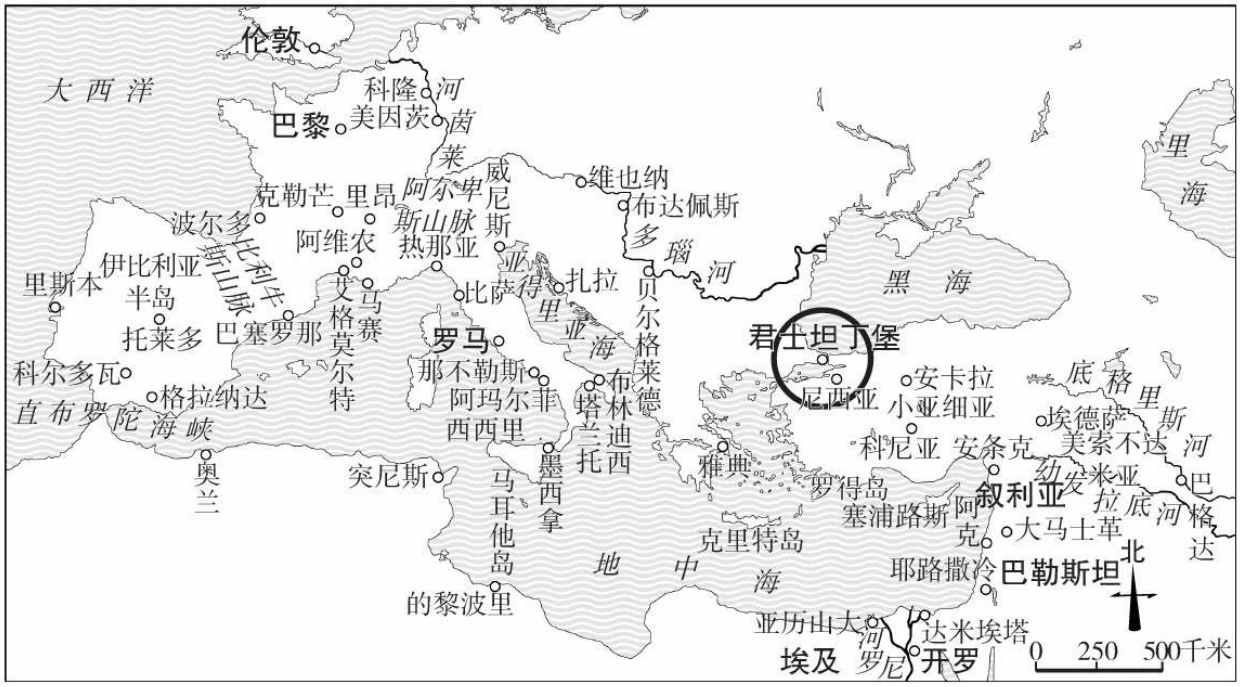
公元1453年，或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感觉时机已到，于是下令向拜占庭帝国发起进攻，企图将其毁灭。历史上有名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可以自由进行交易的城市，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在此居住。前来攻陷这座城市的是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塞尔柱苏丹。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选择离开，留下来战斗的就只有基督徒。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由号称当时最坚固的三层城墙牢牢守护。

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前鼓舞士气

Foul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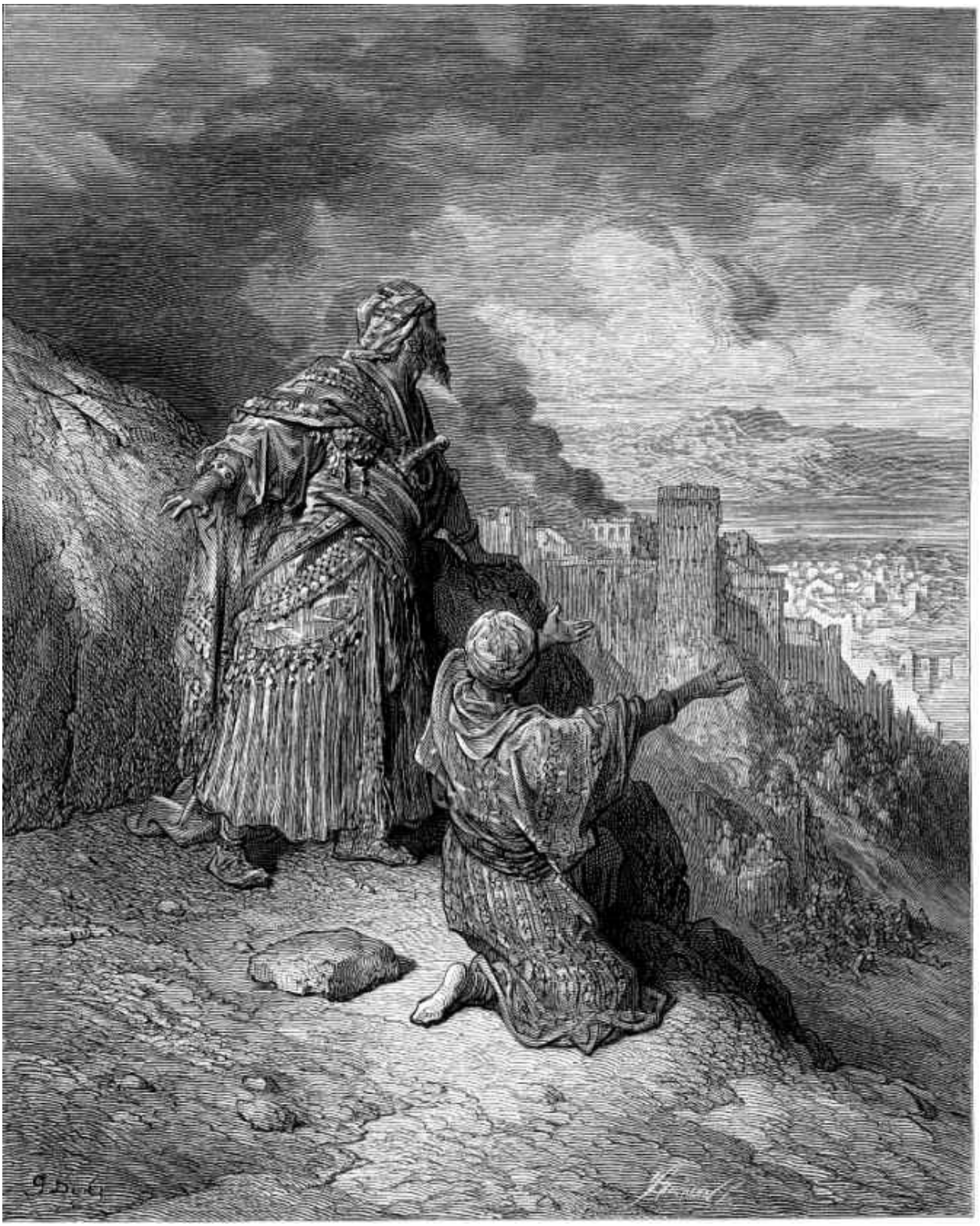
说起同基督教世界相对抗的伊斯兰英雄，萨拉丁首屈一指，接下来要数穆罕默德二世。

这位20岁的苏丹决定攻陷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于是便在君士坦丁堡攻防战中投入了16万兵力。

相比强悍的军队阵容，在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战斗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竟是前所未闻的大炮。发明者是来自匈牙利的基督徒，但却一直为拜占庭帝国所用，这件事让穆罕默德二世极为震怒。从巨大的炮口射出的硕大石弹击破了坚固的三重城墙。

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闯进城内的敌兵斩首，壮烈牺牲。

摩尔人最后的国王撤离格拉纳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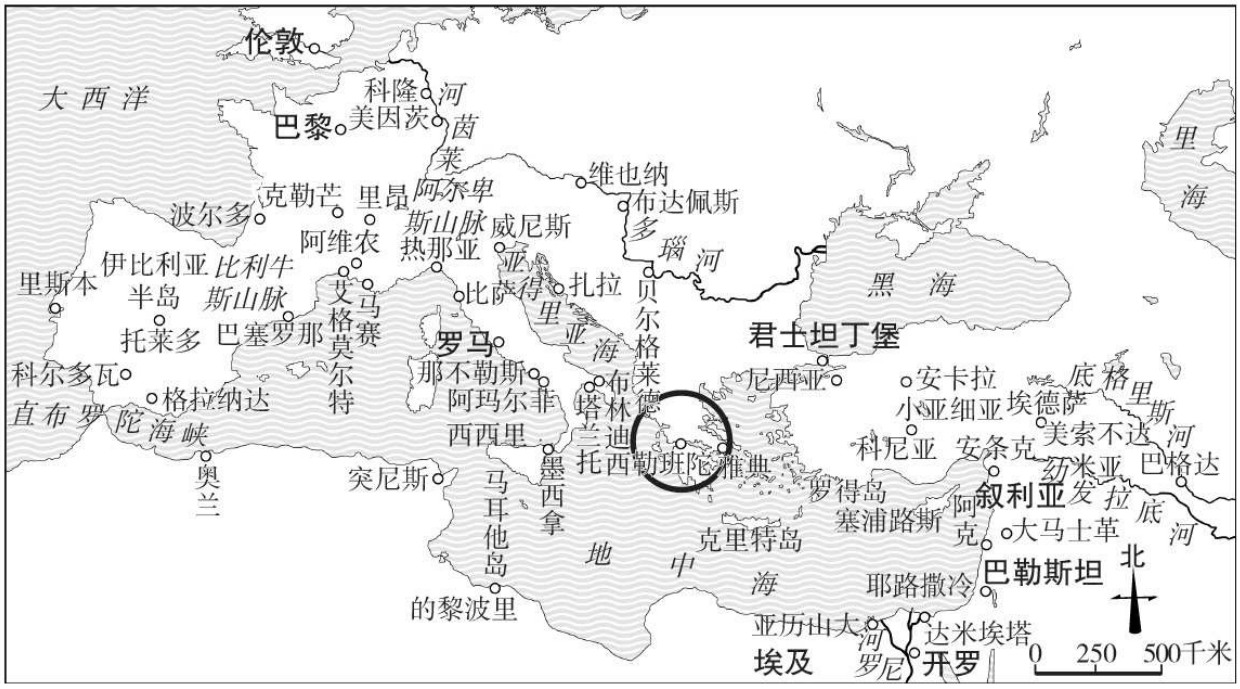


进入中世纪后之前很快就被伊斯兰一方收入囊中的伊比利亚半岛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转移到基督教势力之下。1492年，随着以摩尔人为主导的王国的最后一座城市格拉纳达的沦陷，伊比利亚半岛彻底归属于基督教一方。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基督徒被驱逐，而在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也无立锥之地。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眼下的形势和40年前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如出一辙，仍旧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争斗。

此时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格拉纳达沦陷当年，热那亚的哥伦布迈出了发现新世界的第一步，大航海时代由此开启。

勒班陀海战



从源头上说，君士坦丁堡归属于欧洲。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之后转而进攻西方。

此前进攻东方，御敌迎击的是穆斯林，到了这一时期即15世纪后半叶，御敌迎击的则换作基督徒。

基督教一方和伊斯兰一方之间有过多次战斗，说起决定历史的战斗任何一场战斗都无法和勒班陀海战相提并论。基督教的联合舰队在这场海战中大获全胜，并且阻止了伊斯兰势力向西转移。

在勒班陀海战中，一方是十字架，另一方是印染着《古兰经》经文的军旗，双方均以宗教之名集结于此。

此时是公元1571年，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过去了将近5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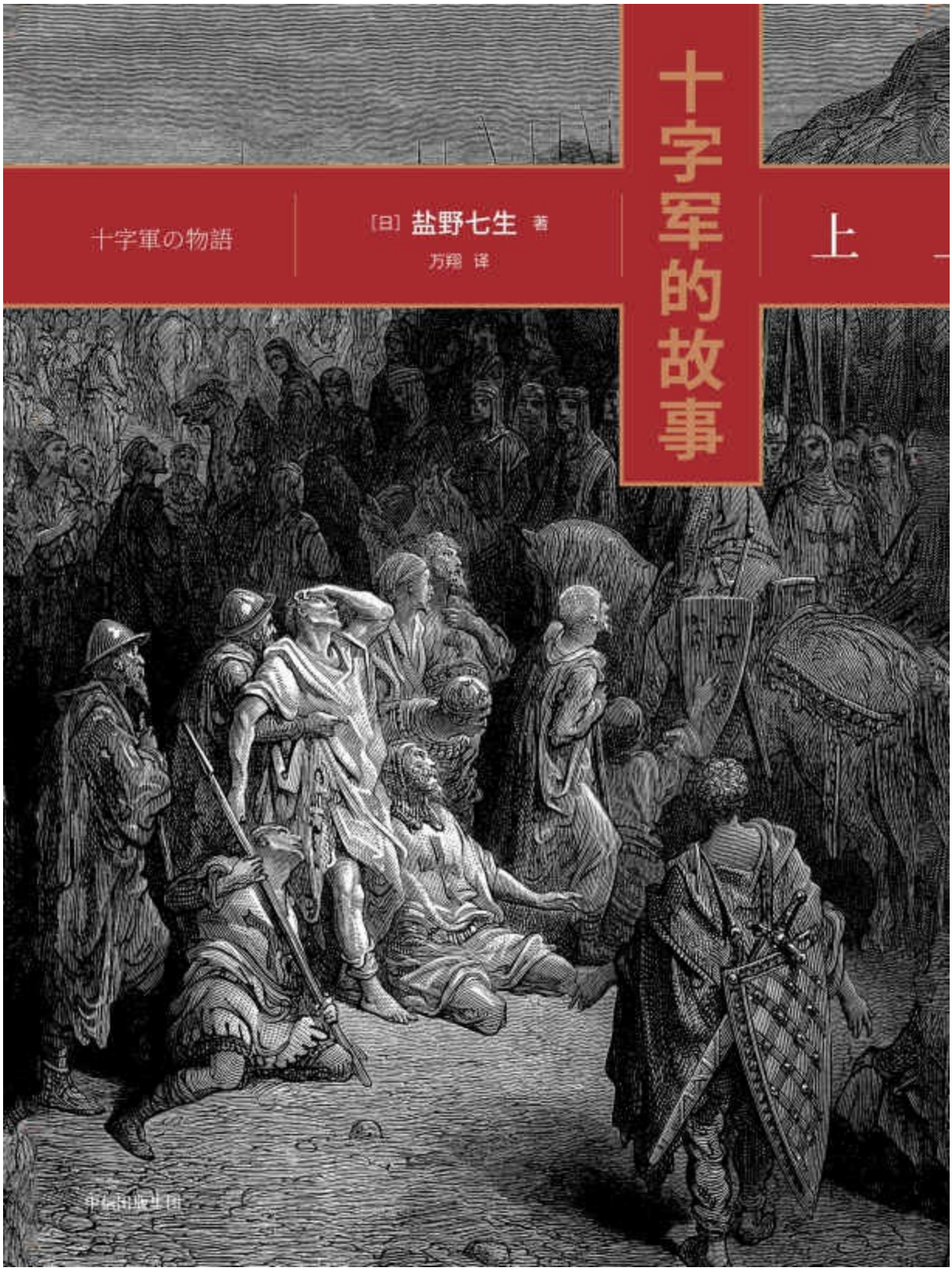
十字军的故事

上

十字軍の物語

[日] 盐野七生 著

方翔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第一章 “这是神所期望的”
“卡诺萨之辱”
呼吁“圣战”
十字军的诞生
隐士皮埃尔
“贫民十字军”
诸侯
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圣吉尔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迪·阿尔塔维拉
第二章 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贫民十字军”的命运
诸侯接踵而至
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的企图
第三章 踏上通往安条克的长路
“法兰克人”
攻占尼西亚
多利留姆之战
陶鲁斯山脉
夺取埃德萨
教皇乌尔班二世雪耻
第四章 安条克攻防战
叙利亚的穆斯林领主们
十字军抵达安条克并布阵
食物的匮乏
埃及来的使节
塞尔柱突厥人来了

波埃蒙多的计谋
攻陷安条克
突厥军队到来并围困安条克
神圣之枪
十字军出战突厥人
安条克究竟落入谁手？
主教阿德马尔之死
人肉事件
第五章 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
“火的试炼”
十字军合流
巴勒斯坦的状况
第六章 圣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围城战
水的匮乏
建造攻城塔
“希腊火”
收复耶路撒冷
“基督的守墓人”
埃及军队来犯
新任教皇代表上任
波埃蒙多和鲍德温的朝圣之旅
活跃的丹克雷迪
戈德弗鲁瓦的征服行动
意大利的经济人
戈德弗鲁瓦之死
波埃蒙多被俘
第七章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鲍德温即位耶路撒冷国王
年轻一代的十字军
波埃蒙多的回归
圣吉尔的作战

波埃蒙多重返西欧
落入陷阱
“奇妙的战争”
青年之死
鲍德温之死
第一代十字军的退场
返回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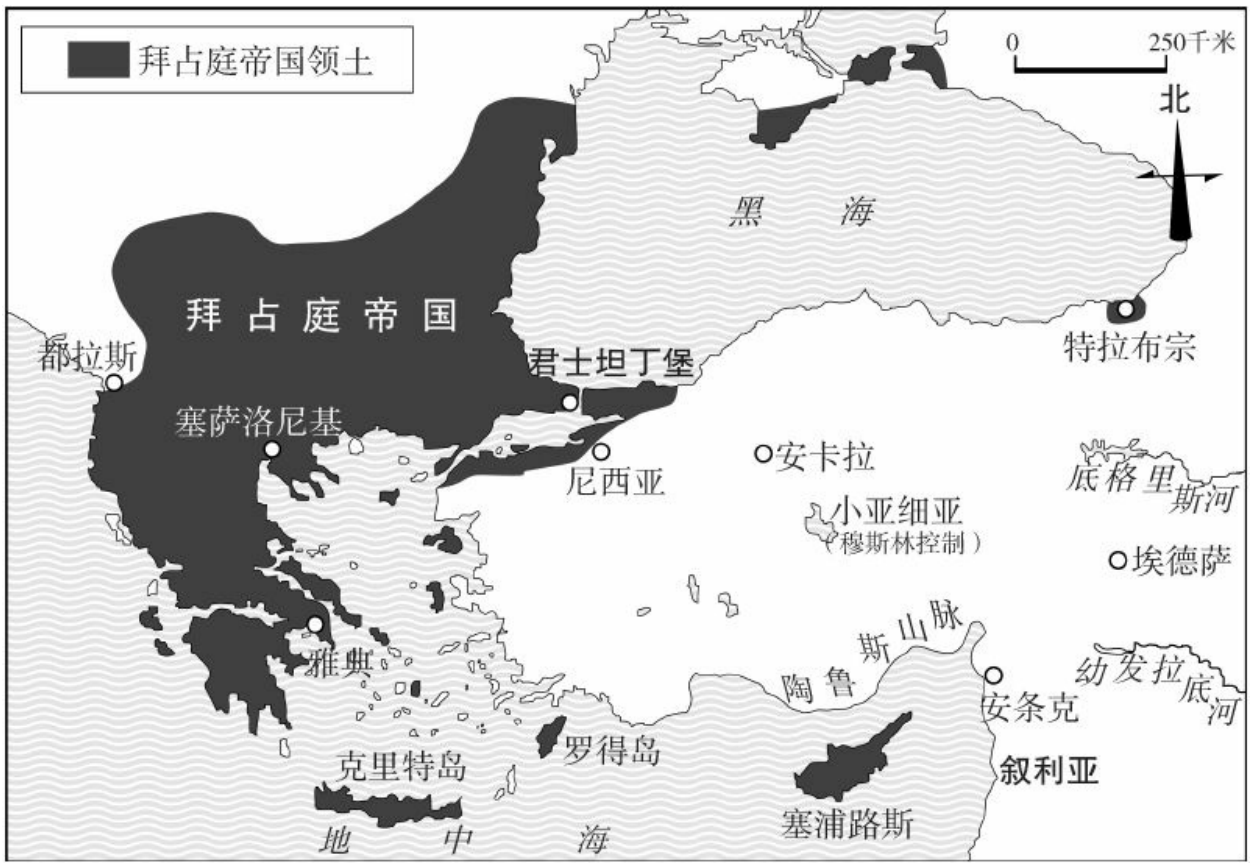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这是神所期望的”

当人们试图一举解决各种难题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念头就是发动战争。在接见手持拜占庭帝国皇帝求援信来访西欧的特使之后，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史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统治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大国。然而，由于7世纪上半叶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帝国丢失了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在内的广大地区。此后到11世纪末，穆斯林军队已经逼近了首都君士坦丁堡，驻扎在从首都乘小船即可到达的小亚细亚地区。

虽然同属基督教信仰的希腊正教会[1]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摩擦不断，当穆斯林到达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天距离之处时，就容不得任何教理争论的空闲了。作为东方希腊正教会首领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乞求西方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教皇，尽快派遣抵御穆斯林的援军。

事实上，这不是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向罗马教皇求援。此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次向西欧求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而到11世纪末，坐在梵蒂冈宝座上的教皇，是来自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代表天主教会改革派的乌尔班二世。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拜占庭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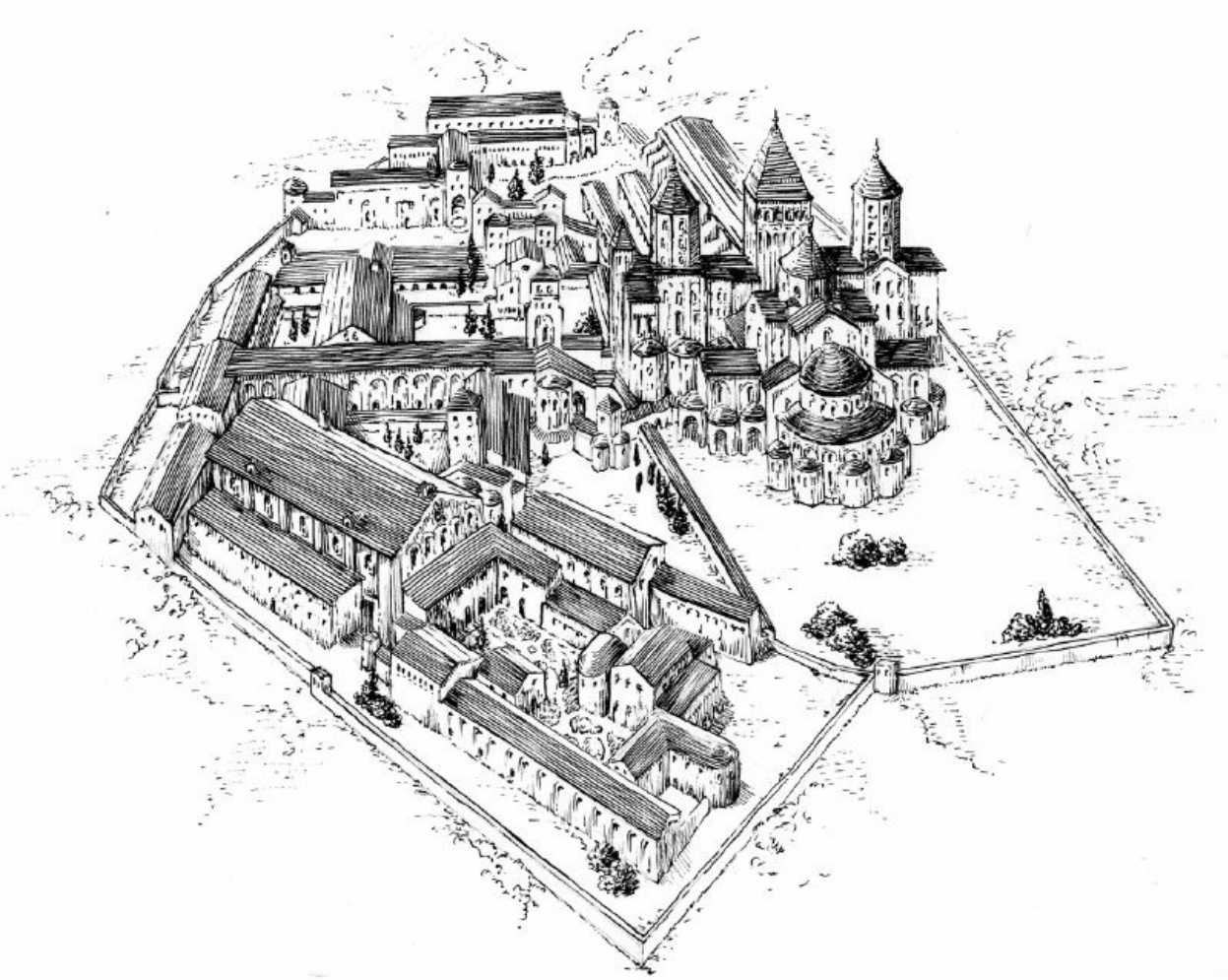
乌尔班二世出身于法国香槟地区贵族之家，在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接受教育。作为很早就受到修道院上层瞩目的青年才俊，他获得了随院长一同前往罗马觐见的殊荣。此时的罗马教皇是格列高利七世。教皇也非常欣赏这位聪慧的年轻僧侣，加上格列高利本人也出自克吕尼修道院，于是将乌尔班从法国调到意大利工作。

乌尔班二世36岁时被任命为罗马附近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之后他逐渐作为教皇的代表，出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各国国王和各大诸侯的宫廷。到公元1088年，46岁的他被选为教皇。7年之后，正是这位乌尔班二世教皇首先提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动议。

然而，作为改革派的教皇，与发动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的经历，可能是乌尔班二世得到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重用的原因。由于自己属于改革派，乌尔班自然会推行本派别的观点，格列高利也不会隐瞒对他的支持。

那么，当时的改革派教士，究竟做了哪些改革呢？



克吕尼修道院（11—12世纪）

如果考察对在贫困中挣扎的基督徒的扶持，就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圣方济各了。

在此之前百年的天主教会上层所做的改革，是建立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将上帝所托付的人间各种恶行逐一解决的信念。若秉持这一立

场，则在罗马教皇之前开辟道路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欧各国国王，有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罗马教皇的名义，驱逐和惩罚基督教世界的敌人的权力和责任。平心而论，不仅宗教一个方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全部事务中，居于顶点的罗马教皇都指导着整个天主教会，而世俗君主们只要忠实地执行其命令即可。

借用后世历史学家的话，这时出现了“社会修道院化”的现象，而反抗这一潮流的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

[1]希腊正教会，325年尼西亚会议以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矛盾逐渐尖锐，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

“卡诺萨之辱”

公元1077年东西方历史教科书上以“卡诺萨之辱”而著名，此事令西欧的善男信女为之惊愕。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反对皇帝亨利四世的人事任命而发端，教皇最终对无视教皇反对意见的皇帝处以开除出教会的绝罚。

绝罚的威力在于，受绝罚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此将其视为基督徒的敌人。由于中世纪西欧人信仰的深刻，家臣和兵士自然就离开了受到绝罚的主人。因此，绝罚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全面地流放。

即使是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也在绝罚的重压之下最终屈服了。

从德意志秘密进入意大利的亨利四世，一个人来到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门前。身穿粗布服装、赤裸双脚的亨利四世，伫立在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雪中，只为了乞求教皇原谅自己的罪过。

卡诺萨城堡是在意大利中部拥有广大领地的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夫人以同情改革派而广为人知。城堡中的广场上遍布着熊熊燃烧的火炉，把城堡炙烤得温暖怡人。城中寓居着洋洋得意的57岁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此同时，城堡内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窗外雪地中一个人站立着的27岁的年轻皇帝。

这次“卡诺萨之辱”是将教皇的权威与权力展现在西欧全体基督徒面前的一次大事。事件最终以教皇同意解除绝罚而告终，成为教皇在世俗权力面前的一次大胜利。

然而，之后的事件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没有记载了。此后的8年是亨利四世不断清除格列高利七世权势的8年。对于一名年轻气盛的男子来

说，虽然在众人面前受辱不能说是聪明的做法，却也表现了他在格列高利七世面前坚强的意志和政治手腕。

虽然后来格列高利七世被罗马教会列为圣人，他却在匆忙逃离梵蒂冈宝座之后孤独地客死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

至死之时，这位教皇留下了“我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因此遭到流放而死”的话。然而，格列高利口中的“正义”，不过是凌驾于整个天主教会之上的罗马教皇宝座而已。

继格列高利之后成为罗马教皇的维克多三世尽管性格温厚，仍不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善关系，上任两年之后郁郁而终。此后选出的教皇就是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年春天，这位当选教皇的修士年仅46岁。

身为整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罗马教皇，在中世纪时并没有现在的教皇每星期日到聚集着信徒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宣讲如何和平而正直生活的那种安逸。

所谓中世纪，说好一点儿是群雄割据，而实际上则是完全凭实力说话的没有秩序的时代。作为上帝在人间代理人的罗马教皇，并无法保证自己过上安逸的日子。

格列高利七世死在南意大利的萨勒诺，而乌尔班二世被选举为教皇的地点，也在萨勒诺附近的小城特拉齐那。在那个特殊时期，教皇的死也好，通过选举成为教皇也好，都只能在罗马之外了。当时亨利四世只有38岁。这位不能忘记卡诺萨之辱的神圣马罗帝国皇帝，在依靠军事力量驱逐格列高利七世的同时，为了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而选出了与之对立的教皇，并自此制定了瓦解罗马教皇权威的策略。

然而，经过考虑之后，乌尔班二世公然自称为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者，他采取的对策可谓巧妙。与亨利四世以在雪中伫立而取胜相比，乌

尔班让对手很容易就陷入无法出手的状态，最终战胜了对方。而他的策略就是去拥有对手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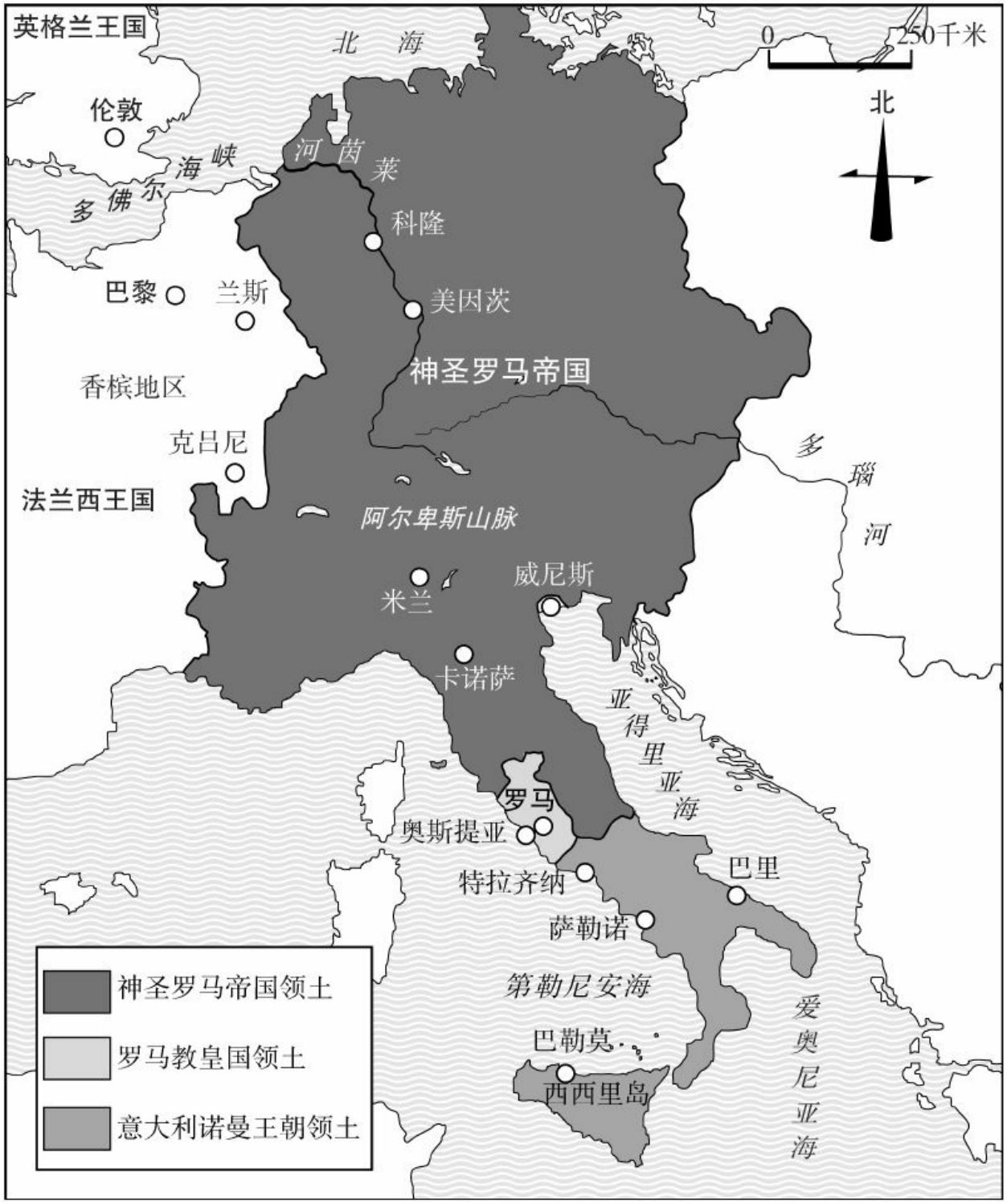
罗马教皇是不允许拥有军队的，因此他们只有利用他人的军事力量。而乌尔班二世利用的这个“他人”，就是一直试图驱逐亨利四世、救援格列高利七世的南意大利的诺曼王朝。附带说一句，格列高利七世去世之地萨勒诺和乌尔班二世被选为教皇的特拉齐那，都位于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统治下的地区。

即位教皇的乌尔班二世与200年前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地区的诺曼王朝关系非常紧密。而枢机主教群集的公会议也并没有在亨利四世支持的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所在的罗马召开，却选择了诺曼人控制下的特拉齐那。

此外，乌尔班二世在上任之后8个月才得以在诺曼兵士的簇拥下进入罗马。而这时他还只能在罗马城外的台伯河中的小岛上短期居住，不能接近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殿拉特兰宫。因为当时这些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设施还处在亨利四世和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的控制下。

罗马教皇从四世纪开始，就一直居住在率先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所赠送的拉特兰宫中。而乌尔班二世成为了第一位无法踏足拉特兰宫的教皇。这就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在法国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实际处境。因此，教皇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大实力面前维持自己的权威。

然而若论起在此时的政治迷局中生存，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比不上教皇的消息灵通。毕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士遍布，而主教则在各个教区有效统率着他们。在君主近前必然活跃着他们的忏悔神父。因此，教皇可以通过联络各个地区枢机主教，直接控制修道院。而各地的修道院又是当地经济生产的枢纽。



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国和意大利诺曼王朝的领土（11世纪末）

如果枢机主教不驻在罗马，而在各个教区往复移驻，从这些地区产

生的各种信息就可以通过他们逐渐汇集到教皇身边。为主教收集信息的人包括商人和僧侣，而在中世纪，这两种人的信息是最为可靠的。而商人和僧侣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两者往往是同一商业行为的买方和卖方。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从大范围的策略运用来看，谁也不如教皇的位置有利。而且与世俗君主相比，教皇身边拥有更多博学之士。

乌尔班二世在从就任教皇到在法国发起十字军东征的7年间，完全不曾踏入罗马一步。这段时间内，38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进入了不惑之年的45岁，但他丝毫没有改变对乌尔班二世的敌对策略。尽管此间教皇在意大利各地辗转往来，这位头脑明晰的基督教世界改革者却因为情报不足，始终未回到罗马。毕竟，与世俗君主仅仅关心自己领土的情况相反，教皇的心中并非只有罗马一城一池，而是心怀天下。因此，影响此后整个世界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欧洲接踵而至。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年。

由此引起了欧洲西北部全境的大变动。

另一部分诺曼人则将穆斯林赶出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1072年。

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曾经迫近到距离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一周路程的地区，诺曼人收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世界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此事在欧洲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征服，是因为诺曼人将原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人最终都依靠在南意大利建立政权的诺曼王朝，并不仅仅是因为该王朝是附近具有军事力量的君主，还因为他们承认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击败穆斯林的功绩。

“卡诺萨之辱”——1077年。

对教皇和皇帝权限范围的争议，并未随着这一事件的结束而解决。而乌尔班二世在此后陷入了在法国与皇帝亨利四世斗争的居无定所的15年流亡岁月。改革派教皇在卡诺萨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使自身吞下了恶果。根据学者的研究，乌尔班比格列高利更善使政治手腕。他不仅通过借助诺曼人的军队，使用了其对手亨利四世所拥有的力量——军事力量，还通过施展仅为教皇自己拥有而皇帝不具备的力量来削弱皇帝。毕竟，无论拥有再强的军事力量，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法自称拥有上帝授予的君权。

收复托莱多——1085年。

当亚平宁半岛南部受到8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急剧扩张影响的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也被穆斯林占领。随着此后200多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再征服”（Reconquista）过程，到11世纪末，基督教势力重新占据了西班牙中部地区。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这条西班牙战线是抵御伊斯兰的“圣战”。毕竟，西班牙的基督徒在进行着为守卫朝圣者数量不亚于耶路撒冷与罗马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城的斗争。在200年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前往东方。毕竟，先在自己家门口完成“圣战”，才有到此外的地区参加“圣战”的空闲。

基督徒在意大利成功驱逐穆斯林，无疑令罗马教皇喜出望外。而西班牙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响应教皇提出的十字军东征。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带来的热忱，在西班牙人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一部分法国人心中涌动。而欧洲全体基督徒心中的热情，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呼吁“圣战”

1094年秋天，乌尔班二世驻在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教皇一行从此地出发，经佛罗伦萨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到达皮亚琴察之后，格列高利七世派的主教，也就是赞同基督教世界改革的派别，召开了公会议。

所谓公会议（Synodus）与近代国家的国会相似。作为天主教会的重要决策机构，公会议根据格列高利七世的宣言，宣布教会不仅对信仰方面的问题，也对天主教信徒的生活负有全面的责任。教皇在皮亚琴察分别接见了前来诉求其夫婚外恋情的王妃，以及在伊斯兰教威胁下乞援的拜占庭皇帝特使。

乌尔班二世在当年整个冬天都驻在皮亚琴察。春天到来以后，教皇一行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国，沿着罗讷河向北，最终到达克吕尼修道院。乌尔班生长在香槟地区的田园，少年时期在古都兰斯度过，青年时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相比为了避开皇帝军队而不得不过着居无定所生活的意大利，法国自然是非常适合他的居住地。因此他在法国广袤的土地上自由旅行。而乌尔班的周游法国，其实是为当年11月在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做准备。

公历1095年11月于法国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室内，而在室外。因为教皇乌尔班二世要在大教堂前对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民众直接开讲。

此次演讲的真实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参照编年史家遗留下来的记载，教皇的“呼吁”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这位出自克吕尼修道院的53岁僧侣，在决定其毕生成就的克勒芒，向全体听众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首先，教皇在前半部分的开篇抨击了当时基督教世界道德沦丧的状况。在批评违反上帝教导的利己行为横行于世之后，他斥责道：如果对此放任下去，上帝的愤怒最终会临到人间。因此，为了避免社会继续堕落下去，他提出了“上帝的休战”，即基督教信徒之间永久休战，不再为领土的保全或扩张而彼此争斗。

在演讲前半段非难基督徒的乌尔班二世，到后半段就将话锋对准了异教徒。他指出，在实现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同时，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不断求助的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施以援手。此言既出，教皇接着说了如下的话：

穆斯林在地中海扩大其势力，攻击、杀戮你们的兄弟，贩卖基督徒为奴。他们破坏教堂，并把教堂变为清真寺。我们再也无法容忍他们的暴行。现在就是对他们展开斗争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要继续伸张正义。

这一号召并不是来自我个人的命令，而是主耶稣的命令。向那里前进吧！与异教徒斗争吧！如果你们命丧沙场，就可以使先前的罪孽得到完全的赦免。我在此以上帝所授予的权力，向你们明确这一点。

昔日的盗贼，要变成基督的战士；过去兄弟和亲属间争斗所产生的怨恨，要在与异教徒斗争的时刻化为乌有。只有少许薪水，靠无聊的工作打发时日的人，现在也可以依靠参加上帝所祝福的事业，得到永久的报酬了。

这次出征是绝不能推迟的。请各位暂时回到家中，当冬去春来之后，在主的引导下开始向东方进军。这是为了上帝的期待，成就神圣的责任。

台下的听众无不深受感动，他们自然为“这是上帝的期望”（Deus lo vult）这句话人声鼎沸。在巨大的欢声中，有一位志愿参加“圣战”的

人，在演说刚一结束就冲到教皇面前。他跪伏在教皇身前，大声发誓要参加远征。

此人是勒布伊的主教阿德马尔，在演讲前的克勒芒公会议中受到过教皇的召见。此外，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未能出席克勒芒公会议，但他来信告知教皇自己将参加远征。这位伯爵曾经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并在公会议前准备时与教皇会晤。

西欧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11世纪）

虽然公元1095年的克勒芒公会议上教会正式决定了向东方的远征，

但这一阶段所决定的议题只有以下三点：

一、在基督徒之间，全面实现“上帝的休战”；

二、参加十字军的全体成员，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

三、向东方出征的时间是次年（1096年）的圣母马利亚升天节（8月15日）。

至于十字军全体成员要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这一点，乃是因为十字架代表基督徒，而选择红色则是表示为了基督流血牺牲的觉悟。“十字军”的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

在此之前去圣地巡礼的人，大都拿着一个顶端带有十字型的手杖，而这一次，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手中拿着的则是各种武器。

一神教的“朝圣”是一种赎罪，也就是说，通过朝圣，可以将日常生活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过一笔勾销。对于信徒来说，要尽到这个毕生的责任，基督徒应当去耶路撒冷，穆斯林应当去麦加朝圣。

因而对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十字军东征也是一次朝圣。但这是伴随着武力而进行的。

在克勒芒公会议的阶段，没有留下教皇关于“解放耶路撒冷”说法的记载。乌尔班二世的考虑，恐怕首先是结束欧洲各个世俗君主之间的战争，实现“上帝的休战”。

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事实往往是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谓世俗君主间的休战，只在当今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与能力之下得以实现，其他时候从未有过。十字军向东方进军，同时在本国休战，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解放耶路撒冷”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不是

别的，而是“大义”与“名分”使然。

如果将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所特有的委婉说法完全除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说的精华部分：

将此前西欧基督徒之间的争斗，带到东方去，引起基督徒战士对穆斯林敌人的斗争。这样做的本意，无疑是把解放耶路撒冷之类的话，以并不直白的方式说出来。神职人员和信众之间相互理解的关系，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

尽管如此，“夺回圣地”“解放圣地”之类的口号，也不能仅仅作为口号来理解。

无论如何当时整个西欧的基督徒都热情高涨，即便是有并不热心的人，也难以反对十字军的东征。此外，一旦东征成功的话，作为发起人的罗马教皇的权威将急遽增长。

乌尔班二世布置了一个大棋局。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了夸示自身的权威，让皇帝亨利四世在雪中伫立了三天三夜，自身也饱尝强硬政策带来的恶果。而乌尔班二世则通过将数以十万计的军士派往东方，以武力夺回耶路撒冷的方式显示了凌驾于全体世俗君主之上的领导能力和教皇的权威。

十字军的诞生

其实，无论是乌尔班二世也好还是别的谁也好，在11世纪将穆斯林的所谓暴行当作十字军出征的理由，都是非常勉强的。

伊斯兰教把去麦加朝圣当作最重要的事件，这大致上与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是类似的。

有时穆斯林的确做出了一些针对基督徒的暴行。例如1008年起的9年间，埃及的哈里发阿尔-哈基姆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墓教堂。但这一事件距离克勒芒公会议已有90年之久。

在此之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一带处于塞尔柱突厥人的控制之下。近些年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勇猛的突厥人偶尔会袭击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团体，并且越过拜占庭帝国的边境线，强夺领土。但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中近东地区，并没有发生导致西欧基督教世界一片悲愤之声的针对朝圣者的大屠杀。

当然，在毫无法律与秩序的中世纪，到圣地巡礼意味着从欧洲到中近东的漫长旅行。不用说常有遭遇强盗袭击的危险，在长途旅行中跌落悬崖、溺毙河中，或是病倒在途中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由意大利商人资助修建的耶路撒冷朝圣者专用的医疗设施，须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并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得以经营。

而在乌尔班二世的克勒芒演说中提到了居住在东方不断求助的基督徒兄弟。关于这一点，教皇所说的“东方”指的是还未被穆斯林征服的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即希腊正教徒所居住的地区。东方的基督徒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多有改变宗教的人，但并非全体变为穆斯林。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作为异教徒被杀，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在11世纪的

中近东地区。

毕竟东方的统治者，穆斯林的领导人，并未威胁这些异教徒的生存。但是他们受到种种制约的限制，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二等公民。一种称为“吉兹亚”的“异教徒税”也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

关于伊斯兰世界对异教徒的种种制约和“吉兹亚”的详细情况，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卷（中文译本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中有详细的描述。请参照该卷相关内容。在此不再赘述，以免偏离本文的主题。

虽然征收“吉兹亚”税代表了对伊斯兰教以外宗教信仰的承认，并成为穆斯林所称颂的“伊斯兰的宽容”的写照，在中近东居住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还是无法形成相互对等的共生关系。

在伊斯兰统治的区域，禁止基督教堂的钟鸣响，也禁止基督徒乘马出行，而在同一条道路上，基督徒必须在一端等待穆斯林通过之后再经过。这就是在两者共生的情况之下，殊为不平等的局面。

称为“吉兹亚”的人头税，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说，是穆斯林统治者保护异教徒的代偿，而实际上则是宽容异教存在而征收的税金。

相形之下，在西方天主教世界，却是连异教徒的存在都无法容忍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东方的希腊正教基督徒甘愿缴纳着代表二等公民身份的“吉兹亚”税金。300多年的岁月中一直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大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因此这些人一直没有接受西方的罗马教皇援助、“解放”自己的要求。而邀请教皇派遣援军的，是希望收复曾经占有的中近东失地的拜占庭帝国皇帝。

教皇乌尔班二世不仅善于煽动群众的情绪，也具有超凡的组织才

能。他在克勒芒演说时的激动与兴奋，立即烟消云散。之后经过10天的讨论，做出了以下诸项决定：

一、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行可获得完全赦免。

天主教的教义，是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原罪和生活中犯下的小罪过相加，就算是没有特别的恶行，也会在信徒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带来不安。在中世纪，大多数善男信女都这样认为。而如果参加十字军就可以保证升天堂，对这些自认犯罪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救赎的喜悦。

而且这种完全的免罪，对于杀人犯和各种凶恶的罪犯来说都是成立的。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将此前的恶行一笔勾销，这就使不法之徒们个个摩拳擦掌，积极要求加入。

二、如果因疾病或类似原因无法参加十字军者，要为其他人提供参加十字军所需服装、武器等费用的资金。

这一决定为贫民参加十字军提供了物质支持。

三、参加十字军者出发以后，其在国内的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等全部在内，以及其归国以后的保全，由罗马教皇为保证人，在参加者所属教区主教的实际监督下得以保障。

这一点是指，十字军成员不必为归国后的事务担忧，可以安心出征。

四、若为参加十字军筹集经费而必须售卖自身资产，或通过资产担保获得贷款，其资产的合理价值由教皇个人做担保，实际的监督由所属教区的枢机主教和主教负责。

五、参加十字军者必须首先向所属教区主教提出申请，在得到许可

之后，在十字架前发誓，之后才可以出发。

这是将乌合之众排除在十字军之外的条件，但实际上远未达到效果，下述的“贫民十字军”就是例证。

六、在十字架前发誓后不出征，或在出发以后提前归国者，一律处以绝罚。

从以上诸项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曾经打算将得到相当程度组织的军队派往东方。就算打败异教徒的愿望再强烈，如果军队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出征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然而，尽管乌尔班二世的筹划非常周密，他算计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隐士皮埃尔

这位法国修士身着粗布僧衣，独自乘着驴子在村庄之间巡回讲道，使很多人被他的真诚所感染。皮埃尔对圣地受到穆斯林横暴的慨叹，号召立即前往圣地，将耶稣基督坟墓所在的圣城从异教徒手中夺回的呼吁，为没有任何资产，也不必为出征做太多准备的贫苦人心中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没有得到主教许可的夫妻带着子女，跟随隐士皮埃尔出发了。对中世纪下层民众来说，日常生活已经非常严酷了。参加十字军使得他们从这种苦日子中解脱出来。于是，所谓的“贫民十字军”形成了。

但如果问教皇乌尔班二世眼中的十字军和隐士皮埃尔组织的贫民队伍是否完全不同，答案却是否定的。

毕竟，两者都是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回主耶稣的圣城耶路撒冷。在这一点上，教皇和皮埃尔的想法是一样的。

虽然穆斯林既没有禁止也没有妨害基督徒去圣地朝圣，但基督徒在从圣墓教堂开始的圣迹参拜路线上，要给当地穆斯林缴纳少数礼金，这一点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有信仰的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可以做个类似的比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没有门票收费的。尽管其内有像米开朗琪罗所作的《圣殇》等代表人类最高艺术水平的画作，作为宗教场所的教堂是与上帝交流的场所，自然不能受到金钱的污染。

相反，教堂近旁的梵蒂冈美术馆就需要入场费。尽管其中充满了宗教意味浓厚的作品，美术馆自然不是教堂。

这一习俗在其他教堂也十分常见。为了欣赏卡拉瓦乔的作品而进入位于罗马的法国国家教堂圣路易吉教堂，穿行于画廊之间仍然不必缴纳入场费。

这自然是由于宗教场所和艺术鉴赏场所的不同。有一点有趣的是——在教堂门口往往有乞丐来往，而美术馆门前却没有。教堂门口自然有乞丐存在的理由。毕竟，在向上帝祈祷之后，人们总会带着几分实践布施之类善行的想法。而在美术馆参观之后，人们却往往为气氛所感染，心中所想的不是行善与信仰，而是对其中的画作进行评论吧。

此外，进入美术馆是不需要注意着装的。女性身着无袖或者胸口大开的服装，都没有人介意。但在教堂内，由于教士随时会路过，女性都要以头巾遮蔽。由于女性在教堂内以面纱遮脸已是长期的习俗，也当然要将裸露的肩膀或胸部遮蔽起来。以上是对宗教场所和艺术鉴赏场所区别的简单介绍。

这些习惯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沿袭，对1000年前的中世纪人来说，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基督徒踏着信仰者的足迹，为了接近耶稣的遗迹而前往圣地，凭什么要向异教徒交纳入场费呢？

这样的想法，对教皇、君主和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会变的。“夺回圣地”“解放耶路撒冷”之类的口号，在他们从欧洲前往东方的遥远路途中，都是强烈的兴奋剂。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主耶稣的期待。

“贫民十字军”

最先向东方进发的，就是隐士皮埃尔所率领的由贫民组成的十字军。这些人不必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留在故土的资产，也不必做特别的军事准备，因此成为了十字军的先锋部队。他们未等到乌尔班二世指定的8月15日，而在1096年的春天就开始动身。

不计其数的民众从法国北部和莱茵河附近德意志西部汇聚起来。他们的领导人隐士皮埃尔也不知道而且大概也不想知道确切有多少人。现代研究者有从5万到10万之众的估计。参加者大多数是农民和城市的下层民众，其中不乏盗贼与罪犯。里面也不全是男性，还有成群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基本上没有武器，身穿军装者也是少数所谓的放浪骑士，就像日本的“浪人”一样。

这些乌合之众自然没有组织纪律，行军时也是跟随在骑驴的隐士皮埃尔之后，有的乘着大车，大多数人则是徒步前进。在既没有后勤部队，也没有医疗单位的情况下，这些人在欧洲之内的行军补给完全依靠沿途居民的善心。

而在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贫民十字军就开始毫不迟疑地劫掠路上所遇到的居民。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异教徒，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疯狂掠夺犹太人社区，受到了皇帝亨利四世的强烈抗议。十字军所到之处，犹太人只好闻风而逃，造成了将近1000犹太人的死难。而当十字军离开德意志，进入匈牙利境内以后，杀害了几乎相同数目的基督徒“兄弟”。

然而，这支“贫民十字军”有一处绝对的优势，那就是毫不关心人生命的牺牲这一点。在行军洗劫过程中被当地人民杀死，或者由于缺乏食物而不断出现的行军中途死亡的现象，在隐士皮埃尔那里和与他一起前进的十字军中完全得不到关注。

贫民十字军开始时虽然维持着军队的规模，但行军中减员的情况越来越突出。从欧洲出发时拥有10万之众的队伍，到进入亚洲时仅剩余5万，但仍然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这支“大军”最终以如此的状态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1096年8月1日，在教皇乌尔班二世所确定的十字军出发日之前两周，贫民十字军就已经走过了旅途的半程。

诸侯

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呼吁，实际上是针对拥有武力的欧洲君主们提出的。因此究竟谁能对这次呼吁做出回应，对十字军的成败至关重要。最终回应乌尔班二世呼吁的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者各大国的国王，而是位列他们之下的诸侯，其原因如下所述。

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来说，第一个出来响应教皇关于十字军东征呼吁的人，是对基督教世界存亡负有责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在十字军出征的1096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亨利四世年方46岁，正值能够充分履行司令官职位的年纪。

但亨利四世与罗马教会之间因“卡诺萨之辱”关系相当紧张。此外，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的本意就是借此强化自身的权威，而相应地，皇帝的权力会被弱化。

因此亨利四世对教皇的呼吁完全置之不理。

除了皇帝之外，西欧权力最大的人是法国国王。法国国王腓力一世时年44岁，从地位和年龄上看都适合担任十字军的总司令。但他面临的是私生活方面的问题。

腓力一世不仅发展了婚外恋情，还把婚外恋的对象立为王后，并和结发妻子离婚，这触怒了教皇，使腓力受到绝罚。毕竟，从克吕尼修道院发起的改革，不仅在于教会内部的整肃，还包括改善基督教世俗道德的目的。属于这一派别的乌尔班二世，绝不能放任不管出现道德问题的腓力一世，而必须对其处以绝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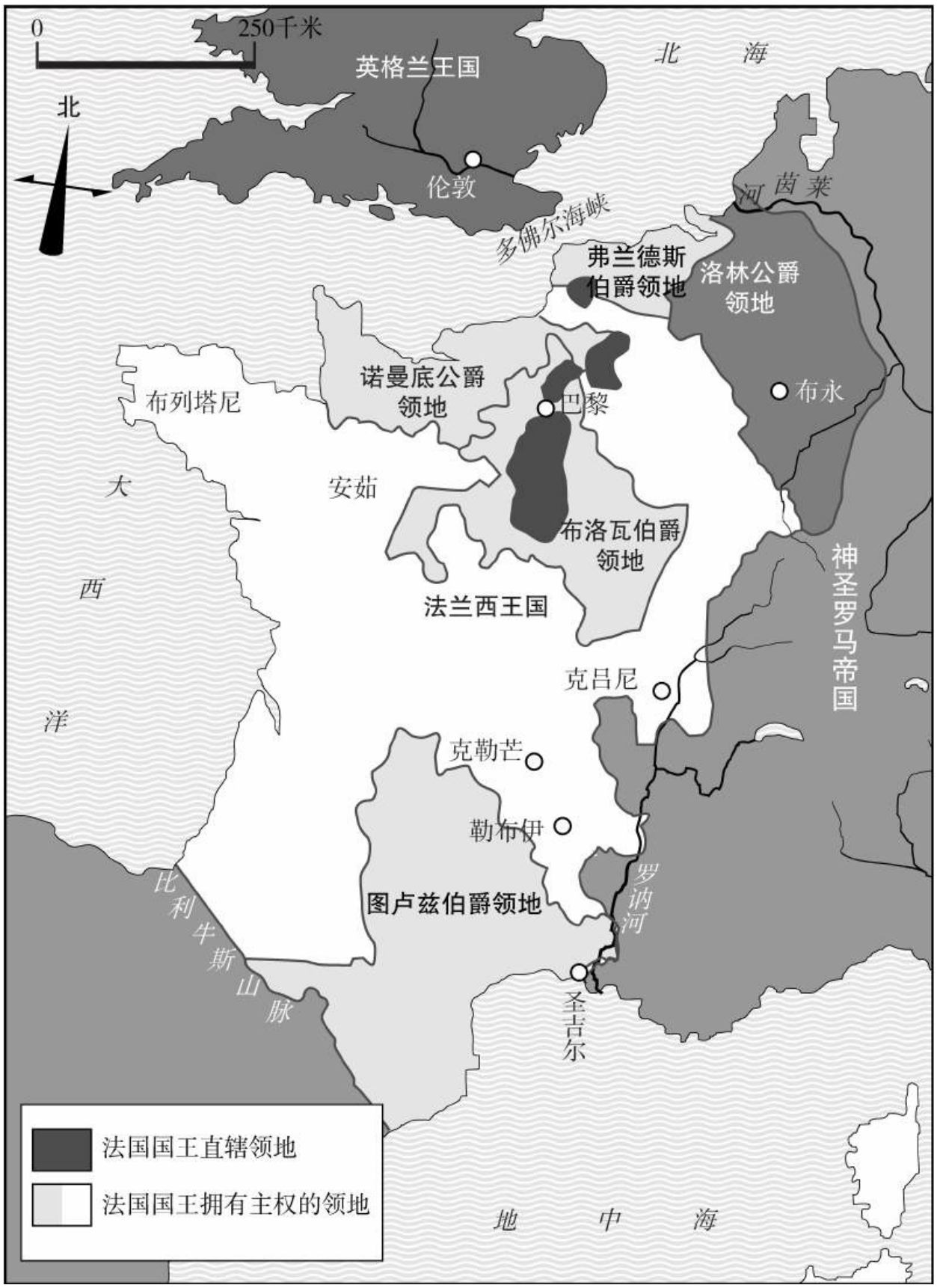
但是腓力却忤逆教皇的权威，并未受到绝罚。他不顾教皇的反对，

执意离婚。而对于绝罚的命令，他也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理态度，由于家臣不二的忠诚，腓力没有像亨利四世那样伫立雪中乞求解除绝罚。应该说，把十字军这样上帝期待的神圣事业委托给腓力一世，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不过这位国王并未因受到绝罚而和教皇关系紧张，相反他安排自己的兄弟代为出征。

因此，1096年时39岁的弗蒙杜瓦伯爵于格代表法国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因为法德两国的君主都未能参加，而被称为“诸侯的十字军”。

一般说来，诸侯属于地位较低的领主，但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央集权制是在十字军之后的时代才确立的，而在11世纪，诸侯与皇帝和国王相比，虽然名义上地位较低，势力却毫不逊色。

公爵或伯爵等诸侯所持有的领地，并非来自皇帝或国王的赐予。这些诸侯世袭拥有领地，唯一可能令他们感到有些不便的是，他们多少要向皇帝或国王宣誓效忠。


0
250千米
北
英格兰王国
北 海
伦敦
多佛尔海峡
河 茵 莱
弗兰德斯
伯爵领地
洛林公爵
领地
诺曼底公爵
领地
巴黎
布永
布列塔尼
安茹
大
西
洋
布洛瓦伯爵
领地
法兰西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
克吕尼
克勒芒
勒布伊
图卢兹伯爵领地
罗讷河
比利牛斯山脉
圣吉尔
法国国王直辖领地
法国国王拥有主权的领地
地 中 海

法国国王拥有主权的领地

虽说有前面的“有些不便”和“多少”的表态效忠，如果真的感到不便，只要举兵反叛就可以了。亨利四世皇帝在雪中伫立恳求教皇解除绝罚，就是因为如果真的被处以绝罚，他就会面临各路诸侯叛变的局面。

在那个时代，图卢兹伯爵也好，洛林公爵也好，都拥有比法国国王直辖领土更大的领地，因此他们治下的纳税人数，以及所维持的常备军，都不比国王差。因此我认为乌尔班二世呼吁这些诸侯参加十字军的策略，是把握现状之后做出的正确判断。而各路诸侯并不在乎皇帝与国王不参加十字军这一点，完全出于自愿，堂而皇之地响应了教皇的呼吁。毕竟他们都是充满威严的一城一国的主人。

军队是需要统一的指挥系统才能发挥其效力的组织。如果不能在指挥上达到统一，而是不同的领导人分别运用各自的实力，就会致使精力浪费，就算是能达到目的，也要花费比统一军令长得多的时间。因此当决定发动战争时，统一指挥是最重要的，而教皇乌尔班二世当然也能够理解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由于法国国王的兄弟于格拥有极其尊贵的地位，他自然被教皇任命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总统帅。而他39岁的年龄，也正合适。

但于格是第一次统帅这样大规模的军队。由于于格是代替其兄长法国国王出征，法王将自己属下部队的一半交给了这位伯爵统帅。

从史载的于格的性格来看，他是个容易妄自尊大的人，虽然勇气可嘉，却欠缺冷静。知人善任的人不难看出，让这样一个人担任统帅，十字军将难免失败的命运。只不过还好这位伯爵没有太大的野心。

在参加十字军的各位诸侯中，拥有能与于格伯爵的军队相匹敌实力的，是以下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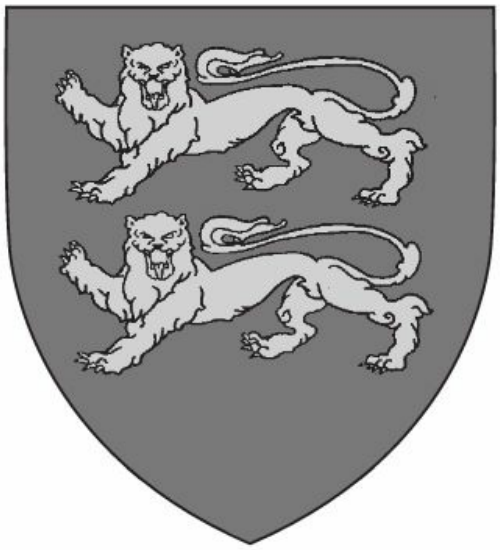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布洛瓦伯爵埃蒂安和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是以征服英格兰著称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的长子。他在父亲生前就起兵反叛，并在威廉死后试图争夺英格兰的王位。但英格兰王位最终被远比他狡猾的兄弟威廉二世夺得，而在罗贝尔出征之前，他只领有诺曼人在法国本土西北部的诺曼底小块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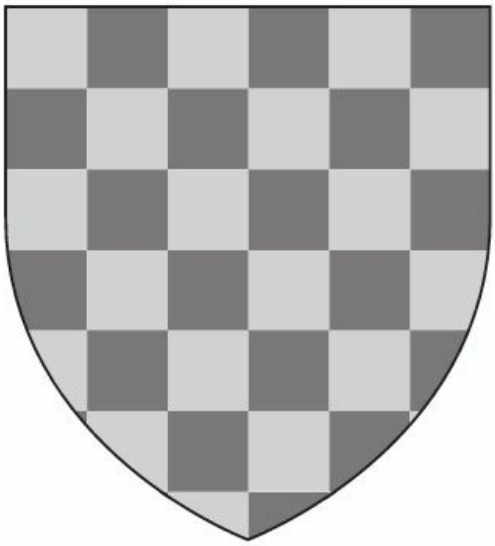
罗贝尔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没有处理能力，自身的资金也不足。因此他只好以自己的领地诺曼底为抵押向威廉二世借款，以筹集东征的费用。

此事与后来罗贝尔的情况恶化有关，而他本人则是真心赞同乌尔班二世呼吁的。他也是毫不怀疑十字军能解放耶路撒冷的诸侯中的一员。而他出发时正值42岁的中年，对于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东征来说，这个年龄还是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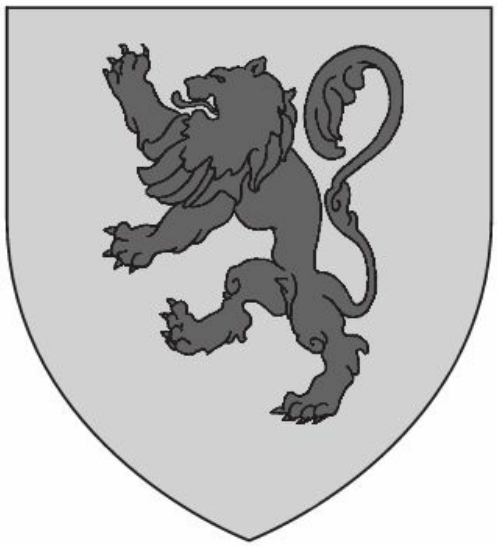
而对布洛瓦伯爵埃蒂安来说，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出征的诸侯中，埃蒂安可以称得上是最富裕的，因此他不必担心费用问题。但此人却是中世纪贵族里罕见的那种对当时家常便饭般的领土兼并战争完全不感兴趣，只喜欢学问和安稳生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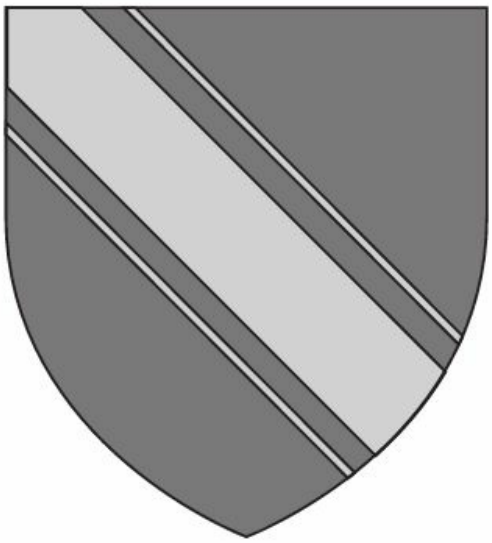
诺曼底公爵家族纹章
（红底上黄色狮子）



弗蒙杜瓦伯爵家族纹章
（蓝色和黄色格子）



弗兰德斯伯爵家族纹章
（黄底上黑色狮子）



布洛瓦伯爵家族纹章
（蓝底上有银色和黄色斜向绶带）

这位富裕的领主迎娶的妻子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可能是因为有一位伟大父亲的缘故，公主比自己的丈夫强势。因此，当乌尔班二世倡议发动东征时，这位伯爵夫人坚持说，既然自己的兄长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参加了十字军，那么自己的丈夫也应当参加。而当还未到达耶路撒冷

时，埃蒂安就离开前线回国了，此时伯爵夫人果然按照十字军的誓约，督促自己的丈夫重回东方战场，可谓是中世纪格外出众的女强人。

关于这位拥有广大土地的富裕领主布洛瓦伯爵所率领的兵力，并没有准确的说法，大约有数百到一千人随他出征。

还有一位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此人从小就和周围的领主保持很好的关系，尚在世的父亲也颇为富裕，所以他能够筹集出征所需的经费和军队，虽说军力不算太强大，但所挑选的兵士精锐。他可谓是将教皇本意的变基督徒内部斗争为反对穆斯林斗争的典型人物。据说他亲率骑兵500，而31岁的年龄则是三位主要诸侯当中最年轻的。

除了布洛瓦伯爵埃蒂安，两位罗贝尔之间有以下的三处共同点。

第一，他们对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目标充满信心。

第二，由于上一点，他们在战场上都表现得非常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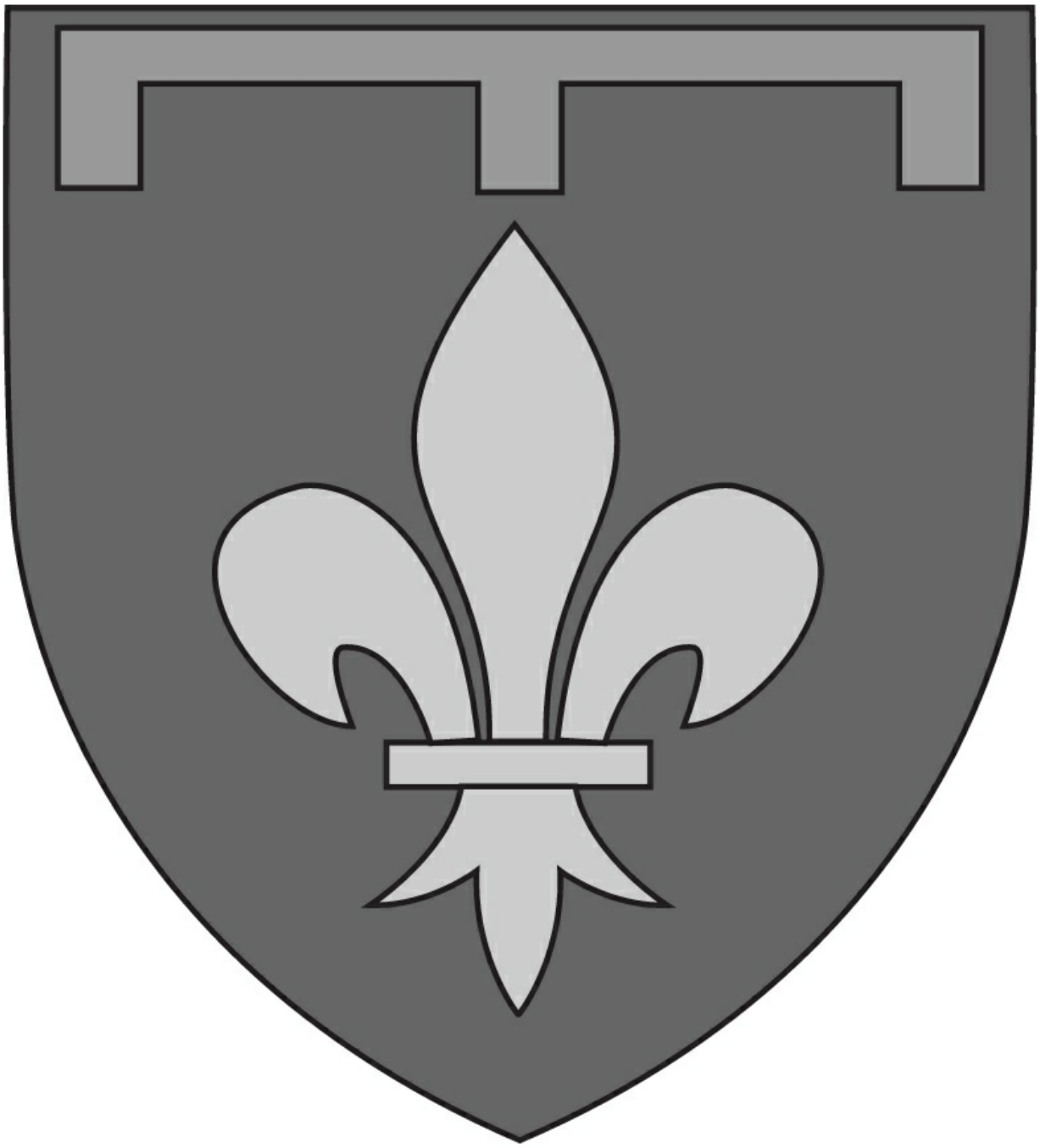
而第三点则是，收复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都回到了欧洲。两位都没有在东方获取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弗兰德斯人进军时英勇善战，而退兵时也保持纪律严明。至于三位诸侯在出征和行军时，为什么会一起行动，恐怕是由于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兵力也无法独自确保在前往东方的遥远路途中坚持下来。

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圣吉尔

在克勒芒公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很可能考虑过让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圣吉尔出任十字军的统帅。

年过五旬的老伯爵是出战诸侯中唯一一位有同穆斯林作战的经验的。在法国南部拥有大片领地的圣吉尔，很自觉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

在克勒芒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乌尔班二世已经会晤了图卢兹伯爵。尽管后者没有参加公会议，他却是最先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人。



图卢兹伯爵家族纹章（蓝底上黄色百合）

当时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心中的感觉，恰似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代表勒布伊主教阿德马尔。圣吉尔与阿德马尔关系紧密，又是众多诸侯中最年长的，自认为肯定会被委任为十字军的统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十字军东征，并带上妻子和次子一同出发。他还召集了周边的小领主，军

力达到近5万人。

但圣吉尔并不是个受人欢迎的人。因为过分倔强而乏味的个性，他在同僚和诸侯之间都缺少声望。就连随同出征的兵士也不喜欢这位领主，因此尽管他在热情的驱使下全力投入战斗，最终战果却乏善可陈。出征之初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在战斗中大都失去了。其实当初有那么多军队跟随他出征，只是因为这位富豪向他们支付了军饷而已。

盲目自信的图卢兹伯爵以为自己笃定成为十字军的统帅，但专擅国际政治的乌尔班二世却深知战争的真实需要。一直垂涎统帅地位的圣吉尔，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因为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到达巴勒斯坦之后脱离了十字军的大部队。这位伯爵总归是深信十字军的意义，在战场上也十分卖力的，因此他的退出，在十字军整体看来非常遗憾。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

当乌尔班二世还未决定统帅任命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这位拥有相当于现代比利时的下洛林地区的领主，比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年轻18岁，正值36岁的壮年。洛林地区在14世纪以后逐渐被纳入法国王室领地，此人的名字也被法语化，但在11世纪时，洛林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戈德弗鲁瓦也是一名封建诸侯。他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德国人来得准确。

很有可能，或者说几乎一定的是，乌尔班二世并没有想到洛林公爵会参加十字军东征。

这是因为，洛林公爵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个属国的领主，名义上是帝国皇帝的臣下。他应该站在皇帝亨利四世一边，而与乌尔班二世敌对。特别是在亨利四世追捕格列高利七世教皇时，戈德弗鲁瓦还参加了帝国军队。那为什么他会决定参加以格列高利七世继承人自居的乌尔班二世所发动的十字军呢？

现代研究者中不少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帝国诸侯中只有洛林公爵一人

参加十字军。而我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

戈德弗鲁瓦时年36岁，可算是过了人生的一半，已经到了一个对于人生何去何从认真考虑的时候。

这位公爵的前半生，一直追随向格列高利七世寻仇的亨利四世，协助皇帝将格列高利七世囚禁在圣安吉洛城堡，还阻止乌尔班二世回到罗马。

经历过这些事件的戈德弗鲁瓦，为什么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难道是因为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演讲的煽动吗？

如果我们细看留诸后世的画像，洛林公爵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成很多。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拥有一般的诸侯所不具备的一些性格特点。在我看来，他是能够冷静看待人生，清楚地把握自己目标的那种人。

实际上，不仅我们无从知晓洛林公爵为什么从亨利四世旗下转投乌尔班二世的怀抱，现代学者甚至完全找不到公爵留下的片言只语。但他既然决定了参加十字军，所作的准备自然是万无一失的。因此，当教皇检视其部众之时，洛林公爵所率军队规模不小，军备齐整。在我看来，从他身上确实体现了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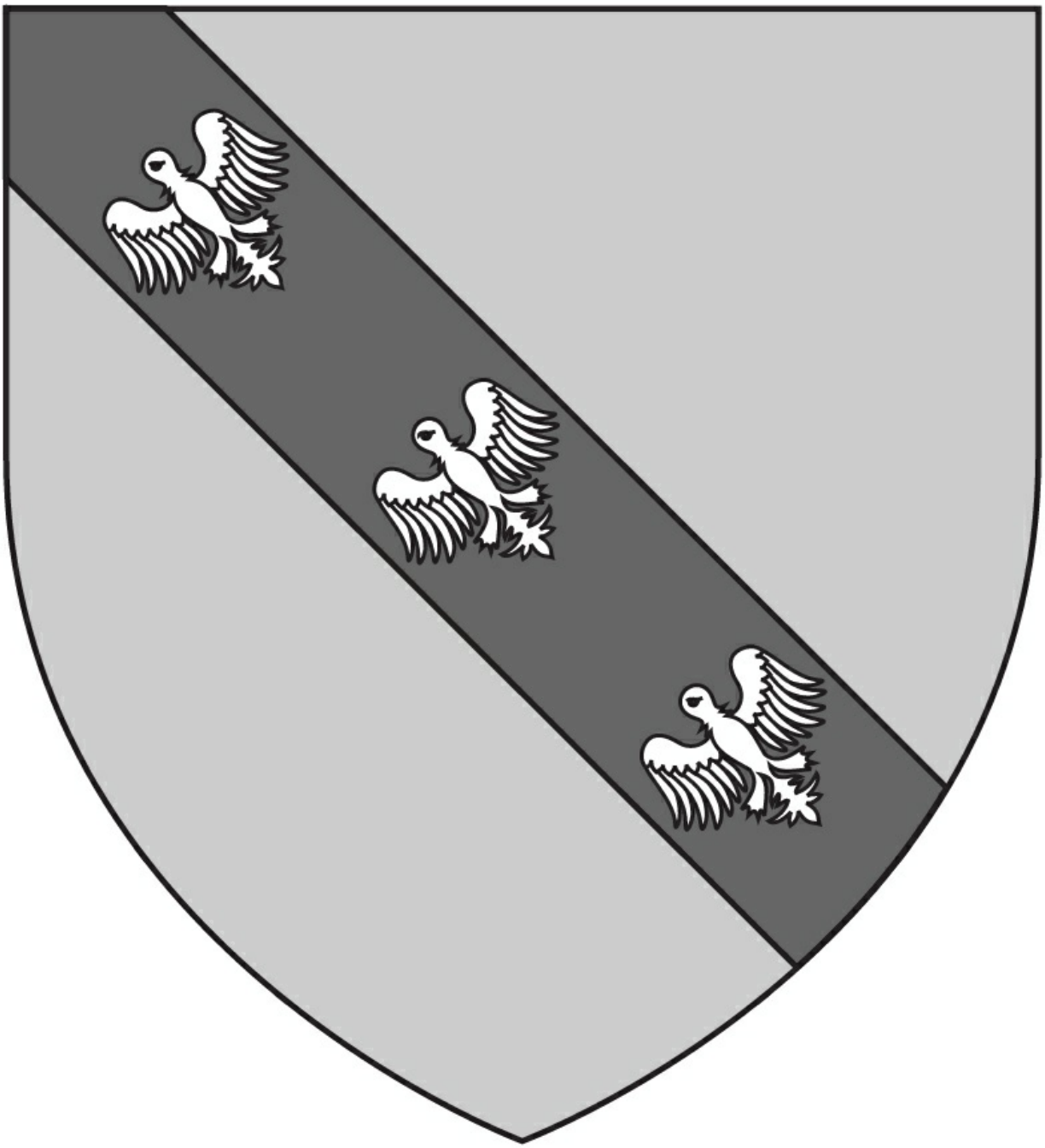
由于克勒芒公会议决定了参加十字军的封建领主完全自筹经费的方针，诸侯必须在出发前把各个方面都打点好。即便是拥有广阔领地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经费。毕竟这是数万名兵士几年的粮饷。

而他此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安排好自己出征时的国内事务。戈德弗鲁瓦将自己治下的下洛林地区，委托给上洛林地区的统治者，也就是自己的兄长来代管。他还没有子息，于是就带着两位兄弟尤斯塔斯和鲍德温出征了。

至于位列其次的费用问题，公爵不得不出售了自己的土地。此外他还出售了一部分价值较高的私人物品。在资金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他向领地内属民筹集经费。大概是由于其在当时罕见的仁政，资金募集进行得非常顺利。

戈德弗鲁瓦是家中的次子，而随同出征的两位贵族则是老三和老四。尤斯塔斯是一块小领地的领主，而老四鲍德温则是完全没有自己领地的“居家骑士”。

在家中多为男性继承人，领地无法全部分割的情况下，中世纪贵族往往会将其中一人送到修道院。本来鲍德温就是应该担任神职人员的，但他早早退出了这一职业。我们并不知道是年轻人自己讨厌这份工作，还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被逐出修道院。总之他的修士生涯早早就遇到了挫折，使这位刚刚年过30的骑士不得不以居家骑士的身份结婚。



洛林公爵家族纹章（黄底上有斜向红色绶带，有秃鹫图案）

戈德弗鲁瓦还带了另外一位名叫鲍德温的人参加十字军。这位鲍德温是他的堂兄弟，而且可能也是一位“居家骑士”。总之包括戈德弗鲁瓦和两位鲍德温在内的洛林公爵家族，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几个大家族组织的远征。

无论是诺曼底公爵、布洛瓦伯爵、图卢兹伯爵还是洛林公爵，自然是优雅华贵的贵族阶层的代表。但若与中世纪晚期中央集权时代出现的宫廷贵族相比，中世纪早期的十字军时代贵族则是截然不同的。

这一时代的公爵、侯爵、伯爵和男爵，都是依靠自身力量夺取和维持领地的主人。他们都拥有不可缺少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的领袖。

史称贵族的中世纪领主阶层，实际上可以称为“豪族”或“部族”，也就是苏格兰人所谓的“氏族”（Cla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佩戴着家族纹章，行军时也以家族旗帜先行，于沙场上则在战旗之下奋战。

虽然教皇乌尔班二世命令全体十字军在胸前和背后都以红色十字为标志，但把当时各式各样的家族纹章全部废止的做法，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个群雄割据的时代，教皇提出这一命令的目的，无非在于强调他作为西欧基督徒最高领袖的权威。

只要这些公爵或伯爵，即“氏族首领”们一声令下，整个家族就浩浩荡荡出征了。对当时的贵族男性来说，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从各方面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典型代表洛林公爵家族所率的部队规模，包括1万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这一数目看上去相当可观，但研究者认为实际参战的只有其中一半兵力。即便如此，这样的军力也可以与众多诸侯的领主法国国王的军队数目等量齐观了。

此外，参战的全体步兵和骑兵，都身着小铁环编织而成的“铁锁网”，再在其上覆盖一层光亮的钢铁甲胄。在作战时，2万人同时接近敌军，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只听得洛林公爵一声令下，严守纪律的军队就

以集团的方式发起全体突击。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迪·阿尔塔维拉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除了洛林公爵以外，还有一位被称为带着亲王意味的“王子”的人，在意大利语中，他则被称为“老板”（Capo）。这个人就是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

中世纪早期是诺曼人活跃的时代。他们当中一部分在英格兰建立了诺曼王朝，另一部分则进入地中海。在穆斯林取代拜占庭帝国势力占领南意大利之后，以阿尔塔维拉家族为代表的这支诺曼人在地中海中部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并最终将穆斯林赶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地中海的诺曼人控制了从南意大利横跨亚得里亚海直到希腊的地区，其势力直逼拜占庭帝国的心脏地带。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在十字军东征前的数年内，一直在与拜占庭帝国军队交战。

那么，为什么47岁的波埃蒙多会接受自己的对手拜占庭帝国的邀请，参加十字军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非常想借助十字军东征，扩大自己的领土。

此时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王位，已经由其父吉斯卡尔多传给了弟弟鲁杰罗。而波埃蒙多自己全力投入的希腊战事，也因为拜占庭帝国获得威尼斯海军支援而宣告失败。毕竟，在陆地上强悍的诺曼人，没有特别强大的海军。当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号召十字军出征时，波埃蒙多正为了获得海军而攻打意大利境内的临海小国阿玛尔菲。

刚一提出参加就到十字架前宣誓的波埃蒙多，与其他诸侯相比，并没有相信收复耶路撒冷口号的那份热忱。

这位47岁的公爵，早已久经沙场，当然知道在这场远征中，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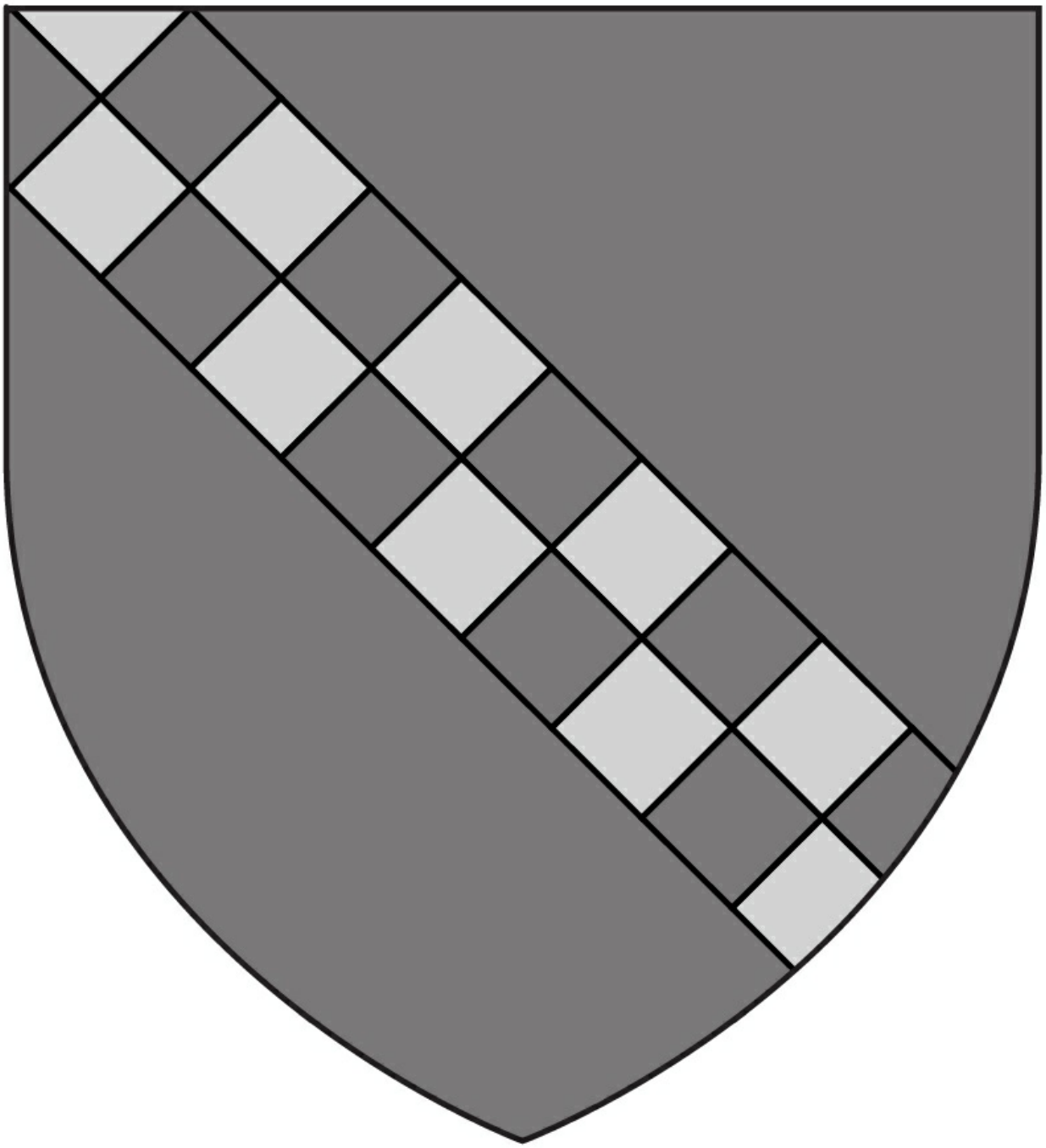
公爵在南意大利军事动员的结果，是集合了1万骑兵和2万步兵。但根据晚近的研究统计，这3万军队中实际出战的也只有一半，大约1.5万。

这支军队的前线指挥官，都是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家族中选拔的，而且特别选拔了其中年富力强的人士。这些所谓的“贵族”或小领主，其实是极为擅长战斗的。即使是在作战空闲之时，他们也整天在马上练习对战。

这样的“贵族”在波埃蒙多的军队里比在圣吉尔或戈德弗鲁瓦的军队中数量多多了。

不难看出，无论与圣吉尔军队的数量相比，还是与戈德弗鲁瓦军队的装备相比，波埃蒙多的军队都要精锐得多。

而在波埃蒙多的精锐部队中最出众的一位，是他的外甥，当时年仅20岁的丹克雷迪。



阿尔塔维拉家族纹章（蓝底上有红白格子的斜向绶带）

关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各位诸侯的容貌，历史上一直缺少记载。但这位波埃蒙多却有记载为证。由于这是女性留下的记载，我会好奇为什么波埃蒙多受到当时女性的欢迎。据说他不仅受到女基督徒的欢迎，就连作为敌人的女性穆斯林也十分追捧这位公爵。

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偶然遭遇的公主安娜笔下，47岁的波埃蒙多是这样的男子：

伫立在其他从西欧来的诸侯之中，普利亚公爵的个子要高过众人一头。他满头金发，身材略显瘦却非常强健。蓝色双眼中的目光，体现了他的高贵和尊严。热切的内心之外，他也拥有冷静与机敏。因此，我对他洋溢着无法言表的喜爱。

虽然这位公主为了安定而无法与波埃蒙多谈婚论嫁，她却深为这位不受社会成见束缚，也无法令人信任的枭雄而倾倒。明知危险就在眼前却还要冒险的男人，总是充满魅力的。他们仅仅作为“男人”而存在，在女性眼中超越年龄和宗教的界限。至于公爵心中有没有对所谓收复耶路撒冷口号的热情，在女性看来是无所谓的。

到波埃蒙多为止，第一次十字军的主人公都相继出场了。而我在其中所选择的主要人物，是以下的三组，一共六位：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和教皇的代表阿德马尔；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及其弟鲍德温；

以及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和他的外甥丹克雷迪。

以上几位十字军领袖都率领了强大的军队。而战场是军力多强，就有多大发言权的地方。因此，我将他们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

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的作品，这些诸侯所率领的军队可达10万之众。若果然如此，第一次十字军的数量可与罗马帝国极盛期皇帝图拉真所率的东征大军相匹敌。但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实际参战的十字军人数大约为5万。而5万人也是很大规模的部队了。

但是，在这支十字军中始终没有一位能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官，也

没有一个人能够对重大事务做最终决定。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这5万军队完全谈不上整体配合作战。

来自不同地区的十字军，是经由不同的路线前往东方的。出发的日期也由主要的贵族各自决定。但至少他们有一个总的集结地，那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第二章 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贫民十字军”的命运

虽然教皇规定的出征日期是1096年的8月15日，早已提前出发的隐士皮埃尔所率领的“贫民十字军”在当年7月底就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这支军队令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愕然不已。他倒不是因得知这些西欧人提前抵达的消息而吃惊，而是对他们的实际状态感到错愕。

拜占庭皇帝在写给教皇的求援信中，希望派遣的是职业士兵。在没有与古代罗马帝国相同的常备军的拜占庭帝国，采取的是雇佣兵制度。这一时期守卫君士坦丁堡的将士中，有许多从诺曼人征服的英格兰逃出的撒克逊人。但由于这些人完全是出钱雇佣来的，没有什么战斗力。于是，当阿莱西奥斯一世收到响应教皇号召的诸侯誓师的消息之后，就期待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到来。

然而出现在皇帝面前的，却是手无寸铁、衣衫褴褛的一群人。这些贫民经过从西欧直插匈牙利，而后南下巴尔干的半年消耗，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支乞丐大军。尽管在欧洲境内损失了一半以上，他们依然数以万计。几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需要食物和服装，也需要在夏天住宿休息的场所。

在拜占庭皇帝看来，隐士皮埃尔所率的这支十字军，不仅毫无用处，还带来了很实际的问题。一股脑涌来的贫苦群众，使首都近郊的居民颇为不满。皇帝只好首先禁止贫民十字军中的任何人进入首都，只在皇宫中单独召见了隐士皮埃尔一个人。一个能煽动如此多贫民远行的人，实在令皇帝感到好奇。

阿莱西奥斯一世时年49岁。这位皇帝自然是想召见生活在法国北部，也是40来岁的身着粗布衫的隐士。皮埃尔请求皇帝早日实现自己前往耶路撒冷的愿望。而皇帝也将衣食供给了皮埃尔所率领的十字军。他还为这些贫民提供了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小亚细亚所必需的船只。

当皮埃尔的十字军刚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踏上小亚细亚的领土，他们就算是被拜占庭皇帝打发走了，人数还是数万之众。海峡固然很窄，但却风大浪高，越是接近冬天，就越难渡过。皇帝很可能确实从夏天就开始打发这些贫民，但直到秋天结束，还没有完全赶走。于是，这些贫民十字军没能在君士坦丁堡遇到后来陆续到达的诸侯的部队。

就这样，拜占庭皇帝把这些和希腊正教信仰有别的天主教徒送到了小亚细亚穆斯林军队的面前。毕竟他们在拜占庭所属的巴尔干地区，做出过无可辩驳的劫掠暴行。而如果贫民长期滞留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周围，自然会带来社会问题。将他们“礼送”到小亚细亚，是可想而知的结局。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居民，也普遍支持皇帝赶紧把这些不速之客打发走。

这一时期的希腊人把西欧人称为拉丁人，将其视为落后的民族。而这些东征的拉丁人与希腊人有所接触之后，也十分厌恶对方。从隐士皮埃尔率领的十字军开始，双方就私底下相互蔑视。当地的正教徒至少表面上还对贫民十字军表示亲切，尽管他们在巴尔干地区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进入小亚细亚以后，迎接这些西欧人的，就是在伊斯兰世界中以勇猛著称的塞尔柱突厥人了。

隐士皮埃尔率领的十字军在小亚细亚宣告解散。根据穆斯林史料的统计，由于受到突厥军队的迎头痛击，这支十字军有2万人被杀。其他人则因为缺乏食物和水而死于非命，或由于疲惫不堪，而被当地居民杀死。夏天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5万人，到秋天已经有一半成为了“殉教者”。按照乌尔班二世的说法，在十字军东征途中死去的“殉教者”都保

证进入天堂。

我们不知道在这场灾难的最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那些与突厥军队作战后随隐士皮埃尔向君士坦丁堡撤退的人，最后为1097年进入小亚细亚的诸侯十字军所吸收。当他们挥师东进时，见到路旁散乱着为突厥人所杀的贫民十字军的遗体。为皮埃尔的狂热所煽动，深信东方是上帝预备着水和食物的贫民，完全来不及接近圣地，而是刚一踏上小亚细亚就被消灭了。

诸侯接踵而至

在贫民十字军渡过海峡到达小亚细亚当年的秋冬季节，诸侯的十字军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首先到达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是法国国王的兄弟于格。他的军队规模不大，因此拜占庭皇帝不难处理。

完全按照乌尔班二世要求，1096年8月15日从法国西北部出发的弗蒙杜瓦伯爵于格，首先南下克勒芒，之后折向东南，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之后沿着经热那亚、比萨、罗马的奥勒留大道南行，经过罗马之后，再沿着阿皮亚大道到达巴里，在此地乘船前往亚得里亚海对岸的海港都拉斯，此时已是深秋季节。

拜占庭的警备部队在都拉斯港接待了于格一行。之后，在警备部队的陪同下，于格率领的十字军沿着古代的埃尼亚提亚大道一路东行，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皇帝之所以派警备部队为于格的十字军开路，其隐含的本意是避免在其境内出现劫掠等暴力行为。此前的贫民十字军，就给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居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于格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虽然受到了皇帝贵客般的礼遇，其实被当作人质。其所率领的兵士，被迫与之分开居住。

在于格之后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是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所率领的十字军。他们于8月底从西欧北部的洛林地区出发，经过美因茨、斯特拉斯堡沿莱茵河南下，之后转向东，沿多瑙河经累根斯堡、维也纳到达匈牙利王国境内。

匈牙利国王和人民没有忘记半年前经过本国，数次实施暴行的贫民十字军。而这次进入匈牙利的，是身着重装备的两万大军。深知武力对抗的结局必然是失败，匈牙利国王只好依照洛林公爵的要求，为其部众提供粮饷。

获得粮饷的洛林军队强大的实力使匈牙利国王深感担忧，他向戈德弗鲁瓦提出，在十字军过境匈牙利期间，扣留一位人质以保证王国境内的安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洛林公爵命令其幼弟鲍德温前往匈牙利宫中为质。鲍德温并未前往，而戈德弗鲁瓦也对此置若罔闻。但在其兄的命令下，鲍德温还是等到洛林军队完全离开匈牙利境内进入巴尔干半岛，才最后一个离开匈牙利。

拜占庭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地区，均由皇帝任命的总督统治。当皇帝的命令到达之后，这些总督才允许来自西欧的十字军通过其所管辖的地区。巴尔干的官吏和居民都忘不了隐士皮埃尔的贫民十字军经过时所带来的动乱与祸害。一听说又有从西欧过来的军队，他们往往是闻风而逃。何况这次来的军队是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的样子。由于当地没有接到皇帝的命令，戈德弗鲁瓦也就无法求得粮饷。大军所到之处，并未引起劫掠之类的暴行。因此当1096年12月23日这支队伍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基本维持了出发时的规模。

在1096年内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除了于格率领的小股部队以外，只有洛林公爵的军队了。

其他的诸侯要么推迟出发，要么在路上耽搁了时间，还有的与拜占庭的警备部队发生冲突浪费了时间，总之进入到海陆两路都不宜旅行的冬季以后，就只有等待翌年春天再抵达君士坦丁堡了。

诺曼底公爵、其内弟布洛瓦伯爵，以及弗兰德斯伯爵三人组成的部

队，于1096年秋天从西欧北部出发，经法国国内南下，到达意大利。他们在行军过程中，一路视察修道院，并欣赏着美好的风光，旅途看似非常愉快。一行到达意大利南部海港巴里时已经入冬，由于此时渡海有危险，诺曼底公爵决定在气候温暖的南意大利过冬。这令一心向往耶路撒冷的弗兰德斯伯爵深感郁闷。他决定自己先期动身，便征调了500艘船，将兵士运往希腊半岛。其余两人直到1097年5月才进入君士坦丁堡。

1096年10月才从自己位于法国南部领地出发的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和教皇代表阿德马尔，沿着法国南部一路向东，进入意大利时已经是严冬季节。他们并未选择从意大利南下，经巴里渡过亚得里亚海的路线，而是沿着意大利北部向东行，到达亚得里亚海东岸，然后沿着海岸南下到达都拉斯。虽然这样走有些绕路，却因为完全是陆路，不必征调船只。

图卢兹伯爵率领的兵士甚众。对于需要大量给养的军队来说，即使是完全走陆路，想做到安全行军也并不容易。何况此时正值冬季。

55岁的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是一位不善于控制自己情感的人。在其军队接近都拉斯时，就发生了事故。圣吉尔的部下与拜占庭帝国的警备部队发生了冲突，还导致阿德马尔主教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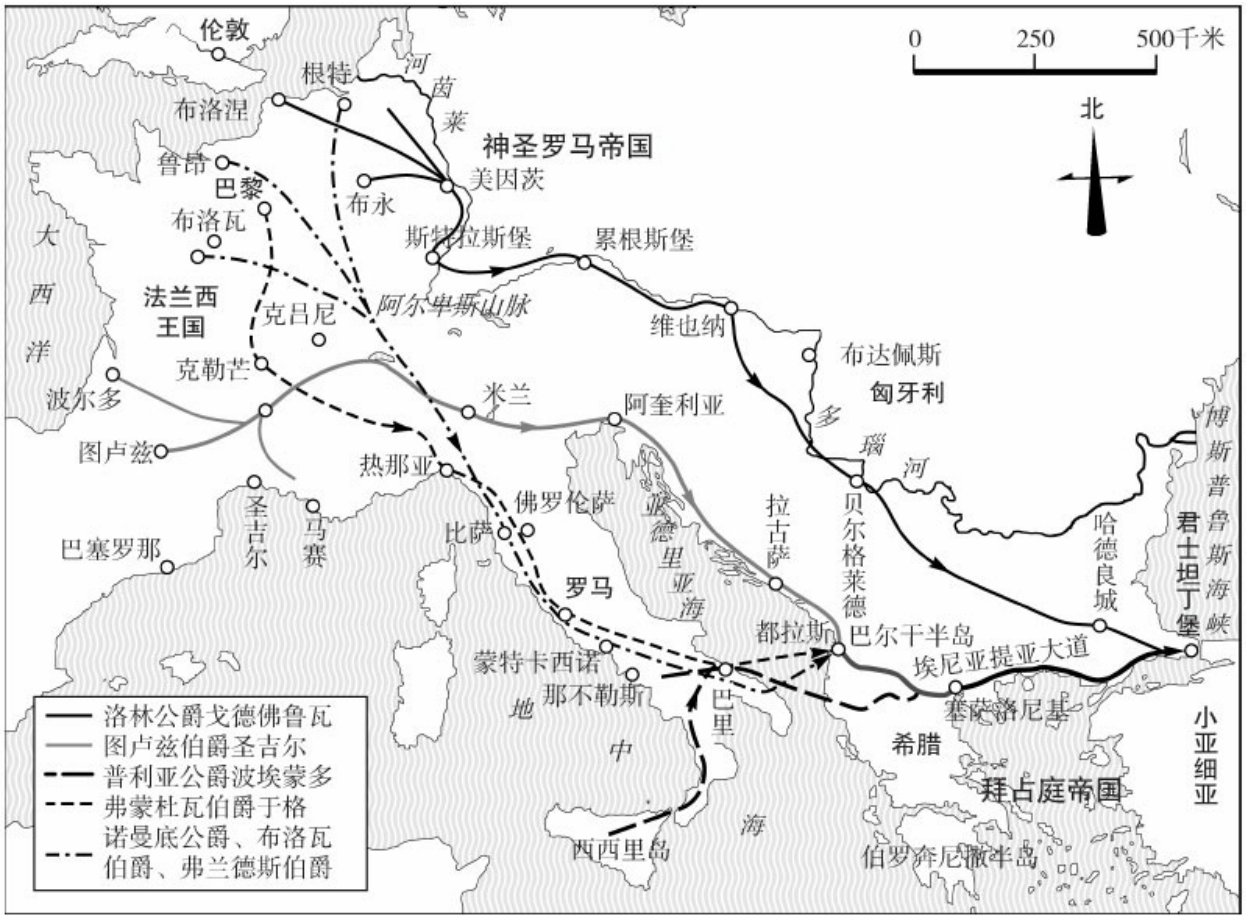
此后直到1097年4月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为止，圣吉尔的军队与拜占庭警备部队的关系非常紧张。原本三万之众的军队，到此时损失不小。

从意大利南部出发，比其他任何诸侯路途都短的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和他的外甥丹克雷迪所率领的南意大利诺曼军队，也于1097年4月抵达君士坦丁堡。

由于距离较近的缘故，波埃蒙多一行动身最迟。然而，此前曾经与拜占庭帝国作战的普利亚公爵，非常熟悉希腊的情况。他避开了拜占庭

警备部队把守的都拉斯，而是选择在其南面的希腊半岛西岸登陆，然后横穿希腊，到达君士坦丁堡，一路上对居民有所掠夺。但好在波埃蒙多的部队没有杀人。他把自己的行军称为“一次军事演习”。

当波埃蒙多获悉圣吉尔的军队已经接近君士坦丁堡时，他将军事指挥委任给丹克雷迪，自己带上一小部分骑兵迅速赶往拜占庭首都。很可能是因为波埃蒙多讨厌图卢兹伯爵，因此要赶在法国人之前进城。尽管如此，曾经在拜占庭帝国领土内制造各种野蛮暴行的波埃蒙多，如今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皇帝面前，真可谓厚颜无耻了。而也只有普利亚公爵这样的人，能做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来。这自然也令图卢兹伯爵非常不快。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新的事项，波埃蒙多和圣吉尔就会因意见不同而发生冲突。



诸侯们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

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11月在克勒芒提出的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到1097年春季完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全军大集结。西欧的十字军终于踏上了以夺回耶路撒冷、收复圣地为目标的道路。但此时发生了各路诸侯都未曾料想到的情况。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在此间三个月内无法同意的问题，又出现在春季到来的各路诸侯面前。

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的企图

此时的拜占庭皇帝是49岁的阿莱西奥斯·科穆宁。正是他恳求罗马教皇派遣援军的。这位皇帝在即位前曾经长期担任帝国的高官，但他并非出身于世代达官显贵的家族。他所属的科穆宁家族，在不到半个世纪前通过宫廷政变取得了拜占庭帝国的皇位。而科穆宁自己已经在位15年。皇帝在位的这段岁月里，一直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穆斯林势力对抗着。

阿莱西奥斯一世通过审阅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各地总督递交的报告，已经了解到接近君士坦丁堡的诸侯所率领的都是职业军队，与之前隐士皮埃尔的十字军完全不同。而最先抵达皇帝宫殿的客人于格，也自然将十字军的行军目的——夺回巴勒斯坦、收复耶路撒冷——告诉了阿莱西奥斯一世。

不难想象，于格一定还告诉了皇帝，这些诸侯都是一城一国之主，没有必要自己大老远的跑到东方来，而只会派遣一些雇佣兵。因此，阿莱西奥斯一世在会见1096年内唯一一位到达君士坦丁堡的诸侯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之前，一直以为从西欧派来的只是一些容易役使的雇佣兵。他哪里知道这些诸侯的部下与被诺曼人征服而从英格兰逃亡来的撒克逊人完全不同。

阿莱西奥斯没有改变自己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他仍然把这些到达的诸侯全部按撒克逊雇佣兵对待，要求他们全体向自己宣誓效忠。

诸侯为了对东方的军事行动，同意效忠拜占庭皇帝。毕竟，这次效忠会换来东方基督徒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些基督徒所在的地区构成了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缓冲地带。

至于换取拜占庭和希腊正教徒支持的代价，则是各位诸侯必须宣誓对拜占庭皇帝保持绝对的忠诚。

如此一来，诸侯的身份就成为了拜占庭皇帝的臣下。而由此可知，诸侯未来军事征服的地盘，最高的所有权都归于皇帝。

对拜占庭皇帝来说，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不久，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是自己国家的领土。但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如果小亚细亚还是刚刚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话，那么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早在400年前就丢失了。

总之，阿莱西奥斯一世的企图是想依靠从西欧来的军队，夺回被穆斯林占领的旧土。这就好比日本人所说的“穿着别人的腰布摔跤”。

此时皇帝手中最有效的一张王牌就是船只了。如果十字军想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然需要许多船只。而此时此地唯一可以提供船只的就只有拜占庭帝国。因此，向皇帝宣誓效忠，就成为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前，也即留宿君士坦丁堡之时，各位诸侯必须做的事。

皇帝按照各路诸侯到达首都的顺序，向他们要求宣誓效忠。他并没有让这些诸侯到自己面前一起宣誓，而是各个分别通知。

法国王弟于格很快就完成了宣誓效忠。善良而不考虑内情的于格，不仅自己在皇帝所颁发的宣誓书上签了字，还自愿充当了第二个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洛林公爵的说客。

洛林公爵的军队按照皇帝指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向着金角湾一侧的培拉安营扎寨。于格乘着皇帝御用的小舟，给洛林公爵出示宣誓书，并建议他署上自己的名字。

戈德弗鲁瓦不愿在宣誓书上签字。他告诉于格，自己已经对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宣誓效忠，不能同时对东方的拜占庭皇帝效

忠。

得知洛林公爵的回复，阿莱西奥斯一世遂停止向宿营中的洛林军队提供粮饷。不满的洛林公爵立即命令其弟鲍德温袭击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村庄，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重新供粮。

此后，由于阿莱西奥斯不清楚洛林公爵的动向，再次切断了军粮供给。戈德弗鲁瓦一怒之下，率领全军从金角湾附近迂回，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布阵。

由于拜占庭皇宫距离城墙不远，皇帝紧急派遣雇佣军组成的弓弩手守备队，在城墙上严阵以待，表示誓死守城的决心。但实际上皇帝和洛林公爵都没有发生冲突的打算。戈德弗鲁瓦主动退兵之后，皇帝重新恢复了军粮的供应。

尽管如此，充当说客的于格带回的消息仍然没有变化，令皇帝对这位法国王弟大为恼火。

然而，随着春天的临近，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得知了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和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的军队接近的消息。由于春天到来，博斯普鲁斯海峡恢复通航，自己的军队必须尽快一次渡过海峡。而这就需要征用许多船只。随着其他诸侯部队的到来，眼看着就要为了谁先渡过海峡起争执。

这样一来，洛林公爵除非主动申请在阿莱西奥斯一世的宣誓书上签字，属下的将士才能得到船只，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皇帝已经对戈德弗鲁瓦的执拗感到厌倦。因此，满心想着到了春天能够向圣地行军的公爵，心情起了很大变化。大概他的德意志人本性，也在此间三个月内和阿莱西奥斯一世打交道的过程中，向东方化的拜占庭人转化了。他也明白所谓忠诚的誓约，与其说是宣誓效忠，不如说是为达到目的而做的权宜之计。

洛林公爵的军队于1096年12月23日到达君士坦丁堡。而他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递交效忠拜占庭皇帝的宣誓书。经过其间不适宜海上行船的冬季，他直到三个月后才最终签字。此后洛林的军队终究还是顺利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渡海的时间定在4月4日，是戈德弗鲁瓦签字两天以后。大部队很顺利就从君士坦丁堡以东50公里处的拜占庭帝国最前线渡海到达了小亚细亚，前后只花了一夜工夫。

下一位面对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的诸侯，是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

波埃蒙多进宫觐见时，目光始终不离皇帝一寸，沉默着将阿莱西奥斯的要求前前后后听了个仔细。听罢皇帝的话，他当即拒绝了宣誓效忠的要求。在拒绝的同时，他依然死死盯着皇帝，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陛下同意任命敝人为拜占庭帝国军队东方战线的最高指挥官，敝人就当即宣誓效忠。”

波埃蒙多的话令皇帝沉默不语。对于这位公爵的军事指挥才能，阿莱西奥斯一世已经通过最近拜占庭帝国与诺曼人的战争有了充分的了解。皇帝不禁怀疑，此人是否想通过获得帝国的军事力量，达到将自己赶下宝座的真实目的。

正当皇帝陷入沉默中时，口角浮现微笑的波埃蒙多拿起桌上的宣誓书，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位完全不相信誓约的冒险家看来，企求诸侯效忠的阿莱西奥斯实在愚蠢不堪。

然而，作为波埃蒙多左右手而声名日隆的丹克雷迪，以其与生俱来的高傲气质，断然拒绝在宣誓书上签字。这位22岁的年轻人在全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才应舅父波埃蒙多的要求，极不情愿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后，于4月26日渡过海峡的波埃蒙多的军队，与先行宿营的洛林军队会师了。

之后抵达君士坦丁堡觐见皇帝的，是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和与他同行的主教阿德马尔。虽然主教是神职人员不必向皇帝宣誓效忠，由于他和圣吉尔一起率领大军，对皇帝来说二人都是必须接见的大人物。

虽然阿莱西奥斯一世为了本国的安全保障借助了西欧的军事力量，作为拜占庭人的他，内心深处还是对圣吉尔这样务农的拉丁人充满鄙视。而被召入皇宫签署宣誓书的图卢兹伯爵，面对比自己年轻5岁，身着华贵皇袍的拜占庭皇帝，说了一句不能忍住不说的话。

“我是为了在东方成就上帝的期望而来的。因此，我所肩负的义务是上帝赋予的，而我只对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罗马教皇效忠。”

他接着说：“因此，如果陛下能以拜占庭帝国皇帝的身份，同意将拜占庭军队交由我等组成基督教联军，而我自然也受陛下的指挥，我便非常乐意在陛下所要求的宣誓书上署名。”

这段话的意图相当凶险。完全依靠雇佣兵的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没有自身的军队。而如果拜占庭帝国有常备军的话，就没有必要向西欧求援了。此外，自身没有军队的拜占庭皇帝，又怎么可能担任西欧援军的总指挥呢？

阿莱西奥斯一世当然不会同意圣吉尔的这些话。他对此未作答复，只是坚持要求图卢兹伯爵在宣誓书上签字。

圣吉尔其实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首先，与其他已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队相比，他的人马姗姗来迟。因此，他也明白必须尽早渡海前往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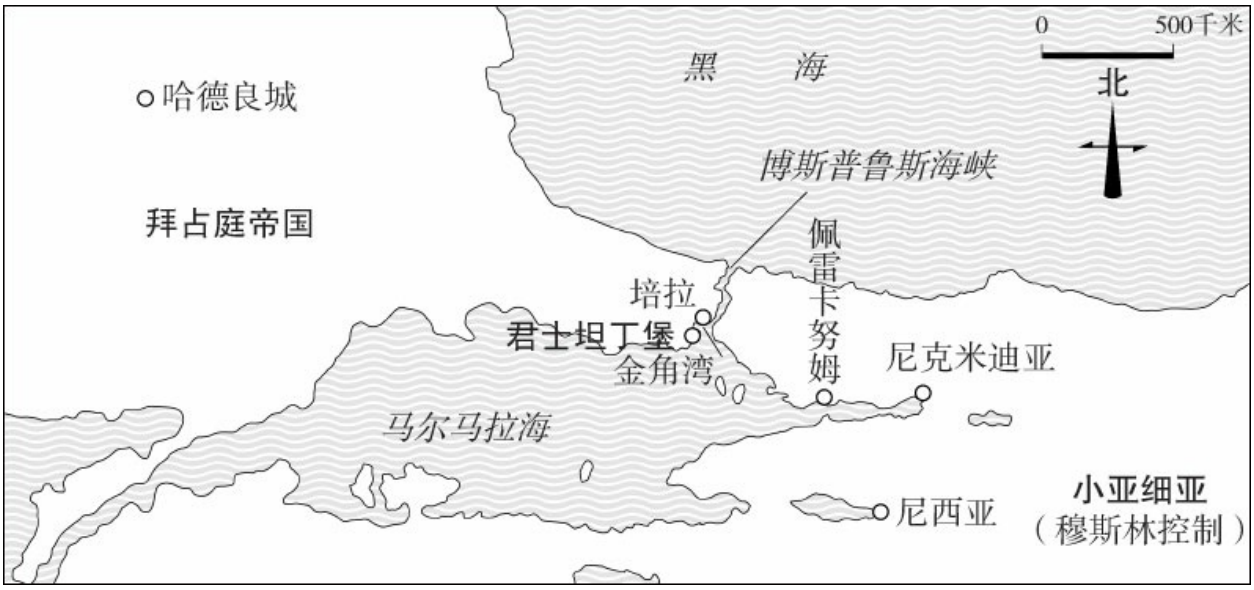
其次，出于与戈德弗鲁瓦和波埃蒙多相对抗的心理，圣吉尔认为，

如果跟阿莱西奥斯一世保持良好的关系，必然对自己较为有利。因此圣吉尔最终也在效忠的问题上妥协了。在加入补充条款后，伯爵在宣誓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加入的补充条款是这样说的：

“敝人努力维持对拜占庭帝国皇帝生命与名誉的尊重，并对企图侵犯皇帝生命与名誉的事件进行监督。”

单看这句话，我们不知道，十字军初占领所征服的地区之后，是如何尊重皇帝的名誉，抑或是如何对拜占庭皇帝有所侵犯的。至于圣吉尔为何对这句话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解释，大概是疲于皇帝的催促所致。总之，圣吉尔是唯一在宣誓书内加入补充条款的诸侯。



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

恐怕这位图卢兹伯爵是感到再没时间耽搁了。当时他已得知，洛林公爵的军队已经从小亚细亚向前线出发了。于是圣吉尔就加上了这条莫名其妙的补充条款，在宣誓书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他的部队在波埃蒙多的诺曼军队之后两天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至此，戈德弗鲁瓦和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率领的西欧北部十字军，波埃蒙多率领的意大利南部十字军和圣吉尔率领的法国南部十字军，全都进入了伊斯兰世界。

在圣吉尔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诺曼底公爵和布洛瓦伯爵的军队才到达君士坦丁堡。两人所带领的部下共计数百人，与此前各位诸侯的大军相比规模小多了。当得知此前诸侯都已向拜占庭皇帝效忠后，两人当即提交了宣誓书。

由于所带兵力太少，此二人在战场和外交场合都处于弱势。皇帝也没有花时间催促他们，只是赠送了一些私人物品。在布洛瓦伯爵给留在国内的妻子的信中，写下了下面的话：

“亲爱的阿黛尔，你的父王（即征服者威廉）曾经赠给我不少东西，但如果跟拜占庭皇帝赠送我们两人的奢侈品相比，父王赠送的真的算不上什么了。”

为后世版画家居斯塔夫·多雷所尽情描绘的君士坦丁堡的豪华气派，令西欧来的骑士惊叹不已。最后这两位贵族自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宣誓效忠皇帝之后，依然逗留在君士坦丁堡，直到听说前面的诸侯开始攻打尼西亚的消息，才动身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阿莱西奥斯一世皇帝每天都过着开心的日子。

隐士皮埃尔的十字军都是一无所有的贫民，非常难打交道。还好，皇帝将他们早早送到了海峡的对岸。

此后抵达的诸侯的十字军也不好对付。他们完全具备推翻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因此，皇帝坚持要十字军的领导人在效忠自己的宣誓书上签字。

此时阿莱西奥斯一世深信不疑的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农民们，根本

没有主见，早已习惯了他人的支配。

第三章 踏上通往安条克的长路

“法兰克人”

公元1097年春天，诸侯十字军进入的小亚细亚，正处于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当时的突厥人中，并没有共同的统治者。相反，其中两个部族为了争夺地盘，正互相争斗着。

以尼西亚为首都的苏丹刻勒支·阿尔斯兰统治着小亚细亚的西部，而达尼斯蒙德则以科尼亚为首都控制小亚细亚的东部。此二人在数年之前就开始了争夺地盘的战争。

以勇敢著称的阿尔斯兰只有16岁。但一年前隐士皮埃尔所率的十字军甫一进入小亚细亚就遭遇惨败，使他极为轻视西欧人的力量。尽管得知了诸侯十字军渡海的消息，他还是不为所动，继续与达尼斯蒙德交战。因此，当诸侯在城墙下布阵准备攻城时，尼西亚处于无城主的状态。

收到首都告急情报的阿尔斯兰急忙与达尼斯蒙德停战，然后带着先头部队火速赶回。这位突厥武将回到尼西亚时，看到的是包围自己首都的法兰克人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的穆斯林，无论是突厥人、阿拉伯人还是埃及人，都将西欧人称为“法兰克人”，而将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称为“罗马人”，因为拜占庭帝国官方自称为罗马帝国。

至于“法兰克人”这一称呼，总的来说是准确的统称。西欧人习惯自

称为“欧洲人”。但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作为整体的“欧洲”的概念，因此“欧洲人”也是个不存在的概念。

在欧洲中世纪，近代以来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没有明确的区分。因此，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就无从区分了。

例如洛林公爵就同时有法国和德国的血缘。

而图卢兹伯爵是法国南部的封建领主，可以算作是法国人。但他的妻子则是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同在法国东北部的法国人，则包含有许多北欧人的血缘。

此外，对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诺曼人来说，血缘的区分就更为模糊了。他们很善于适应不同的地域，除了受到“诺曼人征服”的英格兰之外，诺曼底地区的法国人、意大利南部的意大利人，都以诺曼人为主体。因此不到200年以后，作为整体的诺曼民族消失了，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他们自身“积极的消灭”。

在本书中提到的意大利诺曼人，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和他的外甥丹克雷迪，统治着意大利，也使用着意大利语，因此可以说是被意大利化了。德国人也使用德语。另如使用英语的英格兰狮心王理查一世的父亲是法国人，而他在法国境内也领有广大的土地。

这就是当时西欧的实际情况。因此，穆斯林也只有将这些人统称为“法兰克人”了。总之，在不存在作为整体的“欧洲人”的时代，这些欧洲人就被叫作“法兰克人”。

但对于穆斯林称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情况又略有不同。同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柏柏尔人，以及南欧荒岛上出没的一些海盗，将地中海对面的南欧人也称为“罗马人”，正如《罗马灭亡后的地中

海世界》中介绍的。这些南欧“罗马人”并非希腊人。穆斯林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长期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

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官方一直认为自己是古代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然而伊斯兰世界是在古罗马帝国完全灭亡以后，于公元7世纪兴起的。穆斯林并没有见过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他们所见到的罗马人，都是基督教化的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因此，穆斯林对拜占庭帝国本土的希腊正教徒和南欧的天主教徒，统称为“罗马人”。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古代罗马人的情况，这样称呼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我们当今的人，对1000年前的穆斯林不知道的“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即基督教化之前的罗马人有所了解。因此，穆斯林将拜占庭帝国的臣民称为“罗马人”，可能会造成我们认识上的混乱。而穆斯林所称的“法兰克人”即西欧人，把穆斯林所谓的“罗马人”叫作“希腊人”。因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事实上是属于希腊民族的。

此外，西欧的“法兰克人”把当时的穆斯林也统称为“阿拉伯人”。而其实穆斯林当中有突厥人、库尔德人等不同民族的成分，但西欧的基督徒将他们统称为“阿拉伯人”。这大概是因为《古兰经》以阿拉伯语写成，而宗教人士也以阿拉伯语解释经典，就给西欧人留下了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的印象。

这个东西方都以偏概全地认识对方的中世纪，就是十字军的时代。

攻占尼西亚

尼西亚是君士坦丁大帝最初召开基督教公会议的地方，在古罗马时代就是著名的古城。此城有完备的防御体系，6公里长的城墙将城市完全包围。

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尼西亚居民多为希腊人，但在伊斯兰化300年之后，和中东地区一样，基督徒已经沦为二等公民。他们不能坐车或骑马，也被完全禁止携带武器。尽管如此，基督徒数量仍然很多。

这一时期的小亚细亚的统治阶层是塞尔柱突厥人，而城市的主要居民则是希腊人。尼西亚的情况便是如此。

尼西亚的领主阿尔斯兰得知诸侯接近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拜占庭皇帝又像往常一样派遣法兰克人雇佣兵，试图夺回旧土。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阿尔斯兰没有料到的是，法兰克人带着宗教狂热扑向自己的首都。

而此时的十字军并不关心是否能占领这座首都，他们只是朝着尼西亚的方向进军。在沿着从小亚细亚西北部向东南部延伸的未知道路进发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保证的是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而尼西亚就是这条道路的出发点。

4月26日，两支十字军部队首先开始向尼西亚进军。第一支是戈德弗鲁瓦率领的洛林军队，沿马尔马拉海海岸，从尼科米迪亚附近经过，到达尼西亚。这支部队在行军途中遇到了隐士皮埃尔所率领的贫民十字军的幸存者。

稍后出发的是波埃蒙多率领的南意大利军队。由于波埃蒙多计划与

拜占庭海军共同作战，他事先返回了君士坦丁堡。这支军队实际上由丹克雷迪率领。

两支部队在5月6日到达尼西亚城下，准备围攻这座城市。

两军在城下分别列阵。其中戈德弗鲁瓦的军队在北侧城墙下，丹克雷迪的军队在东侧城墙下。5月13日，波埃蒙多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三天以后的5月16日，圣吉尔率领法国南部军队也来到了尼西亚。他的军队在城南布下战阵，其中包括弗兰德斯伯爵率领的500骑兵。

至于6月3日到达尼西亚的诺曼底公爵和布洛瓦伯爵是否参加了攻城战，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无从知晓。他们可能还沉溺在对君士坦丁堡的赞叹之中。

在唯一没有被包围的城西一侧，城墙正面对着一片湖泊，防御薄弱。湖泊通往不远处的马尔马拉海，因此这一侧的进攻由拜占庭海军负责。拜占庭军队主要是海军，并担负着军粮供应的任务。皇帝自己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驻跸在诸侯后方的前线基地帕加马。

虽然诸侯的十字军都是西欧军队的精锐，但是他们并未携带任何攻城武器。如果直接攻击面前坚固的城防，会给自己的部众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前两路诸侯等待圣吉尔的4天之内，突厥人在尼西亚的守备部队在城主不在的情况下，意志坚定地在城墙上防守，密切注视着城下十字军的一举一动。

5月21日，与达尼斯蒙德休战的阿尔斯兰亲率一万突厥骑兵回师尼西亚。由于城中尚有他怀孕的妻子，这位年轻的突厥骑士抱着必死之心投入战场。

突厥军队从南边赶来，首先面对的是城南圣吉尔的部队。

圣吉尔没有料到背后突然出现敌人，因此其中弗兰德斯伯爵的军队刚一遭遇突厥骑兵就陷入了苦战。但随着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以及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的赶来，西欧诸侯与塞尔柱突厥人的第一次战斗以“法兰克人”的胜利而告终。

从两军的牺牲者数目就可以看出这场战斗的激烈。突厥军队中战死者达到4000之众，其余部众逃离了战场，而战胜的诸侯一方，死者也达到2000人。年轻的苏丹阿尔斯兰最终败退。

此后，胜利的西欧诸侯军队将战死的突厥士兵中2000人的头砍下来，其中1000投入尼西亚城中，另1000呈给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由此，十字军的事迹在西欧广为称颂。

关于这段悲惨而残酷的事迹，在近现代西欧研究者笔下，投入城内的人头数量是实际情况的几倍，但他们却没有提及其中另一半送给拜占庭皇帝的人头。

而在伊斯兰史料中，则完全没有此事的记载。

在我看来，关于此事的记载完全有失夸张。在这场惨剧之中，胜者自然记下各种夸大的数字。而对于败者来说，自然不会因强调自身的悲惨而留下任何记载了。

以此事件为例，当历史研究者阅读这类史料时，必须直面的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事实，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有与战争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留下的记载。

但在十字军的历史中，没有这样的第三方记载。

第二，要参考有着如实记录的史学传统的民族所留下的记载。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秉承这样传统的国家有两个。其一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其二是古代的罗马帝国。

前者作为商业民族，从其商业贸易开始之初就保持数字记录的真实性；后者则是不同宗教与文化民族结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有必要尽可能正确地把握事实情况。在十字军的时代，罗马帝国早已灭亡，而十字军东征与威尼斯共和国并没有多少关系。

而不论有多少突厥士兵的人头被扔进尼西亚城，对城内守军的士气都是巨大的打击。当苏丹阿尔斯兰在战斗结束后败走，死亡的士兵首级又被扔进城内以后，守军士气跌落到极点。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得知战斗胜利的消息以后，更是抢在各路诸侯之前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到6月17日，诸侯已经将战死者悉数埋葬，负伤者也都得到了初步的治疗。向尼西亚发起总攻的准备在这一天宣告完成。第二天，十字军准备在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攻城，计划到日没时分攻陷尼西亚。

在6月18日一早，各路军队整齐列于城下，等待指挥官的攻城命令。

然而就在此时，尼西亚城墙上突然响起呼喊声。众人顺声望去，只见城墙最高处的塔顶缓缓升起了一面拜占庭帝国的国旗。

尼西亚城就这样对拜占庭帝国不战而降了。诸侯对此表示异常愤慨，年轻的丹克雷迪更是狂怒不已。

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本来就没有打算靠武力夺回尼西亚。毕竟它是小亚细亚距离君士坦丁堡最近的防卫坚固的都市。其居民大多数是希腊人，信仰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希腊正教。皇帝相信，和平取得尼西亚之后，这座城市就可以作为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收复小亚细亚的前沿阵

地。

因此皇帝从拜占庭军队所围困的城西一侧派遣密使入城。密使提出，在保障包括突厥人和希腊人在内全体居民的安全的前提下，整座城市向帝国投降。

城内守军首领见友军败于法兰克人之手，苏丹本人也仓皇逃走，最终决定为了城内居民的安全，接受皇帝的投降建议。苏丹怀孕中的妻子和新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因此得以在拜占庭军队的护送下，前往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在那里得到安全保证。

诸侯尽管对这一做法愤慨不已，却无法应对早已将尼西亚收入囊中的拜占庭皇帝。他们众人中也无人想在这座城市称王称霸，而是准备继续向东进军。而皇帝则从突厥军队回师的5月21日到总攻尼西亚城的6月18日至28日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尼西亚和周边的地区。当局势明朗之后，他无视诸侯的抗议，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向诸侯展示了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所签署的宣誓书。他要求诸侯按照宣誓书中的要求，效忠自己。因此，在皇帝的命令下，原来守城的突厥人被赶走，取而代之的是拜占庭的警备部队。

从这次尼西亚之战开始，不仅是怒不可遏的丹克雷迪，全体诸侯心中都对阿莱西奥斯一世充满了不信任。

但对诸侯来说，皇帝的存在仍然十分必要。从军粮的补给，到对陌生的小亚细亚道路的向导，都需要仰仗皇帝。虽然军粮可以靠在穆斯林地区的掠夺来补给，在小亚细亚的行军路线则必须依赖熟悉本地地形的希腊人开路。而十字军行军的向导都是由皇帝派遣的。

6月26日，诸侯的十字军在希腊人向导的带领下离开了尼西亚。沿着古罗马的大道，他们逐渐深入了小亚细亚内地。

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正等待着这些法兰克人。在尼西亚之战中败退的苏丹阿尔斯兰，成功说服了自己的仇敌达尼斯蒙德派出军队，共同对抗法兰克人的威胁。

多利留姆之战

诸侯的十字军从尼西亚向东南方向前进30公里以后安营扎寨，并在当夜决定兵分两路向小亚细亚腹地行军。

先出发的第一部分军队，由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率领，除南意大利诺曼军队外，还包括法国北部的布洛瓦伯爵和弗兰德斯伯爵的部队。

在此之后稍晚出发的第二部分，则是不愿屈于波埃蒙多之下的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所率领的来自法国南部的军队。这部分人马还包括率领着更强大部队，与穆斯林敌对意识强烈的洛林军队。此外，法国王弟于格也在此中间出发。

此外还有相当于前两部分部队1/10的主教阿德马尔所率的小部分兵力。这支部队的向导并非拜占庭皇帝所派，而是主教自己寻找的希腊天主教徒。根据阿德马尔的命令，他们从古罗马的大道折向山间小道行军。由于部队人数较少，阿德马尔的部下得以在山中前进。

勒布伊主教阿德马尔是功勋卓著的神职人员，是代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立场参与十字军的。他的首要任务是负责拯救士兵灵魂的工作，而在行军过程中则逐渐展露了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因而也能在肉体上救助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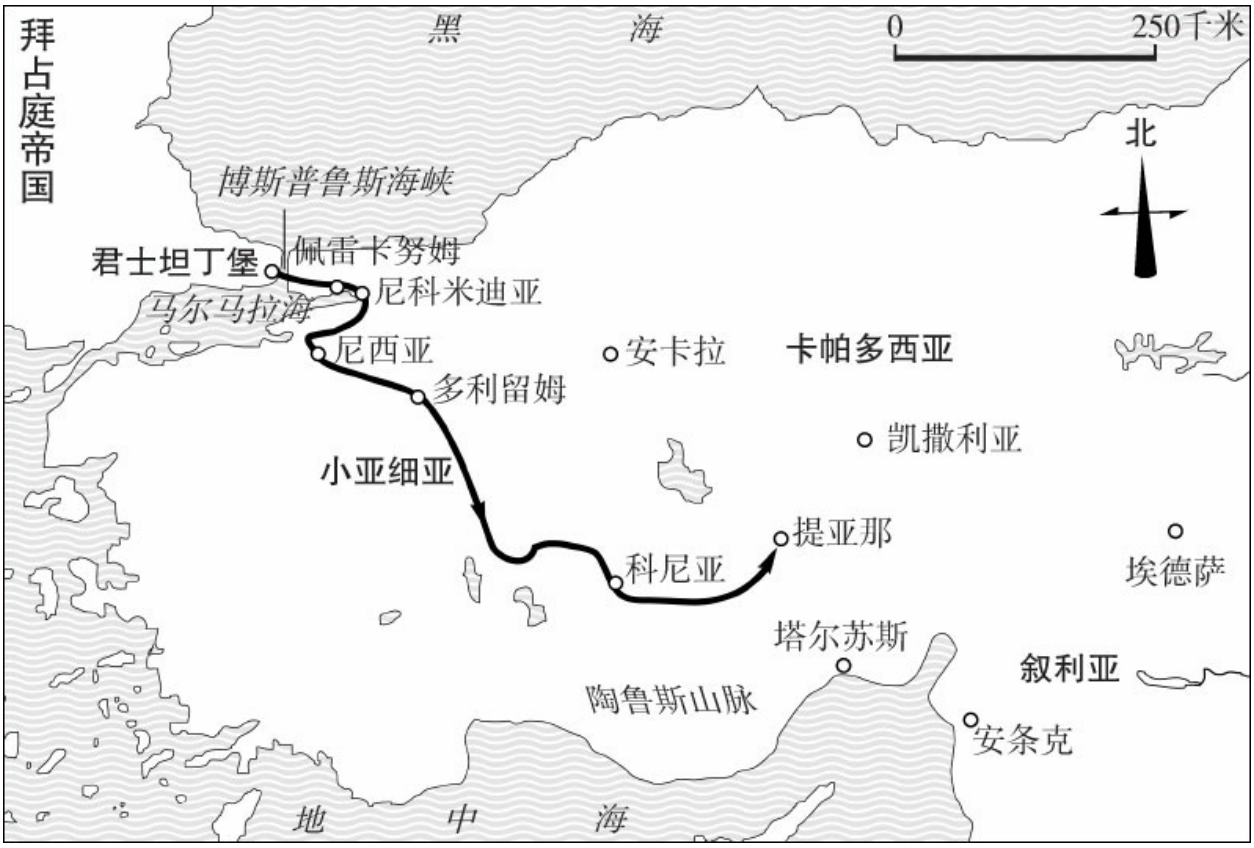
波埃蒙多所率的第一部分军队，于6月30日到达了多利留姆（今土耳其的埃斯基谢希尔）。他准备在此处过夜，遂即命令部下设置营帐。从当天中午开始，部队就设下帐幕。

就在此地，阿尔斯兰率领的塞尔柱突厥先头部队袭击了波埃蒙多的十字军。由于多利留姆位于山与山之间开阔的谷地，是非常适合开展伏

击战的区域。虽然达尼斯蒙德没有参战，同属塞尔柱突厥人的卡帕多西亚埃米尔哈桑也和阿尔斯兰并肩作战。至少在名义上，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倾巢出动，展开决定性的攻击。

未雨绸缪的波埃蒙多立即命令全军迎击。无法作战的神职人员和伤病员藏在装载物资的马车围成的保护圈中间，躲避冲入谷中的突厥人。全军分成三部分，从马车轮之外冲出去，积极抵抗敌人的冲锋。三部分军队分别由丹克雷迪、弗兰德斯伯爵和波埃蒙多本人率领。

塞尔柱突厥人在作战时，一般首先按照东方传统的战法，以大量弓弩射击的方式发起战斗。当看到敌兵纷纷倒下，四处发出痛苦叫喊之时，再投入骑兵冲锋。在多利留姆，突厥人也是以这种方式出战的。



十字军在小亚细亚的行军

纷纷中箭的轻步兵一个个倒了下去。以盔甲蔽体的重装骑兵，在如

骤雨般落下的箭矢中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状态。从山上冲下的突厥军队居高临下发起冲锋，而处于山脚下的十字军相当不利。前面的突厥兵士倒下了，后面的便立即迎上来。小亚细亚全体塞尔柱突厥军队集中在多利留姆，其数量相当之多。

在陷入苦战的波埃蒙多的部队中，同行的神父不断为死去的兵士祈祷着，恳求上帝让这些亡人在天堂得到解脱。另一边得知友军告急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则只派出了50名骑兵支援。还好圣吉尔率领的部队很快就到达了战场。

率领突厥军队的阿尔斯兰以为敌人只有波埃蒙多率领的第一部分那么多，完全没料到第二部分十字军前来投入战斗。圣吉尔军队的到来，使战事完全朝着十字军有利的方向逆转。他当下决定了阵容的安排。

十字军的左翼，是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率领的南意大利军，加上诺曼底公爵和布洛瓦伯爵率领的军队。

阵营的中央，是圣吉尔的来自法国南部的军队，以及弗兰德斯伯爵的500骑兵。

右翼则是戈德弗鲁瓦率领的德意志洛林军队和于格率领的法国军队。

他将轻装步兵布置在军阵后方，而以重装骑兵为先头部队。这些骑兵和马匹身上，都覆盖着小铁环编成、上覆铁片的锁子甲，武器则是标枪和长剑。十字军以这样的阵容攻击突厥军队。

以重装甲覆盖的士兵，即使是被大量箭矢射中，也不会受到损伤。只是他们前进的速度比较慢。各位军士整齐前进的过程中，竟不为枪箭所伤。这让突厥人第一次领教了西欧重装部队的厉害。

当发现以强弓硬弩都无法伤到十字军时，突厥人慌了阵脚。他们不

顾年轻的阿尔斯兰高喊的激励声，开始逐渐逃出了战场。

这些逃兵刚离开山谷，就在蜿蜒的山道间遭遇了主教阿德马尔率领的部队。虽然他的人马不多，但也足够堵住逃出多利留姆的山间道路。

现在轮到突厥人被包围了。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突厥军队，也知道自己无法抵御十字军的进攻。

到落日时分，战场上留下了3000突厥骑兵和2万多突厥步兵的尸体。

而待突厥人逃走之后占据其大本营的西欧诸侯，十分惊诧于其领主在营帐内留下的大量贵金属和奢侈品。营地内还留下了不少阿拉伯产的骏马和上等的马具。东方的统治者们习惯于在出征时带上自己全部的财产，因此十字军缴获颇丰。

多利留姆的战斗以十字军的大胜而告终。小亚细亚所有的塞尔柱突厥军队，在这次战役后宣告败北，从此在整个小亚细亚范围内不再有阻挡十字军前进的障碍了。两次败于基督徒对手的苏丹阿尔斯兰的再度崛起，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然而获胜的一位法国士兵却这样描述突厥人：

“他们真可称为是无比勇敢的战士。如果他们也是基督徒的话，我想一定可以成为我们亲密无间的战友。”

并未放弃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多利留姆战役之后改变了战略战术。他们不再使用大部队集结的方式作战，而是以小股兵力展开游击战。

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而突厥人熟知各地的地势。他们采取不断游击袭扰的策略，冀望使行军中的十字军感到不安。在见不

到敌人的情况下屡屡受袭击，自然会滋长兵士的不安情绪。此外，如果采取大规模战役的方法作战，即使取胜也会大大消耗有生力量，而游击战的结局则是即使失败也能取得相当的战果。毕竟，对于穆斯林来说自己是在家乡作战的“主军”，而深入小亚细亚的十字军则是“客军”了。

在勇猛的突厥军队面前，十字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与多利留姆之战中突厥军队2.3万人的损失相对照，十字军方面折损了4000兵力。其中有四位有名的贵族战死。诸侯从此决定一同行军，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这一阶段，无论是阿尔斯兰、卡帕多西亚的埃米尔哈桑，还是未参战的达尼斯蒙德，都处在居所不定的游击状态中，但十字军并不知道他们的动向。在多利留姆战败的塞尔柱突厥军队，正是这样依靠着游击战术且战且退。

从一开始就负有防御责任的阿尔斯兰，带领着全体突厥人撤退。他们不仅实施游击战术，整个民族甚至到了坚壁清野的状态。

十字军所到之处看见的都是已经被烧毁的农田，地里完全不见家畜的影子。所有的水井都填死了，蓄水池内则投下了毒药。村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烟。而拜占庭皇帝也没有遵守提供军粮补给的约定。行军过程中还不时发生满载军粮的马车被突厥人劫掠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窘境，其实是由于中世纪的部队没有后勤补给的概念。因得不到粮食供给而逐渐陷于饥饿的十字军骑士们，最终不得不杀掉自己的马匹，而转为徒步行军。因体力不支而逐渐掉队的士兵，则往往遭到山谷中或山顶埋伏着的突厥弓箭手的射杀。

就这样直到当年8月中旬，十字军终于抵达科尼亚城。在忍受突厥人的坚壁清野和游击战一个半月以后，他们总算可以在这座城市稍作休整了。

位于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科尼亚，在13年前还是拜占庭帝国的领

土。当十字军进城时，城内的居民都是希腊人。曾经统治科尼亚的突厥人得知十字军逼近城市，就都携家带口地逃走了。

如今从飞机上眺望小亚细亚，只能看到荒凉的山野。但如果在地上旅行，这里的物产其实很丰富。各式各样的农产品琳琅满目，畜牧业的发展也非常可观。小亚细亚拥有广大的平原地区所没有的许多河流带来的丰沛水资源。自古以来，其沿海地区就以适宜通商而闻名，而以农牧业为主的内陆地区，也是一派繁荣的景象。古典时期的多个民族都以获取小亚细亚作为战略目标，而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自然也执着于收复这片失地。

古都科尼亚是集中了小亚细亚风格的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由于居民的友好相待，进入城市并不用耗费武力。因此十字军在科尼亚得以休整。

然而，在这座令人安心的城市休整期间，十字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故。也许是由于太过安定，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病倒了，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则受了伤。

圣吉尔病得相当严重。他接受了主教阿德马尔的临终告解和涂油仪式。如果这位曾为十字军东征而无比狂热的大贵族就此撒手人寰，他也只能在病床上静静地接受55岁升天的事实。

而37岁的戈德弗鲁瓦之所以受伤，则是因为在城郊狩猎时的一次意外。他听说郊外有熊出没，就试图独自将其捕获，结果反而被熊袭击。虽然戈德弗鲁瓦最终得以将熊杀死，但他的大腿被熊咬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由于公爵独自一人与熊搏斗，当随从发现他时他已经大量失血，奄奄一息。

尽管如此，中世纪的骑士身体都是非常强壮的。圣吉尔并没有如期前往天堂，而戈德弗鲁瓦虽然不能骑马，却也在逐渐恢复之中。

诸侯的十字军从科尼亚出发，向东行进。病重的圣吉尔躺在马车内，身体衰弱的戈德弗鲁瓦则被抬上担架行军。这两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仍然有着面对任何困难绝不低头的青年一般的勇气。47岁的波埃蒙多一直与伤病无缘，而他却是与其他诸侯不同的利己主义者。所谓利己主义者，在对自己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不会做出干涉别人行动的事来。

陶鲁斯山脉

在诸侯到达小亚细亚东南部的提亚那城以后，就必须转向南去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了。

提亚那以南横亘着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分开的陶鲁斯山脉。虽然翻越此山脉的道路距离最短，当地的向导却建议十字军沿另一条道路行军。这位希腊向导相信，陶鲁斯山中一定埋伏着突厥人的军队，而如果向北经过凯撒利亚（今土耳其凯赛里），并从此处绕道进入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行军，然后向南接近安条克，一路上会安全得多。

向导的建议遭到了刚刚年过30岁的鲍德温和22岁的丹克雷迪的反对。这两人对在山中遭遇突厥军队毫无恐惧。于是戈德弗鲁瓦同意划拨一部分军队交给鲍德温指挥。而丹克雷迪虽然在其舅父波埃蒙多看来有些独断专行，却也得到了率领一部分人马的权力。于是此二将的先锋部队在9月10日出发了。他们并未一同行军，而是分别进山。

而十字军的主力部分则选择了向导建议的距离较长却相对安全的路线。他们行进到凯撒利亚的路上一直都没有出什么问题。但当十字军离开凯撒利亚向南迂回，往叙利亚的方向前进时，遭到了路上埋伏的突厥军队的袭击。

这支突厥军队是由卡帕多西亚埃米尔哈桑率领的。在稍作交战后，他们再次被十字军击退了。这次遇袭使从病中恢复的圣吉尔、伤愈的戈德弗鲁瓦和机智的波埃蒙多都相信，拜占庭皇帝派来的向导是靠不住的。

诸侯都知道，阿莱西奥斯一世往十字军经过后的小亚细亚各城市派遣军队，使这些城市一个个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对诸侯来说，小亚

细亚不过是通往圣地的必经之路而已。因此他们当中任何人都不关心拜占庭皇帝会怎样收复这些城市。但是，在十字军向安条克逼近的过程中，诸侯不希望遇到任何阻碍。

然而也没有证据显示，希腊向导是故意引导十字军前往有突厥军队埋伏的道路上的。但诸侯还是不能相信这位向导。除了容易轻信他人的圣吉尔以外，诸侯大多不信任拜占庭皇帝。

关于十字军向导具体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为十字军在小亚细亚开路的总向导，却的确是颇具名望与地位的人士。他的名字叫塔蒂基奥斯，曾经担任拜占庭军队的司令官，是阿莱西奥斯一世的家臣。因此不难想象，塔蒂基奥斯是按照皇帝的旨意行动的。

在击败伏击的突厥人之后，十字军的担忧大大减少了，因为他们进入了居住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的地区。虽然和西欧天主教徒分属不同的宗派，亚美尼亚人也是基督教徒。而他们一直孤立于穆斯林中间，因此对将自己从伊斯兰势力压迫下解救出来的十字军怀着特别的好感。

诸侯的十字军经过亚美尼亚人地区以后，就来到了通往圣地巴勒斯坦的第一道关卡安条克城。在1097年秋天，十字军到达了这一地区。

另一方面，鲍德温和丹克雷迪的军队没有遇到突厥人的偷袭，顺利地翻越了陶鲁斯山脉，进入了沿海的基利基亚地区。

鲍德温从其兄长戈德弗鲁瓦那里要来了500骑兵和2000步兵，而跟随丹克雷迪的骑兵和步兵都不到鲍德温部下的一半。

虽然只有这一点儿兵力，丹克雷迪也成功占领了基利基亚最大的城市塔尔苏斯。一听说十字军要来，突厥守军早就没了踪影。因此从不放过好机会的丹克雷迪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城。当然，此时正是大好的机

会。在城墙和塔楼上高高飘扬着的，都是丹克雷迪和波埃蒙多所属的阿尔塔维拉家的蓝底红白格绶带军旗。

几天以后，鲍德温的军队也到达了塔尔苏斯。他自然对比自己年轻10岁的丹克雷迪的行为感到不满。鲍德温入城会见丹克雷迪以后，当即表示，十字军征服的城市，应按照全体诸侯签字的宣誓书中的约定，归拜占庭帝国皇帝所有。但丹克雷迪对此只是一笑置之。鲍德温敢于干涉丹克雷迪的做法，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后者两倍的兵力而已。

丹克雷迪也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于是，他将塔尔苏斯城主的位置让给了鲍德温。在城墙的高塔上，阿尔塔维拉家的旗帜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则是洛林家族的旗帜。这是两人相互妥协后的结果。

塔尔苏斯城主之争，不过是两个无赖之间争议的一幕而已。而下面的事件说明，这两位无赖都具备发现偶然事件重要性的能力。

正当鲍德温和丹克雷迪驻在塔尔苏斯时，一艘海盗船沿河上溯到达了这座城市的港口。船长是法国人，而水手多为丹麦人和弗兰德斯人，全体都是基督徒。他们自称前来参加十字军，但实际上是利用十字军东征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亡命之徒从北海出发，经过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一直航行到地中海东岸。

刚刚成为塔尔苏斯城主的鲍德温得知了这只海盗船停泊在港口的消息。他随即在城中召见了海盗的首领。在交谈过程中偶然发现，船长正是鲍德温所在的洛林地区的属民。

未曾料想在遥远东方遇到故乡人的海盗首领对鲍德温非常感激。鲍德温倒是没有觉得感动，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利用海盗的力量。

鲍德温于是就把海盗首领任命为自己的副将，而将自己2500人中的300交给这位新将领统率，并以十字军的名义任命其为塔尔苏斯的警备

司令。这令海盗们愈发感激，因为这些亡命之徒竟然也可以参与上帝所期望的事业了。鲍德温在向安条克南下的过程中，回到了十字军的大队伍中间。这是因为他得知了自己离开神职之后所娶的妻子因重病倒下的消息。

丹克雷迪也意识到了回到十字军大部队的必要。他不是狡猾的鲍德温的对手，却是富有责任感的青年。因此，丹克雷迪动身向大部队的行军方向靠近。

丹克雷迪所率的1000多人的军队，足够在基利基亚的各个城市之间穿行了。这一地区位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接壤的地带，因此也是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想占有的土地。但由于十字军的占领已经是既成事实，皇帝最终放弃了进占基利基亚的打算。鲍德温和丹克雷迪并不知道皇帝的不快。对于一直拒绝在效忠皇帝的宣誓书上签字的丹克雷迪来说，在基利基亚的行军伴随着霸道的快感。

这两位年轻领主从塔尔苏斯开始在基利基亚境内的行军，为以夺回圣地为目的的十字军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自由行动扫清了障碍。而与此同时，这些从西欧来的天主教徒，与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正教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尽管鲍德温丢下在基利基亚海岸独自行军的丹克雷迪，火速与大部队会合，他还是没能在妻子去世前赶到诸侯的军营。回到大本营之后，鲍德温将海盗加入的事告知了各位领主。

这一事件引起了诸侯的兴趣。既然远在北欧的海盗能一直航行到小亚细亚加入十字军，十字军为什么不能利用在地中海区域内一直通商的基督徒海上力量呢？

如果使用西欧的海上力量进行补给，就不必依赖拜占庭帝国的船只了。从此以后，第一次十字军逐渐开始依靠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

大利的滨海城邦进行斗争。

夺取埃德萨

鲍德温在诸侯面前一定还提及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与其成为朋友的亚美尼亚领主的兄弟，埃德萨的领主托罗斯请求十字军支援，以抵抗来自摩苏尔的穆斯林军队的进攻。

由于这一请求是鲍德温在基利基亚时就接受的，他决定独自前往埃德萨协助亚美尼亚人。当然，这还要仰仗其兄长戈德弗鲁瓦的兵力。

在此处我们必须对以下的事项有所认识。

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人认识到十字军是打着宗教旗号的远征军。一开始，穆斯林普遍认为十字军是拜占庭帝国雇来打仗的佣兵。跟十字军作战的塞尔柱突厥领主也以为他们是想收复旧土的拜占庭皇帝雇来的，因此其所展开的防御作战的目的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地盘。这些突厥人之所以拼死战斗，并非因为对方是基督徒，而是将十字军看作夺取自己领地的侵略者。

但当穆斯林得知十字军从小亚细亚西北部一路行军到东南部，却并没有在中近东占领土地，他们心中不禁怀疑起这些法兰克人的动机来。

这一时代，东方的穆斯林领主们正为领地相互斗争着。而当新的侵略者闯入以后，他们就逐渐团结起来。

作为亚美尼亚派基督徒的埃德萨领主，正为了领地同穆斯林的摩苏尔领主交战。埃德萨领主和亚美尼亚领主之间的良好关系，并非因为二人都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亚美尼亚没有侵略埃德萨的意图而已。而埃德萨领主通过亚美尼亚人请求天主教徒鲍德温来抵御摩苏尔领主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他的打算不过是此时中近东实际情况的

反映罢了。

因此，当时东方的一切纠纷都不是宗教问题，而只是领土问题。直到80年后萨拉丁的时代，伊斯兰世界才知道这些西欧来的基督徒远征军的目的是在上帝的旗帜下，击败穆斯林并收复圣地，建立十字军的国家。

穆斯林很自然地认为十字军是以占领地盘为目的的军队，只不过是从遥远地方来的新侵略者而已。当然，在十字军中，也有不少以获取东方领地为目的的领导人，因此也不能说伊斯兰世界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基督徒也好，穆斯林也好，在11世纪末，一城的领主无论向谁求助，双方都必须是同一宗教内的教友。这在充满领地扩张念头的中近东领主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接受支援请求的鲍德温和得知埃德萨城主要求的诸侯，首先要考虑的是支援这座城市的战略意义。

为了夺回耶路撒冷并将其一直置于基督徒的控制之下，必不可少的是夺回这座圣城的北大门安条克。而如果想防御穆斯林对安条克的进攻，将其东北的埃德萨控制在十字军手中就是万全之策了。因此，援助并控制埃德萨对十字军东征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拥有了埃德萨，会使攻击安条克的十字军没有后顾之忧。

回顾古代战争的历史，从美索不达米亚向西进攻的路线中，如果向西方直行，虽然距离较短，却因为叙利亚沙漠的阻挡而无法通行。商队纵然可以穿越沙漠，但远征的大军无法从其中通过。

因此，每当军队从中东向近东攻击的情况下，都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再从其上游的城市转向西行军。而古罗马帝国自西向东的攻势，则是沿着同一路线反方向行军的。今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埃德萨，依然拥有绝佳的战略位置。

我们自然无法知道30多岁的鲍德温是否了解到埃德萨城的重要性，也无从得知接受了埃德萨请求的各位诸侯中，是否有人认识到这座城市对于十字军的战略价值。而留下关于第一次十字军记载的神职人员，往往是最缺乏军事眼光的。毕竟人们有着只记载自己所关心事务的倾向。

然而，深入阅读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之后，我可以大致得知诸侯的看法。事实上，当鲍德温决定离开十字军大部队，率兵前往埃德萨时，没有一位诸侯站出来反对。也就是说，没有人对他不参加即将开始的安条克之战提出异议。

我们并不知道独自前往埃德萨的鲍德温所率军队的准确数量。估计他此时的兵力应该比不上翻越陶鲁斯山时从兄长戈德弗鲁瓦处借来的那些人马。但这支不到500骑兵和2000步兵的部队已足以令埃德萨的城主托罗斯大喜过望了。

然而一开始托罗斯只想把鲍德温任命为雇佣兵队长，于是拿出钱来准备交给十字军。洛林人这时回答说自己并不在乎钱。对此心存感激的托罗斯当即决定将鲍德温收为养子。由于托罗斯年龄已经很大而没有儿子，他便提出举行正式的仪式，认洛林人为养子，并由其负责守卫埃德萨。鲍德温欣然同意了。

收认养子的仪式在埃德萨城中心的广场上隆重举行。

仪式刚结束不久，托罗斯就被暗杀了。在伊斯兰史料中，他是被鲍德温手下所杀，而实际上这位老领主是为自己的仇人所杀，鲍德温虽然有所疏忽，却并未帮助暗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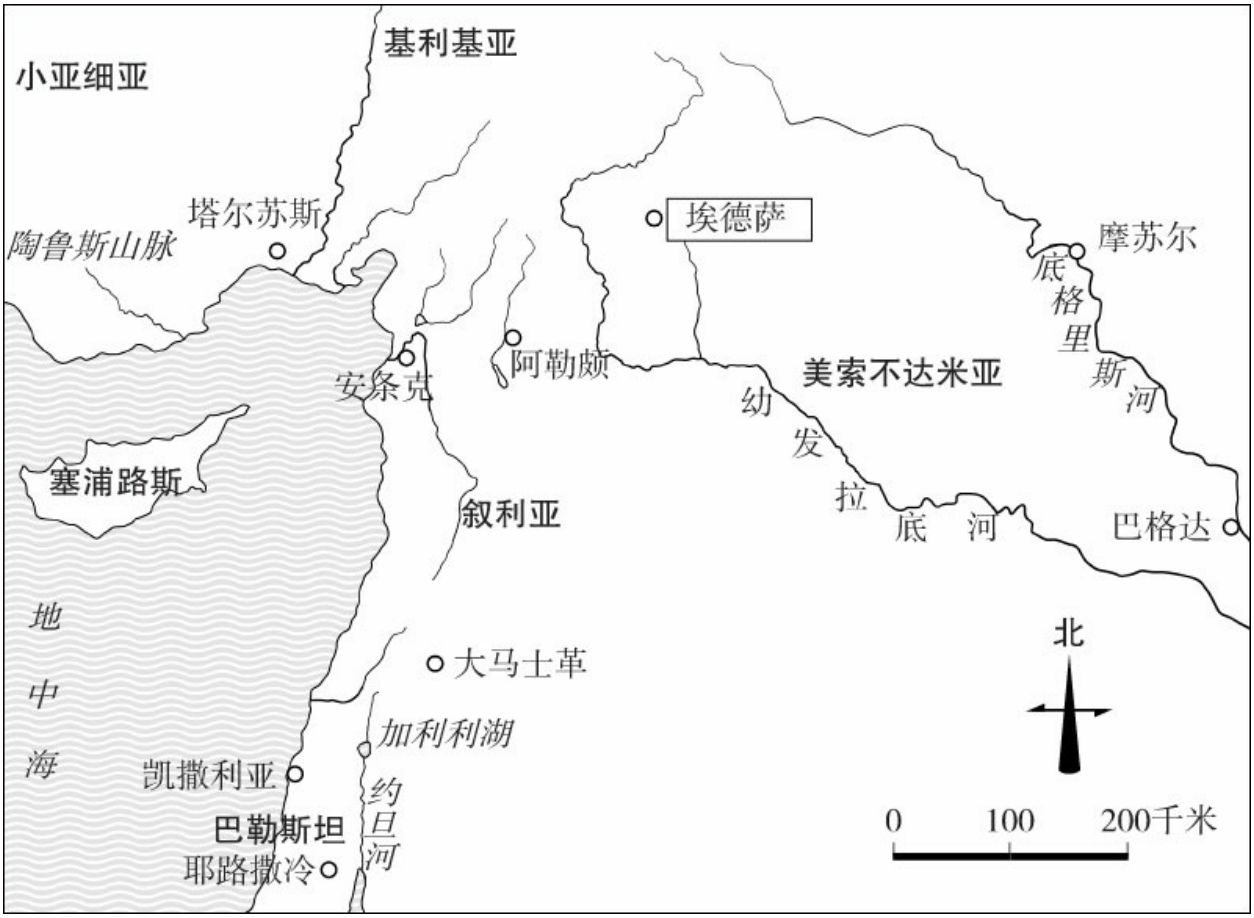
老领主死后，新认的养子鲍德温自然成为了埃德萨城的新领主。这位西欧的“居家骑士”，离开故乡一年后就拥有了近东重镇埃德萨城。

鲍德温这一路行军可谓非常顺利。而他也很快就满足了这座出征时

并不知道的东方城市里居民的期待。

十字军时代东西方平民的愿望，都是受到能保证自身安全，而又只征收较低赋税的贵族的统治。只要能满足以上两点，他们对于统治者是谁并不在意。虽然埃德萨的居民将十字军看作一群侵略者，但他们也并不介意受到天主教徒的统治。

鲍德温在稍微享受了埃德萨城中东方式的奢华之后，便专心率兵征服附近的城市去了。他的部队极为善战，到1098年年底就占领了原来托罗斯控制下的全部领地。他因此在埃德萨城的居民中颇受欢迎，最终正式成为得到属民支持的领主。



基利基亚与埃德萨周边地区

此后，鲍德温将其统治下的埃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变成“埃德萨伯爵领地”，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中的一个。

鲍德温在埃德萨建立的统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进攻安条克的诸侯十字军背侧的安全，也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防御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前来攻击的穆斯林军队。如果说他在埃德萨的成功完全出于偶然，这必然是幸运的眷顾。

纵观十字军所建立的国家200年命运延续的成就，基利基亚和埃德萨一带十字军霸权的确立，完全得自诸侯组成的第一次十字军中最为无赖的两个人。

这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无人能敌的胆量，都是天生善战的骑士。

他们还都是在西欧没有自己领地的“居家骑士”。鲍德温以取得自己的领地为最高目标，而丹克雷迪则不同。前者没有参加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攻城战，后者不仅完整参与了这两场最重要的战斗，还一直奋战在最前线。

公元1097年10月中旬，十字军的大部队开始逐渐接近能够远远望见安条克城的地区。此时距离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已有半年之久。通常情况下，通过小亚细亚需要三个月时间，但这支大军的远征花费了六个月。由于突厥人所采用的回避正面决战，转而在后方游击袭扰的战略战术，十字军受到了很大损失。在躲避突厥军队不断的攻击之后，十字军还必须越过难以行军的陶鲁斯山脉。鲍德温和丹克雷迪的军队从西侧翻越陶鲁斯山，而十字军的大部队则绕道北侧。无论从哪里经过，翻过陶鲁斯山脉之后到达的都是叙利亚境内。

经过六个月的艰难行军，十字军已经疲惫不堪，无法组织像样的进攻。然而，从北面逐渐接近安条克的十字军战士们，都注意到了这座阳

光之下巍然挺立的大都市的威容。在欧洲难得一见的东方大城市，已经近在眼前。

教皇乌尔班二世雪耻

当诸侯所率领的十字军到达能够远远望见安条克城的地方的同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正在远方的罗马静悄悄地发生着。

教皇乌尔班二世终于回到了罗马教皇的正式官邸拉特兰宫。

乌尔班二世在教会内的工作，从1078年被任命为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开始。1078年正是著名的“卡诺萨之辱”发生后的第二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让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堡外站立三天三夜的事件，向全西欧表明了教皇的权威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上。但从次年开始，亨利四世就展开了反击，使得受到追缉的格列高利七世不得不逃离拉特兰宫，最终客死他乡。

此后的7年之中，年轻的乌尔班一直与四处奔逃的格列高利七世在一起。而在他获选成为教皇的前9年内，也未曾踏入拉特兰宫一步。

他一度进入了罗马的地界，但只是在台伯河中的小岛（提贝里那岛）上逗留了几天。从这座岛屿到拉特兰宫的直线距离有2000米。

为早期基督教会所尊崇的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并赠予罗马教皇的拉特兰宫，从竣工之日起就是作为天主教会首领的教皇本人的官邸。教皇所召集的公会议也时常在拉特兰宫内召开。

罗马教皇在“卡诺萨之辱”以后的20年来无法进入拉特兰宫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皇帝拥立了与之相对立的教皇，并命令支持自己的高级神职人员统治罗马。

这一状态在20年后发生了变化。由于在罗马无法召开公会议，教皇

选在法国的克勒芒召开了鼓动十字军东征的公会议，而响应乌尔班二世号召的诸侯也已经到达了东方。虽然十字军还未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天主教军队已经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这一事实给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很大的冲击。而这次东征完全是由乌尔班二世的呼吁开始的。

而另一方面，仍然高居神圣罗马帝国宝座上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权威，已经日薄西山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乌尔班二世权威的承认，这位一生努力反对罗马教皇的君主逐渐感受到自己昔日的权势不再。例如曾经宣誓效忠皇帝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已经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于是，失去皇帝强有力后盾的对立教皇，不得不狼狈地离开罗马，逃亡意大利北部。

乌尔班二世不必以让世俗君主伫立雪中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权威。他只不过是依靠发动基督徒前往东方反对穆斯林的战争，就成功地显示了自己作为罗马教皇的权威。在与亨利四世的20年权力斗争中，教皇最终取得了胜利。

亨利四世人生最后的9年在寂寞中度过。除了洛林公爵以外，帝国境内其他的诸侯和骑士也大多参加了十字军。更糟糕的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相继起来反叛。到他死的时候，整个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都陷入了混乱状态。由于再次受到教会的绝罚，他的遗体不能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埋葬，在葬礼之后遗体还被挖出。直到5年之后，教皇最终解除了对这位皇帝的绝罚，在大教堂举行盛大的葬礼之后，他的遗体总算得以安葬。

人死后5年，对他的绝罚就没有时效性了。由于绝罚处置是教皇按照上帝意志进行的处罚，上帝的愤慨也是有时效性的。

教皇之所以在亨利四世死后5年解除对他的绝罚，也是由于之前收复了耶路撒冷，西欧人之中弥漫着宗教狂热的气氛，教皇本人也心情舒畅的缘故。

在日本高校中所学习的西洋史教科书中，罗马教皇权力的顶点是英诺森三世在位的时期。如果说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罗马教皇权力的最高峰，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在其百年之前乌尔班二世在位的时期，教皇的权力开始进入上升期。而乌尔班二世之后的三位教皇，都与他一样出自克吕尼修道院。这足以证明，在天主教会内部，赞同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的人有所增加。

十字军的战火从法国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开始点燃，发展成为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随着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克吕尼修道院的相关思想被尊为正统，而罗马教皇的宝座也自然由这里走出来的僧侣把持。由此不仅使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得到加强，也确立了天主教会和十字军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第四章 安条克攻防战

安条克城在21世纪称为安塔基亚，后者是一个土耳其语的名字，位于土耳其东南部临近叙利亚边境的地区，是一座无比孤寂的城市。然而在古代，安条克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并称的近东两大都市之一。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其属下大将塞琉古所占的叙利亚首都就是安条克。在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下，安条克逐渐成为繁荣的都市。

在这段希腊化时代结束以后，新兴起的罗马统治者也常以安条克作为帝国东方最高军事长官的驻地。在这一时期，安条克从一个区域性经济中心发展为罗马帝国东半部军事、外交和经济的中心。

当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建设君士坦丁堡作为新首都之后，安条克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它虽不再是外交和军事的中心，却以其在中东和地中海整个区域的贸易枢纽地位，以及以丝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而著称。由此以降，安条克一直是充满魅力的大都市。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地图上，包围地中海的整个罗马世界中，安条克与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等代表性都市一样，用特殊的记号标注着。

而且，相对于在耶路撒冷遇到传教困难的早期基督教会，安条克是早期基督教社团活跃发展的城市。早期基督教使徒们，特别是圣彼得本人就曾经在安条克传教。不难想象，在集中了来来往往的各个阶层民众的安条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

而在伊斯兰教势力发展壮大的时期，安条克城却逐渐走下坡路。穆斯林武力扩张的主要路线并不是位于近东西部的地中海东岸，而是东面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安条克不再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城市，却成

为了伊斯兰世界边境上的都市。这座边城不断衰落下去，从罗马帝国时代的30万人口，下降到中世纪十字军东侵时期的5万人左右。

直线贯穿安条克城中央的两公里长的大道两旁，并立着象征古代安条克繁荣景象的回廊。回廊的大理石圆柱有不少因为地震而倒塌了。安条克所在的叙利亚，是地震的多发区域。

通往海港的奥龙特斯河，昔日曾使安条克成为中东通往地中海最适宜的港口。然而由于砂石在河中不断沉积，到十字军的时期已经无法通航。在这座边境上的都市，原来忙碌的港口失去了作用。

即便如此，经过漫长的岁月，安条克的繁华景象还是保持了下来。

高耸着包围安条克的城墙全长12公里。在罗马帝国时代，城墙更是长达20公里。但经过拜占庭帝国最盛时期皇帝查士丁尼的修葺，安条克的城墙比罗马帝国时期更为坚固。

在城墙的重要部位起加固作用的塔楼，数量接近400座。一般的平面城墙只能抵御正前方的进攻，而塔楼则对正面和左右两侧的来犯之敌都能起到防御作用。因此，塔楼越多，城墙的防御力就越强。在重要部位设置的塔楼的数量，是体现整座城墙防御能力的重要因素。

这样一来，安条克的城墙守卫可谓完美了。疲惫的十字军兵士抵达此地之后，大概会绝望地认为自己不可能攻陷这座都市。

然而十字军的士气却依然很高。他们相信，只要首先攻陷安条克，接下来就能够收复耶路撒冷了。

各位诸侯普遍如此认为。而这些领主们都拥有变任何不可能为可能的气概与实力。

攻打坚固的城墙所环绕的大都市，是极为困难的任务。与在自家守

卫的对手相比，攻城者要一直在城外实施攻击。即使兵力和军粮都足够，他们也会直接受到酷暑严寒之下的雨雪风霜的打击。此外，攻城一方还要时刻提防后方出现的敌人的援军。

此外，在恶劣的野外，很容易暴发各种疫病。除了战死的人员，由于食物匮乏，或卫生状态恶化等原因死亡的大量兵士，常常给攻城者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攻城一方需要常常在进攻的过程中集结部队，以努力保持士气高涨。

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著名将领，也大多不喜欢开展攻城作战。他们往往用计将敌人从城墙内诱出，通过城外的会战来取得战果。

在伊苏斯和高加米拉之战中，亚历山大大帝大胜5倍、10倍于自己的敌军。但他在攻打推罗城的战役中遇到了很大麻烦。而在攻取奥尔良城时陷入苦战的凯撒大帝，则在数日之内击败了7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阿莱西亚之战的胜利。至于布匿战争中最后的迦太基攻城之战，则让罗马共和国最强大的军队耗费了3年之久。

有了上述的历史教训，谁都明白安条克这座历史悠久的东方最大城市之一，决非轻易可以攻陷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绕过这座城市，直接进军耶路撒冷。原因很简单：十字军里没人允许这样的愚蠢想法成为现实。

那么，问题就在于，有没有方法能诱使安条克城内的军士们出城迎战。

叙利亚的穆斯林领主们

安条克城内，总督雅基·西延早在秋初就已得知基督徒军队接近的消息。这位突厥长者作为安条克城防的总负责人，决定做顽强的抵抗。尽管如此，他并未打算出城作战。毕竟他并不了解来犯之敌的兵力，因此对自己手下人马是否充足没有把握。

雅基·西延派其子求助于当时大马士革的统治者杜卡克，以及摩苏尔的埃米尔克尔伯加，希望他们派遣援军。此二人和西延一样，都是塞尔柱突厥人。但西延并未向距离安条克最近的阿勒颇领主里德万求援。这一考虑是他基于当时叙利亚的现实情况而做出的。

11世纪末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一样，都处于新兴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因此，安条克、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统治者都是突厥人。

至于这三位统治者的关系，阿勒颇的城主里德万和大马士革的城主杜卡克是亲兄弟，而安条克总督西延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里德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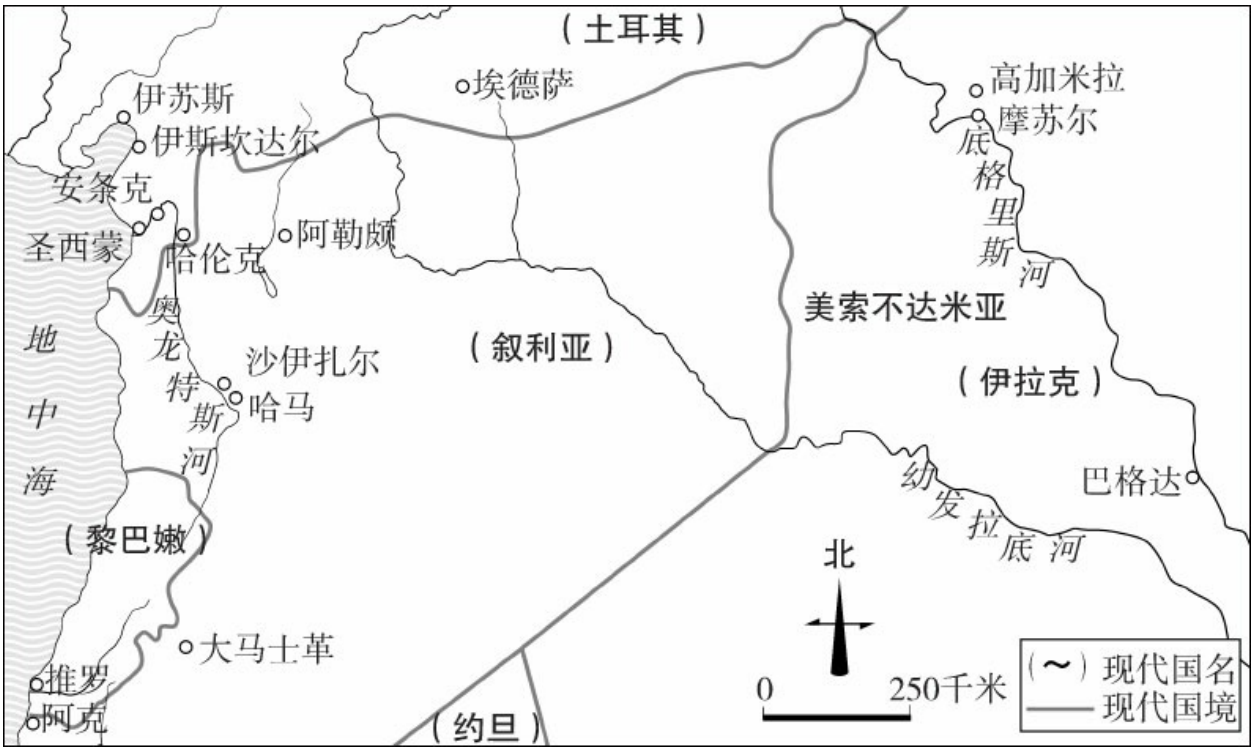
在穆斯林史家看来，三人之间这样看似圆满的关系，本不应让十字军成功侵入叙利亚的。但事实是这些西欧人进入叙利亚以后，就直接在安条克城前安营扎寨了。

之所以十字军能够大摇大摆地进入叙利亚，是因为这三位穆斯林领主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

阿勒颇的领主里德万为了当上城主，计划杀掉自己的两个弟弟。他杀掉了其中一人，但被幼弟杜卡克逃掉了，后者跑到大马士革，并最终在那里做了城主。虽然兄弟二人都非常年轻，相互之间势不两立的关系

却因此一直持续下去。

考虑到和距离最近的阿勒颇保持良好关系，以使安条克城的安全得到保障，西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里德万。但这位阿勒颇的领主完全无视自己妻子家族的实力，反而多次向西延的领地发起攻击。因此，当十字军逼近时，西延没有向自己的女婿里德万求援，而选择了附近的另一座城市大马士革。



叙利亚周边地区

至于西延向克尔伯加乞求援军，则是考虑到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的强大实力，以及其与安条克的遥远距离使摩苏尔无法染指叙利亚。如今阿勒颇与大马士革都位于叙利亚境内，而摩苏尔则是伊拉克境内的城市。

中世纪时的摩苏尔已经和今天一样，是著名的高级棉织品产地，它还出产一种可以点燃的黑色粘稠液体，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石油。

大马士革的杜卡克当即答应了总督西延的请求，而摩苏尔埃米尔却迟迟没有回应。

11世纪末、12世纪初叙利亚的伊斯兰势力，就处于这样的群雄割据的状态。

当时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在西欧的王侯之间形成了“上帝的和平”状态，而同时期的中近东一带，却没有人倡导“真主的和平”，因此穆斯林相互之间时有战事发生。安条克的总督西延也只有向这些不愿和解的领主求助了。

当西延之子出城求援之际，总督囚禁了安条克的希腊人主教。这是因为他担心城内得知十字军接近的希腊正教徒拥立主教，反抗自己。

安条克城内居住着很多基督教徒。据现代的研究，居民当中一半以上是基督教徒。总督一定充分考虑到，城内有人会暗通逐渐接近的胸前画着红色十字的西欧军队。只把主教投入监狱，恐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总督西延为了增强城市的防御力量，命令在城外修筑又深又宽的壕沟。他动员了城内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隔日交替工作。由于基督徒习惯了在这里当二等公民的地位，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动员有什么特别。穆斯林修筑壕沟之后的某一天，轮到基督徒男子劳动。

意料不到的是，在黄昏时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城门突然对这些基督徒关闭了。城上传来总督的命令，要他们离开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基督徒的妻子儿女还留在城中，因此他们向总督大声抗议。对此，总督表示会保证这些基督徒妻子儿女和所有财产的安全。

就这样，安条克居民中的基督徒男子被流放了。总督西延认为，这样做不仅消除了城内居民暗通十字军的危险，还减少了粮食消耗。对处

于包围中的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粮食供给的保证。

不可思议的是，被流放的基督徒男子，没有一个人加入逐渐逼近的十字军。在他们看来，与其求助于来自遥远西欧的未知的基督徒，不如到附近穆斯林控制的城市里讨生活。

但总督西延所害怕的危险，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安条克附近的一座卫星城镇，得知十字军接近的基督徒就起来反抗了。他们不仅袭击了突厥人的警备部队，还向十字军提出引导进城的请求。弗兰德斯伯爵随即率领自己的500骑兵离开大队，直扑这座市镇。他们将当地的突厥兵士全部杀死，并告知附近其他的村庄和城镇，十字军将保证自己行军路线西侧的安全。而安条克城外的大河，恰恰就在十字军行军路线的西侧。

十字军抵达安条克并布阵

公元1097年10月20日，十字军的先头部队在距安条克不远的山丘上出现了。紧跟在后面的是三位十字军的领导人，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和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在他们的马匹后面跟随的是其他诸侯。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安条克城。

在翻越陶鲁斯山脉之后，十字军一直沿着奥龙特斯河行军。他们必须渡过这条向西流向地中海的河流，才能到达安条克。通往安条克的第一个关口，一座坚固的铁桥，横跨在奥龙特斯河上。修建这座桥的目的不止是为了居民的通行。在两岸桥头都立着防御用的塔楼，有士兵在其内把守。十字军派出主教阿德马尔率领一队兵士，前来夺取这座铁桥。

阿德马尔自然是主动接受命令的。在多利留姆之战中，他所率领的部队切断了突厥军队的退路，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决定作用。从此以后，这位神职人员在军事指挥方面表现积极。他的骑兵与步兵合成一队，很快就占领了守卫铁桥的两座塔楼。从此直到安条克城下，再没有阻挡十字军的障碍了。

总数约5万的十字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后的实际战力略少于5万。但这支军队仍然具备很强的实力。

10月20日晚上，大军在广袤原野上的夜幕下通过铁桥。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向安条克城内望去。看到城市之后，他们先是叹息，然后普遍感到绝望。在这深秋季节，月光皎洁，路上也没有沙尘的困扰，是中近东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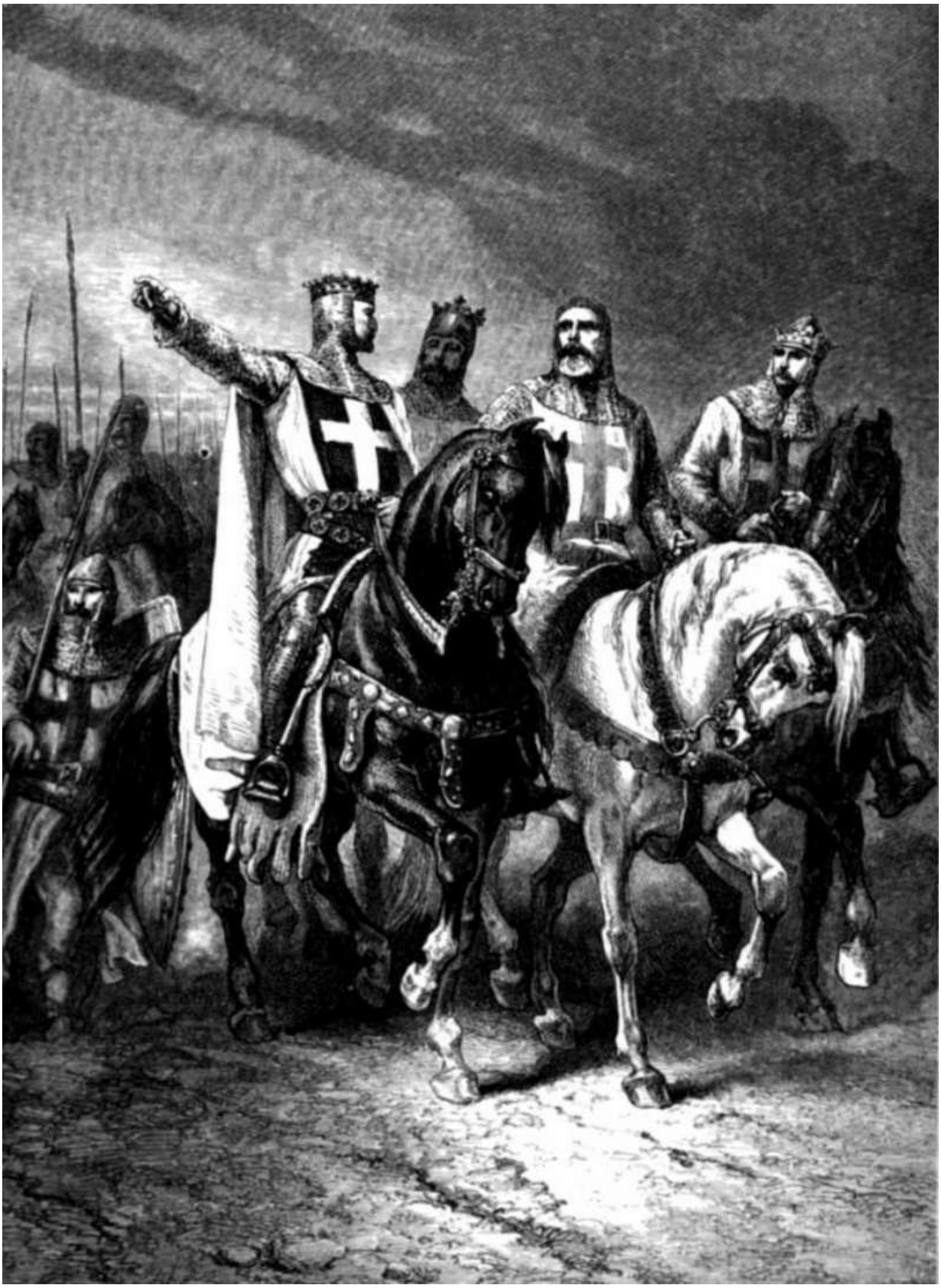
21日，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自己带一队骑兵前往视察敌情。视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明是否有敌兵埋伏。他在这一天之内详细查看了安条

克周围弓箭射程之外的部分，没有发现任何伏兵。而安条克的每座城门都紧紧关闭。

安条克是在奥龙特斯河流过的山间平地上建成的都市，城市的中心位于城的西北角，整座城市离山不远，又有河水流过。安条克的城墙坚固异常，而在依山的最高处，建有坚固的城堡。这座城堡类似于日本城中的天守阁，即便是城市被敌人占领，守军也可以退入城堡内进行防御。安条克城内只有一座城堡，其城防主要依赖城墙上的400座塔楼。

城门对于攻守双方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区域。波埃蒙多仔细观察了5个主要城门的情况。下面是当时基督徒关于这些城门的描述，按照逆时针的顺序进行：

城堡北面的城门叫作“铁门”。这座城门向东开，出城不远就到达了奥龙特斯河。由于它开在山上，不利于大军的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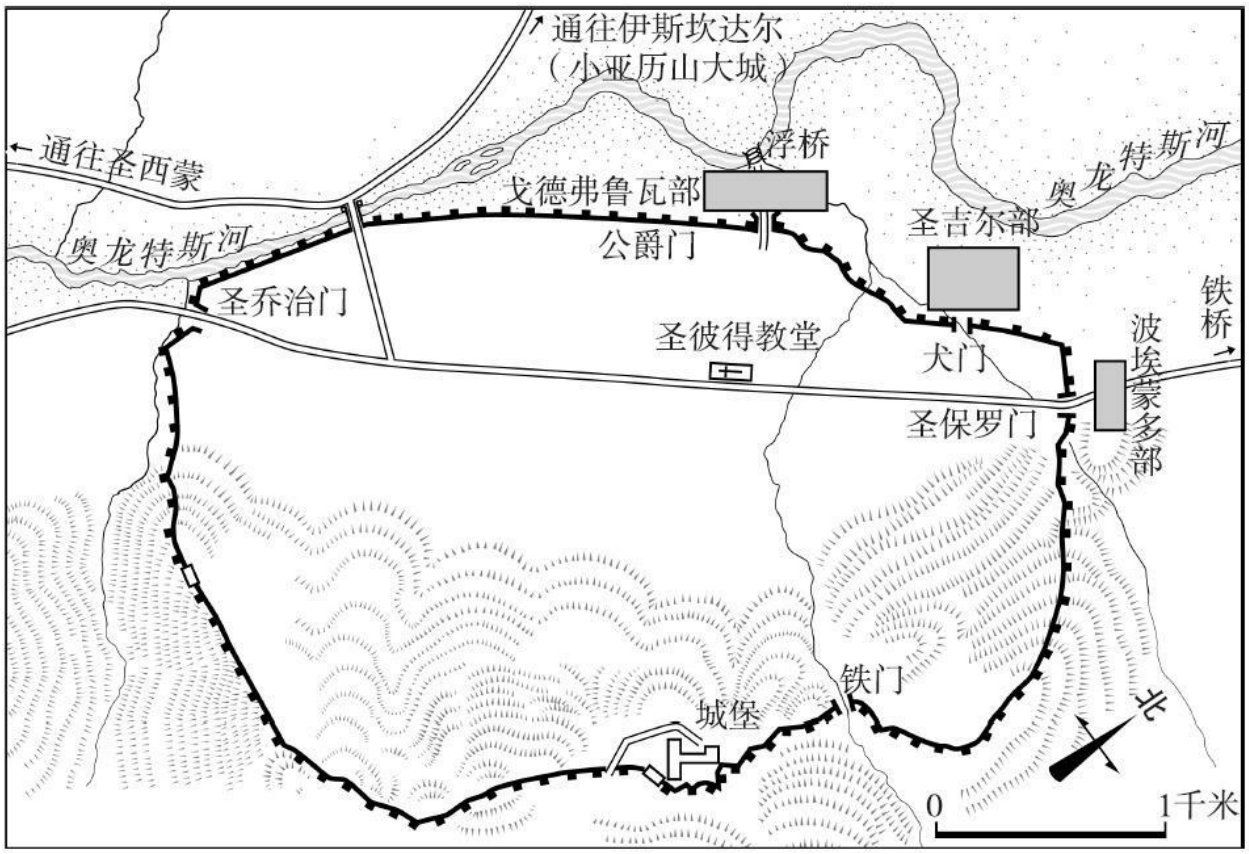


戈德弗鲁瓦及左右两边的波埃蒙多和圣吉尔，二人头戴王冠的形象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是后世的作品

从铁门往北去，下一座城门是“圣保罗门”。这座城门正对着铁桥，因此是5个城门中最重要的两个之一。这个城门连接着安条克通往中东的道路。

连接主要道路的城门除了圣保罗门之外，还有其附近的一个“犬门”。

向西方开着的城门是“公爵门”，其意思是“司令之门”。这个城门和圣保罗门一样，连接着主要道路。它所通往的方向是地中海。这个公爵门和城西南的“圣乔治门”一起，保障了安条克与地中海联系的畅通。



安条克城市图与各位十字军将领的阵形，根据史蒂文·朗西曼《十字军史》，第1卷（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1）

视察结束后回到营地的波埃蒙多，把以上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其他诸侯。由于城墙非常长，无法进行包围作战，诸侯决定在主要城门前列阵，并布置了各自阵列的地点。

由于第一次十字军没有明确的总司令，其指挥系统是多元的。在作战会议上或情报与传达方面，各人对其他人的布阵情况，以及从何处发起进攻，都没有统一的认识。这就使得诸侯都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布阵。而我们能够从各人的布阵地点，来推测出此人的战略战术运用能力。这一现象在安条克之战表现得还不是特别突出，而在其后的耶路撒冷攻城战中更为明显。而在安条克之战中，各位十字军领导人是这样选择自己的阵地的：

在穆斯林援军可能到达的北面，也就是圣保罗门的方向，部署的是波埃蒙多率领的南意大利诺曼军队。

在其右侧的犬门前，则是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率领的法国南部军队。

城西的公爵门前部署的，是戈德弗鲁瓦率领的德意志西北部兵士。

在距离城堡最近的铁门前面，由于城门开在山上，不适宜攻城方布阵。

波埃蒙多的外甥丹克雷迪的部队，按要求应部署在距地中海最近的圣乔治门前。但丹克雷迪正在与从热那亚赶来的舰队一起攻击基利基亚南部的两座港口，还没有按时到达安条克城下。

其他的各位诸侯，包括一直积极作战的弗兰德斯伯爵、法国王弟于格、诺曼底公爵与其内弟布洛瓦伯爵，以及主教阿德马尔，指挥着各自的部队，在必要时对围城的主要阵列给予支援。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在公爵门前布阵的同时，还在西侧流过的奥龙特斯河上架设浮桥。其目的在于与丹克雷迪控制下的港口取得联系，确

保其能从地中海赶到安条克城。

丹克雷迪在基利基亚控制的两座港口，一座叫作小亚历山大港，另一座则叫作圣西蒙港。由于圣西蒙港位于奥龙特斯河口，这座港口从希腊化时代以来一直是安条克城繁荣的保证。

小亚历山大港现称为伊斯坎达尔港。在这座港口北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战胜波斯帝国大流士三世的著名战场伊苏斯。亚历山大大帝战胜之后，建造了这座海港，为了与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相区别，就起名为“伊苏斯的亚历山大”。而这座港口现在的名称伊斯坎达尔，就是亚历山大的土耳其语译音，这就像伊斯坦布尔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语名称一样。

由于没有受到城内的威胁，十字军得以在到达安条克城外的一周时间内，做出总攻前的阵营设置。

波埃蒙多不仅在圣保罗门前布置了军阵，还往铁桥的方向派驻了部队。这一方向是穆斯林援军最可能到达的位置。

戈德弗鲁瓦也在河上浮桥的方向派驻了部队，以应对可能从这个方向到来的援军。在十字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圣吉尔在布阵之后什么也没做。

此时已经接近10月底，圣吉尔的营地内突然忙碌起来。原来是他决定向安条克发起进攻，命令全体将士武装起来。

得知此事以后，波埃蒙多连忙只身骑马赶来，劝说图卢兹伯爵收回成命。不愿停止进攻的55岁的圣吉尔，一直将面前这位47岁的诺曼人公爵视为对手，而波埃蒙多也不信任图卢兹伯爵。37岁的戈德弗鲁瓦虽然不愿介入两人的争执，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还是站到了波埃蒙多一边。安条克的攻城战在此时陷入了僵局。

而在丹克雷迪一边，为取得海港而进行的作战于1097年11月中旬大获成功。此次战斗中有13艘来自热那亚的军舰参战，标志着意大利临海城邦国家正式介入十字军东征。

对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这些以贸易立国的临海城邦国家来说，他们对十字军的帮助不仅仅是提供补给所需的物品。由于长期面对穆斯林海盗的威胁，这些国家的商船早已武装成军舰，船上的水手都持有武器。因此当热那亚的13艘船只进入小亚细亚的港口后，登陆的水兵至少有千人之众。

到10月底，总督雅基·西延的儿子返回了安条克城。他得知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将赶来驰援的消息以后，也开始采取积极出击的战斗策略。

在安条克东边不远处，有一座名叫哈伦克的城市，其中驻扎着突厥军队。总督西延密令这支部队从背后袭击在铁桥附近的波埃蒙多的军营。

波埃蒙多不仅击退了前来偷袭的突厥军队，还一路追到哈伦克城内，将这些突厥兵士全部杀死。于是，安条克的周边，又少了一座卫星城市的保护。

食物的匮乏

从1097年11月的下半月开始，十字军的食物匮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虽然有进出圣西蒙港的13艘热那亚船只提供武器和军粮补给，对十字军的食物需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安条克之前列阵的十字军，主要是按照以下的次序组成的：

诸侯；

重装骑兵；

重装步兵；

轻装步兵；

隐士皮埃尔率领的毫无战斗力的朝圣者。

这些人所食用的粮食的质量和数量，反映了中世纪的阶级差别。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连各位诸侯都要忍受粗茶淡饭的生活，较低的阶层能有东西吃就不错了。

那些无法忍饥挨饿的人，自然会掠夺周围村庄里的民众。其中不少人能抢到些食物，但他们也常常遭到所掠夺的村民追赶，不得不狼狈地逃回大营。主教阿德马尔将这些逃回的人安排到圣保罗门附近，让他们常驻于此，建设一座名为马尔雷加尔的塔楼。十字军也因为给养不足，无法庆祝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圣诞节。

这一现状使波埃蒙多认识到，必须设法从外地获得军粮。他从安条克城外的军营内抽调了两万军队，并特别请弗兰德斯伯爵与自己同行。

他看中的是这位伯爵从东征出发以来积极作战的能力。波埃蒙多离开圣保罗门之后，这一区域的阵营交由原来负责犬门前作战的圣吉尔管理。

波埃蒙多之所以要率两万大军，第一个原因在于其选择的征粮地点在安条克以南150公里的哈马一带，地域广阔而路途遥远。从哈马再往南150公里的距离就是大马士革。波埃蒙多此行是深入穆斯林地区抢夺粮食，因此很可能遭遇敌军的阻击。

而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则是这样强大的兵力会给沿途的城镇和村庄带来巨大的压力。这样一来，他不必真的动用武力，就能够获得必要的物资。事实上这就是以压迫的手段征调军粮。

然而在波埃蒙多和弗兰德斯伯爵出发以后的第二天，负责守卫他们防区的圣吉尔就将自己的军营从犬门移动到戈德弗鲁瓦所搭建的浮桥附近了。他移动防区的理由是天降大雨，导致原有阵地被水淹没。

波埃蒙多的行动和圣吉尔移动阵地的做法，都被安条克城内的侦察兵看得一清二楚。

当天夜晚，安条克总督西延就集中全部兵力，从没有十字军防备的犬门前杀出，袭击了圣吉尔的营地。费尽力气移动大营之后刚刚熟睡的法国南部的兵士们，不得不立即起来迎击，并陷入了苦战。由于戈德弗鲁瓦派兵前来支援，最终击退了突厥人，但还是有许多十字军被杀。圣吉尔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下降不少。

而另一方面，南下的波埃蒙多一路顺利地征集粮食。但当他行进到哈马附近的沙伊扎尔时，遇到了大马士革方面的穆斯林军队。

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同意安条克总督的派兵请求后，得到了前线部队的报告，声称在沙伊扎尔出现了攻击安条克的一部分法兰克人军队。

虽然杜卡克还没有把自己承诺的派遣援军一事提上日程，当他发现

十字军接近以后就立即动员起来。他集合属下，亲自率兵北上迎击。而这支大马士革军队在从沙伊扎尔向哈马行军的途中遭遇了弗兰德斯伯爵率领的骑兵。看到全体身披甲胄的十字军骑士，首次与法兰克人交战的大马士革领主命令全军投入战斗。因为和他的大军相比，这些敌人的数量实在少得多。

正当突厥军队围攻弗兰德斯伯爵的骑兵时，波埃蒙多的部队从他们的背后出现了。战况由此迅速发生了变化。突厥士兵纷纷溃逃，而杜卡克自己也不得不全速逃到哈马。

此后波埃蒙多和弗兰德斯伯爵进入了附近的城市沙伊扎尔，这里离预定到达的哈马不远。由于已经战胜了大马士革的军队，进城之后这些十字军没有受到任何袭扰。

未曾想到当天夜晚发生了地震。由于这场地震相当强烈，人们可以感受到黑暗中大地不停的摇晃，在轰隆的巨响中，房屋纷纷崩塌。当地的叙利亚人早已习惯了地震，但西欧人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们怀着恐惧认为，地震是上帝的惩罚。

次日早晨，波埃蒙多决定停止征粮行动，回师安条克。令十字军恐惧的不是穆斯林军队，而是刚刚发生的地震。即使是波埃蒙多这样的人物，也深感不安。在未能达到征粮目标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沿着来时的路线，于1097年的最后一天回到了安条克。

到1098年1月底，安条克城外的十字军陷入了粮食极端不足的窘境。尽管诸侯放任自己的属下在周围掠夺食物，这些兵士的所得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大军果腹的需要。

如果这时拜占庭皇帝能够派遣船只送来军粮，十字军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十字军是从小亚细亚一路远征而来的，而无论是从小亚细亚南岸的诸多港口，还是从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塞浦路斯

岛派出船只，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在小亚细亚担任十字军向导的塔蒂基奥斯也曾经寄望于塞浦路斯的船只前来支援。

但阿莱西奥斯一世对十字军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基利基亚的活动感到十分不快。这位皇帝虽然精于算计，却并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于是白白放过了这个向十字军施以恩惠的绝好机会。

在1098年初，十字军已经无力继续包围封锁安条克城。在城南的圣乔治门，有从城内出来的希腊人，与城外的十字军接触。但这些希腊正教徒与西欧来的天主教徒接触的目的，只是为了高价贩卖自己的粮食。粮食的价格日日攀升，逐渐到了连诸侯也买不起的程度。十字军兵士对希腊正教徒的厌恶也因此与日剧增。

主教阿德马尔看到十字军因饥饿而逐渐失去人性，想出了一条计策。他以上帝的愤怒为由，命令全体将士为赎罪而封斋三日。这就给由于食物不足所导致的饥饿，加上了一个自发赎罪的好理由。众人都表示同意，于是全体严格执行了禁食三日的计划。

但三天过去以后，上帝不再禁止十字军进食，他们的饥饿状态并未好转。这场赎罪的斋戒就转变成了仅仅因为食物不足而导致的饥饿。

从此开始，十字军中渐渐有人脱离了部队。这些逃走的人沿着奥龙特斯河下溯，抵达圣西蒙港，并在此处等待前往欧洲的船只。任何人都可以向这个方向逃。

可是丹克雷迪的一支部队正守在此处。这些试图逃走的人被一个不剩地逮住，送回了安条克城外的军营。

在逃走的人当中，居然有隐士皮埃尔在内。当初他曾狂热地煽动平民结成十字军，而最终这些人大都死在东征路上。丹克雷迪押送着这位僧侣到达波埃蒙多的营帐，公爵向这位十字军中最狂热的说教者投以轻

蔑的目光。

但对于现状感到绝望的不只是隐士皮埃尔。在被十字军围困的水泄不通的城内，总督西延一样无法抵御断粮的威胁。保证派遣援军的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迟迟没有出现。由于被征粮的波埃蒙多和弗兰德斯伯爵击败，杜卡克的军队士气低落。但西延对此一无所知。

绝望的西延最终向阿勒颇城主里德万求援。他开出条件，如果里德万前来，就把安条克城献给这位年轻的突厥领主。

这样的条件对于塞尔柱突厥的强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虽说里德万和西延都是突厥人，但他们为了领土扩张，一直在相互争斗。而听说只要派遣援军就可以取得安条克城的统治权，还未与法兰克人交手的里德万能不对此摩拳擦掌吗？

里德万立即动员了自己的部队，还命令哈马的埃米尔一起出兵支援安条克。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的规模，但阿勒颇也是古代和中世纪近东的主要城市之一，而且里德万毕竟拥有相当大的领地，因此其部众从质到量来说都应该是颇具规模的。而当这支阿勒颇的军队于2月初出发时，十字军的断粮状况有了些许的改善。

此时十字军在波埃蒙多的领导下，迎击前来援救安条克的穆斯林部队。

他首先率领一队骑兵，从阿勒颇军队的左侧迂回。这支骑兵在交锋中从后方驱赶敌人，将其逼迫到奥龙特斯河与安条克湖之间的平原上。在这一位置守候的，是戈德弗鲁瓦的重装步兵。

战况按着波埃蒙多的设计进行下去。在受到重装步兵和骑兵前后夹击，左右两边分别是湖泊和山丘的情形下，来自阿勒颇的穆斯林军队被完全击溃。里德万和响应其号召而参战的叙利亚小领主们，都互不相顾

地纷纷逃散。里德万一路奔逃，最终狼狈地回到阿勒颇。

与此同时，获悉阿勒颇军前来以后出城迎击的总督西延的军队，也被圣吉尔统率的十字军击败，逃回城去。里德万和西延的部队未能合兵一处，造成了决定性的失败。

十字军已经取得了对附近支援安条克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支军队的胜利，因此总督西延愈发苦恼了。

直到当年的2月中旬，十字军的补给一直没有跟上。虽然粮食不足的状况没有改善，他们的士气却有所好转。战胜穆斯林的援军，使得他们精神抖擞。无论是骑士、普通士兵还是前来朝圣的普通人，都怀有一种冬去春来的希望。而事实上，不仅季节转换了，战况的春天也即将到来。

3月4日，丹克雷迪给波埃蒙多送来了一条消息，后者将其转告了全体诸侯。

有一艘从英格兰来的船，过多佛尔海峡一直航行到安条克附近的圣西蒙港，船长是一位骑士。这艘船不仅带来了志愿参加十字军的英格兰骑士和大量军粮，还运来许多木材。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无论是小亚细亚南岸还是塞浦路斯，都有出产木材的山区。而利用船只将当地出产的木材运送过来，并就地组装，就可以制作攻城所需的塔楼。这对于十字军在安条克的攻城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波埃蒙多就向各位诸侯公布了丹克雷迪送来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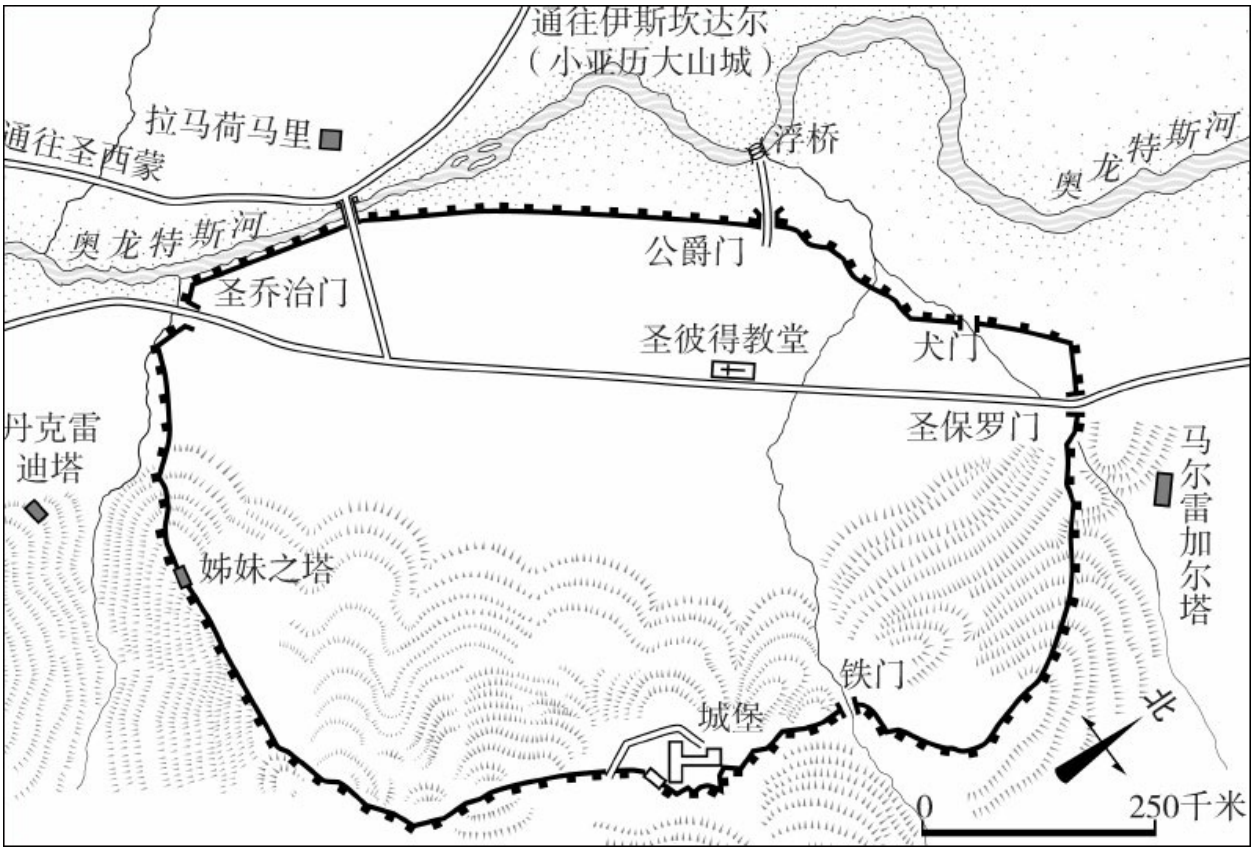
此后的4个月内，在安条克城前布阵的十字军逐渐拥有了建筑攻城塔楼所不可缺少的大量建筑材料。

然而在此之前，十字军并未大量伐木以获取木材。其实叙利亚并不只有沙漠，在安条克周围就生长着许多树木。他们一直守在自己的军营

里，因此完全没有开展伐木取材的工作。

一直拥有安条克攻城战主导权的波埃蒙多，此时想到了一条妙计。

波埃蒙多的想法是否得到了其他诸侯的赞同，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到达安条克以后试图贸然出击的圣吉尔，在波埃蒙多干预下没有单独开展攻势。各位诸侯大概是出于慎重考虑避免战力消耗，达成了一致。十字军的兵士们也没有进攻城市，而是在周边征粮。



安条克城市图与监视塔（根据史蒂文·朗西曼《十字军史》，第1卷）

丹克雷迪传来消息以后，十字军就开始对不断运送来的木材开始进行组装。很快，他们建起了两座塔楼。

其中一座塔楼的名字叫拉马荷马里，位置就在城墙下奥龙特斯河的对岸。在这里，河面上有一座桥，桥的左右分开两条道路。向北的道路

通往小亚历山大港，向西南的道路则通向圣西蒙港。因而此处塔楼的建立，对十字军与地中海之间联络路线的畅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这座塔楼的守卫由圣吉尔负责。

另一座塔楼则得名于其实际建造者丹克雷迪。没有任何记载说明为何要在该处建立塔楼。我推测很可能是由于要加强圣乔治门附近的进攻力量。

在此处建立塔楼，也与波埃蒙多准备秘密实施的计策有关。因此，他特意将这一塔楼的建设交由自己信赖的外甥丹克雷迪来完成。

此外，建设这两座塔楼，不仅对于进攻安条克城十分必要，攻陷以后守卫城市时，它们也能发挥作用。可以说，波埃蒙多出于自身的考虑，妥善利用了英格兰船只带来的木材。

至于其他的诸侯是如何看待波埃蒙多的做法，首先戈德弗鲁瓦对此保持沉默。这位洛林公爵是不大在乎别人野心的。而图卢兹伯爵圣吉尔肯定关注此事，但他并不是一位老谋深算的领主。

圣吉尔负责的拉马荷马里塔楼于3月19日完工。由于英格兰船只频繁往来运送木材，这座塔楼得以在两周内建成。丹克雷迪塔楼也在4月初完工，这就使十字军得以严密监视出入圣乔治门的人员。由此，安条克的包围圈收紧了，而西欧人也能更加密切地接触城内的希腊人。

安条克的攻城战已经开始6个月了，但这期间城外的十字军与城内的守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多的时候双方只是相互对视。这一持久战带来的影响，从叙利亚波及到了遥远的地方。

公元1098年4月下旬的一天，从埃及派来的使节在圣西蒙港下船。这位使节要求觐见攻击安条克的十字军领导人。

听说前来拜见的使节是埃及哈里发的维齐尔阿尔·阿布达尔，十字

军阵营内爆发了一阵骚动。

埃及来的使节

伊斯兰教国家的“维齐尔”这一官职，是与宗教领袖“哈里发”相对应的实际统治的执行者，就如同今天立宪君主国中的首相一般。他的到来所引发的十字军中的大骚动，并非为一触即发的军事斗争做准备，却仿佛是迎接贵客之前的大扫除。

完成军营内大扫除的军士们接到的命令，是将自己手中的兵器和军装调整到最佳状态。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甲胄、佩剑和标枪都磨得锃亮，等候使节的到来。

各位诸侯也急忙命令随从取出自己的衣柜中的礼服，并为自己穿上。他们上次穿着这些华丽的衣服，还是在君士坦丁堡谒见拜占庭皇帝时。

参加仪式时所用的甲胄和武器，都与战斗时所用的不同。作为礼仪服装的胸甲上面都饰有家族纹章，其制作之精良可称为艺术品了。由于它们并不频繁使用，其保存状态一般非常完好，得以在现代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中展示。而如今连复原图都很少留下的战斗用甲胄，则为了作战的方便，少有无用的装饰。听说哈里发的特使到来，诸侯赶紧脱下作战用的甲胄，换上礼服。

从头到脚都披挂用一个个小铁环制作而成的盔甲，在日本称为“锁子甲”，而西欧人则统称其为编织物。

在这编织物之上，骑士们罩着光亮的钢制胸甲，而普通士兵穿着的是皮质的胸甲。

而十字军全体都在胸甲上面覆盖着印有白底红十字的上衣。

安条克城下布阵的十字军，就这样从上到下，阵容齐整地迎接埃及的特使。

无论是对军营的大扫除，还是整理自己的着装，都不完全是为了迎接贵客这一目的。十字军是想让埃及人看到，尽管攻城战已经进行了6个月，以自身部众良好的精神状态，迟早能够攻陷安条克。这样的做法，不单是十字军，只要是了解战争的任何人都会实施的。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身穿极具东方奢华感的长装，头缠头巾的高大维齐尔及其随从，在骑士和士兵的列队中通过，会见了身着礼服前来迎接的各位诸侯。

会谈一开始，诸侯还未开口就大吃一惊。埃及宰相阿尔·阿布达尔开门见山地提出，穆斯林的埃及要与基督徒的十字军结成同盟。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中东和近东，也就是作为穆斯林世界主要部分的东方（Orient）地区，是处于如下的状态的：

首先，作为宗教领袖的哈里发，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一位驻在埃及开罗，另一位则驻在伊拉克的巴格达。

开罗的哈里发国家是由法蒂玛王朝主宰，属于什叶派穆斯林。

而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则是由阿拔斯王朝主宰，属于逊尼派穆斯林。

与选举出的罗马教皇不同，哈里发是世袭更替的，但二者在宗教领袖这一地位上基本一样。

而在世俗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穆斯林世界就是苏丹了。这与基督教世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各国的国王类似。

由于此时的哈里发只是宗教领袖，而不是军事指挥职务，如果其权威没有军事力量做保障，其统治就自然无法存续。

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军事方面主要依赖的是塞尔柱突厥人。

而开罗的哈里发则主要依赖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穆斯林部族军事力量。

由于中近东的这种分裂状态，叙利亚处在突厥人的控制之下，而巴勒斯坦则为阿拉伯人所统治。

伊斯兰世界常常发生的争议，是谁才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正统。当时埃及的哈里发是视巴格达哈里发为敌的。而十字军至此的远征，攻击的对象限于塞尔柱突厥人控制下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特别是此时正在围攻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

这就是典型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在埃及的阿拉伯人看来，与跟突厥人斗争的法兰克人结盟，在真主面前是不必感到羞耻的。

于是，埃及宰相在诸侯的面前这样说道：

“如果各位想得到叙利亚，那么请便，但请勿染指巴勒斯坦。

“然而，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等地是基督徒的圣地。对于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的自由与安全，由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埃及军队负责保证。”

虽然留下了十字军的应答，但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十字军当中是谁负责回应了维齐尔的建议。但我想当时站出来的应该是主教阿德马尔。原因在于阿德马尔是罗马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代表，也确实代表了罗马教会的主流，并且拥有代表诸侯的资格。这位勒布伊的主教对埃及宰相的回应，在史书中这样记载：

我等怀着对所信奉之宗教，恢复在其初生之地荣光之确信而来。为实现此愿望，我等毋需现有之国家与军队。只需信徒与信仰，便可使之实现。

因此，我等在此亚细亚之地所为，并非为受贵教之慈悲，亦非为遵从贵教之律法。

反之，我等基督教徒，无法释怀于哈里发哈基姆所为之暴行（这是90年前的事了）。彼时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遭受破坏，教堂中之巡礼者亦惨遭杀戮。经此事以来，我等深受教训。基督教徒不仅理当守护圣地，亦理应拥有对圣地之领有权。

请阁下转告贵国决定战争与和平之立场者（哈里发）：我等于安条克城前布阵之基督教徒，既不畏惧巴格达哈里发，亦不畏惧埃及哈里发。亦请转告，我等无法与不遵耶稣基督律法与正义之势力结为同盟。

此言既出，双方交涉即宣告决裂，埃及宰相只好负气离席而去。实际上当时的会谈气氛，还是相当友好的。与其说是双方完全决裂，不如说是由于无法达成协议而告结束。

可能与我们料想的相反，中世纪的骑士对于远方而来的客人，都颇具气质地以礼相待。说出一番严辞拒绝话语的阿德马尔就出身于骑士家庭，而他的弟弟也参加了十字军。其他的诸侯不论人品善恶，都很注重礼节。

无论在欢迎宴会上，还是送行的时刻，埃及宰相都收到了许多来自西欧的赠品。会谈自始至终都在外交礼仪下进行。

至于十字军赠送的物品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参考当时与穆斯林贸易的意大利沿海城邦船只中常载的物品。当时从西欧出口到近东的主要是手工业制品。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是颇为有趣的。

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的沿海城邦相比，最早和穆斯林进行贸易的阿玛尔菲地区有一种特殊的产品出口到近东。这就是经改良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的指南针。最早的指南针，也就是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而被阿拉伯商人用来航海。最终，意大利人将其做成方便携带的小型指南针。这种指南针也被阿拉伯人卖到伊斯兰世界各地。无论是在海上行船，还是在沙漠中进行贸易，指南针的应用助长了中世纪的企业家精神。

虽然我们不知道十字军赠送埃及宰相的物品是什么，在这一时刻双方还是保持了相互友好的关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拥有海军，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位于地中海东岸。如果十字军平白无故地做出刺激海上对手的行为，那就只能说是体现自身的愚蠢了。虽然他们决不能向宰相阿尔·阿布达尔承诺不进攻巴勒斯坦，但也要尽量照顾这位重臣的心情。

但到了5月，诸侯面临的状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来了

早在十字军抵达安条克之前就收到总督西延援助请求的摩苏尔埃米尔克尔伯加，在6个月之后终于决定派遣援军。在得到巴格达哈里发允许后，克尔伯加的援军不仅包括从摩苏尔出发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还有从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塞尔柱突厥人统治全境出发的兵士。在巴格达哈里发的要求下，逊尼派穆斯林全体动员，来自波斯的兵士也渡过底格里斯河加入摩苏尔的军队，前来救援正为基督徒所围攻的安条克城。

关于克尔伯加所率领的西征大军总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其骑兵的总数大约有2万，而加上步兵总计有20万之众。但由于当时统计人数常常是真实情况的两倍，这支大军的实际人数约为10万左右，也就是十字军总人数的两到三倍。诸侯得知他们的到来，自然感到恐慌了。

克尔伯加大军的进军路线，与帕提亚进攻罗马帝国安条克城时其军队所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在经过叙利亚沙漠之后，他们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河，而是折向西北，然后再向西进发。至此他们面对的就是鲍德温控制的埃德萨伯爵领地了。

克尔伯加不愿绕过埃德萨直扑安条克，于是他命令全体进攻埃德萨城。

我们不知道埃德萨伯爵鲍德温有多少兵力。但既然此处已经是自己的个人领地，年轻的伯爵必然尽全力防守城市。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位西欧人的指挥下，埃德萨城的全体居民都勇敢地为守城而奋战。

在克尔伯加看来可以轻易攻取的埃德萨城，与从美索不达米亚前来的穆斯林大军陷入了拉锯战。这一局面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三个星期的时间，着实救了安条克城下的十字军。

此时的波埃蒙多，策划了一个其他任何诸侯都不知道的计谋，就连他的外甥丹克雷迪也浑然不知。

他在安条克城内，安排了一位内应。

波埃蒙多的计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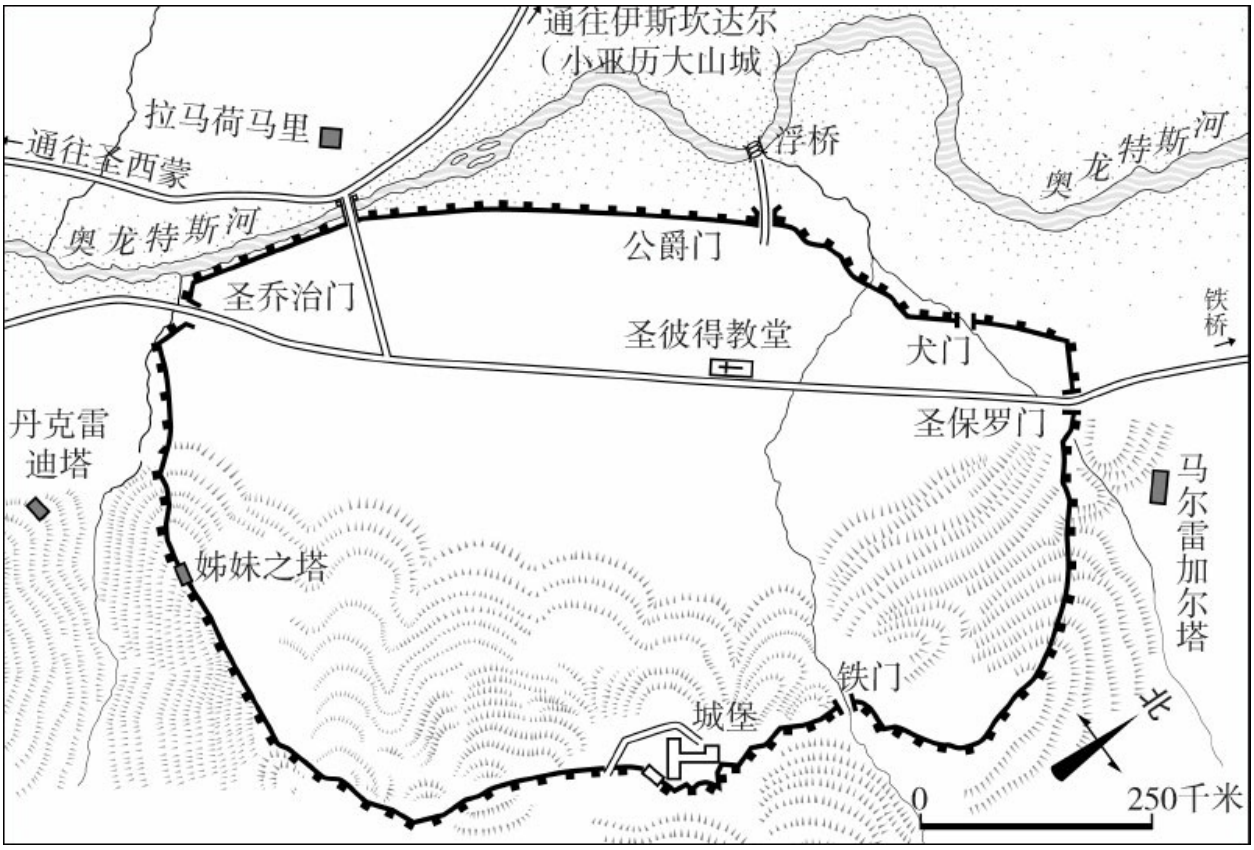
围绕安条克城的12公里长的城墙，一半是沿着低矮的山丘修建的。从城墙西南角开始逆时针行进，就会一直上升到山顶耸立的城堡，再沿着山下到平地。如果沿着这段城墙行走，必然要在山脉中上上下下，往复周折，而在城墙的重要部位则有塔楼把守。

安条克城的防御依赖于坚固的城墙，而在依山而建的城墙这一边，受到攻击的危险并不大。在连绵起伏的地表之上，城墙边还高耸着塔楼。

安条克城的防御总指挥西延，在平地一侧派遣突厥兵士守卫，而在靠山的一侧，则安排了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来防守。

其中有一名改宗的队长名叫菲鲁兹，其所负责的区域是安条克西南城墙内的以“姊妹塔”为中心的地带。

在此一个月前，丹克雷迪塔在距离此姊妹塔300米的地方建成。如果丹克雷迪塔只是为了监视从圣乔治门出入的人员，它完全应该建在离城门更近的地方。而丹克雷迪塔之所以要建在靠近姊妹塔的位置，其隐含的原因是波埃蒙多可以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与菲鲁兹进行秘密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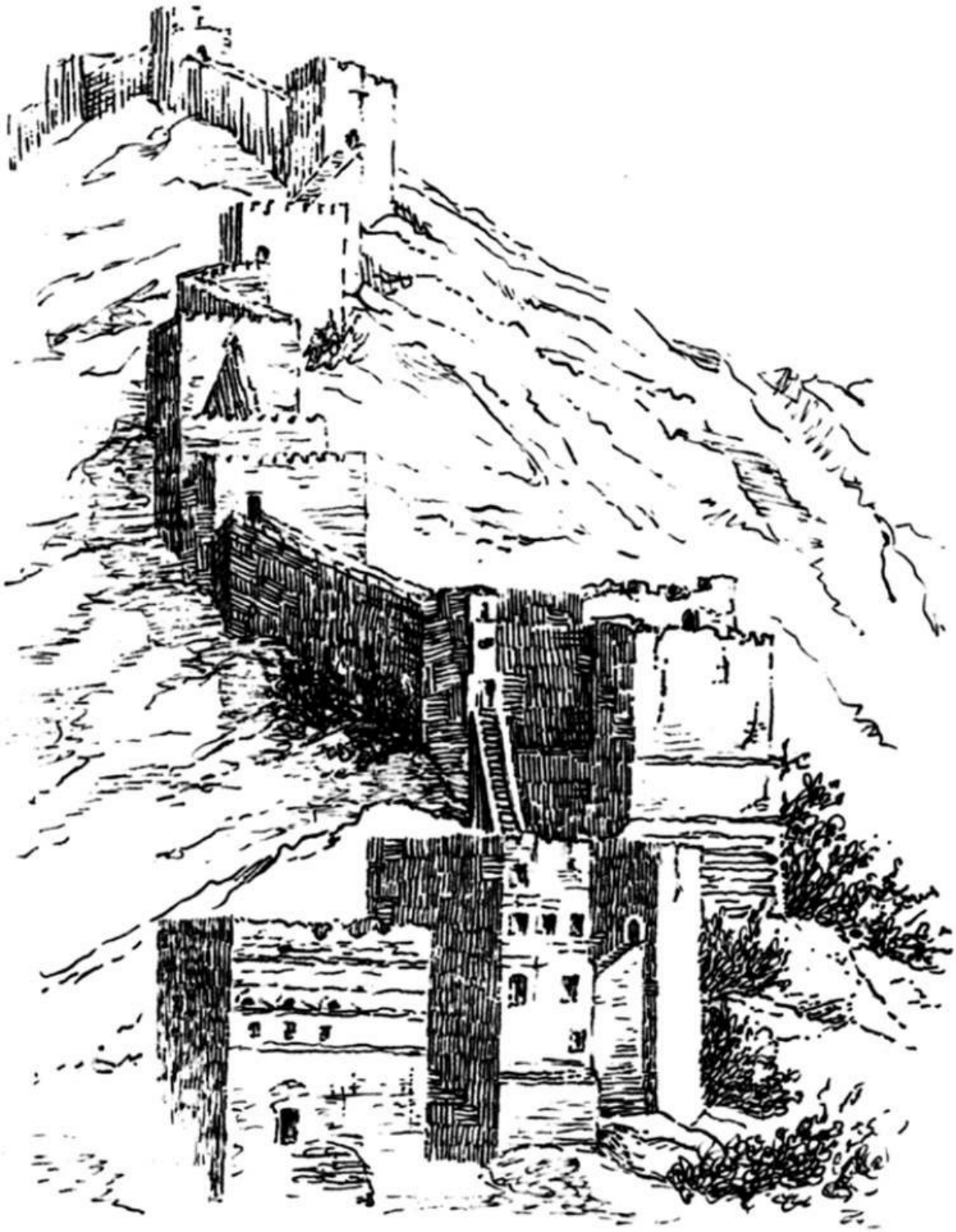
安条克城市图（根据史蒂文·朗西曼《十字军史》，第1卷）

经过与菲鲁兹的讨价还价，到5月底，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而此时克尔伯加围攻埃德萨已达三周之久。

当各位诸侯于6月2日得知克尔伯加所率的大军已经向安条克开来时，无人不感到十分紧张。其中的布洛瓦伯爵更是陷入恐慌之中。

因此，这位伯爵就往小亚历山大港的方向逃走了。他和随从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辞而别，但既没有人恳求这位伯爵回心转意，也没有任何人上前阻拦。这位善良的伯爵没有多少兵力，他是否在场，对攻城并没有多大影响。

而在布洛瓦伯爵离开当天，也就是6月2日的下午，波埃蒙多将全体诸侯召集到他的营帐内。此时他才将与菲鲁兹密谋的事情告诉了各位诸侯，并制定了潜入城内的策略。



十字军时代安条克靠山一侧的城墙（想象图）

波埃蒙多说：

“今天半夜，绳子会从姊妹塔上降下。我们可以派50人从此处攀上这座塔楼。塔楼上面全是菲鲁兹的心腹。

“上塔以后，我们的人就立即下来，全体集合以后，分头按指示到达各个城门内侧，依次打开圣乔治门、公爵门、犬门和圣保罗门。然后，在各个门前的诸侯军队，一起向城内进攻，就可以攻陷安条克。”

姊妹塔上的十字军士兵并未引起城内突厥兵的注意。而城外的十字军却从半夜就开始武装起来，也为了防备克尔伯加的军队而进行了阵列调整，因此耽误了时间。直到凌晨天明的时候，诸侯的大部队才在混乱中进入了安条克城。

感到十分意外的总督西延，陷入了巨大的恐怖之中，只好向没有敌人涌入的方向，也就是铁门的位置出逃。还未逃远，他就被身边的一名亚美尼亚人杀死了。

曾在此前几度出城求援的总督之子沙姆斯·阿德·达乌拉逃到了山上的城堡中。这位突厥人眼中所见的，是到处浓烟滚滚，火光一片。此时正值6月3日的清晨。

攻陷安条克

1098年6月3日这天，留在安条克城内的突厥人被屠杀殆尽。为了不让城内任何穆斯林留下活口，骑士、士兵和朝圣者都展开了搜索和杀戮。此次攻城中死亡的人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至于总督西延留在城中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妻子最终结局如何，我们也无从知晓。

第二天，从屠杀和破坏之中清醒过来的十字军，才发现城内的粮库已经和许多房屋一起被大火烧毁了。虽然经历了7个月的围困，安条克城的粮食储备依然足够。但这场大火使十字军再次像在城外布阵时一样陷入了饥饿之中。只有石制的房屋和无法食用的一些物品从火灾的浩劫中幸免。

此时十字军得知了克尔伯加率领的大军接近安条克的消息。摩苏尔的埃米尔久攻三周后依然无法破城，只好集合军队，离开埃德萨，匆匆驰援安条克。这支大军的先锋部队早就接近了奥龙特斯河上的铁桥，而到6月5日，克尔伯加本人来到了能够远远望见安条克城的山丘上。

突厥军队到来并围困安条克

6月6日，从安条克陷落的混乱中得以成功逃脱的突厥人都到了山上的城堡中，其中领头的自然是总督的儿子沙姆斯·阿德·达乌拉，还包括一支突厥军队。这一安条克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目前还在穆斯林的手中。

为了夺得城堡，波埃蒙多命令在粮库大火后士气低落的部下建造将其围困的城墙。这座城墙把城堡的出入口完全堵住。最终，在6月6日当天，十字军依靠从地震中受到破坏的房屋中取来的石材，建成了将城堡团团围住的高墙。这样，城堡依山而建的有利地势就宣告无效了。

6月7日，看到防御墙完工的总督之子沙姆斯，明白了自己身处的险境。而他同时也得知了克尔伯加所率领的援军接近安条克的消息。克尔伯加已经兵临城下，而城堡附近的铁门还未落入十字军的控制下。沙姆斯随即召来兵士，令其送信给前来支援的摩苏尔埃米尔。

当天信就送达了克尔伯加手中。埃米尔阅毕来信后，立即让秘书起草了回信。

埃米尔回信承诺派自己的心腹阿赫迈德·伊本·麦尔万营救，但条件是城堡也要交归麦尔万。

读罢回信，年轻的沙姆斯感到绝望。援军到达固然可喜，但把城堡交给摩苏尔人，就等于放弃了城市。之前其父西延向克尔伯加求援时，曾认为遥远的摩苏尔领主不会对安条克城提出领土要求，而其实克尔伯加却急于扩张。他想在击退十字军之后，夺取其他穆斯林的领地。

对总督年轻的儿子来说，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余地。沙姆斯再次送信

给克尔伯加，最终同意了让出城堡的条件。

6月8日，麦尔万的人马向安条克城进发。他所率领的部队规模很大，从北向东移动。十字军从城墙上向外望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些穆斯林行动的方向。

各位诸侯立即做好迎击的准备。从摩苏尔军队的行军方向看，他们是朝着铁门的位置攻城的。

在沿着山脉走向修筑的城墙开口处建造的铁门，两边的城门都是铁质的，而且非常狭小，并不利于大量部队通过。

经过诸侯合议，弗兰德斯伯爵、诺曼底公爵和法国王弟于格三人一同负责迎击麦尔万率领的塞尔柱突厥人。这几位诸侯所率领的兵力都不多，主要通过游击战来袭扰敌人，其中弗兰德斯伯爵的部队以英勇善战而著称。三人的决死队于当天夜晚向铁门出发。

9日天刚亮，麦尔万就率部向铁门发起总攻。突然之间，门向内侧打开，三位诸侯的士兵在城内静候突厥军队入城。

大批突厥兵士涌入了狭窄的城门内。出于当地气候考虑，这些兵士大都轻装上阵，因此很快就被城内十字军的重装武士们枪挑刀砍，瞬间成为了肉块。

后续的突厥士兵听到城内悲惨的叫喊声，争先恐后地四散而逃。他们逃到没有敌兵的位置，又重新转回来。后方前来的军士和逃兵发生了冲突，结果不少士兵倒下，引发了攻城方的大混乱。

麦尔万最后只得带着败军回到大本营。克尔伯加见损失不小，决定对攻城一事慎重对待。十字军顺利抵挡了摩苏尔军队的首次攻势。

第二天，6月10日，克尔伯加决定利用自己兵力的优势，对安条克

进行包围，这是十字军没能实现的。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决定。随着一声令下，塞尔柱突厥军队就从圣保罗门附近的大本营出发，将12公里长的安条克城墙完全包围。

到了晚上，突厥人的营帐前都燃起火把。从安条克的城墙上向下望去，仿佛一片火海包围了这座城市。

十字军被完全围困在毫无存粮的城内。此时离他们攻陷这座近东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已有一周之久。

有个别绝望的人们，在突厥人熟睡的夜晚悄悄逃出城外。此时逃走的人，并非跟随诸侯军队前来朝圣的普通人，而是一部分骑士。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随诸侯而来的亲兵。毕竟他们拥有很强的主仆意识。

如乌云压顶般敌军的包围，给试图夺回圣地的十字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而朝圣者则由于食物不足，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连逃走的体力都没有了。而如果逃走者想成功离开，就必须到圣西蒙港附近。

这些逃走的人，最终得以在圣西蒙港乘上热那亚的船只，前往塔尔苏斯的外港。

先期逃离的布洛瓦伯爵此时就正驻在塔尔苏斯。听说克尔伯加逼近以后便出逃的布洛瓦伯爵，对留在城内的同僚深感羞愧，正考虑着是否要回到安条克城中。然而绝望叫喊的骑士们就在此刻逃到了塔尔苏斯，使布洛瓦伯爵打消了回安条克的决心。于是这座基利基亚的城市逐渐成为逃脱者的避难所。

6月中旬，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率领的大军抵达了塔尔苏斯附近的小亚细亚南岸。他得知安条克已经为十字军夺取，就根据宣誓书的要求，前来收取这座城市。

等他到了塔尔苏斯附近，才得到安条克正被突厥大军围困的情报。这消息是从安条克逃来的十字军士兵那里传来的。

不管逃跑的人是谁，逃跑已经是正当的行为了。听罢布洛瓦伯爵埃蒂安的叙述，皇帝明确认为，被突厥大军围困的安条克城已经绝无收复的可能。

于是阿莱西奥斯一世决定班师回朝。这支拜占庭军队在帝国最高军事长官杜卡斯的率领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几天以后，安条克城内的十字军得知了拜占庭皇帝的行动。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到皇帝自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神圣之枪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巴托罗缪的人拜会了圣吉尔，将其前一天晚上所做的一个梦转告了这位伯爵。在巴托罗缪的梦中，圣安德烈显现出来，并告诉他如下的话。

圣安德烈说，在城中心所建的圣彼得教堂地下，埋藏着曾经刺中十字架上的耶稣肋部的神圣之枪，十字军要将这支圣枪挖出来。梦中的圣安德烈还保证，如果在圣枪之下与突厥人战斗，就一定能击退突厥军队。

圣吉尔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诸侯。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毕竟巴托罗缪只是一名地位很低的朝圣者。诸侯的意见是，下等人所说的话完全不可信。不仅作为世俗贵族的诸侯这样认为，主教阿德马尔也觉得巴托罗缪的梦不值一提。

两天以后，克尔伯加突然从城西南角发起总攻。此处正好有热那亚的船只经过，他们英勇抵抗了突厥人的进攻，并在波埃蒙多的驰援之下，得以成功击退克尔伯加的军队。这一区域的城墙和居民的住宅非常接近，因此波埃蒙多命令这些居民撤离。由于没有平民，十字军得以专心防御。

有记载表明，两天后的6月14日夜晚，流星从天上落下，使克尔伯加军队的营地内突发火灾。我估计这应该不会是流星，而是当地夏天时常发生的雷电击中突厥军队的大营，烧死了一些兵士。城墙上的十字军见到此事，以为是上帝相助，一个个感激涕零。

在这一夜感动落泪的圣吉尔，第二天俨然一副考古学者的模样。他带着一队士兵，前往突厥人改造成马厩的圣彼得教堂，并按巴托罗缪的

启示开始挖掘。

果然，士兵挖到了一柄圣枪。尽管经历了很长的时代，圣枪依然锋利如故。圣吉尔毕恭毕敬地将其迎入营帐，稍作磨洗之后，安放在金丝织成的布料上。此时相信这一奇迹的诸侯，只有圣吉尔一人。

随着发现圣枪的故事在十字军中传开，巴托罗缪受到了兵士们普遍的感激，而部队的士气也为之大振。这支圣枪只保留了枪头和之后很短的一段枪柄，但作为“耶稣的遗物”，令人感到颇为神秘。

无论是在铁门击退突厥军队，还是天降流星烧死围城的士兵，都成了这支神圣之枪带来的祝福。当十字军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护佑之后，就忘记了饥饿带来的痛苦。

在另一边，两次攻城都被击败的塞尔柱突厥军队的士气开始受到了影响。

这一情况被波埃蒙多看在眼里。这位48岁的诺曼公爵派出使节，向克尔伯加求和。而他所派遣的使节正是隐士皮埃尔。这位隐士曾经试图逃走，却被丹克雷迪抓回了波埃蒙多的大营，于是就一直在普利亚公爵的“保护”下生活。

接到前往突厥军营命令的皮埃尔，因为害怕而再次想要逃跑，苦苦哀求波埃蒙多改选他人。嘲笑之余，波埃蒙多告诉皮埃尔，自己安排了一队人马与他同行，不必为此感到惊慌。无奈的隐士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克尔伯加的大营。

波埃蒙多派遣的使节中，包括自己非常信赖的西西里岛的骑士，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会讲阿拉伯语，而隐士皮埃尔会讲流利的阿拉伯语。自然，公爵还没有把握能否讲和，他只是想借皮埃尔了解塞尔柱突厥人内部的情况。

进入克尔伯加营帐的隐士皮埃尔受到了客气的招待。跟随而来骑士们也聆听了他和埃米尔的对话。关于求和的内容，大致是如此的：

“我等到达安条克之基督教徒，仅为伸张正义而来。在此沾满耶稣基督与诸殉教者之处，土地即留诸我等之遗产，领有此地即我等之权利。因此，主张正当权利之我等，与非正义据有此地之汝等间，何为主所护佑者，昭然若揭。”

片刻之后，克尔伯加回答道：

“诸位请即刻回城，并向派遣诸位者传达：安条克城早已是我等囊中之物。至于战败一方，绝无陈述个中理由之资格。

“然则我等亦愿以宽容而待败者。《古兰经》中言：服从伊斯兰之法者可获赦免。若汝等拒绝服从，刀剑之下，安条克将告征服，彼时汝等自然觉悟。”

双方的会谈就此破裂。其间不懂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骑士们，只好闷着头听克尔伯加营帐内皮埃尔和埃米尔的谈话。

回到城内后，波埃蒙多主要向隐士皮埃尔和那位能听懂阿拉伯语的骑士问话。并不知道波埃蒙多刺探军情本意的皮埃尔，向人们得意洋洋地描绘着自己与克尔伯加的对话。

而波埃蒙多却得知了自己一直有所预感的一件事实。

从克尔伯加率领摩苏尔大军来到安条克城前那天算起，已经过去20天，这中间突厥军队两次攻城，但两次都被击退了。

到了这个时候，城内官兵的耐力都已经到达了极限。克尔伯加也一直关注着城内兵士逃走的情况。波埃蒙多则从这次佯装的讲和交涉过程中，得到了敌情方面的重要信息。

以克尔伯加为总指挥的各位领主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例如其中的阿勒颇城主里德万和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两兄弟之间，就势同水火，相互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穆斯林势力中涌动的地盘欲望，在一直未能奏效的围城战中逐渐暴露出来。当克尔伯加的军队扎营将近一月时，其自身逐渐开始解体了。

考虑到敌我双方的情况，波埃蒙多决定出城迎战，一决胜负。

十字军出战突厥人

6月27日，波埃蒙多召集诸侯，制定出城作战的计划。在会议上，全军被分为六个分队。

第一队由法国和弗兰德斯人组成，其指挥是法国王弟于格和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由于弗兰德斯伯爵众所周知的战绩，他是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

第二队由来自洛林的骑兵组成，其领导人自然是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

第三队由来自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兵士组成，其指挥为诺曼底公爵罗贝尔。

第四队则由法国南部图卢兹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兵士组成，指挥是图卢兹伯爵圣吉尔。但由于圣吉尔突然染病，实际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主教阿德马尔。

圣吉尔也并非完全不参加战斗。他属下的200人，负责围困山顶城堡内的突厥兵士，其任务是阻止这些沙姆斯所率的兵士趁机逃脱。

波埃蒙多决定让城内的全体十字军都参加与克尔伯加的决战。此时整座城市内将无兵把守，城堡中的突厥兵士一旦出来，安条克就会重新落入穆斯林之手。而安排200名士兵守卫先前建筑的石墙，自然能够封锁山上的城堡。

六个分队中的第五队由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兵士组成，波埃蒙多亲自指挥。

来自相同地区的第六队士兵的指挥，是他的外甥丹克雷迪。

至于为什么波埃蒙多没有像正常作战那样，把士兵分成左中右三路，而派遣了六支分队，如果从他的角度出发，我们大概能想到三方面原因。

其一，克尔伯加所率的突厥军队，人数达到十字军的三倍。如果十字军以一个整体出战，几乎肯定会招致失败。

其二则是因为突厥军队内的各个领主之间存在隔阂。由于他们不能各自无条件接受克尔伯加的命令，分成几队的十字军就可以利用阵型的机动，在不同的突厥军之间获得战机。

第三个原因是在十字军内部，无论行军还是作战，都是按自己本来的地域和民族分开进行的。各地的诸侯都是率领自己本地的兵士作战。比如戈德弗鲁瓦率领洛林军队，诺曼底公爵率领诺曼底来的军队，而弗兰德斯人则听候弗兰德斯伯爵的调遣。将领知道兵士的底细，而兵士也习惯于本地领主的指挥，官兵之间生死与共。占领埃德萨的鲍德温和盘踞基利基亚的丹克雷迪，都是因此依靠少量士兵就取得成功的。将领和士兵之间具有同族意识，相互团结。因此，波埃蒙多把十字军全体分为六队。

在各路诸侯面前安排妥当之后，波埃蒙多想必做了如下的动员。

“我们明天就去挑战克尔伯加。害怕属下叛乱的克尔伯加也一定会尽快跟我们决战。预定的战场就在奥龙特斯河西岸的平原上，这里离安条克城不远，非常适宜大军展开。”

眼光犀利的波埃蒙多对于形势的预测极为精准。

6月28日拂晓，克尔伯加率领塞尔柱突厥军队，在奥龙特斯河西岸列阵。十字军一方自然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他们士气高涨地出城而

去。

集结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突厥大军的总司令克尔伯加，第一次看到了十字军的全体部队。

各位诸侯全体身穿朝阳下闪闪发光的钢制甲胄，在各式各样绣着家族纹章的旗帜下，乘着战马前进。诸侯身后的骑兵也以钢制甲胄武装，右手持长枪骑在马上。由于粮食短缺，很多骑士杀掉了自己的马匹，他们也披着钢甲，手持长剑，组成重装步兵阵。即使是普通的十字军士兵，也身披皮制的胸甲，而全体将士的胸前都统一挂着白底红十字。在突厥军队看来，这样的对手比实际军力要强大得多。

克尔伯加按照东方军队一般的作战方式，将弓兵配置在阵列最前面的山上待机，自己则站在后面的山上指挥。这样，弓兵可以从山上压迫敌军，同时以河边的左翼防守十字军进攻，并从此方向派出别动队。为了阻止十字军的攻势，克尔伯加还命令在平原上放火。然而尽管当时是夏天，火攻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克尔伯加的战术在接受统一指挥的部队中很可能奏效，各军可以依据战况，灵活运用战术安排。

但在这支缺乏统一指挥的突厥军队里，无法实现总司令的战术意图。混乱的大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就被诸侯的六支分队抓住破绽。

波埃蒙多见状将自己所率的第五分队分出一只别动队，由一位部将统领，绕到敌军弓兵的背后。这样，十字军就将敌军待机的弓兵和后面的部队完全分隔开。到接近正午的时候，克尔伯加军队的形势迅速恶化。

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满摩苏尔埃米尔指挥的各地领主率领自己的部队扬长而去。第一个离开战场的是大马士革的城主杜卡克，其

他的领主见状纷纷离去，其中包括阿勒颇的城主里德万。

最后还在与十字军交战的除了克尔伯加本人，只有附近哈马的城主了。

这时胜负的天平已经倾倒。克尔伯加只好丢下还在激战的士兵，仓皇逃走。由于在其逃遁的途中无处可依，这位埃米尔只好渡过幼发拉底河，越过沙漠，一口气逃到摩苏尔。

公元1098年6月28日，十字军在安条克之战中取得大胜。最后战场上留下的突厥兵士的尸体，达到2万之多。其中大多是在山上待命的弓兵。

而十字军方面的损失也达到4000人。虽然交锋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从伤亡情况可以看到当时战斗的激烈。

这次大战是十字军在塞尔柱突厥人面前取得的一次大胜。山上的城堡得知援军已经尽数败走，只好宣布投降。安条克城内最重要的战略建筑终于落到了十字军手中。这就意味着在叙利亚一带已经没有能与十字军对抗的穆斯林军队了。

安条克究竟落入谁手？

交战过后不到两天，到6月底，安条克城内外的穆斯林军队都已扫清。接下来，十字军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将安条克交给何人管理，从而能够布置向耶路撒冷的进军。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并未掩饰自己的野心。他自然认为，若论攻占并守卫安条克的功绩，自己无疑是最大的，因此宣称自己拥有对这座城市的领主权。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圣吉尔反对的原因，出自对波埃蒙多的反抗意识，但由于普利亚公爵的功绩为众人所承认，他的异议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但圣吉尔出示了诸侯在君士坦丁堡对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签署的宣誓书。根据宣誓书上的要求，诸侯都是拜占庭皇帝的属下，因此应当将取得的土地交给皇帝。

圣吉尔认为，十字军有将安条克献给皇帝的义务。而波埃蒙多也是宣誓书的签字者之一。这极大打击了波埃蒙多想领有安条克的野心。

此时作为教皇代表的主教阿德马尔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建议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派出特使，如果皇帝自己愿意前来安条克，十字军就对安条克归属拜占庭帝国不持异议。这一建议获得了十字军全体的同意，而诸侯决定派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是法国王弟于格。

于格带着给皇帝的提案，从圣西蒙港出发，乘坐热那亚的船只前往君士坦丁堡。皇帝很快给出了答复。

阿莱西奥斯一世以夏季大军难以行动为由，定于第二年春亲自率领拜占庭军队前往安条克。具体时间要到8个月以后。

这位皇帝错过了好机会。安条克在13年前还是拜占庭的领土，居民也大都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如果他愿意在当年夏天就率军前来，就可以很快收复安条克。大概此时的拜占庭人都缺乏趁热打铁的积极性吧。

主教阿德马尔之死

在安条克，圣吉尔和波埃蒙多的敌对已经激化。后者将自己的部队送到山上的城堡和城墙上的塔楼，以占据有利地形；前者则派遣自己的士兵抢夺了克尔伯加大军所留下的财宝。

正当诸侯忙于扩大自己势力时，瘟疫开始在安条克城蔓延起来。

瘟疫首先在城墙外，然后在城内蔓延。在安条克围城的8个月间，深受粮食不足之苦的居民和十字军，体力已近乎衰竭，卫生状况极差，非常有限的居住场所内又住着许多人。不生病反倒是很意外的事情。

虽然击败了突厥人，十字军和跟随而来的朝圣者却在已经征服的安条克城内，遭遇了酷暑之下的饥饿与疫病的威胁。

7月份，十字军的领导人中有一位因疾病而丧生。大概是由于神职人员需要大量接触病人和死者，而阿德马尔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在瘟疫面前，这位主教终于倒下了。

阿德马尔的死令全体十字军都陷入悲痛之中。即使是冷酷的波埃蒙多也为之流下泪水。与其说诸侯是为失去教皇的代理人而悲伤，不如说是对经过艰苦远征的战友之死感到难过。

在进行毫无必要对抗的波埃蒙多和圣吉尔之间，也终于达成了谅解。他们看着同行者就这样死去，默默地目送主教前往另一个世界。这位勒布伊的主教，就这样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撒手人寰了。

虽然阿德马尔的遗言是将自己埋葬在安条克城内被穆斯林改为马厩的圣彼得大教堂，但是各位诸侯决定，务必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埋

葬这位主教。

受主教阿德马尔之死影响最大的人，是图卢兹伯爵圣吉尔。两人从出发以来都是一起行动，而圣吉尔在行军当中一直受到主教的鼓舞。

此外，在诸侯当中最年长并拥有最大的领地的圣吉尔，性格极为火爆，而阿德马尔总能在恰当的时候给他中肯的建议，对伯爵的冲动有所约束。

总之，如果不是阿德马尔的话，此时圣吉尔所取得的战绩，完全赶不上波埃蒙多和戈德弗鲁瓦，甚至跟晚辈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以及丹克雷迪相比，都有着差距。

因此为主教之死感到最悲哀的人，无疑是56岁的圣吉尔了。

主教阿德马尔死后，发生了一件损害圣吉尔权威的事。曾经梦见神圣之枪的朝圣者巴托罗缪，来到同为法国南部人的图卢兹伯爵的营帐，描述了自己的另一个梦。

圣安德烈带着阿德马尔的亡魂，在巴托罗缪的梦中显现。据巴托罗缪的描述，身在地狱中的阿德马尔，深为自己怀疑神圣之枪的真实性而忏悔，并希望诸侯为他祈祷。而梦中的圣安德烈，则委托防御安条克城的正义之师，及早向耶路撒冷进军。

这些话自然令傲慢自大的圣吉尔颇为怀疑。巴托罗缪见圣吉尔没有应答，只好一脸悲戚地离开了。虽然巴托罗缪所说的话不足为信，他上次梦见的神圣之枪却是圣吉尔所发现的。而首先宣布这支枪为圣物的，正是圣吉尔自己。

8月里，由于瘟疫而丧生的人已经布满全城。各位诸侯不得不带领自己的兵士，前往附近的城镇和村庄避难。

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前往了基利基亚的海港。

戈德弗鲁瓦的部下则向北撤离，接应从埃德萨出发的携带必要物资的鲍德温。

我们不知道圣吉尔的人马去了哪里，但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分别前往了附近的一些村庄。

空荡荡的安条克城内不再有十字军，也没有任何敌人，居民也因为瘟疫的流行前往乡下避难。

到了9月，安条克的疫情逐渐好转，诸侯可以带兵回城了。波埃蒙多和圣吉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时候不复存在。因为只有波埃蒙多的军队回到了安条克。他们在基利基亚逗留期间，做了一件对十字军影响很大的事。

波埃蒙多代表十字军与前往基利基亚海港进行贸易的热那亚商人签署了军事和经济协议。他以安条克领主的名义，批准了热那亚人在安条克城内单独设立市场的权利，并卖给了热那亚人一座教堂和30栋房屋。从此安条克城内出现热那亚人的居住区。

这一协议的军事方面，则是同意为热那亚的商船添置武装，使其全体水手一变而成战斗人员。这样波埃蒙多就为自己夺取安条克城，增添了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也获得了热那亚船只在海运方面的支持。

对于以经济立国的热那亚来说，这一协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此时热那亚人来到安条克，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开放市场和引进外资。波埃蒙多在征服安条克之后，并未流放当地的穆斯林，而是让他们留在基督教社会中生活。通过开放市场，利用外来资金和人才，最大限度降低了其领地受外来袭击的可能性。而热那亚人其实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就

已经和近东的穆斯林进行了长期的贸易活动。

拥有丰富经验的热那亚人，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保持了政治上的冷静。在与波埃蒙多协议的最后，他们加上了一条：一旦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发生冲突，热那亚将保持中立。毕竟，卷入战争会导致本国经济利益的损失。

在协议签订之后，波埃蒙多回到了安条克。这时，他就开始着手准备与圣吉尔的冲突了。

在圣彼得教堂内凭吊阿德马尔的集会上，波埃蒙多和圣吉尔开始了唇枪舌剑的交锋。

波埃蒙多说道：

“拜占庭皇帝的性格实在是优柔寡断，结果怎么样？他根本就不会来安条克。那么，怎样维持好在这里的统治，是进军耶路撒冷之前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没有谁比我更适合管理这座城市。”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则反击到，既然皇帝的宣誓书上写着全体诸侯的名字，任何人都不应该单独站出来挑战皇帝的权威。

这个时候，一直保持中立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站了出来，明确表示对波埃蒙多发言的赞成。接下来，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也转而支持波埃蒙多。

由于戈德弗鲁瓦手握重兵，他的发言自然至关重要。而亲率500骑兵的弗兰德斯伯爵，则由于其所率部众的英勇善战而广受尊敬。

他们二人决意远征耶路撒冷，因此在身后的安条克城需要安排一位强有力的战友作为后盾。安条克之战中，鲍德温在埃德萨抵挡三周的重要性，对十字军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局势一边倒向波埃蒙多，圣吉尔只得咽下自己的怒火。于是他抛出一个又一个难题，而十字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一再推迟前往耶路撒冷的打算。

首先，圣吉尔跳出来说，一直想独占安条克的波埃蒙多，妨碍了十字军向耶路撒冷的进军。

对此，波埃蒙多声称，自己绝对没有任何妨碍大军前往耶路撒冷的意思。

圣吉尔要波埃蒙多自证清白，要求他跟随全体十字军一起进军耶路撒冷。

波埃蒙多回答说，自己要留下来帮助本地的基督徒重建安条克城，至于前往圣地的行军，请丹克雷迪代为前往即可。

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圣吉尔满意。在下一次合议时，他提出，波埃蒙多可以领有整个安条克城的3/4，但包含总督府在内的另外1/4，则应交由圣吉尔统治。分割统治的想法，令周围诸侯感到不切实际。

出席会议的诸侯无法掩饰自己的讶异。这一个月以来，圣吉尔和波埃蒙多的矛盾一直无法调和。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一胶着状态最终导致了圣吉尔的一无所获。

人肉事件

一座大都市不仅包括城墙以内的市区部分，提供粮食、手工制品和原材料的附近的城镇和村庄，也承担了大都市的部分功能。因此，越大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城镇、村庄和田地来支撑。

为了抵挡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犯的敌军，鲍德温在不及安条克规模的埃德萨，取得了邻近地区的支持。

攻占安条克的十字军，自然要在城四周的城镇和农村尽可能获得支持了。在法国南部拥有大片领地的圣吉尔，自然了解获取周边村镇的重要性。

安条克东南百余公里有一座小城名叫玛拉特·安努曼，城外围绕着一圈坚固的城墙，城内驻扎着许多与十字军交锋失败的塞尔柱突厥人，因此并不容易攻取。这时，三位诸侯和一些其他的部队都来到了城下。

11月27日，圣吉尔的部队开始攻城。第二个到达的弗兰德斯伯爵从城墙的另一位置发起进攻，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二人都命令自己的兵士退出战场。当天下午，波埃蒙多的人马也到达城下，但在尝试攻城之后，发现无法攻克。

由于三人分别率部前来，根本没有商讨如何攻城，各人完全凭自己喜好调遣部队，自然无法攻下城市。面对波埃蒙多和圣吉尔的对立局面，弗兰德斯伯爵也无法说服他们统一指挥全军。

在这一形势下，圣吉尔和弗兰德斯的部队先对城市附近的村镇发起了进攻。而波埃蒙多则派遣密使潜入城中，试图兵不血刃地占领这座小城。

由于普利亚公爵的人马大多来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其中有部分属下通晓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他从中选择了一人送入城内。这位南意大利人的长相和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完全不同，肤色接近中近东的居民，此外还懂阿拉伯语，因此颇为适合作为密使潜入城内。波埃蒙多提出的条件是不战而开城，并且保证突厥守备队与全体居民的安全。他认为，这个条件对于玛拉特·安努曼城内的居民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

然而在附近村镇作战三个星期的圣吉尔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波埃蒙多也没有告诉他相关的情况。

12月11日，圣吉尔再次攻城。他利用从附近砍伐的大量树木，建造了攻城用的塔楼。这一次，守军未能抵挡住十字军的进攻，圣吉尔的部下翻越城墙，杀入了城内。

无论是守备队的成员，还是城内的居民，都没有在十字军的屠杀下得以幸免。这座城市内所居住的将近一万居民，成年男性全部被杀死，女性和儿童全部被贩卖为奴隶。

这个时候出场充当奴隶贩子的，往往是信奉犹太教的商人。他们从十字军手上买下这些妇孺。由于犹太人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处于中立地位，他们在使异教徒变为奴隶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中间人角色。

小亚细亚
基利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伊斯坎达尔
安条克
圣西蒙
奥龙特斯河
哈伦克
阿勒颇
幼发拉底河
马拉特·安努曼
拉塔基
卡法尔达布
叙利亚
贾巴拉
沙伊扎尔
哈马
塞浦路斯
布尔尼亚斯
马沙夫
拉法尼亚
托尔托萨
侯斯尼·阿尔·阿克拉德
霍姆斯
阿尔喀
特里波利
地
中
海
巴尔贝克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提比利亚斯
阿克
海法
加利利湖
拿撒勒
凯撒利亚
加利利
约旦河
纳布卢斯
巴勒斯坦
阿尔苏夫
雅法
拉姆安拉
杰里科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伯利恒
希伯仑
加沙
死海
北
0
100千米

伯利恒

圣吉尔和波埃蒙多又在谁来统治这座城市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一次圣吉尔表现得十分强硬。他认为，既然是自己的部队征服了这座城市，把守这里的兵力就应该出于自己手下。

波埃蒙多很快妥协了。玛拉特·安努曼城内的屠杀还历历在目，如何征服周围的城市和村镇着实是一个问题。波埃蒙多已经从安条克城主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行动了。

出于与波埃蒙多一样的考虑，不关心安条克归属的戈德弗鲁瓦和弗兰德斯伯爵，积极前往安条克周边的地区。

12月25日圣诞节之前，各位诸侯回到了安条克。他们前往重新修缮为天主教堂的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庄严的弥撒仪式。

在云集的诸侯面前，圣吉尔决定，于次年复活节向耶路撒冷进军。1099年的复活节是4月10日。由于近东一带的冬天十分寒冷，无人对此持有异议。

此时心情大好的圣吉尔，以诸侯中最年长者的身份，向在场各位派送圣诞礼物。他的礼物是来自其领地法国南部铸造的小金币“索尔德”，按顺序分别赠给以下四位：

38岁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1万索尔德；

44岁的诺曼底公爵，1万索尔德；

33岁的弗兰德斯伯爵，6000索尔德；

23岁的丹克雷迪，5000索尔德。

自然，圣吉尔没有给次年长的48岁的波埃蒙多任何礼物。但这位公爵的慷慨究竟收到了多少回报，实在值得怀疑。诸侯并不会为收到这些

礼物，而对圣吉尔心怀感恩。

相反，新年过后，出现了一桩不祥的事件，令安条克的诸侯愤慨。

他们得知，玛拉特·安努曼城内圣吉尔的部下，食用了被杀害的当地居民的肉体。

给诸侯赠送礼物的圣吉尔，放任自己部下的兵士。因此，在城内得不到食物补给的情况下，饥饿难耐的兵士把手伸向了尸体。

可以想象，诸侯一齐指责圣吉尔。伯爵只得宣布将做出此行径的士兵处以极刑，以警告其他士兵。同时，他下令放火烧毁了整座城市。

玛拉特·安努曼就这样熊熊燃烧下去，直到变成一座废墟。

此事在穆斯林中间传开以后，基督徒就被当作食人族一样看待。在穆斯林史料中，发生食人事件的日期是城市陷落之前的12月12日，因此为城内的居民普遍所知。根据记载这一事件的伊斯兰史诗，当时玛拉特·安努曼的居民达10万之众，但经现代穆斯林学者的研究，城内只有1万人。这是历史上常有的对惨剧的夸张叙述。

但关于此事的记载并非纯属谎言。为了对自己军中的不祥事件进行答复，圣吉尔率领全军前往现场，亲眼目睹了玛拉特·安努曼城的毁灭。在此之后，他仿佛忘记了一切，率军直接南下耶路撒冷。圣吉尔出发的时间，是在比复活节早三个月的一月中旬。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冬季行军的困难。

圣吉尔的突然出发，自然使安条克落入了波埃蒙多的手中。

在安条克的大战结束之后，率领十字军的诸侯向着最终的目标——圣城耶路撒冷前进。此时，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下列出的是安条克战前与战后的诸侯。

战前：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及其两位兄弟鲍德温和尤斯塔斯；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以及教皇的代表主教阿德马尔；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及其外甥丹克雷迪；

法国王弟，弗蒙杜瓦伯爵于格；

征服者威廉之子，诺曼底公爵罗贝尔；

罗贝尔的内弟，布洛瓦伯爵埃蒂安；

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

战后：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与其弟尤斯塔斯；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

丹克雷迪；

诺曼底公爵；

弗兰德斯伯爵。

在战后的诸侯名单中没有出现的人物，都有其各自的原因。

鲍德温——一直在埃德萨及其附近坚持作战；

主教阿德马尔——在安条克陷落以后因疫病亡故；

波埃蒙多——在安条克及其周边坚持作战；

法国王弟于格——在代表十字军邀请拜占庭皇帝前往安条克之后，留居君士坦丁堡。其后又从拜占庭首都返回法国。两年后才重新回到东方。

布洛瓦伯爵——出于对克尔伯加所率大军的恐惧，逃出安条克，回到基利基亚后，一直犹豫是否应回到十字军中。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了西欧自己的领地。

然而伯爵的妻子，征服者威廉之女阿黛尔对其夫提前回国的行为深感不齿。她不断责备丈夫，要求他再次回到十字军中。两年后的1100年，布洛瓦伯爵重返巴勒斯坦。但到这时候，不仅安条克早已落入十字军之手，收复耶路撒冷的任务也已经完成。

最终向耶路撒冷进发的诸侯，从一开始的11位减少到了6位。

第五章 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公元1099年1月13日，因十字军远征来到玛拉特·安努曼的圣吉尔，第一个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征程。圣吉尔自己在寒冬季节身着粗布长衫，赤裸着双脚，手持带着十字架的手杖，以典型的朝圣者姿态立于众人之前。他率领着胸前印有白底红十字的军队，全体带着朝圣的心情前行。圣吉尔是对此行充满信心的。随着一步一步接近耶路撒冷，他保持着谦虚的朝圣姿态，并从玛拉特·安努曼出发以后没几天，就命令全军准备好向圣地进发。

当安条克城内的诸侯得知圣吉尔南下的消息之后，诺曼底公爵第二个向耶路撒冷进军。

同时，丹克雷迪也出发了。丹克雷迪不跟圣吉尔一起行军，自然是由于波埃蒙多与圣吉尔互不信任。波埃蒙多把自己的部队分给外甥，使丹克雷迪率领了一支大军，积极地前往圣地。

诺曼底公爵和丹克雷迪并未采取朝圣者的方式，而是全副武装地向耶路撒冷进军。

圣吉尔出发后的一个月，2月中旬，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也从安条克出发，向耶路撒冷而行。与戈德弗鲁瓦同行的，是弗兰德斯伯爵所率的骑兵队伍。他们的部队从骑兵到步兵都是全副重武装，极为善战的军团。值得一提的是，戈德弗鲁瓦选择了一条与圣吉尔不同的道路行军。

与此同时，鲍德温还留在埃德萨，而波埃蒙多留驻安条克。从圣吉尔离开以后，波埃蒙多就开始着手将安条克变为自己的公国，而鲍德温则把埃德萨确立为自己的伯爵领地。

根据后来研究者的统计，分成两股前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的规模如下：圣吉尔、诺曼底公爵和丹克雷迪组成的第一部分，包括骑兵1000余人和步兵5000人；一个月后出发的戈德弗鲁瓦和弗兰德斯伯爵的军队，则包括50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两支军队合计，骑兵1500人，步兵1.1万人，总计是1.25万人。相比之下，十字军从西欧出发时，总人数为5万。

在经过小亚细亚的6个月间，十字军就在与突厥人的作战中大量减员。

而在将近一年的安条克攻防战中，又有许多军士因战争或瘟疫而死。

此外，还有许多人马守卫着埃德萨伯爵领地和安条克公国。

因此，在向最终的目的地耶路撒冷进军的过程中，十字军的人数逐渐减少。参加的诸侯数量也减少到原来的一半。此时，离最初从西欧出发已经过去了3年。这3年中，十字军的人数减少到原来的1/3。路上丧命的人，都成为了前往天堂的“殉教者”。在安条克城中因粮食不足而死的人，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

减员并未动摇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决心。虽然在人数上有所减少，十字军却在一次次作战中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向着耶路撒冷进发。

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

1099年的巴勒斯坦处在埃及开罗哈里发的统治下。

巴勒斯坦被山地分成东西两部分。据有山脉东侧的是大马士革的突厥领主，而山以西的海岸地带，从贝鲁特到加沙之间的狭长地区，则全部在埃及的统治之下。正是因为如此，当十字军进攻安条克时，埃及宰相才会来到十字军的阵前，希望缔结协定，让巴勒斯坦免受十字军的进攻。虽然当时未能达成任何协定，而此时此刻，十字军已经踏上了埃及哈里发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

但埃及哈里发是最近才刚刚占据此地的。因此，当地的很多领主并不是埃及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几个城市，都是由承认埃及主权的塞尔柱突厥人埃米尔实际管理。

巴勒斯坦的状况因此就变得很特殊。如果这里完全是埃及人治理的话，十字军自然就是侵略者了，但在突厥人统治的城市中，十字军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解放者。

十字军的领导人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情况。他们在远征的过程之中，逐渐学会了在西欧学不到的变通。无论经历成功与失败，东征都给了他们很多教训。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接近了耶路撒冷。

先期出发的圣吉尔的部队，从一把火烧尽不祥事件的玛拉特·安努曼开始，沿着内陆的大道向南行军。这条道路通往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城市。尽管如此，圣吉尔的部队还是得以在玛拉特·安努曼以南30公里处的卡法尔塔布城休整了三天，并得到当地居民的友好接待。

之后，诺曼底公爵和丹克雷迪也到达了这座小城，三人在此地对以

后的行军路线进行了安排。

有两支突厥军队可能阻挡这三人的去路。一位是沙伊扎尔的埃米尔，另一位则是特里波利的埃米尔。他们不只是这两座城市的领主，还能够命令附近的小城市加入自己的队伍。

三位诸侯都试图避开两位突厥领主的进攻。毕竟，双方一旦交锋，十字军有限的兵力就会受到很大损失。这对收复圣地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希望和当地的突厥人保持友好关系，确保领主们保持中立。

恰好在这个时候，沙伊扎尔埃米尔的使节来到了十字军的大营。他们带来了埃米尔的建议。根据建议的内容，沙伊扎尔和哈马保证十字军和平通过，两地的领主会以很便宜的价格将军需用品卖给十字军，并提供向导。

至于所谓“和平通过”，是希望基督教军队不要攻击沙伊扎尔和哈马及其附近的各城镇，和平地经过这两座城市的近郊。

接受沙伊扎尔埃米尔提议的十字军，在经过其城郊时毫无顾忌地夺取了当地牧羊人的羊群，将羊群卖给市民，然后以所得的财富换取马匹。这样，多达1000人的没有马匹的骑兵恢复了原来的战斗序列。

一路南下并未受到威胁的圣吉尔部队，出现了新的问题。他听说热那亚和英格兰的船只沿着叙利亚海岸航行，便想率领军队往海边行进，以便于获得给养。

他的建议受到20岁出头儿的丹克雷迪的坚决反对。后者认为，率领大军在严冬时节翻越山脉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一山岳地区还处在两次遭十字军击败的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的控制下。因此，丹克雷迪主张部队一直南下，到没有山区阻隔的地带，再转向海岸行军。丹克雷迪之所以反对圣吉尔，很可能也是来自与其舅父波埃蒙多一样的立场。而最后圣

吉尔接受了丹克雷迪的意见。

当十字军继续开始行军之后，就出了沙伊扎尔的埃米尔统治的地区。此时，对于十字军来说，要尽可能做到和平行军，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则要依靠武力了。以和平为优先目标，各位诸侯向着耶路撒冷前进。

1月22日，圣吉尔和丹克雷迪的部队到达了马沙夫城。他们和当地的城主达成了妥协。

1月23日，十字军进入了马沙夫以南的拉法尼亚。由于城主和居民大都纷纷逃走，他们得以和平地进入城市，并在城内休整了三天。从此处起，道路进入了转向西南的山脉地带，前面的山上耸立着一座无法绕过的城堡。

这座城堡名叫侯斯尼·阿尔·阿克拉德。听说十字军要和平通过此地，当地人就关上了城门。当十字军开始攻城时，城门突然打开，一群家畜从城内冲了出来。

十字军的兵士看到此景，在攻城的同时，就开始捕捉这些家畜。圣吉尔周围的将军都忍不住上前捕捉。在丹克雷迪部队的协助下，十字军全力捕捉家畜，结束了当天的进攻。

第二天，准备再次进攻的十字军士兵，发现城内一箭不发，城门洞开而空无一人。原来，守军和居民都在赶出家畜以后逃跑了。

十字军在空荡荡的城中度过了好几天。那些逃跑的居民留下了很多粮食，这给6000多兵士提供了给养。十字军也不必担心敌人的袭击，得以对此城堡进行彻底的改造与扩大。1000年以后的今天，坚固的城堡“骑士之城”（Krakdes Chevaliers）仍然历历在目。与此前的规模相比，新的城堡在山上的部分使之易守难攻。

特里波利的埃米尔派来使节，访问驻在城内的圣吉尔。

特里波利的埃米尔贾拉尔·阿尔·穆利克不愿服从埃及哈里发的统治，因此想利用十字军取得独立的地位。他给圣吉尔的条件是承认十字军对特里波利的领有权。

这引起了圣吉尔的兴趣。他派遣自己的一名部下去特里波利直接与埃米尔交涉。这位部下回来禀报图卢兹伯爵，特里波利城内物产非常丰富。因此，圣吉尔打算向埃米尔索取一笔赎金。

丹克雷迪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卷入特里波利的事务会拖延前往耶路撒冷的时机。因此圣吉尔只得自己率军前往特里波利，并在城外20公里处的障碍前停下。

此处小城阿尔喀的居民做出了彻底抗战的充分准备，使圣吉尔的军队无法继续前进。图卢兹伯爵只得将一部分兵力交给属下，让他们进攻附近的托尔托萨城。他相信当阿尔喀的居民得知附近城市失陷的消息以后，自然会动摇抵抗的决心。

托尔托萨很快陷落。这座城市的城主和居民见到十字军大军压境以后，就全部投降了。得知托尔托萨陷落的城市，在十字军接近以后就赶忙大开城门。

然而，阿尔喀的抵抗决心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虽然圣吉尔完全不愿改变攻占这座城市的打算，诺曼底公爵和丹克雷迪却想撤军了。他们认为圣吉尔的部队战术水平太低。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降低圣吉尔权威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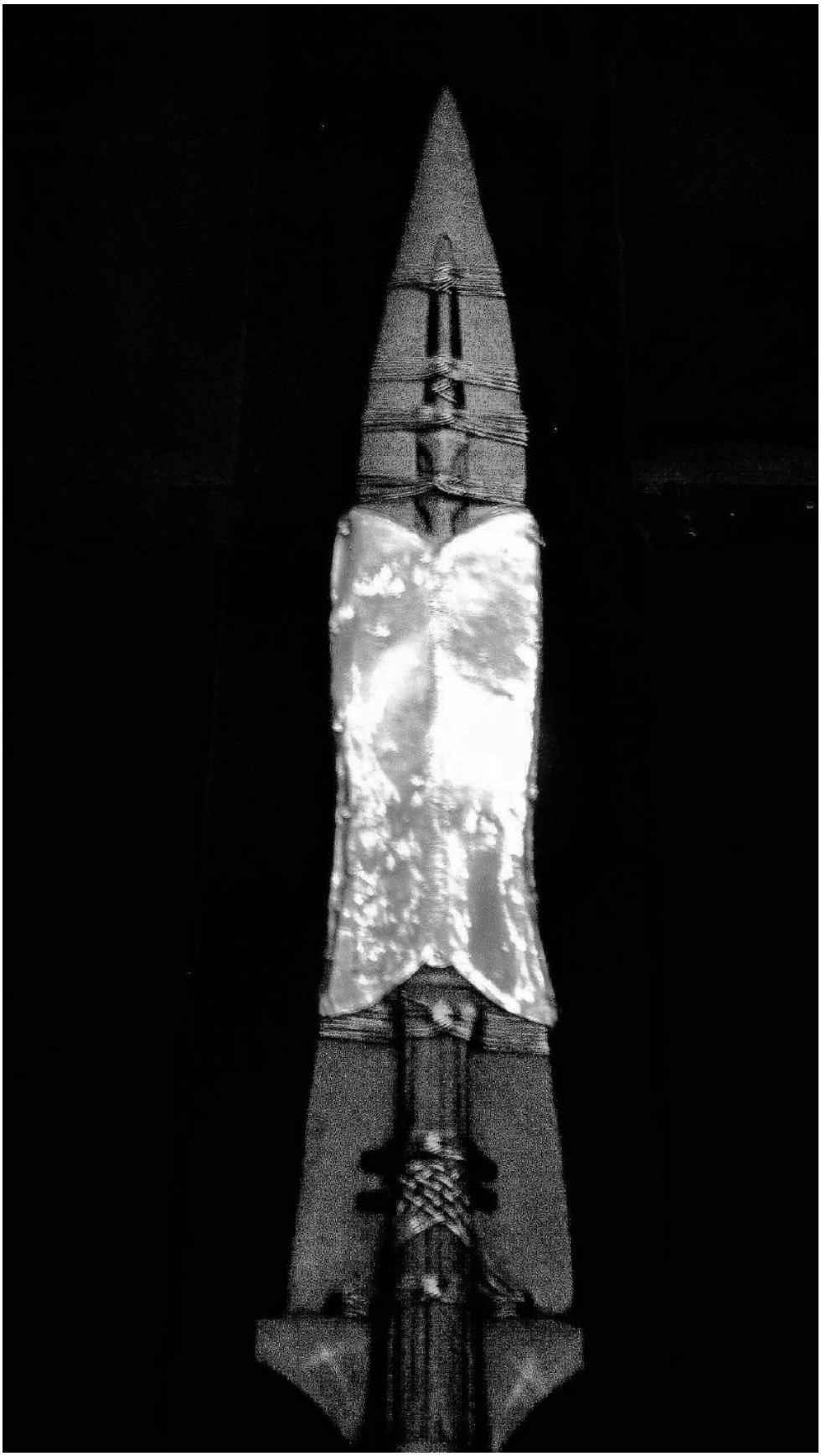
“火的试炼”

以发现神圣之枪而闻名的巴托罗缪，仍在圣吉尔的军中。他在阵营中大声呼喊“阿尔喀要陷落了！阿尔喀要陷落了！”引起大多数士兵们的反感。很多人认为他所发现的“神圣之枪”是伪圣物。于是巴托罗缪决定以“火的试炼”来证明自己所发现圣枪的真实性。4月8日，他开始了这场试炼。

所谓“火的试炼”，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的真伪，以上帝的名义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一口气赤脚走过。试图在士兵中证明自己的巴托罗缪，在这次试炼中被严重烧伤，于9天后痛苦地死去。

圣吉尔不仅相信“神圣之枪”的奇迹，还将其在军士中传看。主教阿德马尔一开始并不相信此物，但在圣枪发现以后，就将其作为圣物放在身边，而圣吉尔对巴托罗缪更是尽力保护。现在巴托罗缪死了，圣吉尔应该不难感受到人们的嘲讽吧。

但图卢兹伯爵圣吉尔还是一直拿着这柄圣枪。在6年以后，圣吉尔死去时，圣枪的数量增加到四支。这四支圣枪，意味深长地显示了圣物的命运。



维也纳霍夫堡宫所藏“圣枪”

其中一支圣枪一直在亚美尼亚教会保存，自称是直接来自巴勒斯坦的遗物。

第二支圣枪是率领第七次十字军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从巴勒斯坦获得的战利品，一支保存在巴黎的教堂，但在法国大革命后失踪。

第三支圣枪于15世纪末由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送给教皇，存放在梵蒂冈。但没有人知道这支圣枪保存的具体地点。

最后一支保存在维也纳，是唯一可以在网上看到照片和介绍的一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权威的象征之一，受到了精心保管。

十字军合流

在“火的试炼”这一骚乱之后，从安条克迟出发一个月的戈德弗鲁瓦和弗兰德斯伯爵的军队，到达了圣吉尔正在进攻的阿尔喀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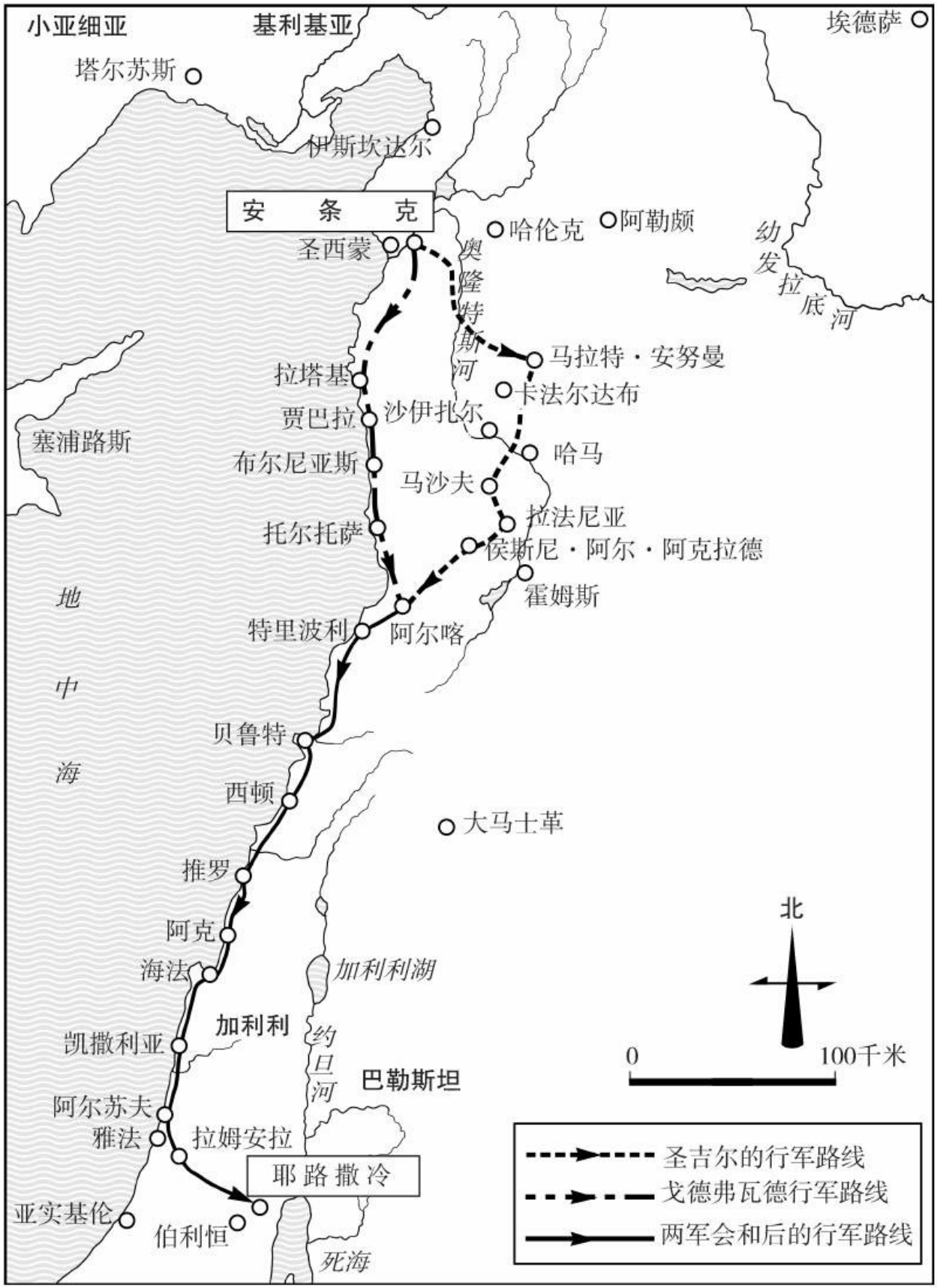
这支军队沿着海岸南下，在接受英格兰和热那亚船只的补给之后，很快就接近了前面的十字军。他们不必像圣吉尔那样与穆斯林领主交涉，只要沿路行军，就轻轻松松地通过了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沿途的城镇和村庄都因为恐惧这些西欧人，不敢轻举妄动。

当这支军队到达阿尔喀城下以后，圣吉尔就被完全孤立了。反对他的人从两个增加到了四个。

此时，圣吉尔失去了领导地位。他只好放弃进攻阿尔喀，同意和其他诸侯一起行军。于是十字军以得到特里波利城赠送的1.5万拜占庭金币为代价，兵不血刃地进入城市。圣吉尔的军队也向地中海沿岸地区进军了。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勇猛有余，但在同时期人中评价不高。

这也是他对拜占庭皇帝过于轻信所致。


小亚细亚
基利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伊斯坎达尔
安 条 克
哈伦克
阿勒颇
幼发拉底河
圣西蒙
奥隆特斯河
马拉特·安努曼
拉塔基
卡法尔达布
贾巴拉
沙伊扎尔
塞浦路斯
哈马
布尔尼亚斯
马沙夫
拉法尼亚
托尔托萨
侯斯尼·阿尔·阿克拉德
霍姆斯
地
特里波利
阿尔喀
中
贝鲁特
海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北
阿克
海法
加利利湖
加利利
凯撒利亚
约旦河
0
100千米
巴勒斯坦
阿尔苏夫
雅法
拉姆安拉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伯利恒
死海
圣吉尔的行军路线
戈德弗瓦德行军路线
两军会和后的行军路线

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的行军路线

在阿莱西奥斯一世收到十字军的来信之后，他于6月亲率大军前来，并来信告诉诸侯，自己也将向耶路撒冷进军。

令各位诸侯不能接受的是，圣吉尔又站出来说，皇帝所率的部队对十字军非常必要，因此要等待拜占庭大军的支援。

没想到皇帝来信的内容早被埃及的哈里发所获悉。他立即遣使君士坦丁堡，责问皇帝为何要与法兰克入侵者一起作战。

并不想与埃及哈里发为敌的拜占庭皇帝，考虑到波埃蒙多抢占安条克的威胁，当即对哈里发的使节表示，拜占庭帝国在穆斯林和法兰克人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此时有哈里发的探子潜入特里波利城，他们不仅搜集情报，还将各种消息散布出去。当十字军得知皇帝将保持中立的消息以后，圣吉尔再次在不信任皇帝的各位诸侯面前颜面全失。

命令探子散布皇帝中立的消息以后，埃及哈里发再次遣使十字军，提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十字军答应不动用武力，而是和平地朝圣，哈里发将保证其治下巴勒斯坦基督徒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这一次，十字军没有答复。虽然这些西欧来的农民一直为富裕的东方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所蔑视，诸侯相信自己能打破哈里发和拜占庭皇帝的勾结，并再次团结起来，为了收复耶路撒冷的目标进军。

这一段十字军所征服的区域，是现代的叙利亚。为了通过这段路程，圣吉尔所率的部队花了四个月，戈德弗鲁瓦的部队花了三个月。之后经过的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在的地区了，从这里到耶路撒冷只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到了这个地方，十字军全体一致，直扑耶路撒

冷。

巴勒斯坦的状况

5月16日再次出发的十字军，不再进攻沿途的城市，只是会在周边征粮。

贝鲁特的埃米尔接受了特里波利埃米尔的经验，在十字军接近时提供了金钱与军粮，接下来到达的西顿城也如此效仿。在要塞推罗城下，十字军面临了城门紧闭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城墙外还是摆放着粮食，供经过的十字军补充给养。

1.5万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地一口气经过了阿克、海法和古罗马时代的大型海港城市凯撒利亚，以及阿尔苏夫、雅法等城市。

近东人没有见过西欧的重装骑士团。他们看到的是从头到脚以重装备武装起来的一支大军。由于中世纪西欧骑士的头盔罩住了脸，看到的人们都对这一身机械感到恐惧。

这些人腰上都佩着长剑，左手持盾，右手拿着标枪。

在中东沙漠中，即使是春天也已经酷热难耐。十字军行军时一身盔甲，正如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精英们，在沙漠中也身着皮夹克，就算是挥汗如雨也并不在乎。

我们不难想象十字军列队前进的样子。中世纪近东的人们体会的是他们带来的一种现代坦克部队接近似的威压感。近现代的坦克部队，就是中世纪和近代重装军团的继承者。

重装骑士团以无言的压力代替使用武力，轻易地成功经过了这段路程。

统治巴勒斯坦的埃及哈里发，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海军。十字军经过的城市都是海港，它们无不期待着埃及的支援。然而，城主和居民最终认为，与其靠支援与十字军硬碰硬作战，不如提供军需物品，让他们通过了事。其隐情在于，当地人不愿接受埃及哈里发的命令。让十字军快速通过的城市居民，和快速通过的十字军想到一起去了。

十字军从雅法（今天的特拉维夫）开始，不再沿海岸行军，而是折向内陆。从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通道，是从海上来的欧洲朝圣者的必经之路。在此道路上，有一座名叫拉马拉的城市。由于这里的居民都已逃走，十字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城市。在拉马拉，十字军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这些人是在当地穆斯林人海中，与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希腊正教徒信仰不同的极少数天主教徒。他们来自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自告奋勇地为十字军担任向导。

这些人非常希望十字军能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稣的出生地。

丹克雷迪当即表示要前去收复伯利恒。这位青年将领很快付诸行动，率领属下300将士前往这座小镇。

很快，伯利恒就宣告收复，但之后十字军中起了冲突。丹克雷迪宣称伯利恒是自己的领地，但在当地的天主教神父看来，普通人不能占有上帝的都城。对此，丹克雷迪警告说，如果不将伯利恒变成他的领地，十字军就会撤离，让当地天主教徒自己守卫这座小镇。于是当地人转而向十字军的其他领导人寻求帮助。

打破尴尬局面的，是戈德弗鲁瓦的一席话。他希望丹克雷迪先放下争执，与其他诸侯一起前往耶路撒冷。丹克雷迪最终同意搁置争议，与大军一起向耶路撒冷进发。

但这位年轻人还是无法释怀，在行军途中带兵返回了伯利恒。最终，丹克雷迪占领伯利恒成为了既成事实。他既富有战术素养，又能够果敢行动，也具备很强的预见能力。

比其他诸侯晚三天到达耶路撒冷的丹克雷迪，为了耶路撒冷的攻城战特意准备了很多粮食。丹克雷迪的部队带着满载面粉的大车，赶着成群结队的牲畜，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下的军营。

第六章 圣城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6月7日，十字军终于到达可以远远望见耶路撒冷的地方。

各位诸侯纷纷下马，在甲胄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金属声中，恭敬地整理好服装，脱下头盔，仿佛进入教堂一般。

骑士们也都下马整装。

普通的士兵们都不假思索地双膝跪地，有的已经泣不成声。

每个人都在感动中受到震撼，泪如雨下。毕生耳闻的圣城耶路撒冷，如今就在眼前。在夕阳的照耀下，将士们静静地伫立着，胸中怀着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愉悦心情。

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战士们，在这一瞬间，都成为了谦卑的朝圣者。

心怀这样的想法，诸侯和普通士兵的差距顷刻间消失了。由于能够免罪而前来参加十字军的杀人犯和盗贼们，也变得跟志愿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一样。

耶路撒冷是一座能让任何人感动的神奇城市。而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将其视为圣城，这也成为了三大一神教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耶路撒冷围城战

十字军首先在耶路撒冷城郊野营。虽然没有记载说诸侯是否像波埃蒙多在安条克那样花一天时间绕城一周视察，但我想这是必然要做的准备。与围绕安条克的12公里城墙相比，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全长只有4公里。因此攻占耶路撒冷并非像安条克那样困难。

古代和中世纪的耶路撒冷，就是现代耶路撒冷的老城。它的结构在历史上没有太大变化。古罗马时代的哈德良皇帝曾加固了城墙，并对城内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之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在城市内部开展了进一步的建设。总的来说，十字军所见到的耶路撒冷，与900年前变化不大。

在背靠着橄榄山的耶路撒冷东侧，深幽的山谷之中错落着高耸的城墙。这里起伏多变的地势非常不利于攻城，因此城墙非常窄，也完全没有能够增强防御力的塔楼。

而在背靠着锡安山的南侧，则有一大片平地，从而适合排兵布阵。但由于地势差距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城墙上的进攻。如果一旦遇到大雨，沙漠中的雨水奔流而下，甚至会把营帐冲走。沙漠地区的大雨，往往带来致命的灾害。

在耶路撒冷的四面城墙中，对于攻城一方来说，能够摆开阵势进攻的，只有城的北侧和西侧。因此在这两侧的城墙上，遍布着守城的塔楼，相应地提高了防御力。

但当十字军于1099年准备进攻耶路撒冷时，他们还要提防来自西面的援军。耶路撒冷正处在埃及哈里发的统治下，而埃及军队正驻防于雅法以南的亚实基伦。因此，攻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所担心的方向，是通

往雅法的城西大道。各位诸侯自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就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决定了自己阵营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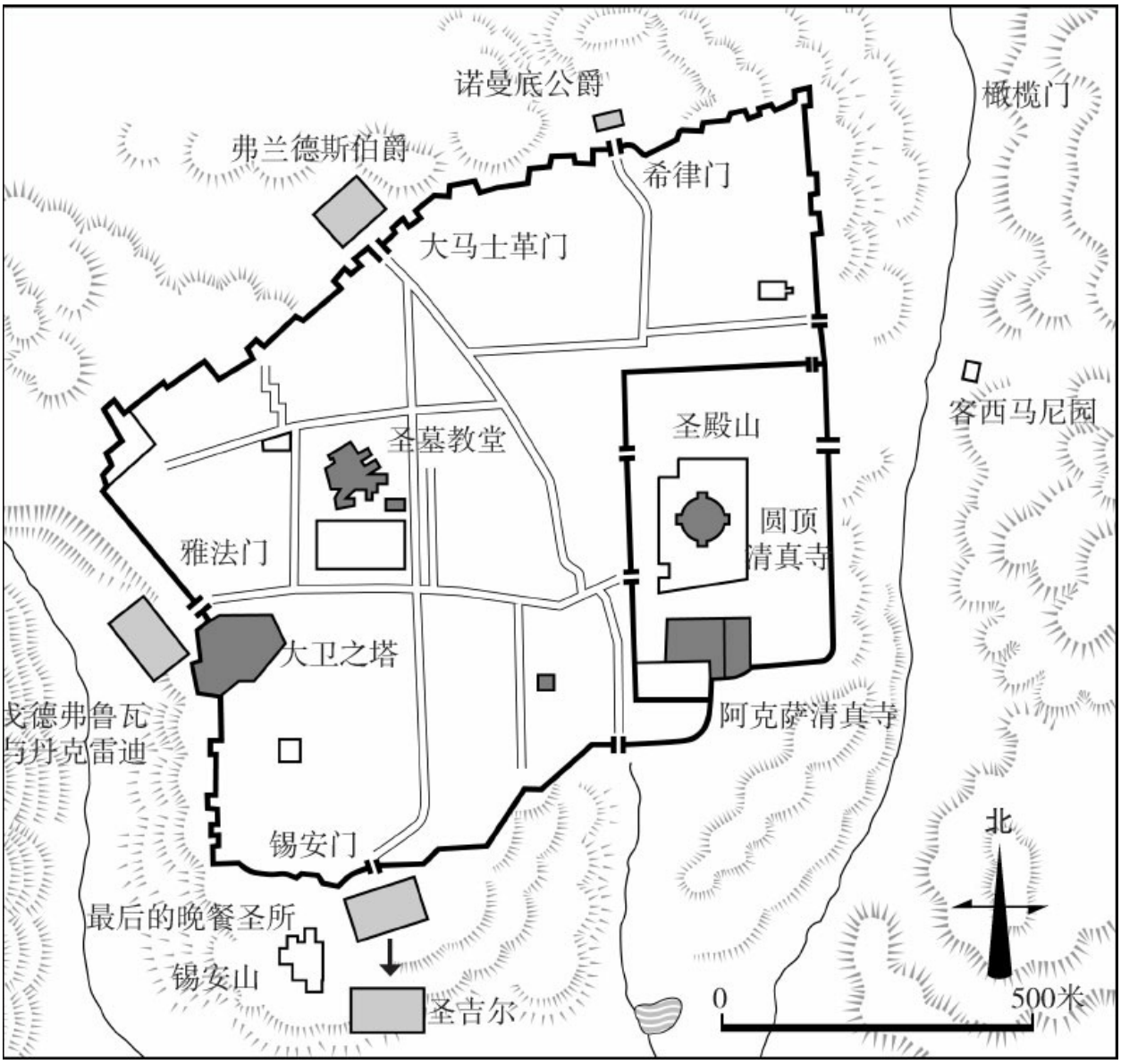
几乎没有率领什么部队的诺曼底公爵在城北的希律门外列阵。在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因为基督徒憎恨曾经迫害耶稣的犹太王希律，这座城门被改名为“花之门”。

在此处右侧西北偏北，面向大马士革方向的大马士革门前，是弗兰德斯伯爵所率的少数精锐之士的阵地。十字军后来把这座城门改名为“圣司提反门”。

为了抵挡西侧来犯之敌的威胁，守军建造了名为“大卫之塔”的塔楼。塔楼正对着通往雅法的雅法门。

在大卫之塔和雅法门之外，遍布着戈德弗鲁瓦所率军队的营帐。洛林军队的布阵同时对着城门和雅法的方向，以便于在任何一方的敌人到来之时有所防备。这些部队也十分精锐，深得洛林公爵的领导之法。

三天之后到达耶路撒冷的丹克雷迪带着满载军粮的大车和成群的牲畜，与戈德弗鲁瓦的部队会合了。



耶路撒冷城市图及周围各将的布阵情况（根据史帝文·朗西曼《十字军史》，第1卷）

另一方面，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则选在锡安山后的城南布阵。在城外这个位置，座落着以耶稣最后的晚餐而著称于世的“餐室”（Cenacolo——意大利语，译者注）。这是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们无一例外要参拜的圣所。对心中充满虔诚信仰的圣吉尔来说，这里自然是独具魅力的地方。

然而，圣吉尔的营地最终无法坚持下来。城墙上埃及士兵的箭矢如

雨点般落下，来自法国南部的士兵们难以招架。于是伯爵只好将阵营移到锡安山上，以远离敌军的攻击。

最终，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的主战场是北边的希律门到西侧的雅法门之间的区域。

十字军将攻占耶路撒冷的战役称为“解放”。相反，他们并未这样称呼安条克之战，因为没有人认为此战是这种性质的。而在耶路撒冷这座“圣城”，攻坚战有着特别的含义。

因为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本来不能前来参战的诸侯，也会派代表来出战。

在安条克攻城战中因疫病而死的主教阿德马尔，委托圣吉尔营中自己的兄弟代为参战。

还留驻安条克的波埃蒙多，则要求其外甥丹克雷迪代表自己参战。

在埃德萨的鲍德温，则让同名的另一位鲍德温留在埃德萨，自己赶来耶路撒冷。

这样，戈德弗鲁瓦、尤斯塔斯和鲍德温三兄弟全家都参与了“解放耶路撒冷”的战斗。

与以上诸位同来东征的诸侯当中，自己不能前来，也无法找人代表的，包括在安条克之战中作为使节派往君士坦丁堡，辗转回到西欧的法国王弟于格，以及临阵脱逃的布洛瓦伯爵埃蒂安两人。贫民十字军的领导人皮埃尔，倒是与众朝圣者一起跟随诸侯之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对第一次十字军来说，最终目的就是收复这座圣城。

此时守卫耶路撒冷的，是埃及哈里发的将领伊夫蒂哈尔·阿达乌拉。他知道基督徒军队接近耶路撒冷，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准备依仗圣

城的高墙，一直固守到援军来临。他准备了储存雨水的水槽，使守军不必担心缺乏供水。由于古罗马时代的下水道系统还在发挥作用，城市也不会遭到疫病的威胁。同时，城中的粮食储备也非常充分。他唯一担心的是守备士兵的数量不多，这只有依靠坚固的城墙来弥补。

此外，守城一方尽快实行了三项对策。

第一项对策是恳请埃及军队前来救援。为了慎重起见，耶路撒冷城并未派出递送求援书的信使，而是采用近东常用的信鸽。很多封求援信的复制版被绑在信鸽身上，这样就可以确保亚实基伦的埃及军队必定能收到耶路撒冷的请求。

第二项是将耶路撒冷城内全部基督徒——当然，几乎全部是希腊正教徒，流放到城外。但犹太人准许留在城中。这样，就阻止了城内通敌的情况，也减少了围城时的口粮需求。

至于城内的第三项对策，则是给耶路撒冷城外近郊的所有水井投毒，使其无法饮用。这些水井是为了旅行者和放牧的家畜而设的，因此城内的守军通知了牧人，命令他们将所有牲畜赶入城内避难。这样也部分减缓了城内食物的消耗。

虽然防御耶路撒冷的军士数量很有限，耶路撒冷的守将阿达乌拉还是确信自己能够坚持到援军到来。他认为，如果打持久战的话，自己应该能够取得胜利。

水的匮乏

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前列阵的十字军，并未陷入粮食不足的状态。由于丹克雷迪的悉心准备，现有的军粮满足了全体部队攻城的需要。但供水不足成了使十字军无法攻城的问题。

在中近东一带，6月已经完全进入夏季。虽然十字军习惯穿着沉重的甲胄，但在此酷暑季节这样装扮显然会让人难以忍受。在刺眼的强烈阳光照耀下，汗水浸透了身上的盔甲。如果兵士脱下身上的甲胄，则很容易成为城墙上所射出的冷箭的牺牲品。

而此时所有的水井都无法使用。唯一免遭城防一方下毒的，是城东南的一座水池。但若想去那里汲水，就会成为城墙上弓兵的活靶子。

如果十字军想获得没有被下毒的饮用水，要走上10公里远的距离。但是这样的远距离补给，又很可能成为埃及伏兵的猎物。此外还有位于更远地方的约旦河。有几名深受口渴之苦的士兵，来到了约旦河边。正当他们在这条当年耶稣基督接受施洗者约翰洗礼的河中愉快沐浴嬉戏时，被附近村民误以为前来掠夺，结果全数被杀，一个人也没能回去。发生这样的事件，反映了当时营地里有大量士兵因为不耐口渴，到远处寻找水源的情况。

这样下来，十字军就无法发动进攻了。各位诸侯深为军士们由于供水不足而引起的意志消沉感到苦恼。就这样，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围困了5天。

6月12日，诸侯决定向上帝祈祷，以求从困境中得救。他们专程请来了橄榄山中修行的隐者，向其求助得救的办法。这位并不代表任何机构的隐者彼得，给十字军的建议是带着虔信全体攻城。

第二天，十字军果然信誓旦旦地全体投入了攻城战中。大概是真的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当天十字军从北侧的城墙攻入了城内。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城墙内侧还有一道城墙。为了攻取第二道城墙，就需要建造大量木材制成的塔楼。而只知道向上帝祈祷的十字军，自然对此毫无准备。

到日落后归营的时刻，十字军才明白，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城墙必须依靠攻城塔才能攻取下来。

建造攻城塔

令十字军感到束手无策的是，在沙漠中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周围有一些山石，但光秃秃的地表上没有树木。

再次陷入消沉之中的诸侯，很快又听到了好消息，足以令他们相信，是上帝在眷顾十字军的努力。

6月17日，成群的热那亚和英格兰船只进入了雅法港。这些船只不仅满载着各种援助物资，还载有圣吉尔的部将雷蒙·德·皮雷所率领的人马，意在攻取雅法。最终经过苦战，这支舰队奇迹般地击败了埃及舰队，占领了雅法的港口。而埃及海军再也无法封锁雅法港，不得不退回亚实基伦。

然而，在热那亚的两艘大型桨帆船和英格兰的四艘小型帆船运来的物资当中，并没有木材在内。也许是船长们认为木材可以就地征调，但实际上耶路撒冷周边完全没有树木可供砍伐。因此，要建造攻城塔，仍然是很困难的。

丹克雷迪和弗兰德斯伯爵两位一直活跃在战场上的诸侯担负起了去远方征调木材的任务。他们两人将属下兵士编为一队，前往撒马利亚地区，试图将尽可能多的木材征调到耶路撒冷周边的十字军军营。

很快，军士们开始赶建攻城塔。塔楼必须建得高于城墙的高度，才能发挥效果。戈德弗鲁瓦和圣吉尔麾下的两支部队，分别建造一座塔楼，而这两人所拥有的军队，正是目前在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当中人数最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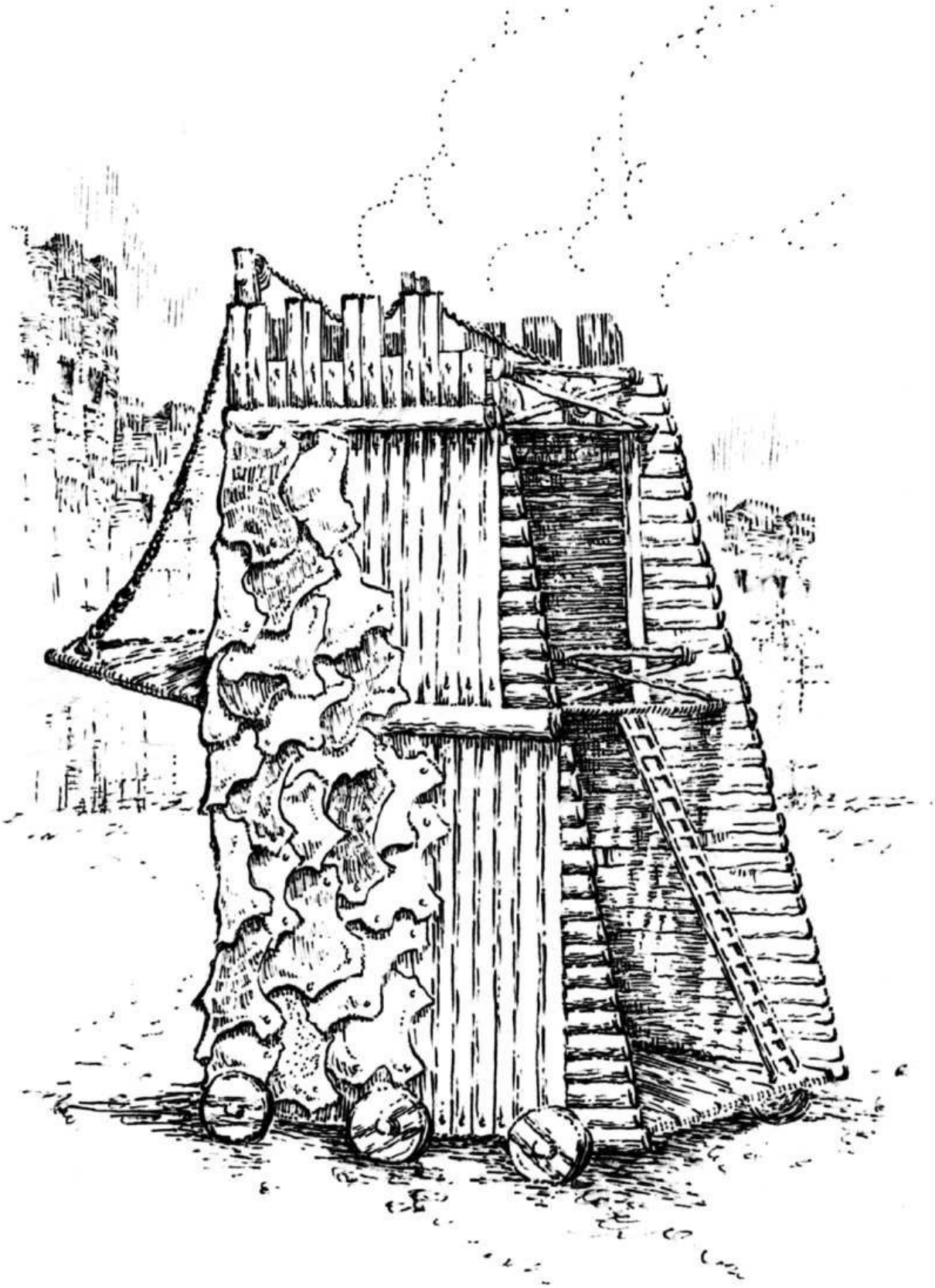
但攻城塔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的。而且，建造塔楼需要特殊的工

兵技术，一般的军士只能在一边搭把手。军队在耶路撒冷虽然没有粮食不足的压力，可依然面临饮用水不足的窘境。在建造塔楼的过程中，士兵总是缺乏防御力，而由于条件恶劣心情低落，相互之间又时常发生口角。这样下来，十字军兵士们的士气越来越差了。

关于此事，主教阿德马尔的兄弟于格·德·蒙塔尤留下了记载：

“昨夜梦见兄长阿德马尔，对如今十字军的状态甚为悲叹。他告诉我，全体将士应绝食三天，赤脚围绕耶路撒冷城墙外行走祈祷，以赎罪的心情示于上帝，求上帝在九天之内助佑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

于格将此事告知诸侯，得到了全体将士的积极响应。他们一时间中断了建造攻城塔的工作，全体绝食三日。在这三天之内，每天全军都赤脚绕着耶路撒冷的城墙走一周。队伍由手捧十字架的神职人员打头，后面跟着脱下甲胄身着短衫的诸侯、骑士、普通士兵以及朝圣的人群。而此时城墙上的穆斯林守军只有默默地看着城下行进的西欧人。



攻城用的塔楼

就这样，十字军的战士们以基督教所谓“赎罪”，用相当于“修禊”的驱邪仪式似的方式，完成了“集体洗脑”的过程。到第三天晚上，整个赎罪过程结束的时候，此前一直陷入对立之中的圣吉尔和丹克雷迪，也相互拥抱着哭泣起来，可见这次“洗脑”的效果。

三日之后，建造攻城塔的工作再次开工。为了使攻城塔能够抵抗城墙上发射的火箭，塔的外侧必须敷上动物的皮革。这次，集体洗脑发挥了作用，建造攻城塔的士兵们干得十分积极，似乎完全看不到工作的麻烦之处。最终建成的攻城塔比预定的两座还多了一座。除了在原先计划的城南侧和西侧以外，在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所在的城北，也建起了一座攻城的塔楼。

关于7月13日的总攻，各位诸侯是这样谋划的：以南北两侧的攻城塔接近城墙，同时吸引守军的注意力，而同时以西侧的攻城塔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这样的策略，使十字军迷惑了对手。守将伊夫蒂哈尔给三个方向配置相同的兵力，结果使戈德弗鲁瓦主攻的西侧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方向，攻城一方的地方非常狭窄，因此攻城塔与城墙的距离也远较其他两侧为近。

“希腊火”

守城一方所使用的一种特殊武器，被称为“希腊火焰器”或简称“希腊火”。其制作方法是把石油与硫磺混合放入小的壶状容器中，再以火将其引燃，投向敌人。这种恐怖的武器，最早是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发明的，故得名为“希腊火”。

在第一次十字军时期，这种武器是像今天的手榴弹一样使用的。而后来不久发展为类似火焰喷射器的样式，在石油资源丰富的近东地区，作为一种强力武器而使用。

即使是手榴弹的样式，也足以令西欧来的十字军兵士感到恐惧了。

当守军把这种武器投掷出去，城西的攻城塔瞬间就燃烧起来。情急之下，戈德弗鲁瓦只得命令部下将塔楼向后移，在上部还燃烧着熊熊烈焰之时，将其转移到城的西北角。在这个位置，城下的土地相对开阔一些，带有车轮的移动式攻城塔可以相对比较自由地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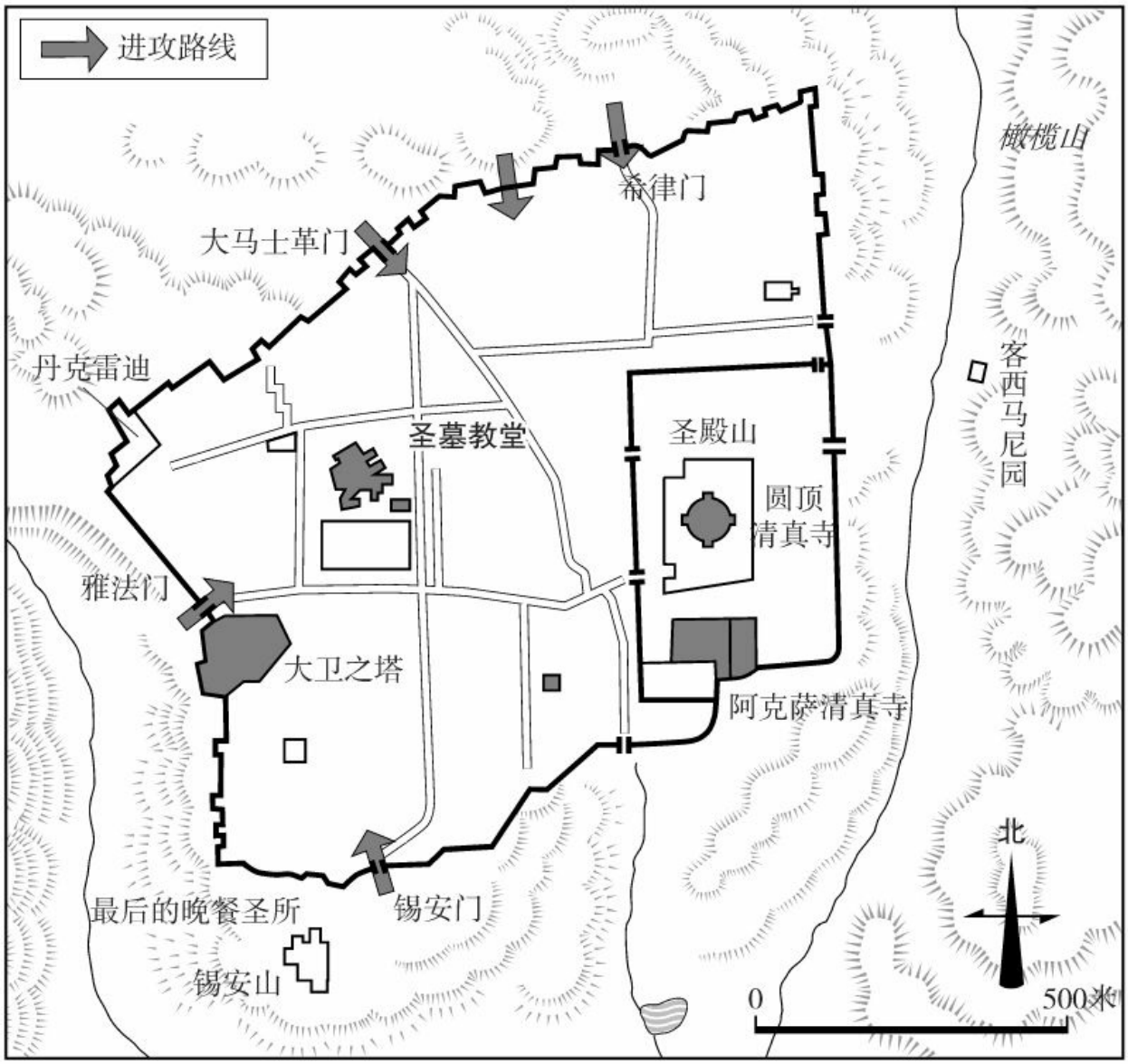
这样在城墙的西北方向就同时有两架攻城塔一起进攻了。圣吉尔所率领的南侧部队也受到了“希腊火”的攻击，但依然坚持攻城。

虽然耶路撒冷的埃及守军人数不多，但他们个个骁勇善战。他们的箭矢不能穿透十字军钢铁制成的盔甲，但“希腊火”却让攻城的西欧人难以招架。

围攻耶路撒冷的激战，在当天之内未告结束，于次日继续下去。在这期间，戈德弗鲁瓦部队的攻城塔已经完全为“希腊火”所吞没。

但是并未丧失战斗意志的洛林公爵兄弟，以及同在一军的丹克雷

迪，向北侧的攻城塔移动。他们来到了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所建的这座塔楼之下，而戈德弗鲁瓦成为了此时全军的总指挥。



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形势图（根据史帝文·朗西曼《十字军史》，第1卷）

7月15日早晨，十字军将这座攻城塔成功地靠上了希律门附近的城墙。同时，许多架特意制成的云梯也在塔楼的左右两侧靠上了城墙。

随着一声巨响，在四角形塔楼最上层靠近城墙的这边，洛林公爵戈

德弗鲁瓦跳上了城墙。在他之后，丹克雷迪、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也跟着上了城。后面跟着的，是一群冲上来的十字军兵士。

有人打开了希律门。十字军到达以来一直紧闭着的城门，完全打开了，十字军的将士和朝圣者们都从这里涌入了耶路撒冷城内。

收复耶路撒冷

守城的将官伊夫蒂哈尔发现城已经无法守住，就撤退到附近的“大卫之塔”内。这座塔楼其实是坚固的堡垒，完全可以在内做长期的抵抗。但伊夫蒂哈尔却以自身的安全离去为条件，向从附近的雅法门入城的圣吉尔提出投降。圣吉尔要求伊夫蒂哈尔留下贵重物品，接受了他的投降请求。在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后，守将却自己向亚实基伦逃去。

耶路撒冷城内发生的屠杀惨剧，比安条克陷落时更加严重。

与在安条克城时一样，十字军认为耶路撒冷城内一个穆斯林都不应该留下。此时城里虽然没有基督徒，却还有犹太人在城中。但在西欧来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也是异教徒。因此十字军所做的，就是杀死在城内见到的每一个居民。这次占领之后，他们连一个奴隶也没有俘虏。在这座圣城耶路撒冷，一个异教徒也没有活着留下。

在暴乱之中，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和少量士兵一起，径直来到了圣墓教堂，并在这座耶稣墓上建造的圣所里，虔敬地做了祈祷。但是祈祷并未使他们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全城内正在发生的暴行。毕竟，戈德弗鲁瓦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中世纪基督徒。

丹克雷迪则在城门打开之后，独自前往穆斯林的圣所掠夺财富。当他踏入阿克萨清真寺，准备大行劫掠之时，他所见到的是避难于其中的300名穆斯林，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

这位25岁的年轻将领命令避难的穆斯林全数离去。之后，他在清真寺的屋顶插上了代表自己和波埃蒙多所属的阿尔塔维拉家的旗帜，并将寺内的宝物全部运走。

但丹克雷迪部下的士兵却在搜索宝物的过程之中，将阿克萨清真寺付之一炬，烧死了其中的300名穆斯林。

第二天，也就是7月16日，耶路撒冷市内的街道到处都被屠杀惨剧留下的鲜血染红了。屠杀居民并不是诸侯的命令。兵士和朝圣者们杀得兴起，直到黄昏时分才告罢休，回到城外的营帐内休息。此时城内已经平静下来，各位诸侯通过成堆的惨遭杀害的穆斯林平民尸体之后，来到了圣墓教堂，进行攻陷城市后的首次会议。

这次会议以在圣墓教堂中对上帝的感谢祈祷而告终。对异教徒见一个杀一个的西欧基督徒，在教堂的祭坛前一个个泣不成声。“解放耶路撒冷”的目标，终于在公元1099年7月15日成功实现了。这时距离十字军从欧洲出发已经有三年之久。

人是很难分善恶的，因为在同一个人心中，同时有善与恶存在。因而宗教、哲学或道德伦理的教导，往往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古人有言形容现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译者按：此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1-9》）

城陷后两天，7月17日，十字军的领导人再次聚集于圣墓教堂。这次聚会是为了决定耶路撒冷城今后的命运。

在从军神职人员的强烈要求下，十字军领导人首先讨论了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任命问题。对神职人员来说，圣城耶路撒冷理应交由神职人员来统治。然而尽管各位诸侯对此没有异议，在具体的人事任命上，还是产生了分歧。

本来最有资格担任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两位神职人员，现在都无法出任了。他们是教皇的代表阿德马尔，和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时的大主教西蒙。阿德马尔已经死在了安条克，而西蒙则被耶路撒冷原来的埃及当局流放，并于城陷之前不久死于塞浦路斯岛上。

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只有遣使罗马，请教皇乌尔班二世来裁决。但当时乌尔班二世已经病入膏肓，最终于当年7月29日死于罗马。此时正值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两周，由于消息传递慢，以“十字军的教皇”闻名于世的乌尔班二世，最终未能得知收复圣地的捷报。而罗马教廷随即选出了新的教皇。

因此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就必须在当地选出。在各位诸侯所率领的军中，都有神职人员积极参与。

其中声望最高的，是一位属于南意大利诺曼人的波埃蒙多军队里的僧侣。但他并没有推荐自己，而是推荐了自己的朋友担任耶路撒冷大主教。他本人则被选为伯利恒大主教。

最终被推选为耶路撒冷大主教的，是跟随诺曼底公爵军队的德罗，他曾担任征服者威廉之女塞西莉亚的家庭教师。他作为跟统治者关系紧密的人士而得以获选。

但圣吉尔反对由此人担任大主教。对于占据法国南部图卢兹和普罗旺斯的圣吉尔来说，德罗的上任无异于法国北部势力的胜利。

但圣吉尔的反对并未影响耶路撒冷大主教的选举结果。当这一问题解决之后，下面就是谁来担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问题了。

“基督的守墓人”

正如哈里发身边有苏丹和维齐尔一样，大主教身边也有国王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因此，在收复了的耶路撒冷选出一位担负防御圣城任务的人，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首要问题。

在这一时刻，圣吉尔具有很大的优势。他是手执神圣之枪，列阵于耶稣与使徒最后的晚餐所在地的虔信之人。但这位已在法国南部拥有广大领地的诸侯，并没有特别的领土野心。他只对“圣城耶路撒冷之王”这种带着虚名的称号非常热心。可以说，这位图卢兹伯爵并非野心家，而是虚荣家罢了。

一心想把国王称号据为己有的圣吉尔，却也深知自己不讨其他诸侯的喜欢。情急之中，他想出了一条计策。

圣吉尔在诸侯面前这样说道：“我作为诸侯当中最年长者，不想在圣城自称为王。”他这样一说，想的是其他诸侯也会纷纷谦让，使得圣城之王的称号落空。

没想到，圣吉尔的推辞，使得不愿让他称王的各位诸侯一致推举戈德弗鲁瓦为耶路撒冷的国王。而与圣吉尔所猜想的相反，洛林公爵在一度推辞之后，最终接受了国王的称号。

57岁的圣吉尔在安条克的竞争中输给了49岁的波埃蒙多，而在耶路撒冷，圣吉尔连和39岁的戈德弗鲁瓦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心情低落的圣吉尔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耶路撒冷，向杰里科行进。在这座建造于《圣经·旧约》时代的古城，他毫无顾忌地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由于圣吉尔离开了耶路撒冷，本来为其所占领的“大卫之塔”自然落入了戈德弗鲁瓦的手中。

圣吉尔离开耶路撒冷，也使得他所反对的新选举出的耶路撒冷大主教面前少了一个障碍。诺曼底公爵属下的德罗，最终就职为十字军统治下的首任耶路撒冷大主教。

与诸侯没有异见的大主教德罗，充满了宗教热忱。此时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主要为天主教派所掌握，对希腊正教和亚美尼亚基督教派都缺少认同。这最终成为十字军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摩擦的原因之一。

大主教非常热心于在耶路撒冷城内寻找耶稣受难时的十字架。他最终在城内找到了一些零碎的木片，将其拼接起来称为“真十字架”，并在以后十字军的军事行动中作为圣物供奉。

神职人员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十分频繁。而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呼声，那就是在上帝的首都耶路撒冷，世俗人士不应以国王之名进行统治。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是一位不会争夺无用功名的领导者。因此，他并未以国王的特权，来压制神职人员对他头衔的置疑。

戈德弗鲁瓦没有自称为国王，而是以“为耶稣基督圣墓献身的守墓人”为自己的封号。

这就是拉丁语的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耶路撒冷没有“国王”（Rex），只有“守护人”（Advocatus）。这个词在古罗马时代有“辩护人”的意思。戈德弗鲁瓦的做法使神职人员默认了他的统治权。

洛林公爵并不是耶路撒冷王国名义上的第一位国王，但他是实质上的国王。这一实质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得到了确立。

就任为“耶稣基督守墓人”的戈德弗鲁瓦，面临着以下的难题：

首先，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计划离开近东回国。两人已经完成了在十字架下所立的收复耶路撒冷的誓言，此后就理应回到西欧自己的领地去。虽然他们所率的兵士数量不多，却都是常常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士。其中弗兰德斯伯爵更是诸侯都仰仗的常胜将军。这两位大将及其所率部众归国，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戈德弗鲁瓦在安条克之战和耶路撒冷之战中损失了不少部下。由于两位诸侯的归国和圣吉尔的离去，他所能依赖的部队，除了自己的以外，只剩下丹克雷迪属下的人马了。

但毕竟诸侯已经完成了十字架下的誓约，再留下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戈德弗鲁瓦的兄弟尤斯塔斯，和诺曼底公爵、弗兰德斯伯爵一起，乘坐热那亚人的船只返回了西欧。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和诺曼底公爵、弗兰德斯伯爵一样，都是在西欧拥有可观领地的领主。他其实也可以在收复耶路撒冷之后回到故土。但由于其领地下洛林地方已经交付上洛林地区的长兄代管，这位“基督圣墓的守护人”就不必担心西欧那边的形势，而应当专心守卫耶稣的陵墓了。他让尤斯塔斯回国，也是希望能够代自己管理领地，至于公爵本人，已经决定埋骨于巴勒斯坦了。

埃及军队来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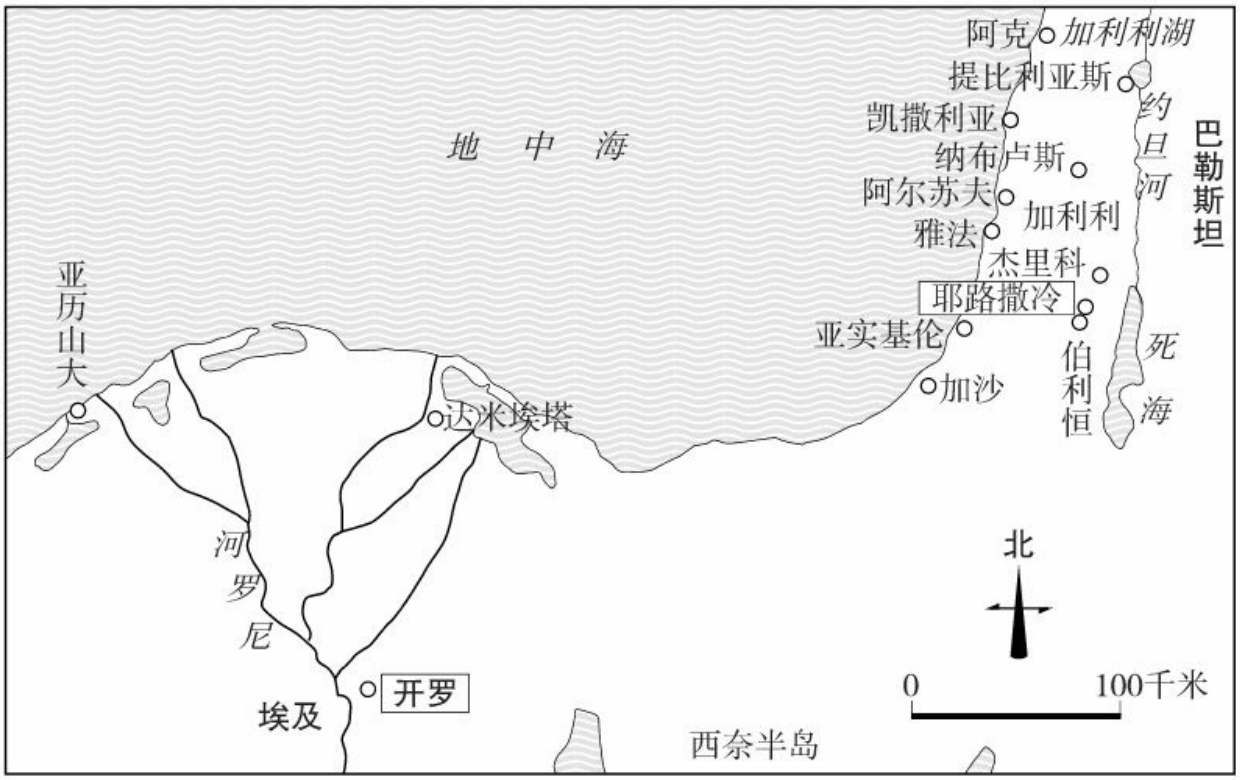
但实际上，戈德弗鲁瓦并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未来的事情。因为此时埃及的军队已经从开罗出发，大举进攻耶路撒冷。

得知敌军来犯，在雅法等待船只的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以及引军杰里科的圣吉尔，都纷纷赶回了耶路撒冷。

戈德弗鲁瓦首先通知城内居民，耶路撒冷王国正式建立，然后派人请回前往附近城市纳布卢斯的丹克雷迪，并开始着手打探埃及军队的情况。在此期间，圣吉尔和准备归国的两位诸侯相继回到圣城，而数天之后丹克雷迪也返回了耶路撒冷。

通过对俘虏的几名埃及士兵的审问，以及进攻亚实基伦的丹克雷迪所提供的报告，进攻巴勒斯坦的埃及军队总兵力为三万人。率领埃及军队的，正是在安条克与诸侯会晤的宰相阿尔·阿布达尔。他们通过陆路抵达亚实基伦，并在那里等待从埃及经海路运来的军粮。

丹克雷迪建议戈德弗鲁瓦趁埃及军队未完成战斗准备之际先发制人。后者采纳了这位24岁将领的计策，决定于到达亚实基伦之日拂晓展开进攻。



巴勒斯坦与埃及

在7月15日耶路撒冷陷落后25天，十字军再次迎击穆斯林的大军。这次战役的结局，是在一个月内确立了十字军长期占有耶路撒冷的形势。

关于抵抗埃及军队的十字军总兵力，没有确切的史料统计。但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十字军的总兵力是1500骑兵和1.1万步兵。耶路撒冷攻城战和此前的供水匮乏所造成的损失，使得十字军的总人数相比于最初的1.25万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总的来说，迎战埃及军队的十字军总数大约只是对手的1/3。

距离埃及军队最近的城市亚实基伦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偏西70公里处。而雅法港则在耶路撒冷西北60公里处。对于实现“解放耶路撒冷之梦”所面临的最大敌人来说，想要接近圣城，只需要花三四天的行程。因此，成功占领耶路撒冷的诸侯，一刻也不敢懈怠地同仇敌忾，紧密团

结起来。

在等待军需物资到来期间，埃及宰相所率的三万大军于亚实基伦郊外安营扎寨。他们对十字军的兵力有着准确的掌握，并对可能出现的袭击做了防备。

逐渐接近埃及军队的十字军按照戈德弗鲁瓦的安排组织了阵型。

圣吉尔所率的法国南部军团，组成靠近地中海的右翼部队。他们的任务是阻断埃及军队逃往亚实基伦城内的道路。

弗兰德斯伯爵、诺曼底公爵和丹克雷迪的部队，组成了颇具突击能力的中央阵列。

左翼则由洛林公爵、“基督的守墓人”戈德弗鲁瓦亲自担负。他亲率德意志骑士，从左侧迂回包围敌军。

十字军要想以少胜多，必须出其不意地突袭埃及军队。因此，他们要特别注意不要发出声音。在盛夏季节，十字军脱下了除胸甲以外的护具，摘掉头盔，这样虽然防御力有所下降，却提高了在战场上进攻的灵活性。毕竟，骑兵的标枪、长剑和盾牌，步兵的长剑和盾牌都不离手。在军士们背后，耶路撒冷大主教手拿“真十字架”，对兵士们来说，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死难于斯的十字架，心中会油然而生为基督而战斗的热情。此时正值1099年8月11日拂晓时分。

由于埃及士兵没有早起的习惯，十字军在日出之前发起进攻的策略奏效了。但是，进攻的成果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趋于明朗。

遭到意外袭击的埃及军队陷入慌乱之中，在连忙开始迎击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的夹击。众多兵士在枪挑剑刺中倒下，而逃往亚实基伦方向的乱军，也被圣吉尔的部队追到海边，纷纷溺亡于海水之中。

埃及军队的总司令阿尔·阿布达尔宰相，只得在近卫部队的护送之下逃进了亚实基伦。他并未在此地停留，而是径直乘上港内停泊的埃及船只，连忙返回了开罗。

十字军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阿尔·阿布达尔丢下埃及法蒂玛王朝印有白色《古兰经》经文的绿底旗帜，以及自己装饰华丽的宝剑，仓皇逃离了战场。

他所丢下的东西还包括大量豪华的绒毯、金光闪闪的大马士革产的丝质服装、整箱的各式各样的宝石，以及波斯产的珍珠首饰。此外，大量的金块和阿拉伯产的血统纯正的宝马，都成为了十字军的囊中之物。

游牧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有在战时携带大量财富的习惯，还会将女眷带到战场上。因此，十字军每次战胜穆斯林军队，都会收获不少财产。8月13日，十字军满载着战利品返回了耶路撒冷。

但在胜利的陶醉之后，十字军发现了新的问题。

在阿尔·阿布达尔所率的埃及大军败走亚实基伦之后，该城内的穆斯林感到极度恐慌。虽然这座城市内尚有守备部队，但在听闻耶路撒冷屠城的惨剧之后，亚实基伦的居民决定和附近阿尔苏夫城一起，向十字军开城投降。

他们的使者来到了圣吉尔的营帐。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看来，圣吉尔是侵略者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这件事为戈德弗鲁瓦所知。结果这位圣墓的守护者认为应当拒绝两座城市的投降请求。

这一次，诸侯站到了戈德弗鲁瓦的对立面。不知道是由于圣吉尔收到两座城市提供的好处而暗中操作，抑或是其他人对戈德弗鲁瓦借机占据地盘感到眼红，一直与洛林公爵保持一致的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

爵都反对他的意见，并指出他是出于嫉妒圣吉尔而损害了十字军整体的利益。而圣吉尔则在接受两座城市投降请求之后，径直率兵北去，离开了耶路撒冷。

此时洛林公爵的意见，并非是因为嫉妒圣吉尔，而是出自统一指挥的考虑。

在这两座城市递交降书之前，圣吉尔往往是一言不发。但在亚实基伦与阿尔苏夫归顺十字军以后，圣吉尔的发言权肯定大为增长。这样，耶路撒冷的领导权之争又将开始。

正如拿破仑所说的，与其选两名非凡的将领一起作战，还不如让一位普通将领带兵。只有统一指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效率。

在与埃及大军交战之后，十字军的兵力约为一万人。此时如果出现两位主将并立的局面，亚实基伦和阿尔苏夫还是唾手可得，尽管这次埃及军队战败退出了巴勒斯坦，但法蒂玛王朝对耶路撒冷的虎视眈眈始终没有消除，未来诸侯之间的纠纷很可能导致卷土重来的穆斯林有机可乘。

这一点，圣吉尔并不明白。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也不清楚。只有丹克雷迪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

而为何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要选择向圣吉尔而不是戈德弗鲁瓦提出开城投降，则是由于古往今来东西方不变的“新闻界”的特点。

这一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十字军的记载中，对戈德弗鲁瓦都没有多少细节描述。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作家，记述中最频繁出现的人物都是波埃蒙多和圣吉尔。

在安条克之战中波埃蒙多的活跃表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圣吉尔，则由于此人的言行常常带来麻烦，而为当时的“记者”所关注。

无论是一般的记载者，还是编年史家，共同的倾向是关注有话题的人物，这对现代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来说也完全一样。

而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除了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斗中不可或缺以外，从逸事和个性方面都乏善可陈。这样一来，他就自然无法为新闻界的闲言碎语提供素材了。

圣吉尔则因为其在基督徒一方闻名遐迩而为穆斯林所知。此外，由于伊斯兰世界中尊重长者的风气，年纪最大的圣吉尔自然成为了两座城市的谈判对象。

最终，戈德弗鲁瓦还是坚持拒绝接受两座城市的降书。于是，心情不佳的圣吉尔和弗兰德斯伯爵、诺曼底公爵在9月初整理好装备，离开耶路撒冷向北行军。

实现收复耶路撒冷的诺言之后一个月，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终于动身返回西欧。他们一路回到叙利亚，在那里的海港乘坐拜占庭和意大利的船只，回到了故土。

他们两人与戈德弗鲁瓦的二弟尤斯塔斯同行，留在巴勒斯坦的公爵委托其弟治理自己在西欧的领地。

洛林公爵的幼弟鲍德温，本来也要参加耶路撒冷的攻城战。但在得知圣城已告收复之后，他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回到了自己在埃德萨的伯爵领地，继续坚持在自己领地内的战斗。

此时留在耶路撒冷的，只有39岁的戈德弗鲁瓦本人，和24岁的丹克雷迪了。他们两人的兵力总和，只有300骑兵和2000步兵。其中丹克雷迪所率领的，不过区区24名骑士而已。

后世的基督教史家往往称赞收复耶路撒冷后立即返回西欧的几位诸侯毫无领土欲望，专心于信仰的虔诚。但我却以为，他们多少缺乏一些责任感。毕竟，信仰不仅仅是保守脑海里的意志，也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奋斗。

留在耶路撒冷的戈德弗鲁瓦，常因一直英勇作战、正值34岁盛年的弗兰德斯伯爵的离去而感到痛心。在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戈德弗鲁瓦身边，只剩下不到25岁的丹克雷迪一员勇将了。

新任教皇代表上任

当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一行离开耶路撒冷北上时，留在近东的圣吉尔于9月中旬来到了叙利亚的一座港口城市贾巴拉。此时他得知，在这座城市以北20公里的拉塔基城，有一支来自比萨的舰队入港了。这支舰队中载有阿德马尔之后乌尔班二世委任的新的教皇代表。

新任教皇代表名叫戴姆伯特，之前在意大利的比萨担任大主教。由于曾任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教皇代表，具有与摩尔人斗争的经验，这位主教被再次任命为与穆斯林斗争的巴勒斯坦的教皇代表。由于他居住在比萨，就乘坐比萨的船只来到了叙利亚。

由于圣吉尔在阿德马尔生前一直对其言听计从，他非常喜欢高级神职人员。得知新的教皇代表到来，圣吉尔希望能够与其成为朋友，从而对戈德弗鲁瓦施加影响。

戴姆伯特眼中盯住的是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位置，但目前这一职位正被他人所占有。于是圣吉尔的策略就是同时接近戴姆伯特和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想将自己占领的地区辟为伯爵领地。

新任的教皇代表戴姆伯特因长期生活在比萨而被称为比萨人。在当时的意大利，不同地方的人被称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等。

比萨是与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同为滨海城邦中的一个，以经商为一贯的立国方针。它们既与穆斯林相互贸易，又拥有针对穆斯林海盗船而设的强大海军，也因而成为了最早向欧洲引入阿拉伯数字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都绝顶聪明。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很难想象意大利水手们如何在充满威胁的地中海上纵横航行通商。

戴姆伯特就是这样聪明的比萨人。与对城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跟随西欧贵族领主的教士德罗相比，他的能力无论善恶都要高出一筹。

在拉塔基（今拉塔基亚）下船的戴姆伯特，对圣吉尔的邀请不置可否，径直前往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安条克。

相比圣吉尔的虔诚信仰，安条克的城主波埃蒙多没有那么多宗教上的考虑。但作为安条克公国首脑的他，还是隆重而热烈地欢迎了新任的教皇代表。

这位在两年前深深魅惑了拜占庭公主的49岁男子，向教皇代表提出，自己也随行前往耶路撒冷。一方面他能提供护卫，另一方面也是出发时誓言的要求。他联络了也想实现誓约的埃德萨伯爵鲍德温，两人一同护送戴姆伯特前往耶路撒冷。

虽然十字军已经收复了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安全还远未得到保障。戈德弗鲁瓦和丹克雷迪一直在其周边一带开展征服行动，但从安条克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并不安全。因此，不好推辞的戴姆伯特，就和波埃蒙多、鲍德温两人一起向南进发了。

这样，未能参加耶路撒冷攻城战的波埃蒙多和鲍德温，终于获得了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机会。

同时，由于阿德马尔死于安条克之战，罗马教皇的代表一直未能进入耶路撒冷。但戴姆伯特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对这位新任教皇代表来说，他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波埃蒙多恭敬地告知戴姆伯特，希望能在圣诞节时赶到伯利恒。他和鲍德温立即做好各项准备，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

波埃蒙多和鲍德温的朝圣之旅

波埃蒙多所率领的意大利南部军队，无人不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毕竟有一部分人马要留守安条克。波埃蒙多费了很大工夫选拔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兵员，但更为费工夫的是接受并非兵士的朝圣者参加队伍。

耶路撒冷“解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西欧，于是大批天主教徒涌向东方前来朝圣。这些人大都乘船而来，在已为基督徒所控制的叙利亚港口登陆。因此，他们首先到达的就是安条克，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朝圣者的集散地。这些人趁着波埃蒙多发兵的安全与便利，浩浩荡荡地前往耶路撒冷。

根据编年史家的记载，跟随波埃蒙多前往耶路撒冷的人数达到2.5万之多，但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是士兵。士兵和普通人的比率，大概是一比一。而朝圣者中也有大量女性在内。

这支朝圣大军于11月初离开安条克，沿着滨海地区南行。

波埃蒙多的部众首先到达了拉塔基。由于这里驻扎着圣吉尔，他希望在此处得到补给。

但对教皇代表和波埃蒙多的行动充满厌恶的圣吉尔并未提供任何方便。于是波埃蒙多只好向比萨的船队寻求补给。

此后，朝圣队伍南行到达布尔尼亚斯（今巴尼亚斯）。他们在这座城市与从埃德萨赶来的鲍德温会合。

鲍德温一行也是经由拉塔基而来，圣吉尔向他提供了补给。在圣吉

尔看来，波埃蒙多是自己的宿敌，而鲍德温却是可以利用的朋友。

然而在布尔尼亚斯等待鲍德温的波埃蒙多和戴姆伯特却受到了拜占庭皇帝的憎恶。对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活动感到忧虑的阿莱西奥斯一世，命令其帝国统治下的海港城市不得向十字军及其同盟出售粮食。当时塞浦路斯处在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之下，而叙利亚沿海的城市就接近塞浦路斯。

来自比萨的船只从塞浦路斯购买粮食，因此与作为拜占庭帝国臣民的希腊人建立了商贸关系。但比萨人是十字军的同盟，因而在拜占庭皇帝的禁售令之列。

会合以后的波埃蒙多、鲍德温和教皇的代表戴姆伯特，率领兵士于11月底到达托尔托萨（今塔尔图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粮食补给方面的困难。

圣吉尔攻陷这座港口城市后不久，穆斯林重新占领了托尔托萨。城市的居民对基督徒怀着强烈的敌意，在向朝圣者出售粮食的同时，对其发起袭击。这使对冲突毫无准备的朝圣者死伤甚众。可以说，在中世纪的异教徒领地朝圣，没有武器伴身，随时都可能丧命。

从此处一直到南面的特里波利，穆斯林的一致抵抗使朝圣者普遍买不到任何用以充饥的粮食。由于食物价格太高，朝圣者只有采割甘蔗充饥。

特里波利以蔗糖产地而著名，此地原产的砂糖一直出口到十字军时代的西欧。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古代的甜味剂逐步为十字军时代的砂糖所取代。

地中海式气候影响下的地区，雨季在冬天到来。波埃蒙多等人一行在12月的雨中接连通过了贝鲁特、西顿、推罗、阿克、海法等城市，到

中旬时抵达了凯撒利亚。

与在叙利亚时相比，朝圣队伍在巴勒斯坦行进过程中没有遇到多少麻烦，这自然是由于十字军刚刚在巴勒斯坦清除了埃及的军事存在。此处海港城市内居住的穆斯林，对十字军能够和平相待，主要是基于自身实力太弱的考虑。

这样，不必担心食物匮乏的波埃蒙多一行，于12月21日抵达了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时距圣诞节只有四天。

戈德弗鲁瓦喜出望外地出城迎接。由于破城之后的屠杀，此时的耶路撒冷城内除了十字军之外少有居民。大主教德罗则秉持天主教徒为中心的立场，将希腊正教徒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使得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无意返回。

随着2.5万人的到来，戈德弗鲁瓦相信这座圣城即将复兴。

因此他试图说服兵士们留下来防御耶路撒冷，并将城市周围的耕地免费提供给朝圣者，建议他们定居于此。他声称，由于自己和丹克雷迪的努力，耶路撒冷附近的安全可以完全得到保障。

波埃蒙多和鲍德温靠自己的力量获取了安条克和埃德萨的领地。而他们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发现了戈德弗鲁瓦和丹克雷迪军队的弱小。只靠这300骑兵和2000步兵，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守卫圣城的。

鲍德温的部下大都愿意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些兵士原来都听从戈德弗鲁瓦的指挥，是在鲍德温前往埃德萨途中借调的部队。

而波埃蒙多的一部分下属也对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异议。他本人来朝圣，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得知戈德弗鲁瓦的兵力不足以防御耶路撒冷。

此时，他的得力部将丹克雷迪已经成为戈德弗鲁瓦麾下的一员勇

将。这位青年仅仅率领24名骑士，就敢于征服耶路撒冷附近的村庄加利利。加上骑士们的马弁，整个队伍不过72人，但其战斗力不容小觑。

两年之前，丹克雷迪和鲍德温一起在小亚细亚的基利基亚往返时，就对位于其南侧的安条克的攻防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自然已为安条克领主波埃蒙多了然于胸。基利基亚之于安条克，就像加利利之于耶路撒冷。因为加利利是耶路撒冷防御来自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进攻的重要屏障。

至于在波埃蒙多和鲍德温的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留在了耶路撒冷，并没有确切的统计。令戈德弗鲁瓦感到安慰的是，波埃蒙多和鲍德温都没有介意将自己的兵力分出来守卫耶路撒冷。

此时，在寂静的耶路撒冷城内，逐渐有人开始定居了。

到圣诞节的日子，庆祝大典自然要在耶稣降生地伯利恒举行。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和鲍德温三位诸侯，以及教皇的代表戴姆伯特，带领众兵士和朝圣者，于12月24日和25日两天，在伯利恒过节。

活跃的丹克雷迪

至于丹克雷迪是否参加了圣诞集会，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来证明。他正在从耶路撒冷北上，一路征服杰里科、纳布卢斯、拿撒勒、提比利亚斯等地，沿着约旦河上溯，直逼大马士革城主所控制的地区。

24岁的年轻将领此次的征服行程，可谓是意味深长。因为在巴勒斯坦内陆地区的加利利一带，居住着很多非天主教派的基督徒。

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城市，当丹克雷迪到达之前，居民大都已经逃走。丹克雷迪向留在城市的人宣布，如果逃走的居民愿意返回，耶路撒冷王国承认其为属民。但是，这些人每年要缴纳人头税。

至于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城市，非天主教派的希腊正教徒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都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大主教的命令下遭到流放，但丹克雷迪并不认为如此。他准许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在原地居住，并承认其为耶路撒冷王国的臣民。

丹克雷迪征服加利利各个城市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遇到了不少抵抗。不过抵抗者毕竟人数甚微，他凭借24骑就实现了对广阔地域的征服。尽管自身的兵力不多，丹克雷迪的战略却非常成功。加利利因此成为了耶路撒冷看不见的屏障，其屏障作用正是来自该地区居民的协助。

丹克雷迪决定，在耶稣教导众使徒做人的渔民的地方，加利利湖畔提比利亚斯一带，建立城堡，发展城市。如果在这一带稳固下来，不仅可以成为南面耶路撒冷的屏障，也可以向西发展，控制地中海沿岸的阿克、海法等城市。

这一次颇具战略意义的征服行动只依靠24名骑士就完成了，可谓相当精彩。戈德弗鲁瓦对丹克雷迪的依赖，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虽然不知道丹克雷迪是否在伯利恒度过了圣诞节，但到年底时，他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伯利恒过圣诞的全体诸侯也回师耶路撒冷。

分离一年之后，丹克雷迪再次与舅父波埃蒙多相见。可以说，作为亲属的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相似的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次十字军成功的关键之一。这四人与其他诸侯相比，在进入近东地带以后，地盘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他们成功的秘诀也在于对当地形势的迅速适应。

从伯利恒返回耶路撒冷之后，此前一直未能提出自己主张的教皇代表戴姆伯特，也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首先计划把德罗从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位置上赶下来。

耶路撒冷大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条克大主教一样，并非以西方的“大主教”（Archbishop）之名称呼，而是以东方教会特有的“牧首”（Patriarch）来称呼。这一名称并非来自拉丁语，而是源自希腊语，其义为大都市的信仰领袖。耶路撒冷虽然不能算是大都市（Metropolis），但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地，因此也与东方的各大都市并列。

戴姆伯特的主张是把耶路撒冷大主教的名称重新改为“牧首”，而自己作为罗马教皇的代表，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

德罗此时显然处于不利的位置。他既没有来自教皇的支持，也没有担任主教的经验。以前的经历除了在意大利的生活之外，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担任诺曼底公爵属下的职务，但此时为之背书的诺曼底公爵早已返回了西欧。这样，在丹克雷迪有波埃蒙多撑腰的时刻，戈德弗鲁瓦也选择了为教皇的代理行方便。

于是，德罗辞去了大主教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在耶路撒冷郊外普通教士的生活。

接下来，正式就任为耶路撒冷牧首的戴姆伯特就要以上帝的名义，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君主授予正当的统治权了。

在基督教世界中，君主的世俗地位，都要通过上帝的授予而获取正当性。因此，向人间传达上帝意志的主教和大主教们，将象征地位的王冠授予国王的加冕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则要依靠罗马教皇授予皇冠的加冕礼，来获得统治帝国的权利。

于是戴姆伯特就主持了对波埃蒙多和戈德弗鲁瓦授予统治权的仪式，行使了上帝的权力。通过代表上帝意志的耶路撒冷牧首，正式确立了波埃蒙多作为安条克公爵，和戈德弗鲁瓦作为耶路撒冷“圣墓守护人”的地位。

至于埃德萨伯爵鲍德温是否也参加了这样的授权仪式，历史上没有记载。在东征到达小亚细亚之后，鲍德温的妻子因病去世，这位诸侯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在征服后的埃德萨娶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之女作为妻子。由于新娶的妻子不是天主教徒，这场婚姻可能成为鲍德温取得公认伯爵地位的绊脚石。但鲍德温也没有对地位问题提出抗议。这位曾经的神职人员，恐怕是欠缺对上帝的意志尊重吧。

在举行仪式的同一天，戴姆伯特代表天主教会承认了丹克雷迪对加利利的统治权。24岁的年轻人正式成为了加利利公爵。这显然是来自对其能力大加赞赏的波埃蒙多和戈德弗鲁瓦的大力举荐。

意气风发的丹克雷迪打算不久以后就重返加利利。这次他不再只有24名骑士相随，而是将舅父波埃蒙多麾下的部分兵力借调而来，全数率领前往自己的新领地。与心腹24骑一样，丹克雷迪的士兵都来自意大利南部，其兵力达到数千人。

此后的一年之间，丹克雷迪都一直在加利利的各个城市继续征服活动。他在提比利亚斯一带修建的城堡，至今还能看到遗迹，体现了当时西欧的建筑技术。加利利地区是西欧人在东方的最前线，直到87年后被萨拉丁攻陷之前，一直处在十字军的掌控之下。

圣诞节之后西欧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是1月6日的主显节。这一节日相传是源自东方的三名贤者看到大星升起，得知救世主的降生，于是在星的指引下来到伯利恒。因此这一节日的名称也叫作“三王礼拜”。

波埃蒙多和鲍德温度过主显节之后，就准备回各自的领地安条克和埃德萨了。

与来耶路撒冷时相比，跟随两人北上的人数大大减少。部分兵士留在了耶路撒冷，而一同前来的朝圣者更是悉数留下。两人选取和来时不同的路线回到自己的封地。

波埃蒙多和鲍德温从杰里科沿着约旦河北上，从加利利湖的东侧，经过残存大量古代神殿的巴尔贝克，在阿尔喀附近折向西，经沿海的路线返回安条克。

虽然士兵人数有所减少，但由于丹克雷迪行动的成功，这一路鲍德温和波埃蒙多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十字军平安地通过大马士革领主杜卡克的防区，后者未敢贸然出城挑战。

关于这段时间的战争，穆斯林史料的记载往往将本方的败因归咎于内耗。但事实上，十字军内部的斗争也非常剧烈，但各位诸侯一直没有脱离收复耶路撒冷这个统一的目标。即使一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各位诸侯也会及时回到共同利益上去。

而这一时期的穆斯林阵营内缺乏的就是共同的目标。因此，相对于在家门口作战的埃及人和突厥人，十字军得以在近东的土地上反客为

主。直到萨拉丁的时期，穆斯林一方才有了统一的共同目标。

小亚细亚
基利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伊斯坎达尔
安 条 克
圣西蒙
阿勒颇
奥隆特斯河
幼发拉底河
马拉特·安努曼
拉塔基
贾巴拉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布尔尼亚斯
马沙夫
托尔托萨
地
特里波利
阿尔喀
中
巴尔贝克
贝鲁特
海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提比利亚斯
阿克
拿撒勒
加利利湖
海法
加利利
约旦河
凯撒利亚
巴勒斯坦
纳布卢斯
阿尔苏夫
雅法
拉姆安拉
耶路撒冷
杰里科
亚实基伦
伯利恒
希伯伦
死海
北
0
100千米

波埃蒙多与鲍德温的归途

在收复耶路撒冷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来自西欧的诸侯已经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确立了自己的十字军国家。“解放圣地”的事业已有了充分的成果。

然而正是在1100年，令伊斯兰势力一方欢呼的事件接踵而至。

过去的一年之中，战事的主导权一直在十字军一方。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像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以后立即遭遇各种不测一样，十字军由于突发的意外事件面临失去优势的境地。

戈德弗鲁瓦的征服行动

谦卑地自称“基督圣墓守护人”的戈德弗鲁瓦，一直认为为了维持耶路撒冷所在的内陆地区的统治，必须打通海上的交通线。他相信仅仅占领雅法（今特拉维夫）一座海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像波埃蒙多在叙利亚所做的那样，将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尽数征服。于是，他首先以耶路撒冷国王的名义派出使节要求阿尔苏夫城缴纳贡金。这座城市位于雅法以北16公里的海边。

阿尔苏夫城希望戈德弗鲁瓦派出人质，以换取及时缴纳贡金的保证。戈德弗鲁瓦随即命令部下达维内斯前往，并谎称其为自己的兄弟。戈德弗鲁瓦身边其实已经没有兄弟了，但他仅把派自己兄弟为人质作为一种外交手段。阿尔苏夫城以为，耶路撒冷国王真的派遣自己的兄弟作为人质。

结果，达维内斯的交涉失败了。此时戈德弗鲁瓦要求取得对阿尔苏夫完全的统治权，便拒绝了城市的投降请求，而是选择武力攻城。城内的穆斯林决定抗战到底，并把达维内斯绑缚在城墙上示众。

达维内斯在城上对着十字军大声叫喊道：“大家攻城吧，不必管我！”戈德弗鲁瓦自然没有任何动摇，并不管人质的安全，命令弓箭手向着达维内斯和身边的守军放箭。

阿尔苏夫的守军为之一惊。他们连忙将受伤的达维内斯从城墙上放下来，并向十字军支付了赎金。

戈德弗鲁瓦从此改变了战略。他决定通过打击周边的农田，来消磨城市的意志。在他的命令之下，十字军在阿尔苏夫周围烧杀抢掠。

烧杀抢掠的做法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戈德弗鲁瓦属下的兵士当中，有不少有过在安条克和埃德萨作战的经验。由于长期与异教徒作战，十字军士兵的情绪爆发了，不仅在阿尔苏夫周围施暴，还一路向北劫掠凯撒利亚、海法、阿克等地区。而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十字军在凯撒利亚将逃入清真寺的平民全体活活烧死。

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终于传入了一直拒绝接受西欧人统治的巴勒斯坦海滨城市居民耳中。这些城市不得不结束与埃及海军的合作，倒向了比萨和威尼斯的舰队一方。

3月，在戈德弗鲁瓦的允许下，阿尔苏夫派来了使者。城市无条件释放了达维内斯，并将城防塔楼的钥匙和贡金尽数上缴。与此同时，戈德弗鲁瓦同意穆斯林享有继续居住于城内的权利。

几天以后，仍在治伤的达维内斯回到了耶路撒冷。戈德弗鲁瓦嘉奖了这位骑士，将希伯仑城授予他作为领地。

4月内，效仿阿尔苏夫的成例，凯撒利亚、阿克和一直作为埃及海军基地的亚实基伦，都向戈德弗鲁瓦派遣了使节，提出求和的建议。这三座城市缴纳的贡金数目，达到每月5000拜占庭金币，其他条件与阿尔苏夫相同。戈德弗鲁瓦全部接受了这些城市提出的条件。

约旦河东岸的地区也得知了戈德弗鲁瓦软硬兼施的行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长老，会将财货贩运到约旦河西岸的海港城市。由于十字军的入侵，这项贸易中断了。因此他们希望得到戈德弗鲁瓦的允许，重新向海港城市出口自己的产品。

此时戈德弗鲁瓦也认识到，如果滨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够大大丰富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的物产。中世纪的领主自然也有一定的经济意识。这一点与其后意大利滨海城邦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并成为十字军不可缺少的后盾分不开。戈德弗鲁瓦所做的与此有

关的一件事，就是命令比萨人对雅法港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完全受十字军控制的港口。

但并非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全体穆斯林都选择了与十字军合作的现实策略。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的领地内有一位穆斯林首脑，被十字军称为“胖农夫”。这位穆斯林领主与征服加利利地区的丹克雷迪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局势颇为紧张，“胖农夫”向杜卡克求援。

丹克雷迪则请求戈德弗鲁瓦与之共同战斗。如果能够占领“胖农夫”所拥有的富饶土地，则可以为加利利进一步与大马士革做斗争提供物质保证。戈德弗鲁瓦热心回应了丹克雷迪。

丹克雷迪和戈德弗鲁瓦的共同作战，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掠夺。这是一场夺取敌人财富、削弱敌方经济基础的斗争。结果大量的财富被从附近的地区运往耶路撒冷。

但是，此前一直不敢与诸侯打阵地战的杜卡克，却能够在这个时期尾随满载战利品的十字军，成功地进行袭扰。戈德弗鲁瓦的部队走在前面，从而并未遇袭，但押后的丹克雷迪却遭遇了大马士革的军队。十字军为了自己的性命，只得丢下财物，狼狈逃走。

杜卡克的袭击使丹克雷迪又羞又恼。当这位25岁的年轻人发怒时，即使是波埃蒙多的劝说也无济于事。

戈德弗鲁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丹克雷迪留在了提比利亚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横征暴敛。这次他率领军队直扑大马士革，杜卡克见状被迫提出和议的要求。

丹克雷迪依然怒不可遏，对使节提出了极端强硬的条件。

他要求杜卡克在受洗改宗为基督徒和放弃大马士革城二者之中选一。

如果这一要求是丹克雷迪本人想法的真实反映，只能说这位25岁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外交头脑。虽然伊斯兰世界的首都早已从大马士革移往巴格达，这座大都市仍然完全不可能成为十字军的囊中之物。倘若丹克雷迪能够直视现实，必然不会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

得知丹克雷迪的要求之后，杜卡克表现出了穆斯林的坚韧。他径直要求六位使节在改宗伊斯兰教和死亡之间二选一。其中一人选择了改宗，而另外五人则拒绝了苏丹的要求。于是这五人立即被杀。

使节被杀的消息再度点燃了丹克雷迪心中的怒火。他再次请求戈德弗鲁瓦与其一起作战，这一次两人一起行动了两个星期。

这是充满杀戮与掠夺的两个星期。杜卡克只得关闭大马士革的城门，在恐惧中度过这段时日。“胖农夫”只得向十字军投降，发誓做丹克雷迪忠实的奴仆。

两周之后，丹克雷迪继续在加利利地区与忠于大马士革苏丹的穆斯林作战，而戈德弗鲁瓦则返回了耶路撒冷，有新的问题等待他解决。

教皇的代表戴姆伯特在得到耶路撒冷牧首位置之后，表现出了天主教会的世俗本质。

不要以为神职人员只专心思想领域的事务，不关心世俗的资产。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以为了信徒的需要为理由，非常热心占有土地与各种财产。

此时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已经成为收复了的圣地，而耶路撒冷则是基督教的圣城。戴姆伯特和其他神职人员都认为，圣地和圣城理应归教会所有。

戈德弗鲁瓦刚刚回到耶路撒冷，戴姆伯特就向他提出教会应在雅法获得一块土地。戈德弗鲁瓦答应了他的要求。

得寸进尺的耶路撒冷牧首，进一步要求得到雅法全城。他还要求戈德弗鲁瓦将圣城耶路撒冷西侧大卫之塔的所有权交给教会。

这一要求，连虔信的戈德弗鲁瓦也感到难以接受。他回答说，等到自己死后，或者攻下剩余的两座穆斯林城市之后，可以将雅法城和大卫之塔交给戴姆伯特管理。在戈德弗鲁瓦看来，自己死后巴勒斯坦地区的麻烦事，恐怕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了。

意大利的经济人

在这时挽救近东十字军的，是威尼斯共和国使节的访问。威尼斯向戈德弗鲁瓦建议，以自己的海军和十字军结成同盟，并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第一、威尼斯商人具有在十字军控制下的全部地区开展经济活动的自由；

第二、在有威尼斯人活动的城市，开辟三分之一的街区作为威尼斯人的居留区；

第三、威尼斯全面协助十字军进攻特里波利。在城陷之后，特里波利全城归威尼斯所有。作为交换，每年特里波利的威尼斯人向耶路撒冷王国缴纳贡金。

同一时期，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也通过积极与海盗作战，以及与穆斯林进行贸易等方式活跃在地中海上。他们都是以个人为主进行活动，但这些个人所雇佣的集团兵力，往往非常强大。热那亚人尤其以个人主义著称，他们的桨帆船和帆船很少编成大的舰队。

而威尼斯人虽然也来自意大利，他们的习惯却截然不同。正如我在《海都物语》中所叙述的，威尼斯人仿佛全体组成了“威尼斯有限公司”一样，常常以集体的方式活动。

起初在近东活跃的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就这样逐渐为长期活动的威尼斯人所取代。如果拿“经济人”的标准来衡量，威尼斯人可以称为是“经济动物”了。

威尼斯人的国家观念也和比萨、热那亚人不同。后两座城邦的居民信奉个人主义，每个人都仿佛一匹狼一般，即使是祖国遇到威胁，也照常进行自己的商贸活动。而威尼斯人则都以国家利益为先，虽然热衷于个人的经济活动，一旦国家面临危机，威尼斯的商船会不假思索地加入海军。

威尼斯的要求令戈德弗鲁瓦感到为难。此时的他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同时面临神职人员和商人的领土要求。

神职人员、骑士和商人，构成了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基本的社会结构。诚然，这三方最终追求的都是自身的利益。但若三者都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特质，十字军国家的寿命也不可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神职人员、骑士和商人互相表达自身主张，从而形成积极的竞合关系，令各自阶层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

1100年夏天，十字军与威尼斯达成的协议，使缔约方互相默许了对方在陆地和海上称霸的权利。双方的首次共同行动，是在威尼斯人建议下，十字军于7月13日从耶路撒冷出发，夺取良港阿克。

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只有年轻的丹克雷迪，而戈德弗鲁瓦本人并未出征。他由于身体有小恙，留在耶路撒冷休养。他派遣了自己最信赖的勃艮第骑士，瓦尔纳·德·格雷，代表自己出征，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牵制丹克雷迪的势力。

在前往阿克之前，十字军首先抵达了雅法。与停泊在雅法港湾的威尼斯舰队会晤之后，两军沿陆路和海路分别北上。

近东地区的海风风向时常变化，使得陆上的耶路撒冷王国军队和受制于风向的威尼斯舰队逐渐拉开了距离。这时，十字军中发生了变故。德·格雷病倒了。实在无法支撑的他，最终决定返回耶路撒冷。

对于德·格雷来说，这一决定是幸运的。当戈德弗鲁瓦临终时，在他身边的不仅仅是教皇的代表戴姆伯特一人，还有自己的亲信陪在身旁。

戈德弗鲁瓦之死

公元1099年7月18日，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去世了，时年仅40岁。

在为戈德弗鲁瓦进行临终涂油仪式时，牧首戴姆伯特询问他是否愿意将耶路撒冷遗赠给罗马教会。但戈德弗鲁瓦至死对此一言未发。在一旁站立着的勃艮第骑士德·格雷，也对牧首表示自己没有听到其领主任何遗赠圣城的话语。

戈德弗鲁瓦的遗体在圣墓教堂的祭坛前停放五日供人吊唁，之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戈德弗鲁瓦身裹武装礼服，胸前覆盖着印有红色十字的白布，仰卧于打开的棺木之中，接受与之一起奋战的十字军将士的列队瞻仰。

其中自然有停止进攻阿克而率军返回的丹克雷迪，身着武装礼服带领着自己的军士们。而在炎热的7月里，身居埃德萨的鲍德温来不及赶来参加兄长的葬礼。

这位征服了耶路撒冷的骑士，没有自称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而是以“基督圣墓守护人”的身份，获得了埋葬于圣墓教堂的殊荣。

戈德弗鲁瓦之死着实是值得伊斯兰世界庆祝的一件事。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军事首脑不复存在了，这对穆斯林来说是一个发起反击的好机会。但实际的事态却并未如此发展。

在牧首戴姆伯特采取行动之前，戈德弗鲁瓦的亲信瓦尔纳·德·格雷火速率自己的部下占据了大卫之塔，并立即向埃德萨的鲍德温派出了信

使，告知他城防已经完全控制在洛林军队手中，请这位伯爵赶来耶路撒冷主持局面。

这一场景令人感到滑稽。

戴姆伯特本想在戈德弗鲁瓦临死之时，得到将耶路撒冷全城转赠罗马教皇的遗嘱。

就连普通人也知道，在基督教世界特别是天主教国家中，人死后做的任何约定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那些神职人员有着在人死之前接受忏悔，将其灵魂送至天堂极乐世界的权力，因此被形象地称呼为“上帝之手”。如果用更冠冕堂皇的话来说，他们是得到“上帝的恩宠”的一批人。

即使是作为普通俗人的戈德弗鲁瓦死后，其遗言也不能随便捏造或更改。在答应戴姆伯特关于大卫之塔所有权的请求后不到一个月，戈德弗鲁瓦就撒手人寰，这对戴姆伯特来说不啻是“上帝的恩宠”。

让我们回到本来的话题。

由于戈德弗鲁瓦之死而中断的阿克之战，在丹克雷迪重返战场之后再度开始。但阿克居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令十字军一无所获。在威尼斯人的再次建议下，丹克雷迪转向南进攻海法。在陆海两军的猛攻之下，海法城很快陷落了。

这样，十字军控制了从北到南依次包括贝鲁特、西顿、海法、凯撒利亚、阿尔苏夫、雅法和亚实基伦在内的7座海港城市。而仅仅是在一年之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还只有雅法一个出海口。这一年的成果可谓丰硕。耶路撒冷的安全，也由对这些海港的控制而得到了保障。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令伊斯兰世界振奋的一件大事。

波埃蒙多被俘

坐稳了安条克公爵宝座，又刚刚迎来50岁生日的波埃蒙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对他来说，起初不过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为了确保安条克公国的安全，波埃蒙多对周边地区的战略要地逐个征服。但他并不满足于拥有附近的属地，而是不断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领地。这时，来自小亚细亚梅利特内城的居民向安条克求助，波埃蒙多认为扩大领地的好机会来了。

古代的梅利特内（今土耳其的马拉提亚）是一座天然要冲，位于罗马帝国东方防线上。曾经视察帝国整个边境的哈德良皇帝就特意访问了这座城市。而如果波埃蒙多能吞并此处，未来就有可能在小亚细亚全境压制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也会给一直虎视眈眈的拜占庭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以无形的压力。

总的来说，波埃蒙多救援梅利特内的考虑是正确的。但是他将主力留在安条克，只带了小规模的部队深入小亚细亚腹地。

得知敌情的达尼斯蒙德苏丹认为复仇的好机会来了。这位突厥老者没有忘记十字军通过小亚细亚时多利留姆一战的耻辱，而波埃蒙多正是那场战役的主将之一。

老苏丹对即将到来的作战进行了慎重的布置。此时波埃蒙多的大名已经广为伊斯兰世界所知，突厥人相信正面进攻并非易事。因此，穆斯林军队选择了依靠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战的策略。

突厥军队的战术果然奏效了。从两侧山上冲下来的穆斯林兵士前后夹击，将波埃蒙多和两位骑士之外的十字军全部杀死。

但波埃蒙多没有选择做殉教者的命运。他把自己的头发截下来一段，交给一名生还的骑士，命令他全速赶往埃德萨，向鲍德温求助，希望埃德萨伯爵能尽全力赎回自己的性命。当骑士逃走之后，波埃蒙多向突厥人投降。

达尼斯蒙德对俘获波埃蒙多感到喜出望外。这位老苏丹希望能将安条克从波埃蒙多的手中夺回。他立即将绑缚了手脚的波埃蒙多和另一位生还者里卡多送到了十字军遥不可及的突厥大本营。

波埃蒙多一直被押送到距离黑海不远的尼克萨尔城囚禁起来。等到十字军得知波埃蒙多被囚时，他已经被突厥人关押了很久。

此时，十字军中再没有像波埃蒙多这样可以信赖的人物。对于十字军来说，失去波埃蒙多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在他进军梅利特内之前，一直对其心怀不满的圣吉尔，此时正接受阿莱西奥斯一世的召见，向君士坦丁堡行进。

1100年，十字军遭受了三大不幸，足以令十字军的对手穆斯林感到欣喜——

戈德弗鲁瓦去世了；

波埃蒙多被捕，囚禁于未知之地；

圣吉尔离开前线，去了君士坦丁堡。

在穆斯林的敌手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上面三个人。他们一齐退出了十字军的舞台，自然是令穆斯林欢欣鼓舞的事。

鲍德温见到波埃蒙多截下的一段金发，便立即准备将其救出。他根据求援骑士提供的情报，率领140名骑士前往梅利特内。

老苏丹得知救援军队前来的消息，料想少数骑兵后面还有大部队。因此突厥人暗自退兵，使鲍德温所率的140骑平安进入梅利特内城。前来迎接的梅利特内守军只有50名骑兵，而鲍德温也无心留下，旋即率部返回了埃德萨。回城之后，他多方打探波埃蒙多的下落，但始终无法得知囚禁安条克公爵的地点。

8月底回到埃德萨的鲍德温，得知了兄长戈德弗鲁瓦7月18日的死讯，同时也获悉了德·格雷传来的求援消息。

第七章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鲍德温即位耶路撒冷国王

由于出生年代不明，位居其兄40岁去世的戈德弗鲁瓦与返回西欧的尤斯塔斯之下，鲍德温在1100年时大约30多岁。

这位年轻的伯爵虽然行动敏捷，却并非做事冲动欠考虑的鲁莽之徒。

鲍德温决定先前往安条克，处理波埃蒙多被俘的善后事宜。为此他将埃德萨交付同名的堂兄弟管理。

在离开埃德萨之前，他将堂兄弟和领地中的实力派召集于一处，下达了各种命令。毕竟，如果埃德萨能够坚持固守下来，安条克就获得了天然的屏障。

在准备妥当之后的10月2日，鲍德温率领200名骑兵和700名步兵离开了埃德萨。第一次十字军从此全面进入了青年领导人指挥的时代。

亡兄戈德弗鲁瓦的部下还在耶路撒冷等待着鲍德温。从埃德萨到耶路撒冷的遥远旅途，鲍德温不得不独自走完。跟随他的只有骑士和步兵，而没有任何重武器。这样的一支部队，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出发，经过叙利亚和黎巴嫩到达耶路撒冷，旅途充满了危险。

鲍德温的部队首先到达了安条克。在安条克，鲍德温制定了波埃蒙多被捕后的守备策略，然后就出发前往十字军控制的港口拉塔基。他在此处未做逗留，径直沿海岸南下。

但此时鲍德温的军队受到了大马士革城主杜卡克所派遣的游击队的袭扰。由于游击队不断偷袭，鲍德温只得将战死的兵士就地草草埋葬了事。当他的人马到达特里波利时，只剩下160名骑士和500名步兵了。

特里波利的埃米尔热情接待了鲍德温，并为他的部队提供了必要的军需物资。虽然特里波利的埃米尔和杜卡克都是穆斯林，彼此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因此，他不仅为鲍德温提供了物资，还将大马士革军队的情报告知了埃德萨伯爵。

根据特里波利埃米尔的情报，杜卡克的军队正埋伏在位于特里波利和贝鲁特之间“猎犬之河”的河岸上。由于不渡过这条河就无法前往耶路撒冷，鲍德温的军队只得从此处南下。

特里波利埃米尔的情报绝非虚假。大马士革的苏丹正与霍姆斯的埃米尔一起，以数倍于鲍德温的兵力，守候在河边。

鲍德温假装没有注意到埋伏在河对岸茂密灌木丛中的敌军，悠然自得地开始了渡河。实际上，他早已为交战做好了准备，计划在渡河的过程中发起突袭。

他把最精锐的骑士布置在队尾，因此习惯于背后偷袭的大马士革军队，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

这些训练有素的骑士们一发现敌军偷袭，马上掉转过来向着河岸冲击。在这片狭窄的岸边地带，双方兵力的差距就无从显现了。此时，数量众多的突厥军队反而陷入了慌乱之中。杜卡克见局势不妙，只好逃回了大马士革。

“猎犬之河”构成了当时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自然边界。十字军入侵以前，叙利亚处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委任的塞尔柱突厥人统治之下。而南面的巴勒斯坦则为开罗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属下的阿拉伯人所

控制。而在12世纪初十字军来到之后，“猎犬之河”以南的巴勒斯坦滨海地区已经被戈德弗鲁瓦征服了。鲍德温过河之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连埃及来的埃米尔治理下的推罗城，也开城欢迎鲍德温的军队。

鲍德温于11月9日到达了耶路撒冷。此时距戈德弗鲁瓦之死已过了三个多月，一直为无人守城而担忧的居民，因洛林公爵之弟到来而感到安心。对鲍德温来说，也不能浪费任何时间了。

埃德萨伯爵立即会晤了耶路撒冷牧首戴姆伯特。经过两人的密谈，鲍德温向这位教皇代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尊重戴姆伯特的现有地位，但决不出让自己占有的领地。

在教皇代表看来，鲍德温这样做是对自己使了阴招。但后者威胁说，他将揭露戴姆伯特利用职务之便聚敛钱财的行为。戴姆伯特不得不沉默下去。这位立足未稳的牧首知道，鲍德温是通过戈德弗鲁瓦属下的将领得知自己贪污的消息的。

鲍德温继续马不停蹄地在耶路撒冷确立自己的地位。入城两天后的11月11日，鲍德温召集了城内的居民，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当选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他没有继续采用兄长“基督圣墓守护人”的头衔，而是堂堂正正、名副其实地做了耶路撒冷的国王。

然而，民众的欢呼并不代表一切。在基督教世界中，得到神授予的君权，必须经过教皇或大主教主持的加冕仪式。如果不这样做，鲍德温的王权就得不到正式的承认。在耶路撒冷，加冕仪式自然要由教皇代表来主持。

仿照300年前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仪式，耶路撒冷的国王也要于圣诞节加冕。于是，鲍德温的加冕仪式就在1100年12月25日举行，加冕的地点自然是在圣墓教堂。

就这样，从神职人员到居家骑士的鲍德温，最终登上了每个基督徒都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国王的宝座。这离他在下洛林当居家骑士的日子不过仅仅4年。第一次十字军的几位主人公当中，鲍德温是在来到近东以后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位。甚至可以说，他是所有十字军领袖中最成功的。

此后史称鲍德温一世国王的这位30多岁骑士最大的优点，就是及时放下过去的纠纷。他对牧首戴姆伯特采取了安抚的对策，及时避免陷入与罗马教廷对立的局面。

可以说，这位国王并非忘却了自己的愤怒，而是超越了对立意识。这得益于他独有的人格魅力。而且，鲍德温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相反，他对事务有敏锐的判断，也维护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丹克雷迪也出席了鲍德温的加冕仪式。两人相差十二三岁，都属于十字军中的少壮派。在戈德弗鲁瓦死后，丹克雷迪垂涎耶路撒冷的王位，但面对戈德弗鲁瓦人数众多的部下，他不敢尝试争夺这座圣城的统治权。

但是，丹克雷迪此时取得的成绩，完全不在鲍德温之下。但若以丹克雷迪和波埃蒙多的关系与鲍德温和戈德弗鲁瓦的关系做对比，后者是一家人，前者则是分开的舅甥两家。在中世纪西欧，人们除了重视能力之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门第出身以及亲疏远近。丹克雷迪在出席加冕仪式时，心中必定有各种想法。仪式刚一结束，他就返回了自己的领地加利利。

年轻一代的十字军

新任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在和牧首戴姆伯特达成妥协之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丹克雷迪的问题。

丹克雷迪的领地加利利是耶路撒冷王国的一部分，但丹克雷迪并不是甘于屈居人下的那种人。耶路撒冷王国里，两位领主同时存在。

两人曾经在基利基亚并肩作战，那时鲍德温已经对丹克雷迪出色的战斗力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回到加利利之前，丹克雷迪拜见了鲍德温。

鲍德温告诉丹克雷迪，当他前往安条克之后，自己一定会代为管理好加利利。而丹克雷迪则告知鲍德温，自己将在救回舅父波埃蒙多之前，代行安条克公爵的职务。

会晤之后，正式成为加利利公国统治者的丹克雷迪，就起身前往安条克公国。鲍德温解决了国内的两件事，丹克雷迪也认为他给自己行了不少方便。

在会晤之时，丹克雷迪提出，如果三年内未能救出波埃蒙多，安条克公国就归自己所有。鲍德温同意了这一要求。

骑士和士兵中有部分人曾经被穆斯林俘虏，但波埃蒙多是诸侯当中的第一个。这次，达尼斯蒙德让十字军吃了苦头。他们不知道波埃蒙多是被俘生还，还是已经做了突厥人的刀下鬼。鲍德温和丹克雷迪都觉得，已经没有救援的希望。

对鲍德温来说，把安条克托付给丹克雷迪是非常有意义的。十字军

在安条克的领地如果能坚持下来，耶路撒冷的防御会轻松很多。因此，他不希望看到安条克一直处在权力真空的状态。而丹克雷迪也恰恰能够胜任防御安条克的任务。这位25岁的将领不仅擅长作战，也是颇具信义之人。

抓住这一良机的丹克雷迪，仅仅率领着自己从故乡带来的亲兵，就勇敢地向安条克出发了。到了安条克，他完全能够自由地支配舅父属下的部队。

通过鲍德温和丹克雷迪的继任，十字军克服了戈德弗鲁瓦突然去世和波埃蒙多被俘这两大困难。不到半年间，过去的不幸都已经过去。无论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还是开罗的法蒂玛王朝，都没能利用这半年的机会。战争的主导权还在十字军手里。

继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自然了解把战争主导权握在手中的重要性。这时，他已经盘算着立即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鲍德温开始逐步熟悉戈德弗鲁瓦手下的兵士，并继续兄长未竟的事业——征服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

历史上常用的一个词叫作“政治征服”。

政治征服的方法，就是率领军队，以进攻相威胁，使对手承认自己的霸权，并恭敬地支付贡金。其统治目的在于控制所征服城市的征税权，而城市则以缴纳税金来摆脱被侵略和掠夺的命运，从而使自身的统治者和市政机构得以保全。戈德弗鲁瓦此前的征服，一直采取这一方法。在其控制耶路撒冷的一年内，对其他城市都采取政治征服的手段。

这样下来，十字军征服的巴勒斯坦海港城市，表面上都对耶路撒冷王国表示顺服，私下里却和以前的统治者埃及保持良好的关系。它们采取这样两面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还不到

两年的时间。谁也不能保证这些西欧人能否一直确立自己的统治，一旦埃及人卷土重来，完全可能将十字军势力清除出巴勒斯坦。各个城市两面的态度并非出于宗教原因，只是自身的利益使然。

但这种状态对十字军就很不利了。很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城市的居民会发动起义，袭击停泊在港口中的基督徒的船只，导致港口关闭。因此，在鲍德温看来，为了使这些海港城市完全为十字军服务，应当对其进行全面的武力征服。

这时的海港城市居民多为穆斯林，鲍德温并未打算将这些人逐出，而把整个城市变成基督徒的天下。此前他在埃德萨伯爵领地也将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视为自己的属民，而自己所娶的妻子就是亚美尼亚基督徒。

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主权握于何人手中。十字军国家的主权，必须掌握在天主教徒手中。在深刻影响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特别是如此。因此，从鲍德温即位耶路撒冷国王开始，他就一直致力于将附近的城市纳入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

但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却无比艰巨。

首先，耶路撒冷附近非常贫困。城市周边一片荒芜，根本不是西欧人梦想的天堂般的“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这里的土地并不适合农耕，也没有发达的手工业。与周围遍布耕地的埃德萨，或适合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安条克相比，耶路撒冷是一座连自给自足都不能实现的城市。

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是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的圣城。此前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收取海港和内陆城市物产的关税。

当十字军侵入巴勒斯坦之后，海港到内陆地区的贸易中断了。因

此，鲍德温迫切需要通过征服附近的海港城市，来保障自己的财政盈余。

但此时的海港城市大都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对于鲍德温的征服计划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那就是导致戈德弗鲁瓦丧命的疫病。在海港城市及其附近淡水河流汇入地中海的区域，有许多沼泽和湿地，它们是疫病的温床。

继其兄掌握耶路撒冷的鲍德温，已经到了不得不尽力开疆拓土的时刻。但令他极为烦恼的是，由于粮食不足和疫病，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未经战斗又减员了不少。

鲍德温还感到了来自远方法蒂玛王朝埃及的压力。与巴勒斯坦相比，埃及的物产极为丰富。

不用说尼罗河谷地的适宜耕种，以开罗和亚历山大为中心的地区手工业极为发达，是玻璃、陶器、棉织物、砂糖和各种奢侈品的产地。而通过其控制的红海贸易，法蒂玛王朝拥有阿拉伯半岛出产的橡胶，埃及内地出产的大理石，以及从亚洲长途运输来的香料。当时的埃及是整个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

由于埃及的富庶，作为统治阶级的阿拉伯人普遍缺乏战斗的欲望，因此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雇佣兵组成。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可算是雇佣兵的天堂。与巴格达的逊尼派哈里发不同，开罗的什叶派统治者对于任何穆斯林不分民族和出身阶级都加以提拔，形成了重用人才的社会风气。

从埃及出发，经海路三天就到达了巴勒斯坦。此外，埃及和巴勒斯坦还经过西奈半岛相连。

既不缺金钱也不缺食粮，还拥有庞大海军的埃及人，如果说有什么

不足的话，就是和所有自由自在的人一样，在实际行动之前不断拖延、浪费时间了。而鲍德温自然在跟当地人打交道中认识到了他们的这一特点。

这时，鲍德温得知了一条喜讯，那就是新的十字军部队从西欧出发了。

西欧陷入了得知耶路撒冷解放后的狂热之中。一时间，人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十字架前宣誓，满心欢喜地要求参加十字军。

第一支整装待发的部队来自意大利北部。这次出发的十字军没有被历史学家们算在第一次到第八次东征之中，而以“1100年出发的十字军”而著称于世。其发起人是米兰大主教，主要由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兵士和朝圣者组成，首先向君士坦丁堡进发。

不久之后，由法国和德意志的骑士组成的军队也开始向拜占庭首都行军。这支军队中包括在安条克之战时先期逃回西欧的布洛瓦伯爵和法国王弟于格。他们并未完成第一次参战前的誓约，还准备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去做祈祷。其中的布洛瓦伯爵，还是在其夫人的积极动员下才再次出征的。

接见这些十字军的阿莱西奥斯一世，希望新抵达的十字军能够再次击败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以使拜占庭帝国能够扩张领土。他点名希望暂时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圣吉尔担任这次十字军的总指挥。

虽然圣吉尔、布洛瓦伯爵和于格三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中都没能发挥多大作用，他们毕竟熟悉地形，因此由他们率军进入小亚细亚是比较合适的。由于过去互相之间的竞争心态，三人选择了独自行军。

如果沿着小亚细亚西北部向东南部之间的道路行进，新的十字军就会到达基督徒控制下的安条克公国。相反，这支十字军选择了先向安卡

拉行军，然后折向东北的路线。他们希望在抵达安条克之前，先救出被俘的波埃蒙多。关于这一点，三位诸侯没有分歧。

但这一地区是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区域。上次塞尔柱突厥人对西欧骑士的战法感到不适应，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了。

十字军深入敌军领地的结局，是导致多数将士白白死在小亚细亚的荒山野岭中。圣吉尔、布洛瓦伯爵和于格也差点儿像波埃蒙多一样惨遭俘虏，不过还是侥幸逃脱了。圣吉尔逃回了君士坦丁堡，而布洛瓦伯爵和于格则踉踉跄跄地抵达了安条克。

这次行军的惨痛教训，使西欧人了解了通过小亚细亚的困难。因此，后来的朝圣者大都选择了海路。

十字军的失败也给企图利用他人的阿莱西奥斯一世重重一击。虽然十字军在叙利亚重创了穆斯林的力量，但小亚细亚依然是突厥人的天下。拜占庭帝国已经不可能依靠第一次十字军的力量收复小亚细亚了。经过此战，塞尔柱突厥人又从拜占庭手中夺回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重镇科尼亚。

1100年十字军在小亚细亚的失败，也使鲍德温对援军的期待化为泡影。虽然终于完成在圣墓教堂前祈祷夙愿的布洛瓦伯爵和于格与他商定今后共同作战，从西欧返回的两位诸侯却没有带来多少能够上战场的士兵。

而除了由疫病导致的大量非战斗减员外，令鲍德温感到失望的是，威尼斯海军放弃了在地中海东岸的斗争。这一局面持续了20年之久。

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考虑的。在各国都首先考虑宗教问题的中世纪，威尼斯是一个另类。该国的格言是“首先做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它一直在与埃及的穆斯林开展贸易，并

不会因十字军的到来而中止。虽然罗马教皇是全西欧的精神领袖，威尼斯却可以不顾教皇的禁令而与异教徒通商。

1100年前后，匈牙利国王正在进攻威尼斯的生命线——亚得里亚海东岸。由于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为了维持本国船只航行的安全与自由，它必须保持对时称“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的控制。

为了防守受匈牙利进攻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港口，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召集了本国分散在整个地中海的商船队。由这些船队组成的强大海军，得以将匈牙利军队的陆上攻势完全击退。正是因为此事件，威尼斯舰队从巴勒斯坦的外海完全消失。直到20年后与匈牙利解决了领土纠纷，威尼斯的船只才恢复在这一海域的活动。

由于在海法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威尼斯舰队不辞而别，鲍德温只得依赖意大利滨海城邦中不太重视国家利益的热那亚海军力量。然而，他与热那亚的合作导致了不愉快的虐杀。

比萨和热那亚船只上的水手，在与鲍德温的部下一同攻陷海港城市之后，以比十字军更残暴的方式，屠杀城内的穆斯林。

我们不难理解这些水手的想法。在此前的《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里，我曾述及，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一直战斗在与北非穆斯林海盗船斗争的最前线。

虽然同是意大利人，威尼斯人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拜占庭帝国和中近东的穆斯林国家，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城邦则很少与异教徒和希腊人开展贸易。相反，他们总是伺机袭击和掠夺穆斯林船只，绑架船上的商人，并勒索赎金。

与威尼斯的另一处不同，则是比萨和热那亚建立海军的目的。他们首先并非为开展贸易而建立海军，而是为了防范从北非来袭的海盗。比

萨和热那亚海军的打击对象，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海盗。

对比萨和热那亚人来说，穆斯林的唯一意义就是敌人。既然是仇敌，那么见到手无寸铁的穆斯林，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屠杀。但比萨和热那亚毕竟是以贸易立国的，因此他们不会拒绝与异教徒通商。在可以放手经商的地区，例如海港城市内的本国居留区，他们自然会与穆斯林开展贸易。这时，双方的宗教差异就不重要了。

与在贸易当中不考虑宗教问题的意大利人相比，西欧北部来的十字军骑士就显得不那么变通了。但大家都抱持着利己主义的心态，因此常常互相妥协。这一时期，鲍德温最能够依赖的朋友，就是这些意大利商人了。

波埃蒙多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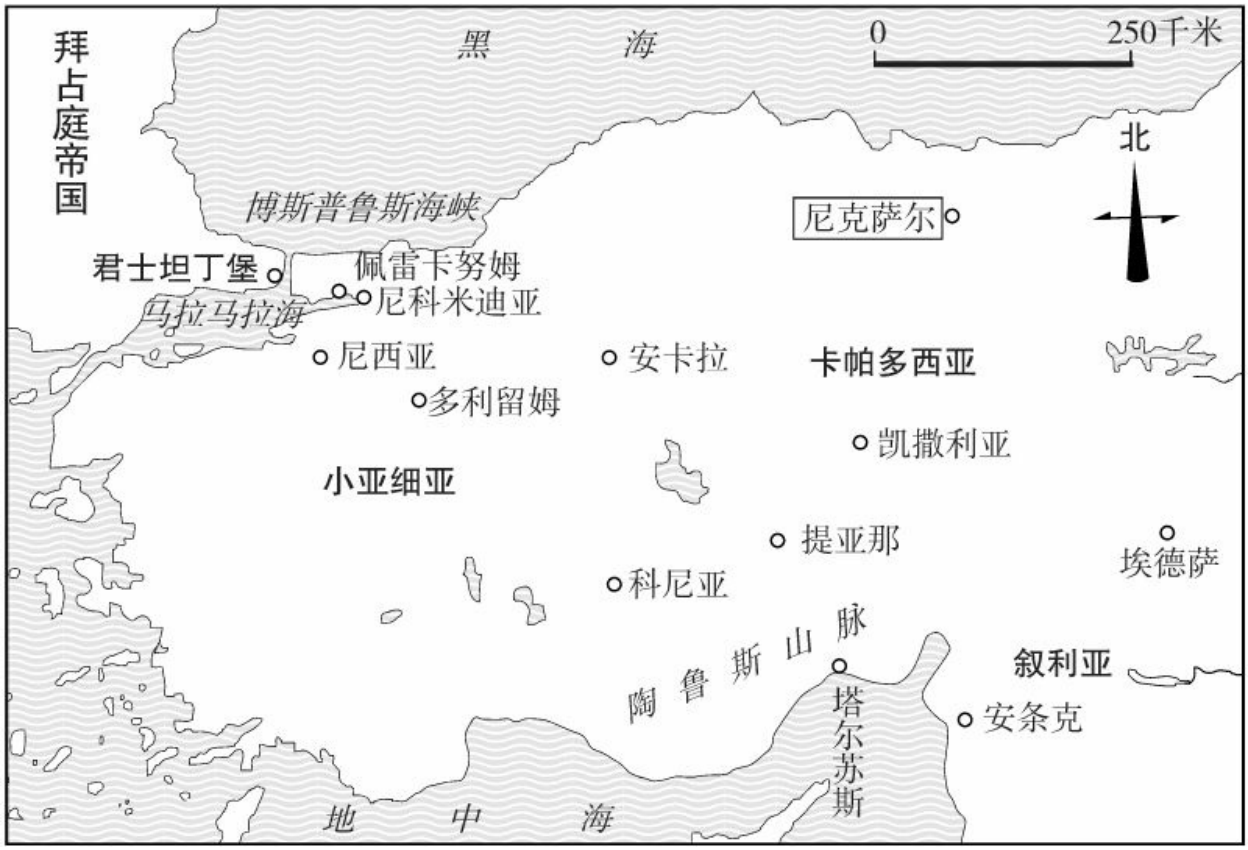
鲍德温就任耶路撒冷国王之后，就自然成为了全体十字军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对被囚的波埃蒙多置之不理。他通过留在埃德萨的堂兄弟打听波埃蒙多的下落，并希望同名的堂兄弟能设法救出普利亚公爵。终于，擒获波埃蒙多的达尼斯蒙德苏丹提出，十字军可以用26万拜占庭金币将其赎回。

被捕时身居高位的波埃蒙多，此时正被手铐脚镣所缚，不能离开囚室一步。他与一位来自萨勒诺的骑士里卡多一起，被关在一座高塔之内，过着度日如年的囚徒生活。

据传说，被囚的波埃蒙多曾经设法笼络苏丹的爱妾。虽然这个说法真伪不明，因为他想会见苏丹的内室，还是非常困难的。

对老苏丹来说，关押着这位身价26万金币的俘虏，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因为倘若别的苏丹知道波埃蒙多的关押地点，必然会试图将其夺走。

不得已之际，苏丹前来劝说这位高贵的俘虏交赎金。波埃蒙多在囚禁之中学会了突厥语，这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囚禁波埃蒙多的尼克萨尔及其周边地区

波埃蒙多讨价还价到10万拜占庭金币。苏丹抵挡不住现金的攻势，接受了自己俘虏的提议。但他要求里卡多留下作为保证。最终，老苏丹同意波埃蒙多在没交赎金的情况下自由离开。毕竟，对达尼斯蒙德来说，这位俘虏是只烫手的山芋。

在被囚两年后，波埃蒙多只身回到了安条克。丹克雷迪对此感到吃惊，兵士们则欢声雷动。

但安条克城里并没有10万赎金可以支付给达尼斯蒙德苏丹。可是，对基督徒骑士来说，欠异教徒债是极不光彩的。为了解决这一窘迫的事态，波埃蒙多最终向安条克城内的居民征收了特别税。待赎金交付之后，萨勒诺的里卡多也被放了回来。

恢复自由之身的波埃蒙多，自然对前来守城的丹克雷迪表示了深深

的谢意。而丹克雷迪也准备好了将安条克城交还给返回的公爵。同时，丹克雷迪表示，希望舅父承认自己最近征服的与安条克公国接壤的地区。但波埃蒙多对此不置可否。

最终，丹克雷迪交出了安条克城主的位置，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回到加利利以后，却发现鲍德温已经完全吞并了这片原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位年轻人的困境，体现了作为旁系继承者的悲哀。

然而丹克雷迪还不能和舅父断绝关系。在波埃蒙多看来，至少这位年轻人还大有用武之地。诺曼人亲属间的联系很紧密，舅甥两人之间就像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亲兄弟的关系一般。

这时候，鲍德温正忙于征服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而从囚禁中重返安条克的波埃蒙多也再次回到了战场。他的对手是叙利亚的穆斯林守军。虽然叙利亚各个城市的埃米尔之间还在为争夺领土而斗争，在面对波埃蒙多时，他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

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埃德萨附近展开了激战。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有许多埃德萨伯爵建立的堡垒。当鲍德温就任耶路撒冷国王以后，这些堡垒的实际控制者是他的同名堂兄弟。

此时的埃德萨城内有一位来自法国西部库尔特尼家、名叫若瑟兰的骑士。他参加了1100年的那次十字军，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从小亚细亚逃到安条克的幸运者之一。后来，若瑟兰来到了埃德萨协助这里的防御。

留守埃德萨的鲍德温请求波埃蒙多派兵支援自己，以进攻幼发拉底河支流上的战略要地哈兰城。站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可以将周边的原野尽收眼底。而如果鲍德温能占据哈兰，就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建立了自己的前沿阵地。

穆斯林在此时全面团结起来。叙利亚当地的领主都积极参加了摩苏

尔领主组织的联军，以7000骑兵和3000步兵的总兵力，与南下的十字军展开了一场激战。

十字军的总兵力难以估计，但应不到敌军的一半。而鲍德温和若瑟兰所率的埃德萨军队，与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的安条克军队之间缺乏配合，最终在敌人的突击中败下阵来。

据伊斯兰史料，十字军方面战死的人数约有2000。总之，西欧人经历了一场大败。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成功逃离了战场，而鲍德温和若瑟兰则被俘虏。从攻陷耶路撒冷以来，十字军首次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打击。

但是穆斯林一方也未能乘胜追击。当俘虏了两位重要人物之后，突厥领主之间继续互相争斗起来。最终，鲍德温和若瑟兰分别被分配给两位领主。而十字军也并未能够利用对手内讧的机会。

返回安条克的波埃蒙多，派遣丹克雷迪前往埃德萨代行统治。

时年29岁的丹克雷迪，率军向埃德萨出发了。对他来说，想坚守住埃德萨伯爵领地，并非易事。毕竟，此前哈兰战役的失败，粉碎了十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哈兰战役之后陷入内斗的穆斯林领主们，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联军，而是分别单独进攻埃德萨。在一次次的攻城战中，丹克雷迪都成功击退了敌军。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并未获得来自波埃蒙多的任何支援。

倘若叙利亚的塞尔柱突厥领主再次联合起来，丹克雷迪必然无法招架。而穆斯林一旦夺回埃德萨，安条克公国就危在旦夕了。

而使十字军从危机中得救的，是塞尔柱突厥人之间的领地纠纷。对突厥人来说，俘获波埃蒙多获得大量赎金的先例，使他们充满了对生擒

十字军中重要人物的兴趣。

捕获埃德萨的鲍德温的领主，向安条克派遣了使者。这位领主自然知道鲍德温的身价比不上波埃蒙多，因此只向波埃蒙多要求1.5万拜占庭金币的赎金，并附带了交还波埃蒙多所俘虏的突厥公主的条件。

波埃蒙多自然接受了使者的请求。他当场将1.5万金币和突厥公主交给了使者，使者随即离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东岸。波埃蒙多不假思索地交付赎金，表现了为释放同为十字军领导人的鲍德温所做的努力。

但他并没有催促穆斯林一方释放鲍德温。而在没有催促的情况下，突厥领主也就一直没有释放俘虏。这样下来，鲍德温就一直以囚犯之身滞留着。

至于波埃蒙多为什么没有催促对方放人，丹克雷迪的一段记载道出了其中隐秘的缘由：

“倘若释放了鲍德温，埃德萨便恢复了从前的状况。公爵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安条克和埃德萨两块领地都归于我们一家所有。”

在埃德萨担负防御任务的鲍德温，作为戈德弗鲁瓦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的堂兄弟，是西欧北部洛林家族的一员。而丹克雷迪和波埃蒙多，则是意大利南部诺曼人家族的成员。西欧的家族就像苏格兰的氏族一样，内部十分团结，将别的家族视为潜在的对手。在穆斯林的部族中，即使是本家也常常有对立的关系，而中世纪的基督徒则以家族为斗争的基本单位。

至于库尔特尼的骑士若瑟兰，则与俘虏自己的穆斯林首领交涉起来。他愿意为该首领作战，协助其防御附近穆斯林领主的进攻，并愿以3万第纳尔金币赎身。这位来自法国西部的骑士并未花费多少盘缠，因此还有充足的资金使自己重获自由。最终，领主释放了若瑟兰。

在获得释放之后，若瑟兰得知了鲍德温仍身陷囹圄的消息。他充分发扬了骑士精神，只身前往囚禁鲍德温的领主那里，请求将其释放。

囚禁鲍德温的领主并不满足于波埃蒙多所支付的1.5万拜占庭金币，再次向若瑟兰要求缴付6万第纳尔的赎金。若瑟兰并没有这么多盘缠在身，于是提出先付3万第纳尔，并以自己交换鲍德温入囚。

若瑟兰的行为使领主大为感动。在收取3万第纳尔之后，他立即释放了鲍德温，并让若瑟兰也自由离开。

面对重返埃德萨的鲍德温，丹克雷迪只好让出了城主的位置。在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另一位鲍德温未能重返埃德萨的情况下，这位鲍德温成为实际的埃德萨伯爵。而丹克雷迪则分别在埃德萨和安条克担任过摄政。

1099年收复耶路撒冷的最大功臣戈德弗鲁瓦于1100年去世。此后，十字军进入了在近东建立国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和安条克公爵波埃蒙多都常常为了建立实质性的统治而诉诸武力。此时，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不统一，客观上促成了十字军国家的建立与稳定。如果穆斯林团结一致的话，其勇猛足可与十字军相抗衡。

因此，十字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占据优势。但尽管如此，这些西欧人还是丧失了大量的兵力。诚然，任何成功的远征，都是以牺牲为胜利的代价的。无论是鲍德温还是波埃蒙多，都对自己属下的损失感到痛心。

收复耶路撒冷、夺取巴勒斯坦，在西欧掀起了宗教狂热。前往近东的朝圣者增加了不少。从英格兰、丹麦、挪威等地，也有部分兵士前来与异教徒作战。

但是这些新来的人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对于骑士来说，需要有一下

命令，就能让全体听从的指挥官，而根本没有人训练那些普通的朝圣者。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组成第一次十字军的，都是诸侯率领的亲兵。这些亲兵在战斗中难免出现减员的状况，而作为补充的普通兵士，并不能达到亲兵所拥有的令行禁止的能力。虽然每天都有新的西欧兵士从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下船，他们无法实际改善兵力减少的情况。而一起组织来到近东的“1100年的十字军”，也在抵达叙利亚之前就丧失了大半。可以说，哈兰战役的大败，就是这段时期十字军兵力减少、战斗力下降的反映。

1104年秋天，安条克公爵波埃蒙多召唤了还在埃德萨的丹克雷迪。他正式任命后者为安条克的摄政。而波埃蒙多自己则乘船返回西欧。此行的目的是游说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组织新的十字军部队送往东方，以补充有所减少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十字军。

丹克雷迪再度统领了安条克，而同时由于鲍德温还未返回，他还代管埃德萨伯爵领地。三年以后，鲍德温得到释放，重新掌握了埃德萨，而丹克雷迪则一直管理着安条克公国的内政与防御。

丹克雷迪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担任摄政长达8年之久。

以能征善战而为穆斯林所熟知的丹克雷迪，在管理内政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他效仿波埃蒙多为热那亚人提供居留区，从而发展了安条克城经济的策略，进一步为比萨人提供了居留区。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安条克公国在丹克雷迪治理下，一次动乱也没有发生。可以说，这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年轻人既是战场上积极作战的一员猛将，也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圣吉尔的作战

那么，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的情况又如何呢？

当圣吉尔所率领的1100年十字军宣告惨败之后，他只好狼狈地逃回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终日无所事事地生活着。后来，圣吉尔接受了阿莱西奥斯一世的秘密任务，返回叙利亚的拉塔基，从那里试探侵入安条克公国的领地，却受到了丹克雷迪的迎头痛击。

丹克雷迪一度俘获了这位老前辈。虽然圣吉尔最终获释，他却深知丹克雷迪的危险。可如果前往耶路撒冷，鲍德温一世早已控制了局势，而这位国王又不愿利用圣吉尔的军队。于是，60岁的老伯爵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窘境。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征服特里波利。如果能攻陷特里波利，并建立属于自己的伯爵领地，就可以将十字军的领土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连接起来。应该说，圣吉尔的这一想法是明智的。

此时的特里波利，正处在名为穆鲁克·阿布·阿里的阿拉伯领主的统治下，而他一直与法兰克人关系良好。这位领主不仅为前往耶路撒冷的鲍德温提供了一夜住宿，还向丹克雷迪的军队及时报告了在“猎犬之河”有杜卡克军队埋伏的消息。

穆鲁克与许多其他领主一样，并不知道法兰克人的宗教狂热，认为十字军不过是普通的侵略军，是可以与之共存的。附近的沙伊扎尔、哈马、霍姆斯、布凯亚、巴尔布克城的领主也抱持相同的心态。第一次十字军还未染指这些城市。

在圣吉尔看来，如果特里波利陷落了，这些城市就很容易拿下了。

因此，他决定首先攻占特里波利，并以此为自己伯爵领地的中心。圣吉尔心中比任何其他人都强烈的宗教狂热，会通过实现这个计划而得到大大的满足。

老迈的伯爵一决定就出发了。他仅仅率领了300骑兵，直扑特里波利城下。

事已至此，特里波利的埃米尔只得下令迎战，并向大马士革的杜卡克和霍姆斯的达乌拉求援。此二位领主很快率领了2000名骑兵赶来支援。

到达特里波利城外的圣吉尔，看到敌方大量援军到来，并没有下达退兵的命令。他可能已经陷入了极度绝望之中。在敌军面前，圣吉尔把自己所率领的300名骑兵分成四队：

100名骑兵抵挡大马士革来的杜卡克；

100名骑兵进攻特里波利的埃米尔穆鲁克；

50名骑兵迎战霍姆斯的达乌拉；

最后是50名骑兵组成自己的近卫队。

首先与圣吉尔交锋的是霍姆斯的2000骑兵。50对2000的作战，看上去是寡不敌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善于征战的圣吉尔，根据地形布置了战术。他的50名骑士使霍姆斯的2000骑兵在劣势地形中陷入了混乱。同样地，圣吉尔以100名骑士扰乱了大马士革来的2000骑兵的阵形。

圣吉尔很快由守转攻，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他的300名骑士大声呼喊着冲击敌人的战阵，使穆斯林兵士溃不成军。特里波利的郊外，到处是被砍死的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尸体。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这次战斗中穆斯林一方损失了7000人。如果此数字属实的话，对于十字军来

说当算是一场大捷了。

圣吉尔参加十字军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大胜的喜悦。他决定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在第二年年初仍以300骑兵进攻特里波利城。

次年春天，战事再开，而圣吉尔改变了战术。他深知，以300名骑兵是不可能攻破特里波利城的，因而采取了孤立这座城市的策略。他决定对所有援助特里波利的城市展开进攻。

可以说，圣吉尔的新战术相当幸运地奏效了。更为幸运的是，支援过特里波利的霍姆斯城主达乌拉，在从清真寺礼拜出门之后，遭人暗杀。

暗杀达乌拉的人，并非与十字军有关的任何基督教徒，而是与其有私仇的穆斯林。这次暗杀也并非由于宗教或政治原因，而仅仅是由于财产纠纷。由于达乌拉是阿勒颇城主里德万之子，这次暗杀也含有家族仇杀的意味。

此时，失去埃米尔的霍姆斯城只好向大马士革的杜卡克求助。而杜卡克正是里德万的兄弟。第一次十字军时期叙利亚领主之间的内斗，令伊斯兰史家感到扼腕。

由于大马士革的军队抵达了霍姆斯，他们就能与特里波利的军队一起对抗圣吉尔。圣吉尔攻取特里波利的困难似乎又增加了不少。

正当此时，热那亚人向圣吉尔提出协同作战——热那亚海军的40艘战舰从海上进攻特里波利，十字军则从陆上攻城。伯爵同意了这一建议。

然而特里波利城拥有雄厚的资金，它雇佣埃及船只击退了热那亚海军的进攻。

圣吉尔只得独自攻城。他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1105年春，特里波利城被迫求和。而圣吉尔的条件是城市承认其为领主。

在交涉进行当中，图卢兹伯爵病倒了。他在攻城时受到敌人火箭所伤，伤势恶化形成了感染。最终，圣吉尔以63岁的年龄离开了人世。他占据了相当于今天黎巴嫩领土的一半，而沙伊扎尔、哈马和霍姆斯，当然还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广大地区，仍处在穆斯林控制之下。但特里波利伯爵领地还是足以连接起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使十字军在近东的领土成为完整的一块。

波埃蒙多重返西欧

在十字军当中，一直与圣吉尔冲突的，是被穆斯林视为第一勇将的波埃蒙多。

波埃蒙多把安条克托付给丹克雷迪之后，自己乘船回了西欧，首先回到了南意大利。他本是在长靴形的亚平宁半岛南部普利亚地区的领主，于是在自己的领地居住到1104年晚秋。在这片自己已离开9年的土地上，波埃蒙多有许多事要做。其中的一件事，是组织一支新的军队，以准备再次前往东方。

在欧洲南部，即使是晚秋时节，也不妨碍旅行。波埃蒙多从意大利南部前往罗马，会见新任教皇帕斯卡尔二世，游说其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

帕斯卡尔二世和乌尔班二世一样，都出自克吕尼修道院。他的性格过于温厚，虽然也很关心十字军，却没有乌尔班二世那样的积极性。最终，波埃蒙多得到了他的许可，作为教皇的代表前去游说法国国王。

1105年春天，波埃蒙多在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腓力一世的热情接见。由于整个西欧正沉浸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的狂热之中，法国国王的宫廷里也对其中的大功臣波埃蒙多颇为器重。腓力一世是参加十字军的于格的长兄，而此时于格已经回到巴勒斯坦参战。得知波埃蒙多请求募集参加十字军的兵士，国王爽快地应允了。

然而，波埃蒙多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却来自女性。

如前所述，布洛瓦伯爵夫人阿黛尔是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女儿。她曾两次激励丈夫埃蒂安参加东征，是一位热心支持十字军的

女贵族。而波埃蒙多则是深受女性青睐的男子。

于是，布洛瓦伯爵夫人就为波埃蒙多引见了其兄长，新任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亨利一世也同意协助波埃蒙多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

当然，阿黛尔的热心，仅仅是为了支持十字军的缘故，而不是出于男女之情。她的帮助，对波埃蒙多所准备的新的远征，也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依然独身的波埃蒙多，还是需要找一位各方面都适合自己的伴侣。

1106年暮春时节，56岁的波埃蒙多终于结婚了。他的妻子名叫康斯坦丝，是法国国王腓力一世的女儿，曾以公主的身份嫁给香槟伯爵，但已离婚（一说为分居）。在两人结婚之后，康斯坦丝公主随波埃蒙多一起抵达了意大利南部，并在其夫死后一直留居普利亚的公爵领地。虽然这次婚姻明显是政治联姻，但也有二人之间恋爱的可能。

愉快的波埃蒙多给丹克雷迪也找了一位名叫塞西莉亚的妻子，其中也有布洛瓦伯爵夫人代为穿针引线。此人是与腓力一世有染的一位女子所生的，因此算是一位庶出的王女。在丹克雷迪不在的情况下，波埃蒙多为塞西莉亚举行了成婚仪式。

塞西莉亚也跟随波埃蒙多一起来到了南意大利，之后为了尽对其夫的义务，扬帆远航，只身前往近东。

还未收到波埃蒙多来信，丹克雷迪就见到了远航而来的塞西莉亚。她的出现令这位青年将领大吃一惊。此时的安条克，与其说是优雅的大都市，不如说是兵马交锋的前线基地。在城内，年轻美貌的贵族妇女吸引了众人的注目。要知道，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诸侯当中，携带妻子出征的只有鲍德温和圣吉尔两人。而在此时，美丽的塞西莉亚翩翩而来，与美男子丹克雷迪可谓是眷侣天成。

波埃蒙多的西欧之行，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圆满的成果，只待新的十字军整编完成了。与此同时，身在安条克摄政的丹克雷迪也不负重托，成绩斐然。56岁的波埃蒙多，在此刻已是高枕无忧了。

然而，人生中的陷阱，往往在这个时候静候着主角。在近东、罗马和法国都大获成功的波埃蒙多，没有料到悄然袭来的危险。此时正值1106年秋天。

落入陷阱

一直在意大利南部等待十字军集合，为重新出征做准备的波埃蒙多，处在人生的巅峰。这次的十字军，完全由他一人统领。

但普利亚公爵心中所想的，却是占领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城市都拉斯。

都拉斯是一座重要的海港城市，是古罗马时代埃尼亚提亚大道的出发点，在中世纪为拜占庭帝国所控制。如果进攻这座城市，拜占庭皇帝必然震怒而派遣军队还击。除了阿莱西奥斯一世之外，波埃蒙多进攻都拉斯，还将面对另一个强大的敌人。

波埃蒙多的领地普利亚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岸，而都拉斯则位于其东岸。倘若两岸都被同一人占领，位于亚得里亚海最深处的威尼斯就好像老鼠被装进了口袋一般。因此，强大的威尼斯海军不会对波埃蒙多的野心坐视不管。

1100年春，亲率大军渡海进攻都拉斯的波埃蒙多，受到了海陆两面的夹攻。在拜占庭军队的陆上攻势和威尼斯海军的封锁下，他的军队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进入夏季，完全没有补给的兵士们，在暑湿的折磨下纷纷病倒。到了9月，波埃蒙多也身染疫病。他能够耐受两年的囚禁生活，却在传染病面前倒了下来。

被围期间，波埃蒙多答应了阿莱西奥斯一世的使者送来的四项和议条件：

一、波埃蒙多继续统治安条克公国，但作为拜占庭皇帝臣下的身份而统治。

在以希腊语写成的条约全文中，只有“臣下”一词以中世纪拉丁语“vassallus”标明。这当然是为了让全体十字军和西欧的王侯们都明白而特意做的文章，其间体现了阿莱西奥斯一世复仇的快意。

二、安条克的实际统治者丹克雷迪，以及以后统治该公国的任何人，都必须以拜占庭皇帝“臣下”的方式，得到其统治权。

三、在现任安条克大主教的法兰克人去世后，必须任命信奉希腊正教的希腊人为大主教。

四、基利基亚和叙利亚地区的所有城市，都归拜占庭皇帝统治。

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率领残兵逃回普利亚的败军之将波埃蒙多，再也不是以前那位叱咤风云的十字军统帅。

波埃蒙多在西欧王侯中的信用一落千丈。由于拜占庭帝国和埃及法蒂玛王朝达成了瓜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密约，与埃及哈里发交往的拜占庭皇帝成了十字军的敌人。波埃蒙多臣服于阿莱西奥斯一世，可谓是奇耻大辱了。

同样，波埃蒙多组织新十字军东征的设想也完全落空了。其他诸侯都失去了支持他的热情。

整个西欧都对波埃蒙多感到无比失望，其中自然包括布洛瓦伯爵夫人。

而困守故土的波埃蒙多，也就无从得知安条克公国的命运了。但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吧，可惜这位公爵的时间不多了。

从都拉斯败退回普利亚的波埃蒙多，没有踏出巴里城一步，在一年后的1111年郁郁而终，时年61岁。他与妻子康斯坦丝育有两个儿子。

然而，已逝的波埃蒙多并不知道，阿莱西奥斯一世所要求的条件，最后都没能实现。

拜占庭皇帝的特使带着波埃蒙多署名的条约文书前往安条克。迎接他的丹克雷迪虽然也在上面签字，却对特使的要求一笑置之。这位曾经对拜占庭皇帝的效忠宣誓书抵抗到最后的年轻人，完全不把阿莱西奥斯的要求当回事。

应该说，丹克雷迪的强硬态度，挽救了十字军国家的命运。此后，无论是安条克公国还是耶路撒冷王国，都一直保持独立，从未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

对强迫签订的条约一笑置之的丹克雷迪，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从容应对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的夹击，一方面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的埃米尔们，另一方面则令拜占庭皇帝的试探性袭扰无功而返。

然而，丹克雷迪并不是一位十分成熟的男子。他就像一匹只知道加速前进，却没有人攥住缰绳的骏马。过去，在进攻安条克的时候有波埃蒙多，在耶路撒冷之战与其后的加利利征服战中有戈德弗鲁瓦为他勒紧缰绳。但当戈德弗鲁瓦死后，波埃蒙多返回西欧之后，丹克雷迪就好似脱掉了缰绳一般狂奔而去。结果，发生了伊斯兰史料中称为“奇妙的战争”的一场大战。

“奇妙的战争”

戈德弗鲁瓦死后，鲍德温继承了耶路撒冷的王位。他委托了同名的另一位鲍德温统治自己的埃德萨伯爵领地。但在前述的哈兰战役失败以后，这位鲍德温被囚禁于位于今天伊拉克的摩苏尔，关押他的领主名叫贾瓦里·萨卡瓦。

来自法国西部的骑士若瑟兰·德·库尔特尼愿以骑士精神救出鲍德温，但他的3万第纳尔赎金并不足以赎回埃德萨的统治者。最终，若瑟兰交出了两倍的赎金，并约定协助摩苏尔的领主攻击其对手，才换来了鲍德温的获释。

尽管经历了几次交锋，穆斯林仍然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仅仅是一般的侵略者而已。他们甚至会利用这些信基督教的异教徒，来与同是穆斯林的对手作战。

已经将埃德萨的鲍德温和若瑟兰视为友军的摩苏尔领主贾瓦里，决定进攻里德万的阿勒颇城。他率领塞尔柱突厥和贝都因骑兵组成的大军，挥师西进，而鲍德温和若瑟兰也如约派出数百名骑士，与贾瓦里合兵一处。

里德万对此感到颇为惊恐。他深知摩苏尔军队的实力，再加上埃德萨的十字军，自己实在无力抗衡，因此需要特别施计。

他没有选择向自己的兄弟，大马士革领主杜卡克求援，因为双方在争夺领土方面互不相让，已经闹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结果，在摩苏尔军队逐渐逼近的形势下，里德万派使节向丹克雷迪求援。

令后世穆斯林编年史家颇为叹息的是，叙利亚的穆斯林首领之间，

不能团结一致抵抗法兰克人，却相互敌对起来，为了领地的纠纷，血亲兄弟反目成仇。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最终也改变了十字军领导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丹克雷迪对埃德萨的鲍德温，也没有多少好意。

事实上，丹克雷迪对鲍德温的回归耿耿于怀。在鲍德温被捕期间，整个埃德萨伯爵领地都由丹克雷迪代管。而他通过向东、南两个方向的征服活动，扩大了伯爵领地的领土。

然而，鲍德温还是被释放回来了。这时，丹克雷迪只好将自己费尽心血扩大的土地，交还这片领地原来的统治者。

丹克雷迪曾向鲍德温提出，自己扩大的领地应划归安条克公国。但这一要求为鲍德温所无视。毕竟，埃德萨的鲍德温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的堂兄弟，因此都属于洛林家族。而丹克雷迪和波埃蒙多则属于诺曼人的家族。由于波埃蒙多返回了西欧，在近东形成了洛林家族一家独大的局面。

丹克雷迪很快答应了阿勒颇领主里德万的要求。他不仅答应援助里德万，还亲自率领了相当于阿勒颇守军两倍的兵力。丹克雷迪和鲍德温，即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于是，穆斯林眼中的“奇妙的战争”，或者说是“超越宗教的差别，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此时正值1108年10月初，而战争爆发的地点在阿勒颇与埃德萨之间门比城附近的平原上。

由于摩苏尔领地的首领贾瓦里年事已高，率领500突厥兵和许多贝都因武士的，是他的儿子。而鲍德温和若瑟兰麾下的援军有数百人，这一方的军队总数约为2000。

而阿勒颇一方的军队则包括里德万自己率领的600名突厥兵，以及

丹克雷迪所率的1500名十字军，总计2100人。

战事一开始，朝着对摩苏尔和埃德萨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摩苏尔军队所雇佣的贝都因士兵从己方的军营中偷盗了几百匹强壮的阿拉伯马，逃离了战场。远远望见贝都因人盗马而逃，摩苏尔和埃德萨的士兵顿时无心恋战。这时丹克雷迪一声令下，阿勒颇和安条克的联军全线出击。摩苏尔和埃德萨的部队纷纷溃逃，而丹克雷迪和里德万则凯旋而归。

有伊斯兰史料记载此战中死亡的十字军士兵达2000人，明显不符合事实。将代表双方参战的十字军加起来，也不足2000的数目。

然而，就算本次战斗丧生的法兰克人仅有史料记载的十分之一，对十字军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了。鲍德温得知此战以后，自然怒不可遏。对这位耶路撒冷国王来说，十字军在与埃及的拉锯战中不断补充的军力，却在自己的内耗中损失了。

鲍德温立即谴责了丹克雷迪和埃德萨的鲍德温。虽然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可以想象他对双方都进行了警告，声称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全体基督徒将以他们二人为敌。二人收到来信之后，都表示要相互和解。

但两人是否真心和解，就不得而知了。但从此以后，安条克和埃德萨之间再没有发生战事。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对此深感欣慰。此时他正着手征服圣吉尔生前一直进攻的特里波利。

在围攻特里波利时死去的圣吉尔，有一名叫贝尔特兰的儿子。但这位贝尔特兰并非圣吉尔的妻子所生，因此只能算是庶出，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处于不如嫡子的地位。但由于圣吉尔的嫡子先于其父丧命，贝尔特兰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贝尔特兰则育有一位名叫庞斯的儿子。在鲍德温和热那亚舰队的协助下，这对父子最终实现了圣吉尔征服特里波利的梦想。

1109年夏天，特里波利之战宣告结束。经过10年的经营，十字军终于将从特里波利到拉马拉之间整个巴勒斯坦海岸全部纳入自己统治之下。剩下的推罗，直到1124年才落入基督徒之手。要知道，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是经过了数月围困，才攻破推罗城的。

而亚实基伦城也还在穆斯林手中。这座海港是埃及向巴勒斯坦进军的基地。因此，只要十字军试图进攻亚实基伦，埃及就会立即出兵抵抗。

到1123年，十字军终于夺取了亚实基伦。进攻海港城市，不可缺少的是海军的配合。当20年后解决了与匈牙利的领土纠纷，威尼斯就可以腾出手来一起进攻亚实基伦。

威尼斯人的方式是彻底的决战，要么就不出兵。1123年，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亲率由40艘军用桨帆船、28艘运输帆船和4艘大型商用桨帆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巴勒斯坦附近的海面。

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滨海城邦的海军，在驾船技术上远超埃及水手，而且威尼斯人在此战中投入了相当大规模的舰队。与之交战的埃及船只纷纷沉没，使失去海军保护的亚实基伦很快陷落。第二年，威尼斯再次从海上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最终将号称永不陷落的推罗城完全攻破。

至此，十字军国家已经占据了包括今日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内的整个地中海东岸。然而，应当最为这一战果而喜悦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早在6年之前就已驾崩了。

而丹克雷迪则比鲍德温更早去世。

1112年12月，一直致力于征服安条克周边地区的丹克雷迪，染上了疫病，最终含恨而死。直接的病因是他在过去15年间，马不停蹄的征战，以及当时恶劣的卫生条件。与主教阿德马尔和戈德弗鲁瓦一样，关于丹克雷迪的死因，只有短短的“疫病”（typhus）一个词。

青年之死

当丹克雷迪染病的时候，他自己完全没有觉察，但他所染的疫病一开始就非常严重。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丹克雷迪，从以前脱缰野马般的性格摇身一变，让臣下准确而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对嗣后事项的安排，并命令有关人士发誓严格遵从自己的要求。

他首先叫来了骑士鲁杰罗。原籍萨勒诺的鲁杰罗，是随波埃蒙多一起囚禁在达尼斯蒙德苏丹腹地的骑士里卡多的儿子。正如其已故的父亲是波埃蒙多的忠实助手一样，鲁杰罗也是丹克雷迪最信任的心腹。

丹克雷迪委任鲁杰罗为安条克公国的摄政，其职务应一直担任到波埃蒙多之子来到安条克继承领地时。

最终，丹克雷迪没有将自己一直统治的安条克公国遗赠于自己的血脉，而是将其继承权交付了一年前去世的舅父波埃蒙多之子。

与此同时，丹克雷迪命令鲁杰罗与埃德萨伯爵领地的统治者鲍德温的女儿结婚。这是为了使鲁杰罗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以为将来波埃蒙多之子的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他还命令，妻子塞西莉亚在自己过世之后，与新任特里波利伯爵贝尔特兰的儿子庞斯再婚。

丹克雷迪到死都没有得到自己的封国，而塞西莉亚则是法国国王庶出的女儿。自己死后，如何给妻子安排生计，自然是他要考虑周全的。他希望塞西莉亚未来能成为特里波利伯爵夫人。毕竟，在中世纪欧洲，如果一位贵族女子在没有足够遗产的情况下守寡，就只能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了。

最后，丹克雷迪还要求成为摄政的鲁杰罗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在他的促成下，鲁杰罗的妹妹玛丽亚与即将赴任加利利总督的若瑟兰·德·库尔特尼结为夫妻。

在丹克雷迪全面细致的善后安排之后，以上各位都在他的病榻前发誓，未来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紧密的关系。

完成以上安排之后，丹克雷迪在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爵领地、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加利利地区未来的统治者之间结成了一张亲缘关系网，使十字军领地的北半部分在自己去世以后全面安定下来。

一直积极进取、脾气暴躁的丹克雷迪，在临死之时却能够拥有罕见的深谋远虑，可以说他最终是成熟了。

可以说，这些安排是丹克雷迪遗赠给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最珍贵的遗产。在以后的6年间，鲍德温可以不必考虑北部的敌情，集中精力于与埃及的战事。

丹克雷迪死时，年仅36岁。在那个时代，这并不算早死。然而在史书中记载的丹克雷迪，则以青年的面貌著称。

在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塔索的长诗《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丹克雷迪的青春形象跃然纸上。而19世纪罗西尼作曲的歌剧《丹克雷迪》，则刻画了这位青年的悲剧人生。

在20世纪维斯孔蒂导演的电影《山猫》里，阿兰·德隆扮演的老公爵的外甥，就以丹克雷迪之名而广为传颂。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西西里作家兰佩杜扎。

直到今天，只要南欧人听到丹克雷迪这个名字，脑海中就会自发地浮现一个充满信义、永远年轻的形象。

如果说丹克雷迪的改变发生在他临终的病榻上，曾经与丹克雷迪并肩作战的鲍德温，则是在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宝座上完成转变的。兄长戈德弗鲁瓦死后，从埃德萨前往耶路撒冷的鲍德温，就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18年间，鲍德温专心于其兄在一年时间内无法完成的事业，加强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附近的海港城市最终为十字军所控制，而埃及法蒂玛王朝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则完全瓦解。

鲍德温是一位不会抱怨他人的领袖，因此也常能化解他人之间的仇恨。

在1110年，鲍德温决定全面进攻埃及控制下的亚实基伦。由于自身军队的数量有限，他要求安条克和埃德萨出兵支援。丹克雷迪和埃德萨的鲍德温都响应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呼吁。

但实际上，两位前来的诸侯都只想固守在自己的领地。他们在亚实基伦城外视察之后，一致劝说耶路撒冷国王退兵。

两人的理由是，亚实基伦的城堡是行之有效的防御设施，因此陆路进攻非常吃力，而且，十字军缺乏海上力量。比萨和热那亚的船只仅仅能提供零星的火力支援，并不足以依赖。

鲍德温只得同意退兵。相比此前对双方内讧的呵斥，鲍德温此次的决定可谓富有政策弹性。

由此可见，在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的18年间，鲍德温不仅善用军事力量，也颇具政治手腕。

值得一提的是，鲍德温不顾教皇代表戴姆伯特的强烈反对，改变了耶路撒冷王国内以天主教为尊的局面，开始接纳正教和亚美尼亚教派的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定居。

而在其以武力取得的其他城市，鲍德温没有赶走城内的穆斯林和希腊正教徒。在希腊正教徒之外，他也允许穆斯林居住在城内，并在清真寺内做礼拜。清真寺的设施也并未受到破坏。

鲍德温甚至承认了西欧人和当地穆斯林之间的通婚。这一策略是以与异教徒共存的方式，增强了属下兵士的实力。毕竟，纷纷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并无法提供多少兵力。

同时，为了增强国力，鲍德温也实施了必要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受到自己属地内穆斯林的欢迎，也吸引了境外的穆斯林。

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十字军征服的海港城市内建立了居留区，这里成为了他们在近东的贸易基地。他们不仅经营着中近东地区的物产，还从事对来自印度、中国等地货物的贸易。逐渐屈服于十字军宗主权的沙伊扎尔、哈马、霍姆斯等地的穆斯林首领，最终也到十字军控制下的海港城市开展贸易活动。

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商人，渐渐成为了法兰克人的贸易伙伴。在基督徒居住的城市里，徜徉着戴着头巾的各民族穆斯林。这一场景，令从西欧前来的虔诚朝圣者感到不快。

鲍德温之死

但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并没有忘记埃及的威胁。

从埃及前往巴勒斯坦，可以选择三条道路。第一条，是经过海路，从亚实基伦登陆。第二条则是通过经西奈半岛的陆路前往巴勒斯坦，并不需要经过半岛上的沙漠地带，而是从开罗沿着地中海沿岸到达加沙。加沙与亚实基伦相距不远，而从亚实基伦到耶路撒冷的路途约为70公里。

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控制了红海的埃及所可能取道的路线。埃及船只可以绕过西奈半岛，在位于今天约旦南部的阿喀巴港登陆。从阿喀巴北上，经过死海北进，就到达了耶路撒冷。拥有充足资金雇佣船只和人力的法蒂玛王朝，完全可以三路并进，直抵巴勒斯坦。

十字军方面唯一的希望，在于一再试图进攻巴勒斯坦的埃及宰相阿尔·阿布达尔放弃自己的计划。如果阿布达尔能放弃进攻，鲍德温心中自然不再担忧了。

以鲍德温在位时十字军的战斗力，根本无法攻破亚实基伦。至于入侵埃及境内，更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鲍德温所能做的，就只有率军袭扰西奈半岛，牵制埃及的兵力一件事了。

担心安条克陷落而落入腹背受敌境地的，不仅仅是丹克雷迪一人。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也在每个夜晚彻夜难眠，担忧敌军明天拂晓就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之中。

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实力，鲍德温与身为亚美尼亚人的第二位妻子

离了婚，迎娶了已故西西里国王的寡居王后，作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对鲍德温来说，这次婚姻完全以妻子所拥有的资产为目的，他并不关心对方是否与自己一起生活。早已死去的第一任妻子未能留下子嗣，而鲍德温也没有跟后两位妻子生育子女。

公元1118年春天，鲍德温向往常一样率兵前往西奈半岛，牵制埃及的军事力量。在半岛上的埃尔·阿里什，耶路撒冷国王病倒了，他被抬在担架上返回耶路撒冷。这次担架之旅并不漫长。4月5日，鲍德温死在回城路上。他的遗体被运回耶路撒冷，埋葬在圣墓教堂戈德弗鲁瓦墓的旁边。

由于鲍德温早年在教会内供职，其生年不得而知。在以神职位阶而论的修道院，通常不会记载进入时的年龄。除了罗马教皇一级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外，一般的神职人员档案里面只有身故的年份。虽然鲍德温的生年不明，通过史料可以大致得知其出生于1065年前后，因此去世时的年龄约为53岁。

第一代十字军的退场

在本书至此所述的23年间，十字军国家已经在东方确立下来。埃德萨伯爵领地、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以及耶路撒冷王国，以明确的形态，构成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联邦式十字军国家。

通过丹克雷迪临终时所促成的亲缘，埃德萨的鲍德温、安条克的鲁杰罗、特里波利的庞斯三人，成功地结成了互相协助的关系。他们不再像丹克雷迪生前那样抵抗耶路撒冷王国的权威，而是在耶路撒冷国王的统一领导下，共同进退。而耶路撒冷国王，就成为这一联邦实际的领导人。由于联邦的存在，十字军国家的寿命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延续。

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之死，则标志着第一次十字军的领导人全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教皇代表而参加十字军的主教阿德马尔，在1098年的安条克之战中率先离世。

接下来是耶路撒冷陷落后实际的国王，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1100年死于耶路撒冷。

先期逃回西欧，又在其夫人斥责之下回到巴勒斯坦的布洛瓦伯爵埃蒂安，在与穆斯林军队的激战中阵亡。而与其一同回到近东的法国王弟于格，则在同一时期死去。

诺曼底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两人，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由于完成了出征的誓言，便回到了西欧，最终死于自己原来的封地。

然后，各诸侯中最年长的，也是最喜欢与同僚争执的图卢兹伯爵圣

吉尔，在1105年进攻穆斯林对手时死去，时年63岁。他所渴望得到的特里波利，最终落入了自己儿孙手中。这大概可以使身在天堂的圣吉尔有所告慰吧。

穆斯林所熟悉的法兰克人波埃蒙多，也就是普利亚公爵，在与之长期竞争的圣吉尔去世后6年，死于普利亚的巴里，结束了61岁的人生。虽然波埃蒙多本人死于失望之中，所委托的丹克雷迪却成功地将安条克公国的统治权交付其子，使公爵一直苦心经营的领地，留在自己家族手中。

而丹克雷迪本人则以36岁的壮年之身，于1112年去世。

6年后的1118年，第一次十字军的最后一位领袖，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撒手人寰。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一直与十字军保持微妙关系的拜占庭帝国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也离开了人世。

1118年，十字军历史上的第一代人，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临死前的遗言，是留给埃德萨的鲍德温的。

接到继承耶路撒冷的遗训，埃德萨的鲍德温迅速赶来。他将埃德萨委托给自己的战友若瑟兰·德·库尔特尼。从此，埃德萨的鲍德温成为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如果从实质上的首任国王戈德弗鲁瓦开始计算，圣城耶路撒冷的“守护人”一直是洛林家族的成员。

我们也不知道鲍德温二世的年龄。他大概比自己的堂兄鲍德温一世略小，但年长于丹克雷迪。因此，当鲍德温二世就任国王时，已经40多岁，将近50了。

十字军的第一代人，完成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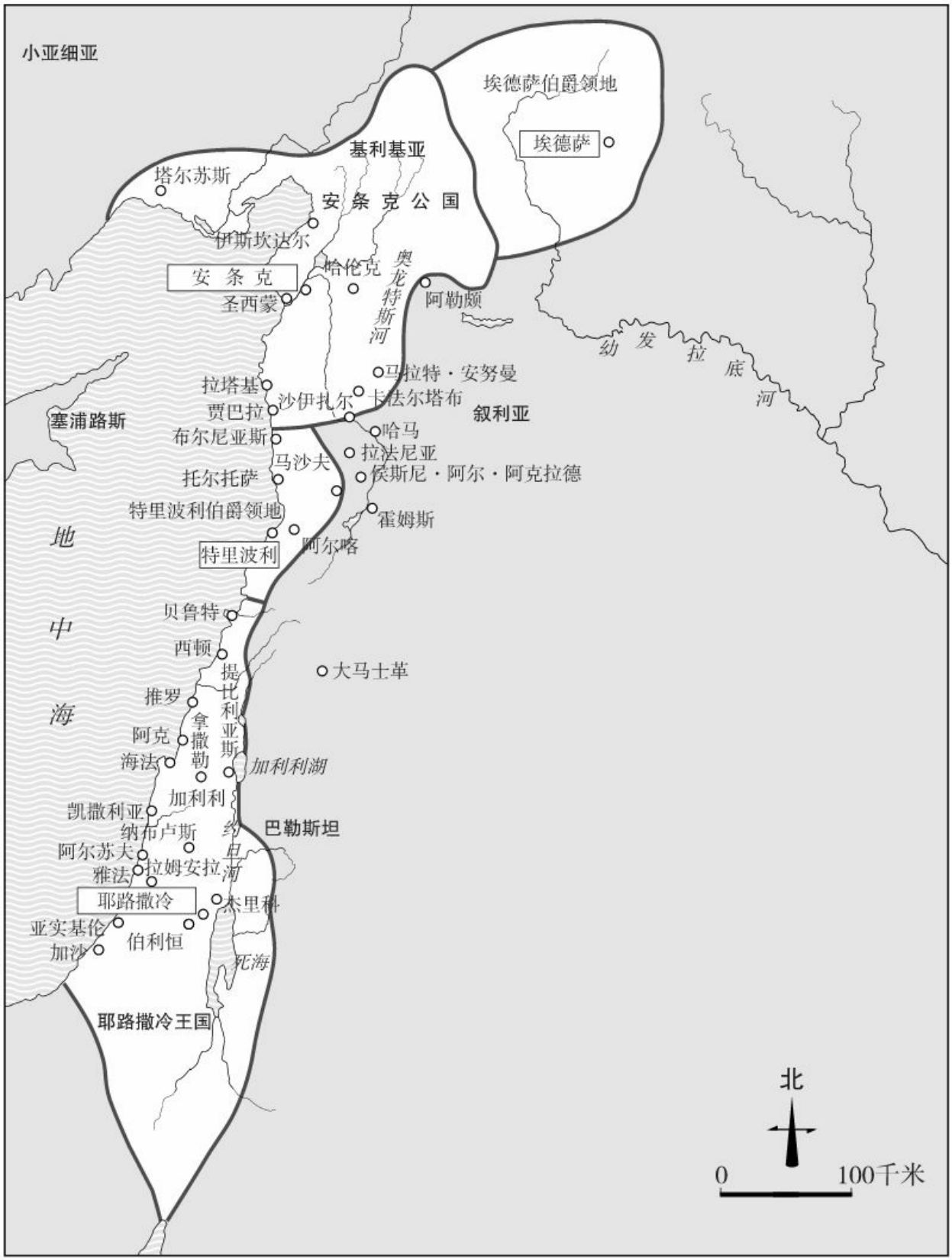
他们1096年从西欧出发以后，只用了3年就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后花费了18年时间来巩固在东方的统治。

没有皇帝和国王参战的第一次十字军，主要依靠在西欧各地拥有领地的诸侯领导。他们虽然时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在共同的目标面前，还是能够团结起来的。相反，穆斯林领主却由于自身利益出发，不能持续结成统一的战线。

此后的故事，将围绕着后人如何防御第一次十字军所建立的国家展开。不难想象，当伊斯兰世界认识到特意从远方而来的十字军的真实目的后，他们将给十字军以坚决的回击。

但是想象的情况与事实，却是千差万别。

在第一代十字军退场的真空中，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比西欧人感觉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当地人。



第一次十字军在中近东所建立的十字军国家

——《十字军的故事》（上）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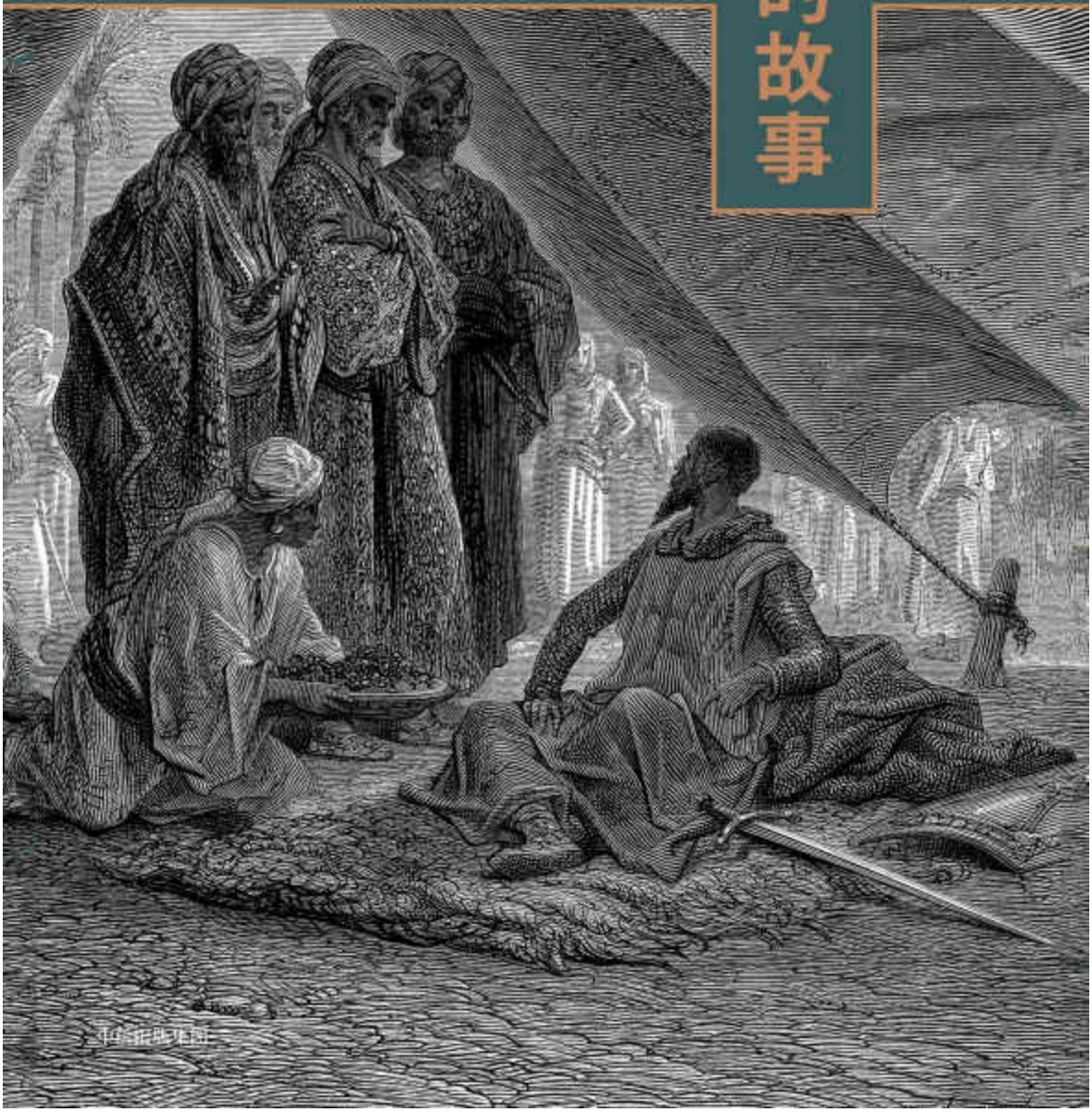
十字军的故事

中

十字軍の物語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目　录

第一章 守业的时代
十字军的第二代
圣殿骑士团的诞生
圣约翰骑士团的转变
鲍德温二世
十字军中的女性
法国来的耶路撒冷国王
城堡
第二章 穆斯林开始反击
埃德萨的陷落
修士贝尔纳
第二次十字军
通往圣地的道路
进军大马士革
撤退
深刻的影响
努拉丁的登场
十字军国家的实际情况
大地震
拜占庭式外交
海军力量＝制海权
两次十字军之间的岁月
宗教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
十字军时代的城堡
中世纪的经济人

海军力量
居留区
商馆
温和的穆斯林
第三章 萨拉丁登场
逊尼派与什叶派
法蒂玛王朝的灭亡
新十字军的企图与挫折
青年萨拉丁
麻风病国王鲍德温四世
统一伊斯兰世界的漫长历程
鲍德温四世的最终战役
“抽大麻的男人们”
“解锁的狗”
第四章 武力吉哈德之年
哈丁战役
胜者与败者
伊柏兰的巴里安
耶路撒冷之战
男人间的对决
耶路撒冷再次被穆斯林掌控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守业的时代

在长久对立的双方中，往往是一方集中涌现一代人才，当这一代人纷纷殒落之后，与之对抗的另一方则涌现出下一代人才。

从此处开始的第二卷，是继第一卷描写基督徒一方的诸位主人公后，以穆斯林一方新登场的主人公们为中心的。至于双方的人才为什么没有同时出现，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法一两句话概括清楚。可能是知道人与人之间界限的神明的安排，使历史变得如此没有条理吧……

十字军东征，对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上帝所期望的。在信奉上帝的人看来，自然是正当的行为。

因此，参加者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都会保佑自己，于是就启程向遥远的东方进发。

事实上，正如《十字军的故事》第一卷所述，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完全是参加者的劳苦牺牲换来的。至于相信东征成功是来自上帝护佑的人，在维持其成果的阶段，也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今后必然有上帝相助。

1095年，在法国中部克勒芒所召开的公会议上，宣告十字军东征开始。

1096年，宣誓参加十字军的诸侯，离开西欧，向中近东进发。

1097年，通往耶路撒冷道路上最大的难关——叙利亚大都市安条克的攻城战，拉开了序幕。

1098年，十字军成功攻占安条克。

1099年，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

仅仅经过三年时间，第一次十字军就实现了“将充满苦难的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大目标。全欧洲知道此事，都沸腾了起来。

当然，实际参加十字军，且在苦战之后取得辉煌成果的诸侯，自然知道这一目标的达成，与相信上帝的保佑与否，并没有多少关系。而对周边一带的征服，也是能使圣城耶路撒冷保持“解放”状态的必要步骤。也就是说，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置于十字军的征服之下，是控制耶路撒冷所不可或缺的。诸侯虽然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国王，而是在西欧的故乡拥有广大领地的封建领主。他们绝不会将自己辛苦获得的圣地放任不管，而寄希望于上帝的保护。

因而耶路撒冷王国实际的第一代统治者戈德弗鲁瓦，采取了“基督墓地守护人”的称号。

而攻陷安条克城的，则是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

至于征服特里波利的功劳，就要算在图卢兹伯爵圣吉尔身上了。

在这三位主要人物之后出场的，还有首先征服埃德萨，获得埃德萨伯爵地位，又继其兄戈德弗鲁瓦而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以及作为波埃蒙多左右手而活跃的丹克雷迪两位年轻将领。

这些诸侯，是首先于1099年建立，而后18年中不断确立的十字军国家的主人公。

1118年之前中东的十字军国家

而到了1118年，这五人中的最后一位，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去世了。而他没有留下子嗣。

在这一状况下，同名的鲍德温就任了耶路撒冷国王，史称鲍德温二世。这位鲍德温二世甫一上任，就担负起了防卫远离西欧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重责。

十字军的第二代

由于其出生年月不详，从埃德萨伯爵升级为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二世的实际年龄，我们并不清楚。他大概比堂兄鲍德温一世年轻几岁，而比6年前去世的36岁的丹克雷迪年长几岁。因此，当鲍德温二世就任耶路撒冷国王时，大概已是40岁的后半，将近50了。他在担任埃德萨伯爵期间，与亚美尼亚领主之女结婚，育有四个女儿。

初代耶路撒冷国王戈德弗鲁瓦在西欧北部已经拥有了广大的公爵领地，因此由他来统治基督徒无人不知的耶路撒冷，没有人会觉得不合适。而其后继任第二代国王的鲍德温一世，本身就是戈德弗鲁瓦的亲兄弟，因此自然是西欧强势的家系洛林公爵家的本家了。

但与此二人为堂兄弟关系的鲍德温二世，就不能完全算是他们的本家。于是当他就任王位时，自然考虑到了会遭当地人反对的危机。

事实上，当鲍德温一世死后，有人主张从尚在西欧的洛林公爵家族男性骑士中选择一位来继承耶路撒冷的王位。而提出相反意见，并最终把鲍德温二世推上宝座的，是负责加利利防御的若瑟兰·德·库尔特尼。

他的理由很简单：与其选派一位来自西欧的大贵族，不如让熟悉当地局势的人来担任这一要职。另一位赞成这一主张的大人物，是耶路撒冷的牧首。时任牧首阿努尔夫，从收复耶路撒冷之时，就亲眼目睹了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一世的辛劳。

最终，既不像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一世那样出身名门，又不像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那样擅长作战的鲍德温二世，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三代统治者。本书此后所提及的鲍德温，将是指这位新的国王，而不再是其堂兄鲍德温一世。

当东征的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时，无法离开埃德萨的鲍德温一世，派出鲍德温前往增援，而当戈德弗鲁瓦死后，鲍德温一世继任国王，鲍德温就获得了埃德萨伯爵领地的统治权。因此，当鲍德温一世驾崩以后，身在埃德萨的鲍德温就继承了耶路撒冷的王位。

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和圣吉尔并立于第一次十字军的最前列，随后的鲍德温一世和丹克雷迪则代表了第一次十字军的年轻一代。而位于第三列的则是这位以鲍德温二世之名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新贵族了。关于他的评价，穆斯林一方常称其为“平凡者”，而在基督教史料中，也常以“代理者”来称呼这位耶路撒冷国王。

然而这位平凡者也有不同凡响的一面。由于能够冷静地看到自己能力的局限，鲍德温二世对如何妥当地任用人才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对于并无合适继承人时代的耶路撒冷王国来说，是唯一正确的治理策略。毕竟，鲍德温二世并不是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人。

跟随戈德弗鲁瓦从西欧出征以来的22年间，鲍德温作为第三序列的领导人，常常以“代理者”的身份担任职务，最终成为了具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完整过程经验的领袖。因此，以了解当地局势为理由，将鲍德温推举为新任耶路撒冷国王，是合乎情理的。况且，这位诸侯还曾与若瑟兰一起，在穆斯林的狱中度过了4年的囚徒生活。

1118年加冕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二世，与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的戈德弗鲁瓦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简单说来，就是兵力不足的情况。从西欧出发的1万十字军，到完成收复耶路撒冷的任务时，兵力已经急剧减少了。

首先，从西欧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到达耶路撒冷时，许多兵士都在历次战役中丧生了。

其次，与此同时，因食物和饮水不足，或瘟疫等原因丧命的军士，也不在少数。

最后，达成了收复耶路撒冷的誓约之后，相当数量的十字军兵士返回了西欧。

在诸侯当中，弗兰德斯伯爵和诺曼底公爵就返回了西欧，其部下一同返回，则不在话下。

当诸侯纷纷离开之后，最初负责耶路撒冷防御的戈德弗鲁瓦手下，只剩下了丹克雷迪一位部将。两人的兵力合计，不过骑兵300、步兵2000。

史料中未见继兄长之后加冕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一世所拥有的常备军数目的确切统计。直到30年后第二次十字军的时代，耶路撒冷国王所率的十字军兵力才有了记录。当时的十字军兵力为55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即使是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中最大的耶路撒冷王国，其国内兵力还不如第一次十字军中一位诸侯所率的部众。比方说，第一次十字军中兵力最少的弗兰德斯伯爵，其所率的骑兵也有500名。

因此，在鲍德温一世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的时代，他主要依赖在与穆斯林势力接壤的加利利地区活动的丹克雷迪，安条克公国的领袖波埃蒙多，以及代替自己出任埃德萨伯爵的鲍德温（后来的鲍德温二世），来维持统治。

而当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全体战将去世以后，在无人可以统治的情况下出任中近东十字军领袖的鲍德温二世，担任加利利地区防务；受托负责埃德萨防务的，就只有若瑟兰·德·库尔特尼了。

在“无人可用”的1118年，十字军国家面临着第一次十字军主人公相继去世的局面。与诸侯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兵，即以现代语言来说有能力

的下级士官，是在这20年中为数不多的死里逃生的幸运者。

因此，兵力不足的情况需要加上“绝对的”这个限定语。如果有志愿服兵役的人，为了对其进行训练，自然要有足够有经验的下级士官。

在中近东十字军国家这样的现状之下，最高责任人所应做的，自然是专心防御这一件事了。

从十字军离开西欧的1096年，到鲍德温一世驾崩的1118年之间，基督徒一方保持了22年的攻势。而在鲍德温二世即位以后，十字军转入守势，进入了“无人可用”的状态。

而在西欧，得知圣城已收复的信徒们十分欣喜，朝圣者的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倍。

朝圣者们相信，耶路撒冷重归基督徒统治，是上帝相助的结果。那既然上帝可以令基督徒们夺回圣地，从海上到达巴勒斯坦，进而通向耶路撒冷的路程，自然也就是安全的了。然而现实却与他们所想完全不同。

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一世在位的19年间，一直处于守势的穆斯林一方，在无法依靠正面作战取胜的情况下，将战略重点转移到游击战的运用方面。

游击战的策略，通常来说就是突袭敌人最薄弱的部分。在无法击败从头到脚以甲胄武装的十字军的情况下，袭击毫无防备的朝圣者，就再容易不过了。

从西欧专程来到耶路撒冷，期待到圣墓教堂进行祈祷的朝圣者，大多是地位不高，手无寸铁，却带有盘缠的普通人。在穆斯林看来，他们不仅是可憎的异教徒侵略者，还能提供金钱或货物，甚至可以被贩卖为奴隶。

因此，从巴勒斯坦海港城市雅法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线，就成了朝圣者最危险的一段旅程。

十字军时代的雅法，就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从西欧赶来的朝圣人群，在此处下船之后，前往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其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应对这条主要朝圣路线的安全负责。

但正如前文所述，鲍德温二世的兵力不足。此外，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时的情况不同，埃德萨伯爵领地和安条克公国新的统治者缺乏统治能力，在穆斯林前来进攻之时，还需要耶路撒冷国王派兵支援。

鲍德温二世统治耶路撒冷王国13年，其间除了待在耶路撒冷的时间外，他还在北至叙利亚，南到巴勒斯坦的广阔地区往复征战。很多地区都由于兵力不足，需要这位国王御驾亲征，来保证朝圣路线的安全。可以说，鲍德温二世出任国王期间，一直处在忙得不可开交的状态之下。

这个时候，果然有人为耶路撒冷国王伸出了援手。

圣殿骑士团的诞生

传说当鲍德温二世刚刚加冕耶路撒冷国王之后，就有两位来自法国香槟地区的骑士前来拜访。一位是年近半百的骑士于格·德·班，另一位名叫戈德弗鲁瓦·德·圣奥梅尔。他们声称愿与另外7位骑士一道，组成宗教骑士团，担负起防卫雅法与耶路撒冷之间朝圣路线的任务。

虽然包括于格在内的骑士只有9个人，中世纪的骑士都带有步兵作为辅助，这9位骑士各自带了5位步兵做辅助。此外，每人还有三四位马夫。因此，9位骑士组成的战队，达到90名兵力。当然，主要的战斗力还是这9名骑士。

鲍德温二世得到骑士团的援助，大喜过望，便在耶路撒冷城内东南角的公元前的犹太圣殿位置，为这些骑士提供了活动的据点。因此，在十字军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就这样宣告成立了。所谓圣殿骑士团的名称，就来自其位于古代圣殿遗迹的驻所。

作为一支宗教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成员首先必须是拥有武器，能征善战的骑士。

其次，宗教骑士团与世俗的骑士不同，其参加者必须舍弃世俗身份，一生侍奉上帝，保持修士式的僧侣生活。参加宗教骑士团者，其作为俗人身份所具有的一切资产，都必须捐献给骑士团。因此，加入骑士团以后，就不再是骑士于格·德·班了，而自称修士于格。

圣殿骑士团的纹章

再次，要成为修士，就要在上帝面前发誓一生献身神职，这一点与其他修会一致。

所谓清贫、服从、纯洁三大信条，具体来说，就是舍弃私有财产，对上帝绝对服从，以及一生独身。因为于格·德·班已经结婚，在圣殿骑士团创立之前，他解除了自己的婚约。

宗教骑士团的第四个特点，是不归任何世俗国王或领主管理。这一点不同于世俗的骑士，后者都以地方领主为其主君。由于他们是持有武器的修士，并不受修道院或当地主教的管辖，而是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因此，宗教骑士团独立于诸侯、国王、皇帝与各地主教。

因此，圣殿骑士团完全独立于耶路撒冷国王、安条克公爵、埃德萨

伯爵和特里波利伯爵，也并不受耶路撒冷牧首管辖。它是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十字军国家内的战士集团。

创立圣殿骑士团的于格·德·班，曾在戈德弗鲁瓦指挥之下作战，具备第一次十字军的战斗经验。

于格·德·班也可以选择依然作为世俗的骑士，在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的准许之下保护朝圣路线的安全。由于鲍德温二世也属于洛林家族，他自然能在其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

而于格之所以选择与其他骑士组成宗教骑士团，是因为他们可以作为独立的战士集团，不受世俗诸侯和封建领主的指挥，而独自开展行动。耶路撒冷的王位，不可能永远在洛林家族的鲍德温二世之手。于格·德·班成立宗教骑士团的目的，在于永久保持自身行动的自由，诚然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而第五点特征，则是圣殿骑士团与其他宗教骑士团不同的特色。

圣殿骑士团的成员，除了要遵从清贫、服从、纯洁三大原则之外，还需坚守一项义务，即为了保护朝圣基督徒的安全，对朝圣沿线的异教徒格杀勿论。

圣殿骑士团成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要求穆斯林对手改宗。在他们看来，任何问答都毫无必要，只要记得骑士团的信条即可。对于基督教的宗教骑士团来说，诉诸武力是不受限制的。在所有的骑士团中，明确表示对穆斯林格杀勿论的，除圣殿骑士团外别无他者。

在这个十字军东征仅仅开始20多年的时代，赞同圣殿骑士团强硬路线的人却并非少数。

对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手无寸铁的朝圣者来说，胸前画着白底红十字，又在白色大披风上画着红色大十字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是能够

保护自身的强大军事力量。这些朝圣者希望，在往返西欧的路上，都有这些骑士的护送。

圣殿骑士团从当初9人的水平逐渐增加，终于在成立10年后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正式承认。得到罗马教皇承认，就意味着圣殿骑士团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全体公认的组织。从此，期待加入的骑士不断增加，骑士团所拥有的动产与不动产也源源不断地大幅增长。

此时的圣殿骑士团，受到了强有力协助者的眷顾。这就是号召发动第二次十字军的天主教会圣人圣贝尔纳。此人以“克莱尔沃的贝尔纳”之名为西欧人所知，是西多会派的修士。

这位当时极为著名的人物，曾专门撰写了《对新诞生的圣殿骑士团的赞赏》（*De laude novae militiae ad Milites Templi*）一文。文中明确认为，对其他宗教信徒肉体消灭的行为，在基督教徒战士方面是完全正当的。这篇文章成为在王侯和高级神职人员中，以通用的拉丁语宣传圣殿骑士团的重要作品。他的宣传为圣殿骑士团组织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支宗教骑士团也粉墨登场了。它就是在十字军东征历史上与圣殿骑士团齐名的圣约翰骑士团。

圣约翰骑士团的转变

不能称之为“诞生”，而要称“登场”的圣约翰骑士团，在第一次十字军之前半个多世纪就已经存在于耶路撒冷了。因此它并非在12世纪初从零起点开始创立的。但在第一次十字军的时期，这一骑士团最终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战士集团。可以说，它向战士集团的转型，来自圣殿骑士团的刺激。而谈起圣约翰骑士团的创立，则与圣殿骑士团迥然不同。圣殿骑士团由法国骑士集结而成，而圣约翰骑士团则是由意大利商人创立。

意大利的诸多滨海城邦，如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四国，都在中世纪的地中海上纵横航行，与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进行大宗贸易。其中最早的一个，是阿玛尔菲。

阿玛尔菲今日已然是南欧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而在1000年前却是积极与近东开展贸易的海上强国。其中有一位以与穆斯林贸易而致富的商人毛罗，得以通过购买埃及产的高级布匹，转售罗马高级神职人员，而与埃及的哈里发结成友好关系。

毛罗告知哈里发，希望其许可在埃及治理下的耶路撒冷建立起一座诊所，以帮助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朝圣者。

对穆斯林来说，去往麦加朝觐，是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固然穆斯林和基督徒信仰不同，但对朝圣的理解是彼此相通的。而毛罗则以商人的手段在哈里发的眼中获得了信誉。

最终得到哈里发许可的毛罗，与阿玛尔菲的其他商人一起，在耶路撒冷设立了西欧人最初的一座诊所。此时的诊所还未成为宗教骑士团，而只被称为“医院”，完全不是后来的武装集团。但从此，这座医院就成

为了后世著名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雏形。骑士团的成员身着带有十字的服装，十字的形状和阿玛尔菲纹章中的十字图案相同。

圣约翰骑士团是为朝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设立的。而与之相反，圣殿骑士团设立的目的则是为朝圣者提供“武装服务”。

为了提供医疗服务的目的，圣约翰骑士团的总部“医院”，就设立在朝圣者进入耶路撒冷的雅法门和城中最重要的基督教圣所圣墓教堂之间的路上。对于没有必要接受医疗服务的健康基督徒来说，也可以在进入圣墓教堂之前，到医院内洗手沐足，或休憩片刻。

而对于医疗设施来说，医生是不可缺少的。在阿玛尔菲附近的萨勒诺，开设了西欧最古老的医学院。在这所医学院内，有着中世纪欧洲罕见的不问教师与学生宗教和民族出身的风气。无论基督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能平等地在其中担任教职，或接受教育。

毛罗和其他阿玛尔菲商人很可能请了萨勒诺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前往耶路撒冷，并为朝圣者提供了医疗设施。倘若这一情况属实，在从阿玛尔菲启航，前往近东的帆船上，就会有萨勒诺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出现在意大利商人和水手之间。

通过给予毛罗建立医院许可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统治时间，我们大约可以推测出，西欧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最早的医院，开设于1050年前后。

过了半个世纪，十字军来到了耶路撒冷。在此期间，最初由世俗商人开办的医院，渐渐交由修士和神职人员来运营。

转手的原因有两点：其一，阿玛尔菲的国力在此期间衰落了；其二，与有其他事业的世俗商人相比，修士更适合从事带有慈善性质的工作。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纹章

最终，到了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城内基督徒的医院，已经完全由修士来运营了。

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的1099年，虽然穆斯林总督流放了城内全体基督徒，圣约翰修会医院内的修士依然留居城内。由于医院的修士们不仅治疗基督徒，对守城的穆斯林来说，留下他们十分必要。

当十字军攻城时，圣约翰修会的成员也参与了守城一方的抵抗。总督要求他们在城墙上向十字军投掷石块。

但他们毕竟是基督徒。在十字军攻城时，这些身着僧侣服装的医生并没有投掷石块，却向城下扔下了面包。

总督看到基督徒修士们的行为，当即命令将决定投掷面包的修会领袖杰拉尔多以下的全体成员处斩。

但当修士们就要被杀的时刻，十字军冲进了城内，收复了这座圣城。未被处刑的圣约翰修会医生们，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治疗十字军攻城战中产生的大量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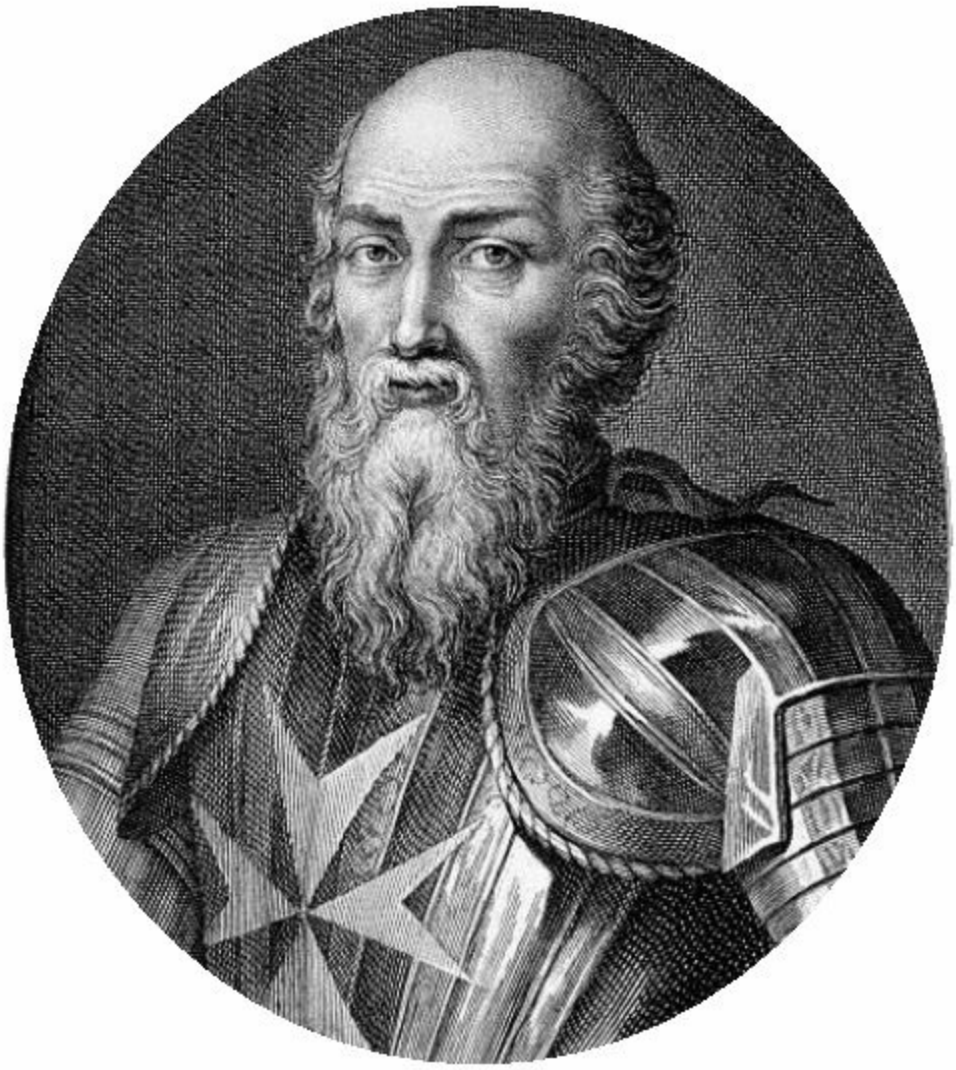
由投掷面包事件而著称的杰拉尔多，在鲍德温二世即位两年之后病亡。

其后继承圣约翰医疗修会会长职位的，是一位生于法国南部的骑士，名叫雷蒙·杜·布伊。这位贵族因为和教皇代表阿德马尔主教的亲戚关系，成为了圣约翰修会的领导人。到1118年，最初以为朝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目的而成立的圣约翰修会，转变为一支宗教骑士团。

它不再是单纯提供医疗服务的集团，而成为对异教徒斗争的战士集团。

在18世纪人的肖像画中，1118年之前担任圣约翰医疗修会会长的意大利人杰拉尔多·萨索，和之后担任圣约翰骑士团团长的雷蒙·杜·布伊，有着完全不同的身姿。这两幅画反映了该时期修会的变迁。

以面包代替石头投掷给十字军的杰拉尔多，身着修士的僧袍，而雷蒙·杜·布伊则身穿甲胄。



第二代团长雷蒙·杜·布伊

第一代团长杰拉尔多

圣约翰骑士团的直属上司罗马教皇，在其从修会转变为骑士团之后，正式为之授予了象征战团的军旗。这面军旗以红底白十字图案，区别于白底红十字图案的圣殿骑士团旗帜。

若将其与圣殿骑士团对比，圣约翰骑士团明智的一点是没有将杀死异教徒作为成员的行为准则。毕竟，圣约翰骑士团成立的明确目的，还是以医疗服务为核心，保护朝圣的基督徒。

随着只知道作战的骑士大量加入圣约翰骑士团，这一组织的战士集

团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尽管如此，这些骑士必须每周履行一天为医生担任助手的义务。后来，圣约翰骑士团从耶路撒冷搬到了罗得岛，后来又到了马耳他，改名“马耳他骑士团”，但骑士的这项义务始终没有改变。

此外，在十字军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两大骑士团之间，还有一点风格上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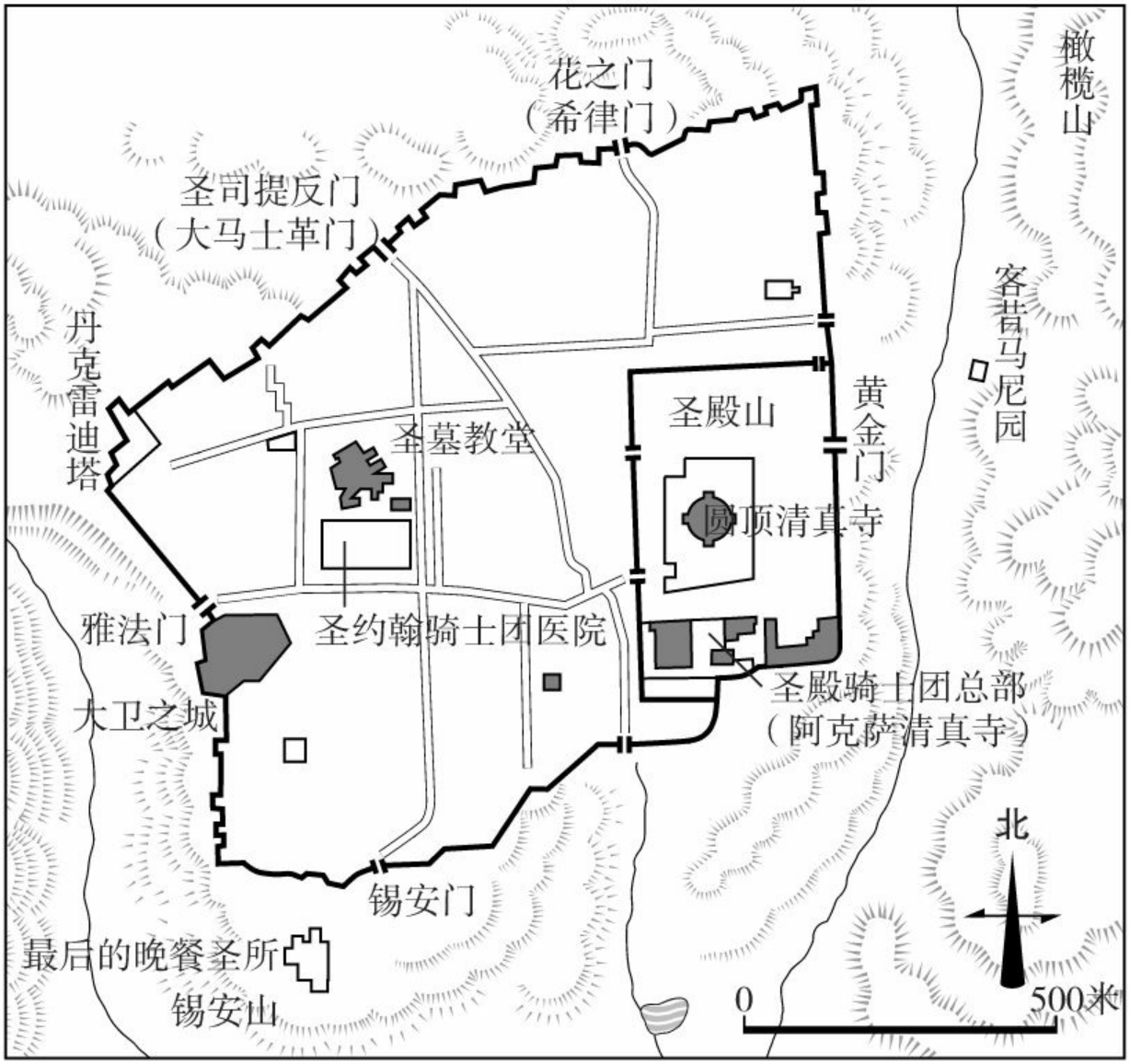
圣殿骑士团是在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敕令下成立的，其总部在耶路撒冷的东半部分，穆斯林生活区的中心位置。

追溯到古代，此处建立的是所罗门王的圣殿，而在中世纪伊斯兰化之后，圣殿遗址上建起了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从阿克萨清真寺向北，又有一座以金色圆顶著称的圆顶清真寺纳入今人的眼帘。

中世纪的穆斯林，常以耶路撒冷的东半部作为自己的圣地。

当第一次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建都以后，昔日的伊斯兰化为基督教化所取代。圆顶清真寺一度变成了基督教堂，而阿克萨清真寺则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宫殿。

这两座建筑一直保持着恢弘雄伟的风貌。而鲍德温二世将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附近一半以上的广场，提供给圣殿骑士团作为其总部。古犹太国时代的王宫，变成了“所罗门的马厩”——对骑士团来说，马是必需品，而在开阔的广场上，便利地拴着许多马匹。这大概就是鲍德温二世将这片广场赠予圣殿骑士团的原因。



十字军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城市图

随着耶路撒冷成为十字军王国的首都，逐渐有少量穆斯林回到城内居住。虽然第一次十字军在“解放”圣城时将城内穆斯林屠杀殆尽，为了发挥其都市机能，穆斯林回城居住十分必要。毕竟，陆续前来的朝圣者，大都在朝圣巡礼之后返回了西欧。而逐渐地，穆斯林也不会遭到基督徒的残杀了。

人数不多的基督徒，就这样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中近东地区建立了十

字军国家。在耶路撒冷为基督徒攻陷之后19年，为了满足经商、役使佣人和翻译等需要，城内的穆斯林逐渐增多。担任18年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一世，也以怀柔的政策，促使原来居住在城内的穆斯林返回。鲍德温一世还承认了基督徒男子与穆斯林女性的通婚。

到了鲍德温二世统治的时期，这座基督教的首都内已经居住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和突厥穆斯林。在他们眼里，从圣殿阿克萨清真寺里招摇而出的，是白色胸衣上画着大红十字的骑士集团。而这些骑士的行为准则里，则堂而皇之地写着对异教徒格杀勿论的要求。

以被西欧人简称为“神殿”或“圣堂”的伊斯兰教圣所为基地的圣殿骑士团，并不能认真遵循其创设之初的规定了。

而圣约翰骑士团的医院勤务们，穿着的是带有白色阿玛尔菲十字的黑色僧袍。在出征时，骑士们会在印有红底白十字图案的黑色僧衣之上覆盖自己的甲胄，一变而成战士的集团。但圣约翰骑士团一直没有离开阿玛尔菲商人所建的医院。他们以收容病人为优先，不会把拴马桩当作最重要的设施。

因此，与圣殿骑士团并称的圣约翰骑士团，得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别名，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穆斯林看来，“圣殿”之称会联想起阿克萨清真寺，而“医院”的称呼则引发了对与自身信仰相同的哈里发和苏丹所作所为的联想。

以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为代表的身兼修士与骑士两职的宗教骑士团，是十字军的产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十字军的话，这样的修会或骑士团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这一现象，以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出现而引人注目。毕竟，率领第一次十字军的诸侯，是拥有与法国国王属地一般大小的广阔领地的大领主。而他们属下的骑士，也从一开始没有领主的局面，变成了洛林公

爵或图卢兹伯爵的部下。

“解放”耶路撒冷时的西欧诸侯，并未想到在东方成立骑士团。而此后以十字军精神自诩的骑士们，逐渐从西欧来到了东方。在这里，他们为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所吸收。

以战斗集团而肇始的圣殿骑士团，全体创始成员都来自法国，而从医生集团转变而来的圣约翰骑士团，也以法国来的骑士为主。这自然与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诸侯部队大都来自法国有关。那些未紧紧跟随诸侯的骑士们，为了生计最后都被迫加入了宗教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左）与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

因此，在守势中承担十字军国家防务的鲍德温二世，面对长期兵力

不足，需要向外借兵的状况，不会忘记大力扶植宗教骑士团的发展壮大。

而宗教骑士团的本质是以军事行动为目的的修士集团。修士们既然决心一生侍奉上帝，就要以毕生精力投入上帝所期望的军事行动之中。

于是鲍德温二世有了能够致力于防御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常备军事力量。可以说，这两支骑士团就是十字军国家的常备军。

然而，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都采取的是志愿兵制度。从西欧前来的骑士们，要担负被穆斯林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困的十字军国家的防务，一直到其死亡为止。这两支骑士团从未有过兵力强大的时期，最多的时候不过300～500人，而时常以100骑的兵力投入战斗。在研究者看来，骑士团的作用，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特种部队”。

但即便是100骑，对鲍德温二世也有很大的帮助。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活动区域，一般不出耶路撒冷周边的范围，而在鲍德温二世需要时，他会委托两大骑士团守卫耶路撒冷，自己率领部众御驾亲征。

鲍德温二世

实际担任“无人可用”时期最高防务负责人的鲍德温二世，在位的13年间所做的工作并不简单。我不再一件一件深入记述，而简略地扼要列在下面。

就好像在接力赛中，交接棒的时候往往会减速；当一国的领导人更迭之时，国策会推迟提出。而在权力交接时，自然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当鲍德温一世死后，鲍德温二世刚刚接手耶路撒冷王国时，穆斯林就发起反击了。

鲍德温刚刚加冕不到一年，1119年，大马士革的军队攻入了加利利。原本负责这一地区防务的库尔特尼，已经前去埃德萨任职，无法赶回原防区组织军队。他请求鲍德温二世前来支援，并最终合兵击败了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军队。此后，加利利的防务易手于鲍德温二世，而库尔特尼只能防守埃德萨伯爵领地。

最令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担忧的，是同时面对巴格达和开罗两大穆斯林政权的反击。

巴格达是以突厥人和波斯人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在阿拔斯朝宗教领袖哈里发的统治下，成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中心。

而同处伊斯兰世界的开罗，则是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法蒂玛王朝的首都。法蒂玛朝的哈里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领袖。

对十字军国家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巴格达和开罗的政权一直交恶。巴格达的逊尼派仇视什叶派，而与异教徒的十字军政权联手。而在逊尼派当中，突厥人和波斯人又时常发生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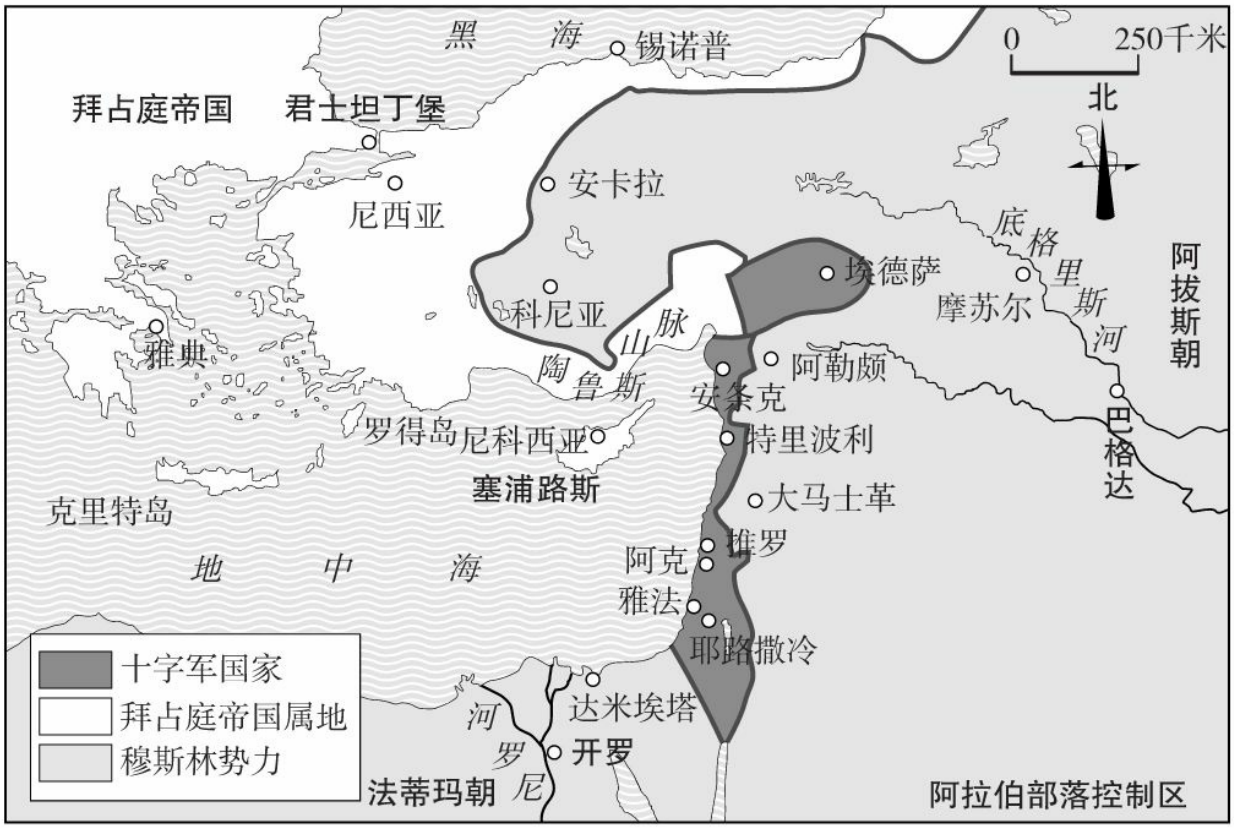
在这一情况下，埃德萨伯爵领地就成为了面向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哈里发的前哨阵地，起到了十字军国家防御屏障的作用。在12世纪初，若瑟兰·德·库尔特尼正担负着守卫埃德萨的重任。而当他离开加利利之后，这一邻近耶路撒冷的重要领地就陷入了无将可用的状态。

当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们完全退场之后，十字军缺少的不只是普通士兵，还有有能力的指挥官。

对于确保了加利利地区安全，回到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来说，还未在首都休息片刻，又不得不率军北上。这次他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阿勒颇，穆斯林军队正在进攻安条克公国。

安条克公国从7年前去世的丹克雷迪转入了鲁杰罗之手，以为未来波埃蒙多之子的继承做准备。摄政鲁杰罗麾下的兵力，包括700名骑士和4000步兵。他自信能够抵挡阿勒颇领主的攻势，未等库尔特尼和鲍德温的援军到来，就亲率部众接受阿勒颇大军的挑战。

鲁杰罗的700名骑士和4000步兵，比起鲍德温二世的兵力还要多些。然而，这些部队中大半是一直居住在中近东的希腊人。而鲁杰罗虽是可受丹克雷迪之托的重信义之士，却完全不具备丹克雷迪所拥有的统帅才能。



第一次十字军以后的中近东

这场战斗的结局，以十字军完败而告终。鲁杰罗本人战死沙场，其属下的骑士也大都战死。未战死的俘虏被绑缚到阿勒颇之后，在群众的咒骂声中惨遭杀戮。最终只有少数步兵溃逃回安条克。

这个时候，安条克牧首贝尔纳站出来，安定了城内居民的情绪。这位来自法国的牧首组织起守备部队，加强了城墙的守卫，等待鲍德温二世所率援军的到来。而此时阿勒颇的领主认为，攻下这座大都市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乘胜率军西向，直扑安条克城下。

与特里波利伯爵庞斯同行的鲍德温，果断地从敌军未包围的南侧进入了安条克城。此后的安条克之战中，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阿勒颇的军队只好撤退了。

进入安条克城内的鲍德温二世，不得不面对整个公国没有领主的情

况。由于前摄政鲁杰罗战死，公爵波埃蒙多二世还未成年，耶路撒冷国王不得不自任安条克的摄政。

但鲍德温本人还担负着以耶路撒冷王国为核心的全体十字军国家元首的任务。因此，他最终决定将安条克城的内政委任给牧首贝尔纳，而自己单纯负责安条克的防务。在库尔特尼守卫埃德萨的掎角之势下，十字军国家的北半部分基本可以确保安全了。这时鲍德温二世终于能够安心回到耶路撒冷，并在这“不安定中的安定”局面里度过了三年时间。

出乎身在耶路撒冷的鲍德温的意料，若瑟兰·德·库尔特尼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他并非在战场上为敌人所俘，却在一次乘马外出时，被阿勒颇的穆斯林游击队擒获。

鲍德温二世只得再度率军北上，以驰援没有领主的埃德萨。

进入埃德萨的鲍德温，急忙选任了一位了解周边事务的骑士，代理埃德萨伯爵的职务。

然而此时鲍德温并不知道库尔特尼被囚禁于何处。阿勒颇的军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穆斯林离开埃德萨之后，便陷入了与其他穆斯林领主的内战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刚刚在埃德萨安顿下来的鲍德温，又遇到了一桩极为倒霉的事。当他率领一小队士兵在城郊狩猎之时，遭遇埋伏，护卫的兵士全部被杀，而国王本人被俘。诱捕他的人，还是先前抓获库尔特尼的阿勒颇领主的外甥。

在鲍德温还是埃德萨伯爵的时候，他就跟库尔特尼一起被俘过一次。这次两人再度一起落入穆斯林之手。两人大概已经习惯了做俘虏的生活，但这次鲍德温却是作为十字军最高领袖——耶路撒冷国王而被囚禁的。

得知此事的耶路撒冷全城陷入慌乱之中，而穆斯林一方则因此次俘获而狂喜。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看来，俘获鲍德温以后，就再不必为受到基督徒的攻击而担忧了。而且，为基督徒所占据的土地，也可以轻易夺回来。

然而穆斯林的想法，最终还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已。

被俘的耶路撒冷国王和埃德萨伯爵，居然成功越狱出逃。他们并不是自己单独行动，而是依靠一队库尔特尼的心腹亚美尼亚兵士，奇袭囚禁两人的城堡，从而得以逃脱的。

两位贵族重获自由以后，能一直保持自由之身的却只有库尔特尼一人。倒霉的鲍德温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再次被俘。因此，穆斯林再次拥有了耶路撒冷国王这张“王牌”。

然而，令穆斯林的想法化为泡影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基督徒一方在国王被捕之后的行动。

得知国王被捕以后，耶路撒冷仅仅在短时间内陷入混乱。很快，王国就选举出一位名叫尤斯塔斯·加尔尼埃的骑士，代理总司令的职位，从而克服了没有领袖的窘况。此外，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亲自率领的海军，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强大后盾。

1123年，没有受到国王被俘影响的耶路撒冷王国，与威尼斯一起对附近的海港城市推罗发起了猛攻。到1124年2月，十字军成功攻陷了推罗，而且出于对尚在敌牢的鲍德温的安全考虑，没有在城内大肆屠杀。

穆斯林的希望落空了。他们发现牢内的鲍德温并没有多少利用价值。虽然穆斯林手握如此重要的人质，基督徒方面的行动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利用这个机会，一直惦念鲍德温的库尔特尼向阿勒颇的领主提出，以赎金保释耶路撒冷国王。穆斯林一方考虑了鲍德温的利用价值之后，决定与库尔特尼谈判缴纳赎金的问题。

代表穆斯林进行谈判的，是与基督徒长期交流的沙伊扎尔的埃米尔。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伊斯兰世界的通货第纳尔来缴付赎金，总价为8万第纳尔，其中2万为当即缴付，其余6万在释放鲍德温之后分期付清。释放鲍德温以后，作为缴纳余下赎金的担保，以库尔特尼的幼子为人质，这是因为鲍德温并没有子嗣。最终，经过一年多的囚徒生涯，耶路撒冷国王重获自由。

此后鲍德温的行动，并未因为第二次被囚而变得消极起来。虽然释放条件中包括穆斯林的现有领土不可侵犯这一点，他在此后到去世的7年之间，一直履行着耶路撒冷国王的责任，为保证自己国土的安全而忙碌着。

鲍德温二世对北边的塞尔柱突厥人和南面的埃及人可能展开的反击，都进行了积极的防御。

但由于一直处于兵力短缺的状况，鲍德温越来越依赖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力量。宗教骑士团的势力在此期间进一步加强了。而十字军国家存续的关键，则在于埃德萨伯爵领地、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耶路撒冷王国之间的团结。

十字军中的女性

鲍德温二世任埃德萨伯爵期间，与亚美尼亚公主莫尔菲亚生育了四个女儿。他希望以女儿的婚姻，来与各个十字军领袖结成紧密的亲缘关系。

鲍德温的长女梅丽森达之夫，后来继承了耶路撒冷王国。次女爱丽丝则与还未成人的波埃蒙多二世订立了婚约。三女奥蒂埃尔娜嫁给了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二世。而幼女约维塔则预定为女修道院未来的院长。以公主的身份出任修道院院长，可见其父信仰之心的深刻。

鲍德温长女梅丽森达的丈夫，与耶路撒冷王国的正式继承人梅丽森达结婚以后，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耶路撒冷国王继承人。鲍德温对选择夫婿一事颇为慎重，以至于到梅丽森达28岁时才最终完婚。

鲍德温为其挑选的夫婿，是法国国王路易六世的亲戚，路易六世本人力荐的安茹伯爵福尔克。1129年，梅丽森达和福尔克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婚礼。此后，除了库尔特尼所在的埃德萨伯爵领地之外，其他三个十字军国家实现了由三姐妹掌管的局面。这样，鲍德温以为自己可以安度余生了。然而就在此时，一直缺少优秀人才的伊斯兰世界，突然涌现出了意志坚强、行动果敢的领军人物。

放眼广阔的人世间，人才辈出的现象就如潮起潮落一般。一个国家人才涌现如涨潮的时刻过去，必然会有落潮的时候，从而陷入人才不济的局面。

遇到人才不济的年代，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前一时代所蓄积的能量，要到下次涨潮的时候才会完全吸收。

在这不幸的人世间，人才辈出与人才不济的轮回，很少在不同的国家一起转换。现实往往是，当某一阵营陷入人才不济之时，对方阵营却进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1096年自西欧出发，经过1099年收复耶路撒冷，再到1118年鲍德温一世去世的22年，是十字军一方人才辈出的时代。

在研究者看来，第一次十字军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由于十字军出其不意的进攻，当时伊斯兰世界没有做充分的防御准备。

第二则是由于穆斯林领主之间的不和，导致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统一局面。

研究者提出这两个原因都是恰如其分的。当地的穆斯林把十字军仅仅视为普通的侵略者，在法兰克人进攻附近其他穆斯林领主时大都按兵不动，只在自己受到攻击时才着手防御，于是在静观之中贻误战机，始终无法结成统一战线。这是十字军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能一直贯彻战略意图，并充分利用自身战术能力的优秀指挥官。由于缺乏有能力的人才，穆斯林不得不将圣地拱手让给了十字军。

在人才济济的第一次十字军领导人总退场之后，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只剩下鲍德温二世一个人。他是自1096年跟随戈德弗鲁瓦东征的十字军骑士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代十字军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他还有若瑟兰·德·库尔特尼的协助。在鲍德温二世的时代，虽然人才的潮水已经从高处下落，还可以见到最后的波澜。

十字军自西欧出发时，安茹的福尔克年仅5岁。30多年以后，这位法国王室的贵戚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国实际的国王。到这时，基督教世界

的人才潮流停止了涌动，而伊斯兰世界却开始涌现出一代英武的领袖。历史的不可思议，推动了人世间的无序。

伊斯兰世界中涌现的第一位人才，名叫曾吉。他在巴格达的突厥军队服役时成就突出，后来掌握了伊拉克北部摩苏尔的主权。此人率军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挥师西进，意在一扫割据状态之中的叙利亚领主们，将穆斯林的叙利亚统一于自己之下。

即使在这个还不知如何利用石油的时代，摩苏尔的各种产业已经十分兴盛。因此曾吉能够集结起一批大军。得知曾吉军队到来的消息，叙利亚的领主们像牧场里被驱赶的牛羊一般慌了手脚。年轻的波埃蒙多二世本想利用这一局势扩大安条克公国的领土，没想到在与叙利亚穆斯林领主的短兵相接中丧生了。鲍德温二世的女儿、嫁给安条克公爵的爱丽丝早早就成了寡妇。作为摄政的她，与自己两岁时就失去父亲的女儿一起，统治安条克公国。

此时不仅安条克的居民对动荡的局势感到不安，身在耶路撒冷的父亲鲍德温二世也十分担忧。由于曾吉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阿勒颇，耶路撒冷全城都感受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压力。

而当鲍德温二世的军队北上之时，事态有了奇妙的发展。

得到曾吉军队占领阿勒颇消息的爱丽丝，向这位势不两立的敌手寄去了一封书信。幸运的是，在这封信送到曾吉手中之前，被鲍德温二世截获。爱丽丝在信中写到，如果曾吉能够承认自己在安条克公国的地位，安条克公国就承认曾吉的宗主权。

安条克与阿勒颇的距离不过100公里。受到来自阿勒颇大军的逼迫，十字军国家的女领导人只好无奈地投降。通过嫁给波埃蒙多二世而成为安条克公爵夫人的爱丽丝，并不像自己的亡夫那样受到安条克居民的爱戴。因此在守寡之时，这位公爵夫人完全不自信能维持自己的身

份。于是，她就派出了一位心腹，将信件秘密地送给曾吉。

但从鲍德温二世的角度来看，作为安条克摄政的爱丽丝绝不应当投降。这位亲生女儿，显然是一时糊涂。鲍德温抵达安条克以后，就将爱丽丝流放到海港城市拉塔基。在此以后安条克的统治，就由库尔特尼为两岁外孙女摄政。鲍德温安排妥当之后，返回了耶路撒冷，而爱丽丝这件事，成为十字军历史上女性主政的一例。

爱丽丝事件，是1131年夏天返回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所处理的最后一件公事。他刚刚回到耶路撒冷，就倒在了病床上。

自从1096年离开西欧以后，鲍德温经历了第一次十字军的全部战斗，之后又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出任13年的耶路撒冷国王。

在十字军东征35年的岁月中，鲍德温到处转战，其间三次被俘。到此时已经年近60，可谓身心俱疲。

8月21日，久卧病床的老国王终于断气。他的遗体与前两代耶路撒冷国王戈德弗鲁瓦和鲍德温一世一样，埋葬在圣墓教堂的地下。

鲍德温二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才能。他唯一具有的优点，大概是责任感吧。

第四代耶路撒冷国王之衔，就落到了鲍德温的正式继承人梅丽森达的丈夫福尔克头上。

此时，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里，又失去了一位富有责任感的领主。

为了夺回被曾吉军队占领的城市，埃德萨伯爵库尔特尼踩到了敌军布下的地雷，身负重伤。虽然中世纪的地雷制式简单，杀伤力不如后世，但已为穆斯林军队所广泛采用。受重伤的库尔特尼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虽然最终使敌军退却，但到死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鲍

德温二世于耶路撒冷丧命后不久，他唯一的挚友追随而去。

若瑟兰·德·库尔特尼的死，使埃德萨伯爵领地和安条克公国都失去了首脑。曾吉敏锐地利用了这个时机，剑指十字军的桥头堡埃德萨。

法国来的耶路撒冷国王

在12世纪前半段的中近东，第四代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不得不面临与曾吉对决的局面。

这位来自法国的贵族所拥有的优势，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其自身拥有大量财富，他可以自己花钱组织一支骑兵和步兵，并亲率这支直属的部队投入战斗；其二，他来到中近东以后，不会过度关注于攫取私有领地与私人财产。

而法国国王路易六世的推荐，则不能说是福尔克所具有的优势或劣势。由于推荐了福尔克，路易六世自然有责任给予耶路撒冷国王一部分兵力，而当作为法国国王亲戚的福尔克率领十字军东来，在危机中的耶路撒冷加冕为国王时，其职位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因此，福尔克与法国国王的亲戚关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

相反，福尔克本身的一些劣势，却不是以私人经费组织起一支军队就能解决得了的。

首先，这位空降到耶路撒冷的国王，对中近东的形势，特别是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对手的情况没有多少认识。

其次，福尔克有着老好人的性格，却缺乏个人魅力。

之所以说福尔克没有魅力，是因为梅丽森达与之结合不久就有了婚外情。早早就在妻子面前失去吸引力的福尔克，也缺乏约束诸侯与家臣的能力。

以耶路撒冷王国为代表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基本上移植了西欧的

封建制度。

与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自己建立的安条克公国不同，戈德弗鲁瓦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是一个将其国内分散的诸侯领地统合起来而成的国家，就如同一个缩小了的法国的情形。

因此在编年史中，拥有5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的安条克公国，其兵力应当完全是波埃蒙多自己的亲兵。而在耶路撒冷王国里，并没有国王直属的常备军，其军队是国内封建诸侯兵力的总和。

在十字军国家中，只有耶路撒冷王国是以国内各领地的诸侯在国王的召集下成立的委员会进行统治的。由于耶路撒冷与其他城市不同，是“上帝的都城”，任何世俗人士都不能以其私人的名义占有这座城市。而对耶路撒冷的防御，则由国王一人负责。

虽然名义上国王独自负责耶路撒冷的防务，但在现实当中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就像法国国王受到国内各大诸侯掣肘，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一样，耶路撒冷国王很难完全自由地做出关于国是的决定。

在这一制度之下，处于敌人三面包围的十字军国家如何正确地施政，往往与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息息相关。

然而耶路撒冷的国王们，缺乏的就是那种“以超人的能力与非凡的地位，令人心服口服的统御力”，那种被称为“个人魅力”（charisma）的资质。

第一代国王戈德弗鲁瓦、第二代国王鲍德温一世，以及后继的鲍德温二世，既不是拥有超强能力的统治者，也并非以令众人心服的战绩获得了耶路撒冷国王的位置。

但这三位国王都能够获得诸侯所提供的兵力。总的来说，那些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块领地而一致行动的诸侯，为了耶路撒冷王国参与作战，

对这个国家的存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因此不能说这三个人完全没有个人魅力。至少从作战号召能得到响应这一点来看，他们具备一定的魅力。如果没有小领主们的支援来牵制埃及军队的进攻，鲍德温一世的历次远征就不可能实现了，而鲍德温二世统治的13年内，他也很难在整个十字军国家领土内纵横往返，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

在鲍德温二世南北往复期间，所带领的军队不可能只有自己的一点点亲兵。为了击退数量众多的穆斯林大部队，他需要王国内封建诸侯必不可少的支持。

在遥远的西欧人眼中，耶路撒冷国王是强大的领主，可实际上这一王位非常孱弱。因此，担当者的个人魅力，对国王来说至关重要。

当今关于十字军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者之一斯蒂芬·兰西曼，曾经这样写道：

“耶路撒冷王国的王权，只有在国王个人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并且取得其国内强有力的人物共同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兰西曼所说的“力量”，指的不仅是军事力量，而是能让诸侯和兵士们紧紧跟随的强大统御力。对领导人来说，不仅要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还要有善于用人的现实能力。

在法国国王的亲戚，安茹家的福尔克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的30年间，国王御驾亲征的次数大大减少了。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内的诸侯不愿跟随国王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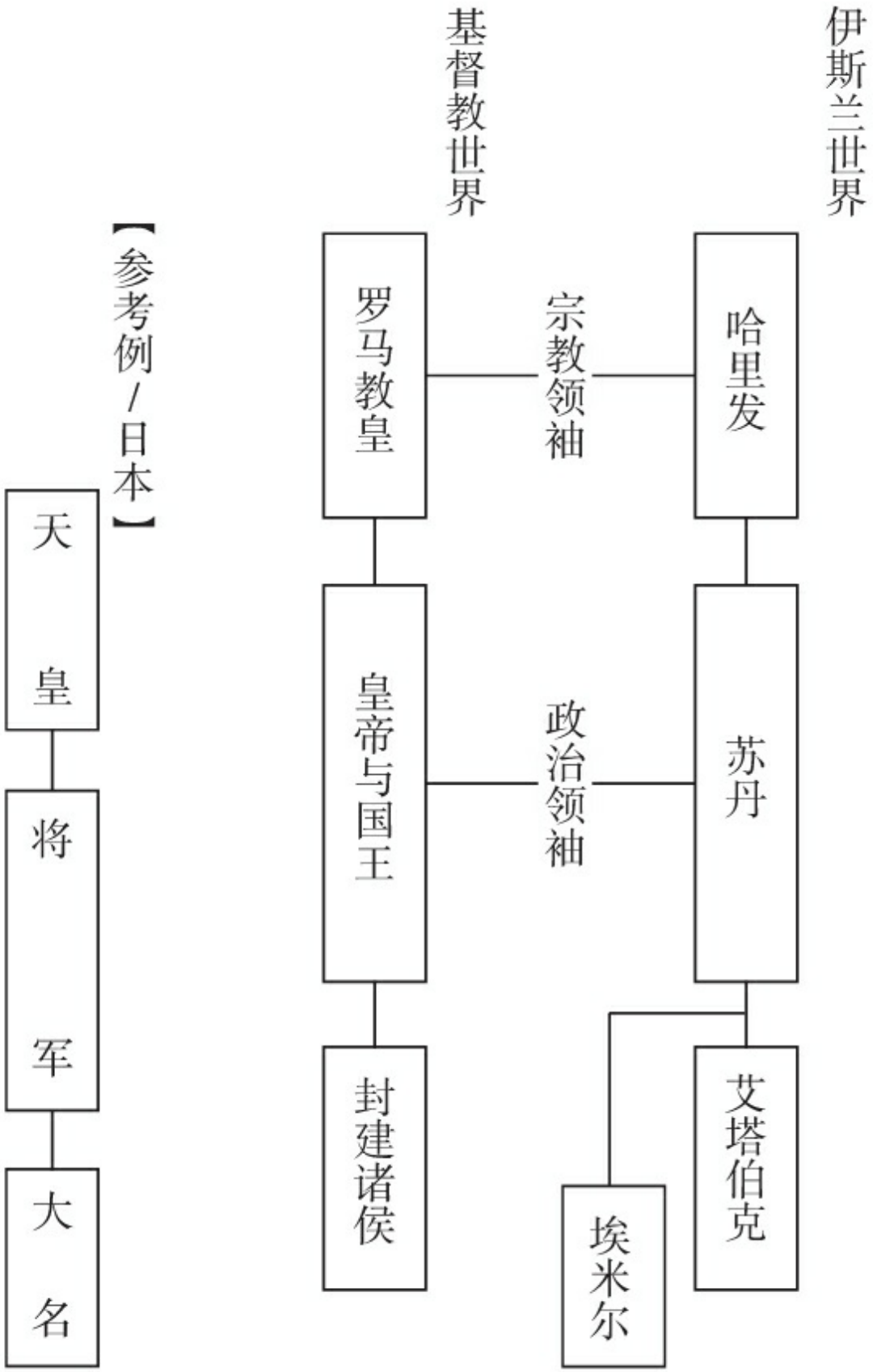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安条克、埃德萨和特里波利的统治者，也常常拒绝耶路撒冷国王的支援请求。甚至于当福尔克想向安条克方向进军时，遭到行军路线上特里波利伯爵雷蒙的拒绝，不得不乘船前往。

因此，在福尔克统治期间，十字军国家的分离与瓦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四大十字军国家侥幸没有被穆斯林占领，只是因为曾吉方面出了状况，停止进军。

如果对当时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双方的权力构造进行大致比较，可以绘制如下页图。

如果以日本的情况做对比，伊斯兰世界中的阿拉伯人相当于日本的“谱代”（数代侍奉同一个领主的家臣），而塞尔柱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则相当于日本的“外样”（战败后降服的家臣）。

福尔克继任耶路撒冷国王的同一年，巴格达的苏丹去世了。此后的伊斯兰世界便爆发了纷争，像每次失去领袖时一样。


伊斯兰世界
哈里发
宗教领袖
苏丹
政治领袖
艾塔伯克
埃米尔
基督教世界
罗马教皇
皇帝与国王
封建诸侯
【参考例/日本】
天皇
将军
大名

曾吉的正式地位，是底格里斯河上游摩苏尔城（今伊拉克境内）的艾塔伯克（土耳其语Atabeg，大致相当于阿拉伯语的埃米尔）。为了阻止自己的敌人成为下一任苏丹，曾吉停止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将阿勒颇委任给自己的儿子努拉丁，然后返回了美索不达米亚。

仍是艾塔伯克的曾吉，不能滞留在远离自己统治中心的叙利亚。毕竟，巴格达方面可以随时进攻摩苏尔。谁最终成为下一任苏丹，对于希望在从摩苏尔到大马士革之间的广大地域中称霸的曾吉来说，是关系到其大后方稳定的。因此，曾吉足足花了三年时间处理美索不达米亚方面的事务，然后才回到叙利亚。

曾吉的野心并非将中近东的基督教国家一扫而光。他在取得阿勒颇之后，准备进攻的下一座城市是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大马士革。

中近东以山岳地带为界，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安条克在西侧，而大马士革则在东侧。从地势考虑，先进攻大马士革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进攻大马士革，并非易事。曾吉首先着手攻占通往大马士革道路上的小城市，而这些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市正好在福尔克的控制之下。曾吉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行军道上一路行使武力，而为了阻止曾吉的进攻，福尔克只得率军北上。他知道，如果大马士革落入曾吉之手，其西面的十字军国家就将陷入巨大的威胁之中。

然而，安条克与特里波利的领导人都不愿与耶路撒冷国王协同作战。曾吉因此得以在分化敌人的状态下，包围了十字军名为蒙费兰的城堡。

坚固的城堡本可以使决意防御的守军坚持到援军到来。但即位以来一直无法与其他诸侯搞好关系的福尔克，无法期待任何友军。随着穆斯林大军对城堡一天天围困下去，国王只得派人与城外的曾吉交涉。他希

望能支付赎金换得曾吉退兵，而不至于被对手俘虏。

曾吉的答复是，他不仅保证上至国王，下至普通士兵的全体人员的安全，还释放先前俘虏的一名特里波利伯爵领地的将军，此外完全不收取赎金。艾塔伯克所要的报偿，是请福尔克把蒙费兰城堡交给他。

在福尔克看来，如果将城堡交给曾吉，就能平安返回耶路撒冷，还不用支付巨额赎金，这自然再好不过。于是他就接受了曾吉的条件。

这座蒙费兰城堡，是十字军建设的锁钥西侧十字军诸国与东侧穆斯林世界的著名要塞。其地理位置正处在从阿勒颇南下大马士革的大道正中，对于掌握阿勒颇的曾吉来说，可以以此地为前哨基地，进攻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的富裕，早已为穆斯林所熟知，因此如果曾吉要求赎金，福尔克自然能够给得起。但获取赎金，与占有进攻大都市大马士革的战略基地相比，就次要得多了。

此外，这座城堡还有一点儿战略价值。如果穆斯林拥有这座城堡，当他们进攻埃德萨时，耶路撒冷援军北上的路线就被切断了。曾吉并非因为西欧人所谓的骑士精神而只要求福尔克交出蒙费兰城堡一个条件，他只是看重了这兵不血刃取得城堡的机会，节省了时间和兵力。

对福尔克来说，能避免被俘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退出了城堡，完成交接手续之后，离开了战场。此时这位国王已经在位6年，时值公元1137年。

13年乏善可陈的统治中，福尔克的下一次行动，是3年后的1140年，与大马士革的领主结成了抵抗曾吉的同盟。

这一穆斯林与基督教国家的同盟，在当时的伊斯兰领主看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十字军国家一方，就是令人意外的事件了。而在此之后，曾

吉的军队并未向南攻取大马士革，却转向北进攻埃德萨。

当南面的埃及军队入侵耶路撒冷王国时，与之结盟的大马士革领主却没有义务帮助福尔克。于是，防御埃及进攻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肩上。

作为十字军首领的福尔克，接下来所犯的错误，就毫无理由开脱了。他的错误，使安条克公国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

早在第一次十字军攻下安条克之后，拜占庭帝国就想将其据为己有。而福尔克却在十字军收复安条克40年以后，承认了拜占庭对安条克的吞并。福尔克错误地认为，想从对曾吉的战争中获胜，就要依靠拜占庭帝国的力量。但拜占庭皇帝却只热心于操纵安条克的局势，完全没有兴趣支援耶路撒冷王国。

在拜占庭吞并安条克一年后的1143年，福尔克外出狩猎时落马而死，卒年52岁。他的两位王子中，较大的还不到13岁，于是42岁的妻子梅丽森达就任了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女王。在这个王国，血统比能力更为重要。由于梅丽森达是鲍德温二世的长女，没有人反对其继承王位。

在历代耶路撒冷国王当中，福尔克在同时代人与后世史家中都评价甚低，只有一个方面的评价较为正面，那就是他首先开始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内建设城堡。

城堡

西欧的掌权者们，即便是最富裕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也得到十字军之后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够居住在宏大舒适的宫殿中。此前的各国国君，都是居住在城中的。他们的住所与其称为“城”，不如称为“城堡”。相较于舒适性，这些城堡首先强调的是防御能力。

城堡的外侧一般都围绕着充满水的护城河，而在护城河内则耸立着城墙。城墙内除了家仆们的住所，还少不了马厩。城堡主人的家族，往往居住在城内高筑的石质塔楼中。至于通往城外的道路，少不了经过护城河上面架设的吊桥。中世纪欧洲的象征，便是这些城堡了。

一般来说，城主居住的塔楼石壁都有一米多厚，因此夏天室内会很凉快。而到了冬天，特别是在北欧的严冬季节，寒冷常令人难以忍受。此时，塔楼内的壁炉会燃起熊熊薪火，内墙壁裹上厚厚的绒毯，而床上则会铺就狩猎所获的野兽毛皮，以抵御酷寒。

因此，西方建筑以大型壁炉为显著特征，以厚实的壁毯作为石壁防寒的主要用品，特别是在十字军时代以后，随着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绒毯取代了野兽的毛皮，铺在石质的床几上做防寒之用。

由于防御优先的建筑思想，为了防箭矢，城堡的窗户做得很小；台阶也造得又急又窄，使手持武器的敌人不便攀登。在常常乌云笼罩的北欧，由于窗户很小，即使在中午时分，也需要点起灯火。大型的壁炉常常燃烧着，为了屋内照明还要燃起灯火来，使屋内常处于缺氧的状态。

常居住在这样的城堡中，人不容易感到舒适。由于冬天寒冷，人们在屋子里不仅要穿厚衣服，还需要多穿几件。通过一个人着装的多少，

可以看出其社会地位。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和世俗君主们常常穿着多层衣服保暖，而下层平民往往只有一件短衫。

肖像画中的贵妇身穿胸口大开服装的场面，往往是在迎接贵客的隆重宴会上请画师来作的。如果平时总穿着这些美丽而单薄的服饰，很容易就引起感冒，而一命呜呼了——这也是中世纪城堡中居住者常有的命运。

若以同等社会地位的西欧人与近东人的生活相比较，中世纪近东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本就有丰富水资源和绿地的近东人，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社会上层竞相在其居住的院落内种植树木，并任流水经过后院。

中世纪西欧的城堡虽然在居住方面有些不便，却也有两点有利之处。第一，它非常利于防御；第二，只需要少数兵力，就可以将城堡防守住。

在法国一直居住到40岁的福尔克，早已习惯了将城堡作为防卫和生活的场所。他自然了解城堡的两点有利之处。而且，中近东与西欧相比，并没有难耐的严寒。相反，在这一地区建造厚重石壁围成的城堡，非常适合抵挡酷暑的袭击。

此外，大量建立城堡，还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十字军国家所面临的兵员不足的问题。而十字军的对手们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城堡的传统。

穆斯林在军事行动中往往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并不会考虑以少数兵力据点防御。而且，近东的穆斯林领主大都居住在以城墙包围的城市中，并没有在远离都市的城堡内分兵的习惯。

因此，在十字军时代的中近东，只有法兰克人建筑了成网络状的城堡体系，穆斯林一方没有相应的防御体系。

兵力不足的十字军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常备军，使其在面对敌人攻击时难以招架。而这一问题在鲍德温二世承认两大宗教骑士团之后，有了一定的缓解。

圣殿骑士团从成立之初的9人，增长到原来的10倍，圣约翰骑士团也从医疗修会转变为医疗与战斗合一的组织。其后，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志愿者急剧增加。与以社会中下层为主的圣殿骑士团相比，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以贵族出身者为主。然而，这两大骑士团都没有达到能独自出战抵御穆斯林大军的兵力，它们只是以小规模战斗为主要行动方式的高级战士集团，因而被现代研究者称为“特种部队”。

继鲍德温二世为王的福尔克，要求宗教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内的封建领主们建造城堡，作为其防御与攻击的支点。他允许有财力的领主自己建设城堡，并对财力达不到的领主给予资助，并将建成的城堡委任给当地领主管理。此时十字军的主要港口雅法附近城堡的拥有者，伊柏兰的巴利安，就是50年后与萨拉丁进行生死谈判的同名男子的父亲。

十字军的城堡并非都建于福尔克统治的时期。从鲍德温一世在位时，小规模的城堡建设就开始了。到鲍德温二世在位时期，建成了四座城堡。但在福尔克在位的时候，十字军的城堡建设进入了高潮。其中最有名的“骑士之城”的建设，就是由圣约翰骑士团在福尔克死前一年（1142年）完成的。

城堡这种建筑类型，是依靠少量兵力就可以控制并防御的。对由攻转守时代的十字军来说，当然有必要大量兴建城堡。毕竟，与常能组织起大军的穆斯林对手相比，十字军一直处于兵员短缺的局面。

此外，排除宗教方面的因素，单纯从20世纪的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十字军时代城堡的，是在英国出生，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而著称的人物。在他深入近东之前所著的研究论文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这些十字军的城堡。而当劳伦斯成为率领阿拉伯军队挑战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家之后，就

从调查十字军时代所建设的城堡中得到了战略灵感。当年建设城堡的时候，必然选择了战略上非常合适的地点。

劳伦斯对阿拉伯人的煽动口号，是著名的“到大马士革去！”。这句话恰恰是1000年前曾吉的口号。为了征服整个叙利亚，激励兵士的不变的话语，从古至今都是这句“到大马士革去”。多少年来，大马士革就是象征着叙利亚的都市。

小亚细亚
基利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伊斯坎达尔
安条克
阿勒颇
哈伦克
奥龙特斯河
幼发拉底河
塞浦路斯
贾巴拉
沙伊扎尔
哈马
叙利亚
托尔托萨
霍姆斯
地中海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海法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阿尔苏夫
雅法
安曼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北
0
100千米
阿喀巴

十字军城堡的分布图

回到1000年前，曾吉对大马士革的进攻，恰逢良机。

为了对抗曾吉，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王国结盟。而福尔克驾崩之后，继承王国的是梅丽森达。穆斯林领主们完全不相信这位女流之辈敢于出兵。曾吉相信，攻占大马士革的时候到了。

然而，在这难得的良机面前，曾吉没有南下大马士革，却挥师北进，直逼埃德萨。关于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我看来，他显然是看上了刚刚建成的“骑士之城”。

这座“骑士之城”是圣约翰骑士团所建，城内驻扎的都是极富骑士精神的十字军。

曾吉是少数知道如何利用城堡的穆斯林军事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在蒙费兰之围中做出了特别的选择。而这座建立于蒙费兰城堡附近的“骑士之城”，自然是曾吉军队进攻大马士革的后顾之忧。即使是在千年之后的今日，站在依山而建的“骑士之城”上远眺，仍然能感到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第二章 穆斯林开始反击

1144年，曾吉57岁，急于征服整个叙利亚。此时，他决定首先攻击埃德萨，接下来进攻大马士革。

埃德萨的陷落

此时的埃德萨伯爵领地，由13年前战死的若瑟兰·德·库尔特尼之子守卫。这位领主虽然没有其父的能力，却受到埃德萨居民的爱戴。又因为其母出身亚美尼亚王室，若瑟兰二世可以得到来自北方亚美尼亚人的支援。在其防御之下，曾吉对埃德萨的进攻必将是一场恶战。

而曾吉则采取了诱使若瑟兰二世离开埃德萨城的计策。当若瑟兰与附近的穆斯林领主发生摩擦时，曾吉的大军突然出动，对埃德萨发起总攻，并以一部分军队阻挡若瑟兰回到埃德萨城内。

于是，担负中近东穆斯林国家侧翼防御的埃德萨，就不得不在没有总司令的情况下开始守城了。此时埃德萨的城防长官，是三位宗教领袖：天主教的埃德萨大主教于格，亚美尼亚使徒教派的主教约翰，以及希腊正教的主教瓦西里。在东方基督教城市埃德萨城内，同时生活着三大教派的信徒。

攻城战开始之时，城内的居民不仅相信若瑟兰二世一定会返回，还认为附近的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会出兵相救。因此，对曾吉发动进攻之前的两次劝降，城内守军都断然拒绝了。

十字军主要都市和城堡城塞

然而若瑟兰由于受敌军阻挡，一直不能回到埃德萨。安条克公爵则像缩头乌龟一般地躲在自己的领地之内。统治耶路撒冷的梅丽森达，在

是否派兵援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等援军出发时，早已贻误了战机。

埃德萨的居民顽强抵抗了四个星期。最终，在12月24日，埃德萨城被攻陷。曾吉对任何不接受劝降条件的对手，都会采取屠杀和劫掠的手段，即使同是穆斯林也难以幸免。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埃德萨，烧杀抢掠的事件自然发生了。

埃德萨的主要贵族，包括大主教在内，都被处以极刑。在巴格达哈里发的许可之下，这些人被念着如下的诗文处死：

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我们承你之名取得了胜利。这些崇拜偶像者的血，为证实《古兰经》教导的真实而流。

埃德萨的陷落，在穆斯林看来，是夺回了自己原来的领地。因此，即使是生还的原是基督教一方的俘虏，也被贩卖为奴隶。据史载，这次被卖的奴隶数量超过两万。

在城陷之时，曾吉还承认基督教化之前的埃德萨居民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屋。两年之后，其子努拉丁完全不承认任何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并彻底破坏了整个城市。穆斯林将埃德萨的街道破坏，使基督徒无法回到城中生活。这不啻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城市的一大惩罚。

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失去了埃德萨伯爵领地。这座第一次十字军的东方桥头堡落入了穆斯林之手。若瑟兰二世没能回城，也未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而另一方面，曾吉也去世了，未能完成其进军大马士革的心愿。他的死因，是在埃德萨陷落之后，被一位憎恨自己的奴隶所杀。

得知埃德萨的陷落，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两国深受冲击。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西欧也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西欧的基督徒都相信，十字军国家的成立是实现了上帝的期望。因此，十字军国家自然有来自上帝的护佑。作为十字军四大国之一的埃德萨的陷落，给这些相信上帝守护的人们心里，打下了巨大的问号。

修士贝尔纳

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从北到南依次是埃德萨伯爵领地、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耶路撒冷王国。其中一国被穆斯林攻陷之后，信仰上帝的人们就担忧起来。令他们恐惧的是，上帝不再守护自己的国家了。这种恐惧感在上至国王、下至庶民的整个社会蔓延开来。

而在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里，修士贝尔纳的呼声高涨起来。第一次十字军是由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们倡议发起的，而第二次十字军则由更为激进的改革派基督教会，批判克吕尼修道院的西多派修道院发起。

后来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的“圣贝尔纳”，公元1090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地区。有不少人从香槟地区前往东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贝尔纳6岁时就已亲眼目睹十字军的盛况。

贝尔纳的父母双方的家族均是勃艮第公爵的家臣，属于中等贵族，也是居住在城堡中的阶级。贝尔纳排行七兄弟中的第三位，属于早熟的少年，为村内的神父和教师服务，同时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11岁时，贝尔纳就和兄弟五人一起，在父亲的山庄生活。这充满祈祷和冥想的静修生活非常有吸引力，一年后，在山庄内生活的人增加到30名。

这30人最终都决定到西多修道院，舍弃世俗的人生，发誓成为修士。于是，12岁时，修士贝尔纳的神职生涯开始了。

此时，整个法国乃至整个西欧最著名与最权威的修道院，是克吕尼修道院。由于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且成功收复了耶路撒冷，克吕尼修道院深受人们的尊敬。但贝尔纳并未选择门庭若市的克吕尼修道院，而加入了时人知之甚少的西多派的修道院。这一方面是因为克吕尼派的改革已经造成了很多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贝尔纳不愿在等

级森严的大修道院屈居人下。在西多修道院三年之后，贝尔纳也选择了离开。

1115年，25岁的修士贝尔纳与12名同修在亲戚所赠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新的修道院，并移住其中。新修道院沿河而建，附近的森林郁郁葱葱。贝尔纳将其命名为“克莱尔沃”，意为“清澈的山谷”。此后，他也被称为“克莱尔沃的贝尔纳”。

然而，修士贝尔纳并不甘心安居于山谷内的修道院。三年之后，他就开始了布道活动。贝尔纳的布道不只是进行单纯的说教，而是集合与其有共鸣的人士，打造信仰的基地。他开始云游法国各地，建立修道院网络。到他去世时，贝尔纳倡议修建的修道院达到343所。他不仅勤于思索，更善于行动。

中世纪的欧洲可谓是“修道院的时代”。修道院对俗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自从圣本笃在意大利南部的蒙特卡西诺建设修道院开始，本笃派的修道院最为兴盛。克吕尼修道院也属于本笃派。因此，在这座修道院中，修士们都要遵循创始人圣本笃所制定的基本原则：清贫、服从与贞洁。

由于其成功发动第一次十字军的功劳，克吕尼修道院不仅汇集了信仰虔诚的人士，也充满了来自民众的捐款。有记载说，从意大利北部登陆前往法国南部劫掠的海盗，劫掠了前往罗马觐见教皇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获得了丰厚的物资。时人多流传，克吕尼修道院内的高级僧侣，其奢侈程度甚至超过了罗马教皇。

生来就讲原则的贝尔纳，辛辣地批判了克吕尼修道院的奢靡。说起讲原则，贝尔纳是非常极端的。他不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时时注意他人的言行。

本笃派修道院除了前述的三个原则之外，还有“安定”（拉丁语

stabilitas）。贝尔纳对清贫等原则十分认同，但拒绝接受这一原则。在贝尔纳看来，所谓的“安定”，就是完全不关心人世间的事务，潜心接近上帝。而他所确信的观点是，神职人员必须积极介入世俗事务，才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治理整个基督教世界。

因此，比起以医疗服务为最主要任务的圣约翰骑士团，贝尔纳更加赞赏以对抗异教徒为己任的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身份都是修士，这与贝尔纳心中“战斗的修道者”的观念不谋而合。

在法国生活的贝尔纳的对手，并不是异教徒，而是对基督教信仰有不同认识的“异端”人士。当时西欧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都被定性为异端，成为像贝尔纳这样年轻僧侣组成的宗教迫害团体的牺牲品。其中著名的例子，包括陷入谴责的哲学家阿贝拉尔，最终被罗马教皇处以绝罚。

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呼声较大的主张，自然容易引起大众的注目。支持贝尔纳的人与日俱增，他所属派别的修道院所收到的捐款也随之滚滚而来。西欧的修道院逐渐从克吕尼修道院所属的派别的支配之下，转变为以贝尔纳所属的西多派为主。在埃德萨陷落后一年的1145年2月初，支持贝尔纳的新教皇尤金三世上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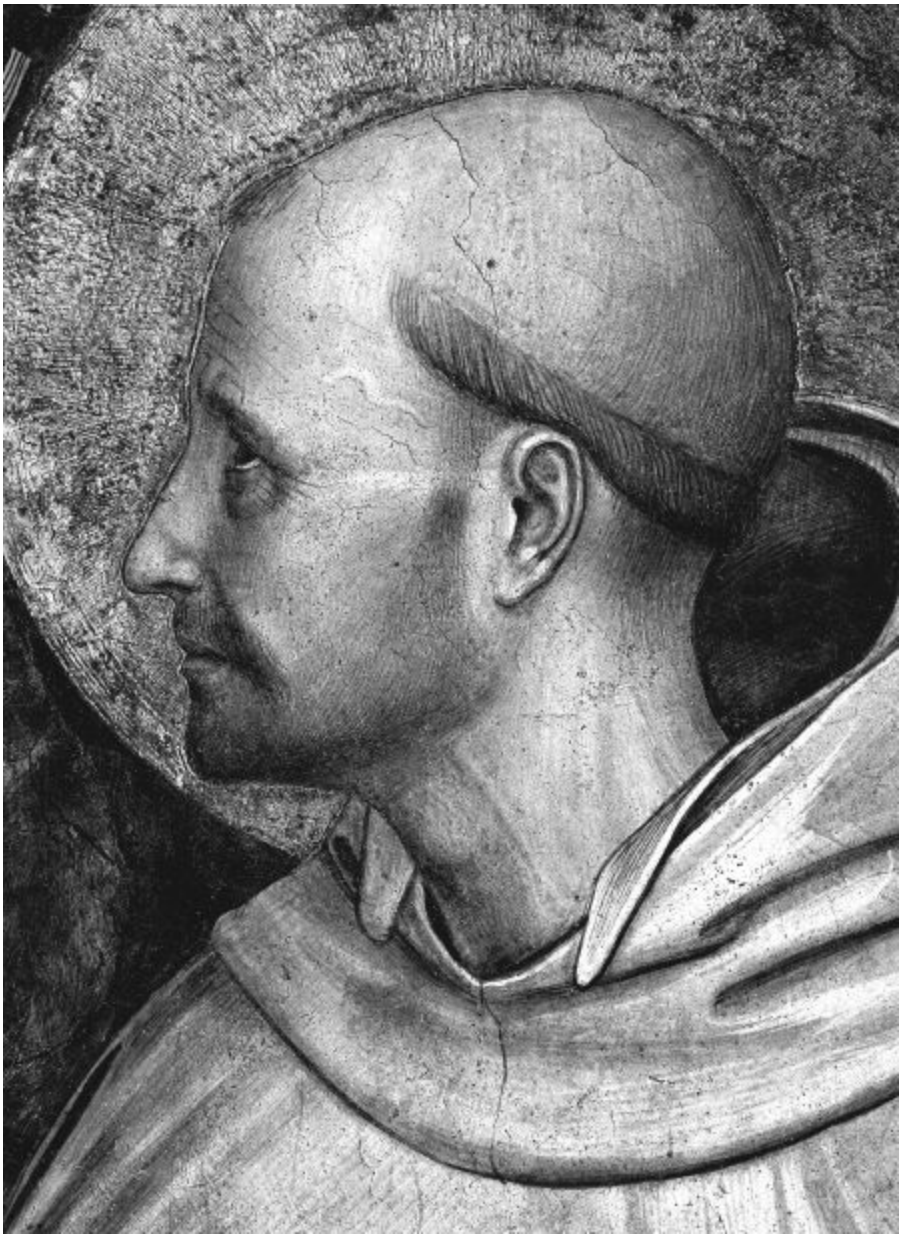
在给新教皇的信中，位于神职人员序列最下层的贝尔纳，对最上层的教皇直接说了下面的话：“您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与我面谈。”

这句不合正常礼仪秩序的话，反映了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所拥有的权势。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发动者乌尔班二世相比，贝尔纳自然没有教皇的地位，甚至不是大主教或者主教身份。然而正是这一介普通修士，成了第二次十字军发动的原动力。

这是因为，修士贝尔纳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

首先，贝尔纳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物。在中世纪欧洲，君主和诸侯重视的只是军事和武器装备。而知识与教养，则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世俗权威只懂得如何作战，却缺乏语言的艺术。

虽然贝尔纳只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他对于辩论术和修辞学却十分精通。因此，贝尔纳善于在辩论之中说服拥有世俗权力的贵族。因此，在神职人员与世俗贵族集中的场所，他以语言为武器，无往而不利。



修士贝尔纳（弗拉·安杰利科画）

此外，在我看来，贝尔纳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外形。

贝尔纳出身贵族，身材高大。然而，与其他高大魁梧的君侯相比，贝尔纳的体型极端瘦削。由于他发誓一生清贫，与其他修士相比，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其他修士每人每周斋戒一次，而贝尔纳每周要封斋三次。有时候其他人会绝食一日，贝尔纳则能做到断食一周。在修道院的日常生活，对他来说就是苦行的生涯。

由于中世纪治安很差，修道院都建成城堡的模样。到了冬季，石壁石床上会升起难耐的寒气。在修道院中，唯一的取暖方式是烧柴的壁炉，墙上的绒毯、床上的毛皮都被作为奢侈品而禁用。修士身上穿着的依然是春秋季节的粗布僧衣，脚上仅仅穿着拖鞋，至于食物，除了面包和蔬菜以外，只有少量葡萄酒。除了每周五可以享用一次鱼之外，修士与其他的肉类完全无缘。此外，每周只有一次外出的机会。

这是相当程度的苦修生活。然而，贝尔纳却能逐渐做到连一点儿食物都不进的绝食修行。

在留诸后世的记载中，贝尔纳是以粗布僧衣包裹着的瘦骨嶙峋的身体，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外貌出现的。与营养充足、身形健硕的皇帝和王侯们相比，他的贫弱外形，成了有力的无声武器。

看到贝尔纳的外形，权贵们就会有一种被压倒的感觉。冲击着这些穿着华丽服装的肥硕身躯的，与其说是羞耻，不如说是负罪感。接下来，他们会听到这位善于讲述基督事迹的僧侣侃侃而谈，顿时有自愧不如之感。

但是，听从贝尔纳说教的，并不仅仅是权贵们和社会上层人士。他

在平民中的影响力也极大。他展示了自己的清贫，却令穷人们信服地认为，贫穷决不是一种罪过。这使贝尔纳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

这就是贝尔纳的外形带来的影响力。

在基督徒看来，见到其他人的苦难，例如衣不蔽体的情况，都会动恻隐之心。他们看到贝尔纳的样子，就会认为他是在代自己受苦。因此，中世纪基督徒常常会极为尊敬苦行僧。他们往往会认为这些僧侣是感上帝之圣灵的圣人，而由衷地对他们产生崇拜。这自然是因为十字架上受难而死的耶稣基督，常驻在基督徒内心的缘故。基督教是常常以痛苦而非愉快使人感动的。毕竟，人们总会有设身处地思考的倾向。

以极端严格的苦行考验自己的贝尔纳，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死都保持这样的外形。因此，在当时的民众眼中，贝尔纳是未背负十字架的基督式的人物。他以自己的全身心代替民众赎罪，从而赢得了尊重。

但是，与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同，贝尔纳经常听取周围的声音。他也相应地叱责众人，为何不能匍匐倾听上帝的教诲。在中世纪后期，贝尔纳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身着华丽服装的罗马教皇和大主教们。

第二次十字军

对埃德萨陷落感到强烈危机的女王梅丽森达，请求教皇尤金三世派遣新的十字军。教皇立即将女王的要求转告了贝尔纳。贝尔纳接受了教皇的委托，着手游说王侯们组织第二次十字军。

与克吕尼修道院出身的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第一次十字军不同，第二次十字军的主导权落入了与克吕尼派相敌对的西多派修道院手中。不得不说，宗教界内部也与世俗社会一样，充满了敌对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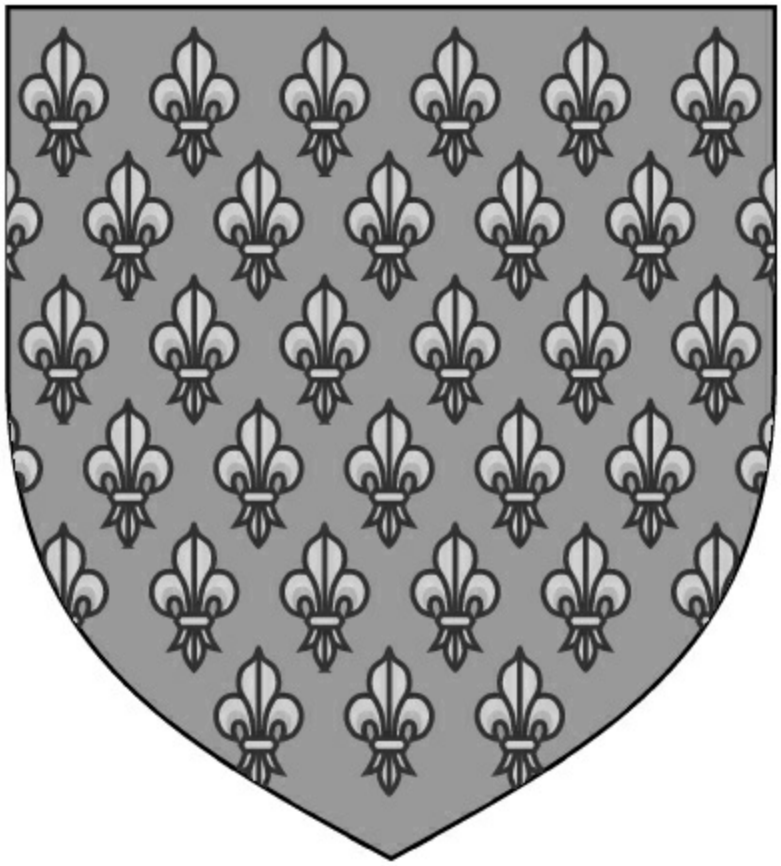
第一次十字军，没有皇帝与国王誓师参战，主要依靠诸侯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而为罗马教皇组织第二次十字军的贝尔纳，则不像乌尔班二世那样选择诸侯作为游说对象。他径直前往法国国王的宫廷，相信自己能够说服国王御驾亲征。

此时的法国国王，是年仅25岁的路易七世。路易七世的王后是在法国西南部拥有广大领地的阿奎丹女公爵埃莉诺尔。两人结婚时分别为17岁和16岁，妻子对丈夫施加了很大影响力。

史称“阿奎丹的埃莉诺尔”的女公爵，是拥有比丈夫法国国王直辖领地更大领地的女继承人，性格十分强势。在与路易七世结婚之前，她是包括阿奎丹公国、加斯科涅伯爵领地和普瓦提埃伯爵领地在内，占今日法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领地的女主人。而在婚后，她又拥有了法国王后的头衔。

国王夫妻自结合以来，时时刻刻与邻近的诸侯展开争夺领地的斗争。虽说这样的斗争对当时的国王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却出现了一起不小的事故。

这起事故发生在一次王家军队对巴黎以东150公里的村落的攻击之时。当1300名村民逃入村中教堂以后，国王的士兵点火烧死了里面所有的教士和平民。虽然此后国王深表忏悔，惨剧引发的流言仍然传遍了整个西欧。



法国卡佩王朝的纹章（蓝底百合图案）

罗马教皇对穆斯林的牺牲可以放任不管，但这次事件中惨死的民众都是天主教徒。教皇当即命令法国境内全体神职人员停止执行所在教区内的工作。当这一“神职休止令”下达之后，无论是初生婴儿的洗礼，还是婚礼葬礼都无法举行。而此时王后埃莉诺尔正怀着第一个孩子。

孕中的埃莉诺尔只好来到克莱尔沃的修道院，向贝尔纳求助。她自然是希望贝尔纳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劝说教皇收回成命。

贝尔纳具体做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结果是法国全境的“神职休止令”撤销了。此时比穆斯林攻陷埃德萨早8个月的时间。

有了这一次的人情关系，1145年寒冬季节身着粗布单衣出现在法国国王夫妻面前的贝尔纳，很轻松地达到了游说组织十字军的目的。

贝尔纳出身贵族，自然对人情的来往谙熟于心。纵然他绝口不提此前国王军队烧毁教堂的暴行，国王也知道自己必须对这位全欧洲景仰的人物言听计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贵族面前都是能言善辩的。

路易七世原本就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很容易产生一种以参加十字军东征而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赎罪的心理。他对由于“神职休止令”解除而成功受洗的新生公主的怜爱，也影响了这位国王的决策。王后埃莉诺尔甚至向贝尔纳提出，要将女性贵族组织起来，向圣地进发。

当然，组织十字军不仅需要进行战略层面的谋划，还要有一番宣言和庄重而严肃的出征仪式。这样，出征的诸侯就可以在宗教的“大义”之下，获得应有的名分了。而神职人员最适合的，就是策划和导演这些仪式。

法国勃艮第的小城市韦泽莱，成了贝尔纳的舞台。1146年3月1日，背对韦泽莱大教堂正门站立的贝尔纳，向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了反响热烈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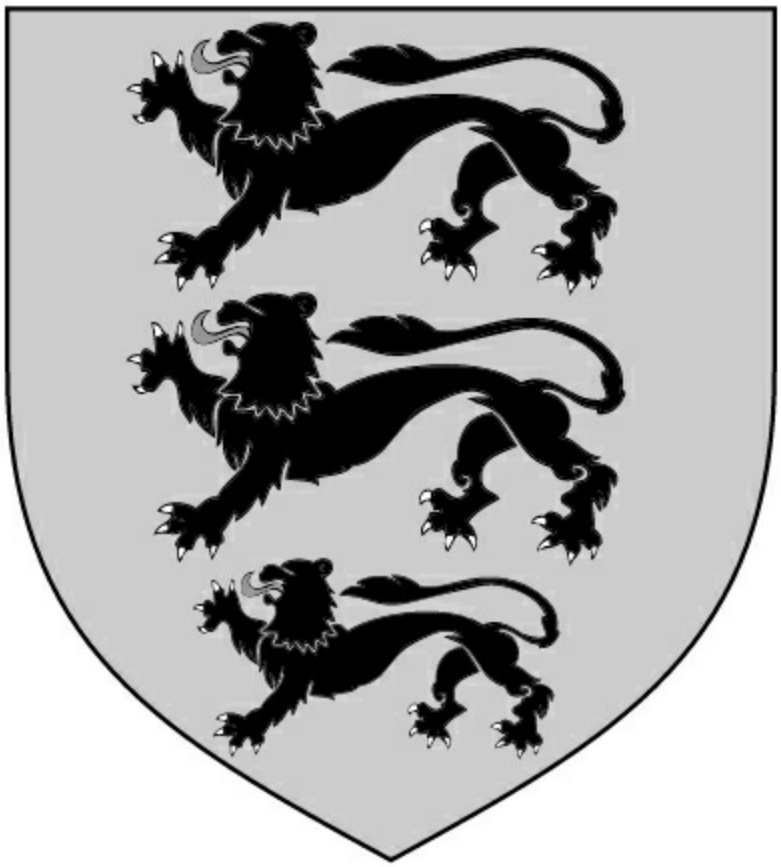
他采用宗教人士常有的布道方式，以现实世界的堕落与罪恶而开始。接下来，贝尔纳指出，世人已经无法忍受俗世的苦难，而面对上帝对世人缺乏信仰的愤怒，人们唯有赎罪才能洗涤自己的罪恶。

贝尔纳话锋一转，将埃德萨被异教徒夺取的消息，告知了聚会的大众。他详细描述了埃德萨陷落的惨状，以及圣地基督徒的不安与恐惧。在演讲的最后，贝尔纳声嘶力竭地叫喊：

“驱逐异教徒、解放圣地，是你们赎罪的正途，是对上帝的报偿！”

裹在粗布里的瘦削身躯所发出的呐喊，给朴素的信众心中带来强烈的震撼。群众自发地呼喊着“这是上帝的期望”，仿佛又回到了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的时代。

26岁的路易七世感动异常，径直跪倒在贝尔纳面前。贝尔纳特意赠予国王一把为东征而制作的精美的小十字架。跪谢的国王，双手捧着十字架，含泪接受，并在这把十字架下，向贝尔纳发誓参加十字军。



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朝的纹章（黄底黑色狮子）

比国王年轻两岁的王后埃莉诺尔，也为丈夫所感动。跟随国王一起跪拜的她，也得到了贝尔纳的祝福。与第一次十字军不同，第二次十字军正式允许女性参加。在路易七世决定亲征之后，法国的诸侯踊跃加入

十字军的行列。图卢兹伯爵、香槟伯爵、弗兰德斯伯爵等曾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家族纷纷再次出兵，俨然一副法国国家军队的气势。

法国全国的参战并未使贝尔纳感到满足。他越过莱茵河，游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康拉德三世皇帝参加十字军。

贝尔纳劝说53岁的康拉德的方法，也是把十字军东征当作赎罪来讲解。康拉德三世是在漫长岁月中与各路对手顽强斗争之后，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虽然他还远未掌握德意志全境，毕竟已在8年前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要正式坐上皇帝的宝座，还需罗马教皇亲自加冕。

这加冕仪式的许诺，就成为了贝尔纳的武器。最终，二人之间达成了十字军东征成功之后，康拉德就能够在罗马加冕的约定。这样，贝尔纳在说服法国国王以后，又促成了德意志皇帝的参战。

依照第一次十字军之例，平民参加十字军，就可以得到罗马教皇的免罪宽恕。但对皇帝和王侯来说，只准备天堂的席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关系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存续的大事，不能只依靠平民的信仰，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皇帝与国王所率的军队。

第二次十字军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与诸侯率领的第一次十字军不同，这次十字军的首脑是皇帝与国王。修士贝尔纳的设想，在东征伊始圆满实现。此时没有人怀疑第二次十字军的成功。

通往圣地的道路

翌年（1147年）5月，皇帝康拉德三世离开了德意志，向东方进发。关于其军队的规模，现代人只知道包括2000多名骑兵。这支军队中，包括许多受到贝尔纳布道影响的德意志农民，他们并不完全听从康拉德三世的命令。

但康拉德手下的2000骑兵，都是从头到脚以钢铁盔甲武装的重装骑士，是会使接近的对手感到巨大压力的战斗集团。直接指挥这支骑兵团的，是康拉德的侄子，22岁的腓特烈。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德意志皇帝出发以后一个月离开了巴黎。他与王后埃莉诺尔同行。在拜占庭编年史家笔下，埃莉诺尔所率的女子军团，身穿胸甲，乘马行军，颇有古代亚马逊女战士的风采。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部分是因为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等诸侯坚持共同行军。而当第二次十字军出发以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得到了教皇传来的消息，不敢对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军队补给有所怠慢。因此德法两军不必花时间去劫掠行军路线上的村庄，因此得以顺利地沿着经东欧、巴尔干半岛，直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前进。而在此之后，第二次十字军遇到了问题。

德意志军队首先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皇帝亲切而隆重的迎接仪式后，德意志皇帝面前呈上了“效忠宣誓书”。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情形一样，皇帝被要求在文书后面签名。

文书的内容也与此前毫无二致，要求署名者发誓绝对效忠拜占庭皇帝，并将未来收复的（300年前）拜占庭帝国在中近东的全部领土交还拜占庭皇帝。

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国王，在外交上与拜占庭皇帝是对等的。因此曼努埃尔一世的做法，实在是失礼的行为。让皇帝和国王像诸侯一样屈尊签名，令康拉德三世无法接受。他当即面露怒色，扫兴地离开了宴席。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康拉德最终还是签名了宣誓书。一个月后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国王，也毫无愠色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曾令各路诸侯抵抗的“效忠宣誓书”，怎么换成皇帝和国王，就以简单的签名应付了事呢？

第一个原因，渡海前往小亚细亚，必须依靠拜占庭皇帝才能提供足够的船只。这是与第一次十字军最终签名相同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经过第一次十字军的实践，证明了所谓“效忠宣誓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如果这些宣誓真的奏效，十字军国家早就纳入了拜占庭皇帝之手。既然宣誓书没有实际的效力，那么皇帝和国王在上面签名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经过了半个世纪，拜占庭皇帝依然毫无道理地让十字军领袖们在所谓的宣誓书上签名，实在是缺乏外交手腕。强制采取这种毫无实效的手段，只会使西欧天主教世界对拜占庭帝国更为轻蔑。法国国王一到君士坦丁堡，就表现出对拜占庭帝国明显的嫌恶。

拜占庭的外交失误不仅恶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对本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半个世纪以后到来的第四次十字军，转而把矛头对准了君士坦丁堡。

引发十字军对拜占庭帝国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曼努埃尔一世的“两面外交”。

对于同是来自西欧的十字军，曼努埃尔当然不希望他们失败。如果十字军东征成功，拜占庭帝国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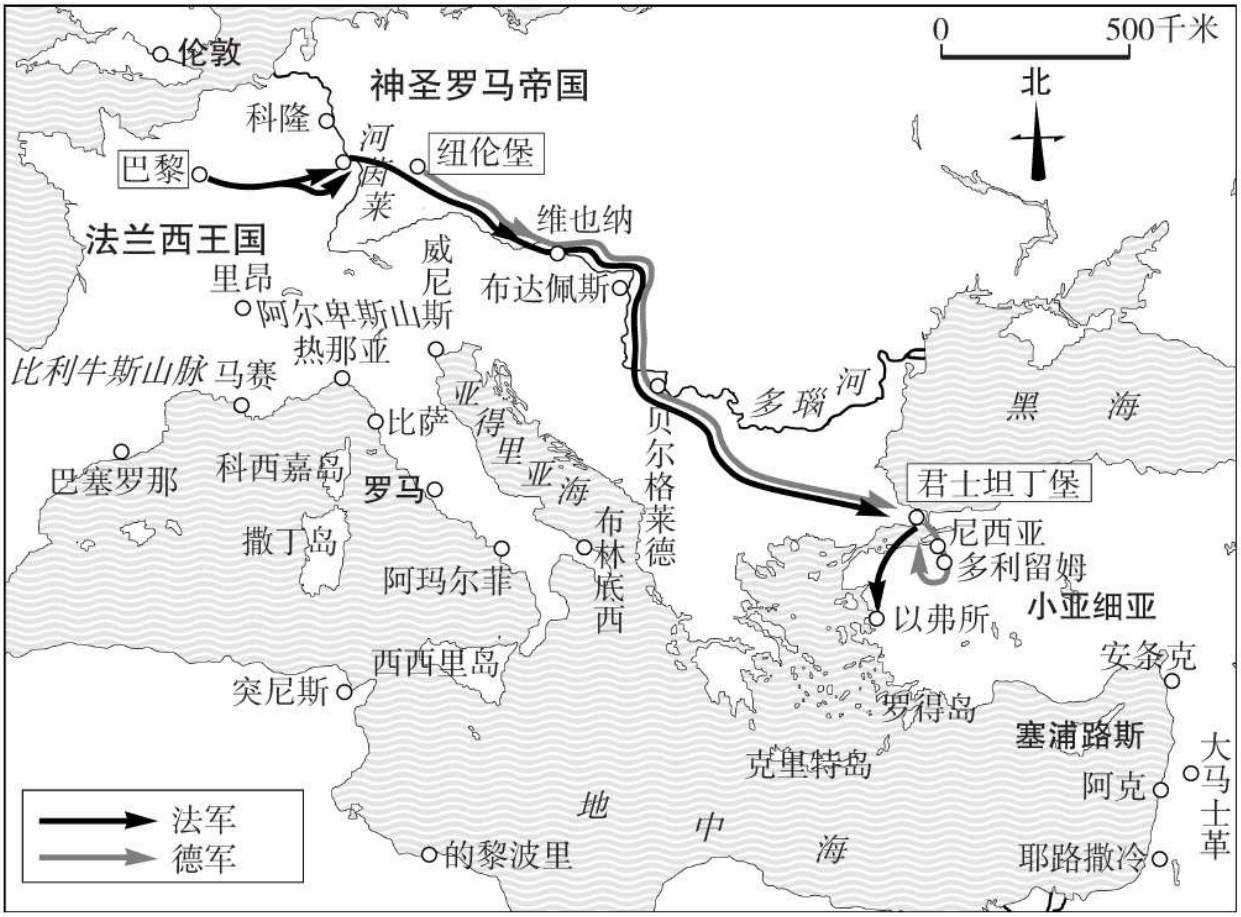
但皇帝也采取外交手段，避免与一直占据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冲突升级。在突厥军队面前，拜占庭帝国屡战屡败。

在十字军和突厥人之间保持中立，看上去是最好的策略。作为强者保持中立，对自身的利益固然有好处。但像拜占庭帝国这样的弱者，中立不仅在战争中无效，甚至会对本方有害。如果以拜占庭的军事力量和第二次十字军做简单的对比，就能看出其弱势了。

另一方面，无论是多高的头衔的十字军领袖，都需要依赖防御本国的曼努埃尔所提供的船只，前往小亚细亚。因此他们不得不签字宣誓效忠。当获得船只以后，康拉德三世得到了忠告。曼努埃尔告诉他，与其深入小亚细亚内陆跋涉行军，不如沿着海岸线，到小亚细亚南岸登陆，前往近东。

曼努埃尔没有细说为何要求十字军选择这条路线，但真实的原因是他已经与塞尔柱突厥人缔结了停战条约。此时的小亚细亚内陆，已经完全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的状态。穆斯林占领了小亚细亚大部，只有南部沿海的一些地区还处于拜占庭帝国控制之下。

拜占庭帝国与突厥人的秘密条约，并不为西欧所知。倘若罗马教廷得知了这一条约的存在，西欧人必然会敌视君士坦丁堡一方。曼努埃尔一世之所以要求十字军取道海路，也是为了不走漏风声。



第二次十字军进军路线

并不知道密约存在的康拉德三世，把曼努埃尔一世的忠告当作对德意志军队的轻视。再次感到受辱的康拉德，拒绝了拜占庭皇帝的建议，选择与第一次十字军相同的道路，前往小亚细亚。

由于尼西亚城尚在拜占庭帝国控制之下，康拉德准备在进入小亚细亚之后从尼西亚出发，向东南行军。然而，在离开尼西亚城30公里后的多利留姆，他们遇到了塞尔柱突厥军队的伏击。

第一次十字军就曾在多利留姆遭到突厥军队伏击。兵分三路的戈德弗鲁瓦、波埃蒙多和圣吉尔，率军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而此时康拉德的部队则是孤军深入。

突厥人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多利留姆之战，距离第二次十字军已有40年。当年的突厥军队，还为无法射穿西欧人的钢铁铠甲而苦恼，而今他们早已习惯了法兰克人的甲胄。他们清楚，全身披挂的重装骑士拥有极强的防御力，但缺乏足够的机动性。

与第一次多利留姆之战完全相反，40年后遭遇伏击的第二次十字军，完败于突厥人之手。如果伊斯兰史料记载属实，成功逃脱的德意志军队仅占总兵力的1/10。康拉德三世负伤而逃，所幸其率领的2000名骑士损失不大。

逃回尼西亚的康拉德和他的残兵败将，在刚刚到来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迎接下回到城内。曼努埃尔一世出于隐藏密约的考虑，也劝告路易七世不要深入小亚细亚内陆。但路易七世并未听从劝告，直接进入了小亚细亚。

康拉德和路易最终得知了拜占庭皇帝与突厥人缔结秘密和约的消息。他们怀疑是曼努埃尔提前告知了突厥人十字军的行军路线，从而导致了多利留姆的伏击。善良的路易七世最终也相信了拜占庭皇帝与突厥人相互勾结，以使通过小亚细亚的十字军无法到达圣地。最终，康拉德和路易决定，听从曼努埃尔的建议，沿海路前往小亚细亚南部。

然而康拉德在多利留姆之战中负伤以后，已经无法离开尼西亚继续行军。得知这一情况的曼努埃尔，请康拉德考虑返回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恼怒的康拉德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将属下的残兵委任给自己的侄子腓特烈，跟随法国军队登船南进。

虽然拜占庭皇帝可以根据停战条约保存自己的实力，小亚细亚的突厥军队已经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之前的水平。因此，即使十字军沿海路前进，也并不安全。

路易七世所率领的法国军队，也不断遭到突厥游击队的袭扰。路易

想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度过圣诞节，却总在行军路上遭遇敌人。进入1148年以后，法国军队已经无法忍受突厥游击队的袭击，不得不在小亚细亚南岸调遣船只，前往安条克附近的圣西蒙港，直接进入安条克公国的领地。然而由于船只有限，跟随国王的许多朝圣者还是只能沿着海岸地区的陆路行进，由弗兰德斯伯爵和波旁伯爵为之护卫。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一年内，可谓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而这一状况，在十字军到达安条克公国以后，没有丝毫改变。

1148年的安条克公国，由于先前波埃蒙多二世的战死绝嗣，转而归一位生于法国西部普瓦提埃的雷蒙统治。普瓦提埃属于阿奎丹公国的一部分，而雷蒙则恰恰是法国王后埃莉诺尔的伯父。

迎接远道而来的法国国王夫妻之后，安条克公爵雷蒙恳请国王协助其攻击占领埃德萨的曾吉之子努拉丁。当时努拉丁的部队正驻扎在阿勒颇。埃莉诺尔立即爽快答应，但一旁的路易拒绝了雷蒙的请求。他的理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还在君士坦丁堡养伤，而十字军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能没有皇帝的参与。

路易的拒绝令王后极为不快。她为丈夫不帮助自己的亲族而感到愤怒。自此之后，夫妻俩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此时的埃莉诺尔，是跟随以赎罪为目的的丈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因此还不能直接挑战国王的权威。但她深受修士贝尔纳的影响，一方面颇具利己精神，另一方面又有着很强的信仰之心。

1148年的复活节是4月3日。当时，第二次十字军已经抵达耶路撒冷，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其中的首脑人物包括：

从君士坦丁堡赶来的伤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

从安条克南下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

迎接以上两位西欧最高统治者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以及事实上治理耶路撒冷王国的梅丽森达。

与法国王后继承了其父遗留的广大领地一样，梅丽森达也作为鲍德温二世的长女，继承了耶路撒冷王国。5年之前，其丈夫福尔克驾崩，儿子鲍德温三世只有13岁，因此梅丽森达成为了圣地事实的统治者。她并未以摄政施行统治，而是作为女王的身份君临耶路撒冷，因此在第二次十字军到来之时，她的身份与德法两国的首脑完全平等。在这女性领导者辈出的时代，本已十分复杂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了。

而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男性统治者鲍德温三世，刚刚年满18岁。他虽然具有法国血统，却生长在中近东。这位年轻的国王，已经有了与穆斯林对手斗争的经验。

有一位要人并未出席此次耶路撒冷的峰会，这就是安条克公国的领导人，兼领普瓦提埃伯爵的雷蒙。他未能到场的理由是要在安条克防备随时可能来犯的努拉丁，但事实上是由于路易七世没有同意进攻阿勒颇，而令这位贵族不快。

除此以外，紧邻安条克公国的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也没有响应德法首脑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若再加上已经落入敌手的埃德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中近东基督教国家只有耶路撒冷王国一个。这无疑给以协助十字军国家为目的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泼了冷水。

1148年6月24日，全体十字军在海港城市阿克集结完毕。第二次十字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以得知埃德萨陷落而组织起来的第二次十字军，为何不首先以收复埃德萨为目标，或以攻占埃德萨的曾吉之子努拉丁所在的阿勒颇为目标，而选择大马士革来进攻呢？

虽然没有任何当事人的证言，我想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如果大马士革被十字军占领，可以成为耶路撒冷的重要屏障。

第二，夺取大马士革，就会阻止以巴格达为首都的突厥系穆斯林，与以开罗为首都的阿拉伯系穆斯林，形成统一的力量。

中近东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有很大的分歧。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成为十字军国家得以在此立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第二点，实在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而且也是从基督徒的所谓“大义”出发的。

至于第三个原因，则是大马士革在西欧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埃德萨和阿勒颇。因此，第一次十字军一直未曾试图攻占的大马士革，成为刺激第二次十字军领导人虚荣心的地方。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自私的。

既然打算进攻大马士革，十字军就应该整合兵力，向目标行进。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未这样做。

四月初集会的十字军领导人们，直到三个月以后的6月底才开始行军。这与法国国王的游历有关。

路易七世不仅在耶路撒冷城内瞻仰了耶稣时代的遗迹，还到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曾传教的拿撒勒、受洗礼的约旦河畔等圣地巡礼，以祈求作战的胜利。

于是，十字军战士们也就多了一层作为朝圣者为耶稣基督而战的意味。

领导第一次十字军的诸侯先作为战士一路杀到耶路撒冷，而后才转变为朝圣者的身份，而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法国国王，则是先作为朝

圣者来到耶路撒冷，再领导部下以战士的身份出征。两次十字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第一次是十字军以武力夺取耶路撒冷之后朝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耶稣生前游历的地方已尽在基督徒之手。

由于路易七世朝圣优先的决策，作战直到6月底才开始。在中近东夏季的酷暑中开展军事行动，简直是疯狂的行为。厚重的甲胄包裹着汗流浃背的身体，还如何能够作战？何况，十字军所要进攻的城市，是叙利亚的第一大都市大马士革。

但法国国王与王后，已经在最适宜作战的春季与初夏，耗费在圣地的巡礼与观光之中。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则在这段时间内视察了中近东地区十字军控制的城堡。康拉德年轻时曾经来到过耶路撒冷朝圣，因此这次出征期间，他没有花太多精力观光。

而穆斯林一方则在这三个月内充分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进军大马士革

这时的大马士革，由一位奴隶士兵出身的领主奥努尔统治。

大马士革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富饶的都市，周边分布着肥沃的土地，到处是连年丰收的农田。除了四通八达的商路之外，大马士革本身也出产各种商品。除了盛产各种农产品之外，这里还是手工业的中心。直到今天，西欧人还将当地出产的厚实的豪华丝织品称为“大马士革的织物”。

大马士革自然成为了象征叙利亚的都市。古罗马时期有六条大道汇集于此地，而在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向北扩张的时期，一度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之后才在美索不达米亚腹地建设巴格达城，作为新首都。可以说，大马士革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之一。

谙熟大马士革辉煌历史的曾吉，怀着统一整个叙利亚的野心，一直把大马士革视为自己的征服目标。当他遇刺之后，统治大马士革的奥努尔感到松了一口气，并与曾吉之子，30岁的努拉丁缔结了和约。

奥努尔刚刚制止了虎视眈眈的努拉丁对大马士革的垂涎，紧接着又面临西欧来的皇帝与国王的进攻。无计可施的奥努尔不愿坐以待毙，但他也明白，与西欧来的基督教军队相比，身边的努拉丁更为可怕。

奥努尔最终的决定，是不得不与努拉丁结盟。他向阿勒颇派出使者，请求努拉丁派军支援，条件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对努拉丁来说，接受这个条件，就离父亲没能征服的大马士革近了一步。

努拉丁虽然答应派遣援军，却并未明确表示何时出兵。他其实并不愿意组织大军前往大马士革。

身在阿勒颇的努拉丁，已经得到了十字军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是从自由进出近东各城市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地的商人传到与之交易的穆斯林商人耳中，再由后者带到阿勒颇的。对穆斯林来说，由于商业往来的便利，很容易得到基督徒一方的各种信息。因此，十字军在阿克集结的具体情况，很快就到了努拉丁手中。

那么，集结完毕的第二次十字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

根据研究者的推测，在阿克集合，向大马士革出发的十字军兵力，大致是这样的：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所率的骑兵2000人；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所率的骑兵700人；

弗兰德斯伯爵所率的骑兵600人；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以及其领地内诸侯部下的骑兵550人、步兵6000人；

圣殿骑士团骑兵130人与圣约翰骑士团骑兵不到100人，合计约200名骑士。

总计骑兵4050和步兵6000人，其中从西欧前来的，包括3300名骑兵。

当然，每名骑兵还带有至少3名步兵，以及随从和马夫。因此3300骑兵的总人数，实际达到2万之多，虽然主要的战斗力还是由骑士本人来体现。而自西欧远征前来的十字军中，并不包括任何步兵的力量。

这些兵力，基本上就是西欧天主教世界最强大的两支力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军队总和了。在并没有皇帝与国王参加的第

一次十字军中，骑兵与步兵共计5万，其中骑兵只有1000多人，而主力则是重装步兵。相对于步兵来说，骑兵是更好的突击力量。

在后世人看来，皇帝与国王亲率的总兵力，肯定是一支大军了。同一时代的穆斯林，看到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两位苏丹的人物御驾亲征，也必然对其声势有足够的了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央集权还未确立的时代，皇帝与国王都难以约束属下的诸侯，其兵力也未必比诸侯多多少。证据之一，就是弗兰德斯伯爵亲率600名骑兵，并不比法国国王所率领的700名骑兵少多少。如果不是与继承了广大领地的埃莉诺尔结婚，路易七世也很难扩大自己的领地。

可以说，以骑兵步兵共计一万出头儿的兵力，想要攻陷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大马士革，不啻是天真的想法。在这个“骑士时代”成为西欧最高世俗领袖的皇帝与国王，大概是太过于相信骑兵的战斗力了。因此，在阿勒颇远观第二次十字军动向的努拉丁，并不急于向大马士革派出援军。

而第二次十字军有着比第一次十字军更为有利的一点天然优势，这就是不必担心军粮补给。与深入敌境包围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诸侯的十字军相比，皇帝和国王可以很好地得到西顿、推罗、阿克这些基督徒控制下的城市运送而来的军粮。令第二次十字军感到苦恼的，并非食物的匮乏，而是中近东炎夏季节的酷暑。

在7月中旬的热浪中，第二次十字军从阿克出发，开始分为三个序列向大马士革行军。

走在最前面的是熟悉地形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的军队。其中包括王国境内诸侯的55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200名骑兵。

紧随其后的第二部分，是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所率的部队。这支军队包括路易亲率的700名骑兵和弗兰德斯伯爵带领的600名骑兵。

作为后卫的第三部分，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所率领的2000名重装骑兵。

这支部队的总兵力，包括4000多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可谓是一支大军了。然而，从行军伊始，跟随在十字军后方的补给车辆就遭到了穆斯林游击队的袭击。虽然负责后卫的德意志骑兵最终将这些游击队击退，十字军的行军阵形也因此被扰乱。

安条克
奥龙特斯河
阿勒颇
拉塔基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托尔托萨
霍姆斯
地
特里波利
中
贝鲁特
巴尔贝克
海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基斯瓦
阿克
北
提比利亚湖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巴勒斯坦
0
100千米
约旦河
努拉丁的军队
第二次十字军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死海

第二次十字军和努拉丁前往大马士革的进军路线

7月23日，大军来到了大马士革以南12公里的基斯瓦，并在此处安营扎寨。选择在这里宿营的问题，是距离大马士革太远，而且供水不足，因此十字军计划第二天到大马士革以西4公里的米扎·雅巴尔重新宿营。

7月24日，十字军到达了米扎·雅巴尔并在此处构筑营地。设置营地的工作于第二天完成。

然而在25日拂晓，大马士革的军队突然出城迎击。十字军全军动员，终于在日出之后将穆斯林击退。德意志骑兵纷纷下马，变为重装步兵作战。

到26日，十字军迫近了大马士革城墙的西侧，此时大马士革的守军再度出城迎战，城墙上也不断飞下弓箭手射出的箭矢。

第二次十字军没有携带任何攻城器械，就匆忙来到了大马士革。在高耸的城墙面前，他们来不及建造攻城所必需的塔楼。

7月27日、28日两天，正当第二次十字军进攻大马士革城之时，在距离城墙以外数公里的地方爆发了新的战斗。

与第一次十字军一样，第二次十字军并没有设置全军总指挥。但第一次十字军中的各位诸侯都颇具军事才能，且能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兵共同作战，第二次十字军的三位领导人并没有司令官的气质，也没有明确的攻城策略，只能依靠骑兵和步兵个人的勇敢来与敌人斗争。

7月28日夜晚，十字军领导人们得知了阿勒颇领主努拉丁带领援军前往大马士革的消息，并且已经到达了霍姆斯。从霍姆斯到大马士革的直线距离为130公里，以当时的行军速度，5天就能到达大马士革城下。

撤退

7月29日，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们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营帐中决定全军撤退。撤退行动于当天开始。

算起来，从阿克出发不到两周，进入大马士革的领地只有一周而已，从米扎·雅巴尔宿营之后仅仅5天，而与敌人不过交战了4天，现在十字军居然就撤退了。这段时间内，康拉德三世和路易七世一次也没有去过城下指挥士兵，可是一听到努拉丁来袭的消息，就决定撤退了。这简直是对敌人闻风丧胆的态度。

第一次十字军攻占安条克，是忍耐了8个月之后的成果。

而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攻城战也持续了5个星期。

相形之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这两位西欧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所率领的军队，只经过4天就退兵了。

如果说撤退是为了减少损失，事实却并非如此。

史料中没有留下十字军全体的损失情况。大概是由于皇帝和国王不愿将这次败绩的具体情况留给后人，因此没有完全记载吧。然而，关于高级贵族的损失，则有档案留存下来。这大概是因为骑士与贵族多为高位出身，因此以下所举的例子，代表了第二次十字军中领导人物的命运，共计113人，其中：

战死者——22人

归国者——42人

去向不明者——49人

关于去向不明者，其中很多生死不明，还包括负伤或被敌方俘虏的人。其中运气较好的，在支付赎金以后就可以重获自由，但这样的幸运者为数很少。被杀死，或贩卖为奴隶，或通过改宗伊斯兰教避免死亡和奴隶生涯的基督徒不在少数。

几乎完全没有取得正面战绩的第二次十字军，从经过小亚细亚时就已经有大量兵员损失。而在大马士革附近修筑营地时，十字军又受到敌人游击战的袭扰。49位去向不明的贵族中，有不少受到穆斯林士兵的追击，最终脱离己方军队，在战斗结束后不知所终。

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位在撤退之后，留在巴勒斯坦的，是弗兰德斯伯爵。而他所率的600名骑士究竟有多少残存，则不为我们所知。

从大马士革撤退之后，最早离开近东的是皇帝康拉德三世。他并没有直接回到西欧，而是从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登陆，作为拜占庭皇帝的贵客愉快地度过了冬季。康拉德三世上次在多利留姆负伤以后，曾在君士坦丁堡治疗，其间与曼努埃尔一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两位皇帝在基督教世界共同利益的框架下，构筑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友谊。在春季返回德意志之前，康拉德三世的女儿还与拜占庭王室贵族结为了夫妻。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则在第二年春季离开了巴勒斯坦。这位未能获得丝毫名誉的国王之所以长留在中近东，恐怕是因为责任感所导致的羞耻之心。而路易七世也没有直接前往法国，而是经由海路，到达意大利南部，受到西西里国王鲁杰罗的迎接，并在此过冬。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国王都十分厌恶拜占庭皇帝，因此他们谋划着

进攻拜占庭帝国。但这初次谋划并未成为现实。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出发的第四次十字军，才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君士坦丁堡。当路易七世于秋季率军返回法国时，距其率领十字军出征时已有3年之久。

没有取得任何荣誉就撤退回国的路易七世，也许还能使家臣保持对其的忠诚，但却无法赢回王后的爱了。在返回法国以后，夫妻之间的不和已经彰显无遗。

第二年，罗马教皇的公会议正式宣布，路易七世与埃莉诺尔的婚姻无效。由于天主教徒不能离婚，宣布婚姻无效就等于撤销了婚约。

两年后的1152年，30岁的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与比自己年轻11岁的诺曼底公爵亨利结婚。这位公爵于两年后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从此，法国西南部富饶的阿奎丹地区，从法国国王手中转移到英格兰国王手中。

亨利二世与埃莉诺尔恋爱结婚之后，育有几位王子，其中之一就是率领第三次十字军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而这次婚姻使阿奎丹的易手，则成为了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一直保持强势的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也成为一位颇受争议的女性。

曾经大张旗鼓宣传的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积极倡议组织这次十字军的修士贝尔纳，也受到了波及。

得知第二次十字军最终结局的贝尔纳，说了如下的话：

“这些不能令上帝满意的人们所做的，当然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常常这样总结自己所鼓动事件的失败。以执行者的信仰不够坚定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变化。

为第二次十字军祈福的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在大马士革之战以后5年离世，此间对于第二次十字军一言未发。他很可能也像贝尔纳一样，把十字军的失败归结为信仰之心不足。

700年后的1872年，这位罗马教皇被封为天主教会的“至福者”（拉丁语：beatus）。“至福者”在天主教会中，比“圣人”（拉丁语：sanctus）的地位略低，和圣人一样，是信众们生活中的榜样。

修士贝尔纳死于教皇死后一个月。这位组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著名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赞赏圣殿骑士团：

穆斯林中间充满了各种恶行。他们借恶魔之手而生，是我们眼中罪恶的标本。

面对穆斯林，我们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连根铲除。

杀啊！杀啊！必要之时，我们要在他们的刀下杀身成仁。因为这才是为了基督而生活。

留下这样激烈说辞的修士贝尔纳，于死后21年的1174年被封为“圣人”。因此这位修士以后在天主教徒中被称为“圣贝尔纳”。8月20日，是这位“圣人”的纪念日。他在西欧天主教徒心目中，是农民的守护者。

比28岁的法国国王和18岁的耶路撒冷国王年长很多的康拉德三世，返回西欧时55岁。他在回国三年以后，即1152年离世，比罗马教皇和修士贝尔纳早一年。他到死都没有实现被罗马教皇加冕的夙愿，没能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去世以后，曾经随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侄子腓特烈继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红胡子腓特烈”之名，成为第三次十字军的三位主人公之一。

与康拉德年龄相差一代的路易七世，一直活到1180年才去世。这位国王的后半生，一直在与占据了自己前妻广大领地阿奎丹的亨利二世的

斗争中度过。他一直被描绘成一位良善之士，但在大马士革城下，由于害怕被穆斯林俘虏而临阵脱逃，则为他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继承路易七世的是其子腓力二世。此人以腓力·奥古斯都之名著称，也是第三次十字军的主人公之一。

在西欧，以失败告终的第二次十字军并没有带来多少社会问题。毕竟相关的人物都很快淡忘了这次远征。然而，第二次十字军对中近东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

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首先给中近东的基督徒带来了极度的失望。他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代表了西欧最强大的势力。可是这两位大人物所率领的军队，草草与敌人作战四天，便全军撤退，让当地人觉得，是西欧抛弃了自己。

而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击败第二次十字军大大提高了士气。如果以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基督教世界做对比，哈里发就相当于罗马教皇，而苏丹则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与国王。这些法兰克人的“苏丹”们所拥有的军力，超过小亚细亚突厥贵族的苏丹们，而与开罗、巴格达哈里发的军事力量相当。

哈里发和教皇的区别在于，前者世袭罔替，后者由选举产生。在普通穆斯林看来，哈里发和教皇都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他们自然也会将西欧人的皇帝与国王和伊斯兰世界的苏丹等量齐观。为了维护宗教权威，宗教领袖会授予世俗的权力，这一点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是一样的。

如果把伊斯兰世界眼中的第二次十字军，用日本中古史的名词来理解，可以这样做比方：

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进攻的基督徒诸侯领导人是“大名”，那么抵挡他们的穆斯林领导人艾塔伯克和埃米尔，也相当于“大名”。而其中的胜者，是基督教一方。

相比之下，第二次十字军则是“将军”亲率大军进攻了。但西欧基督徒的“将军”有两位。他们的对手，则是两位“大名”，一位防御大马士革，另一位则从阿勒颇出兵。只经过四天的战斗，在穆斯林世界两位“将军”完全不必出马的情况下，就将基督教世界的两位“将军”赶回了

西欧。

将穆斯林的看法换个角度，就是中近东基督徒对此次十字军东征的看法。

第二次十字军是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最为惨淡收场的。从头到尾，这次东征都一无是处。因此，伊斯兰世界的一位“地方大名”就足以让整个十字军一败涂地。

努拉丁的登场

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大马士革领主奥努尔，在十字军撤退后一年去世。其子继承领主之位后，仍惧怕十字军的进攻，便与阿勒颇的领主努拉丁结成了同盟。

努拉丁依然怀着先父曾吉的野心，但他并不急于进攻大马士革。毕竟，大马士革的领主因成功击退第二次十字军而声名远扬，在此时谋取，对自身的影响不好。

在大马士革领主奥努尔去世的同年，努拉丁的兄长也因故丧生。

曾吉的四个儿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这在血亲之间常常明争暗斗的伊斯兰世界实属罕见。他们完全遵从亡父的指示，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可称为穆斯林世界的异类。

曾吉死后，长子在摩苏尔，次子在阿勒颇，谨守其父遗言，绝不相争。对曾吉来说，将自己发迹的摩苏尔留给长子，而将新征服的阿勒颇赐给次子，是非常成功的安排。征服埃德萨之后，曾吉为防止基督教势力再次发展起来，将这座城市完全破坏，使人无法居住。

曾吉的长子，摩苏尔领主，于第二次十字军撤退次年的1149年去世，而此时大马士革的领主也去世了。31岁的努拉丁因此得以继承摩苏尔，并拥有了从今天伊拉克北部直到叙利亚北部的广大领地。

这位新的军事领袖，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占据领主交替时代的大马士革。但31岁的领主并未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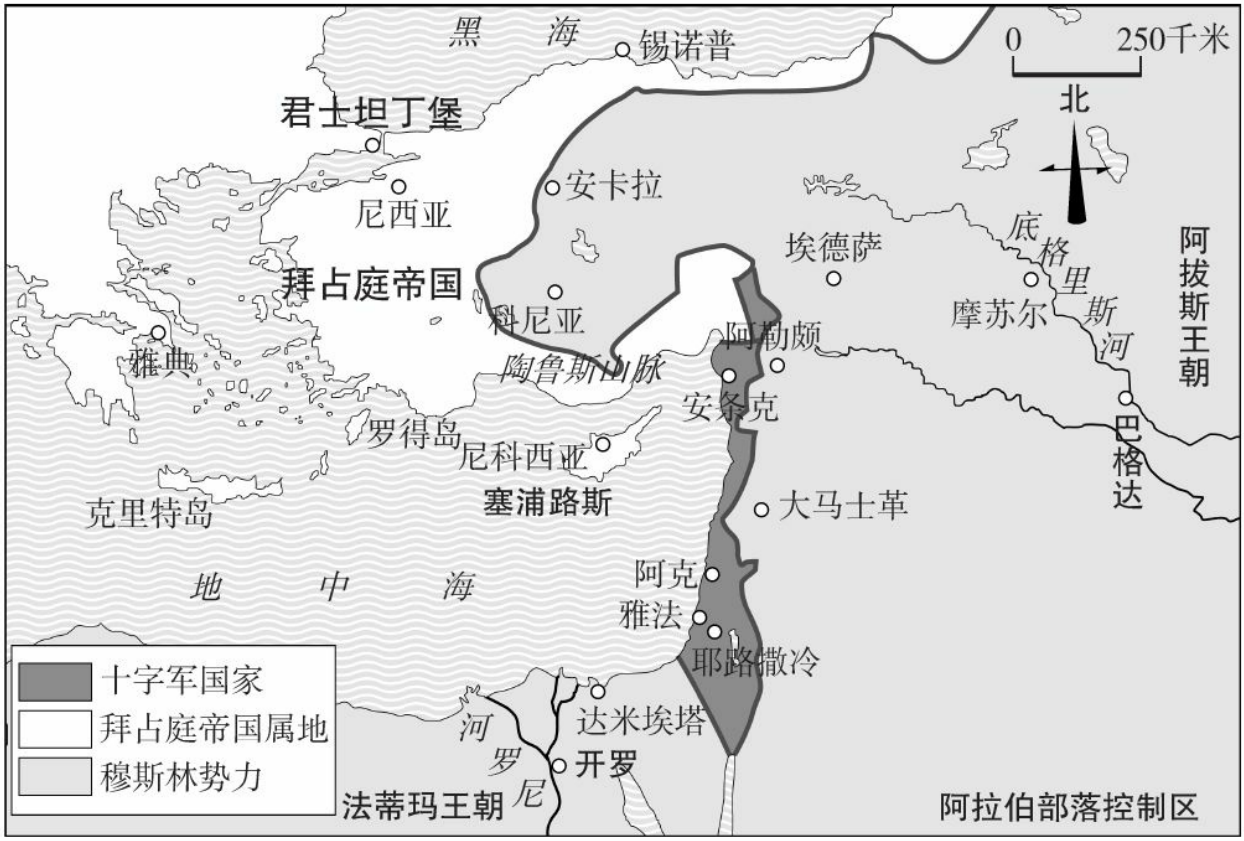
如果真的染指大马士革，对努拉丁来说有两点不利。

第一，大马士革城内仍然充满了一年前击退第二次十字军的喜悦。

第二，由于当时雇佣的大量兵士仍然滞留在大马士革城内，一旦努拉丁进攻，这些雇佣兵会起来反抗。他们既然能击退十字军，也就自然具备击退任何穆斯林军队的能力。因此，努拉丁能够安然等待时机，但他绝不是碌碌无为者。

努拉丁为夺取大马士革静静等待了5年。这5年之间，他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直试图在大马士革城中增加支持自己的力量。渐渐地，居民们注意到了大马士革年轻领主的碌碌无为，开始对其冷眼相待。

5年后的1154年春天，按照惯例为同盟续约的阿勒颇使者进入了大马士革，发现此时他身边的护卫比以前多了几倍。原来，这座叙利亚第一大城市，已经完成了不流血的政变，成为努拉丁的囊中之物。年轻的领主被流放到外地。



第二次十字军以后的势力图

基督徒称为努拉丁的他，全名为努尔·阿丁（Nur ad-Din），在36岁时，拥有了相当于现代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全境的广大领土。

这位并未与第二次十字军交锋的男子，成为第二次十字军时代最后的胜利者。西欧的第二次十字军，不仅没能给伊斯兰世界任何打击，反而加强了对方的力量。此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从起初不同领主之间相互争斗的不利态势，转变为一位强大领导人之下的团结局面。

中近东的十字军势力深刻感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在皇帝与国王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他们一直无法盼到西欧来的新十字军。

结果，从第二次十字军失败，到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命运之年”中的40年间，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无可奈何地坐视穆斯林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基督徒一方并非没有人才，但一直没有能得以恰当使用人才的领导人。相反，在此后的40年间，伊斯兰世界先后出现的努拉丁和萨拉丁两位领袖，都以出色的指挥能力，成功对抗了来自西欧的入侵者。

十字军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是移植了同时期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

首先，在中近东，统治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是和西欧一样头衔的“男爵”（Baron）。前面所提到的耶路撒冷王国的诸侯，就是这些“男爵”们。将英语的Baron翻译为“男爵”，仅仅适合皇帝和国王完成中央集权统治之后的时代。在十字军的时代，这些封建领主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诸侯”。

这些地方豪强表面上服从于皇帝与国王之下，形成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说是表面上服从，首先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站队，其次则是因为皇帝和国王还是在神权之下进行统治的。对诸侯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领地内重视神权的信众们的想法。

然而，诸侯的土地并非来自皇帝或国王的授予。他们的土地都来自祖先的遗产，并通过对近邻的攻击与兼并而扩张领地。因此，从一开始，这些诸侯的独立意识就非常强烈。皇帝和国王很难对诸侯形成有力的约束，这一方面因为关系其自身地位的加冕权掌握在罗马教皇与主教们手中，另一方面则是其自身实力有限。耶路撒冷王国可以算是一个缩小版的西欧社会。

因此，对耶路撒冷国王来说，制约国内的诸侯是最为重要的事务。他会让诸侯尽到守卫圣城耶路撒冷的义务——这也是所有十字军国家都要履行的义务。

这些十字军国家也反映了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特点——对还不到20岁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来说，王冠所带来的权威和义务同样重要。

关于这一时期十字军国家的记载中，最值得信赖的，是由一位名叫“推罗的威廉”的神父所著的作品。这位作家生于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推罗，在天主教会供职，颇具才能与智慧，年纪轻轻就已是十字军国家的上层人物。威廉生于1130年，与鲍德温三世同龄。

推罗的威廉是这样描绘鲍德温三世的：

他的个子比一般男性都高。由于这位国王身材十分匀称，他的身高并不令人觉得突兀。国王的面孔生的尤为俊朗，人们一见到他的面貌，就能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魅力。一双大眼睛放射出炯炯目光。他的金色长发并无突出的特点，而同样颜色的胡须长满了整个脸庞。虽然他的外形非常强壮，脱去甲胄和华丽服装之后，国王和其母与其弟阿莫里一样，既不胖也不瘦。

在这位同时代推罗人笔下，鲍德温三世的形象颇为丰满。这位国王喜欢阅读，特别是阅读同时代的历史与法律书籍。他还是一位无论谈话对方地位高低，都能与之平等对话的领导人。

同样，由于鲍德温三世对各个宗教的宽容态度，耶路撒冷城内住着不同人种、不同宗教的居民。

除了西欧来的天主教徒以外，圣城内还居住着同属基督徒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此外，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之后被流放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也逐渐回到耶路撒冷城内。

耶路撒冷国王有治理耶路撒冷的责任。如果城内各个社区的领导人求见，鲍德温三世都会很快接见。

可以说，鲍德温三世是一位完美的绅士。

而在穆斯林看来，同属“法兰克人”的西欧人和出生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后代，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清一色基督徒的西欧，像贝尔纳那样，敌视穆斯林，恨不得将其全部根除的人不在少数。但在中近东，即便是贝尔纳赞赏的圣殿骑士团，也不再将杀戮穆斯林作为自己的目标。

“杀啊！杀啊！”这样的话，并不是能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毕竟，交付赎金就能使被穆斯林俘虏的基督徒重获自由，因此金钱交易对十字军国家来说必不可少。此外，为生产粮食而占有土地的诸侯与骑士团，还必须依赖生活在自己领地上的穆斯林所支付的地租和农产品过活。与异教徒接触，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样看来，所谓的“杀啊！杀啊！”，实在是不现实。

而以医疗为主要任务的圣约翰骑士团，对贝尔纳的呼吁就更为冷淡了。为了交流医术而加强与穆斯林的接触和交流，是圣约翰骑士团从一开始就缺乏宗教狂热的原因。

这两个宗教骑士团都是为了防御穆斯林，而在十字架下发誓成立的骑士集团。但在中近东的事务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那就是来自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们。他们从来都是以经济利益优先，因而决不会倾听贝尔纳的呼声。如果参加十字军，也只是不得不在十字架下发誓要与异教徒穆斯林作斗争罢了。

这些中世纪的“经济动物”，居住在十字军统治下的中近东海港城市内的“居留区”内。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人的居留区与普通的社区不同，相当于十字军国家内的“经济特区”。

意大利商船将武器和各种军事用品装载到港口，然后运送到附近的居留区，在仓库内收纳起来。购买这些特殊商品的不仅包括基督徒骑士们，还有阿拉伯和突厥商人。

穆斯林的武装也逐渐受到十字军的影响而加强了其防御性。由于穆斯林认为西欧的钢铁制品质量更好，他们逐渐开始大量进口西欧生产的

武器。虽然罗马教皇注意到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正变得日渐强大起来，而颁布了对穆斯林商人武器禁运的敕令，意大利商人并未听从教皇的呼吁。在努拉丁和萨拉丁的胸甲上，都镌刻着“米兰制造”的字样，一时传为笑谈。

而穆斯林商人所出售的，也大都是东方生产的高级产品。包括摩苏尔的特产薄平纹细布，大马士革的特产丝织品，以及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出产的形形色色的绒毯。

在这些出口到西欧的高级织物中，纤薄的摩苏尔平纹细布包裹着贵妇的头部和胸部，而厚实的大马士革丝织品则将王侯们从繁复的着装中解放出来。穆斯林生产的绒毯，也渐渐取代了野兽的毛皮，成为最重要的室内装饰品。

教皇以下的高级神职人员，也逐渐适应了这一风潮。虽享用着东方的各种高级物产，这些西欧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相信，向东方派遣十字军是正义的行为。

推罗的威廉作为神职人员代表，经耶路撒冷国王授意，向西欧出发，请求教皇派遣新的十字军。而在此之前，威廉曾前往埃及开罗，与苏丹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对伊斯兰世界首都之一开罗的繁荣景象有了深刻的认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近百年时的十字军国家，在西欧人眼中，已经彻底堕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并没有积极准备在第二次十字军之后派遣新的十字军。

此时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无疑是肩负着全体十字军国家防御重任的。他的母亲梅丽森达是这位国王面前巨大的障碍，她并未将统治权让渡于已成年的儿子。

父亲福尔克死后，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鲍德温三世年仅13岁，因此由母亲梅丽森达代行统治。当时梅丽森达并未成为摄政，却要求母子共享王位，最终得以成为共治的君主。但直到鲍德温成年以后，梅丽森达一直没有放弃其统治权，将国政操于自己之手。从统治能力上来说，她并不为政治家所看好，在民众中间的评判也非常低下。

鲍德温三世试图劝说母亲远离政坛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只好率兵攻击梅丽森达，夺取王国的统治权。绅士的国王并未将梅丽森达流放，也没有把母亲投入监狱，而是为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使母亲体面地退出政坛。24岁的鲍德温三世，终于将国政从母亲手中夺回。而梅丽森达可算是介入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政治的女强人之一。

但就算是得以独立治国的鲍德温三世，也并非处于自由行动的状态之中。鲍德温18岁时所率的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兵力，是王国内男爵们提供的55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而占据大马士革之后的努拉丁，坐拥数以万计的兵力。

鲍德温三世的常备军的数量，比500名骑士、6000名步兵少得多。为了防御而能够出战的部队，远不能提供决定性的兵力。而且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也不会与耶路撒冷王国共同出兵。虽然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会出兵援助，它们的兵力也不过100名骑兵。而且，这些骑士团往往在平时分兵把守各地的城堡，能够出战的骑士数量非常有限。

如果努拉丁此时从大马士革派大军进攻，耶路撒冷很可能会陷落。然而，时局的两点变化，暂时挽救了耶路撒冷。

大地震

第一件大事，是1156年发生的叙利亚大地震。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城市普遍受灾。地震延缓了努拉丁扩张的脚步。他不得不将进攻十字军国家的计划搁置下来，优先重建受到大地震破坏的城市，并对受灾者提供救济。

而使耶路撒冷免于受到进攻的第二点原因，是冷酷而有能力的武将努拉丁，摇身一变成为温厚而平和的统治者。这一变化，即使在异教的基督徒中间也广为传颂。

通过努拉丁对受灾者的救济和灾区的重建工作，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地建起了壮丽的清真寺。努拉丁不惜代价地修复了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清真寺，并扩大了医院，还从巴格达招募了优秀的医生。

努拉丁高薪招募的对象，不仅有医生，还包括许多学者。以此为契机，大马士革的教育水平比以前上了一个大台阶。大马士革的学校除了教授《古兰经》之外，还传授各行各业的知识，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代表伊斯兰世界教育最高水平的大马士革接受教育的，包括当时年仅18岁的萨拉丁。

在38岁的努拉丁的治理下，大马士革发展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雄伟壮丽的都市。鲍德温三世依然十分担心努拉丁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他与拜占庭帝国走得更近了。在叙利亚大地震之后次年的1157年，利用与努拉丁“自然休战”的时机，鲍德温派出特使，前往拜占庭帝国寻求政治联姻。

鲍德温三世求娶一位拜占庭公主作为自己的王后，而曼努埃尔一世自然也明白他的意图。最终，皇帝决定将自己的侄女嫁给鲍德温三世，

同时希望耶路撒冷国王正式承认安条克公国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拜占庭式外交

由于一直没有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行动，大都市安条克和周边的安条克公国逐渐与耶路撒冷王国疏远起来。而且，安条克公国的统治者，普瓦提埃公爵雷蒙，也在与努拉丁的斗争中战死。继任为安条克公爵的雷诺·德·沙提永也被努拉丁的军队俘获，囚禁于叙利亚的监狱中。

因此，安条克公国的防御，也只有交由鲍德温三世负责了。但一直专注于耶路撒冷的他，对遥远的安条克鞭长莫及。在他看来，与安条克落入努拉丁之手相比，不如让同是基督徒的拜占庭皇帝来统治。

于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波埃蒙多和丹克雷迪一直拒绝交付的安条克，在60年之后终于落入了拜占庭帝国手中。

1158年，鲍德温三世迎娶了拜占庭皇帝的侄女特奥多拉，两人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成婚，新郎28岁，新娘还不到13岁。

就这样，中近东的十字军势力，于1144年失去了埃德萨，1158年失去了安条克公国。在最初建立的四大十字军国家中，只剩下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耶路撒冷王国两个。

1159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于安条克首次会晤。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同盟，两人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

在会晤仪式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骑士之间的挑战比赛。年轻的鲍德温三世亲自披挂上阵，结果在对方真刀真枪的挑战面前负伤离场。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亲自为国王疗伤。这位皇帝以行医为个人爱好，且医术高超。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多利留姆大败负伤的皇帝康拉德三世，也

是在逃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经曼努埃尔的治疗而痊愈的。

曼努埃尔治疗鲍德温的伤势之后，向耶路撒冷王国提出了联姻的请求。皇帝想要迎娶的对象，是以“安条克的玛丽亚”而著称的前任安条克统治者雷蒙的遗孀玛丽亚，鲍德温三世的表妹。

鲍德温推荐皇帝迎娶特里波利伯爵的亲戚，另一位同名的玛丽亚。但这一建议显然不会为企图加强拜占庭与安条克联系的曼努埃尔一世所采纳。

最终，安条克的玛丽亚和曼努埃尔的婚礼在1160年举行。从此，安条克开始了拜占庭化的过程。

两年后，在与穆斯林的一次小冲突之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在贝鲁特卧病不起。传说他是被曼努埃尔一世毒害而死，但客观上看，毒杀鲍德温三世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并无利益可言。如果鲍德温三世的确转变了对拜占庭帝国的立场，他也的确可能成为曼努埃尔一世眼中的障碍。

推罗的威廉这样记载了不到32岁的耶路撒冷国王的死：

国王的遗体从贝鲁特运往耶路撒冷的8天之中，路边站满了为国王之死致哀的人群。居民们纷纷含泪相送。到了耶路撒冷周边，人们的哀号之声此起彼伏，有很多人不禁大声号哭起来。

与对此前一年梅丽森达之死毫无反应的情况相比，当地居民对鲍德温的同情，可见是相当认同国王的功劳。

由于鲍德温三世和特奥多拉未能生育子女，耶路撒冷的王位由其弟阿莫里继任。

丧夫的特奥多拉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婚前所在的阿克城。16岁

的特奥多拉，并非梅丽森达那样强势的女子，她满足于阿克城主的位置，而对耶路撒冷王国没有任何帮助或损害。

得知鲍德温三世之死的努拉丁，这样回答劝说他进攻耶路撒冷的家臣：

“法兰克人正沉浸在失去他们所敬爱的优秀君主的悲哀之中。此时进攻他们，并不是我的作派。”

利用这一机会的，是拜占庭的皇帝。26岁的阿莫里在母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继任王位，对当时的局势深感不安。

曼努埃尔一世借机向这位耶路撒冷国王推荐了拜占庭皇室家族的成员之一玛丽亚作为王后。玛丽亚年仅8岁，5年后才跟阿莫里完婚。这样，拜占庭皇帝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中普遍安插了自己家族的势力。

然而在与玛丽亚成婚之前的5年中，阿莫里必须恢复独身。他与结发妻子阿格尼丝·德·库尔特尼的婚姻，被天主教会宣告无效，而这次婚姻所生的两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却要在教会中保证为合法的继承人，为此国王做了大量工作。对天主教国家内的一国之君来说，这类事务必须获得罗马教皇的认可。

21世纪欧洲所谓的“拜占庭式”，指的是工于细枝末节的计谋，而失于大局的情况。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中间，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拜占庭皇帝一直垂涎于安条克及其周边的土地。曼努埃尔一世终于在60年后实现了这一领土野心。此后，帝国应当做的是负责安条克的防御。但由于安条克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小亚细亚地区大部分为突厥人所占领，两地的陆路联系非常困难。于是，拜占庭帝国只能利用小亚细亚南岸的港口城市，以及罗得岛、塞浦

路斯岛等区域为基地，从海路加强安条克的防御。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国王与拜占庭帝国结盟，还在于希望拜占庭能协助加强耶路撒冷王国内的防御。

那么，拜占庭皇帝真的有心帮助耶路撒冷吗？

答案是否定的。

拜占庭皇帝毕竟是基督徒，那么，他对耶路撒冷的防御真的关心吗？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是很复杂的。他既不是完全不关心，也不是真的关心。

耶路撒冷直到今天都是基督徒的圣地。它是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首都，也是十字军所代表的天主教徒所统治的城市。

而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则是与天主教有所不同的希腊正教。对希腊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当然也是一座圣城。比如说，耶路撒冷城内最重要的圣墓教堂，就是拜占庭这座城市的建立者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习俗，则也是从君士坦丁大帝之母赫莲娜的朝圣而发端。对继承君士坦丁大帝国家的拜占庭皇帝来说，将耶路撒冷置于自己的统治下，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但是，耶路撒冷王国从建立之时，就一直处于天主教徒的统治下。虽然拜占庭皇帝为了介入耶路撒冷的事务，强行将自己家族的王女嫁给阿莫里，君士坦丁堡方面的行为必然遭到西欧国家的抵制。而西欧的抵制，将会带来莫大的损害。

众所周知，率领第二次十字军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就坚定地反对拜占庭帝国。路易在回西欧途中，在意大利南部停留，与一直进攻拜占

庭领土的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会晤，一起谋求反对拜占庭的同盟。此后，路易七世还造访罗马，向教皇述说了拜占庭皇帝背信弃义的行为。

而拜占庭皇帝则绝不能容许西欧天主教世界内出现堂而皇之地进攻自己的局面。

此外，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的圣城。如果拜占庭插手耶路撒冷的事务，就很难不引起穆斯林的反拜占庭情绪。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曼努埃尔一世曾经秘密地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领主结盟。通过承认突厥人对小亚细亚内陆的占领，君士坦丁堡避免了受到这些来自亚洲腹地的入侵者的袭击。当第二次十字军失败返回西欧之后，拜占庭帝国又与新近取得大马士革的努拉丁结盟。这一同盟的目的在于，希望努拉丁承认拜占庭对安条克的主权，与此同时拜占庭保证对其他地区的事务保持中立。所谓的其他地区，并不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拜占庭帝国跟耶路撒冷王国也缔结了同盟条约。关于这一同盟，拜占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耶路撒冷王国承认其对安条克公国的主权。同时，这样做也是拜占庭帝国对中近东的基督徒和远在西欧的天主教世界宣示主权的必要行动。签署同盟条约时，200艘船只组成的拜占庭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沿岸海域，表示可以担负起海上防御的任务。

但这支舰队最终全部转回了君士坦丁堡。这一方面是因为耶路撒冷王国并不需要大量海军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对地中海东岸造成祸害。

海军力量＝制海权

被穆斯林称为“法兰克人”，主要从法国和德意志前来的欧洲人，都是备受称赞的中世纪骑士，非常善于在陆地上作战。但这些国家都不是发达的海上霸主，几乎没有海军。而强大的海军必然诞生于拥有海运传统的民族。

第一次十字军占领了许多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而这些海港城市一直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由于伊斯兰世界只有埃及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十字军所占领的海港城市一直恐惧的，就是埃及的海军。

但在法兰克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具有海运传统和海军力量。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曾经不断进出于东方的海港。到12世纪中叶，阿玛尔菲从第一线消失，其余三个城邦一直担负着十字军的海上支援力量。

对没有海运传统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海军。而海运则要求运送货物的船只平安无事地前往目的地，自然需要组织高效的军事力量来护卫。

这三个意大利的共和制城邦国家，人口不到法国的百分之一。因此，这些国家必须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每一位国民。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对船的大小、乘员数量、如何防御海盗、航海术、驾船技能等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它们的战斗力比以宣示皇帝威严为目的而建设的拜占庭海军强大得多。

意大利各城邦海军的介入，使十字军一方牢牢掌握了中近东海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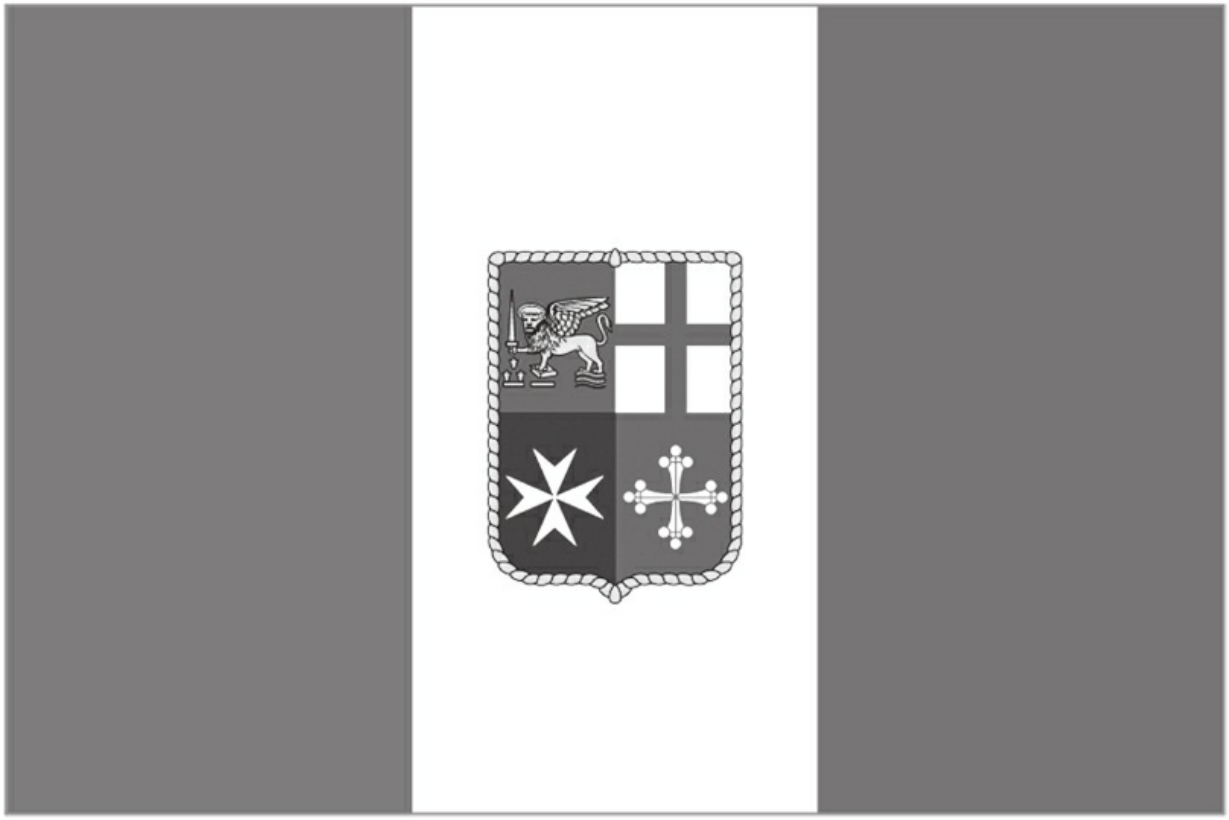
制海权。意大利海军在与埃及海军的海战中屡屡获胜，使埃及军舰再也无法靠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将这些港口城市的居民从对埃及舰队的恐惧中解救出来。这期间，拜占庭海军由于遵守皇帝与哈里发之间的秘密协议，并未出现在近东的海岸。

而在与耶路撒冷王国结盟的时刻，拜占庭海军却悉数南下。在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水手们看来，拜占庭海军的巡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巡航期间，拜占庭的海军还遭到了埃及船只的袭击，不得不依靠意大利船只的帮助而脱险。

因此拜占庭海军退回君士坦丁堡的决定，很可能是因为损失惨重不得已而为之。曼努埃尔一世虽然与鲍德温三世结成了同盟，却无法给十字军国家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能顾及自己对安条克的主权问题。

当此事传达到西欧时，引发了不同的看法。西欧人普遍认为，拜占庭帝国只是觊觎安条克，却毫无防御耶路撒冷的意志。

拜占庭皇帝本想既不与天主教徒为敌，又不与穆斯林为敌。可惜其中立态度为西欧各国所曲解。拜占庭的中立外交路线一贯如此，本意是保守自己的利益，只是因为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帮助其他任何国家而已。但奉行这一中立路线的结局，却使西欧国家失去了对拜占庭的信任，也使其国为伊斯兰世界所轻视。



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红绿两色条中间的白色部分，中部的盾牌形纹章从右上角顺时针依次是热那亚、比萨、阿玛尔菲和威尼斯的纹章）

而努拉丁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他会尊重之前的同盟，而对十字军国家按兵不动吗？

努拉丁还是派出了部队。他并未亲率大军，而是命令属下小规模进攻耶路撒冷王国。阿莫里只得率军应战。努拉丁属下的行动，就像现代的工会组织为了体现自身存在价值而发动的罢工一样，向耶路撒冷国王表示自己作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军事存在。

在中近东的基督徒看来，努拉丁本人的态度有所转变。据同时代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努拉丁的变化是由于其身患重病而导致的。在基督教一方，并没有人探求其不再大规模进攻十字军国家的原因。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主要是我个人的想象。

一个人如果有野心，那么在有条件实现的情况下，一定会尽可能去实现。此外，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或者更为冠冕堂皇地说，“愿望使然”。任何人都有野心和虚荣心。没有这两者的人，除了远离世俗的隐士之外，恐怕并不存在。

问题在于，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当中，哪一个比较大。另一个问题则是，当良机出现时，让一个人心动的究竟是野心还是虚荣心。

在穆斯林史家笔下，努拉丁是这样一个人：

身材高大而匀称，浅黑色的皮肤富有生气，脸上遍布浓密的胡须，额头高耸，目光时而非常锐利，时而一变为平和。与他相会的人，都对他的不凡举止尤为赞叹。

努拉丁汇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期待。为了反击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法兰克人的侵略，他是唯一能够不负真主的期望，率领突厥与阿拉伯兵士，联合一直互相争斗的穆斯林领主们，将不信者赶出伊斯兰的土地的大人物。

以上的描述，符合1154年之前努拉丁的情况。当他的军队离进攻大马士革的第二次十字军还有5天路程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就闻风而退。努拉丁对大马士革城静候5年，然后兵不血刃地取得这座叙利亚的大都市，一时间传为佳话。36岁的努拉丁，成为勇敢与慎重的象征。

从其父曾吉开始的叙利亚统一事业，终于为这位冷静的领主所完成。努拉丁所移居的大马士革，也成为了他所统一的叙利亚全境的首都。

但是，在努拉丁统一叙利亚两年之后，发生了毁坏城市的大地震。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倒塌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火灾，但大马士革附近的河流

却发了洪水。道路和桥梁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需要进行大量重建工作。

努拉丁全力投入了叙利亚震灾的救济与受灾地区建筑的修复工作。在此时期，他的脑海中大概也会认为，这是真主期待自己所做的吧。

这位30多岁的统治者，一发不可收拾地投身到重建的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重现了往日的辉煌，并且变得更加雄伟壮丽。

当地发达的教育机构和文学社团，使努拉丁广为穆斯林知识分子所称赞，而普通平民则大大受益于他所建设的救济孤寡贫穷的设施，以及免费的医疗机构。在当时中近东的免费医疗机构中，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医院可以治疗2000名患者，但努拉丁建造了远超这一规模的大医院。在伊斯兰世界中，与基督教世界一样，慈善事业也是为人们所赞赏的大事业。

努拉丁也是一位积极履行前往麦加朝圣功课的穆斯林，以其虔诚而著称。

最终，巴格达的哈里发向努拉丁授予了苏丹的职位。可以说，努拉丁已经集伊斯兰世界的敬意与赞赏于一身。

意气风发的努拉丁，在每周五清真寺的礼拜中，位列于先知穆罕默德与历代哈里发之后而被广为传颂。能够取得如此殊荣的人物，在以前的苏丹当中还从未有过。

但是，仅仅对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热心，并不能长期得到人们的敬意与赞赏。用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必须努力实现“真主的期望”，哈里发与苏丹才能在周五的礼拜中得到传颂。努拉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最终，努拉丁回到了与十字军作战的轨道上，重新开始了军事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消灭十字军，而是在小规模的袭扰之后，被骑士团的反击所击退。

突厥和阿拉伯兵士本身并不善于进攻高耸的城堡和狭长的城墙。他们虽然十分勇猛，但欠缺长期作战的耐心。作为总指挥的努拉丁，在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缺乏了以前的执着。对于收复圣地的热心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减少。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努拉丁最终没有对十字军国家大规模用兵。

人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很好，但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就不大容易做好了。反之，人们对自己能做好的事情会更为关心，而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就会缺乏足够的关注。

一直热心于规划叙利亚全境震后恢复的努拉丁，对战场渐渐失去了热情。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常常可以见到全副武装的卫士簇拥着腰间悬挂宝剑的努拉丁闲庭信步的场景。他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热烈的感谢与欢迎。而在战场上，迎接他的将军与兵士要么十分紧张，要么陷于沉默，负伤的士兵还会时不时发出呻吟声。习惯了平安、愉快与稳定的人，会对战场的压力感到十分沉重而无心应付。

当努拉丁44岁时，比自己军事才能低下的对手鲍德温三世驾崩了。得到这一消息以后，努拉丁的部将建议乘机进攻耶路撒冷。然而努拉丁却认为，不能乘对手不幸的时候发动进攻，这表现了一定的骑士精神，但也不能不说是十分消极的。当阿莫里继任为耶路撒冷国王以后，努拉丁以前所具备的善于抓住机会的特点，却没有发挥出来。

努拉丁的变化，也许跟这时十字军的以下特点有关。在没有涌现优秀领导人，又等不来西欧新十字军的情况下，十字军国家能够在努拉丁率领的伊斯兰世界得以存在，有三个原因：

一、十字军拥有战斗力十分精锐的“特种部队”作为常备军，即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二、苦于长期兵力不足的中近东十字军部队，采取了重点防守的策略，其重点是第一次十字军时期就开始建设的城堡。

三、从西欧来的十字军战士和宗教骑士团的骑士都曾在十字架下发下重誓。这些穆斯林统称的法兰克人，有着相同的天主教信仰。

未在上帝面前发誓击败异教徒的“法兰克人”，对十字军国家的存在也有着积极贡献——这就是以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他们在地中海纵横航行，是成功的商人和优秀的水手。可以说，他们一手担负起了十字军国家的海军与海运力量。

两次十字军之间的岁月

对1118年以后进入守势的十字军来说，以上的三个要素成为其长期守成的主要原因。下面是200年来十字军历史的简略年表：

1099年　第一次十字军，成功收复耶路撒冷。

1118年　鲍德温一世驾崩。此前20年间，十字军诸国建立。

1148年　第二次十字军在大马士革城前撤退，宣告失败。

1174年　努拉丁去世。萨拉丁崛起。

1187年　基督教一方失去耶路撒冷。

1190年　第三次十字军。未能实现最初目标而宣告失败（1192年）。

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不仅攻陷耶路撒冷，还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1220年　第五次十字军。目标埃及，最终失败。

1229年　第六次十字军。达到了收复耶路撒冷的目的……

1250年　第七次十字军。远征埃及，总司令法国国王被俘，完全失败。

1270年　第八次十字军。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再度发动十字军东征，但国王在突尼斯登陆后驾崩，于是这次十字军宣告解散。

1291年　十字军最后的基地阿克陷落。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完全灭亡。

完全由欧美人所书写的十字军历史，大都完整叙述了从西欧发动的8次十字军东征。而我在此处试图描述的，是在两次十字军东征之间，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情况。

换句话说，我所关注的不仅是西欧人眼中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也包括当时中近东生活的人们的观点，以及这些人是如何度过两次十字军之间的时期的。

总的来说，从第一次到第八次十字军，与是否有皇帝或国王率领无关，都有大量兵士在短时间内进入中近东。而在两次十字军之间的时期，从十字军的领导人到普通士兵，纷纷踏上前往西欧的归途。除了第一次十字军算是达成了既定目标以外，以后的十字军与十字军之间的时期，都有大量败退回西欧的部队。

在这一中间时期，中近东的十字军大都处在防御的境地中。

第二次十字军到第三次十字军之间，经历了40年的岁月。其间，穆斯林世界英雄辈出，但十字军国家仍然可以做到以少量兵力成功防御。

之所以十字军国家能够在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穆斯林大军面前屹立不倒，主要包括宗教骑士团、城堡、经济交流与海军力量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宗教骑士团

如前所述，以侍奉上帝为生活准则的修士，同时又成为为上帝而战的骑士。这些男子集合而成的宗教骑士团，就是十字军时代的特殊产物。

宗教骑士团的代表，是以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所在的中近东为基地而创立的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在第三次十字军的时期，条顿骑士团建立起来。这一骑士团的创立与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德意志及其附近地区，因此对圣地的贡献远不如上述两大骑士团。

虽然宗教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它们决不是没有任何基础突然出现的组织。

中世纪欧洲可以称得上是封建制度与修道院的时代，修士集中的各个修会的势力非常强大。究其原因，是封建诸侯、皇帝和国王常常为各自的领地而斗争，修会却是能够独立于其间的团结的组织。

拥有许多修道院的克吕尼与西多修会，并不受所在地的主教与大主教管辖。它们也不受所在地的封建领主支配，即使是作为君主的皇帝与国王，也无权对修会发号施令。唯一能管辖修会的，只有罗马教皇本人。

而在中世纪的通信条件下，罗马教皇的圣谕在西欧境内需要一个月才能传达，传达到中近东地区更是需要两个月以上。这还只是在罗马教皇接到报告就立即反应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各地的修会自然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了。这样，各个修会的修士能力日渐增强，修会整体也就强大起来。

在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内诞生的圣殿骑士团与圣约翰骑士团，都是舍弃世俗生活的修道士组成的集团。与西欧的修会不同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与穆斯林敌人的斗争。这两大宗教骑士团不必遵从耶路撒冷牧首的命令，也并不听从耶路撒冷国王的指挥，事实上是完全独立的组织。因此，在努拉丁所率的大马士革军队接近时，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由的。

在这一时刻，宗教骑士团就会与耶路撒冷国王一起战斗，不经过罗马教皇的许可就大开杀戒。自主判断、自主行动，这就是宗教骑士团的生存法则。

由于具备独立性，宗教骑士团成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剑”。在和平时期，不用拔剑社会就能安定，而在战时，拔剑应战是生死之间必然的选择。

十字军国家的两把利剑，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在1118年就创立为战斗集团了。1118年也是鲍德温一世去世的年份。已经确立了20年统治的十字军国家，从这时开始进入守势。因此，圣殿骑士团被视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标志性存在。

根据前面的年表，十字军的守势从1118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1148年，达到30年之久。而第二次十字军失败以后到第三次十字军出征，则间隔了40年。

发动新的十字军，自然需要西欧投入大量兵力。而在中近东停留一两年之后，这些兵士又大都回到了原籍。这一来一回，就分别过了30年和40年……

在此间的岁月，中近东的基督徒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防卫圣地，

但一直陷入长期兵力不足的状态中。相比之下，出色的穆斯林领导人曾吉、努拉丁和萨拉丁相继集合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绝望的时刻，立于最前线的是宗教骑士团。宗教骑士团在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超过500人，绝对数量并不多。因此，在其独立作战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占领。

但作为迎击的军事力量，宗教骑士团还是发挥了其作用。由于它们是职业的战士集团，都不会考虑返回西欧，而志愿一生奉献给圣地，宗教骑士团自然成为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最需要的常备军事力量。

在两大宗教骑士团中，更为受人注目的是圣殿骑士团。这一骑士团与圣约翰骑士团相比，以宗教狂热而著称，最终以悲剧的结局而收场，因此成为吸引大众兴趣的重要存在。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从创立伊始就是以消灭异教徒穆斯林为目标，以战斗为唯一方针的集团。其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中公元前犹太国时代的所罗门圣殿中，因此得名为圣殿骑士团。

所罗门圣殿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成为基督教堂，而在伊斯兰征服以后成为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当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以后，圣殿为耶路撒冷国王与圣殿骑士团所瓜分，成为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城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公然以这座圣殿为总部，并堂而皇之地自称“圣殿骑士团”的组织，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骑士团的性格。

圣殿骑士团从创立时的1118年到解散时的1314年间，共有23名团长。而关于团长以下的人员情况，则完全缺乏资料。当骑士进入圣殿骑士团之后，和其他修会里的修士一样，立即变为没有名字和面貌的存在，按照宗教骑士团的清规，与世俗断绝了关系。在以与异教徒战斗为唯一目标的圣殿骑士团中，团员互相称为修士某某，到死都只留下名字，而没有姓氏。

圣殿骑士团的僧侣服装，都是白底色，在胸前画有红十字的样式。他们都发誓甘于清贫，对上帝绝对服从，并一生保守独身——这与其他修会的僧侣并无二致——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还要加上一条誓言，那就是“消灭异教徒”。

若以尚在俗界时的社会地位来看，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大都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下层人士。

西欧封建社会中，所谓“骑士”指的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但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在加入之前并非封建诸侯属下的骑士，而是像日本“浪

人”一样的无业者。中世纪能够受到教育的，仅限于神职人员和上流社会的人士，圣殿骑士团的团员以前大都是没有知识的人物，对世俗社会也没有多大影响。

但这些人与中世纪西欧的平民一样，拥有很强的信仰之心。他们志愿前往中近东，身披白底红十字的制服，常常以死于异教徒的剑下而告终。他们的生命，就此长眠在远离故乡的东方土地上，没有墓穴，没有名字，也没有关于他们容貌的记忆。

本卷封面上以头盔覆盖面容的圣殿骑士团群像，就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这些骑士们的精神风貌。

作为为全体基督徒的圣地耶路撒冷执行防御任务，坚持在前线作战而不求回归故土的骑士组织，圣殿骑士团收到了来自西欧基督徒的大量捐助和遗赠。

捐献的内容包括耕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也包括现金和其他类型的动产。这些产业在圣殿骑士团的管理下，从耕地上生产为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提供的小麦，建筑物则大都被变卖为现金，而并没有作为房产经营。

十字军国家内设立的宗教骑士团与西欧的修道院一样，对团员入团时所捐献的私人财产加以管理。由于圣殿骑士团从团长以下都是社会中下层出身，团员所捐献的财产少得可怜。因此，圣殿骑士团的初始运营费用来自现金捐助。

创立30年以后，圣殿骑士团的功绩已广为西欧社会所知，从此开始得到了远超必要经费的捐款。此时，圣殿骑士团开始对外投资。从此开始，圣殿骑士团总部为了金融管理，设置了专人处理投资业务。他们虽然不得不生产商品，却不直接进行商品贸易。圣殿骑士团所生产的商品就是货币，而在中世纪参与此类活动的，就是当时的金融家。

圣殿骑士团从事信贷业务的客户，除了十字军国家内的国王和小领主，还包括骑士团仇视的对象——穆斯林。导致圣殿骑士团后来悲剧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过度介入金融行业，导致其运营费用出现问题。

虽然骑士们都是不领薪酬侍奉上帝的，但宗教骑士团的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

因为这些没有俸禄的骑士，需要相当数量的活动经费。

首先，重装骑兵的装备包括钢铁制的甲胄、剑、枪和盾牌。准备一套往往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四五套。这些装备都在西欧制造，而在中东当地只有一些冶炼作坊可以进行修理。因此，质量上乘的武器装备都要经意大利商人之手，从西欧远道贩运而来。

古希腊盾牌
（约60cm×60cm）

古罗马盾牌
（约60cm×90cm）

圣殿骑士团的盾牌
（约60cm×120cm）

对骑士不可或缺的战马，也要从西欧进口而来。十字军也从中近东买入阿拉伯马。身穿厚重甲胄的骑士们乘马在战场上驰骋，发挥了阿拉伯马的特点。体型最大的战马产自西欧的弗里斯兰。宗教骑士团的马厩中以阿拉伯马居多，而骑士的随从则使用弗里斯兰马。这样，仅仅是战马一项，费用就相当高昂。

一般来说，每个骑士有三五个随从。随从有时是轻骑兵，但大多数时候是步兵。这些随从既有从西欧前来的，也有在当地雇佣的改宗基督教的突厥人。为他们提供武器、服装、军粮和住宿，则是十分必要的。

对骑兵非常重要的马夫们，则是不发工资就不服务的。每位骑士都配备有多匹战马，因此需要相应数量的马夫，而这些马夫除了服务马匹，也兼任骑士的随从。

此外，骑士团内部的各种事务，也有专人来管理。因此，历史记载的圣殿骑士团有300名骑士，实际数量达到这一数字的10倍。而高昂的管理费用则都要圣殿骑士团自己来承担。

在此之外，骑士团所拥有的城堡的建设费用，以及维护这些城堡的必要费用，都是高额开支。

总之，在宗教骑士团这类组织当中，运营所需要的资金相当高昂。捐献给骑士团的资金，除了运营过程中所使用的部分以外，大部分被用来投资，这大概是由社会中下层出身人士所组成的圣殿骑士团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式。

圣殿骑士团所放的高利贷，往往以穆斯林为对象。因此骑士团逐渐避免与穆斯林发生摩擦，使消灭异教徒的原则无法得以实现。但如果真的投入战斗，圣殿骑士团的勇武依然是与此前相同的。他们完全不欠缺勇气，在勇于献身这一点上，比十字军国家内的其他人都强烈。

拥有这一特征的圣殿骑士团，并不考虑自身的座右铭。也许是由于骑士团中欠缺这方面的思考能力。他们完全是理论方面的门外汉，最多只能附和着第二次十字军倡议者贝尔纳的话：

“穆斯林是恶魔的化身。面对他们，我们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连根铲除。杀啊！杀啊！必要之时，我们要奉基督之名杀身成仁。”

这位贝尔纳死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天主教的圣人。这位信仰坚定，勇气远高于时人的朴素修士，叫喊的是“杀啊！杀啊！”的口号。圣殿骑士团的军事行动，简单概括就是迅速出动，杀人，然后快速归队。研究者常常称其为一千年前的特种部队。而这一特种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自法国。

同时代同一地点活跃着的圣约翰骑士团，则与圣殿骑士团相当不同。

医院骑士团

首先，与身着白底红十字制服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圣约翰骑士团的制服是黑色的，胸前则是红底白十字图案，也有黑底白十字图案的制服。在作战时，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胸甲上覆盖的是白底红十字的胸衣，而圣约翰骑士团覆盖的胸衣是红底白十字。

圣殿骑士团的骑士，有身着统一制服的习惯。在城内街头通行时，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身穿胸前带有大红十字的白色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

而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则完全身着黑色和棕色的普通修士服装，胸前绣着小型的白色十字。骑士团的成员大都来自西欧社会的上层，在他们的房间内放置着饰有家族纹章的银器。

圣约翰骑士团创立的时间比圣殿骑士团早半个世纪。在耶路撒冷还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时代，意大利的滨海城邦中最早从事东方贸易的阿玛尔菲，就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欧基督徒修建了医院。这座医院建立在朝圣者首先要瞻仰的耶稣基督圣墓教堂旁边。从此，以施洗者约翰为守护圣人的医疗集团，就作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先驱开始运营了。

从圣殿骑士团创立的1118年开始，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进入了守势。圣约翰骑士团也相应地从单一的医疗服务，发展为以防御异教徒为目的的骑士集团。此前以医生和志愿者为主的人员结构，转变为以医生和志愿骑士为主。

与圣殿骑士团不同，圣约翰骑士团的医生和骑士都必须是贵族出身，要求加入者是封建领主家族的男性后代，来自西欧的上层社会。在《罗得岛战记》中，大量记述了相关的情况。因为出身的限制，圣约翰

骑士团的志愿者人数并不多，常少于同一时期记载中的圣殿骑士团。

十字军时代骑士团的武器装备

由于限定骑士必须为贵族出身，与规模较大的圣殿骑士团相比，这使圣约翰骑士团获得了一些优势。

属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在当时大都是比较有学识的人物，其教养与武力显得十分相称，也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与圣殿骑士团的狂热暴力形象相比，圣约翰骑士团的修养要好得多。

我一直将全称为“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组织，简称为“圣约翰骑士团”。在与这一骑士团相关的作品《罗得岛战记》中，作者将其称为“罗得岛骑士团”，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下卷中，这一骑士团以“马耳他骑士团”之名，在奥斯曼帝国的围攻之下，完成了一次气势磅礴的保卫战。这些守卫不同地点、不同名称的骑士团，都是不同时期的圣约翰骑士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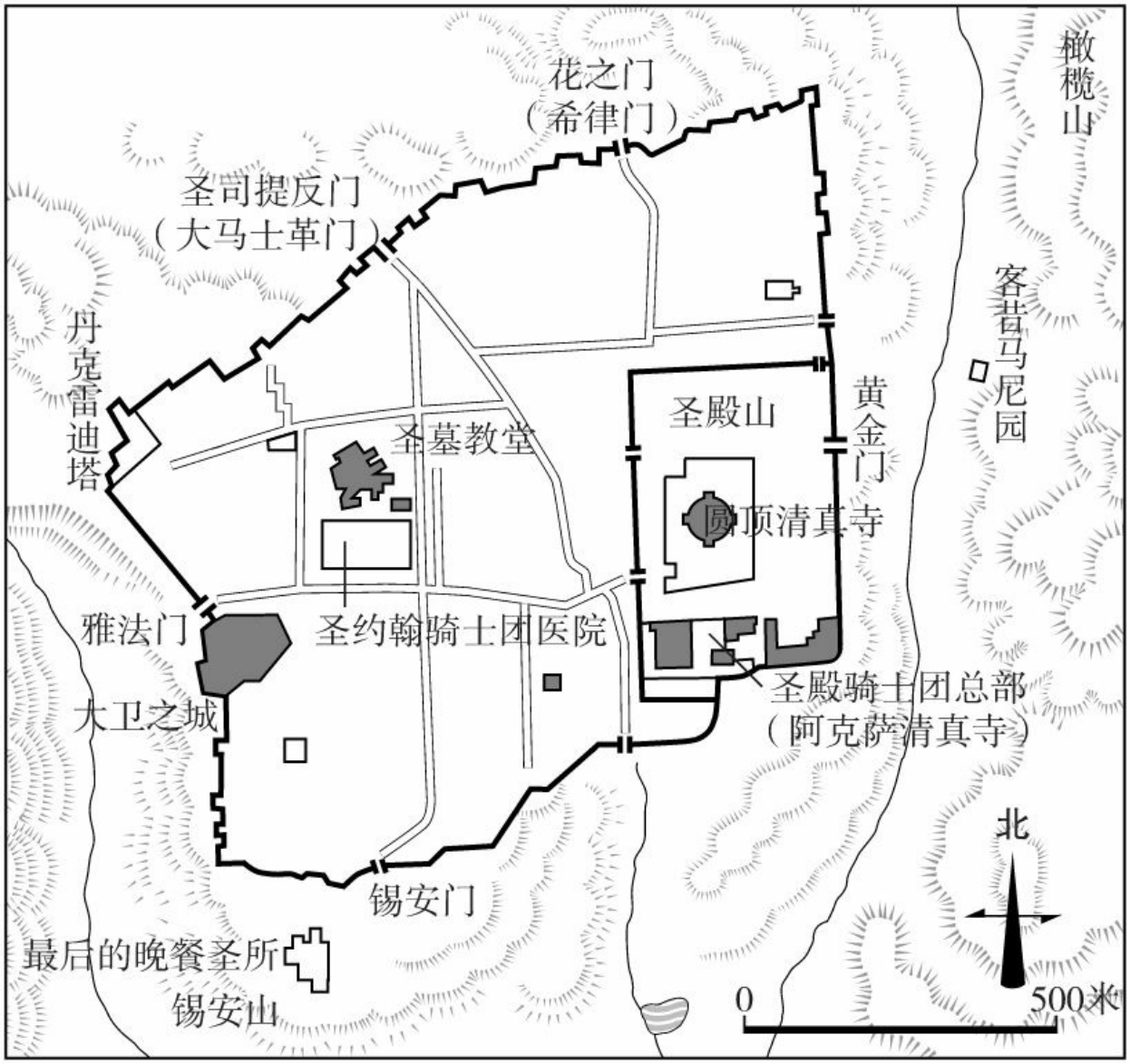
但在圣约翰骑士团最初的创立地点耶路撒冷，它明确的本质就是“医院骑士团”。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史书，大多数情况下都称其为“医院骑士团”。与只和穆斯林做斗争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一直为朝圣者提供医疗服务。

在圣约翰骑士团加入作战职能以后，医生仍然处于最高的地位。每一位骑士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周一天，或者在战事结束后连续数天作为医生的助手，为医院收容的病人进行服务。在十字军势力处于守势以后，圣约翰骑士团虽然执行防御的任务，但一直坚持其本职工作。

这一点也表现在圣约翰骑士团所选择的工作场所上。在医院骑士团的建筑物中，最大的房屋是病房。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中，为患者提供的房间很大。能够治疗2000名患者的医院，得到了穆斯林的好评，成为阿拉伯和突厥医生常常访问的机构。

对以战斗为职业的骑士来说，需要广大的空间来放置马匹。圣约翰骑士团没有搬迁到新的总部，而是选择在总部之外新开辟一片场地作为马厩。

由于耶路撒冷完全处在基督徒的控制下，圣殿骑士团选择了没收后的清真寺作为自己的总部，但医院骑士团并没有这样做。圣殿骑士团的总部位于醒目的金色圆顶清真寺，而医院骑士团则与阿克萨清真寺此起彼伏的祈祷之声并存。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们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惯与圣所，体现了超越宗教差别的智慧。



十字军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城市图

对于所捐赠的不动产和动产，医院骑士团的使用方法也和圣殿骑士团不同。

圣约翰骑士团通常将自己的耕地和在西欧得到的土地委托给当地人耕作或管理，而不是出售以换取现金。在中东的土地往往委任给穆斯林管理，负责耕作的也是穆斯林农民。因此，与圣殿骑士团主要接受西欧运送来的农产品不同，就地获取食物的圣约翰骑士团不必向意大利商船

支付运费。

对于捐献所得的房产，圣约翰骑士团也选择了出租，而非出售的方式将其处理。渐渐地，医院骑士团在西欧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不动产。

由于医院骑士团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它并未染指金融业。其军费开支委托耶路撒冷国王进行融资，获得一些低息贷款。

圣约翰骑士团的人数虽少，运营费用却并不低于圣殿骑士团。

以所拥有的城堡数量来衡量，医院骑士团比圣殿骑士团还要多些，其中不少是在与穆斯林控制区接壤的边境地带建设的城堡。一千年后仍历历在目的“骑士之城”，就是由医院骑士团从零开始建设，并负责防御的要塞。为了维持各地兴建的城堡，骑士团需要大笔经费开支。

医院骑士团的团员从加入伊始，也需要将私人产业完全捐献。由于成员都是贵族出身，医院骑士团只要求加入者捐献自己名下的财产，而不是家族的财产。这样下来，仅靠入团时的捐献，并不足以为随从和马夫支付工资。可以说，医院骑士团缺乏长期固定的财源。最终，它也不得不开始发放贷款。

留在西欧的医院骑士团战士们，与日本的“在家僧”极为相似。圣约翰骑士团要比以“第三等级”而将在家修行制度化的圣方济各修会早100年。而在此之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往往成为枢机大臣、公卿将相或王侯。这些大人物一开始时，都是“在家僧”。

长期正常运转之后，圣约翰骑士团就能够成功地利用其在西欧的地产了。毕竟，除了圣殿骑士团的各项开销之外，医院骑士团还有一大笔购买药剂的支出。

在医生与患者大部分来自西欧的十字军时代，药剂供给也大都来自西欧。医院骑士团在西欧捐献的耕地中，实践草药栽培的计划。为了将

干燥后的草药运往中近东，医院骑士团买下了两艘船。药剂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由自身拥有的船只运送。相反，圣殿骑士团就完全不用关心海上的事务了。也是因为如此，当十字军势力被逐出巴勒斯坦以后，圣约翰骑士团还能够从海路撤退到其他地区。

到1118年圣殿骑士团创立以后，圣约翰骑士团也开始以与穆斯林作战为目标。但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与圣殿骑士团完全不同。

圣殿骑士团成员的那种“杀啊！杀啊！”叫喊的气势，非消灭异教徒不可的过激的原则，在圣约翰骑士团之内完全不存在。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用他人的言论来为自己的成员洗脑，而从自身的存在意义出发，用理论武装了自己。

在圣约翰骑士团遗留下来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多少对骑士们内心想法的介绍。而在“骑士之城”内部回廊拱门上雕刻的这段话语，却多少反映了这一骑士团的宗旨。原文为拉丁文，是这样的：

“Sit tibi copia， Sit sapientia， Formaque detur， Inquinat omnia sola， superbia si comitetur。”

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

“你们可以享受富足、智慧与美貌所带来的喜悦。然而，如果因为傲慢而妄自尊大，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会受到污损，而陷于卑俗。”

这段警句，是以当时西欧社会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写成，而作者就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这段话，自然不是只知道“杀啊！杀啊！”的圣殿骑士团能够写出来的。

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战斗方法也完全不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并不会贸然从城堡出击，相反，会以据守的方式达到战略目的。

骑士们都是十分宝贵的战斗力。因此，骑士团缺乏历史记录，部分原因是由于要保守秘密，而在骑士团员被穆斯林俘虏之后，一般会用交换俘虏或者支付赎金的方式，来努力保证骑士得到释放。

此外，圣约翰骑士团较少出击的原因，也是由于其大量成员在战场服役不足一年，就回到医院中进行服务。

相反，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就很少用交换俘虏或缴纳赎金的方式恢复自由。他们当中被俘的，往往会死在穆斯林一方的牢狱之内。

此外，两大骑士团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骑士的出身地。圣殿骑士团的全体成员几乎都来自法国，而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则来自西欧各个国家。

在圣约翰骑士团当中，有许多来自法国的成员。然而法国人也分三类。来自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的属于法国北部人，来自奥弗涅地区的属于法国中部人，而来自普罗旺斯的则属于法国南部人。此外，还有来自英国、德意志、意大利各地的成员。圣约翰骑士团中很少有西班牙人。这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正处于针对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之中。

来自同一地区的十字军成员，常常一起行动。在防守城堡的情况下，往往是来自同一地区的成员组成一个分队。

从骑士团长的国别来看，圣殿骑士团的历届团长全部由法国人担任，而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除了法国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英国人、德意志人，甚至还曾经有过葡萄牙人团长。

形成医院骑士团的国际化特点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

第一，由于医院骑士团从事医疗活动的医生已经组成了不分民族的混合队伍，在同时进行的战斗活动中，也就继承了这一传统。

第二，在中世纪西欧，无论是皇帝还是王侯，都不与自己国内的女性结婚，而是会与其他国家或领地内统治者的家族联姻。由于政治婚姻的缘故，全欧洲都发展成为了混血的社会。

全部以贵族身份入团的医院骑士团成员们，都来自西欧上层社会。他们自然大都是混血的，很多人生在德意志，却拥有法国的血统。骑士团的正式通用语是拉丁语，日常说法语，并没有人对此感到不适应。

而普通平民则一般与附近的人结婚。因此，大多数来自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团员都不讲德语或意大利语，在正式场合和日常情况下都说法语。

从两大骑士团的相互关系看，它们既不经常单独作战，也很少共同战斗，而是分别与耶路撒冷国王的军队一起，与穆斯林作战。与以勇气著称的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会在有良机的时候出战，而在不适合作战的时候按兵不动。

但这两大骑士团互相也没有任何竞争的关系。虽然双方特点迥异，但在防御十字军国家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总之，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是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手中的利剑。两者都是十字军时代的“特种部队”。

十字军时代的城堡

除了对伊斯兰文明的关注和对基督教、犹太教圣地的巡礼之外，令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旅行的人非常感兴趣的景点还包括十字军时代的城堡。在中近东处于英法两国统治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许多来自欧洲的研究者，对十字军时代的城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从这些城堡的建筑样式来看，早期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它们受到了拜占庭帝国城堡的很大影响。

然而，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英法两国中世纪城堡开展了长期的调查，然后来到中近东，写成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研究论文。他认为，十字军时代的城堡完全不是受到拜占庭城堡的影响，而是在当时西欧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下建造的。

这位年轻学者的名字叫作T.E.劳伦斯（T.E.Lawrence），后来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称于世。此后，劳伦斯的历史研究向其他方面转移，但他关于十字军城堡的看法却未曾改变。

此后的研究者转而研究十字军城堡与当时西欧城堡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新观点，为十字军城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逐渐地，各个方面的情况清晰了起来。

12世纪以来十字军在中近东建设的城堡，从一开始就深受同时代西欧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但到了这一世纪的后半段，十字军的城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建筑风格，到13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堡反而受到了十字军

的城堡建筑风格的影响。

1150年到1200年的12世纪后半期，基本上包括了1148年出征的第二次十字军，到1190年出征的第三次十字军之间的时期。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给十字军国家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十字军的失败，也让西欧从十字军的狂热中醒来。皇帝和王侯们都没有再次发动十字军的意愿。从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大量兵力的支援，长期兵力不足的状况一直无法得以缓解。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耶路撒冷国王能力的低下，十字军国家的领导力量也日趋弱化。

与之相反，穆斯林一方的领导人曾吉、努拉丁，以及即将出场的萨拉丁，都是能力出众的强势领袖。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常备军虽然善战，兵力却实在有限。它们能够作为特种部队发挥有限的战斗力，却不是能够左右战争结果的军事力量。

在这一状况下，大量建造能够有效利用少量兵力的城堡，就成为最为可行的防御方案。中近东的十字军，集中于12世纪的后半段建造城堡。

结果在这半个世纪当中，十字军建立的城堡数量和完整程度，超过了同时期西欧的城堡。出于战争的必要，十字军的城堡的战略功能也非常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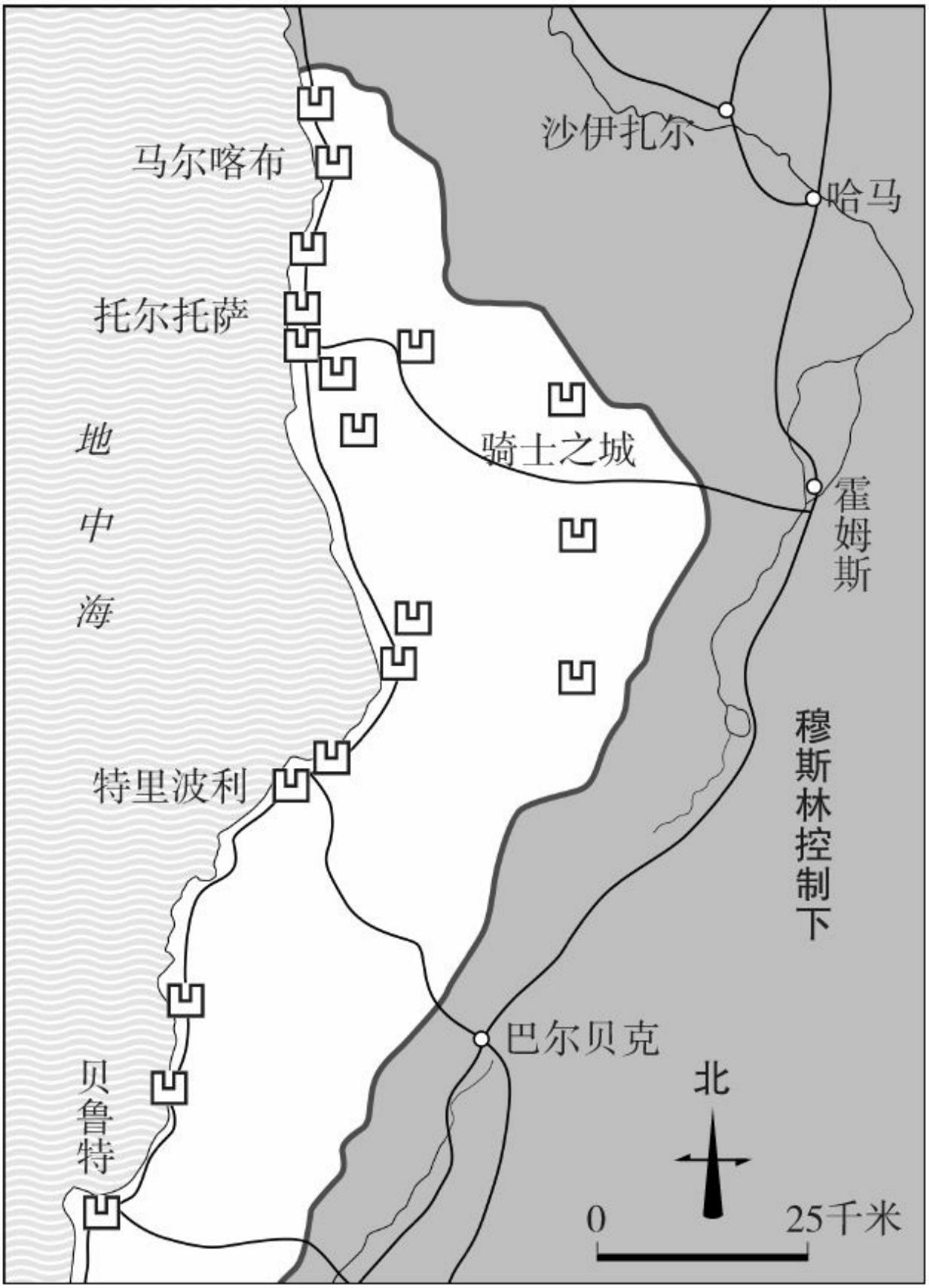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以后，英国国王狮心理查特别将十字军城堡的建筑方法带回了英国。

但从城堡来说，其形制绝非只有一种。根据建设所在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守卫城堡的军事力量的情况，城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类型。

中近东十字军所建立的城堡，大体上可以分为内陆和海岸建造的两种类型。

在内陆所建的城堡，以医院骑士团建造的“骑士之城”为代表，其目的是作为防御与出击的据点，以城堡的威严风貌而令进攻之敌心生恐惧。通过城堡的建立，能够成功地将周围的地区置于十字军的控制之下，因此需要在内陆地区大量建设城堡。

而在海岸地带建设的城堡，则能够与海港城市互为犄角之势，既可以作为进攻的基地，也可以作为防卫的据点。在这些城堡的作用之下，以城堡为中心的港口防御就得以完全有效地实施了。


沙伊扎尔
哈马
马尔喀布
托尔托萨
骑士之城
霍姆斯
地中海
穆斯林控制下
特里波利
巴尔贝克
贝鲁特
北
0
25千米

耶路撒冷周边的主要都市和城堡

这类城堡比比皆是，却缺少典型的例子。沿着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建立的若干海港城市，大都为这些城堡所保卫。城堡往往沿着城市原来的城墙而建，因此，当城堡建成之时，海港的防御屏障就形成了。

在中近东相同区域互相斗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中，只有前者热衷于建造城堡。这一点需要在此阐明。也就是说，为什么穆斯林眼睁睁看着十字军修建城堡，自己却从不相应地建造城堡与之对抗。

这首先自然是因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所致。

如前所述，中世纪欧洲的贵族阶层，往往居住在城堡中。而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则往往住在城内的庭院之中。

在穆斯林的庭院中流着清澈的活水，种植着树木，栽培着各种各样的花朵，还有鸟儿交相飞过。因此，穆斯林的上层社会居住的，是地上的乐园。屋内流水的清凉房屋，能让主人在微笑中安然入眠，其居住环境比简朴的西欧式建筑舒适很多。

因此，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苏丹与各地的埃米尔们，自然不会考虑在城市之外建设城堡了。即使他们攻下了十字军的城堡，也不会像基督徒那样，将其作为进攻与防御的基地。

穆斯林的军事行动也不是利用城堡，而是将城市内编成的军事力量一举投入。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像西欧人一样主动建造城堡。

此外，西方人喜欢建造城堡，还有一点历史原因。早在古罗马时代，来自欧洲的远征军就开始在近东地区修建城堡了。

相反，东方的穆斯林是以游牧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并没有建筑城堡的传统。

以上的诸多原因，证明了中近东的城堡，完全是十字军一方的设施。

那么，这些城堡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

首先，必须考虑的第一点是，它们是在哪里建造起来的。这些城堡并非建造在高山上——高山上的城堡固然利于防御，却不利于主动出击。因此，十字军通常把城堡建筑在高度适当的地点，参考防御塔的高度建设起来。

建造于内陆地区的“骑士之城”，首先是为了从往返于内陆和海港都市之间的商队收取过路费，而在周边穆斯林领主的主持之下建立起来。到了第一次十字军的时代，十字军才夺下这座城堡。因此，将“骑士之城”重建为十字军风格城堡的最初人物，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安条克公国的摄政丹克雷迪。

此后，这一城堡划归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并最终转入医院骑士团之手。在这一时期，经过大力改造，“骑士之城”成为威严的山上城堡。

这座在骑士团眼中不得不闲置的城堡，只完成了一半的建设。建造“骑士之城”时，利用了伊斯兰时代、拜占庭时代乃至古罗马时代的旧石材。不能利用的旧城墙，则尽数加以拆毁。

“骑士之城”建筑在距离地中海东岸35公里的地方，海拔650米，可以俯瞰海港城市特里波利与内陆的产品中转地霍姆斯之间的道路。

当建造地点确定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这一地点建设地基。由于城堡的重量相当大，地基必须十分坚固。此外，在地震多发的中近东建设城堡，还必须考虑防震的问题，而这一点与没有大地震的西欧不同。

供水的保障，也是在中近东建设城堡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无论城

堡建于何处，都务必保证供水的畅通。如果泉水和井水不足以供应城堡使用，最普遍的解决办法是修建大的蓄水池。在中东地区，降雨非常非常稀少。因此，所有的城堡都建有巨大的地下蓄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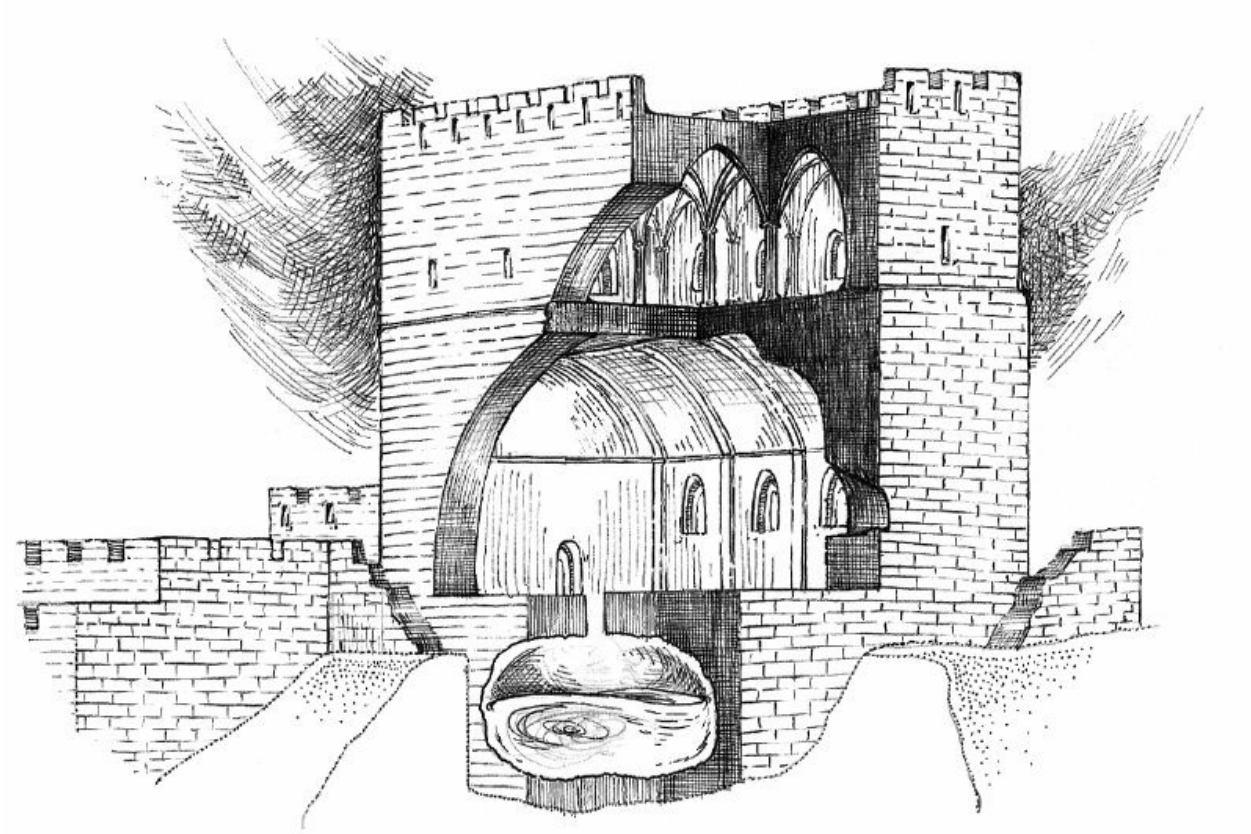
城堡建设之初，需要考虑的设施就是大型蓄水池。

除了蓄水以外，排水也非常重要。建设排水设施的主要目的，包括预防疫病，以及在被包围时保证城堡内的卫生。城堡内的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战斗人员，而一旦发生疾病，对城堡来说就非常危险。

考虑排水问题，首先要在城堡的最外侧挖掘壕沟。

壕沟的作用还包括延阻敌军的进攻，因此在城堡周围非常有必要修筑壕沟。对于长期兵力不足的十字军来说，建造壕沟显得尤为重要。与同时代西欧城堡周围的单层壕沟相比，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修筑的城堡周围一般要修筑两圈壕沟。

在海岸边所建城堡的壕沟内可以引入海水，但在内陆的城堡中，由于缺乏雨水补给，基本上无法注水。像“骑士之城”这一级别的大型城堡附近，有古罗马时代留下的水道桥可供利用，由此建设的蓄水设施满足了城堡的要求。但其他的城堡则不一定能保证水能引入壕沟。这大概是十字军的城堡不得不建造两层壕沟的原因。壕沟的深度常常达到10米以上，其建设作业并非易事。



城堡内建造的蓄水池

在壕沟建设完成之后，接下来需要建造的是城堡的石墙了。建造石墙不必考虑地基的问题，只要在壕沟附近建设就可以。从壕沟内爬上来登上城堡墙壁的敌兵本来就没有多少，上来之后还有当时的“狙击手”弓兵等着他们。

在10米深的壕沟上耸立的墙壁，高5～7米就足够进行防御了。墙壁的前后距离大约20米，以半圆形的塔楼构成一百八十度的强化防御。

城堡与城外联系的路线，则由架设在壕沟之上的吊桥来保证。吊桥后面的城门两侧，往往有高耸的塔楼防御，特别是在面对穆斯林的东面，建造塔楼是十分必要的。

“骑士之城”全长1500米的石墙外侧还包围着一层墙面。在城的内侧，有一座高耸的城楼。因此，在外城被攻破的情况下，守军还可以退

到内城进行防御。

以“骑士之城”为代表的双重壕沟，双重城墙，双重城堡的建筑样式，在十字军的城堡中多少有共通之处。为了能够合理地利用少量兵力进行防御，十字军有必要采取这样的建筑样式。

至于不同的城堡之间如何联系的问题，十字军想到了不同的方法。一般来说，采用狼烟联系，是城堡之间联络的主要方法。而十字军也学习了中近东的穆斯林对手，采取了使用信鸽联系的方法。显然，为了对临近的敌情加以传递，十字军的城堡之间常常互相联络。

医院骑士团控制的城堡，如何与圣殿骑士团控制的城堡进行联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得而知的了。历史上没有留下圣殿骑士团受到进攻时，医院骑士团前往救援的记载。相反的情况也没有记录。总的来说，十字军时代的两大常备军事力量，都是独自开展军事行动的。

在古罗马帝国的时代，监视塔和城堡驻扎着军团，一旦收到狼烟信号，就会派出骑兵进行联络。罗马帝国一直拥有单一的指挥系统，因此各个城堡可以形成一个集合的安全保障，就是罗马人自己说的“防线”（拉丁语：Limes）。

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建设的城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因此，并不能成为“防线”式的安全保障。它们只能作为据点进行防御，而无法指望附近的“军团基地”派兵援助。毕竟，在十字军的时代，西欧人并没有任何“军团基地”。

而且，在十字军国家中移植了西欧封建制度以后，军事指挥也是分散的。总的来说，十字军国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过统一的领导权，其防御系统也是社会特征的体现。

十字军的城堡作为进攻与防御的基地，必须考虑与西欧不同的中近

东的地形。当时的西欧人建筑城堡的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因此十字军在中近东所建的城堡都与“骑士之城”十分相似。城堡的形制深受地形的影响。

例如在安条克公国境内同属医院骑士团的贝尔沃亚（Belvoir）城堡就是四角形的。它建筑于平地之上，被医院骑士团称为Castrum，这个词原先被用来指古罗马军团的基地。也许此地有千年之前的罗马军团基地的遗迹。

另一座因地形而建的例子，是医院骑士团建设的名为马尔喀布（Marqab）的城堡。这座城堡是三角形的，利用高地的地势而建成。

不论城堡的形制因地形如何变化，它们基本上都有壕沟和石墙，并且有内侧的城墙。

上述的三座医院骑士团所建的城堡，都是在对最初建筑的全面改造基础上建成的。

为了解决长期兵力不足的问题，许多城堡分两次建成。第一期工程在第二次十字军与第三次十字军之间的半个世纪内，而第二期工程则在第三次十字军以后。

在第一期工程时代开工的，都是医院骑士团的城堡。而到了医院骑士团建设第二期工程的时候，圣殿骑士团才开始修筑城堡。

原因很简单：修建城堡需要巨大的开支。而从资产来对比，圣殿骑士团比医院骑士团差了很多。

还需要提的是人力方面的情况。

直到四个世纪以后，西欧才开始大量出现善于修建城堡的工程师，以取得技术的革新。在十字军的时代，建造城堡主要靠的不是技术，而

是人力。

在这一方面，出身贵族的医院骑士团自然有优势。他们来到中近东之前，就在城堡里长大，前半生中所学到的知识，自然能在中近东派上用场。这就是医院骑士团在建造城堡方面遥遥领先的原因。相反，出身社会下层，没有城堡生活体验的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在修筑城堡方面只能甘拜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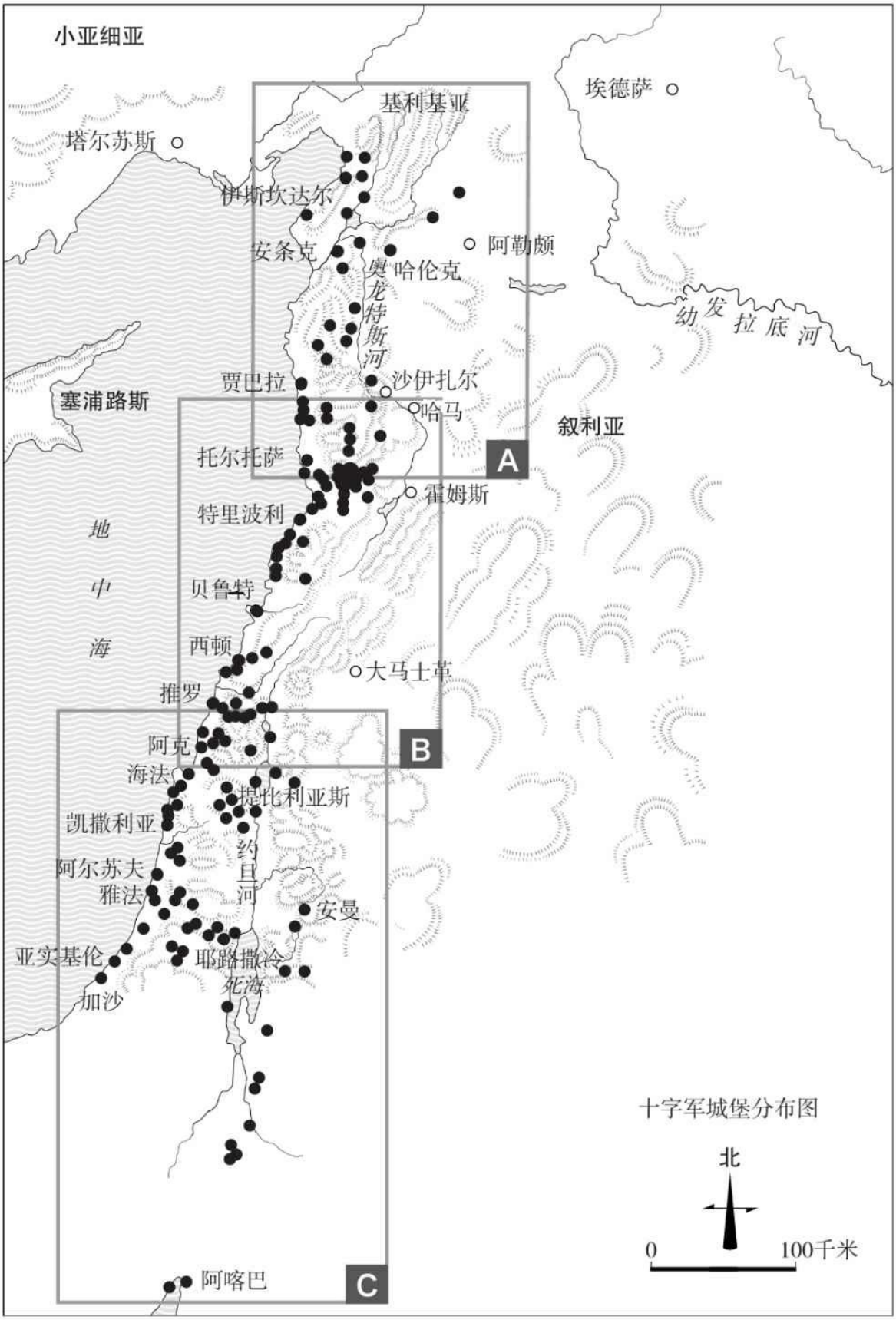
在硬件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的城堡，也在作为软实力的文化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来自牛津大学的年轻学者对十字军城堡与西欧城堡异同的比较，就体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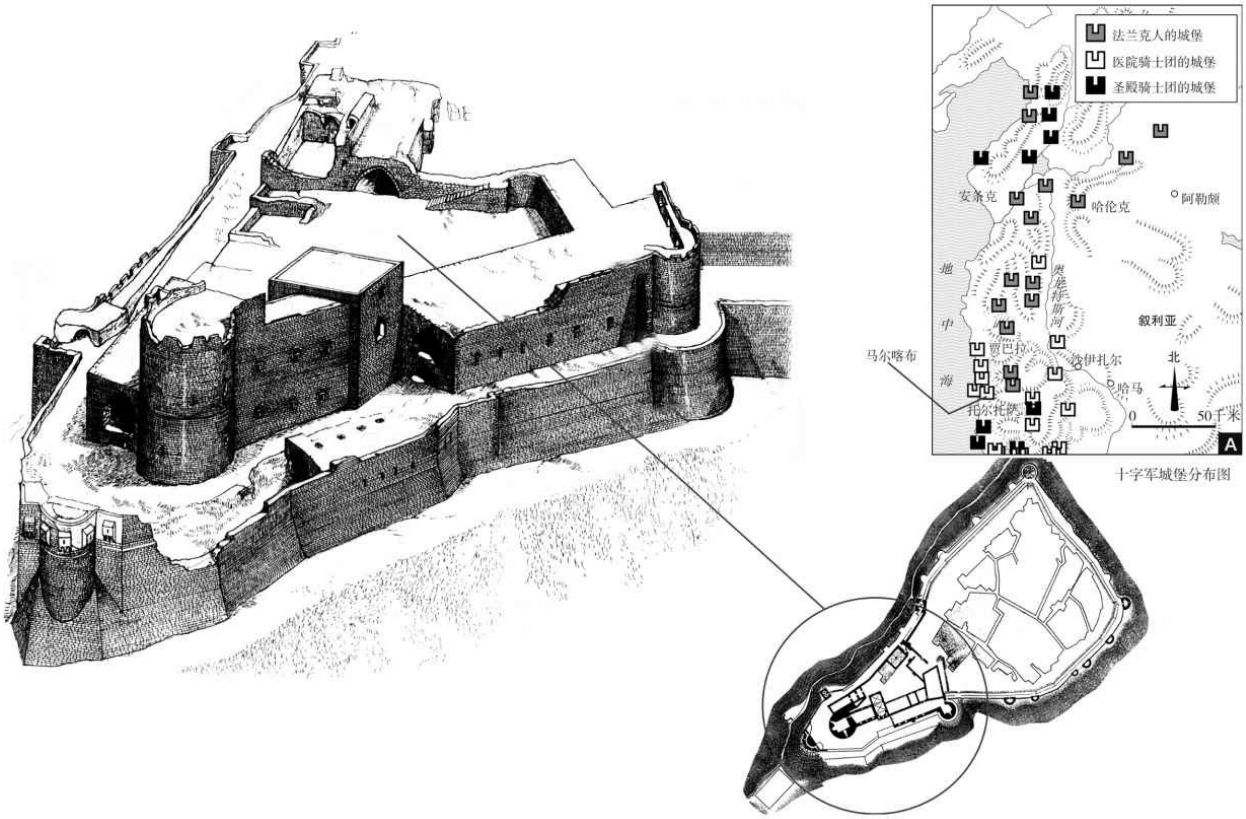
十字军时代的城堡总数超过了100座。如果加上规模较小而不足以称为城堡的要塞，以及用于监视敌军动向的塔楼，防御建筑的总数达到200多座。

这些城堡集中在中近东西部狭长的地域内。这些城堡与宗教骑士团、意大利人的贸易和海军支援一起，构成了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得以存续的三大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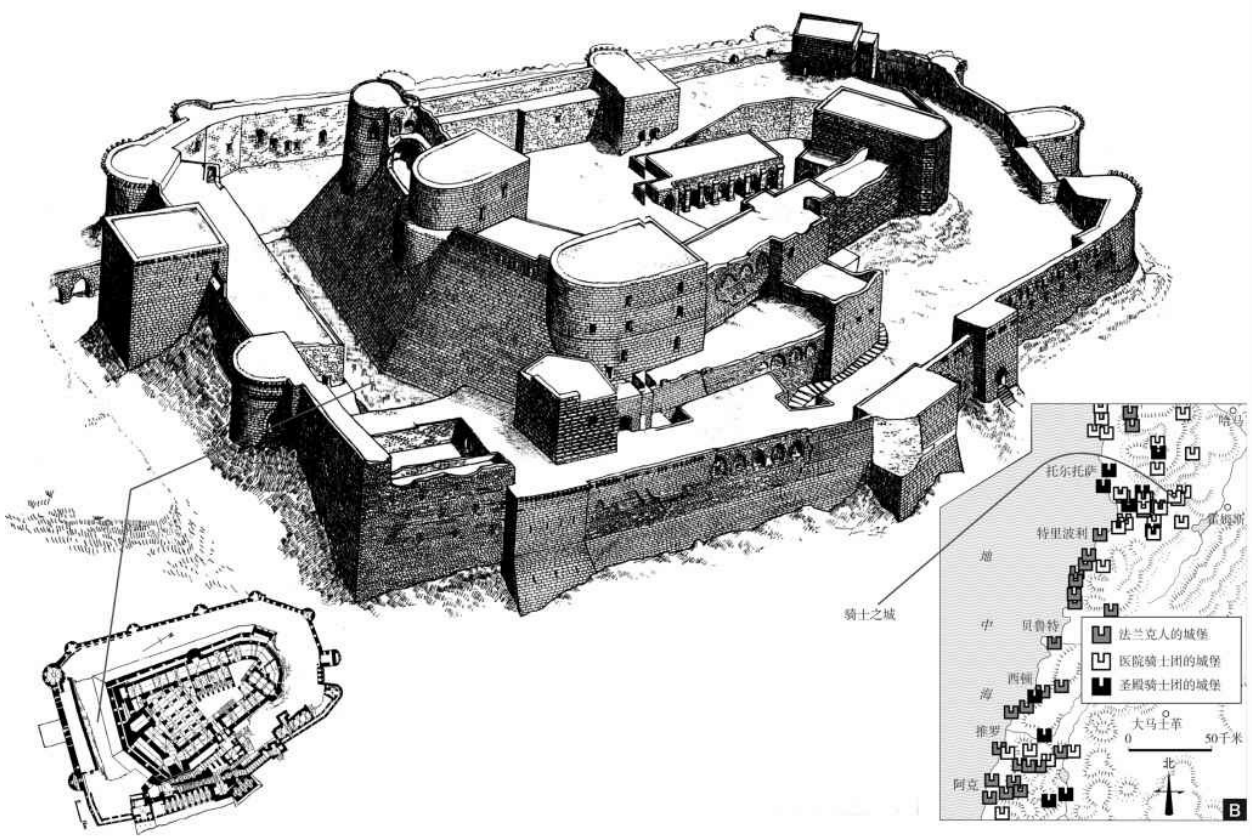
尽管现代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却始终未能统计出十字军所修建城堡的总数。十字军国家位于21世纪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境内。由于所处国家内部复杂的政局，对十字军时代历史的调查没有完成。很多地区是军事禁区，不对学术人士和普通旅客开放。此外，这一地区目前的居民主要是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对基督徒的遗迹并不关心。

对于已经确认存在的142座十字军的城堡，其中近一半由医院骑士团负责守卫。其他的城堡除了由圣殿骑士团守卫的以外，分别归耶路撒冷国王、特里波利伯爵、安条克公爵以及其属下的封建领主所有。每个小封建领主负责守卫的城堡不过一两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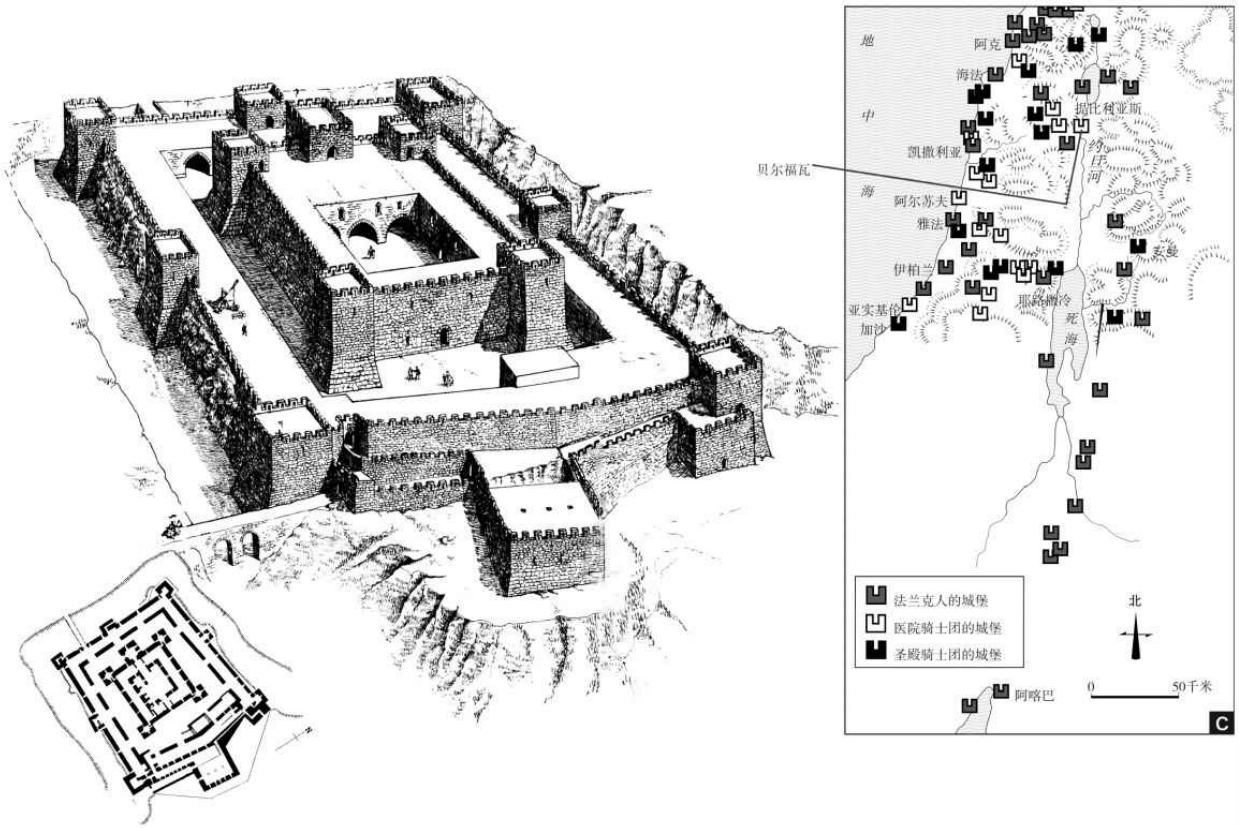

小亚细亚
埃德萨
基利基亚
塔尔苏斯
伊斯坎达尔
安条克
阿勒颇
哈伦克
奥龙特斯河
幼发拉底河
塞浦路斯
贾巴拉
沙伊扎尔
哈马
叙利亚
托尔托萨
A
霍姆斯
特里波利
地中海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B
海法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阿尔苏夫
雅法
安曼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阿喀巴
C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北
0
100千米


法兰克人的城堡
医院骑士团的城堡
圣殿骑士团的城堡
安条克
哈伦克
阿勒颇
地
中
海
奥龙特斯河
叙利亚
贾巴拉
伊扎尔
哈马
托尔托萨
马尔喀布
北
0
50千米
A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骑士之城
哈马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地
中
贝鲁特
海
西顿
推罗
阿克
大马士革
法兰克人的城堡
医院骑士团的城堡
圣殿骑士团的城堡
0
50千米
北
B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十字军城堡分布图

因此，中近东十字军所建的城堡，一半以上是两大骑士团负责守卫。这两个骑士团的人数虽少，却能保持常备的军事力量。但到底有多少人配置在城堡之中，却不为我们所知。

研究者目前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原因在于，其中有不少人战死，准确的数字就无法统计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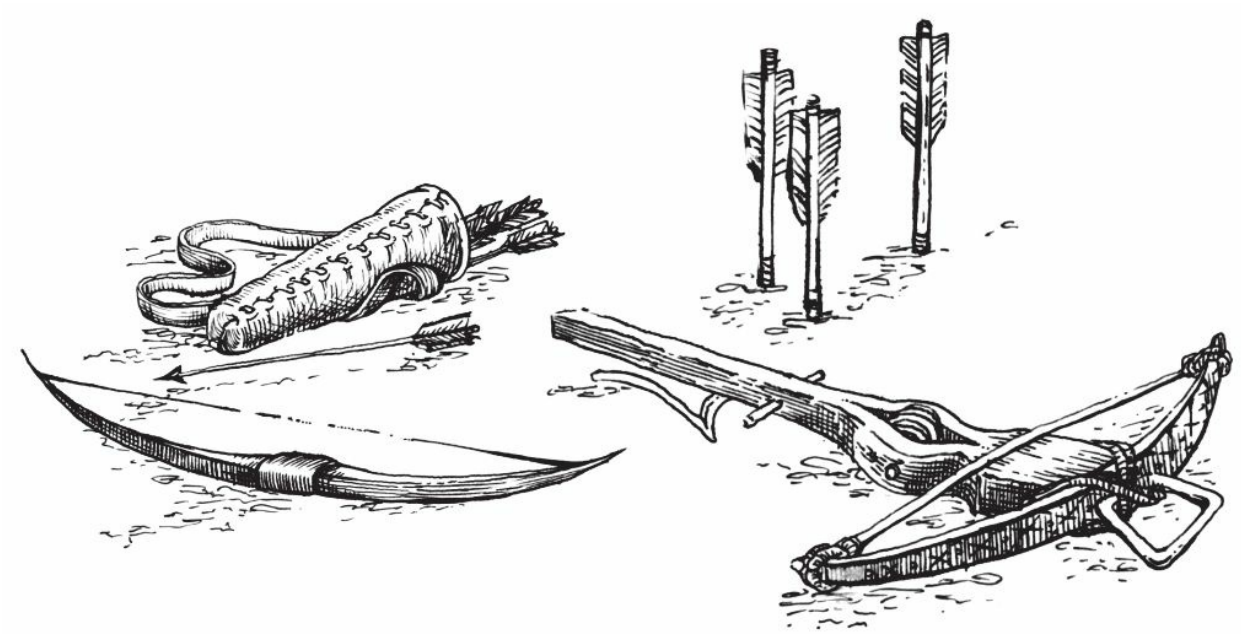
此外，在团员加入宗教骑士团时，他们都舍弃了俗界的地位，成为隐居的无名修士，一直到死。遗体一般都埋葬在教堂内，不为外人所见。

尽管如此，有时骑士团还是能够留下关于城堡情况的记录。提比利亚湖北侧所建的圣殿骑士团的萨法德城堡（Safad），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骑士团的记录，此城堡内驻扎着50名骑士、30名随从、50名改宗基督教的突厥步兵、300名弓兵、820名工人，以及400名穆斯林佣人，总计1650人。

但这一记录与实际的数字有差异。比如，在穆斯林前来袭击的时候，一部分从事修补工作的工人就会离开城堡。根据记载，1650人当中，有430人离开。

以“突厥子”（Turcopole）而闻名的改宗基督教的突厥步兵，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士兵和能征善战的战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墙上用弩射击，或者在塔楼上使用固定的投石器投掷石弹。他们与狙击敌兵的弓兵有分工上的不同。



通常的弓与弩

在比萨法德城堡规模更大的“骑士之城”的内城中的高塔上，居住着作为主要战斗力的60名骑士。而骑士以外的居住者，则可以通过城堡规模按比例估计。

我把在萨法德城堡内居住的300名弓兵称为“狙击手”，因为这些来自西欧的弓箭手们，一齐向天射箭，箭矢如雨，落在攻城的敌人头上。他们的射术比同时代的穆斯林强很多。

与之对抗的萨拉丁，后来不得不命令自己的兵士戴头盔并披挂出战，完全是因为城堡石墙上十字军狙击手的巨大威胁。率领第三次十字军的英国国王狮心理查的弓兵，各个都有罗宾汉一般的准头。

外面看上去威严耸立的城堡，内部十分简朴。骑士们只有最必要的家具，以及本地产的各色的绒毯，此外仅有的装饰就是防寒用的大马士革布匹了。骑士们身上只穿着僧袍，而下身只有一条衬裤。

虽然城堡内有壁炉取暖，在中近东木材短缺的情况下，能够接触明火的只有冶炼厂和厨房了。宗教骑士团的骑士们，说到底和修道院的修士没有什么两样。

监视周边广大领土的城堡，从50名骑士开始，一直发展到400多人守卫。对于成员数目曾达到500人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来说，保证每一座城堡都有足够的守备部队，是极为困难的任务。

成员数量较少的医院骑士团之所以能比骑士较多的圣殿骑士团负责更多城堡的守备工作，是因为耶路撒冷国王、特里波利伯爵等人属下小领主逐渐把城堡让渡给医院骑士团管理。此后，由英王狮心理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所率的第三次、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都将自己建设的城堡委任给医院骑士团来守卫。

这部分是因为出身贵族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欧领导人眼中比圣殿骑士团更有信用的缘故。此外，医院骑士团在中近东守卫城堡的成绩也颇具说服力。

然而，这些看上去建造完美的、难以攻破的城堡，存在着致命的缺

陷。

十字军所建的城堡的缺陷，是只从正面发起进攻的人完全看不到的。我所指的缺陷，是对城堡存在意义的怀疑。对努拉丁这样的敌人来说，十字军的城堡一直发挥着威力。问题在于，当新的敌人出现以后，城堡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从地图上看去，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处在伊斯兰世界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之中。在这一状况之下，十字军国家坚持了200年。

在第一次到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每次东征都是在进行了一两年军事行动之后就返回了西欧。两次十字军东征的间隔最长达到40年之久。这中间，为何还有基督徒生活在中近东，而他们又是如何在此地生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两点要素。

第一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存在。他们兵力虽少，却十分精锐，作为守卫圣地的志愿者，发誓埋骨于圣地，因此成为中近东常备的基督教军事力量。而中近东十字军国家最为苦恼的兵力不足问题，并不能为前来东征一两年的部队所解决。

十字军国家能够得以存续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对城堡的利用。这是在长期兵力不足情况下产生的战略之一，而由于穆斯林没有利用城堡防御的传统，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总之，对于十字军来说，除了八次远征以外，值得一书的就只有宗教骑士团和城堡了。但我所认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与海军力量，却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究其原因，自然是提供经济支援与海军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在十字架前发誓，立志守卫圣地而已。

中世纪的经济人

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直到第八次十字军，参加东征的人员，在穆斯林看来都是侵略者。从皇帝、王侯乃至普通的士兵，每个人都在十字架下面发誓要收复圣地。在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中，不仅骑士团员需要在十字架下发誓离开故乡守卫圣地，随从和普通的弓兵也要发下相同的誓言。无论是白底红十字，还是黑底白十字的制服，胸前的十字都代表着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中近东十字军所需的必要物资的海运工作，运送前来朝圣的西欧善男信女的工作，以及各种人力、战马、武器装备等运输的工作，都由意大利滨海城邦的船只来负责。

研究者一直将这些意大利人排除在十字军的成员之外。这是因为，他们并未在十字架前发誓守卫圣地。他们的服装上，也没有任何十字架标志。

但晚近的研究者也逐渐承认，意大利滨海城邦国家对地中海东部制海权的长期控制，为十字军国家的长期存在做出了很大贡献。即使在萨拉丁将叙利亚与埃及统一之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海军还是控制了制海权，使叙利亚、巴勒斯坦附近的海面上没有任何埃及的船只。此外，这些意大利人对经济贸易方面的贡献，则并没有人做深入的研究。

意大利四大滨海城邦国家

当然，这些意大利人的贡献并非为了基督教信仰，而是出于赚取金钱的目的。

在我看来，欧美人所著述的十字军历史中，包含着一点矛盾。他们认为，基督徒之所以要发动十字军东征，仅仅是由于十字架下发誓时的信仰之念。在我看来，这是有矛盾的。

欧美研究者常常赞赏那些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却在“解放”耶路撒冷，兑现自己誓言之后没有领土欲望，安然回国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却会责难那些在兑现对上帝所发下的誓言以后，留在中近东，获得并守卫自己的新领地的诸侯，认为他们拥有世俗的欲望。

然而，正是由于大量十字军成员在兑现誓言之后回国，导致收复的圣地陷入长期兵力不足中。结果，先是埃德萨伯爵领地被穆斯林攻取，接着安条克公国落入拜占庭皇帝之手，最后，耶路撒冷也被萨拉丁夺回。

对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来说，这就是现实。当得知埃德萨被穆斯林夺取之后，西欧派出了第二次十字军。在为耶路撒冷失陷而震惊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从西欧出发了。然而，这些军事行动都来得太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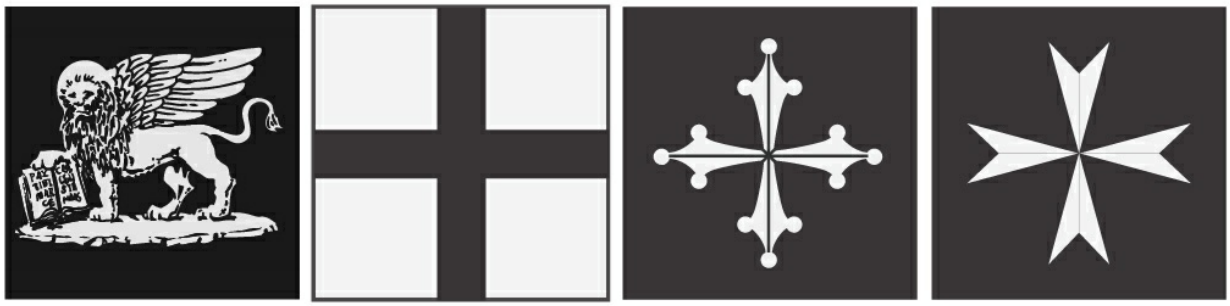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赞扬那些没有领地欲望和赚钱目的的人，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之初“上帝的期望”号令一下，基督徒就全部出发了。但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和自己的欲望相比，究竟哪个能坚持更久，在人性的现实中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我自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在我看来，以获取金钱为动机的意大利经济人，所做的贡献并不比在上帝面前发誓的十字军战士少多少。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这些意大利滨海城邦国家的商人，早在十字军

东征前200多年，就已经开始与东方的穆斯林做生意了。

各国的纹章



威尼斯　热那亚　比萨　阿玛尔菲

威尼斯的大教堂以圣马可为名，教堂前的大广场也叫作圣马可广场。这一名称是从9世纪开始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活动时，恰逢穆斯林反对基督徒的暴动。他们将当地修道院内安置的使徒圣马可的遗骸买回，藏在穆斯林所禁忌的猪肉中，运回了威尼斯。

圣马可是《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之一的作者，是基督徒信仰的圣人中，仅次于耶稣的使徒之一。他的象征是手拿《圣经》的狮子。因此，威尼斯将圣马可作为自己的守护圣人。至于威尼斯商人运回的圣马可遗骸是不是真的，倒没有人介意了。它是一种寄托了当地人情结的存在。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按与穆斯林开始贸易的顺序依次排列，分别是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

威尼斯商人从9世纪开始才出没于地中海东岸，而阿玛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同行们在此之前早就活跃在与穆斯林的贸易中了。

位于亚得里亚海最深处的威尼斯，和接近那不勒斯的阿玛尔菲，主要在地中海东部活动，而比萨与热那亚主要在地中海西部活动。比萨与热那亚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与近东的贸易则首先由阿

玛尔菲，然后由威尼斯的商人所主宰。

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半个世纪，耶路撒冷已经有了为朝圣者修建的医院，这就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前身，由阿玛尔菲商人建立。耶路撒冷当时还处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在穆斯林社会建立为其他宗教人士所设的医院，自然需要得到穆斯林的批准。而当时准许创立医院的开罗哈里发，与阿玛尔菲商人毛罗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样的友好关系，来自意大利商人“宗教归宗教、商业归商业”的一贯方针。威尼斯人也有“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的格言。

进入十字军时代以后，帮助十字军在近东海域作战的，是比萨和热那亚的人。

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都选择了陆路。两次东征的教训，使得西欧人了解到突厥军队出没的小亚细亚的风险。因此，收复耶路撒冷之后急剧增加的朝圣者们，几乎全部选择从海路往返。十字军的主力来自西欧北部，因而从这一地区前来的朝圣者数量最多。他们需要在漫长的旅行过程中得到安全的保证，因此会选择为对抗北非穆斯林海盗一直保持强大海军力量的比萨和热那亚两国的船只。

在十字军时代，此前一直充当近东贸易先驱的阿玛尔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为商人所主宰的阿玛尔菲共和国，被以征税为主要经济目标的君主国所吞并，活力逐渐丧失。打破“黑暗中世纪”的排头兵阿玛尔菲，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内为数众多的海港之一。其作为滨海城邦国家时代的纹章，转变为医院骑士团的纹章。

这样，比萨、热那亚、威尼斯三大滨海城邦，逐渐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他们运送的对象，从朝圣者开始逐渐扩大了。

此时，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尚处于能够自给自足的状态，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匮乏。

将西欧的封建制度移植到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主要的经济产业是农业。在西欧，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西欧基督教社会中的农奴生产力十分低下，而在中近东，农奴主要是穆斯林。有时小麦也需要从西欧运来。在这一状况下，如果有敌人靠近，十字军国家不得不将耕地转让给穆斯林时，为十字军做农田交易代理的也是意大利的商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和穆斯林进行交易。

虽然粮食生产可以在当地完成，但还有其他类型的商品需要进口。兵器、防具以及各类战斗用品，在近东都没有能够制作与西欧相同品质的作坊。中世纪西欧武器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生产的武器集中到威尼斯，意大利北部生产的武器集中到热那亚或威尼斯，再由商船运输到中近东出售。

从第三次十字军开始，十字军选择从海路出征。兵士和马匹的运输，都需要通过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船来完成。

作为这些“十字军特需”运输的主力，意大利商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东返回的船只，不仅载着支付高额船票的归途朝圣者，也满载了各种东方的特产。

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绒毯、摩苏尔特产的高级棉布、以“大马士革丝织品”著称的高级丝织品、弥撒时不可或缺的阿拉伯半岛出产的没药、中世纪贵妇们喜爱的波斯湾产的珍珠、亚洲各地盛产的各种宝石、以胡椒为代表的香料和阿勒颇产的石碱。西方人喜爱的各种东方商品，都能在意大利商人的货船上找到。

最后提一下阿勒颇所产的石碱。从古代开始直到今天，马赛和阿勒颇是石碱的两大产地。

马赛和阿勒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出产石碱的，而在中世纪开展石碱贸易的主要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会在沐浴时使用石碱，此外将

其运用在作战中。他们用溶解了石碱的水溶液浇洒敌船的甲板，石碱溶液的润滑作用令敌人在甲板上经常滑倒。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秘密武器了。

威尼斯商人如果在马赛购买石碱，并没有什么特产可以用来交换。而在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阿勒颇，他们可以用西欧的特产来交换石碱，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海军力量

中世纪地中海上航行的船只大都是桨帆船。无论军舰还是商船，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型。桨帆船与单靠风力航行的帆船相比，在风向多变的地中海航行更加方便，适合作为运输船。

意大利滨海城邦船只上的划桨手，并不是奴隶。滨海城邦会贩运奴隶到伊斯兰国家作为商品出售，但在自己国内不役使奴隶，因此在船上也不使用奴隶。

在伊斯兰国家中，基督徒常常被绑架为划桨手，而在本来人口就不多的意大利滨海城邦，划桨手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

除了200名划桨手之外，每艘船上还有30名水手专门负责与海盗作战。海盗船主要是穆斯林船只，其中的划桨手是基督徒奴隶，他们不与基督徒的船只作战。因此，意大利船只从作战人员数量上比海盗船有很大优势。

意大利各城邦海军逐渐在与海盗的斗争中积累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些海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沿海居民的安全，以及控制地中海广大海域的制海权。

正如《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两卷所叙述的，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滨海城邦的居民逐渐成为了“海洋民族”。这主要是由海外贸易以及与海盗斗争过程中乘员航海术与战斗力的不断增长而导致的。

相反，埃及的海军是伊斯兰世界最强的。他们并不会受到穆斯林海盗的袭击。虽然埃及建造了数量庞大的船队，却一直缺乏海战经验。他

们一直忠实于传统，使用没有战斗力的奴隶担任划桨手。

十字军在陆地上主要依靠来自法国和德意志的成员，而在海上则依靠意大利各国取得制海权。此后，穆斯林虽然在陆地上做出了全面的反击，却一直没有在制海权方面压倒西欧人。

叙利亚、巴勒斯坦两地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城市，除了耶路撒冷以外，都位于地中海东岸沿海地带。如果穆斯林能够在海上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这些城市很可能悉数陷落。然而，即使是在萨拉丁统一伊斯兰世界以后，中近东的制海权仍一直牢牢掌握在基督徒一方的手中。萨拉丁的海军最终还是败给了意大利诸国的舰队，地中海东岸仍然一直没有穆斯林军舰通行。

基督徒对地中海东岸的制海权一直维持到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时刻。也是因为掌握了制海权，十字军国家不可或缺的物资补给一直能够得到保证。这都是以贸易利益为目的的意大利商人的贡献。

而且，这些意大利的“经济动物”并不满足于海上运输和贸易，也不满足于仅拥有制海权这么简单。

包括划桨手都参战的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只，从海上帮助陆地上的十字军攻陷原为穆斯林控制的近东海港。全体船员都一变而为海军官兵。威尼斯曾经一次派遣40艘船组成的舰队出战，总兵力达到一万人。这一巨大的兵力，决不比陆上的十字军兵力弱。

意大利的滨海城邦都积极参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港城市的攻城战。直到现在，意大利海军的军旗就是古代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而意大利的滨海城邦，一直以盛产海军而闻名。

居留区

积极参加十字军战争与建设的意大利人，普遍要求在十字军所占领的海港城市内得到本国人的居住区。他们一般要求在船只停靠的港口附近选择一处方便放置货物的地方，来作为自己居留区的一部分。

由于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对抗意识强烈，在一座城市中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居留区都是相互独立的。根据参与攻城战的情况，在雅法主要是比萨人的居留区，安条克和贝鲁特则主要是热那亚人的居留区，而推罗主要是威尼斯人的居留区。

在这些居留区内，各国居民建立以本国守护圣人命名的教堂。此外，居留区内还有各自国家风格的面包房。堆满从西欧运送而来的各种产品的仓库，也成了这些居留区内的一道风景线。

此外，在居留区内还有为穆斯林商人前来访问居住而设立的“商馆”。意大利商人居住在本国政府派遣来的领事官邸周围，领事是居留区内统治的负责人。

这些十字军国家内的意大利人居留区，成为十字军国家的“经济特区”。

在进攻这些海港城市时就要求建立居留区的意大利滨海城邦，常常被现代研究者以商人的物欲而责难。然而，这些人并未考虑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区别。

对于君主国来说，是否开战取决于国王或领主的意志。开战的费用自然是这些领导人自己负担。以十字军时代以后200年的情况来看，德意志诸侯之一符腾堡伯爵曾经对多明我会修士施密特说过这样的话：

“在人世之中，对是否该建议别人去做的事，最不容易决定的，第一是结婚，第二是战争，第三则是去圣地朝圣。”

这三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在君主国的国内，君主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而在共和国之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由经济人主导的共和国。在十字军时代以后，重要的国政由元老院决定，而在十字军时代的威尼斯，像是否发起军事行动这样的重要事务，依靠市民集会来议定。

虽然市民阶级拥有权力，国政实际掌握在元首和内阁手中。而关于国政方针的说明则常常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民众对抽象的话语往往得出错误的判断，而对具体的话语总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对共和国的执政者来说，为了将自己的想法施行到大政方针中，常常要做具体的说明。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在圣马可广场聚集的民众面前，元首米歇尔讲了下述计划：

40艘桨帆船、28艘帆船和4艘大型桨帆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将在元首本人的指挥下前往近东。我们威尼斯人也是基督徒，因此为了支持解放了中近东圣地的十字军，我们将投入解放阿克、海法、推罗和亚实基伦四座城市的战斗。在军事行动成功后，威尼斯会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贸易基地。

这次军事行动的费用是×××，参加的人数为一万人。请诸位市民决定是否开展这次行动！

在元首说明之后，全民投票开始，这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的行政方法。与一人决定的君主国相比，共和国需要多数人来决定，因此常常要求元首说明责任。

热那亚和比萨也一样，早在与十字军共同作战之前，就决定要在攻

占城市之后设立居留区。商人自然是以其商业利益的驱使来投入战斗的。事成之后，共和国再通过战果报告，向市民说明责任。

虽然后世的研究者会怀疑这些意大利人作为的动机，同时代的十字军诸侯却不会对此有所异议。无论是安条克的公爵波埃蒙多，还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和鲍德温二世，都认同意大利人在海上的贡献。

这些意大利滨海城邦的海军力量，实实在在地为攻占海港城市付出了努力。可以说，他们是将地中海东岸的海港城市从穆斯林手下“解放”的重要力量。

而攻占这些城市以后的居留区，也作为经济基地极大地强化了十字军国家的经济力量。他们所付出的是实在的劳动，而不是十字架下的誓言。

商馆

当然，意大利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居留区，是因为这些城市被基督徒组成的十字军占领了。同在中近东的穆斯林控制下的城市，却无法设置这些居留区。中世纪的经济人自然不会放弃在穆斯林城市中开展经济活动。

虽然不能设立居留区，但意大利人获得了开办商馆的权利。这首先需要获得当地统治者苏丹或埃米尔的许可。

在这一时代，威尼斯人在阿勒颇开办了商馆。即使在十字军最兴盛的时代，阿勒颇也一直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后来，威尼斯商人还成功地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都市大马士革开设了商馆。

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城市设立的商馆，与威尼斯城内设立的德意志商馆类似，也与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商馆一样，都是携带商品前往所在国进行交易的商人商谈与交易的场所。

意大利人在伊斯兰世界城市内所造的商馆，和在与其友好的基督教国家内所造的商馆外观不同。在伊斯兰世界内所造的商馆建筑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宗教排斥，为简单的四角形，外侧的窗户细长，以避免遭箭矢射入。由于是为了商业目的所建，商馆周围自然没有高墙深壕。至于采光则主要依靠宽大的中庭。

围绕着商馆中庭的是一圈地窖，作为放置商品的仓库。此外，商馆内还有理发店和用于急诊的诊所。从中庭沿着石质阶梯可以上到一楼，这里是分隔成很多间的房屋，一般用来作为集会和交谈的场所。再上到二楼，则是为了短期居住的人提供的住宿房间。需要长期居住的商人，一般会在城市内租住。

商馆毕竟是在异教徒的土地上贸易的场所。因此，为了以防万一，商馆内储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为了防火，厨房设置在商馆的最高层。在用餐时，阿拉伯、突厥少年常常作为侍应往返于厨房和餐厅之间。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每周的确有一天是不同寻常的。

商馆规则的第一项，是绝对禁止在星期五外出。这一天是穆斯林的礼拜日，基督徒商人不能在街上活动。

前往伊斯兰世界的人，在从母国出发之前，都不再剃须，要一直把胡须留长。如果他们剃掉胡须，就会有被穆斯林视为男宠的危险。他们出发前都会带上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的双语辞典，以备经商之用。

马可·波罗在其前辈百年之后，出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人自发的行为，把意大利商人的足迹从中近东扩展到远东，开拓美索不达米亚以东远东地区的市场。

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人也对新市场的开拓十分热心。在十字军进攻时，穆斯林商人依然保持与“法兰克人”商人的接触，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在西欧法兰克人居住区的商机。商人们不会出于宗教狂热，而考虑将来自西欧的侵略者逐出中近东。即使有宗教狂热的人，也是希望通过战争而获取财富，而财富则是出自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人之手。

意大利的商人从伊斯兰世界的同行那里购买了大量的物产，并贩运到西欧。这一行为对一直处于守势的十字军国家的存续起了相当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由于意大利诸国对制海权的控制，埃及海军一直不能有效地袭击十字军国家的港口。意大利的船只也为十字军国家提供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补给。

如果有人问意大利的滨海城邦是否是在十字军的大义面前团结一致

行动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最先与东方贸易的阿玛尔菲共和国，早在十字军时代之前就渐渐衰落了。它被不重视贸易立国的领土型国家诺曼王国兼并。而决定另外三个滨海城邦命运的，是它们自身的对抗意识。

比萨在与热那亚的对抗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后，比萨的国力衰微，只能依靠商人个体的力量，而不是整体的国力来取得发展。

击败比萨的西地中海霸主热那亚，则与威尼斯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两大滨海城邦国家的竞争，从十字军的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字军国家灭亡之后，持续了120年之久，其间爆发了4次大战。

在这部十字军历史中，我无法详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故事。在《海都物语》中第六章“对手热那亚”部分，读者可以获得详细的了解。

可以说，在十字军时代的200年间，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不仅有战争冲突，也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经济活动促进了世界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在十字军时代也不例外。

温和的穆斯林

以透视的画风描绘十字军时代的中近东，将士列队时武器的声响，与前往圣地朝圣的人群的祈祷声构成了一组交响，贩运整车商品的商人来来往往，组成一道特别的风景。许多欧洲人兴致勃勃地穿梭在街道上。

至于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交流是如何实现的，从一位穆斯林留下的文章当中可以窥见一斑。

这位留下作品的穆斯林，是一度为十字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城市沙伊扎尔的埃米尔，名叫奥萨马·伊本·蒙齐兹。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生于沙伊扎尔，到1188年萨拉丁的鼎盛时期死于大马士革，可谓长寿。

奥萨马记录了从第一次十字军成功开始，一直到第二次十字军失败以后长时期的历史。他的领地沙伊扎尔位于叙利亚，虽然距离十字军国家很近，但一次也没有受到十字军的攻击。他的领地一直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面向十字军国家的最前线，由于如此接近的地理位置，他对前来侵略的“法兰克人”有最直观的认识。

在十字军势力确立的时期，穆斯林一方处于群雄割据的乱象之中。担任沙伊扎尔埃米尔（太守）的奥萨马，在与基督徒为敌时，并未到战场上拼杀。但从他的记载来看，他是一位具有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的人物，并且与十字军一方的重要人物有密切接触。

这位穆斯林军人政治家非常有教养。有一次，他受到盗贼的袭击，损失了大量财物。奥萨马首先感到遗憾的是自己丢失了4000卷藏书，而不是自己的财宝。他以阿拉伯语写作的关于法兰克人的评论被保留下来，成为关于十字军的宝贵记载之一。这部著作从穆斯林习惯的“真主

惩罚不信者”开始，而之后的记载则颇为有趣。

法兰克的骑士们

法兰克人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是作为战士的价值。因此，骑士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力都要大。在他们的社会中，骑士担负和指挥军事任务，也拥有市民社会中各项事务的决定权。

在法兰克人与我们休战期间，在巴尼亚斯的基督徒的领地上劳动的农民，向耶路撒冷国王投诉其领主非法征发家畜的事件。

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立即召集了其周围的六七位骑士，委托他们进行调停。退到一旁的骑士们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在国王的允许下发言：“我们一致认为，被告人巴尼亚斯领主必须赔偿原告农民。”

国王接受了这一裁决，命令原告与骑士协商赔偿金额。最终裁定被告赔偿原告400第纳尔。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看到法兰克人社会中骑士拥有的绝对决定权，相反其国王没有这样的权力。此外，在法兰克人之间，骑士又拥有作战的能力，身材高大，因此特别受到尊敬。

有一次，耶路撒冷国王与我谈话。

“昨天朕感到心情不错。”

“陛下有何喜事？”

“朕高兴的是身边有像沙伊扎尔太守阁下这样伟大的骑士。与阁下这两日的交谈，使朕了解了骑士的伟大之处。”

“陛下，若鄙人也是骑士的话，那只能是鄙人所在世界（即穆斯林中间）的骑士了。”

法兰克人的医术

十字军统治下的穆那提拉的领主，依赖我伯父所派遣的医生治疗其部下的骑士。我的伯父相信为基督徒治病应选择基督徒医生，因此他派遣了一名叫作达维德的突厥基督徒医生。没想到，这位医生不到10天就回来了。他对伯父说，“没想到这么快治疗就结束了。”

医生接着说：

“我一到穆那提拉，就前往诊室，里面收容了一位骑士和一名女性。收诊的骑士足部化脓，而那位女性则只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略显憔悴。我首先把骑士的患处切开，用膏药涂抹处置，症状就略见改善；对女士则施以退烧处理，并开了食疗的处方，希望她能补充营养。”

“此时进入的法兰克人医生，突然大声叫了起来。我并不了解他的医术，只听他对骑士说：‘你是想留下一只脚而活着，还是带着两只完整的脚去死？’”

“惊讶的骑士不假思索地说，哪怕剩下一只脚，只要活下来就好。因此这位医生手持板斧，将骑士化脓了的脚完整地切除了。医生接下来对不能一次完整切除的脚骨，进行了二次切除。此时脚骨中的骨髓向四面八方飞散，骑士还来不及看就昏厥过去。”

“刚刚动过手术的医生，马上转向一边的女士。她刚刚被骑士凄惨的场景所震撼。根据法兰克医生的诊断，这位女士的病因是头上藏着恶魔。治疗的方法是剪掉头发。在理发的同时，为了对抗恶魔，医生还要求女士吃下大蒜。这位女士显得更加憔悴了。”

“最后，医生在她剃光的头皮上，用手术刀刻下一个十字，深及颅骨，再在伤口上面撒盐。女士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当场死去。”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问医生，这里是否还需要我。当得到否定的

答案之后，我就离开了诊室，回到您这里。我虽然不知道法兰克人做了些什么，却已经领教了他们的医术。”

沙伊扎尔太守的这段描写到此结束。这里不仅叙述了西欧人的医术，也证明医院骑士团的医院中有穆斯林患者。中世纪外科医生开的诊所，不是肉铺的，实属罕见。在文章中所提及的极端的例子，写出的是骇人听闻的消息，与现代记者喜欢捕捉的消息并没有多大差别。这篇记载说明，当时的穆斯林医生对基督徒医生有很强的优越感。

法兰克男子的嫉妒心

法兰克男子对自己的妻子充满了嫉妒心。有一天，一位法兰克男子携妻子外出，返回时遇到了一位妻子的朋友，妻子便与那位男性亲切交谈起来。此时，丈夫会远远地站在一旁，一直等到妻子把话讲完。而如果妻子与朋友的交谈时间很长的话，丈夫就会提前回家。虽然我们难以理解，这却是法兰克人之间的礼节。

法兰克人的羞耻心

我父亲留下的遗产包括一座浴场。下面的内容是根据在那里工作的萨利姆的原话转述的。

法兰克人喜欢到东方式的浴场沐浴，因此他们的骑士会常常光顾。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各自面前裸体。当他们习惯了东方式的沐浴以后，这些骑士也逐渐像东方人一样剃除体毛。

有的时候，新来的法兰克骑士看到其他骑士无毛的下体，就会喊来萨利姆，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剃毛。由于他的体毛与胡须一样繁密，剃毛之后的骑士会十分满足地对萨利姆说：

“萨利姆，你可以对女人做同样的事吗？”

得到萨利姆肯定的回答之后，骑士会命令随从叫来自己的妻子。当骑士的妻子来到萨利姆的面前，骑士说：

“萨利姆，请把对我做的，也对妻子做一次。”

当萨利姆为骑士的妻子剃毛之后，满意的骑士会给萨利姆双份的报酬，夫妻二人开心地离去。

听完这段话，我心里有复杂的想法。这些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法兰克骑士，却能在战场上勇敢战斗。而我们是有很强羞耻心的，虽然战斗力丝毫不逊色。

东方化的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之中，在侵占后的东方定居，并与穆斯林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并不在少数。我就在前往安条克访问朋友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位法兰克人。

朋友和我一起，到这位法兰克人家中赴宴。法兰克人早已从军务之中引退，在安条克郊外购买了土地，以平稳的收益愉快地生活。

他用洁净的美味招待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围坐在饭桌前，法兰克人说：

“请安心就餐吧。我已经很多年没吃法兰克餐了。现在我雇佣的是埃及厨师，每天吃清真餐。猪肉之类的食物，绝对不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两位只管安心用餐就好了。”

于是我们开始用餐，但我一直没有吃肉食。

宴会结束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城里的市场逛。突然，背后有一个女人戳了我一下。这个法兰克女人用我无法理解的野蛮的话语不停地对

我嘟囔着什么。听到她叫嚷的法兰克人纷纷围了上来，对我面露怒色，一时状况非常险恶。

看到这一场景，宴请我们的法兰克人连忙冲了进来，对女人说：

“你要对我的穆斯林朋友做什么？”

女人高声回答说：

“我的弟弟乌索在战斗中被穆斯林士兵杀死了！”

法兰克人回答说：

“你看到了，这两位穆斯林根本没有武器。跟我一样，他们都是普通市民。我们同是商人，这里也不是战场。”

此话一出，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对峙，人们纷纷散去，我也最终回到了自己家里，躲过了法兰克人的袭击。

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

法兰克人是无视真主存在的。这里叙述的，都完全转述自他们的话。

到耶路撒冷朝圣，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并在其之内祈祷，对穆斯林来说都是自然的事。圣殿骑士团的团员得知我们的用意以后，他们也准许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进入清真寺祈祷。

我们知道，阿克萨清真寺已经被用作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在总部的一旁，还建造了基督徒祈祷用的小教堂。我的骑士朋友从这一侧带领我们穿过，就进入了清真寺。

我一个人在里面跪下，默念着“真主至大”，开始祈祷。

突然，一位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进来，让我面向东方祈祷，“祈祷的方向是这边！”

当他被后面的几个圣殿骑士团同僚叫走以后，我继续自己的祈祷。从“真主至大”开始，我的祈祷进行下去。此时我的确是在朝向东边祈祷。片刻之后，我的骑士朋友进来，其中一个人对我说：

“这些骑士很多都是刚从法国来的，并不懂得礼节。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也像在故国时一样，朝向东方。”

对穆斯林来说，祈祷要朝向圣城麦加的方向。在耶路撒冷，祈祷的方向应是面向南方。但我被骑士恐吓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祈祷的方向。

圆顶清真寺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圣地圆顶清真寺，现在变成了基督徒的教堂。同行的友人说，他见过幼时的神。他跟我一起来到圆顶清真寺，墙上画着马利亚和婴儿耶稣。指着这一图案的友人对我说，这就是幼时的神。

看着这一图案，我的视线自然落在了圆顶之上。在这里，描绘着很多不信者心中的神灵（即耶稣）。

关于儿子前往法兰克人国家的对话

一位来朝圣的法兰克人与我十分亲密，简直如同兄弟一般。我们两人之间，有着超越宗教的理解。他经常来我的家，跟我14岁的儿子如父子一样亲密。

他就要回国之前，到我家里来做客，说了如下的话：

“兄弟，我要回国了，带上你儿子一起去怎么样？在我的故国，他

可以像骑士一样长大。只要你同意，他可以在我们国家学习骑士精神，获得很好的教养，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

我深深感谢了这位朋友，但绝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不过，我自然得想出一个好的理由来说服他。思考片刻之后，我这样答复他：

“兄弟啊，你的热情我心领了。只是我的老母亲，我儿子的祖母，特别特别喜爱这个孙子。如果他去了遥远的外国，恐怕我母亲要难过地去世了。”

法兰克人听了我的话，只好就此告别了。

基督徒的信仰与穆斯林的信仰

我们的宗教也尊崇先知宰凯里雅和其子叶哈雅，因此我来到位于纳布卢斯地区的塞巴斯提亚，来拜谒他们的墓园。拜谒之后，我走出墓园，看到旁边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小教堂。教堂的门半掩着，我走近向内望去。教堂里面大概有10个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正全心祈祷着。里面每个人都面向东方，身着胸前绣着十字的服装，看上去每个人都是来朝圣的。

看到这一情景，我的心中充满感动，同时又十分惋惜而无话可说。周围的穆斯林，有几个能像这些老人一样，怀着信仰之心，向神祈祷呢？在赞叹与惋惜的同时，我离开了教堂。

几天之后，我到大马士革去，与一位朋友一起散步。他突然开口问我，“你有没有见过苦行僧？”然后我立即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的基督教堂去看看。

刚一进入教堂，里面仿佛空无一人。这是因为从外面进来，眼睛还不适应屋内的昏暗。当眼睛适应以后，我看到教堂中间铺设了很多祈祷者用的垫子。每个垫子上面都坐着一位苦行僧，安静而专心地祈祷着。

他们在上帝面前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是只有深信的人才能做到的。可以说，他们真是信仰深刻的人。

这一情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能理解，在基督徒中也有真心虔敬的人士，当然在我们穆斯林之间，也有非常虔诚的信徒。忙碌于世俗之中的我，直到这把年纪才见到苦行的僧人，和他们专注祈祷的样子。

到此，沙伊扎尔太守奥萨马的文章告一段落了。人世的现实，就是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之间，抱持着信仰去灭绝不同信仰的人们，从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在12世纪后半期的中近东，人们最朴素的愿望——和平，最终被打破。

第三章 萨拉丁登场

沙伊扎尔的太守奥萨马，终生都处在十字军入侵的动乱年代。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只有一位王子，还患上了麻风病。这对十字军国家来说，是最绝望的宣告。

10岁的少年王子鲍德温，患上了如此的绝症，在和同龄的少年游戏时，不得不独自忍耐痛苦。他的手脚逐渐失去了知觉。无论用多尖锐的笔戳他的皮肤，都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但是，麻风病并没有在外表上显现出来。在不知道内情的人眼里，王子逐渐成长为一位翩翩少年。

在中世纪，麻风病不仅是不治之症，而且还会传染。患者往往被流放到不为人知的村落里，或者城墙外黑漆漆的洞穴中，与相同的病患一起居住，等待命运的安排。

为了避免传染给健康人，麻风病人外出时手中都拄着拐杖，拐杖上面拴着铃铛，边走边响着。听到铃声的人就会躲得远远的，看上去十分残酷。如果麻风杆菌的数量增加，就会使人面临死亡的危险，身体逐渐畸残，惹人忌讳和嫌弃。推罗的威廉是王子的家庭教师，他自然得知了王子患病的消息。当时国王阿莫里刚刚30多岁，不得不直视自己10岁儿子的残酷命运。

阿莫里没有别的儿子，只有一位女儿西比拉，比鲍德温年长一岁，对于寻找夫婿来说，过于年轻了。

还是少年的鲍德温，已经集处于守势的十字军诸国期待于一身。他

十分聪慧，又富有责任感，迅速成长为一位充满政治敏感的年轻人。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都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男性统治者之后，经历了女性统治，在国家治理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她们缺乏男性统治者政策的强势，从而遭到了十字军诸国平民的嫌恶。

成长中的鲍德温王子逐渐成为平民的希望。王子明快的话语，对任何人不屈服的勇气，以及勇于担当的责任心，使中近东的基督徒感到拥有了久违的理想的领袖。但是，他们的希望难以成为现实，只因为鲍德温的疾病。

阿莫里也觉得，一直隐瞒王子的疾病，并不合适。逐渐衰老、疾病缠身的耶路撒冷国王，最终还是没有活到鲍德温成年。

阿莫里逝世以后，耶路撒冷的王位就传给了麻风病患者鲍德温。至此，以耶路撒冷王国为中心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开始以这位鲍德温四世为统帅。

十字军国家内基督徒对鲍德温四世的继位，看作是上帝的委任。在我们看来，阿莫里国王的考虑有失偏颇。但正当此时，穆斯林一方的努拉丁正踏出决定性的一步。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线南北走向的山脉两侧，发生着明暗不同的走势。

逊尼派与什叶派

在埃及，一直十分稳定的法蒂玛王朝开始瓦解了。与巴格达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不同，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属于什叶派。

在这两个国家，与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相对应的世俗领袖，巴格达是“苏丹”，埃及是“维齐尔”。

从主要民族与教派的对应关系来看，什叶派多为塞尔柱突厥人，逊尼派则是阿拉伯人为主。

1168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迎来了一位年轻无能的哈里发。由于哈里发是世袭制，血统比任何因素都来的重要。在内室中居住、除了生活一无所知的哈里发，将实际统治的大权完全交给宰相，即“维齐尔”。此时的维齐尔沙瓦尔并不满足于宰相的地位。他秘密地开始了提高自身权力的计谋。

然而沙瓦尔的计谋被与自己关系不睦的儿子卡米尔获悉。卡米尔从哈里发处得到许可，率领了一支军队企图推翻父亲，并联合与开罗什叶派对立的逊尼派领袖努拉丁，策划政变。

正如前述，努拉丁已经是叙利亚、伊拉克广大领地的霸主。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但却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位武将。努拉丁将叙利亚的都市悉数改造，建造了壮美的清真寺，为救济贫民而建造医疗设施，推行福利政策，并热心于教育和文化事业，受到了穆斯林伊玛目的高度赞扬。

这一年努拉丁已经年过半百。他需要在人生中再增添几笔重要的事功，以博取真主的喜悦。

收到埃及宰相之子要求派遣援军的邀请，努拉丁认为将埃及变为逊尼派统治的好机会来了。

在一个文明分裂成两个政权的状态下，一方总希望吞并另一方。在伊斯兰世界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立，如同基督教世界中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一样。

此时，巴格达的哈里发将努拉丁任命为苏丹，于是他成为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最高领导者。如果努拉丁能够吞并埃及，他将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之间伊斯兰世界中心区域的领导者。努拉丁所能达成的大事业，将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体化。这位刚刚年过五十的谦虚穆斯林，有了甜蜜的梦想。他很快在大马士革组织起了一支大军。

1169年1月2日，80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离开了大马士革。努拉丁希望完全靠骑兵的力量，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取得胜利。

率领努拉丁的8000骑兵的，是名叫西尔库的部将。西尔库是努拉丁的塞尔柱突厥部队中为数不多的库尔德族将军。努拉丁用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只重视才能，不问民族出身。

西尔库接到努拉丁的命令之后，带领了自己30岁的侄儿一同出征。

这位青年的名字叫作萨拉丁。他与身高体壮的努拉丁和西尔库不同，身材不高，一副翩翩书生的样子。萨拉丁的学问与教养极其深厚，他的加入部队，使努拉丁非常满意。努拉丁听从了自己十分信赖的西尔库的建议，计划在攻取埃及之后，委任萨拉丁为当地的行政官员。

就这样，出生于底格里斯河附近，摩苏尔以北库尔德人聚居区提克里特，成长在父亲与伯父属地叙利亚的萨拉丁，离开大马士革，跟随部队向埃及进军。

法蒂玛王朝的灭亡

1169年1月8日，西尔库率领的部队早早地到达了开罗。前来迎接的是宰相的儿子卡米尔。而对大马士革骑兵闻风丧胆的宰相沙瓦尔，早已没了踪影。根据卡米尔和西尔库之间的协议，埃及全部领土的1/3，都要划给努拉丁来统治。但事实上，整个埃及已经落入了努拉丁之手。

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埃及的西尔库，在开罗郊外拜谒了伊玛目沙菲仪的墓地。此时萨拉丁则留在开罗城内。

当天夜晚，萨拉丁率领一队人马，袭击了宰相沙瓦尔的住所。

萨拉丁杀死沙瓦尔之后，西尔库顺理成章地做了新的宰相。在内室中居住的哈里发，当即同意了西尔库的任命。

两个月后的3月23日，西尔库突然因意外去世。他是在浴室中滑倒头部受伤而死，其死亡与侄子萨拉丁没有关系。

在西尔库死后，萨拉丁就被哈里发任命为宰相。此时离大军从大马士革出发仅仅两个月零三星期。31岁的宰相，以电光火石般的速度就任了。

大马士革的努拉丁对埃及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感到震惊。杀死沙瓦尔、西尔库出任宰相，这都是按照计划发展的。没想到两个月以后西尔库突然死亡，年轻的萨拉丁就任了宰相，这是努拉丁始料未及的。

努拉丁能够完全信任西尔库，却并不放心萨拉丁。他连这位新部下的面都未曾见过。不过，努拉丁相信，埃及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位31岁的库尔德年轻人，自然会服从自己的命令。

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也得知了相关的情况。

新十字军的企图与挫折

拥有从巴格达到大马士革之间广大土地的努拉丁，早已是十字军国家最大的威胁。而如今埃及又落入了努拉丁之手。中近东的十字军势力，除了西面的地中海之外，已经从北、东、南三个方向陷入了努拉丁的包围。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的形势，已经像风中的蜡烛一样危在旦夕。

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只得再次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发动新的十字军。在努拉丁一方严阵以待的形势下，除了来自西欧的新十字军，没有别的什么力量能救援耶路撒冷王国了。

然而收到哀求般书信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完全没有行动的意思。

罗马教皇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十字军东征必须依赖他人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西欧最强大的三支军事力量，都没有余力派遣十字军。

首先，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绰号“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曾经作为康拉德三世的副将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应当说是一位合适的人选。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允许他出征。因为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公社正与腓特烈一世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深入的原因，是罗马教皇和威尼斯共和国达成和解，进而与皇帝对抗，使得皇帝不得不率领全部战斗力在意大利北部作战。

率领第二次十字军的另一位领袖，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并非不想率领新的十字军，一雪前次溃败的耻辱。但是路易七世面临的，则是自己个人和国家的大问题。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归国的路易七世，不得不直面与王后离婚的状况。王后埃莉诺尔是法国西南部阿奎丹地区广大领地的继承人。在与法国国王结婚的时期，阿奎丹地区并入了法国国王的领地，而当她与路易七世离婚，与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结婚以后，问题就变得非常微妙。广大的阿奎丹地区，从法国国王手中让渡到了英国国王手中。而遭受了巨大损失的路易七世，则在法国国内卷入了与亨利二世争夺领地的大战。

与处于守势的路易七世一样，进攻一方的亨利二世也不积极参与未来的十字军东征。这位亨利二世所面临的，是非常棘手的托马斯·贝克特事件，这件事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有所记载。

这一事件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争斗。其起因是为了阻止天主教会势力渗透国家政权的亨利二世，任命自己的挚友和宰相托马斯·贝克特为代表英格兰天主教会最高权力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二世提起这一任命的深层原因，是由于贝克特作为自己的挚友和宰相，能够理解自己，并在王权与教皇权力的对抗中倾向于自己。

就任大主教的贝克特，却在自己的任上完全倾向于教皇。因此，他与亨利二世的关系急剧恶化，并最终不得不流亡离开英格兰。而他所亡命的地方，正是与亨利二世领土纠纷最严重的路易七世的土地——法国。

这样一来，英国的国内问题就成了国际问题，宗教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直到贝克特决意归国时，亨利二世默许的刺客迎接了他。

0
250千米
北
北海
英格兰王国
伦敦
海峡
河
莱茵
佛尔多
大西洋
巴黎
法兰西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
多瑙河
普瓦捷埃
阿尔卑斯山脉
阿奎丹
威尼斯
米兰
图卢兹
比利牛斯山脉
亚得里亚海
伊比利亚半岛
巴塞罗那
科西嘉岛
罗马
教皇领地
西西里王国
撒丁岛
第勒尼安海
地中海
巴勒莫
爱奥尼亚海
亨利二世通过婚姻得到的埃莉诺尔的领地

西欧主要国家的势力图

刺杀贝克特的事件发生之后，亨利二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罗马教皇以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杀一事，将亨利二世处以开除出教的绝罚。这位亨利二世可不是能将绝罚一笑处之的皇帝，毕竟他正处在与法国国王的领土纷争之中。杀死逃亡法国的贝克特，就让法国国王和罗马教皇结成了同盟。由于陷入了领土和宗教双重争端，亨利二世不可能参加新的十字军。

西欧的各位强权人物，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无法参加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的担心，逐渐成为了现实。圣城耶路撒冷的命运，如同风中的烛火，摇摇欲坠。

而在伊斯兰世界，刚刚年过30的萨拉丁，并不顺从于比自己年长20岁的最高世俗领袖努拉丁。

青年萨拉丁

外表颇具书生气的萨拉丁，在兵士之中深得人心。

1169年大马士革军队进攻开罗、杀死沙瓦尔、伯父西尔库之死、自己就任宰相，这几桩事件，使萨拉丁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所率领的塞尔柱突厥大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此时努拉丁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亲自率军前往开罗，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可以说，努拉丁是轻视了萨拉丁。结果，1170年，叙利亚全境发生了大地震。努拉丁以比上次地震更大的热情投入救灾与重建之中。当时，就连坚固的“骑士之城”也有部分损坏，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这样的大城市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因此，努拉丁也就没有机会前往埃及了。

而萨拉丁在没有努拉丁干涉的情况下，独自展开了对十字军的进攻。他自南向北，从埃及进攻巴勒斯坦。萨拉丁进攻了耶路撒冷王国南部圣殿骑士团的一处城堡，但在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的防御之下而败退。萨拉丁接下来选择了进攻加沙。加沙之战中，耶路撒冷王国的一位将军拼死抵抗，最终迫使萨拉丁退兵。

这次作战是32岁的萨拉丁初次自己领兵。他发现，穆斯林兵士并不善于进攻十字军的城堡，而同时从海上进攻十字军国家的港口也基本没有可能。前者是因为十字军城堡建筑的坚固，后者则是因为地中海东岸活跃着意大利滨海城邦的战船。

将震后救灾重建工作告一段落之后，52岁的努拉丁开始考虑如何对待32岁的萨拉丁了。他希望尽快严肃处理萨拉丁。因此，努拉丁要求穆斯林在周五的礼拜中，都要传诵苏丹努拉丁的名字。

这对于萨拉丁来说，是颇具危险的难题。萨拉丁是在什叶派统治下的埃及居住的逊尼派领导人，而且刚刚就任宰相。如果按照努拉丁的命令做，要求什叶派民众歌颂逊尼派苏丹的长寿，可能随时会触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萨拉丁选择了逃避这一责任。努拉丁为了说服萨拉丁执行命令，专门请萨拉丁的父亲前往埃及出任说客。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一直在内室中生活的青年哈里发，有一天突然被发现自然死亡。

萨拉丁拥立了一位新的哈里发。法蒂玛王朝从此血脉断绝，这样，由宣传阿拔斯王朝苏丹努拉丁之名所引起的危险，自然就消除了。在什叶派的大本营埃及，从此没有了什叶派的哈里发，进入了逊尼派的控制之下。

1171年，北上独自行动的萨拉丁军队，与南下的努拉丁的军队擦肩而过。萨拉丁选择了避开，其理由是开罗发生了宗教动乱，需要立即回国。这样，萨拉丁率军返回了开罗。

萨拉丁的父亲在开罗对他展开了劝说的攻势。无论是伯父西尔库还是父亲，都出身于少数民族库尔德人，深受努拉丁的知遇之恩。因此，父亲希望萨拉丁能去向努拉丁道歉。最终，萨拉丁决定，给努拉丁送去一封道歉信。令努拉丁诧异的是，信中并未感激苏丹对自己伯父与父亲的提拔。不过，从兵力水平上来说，萨拉丁肯定不是努拉丁的对手。但是，这也是努拉丁第一次对萨拉丁的行为感到警觉。最终，这位苏丹没有对萨拉丁做出任何处分，而是径直率军返回了大马士革。

到1142年，努拉丁的正式命令传达到了开罗。他决定将大马士革的军队与开罗的军队合并，攻击约旦河东岸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土地。萨拉丁只得从命，从埃及出兵，穿过西奈半岛，直取耶路撒冷王国的南端。

然而，萨拉丁突然撤军回了埃及。这次撤退的理由是由于留在开罗的父亲生了急病。

这次，努拉丁没有相信萨拉丁的话。他立即派一名部下火速赶往开罗，刺探萨拉丁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病。部下返回时告知，萨拉丁的父亲不只生了病，还在他到达前一天晚上亡故。因此，萨拉丁只能奔丧，而无法署理军务了。本来恼怒的努拉丁，只好无奈地返回了大马士革。

两人于大马士革和开罗隔空对峙，就这样到了1173年。萨拉丁依然感到巨大的威胁如芒刺在背。他让自己的兄弟率军进攻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如果取得也门，在努拉丁大军攻来时，自己能够有一条退路。这个时候，就连十字军国家也能够感到，大马士革和开罗之间的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到了1174年，努拉丁终于下定决心，把无礼的年轻人彻底剪除。他在大马士革组织了一支大军，准备进攻开罗。苏丹的前前后后都在为努拉丁的计划而忙碌着。

努拉丁日以继夜地俯瞰着桌上铺开的大地图，演练进攻埃及的战略战术。

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应召进入营帐的部下，发现了倒在地图上已经昏迷的主公。

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努拉丁的死因是由扁桃体发炎引起的高热。在我看来，他的死，与对年轻的库尔德人的愤怒不无关系。56岁的努拉丁，一直把36岁的萨拉丁当作自己的心头之恨。完全不知感恩的无礼年轻人，将努拉丁心中的傲慢自负转变成暴怒与疯狂，一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

话说30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曾经总结了成功领

袖的三个必要条件：

能力（virtù）、幸运（fortuna），以及时代所需要的资质（necessit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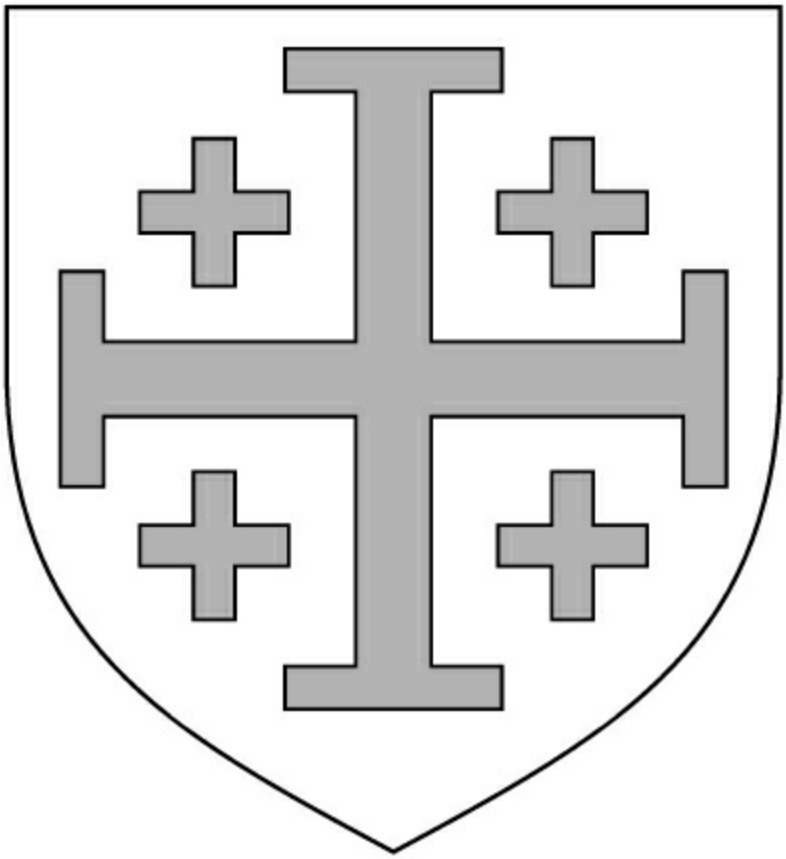
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不合适的事件，从而不得不从历史舞台上黯然退场的人，实在不幸。

在伊斯兰世界主角交替的1174年，十字军国家也面临着主角的交替。38岁的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因病去世。这位努拉丁的对手在位12年，在完全没有西欧援军的情况下，依靠宗教骑士团和城堡的协助，守住了自己的王国。

他唯一的儿子就任王位。13岁的新国王一直受到麻风病的折磨。

麻风病国王鲍德温四世

麻风病从身体内部开始破坏，因此病人初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他的病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参加13岁的鲍德温四世加冕仪式的众多重臣看来，国王和自己的未来，都难以预料。



耶路撒冷王国的纹章（白底黄色十字）

与臣属相比，少年更清楚自己的状况。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得长久。尽管如此，鲍德温四世表现出了极大的英雄气概。

成为领袖的首要条件，就是对自己的领袖角色有强烈的自觉。少年

鲍德温从小就在家庭教师推罗的威廉的教导下，形成了领导人不可或缺的责任感。这位教师出身于巴勒斯坦的海滨城市推罗，与其他天主教徒相比，更加熟知中近东的实际情况。

鲍德温四世加冕为国王之后，他的母亲阿格尼丝·德·库尔特尼就远离了王宫。十字军国家近半世纪以来的弊病，是未成年人就任国王，母后干预政局。这一次，鲍德温就任国王以后，明确对母后说“不”。阿格尼丝自然会感到不满，但鲍德温必定是把国家命运放在母爱之前考虑的。

少年国王接下来做的，是任命推罗的威廉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宰相。这一任命很大程度上是“强行”的。

罗马教皇以耶路撒冷是全体基督徒的圣城为理由，不断介入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政局。除了耶路撒冷的牧首以外，罗马派遣来的高级神职人员驻跸在十字军国家的各个城市，享受着与世俗君侯同样的待遇与权威。这些人与当地出身的天主教教士们时有摩擦。

得到推罗的威廉协助之后，鲍德温四世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以前诸国王未有的成就。在萨拉丁这样强劲的敌手面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众人在麻风病国王面前所表现的同情与不安，逐渐变成了感动。

世间不乏狡猾的人物。狡猾的性格特点，在为自己所服务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或者为自己个人利益使用时，自然有很大的分别。但行为狡猾的人可谓甚众。而人们也总会在为大义殉难的人物面前深深感动。王国内的封建领主们、家臣们和普通的兵士们，都知道鲍德温四世的病情，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接近这位领袖。

这段时间里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对鲍德温四世来说也是幸运的。36岁经验丰富的萨拉丁，正在试图将努拉丁死后留下的伊拉克和叙

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无暇顾及耶路撒冷王国。

苏丹努拉丁，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史中“将军”类的人物。而萨拉丁则是出身“大名”。由于他出身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因此还是敬陪末座的“外样大名”。在将军死后，自然由将军之子继承，努拉丁的儿子年纪尚轻。

得知努拉丁去世的萨拉丁，对正统后继者以臣下的身份宣誓效忠。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与努拉丁的一位遗孀结婚了，可谓是迈出了使自己取得正统地位的第一步。与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世界不同，可以重复娶妻的伊斯兰世界为萨拉丁提供了好机会。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应对穆斯林的策略，是尽可能避免与之全面对抗。这一策略也得到了努拉丁属下的穆斯林领主的支持。

努拉丁属下的领主，大都在十字军国家内拥有领地。他们能够通过与十字军国家商人的贸易，获得大量财富。因此，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十字军与穆斯林之间厮杀。当努拉丁的权力向萨拉丁过渡时，这些领主们表现的不够积极。

而十字军国家的经济人，也就是那些意大利滨海城邦的商人，也不希望出现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的对决。鲍德温四世与他们利益一致，不希望穆斯林结成对抗十字军的统一战线。事实上，穆斯林的领主们大都像沙伊扎尔的埃米尔奥萨马那样，与法兰克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与对手维持友好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在对方阵营中没有想发动全面进攻的实权人物；

第二，本方阵营必须做好全力迎击的准备。

所幸的是，萨拉丁还没有具备绝对的权力。而在十字军方面，数量

虽少但战力精锐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正处在鼎盛时期，他们所盘踞的城堡也遍布十字军国家各地。

问题是，谁能继国王之后担任十字军国家防御的总负责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鲍德温四世，希望自己姐姐西比拉的丈夫能在未来担任这一职务。

但最终这一希望化为了泡影。最初为西比拉挑选的夫婿是香槟地区的圣塞尔伯爵，但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王国，得知中近东的现状以后，声称自己只是前来朝圣，匆匆返回了法国。

西比拉的第二次相亲对象，是与圣塞尔伯爵有亲戚关系的巴伐利亚公爵亨利。这位来自德意志的贵族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也改变了心意，早早返回了故乡。在西欧的贵族看来，这一时期的耶路撒冷国王是相当难以担负的重任。

西比拉的第三次相亲终于成功了。法国国王的外甥蒙费拉特侯爵，在造访耶路撒冷之后决定留下。这是对耶路撒冷国王的积极相助。没想到，这位侯爵一年后病倒了，留下怀孕的西比拉撒手人寰。

鲍德温四世不免感到失落。还好，在前国王阿莫里死后，西比拉产下了一位男婴。16岁的耶路撒冷国王，决定专心抚育自己姐姐的孩子，并将婴儿也取名为鲍德温。后来就任耶路撒冷王位的小王子，成为鲍德温五世。从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之后鲍德温一世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算起，鲍德温已经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代名词了。

丧夫不久的西比拉，最终再次结婚了。她的第二位丈夫，是生于普瓦提埃的法国人，拥有雅法城的居伊·德·路西尼安。这位27岁的新丈夫是一位相貌出众的美男子，获得了耶路撒冷居民的一致欢迎。

鲍德温四世并不同意年长自己一岁的姐姐再婚。但是，为比自己大

10岁的美男子而心动的西比拉，明确告知弟弟自己不愿意进入修道院。结果，两人最终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成婚。不满的鲍德温四世心中充满了各种忧虑。

与此同时，比鲍德温四世年长23岁的萨拉丁，陷入了努拉丁死后充满艰难险阻的权力斗争。

统一伊斯兰世界的漫长历程

努拉丁去世时，他的儿子年仅11岁。大马士革的宫廷里，担任摄政的是年迈的太守伊万·穆喀达姆。库尔德族出身的萨拉丁，被塞尔柱突厥领主们当作异类，很快他们结成了反对萨拉丁的联盟。他们也希望耶路撒冷国王能加入反萨拉丁的联盟，但后者要求给予金钱援助，并以释放大马士革监狱内的基督徒为条件。然而，得到金钱和赎回的基督徒的阿莫里，在返回耶路撒冷途中病亡，这使得十字军和大马士革的同盟宣告瓦解。

这就是努拉丁死后大马士革的状态。萨拉丁并未选择与拥立努拉丁之子的突厥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自称努拉丁遗孤的保护者，要求进入大马士革。他慎重考虑了时人的议论，仅仅带领700名突厥骑兵离开开罗，途中也未补充任何兵力，径直向大马士革开去。

36岁的萨拉丁，并没有立即剪除11岁的正统继承人。但不久之后，少年苏丹的存在就变得形同虚设。萨拉丁也没有提出对抗基督教势力的建议。当十字军提出休战时，他当即开口应允。但是，萨拉丁绝不会与十字军结成同盟。

由于萨拉丁出身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他一直希望能够掌握一支由自己控制的大军。然而，组织这样一支大军，需要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一致。在伊斯兰世界中，除了宗教方面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以外，在民族层面，阿拉伯、突厥和其他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纷争。为了消除这些纠纷，最后还是要回到宗教上来。因此萨拉丁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都了解法兰克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勇敢地战斗，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上帝而战。他们人数并不多，实力却颇为强大。相形之下，我们虽然必须发起圣战，却欠缺宗教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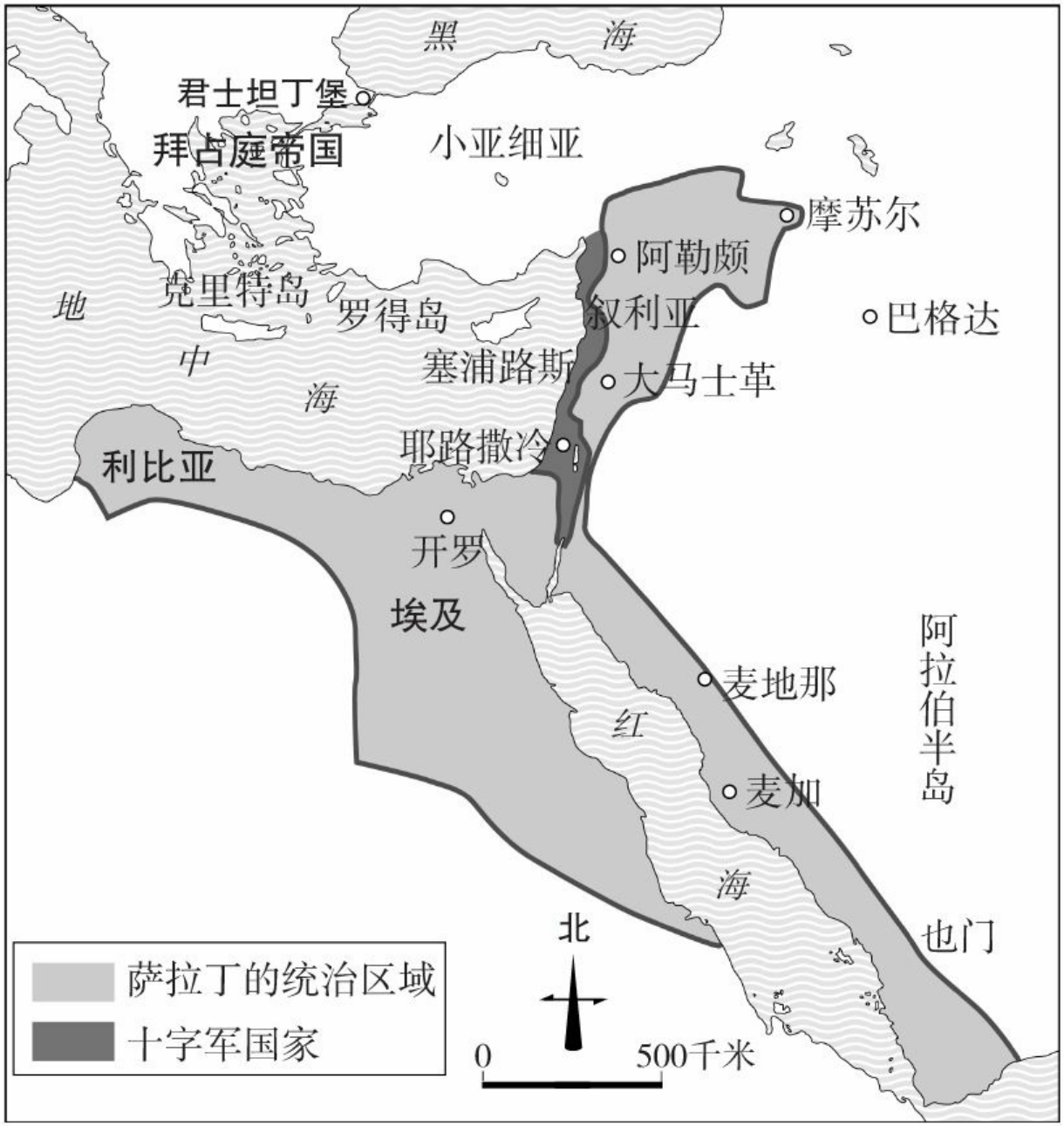
在成为努拉丁遗孤的摄政之后，萨拉丁逐渐以虔敬的穆斯林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他每天到清真寺例行五次礼拜，严守《古兰经》的规定，敬重并大大优待伊斯兰世界中的教职人员伊玛目，因此受到这些伊玛目的广泛欢迎。萨拉丁还亲自到麦加朝圣，从此激发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责任感，对推动穆斯林的虔诚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努拉丁去世的1174年，萨拉丁通过担任摄政，最终实现了对大马士革的完全掌控。在开罗哈里发死后，萨拉丁自己创立了阿尤布王朝，并拥有开罗和大马士革两座首都。在作为努拉丁遗产的叙利亚，除了大马士革城之外，阿勒颇所在的叙利亚北部也最终落入萨拉丁之手。

而伊玛目们对萨拉丁的赞颂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巴格达的阿拔斯朝哈里发所派遣的特使，任命身居大马士革的萨拉丁为苏丹。在与豪华的朝服一同馈赠的正式任命文书上，写着这样的话：

哈里发任命萨拉赫·阿丁·尤素福·伊本·阿尤布为统治埃及、叙利亚中部、努比亚和也门的苏丹。

哈里发承认苏丹萨拉丁，作为以上全境穆斯林之首，统率境内的太守与领主的权力，以取得辉煌胜利的司令官之身份，为伊斯兰帝国的荣耀而战，是宣扬伊斯兰圣教的贵胄，是伊斯兰之剑，以阿尤布朝创立者之身份，享有必要的权力。



萨拉丁的统治区域

阿拔斯朝的哈里发准许了萨拉丁铸造货币的权力，也准许清真寺周五主麻拜时，在歌颂先知穆罕默德与哈里发之外，歌颂萨拉丁的名字。在萨拉丁得到哈里发正式任命为苏丹的同时，努拉丁的儿子就从埃及和叙利亚的文书中正式消失了。

最终，萨拉丁将努拉丁的遗产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完成的。

到1182年，萨拉丁完全掌握了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而到1186年，他控制了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经过12年时间，萨拉丁继承了努拉丁的全部所得，而此时他的年龄也从36岁增长到48岁。此时，他已从“外样大名”的身份摇身一变为“将军”了。

而在这12年内，萨拉丁的对手鲍德温四世，也成长为23岁的青年人。他不仅兵力十分有限，还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鲍德温四世的最终战役

鲍德温四世在从继位到逝世的11年间，从未因病而从王位上引退。

他始终秉持不与穆斯林大军正面对抗的方针。但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防御力量，必要的出击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十字军国家不能受到敌军的轻视。穆斯林随时会从大马士革和埃及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因此鲍德温几乎每年都要从耶路撒冷出击。

在战场上，为了攻击敌军，鲍德温一步也不能后退。即使是他病情恶化的时候，这位国王也从不离开马鞍，亲自指挥军队。即使一旁的谋士告知敌军迫近的危险，鲍德温四世也从来保持镇定自若。

在这位年轻国王气势的感染之下，即使是并不直属于耶路撒冷国王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也真心倾听鲍德温四世的意见。他们并没有为国王而忧虑，尽管整个耶路撒冷王国都知道了鲍德温实际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没有任何人对鲍德温的病情感到恐惧。

1177年，鲍德温四世16岁。

萨拉丁率领2.6万名士兵，从开罗北上进攻加沙。耶路撒冷城内陷入一片恐惧之中。显然，萨拉丁的部队是冲着耶路撒冷来的。

此时，鲍德温四世在亚实基伦。他得知萨拉丁从开罗出兵以后，就领兵前往常与埃及斗争的前线亚实基伦。鲍德温四世属下的兵士，只有1400人。

萨拉丁知道，攻击海港城市需要海军配合，因此有相当的困难。他的意图是向耶路撒冷进军，从而诱使亚实基伦和耶路撒冷的守军出兵，

再通过野战将十字军一举歼灭。萨拉丁的这一策略，是在掌握耶路撒冷守军数量的基础上制定的。

16岁的鲍德温利用了萨拉丁的策略。鲍德温之所以能够利用萨拉丁的策略，是因为骑兵对战斗胜负的决定性作用。而萨拉丁当时显然是轻视了年轻的麻风病国王。

萨拉丁的2.6万名士兵，有一半都在行军路线上进行烧杀抢掠。他希望通过激怒耶路撒冷和亚实基伦周边的居民，让守军出城迎战。

萨拉丁指挥着其余1.3万名兵士，遭遇了鲍德温四世的部队。前来迎战的鲍德温四世，只率领了500名耶路撒冷王国的骑兵，并有80位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助阵。

敌军刚刚进入视野，鲍德温就命令580名骑士全军突入敌阵。还没有开始作战，十字军的气势就压倒了萨拉丁的大军。冲入敌阵的十字军奋勇拼杀，结果萨拉丁的库尔德骑兵近卫队首先退却，引发了穆斯林军队的大溃败。苏丹本人也差点儿被俘，最终这次蒙吉萨尔战役以鲍德温四世以少胜多而告终。

率军狼狈逃离战场的萨拉丁，在其39岁的人生中初尝败绩。

携战场上缴获的敌军战旗凯旋而归的鲍德温四世和骑士们，受到耶路撒冷居民的热情迎接，有不少百姓都落下了眼泪。谁都没有想到，一直受到不治之症折磨的少年国王，能够取得这样一场空前鼓舞人心的胜利。

然而，两年之后，萨拉丁雪耻的机会来了。

1179年，鲍德温四世18岁。这一次他与萨拉丁的战场位于叙利亚。

当年4月，向穆斯林控制地区内进军的耶路撒冷国王遭到了萨拉丁

侄儿的袭击。两军陷入激烈的肉搏战，一时间鲍德温四世被敌军团团围住。为了救出国王，将军托伦奋不顾身地杀入敌阵，身负重伤，几天之后不治身亡。托伦对鲍德温的忠诚广为人们传颂，因此无论士兵还是普通市民，都为他的死深深哀痛。

但是鲍德温并没有陷入沉痛之中。他呼吁将士们为托伦展开追悼之战。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和宗教骑士团都响应了鲍德温四世的号召。这几支部队合流以后，鲍德温大胆地深入了穆斯林势力控制的区域。

身先士卒的鲍德温，率领骑兵团大破迎战的穆斯林将军，眼看着就取得了追悼之战的成功。始料未及的是，萨拉丁本人的大军，突然从败走的穆斯林军队的方向出现了。萨拉丁将鲍德温的部队团团围住，两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鲍德温的身体状况尚可，他紧坐在马鞍上，奋力搏斗。结果，战马被敌军的长枪刺中倒下，耶路撒冷国王滚落到地面上。

这个时候，麻风病缠身的鲍德温已经虚弱不堪。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从地上爬起来，只能躺倒着一动不动。

一位士兵背负着鲍德温，陷入了敌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而此时特里波利伯爵则从敌人中间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逃脱。除了特里波利伯爵以外，在当天的战斗中，十字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大都被俘，其中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与其他贵族选择支付大量赎金获得自由不同，圣殿骑士团的团长拒绝赎身或交换穆斯林俘虏，自愿病死在大马士革的监牢里。

当年的败北，给鲍德温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此后的6年之间，他未能再次与萨拉丁对决。此时萨拉丁主要忙于出征阿勒颇和摩苏尔，而鲍德温四世则由于身体状况恶化，无法重返战场。

由于麻风病造成外貌损毁，鲍德温四世不得不在公众场合戴上银质的假面具。这种银质假面具是古罗马骑士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而鲍德温四世则戴着假面具骑马出行，在战场上也保持这样的装束。

支持鲍德温四世的，除了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之外，还有耶路撒冷王国内的领主巴里安·伊柏兰。但是，他们两人的支持，无法解决鲍德温四世自己亲属带来的苦恼。

与鲍德温四世大姐西比拉结婚的居伊，是一位除了相貌以外再无可取之处的男子，但却因为其身居高位而目中无人。西比拉也执拗地要求自己的弟弟将死后继承权传给居伊，使其成为与自己共治的国王。

鲍德温不得已只好同意了西比拉的请求。没想到居伊完全不堪大用。他在自己的城堡中遭到穆斯林军队的围困，最终依靠鲍德温的驰援得以解围。追击敌军的鲍德温了解到，胆怯的居伊完全没有出城迎战的决心。这位男子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懦弱无能。

鲍德温希望解除西比拉和居伊的婚约，但当耶路撒冷牧首为此前往西比拉处时，公主直接前往其夫在雅法的领地，不予回应。随着鲍德温病情的发展，时间越来越不利于这位国王。

1183年，22岁的耶路撒冷国王的病情导致了他视力的恶化。与此同时，萨拉丁成功占据了阿勒颇，成为了叙利亚和埃及全境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以外，萨拉丁已经占据了自己势力可能到达的绝大部分地区。

怀着巨大危机感的鲍德温四世，使出了最后的手段。他任命西比拉与前夫蒙费拉特侯爵所生的6岁少年为共同统治者。说到底，鲍德温四世都不能允许无能的居伊接手自己的王国。

而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和领主巴里安·伊柏兰被任命为少年的摄

政。鲍德温向他们嘱咐了自己死后王国的施政方针，并拜托二人延续耶路撒冷王国的命运。

1183年11月20日，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前，共同统治者鲍德温五世的加冕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隆重举行。

作为母亲西比拉和继父居伊·德·路西尼安都出席了这场加冕仪式。在雷蒙三世和伊柏兰引导的幼年新国王面前，这对夫妻试图尽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快感，但这一切都被假面具之后的鲍德温四世瞧在眼里。

加冕仪式后翌日，鲍德温四世会晤了宰相、自己的家庭教师推罗的威廉。他将威廉任命为恺撒利亚的大主教，而解除了原先的宰相任命。

鲍德温四世委任这位最理解自己的忠臣前往罗马，请求教皇派遣新的十字军。对这一任务来说，以恺撒利亚大主教这样的神职人员身份来完成，自然比以王国宰相这样的世俗身份执行更加合适。

推罗的威廉完整领会了鲍德温四世的意图。为国王毕生最后的事业而奋斗的使命，落在了这位老臣的肩上。两人从此别后，再未相聚。

关于推罗的威廉的消息，在其到达罗马时还有记载，但后来他从罗马出发，到法国以后，就没有文献可考了。原因可能在于中世纪治安混乱，在个人旅行的主要道路上，都常有盗贼横行。

作为希腊天主教徒的推罗的威廉，留下了一部关于十字军的史书。由于这部著作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十字军，可算是一部具有独特立场的重要作品。

推罗的威廉作为现场的见证人，叙述了1144年至1183年之间十字军国家最困难岁月里发生的故事。1144年，是穆斯林从十字军手中夺回埃德萨之年。从这座外围城市的失陷开始，以至第二次十字军失败给十字军诸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伴随着努拉丁和萨拉丁所率领的穆斯林势力的

扩大。直到后来1187年哈丁战役的完败、耶路撒冷的陷落，十字军国家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夜。推罗的威廉提供了这一时代的重要史料。

这位掌握了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乃至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名士，具有一般市民所没有的历史眼光。从30多岁时就受聘为王子家庭教师的他，44岁时正式出任鲍德温四世的宰相，在署理宰相职务的10年间，全力辅佐麻风病国王的统治。

他所留下的史书，是十字军时代最可信的基督教史料。由于其出色的语言素养，在外交场合并不需要翻译，因此留下了很多直观的第一手材料。在其访问萨拉丁的首都开罗时，甚至被当地人问到自己是谁的友人。

推罗的威廉与前述的沙伊扎尔太守奥萨马是一个时代的人。以两者的地位而言，很可能有见面的机会。试想如果他们见面的话，彼此之间会有什么话要说呢？由于两人并不需要翻译，直接用阿拉伯语对话就可以了。

十字军时代的200年，是争战的200年。但交战双方中，都有像威廉和奥萨马这样的人。然而人世间悲哀的是，他们心中的热情，难以使大众感染。由于不能点燃大众心中的热忱，也就无法推动历史了。

虽然50多岁的推罗的威廉，已经断绝了消息。他在法国、英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前，可能已经递交了鲍德温四世的请求。然而，新的十字军东征并未从西欧开始。毕竟，远在西欧的天主教徒，难以理解中近东圣地民众的危机感。

又过了一年零四个月，1185年3月16日，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病逝。他的青春之火，只燃烧了24年。

8岁的鲍德温五世继承了耶路撒冷王位。这位少年国王由于病弱，

于一年后的1186年撒手人寰。

在此以后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的，是路西尼安和女王西比拉。居伊·德·路西尼安时年36岁，可谓正值壮年。不过，这位国王除了年龄以外，其他方面并不适于执政。

同在1186年，萨拉丁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重要的都市摩苏尔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的文治武功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长期斗争画下了休止符，以统治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广大地区，确立了自己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的地位。

萨拉丁通过占有广阔的领土，将各地征集兵士和资金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样，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期望的，组织一支大军的梦想。

同时代的穆斯林，对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种种期望，都在萨拉丁一人身上实现了。

然而这一时代，依然堪称乱世。因此在本章的最后，我需要稍费笔墨，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以“抽大麻的男人们”著称的暗杀者集团；第二个，则是被当时基督徒称为“解锁的狗”的雷诺·德·沙提永的故事。

“抽大麻的男人们”

这一暗杀者集团是何时、何地、为何而组织起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一位被称为“山中老人”的穆斯林，是该集团最早的组织者。他们以叙利亚北部的山岳地带为最初的总部。

在这一荒凉的沙漠山区，有许多自然形成的洞穴。暗杀者集团在洞穴内部建设联络工事，将其变为三层的城堡。利用这一建筑方法，他们很轻易地在渺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建筑了自己的要塞。

十字军方面也有一两座这样的城塞。但是，西欧来的基督徒并不喜欢这种中近东式的城堡，而大都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建设城堡。但对当地人来说，城堡并没有既定的形状。近年来发现的死海古卷也显示，在洞穴居住的人并没有什么抵抗外敌的能力。

“山中老人”率领的暗杀集团，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他们既不愿意屈从于其他的穆斯林势力，也决不与十字军结盟。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暗杀集团就已经宣告创立。它的成立，是当时伊斯兰世界客观形势的反映。由于各地领主之间纷争的局面，埃米尔们往往不采取战争的手段，而是通过派遣职业杀手暗杀来消灭敌方的领主，以获得其领地。

这些杀手制造了各种恐怖事件，而他们都是不畏死亡的男子。他们常常在吸食大麻之后行动，在暗杀成功之后忘记逃走，最终在暗杀现场被抓获并杀死。由于他们完全不顾自己被杀的危险，执行暗杀任务时也不考虑逃走，自然成为令众人恐惧的存在。

由于这支暗杀集团仅仅为了金钱而行动，因此，任何人都没有什么

消灭他们的好方法。而且，杀手们暗杀成功以后往往直接选择被围堵的众人杀死，人们也就无法得到有关雇凶者的信息。

当十字军入侵之后，暗杀集团除了继续对穆斯林展开行动以外，还把暗杀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十字军一方。但他们的行动与宗教无关，只对买凶者负责。

如果基督徒被暗杀者杀死，除了能调查出是“山中老人”手下所为以外，没有人知道是谁雇佣了凶手，整个案件由此陷入了谜团。

西欧人所说的“职业杀手”有两个词。拉丁语的sicarius是一个来源，在意大利语中是sicario。但到12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语hashshashin的hascise进入了拉丁语，并发展为意大利语的assassino（英语的assassin）。

这一暗杀集团曾经受到过毁灭性打击。圣殿骑士团袭击了他们的总部，将在场的暗杀者全部杀死。“山中老人”只得表示降伏，并每年向圣殿骑士团缴纳贡金。作为十字军中特种部队的圣殿骑士团，自然不能容忍穆斯林一方特种部队的存在。

这些“吸大麻的男人”的另一个令人畏惧的原因，是杀手的渗透力。即便是再严密的警备，也能为杀手所轻易突破。这些看上去像日本忍者的杀手，令萨拉丁颇为头痛。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过对这一集团的厌恶。

有一天，返回开罗王宫自己卧室的萨拉丁，发现自己豪华的床单上放着一袋穆斯林之间相互拜访时所用的甜点，以及暗杀集团杀手们所使用的一把短剑。从此之后，萨拉丁也没有发表过关于这些吸大麻男人的言论。

这样的暗杀集团，即使在1000年以后的今天，仍是任何人都无法消灭的存在。

“解锁的狗”

雷诺·德·沙提永出身法国北部香槟地区的小领主家庭，生于1125年前后。

他作为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附庸，参加了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这位年轻人没有跟随败军返回西欧，而是选择了留在中近东。由于他是小领主家庭的一位普通子嗣，回故乡很难继承到土地。

这一时期的中近东，大人物的女儿往往拥有大量财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沙提永就抓住了这个攀龙附凤的机会，受到了安条克公国的女继承人“安条克的康斯坦丝”的青睐。

24岁的沙提永，不仅成功接近了这位女贵族，还私下里与她结婚。结果，当婚姻需要公开承认时，遭到了十字军各国的领导人的集体反对。原因在于，沙提永的出身太低。

但沙提永没有退缩。他不仅将拒绝为两人举行正式婚礼的安条克大主教投入牢中，还给出了令平民们震惊的残酷答案。沙提永将大主教赤裸的身体涂满蜂蜜，捆绑起来，任由各种虫子啃噬。最终，大主教不得不同意为沙提永在教堂举行婚礼。而后者则瞒过全体市民，挪用了安条克城的军费。

沙提永使用这些军费，从安条克公国出海，航行两天，进攻塞浦路斯。他打着安条克公爵的旗号，在塞浦路斯靠岸。

这场进攻无非是烧杀抢掠的暴行。由于塞浦路斯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君士坦丁堡发出了严正的抗议。沙提永完全不顾使者的来信，继续攻击岛上的部队和居民。此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并不愿意与拜占庭皇帝为

敌，因此鲍德温三世命令沙提永从塞浦路斯撤军，并向拜占庭皇帝谢罪。

在这次草草收场的塞浦路斯之战无疾而终之后，沙提永的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与穆斯林之间展开了激战。

圣殿骑士团与沙提永结成了攻守同盟。由于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大都来自西欧社会中下层，出身小贵族的沙提永自然对这一军事组织充满好感。

沙提永和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有两点相似之处。第一点是长剑在手的时候，就会有优于众人的飘然之感；第二点则是充满了不顾一切杀敌的勇气。

当沙提永从塞浦路斯回到安条克之后，在1160年与穆斯林的一次作战中被俘。时年34岁的沙提永在阿勒颇的监狱中度过了16年。在这16年间，十字军诸国内居然没有一人提出为他支付赎金，就连当初与之结婚的妻子，也没有任何要求穆斯林释放他的意思。这足以说明沙提永如何在当时是多么令人厌恶。

16年后重获自由的沙提永，是被努拉丁之子释放的。后者大概是由于被萨拉丁排除在统治圈之外而感到不满，与沙提永有着相似的境遇。重新回到十字军领地的沙提永，看到的是安条克公国早已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而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者，却是患有麻风病的鲍德温四世国王。

年轻的鲍德温四世知道如何对待回归的沙提永。由于他在安条克的妻子已经病逝，国王找了一位耶路撒冷王国内领主的女儿与之再婚。她除了有一定资金以外，还有名为克拉克和蒙特利尔的两座城堡，位于耶路撒冷的南边。因此，以作战英勇著称的沙提永，在耶路撒冷王国内担任了军务。

51岁的沙提永，与翌年参与了萨拉丁唯一的一场大败，即前述的蒙吉萨尔之战。他是与鲍德温四世一起冲击萨拉丁1.3万大军的580名骑士中的一员。

鲍德温四世会忘却这场大胜，但沙提永却甚为振奋。他相信，再次与穆斯林作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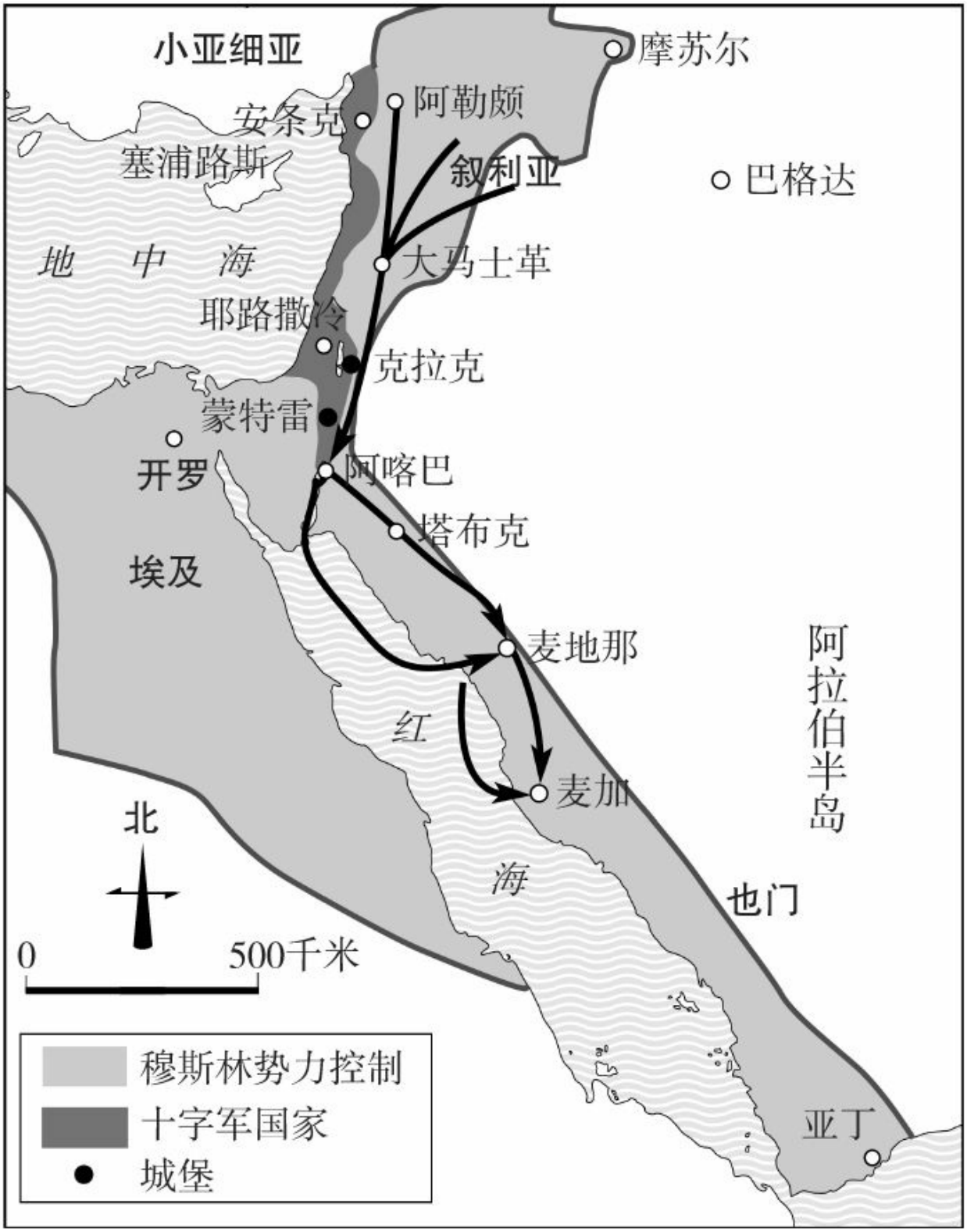
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的萨拉丁，与鲍德温四世缔结了停战条约。双方都为了休养生息，而达成了和平的目标。当然，如果有战争的必要，停战条约也将形同废纸。但在萨拉丁和鲍德温四世互相尊重的条件下，双方达成了协议，表示绝不戕害对方宗教的朝圣者。

这一协议最终被沙提永破坏。他再婚所获的克拉克和蒙特利尔城堡，位于距离死海边上阿喀巴城80公里的大道上。鲍德温四世希望沙提永利用城堡防御敌人从南侧的进攻，但沙提永却从城堡出兵，袭击并劫掠了城下道路上通行的穆斯林朝圣者。

从叙利亚去麦加的朝圣者，首先在大马士革集合，然后通过约旦南下阿拉伯半岛，一般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到阿喀巴，从阿喀巴乘船南下红海，再到麦加附近登陆。

第二条是从阿喀巴经过塔布克，沿陆路进入阿拉伯半岛，再到达麦地那、麦加。



穆斯林前往麦地那和麦加的朝圣道路

选择陆路的朝圣者，会在归途中经过红海和阿喀巴北上，再沿着来时的道路回到大马士革。

对于穆斯林来说，一生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是必修的功课。因此，从大马士革到阿喀巴之间的道路，是穆斯林朝圣者的主干道。而克拉克和蒙特利尔城堡则恰恰位于距这条主干道80公里的位置。

沙提永一变而成盗贼头目。他毫不费力地纠集了兵士，将抢来的人和货物分给自己的部众。朝圣的穆斯林手无寸铁，而沙提永却散布说，杀死穆斯林，抢劫他们的财物，是服膺上帝的大义。

起初，沙提永的强盗行为规模不大，但很快就扩大了袭击的规模。朝圣的穆斯林一次次遇袭。但总的来说，沙提永并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斯兰教重视商业行为，因此朝圣者往往持有大量财物。从麦加返回的朝圣者，则往往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购买了各种物产。这些都成为了沙提永的囊中之物。

沙提永的行动，自然与鲍德温四世尽可能避免与穆斯林正面交锋的原则相抵触。在鲍德温的斥责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雷蒙三世与伊柏兰一致警告了这位老领主。

1181年，沙提永再次袭击了从大马士革南下的穆斯林朝圣者。由于这一时期的朝圣人数很多，沙提永缴获了大量人马和货物。萨拉丁为此对鲍德温四世提出了严重抗议。

在推罗的威廉积极斡旋下，萨拉丁放弃了派出讨伐沙提永军队的做法。

两年之后，沙提永再度生事。他在阿喀巴组织了一支舰队，到红海上从事海盗活动。

麦加和麦地那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红海的东岸。红海从北面的阿喀巴，西面的埃及，到南面的亚丁湾，都是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的必经之路。沙提永在红海上大肆抢劫，自然不能为萨拉丁所容忍。

萨拉丁的弟弟阿拉迪尔率领舰队出海，攻击沙提永的海盗舰队。沙提永被击败之后，沿着阿喀巴逃回了自己的城堡，而他的手下大都成为俘虏。由于他们一直危害朝圣者的安全，萨拉丁下令将这些俘虏全部斩首。

击败沙提永之后，萨拉丁派出军队占领了阿喀巴。但沙提永并未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在停止了海盗行为以后，继续在陆上抢夺穆斯林朝圣者。以至于后来穆斯林不敢在克拉克与蒙特利尔附近的道路上通行。

深为沙提永所作所为而震怒的萨拉丁，一再责备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陷于肉体的痛苦之中，因此无法对沙提永发号施令。

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十字军一方，都没有想到利用“山中老人”率领的暗杀集团来解决沙提永。这些暗杀者唯一不敢染指的组织是圣殿骑士团，而圣殿骑士团却恰恰是沙提永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两年之后的1185年，鲍德温四世驾崩。

翌年，9岁的鲍德温五世也夭折了。

此后就任耶路撒冷国王的，是路西尼安。

61岁的沙提永，完全不忌惮无能的路西尼安。随着这位新王的登基，曾经协助鲍德温四世的特里波利伯爵、伊柏兰和医院骑士团，都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谁也无法控制沙提永了。

1186年，路西尼安的加冕仪式上，见不到沙提永的身影。这位老领主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袭击从阿喀巴到大马士革朝圣路线上的穆斯林。

从此，沙提永成了一只“解锁的狗”。

萨拉丁照例向路西尼安送去了严正的抗议。他要求耶路撒冷王国归还沙提永掠夺的人员和财物。

路西尼安向沙提永传达了萨拉丁的照会。未曾想到的是，61岁的“老狗”，趾高气昂地告诉新任国王：

“路西尼安只是耶路撒冷的主人，而我才是我自己领地的主人！”

他自然不会归还任何劫夺的人员与财物。通过路西尼安得知此事的萨拉丁，陷入了暴怒之中：

“我萨拉丁愿对《古兰经》发誓，擒获此‘狗’之日，我必手刃之！”

沙提永从此成为了在阿拉伯与突厥世界中经常提及的存在。

耶路撒冷王国内的著名领主巴里安·伊柏兰，是连穆斯林伊玛目们都十分尊敬、能够讲流利阿拉伯语的名士。他很早就来到中近东，因此学会了当地的语言。

从事贸易的意大利商人也不得不学习当地的语言。而十字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还使用了很多改宗基督教的突厥兵士。由于这些突厥人不懂拉丁语、德语或法语，十字军的领导人只好学习当地的语言。

但是，在阿勒颇监狱里度过16年铁窗生涯的沙提永，从未学过一点儿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虽然他能听懂一些当地语言，但自己绝对不会讲。在沙提永看来，穆斯林的语言是自己所憎恶的敌人的语言，也是野蛮的语言。

就这样，1186年过去，历史性的1187年到来了。

第四章 武力吉哈德之年

1187年，大地刚刚感受到春的气息，从叙利亚北部到美索不达米亚，一支大军正向大马士革集结。

3月13日，萨拉丁从开罗来到大马士革。十字军时代首次发布伊斯兰“武力吉哈德”的宣言，始于大马士革。

在此之前，倡导吉哈德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导师伊玛目们。而在大军面前，由苏丹本人提出，则是首次。

萨拉丁认为，在历史上一直具有分离倾向的伊斯兰世界，只有通过宗教才能整合起来。然而，萨拉丁的“武力吉哈德”宣言，并非以夺回耶路撒冷为目标。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看，夺回耶路撒冷都不是唯一的目标。

在战争中，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目标的优先顺位也常常会发生变化。在此之际，萨拉丁的目标，首先是维持将士的士气。

在与异教徒斗争中牺牲的穆斯林，会被视为殉教者。除了夺回耶路撒冷的战斗以外，在任何战斗中牺牲的战士都会得到上天堂的保证。作为最高司令官的萨拉丁，必须考虑到这一问题。

十字军一方当然认为，萨拉丁大军的攻击目标是耶路撒冷。虽然苏丹没有明言，但十字军国家还是对此深信不疑，从而再一次陷入恐惧之中。

49岁的萨拉丁，已经有13年的作战经验，对穆斯林不善于攻陷城堡的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萨拉丁自己对十字军城堡的进攻，也完全以

失败而告终。

穆斯林兵士并非缺乏勇气，相反他们有着超越一般人的勇敢；他们所欠缺的，只是集中兵力攻打据点的耐性。

进攻中发生的各种不利状况，以及恶劣天气、水和食物的缺乏、疫病之类的不测事态，会使穆斯林在城堡攻坚战中退兵。至于对拥有城墙的都市耶路撒冷的攻坚战来说，攻守双方都需要巨大的韧性。

萨拉丁总是试图避免对坚固的城堡和都市的攻坚战，而大都诱使守军出城，在其不易逃回城内的地点进行决战。这一战略的奏效，使十字军十分担忧萨拉丁会进攻耶路撒冷。

此外，萨拉丁对中近东十字军的城堡，也采用了与以前诸位穆斯林领袖不同的攻略。

城堡的真实威力，并不是其易守难攻的特点，而是在易守难攻的同时，可以随时派出兵力，对城堡周围的地区进行控制。因此，如果想削弱城堡的力量，就要一座一座地拔除城堡，这正是穆斯林士兵难以完成的。

萨拉丁的战法是，带领大军像洪水一样通过城堡的防区行军，这样城堡自然无法发挥其作用了。在高地上矗立的城堡，仿佛被周遭的洪水淹没，城内的守军根本不敢出来挑战，因为出来就意味着送死。他们只能目送萨拉丁的大军通过。就算是萨拉丁的大军中有不少缺乏训练的新兵，他们的气势也足以压倒城堡守军。

这样，努拉丁未曾染指的耶路撒冷，成为了萨拉丁进攻的目标。

与统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努拉丁相比，萨拉丁还多了埃及作为自己的领地。

在大马士革和开罗关系紧张的时代，大马士革的军事行动会被埃及看作挑衅。而萨拉丁完全不会为此担心。伊斯兰世界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十字军国家的合围，这一次成为萨拉丁一个人的部署。

1187年的这场战争，萨拉丁派出自己的弟弟阿拉迪尔，从开罗配合进攻。他充分考虑到了包围耶路撒冷王国的手段。

努拉丁和萨拉丁之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差异。努拉丁只从穆斯林的视角考虑问题，而萨拉丁却能够从穆斯林和基督徒两方面来考虑。

对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圣城是麦加；第二重要的是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麦地那城；居于第三位的，才是先知升天受启示的耶路撒冷。

而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生长、被钉十字架而死、复活的耶路撒冷，无疑是最重要的圣城，然后才是使徒圣彼得殉教的罗马，第三则是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为了保卫这第三座圣地，西班牙人展开的“再征服”运动，直到1492年才宣告结束。

对十字军来说，最大的打击当然是圣城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夺去。

当萨拉丁的大军在大马士革集结时，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整个人都坐立不安。

他决定集中所有能够集结的部队，动员每一位将领，并在敌军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拦截。而在耶路撒冷城内，留下牧首和少量兵士防守。这一决策正中萨拉丁下怀。作为总司令，常识是迎击时应保证后方的稳固，但此时的十字军国家领袖，是平庸的美男子路西尼安，他能够依赖的战将，只有沙提永而已。

6月26日，萨拉丁将大马士革的防御委任给自己的长子，然后率军南下。

萨拉丁动员了1.2万名骑兵和大量步兵组成了4万大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行军，以缓慢的速度推进，使沿途的城堡不敢出兵阻挡。

在邻近地中海的海港城市阿克集结的十字军部队，包括以1200名骑士为首的1.8万名将士。安条克公国与萨拉丁提前讲和，因此没有派出部队支援。萨拉丁成功地利用计谋，分化了耶路撒冷王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和安条克公国。

人数虽少但精锐的宗教骑士团，也只有一半人马来到了阿克。由于十字军的城堡都在两大骑士团控制下，负责守卫城堡的团员都没有前来集结。在萨拉丁行军过程中，医院骑士团的团长率领130名骑士出城挑战，结果被淹没在萨拉丁的人海战术中，全军覆没。

医院骑士团的独自行动，多少与不信任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有关。在阿克集结的医院骑士团成员，只好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作战。至于此时他们的领导为何人，我们不得而知。

与医院骑士团并立的精锐之师——圣殿骑士团，也在与萨拉丁大军的对抗中失去了相当数量的骑士。但团长热拉尔率领数名骑士成功逃脱，最终回到阿克指挥骑士团。两大骑士团的总兵力为400人。由于宗教骑士团采取志愿加入的制度，一般情况下其兵力达不到这么多。

十字军的骑兵数量，只有萨拉丁大军骑兵的十分之一。因此，这一实际状况就决定了最终的胜负。

十字军的骑兵都是重装骑兵，而穆斯林的1.2万名骑兵全部为轻骑兵。

身着厚重铠甲的重装骑兵，是中世纪西欧的精华，也就是说，他们代表了中世纪西欧的文化。在气候和地形与西欧迥异的东方，人们没有重武装的文化。即使从西欧引入了重装骑兵，也没有成为东方穆斯林军

队的流行兵种。萨拉丁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装备更换，使用了欧式装备，但依然不出轻武装的范畴。

对骑兵来说，马是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马体态优美，但如果是重装骑士骑乘的话，它们无法长时间驰骋。因此，西欧的骑士们都骑乘比阿拉伯马大一圈、弗里西亚产的中欧马。这种马必须从西欧进口，而在得不到弗里西亚马的情况下，十字军只能使用阿拉伯马。而穆斯林一方都使用阿拉伯马，对于轻武装来说，是最合适的。

当战马与骑士一起突击时，重装骑兵带来了强大的威压感，对敌人有压倒性的心理优势。1200名重装骑兵，在善于使用的将领调遣下，可以冲散10倍于己的敌人。但是，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强大的西欧骑兵，到1187年已经是90年后截然不同的情况了。

与萨拉丁率领的4万大军相比，十字军的1.8万兵力，并不是决定战斗结局的主要原因。追溯到古代，在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军事奇才率领下，以1/5的兵力战胜敌军的例子不在少数。十字军的历史上，也有亲率24骑称霸加利利的丹克雷迪，和以580骑战胜萨拉丁1.2万大军的鲍德温四世。

总之，战役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将领的能力和气概。与1.2万名骑兵和1200名骑兵的差距，或者4万和1.8万的差距相比，十字军领导人的无能，是历史上著名的哈丁战役胜负分明的最主要原因。

最高指挥官的能力，自然体现在战场上部署军队的能力。萨拉丁对于防御力超强的重装骑兵所采取的战术，是命令兵士袭击马匹。失去马匹的骑士，就会陡然失去一半以上的战斗力。

哈丁战役

步步为营的萨拉丁，于6月27日进入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地，然后在戈兰高地与提比利亚湖之间行军，到30日渡过了约旦河，进入十字军国家内部。他的大军绕过提比利亚湖南侧，从湖的西岸深入，在提比利亚斯城下摆下阵势。但是，萨拉丁并未攻城。他派出探马得知，十字军已经在阿克集结完毕，向提比利亚斯开来。萨拉丁做好了在野外迎战的准备。

7月3日，十字军到达了阿克与提比利亚湖之间的塞佛利埃。此处有一座大型城堡，因此同行的特里波利伯爵建议暂时驻扎于此，等待援军。但是沙提永反对他的意见，提出应继续行军。路西尼安为沙提永所说服，舍弃了这一安全位置，于翌日继续向东行进。

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担心的是，从塞佛利埃向东到提比利亚湖之间，一直没有水源。这段距离毕竟只有30公里，因此路西尼安轻易否决了他的提议。然而，对萨拉丁来说，这30公里意味深长。

战役的结局，体现了司令官的能力。而敌军在司令官所设想的地域，以所设想的方式出现，预示了战斗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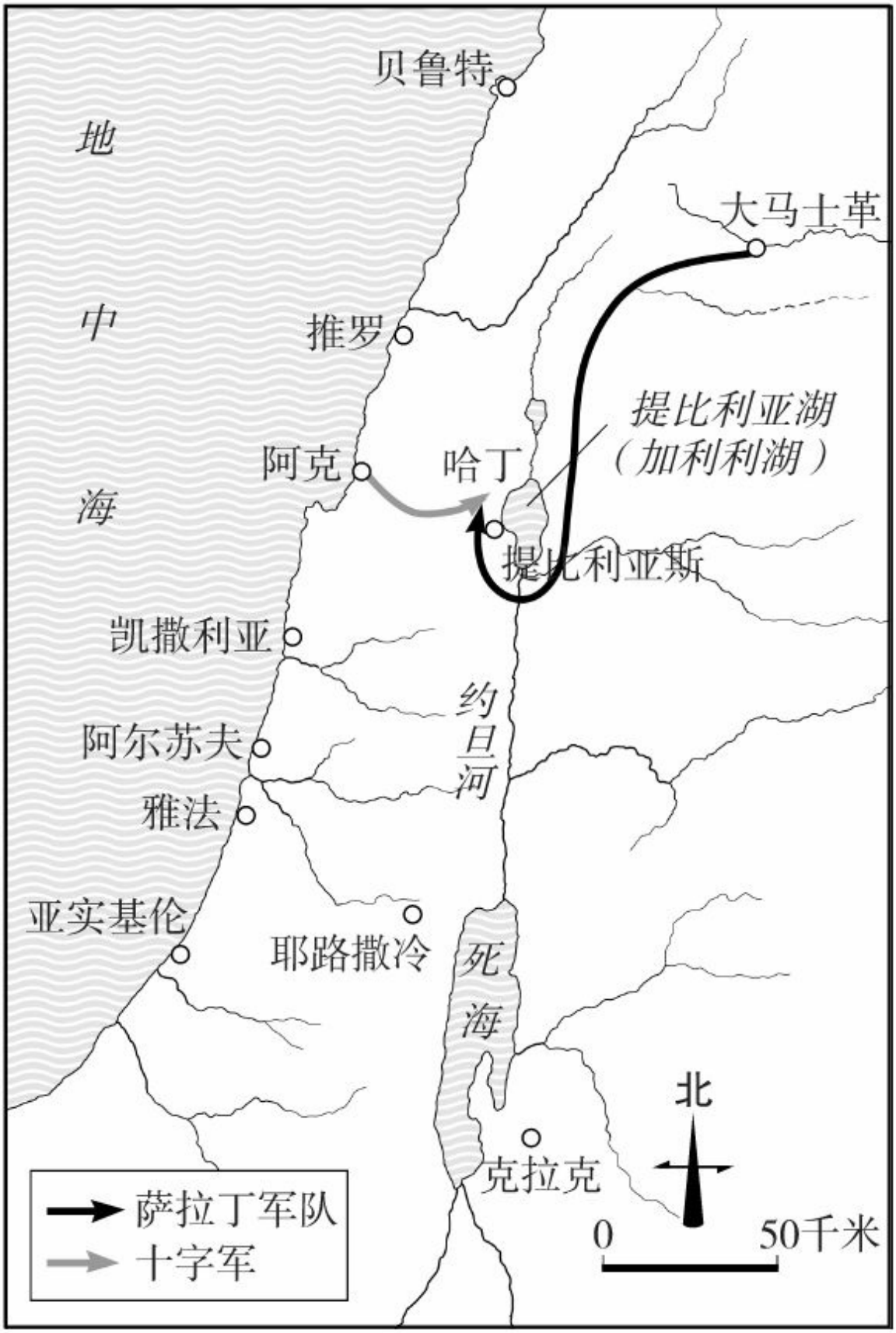
哈丁战役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水源。在干燥的中近东，夏天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就是对饮水的保障。

萨拉丁从大马士革出发后，行军路线上不离水源。相反，离开塞佛利埃城堡的十字军，一直在没有水源的路线上行军。在诸多十字军领主中，只有特里波利伯爵和巴里安·伊柏兰的部队特意准备了备用水。耶路撒冷国王完全没有考虑这一点，而习惯了强盗行为的沙提永，则只知道抢夺有备用水的诸侯。

在这30公里的行军之中，十字军分成三个军阵，依次而行。

走在最前面的是熟悉地形的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的部队。

紧随其后的，是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所率的部队。阿克的主教捧着“真十字架”，在这支队伍前面行进。从第一次十字军发现这个相传为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开始，它就一直跟随出征的十字军队伍。十字军将士相信，有“真十字架”的护佑，自然能在战斗中击败穆斯林。在这一军阵中，还有沙提永的部队。


贝鲁特
地
中
海
大马士革
推罗
提比利亚湖
（加利利湖）
阿克
哈丁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阿尔苏夫
雅法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北
克拉克
萨拉丁军队
十字军
0
50千米

两军向哈丁进发示意图

走在最后面的，是巴里安·伊柏兰的部队和以圣殿骑士团为主的宗教骑士团。

在行军过程中，特里波利伯爵感到，再持续下去就会使部队面临缺水的生命危险。他连忙催马来到路西尼安面前，要求到6公里外的地方取水。由于兵士们早就深受缺水之苦，路西尼安同意了雷蒙的要求。但是，此时取水已经太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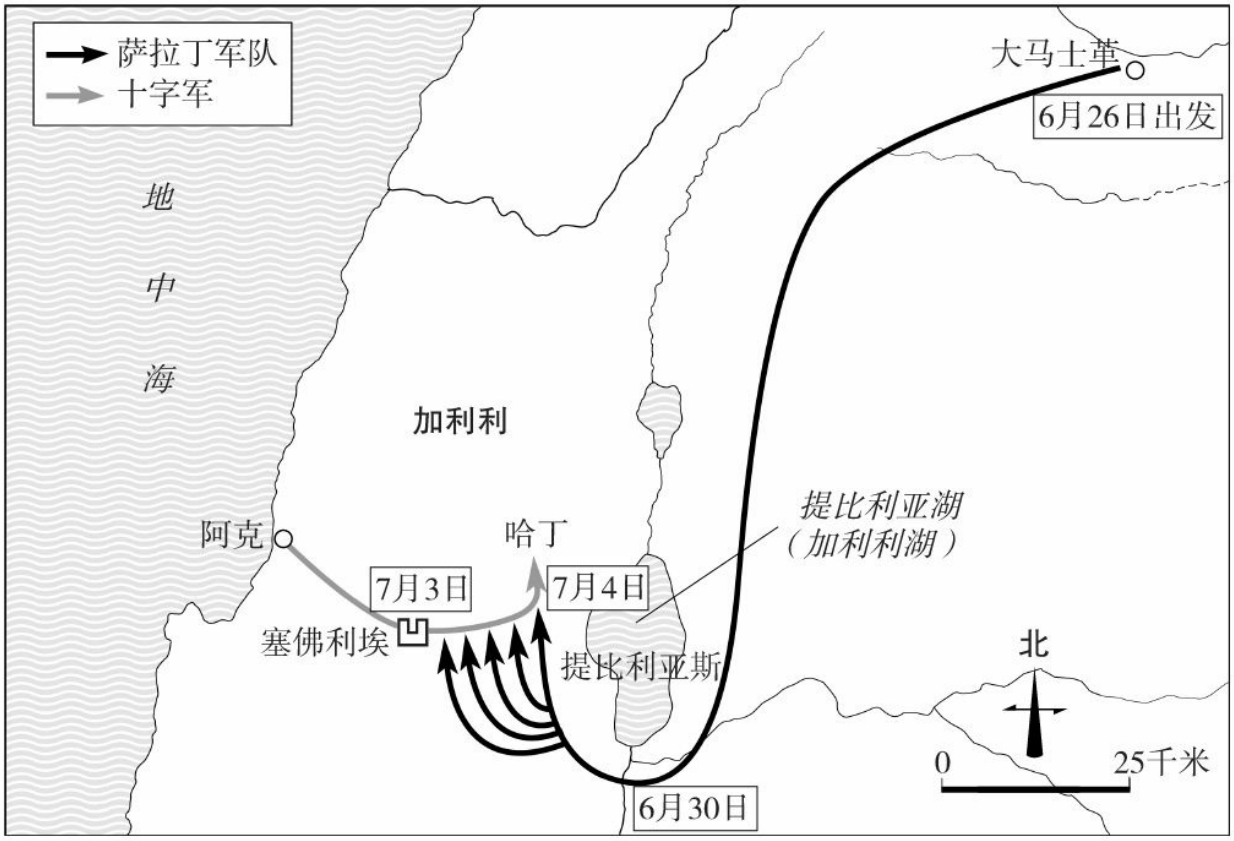
领受萨拉丁命令的穆斯林骑兵团，袭击了行进中的十字军。他们的目的不是与之决战，而是延缓十字军的行进速度。这些轻骑兵组成不同的小队，一支突袭后就撤走，紧接着另一支又前来袭击。结果，十字军疲于应付，到7月3日凌晨都无法继续前进。

在距离提比利亚湖仅仅12公里的地方，十字军可以看到月光笼罩下的湖面，可是却完全无法取水。就在这时，萨拉丁开始实施了他的第二阶段计划。

萨拉丁的策略是，在十字军取得饮水之前，就将其包围歼灭。7月3日夜晚，萨拉丁集中进攻十字军的后卫部队，遭到伊柏兰和宗教骑士团的顽强抵抗，最终未能成功。

然而，7月4日，十字军开始继续行军以后，萨拉丁的包围宣告完成。十字军左右的低矮山丘上站满了穆斯林兵士，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敌人。

此时唯一可以逃脱的通往附近村庄尼姆林的道路，也已经完全封闭了。根据萨拉丁的计划，穆斯林点燃了附近山上的树林。在浓厚的烟幕中，逃脱之路完全消失。



哈丁战役

烟幕不仅屏蔽了十字军逃跑的路线，也把分成三队行军的十字军完全隔离，使其首尾不得相顾。走在最前面的特里波利伯爵的部队成功突围，但跟在后面的大部队和后卫部队就被分割包围了。

由于被分割包围，将士们无法互相救援。穆斯林射杀了十字军的马匹，使得骑士们也只能以步兵的方式作战。

激战在各处展开。坐镇山上指挥的萨拉丁，调遣兵士与十字军进行白刃战，一直保持对局势的控制。

绝望的十字军唯一的激励，来自战场上高举的“真十字架”。在临时搭建的营帐中，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和幕僚们紧张地谋划着。

战斗以营帐的倒塌而告终。看到国王营帐倒塌的伊柏兰，集结自己

的属下，从穆斯林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最后成功突围。

以此处战场北侧的哈丁，今天叫作希丁的地方命名的“哈丁之战”，完全在萨拉丁的计划之中结束了。

成功逃脱的基督徒军队，包括特里波利伯爵和伊柏兰的部队在内，不超过3000人。在哈丁战场上掩埋的十字军死者，达到1万人以上。

我们没有萨拉丁一方战死者的统计。伊斯兰史料中一直缺乏对死伤者数目的记载。在此战之后不久，萨拉丁就为哈丁战役的死难者建立了纪念碑。此战极为惨烈，双方的记载应当出入不大。

著名的哈丁战役是萨拉丁最高的杰作。可以说，此战的编剧、导演和主演，都是萨拉丁一个人。

一、将努拉丁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遗产合二为一，实现对十字军完全包围的萨拉丁，打出了决定性的一战。

二、由于成功地获取了安条克公国的中立，萨拉丁分化了十字军的力量，以此一战决定了以耶路撒冷王国为代表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命运。

三、虽然萨拉丁的目标在耶路撒冷，他巧妙地避开了十字军擅长的城堡、都市攻防战，而是采取平原野战的方式，诱敌深入，大破敌军。

四、萨拉丁大军的行进，使十字军苦心经营的城堡防御体系失去了作用。

五、通过使敌军断水的基本策略，萨拉丁在自己预判的时间和地点，以自己所期望的方式，成功地分割包围了十字军。

六、战况完全处于萨拉丁的掌控之中。从6月26日自大马士革出

兵，到7月4日的决战，一共不过9天时间。萨拉丁的神机妙算，值得21世纪的五角大楼学习。

如果拿这场哈丁战役与历史上其他著名战役相比，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亚历山大大帝最成功的战役，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之战。

汉尼拔对罗马军队的最大胜利，则是坎尼会战。

恺撒则是以阿莱西亚战役和法萨卢斯战役名垂青史。

这些战略战术的杰作，都是在相当强大的对手面前取得的。对方的司令官，都拥有足够的能力。

由于双方展开了正面的交锋，这几次战役的规模相当大。

而哈丁战役的规模显然不能与前述的几场战役相比。在十字军一方，并没有一位擅长战略战术，集责任与义务于一身的最高司令官。这恐怕是哈丁战役与前述的大战不能相提并论之处。

从战果来看，萨拉丁自然是取得了胜利，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完胜。

胜者与败者

成功从哈丁战场逃离的十字军领导人，只有打先锋的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和率领后卫部队的伊柏兰。除此二人以外，并没有任何领导人战死，而是全部做了萨拉丁的俘虏。

其中包括：

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

路西尼安的两位弟弟，他们是耶路撒冷军队的指挥官；

蒙费拉特侯爵威廉；

雷诺·德·沙提永；

手捧“真十字架”的阿克主教；

圣殿骑士团团长热拉尔。

哈丁战役于7月4日午后宣告结束。被带到萨拉丁营帐的十字军王侯们，早已口渴难耐。

萨拉丁见状，吩咐手下递给耶路撒冷国王水喝。路西尼安自己没有喝水，而是把递过来的水杯交给了站在一旁的沙提永。

看到这一情景，萨拉丁突然怒不可遏。他大呼“你不能喝水！”随即拔出剑来，砍倒了沙提永。苏丹的近卫兵士立即上前，将沙提永斩首。萨拉丁终于实现了亲手斩杀劫掠朝圣者的强盗的誓言。

在被捕的诸位要人中，只有沙提永遭到了死亡的命运。其他人，包

括国王路西尼安在内，首先被萨拉丁带回大马士革。萨拉丁并不想杀害各位王侯，将他们留下还有其他的用处。只有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与其他王侯略为不同。

至于比王侯级别低的俘虏，则受到了萨拉丁的严惩。毕竟，这大批兵士如果留在穆斯林中间，可能生出各种祸端。

被称为“突厥子”的改宗基督教的突厥士兵，是十字军中最忠诚的战士，战死的比例非常高。可以说，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战死比例最高的，除了两大宗教骑士团之外，就是这些信奉基督教的突厥人了。因此在哈丁战役中，他们被俘的人数最少。

萨拉丁将俘获的“突厥子”全部斩首。作为突厥人，改宗基督教是背叛伊斯兰的行为，因此这些人不能存活。

对于“突厥子”以外的俘虏，大都被作为奴隶贩卖。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贩卖穆斯林为奴，这次被卖的都是信奉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派的步兵。

萨拉丁对于俘获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给予了保命的机会。他承诺，如果这些骑士改宗伊斯兰教，可以在穆斯林军队中获得要职。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对穆斯林处以死刑，通过改宗，这些骑士就能得到活命的机会。

但是，骑士们绝少答应改宗。最终，萨拉丁下令处死了230名宗教骑士团的骑士。

在哈丁战役42年之后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名圣殿骑士团骑士改宗的事实。这位当时年仅20岁的西班牙骑士，加入了穆斯林军队，并在意大利商人贸易记录里，成为大马士革的守备队长。

经过此战，萨拉丁几乎彻底消灭了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突

厥子”这些十字军国家常备军的有生力量。他们一直担负着两次十字军东征之间中近东最主要的防御任务。因此，消灭他们，萨拉丁所擒获的要人就失去了支持。

但是，这一处理取得的效果只是暂时的。无论是改宗的突厥人，还是宗教骑士团，都很快得到了新的志愿兵的补充。

两大宗教骑士团的成员大都来自西欧。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西欧的修士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通过祈祷与冥想来接近上帝。但他们还有一条接近上帝的途径，那就是以基督战士的名义与穆斯林作战。由于中世纪人心中强烈的信仰诉求，两大骑士团的兵员补充一直没有中断。

萨拉丁知道，杀死骑士团的成员不足以根除骑士团。但他毕竟是以战胜敌人为最优先目的的武将，因此一定要尽可能做到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在哈丁战役之后，他也一直秉持相同的策略。

对于武将来说，新获得的胜利一定要尽可能充分利用，这就是常说的“趁热打铁”。

7月4日哈丁战役结束后，第二天一早，萨拉丁就向附近的提比利亚斯派遣了使者，要求开城投降。萨拉丁提出，如果这座加利利的中心城市能够开城投降，他保证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提比利亚斯是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的领地。在雷蒙出征期间，由伯爵夫人，也即是伊柏兰的妹妹守卫。伯爵夫人同意了萨拉丁的要求，毕竟在哈丁战役之后，没有人敢于违抗萨拉丁的旨意。

萨拉丁完全遵守自己提出的条件。在萨拉丁所派卫队的护送下，伯爵夫人与其子女、佣人，携带着全部家当，前往伯爵所在的推罗。

从此，萨拉丁将第一次十字军时代丹克雷迪占据的十字军国家的东部屏障——加利利，收入了自己手中。这相当于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

打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提比利亚斯城，是哈丁战役以后两天内不战而取的收获。

第二天，7月7日，萨拉丁命令其侄儿率军西征阿克。由于兵力不足，萨拉丁于次日亲率大军前往阿克城下。

萨拉丁之所以选择阿克作为第二个目标，是因为在近东地区，夺取海港城市十分重要。

埃及虽然拥有海军，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的百年之内，从未靠近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海岸。面对意大利滨海城邦对制海权的控制，处于劣势的埃及海军，只有夺取一些海港，才能扭转局面。因此，萨拉丁希望一鼓作气，攻下阿克、雅法和亚实基伦等几座重要的海港城市。

其中，阿克是西欧船只最多的一座港口。如果萨拉丁能够取得阿克，来自西欧的援军就难以登陆了。

但阿克也是一座以城墙坚固而著称的城市。因此，萨拉丁希望能以先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占领阿克城。

哈丁战役的结果自然也传到了阿克。居民为了能在城里继续生活，同意了萨拉丁的条件。但是，居民中也有决定离开城市的。城中居留区内的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商人们，以其经济人的特点，积极介入与穆斯林的贸易。但在萨拉丁取得城市以后，他们对自己的居留区是否还能存在，就起了怀疑。除了“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的威尼斯商人还愿意留下以外，成为二等公民的基督徒商人们，纷纷离开阿克的居留区，移居推罗或特里波利。

萨拉丁对巴勒斯坦其他几座海港城市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目的，是在进攻耶路撒冷之前，切断其补给线。

萨拉丁征服各个城市时，利用了被俘的两位要人，一位是耶路撒冷

国王路西尼安，另一位是圣殿骑士团团长热拉尔。

当萨拉丁的大军来到一座城市前时，两位俘虏就被兵士带到城墙下面。萨拉丁命令他们说服城市，不要进行无谓的战斗，尽量在不抵抗的情况下开城。

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都照做了。城墙上的守军往往对他们展开辛辣的嘲讽和轻蔑的叫骂。最终，萨拉丁结束了费时费力的海港攻势。

恬不知耻的路西尼安，在此之后还苟活了7年，而圣殿骑士团团长热拉尔则在两年后病逝。他们都得到了萨拉丁的释放，回到故国，而并非死于穆斯林的牢狱之中。

虽然萨拉丁的策略一直奏效，但到了9月，他中止了这次进攻。他下一步要做的，是“圣战”的最重要一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世俗领袖，萨拉丁以哈丁战役的英雄事迹而得到广泛的传颂。然而，他的行动自由反倒不如以前了。

伊斯兰社会也是封建社会。相当于同时代西欧皇帝与国王的苏丹，对服膺于自身权威的埃米尔与领主，并没有直接约束的能力。他的亲兵数量并不很多，相反要依靠各地埃米尔与领主提供的兵力来征战。

苏丹能够长期作战，完全是来自各地埃米尔和领主的支持。由于他们并不希望折损兵力，如果一旦出现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苏丹就无法组织大军。有时，宗教方面的原因就会成为埃米尔和领主拒绝出兵的引子。

按照伊斯兰教法，如果丈夫外出四个月以上不归，妻子就有权利提出离婚。埃米尔们有可能面临妻子离婚的诉讼，除非是在参加圣战战斗的情况下。因此，如果萨拉丁想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就必须打着任何穆

斯林都不能拒绝的“武力吉哈德”的旗号，以夺回耶路撒冷为终极目标。

1187年9月20日，萨拉丁的大军，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下。

耶路撒冷并非一座易守难攻的都市。四周的城墙不过4公里长，城外也没有任何援军。因此，只要萨拉丁坚持进攻，耶路撒冷迟早会落入穆斯林之手。由于路西尼安所率领的大军早就败绩哈丁战场，城内几乎无兵可用，更不要说有能力的指挥官了。

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差不多有6万人。

其中四分之一，也就是1.5万人，是穆斯林所说的“法兰克人”。他们从西欧来到这里，或者是西欧人的后代。

其余4.5万人，是由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等东方基督徒和犹太人、穆斯林组成的“东方人”。

因此，这6万人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抵御萨拉丁所率的穆斯林军队。东方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曾经在穆斯林的吉兹亚税收制度下生活过。而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任何防卫的努力其实都是无济于事的。毕竟在过去的500年间，基督徒的统治只有最后100年的历史。至于1.5万名法兰克人，肯定比任何人都对萨拉丁的大军感到恐惧。此时，城内的焦点在负责防御的巴里安·伊柏兰身上。

伊柏兰的巴里安

作为耶路撒冷王国内强有力的领主，巴里安·伊柏兰也难以完全统御耶路撒冷的十字军。

伊柏兰的祖先是意大利南部人，后来成为了以雅法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领主。他们在伊柏兰定居，成为了中近东土生的法兰克人。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家族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对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特别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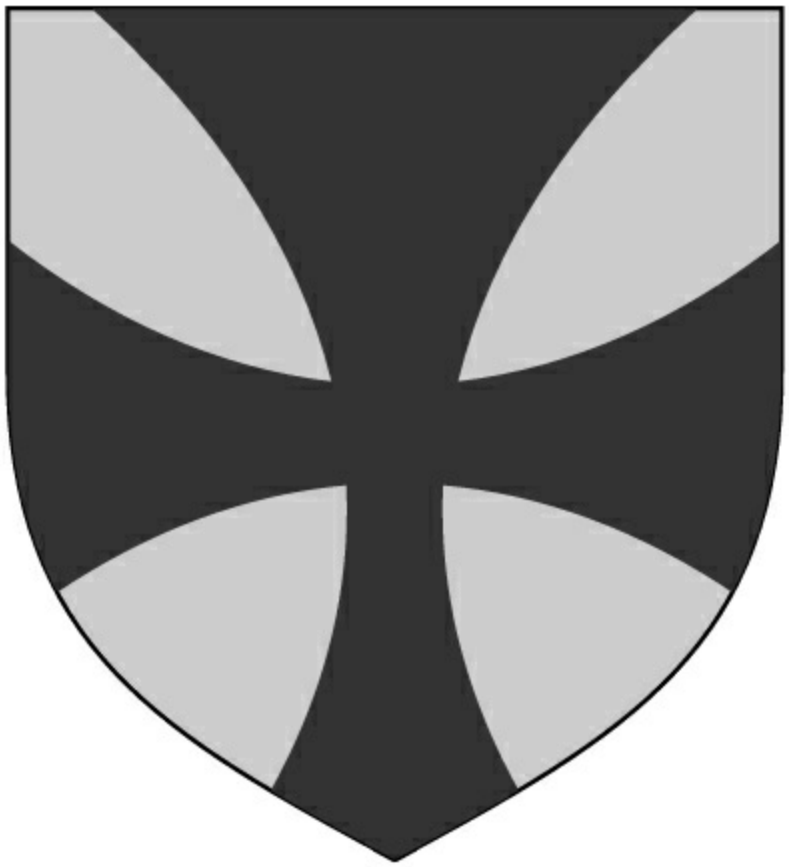
而伊柏兰之所以留在耶路撒冷，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从哈丁战役成功逃脱的伊柏兰，与属下的兵士一起来到了推罗，但妻子儿女还都留在耶路撒冷。由于哈丁战役后萨拉丁的封锁，伊柏兰难以前往耶路撒冷。

因此，伊柏兰不得不以阿拉伯语致信萨拉丁，希望能够得到通行许可，返回耶路撒冷与妻子儿女团聚。

萨拉丁虽然未曾与伊柏兰会面，却深深了解这位对手。他是连伊玛目们都评价很高的少数法兰克人中的一位。在鲍德温四世大败萨拉丁的蒙吉萨尔战役中，伊柏兰奋勇拼杀，因此广为人知，而此次在哈丁之战中作为后卫，在敌军密集包围中，成功突围，也是诸多武将中最强的实力派。

萨拉丁对这位手下败将的请求，最终给予了应允的答复。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伊柏兰只能在耶路撒冷停留一天，然后就必须带着家眷返回推罗。而当伊柏兰进入被萨拉丁重重包围的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看到的满是陷入恐惧的居民。



伊柏兰家的纹章（黄底红色变形十字）

巴里安·伊柏兰并不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些人的愁苦而离去。此时离哈丁战役的失败不到三个月。伊柏兰最终决定留在耶路撒冷，与萨拉丁奋战到底。他与妻子一同留在耶路撒冷，担负起城防工作。

于是，伊柏兰给萨拉丁又写了一封信。他希望萨拉丁能够允许自己解除两人之间的约定。

萨拉丁最终决定回复这封来自耶路撒冷城内的信，在回信中同意了伊柏兰的请求。不仅如此，萨拉丁还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保证伊柏兰的妻子儿女事先平安无事地前往推罗，然后再进行男人之间的决战。

萨拉丁虽然做了如此绅士的安排，并不代表耶路撒冷是容易攻陷的城市。可以说，作为中世纪文化的骑士精神，是超越宗教界限的。

为了耶路撒冷的防御而留下的伊柏兰，充分具有城防首领的资格。

这里所谓的“充分”，是指在完全没有其他军事领袖的窘境下，能够担当耶路撒冷防御重责的，只有伊柏兰一个人。

巴里安·伊柏兰并不是家族中的长子。因此，他并不是作为耶路撒冷王国内的重要领主，而是以领主家庭内一员的身份为王国服务的。由于他的长兄在耶路撒冷王宫内受到排挤，退隐安条克，巴里安得以成为家族内的掌权者。1187年，巴里安46岁。

从成为伊柏兰家族的族长开始，巴里安就为鲍德温四世忠心耿耿地工作。从鲍德温四世13岁继位到24岁病逝，伊柏兰度过了34岁到45岁之间的中年时期，是麻风病国王最得力的两位重臣之一。与另一位重臣，特里波利伯爵雷蒙三世不同，伊柏兰常与鲍德温四世共同出入于战场。而特里波利伯爵则由于自身领地事务繁忙，不能经常与国王同行。

鲍德温四世将其守寡的继母，拜占庭皇帝之女玛丽亚·科穆宁娜许配给伊柏兰。这自然是对后者破格的厚待。早知自己不能长命的鲍德温四世，认为耶路撒冷王国需要伊柏兰这样的才俊来力挽狂澜。由于伊柏兰的领地级别不够，鲍德温还特意在其与继母的婚礼上，馈赠了纳布卢斯作为新郎的封地。婚礼举行的那一年，伊柏兰37岁。

6年之后，不得不正视自己身体日渐衰弱的鲍德温四世，将自己6岁的侄子加冕为共治国王。为了阻止自己死后西比拉和路西尼安继承王位，鲍德温命令伊柏兰和雷蒙三世带领年幼的新国王走上宝座。这一仪式本来要国王亲自完成，但是身体已经十分衰弱的鲍德温四世，实在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在加冕仪式两年之后，24岁的鲍德温四世就驾崩了。8岁的少年鲍德温五世在成为国王翌年也宣告夭折。西比拉和丈夫路西尼安，最终还是坐上了耶路撒冷国王的宝座。

伊柏兰一直与耶路撒冷王宫中的西比拉和路西尼安保持距离。虽然伊柏兰跟随路西尼安参加了哈丁战役，但他的部队完全听命于他自己。这一时期内，出任家族族长的伊柏兰，一直与路西尼安保持距离。

而对路西尼安重用的沙提永，伊柏兰常常保持沉默。他与沙提永完全不是一路人，而沙提永对穆斯林的强硬路线，也是伊柏兰所反对的。

历史把47岁的伊柏兰推到了耶路撒冷城防总指挥的位置。而这位领主大概也在思索着自己的命运吧。

现实是十分严峻的。能够跟随伊柏兰参加城防作战的骑士不足60人。在与萨拉丁决战之际，耶路撒冷的城防空空如也，这是路西尼安的责任。他只留下牧首负责城防，而牧首却是左右为难，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

伊柏兰召集了耶路撒冷城内16岁以上的男子，将他们全部任命为骑士。这些人一共有多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伊柏兰的骑士任命，显然是为了从气势上鼓舞城内居民保卫圣城的决心。

伊柏兰能将60名骑士与一群业余士兵捏合起来，足见其能力的高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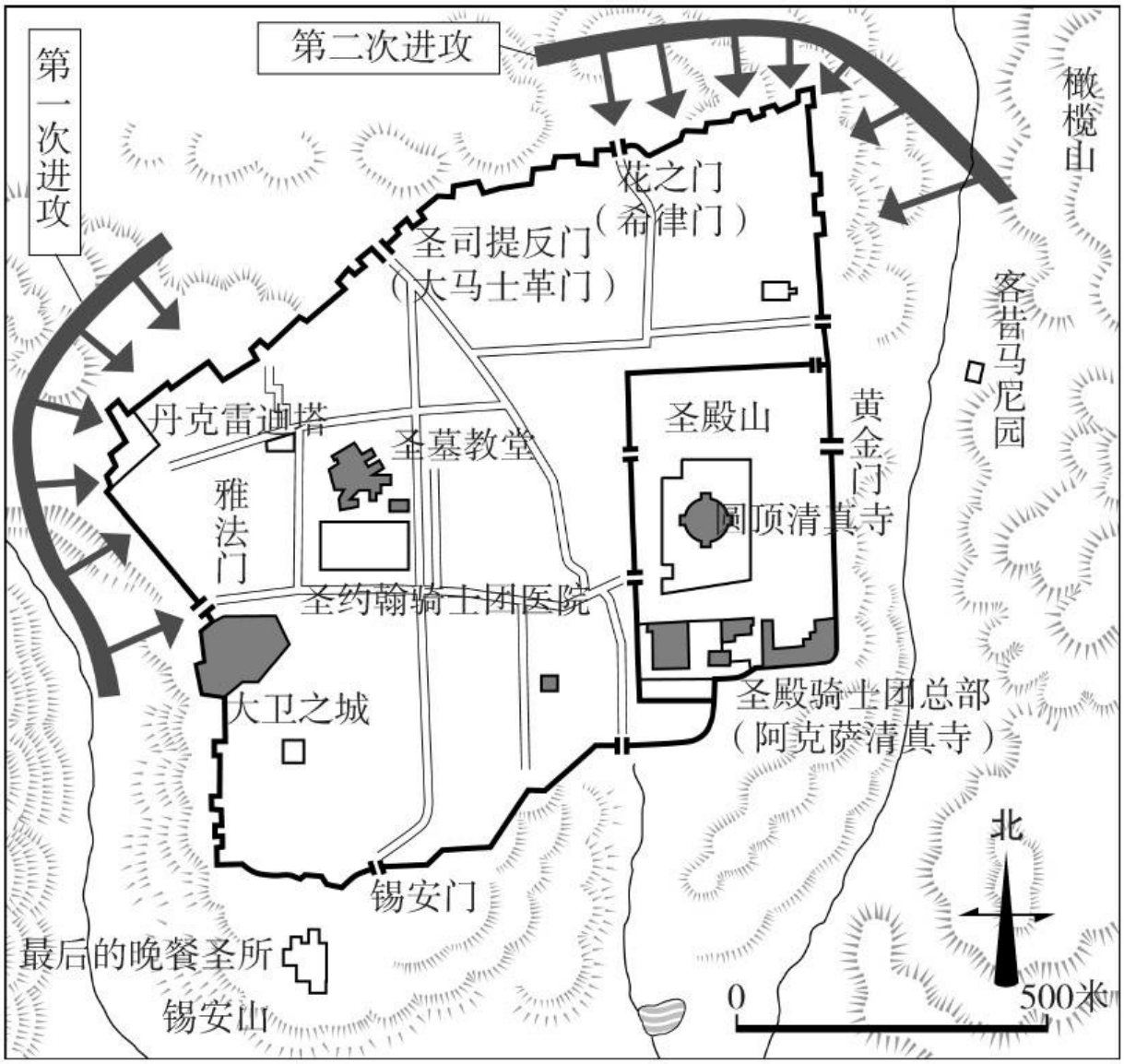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之战

萨拉丁在到达翌日，9月21日一早，就开始发动进攻。耶路撒冷西北面和西面的城墙，是从大马士革门到雅法门之间的区域。萨拉丁选择这一区域发起进攻，是与第一次十字军的攻城方向相同的。萨拉丁军队的攻势，从21日持续到25日。

我们并不知道伊柏兰是如何在城内领导骑士们进行防御的。但是，在绝对优势于己方的兵力面前，防御方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萨拉丁的军队虽然猛攻了5天，却连一座城门也没能攻破。

萨拉丁的军队比以前的穆斯林军队拥有更强大的技术支持。他们不仅拥有许多投石器，还有发挥着如同今日手榴弹一般作用的“希腊火”。尽管如此，城防部队并未退却一步。

5天的战斗结束以后，萨拉丁明白，用相同的战法，肯定无济于事。于是他决定连夜拔营，把军队向耶路撒冷东北方向移动。



耶路撒冷攻城战

26日，萨拉丁向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向展开了新的攻势。从城墙下面的投石器中发射出的，是装满了石油的“手榴弹”。这些“手榴弹”不再单个地从兵士手中投掷出去，而是一齐向城墙上发射。被“手榴弹”击中的城墙，顿时化作一片火海。

在猛攻城墙的同时，萨拉丁命令工人在城墙下面挖掘坑道。经过三天的工作，坑道挖掘了30米，然后在坑道内施以火药，将城墙炸开。萨拉丁命令骑兵部队从毁坏的城墙上越过，进入城内。

防守方自然也注意到了萨拉丁挖掘坑道的作业。

30日，巴里安·伊柏兰向萨拉丁递交了一封信，希望与之会谈。但是，萨拉丁没有答复。

10月1日，伊柏兰再次向萨拉丁提出会谈的要求。萨拉丁依然没有答复。伊柏兰还是没有明白。第二天，10月2日，两人在萨拉丁的营帐里会面了。他们无需翻译，直接用阿拉伯语交谈。49岁的穆斯林和47岁的基督徒之间面对面的对决开始了。

男人间的对决

巴里安·伊柏兰已经泣不成声。而与此同时，他说了一番威胁萨拉丁的话。关于对萨拉丁的威胁，伊斯兰史料中有如下的记录。

伊柏兰这样说：“耶路撒冷早晚是你的了。但是，今天耶路撒冷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还会把城里的5000名穆斯林全部杀死。还有，你们伊斯兰教的圣殿，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我发誓一定把它们全部毁掉！”

“萨拉丁，你，终于成了耶路撒冷的征服者了。可你终究不过是在破坏之后的一片废墟上，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鲜血染成的城市的征服者罢了！”

萨拉丁在沉默中听着这一番话。看到萨拉丁的样子，巴里安·伊柏兰改变了说话的口气。他谈及在耶路撒冷的一笔巨款。当时，为了平息托马斯·贝克特事件之后罗马教皇的愤怒，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给耶路撒冷捐献了相当于3万第纳尔金币的重金。伊柏兰希望用这笔款项作为城破之后法兰克人不被贩卖为奴隶的赎金。因此，萨拉丁和伊柏兰之间的交涉，转移到了赎金的方面。

伊柏兰首先希望用3万第纳尔作为1.5万名法兰克人安全与自由的赎金。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男子10第纳尔，女子5第纳尔，儿童1第纳尔的市场价格，这笔钱只能救出7000人。

这7000人自然只包括法兰克人。城破以后，同样被捕的犹太人、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也需要萨拉丁格外开恩，但是这部分人的赎金就难以提供了。

伊柏兰想做的，并不只是救下这7000人。他希望将全体市民救下来。伊柏兰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并将城内的资金集中起来，只求萨拉丁尽可能多地保障居民的安全与自由。

萨拉丁看到这一场面，深为感动。在场的萨拉丁之弟阿拉迪尔尤为感动，他向兄长提出，自己出1000人的赎金。萨拉丁表示同意。

萨拉丁以最高司令官的名义，许可了城内老年法兰克人的自由。对于孤儿和寡妇，也执行了相同的命令，不需要支付赎金就可以安全离城。而实际上是萨拉丁自己为他们垫付了获取自由的赎金。

耶路撒冷城内的法兰克人，也为了自己的同胞不致沦为奴隶而奉献一切。牧首提供了700人的赎金，伊柏兰则贡献了500人的赎金。其他人也尽自己所能，为同胞捐献财物。为了救助那些无法支付赎金的人，法兰克人竭尽所能地捐献。

最终，没有一个法兰克人被贩卖为奴。这一点，在交战双方的史料中都有记载。

萨拉丁的处理，成为遭受伊玛目们责难的原因。在他们眼中，萨拉丁的宽容超越了宗教所能容忍的正常界限。

在88年前基督徒征服耶路撒冷时，他们对待穆斯林是要么杀戮，要么贩卖为奴。

但是，萨拉丁并没有听从这些宗教人士的话。他严禁兵士劫掠城内的难民。城内的居民因而得以逃到推罗和特里波利，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耶路撒冷再次被穆斯林掌控

从萨拉丁自己的考虑来看，他对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与第一次十字军的“解放”完全不同的，避免了血腥的杀戮。88年之后，耶路撒冷再度成为穆斯林的都市。

1187年10月9日，是一个值得穆斯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萨拉丁举行了收复耶路撒冷的入城式。他终于把耶路撒冷从基督徒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解放者萨拉丁入城之前，发生了好几件事。

首先，始建为圆顶清真寺的圣殿，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然后，内壁上涂画的各种基督教题材的绘画被抹去，带着蔷薇香气的圣水也被完全清除。在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穆斯林得以回到清真寺内进行礼拜。

在法兰克人改建的其他圣所，穆斯林也进行了相同的复原程序。被圣殿骑士团作为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也进行了清理改造。这一清真寺比圆顶清真寺的地位更加重要。而耶路撒冷牧首的官邸则改建为穆斯林的学校，耶路撒冷市内88年间改建为教堂的清真寺，全部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然而，萨拉丁并未听从伊玛目们的全部建议，他保留了基督徒的圣墓教堂。这座在基督墓上建立的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受到了温和的待遇。由君士坦丁大帝敕建的圣墓教堂，既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被改为清真寺，一直保存到今天。

萨拉丁保留了圣墓教堂，也保证了基督徒朝圣的自由。在圣墓教堂旁的医院骑士团总部，也因此一直留存到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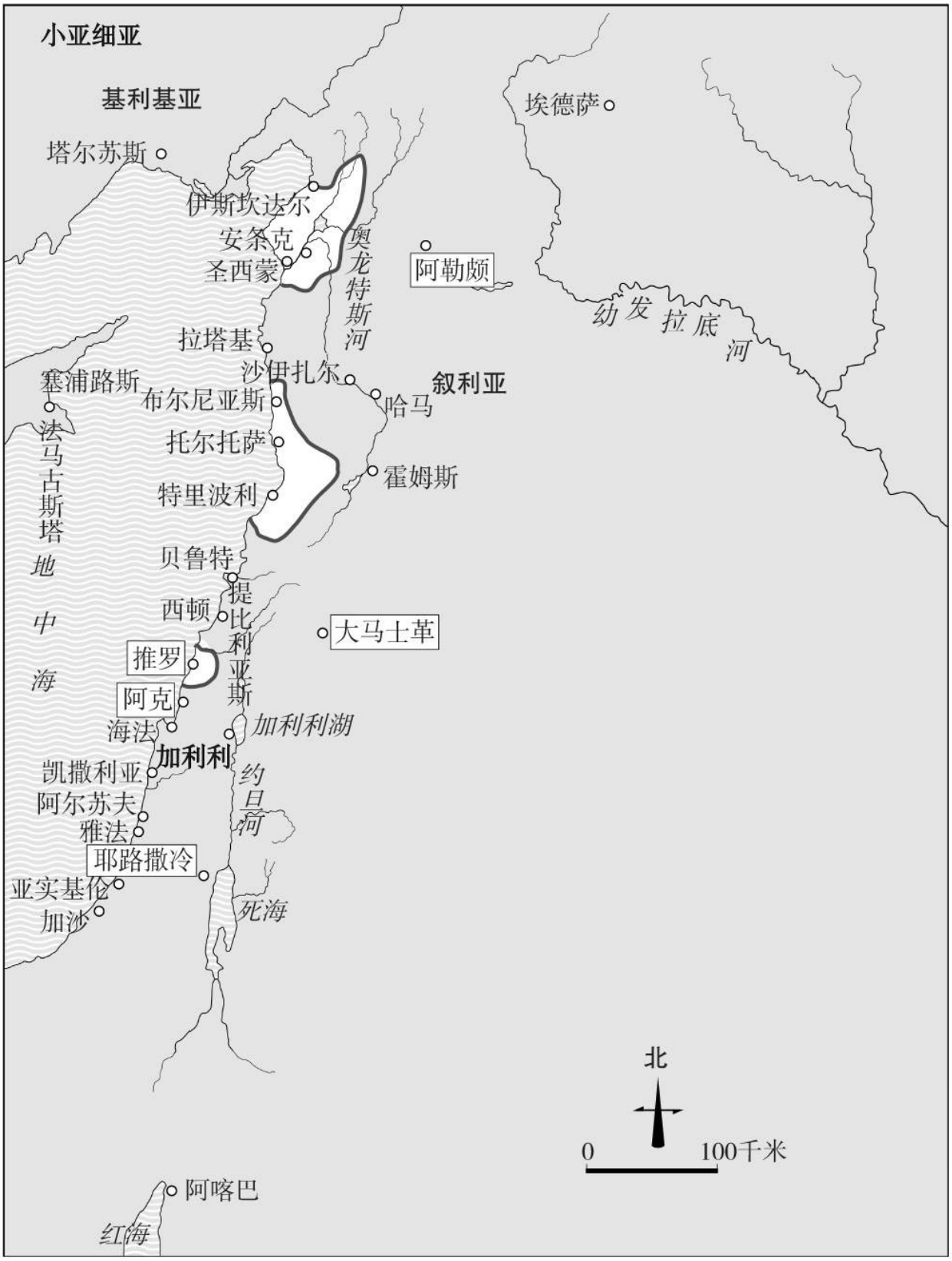
萨拉丁使耶路撒冷回到了十字军占领之前的状态。他虽然使耶路撒冷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但也保障了来自西欧的基督徒朝圣者的安全。萨拉丁不允许十字军时代的耶路撒冷牧首留在城内，但同意在圣墓教堂中保留修士。同时，出于人道考虑，他允许10名医院骑士团团员留在城内。

1188年1月1日，完成吉哈德使命的萨拉丁，解散了自己的大军。埃米尔们得以回到自己的领地，兵士们也回到了各自的妻子身边。

仅仅在1187年一年之内，萨拉丁就成功占据了十字军国家的半壁江山，即最重要的耶路撒冷王国。他将十字军近百年取得的成就尽数抹去。

留在法兰克人手中的，除了安条克和特里波利以外，只剩下推罗一座城市了。

1118年的十字军国家



1187年的十字军国家

由于安条克没有参加哈丁战役，它勉强支撑下来。但是，安条克公国实际上已经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不再是法兰克人的国家。得知耶路撒冷陷落的拜占庭皇帝，给萨拉丁送去了祝贺信。

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留在十字军一方的原因，则是其统治者雷蒙三世委托医院骑士团在当地建造的城堡所起到的抵抗作用。“骑士之城”在萨拉丁的猛攻面前屹立不倒，其他的城堡也抵挡了穆斯林的攻势。

然而，约旦河东岸与耶路撒冷王国内的80座十字军的城堡，都在1187年内向萨拉丁敞开了大门。他几乎没有花费时间进攻这些城堡。守军大都得以保住性命，离开了城堡。由于耶路撒冷和国内的海港城市尽数失守，再坚固的城堡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长年眺望东方的城堡，在萨拉丁面前，变得如此苍白无力。

至于推罗之所以能在萨拉丁的攻势下存续下来，完全是因为这座城市是建立在海上的港口。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便以易守难攻而著名。如果想攻下推罗城，从海上发起进攻是不可或缺的。而萨拉丁知道，埃及海军还不足以发动这样的进攻。

萨拉丁固然是穆斯林大为赞赏的战略天才。但是，这位伊斯兰世界的英雄，在后世并未受到追捧。他出身于少数民族库尔德族，并不为后世穆斯林所熟知。

相反，在远离中近东的西欧，人们已普遍得知萨拉丁夺取耶路撒冷的消息。对西欧的基督徒来说，这不啻是巨大的打击。

埃德萨的陷落，与耶路撒冷不可同日而语。92年前发动十字军时，就是以收复耶路撒冷为目标。而从得知失去埃德萨的打击以后，在修士贝尔纳的动员之下，西欧人组织了第二次十字军。这一次，新的十字军自发行动，各位领导人整装待发了。

在德意志，率领十字军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领兵出战。

而在英国，率领十字军的是以“狮心王”著称的理查一世。

十字军历史上的第三次出兵，即将拉开帷幕。这一次十字军的对手，当然是萨拉丁。

——《十字军的故事》（中）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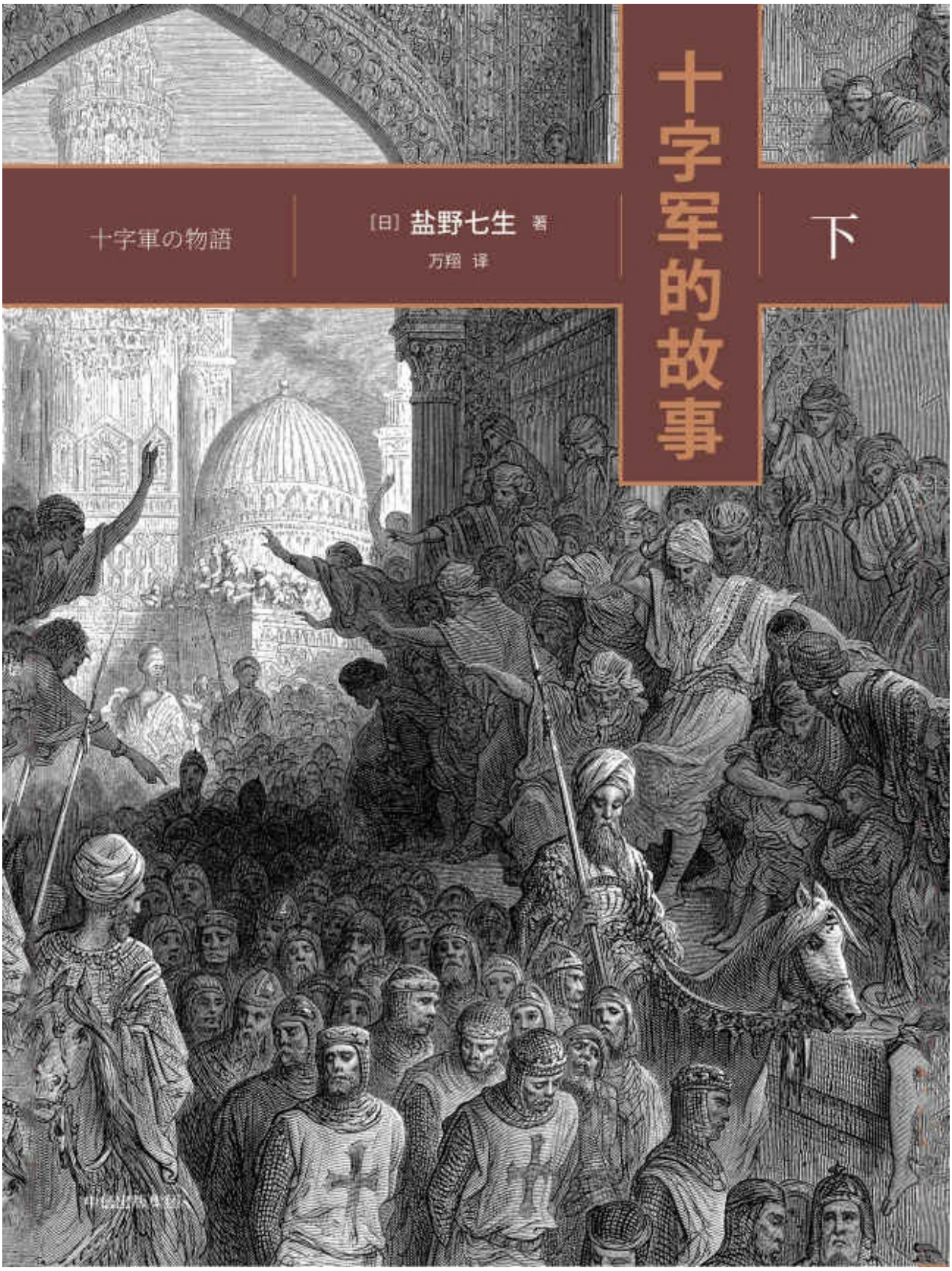
十字军的故事

下

十字軍の物語

[日] 盐野七生 著

万翔 译



目　录

第一章 狮心王理查与第三次十字军
圣城失守
英格兰
法国
理查与腓力
“红胡子”皇帝
推罗之战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
阿克之战
萨拉丁参战
前方与后方的敌人
“红胡子”之死
两位年轻的国王
塞浦路斯岛
进入战场
成功夺回阿克
法国国王回国
条顿骑士团的诞生
狮心理查与萨拉丁的对决
第一次对决：阿尔苏夫
战斗结束
收复雅法
通往圣城之路
严酷的现实
勇往直前
得知母国的糟糕情势
右手持剑，左手……

第二次对决：雅法
讲和的决定
萨拉丁评价理查
理查最后的命运
第二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第四次十字军 （1202—1204年）
秀才教皇的登场
元首丹多洛
苏丹阿拉迪尔
年轻的法国诸侯
“海都”
威尼斯参战
在法国
在威尼斯集结
出阵
攻占扎拉
拜占庭皇子
行军目标变更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拉丁帝国
地中海的女王
第三章 罗马教廷与第五次十字军 （1218—1221年）
圣地的情况
少年十字军
国王们并未行动
教皇的代表佩拉约
达米埃塔
阿西西的方济各
议和提案（一）
议和提案（二）
第五次十字军宣告结束
第四章 腓特烈二世皇帝与第六次十字军 （1228—1229年）
南方的岛屿西西里
皇帝登基

何时远征？
撒拉森人的居留地
那不勒斯大学
萨勒诺医学院
耶路撒冷国王
与敌人接触
教皇格列高利
第一次绝罚
出发
再次接触
从特拉维夫到加沙
缔结和约
在反对的旋涡中
访问圣城
教堂与清真寺
基督之敌
归国
和平之吻
第五章 法国国王路易与第七次十字军 （1248—1254年）
理想的君主
华丽的阵容
强行进军
曼苏拉惨剧
撤退
史无前例的败北
第七次十字军的“成果”
第六章 最后半个世纪 （1258—1291年）
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与马木路克的对决
圣路易与第八次十字军
海港城市阿克
“为了地中海，基督徒将战斗到最后一人”
锁定目标

阿克攻城战
最后的一天
第七章 十字军后遗症 （1258—1291年）
从罗得岛骑士团到马耳他骑士团
阿维农之囚
意大利的生意人
朝圣
尾声
附录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狮心王理查与第三次十字军

圣城失守

公元1187年，可以说是萨拉丁之年。

将伊斯兰世界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长期诸侯分裂统一起来的萨拉丁，率领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187年7月4日，在哈丁的原野上给十字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他并未停歇进攻的脚步，而将十字军控制的主要城市阿克、西顿、贝鲁特、雅法等悉数攻取。

这些城市的居民得知哈丁战役失败的消息，便在一个月之内纷纷投降。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外乎所在海港都市的重要作用。

对萨拉丁来说，夺回耶路撒冷，是比占领这些城市优先的任务。因此，他夺取这些城市以后，就挥师直扑圣城。

由于在哈丁战役中失去绝大多数防御力量，又失去了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耶路撒冷孤立无援，最终于1187年9月20日向萨拉丁开城投降。从第一次十字军成功以来一直落入基督徒之手的耶路撒冷，在88年后重新回到穆斯林掌中。

在21世纪的今日，对于信仰深厚的基督徒来说，首选的朝圣目的地还是耶路撒冷，然后才是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在千年之前的中世纪，耶稣基督与其信众的距离更加接近。第二次十字军由于埃德萨失守而发动。虽然埃德萨与耶路撒冷先后被穆斯林夺回，二者所引起的效应则不可同日而语。耶路撒冷的失守，带给基督教世界巨大的冲

击，使西欧陷入一片惊恐之中。

一线情报由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快速邮件传到了西欧。情报以接力的方式，在一艘船到港，另一艘船离港之时，以最快速度传达到下一个目的地，使从中东到意大利的信息得以在一个月之内送达。罗马教皇此时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对他来说，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距离都不远。

根据教廷的记录，教皇乌尔班三世大惊而死。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是从乌尔班二世组织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之后而成的。而耶路撒冷却在同名的乌尔班三世的时代，再次回到了穆斯林的手中。教皇大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痛吧。

选出的新任教皇格列高利八世，也在一年之后撒手人寰。罗马教皇得知了萨拉丁的威风，也清楚中近东十字军势力的羸弱。

也许是萨拉丁的威势，致使在一年之内，两位罗马教皇去世。直到第三任教皇克力门三世上台以后，才正式开始筹划第三次十字军。此时，离圣城耶路撒冷失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

罗马教廷的迟缓应对，与第三次十字军的性质密不可分。

第一次十字军实际上是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提倡之下发动的。

第二次十字军则是在教皇的左膀右臂，修士贝尔纳的感召之下，通过说服西欧的皇帝、国王而实现的。十字军东征的司令部是罗马教廷，两次十字军都有作为“教皇代表”的高级神职人员，在教皇任命之下同行。

而第三次十字军中就没有了这样的人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英法两国的国王，都没有与教皇的代表同行。因此，第三次十字军也就成为“世俗人士的十字军”。

这是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失守的事实，震骇了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王侯们组织十字军的自觉，已经不需要教皇和高级神职人员的动员了。

英格兰

最早组织十字军的，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在此前的十字军东征中，英格兰人有个人参加的，但从未以国家的名义出征。11世纪末到12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还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之中。而到12世纪中叶亨利二世领土扩张的结果，是使英格兰变成了拥有法国一半领土的强国。与西欧传统强国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两国相比，英格兰的实力毫不逊色。

亨利二世为了发动十字军东征，决定征收新税。税的名字叫作“萨拉丁税”。

此时，亨利二世已经50多岁。势力远及爱尔兰的英格兰王国，加上来自祖辈的法国诺曼底、来自王后的法国西南部阿奎丹的军队，声势浩大。因此，他并不存在资金与兵员缺乏的情况。到1188年，亨利二世已经做好了东征的充分准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出现了后宫失火的情况。王子理查起兵反抗自己的父王亨利。

在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主权更替的事件在英国先行发生了。这次权力更替，着实反应了父子两位国王的性格，却并非充满阴谋与权术的事件。这次事件，就像是长期居于君位的老狮子，遭到挑战自己权威的年轻狮子的挑战一般。结果是，父子二人陷入了正面决斗。1189年7月4日，双方的激战终于爆发。

两天之后，统治英国35年的金雀花王朝创始人亨利二世，离开了人世。

两个月后，即将迎来32岁生日的理查，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从此，英国国王理查一世，作为历史的主人公

粉墨登场。

加冕之后的理查一世，宣布将在一年后发动十字军东征。他早在得知哈丁战役失败的消息之后，就宣誓参加十字军。而在完成夺权之后，理查终于可以将自己的誓言付诸实施。远征的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其父王留下的萨拉丁税，此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字军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城市图

法国

一直以十字军主力出现的法国，为腓力二世所统治。这位国王被后世的爱国者以古罗马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号相称。在比自己年长8岁的理查一世就任英格兰国王时，腓力二世只有24岁。然而，这位从15岁就继任法国国王的年轻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治国经验。

在即位后不久，腓力二世就通过与弗兰德斯伯爵的侄女结婚的方式，与之结为同盟，并共同击败了香槟伯爵。而在一年之后，他又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结盟，击败了弗兰德斯伯爵。这样，腓力削弱了法国东北部强大封建诸侯的力量。6年之后，他又与理查结盟，挑战其父亨利二世的权威。但在此时，腓力的成功战术到头了。

法国国王希望看到的是，亨利二世在其子的挑战之下一败涂地，放弃诺曼底地区。除了理查一世能够名正言顺继承的阿奎丹一地之外，其他英王名义下的土地，都能收归法国所有。

腓力的算计没能实现。理查一世在战场上所表现的能力，远超常人。父子之间的斗争以王子的完胜而告终。而亨利也猜到了腓力的别有用心。他死后，将自己的全部领地传给了理查一世。在理查一世加冕仪式上，这位新国王的正式称号是：

“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阿奎丹与加斯科涅公爵、普瓦提埃伯爵”。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9年的苦心经营，就此化为泡影。英法两国国王的领地，与腓力即位之初没有任何变化，而对方的领导人，却顺利完成了代际更新。与亨利二世的时代相比，法国想在这时夺取境内的英王领地，变得更加艰难。这时，两国国王都把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提上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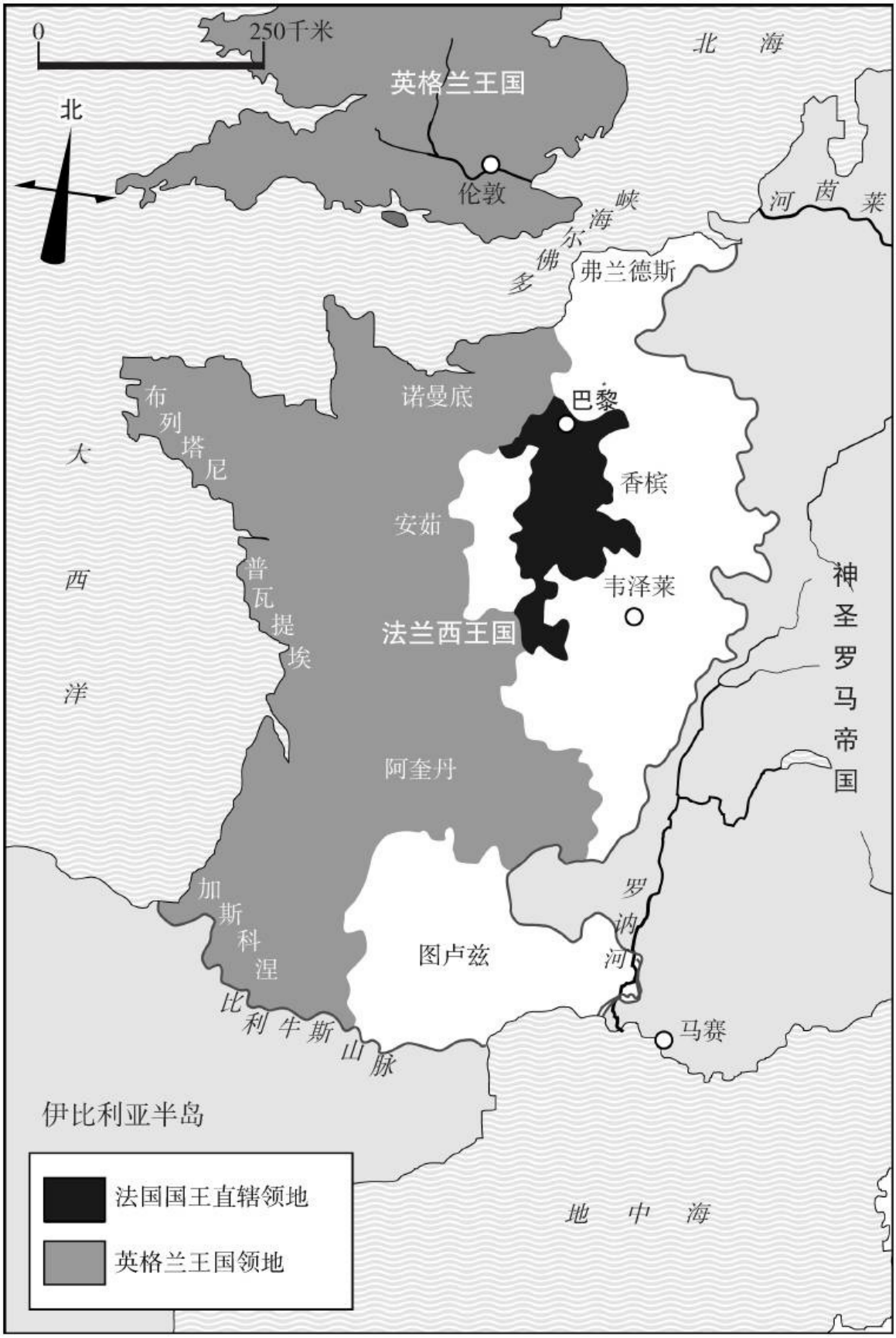
程。

腓力二世人生的最大目标，或者说唯一的目标，就是扩大自己的领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人与机会。

腓力本来并不想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但是，他最终决定发动十字军，其内在原因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原因是，腓力二世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的两位领袖之一路易七世的儿子。信仰虔诚、珍惜名誉的腓力一定非常希望能亲身为惨败的第二次十字军雪耻。而且，作为法国国王，如果不参加十字军，就会广为法国境内的基督徒所知。

如果腓力不参加十字军，第一个感到不快的就是罗马教皇。腓力二世在亲政的9年间，为了唯一目标的达成，使用了各种权谋之术。他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并不十分自信，因此这位深谋远虑的国王，肯定不希望到处树敌。违背罗马教廷的意志，对这位国王来说显然是愚蠢的。毕竟，他的政治联姻还需要教皇的背书。


0
250千米
北
北 海
英格兰王国
伦敦
海 峡
佛 尔 多
弗兰德斯
河 茵 莱
诺曼底
巴黎
布 列 塔 尼
大 西 洋
香槟
安茹
普 瓦 提 埃
韦泽莱
法兰西王国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阿奎丹
加 斯 科 涅
罗 讷 河
图卢兹
比 利 牛 斯 山 脉
马赛
伊比利亚半岛
法国国王直辖领地
英格兰王国领地
地 中 海

1187年前后法国各势力示意图

第二个原因，则是可以通过十字军东征与对手停战。在腓力二世领土扩张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英格兰国王、香槟伯爵、弗兰德斯伯爵和勃艮第公爵四人。而这四个人都表示会参加十字军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法国国王与其主要对手之间的领土纠纷就会处于冻结的状态。而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这四位对手如果一旦殉教，对腓力二世来说，都是天赐良机。

理查与腓力

在军事能力上绝不逊色于腓力的理查一世也是生活在中世纪欧洲权谋旋涡中的男子。无论他是否看透了腓力的本意，理查还是于1190年7月与腓力在法国的韦泽莱会晤，一起发动了十字军东征。

两人发誓一同出发，一同归国。双方宣誓，假如一方归国在先，决不侵占其后归国一方的领土。这一约定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协定，而君子协定并非与善权谋的腓力·奥古斯都无关。

1190年7月初，法国西北部的小镇韦泽莱汇集了来自各地的军士。在城墙外架设的营帐中，蓝底黄色百合的法国国王旗帜，和红底黄色狮子的英国国王旗帜，遮天蔽日地飘扬着。其间往来的兵士，不分国籍，都穿上了印有红色十字的战袍。

腓力所选择的出发地韦泽莱，正是其父路易七世发动第二次十字军时的出征地点。他向遥远的罗马教皇所发出的信息，是他将以第三次十字军为第二次十字军雪耻。

1190年7月4日，英法两国的国王一同从韦泽莱出发。他们沿着罗讷河南下，到达地中海沿岸。理查一世从马赛出海，腓力二世则从热那亚出海，前往中近东。两人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再次相遇。

这两位分别为33岁与25岁的国王，一起从法国出发，远征东方，但实际上，两人又起着互相牵制的作用。

之所以法国国王不从马赛出港，而选择热那亚作为远航的起点，与当时法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当时法国国王的领地并不包括法国南部，而这一地区是属于阿奎丹-加斯科涅公爵理查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理查的舰队从英格兰出发，绕过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就停泊在马赛等候主公上船。

腓力选择热那亚，则会获得充分的便利。乘坐地中海航线上经验十分丰富的热那亚人的船只，会得到许多关于长途航行的知识。

而理查一世从北海和多佛尔海峡召集来的舰队，大都是以维京人船只为原型的船组成的。

这些船只能够抵御北海的巨大波涛，自重很大，载重也多。但这种船只也因此速度缓慢。由于这些船只大都是帆船，并没有桨帆船常设的划桨手。因此，这类船只不适合作为海战用舰，只能作为运输船来使用。

理查一世命令这些船只装运投石机。这些投石机的部件，先拆下来，通过车船运送，最终在战场上由兵士装配完成。由于投石机底部有车轮，在战场上移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节约人力和时间。

关于这种装配式的投石机，在理查一世使用之前并没有记载。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法国国王和诸侯所使用的投石机，都是在到达战场之后制造的。只有理查一世的投石机是在战场上组装，在战斗结束后分拆并运送到下一个战场的。

理查一世的舰队不仅运送投石机，还运送从投石机中发射的石弹。理查一世所使用的石弹，全是不易崩裂的圆球状，比法国国王和诸侯使用的石块更为先进。由于圆球弹的空气阻力小，可以飞得很远，下落时的破坏力也更大。

石块和石球的破坏力大为不同。在理查一世与萨拉丁的对决中，石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以狮心王之名著称于世的理查一世，不仅有一颗勇敢的心，也是颇具头脑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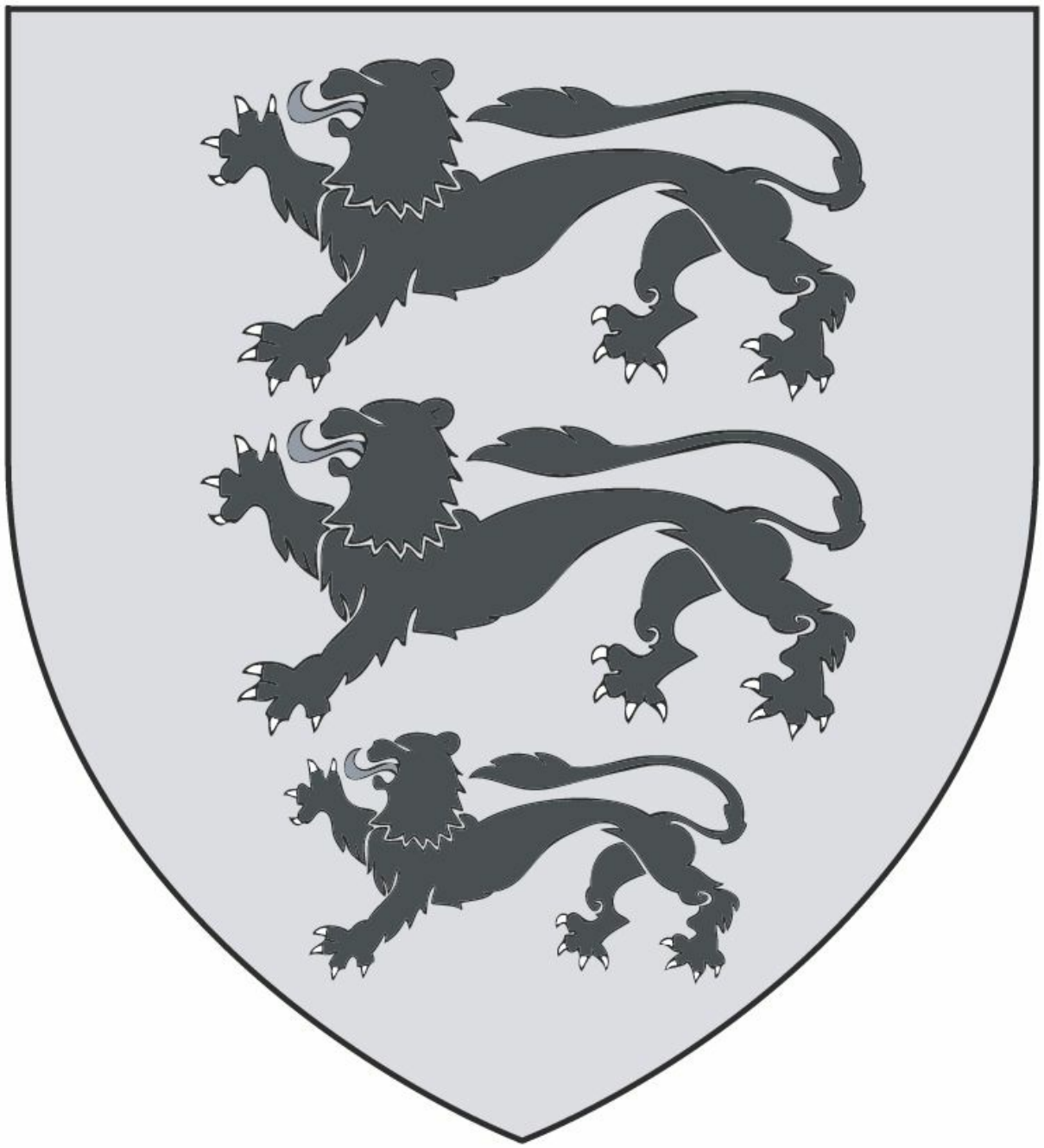
“红胡子”皇帝

在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之外，十字军东征中不可或缺的还有德意志皇帝。这一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以“红胡子”绰号著称的腓特烈一世。在萨拉丁夺回耶路撒冷的1187年，腓特烈已是62岁高龄。

由于腓特烈曾经随其伯父康拉德三世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他成为第三次十字军中唯一一位拥有东征经验的领导人。对他来说，长期离开本国，前往东方，是没有问题的。腓特烈希望能一雪以惨败而告终的第二次十字军的耻辱。与上次试图夺回埃德萨的目标不同，这次十字军的目标是耶路撒冷。

腓特烈既不需要经历理查一世那样的王位更替，也不必像腓力·奥古斯都那样陷入深思。因此，他是第三次十字军中最先动身的。

1188年3月，腓特烈在美因茨大教堂的十字架下，率领全体德意志诸侯庄严誓师，定于翌年5月出发东征。诸侯承诺在未来的一年中，自己负责筹措远征的费用。1189年5月，德意志全军在腓特烈一世的率领下，从雷根斯堡向东进发。此时英格兰国王父子正在激战之中，而腓特烈一世认为没有等待英法两国的必要，径直率领大军起程出发。



腓特烈一世的纹章（黄底黑狮子图案）

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黄底黑鹫）

地位与权力都十分稳固的红胡子腓特烈，其所率的大军规模庞大。与一年两个月后出发的英法两国以数百名骑兵和数千名步兵所组成的军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历史记载，腓特烈一世所率领的德意志军队，拥有数千名骑兵和数万名步兵，总人数达到10万之多。因此，迎战

的萨拉丁对德意志军队的动向尤为关注。

但是，这支大军自然有其弱点。由于兵士数量太多，没有任何西欧国家可以为德意志军队提供足够数量的船只。因此，德意志军队只能选择由陆路行军，从而令红胡子皇帝大为苦恼。

腓特烈一世选择了一条与第一次十字军大获成功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完全相同的行军路线。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经验，使他清楚各条道路的情况。当然，通往东方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就需要他的部队逐一克服了。

为此，腓特烈一世采取了在对手探得自己情况之前，先行探得对手情况的策略。他为了消除行军路上的障碍，给同为基督徒的匈牙利国王和拜占庭皇帝，甚至身为穆斯林的小亚细亚领主们都寄去了书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 朕所亲率之大军声势浩荡，汝等之抵抗皆无意义。我军之意图仅为通过而已，望务必提供我军必要之食粮，并为我军开路。

10万大军所到之处，手持皇帝书信的使节，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威胁。就这样，腓特烈的大军通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他的策略十分奏效，在众人对大军的惊恐之下，腓特烈顺利地经过东欧和小亚细亚。

腓特烈一世也给萨拉丁送去了书信。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的信函中自然要表现骑士精神。他以皇帝的身份，正式递交了宣战书。

我想在此同时介绍一下腓特烈一世的去信和萨拉丁的回信。

这两封信件，首先是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以此历史价值来看，双方的往复书信是十分愉快的。

64岁的腓特烈一世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上帝祝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战功彪炳的腓特烈，致撒拉森人的首领，必须离开耶路撒冷的萨拉丁：

东方的穆斯林把西欧的基督徒称为“法兰克人”，而中世纪西欧的基督徒也把穆斯林——无论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波斯人——统称为撒拉森人。因此，在腓特烈的信中，萨拉丁是“撒拉森人的首领”。

我已得知阁下攻占我等基督教徒之圣城耶路撒冷，并亵渎城内教堂与圣迹的行径。朕身负守卫整个基督教世界之责任，因而阁下之行为，必然引起朕对阁下之行动。

因此，倘若阁下不愿离开所夺取之圣地，并消去此圣地中亵渎之迹，我必将率军到达，以武力令阁下悔悟。特此宣示是荷。1190年11月1日，我二人必将兵戎相见。

腓特烈一世接下来写了“条顿人的愤怒”。以所谓条顿人，也就是德意志人的愤怒名义而集结的大军，来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地方。这支完全来自日耳曼民族的军队，并不允许其他民族成分加入。至于最终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国的舰队与陆上的德意志军队共同作战，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最后，腓特烈一世写道：

阁下想必是认为，在最近的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军队的右手已被斩断。但是，西欧人强大的右手依然健全。右手执剑与枪的大

军，即将在11月1日与阁下正面交战。这一天将会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最喜悦的日子。

51岁的萨拉丁如此回复：

致伟大而高贵的、充满善意而亲切的条顿皇帝腓特烈：

陛下的来信已由名为海因里希的使者送来。据此使者所言，信函确由陛下亲笔书写。在此，鄙人不免失礼，而致此回复于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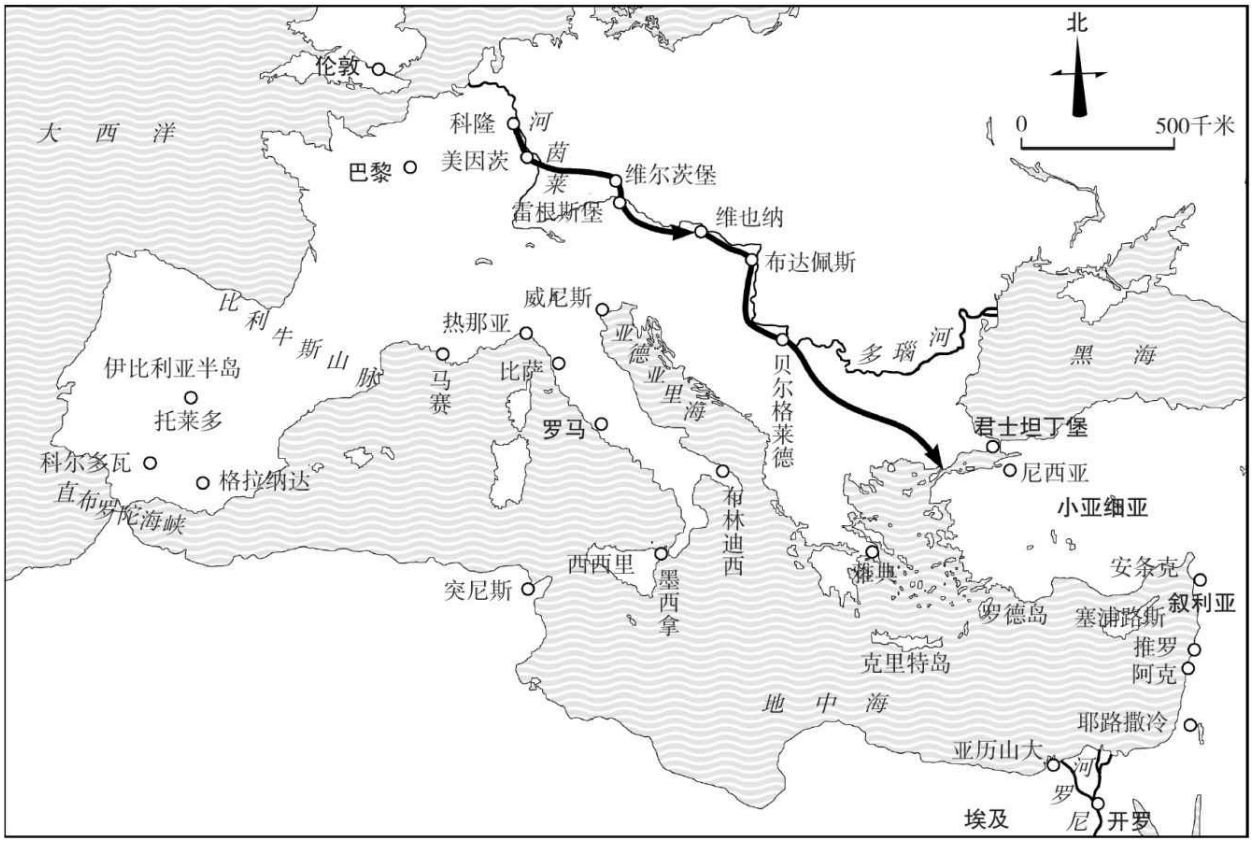
接下来，萨拉丁也效仿腓特烈列举其所率大军来自多个地方的笔法，列举了自己所率领军队的声势。他的部队除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外，还有突厥人和贝都因人。他也像腓特烈一世一样称，自己的部队将受到真主的护佑，而必然获胜。

然后，萨拉丁的信中写下了不同的内容。

萨拉丁指出，是基督徒侵略了穆斯林的土地。因此，穆斯林得以在真主的护佑之下，成功收复耶路撒冷，只是收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由于耶路撒冷重回穆斯林之手，目前中近东十字军控制的城市只剩下推罗、特里波利和安条克三座。如果穆斯林一鼓作气进攻，会从基督徒手中夺回这三座城市连同周边的地区。

之后，萨拉丁说："此信读罢，若陛下仍坚持与我方交战，则我军必泰然而迎击之"，"与陛下会面之日，即陛下所言之交战日"。

萨拉丁对腓特烈一世提出的"归还所占领之地、将圣地中亵渎圣物之迹完全消除"以避免军事冲突的提议，给予了完全拒绝的答复。



腓特烈一世的进军路线

但萨拉丁也对腓特烈一世提出了避免军事冲突的建议：

若陛下期待与穆斯林之间和平共处，鄙人亦提供充分的可能。

首先，鄙人将派遣属下三位将官，前往推罗、特里波利与安条克三座都市，使其无条件开城投降。同时作为交换，鄙人将归还哈丁战役后落入穆斯林之手的“真十字架”与全体俘虏。同时，鄙人向陛下承诺：为维护与管理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基督徒可以常设修士，并且可以在耶路撒冷城外新建修道院；鄙人亦发誓确保造访圣地的全体基督徒的人身安全。”

在萨拉丁书信的末尾，按照穆斯林文书的惯例，写下了“真主至大”等伊斯兰教信仰至上的语句。

然而，第三次十字军是为了夺回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集结而成。率领其先锋部队的腓特烈一世，虽然期待十字架和哈丁战役俘虏的回归，却断无接受萨拉丁所说条件的道理。在行军途中成功威胁其他国家的腓特烈一世，也希望通过信函成功说服萨拉丁。

1189年5月从德意志出发以后，燃烧着条顿人的怒火的腓特烈一世的军队，到1190年5月进入了小亚细亚的中央地带。

萨拉丁对给自己致信的腓特烈感到恐惧。为了阻止德军的前进，他暗中与拜占庭皇帝订立盟约。然而，盟约完全没有收到效果。

“红胡子”皇帝具有参加第二次十字军的经验，他深知拜占庭皇帝完全不可信任。因此，他并没有率军经过君士坦丁堡，而是利用拜占庭船只，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小亚细亚。德意志的农民们一路上互相传说着五彩斑斓的君士坦丁堡生活，但在腓特烈的命令下，他们无福一睹拜占庭首都的风采。

在“条顿人的愤怒”面前，腓特烈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因此得以径直东进，随后朝南折向叙利亚。在这一形势下，腓特烈所说的“11月1日战场见”，有了现实的意味。萨拉丁将一半兵力派往叙利亚北部，在腓特烈一世刚刚进入叙利亚之时，就遇上了萨拉丁的军队。

除了近在咫尺的德意志军队，此时的萨拉丁还面临相当棘手的问题。

希望在1187年结束攻势的萨拉丁，到1188年时遇到了难缠的对手。基督教势力控制的三座城市之一——推罗，在收到萨拉丁的劝降书之后，开始了顽强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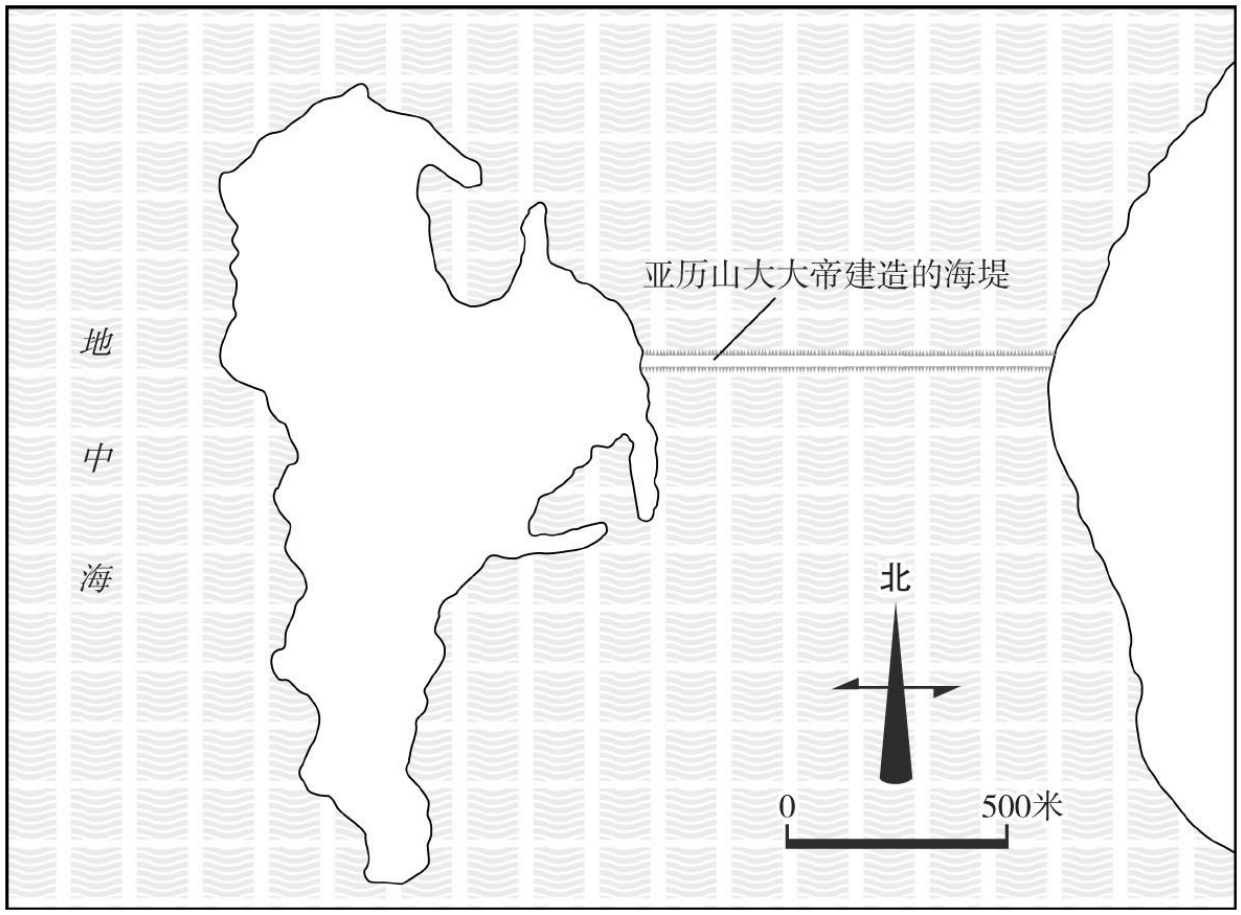
推罗之战

位于黎巴嫩境内的海港城市推罗，是一座立于海中的岛屿，因此成为天然的要害之地。在伊苏斯战役中大胜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经过了数月才攻下这座城市。这场战役对亚历山大来说，也是一次逆转之战。他通过筑造一公里长的堤岸，最终赢得了攻城战的胜利。

亚历山大不是一位满足于攻陷城市的领袖。他为了给自己创立的帝国增添一座重要的都市，加固了岛上的堤岸，并将陆地上连接推罗的部分变成了一座海港城市。推罗就这样经历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进入了中世纪。

就这样，在海面上建立起来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城下的部分在陆地上，而岛上的推罗就此成为一座无法攻陷的城市。

即使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推罗也是最后一座落入基督徒之手的城市。在十字军从海陆两方向都无法攻陷推罗的情况下，依靠1124年威尼斯海军全军的投入，才使这座城池落入十字军之手。



古典时代的推罗

而萨拉丁并没有海军。在东地中海上，满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海军舰船。因此，萨拉丁只能从陆路发起进攻，但这样是绝对无法攻下推罗的。

此外，推罗得以顽强抵抗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其天然的要害地位，也并非因为基督教国家还控制着东地中海的海权，而是由于在推罗城内，拥有愿意并能够坚守的领导者。

首先，从哈丁战役中逃出的军士，都汇集到了推罗。虽然特里波利伯爵雷蒙在战后回到了特里波利，并死在自己的封地，但在耶路撒冷之战中与萨拉丁谈判并开城的巴里安·伊柏兰参与组织了推罗的防御。由于这位在中近东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参战，他属下的将士们自然顽强效

命。

其次，这一时期的推罗城内集合了众多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宗教骑士团在哈丁战役中的牺牲，以及其后所有被捕的成员都被萨拉丁杀死的事实，使骑士们能够同仇敌忾，一致对敌。

最后，在参加推罗城防御的诸侯之中，有一位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他是这次防御战的总指挥。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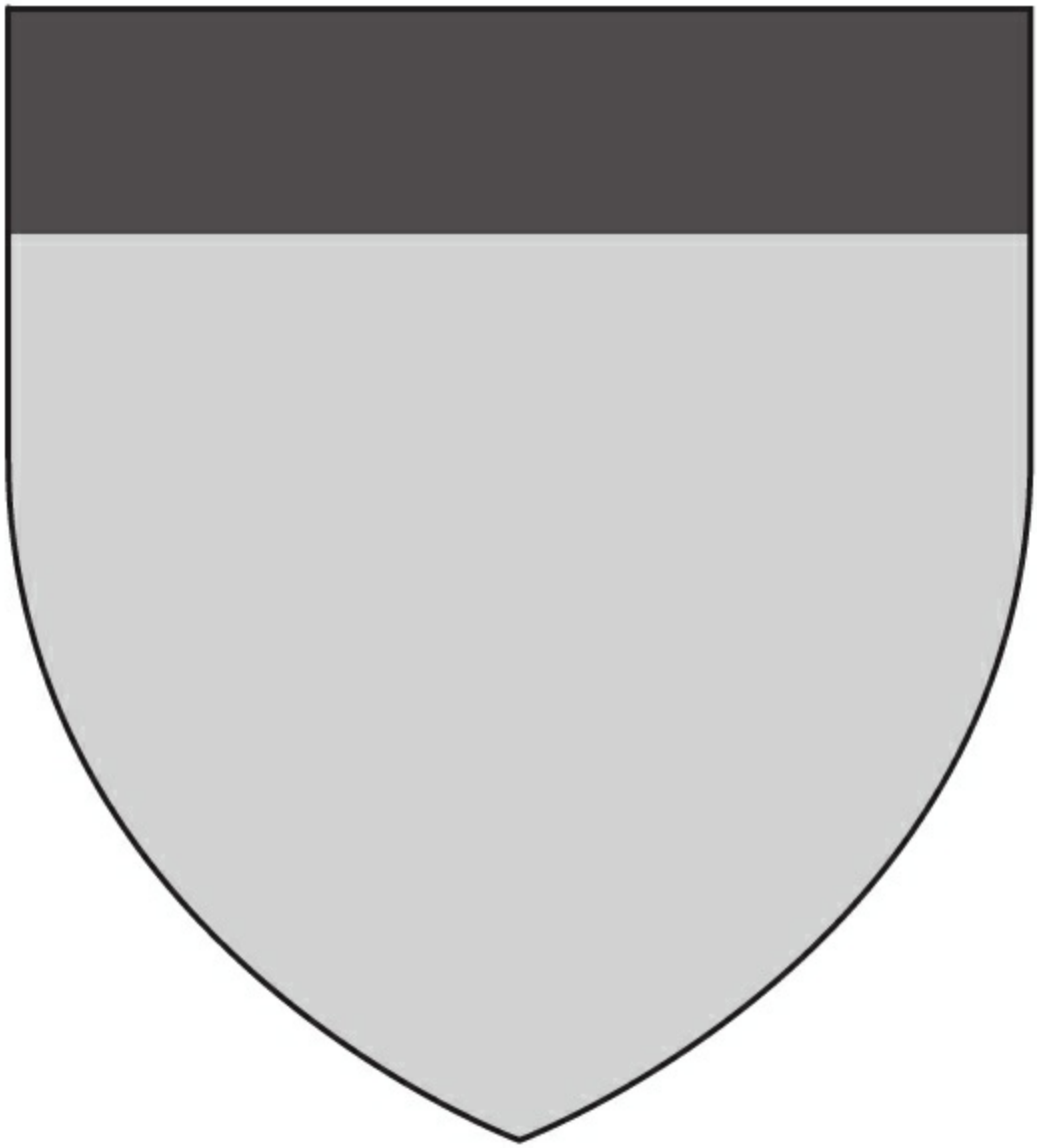
1187年底现身推罗的康拉德，已年过四旬。他的前半生可谓是波澜壮阔，也可以说是几番辗转一事无成。

意大利北部热那亚以西的蒙费拉特，是这位侯爵的领地。他是家中的次子，家族与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有亲戚关系。可是拥有这样显赫家世的康拉德，却曾经两次成为阶下囚。之后，他举家移居拜占庭帝国，并在君士坦丁堡得知了哈丁战役的惨败。

这位充满十字军精神的贵族，从君士坦丁堡毅然前往已经形如空城的耶路撒冷。结果由于所乘船只遭遇逆风，康拉德还未登陆时，耶路撒冷已经开城投降。因此，他不得不改变航向，前往推罗组织针对萨拉丁的防御。由于阿克与雅法都已落入穆斯林之手，康拉德只能选择在推罗靠岸。

在推罗，康拉德得以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虽说他并不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这位侯爵在战场上还是勇气可嘉的。

康拉德与其他十字军将领不同，他没有在战场上败北的经历。在萨拉丁面前，康拉德也没有任何处于劣势的感觉。在彻底的败绩之后，任何人都难以恢复往日的元气。而由于康拉德并未经历对萨拉丁的失败，他能够专心组织推罗的防御。因此，从圣地撤退到推罗的全体基督徒，都集合在康拉德的麾下——巴里安·伊柏兰也罢，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也罢。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的纹章（灰底红带）

萨拉丁之所以要攻取推罗，是希望不给西欧来的新十字军留下登陆的港口。因此，他希望推罗能够像阿克和雅法那样，从基督徒居民控制下和平转入自己的手中。

但是推罗的居民坚决拒绝了萨拉丁的劝降。居民回答说，一旦萨拉丁发起进攻，他们必将抵抗到底。而此时的萨拉丁无法专注于对推罗的进攻，因为他还要注意腓特烈一世皇帝的动向。

早已着手进攻推罗的萨拉丁，想到了一条计策。他利用了在哈丁战役中俘获的康拉德之父，作为计策中的诱饵。

在推罗城墙下，老迈的前任蒙费拉特侯爵吉列尔莫被萨拉丁的兵士带到阵前。虽然他在大马士革经历了两年的囚徒生活，城墙上的守军依然能认出老侯爵的模样。

押送这位老骑士出阵的阿拉伯人，用基督徒能够听懂的法语，宣读了萨拉丁的告示。他要求基督徒开城投降，否则就杀死老侯爵。

此时此刻，康拉德也站在城头，而且正是他担任了防御方的总指挥。如何答复萨拉丁，自然是康拉德的责任。在距离城墙不到10米的地方，萨拉丁的军士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康拉德的声音。

康拉德用法语回答，身边的翻译以阿拉伯语大声答道：

“我们绝不会答应你们的条件，绝不会把推罗交给你们！如果你们要杀死我的父亲，就请杀吧！这样，我家里也有殉教者了！”

话音刚落，康拉德就手持弩机，向父亲的方向射去。当然，此时康拉德射击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父亲身边萨拉丁的卫士们。

萨拉丁对此大为诧异。他最终带着老侯爵撤退回大营，并将其带到自己的营帐之内共进晚餐。

晚餐时，萨拉丁与老侯爵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当然是保密的。也许萨拉丁对老侯爵所表达的，是其子对父亲的不敬吧。不过，在萨拉丁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起兵反叛了努拉丁。而此时的萨拉丁，已经到了做父亲的年龄。他所信任的人，并非自己的两个儿子，而是弟弟阿拉迪尔与侄子塔基·阿尔迪尔。

第二天，萨拉丁将老侯爵无条件释放。他命令属下的兵士护送吉列

尔莫进入推罗城。不知道这位孑然一身回到推罗的老人，对自己的儿子康拉德说了些怎样的话。

最终，萨拉丁决定放弃进攻推罗，宣布班师退兵。同时，他释放了哈丁战役时俘获的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路西尼安。这位毫无战斗力的美男子之重获自由，深孚基督徒一方的期待，反映了十字军抵抗的实际成果。

出兵一年而最终撤军的推罗之战，成为萨拉丁光辉业绩上的第一个污点。对于此时敌军动向分外关注的萨拉丁，选择了放弃进攻而退兵。

同时萨拉丁也放弃了对医院骑士团守卫的城堡“骑士之城”的进攻。可以说，城堡和海港城市的战略地位截然不同。推罗并非依靠任何西欧来的十字军援军，而得以防御成功的。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的善战，以及官兵的同仇敌忾，是成功的关键。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所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直到1191年还没有到达中近东。在1187年哈丁战役失败、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不到半年，推罗之战就开始了。而推罗之战，可算是第三次十字军的第一次战役。

推罗之战的胜利，给基督教一方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无敌的萨拉丁不再所向披靡。可以说，哈丁战役后的失败士气，在此后一扫而光。推罗之战不仅维持了推罗在基督教一方手中的地位，也给十字军带来了心理上的优势。

但正如萨拉丁所预见到的，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路西尼安的到来，给十字军带来了棘手的问题。

首先，已经成功逼退萨拉丁的康拉德和推罗的市民，该如何迎接路西尼安的回归。推罗选择了紧闭城门，拒绝路西尼安入城。其理由是，

这位国王是哈丁惨败的直接责任人，目前只是名义上的国王而已。而推罗城的守卫成功，完全是推罗城居民自己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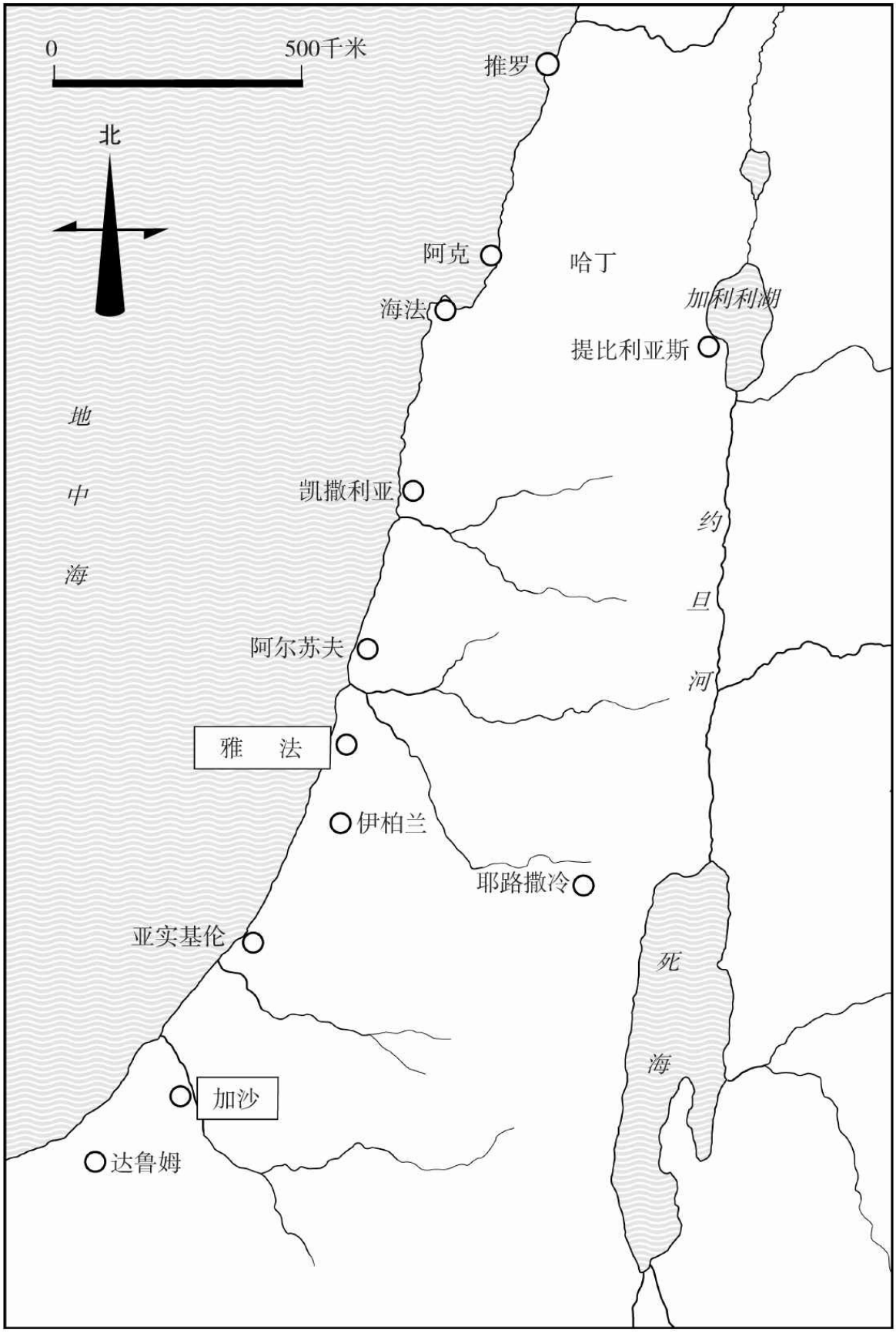
然而，就算路西尼安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他毕竟还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君主。此时的中近东基督徒已经开始考虑收复耶路撒冷的可能性了。一旦耶路撒冷收复，王位还应当是路西尼安的。况且，用后世的话来说，他是一位亡命之君。因此，在推罗城中，除了康拉德和城内居民以外，其他的十字军成员都不愿看到路西尼安被拒之门外的情景。

走投无路的路西尼安，给巴里安·伊柏兰提出了一条妙计。他提出与伊柏兰一起出兵，为夺回推罗以南50公里的阿克而战。

路西尼安当然没有领兵夺取阿克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兵力可以调遣。只是，既然推罗城的防御战大获成功，下面自然应该考虑夺回阿克了。这是为基督而战的十字军明确的任务。

做出这一决定之后，以战场上无能的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为首，以下的人员参与了这次战役。

首先是以巴里安·伊柏兰为首的耶路撒冷王国内的封建诸侯。同时，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团长们也亲自要求参战。此外，偶然来到中近东并参加了推罗保卫战的兵士、在巡游过程中由于战斗状态而停留在推罗的朝圣者们，都做好了前往阿克作战的准备。


0
500千米
北
推罗
阿克
哈丁
海法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地
中
海
凯撒利亚
约
旦
河
阿尔苏夫
雅　法
伊柏兰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死
海
加沙
达鲁姆

为了夺取阿克这样的海港城市，从海上提供补给并依靠海军来攻击，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比萨和热那亚出发的船只上，满载着身兼划桨手的水兵。

十字军的兵力共计700名骑士和9000名步兵。出兵的名义则来自失去了耶路撒冷和实权的国王。

阿克之战

1189年8月28日，路西尼安率领全军抵达阿克城下。三天之后，总攻开始，为期两年的阿克之战拉开了序幕。

如果说在推罗的那场交锋只是一次战役的话，夺回阿克的较量堪称一次战争。推罗之战是第三次十字军的第一次战役，而阿克包围战则是其第二次大规模作战。十字军全体身着印有大十字的战袍，在阿克的陆地一侧围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十字军战士们展现了为基督而战的意志。

萨拉丁自然没有想到，重获自由的路西尼安，会引兵进攻阿克。一开始，萨拉丁相信，阿克的穆斯林守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守住城市。在他看来，路西尼安所统率的部队，必然会因为其统率能力的低下而在不久之后宣告解体。因此，他没有派出军队支援阿克的守军。

然而，萨拉丁对于阿克之战的判断，显然有所失误。

首先，在十字军自身层面，参加的基督徒心中的想法，随着行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他们看来，就算杀死一个穆斯林，也是对耶稣基督的贡献。而如果在战斗中被杀，则成为了光荣的殉教者。对于他们来说，这无异于获得了天堂中的一席之地。

其次，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缺少作为统帅的能力，这一点在十字军一方看来未必是弱点。

路西尼安的无能，是为参加阿克之战的十字军将领们所周知的。就连路西尼安的亲弟弟，也承认其兄在此方面能力的欠缺。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参加阿克之战的各支部队的领导人，并不仰仗总指挥路西尼安的领导，而是率领自己的兵士，拼死决战。

从统一指挥的角度来看，此次进攻阿克的十字军并不令人满意。但正因为在无能统帅的率领下，统一指挥的十字军遭受了哈丁的惨败。因此，当这次的总司令与哈丁战役为同一人时，将领们自然不会考虑将指挥权交予此人之手。

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都在适当的地点布下了自己的阵势。而路西尼安则听从其弟的建议，在阿克城墙附近布阵。参加此战的耶路撒冷王国内的各路诸侯，依次于国王阵营旁边安营扎寨。

十字军所发起的总攻，此时已是全体的共同行动。但是，此次攻城并非在总司令的指挥下全军一齐发动的攻势。

这种实际上并不协调的攻势，给穆斯林一方带来了好笑的困惑。由于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在守敌眼中，看不出十字军是在哪里、由谁集结部队发起进攻。

由于婚姻而取得耶路撒冷王位的路西尼安，只是由其美貌而非能力而获得了君主的地位。但此人作为名义总指挥领导进攻阿克的十字军，则令西欧人的目光一时集中于阿克城。从西欧赶来准备收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部队，都以阿克作为其进军的目标。

对西欧的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夺取的事件，给他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冲击。发誓夺回圣地的人数量很多，从而自发发动了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和英格兰国王在内的大军。这些人由各地的领主与主教所组织，在皇帝与国王的率领下，朝向东方进军。当他们各自得知阿克城的战事时，都不约而同地向阿克袭来。

首先到达的十字军部队，是由今天丹麦、荷兰、苏格兰和比利时的

军士组成。他们从北海出发，经过大西洋和伊比利亚半岛南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自西向东航行到达近东的海岸。这些北欧十字军出发时达到一万之众，但由于在伊比利亚半岛参加了与穆斯林摩尔人的战斗，他们到达东方时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出发时的一半以下。他们登陆以后，都编入了路西尼安的部队。

援军的第二阵，则是由阿韦讷伯爵所率领的位于比利时境内和法国东北部的兵士们所组成的军队，其数量不详。阿韦讷伯爵雅克时年37岁，早就得知耶路撒冷国王不成器的消息，因此他并未听从路西尼安的劝诱，而是直接开拔到阿克城墙下一处险要之地——“诅咒之门”下独自布阵。

中世纪基督徒有一种奇特的癖好，比如将医院命名为“不治之地”。因此，阿韦讷在“诅咒之门”前布阵，也是毫不避讳的表现。在此后一年间的阿克攻城战中，阿韦讷担任了实际的指挥官。

在阿克登陆的第三阵，则是率领了来自法国、英格兰、弗兰德斯、德意志等地骑士的博韦主教。此人虽说不是误入神职界，却可以称得上为战场而生。这支部队还加入了主教之弟罗贝尔所率领的来自西欧东北部的骑士们，成为十字军骑兵的主力。他们与同以骑兵为主的圣殿骑士团比邻列阵，而其阵营所在地成为阿克战役中最激烈的战场。

从以上的一波波登陆阿克的西欧援军来看，第三次十字军并非仅仅由当时西欧最主要国家的皇帝与国王所发动。这次东征涉及了全体西欧基督徒。毕竟，萨拉丁夺取圣城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世界无与伦比的晴天霹雳。

然而，当这些援军纷纷加入围攻阿克的十字军阵营时，还待在推罗的康拉德并未参战。最终，在阿克之战开始一个月之后的9月底，康拉德才带领推罗居民组成的军队，来到了阿克城下的阵地。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曾与一个月前拒绝为之开门的路西尼安相会，只知道他的部队驻扎

在国王的军阵之前。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的参战，为十字军一方增加了一员善战的将领。而由于康拉德已经成为推罗城事实上的领主，他的参战就确保了来自推罗的补给线的畅通。

对于战争来说，后勤补给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而对于很可能长期持续的攻城战来说，补给是关系生死的大事。因此，优秀的将领一定会十分关注后勤补给。

阿勒颇
安条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托尔托萨
霍姆斯
地
中
海
特里波利
巴尔贝克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约
旦
河
巴勒斯坦
北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0
100千米
死 海

阿克及其周边主要城市

阿克之战开始时，路西尼安还被挡在推罗城门外，因此他一直没有考虑开战以后补给的问题。而开战后一个月内的补给，则主要依赖尚在基督徒手中的特里波利和安条克两座城市。

但特里波利和安条克距阿克路途十分遥远。同时，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船只所面临的敌手，并不仅是穆斯林的船只。地中海上的急风骤雨也是海员们的大敌。航行距离越长，遇到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萨拉丁已经夺取了贝鲁特和雅法这两座城市，附近的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人又不帮忙。冒着狂风暴雨的风险，从特里波利和安条克经海路来补给，是不得已的事情。

因此，康拉德的参战，使得来自推罗的补给成为现实——这条补给线的长度不过是从特里波利来的海路的1/5。当萨拉丁得知康拉德参战的消息之后，深知补给重要性的他开始关注阿克的战事了。

萨拉丁参战

得知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参战的消息，萨拉丁决定亲自率军前往阿克支援。此时正值1189年的秋季。

离开德意志向东行进的红胡子皇帝的大军，经过漫长的路途，于1190年春天穿越整个小亚细亚，在夏季到来时出现在叙利亚北部。

而取得英格兰王位的理查一世，于1190年春天正式宣布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同前进，于1190年秋季到达阿克。

51岁的萨拉丁，不得不迎击参加第三次十字军的全体部队。此前一直处于攻势地位的萨拉丁，在面对这样大数量的敌军时，不得不转入守势。

萨拉丁终于明白了，不能将阿克城的防御置之不顾，而必须亲率大军出征，才能尽早解决阿克之战。此战无疑对穆斯林世界至关重要。

萨拉丁认为，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决之前，必须首先把阿克之围解除。退一步说，在英法两国国王的大军到来之前，阿克之战不得不结束。可以想象，这时的萨拉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阿克这座位于今天以色列北部，濒临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在从1189年起的两年间，成为了第三次十字军与迎战的萨拉丁之间正面交锋的战场。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地中海海岸边，阿克是一座特别的良港。这座建立在突出于海中的海角上的港口城市，与附近其他海港相

同，冬天常常刮北风和西北风。因此，其海港是向南侧开放的。

由于阿克的西北和北方都是高耸的悬崖，经常有船只在这一侧操作失误而撞上悬崖。在夏天常盛行于地中海的西风，给阿克港带来了一丝丝凉爽的空气。

然而，熟知地中海沿岸各地的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水手们，即使是在这清凉的夏季，也无法安心进入阿克港。这座城市向南开放的海港本是十分安宁的，但是，1189年开始的攻城战，使防守阿克的穆斯林军队封锁了港口。

海上封锁是通过给港湾入口降锚的方式，使敌方的船只无法靠近。哈丁战役失败后的中近东十字军，无法在阿克的南北两侧入港。而最近的港口是阿克以北50公里的推罗。这完全是由于哈丁战后萨拉丁优先夺取海港城市的战略所致。

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还是一次次试图入侵阿克的港口。不出所料，他们遭遇了港湾入口处的封锁和港内停泊的埃及舰队的拼死抵抗。穆斯林非常清楚，如果港口失守，这场防御战就将以失败而告终。

从交战之年前两年上溯，基督徒控制阿克长达70年之久。参加哈丁之战的十字军也是从阿克出征。在过去的70年间，阿克港被打造为西欧基督徒访问中近东的主要登陆港，以完备的设施和充足的防御力量，成为地中海东岸的重要海港城市。而此时此刻，基督徒军队却要进攻这座自己建设的城市。

阿克的海上封锁，并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意大利诸邦的舰队，有效阻止了萨拉丁派出的补给舰入港。

如第一册所述，由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的水兵常年与穆斯林海盗作战，其战斗力十分强大。相反，由于穆斯林埃及的海军没有海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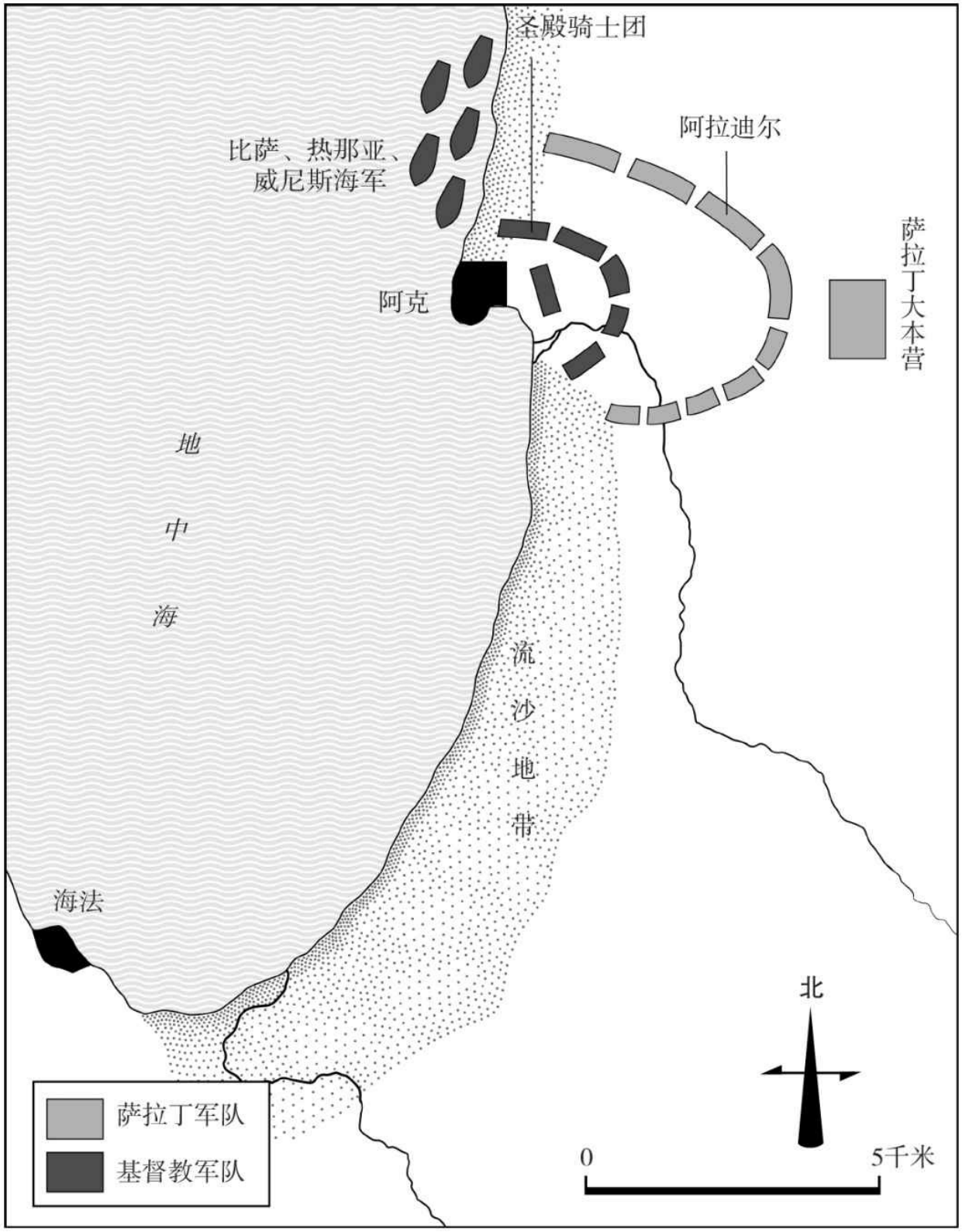
为对手，他们的操船能力和战斗力都远不如意大利的海军。

虽然意大利海军不能完全封锁整个地中海，但他们还是充分地追击并俘获了穆斯林的船只。虽然没有邻近的港口可以作为基地，意大利的滨海城邦还是有效掌控了巴勒斯坦地区沿岸地中海海域的制海权。

这一状况，在萨拉丁看来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由于十字军对阿克城的半圆形包围，使得守军无法通过陆路获得任何补给。而虽然港口控制在穆斯林手中，海上的补给线也几近完全切断。无论是从北方的贝鲁特，还是从埃及经由亚实基伦所输送的物资，都被阿克附近海面上出没的意大利船只缴获。满载的粮食、武器和军服，以及成袋的第纳尔金币，都成为在海上封锁的意大利船只海盗行为的战利品。

于是，陷入包围的阿克城，无法获得任何来自海陆双方的补给物资。就连通信的传达，都是非常困难的。


圣殿骑士团
阿拉迪尔
比萨、热那亚、
威尼斯海军
萨拉丁大本营
阿克
地
中
海
流
沙
地
带
海法
北
萨拉丁军队
基督教军队
0
5千米

阿克攻城战中两军布阵

穆斯林常常使用的信鸽，可以飞越山野，经过很长的距离。但是，在敌军上空飞过时，常有被射杀的危险。港内守军不得已只得派人游泳通过意大利海军封锁的海域。在有意大利船只的海域，穆斯林水兵乘坐难以发现的小船，接近海港，然后弃船游泳进入港内。这样的通信成功率之低，可想而知。而补给船只的成功到达，就更是无法确保的事情了。

阿克围城战的主战场自然是在陆地上。在围成半圆形的十字军外侧，萨拉丁的大军也围成了一个半圆。

在这一战线的最北端，是圣殿骑士团的阵营。萨拉丁用以对抗勇猛善战、不甘人后的圣殿骑士团的，是一支恰似第一次十字军丹克雷迪所率青年军的热血战团，其指挥是萨拉丁的侄子，手持利剑的塔基·阿尔迪尔。

在穆斯林战线的中央部分，坐镇后方监督的萨拉丁把指挥权委任给自己的弟弟阿拉迪尔。在其军阵的其他部分，与十字军的构成相似，各个地区的穆斯林领主，率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军队，安营扎寨。

在战线的北端，双方的营地都迫近了海岸，而南端的战线则距离海很远。这是由于人和马都难以踏足阿克以南广阔的滩涂地带。双方的船只也无法靠近这一区域。因此，阿克以南的海岸并未成为双方的战场。两军在此处僵持下来，一直到1190年年初。

前方与后方的敌人

包围阿克的十字军兵力不可谓不足。但当萨拉丁率军抵达之后，穆斯林一方的兵力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加上阿克城内的守军，穆斯林军队的兵力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此时的基督教军队，包括来自整个西欧的兵力。从1190年开始，西欧的援军陆续赶来。新来的十字军不仅来自英、法、德三国，还包括北欧、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

尽管如此，包围阿克的十字军现在所面对的，是前后两个方向的敌人。而这支十字军却还一直没有确定总指挥人选。路西尼安并未期待任何人的到来。虽然阿韦讷伯爵能够作为代理总指挥，这位勇敢而沉着的贵族并不能使参战的全体将士们服从命令。

阿韦讷伯爵雅克正值37岁的壮年。他只是法国的一位地方领主，与英、法、德三国君主并无任何亲缘。相比之下，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却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着亲戚关系。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中，有这样的上层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最终，在一年后攻克阿克城时，阿韦讷伯爵将总指挥的位置让给了跟随理查一世前来的香槟伯爵亨利。虽然香槟伯爵比阿韦讷伯爵年轻，却有着与英法两国国王的叔侄关系。

在阿克之战中，阿韦讷伯爵全力以赴，与前后两个方向的敌人奋战到底。但他并不是一位能够从全局进行战略考虑，并大胆执行战术的领袖。他也缺乏能够提早做出判断，预先制定对策所必要的想象力。可以说，阿韦讷伯爵是一位“中世纪之花”式的典型骑士。

这种遇到敌人前后夹攻的局面，在古罗马恺撒所指挥的阿莱西亚战役中出现过。当时，恺撒命令士兵在前后两个方向挖掘深深的壕沟，并

以障碍物组成的栅栏围困敌军，从一开始就让对手感到恐惧。而这次，攻城战开始一年后，十字军才开始在后方的萨拉丁军队方向挖掘壕沟。

另一方面，穆斯林一方的最高统帅萨拉丁是既具备战略能力又充满想象力的领袖。而之所以这场战役拖延了长达两年之久，是因为萨拉丁尚需处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事务。

萨拉丁在这段时期内的光辉战果，使他心中燃起了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愿望。只有弥合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长期的对立，才算是取得了长期的成功。通过收复十字军所侵占的穆斯林领土，萨拉丁将各地的领主与埃米尔们整合起来，使这些并非神职人员的贵族们拥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

通称为武力吉哈德的战斗，汇集于萨拉丁的大旗之下。在他旗帜下的穆斯林，呼喊着“真主至大”的口号，与基督徒展开了殊死搏斗。与此同时，基督教世界也以“上帝的期望”为口号，集合于收复耶路撒冷的大旗之下，向伊斯兰世界发起挑战。

然而，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其圣战思想都没有长期保持下去。毕竟，任何的狂热都有冷静下来的一天。

伊斯兰世界的吉哈德，团结于“真主至大”的一致声音中，不到半年里就取得了哈丁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和收复耶路撒冷的功绩。由于哈丁的胜利和耶路撒冷的收复，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一时间达到了顶点。但人在狂热顶点之时，清醒的速度会比任何时候都快，即便是所向披靡的萨拉丁也如此。

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皇帝腓特烈的回信中，萨拉丁写下了这样的话：“在真主的护佑之下，我们击败了前来侵略的基督徒，使这片土地回到了穆斯林的手中。”

在真主的护佑和萨拉丁的指挥之下，重新夺回自己土地的埃米尔们，感到内心的满足。在夺回耶路撒冷的作战中，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吉哈德的力量。

从1188年往后，萨拉丁面临着新的问题。虽然他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英雄，但其集结军队的能力比其成为英雄之前更加困难了。穆斯林兵士们首先要由居住地的埃米尔整编，然后集合到萨拉丁的旗下。萨拉丁的身份是各埃米尔之上的苏丹，他与各地埃米尔的关系，实际上是完全专制下的表面上的团结。这一点，跟西欧的皇帝和国王们与其属下的诸侯之间的紧张关系颇为相似。

拥有伊斯兰世界除巴格达哈里发外最高地位的萨拉丁，其所能够自由调遣的兵力，只有自己所控制的叙利亚和埃及的部队。如果要调动其他地区的部队，必须动员当地的埃米尔们。只有在萨拉丁自己最为信赖的亲兄弟阿拉迪尔所控制的埃及，他能够任意地组织军队。

跟随萨拉丁的埃米尔们，并不愿出兵协助海港城市阿克的防御战。对他们来说，将自己的兵士投入战斗，造成无谓的牺牲，是非常不利的。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突厥人，都需要首先考虑现实问题。因此，他们向萨拉丁提出，在不适宜作战的冬季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年春天再回到战场。但当春天到来时，这些兵士们还逗留在自己的家中，迟迟没有回归营地。萨拉丁只好借助巴格达哈里发的力量，以吉哈德的名义召唤更多穆斯林的参与。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已经深入小亚细亚，而最终将在叙利亚与萨拉丁对决。此时就算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也需要众人的鼎力相助。

至于十字军一方，他们一直缺少一位具有领袖才能的指挥。而穆斯林一方，则为了同道兄弟的安危拼死作战。在阿克的战斗中，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进行个别的厮杀，战斗激烈地继续着。无论是穆斯林一方，

还是十字军的记载当中，大大小小的激战层出不穷。这场阿克战役中，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两年时间。

只是因为互相不认同对方的宗教，两种一神教的信仰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双方看来，杀死异教徒都是神明所喜悦的事情，而他们也确信，就算是被杀，也能作为殉教者升入天堂。特别是对十字军来说，耶路撒冷的失陷使他们尤其有这样强烈的想法。下面的两个战例，生动地表现了战斗的进程。

在圣殿骑士团所在的北线，双方的骑兵展开了厮杀。在战况最惨烈的一天，骑士团长热拉尔以下的全体团员都被萨拉丁的侄子塔基所率的骑兵屠戮殆尽。这支精骑兵可谓是整个穆斯林军中最精锐的力量。而勇猛程度无人可及的圣殿骑士团，也无人愿意遭受被俘的命运。最终，数名团员请求团长允许他们借故逃脱。热拉尔听罢他们的要求，立即拒绝了：

“这绝对不可以！看到同袍被杀，自己却想着溜走，是圣殿骑士团骑士的耻辱！”

这位团长大喊着杀入敌阵，在砍杀数名敌军之后，被塔基的兵士们俘获。他被带到萨拉丁面前，而后者要求他当即改宗伊斯兰教。萨拉丁当然知道，以圣殿骑士团团长的身份，接受这样的改宗要求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在热拉尔断然拒绝之后，萨拉丁立即命人一刀杀死了骑士团团长，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折磨。

在哈丁之战后，萨拉丁对俘虏中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都判处了死刑。当时，失去大多数主力的圣殿骑士团，几乎处于完全覆灭的状态。

而在哈丁战后不到两年的阿克之战中，圣殿骑士团又重新成为了一支独立的军旅。他们以勇猛异常的战斗表现，在普通基督徒中间充满声望，因此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志愿者加入和资金支持。

我所要讲述的另一个战例，是围攻阿克港的比萨海军与守军之间的对决。

在海上进出阿克的关键港湾，守军将防波堤把守得严严实实。因为一旦这里被敌军侵入，阿克城即告陷落。因此，穆斯林士兵日以继夜地据守在港湾入口处的要塞中。

比萨海军选择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发起进攻。熟练的水手经过三天航行，到达了阿克的港湾。这支从推罗出发的舰队，在黎明前接近阿克港时，全部降下船帆。他们所使用的桨帆船既可以只使用船帆作为动力，也可以用桨划行，而作为战船使用时，主要依靠划桨手来驱动船只。在接近敌军的过程中，船帆降下，划桨手们开始行动。这些水手们以最出色的驾船技术，从阿克西侧的悬崖南下，接近了港口。

往往是出其不意的突袭，能够取得最高的成功率。划桨手们静默操船，已经几近突破漫长的铁索，奈何划桨的力量还是稍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水手们把船帆再度打开，三艘船同时以桨和帆的力量驱动，一举突破了港口封锁的铁链，直接逼近了港内的要塞。

整个港口连同要塞都进入了紧急状态。港内全体穆斯林水兵立即上阵迎击。停泊在港内的埃及船只组织起来，与进港的三艘比萨船相对峙。正在这时，要塞上投下的希腊火“手榴弹”，正中比萨的船只。船上装满的火药和油料一齐爆燃，火焰顺着船帆炎炎而上。比萨毕竟是以贸易立国的小城邦，操船手和划桨手都不是特别狂热的战士，因此，这些船只连忙在遭到围捕之前撤退了。

热那亚海军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但他们最终也无法攻克港口。阿克港依然处于穆斯林军队的控制之下。

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联合进攻，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但事实上这两国，加上威尼斯和阿玛尔菲，在制海权与通

商权的控制方面，都是互不相让的。

虽然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上绘制着四个滨海城邦的纹章，四国在中世纪的时候为了地中海的霸权进行的却是毫不相让的较量，从来未曾有一国与他国结盟，这使海军军旗上的图案成了确确实实的笑话。因此，他们从不共同与穆斯林作战，而都是各自为战。至于参加十字军，只是因为他们同为基督徒而已。

阿克之战渐渐日久以后，十字军食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萨拉丁所率的穆斯林军队能够轮换在冬季回到自己的故乡，而且背后的广大地区都在伊斯兰势力控制下，因此就不会陷入军粮不足的境地。

只有腹背受敌的十字军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当冬季来临时，他们没有可以轮换休息的场所。后方的敌人阻断了退路，前面又是冰冷的阿克城墙。再加上负责补给的意大利诸邦舰队难以找到登陆点。在受到敌军袭击的过程中，舰队只能在双方阵营中间狭窄的海滩登陆，自然无法提供足够的补给。

十字军渐渐成为被粮食不足所深刻影响的一方。与在冲突中战死的人数相比，在空腹状态下被冷箭所射杀，或因为饥饿而导致动作迟缓，被敌军斩杀的人数要多得多。

在整个阿克之战中，十字军的伤亡比例达到1/5。这一比例在将官和士兵中都是一样的。有许多高级将领都战死沙场。

而阿克城内的穆斯林守军也面临食物极度匮乏的局面。虽然港口一直未被攻克，可是能够进港的补给船寥寥无几。在战事打响一年之后的1190年春天，阿克守军司令给萨拉丁秘密致信，希望他允许城内部队向十字军投降。但萨拉丁否决了他的提议，理由是埃及的补给舰队正在前

往阿克的海面上。当这支舰队接近阿克时，发现自己很可能会成为在此等候的意大利海军的俘虏，于是就掉头返回了。

在长期的胶着状态之下，1190年夏天到来了。这时，一条谁都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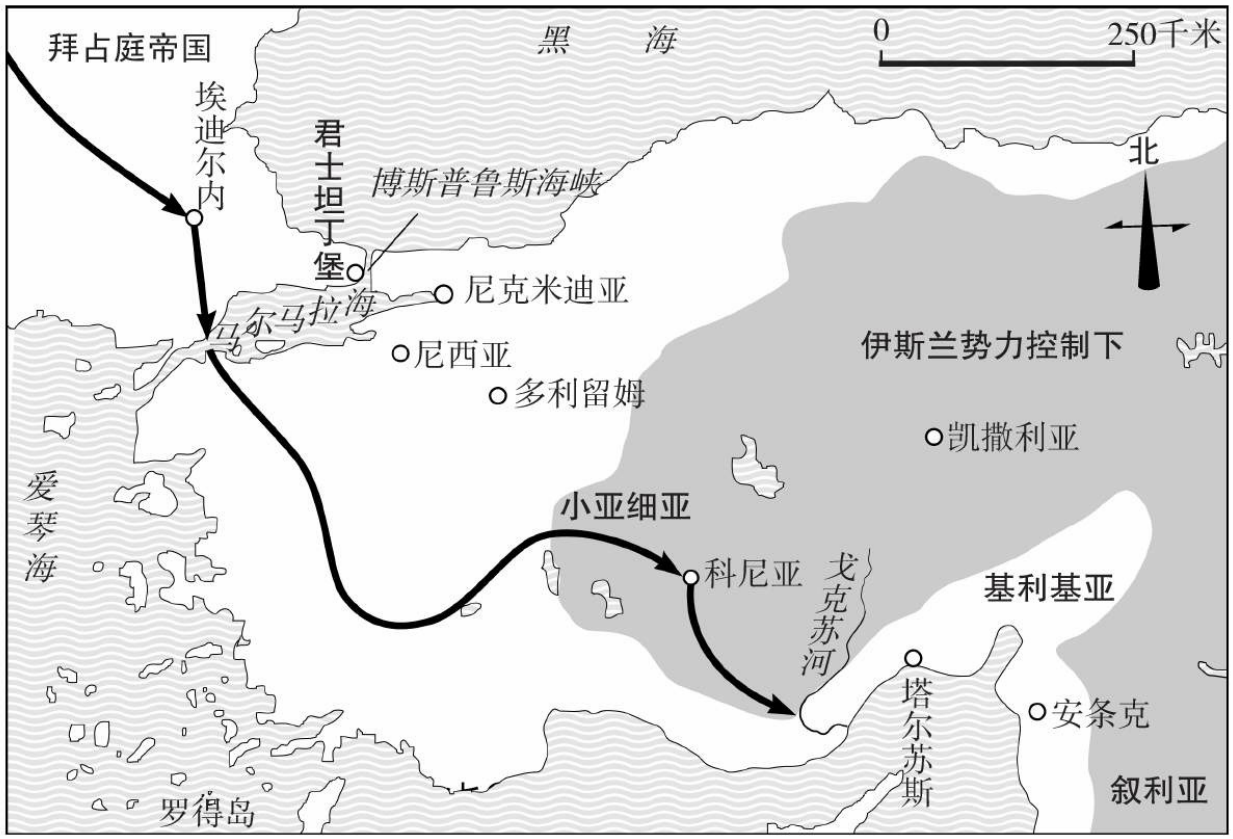
“红胡子”之死

最为萨拉丁所忌惮的，是由3000名骑兵和8万名步兵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如果基督教史家的记载可靠的话。为了了解红胡子皇帝腓特烈一世大军的动向，萨拉丁组织了十几名密探，不断地递送第一线的情报。其中的一位密探，刺探到了一条无人相信的重要情报。

萨拉丁听到消息也为之一惊，无法确信情报的真实性。他立即加派密探，以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为了证实密探的消息来源，他不仅派遣了普通的探子，还加派了一名能力出众的将领。萨拉丁所要获得的是准确而详细的情报。

1189年5月11日，红胡子皇帝腓特烈率领大军从雷根斯堡出发，经过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沿着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一路行军顺利。他们在古罗马时代建立的哈德良城（今天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度过圣诞节，然后在1190年春季开始继续行军，未受任何阻碍就通过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进入小亚细亚。

腓特烈一世给所经过各国的首脑都送去了说明借道的信函，因此得以顺利行军。



腓特烈一世前往小亚细亚的进军路线

拜占庭皇帝怀着对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双方中立的态度，让腓特烈的大军径直进入了自己的天然敌手——小亚细亚突厥领主们的地盘。皇帝与诸侯属下的3000骑兵，毫发未伤地通过了小亚细亚。唯一的一场遭遇战是1190年5月科尼亚的突厥军队的袭扰，而德意志大军取得了一场完胜。

从科尼亚出发以后，皇帝的军队只需要经过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基利基亚就可以到达叙利亚。

从科尼亚经过基利基亚到达叙利亚，必须经由地中海上的海路。出地中海向东航行进入叙利亚是古代以来的交通干线。

从科尼亚出发的德意志军队，在到达地中海沿岸之前，需要渡过戈克苏河。这条河上没有桥梁。骑兵、步兵和满载军需物资的牛车都需要

淌水渡河。令人意外的是，腓特烈一世在渡河时溺水身亡。

历史记载的死亡原因是皇帝在渡河过程中摔落马下，由于身穿厚重的钢制铠甲，沉入水底而溺死。这种说法是最为史家确信的。

我在30年前也到过这条河边。当时我只是去小亚细亚旅行，还没有想过要写十字军时代的故事。但是，这条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小河，已经作为红胡子皇帝的葬身之地而广为人们所知。我站在河岸上眺望流水，还脱下鞋子进入河中淌水，感觉到河水的冰冷刺骨。

此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个成语："老人的冷水浴"（日本成语，比喻老年人逞强做不自量力的事——译者注）。

科尼亚大胜之后，腓特烈自然不必担心会在行军过程中受到突厥军队的偷袭。而当时已经是仲夏6月，将士们应当已经收起了沉重的铠甲，轻装行军。

一条水深不过腰间的河流出现在官兵们眼前，流向远方的地中海。在渡河之前，他们脱下衬衫和鞋，这样就不至于出太多汗。

腓特烈看到部下们纷纷下水，自己也对游泳跃跃欲试。可是这位皇帝毕竟已经65岁了，他直到这时还对自己身体的问题满不在乎。由于身强力壮，他从来没有生过病。正是由于对体力的自信，腓特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以为，跟部下一起半裸游过河去，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结果，在过河途中，他意外溺水，当被捞起来时已经没了呼吸。

当今的学者大多认为他溺死时已经心脏麻痹。溺死的当天是1190年6月10日，距离从德意志出发已有一年又一个月之久。

萨拉丁最终得到确实的腓特烈皇帝死亡情报之后，长松了一口气。他接下来命令密探保持观察腓特烈死后德意志军队的动向。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双方史料的记载，在腓特烈死后发生了以下的事件。

以3000骑兵和8万步兵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到达基利基亚之后宣告解体。

这支军队之所以在失去领袖之后即宣告解体，且容我以一段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其封建诸侯关系的论述来解释其原因。

西欧基督教世界最高的世俗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不是前任皇帝之子就可以继承皇位。即使是前任皇帝的长子，也不能自动成为新的皇帝。他首先必须得到各位诸侯的承认，然后前往罗马，接受罗马教皇亲自主持的加冕仪式，方能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公认地位。

罗马教皇向皇帝授予帝冠，和大主教为西欧各位国王加冕一样，是向信徒宣示帝王的统治权来自神授的仪式。

但是，神授仪式仅限于对皇帝和国王的加冕，诸侯的身份确认并不需要这样的仪式。依靠祖先与自身的实力和才能来治理所获得领地的封建诸侯，自然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统治的权力。因此，在诸侯死后，土地自然由自己的后代继承。

腓特烈带着自己的次子，同名的腓特烈一起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而他的长子亨利则留在本土，并未一起前往东方。

在当时的西欧社会，如果皇帝驾崩，他的儿子必须争取成为皇帝。但此时，跟随腓特烈一世前往东方的封建诸侯并没有可以宣誓效忠的对象。而由于参加十字军是由于皇帝的命令使然，关于皇帝死后是否继续行军的问题，还要依据诸侯与皇帝一同在美因茨大教堂的誓言来决定。对他们来说，对皇帝的效忠誓言已随着腓特烈之死而宣告解除，而是否继续带领将士参加十字军，成为诸侯之间争论的问题。

在红胡子皇帝宣誓发动十字军东征之际，跟随他的诸侯都承诺负担东征第一年内的全部军费。而这一年期限已于一个月前结束。由于皇帝

突然驾崩，谁来承担以后十字军的军费，成为一个重大的疑问。

以上的问题，使参加第三次十字军的德意志军队，随着红胡子之死而宣告瓦解。

在皇帝麾下参加十字军的多数诸侯，都是因为帝国皇帝的动员才前往东方征战。其中不乏怀着发誓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怒火，向阿克城进军之人。在阿克之战初期到达的十字军当中，就包括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疆伯爵。所谓边疆伯爵，是神圣罗马帝国内特有的封建领主名称。

但是，跟随红胡子皇帝到东方的大多数诸侯，还是选择了返回本土。只有腓特烈的次子和其他几位诸侯决定继续行军。试图完成远征的总兵力包括70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而原来令萨拉丁极为忌惮的皇帝亲自率领的大军，总兵力包括3000名骑兵和8万名步兵。

不知萨拉丁是否得到了继续行进的德意志军队的准确信息。但这位阿尤布王朝的苏丹比以前任何一位穆斯林统治者都热衷于搜集情报。腓特烈在小亚细亚东南部驾崩的情报，几天之后就传到了萨拉丁手中。他再次派人打探详细情报，并在6月20日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时，萨拉丁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与为这一消息而高兴的穆斯林阵营相反，阿克城前围攻的十字军受到了悲哀与失望的打击。在萨拉丁得到确切情报以后数日，十字军得知了失去皇帝的德意志军解体的消息。继续行军的少数部队到达了安条克，而围攻阿克的十字军通过威尼斯快船（桨帆并用）的紧急传送讯息，得知了这支人马的实际情况。

德意志军的瓦解不啻是对整个基督教军队的巨大打击。围攻阿克的军队得知德意志军已抵达基利基亚，本以为他们会很快前来增援，却不想其终究未能成行，使整个基督教军队阵营军心动摇。部队的士气尤为低落，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都体现出来。

发生在6月10日的皇帝溺亡事件，一个月后才传到法国。而英法两国国王已于7月4日率军出发，并不知道这一变故。因此，围攻阿克的十字军的最后期待，落在了英法两国国王所率领的部队上。

无论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还是英国国王理查一世，都是在一年前公开宣布发起十字军东征。他们虽然拖延，但终究还是出发了。但从西欧到中近东的距离相当遥远。在两位国王到达之前，围城的十字军只能以现有兵力继续作战。

十字军在这段阿克攻城战中最困难的时期，涌现出了一位为同胞竭尽全力的领袖，那就是38岁的阿韦讷伯爵雅克。

由于预见到了长期的胶着形势，雅克把战斗的重点从以发起攻击造成敌军的损失，转变为尽可能减少己方的损失。于是，基督徒军队开始在朝向外围萨拉丁援军的战线上修筑壕沟，以保持防御力。

十字军所修筑的壕沟又深又宽，虽然不能完全阻止敌军的进攻，却能够有效减缓敌军的进攻速度。想要越过这道壕沟，必须先跳进沟底，再从底下爬上来，但跳入沟内的军士就会成为十字军弓兵箭矢之下的牺牲品。因此，穆斯林不得不先填埋壕沟，然后才能发起进攻。由于所用的土石方要从后方长途运输，填埋作业需要相当长时间来完成，作业中的穆斯林兵士由于没有防备，常常被十字军的弓兵狙杀。

就像在城堡周围挖掘壕沟一样，十字军在围攻阿克时，也花费了数月时间来修筑壕沟。但是，这支十字军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以至于各位诸侯只能命令部下沿着自己阵营的战线挖掘，从而形成了多条不同的壕沟。医院骑士团的阵营和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的弟弟所指挥的阵营都分别挖掘了壕沟。而从来都坚持与敌军正面对抗的圣殿骑士团，则认为完全没有挖掘壕沟的必要。

然而，无论是壕沟还是护城河，都需要联结起来才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阿韦讷伯爵希望整个十字军阵营能联合起来挖掘一条完整的壕沟。由于他在此前作战中表现出的英勇和智谋，这一主张得到了十字军各阵营全体领导人的同意。

虽说在敌军大举进攻之前完成壕沟的建设可以避免战斗造成的损失，十字军在这段时期还是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得知腓特烈皇帝死讯的穆斯林军队，集中力量阻止围城十字军挖掘壕沟，因此十字军必须在挖掘壕沟的兵士身旁布置好防御敌军袭击的士兵。而由于一直疲于应付后方萨拉丁的援军，十字军并没有力量攻击前方的阿克城。

但与此同时，当又深又宽的壕沟联结完成之后，十字军就有能力对萨拉丁的进攻进行有效的防御了。壕沟充分延迟了敌军的进攻速度，因此可以说挖掘壕沟多少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在无法期待大规模援军的一年当中，围城的十字军得以抵挡住来自前后两个方向的敌人。

在“老人的冷水浴”之后解体的德意志军队残部，由腓特烈的次子率领，于8月抵达了阿克的战线。这支共计7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兵的部队，虽然与英法两国国王所率军的数量相当，也不及在此围困一年的战斗同志们那般疲劳，却始终未能担当起战斗的主力。这一方面是由于红胡子腓特烈之子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则是他抵达推罗之后于翌年早早病死。十字军方面只好委任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为这支大军的代理统帅，而新统帅直到1191年春天才从西欧风尘仆仆地赶来。

结果，阿克城前的十字军部队只好从围城之初的1189年一直孤军奋战到1191年。此间由于敌军不绝的袭击和补给方面的困难，导致了1/5的死亡率。与萨拉丁的士兵拥有可以轮流归乡的便利相反，围城的十字军只能驻扎在阿克城下，寸步不离。

第三次十字军的一个特色，是大主教与主教一类的神职人员，经常立于阵前，亲自指挥战斗。他们自然要在阿克的战场上脱下华丽的神职服装与冠冕，与骑士们一样身着钢铁制成的盔甲，腰挂长剑，手持标

枪，骑着战马出征。而当一天的鏖战结束后，他们还要继续进行本职工作——脱下甲胄，穿上主教的服装，为战死者凭吊祈福。无论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是鲁昂大主教，都在日以继夜的辛苦劳作之后撒手人寰。

这些神职人员所率领的英法两国的兵士，大都不是皇帝与国王所率的封建诸侯带来的。他们一般是没有领主的骑士和普通平民。腓特烈将“条顿人的愤怒”写进了给萨拉丁的信中。但胸中燃烧着收复耶路撒冷怒火的十字军士兵，大多数并非来自德意志。

第三次十字军时代基督教与伊斯兰双方史料的记载所共有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再有任何关于奇迹或上苍恩宠的内容。第一次十字军时代记载中常常出现的奇迹、上帝或圣人的保佑等现象，在这时全然消失了。虽然双方首脑之间来往的信件中依然充满了感谢上帝、真主护佑一类的语句，这些话语只不过是作为表现当事人信仰之深刻的惯用语而留存。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地位低微的人，提笔时也必须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始。

一言以蔽之，第三次十字军是世俗人之间的战争。上帝或真主并不愿对这场持久战给予任何偏袒，使大战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只是其中一方还穿着印有十字架的战袍，而另一方则高举着印有白色古兰经文的绿色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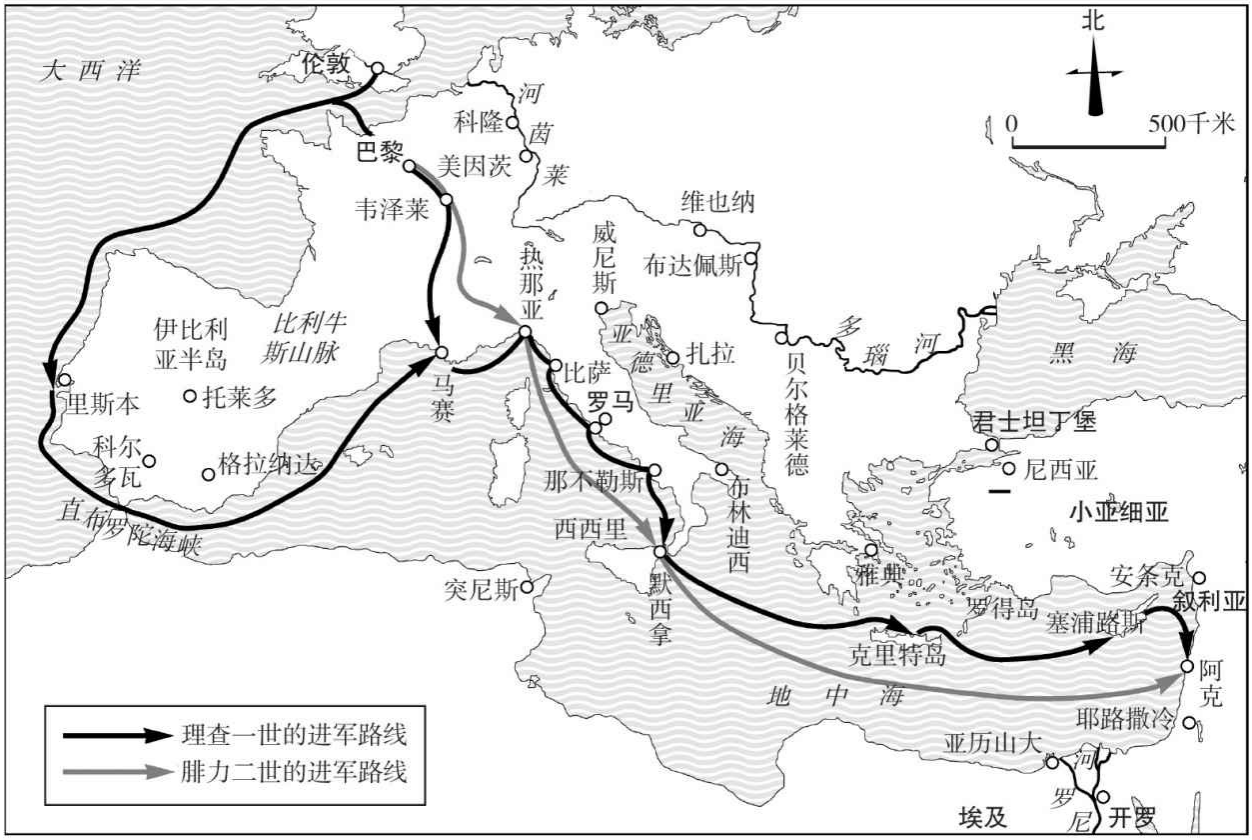
这一点特色，在第三次十字军时代的主角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一世的气质上体现出来。在神的角色淡出之后，此二人的对决，成了这场大战的特点。十字军的历史，也从这第三次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两位年轻的国王

1190年7月4日从法国北部出发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直到行军到达位于西西里岛墨西拿的集结地时，才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逝世的噩耗。此时，两人决定分别率军赶往阿克，直到战场上再见。尽管如此，他们的军队直到一年以后才到达阿克。这并非因为两位国王都是拖延症患者，只是因为偶然事件的发生阻止了他们的急行军，而处理之后，就必须等待下一个适于航行的季节才能起航。两人之中理查一世的行军更慢一些，而这与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有关。

25岁的腓力二世，是一名坚定不移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并不在意，因此处理问题时往往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

而33岁的理查一世却是一位喜欢彻底处理问题的君主，也以其战略眼光而著称。因此，他往往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改变对友军的策略。



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的进军路线

同一天从同一地点出发的两位国王，分别率领自己的部队，以不同的路线抵达墨西拿。腓力二世从热那亚登船，直接沿海路到达墨西拿。而理查一世则从马赛登船，会同从英格兰经直布罗陀海峡赶来的运输船队，依次经热那亚、比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那不勒斯，最后才到达墨西拿。

理查一世这样做有几点原因。首先，与运送腓力二世军队的海上老手热那亚舰队不同，理查一世必须与自己麾下的坚固的北海舰队同行。这些运输船上都载有组合式投石机，以及大量的供投石机使用的石弹，行驶非常缓慢。

此外，理查一世舰队中与运输船队一起行进的运兵船，采用的是可以用船帆和桨来驱动的桨帆船。为了不拉开两支船队的距离，他采取了

多次停留的策略。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可能的答案有两个。

其一是理查一世有晕船的问题。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一点足以成为后世海洋帝国英格兰国民最为崇拜的历史人物狮心王理查的一大耻辱了。因此，有人提出了第二种说法。那就是理查一世一直觉得在行动受限制的船只上停留十分无聊。因此，他需要频繁踏上陆地，以感到舒适。

于是腓力二世首先到达了西西里岛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海港城市的墨西拿。1190年9月，他的部队全部进入了墨西拿。而一个月以后，理查一世的舰队才进港。如果他能够尽快行动，就不至于在墨西拿滞留了。可惜，随着11月到来，地中海进入了冬季，以前平稳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两位国王只得一起在这座小城过冬。

这一时期统治西西里岛的，是一位名叫丹克雷迪的领主。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那位名将除了名字相同以外，没有任何关系。在前任西西里国王威廉无子的情况下，丹克雷迪夺取了王位。他在夺取政权之后，将威廉的遗孀，英国国王狮心理查的妹妹乔安娜下狱，并夺取了她连同嫁妆在内的全部财富。

理查当然不能容忍丹克雷迪的做法。不无巧合的是，理查的母亲，阿奎丹的埃莉诺尔，就曾长期被其父亨利二世监禁。

阿奎丹的埃莉诺尔作为以普瓦提埃为中心的法国西南部阿奎丹地区的女继承人，在不满20岁时与同龄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结婚。在其夫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她也一同前往东方。然而，随着第二次十字军的不战而退，路易七世表现出缺乏勇气的一面。在对丈夫感到失望之余，法国王后转而爱上了比自己年轻11岁的诺曼底公爵亨利。由于天主教会不准许离婚，大贵族们常常以转而宣布原来的婚姻无效的方法来开始新的婚姻。最终，罗马教皇同意承认埃莉诺尔和路易七世的婚姻无

效。30岁的埃莉诺尔得以与亨利结婚。

两年以后，亨利的父亲驾崩，他得以登上英格兰王位，埃莉诺尔就成了英格兰的王后。埃莉诺尔在历史上出名，不仅因为她先成为法国的王后，又做了英国的王后，还在于她拥有的广大领地阿奎丹。比法国王室直辖的领地还要大的阿奎丹，从法国国王手中拱手让给了英格兰国王。

由恋爱而非政治婚姻而开始的亨利与埃莉诺尔的婚姻，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20年。他们共育有五男三女。理查是他们的第三位王子，而乔安娜则是第三位公主。

由于亨利二世的几位王子先后起兵反叛其父，正值壮年的国王不得不动用武力，使各位王子被迫宣誓效忠父王。亨利并不满足于这一结果，还用禁闭的手段惩罚埃莉诺尔。由于丈夫早已倾心于年轻的女子，妒火中烧的埃莉诺尔一直站在儿子们一边。

埃莉诺尔被囚禁了15年。在这15年里，她的子女们只有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才能来探望养育自己的母亲。

亨利二世自然不想重蹈路易七世的覆辙。他希望通过游说罗马教皇，使原先与埃莉诺尔的婚姻失效，以便自己和当时心爱的人结婚。然而这样做就会使自己失去对阿奎丹的所有权。因为两人不再同居，妻子的领地自然要回到她自己手中。为了保住对阿奎丹的所有权，亨利二世维持了与埃莉诺尔的婚姻，但把她监禁起来。

20年以后，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再度起兵反叛。这一次，他的长子已经去世，次子在战乱开始后丧生。因此，挑战父亲王权的，主要是理查。这两位能征善战者之间的斗争，仿佛幼狮挑战老狮子的权威。在二人的正面对决中败北的亨利二世，受到莫大的打击，一病不起，战役之后几天即告驾崩。

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后，理查一世立即打算将母亲从囚禁中释放出来。67岁的埃莉诺尔，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强健。得知亨利的死讯，她立即设法从囚禁的城堡中逃脱，并乘马前往英格兰。理查一世派出的人马在途中遇到了埃莉诺尔和她的侍女，并一路护送她前往伦敦。

在她的儿女当中，埃莉诺尔最喜欢的就是理查。当理查还未成年时，他就被授予阿奎丹领地中核心区域的普瓦提埃伯爵的身份。狮心理查的事业就从普瓦提埃伯爵领地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英格兰国王加冕仪式，是扬眉吐气的阿奎丹的埃莉诺尔骄傲的时刻，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理查起兵反叛自己的父王，并非为了夺取英格兰的王位。在他少年时期的叛乱中，长兄和次兄都还健在，即使叛乱成功，排行第三的他，取得王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第二次叛乱中，他的次兄依然活着，因此理查也不是王位的继承人。只是因为次兄在叛乱中死去，理查才最终得以继承王位。

总之，理查不是为了取代其父成为英国国王而起兵的。他只是出于对父亲囚禁母亲的卑鄙手段的厌恶而起来反叛。倘若父母离婚，理查就不至于如此厌恶其父了。为了夺取妻子的领地，狠心囚禁埃莉诺尔15年，这样的亨利，令理查感到耻辱。

而在来到西西里的理查眼中，夺取王位的丹克雷迪只不过是一个小号的亨利二世罢了。这位君主之所以囚禁乔安娜，不过是为了金钱而已。这种卑鄙的行为，自然不为理查所容忍。乔安娜这位西西里的王后，并没有自己名下的领地，因此在嫁妆完全被没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到达墨西拿的理查，立即要求丹克雷迪释放乔安娜王后，并全数退还她的嫁妆。此时，狡猾的丹克雷迪顾左右而言他，反而暗中部署军队。理查率领的前往中东的十字军，被丹克雷迪限制住，不得出港。

此时，理查的震怒爆发了。他命令部队交战，宣示了自己的实力。在墨西拿附近，英军击败了西西里军队，最终在11月解决了问题。丹克雷迪宣布投降，释放了乔安娜，并把她的嫁妆全数退还。

此外，理查还迫使丹克雷迪在墨西拿准备必要的设施，以使其成为西欧前往近东朝圣者的中转港口。对于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些合适的中转港口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腓力和理查错过了当年的出港时间。因此两人只得在墨西拿度过1190年的圣诞。两人计划到1191年天气渐暖之后一起出港。

而在乍暖还寒的时候，理查的母亲来到西西里岛访问。

这位母亲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英国的王后，而是英格兰的王太后了。理查此时还未离开墨西拿，于是率部前来迎接。他命令属下将士做好准备，亲自乘船出海迎接母亲的来访。

埃莉诺尔并没有为自己初次东征的儿子感到担忧。68岁的她希望与儿子一同前往东方，这在理查看来是不合适的。埃莉诺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将随行的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公主贝伦格拉介绍给儿子。未婚的理查已经34岁，作为英格兰的国王，母亲为他挑选了一位合适的结婚对象。

理查在此之前有婚约在身，是法国国王腓力的姐姐。她与理查订立婚约之后，来到了英国亨利二世的宫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公主与迈入老年的亨利之间发生了恋情，消息不久即传遍了整个王宫。

得知这一消息的理查，请求取消婚约。在监禁中的埃莉诺尔也赞同理查的要求。最终，埃莉诺尔挑选了自己入眼的儿媳妇，带到了西西里。

一直听取母亲意见的理查一世，这一次也听从了母亲的劝告。他自然不愿意迎娶一位与自己父亲有染的妻子。他的选择使他跟同在墨西拿的腓力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尴尬。在腓力看来，结婚只不过是政治联姻而已。因此，被悔婚的腓力家一方多少心中有些不快。只不过腓力并非那种喜怒形于色的君主，此时的理查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理查一世终究没有让母亲随同远征。但是他带上了自己的未婚妻，阿拉贡的公主。从监禁中释放的王妹乔安娜也跟理查一起前往东方。

在理查一世东征途中，他与母亲埃莉诺尔之间频繁进行书信往来。两人之间信件的内容，并不是通常母子之间的嘘寒问暖，而是两位公务繁忙的政治家之间的报告。理查将自己英国和法国境内的领地委任给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埃莉诺尔。而这位母后将任务完成得相当漂亮。在12世纪后半叶历史中著名的阿奎丹女公爵，应当是颇具统治才能的人物。

由于理查一世延迟出港，腓力二世最终决定先期于3月30日从墨西拿出发。两周之后的4月14日，理查也踏上了向东的征程。他在西西里岛停留了半年之久。

塞浦路斯岛

法国国王的军队，于1191年4月20日到达了阿克。从墨西拿到阿克的航程只要20天。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的军队，却直到6月8日才到达阿克。除了由于在墨西拿出发时迟了两周以外，英国军队在塞浦路斯耽搁了一段时间。

此时的塞浦路斯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然而岛上发生了政变，归新的统治者所有。这位统治者杜卡斯自称皇帝，其部下都是希腊人。

理查一世的舰队是由速度缓慢的运输帆船与同时使用船桨和帆的桨帆船组成的混合舰队。因此，为了保持舰队的队形协调，必须一再于中途的港口停留。在离开墨西拿之后，舰队先后在克里特岛和罗得岛靠岸，而抵达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时，速度不一的两种船只被拉开了距离。当时理查乘坐在桨帆船上，而他的妹妹和未婚妻则乘坐在运输帆船上。

运输船队由于操作失误，搁浅在塞浦路斯岛上。由于有两位高级女贵族在船上，运输船队内有多名女官。她们华丽的服装引起了岛民的注意，而自称皇帝的杜卡斯随即命令岛民抓捕全体船员。他希望从理查那里得到赎金——这自然是理查最为憎恶的。

因此，理查决定登陆塞浦路斯，征服这座岛屿。此时距离阿克只有两天的航程，因此理查将自己的一部分兵力分给索尔兹伯里主教指挥，前往阿克。

与一般的神职人员相比，比理查年轻三岁的主教更接近一位武将，是深得理查信赖的心腹。理查告知主教，自己将在处理完塞浦路斯事件之后，赶到阿克，加入攻城的十字军。此时已经进入5月。法国军队在

此前的4月20日到达了阿克战场。当理查征服塞浦路斯之后，他就会按照承诺前往阿克参战。

当送走索尔兹伯里主教所率领的部队之后，理查命令全军登陆。这一天是1191年5月20日，理查的全体部下都整装待发。

理查军队向塞浦路斯发起的进攻，是速战速决的战斗。自称皇帝的领主狼狈而逃，岛民并不支持他。理查则贴出布告，宣称岛民只要放弃抵抗，英军不会威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上仅次于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克里特岛的第四大岛。而从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来说，塞浦路斯的重要性仅次于西西里岛。理查只用了五天就征服了全岛。在岛上医院骑士团团长的主持下，自称皇帝的杜卡斯向理查求和，此时全岛形势已经稳定下来。杜卡斯请求理查允许他离开岛中央的尼科西亚城，并将岛的所有权和统治权都交给英国国王。此外，塞浦路斯提供50艘船和3500枚拜占庭金币，作为对十字军的援助和对理查的赔偿。

但对于理查来说，他和十字军在塞浦路斯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50艘船和3500枚金币那么简单。

塞浦路斯在此前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对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并无帮助。这里距离叙利亚、巴勒斯坦非常近，非常适合作为十字军一方海上的补给基地。

而理查征服塞浦路斯，就在这里建立了与以前希腊东正教徒统治完全不同的天主教统治。此事件的重要性，对于西欧天主教世界来说是不言而喻的。随后，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的家族和威尼斯共和国统治了塞浦路斯380年，直到1570年，这座岛屿都在天主教势力的手中。

由于该岛的重要性，无论是法国的路西尼安家族还是威尼斯人，都

非常重视在塞浦路斯坚持下来。由于面向中近东的地中海东部的制海权，一直在基督教一方，控制对于制海权来说非常重要的岛屿，就掌握了能与在陆地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穆斯林相对抗的基地。对于基督徒来说，塞浦路斯的作用，就像伊斯兰世界的埃及一样。

这样，塞浦路斯成为了对于战略、贸易和朝圣者等诸方面都十分重要的中转港口。关于朝圣这一点，穆斯林把耶路撒冷视为麦加、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城。对于穆斯林来说，一生当中必须前往麦加朝觐一次，但去耶路撒冷朝圣并不是义务。

0
100千米
北
小亚细亚
基利基亚
安条克
叙利亚
拉塔基
沙伊扎尔
哈马
尼科西亚
法马古斯塔
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巴尔巴克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地 中 海
阿 克
加利利湖
海法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纳布卢斯
阿尔苏夫
雅法
依柏兰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死海
加沙
达鲁姆
达米埃塔
河
埃及

理查控制塞浦路斯后的基督教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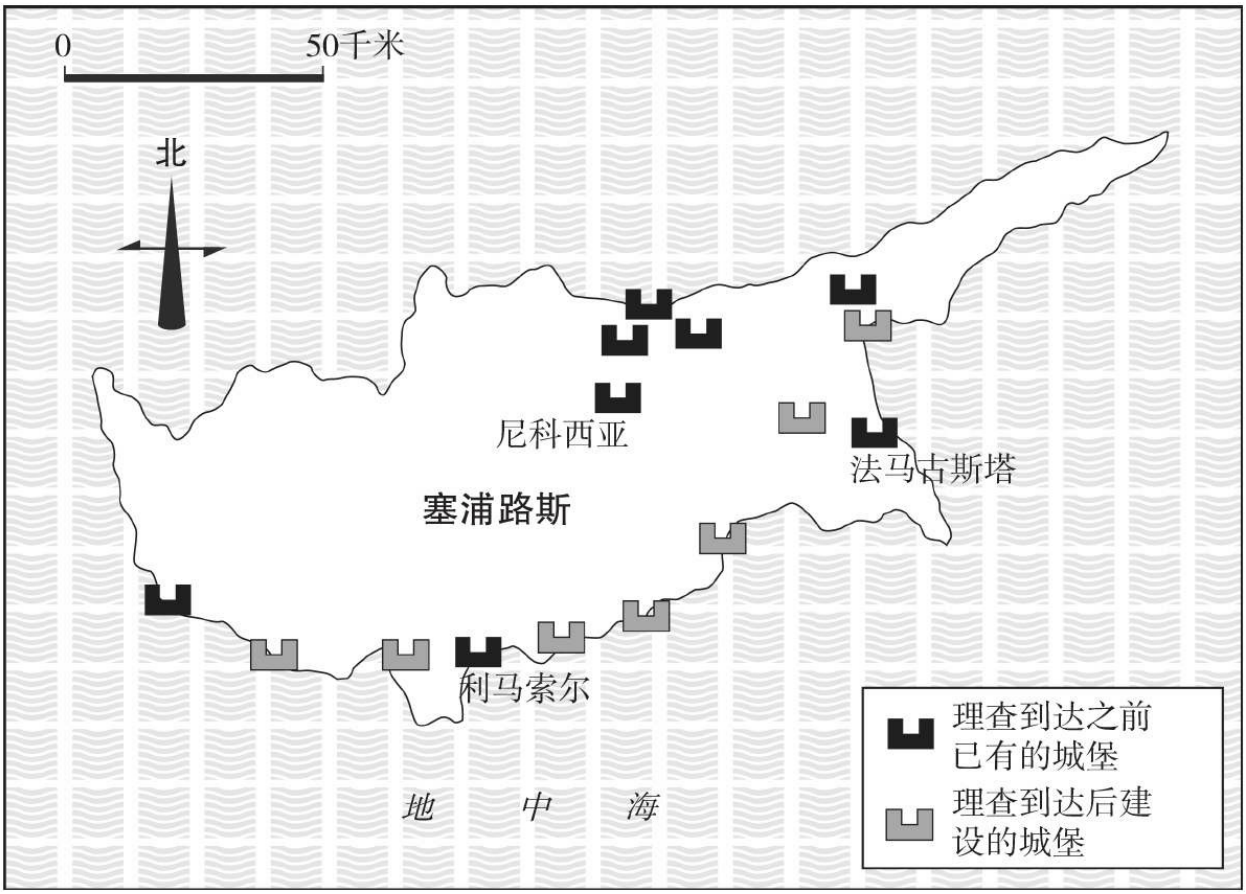
而对基督徒来说，虽然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不是义务，这座城市却是比罗马和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更重要的圣城。对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自然希望这座城市处于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的控制下。而在他们看来，朝圣中途能够在西西里岛和塞浦路斯休整，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理查一世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看上去只是偶然。但实际上，这一偶然开始的行动，为十字军带来了长期的利益。从理查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勇猛善战的人物，也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妥协。

虽然理查对索尔兹伯里主教说过，在处理完塞浦路斯的事件之后就向阿克进发，他实际上并未立即行动。得知理查抵达塞浦路斯消息的中近东十字军首脑们，陆续前往塞浦路斯拜访这位国王。

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特里波利伯爵和安条克公爵都来到塞浦路斯。只有路西尼安一人是抱着希望理查尽早参战的目的来访的，其他两人暗中与萨拉丁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拜访理查只是为了表示尊敬。

见到这些贵宾来访，理查当即决定，在塞浦路斯岛上与贝伦格拉举行结婚典礼。



塞浦路斯的防御体系

我想也许是因为塞浦路斯是古代传说中爱神维纳斯的诞生之地，才促使理查做出这一决定的。理查虽然才智过人，却并非拥有教养的人士。这位以第三次十字军总指挥自居的国王，自然希望在十字军首脑列席的情况下举行婚礼。1191年5月12日，理查的婚礼在塞浦路斯南岸的海港利马索尔举行。在此之后，理查进行了两周的新婚旅行，然后才向阿克进军。

据说，理查的新婚旅行是环绕塞浦路斯全岛的游览。如果确属事实的话，那么理查不仅是在旅行，也是借新婚旅行视察全岛的防务。从这一时期开始，塞浦路斯岛上也像其他十字军控制的地区一样，开始修建城堡。

理查于6月5日离开塞浦路斯。在此之前数日，他把妻子贝伦格拉和

妹妹乔安娜，连同她们随行的女官送到安全的特里波利。理查不愿将女子送上战场。

理查本应在两日内到达阿克，但最后抵达的时间是6月8日，途中耽搁了一天。这一天的耽搁自有其原因。

理查从塞浦路斯东岸的港口法马古斯塔起锚，向南方的阿克航行。他命令舰队先向东南方航行，这样可以在抵达阿克之前，从海上观察阿克以北的海港城市。当他的舰队看到海港城市时，理查也进入了面向地中海的海港观察哨的视野。贝鲁特、西顿、推罗这几座城市，都能看到浩浩荡荡驶过的舰队。其中贝鲁特和西顿在过去近百年间一直为基督徒所占据，但在哈丁战役之后成为穆斯林控制的城市。

在向阿克航行的途中，理查的舰队在右前方海面上发现了一只大型帆船，正在向南航行。

当理查的舰队捕获这只大型帆船之后，水手们得知，它是根据萨拉丁的命令，将贝鲁特的大量物资运送到阿克附近的海法港的。这艘三桅帆船十分巨大，里面容纳了百余头骆驼，以及大量武器和粮食，船上有7位埃米尔和800名兵士。

这艘船之所以选择深入地中海，而非沿海岸航行，是因为热那亚和比萨的船只一直在海岸活动。结果它意外遇上了理查的舰队。这艘船上悬挂着萨拉丁创立的阿尤布王朝的黄色旗帜，分外醒目。

观察到这艘船之后，理查便命令一艘小型桨帆船前往侦察。当理查的部下接近大型帆船时，便大声问道："这是哪里的船？"大船回答："法国的船。"然而这位部下是法国普瓦提埃人，当他转而用法语提问时，大船却回应道，"这是热那亚的船。"这一来一往，令部下感到诧异。

理查听取部下的汇报时，一位近臣不禁发问，“它恐怕是撒拉森人的船吧？”撒拉森人是当时西欧人对穆斯林的统称。

理查当即决定，全体对大船发起进攻。他的命令声响彻海面。

在理查所乘旗舰前面的运输船队，首先投入了进攻。然而，撒拉森人的船并非轻易就能擒获。由于英国船只比穆斯林的大船低，穆斯林水手可以从高处射箭，从而处于有利的形势。此时理查改变了作战方针。他命令英军的小型船只围攻穆斯林的大船，直到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小船把大船团团围住，令其动弹不得。

就像群狮围攻巨大的水牛一般，理查的战术奏效了。为萨拉丁所率部队提供的补给，与大船一起落入了理查之手。

与穆斯林初次交锋的胜利，给理查和他的部下以极大的信心。而萨拉丁则同时得知了船只和大量补给物资被夺取的汇报，以及理查一世到达的消息。

1191年6月8日，理查在所缴获的大型帆船的领航之下，到达了阿克城外的阵地。此时距他从法国出发已有一年之久。

进入战场

法国国王腓力已经于4月20日到达阿克的战场。26岁的法国国王，并不喜好排场，到达之时颇为平静。由于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包围阿克的十字军直到看见蓝底黄色百合的法国国王旗帜，才知晓了国王的驾临。

而50天后进入阿克城的理查就完全不同了。34岁的英国国王不仅不忌惮排场，还深知排场所带来的效果。

阿克城下的十字军将士们，远远望着理查舰队的到来。他的旗舰首先出现在岸边。当运输船队的兵士们上岸装卸货物之时，理查的船向南航行着。

高耸的桅杆上，悬挂着白底红十字的十字军旗帜。站在船头的理查，身旁飘扬着红底上绘有三头黄色狮子的英格兰国王旗。

关于理查的相貌身材，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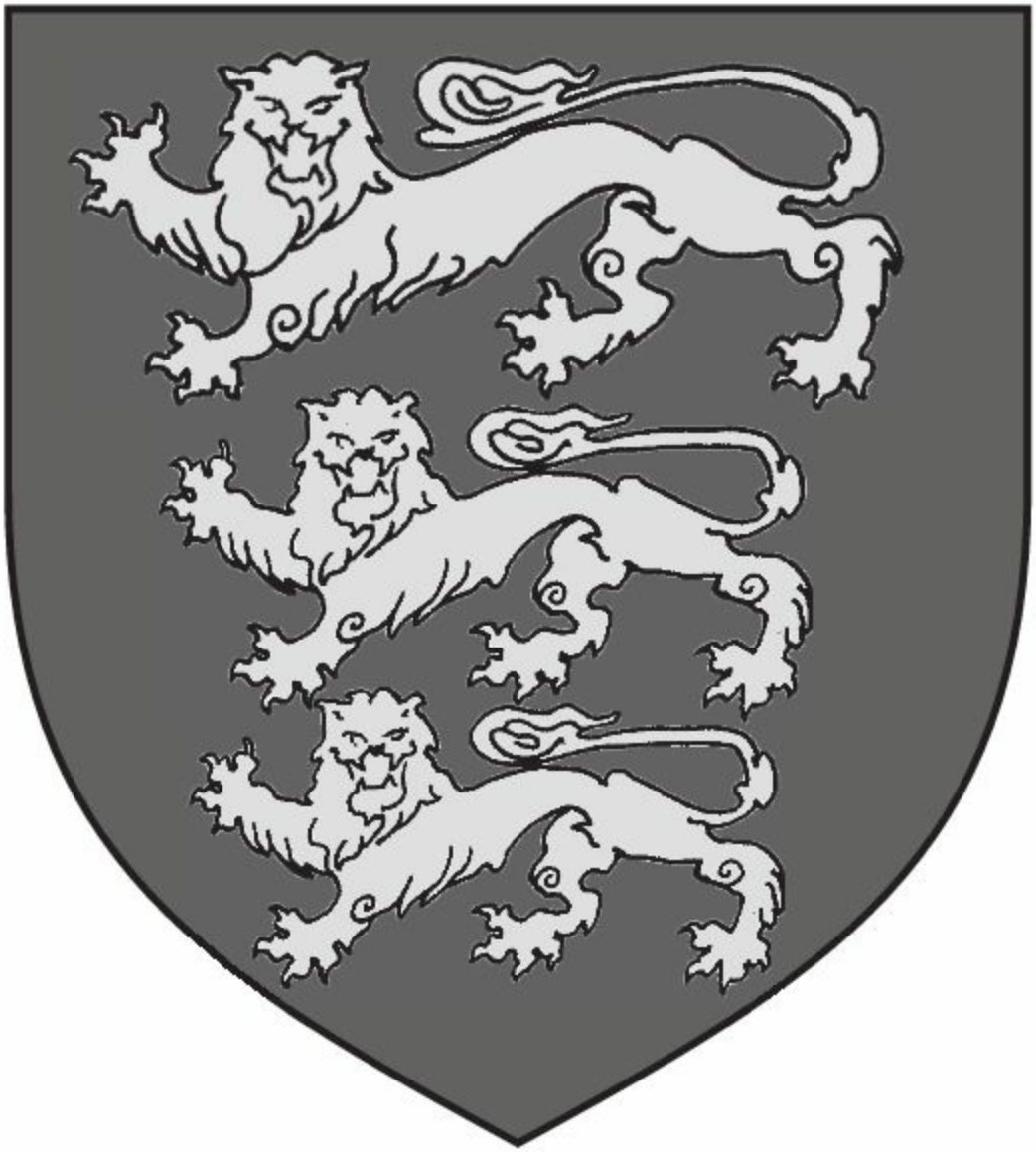
> 理查身材高大，神态优雅。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是泛红的金色，双眼则是深蓝色的。他双腿修长，行动敏捷。生着一双长臂的他，既善使腰间的宝剑，也擅长挥舞长枪。理查匀称的身材十分完美，以至于人们只要一看到他，就相信眼前这位男子一定拥有高人一等的地位。

记载中并未述说理查是一位“美男子”，而是用“神态优雅”来形容他，这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位身姿优美的男子。在同时代人的记述当中，我们看到，中世纪西欧人热衷于追求自己领袖的完美身材。

这一天，理查乘船穿过阿克城西侧的海面，海岸上是笔直的峭壁，一直向南航行到阿克港湾的开口。在海上封锁的意大利船只的欢呼声中，理查在旗舰上视察了阿克的情况。随后，他掉头返回了阿克城下的战场。

参加阿克之战的十字军将领们，全体出城迎接抵达的理查。

在场的本地十字军代表包括路西尼安及其弟，以及以巴里安·伊柏兰为首的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内强有力的封建领主们。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团长由于军务不能前来，因此由两位骑士团内的队长代为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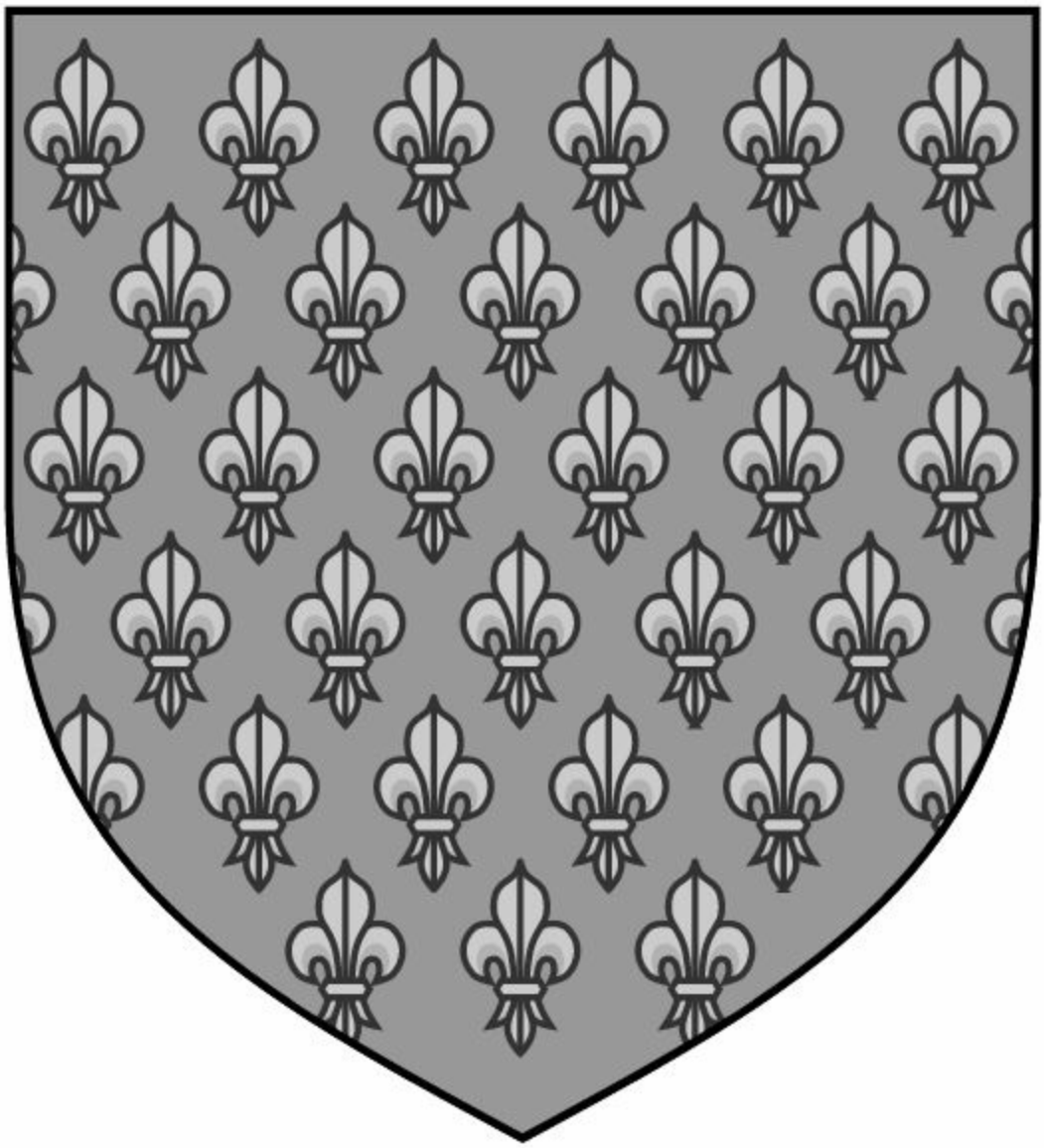


英格兰国王的纹章（红底黄色狮子）

而从西欧前来的十字军代表，则包括阿韦讷伯爵雅克、腓力和理查共同的侄子香槟伯爵亨利、先于理查到达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以及在红胡子腓特烈的次子死后出任东征德意志军总司令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此外当然还有先期抵达的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当时唯一未在场的第三次十字军领导人是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他从阿克的前线返回了推罗。

在各位领导人欢迎理查一世到来的同时，普通骑士和步兵也喝彩相迎。他们都听说了理查征服塞浦路斯、俘获敌军大帆船的喜讯。战场上的兵士们，感觉是十分敏锐的。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次十字军真正的领导人驾临了。

首次踏上西欧人所谓圣地的理查，也不忘回应各位将士的期待。他身披钢铁制成的甲胄，胸前的白底红十字分外显眼。理查骑着高头大马，在兵士的簇拥下行进。看到理查身旁的骑士手执的红底黄狮子英国王旗，在场的兵士们欢声雷动，兴高采烈地迎接着这位英武的国王。



法国国王的纹章（蓝底黄色百合）

整个十字军阵营中巨大的骚动之声，传到了城墙另一侧的阿克城内，也传到了战壕对面的萨拉丁的营地中。

在将士们的欢呼声中，理查一世悠然乘马行进着。他缓缓而行，视察着陆上的十字军战线。这位国王在抵达阿克的第一天，就将海陆两线的战事情况做了充分的了解。

从后方前往前线阿拉迪尔阵营视察的萨拉丁，也听到了敌方巨大的骚动之声。

包括萨拉丁在内，穆斯林当时还并不知道英格兰这个国家。这是因为以前的十字军很少有从英格兰来参战的。而在此次理查抵达以后，穆斯林在对“西欧来的基督徒”的统称“法兰克人”中，开始有了不同地区的分别。

基督教史料中有着“理查的到来使我军大为鼓舞，敌人十分绝望”的言过其实的描述。对于不明实力的对手的到来，萨拉丁并不会感到绝望。此时，穆斯林军队还完全不知道理查一世实力如何。

在大摆排场之后，理查为迎接的骑士们派发了见面礼。当听说法国国王腓力抵达时派送了礼物后，理查也做了相同的安排。腓力给每个骑士三枚金币，而理查则馈赠了四枚。与仅仅馈赠了金币的腓力不同，理查还向各位骑士赠言一句：

> 不管各位来自何方，属于哪个民族，有着怎样的经历，大家只要听从我的命令战斗就好！

这句话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听众们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在理查的身边，有曾经效忠于其父亨利二世的老部下，他们

对参加十字军是有所犹豫的。在理查的身边，的确有为数不少的敌对者。

腓力和理查馈赠给骑士金币，是因为每个骑士属下有5名步兵参战。他们馈赠的金币为全体作战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然而，到达次日，理查就倒在了营帐内的病床上。全无征兆的情况下，理查在即将投入战斗前病倒，难道是有什么阴谋吗？

此事一传开，前一天欢声雷动的将士们集体失声了。这时，理查被担架抬着，运送到阿克城下的城壕边。

病倒的英国国王在战场前线出现，并非为了让将士有一阵悲怆感。只见理查手执心爱的弩机，从担架上缓缓坐起来，瞄准城墙上的敌兵，用力射出一箭。将士们只听得箭矢飞出的响声，被射中的敌兵应声中箭，从城头栽落下来。十字军全体兵士瞬间迸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众人都为理查而倾倒，“我军的主将并无大碍啊。”

根据研究者的推测，理查的急病很可能是中暑。因此，没过几天，他就痊愈并回到了战场。从此以后，十字军在内外两线的战况都起了质的变化。第一次参加东征的理查一世，成为了十字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

十字军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指挥系统。各位首脑人物都听从理查的总调遣。法国国王腓力对此保持沉默。如果他有异议的话，恐怕就会招人嘲笑了。腓力在50天之前已经来到了战场。但在这50天中，他并没有对打破双方的胶着状态起多大作用。这一点，兵士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理查的到来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役的形势。他只是在几个重要的位置进行了改进。以下是两个例子：

对于中世纪的大炮——投石机的使用，十字军主要将其部署在阿克

城墙周围的城壕边上。在尚未使用火药的时代，投石机的弹丸是石质的。理查使用了圆形的弹丸，从而减小了空气阻力，增加了飞行距离，杀伤力也有所增加。而在此前的两年间，十字军一方一直难以达到攻城的效果。在法国国王腓力抵达以后，发现攻击效果不佳，也提出了改变攻击位置的建议。

在两年之间，阿克城各处都是残垣断壁。然而，投石机打开的缺口还未达到能让十字军攻进城内的程度。

理查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命令投石机不再攻击城墙，转而集中力量砸向城门。城墙是石砌的，然而城门即使再坚固，也是木制的。

阿克这座曾长年为十字军所控制的港口城市，并非处于敌军之中的孤城。因此城门主要是为了方便人通行，防御是第二位的。城门尽管坚固，却远不及石质的城墙。因此，理查为了在阿克城外打开缺口，集中力量进攻7座城门。

理查将从英国运来的投石机组装完成，设置在城门对面，发起了攻击。由于圆形的石弹阻力小、飞行距离长，直接越过城墙，飞进了城内。破坏力巨大的石弹，令阿克城内的守军和市民都感到极为恐惧。

理查将圆形石弹送到了萨拉丁的军营，以向对手表明自己的驾临。作为一代战略家的萨拉丁，却无法理解理查的圆形石弹的威力。其实萨拉丁并非没有原材料、人力和时间来仿制。总之，无论是十字军还是穆斯林一方，直到200年以后，才普遍使用圆形的石弹。

抵达阿克以后，理查对战术的另一贡献，是给将士们下达了明确的作战任务。

在理查到达之前，十字军的领导人各自分别列阵，将阿克城包围起来。这样一来，每个人的阵营都要面临同时与正面的阿克城守军和背后

的萨拉丁援军同时交战的境地，迟迟打不开局面，十分狼狈。

理查将围城的兵力明确地分为外侧防御萨拉丁援军的“盾”和内侧进攻阿克的“剑”两部分。

与“剑”相比，“盾”的任务格外艰巨。这部分兵士不仅要十分勇敢，还需要冷静与耐力。理查将这一艰难的任务授予了路西尼安的弟弟——他拥有兄长所不具备的能力——以及绝少贸然行动的医院骑士团，和在前面两年内十字军的实际领导人阿韦讷伯爵。

而在“剑”一侧，理查配置了善于突击猛攻的圣殿骑士团为首的十字军主力。这样，无论是“盾”还是“剑”一侧，都可以专注于完成所命令的任务。当一位士兵有了明确的目标，不必担心背后的时候，他就能发挥出全部的战斗力。

在阿克战场上的理查，与后来一样，并没有身先士卒，在敌军人丛中拼杀。他所做的，只是指挥系统的一元化。理查的安排，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在与现代的记者一样追求新闻亮点的编年史家笔下只有寥寥几笔。然而其效果，在两周激战之后变得明显了——战斗如此激烈，弗兰德斯伯爵战死沙场。

由于得不到海上的补给，陆地上又受到十字军联军统一命令下的进攻，阿克的穆斯林守军招架不住了。他们派代表向十字军乞降，并告知萨拉丁，希望他能允许城市投降。

法国国王和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都愿意接受阿克的投降，但理查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此时停战并非良策。

在阿克与萨拉丁联络成功之时，萨拉丁不得不承认阿克城的陷落。根据伊斯兰史料，萨拉丁留下了这样的话：

“在属下无法继续抵抗之时，苏丹有义务承认其投降。”

在受降谈判开始时，阿克城方面只答应了十字军一个条件，即将此前两年交战中所俘虏的250名基督徒交还。

理查和其他十字军领导断然拒绝了阿克城方面的要求。两年的围城不能只得到这样不值一提的战果。战斗再次打响，理查骑马指挥在攻城的最前线。

成功夺回阿克

7月刚刚开始还没过一周，阿克城就再次请求投降。理查对此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交还此前交战中俘虏的所有基督徒，并不要求任何赎金。

二、包围十字军的萨拉丁援军也俘虏了2000名骑士和500名步兵。这些人也必须交还，并且不能索取任何赎金。

三、将萨拉丁麾下所有埃米尔俘虏的基督徒全部释放。

四、阿克城内的穆斯林守军放下武器，带着必需品离城。

五、萨拉丁为阿克城内全体穆斯林支付2万枚金币的赎金。

六、赎金支付完成之后，阿克城内的2500名穆斯林居民作为人质留居城内。

七、以上诸项在谈判后一个月内完成，这一个月内双方停战。

十字军的全体领导人都赞成理查的提议。当提议呈给萨拉丁时，他也同意了。

对于萨拉丁来说，阿克战役的失利是推罗之战以来自己遭遇的第二次失败。推罗之战是进攻的失利，而这一次则是被对手夺回了城市。萨拉丁在哈丁战役后，首先夺取的就是阿克城。这座海港城市的重要性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两方面所周知。阿克被十字军夺取，萨拉丁的心情一定不会太好。

1191年7月12日，在萨拉丁夺取阿克5年之后，阿克战役开始2年之后，阿克城又回到了十字军的控制之下。

从城内打开城门的穆斯林，站立在门的两侧目送十字军进城。理查和腓力下达了绝对禁止敌对行为的命令。然而事实上，这样的禁令完全没有必要。

城内穆斯林看到的十字军，在两年围城战中陷入了食物极端匮乏的境地。而城内的守军也由于无法与援军会合，处于同样的凄惨状况之中。十字军将士们心中充满了赞叹，毕竟，经过双方莫大的牺牲，阿克围城战终于结束了。此时离理查抵达战场不过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

当阿克城内的穆斯林守军离城之后，十字军焦急地进入了城内。不仅守军离开了阿克，萨拉丁也将自己的阵营后撤了不少。

萨拉丁和理查之间就阿克城投降达成了协议，双方已经缔结了和约。而十字军一进入阿克城内，便开始着手建立城防体系。

包括理查、腓力和十字军全体领导人在内的大军，进入了阿克城。进城之后，十字军首先把面向远方萨拉丁阵营的城墙武装起来。

对于加固城墙来说，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筑塔楼。这一点在阿克城也不例外。在建好的塔楼之上，飘扬着英法两国国王的旗帜，明示阿克城作为十字军城市的主权。

在红胡子腓特烈死后，率领其残部抵达阿克的皇帝次子也病死在途中。代理执行统帅任务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指挥了参加阿克之战的德军。他看到别的塔楼上飘扬着英法两国的旗帜，便命令自己的士兵在所建造的塔楼上悬挂起奥地利的旗帜。

看到这一情景，理查命令奥地利公爵降下旗帜。其理由是，国王和公爵有本质上的差别。

在西欧封建社会，国王的权力是“神授”的。拥有神授权力的国王，与作为普通封建领主的公爵，有本质上的差别。利奥波德作为皇帝的代表，领导参加第三次十字军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军队，内心不免十分自负。这次被强迫降旗的事件，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理查并不是那种在谁面前都保持好脸色的人。而由于他并非心怀怨恨的那种人，也就难于体会他人的不满。毕竟，在成功夺取阿克城之后，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务堆积如山。

理查首先面临的，是修复两年攻城战期间损毁的城墙，以使其能够应对萨拉丁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势。参加这一工作的，除了进城的十字军兵士，还包括从穆斯林阵营释放回来的基督徒。萨拉丁遵守了停战诺言，将全体俘虏送还阿克。

除了加固城墙之外，十字军夺回阿克以后，并不需要再做太多工作。此前5年统治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只是把教堂改为清真寺，此外就没有做太多改动。

从第一次十字军占领阿克以来，这座城市就被逐渐改造为西欧的建筑风格。它的外观看上去与西欧的海港热那亚、马赛、墨西拿如出一辙。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5年前穆斯林占领阿克时为止。而在最近的两年，则由于攻城战的破坏，使得阿克仅仅残留了一些西欧风格的街区。

而建筑物内部并不需要过多的改造。此时离第一次十字军已有一个世纪，其间随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广泛交流，没有人对西欧风格的家居设置感到突兀。穆斯林居住期间，只是更多地使用绒毯和坐垫，并建造拱门和柱廊。

而5年后回到城内的基督徒也已经习惯了绒毯和坐垫。在战争打响之前，他们常常到穆斯林的家中做客。在这5年之中，阿克城内的穆斯林渐渐多了起来。到十字军进城以后，城里还是能够看到穆斯林的身

影。他们大多数是前来与意大利人进行贸易的商人。

阿克再度成为西欧与东方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由于其主要建筑物都没有变化，腓力进城之后就住在5年前的圣殿骑士团总部，而理查则住在专门为西欧王公贵族建造的迎宾馆。

理查将远在特里波利的新婚妻子和妹妹乔安娜邀请到这座通称为“王宫”的建筑居住。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妻子的想念，另一方面也是向萨拉丁和十字军将士们表示自己固守阿克城的决心——两位女贵族和大量女官的移驾，表明这座城市已经在十字军的掌握之下固若金汤了。

萨拉丁向城内派遣了许多密探。他们掌握了理查的动向，而理查也将自己的意志通过密探传达给萨拉丁。密探往往有为双方所共同利用的特点。

法国国王回国

然而，在夺回阿克之后，日理万机的理查得到了一条情报——法国国王正准备回国。当这个消息在参战十字军中传开的时候，各位首脑不禁哑然。

第三次十字军主将之一的腓力，在中近东待了不到三个月而已。对他来说，幸运的是，此时阿克已经成功收复了。但在此战中，法国国王并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作为朝圣者和战士的腓力国王，也没有实现参加十字军兵士的愿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因此，无论是作为军事指挥官，还是作为朝圣者，他都没有完成任务。

至于法国国王为什么中途回国，他并没有告诉他人，因此只有编年史家的推测了。

根据法国的记载，腓力到达巴勒斯坦以后，便一直染病在身。

而德意志人则记载说，腓力难以忍受理查的傲慢。

英国的记载却是由于弗兰德斯伯爵战死，腓力感到侵略这一地区的好机会来到了，因此急于回国。

每条记载都是基于一定程度的史实的，而记载史实之外，历史也需要依赖想象力的发挥。

如前所述，腓力最为关心的，是扩大法国国王的直辖领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是法国国内的封建领主，例如拥有比王室领地更大封地的弗兰德斯伯爵、香槟伯爵和勃艮第公爵。当然，比以上三位领主更为强大的对手，是拥有包括诺曼底、阿奎丹等地在内的大半个法国

的英格兰国王。

弗兰德斯伯爵在阿克之战中战死。

香槟伯爵亨利与理查站在一边，唯理查马首是瞻。

理查一直有将萨拉丁夺取的圣城耶路撒冷夺回的念头。他执着于实现这一第三次十字军的最大目标。理查自然也记得，腓力曾与自己达成共同进退的协议。

至于勃艮第公爵于格，则受到腓力的委托，指挥国王归国之后留在巴勒斯坦的法国军队。因此，他也无法回国。

理查要求腓力留下来。他提醒腓力，不要忘记出发之前在法国的韦泽莱定下的两人缔结的一同出发、一同归国的协议。

不知腓力是如何应答的。他自然以中近东的风土气候并不适合自己，已经染病在身作为托辞。此外，他已经委托了勃艮第公爵指挥法军。总之，腓力归国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

理查要求腓力履行誓约——在理查回国之前，腓力绝对不能侵略英国国王名下的领地。腓力在誓约书上签字，并在下面盖上了自己头像形状的印章：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绝不反悔。

腓力这样做，理查能够完全信任他吗？理查也是中世纪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的一位领导人，他大概不会从内心里相信这誓约书的作用吧。但是在这时，理查只有相信腓力一种选择——疑神疑鬼的又有什么用呢？

1191年8月1日，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从阿克出发回国了。此时距离萨拉丁交付城内穆斯林的赎金，双方休战一个月的期限还有10天。

腓力首先前往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控制的推罗，然后从那里登上热那亚的船只，返回了西欧。

这位26岁的国王腓力的行动，可谓非常巧妙。

腓力离开第三次十字军回国，只带了少数近侍，他所率的大军都留在了阿克。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几百名骑兵和数千名步兵还在战场上，谁也不能说腓力放弃了战斗。

而腓力的归途，也并非从热那亚下船之后直接返回巴黎。他首先抵达罗马，向教皇说明自己为何只参加了不到三个月东征。

通过这次内容保密的谈话，腓力避免了使教皇与自己敌对。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开始，教皇就规定擅自提前回国者将会受到开除出教的绝罚。如果因为这个被绝罚，那腓力的如意算盘就打错了。还好，成功说服教皇之后，腓力于这一年的深秋返回了巴黎。

条顿骑士团的诞生

在腓力之后，又有一名领导人决定离开十字军回国，这就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他对理查的指挥感到不满，因此决定离开自己率领的德意志军队回国。而这支德意志军队则留在巴勒斯坦，并以其中的骑士为核心，组成了著名的“条顿骑士团”，是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之外的中近东第三大宗教骑士团。

德意志骑士们之所以从一支军队转变为与“德意志”同义的“条顿”骑士团，是因为离开他们归国的利奥波德没有为他们留下经费。因此，骑士们只得自筹经费，来维持参加十字军的开销。

德意志骑士效仿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例子，以保护朝圣者为名义，自然不会为任何人所反对，从而能够从西欧人手中获取资金援助。

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之后，条顿骑士团正式成立。他们的纹章是白底黑色十字，与白底红十字的圣殿骑士团和红底白十字的医院骑士团相仿。

与圣殿骑士团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类似，条顿骑士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德意志。由于其成员的性质，条顿骑士团更像一个世俗组织。

留在中近东的法国军队，也处于经费匮乏的状态。虽然腓力留下了维持军队的基本费用，但这笔钱从长期来看还是不够。这样，领导军队的勃艮第公爵只得请求理查提供金钱援助。这样，理查就不得不操心法国军队的经费问题了。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也在夺取阿克后离开了战线。由此导致的形

势，是理查在战术和战略两方面的绝对领导权。现在，理查可以自己决策、自己施行各种方略，再没有来自任何人的阻碍。而敌方的统帅萨拉丁则认识到，自己已经遭遇了强劲的对手。从此以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成为53岁的萨拉丁和34岁的理查之间的对决。

狮心理查与萨拉丁的对决

萨拉丁在推罗之战失败后悻悻退兵，但在阿克之战后，他却没有退却，静观理查的变化。

在夺取阿克之后，理查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夺回耶路撒冷。这一点，不消人提醒，萨拉丁自然明白。然而，萨拉丁想知道的是，理查的军队会经过哪条路线前往耶路撒冷。他虽然派遣了密探进入城内，却未能打探到这个关键信息。由于决策层人数很少，十字军不大可能泄露情报。选择哪条道路进军耶路撒冷，完全在理查一人的脑中决定，因此，谁也不知道理查将如何下达命令。他虽然听取了熟悉当地地形的人士的意见，但还在考虑之中。

萨拉丁随之改变了对策。他提出延期支付阿克城投降时十字军所要求的两万枚金币的赎金。

8月12日是理查提出的一个月期限。在萨拉丁提出延期之后，中近东就将慢慢步入冬季。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而且常常降雨，因而只有春季到秋季之间适合作战。萨拉丁的军队在进入冬季前，已经有大批士兵回乡。因此，他相信在冬天到来之际，理查也不会行动的。

萨拉丁一点儿也不吝啬。那么，他为什么不向自己的法兰克人对手支付赎金呢？

理查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萨拉丁的计谋，但当其使者返回，告知萨拉丁需要时间来募集资金时，他不免感到疑虑。他认为，萨拉丁这样做是在有意拖延。

就这样，8月12日的期限到了。他同意再等一个星期。然而，还不

到一个星期，理查觉得等不及了。

他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处置那2500名留在城内的穆斯林——原本以两万枚金币为他们的人身安全做担保的。

倘若他率领十字军倾巢而出，这2500人留在阿克城内，必然成为祸患。

然而此时又没有别的城市能提供给他们容身。身处推罗的蒙费拉特侯爵，以危险为由，拒绝这些穆斯林前往避难。

至于带领他们同去耶路撒冷，更是不现实的。理查只能带上十字军正规部队前往。

8月20日，这2500名穆斯林被带到了阿克城外。在离萨拉丁的阵地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理查的军队将这些平民全部乱刀砍死。2500人就这样被残酷地结束了生命。

当天夜晚，理查召集了全体参与进军的将领，并下达了命令——次日开始进军。第三次十字军从此时开始，进入了为期一年的后半段战事。

从双方的记载中，可以得知离开阿克的十字军的兵力情况。

理查自己统率的部队，包括来自英国、诺曼底和阿奎丹的兵力，骑兵与步兵总计8000人。

法国国王留下的部队，共计1000多人。

集合于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麾下的当地诸侯军队，共计5000人。

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以骑兵为主，辅以步兵支持的兵力，总计1500—2000人。

此外还有利奥波德离开之后残余的德意志军队。

以上的部队，总共不到两万人。而当时围堵十字军的穆斯林军队，数量在十字军的两倍以上。

更不用说，萨拉丁是主场作战，而理查则是在客场。理查需要为粮食、武器、士兵和战马的补给操心，而萨拉丁则完全不必对这些感到忧虑。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查的军队再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了。

至于双方的指挥系统，都已经实现了单一化。

萨拉丁身边有深可信赖的弟弟阿拉迪尔，能果断执行命令的埃米尔也不在少数。

而理查这边，所有的将领都听从他一个人的安排。

例如比理查年长10岁的勃艮第公爵，完全遵从英国国王的命令。

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也认真执行理查的命令，亲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充任先锋。虽然他不是司令的材料，却能够作为一军之将，投入战斗。

理查的军中还有两位身经百战的勇将——巴里安·伊柏兰和阿韦讷伯爵雅克。

此外，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里都是与穆斯林斗争经验丰富的骑士。他们完全服从理查的调遣。这些专业的战士，对理查的专业精神敬佩不已。

因此，理查所率的第三次十字军，虽然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却是非常紧密的整体，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一体化军事力量。

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萨拉丁，有一处弱点。

萨拉丁一直在关注理查的动向。在哈丁战役中，从一开始，主导权就掌握在萨拉丁手中。但从阿克之战以后，战争的主导权转移到了理查手中。萨拉丁一直等待着夺回主导权，但是这必须等待理查有所动向之后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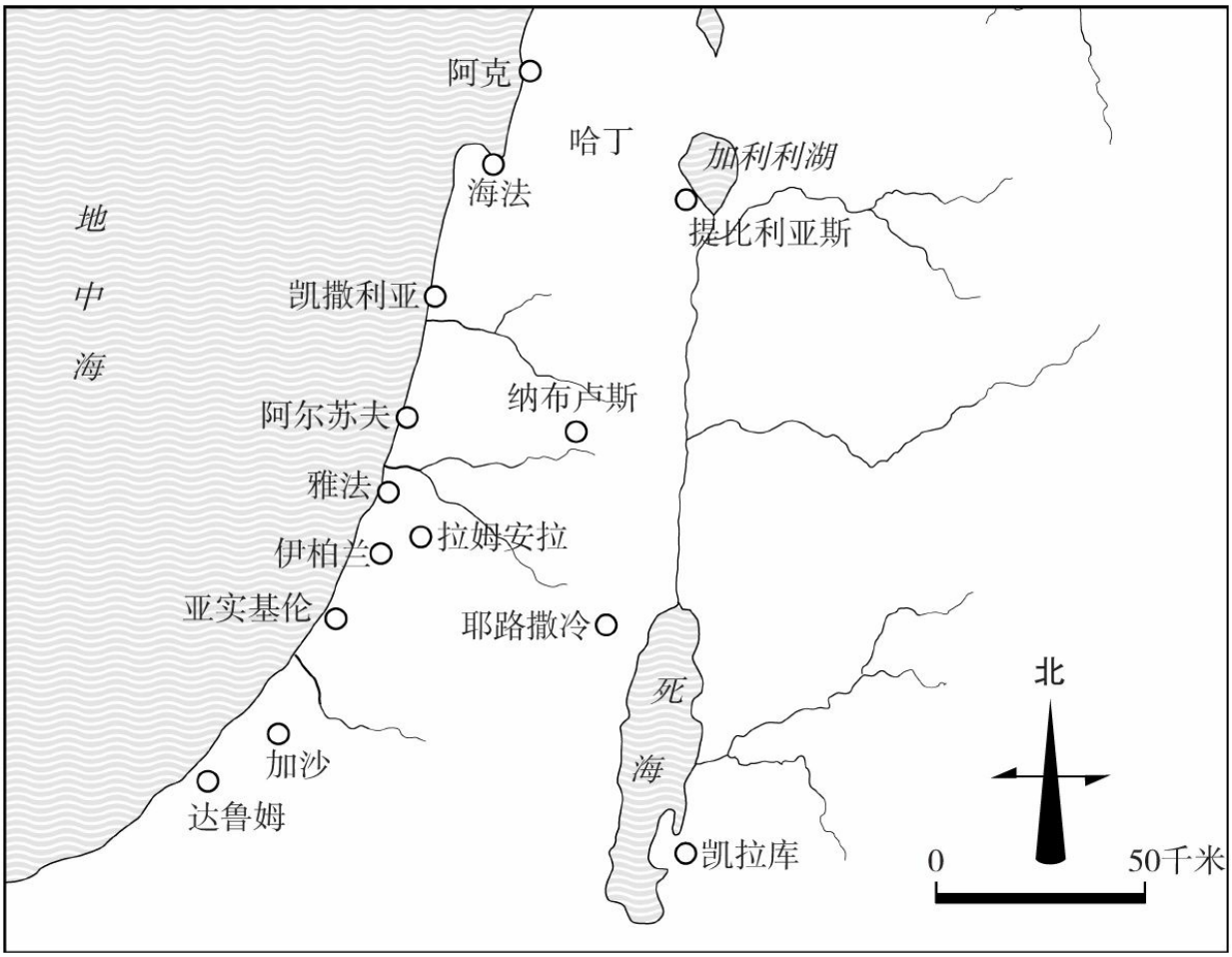
十字军行军伊始，理查就要求全军严守以下几条命令：

一、行军部队仅限男性，而且仅限战斗部队。除了负责洗衣的中年女性以外，严禁女性同行。在战斗人员之外，神职人员例如主教和教士、修士必须配备武器参加行军。

在这一时期的行军中，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常常有随军娼妓活动，兵士对其早已司空见惯。此外，还常常有大量僧侣随十字军行军。理查对此下达了禁令。

二、无论天气多么炎热，骑兵和步兵都必须全副武装行军。

这是因为穆斯林常常突然大量放箭偷袭的缘故。



阿克及其周边

三、行军速度不能过快。匀速行军，使骑兵和步兵保持良好的阵型。

全副武装行军，非常容易造成疲劳，特别是在炎热的8月下旬。由于敌人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保持阵型，减少疲劳是必须的。

四、行军当中，各军队排成三列，每天变换队形。各军兵士要习惯这一变更。

理查沿着地中海东岸南下，向耶路撒冷挺进。按照这一路线，萨拉丁的军队很可能会在十字军的左后方追赶并发起攻击。因此，以上的第四项命令，是让兵士轮流把守敌军前来的方位。

五、绝对不能因敌军的挑衅而自乱阵脚。各军务必保持队列。此外，保持前锋、中央和后卫部队之间的空隙，形成稳定的队形。

哈丁战役的败因之一，就是十字军的前锋、中央和后卫被萨拉丁截成三段。理查到达中近东之后，也许特别关注了哈丁战役的败因。在南进的第三次十字军中，哈丁战役中率领中央部队的路西尼安，与担当后卫的巴里安·伊柏兰同行。

六、部队的行军尽可能选择离海较近的路线。与陆上作战部队一同南行的舰队，负责为十字军提供补给，并将伤病员运回阿克。

这一点充分说明，理查是一位重视后勤的司令。而运送伤兵这一点，则需要单独提出来解释一下。

十字军战士来到中近东之后的噩梦，就是负伤之后被敌军擒获，逃脱死亡的命运之后，往往沦为奴隶。在伊斯兰世界成为奴隶之后的命运，就将是被锁住手脚，带到矿山里或者桨帆船上，劳碌终生。

如果被穆斯林杀死，十字军的兵士就成为了殉教者。但倘若成为奴隶，就不能做殉教者了，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机会。对信仰之心十分深刻的中世纪基督徒来说，作为异教徒穆斯林的奴隶而死，是十分不幸的。理查命令将伤兵运回阿克。提供补给和消除对成为奴隶命运的恐惧，是即使平凡的人也应当努力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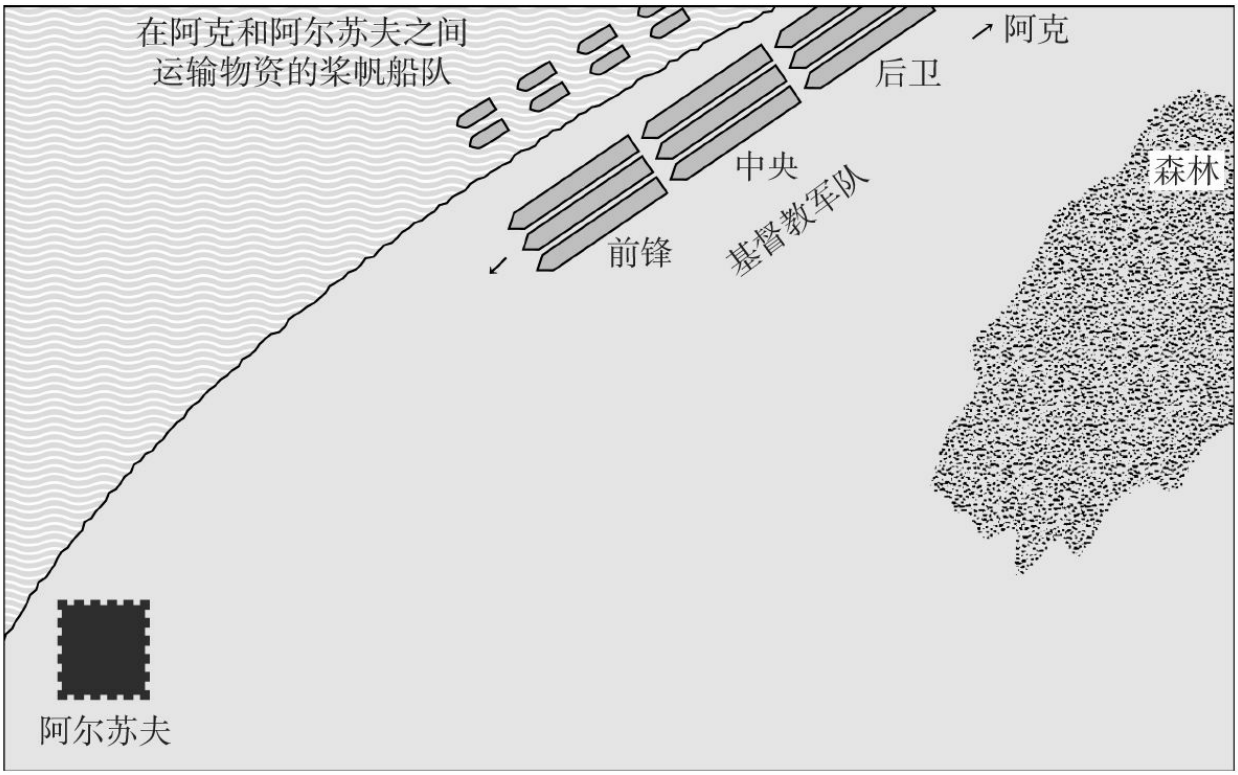
与陆地上军队一同南进的舰队，需要特别注意岸边突出的悬崖，还要保持与军队相仿的速度南行。除了意大利的滨海城邦国家以外，理查的英国船只也具备这样的高超驾船技能。至于只有运输帆船上才能装得下的巨型投石机，就没有携带的必要了。行军途中的城市居民，得知十字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弃城而逃。

由于舰队主要负责运送军粮和伤兵，它们不必接近港口以外的近海

海域。这样就不必非要使用意大利的舰队。

然而理查还是征用了热那亚和比萨的船只和水手。这两个对立的城邦的水手，能够在理查的指挥之下同心合力，实在不可思议。

下方的示意图，是对前述行军情况的简单描绘。



向阿尔苏夫行军

1191年8月底，得知理查的动向之后，萨拉丁的部队也开始行动了。萨拉丁的5万大军，在理查的2万军队之后追击。

萨拉丁首先以通常的战术袭扰十字军。他派出贝都因人组成的轻骑兵，不时地对十字军的后卫部队发起袭击，试图使其队列陷入混乱。

理查的后卫是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国军队。这些刚刚来到西欧的部队，只参加过阿克之战，并不知道如何有效防御敌方的袭击。

这些法国军队，却有着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以来的自负之心。这种自负的心理，使他们能够耐受城墙上射下的箭矢，却不能耐受贝都因骑兵的猛攻。在敌人挑战之下，法军的队列变得凌乱，除了抵挡之外别无他法。当敌军冲到近前时，则只好进行殊死的肉搏战。于是，法军停止了前进，像一群刺猬一样四处乱撞。

当天夜晚，理查来到法军的营地，首先褒奖了他们不要求支援、独立作战的勇气。法国军队的兵士们非常清楚本国国王与英王之间的不睦。他们原本私下里觉得，英国国王把自己部署到最危险的后卫位置，还不派援军协助，是对法国人的冷遇。因此，理查亲自前来慰问和赞赏，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法国军队的一些顾虑。

理查所率领的十字军，经过一夜行军就到达了阿克以南海湾另一侧的海法城。第二天一早，又沿着地中海岸继续南下。之后的路线是在高耸的山崖上行军，这一地形使敌军骑兵很难追上。在这两天的行军当中，队伍的顺序没有变化。

理查的先锋是来自英国和诺曼底的部队。而中央部分则是路西尼安和宗教骑士团的部队，以及普瓦提埃的理查军队共同组成的。后卫部分就是前述的法国军队。

虽然部队的前后顺序没有变化，但是理查命令骑兵在步兵的左方和右方交替行军。到第三天，他命令圣殿骑士团随同后卫部队行军。

就这样，以穆斯林逃走之后的城镇作为宿营地，理查的军队行进了4天。

在这4天之内，穆斯林军队从未停止对十字军的袭击。不断有数千规模的敌兵，在十字军的后卫乃至中央部队附近出现。十字军则在保持行进队列的同时，成功击退了敌军。他们仅仅迎击来犯的穆斯林军队，但并不追击逃走的敌人。十字军依靠对敌军箭矢和标枪的防御，确保行

军的步伐。

这一地区有很多称为“瓦迪”的干涸河谷，对十字军来说特别危险。由于降雨变化导致河流走向的变化，在中近东地区常有干河床形成的谷地。在河谷中行军的最大危险，就是从河谷两侧山上风驰电掣般杀出的贝都因骑兵。

但是，干河床往往是通向河流出海口的。对没有合适的港口为十字军提供补给的意大利桨帆船来说，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抛锚，并依靠小船将物资运送到河口内的十字军处，是唯一的补给方法。因此这些瓦迪很适合补给工作的进行。

如此一来，十字军就势必难以快速通过瓦迪。敌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十字军进入瓦迪的时候，对他们发起突袭。

夜幕降临以后，令十字军兵士最为苦恼的，是地中海世界特有的毒蜘蛛。这种毒蜘蛛在南欧数量不少，而在北欧几乎没有。如果被毒蜘蛛螫伤，即使不死也会承受莫大的痛苦。比萨和威尼斯船只所运送的伤病员中，除了被敌军所伤的，还有不少是毒蜘蛛螫伤的。毕竟，十字军东征是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土地上作战。

理查所计划的海上支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支十字军没有受到粮食和水匮乏的烦扰。

而萨拉丁则通过一次次的突袭，等待机会的降临。拥有理查两倍以上兵力的萨拉丁，希望在平原上发挥自己的数量优势。

第一次对决：阿尔苏夫

萨拉丁所等待的机会，在9月初终于到来。此前的12天内，理查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萨拉丁希望诱使理查离开海岸的补给线，然后再对十字军发起总攻，但一直没能实现。

当十字军离开凯撒利亚，前往阿尔苏夫时，理查的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萨拉丁发现，理查的部队不再沿海岸行军，而是进入了他希望与之决战的平原地带。

萨拉丁使用侦察队获得理查的动向报告，理查也派出了侦察队。经过侦察，理查不仅得知了萨拉丁的动向，也获取了关于行军路线的信息。根据侦察队的情报，理查明确了以下事项：

一、阿尔苏夫与海法、凯撒利亚等已经通过的城市不同，其穆斯林居民并未逃走，相反，他们与萨拉丁派遣的援军一起，进行城防工作；

二、从理查军队现在的位置到阿尔苏夫之间的海岸以悬崖为主，并不适合十字军一方舰队靠岸，特别是在阿尔苏夫附近，舰队无法靠岸；

三、十字军在此前的行军过程中，路线的右侧是地中海，而左侧则是通向广阔平原的森林。

如果说北欧的森林才算是真正的森林，中近东的只能算是“小树林”。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人马行进的速度也会大受影响。

53岁的萨拉丁，打算在次日（9月7日）与理查决战。理查此时也得知了敌军的动向。他判断，萨拉丁一定会在次日挑起决战。

34岁的理查，以此为契机制定战略。当天晚上，他集合全体将士，

传达命令：

一、敌军发起攻击时，一方面要将其击退，同时还要保持行军；

二、明天开始，以战斗序列行军。

这支将近两万人的队伍，全长达到两公里。理查分开了行军队伍，组织了战斗序列：

香槟伯爵亨利所率的步兵，首先行进。这支部队担负着护卫军需物资车队的任务，并要为整个部队建造阿尔苏夫城外的宿营地。对于这些士兵来说，首先要保障的是在一旦出现紧急事态时，整支军队能够有序地撤离阵地。

这支部队完成建造宿营地之后的任务，是在此次战役中担任阵形右翼的第一军。

理查将四个中队的圣殿骑士团部队也分配到战线的右翼第一军当中。加上一部分来自法国安茹的人马，整个第一军的总指挥是圣殿骑士团的团长。

这之后的第二军，是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及其兄弟所率领的当地十字军。理查自己亲率来自普瓦提埃的骑兵队伍跟随在这支军队之后，并指挥整个第二军。

其后行军，负责战役左翼的，是来自法国、弗兰德斯和德意志的骑兵和步兵。

在整支军队的最后，是四个中队组成的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由团长加尔尼埃负责殿后。

当天十字军行军阵形的特点，是将部队分成几个大队行军，并没有

统一的指挥。理查进一步将部队分成100骑左右的中队。这样的布置特别注重各个队伍的行动自由，使得各部在击退敌军的同时，能够保持继续行军的队形，而且从投入战斗伊始，就是相对偏进攻的阵列。

理查自己做示范，命令将领们分别率领各个中队。常常指挥整个大队的将领，被理查分派指挥中队。实施这一战略，旨在面对数倍于己方的敌军时，以多个相当于原来1/10兵力的中队进行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展开斗争。

相反，萨拉丁以成千上万人的规模编队投入战斗。这支大军通过了森林，接近了理查的军队。

当天，萨拉丁的行动，是罕见地放弃了进入森林之前的阵地，而是在走出森林以后重新布阵。阿克之战中一直将阵地置于敌军后方的萨拉丁，效仿哈丁战役中的战法，将战线移动到己方军队附近。

萨拉丁所设想的战法，是从陆上三个方向缩小包围圈，从而将十字军围歼。至于西侧的海上方向，由于陆上三面包围，十字军可以沿海路逃跑。

当天萨拉丁所投入的兵力超过4万，而理查的兵力不到2万。但双方实际作战的兵力大约只有各自总兵力的一半。

这是因为，萨拉丁并未下令让全体穆斯林军队出击。在战斗开始阶段，有相当一部分兵力没有行动。理查也没有按照萨拉丁设想的方式迎战。

1191年9月7日，阿尔苏夫之战伴着上午9点的阳光和穆斯林军队的战鼓声开始了。

萨拉丁一方的弓兵首先按照通常的战法，一齐向十字军阵营发射，顿时箭如雨下。

这一招对于身着厚重甲胄、手持坚固盾牌的十字军将士来说，并非多大的挑战。然而穆斯林弓兵保持着边前进边发射大量箭矢的步调。在弓兵和步兵之后，萨拉丁的骑兵从林中策马扬鞭而出，越过前面的步兵，重新编成两队，分别扑向理查军队的前锋和后卫部分。

至于萨拉丁为何选择这样的进攻策略，我以为，他是考虑到用骑兵袭击十字军的后卫部队，拥有速度方面的优势。

结果，首先受到攻击的十字军部队就是在最后行军的医院骑士团。尽管这支骑士团保持全速前进，还是受到了最猛烈的进攻。

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按照理查的命令专心进行防御。但随着他们与敌军骑兵交锋的相持，后面的穆斯林弓兵也赶了上来。

当这些弓兵接近之后，他们射箭的方式有所改变。箭不再对准骑士团的骑士，而是直接射杀他们乘坐的马匹。在与失去战马的对手作战时，穆斯林弓兵收起弓箭，拿出铸铁制成的棍棒，攻击身着甲胄的骑士。

这些棍棒的威力巨大，只要抽打到骑士身上，钢质的甲胄就会变形。变形的甲胄压迫下面的身体，致使骑士们身受重伤。

眼睁睁看着牺牲者人数的增加，医院骑士团的团长赶紧派一名部下前往理查的部队，请求准许对穆斯林实施反击。然而理查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这只许防御的行军路上，医院骑士团面对萨拉丁军队的攻击，就像逃跑的羊群背后跟着追赶的狼群一般。

团长不得不亲自驱马前往理查身边，请求获准发动反击。然而理查还是没有同意。回到自己部队中的骑士团长，满眼都是被敌人无情杀戮，血洒沙场的同袍们痛苦的情状。对这些骑士们来说，理查的再度拒

绝，真可谓是十分残酷的。

最终，骑士团长加尔尼埃不得不决定违抗理查的命令，全军发动反击。团长命令一下，一直忍耐着的骑士们的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医院骑士团全体将士们一齐发起了反击。

理查见状立即改变了战术。

优秀的将领，不仅会预先制定战术，更能够按照局势的发展随机应变。

理查迅速率领自己的中队赶往后卫部队，身先士卒地砍杀敌兵。得知理查参战消息的其他将领，也纷纷率领自己的部下驰援而来。很快，整个行军的后卫部分，成为了最激烈的战场。

此时的十字军战士，已经不分来自何方，属于谁的队伍了。他们全体投入了战斗，心中只有击败敌人的念头。上至理查，下至任何一名普通的士兵，都持此念而毫无区别。由此，战斗的大势于午后倒向了十字军一方。

萨拉丁的部队开始溃散。伴随着战场上凄惨的叫喊声，穆斯林军队的伤亡不断增加，一直擂响的战鼓声，听上去更像是对死者的凭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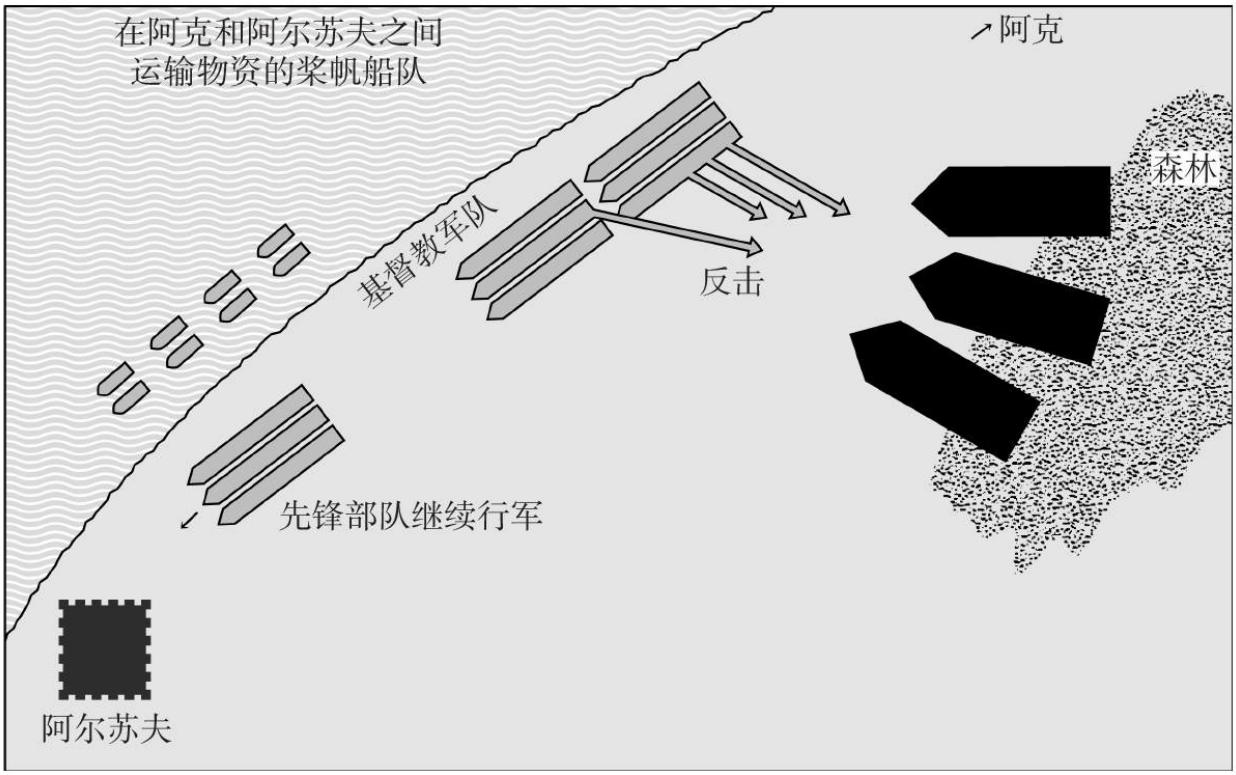
一度勇敢作战的穆斯林军队，从率军的埃米尔们开始撤退了。其中的贝都因骑兵，来得早，逃跑得也早。穆斯林骑兵和步兵都逃回了了林中。这片不大的森林里，很快涌入了投入战斗的一万名穆斯林官兵。

看到自家兵士跟着追杀进入森林的敌军，理查立即下令严禁十字军进入森林。他深知，林中的战斗绝对不利于十字军的重骑兵，因此必须避免无谓的牺牲。

理查与萨拉丁一样，并不会在战场上投入全部的兵力。他掌握有一

部分预备队，并不向森林的方向发起进攻。

英国国王十分清楚，此时最重要的是继续行军。尽早地安全进入宿营地，比乘胜追击更有意义。



阿尔苏夫攻城战

萨拉丁想在森林中聚歼十字军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哈丁战役自始至终都是按照萨拉丁的设想进行的。当时率领十字军的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被萨拉丁引诱上了圈套。

萨拉丁以此为成功经验，想诱使理查上钩。然而这次他面临的，是与自己一样的军事天才。最终，萨拉丁的胜利梦想化为泡影。

虽然他成功地杀伤了理查的后卫部队，却无法给整个十字军造成损失。

在林中等待的萨拉丁，终究还是没能等到理查应战。

经过此次交手，萨拉丁认识到了理查的实力。

战斗结束

先期到达并建设好宿营地的步兵团全体将士，十指紧扣祈求当天的胜利。运送到营地的伤病员，得到了医院骑士团骑士医师们的紧急处理。其中的重伤者被运上靠岸的小船，转乘海上待命的桨帆船前往阿克。在阿克，他们得以在医院骑士团的总部接受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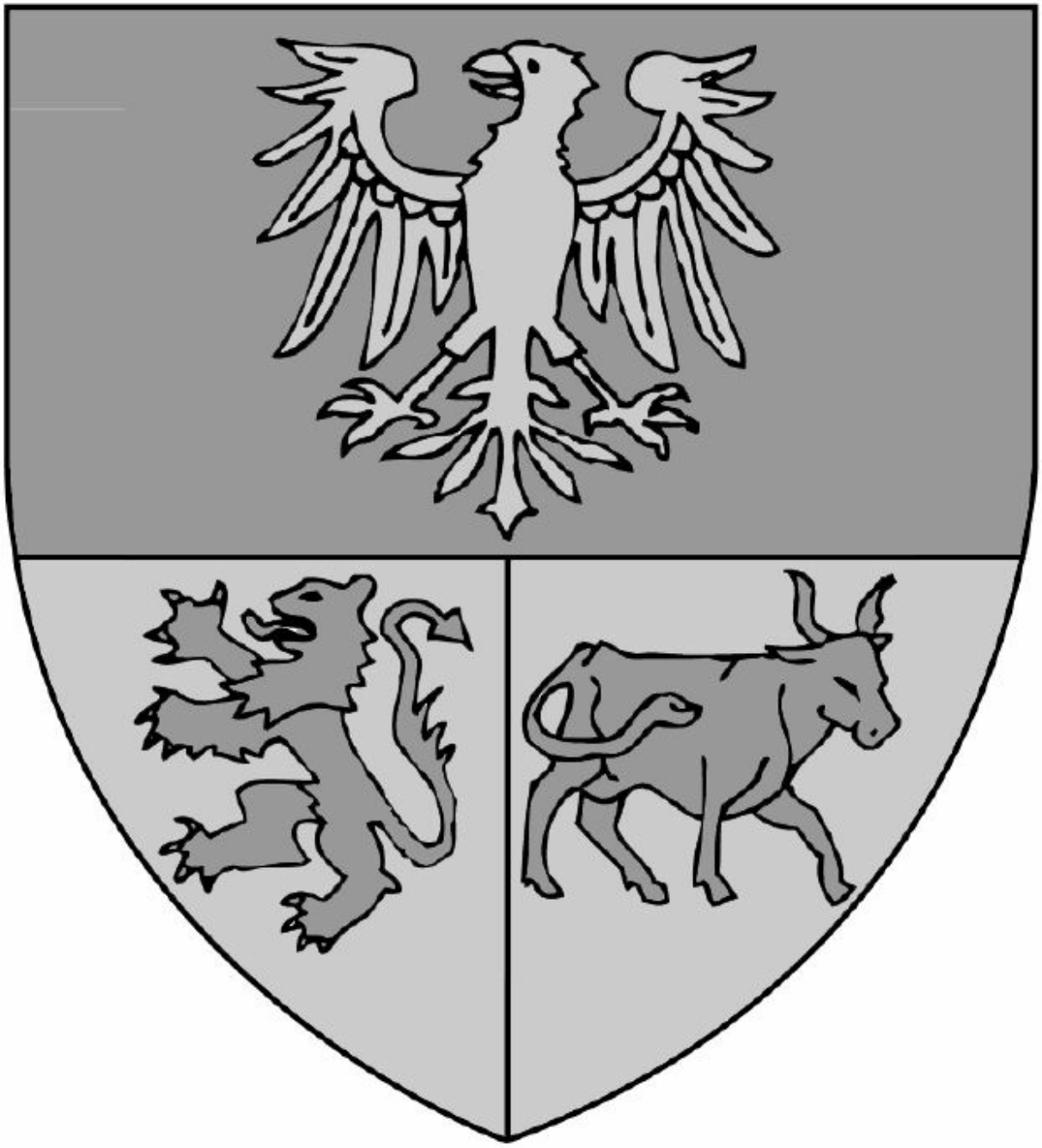
此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得知平原上战斗结果的阿尔苏夫城内的守备部队，连忙逃出城了。这样，十字军得以在当晚进入阿尔苏夫城休整。

然而，在日落时分，将领当中有一位没能赶到营地。这就是阿韦讷伯爵雅克。得知他已经负伤，不能行动，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连忙赶去救援。这些骑士也是刚刚离开战场。

根据萨拉丁的指示，穆斯林士兵也为了运送伤者而回到战场。看到对方人多势众，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只得先行退却。

第二天早上，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和来自阿韦讷地区的普通兵士们一起，再次来到战场搜寻。在阳光的照耀下，战场的凄惨情形历历在目，在其中搜索尤为困难。所有的遗体全身是血，很难辨识死者的身份。

最终经过仔细辨识，骑士们找到了阿韦讷伯爵的遗体。由于战马被杀，伯爵只能徒步应战，最终与爱马死在一起，身边是一圈敌兵的尸体，敌兵数量多达16人。从这16人手中的武器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骑兵。步战的阿韦讷伯爵雅克，在相继杀死这些敌兵之后，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时年39岁。



阿韦讷伯爵雅克的纹章

伯爵的遗体被运往阿尔苏夫，然后殓尸人将他全身的血迹洗濯干净。侍从们个个以泪洗面，他们忍痛给伯爵穿上正装。6位将领抬着盛有伯爵遗体的棺木，在阿尔苏夫的教堂内下葬。

葬礼弥撒由脱下战袍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主持，理查、路西尼安和全体高级将领悉数到场。伯爵的葬礼绝不仅仅是法国东北部一位普通领主的丧葬仪式。责任感高于常人一倍的伯爵，在兵士面前颇具声望，是每位将领都十分尊重的战场上的领袖。

不过，在葬礼上凭吊过逝者以后，活着的人还是要好好活下去。当天夜晚，在理查的命令之下，阿尔苏夫的全体十字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烧烤宴会。

在阿尔苏夫之战中，胜利的十字军一方有许多马匹被杀。由于萨拉丁命令弓兵狙杀马匹，许多十字军的骑士失去了自己的爱马。

十字军士兵肢解了被杀的马匹，用来制作烧烤。由于马匹是骑士的私有财产，只有骑士的随从步兵能免费食用。那些作为普通步兵参加十字军的军士们，就必须花钱购买马肉了。

此时，理查公示全军：马匹被杀的骑士，将免费获得新的战马。因此，最终马肉被平等分配给各人。

阿尔苏夫城的中心广场上，升起了烤肉的浓烟。由于得到了城市和海上的补给，理查的军队拥有充足的水和食物。但由于依然是夏末时节，与面包、奶酪等食物相比，容易腐败的新鲜肉食只有指挥官阶层能够充分享用。此外，与喜欢吃鱼的南欧人不同，以西欧北部人为主的十字军只喜欢吃肉。就像食用罕见的鹿肉和野猪肉一样，他们只能适应马肉的味道。

当天夜晚，萨拉丁在营帐中集合将领，对他们加以训斥。他直接批评道，诸位埃米尔在战场上逃跑的行为，是对苏丹名誉的污辱。各地的埃米尔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有阿勒颇的埃米尔提出了异议。

“苏丹的说法恐怕并不妥当吧。十字军的甲胄非常坚固，我们的箭

矢和刀枪都不那么容易伤到他们。

“对我军来说，敌人最强的作战单元就是善战的骑士了。骑士们常常身先士卒，不仅能在马上杀死我们的骑兵，左右拼杀，在战斗自始至终激励着他们的士兵。

“骑士们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能以一敌众，杀伤我军的多名战士。他们在最前线的表现，实际决定了战斗的结果。他们的领袖，更是以狮子的化身而著名的骑士，兵士们称为‘理查国王’的那位。”

从此，理查有了“狮心王”的称号。

萨拉丁并未对阿勒颇埃米尔的意见做出应答。他只是下达了一道命令，即将从阿克以南直到耶路撒冷之间十字军建设的全部城堡悉数拆毁。

然而十字军建立的城堡异常坚固，与西欧的城堡无异。由于不能将其地基全部破坏，萨拉丁的部下只能尽量拆除城堡的设施。

萨拉丁渐渐感到无法阻止理查的前进。因此，他的策略转变为将理查行军道路上的据点全部清除。除了拆毁城堡之外，萨拉丁还命令烧毁其周边的村落，实施“焦土政策”。此时受到破坏的不仅包括独立的城堡，还有内部包含城堡的海港城市。其中之一的雅法，就是理查接下来要攻取的城市。

长年生活在紧张斗争中的萨拉丁，以53岁的年龄而渐渐老去。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在推罗之战失败以后，萨拉丁总结，攻击海上的推罗，必不可少的是海军的力量，这正是穆斯林一方的短板。

而阿克之战的失利，则使萨拉丁认识到，穆斯林军队的弱点不仅在

海军力量较弱，还有在持久战方面的欠缺。

然而阿尔苏夫的失败，则既不是因为有海军力量的参与，也不是长期战斗的结果。战斗只持续了5个小时。

以步兵为中军，左右两翼骑兵包抄的战法，没有发挥效果。首先，萨拉丁左翼的骑兵受到以圣殿骑士团为核心的敌军先锋部队的猛攻，使其无法包围十字军，最终不得不退却，而让遵照理查命令前往阿尔苏夫安营扎寨的第一军顺利通过了。

此外，对十字军后卫部队医院骑士团的猛攻，也由于理查的战术变化而遭受了十字军中央和后卫部队的反击。因此，从这一方向包抄的计划也流产了。

最终，理查命令部队不要乘胜追击进入林地，这样萨拉丁唯一的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也溜走了。

可以说，阿尔苏夫近郊的这次战斗，是最擅长陆上遭遇战的萨拉丁所遇到的第一次全面败北。

而理查则实现了南下行军的战略目的。萨拉丁在阿尔苏夫附近攻击十字军，就是为了阻止理查南下，但终究没有成功。

为了在陆战中决一胜负，萨拉丁投入了自己5万兵力中的4万。而理查迎击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先锋部队的第一军和大多数圣殿骑士团的部队保持继续行军，在不到两万的十字军中，最多只有1.3万人投入了战斗。

战场上残留的穆斯林军士遗体达到7000之众。光是因为没有得到应急治疗而丧生的伤员，就达到3000人。两者合计，死者上万。此战中萨拉丁军队的1/4战死沙场，其中死亡的埃米尔共计32人。

而十字军一方的死者不到700人。至于高级将领，则只有阿韦讷伯爵雅克一人而已。

从第一次东征以来十字军历史过半的岁月中，首次出现了以一个人为最高司令官，全体将士服从其命令，遵守其军规，以一个有机整体的形式作战的情状。萨拉丁所面临的对手，再也不是缺兵少将，陷入食品和饮水匮乏的哈丁战役时的那支十字军了。可以想象，萨拉丁在阿尔苏夫之战以后，受到了怎样大的冲击。

伊斯兰世界的埃米尔，与同时期天主教世界的封建领主相当。而在伊斯兰世界中，领主的意义与西欧又稍有差别。他们不仅是一个地区的领主，也是对立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代表。

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出身的萨拉丁，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十字军的“武力吉哈德”，将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统一到自己的旗下。但这种统一的前提，是他作为胜利者的身份。然而在阿尔苏夫一战中，萨拉丁麾下的32名埃米尔战死沙场。

因此阿尔苏夫之战，成了以不败著称的萨拉丁的不败金身告破的标志。这一战役给十字军很大的信心与勇气，而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影响也超过了战役本身。

阿尔苏夫战后，萨拉丁的部下思索的，是他们所跟随的领主并非无敌于天下。那么，自己怎样才能避免那32位埃米尔的命运，就成了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这样下去，萨拉丁所依靠的基本盘面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对本土作战的萨拉丁来说，兵员的补充并非难事。但与一万名死难士兵所带来的问题相比，32位埃米尔战死的事实，才是他需要正视的麻烦。

对萨拉丁来说，采取焦土作战，消极抵抗的策略，并不足以遏制理查咄咄逼人的势头。他必须有其他的作战部署。他首先做的，是将部队

撤出，在理查接下来从阿尔苏夫到雅法的必经之路上制造障碍。而他本人则回到了耶路撒冷。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圣城。属下的埃米尔们即使有离开战场的打算，当萨拉丁提出死守耶路撒冷的计划时，他们还是不得不留在大军之中。

理查所率的十字军，于阿尔苏夫之战后三天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在城里不过居住了一夜而已。理查急于尽早出发，于是在9月10日开始行军。

在前往下个目的地雅法的行军路线上，理查以圣殿骑士团作为后卫部队的主力。由于其团员大都未参加阿尔苏夫之战，在战斗意志和体力方面有充分的保证。显然，萨拉丁不会放过在十字军行军路线上袭扰的任何机会。

正当此时，阿尔苏夫遭到了先前逃离的守城埃米尔所率的1.5万大军的袭击。这位埃米尔显然是想为自己临阵脱逃的行为雪耻而来的，但他面临的是圣殿骑士团的顽强阻击。

迎战的除了圣殿骑士团，还有此前没有参加阿尔苏夫之战的香槟伯爵所率的步兵。在十字军的反抗下，1.5万人的军队并未得势，最终不得不撤离战场。这样，在理查不必亲自出马的情况下，大队十字军保持着队形继续前进了。

理查依然禁止圣殿骑士团追击撤退的敌军，而是命令他们迅速赶上前面的队伍。他的指挥使行进中的十字军保持着紧密的队形。虽然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嗜好进攻，却也不得不听从理查的命令，坚守在队伍最后的位置。

收复雅法

到9月15日，十字军进入了雅法。先锋部队在两天前就已经到达了这里，但由于萨拉丁对城市实施焦土政策的破坏，他们只能在城外的橄榄田里宿营两天。

与阿克一样，雅法也是十字军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港城市，城内都是西欧式的石砌建筑。萨拉丁控制这座城市不过四年，不可能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造。虽然其间有地震的破坏，重建也并非难事。

雅法港依然可以使用。对穆斯林军队来说，使港口不能为理查所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港口内的船只全部凿沉。然而他们虽然在理查的军队进城之前焚毁了街道，却没有破坏港口。

能够使用雅法港，就为十字军的补给提供了很大便利。理查这一路一直依靠小船把补给和伤病员往复运送于桨帆船队和大部队之间，可谓充满艰辛劳苦。

收复雅法之后，第三次十字军的补给路线是塞浦路斯—推罗—阿克—雅法一线。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得以从这条补给线上安全地运送。由于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依然活跃，十字军一方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

离开阿克以后，理查的第一目标就是进占雅法。当取得雅法之后，他就面临一个抉择：究竟是首先强化雅法的城防，还是夺取雅法以南的港口城市亚实基伦。

雅法的现代名称是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行政首都，而耶路撒冷则是以色列人心理上的首都。

至于亚实基伦，则是距离现代巴勒斯坦人自治区加沙地带以北不到30公里的一座以色列港口城市。它没有雅法那样重要，也没有改名，只是按照现代的发音，被翻译为阿什克隆。

从地图上看去，特拉维夫、阿什克隆和耶路撒冷，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从古典时代末期到出现飞机的漫长岁月中，雅法一直是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首选的登陆港。在耶路撒冷为穆斯林所控制的时代，耶路撒冷的西侧城门被称为“雅法门”，意思就是通往雅法的城门。从雅法登陆的基督徒朝圣者，经过雅法门时，要向门口的穆斯林守卫缴纳入门费。

因此，对于十字军来说，加强雅法的城防，不仅强化了十字军的补给线，也保证了从西欧前来的朝圣者顺利登陆。

基雷尼亚
尼科西亚
法马古斯塔
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
托尔托萨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地 中 海
推 罗
阿 克
海法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阿尔苏夫
约旦河
雅 法
伊柏兰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达鲁姆
北
0
100千米

收复后的雅法及其周边

至于攻取亚实基伦，就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了。但是，亚实基伦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补给线的终点站。如果十字军占领了这里，就明确了攻取耶路撒冷的目标，并且切断了萨拉丁从埃及方面获取补给的路线。毕竟，从埃及到巴勒斯坦，使用这条路线，可以节约不少时间和劳力。

理查本人相对倾向于把下一步的重点放在攻打亚实基伦上。为此，他派遣了两名属下骑士，从海路前往侦察亚实基伦的情况。两人回到雅法之后报告说，亚实基伦的城市和港口都已经被穆斯林完全破坏。

这很可能是因为萨拉丁不希望城市和海港落入理查之手而做出的决定。得到这一情报之后，理查便决定不再攻打亚实基伦，转而全力以赴建设雅法的城防工事了。

秋天渐渐来临，正值巴勒斯坦最舒适的季节。雅法城内的工事正在重建之中。其间获得闲暇的理查，驾马出城。除了狩猎之外，他还带着几位侍从，在雅法郊外游览。

理查在城外并不多见的常绿乔木之下下马，席地而坐，小憩之时，浑然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酣睡疏解了理查此前三周的紧张。随行的侍从们看到主人已经入眠，也纷纷在一旁休憩。

就这样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当理查被一名侍从奇怪的噪声中唤醒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一队穆斯林骑兵团团围住。

理查此行只是郊游，侍从和他却也都携带了武器。虽然骑士们都做好了迎击的姿态，但敌人骑兵的数目还是太多。如果真的交起手来，结果实在难以预料。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叫威廉·德·普莱奥的侍从，突然纵马

上前一步，用阿拉伯语对敌兵大吼：

“来人还不让开，理查王在此！”

在那个没有电视和各种媒体的时代，以“狮心王”之名著称的理查，是萨拉丁手下全体官兵熟知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理查的长相。听到理查这样头等重要的猎物就在面前，穆斯林骑兵一齐向威廉涌来。

刹那间，理查和其他侍从连忙快马加鞭，逃之夭夭了。他们刚一进雅法城，理查就立即命令一支队伍前去搜索威廉的行踪。但是，穆斯林骑兵急于获得萨拉丁的奖赏，早已将威廉俘虏而去，搜索队伍连个人影也没见到。

此时在雅法城内的人群，得知理查的平安归来，心中长舒了一口气。外出狩猎迟迟未归的理查，引发的是全体十字军的担忧。

当天晚上，理查的近臣来到他的营帐，大声劝谏道：

“陛下是何等轻率！作为十字军的最高统帅，您是无人能够替代的。因此，您的一举一动，全体十字军都牵挂着。

“我等恳请陛下发誓从今往后，若要离开城市外出，一定带领大量兵士随行！”

理查手下的心腹骑士有好几位。其中包括与34岁的理查年龄相仿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绍维尼伯爵安德烈、德比伯爵沃克林，以及代替理查成为俘虏的威廉及其兄长彼得等。除了德比伯爵沃克林在阿克之战中战死以外，其他人都跟随理查来到了雅法。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心腹骑士当中，一半以上是在理查与亨利二世的父子之战中支持老国王亨利的。

因此，理查面临的是曾与自己为敌的部下的责难，他们自然不会忘

记三年前与这位新国王为敌的历史。其中还有一些臣下，则从理查还是普瓦提埃伯爵之时，就已经与之共事，而以忠臣自居。这些人一齐向国王发难，指出此次郊游狩猎所表现的轻率。

在他们的劝谏之下，理查保证，以后定会慎重行动。在这一事件之后，理查果然会在每次出行时都带上这些劝谏之臣。

理查毕竟是一位值得崇拜的领袖。为了防止他常有的冒进倾向，莱斯特伯爵总在战场上担任他的左翼，而理查的右翼也根据战事需要安排不同的近臣负责。这些忠臣在作战中对理查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扩大了理查的视野。

他们并非为了参加十字军而来，而仅仅是为辅佐理查才前往东方的。

代替理查被俘的威廉，在被带到萨拉丁面前时，公开了自己身份。他说明了事情经过。萨拉丁命令阿克城投降时与理查交涉的一位官员前来查验，证明了威廉所言属实。

萨拉丁虽然震怒，却并未杀死威廉。这位俘虏与其他十字军高级俘虏一起，被软禁在舒适的地方。这一情况，很快被与穆斯林商人密切往来的威尼斯人转告了理查。

通往圣城之路

不再进行郊游的理查，转而在雅法周围频繁开展军事行动。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征服周边的村镇，有利于保证雅法城的安全。

第二，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内陆行军，将是决战的关键。

关于这一点，萨拉丁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在阿尔苏夫之战以后，他采取了焦土政策，命令将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城堡和要塞破坏殆尽。但理查在雅法周围出兵，就使穆斯林士兵无法进行破坏工作。这样，理查重建防御工事体系就很容易了。

理查委任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负责重建城堡和要塞的工作。理查之所以将此重任委以两大宗教骑士团，一是因为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知；二是因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和执行能力；三则是看中了宗教骑士团的资金能力。两大骑士团自然也是积极执行理查的命令。

理查在雅法周边展开军事行动的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消解这段时期兵士中的不满情绪。

在雅法城的重建过程中，兵士中间，特别是骑士中间，弥漫着一种不愿从事土木工程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到圣地不是来做工的。

与兵士们讲理自然无法奏效。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轮班出城与穆斯林作战。随着对前面两个原因的解决，不满情绪也就逐渐消散了。

然而，当军队从雅法出城与穆斯林作战以后，回来的士兵人数渐渐

减少。这引起了理查的注意。他开始逐一清点雅法十字军的人数，结果发现与到达雅法城时相比，十字军的总人数大幅度减少。

十字军夺回雅法之后，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常常往返于雅法与阿克之间，运送各种给养。这段时间内，十字军并没有因作战而负伤的战斗人员。船只并没有空载返回，而是装满了假冒伤病员前往阿克的临阵脱逃的士兵。

对此感到极为愤怒的理查，命令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前往阿克，将这些逃兵抓回来。可是，在将领和士兵中间都没有声望的路西尼安，只带回来少量兵丁。理查见状只得亲自前往阿克。他抵达之后，在阿克的中心广场上集合了装病的逃兵，对他们发表演说。

“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耻辱！各位最好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那曾在十字架下庄重发出的誓言？”

理查说明了这次亲自前来的要旨，在斥责之后并未惩罚逃兵们。他的演说感动了在场的士兵，他们都为自己的装病脱逃感到耻辱。

在与兵士们一起返回雅法之时，理查带上了仍在阿克的妹妹乔安娜和妻子贝伦格拉。

两位贵妇与其女侍从一行，首先从推罗来到阿克，此次又前往雅法。这两次行动都体现了理查向众人证明，阿克和雅法已经成为了向耶路撒冷进军的安全的前线基地。

理查也明白装病逃往阿克的士兵们的心思。他命令留在塞浦路斯的属下，将岛上的300名妇女护送到雅法。

300名希腊妇女的到来，伴随的是兵士们的欢呼声。常认为此类事件并不恰当，并加以抨击的神职人员，在理查面前也没有做声。这并非因为当地没有高级神职人员，而是因为从索尔兹伯里大主教以下的神职

人员，关心的不是士兵们的私生活，而是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因此，兵士们虽然把耶稣基督放在心中，却终日与希腊娼妓们厮混在一起。

很难评价理查这样做究竟导致了怎样的效果。但是，在一天的战斗结束后，雅法城内总是充满了女性的气息，兵士们在温柔乡里消化着白天的战果。理查所率的部众在与穆斯林的作战中连战连胜，所向披靡的状态，使雅法周边变成了十字军的属地，而通往耶路撒冷的大道似乎就要敞开。

正在这时，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和平谈判开始了。

充当使节的不是理查部下的将领，而是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内托隆地区的领主。在第一次十字军之后，托隆就成为了十字军控制的地盘，而这位领主就出生在当地。与巴里安·伊柏兰一样，托隆领主也擅长阿拉伯语。

理查对萨拉丁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

> 萨拉丁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整个耶路撒冷王国返还给十字军，此外将叙利亚等地的十字军领地一并返还，使十字军的领土恢复到鲍德温四世时代的大小。

这意味着将伊斯兰世界和十字军国家的边界恢复到哈丁战役之前的情形。萨拉丁对理查的条件的回答，自然是拒绝了事。

萨拉丁在拒绝理查开出的条件之后，派出了弟弟阿拉迪尔，进一步交涉。

萨拉丁对比自己年轻5岁的弟弟——以勇敢沉着著称的阿拉迪尔的信赖，超过任何人，甚至超出自己的儿子。成为苏丹以后，萨拉丁一直驻跸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但他的根基实际上在埃及。而他恰恰把埃及

委任给阿拉迪尔。可以说，在与理查的交涉中，萨拉丁投入了自己最大的一张王牌。

即便如此，这一阶段的议和，还是并没有多大希望的。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接受理查提出的条件。

因此，萨拉丁将自己极为信任的亲兄弟派去和议的真正原因，是让阿拉迪尔观察理查的动向。直接了解在此前的战役中保持不败的对手，会对以后的交锋有重要的意义。

于是，1191年11月8日，理查和阿拉迪尔在雅法城外会面了。

阿拉迪尔按照穆斯林的惯例，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其中包括7头雄壮的骆驼，以及苏丹专用的豪华帐幕。

令理查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对方送来的奢侈的赠礼，还有萨拉丁之弟的品格、态度与谈吐。

高级首脑会谈时，双方不仅要通过翻译了解对方的意思，还要相互注视以保持眼神的接触。因此，首脑本人可以观察到对方的一举一动。通过对对方言语、神态和动作的观察，就可以不需要翻译而获得关于对方的认识。

令34岁的理查满意的是，48岁的阿拉迪尔所表现的善意。他们两人之间的默契，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相互感觉合拍。

在会谈中，理查只讲真话，不讲假话。而阿拉迪尔也是如此，真话知无不言，假话一句没有。

萨拉丁通过其弟向理查传达的讲和条件，是返还约旦河西岸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土地，但是不包括亚实基伦在内。此外，耶路撒冷城亦必须维持在穆斯林的管理之下。

这自然不是以夺回圣城为目标的第三次十字军的统帅理查所能接受的条件。因此，尽管会谈双方个人间保持了良好的气氛，这次和议却只能以破裂收场。不过，会谈终究是在双方友好的气氛之下结束的，并没有任何过激的场面出现。

此次会谈之后，双方都没有决定是否要进行下一轮谈判。理查为向其兄汇报谈判结果的阿拉迪尔安排了警卫队，一路护送其前往耶路撒冷。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毕竟，在雅法周围活动着各支敌视穆斯林的基督徒军队。

在此次会谈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理查再度于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开展了军事行动。在西欧，冬季严寒，是无法作战的；中近东虽然很少下雪，士兵们却常常为凄风冷雨所恼。但理查的将士们非常能吃苦，他们绝不因此拒绝行军。即使在寒冷的冬日，十字军依然一边行军，一边与穆斯林军队交战。

11月22日，理查占领了拉姆安拉。此地位于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路线上1/3的位置。

12月25日，十字军完成了对拉姆安拉周边村镇的全面征服。理查和兵士们从当天开始庆祝圣诞。

之后，到1192年1月3日，理查所率的十字军到达了拜特努巴。这座城市位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路线上2/3的位置。

此时，十字军主力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不到30公里的路程。在30公里外的圣城内，萨拉丁正严阵以待与理查的决战。

然而，理查却没有继续行军。他在拜特努巴逗留5天之后，于1192年1月8日后退到拉姆安拉。之后，他本人又回到了雅法。

此时，理查也没有联系阿拉迪尔进一步议和。他召集了十字军的首

脑们，开始商议1192年的战线应当如何推进。

严酷的现实

理查认为，接下来的行军要极为谨慎。从欧洲来的第三次十字军首脑们和当地十字军国家的诸侯，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团长们，都出席了在雅法召开的军事会议。自从来到中近东以后，理查时常倾听当地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情况，十字军是无法完成对耶路撒冷的包围的。虽说此时的士兵数量相当可观，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但理查所面对的现实，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完全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此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完全统一于最高司令官萨拉丁的旗下。

此外，根据潜入耶路撒冷城内，充当间谍的意大利商人传来的情报，阿拉迪尔已经从耶路撒冷城内消失了。理查判断，阿拉迪尔已经按照其兄的命令，回到埃及，组织了大规模援军，随时可以从埃及前往萨拉丁据守的耶路撒冷。

这样，如果十字军包围耶路撒冷，很可能会遇到与阿克之战相同的情况——遭到敌军的前后夹击。

在阿克，十字军用了两年时间才取得攻城战的胜利。能够取胜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来自海上的补给线。而在深入内陆的耶路撒冷，并没有海上补给的条件。如果要保证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陆上补给线，就需要分兵把守沿途各地，防止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让十字军回到两年前阿克之战的那种状态，无异于噩梦般的情景再现。

于是，第三次十字军的下一个目标，转变为亚实基伦。如果能够夺得这座城市，整个基督教世界就将完全掌控中近东地中海沿岸的制海权，从而使萨拉丁的海上补给线完全切断。而萨拉丁目前所依靠的陆上补给线，是从埃及经过西奈半岛的地中海一侧。十字军占领亚实基伦以后，也能够出兵切断这条补给路线。

正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变发生了。进攻亚实基伦时不可或缺的比萨海军和威尼斯海军之间出现了内讧。意大利水手们在阿克城内发生了武装冲突。此时只有理查本人出面能解决问题。于是，冒着严冬，英国国王从雅法返回了阿克。

同是意大利的滨海城邦，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力量十分强大。

相反，比萨和热那亚虽然同是共和国，它们的内政就不是那么稳定。由于政府不够强大，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往往依靠公民个人的实力。

换句话说，如果以母国对从事海外贸易者的影响力强弱来排名，威尼斯属于比较强的，而比萨和热那亚则是比较弱的。

能够尽情发挥个人实力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秉持个人主义的一方，往往以短期利益优先，先看到眼下的事项，从而容易与其他各方爆发冲突。

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都为理查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提供了海上力量支持。从一开始就彼此敌对的三国之间，会随着牺牲人数的增加而计较自己的得失。在十字军于陆上行军的过程中，三国尚能团结一致，暂时忘却对立关系，以实现共同的目标。但当十字军的战略目的逐渐达成的时候，三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敌对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

这次在阿克发生的冲突，并不仅限于比萨人和威尼斯人的矛盾，双方的背后都有第三次十字军中的首脑级人物在背后操纵，从而使问题变得极为复杂。

比萨人的后台是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而威尼斯人则得到了推罗的统治者，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的支持。而康拉德的背后，则是法国国王归国时留在中近东的代理人，勃艮第公爵于格。

这支法国军队在夺取雅法之后，并未跟随理查前往拉姆安拉一线行军。

由于腓力二世只留下了士兵，却没有留下任何军饷，留守巴勒斯坦的勃艮第公爵不得已向理查借款充当军费。但由于这笔费用数量过大，理查明确表示无法满足法国军队的资金需求，勃艮第公爵只好率兵回到阿克。

因此，1192年初在阿克发生的骚动，是第三次十字军内部裂痕的真实反映。理查必须亲自回到阿克解决这些问题。

理查十分清楚，此次来到阿克，必须将军中的全部问题悉数解决。

他在2月18日进入阿克港。这一天恰逢基督教的“圣灰星期三”，即复活节前40天的“四旬节”。当天基督徒们都以灰涂额，斋戒终日，以忏悔过去所犯的罪。

理查在入港当天，前往阿克的中心广场，集合了城内全体比萨和威尼斯人，并向他们发表了演讲：

> 对相互协作以完成任何伟大事业的人来说，在友情面前，自尊心算不了什么；在团结面前，名誉算不了什么；在和谐与融洽面前，任何好事都算不了什么。

相反，敌对意识带来的破坏行为，会让原本的团结不复存在，友军之间失去对彼此应有的尊重，给整支军队带来危险。

因此，我们之间必须有同志之爱，各个组织之间要互相尊重，而羡慕、嫉妒之类的冲动感情，则是应当完全消解的。

理查的演讲最终感动了一直以个人利益优先的利己的比萨和威尼斯的商人们。在演讲结束后，比萨人和威尼斯人互相拥抱，重现了昔日的友谊。

接下来，理查前去质询勃艮第公爵于格。虽然两人的会谈内容并未留下记录，但从结果看，理查成功地说服了法国军队于复活节之后重新加入战场。经过不到一个半月，这支军队回到了十字军的战线上。

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和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之间的裂痕，是长期以来双方分别作为中近东十字军名义上和实质上的领袖所导致的，任何人都很难从中进行调解。路西尼安42岁，而康拉德52岁，都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年龄。35岁的理查的调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路西尼安是通过与继承耶路撒冷国王血缘的西比拉结婚而得到耶路撒冷王国的宝座的。一年之前，西比拉刚刚去世，这导致路西尼安的名义统治地位看上去摇摇欲坠。而以女儿身拥有王国继承权的，还有一位伊莎贝尔，她与在理查和萨拉丁之间充当使节的托隆领主结了婚。可以说，在当时的尴尬局面下，托隆领主比路西尼安更具有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资格。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看到这一点，就使用手腕，要求伊莎贝尔与托隆领主离婚，嫁给自己。然后，他以此要挟路西尼安让出耶路撒冷王位。

在这个重视血统的中世纪，想要收复耶路撒冷的理查，必须首先解

决夺回圣城之后，由谁来继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问题。

理查集合了当地全体封建诸侯，以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成员，要求他们从路西尼安和康拉德之间选举一位本地的最高领导人。

令理查大为意外的是，这些封建领主们全体一致选举康拉德作为耶路撒冷王国新的领导人。

居伊·德·路西尼安虽然是一位绅士，却完全没有担任最高司令官的能力。

而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则根本没有什么绅士风度，但在推罗与阿克的战役中，他体现了出众的战斗力。

在异教徒环伺的中近东，一位有能力的将领显然比风度翩翩的绅士重要。

尊重当地领主意志的理查，十分同情落选的路西尼安。这位将领虽然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却能坚决执行理查的命令。因此，理查将路西尼安委任为自己征服的塞浦路斯的国王。从此，以路西尼安为名的王朝统治了塞浦路斯岛300年，直至后来威尼斯人占据这座岛屿为止。

此时，来到阿克的理查手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就是说服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参战。康拉德自从阿克之战以后，就不再加入十字军。理查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参战的要求。

既然成为了新的耶路撒冷国王，康拉德自然有权利和义务参加十字军。耶路撒冷国王并不仅仅是耶路撒冷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从第一次十字军以来中近东建立的所有十字军政权的最高负责人。因此，参加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康拉德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他辩称，如果自己不在

推罗城，这座港口就将岌岌可危，由于担心居民的安全，不能随便离开推罗。

其实，康拉德正在秘密联络萨拉丁。他正在试图与萨拉丁缔结和约，一方面使萨拉丁承认自己作为耶路撒冷国王对推罗和贝鲁特一带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可以不必参加理查率领的十字军。

理查此时并不知道康拉德和萨拉丁的秘密谈判，而且很可能他对此一直一无所知。在此后与阿拉迪尔的接触中，理查也没能得到相关的信息。

对一个人，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人来说，高尚的品格是十分难求的。但若其他方面做的再好，却在品格方面越过了底线，最终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

蒙费拉特侯爵拥有中世纪乱世中理查所具有的全部资质，唯独缺少的就是人品而已。

萨拉丁在与理查谈判时，派出的是阿拉迪尔。而在与康拉德谈判时，萨拉丁并未派自己的弟弟前往。可以说，萨拉丁是真的把理查当作对手，而并未将康拉德放在眼里的。毕竟，就算是完全按照康拉德提出的条件实现了和议，对萨拉丁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

最终，一心想着与萨拉丁议和的康拉德，在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之后，也没有派一兵一卒参加理查率领的十字军。理查不得不满足于将比萨和威尼斯的舰队，以及承诺参战的法国军队带回雅法的结局。这是他在阿克逗留三个月间所得到的全部收获。

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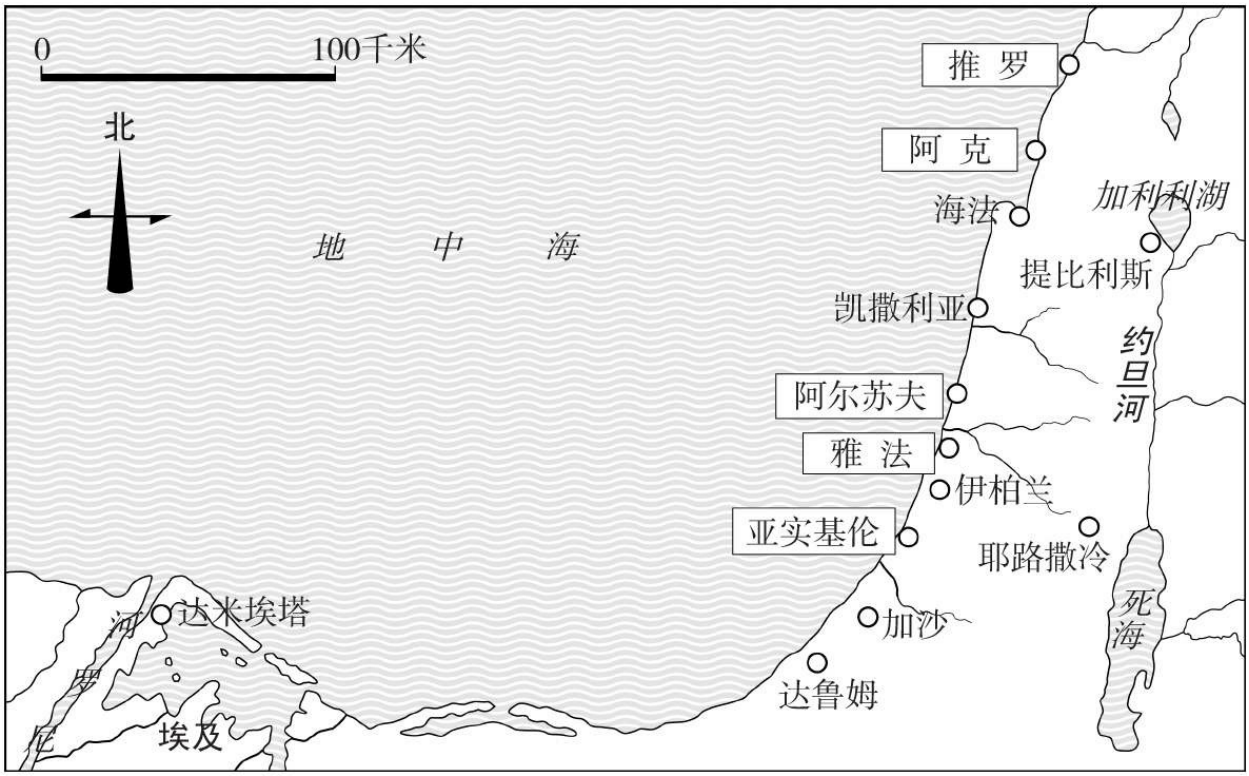
回到雅法的理查，准备再次向穆斯林军队发起进攻。

理查认为，在进攻耶路撒冷之前，首先应该从萨拉丁手中夺取补给港亚实基伦。为此，他着手进行全面的准备。对理查来说，全力投入是必然的。

亚实基伦的守军已经得到萨拉丁的命令，对城市和港口进行全面的破坏。守卫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军士和城内的穆斯林居民都相继撤离。因此，理查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取了这座城市，但是需要安排人着手重建，并确保重建工作的安全进行。

于是，理查派遣兵士从雅法出发，前往亚实基伦。同时，他委派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运去建材、施工机械和粮食。意大利诸邦的水手们在此阶段的任务不仅限于海上运送。亚实基伦港所受到的破坏，还需要这些熟悉港口情况的航海者们来全面修复。

在亚实基伦重建过程中，理查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兵士们能够安心建设。因此，他率部在亚实基伦以南开展了军事行动。而萨拉丁为了延缓十字军在亚实基伦的建设，也派出军队集中进攻这一地区。



理查控制的主要海港城市

理查必须确保从雅法到亚实基伦一线的安全。因此他从亚实基伦向南出兵，进入加沙地带，向东和南两个方向扩大行动范围。

十字军除了和穆斯林军队交战，还袭击了从陆路交通线向耶路撒冷的萨拉丁部队输送物资的补给队。理查押送着缴获的马匹和军需品凯旋而归，得到了士兵们一致的喝彩。这次作战中，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既熟悉当地的地形，又了解穆斯林军队的作战特点。

理查为此时的军事行动拟定了明确的作战方案。在攻取加沙之后，他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以取得对此地南侧达鲁姆的控制权。

达鲁姆在今日名为戴尔·阿尔巴拉，属于整个加沙地带中的一座城市，位于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边界上。攻取这里之后，理查的铁蹄几乎就要踏上埃及的领土了。

此时，理查的战略，是将从推罗延伸到阿克、雅法、亚实基伦的控制区，尽可能地接近埃及的边界。

以上的城市都是港口城市，从而连接起了一条以海港间航路为线索的，充分控制所在海域制海权的线路。

从地图上看，现代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海岸所连成的地中海东岸，完全处在基督教势力的掌控之下。毫不逊色于埃及海军的意大利诸邦的海军，很好地完成了对这片海域的控制。

为了完全征服一座城市，十字军必须将周边的村镇置于控制之下。将达鲁姆收入囊中的十字军，不仅切断了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海上补给路线。从开罗经尼罗河口，沿着地中海海岸到西奈半岛北部，再进入巴勒斯坦的陆上补给路线，也在十字军的袭击之下难以使用。这样，埃及与萨拉丁军队之间，只能通过西奈半岛和以色列南部的沙漠之路进行联络了。

到1192年春天，理查已经切断了耶路撒冷的萨拉丁军队一半的补给线。剩下一半的补给由来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埃米尔们负责。当他们看到萨拉丁在推罗、阿克和阿尔苏夫的失利之后，无不开始怀疑这位苏丹的力量，从而对迫在眉睫的守卫圣城的大战，抱着悲观和消极的态度。相反，萨拉丁对埃及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了。

在萨拉丁命令下被押送往埃及的1500名基督徒俘虏，被攻取达鲁姆的十字军释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这则实例，充分体现了占领达鲁姆以后十字军在埃及边界的强势。

理查在埃及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各条道路中间设置了路障，以充分完成进攻耶路撒冷的最后准备。

基督教的复活节，每年会落在不同的日期。1192年的复活节是4月5

日。对理查来说，这一天可不是休息的日子。他召集在亚实基伦市内重建工事的全体士兵，和所有在城外与穆斯林军队作战的十字军战士，在城墙外支起帐篷，办起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除了庆祝复活节之外，理查和士兵们也欢庆亚实基伦重建工作的完成。整支军队从上到下士气大受鼓舞。

然而，第二天一早，勃艮第公爵所率的法国军队就离开了亚实基伦。他们并未在雅法和阿克做任何停留，而是直接开赴北面的推罗——在那里驻扎的是跟法国国王腓力保持良好关系的康拉德。理查不得不尴尬地送走了他们。

勃艮第公爵之所以率部队离开，并不仅仅是因为军费的问题。根据后世的记载，先期归国的腓力二世希望延缓理查回到西欧的时间，因此命令自己的部队撤离，以使理查陷入圣地之战的泥潭中。无论如何，法国军队的撤离，减少了理查所率十字军的总兵力。

正当此时，推罗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4月21日正式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的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在一周后的28日，遭遇两名刺客袭击，被杀身亡。

推罗全城居民都仰仗康拉德来抵御萨拉丁可能发起的进攻。因此，康拉德在城内的时候并不在自己身边配置警卫。当天他在主教家中用过午餐以后，只带了几个护卫，启程回家。

照耀着明媚春光的推罗城内，发生了大庭广众之下的惨案。在康拉德回家的路上，身着中近东城市内常见的用人服装的两名阿拉伯人，突然出现在康拉德面前，对他行刺。康拉德当场被刺身亡。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的耶路撒冷新国王，波澜壮阔的人生于52岁之年戛然而止。

两名刺客之一被赶来的卫士当场杀死，另一人在受重伤之后，说明

了自己是受谁指使而来，然后也倒毙于现场。

刺杀康拉德的，是一位叫作“山中老人”的领袖所率领的吸食致幻草（Hashish，此处盐野七生根据的是一般流传的说法，但事实上，根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无论是在刺杀者自己的文献当中，还是同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可靠记载中，都没有关于他们吸食致幻剂的证据。这个称呼，源于阿拉伯语hashish即“野草”的词汇，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蔑称，类似我们所说的“草根阶层”——译者注）的暗杀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哈查只派”（Hashshāshīn）。

然而，这支暗杀集团从来都是收取钱财为雇主杀人的。当人们开始调查雇凶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刚刚到达推罗的法国军队。

与让康拉德获得耶路撒冷王位相比，更希望路西尼安继续统治的理查，认为是法国人出钱雇凶杀害了康拉德。

但是，理查并不完全坚持这一看法。此时，还有一个人非常关心“山中老人”背后究竟何人主使，他就是巴里安·伊柏兰。

十字军征服中近东之后，在这些殖民地上定居并生儿育女。同时代的穆斯林把这些生在中近东的十字军后代，都统称为“法兰克人”。

在第一次以至第三次十字军间的百年之中，有不少法兰克人在中近东成长起来。他们的祖先有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例如巴里安·伊柏兰就是其中一位。现代改名为巴特亚姆的特拉维夫以南的地区，在特拉维夫还叫雅法的时候，就叫作伊柏兰。

在十字军国家内一直保持强势的巴里安·伊柏兰，参加了5年前路西尼安所率领的哈丁战役。他在那场惨败中担任后卫，成功逃出了战场。在接下来的耶路撒冷保卫战中，他负责城防总指挥，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以赌博的方式与萨拉丁面对面会谈。正如本书第二册结尾所述，萨

拉丁同意了不流血的开城，而伊柏兰换取了全城内法兰克人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保障。

此后，伊柏兰再次与萨拉丁敌对。在推罗之战中，他与康拉德共同抵抗，并参加了其后的阿克之战。由于深感路西尼安的无能，伊柏兰一直是康拉德一派的得力干将。

在耶路撒冷王位的正统继承者西比拉逝世的1190年，伊柏兰开始行动了。看到路西尼安的地位由于西比拉之死而动摇，伊柏兰秘密为康拉德夺取王位做准备。在西比拉之后拥有王位继承权的，是先王阿莫里的女儿伊莎贝尔。伊柏兰促成了伊莎贝尔和康拉德的婚姻，这样，耶路撒冷王位的男性第一顺位继承权就从路西尼安转到了康拉德的头上。

伊柏兰站在康拉德一方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赞赏康拉德的战斗力。在哈丁之战中，伊柏兰充分了解路西尼安的无能，因此他深感有必要以能征善战的康拉德，代替原来翩翩君子的国王。

这一策略成功了。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最终正式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新国王。可是，一周以后，他却被刺杀了。

此时，伊柏兰迅速行动起来。他立即将守寡的伊莎贝尔嫁给了香槟伯爵亨利。这时，42岁的路西尼安，在与康拉德的王位争夺战败北之后，成为了塞浦路斯国王，已经在前往塞浦路斯岛的路上。为了阻止他的回归，伊柏兰以伊莎贝尔的再嫁造成了既成事实。

伊柏兰之所以能够任意支配伊莎贝尔的婚姻，是因为她从5岁起就被这位领主收为养女。

在耶路撒冷还为基督徒所控制的时代，由于麻风病而即将不久于人世的鲍德温四世，就将自己死后的国土安全托付给时年37岁的伊柏兰。此时，伊柏兰还只是一家中的次子，地位低微，没有领地。因此，鲍德

温四世令其与亡父阿莫里守寡的妻子结婚，并赐予他纳布卢斯附近的领地。得到如此破格的高待遇，伊柏兰便自然将妻子所带的继女伊莎贝尔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由于这段婚姻一直很幸福，伊莎贝尔对继父伊柏兰也就言听计从。

伊柏兰之所以为伊莎贝尔选择下一任丈夫，即继任耶路撒冷国王的26岁的香槟伯爵亨利，是出于以下的原因：

首先，亨利虽然年轻，却已经有过数次作战经验。就连理查也对香槟伯爵的能力刮目相看。

其次，香槟伯爵是理查的侄子，也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有亲戚关系。在受到萨拉丁压制而处于困难时期的中近东十字军领导人看来，推举一位与英法两大强国国王有血缘关系的领袖，是对耶路撒冷王国颇为有利的。

受到伊柏兰邀请的香槟伯爵，此时正在阿克。他告知伊柏兰，自己将首先征询身在亚实基伦的叔父理查的意见。对亨利来说，比自己年长10岁的理查不仅是叔父，也是自己极为佩服的领导者。

理查从亚实基伦寄来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 这真是极好的消息！我也感到满足了！你做了耶路撒冷国王以后，不单推罗和阿克，就连雅法和亚实基伦——我在巴勒斯坦征服的全部土地都送给你。

对义父言听计从的伊莎贝尔，同意了再婚的请求。与同52岁的康拉德结婚相比，嫁给26岁的帅气新夫，20岁的伊莎贝尔大概会感到十分满意吧。在康拉德遇刺后一周，新婚仪式就举行了。

就这样，跟随理查前来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香槟伯爵亨利，在没有多

少实力的情况下，即位为新的耶路撒冷国王。他十分忠实于自己的义务，集合了所有能够效忠耶路撒冷王国的兵力，加入理查对抗萨拉丁的斗争。而理查也拥有了在康拉德控制耶路撒冷王国时期所无法具备的兵力支持。可以说，此时十字军对萨拉丁的战斗力得到了增强。

理查十分认可巴里安·伊柏兰在这件事中的功绩。两人之间的急速接近，促使理查以伊柏兰作为与萨拉丁之弟阿拉迪尔谈判的使节。

伊柏兰并不仅仅是作为翻译工作的。在理查看来，伊柏兰熟悉当地的各项事务，是与萨拉丁进行交涉的最理想人选。

伊柏兰不仅得到了理查的信赖，在敌对的萨拉丁和阿拉迪尔看来，他也是令人尊敬的人物。5年之前伊柏兰在耶路撒冷开城时所做的贡献，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得知母国的糟糕情势

在以上诸多事务尽数好转之后，理查决定于东征两年后的1192年春天，向耶路撒冷发动决定性的一击。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英格兰，发生了一场变乱。

当理查起兵东征时，他任命赫尔福德修道院院长威廉·朗香为枢密大臣，于自己不在国内时管理英格兰。正在此时，理查收到了来自威廉的一封亲笔信。

威廉恳求理查尽早返回国内。信中告知，理查的幼弟约翰联合法国国王的军队，入侵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在西欧的军队已经尽力苦战，但难以支持，因此希望理查能尽快率军回国。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欧的皇帝、国王和诸侯，在罗马教皇的提倡之下，严守“上帝的和平”，规定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任何人都不能侵略其他人的领地。

为了出征的十字军能够安心行军而结成的“上帝的和平”，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破坏过。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是第一次破坏西欧和平局面的人。他所破坏的不仅仅是“神的和平”，还有夺取阿克之后与理查之间的盟誓：直到理查回国时止，绝不侵犯英国国王的领地。

腓力是在1191年秋天回到巴黎的。甫一回国，腓力就开始着手入侵在阿克之战中死难的弗兰德斯伯爵的领地。然后，腓力把手伸向诺曼底。他虽然善于谋略，却并不擅长作战，因此想出了利用约翰的计策。

在1191年到1192年的那个冬天，腓力接近了约翰，许诺在将理查击败以后，确保约翰登基为英格兰国王，以此换得他与法国国王的合作。

24岁的约翰，是一位软弱的王子。腓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了他。有这位约翰在前面出头，对于并不善战的腓力来说，就有了堂而皇之撕毁和平协议的理由。

无论如何，中世纪是重视血缘超过实力的时代。因此，到了实力超过血缘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常有从黑暗中得到解放的感觉。

十字军时代则恰好在中世纪。因此，与实力必须经过明示才能让人心服相比，血缘的优势在于只要提出就能让众人信服。

如果法国国王直接侵略英国的领土，那么迎击者面对的就是外国的军队，而加入外国国王一方的，就是本国国王面前的叛徒。

然而，当外国支持本国的一位王子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英格兰人曾经目睹理查与腓力联合反叛老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况。当时，整个国家分裂为二，有的人站到亨利一边，也有的站到理查一边。

这一情景而今再次出现了——金雀花王朝创始人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一世前往东方之后，另一位儿子约翰在法国国王的帮助下进攻英格兰。

从力量对比来说，理查明显占上风。但是，从先王亨利的血缘来看，约翰和理查是完全相同的。从英格兰的大臣到普通居民，都难以在这两位兄弟之间做出抉择。面对此时的情况，法国国王腓力的目的达到了。

理查虽然心潮澎湃，却对此一言不发。他读罢威廉的来信，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理查周围自负的心腹大臣，以及最为信任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都希望国王能够说出自己所想。他们也深知，国王心中正乱

作一团，在向耶路撒冷进军与归国之间举棋不定——如果此时他依然滞留在东方，会不会就此变为没有国家的国王呢？

理查的心腹也好，普通士兵也好，都是为了将萨拉丁夺取的圣城再次夺回这一目的而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为了总攻耶路撒冷所作的准备，已经全部完成。大军所要做的，就是向耶路撒冷进攻而已。没想到就在此时，最适合担任耶路撒冷之战总指挥的十字军领袖，却面临着丧失国家的境地，甚至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

理查的近臣，都是他亲自选拔的。唯独从理查年少时就跟随他的索尔兹伯里主教，拥有与理查同等的资历。在死一般默然的理查面前，众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主教在理查留宿的修道院的廊柱之下，静静地哭泣。

当理查走过主教面前，看到他哭泣的场景时，就将其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国王想知道主教为何像一个女人般痛哭。长年跟随国王的教士于是说开了：

“陛下，您是否还记得，当年您还是普瓦提埃伯爵的时候。那时您还未成年，与其说是一位青年，不如说是在少年时代。您为了防守母后所赐予的普瓦提埃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您是那么年轻，却能够百战百胜。

“陛下，在您成长的过程中，也就是陆续将领地扩大到加斯科涅、安茹和诺曼底的过程当中，本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那些领地的。然而您为了确保对领地的实际控制，都会身先士卒，通过一次次的战斗取得它们。您父王将与太子意味相同的诺曼底公爵之位赐予您，正是由于对您战绩的认可。

“在此之后，您更是连战连捷。在墨西拿，西西里的国王屈服了，而您仅仅用了5天，就征服了广大的塞浦路斯岛。从塞浦路斯出发到阿

克的海路上，您又以800名兵士，俘获了撒拉森人的大帆船。

“再然后是那场阿克之战。两年攻不下的阿克，在您到达之后一个月内就夺下来了。

“接下来的是阿尔苏夫之战的胜利，以及占领雅法和亚实基伦。达鲁姆之战，也只花了4天时间。

“这一次次的胜利，可不是因为敌人都在做梦。这是因为您的英勇善战，而上帝也总赐福于您。

“上帝希望借陛下之手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他一直眷顾陛下。

“正是凭着上帝的愿望，陛下达到了今天的状态。然而此时，从一开始就受到上帝眷顾，从而所向披靡的您，却陷入了迷惘之中。当上帝最喜悦的结局近在咫尺时，陛下为何如此苦恼呢？

“苏丹也罢，穆斯林士兵也罢，后方的埃及人也罢，他们无不闻陛下之名而胆寒。而倘若现在陛下舍弃这里的一切而归国，那么您全部的战果，都会回到异教徒手中——这无异于是对他们莫大的馈赠啊！”

少年时代的理查，是对祷告的钟声充耳不闻的浪荡少年。眼睁睁看着理查长大的主教，对此只能摊手叹息。然而今天，理查默然聆听着主教的肺腑之言，并在他言毕退去之后，独自留在屋内，连当天的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都没有吃。

第二天午后，焦急等待的十字军首脑们，得到了理查的命令：

“明天一早，向耶路撒冷进发。”

得知理查决心的全体兵士欢声雷动。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不仅有战士，还包括一部分朝圣者。当他们听到“耶路撒冷”这个词时，心中的激

动都难以言表。

十字军首先要做的，是回到雅法。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路程中的2/3，已经在前一年秋季开始的攻势当中为十字军所占领。此外，如果十字军从雅法出发，征集军需物资就较为容易，补给线也相对安全。

在从雅法向耶路撒冷浩浩荡荡出发的路上，理查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开始了外交谈判的工作。

右手持剑，左手……

理查希望能够尽早返回英国。他一方面利用从埃及的补给线被切断之机，在军事上压制萨拉丁；另一方面也在这一有利局势下，考虑与萨拉丁和谈。这样毕竟能使理查早日回国。

负责和谈工作的，是巴里安·伊柏兰。他不仅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还在耶路撒冷开城时与萨拉丁和阿拉迪尔会过面。这次会面使他成为唯一得到两位穆斯林领袖好感的十字军领导人。

得到身在耶路撒冷的萨拉丁许可而来访的伊柏兰，告知苏丹，理查希望重开谈判。萨拉丁当即同意继续谈判。萨拉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十字军归还亚实基伦。

理查断然拒绝了萨拉丁的要求。此时，他已经率领十字军到达了拉姆安拉。

前往拉姆安拉并不单单意味着理查的军队控制了前往耶路撒冷路程的1/3。十字军是在将视野内所有萨拉丁部队与补给队各个击破的同时，完成行军的。这期间所获得的大量战利品中，包括许多基督徒不善役使的骆驼。于是，十字军兵士们杀死骆驼食用，竟发现它们是格外的美味。

由于此时正值适宜作战的初夏，理查命令军队继续加紧向耶路撒冷前进。6月11日，大军抵达了拜特努巴。此后，十字军继续进发，到达离耶路撒冷只有15公里的地方。在这一位置，虽然还有一段距离，天气放晴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

在此期间，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耶路撒冷由于

理查的迫近而处于临战态势。伊柏兰并不能入城。受萨拉丁之命从叙利亚的战线上回归的阿拉迪尔，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与伊柏兰会面。

在与阿拉迪尔谈判后，伊柏兰带着萨拉丁提出的条件面见理查。萨拉丁此次的条件要容易接受一些，他只希望双方维持现状。虽然他还希望能够得到亚实基伦，但萨拉丁清楚，他所能得到的只是一座被破坏的城市。

在决定接受谈判条件之后，理查于7月5日率军撤退。十字军从离耶路撒冷15公里的地方，退到了离圣城50公里开外的拉姆安拉。

新一轮谈判并非是伊柏兰进入耶路撒冷面见萨拉丁，而是萨拉丁以阿拉迪尔作为全权大使，造访理查的营地。在最初的面谈中，阿拉迪尔和理查保持了十分友好的气氛。再次开始的和谈以这种方式进行，大概是最为节省时间的。

54岁的萨拉丁，毫无疑问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拥有最高世俗权力的苏丹。让这位领袖亲自前往理查的大营求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萨拉丁真的这样做了，为他提供军队的各位埃米尔，恐怕就会一哄而散。

在十字军时代的伊斯兰世界里，也有今天存在的“原教旨主义者”。有一部分教职人员，被呼为导师（伊玛目），常与世俗统治者苏丹同行，拥有以《古兰经》和《圣训》等内容训导信众的权力。

以哈里发为最高者的穆斯林伊冯目，在以导师身份受到普通信众尊敬的同时，也拥有对《古兰经》的解释权。这一点，与以罗马教皇为最高者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是一样的。

伊玛目们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他们一生信主唯一的伊斯兰教，绝不轻言妥协。在耶路撒冷开城之时，容忍城内基督徒全体撤离的萨拉丁，受到了这一派人的强烈反对。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城内全体

穆斯林惨遭屠杀，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本方也应当对基督徒以牙还牙。

对萨拉丁来说，面临来自宗教导师们的巨大压力，成功完成和平谈判绝非易事。而在理查身边，也环伺着怀有对异教徒强烈敌对意识的主教和修士们，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让萨拉丁同意理查交还耶路撒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圣城。倘若交还这座圣城，那么为了夺回它而发起的整个武力吉哈德，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阿拉迪尔和理查毕竟建立了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两人的会谈尽管来来往往了多个回合，却毫无紧张的气氛。在35岁和49岁的两位男性之间，谈话友善地进行着。作为翻译的伊柏兰，自然也为这种友善的气氛出力不小。

会谈之中，理查向阿拉迪尔说道：

“阁下所信奉的宗教，是否认为男子可以娶任意数目的妻子呢？”

不等阿拉迪尔回答，理查接着说：

“我有一个亲妹妹，曾嫁给西西里国王，而今守寡住在雅法。阁下是否愿意迎娶我家这位乔安娜？若事成，阁下便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了。

“不过，基督教世界要求耶路撒冷国王必须是基督徒。阁下认为，改宗基督教这样的事，可以接受吗？若真这样解决，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就全都解决啦！”

阿拉迪尔爽朗地笑了起来。从兄弟处得知情况的萨拉丁听罢，更是呵呵大笑。

然而，也有笑不出的人。乔安娜向兄长致以强烈的抗议：“你若敢将我嫁给穆斯林，我便向罗马教皇申诉！”于是，在下次与阿拉迪尔会面时，萨拉丁马上改变了说辞：

“舍妹毕竟是西西里王后，若要再婚，得罗马教皇批准。不过，我还有一个侄女，至今未婚，因此不必多虑。把她嫁给阁下，您认为如何？”

阿拉迪尔看着理查，惊愕地说不出话来。当他回禀兄长之后，萨拉丁再次愉快地笑了起来。

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自然是耶路撒冷。谈判围绕着这个话题一再展开，却一直未能找到突破口。

理查感到不能继续下去，便中止了谈判。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前往阿克。在那里，刚刚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香槟伯爵亨利，正在招募部队。理查打算和亨利一起带兵从阿克返回雅法，而他离开时并未带走自己的妹妹和妻子。

得知理查行踪的萨拉丁，马上起了新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好机会。此时不出兵，可能就没有战胜理查的机会了。

于是，萨拉丁决定亲自出兵进攻雅法。苏丹率领的，当然是一支大军。

这支军队里，作为将领的埃米尔人数超过100，贝都因和突厥骑兵也达到2000以上。7月27日，大军离开耶路撒冷，直扑雅法。

理查在阿克得知了萨拉丁出兵的消息。他当即命令亨利率兵从陆路驰援，自己乘船迅速前往雅法。

在雅法城内，理查安排了守备部队。但是，敌军数量众多，援军无

法从海路赶到。但对理查来说，让萨拉丁染指雅法，就意味着全军崩盘。因此，他必须尽全力保住雅法城。

第二次对决：雅法

萨拉丁率领总兵力超过2万的大军，直扑雅法。此时理查还未赶回，城内无人可以担当防御。逗留雅法的伯利恒主教，只得通过与阿拉迪尔熟悉的机会，致信萨拉丁，希望能在7月31日之前的4天内休战。

萨拉丁接受了城内提出的请求。他也需要先在城下布阵。萨拉丁预测理查应该不会在4天之内赶回雅法。

但理查还是及时回来了。沿陆路南下的亨利的军队，也抵达了凯撒利亚。萨拉丁见状，做好了与亨利在雅法城下决战的准备。

而沿海路南下的理查和他的将士们，遭遇了来自海法的猛烈逆风。

地中海上航行所使用的帆船，大都是三角帆船。与在逆风下只能被吹得后退的四角帆船相比，三角帆船可以之字形前进。

理查所乘的前往雅法的帆船，来自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船都是桨帆船，在强烈的逆风面前，不能发挥三角帆的优点。船只随着水流后退，丝毫不能前进。起决定作用的划桨手们，就算竭尽全力，也无法让船前进。

船队就这样连续三天不能前进，理查最终也几近要放弃。立于船头的狮心王，张开双臂，朝向天空叫喊：

“上帝啊，为何将我钉在此处？请为我想想吧！现在，是分秒必争的危急时刻。我可是在为您的意志而战斗的啊！您为何用如此的罡风，直吹打我的船头？”

对一名基督徒来说，当上帝的试炼临到自己面前时，是可以向他倾

诉自己的想法的。如果所祈祷的事无法实现，基督徒不能试探上帝，相反是上帝在试炼自己。

但是，倘若无论理查和手下们怎样努力，上帝都不赐予顺风的话，基督徒们也不能说出非难上帝的话来——这样做就是亵渎上帝，用意大利语叫作bestemmia，英语则叫作blasphemy。

总之，在基督徒中间，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不知为何，强烈的逆风最终变成了强烈的顺风。于是，理查的船队得以顺利南行，一路平安地在休战期即将结束时进入了雅法港。而如果选择陆路的话，理查的时间远远不够。

理查回到雅法港的时间，是7月31日的黄昏时分。萨拉丁所率的穆斯林大军，从陆路三面围困了雅法，正准备发起次日清晨的总攻。亨利的援军则还远在凯撒利亚停留休整。留给理查的时间不多了。萨拉丁又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

面对萨拉丁，理查手下包括54名骑士、400名弓兵，以及来自比萨和热那亚的1000名水手，合计1454人。由于船队并未运来马匹，在54名骑士当中，能够乘马作战的仅有17人——其中还包括理查本人。他们要面对的，是10倍于己的敌军。理查的处境，可以用命悬一线来形容——与他的17名骑兵相对照的，是敌军的2000骑兵。

在这场后世称为“雅法城下之战”的战役中，理查如此配置自己的军队：

全军背对雅法城墙，迎击萨拉丁的大军。没有马的37名骑士，作为步兵参战。这些善战之士部署在最前线的两侧。包括400名弓兵在内的1400人，全部身着骑士的钢铁制成的盔甲，组成战线。基本的作战队列，是在两名步兵中间，配置一名弓兵。

弓兵以外的全体步兵，每人配备两杆长枪，两手各拿一杆。理查的这一战术，与罗马时代尤利乌斯·恺撒在法尔萨卢斯战役中的阵型一样——是对抗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骑兵的战法。

此外，弓兵的攻击方式也并非如穆斯林弓兵那样对空中射箭，而是俟敌军接近时，以水平方式直接射击敌军骑兵的马匹。英格兰弓兵的特点，是担任整个军队的狙击手。理查的部下都习惯这一战术。

在这一整齐的军阵后方，包括理查在内的17名骑士，并着马头排成一排。

在8月1日清晨的阳光照耀下，两军之间的战斗开始了。当天的战斗中，萨拉丁也亲自在本军阵地的后方指挥。在萨拉丁面前，战斗以穆斯林军队常用的战术开始——箭矢如雨点般射向敌阵。

密集的箭矢，都被理查全体军队身着的盔甲挡了下去。钢铁制成的盔甲，简直就是两手执枪的十字军步兵身上的盾牌。

在箭矢如雨点般放射完毕之后，萨拉丁命令骑兵全军突击。

正如法尔萨卢斯之战中的情况一样，马有着在障碍物之前停止前进的习性。冲到十字军长枪阵前的战马，任凭主人的皮鞭抽击，也不会再前进一步。于是，接踵而至的一群群穆斯林骑兵就成了理查军队狙击手的活靶子。

而理查这边没有配备马匹的骑士，则发挥了老辣的战斗力。他们用手中的长枪，击杀冲上前来的敌军骑兵。承担这一任务的兵士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阵线一步。不能作为骑兵作战的骑士，在当天坚决执行了作战部署。

而包括理查在内的17名骑兵，其中的1/3即5名骑士、索尔兹伯里主教和莱斯特伯爵，守卫着理查，寸步不离。理查驾马往返于阵地之中，

为抵挡敌军猛烈攻势的的步兵们激励喝彩。在理查激励步兵之余，莱斯特伯爵忍不住冲到阵前，砍杀敌军骑兵，索尔兹伯里主教连忙赶去制止，却已经来不及。

此时穆斯林军队并未在十字军的阵前溃散。穆斯林军士们踏着本方士兵的尸体继续前进，然后在长枪阵前一个个倒下。

萨拉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行进速度放慢下来，这自然是士兵们的战斗欲望下降所导致的。穆斯林士兵在进攻时声势浩大，但能坚持的时间有限。

于是，萨拉丁命令全军撤退。太阳正在天空的正当中。在退兵同时，萨拉丁给理查留下了礼物——身着华丽战衣的两匹高头大马。在钢铁制成的甲胄之下，这两匹阿拉伯产的大型骏马依然可以为壮硕的西欧骑士所骑乘。

理查当然不会不要这馈赠的礼物。如果哪天自己的战马倒下，他还需要换乘良马。

萨拉丁所赠送的马匹，也代表着他的敬意。在伊斯兰史料中，萨拉丁之所以命令大军撤退，是深为理查所布下的阵型所折服的缘故。

讲和的决定

最终，在理查一方的顽强抵抗之下，萨拉丁不得不撤军。两天以后，耶路撒冷国王亨利的部队，抵达了雅法。

理查在战斗结束后第二天写了一封信，由伊柏兰转交给萨拉丁。

根据萨拉丁一方的书记官伊马德·阿丁的记载，以阿拉伯语翻译的这封印有理查王玺的信，是这样写的：

> 船只能够西航的季节，正在一天天过去。过了这个季节，就会风高浪急，地中海上的航行，将会十分困难。
>
> 我们两人之间若能缔结和议，我就能如愿归国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之间又将陷入战争状态，那样的话，我只有在此安营扎寨，永远居住于这里。
>
> 现在，双方的兵士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你我二人，已经饱受战事之苦。
>
> 于是我决定，将耶路撒冷放弃了。亚实基伦，也将放弃。
>
> 但倘若阁下因此而大喜，恐怕为时过早。在我方阵营中，内部争端从未停息，而我确知，贵军之内亦并非与此种烦恼无缘的。因此，若阁下同意我的提议，对我们双方都有利。阁下若能接受我的条件，我也会对阁下心生敬爱之意。
>
> 你我若早缔结和议一天，我便可离开此地，并将与阁下真心道别。

读罢这封可以用率直二字来形容的信，萨拉丁当即召集了全体埃米尔。根据伊马德的记载，萨拉丁告知集合的埃米尔们，他将与理查缔结

和约。

有许多埃米尔强烈反对苏丹的计划。他们坚持说，目前着急的人，是那位法兰克国王，时间是属于穆斯林一方的。其中一人提出，理查终归是要离开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缔结和约，只要停战就足够了。

萨拉丁用一句话制止了诸位埃米尔的议论：

“倘若我死了，谁能集结伊斯兰的军队呢？”

萨拉丁时年54岁，而理查35岁。换句话说，时间并非属于萨拉丁一方。接下来，萨拉丁陈述说，与容易撕毁的停战协议相比，缔结对双方具有更高约束力的和约，才是对伊斯兰世界更为有利的结果。兴奋的埃米尔们，也都反思了至今以来对理查的实际战况。最终，他们同意缔结和约，而不是仅仅宣布停战。萨拉丁决定，依然由阿拉迪尔出任和谈的使者。

怀着对理查的同情，萨拉丁和阿拉迪尔尽快开启了新一轮谈判。8月4日一早，阿拉迪尔就来到了雅法。像以前历次和谈前一样，理查严禁十字军中有任何挑衅行为。在这次访问理查的雅法之行中，阿拉迪尔带上了自己12岁的长子。

这位少年引起了理查的注意。知书达礼、健康活泼而充满好奇心的穆斯林少年，正是理查所欣赏的类型。

会谈当天，理查命令少年到他跟前行单膝跪地之礼。少年立即顺从地行礼。站立在他身前的理查，拔出了腰间的佩剑。少年瞬间眨了一下眼，立即睁大眼睛，毫不畏惧地与理查四目相对。理查把剑锋放到少年肩上，徐徐地说：

“你被授予骑士之衔了。”

当伊柏兰将这句话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后，少年不禁喜笑颜开。

令少年更为欣喜的是，授予他骑士头衔的理查，把自己的佩剑也赠给了他。少年十分喜爱这把西洋风格的长剑，一整天手不离剑。他的父亲阿拉迪尔，只好以苦笑般的微笑表情，看着自己快乐的儿子。

在穆斯林对手中间以“狮心王”而称的理查，在中世纪那个两大一神教截然对立的时代，依然能拿宗教问题开玩笑，完全不顾这方面的禁忌。他一度要把亲妹妹嫁给穆斯林，一度又将只有基督徒才能接受的骑士头衔授予穆斯林少年。

这位12岁的少年，便是在37年后的第六次十字军时代，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达成和议的苏丹阿尔·卡米尔。

第六次十字军，是以外交方式而开始，又以外交方式结束的，并无任何军事冲突。它的别称是“无血的十字军”。

回到37年前，在理查和萨拉丁两人心意已决之后，谈判向缔结和约的方向急速发展。

首先，双方同意，耶路撒冷城归穆斯林控制。

同时，穆斯林统治者必须保证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所有基督徒的安全与自由。

此外，当地穆斯林统治者有义务保证前往耶稣诞生地伯利恒、成长之地拿撒勒，以及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约旦河等圣地、圣迹朝圣的所有基督徒的安全与自由。

在我看来，萨拉丁接受这一条件，不仅体现了他的宗教宽容立场，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从工商业角度看并不重要的耶路撒冷，却是三大宗教的圣迹所在地，朝圣者的开销是城市主要的收入来源。毕竟，朝圣

之旅也是旅游业的一种。

第二个和谈条件，则是萨拉丁承认从推罗到雅法一线，以及周边的地区，归十字军控制。

这个区域的中心，是从北到南，包括推罗、阿克、海法、凯撒利亚、阿尔苏夫、雅法在内，面向地中海的海港城市群。在这一区域以北，是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曾攻取的贝鲁特和西顿，连同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沿海，都在十字军的控制之下。

曾被理查征服，后来送给路西尼安的塞浦路斯，也在十字军属地之列。此时的塞浦路斯统治者，已经不再是希腊正教徒，而是罗马天主教徒了。

此外，萨拉丁还同意十字军，特别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保留在巴勒斯坦地区建造的全部城堡。这两大宗教骑士团因而得以在基督徒的“圣地”继续存在下去。

第三个条件，则是从事经济和民事活动的穆斯林，在上述萨拉丁承认的十字军国家领土内，拥有自由来往的权利。与此同时，在穆斯林控制的领土上，基督徒也拥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民事往来的完全自由。

这一项和议不仅在陆上有效，在海上也具有充分的效力。对于在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通行无阻的意大利商人来说，和议无疑是有效地扩大了他们的市场。

接下来，是对理查和萨拉丁间争议的亚实基伦的归属问题的决议。这个海港城市在双方的混战中完全破坏，最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重建。最终，萨拉丁放弃了这座上佳的补给港。

双方还决定，在此次1192年的和议实现后，交换手中全部俘虏。为

了解救酣睡的理查而冒名顶替的骑士威廉，终于得到了释放。

双方都没有要求对方支付任何赔偿金或赎金。除了几人例外，双方扣押的全部俘虏都得到了无偿释放。

在以上各项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对象并未纳入谈判条款。那就是基督徒所谓的“真十字架”。在哈丁战役之后，十字架被萨拉丁夺走，现在终于返还十字军。这个十字架是在第一次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现的，被认为是耶稣受刑的那个十字架。在发现之后，它一直被当作十字军国家的国宝。基督徒中间，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伪，都认为它就是耶稣受刑之物。

在严禁偶像崇拜的穆斯林看来，这个十字架不过是一次战役中获得的战利品而已。以至于他们并不知道这战利品被丢到哪里去了。理查也对此漠不关心，忘记提出返还的要求。在1192年的这次和议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及这个“真十字架”。

9月2日，谈判结束，理查在和约书上签字，并按上了自己的玺印。此后，阿拉迪尔携带和约书前往耶路撒冷，以取得萨拉丁的签名和印记。此间理查一直在雅法等候。

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理查的妹妹乔安娜和妻子贝伦格拉，以及全体女官，从雅法启程，经过阿克返回西欧；

第二，理查派遣一队人马前往亚实基伦，查看萨拉丁军队对这座港口城市的破坏情况；

第三，十字军中希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兵士，从雅法出发前往圣城。

萨拉丁评价理查

作为十字军参加东征的将士们，既是战士也是朝圣者。这是从第一次十字军以来，罗马教皇做出的决定。同时，罗马教皇也宣布，他们与其他朝圣者一样，可以获得完全的赦罪。

在和议达成之后，将要回国的将士，自然希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他们必须按照和议，即在完全解除武装的情况下入城。

然而实际的问题是，在一直为敌的穆斯林云集的耶路撒冷，十字军将士能不带武器安全进城吗？

理查只好将将士分为四队，分别由自己的一位心腹率领，前往耶路撒冷。由于这群朝圣者中还包括许多比萨和热那亚的水手，队长的责任就是控制住他们中间随时可能爆发的针对异教徒的不友好行为。

虽然十字军入城导致了穆斯林士兵一触即发的敌意，双方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萨拉丁命令部下严禁任何侮辱朝圣者的行为，并委派阿拉迪尔在城内巡视，严格执行。

理查不仅同意自己属下到耶路撒冷朝圣，还给了中途退场的法国国王腓力留下的士兵前往朝圣的机会。代理指挥法国军队的勃艮第公爵于格，8月在推罗病死。法国军队变得群龙无首，但还是在理查的帮助下，完成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

理查自己却并未前往耶路撒冷。根据基督教史料的记载，他由于担心不带武器深入敌境的安全所以放弃前往。然而我不得不说，如果理查能不带任何武器到达此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地，他的声誉一定会达到顶峰。最终，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作为理查的代理人前往圣城，而国王

自己乘船离开了雅法，前往阿克。

率领最后一支朝圣队伍的休伯特，作为理查的代理人得到了萨拉丁的接见。萨拉丁以隆重的礼节会晤休伯特，并向他赠送许多奢侈的礼品。但休伯特以此次入城仅为朝圣一事而婉拒收礼。萨拉丁并未强求，转而摆设盛大的宴席招待休伯特，并邀请阿拉迪尔和伊柏兰列席。

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席间谈及了武力吉哈德的话题。但这一记载中并未提及谈话的内容。不过，双方在席间自然谈及了理查。

萨拉丁首先问索尔兹伯里主教，理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比理查年轻三岁的主教，做了如下的回答：

“我确信我国国王理查，集合了将帅的谋略、战士的勇气，以及伟人的胸襟，在任何优秀的人中间，也很难找到如他一般出众的领袖。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没有别人具备像我国国王那样的器量、能力与美德的。不知道阁下一方，是否有这样的人物。”

主教休伯特·沃尔特说完这段话，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可以说，像理查国王和阁下这样优秀的君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54岁的萨拉丁，微笑着对答休伯特的话。他对从未谋面的敌手，35岁的理查，做了如下的评价：

“我对贵国国王的能力与勇气毫无异议。

“然而，作为年长者的我抱持着一种观点，那就是理查国王一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我当然不是认为这样鲁莽。但是，长此以往，会形成一种率性而为的作风。

“当然，这造就了一位与任何人都不同的非常人物。不过，我自己的话，无论信奉任何宗教，都会选择做一位奉行中庸之道而慎思笃行的君主，而不会做一位不假思索，欠缺自我控制的君主。”

酒店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就这样直到宴席结束前，萨拉丁对索尔兹伯里主教说：

“阁下有何愿望吗？作为理查国王代理人的您有任何愿望，我都会尽力满足的。”

年轻的主教思考片刻，答道：

“我的愿望就是率领朝圣的兵士们，参加圣墓教堂内的一次弥撒。”

萨拉丁当即应允。他还允许休伯特参加在伯利恒和拿撒勒两地的弥撒。这自然令主教感到愉快。由于这三地都在穆斯林控制之下，萨拉丁还特意派遣了一支警卫队，保障主教一行的安全。年轻的主教造访拿撒勒之后，就向着阿克的方向出发，并在那里与理查会合。萨拉丁派出的警卫队，将手无寸铁的主教和朝圣队伍护送到阿克城下。

理查在10月初抵达阿克，一直逗留到9日。他先把妹妹和妻子送回西欧，之后拨出自己属下的3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送给留在中近东的耶路撒冷国王亨利。虽然和平已经得以实现，但如果用以自卫的军事力量不足，和平的局面就难以维持下去。

理查将所率军队的大半部分，经直布罗陀海峡由海道送回国内。理查自己则带着少量兵力，于10月9日离开阿克。

当理查从阿克出发以后，萨拉丁还留在耶路撒冷。当他确认理查已经离开巴勒斯坦之后，便将自己的军队解散了。

在武力吉哈德的大旗之下成功集结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萨拉

丁，终于让自己属下的埃米尔和普通士兵全部归乡。

在耶路撒冷等待理查离去的这段日子里，萨拉丁完成了对为和议立下汗马功劳的伊柏兰领地的确认工作。

巴里安·伊柏兰从祖父和父亲处继承了雅法近郊的一块领地。理查通过联系耶路撒冷国王亨利，重申了伊柏兰家对此处的领主权。

伊柏兰还接受过鲍德温四世所赐予的纳布卢斯近郊的一处土地。根据理查和萨拉丁的和约，这片土地处于穆斯林控制的范围内。

萨拉丁所做的，是重新承认伊柏兰拥有这片土地。

从耶路撒冷回到大马士革的萨拉丁，身体日渐衰老下去，以至于逐渐连马都骑不动了。

1193年2月21日，他终于病倒。随着病情的逐渐发展，到3月1日，萨拉丁陷入了昏迷状态。3月4日清晨，他离开了人世。

0
100千米
北
小亚细亚
基立基亚
安条克
叙利亚
拉塔基
沙伊扎尔
哈马
尼科西亚
法马古斯塔
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巴尔巴克
西顿
大马士革
地 中 海
推罗
阿 克
加利利湖
海法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纳布卢斯
阿尔苏夫
雅法
伊柏兰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海
加沙
达米埃塔
达鲁姆
河
罗
尼
埃及

第三次十字军以后的基督教势力

萨拉丁终年55岁。他死的时候，理查刚刚离开巴勒斯坦不到5个月的时间。

以和议而终结的第三次十字军，常被现代研究者评论为并未给现状带来改变的一次东征。

的确，这次十字军未能收复耶路撒冷。因此，单纯从军事角度看，第三次十字军是失败的。

但是，理查和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和平状态，远远超过了和约所记载的三年八个月的期限，一直维持到1218年。

如果说26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的话，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若能达成26年的和平，恐怕是谁都希望看到的破天荒大事吧？因此，这26年的和平，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断不能称为是短暂的。

1218年，即阿拉迪尔逝世的年份。基督教世界利用此次机会，破坏了和议，发动了第五次十字军。

狮心王理查没有能够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但是，他给基督徒的“圣地”带去了26年的和平与安全。

理查最后的命运

准备回到西欧的理查，必须选择一处西欧的港口登陆。

当他还在阿克时，就已经得知，兄弟约翰和法国国王腓力的军队正等候在马赛和热那亚港。

因此，理查告知率先出发的妹妹、妻子和军队主力，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航行，返回英格兰。

而由于诸多原因推迟出发的理查则带着少数兵士从希腊进入亚得里亚海，北上威尼斯，计划横穿欧洲大陆回到伦敦。

为了蒙蔽敌人，理查改变了装扮。他身着圣殿骑士团的制服——白色服装，白斗篷，上面印着很大的红色十字。由于圣殿骑士团在西欧拥有很高的声望，他这样穿着就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然而，理查回程所乘的并非熟悉地中海情况的意大利船，而是自己从英国带来的常在北海航行的船只。这些船都没有配备划桨手，而且悬挂着不利于秋冬季航行的四角帆。而此时已经进入秋季，理查的船队勉强从亚得里亚海入口位置的科孚岛驶入内海。

经过科孚岛之后，天气骤然大变。强风过后，理查的船只触礁沉没了。

虽然跟随理查的兵士大半溺死或失踪，他本人和几名部下幸免于难，漂流到岸边。他们在岸边雇了一艘小船，继续航行。

没想到这艘小船在亚得里亚海深处搁浅了。狼狈逃生的理查一行人，最终在的里雅斯特附近上岸。

令理查十分意外的是，他们登陆的地点并不在威尼斯共和国境内，而是在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领地上。

理查和剩下的几名随从，不得不以这里为起点，开始横穿西欧大陆的旅程。他们身着的圣殿骑士团制服，向路人显示，自己是经历了圣地之战的勇者。他们进入一家酒店，便得到了免费招待，而在下一家酒店中，理查遇到了一队兵士。

这队兵士当中领头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溺死之后，率领其军队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部下。他曾经参加过阿克之战。夺回阿克的当天，理查命令降下利奥波德旗帜的时刻，这位队长也在场。这位亲眼目睹主公受辱的队长，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理查的相貌。

这队士兵当即逮捕了理查，并将其送往利奥波德的宫殿。这位公爵绝不是理查那种不记仇的人。为得到日思夜想的猎物而欣喜的利奥波德，当即将理查监禁在无人可以接近的城堡里。

由于捕获的对象贵为国王之尊，公爵不能给理查加上手铐、脚镣或者将其投入地牢。因此，理查被关在城堡内高塔顶部的小屋中。

这一天是1192年12月11日，距理查离开阿克两个月。当先行出发的其他人都顺利抵达伦敦以后，得到了理查去向不明的消息。

被幽闭在塔顶的理查，终日无所事事，只好在房间内唱歌排遣。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一天，偶然路过此地的吟游诗人布隆德尔听到了理查的歌声。他所听到的这首歌，正巧是在阿克时理查为之作词作曲，他亲自在理查面前演唱的那首。

因此，这位吟游诗人向塔顶投掷石子。这引起了理查的注意。他打开窗户，看到了布隆德尔。理查告诉了诗人几个自己属下的名字，希望

诗人告知属下自己关押的地点。布隆德尔忠实地完成了理查的布置。很快，理查的属下得知了国王关押的地点。

这样一来，轮到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恐慌了。他获悉，理查的部下已经得知自己主公被囚禁的地点。利奥波德十分担心理查的部下袭击自己，使自己变成阶下囚。于是，公爵只好将理查押送到自己的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那里。

亨利六世是征途中溺死的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在他看来，曾经将率领亡父残军的利奥波德的旗帜无礼降下的理查，绝非应当善待的对手。

因此，皇帝早就与法国国王腓力暗中联手。腓力比任何人都希望理查不能回国。因此，他希望皇帝能继续囚禁理查，为此还给皇帝提供了大量资金作为囚禁所需的经费。

但是，即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囚禁英国国王，也需要提出一个缘由。皇帝的裁决是，理查是雇佣阿拉伯暗杀集团刺杀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的幕后主使。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仅仅做了一周耶路撒冷国王。在西欧人看来，耶路撒冷国王是圣地中地位最高的人。唆使异教徒刺杀耶路撒冷国王，无疑是莫大的重罪。

然而，理查毕竟享誉整个西欧。在审判理查的过程中，集合不到足够的法官，而公诉人也借故先行离开。

正在这时，皇帝收到了一封信，信件来自率领暗杀集团的“山中老人”。他在信中说明，康拉德之死并非理查在幕后主使，而是自己所下的命令。

“山中老人”说，他之所以要康拉德的命，是因为侯爵曾经袭击过哈查只派的车队，夺取了物资，并杀害了全体人员。因此，刺杀康拉德，

是他们的复仇行为。

虽然哈查只派与黑手党的所作所为类似，作为秘密结社的他们却有着很强的名誉观念。因此，他们会将雇凶杀人和自己的行为严格区分，以避免影响他人的名誉。

“山中老人”所率的暗杀集团，最终成了理查的辩护证人，虽然这封信的真实性无从证明。他们显然知晓理查的威名，送来信件的目的，大概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声誉。

于是，理查就不能被宣判有罪了。然而法国国王腓力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囚禁理查。为此，腓力和亨利六世达成协议，要求理查支付赎金赎身，否则就继续囚禁他。

这时，理查的心腹和部下们出动了。

理查的母亲埃莉诺尔，将自己的珠宝首饰全部变卖，筹集了赎金的一半。剩下的部分，由索尔兹伯里主教以下全体出资，在短时间内凑齐了另一半赎金。主教休伯特携带全数赎金，从英国出发，来到德意志。

不得不释放理查的亨利六世皇帝，并不希望得到一个收取赎金释放钦犯的名声。于是，他提出理查若要换取自由，必须承认自己是皇帝的封臣。理查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立即签署了宣誓效忠的文书。

1194年3月，理查终于告别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囚徒岁月，在无法掩饰欣喜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的陪同下，回到英格兰。这次逃出奥地利公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设下的三重魔障，理查再也没有必要装扮成圣殿骑士团骑士的样子了。

在这段旅途中，理查得知了一年前萨拉丁逝世的消息。他不禁对索尔兹伯里主教慨叹道，倘若自己一直留在圣地，很可能现在已经光复耶路撒冷。不过，如果理查继续在圣地作战，萨拉丁还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去世，就很难说了。由此看来，理查实在是性格太过简单的一个人。

1194年3月20日，理查在多佛尔以北的桑维奇登陆英格兰。

在通往伦敦的路上，理查受到了民众的夹道欢迎。狮心王的声名远播，使英格兰人民的狂热达到极点。此前站在约翰一边的诸侯，也纷纷重归理查麾下。理查得到的敬意，使他看起来仿佛一位凯旋而归的勇将。英国境内形形色色的势力，都重新统一到他的旗下。

经过四天行程，理查到达了伦敦。在欢庆凯旋的人潮中，理查首先前往圣保罗教堂，向上帝报告归国的消息。

理查仅仅在威斯敏斯特王宫居住了三天，接下来就向诺丁汉起程出发。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诺丁汉，是约翰势力的核心地带。理查在当地停留三日，便使全体约翰派的诸侯归顺到自己一方。

诺丁汉地区还是罗宾汉的传说最集中的地方。罗宾汉故事里的贪官污吏，都来自诺丁汉地区，他们大都属于约翰一派。因此，理查不在国内时，诺丁汉的臣民深受暴政之苦。

从民间传说反映的情况看，诺丁汉是约翰一派的势力中心。理查出现在诺丁汉的时候，约翰早已逃到了法国的领土上。

完成英格兰统一的工作之后，理查回到了伦敦。

回到伦敦之后，理查任命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为空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位理查的亲密战友，从此成为英格兰的宰相。接下来，理查宣布，不日将渡过多佛尔海峡，与法国国王腓力会面。

法国国王腓力得知理查将要前来的消息，便主动切断了与约翰的联系。完全依靠腓力的力量谋反的约翰，就这样被自己的靠山抛弃了。此时的约翰，成为既没有国内诸侯支持，也没有国外势力相助的孤家寡

人。

1194年5月12日，理查渡过多佛尔海峡，登陆诺曼底。只求饶命的约翰，早已在此恭候自己兄长的发落。

理查当即饶恕了约翰。兄弟之间的和好，也使希望看到他们反目的腓力大失所望。

在与腓力见面之前，理查用计孤立了自己的老对手。他把妹妹乔安娜嫁给法国南部的强势诸侯图卢兹伯爵，大大离间了法国南部和北部的关系。这样一来，乔安娜再也不会担心自己被嫁给穆斯林阿拉迪尔。

腓力还面临着其他问题。法国境内强有力的诸侯，如弗兰德斯伯爵和勃艮第公爵，都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战死。香槟伯爵则成为了耶路撒冷国王，一直留在圣地，无法回国。因此，腓力妥善利用了这一时期的良机，扩大了法国国王直属领地，兼并了其他诸侯的土地。但正因为如此，在他与理查的较量中，得不到任何诸侯的支持。

腓力在理查尚未回国时，成功占领了诺曼底和阿奎丹的大片土地。现在理查回到法国，目的就是重新夺回被腓力强占的领地。

登陆诺曼底之后，理查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在战场上，腓力绝不是理查的对手。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理查收复了整个诺曼底。诺曼底是英国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发源地。即使在腓力强占的时代，这一地区的人民也还是倾向于英格兰人一方。当法军撤退以后，人民对理查表示了公开的支持。

夺回诺曼底的过程中，理查偶然进入一座教堂，看到祭坛上弥撒使用的银烛台和圣杯都不见了踪影。理查问是否被腓力没收。神父回答说，这些圣物早已变卖，换成了为理查赎身的赎金。当年得知要为理查

赎身时，诺曼底所有的教堂都是这样做的。

心中有愧的理查，当即许诺和平到来之后，便将大量制作银器，归还教堂。并非虔诚信徒的理查，在自己的领地内，也要表现出宗教的热忱。

两年之后的1196年，理查和腓力达成了停战协议。对处于守势的腓力来说，停战提供了喘息之机，而进攻的理查一方则由于停战协议，获得了将兵力转移到其他战线上的必要时间。

在停战协议中，法国国王腓力承认，巴黎以北的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归理查所有。

在两年之后的1198年，英法两国之间再次开战，战场主要在法国西部。

理查依然是接连取胜，最终夺回了腓力趁自己东征时所占据的九成以上的领地。

然而，人生的落幕也开始悄然接近理查。在进攻腓力所控制的利摩日地区的沙吕城时，一直站在最前线指挥的理查，被城上射出的一支利箭刺中了右肩。

由于箭是从一部弩机上射出的，其速度与杀伤力都超过了一般的弓弩。

由于敌军的弩机手正好射中了位于阵线最前列的理查，他所穿的钢制盔甲也无法抵挡这支利箭。

这次所受的箭伤，在几天之后夺走了理查的生命。1194年4月6日，是狮心王理查四十一岁又七个月的人生尽头。

理查的遗体并未运回英格兰。他死后，头部埋葬在普瓦提埃的修道院，心脏则保存在诺曼底的鲁昂大教堂，其他部分的遗体，则埋葬在安茹的一所修道院内。

拥有多处领地的理查，在其死后，遗体分开埋葬。这首先是为了显示他对各个领地的所有权，同时也为领地内的居民瞻仰国王的墓地提供了方便。

然而直到19世纪，英国国内才制作了理查一世的骑马铜像。到威斯敏斯特宫开会的每一位英国国会议员，在门口都要瞻仰狮心王理查一世的飒爽英姿——英国人对理查的喜爱，可见一斑。

由于理查没有留下子嗣，他遗嘱由亡兄的遗子继承王位。然而约翰并未遵从兄长的遗愿，强夺了英国王位。

理查驾崩以后5年，其母亲埃莉诺尔王后撒手人寰。一年之后的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的亲密战友，曾经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也离开了人世。在这段时间内，曾前往中东与理查并肩作战的心腹属下们，相继去世。

狮心王理查之后继任英格兰国王的，是史称“无地王”的约翰。在他就任英国国王的17年间，将兄长理查从法国国王腓力手中夺来的领地悉数丧失。

而腓力则比理查多活了24年之久。

腓力二世被法国人赠以罗马帝国开国皇帝的称号“奥古斯都”。与奥古斯都相似的是，腓力二世十分长寿，并且不是善战之君，此外，在法国人看来，法国领土的扩张，以及最早推动中央集权发展的，就是这位奥古斯都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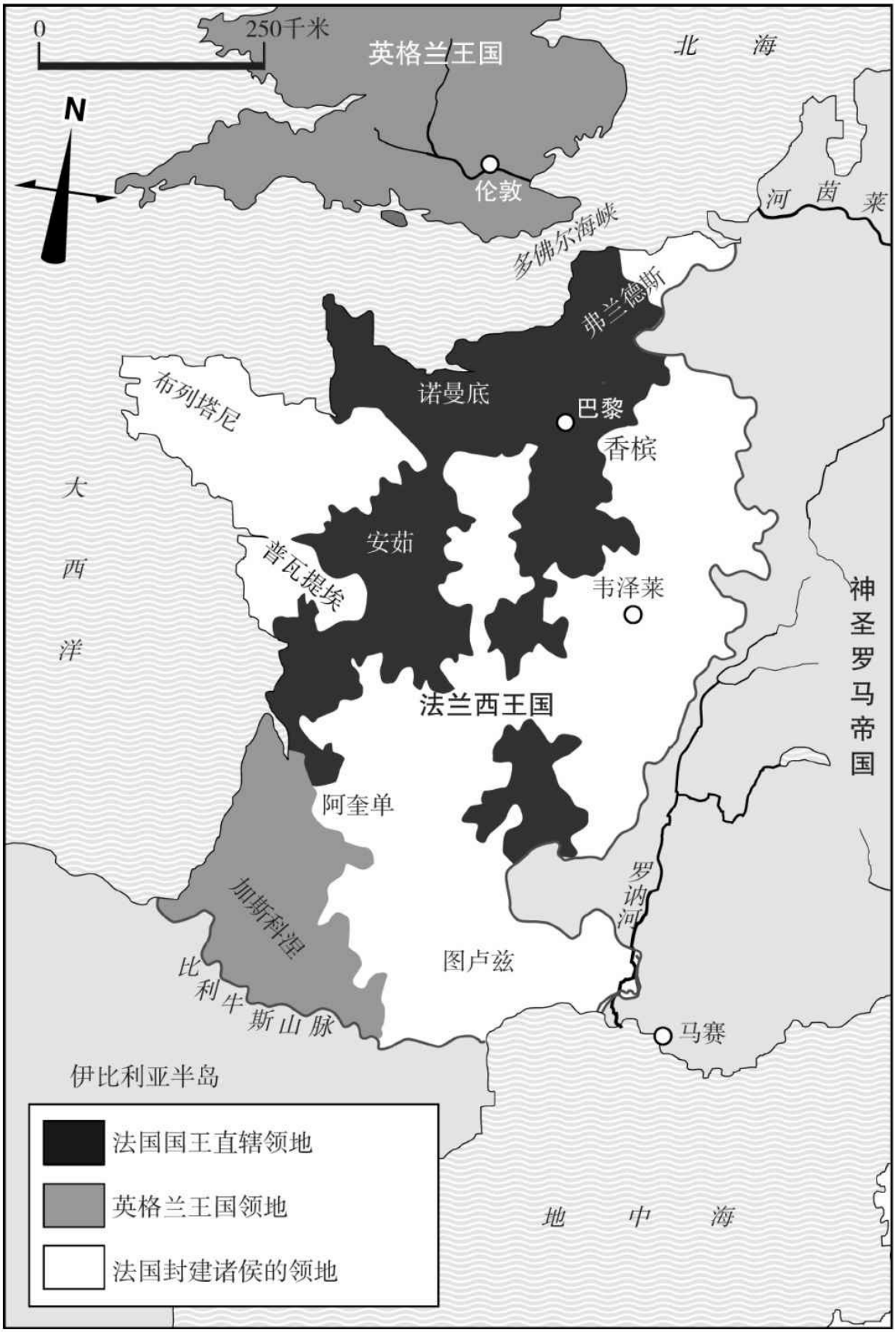
法国领土的扩张，自然不是在腓力与狮心王理查的战争中，而是在

与无地王约翰的战争中实现的。因此，英格兰人常常对腓力表示轻蔑，评价甚低。这是历史研究很难做到中立的一个例证。

而说起法国人对理查的评价，也是十分微妙的。在对英国人无不加以恶评的法国人看来，如何评价这位生于英国牛津、成长在法国普瓦提埃的国王，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至于威斯敏斯特宫门前的理查一世铜像，则是意大利人卡洛·马罗切蒂的作品。他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这座雕像的工艺，堪称十分精湛。

最后，差一点儿忘了提及，理查自制的金底色上绣三只黑狮子的纹章，直到今天都是英国国王的纹章。


0
250千米
N
英格兰王国
北 海
伦敦
河 茵 莱
多佛尔海峡
弗兰德斯
诺曼底
巴黎
香槟
布列塔尼
大
西
洋
安茹
普瓦提埃
韦泽莱
神圣罗马帝国
法兰西王国
阿奎单
罗纳河
加斯科涅
图卢兹
比利牛斯山脉
马赛
伊比利亚半岛
法国国王直辖领地
英格兰王国领地
法国封建诸侯的领地
地 中 海

1223年前后法国的各个势力图

RICHARD·I·
CŒUR·DE·LION

狮心王理查一世塑像

第二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

秀才教皇的登场

在狮心王理查于法国西部的战斗中去世的前一年，1198年，罗马圣彼得所留下的教皇宝座上，坐上了一位38岁的新教皇。在日本高校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位教皇被描述为将教皇权力发挥到最大的一位人物。他就是英诺森三世。

这一时代的罗马教廷所在的意大利，像德意志、法国、英格兰这样的封建国家一样，处于领主割据的状态。在意大利中部罗马一带的教皇国南面，就是这位新教皇的家族所在地。这一家族的名称，叫作孔蒂·迪·塞尼。在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之前，他的全名是洛塔里奥·德·孔蒂·迪·塞尼——出身显赫的贵族家庭。

在中世纪欧洲，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男性，只有长子具有继承权，次子以下则根据资质，选择成为神职人员或军人的人生道路。头脑发达，却不善武力的洛塔里奥，走上了圣职之路。他从小便专心于学问，具备了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必要条件。

洛塔里奥首先来到离家不远的罗马，然后又前往巴黎留学。

虽说是留学，当时法国的国境线并不明确，还处在中央集权以前的时代。巴黎大学与私塾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外来的学子并没有太多出国留学的感觉。洛塔里奥在那里也实现了接受著名教授指导的目的。之后，这位青年回到意大利，在中部的博洛尼亚继续深造。博洛尼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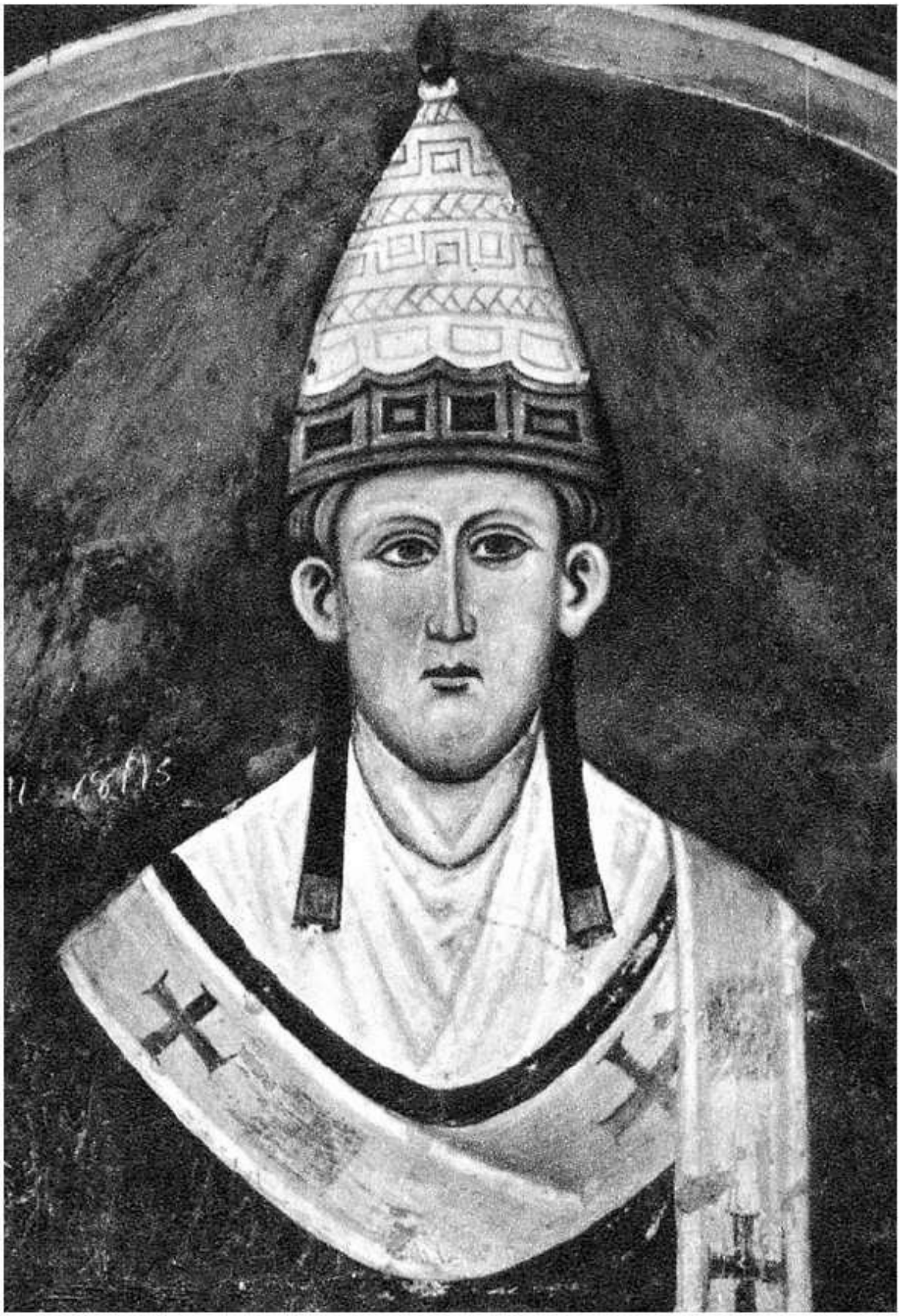
是西欧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意大利国内的最高学府。

洛塔里奥20岁时返回了罗马，并开始在罗马教廷内任职。他在这一时期内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名为“论人世间惨状”（*Demiseria humanae conditionis*）的成名论文。如何将人世间从目下的惨状当中拯救出来，自然只有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一途——除此中世纪教会人士的共同信条，别无他法。因此，他的文章，完全符合罗马教廷的“正道”（意大利语：Strada Maestra）。

前任教皇去世后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正常情况下要经过数轮投票才能选出新的教皇。然而1198年的这次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即宣告洛塔里奥当选。作为罗马教廷精英中的精英，38岁的他毫无悬念地执掌了天主教世界最高的权力。

以英诺森三世之名继任为教皇之后，他更加确信教会的“正道”。对于中世纪天主教世界最关键的问题，即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问题，他发表了如下的言论：

> 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帝国）的诸侯，拥有对本国皇帝的选举权。同时，罗马教皇则拥有对皇帝是否拥有加冕资格的决定权。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

这就是说，由于皇帝是上帝所委任的世俗统治者，负责将上帝意旨传达人间的主教（以罗马教皇为首），自然能决定皇帝是否有资格胜任。

一言以蔽之，就是：

“教皇是太阳，而皇帝则是月亮”。

直到今天，尽管大多数基督徒已经不这样认为了，罗马天主教会依然坚持中世纪以来的这条“正道”。

看似保守的权威主义者的英诺森三世，却出人意料地对中世纪西欧的新潮流——青年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所组织的修会，宣扬上帝以爱而非惩罚拯救信徒的理论，在天主教世界掀起了新的波澜。英诺森三世从一开始就对方济各会加以承认。在当时的神职人员看来，这一青年团体是以极端分子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一步走错就会引火上身。但正由于教皇的支持，方济各会的未来得到了保证。

此外，在还未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前往德意志帝国之时，英诺森三世就为这位未来不定的21岁青年提供了大量资金与兵力支持，使他获得了最急需的资源。

腓特烈和圣方济各，分别是西欧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政治与宗教领域的旗手。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世纪思想的化身英诺森三世的鼎力相助。

两人之外，还有一位年轻人得到了教皇的援助。他就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卷详细介绍过的法国修士若望所组建的圣三一修

会。

这一修会以提供赎金的方式，将被北非穆斯林海盗所掳去的基督徒奴隶赎回本国。英诺森三世在修会成立两年后即给予承认，并为其在此后的日常活动筹措资金。

这类宗教组织必须依附于其他机构而运营。在拥有日常经费之后，它们就可以持续运行下去。英诺森三世下令将罗马的七座山丘中的西莲山赐予圣三一修会，并宣布，罗马11座城门中4座所收缴的关税，都作为该修会日常资金所用。

这个全名为“为救济沦为奴隶的基督徒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道会”的活动，直到19世纪初地中海海盗活动完全消失之后也还一直继续着。由于财源的保障，在600年间一直能够开展赎回奴隶的工作。

以上述及的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与援助，体现了四个特色。

第一，他为所援助者提供的都是最必要的支持，这一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团体都一样。

第二，即使提供支持并不带来任何好处，英诺森三世也不会停止支持。腓特烈二世后来与教廷发生了冲突，但英诺森三世还是会援助世俗君主，应该说他是颇具勇气的。

第三，初期会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后则要靠被资助者自力更生，这样就不会带来异议。

第四，教皇一定是在与被援助者面谈之后，才决定施以援助的。无论是圣方济各、腓特烈二世还是修士若望，接受援助之前都是前途未卜的年轻人。保险起见，英诺森三世都要直接与他们会面。

依我之见，英诺森三世树立了一个当权者为尚未当权者提供支持的

典型。

然而，这位教皇却是对“唯信仰才能救人世于凄惨之中”深信不疑的。凡不是这样认为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反对体制的异端。

英诺森三世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已经远超普通镇压的程度，而是号召了一场十字军。就任教皇10年后开始的这次“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使法国南北双方力量的天平发生了逆转——此前一直强势的法国南部大伤元气，而法国北部则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教廷发动的针对异端的十字军，最终让巴黎的腓力二世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最令就任教皇之后的英诺森三世关切的，是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实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38岁的教皇的最大课题。

在理查和萨拉丁达成和议之后，基督徒朝圣者可以自由而安全地通行于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这些圣地。然而，这三大圣地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依然掌握在异教徒穆斯林的手中。

这样的现状，绝非信奉罗马天主教会“正道”的英诺森三世所能接受的。

英诺森三世对第三次十字军的成果，当然不会满足了。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军中都有教皇的代理人同行。这些教皇代理人都有很重要的发言权，他们代表罗马教皇行使权威。

但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教皇的代理人。当时由于教皇的动员，皇帝和国王都自发组织了东征。但这支没有教皇代理人的大军，自始至终都是以“世俗”的十字军而行动的。

第三次十字军当中并非没有神职人员。但理查身边的这些主教们，与代理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相比，更像是浴血奋战的将领。

此外，英诺森三世并不认同理查与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和议。基督徒和穆斯林相互否认对方的信仰，因此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单独与穆斯林媾和，本是不合法的。

在教廷看来，此时圣地基督徒的自由与安全，是由“不信者”保证的。教廷当然不能容忍这一现状继续下去。

而倘若第三次十字军有教皇代理同行，他必然会阻止理查与萨拉丁讲和。因此在英诺森三世眼中，必须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来重申罗马教皇在东方的影响力。

而新十字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耶路撒冷夺回。这自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谁才是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呢？在圣彼得大位上端坐的第176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内心，就被这个问题占据着。

如果发动皇帝和国王前往东征，他们迟早会变得归心似箭。这一点弊端，早已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教训所证明。而此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年仅6岁，国内局势尚未稳定。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虽然不足40岁，却垂涎于理查死后留下的领地，对十字军并无兴趣。在这两位最重要的世俗君主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英诺森三世只得考虑其他人。

虽说罗马教皇是太阳，皇帝和国王们是月亮，这独一无二的太阳却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支配。

而英诺森三世这当红的太阳本人，不过是一介书生出身的秀才教皇，从来没有在军事组织中锻炼过。

正如其他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抱负深信不疑的教皇，无法了解与自己想法迥异者的真实内心。这一缺点，最终变成了事后未能兑现的承诺。

元首丹多洛

在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以前6年（1192年），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恩里科·丹多洛为元首（Doge）。这一年，理查和萨拉丁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由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不知道丹多洛当选元首时的年龄。一般的估计是他已年届七十有余。由于丹多洛家族是威尼斯的名门，他的人生一直官运亨通，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直到暮年。

丹多洛二三十岁的时候，一直在海外经商。那时，他的事业并不仅仅在威尼斯国境之内。

乘坐着满载商品的船只，与商人一起了解如何与其他民族和异教徒从事贸易，在学习经商的同时，丹多洛对航海术也了然于胸。而一旦海战在即，威尼斯船只就会得到征召，而习得海战之术，就得以在危难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此外，与经商有关的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也是青年时期的丹多洛学习的重要内容。

到40岁上下，丹多洛回到了陆地上，由于家族背景，很快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威尼斯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常常是今天还在国内处理事务，后天就动身前往德意志、法国或者君士坦丁堡。

以外交家自居的英国人，通常也认为，近代外交是从13世纪的威尼斯开始的。威尼斯的外交官作为领事常驻于他国，为了国家利益收集军事、外交方面的情报，结交可信的人士。履历复杂的丹多洛，就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担任领事。

丹多洛进入暮年时，已从事了多年外交活动。他圆满地获选为威尼

斯共和国的元首时，拥有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过去的种种经验，使丹多洛成为其他国家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全能型领袖。

然而，威尼斯毕竟是共和国，并非君主国。尽管元首为终身制，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在是否发动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由全体威尼斯人参加的公民大会来决定。此外，在相当于上议院的元老院针对具体问题投票时，元首也只是作为120名元老院成员中的一员，掌握一票而已。在政府机关中，元首也只是作为17名要员之一拥有一票。

不过，元首毕竟是在具有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的经验之后选举产生的。仅仅从元首的高龄这一点，就增加了其发言的分量。这并非因为年龄使他得到额外的尊重，而是由于其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使其发言颇具分量。恩里科·丹多洛这位元首，就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导人中的典型。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十分先进，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也走在前列。

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君主的宫殿和城市的大教堂往往并立在首都的市中心地带，主教的住所就在教堂旁边。

而在威尼斯共和国，在政府即元首官邸旁的圣马可教堂，仅仅是元首的正式礼拜堂。虽然威尼斯的全体市民名义上属于罗马教皇管辖下的威尼斯教区，却并没有一座供全体市民使用的公共礼拜堂。

此外，虽然教皇向威尼斯派遣了总主教，主教官邸却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是尽人皆知的，至于威尼斯，就连曾经多次游览这座水城的我，也说不出它的主教堂的位置。

但威尼斯共和国毕竟是罗马天主教世界的一员。从罗马派遣而来的总主教，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名称不同。其他国家是“大

主教”（archbishop），而威尼斯却是与东正教国家相同的“总主教”（patriarch，或称“牧首”）。国家自然要给总主教以施展的舞台。

每到宗教节日时，威尼斯的总主教就会加入节日的游行队伍，从自己的官邸一直前往市中心的圣马可广场。

在具有浓厚威尼斯色彩的节日庆祝活动中，身穿豪华宗教服饰的总主教，总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而庆祝活动的主人公，自然是在行进队伍中央的共和国元首。元首在瑰丽的华盖之下阔步前行，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在元首之后，政府高官和元老院的议员们依次而行，这一顺序与宗教祭祀的顺序相仿。

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也是由威尼斯总主教担任第一司祭。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一神教世界当中，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教分离最为彻底。

在威尼斯共和国，所谓“教皇是太阳，世俗领袖是月亮”的天主教会观念，并非人们的思想。

与穆斯林贸易，在其他天主教国家会被处以剥夺圣职或开除出教的惩罚，在威尼斯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儿。罗马教皇对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网开一面，毕竟，这个国家负责木材等战略资源的进出口贸易，因此无法按照宗教法律对威尼斯商人做出处罚。

威尼斯共和国令罗马教皇特殊对待的原因，除了在于其商人群体之外，还由于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每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海上冲突时，威尼斯海军的参战与否，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总而言之，“首先是威尼斯的公民，然后才是基督徒”这样的言语，是威尼斯人真实观念的写照。即使是权威如日中天的罗马教皇，也常常慨叹自己“在任何国家面前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人面前……”

当然，在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对抗伊斯兰世界时，威尼斯共和国也

一直站在整个西欧一方。保持中立无疑是极为有害的。而虽然站在基督教一方，威尼斯人还是会尽可能为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行动。

就任元首之后的恩里科·丹多洛，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威尼斯如何在同为意大利人的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面前，保持在中近东海上的优势地位。

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是十字军在海上的同盟。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主要就是为十字军提供军需物品。

在已经结束的第三次十字军行动中，比萨和热那亚舰队的协助起了决定性作用。狮心王理查之所以选择与这两国的舰队合作，正是因为他们比以国家为单位行动的威尼斯，更易于贯彻十字军的战略。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比萨和热那亚商人在中近东的活动大大增加。而同为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就亟待挽回此时所处的劣势。

丹多洛就任元首的第二年，萨拉丁去世了。在那个时代，在和议主持人死后破坏原来的协议，并不罕见。但威尼斯的丹多洛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因为如果和平遭到破坏，比萨和热那亚就可能通过与十字军的合作，获得更大的优势。

因此，在萨拉丁死后，丹多洛继续推行与穆斯林保持和平的策略。当三年八个月的和议到期时，伊斯兰世界希望将和平继续下去，而基督教一方也对此表示了合作。

根据丹多洛的意见，在萨拉丁死后5年的1198年，双方延长了和议的期限。此次的谈判是由阿拉迪尔主持完成的。威尼斯在谈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早在第三次十字军以前的时代，威尼斯和埃及就保持着友好关系。这自然是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与其他基督教国家并没有任

何性质的经济同盟，更不要说军事合作了。这大概是威尼斯不希望别国的政治或军事体制对本国有所干预的缘故。而与此同时，威尼斯一再延长与埃及之间缔结的通商条约，并在接受理查与萨拉丁和议的局面下，对中近东进行无形的渗透。

在1201年威尼斯与阿拉迪尔之间缔结的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一旦西欧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共和国保证不参与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苏丹阿拉迪尔

兄长萨拉丁去世时的1193年3月，阿拉迪尔50岁。此时，他并没有任何侵犯兄长子嗣的继承权利的念头。

墓园安置在大马士革壮丽的清真寺内的萨拉丁，留下了17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都担任闲职，只有几人被委以重任。根据萨拉丁去世前的遗书，他所创立的阿尤布王朝领土，将这样分割：

萨拉丁22岁的长子阿夫达尔，继承大马士革，阿尤布王朝的首都。他自然成为整个叙利亚的统治者。

比长子年轻一岁的阿齐兹，成为埃及的统治者。

第三子扎希尔继承了叙利亚的第二大城市阿勒颇。

作为城主，扎希尔拥有对城市及周边地区村镇的所有权和管辖权。

最后，萨拉丁给自己最信赖的兄弟阿拉迪尔留下的是史称“内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萨拉丁把这一地区分给阿拉迪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味。

约旦河西岸地区，正好与理查和萨拉丁之间和议中所承认的十字军国家——推罗到雅法之间的地带相毗邻。这一地区的东边是约旦河，与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叙利亚接壤。

萨拉丁将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间的狭长地带托付给阿拉迪尔，自然是希望这一地区成为十字军国家和他的后代所控制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

通过和议使耶路撒冷保持在伊斯兰世界之内，萨拉丁结束了“武力吉哈德”。当他确知理查已经从阿克启航前往西欧，便解散了为“武力吉哈德”而组织的大军。

阿拉迪尔基本延续了兄长的战略方针。在理查与萨拉丁的和议到期之际，他主动联系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导人耶路撒冷国王，延长了双方和议的期限。

无论是萨拉丁还是阿拉迪尔，都容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穆斯林所称的“法兰克人”的存在。当然，他们的容忍是以西方不再派来新的十字军为前提的。

而理查和第三次十字军所夺得的，实际上是中近东的法兰克人的“满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十字军的精神逐渐镇静下来，他们慢慢淡忘了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意识。

然而，这种状态反过来动摇了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强权人物努拉丁和萨拉丁出场之前的伊斯兰社会的特点——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再次浮现出来。

1194年，萨拉丁死后不到一年，他的儿子们之间就爆发了武力冲突，只好请叔父阿拉迪尔来做仲裁和调停人。1196年，冲突再次爆发。这次，阿拉迪尔和其他继承人一致认为，阿夫达尔不适合做萨拉丁的继承人。于是，这位长子被从大马士革流放。

两年之后的1198年，取代阿夫达尔掌握阿尤布王朝大权的阿齐兹，在一次狩猎之中落马而死。得知这一消息的阿夫达尔，便摩拳擦掌，准备重掌大权。

但是，各地的埃米尔相信，年轻的阿夫达尔没有能力掌管整个王朝。埃米尔们请求阿拉迪尔出来主持局势，并一致希望他继承阿尤布王

朝。

此时的阿拉迪尔，并不想僭越亡兄的遗子们才有权继承的王位。直到1201年阿夫达尔宣布最终隐退之后，阿拉迪尔才继承了苏丹的宝座，当时他已经58岁。

阿拉迪尔对阿尤布王朝的领土进行了重新分配。

落马而死的萨拉丁次子留下了一位继承人，17岁的曼苏尔，成为埃德萨的统治者。

阿拉迪尔的长子，21岁的卡米尔，得到了埃及的统治权；次子穆阿扎姆则统治大马士革；他的三子与四子分别统治各个地区。

意味深长的是，阿拉迪尔只给予自己的儿子以父亲名义统治的权力。虽然这一点是后继的卡米尔所不能忽视的障碍，毕竟深受兄长信任的阿拉迪尔，是在僭越其兄直系子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统治的。

不过，阿尤布王朝的统治，终究再次巩固了。

在完成内部权力交接之后，伊斯兰世界实力最强的阿拉迪尔，就与威尼斯共和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的通商条约。

拥有着与萨拉丁一起身经百战的经验的阿拉迪尔，与兄长一样深知意大利诸邦海军的强大实力。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岛，已经在路西尼安的统治下，成为从西欧前往中近东的重要中转站。但由于其防御设施还没有设置完备，以当时穆斯林的军力，是有可能征服塞浦路斯岛的。然而，由于塞浦路斯四面环海，而基督教一方控制着制海权，就算是再多穆斯林军队，也无法抵达这个岛屿。

不仅塞浦路斯的情况使阿拉迪尔只能对其保持现状，他还要尽力避免使伊斯兰世界受到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威胁。如果新的十字军要来到中

近东，他们必然依靠来自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因此，伊斯兰世界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设法瓦解十字军的海上同盟。

在选择和平谈判的对手时，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情况并不相同，主要是各国能够控制其投入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不同。比萨，特别是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很强，因此国家对其军事力量的实际控制比较弱。因此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威尼斯相对更为合适。

通过缔结和约，威尼斯所得到的利益，就是能够在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迪尔控制的全部领土内，从事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威尼斯的商人们，因此得以在比商业对手更为有利的环境中营生。

然而威尼斯商人是非常讨厌集中的。在政治上，威尼斯人并不喜欢中央集权，而在经济活动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分散风险。即便埃及为他们提供了市场中的最高地位，威尼斯商人还是感到不能满足。

如前所述，教皇英诺森三世、威尼斯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和继任苏丹的阿拉迪尔，是第四次十字军时代的主人公。

始终处于明处的丹多洛的侧面，站立着英诺森三世，而阿拉迪尔则是与英诺森三世对立位置的幕后人物。但这三人在第四次十字军时代的主人公位置，一直没有变化过。倘若这三位角色中少了任何一人，第四次十字军的历史都必将改写。

因此，在此三人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过是“马驹”罢了。

年轻的法国诸侯

在12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天，法国西北部香槟地区城市的舞台上，开始了一场马上决斗锦标赛。

主方是22岁的香槟伯爵蒂博。挑战的客方则是27岁的布洛瓦伯爵路易。

两人都是位居法国国王之下的封建诸侯。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拥有比国王直辖领地更广阔土地的封建诸侯，并不少见。而作为香槟伯爵来说，其身份特殊的是，无论与法国国王腓力，还是与英国国王理查，都具有来自母方的亲戚关系。

在香槟伯爵主推的锦标赛中，不仅有来自法国各地的亲戚关系盘根错节的诸侯，也有从各地赶来争夺冠军的骑士们，因此是云集了各路好手的盛会。现场甚至有教皇英诺森三世派来的教士。

身着华丽服饰的贵妇，在比赛结束时参加进来，为城内举行的大宴会锦上添花。在中世纪的宴会上，干杯之前必然对神充满感谢，此时正是高级神职人员出场之际。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新十字军的决定，传达到了会场。他没有通知皇帝与国王，而是对诸侯寄予厚望。

毕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所率的第二次十字军以失败告终。

英、法、德三国君主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最终未能夺回圣城。在英诺森三世眼里，这也是一次失败的远征。

只有第一次十字军成功解放了耶路撒冷。诸侯的头上虽然没有皇帝和国王的冠冕，所率的兵力却并不比各位君主们差。因此，英诺森三世认为，以强大的封建诸侯来率领新的十字军，是最稳妥的策略。

在宣示骑士精神的马上锦标赛结束之后，教士们热情洋溢地描绘着新的十字军远征。年轻骑士的心中，立刻燃起了对战斗的渴望。

于是，蒂博当着全体骑士的面，宣誓出征。蒂博的兄长，就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中跟随理查一世参战，并娶到耶路撒冷王位继承者西比拉的新任耶路撒冷国王亨利。就在两年之前，亨利于阿克病死。蒂博自然想趁机继承亨利在法国和中近东的全部产业。

在蒂博之后宣誓远征的，是这场锦标赛的主客，布洛瓦伯爵路易。两人之后，又有30名参会者接着宣誓。

第二天，香槟伯爵蒂博致信身在布鲁日的表兄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后者在回信中同意与其表弟一同出征。

弗兰德斯伯爵家族的全体骑士们，参加了先前的全部三次十字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弗兰德斯伯爵在阿克之战中战死。尽管如此，家族中还是有两人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

得知弗兰德斯伯爵加入了十字军，其他诸侯纷纷效仿。在听说这一消息之后，立即有40名骑士宣誓加入。诸侯和骑士的宣誓加入，意味着他们的全体家臣和仆从都加入了十字军的行列。

与第四次十字军有关的最可信的史料，是香槟伯爵的家臣维拉哈都因所著的行文平实却以情节出彩的记载。此人亲眼目睹了第四次十字军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最先宣誓的70位骑士的名单中，也能找到他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书写着中世纪法国骑士精神最灿烂的篇章。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的这支没有冠冕的十字军，出自完全现实的考虑。

弗兰德斯伯爵纹章（黄底黑狮子）

布洛瓦伯爵纹章（蓝底黄白绶带）

香槟伯爵纹章（蓝底黄白色绶带）

但是，在这份书写着法国最出色骑士的名单上，并没有几位重要人物的名字。

其中第一个，就是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公爵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并在法国国王腓力回国后负责掌管留在圣地的法军，与理查一起参与了其后的战斗。理查和萨拉丁达成和议之前不久，公爵病死于推罗。结果，整个公爵家族和家臣都滞留在东方的勃艮第公国，成为法国国王腓力领土扩张的直接目标。在香槟伯爵带领诸侯发誓的时候，腓力依然健在，还在对勃艮第公爵的领地保持强大的压力。因此，勃艮第公爵家必须首先防御好自己的封地，而不能参加十字军东征。

在今天法国境内，还有一个地区的领主没有响应香槟伯爵的倡议。

这就是在理查死后仍为英格兰所拥有的法国西南部地区。这一地区

的诸侯不参加第四次十字军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当理查死后，他们必须团结起来防御法国国王腓力的威胁。

说起来，法国国王腓力真是位既不为教皇所喜爱，也被其他诸侯厌恶的君主。这位狡猾的政治家，年仅35岁。

香槟伯爵蒂博很快将骑士们宣誓的情况汇报给了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读罢蒂博的来信，感到喜出望外。他所朝思暮想的十字军，今天终于迈出了成立的第一步。就任教皇两年以来，这是最大的喜讯，令他兴奋不已。

英诺森三世向整个西欧发布了特别的公告，宣布只要在这次十字军中从军一年，就可以免除世间的罪。中世纪的基督教常将死后的惩罚描绘得异常恐怖，因此对中世纪人来说，得到免罪，无异于心灵的救赎。

来自最高宗教权威罗马教皇的免罪布告，为参加十字军的西欧天主教徒提供了精神救赎的正式保证。更多人因此纷纷踊跃参加，并最终齐聚法国南部的苏瓦松。在这次集中期间，各路诸侯开始讨论如何组织兵力，何时出发，以及取道哪条路线。

这些现实问题，在青年人为主的各路诸侯热烈的讨论之下，变得毫无结论可言。最终，诸侯选出6位代表，以他们来决定全体的意志。6位代表分别产生于香槟伯爵、布洛瓦伯爵、弗兰德斯伯爵家的家臣之中，每家2名。为这次十字军留下记载的维拉哈都因，也是代表之一。40岁的维拉哈都因，是香槟伯爵的侍从大将。

在6人的努力之下，现实问题均得以解决，结论如下所述：

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地，是埃及的首都开罗。

这是从第三次十字军时代理查断绝萨拉丁的补给路线所推论的下一个需要征服的地区。埃及是穆斯林重要的大本营。

二、远征部队从海路行军。

根据以往的经验，陆路行军会遇到各种危险。因此，取道海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三、由威尼斯共和国运输全体十字军部队。

在第三次十字军时代，威尼斯共和国的舰队就主动担负了海上运输的职责。但上次他们所运送的十字军部队，只有此次规模的1/10。此次十字军出征的大军，完全委托威尼斯舰队运送，是因为只有该国拥有能够运输全部十字军及其装备的海上力量。关于这一点，6位代表一致同意。

这一提议得到了香槟伯爵、布洛瓦伯爵、弗兰德斯伯爵和新加入首脑阵营的圣保罗伯爵的一致同意。得到主公信任的6位家臣，立即动身前往威尼斯联络，其时正当1201年5月。

“海都”

元首丹多洛专程迎接了6位使节：

“我已认真拜读派遣诸位阁下的位极人臣的诸侯所递交的国书。诸位阁下所决定的，自然与派遣各位前来的诸侯一致。那么请问，诸位希望我国做些什么？”

“我等希望阁下召集内阁会议，最好是在明日。在会上，我等将尽述主君的意向。”

丹多洛回答说，想次日就召开内阁会议，恐怕是来不及的。他与来使约定，4天后召开会议。

事实上，第二天就开会并没有什么来不及的。在威尼斯共和国，针对大事件所召开的特别内阁会议，常常在当天晚上就能够召集起来。而这段特殊时期内，内阁会议所秘密讨论的，是与阿拉迪尔订立的通商条约。

然而对威尼斯的秘密一无所知的6位使节，只好先在这4天之内静静休息等待了。直到约定的当天，6人来到了壮丽豪华的元首官邸内。在内阁会议室中，自元首以下的全体威尼斯内政外交官员们，迎接了到来的使节。6人中最为年长的维拉哈都因，首先开口了：

“各位阁下，我等是法国最具权威的诸侯所派遣而来的。我等的主君，以上帝的期望为志，已奉耶稣基督之名在十字架下宣誓，夺回为异教徒所强占的圣城耶路撒冷。

“我等悉知，贵国拥有无比强大的海军力量。因此，还望诸位阁下

提供海军支持，与我等主君之军队同心协力，以耶稣基督之名一雪前耻。”

元首丹多洛问道：

“使用怎样的方法呢？”

使节们答道：

“任何方法都可以。”

从法国来访的6位使节，希望威尼斯能够提供运输十字军全军的足量船只。这自然还包括必要的操船手和划桨手，以及海路行军所需要的军粮。听罢使节的诉求，丹多洛这样回答：

“诸位与我国商议的，是最为崇高的事业。我国自然也要依赖诸位，才能对这一事业有所成就。请诸位于8日后再次聚于此地，我国届时将做出答复。”

于是，使节们继续在威尼斯等待8日。他们完全理解，对于这样重要的大事业，威尼斯共和国自然有花费时间慎重讨论的必要。

但这段时间内，威尼斯共和国实际上在做的，是与伊斯兰世界掌握实权的第一人，苏丹阿拉迪尔，进行一项秘密的通商条约谈判。

在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紧急决议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就交由包括元首在内的10人内阁会议来定夺。此时，元老院只会对内阁会议的决定进行事后承认。

而这一决议手段，在强调多数决定的共和制国家中，是独具威尼斯特色的避免贻误时机的策略。元老院的事后承认是其中关键的步骤。元老院议员的人数是内阁会议的10倍，而威尼斯政府官员的任期则是一

年。当年的元老院议员，在一年后很可能就会成为政府官员。这样的机制使威尼斯共和国很难发生内部的斗争和变乱。

在这1201年初夏，威尼斯共和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大问题。因此，8天的准备时间并不长。

就在这几天之内，出使埃及的阿拉迪尔的船只从威尼斯启航了。船上带着元首亲笔签名的条约文书。

威尼斯是发明复式簿记的国家。这些面面俱到的准确记录，体现了出色的威尼斯商人的细致之处，这种细致流淌在威尼斯人的血液里。

然而在威尼斯共和国，也有完全没有留下记载的事件。一般来说，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件，都得不到记载。因此，虽然与法国诸侯使节的谈判记录得以详尽保留，威尼斯与阿拉迪尔的秘密谈判则没有任何记录。在以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代表面前，威尼斯不能露出任何马脚。

因此，威尼斯和埃及的谈判的细节，我们只有去想象了。我想，这也是中世纪的奇妙之处吧。

回到使节与元首会谈这一头，8天之后，6名使节来到了元首的官邸。丹多洛告知他们：

“诸位使节，威尼斯共和国决定接受各位主上的请求。然而这最终还需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承认。”

元首接着说，

“根据各位所提供的数字，我国提供运输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所需的船只，以及运输4500匹战马和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而为这些兵士和马匹提供必要军粮的工作，我们也将完成。

“我们尽量降低以上各项的费用。一匹马的价格是4马克，一个人的价格是2马克。

“因此我们提供的合约，是保证十字军在一年之内从威尼斯港出发，费用共计8.5万马克。”

马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也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货币。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未开始铸造100年以后整个地中海世界和西欧的流通货币杜卡特金币，本国的货币还是一种叫作格罗索的银币。此时威尼斯使用马克，就像今天外汇交易中使用美元或欧元一样。

例如，使禁闭中的理查一世恢复自由的赎金，大约是10万马克。付出这样一大笔钱，需要索尔兹伯里主教来回奔走。对于理查一世这样萨拉丁眼中的枭雄，付出的赎金自然要十分可观。

理查死后两年，威尼斯向十字军诸侯索要8.5万马克的费用，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并不算过分——这自然是从威尼斯商人的角度来看的。

10年之前，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热那亚之间的协定，是在8个月之内完成运输，每2匹马和3个人收取9马克费用。

这次威尼斯的情况，期限为一年，运输的数量也不同。腓力的部队包括650名骑士、1300名马夫和1200匹马，而法国诸侯的兵士和马匹数目要多得多。

上次热那亚运输法国军队时，并不需要新造船只。但这次威尼斯不仅要动员全部的商船，还要为运输马匹特别建造大量新的平底船。

平底船的基本构造，与当今运输汽车的运输船相似。在800年前，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很多这种平底船。

因此，威尼斯共和国所提供的8.5万马克的数目，并不是很高的价

格。当今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个价格也就是当时的市价而已。

此外，根据双方的契约，每匹马需要的粮草是8蒲式耳[1]的燕麦，而兵士则可以得到包括面包、奶酪、香肠、蔬菜和半壶葡萄酒在内的食粮补给。

骑士和马夫虽然都支付2马克，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骑士还会通过自带财物购买更多的食物。

这8.5万马克，需要分四次付清。

根据计划，8月中旬，十字军支付1.5万马克；11月1日支付1万马克；到1202年2月中旬，再支付1万马克；最后5万马克统一于4月中旬支付。

威尼斯一方的义务，则包括在一年后的1202年6月24日之前，提供全部船只和水手。

来自法国的使节们对契约的明细极为满意。

然而正在此时，威尼斯共和国提出了比萨和热那亚未曾做过的提议。

---

[1] 蒲式耳：1蒲式耳（英）=4配克（英）=36.3688升。

威尼斯参战

威尼斯元首亲自率领50艘武装桨帆船以及6000名水手和战斗人员参加十字军。作为交换，威尼斯要求获取此次东征所占领土地的一半。也就是说，威尼斯并不仅仅扮演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而是要与法国诸侯共同作战。

6位使节一开始对此犹豫不决。但经过当晚的讨论，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得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力同盟，使6位骑士兴奋得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同意了元首的要求。

数日后，在维拉哈都因眼中世间最堂皇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威尼斯全体公民参加的盛大弥撒。

弥撒结束后，元首通知在住所中等待的使节们，公民大会通过了与法国诸侯的十字军契约。于是，在全体公民的注视下，使节们进入了圣马可教堂。维拉哈都因代表香槟伯爵，在教堂内发表了演说：

> 各位公民阁下，拥有最高贵血统和最强大权力的法国诸侯，派遣我们6人来到贵国。为了夺回被异教徒奴役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将与诸君共同作战，以上帝与圣子耶稣基督之名，一雪前耻！
>
> 我们之所以选择与诸位合作，因为威尼斯人乃是强大的海洋民族，是任何其他海洋国家都无法匹敌的。诸侯命令我们在各位面前屈膝，表达我们真心诚意的希望。各位威尼斯公民，请为地中海彼岸的圣地而祈祷吧！

6位法国使节齐刷刷的跪倒下来。教堂内的人们见到法国骑士们的样子，霎时间静默下来。瞬间之后，元首的呼声起来：

“诸位，是否同意啊？”

元首的呼唤如同点燃了众人心中的火焰。宏大的圣马可教堂中，“同意！我们同意！”的喊声此起彼伏。在维拉哈都因眼中善良而深谋远虑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向教堂内的公民说道：

> 诸位公民，上帝已将无上的荣誉给了你们！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们，并未选择其他国家，而是与我们结成了同盟。我们将一雪前耻，为主耶稣的至上高贵事业共同奋斗！

这样，代表威尼斯最高主权的全体公民大会通过了与法国诸侯共同出征的建议。在威尼斯共和国之内，解决国家大事的最终裁决，要通过公民大会的鼓掌多数票。在此之后，双方剩下的只是具体的签字仪式了。在契约文书上面，有出发日期的明确记录。

双方决定，1202年6月24日，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纪念日那天，第四次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

到该日，十字军的参加者和朝圣者全体在威尼斯集合完毕。威尼斯一方则准备好全部的船只和水手。

在签字画押完成的契约文书之前，使节和元首们手按《圣经》，以上帝的名义宣誓逐条执行契约的各个条目。文书的副本被立即送往罗马教廷，很快得到教皇“十分满意”的批示。

然而，这份对军粮的详细条目清楚记载的契约书，并未写明远征的目的地。根据维拉哈都因的记载，双方秘密约定，远征目的地是埃及的开罗，但他并未指出为何秘密约定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这一事项，在后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文书签署之后，使节们从威尼斯的银行预先借出2000马克，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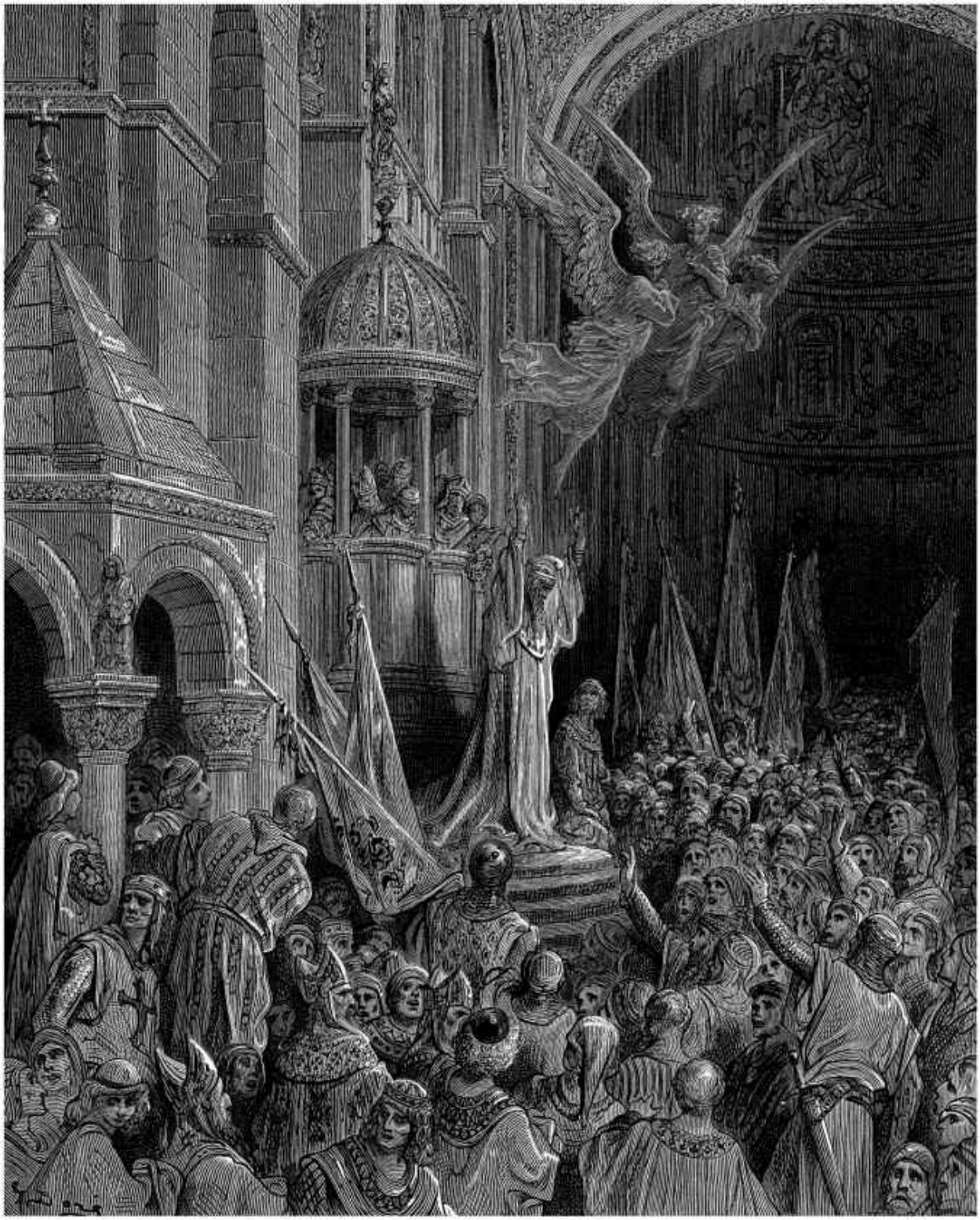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付款的定金，然后就返回法国回报各自的主君。

当使节离开之后，威尼斯便开始举全国之力准备十字军东征。

威尼斯需要为法国诸侯准备3.5万人和4500匹马所需的粮草，以及大量运输船。这不啻是一桩大事。共和国命令其在地中海上航行的全部商船，于当年底之前返回威尼斯，还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城镇和乡村大量募集水手。

威尼斯的造船厂一时间也忙碌了起来。为运输马匹所定制的大量平底船，在紧锣密鼓地制造着。

到第二年的春天，需要建造400艘这样的平底船。对于当时地中海海运力量居于第一位的威尼斯来说，也要动员全国的国力才能完成。



在圣马可教堂向市民呼吁的元首丹多洛

第四次十字军对于威尼斯来说，是举国的投资。因此，他们自然是

按照契约的各个细节，认真完成的。

在法国

为了尽快传达喜报而昼夜兼程骑马回到法国的维拉哈都因，却见到了自己正卧病在床的主君。

香槟伯爵蒂博听罢维拉哈都因的汇报，立即打起精神，感到十分喜悦，甚至命令马夫牵来自己的战马，想练习骑术。但他上马之后不久便再次感到不适，重新回到了床上。

伯爵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这使他不得不留下遗嘱。他授意将自己用来出征的资金分配给属下的骑士，以使他们能够在誓约日期前抵达威尼斯。

蒂博也将自己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维拉哈都因。

之后，这位年仅23岁的伯爵就撒手人寰了。

得到伯爵遗赠的骑士虽然很多，却有不少人留了下来，没有前往威尼斯。

失去了总司令的十字军，必须选出另一个人来领导。会谈之后，众人推举勃艮第公爵承担这一任务。但勃艮第公爵不仅拒绝担任总司令，甚至连参加十字军都拒绝了。最终，使节们没能说服拥有像亡故的香槟伯爵一般影响力的诸侯担任总司令。毕竟，各大诸侯都在为了抵抗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扩张领土的图谋而做准备。

最终集合在苏瓦松地区，为十字军东征而商议的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商议的结果，是任命蒙费拉特侯爵博尼法乔为十字军的总司令。

蒙费拉特侯爵是意大利人，也是法国国王腓力的亲戚，以战场上的勇猛而著称。博尼法乔比三位伯爵年长，已年过半百，爽快地答应了诸侯的请求。

在前往苏瓦松的路上经过巴黎的博尼法乔，得到了腓力的热烈欢迎。

这是自然的。对腓力来说，第四次十字军当中有很多人是自己领土扩张的障碍。此时由自己的亲戚、老练的蒙费拉特侯爵担任十字军的统帅，自然有着帮助国王消除障碍的作用。

腓力把这次东征当作一次良机。此时理查已经驾崩，继承英国王位的约翰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十分无能。而其他诸侯则由于参加第四次十字军而不在封地，给法国国王以可乘之机。

离开巴黎，抵达苏瓦松的蒙费拉特侯爵，与在当地等候的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一起，在苏瓦松主教堂的十字架下宣誓出征。仪式结束后，十字军正式发兵。在大主教出席的庄严仪式上，全体十字军宣誓于约定之日前抵达威尼斯。

苏瓦松宣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法国。自此之后，决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大量增加。但相对于普通的骑士，诸侯级别的封建领主数量并不多。

从1202年4月14日复活节前后，到6月2日的五旬节，法国的骑士们大都完成了旅程，到达了威尼斯。他们的路线是在法国境内从北到南，然后再自西向东横穿意大利。

与此同时，一些拥有舰队的弗兰德斯骑士们，顺着大西洋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终抵达威尼斯。

这一行人从布鲁日出发，计划与弗兰德斯伯爵在威尼斯会合，一同

手持《圣经》宣誓出征。伯爵及其兄弟委托经海路南下的骑士，运送了远征的必要物资，自己则与属下骑士沿陆路前往威尼斯。

然而，这支沿海路出征的队伍，始终没有抵达威尼斯。当十字军大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德内港登陆时，也没有见到这些来自弗兰德斯的骑士。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实际上直接前往了巴勒斯坦。

他们抵达圣地之后，很快就与当地的穆斯林兵戎相见，结果大都被杀，只有极少数人返回了故土。

从法国出发的骑士中，也有并未抵达威尼斯，而取道马赛乘船前往莫德内。这些人当中，也有并未抵达莫德内的。他们的命运，也大都像那些失散的弗兰德斯人一样。

在维拉哈都因的笔下，记录的满是这些同袍们的悲怆故事，与之伴随着的自然还有抵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的情况。维拉哈都因评价威尼斯元首丹多洛时，用了“善良”的字眼。而这位真诚而善良的香槟绅士自己，则是通过婚姻取得领地。他毕生谨守去世的主君遗赠的地产，绝不在同志面前做任何利己的单边行动。可以说，维拉哈都因的人生，笔直地走在上帝所规定的“正道”上。

在威尼斯集结

在约定日期前不久，又有一位善良的绅士抵达了威尼斯。他就是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期的临近，到达威尼斯朝圣者和普通士兵不断增加。

尽管如此，十字军的总数并不多。在期限的日子到来时，还在前往威尼斯的道路上缓缓前行的人不在少数。

威尼斯得到通知，蒙费拉特侯爵由于后方的事务而姗姗来迟。至于布洛瓦伯爵，也没有按时抵达。威尼斯的使者抵达帕维亚，并在那里拜见了在此逗留的伯爵，诉说了在威尼斯的始末。布洛瓦伯爵随即派遣了使节前往威尼斯，会见先期抵达那里的维拉哈都因和圣保罗伯爵。

此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和皮亚琴察，有许多法国人并未向东前往威尼斯，而是折向南方。有的人是怀疑威尼斯人的信用，而另一些人则是受到在意大利南部获得领土的同胞的邀请，到当地去与穆斯林海盗作战的。这些人后来并未与十字军主力合流。

由于中途离去者众多，在威尼斯集结的十字军兵士数量很少，甚至连与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所签署协议的1/3都不到。最终统计的官兵总数约为一万人。

当十字军兵士们来到威尼斯外港的圣尼古拉岛时，他们为所见的情景而震动。

用维拉哈都因的话来说，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没有见过如此浩大的舰队——不计其数的桨帆船、大帆船和平底船将港口围得密密实实。善良的维拉哈都因不仅惊叹道：

哎呀，那些骑士们为什么要离开前往威尼斯的正途啊？基督徒拥有这样的一支大舰队，彻底消灭异教徒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可是，到达这里的十字军，却只有约定数目的1/3！

威尼斯一方已经完全履行了双方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从伊利里亚到达尔马提亚之间的地区招募了大批水手，而本国国内的成年男子则有1/5计划参加十字军，可谓是以举国之力来完成与法国诸侯的约定。

相反，法国的诸侯却没有如约行事。大概是由于信心不够的缘故，为3.35万名行军人员支付8.5万马克的钱财，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法国国王腓力在国内的作战中征发了大约一万名兵士，而他此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时，仅仅率领了2000人。以当时法国的军事实力，地位低于国王的封建诸侯根本无法召集如第一次十字军时代一般的大军。因此，诸侯最开始估计的超过3万的人数在实际成行时就打了折扣。

当约定的日期到来时，抵达威尼斯的法国十字军总人数大约是一万人。在四次分期支付中，前两次的2.5万马克已经支付完毕，而剩下的6万马克则不了了之了。威尼斯得到的经费平均下来是每人两马克，剩下的部分只能依靠诸侯和骑士们自筹。

但十字军还是陷入了经费短缺的局面。最终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声称，如果得不到约定金额的经费，就将拒绝派出舰队。

关于这一点，后世的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在参战人数减少到原来1/3时，威尼斯还强行要求诸侯支付经费，是因为威尼斯已经为履行约定进行了大笔投资。

对此感到困惑的显然不止是诸侯，作为诸侯代表的维拉哈都因也在其列。但是在他留下的记载中，这位使节不得不承认，威尼斯人完全遵

守了约定，不遵守约定的是法国人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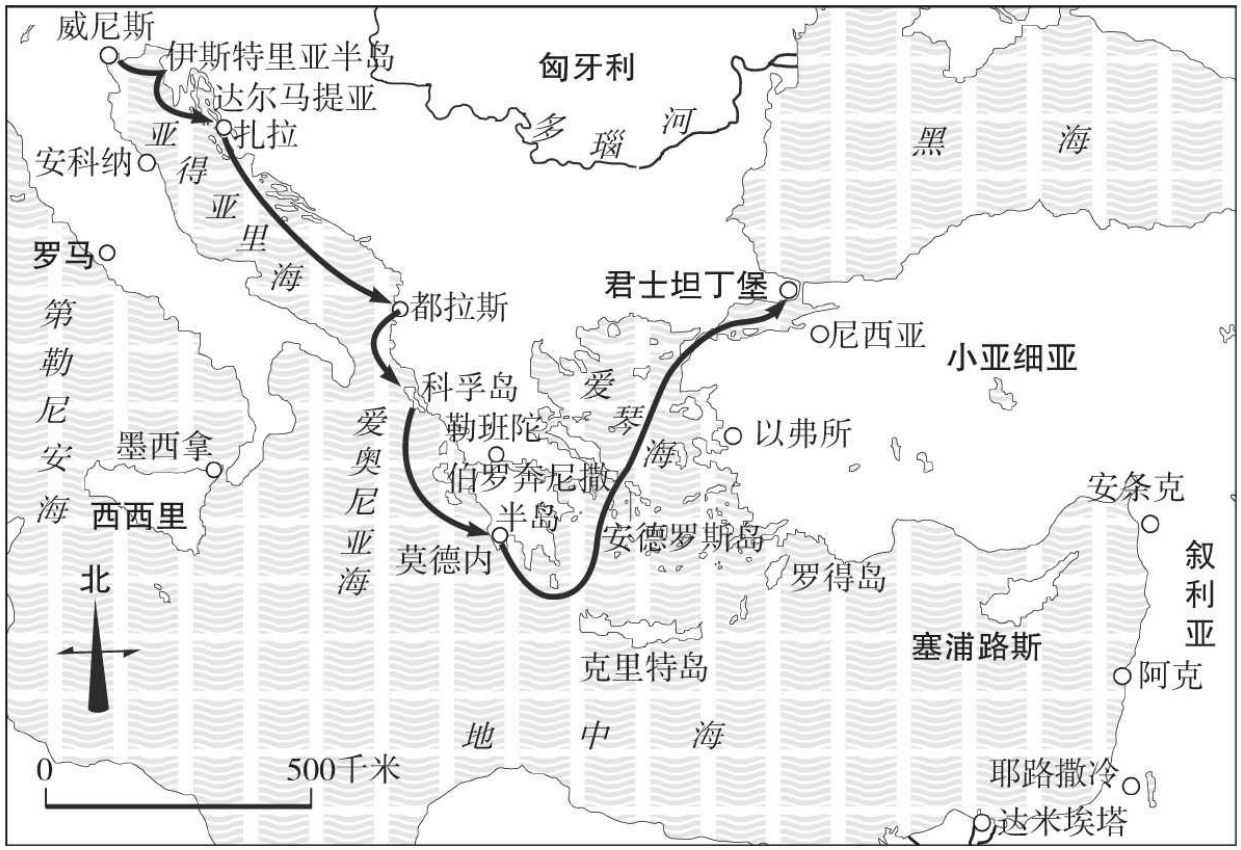
最终，各路诸侯协商决定完全支付这些费用。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金钱。最终，弗兰德斯伯爵将自己携带的全部金银财宝都变卖了，其他的诸侯和骑士们也竞相效仿，将堆积如山的金银器纳入了威尼斯的国库。

将这些财物全部抵充账款，十字军最后凑了将近3.4万马克。此时，上至各位诸侯，下至普通骑士，都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用来支付出征的费用了。

在这些法国骑士精神的代表看来，如果只是因为无法支付费用就导致此次十字军东征流产，那他们是没有任何颜面回国面见家乡父老的。此时，虽然威尼斯的银行有可以外借的资金，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向银行伸手乞援。

威尼斯政府只得静待法国人最终支付。到了6月24日那天，威尼斯的舰队依然停泊在港口之内。

焦虑的情绪在圣尼古拉岛上滞留的十字军将士们中间蔓延开来。虽然诸侯和骑士们能够进入威尼斯城，普通士兵则没有这个权限。当时不允许大量外国人进入城内，主要是出于治安和预防传染病的考虑。该政策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实行。眼看着面前的大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十字军士兵们却要在进退不得的局面下度过6、7两个月。



第四次十字军与威尼斯海军的进军路线

就在8月也只剩下几天的时候，元首丹多洛召集了十字军诸侯，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

丹多洛的提议是，如果十字军愿意在前往近东的过程中帮助威尼斯攻占扎拉城，威尼斯银行就可以为十字军提供期限尽可能长的贷款，以使这次东征成行。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从威尼斯出海的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城市。

由于匈牙利国王的煽动，扎拉城举起了反抗威尼斯的旗帜。由于不能以扎拉为航线中继港，威尼斯的船只回母港的通道就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因此，共和国无论如何要重新夺回这座港口。

让十字军接受这一提议，多少是有些困难的。毕竟，扎拉城的居民是基督徒，而支持他们的匈牙利国王也是基督徒。以消灭异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是不能攻击基督徒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让罗马教皇知道，可是会导致极为麻烦的结果的。

然而，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是要抓住的。于是，在丹多洛提出建议的当天，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都同意了威尼斯的提议。

与此同时，一部分不同意这一提议的骑士们，决定与大军分开单独行动。他们前往其他的港口自行乘船去巴勒斯坦，也有一少部分直接返回了法国。这样，一万人的部队又减少了一些。

得知十字军一方决定的元首丹多洛，率领威尼斯的全体参战人员在十字架下发誓，从此也加入了十字军的战斗序列。威尼斯的公民们群情振奋的情景，与法国人的士气低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连同水手在内的威尼斯参战人员的总数，已经与法国来的十字军人数基本持平。第四次十字军，由此成了法国诸侯与威尼斯共和国的一次联合远征。

万事俱备之后，诸侯和骑士们各自乘上分配好的船只。法国诸侯的总司令蒙费拉特侯爵和威尼斯元首丹多洛一起，乘坐这支大舰队的旗舰。

一时间只见人头攒动，潮水一般涌上船去。将士们一边运送着攻城器械和个人用品，一边赶着马匹上船，就这样整个9月的威尼斯都在忙碌中度过了。

出阵

1202年10月8日，最终等到了出港的日期。庞大的舰队将港口围得水泄不通，而激动的法国骑士们早已忘记了在威尼斯已耽搁3个月的事实。

这支舰队所载的攻城器械，数量达到300之众。船桅上秋风吹拂着诸侯和骑士们的各色旗帜；甲板上整齐排列着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盾牌；盾牌之后站立着手执钢枪的英姿飒爽的骑士们。

元首和蒙费拉特侯爵所乘的旗舰桨帆船，周身连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桅杆顶端飘拂着绣有金色圣马可狮子图案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旗舰的舰桥上站立着四位号手，手持银色的号角高声吹奏着。从桨帆船船腹两侧伸出的长柄划桨，整齐划一地舞动着，推动船只缓缓前行。桨帆船牵引着威尼斯大帆船倾巢而出。在港口外的海面上，桨帆船和帆船次第航行，船帆迎着徐徐秋风舒展开来。霎时间，水手们切断了桨帆船牵引帆船的缆绳，桨帆船的划桨像水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使船保持水平，逆风前行。大舰队就此离开港口送别的人群的视线，向着地平线的方向远去。

关于这支舰队的舰船数量，由于存在各种说法，并没有准确的数字。亲身经历的维拉哈都因，只是说此次出征的舰船为数众多，前所未闻，并没有任何数字记载。在爱德华·吉本所引用的威尼斯方面的记载当中，有如下的说法：

战舰用桨帆船——50艘；

运输用帆船——240艘；

平底船——120艘；

传令用小型桨帆船——70艘；

合计480艘。

但是，这一统计来自各船乘员记载的综合，其中多有重复。如果以双方约定的人数——3.5万法国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兵士来计算，威尼斯需要准备的船只数量并没有吉本统计的那么多。因此，根据当时及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的记载，这支舰队的船只总数大致如下：

桨帆船——50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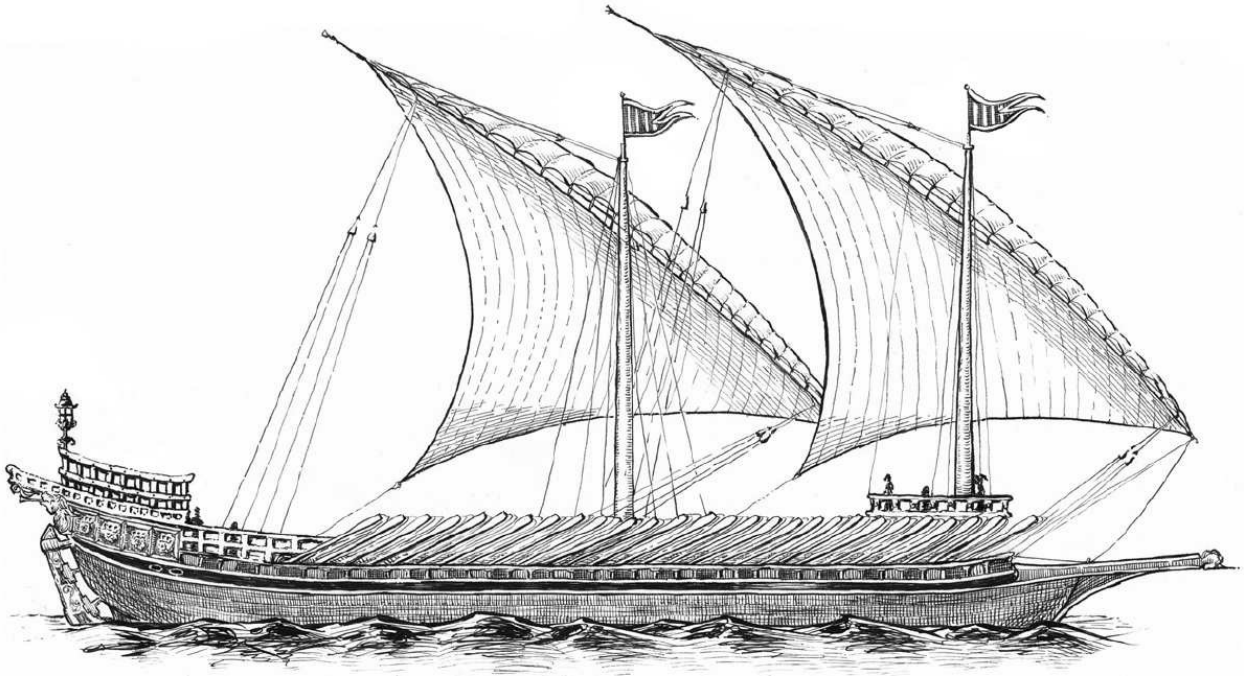
帆船——大约与桨帆船相同；

平底船——80艘；

快速小型桨帆船——20艘；

合计200艘。

实际的情况，是威尼斯一方的参战人员并未减少，而法国来的十字军人数为约定数量的1/3。



桨帆船

即便如此，在这13世纪初的时代，200艘舰船齐集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参考370年后勒班陀大海战时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投入的兵力，双方也不过各自调遣了200余艘舰船。

舰队离开威尼斯之后，首先向东航行，前往亚得里亚海东岸。这一地区的沿海城市拥有充足的新鲜食物和饮用水。威尼斯船只向其他国家航行时，都不在本国内购买食物和饮用水，而是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来大量购入。因此，舰队在这一地区停泊了一天。

从当天开始，到11月10日的一个多月内舰队的行动，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维拉哈都因的编年史里，只叙述了舰队离开威尼斯和抵达扎拉两件事。那么，在这一个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对威尼斯并无好感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推论的：

“谙熟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威尼斯人，在对此处陌生的法国人眼皮底下，驾驶着船只兜圈子。”

而对威尼斯没有恶意的历史学家，则对此提出了反论：

“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港口，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可以利用，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舰队还依照惯例，在这一地区逗留以招募中下级水手。”

后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原定6月招募的水手，由于出航晚了3个月，其中必然有一大部分已经回家。将他们再次召集出来工作，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这次舰队出海的时间也与平时不同，除了更长的勤务时间，还有未知的海战使人感到前途叵测。因此，在威尼斯公民当中，选择出战的人选，必然是十分缜密而慎重的。

攻占扎拉

11月10日，舰队在扎拉城外的海面上现身了。来自法国东北部的十字军骑士们，从未在海上看到过陆上的都市，面对眼前高耸的坚固的城墙，并不知道如何攻打，心中充满了不安。

虽然威尼斯也是面向大海的城市，由于威尼斯附近只有它一座大城市，亚得里亚海就充当了城墙的作用。因此，威尼斯并没有其他中世纪城市所普遍具有的城墙。因此，从陆路前往威尼斯的法国人见到的第一座耸立于海岸的城墙，便是扎拉城。

正当法国人发出慨叹的时候，元首丹多洛立即命令大型平底船强行突破封锁港口的铁锁，接着就要求扎拉的居民投降。

城内的居民立即将十字架和耶稣像抬到城头，要求同是基督徒的十字军停止攻击扎拉城，并声称绝不会屈服。

法国人虽然眼看着十字架和圣像，但还是从平底船上牵出马匹，完成了登陆和安营扎寨的准备。在海上，早已占领了港口内部的桨帆船队，已经将海路封锁完毕。

从11日开始的攻城战，在3日内决出了胜负；到第5天，扎拉城就宣告投降了。面向大海一侧的城墙被十字军攻破，于是扎拉的居民向威尼斯元首递交了降书。

得知扎拉之战的发生，教皇英诺森三世震怒不已。他立即发出手谕，将此次全体十字军处以开除出教的绝罚。

法国诸侯连忙向罗马派遣使节，将此前的情况详细禀明，希望教皇

可以解除绝罚。教皇得知了法国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之后，解除了对他们的绝罚。

然而，教皇依然维持对威尼斯人的绝罚处理。威尼斯人对此心态十分平和，并没有派遣使者请求教皇解除绝罚。

绝罚的威力，就在于使其他基督徒与被开除出教者之间划清界线。然而尽管如此，被绝罚了的威尼斯人和解除了绝罚的法国人还是一起组成了这次奇妙的十字军。

正当此时，一心想着征讨异教徒的法国人，被元首丹多洛的一段话泼了冷水。由于冬季航海颇为危险，元首建议整支大军在扎拉逗留到来年复活节前后。就算是忙于从事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舞台的商船，也会在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之间回到母国，修理船只，以避免在冬季航海。法国人只好听从了航海专家们的建议，决定延期到次年春季再向东进军。

在这段时间，教皇的使者来到了扎拉，传令解除对威尼斯人的绝罚。毕竟，继续这次十字军东征，还有赖威尼斯的船只提供运输。英诺森三世也就不得不承认威尼斯人对扎拉的占领了。

除了教皇的使者之外，另一位到访者，却做出了令法国诸侯和骑士们惊异的事情。

拜占庭皇子

12月中旬的一天，在扎拉的十字军首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这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子阿莱克西斯。他手持德意志王国国王的介绍信，与德意志王国的随从一起到来。

阿莱克西斯虽然贵为皇子，却被自己的亲叔叔夺取了皇位，还被打入了大牢。这位20岁的皇子最终成功越狱，并乘一艘商船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安科纳。

阿莱克西斯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德意志王国，向德意志王国国王求援。由于皇子的姐姐嫁给了德意志王国国王，他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与德意志王国国王约定帮助他夺取帝位。

拜占庭皇子在十字军的首脑面前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他请求十字军改变行军目标，前往君士坦丁堡，将无道的叔父推翻，使拥有正统皇位继承权的自己回到宝座上。

而阿莱克西斯列出了如下的条件作为事成之后的报偿：

1.向诸侯支付20万马克。

2.提供一万名兵士进攻埃及的全部军费。

3.在自己夺取皇位之后到整个在位期间，拜占庭帝国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提供500名骑兵，以协助防御穆斯林。

4.将希腊正教会统一在罗马天主教会之下。

十字军的首脑们鸦雀无声。对法国的诸侯来说，这一消息十分令人

意外。维拉哈都因的记载中，完全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因而我们就不能通过他的记载来悉知他和诸侯的立场和想法了。

不过，有一个人并未觉得此事意外，他就是十字军的总司令蒙费拉特侯爵。

当侯爵从苏瓦松宣誓出征之后，曾专程前往德意志王国会见其国王。此时阿莱克西斯正在德意志王国宫廷之内。因此，三人很可能在德意志王国举行了秘密谈判。而此时蒙费拉特伯爵所率十字军的目的地也渐趋模糊，以皇子提出的逐项条件来看，完全可以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正是蒙费拉特侯爵同意了皇子的提议。他还进而以接受提议的种种好处，来游说游移不定的法国诸侯。

如果能得到20万马克的资助，诸侯不仅能够还回威尼斯的借款，还能为十字军的后续开支提供足够的经费。

而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进攻埃及的部队就会增加来自拜占庭的一万名军队，这将大大强化十字军的兵力。

而阿莱克西斯许诺提供的负责巴勒斯坦地区防御的500名骑兵，加上随从共计达到1500人，对当地的基督徒来说是莫大的支援。

最后，历代教皇都希望却从未实现的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合并，将成为此次十字军给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好的赠礼。

法国的诸侯和骑士们深为蒙费拉特侯爵的话所吸引。他们还沉浸在攻陷扎拉的喜悦中，而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不仅是希腊正教徒所拥有的最大的都市，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大的都市。

而最为吸引他们的，就是皇子阿莱克西斯开出的最后一项条件了。

当然，第一到第三项条件已经足够吸引人了。与这些条件相比，一代代教皇孜孜不倦追求却从未实现的东西方教会之统一，若单单在威尼斯人的手上实现，对自负的法国诸侯和骑士们来说是分外眼红的。因此，他们不能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威尼斯人自己夺取了头功。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就没有这样的苦恼，丹多洛明确赞成了皇子的提议。

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并不相信皇子所提的条件可能真的实现。就算是一切顺利，皇子也兑现了诺言，威尼斯也不会参与其后对埃及的远征。

丹多洛在担任元首之前的大半生中，曾经分别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领事。因此，他对同是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和异教徒穆斯林的埃及都十分熟悉。由此所积累的经验，使丹多洛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信念：信奉相同宗教的国家之间未必会有良好的关系，而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之间也未必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扎拉被威尼斯攻陷之后，匈牙利国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拜占庭皇帝。匈牙利和拜占庭接近，导致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关系恶化，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的活动变得困难起来。

相反，穆斯林埃及与威尼斯的关系，却由于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阿尤布王朝的态度而顺利发展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尼斯与同是基督教国家的匈牙利和拜占庭的关系，远远不如其与穆斯林埃及的关系那么稳固。

但威尼斯人毕竟信奉“首先是威尼斯的公民，其次才是基督徒”这一并不符合中世纪一般伦理的座右铭。由于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往来，即便他们交往的对象是异教徒，也能秉持着“良心”而往来。

在扎拉重归威尼斯控制之后，成为了威尼斯海上航线的重要一站。而如果拜占庭的皇位归于与威尼斯友好的主人，威尼斯自然会对君士坦丁堡做更多的投资。

如果只是忠实执行双方议定的计划，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但是，如果要对议定事件之外的特别事态做考虑，并做出十二分的灵活利用，就需要特别优秀的人才了。

元首丹多洛，恰恰就是拥有统治者绝对必需才能的一位伟大人物。这一点，从当时和之后的事态发展中都得以充分证明。

行军目标变更

在为拜占庭皇子的提议而困扰的法国人之间，对于是否将行军目标变为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诸侯和强有力的骑士之间，就连一般的士兵也分裂成唇枪舌战的两派。

随着十字军的首脑中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陆续赞成了阿莱克西斯的提议，最终的决议也就达成了。十字军中的大部分，都将下一个行军目标定为君士坦丁堡。

然而十字军中毕竟还是有人不愿意进攻基督教国家的。一支500人的十字军队伍，从扎拉港夺取了停泊着的威尼斯船只，向埃及进发。但是，由于没有威尼斯水手肯为他们操船，这些人离开扎拉不久就无法继续航行下去，孤零零地在冬季的海上漂泊了几天之后，船只宣告沉没，没有人前来救援。

也有人取道陆路前往巴勒斯坦。这些人离开扎拉之后，就进入了匈牙利国王的控制区。这些法国骑士们受到匈牙利士兵的追击，幸好及时逃回了扎拉城内。自然，没有一个威尼斯人离开扎拉城。

最终，十字军与阿莱克西斯签订了明确记录以上四项条件的契约。法国诸侯的署名仅有10人。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圣保罗伯爵和元首丹多洛之后，还有6人署名。各位诸侯都是在同意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教皇得知了十字军行军目标的变更，再次震怒。但历代教皇中拥有最高权力的英诺森三世，对第四次十字军的既成事实，也只好事后承认了。

毕竟，如果能在自己在位期间，实现东西方教会的统一，对这位野心勃勃、学识过人的教皇来说，将是喜出望外的收获。

因此教皇并未像扎拉之战时那样给出明确的意见。至于绝罚之类的情况更是完全没有发生。他默许了十字军进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希望他们不要进犯行军途中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只要十字军不进攻其他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在进攻君士坦丁堡得手之后，教皇自然会予以承认。

一言以蔽之，英诺森三世希望能够重新将这支十字军控制在自己之手。

所谓教皇代理人，就是不能亲自参加十字军的罗马教皇在十字军中的正式代表。教皇代理人在肩负着上帝期望的十字军中，拥有与总司令同等的至高地位。但对教皇代理人来说，他还是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使节。在第四次十字军中的教皇特使，能够对十字军的首脑起到监督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钦差大臣”。

但教皇特使对元首丹多洛并不起这样的作用。丹多洛以特使并不重要为由，敦促特使早早返回了罗马。他派遣船只，将特使送回了教皇国的港口安科纳。

而当特使手持教皇的回信，再次来到扎拉港时，他发现威尼斯的船只已经无影无踪了。由于十字军离开扎拉以后不需要再回港口，原来雇佣的船只也都纷纷解散了。当特使再次到来以后，十字军的舰队早已离开了港口。

结果，十字军里就没有了教皇的“钦差大臣”。这支没有罗马教廷监视的第四次十字军，与理查一世所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的情况类似。

1203年4月6日，复活节期间，十字军离开了扎拉。当天出港的是帆

船和平底船组成的舰队。第二天，较少受风向变化影响的桨帆船队扬帆起航。

多种舰船混编的舰队，根据航速的差别，决定了一处集合目的地，然后从此地开始再次按顺序编队航行，前往下一处目的地。从扎拉出发后，下一处目的地是科孚岛。

元首、蒙费拉特侯爵和阿莱克西斯所乘的旗舰所在的桨帆船队，顺利地乘风驶出了亚得里亚海，南下来到了距离科孚岛只有两天航程的都拉斯。都拉斯虽然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却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威尼斯舰队停泊于此处，是为了要求港口的居民对阿莱克西斯宣誓效忠。效忠仪式结束后，舰队便离港前往科孚岛。

帆船和平底船队已经先期到达了科孚岛。平底船内的马匹被悉数牵出，由骑士引领着，在帐篷外休息。科孚岛的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浪涛声对面浓密的绿色杉树林，给从西欧北部前来的法国人以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

十字军在这座拜占庭帝国的岛屿上逗留了三个星期。这里的居民虽然表面上向皇子宣誓效忠，实际上却因为与意大利南部隔海相望，而时时刻刻都留存着反叛的心思。

然而，虽然南意大利人有想夺取科孚岛的心思，却未能跟对岸的同志们取得联系。直到法国诸侯从科孚岛出发，也没有任何反叛的事情发生。

5月24日，整支舰队按照平底船、帆船和桨帆船的顺序，从科孚岛出发了。当天晴空万里，清风徐徐，船帆借着风力张开，推动船只沿着水面前进。在目光所及的海面上，整齐排列着舰队的船只。法国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禁心潮澎湃，已经全然忘记了中途离开的那些人。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岸南下，在半岛南端的莫德内港稍作停留之后，转向东航行。从此经过一条狭窄的海峡绕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侧的爱琴海。就在此处，舰队遭遇了从马赛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两艘船。原来，这两艘船在巴勒斯坦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口，只好返航。船上乘坐的都是来自法国的骑士。

当双方的船只接近时，弗兰德斯伯爵向对方船只发出了询问所乘何人的旗语，但对方没有回答。只有一位骑士对伯爵船的方向看来，随即发出了大声欢呼。然而就这样，两艘船与大舰队相向而行，很快就消失在西方的天际。

在这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的舰队于途经的岛屿登陆补充军粮。而在以水源清澈而著称的安德罗斯岛，舰队的饮水得到了充分补充。

舰队就这样通过了爱琴海，又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在6月中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映入十字军将士眼帘的君士坦丁堡的壮观景象，令初来乍到的法国人为之倾倒。围绕着街道的城墙高耸，在城墙的险要处则建有坚固的塔楼。向城内眺望，可以看到数不清的豪华的宫殿和教堂。法国的诸侯、骑士和普通士兵，都为自己要进攻的这座世界最大的都市而感到胆寒。

在附近岛屿上登陆的十字军首脑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元首丹多洛在会上发言：

“在座的各位诸侯，我比各位更了解这座都市。各位今天所面临的，是任何民族都未能完成的大事业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以妥善而合理的方式取得这座都市。

“如果我们仅仅从陆上攻城的话，敌方国土广大，居民众多，人数劣势又缺少军粮的我军，必然会为了获取军粮而分散，从而被敌人各个

击破。我方的兵力已经很少了，不能因为任何缘故再损失兵力。

“而在君士坦丁堡周边有许多岛屿。在岛上驻扎就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军粮。因此，首先在岛屿上贮存军粮，然后再听从上帝的命令而行动吧。只有不为粮食发愁的兵士，才能勇敢地战斗。”

作战会议在当日结束，各位诸侯乘坐自己的船只分开行动。

然而，诸侯完全没有听从元首的建议。第二天（6月24日）一早，法国诸侯的军队纷纷手持武器，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从这一天开始，历时10个月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拉开了帷幕。

在这10个月间，由于与拜占庭谈判和获取军粮，双方一度休战，军事行动在此之后再次展开。此时，为了提高围困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军队的士气，元首丹多洛领导威尼斯军队采取了全新战术，为限于停滞的战线注入了活力。

以地中海世界最强城防而著称的君士坦丁堡，在10个月之内就被军力并不强的第四次十字军攻破，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事件。

不过，在此处我打算略去对这场攻城大战的叙述。其原因如下所述。

我在30年前所著的《海都物语》[2]中，已经从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角度，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第四次十字军的经过。

毕竟，第四次十字军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其“高速成长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在编著该国通史时，有必要用整整一章内容来充分论述。

然而，在本书中详细叙述君士坦丁堡之战，也是有理由的。在本书中一直以从事海运和贸易立国的威尼斯人，参与到正式的攻城战，特别是攻击陆地上大都市的战争之中，说明威尼斯人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古罗马时代详细考察罗马共和国与汉尼拔作战的三次布匿战争的理由是相同的。

同样，对战争的胜败来说，胜者是如何取胜的，而败者是如何失败

的，都值得认真检视。

《海都物语》的主人公，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民们。因此，在写作该书时，我有必要详述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经过。而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东征的十字军战士，而此时的敌人是穆斯林。相反，在《海都物语》中敌对的，是天主教徒和希腊正教徒。因此，在这本《十字军的故事》中，我有有意省略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理由。关注这场战役的读者，请参见《海都物语》的上册。

此处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线索，与我在30年前著作中的叙述相同。当时我对善良的维拉哈都因的叙述与不能称之为善良的威尼斯记载的比较，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必修改。

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我并不想完全追述当时的记载，其原因在于，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到了穆斯林撰写的原始材料。

30年前，我阅读了十字军东征历史权威史蒂文·朗西曼的《十字军的历史》一书。通过对他翻译的伊斯兰史料的掌握，我了解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记录。

然而，虽然朗西曼是博学的史学家，他却会从自己的史观出发，在对原始材料介绍的过程中，筛选一部分进行论述。因此他所翻译的伊斯兰史料并非完整的记载，而是从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的引述。这样，我所引述朗西曼作品中的伊斯兰史料，就是“二次引用”的了。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从整体上参考了伊斯兰史料。这次不再是通过“二次引用”，而是虚心地从头到尾读过了一遍原始材料。如果说在部分引用时我只是对问题有了粗线条的了解，在虚心拜读原始材料之后，大致上就有了整体的把握。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必须提及——史料毕竟是人写的，完全依赖史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处理——如果只是片面依赖某一方面的史料，必然会导致引用者实际写作中

出现偏差。

30年后我读到的这些伊斯兰史料，为我提供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介绍鲜为人知的阿拉迪尔一方情况的机会。这就为第四次十字军在英诺森三世和元首丹多洛之外又增添了一位主角。如果不是因为阿拉迪尔的缘故，这次十字军东征将如何进行下去，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了。

而我从此著作开篇起就十分尊重的著名历史学家朗西曼，在其代表作《十字军的历史》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指的是1453年的那次）中，跟我对同一事件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朗西曼是这样概括狮心王理查一世的：

“他是最坏的儿子，最坏的丈夫，也是最坏的国王。但如果从一员战将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最勇敢而完美的。”

以性格严谨而著称的朗西曼笔下的理查和我笔下的理查，几乎是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理查绝不是一个坏儿子，也不是坏国王，而由于其妻子贝伦齐亚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参考，两人虽然没有留下子嗣，也不能因此说理查是最坏的丈夫吧。也许朗西曼认为，理查把妻子撇在一边，自己在战场上出征，是一件坏事。

我还是回到正题，不再说无关紧要的话了。

---

[2] 《海都物语》中文简体译本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者注

拉丁帝国

在10个月内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城内，发生了拜占庭皇室内部的仇杀。双眼失明的老皇帝连同前来复仇的皇子阿莱克西斯都一命呜呼，杀死他们夺取帝位的穆尔祖弗洛斯则逃亡小亚细亚。拜占庭的帝位成了空位，威尼斯人则抓住机会，计划扶持一位亲威尼斯者登基。

最终，一个名叫“拉丁帝国”的新国家建立了起来。而为了建立这个国家，一位新皇帝必然要上台。

最终的人选，由法国方面的6名选举人和威尼斯方面的6名选举人决定。

一开始，当选皇帝呼声最高的，是集沉着与胆识于一身，受到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丹多洛。然而元首以自己高龄为由，推辞了出任皇帝的建议。

丹多洛拒绝出任拜占庭皇帝，自然是由于别的原因。作为威尼斯共和国普通公民的丹多洛出任别国的皇帝，就会有触犯威尼斯的共和制的嫌疑了。此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丹多洛一直是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祖国威尼斯才是丹多洛个人成就的根基，因此让他做出任何违背威尼斯共和国制度的举动，都是不可能的。

在丹多洛之外，出任拉丁帝国第一任皇帝的候补，就是十字军的总指挥蒙费拉特侯爵。侯爵自己则为了对选举人的心理施加影响，在城陷之后就当即与前任皇帝的皇妃、匈牙利公主举行了婚礼。

然而威尼斯方面并不希望由侯爵本人出任皇帝。出身意大利北部蒙费拉特地区的侯爵，与邻近的热那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又与威尼

斯的敌国匈牙利出身的拜占庭皇妃结婚，这绝不是威尼斯人心目中的皇帝人选。威尼斯人心目中希望的，是由弗兰德斯伯爵来出任皇帝。

选举的结果，果然是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成为新皇帝。他取得了威尼斯一方6人一致投票支持，也得到了部分法国选举人的选票，从而成为了简单多数票的获得者。

至于新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则由威尼斯共和国的托马索·莫罗西尼出任。

拉丁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加冕仪式上，新任牧首莫罗西尼为皇帝授予皇冠。而从蒙费拉特侯爵以下的法国全体诸侯和骑士们，都以臣下的身份宣誓效忠皇帝。

新皇帝将帝国5/8的土地授予了蒙费拉特侯爵以下的诸侯。只有将国土分配给诸侯和强有力的骑士阶层，才能使这些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臣下保持对皇帝的忠诚，而不至于出现内乱。

而威尼斯方面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未对皇帝宣誓效忠。最终，法国诸侯没有抗议威尼斯的做法，而威尼斯实质上取得了此次东征所获得拜占庭领土的3/8。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是拉丁帝国存在期间的“东罗马帝国3/8领土的拥有者”。

此外，在皇帝的官僚机构中，也始终有威尼斯人加入。

而这还不够，威尼斯成功地在拉丁帝国的政策中，加入与威尼斯敌对国家不能在帝国内经商的条款。这样，威尼斯人在拉丁帝国当中就没有了对手。

地中海的女王

这次十字军名义上的领袖是蒙费拉特侯爵，实际上则是元首恩里科·丹多洛。这位威尼斯元首的最大成就，就是完成了本国在地中海东部商业航线网络的建设。

威尼斯人在其海上商业帝国中的成功经营，使其在整个地中海的最大对手热那亚，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收复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失地。

威尼斯共和国在帝国领土中所获得的3/8部分，并非集中于一个地区。帝国的内陆部分大都处在法国封建诸侯的占有下，而威尼斯人则保持了对军事和贸易要地的控制。这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威尼斯十分明智的做法。他们只对能增加本国利益的区域感兴趣，而对内陆地区并不关心。

在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沿着金角湾，布满码头和仓库的狭长地带，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周围，是威尼斯人的居住区。

威尼斯人的活动区域，既不是“面”也不是“线”，只是“点”而已。在人员不足，无法维持对这些“点”的控制的情况下，就只能将其让给其他国家了。威尼斯有许多友好城市，这确保了它能够控制在地中海世界的商业利益。下面我就将这些“点”一一列出：

亚得里亚海东岸中间位置的扎拉，在此次东征期间完全回到威尼斯手中。

亚得里亚海出口处的都拉斯。

进入爱奥尼亚海之后的第一个岛屿科孚岛，暂时是威尼斯控制下的岛屿，后来几经转手，最终在1386年完全落入威尼斯之手。

科孚岛以南的凯法罗尼亚岛，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一直控制在威尼斯人手中了。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德内和科洛内两个海角，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海军基地，史称“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还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南，接近克里特岛的克里贡德群岛。

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琴海的入口处的特尔米西奥内。在1386年之后，由于战略需要，威尼斯转而着手经营附近的那福利翁和阿尔戈斯。

还有爱琴海中的米罗斯、帕罗斯、纳克索斯、米克诺斯、斯坦帕利亚、提诺斯、安德罗斯等岛屿。

以上这些威尼斯共和国的直辖领地，都分别由威尼斯国内的大家族管理。这些家族，并非都忠实于本国的政策。

萨梅多家族控制了纳克索斯、米罗斯和帕罗斯岛，基奇家族则控制了米克诺斯和提诺斯，朱斯丁尼安家族领有西佛斯和泽亚岛，奎里尼家族和丹多洛家族则分别是斯坦帕利亚岛和安德罗斯岛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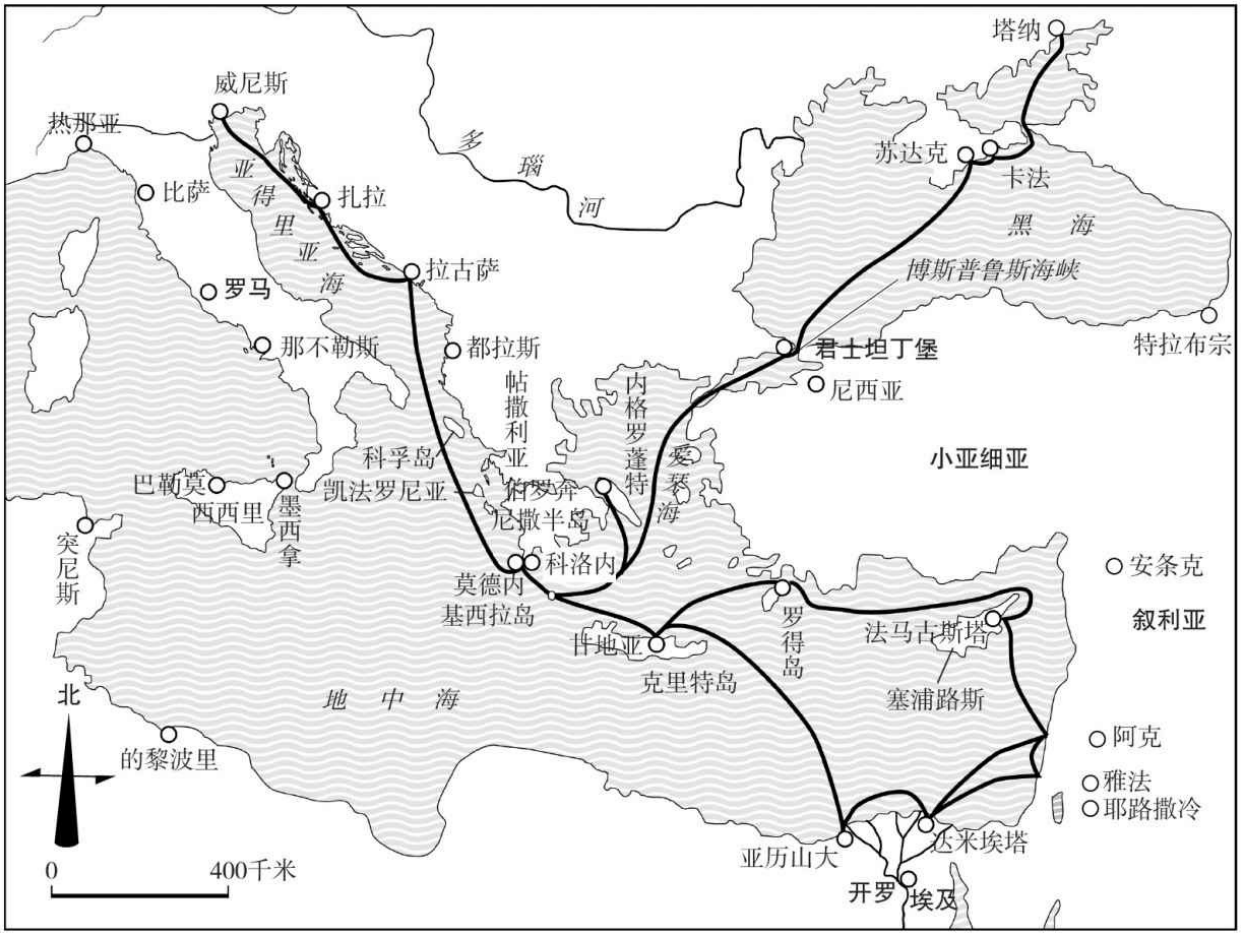
这些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带着自己的家庭移居希腊岛屿，在所领有的岛上开展经营活动。这些岛屿上居住着的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因此他们很难接受身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人的统治。作为变通，威尼斯的移居者并非以封建领主的形式控制这些岛屿，而是以类似公司领导和职员的方式，在岛上从事经营活动。这正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动物——威尼斯人所向往的。

而对于控制爱琴海不可或缺的内格罗蓬特岛（希腊语称优卑亚岛）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就必须将整个岛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将这里掌握在自己手中，就等于掌握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路线。

最后就是克里特岛了。这座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岛屿，可称是地中海东部的航空母舰，其作为战略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威尼斯来说，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与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和中近东城市进行贸易的中继站，因此威尼斯人要保证对此处的控制。

然而，在分割拜占庭帝国领土期间，克里特岛被划为蒙费拉特侯爵的领地。最终，威尼斯向侯爵缴纳了一万马克，连同希腊半岛上帖撒利亚领地作为交换，使克里特变成了共和国的直辖领地。

从此以后的400年间，不管是付出多大的牺牲，威尼斯都要竭尽全力守住这座克里特岛。



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网络

就这样，威尼斯的海上航线网络，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个人口不到10万的国家，通过合理而现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控制整个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帝国。正是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十二分巧妙的利用，使得威尼斯完成了海上霸业，加冕为“地中海的女王”。

然而，史学界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评价极低。例如朗西曼就认为，此次十字军毫无可取之处。恶评如潮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此次十字军是基督徒攻击基督徒的运动。

这类恶评虽然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在此之前的700年间关于十字军的叙述当中，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评价也不高。其证据是，在19世纪米绍的《十字军史》中，有古斯塔夫·多雷为他提供插图。在多雷的100张

插图中，只有5张是描绘第四次十字军的。

但是，在此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编年史记载中，并没有出现多少负面评价。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也并没有对任何人处以绝罚。尽管如此，当时的世界还是都知道了这件基督徒进攻其他基督徒的大事。

那么，在当时的西欧基督徒那里，此事到底是怎样评价的呢？

生活在耶稣基督话语中的中世纪西欧人的理想，是到耶稣出生和死难的圣城耶路撒冷去朝圣。

由于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和平协议，西欧基督徒前往圣城巡礼已经是自由而安全的了。虽然耶路撒冷还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基督徒的朝圣往来却是十分活跃的。朝圣者登陆的港口阿克和海法，也在和议条件下归基督徒所有。

在这一状况之下，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的船只，可以在沿途威尼斯控制的岛屿靠岸补给，大大增加了旅行的安全性。此外，理查所征服的塞浦路斯岛，此时也成为西欧天主教徒控制的岛屿。朝圣者们以这些岛屿为跳板，安全地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威尼斯人也把朝圣当作商业来经营，从而使第四次十字军以后的基督徒朝圣旅行变得日益安全、便利起来。

以上的事实，是跟后世原教旨主义者的想法并不相同的。而原教旨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杜雷生活的时代是否已经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在800年过后的21世纪中，人们还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4年发起的针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基督教异端的十字军，称为“阿尔比十字军”。

最后，我想以法国南部香槟地方的维拉哈都因笔下对威尼斯元首丹

多洛的描写，来结束对第四次十字军的介绍。

> 在战斗中，元首时常全身披挂，英姿飒爽地伫立在旗舰船头的大圣马可国旗下。
>
> 当舰队抵达城下时，元首向水手们大声命令，立即下船上岸。此时，威尼斯人看着年事已高的元首，多少表现出对执行命令的踌躇。元首见状，当即大声喊道，凡不遵命者，必受重罚。
>
> 在城墙上如雨点般落下的敌军箭矢中傲然挺立的元首丹多洛，以及他身边的大圣马可国旗，成为全体威尼斯将士遵从的号令。平底船中的马夫牵着马一起上岸，大型帆船上的船员们也乘着小舟赶来，加入了陆地上的战斗。

维拉哈都因接下来写道：

> 高大的老元首立刻纵马疾驱，以一贯所示的毅然之姿，克服进军中的一切困难，以必死的决心，迎战最后的敌人。

在第四次十字军攻陷拜占庭帝国之后一年零两个月，1205年6月，恩里科·丹多洛未及回国，就病死在君士坦丁堡。他被葬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内。盛放遗体的石棺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的装饰，只是在一侧雕刻着逝者的意大利语名字（Enrico Dandolo）的拉丁语形式：Henricus Dandolo。这座石棺今天仍然保存在原处。

在丹多洛的母国威尼斯，并没有任何的勋章或铜像来纪念他。在威尼斯人的观念当中，他只不过是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一个普通人而已。

第三章　罗马教廷与第五次十字军（1218—1221年）

圣地的情况

14年过去了。在1204—1218年的14年间，继承萨拉丁苏丹之位而成为中近东主人的阿拉迪尔也离开了人世。

理查和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是在1192年实现的。和议的期限只有三年零八个月，也就是说，到1196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就结束了。

然而，和平并未在这之后结束。萨拉丁死于1193年，理查也在1199年去世。两人之间的和议，在到期之后得到了续约。这都是继承了其兄的地位与思想的阿拉迪尔实现的。

而这位阿拉迪尔也是基督徒的友好邻居。在十字军一方，也有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就以巴勒斯坦为家的巴里安·伊柏兰与阿拉迪尔一起，冷静地认识、对待现状。

这一冷静的处事方式，为伊柏兰之后的历任耶路撒冷国王所继承。这种冷静并不仅是当时领导人的处事方式，也是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相处方式的写照。

1211年7月，阿拉迪尔与一年前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布里安努更新了和平条约。新和约的有效期长达6年，到1217年为止。这一次，是阿拉迪尔生前与基督徒一方的最后一次和平协议。

这样，狮心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和平协议有效期长达1/4个世纪。在此期间，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爵领地，以及耶路撒冷国王实际统治的推罗到雅法之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狭长地带上的基督徒，都享受着和平。

这个时期，在基督徒所控制的狭长地带周围，一直没有出现穆斯林围困的状况。

耶路撒冷国王实际统治的地区，包括推罗、阿克、海法、凯撒利亚、雅法（今特拉维夫）等等面向地中海的海港城市。而从欧洲前往近东的海路，也有理查征服之后的塞浦路斯岛和威尼斯控制的诸岛作为中继站。

在这条安全的海路上，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始发的西欧商船往来忙碌着。船上不仅满载着各种商品，还有很多朝圣者。

这些商品和朝圣者，都从前述的海港城市上岸。在此地等候的穆斯林商人，将各种当地的特产卖给从事贸易的商人和朝圣者。

在穆斯林控制下的内陆城市中，也建有许多供基督徒与穆斯林进行贸易的商站。在这1/4个世纪中，当地的经济交流十分繁荣。

而登陆的朝圣者也由于理查和萨拉丁的和平协议得到了长久的安全保障。

从离耶路撒冷最近的雅法到圣城的距离也有60公里。因此，朝圣者们必须经过穆斯林控制的地区。朝圣者在这段路上的安全，是十字军国家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条顿骑士团在1199年的正式建立，很快成为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并列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当年，英诺森三世正式承认了以德意志贵族骑士为团员的条顿骑士团，其制服与盾牌都是白底黑色十字图案的。

以法国骑士为主的圣殿骑士团的标志是白底红十字图案。

以整个欧洲贵族子弟为主的医院骑士团的标志是红底白十字图案。

再加上德意志骑士为主的白底黑十字图案的条顿骑士团。

圣地的三大骑士团，以其特殊的装扮而一目了然。

建立这些骑士团的最初目的，都是保卫前往圣地巡礼的基督徒。第三次十字军结束后的1/4世纪内，并没有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因此，这些骑士团主要就是担负对朝圣团体的警卫工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十字军对各地的城堡加以维护，但城堡的总数比以前有所减少。这部分也是由于对和平协议的执行所致。

当然，在这半个世纪中，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也并非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冲突的级别还远未达到要阿拉迪尔本人出面解决问题的程度。在这25年中，可以称得上有一定规模的冲突只有两次。总的来说，双方是处于共生状态之中的。

双方并无冲突的例证是，在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后，中近东的基督徒并没有任何抗议之声。

在中近东的基督徒看来，从欧洲出发远征的新十字军，是为了帮助十字军国家的援军。这些援军是有希望使十字军国家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的。

然而这支新的十字军并未与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异教徒开战，却转而进攻同是基督徒的希腊正教国家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了。

在中近东基督徒看来，第四次十字军的行为自然是可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出任何抗议之声。这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们，大概并没有想着依靠西欧来的援军。新的十字军所带来的，只会是新的战争

而已。

少年十字军

但是，同为天主教徒的西欧人，却并非这样考虑的。

凡是情报，都有距离越远越难以准确传达的特点。西欧人对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唯一理解，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目前还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左右着普通民众情感，并以民众领导者自居的罗马教皇，非常希望将十字军的主导权收归教廷。出于这一想法，教皇组织了“少年十字军”。

1212年5月，一名叫斯蒂芬的12岁牧羊少年造访了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拿出一封自称是耶稣基督写给自己的信，信中号召新的十字军东征。47岁的国王并未阅读这封信，而是直接要求斯蒂芬离开宫廷。

但这位少年牧羊人并未气馁。他周游法国，到处发表狂热的演讲，声称新的十字军不必依靠成年人来完成。有许许多多少年起来追随他，当队伍行进到马赛时，人数已达3万。

在马赛港岸边伫立的斯蒂芬，张开双臂向上帝呼唤。然而，这位少年并非先知摩西，他面前的大海也没有分成两半。

跟随牧羊人斯蒂芬前来的许多少年见状，纷纷感到失望而返回故乡。不难想象，他们在回乡路上会遭遇何等的苦难。

仍然有一些少年跟随在斯蒂芬身边。两位马赛的船长决定，免费送他们前往圣地。然而，他们最终的命运并非安全抵达巴勒斯坦，而是被贩卖到北非，成为奴隶。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境内莱茵河畔，有一位名叫尼克尔的少年，以

相同的狂热号召向圣地的远征。他的队伍经过巴塞尔，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热那亚，此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年跟随。

尼克尔也在热那亚的港口岸边像摩西一样大声祈祷。此处自然也不会出现海水向两边分开，铺开一条直通圣地大道的异象。失望的少年们结伴归家，途中由于衣食短缺而倒毙者不在少数。

尼克尔并没有放弃，他身边也团结着许多少年。他们离开热那亚前往比萨。尼克尔在比萨模仿摩西的行动还是没有成功。于是这支队伍继续沿亚平宁半岛南下，到达了罗马。

在罗马，52岁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接见了少年们，直接告诉他们，十字军东征是大人的事情，孩子们最好尽快返回家里。

教皇的话对基督徒来说，如同上帝的声音。聆听圣音的尼克尔和少年们，不得不同意返回故土。然而归途上的种种苦难不会与他们无缘。也有部分少年前往安科纳和布林迪西，试图搭船前往圣地的。据史料的记载，这支德意志少年十字军里，极少有孩子能安然无恙地返回家中。而在失去儿子的家长们的逼迫下，走投无路的尼克尔的父亲只好自缢在家了。

当时整个西欧弥漫的狂热气氛，在此可见一斑了。

国王们并未行动

法国国王腓力没有任何兴趣参加十字军。对罗马教皇的呼吁，他始终无动于衷。腓力集中致力于削弱继理查之后即位英格兰国王的约翰的权力，因此无暇顾及其他方面的活动。

而绰号“无地王”的约翰，在理查死后不断失去英国王室在法国境内的领地。他自然也没有参加十字军的动力了。

常成为十字军主力的法国诸侯，此时也充分认识到在东征期间很可能有被腓力占据领地的危险。对他们来说，唯一值得羡慕的，就是上次出征时诸侯在拜占庭帝国获得的领地。然而，法国的诸侯也清楚，在阿拉迪尔严密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和埃及获得新领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神圣罗马帝国，也没有愿意领导十字军的头面人物。只有16岁的腓特烈二世还没有取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

总之，在整个西欧，没有领导人愿意参加十字军。由于十字军的领导人还将成为未来的耶路撒冷国王，这一要职的人选也难产。

如前所述，鲍德温四世去世后，耶路撒冷国王的继承权就世代由女性继承人的婚嫁所决定。此时，王位继承权落到了17岁的玛利亚公主头上。谁能娶到她，就能够加冕耶路撒冷国王。然而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

唯一一个还够得上有资格的，是法国骑士让·德·布里安努。不过，他已经60岁了，出身不高，也没有任何资产和领地。

为了让这位毫无光彩可言的老单身汉体面地就任耶路撒冷国王，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专程为他提供了结婚所需的资金。

在这一背景下，布里安努加冕次年早早地向阿拉迪尔提出更新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和平协议，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在巴勒斯坦，他的实力完全不能与苏丹相比。

到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驾崩，继位的是霍诺留三世。

已经步入老年的霍诺留三世，完全遵循前任的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在教皇的领导下实现新的十字军东征。在教皇看来，十字军对西欧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霍诺留三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克主教的信。信中说，圣地的基督徒并不希望西欧派遣新的十字军，相反，经过与当地穆斯林的交流，基督徒中间流行着一种东方式的奢华之风。

这封信向教皇传达了危险的信号，令他寝食难安。现在，不仅西欧的基督徒失去了斗志，圣地的基督徒也给他平添了许多烦恼。

这自然是由于欧洲的大权在握者们全然不顾“上帝的和平”，纷纷卷入了争夺领地的过程。至于连结婚资金都要依靠教皇的耶路撒冷国王，就连说话的份儿也没有了。

最终，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大公参加了第五次十字军。他们从圣地带回了各种圣物，而给中近东的基督徒带来了负面的结果。这支十字军最初决定的目的地，是埃及北部的港口城市达米埃塔。

热那亚的海军也参加了这次东征。由于威尼斯没有意愿进攻阿拉迪尔统治的埃及，热那亚希望借参加第五次十字军，挽回在与其对手竞争中的失利局面。

虽然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并不希望新的十字军进入中近东，第五次十字军的计划还是在1217年11月达成了。这支军队计划在1218年5月出发。

就这样，没有充分准备、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

然而罗马教廷却并不认为如此。这次十字军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教廷手里。教皇为此还特意任命了特别代表。

教皇的代表佩拉约

50多岁的红衣主教佩拉约，出生于西班牙，直到成年后在巴黎学习神学前，一直在西班牙的修道院中生活。

伊比利亚半岛在此前的500年间，一直是基督徒与穆斯林大战的前线。在这里，十字军是500年来历历在目的现实。佩拉约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对异教徒的憎恨中度过。在他从巴黎学成之后移驻罗马教廷期间，这种强烈的情感从来没有改变过。

佩拉约曾经受托于英诺森三世，在拉丁帝国建立9年之后，担任教廷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实际上是担当促进东西教会统一的角色。结果，佩拉约未能促成两大教会的统一，这段经历反而加深了他对希腊正教徒的憎恶。

这位从头到脚身着红装，甚至连坐骑都披着红色马衣的焦点人物，将希腊正教僧侣纷纷下狱，关闭所有正教会，禁止其信徒做弥撒。最终，希腊人评价其为“性格暴虐、顽固不化而又喜欢招摇”的狠角色。

东西教会统一的难点中的难点，是如何使将自身的信仰称为“正教”的希腊人遵从罗马。而佩拉约的所作所为加剧了这一难题。教皇不得已只能将其召回教廷，但佩拉约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佩拉约受到教皇的委任，成为教皇在十字军中的全权代表。

这样，第五次十字军就以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准备不足和教廷影响力强三个特点而著称。

迎战的伊斯兰教一方，也处在微妙的境地中。

首先，声威遍布整个中近东的苏丹阿拉迪尔年事已高，73岁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继承人问题。虽然阿拉迪尔38岁的长子阿尔·卡米尔能力不凡，但在新旧统治者交替的时代，难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风波。

此外，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埃米尔之间发生摩擦，在这一时期已经颇为普遍了。

在伊斯兰世界中，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北、西、东三个方向扩张的7世纪，半岛以外最初的首都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130年后首都迁移到新建的巴格达之前，大马士革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在此之后的多年中，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以巴格达为首都，而政治、军事领导人苏丹则是驻扎在大马士革的。

萨拉丁成为苏丹之后，也住在大马士革，其墓地也在大马士革。在其遗嘱中，也把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分给了长子，而令次子继承以开罗为中心的埃及。

在萨拉丁子嗣的争斗中获利，最终成为新任苏丹的阿拉迪尔，几乎完全继承了萨拉丁的遗志。两人唯一的不同，就是阿拉迪尔改变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传统，而是把统治中心转移到了埃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拉迪尔在任命继承人时，将长子阿尔·卡米尔委任为埃及的统治者，而令次子阿尔·穆阿扎姆统治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这一任命，是基于埃及是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考虑而出发的。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大马士革的繁荣已不如开罗。如果说萨拉丁的考虑还是军事大于经济的话，阿拉迪尔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在叙利亚，还存在各个地方掌权的埃米尔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他们

显然不乐意看到埃及的重要性提升。叙利亚的埃米尔逐渐对步入暮年的阿拉迪尔不满，并形成了对未来阿尔·卡米尔统治的威胁。

事实上，如果布里安努率领第五次十字军从达米埃塔登陆，当地的穆斯林军队将其击退也并非难事。但是，十字军却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这完全是由于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内耗所致。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与十字军作战，第五次十字军出其不意地站住了脚跟。

达米埃塔

尼罗河三角洲从开罗以下呈扇形铺开。扇形的西端是亚历山大，而东侧的大城市就是达米埃塔。从西欧抵达埃及的船只在亚历山大入港，而巴勒斯坦来的船则选择邻近的达米埃塔。

第五次十字军将进攻对象选在达米埃塔，是因为这里离阿克和雅法很近。而且，若以达米埃塔为据点，可以沿尼罗河上溯进攻开罗。

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所率的十字军，于1218年5月24日在达米埃塔附近登陆。这支军队很快就攻占了达米埃塔以西的一处城堡。

得知十字军进犯的阿拉迪尔，立即召集叙利亚全境的埃米尔，亲率大军前往埃及。由于巴勒斯坦近海的制海权为意大利各邦国所控制，加上热那亚也参加了此次十字军，阿拉迪尔便选择由陆路驰援埃及。这样一来，他的军队行军速度就比较慢了。

担当埃及守备的阿尔·卡米尔率领埃及军队北上，先期到达了达米埃塔以南数公里的地方。然而，他的部队并未与阿拉迪尔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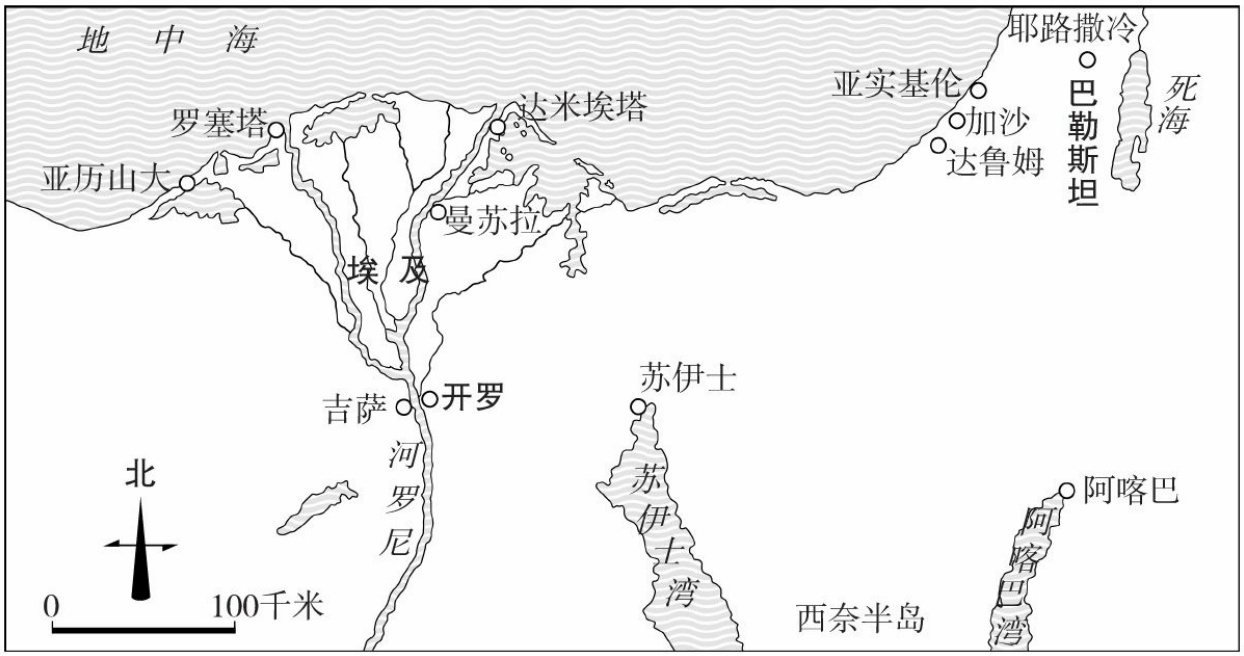
由于受到攻击的达米埃塔是海港城市，埃及一方本来可以从亚历山大派出海军支援。然而，由于当时埃及只有商船队，并没有可以称为海军的舰队，热那亚的海军在地中海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是直接加入了第五次十字军攻击达米埃塔的战斗，从而使这场攻城战变为海陆两方面的作战。

在攻城开始三个月之后的8月24日，达米埃塔城边的城堡陷落。

一个星期后，阿拉迪尔去世。

这位与狮心王理查谈笑风生，被理查的近臣索尔兹伯里主教称为“法兰克人般的穆斯林”的阿拉迪尔，在法兰克人的进攻中，结束了73岁的一生。

阿拉迪尔35岁的长子阿尔·卡米尔成为阿拉迪尔的继承人。这位25年前受到理查“法兰克式”骑士任命，并赠送“法兰克式”佩剑的少年，获得了苏丹的称号。



埃及及其周边

阿尔·卡米尔与其弟，大马士革的领主阿尔·穆阿扎姆的关系并不坏。但是，阿尔·穆阿扎姆的主要任务，并非与长兄合兵一处，而是要防御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可能发起的攻击。如此一来，阿尔·卡米尔只能独自防备第五次十字军的进攻。

9月初，阿拉迪尔去世一周后，红衣主教佩拉约到达了激战中的达米埃塔前线。当这位教皇的代表进入军营之后，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的大臣们都感到诧异。佩拉约宣称，十字军是以完成上帝的愿望为目标的战斗集团，因此十字军的实际领导人是罗马教皇，而自己就是教皇的

代表。布里安努听罢也十分吃惊。

试图施展自己的领导才能的佩拉约，最终成为众人厌恶的对象。因此，统一指挥第五次十字军的愿望，最终化为了泡影。

到10月份，从父亲去世的悲痛中重返战场的阿尔·卡米尔与十字军之间再度开战。此时双方的状态如设置了铜墙铁壁一般互不相让，陷入你来我往的拉锯战。

11月下旬，尼罗河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海上刮来了强风，整个三角洲地区洪水泛滥。交战双方都深受其害。而当洪水退去之后，发生了一场瘟疫，使得双方的兵士一个接一个倒下。

1219年2月5日，十字军惊奇地发现，埃及军队的大营空空如也。由于十字军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对方设了埋伏，因此格外加强了警戒。

阿尔·卡米尔退兵的真实原因，是自己的胞弟在后方发动了叛乱。

排行第七的胞弟阿尔·菲斯，对父亲生前委任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统治权并不满意。而在父亲去世，其权威不再的情况下，阿尔·菲斯联络了若干埃米尔，起来反叛阿尔·卡米尔的统治。

这时候，排行第二的阿尔·穆阿扎姆站到了兄长一边。因此，在平叛成功之后，他就赢得了阿尔·卡米尔的信任。

刚刚继承苏丹之位的阿尔·卡米尔，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固自己的大后方。因此，他根本无法专心于达米埃塔的防御。

雪上加霜的是，当年尼罗河的泛滥并未达到正常水平，这就导致了整个埃及的大灾荒。得知埃及天灾发生，阿尔·穆阿扎姆率军返回了大马士革。阿尔·卡米尔从就任苏丹伊始，就面临着种种的试炼。

而十字军则未能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完全将时间消耗在布里安努和佩拉约之间的指挥权斗争中了。一言以蔽之，胶着状态的双方都没有利用好机会。

阿西西的方济各

在此时的世界历史上，有一位列于天主教圣人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圣方济各。这位出身意大利中部阿西西的修士，也参加了第五次十字军——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以何种资格或方式参战的。当时，方济各只不过是一名最低级的从军神职人员。

而与众不同的是，时年37岁的方济各，立志要成为一位和平使者。

虽然方济各有追求和平的志向，却难以将其实现。由于修士是直属于罗马教皇的神职人员，在这次十字军中就必须听命于教皇的正式代表佩拉约。

佩拉约一开始激烈地反对方济各的求和提议。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渐渐同意修士的主张。也许这位强硬派人物也希望能打开胶着的局面吧。

于是，37岁的修士独自一人前往敌营。他所穿着的茶色粗布僧袍和皮制拖鞋，成为后来方济各会修士的制服。方济各的这身打扮显然是与战士不同的。

圣方济各（奇马布埃画）

他就这样一直走到了敌军的营地，进入了营地中央最豪华的帐篷中间。

身着东方式奢华服装的苏丹阿尔·卡米尔，时年39岁。对面身穿粗布僧袍的意大利修士则是37岁。虽然不知道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但由于方济各成为修士之前的青年时代一直在法国学习，其母亲也生于法国，他很可能是以法语和苏丹交谈的。而阿尔·卡米尔从少年时期就得到了与理查进行西欧式的骑士谈话的机会，大概也可以讲流利的法语，因此两人之间不必使用翻译了。

无论如何，两位衣着与信仰迥异的人士年龄相仿。意大利修士告诉苏丹，双方应当追求和平，此外，如果苏丹能够皈依基督教，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伊斯兰世界中严禁穆斯林皈依其他宗教。方济各犯了这样的忌讳，是可以当即斩首示众的。而事实上，周围的人听了方济各的话，立即显露出一股杀气。

阿尔·卡米尔听到这位与自己同龄的西欧人的话，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方济各不过是一个简单无害的人罢了。因此，苏丹既没有扣押他，也没有杀他，而是命手下将其送回了十字军的营地。

看到方济各平安归来，佩拉约和十字军的全体领导人都大吃一惊。但毕竟方济各没能完成和平使命。他并未试图再次充当这一角色，而是离开了十字军阵营，回意大利去了。

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会面，并未改变苏丹作战的决心。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他对十字军发起了总攻。

但这一攻势并未奏效。以桨帆船队为后盾的十字军发起了反击，使战线继续呈现胶着状态。因此，阿尔·卡米尔未能将自己占据的地盘稳

定下来。

议和提案（一）

1219年10月，苏丹的特使来到了围攻达米埃塔的十字军营地中。特使带来的议和提案的内容，是十字军中无人预想到的。

提案声称，如果十字军从埃及撤军，苏丹就将耶路撒冷返还。返还的区域除了耶路撒冷，还包括理查与萨拉丁议和时划归伊斯兰教一方的加利利地区。此外，十字军还可以每年向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征收城堡的维持费用。

超乎想象的条件令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和中近东的十字军骑士们倾向于与苏丹议和。特别是归还耶路撒冷这一项条件令全体十字军都感到兴奋。毕竟，十字军东征的最高目标，就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城。

然而，教皇代表佩拉约反对这一提案。

他提出反对的第一个理由，是该提案由敌方送来，不能直接接受。

所谓异教徒，就是所信仰的神与基督徒不同的人。因此，在基督徒看来，他们就是“不信者”，是持有错误信仰的人，是蔑视的对象。

教皇以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多以“不信者”称呼穆斯林。而伊斯兰世界哈里发以下的神职人员（伊玛目）们，也以“不信者”称呼基督徒。由于双方都是一神教，这一现象是自然的。因此教皇代表佩拉约在指称穆斯林时，常以“不信者”称之。

佩拉约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作为基督教“圣城”的耶路撒冷，不能通过与“不信者”的谈判而取得，必须经基督徒的流血斗争而“解放”。

一开始，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佩拉约一个人。他的断然否决声，显

得势单力孤。然而很快就有人出来附和佩拉约的提议。

其中首当其冲就是耶路撒冷的牧首。

与耶路撒冷国王一样，耶路撒冷牧首也是由于不能在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居住，而流亡到阿克的。而如果十字军与阿尔·卡米尔的和议成立，耶路撒冷国王和牧首就都能够回到圣城之内了。然而，布里安努的赞成之声，却受到牧首的反对。一神教神职人员的看法，常与现实主义的思考相反。他们生活的目的是神，而并非世人，因此专职的神职人员常常有不同一般的倾向。

而反对与“不信者”议和的人当中，还有与前述的原教旨主义者不同的一类。

这就是既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又参加第五次十字军，活跃在运输和补给线上，并参与最前线战斗的热那亚海军。

热那亚积极参加第五次十字军的本意，是为了驱逐在埃及拥有利益的威尼斯商人。而如果十字军与苏丹议和，离开埃及，他们参加十字军的目标就落空了。

而且，从热那亚商人的角度看，阿尔·卡米尔提议归还十字军一方的内陆领地上的城堡，对从事贸易是毫无利用价值的。与之相比，攻陷达米埃塔，利用此地作为与埃及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则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热那亚舰队在此次十字军中十分活跃，他们的立场变得举足轻重。

最终，十字军拒绝了阿尔·卡米尔条件优厚的议和提案。达米埃塔城也在缺乏补给的状态下为攻城战所消耗，一直维持到陷落。

1220年11月5日，经过两年的围攻，埃及东北部的达米埃塔陷落

了。攻入城内的十字军，将无处可逃的居民大量屠杀。只有被强迫改宗基督教的居民幸免于难。

此时，就这座新征服城市归属的问题，教皇代表佩拉约和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起了冲突。

布里安努认为，达米埃塔是耶路撒冷王国在埃及的前线基地，因此应归自己统治。

而佩拉约则声称，十字军所征服的土地的统治权都归罗马教皇。但是佩拉约身边并没有人能够防守这座为敌方领土所包围的城市。

两人最终达成了妥协。双方约定，在更合适的人选从西欧抵达之前，达米埃塔的统治权归布里安努。

虽然佩拉约和布里安努在协议中都使用了“更合适的人选”这一用语，实际上并没有人会从西欧来到前线。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已经55岁。他从一开始就对十字军东征不感兴趣。而现今他的年龄也偏大了。

而在英国，“无地王”约翰已于4年前去世。由于其理政无方导致国内混乱，没有派出新十字军的可能。

而“更合适的人选”德意志国王和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尚未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当年11月，腓特烈从教皇手中得到了皇冠，正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皇帝加冕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稳定本国国内的局势，然后才是在教皇的要求下，参加十字军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由其选帝侯选出，然后要通过代表教皇对其承认的加冕仪式才能正式成为皇帝。因此，尚未加冕就让这位“更合适的人选”立即动身前往东方，是无法实

现的事。

26岁的腓特烈二世在其加冕仪式上，正式应允教皇霍诺留，处理好国内事务之后，就动身参加十字军东征。

当来自遥远地域的消息还未传达之时，达米埃塔的十字军只能静候腓特烈的到来了。

议和提案（二）

阿尔·卡米尔虽然远在埃及，却已经了解到十字军方面的动向。在基督教阵营中给他透露信息的，应当是与其保持友好商贸关系的威尼斯人。至于具体是谁将消息传到苏丹耳中，就是历史留下的谜团了。

英明且能征善战的青年皇帝腓特烈二世，获得了全欧洲的瞩目。他正是以“红胡子”绰号著称于世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直系孙辈。

而英诺森三世教皇更是如同对待养子一般，不惜代价地支持这位年轻的皇子取得帝位。

苏丹阿尔·卡米尔不由得紧张起来。他一定听自己的父亲阿拉迪尔讲过，在第三次十字军的时代，率军远征的红胡子腓特烈曾让萨拉丁寝食难安。此次腓特烈二世所率领的，想必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年轻有为的领袖所率的这支大军，是此时的埃及所无法抵挡的。阿尔·卡米尔的苏丹地位，也因此而岌岌可危。

1221年春天，阿尔·卡米尔第二次向达米埃塔的十字军派去了议和的特使。

这次议和提案的内容中，有一半和前一次相同。只要十字军同意撤出埃及，阿尔·卡米尔就将耶路撒冷和加利利返还，并负责修复各地的十字军城堡。

在此次的议和提案中，苏丹还加入了如下的内容：

一、议和的有效期为30年。

二、穆斯林承担对耶路撒冷的城墙进行重建的费用。

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时，阿尔·卡米尔之弟阿尔·穆阿扎姆曾下令将耶路撒冷的城墙尽数破坏。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阿尤布王朝考虑集中防守埃及大本营，而由于十字军会集中力量夺取耶路撒冷，先行破坏其城墙有利于穆斯林一方反击。

然而，如果议和方案得到接受，耶路撒冷就将回到基督徒手中。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其说是阿尔·卡米尔绅士的做法，不如说是在十字军众望所归的新领袖到来之前，做出的一种外交姿态。

面对比上次更加优厚的议和方案，十字军的领导人物纷纷开始动摇。中近东的基督徒都认为，没有比这个议和方案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这次提出反对意见的，仍然是教皇的代表佩拉约。他认为，由于众望所归的新领袖腓特烈二世已经在前往中东的路上，这位新皇帝将率领大军，开辟通往开罗的道路。因此，十字军理应追求胜果，而不是在此讲和。

于是，十字军并未在达米埃塔久留，而是继续沿尼罗河上溯，向开罗方向进军。

第二次议和的提案再次遭到拒绝之后，阿尔·卡米尔的处境愈加艰难。

之所以卡米尔之父阿拉迪尔能够在狮心王理查和他的近臣面前得到信赖，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真实情况尚不完全明朗时，绝不说大话；

第二，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一如既往地冷静沉着。

而阿尔·卡米尔正继承了其父的这一性格特征。

此时，这位苏丹得知了一条情报——当年尼罗河水量大增，上游的河水正向下游奔腾而来。

于是，阿尔·卡米尔做出了决定胜负的一着。

人们为了调整尼罗河在三角洲地带的水量，在其三角洲的各个支流分支处建立了大坝。因而在尼罗河涨水之后，洪流并不会直接流向三角洲，而是被各处的大坝阻挡一部分。

1221年夏天的洪水，也受到了大坝的阻挡。在朝向三角洲西部的亚历山大方向，洪水向往常一样，受到大坝阻挡后，通过水闸流向下游，然而在靠近达米埃塔的东侧，埃及人关闭了水闸，使河水在大坝上方大量蓄积。

接下来，当东侧大坝上方河水水位上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埃及人并未打开水闸，而是直接将大坝破坏。

于是化为洪水的河水奔流北下，冲向溯河而上的十字军。满载武器的士兵和军马霎时间被洪水一起冲走，狼狈不堪的残余部队逃回了达米埃塔。

然而达米埃塔也不再安全无忧。为了引走夺路而来的洪水，十字军不得不把城墙附近的港湾填平，结果威尼斯的船队就无法靠近。失去了来自威尼斯船队的给养，这座城市孤立无援。此时又恰逢疫病流行的盛夏。

第五次十字军宣告结束

得知敌方窘境的阿尔·卡米尔第三次向十字军派出了使者。这次的和议条件与前两次完全不同：

一、十字军必须放弃达米埃塔，完全撤出埃及；

二、和议的有效期为8年。

身在达米埃塔的十字军领导人为是否接受和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耗费了一个月时间，而领导人对士兵逃跑的行为视而不见。教皇代理人佩拉约的反对也无济于事。

最终，在1221年8月，十字军领导人决定接受和议条件。9月8日，十字军启程撤出达米埃塔，前往巴勒斯坦。历时三年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宣告结束。

阿尔·卡米尔一直遵守8年间互不侵犯的协议。1221—1229年之间，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徒享受了8年和平与安宁的生活。

与此前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默契一样，阿尔·卡米尔也严格遵守对和议条文并未提及的巴勒斯坦海岸的基督教城市阿克、雅法等安全的保障。这样，通过这些港口抵达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直享有与此前相同的安全与自由。

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和议，虽然被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打破了三年，却在阿尔·卡米尔治下继续保持下去。

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归咎于教皇的代理人佩拉约。

然而，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回到罗马的佩拉约，并未受到任何人的责难。第二次十字军失败后回到西欧的贝尔纳，也是无人问责。

作为将上帝的旨意传达到信众之间的神职人员，其第一任务是坚信。既然上帝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传达上帝旨意的神职人员自然也不会犯错了。而如果事件的结局不如人意，就只能是信仰不足的世人所犯的错误导致的。

红衣主教佩拉约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度过了余生。在他此后的19年生涯中，始终不变的是与任何人都不免冲突的性格。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引起了我如下的思考。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恶行。然而人类始终无法从这种恶行中挣脱出来。

不以战争的胜负来评价其影响，而以战争之后，人类社会能获得多久的和平来评价战争，恐怕才是正确的吧？

而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战争的罪恶中脱身，并将永远陷入未来往复的战争劫难之中，争取达成一次又一次的短期和平局面，才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吧。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正面冲突，被称为“华丽的第三次东征”。而此次东征之后萨拉丁和理查签订的和平协议，持续了25年。经过第五次十字军而中断之后，和平又持续了8年，合计33年。

伊斯兰世界一方正值贤明的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阿拉迪尔和阿尔·卡米尔三人统治的时期，他们对促成和平起了巨大的作用。阿尔·卡米尔也由于和平而稳固了苏丹之位。

然而随着33年和平的过去，基督教世界中“不与异教徒议和”“不惜流血夺回耶路撒冷”的声音甚嚣尘上。领导人面临如此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重开战局。

第四章　腓特烈二世皇帝与第六次十字军（1228—1229年）

南方的岛屿西西里

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诺曼王朝首都，位于西西里岛上的巴勒莫。巴勒莫城外一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以“齐萨”（Zisa）著称的离宫。Zisa是阿拉伯语“壮丽的”（aziz）的意大利语转音。在阿拉伯人短暂征服这座岛屿之后200年，来自法国北部的诺曼人完成了对西西里的征服。新的征服者并未杀死或流放阿拉伯人，因此仍有穆斯林长期居住在西西里岛上。

“齐萨”是岛上穆斯林臣民为西西里国王吉埃尔默建立的夏宫。逐渐意大利化的诺曼人，却居住在阿拉伯式的避暑宫殿中。

穆斯林的人生梦想，是在这地上建设生活的乐园。他们在生活中收集各种物品，来建设这座乐园。涓涓流淌的清澈溪水、靠水流滋养的枝繁叶茂果实众多的树木、聚集在树林中的各类鸟儿、花朵招引的蜜蜂与蝴蝶，构成了乐园里的种种要素。

这就是穆斯林心目中地上乐园的样子。伊斯兰世界的大人物们，都居住在与之类似的地上乐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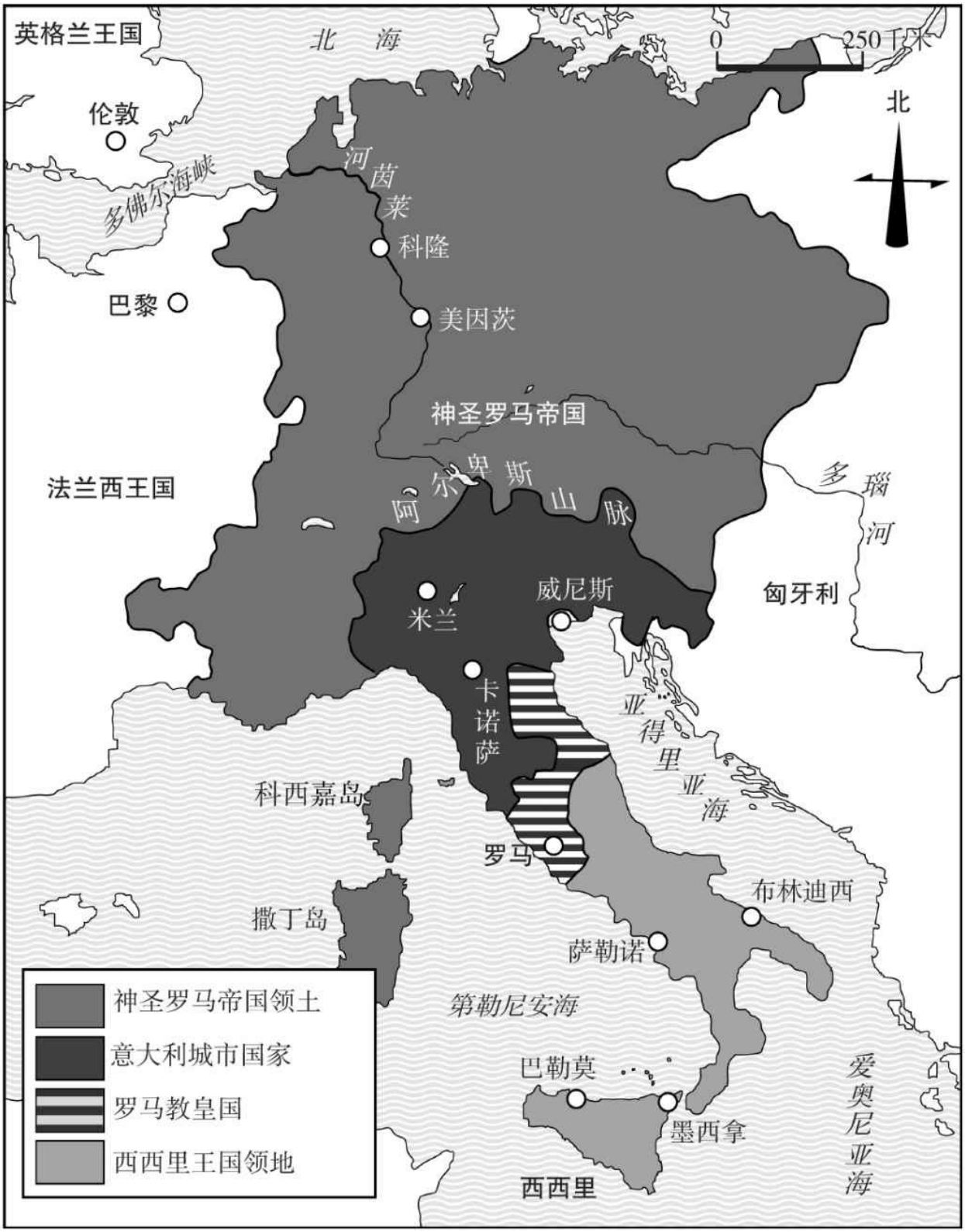
然而“齐萨”的主人，却是诺曼王朝的基督徒国王。在这座宫殿中，从天井到墙壁的壁画都与伊斯兰世界色彩斑斓的庭院相仿，而宫殿一隅则筑有基督教的小礼拜堂。

使这座“齐萨”成为夏宫的布置，自然是各个屋外的水流。这些水流起到了空调的作用。建筑师使水流从各个屋子汇集到厅堂的一层，再由此流向后花园。然而水流并非一齐径直流淌，却由着花园内各处纤细的水道导引，为树木和花草提供灌溉。阿拉伯人建筑此类水道的能力，远超同时代的欧洲人。

今日所见的“齐萨”，已不复800年前的模样。宫殿的建筑都来自后世的修复，而花园则已荡然无存。因此，来此考察的学者并不多。当我旅行到这里时，除两位来自德国的年轻人外，再没有别人进入。

造访这座遗迹时，我必须依靠想象来再现当时的情景。望着标有“喷水间”的厅堂一层中央的遗迹，我从这里出发的无水的水道，想象着当年水向花园流淌的样子。

诸如柠檬、橙子之类的水果，也被阿拉伯人移植到了西西里岛。花园里还种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常在阴影里开放的茉莉花，也由阿拉伯人的引种而在此繁盛生长，静静地散出诱人的馨香。花园中流水潺潺，水边伫立着一位四五岁的男孩。他一边在花园中游玩，一边将树叶做成的小舟轻轻放在水面上，任由其漂流。他一路追着水上的叶舟，丝毫不顾旁边家庭教师的呼唤。



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在内的腓特烈二世领地

腓特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而四岁时他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作为独生子的他，也没有兄弟姐妹。这个小男孩，已是占据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国的国王。而在两年前的1196年，德意志的诸侯把他选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预备者——德意志的国王。

这是因为，他是以“红胡子”著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直系孙子，而他的母亲则是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继承人。

然而，这位生来就戴着王冠的少年，却未能在周围人的注视中得到应有的教育。这部分是因为他四岁就成为孤儿的命运所致。他并没有拜在著名教师的门下，而成长道路上的伙伴则多是平民出身。据说只有一名修士曾经充当过腓特烈的家庭教师。

腓特烈在自学的环境中长大。他不仅受到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教育，还学习了阿拉伯语。

当腓特烈成年之后，他熟练掌握，能够听说读写的语言不仅包括西西里人日常通用的阿拉伯语，还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拉丁语是中世纪的外交语言。此外，腓特烈还通晓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虽然腓特烈的成长之路上没有严格的高水平教师指导，他却在自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之下，完成了对自身的充实。

拥有着父亲的德意志血统和母亲的意大利化的诺曼人血统的腓特烈，在残余着浓厚伊斯兰文明气息的西西里成长起来。在这位曾追逐着树叶小舟而游玩的年轻人面前，伫立着以率领基督徒与异教徒作战为第一任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

在尚未确立中央集权的中世纪，皇帝和国王只有将继承权置于手中，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地位。而要获得王位继承权，则必须凭借自身的实力。即使是在王位世袭的时代，王子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实力来争夺王位。

皇帝登基

1220年11月22日，年仅26岁的腓特烈正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仪式在罗马教皇霍诺留三世的主持下，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举行。

霍诺留三世是前任教皇英诺森三世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对于前任“罗马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以及“选举皇帝是德意志诸侯的权力，而判断选上的人物是否具有成为皇帝的资格则是罗马教皇的权力”的说法，霍诺留都是视为金科玉律的。他也自然希望将十字军东征置于教皇的主导之下。

教皇将帝冠授予腓特烈的同时，也当然有战略方面的相应考虑。这要从加冕仪式前三年说起。

这一年，23岁的腓特烈向英诺森三世去世后继承教皇位置的霍诺留三世致以贺信。教皇随即回信，告知前任教皇要求自己积极协助年轻的腓特烈领导十字军东征。这是在第五次十字军出发之前的往事。

此后两人的通信一度中断，关于十字军的讨论也就因此搁置起来。

加冕之前两年的1218年底，腓特烈再次收到了霍诺留三世的来信。此时正值第五次十字军陷入埃及达米埃塔的苦战之中。此次的信中，教皇明确要求腓特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发动十字军东征。如果说上一次的来信还是暗示的话，这次就是明说了。

25岁的腓特烈在回信中提出了若干要求。

虽然次年三月腓特烈就能准备完毕，并于6月发兵，但由于他本人

还未加冕为帝，就没有率领德意志各邦诸侯出征的资格。而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没有来自诸多王侯的配合，是不可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在两人的通信中，狡猾的腓特烈自己逃出了陷阱，却把40岁的教皇推向了陷阱的边缘。

腓特烈在回信中，将允诺教皇的出兵时间从6月推迟到9月。由于涉及到说服其他诸侯出兵的问题，教皇对腓特烈的言辞信以为真。

然而此时腓特烈派遣前往谒见德意志诸侯的使节，并没有做出任何说服他们出兵的努力。他努力说服的，只是要求诸侯承认自己长子亨利对于德意志国王王位的继承权而已。

得知实情的教皇向腓特烈致信诘问。腓特烈在回信中指出，此去东征路途遥远，尚且未知能否全身而还。因此，他有权利确保出发后自己的领土由亨利统治。这样说来，把亨利的继承权事务放在十字军出征之前，是自然不过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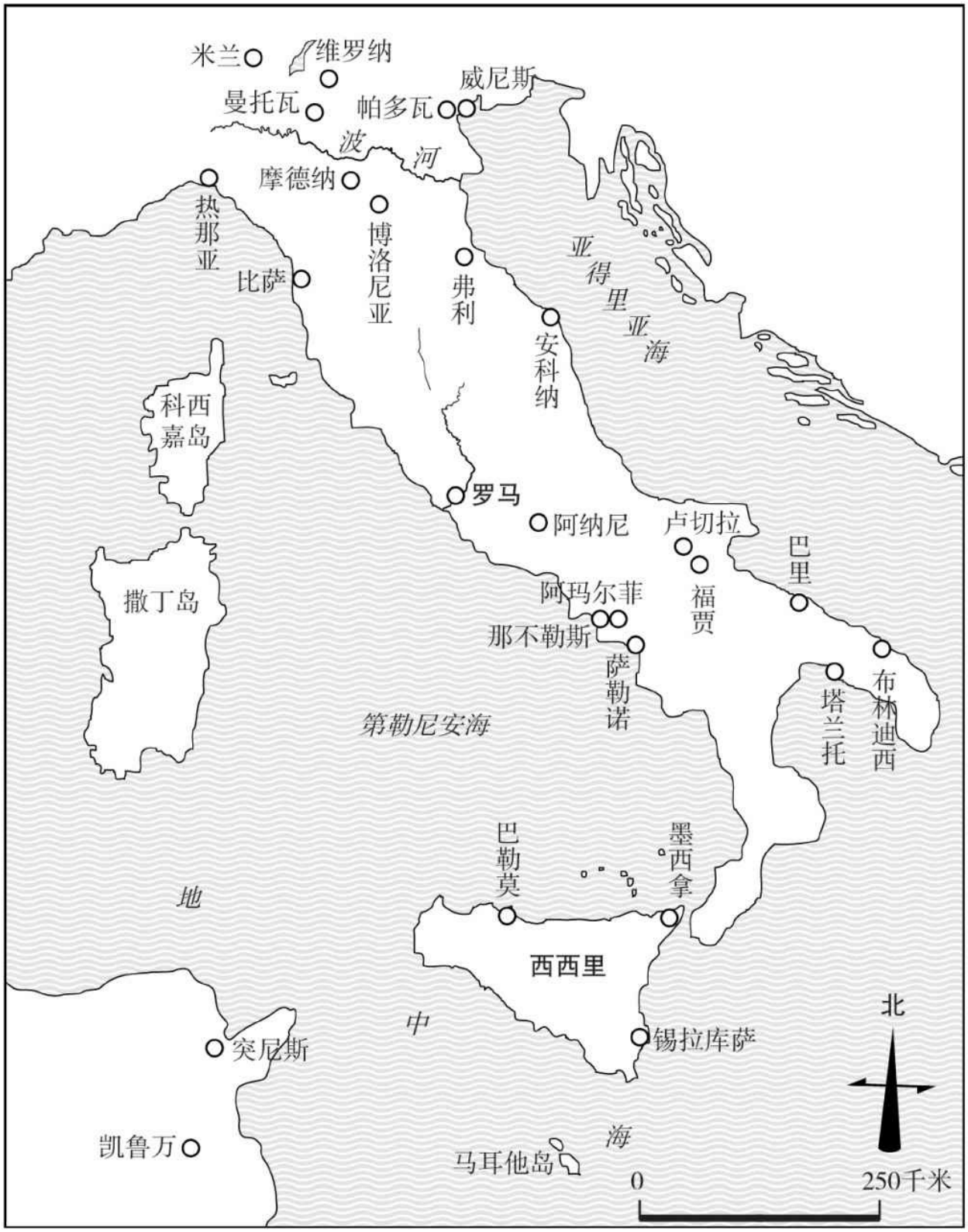
1220年5月于法兰克福召开的选举德意志国王的会议上出席即位典礼的腓特烈，在典礼甫一结束就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接受霍诺留三世的加冕。腓特烈亲自率领德意志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往罗马出席加冕仪式。

经过维罗纳、曼图瓦和摩德纳南下之后，大军沿着古罗马的埃米利亚大道，通过博洛尼亚、法恩扎、弗利三座城市，向东南行进。腓特烈一行还不忘到全欧洲最高学府博洛尼亚大学视察。

到达亚得里亚海滨之后，腓特烈的军队沿着古罗马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向罗马行进。这次行程对腓特烈来说并非简单的旅行。率领强大的军队夸耀自己的实力，是即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他，此次行军的真实目的。同时，一直不愿受到十字军东征约束的他，带领声势浩大的军队前往教廷，也是向教皇施加压力的表现。

腓特烈到达罗马之后，并未立即前往教皇的宫殿，而是率领全军，在城外的蒙特马里奥山上安营扎寨。在此处向下望，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罗马城的居民望见密密麻麻的部队，感到十分恐惧。然而在接近蒙特马里奥山的梵蒂冈，教廷却对大军毫无惧色。毕竟，无论是多大的军事压力，都改变不了皇帝发誓参加十字军才能获得帝冠的事实。

加冕仪式于1220年11月22日平安举行。仪式之后三日之内，腓特烈遍访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永恒之都。在众多的兵士簇拥之下，腓特烈应该是感到颇为满足了。离开罗马以后，腓特烈带兵前往自己的母国西西里。


米兰
维罗纳
威尼斯
曼托瓦
帕多瓦
波
河
摩德纳
热那亚
博洛尼亚
比萨
弗利
亚得里亚海
安科纳
科西嘉岛
罗马
阿纳尼
卢切拉
巴里
撒丁岛
阿玛尔菲
福贾
那不勒斯
萨勒诺
布林迪西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巴勒莫
墨西拿
地
西西里
中
锡拉库萨
突尼斯
北
海
凯鲁万
马耳他岛
0
250千米

意大利及其周边

何时远征？

得知腓特烈就任新皇帝的十字军官兵，一致决定在达米埃塔等待新统帅的到来。此时，十字军对与阿尔·卡米尔所率领的埃及军队作战的前景并不乐观。

而腓特烈二世虽然已经誓师东征，却也向霍诺留三世声明，行前必须确保国内安定。而至于究竟什么时候出发，皇帝并没有明言。

就这样8个月过去了。最终，1221年8月，基督教军队放弃了达米埃塔，从埃及撤退。第五次十字军就这样宣告失败。

第五次十字军并非以悲惨的结局收尾。十字军按照阿尔·卡米尔要求的条件，从达米埃塔完全撤军，在没有支付进攻埃及赔偿金的情况下，全员平安撤回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两手空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此外，在1221年8月双方缔结的和约中，经过慎重考虑的阿尔·卡米尔和十字军领导人，签字同意以交换人质的方式实现和平。

十字军一方的人质包括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和教皇代表佩拉约，而卡米尔一方的人质则是苏丹自己的长子和次子。

第五次十字军自然是无疾而终。但顷刻间和议的达成，也是双方期待的结果。尽管在战争状态下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

以上的简短回述，便是霍诺留三世同意腓特烈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安定国内要求的大背景。这时的新皇帝年仅26岁。

然而就是在这“顷刻间”，教皇对腓特烈二世的不满，也增长了起

来。

撒拉森人的居留地

在中世纪这个两大一神教敌对的时代，西西里岛上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处状态，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一地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两大宗教信徒在行政、学术和技术等领域的融合。缠着头巾，身着长装的穆斯林行政官员自由出入于西西里的王宫，在国王的近臣中，也不乏穆斯林名士。巴勒莫城内为数众多的清真寺内祈祷时的颂歌声，与大教堂的钟声一同响起。

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城市中，长于学术和技能的穆斯林，在身为基督徒的皇帝统治之下，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

但在农村，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农村当中并不需要有学术和技能的人物。此时宗教的分别就变得显著起来。而社会下层对民族差异的反应也更加明显。

时值1221年冬，腓特烈二世将王子选为未来的德意志国王，自己也得到加冕。此时在西西里的农村爆发了穆斯林农民的起义。

新皇帝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这次起义。所幸的是起义仅限于岛上的一部分地域，起义的领导者也只是很少的几个人。

1222年3月，起义首领伊万·阿巴德及其子被抓获并处死，起义被平息了。然而没过几个月，起义就再度发生。腓特烈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撒拉森人问题”。

正如穆斯林把全体西欧基督徒统称为“法兰克人”一样，欧洲的基督徒把包括阿拉伯人、北非的柏柏尔人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在内的穆斯林

统称为“撒拉森人”。在西西里居住的阿拉伯人自然也是“撒拉森人”。

1223年5月，腓特烈二世强制西西里岛上的全体撒拉森人全家迁出。

腓特烈要求撒拉森人移居到意大利半岛南部山峦中狭小的与世隔绝的地带。撒拉森人主要的移居地，位于当时腓特烈修建行宫的福贾，即今天意大利普利亚州居于首府巴里之后的第二大城市福贾以外18公里的卢切拉。

与福贾一样，卢切拉是古罗马人修筑的城市。在罗马时代，这座城市名叫卢切里亚。在撒拉森人移居之后，腓特烈将其命名为“Luceria Saracenorum”，意思就是“撒拉森人的卢切里亚”。而当地的撒拉森人则以阿拉伯语名卢格拉（Lugerah）称呼这座城市。

如果腓特烈二世不仅强制撒拉森人移居，还能够强迫他们改宗天主教，他就会大大减少霍诺留三世的不满。教皇对这位天主教世界最高的世俗君主恐怕将会不由得赞赏起来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腓特烈二世不仅没有要求他们改宗，反而宣布绝对尊重卢切拉居民的信仰自由。卢切拉城内的清真寺纷纷矗立起来，寺内尖塔上传颂的经文，每日5次响彻整个城市。而这里离天主教世界最高世俗领袖的皇宫不过18公里之遥。

更过分的是，腓特烈竟从卢切拉城内的穆斯林男子当中征兵，让他们在自己的卫队中担任步兵。这些穆斯林在为他作战的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然而罗马教皇毕竟是整个大地的领主。就在罗马教皇国的南端，那不勒斯附近的山上，耸立着著名的蒙特卡西诺大修道院。第五次十字军中的教皇代表，枢机主教佩拉约，就是在这座修道院内度过余生的。而

这座修道院与天主教徒的不共戴天之敌穆斯林所居住的卢切拉之间的距离，还不到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距离的一半。

卢切拉城中响彻的再也不是教堂的钟声，却是清真寺祈祷的召唤声。听到这声音，罗马教皇的怨恨简直沸腾了起来。

不得不说，来自卢切拉的这支穆斯林军队，不仅在腓特烈生前保持对他的绝对忠诚，在他去世以后也保持着对皇帝继承人不变的忠诚。而直到80年后，卢切拉才被法国的安茹伯爵攻破。忠于腓特烈之子曼弗雷德的穆斯林被悉数贩卖为奴，清真寺被毁弃，城市重新回到天主教世界。这80年间，城内的清真寺一直传唱着穆斯林的祈祷。

那不勒斯大学

另一件令罗马教皇霍诺留三世极为不满的事，是腓特烈二世在他30岁那年——1224年，于那不勒斯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

当时欧洲的最高学府，是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当时有不少人像英诺森三世那样，曾在这两所大学接受教育。

在那个天主教的影响遍及信徒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神学、法律等学科都是完全沿袭宗教精神的。而博洛尼亚大学几乎完全是在教廷支配之下的。

而腓特烈之所以创立一所新的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有一个教授罗马法的学科。

腓特烈声称，建立那不勒斯大学的原因，是作为领主的他，不忍心看到自己领地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青年才俊们远赴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求学的辛苦。

表面的理由之下，皇帝的真实想法，是想从在那不勒斯大学培养学习罗马法的青年人才中选拔未来的帝国行政官僚。毕竟，在罗马法通行的时代，法律事务并未置于宗教权威之下。

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的时代，罗马帝国是全体基督徒的敌人。这一点，在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中间普遍认同。但学习罗马法这一行为本身，并非身为基督徒的学者不允许的行为。

就这样，一所延续至今的国立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就以腓特烈二世的名字传承下来，在今天的意大利，以他的意大利语名而称为“费

德里科二世大学”。

萨勒诺医学院

第三件引起罗马教皇不快的事，则是腓特烈二世积极资助与鼓励位于萨勒诺的医学院的复兴。

欧洲最古老的萨勒诺医学院始建于公元9世纪。随着最早的资助者阿玛尔菲城市国家的衰落，这一医学院的活动也渐渐消停下去。腓特烈二世最终使它复兴。

萨勒诺医学院的特色，就是专注于医学研究，而不问教师与学生的宗教和民族出身。学院的教科书以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成，教授和学生更是从地中海各地汇集而来。

只可惜在腓特烈二世的时代以后，萨勒诺医学院重新沉寂下来。但它的薪火相传，却没有因此而中断。

不久，威尼斯共和国就为了对抗博洛尼亚大学，在境内的帕多瓦建立了大学。21世纪帕多瓦大学最著名的就是其医学部。在南意大利萨勒诺开出的花朵，最终移植到了北部的帕多瓦。

耐人寻味的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医学院的资助者，从最早的阿玛尔菲到后来的威尼斯共和国，都是以与异教徒贸易著称的滨海城邦国家。只有腓特烈二世，并不是商人出身。但他与同时代的商人一样，并不拒绝跟异教徒交流。

但腓特烈二世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和罗马教皇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还是要缓和下来。此外，腓特烈也宣誓了带领十字军东征。因此教皇对他的期望是最终把注意力转移到实现东征上去。

那不勒斯大学和萨勒诺医学院建立后，1224年底，腓特烈接待了从圣地前往求助的医院骑士团团长，在二人的直接会晤中听取了巴勒斯坦前线的情况。翌年春天，条顿骑士团团长也前来拜见，并与腓特烈会晤。

得知骑士团来访的教皇，即刻寄来了询问何时出征和兵力配置情况的书信。然而腓特烈的答复却令教皇极为失望。这封复信的内容如下：

预计大约在两年后即1227年8月出征。

其时兵力大约为骑兵1000人，乘坐由桨帆船和帆船共150艘组成的舰队出港。

计划于圣地停留两年。

计划用于东征和保证圣地安全的军费大约为10万枚金币。

在霍诺留三世眼里，说服腓特烈二世出征，几乎是跟魔鬼做交易一般。正当此时，一位献上妙计的人物出现了。

耶路撒冷国王

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个妻子，阿拉贡公主卡特琳娜，三年之前撒手人寰。这位皇帝除了正妻以外，共有5位女性配偶为他留下子嗣。但正值30岁时，腓特烈还是处于单身状态。

以一名普通骑士成为耶路撒冷国王的布里安努，当他的妻子、耶路撒冷王国正统继承人去世之后，王位继承权落到了他唯一的女儿身上。这位名唤约兰达的王国继承人年仅14岁。此时年近70的布里安努，急于为女儿寻找一位如意郎君来继承耶路撒冷的王位。

31岁的腓特烈二世皇帝，与14岁的约兰达联姻的计划，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

对腓特烈一方来说，并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他与前妻是政治婚姻，此外还有好几个情人。而且，这样一来，罗马教皇就不会再继续为难自己。

1225年11月，约兰达一行带着丰盛的嫁妆，从巴勒斯坦出发，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港登陆。腓特烈身着皇帝盛装，在岸上迎接。11月9日，双方在布林迪西港的大教堂举行了华丽的结婚典礼。

约兰达和腓特烈二世结婚（据当时的编年史）

腓特烈相继成为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耶路撒冷国王。至此教皇终于为十字军东征的事情安心下来。尽管如此，商定的出征时间毕竟是“大约1227年8月”。倘若腓特烈遵守这一协定，此时距离出征尚有一年零九个月。

14岁的新娘，并没能得到特殊的待遇。在写给父亲的书信中，约兰达叹息道，新婚后翌日清晨，新郎就带着一位随行的女官，单独寻欢去了。

但这样的婚姻，目的毕竟是生下后代。腓特烈与新婚妻子蜜月一段时光，当约兰达出现妊娠征候时，便以孕期必须在宫中休养为理由，将她送到了巴勒莫。

腓特烈二世对约兰达父亲布里安努的态度十分明确。这位从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那里得到结婚聘礼资助的法国乡村骑士，跟腓特烈二世的威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把继承权从妻子传给女儿，并为女儿找到夫君之后，这位老人将耶路撒冷的王位让渡给了腓特烈。但是教皇并没有准许他的让渡行为，还让他返回巴勒斯坦。

到这时，腓特烈二世感到，十字军东征的日期不能再继续推迟了。

环顾欧洲，在位43年，征战中从未落入下风，为法国开疆拓土的腓力二世，已于1223年驾崩。继承他的路易八世三年之后死去，而1226年新即位的路易九世年仅12岁。而英国也在“无地王”约翰的统治之下陷入内乱。

整个天主教世界中，只剩下腓特烈二世一位可以领导十字军东征的君主。他跟罗马教皇更是知根知底的老相识。更戏剧化的是，教皇对腓特烈东征的要求，已经从邀请发展到胁迫的地步。

与敌人接触

也是在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自己的对手，苏丹阿尔·卡米尔，开始了直接的接触。

关于历史记载的双方的接触，是从1227年开始的。至于在这之前的接触，就没有材料提及了。但当代人可以推断出双方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几次秘密的接触。

接触的双方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伊斯兰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苏丹。双方的接触必须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此时两人之间显然还没有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接触必然是遵循着即使有怀疑也对对方深信不疑的铁律的。

在此之前，腓特烈的宫廷与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以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苏丹之间，常常有学者和诗人进行来往。巴勒莫的宫廷一直十分欢迎穆斯林学者的往来。有了这些交往的先例，派遣手下前往埃及苏丹的宫廷，从一开始就少了很多危险。在外交领域的建设，如果一开始不重视建立深厚的基础，往往会有中途崩盘的危险。

阿尔·卡米尔是腓特烈所率十字军的直接敌人。这一点，苏丹自己十分明白。通过无关政治的文化交流，苏丹和皇帝建立了联系，为未来针对具体问题的外交交涉铺平了道路。

当年47岁的阿尔·卡米尔，远未处在安心的状态之下。

阿拉迪尔死后，长子阿尔·卡米尔和次子穆阿扎姆的关系出奇得

好，这与通常的伊斯兰领主死后你争我夺的情况大为不同。年龄仅相差两岁的兄弟俩，在父亲去世以后明显处于对手的关系。但两人忠实地继承父亲的遗志，满足于分别统治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区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维持得很好。

然而正如前所述，伊斯兰世界分裂为埃及派和叙利亚派，两派中都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阶层。开罗和大马士革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进行的竞争，一直在水面下暗流汹涌。尽管两兄弟之间并没有撕破脸，对埃及的领导地位颇有微辞的叙利亚派，希望挑起兄弟相争的局面。就这样，大马士革的统治者穆阿扎姆，逐渐被推到了与兄长的开罗决裂的风口浪尖。

这成为开罗的阿尔·卡米尔无法回避的问题。假如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爆发冲突，就会进一步引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内战。将避免内战视为第一要务的阿尔·卡米尔，自然不希望西欧人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

经过几次无关主题的通信往复，阿尔·卡米尔直奔主题。他任命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埃米尔——法拉丁，作为呈送自己亲笔信的特使。1227年1月，法拉丁越过冬季寒冷的地中海，在意大利南部登陆，觐见在福贾的王宫中休养的腓特烈二世。

从此以后法拉丁就成为了苏丹与皇帝之间的密使。史书上没有对他年龄的记载。但根据他漫长外交生涯的推理，与时年33岁的腓特烈相比，他可能还要略微年轻一些。

令法拉丁诧异的是，腓特烈二世见到自己，并不需要翻译就能够对话。

叙利亚、巴勒斯坦出生的基督徒中，有不少能听懂阿拉伯语的。但像巴里安·伊柏兰那样能够讲流利上乘阿拉伯语而不需要翻译的，并不常见。

此时法拉丁眼前端坐的，是从未去过中近东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位与罗马教皇平起平坐、率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人，居然能够不需翻译、毫无障碍地阅读和理解阿尔·卡米尔的信函，并能用阿拉伯语做出口头的答复。

这自然使法拉丁对皇帝油然而生出奇的好感。而腓特烈对年轻的埃米尔也抱持着正面的态度。腓特烈不会给自己并不喜欢的人致以热情的回信。然而苏丹的信却带来了积极的回应。

阿尔·卡米尔在信中允诺，将耶路撒冷和包括拿撒勒在内的整个耶路撒冷王国领土都返还给基督徒。这样的话，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征服耶路撒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再进行一次远征。这自然合乎腓特烈的心意。

腓特烈立即以护送法拉丁回国为理由，派遣自己的心腹巴勒莫主教贝拉尔多前往开罗。贝拉尔多此行，就是为了进一步商议和解决双方的外交问题。

虽然双方信仰不同的宗教，但一方并不想出征，另一方也不想让对方染指。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双方看上去能够一拍即合。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未尽如此。

教皇格列高利

两个月后的1227年3月，霍诺留三世离开了人间。新教皇于第二天获选。57岁的格列高利九世，与前任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火爆性格。教皇上任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与年轻自己20多岁的腓特烈二世性格的冲突。格列高利意志坚决，要全力鞭策皇帝出兵东征。

甫一即位，教皇就写信给了腓特烈。

信一开始就是一段典型的措辞：作为世上羔羊牧者的教皇，祝愿羔羊的心中平安，而皇帝只有实现上帝的期望，平安才会真的降临。信中强调，如果腓特烈不发兵东征的话，教皇就将对其处以开除出教会的绝罚。

在一年前，腓特烈就已经派遣了250名兵士。之后他还约定，将4000名英国兵士、100名西西里的骑士和400名德意志士兵统一集结于布林迪西。这些出征兵士的军费，自然都要皇帝来负责。

腓特烈并未告知教皇，他已经开始组织建造适于溯尼罗河而上的浅底帆船组成的船队。

腓特烈在集结军队同时进行秘密和谈的工作，令人想到了同时代的圣人阿西西的方济各。圣人以和平为目的进行交涉时，是手无寸铁的。而以军事力量为依靠的和谈，无疑是更为有效的。

蒙在鼓里的格列高利九世，已经决意以绝罚为武器来鞭策皇帝。腓特烈只好决定率军出发了。由于皇帝和苏丹还在为正式协议进行紧密的磋商，东征的宣言自然也就成了一次走过场的仪式。

1227年8月21日，十字军从布林迪西出发了。这支十字军当中，并没有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同前往——因为在出发之前，瘟疫突然爆发了。

从9月8日开始，腓特烈的舰队中相继有人倒下。舰队只好转头返回母港。回港以后，染病者的数目不断增加，腓特烈的大将中有一位因染病而死，而皇帝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无奈的腓特烈只得让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率领800名骑兵，乘坐20艘桨帆船，先行前往东方。皇帝自己则给教皇写信说明延期出行的原因，乘船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伯乔利港，在这一温泉疗养地休整。

第一次绝罚

皇帝的请求导致了教皇愤怒的暴发。怒上心头的教皇，以腓特烈违反约定为理由，对其公开处以开除出教的绝罚。

绝罚的理由并不仅仅是这些。绝罚敕令中简单回顾了孤儿出身的皇帝是如何在教廷的支持下，一步步成为西西里国王、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指出假如没有教廷的支持，就没有腓特烈二世的今天。

格列高利立即将这一敕令传达给整个西欧的大主教、主教、国王和诸侯。敕令的全文更是于1227年11月18日张贴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正面的大门上。这样一来，对腓特烈二世的绝罚，就得以完全公之于世。

此时的腓特烈，采取了与自己地位相称的一套强硬说辞，把想法写成书信，呈送给教皇。

> 寡人在幼年时代固然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襄助，但在那之后西西里的岁月中，寡人就是在教廷完全漠不关心的情境中成长的。而当寡人成年以后取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则是由伯父奥托让位而来，并非教皇所赐予。
>
> 因此，寡人达到今日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上帝所护佑，另一方面则是意大利与德意志诸侯的支持。

这封信令格列高利九世怒不可遏。他根本无视腓特烈信件末尾的1228年春季率领十字军出征的承诺。

第二次绝罚

1228年3月23日，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门前，再度张贴了绝罚的告示。在第一次绝罚还未解除的情况下，腓特烈面临第二次绝罚的惩处。

第二次绝罚的理由，是皇帝缺少一颗对罗马教皇恭顺的心。

在格列高利九世看来，受到绝罚的皇帝理应身着罪人的粗麻布服装，前往教皇的驻跸地，跪在大雪中三日三夜，祈求自己为他解除绝罚。而腓特烈现在却在温泉疗养地独自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然而腓特烈二世却并非忍受“卡诺萨之辱”的皇帝亨利二世。

因此，格列高利只得变本加厉地发出第二份绝罚告示。这封文书很快传遍了整个天主教世界，其中加入了如下的指示：

第一，对受绝罚者所在地的所有居民，作禁止圣务的处罚。

禁止圣务是开除出教的前一步。教皇以此惩罚俗人，禁止他们从事宗教活动。从弥撒开始，新生儿的洗礼、婚礼、葬礼等一概不能举行。

如果说开除出教的绝罚是针对个人，禁止圣务就是对整个地区居民共同的惩罚。

第二，受绝罚者所拥有领地内的全体居民，从对此领主服从的义务中解放。因此，居民不再有纳税的义务，也不必响应征兵的要求。

第三，受绝罚者所率的军队不再是十字军。因此，其军队所到之处，当地居民有权利阻止其行军，也可以任意掠夺其军备物资。

以上三项中，第二项的作用最厉害。

但在腓特烈二世已经明确宣布进行十字军东征以后，教皇提出的第三项指示带来了与之预期相反的效果。

那个时代的西欧大多数人，还是信任十字军的。此时在普通人看来，地位并不如皇帝高的教皇对皇帝的军队进行处罚，就成了教皇自己阻碍十字军东征的实施。这一举动让普通平民感到极大的疑惑。

而从腓特烈二世一边来看，他虽然受到了两次绝罚，实际的损害却并不大。领地上的居民没有起来反抗，神职人员也没有造反。西西里岛的大主教和主教们本来有绝对服从教皇的义务，但他们都选择站在皇帝一边。没有人真的服从教皇的命令。

1228年春天，除了两次受到绝罚以外，腓特烈二世还不得不处理另外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皇后约兰达的去世，这发生在4月。不到17岁的约兰达，在诞下皇子康拉德10天之后撒手人寰。在那个产妇死亡率很高的年代，失去妻子的腓特烈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

通过婚姻得到耶路撒冷王国国王身份的他，从此失去了作为继承者的合法性。但由于康拉德的出生，腓特烈又戏剧性地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国正统继承者的父亲。这对于已遭绝罚的腓特烈来说不啻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受到绝罚者无法得到教皇的承认，但父亲为确立儿子的王国继承权而领兵出征，在全世界都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个问题，则是前一年冬天，大马士革传来了穆阿扎姆的死讯。穆阿扎姆无疑是自然死亡，但随后叙利亚派对阿尔·卡米尔的反抗被埃及的苏丹完全平息下来。

随着对整个叙利亚的兼并，47岁的阿尔·卡米尔，成为了父亲阿拉迪尔之后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

对阿尔·卡米尔来说，将同为伊斯兰教圣城的耶路撒冷返还，并阻止腓特烈领导的十字军，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对于和平取得耶路撒冷的安排，腓特烈二世在出兵之前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教皇则完全没有解除皇帝绝罚的意思——他对东征的干扰丝毫没有改变。

于是，腓特烈所率领的十字军，成了未受到教皇祝福的十字军。参加这第六次十字军的成员，也就因此没有任何免罪的报偿。

如果是平凡的人，经受如此的打击，大概就不会出兵了。他一定会为了满足教皇，身着粗布衣衫，赤脚前往罗马，以悔改的姿态伫立在圣彼得广场中央，祈求解除绝罚。毕竟以受绝罚之身率领十字军东征师出无名。然而倔强的腓特烈却完全没有改变出征的决定。

出发

最终，受绝罚者所率的第六次十字军，从意大利南部最大的海港布林迪西出发了。这一天是1228年6月28日，33岁的腓特烈为出征做了周密的准备。

腓特烈所率的舰队包括40艘桨帆船和上百艘运输帆船，上面装有大量军粮、武器和马匹，还乘坐着来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1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以上只是皇帝亲自指挥出征的部队，还有一部分人马已经提前出发。

先行出发的是在瘟疫爆发前一年，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率领的800名德意志骑士。这支部队除了骑士，还包括一部分步兵和后勤人员，总人数大约是骑士人数的三倍。

先行部队在1227年秋天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遵照腓特烈的命令，在西顿港进行整备，并完成了对港口防御工事的改造。

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接下来对阿克和蒙福特的城堡进行了加固，到1228年，他们又前往凯撒利亚，改造当地的防御工事。这一系列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腓特烈二世登陆时军队的安全和拥有足够数量的前线防御基地。

将参加第六次十字军的全部人马合计起来，包括900—1000名骑兵，以及三四千名步兵。兵力并不众多。

但这支军队的指挥完全处在腓特烈二世一个人支配下。直接听命于他的两位总指挥，分别是陆上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海上的马耳他的恩里科。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当腓特烈到达巴勒斯坦以后，

他还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并肩作战，加上条顿骑士团的支持，协调一致。

年届50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对比自己年轻15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他不仅作为一名战将，也作为腓特烈二世的外交人员活跃在皇帝身边，时刻代表皇帝的立场。

如果说赫尔曼是腓特烈的右臂，皇帝的左臂就是活跃的海军统帅恩里科了。马耳他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抵抗穆斯林的最前线。这位出身马耳他的将领，就是最忠实执行皇帝命令的人物了。与赫尔曼一样，恩里科也善于外交活动，是腓特烈身边不可多得的人才。

恩里科虽然不如赫尔曼年龄大，但与34岁的腓特烈相比，还是要年长不少。

他们两人就成为了腓特烈事实上的副将。因此，有两人辅佐的第六次十字军，规模不大，却都是精兵强将。

除此以外，第六次十字军还有一大特色。

这就是本次十字军的海军力量完全是由自己控制的。回顾第三次十字军，法国国王腓力需要完全依赖热那亚的海军力量，而英国狮心王理查虽然动用本国舰队运输兵士，在海战时也不得不依赖比萨和热那亚的力量。英格兰的帆船适于运输，但在海战时，可靠的战舰还是依赖桨橹灵活机动的桨帆船。适于地中海航行的桨帆船并非欧洲北部各民族常用的船只，只有习惯于在地中海活动的当地船员善于驾驶。

腓特烈二世的领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都面对着地中海。这些地区的海员不仅长于海运，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桨帆船驾驭者。无论是赫尔曼先期率领的骑士团所乘坐的20艘桨帆船，还是腓特烈自己率领的40艘桨帆船，都是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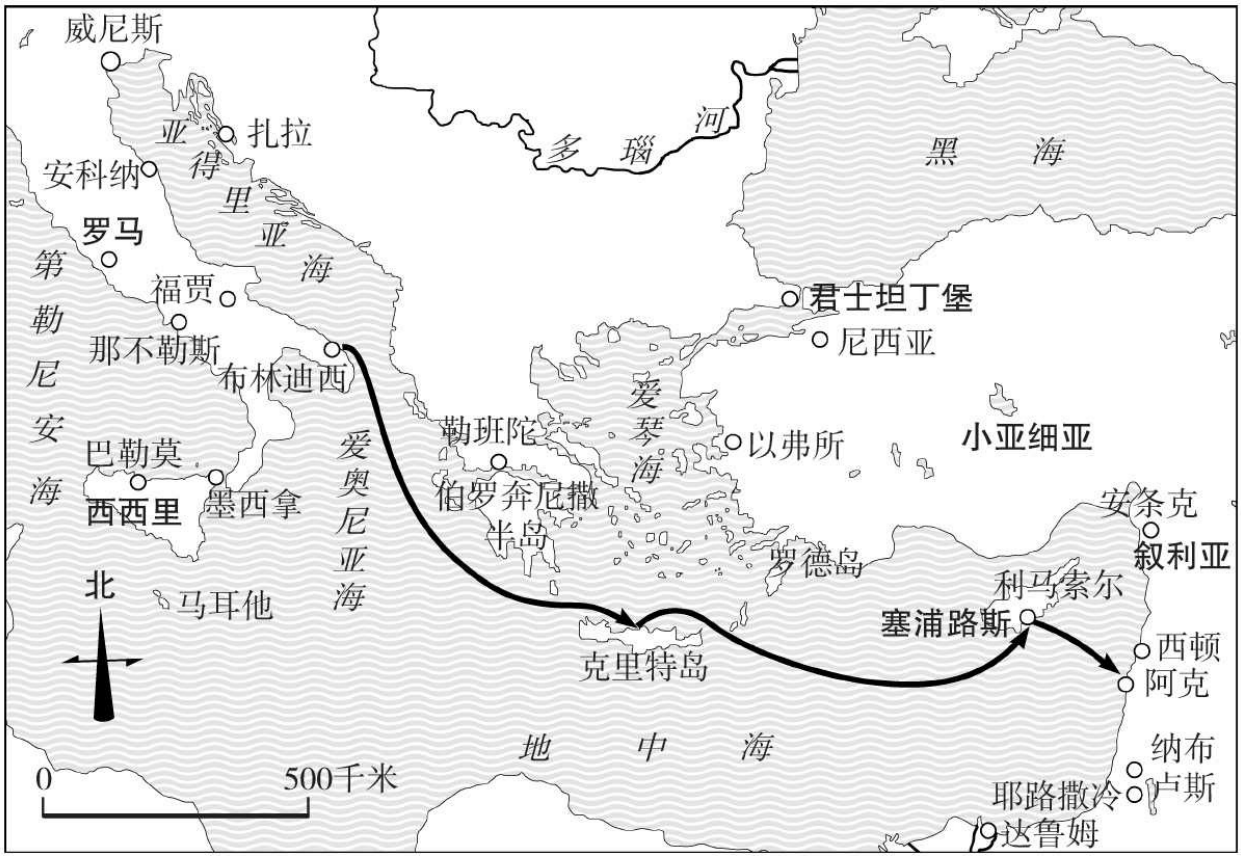
这些舰船的总指挥，正是生长于马耳他，熟悉整个地中海的恩里科。因此，拥有自身的海军力量而无须他国提供，对于指挥作战来说是殊为有利的。腓特烈的海军也因此独具特色。

腓特烈的舰队中还包括为本次东征特制的运输船。这种船的底部很浅，可以溯尼罗河而上，进攻开罗。

腓特烈二世以周密的准备前往东方。虽然他还没有与阿尔·卡米尔交战的经历，但他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战斗力。作为最高司令官的腓特烈，还从没有在此前的作战中失利过。而此时皇帝的打算，是在并不动用自己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和平达到东征的战略目标。

6月28日离开布林迪西的舰队，沿着希腊半岛的西侧南下，然后转舵向东，经过克里特岛和罗得岛，于7月21日在塞浦路斯岛南部的利马索尔港登陆。经过3周的旅行后，腓特烈一行于塞浦路斯岛上休整6周。与狮心王理查一样，腓特烈二世也十分重视塞浦路斯岛的战略地位。

从理查时代转入天主教徒控制的塞浦路斯岛，正由一位8岁的幼年国王统治着。而以贝鲁特为中心发展自己势力的伊柏兰家的继承人约翰，正对塞浦路斯虎视眈眈。准备君临巴勒斯坦的腓特烈，自然不希望塞浦路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内乱。况且塞浦路斯还是能为自己提供大量军粮的基地。



腓特烈二世的进军路线

腓特烈非常希望不动用军事力量就能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但是，腓特烈和约翰的谈判并没有进展下去，皇帝也没有派兵追击从法马古斯塔逃出的约翰，而是最终与伊柏兰家签订了协议。

双方的协议包括如下内容：

一、直到问题完全解决，皇帝承认伊柏兰家的约翰对贝鲁特的领主权；

二、皇帝到达巴勒斯坦之后，若开展军事行动，约翰负有保卫叙利亚基督徒的责任；

三、这期间塞浦路斯王国的防务，由腓特烈的部众代替幼年国王完成。

从此塞浦路斯的问题得以解决，腓特烈也于9月3日出发。9月7日，大军在巴勒斯坦基督教势力的中心阿克登陆了。

到达阿克

十字军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首次驾临圣地，引爆了中近东基督徒的宗教狂热。除了阿克的居民，邻近各个城市的基督徒都蜂拥而至，将阿克城的港口围了个水泄不通，期待着皇帝御驾的光临。

沐浴着秋季阳光的腓特烈二世，在以阿克大主教为首的一众要人引导下，从港口向王宫缓缓行进。英姿勃发的皇帝跨坐在马上，俨然一副中近东全体基督徒保护者的威严形象。

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热烈欢迎，使腓特烈感到风光无限。同行的巴里大主教将到达的盛况记录下来，写成书信，委托恩里科派人呈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大主教十分期待教皇能够收回成命，解除对皇帝的绝罚。

就在这时，两位手持教皇敕令的修士，乘船来到了阿克。他们一登陆，便径直前往中近东基督徒的最高精神领袖——耶路撒冷牧首的官邸，将教皇的敕令递交给牧首。

在敕令中，教皇重申了第二次绝罚的告示：基督徒没有服从已受绝罚的皇帝的义务。教皇特别明令禁止宗教骑士团服从皇帝的调遣，严禁骑士团团员与皇帝并肩作战。

得知教皇的敕令，阿克的居民动摇了。但他们毕竟亲眼目睹了皇帝的飒爽英姿，一时间难以接受绝罚的事实。最终，阿克城内居民分裂为敌视皇帝的一方和支持皇帝的一方。

而在各个宗教骑士团的内部，人们为是否接受皇帝、听从教皇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与其他修会一样，都处于罗马教皇直接管辖下。理应服从教皇命令的两大骑士团，由于在中东的长期驻扎，对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基督徒的现状十分清楚。

一番争论之后，两大骑士团达成了一致，都决定支持腓特烈的十字军。他们也分别致信教皇，禀报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我们只得与皇帝并肩作战。但我辈的协助，绝非在皇帝名义下，而是为了上帝和全体基督徒尽全力。”

同样是宗教骑士团的条顿骑士团就没有以上的困扰了。条顿骑士团的成员仅限于德意志贵族出身者，并不直接受罗马教皇管辖，因此天然服从皇帝的命令。

出于政治上避免自己处于风口浪尖的考虑，腓特烈将第六次十字军名义上的总统帅职务交给了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

这样一来，第六次十字军就不再是受绝罚的皇帝领导了，而是名正言顺地由条顿骑士团团长来率领。

再次接触

抵达阿克之后，腓特烈二世再次派出了密使，与阿尔·卡米尔交涉。两位密使都是长期居住在中近东的封建领主，能够自由运用阿拉伯语交谈。两人前往苏丹当时的驻跸地纳布卢斯。腓特烈的外交努力，在刚刚来到阿克接受人群欢迎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阿尔·卡米尔之所以来到纳布卢斯，是因为一年前穆阿扎姆之死引发的叙利亚的群龙无首，使埃及苏丹有了将整个叙利亚据为己有的机会。腓特烈来到之前，阿尔·卡米尔已经成功兼并了叙利亚。

阿尔·卡米尔还有一名兄弟，与穆阿扎姆同龄的阿尔·阿斯拉夫，从亡父阿拉迪尔那里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权。这位兄弟对长兄占领叙利亚的行为无法容忍，正准备与阿尔·卡米尔对抗。

腓特烈进入巴勒斯坦时，阿尔·卡米尔正在与阿尔·阿斯拉夫协商，希望能够化解矛盾。此时的埃及苏丹，正处在两难的境地。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一直墨守创始人萨拉丁的策略，与哈里发保持较远的距离。当时穆斯林眼中的哈里发形象，可以从他们流传的一句“罗马教皇就是基督徒中的哈里发”中窥见一斑。做为最高的宗教领袖，在萨拉丁以前，巴格达和开罗各有一位哈里发。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属于逊尼派，而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则是什叶派。

萨拉丁在开罗哈里发死后，终止了法蒂玛王朝，并未指定新的哈里发。这一状态在阿尤布王朝的后两位苏丹阿拉迪尔和阿尔·卡米尔在位期间一直持续。

阿拉迪尔临终时将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委托给自己的儿子阿尔·

阿斯拉夫。他的驻跸地摩苏尔，处在距离巴格达不远的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带。这就使他比远在开罗的长兄离哈里发更近，也因此更容易和哈里发及其周围的伊玛目们相互影响。

阿尔·卡米尔深知，在与阿尔·阿斯拉夫争夺的时刻，自己在与腓特烈二世的谈判中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因此，早在一年前腓特烈未曾出发时，苏丹就提出了“返还耶路撒冷”的和谈条件。然而耶路撒冷毕竟也是穆斯林的圣城。将圣城拱手让给基督徒，自然会遭到拥有哈里发支持的阿尔·阿斯拉夫强烈的反对。

但以埃及为基地的阿尔·卡米尔又不能无视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力量。

一直所向披靡的青年皇帝所率的精锐集团，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带着可以在尼罗河上通行无阻的舰队造访中近东。如果这支舰队满载骑兵和步兵沿尼罗河上溯，出现在开罗的市中心，对阿尔·卡米尔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苏丹刚刚取得叙利亚，又在努力改善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此时如果大本营出了闪失，就相当于前功尽弃。

于是，阿尔·卡米尔接受了腓特烈二世再次和谈的请求。他再次任命曾经面见皇帝的埃米尔法拉丁全权负责。法拉丁的上次出使，已经在腓特烈面前完整表达了苏丹的意思。

但此时阿尔·卡米尔同意和谈，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苏丹完全知悉皇帝在西欧的现状。教皇对皇帝的绝罚尽人皆知，而腓特烈所在的阿克也已经分裂为教皇派和皇帝派。

苏丹还知道，皇帝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跟教廷直辖领地接壤。如果深深憎恶皇帝的格列高利九世出兵进攻意大利南部，腓特烈二世一定会归国抵抗的。

作为书写历史的我们，总能深深地感到一点，那就是无论什么信息，信息只对认识到它重要性的人重要。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说，都是一样的。同是基督徒，有善于利用信息的教皇和王侯，也有不善于利用信息的。而对于同在基督教世界从事贸易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来说，前者就比后者更为善于利用信息。

正如古罗马伟人恺撒所说的："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事实的全部。大多数人只看得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实。"

而能够充分利用信息的人，则是能直视自己不愿看到的事实的。

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周围的伊玛目们也好，美索不达米亚的领主阿尔·阿斯拉夫也好，他们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率领大军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们也知道皇帝受到了教皇的绝罚，迟早会有一天不得不返回欧洲去。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位皇帝拥有能直捣开罗的强大军事力量。只有阿尔·卡米尔注意到，次年春天，马耳他出生的海军将领恩里科又率领20艘船来到了巴勒斯坦。

1228年秋天再次开始的谈判，在阿克城外皇帝的营帐内进行。全权代表苏丹的年轻埃米尔法拉丁，以务实的态度与腓特烈二世积极沟通着。二人一边下棋，一边亲切地交换着意见，谈判桌旁洋溢着轻松的气氛。

手拿着棋子的腓特烈抛出一个个重要问题，法拉丁无法完全确知苏丹的决意，因此只能闪烁其词，见招拆招，小心翼翼地回答。双方这样的反诘，往来了好几次。

由于这次谈判完全以阿拉伯语进行，在十字军一方并没有关于谈话内容的记载。完全不理解对话内容的书记官，只留下了一句"双方一直

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会谈”。

从特拉维夫到加沙

9月开始的会谈，到11月初时转移了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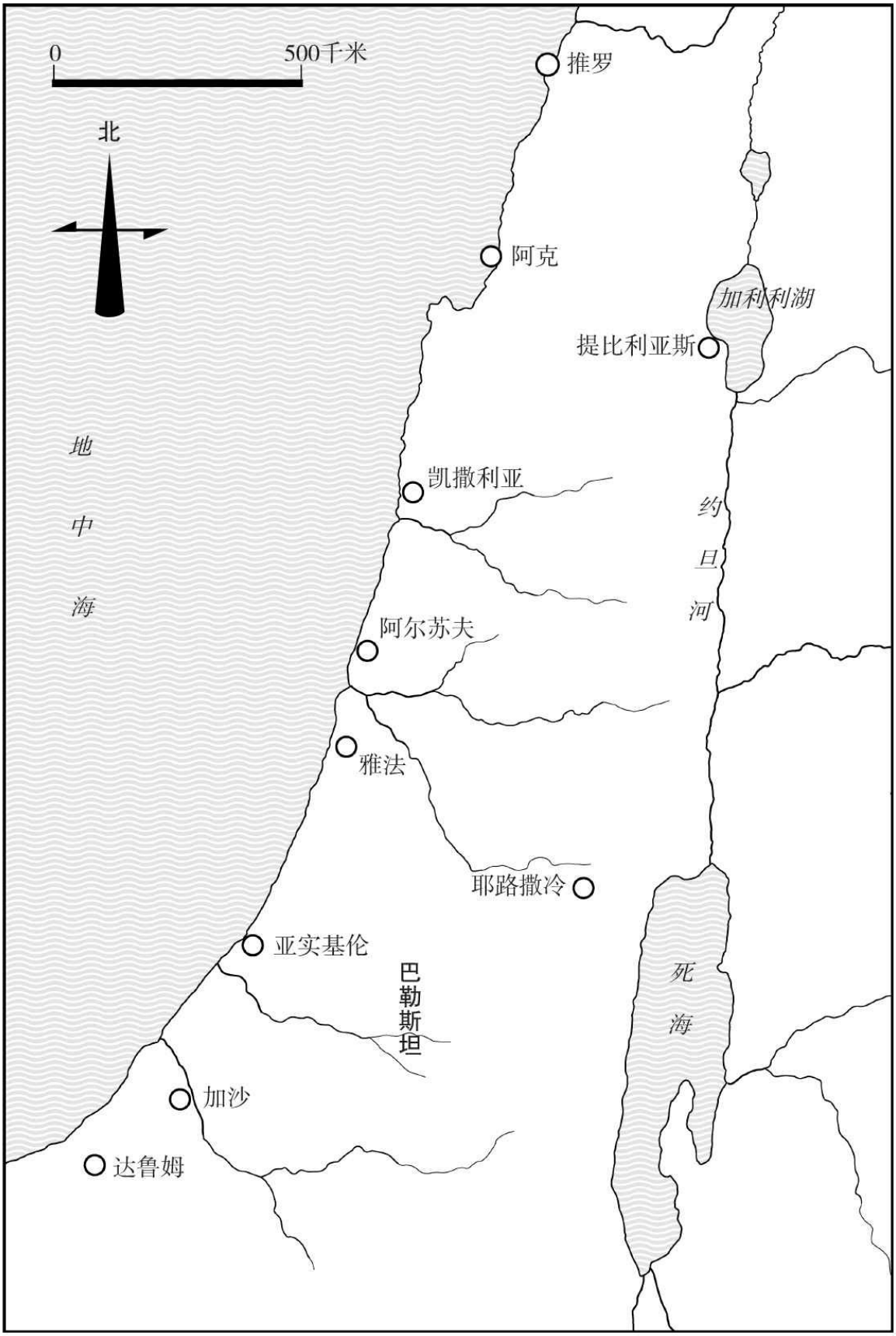
妥善完成与阿尔·阿斯拉夫的谈判之后，阿尔·卡米尔不必继续留驻纳布卢斯。在返回开罗的途中，他前往加沙的行宫居住。

得知此事的腓特烈二世，从圣地基督教国家的临时首都阿克动身南行，来到了雅法。到达雅法之后，他与阿尔·卡米尔的距离只有以前的一半。

雅法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行政首都和第一大城市特拉维夫。而加沙今天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名称，是巴勒斯坦自治地区内激进派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的行政中心。

从特拉维夫到雅法的距离大约有70公里。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两座城市之一发射导弹，导弹瞬间就会在另外一方爆炸。

而在约800年前的1228年至1229年间，同样距离的两位君主，却决定不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和平共存。要知道，他们分别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强有力的世俗统治者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世俗统治者中的第一人，精英中的精英。


0
500千米
北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地
中
海
凯撒利亚
约
旦
河
阿尔苏夫
雅法
耶路撒冷
亚实基伦
巴勒斯坦
死
海
加沙
达鲁姆

雅法和加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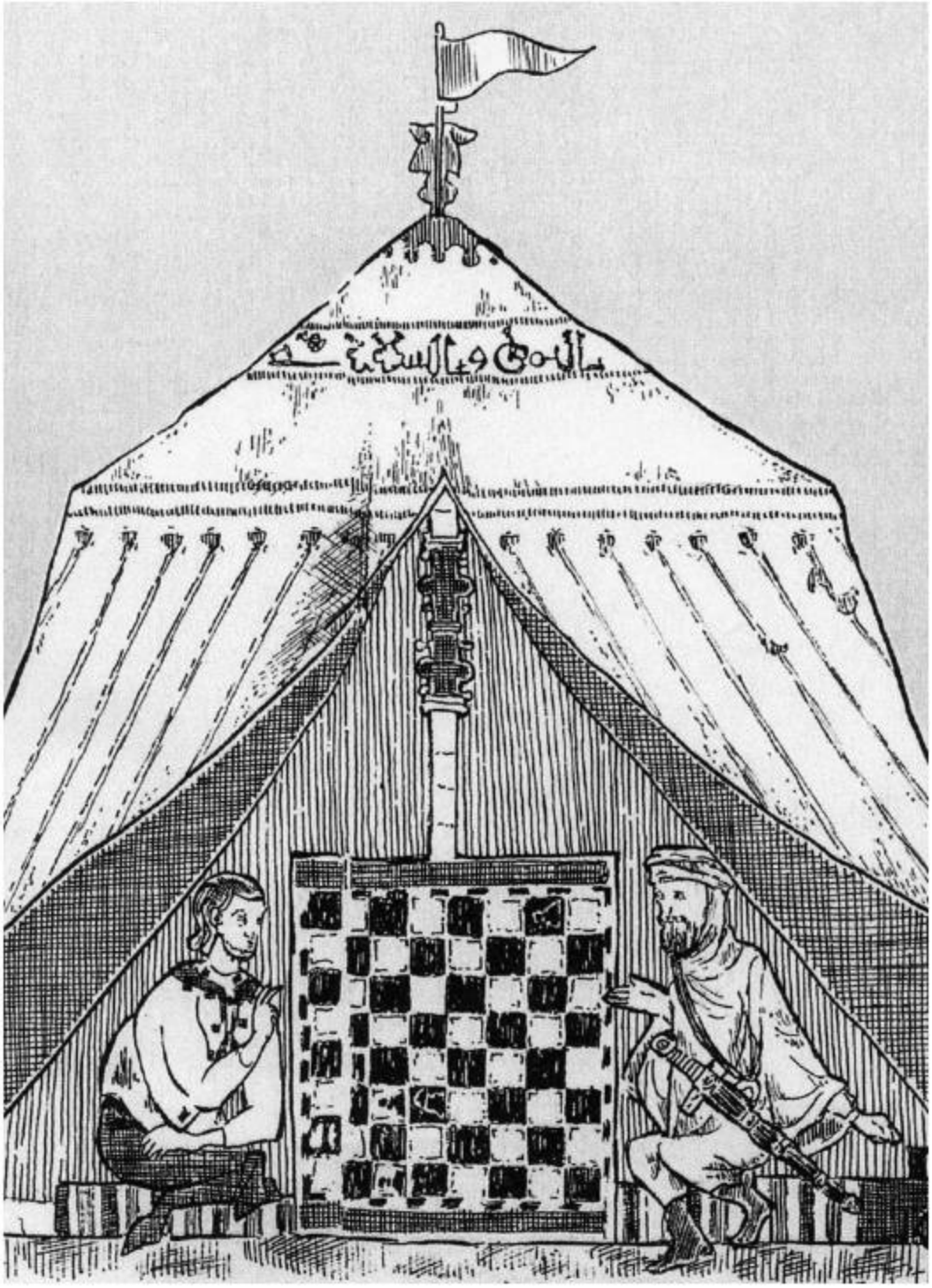
由于受到33岁的皇帝大幅度缩短距离所带来的压力，48岁的阿尔·卡米尔决定留驻加沙。法拉丁带着与腓特烈谈判的结果面见苏丹，然后再把加沙的指示带到雅法的谈判桌前。多次往返颇为辛苦，所幸的是加沙和雅法之间是平坦的低地，适合马匹纵横驰骋。

在时断时续的来来往往之间，不变的是双方会谈时的友好气氛。苏丹向皇帝馈赠了自己所使用的豪华营帐，皇帝则将自己绘有黑色鹰鹫的黄色骑士装和欧洲产的骏马赠给了苏丹。双方还不时作诗交换。对穆斯林来说，作诗是上流人士的时髦。精通阿拉伯语的腓特烈也擅长此道。

有意思的是，与腓特烈相谈甚欢的法拉丁，干脆地接受了西欧的仪式，成为了一名骑士。消息传到阿尔·卡米尔那里，苏丹忍俊不禁，“你小子也成了骑士了！”他想必是忆起36年前，自己在狮心王理查面前被授予骑士称号的故事。

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必须在其封君面前宣誓效忠。但如果穆斯林成为骑士，自然是无法对基督徒宣誓效忠。因此无论是狮心王理查还是腓特烈二世，在授予对方骑士的时候，都是凭着一时的心情愉快而做的决定，这自然也是基督教所不允许的。而阿尔·卡米尔和法拉丁，则都是泰然接受，活脱脱成为“骑士”。

这样一来，阿尔·卡米尔为拖延时间而进行的和谈，逐渐认真地向着两大异教共存的方向发展了。与此同时，腓特烈二世也不忘继续强化中近东基督教国家的防御工作。



边下棋边谈判的腓特烈二世和法拉丁

从这一时期起，巴勒斯坦开始出现了条顿骑士团建造的城堡。此前当地的城堡主要由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兴建，而条顿骑士团也逐渐

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然，假如没有腓特烈二世的积极援助，创立仅10年的条顿骑士团也不可能取得建造城堡的机会。

腓特烈不单单资助条顿骑士团，而且对各个骑士团的所有重要城堡都进行了战略上的关注和物资援助，以增强其战斗力。他还特别任命医院骑士团的团长负责对各个海港城市的城堡进行加固和兵力部署。

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腓特烈派遣兵士加强防御工事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当地主张对穆斯林强硬的鹰派人士的支持。无论如何，既然率领了大军来巴勒斯坦，只是谈判而不做抵抗，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缔结和约

雅法和加沙之间的和平谈判，从1228年11月起就一直进行着。

三个月后的1229年2月，双方基本达成一致。谈判一度陷入胶着，但最终还是向着皇帝满意的方向发展。

2月18日清晨，双方在雅法的和平议定书上签字。腓特烈二世首先签字用玺。当天夜晚，阿尔·卡米尔在加沙也签字用玺。未曾谋面的两位统帅间实现了和议。

这一议定书的文本原样已经荡然无存。它之所以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与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双方对这一和议的恶评不无关系。然而，所有的评判大都是反对压过赞成声音。历史上记载过这次和议的人，重视的也是那些更尖利的反对声音。

因而研究者不得不满足于通过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所存留的史料片段，来构筑这部分历史的真相。很多研究者只不过是以罗列原始史料作为结论。至于对史料的翻译来说，西方史家总以“我们”来指十字军一方，而以“他们”来指伊斯兰世界，翻译的言辞也不免陷于繁杂。

腓特烈二世和阿尔·卡米尔握手（根据当时的编年史，但两人实际上并未会面）

而我在本书中所做的，是将基督教史料和伊斯兰教史料中的记载，分别按照当时和议的项目来整理。这些史料中共通的、明确的部分，都可以在腓特烈和阿尔·卡米尔一方的记载中找到。这样做大概是一种较为合适的处理方法吧。

第一，苏丹同意，穆斯林一方将耶路撒冷让渡给基督教一方。

但是，耶路撒冷城内东侧的1/3，仍然作为非武装的“伊斯兰区”由穆斯林自治。

在这一地区至今还伫立着苏丹奥马尔兴建的金碧辉煌的圆顶清真寺，以及中世纪以来耶路撒冷穆斯林信仰的中心——阿克萨清真寺。

依据和议，尽管耶路撒冷由基督徒管辖，但基督徒在进入这一“伊斯兰区”时，则必须经穆斯林管理者的允许，才能通行。

而之所以基督徒需要常常进入伊斯兰区，是因为古犹太国时代的所罗门圣殿座落在这一区域内。相传耶稣年轻时曾与犹太祭司在这一区域争论。对于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来说，凡是与耶稣生前活动有关的地方，他们都会去参观。

出于相同的原因，腓特烈二世要求将耶稣诞生地伯利恒和成长之地拿撒勒都收入基督徒控制的范围。阿尔·卡米尔满足了皇帝的要求。

第二，虽然除“伊斯兰区”以外的区域都归基督徒领有，耶路撒冷周边的地区仍然归穆斯林控制。

这就使耶路撒冷成为了一个深入敌境、孤立无援的飞地。就算市内有常备武装，也很难防止城市周边成群的强盗和土匪。因此，腓特烈二世提出，加强耶路撒冷的城防工事。这一要求也得到了阿尔·卡米尔的

认可。

第三，伊斯兰世界承认十字军国家从贝鲁特到雅法之间的巴勒斯坦沿海地区的海港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领有权。

虽说早在理查与萨拉丁之间就实现了伊斯兰世界对十字军国家的承认，但当时是从推罗到雅法一线。经过腓特烈和阿尔·卡米尔的和议，从推罗以北的西顿直到贝鲁特一线，都作为十字军国家的领地得到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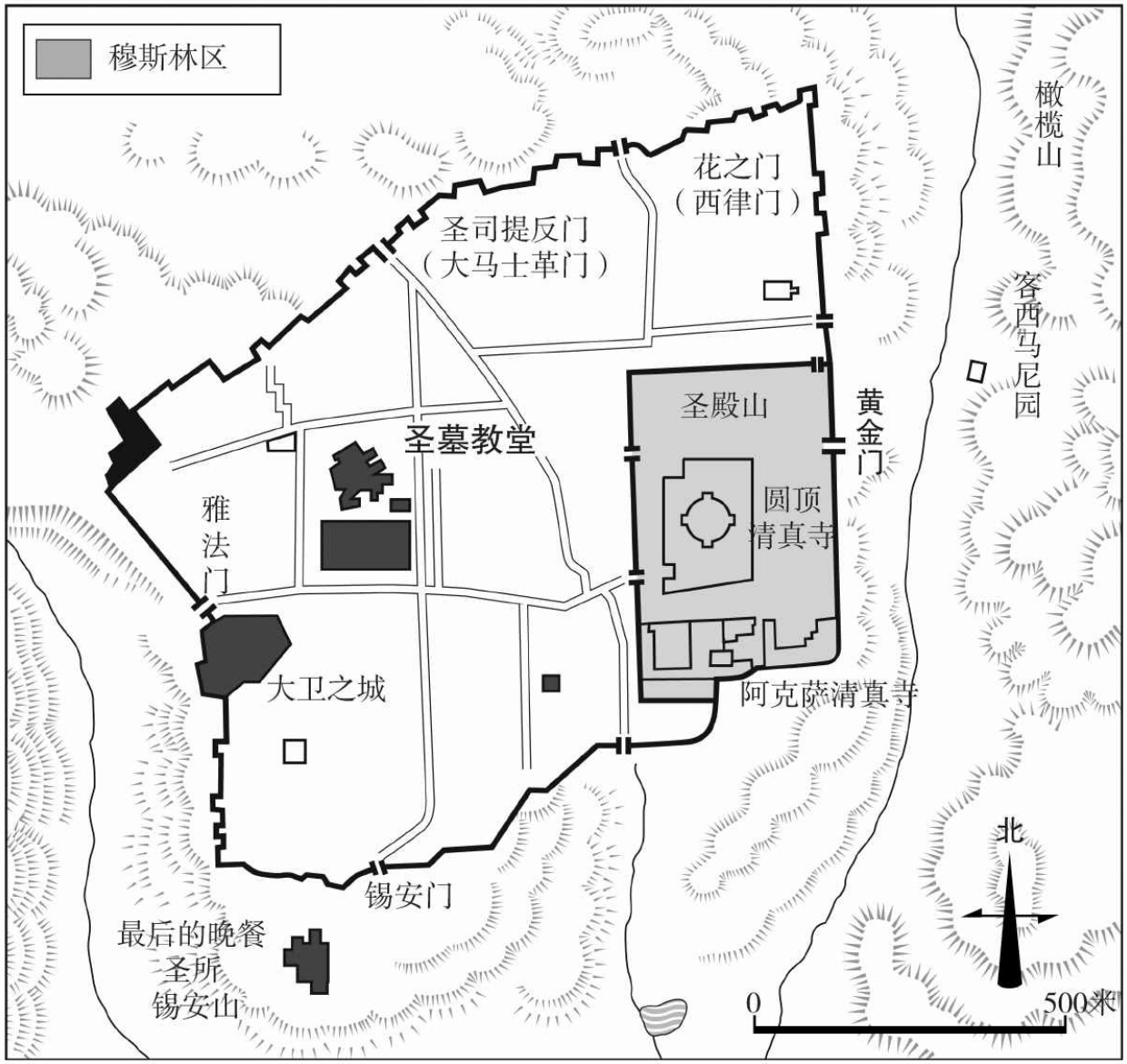
新的和议增加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土，但结果绝不仅是增加领土这么简单。增加这一段海岸线之后，从安条克经特里波利直到雅法的整个近东海岸线上，十字军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的连续控制线，其间没有穆斯林控制的区域。

这样一来，无论是朝圣者也好，通商者也好，在那个欧洲与近东以海路相连的时代，基督教世界取得了极为有利的战略形势。

第四，无论是在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领地上，双方都负责保证朝圣者和商业活动的安全与自由。

这一点是对理查和萨拉丁之间和议的再次确认，确保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利益共享。

第五，交战双方交换在押的全部战俘。



耶路撒冷城市图

该条目所指的战俘，是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在达米埃塔之战中双方被俘的兵士。

第六，和议有效期为双方署名用玺之日起10年。

因此，双方的和议到1239年2月为止，而且双方都没有关上续约的大门。

得知和议结果之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骚动起来。

在伊斯兰世界，首先发难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阿尔·阿斯拉夫。他首先起来反对将圣城耶路撒冷让渡给异教徒。但阿尔·卡米尔的威信毕竟早已树立，反对的声音没能起到实际作用。

阿尔·卡米尔始终未能说服自己的兄弟。从此后直到21世纪的今天，伊斯兰世界中所有涉及十字军的记载，都把这次议和看作“屈辱”的事件。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中，对这次和议的争论，可就不像“屈辱”那么简单了。

在反对的旋涡中

驻跸阿克的耶路撒冷牧首，以激烈的言辞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辩解说，和议的达成，收回了原来一直在异教徒手中的耶路撒冷，朝圣者也就因此可以方便地前往圣城了。牧首对此充耳不闻。

在即刻写成的书信中，耶路撒冷牧首向教皇做了如下的汇报：

> 这位皇帝完全不配做基督徒的皇帝，以无能二字概括绝不为过。在撒拉森人面前，他完全不敢强硬起来，只是不停地感谢对方。对这种毫无信仰之徒，我只想表达自己的轻蔑。

对牧首杰拉德来说，无论是议和，还是腓特烈二世对异教徒的尊重，以及与穆斯林共存的观念，都是无法接受的。

教皇读罢牧首的来信，对腓特烈的评价更加负面。至于解除对皇帝的绝罚，此时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对教皇和耶路撒冷牧首来说，皇帝与异教徒的谈判，对于皇帝的基督徒身份来说，是极大的错误。他们坚持认为，圣城耶路撒冷的“解放”，决不能通过与异教徒的协商解决，而必须以基督徒的流血牺牲为代价实现。

除了神职人员以外，在中近东的基督徒中间，反对此次和议的主要是圣殿骑士团的团员。自创立以来，圣殿骑士团就以没收的阿克萨清真寺作为总部。自从萨拉丁夺回耶路撒冷以后，圣殿骑士团就一直处在没有总部的状况下。腓特烈二世此次将包括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区域交给

穆斯林，使圣殿骑士团在其创建42年之后回归总部的愿望化为泡影。

当然，也有许多基督徒为和议的达成感到高兴。专程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朝圣者，首先为和议达成而欢呼。当腓特烈的军队放行之后，他们从各个城市一齐涌向耶路撒冷。

此外，除皇帝直属的条顿骑士团之外，中近东本地的医院骑士团也与腓特烈通力合作。当和议达成之后，皇帝从雅法出发去周边的城堡视察时，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常常陪伴在他左右。

还有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海港城市的商人，由于和议的达成极大便利了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极为赞同。

但总的来说，比起声势浩大的反对者来说，赞成的声音还是要弱得多。腓特烈在反对声浪的面前，只得低调行事。从2月到3月之间，他都一直专注于视察各地城堡和防御工事的加固事宜。

回顾历史，从基督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曾经对狮心王理查庄严承诺，保证前往圣城朝圣的基督徒的自由和安全。继承其兄王朝的阿拉迪尔，也奉行相同的路线。但这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将耶路撒冷拱手相让。

在萨拉丁和阿拉迪尔统治的岁月里，同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圣城的耶路撒冷，作为穆斯林控制下的城市向基督徒开放。从理查与萨拉丁之间和议到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尔之间和议的37年间，即便是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保持着这一状态。

之所以阿尔·卡米尔要冒险选择完全让渡耶路撒冷，只是因为这一冒险对苏丹有利。

毕竟，时间是对苏丹最为有利的因素。因为无人不知，腓特烈二世并不会长久滞留在东方。

我的思绪直飘到十字军东征1000年前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的时期。当时尚没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哈德良面对的是生活在当地的犹太人。

镇压罗马帝国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犹太人起义的哈德良皇帝，流放了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太教徒。犹太人可以在帝国境内各处居住，但唯一被禁止进入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德良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在其他地方能够与各民族共生，而在耶路撒冷城内却会愤而起义。

哈德良皇帝不仅流放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将这座城市改名为埃利亚·卡比托利那（Aelia Capitolina）。他还下令重建城内半个世纪前罗马皇帝提图斯破坏的大神殿，并将其变为祭祀罗马诸神的万神殿。

埃利亚这一名称，得自哈德良的家族名（nomen）埃利乌斯（Aelius）。而“卡比托利那”则得自罗马城的七座山丘之一卡比托利诺山（Capitolinus），相传是神居住的区域。因此，埃利亚·卡比托利那的名字，带有“哈德良所建神殿”的意味。

至于古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为什么对耶路撒冷改名，并未得到史家的记载。作为一神教圣地象征的耶路撒冷，在其他民族看来，总有别的名字可以替代。罗马人自己的信仰是多神教，因此希望以多神的信仰，来取代当地的一神教。

然而，埃利亚·卡比托利那不过是个短命的名字。随着4世纪初基督教势力抬头，基督徒将圣城的名字改回了耶路撒冷，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基督徒成为城市的主人。

又过了300多年，当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被新生的伊斯兰征服运动席卷之时，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从此以后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耶路撒冷再次易手。

对比哈德良皇帝这位多神教时代的罗马公民，苏丹阿尔·卡米尔则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如果不考虑宗教和时代的差别，作为一国之君的阿尔·卡米尔做出的决定，是否有如下的考虑呢——

如果耶路撒冷一直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控制之下，欧洲的基督徒会一直不停地保持对圣地的亢奋和觊觎，新的十字军会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涌来，并导致一次次的战争……

恐怕腓特烈二世在和谈期间也会明示这一点吧。比十字军更亢奋的罗马教皇和整个天主教会，给皇帝带来巨大的麻烦。他直白的建议，也会促使阿尔·卡米尔做出让渡圣城的决定。

不过，与腓特烈谈判的苏丹，并非除了让步以外别无选择。在和约签署之前，阿尔·卡米尔自然会预料到，自己的决定将会带来整个伊斯兰世界暴风骤雨般的反对。毕竟自己的伯父和父亲都不曾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当初迎击第五次十字军时，阿尔·卡米尔刚刚取得自己的基地埃及的领导权，实力还不够强大。对他来说，十字军如潮水一般一次次涌来，跟中近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合流，并非难以预见的事情。为了防止十字军再次入侵，把耶路撒冷交给基督徒，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

以上的种种，不过是我个人的想象罢了。我只是觉得，无论双方的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理解与协调的余地总是存在的。

想象归想象，我们还是应该探究一下阿尔·卡米尔做出决定的真实原因。

有些研究者从50岁的阿尔·卡米尔对比自己年少15岁的腓特烈二世

的好感入手。由于同情腓特烈两次遭绝罚的命运，苏丹对他网开一面。但如此的理由显然并不充分。

将除了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伊斯兰区”之外的整个耶路撒冷拱手让给基督徒的决定，使阿尔·卡米尔这位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不仅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直到800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还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当作“屈辱”对待。

“腓特烈-阿尔·卡米尔和约”在苏丹冒着巨大风险的前提下完成。而且，腓特烈二世自己也面临着相当的风险。与苏丹不同，年轻15岁的皇帝，将带着这一风险所导致的结果终其一生。

回想狮心王理查也曾经与异教徒签署和约。但理查一世是在与萨拉丁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斗之后，握手言和的。腓特烈二世却一次也没有跟异教徒作战，就签订了和约。

因此，对未能夺回圣城的理查，教皇选择了正面的评价和宽容的态度，倒是成功得到耶路撒冷的腓特烈，却遭到了教皇的抨击。

追根究底，在教廷看来，无论是圣地巴勒斯坦还是圣城耶路撒冷，都是必须依靠基督徒流血牺牲才能得到“解放”的。正因为如此，全体参加十字军的基督徒，才能一次性地得到免罪。

访问圣城

1229年2月18日，腓特烈二世签署了和约。此后他一路视察城堡和防御工事，直到3月17日抵达耶路撒冷。出城迎接的耶路撒冷总督阿尔·高吉，在城门外的交接仪式上向皇帝呈送了耶路撒冷城门的钥匙，宣告城市交接的正式完成。

34岁的皇帝首先前往医院骑士团的医院附近的骑士宿舍。皇帝决定在此处驻跸，因为这些宿舍是当时城内唯一的可以留宿基督教世界君主的场所。萨拉丁接管耶路撒冷之后，只有医院骑士团的医院和这些宿舍被保留下来，成为接待前来朝圣的基督徒的场所。除此以外，无论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宫殿，牧首的官邸，还是作为防御设施的大卫之城，都驻扎着穆斯林士兵。

在医院骑士团建筑物内安顿好的腓特烈，于晚餐之前携少数随从一起前往圣墓教堂祭拜。

掌管圣墓教堂的执事们，是与医院骑士团的医生们一样，经过萨拉丁允许，留驻耶路撒冷城内招待前来朝圣的西欧基督徒。在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62年间，他们一直在教堂内工作。作为神职人员，他们也知道腓特烈二世已经受到了绝罚。

但腓特烈并没有受到绝罚的影响。在满腹狐疑的执事们面前，皇帝让随从等候一旁，自己一个人走向祭坛。走到祭坛下，双膝跪地的皇帝，一个人祈祷着。祈祷完毕之后，腓特烈又在踌躇犹豫的执事们的注视下，率领随从返回了宿舍。

第二天（3月18日）一早，耶路撒冷国王加冕仪式在圣墓教堂内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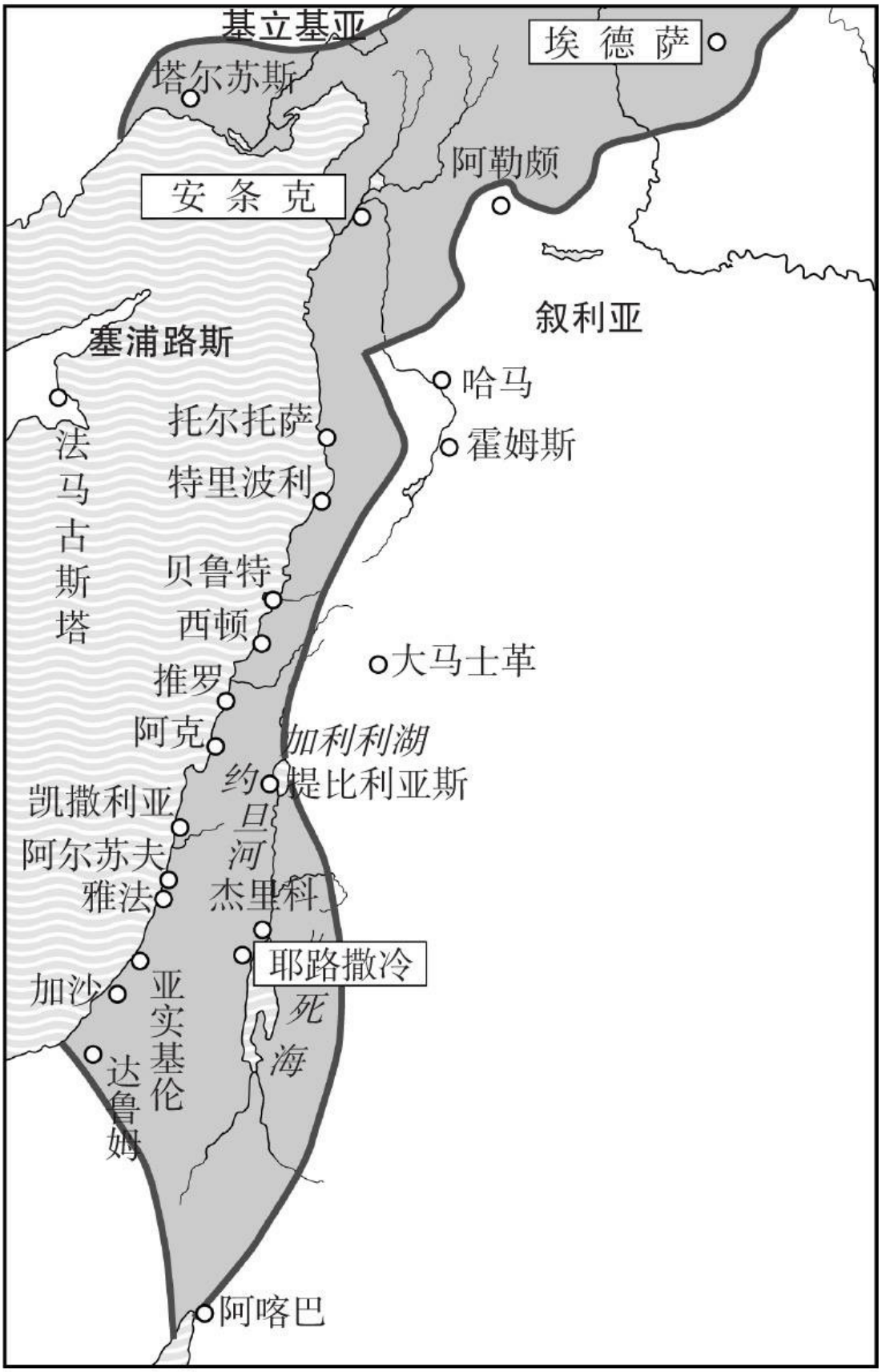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本来打算参加加冕仪式前举行的弥撒，然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劝告说，已遭绝罚的皇帝参加弥撒，无异于为罗马教皇的怒气火上浇油。腓特烈听从了赫尔曼的劝说，并未出席弥撒。

弥撒结束之后，圣墓教堂内的人群并未散去。此时，身着皇帝正装的腓特烈二世缓缓走入教堂内，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已经回到基督教世界怀抱的圣城，在耶稣基督圣墓上建立的教堂中间，亲眼目睹基督教世界最高世俗统治者的风采——就算这位皇帝遭受了绝罚，也无法掩盖亲历者的喜出望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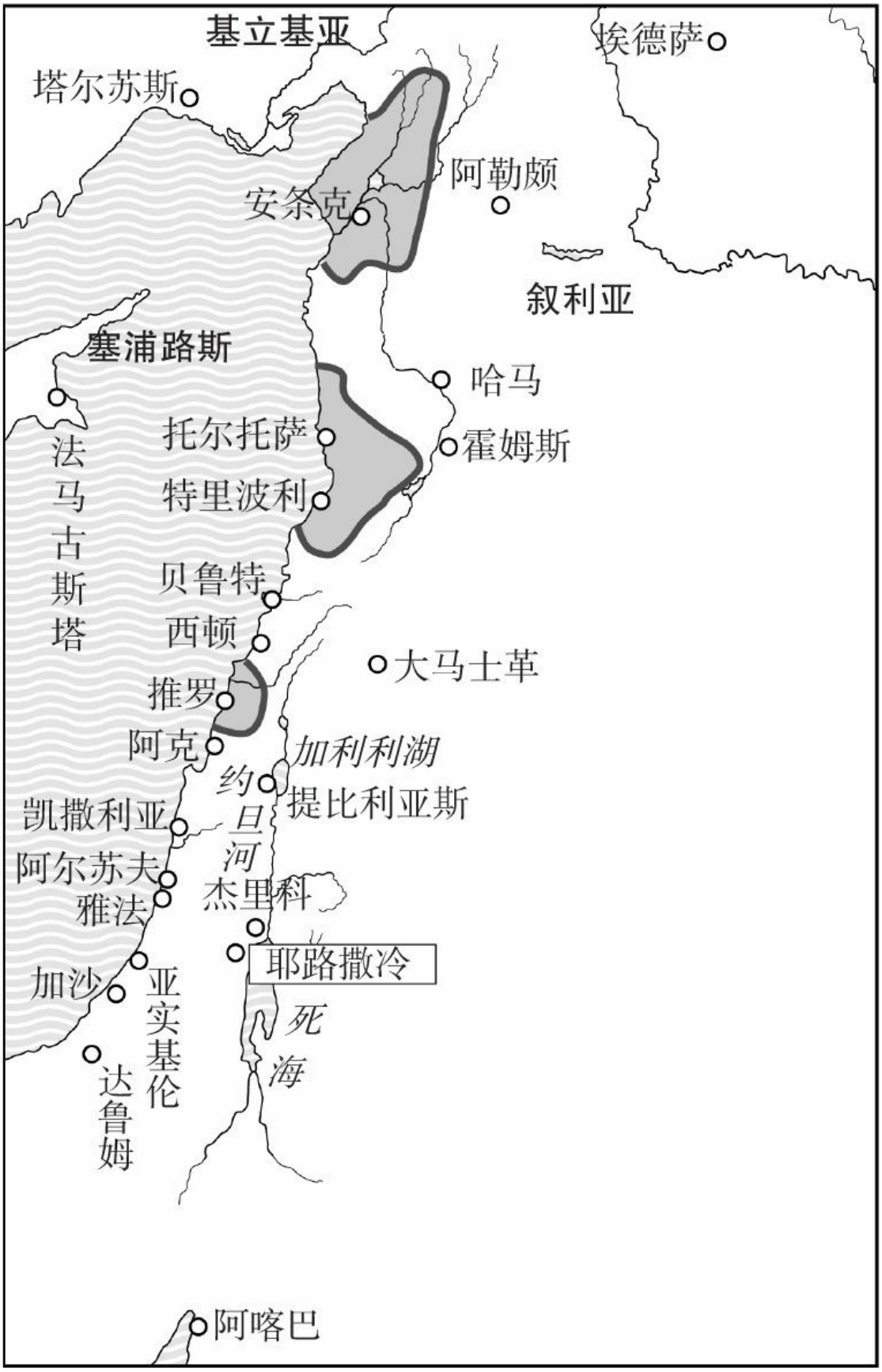
群众们为皇帝让开了通往祭坛的道路。然而，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能够为国王加冕的必须是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但当天的耶路撒冷城内，并没有牧首和任何主教在场。

于是，34岁的皇帝自己手拿祭坛上的王冠，戴在了自己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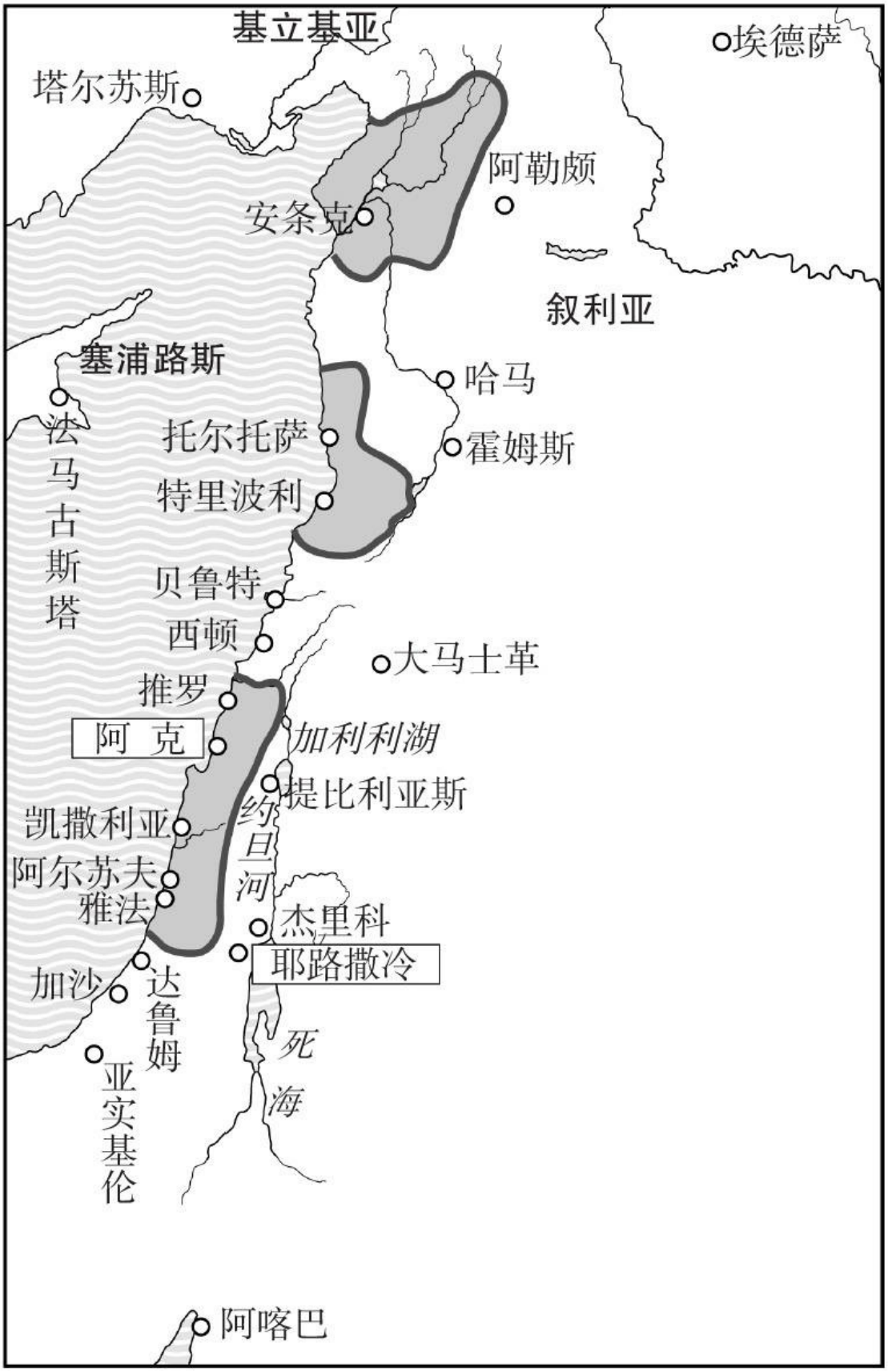
眼见圣墓教堂内这一令人惊异的场景，在场的群众却无人提出异议。对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来说，今天皇帝的行为完全是向上帝表达自己的感谢，并不需要在事后做出说明。仪式上在场的大都是长期居住于中东的领主和宗教骑士团的领导人。所谓的事后说明，在他们看来实在没有意义。


基立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阿勒颇
安条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约旦河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阿尔苏夫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亚实基伦
死海
达鲁姆
阿喀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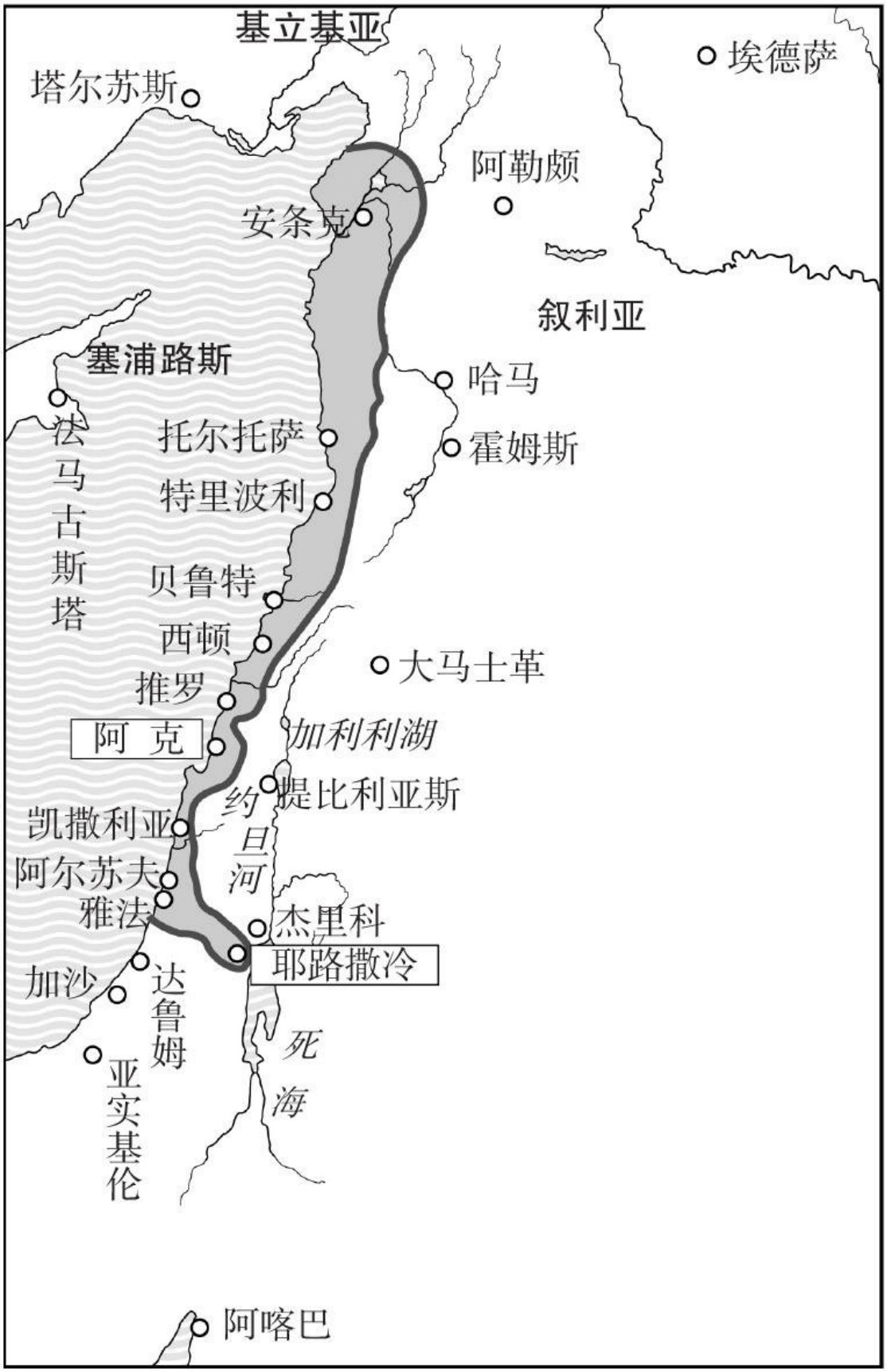
第一次十字军建立的十字军国家（1119年）


基立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阿勒颇
安条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约旦河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阿尔苏夫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亚实基伦
死海
达鲁姆
阿喀巴

哈丁之战后的基督教势力（1187年）


基立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阿勒颇
安条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凯撒利亚
约旦河
阿尔苏夫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达鲁姆
死海
亚实基伦
阿喀巴

第三次十字军结束后的基督教势力（1192年）


基立基亚
埃德萨
塔尔苏斯
阿勒颇
安条克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约旦河
凯撒利亚
阿尔苏夫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达鲁姆
死海
亚实基伦
阿喀巴

腓特烈二世议和后的基督教势力（1229年）

出席加冕仪式的中近东基督徒实力派人物，都应邀参加了仪式后腓特烈召集的讨论此后统治的会议。

腓特烈于会上说明了自己与阿尔·卡米尔之间所缔结和约的各个条款。重新回到基督徒之手的耶路撒冷，由于长期的维护工作，保持着防御工事的完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城内的安全。除了一圈坚固的城墙，城内还有以“大卫之城”命名的一座城堡。腓特烈将这座城堡交给了条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三大宗教骑士团，担负起了防御圣城的任务。曾经由于无法收回位于阿克萨清真寺的总部而反对皇帝的圣殿骑士团，也在腓特烈精心视察和加强城堡防御之后，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这样一来，从头到尾一直反对腓特烈在巴勒斯坦统治的，就只剩下耶路撒冷牧首一个人。

给教皇去信之后，滞留在阿克的耶路撒冷牧首，派遣凯撒利亚的主教前往耶路撒冷，向当地人送去了“禁止圣务”的公告。

虽然整个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基督徒的手中，它却由于腓特烈二世受绝罚的重罪，而被处以“禁止圣务”的责罚。在牧首眼中，由受绝罚者带来的“解放”并非真正的解放。

由于“禁止圣务”的实行，耶路撒冷成为正统基督徒不得进入的城市。牧首颁发的禁令，让前来朝圣的基督徒疑惑不解。

最终，大家并未按照牧首的禁令行事。没有人逃出耶路撒冷，入城的朝圣者依然络绎不绝。他们排列成行，感激地缓缓向圣墓教堂前进

——此次旅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到耶稣受难的场所进行一次祈祷。

腓特烈二世则忙于各种机要，以确保耶路撒冷的秩序和安全。他一边工作，一边不忘向随从嘲笑神职人员的顽固不化。

耶路撒冷交由基督徒控制之后，城内的穆斯林并没有立即全数离去。从伊斯兰区的管理者往下，耶路撒冷全城内都居住着穆斯林。在和约缔结之后，腓特烈承认穆斯林在城内的居住权。随着圣城逐渐基督教化，城内的穆斯林开始迁走，但伊斯兰区内的穆斯林守备卫队还一直留在城内。

耶路撒冷不仅是基督徒，也是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圣城，三种宗教的信徒混合居住着。这样一座特殊的都市，要求特别的艺术来施行统治。

我们不妨以此时期访问耶路撒冷的一位基督徒商人的话，来管窥腓特烈二世的统治艺术。这位长期来往于中近东的威尼斯商人，对腓特烈统治前与统治开始后的变化是这样描述的：

> 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如果要深究变化的话，一是街头的卫队从穆斯林换成了基督徒；二是基督教堂的钟声比以前更清脆宏亮了。

教堂与清真寺

腓特烈二世在耶路撒冷停留了一个星期。

加冕仪式第二天，腓特烈向由于各种交接事务而频频会面的总督阿尔·高吉提了一个问题：

“我来耶路撒冷这些天，一次也没有听到清真寺的召唤声。这是为何？”

总督回答说，根据苏丹的指示，皇帝驾临这段时间，清真寺不发出召唤。

腓特烈笑着回答说：

“这么说来，如果贵国有要人前往寡人的领土，教堂就因此不鸣钟了么？”

次日清晨起，清真寺的尖塔上响彻召唤祈祷的声音，一天5次。当腓特烈率领部下视察城内时，他的穆斯林部下们听到召唤声，立即从队列出来，匍匐在地面上祈祷。

这样的情景令周围的穆斯林大吃一惊。他们无人料想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皇帝所率的部下当中，有那么多穆斯林；令他们更加吃惊的是，腓特烈二世默默注视着自己部下进行完整个祈祷过程，回归队列之中，没有丝毫的异样，然后继续率领着全队完成视察。

伊斯兰世界中，留下了不少关于腓特烈在耶路撒冷时印象的评论。

其中有一个人认为，皇帝根本就是一位无神论者。

皇帝在工作之余，参拜了城内的圣迹。但他每到一处，绝不会双膝跪地，哭泣着祈祷。

耶路撒冷的穆斯林见惯了基督徒的朝圣。在他们看来，腓特烈到圣迹前的游览，根本就是观光，而并非参拜。当皇帝进入伊斯兰区之后，也会对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雄美赞叹不已。

穆斯林中还有一个评价：这位皇帝即使是拿到奴隶市场卖，也卖不出去。

在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人看来，男子要么肌肉发达，要么身体肥硕，才能卖出好价钱。

腓特烈的身体虽然不能称为羸弱，却既不是肌肉男，也不是胖子。他是那种阿拉伯人不喜欢的皮肤惨白、发色绯红的样子，继承了同名的祖父“红胡子腓特烈”的体貌特征。

腓特烈在耶路撒冷停留一周之后，于3月25日启程回到阿克。腓特烈计划在阿克对整个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防御进行重新整备。然而这座城市迎接他的气氛，却与耶路撒冷迥然不同。

事实控制阿克的耶路撒冷牧首，对腓特烈的态度毫无变化。尽管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一直努力希望改善双方的关系，同在阿克的牧首始终拒绝与皇帝会谈。腓特烈也拒绝任何让步。

回到阿克的腓特烈，不仅面临着牧首和全体神职人员的反对，还受到了皇帝的敌视。但居民的反对，并非因为牧首的煽动，而完全是由于现实的原因。

腓特烈二世和十字军从西欧到来之前，阿克一直是西欧朝圣者来到中近东登陆的第一站，位于朝圣之路的关键位置。然而随着腓特烈为了进行和谈，将驻跸地转移到雅法，并在雅法滞留三个月间加强当地的基

础设施和防御工事，最终使和议达成之后的雅法，发展成为比阿克更安全、设施更完备的城市。

更有甚者，与阿克相比，雅法到耶路撒冷的路途更近。因此，朝圣者转而从雅法登陆，前往耶路撒冷。这使得阿克居民通过朝圣经济获得的收入锐减——牧首和神职人员反对腓特烈的呼声，进一步得到了现实利益的支持。

腓特烈自己并未把阿克人的敌视放在心上。在他看来，由于和约达成，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诸多海港城市都将繁荣起来，作为其中之一的阿克自然也会注入经济活力。对皇帝来说，当地人暂时的敌视，不会使他放弃自己未完成的大事业，自然也不会让他灰心。

然而事件的发展并不以皇帝的计划为转移。他刚刚进入阿克城，就得知了一桩完全不曾料想的突发事件。

基督之敌

皇帝收到消息，罗马教皇派遣的军队，从教廷直属领地出发，侵入了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高举教皇旗帜侵入意大利南部的军队，是由前任耶路撒冷国王布里安努所率领的。而教廷入侵的理由，则包括腓特烈以受绝罚之身率领十字军出征，以及不战而与异教徒达成和议两点。这样一来，腓特烈就不仅是教皇的敌人，更是成为基督的敌人。

东征之前，腓特烈就完整安排了防御计划，将自己的领地委任给亲信。如果只从军事方面来说，与年迈的布里安努对垒，对腓特烈的部下并不成问题。但成为基督之敌的名号，使得整个领地人心动摇，各个城市在教皇军队的面前，尽数城门洞开。

如此危急的形势使留守的亲信不得不期待腓特烈立即归国。抵达阿克的信使递上急件，请求腓特烈尽早回国领导作战。

腓特烈阅信之后只说了句“很遗憾”。他深知，如果要维护和约签署以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必须继续完善十字军国家的防御体系。如果有新的十字军前往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此时并不可能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

因此，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想完善防御体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城堡。而新建城堡耗费巨大，颇为不可行，只有利用现有的城堡来加强防御了。而且如果大规模新建城堡的话，必然会刺激伊斯兰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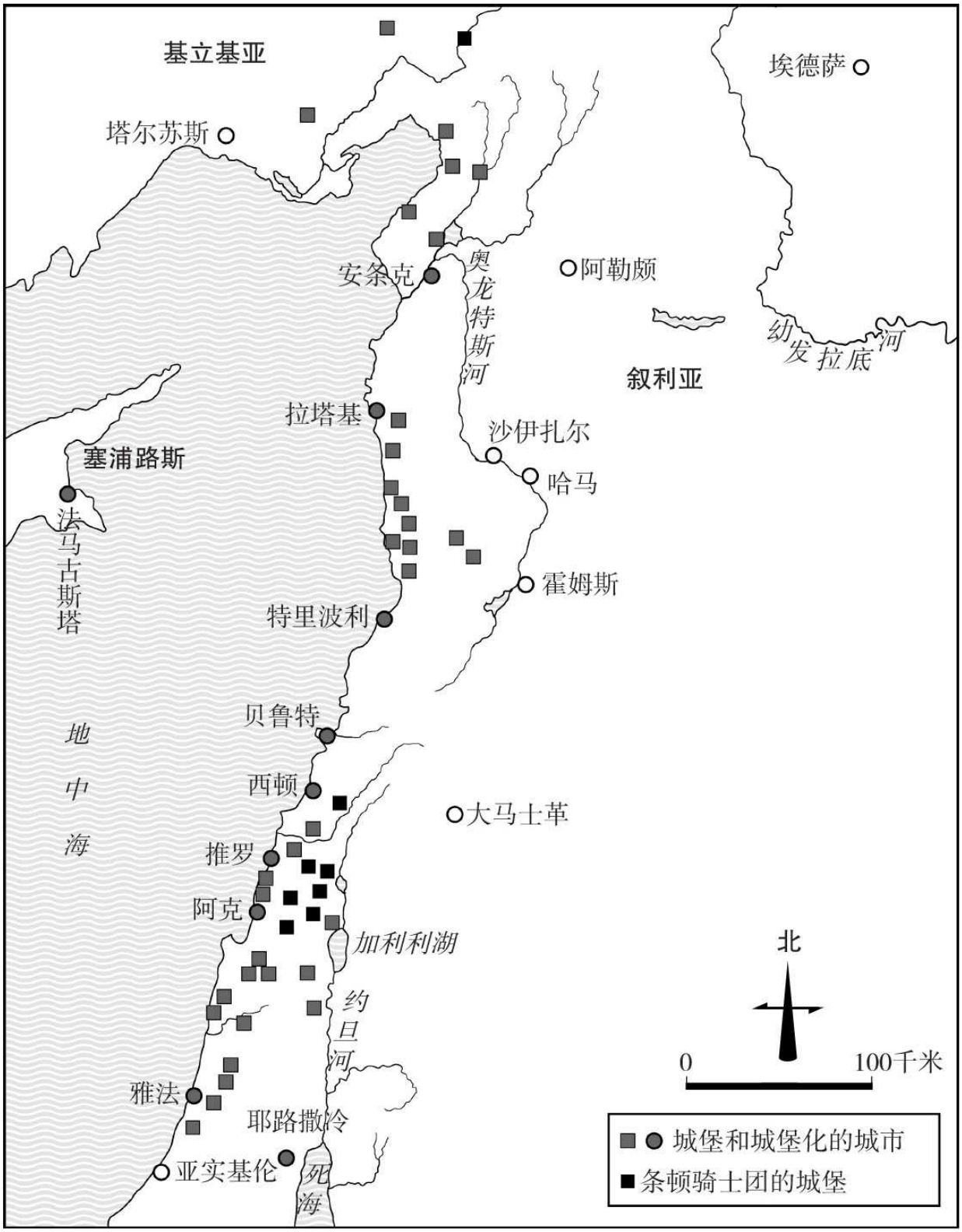
从达成和议到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月间，腓特烈二世一直采取这一策略。在耶路撒冷驻跸的一周内，他完善了当地的城防措施，而回到阿克之后，腓特烈又对城北和城东的城堡网络进行了充分的建设。

十字军国家城堡的防御功能，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到这一时期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

其原因在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城堡，分别控制在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各地的封建领主手中。每个城堡都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没有形成配合。唯一的例外是特里波利伯爵领地的城堡群，完全在医院骑士团的控制下，以“骑士之城”为中心，成为一个防御体系。

腓特烈所做的，是依照医院骑士团的范例，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十字军控制区内建立城堡防御体系。随着条顿骑士团的加入，腓特烈力图将三大骑士团整合起来，统一在十字军的战略目的下，发挥体系化的防御作用。

通过体系化的防御策略，就能够在没有新十字军前来，也没有伊斯兰势力入侵的情况下，保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安全。城堡群组成的防御体系，由此成为海港城市群外的一道铜墙铁壁。



基督教势力网络化的城堡群

腓特烈二世东征出发之前，对自己在西欧的领地也进行了明确的防御安排。古罗马的道路系统，就是通过对道路体系的建设，形成交通网络的效果。而用于防御的城堡体系，也是通过建设成为有机网络，实现防御能力的整体提升。

发生在意大利的状况，使腓特烈恨不得分身两地。斟酌之后，他决定争分夺秒地完成在巴勒斯坦的工作，然后班师回国。

最终，当阿克的城堡体系建设完成之后，腓特烈二世在阿克王宫内召集了三大骑士团的团长和各地的封建领主。

腓特烈和团长、领主的会谈持续了整个4月。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受到召集的各位领导人物，都领会了腓特烈的意思，并决定为防御体系的完善而努力。最终，在腓特烈返回欧洲之后的15年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未开战事——其中前10年是在和约有效期之内的。

归国

当防御安排工作结束之后，腓特烈于1229年5月1日启程，离开了阿克。

腓特烈是于前一年9月7日率领第六次十字军抵达的。他在圣地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到8个月。就在这短短的8个月内，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了基督徒手中。

未曾料想，35岁的皇帝，是在阿克城居民的辱骂和投掷污秽中离开的。城内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前往港口为腓特烈送行。

腓特烈返程的第一站是塞浦路斯。在此地停留几天之后，直接乘船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并于6月10日登陆。

算起来，腓特烈前一年从布林迪西出发的时间是6月28日。第六次十字军往复的海路航行，加起来不到一年。

不仅整个意大利南部得知了皇帝回国的消息，罗马教廷和为教皇提供军队的意大利北部，也得知了腓特烈的归来。

离开布林迪西，在其北方邻近的城堡巴莱塔度过夏季的腓特烈，看到意大利南部的居民因自己归国恢复了士气。腓特烈在这座面海的城堡居住，并非只是单纯的休养，同时也准备好了对教皇的反击。

然而，腓特烈毕竟是没有杀死一个穆斯林就取得了第六次十字军的成功。如果他返回欧洲以后，就前来残杀基督徒，这位皇帝必将威信扫地。因此，面对教皇的一再非难，腓特烈必须以不流血的方式，来恢复自己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

9月，当得知腓特烈出兵之后，率领教皇军队的布里安努就仓皇逃亡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北部的各个自治城市，随之宣布从教皇集结的军队中撤出。

腓特烈见状，率兵北上进入那不勒斯。其后从那不勒斯向卡普亚的行军路上，有那不勒斯的居民自愿作为腓特烈的先导。

从此直到10月，为教皇所侵占的土地全部回到了腓特烈手中。此时距离皇帝在布林迪西登陆已过去6个月，而他的军队还没有与教皇军交手。

陷入孤立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整个罗马教廷从教皇以下，除了与皇帝达成和解之外，别无他法。

得到教皇求和的允诺后，腓特烈派出了自己特命的外交大臣——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访问罗马的赫尔曼，是第二次与教皇会面。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赫尔曼转达腓特烈，教皇的态度已经软化。

在那个“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时代，想要不伤体面地改善与教皇的关系，并非易事。这一工作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

经过漫长的磋商，教廷和腓特烈就双方领地的边界问题达成了协议。皇帝决定，利用教皇回到自己家乡阿那尼省亲之际，与教皇进行私人会晤。

阿那尼是罗马以南的一座小镇。从英诺森三世以后，这座小镇走出了许多位教皇。

格列高利九世在接见皇帝之后，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 全体信徒之母，大公教会，心生慈爱之情地欢迎不羁孩子的归来。从今以后，皇帝回归了正道，整个基督教世界，也从此不再为

恐惧所笼罩，走上平稳光明的前途！

和平之吻

1230年9月1日，在双方和解的仪式上，60岁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和36岁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拥抱在一起，互相接吻。这样的吻，在西欧被称作“和平之吻”。以前的绝罚随之解除。当天，教皇在自己小镇上的家里招待皇帝午餐。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随皇帝一起就餐。

阿那尼小镇“和平之吻”三天后，腓特烈回到了意大利南部自己的领地。

离开巴勒斯坦的腓特烈，无法忘记中近东的基督徒。在与阿尔·卡米尔和约生效的10年间，双方谨守互不侵犯的协议，保证和平持续至和约到期的1239年。

这段时光，也是腓特烈二世最思念中近东的日子。

皇帝通过书信，保持与伊斯兰领导人的交流。这些以阿拉伯语写成的信件，都是腓特烈写给和约的直接谈判人法拉丁的。信件通过法拉丁转交给阿尔·卡米尔。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在信中谈及自己如何带兵对抗教皇军队的内容，信的口吻与其是跟外交谈判的对手交谈，不如说是跟亲密的朋友讲述新鲜的经历。除了表达对和平的祈愿之外，腓特烈一边讲述自己的近况，一边与法拉丁交换对于数学和哲学问题的看法——这就是腓特烈式的思念吧。

1238年，阿尔·卡米尔去世。无论是继承他的长子，还是1248年长子死后继承苏丹大位的次子，都继续与腓特烈保持书信来往。

双方的书信究竟起了怎样的效果，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是在和约期限结束之后，中近东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共处，还是一直保持了下去。

这一状态的决定性改变，发生在1248年。

1248年8月，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所率的第七次十字军从法国南部港口艾格莫尔特出发，沿海路奔袭埃及。然而两年之后的夏天，路易九世被埃及人俘虏。

当时还在意大利南部的腓特烈，自然知道路易九世被俘这件事。至于得知此事之后，他是如何想的，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然而此后仅仅4个月，1250年12月13日，腓特烈二世驾崩。两周之前，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6岁生日。

十字军历史的权威学者朗西曼，是这样评价腓特烈二世的：

“他集残忍、自私与狡猾于一身。在友人面前，他毫无诚信可言；面对敌人，他尽一切可能相周旋。”

站在罗马教皇的角度，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评价吧。

第五章　法国国王路易与第七次十字军（1248—1254年）

理想的君主

史称“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早在年仅12岁时，就在历代法国国王加冕的兰斯大教堂举行了加冕礼。他之所以能荣登大宝，是因为父亲路易八世即位三年后便驾崩，而三位兄长也都先于他离世。

少年皇帝12岁即位，还需要母亲摄政。路易九世的母亲布兰卡来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皇家，能力出众，信仰虔诚。

母亲对路易百般呵护，除了为国王请各科的家庭教师，在宗教上则身体力行，亲自教育，带领着儿子一遍一遍诵读《圣经》。国王幼年经历着一再失去血亲的痛苦，与此同时，母亲一直伴随在身边，日复一日读着《圣经》。路易的成长自然伴随着深刻的信仰之心。

至于内政方面，路易九世受到母亲的协助，以稳健善治而著称。在他9岁那年，祖父腓力二世撒手人寰。腓力二世以善用各种阴谋手段取得王室领地而著称。而路易的幸运之处，则在于他并不需要采取任何阴谋与手段，就保住了法国国王的地位与领地。

1229年，持续20年之久的针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宣告胜利。5年之后的1234年，20岁的路易与南部的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结婚，结束了法国北部与南部之间漫长的斗争。

虽然路易和玛格丽特之间是政治联姻，两人却一直相敬如宾，萌生

了令后人歌颂的爱情。

路易九世活了56岁，共生育了10位子女。比路易年长20岁的腓特烈二世也活了56岁，他生育有20位子女。作为君主，尽量多生育后嗣，是无可厚非的。腓特烈的20位子女来自13位女性。而路易九世与他最大的不同，就是10位子女都由王后玛格丽特所生。

腓特烈二世像伊斯兰世界的苏丹那样，后宫佳丽不断，招致了罗马教廷的谴责。相形之下，路易九世就被树立为基督教世界理想的君主，得到教廷的赞赏。腓特烈发兵东征时没有带女性前往，而路易则在东征的始终，有王后陪伴左右。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埃尔·格列柯画）

罗马教廷的优等生路易九世，在1244年经历了一件使他进一步成为优等生的事件。

当年底，路易生了重病，躺在床上。国王的病因是食物中毒引起的脱水。由于一病不起，路易渐渐衰弱下去，母亲和侍从眼睁睁看着他像40岁离世的父王一样的症状，都感到十分绝望："难道病床上的路易，也要重蹈其父亲英年早逝的命运吗？"这时，虚弱的路易低声向上帝起誓，如果还能恢复健康，自己务必率领十字军，与异教徒作战到底。

路易的身体不久就有了转机，很快，他的疾病痊愈了。相比起40岁重病去世的父王，路易很可能是因为年仅30岁，体力更好，所以终获痊愈的。但在中世纪那个笃信基督教的年代，教会的优等生路易则完全把自己的痊愈归因于上帝的救恩。于是他决意要履行自己对上帝的诺言，并从此成为了一个为使命而自觉的统治者。

1245年春天，贝鲁特主教手持耶路撒冷牧首的书信，前往罗马造访教皇英诺森四世。牧首在信中恳请教皇派遣新的十字军前往中近东。

信中还说，从前一年11月起，就有了穆斯林准备武力收回耶路撒冷的传闻。由于穆斯林已经磨刀霍霍，基督徒一方必须派遣新的十字军才能保卫圣城。

作为整个中近东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耶路撒冷牧首从一开始就反对腓特烈二世与异教徒的阿尔·卡米尔之间的和平条约。因此，他并没有前往耶路撒冷，而是始终驻跸于阿克，以宣示自己的态度。和议的有效期为10年，到1239年已经结束。此后，继任苏丹的阿尔·卡米尔之子并未改变自己的版图，和议时的领土状况就这样继承下来。

然而到了1244年，来自叙利亚的一个穆斯林部族出其不意地攻击了

埃及的苏丹，并在名利心的驱使下，占领了耶路撒冷。

这一偶发事件给一直反对腓特烈二世和阿尔·卡米尔之间和议的耶路撒冷牧首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口实。他立即致信教皇，要求派出新的十字军，以全体基督徒的名义夺回圣城。

英诺森四世也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教皇开始着手遴选新的十字军统帅。50岁的腓特烈二世与教皇的关系十分紧张，双方处在正面冲突中。因此，他自然不在考虑之列。而英国则处于内乱之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提供。因此，最终可以担当的统帅就只有路易九世一个人。

而路易又正是罗马教廷眼中理想的君主。理想的君主所率领的，自然是理想的十字军了。由于教廷足够信赖路易，教皇甚至宣布，在他的十字军中，不必有教皇代表出席。

收到教皇谕令的路易，仿佛在疾病新愈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奇迹来临。他当即回信，承诺出兵。这位31岁的青年，比任何时候都向往响应上帝的召唤。他火速宣布在法国全境内征税，以作为出战的资金。而自己亲征之后的法国内政，则交给母亲布兰卡全权处理。

此外，路易决定，以埃及作为新十字军的目的地。他相信，只要攻陷了中近东的中心埃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就会崩溃。此外，他也希望能够一雪第五次十字军未能在达米埃塔保持胜果的耻辱。

出人意料的是，在顺利的前期准备之后，东征的计划延迟了三年。

东征延迟的第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对十字军的态度不温不火。除了神职人员热情高涨以外，普通基督徒对新的十字军并没有多大兴趣。

在埃及苏丹出兵赶走占据耶路撒冷的部族之后，回到苏丹治理下的

耶路撒冷，同以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

此时的耶路撒冷同以前一样，依旧是教堂的钟声与清真寺的召唤声共鸣，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像往常一样巡礼。只有原来以“大卫之塔”为总部的条顿骑士团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迁出城外。穆斯林军队也并没有袭击基督徒控制下的海港城市。

东征延迟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十字军一直未能就运输兵力的海军力量达成一致。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军，但其海军实力并不强，主要的海港也只有马赛一座。虽然马赛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港口，此时该港却不在法国王室的控制之下。

虽然路易九世对马赛以西150公里的艾格莫尔特渔港进行了升级改造，使用哪个国家的海军来协助运输十字军，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威尼斯共和国首先不考虑协助路易九世。威尼斯商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都拥有很多相关利益，运输十字军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在砸自己的生意。威尼斯商人的市场，囊括了第四次十字军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大港口的丰厚利润，使他们对十字军没有任何好感。

最终为路易九世的十字军提供运输服务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威尼斯共和国最大的对手热那亚头上。

依赖热那亚的海军力量，对于路易来说，有双重的不利因素。一方面，由于海军力量都“外包”给热那亚，对于舰船的具体建造方法，法国人无法自己掌握。而与路易结盟的热那亚人只好使用其在港的舰船。相比之下，腓特烈二世就能够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使用自己监督建造的适合在尼罗河上航行的专用船只。

而更关键的不利因素，则是路易无法自己掌控海军的战略。

腓特烈二世的海军来自自己的领地意大利南部，虽然并不比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军更强大，却是牢牢控制在自己指挥之下的。

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理查一世，也是以本国的海军为主力出征近东，经北海、大西洋南下直布罗陀海峡，并穿越整个地中海。夺回阿克以后，理查也调遣了热那亚和比萨的船只一起对抗萨拉丁，但从整个战略来看，他的整个海军力量是在自己一人指挥下的。

战争指挥的一元化，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各个作战单元之间的消耗才会减少到最小。

路易九世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派遣了法国将军出任热那亚海军的提督。但由于这位将军是内河航运出身，自然受到了热那亚海员的轻蔑。要知道，250年后涌现出哥伦布这样航海奇才的热那亚，比起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威尼斯来，拥有着更为训练有素的海员。

带着以上的不利因素，34岁的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于1248年6月12日从巴黎出发，向艾格莫尔特港南行。

华丽的阵容

在编年史家笔下的第七次十字军中，可谓明星荟萃，集合了当时的诸多头面人物。

首先是常伴夫君左右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

接下来是路易九世之弟，阿尔图瓦伯爵罗贝尔。

此外是路易的另一位从弟，安茹伯爵夏尔。

还有路易的末弟，普瓦提埃伯爵阿尔丰斯。

路易的三位兄弟都在二三十岁之间，可谓是整个加佩王朝全体出征。

路易的堂兄，勃艮第公爵于格。于格参加了第六次十字军，但在与腓特烈二世交往之后，殊为嫌弃皇帝的作风，于是提前回到了国内。

同为路易堂兄的布列塔尼伯爵皮埃尔。他也参加了第六次十字军，也和于格一样，讨厌皇帝的作风，中途回到国内。

弗兰德斯伯爵丹皮尔。历代弗兰德斯伯爵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就常亲自出征，这次也不例外。

圣保罗伯爵基伊。

萨尔布吕肯伯爵若望。他和他的堂兄弟，身为香槟伯爵部下的同名的若望·德·茹安维尔一起出征。正是茹安维尔留下了关于第七次十字军仅有的记载。

除了以上的法国贵族之外，来自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和来自苏格兰的丹佛伯爵帕特里克也参加了第七次十字军。

茹安维尔所谓的明星荟萃，只列出了参战的贵族名单，却并未提及各位贵族所率的兵力多少。但依据此人的记载，出征的骑士有2500人，加上同等数量的马夫，和骑士数量两倍的随从，以及1万名步兵和5000名弓兵，总兵力大约是2.5万人。前往东征的战马则共有七八千匹之多。

与祖父腓力参加第三次十字军时所率的2500人相比，路易的兵力达到10倍之多。第七次十字军比理查一世的兵力要多，更是达到了腓特烈二世所率第六次十字军的5倍以上。西欧基督教国家王牌中的王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将其全部兵力投入了十字军东征。

这支大军所乘坐的，是以38艘大型舰船和上百艘小船组成的舰队。与以桨帆船为主的威尼斯舰队不同，热那亚的舰队以帆船为主。茹安维尔只提到了大型帆船，而他未提及的小船也应当是以帆船为主。然而这一类型的帆船并不适合在尼罗河上航行。

法国国王和同行的贵族们到达艾格莫尔特之后，便在该地驻扎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时间内，负责输送十字军士兵的热那亚，将航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的船只召集回母港，在完成对船只的修理和补充水手之后，向艾格莫尔特集结。

十字军士兵和乘上战马到达的舰队，最终于8月28日离港。舰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塞浦路斯。在水手熟练的操纵之下，舰队完全不必于克里特岛和罗得岛进行补给。而且，克里特岛当时处在威尼斯控制下，死对头热那亚的舰队自然不会在那里靠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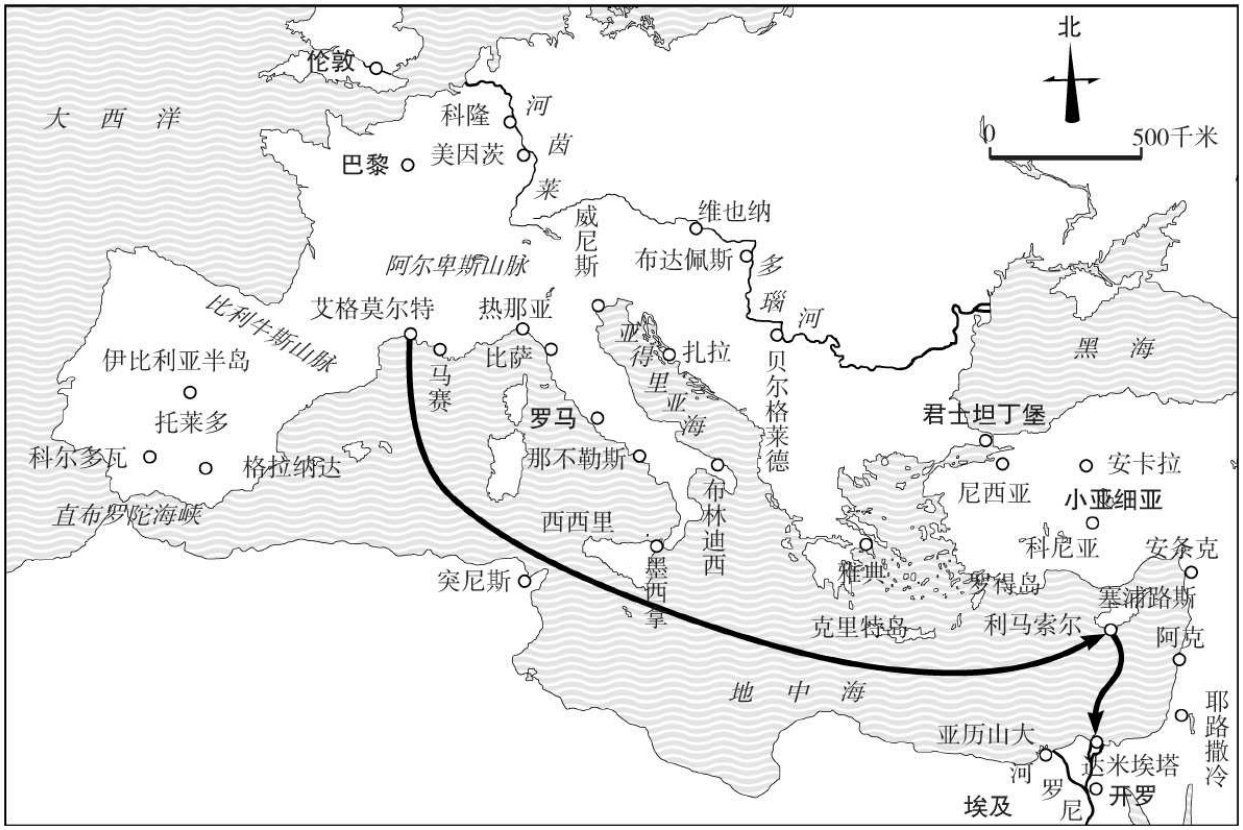
到了塞浦路斯，舰队就没有任何顾虑了。从理查一世开始，到腓特烈二世，经过不断的建设，塞浦路斯已经成为十字军的重要基地。舰队

于9月17日到达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上航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中近东基督教世界的主要领导人纷纷来到塞浦路斯，迎接路易九世的到来。然而这些头面人物觐见法国国王的用意，是希望他放弃与穆斯林决一死战的念头。

他们一同告知路易，伊斯兰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希望路易能够妥善利用这一状态。所谓利用，指的是与其中一部分势力结盟，消灭另一部分势力。

此时此刻，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阿尤布王朝苏丹，正苦于内部的纷争。虽然阿尔·卡米尔在位时建立了十分稳固的权力基础，但他去世10年之后，其子侄之间斗争不断激化的形势下，阿尤布王朝面临内部的权力危机。他的长子，即现任埃及苏丹，为了镇压各地的叛乱，不得不出兵叙利亚。



路易九世所率第七次十字军的进军路线

路易九世所率的第七次十字军最幸运的一点，便是恰逢敌方陷入分裂的时期。时常处在与伊斯兰势力斗争第一线的圣殿骑士团，也强烈建议路易利用好敌方的状态，抓住时机取得战果。由此可见这时伊斯兰世界分裂状况之深。

意想不到的是，路易拒绝了圣殿骑士团的建言。在他看来，利用敌方的困境而突袭，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纵然突袭能够消灭一部分敌人，路易也拒绝这样做。

历史学家对路易九世的想法感到疑惑。他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率领大军从塞浦路斯航行到阿克，经雅法一线机动，趁敌方内乱之际一举夺取耶路撒冷。在整个军队士气高昂的当时，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之所以没有突袭耶路撒冷，大概也是因为他的道德感所致。

结果，直到1249年5月30日，十字军才从塞浦路斯起航。

这支十字军之所以在塞浦路斯越冬，直到温暖安全的5月才出发，完全是因为热那亚海军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经过一个月的航行，热那亚水手们完全厌烦了指挥他们的法国提督——他只是旱鸭子般的业余水平。对热那亚舰队来说，运输十字军带来的最大便利，是能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海港城市争夺自己竞争对手比萨人的市场。为了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热那亚海军频繁来往于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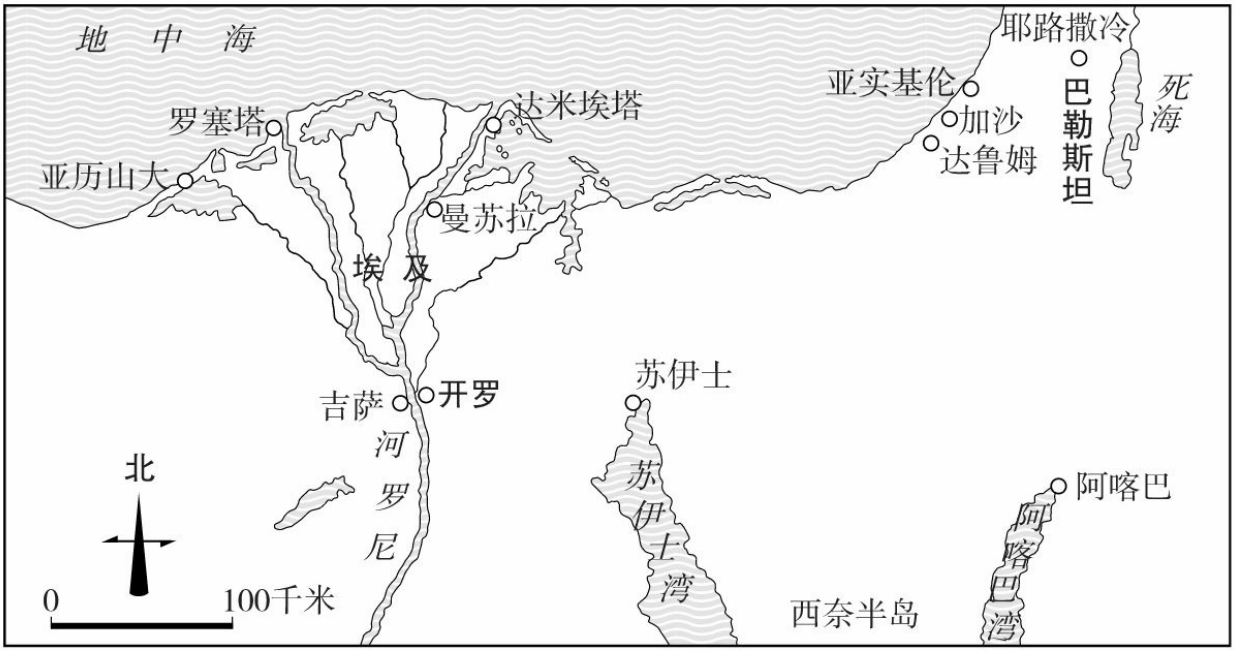
最终解决热那亚人带来的骚动的，不是路易九世，而是阿尔苏夫的领主伊柏兰家。虽然伊柏兰家促使热那亚人休战，这支海军力量在第七次十字军的东征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并成为路易九世的切肤之

痛。从战略层面上看，他做梦都想拥有一支自己控制下的海军力量。

在埃及登陆

以上诸多烦心事之外，路易九世所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终于1249年6月4日在埃及达米埃塔附近登陆。

得知法国国王登陆的苏丹，当即解除了自己对霍姆斯的包围，急忙率领军队返回埃及。对他来说，为自己大本营的安全而放弃叙利亚的城市，自然是丢车保帅的选择。



埃及及其周边

为了迎击路易，苏丹一路急行军，结果旧病复发，再加上在叙利亚战斗中的体力消耗，一行到达尼罗河三角洲东端之时，便卧床不起了。整个军务只好委托苏丹之父阿尔·卡米尔最为信赖的大臣法拉丁。而法拉丁正是20年前与皇帝腓特烈二世之间来往的信使，最终也促成了和议——他作为外交官的才能毋庸置疑，但不能说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就这

点来看，路易又是十分幸运的。

十字军登陆后翌日早晨，便向达米埃塔发起总攻。热那亚的海军也参加了攻城——这座海港城市可以从海陆两方面攻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地理位置，使第五次十字军从海陆两方面将其攻占。

对第七次十字军来说，攻占这座海港要比第五次十字军来的容易些。指挥守军的法拉丁率领部众仓皇逃跑，以至忘记破坏附近河流上的桥梁。

苏丹并未对逃回身边的法拉丁深加追究。这位与腓特烈二世皇帝气味相投的埃米尔不仅教养极好，也以重信义而著称，因此人望甚高。

另一方面，十字军在登陆翌日即攻占达米埃塔，但此后却一直没有新的动作。在这个初夏季节里，路易九世优先考虑的是达米埃塔的基督教化。

他首先命令部下将城内的清真寺全部改建为教堂。接下来，路易任命了达米埃塔城的主教，这位主教一直为城内原有的基督徒服务。

与路易实行的清真寺改为教堂一样，穆斯林一方也会将攻占的城市的教堂改建为清真寺。这样的工作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而作为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此类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完成城市的基督教化工作之后，路易召来了自己的王后玛格丽特。此前一直逗留于阿克的王后，率领一班女官，浩浩荡荡地来到埃及。

路易在达米埃塔完成的另一项工作，是给协助十字军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片城内的居留区。

他首先把最好的一块地区给了热那亚人，然后给了比萨人一块地区——后者曾经帮助路易从塞浦路斯运输军队。

尽管热那亚人强烈反对给并未参加战斗或运输工作的威尼斯人一个居留地，仁慈的路易还是为威尼斯人划定了他们的贸易和居住区。

路易之所以给威尼斯人方便，表面上是他口头说的基督徒不分各国一律平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搜集能力，在地中海各个势力中为最强。因此，当威尼斯商人以本国政府命令其不参加十字军为由，向路易致歉时，同时给路易呈上了圣物作为赠礼。从此以后，尽管威尼斯商人一直没有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他们通过给路易及其部下赠送喜好的东方物品，讨取了十字军领导人们的欢心。

至于首次会面时，威尼斯商人给路易赠送的商品具体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留下的记载只有三年后，威尼斯人帮助路易成功买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当然，是以不可思议的高价获得的。

如此以后，善于收集情报，也热心于开发新市场的威尼斯人，投入到日渐兴隆的“圣物买卖”活动中。

反观埃及一方，却渐渐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放弃达米埃塔之后，大军急忙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曼苏拉组织阵地进行防御，而苏丹的病依然没有好转。曼苏拉位于达米埃塔和开罗之间的位置。曼苏拉的命运，直接决定了开罗的命运。

走入穷途末路的埃及一方，向路易九世提议和谈。和平条件是将耶路撒冷返还给十字军。

路易当即拒绝了使者的和平提议。他的理由很简单：与“不信者”谈任何条件都是不可能的。

强行进军

秋意渐深，尼罗河的水位也大为降低。对进攻一方来说，这是绝好的时机。然而在十字军的首脑中间，对于战略起了分歧。

以布列塔尼伯爵为首，得到中近东当地诸侯和宗教骑士团支持的一方，主张进攻海港城市亚历山大。他们看来，如果攻占达米埃塔之外的另一座贸易集散地，将对埃及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攻占亚历山大之后，埃及苏丹便只能无条件投降了。

但这一提议受到了以路易九世兄弟为首的大多数西欧诸侯的反对。他们认为，苏丹的阵营就在曼苏拉附近；如果直取曼苏拉，开罗也就唾手可得了。路易最终采纳了后者的意见。

路易也认为进攻曼苏拉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未免有些幼稚。

1249年11月20日，路易率领全军从达米埃塔出发了。这支2.5万人的大军，全体开拔，沿尼罗河逆流而上。

此处最为不可思议的，便是路易九世为何不曾参考狮心王理查和腓特烈二世皇帝的先例。

腓特烈皇帝之所以在上次十字军东征中给苏丹阿尔·卡米尔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最后不战而获得圣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控制强大的海军之余，还建造了一支由能够沿尼罗河而上的平底船组成的舰队。而对没有海运传统的法国人来说，自身海军力量十分薄弱，不得不依靠热那亚人的力量。

即便是拥有本国舰队的理查一世，也只是在运输中使用。在与萨拉丁海军的激战中，他依靠的是比萨和热那亚人的桨帆船。

读者大概还记得，当狮心王夺取阿克，率军继续南下时，他命令桨帆船组成的舰队沿海岸而行，与沿海南下的陆军互相成掎角之势。

由于舰队承担了大部分辎重的运输，理查军队南进时负担轻了很多。尽管在行军期间屡遭萨拉丁军队的袭扰，理查指挥的部队可以从容不迫，轻装迎战。

与此同时，理查部队中的伤病员也不会造成行军的负担。比萨和热那亚船只不仅承担了军粮和武器的补给，还能将伤病员运送到阿克及时治疗。这一往复输送的战略，是致使萨拉丁的阻击袭扰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当兵士看到伤病员受到妥善照顾时，自身士气便会得到提振，其战斗力便强大起来。

路易九世除了率领十字军陆军之外，也征用了100多艘小型舰船。这些船只虽然不是平底船，但由于吃水浅，也可以在欧洲的河流中航行。

然而尼罗河下游三角洲的地貌则与欧洲截然不同。从开罗往下游去都是三角洲，整个扇形的西端是亚历山大，东端则是达米埃塔。两地之间广阔的三角洲地带，由无数条水路连通。其中有文字记载的水路有两条。

第一条是后来拿破仑远征时留下的，由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发现地罗塞塔（今埃及拉希德）通往地中海的水路。另一条则是经达米埃塔通往地中海的水路。

19世纪殖民埃及的英国人，将前一条水路称为“罗塞塔水道”，而后一条自然也就成了“达米埃塔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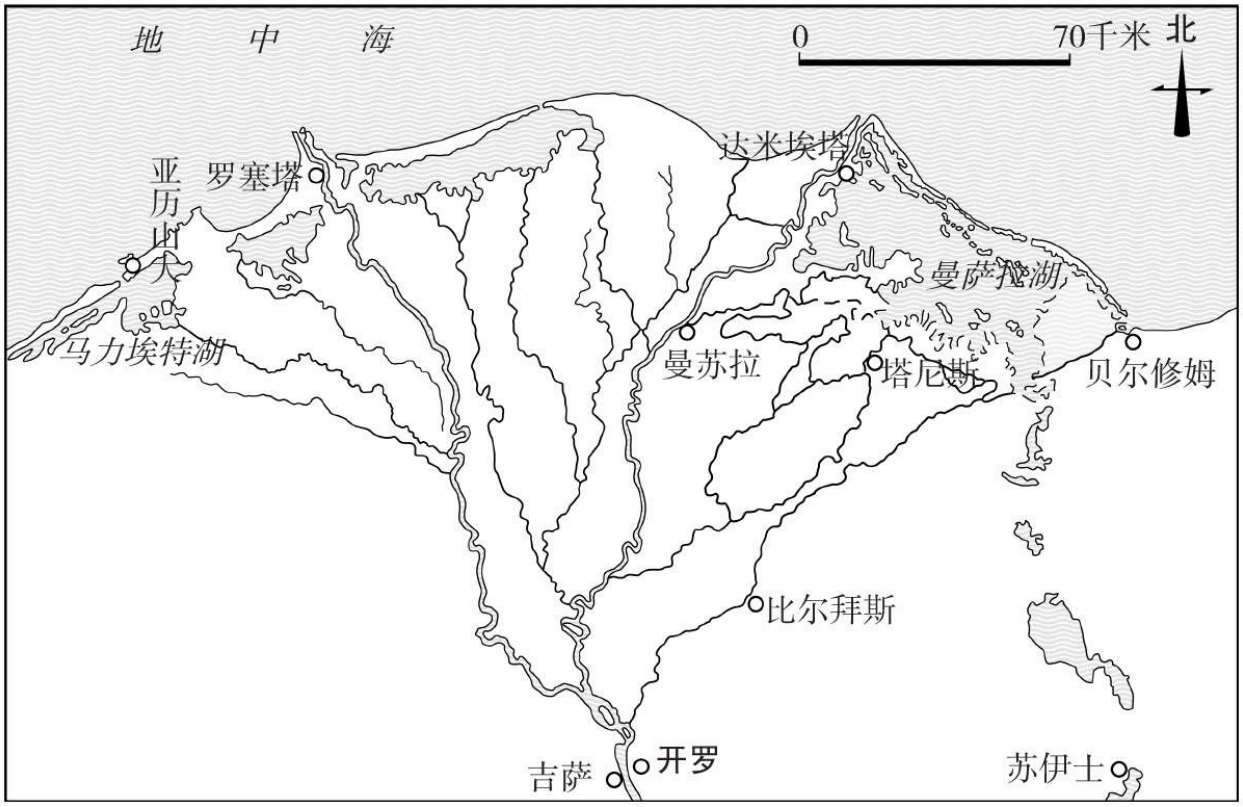
路易九世所率的十字军，正是从“达米埃塔水道”溯流而上，向曼苏拉行军，最终的进军目标是开罗。虽然大型帆船无法在这条水道中航行，小型桨帆船完全可以与陆军齐头并进。

然而路易并没有安排水军同行。他放弃了这一理查曾高度依赖的军粮补给方法。

达米埃塔的陷落，使埃及一方士气低落，但在敌军逼近曼苏拉时，他们还是开始行动了。

善于以风驰电掣一般的方式袭击的贝都因骑兵，不会放过阻止十字军前进的任何机会。

另一边，路易率领着大军庄严地前进，士兵夜以继日地抵挡贝都因骑兵的突袭。



开罗及其周边

由于敌军袭击而战死者并不多，而且没有重要人物，因此路易下令将他们就地掩埋。然而因袭击而负伤者则继续跟随大部队行军——无论是步行还是骑在马上。如此一来，行军速度就渐渐慢了。特别糟糕的是，以骑兵为主的队伍和以步兵为主的队伍在行军中渐渐拉开了差距。

尽管如此，从战略总体上看，路易的十字军不至于陷入毁灭性的打击，是因为埃及一方自己陷入了动乱。

路易率军离开达米埃塔三日之后，驻跸在曼苏拉的苏丹因病一命呜呼了。其长子即直系继承人远在叙利亚，无法立即赶回主持政务。在此危急时分，苏丹的一位妻子果断下令秘不发丧，直到长子回到埃及为止。这段时间内曼苏拉的军事指挥，则完全交由曾与腓特烈皇帝交涉的法拉丁负责。

但苏丹的死讯还是很快传开了。就连行军中的路易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可谓是众人皆知的秘密。路易对此深以为是天赐良机。毕竟此时法国国王面前的对手，已经只剩下女子和老人。

坏了路易心想的好事的，并非埃及军队，而是静静流淌的尼罗河。流经队伍前进路线的河水汇聚成一个湖泊，阻挡了队伍前进的道路。

路易集结士兵，命令他们修筑堤坝，以阻止河水汇聚。然而修筑作业受到埃及士兵投掷的燃烧弹“希腊火”的妨碍，最终不得不作罢。

随着纪元悄然进入1250年，十字军和埃及的穆斯林军队隔湖对峙了6个星期。

1250年1月中旬，有一位埃及人来到了湖畔的十字军大营之中。这位科普特基督徒男子直接请求觐见法国国王，在侍从的引导下进入了路易的营帐。埃及人禀报说，这座湖一边水势较深，另外一边则是浅滩。从浅的那一面通行，即可到达对岸。

科普特教会，与罗马公教会、希腊正教会和东方的聂斯托利派教会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派，流行于埃及。他们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基督教会之一，与其他教会的信条略有差别。

与和穆斯林生活习俗迥然不同的希腊正教和聂斯托利派教会信徒相比，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尽管保持自己的信仰，与当地的伊斯兰社区已经深深融合。因此，科普特基督徒的衣着打扮和一般埃及穆斯林区别不大，皮肤和发色也与普通埃及人没有任何不同。

而他毕竟是基督徒。为路易提供重要情报一事，说明他在自己生活的社会面前，选择了自己的信仰。这位情报提供者除了少许报酬之外，并没有要求什么。

曼苏拉惨剧

路易随即派出兵士，前往侦察情报的真假。当获悉情报可靠之后，他立即将十字军的首脑集合起来，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很快取得了共识，决定派一支先遣队到湖对岸，奇袭埃及军队的大营；如果得手，再出动大军，直捣曼苏拉。

国王的兄弟，阿尔图瓦伯爵志愿担任先遣队的队长。先遣队由他率领的法国骑士，和索尔兹伯里伯爵所率的英国骑士，以及本地的军事力量圣殿骑士团组成。

这里所说的“骑士”和一般所说的“骑兵”有所不同。

所谓“骑士”都需要经过一个叙任仪式，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才能成为“骑士”。

而所谓“骑兵”是对骑马作战的士兵的泛指，与徒步作战的“步兵”相对。

“骑士”还含有出身阶级的意味。他们生来就以战斗为职业。相反，“骑兵”平时可能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但因为善于骑马，在战时可以充任骑兵。而像圣殿骑士团这样的宗教骑士团，其团员在入团仪式上就正式成为了一名骑士。

1250年2月组成的这支敢死队般的先遣队，完全由骑士组成。其战斗力可谓极为强悍。

2月8日，先遣队誓师出发。然而就在此时，作为总指挥官的路易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不等先遣队战斗的结果，就率领全军的半数向

浅滩的方向移动，而把大营的守卫工作留给率领另一半军队构筑防御工事的勃艮第公爵于格。这样一来，当先遣队离开以后，路易的大军被一分为二。

而之后战果渐趋明朗化时，路易也没有注意到自己这一步所犯下的错误。

当先遣队出发时，路易郑重地对自己兄弟说："埃及军队的大营，就看你的了！之后我们合力进攻曼苏拉城！"

埃及军队完全没有料到先遣队的奇袭，于是，奇袭取得了完美的成功。那与其说是一场激战，不如说是完全的屠戮。处在最前线的埃米尔法拉丁，就在当天战死沙场。

酣畅淋漓的大胜，令先遣队队长阿尔图瓦伯爵自以为无敌于天下。与他一样年轻气盛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也自信满满。队伍里的圣殿骑士们一直以对穆斯林作战为自己的唯一使命，因此在战斗中勇猛异常。

于是，先遣队内当即一致决定，乘胜进攻曼苏拉。然而，不幸悄然向他们袭来——防守曼苏拉的不是别人，正是剽悍的马木路克骑兵。

用拉丁字母写作"Mamluk"的这支骑兵，与一般的雇佣兵并不相同。这一名字的意义，指他们是从奴隶市场上买回，专门培养成兵士的男子。这些出身于各个不同部族的"奴隶"（"马木路克"的本意）从小接触各种武器，终身以作战为职业。

对马木路克来说，战斗即生活，一生如此。

而对基督教世界的骑士来说，为了上帝，为了主君，为了人人爱怜的美女而死，都是无上纯洁的。

出身马木路克的埃及的骑兵司令鲁克纳尔丁·拜巴尔斯，像任何一

位马木路克一样，会为了战斗的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

阿尔图瓦伯爵率领的精锐部队来到曼苏拉城下时，望见城门洞开的场景，不由得吃了一惊。然而，整支部队中并没有人猜测到敌人的诡计。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城内守军得知附近营地尽失以后，便和当时达米埃塔的守军一样望风而逃了。现在，放眼望去，曼苏拉城头上连一个士兵的影子也没有。

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走在最前面，整个队伍昂首阔步进入了曼苏拉城。

队伍沿着城内的巷道前进。由于道路狭窄，骑在马上的骑士队列逐渐变成了一字长蛇阵。

当他们正在狭长的街巷中行进之时，忽然从两边的屋顶上射来了乱箭，投来了石块。骑士们全体都在马上，却被街巷的地形限制住，动弹不得，活生生成了两边敌人的靶子。这支精锐的先遣队，连使用刀剑的机会都没有，就横遭屠戮。

将这一惨剧转告路易九世的，是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成功单骑脱逃的布列塔尼伯爵皮埃尔。而他也并不知道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命运如何。

直到两位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化装成马木路克潜入曼苏拉，亲眼看到穆斯林士兵将西欧骑士的遗体投入尼罗河，路易才确认了先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

同为宗教骑士团，与拒绝学习阿拉伯语的圣殿骑士团骑士截然相反，医院骑士团常常化装成穆斯林，潜入敌方阵营刺探情报。

路易由此得知了先遣队失败的消息。至于阿尔图瓦伯爵罗贝尔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的死讯，则是医院骑士团骑士看到尼罗河上漂浮的华

丽贵族盔甲之后得以确认的。

路易在给臣下的书信中，告知了自己泣不成声的悲痛心情。亲兄弟的丧生，给35岁的兄长以巨大的打击。然而，医院骑士团骑士的报告，给路易的打击更大，简直令他泣不成声。

两位乔装成马木路克的医院骑士团骑士，很可能参与了将十字军将士遗体从城内运往河边的工作，并亲手将遗体投入尼罗河中。为了刺探工作不被埃及人识破，两位骑士必须亲自参与以上的工作。

尽管未被识破，两人还是没能见到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遗体。据他们统计，参战的290名圣殿骑士团骑士中，投入尼罗河的只有285人。

圣殿骑士团的制服是众所周知的白底大红十字。虽然马木路克把阿尔图瓦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所率骑士的精钢制成的甲胄尽数剥下，印有红十字的白袍却对他们毫无价值。于是，白袍被一件一件丢弃在尼罗河上，顺水向下游漂去。这样一来，两位乔装打扮的医院骑士就能把圣殿骑士团牺牲的人数数个清楚了。

至于没有被扔进尼罗河的5位圣殿骑士，此时一定是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不难想象，这5位重伤者，和其他参战的士兵，最终都不免逃脱葬身河底的命运。

马木路克对俘虏敌人并无兴趣——如果他们俘获敌人，十字军为俘虏所交付的赎金，最终会落入他们的阿拉伯或突厥主人手里，他们自己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场全军覆没的曼苏拉惨剧之中，只有圣殿骑士团的牺牲人数为历史所记载。至于阿尔图瓦伯爵所率的法国骑士和索尔兹伯里伯爵所率的英国骑士人数，就没有资料可以查考了。

根据圣殿骑士团的其他战例，参考两位伯爵的地位，现代学者估计参战人数约为1000人以上。

这次1000人规模的覆没，对于整支大军2.5万人来说，并非毁灭性的打击。然而，由于先遣队全部由骑士组成，第七次十字军的精锐几乎完全丧失。曼苏拉的损失，并不在于量而在于质。经此打击，路易九世已经欲哭无泪了。

曼苏拉惨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一直以最下层兵士身份作战的马木路克，以下克上地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西欧骑士们。

撤退

曼苏拉惨剧之后不到三天，1250年2月11日，马木路克骑兵集中起来，开始进攻路易九世的大营。路易连忙放下悲伤，仓促应战。

奴隶出身的马木路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危在旦夕的十字军在各个方向慌忙招架。在这场战略与战术全无的白刃战中，路易的幼弟，普瓦提埃伯爵阿尔丰斯为周围侍从簇拥着杀出重围，从而幸免于难。最终，路易得以将敌军击退，马木路克骑兵踏着扬沙回到了曼苏拉城内。

在为水道所包围的危险地势上，大营中的路易和诸侯夜不能寐，度日如年地防备着马木路克随时可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然而，敌人并没有前来挑战。原来，这段时间内，新任苏丹终于从叙利亚回到了埃及，并来到曼苏拉视察。

新任苏丹甫一到来，便用计让十字军陷入了比之前更加窘迫的状况中。

苏丹一边命令来自各地的骆驼集结，一边组织大量建造小船。

骆驼驮着小船，一只一只运送到被后来欧洲人称为“达米埃塔尼罗河”的水道上。小船上乘坐的除了划桨手之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兵士。苏丹的战术是用这些成群的小船阻止十字军用来提供补给的小型船只。

由于路易九世并未将达米埃塔到前线的补给作为战役的重要部分来考虑，补给船只上没有安排战斗人员。于是埃及的战略大获成功，路易的大本营陷入断粮断水的境地。接下来，新苏丹图兰沙便命令马木路克和贝都因骑兵袭扰十字军的大营。此时的十字军陷入饥饿和疾病之中，内外交困。

1250年4月初，路易最终不得不决定拔营撤退。同时，他向苏丹提出了停战的请求。停战条件与之前苏丹提出的一样——用达米埃塔交换耶路撒冷。

先前苏丹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提出同样的条件，遭到路易的断然拒绝。到这次路易陷入绝境，却提出相同的条件，苏丹自然不会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伴随着苏丹的严词拒绝，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的撤退，即将史无前例地惨淡收场。

史无前例的败北

抵挡着敌军的袭击，十字军且战且退。从底层士兵到路易九世，整个军队都陷入了连续的苦战。路易让负伤者乘船先行撤退，自己指挥后卫部队，以确保安全撤退。

然而，后卫部队的作战牺牲巨大，路易却没有做成功的部署。36岁的路易在敌人的不断追击之下，于撤退途中过于劳累，最终病倒了。躺在担架上的法国国王，最终被移动到相对安全的前卫部队中。

路易决定再次向马木路克骑兵司令提出休战。他派出蒙佛尔伯爵率领一队人马，前往敌营求和。

从以往十字军和阿拉伯人、突厥人交往的先例来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对这次和谈的对象马木路克来说，成功实现和议却是不可能的。

目睹和谈进展的重重困难，蒙佛尔伯爵手下的兵士纷纷认为，与其面临被马木路克集体残杀的命运，伯爵不如放弃和谈，投降对方。由此可见，此时的第七次十字军早已人心涣散，陷入统帅无法领导下级兵士的境地。

负责守卫伤员所在的船只的兵士，同样自私地认为不如投降了事。他们在敌军船只的围攻下，赤手空拳地连同伤员一起被俘。就这样，下级士兵一个个成了埃及人的阶下囚。

路易的大军由此一点点垮掉，而国王对此完全无能为力。照这样下去，整个十字军要一步步成为穆斯林军队的俘虏了。

第七次十字军的窘境在之前的六次东征中从未出现。上至国王，下至兵卒，滚雪球一般地投降敌军——俘虏的盔甲被剥下，武器全数遭到缴获。

避免这一惨状的，除了早早逃离战场的侍从、马弁和厨子，就只有顺尼罗河而下返回达米埃塔的热那亚水手了。

自法国国王以下的全体贵族，被曼苏拉的埃米尔羁押于自己的官邸之中。

至于被俘的作战人员总数，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几乎可以确定超过了一万人。曼苏拉这座小城已经不够收容十字军士兵，他们当中许多人被押解前往开罗。

见到被俘的十字军战士，对开罗市民来说不啻是值得狂欢的事情。然而即使是大都市开罗也无法收容一万名战俘，俘虏们被收押露宿于城外的古埃及神殿遗迹附近，一路上重伤员和病员往往被随行的马木路克残杀。

在1250年4月中旬，胜负双方最终缔结了和议。

失败者路易答应胜利者苏丹的第一个条件，是全部返还中近东基督徒占领的所有城市，以换取自己的人身自由。

为此，路易通信告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即耶路撒冷王国的正统继承者，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子康拉德，决定这一地区未来命运的权力在自己而不在这位德意志人。

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二世于当年12月驾崩。因此此时他作为皇帝还在位，而当年与他订立和约的阿尔·卡米尔，是在位的埃及苏丹图兰沙的祖父。图兰沙之所以敢于撕毁祖父订立的和约，只是因为失败者路易向自己要求的是人身自由——多少赔款都无法换回的权利。

此外，苏丹还要求路易提供100万拜占庭金币的赎金。

赎金是为了释放国王以下的全体贵族、骑士乃至士兵而提供的。由于第七次十字军全体成为了苏丹的阶下囚，这100万金币即成为释放国王以下全体十字军成员的赎金。

根据和议，当支付一半赎金之后，埃及一方首先释放国王和贵族。基督教世界眼前的紧急任务，便是筹集这一半的赎金。

苏丹的另一个要求则是放弃达米埃塔。基督教世界放弃达米埃塔之日，路易九世即重获自由。

在因国王被俘而陷入动乱之际的达米埃塔，王后玛格丽特临盆了。她的新生儿名叫让·特里斯坦。

此时的王后连产后进补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赎金都要靠她一个人筹集。

王后不得不将全部财产加以变卖：除了各种珠宝饰品，名贵服装，再加上手中留存的部分出征军费，合计凑够了差不多40万拜占庭金币。

虽然离半数赎金需要的50万还差10万，但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阿尤布王朝的末代苏丹图兰沙最后允诺当即释放路易和各位贵族。

1250年5月6日，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重获自由。他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囚徒生活，然后与自己的两名兄弟和列位贵族一起获释。

全体贵族成员首先启程前往达米埃塔，甫一到达，国王便连同王后一起离开达米埃塔，前往阿克。至于在开罗收容的一万多俘虏，则只能等待回到阿克的路易为他们筹集赎金了。

留下关于路易九世和第七次十字军记载的那位来自香槟的骑士茹安

维尔，也是被俘十字军将士中的一员。由于他身份低微，未能随国王释放，不得不继续忍受艰难的囚徒生涯。

我们可以从茹安维尔的记载中得知，他曾以自己作为法国国王远房兄弟的资格而要求获释。然而他的呼吁石沉大海，毫无效果可言。于是，茹安维尔转而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远亲资格要求获释，这一次反而取得了成功。

虽然与腓特烈面谈的法拉丁惨死于曼苏拉附近的战斗之中，这位外交家在埃及宫廷中为皇帝制造的美好形象，一直都没有消散。

最终，若望·德·茹安维尔在未支付赎金的情况下得以释放，平安回到了法国。

返回阿克的路易九世首先命令自己的兄弟安茹伯爵和普瓦提埃伯爵启程回国。与此同时，从国内传来了摄政的母后布兰卡卧病在床的讯息。

0
100千米
小亚细亚
基立基亚
北
安条克
叙利亚
尼科西亚
法马古斯塔
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
托尔托萨
特里波利
地
中
海
贝鲁特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提比利亚斯
约
旦
河
阿尔苏夫
雅法
亚实基伦
耶路撒冷
死
海
达米埃塔
加沙
达鲁姆
埃及

从达米埃塔到阿克

但路易自己还无法回国，他必须筹集剩余部分的60万赎金。

这边厢筹集资金毫无进展，俘虏继续扣押的情形之下，埃及人那边却发生了内乱。

新登基的苏丹图兰沙，大好形势之下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图兰沙忽视了协助他取得苏丹位置的一位父亲的遗孀，导致这位名叫沙加尔·杜尔的女子怒火中烧，暗中勾结马木路克。在她的策划下，最终，马木路克统帅拜巴尔斯决定对图兰沙实施谋杀。成事以后，沙加尔·杜尔与一位年长的马木路克结婚，最终成为一位女苏丹。

从此以后，萨拉丁所创立的阿尤布王朝寿终正寝。埃及进入了马木路克统治的时代。由于这次内部权力更迭，留在阿克的路易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

这段时期内，路易继续忙于筹集资金。这位虔诚的国王虽然拒绝与异教徒交涉，却愿意遵守与异教徒的约定。无论如何，他必须设法使部下重获自由。

然而中近东的基督徒家族中，并没有多少财富可以提供给路易。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圣殿骑士团，向这支队伍强制索取。

与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的成员来自欧洲各地，而条顿骑士团的成员都是德意志人。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全部来自法国，因此，他们无法断然拒绝法国国王的强制要求。虽然历史没有记载圣殿骑士团提供的赎金总额，但路易索取的这笔款项绝无偿还的可能。

对中世纪的历代法国国王来说，向别人借钱，最后欠债不还，是常有的事。从事相当于今天金融业的高利贷，因为向国王借钱而最终破产的银行不在少数。路易九世强行索取圣殿骑士团的经费之后，这家在第七次十字军中折损了300名精锐团员的组织，元气大伤。

最终，由于赎金总是分批募集，且最终募集的资金仍然不够释放全部俘虏所要求的总数，只能依照每次募集赎金的比例赎回相应比例的俘虏。

据研究者统计，与路易九世同获自由的贵族有400人，其后首次释放的俘虏为1400人，两年后获释者为3000人，以上总共4800人。然而，被俘的十字军总数为1万至1.2万人之间。之所以没有准确的人数记载，想必是因为惨败之后无人愿意提及吧。不过，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欧各国除了威尼斯之外，都没有关心本国战争中牺牲者的传统。

但当对手是穆斯林的时候，情况则有所不同。对被俘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他们决定在囚徒生涯中改宗伊斯兰教，则可以恢复自由。在伊斯兰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不能被卖为奴隶的，因此改宗后的十字军俘虏不必担心被卖为奴隶。而且一旦改宗，俘虏们也不用担心会被悄无声息地杀害。

因此，对十字军俘虏来说，没有比改宗伊斯兰教更好的选择了。当然，在伊斯兰世界，对改宗伊斯兰者的宽容是单方面的，如果伊斯兰教徒想要改宗异教，等待他的将是死刑的裁决。而在天主教的西欧，改宗异教则会被火刑夺去性命。一神教信仰的世界，都是“单向通行”的。

在这“单向通行”的规则之下，无论是从农民当中征集的步兵，还是出身于封建领主部下的弓兵和普通骑兵，大都在严酷的囚徒生活和被贩为奴隶的可怖前景之下，选择了改宗伊斯兰教。这样一来，即使路易支付了相应数额的赎金，也没有那么多俘虏最终回到基督教世界去。大概只有原本就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骑士们，才会最终选择被赎回的命运。

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就是这一时期重获自由的一人。他早在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的1244年就被俘，由于一直拒绝改宗，度过了7年牢狱时光，终获释放。

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剩余的5200人中，最终回国的肯定相当少——这样说来，虽然我无法为路易九世在战场上的无能辩护，却可以为他没能赎回全部俘虏找到客观原因了。

第七次十字军的“成果”

1254年4月25日，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携王后一同启程，向西欧出发了。从1248年8月离开法国，路易在中近东停留将近6年，直到1254年7月10日回到法国。

这支在埃及仅仅停留两年的第七次十字军，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

第一，由于这支由西欧基督教世界强国法国国王所率领的十字军，在埃及遭受了完败，伊斯兰世界开始认为，西欧的王侯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了。

路易亲率的2.5万大军，除了5000—7000人平安回国，近8000人改宗伊斯兰教，1万人以上在埃及命丧黄泉。

第二项“成果”则是，中近东基督教势力的常备军事力量——宗教骑士团，经过这次十字军东征，受到了决定性的削弱。

除了一战损失300精锐的圣殿骑士团以外，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也在埃及之战中丧失了巨大的人力和资金。

第三，同在中近东居住的基督教势力的核心即十字军国家的封建诸侯，也被大大削弱了。

第七次十字军的失败，使以仗剑守卫为天职的骑士阶层人数锐减——骑士在阿拉伯奴隶兵马木路克的面前屈服了。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海港城市则受到以此处为基地的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商人的力保，维持了繁荣的景况。

成为“圣人”的路易九世

从第一次到第七次十字军的历史中，唯有路易所率的这第七次十字军，对中近东的基督教势力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第七次十字军归国时，西欧人的圣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处于军事空白状态了。

然而获释回到西欧的路易，却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经历的奇耻大辱。路易重获自由回到阿克以后，距离其他俘虏获释前两年的1250年8月，他向臣属发表了以如下词句开始的演说：

“为了荣耀上帝的美名，朕愿全身心继续十字军的伟大事业。”

在冗长的演说中，路易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再度发起十字军东征”。

当4年后路易九世归国时，受到了法国教士和修士的夹道欢迎。此时的路易并未因失败而受到责备，相反，他大谈特谈自己建设人间乐园的使命。对40岁的路易来说，这个使命大概是最光明的事业吧。

第六章　最后半个世纪
（1258—1291年）

蒙古人的威胁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历史上常常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而介于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之间的中近东，则常常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古代是罗马帝国，中世纪则是十字军。

这一传统，随着蒙古人的崛起而悄然变化。进入13世纪，迅速扩张的蒙古势力，在其初代领导人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继续发展，不到半个世纪间便发展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帝国，东起朝鲜半岛，西到黑海和匈牙利。

以底格里斯河畔巴格达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东半部，在波涛一般的蒙古人攻势面前风雨飘摇。

巴格达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中心。哈里发起先试图支付重金给蒙古军队，使其绕道离开。但蒙古军队的强悍之处，不仅在于其骁勇善战的骑兵，更在于要求对手在投降和死亡之中二选一的强迫。当蒙古军队兵临城下，在距离巴格达5公里的地方实施包围，和谈的努力失败后，末代哈里发穆斯台绥姆被迫投降——这一天是1258年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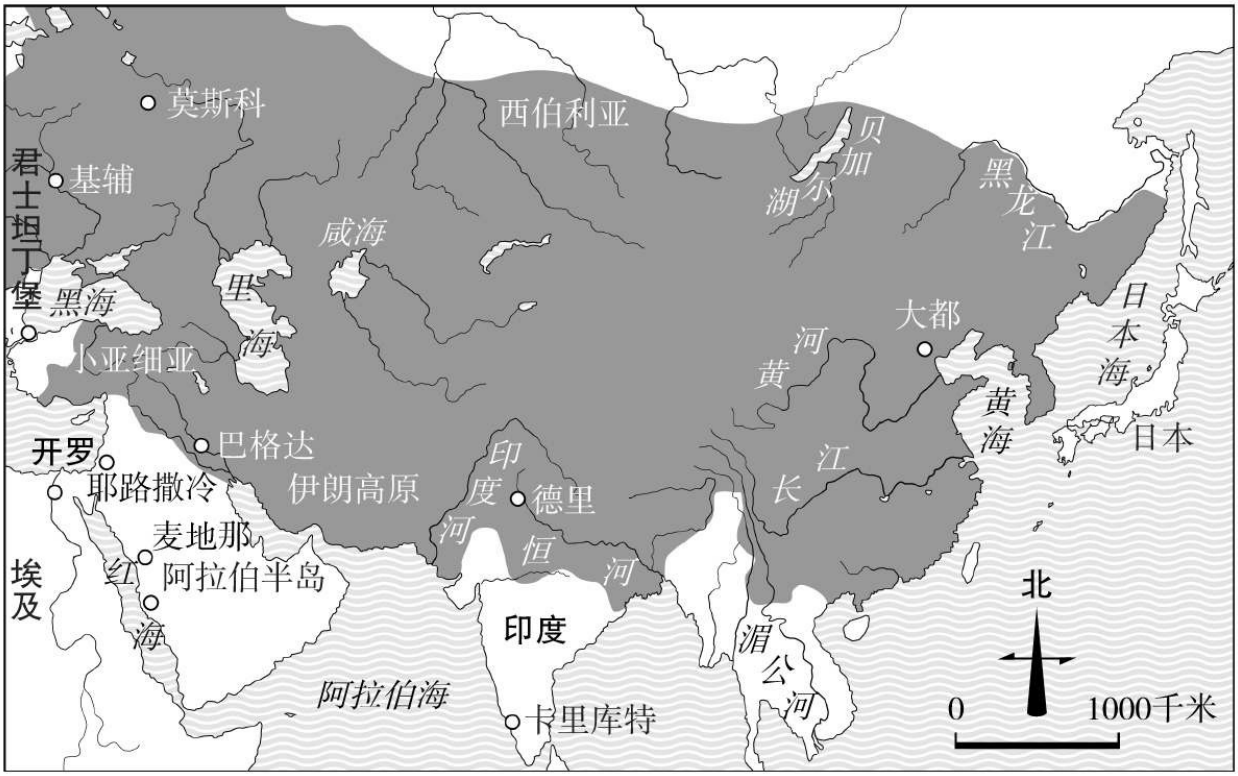
自762年阿拉伯人建成巴格达城以来，这座城市一直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首都而存在。从阿拉伯半岛发轫的伊斯兰势力，起先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作为首都，之后则在底格里斯河畔兴建巴格达作为新的都城。

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巴格达，经历496年的繁荣之后，终于陷落。蒙古人对城市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残杀了哈里发，掠夺了城内全部资财，屠杀了8万居民。逊尼派穆斯林的信仰中心阿拔斯王朝寿终正寝了。

蒙古军队杀人之后，从来不处理尸体。他们任凭堆积如山的尸体曝晒于露天，导致疫病蔓延，使蒙古士兵也成为瘟疫的牺牲品。于是，率领大军的蒙古司令官不得不放弃刚刚攻陷的巴格达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巴格达，从此在暴行的破坏下沦为一片废墟，就连孩子的哭喊声也听不到。巴格达的再度复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一中东的大事件，穿越横亘中近东之间的大沙漠，传到了近东。

选择屈服或死亡，是摆在蒙古大军对手面前不变的课题。而蒙古军队本身，也以屈服者的不断加入而膨胀起来。当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蒙古军队来到沙漠地带时，他们的行动便不如在草原上那般便利了。于是，这支大军小心翼翼地在沙漠的边缘地带行进，以避开纯粹的沙漠。



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

征服中东之后，将视线投向近东的蒙古大军，并未径直西行，而是转向了北方。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城得知巴格达被攻陷的惨状，当即开城投降。

此后，蒙古军队折向西行，自然来到了第一次十字军征服的埃德萨伯爵领地。这里是中东与近东之间的十字路口，历史上交通干线的必经之地。

经过这一干线，到达的第一座大城市便是控制在穆斯林手中的阿勒颇。阿勒颇的领主对接近的蒙古大军感到极为恐惧，未作任何抵抗就携家眷逃亡埃及。

留守的将士只抵抗了三天，全盛时期的十字军也未曾攻下的阿勒颇城便被蒙古大军攻破了。此时正值1260年早春，巴格达陷落两年之后。蒙古军队在阿勒颇所实施的屠杀，与巴格达的并无二致。

攻陷阿勒颇之后，蒙古铁骑决定围攻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大军立即开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扑。

1260年3月1日，大马士革终告陷落。蒙古大军的威胁席卷近东，距离埃及咫尺之遥。

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也将面对蒙古的威胁。以巴格达陷落为标志而失去东半部分的伊斯兰世界，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蒙古与马木路克的对决

拜巴尔斯是一位从奴隶市场上被贩卖为兵士的职业马木路克，大约出生于1223年前后。出身奴隶的马木路克大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拜巴尔斯也不例外。

击溃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使马木路克一战成名。刺杀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图兰沙，将埃及的主权置于马木路克的统治之下，拜巴尔斯居功至伟。面对蒙古铁蹄的威胁，众人都寄希望于这位马木路克的领袖。

无论是巴格达、摩苏尔还是阿勒颇、大马士革，一座座城市被蒙古人轻易攻陷，这不能不说是负责防御的领主哈里发和埃米尔的问题。究其原因，阿拉伯和突厥领主们都是伊斯兰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出于诸多利益的考虑，使他们患得患失，无法做出果断的决定，最终陷入失败的命运。

与这些既得利益者相比，出身奴隶的拜巴尔斯完完全全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今天的地位。

这位37岁的马木路克，决定与蒙古人决一死战。为此，他做了慎重的准备。

拜巴尔斯精心挑选了最忠于自己的亲兵上战场。出战的3.5万名埃及步兵，全部出身于马木路克。

当部队集结完毕之后，拜巴尔斯并不打算集中全军于埃及进行守土防御。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惨剧历历在目，他并不想将士们在战战兢兢的埃及民众的议论中丧失士气。

马木路克选择了远离家乡的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作为决战的战场。拜巴尔斯的计划，是待蒙古军队离开大马士革，在其南方的巴尔贝斯城休整后开拔南进时，对其进行截击。之所以选择巴勒斯坦北部，是因为这一地区距离留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的友军尚远，他们无法及时驰援。

马木路克大军从开罗出发，沿地中海海岸到达加沙，由此北上到达阿克。由于埃及军队决定的战场加利利地方恰好是十字军控制的地盘，马木路克一边行进，一边密切关注着十字军的行动。

距离第七次十字军的大败和路易九世的惨淡归国，还不到6年的光景。以阿克为首都的近东十字军势力，正屏住呼吸期待着伊斯兰世界和蒙古的对决。十字军除了答应拜巴尔斯借道的要求之外，别无选择。而拜巴尔斯也得以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组织对蒙古大军的反攻。

如怒涛般西进的蒙古铁蹄，到达地中海沿岸之后，并未放慢脚步。他们不待与友军会合，便径直西行渡过了约旦河。1260年9月23日，这支蒙古大军抵达了阿音扎鲁特（Ain-Jalut）的原野，与埃及马木路克大军短兵相接。

最令拜巴尔斯恐惧的对手，便是妇孺皆知的蒙古骑兵军团。相形之下，马木路克骑兵的实力要弱很多。

37岁的马木路克司令在军中的角色，犹如今日的足球队主教练。在球场上，遭遇有强力前锋的对手，教练必然会命令己方后卫对强力前锋进行时刻紧逼盯防。受到严密盯防的前锋与队友隔离，任凭他具有再天才的球技，也得不到传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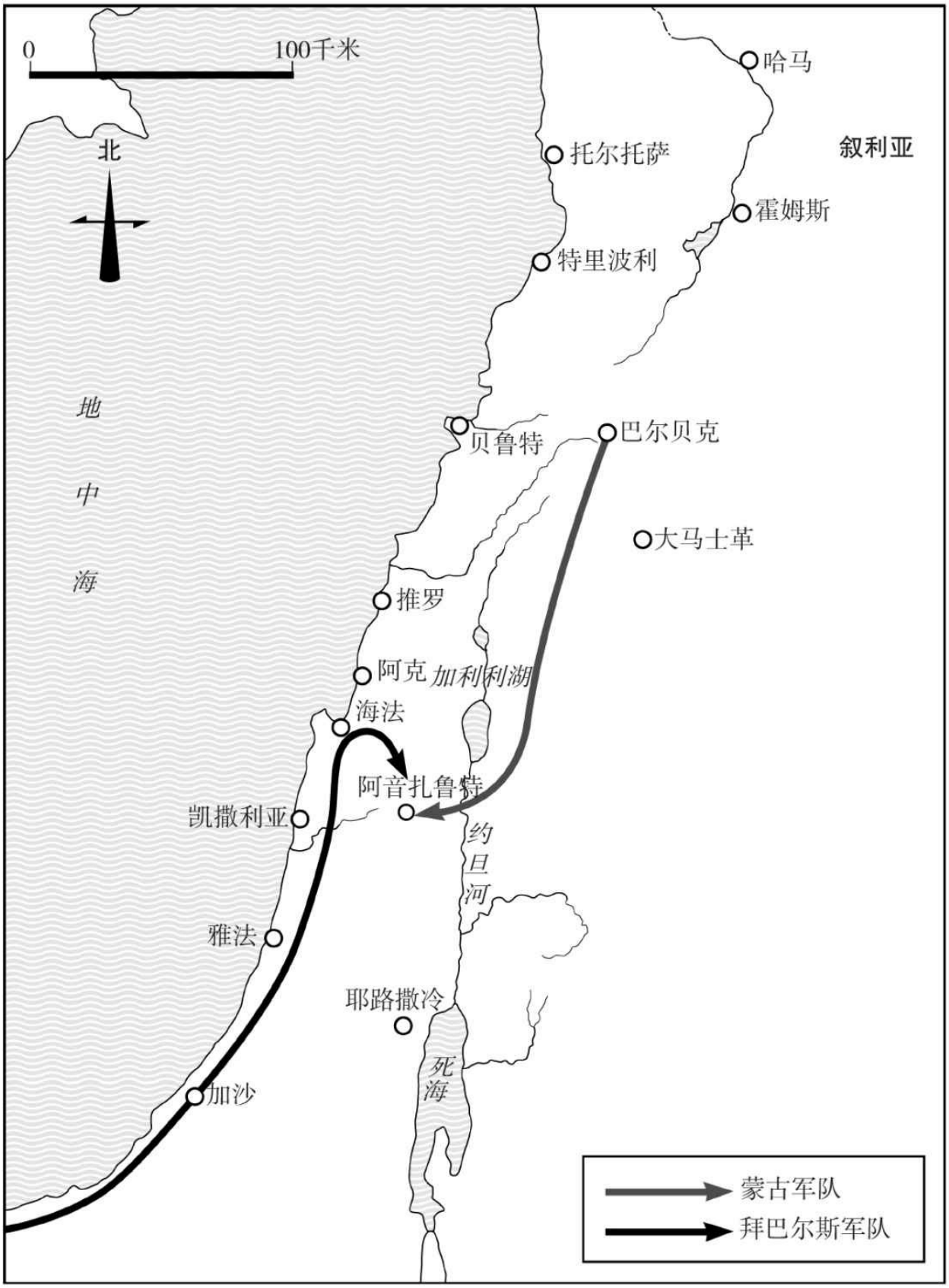
拜巴尔斯便实施了类似的战术。他的少量骑兵部队将勇猛的蒙古骑兵军团引入不适合骑兵行动的森林中，而步兵则与敌方的步兵进行缠斗——马木路克一方的步兵拥有极大的数量优势。

于是，阿音扎鲁特之战的天平，逐渐向马木路克一方倾斜。

从规模上看，这场会战并不大。然而就此一战，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便得以幸免于蒙古军队的蹂躏。

阿音扎鲁特战役打破了蒙古大军不败的神话。由于担心战线太长，蒙古军队在阿音扎鲁特失败之后，便径直退回了幼发拉底河东岸。这样一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不费吹灰之力地回到了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一位奴隶出身的将领，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英雄。如果说此前苏丹之位除了实力之外还要求出身高贵，阿音扎鲁特一战之后，出身低微者也可以竞逐苏丹的大位了。对其治下的穆斯林来说，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导人就是最受拥护的领袖，至于其出身则是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0
100千米
北
哈马
叙利亚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特里波利
地
中
海
贝鲁特
巴尔贝克
大马士革
推罗
阿克
加利利湖
海法
阿音扎鲁特
凯撒利亚
约
旦
河
雅法
耶路撒冷
死
海
加沙
蒙古军队
拜巴尔斯军队

阿音扎鲁特之战示意图

这位出身奴隶的英雄，在政治上也棋高一着。他找到巴格达陷落时死难的哈里发的继承人，将其迎入开罗，成为新的哈里发。

拜巴尔斯承认哈里发宗教权威的同时，独揽政治和军事大权。哈里发在宗教领域为这位出身卑微的苏丹大唱颂歌。哈里发从此不再是苏丹权力的障碍。

日本常译为“奴隶王朝”的马木路克王朝，巩固了统治。

由萨拉丁创立，经阿拉迪尔、阿尔·卡米尔以至于全盛的阿尤布王朝苏丹，并不需要哈里发作为自身的宗教权威。然而，对出身奴隶的马木路克王朝苏丹来说，这样的宗教权威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马木路克王朝对伊斯兰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拜巴尔斯于17年后的1277年在大马士革去世。这位以幼狮为旗号，出身钦察人的马木路克苏丹，死后在开罗的大清真寺中获得了华丽的墓所。

此后的马木路克苏丹，很快与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的基督教残余势力展开了斗争。

圣路易与第八次十字军

内政和外交固然都是政治活动，二者的性质却全然不同。

只要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内政活动往往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推行以大多数国民福祉为目标的政策，最终会造福于国家的利益。

然而对外交来说，政治利害和对象国家的利益往往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真心往往得不到好结果，反而会促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因此，负责外交的领导人，就要有着比从事内政的领导人更高的智慧，还要有内政领导人所不具备的辛辣手腕。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内政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而在外交方面，他的成就堪称耐人寻味……

路易九世是一位并不为自己考虑太多的君主。他从未致力于祖父腓力二世那般扩大领土的事业。路易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神，献给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他是一位与利己主义、自我中心无缘的领导人。从基督教会的角度看，路易九世是再理想不过的世俗君王。

1270年，56岁的路易九世决定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

在他20年前发动的第七次十字军中，路易的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许多部下改宗伊斯兰教，成为了埃及社会的一分子。

此时距离路易自己获释回到法国，已经过去了16年。

在开罗，以大破蒙古铁骑而扬名的拜巴尔斯，苏丹大位坚如磐石。

整个西欧天主教世界，并没有任何人支持路易对十字军的狂热号召。

第七次十字军的惨败，令罗马教廷怅然若失。雪上加霜的是，穆斯林军队1268年攻下了十字军控制的安条克公国。罗马教廷此时对向欧洲各地宣传十字军东征失去了信心。

此时此刻，面临拜巴尔斯威胁，又新近失去安条克的中近东基督教势力，完全没有对十字军东征的新期待。

因此，1270年出征的第八次十字军，除了出自路易九世本人的愿望以外，并没有任何人的推动。这位并未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而气馁的国王，依旧身怀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和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信心。

他所选择的出征目的地，不是以前的任何地点，而是北非的突尼斯。

路易之所以选择突尼斯，大概是因为风头正盛的拜巴尔斯的兵力集中于北侧，难以顾及西面的北非腹地。自狮心王理查以来基督徒占领的凯撒利亚、雅法等城市，都已尽数为拜巴尔斯夺去。

路易的计划一旦成功，则不得不称之为天才级的战略。如果他击败了突尼斯的埃米尔，并使北非基督教化，则可以从西面率领北非军队长驱直入，攻取埃及。然而要让整个北非基督教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推翻当地的穆斯林政权。

法国国王亲自率领的第八次十字军阵容，比第七次十字军更加华丽。

路易和法国的两位王子、英格兰王子、纳瓦拉国王都带着后妃出征。随行骑士们的甲胄和战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妃的女官们艳丽的礼服花枝招展。倘若没有海上的惊涛骇浪，这阵势真宛若上流社会的观

光旅行。

1270年7月1日，从艾格莫尔特港出发的第八次十字军，在撒丁岛南端稍作停留，便向突尼斯进军。

7月17日，大军在距离古港口迦太基不远的地方登陆。

古典时代北非物产的集散地迦太基，随着中古时代以来当地经济文化中心向突尼斯转移，逐渐被遗弃为一座沙漠中的废都。十字军在此处的沙漠地带登陆之后便就地扎营，等待从西西里前来会合的安茹伯爵查理。路易计划在与这位王弟会合之后，率军前往突尼斯。

由于缺少第七次十字军时代茹安维尔式的记录者，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第八次十字军的总兵力情况。但无论如何，逾万人在沙漠地带持续露营，都是十分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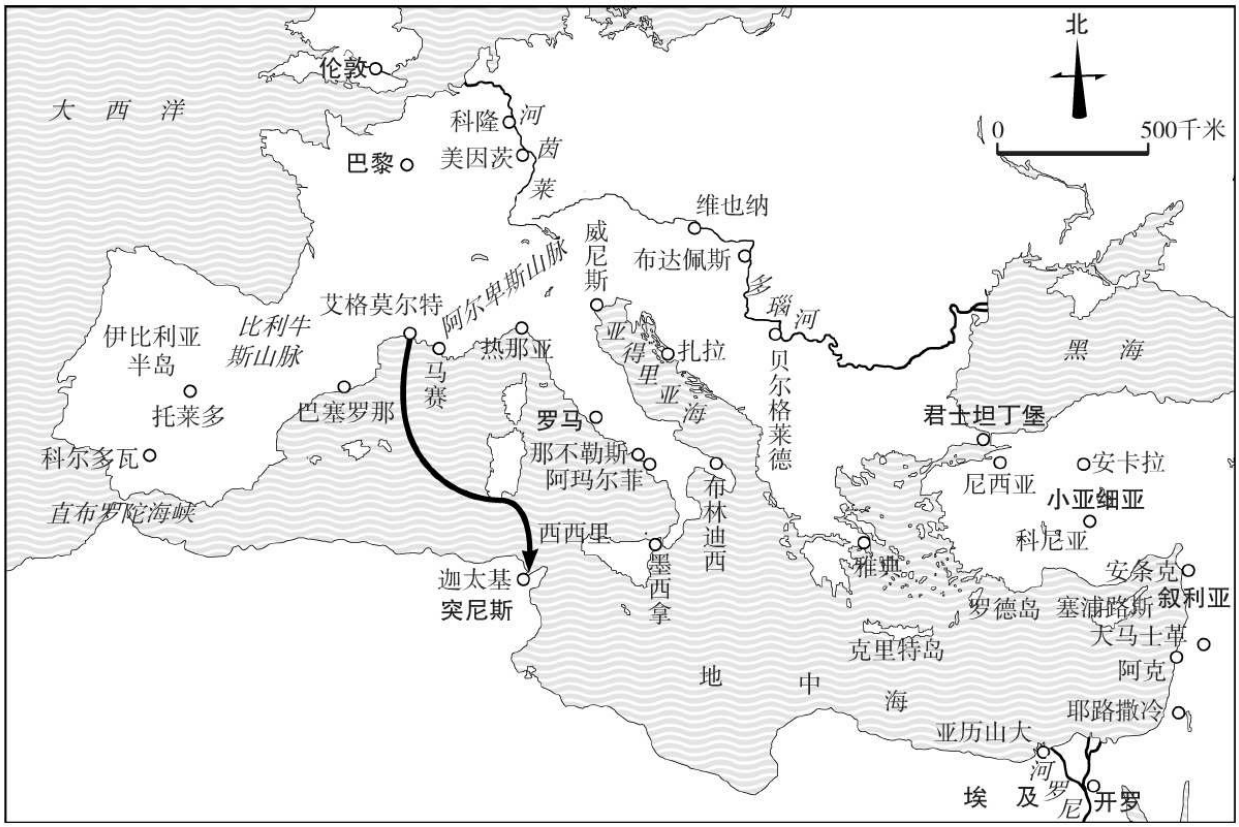
深知自己身处危险境地的路易，在决定实施军事行动之前，首先试探外交途径的解决。他给突尼斯的埃米尔送去了亲笔书信，信中写道：

> 若阁下考虑改宗基督教，鄙人愿为实施洗礼。若阁下拒绝，鄙人将亲率万余部众，与阁下兵戎相见。

突尼斯埃米尔即刻发来了回信：

> 收回您关于洗礼的话吧，我愿与您战场上见。您若胆敢进攻突尼斯，我就会杀掉城内“浴场”的所有基督徒奴隶。

所谓“浴场”，即此时期北非穆斯林海盗收容所掠夺来的南欧基督徒奴隶，并役使其进行廉价劳动的场所。我已经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路易九世所率第八次十字军进军路线

即使是单纯如路易九世，也对突尼斯埃米尔的强硬回复感到意外。于是他决定停止外交活动，尽快开始军事行动。他派遣船只火速前往西西里，催促兄弟查理尽快出兵，并提供更多的水和军粮。

然而，查理四年前刚刚杀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儿子曼弗雷迪，夺取了西西里的王位。西西里人对这位来自法国的新国王并无好感，于是他无论是征募兵士，还是筹集钱粮，都进展缓慢。

突尼斯盛夏的太阳毒辣辣地照耀着十字军的将士，他们逐渐陷入缺粮缺水的境地。由于没有选择好登陆地点，一直处在野营状态下的部队状态日趋恶化。敌人还没有来袭，瘟疫却悄然来到了。

进入8月，迟迟等不到查理的路易病倒了。

得知路易病情的查理急忙调遣部队和补给物资，从西西里岛西岸的特拉帕尼港出海，率军于8月25日登陆迦太基。

登陆的王弟并未得到任何人的欢迎——急忙赶去路易营帐的查理，见到的是片刻之前已经撒手人寰的兄长的遗容。据说路易九世生前最后的声息，是“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

在恶劣条件下病倒的，并非只有路易一人。以教皇代表身份同行的主教，以及路易的儿子，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出生的特里斯坦，都命丧黄泉。另一位王子腓力也一病不起，危在旦夕。

国王和高级贵族的遗体，在死后会直接分解，心脏收入特制的器皿中，送回母国，而骸骨则会与皮肉分离，运送到适合其尊位的教堂埋葬。由于突尼斯并没有基督教堂，除了心脏和骸骨以外的遗体只得就地火化。这种特殊的遗体处理方法，是一般采取土葬的基督教社会在处理远征中牺牲的基督徒的常用惯例。此时查理也只好采用此法，将兄长的遗体火化。

正在这时，传来了敌军从突尼斯方向袭来的消息。查理急忙命令兵士们拿起武器迎击敌人。

尽管处于种种不利条件下，十字军还是赢得了与突尼斯军队战斗的胜利。不得不说，比路易年轻12岁的安茹伯爵、西西里国王查理，拥有比兄长更强的军事指挥才能。

眼看手下军队败北，突尼斯的埃米尔早早地提议求和。他提出的议和条件只有一个——十字军退出突尼斯，而自己向查理支付用于撤军的赔款。

查理和十字军的全体领导人简单磋商之后，便同意了突尼斯提出的请求。最终，十字军在11月20日撤出了突尼斯，埃米尔也在三个月后应

约支付了赔款。然而，无论是突尼斯城，还是城内“浴场”里的基督徒奴隶，都没能等到十字军兵临城下的一天。大张旗鼓出征的第八次十字军，仅仅从异教徒手里拿到赎金便扬长而去，恐怕是上帝和耶稣基督都无法容忍的吧。

然而此次十字军冬季的撤军出海，却导致了撤退途中的大混乱。按照常识，地中海的商船和渔船都尽力避免冬季出海，来自西欧的贵族和骑士们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

就在大军即将抵达西西里岛附近的特拉帕尼港时，冬季的暴风雪向舰队袭来。就在港口迎接的部众眼前，18艘舰船被呼啸的海浪吞噬。船上的4000名兵士和马匹、武器一起葬身海底。

特拉帕尼全城的居民立即动员起来，渔船倾巢出动，争分夺秒地营救还未沉没的舰船，并搭救从沉没的船只落水的官兵。救援作业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所幸的是，查理本人，路易死后继承法国王位的腓力，纳瓦拉的国王和英国的王子，以及路易和腓力的王后，路易的女儿纳瓦拉王后，都最终得救。

十字军回到西西里岛以后，从突尼斯感染疫病的死亡者继续增加。到12月4日，从海上救回来的纳瓦拉国王夫妇双双病故。

查理和即将登上法国王位的腓力为纳瓦拉国王夫妇和路易、特里斯坦的遗骨一起举行了葬礼。葬礼安排在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附近的蒙雷亚尔大教堂。四位王侯的心脏则由专人携带回本国国内。

葬礼举行之后，各国的贵族纷纷出发，踏上前往本国的旅程。由于寒冬海路不畅，全体成员都选择从陆路返国。启程之前，全体贵族来到巴勒莫的大教堂聚会，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相约以四年后的1274年7

月22日为期，参加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为目标。

以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强烈愿望促成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从1270年7月1日于法国出兵，到7月25日路易病逝，只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短暂时光。

至于这次十字军有多少人参加，其中又有多少人回到了故土，并没有任何数字可以参考。

相比第七次十字军时代法国国王路易被俘的特大新闻，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并没有留下任何有意义的“新闻”。以至于在伊斯兰史料中，完全没有此次东征的记载。

然而，在基督教信徒中间，不仅胜利者受到传颂，失败而殉教者更受到人们的尊敬。罗马教廷于路易死后27年的1297年将其封为全基督教会榜样的“圣人”。在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史上，获封为圣人的世俗统治者，只有路易九世一人而已。这位教会眼中的虔诚信徒，两度发动十字军东征，两度以失败而告终，却在历史上遗留下了“圣路易”的美名。

在罗马为数众多的教堂中间，有一座比其他的更受游人青睐。除了因为这座教堂藏有三幅卡拉瓦乔的画作，还因为它对圣路易的崇拜。

在教堂入口的左侧，耸立着身着十字军甲胄的路易的全身像。往来于此的游客毫不关心这里是否崇拜上帝的场所，常常只是专心欣赏卡拉瓦乔惟妙惟肖的作品。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了路易潇洒的雕像。

以上帝的期望为名而出征的历次十字军中，圣路易所率的第八次是最后的一次。而这最后一次十字军唯一的遗产，就是这位获封圣人的法兰西国王了。

当最后一次十字军的时代渐行渐远，巴勒斯坦地区基督徒最后的日

子就越来越近了。

海港城市阿克

如今位于以色列境内的海港城市阿克，在200年的十字军历史后半部分的100年间，都作为巴勒斯坦地区十字军事实上的首都而繁荣着。1187年萨拉丁曾夺取了阿克城，1191年狮心王理查所率的第三次十字军将其夺回。此后直到重新被穆斯林夺占，还有大约100年的光景。

虽然在1229—1244年的15年间，基督教世界夺回了耶路撒冷，阿克仍然发挥着整个中近东十字军国家首都的功能。

历代罗马教皇都不承认皇帝腓特烈二世与阿尔·卡米尔之间缔结的和约——这次和议为基督教世界兵不血刃取得了耶路撒冷，却得不到教会的许可。即便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为基督徒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国王和牧首也不会回到城内。

统率全体近东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国王和宗教领袖耶路撒冷牧首，都一直滞留于阿克。虽然此间来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络绎不绝，国王和牧首都从未踏入圣城半步。

由此，阿克逐渐发展为一大海港城市。这里不只有王宫和牧首的宅邸，还有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建立的居留区。

这些居留区，成为来自西欧商品的集散地和阿拉伯人频繁出入的贸易中心。来自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只，在阿克往来穿梭，使这座港口成为一大自由港。

无论是执行首都的职能，还是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安全保障都是十分必要的。足够的安全保障，也使阿克处于比巴勒斯坦其他地区更为优越的位置。

中近东基督教势力的常备军事力量即三大宗教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都将总部置于阿克。其中的圣殿骑士团，还由于腓特烈和阿尔·卡米尔的和约而失去了其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不得不将在阿克建立的临时总部变为其永久的总部。

医院骑士团，顾名思义，是以为治疗前往圣地的朝圣者为目的而创立的。因此，这一骑士团的总部常以医院为主体。条顿骑士团则是一群德意志出身的骑士集团，为保证朝圣者安全而建立的。此两大宗教骑士团的总部，并非由高大的城堡改建而成。

阿克的圣殿骑士团总部，位于包围着阿克全城的城墙一角。在阿克城内，只有圣殿骑士团的总部，是完全为了抵抗伊斯兰势力进攻而修建的中世纪西欧式城堡。

圣殿骑士团之所以存在，与其他宗教骑士团一样，都是为朝圣者安全提供军事力量的支持。位于阿克的圣殿骑士团总部，是一座威严的城堡，建筑在两面靠海的高崖之上。

条顿骑士团总部
医院骑士团总部
医院骑士团居住区
威尼斯人居住区
比萨人居住区
热那亚人居住区
圣殿骑士团总部
圣殿骑士团居住区

阿克的市中心

由于阿克城集中了中近东各大基督教势力的总部，其指挥并未实现一体化。而且，由于耶路撒冷国王兼任塞浦路斯岛的国王，很多时候都在岛上居住，不在阿克城内。

而耶路撒冷牧首也由于其实质上的流亡身份，没有多少控制阿克的实权。

往来交易的意大利各个滨海城邦，由于相互之间强烈的敌对意识，也形成了不利于城市一体化的紧张关系。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居留区各自独立，各国公民在其中享有治外法权。

此外，各个宗教骑士团在其居住的区域内也享有治外法权。

条顿骑士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属下，而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则直属于罗马教皇。无论是耶路撒冷国王还是牧首，都没有对骑士团下命令的权力。至于骑士团所唯一仰仗的罗马教皇，则因为罗马与中近东遥远的路途而鞭长莫及。发给罗马的请示，要经过半年才能以教皇敕令的形式返回阿克。长此以往，骑士团往往倾向于独自行动了。

出于以上原因，整个十字军历史后半段的首都阿克，成为了诸多势力相互摩擦，混合存在的首都。在这里，虽然无从谈起任何的权力规则，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繁荣。

阿克的内城由两重墙壁所包围，建筑物大都为石料砌成，与西欧式的都市别无二致。此外，由于中近东地区气候炎热，阿克的建筑大量使用拱门等开放式结构。

阿克城内也有很多阿拉伯式的建筑物，屋顶并非常见的三角形，而以平顶为主。这是因为，在少雨无雪的中东地区，并没有建筑三角形屋顶的必要。同样，城市内处处可见的市场类建筑，屋顶大都是由毛毡覆盖而成。这种屋顶也不是为了防雨，而是为交易商品的人群遮蔽强烈的

阳光。

在城内的市场中，各种肤色、不同衣着的人们接踵摩肩，川流不息。

身着白底红十字披风的圣殿骑士，和戴着白头巾的阿拉伯穆斯林，在市场上各自忙碌着。

胸前绣着白十字的医院骑士团骑士和出售绒毯的波斯商人忙着用阿拉伯语讨价还价。

身着白底黑十字披风的条顿骑士们，操着带有德意志口音的法语，跟讲带着本地口音法语的犹太商人进行交易。

各国封建诸侯的夫人，也在侍女的陪同之下来往于街市之中。从第一次十字军时代起，十字军诸侯多与中近东当地的基督徒亚美尼亚女子通婚，侍女们也多为基督徒，很少有穆斯林。

踏入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居民区，身着长装，头戴贝雷帽的意大利商人，跟戴着头巾，穿长袍的穆斯林商人三五成群地交流着。这些商人常常会探讨的议题，是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开设意大利商人的商馆，互通有无。

靠港的船只登陆后，下船的朝圣者兴高采烈地列队入城。码头的突厥人搬运工将货物运输到仓库之中。炎热天气之下，搬运工的列队面无表情，与朝圣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上几段的描述，构成了13世纪后半期阿克城的自然风景。

皮肤也好，发色也好，宗教信仰也罢，身着的服装也罢，各人的语言也罢，展现的种种色色的区分，浑然一体而共存的场面，令阿克城的日常别开生面。

此时的阿克城，无论谁都在互利的状态下生活着，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倘若不久后阿克能免于受到侵略，恐怕就没有人会受到损失了。

然而，就像20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所说的那样：

> 现实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就是把对手当作跟自己一样，基于现实考虑而愚蠢地诉诸行动的人。

阿克城的命运，并非系于阿尤布王朝苏丹，而是系于马木路克王朝苏丹之手。

“为了地中海，基督徒将战斗到最后一人”

阿尤布王朝创始人萨拉丁所宣扬的“武力吉哈德”，在他任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将以十字军圣战思想袭来的西欧天主教军队击败，不仅发扬了伊斯兰教的武力吉哈德精神，还将此前一直陷于分裂的伊斯兰世界成功团结起来，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

对这位常与宗教权威保持距离的穆斯林英雄来说，武力吉哈德的目的是夺回耶路撒冷，至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沿海十字军控制下的海港城市，则不是武力吉哈德的对象。

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之间的和议，确认了十字军国家对这些海港城市的主权。此外，两人还协议保证了从欧洲来的朝圣者和商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自由。

萨拉丁的侄子阿尔·卡米尔和皇帝腓特烈之间的和平协议，再次确认了朝圣者和商人的自由与安全。

以上的协议表明了萨拉丁、阿拉迪尔和阿尔·卡米尔这两代三任阿尤布王朝苏丹对中近东基督徒的态度。阿克城的繁荣，正得自阿尤布王朝对整个十字军控制的近东沿海城市的共生态度——阿克显然是受益最大的城市。

时过境迁，同是宣扬“武力吉哈德”的苏丹，马木路克王朝领导人心目中的“武力吉哈德”则完全不同。最终，他们以“扫除中近东全部基督教势力”诠释了“武力吉哈德”。无论是朝圣者还是商人，全部清除——尽管事实上朝圣者和商人会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商业利益。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阿尤布王朝的历代苏丹，从萨拉丁到阿尔·卡米尔，不仅具有优秀政治家的素养，也是接受了极好教育的最有教养的阶层。优良的教养，使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相反的是，马木路克王朝的历任苏丹，无论是初代的拜巴尔斯还是第二代的卡拉温，都是奴隶出身，被贩卖为军人，经过军事训练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都十分擅长作战，却由于自己的奴隶出身，得不到充分的教育。许多马木路克苏丹甚至无法使用伊斯兰世界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进行书写。毕竟，马木路克这一词汇的本义，就是“出身奴隶的兵士”。

出身奴隶的苏丹，迫切需要现存的宗教权威作为自身统治的后盾。拜巴尔斯从被蒙古人毁弃的巴格达请来了阿拔斯王朝的继承人，让哈里发制度在开罗复活。这一举措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死后，阿尤布王朝的政教分离举措截然不同。

十字军东征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有类于天主教世界的罗马教皇。哈里发制度，即哈里发与周围为数众多的伊玛目——伊斯兰教学者和神职人员所组成的制度安排。当哈里发常驻开罗之后，开罗也就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罗马。

马基雅维利曾经在著作中希望教皇离开罗马，搬到瑞士去，而圭恰尔迪尼也在死前的三项政治主张中提出，把教皇和神职人员彻底排除于政治之外。

马木路克王朝的创始人拜巴尔斯，虽然在自己的首都开罗复活了哈里发制度，却也同时要求哈里发不得参与苏丹的行政和军事管理事务。但是，作为宗教领袖，哈里发不可能不对政治、军事施加影响。与阿尤布王朝不同，马木路克王朝“武力吉哈德”思想的极端化，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领导人的奴隶出身导致的结果，但也包括居住在苏丹近邻的哈里发和诸位伊玛目导师学者们的影响。他们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丹政

令的走向。

以宗教为追求的人，往往无视世俗利益，只为了纯粹的宗教信仰而生活。对虔诚的穆斯林宗教人士来说，无论是基督教朝圣者带来的金钱，还是与意大利商人贸易获得的收益，都有害于伊斯兰教的纯粹。

就这样，当马木路克王朝苏丹的权力稳固之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扫除中近东全部基督教势力”。这是伊斯兰世界第二次“武力吉哈德”的目的。而对基督教世界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尽一切努力阻止马木路克苏丹的目的实现。

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所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在埃及全军覆没。在两年内分期支付巨额赎金之后，路易本人和部分十字军将士获释回国。此次十字军与前六次十字军相比，对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起到了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

作为欧洲一大强国的法国，其国王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遭到了惨败，这令尚处于内部纷争中的伊斯兰世界领主们个个高奏凯歌，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士气也达到了十字军东征以来的最低谷。

从此以后，西欧十字军再也无法向中近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远征了。

此外，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还为伊斯兰世界送去了一项赠品。那就是加速了衰落的阿尤布王朝向奴隶出身的强有力的马木路克苏丹的权力交接。马木路克军队击溃第七次十字军的功绩，为其通往权力顶峰铺平了道路。

在1260年前后走上政治舞台的拜巴尔斯，并未在其苏丹任内集中力量扫除中近东的基督教势力。这显然是迫于来自东方的蒙古军队的压力。

1258年，整个伊斯兰世界东半部分的首都巴格达陷落了。

1260年，阿勒颇、大马士革这两座历史名城为蒙古铁蹄所攻破。此时，伊斯兰世界西半部分的大门，已向蒙古军队敞开。

就在当年，拜巴尔斯率领的马木路克军队，在阿音扎鲁特一战成名，击退了蒙古大军，保住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为自己成为苏丹的正当性奠定了基础。

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让拜巴尔斯长出了一口气，也使战斗着的每一名穆斯林斗志昂扬。毕竟，在阿音扎鲁特平原的后方，就只剩下埃及这一块必须保住的土地了。

然而，蒙古军队虽已撤退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他们的威胁却并未消失。此后20多年间，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常忙于防御来自东方的袭击。

回想萨拉丁1187年夺回耶路撒冷之后，也曾经悉数破坏其周边十字军建立的城堡。由于穆斯林并不使用这些城堡作为防御设施，萨拉丁将其攻占之后，悉数拆毁。

而拜巴尔斯的战术则是攻占十字军城堡后特意修复之。例如他下令收复了以“城堡之王”而著称的“骑士之城”，并对其加以部分改造。

十字军的城堡大都坐东向西而建。在阿尤布王朝时代，东方还没有蒙古人的踪影，而马木路克王朝时期特意保留十字军城堡，就是为了应对来自东方蒙古人的威胁。此前一直不善利用城堡的穆斯林军队，从此也逐渐学会了以此为据点作战。

自从马木路克军队需要利用城堡之后，他们便开始不惜代价地强行攻占十字军修建的城堡了。马木路克向驻守城堡的宗教骑士团骑士们提出“光荣撤退”的请求，即在包围城堡之后，要求城内骑士解除武装，并

以优厚的条件礼送而去。城堡内的骑士在断粮断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大都选择了放弃城堡，“光荣撤退”。

当这一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之后，中近东基督教势力最外层的防守链被大大缩短。

正当巴勒斯坦方面基督教势力的生存空间逐渐式微之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70年发动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虽然这次十字军的登陆地点远在北非中部的突尼斯，虽然大军登陆之后不久路易就在军中病亡，这次十字军东征对中近东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又一次冲突。在此之前，双方都天真地确信，西欧国家再不会派兵来到这个冲突地区了。

拜巴尔斯于1277年逝世。在此以后，其儿子和继承人能力明显不足，执政不到两年便被卡拉温取而代之。这位马木路克王朝的第二代苏丹，是拜巴尔斯手下的得力干将。作为一位马木路克，卡拉温继承了拜巴尔斯的全部政策路线。

从1270年到1290年的20年间，拜巴尔斯和卡拉温全力以赴，使整个中近东世界的主导权完全控制在以开罗为统治中心的马木路克手中。虽说二人只是奴隶出身，他们对当地基督教势力的蚕食颇为巧妙。

中近东的十字军国家中，除了以阿克为首都的耶路撒冷王国之外，还有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分别与三方签署了单独的停战协议。

这些停战协议，都是基督教国家主动签署的——他们的领导人对取代阿尤布王朝的马木路克心存恐惧。

这些领导人希望地中海东岸在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获得一时的和平。然而，在停战协议签署之后，自己领地边界上的城堡，还是一个个为马

木路克所蚕食。

最终，这些停战协议都没能够在议定期之内得到遵守。而在能够得到遵守的日子，基督教国家得以喘息，也只不过是因为马木路克王朝需要处理其南方邻国努比亚发生的动乱。

在此状况之下，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爵领地相继消失了。随着休战期间的领土丧失，越来越多的“法兰克人”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代占领的土地退出，到塞浦路斯定居。

塞浦路斯是海上的岛屿。由于马木路克王朝的海军战斗力较弱，移居的基督徒基本上免受威胁。

人之所以为人，信义是一条不变的准则。换句话说，做人必须遵守约定和承诺。遇到公然撕毁协议的对手，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法应对了。

在中近东沿海城市居住200年的西欧人，选择离开这片土地，只是因为马木路克王朝并不遵守任何相关协定。作为一国之君，做出这样的决定，只会让民众陷入绝望。

即位之前作为太子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曾经想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历史研究者常称其为第九次十字军，但对此并没有合适的官方称呼。爱德华在东方与马木路克达成了10年的停战协议，得意洋洋地归国——不如法国强大的英格兰，却赢得了强大对手马木路克的尊重。

从不严格遵守停战协议的马木路克苏丹，对同时以塞浦路斯国王为名的耶路撒冷国王也实施了骗局。这位国王对马木路克遵守10年停战协议的承诺信以为真，安心回到塞浦路斯休养。

没过多久，马木路克王朝就开始筹划对阿克的进攻。

1290年，十字军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停战还未结束，苏丹卡拉温便着手进行“吉哈德”的准备工作。当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马木路克王朝需要的只是破坏停战协议的借口。

锁定目标

当年11月，卡拉温去世了。自以为从此安然无恙的十字军国家，突然遭遇不测。

苏丹在临死之前，召唤儿子卡利勒，令其在全体马木路克部下面前发誓“武力吉哈德”之后，才断气而去。这样一来，卡利勒必须实施扫除基督徒为目标的战争，才能巩固自己作为新苏丹的地位。

而发兵的导火索，早在当年8月便出现了。

由于阿克是朝圣基督徒安全登陆的唯一地点，欧洲朝圣者一直在阿克集中。这些朝圣者并不携带武器，心中所想的只有和平的朝圣。

看到国际化的阿克城内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人从事贸易的场景，西欧来的朝圣者感到义愤填膺。他们无法想象，这里的基督徒怎能与生来不共戴天的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犹太人进行贸易，于是纷纷指责当地人是基督教世界的叛徒，堕落到要下地狱的程度。

这种宗教狂热的发展，使部分朝圣者对市场内的穆斯林拳脚相加。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可以通过着装轻易地辨认，于是他们就成为朝圣者袭击的对象。

随着更多朝圣者的加入，这场恶斗的规模不断扩大。阿克当地的基督徒也卷入了双方的斗争，最终导致朝圣活动的中止。大批新的朝圣者在阿克登陆后遭到扣押，当地基督徒和朝圣者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场暴乱的结果，是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商人和来自周边贩卖农产品的突厥农民的伤亡。

到了8月底，伤亡穆斯林家属组成的队伍来到开罗，向苏丹出示家人血染的服装，要求向基督徒复仇。

此事不能不说是一起偶发事件。但一场简单的偶发事件，却给准备着政治军事干预的人以诉诸行动的理由。

十字军国家一方，注意到此威胁的人，是圣殿骑士团的团长纪尧姆·德·博热。

这位团长，在弥漫着以与伊斯兰世界战斗到底，拒绝和穆斯林共存，完全不愿学习阿拉伯语气氛的圣殿骑士团中，是个与众不同的另类人物。

博热出身法国的大贵族，其家族与路易九世有亲戚关系。他曾随路易九世参加1270年的第八次十字军，进攻突尼斯。

在这次命运多舛惨淡经营的十字军中，20岁的博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第二年他便舍弃了法国优渥而安定的贵族生活，加入了圣殿骑士团。

1273年，23岁的博热获选为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他之所以能够以新人的身份就任，恐怕跟教皇看中他法国王室的亲属身份有关。

此后两年内，博热一直作为教皇召集的公会议的助手在罗马工作，直到1275年才前往中近东的“圣地”。这位25岁的年轻人，从此以圣殿骑士团团长的身份，跻身“圣地”基督教社会的最高层领导之列。

这位新的首脑一反圣殿骑士团的传统，与叙利亚的穆斯林领主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时常与埃及马木路克苏丹的近臣来往。他早早地学习了阿拉伯语，在骑士团内部赢得了一批团员的效仿和支持。

早在1288年，这位年轻的团长便已提醒中近东的其他基督教领导

人，卡拉温已经决意要进行“吉哈德”，十字军一方有必要做好准备迎战。然而此时其他领导人认为既然已经跟马木路克缔结了休战协定，就可以高枕无忧。

1290年8月的事件发生以后，圣殿骑士团团长最初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与苏丹紧急通信之后，阿克派遣外交使团前往开罗斡旋。卡拉温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交出杀害阿拉伯商人和突厥农民的凶手，并支付高额赔偿款。

尽管阿克政权的领导人确知暴乱的朝圣者袭击穆斯林一事，想在事后找出凶手，却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人自首，更没有人告发。至于支付赎金的事情，则受到了上至耶路撒冷牧首，下至地方实力派的抵制。

只有纪尧姆·德·博热本人一直坚持，不仅要支付赔偿款，还应当找出凶手，引渡给苏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将阿克的大牢内因杀人或伤害罪关押的罪犯引渡到开罗。

然而阿克的军政首脑并未同意博热的请求。在高层为此争论不休之际，收拾事态的时机悄然过去。1290年年底出使开罗的阿克使节，连见到新任苏丹卡利勒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丢进了开罗的监狱。跟一直保障使节安全的阿尤布王朝相去甚远，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不仅不遵守和平协议，还根本不愿保证外交使节的人身安全。

虽说如此，新取得苏丹大位的28岁年轻人卡利勒，跟彼此相识的圣殿骑士团团长之间，有着相互敬重的态度。卡利勒致信博热，开篇如此写道：

> 苏丹中的苏丹，君主中的君主，马利克·阿什拉夫，威严的信仰者，鞭笞无信仰之徒的权威，法兰克人、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征服者，中近东所有城堡的主人，地中海与红海的支配者，两大圣地（可能指麦加和耶路撒冷）的守护者，卡利勒·萨利赫，

致阁下圣洁的圣殿骑士团的团长。对寡人而言，阁下一言九鼎，故寡人亦将真意悉数吐露。

近日，在寡人和阁下共同守护的土地上所发生之错误，望阁下努力纠正。

望阁下悉知，此前所派遣的来自阿克之使节，无论其所携之书信，或所备之礼品，皆无益于事态之解决。以后任何使节斡旋此事，寡人恒将拒绝。

卡利勒的来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夺取阿克而寻找借口。这位苏丹的理由，自然是为惨死于阿克的穆斯林商人和农民复仇。然而若要说到“错误”，卡利勒所期待的，恐怕是对第一次十字军以来200年间十字军在中近东“错误”的总清算。

1290年与1291年之间的冬季，卡利勒命令哈马城的埃米尔大量砍伐叙利亚的森林，以提供制造100台投石机所需的木材。完成后的投石机首先集中运到巴尔贝克，然后沿贝卡高原而下，运送到大马士革。哈马的埃米尔最终负责将投石机运到阿克城下——这位从阿尤布王朝时代一直管理哈马的埃米尔，在马木路克苏丹的治下继续听命于开罗。

从贝卡高原到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到阿克的路线，需要经过沙漠，渡过河流，还要翻山越岭。运输100台投石机，是必须依靠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哈马埃米尔身先士卒，做了有效的动员，才最终解决了人员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卡利勒命令各地的埃米尔和地方领主，以“武力吉哈德”的名义大量征兵。苏丹亲自以针对基督徒的“武力吉哈德”来号召出兵，使附近各地的穆斯林感到责无旁贷。对于一场“武力吉哈德”来说，战死就意味着成为光荣的殉教者。

在十字军历史上的最后一年，1291年3月3日，穆斯林军队的先锋到

达了阿克城下。这支先遣队，由刚刚在努比亚执行了军事任务的阿夫拉姆负责指挥。

20天后，由哈马埃米尔负责押运的100台投石机到达了阿克城下。又过了19天，以扫除整个中近东基督教势力为己任的大军也到达了。

哈马埃米尔本人所率领的来自叙利亚北部的军队，在投石机到达后三天的3月26日抵达阿克城下。

次日，马木路克将领、大马士革的总督所率的叙利亚南部军队抵达了阿克。而苏丹本人所率的大军则已在3月6日启程。

苏丹大军出发前一周，以哈里发为首的高级神职人员，与苏丹和大军一起在开罗大清真寺举行了盛大的誓师仪式。伴随着《古兰经》的吟诵，人们为阿克之战的胜利而祈愿。卡利勒也在仪式后的游行中，为开罗的贫民布施钱财——在伊斯兰世界中，“吉哈德”常常伴随着对贫民的救济活动。

苏丹本人于出发一个月后的4月5日抵达阿克城下。此时，参加“吉哈德”的整支大军已经全部抵达，军队部署也毫无障碍地展开。苏丹接受先期抵达的阿夫拉姆的建议，将主阵地设在阿克城的东面南侧。在主阵地的北侧，配置着来自大马士革和哈马的军阵。卡利勒安排停当，认为事不宜迟，决定于4月6日清晨发起总攻。

阿克攻城战

据史料记载，在“吉哈德”旗下集结的穆斯林军队总战斗力为16万步兵和6万骑兵。如果这一记载为真实情况，则实际上大多数步兵都是征集到前线的农民，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武器。他们使用的战术，主要是在城墙外面挖掘地道。苏丹征发大量民夫的目的，是通过全面包围和修筑地道，给城内居民制造巨大的心理压力。

至于骑兵的人数，也达不到记载的6万之多。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东半部分苦于蒙古人入侵的时期，善于骑马射箭的波斯轻骑兵怎么可能来到阿克城下呢？

因此，步兵骑兵合计22万的总数，包括了大量的民夫和随从。这样一支大军，是为了进攻阿克一座城市而组织起来的。

虽说拥有一支大军，苏丹卡利勒却并没有派出任何的舰船辅助进攻。这是由于意大利各滨海城市国家完全控制了制海权。埃及人非常清楚，自己无论出动再多海军也无济于事。

抵御苏丹大军的，是阿克城内的4万居民。全城居民当中，包括1.4万名步兵、700名骑兵和1300名跟随骑士作战的侍从。作战人员总共加起来不到1.6万人。

更为复杂的是，这1.6万守军，根本无法做到一人令下，全军进入战斗状态。

首先，在阿克城内的1.4万名步兵当中，除了基督徒之外，还有突厥人雇佣军和意大利人。此外，手持武器参战的朝圣者也不在少数。

步兵当中的意大利人，主要是来自当地比萨和威尼斯人居住区的居民。他们都积极参加阿克的防御。对这些意大利人来说，无论是作为商人、水手还是居民，在战斗开始时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剽悍的海军战士。

唯有热那亚人不参加此次阿克之战的防御，因为热那亚早已与马木路克之间缔结了和平协议。但也有个别热那亚人选择留在阿克，决心与苏丹的大军战斗到底。

接下来是守城的主要战斗力，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战斗力量——骑兵。

在700名骑兵当中，首先是第七次十字军时代完败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来的100名骑兵。为了赎罪，他在生前决定每年向圣地派出100名骑兵。

需要注意的是，路易九世派出的这100人，并非“骑士”而只是普通的骑兵。所谓骑兵指的是在马上发挥战斗力的战斗单位，而骑士则是一种以战斗为职业的身份象征，骑士即使不乘马也以战斗为天职。由于骑兵兵种自身特点的限制，法国来的100名骑兵在守城方面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

其余的600人则是在守城战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量。这600人无一例外是宗教骑士团的团员。在圣地成长起来的三大宗教骑士团，自然要与圣地共存亡。

圣殿骑士团由40岁的团长纪尧姆·德·博热率领。他的副手是同来自法国的皮埃尔·德·斯瓦雷。两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年代都在中近东度过。

对于参加阿克之战的圣殿骑士人数，没有记载留存。研究者将各地城堡内撤退回阿克的圣殿骑士人数加总之后，估计当时圣殿骑士组成了

约300人的“特种部队”。

同为“特种部队”的医院骑士团骑士们，则由其团长，与博热同年的若望·德·维利埃领导。虽然关于医院骑士团骑士的数量也没有任何记载，但一般认为应少于圣殿骑士的数量，不到300人。一直分别独自行动的两大宗教骑士团，在这最后一城一地的守卫中同仇敌忾，协同作战。

至于以德意志骑士为主的条顿骑士团，则面临其团长不在现场的局面。条顿骑士们因此接受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团长的指挥。他们以阿克城内皇帝腓特烈时期建造的总部为指挥所，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为号召，宣誓作战到底。条顿骑士团的人数远远不及前面两大骑士团。

除了上述三大骑士团之外，研究者还发现，有两个规模较小的骑士团，也在阿克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圣多玛骑士团，团员大都来自英格兰。

另一个则是圣拉撒路骑士团，团员由麻风病患者组成。西欧人一直把麻风病当作上帝的惩罚，因此麻风病患者常常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而在中近东，情况则不尽然。这种疾病被视为一种疑难病症，患者并非为上帝所遗弃的存在，都拥有行动的自由。读者请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国王，著名的鲍德温四世，就是一位麻风病患者。

圣拉撒路骑士团的团员，都是曾患有麻风病而后告痊愈的男子。这一骑士团的人数并无人知晓，只知道经过阿克一战，他们被尽数歼灭。

加上全部“特种部队”的1.4万名兵士，在苏丹的22万大军面前，可谓是不堪一击。

然而，阿克城并未陷入完全的包围之中。海港一侧还完全控制在十字军一方。从塞浦路斯方向来的源源不断的补给，为长期固守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

而且，苏丹的大军在城外野营，非常容易陷入缺粮缺水、卫生条件恶化的局面。军中已经开始流行疫病，不断有人病倒，照此事态发展下去，“吉哈德”的成功可能就无从谈起了。

卡利勒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立即命令投石机做好发射准备。投石机的主要作用并非杀死防守的兵士，而是以毁坏城墙为主要目的。如果能够破坏阿克的双层城墙，穆斯林民兵便可长驱直入。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阿克城一方是否认为可以长期守城。

对这一点，防御的一方并没有信心。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西欧来的天主教徒，穆斯林眼里的“法兰克人”，再也无法期待来自母国的援军了。

如果阿克城能够坚守一年以上，等到整个西欧动员起来，派出义勇军一般的援军，还多少有点儿希望。但是，以现在的局面，试图守城一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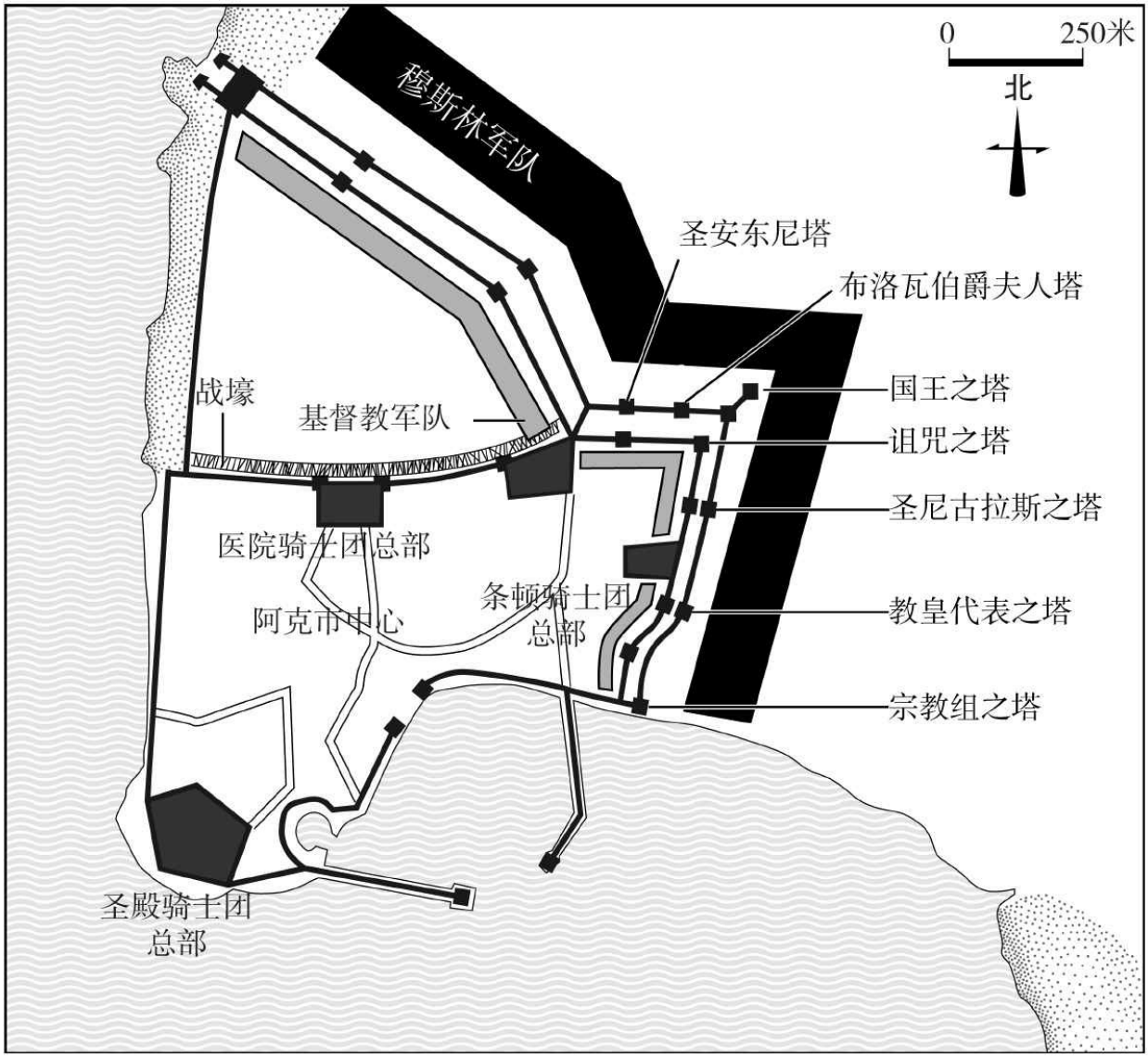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守城的基督徒军队对自己显然不会有什么信心。

而如果失去阿克，十字军东征200年间取得的全部成果就会尽数丧失。这给守城者带来的危机感和绝望可想而知。

对每一位负责守城的青年骑士和贵族来说，心中的荣誉感驱使他们作战到底。

虽然整个阿克城的守军没有一位总司令，他们名义上还是臣属于耶路撒冷国王。兼任塞浦路斯国王的亨利二世应为阿克城的防务负总责，但他本人还驻跸在塞浦路斯。亨利一面自称不久后前往阿克，一面派遣自己的弟弟阿毛里来到前线。这一年亨利20岁，而阿毛里只有19岁。

阿毛里信心满满地来到阿克，请缨负责南侧阵地的防御，这一面正对着苏丹卡利勒大军的主体。由于这位贵族年纪资历尚浅，整个防御的总负责还是由40岁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团长来担纲。



阿克城下两军布阵图

两大宗教骑士团的骑士不仅要负责其自身战线的防御，还要顾及阿毛里的防守区域。因此，沿阿克城墙两侧对峙的两支军队中，与穆斯林一方较弱的哈马和大马士革军队对阵的是基督教一方最强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而穆斯林一方最强的埃及马木路克军队，则与基督教一方较弱的阿毛里的军队对阵。阿毛里所率的步兵人数虽多，却以其混成的特点而缺乏战斗力。

1291年4月6日，阿克攻城战开始了。最初的5日中，穆斯林一方的

喊杀声混合着鼓声和喇叭声，却不见攻城取得任何进展。

随着4月11日投石机的到来，战况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哈马埃米尔监造的100台投石机中，只有67台能够投入战斗。其中15台为大型投石机，其余52台则是由数位兵士操作的小型投石机。此外，马木路克军队中还有5台大型弩机，弩机上放置有点燃的火箭，用来射杀城头的敌兵。

不止攻城方采用了机械化设备，守城方也有相应的设施。由于意大利各国握有制海权，他们在舰船上设置了投石机，以此向敌阵发起攻击。比萨的海军尤其善用这一战法。他们从北南两侧分别向哈马的军阵和埃及马木路克的军阵发起进攻。

但十字军海军的战法存在一个缺陷。安置在船上的投石机受到波涛影响欠缺准星，而风浪大时使用投石机还会破坏船只的平衡。4月13日，十字军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发生了。随着风暴袭来，许多载着投石机的船只倾覆了。比萨人不得已只好加入阿毛里的军队，从陆地上使用投石机袭击敌军。

穆斯林大军的67台投石机，日以继夜地轰击阿克城。这支“炮兵”采用一天四班轮替的制度，投下的石块不住地砸向阿克的城墙。

眼看着轰击的进展，4月15日深夜，阿克城内的守军派出了一支敢死队。这支队伍出城的目的，就是破坏敌军的投石机。

敢死队出城袭击的对象是哈马军队所在的战线，圣殿骑士团团长纪尧姆·德·博热亲自负责指挥。这支由300名骑士和50名侍从组成的敢死队，除了圣殿骑士外，还有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近臣奥托·格朗逊率领的圣多玛骑士团骑士和一部分圣拉撒路骑士团的骑士。

博热的策略，并非拆除敌军的投石机，而是投掷“希腊火”燃烧弹烧

毁投石机上的传动绳，使其陷于瘫痪。这一工作主要由步兵负责，而乘马的骑士则负责保护步兵免遭敌军的袭击。

博热把最重要的投掷任务托付给了一位长期负责城防的来自法国南部的贵族。

这位贵族虽然拥有丰富的守城战经历，却没有足够的野战经验。他率领的步兵还未来得及接近敌军的投石机，便不慎将“希腊火”掉落在附近的草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掉落草地的“希腊火”迅速燃烧起来，火势无法控制，照亮了整个夜空。

正在黑暗中突进的敢死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虽然博热当即命令全军撤回，慌乱中撤退的骑士们却遭到了敌阵外绊马索的阻拦。身着重装的骑士纷纷落马，此时敌军的士兵正呼喊着杀声赶来。

一边掩杀一边撤退的十字军敢死队，经此一战损失了18名骑士。第二天早上，哈马埃米尔向苏丹献上了这些骑士的头颅和所乘的战马。

两天后的18日深夜，敢死队再度出城作战。此次敢死队由医院骑士团团长若望·德·维利埃率领，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混合部队。这次的出击目的仍然是破坏投石机，但进攻方向改为南侧的埃及军队。

这次深夜出兵，是秘密决定的。参战的大多数骑士直到上马集合，才知道出击的目的和方向。

然而，十字军出其不意的进攻还是以破产而告终。当敢死队轻声打开阿克城的圣安东尼门时，眼前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马木路克大军。

骑士们连忙指挥关上城门。敌军射出的箭矢终究还是伤到了几匹战马。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月20日深夜，圣多玛骑士团团长格朗逊第三次组织了敢死队，队中还有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

敢死队出城再次遭遇了阵容齐整的敌军。原来，阿克城内有人向城下射出带着密信的箭，使马木路克提前知道了骑士们的行动。

4月15日到20日之间，除了以上三次规模达到300人的大规模出击之外，十字军还数次组织了大约100人规模的出击。这一系列出击都是由宗教骑士团的骑士组织的。除此以外，守军一直龟缩在城内。

三个星期的攻势过去，阿克城依然在十字军的控制下。

此时阿克的外城墙已经逐渐破坏不堪。而当马木路克军队试图从城墙的缺口攻入城内时，守军就会即刻杀到，将进城的敌兵赶出城外。

此时城内的守军是不分彼此的——哪里有缺口，哪里就有守军上去填补——无论是阿毛里的步兵，还是各个骑士团的骑士。

此时的骑士们也把自己的爱马贡献出来，共同使用。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乘马的骑士和侍从赶来厮杀。平时负责养马和后勤的侍从，也拿起刀剑和钢枪，与主人并肩作战。在守城之战中，随从和主人的身份变成了共同对敌的战友——两人同心同德，带着相同的信念与进入城内的敌兵作战到底。无论是骑士还是侍从，都团结在宗教骑士团的旗帜下。

攻城战开始一个月后的5月4日，耶路撒冷国王亨利二世终于率领着40艘舰船，载着1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从塞浦路斯登陆阿克。守军见到兵力补充自然大喜，20岁的国王亨利却眼望着阿克城难以支撑，即刻遣使苏丹，请求停战。

5月7日，国王的两位使臣来到了苏丹的营帐。卡利勒见到使节便问，是否带来了阿克城门的钥匙。使节回答并未带来城门钥匙之后，怒

不可遏的苏丹当即命令将二人斩首，最后在众人劝谏之下作罢。苏丹最终驱逐了使节，并对他们大吼，“寡人要将你们这些异教徒全部赶下地中海去！”

两位使节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到了阿克，他们传来的消息令整个城市陷入绝望。

阿克城中的3000居民，借此机会要求逃离。这些难民乘上运载军队的船只，直接前往塞浦路斯。

从这第一批难民开始，阿克的基督徒贵族陆陆续续离开了塞浦路斯。其实早在前一年秋天，十字军国家的贵族就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陆续送往塞浦路斯了。到穆斯林军队开始围困阿克的时候，城内已经没有了贵族妇女和儿童。因此这次离开的3000居民全都是男性。

然而，阿克的平民连同妇孺还都滞留在城内。如果说他们在战役开始前还能乘船离开的话，随着战况日趋激烈，就只能待在家里听天由命了。此时的阿克城中，除了战斗人员之外，只剩下既没有资财，又无处可逃，被俘之后也无法支付赎金获得自由的平民了。虽说耶路撒冷国王亨利也决定留下来参与防守，留给他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11天。

苏丹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十字军首脑们经过军事会议协商，决定放弃阵地中向敌营突出的两座防御塔“国王之塔”。其中的守备力量，将疏散到其他各个防御塔。

这只是全面放弃城外工事的第一步。苏丹的军队看准时机，从此对十字军的防御各个击破。

5月9日至16日的一周内，阿克城墙外的全部防御塔，都落入了攻城方之手。

从北向南，“布鲁瓦伯爵夫人之塔”“国王之塔”“圣尼古拉之塔”“教皇

代表之塔”“牧首之塔”，这些不仅在当地人心目中十分重要，也令来往的朝圣者印象深刻的防御塔，一座接着一座陷落了。而敌军全力猛攻的外城墙，也在投石机的轰击和掘进的地道内埋设的火药爆破之下成为了残垣断壁。

从这一带向内的“圣安东尼之塔”和“圣尼古拉之塔”间的区域，是整个城防的关键地带。各大宗教骑士团都以这一带为重点防御区域。此处是否会陷落，将决定阿克城的命运。

这一区域中，又以“诅咒之塔”为要冲。负责死守这一防御塔的，是医院骑士团的副团长马修·德·克莱尔蒙。他率领着来自各个骑士团的骑士英勇奋战，将敌军的攻势一次次击退。

然而，穆斯林军队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苏丹也丝毫没有延缓攻击的打算。毕竟，“吉哈德”的号召是一道猛药，时间拖久了就会失效。关于这一点，从萨拉丁到阿尔·卡米尔的阿尤布王朝苏丹，都深深明白。于是，穆斯林军队对这座久攻不克的防御塔，不厌其烦地持续攻击。不知不觉间，战役已经进行了42天。

5月17日深夜，苏丹卡利勒将属下全体埃米尔和总督集中在自己的营帐当中，命令次日发起全员总攻。苏丹命令，无论是否攻破城墙，全军都在当天内持续保持进攻。一旦攻破城墙，便从缺口处突入城内。5月18日是星期五，这一天，对穆斯林来说是适合决定大事的日子。

最后的一天

1291年5月18日，是历史上“阿克最后的一天”。在以“推罗的圣殿骑士”代称的无名骑士的记载中，详细叙述了这一天发生的故事。根据这位骑士的记载，后世的作家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十字军国家的喋血黄昏”（*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的著作。

> 黎明前，伴随着一阵响彻云霄的战鼓声，撒拉森人的大举进攻开始了。
>
> 走在最前面的敌兵，手持着巨大的盾牌。投掷“希腊火”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再往后，群集着放箭的弓兵和投枪兵。“诅咒之塔”的守军，在怒涛般的敌军攻势面前，不得不退回城内。这样一来，敌军就将从塔一侧的城门内鱼贯而入，侵入阿克城。

然而如果内城洞开，阿克全城就将失陷。因此，守城的全体骑士不得不集中兵力防守“诅咒之塔”。

驱马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持钢枪的医院骑士团副团长马修·德·克莱尔蒙。紧跟在他后面冲锋的，就是手拿砍刀的医院骑士团团长若望·德·维利埃。战斗的最前线，当然也少不了身先士卒的圣殿骑士团团长纪尧姆·德·博热。“推罗的圣殿骑士”接下来写道：

> 敌人不断投掷着大量的“希腊火”燃烧弹，使这一带陷入烟雾缭绕之中。骑士们完全看不清身边的战友。随着敌军弓箭手密集的箭镞射来，只见我方的战士一个个，战马一匹匹倒下去。
>
> 我仍然心有余悸地记得，一位从英格兰来的年轻侍从，被“希腊火”击中，瞬间全身的衣服燃烧起来。在敌军的猛烈攻势下，谁

也没法腾出手来搭救这位侍从。发出撕心裂肺惨叫的年轻人，被燃烧的松脂覆盖全身，活脱脱烧得不成人形。

看到这样的光景，就连进攻的撒拉森人也倒吸一口凉气，刹那间放下了武器。然而，暂停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再次大声叫喊着攻上来的敌军兵士，最终突破了“诅咒之塔”，杀入城内。

“诅咒之塔”处的激战过后，医院骑士团团长若望·德·维利埃身负重伤。许多骑士和侍从要么战死，要么重伤难治，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几位尚能撤退的医院骑士团骑士，将团长运出了战场。他们并不听从奄奄一息的团长的意见，直接把他送到了收容避难者的威尼斯船只上。此时的阿克码头，已经充斥着逃亡的人群。他们争先恐后逃上船去，整个港口混乱到极点。

最终，穆斯林军队避开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主力所驻守的区域，从“圣安东尼之塔”经“诅咒之塔”到“牧首之塔”的东侧城墙内大举侵入城内。

位于敌军入侵路线上的条顿骑士团总部，迎来了潮水一般涌来的敌军。在过去的40多天内，以皇帝腓特烈二世赠送的建筑物为总部的条顿骑士团骑士们，一直以必死的信念成功抵御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然而在此之前，负责这一带城防的塞浦路斯国王和其王弟，早已乘着港口内停泊的塞浦路斯船只逃离了阿克。国王属下的将领和十字军国家的多名政要，也跟随着一同离开。

得知内城墙已被攻破的消息，名义上的耶路撒冷牧首也逃离了阿克。牧首早已为安全前往塞浦路斯准备了自己专用的船只，并让许多逃到港口的平民及其全家老小乘上这艘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艘严重超载的船只出港之后不久便意外沉没。牧首也因此葬身海底。

圣殿骑士团团长纪尧姆·德·博热，也因身负重伤而无法移动。“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载道：

> 敌军掷来的一柄长枪，刺穿了团长的身体。正当团长扬起左臂的一瞬间，长枪刺了过来，而当天团长又没有带盾牌。由于敌兵如潮水一般涌来，团长左手中的剑一刻也没有放下，他的右手还拿着指挥杖。敌兵的投枪从胸甲下方穿进团长的身体，枪尖在他的背后突出，足有一只手的长度。
>
> 团长平时身穿的铠甲，不是一般的投枪或箭镞能够穿透的。但当今天他突然得知“诅咒之塔”失陷的消息时，就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副轻甲胄，连忙赶到了战场。

团长所受的伤如此之重，涌出的鲜血刹那间就将他的甲胄染红。他已经完全不能出声，只有喘气的工夫。

在博热身旁作战的医院骑士团副团长马修·德·克莱尔蒙召集周围的圣殿骑士，将奄奄一息的团长运到内城的建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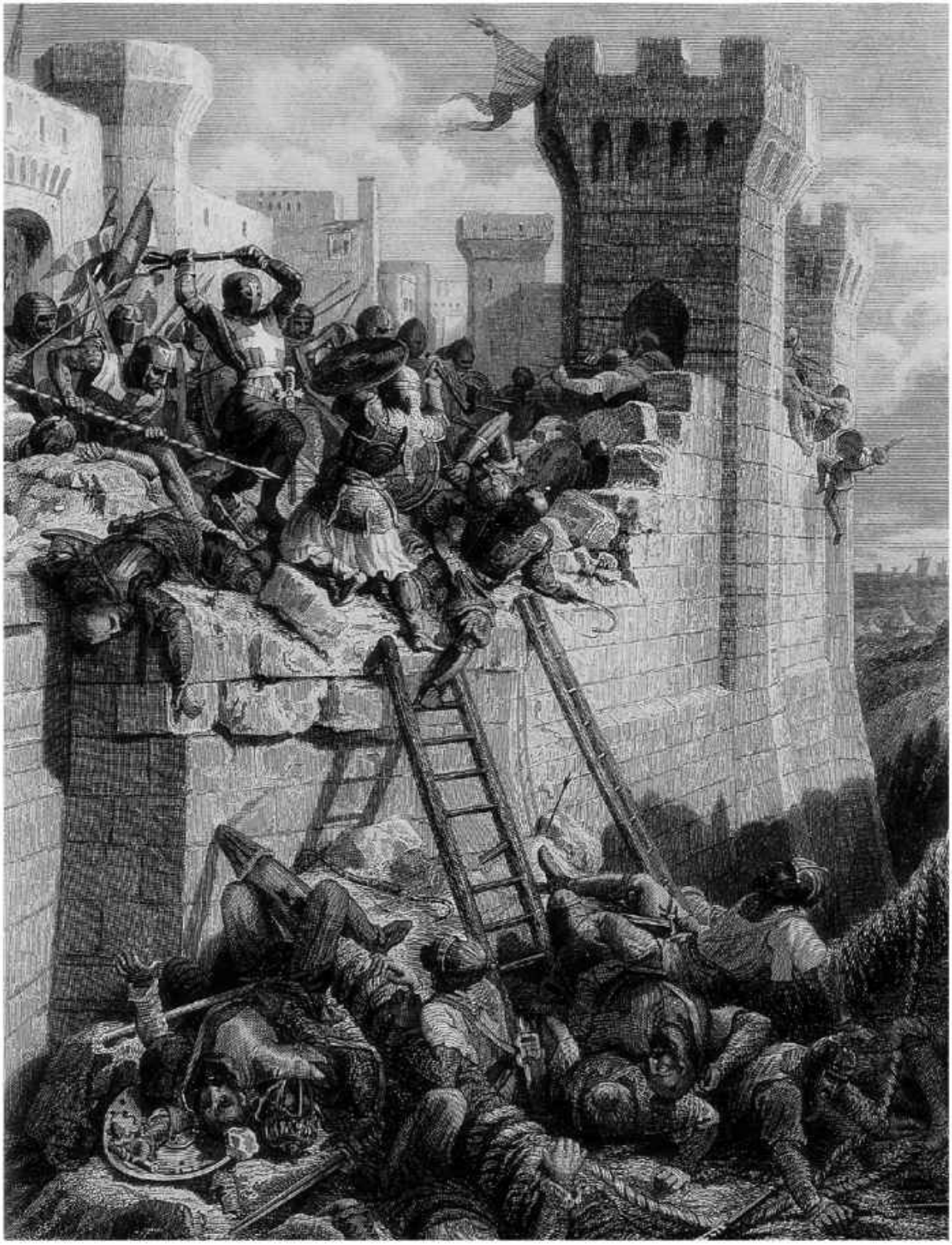
但博热的身体状况已经令人绝望了。最终，这位圣殿骑士团的团长，在医院骑士团副团长的注视之下，停止了呼吸，年仅40岁。

静默凝视着战友遗体的克莱尔蒙，当即要求医院骑士团全体骑士撤回总部。骑士们向着总部的方向，在敌军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以穆斯林为敌，自1118年起建立的两大宗教骑士团，在过去的173年间，直到阿克之战以前，还没有并肩作战过。

这两大骑士团一直在守卫圣地的大旗下作战，是十字军的常设军事力量。骑士的数量虽然不多，单位战斗能力却十分强悍，对抗意识也很强。

但以不属于西欧任何贵族体系的“浪人”组成的圣殿骑士团，与西欧各国国王和封建领主家系出身的医院骑士团两者相比，无论是骑士的日常生活方面，团队活动方面，还是战斗组织方面，都很不同。



阿克攻城战

此外，与全体来自法国的圣殿骑士不同，医院骑士团的团员来自欧洲各地。

在这场阿克之战中，十字军历史上的主角——两大宗教骑士团，各自进入了对方负责的防区，自始至终保持着共同作战。

圣殿骑士团的团长和医院骑士团的副团长，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

后者将重伤倒下奄奄一息的圣殿骑士团团长，运送到了敌军尚未接近的圣殿骑士团总部。

在医院骑士团副团长的怀中，圣殿骑士团的团长停止了呼吸。

也许是出于对战友之死的伤感，医院骑士团副团长放弃了守城，决定率部撤退。而他也担负着率领失去团长的圣殿骑士们逃出阿克，前往塞浦路斯的重任。于是，两大骑士团的成员当即撤回自己的总部，突破敌阵，斩杀而行。

正因为如此，骑士们的英姿，才得以在年轻的圣殿骑士的笔下传诸后世。

这样的经历，过去173年中未曾有过，只有阿克之战一次。

苏丹卡利勒所命令的总攻，在5月18日天黑之前取得了成果。

黄昏时的阿克城内，到处是手持战利品的马木路克兵士。在他们中间，雄赳赳往来穿梭着维持秩序的穆斯林骑兵队。

阿克城内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总部，都为取胜的穆斯林军队所控制。由于骑士们早已逃之夭夭，马木路克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这些建筑物。

事实上，除了两面临海，建于悬崖之上的圣殿骑士团总部以外，无

论是以医院为基础的医院骑士团总部，还是宏伟雄壮的条顿骑士团总部，都不是能够用来长期守卫的堡垒。

但骑士们奋战到最后，得知城池不保以后，都不得不进入自己骑士团的总部。

无论圣多玛骑士团的英国人、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人，还是医院骑士团的从法国以至全欧洲各地的人们，都是如此。

此外，来自比萨和热那亚的水手们，和几名圣殿骑士一起驻守在自己的总部。只有身患麻风病的圣拉撒路骑士团团员们，已经被穆斯林悉数歼灭。

身在穆斯林军队控制下的阿克，这些骑士们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天深夜，一位穆斯林到访了医院骑士团的总部。

他是哈马埃米尔手下的一位将领，在拜巴尔斯手下进攻医院骑士团所属的“骑士之城”时，身负重伤而被俘。在医院骑士团骑士们的悉心照料下，他得以痊愈，后来通过交换俘虏而获释。这位与阿尤布王朝有关系的穆斯林，前来医院骑士团总部，正是希望能报答当年的恩情。

从这位不速之客口中得知未曾预期的消息，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连忙召集各路骑士商量。最终，他们接受了穆斯林将军的建议，向苏丹寻求恩赦。

所谓恩赦，就是特赦的意思。骑士们将不会被解除武装，而可以自主撤离，正所谓“光荣撤退”。

医院骑士团寻求恩赦的决议，传达到了条顿骑士团的总部，后者亦对此表示同意。然而，骑士们无法将信息传达到远离阿克城中心的圣殿

骑士团总部。

苏丹卡利勒当即同意了属下提出的骑士“光荣撤退”建议。携阿克陷落之势，基督教残余势力控制的推罗和西顿皆收入年轻苏丹的囊中。他发动的“吉哈德”，完成了“将全体基督徒赶回地中海”的目标。

阿克陷落后两天，5月20日，得以“光荣撤退”的骑士们向苏丹投降。他们离开各自的总部，乘上港口内停泊的比萨和热那亚的船只，离开阿克，前往塞浦路斯。此时地中海的制海权，还完全控制在意大利人手里。出海以后，便不再有穆斯林军队跟踪追击了。

穆斯林控制的阿克城内，唯一掌握在十字军手中的要塞，只剩下圣殿骑士团的总部了。在这座坚固的城堡中，还有大约100名圣殿骑士，以及大批在内避难的平民。

圣殿骑士团总部就这样坚持了8天时间。8天时间内，双方并未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苏丹还是希望圣殿骑士们“光荣撤退”，并将恩赦的条件告知了圣殿骑士们。

然而，历史上一直以无与伦比的勇猛作战而著称的圣殿骑士们，并不善于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与马木路克保持良好关系的前任团长博热，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最终，代替战死的团长发号施令的副团长，断然拒绝了苏丹提出的改旗易帜，“光荣撤退”的建议。被激怒的卡利勒当即要求马木路克兵士，对城内副团长以下的全体骑士格杀勿论。

于是当总攻命令一下，冲入城堡的马木路克兵士便与圣殿骑士们厮杀开来，直到骑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最终，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留下了守卫圣地至最后一人的英名。

阿克及其周边

卡利勒征服阿克之后，便命令部下将整座城市彻底破坏。这座基督徒聚居的城市，从此不再有人居住，从城内的建筑到海港都毁坏殆尽。苏丹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再不让基督徒登陆”。

除了破坏阿克城，苏丹还派兵前往推罗和西顿。两座城市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克了，城内居民都逃往塞浦路斯。

第一次十字军开始“解放”圣地的十字军运动，以阿克之战的结束而告终。

从1099年的圣城耶路撒冷“解放”，到1291年阿克城的陷落，经过192年的斗争，穆斯林终于将基督教政权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全部扫除干净。

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以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流血的形式实现的，而阿克之战也经过了这样的流血牺牲。

虽然在这200年间，双方一度在这一地区共存，但到了最后的时刻，双方的共存被彻底破坏了。

一段漫长的战争史，如果没有连续的战役做基础，就没法组成连续的故事。无论是一次次共存的尝试，还是时而发生的破坏，都是组成这一故事的人们之间鲜活的经历。

第七章　十字军后遗症
（1258—1291年）

从罗得岛骑士团到马耳他骑士团

阿克之战幸存者所逃亡的塞浦路斯岛，由于基督徒在制海权方面的优势而十分安全，其地域也远较海港城市阿克更为广阔。来到此处的基督徒难民，自可以在此安宁地生活下去。

但与阿克不同，塞浦路斯国王是明确的统治者。塞浦路斯国王很难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骑士团共存，也很难真心接纳难民。

圣多玛骑士团首先启程返回英格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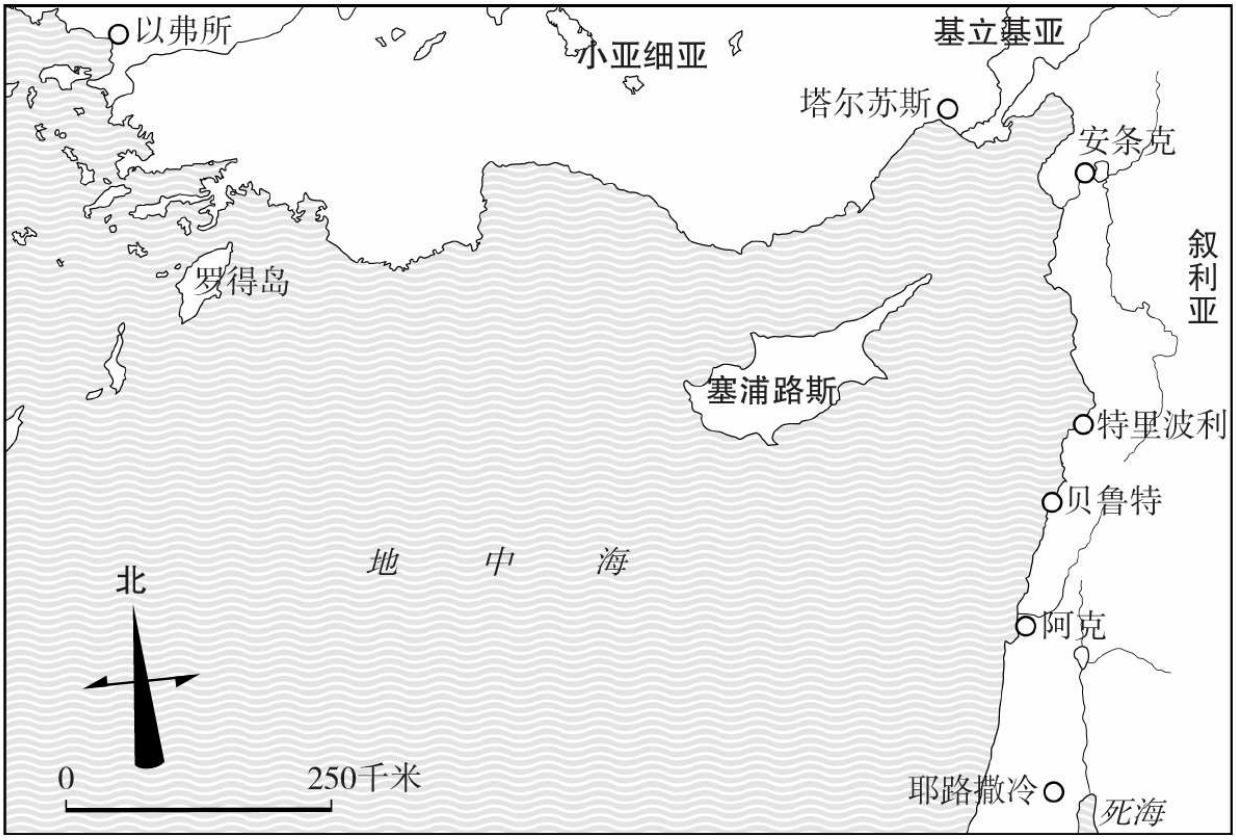
条顿骑士团也有了新的任务。他们回到德意志，从那里向北出发，为完成北方民族的基督教化而进发。

这两个骑士团由于历史短、规模小，在中近东十字军国家被完全扫除之后，自然要寻找新的存在理由。然而，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这两大机构，其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徒的“圣地”。

医院骑士团此时以冷静的洞察力，审时度势，表现出了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们并没有固执于收复圣地，而是选择了基督教国王治理的塞浦路斯岛和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的克里特岛之间的海中的一座小岛——罗得岛，作为未来的基地。

由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同时也是医生，以建设医疗机构为目的的

迁移，并未受到罗得岛主权所有者——拜占庭皇帝的反对。到1310年，医院骑士团把这座岛屿完全变成了自己的领地。从此，这一组织改名为“罗得岛骑士团”。



塞浦路斯岛及罗得岛

医院骑士团离开阿克以后20年，终于确保了新的居住地。他们的必要资金，则主要依靠从圣地撤出的威尼斯共和国势力的援助。

对于宗教骑士团来说，只保有居住地，而没有存在的理由，其组织也就不必存在了。在这个不再有朝圣者的时期，从事医疗活动便成为了罗得岛骑士团存在的理由。

站稳脚跟之后，罗得岛骑士团的骑士们不断袭击穆斯林的船只，变成了地中海东部的海盗，令来往航行的穆斯林商人感到如鲠在喉。这支以“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为正式全名的组织，曾经数次击退取代马木路克

王朝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军，最终在苏莱曼大帝所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猛烈的攻势面前，撤离罗得岛，前往马耳他岛——这是200年后的事了。

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医院骑士团”，先后以“罗得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的名称存在，一直站在与伊斯兰世界作战的最前线，从而保持着其自身存在的理由。

而与此同时，医院骑士团还在建设新的城堡。

他们在罗得岛上建立了新的“骑士之城”，在附近的科斯岛上和小亚细亚陆地最西端的博德鲁姆都建立了城堡。由于陆地上城堡的存在，骑士团控制了周边一带的地区。他们把岛屿变成了海上的要塞。

通过对制海权的控制，医院骑士团完成了转型，适应了从陆上迁移到海上活动。

相形之下，没有医疗的招牌，作为纯粹战斗集团而存在200年的圣殿骑士团，想适应时势的变化，就十分艰难了。

圣殿骑士团的结局

阿克城失陷之后，圣殿骑士团比任何人都执着于收复巴勒斯坦。他们以今天黎巴嫩托尔托萨附近的小岛为前哨基地，从塞浦路斯出发登陆，试图收复失地。结果，登陆的圣殿骑士被马木路克军队屠杀殆尽，攻势惨淡收场。

此事过后，圣殿骑士团与塞浦路斯国王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塞浦路斯国王最惧怕的，是马木路克大军夺取塞浦路斯。圣殿骑士团的尝试，为苏丹的进攻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于是，圣殿骑士团虽然还在塞浦路斯居住，却已经没有了恢复的基础。阿克战后15年的1306年，骑士团决定全体返回法国。由于团员全部是法国人，从塞浦路斯撤离是最合理的选择。

能够回到法国的，是以团长雅克·德·莫莱为首的老一代圣殿骑士。而属下的年轻人大都在此前的战斗中牺牲。

等待圣殿骑士的，是老谋深算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他罗织了圣殿骑士团的若干罪名，搜集证据宣判骑士们有罪。

一位罪犯的出现，使圣殿骑士的罪名浮出水面。

这位罪犯坐牢期间，结识了一位自称曾经是圣殿骑士的狱友，跟他说了下面的话：

> 圣殿骑士团的入团仪式，常秘密进行。参加入团仪式的骑士，必须在包括团长在内的骑士团主要成员面前亵渎神，对十字架吐唾沫，发誓绝对效忠领导人，乃至同意被迫接受男男性行为，才能被接纳入团。

法国国王收集了这段并非出自本人之口，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他人述说的证言，并从三位圣殿骑士团开除的前任团员口中收集了相同的证据，并基于此证言秘密定下了骑士团的罪状。

雅克·德·莫莱

1307年，法国国王下令将国内各地散居的圣殿骑士团全体成员，包

括圣殿骑士、随从和骑士团内的神职人员共计一万余人全部逮捕。稍后，除了圣殿骑士以外的成员获得了释放。

骑士团团长雅克·德·莫莱在1307年10月13日被捕，同时在巴黎被捕的还有138名骑士。

从地方到巴黎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持续了三周。而之所以圣殿骑士们没有逃跑，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向自恃强大，把什么威胁都不放在眼里。

然而从这一天起，面对他们的就是种种恐怖的酷刑拷问。

腓力四世的狡猾之处，是把整个的逮捕、拷问和审判过程都交给宗教裁判所。也就是说，整个的审判过程不是来自世俗君主的裁决，而是由同属宗教界的修士来完成。

1231年创立的宗教裁判所，并非为审判异教徒而设，而是为审判异端设立的。所谓异端，指的是对基督教信仰有错误认识的个人或组织。宗教裁判所设立的目的就是对他们是否有错误，以及如何处置进行裁决。为后世所诟病的“女巫审判”，以及对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审判，也都在宗教裁判所进行。

作为天主教会内的一个机构，宗教裁判所只负责拷问、审讯和裁决。执行最终的刑罚，则要由世俗权力来完成。一旦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判决了火刑，王侯的兵士们就会架起火刑架。

在十字军国家当中奋战200年，牺牲了2万名团员的圣殿骑士团，由于被告发其信仰“有误”，最终被裁决为异端组织。这一裁决，使狱中的骑士们绝望至极。

法国的卡佩王朝时期，国王的名字往往是在路易和腓力之间往返变化，每位国王都有一个诨名。此时的国王腓力四世39岁，诨名为“美男子”（le Bel）。正是这位国王，使出阴险的招数消灭了圣殿骑士团。

但为何这位美男子国王如此敌视圣殿骑士团呢？

第一，阿克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以后，发动新十字军东征的呼声高涨起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法国国王才是新十字军最合适的领导者。

忙于巩固卡佩王朝权力的美男子腓力，毫无发动十字军的兴趣。相反，圣殿骑士团回到法国之后，试图积极说服当地诸侯发动十字军。因此，对腓力来说，圣殿骑士团的存在无疑是对自己战略的威胁。

第二，此时的法国国王已经陷入极度的财政危机之中。在此之前，法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圣殿骑士团却以拥有大量资产而著称。

法国的历代国王，已经欠下了圣殿骑士团巨额债务，难以偿还，其中就包括了半个世纪前路易九世失败后借贷的赎金。

法国国王腓力四世

第三，对法国国王来说，摧毁圣殿骑士团，还可以转嫁之前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责任。

法国国王是第二次、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这三次东征都以惨败而告终。

而除了腓特烈二世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以外，其他几次十字军东征的主力都是法国人。十字军的通用语言，除了拉丁语，就是法语了。

历代法国国王如果想推卸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责任，最重要的莫过于找到一个替罪羊。虽然罗马教皇对十字军东征失败也负有责任，但他们毕竟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将责任转嫁给教皇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127条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当中，里通穆斯林异教徒，背叛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就是其中之一。这支200年间2万人葬身圣地的骑士团，亡灵尚不得以安息，法国国王却把十字军的失败归咎于他们。

10年前的1297年，腓力四世的祖父路易九世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尽管如此，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的失败，显然应由路易来负责。但东征失败的圣王路易毕竟是法国王家的一员。在腓力看来，随着路易的封圣，法国王家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因此，找到一只转嫁责任的替罪羊，对腓力来说是最有利的策略。圣殿骑士团就是这只替罪羊。

遭到逮捕的骑士大都已经进入老年。他们年轻时在圣地作战，年老以后则都归国，经营位于法国各地圣殿骑士团拥有的地产。这是当时圣殿骑士团的实际情况。

骑士们受到了极端残忍的严刑拷问。皮开肉绽的鞭笞只不过是轻的，更为残忍的是强行剥开皮肤，用火炙烤筋肉，或者在一周内强迫犯人连续饮下大量的水，以实现逼供的目的——这就是黑暗的中世纪里的刑讯逼供。

到1308年1月，经过三个月的持续拷问，在巴黎逮捕的138名骑士中的134人，被迫在自己的罪状上署名。

团长雅克·德·莫莱被捕时，已经64岁。这位22岁时加入骑士团，27岁起前往圣地的骑士，在圣地的20年间，一直与马木路克军队勇猛作战。阿克之战失败后，莫莱前往塞浦路斯，几次在作战的过程中出生入死。

与团长一起被捕，受到拷问的骑士们，也从年轻时就多次身受重伤，有很多人曾长期被关押于穆斯林的监牢中，严词拒绝改宗的要求，日复一日熬到获救。

谁能想到，这些身经百战的勇者，就这样轻易地成为了阶下囚。倘若初读这一时期的审判记录，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圣殿骑士们很快就会认罪。就算是极端变态的酷刑所致，骑士们也毕竟是身经百战，早已适应了严酷的生活。

当我仔仔细细读罢审判记录，终于明白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对这些失去存在理由的骑士来说，他们心中充满的是无处藏身的丧失感。

举例来说，对所列举的127条罪状当中，骑士们很少对恶魔崇拜、向十字架吐口水、把圣地出卖给穆斯林、背叛基督教会等等重罪表示认罪。他们大多数死于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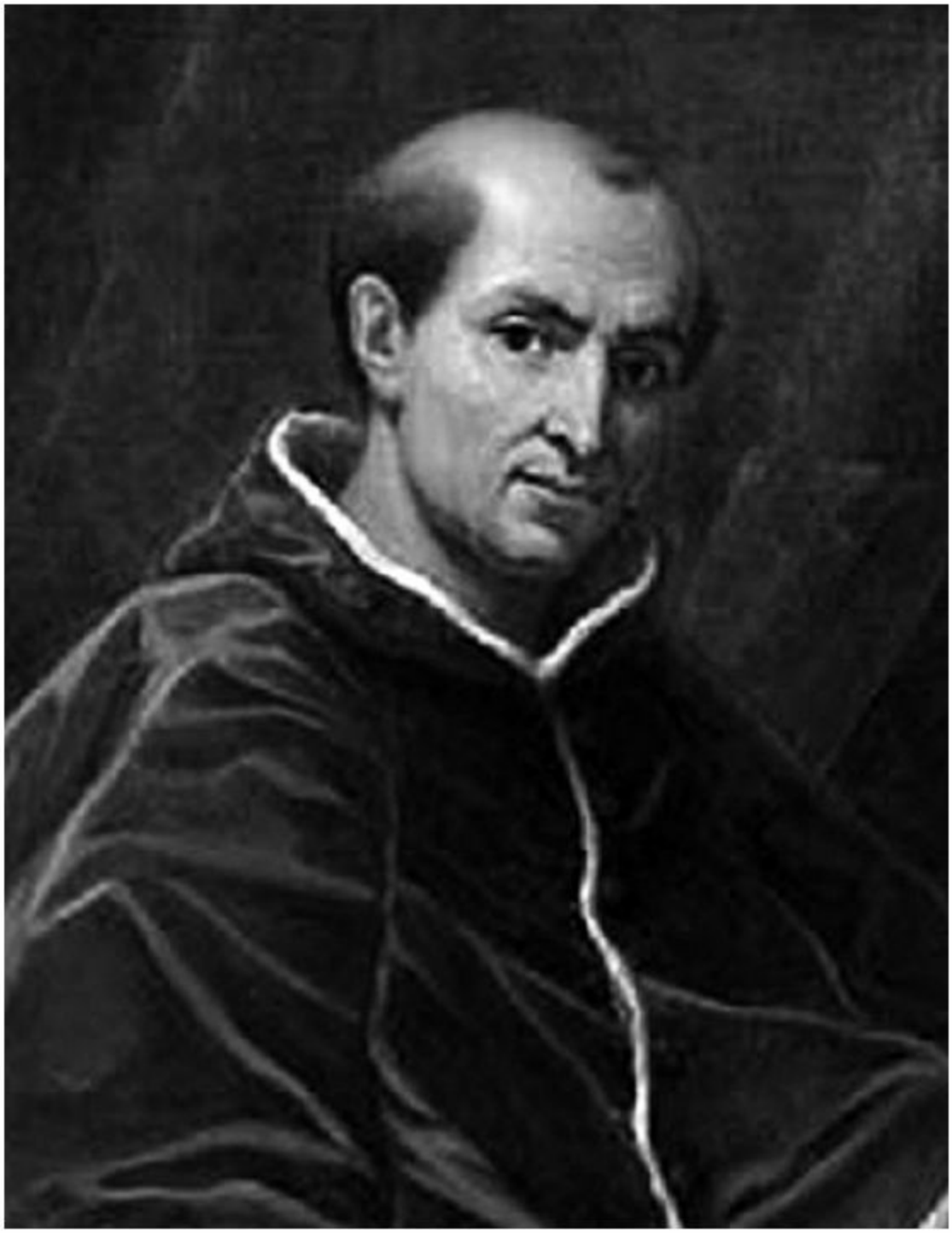
至于同性恋行为，在纯男性组成的团体当中，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圣地的基督徒们都知道，圣殿骑士大都纳当地的阿拉伯、突厥女子为女眷。

然而在民众中间，圣殿骑士团的声望很高。当年避免被法国国王获知动向，秘密归国的狮心王理查，也是化装成圣殿骑士，返回西欧登陆

的。此时的腓力四世也不能不考虑民众对清洗骑士团的反应。

于是，国王开动了宣传机器。目不识丁的法国群众们，从国王的宣传中得知了被描绘得污秽不堪的圣殿骑士形象。

与此同时，腓力四世向巴黎大学的教授们致信，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制定法律，确保对圣殿骑士团的毁灭的正当性。教授们只好根据国王的要求，妥善制定相关的法律，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



罗马教皇克雷芒五世

同样只能遵照法国国王旨意抹黑圣殿骑士团的，还有出身法国的教皇克雷芒五世。

与其他许许多多天主教修道会、修道院一样，宗教骑士团隶属于罗马教皇直接管辖下。圣殿骑士团也是直属于教皇，既不是国王或君侯的部下，也不是任何大主教、主教能够管辖的。他们的最终屈服，还要罗马教皇来下令。

唯一能够拯救圣殿骑士团这一法国国王眼中钉的，就只有罗马教皇了。但戏剧性的是，就连这位教皇自己都只能在法国国王控制下行动。

1306年，罗马教皇移居法国，这一事件后来以“阿维农之囚”著称于世。而圣殿骑士团则是在1307年被全部逮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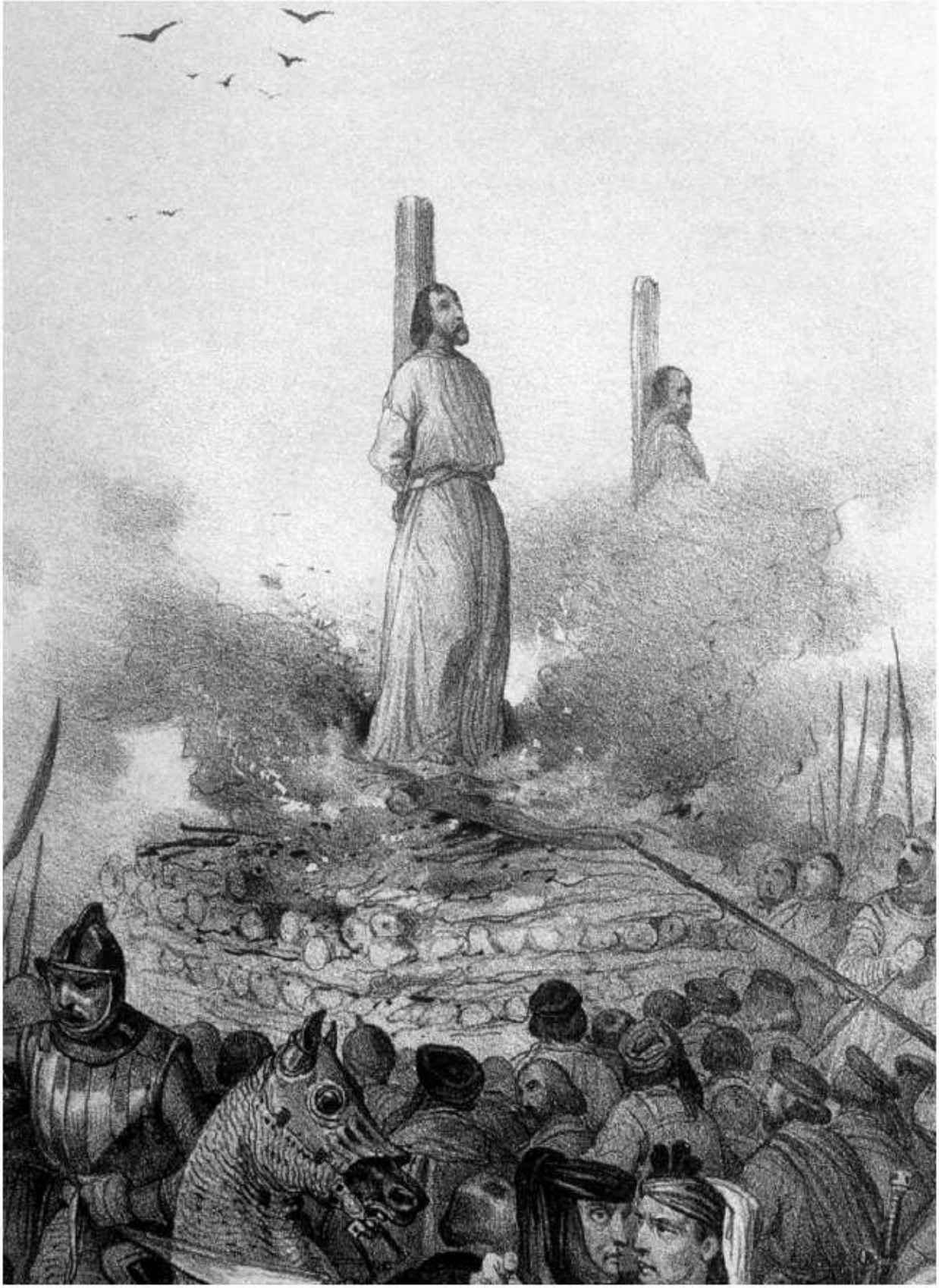
逮捕5年之后的1312年，教皇克力门五世公开发表了宣告圣殿骑士团的取缔与解散的谕令。

对全体天主教徒来说，任何人希望加入圣殿骑士团便构成了犯罪，穿着白衣红十字的圣殿骑士团制服也是犯罪。从此以后，任何人连提都不能提圣殿骑士团这个名字。

圣殿骑士团的全部资财，都被法国国王没收国库。其中1/8的金额，作为异端审判的费用，支付给了宗教裁判所。

根据判决，圣殿骑士团的所有不动产，都被让渡予医院骑士团。但由于转战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回避了领有圣殿骑士团的财产，法国国王就将法国国内的圣殿骑士团不动产悉数出售，换得现金，再从医院骑士团手里买来法国境外的圣殿骑士团不动产，并把它们折现出售。

美男子腓力还企图将圣殿骑士团在地中海世界各地的财产搜刮一空，但很多财产在他探求的过程当中都不翼而飞，为后世留下了“圣殿骑士团遗宝”的传说。



雅克·德·莫莱被处以火刑

两年之后，1314年3月18日，是对圣殿骑士行刑仪式的日子。

行刑地点是巴黎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的后院。圣殿骑士团末任团长雅克·德·莫莱和一位老骑士一起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两位老人一直不肯供认所指控的罪名，最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以极刑。

此两人之外，法国各地都有圣殿骑士被处以火刑。在此之前，没有被处以火刑的圣殿骑士，已经都在牢内被活活折磨而死。

公元1118年创立的圣殿骑士团，在罗马教皇的宣布之下，于1312年解散。两年之后两位老骑士在巴黎遭受的火刑，是法国当局一次残忍的演示。

一个月之后的4月20日，不到50岁的教皇克雷芒五世一命呜呼。同年11月29日，不到46岁的美男子腓力，在一次狩猎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我心里觉得，这恐怕是上苍的恻隐使然吧？

对圣殿骑士团的宗教审判，是世俗君主和天主教会合谋的“构陷审判”，可以与一个世纪后对圣女贞德的审判相提并论。

圣女贞德的名誉，早已被罗马天主教会恢复了；圣殿骑士团的名誉，至今还没有恢复的可能。但今天的因特网之上，已经有了“圣殿骑士团粉丝俱乐部”这样的群体。

阿维农之囚

像牺牲的羔羊一样完全丧失声威的，是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陷入失去圣地绝望中的教会，将阿克陷落9年后的1300年定为“圣年”，提出基督徒到罗马朝圣可以享受与到耶路撒冷朝圣相同的“免罪”待遇。

在日本大学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讲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时，以下三项事件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

卡诺萨之辱

十字军东征

阿维农之囚

所谓卡诺萨之辱，是公元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为了请求罗马教皇解除开除出教的绝罚，身着粗布服装，站在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三天三夜悔过的事件。此时，教皇的宗教权威对皇帝世俗权力的主宰达到顶点，对整个天主教世界起到了宣示性的作用。

十字军东征，则是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尔蒙号召发动夺回圣地的远征开始，到1291年阿克陷落告终的，一共8次大规模运动的总称。

至于阿维农之囚，则是从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开始的70年间，法国国王一直将教皇软禁在法国城市阿维农的事件。

阿维农之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囚禁，教皇并没有被扔进监狱。整座法国南部小城都处在国王的监视之下，教皇从选上到身故一直生活于其中。选举下任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也在阿维农召开，在连续7次会议

上，出生于法国的新教皇获得加冕。这段时间内，罗马梵蒂冈的拉特兰宫并无主人，圣彼得大教堂也没有人主持弥撒。

要是教皇回忆卡诺萨之辱，恐怕会有恍若隔世之感——教皇的权威业已荡然无存。而这两大事件之间，横跨的是十字军东征的岁月。

那么，教皇权威的丧失，与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责任是否直接相关呢？

在教会的理论中，罗马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也是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人间的中介。上帝自然是不会犯错的，那么传达上帝旨意的中介人，也理应不犯错误了。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其提出质疑之前，人们大概都相信这一点。

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自然不是希望其成为现实的上帝，或煽动其成为现实的教皇的责任。失败的责任，完完全全在于对上帝的信仰不够充分，或在实行远征的过程中犯了错误的人们。圣殿骑士团的下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既然教皇对十字军东征失败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教皇权威的丧失又是为何呢？

如果先给出答案再解释的话，那就是实力强弱的变化。

罗马教皇并没有自己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们只能依靠世俗君侯来实现发动十字军所需要的军事和社会动员。愿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个人和组织，自然是全心全意相信教皇的煽动，但由于领导十字军的君侯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并不容易在远征中形成某一势力独大的局面。

中世纪西欧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与教廷和诸侯复杂的权力斗争，帝国的权力

被大大削弱。腓特烈二世固然能征善战，却并不长命。随着他的儿子被教皇的阴谋推翻，霍亨斯陶芬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教皇的所作所为，却为法国国王在欧洲大陆的横行无阻扫清了障碍。

此时的英国，也处在较弱的状态。西班牙则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穆斯林对手拉锯战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中。意大利则分裂为多个城邦国家，没有统一。与它们相比，法国国王得以在参加十字军的诸侯死后兼并他们的封地，变其为王室直辖领地，充分加强了法国的王权。从十字军东征结束开始，法国的中央集权化便开始了。

1303年，当时的罗马教皇被法国国王的军队俘获。不到三年，教皇就被掳至法国。从此，象征罗马教皇权威丧失的“阿维农之囚”便开始了。

意大利的生意人

阿克陷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时间没有了基督徒的踪影。但这一状态很快发生了变化。基督徒重新出现，并不是因为西欧天主教会希望他们回去，而是胜利者——穆斯林们的要求。

阿克之战后10年，1302年，马木路克王朝苏丹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签订了友好通商协定。

虽然发动“吉哈德”时苏丹号召过，要把“不信仰者”一扫而光，他却无法忽视本国生意人希望与“不信仰者”通商的愿望。

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已经离不开与西欧的贸易了。

地中海东岸盛产各种高级的奢侈品，普遍价格很高，就连穆斯林也只有上层才买得起。而此时的西欧雨后春笋般崛起了许多城邦国家。西欧国家内以自己的才智和技能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阶层逐渐发展起来。伊斯兰世界生产的著名的大马士革毛纺品，只有埃米尔级别的高级官员才能穿着。然而这类纺织品已经成为意大利各邦国上流社会的主要服饰。

阿拉伯商人自然不愿失去潜力无限的意大利市场。同样，在双方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意大利商人，也并未因为阿克失陷而放弃贸易的企图。

此时回到地中海东岸的意大利商人，在自己的居留区内不再有十字军东征时代享有的治外法权。但随着商馆的建造，当地埃米尔承认其以此为贸易据点的贸易自由。于是，意大利商人陆续回到了中近东各地。

但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与中东当地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在积极进取的威尼斯人那里尤为明显。

意大利人不再以一城一地集中的方式进行贸易，而是完全分散开来，跟穆斯林进行贸易活动。

虽然威尼斯人跟马木路克王朝的苏丹签订了双边通商协定，威尼斯商人实际活动的地区却并不仅仅在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还是巴勒斯坦，到处都有威尼斯商船活动的据点。对于彼此不能建立完全信用的贸易对象，最好的贸易方式，大概就是完全分散活动吧。

况且对商人来说，如果要分散风险，同时又获取较高的利润，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资本尽可能多地分散投资。

此时的威尼斯人，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有限责任股份”（Colleganza）制度。这一词汇的直译是“连带”，是将与贸易和运输无关的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变为个人投资者的股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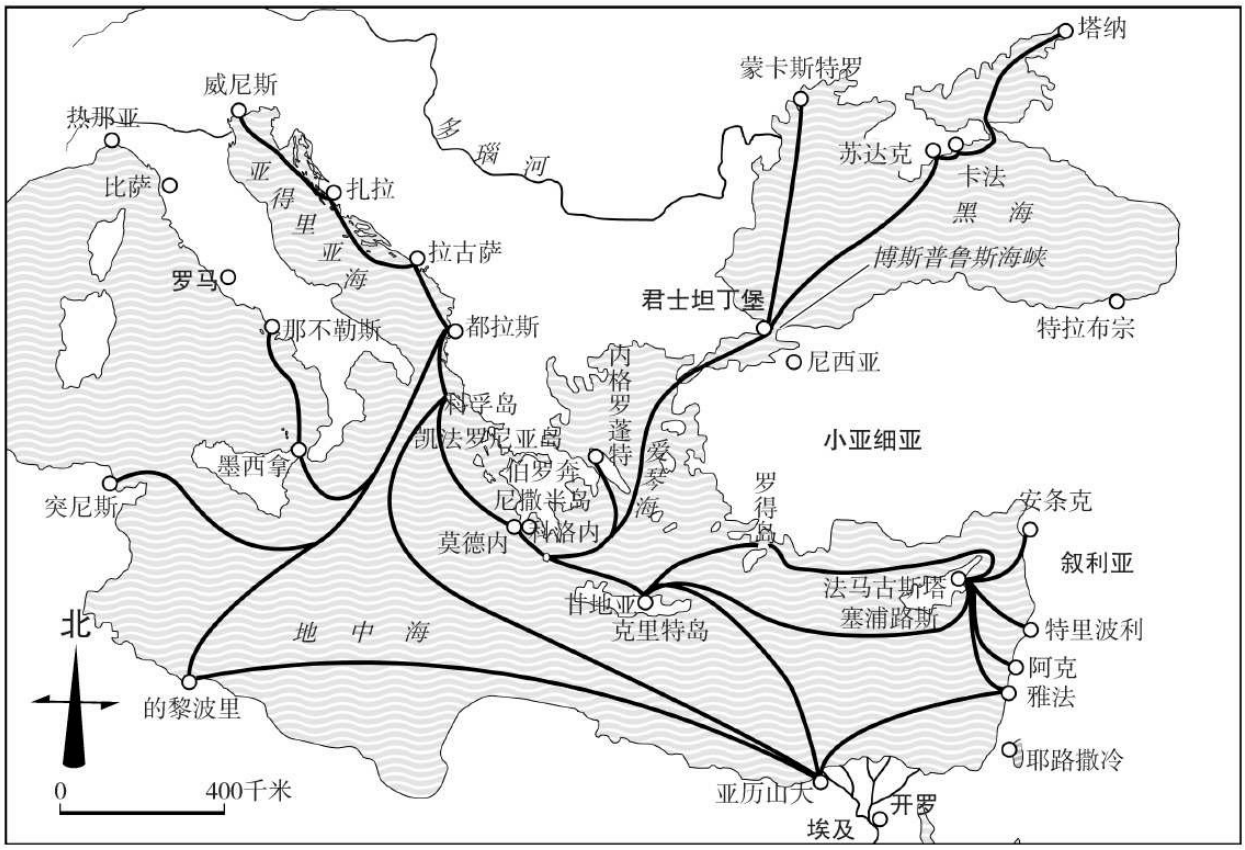
于是，当威尼斯商人的资本汇集起来之后，他们的购买力就大大超过了以血缘为资本组织方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商人。热那亚人也采取了和威尼斯人相同的制度（称为Commenda）——这些意大利的商人将“信用”从血缘者之间扩大到了其他人，为追求利润迈出了第一步。商业的目的是将劳动所得作为私有资本而积累起来，而不是建立信赖关系。

积累资本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出口利润丰厚的高级产品的同时，也为了遵守合约期限而进行投资。威尼斯商船队的主力，是拥有为数众多划桨手的桨帆船，其人力成本远高于一般的帆船。桨帆船的划桨手，就是船只的发动机，船队受风向变化的影响很小，航海的变数不大。因此，威尼斯人商业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与贸易对象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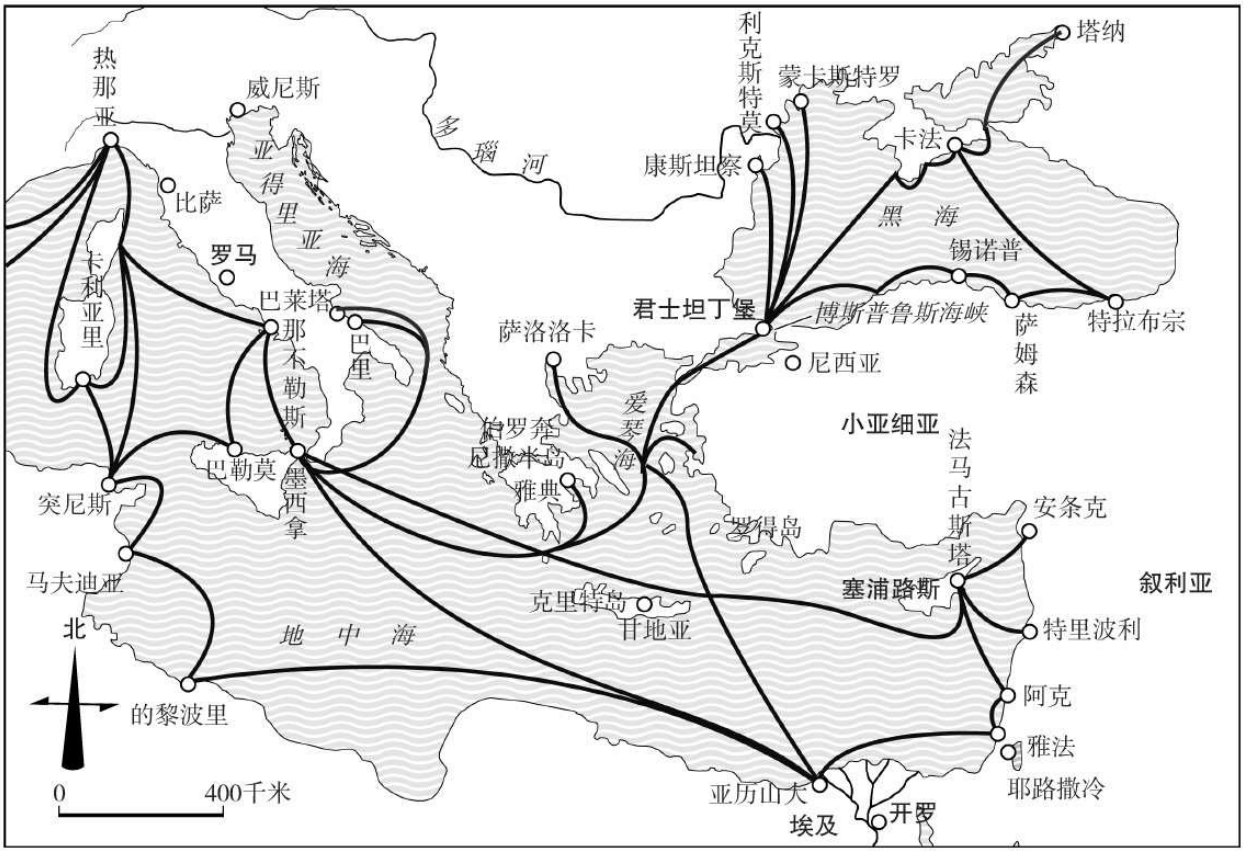
无论是分散风险，还是严守合约期限，准确的商业情报收集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以情报立国，令后世大英帝国的谍报人员由衷赞叹。

而基于商业情报做出迅速决断的必要性，则通过高效的政策决定过程而实现。这一决策过程是在阿克陷落之后6年成为现实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除了提高统治能力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外，威尼斯共和国还不断提升本国的海军力量。这样一来，它就能安然度过十字军东征失败所带来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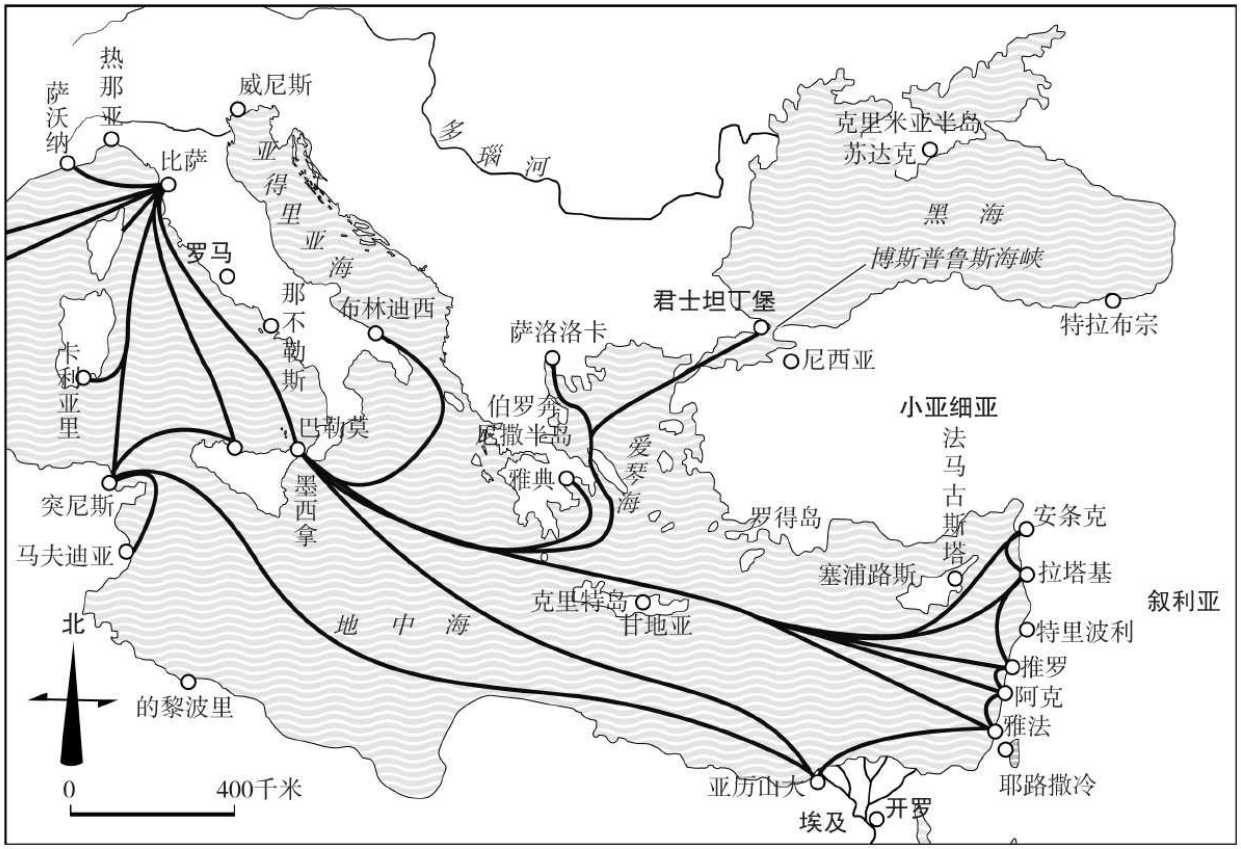
十字军东征以后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十字军东征以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威尼斯共和国由此跻身经济大国的行列。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逐渐取代了拜占庭金币和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第纳尔货币，成为地中海世界和西欧的国际通用货币。杜卡特这种世界货币充斥于各大城市——从开罗、君士坦丁堡以至巴黎、伦敦，莫不如此。

商业的繁荣为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的市民走向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文艺复兴，正是这一阶段崛起的中产阶层自己生产的文化与文明。



十字军东征以后比萨在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

朝圣

与意大利商人一起回到中近东的，是朝圣的基督徒。

由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利益的内在一致性，朝圣活动再次繁荣起来。作为三大宗教圣地的耶路撒冷，所吸引的朝圣者以基督徒为压倒多数。而对穆斯林来说，第一圣城是麦加，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往往将蜂拥而至的朝圣者当作旅行者来对待。

对威尼斯人来说，朝圣旅行也是巨大的商机。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海都物语》里面详细叙述。读者们可以由之管窥中世纪威尼斯人作为彻底“经济动物”的一面。在威尼斯人组织团体朝圣之前，朝圣的基督徒常因向穆斯林支付一定数额的“圣地参拜费”而心生抗拒，这部分费用一直包含在旅行费用当中。

威尼斯人开发了团体旅行朝圣的方式，包下了与异教徒打交道的过程和开支。这样一来，朝圣者们就再也不会感到为难了。

尾声

十字军时代结束以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多次战争。其中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以下的几次：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拜占庭帝国灭亡，首都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

西班牙境内的伊斯兰政权被完全清除，基督教一方的“再征服运动”完成。

1522年——罗得岛之战。

令伊斯兰世界“如鲠在喉”的医院骑士团，终于在奥斯曼帝国海军的攻击之下败北了。虽然这支骑士团再次“光荣撤退”，却失去了“罗得岛骑士团”的名号。

1529年——维也纳之战。

奥斯曼帝国的强势扩张，终于在维也纳城下受阻。由此，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确定下来。

1565年——马耳他之战。

从罗得岛败退下来的医院骑士团，与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在马耳他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大战，最终击退了奥斯曼帝国的进攻。从此以后，这一

骑士团就以“马耳他骑士团”之名，一直担负着基督教世界最前线的斗争任务。

1571年——勒班陀之战。

威尼斯、教廷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的勒班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海战，战役以基督教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西进，由此战而告终。

1645年——克里特岛之战。

历时25年的克里特岛之战拉开了帷幕。最终，威尼斯共和国丧失了这艘“地中海的航空母舰”。

1683年——第二次维也纳之战。

此战之败北，使奥斯曼帝国最终放弃了西进的计划。

回首历史，倘若基督教军队在勒班陀和两次维也纳之战中败北，欧洲的伊斯兰化一定在所难免。

但必须指出，以上的战争都不能称为宗教战争。这些争端都是领土和利益的纠纷，只是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只是普通的战争罢了。仅有的身着印有大十字军装的是罗得岛和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十字军时代的遗产。

最后一次聚集在宗教大旗之下，以宗教信徒为主要作战人员的战役，就是1291年的阿克之战了。无论是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还是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它都是最后一次宗教战争。

因领土和利益纠纷而起的战争，是无法带来人类内心的平安的。

著有多部有关十字军东征历史著作的伦敦大学教授乔纳森·里利-史

密斯（Jonathan Rilly–Smith），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其《十字军简史》（*The Crusades–A Short History*）的结尾：

> 欧洲人逐渐从对十字军的狂热中苏醒过来。到14世纪末，宗教再也没有打动民众的魅力了。……没过多久，“圣战”就为“正战”所取代。

当人心中唯一的正义只有上帝的期望时，发动一场战争便成为正义的了。而当上帝的意志退居其后，便只有“正义战争”留存下来。如果人心里只希望留下“正义”，那么最后留存下来的，也就只有“正义”。

而这最后一点，大概就是20世纪以来风起云涌，到如今的21世纪依然横行于世的战争中，不论发起的一方也好，被动应战的一方也好，正义一方也好，非正义一方也好，战争都是给人类带来痛苦的根源吧。

——《十字军的故事》（下）完——

附录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07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前往卡诺萨城堡，恳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解除绝罚（卡诺萨之辱）	
1095		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开克勒芒公会议，号召发动十字军东征	
1096		隐士皮埃尔组织的“贫民十字军”向中近东出发，洗劫匈牙利之后，到达君士坦丁堡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波埃蒙多之侄丹克雷迪向中近东出发，于冬季到达君士坦丁堡	
1097	诸侯的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后，相继取得尼西亚、多利留姆。 鲍德温离开大部队，进占埃德萨。 鲍德温作为养子继承埃德萨伯爵之位，建立了最初的十字军国家	拜占庭帝国皇帝阿莱西奥斯一世强行要求诸侯行臣下之礼。诸侯在形式上接受，然后向塞尔柱突厥人控制的小亚细亚进军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098	经过7个月的战斗，十字军占领了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条克。波埃蒙多据有头功，因此成为城市的领主——安条克公爵		
1099	十字军进军巴勒斯坦 7月，长期处在伊斯兰世界控制下的耶路撒冷陷落。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以“耶稣基督守墓人”的身份成为耶路撒冷实质上的国王		
1100	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城市阿尔苏夫、凯撒利亚、阿克等与戈德弗鲁瓦达成协议，成为十字军国家的附庸 7月，戈德弗鲁瓦去世。其弟鲍德温从埃德萨赶到耶路撒冷，即位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的堂弟，同名的鲍德温派遣为埃德萨领主		
1105		波埃蒙多回到西欧，恳请各国首脑继续派遣新的十字军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18	鲍德温在进攻埃及途中去世。其堂弟，埃德萨伯爵鲍德温继位耶路撒冷国王，是为鲍德温二世 此时，圣殿骑士团成立，担负鲍德温二世治下耶路撒冷的防御任务 同时，最初以医疗组织成立的修士组织圣约翰修会正式成为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一起成为圣地的主要战斗力		（中国）金灭北宋（1127）
1131	经过13年统治，鲍德温二世去世。其女婿安茹伯爵福尔克即位为耶路撒冷国王，专注于建设对十字军国家防御极为重要的城堡体系		
1143	福尔克去世。其13岁的儿子鲍德温三世与母亲梅丽森达共坐王位		
1144	控制摩苏尔和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埃米尔曾吉攻占并破坏埃德萨。第一个十字军国家宣告灭亡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46		西多会修士贝尔纳在法国小城镇韦泽莱的广场上发表演说，号召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响应了他的号召。此后，贝尔纳又成功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开始	
1147		康拉德和路易进军中近东	
1148	康拉德和路易抵达耶路撒冷，并决定与耶路撒冷国王一起进攻大马士革 曾吉的次子、继承了阿勒颇的努拉丁接受了大马士革领主发出的支援请求，率军接近大马士革。十字军决定翌日撤退 康拉德随即离开巴勒斯坦，并经由君士坦丁堡回国		
1149	路易经西西里归国 努拉丁因其兄之死而取得对摩苏尔的统治权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50		路易与阿奎丹的埃莉诺尔的婚姻被宣布无效	
1152		埃莉诺尔与诺曼底公爵亨利，即后来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结婚	
1154	努拉丁占领大马士革，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有权势的世俗统治者		
1156	叙利亚大地震。努拉丁为所控制地区的震后重建而努力		（日本）保元之乱
1158	鲍德温三世与拜占庭公主结婚，安条克公国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地的一部分		（日本）平治之乱（1159）
1162	鲍德温三世去世，其弟阿莫里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1169	努拉丁属下的将军西尔库及其侄子萨拉丁进攻埃及法蒂玛王朝，并将其控制 西尔库去世后，萨拉丁成为埃及的维齐尔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70	埃及法蒂玛王朝灭亡。萨拉丁建立阿尤布王朝		
1174	阿莫里去世，其有麻风病的儿子鲍德温四世即位为耶路撒冷国王 努拉丁去世，由其子继承，萨拉丁表面上效忠，实质上占据大马士革		
1182	萨拉丁占据阿勒颇		
1185	鲍德温四世去世。前一年成为共同统治者的年仅8岁的侄子鲍德温五世即位		（日本）坛浦之战；源赖朝在各国设置守护、地头，镰仓时代开始
1186	萨拉丁占据伊拉克重镇摩苏尔，完成了伊斯兰世界实质上的统一 鲍德温五世去世。其母后西比拉和她的丈夫居伊·德·路西尼安成为耶路撒冷实质上的统治者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87	萨拉丁率领大军侵入十字军国家 路西尼安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哈丁平原之战中完败于萨拉丁的军队。耶路撒冷国王路西尼安成为穆斯林的俘虏 萨拉丁控制了提比利亚斯附近，以阿克为中心的海港都市 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88 年后，耶路撒冷重新为穆斯林所控制		
1188	萨拉丁进攻推罗，但终告失败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率军向中近东出发	
1189	萨拉丁释放路西尼安 路西尼安与伊柏兰等开始进攻阿克	理查一世即位为英格兰国王	（日本）源赖朝惩罚奥州
1190	腓特烈一世到达小亚细亚后，在科尼亚附近的戈克苏河畔溺死。德意志军队除一少部分继续行军外，大部回国	理查一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在韦泽莱会合，组成第三次十字军，进军中近东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91	腓力二世抵达阿克，参加阿克守城战 理查抵达塞浦路斯，经过5天时间征服拜占庭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岛，将其变为十字军的补给地 之后，理查抵达阿克，参加守城战 阿克向萨拉丁提出全面和议 腓力回国，不久后率领德意志军队的奥地利大公也离开了战场，其属下留在圣地的组织为条顿骑士团 理查率军前往阿尔苏夫，行军路上击败萨拉丁所部，最终进占阿尔苏夫 十字军收复雅法和亚实基伦，为围攻耶路撒冷做准备		（日本）荣西和尚自中国宋朝归国，临济宗弘法开始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192	蒙费拉特侯爵康拉德取代路西尼安成为耶路撒冷国王，旋即被暗杀，王位由香槟伯爵亨利继承 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和谈达成协议：耶路撒冷仍归穆斯林占领，但萨拉丁承诺保证基督徒朝圣的安全，并将巴勒斯坦海港都市交由基督徒一方 理查从圣地出发回国	腓力侵入理查的领地	（日本）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
1193	萨拉丁去世。其广大的支配地域由三位子嗣及其弟阿拉迪尔所分割。三位子嗣之间争夺不断，阿拉迪尔最终继承阿尤布王朝苏丹之位		
1194		理查回到英格兰，与腓力的斗争激化	
1198		教皇英诺森三世即位	
1199		狮心王理查去世 香槟伯爵、布洛瓦伯爵、弗兰德斯伯爵结成第四次十字军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201		第四次十字军使节前往威尼斯，请求其协助。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丹多洛和埃及的阿拉迪尔缔结互不侵犯密约，同时答应了十字军的请求	
1202		第四次十字军和威尼斯海军共同出兵。由于未支付海上运输费用，十字军对本次出兵并没有主导权。他们首先应威尼斯的要求，攻占了亚得里亚海岸城市扎拉 拜占庭帝国皇子访问扎拉的十字军军营，请求帮助推翻杀害其父皇的叔父。十字军接受了皇子的邀请，行军目标变更为君士坦丁堡	
1203		十字军和威尼斯海军抵达君士坦丁堡	
1204	经过10个月的攻城战，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皇位落空，新的“拉丁帝国”建立起来		（蒙古）成吉思汗侵入华北（1211）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212		“少年十字军”成立	（日本）鸭长明著《方丈记》
1218	在罗马教廷促成下，耶路撒冷国王让·德·布里安努组织了第五次十字军，进攻埃及的达米埃塔 阿拉迪尔去世，长子阿尔·卡米尔继承其在埃及的领地		（蒙古）成吉思汗发动西征（1219） （日本）源氏灭亡，北条氏开始掌权（1219）
1220	第五次十字军占领达米埃塔	腓特烈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221	第五次十字军因尼罗河泛滥而撤退		（日本）承久之乱
1225		腓特烈二世与布里安努之女结婚，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国王	
1227		在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再三催促下，腓特烈二世仍拒绝发动十字军东征，终于被开除出教	（日本）道元和尚从宋朝归国，曹洞宗弘法开始
1228		教皇重申对腓特烈二世的绝罚 腓特烈二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向圣地进发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229	经过三个月谈判，腓特烈二世和阿尔·卡米尔达成和议。十字军不战而取得耶路撒冷，腓特烈回国		（中国）窝阔台汗灭金（1234）
1244	叙利亚一部落占领耶路撒冷，此前15年的和平局面宣告破灭		
1248		在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求下，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	
1249	第七次十字军在达米埃塔登陆，向曼苏拉进军		
1250	第七次十字军在以奴隶出身的马木路克军队面前大败，精锐骑士遭到歼灭。包括路易九世在内的主要十字军成员被俘。支付大量赎金之后，路易获释		
1254	路易九世从阿克返回法国		
1258	蒙古帝国西征，攻陷巴格达，旋即直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260	埃及的实际统治者，马木路克出身的拜巴尔斯击败蒙古西征军队		
1270	第八次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由于疫病蔓延，一个月之后撤退。路易本人丧命于该地	路易决意再度组织十字军，第八次十字军随即进军突尼斯	（中国）忽必烈汗建立元朝（1271） （日本）文永之役（元朝入侵，1274） （日本）弘安之役（元朝入侵，1281）
1291	马木路克朝苏丹卡利勒率军对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据点阿克发起总攻 5月18日，阿克陷落。中近东十字军国家历史告终，残余势力退往塞浦路斯		
1306		圣殿骑士团总部转移回法国 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强行将教皇克雷芒五世移驻法国阿维农，阿维农之囚开始	
1307		圣殿骑士团开始受到镇压	

续表

公历纪年	中近东·小亚细亚·埃及	欧　洲	世界其他地区
1309	医院骑士团总部迁到罗得岛，更名为罗得岛骑士团		
1312		教皇宣布圣殿骑士团解散	

参考文献

Abel F.M., *Lettre d'un Templier trouvée récemment à Jérusalem,* 《Revue biblique》 35 (1926), pp.288-295.

Abu'l-Fida (tr. P.M. Holt), *The Memoires of a Syrian Prince; Abu'l-Fida, Sultan of Hamah (672-737/1273-1331),* Wiesbaden 1983.

Abulafia D.S.H. (edit.),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London 1933.

Addison C.G., *The Knights Templar History,* AMS Press, New York 1912 and 1978.

Airaldi G. - Kedar B.Z. (a cura di), *I Comuni Italiani nel Regno Crociato di Gerusalemme,* Genova 1986.

Alphandery P., *Les Croisades d'Enfants,*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vol. LXXIII, Paris 1916.

Alphandéry P., Dupront A., *La cristianità e l'idea di Crociata,* il Mulino, Bologna 1983.

Ambroise, *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ed. G.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897.

Ambroise, *The Crusade of Richard Lionheart,* trans. Hubert M.J. and La Monte J., New York 1941.

Andressohn J.C., *The Ancestry and Life of Godefroy of Bouillon,* 1947.

Angold M.,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1984.

Anna Comnene, Alessiade, in B. Leib (ed.), *Collection Byzantine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3 vol., Paris 1937-45.

Annales de Terre Sainte, edited by Röhricth, in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vol.II, Paris 1884.

Anon. (ed. R.C. Johnston), *The Crusade and the Death of Richard I: Anglo-Norman Texts XVII,* Oxford 1961.

Anon (ed.), *Acri 1291 - la fine della presenza degli ordini militari in Terra Santa... a cura di Francesco Tommasi,* Biblioteca di Militia Sacra 1, Perugia 1996.

Anon. (ed. H.J. Nicholson), *The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The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Aldershot 2001.

Archer T.A., *The Crusade of Richard I,* G.P. Putnam's Sons; AMS Prints, New York 1897, 1978.

Ardouin E., *Essai sur l'Armée Royale au Temps de Philippe Auguste,* Paris 1913.

Auvray L. (ed.), *Les Registres du Grégoire IXe,* Paris 1896-1955, 4 vol.

Avissar M. – Stern E., 'Akko, the Citadel',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XIV, 1994, pp.22-25.

Ayalon D., *The Mamluk Military Society,* London 1979.

Bahā al-Dīn ibn Shaddād, *The Life of Saladin,* trans. C.W. Wilson and C.R. Conder, Palestinian Pilgrims Text Society, London 1897.

Baldwin M., *Raymond III of Tripolis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Princeton, 1936.

Baldwin W.,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 Augustus. Foundations of French Royal Power in the Middle Ages,* Berkeley-London 1986.

Baluze S., *Vitae Paparum Avenionensium,* 2 vol., Paris 1643.

Barber M., *The Trial of the Templ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8.

Barber M.,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3.

Bartolf de Nangis, *Gesta Francorum Iherusalemn Expugnantium,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vol.III.

Beck A., *Der Untergang der Templer,* Verlag Herder, Freiburg 1992.

Becker A., *Papst Urban II (1088-1099),* I, 1964.

Ben-Ami A., *Social Chang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The Crusaders' Kingdom of Jerusalem,* Princeton 1969.

Bennet M., 'La Règle du Temple as a military manual, or how to deliver a cavalry charge', in C. Harper-Bill, et al., edits (edits.),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R. Allen Brown,* Woodbridge 1989, pp.7-19.

Bernard St., 'Liber and milites Templi de laude novae militiae', in *Sancti Bernardi Opera,* a cura di J. Leclerq, III, Roma 1963.

Billings M., *The Cross and the Crescent,* London 1987.

Blake E.O – Morris C., 'A Hermit goes to War: Pet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Crusade', in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21, 1984.

Boase T.S.R., *Boniface VIII,* London 1933.

Boase T.S.R.,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the Crusader States in Palestine and Syria', in K.M. Setton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IV, Madison 1977.

Boaz A., 'Bet Shean, Crusader Fortress – Area Z',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IX, 1989-90, 129.

Bohn H. (ed.),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he Crusade of Richard Coeur de Lion by Richard of Devizes and Geoffrey de Vinsauf and of the crusade of Saint Louis by the Lord John de Joinville,* H.G. Bohn,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 1848, 1900.

Boissonade P., *Cluny, la Papauté et la première grande Croisad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s*

Sarrasins d'Espagne, in 《Revue des Question Historiques》, vol.CXVII, Paris 1932.

Bombaci A., 'The Army of the Saljuqs of Rum',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Annali,* 38, 1978, pp.343-69.

Bordonove G., *Les Templiers: histoire et tragédie,* Fayard, Paris 1977.

Bordonove G., *La vie quotidienne des Templiers au 13° siècle,* Éditions Famot, Genf 1978.

Bradbury J.,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1223,* London 1997.

Bradford E.,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London 1972.

Brand C.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8.

Bredero A.H., *Bernard de Clairvaux: Between Cult and History,* Edinburgh 1996.

Breysig T., *Gottfried von Bouillon vor dem Kreuzzüge,* in 《Westdeut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XVII, Trier 1898.

Brice M., *Forts and Fortresses,* Oxford 1990.

Brosset M.F., *Collection d'Historiens Arméniens,* 2 vol., Sankt-Peterburg 1874-76.

Browne E.J., *La médecine arabe,* Paris 1933.

Brundage J., *The Crusades: a documentary survey,*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Milwaukee, Wisconsin 1962.

Bruno S.-J., *The Letters of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 London 1953.

Bull M., 'The Capetian Monarchy and the Early Crusader Movement: Hugh of Vermandois and Louis VII',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40, 1996, pp.25-46.

Bull M.G. – Leglu C. (eds.), *The World of Eleanor of Aquitain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France between the Eleven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Woodbridge 2005.

Burwan E., *The Templars: Knights of God,* Destiny Books, Rochester 1986.

Cahen C., *Indigènes et Croisés,* in 《Syria》, vol.XV, Paris 1934.

Cahen C., *La Syrie du Nord à l'époque des croisades et la principauté franque d'Antioche,* Geuthner, Paris 1940.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directed by J.B. Bury, 6 vols., Cambridge 1911-36.

Cappelletti L., *Storia degli ordini cavallereschi,* Livorno 1904, pp.358-361.

Cardini F., *Il Movimento Crociato,* Sansoni, Firenze 1972.

Chaffanjon A., *Les Grands Ordres de Chevalerie,* Paris 1970.

Chalandon F.,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en Italie et en Sicilie,* 2 vol., Paris 1907.

Champdor A., *Saladin, le plus pur Héros de l'islam,*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53.

Charpentier J., *L'Ordre des Templiers,* La Colombe 1962.

Charpentier L., *I misteri dei Templari,* Roma 1981.

Chaumeil J., *Lue du premier au dernier Templier,* Paris 1985.

Chaytor H.J., *The Troubadours,* Cambridge 1912.

Chehab M.H., 'Tyr à l'epoque des Croisades', *Bullettin du Musée de Beyrouth,* XXXI, 1979.

Cheney O.R., 'The Downfall of the Templars and a letter in their defence', in *Medieval Miscellany presented to Eugéne Vinaver,* Manchester 1965.

Chevedden P.E., ,The Hybrid Trebuchet: the Halfway Step to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in D.J. Kagay - T.M. Vann (eds.), *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Medieval Institu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Joseph F. O'Callaghan,* Leiden 1998, pp.179-222.

Chevedden P.E., 'Fortif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fensive Planning in the Latin East', in D. Kagay and L.J.A. Villalon (eds.), *The Circl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99, pp.33-43.

Clifford E.R., *A Knight of Great Renown,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hon de Grandson,* Chicago 1961.

Constable G., 'The Financing of the Crusad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B.Z. Kedar (ed.),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Jerusalem 1982, pp.64-88.

Crawford P. (tr.), *The Templar of Tyre: Part III of the Deeds of the Cypriots,* Aldershot 2003.

Crozet R., *Le Voyage d'Urbain II et ses arrangements avec le Clergé de France,* in 《Revue Historique》, vol.CLXXIX, Paris 1937.

Curtis Van Cleve T.,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Immutator Mundi,* Oxford 1972.

Da Mosto A., *I Dogi di Venezia,* Aldo Martello-Giunti Editore, 1977.

Dailliez *L., Histoire de l'Ordre du Temple,* Alpes-Mediterranées Éditions /Impres du Sud, Nice 1980.

Daimberto, arcivescovo di Pisa e patriarca di Gerusalemme, lettera XVIII e XXI, in Hager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Dajani - Shakeel H.,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uslim and Frankish Rulers 1097-1153 AD', in M. Shatzmiller (ed.), *Crusaders and Muslims in Twelfth-Century Syria,* Leiden 1993, pp.190-215.

Dal Borgo F., *Diplomata Pisana,* Pisa 1765.

R. Davico, *Cultura araba ed ebraica nella scuola medica salernitana del Medioevo, in Salerno e la sua scuola medica,* a cura di I. Gallo, Salerno 1994, pp.53-87.

De Expugnatione Terrae Sanctae per Saladinum Libellus, excerpts trans. Brundage J.A. in the *Crusades: A Documentary Survey,* Milwaukee 1962, pp.153-63.

Dean B., 'A Crusader Fortress in Palestine (Montfort)',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2/2, 1927, pp.91-97.

Delacroix P., *Vrai Visage de Saint Bernard, Abbé de Clairvaux,* Angers 1991.

Delaville-Leroulx E., *De Prima Origine Hospitaliorum Hierosolymitanorum,* Cartolaire général des Hospitaliers de Saint-Jean, 4 vol., Paris 1894.

Delaville-Leroulx E. (ed.), *Cartulaire Général de l'ordre de S. Jean de Jérusalem, 1100-1310,* 4 vol., E. Leroux, Paris 1894-1906.

Delaville-Leroulx E., *Les Hospitaliers en Palestine et à Cypre, 1100-1310,* Paris 1904.

Delaville-Leroulx E., *Les Hospitaliers à Rhodes,* Paris 1913.

Delisle L., *Mémoire sur les opérations financiéres des Templiers,* in 《Mémoires de l' Institut de Franc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XXXIII, 1888, part II.

Demurger A., *Vita e morte dell'ordine dei Templari,* Garzanti, Milano 1987.

Der Nersessian S., *Armenia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Cambridge, Mass. 1945.

Deschamps P., 'Deux Positions Stratégiques des croisés à l'Est du Jourdain: Ahamant et el Habis', *Revues Historiques,* CLXXII, 1933, 42-57.

Deschamps P., *Les Châteaux des Croisés en Terre Sainte: le Crac des Chevaliers,* Paris 1934.

Deschamps P., *La Défense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2 vol., Paris 1939.

Deschamps P., *La Toponomastique en Terre sainte au temps des Croisades, in Recueil de travauz...,* Geuthner, Paris 1955.

Deschamps *P., Les Châteaux des Croisés en Terre Sainte, III, La Defence du comte de Tripoli et de la principaute d'Antioche,* 2 vol., Paris 1973.

Desmond S., *The Monks of War,* London 1972.

Desquesnes R. - Faille R. - Faucherre N. - Prost P., *Les Fortifications du Littoral: La Charente-Maritime,* Chauray 1993.

Donovan J.P., *Pelagius and the Fifth Crusade,* Philadelphia 1950.

Du Chesne A., *Historiae Francorum Scriptores,* 5 vol., Paris 1636-49.

Ducange C. du F., *Les Familles d'Outremer,* edited by E.G. Rey, Paris 1869.

Duez J., *Rituels secrets des Templiers: initations, écuyer-novice, écuyer du Temple, chevalier-novice, rituels de reception,* J. Bersez, Villeneuve-sur-Bellot 1985.

Duffy E., *Saints and Sinners: A History of the Popes,* New Haven, CONN, 1997.

Duncalf F., *The Pope's Plan for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C. Munro,* New York 1928.

Edde A.M., 'Kurdes et Turcs dans l'Armée ayyoubide de Syrie du Nord' in Y. Lev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astern Meditterranean, 7th-15th Centuries,* Leiden 1996, pp.225-236.

Edbury P.W. - Gordon Rowe J., *William of Tyre,* Cambridge 1988.

Edbury P. W., 'Castles, towns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Medieval Archaelogy, XLII, 1988, pp.191-193.

Edbury P.W.,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 Cambridge 1991.

Edbury P.W, *Propaganda and Faction in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the Background to Hattin,* in Shatzmiller M. (ed), *Crusaders and Muslims in Twelfth Century Syria,* Leiden 1993, pp.173-89.

Edbury P.W., 'The Templars in Cyprus', in M. Barber (ed.), *The Military Orders: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Variorum, Aldershot 1994.

Edbury P. W,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and the Third Crusade* (Sources in Translation), Ashgate, Hampshire 1998.

Edwards R. W.,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menian Cilicia,* Washington 1987.

E. Egidi, *La colonia saracena di Lucera e la sua distruzione,* in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e napoletane》.

Ehrenkreutz A.S., 'The Place of Saladin in the Naval History of the Meditterranean Sea in the Middle Age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LXXV, 1995, pp. 100-116.

Eidelberg S. (ed. and tr.), *Jews and Crusaders: the Hebrew Chronicl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rusades,* Madison 1977.

Elbeheiry S., *Les Institutions de l'Egypte au Temps des Ayyubides,* Lille 1972.

Elisseeff N., *La description de Damas d'Ibn 'Asakir,* Damas 1959.

Elisseeff N., *Nur-ad-Din, un grand prince musulman de Syrie au temps des croisade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67.

Ellenblum R., 'Frankish and Muslim Siege Warfa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nkish concentric castles', in M. Balard (ed.), *Die Gesta per Francos,* Aldershot 2001, pp.187-198.

Ellenblum R., 'Three generations of Frankish castle-building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M. Balard (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6, pp.517-551.

Epistola de Morte Friderici Imperatoris, in Chroust A. (1928).

Eydoux H-P., 'L' architecture militaire des Francs en Orient', in J. P. Babelon (edit.), *Le Château en France,* Paris 1986, pp.61-77.

Favier J., *Philippe le Bel,* Paris 1978.

Favreau - Lilie M.-L.,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the Escape of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from the Holy Land in 1291',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XIX,* 1933, pp. 201-227.

Favreau - Lilie M.-L.,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Acre after the fall of Montfort (1271): Some Reflections', in B.Z. Kedar (ed.),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Jerusalem 1982, pp.272-84.

Fedden R. - Thomson J., *Crusader Castles,* London 1977.

Fiene E., *St. Hilarion, Buffavento, Kantara: Bergburgen in Nordzypern,* Hannover 1992.

Filippo da Novara, *Mémoires, in Gestes des Chiprois,* trans. of La Monte and Hubert (ed.), *The Wars of Frederick II against the Ibelins in Syria and Cyprus,* New York 1936.

Filippo da Novara, *Guerra di Federico II in Oriente (1233-1242),* intr., testo critico, trad. e note a cura di S. Melani, Napoli 1994.

Flori J., *Richard Cœur de Lion, le roi-chevalier,* Collection 'Biographie', Paris 1999.

Forey A.J., 'The Failure of the siege of Damascus in 1148',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0, 1984, pp.13-23.

Forey A.J., *Novitiate and instruction in the military orders during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vol.61, n.1 (1986), pp.1-17.

Forey A., *The Military Orders: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 Macmillan, London 1992.

France J., 'Crusading warfare and its adaption to Eastern conditio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15, 2000, pp.49-66.

Frolow A., *Reserches sur la déviation de la quatrième crusade vers Constantinople,* 1955.

Gabrieli F., *Storici arabi delle Crociate,* Einaudi, Torino 1957.

Gabrieli F., *Friedrich II. und die Kultur des Islam, in Stupor mundi. Zur Geschichte Friedrichs II. von Hohenstaufen,* G. Wolf (ed.), Darmstadt 1982, pp.76-94.

Galterius Cancellarius (franç. Gautier), Bella Antiochena,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vol.V.

Gerish D., 'The True Cross and the Kings of Jerusalem', *Journal of the Haskins Society,* 8, 1996, pp.137-55.

Gertwagen R., The Crusader Port of Acre: Layout and Problems of Maintenance', in M. Balard (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6, pp.553-582.

Gertwagen R., 'Venetian Modon and its Port (1358-1500)', in Cowan A. (ed.), *Meditteranean Urban Culture 1400-1700,* Exeter 2000, 128-48.

Gertwagen R., 'The Venetian Colonies in the Ionian Sea and the Aegean in Venetian Defence Poli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editterranean Studies,* 12, 2002, pp.351-84.

Gesta Innocenti III, in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vol.CCXIV.

Gesta Obsidionis Damiete, in Röhricht, *Quinti Belli Sacri Scriptores Minores.*

Giardina A., Sabbatucci G., Vidotto V., *Manuale di Storia: il Medioevo vol.1,* Editori Laterza, Bari 1989.

Gibb H.A.R., 'The Arabic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Saladin', *Speculum,* 25, 1950.

Gibb H.A.R., *The Aiyūbids,* i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K.M. Setton (ed.), Madison-London 1969, II, pp.693-714.

Gibb H.A.R., *The Life of Saladin,* Oxford 1973.

Gilles R., *Les Templiers sont-is coupables? Leur histoire, Leur règle, leur procès,* Guichaoua 1957.

Gillingham J., 'Roger of Howden on Crusade', in Morgan D.O. (ed.), *Medieval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Christian and Islamic Word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1982.

Gillingham J., 'Richard I and the Scienc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in Gillingham J. and Holt J.C. (eds.), *War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J-O. Prestwich,* D.S. Brewer, Cambridge 1984.

Gillingham J., *Richard the Lionheart,* II edn., London 1989.

Gindler P., *Graf Balduin von Edessa,* Halle 1901.

Giovanni dal Pian del Carpine, *Historia Mongolorum,* in Pulle (ed.), Firenze 1913.

Glubb J.,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Story of the Mamluks,* Dorchester 1988.

Gore T.L., *The Campaigns of Saladin: Hattin and Arsuf 1187 and 1193 AD,* New York 1991.

Gottschalk H.L., *al-Malik al-Kamil von Egypten und seine Zeit,* 1958.

Gravett C. - Hook R., *Medieval Siege Warfare,* London 1991.

Gregoire H., *The Question of the Divers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 in 《Byzantion》, vol. XV, Boston 1941.

Grifone E., *La vita dei Templari,* 《Osservatore Romano》 n. 93 (1952), p.3.

Grousset R., *Histoire des croisades e du royaume franc de Jérusalem,* 3 vol., Paris 1936.

Guardini A., *Origine e fondatione di tutte le religioni e militie di cavallieri, con le croci e segni usati da quelle, erette da principi diversi in varii tempi...Ristampati per opera del Sig. Giacomo Cataneo,* Appresso Valentino Mortali, Venezia 1666, pp.22sgg..

Guillaume le Breton (ed. F. Delaborde), 'Gesta Philippi Augusti', in *Œuvres de Rigord et de Guillaume le Breton,* tome 1, Paris 1882.

Guillelmus Tyrensis (engl. William of Tyre),, 'Guillelmus Tyrensis archiepiscopus, Historia rerum in transmarinis partibus gestarum',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5 vol., Paris 1844-95.

Guillelmus Tyrensis (franç. Guillaume de Tyr), *Die latieinische Fortsetzung,* Salloch (ed.), Leipzig 1934.

Guillelmus Tyrensis (franç. Guillaume de Tyr), *Tractatus de Statu Saracenorum,* in Prutz, Kulturgeshichte der Kreuzzüge, p.118.

Hallam E. (edit.),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Wa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9.

Hamilton B., 'The Elephant of Christ: Reynald of Chatillon', in Baker D. (ed.), *Religious Motivation: Bi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Problems for the Church Historian,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15, 1978.

Hamma Z., *Syria: The Castle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rtous (Governorate),* Damascus 1994.

Hammer J. Von, *Histoire de l'Ordre des Assassins,* Paris 1833.

Harper R.P., 'Belmont Castle (Suba) - 1987',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CII-VIII, 1988-89, pp.13-14.

Harris J.,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03.

Hefele C.J., *Histoire des Conciles,* trans. H. Leclerq, Paris 1907.

Henry of Huntingdon, *De Captione Antiochiae,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vol.V, part II.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trans. Furcy Raynaud, 2 vol., Leipzig 1936.

Hillenbrand *C., A Muslim Principality in Crusader Times: Tarikh Mayyafariqin* (partial trans. of Ibn al-Azraq), Leiden 1990.

Historia et Gesta Ducis Gotfridi,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vol.V, part II.

Historia Diplomatica Friderici Secundi, J.L.A. Huillard - in Bréholles (ed.), 6 vol., Paris 1852-61.

L'Hi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échal, ed. P. Meyer, 3 vol., Librarie Renouard, SHF, Paris 1891-1901.

Historia Peregrinorum, in Chroust A. (1928).

Hitti P.H. (trans.), *Memoires of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Usam ibn Munqidh),* Beirut 1064 (reprint).

Hodgson M., *The order of Assassins,* Mouton, l'Aia, 1955.

Hoch M., 'The Choice of Damascus as the Objective of the Second Crusade; a Re-evaluation', in M. Balard (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6, pp.359-69.

Holt P.M.,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1517,* London 1986.

Holt P.M.,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aun and the Crusaders,* Leiden 1995.

Holtzmann R., *Wilhelm von Nogaret,* Freiburg im Breisgau 1898.

Holtzmann W., *Die Unionsverhandlungen zwischen Kaiser Alexios I und Papst Urban II im Jahre 1089,* in 《Byzantion》, vol.XXVIII, Leipzig 1928.

Housley N.J., *The Italian Crusades,* 3 vols., 1970-86.

Housley N., *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80; From Lyons to Alcazar,* Oxford 1992.

Howarth S., *The Knights Templar,* Collins 1982.

Hume E. E., *Medical Work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Baltimore 1940.

Huygens R.B.C., *De constructione castri Saphet,* 1981.

Ibn al-Athīr, *El-Kamel Altevarykh,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rientaux* 1-2, 1872.

Ibn al-Qalanisi (tr. R. Le Tourneau), *Damas de 1075 á 1154: traduction annotée d'un fragment de l'histoire de Damas d'Ibn al-Qalanisi,* Damas 1952.

Ibn Bibi, *Histoire des Seldjouqides,* in Houstman (ed.),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s Seldjouqides,* vol.III-IV, Paris 1902.

Ibn Wasil, *Histoire des Ayyubides,* in Reynaud, *Extraits,* in *Bibliothèque* de Michaud.

'Imād al-Dīn al-Isfahānī, *Conquête de la Syrie et de la Palestine par Saladin* (tr. Henri Massé), Paris 1972.

Iorga N., *Les Narrateurs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28.

Irwin R., 'The Mamluk Conquest of the County of Tripoli', in P.W. Edbury (ed.), *Crusade and Settlement,* Cardiff 1985, pp.246-50.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in Stubbs (ed.), 《Rolls Series》, London 1864.

Jacoby D., *Recherches sur la Mediterranée Orientale du XIIe au XVe Siècle,* London 1979.

Jacoby D., 'Crusader Ac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rban layout and topography', *Studi Medievali,* 3 ser. XX, 1979, pp.1-45.

Jacoby D., 'Mortmussard, Suburb of Crusader Acre: The First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in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Jerusalem 1982, 205-217.

Jacoby D., 'Les communes italiennes et les ordres militaires à Acre', in M. Balard (ed.), *Etat et colonisations au Moyen Age et à la Renaissance,* Rheims 1988, pp.193-214.

Jacoby D., *Conrad,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1187-1192),* in Balletto L. (ed), *Dai feudi monferrini e dal Piemonte ai nuovi mondi oltre gli Oceani,* Biblioteca della Società di Arte e Archeologia per le Province di Alessandria e Asti, 27, Alessandria 1993, pp.187-238.

Jacoby D., *Trade, Commodities and Shipping in the Medieval Meditterranean,* London 1997.

Jardin P. – Guyard P.,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Perrin, 1974.

Al-Jazari, *Chronique de Damas,* trans. de Sauvaget, Paris 1949.

Jean de Ibelin, Le Livre de Jean d'Ibelin,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Lois,* vol.I.

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e Pontificalis quae Supersunt,* in Lane-Poole (ed.), Oxford 1927.

Johns C.N., 'Excavations of Pilgrim's Castle, 'Atlit (1932-3): Stables at the south west of the suburbs', *Quaterly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of Palestine,* V, 1935, pp. 31-60.

Joinville J. sieur d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Wailly (ed.), Paris 1874.

Jones Ph., *The Italian City-State. From "Comune" to "Signoria",* Oxford 1997.

Jordan E., *Les Origines de la Domination Angevine en Italie,* Paris 1909.

Jordan W.C., *Louis IX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rusade,* 1979.

Kantorowicz E., *Frederick the Second,* London 1931.

Kedar B.Z., 'A Western Survey of Saladin's Forces in the Siege of Acre', in B.Z. Kedar (et al eds.), *Montjoie: Studies in the Crusade History in Honour of Hans Eberhard Mayer,* Aldershot 1977, pp.113-122.

Kedar B.Z. et al. (edits.),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Jerusalem 1982.

Kedar B.Z., *Crusade and Mission,* 1984.

Kedar B.Z. (ed.), *The Horns of Hatt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Latin East,* Jerusalem – London 1992.

Kedar B.Z., *The Franks in the Levant, 11th to 14th Centuries,* London 1993.

Kedar B.Z., 'The Outer Walls of Frankish Acre', *'Atiqot,* XXXI, 1997, 157-180.

Kennedy H.,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94.

King E.J., *The Rule, Statutes and Customs of the Hospitallers (1099-1310),* London 1924.

Kloner A. – Chen D., 'Bet Govrin: Crusader Church and Fortifications',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II, 12-3, 1983.

Kluger H., *Hochmeister Hermann von Salza und Kaiser Friedrich II. Ein Beitrag zur Früh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Ordens,* Marburg 1987.

Knappen M.M., *Robert II of Flanders in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C. Munro,* New York 1928.

Knowles D., *Christian Monasticism,* London 1969.

Kügler B., *Bohemund und Tankred,* Tübingen 1862.

La continuation de Guillaume de Tyr (1184-97), ed. M.R. Morgan, Paul Geuthner, Paris 1982.

La Monte J.L., 'Taki ed Din, Prince of Hama', in *The Moslem World,* XXXI, 1941, pp. 149-160.

La Monte J.L., *The Lords of Sidon,* in 《Byzantion》, vol.XVII, New York 1944.

La Monte J.L., *The Lords of Caesarea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in 《Speculum》, vol. XXII, Cambridge, Mass. 1947.

Lamy M., *Les Templiers. Ces Grand Seigneurs aux Blancs Manteaux,* Bordeaux 1997.

Lane C. Frederic,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Lane-Poole S., *Saladin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Greenhill Books, London 2002.

Lawrence T.E., *Crusader Castles,* edited by D. Pringle, Oxford 1988.

Leclerq J., 'L' attitude spirituelle de S. Bernard devant la guerre', *Collectanea Cisterciensis,* 36, 1974, pp.195-225.

Le Goff J., *Marchands et banquiers du Moyen Age,* P.U.F., Paris 1956 (tr. it., *Mercanti e banchieri nel Medioevo,* D'Anna, Firenze-Messina 1976).

Le Goff J., *La 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rthaud, Paris 1964 (tr. it. *La civiltá dell'Occidente medievale,* Einaudi, Torino 1981).

Le Goff J.,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Temps, travail et culture en Occident,* Gallimard, Paris 1977 (tr. it. *Tempo della chiesa e tempo del mercante: é altri saggi sul lavoro e la cultura nel Medioevo,* Einaudi, Torino 1977).

Le Goff J., *Saint Louis,*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6.

Le Goff J., *Saint François d'Assise,*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9.

Lehmann J., *I Crociati,* Garzanti, Milano 1978.

Levis - Mirepoix Duc De, *Philippe le Bel,* Paris 1936.

Lewis B., 'Saladin and the Assassin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5, 1952, pp.239-245.

Lewis B., *The Assassins: A Radical Sect in Islam,* London 1967.

Ligato G., 'Saladino e i prigionieri di guerra', in G. Cipollone (ed.), *La liberazione dei 'captivi' tra Cristianità ed Islam,* Vaticano 2000, pp.649-654.

Lillie R-J. (tr. J.C. Morris - J.E. Riding),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r States 1096-1204,* Oxford 1993.

Little 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Muslim accounts including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avid Ayalon,* edited by M. Sharon, Jerusalem - Leiden 1986.

Lizerand G., *Les dépositions du grand-maître Jacques de Molay au procès des Templiers (1307-1314),* Champion, Paris 1913.

Loewe H.M.J., *The Seljuks,*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IV, cap.X,B, Cambridge 1923.

Longnon J., *L'Empire Latin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49.

Lotharii Cardinalis (Innocentii III), *De miseria humanae conditionis,* a cura di M. Maccarone, Lucca 1955.

Louis IX, Lettre, in Baluzius, *Collectio,* vol.IV.

Lundgreen F., *Wilhelm von Tyrus und der Templerorden,* Berlin 1911.

Lyons U. - Lyons C. (tr.), *Ayyubids, Mamluks and Crusaders: Selections from the Tarikh al-Duwal wa'l-Muluk of Ibn al-Furat,* Cambridge 1971.

Lyons M.C., Jackson D.E.P., *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 CUP, Cambridge 1982.

Maalouf A., *Les Croisades vues par les Arabes,* Jean Claude Lattès (ed.), 1983.

Maissoneuve H., *É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nquisition,* Paris 1960.

Manselli R., *Normanni d'Italia alla Prima Crociata: Boemondo d'Altavilla,* in 《Iapigia》, vol.IX, Napoli 1940.

Markowski M., 'Richard Lionheart: bad king, bad crusader?', in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3, 1997, pp.351-365.

Marshall C.J., 'The Use of Charge in Battles in the East, 1192-1291', *Historical Research,* LXIII, 1900, pp.221-6.

Martin E.J., *The trial of the Templars,* AMS Press, New York 1978.

Marulli da Barletta G., *I natali delle religiose milizie dei Cavalieri Spedalieri e Templari e della religione del tempio l'ultima roina,* Malta 1643.

Mayer H.E., 'The Wheel of Fortune: Seigneurial Vicissitudes under King Fulk and Baldwin III of Jerusalem', *Speculum,* 65, 1990, pp.157-67.

Mayer H.E., *Kings and Lord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994.

Melville M., *La Vie des Templiers,* Paris 1978.

Menache S., *Clement V,* Cambridge 1998.

Ménard P., 'Les combattants en Terre Sainte au temps de Saladin et de Richard Cœur de Lion', in J. Paviot - J. Verger (eds.), *Guerre, pouvoir et noblesse au Moyen Age: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Philippe Contamine,* Paris 2000, pp.503-511.

Mesqui J., *Châteaux d'Orient, Lyban, Syrie,* Paris 2001.

Michaud J.,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1817-1822.

Michel A., *Amalfi und Jerusalem im griechischen Kirchenstreit, Orientalia Christiana Analecta,* n.121, Roma 1939.

Moeller C., *Godefroy de Bouillon et l'Avouerie du Saint-Sépulchre, in Mélanges Godfried Kurth,* vol.I, Liège 1908.

Mollat G., *The Popes at Avignon,* 1305-1378, London 1963 (tr.).

Morgan D.O., 'The Mongols in Syria, 1260-1300', in P.W. Edbury (ed.), *Crusade and Settlement,* Cardiff 1985.

Muhi ad-Din Ibn Abdazzahir, *Vies des Baybars et Qalawun,* in Reynaud, *Extracti,* in *Bibliothèque* de Michaud.

Muldoon J., *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1979.

Munro D. C., *The Speech of Pope Urban II at Clermont,*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I, New York 1906.

Munro D.C., *The Children's Crusad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XIX, New York 1914.

Narratio Itineris Navalis ad Terram Sanctam, in Chroust A. (ed.), 1928.

Nerses Shnorhali, catholicus, Elegia sulla caduta di Edessa,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I.

Nicolau - Konnari A., 'The Conquest of Cyprus by Richard the Lionheart and its aftermath', in *Epitirida tou Kentrou Epistimonikon Evrenon,* 26, Nicosia 2000, pp.25-123.

Nicholson R.H., *Tancred,* Chicago 1940.

Nicholson R.L., *Joscelyn III and the Fall of the Crusader States,* 1134-99, Leiden 1973.

Nicholson H., *Templars, Hospitallers and Teutonic Knights: Image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1128-1291,* Leicester 1993.

Nicholson H., 'Women on the Third Crusad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997.

Nicholson J.H., *The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The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Ashgate, Hampshire 1997.

Nicholson H. - Nicolle D., *God's Warriors: Knights Templar, Saracens and the Battle for Jerusalem,*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5.

Nicolle D., *Saladin and the Saracens,*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1986.

Nicolle D., 'Ain al Habis. The Cave de Sueth', *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XVIII, 1988, pp. 113-128.

Nicolle D., *Hattin 1187: Saladin's greatest victory,*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1993.

Nicolle D., *The Mamluks 1250-1517,* Osprey Publishing Ltd., London 1993.

Nicolle D., *Knight of Outremer 1187-1344 AD: weapons, armour, tactics,*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1996.

Nicolle D., *Arms and Armour of the Crusading Era, 1050-1350 (Islam, Eastern Europe and Asia),* Greenhills Books, London 1999.

Nicolle D., *Knight Hospitaller (1): 1100-1306,*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1.

Nicolle D., *Knight Hospitaller (2): 1306-1565,*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1.

Nicolle D., *The First Crusade 1096-99,*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3.

Nicolle D., *Crusader Castles in the Holy Land 1097-1192,*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4.

Nicolle D., *Crusader Castles in the Holy Land 1192-1302,*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5.

Nicolle 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5.

Nicolle D., *The Third Crusade 1191: Richard the Lionheart, Saladin and the struggle for Jerusalem,*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5.

Nicolle D., *Crusader Castles in Cyprus, Greece and the Aegean 1191-1571,*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7.

Nicolle D., *Teutonic Knight 1190-1561,*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7.

Nicolle D., *The Second Crusade 1148: Disaster outside Damascus,* Osprey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9.

Norwich J.J., *Byzantium: The Apogee,* London 1991.

Norwich J.J., *Byzantium: The Decline and Fall,* London 1995.

Oldenbourg Z., *Les Croisades,* Gallimard, Paris 1965.

Ollivier A., Les Templier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58.

Otto of Friesing (tr. C.C. Mierow), *The Deeds of Frederick Barbarossa,* New York 1953.

Papa Gregorius VIII's bolla, *Audita tremendi* (October-November 1187), trans. in Riley-Smith J., *The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 London 1981.

Papa Gregorius IX, Epistolae,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pistolae Saeculi XIII,* vol.I.

Papa Innocentius III, Epistolae, in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voll.CCXIV-CCXVII.

Papa Paschalis II, Epistolae XIX and XXII, in Hagen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Papa Paschalis II, Epistolae, in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vol.CLXIII.

Papa Urbanus II, Epistolae II e III, in Hagen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Parodi E., *Storia dei Cavalieri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Bari 1907.

Parry V.J. & Yapp M.E. (edits),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5.

Partner P., *The Murdered Magicians: The Templars and their My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2.

Patto dei Genovesi con Boemondo, XIV, in Hagenmeyer, *Die Kreuzzugsbriefe.*

Pelliot P.,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in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vol.XXIII-XXIV et XXVIII, Paris 1922-32.

Pernoud R., *Les Templier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4.

Phillips J. P. - Hoch M. (eds.), *The Second Crusade: Scope and Consequences,* Manchester 2001.

Piers Paul Read, *The Templars,* Weidenfeld & Nicolson, Great Britain 1999.

Piquet J., *Les Banquiers du Moyen Age: Les Templiers,* Paris 1939.

Potthast A.,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 2 Bde., Berlin 1874-75.

Powell J. M., 'Frederick II, the Hohenstaufen, and the Teutonic Order in the Kingdom of Sicily', in M. Barber (ed.), *The Military Orders: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Aldershot 1994, pp.236-44.

Prawer J., 'The Battle of Hattin', in *Crusader Institutions,* Oxford 1980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La Bataille de Hattin', in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XIV, 1964).

Prawer J., *Histoire du royaume franc de Jérusalem,* C.N.R.S., Paris 1975.

Prawer J., 'Crusader Cities', in H.A. Miskimin et al. (edits.), *The Medieval City,* New Haven 1977, pp.179-99.

Prestwich J. O., 'Richard Cœur de Lion: Rex Bellicosus', in J. L. Nelson (ed.), *Richard Cœur de Lion in History and Myth,* London 1992.

Pringle D., 'King Richard I and the Walls of Ascalon', *Palestinian Exploration Quaterly,* 116, 1984.

Pringle D., 'Reconstructing the Castle of Safad',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terly,* CXVII, 1985, pp.139-149.

Pringle D., 'A Thirteenth Century Hall at Montfort Castle in Western Galilee',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LXVI, 1986, pp.52-81.

Pringle D., 'Towers in Crusader Palestine', *Château Gaillard 1992,* XVI, Caen 1992, pp.335-370.

Pringle D., 'Town Defence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Corfis, I.A. and Wolfe M. (ed.), *The Medieval City under Siege,* Woodbridge 1995, pp.69-121.

Pringle D., 'The Castle and Lordship of Mirabel', in Kedar B.Z. (ed.), *Montjoie - Studies in Crusader history in Honour of Hans Eberhard Mayer,* Aldershot 1997, pp.91-112.

Pringle D., 'Templar castles between Jaffa and Jerusalem', in Nicholson H. (ed.), *The Military Orders: Welfare and Warfare,* Ashgate, Aldershot 1998.

Pringle D., *Fortification and Settlement in Crusader Palestine,* Aldershot 2000 (reprint).

Pringle D. - De Meulemeester J., *The Castle of al-Karak, Jordan,* Namur 2000.

Pringle D. - Harper R., *Belmont Castle, the Excavation of a Crusader Stronghold in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British Academy monographs in Archaeology 10, Oxford 2000.

Pryor J.H., 'Transportation of horses by sea during the era of the Crusades: Eighth century to 1285 A.D.', *The Mariner's Mirror,* vol. LXVIII, 1982, pp.9-27 and 103-125.

Pryor J.H., 'The Naval Architecture of Crusader Transport Ships', in *The Mariner's Mirror,* 70, 1984.

Pryor J. H.,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UP, Cambridge 1988.

Pryor J.H., *The Crusade of Emperor Frederick II; 1220-29: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Evidence,* in 《The American Neptune》, 52, 1992, pp.113-32.

Pulle L., *Dalle Crociate ad oggi. Rassegna deli ordini militari ospitalieri religiosi e di cavalleria di tutto il mondo 1048-1904,* Menotti Bassani & Co., Milano 1905.

Purcell M., *Papal Crusading Policy 1244-91,* 1975.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de Belles-Lettres, 16 vol.,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841-1906:

Documents Arméniens, 2 vol., 1869-1906.

Historiens Grecs, 2 vol., 1875-81.

Historiens Occidentaux, 5 vol., 1844-95.

Historiens Orientaux, 5 vol., 1872-1906.

Regan G., *Saladin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London 1987.

Regan G., *Lionhearts, Saladin and Richard I,* London 1998.

Rey E. G., *Les Seigneurs de Barut et Les Seigneurs de Montréal et de la Terre d' Oultrejourdain,* in 《Revue de l'Orient Latin》, vol.IV, Paris 1896.

Riant P., *Expéditions et Pèlerinages des Scandinaves en Terre Sainte,* Paris 1863.

Richard of Devizes, *The Chronicle of Richard of Devizes of the Time of King Richard the First,* ed. and trans. J. Appleby, Nelson, London and Edinburgh 1963.

Richards D., "Imād al-Dīn al-Isfahānī: Administrator, Littérateur and Historian', in Shatzmiller M. (ed.), *Crusaders and Muslims in twelfth century Syria,* E. Brill, Leiden 1993.

Richards D.S., *The Rare and Excellent History of Saladin* (or *al-Nawādir al-Sultāniyya, wa'l-Mahāsin al-Yūsufiyya* by Bahā' al-Dīn Ibn Shaddād), Ashgate, Hampshire 2002.

Richard J., *Chypre sous les Lusignans: Documents chypriotes es archives du Vatican (XIVe et Xve siècles),* 1962.

Richard J., *Philippe Auguste, la croisade et le royaume,* in Bautier H. (ed),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 Le temps des mutations,* Paris 1982, pp.411-424.

Richard J., *Croisés, missionaires et voyageurs,* London 1983.

Richard J., *Saint Louis,* 1983.

Rihaoui A., *The Krak of the Knights,* Damascus 1996.

Riley-Smith J.,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Latin Syria,* Cambridge 1964.

Riley-Smith J., *The Knights of Sain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c.1050-1310,* London 1967.

Riley-Smith J., 'The Templars and the castle of Tortosa in Syria; an unknown

document concerning the acquisition of the fortres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V, 1969, pp.278-288.

Riley-Smith J., 'A Note on the Confraternitie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44, 1971, pp.301-08.

Riley-Smith J.S.C., '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D. Baker (ed.),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1973.

Riley-Smith J., *The Feudal Nobility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Macmillan, London 1973.

Riley-Smith J.S.C.,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and the First Crusade', in *Studia gratiana,* 20, 1976.

Riley-Smith J.S.C., *What were the Crusades?,* 1977.

Riley-Smith J., 'The Survival in Latin Palestine of Muslim Administr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nds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P.M. Holt (ed.), 9-23, Warminster, England 1977.

Riley-Smith J.S.C., 'The Templars and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Cilician Armenia', in T.S.R. Boase (ed.), *The Cilician Kigdom of Armenia,* London 1978, pp.92-117.

Riley-Smith, Louise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Crusades: Idea and Reality 1095-1274. Documents of Medieval History,* 4, Edward Arnold, London 1981.

Riley-Smith J.S.C.,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1986.

Riley-Smith J.S.C., *The Crusades - A Sho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iley-Smith J.S.C., 'The Venetian Crusade of 1122-24', in *I comuni italiani nel regno latino di Gerusalemme,* edited by B.Z. Kedar and G. Airaldi, 1987.

Riley-Smith J., 'Family Trad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Second Crusade', in M. Gervers (ed.), *The Second Crusade and the Cistercian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1.

Riley-Smith J., *The Atlas of the Crusades,* New York 1991.

Riley-Smith J., 'History, the Crusades and the Latin East, 1095-1204: A Personal View', in M. Shatzmiller (ed.), *Crusaders and Muslims,* Brill, Leiden 1993.

Riley-Smith J.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The Crusading Movement and Historians', in J.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The Minds of Crusaders to the East, 1095-1300', in J.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Revival and Survival', in J.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The First Crusaders, 1095-11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Riley-Smith J., *Hospitallers: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Hambledon Press, 1999.

Roche J.T., 'Conrad III and the Second Crusade; Retreat from Dorylaion', *Crusades,* 5, 2006, pp.85-98.

Roger of Howden, *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 ed. W. Stubbs, 2 vols., RS 49, Longman, London 1867.

Roger of Howden, *Chronica,* ed. W. Stubbs, 4 vols., RS 51, Longman, London 1868-71 (translated by H.T. Riley (1853), as *The Annals of Roger of Hoveden*).

Rogers R., *Latin Siege Warfac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xford 1992, pp.212-236.

Röhricht R. (ed.), *Regesta Regni Hierosolymitani,* 2 vols., Libraria Academica Wagneriana, Innsbruck 1893, 1904.

Röhricht R., *Etudes sur les Derniers Temps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in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vol.II, Paris 1884.

Röhricth R., Lettres de Ricoldo de Monte-Croce sur la prise d'Acre (1291)', in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II,* Paris 1981 (reprint 1964), pp.258-296.

Roll I., 'Medieval Apollonia-Arsuf; A Fortified Coastal Town in the Levant of the Early Muslim and Crusader Periods', in M. Balard (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6, pp.595-606.

Roscher H., *Papst Innocenz III und die Kreuzzüge,* 1969.

Round J.H., 'Some English Crusaders of Richard I',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VIII, 1903.

Runciman S., *The Holy Lance found at Antioch,* in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 LXVIII, Bruxelles 1950.

Runciman S.,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London 1951-54.

Russell F.H., *The Just war in the Middle Ages,* 1975.

Sadeque S.F., *Baybars I of Egypt,* Oxford 1956.

Salvemini G., *L' abolizione dell' Ordine dei Templari (a proposito di una recente pubblicazion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Quinta Serie, Tomo XV (1895), pp.225-264.

Sanudo Marino, *Chronique de Romanie,* in Mas Latrie (ed.), *Nouvelles Preuves.*

Sauvaget J., *Historiens arabes,* Adien-Maisonneuve, Paris 1946.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Revival and Survival', in J. Riley-Smith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Riley-Smith J., *The First Crusaders, 1095-11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Riley-Smith J., *Hospitallers: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Hambledon Press, 1999.

Roche J.T., 'Conrad III and the Second Crusade; Retreat from Dorylaion', *Crusades,* 5, 2006, pp.85-98.

Roger of Howden, *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 ed. W. Stubbs, 2 vols., RS 49, Longman, London 1867.

Roger of Howden, *Chronica,* ed. W. Stubbs, 4 vols., RS 51, Longman, London 1868-71 (translated by H.T. Riley (1853), as *The Annals of Roger of Hoveden*).

Rogers R., *Latin Siege Warfac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xford 1992, pp.212-236.

Röhricht R. (ed.), *Regesta Regni Hierosolymitani,* 2 vols., Libraria Academica Wagneriana, Innsbruck 1893, 1904.

Röhricht R., *Etudes sur les Derniers Temps du Royaume de Jérusalem, in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vol.II, Paris 1884.

Röhricth R., Lettres de Ricoldo de Monte-Croce sur la prise d'Acre (1291)', in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II,* Paris 1981 (reprint 1964), pp.258-296.

Roll I., 'Medieval Apollonia-Arsuf; A Fortified Coastal Town in the Levant of the Early Muslim and Crusader Periods', in M. Balard (ed.), *Autour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Paris 1996, pp.595-606.

Roscher H., *Papst Innocenz III und die Kreuzzüge,* 1969.

Round J.H., 'Some English Crusaders of Richard I',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VIII, 1903.

Runciman S., *The Holy Lance found at Antioch,* in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 LXVIII, Bruxelles 1950.

Runciman S.,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London 1951-54.

Russell F.H., *The Just war in the Middle Ages,* 1975.

Sadeque S.F., *Baybars I of Egypt,* Oxford 1956.

Salvemini G., *L' abolizione dell' Ordine dei Templari (a proposito di una recente pubblicazion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Quinta Serie, Tomo XV (1895), pp.225-264.

Sanudo Marino, *Chronique de Romanie,* in Mas Latrie (ed.), *Nouvelles Preuves.*

Sauvaget J., *Historiens arabes,* Adien-Maisonneuve, Paris 1946.

Trimingham J.S., *The Sufi Orders in Islam,* Oxford 1971.

Tritton A.S. - Gibb H.A.R., 'The First and Second Crusades from an Anonymous Syriac Chronicle (Part Tw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93, pp.273-305.

Tronci P. (ed.), Annales Pisani, 4 voll., Pisa 1828-29.

Turner R.V. - Heiser R.R., *The Reign of Richard Lionheart: Ruler of the Angevin Empire 1189-1199,* London 2000.

Vacandard E., *Vie de Saint Bernard, Abbé de Clairvaux,* 2 vol., Paris 1895.

Van Cleve T.C., 'The Fifth Crusade', in K.M. Setton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Madison-London 1969, II, pp.429-62..

Van Cleve Th.C., *The Emperor Frederich II of Hohenstaufen. Immutator Mundi,* Oxford 1972.

Van Otroy F., *Saint François et son Voyage en Orient,* in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 XXXI, Bruxelles 1912.

Villehardouin G.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Faral (ed.), 2 vol., Paris 1938-39.

Vita Urbani II, in Liber Pontificalis, vol. II.

Walker A., *The Knights Templar,* Aberdeen 1887.

Ward J.M.U., *The Rule of the Templars: The French Text of the Rule of the Order of the Knights Templar,* Woodbridge 1992.

Winkelmann E., *Kaiser Friedrich II.,* Leipzig 1889-97, 2 Bde..

Wise T., *The Knights of Christ,* London 1984.

Wolf G. (ed.), *Friedrich Barbarossa,* Darmastadt 1975.

Wolff R.L.,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1204-1261,* in K.M. Setton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Madison-London 1969, II, pp.187-233.

Yewdale R.B., *Bohemund the First,* New York 1917.

Yunini, Qutb al-Din al- (ed. and tr. A. Melokonian), *Die Jahre 1287-1291 in der Chronik al-Yuninis* (Dhayl mir'at al-Zaman), Frieburg 1975.

Zacharuadou E., *Trade and Crusade: Venetian Crete & the Emirates of Menteshe and Aydin, 1300-1415,* Venezia 1983.

Ziadeh N.A., *Urban Life in Syria under the Early Mamluks,* Westport 1953.

Ziegler G., *Les Templiers. Culture, art, loisirs,* Paris 1973.

Zinsmaier P., *Zur Diplomatik der Reichsgesetze Friedrich II. (1216, 1220, 1231/32, 1235),* in 《ZRG. Germ. Abt.》, 80, 1963, pp.82-117.

十字军的故事
[日]盐野七生　著
万翔 杨思敏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字 数：68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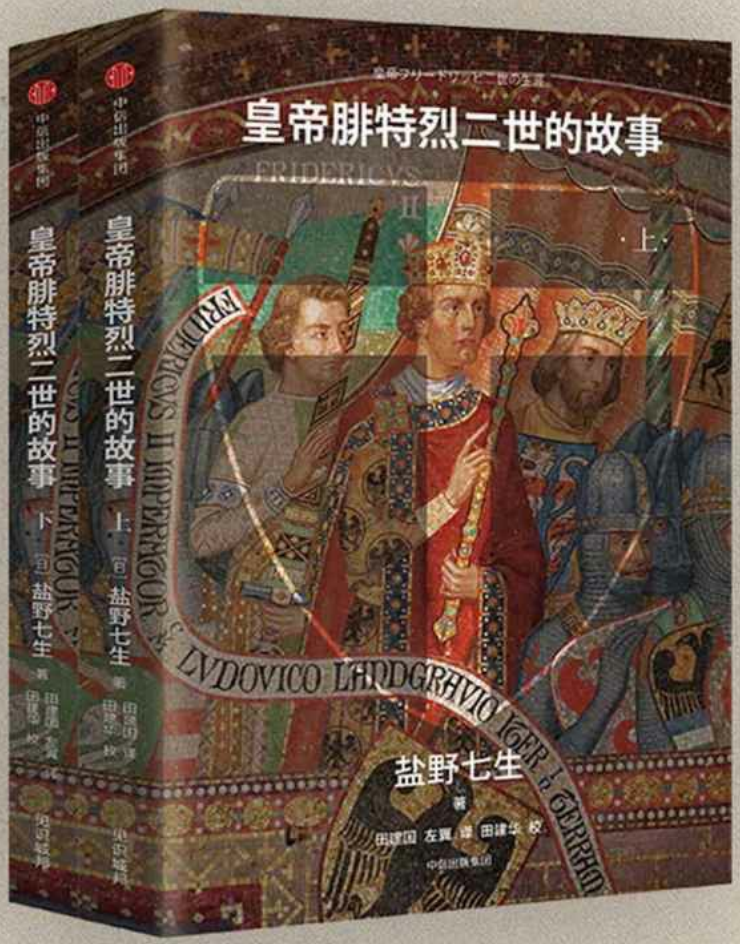
纸书书号：978-7-5086-7805-4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套装共2册）



中信出版集团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套装共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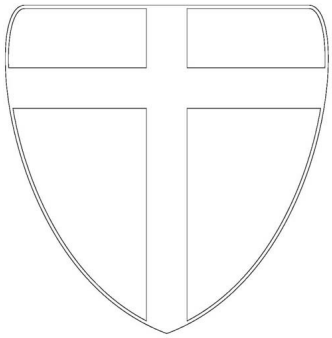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左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上册）
致读者
第一章 孩提时代
第二章 17岁奋起
第三章 作为皇帝
第四章 不流血的十字军
第五章 坚决走向法治国家
第六章 “腓特烈治下的和平”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下册）
第七章 一切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间奏曲（intermezzo）
第八章 冲突再起
第九章 腓特烈死后
年表
代跋 盐野七生及其笔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
返回总目录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上册）



在写这本书，这本讲述用鸟狩猎的书时，我内心的体会只有一句话：

一切都如实写来，一如所见地写来。

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地一以贯之，才能打开迄今为止尚无人尝试过的通向科学之路——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与作为经验才能理解的知识结合起来。

对我而言，论述何为灵魂是无用之劳，因为灵魂为肉眼所不能见。用反复实验所得的知识来探明事理反倒有用。

而且，只要以这种知识为基础，人们便能避免误入歧途的危险。

没有科学上的经验，就没有真正的知识。

第一段引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著《驯鹰的艺术》[1]（*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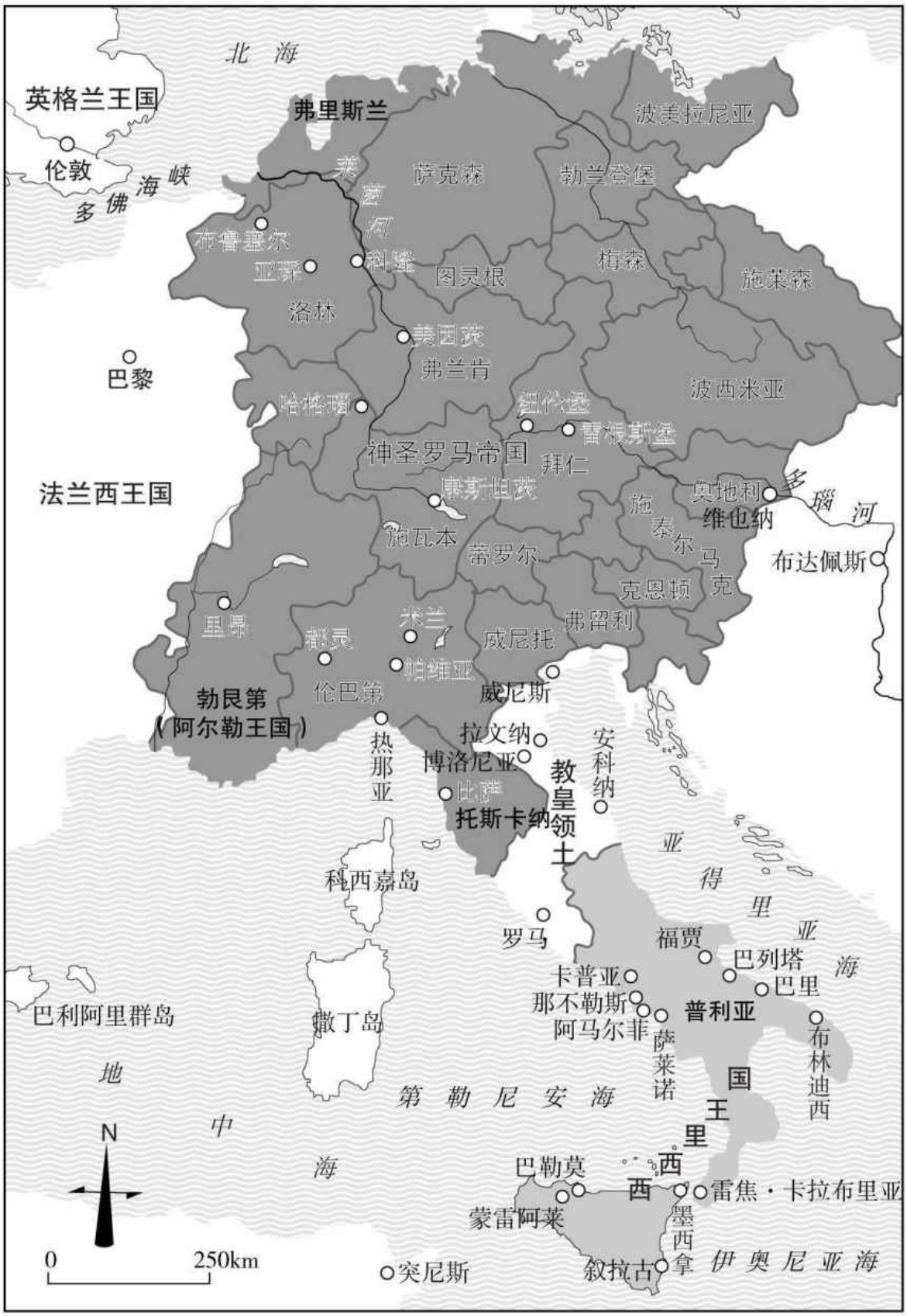
第二段引自莱昂纳多·达·芬奇所著《绘画论》（*Trattato della Pittura*）一书。

两段话都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所写，但中间横亘着250年的岁月。

腓特烈生于1194年，卒于1250年。莱昂纳多生于1452年，卒于1519年。

---

[1] 书名原文“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系拉丁文，直译为“论用鸟狩猎的技术”。（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出处外皆为译者所加。）


北 海
英格兰王国
弗里斯兰
伦敦
多佛海峡
萨克森
勃兰登堡
波美拉尼亚
莱茵河
布鲁塞尔
亚琛
科隆
图灵根
梅森
施莱森
洛林
美因茨
巴黎
弗兰肯
波西米亚
哈格瑙
纽伦堡
雷根斯堡
神圣罗马帝国
拜仁
法兰西王国
康斯坦茨
奥地利
维也纳
多瑙河
施瓦本
施泰尔马克
蒂罗尔
布达佩斯
克恩顿
里昂
米兰
都灵
帕维亚
弗留利
威尼托
勃艮第
（阿尔勒王国）
伦巴第
威尼斯
热那亚
拉文纳
博洛尼亚
比萨
安科纳
教皇领土
托斯卡纳
科西嘉岛
亚得里亚海
罗马
福贾
巴列塔
巴里
卡普亚
那不勒斯
阿马尔菲
普利亚
萨莱诺
布林迪西
巴利阿里群岛
撒丁岛
地中海
第勒尼安海
西西里王国
巴勒莫
蒙雷阿莱
雷焦·卡拉布里亚
墨西拿
叙拉古
伊奥尼亚海
突尼斯
N
0
250km

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欧洲

致读者

那是一桩旧事，发生在45年前的昭和43年（1968年）。当时，我已经写完了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的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杂志连载期间，我有机会见到了林健太郎[1]先生。他曾写信对我说他“读得很有趣”。下面是我与先生见面时的一段对话。

“今后你会写什么呢？”

“我想写腓特烈二世。”

“哦，为什么？”

“不知道，总觉得放不下他。”

“可是坎托罗威奇[2]已经写过他的评传了呀。”

“我买了那本书，但还没有读。”

先生微微一笑。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就任东京大学校长前一直教授德国近现代史。我很高兴，我同他不用多余的解释就能相互理解。

他是第一个在报纸的时事评论上谈到我的人。此后，我也把所有的著作都赠给过他。如果回国，我便会去拜会他。每次见面，先生都会问：什么时候写腓特烈啊？而每次我都会回答说，还没有轮到他呢。先生便报以微笑。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循环往复。

轮到写某人，这对像我这样写东西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内心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与其说完成学习和调查所以开笔，不如说等

轮到了再动笔，写下去的态度也来得扎实。

《罗马人的故事》写完后，也曾有人问过我：下面会写什么。我的回答是：

> “写了文艺复兴，写了古罗马，我才发现这中间还有一千年的岁月未曾染指。我想下面就把这一段被称为中世纪的一千年写掉。”

就这样，我向中世纪发起了挑战。想起来，我以前所写《海都物语》的前半部分已经写过中世纪。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跨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时期的海洋城邦国家。立足于西欧来看中世纪，这本书也就基本够了。

然而，说到中世纪，就有必要更加广泛地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这两个方面统统纳入视野。于是，我写了两卷本的《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书中通过聚焦于海盗与海军，写了那个时代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南欧的基督教徒隔海对峙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四卷本的《十字军的故事》，主题是北欧基督教世界与中近东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

然后，这些描写中世纪作品的最后一部，就是这部《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这部作品写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对立以及围绕神权和俗权的对决。所以在感觉上，这也是我写中世纪的压轴之作。

不过，所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中世纪的一千年为舞台。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作品写的是同一个时代，但聚焦的对象不同。

所以，我能向读者保证的只有一条，如果您读了这些作品，尤其是

在中世纪作品中有压轴之感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您就会了解中世纪是怎样的时代。而且您还能读懂中世纪与古代的不同之处，知道为什么中世纪之后会出现文艺复兴。

此外，作品能否最为明快地展示出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差异，还取决于书中能否介绍好出场人物的“脸谱”。在我的作品中，古代系列和文艺复兴系列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相反，中世纪系列的作品却未能做到。因为中世纪的名人们，就连狮心理查[3]、法兰西王腓力[4]，还有这位腓特烈，都没有留下肖像。中世纪被画下“脸谱”的，只有人们信仰的对象——上帝、耶稣基督和圣人。

所画“脸谱”的真实性与直视人性现实的态度成正比。所以，仅此一端便可让人想象得出中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盐野七生

2013年初秋于罗马

---

[1] 林健太郎（1913—2004），日本历史学家，专攻德国近现代史。曾任东京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校长，并曾任过一届国会议员。著作有《德意志近代史研究》《德国革命史》《德意志史论集》《史学概论》《林健太郎著作集（4卷）》等。

[2] 恩斯特·哈特维希·坎托罗威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德国及美国历史学家，专攻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及艺术史。曾当兵参加过“一战”，后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并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38年流亡英国，后到美国，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其著作《皇帝腓特烈二世》（Kaiser Fredrich der Zweite）出版于1927年。

[3] 狮心理查（理查一世，Richard I，the Lionheart,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年在位。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与埃及的萨拉丁作战，获武勇之名，后在远征法国时战死。

[4] 腓力二世（Philippe II，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年在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围绕法兰西境内的英国领地与英国抗争，占领了诺曼底。他抑制诸侯，加强王权，有“奥古斯都（尊严王）”之称。

第一章
孩提时代

帐幔中

意大利半岛形状像只长筒靴，向地中海中央伸去。靴子的腿肚子上有个名叫耶西（Jesi）的小城。从此处东去20公里便可到达海边，地理上可算作是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但与紧挨着的传统海港城市安科纳不一样，耶西自古就跟大海缘分浅薄。这里的人一直专事农牧业，过着简朴安稳的日子。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与天才和伟人也没有什么缘分。

1194年，就在这座耶西小城里，人们做完基督圣诞的弥撒刚走出教堂，便被展现在眼前的、小城从未见过的光景弄得瞠目结舌。说是展现，但城很小，教堂前的广场也不大，平时也就是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可是今天，却要在广场上支起一顶巨大的帐篷。

所有居民都知道，皇后康斯坦丝几天前来到了这座小城。皇后的随行护卫是德意志骑士，他们身穿铠甲的身影在这座意大利小城里煞是引人注目。

可是，为什么要支这顶大帐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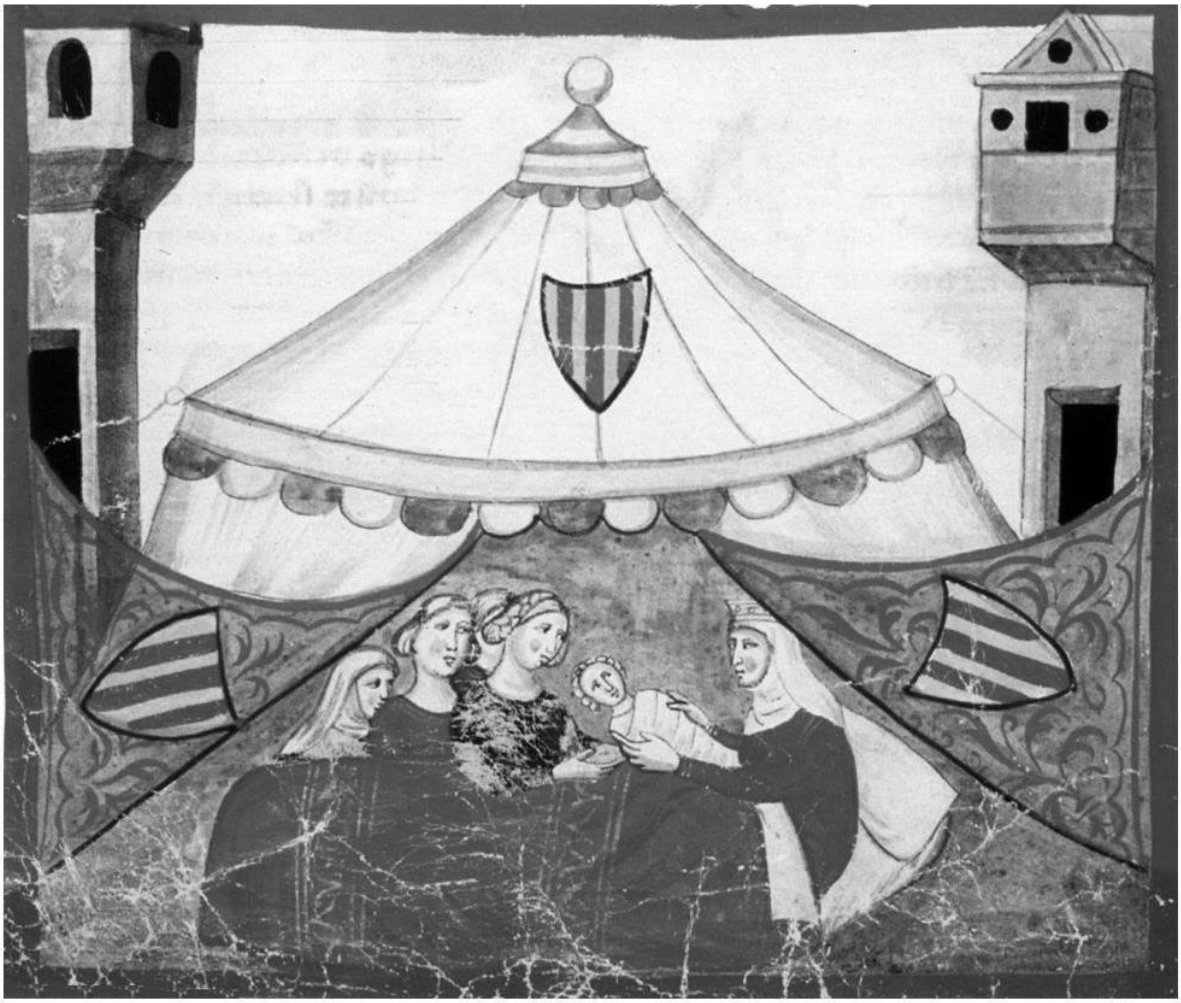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丝的丈夫是亨利[1]皇帝，要去西西里举行西西里王的登基典礼，她得随行前往。诺曼王朝[2]占据西西里王位已经有200年了，可目前只有她才是唯一的正统继承人。亨利是当今神圣罗马帝国的在位皇帝。但他之所以能把只有西西里王国的主人才能拥有的权力弄到手，也是因为他娶了康斯坦丝的缘故。

那年，康斯坦丝正有孕在身。她同亨利结婚都快9年了，一直没有

怀孕，这次终于怀上了孩子。现在，孕妇的年龄已过40岁。当丈夫的当然懂得，万事都需要考虑周全。然而，登基典礼又拖不得，皇帝只好先行一步赶去西西里。

康斯坦丝原想一路慢走，跟上先行的丈夫。她预定在巴里乘船去西西里王国的首都巴勒莫。不曾想，她刚刚来到离巴里还有遥远路程的耶西，就突然感到即将临盆。只能在这里生孩子了，却又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分娩。

皇后下令在耶西城里唯一可以聚集众人的地方——小城主教堂前广场中央，紧急搭建一顶大帐篷，并要求城里的实力人物和耶西城的全体居民都来见证她的分娩。



腓特烈的诞生（引自同时代编年史）

康斯坦丝在32岁那年同21岁的亨利结婚。亨利的父亲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3]，在历史上以绰号“红胡子”而著称。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年龄也相差了10来岁，康斯坦丝甚至一连8年多都没有怀孕。尽管如此，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一直很幸福。

正因为如此，康斯坦丝才想在不容任何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生下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的孩子，不仅是现任皇帝的儿子，迟早还将登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而且，她已年过四旬，这孩子很有可能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这就更有必要明确这个孩子绝对是出自己腹。她请全体

耶西居民见证分娩，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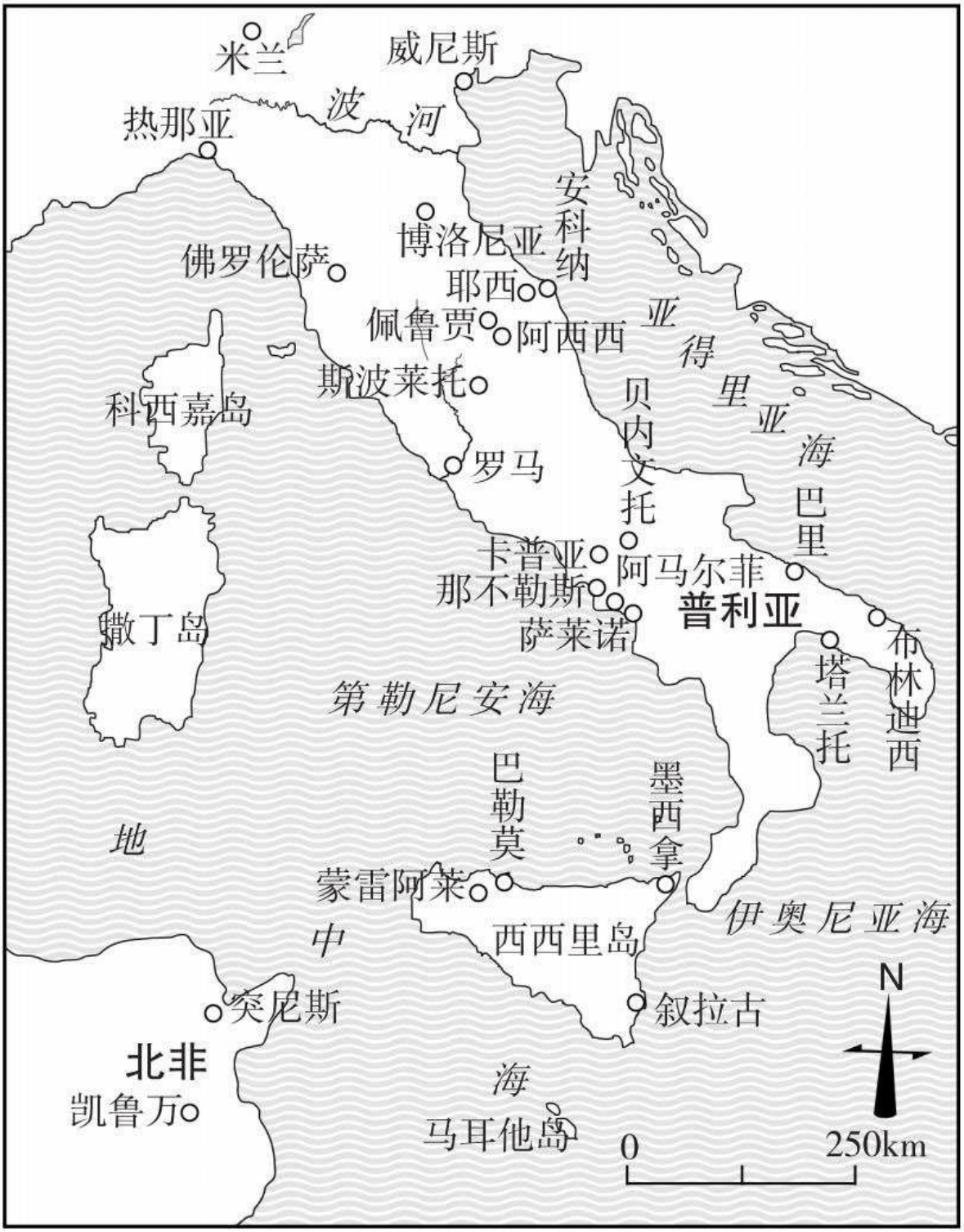
12月26日是基督圣诞的第二天，也是著名的天主教会第一位殉教者圣司提反[4]的祭日。因为这两天连着，基督教徒一般都会连续歇业以纪念。

那天，在大帐篷里，康斯坦丝躺在搬来的床上，周围站满了耶西实力人物的妻子们，已无立脚之地。男人们围在帐篷的外面，老百姓和孩子则挤满了广场。

近午时分，婴儿有力的哭声响起，打破了笼罩在广场上的异常的宁静。

不论是皇帝的孩子，还是农夫的儿子，天真无邪的婴儿哭声总会让人的内心温和起来。整个广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祝福幼子诞生的大喜事。

就这样，日后成为皇帝的腓特烈二世没有生在华丽的宫殿或壁垒森严的城堡深处，而是于1194年12月26日在小城耶西广场上支起的帐幔里开始了他的一生。就在前一天，他的父亲亨利如愿以偿地于圣诞节当天在巴勒莫的主教堂里，把西西里王的王冠戴在了头上。这顶王冠就是统治那不勒斯以南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全岛的权力象征。


米兰
威尼斯
热那亚
波
河
安科纳
博洛尼亚
佛罗伦萨
耶西
佩鲁贾
阿西西
亚
得
里
亚
海
斯波莱托
科西嘉岛
贝内文托
罗马
巴里
卡普亚
阿马尔菲
那不勒斯
普利亚
撒丁岛
萨莱诺
布林迪西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巴勒莫
墨西拿
地
蒙雷阿莱
伊奥尼亚海
中
西西里岛
突尼斯
叙拉古
北非
海
凯鲁万
马耳他岛
N
0
250km

意大利半岛

如果生来就是老百姓的孩子，出生后便会被母亲抱在怀中养育。但是，如果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父亲，有一个西西里女王当母亲，这孩子就不允许这样抚养了。

这倒不是因为宫廷规矩严格。到了12世纪和13世纪之交的时代，漫长的中世纪已经进入了后半期，欧洲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还存在着严格的宫廷规矩。那可是显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这个时代，统治欧洲的概念只有弱肉强食。

刚刚出生的腓特烈只是在康斯坦丝恢复体力、再次启程前往丈夫身边前的几天里感受到了母亲的体温。康斯坦丝把幼子托付给了地位类似女官长的乌尔斯林根公爵夫人。想到与丈夫重逢之后夫妇将会面临的困难，康斯坦丝希望宝贝独生子能在听不到武器撞击声的地方成长。乌尔斯林根公爵是意大利中部斯波莱托公国的领主。斯波莱托公国位于现在的翁布里亚大区，丘陵缓坡相连，其间山谷开阔，映演着四季的变换，美不胜收。

翁布里亚点缀着闻名的富饶小城斯波莱托、佩鲁贾和阿西西。腓特烈在这里长到3岁。在这期间，他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母亲。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快满两岁时在受洗仪式上。亨利皇帝回过一次德意志。在再次赶往意大利南方的途中，他改变了行程，绕道阿西西，参加了独生儿子一拖再拖的洗礼。

如果是老百姓的孩子，出生后一般都会马上举行基督教徒最重要的洗礼仪式。之所以急着举行洗礼仪式，是因为人们害怕如果孩子在洗礼之前死掉，那他可就再也进不了天堂了。腓特烈却在不能保证进天堂的状态下过了整整两年！洗礼仪式的一般形式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神父在孩子头上洒一点圣水。而腓特烈已经两岁了，是自己站着接受洗礼的。这无疑是一幅罕见的景象。

不过，这可是皇帝兼西西里王的独生子。不光是阿西西，就连附近

斯波莱托、佩鲁贾等地的主教、祭司们也都赶来参加了在阿西西主教堂举行的洗礼仪式。他们挤满了教堂，人人都穿着祭典用的金银绣花华丽圣衣。阿西西城的实力人物也是妻儿总动员，列席了洗礼仪式。几乎可以肯定，那天挤在教堂里的人群中，有一位就是年方14岁的方济各[5]。他是当时阿西西的实力人物纺织品商人伯尔纳道奈的独生子。阿西西的少年们在整个洗礼仪式全过程中要连续演唱圣歌。

晚则晚矣，但腓特烈毕竟办了洗礼仪式。父亲亨利大概觉得已经完成了做父亲的义务，第二天便早早踏上旅途，奔意大利南方而去。由于情况不允许父亲带着两岁的幼子同去，洗礼那天的父子见面竟是腓特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此后一年，幼子一直留在翁布里亚。

实力商人的儿子方济各肯定参加了洗礼仪式。但那个时期，在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日后圣人的模样。他是个纨绔子弟，一心只想着跟有钱人家的孩子疯玩。直到8年后，他突然得到上帝的启示，做了一名修道僧。可见，就算住在同一个城市，在公爵的城堡里精心养大的3岁幼子与满城奔跑、青春洋溢的15岁少年，也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的。

然而，正是这两个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虽然生活在中世纪，却开启了通往文艺复兴的大门。他们生活的世界不同，一个是神职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但他们在破除支配中世纪的僵化观念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而且，用现在的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混血儿。

方济各比腓特烈年长12岁，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兰西人。腓特烈的名字在意大利语中念作“费德里科”，他的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法兰西裔意大利人。

诺曼王朝

在这里，也许有必要解释一下法兰西裔意大利人的概念。

腓特烈的母亲康斯坦丝姓阿尔塔维拉（Altavilla）。这个姓氏颇具娘家诺曼王族的气派。阿尔塔维拉是法语欧特维尔（Hauteville）的意大利语读法，反映出上溯到200年前，康斯坦丝家族也出自法兰西诺曼底的欧特维尔家族。那个时代的诺曼底男子颇有行动力，既有人北上攻下英吉利，创建了诺曼王朝，也有人剑指南方，进攻统治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创建了诺曼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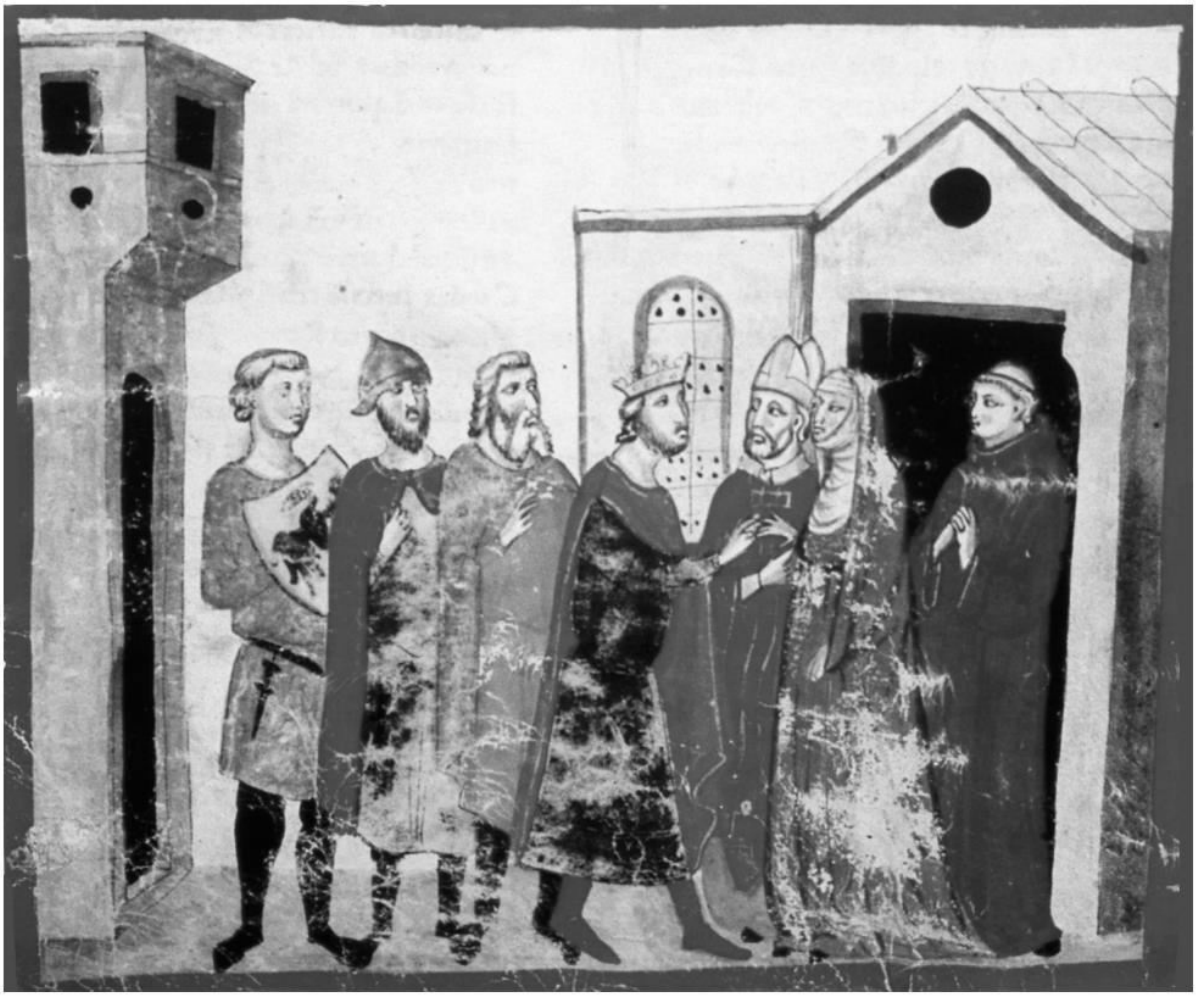
自那时起又过去了200年，到了康斯坦丝生活的时代，诺曼的男人们已经被自己所征服的地方完全同化，变成了意大利人，可以说与地处英法海峡的法兰西北部的诺曼底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欧特维尔家族在意大利南方定居已久，通常会用意大利语去称呼他们的人名。诺曼西西里王朝鼎盛时期的国王罗杰二世[6]是他父亲去世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他的女儿康斯坦丝也是遗腹子。100年以前，活跃在第一次十字军中的波希蒙德[7]和他的外甥坦克雷迪也都是定居意大利南方已久的诺曼裔意大利人。

我们后世固执地认为，中世纪是封闭的社会。然而，那个时代的欧洲却是一个沟通良好的社会，似乎正好跟我们的认知背道而驰。不光圣方济各和腓特烈皇帝二人是混血儿，就连活跃于第三次十字军中的狮心王理查身上也同时具有英吉利和法兰西的血统。在那个时代，意大利商人去法兰西做生意，娶回了一见钟情的妻子，生下孩子便取名“弗朗切斯科”。这名字一听便知具有法兰西血统，但人却从来都不会遭受欺凌。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那个时代伊斯兰教徒一律不分民族地把基督教徒称作“法兰克人”的缘由了。欧洲人并没有把自己分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或德意志人。“欧特维尔”这个名字源自英法海峡岸边的诺曼底，这帮人定居意大利南方以后，马上就把名字改成了“阿尔塔

维拉”。阿西西的方济各和腓特烈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



父亲亨利六世与母亲康斯坦丝结婚

在中世纪，人们不可能像现代一样把欧洲分为若干个国家。尽管如此，各地区还是存在着因历史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腓特烈的父亲亨利六世对西西里施行的是德意志式的高压统治，采取的做法是：当今主人是德意志人，即使是诺曼王朝的相关人等也必须服从。

与此相反，统治意大利南方达200年之久的诺曼王朝成功地推行了与被征服的原住民族相融合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他们享受到了长期的繁荣。他们也因这样的政绩而声名远播。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罗杰二世，

康斯坦丝就是他的女儿。按我们的想象，康斯坦丝是无法同意丈夫连续出台的强硬政策的，但她却接受了。她还默默忍受了丈夫对诺曼王朝时代家臣们的苛刻待遇。然而，西西里王国内部对皇帝亨利六世的憎恶与日俱增。皇帝提出了十字军远征的计划，但意大利南方的人们却在私底下议论说，恐怕只有德意志人才会跟他去遥远的巴勒斯坦。

这位亨利六世突然暴毙。他没有战死疆场，也不是死于仇家暗杀。他很年轻，年方32岁，身体却突发不适，几天后不治身亡。他3年前刚把西西里王国弄到手，一年前刚参加过独生子的洗礼。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地位最高的人。这个人才32岁，没有人料到，他这么年轻就会因死亡而骤然退场。整个欧洲不可能不发生地震。实际上，皇帝的死讯刚刚传来，先是在德意志，紧接着又在意大利南方就爆发了叛乱。神职界地位最高的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也在这时过世[8]，简直是给这场混乱火上浇油。原本可以指望教皇和皇帝站在最具权威的立场上出面调停的，可这二人却几乎在同一个时段去世。康斯坦丝甚至没有工夫为丈夫的死而悲伤。

母亲康斯坦丝

在德意志，围绕空缺的帝位，已故皇帝亨利的弟弟菲利普最早开始了行动。对康斯坦丝而言，如果菲利普的行动能够带来良好结果则最为合适。菲利普跟哥哥关系良好。康斯坦丝刚成寡妇，菲利普就告诉她，继承亡兄的应该是遗子腓特烈。但菲利普有强劲的敌手，那就是萨克森公爵奥托·布伦瑞克[9]。奥托打着教皇派的旗号跟皇帝派菲利普作对。[10]

在欧洲，教皇派和皇帝派的抗争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就好比余震不

断的地震一样持续震荡。但抗争的实质既不是宗教上的观点不同，也不是统治上的想法不一。德意志的教皇派是这样的一伙诸侯，他们纠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反对康拉德[11]、他的外甥“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皇帝的儿子亨利等延续下来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2]。他们之所以要打教皇派的旗号，只是因为霍亨斯陶芬家族出身的皇帝们对意大利有野心，这使罗马教廷的危机感日益加重，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教廷利害一致。对罗马教皇而言，让德意志教皇派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是插在滚滚向前的皇帝车轮里的一根“棒子”。正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所说的“横着推车，蛮不讲理”的人，教皇才会毫不吝惜地援助他们。天主教会最害怕的就是，皇帝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弄到手后夹击教皇宝座所在的罗马。

小叔子菲利普身在德意志，不管他的行动结果如何，刚刚丧夫的康斯坦丝都有她必须从速解决的问题——统治丈夫留下的西西里王国。那些随同亡夫南下意大利，在意大利境内扩张了势力的德意志家臣并不可信。罗马教廷甚至在策反收养着幼小的腓特烈的斯波莱托公爵乌尔斯林根，以保证他继续领有公国为诱饵，让他跟德意志的教皇派统一步调。

另一方面，一直受德意志势力打压的诺曼旧臣也同样不可信任。无论是德意志裔，还是诺曼裔，他们都是封建诸侯，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领有自己的领地。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继续领有领地，他们对站到哪一边并不会感到羞耻。

康斯坦丝所依靠的是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西西里王国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康斯坦丝邀请常驻巴勒莫、蒙雷阿莱、雷焦、卡普亚等境内重要城市的大主教参加她召集的王室最高会议。这些人至少没有露骨的领土欲望。

启动了这一切以后，康斯坦丝才把寄养在斯波莱托公爵夫人那里的腓特烈接回来。幼子3岁了，他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转年到了1198年1月，英诺森三世[13]被选为罗马教皇。38岁的年轻人担任教皇，这在当时也是特例。博洛尼亚和巴黎是那个时代两大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他是在那里研究学问的精英中之精英。他的才华广为人知，在教皇选举投票中甚至只一轮投票就定了乾坤。连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都说，这位教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罗马教皇的权力。他是意大利人，出生在罗马南边的小城阿纳尼。

康斯坦丝终于把儿子安置在了身边。她的下一个愿望是把刚刚3岁的儿子推到西西里国王的王位上。这件事必须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完成。为了早日做成这件事，康斯坦丝决定接近刚刚即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她将提出条件，如果教皇承认腓特烈继承西西里王，她会放弃儿子继承德意志王位的权利。从血统上说，儿子有这个继承权。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男人们合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野心，长久以来一直是历代罗马教皇头痛的根源。自“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如果断绝了这个根源，对教廷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喜讯了。英诺森三世接受了康斯坦丝的条件。

说不定，康斯坦丝心里并不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长大以后与野蛮卑俗的德意志人辛苦盘桓。也许她心里在想，西西里王国气候温暖，经济富裕，文明度高，把这里交给儿子就够了，不要再管德意志了。丈夫去世后，她热衷于排斥丈夫的家臣，流露出她对德意志人的厌恶之感。

就这样，1198年5月17日，刚刚3岁半的腓特烈在巴勒莫的主教堂登上了西西里王位，同时接受了普利亚公爵和卡普亚公爵的称号。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意大利南方全境的统治权，其北部与靠近那不勒斯的教廷领土接壤。而且，这是得到罗马教皇正式承认的。这也意味着，尽管当时仍处于封建诸侯野心的旋涡之中，腓特烈却获得了任何人都难以染指的地位。康斯坦丝的选择在当时的时间点上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菲利普和奥托正在德意志持续着他们之间的抗争。

然而，在仅仅半年后的1198年11月，死神就降临到了康斯坦丝身上。据说她是因病卧床数日后去世的。但在死前，她完成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选择一个人，把不得不扔下的、年仅4岁的独生子的安全托付给他。

英诺森三世

行将就木的康斯坦丝委托教皇英诺森三世做了儿子的监护人。教皇当时提出了条件，要她承认西西里王国为教皇领地。康斯坦丝接受了这个条件。她甚至接受了另外一个条件，即支付把儿子养大成人的费用。把一生献给上帝的人也不会白白给人做监护。不过教皇，同意这笔费用在腓特烈长大成人之后再支付。

尽管如此，让罗马教皇当监护人还是有极大好处的。在那个时代，法律秩序只是梦想。如果一个4岁的孤儿能让教皇而不是别人做他的监护人，那么任何不法之徒都不能轻易对他下手。这就是中世纪。在一个就要去世的母亲看来，这大概是唯一可能且能够预见效果的选择，哪怕儿子长大成人的监护费有300公斤黄金之巨。

“狼群中的一只羔羊”

腓特烈3岁死了父亲，4岁死了母亲，唯一的叔父在德意志还来不

了，他成了天涯孤儿。腓特烈是独生子，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虽说罗马教皇是他的监护人，但教皇关心的只是要他明确西西里王国是教皇的属国，承认西西里王是罗马教皇的臣下，教皇对把一个幼儿培养成那里的统治者并不特别上心。

英诺森三世曾放出大话，说“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而腓特烈现在连“月亮”都还不是。这个时期，教皇满脑子想的都是把十字军第四次派到东方去。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次的十字军自始至终都按着威尼斯共和国的深谋远虑行事，教皇只能心情苦涩地承认既成事实。这也反映出了常见于精英的局限性，事情按照既定设想发展时，他们的能力能够发挥；而一旦超出设想，他们便会放弃。由于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幼小的腓特烈事实上是在被放养的状态中成长的。

腓特烈不是在神职人员和著名教师堆里长大的，前者只热衷于说教，让人做一个好基督徒，而后者只执着于自己的学说。他也不是在与普通人隔绝的环境中娇生惯养长大的。这些都是腓特烈的幸运。他的家庭教师只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叫作圭列尔莫·弗朗切斯科。这人是一位俗界教师，并非神职出身。从日后腓特烈重用了他的儿子这点看，他是适合于腓特烈的那类教师。他一定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教师，他只是认真、正确地教授必要事项，对其他方面则放任自由。否则，他不可能与从小就有“不屈精神旺盛，万事难以驾驭”之评的腓特烈相处得好。

在成为天涯孤儿后的10年间，从年龄上说就是从4岁到14岁之间的10年，腓特烈是在“自己学习、特立独行”中走过来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强迫他必须学什么。他除了学习当时贵公子必须掌握的东西之外，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好奇心扩展探求的领域。仅就语言的习得而言，他就有以下成就。

拉丁语：中世纪的国际语言，因而也是公用语言；

法语：十字军的公用语言是法语，在当时有着“口头国际语言”的地位；

德语：因父系的血缘关系而绝对需要的语言；

意大利语：因母系的血缘关系和自己居住之地的关系，意大利语是“国语”，是首选必修课；

希腊语：要想通过古典书籍学习，这可是必学的活语言，希腊语当时还不是“死语言”；

阿拉伯语：住在西西里首都巴勒莫自然会听到的语言。

那时的巴勒莫是一个由三种西西里人构成的浑然一体共同生活却色彩特异的社会。第一种是天主基督教徒但被意大利同化已久的诺曼裔西西里人；第二种是继续信仰希腊正教的希腊裔西西里人；第三种是没有放弃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裔西西里人。

腓特烈不但能够自由选择学什么，似乎还能自由选择去哪里。这个少年经常溜出自己居住的被人称为“诺曼人宫殿”（Plazzo dei Normanni）的城堡，也不带随从，跑到巴勒莫的大街上就不回家。在伺候他的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万事难以驾驭的人”。但对腓特烈来说，这种体验正是在他长大成人后真正起作用的“人生学堂”。

地位高的人身边必定有神职人员。腓特烈身边也有主教跟随，但这位主教几乎没有影响力。他的工作只是向上司卡普亚的大主教报告腓特烈的日常表现。卡普亚大主教再把这些情况报送给罗马教皇。这个时期，英诺森三世不但发动了进攻异教徒的十字军运动，还向基督教徒发动了史称“阿尔比十字军”[14]的军事行动。送来的报告他也只是过过目，关心的程度仅止于“噢，还算健康”。

不过，有助于我们后世了解这个时期腓特烈的信息来源，也只有给教皇的这些报告了。捡拾一下散见在这些报告中的信息，少年腓特烈有如下的形象。

“中等个子，不算矮；与同龄少年相比，也不算高。身材匀称，体格健壮，很有耐力。”

“武器操作灵巧。剑、矛、弓箭操作的灵巧程度优于一般人。”

“集中精力习武时姿态柔美，游刃有余，不露破绽。”

“似乎对骑马情有独钟，喜欢性情暴烈但比其他马跑得快的马匹。”

“从早晨起床的那一刻起，直到夜里睡着为止，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安静待着的时候。无所事事不是他的所好。也许在他这个年龄，这一切都很正常。”

“白天，书是唯一能够让他捧在手里就能‘安静待着’的物件。喜欢的读物中最多的是历史方面的书。不过，他读书并不挑选人物和主题。不管什么书，看到的、拿到的全部都读。他读书常至深夜。”

“这个少年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但作为国王出场的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举止庄重，神情肃穆。这时的少年国王，全身散发出高贵的气质和凛然之美。见到他的人都会自然想起他的地位，肃然起敬。”

“他不是一个谁见了都会眼睛一亮的美少年。但宽宽的额头显示出他宽广的胸怀，射向对方的犀利目光表现出他内心的智慧和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也经常用老百姓的方式说话，与国王的崇高地位并不相称，令人惊愕不已。”

“他最讨厌服从事先决定好的一切，惩罚的威胁对他也毫无效果。

在这个年龄上，他好像已经断然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似乎已经无法忍受还需要监护人，无法忍受周围人还把他当成孩子的现状了。”

看上去腓特烈是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混杂的城市巴勒莫自由成长的。然而，他并非是在相安无事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原因是在他成为孤儿后的10年间，用一句话来概括，西西里王国一直处在没有法律的状态之下，众多封建诸侯争斗不已。简单地说，这是德意志派与意大利派你争我夺的10年。这也是因为教皇虽然接受了做腓特烈的监护人，但人却在罗马，对统治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毫不关心。于是少年腓特烈便成了两派都要争夺的皮球。任何一派都瞄着把尚未成年的腓特烈弄到手，通过摄政把势力扩展到整个西西里王国。主教送给大主教，进而呈送罗马教皇的报告中记载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件事。

1201年10月，腓特烈还不到7岁。德意志派在与意大利派的势力争斗中占了上风，攻进首都巴勒莫。这派的头目马克瓦德率领手下，站在西西里王居住的城堡“诺曼人宫殿”的城门前，逼迫打开城门。守备队见抵抗徒劳，便不战而降，打开了城门。马克瓦德的目的不是占领城堡，而是绑架小国王。腓特烈以一个7岁孩子的方式进行了反抗。

腓特烈的反抗是一边大声喊叫，一边用手拼命抓挠自己的身体，直到渗出血来。马克瓦德曾经参加过小国王的祖父“红胡子”皇帝御驾亲征的十字军战斗，并以此为荣。他见腓特烈如此反抗，也下不了手。绑架小国王的事件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报告这一事件的主教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

“小国王当时可谓疯狂的举动绝非出于恐怖和绝望，而是出于对自己所处现状的强烈愤慨。不过是家臣而已的人物竟敢对他动手，而他自己身为国王却毫无实权。”

一个人如果幼年时期在这种紧张氛围中成长，他当然会对任何人都疑神疑鬼。他会认为周围都是敌人，不对任何人交心，最终在无人可信赖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腓特烈的身上。他读书近乎乱读，这种对读书的强烈热情防止了他的性格变得封闭。当一个人的想法走进死胡同时，书籍会告诉他，还有别的看法和观点。实际上，腓特烈成人后非常信任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因而他拥有很多自始至终支持他的朋友。

当时他才7岁，成人的路还很长。这期间，成长中的腓特烈依旧“难以驾驭”。尽管王国的无政府状态毫无改善，但小国王的周遭多少平静了一些。腓特烈当时的断然反抗不过是抓挠身体和大声喊叫，但他当时的举动表现出，他虽然年少，却不愧为国王。这对那些因国王年少而视他为掌上玩物的家臣不啻为一种强烈的冲击。至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他动手动脚了。

渐渐地，少年的兴趣也越发广泛起来。腓特烈原本就是“自学型”的人。虽说人生即学校，但并非跟别人混在一起就足够了。而且光靠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也远远不够。不囿于先入为主的观点而虚心观察，这也是很好的学校。在巴勒莫及其周边地区有着数量众多的这类可以成为真正学校的学习场所。

首先是冬季所住的城堡“诺曼人宫殿”内部以礼拜堂为中心的国王居住区。从那里步行可到一座以马尔托拉纳之名而著称的漂亮教堂。这座教堂像宫殿里的礼拜堂一样，以金色打底后上贴色彩鲜艳的马赛克。其次是度夏的离宫，有吉沙宫和库巴宫，一听就知道这名字来自阿拉伯语。第三是蒙雷阿莱的教堂和那里的回廊，如果想当天来回，这里也是“学校”。所有这些建筑的发包人都是西西里的国王。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却雇用希腊正教徒工匠装饰墙壁，雇用伊斯兰教徒工匠装饰柱子和地面。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些建筑。这些建筑是一直以来统治西西里的

诺曼国王们的开放路线结出的硕果。所有这些，无疑有助于腓特烈摆脱中世纪的僵化观念，走向自由。800年后，与腓特烈同为德国人的学者评价他是“德意志君主中唯一一个创造型天才”。其实，这个基础是在他从4岁到14岁的孤儿时代奠定的。所谓创造是一种精神活动，而这种精神活动不可能产生于一个没有不同刺激的地方。也就是说，单靠纯粹培养是产生不了这种创造精神的。

到了1208年，13岁半的腓特烈便不能在这些“学校”里继续学习了。那年6月，叔父菲利普被害。这意味着，在德意志境内持续10年之久的皇帝派与教皇派的争斗以教皇派的胜利而告终。不过，对腓特烈来说，这个结局并非意味着自己的终结。尽管他已经处在决定性的劣势之中，但皇帝派诸侯们在德意志仍旧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视线再次投向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唯一在世的继承人——13岁的腓特烈。

独立宣言

那年的12月26日，刚满14岁的腓特烈就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一般是在15岁，晚一点也会在16岁或17岁举行成人仪式。但腓特烈却刚到14岁就率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今后的一切自己做主。

监护人英诺森三世被弄得措手不及，但他并没有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他能力的脚步要比年龄的脚步走得快啊！从少年期一下子就进到了需要高度认知能力的年龄段。”

但是，教皇的大度没有维持多久。宣布成人后还不到一个月，1209年1月，年仅14岁的西西里王就用实际行动顶撞了年已49岁、权威权力都被视为“太阳”的罗马教皇。他拒绝从教皇推荐的三位神职人员中挑选巴勒莫大主教的后任。

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问题。它触及到中世纪关于叙任权之争的根基。这就是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归罗马教皇，还是归圣务执行地统治者的问题。英诺森三世应对得很稳重。教皇在给腓特烈的信中说，小国王这次的态度源于国王身边的亲信欠考虑，所以可以原谅国王。腓特烈也没有一下走得太远，而是选择了退一步的处理方式。所以，极有可能演变成罗马教皇与腓特烈之间第一次冲突的对立化解了。

年轻时的腓特烈和他的随从们

尽管如此，教皇似乎还是意识到了，需要在马还没有形成暴烈性子之前就给它套上缰绳。这件事发生后一个月，教皇就规劝腓特烈结婚，甚至定好了对象。未来的妻子是阿拉贡[15]国王的女儿。她先前嫁给了匈牙利国王，丈夫死后，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她便回到了西班牙。她比腓特烈年长10岁。14岁的西西里王接受了教皇安排的这门亲事。

婚礼于1209年的8月15日在巴勒莫主教堂隆重举行。8月15日是庆祝圣母马利亚升天的日子，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天多会举行重要的仪式。在当时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新娘在哥哥的陪同下从西班牙嫁到西西里的记录，却留下了新娘带来了500名骑士当嫁妆的记录，好像在告诉人们，腓特烈关心的不是新娘，而是这500名骑士。实际上，这倒真是事实。

可是，这位与腓特烈母亲同名，叫作康斯坦丝的阿拉贡家族的公主并没有如教皇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缰绳”。相反，这个女人一直就是腓特烈的好伴侣。也许是因为自己饱尝过人生之苦的缘故，她温柔平和地呵护着丈夫那颗紧张度日的无法宽解的心，打开了丈夫的心结。两年后，腓特烈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

对任性地宣告自己已经成人，宣布今后一切都要由自己做主的腓特烈而言，阿拉贡家族的公主带来的500名骑士，大概比领地更重要。在宣布成人之后接下来的时期里，腓特烈干起了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他要在长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西西里王国恢复由国王直接统治的秩序。无政府状态是王国内部封建领主各行其是造成的，结果使得税收进不了国库，可供国王使用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就形同虚设。这500名骑士来得正好！

顺便一提，想要恢复国王直接统治下的王国秩序，具体来说，要回到国王能够有效统治的威廉二世[16]时代（1171—1189），即要回到20年前的状态，就必须从重新研究诸侯的领地开始。在这20年中，国王统

治好歹还算管用的只有腓特烈父亲统治的3年和父亲死后由母亲统治的一年，总共不到4年时间。然后就是腓特烈未成年时期的10年。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几乎全是封建诸侯们的天下。

腓特烈宣布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础上重组西西里王国。当然，不管是德意志派还是意大利派，凡是既得利益者对此都坚决反对。14岁的腓特烈要干的事业会变得十分艰难也是因了这20年的缘故。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在婚礼两个星期后就出发前往王国各地视察。这个行动对重新研究诸侯领地不可或缺。他带上了卫兵。腓特烈充分预料到了反对派的敌对行为，意识到了这次行动的风险。

对手奥托

身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根本没有把腓特烈放在眼里，但他还是采取了行动。他把过去对萨克森公爵奥托的暗中支持变成了公开支持。长年以来，奥托的敌手一直是腓特烈的叔父菲利普。尽管菲利普被暗杀之后教皇只得选择奥托，但萨克森公爵奥托本来就是教皇派的头目。教皇预料，这个奥托不会把手伸向意大利，也不会把西西里王国弄到手后南北夹击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廷领土。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德意志和意大利同时归于一个君主之手更可怕的了。

1209年10月，罗马迎来了从德意志南下的奥托，教皇为他举行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教皇英诺森三世见这位正式当上皇帝的奥托比自己年轻27岁，他一定觉得北有德意志的奥托，南有西西里王国的腓特烈，罗马处于两者中间便可安泰无忧，而且这样的状态会延续一段时间。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统治原则。加冕典礼前，教皇要求奥托承诺

不向意大利伸手。

13世纪初的欧洲

可是，加冕典礼一结束，新皇帝奥托就把承诺忘到了脑后。与其说他忘记了承诺，不如说他这匹狼脱下了披在身上的羊皮更为确切。新皇帝的野心首先指向与教廷领土北部接壤的托斯卡纳，紧接着就把军队开

进了属于西西里王国领土的意大利南方。

教皇对奥托感到震怒，但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队。正因为宗教组织不能拥有军事力量，才会有他们自己的“武器”。这“武器”拯救了已经穷途末路的腓特烈。奥托的军队已相继占领了腓特烈的领地卡普亚、那不勒斯、萨莱诺和阿马尔菲。

第二年，1210年10月，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的教籍。

教皇对奥托违反承诺感到愤怒，但一年之后才开除他的教籍。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寻找替代奥托的人遇到麻烦；第二，教廷害怕留在意大利半岛为所欲为的奥托军队。尽管如此，教皇也得赌上“太阳”的权威断然出手处置“月亮”。

不过，这时开除教籍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奥托根本不在乎开除教籍之类的处罚。他在古罗马时代的古都卡普亚享受着南欧温和的暖冬。教皇打算换马，把奥托换成腓特烈。腓特烈尽管也在南欧，却根本无法享受暖冬，每天都在为自己国家的防御而奔走。

直到1211年，在罗马加冕两年、被开除教籍一年以后，奥托才和自己的军队一起返回了德意志。这并不是因为他开始在意被开除教籍的影响，而是因为德意志内部反奥托运动开始蔓延，他无法不闻不问了。这人作为武将能力非凡，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诸侯和士兵中却毫无威信。这与英国狮心王理查受到了从诸侯到士兵由衷欢迎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沾亲带故，奥托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崇拜着狮心王理查。

邂逅贝拉尔德

英诺森教皇换马，把奥托换成了腓特烈。马是换了，但他对16岁的腓特烈也许并不放心。由于被开除教籍的奥托仍然盘踞在意大利半岛，1211年春，教皇向腓特烈推荐了一个人给他当顾问。

这个人名叫贝拉尔德·卡斯达卡，是位神职人员，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卢佐的贵族家庭，时任意大利南部巴里的大主教。许是教皇觉得顾问应该待在国王身边，便把此人调到巴勒莫当大主教。从此以后，这个人便以“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之名留名青史。

教皇的本意是想通过贝拉尔德大主教把腓特烈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腓特烈和贝拉尔德第一次见面时的年龄，前者16岁，后者33岁。这样的年龄差距最能起到监视作用。而在当时，贝拉尔德大主教的见识之高已经广为人知。

教皇也许以为，在腓特烈身边配上这样一个人就能控制万事难以驾驭的烈马了。然而，教皇几乎立即感到了事与愿违。这位33岁的人在16岁的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大主教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明摆着的是，从此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就成了腓特烈一生中最好的陪跑者。一年后，腓特烈下定决心要进行前途未卜的德意志冒险之行，而一开始就跟随腓特烈一起行动的正是这位贝拉尔德。

---

[1] 亨利六世（Heinrich VI，1165—1197），霍亨斯陶芬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91—1197年在位）及西西里王国国王（1194—1197年在位）。他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但他的帝国世袭计划因诸侯反对而告失败。

[2] 诺曼王朝（House of Normandy），又称诺曼底王朝，中世纪英格兰的王朝。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由威廉一世于1066年创立。诺曼王朝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共有过4位国王，1154年因亨利二世创立金雀花王朝而灭亡。

[3] 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约112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年在位。他曾先后6次入侵意大利，人称“红胡子”。

[4] 司提反（Stephen），《圣经·新约》中的人物，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约死于公元36年或37年，其身世已不可考。根据《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在分配公共财物时存在弊端，因而选出7位执事管理日常事务，司提反即为7人之一。他别树一帜，声称摩西律法不必全部恪守，常

与说希利尼语的犹太教徒辩论。后被拘捕到犹太公会受审，最后被拥出城外由乱石砸死。

[5] 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又译法兰西斯，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出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他于1208年开始组织新修会，麻衣赤足，手托乞食钵四处传道。1209年获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方济各会。1212年创立方济各第二会（贫苦克莱尔修女会）。1221年创立方济各第三会（俗修会）。同年制定第一部会规，1223年制定第二部会规。方济各曾于1219年跟随十字军东征抵埃及传教。他于1228年被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追封为圣徒。

[6] 罗杰二世（Ruggero II，1095—1154），1105年成为西西里伯爵，1127年成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伯爵，1130年成为第一任西西里王国国王。他使征服意大利的诺曼人形成了一个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西西里王国。他采取民族、宗教的宽容政策，使王国发展成一个多民族国家，控制了地中海，成为欧洲强国之一。

[7] 波希蒙德（Bohemund I，1058—1111），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之一，塔兰托公爵，后成为安提俄克公爵。

[8] 当时的罗马教皇是西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1106—1198,1191—1198在位），他于1198年1月8日去世。亨利六世去世于1197年9月28日。

[9] 奥托·布伦瑞克，即布伦瑞克的奥托四世（Otto IV von Brauschweig，1175—1218），德意志王（1198—1209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09—1215年在位）。

[10] 教皇派（Guelf，音译“归尔甫派”），12—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别，成员多为银行家、商人和作坊主，代表意大利工商业主的利益。该派为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封建主的皇帝抗衡而与罗马教廷的势力联合。皇帝派（Ghibellini，音译“吉伯林派”）的成员则多为大封建主，他们力图保持封建特权，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势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处于教皇派的控制之下，而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多处于皇帝派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两派的对抗使意大利许多城市间发生残酷混战。

[11] 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1093—1152），德意志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之子。1138年被选为德意志皇帝，但未加冕。霍亨斯陶芬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代君主。1146年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小亚细亚败于塞尔柱突厥人。死前将王位传给侄子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本书传主腓特烈二世的祖父）。

[12] 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 Family）起源于德意志一个名为斯陶芬的城堡。1138年萨克森-苏普林堡王朝的罗退尔二世去世后，德意志诸侯推举该家族的康拉德三世为王，开始了霍亨斯陶芬王朝。家族权势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其后日渐衰落。霍亨斯陶芬王朝于1254年结束。1268年，家族中的最后男性康拉丁兵败后在那不勒斯被斩首，家族灭亡。

[13] 教皇英诺森三世（Papa Innocentius III，1160—1216），1198—1216年在位，本名Lotario dei Conti di Segni。他曾在巴黎和博洛尼亚求学，1190年任枢机主教。他使教廷权势达到鼎盛，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像月亮要在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在教皇那里得到政权”。他发动和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武力镇压异端阿尔比派，出售赎罪券，大量征

收教会捐税，强化异端裁判所。他于1215年召开拉特兰第四次公会议，做出了“天主教会乃举世唯一教会”的决议。

[14] 阿尔比派（Albigenses），中世纪基督教派别，因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为主要活动地得名。该派反对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组织，谴责教会聚敛财富，斥教皇为魔鬼，号召打倒天主教会和隐修院。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法国国王先后组织讨伐。经过20年的战争（1209—1229），该派失败。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派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所灭绝该派。14世纪末该派消失。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即指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与法国国王组织的讨伐阿尔比派异端的军队。

[15] 阿拉贡王国，11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建立的王国，因阿拉贡河而得名。14—15世纪征服西西里与撒丁岛，成为地中海强国，又征服那不勒斯，版图扩大至意大利半岛。1479年与卡斯特利亚国合并为西班牙王国。

[16] 威廉二世（Guglielmo II，il Buono，1155—1189），威廉一世之子，诺曼西西里王国国王（1166—1189年在位），1171年亲政后对各地和贵族采取宽容、公正的政策，有“好人威廉”之称。他懂数种语言，学问深广，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方面多有建树。

第二章
17岁奋起

1212年1月，奥托终于离开意大利返回德意志，此时从德意志又来了一拨人造访腓特烈。这些人是反奥托派的，他们请求腓特烈去德意志。反奥托派的诸侯们聚首纽伦堡，选腓特烈做自己的皇帝。这拨人此行便是请腓特烈接受并去德意志落实此事。

奥托以萨克森为根据地，地盘在德意志北部，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地盘则位于德意志的西南部。与其说是南德向北德造反，不如说是德意志西南部从一开始就不适应奥托粗暴的高压统治。他们起来造反，还选腓特烈替代奥托当皇帝，请他出山做自己的领袖。

腓特烈的祖父、父亲都是皇帝，都死在皇帝的位上。对腓特烈来说，继位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但他没有立即答应，是因为前面还有诸多障碍。

首先，当初要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直接统治一事一直没有进展。

这里的原因在于，封建诸侯的本意只是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奥托南下给了他们最好的理由，让他们把防卫自己的领地放在了首位。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响应腓特烈的命令归还城寨。

第二，尽管实现国王直接统治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腓特烈一无钱二无兵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妻子带来当嫁妆的500名骑士由于水土不服，任务繁重，不少人染上疾病，大部分已经死亡。

然而，不接受或拖延接受德意志的请求也有相当大的弊端。

第一，奥托尽管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又遭到了诸侯们的反对，处于守势，但他很年轻，才30岁。如果腓特烈推迟前往德意志，奥托极有可能在此期间挽回颓势。

第二，腓特烈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能否毅然前往德意志是个问

题。不过，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的直接统治，必然导致与既得利益阶级的激烈冲突。这项艰难事业何时才能实现尚难预料。

17岁的腓特烈做出了决定。他也许不想先立稳脚跟，再迈出脚步，而是考虑先迈出脚步，成功后再回头解决脚跟的问题。17岁的年轻人决定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冒险之行。不过，在出发前他要先做好一些事情。

教皇英诺森三世

17岁的腓特烈想展翅高飞了。在这个时期，下面四个人是他无法忽视的。

萨克森公爵奥托 30岁

教皇英诺森 52岁

英国国王约翰[1]45岁

法兰西王腓力 47岁

教皇英诺森开除了奥托的教籍，所以奥托是教皇的敌人。奥托与他的伯父英王约翰有着同盟关系。约翰与法兰西王腓力因英王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问题一直处于敌对关系之中。法兰西王领土的东侧即与腓特烈在德意志西南部的地盘接壤。因此在逻辑上，执意要把英国势力驱逐出去的法兰西王与开除同英王结盟的奥托教籍的教皇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他们是“伙伴”。

腓特烈此行德意志的目的在于夯实德意志诸侯送给他的帝位。为

此，恢复掌握霍亨斯陶芬家族广布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土便不可或缺。他需要与紧邻西边的法兰西搞好关系。教皇已经表示换马，用腓特烈取代奥托。17岁的腓特烈决定优先考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不过腓特烈懂得，同一个君主统治位于北方的德意志和位于南方的西西里王国，这可是历代罗马教皇的梦魇。教皇为避免这种情况无所不用其极。如今，自己身为西西里国王，却准备接受德意志诸侯的邀请前去落实帝位。腓特烈只有做好一件事，才能让罗马教皇消除疑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接见德意志来使两个月以后，在巴勒莫的主教堂，父亲腓特烈和母亲康斯坦丝出席了他们刚满一岁、名字用德语念作亨利的嫡子恩里克登基成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仪式。这样在形式上，皇帝和国王就分别由两人担任了。腓特烈任命妻子康斯坦丝摄政，代一岁的国王统治国家，并安排好了辅佐她的政府阵容。儿子的登基典礼是这一系列事前准备工作的最后仪式。登基典礼两个星期以后，腓特烈登上了北上之船。

这是一次一无所有的旅程，尽管是去接受帝位，他的随员还是少得惊人。算上德意志来的使节，再加上大主教贝拉尔德，总共才有七人。另外还有两人随行，但他们的工作包揽了秘书、书记员等一应杂事，不能算作随员。我本来认为无论如何腓特烈会带上卫兵，但当时的所有记录都未提及此事，怕是卫兵人数少得不值一记。

而且，载着腓特烈北上的也不是自家的船只。这一时期，西西里王国连商船队都还没有，遑论海军。他们只能乘坐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的船。

这时的热那亚与同属海洋城邦国家的比萨处于战争状态。热那亚船的船长知道搭载的是腓特烈及其一行，却说不能到腓特烈所希望去的罗马。船长让他们在加埃塔的港口下船，请他们从那里再由陆路去罗马。船长说，从罗马近海到比萨之间的海域的制海权掌握在比萨海军手里，

热那亚船无法保证乘客的安全。

就这样，腓特烈半道在加埃塔下了船。所幸加埃塔居民对西西里王国抱有善意，腓特烈一行得以乘坐他们提供的船只来到罗马的外港奥斯蒂亚，从而避开了强盗出没的陆路。4月，在离开西西里两个星期之后，腓特烈一行来到罗马。尽管年轻的腓特烈只带区区数人进城，罗马民众还是用欢呼声迎接了他。

复活节当天，腓特烈实现了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第一次会晤。14年前腓特烈的母亲去世时，教皇就成了他的监护人。这是52岁的教皇第一次见到自己代行父母职责的孤儿长大后的样子。

双方印象似乎非常好。腓特烈有才华，能使每个见他的人瞬间倾倒。教皇英诺森三世虽是中世纪的权力象征，却对能看见时代未来的年轻人格外敏感。

正是这位英诺森教皇，两年前承认了28岁的方济各所领导的修道会。阿西西的方济各鼓吹爱与贫，与当时的基督教会背道而驰。如果被罗马教皇断定为反天主教者，方济各和追随他的年轻人或许会被判处火刑。然而，当时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者却正式承认了这个年轻人的团体。这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圣方济各修道会以后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都是生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却都因得到了感觉像是代表了中世纪的这位教皇的认可而抓住了腾飞的机会。这事非常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英诺森给予17岁腓特烈的援助和他给予方济各的一样，也是年轻人眼下最需要的。教皇给予腓特烈的支持是把自己对腓特烈的强烈支持写成公文发给各国君主和各地大主教，并在金钱上给了一无所有的17岁的腓特烈最难得的援助。

教皇不但为腓特烈提供了他们在罗马期间的费用，还提供了他们离开罗马直到进入德意志以前所需要的所有盘缠。不过，教廷似乎把给钱援助与收回借款分得很清，要求腓特烈支付他到成年为止10年期间的监护费。这笔费用高达318公斤黄金，腓特烈用自己国内的一块领地丰迪做交换，了结了此事。这是腓特烈第一次遇到人生重大的胜败关头，但他用谈判还款的方式避免了行动受阻。

即使这样，教皇英诺森三世对17岁的腓特烈也算是照顾有加了。教皇同意搭载腓特烈的热那亚船悬挂教皇旗帜从罗马航行到意大利北方。这就使与热那亚水火不容的比萨下不了手，使腓特烈得以在比萨的领海内安全航行，并抵达热那亚港登陆。

从热那亚只有陆路去德意志。途中的障碍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北方。障碍也并不是盗贼团伙之流，而是散布在意大利北方、打着“commune”即自治体旗号的各个城邦。

前往德意志

“comune”原本只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法兰西人引进了这个词，读作“commune”。之所以这个词到了中世纪变成了“自治城邦”的意思，是因为地方自治体规模的城镇也都打出了“居民自治”旗号的缘故。他们对自治有着旺盛的热情，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却在于不愿意受任何人的制约，尤其在纳税多寡方面拒绝任何人发号施令。而在法律上，可以对这些事情发号施令的人是拥有意大利北方统治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意大利北方各城邦都成了反皇帝派。

这些反皇帝派成为教皇派，并不是因为这些城邦中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居民有着多么笃深的信仰。相反，因为是经济人，他们属于信仰不深

的一类人。他们拥护教皇派，个中原因是由于罗马教皇讨厌皇帝在意大利北方确立自己的势力，而不惜在背地里支持他们。而且，教廷不是经纪人的聚集地，没有能力对经济说三道四。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自称教皇派并不吃亏。

这些意大利北方的城邦有一个总称叫“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仅代表性城邦就能列出以下这些：

米兰、克雷莫纳、帕尔玛、博洛尼亚、费拉拉、维罗纳、布雷西亚。

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是海洋城邦国家，主要和海外通商，与正在靠手工业和金融业发展经济的“伦巴第同盟”各城邦不能相提并论，自治城邦也不把它们视为同类。

如果这些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总是团结和步调一致倒也挺好。如果只有一个指挥系统，对话也只跟一个人进行，相向而行的路也还是可以开通的。然而，“伦巴第同盟”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比萨和热那亚虽然位置靠近，却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热那亚与威尼斯也总处于对抗之中。与此类似，米兰与克雷莫纳总是交恶，克雷莫纳与博洛尼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好过。在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视附近的阿雷佐为眼中钉，阿雷佐则与佛罗伦萨附近的锡耶纳结好。

自称教皇派的城邦总是教皇派，而皇帝派的城邦却未必总是皇帝派。这就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即使在同一个自治城邦即同一个城市之内也要分出敌友，相互伺机打击对方，这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描述一模一样。罗密欧所属的蒙太古家族是皇帝派，而朱丽叶所属的凯普莱特家族属于教皇派，这一点千真万确。结果，如果蒙太古家族掌权统治，维罗纳就是皇帝派；相反，如果凯普莱特家族掌权，维罗纳就会变为教皇派。

人们无法用确切的形状在地图上表示出这个地方的皇帝派和教皇派，其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不穿过这片意大利北方的土地就去不了德意志。腓特烈那年只是途径意大利北方的这片土地，然而就连单纯的通过也不容易，其中原因也在于此。他得挑那些铁杆儿皇帝派的城邦走。

米兰是一贯的反皇帝派，是自认和公认的“伦巴第同盟”领袖。米兰过去曾被外号“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皇帝打得落花流水，还不得不忍受“红胡子”的儿子亨利与诺曼王朝继承人康斯坦丝在米兰主教堂举行婚礼。这让米兰对这次失败刻骨铭心。米兰人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怨念颇深。腓特烈是“红胡子”的孙子，亨利的儿子。因而，腓特烈要在1212年横穿意大利北方也并非易事。

从热那亚前往德意志最近的路是北去，取道米兰，渡过米兰北部的科莫湖，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腓特烈不能走这条路。他和人数不多的几个随员先从热那亚去了帕维亚。这时期的帕维亚还是皇帝派，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然后，他们躲着北面的米兰取道向东，前往的确属于皇帝派的克雷莫纳。他们一路小心翼翼，不让米兰发觉。米兰一直在追踪从热那亚登陆的腓特烈一行的动向。腓特烈一行在远离米兰也远离克雷莫纳的地方遭到了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

阿尔卑斯山脉及意大利北方周边

腓特烈一行加上他才10个人。大家快马加鞭，一溜烟儿逃脱了。米兰方面安排在这里袭击腓特烈，是想绑架这个年轻人及其一行。一旦他

们进了克雷莫纳就绑架不成了。不过要去克雷莫纳，必须渡过波河的一条支流兰布罗河。

兰布罗河横在了一路逃来的腓特烈面前。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这反映出了米兰和克雷莫纳之间的关系。17岁的腓特烈骑着马就下了河。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以及其他人也都跟着下了河。幸亏是夏季，水量较少，只有马和骑马人的上半身露在水面上。他们成功地甩掉了追击。

腓特烈及其一行全身透湿地行进在去往克雷莫纳的路上，没多久就和克雷莫纳方向过来的一队士兵相遇。米兰在追踪年轻皇帝的行踪，克雷莫纳也在追踪。得知腓特烈靠近的消息后，克雷莫纳方面立即派出了警卫队，遇上了刚渡过兰布罗河的腓特烈。两天后，腓特烈在克雷莫纳受到了全城居民的热烈欢迎。

离开克雷莫纳以后，他们途径曼托瓦、维罗纳，到达了特伦托，途中没有遇到障碍，一路安全。因为一路上挑选的都是皇帝派的城邦。他们一行从特伦托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只要越过头顶上的布伦纳山口，便到了德意志。然而，在特伦托期间，腓特烈接到报告，说德意志境内的教皇派在布伦纳山口设下了埋伏。

在这里，他们再次开始了躲避的行程。腓特烈没有走古罗马时代留下的翻越布伦纳山口的大路，而是绕了个大圈子，像走私者，或是像21世纪的非法入境者一样，沿着森林里的羊肠小道前行，爬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这事发生在8月份，连学者们也称此次旅行是“大胆无比的冒险之旅”。但17岁的腓特烈完成了这次旅行，或许他并未感到多少辛苦。他们离开西西里后已经过去了6个月。

“普利亚少年”[2]

追溯到800年前，腓特烈领国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出产一种葡萄酒，名字叫“Puer Apriae”。与法兰西波尔多产的高级酒相比，这种红酒只能算是本地酒。这种酒丰润而浓烈，喝惯了莫泽尔白葡萄酒的人甚至担心喝了它会脚下踩棉花。

800年前的德意志人说起普利亚就是指意大利南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腓特烈虽然身上流淌着德意志人的血，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普利亚少年”。

在此以前，萨克森公爵奥托并没有把腓特烈的存在当回事。但是，这位奥托不得不睁开眼睛了。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正因为如此，他对年轻的对手来到德意志不得不紧张起来。奥托得知在布伦纳山口的阻击失败后，认为腓特烈首先会去康斯坦茨，便决定先赶到康斯坦茨，亲自在那里堵住腓特烈。

然而，17岁的少年快了他一步。只差两小时，奥托迟了一步，只能在城外看着腓特烈早一步进城。“普利亚少年”让人在奥托面前关上了城门，把是使用武力攻城还是撤退的问题摆到了奥托的面前。奥托只能撤退。

腓特烈似乎没有考虑过要在康斯坦茨恢复冒险旅程的疲劳，过几天眺望眼前美丽湖景的日子。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后，情况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允许他坐等诸侯来访。为了落实这些诸侯对他的支持，腓特烈必须主动去找他们。他去巴塞尔，也是为了落实领有莱茵河上游的诸侯们的支持。

这个“策略”成功了。“普利亚少年”的品位和举止与继承皇统的年轻人的身份十分相称，迷倒了德意志的实力人物。他们再次想起了，眼前这位17岁少年是22年前在十字军远征中死于东方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嫡孙。对德意志人来说，他们想起这位以爱称“红胡子”为人所尊敬的皇帝就感到骄傲，他是最有魅力的皇帝。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时的腓特烈还不具备祖父所具有的力量，他还必须广纳支持者。这时的腓特烈尚无军事背景，这反过来让德意志的实力人物看到，腓特烈是一位纵使没有军事力量也能恢复秩序的领袖。

在这点上，同行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发挥了巨大能量。大主教到处强调罗马教皇对腓特烈的支持和好意，向德意志的实力人物力陈腓特烈的教养之高和对公正统治的愿望。这很自然地就让实力人物们联想到了奥托的粗鲁、高压。且不说表明教养程度的拉丁语，就连德语他都驾驭不了。

此外，尽管腓特烈仍处于缺钱的状态，但遇事他都会表态，给予比收税更重要。这与只管以收税的形式巧取豪夺的奥托正相反。总之，腓特烈非常慷慨地认可了他们一直享受的既得权利。尤其在德意志，封建诸侯也好，大主教也好，都是拥有领地的领主。正因为如此，“普利亚少年”表现出的宽容路线自然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就这样，腓特烈一行在巴塞尔完成了这件重要工作后沿着莱茵河北上了。12月初，他们进入了法兰克福。在这里，腓特烈见到了身为高级神职人员却一贯反对教皇派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4天以后，在美因茨的主教堂，腓特烈从这位大主教手中接过了皇冠。西格弗里德大主教身穿礼服，一边用庄严洪亮的拉丁语宣布“腓特烈因上帝的恩宠而为皇帝，同时成为西西里王”，一边把皇冠戴在了身着皇帝礼服、双膝跪地的腓特烈头上。

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归到同一个君主手上更大的噩梦了。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怕会当场晕倒。不过，以那个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这个消息从德意志到意大利也得需要一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可以拿出使教皇不致晕倒的对策。

对美因茨加冕典礼最早反应的是法兰西王。美因茨到巴黎的距离比

到罗马近，消息也传得快。不过，法兰西王最先反应却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那时47岁。他15岁就登上了法兰西王位，这时已是一位老到的政治家，有着敏锐的政治感觉。

然而，腓力的军事才能低下，好像与他的政治才能恰成反比。因为这个原因，在才能出众的武将理查当英国国王的时代，法兰西一直是英国的手下败将。不过，号称“狮心王”的理查3年前战死。约翰继承了英国王位。他虽是理查的弟弟，但军事能力还不如这方面一塌糊涂的腓力。

老辣的腓力认为，眼下正是扫除法兰西境内英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他的第六感完全正确。但他放心不下的一点是军事能力非凡的奥托跟着约翰。现在，腓特烈争取支持者的工作在德意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腓力眼里，这正是削弱奥托势力的良机。

腓特烈也希望与法兰西王并肩战斗。法兰西王派长子路易[3]来与腓特烈谈判。通过与路易的谈判，德意志与法兰西建立了同盟。这让腓特烈得以专心对付奥托。

有意思的是，腓力是位现实的政治家，他似乎了解腓特烈缺钱，于是送给他2万马克银币，感觉像是在给同盟伙伴准备金。不过，腓特烈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创建自己的军队，而是用在了收买封建诸侯上。光说空话是得不到他们实实在在支持的。腓特烈这样做还强化了年轻皇帝爱好和平的印象。较之奥托的贪婪，腓特烈的大气被广为传颂。“普利亚

少年”虽然只有17岁，却似乎已经懂得了广告宣传的重要性。

决定离开西西里前往德意志的时候，腓特烈的脑子里有三个想法。

第一，路过罗马，落实教皇英诺森三世对他的支持；

第二，遍访因反奥托而皇帝派占据了优势的德意志西南部，落实当地封建诸侯、大主教等实力人物的支持；

第三，与法兰西王结成伙伴关系。法兰西不仅与这里接壤，狮心王理查死后法兰西王正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力量。

从1212年3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里，腓特烈就实现了这三个想法。尽管遇到了诸多障碍，但他还是在自己18岁生日来临之前完成了这些任务。

不过，开辟出来的只是路而已，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路的功能，还需要铺好路。这铺路就成了他今后的工作。在这层意义上说，做好铺路工程本身直接与推翻敌人奥托密切相关。

距莱茵河上游最重要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北30公里处，有一座德语叫作哈根瑙（Haguenau）的城市。它位于阿尔萨斯北部，17世纪以后成为法国领土，从此地名也按法语念成了“阿格诺”。但这地方在中世纪时代还是德意志领土，是以皇帝的居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

这个城市离莱茵河大约20公里，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在它边上流过。城市在一片平原之上，周围环绕着大片森林，丘陵点缀其间，是享受狩猎的最佳之地。这里100年前就已经成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红胡子”皇帝时代又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

不过，普通人也把哈根瑙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居城，却是因为腓特烈。他改造了这里，把统治机构全部搬了进来，并让这些机构充分

发挥作用。这里成了一座不单纯以狩猎为目的的城市。当然，他从小就非常热衷于狩猎。哈根瑙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可以纵情释放狩猎热情的地方。腓特烈在哈根瑙迎来了18岁生日。

中世纪也是这样的时代，统治者要巡游各地，与当地的权贵和百姓代表见面，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腓特烈喜欢哈根瑙，也把哈根瑙改造得环境舒适，但他却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此后，腓特烈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待不住”，到处巡游，不断召集“dieta”（巡会）。

“Dieta”一词在字典里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议会这一个解释。但与腓特烈在“dieta”上见面的人并不是我们后世所理解的议员，而是当地的封建领主。我们知道，腓特烈18岁以后召集“巡会”的地点还在一点点地逐渐北移。这就是说，腓特烈已经开始采取召开“巡会”的形式，驱逐根据地位于德意志北部萨克森地方的奥托了。

奥托依然主张自己是正式的皇帝，仍旧是腓特烈的头号对手。如果奥托正视自己才31岁的年龄，不急不躁，单靠与腓特烈正面决战一赌胜负，那么对“普利亚少年”来说，问题的解决将会变得遥遥无期。腓特烈一度考虑过派兵进攻奥托的老巢布伦瑞克，但却半途而废。腓特烈还没有一支可以称为军事力量的军队。可是，腓特烈的这个强劲对手开始了自掘坟墓的行动。也是因了未能拒绝自己的伯父、英国国王约翰的缘故，奥托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把法兰西王推到敌人一方，可他还是与约翰结成了同盟。

《大宪章》

1214年7月，英国国王约翰和德意志皇帝奥托的同盟军，与法兰西

王腓力在法兰西北部的布汶（Bouvines，现在比利时境内）对决，打了一场会战，结果法方获胜。这场战斗很少能引起军事专家的兴趣，但却是一场在政治上亦即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会战。

约翰战败后逃回英吉利，法兰西王腓力二世成功地了却夙愿，彻底扫除了诺曼底地区的英国势力。另一个败者奥托也只好逃回了萨克森。他原本想使教皇对他做出的开除教籍的处分事实上无效，这个如意算盘也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相反，与法兰西有着同盟关系的腓特烈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却也成了胜者之一。会战结束后，法兰西王甚至对腓特烈予以了热情的关照，把败走的奥托行李中的皇冠送给了他。腓特烈这才拿到了真正的皇冠。当时，由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在美因茨主教堂为腓特烈加冕的皇冠是仿制的代用品，真皇冠还在奥托手中。

这场布汶会战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场会战是《大宪章》（Magna Charta）诞生的起源。约翰失败后逃回了英吉利，等着他的是英国民众即将爆发的不满情绪。他们一直忍受着以与法兰西王打仗为名而征收的高额税赋，但当他们得知这个结果之后，忍耐的限度也就到了尽头。他们纷纷表示没有必要再为这样的国王尽忠，把拒不服从的事实摆在了约翰面前。总之，本该是臣民的诸侯们已经不再信任国王约翰了。

约翰只好在写明缩小王权、扩大诸侯权力的《大宪章》上签字。要是5年前去世的理查还在王位，可能会把这样的要求付诸一笑，而英国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狮心王理查对法兰西王腓力屡战屡胜，持续巩固了英国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而约翰刚当上国王就一转而为屡战屡败，最终被赶出了诺曼底。约翰逃回来后，最先拒绝继续忠于他的就是在诺曼底拥有领地的封建诸侯。

在历史上，《大宪章》被认为是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甚至被说成是英国迈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真相却是，英国民众认为，如果一直让能力如此低劣的人坐在头把交椅上，自己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大宪章》便是民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在大宪章的条款中，当时英国民众最为重视的就是写明以后未经诸侯同意，国王不得提高税赋，不得新增税种的那一条。“迈向民主的第一步”始于金钱问题。这就告诉人们，税收竟是如此重要的政治。

理查被尊称为“狮心王”（Lionheart），而他的弟弟约翰却被冠以“失地王”（Lackland）的绰号。如果那个时期坐在英国王位上的不是“失地王”，那么实现“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也许会更加遥远。

1214年7月27日，布汶战役打响。

12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字。

1216年10月18日，约翰在失意中去世。

拉丁语词语“Magna Charta”在日本直译成“大宪章”。如果采用拉丁语的长女意大利语的发音，应该念成“マーニヤ·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nya Karuta）。但这个拉丁语词在日本是按德语的发音固定下来的，所以这里还是要按德语的发音念成“マガナ·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guna Karuta）。《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当时还有一个人一定会对诸侯的这些要求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当年已经20岁的腓特烈。他如此年轻，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皇帝地位的职责。

教皇与皇帝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承认存在两个最高领袖，一个是罗马教皇，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教皇的作用是向信众传达上帝的意旨，是基督教会地位最高的人，因而也是全体基督教徒精神上的领袖。背叛教皇者会被处以开除教籍的处分，这也是因为人们认为背叛教皇即是背叛上帝。所谓“精神上”，在当时就是“宗教上”的意思。

再说皇帝。这里所谓的皇帝跟东方的皇帝不一样，是只存在于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中，皇帝被认为是世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说罗马教皇的职责在于让信众在精神乃至宗教方面平安地度过一生，平静地迎来死亡，那么，皇帝的职责就在于努力让这些信众生活在和平之中，生活得没有贫困之苦。授予这两个人的“权力”，前者的称为“神权”，后者的称为“俗权”。

在中世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不论“神权”还是“俗权”，都是上帝只授予地位最高之人的权力。所以，罗马教皇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好，他们都不能世袭，都需要通过选举选出。

不经身着红衣的枢机主教们投票选举，就不能成为他们中间唯一一个被允许穿白衣的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这样，不经过被称为“选帝侯”的德意志实力诸侯们的选举，也不能把皇冠戴到头上。

这一点是这两个人同其他王侯最大的不同之处。王权是王子与生俱来的世袭权利，而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地位高于他们，却没有世袭权。

腓特烈能当上西西里王国的国王是因为他行使了母系传下来的世袭权。就这一点而言，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也是一样。不过，要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凭祖父和父亲都是皇帝是不够的，他需要由选帝侯们选出。

1211年9月已经进行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原因不仅是现任皇帝奥托被教皇开除了教籍，还因为德意志的诸侯们已经厌恶了奥托的恶政，聚集在纽伦堡，选腓特烈为皇帝，取代了奥托。

腓特烈于1212年1月才收到这个消息。这时他才知道只是西西里王国国王的自己，现在已经跟祖父和父亲一样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以，当时才17岁的腓特烈在启程去德意志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当选皇帝了。不过，这个地位不是无所作为就能保得住的，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巩固。因为奥托还在德意志，他根本不想老老实实地把皇位拱手让给腓特烈。

奥托在布汶战败后大大丧失了影响力，但还不至于像盟友英王约翰那样遭受致命的权力失落。从科隆到北莱茵河下游一带，以及祖上传下来的萨克森地区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奥托现在才32岁，很年轻，极有可能卷土重来。

然而，东山再起的才能也许跟年龄没有关系。自从腓特烈进入德意志以后，奥托便一退再退。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4]曾经说过，谁握有主动权谁就会在战场上获胜。但不掌握主动权就不能获胜这句话，却不仅仅局限于战场，在外交上也是一样。腓特烈至今没有可以攻打奥托老巢的军事力量。对他而言，眼下只有外交场合是“战场”。

亚琛的誓言

在现代，德国领土的西端非常靠近比利时。从科隆西行70公里左右有一个城市叫亚琛（Aachen）。在中世纪，这个城市用拉丁语称呼，叫作“阿奎斯格拉纳”（Aquisgrana）。它是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徒朝圣地之一，位居耶路撒冷、罗马、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徒皆知的神圣罗马帝国首任皇帝查理大帝[5]在亚琛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1215年，20岁的腓特烈去了亚琛。7月25日，在以查理大帝墓地为中心建起的亚琛主教堂里，已经成为密友的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亲手为腓特烈戴上了真正的皇冠。很多研究家认为，从戴上真皇冠的这一天开始，腓特烈才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亚琛的加冕典礼立即引起了反响。德意志中部的诸侯纷纷抛弃奥托，站到了腓特烈这边。奥托只得节节后退。

腓特烈到亚琛去举行加冕典礼，目的当然是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宣示，只有他才是查理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正统继承人。不过，这次表演的目的不仅在于激起人们对“遥远过去”的回忆，还在于唤起人们对“最近过去”[6]的记忆。40年前，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也在亚琛举行了加冕典礼。腓特烈一世皇帝死后，德意志人也一直以他而自豪。对20岁的腓特烈二世来说，宣示自己是他的嫡孙，其效果抵得上千军万马。

也许是这个原因，加冕典礼结束后，腓特烈随即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死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父亲亨利登上西西里王位就立即宣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身穿胸缀红色十字的军装远征东方，仍然像是欧洲诸侯的家业一般，皇帝和国王也不例外。

然而，身在亚琛的腓特烈是一个刚把皇冠戴在头上的20岁青年，并

非一定要在这时宣誓。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的条件中没有十字军远征这一条，身在罗马的英诺森三世教皇也没有提这样的要求，是腓特烈自己决定并果断地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的。

如果知道多年以后腓特烈对十字军远征的想法，后世的研究家们当然都会问：腓特烈为什么要在这时宣誓呢？然而，他们给不出答案，只能凭想象。有一位研究家说，在查理大帝的墓前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再稳重也该有与其年龄相符的兴奋。他再早熟，毕竟才20岁。然而，腓特烈还是一个对民众的想法很敏感的君主。

腓特烈在为举行加冕典礼北去亚琛途中的某地，大概跟与他反向南去的一群少男少女擦肩而过。这一时期，先在法兰西，接着在德意志发生了十字军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少年十字军”[7]事件。在德意志，居住在以科隆为中心的莱茵河沿岸的少男少女们，正在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少年率领下奔赴热那亚。

这次在十字军史上被称为“少年十字军”的事件是少男少女们自发的行动。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乘船去东方，就以悲惨的结果告终。当然，这一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众的想法。

1099年，靠着第一次十字军远征，长期遭受伊斯兰教徒统治的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这一壮举被基督教徒称为从异教徒伊斯兰统治下的“解放”。

但是，在88年后的1187年，伊斯兰方面在萨拉丁[8]的统率下成功反击，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伊斯兰教徒手中。但基督教徒并没有因此中断朝圣。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重要的朝圣地，无人对此存有异议。萨拉丁是一位现实的统治者，他没有破坏矗立在耶稣基督墓上的圣墓教堂，把它妥善保留下来，并像以前一样认可基督教徒朝圣。不过，朝圣必须得到伊斯兰教徒的许可，并支付参拜费。

然而，十字军运动正是因为不能忍受这种朝拜的条件而兴起的。欧洲世界因圣城耶路撒冷再度落入异教徒之手而愤怒。他们为夺回圣城派去了第三次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之雄萨拉丁与基督教世界之雄狮心王理查之间，被称为“花一般第三次”的壮烈战斗反复进行，但十字军最终没能夺回圣城。

此后，欧洲又以法兰西封建诸侯为主，派出了第四次远征的十字军，但他们并没有去巴勒斯坦，只是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随后解散。

再后来，诸侯和国王们都不再关心解放圣城。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只热衷于在欧洲争夺领土。这期间，基督教徒的圣城耶路撒冷一直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到1215年腓特烈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为止，这种状态持续了28年而毫无改观。

诸侯不管，国王不顾。民众对这样的现状感到不满和愤怒，“少年十字军”便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正因为他们是莽撞的少男少女，这些不满和愤怒才得以爆发出来。

不论怎样早熟，腓特烈毕竟才20岁。他的大叔父康拉德[9]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也参加过第三次十字军远征。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也许正是由此而生的炽热念头让这位20岁的皇帝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其时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实现远征，这些都可以日后再定。他的一贯做法是先放出风去，到要真做的时候再现实地推进。

他的这一系列行动也是在向远在罗马的教皇发出远程信息。

拉特兰公会议[10]

我想，教皇英诺森三世应该是正确理解了从德意志发来的这个信息。他决定召开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于1215年7月25日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

教皇于同年11月2日召开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召开的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任命教皇的亲弟弟做了位于自己领国内的索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领主。现任教皇的弟弟是家中三子，似乎尚未自立，这样一来，他便成了拥有自己领地的出色领主了。

当时的罗马教皇还不住在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古罗马时代的城中心位于台伯河东岸一带。到了古代末期，才在城中心南面建起了拉特兰圣乔瓦尼大教堂，建设时间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早。所以，历代罗马教皇都把建在圣乔瓦尼教堂边上的拉特兰宫作为自己的日常居所。1215年11月召开的公会议史称“拉特兰公会议”，就是因为会议的会场设在圣乔瓦尼大教堂和旁边教皇公邸的缘故。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出过“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豪言壮语。因为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由他召集，会议开得奢华而庄严，正如编年史作家所评论的那样，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公会议。神职人员的代表络绎不绝地汇集到罗马，不仅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也来自希腊正教徒居住的国家，还有来自地处伊斯兰世界却存在至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十字军国家。到会的有71位大主教、400位主教和800人以上的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据说在全体参会人员中，仅在会场为其准备座席的人数就达到2300人。罗马一定挤满了这些神职人员和与他们有关的人。

虽是教皇召集的公会议，但与会者并不限于神职界人士，法兰西、英国和西班牙的国王都派出代理前来参加会议。这些“代理”的任务是做“院外活动”，把公会议要做的决定引向对本国国王有利的方向。腓特

烈这年派去参加拉特兰公会议的是已经成为他头号心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21世纪的今天，罗马教皇也会召集公会议。但召开公会议的理由是调整基督教会内部的各种想法，确定基督教会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在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上又决定了些什么呢？

这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多达71项，其中第一个重要事项是决定了要对异端者采取比以前更为坚决的处置。

“异教徒”指的是信奉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人。而“异端者”则是指基督教徒中被判为信仰方式违反教会规定的那些人。当时，法兰西南部有清洁派（即卡特里派）[11]，而韦尔多教派（亦称里昂穷人派）[12]的信徒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看来，他们这些异端对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就是反体制派。

实际上在7年以前，教廷就组织了十字军，动用军事力量剿灭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者，把法兰西南部化为了战场。这就是史上称为“阿尔比十字军”的运动。拉特兰公会议的异端弹劾决议是天主教会的正式檄文，宣布今后将把阿尔比十字军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正是因为英诺森三世强制推行这个运动，但却没有一人一地提出异议，他才被认为是最大限度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权威和权力的教皇。

拉特兰公会议的第二项重要决议是再次形成决议，把已经被开除教籍的奥托再次开除出教。同时，在基督教会最正式的场合公会议上承认腓特烈就任皇帝。英诺森三世3年前在罗马会见过腓特烈，还向腓特烈提供了资金援助，把他送到了德意志。这次，英诺森三世正式认可了这3年来腓特烈所取得的成果。奥托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他于3年后去世，死时只有36岁。

邂逅赫尔曼

就这样，腓特烈得到了他希望在德意志得到的一切。腓特烈除了派巴勒莫大主教去参加这次公会议以外，还派去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名叫赫尔曼·冯·萨尔察（Herman von Salza）。这个名字显示他出身于德意志贵族。他这年35岁，比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小两岁，比腓特烈大15岁，是只有德意志贵族才有资格入团的条顿骑士团[13]的团长。

赫尔曼把一生献给了腓特烈，比贝拉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腓特烈知道自己有时行事会玩些鬼点子，但处在自己这样的位置上又绝对无法采取行动，而赫尔曼自打辅佐了腓特烈以后，就成了一位娴于外交的人，可以去将腓特烈的想法付诸实践，令人不由得佩服竟有这样的德意志人。有时教皇生腓特烈的气了，腓特烈就派赫尔曼去见教皇。他巧舌如簧，说皇帝是这样说过，但本意却不是这样，直说的罗马教皇怒火平息。条顿宗教骑士团是为保护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而设立的，赫尔曼是这个骑士团的头儿。这也是一张与教皇搞外交的有效“名片”。

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两人是腓特烈得力的“外务大臣”，这也是研究家们的一致见解。年轻的君主不爱妥协，自尊心强，而这两个人帮助了他规避无谓冲突，实现自己的意向。腓特烈身上流着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血，他的两位“外务大臣”也恰好是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德意志人。

在这个时期，腓特烈二世皇帝已经得到了两个比他年长15岁以上的绝好帮手。一个不满20岁的人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这两个人跟着腓特烈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是吃亏的。但这两人却一辈子都站在了腓特烈一边。也许，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一样，都在“普利亚少年”身上找到了与自己梦想相同，因而生存价值相同的伙

伴。贝拉尔德是这样，而赫尔曼的舍命相助则完全超越了自己所属骑士团的利益范围。人们甚至感到，条顿骑士团的最大目的是实现腓特烈之所想，自身反倒是第二位的。

这两个人如此献身，除了他们与腓特烈同有一个梦想即理想外，也许还在于腓特烈对他们的“使用”。

腓特烈对这两位年长者做到了彻底放手。这是一种彻底的信赖，彻底的放手。这甚至让我浮想，莫非基于彻底信任的彻底放手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愉悦，尤其对拥有理想、一直冷静洞察现实、出类拔萃的男子汉来说更是如此？

这样的助手也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提供者。不满20岁的腓特烈似乎已经懂得收集准确客观情报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用好情报是极其重要之事。

教皇英诺森三世行使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和权力，他甚至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要从太阳那里才能得到光辉”。宣示这一切的拉特兰公会议成功后，教皇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他这年56岁，38岁即位教皇以来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

中世纪时，体力充沛的人也难耐罗马的夏天，这里不光气温高，还不卫生。上水道和下水道在古代曾经充分发挥过作用。可是到了中世纪，连维护保养机构都没有了，卫生状况已极度恶化。

而且中世纪的基督教轻视，应该是蔑视保持身体清洁的观念。他们认为，沐浴是使人忘记信仰的古罗马人的恶癖。结果，就连在教皇的居住地因而也该是全体基督教世界首都的罗马，夏天也成了瘟疫流行的同义词。

在罗马，就算住在拉特兰宫里也不安全。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整个教

廷每年夏季都要去避暑地，这已经成为惯例，目的在于躲避瘟疫。1216年夏天，英诺森三世教皇避暑的地方是意大利中部的山城佩鲁贾。教皇在这里收到了腓特烈从德意志寄来的一封信。

腓特烈在给教皇的信中写了这样几件事。罗马加冕后，自己一直遵守着以前和教皇的约定，由儿子亨利担任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德意志和意大利由同一君主统治，从而可以夹击教皇居住地罗马更大的噩梦了。21岁的腓特烈向56岁的教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即使在罗马教皇为自己举行了加冕典礼以后，亦即自己无可辩驳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后，自己作为皇帝也没有兼任过西西里国王。这是教皇英诺森三世自从为4岁就成为孤儿的腓特烈做监护人时起就一直担心的事情。许是收到21岁年轻人寄来的“保证”放下了这颗心，两个星期后，56岁的教皇去世了。

教皇洪诺留三世[14]

教廷全体人员这时正在佩鲁贾避暑。在那个时代，有权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只有十多人，这些人也都在佩鲁贾。前教皇去世两天后，他们便选出了下任教皇。新教皇出身于罗马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当选教皇后的名字为洪诺留三世。他已是88岁的老人，以为人稳重著称。新教皇对教义争论完全没有兴趣，与前教皇的类型正相反。不过，他是自己志愿进入神职界的，信仰笃深，只希望死前看到两件事。第一是消灭异端派，这正在法兰西南部进行中。第二是圣城耶路撒冷再度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在这方面，国王和诸侯们不顾“少年十字军”反映出的民众的不满，根本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毫无疑问，腓特烈一定充分获得了新即位教皇洪诺留的有关信息。他使用了前教皇英诺森在任时他从未尝试过的办法去面对洪诺留。换句

话说，他不再客客气气了。

腓特烈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了西西里。

正式的理由是把他4年前来德意志时留在西西里的妻子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亨利接到身边来。不过，为这个理由派去两个心腹中的心腹，这也太夸张了。如果罗马教廷的情报收集能力不像为人稳重的现任教皇这么稳健，教廷里的警报器单为这一件事就应该闪亮起来。

人们认为时年37岁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是腓特烈的第一心腹，35岁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是第二心腹，但这只是因为这两人结识腓特烈的时间，前者早而后者晚几年。对当时21岁的腓特烈而言，这两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不能以第一第二来划分的。按日本流传的说法“右近之橘，左近之樱”[15]去看待方才恰当。

这两人都比腓特烈年长15岁以上，都是神职界人士。前者是大主教，自然属于神职界，而后者也位居宗教骑士团团长。宗教骑士团已经有先起步的“医院骑士团”[16]和“圣殿骑士团”[17]。“条顿（德意志）骑士团”也和它们一样，一旦加入骑士团，任何人都要抛弃所有俗界的地位和头衔，没有什么公爵、伯爵，全都是“修道士”。他们与关在修道院里，整天祈祷和劳动的修道僧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手执长剑，保护去朝圣的基督教徒。他们虽然武装了起来，但还是修道僧的身份，被禁止拥有妻小。

腓特烈用好了这两个人。他不仅任命他们担任特命全权大使，还让他们担任外交以及外交以外其他领域的顾问，在真正意义上把他们作为重臣。他们活跃的领域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应对罗马教皇方面，或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神职界人士的缘故吧。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见识之高、教养之深，即使在精英云集的教廷也受到尊敬。条顿骑士团团长在巴勒斯坦同异教徒作战，奋不顾身地保护朝圣者，教廷里谁都得礼

让三分。

贝拉尔德是意大利人，赫尔曼是德意志人，而腓特烈的领国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腓特烈有8年时间不在意大利南方，但西西里王国却国泰民安。而在这8年间，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不知多少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奔波于德意志和南意大利之间，功劳之大，有目共睹。

如果对手是德意志人，赫尔曼就会发挥威力。德意志的封建诸侯一直把和自己同属一个阶级却投身宗教骑士团的赫尔曼·冯·萨尔察视为德意志骑士的一面镜子。这样，贝拉尔德负责意大利南方，而德意志就由赫尔曼负责了。

这次，腓特烈把这样两个人同时派去了西西里。这不可能只是命令他们去做接家人的旅行随从。以性格迥异于前教皇的新教皇登基为契机，腓特烈迈出了他国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

奸猾的25岁

1216年的深秋，皇后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西西里王亨利——一行来到德意志。他们华丽的派头立即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传遍了整个德意志。这不单是因为豪华，还因为他们是带着“右近之橘，左近之樱”来到德意志的。如果只是向民众做宣传，豪华就足够了，但腓特烈的工作对象是封建诸侯。而这个时期，腓特烈还没有足以让诸侯服从的军事力量。

这一家人在纽伦堡实现了4年以来的第一次“家庭团聚”。腓特烈已经把这座城市定为召集所有德意志诸侯参加“巡会”的地点。“巡会”完全不是后代的议会，而是统治者召集手下诸侯，向他们传达自己想要决定

的事情，征得他们赞同的会议。1216年冬纽伦堡“巡会”决定，把5岁的亨利封为施瓦本公爵。

亨利已经是“西西里国王”（Rex Sicilie）了。这样一来，他等于又兼任了“施瓦本公爵”（Dux Svevie）。

施瓦本公爵领地东邻拜仁，历史上也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现代，这一带地处瑞士、法国和德国三国接壤之地，主要城市有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康斯坦茨。也许是因为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发源地集中于此的缘故，这里可谓是森林与湖泊之乡，既有以霍亨斯陶芬命名的城市，又有腓特烈在德意志的居城哈根瑙（法语念作阿格诺）。虽然还是个5岁的幼儿，只要他身上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血统，即使成了领主，谁也无法抱怨，因为这不过是行使世袭权而已。腓特烈在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谋略，问题只是以后如何推进。

纽伦堡“巡会”之后，在必须签上儿子名字的所有公文文件上，腓特烈都让人写上“西西里国王”和“施瓦本公爵”，但后来却渐渐不再写“西西里国王”了。如果罗马教廷没有疏于监视腓特烈的言行，他们应该会将此视为这个刚满22岁的年轻人正在逐步把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合二为一的“西西里王国”夺回到自己手中的征兆。

不管怎么说，教廷领土所在的意大利中部受到南北夹攻是罗马教皇的噩梦。如果以德意志为根据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西里的国王，那么，这个噩梦就有变为现实之虞。所以，前教皇英诺森有事没事就让腓特烈发誓不造成这样的事态。

神圣罗马帝国

不管对罗马教皇而言这是否是个噩梦，腓特烈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西西里王国”的想法。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腓特烈的领土横跨阿尔卑斯山脉南北两侧。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他的领土北侧，也就是德国、瑞士和法国的东南

部，显然在地理上地域辽阔，经济强大。然而在800年前的13世纪，位于南侧的意大利半岛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格外富足。而且，从衡量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人口密度来看，阿尔卑斯山脉的南侧也绝对高于北侧。另外，西西里还是腓特烈度过童年时期的地方。放下这段怀乡情感不说，中世纪的意大利南方也是“柠檬花开的南国”[18]，不会不激起阿尔卑斯山北面君侯们的欲望。在柠檬的芬芳里长大的腓特烈，不会没有对南国的甜美回忆。

但是，腓特烈发过誓，不会同时领有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所以，一旦他违背了自己与前任教皇立下的誓言，现任教皇洪诺留三世是可以谴责他的。但这位88岁的教皇心里只想着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十字军远征。

当然，教皇也把压力加到了腓特烈身上，命他率领十字军远征东方。教皇的理由是，你不是在亚琛查理大帝墓前向十字架起过誓吗？在那个时代，“向十字架起誓”和“同十字军远征”是同义词。

然而，腓特烈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22岁的腓特烈没有简单地用语言搪塞躲避来自88岁教皇的压力，相反，他选择了利用这个压力的办法。下面我用编年史的写法罗列腓特烈的做法。腓特烈早在1216年就已开始实施他的策略了。

1216年7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去世后，洪诺留三世当选为新教皇。腓特烈立即去信祝贺。洪诺留在复信中写道，如果腓特烈有率领十字军远征的计划，教皇将予以全面支持。

不过在这个阶段，这种要求对腓特烈还没有形成压力。尽管前皇帝奥托已经被赶回自己的老巢萨克森地区，但他才34岁，仍在苟延残喘。即使教皇也不能要求腓特烈放着这个对手不管而去东方。

当时，教皇洪诺留对由教廷主导派遣十字军仍存自信。上一回第四

次远征的十字军虽然网罗了法兰西的封建诸侯，但被威尼斯共和国所利用，结果占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希腊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首都。罗马教皇不满意这个事实。这次，教皇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自己主导并组织的十字军派到东方，去打击伊斯兰势力。

这为腓特烈赢得了短暂的时间，但由神职者主导的军事行动很难有什么像样的结果。我在《十字军的故事》一书第三册第三章《罗马教廷与第五次十字军》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在“没有像样结果”被证明之后，教皇要求腓特烈进行十字军远征便转变成为“压力”。恰在此时，奥托在失意中自然死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让腓特烈失去了一个转移教皇压力的理由。

时间已接近1218年底。这时已经清楚知道第五次远征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达米埃塔登陆，开始了苦战。正在法兰克福逗留的腓特烈收到了罗马教皇写来的信。信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想要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率领十字军去埃及吧。

腓特烈写了回信，让我们归纳一下信的内容。

他在信中写道，要想远征，准备工作要做到来年1219年的3月才能结束，6月方可出发远征，但客观情况不允许这样做。他接着写道，自己还没有在罗马加冕皇帝，没有足够的力量率领自己的军队，缺少手下诸侯们的参加。一句话，腓特烈是在敷衍躲避，年长腓特烈60多岁的洪诺留不知不觉地上了圈套。

老教皇沉默了。这回轮到腓特烈给洪诺留写信了。腓特烈在信中说，原先所说1219年6月的远征要延期到9月底，愿教皇同意，原因是需要说服诸侯。这样一来，教皇也只能同意。

同样是说服，可腓特烈没有把时间用于说服诸侯进行十字军远征，而是用在了说服他们同意让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亨利做德意志国王。

腓特烈这个时期在给教皇的信中用了“说服”一词。但如果想逼近真实，用辞典意义为“拥入怀中使其驯服”的“怀柔”一词则更为合适。

到了德意志后，腓特烈了解了不同于西西里王国的德意志的社会结构。他已懂得，从当时情况来看，德意志——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帝国领土全境，在这个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社会里，所谓“封建诸侯”实际上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封建诸侯的名义继承并统治某位祖先凭实力获得的领土的那些人。历史上称这些人为“世俗君主”。

第二种是历史上称为“神职君主”的那些人。他们原来是被任命为大主教来统治某个教区的，但后来他们在那里盘踞下来成为领主，实际上与世俗君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话虽如此，在这些大主教的上司罗马教皇的眼中看来，他们现在像领主一样弄来的领地归根结底还是“教区”，统治这里的人就是“神职人员”。所以，同“世俗君主”相比，很难说这些“神职君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很稳固的。

“世俗君主”自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时代以来一直就是“皇帝派”，腓特烈没有施展什么特别的策略便成功地巩固了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然而，“神职君主”出于神职人员的立场理所当然的是“教皇派”。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腓特烈就无法在德意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权力。

于是，腓特烈制定了法律来消除“神职君主”的不安。

这项法律的拉丁语原题是“privilegium in favorem principum ecclesiasticorum”。原题很坦率，赤裸裸地告诉人们这是一部“神职君主优待”法。也就是说，腓特烈采取承认既得权力的办法保证了“神职君主”享有与“世俗君主”同等的权力。

对腓特烈来说，这部法律产生于需求。但由于这部法律的制定，德意志迈出了走向联邦制的第一步。也许腓特烈认为，阿尔卑斯山北侧与意大利南方不一样，更适合使用地方分权制度这样和缓的统治方法。不知为什么，现代的德国也是联邦制国家。

1220年4月，响应腓特烈的邀请，可以用“封建诸侯”这个词来概括的“世俗君主”和“神职君主”们统统来到了法兰克福。这群人按照腓特烈的要求，一致选举他的儿子亨利为德意志国王。这一幕从头至尾都没有通知身在罗马的教皇。

教皇洪诺留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质问。腓特烈回信答复道，一旦十字军出发远征就无法保证一定生还，既然如此，事先确定好把留下的领国交给谁去统治便是统治者的责任。对此，教皇只能再次沉默。

只有25岁的腓特烈竟有如此点子，不能不让人佩服。1220年4月的法兰克福决议对腓特烈的计划来说是一个重大节点。

第一，他让不满9岁的儿子进入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等待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坐上了“候补席”。

第二，他用让儿子亨利成为接班人的形式使罗马教皇承认了由同一位君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事实。

如此一来，他与前教皇英诺森的誓约，即不让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归同一君主所领有的誓约，便成了一张废纸。

当然，教皇洪诺留并非以接受来承认此事的。教皇满脑子充斥着要派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的想法。沉默，就是不情愿地接受。而且，腓特烈已经让教皇意识到，要想派遣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出征，就只能在罗马为他加冕。腓特烈虽然只有25岁，点子却是超一流的。

儿子的登基典礼结束后，腓特烈仍然没有离开法兰克福。教皇派来

特使见他。特使带来了教皇洪诺留三世给腓特烈的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加冕典礼。

---

[1] 约翰（John，King of England，1167—1216），英格兰国王，1199—1216年在位。他与法兰西交战，丧失大片土地；与教皇发生冲突，被迫献地。屡遭失败后，于1215年被迫与贵族签订《大宪章》。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有“失地王”之称。

[2] 拉丁文为Puer Apulia，直译为“阿普利亚的孩子”。原著日语译为“プリーア少年”（“普利亚少年”）。此处译法从日译文。阿普利亚即今天的意大利普利亚地区。

[3] 长子路易，即路易八世（Louis VIII，le Lion，1187—1226），他是腓力二世与第一任妻子埃诺的伊莎贝拉所生长子。他于1223年继承腓力二世成为法国国王，1223—1226年在位。因军事才能及战功被称为“狮子王”（le Lion）。他曾于1214年入侵英格兰并要求英国王位。1226年用王室军队讨伐阿尔比派，对该派的失败有决定性的作用。1226年死于痢疾。

[4]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前336年—前323年在位）。世界古代史上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他曾统一希腊，远征小亚细亚，攻下埃及，灭亡波斯，攻至印度西北部。他在各地建设了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东西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5]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又称查理曼大帝、卡尔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800年由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法兰克罗马帝国”（即“查理曼帝国”）皇帝。他在战胜匈奴和阿瓦尔人后建立了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方面有杰出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引入欧洲文明，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6] “遥远过去”和“最近过去”分别是意大利语语法术语“passato remoto”（过去完成时）和“passato prossimo”（现在完成时）的日语译语。著者在此仅取其字面意义。

[7] 少年十字军，即“孩童十字军”。第四次十字军后的1212年，法兰西和德意志有少年自称得到神的启示，分别召集数万名少年儿童奔赴耶路撒冷，要夺回圣地。因途中遭受饥饿疲劳等，大批人死亡，另有部分人被骗卖至北非为奴。对此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学术界多有争论。

[8] 萨拉丁(Salah ad-Din/Saladin,1138—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创始人，1169—1193年在位。1187年击败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后与第三次远征的十字军媾和。他对基督教徒采取允许朝拜圣地等宽容政策，以开明君主而闻名。

[9] 康拉德（Konrad II，1173—1196），亨利六世的大弟弟，曾为施瓦本公爵（1191—1196年）和罗登堡公爵（1188—1191年）。1196年遭暗杀。

[10] 公会议，又称“普世会议”，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最早的七次会议由东西方教会共同承认，一般也译作“大公会议”。第一次公会议（即第一

次尼西亚公会议）召开于325年。

[11] 清洁派（Cathari，Cathars），音译为卡特里派，12、13世纪流传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基督教派别，常泛指受摩尼教影响而相信善恶二元论和坚持禁欲的各教派。该教派在形成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清洁派、摩尼教派、阿尔比派（法国）、巴尔加里派、巴塔尼派（意大利）等。这些教派强调持守“清洁”（希腊文Katharos），反对腐化，因而得名。要求改革教阶制弊端，提倡安贫精神，谴责婚姻，禁止使用动物食品，排斥权威。该教派多流行于下层群众中，受到教廷迫害，14世纪被异端裁判所镇压。

[12] 韦尔多派（Waldenses，Vaudois），又称里昂穷人派，中世纪基督教派别。12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南部，相传由里昂富商韦尔多捐献财产济贫传教而创立。1184年被教廷判为异端。该派强调信守福音，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会的习俗，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否认有炼狱，关心社会变革，反对教会敛财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13世纪遭到教廷的残酷镇压。1555年以后形成独特的新教教会。1848年以后接受福音派观点，逐渐融入意大利宗教及文化中，对意大利新教各派产生了极大影响。

[13] 条顿骑士团，又名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弟兄圣母骑士团，德意志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主要由德意志人（即条顿人）组成，故名。1190年由日耳曼人创建于巴勒斯坦，最初为医护性质的慈善团体。骑士需宣誓禁欲、清贫和顺从，穿白色披风，上饰黑色十字。1199年被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后进入东欧，是东普鲁士地区文明和基督教化的先导。1525年解散，保留部分于1805年被拿破仑改为世俗组织，存在于奥地利。1945年后曾在德国的帕骚等地重建。

[14] 教皇洪诺留三世（Papa Honorius III，1150—1227），1216—1227年在位。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本名Cencio Savelli。1200年成为枢机主教。曾为腓特烈二世做过家庭教师。他编纂过多部罗马教会的历史书和教会法集等。

[15] 日本古代京都平安宫紫宸殿（亦称南殿）前庭的东边植樱，西边植橘。近卫府分左近卫府（简称左近）和右近卫府（简称右近），左右平等，不分上下大小。右近卫府列阵殿前西半边，阵头是橘；左近卫府列阵殿前东半边，阵头是樱。日语中便有“右近之橘，左近之樱”之说。此处意为排序不分前后的左膀右臂。

[16] 医院骑士团，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称圣约翰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是历史上由教皇组织的三大骑士团之一，成立于1099年。起初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保护及救护朝圣者、照料伤患。曾在耶路撒冷建有医院，并以附近圣约翰教堂的名字命名。该团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先迁往罗得岛（1310—1532），后迁马耳他（1530—1798），故有“罗得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称呼。后因衰败被教皇解散。

[17] 圣殿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约1119年由佩戎的雨果（Hugh de Payens）创建。法国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1118—1131年在位）把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附近的房屋赠给他们，因而得名。1128年获教皇批准。旨在保护十字军东征以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公共路线。遵从本笃会会规，仿效军队编制。骑士穿白袍，佩红十字，等级较低者穿黑色或棕色斗篷。该团接受大量财产，富可敌国。1291年，阿卡城沦陷，该团退守塞浦路斯，财产毁灭。1307年法王腓力四世下令逮捕领土内所有圣殿骑士，借机夺去其财富。在1311—1312年的维埃

纳公会议上，教皇决定镇压该团。财产部分由医院骑士团接管，部分充公给政府。1314年，该团最后一位大牧师及数位伙伴在巴黎圣母院外遭火刑。

[18] “柠檬花开的南国”，语出德国诗人歌德的诗《迷娘曲》。

第三章
作为皇帝

教皇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已成为惯例。为什么加冕典礼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其原因在于，没有比它更能象征中世纪时代的仪式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教皇是西欧基督教世界神职界的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的最高领袖。但这两位人物却不是世袭，也不由前任钦定，而是通过选举产生。

罗马教皇由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选举产生。

皇帝由被称为“选帝侯”的封建诸侯中的实力诸侯选举产生。

然而，不同之处不仅在此一点。

根据基督教会的教理，亦即教会原则，枢机主教们不是根据自身考虑来投票，而是受到圣灵启示后来投这一票的。一般认为，圣灵与上帝及其子耶稣三位一体，因而不用担心圣灵搞错人选。这就是说，得圣灵启示而选出的教皇在当选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合格者”了。

而选举皇帝的选帝侯都是肉体凡夫，这一点同枢机主教并无二致。但由于他们生为俗界之人，圣灵不会给他们启示。

这样，选帝侯们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否合格，就需要另有人来判定了。这个角色由罗马教皇担任。教皇由得到保证不会搞错人选的圣灵的启示而选出，是做此判定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前任教皇英诺森三世就曾说过，选举皇帝的是德意志诸侯，但决定当选人物是否合格的则是罗马教皇。

尽管这是一种令人发笑的复杂逻辑，但希望保有住既得权力的一方常常还是会想出相应的复杂制度。

事已如此，对历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言，去罗马接受教皇的亲手

加冕必然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完成这个仪式意味着皇帝作为俗界最高领袖的合格者得到了承认，皇帝统治权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

“合格者”被认可后，其“合格性”是否就能一直延续下去呢？在基督教世界里并非如此。

罗马教皇有权授予“合格者”证书，也有权力收回。这一点正是引起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之间争斗的真正原因，也是教皇派与皇帝派之间抗争的真正原因。

尽管存在被收回证书的风险，对生活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时代里的皇帝来说，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仍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被教皇授予皇冠，民众才会知道谁是皇帝。加冕典礼不是皇帝想举行就能实现的，只有教皇邀请才能举行。腓特烈终于等来了这个邀请。他没有浪费时间，他要在教皇变卦前把这事变成既成事实。

1220年4月，腓特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巡会”，让儿子当上了德意志国王。

5月，腓特烈收到了教皇的邀请。

腓特烈立即命令诸侯提供随行去罗马参加加冕典礼所需的骑士和士兵。他作为皇帝去罗马加冕，需要带相应的兵力一同前去。但能够命令诸侯提供兵力这件事本身就表示，他已成功获得了封建诸侯的支持。

6月，去罗马的准备工作在扎实进行。

妻子康斯坦丝作为皇后要同行去罗马加冕皇后冠。刚刚登上德意志王位的儿子亨利留在德意志。9岁的儿子是长子，是腓特烈的接班人。腓特烈把养育儿子的事托付给了科隆大主教。

7月，来自德意志各地的士兵开始在奥格斯堡集结。决定亲自率领

手下将士前去罗马的封建诸侯不在少数。

8月，腓特烈到达奥格斯堡，率领一行人出发。他们经过因斯布鲁克，翻越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

9月，进入意大利的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先去见罗马教皇。名义上是协商举行加冕典礼时的各种事务，实际上是托付赫尔曼去交涉更重大的事情。

罗马的加冕典礼

从奥格斯堡出发，经过因斯布鲁克，翻越布伦纳山口，下山到维罗纳，这条路自古罗马时代起就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干道。腓特烈正沿着这条道路大张旗鼓地行军南下。而在8年前去德意志时，他可不是这样。那时，为了躲避米兰抓捕他的追击队，他骑马蹚河，一路奔逃。在得知敌人在布伦纳山口设下埋伏时，他迂回进入森林，走羊肠小道，历尽艰辛才来到德意志。那时，他选择走小路进入德意志，什么因斯布鲁克，什么奥格斯堡，连远远望一眼都做不到。

现在，腓特烈的情况和8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的“普利亚少年”如今作为皇帝回到了意大利，连米兰也不敢轻举妄动。腓特烈也已经从17岁的少年成长为25岁的青年了。

10月，腓特烈一行南下来到意大利中部，途经博洛尼亚。其实不是经过，而是在博洛尼亚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目的是视察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使得博洛尼亚声名远播，超越了这座意大利中部城市本该有的名声。他来视察并不只是在这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中转转看看。他还有个目的，就是会见并听取当时在这所大学执教的法学家罗弗莱多·

埃皮法尼奥的意见。

1220年11月20日，加冕典礼在罗马举行。腓特烈到达后，在罗马城墙外的蒙特马里奥山上搭起帐篷，等待加冕日的到来。他将第二次走进这座永恒的城市。8年前他17岁，如果当时赌他会不会当上皇帝，压倒多数的人一定会赌“不会”。可今天，他为参加加冕典礼回到了罗马。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到他此时此刻的感受。

腓特烈身穿绣满金色和红色图案的华彩服装，骑着白马，绕了半个罗马城，在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前往梵蒂冈，教皇正等在那里。罗马人常常为这种仪式而狂热。教皇洪诺留在圣彼得大教堂正门前迎候腓特烈，他也身穿绣满金色和白色图案的僧衣。金色和红色是皇帝的颜色，金色和白色是教皇的颜色。

腓特烈被引进大教堂，他和跟随他的妻子一同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弥撒结束后，腓特烈被引至祭坛前，在站在那里的教皇面前跪下，接受了教皇的亲手加冕，同时接受了只有皇帝才有权持有的剑和笏。

皇冠、剑和笏都不是梵蒂冈的，而是皇帝将自己的这些东西交给梵蒂冈，再由教皇授予自己。通过这个做法，神职界最高领袖就承认了俗界最高领袖为合格。

腓特烈把皇冠戴在头上，右手持剑，左手执笏，用庄重的声音起誓，发誓要做基督教会的守护人，要进行十字军远征，要消灭异端。康斯坦丝跟在丈夫的后面跪下，接受了皇后冠的加冕。仪式顺利结束。

3天后，腓特烈已经到了离罗马有200多公里距离的卡普亚。

他没有在罗马多住。不，还是不多住的好。腓特烈一面在加冕典礼上庄严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一面却又成功地向教皇洪诺留争取到了再次延期出发的许可。刚进入意大利，腓特烈就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

曼去见教皇。表面理由是协调加冕典礼的各种事务，但真正要做的却是这件事情。在教皇洪诺留看来，自己为腓特烈举行了加冕典礼，也就是正式承认了皇帝的合格性，而从腓特烈那里得到的回报却是十字军远征的再次延期。腓特烈所提出的让教皇不得不接受的理由是：自己离开西西里已经八年，不整饬好西西里王国的内政便无法远赴东方。但这“延期”并未定下具体延到什么时候，所以，腓特烈以后还得继续使用高超技巧躲避来自教皇不断的压力，争取时间。

教皇心里一定很焦虑。教廷主导了第五次十字军远征，原本指望腓特烈参战的第五次十字军虽然连续苦战，却已经明摆着毫无战果。圣城耶路撒冷仍同以前一样，继续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

腓特烈已经感到，加冕典礼后久居罗马无益，便早早离开罗马南下。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他已经安排了一个人于他进入自己领地意大利南方后在不远的城市卡普亚等他。这个人就是他途径博洛尼亚时结识的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也许因为不是神职人员的缘故，这位法学家思想活跃。刚满26岁的腓特烈要想实现自己大脑中的想法，需要得到他的协助。

迈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

腓特烈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十字军远征延期的许可。他在这一时期的目标是重整由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他向教皇提出的延期理由也并非谎言。年轻的皇帝想以不同于德意志的形态实现对西西里王国的重组。

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形态不是联邦制，而是中央集权制。再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形态不是封建社会的延续，而是要打破封建制向近代君主

制国家转变。

封建社会是诸侯这样的强者统治的社会。如果能从强者手中夺得既得权力并集中到君主手中，实现君主统治下依法运营国家的目标，那么，仅凭实力的社会将会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腓特烈的领国分别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按现代国别来看，分为德国和意大利。腓特烈试图用不同的方法统治德国和意大利。这也是他了解了两地各种不同情况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腓特烈在德意志的权力是由于封建诸侯选他才享有的，说起来是一种“受人之托的权力”。

而他对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世袭权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

正如前述，在德意志，封建诸侯这个词所概括的内容实质上包括了“世俗君主”和“神职君主”。大主教同时是广阔领地的领主，这种中世纪现象在当时的德意志司空见惯。

相反，在“西西里王国”，即使是在王国内势力强大的神职人员，如巴勒莫大主教或卡普亚大主教，也没有辽阔的领地。原因是西西里曾处于身为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达200年之久，诺曼王族从北面的法兰西移民过来，征服了这里，西西里才重新回到了基督教的范围内。而这次回归是在没有罗马教皇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既然教皇没有参与，即便他可以派大主教赴任，也不能再要求给大主教大片的领地。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不像德意志那样普遍存在名为“神职君主”的封建诸侯，其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是以诺曼人征服这种军事行动的形式建立的，所以被类似“世俗君主”的封建诸侯们割

据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度割据。只要不能成功地剥夺这些人的既得权益，就实现不了从封建社会向君主制国家的转变。腓特烈要同这些诸侯打心理战，他甚至利用了加冕典礼。他邀请了很多“西西里王国”的封建诸侯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由教皇直接为皇帝加冕的典礼，受邀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他从德意志带来的随行诸侯。不言而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从意大利南方前来罗马参加加冕典礼的诸侯们以深刻印象，你们的主人已不仅仅是“国王”，他现在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了。

德意志与西西里王国的最后一个区别在于能够动员多少优秀官员。

封建制度下，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事务可以自治处理，所以才被称为封建领主。但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既得权力，向君主制国家转化，官僚制度的建立便不可缺少。而且，人员从长官级别的高级职务到书记这样的下级职务都得配齐，所需人数相当巨大。

在13世纪初期，既会写文章又精通法律的人才大都聚集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这是因为，教廷在某种意义上与专制君主国类似，它经常会有官僚制度方面的需求。在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创立最早的大学，也不单单是为了研究神学。这所大学还是罗马教廷组织上所必需的“教廷官僚”的供应地。

德意志没有教廷。所以，即使想在这时的德意志建立专制君主国家，也不能指望保证有人数充足的官僚能把君主脑中的政策付诸实施。

《卡普亚宪章》

1220年已到了11月底，皇帝和法学家在卡普亚见了面。他们两人在

这个时期已对统治“西西里王国”法制不可或缺一事取得了共识，开始设计法制的骨架。他们已经确立了基本方针，要把统治建立在法而不是力的基础上。他们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往这个骨架上添加血肉的工作。在这10年间，腓特烈要做各种工作。但耗时10年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此。他们二人对法律有这样相近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添血加肉”必须一步步来。

法律有两种。一种是上帝制定好授予人的法律，《摩西十诫》和《古兰经》属于此类。这种法律为上帝或无限接近上帝的预言者所制定，人不能改变。

第二种是人根据人的需要制定的法律，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马法。这种法律由人制定，如果不再合适便可修改，不，就应该修改。

腓特烈皇帝和法学家罗弗莱多所思考的法律属于第二种。不过，以传达上帝旨意为大前提的教会法在中世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两人制定的法律还需要与现有的教会法磨合。之所以取得在教会法圣地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法律的专家的帮助，对腓特烈来说极端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以《卡普亚宪章》（Sanctiones Capuanae）之名发表的法律的“骨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废除以暴力统治王国的逻辑，改为依法治国。

即使诸侯也不可擅自行使权力，有事必须诉诸国王设立的法庭，依据判决行事。违反者不但会被没收财产，甚至会被判为死罪。

二、上溯至1189年，在那以前王国内诸侯已经得到国王认可的领地今后可以继续领有。

但是，凡以非法手段自1189年至今的30年间取得并纳为自己领地的

土地均需退还给国王腓特烈，由国王依据正当的继承关系再行分配。

1189年这一年，是他母亲的娘家诺曼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去世的年份。诺曼王朝最鼎盛时期的国王是罗杰二世，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这位国王死后继承他成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是他的儿子威廉一世，再往后继位的是孙子威廉二世。1189年，威廉二世去世。腓特烈是威廉二世的姑妈[1]所生，他在考虑让“西西里王国”恢复30年前的王国功能。这是他重组王国的大义名分之所在。说得通俗点，这样做别人想反对也很难。

腓特烈在卡普亚逗留期间成形的“骨架”的第三点，是在军事上削弱诸侯的力量，设立以把军事力量集中于国王之手为目的的条款。不过这时腓特烈没有收回诸侯手中的兵力。不论地位是公爵、伯爵，还是骑士，即使握有武力，在腓特烈的王国里也严禁滥用。违者会被处以没收财产和判以死罪。

中世纪是一个把人三分为“祈祷的人”（神职者）、“战斗的人”（骑士）和“劳作的人”（庶民）的时代。腓特烈认为，不把这三种人全部置于控制之下就无法创建法治国家。

然而，他的这种想法是对既得利益者封建诸侯的正面挑战。他限制的不仅仅是领地，还有战斗的权力，这些威胁了“战斗之人”的存在。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团结起来，向腓特烈举起反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以毒攻毒

26岁的皇帝在王国各地任命了地方长官和司法、警察等长官。而被任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封建诸侯。这就像任命黑帮头子来做以剿灭黑帮

为目标的部门负责人一样，令人啼笑皆非。不过，腓特烈并没有不加区别地让所有拥有领地的诸侯都担任要职。也许没有来历清白的黑社会，但却有来路正当的诸侯。在传统封建诸侯中有很多是家族中能力教养俱佳之人，因而也有与不法行为无缘的诸侯。以这点作为录用标准，便可极其自然地起用这些人。

恩里克·迪·莫拉就是用这种标准用人的好例子。这人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在那不勒斯北面的腹地拥有辽阔的领地。腓特烈任命他担任了类似司法长官的要职。这就等于腓特烈把回溯30年，即根据30年前的法律从封建领主手中收回领土还给国王的使命交给了一个封建领主。

腓特烈让这位貌似年长自己10岁的恩里克担任这个职务共21年，直到他去世。腓特烈的用人方法是提拔、重用和充分使用。恩里克除了担任司法长官以外，还被“充分利用”在了其他领域。这也显示出，他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及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等心腹中的心腹一样，也成为腓特烈的重臣。像恩里克·迪·莫拉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四五个人。

腓特烈开始重组自己王国的时候，采取的是让黑帮头目站在打击黑帮最前线的做法。如果这个说法不好听，可以换个说法，叫作以毒攻毒。不管怎么说，这个战术取得了成功，因为原本很可能发生的封建诸侯叛乱，最终并没有发生。

但孤立的叛乱还有过几次。叛乱立即遭到镇压，造反的一方便发动了军事行动。根据在卡普亚定下的法律，腓特烈对叛乱分子处以死罪，没收财产。他们对此也无话可说。

然而，如果有人深信不疑地认为，只有严格实施法律定下的所有事情才是行使正义，那他对法为何物便是一个无知的人。腓特烈采取了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的办法。他没有杀掉那些叛乱者，而是把他们交给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于是，保卫朝圣者的使命成了这些叛乱者的二度人生，虽然这的确是体面的海外流放。

腓特烈在卡普亚拟就了《卡普亚宪章》，但他在卡普亚却只逗留了一个月。1221年1月，他转往那不勒斯。他把整个1月份花在了视察那不勒斯到萨莱诺一带的意大利南方地区上。同行者中一定也有法学家罗弗莱多。我认为，腓特烈在那不勒斯创办大学，充实已有的萨莱诺医学校的构思一定完成于这一时期。作为法学院的那不勒斯大学于3年后开课，首任校长就是罗弗莱多。毋庸赘叙，创建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优秀官僚。

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是一位法学家，出生于由那不勒斯进入内陆的要冲贝内文托。他是意大利法制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其原因不仅是他担任过腓特烈的法律顾问，也不仅是他当过至今仍存的国立大学那不勒斯大学[2]的第一任校长，还在于他的代表作《关于教会法和市民法的考察》（*Libelli de iure canonico et civili*）在250多年后的16世纪又不断在各国再版：

罗马，1500年；阿维尼翁，1500年；斯特拉斯堡，1502年和1516年；巴黎，1519年；威尼斯，1537年；里昂，1538年和1561年；科隆，1591年。

生活在基督教思维方式规范着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社会中，如何才能实现世俗法律的公正实施呢？这个问题意识对16世纪的欧洲人也起到了巨大影响，那本书的不断再版便是一个证据。其时，文艺复兴正进入鼎盛期。而在罗弗莱多和腓特烈一起工作的时代，只有他们两人才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

不论有多么高尚的问题意识，只要不解决横亘在眼前的课题，你就无法把你的统治者地位维持下去。学者只要具有问题意识便足够了，政治家在这点上不同于学者。

1221年（26岁）、1222年（27岁）——我忍不住要写出年龄——在这两年间，腓特烈席不暇暖，遍巡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德国出过一

本研究著作，整本都是腓特烈的活动日程表，记录了腓特烈在某地住了两晚，又到下一个城市住了一晚，等等。我一边看着这书一边想，尽管皇帝很年轻，可随从却很受累。我可以不同情年轻的皇帝，但却不禁同情起他随行的人。

这一时期的腓特烈必须遍巡自己的领地。诸侯们趁着30年来的无政府状态，恣意扩大领地。这次巡行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这些领地。有领地就有税收。扩大国王直接统治的领地，就等于给国王的金库里增加税收。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分权制，要想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税收也必须改成中央集权。目标再豪迈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财源保障，无外乎是书呆子的空谈。

这一时期的腓特烈一边要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地，一边还要应付追着要他进行十字军远征的执拗的教皇。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抚慰教皇，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教皇同意他再次延期。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让教皇洪诺留绝望，派腓特烈去充当十字军，成了这个老教皇的执念。

教皇和腓特烈关于十字军远征延期一事观点对立。这归根到底源于两人想法的不同。

在罗马教皇看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优先要做的事应该是远征东方，从伊斯兰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而对腓特烈皇帝来说，最优先要做的事是确立自己对领国的统治，其次才是远征。教皇嫌时间太迟，不肯让步。双方的对立由此而生。腓特烈因为发誓进行十字军远征而得以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这时他也像过去一样敷衍着。他这样做有惹恼罗马教皇的风险。

南国普利亚

根据逐一跟踪研究这一时期腓特烈活动的研究家的说法，腓特烈是1221年2月15日第一次踏上普利亚的土地的。如果是这样，腓特烈先是在卡普亚完成法治国家的“骨架”，然后移师那不勒斯，完成在那里创建大学的构想后去了萨莱诺，在那里推敲好加强医学校的想法，最后去了普利亚。在德意志时，腓特烈被德意志人称作“普利亚少年”，可他以前却从未到过普利亚。他自幼在西西里长大，后来去了德意志。

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普利亚意味着整个意大利南方，而不像现在只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意大利南方，尤其是从长靴的小腿肚到脚跟的普利亚地区，是当时连北欧人都很熟知的地方。

对他们来说，去圣地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也好，决定去巴勒斯坦与异教徒打仗的骑士也好，都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来到普利亚南端的布林迪西，再从那里乘船。这已经成了惯例。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布林迪西就是去东方的海路出发港和到达港，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天，走在高大繁茂的橄榄树林中，人们还能从这里老人的口中听说，他们是听着走过树下的十字军骑士的故事长大的。

可见普利亚在中世纪的知名度比现在还高。腓特烈初来普利亚，在3个月的巡察中迷上了这里。

原因不难想象，只要比较一下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大半。

腓特烈在德意志待了8年之后，第一次亲眼看到意大利南方。那个时代的德意志，即便是南部，也可说是森林和湖泊之乡，阳光柔弱之地。而普利亚正相反，是一个平原辽阔、丘陵低缓、阳光炽烈的国度。

不过，如果认为区别仅在于此，那你就与热烈憧憬南国，一到休假就扎堆南下的当今德国游客没有什么两样了。难道腓特烈不该与这些人有点儿不同吗？

普利亚有森林有湖泊，但都不大不深，不会阻碍视线。这里甚至有丘陵，但却不高，低低地起伏在平原之上，丘陵之间是广阔的麦田。

在阳光炽烈的整个意大利南方，唯独普利亚幅员辽阔，可以说视野几无遮挡。

腓特烈旅行在普利亚，看着奉他之命建起来的城堡，眉笑颜开。只要远远一望，人们就能一眼认出那些他下令建设和加固的城寨。这些城寨只能沿着绕城而建的路才能靠近。人们从四面八方望城寨而来。他们渐渐靠近城寨时一定会想，腓特烈这个人最讨厌的是视野受到遮挡。而当人们进入城寨眺望周边时，他们便坚信了这一点。

腓特烈一生热衷于鹰猎，他甚至写过这方面的书。

读了这本书，人们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但既然这是一本如何使用鹰隼狩猎的工具书，里面写的自然是如何才能成为鹰猎达人的事。

不过，读着读着你就会明白，要到达用鹰隼狩猎的超一流猎人的境界，仅仅是一个优秀的驯鹰师是不够的。

优秀的驯鹰师会欣赏自己所放鹰隼优美的飞行姿态。但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自己也能骑在鹰背上高高地翱翔在天际。做到了这一点，才算达到了超一流猎人的境界。

人变成了鹰俯瞰下界时，他会喜欢什么呢？他喜欢的难道不是在视野毫无遮挡的广阔世界里乘风振翅、悠然飞翔吗？

腓特烈当然会被普利亚迷倒。他从母系的诺曼王朝继承了“西西里

王国”。正如其名称所示，这是一个以西西里岛为主体的王国，首都在巴勒莫。被叫作普利亚的意大利南方虽然不是“西西里王国”的附属，但是相对于城市而言也像乡下一般。

腓特烈改变了这种状况。西西里的重要性并未下降，“西西里王国”的首都和以前一样仍是巴勒莫。王国的宗教界首领仍旧还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可以说腓特烈所做的就是，通过创立那不勒斯大学、强化萨莱诺医学校、完善布林迪西等普利亚地区的海港城市，在福贾营造王宫等措施，来提高意大利南方在“西西里王国”中的地位。

直到800年后的今天，普利亚人仍在酿造一种叫作“普利亚少年”（Puer Apriae）的葡萄酒，因为腓特烈热爱普利亚，并让北欧人了解了这里的美好。至今，居住在西西里的有教养人士们口中还对腓特烈流露出几分不满，因为这位皇帝把大学放到了那不勒斯，而未放在巴勒莫，这是意大利南方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民心超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它会一直延续而不被忘怀。

1223年，王宫在福贾建成。1224年，那不勒斯大学开学。腓特烈那时分别是28岁和29岁。

诸事千头万绪，自然要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地。可就在这个时期，腓特烈失去了皇后康斯坦丝。皇后因疟疾于1222年6月23日去世。此时腓特烈正在普利亚，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接到急使送来的噩耗，27岁的丈夫立即中断巡视，赶回巴勒莫给妻子举办葬礼。他让人准备了石棺。这石棺怎么看都像是古罗马时代埋葬战士用的，外侧的浮雕与收殓女性基督教徒的用途很不相配。但石棺大理石的品质则属最上乘。

按照腓特烈的指示，遗体身着锦缎衣装安放在石棺内，衣装的颜色是象征皇族身份的大红色。遗体头戴镶满宝石的皇后冠。她所有的珠宝

首饰尽数放进石棺陪葬。这是腓特烈为了让妻子死后能作为皇后上路所做的精心安排。

享年39岁的康斯坦丝是腓特烈的第一任妻子，应该也是他最好的伴侣。她性情稳重温和，从不忤逆桀骜不驯的丈夫，经常包容小她10岁的丈夫的想法。让她去德意志她就去了；告诉她加冕典礼须夫妻同行她便去了罗马；要她把年幼的独子留在德意志继承皇位，她也没有反对。更有甚者，丈夫在德意志期间找了情人，还生下了比儿子小5岁的男孩，她得知后也没有像其他王妃那样向罗马教皇写信哭诉告状。

贝拉尔德大主教在庄严的气氛中主持了葬礼，腓特烈站在第一排护灵，直到葬礼结束。遵腓特烈之命，安放遗体的大理石棺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皇后暨西西里王国王妃康斯坦丝长眠于此。你的腓特烈谨记——

在此之前，巴勒莫主教堂已经安葬了诺曼王朝鼎盛时期的国王罗杰二世、他的女儿即腓特烈的母亲康斯坦丝，及其丈夫即腓特烈的父亲亨利六世等三人。腓特烈的妻子康斯坦丝成为下葬于此的第四人。今后，腓特烈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顺便一提，腓特烈此后又结过三次婚。但在他的正妻中，只有首任妻子康斯坦丝一人在巴勒莫主教堂有自己的墓，因为她是接受罗马教皇加冕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唯一皇妃。

妻子下葬后腓特烈没有返回普利亚。他留在了西西里，原因是有个问题必须尽早解决。这就是“萨拉森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星星之火，但火势正在蔓延，若不果断处置，大火将会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岛。

萨拉森问题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它不仅面积最大，还突出到地中海的中央。因为这个地理上的原因，进入中世纪后，西西里岛也是各时期强者觊觎的对象。

西西里岛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纪初期被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希腊人所统治。

后来阿拉伯人统治了西西里200年。

然后是来自法兰西北部的诺曼人，他们推翻了阿拉伯势力，建起了西西里王国。

可见，在从5世纪到10世纪的500年间，西西里的历史就是希腊正教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天主教的基督教徒轮番成为统治者的历史。可是，所有胜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都没有把败者一扫而光，而是选择了共生的道路。这是仅见于西西里的特异现象。

说是说共生，却不是承认平等地位基础上的共生。

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代，古罗马人的后裔拉丁裔居民是被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徒。对阿拉伯人而言，希腊人和拉丁人是异教徒。但阿拉伯人却同意让他们继续居住，不过要向这些被统治者征收名为“吉兹亚”（jizya）的人头税。理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些生活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而事实上却是向容忍他们这些异教徒居住下来的人缴纳的税金。这就是伊斯兰教徒提出的所谓“伊斯兰的宽容”的实际情况。然而，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里，甚至连这种程度的宽容都会被拒绝。

由于付出了这种“宽容的代价”，即使在伊斯兰统治时代，基督教徒也得以在西西里一直居住下来。诺曼人从法兰西北部远道来到西西里，根本没有大量军队，他们却征服了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是因为一直居住在岛上的基督教徒支援了他们。

诺曼人把西西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后，采用了比阿拉伯人更加人性化的统治方法。他们允许败者即被统治者阿拉伯人继续居住，不用支付人头税。不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录用精熟建筑和水渠工程施建、详知行政管理的阿拉伯人。巴勒莫的一号建筑自从变成诺曼王的宫殿以后一直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现在已经用作了大区的政府办公楼。仅从外观上也能看出，这幢建筑是由阿拉伯人建造的。征服者诺曼人人数太少，使用人数众多的败者阿拉伯人，从统治的观点来看是很现实的。

只要看一下巴勒莫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说，在两个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互相敌视的中世纪，西西里是一个奇迹。为建造这些教堂，天主教徒的国王委托希腊正教徒制作表现圣人主题的马赛克，让阿拉伯人制作装饰教堂墙面和地面的彩色石块。这就是诺曼人统治时代的西西里。这是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共生的西西里，是腓特烈继承自母亲并度过孩提时代的西西里。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看上去很理想的状态也出现了缺陷，原因在于那些感到自己被西西里社会抛弃的人们产生了不满。

在行政、技术和学问的领域中，三个民族的共生在来自北欧前去圣地的朝圣者眼中简直是丑闻，是反基督教的。缠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出入王宫，腓特烈的心腹中有不少人听名字就知道是阿拉伯人。清真寺里会传出宣礼员告知祈祷时间的朗朗宣礼声，基督教堂的钟楼一到祈祷时间也会响起钟声。腓特烈继承了诺曼王朝的共生路线。在身为基督教徒的国王和皇帝统治下的西西里，学识和技能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伊斯兰教徒在生存方面全无不便之处。

但是，在农村情况有所不同。在农村，有没有学识和技能没有关系，问题在于收成能赚多少钱。阿拉伯人耕种的农田收益似乎一般都低于基督教徒。人们总会认为，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的国王给了同教人们优惠。这样一来，宗教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于是，社会下层的人们经常会产生种族歧视和排斥异教徒的感情，他们认为能力的差距是待遇的差别造成的。1221年冬天，居住在西西里农村的伊斯兰教徒发动了暴乱。

这场暴动看上去是以处死主谋而镇压了下去，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西西里内陆不满的火焰蔓延到了南部，甚至有人谋求与居住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共同行动。事态升级了。西西里岛与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之间虽然隔着大海，但距离很近。距离之近在当时就不足以阻挡海盗的来袭，今天的难民坐着破船就能过来。

到了这一步，容不得腓特烈坐视不管。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和北非的阿拉伯人联起手来，整个西西里王国就将陷入危险之中。

1223年5月，腓特烈出台了强硬政策。他强制居住在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中所有参与暴动的人本人及其全家离开西西里岛，移居普利亚。据信参与起义的阿拉伯人有2万人，统统都被强行迁到了远离北非的意大利南部内陆地区。

意大利南方及其周边

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徒称欧洲的基督教徒为“法兰克人”，而不分其出生的国家，欧洲的基督教徒也把伊斯兰教徒一概称为“萨拉森人”，而不分阿拉伯人、北非人数众多的柏柏尔人或是起源于亚洲的土耳其人。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也是“萨拉森人”。

腓特烈把这些萨拉森人中的不满分子迁到了自己领国内的意大利南

方，但并没有把他们流放到偏僻的深山里，而是把他们迁到了卢切拉。这里离正在建造王宫的福贾只有18公里。也许腓特烈觉得，这里是内陆地区，远离北非，也远离大海，王宫又建在福贾，今后福贾就是仅次于巴勒莫的重要城市，从这里容易监视他们。

这里成了萨拉森人集体迁居的城市，腓特烈给它起了一个拉丁语名字，意思是“萨拉森人的卢切拉”。

如果腓特烈不仅将这些伊斯兰教徒强行迁徙于此，也不仅把卢切拉确定为萨拉森人的城市，而且还强制这些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他一定会得到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赞赏，因为眼下正是高举剿灭异教徒大旗的十字军时代。

然而，28岁的皇帝同意迁居卢切拉的萨拉森人保有完整的信仰自由。卢切拉建起了很多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塔尖上每天会5次响起宣礼员告知祈祷时间的朗朗宣礼声。这里离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的王宫所在城市居然只有18公里，离教皇领土内最大修道院卡西诺山的大修道院也只有100公里。

腓特烈还给了移居到卢切拉的萨拉森人谋生的手段，同意青年男子加入他率领的军队当步兵，还把耕种和放牧的农地借给壮年年龄以上的男子。他又给了女人织布的工作，为王国的家臣和官吏的衣服织布料，这样就没有必要专门再去东方订货了。

该说不可思议呢，还是理所当然呢，腓特烈就这样解决了甚至被他作为十字军延期理由的“萨拉森问题”。不仅居住在卢切拉的阿拉伯人，就连居住在西西里的其他阿拉伯人，此后也都再没有造反。

复兴海军

在同一时期，腓特烈还着手做了另外一件事，复兴罗杰二世死后一蹶不振的西西里王国的海军力量。

西西里再大也还是个岛，海上安全保障重要无比。可是，腓特烈继承的海上防卫只能是依赖热那亚和比萨。然而，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是通商国家，它们把海外贸易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不可能无偿让他们承包抵御来自北非的海盗袭击。他们要求并接受的“承包费”，是在位于西西里岛西南部自古以良港闻名的叙拉古各自拥有独立的居留区。

就这样，在海港城市叙拉古，靠近港口的一等地段一直以来都被热那亚和比萨的居留区所占据。就这两个国家的性质而言，居留区既是海军基地，同时又是通商基地。和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居留区一样，叙拉古的居留区享有治外法权。

这时的腓特烈处于所有领域都在推行西西里王国中央集权化的高潮之中。在西西里，叙拉古是仅次于巴勒莫的重要城市，腓特烈不想承认这里的治外法权。在通商方面，如果同意外国势力自由行动，收益就是热那亚和比萨的，进不了西西里王国的国库。话虽如此，既然要把海上防卫交给他们，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居留区。

腓特烈要复兴西西里王国独自的海军力量，出发点就是要改善这种对王国经济不利的境况。他认为，为了能在自己合适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撤出居留区，首先要完成海上防卫的自主化。这在祖父罗杰二世时代曾经做到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西西里岛的内陆地区也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可供造船使用。

5年以后，这样建起的西西里王国海军在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当初腓特烈着手复兴海军的意图其实在于实现海上防卫自主化。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能阻止居住在西西里的萨拉森人和居住在北非的萨拉森人这两股伊斯兰势力联手。

腓特烈把复兴王国海军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位叫恩里克的人。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是出生于马耳他岛的热那亚人。这人曾经做过海盗。腓特烈愉快地把打击海盗的事交给了海盗。可是没过多久，这位出生于马耳他岛的恩里克又当上了腓特烈的海军司令。在5年后开始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率领陆军的是正统德意志贵族、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而海军却交给了根本说不上出身正统的马耳他的恩里克。赫尔曼至死都坚守了对腓特烈的忠诚，而这位原来的海盗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年龄小自己几岁的皇帝。在这点上这两人毫无二致。

福贾的王宫

访问现代的福贾，想象存在于800年前的王宫会让你绝望。除了入口处的上半部分以及上面雕刻的碑文以外，王宫其他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腓特烈去世20年以后，罗马教廷终于开始报仇，命令新领有此地的法兰西人国王彻底破坏王宫。

当然，有些建筑遭到破坏却留下了废墟，但这只限于附近无人居住的情形。因为如果城市里的建筑遭到破坏，对住在附近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搜集建材的极好场所。建筑既已破坏，大理石和其他石料很容易被剥下来取走，直接去当建材使用。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以后，原来的建筑就连废墟也没有了，也就不会成为遗迹留给后人了。

可是，为什么只有福贾的王宫被彻底毁掉了呢？

从1223年左右开始，腓特烈的确在普利亚全境建造了许多城寨，而且几乎都全部原样留到了800年后的今天。因为这些城寨建造得异常坚固，在腓特烈王朝之后，不论对统治这个地方的法兰西安茹家族的国王，还是后来西班牙阿拉贡家族的国王都很有用。意大利海军至今还在

使用着巴里的城寨。蒙特城堡被指定为世界遗产，游客也络绎不绝。可见，并不是腓特烈建造的所有建筑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福贾的王宫与这些建筑物命运迥异，原因应该在于唯有它是非基督教的，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

根据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述，福贾王宫不是北欧常见的那种庄重但却冷漠而禁欲式的建筑风格。这座王宫拥有自然色彩丰富的庭园，占地广大，空间开阔，树木繁茂，流水潺潺，鲜花盛开，百鸟鸣啭，甚至还放养着当时欧洲罕见的各种珍禽异兽。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我们所能联想到的就是今天仍然留在巴勒莫郊外的史迹“吉沙”（Zisa）。巴勒莫市内的王宫是城堡式的建筑。可能因为吉沙是夏季离宫的缘故吧，这里的建筑样式虽然是阿拉伯式的，但却是四周被大片庭园围着的一片宅邸。腓特烈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孩提时代。

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天堂就是地上所无之物应有尽有的地方。丰沛的流水，繁茂的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和在花丛中飞舞的各种鸟儿……

在伊斯兰世界里，人们普遍认为，有权有势的人拥有在地上享受这种乐园的权力。所以，住在西西里的阿拉伯建筑师受基督教徒国王之命建造夏季离宫时，自然而然地就把它建成了阿拉伯式的。而西西里王，即那些诺曼王朝的国王在这里度夏也不会产生任何违和感。

腓特烈不就是在福贾让人建起了一座比吉沙规模更大的王宫吗？也许他是想在普利亚也能回味自己孩提时代就已经习惯并感到亲切的环境。其实，腓特烈每年会在福贾的王宫居住，而且是长时间居住。但他并没有把福贾的王宫仅用于愉悦自身。用现代的讲法，他还把这里用作了迎宾馆。

朝圣，对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徒而言是一种比梦想还要强烈的愿望。如果基督教徒能去圣地巴勒斯坦，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祈祷，单凭这一点，天主教会就会彻底免除他的罪孽。一旦被彻底免罪，他就可以实实在在地进天堂了。不难想象，对当时信仰笃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让他们内心踏实的事啊！

既然这是生活在中世纪人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不管是庶民还是王侯，朝圣当然会高热不减。在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狮心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媾和协议仍然有效，伊斯兰势力和基督教势力继续维持着现状，即双方表面上并不处于战争状态。只要向控制圣城的伊斯兰教徒支付参拜费，基督教徒也能够去耶路撒冷，在圣墓教堂祈祷。

这样一来，想踏踏实实进天堂的人就像河水一般川流不息地向巴勒斯坦涌去。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国王或实力诸侯的子弟。对这些属于统治阶层的人来说，这样做不仅可以预约天堂里的席位，还意味着可以往脸上贴金，成为统治者后会很有用处。

一旦当上一国之王或当上拥有辽阔领地的君侯之后，他们就不可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了。所以，为预订天堂席位和往脸上贴金而去朝圣的，都是王子和君侯的子嗣们。

他们也和老百姓朝圣者一样要走朝圣干道。这条路线从北欧南下意大利半岛，从布林迪西取海路到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阿卡，在阿卡登陆后取陆路奔耶路撒冷。回程按原路返回。普利亚在当时的欧洲人中知名度很高，也是因为这里地处朝圣干道。离布林迪西不远的福贾就在这条路线上。

在漫长旅途中受到腓特烈的热情款待，这些下一代的统治者一定会感到身心愉快。20年后，腓特烈同罗马教皇激烈对立时，已成为国家和地方统治者的这些人几乎都没有明确站在教皇一边，因而实质上站在了腓特烈一边。

然而，对教廷而言，腓特烈在福贾的王宫肯定是一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存在。在当时，只有病人才被允许洗澡，但王宫里却有设施完备的正规浴场。洗澡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把洗澡定罪为异教徒罗马人喜好的恶俗。中世纪的基督教较之卫生更重视信仰。

相反，伊斯兰教没有把洗澡视为罪恶。在13世纪中叶的这个时代，完备的洗浴设备，与其说具有古罗马风格，不如说更具有当时的伊斯兰风格。

此外，据说在腓特烈的王宫中，洗浴后会被领去参加晚宴，席间甚至有阿拉伯舞女翩翩起舞，让客人欣赏。而当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度，餐间供人欣赏的通常也只是吟游诗人一边弹奏鲁特琴[3]一边歌咏。

此外，王宫建有附属织造工场，能织出当时只有东方才能生产的豪华丝织品。每当客人离去时，腓特烈就会把这些华丽的丝织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难怪教皇会火冒三丈。

如果这是在位于西西里的离宫，教皇尚可放一马。但福贾和罗马都位于意大利半岛，土地相连，而且福贾北面紧挨着罗马教皇领地的边境。

可以想象，这一切所引起的恐怖和憎恶，正是福贾王宫在腓特烈和他的后代都去世后，在教皇授意下遭到彻底破坏的原因。

卢切拉离福贾只有18公里，曾经长期是伊斯兰教徒的城镇。但今天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伊斯兰教的痕迹。在福贾破坏的只是王宫，而在卢切拉，这种破坏针对的是整个城市。居民被全部当作奴隶卖掉了。天主教会禁止把同宗教徒作为奴隶，但并不禁止奴役异教徒。这种规矩在伊斯兰世界也一样。顺便一说，无论宗教信仰如何都不得奴役人类的法案是在500年后的19世纪才得到各国的批准。

话题回到13世纪。1224年，13世纪前25年即将过去，福贾的王宫犹在，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也过着安稳的日子。这时，29岁的腓特烈又把一件大损教皇心情的事情付诸实施。他在请求教皇洪诺留同意第三次推迟十字军远征后仅仅两个月时宣布，要创设那不勒斯大学。

欧洲第一所国立大学

在11世纪末期到13世纪的200年间，中世纪进入了后半叶，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也从以前的停滞状态进入了变动的时代，时代终于要逐渐摆脱罗马帝国灭亡后开始的黑暗的中世纪了。

首先，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增加了。

“上帝所望”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便蜂拥而至巴勒斯坦。由此导致了1097年到1291年这200年间的十字军远征运动。这也不能不说是因为人口增加的缘故。

欧洲基督教徒因十字军而信仰之心弥笃，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法兰西迎来了教堂建筑的鼎盛期。鲁昂大教堂于1201年开工，1250年落成。亚眠大教堂于1220年动工，1269年完工。还有很多建筑也完成于这一时期。13世纪可谓是哥特式建筑繁花盛开的时代。

人们的兴趣朝着多方面发展，当然会有一部分朝着知识的方向发展。至今犹存的欧洲著名大学也都集中创办于11世纪末到13世纪前半叶这段时间。

以欧洲最古老大学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刚开始时的形式是，想学习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组成学生组织，延聘教授，由学生组织向教授们支付授课费用。也就是说，不是先有大学再有学生组

织，而是先有学生组织再有大学。由于这所大学专门教授神学和教会法，罗马教廷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所大学的赞助人。

巴黎大学是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建立的大学。不过，这所大学在1170年前后创建时，神职人员在此教授有志于走神职道路的年轻人，作为“塾”更为合适。直到1253年，法兰西王专用忏悔僧索邦创立了索邦大学，这里才成为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学的组织。这所大学被认为倾向于天主教会，可能也是因为创建人是原来专听路易九世忏悔的人，而路易九世信仰之笃同当时的其他君主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据说牛津大学也是修道僧于1170年左右建立的，但创建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曲折历史，直到1571年才正式成为大学。其中一个曲折是，一些不满牛津教学内容的学生于1209年创立了剑桥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对抗意识早在800年前就已形成，想来令人忍俊不禁。

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的大学由神职人员和学生组织共同运营而引起。意大利也发生过类似现象。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有学生不满学校的教学内容，和一些同情他们的教授一起离开博洛尼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新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教廷赞助的，而威尼斯共和国很快就成了帕多瓦大学的赞助人。以此为契机，帕多瓦大学改变了教学内容，后来伽利略也来这里执教。腓特烈创设那不勒斯大学比帕多瓦大学建校晚了两年。

虽然这些大学都创建于同一时代，但那不勒斯大学还是有很多地方与其他大学不同。

首先，这所大学不是靠神职人员或学生集资运营，而是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王国国王腓特烈提供的资金即国家资金运营。因而学费全免，教授的报酬也由国库支出。腓特烈在欧洲创办了第一所国立大学。国立的性质也反映在以明确的形式任命校长上。这在其他大学根本见不到。

第二点不同大概就是，教学科目和教授阵容的选定按照腓特烈的想法决定。学生可以有组织，但不是大学的运营机构，只限于为学生生活提供便利。

第三，那不勒斯大学创办伊始就是面向世俗之人的。与其他大学把神学和教会法作为主要科目不同，那不勒斯大学虽然也把这些内容纳入教学科目，但主要科目却是罗马法。此外，那不勒斯大学还教授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其中，阿拉伯人研究的，也是腓特烈自己学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受到特别的重视。腓特烈设立那不勒斯大学的想法是，要教授意味着全部古代修养的文科七艺[4]的所有内容。

总之，腓特烈特意要自己创办大学的意图，就是要用俗界学者充实教授阵容，从而去除基督教的过滤，在此基础上教授所有科目。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科目，则是学生的自由。实际上，托马斯·阿奎那[5]（拉丁语读法为托马斯·阿奎那斯）就曾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毕业后还留校执教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中世纪神学的鼻祖”。

那不勒斯大学与同时代大学的不同之处还反映在大学的校训上。所有大学的校训均用拉丁语写成，因为拉丁语是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语言。

博洛尼亚大学的校训是“Petrus ubique pater legume Bononia mater”，直译是“彼得是伟大之父，博洛尼亚是法律之母”。

圣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耶稣指定这位弟子为首任罗马教皇。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博洛尼亚大学是法律之母，法律之父终归还是基督教会。

牛津大学的校训是“Dominus illuminatio Mea”，意为“神是我们的光明”。这里也把上帝即宗教与探求知识密切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点上，这两所大学是相通的。

据说那不勒斯大学的校训是腓特烈想出来的。“Ad Scientiarum Haustum et Seminarium Doctrinarum”，可试译为“回归知识与教育的本源”。

这里没有提及上帝、耶稣或是彼得。校训想表达的似乎是知识的探究只与探究者的意志相关。认为那不勒斯大学是欧洲第一所“世俗”（laico）大学的根据即在于此。这也是文艺复兴运动开花前250年的“文艺复兴宣言”。

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阵容里，腓特烈基本没有聘用神职人员。同时代的其他大学都有很多神职人员执教，那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属于神职界。在人们普遍认为教师即神职人员的时代，腓特烈在贯彻只用俗界人士做教授的方针之初应该是困难重重的，但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做法给那些不愿意当神职人员却希望探究学问的人增添了很大勇气。

腓特烈在自己统治的王国推行中央集权化，需要很多优秀官吏。这样做可以满足眼下的需求，他为不想当僧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毕业后的为官之路。

然而，即便有了划时代的目标，新建大学所面临的难题古今中外却都是一样的。那不勒斯大学最先意识到的对手是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一个名牌。为了对抗这个名牌，在网罗优秀教授的同时，招收好学上进的学生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重要课题，腓特烈没有从运营负责人的角度，而是从与他同辈的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了对策，毕竟他当时的年龄也是29岁。我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为学生着想的服务措施，还拼命地宣传，甚至到了令人忍俊不住的地步。

腓特烈编写了宣传册，不但在自己的领国意大利南方散发，还散发到了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意大利的中部以及北部。宣传册里写有如下事

项。

首先，想学习的人最关心的是教授阵容。宣传册上列出了生于贝内文托的校长罗弗莱多和以他为首的来自意大利全境的教授的名单。校长和另一位教授是从博洛尼亚大学挖来的。在这些教授名单中的名字后面，还列出了他们所教授的科目。

其次，虽然不收学费，但学生的生活并不免费。因此，宣传册上还逐项写明了经济方面的优惠，其中第一项就是奖学金制度。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制度，正是如此，仅这项制度就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腓特烈规定了获取由国库开支的这项奖学金的资格：没有上大学学习的财力但想要学习的青年，是否能够连续获得奖学金则取决于学习成绩。

不过，即使有愿望有才能，也不一定能够如实反映在教授所给的分数上。自学型的腓特烈对这些情况也很敏感，他没有忘记关怀那些享受不到奖学金的学生。他为这些学生制定了低息贷款制度。学生根据这个制度借到的钱，可以在毕业当官后再还。

第三，在还没有学生会馆之类设施的时代，腓特烈为远离父母来那不勒斯求学的青年提供照顾。学生必须在那不勒斯市内租房。如果放任这些增加的需求，房租就会上涨，就会有学生不愿意来那不勒斯。

腓特烈担心会形成这样的结果，他规定了房租的上限，并把监督这一规定是否得到遵守的工作交给了由两名那不勒斯市民和两名学生组成的委员会。

宣传册上所写的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的第四项好处是，大学承认内部自治。当时，不论是在博洛尼亚、巴黎或是牛津，由谁来审判学生参与的不法行为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腓特烈写明了，这些事情由教授在向学生听取情况后决定。

这份招生宣传册的最后以一句宣传在那不勒斯学习如何愉快的话语结尾，读来令人莞尔。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博洛尼亚一到冬天就雾气朦胧，一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请来南国的那不勒斯吧，这里的隆冬也会天空晴朗，气候温暖。

撇开玩笑不说，腓特烈不但招收本国学生，还劝说出生于意大利南方但正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学习的青年回归那不勒斯。所以，他只是身兼创办人和运营负责人还不够，还需要操心宣传广告。

同博洛尼亚、牛津、剑桥和帕多瓦等各所大学一样，腓特烈二世创设的那不勒斯大学作为意大利南方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存续至今。大学设立时腓特烈起的校名极其简单，只有“Studium Neapoli Tanum”（那不勒斯学问所）几个字。到了后世，大学的正式名称改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Federico II），费德里科是腓特烈的意大利语发音。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21世纪的今天。在这里执教的教授不叫那不勒斯大学教授，而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教授。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不叫那不勒斯大学毕业生，而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毕业生。

腓特烈创立的“那不勒斯学问所”虽然在创设时间上晚于以博洛尼亚大学为首的同类著名大学，但在其他方面，这所大学都在欧洲创下了“最早的先例”。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学就是学生或神职人员聚集在一起的组合，而那不勒斯大学却是在那个时代由一国统治者亲自指挥设立的国立大学。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神职人员执教理所当然，而那不勒斯大学却在那个时代规避了教会人士的参与，只靠世俗学者建立起了教授团队。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教授神学和教会法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而那不勒斯大学却在那个时代把罗马法作为主要科目。当时，古罗马法被

认为是与教会法相颉颃的法律，不叫罗马法，而叫“市民法”。担任首任校长的罗弗莱多被认为是市民法的专家。

腓特烈的目标是要把学校办成一所综合大学，所以那不勒斯学问所教授的科目并不只局限于法律，还有哲学、逻辑学以及修辞学这种学习如何把思想恰当表达出来的技能，等等。总之，那不勒斯大学创设的主旨首先在于教授文科七艺（即一般人文修养）。

此外，那不勒斯大学还有医学部。不过，只有这个医学部不是新设的，而是强化现有的萨莱诺医学校而成的，感觉它像是一个不远的分校，从那不勒斯湾开船后，在右舷望着卡普里岛，不大工夫就能到达。这所医学校内使用的语言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校一直贯彻这个方针，这在黑暗的中世纪堪称奇迹。这所医学校当然有附属医院。在腓特烈强化了这所医学校之后形成了一项制度，学生5年毕业后要在医院里实习一年。

强化医学校，就不能忘记树立医学校的权威。腓特烈决定，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随行的主治医生都只限于毕业于萨莱诺医学校的医师，这一决定终生未改。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侍医是医师的最高地位了。

说到欧洲第一例，使奖学金制度化、通过设置房租上限为学生谋福利也都是“第一例”。而且，学生3年到5年的学业期满毕业后，腓特烈还为他们安排好了就职去向——在他统治的国家内担任官吏。

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在英吉利，“大学”都只是为家中财力雄厚，或志愿进入神职界发展的年轻人而开设的。腓特烈把它扩大到了中产阶级。他向有才和有志的青年们打开了大学之门，哪怕他们不是实力人士的子弟，哪怕他们得不到实力人士的援助。

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什么时候设想创建这所占尽“欧洲第一例”的大学的。不过我认为，早在创建这所大学的1224年之前4年，即1220年，

他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就在1220年那年，25岁的腓特烈在德意志待了长达8年之后，终于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了。为了去罗马举行加冕典礼，他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在南下罗马途中，他绕道博洛尼亚，视察了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他这时结识的法学家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就任了4年后创建的那不勒斯大学的首任校长。

不清楚是在这次逗留期间，还是后来的什么时候，腓特烈还结识了一位刚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名叫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比腓特烈年长5岁，出生于意大利南方城市卡普亚。维尼亚不是权贵家庭出身，也不是贫民出身，而出身于中产阶级。他少年时期就以聪明伶俐而得好评，拿到卡普亚市的奖学金后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他本人似乎希望毕业后在博洛尼亚从事研究。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向腓特烈引荐了这位年轻人。此时，贝拉尔德已经被大家一致视为年轻皇帝身边独一无二的心腹了。年轻人维尼亚比贝拉尔德小10岁，与腓特烈年龄相仿，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秀才。我想贝拉尔德应该是看上了他的写作能力。就这样，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放弃了大学教授的道路，走进了侍奉在年轻皇帝身边的能力高强的高官之列。

维尼亚的写作能力成了腓特烈的至宝，这倒不是因为腓特烈自己缺乏文章表现力。

我们从腓特烈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分析透彻，简洁明了，毫无虚饰。而同样的内容让这位博洛尼亚大学出身的英才来写，他会用精巧考究的文章来表达。换句话说，腓特烈的表现单刀直入，而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却喜好委婉的表现方式。当时，这种表达方法多为罗马教廷的有关人士使用。他们经常同既得权势阶层玩弄计谋，文章不是要让后者理解，而是要故意不让后者弄懂。但腓特烈已经

不能再允许自己一味地惹恼教廷了。

教皇屡屡执拗地要求十字军出发远征，而腓特烈一边躲来避去，一边却建成了排除了神职人员的具有世俗大学特色的那不勒斯大学。罗马教皇知道后当然不高兴。为了多少排解一下教皇的不快，腓特烈需要写一封信为自己做些解释。

这封解释信的内容扼要如下。以前，自己领地内的年轻人为了学习都得背井离乡。作为君主，自己已经无法容忍这种状况，于是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大学，好让这些年轻人不用离开父母就能学习学问。可是如果这样写来，谁读了都会知道这里面多半是谎言。

于是，腓特烈让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写了一封内容一样，但表达上辞句优美、修辞华丽的信寄给了教皇。

这一定十二分地发挥了皮埃尔·德拉·维尼亚的才华。面对高级神职人员时，有适合于他们的说话方式和书写方式。只是腓特烈没上过大学，不擅此道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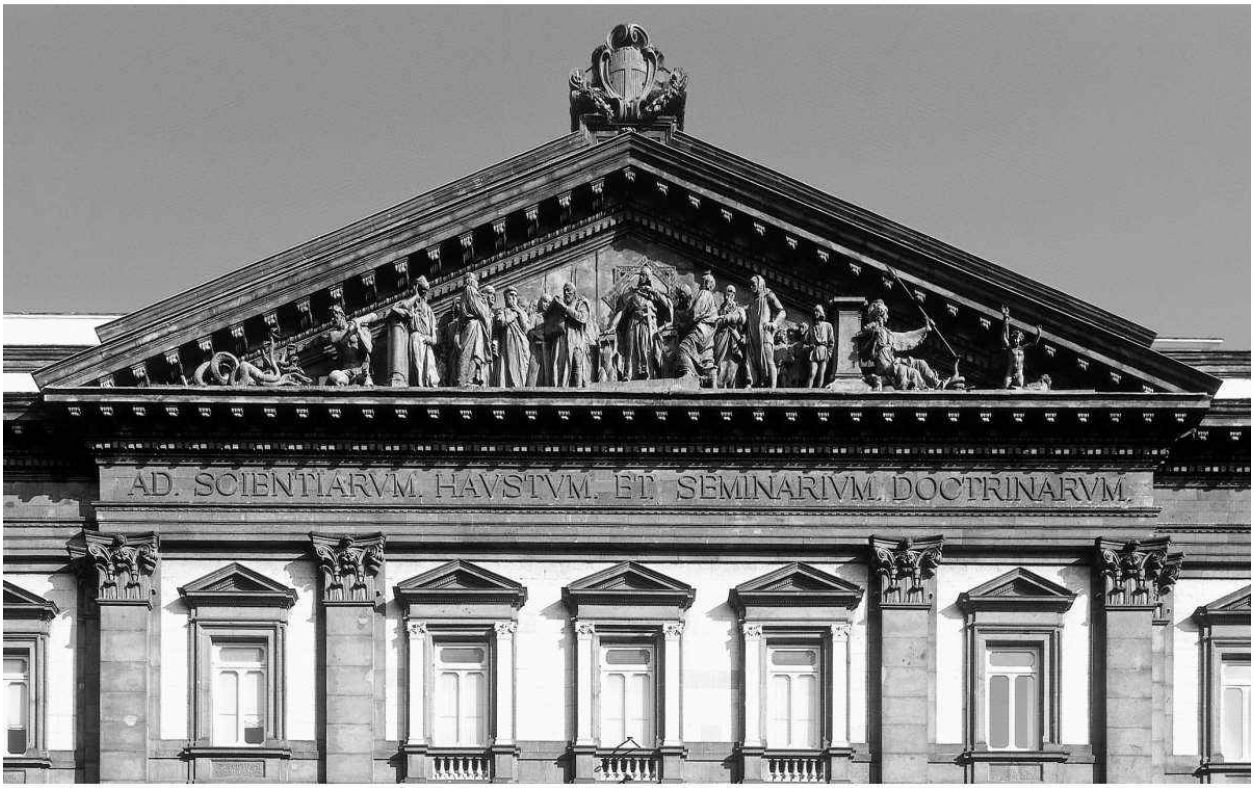
不过我可以想象，当博洛尼亚大学出身的秀才把这封穷尽技巧写出来的信念给腓特烈听的时候，他一定是笑着听完的，因为面对敌人时与敌人使用相同的武器，既是一种礼节，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这武器却是辞句华美、修饰精巧、措辞讲究的文章，任谁都会忍俊不禁的。

自此往后，出身于意大利南方中产阶级的皮埃尔·德拉·维尼亚也成了腓特烈皇帝一生的陪跑者之一。但只有他和其他陪跑人不同，最后以悲剧收场。

1224年9月29日，在南国的蔚蓝晴空下，腓特烈的作品“那不勒斯学问所”举行了庄严的仪式，正式启动了。

今天还能看到的正门上方的浮雕是19世纪的作品，浮雕的构图是这样的，腓特烈站在中间，左边站着首任校长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右边站着皮埃尔·德拉·维尼亚，他正在宣读这所大学的创设宗旨。

这年的12月25日，腓特烈回到了久违的巴勒莫王宫，在那里庆祝了圣诞节。第二天是他的生日。腓特烈也年满30岁了。



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校舍

---

[1] 腓特烈二世的母亲康斯坦丝是罗杰二世的女儿、威廉一世的妹妹，即威廉二世的姑妈。

[2] 那不勒斯大学的正式名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费德里科是腓特烈名字的意大利语发音。——作者注

[3] 鲁特琴，一种起源于阿拉伯的弦拨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

[4] 文科七艺（liberal arts），中世纪欧洲学校教授的一般修养的学科总称，包括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七种科目。

[5]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会士，中

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造了基督教思想的体系，著有《神学大全》等。

第四章
不流血的十字军

腓特烈并非不想进行十字军远征，只是不想按以前十字军的那种形式远征而已。

康拉德[1]是霍亨斯陶芬家族中第一位站到德意志诸侯顶峰位置上的人，他与法兰西王路易七世[2]进行了第二次十字军远征。他的外甥是以红胡子的绰号而闻名的皇帝腓特烈一世。虽然腓特烈一世溺亡于小亚细亚的河中，未能到达圣城，但他与英国狮心王理查、法兰西尊严王腓力二世一起，是进行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君主之一。“红胡子”皇帝的儿子亨利六世即位后宣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但他3年后去世，最终未能实现誓言。腓特烈二世是“红胡子”的直系孙子，是亨利六世唯一的儿子。十字军远征对他来说就如同家业一般。

11世纪末欧洲兴起的十字军运动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大举进攻中近东，已逾百年。只要提到“圣地”人们就知道指的是巴勒斯坦。远征巴勒斯坦甚至也已成为封建诸侯而不仅是皇帝和国王的“家业”，不只是满足一下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君王远征圣地的经历，对他统治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功效。中世纪时代，不论是好是坏，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腓特烈二世20岁那年，也在位于亚琛的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帝的墓前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

25岁那年，教皇在罗马为他举行了加冕典礼，之后他立即又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

此后5年间，他一再从逼迫他远征的教皇那里争取到了延期的许可，这都是事实。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弃自己对上帝的誓言。对他来说，十字军远征也是自己的家业。他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的地位，但他不愿重走以前十字军的老路。

第一次十字军从异教徒的手中解放了圣城耶路撒冷。然而不到百年，耶路撒冷又被萨拉丁夺回，再度回到了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其后又过去了30多年。在这期间，欧洲动员了德意志皇帝、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派出了第三次十字军。但这仍未改变圣城掌控在伊斯兰教徒手中的状态。狮心理查虽然在战场上战胜了萨拉丁，但却未能夺回耶路撒冷。后来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甚至还没有靠近耶路撒冷便解散了。在这期间，欧洲信仰笃深的人们目睹了“少年十字军”悲剧，想象着圣城耶路撒冷在异教徒枷锁下受难的情形悲叹不已。

13世纪初的欧洲及中近东

赋予腓特烈的责任是打破这种僵局。他的目标同样是收复圣城，但实现目标的战略却与理查不同。

英国狮心王理查想的是，首先在战斗中战胜异教徒，从而光复圣城。

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却在寻找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只用外

交手段收复圣城的办法，迫不得已时再使用武力。

他们两人战略不同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

理查对人不持偏见，但在踏上中近东土地之前从未接触过伊斯兰世界。而腓特烈则是在与伊斯兰教徒共生已成常态的西西里度过了孩提时代。

第二个原因在于，理查积极推行的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和腓特烈将要实施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两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

狮心理查面对的敌人是当时有上天摘日之势的苏丹萨拉丁。萨拉丁十二分地利用了自己出身于伊斯兰世界少数派库尔德族的特点，实现了伊斯兰世界最为艰难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两派大团结，成功收复了已经被基督徒夺走的耶路撒冷。他不仅是政治天才，还是军事天才，在与基督教决战的哈丁战役[3]中取得完胜，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版图。欧洲要派出第三次十字军打败萨拉丁。为筹集军费，各国甚至开征了叫做“萨拉丁税”的特别税。

对萨拉丁这样的敌人，理查只能在战场上一赌胜负。只要在军事上战胜不了萨拉丁，就无法靠近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

从理查到现在过去了30多年。这时已是腓特烈在率领十字军了。他所要面对的敌人已不再是萨拉丁。萨拉丁死后，伊斯兰世界由他的亲弟弟阿迪勒统率，而腓特烈的“敌人”是阿迪勒的长子、埃及苏丹阿尔-卡米勒。

从萨拉丁到阿迪勒再到阿尔-卡米勒，他们都是阿尤布王朝[4]的苏丹，完全没有狂热的宗教倾向。他们允许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共生，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伊斯兰稳健派。阿尔-卡米勒12岁那年曾由奉命与理查谈判媾和的父亲带着去过基督教阵营。当时理查就非常喜欢他，狮心王亲手授予他西欧式的骑士头衔。想了解这方面详情的读者，请阅读拙著《十字军的故事》第三册第一章《狮心王理查与第三次十字军》。

当上苏丹后的阿尔-卡米勒并不是因为有了少年时代的这份记忆才成为稳健派的，而是因为他基于现实的考量，继承了由伯父萨拉丁传承到父亲阿迪勒的路线，包容居住在中近东基督教徒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稳健相对于过激并不占优势，也许是因为动之以情要比晓之以理可以影响更多人的缘故吧。

萨拉丁和阿迪勒夺回了耶路撒冷，在军事上有着明确的打败过基督教徒的背景。而阿尔-卡米勒却同他们不一样，在这方面没有胜利的光环，地位总是很微妙。这一点在眼下腓特烈不得不远征的时期表现了出来。

统治大马士革的苏丹起来造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的反了。这不过是一场争夺主导权的纷争而已：究竟是把中近东伊斯兰势力的中心放在开罗，还是像现在一样留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背后有巴格达在操控。哈里发[5]就住在巴格达，他认为一直以来阿尤布王朝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变得不利，马上就拿宗教说事，这是一神教时代即中世纪常见的现象，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

我想，腓特烈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阿尔-卡米勒处境微妙，即使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也不必用剑，谈判就能达到目的。

其次，在上一次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势力进攻的是埃

及，而不是巴勒斯坦。阿尔-卡米勒因此陷入了苦境，曾向十字军方面提出过以十字军撤出埃及为条件归还耶路撒冷。这件事因基督教方面的执迷顽固而没有受到关注，但腓特烈却没有放过这一件事。

话虽如此，但最先要做的就是准确、客观、广泛地收集情报。

那不勒斯的大学顺利启动，腓特烈回到巴勒莫的王宫过圣诞节去了。这时，一直活动在圣地巴勒斯坦的一个宗教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前来拜访。

腓特烈知道他回到欧洲后，特意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这个骑士团通称为“医院骑士团”，历史悠久，在十字军运动开始前很久就开始为朝圣的基督教徒提供医疗服务。甚至萨拉丁在夺回耶路撒冷后依然同意他们的医院继续存在。这么一个组织的头头应该清楚整个巴勒斯坦的情况，而不局限于耶路撒冷一地。他肯定能向腓特烈提供准确的情报。

转年到了1225年3月底，仅次于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也造访了腓特烈。他刚从巴勒斯坦回来。前面讲过，他与腓特烈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一定聊得更加具体更加详细，而且无拘无束。

根据从两位骑士团长那里得到的信息，腓特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远征需要多少数量的军队。

如果带大军前往，就有敌方认为这是来打仗的风险。但如果军队规模偏小，又会被敌人轻视，甚至连外交也只能在不利的状况下开始。因而，所带军队的规模和组成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有一个插曲。随第五次远征十字军同行的阿西西的修道士方济各曾经前去敌营，向苏丹游说和平。苏丹阿尔-卡米勒并没有生气，甚至派

卫兵把他送了回来。不过，腓特烈不是宗教人士。尽管他想和平解决，但却不认为赤手空拳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认为，即使是外交，也只有在配备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换句话就是为不用剑而佩剑。这一点是腓特烈的十字军与其他十字军的不同之处。

出发以前

4月和5月，腓特烈离开西西里去意大利南方，在各地召集“巡会”，重新开始扎实推进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转变工作。

但这并不是要一味地把5年前在卡普亚制定的宪章进行到底。腓特烈的做法是，虽然制定了法律，但如果能修改得更好，那就不断修改下去。被召来参加“巡会”的封建诸侯也不光是一声不吭地听，腓特烈允许他们发言，说出源于基层的要求。

然而，从封建社会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光是收回封建领主的城寨，按照国家防卫战略进行重组一事，就很不容易。领主这些人，对拿走他们的城寨比削去他们的领地反应更敏感。正因为如此，这种事情并不是一声号令就能实现的。已经而立之年的腓特烈在应对这件难事上，没有采用诚心诚意说服的办法，而是利用了对诸侯内心影响力更强的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威。

大凡在这样的场合，腓特烈坐在中间的王座上，如影随形般紧跟腓特烈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就会坐在紧靠他左边的位子上。无论实力诸侯拥有多么辽阔的领地和多么坚固的城寨，只要他是基督教徒，就不过是一只羊而已。对他们而言，大主教是牧羊人，能够严格监督他们。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大主教增加到了两人。在这种场合，卡普亚大主教也一定会在场。

国王腓特烈真够坏的，他会当着西西里王国数一和数二的高级神职人员向参会的诸侯们讲话说，如果在实施《卡普亚宪章》规定的各项条款过程中有什么不便就请提出来。可以想象，即便有人想指出不便之处，发言也会小心慎重。不过，别看采用的是这种战术，西西里王国的中央集权化却在扎实地推进。诸侯们纷纷搬出了城寨，并允许自己曾经的部下在王国防卫的名义下重新整编后进驻城寨。

腓特烈在本国推进去封建化期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在德意志一门心思地为十字军招兵买马。他传来话说，5月会有眉目，届时将返回意大利。

赫尔曼返回意大利不仅是为了向腓特烈报告能从德意志带来多少兵力。这位德意志贵族还是宗教骑士团团长，通晓教廷内部情况。他似乎得到了罗马教皇这次要硬逼腓特烈率十字军远征的情报。

实际上，赫尔曼到达腓特烈居住的福贾后没几天，罗马教皇就于6月要求腓特烈同他正式商谈十字军之事。

进入7月以后，会谈实现。会谈在教廷领土与腓特烈领土交界的卡西纳举行，教皇方面有枢机主教比基耶里，腓特烈方面有赫尔曼参加。

罗马教皇此前曾经多次非正式地要求腓特烈皇帝进行十字军远征，正式要求也已有三次之多。对腓特烈来说，也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在王位上一坐就是44年。他去世后，儿子路易八世即位刚两年。人们都用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6]的名字尊称腓力二世为“奥古斯都”（尊严王）。继承这样的王位对谁来说都是件难事。也许是这个原因，继位国王在一年之后便早早去世，继承他的路易九世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

在英吉利，狮心理查在十字军中显示出了英吉利的存在感。理查死

后，弟弟约翰继位。他丧失了英国在法兰西的大部分领土，与他的绰号“失地王”名副其实。手下诸侯大爆不满，逼迫国王承认了《大宪章》。从此，英国王权就像《大宪章》所反映的那样明显衰落，一直处于无法率领十字军的状态。

在西班牙，将伊斯兰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正酣，国王和诸侯正在国内进行着十字军战争，没有余力远征巴勒斯坦。其实，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西班牙人。

这就是13世纪第一个25年时欧洲的状况，能够重新拉起十字军的君主也只有30岁的腓特烈了。

1225年7月22日，双方发表了由代理人谈判决定的事项。

一、两年后的1227年圣母升天纪念日（8月15日），十字军将从意大利南部的普林迪西港出发做第六次远征。

二、预计远征需要两年时间，皇帝负有在这两年内征召到1 000名骑士的义务。

三、除了1 000名骑士以外，皇帝还须征召到2 000名步兵和其他用途的人员。

四、皇帝承诺加强海洋船队用于向圣地运送军队。

五、皇帝筹措10万盎司的资金用作上述各项的全部开支。

第一次十字军出征的资金都是人们卖掉自己的领地，即使不卖也是用其做担保借款筹措的。现在的十字军已经变样了。在现在这个时代，撇开个人去圣地的情况不说，若是组织军队远征，所需经费均由统率军队的君侯承担。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不过，根据研究家的说法，当时谈判形成的文件里的文字很微妙，字面上写的是“去”，但写法却可能让人理解为“大概去”。我想，这可能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苦心孤诣的结果。他是德意志人，却说得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又精通教廷的内部情况。为了不向神职人员许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他们所擅长的拐弯抹角的冗长辞令和辞藻。然而这样一来，教廷这个以教皇为最高领袖的神职人员集团就没法单凭腓特烈皇帝的“承诺”放下心来。以前腓特烈总是在说“去”，却又两次延期，他们的担心也并非不可理解。也许，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人脑子里根本没有事不过三的思维方式。正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恰当的人，他的进言把这些人的“担心”化作了“放心”。

耶路撒冷王

布里昂的约翰[7]不过是生于法兰西的一介骑士。他之所以能当上耶路撒冷王国[8]的国王，是因为他娶了欧洲君侯人人望而却步的耶路撒冷王国女王。他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妻子去世后，长到14岁的女儿约兰达成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正统继承人。约翰考虑到自己年近七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跟女儿结婚守住耶路撒冷王国的人。

腓特烈的初婚妻子、西班牙王家出身的康斯坦丝于3年前去世。在这个女人的生前死后，腓特烈不断地找情人，光育有孩子的就有4人，加上正妻共有5个女人育有孩子。这时的腓特烈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尽管如此，当时30岁的他又回到了单身状态却是事实。

这样，撮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与耶路撒冷王国公主约兰达结婚的事情迅速浮出了水面。年老体衰、一心只想着十字军的洪诺留教皇觉得，这样一来腓特烈就只能率十字军出发远征了，自己死了也可以放

心。

腓特烈没有理由反对。正妻是政治婚姻，其他都是情人。如果自己与约兰达结婚后当上耶路撒冷王，自会有好处。

虽然叫作耶路撒冷王国，但首都耶路撒冷自萨拉丁以来一直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国王只能住在还掌控在基督教一边的海港城市阿卡，现实中只是一个没有王国的国王。不过，“耶路撒冷王国国王”本身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名头。这是为耶稣基督守墓、保护欧洲朝圣者的负责人的代名词。

腓特烈接受了这桩婚事。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王国国王，还有耶路撒冷王国国王这些名头很大的称号集于一身，可以给欧洲的其他王侯更强烈的冲击。腓特烈过于冷静了，不可能为虚荣心而鬼迷心窍。

当年11月，新娘声势浩大地组成了一支出嫁队伍，从巴勒斯坦远渡大海，在意大利南方登陆。腓特烈穿着皇帝的正装迎接了新娘。9日，他们便在自古以来就以通往东方大门而闻名的布林迪西的主教堂举行了庄严豪华的婚礼。

腓特烈与约兰达结婚

但是，14岁的新娘并没有等来特别的待遇。约兰达给父亲约翰写信哀叹，告诉他新郎在初夜的第二天就勾引了一个随从新娘而来的宫女。

不过，对腓特烈这种地位的人来说，正式婚姻的目的在于生育嫡子。他似乎也把相应的能量献给了新妻子。可刚刚有了怀孕的征兆，他就把约兰达送去了巴勒莫，理由是孩子必须出生在王宫。

对付约兰达的父亲布里昂的约翰，腓特烈做得更加直截了当。在罗马教皇和法兰西王筹钱让约翰和耶路撒冷公主结婚前，他不过是一介地方骑士。腓特烈根本没有按照同等规格对待这位老人，理由是既然自己

已经娶了拥有耶路撒冷王位的人为妻，她就不再需要监护人了。约翰本想皇帝当了女婿，女儿就会跟着皇帝回到巴勒斯坦。而现在，他所能做的就只是缠着教皇哭诉了。

话虽如此，腓特烈也感到，既然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就再不能继续拖延十字军远征了。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腓特烈的王宫所在地福贾和阿尔-卡米勒居住的开罗之间，已经开始了不引起罗马教皇怀疑的接触。

这个接触是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伊斯兰世界俗界最高领袖开罗苏丹之间的接触。双方都需要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行事。双方在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接触，不仅让对方，而且让其他任何人想怀疑都怀疑不起来，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接触时的不变规矩。

以前腓特烈就与居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实力人物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苏丹有过书信往来，请他们派来学者和文人。腓特烈做事都留有余地，让人心生敬佩。他的好学之心所向之处，任何事物都构不成障碍。应他的请求来到西西里的有教养的伊斯兰教徒都在巴勒莫的王宫受到了欢迎，他们中间也有人留了下来。我想，有了这些先例，即使把写信求助的对象改为开罗苏丹，也不大会有引起警惕的风险。外交上的接触也像造房子一样，如果在打基础的阶段就不谨慎，中途必定会崩溃。

腓特烈所率领的十字军远征的敌人是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开罗苏丹对此心知肚明，他冷静地想到，始于单纯文化交流的这段接触终将转变成外交接触。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接触本该顺利进展，但腓特烈这边发生了一件事，叫停了这种接触。

难题显现

1225年7月，腓特烈与教皇约定十字军将在两年后的圣母升天日出发远征。但在没过几个月后的秋天，腓特烈宣布要于翌年复活节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举行“巡会”。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召集的“会议”，召集范围遍及皇帝领土的所有地方。不光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的诸侯，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到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各个自治城邦的代表也都收到了会议通知。

召集这次“巡会”的理由是要全面讨论预定在第二年夏天实施的十字军远征。简而言之，腓特烈要把自己领土境内的所有人都拖入他将御驾亲征的十字军。但是，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却不会腓特烈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

这些自治城邦对腓特烈召集他们开会疑神疑鬼并非没有原因。阿尔比十字军还在法兰西南部行动。被他们当作异端遭到打击的人逃到了意大利北方。人们怀疑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城市人口激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信仰不同宗教的异教徒不同，虽是基督教徒但信仰方式不同的人被称为异端。在罗马教皇看来，他们是反体制派，应该成为镇压的对象。这就是天主教会的观点。在这个时代，从法兰西南部到意大利北方存在着一股称为清洁派（Cathari）的不可忽视的势力。说起来，他们就是200年前路德[9]发起新教时的新教徒，正统天主教会断定他们反体制也属无奈。在接受正统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加冕时，腓特烈也曾发誓要镇压异端。

这个腓特烈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召集“巡会”了。应召而来的各地实力人物不可能徒手前来。不管是大主教还是封建诸侯都带着军队而来，即使有的只是卫队。这些自治城邦害怕，把这些军队握在手中的腓特烈会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前来镇压意大利北方。

意大利北方人们的怀疑和恐惧不完全是曲解。腓特烈有过痛苦经历。17岁那年，他在前往德意志途中遭到米兰派来抓捕他的队伍的追击，骑马涉河，险些遇难。很难断言，已经30岁的腓特烈没有心思利用前来克雷莫纳参会的军队威压顽固坚持反霍亨斯陶芬的意大利北方。

无论如何，从1225年冬天到1226年春天，意大利北方各自治城邦之间一直暗流涌动、积极联络。

转年到了1226年3月2日，即腓特烈在克雷莫纳召开“巡会”的50天前，“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在位于曼托瓦郊外的圣芝诺教堂宣布复兴。参加同盟的有，领头人米兰及都灵、布雷西亚、贝加莫、曼托瓦、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博洛尼亚和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的自治城邦。得知同盟复兴后，皮亚琴察、维罗纳、洛迪、亚历山德里亚等自治城邦也都表态加盟。

另一方面，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却不参加同盟，明确表示自己是皇帝派的自治城邦有克莱莫纳、帕维亚、摩德纳、帕尔马、雷焦、热那亚等。

双方均不见其名的重要城邦国家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由于内部分裂为皇帝派和反皇帝派，态度不能确定。威尼斯共和国则坚持已经成为国家传统的现实路线，回避选边站。

之所以称为复兴，是因为“伦巴第同盟”原本是为对抗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而结成的同盟。“红胡子”这个绰号原本出自意大利语barbarossa（巴巴罗萨），由成为敌人的米兰人叫开。

尽管“伦巴第同盟”同“红胡子”之间互有输赢，但最终屈服，让腓特烈的父亲和母亲在米兰的主教堂举行了婚礼，并在这种反皇帝派认为屈辱的状态下解散了同盟。忘不掉这一切的米兰人作为发起人，为对抗“红胡子”的孙子腓特烈而重建了这个同盟。他们不仅宣布复兴，而且

立即付诸实行。

参加伦巴第同盟的意大利北方各城邦

自古罗马以来，有三条干线道路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德意志南下到意大利。尽管中世纪对完善基础设施漠不关心，三条道路一直被弃置而得不到维修，但由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中世纪的人们仍在使用这些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翻过阿尔卑斯山后南下都灵。

第二条道路是翻过布伦纳山口后南下维罗纳。

第三条道路是从如今已经成为奥地利领土的地方进入意大利半岛东北部。

应皇帝召集前来参加“巡会”的德意志各地实力人物必须通过这三条路中的一条才能到达开会地点克雷莫纳。

得知这一情况的伦巴第同盟采取了对策，向这三条道路派出军队，切断道路。米兰和贝加莫在第一条路上设置了路障。维罗纳和曼托瓦负责第二条路。帕多瓦和特雷维索派兵切断第三条路。

复活节的日子因年而异，那年的复活节在4月29日。意大利已经到了仲春，德意志的春天却刚刚开始。阿尔卑斯山里还没有完全出冬。皇帝手下的德意志诸侯们也知道，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已经筑起了路障，想出发也做不到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诸侯还是绕远走第三条路汇集到了克雷莫纳。由于监视这里的威尼斯共和国保持中立，本该切断这条路的路障事实上没有起到作用。

皇帝在德意志的权威和权势的体现者是他的长子、德意志王亨利。亨利这年15岁，又是皇太子，所以是在克雷莫纳召开的“巡会”上不可缺少的人物。然而，这个15岁的皇太子连从德意志出发的通知都没有发出。不知道是听从了那些得知有路障便吓破了胆的心腹的意见，还是由

于同一年前结婚、年长自己8岁的德意志实力诸侯的女儿玛格丽特[10]搞不好关系而失去了自信，总之，这位“皇太子”始终没有露面。

4月19日，应该是“巡会”开会第一天，腓特烈甚至不在克雷莫纳，他在拉文纳过的复活节。在克雷莫纳开会失败，对已经31岁的腓特烈而言恐怕是初尝苦涩，这等于自己的领土德意志和意大利被“腰斩”了。说不定就是在这个时期，腓特烈的心里涌出了再次推迟翌年十字军远征的念头。一国统治者放下领国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不管而去遥远的东方，这可不是没有烦恼便能下的决断。可是，再次延期已经到了不能允许的地步。

但腓特烈又不能就这样夹着尾巴跑回意大利南方。首先他自己的荣耀就不允许他这样做。其次，让伦巴第同盟各自治城邦高奏凯歌的状态继续下去，明显对以后打开局面有重大不利。

5月，腓特烈离开他度过复活节的拉文纳，但他没有回意大利南方，只带着手头的军队开始访问意大利北方城市。这次旅行可不是为了饱赏春色，而自然是一次示威之旅，兼向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施加压力。因此，这次旅行从东边的拉文纳到西边的皮埃蒙特，横跨整个意大利北方。

其间腓特烈还给罗马教皇写了信，谴责妨碍他召开讨论十字军远征“巡会”的伦巴第同盟，并说教皇也应该采取措施。

教皇洪诺留慌了手脚。他担心，腓特烈又会以此为由再次推迟十字军远征。于是教皇威胁伦巴第同盟各自治城邦说要开除他们的教籍。这位教皇罕见地使出了强硬对策。

当初已经绝望的状况得到改善，至少不那么绝望了。这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率军示威产生了效果。腓特烈行军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城邦阻拦，就连米兰也都一声不吭地躲在城墙后面。

第二，腓特烈在米兰的眼皮底下与萨伏依伯爵结成了同盟。由于在意大利西北部拥有广阔领地的萨伏依家族站在了腓特烈一边，伦巴第同盟的领袖米兰便不可能继续以前的做法了。今后，米兰不得不常常小心着西面邻居萨伏依的态度。

第三，罗马教皇的威胁里透着开除教籍的味道。不可一世的米兰也想避免被当作异端，从而成为打着反对异端旗帜的十字军的目标。

就这样，当初伦巴第同盟宣布复兴时，加盟的自治城邦在数量上压倒性地多于皇帝派，但过了3个月后到了7月份时，形势发生逆转。当然，“伦巴第同盟”本身并未被迫解散，只是反皇帝的领袖米兰安静下来而已。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决定了结“伦巴第问题”。他决定经比萨回意大利南方。离十字军远征出发的日子只剩一年了。

阿拉伯数字

腓特烈绕道比萨有两个原因。第一，比萨是与威尼斯和热那亚比肩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此行就是为了把比萨拉到自己一边。第二是为了从比萨登船前往意大利南方。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最终都达到了。比萨的实力人物们欢天喜地地提供了皇帝的座船和护卫船队。在比萨，腓特烈结识了一位饶有兴味的人物，商人兼数学家列奥纳多·斐波那契。

出现在31岁皇帝面前的是一位年已56岁的在比萨随处可见的普通男

子。这个56岁的男人两眼放光地向腓特烈展现了阿拉伯数字的世界，强烈地刺激起了这位31岁皇帝的兴趣。

列奥纳多·斐波那契是一个典型的出生在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男子，从年轻时起就走遍了地中海周边地区，从事着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他领悟到了在伊斯兰世界遇到的阿拉伯数字的高效，热情地为欧洲引进阿拉伯数字。早在28岁的那年他就出版了《算盘全书》（*Liber abbaci*）。但是，向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引进阿拉伯数字遭到了教会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本书遂成绝版。

阿拉伯数字	0	1	2	4	5	10	99	100	400	500	1000	1194	2014
罗马数字	–	Ⅰ	Ⅱ	Ⅳ	Ⅴ	Ⅹ	XCIC	C	CD	D	M	MCXCIV	MMXIV

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

以前，欧洲使用的一直是罗马数字。与其相比，阿拉伯数字的好处除了书写时可以减少错误之外，还有“0”（零）的概念。

“0”的概念本来发祥于印度，在印度被冠以“S′ūnya”之名，意思是“空”。阿拉伯人引进了这个概念，起名“sifr”，翻译成拉丁语就成了“Zephirus”。威尼斯人弄懂了这个概念后开始用他们的方言称之为“zevero”，以后又成了意大利语的“zero”。自从有“0”的概念以后，数学的发展才真正起步。

这位比萨商人的话给腓特烈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为了让已经56岁的斐波那契能够放弃贸易专心研究数学，皇帝决定向他支付终身年金。也许因了这个原因，《算盘全书》两年后得以再版，流传至今的就是1228年出版的第二版。以后，斐波那契跟腓特烈也一直保持着交往，他的《平方数书》（*Liber Quadratorum*）一书就是献给腓特烈的。威尼斯共和国传承了阿拉伯数字。这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开设了学习阿拉伯数字的

学校，阿拉伯数字从此传遍了欧洲社会。

皇帝腓特烈二世终其一生都热衷于鼓励学习技艺，就连强硬批判他的现代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他没有把学艺看成是只有与政务割裂开来才能进行的独立领域。不管是罗马教皇，还是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不管是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还是意大利南方的臣民，在腓特烈的一生中都没有使他获得释放的感觉。他只有在高度紧张的处理内外政务极其短暂的间隙中，才能满足一下关心学艺的心愿。腓特烈也曾在自己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写道，鹰猎的效用就是让自己从政务带来的日复一日的重压之中暂时解放出来，只有那段时光能让我身心愉悦。

无论是用鹰狩猎，还是论述阿拉伯数字的效用，对腓特烈而言都是愉悦的。正像他一辈子不断忙于政务一样，与这类人共度短暂时光的愉悦也跟随了他一辈子。按现在的说法，这叫作消除焦虑。但腓特烈的“消除焦虑”却不止于消除，而是与振兴技艺密切相关。这与他厌恶逢场作戏的性格很相像。

顺便告诉大家，这位比萨商人斐波那契还向腓特烈推荐了一位比自己小5岁的朋友。这位朋友出生于苏格兰，曾经在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的托莱多求学。不过，腓特烈与他之间谈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位迈克尔·司各特后来成了腓特烈宫廷里的常客，也是最早把亚里士多德介绍到欧洲的人。

这样看来，腓特烈的熟人或朋友中有很多不同凡响的人。莫非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后半叶腓特烈自己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

腓特烈从比萨登船前往西西里的海港城市叙拉古。那里，不仅有马耳他鹰，还有马耳他岛出生的海军将领恩里克在等着他。腓特烈就要率领十字军远征了。他把组建陆军托付给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而海军就交给了出生在马耳他岛、被誉为超一流船长、血管中流淌着热那亚人血液的恩里克。恩里克这位曾经的海盗现在担任了皇帝海军的司令

官。

皇帝命令海军司令建造可以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船只。司令官接受了命令，造出了平底船让皇帝审查。通过审查之后，司令官开始建造一支全部由平底船组成的船队。

在此之后，腓特烈打算途径意大利南方，去福贾的王宫过冬。这时，又有一件重要的政务摆在了他的面前，开罗苏丹派来的使节团抵达了福贾。

苏丹阿尔-卡米勒

使节团的首席代表是一位年轻的埃米尔，名叫法拉丁。所谓“埃米尔”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领主。据说法拉丁是深受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信赖的心腹。

伊斯兰世界俗界第一人与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即外交交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在十字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后，法拉丁一直与腓特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法拉丁生年不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但从他后来岁月漫长的外交官经历以及他准确的卒年推测，他大概与32岁的腓特烈同庚，或稍许年轻一点。

首先让法拉丁吃惊的是，与腓特烈对话时，自己带来的翻译派不上用场。

自第一次十字军以来，许多跟随十字军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徒在中近东定居下来，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到了现在，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人了。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懂得伊斯兰世界的第一语言阿拉伯语。

可是，法拉丁眼前的腓特烈有生以来从未踏上过中近东的土地。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皇帝的意义不同于教皇，但他也是统率所有基督教徒的人。然而，这位皇帝竟然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帮助就能阅读、理解法拉丁带来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还能用阿拉伯语谈出自己对亲笔信的想法！

这样一来，法拉丁对皇帝的认知自然始于美好的感情。腓特烈似乎对年轻的埃米尔也抱有良好的感情。腓特烈这个人是从不让自己厌恶的人靠近自己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决定了腓特烈的良好感情。

亲笔信中写着苏丹已做好了归还耶路撒冷的准备。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腓特烈要与阿尔-卡米勒结成联盟，来应对阿尔-卡米勒的亲弟弟、现在与他处于敌对关系的叙利亚苏丹阿尔-穆阿扎姆，即使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前来，也不攻打埃及。

萨拉丁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在伊斯兰世界被奉为英雄。他的弟弟阿迪勒是哥哥最好的合作者，他接了哥哥的班。他跟哥哥一样，完全没有宗教的狂热。继承阿迪勒的是他的儿子阿尔-卡米勒。阿尔-卡米勒少年时代就被狮心王理查封为西欧式骑士。即使不是这个原因，他这个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感情也不坏。

阿尔-卡米勒与弟弟阿尔-穆阿扎姆的关系很好，这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家族相比算是特例了。兄弟俩年龄只差两岁，也是竞争对手。兄弟二人忠于父亲的遗志，分别在埃及和叙利亚进行分治。他们个人之间的兄弟感情也不错。

但正如前述，这一时期，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分为埃及派和叙利亚派，双方都是既得权益阶级。一方在开罗，另一方在大马士革，双方相互竞争，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叙利亚派对埃及派的逐渐强大变得神经质，不断攻击埃及派，兄弟俩原本关系并不坏，现在弟弟叙利亚苏丹却站到了最前锋，要打倒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

阿尔-卡米勒是长子，因而是父亲留下的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不容许他放任自流的问题。如果埃及与叙利亚发生正面冲突，影响将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阿尔-卡米勒一直在寻找规避的办法。他当然不希望十字军在这个时期前来远征。

他心里绝对不希望十字军打到埃及来。记得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登陆埃及时，阿尔-卡米勒率领埃及军队迎战，虽然成功地把十字军赶了回去，但个中艰辛仍历历在目。在给腓特烈的亲笔信里写的不进攻埃及的条件，正是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的切实想法。

此外，亲笔信里还写到了“同盟”。所谓同盟，并不意味着等同于军事上的并肩作战。同盟并不要求共同进攻某一方的敌人。有的同盟只要求不做对某一方的敌人有利的事情，即要求对方不要帮助敌人。

身为伊斯兰教徒的哥哥为扳倒同为伊斯兰教徒的弟弟而与基督教徒联手所冒的风险，对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苏丹阿尔-卡米勒来说实在太大。他已经能看见，大马士革背后巴格达的哈里发会竭力谴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叛徒。中世纪是一神教的时代，背叛同教教徒的谴责会使苏丹的地位陷入危险境地。

换句话说，阿尔-卡米勒没有忘记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的痛苦经历，他最希望的就是十字军不要进攻埃及。如果这条能获得保证，他就可以归还耶路撒冷。

阿尔-卡米勒有过“前科”。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他就曾说过如果十字军撤出埃及，他就归还耶路撒冷。但在当时，十字军中的狂热信徒太多。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必须通过流血夺回，而不能通过与异教徒的对话收复。结果阿尔-卡米勒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不过，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是腓特烈，他认为最好不流血就能收复圣城。32岁的皇帝决定，认真地接住苏丹投过来的球，再认真地投回去。

腓特烈找了个理由，说护送埃米尔法拉丁时顺便回访，派出使节团出发去了埃及。使节团里有两个封建诸侯兼重臣，但首席仍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赋予贝拉尔德的任务是：第一，确认苏丹所写的内容；第二，直接拜见阿尔-卡米勒，了解苏丹的为人。已经对腓特烈抱有亲密感情的法拉丁将尽力促成大主教与苏丹的直接会谈。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阿尔-卡米勒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他希望不要进攻自己根据地埃及的想法是正当的。但他还说，如果十字军不打到埃及来，他就归还耶路撒冷。可是，眼下统治基督教徒憧憬之地圣城耶路撒冷的是弟弟叙利亚苏丹，而不是他埃及苏丹。

这就是说，阿尔-卡米勒承诺归还并不在自己管辖之下的耶路撒冷。

难道腓特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不，他一定注意到了。但他不动声色，沿着“约定就是约定”的路线走下去。

所谓外交，不一定只要坦率地打出手中的牌就会有好的结果，也不一定只要手里的牌好就能取胜。不论牌好牌坏，关键在于如何打好手中的牌。

并不是皇帝派出的使节团里有相应的重臣就能够完成任务。32岁的腓特烈把这项顶级微妙的外交任务托付给了相互了解远胜他人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从腓特烈16岁那年起，贝拉尔德就明里暗里地支持着他。这时，他也会完美满足拥有共同思想的青年君主的期待。

既然是大主教，贝拉尔德也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执第五次十字军之牛耳的教皇代理佩拉吉奥也是神职人员。

面对阿尔-卡米勒归还耶路撒冷的说法，枢机主教佩拉吉奥主张圣城应通过基督教徒流血夺回，不能通过与异教徒交涉来收复，他甚至拒

绝讨论此事。

对同样的说法，大主教贝拉尔德却为了与异教徒交涉而不远万里前往开罗。

贝拉尔德结束与开罗苏丹的会谈回到意大利，已经是第二年的开春时分。

就在这年春天，罗马“换人”了。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1]

1227年3月18日，年近百岁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去世。第二天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选出了新教皇，以格列高利九世之名即教皇位。新教皇是英诺森三世的侄子，对伯父的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深信不疑。

新教皇即位时已经57岁。与纤细瘦小的前教皇洪诺留相反，他体格魁梧，浓密的胡须遮住了半张脸。他言谈举止颇有威严，也经常暴怒。他心中郁积着颇深的阴暗怨恨，人们经常能在深感自己身处底层、忍受已久的人身上见到这种怨恨。

托了伯父的福，他得到了罗马附近富裕的大教区，而根本不是什么身处底层。可是，客观标准不通用于这种怨恨。顺便说一下。7年前的1220年，当时25岁的腓特烈为了参加加冕典礼来到罗马。当时50岁的格列高利受教皇洪诺留之命迎接并照顾腓特烈。他在加冕当天担任先导，把腓特烈引到教皇等候的圣彼得大教堂。

这位格列高利九世教皇留名青史是因为此后开始的他同腓特烈二世

皇帝之间的炽烈抗争。不止于此，他作为5年后于1232年设立的“异端裁判所”的创设者也在欧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异端裁判所”靠着女巫审判[12]这种多半是嫉妒和羡慕的产物，以及残酷无比的严刑拷打，长期震慑着欧洲社会。而“异端裁判所”竟是由这样一位教皇创设的，他坚信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应该是不仅照耀皇帝、还要照耀所有信徒的太阳！

4月初，教皇格列高利即位尚不满半个月就给皇帝来了信，要求皇帝严格遵守与前教皇洪诺留约定的十字军远征的出发日期。

即使教皇不催促，腓特烈也考虑到事到如今只能决心远征了，只是还没有从阿尔-卡米勒那里得到归还耶路撒冷的明确说法。他再次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去了开罗。

贝拉尔德再度来访，阿尔-卡米勒这次也直截了当地做了答复，也许是他厌倦了玩弄语焉不详的辞藻，或是他觉得不能失礼于远方的来客。他说，耶路撒冷在弟弟阿尔-穆阿扎姆的领地上，要让贝拉尔德做出判断。他还为贝拉尔德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身在大马士革的弟弟。再怎么样弟弟也是敌对方，给这样的对手写介绍信，阿尔-卡米勒也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尽管如此，大主教贝拉尔德还是切身感受到了年轻君主的心思。他拿着介绍信去了大马士革，请求与苏丹阿尔-穆阿扎姆举行会谈。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否见了面，因为这个时期苏丹正在卧病之中。

然而，即使明白贝拉尔德的辛苦，腓特烈也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大主教回国了。

腓特烈将西西里王国托付给一个重臣统治，把怀孕的妻子约兰达留在了安德里亚城，于约定的日子（8月15日）开进了出港地点布林迪西。

腓特烈在布林迪西看到数量庞大的群众挤满了港口。他们基本上都是得知十字军要进行久违的远征后从欧洲各地汇集而来的朝圣者。军事远征让朝圣者同行，这也是以往远征时的惯常做法。但这年的朝圣者数量之庞大前所未有，好似又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狂热时代。尽管皇帝和国王们都没有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但因教皇的倡导，那时的狂热几乎是自发的。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测，欧洲的基督教徒对旨在收复圣城的十字军远征早已翘首以待。

但是，群众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容易导致瘟疫发生。那情况就像很多人挤在住宿设施不足的地方，而且又逢盛夏季节。

到了圣母升天日的8月15日，腓特烈已根本无法出港。朝圣者中爆发的瘟疫已经扩散到了士兵，尤其是为运送远征军召来的船员中也接二连三地有人病倒。

即便如此，腓特烈还是试着于8月21日出港。但那天全军没有准备好，只能延期出发。

9月8日，皇帝登上了旗舰。这是一艘大型加莱船[13]。旗舰领头，整个船队离开了布林迪西港。

但还没航行到10海里，情况就明确显示出他们处于一种绝望之中。船速之慢令人一筹莫展，甲板上满是无力瘫坐的士兵，无处插脚。旗舰像是医疗船，船上躺着濒死的图灵根伯爵。他是腓特烈的同辈好友，腓特烈原本想把十字军的陆军交给他指挥，而现在腓特烈所能做的只是陪在行将去世的图灵根伯爵路德维希的枕边。

腓特烈命令船队调转方向去奥特兰托港。如果撤回，去那里要比去布林迪西更近。

进了奥特兰托港后，腓特烈立即命令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淘选健

康船员，编成有20艘加莱船的船队，载着800名健康骑士先行前往东方。他没有忘记给教皇格列高利写信说明情况，并让海军将领恩里克带着信出发去了教皇那里。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便到那不勒斯附近的波佐利温泉疗养去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妙了。

开除教籍（第一次）

教皇格列高利不但拒绝会见海军将领恩里克，甚至还拒收了腓特烈的信。教皇认为，腓特烈必须亲自前来拜见教皇，说明事情原委，但他却一边泡着温泉，一边只差人送来一封信，这成何体统！

教皇怒向胆边生，以没有在约定的日期远征为由，决定对皇帝处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对基督教徒来说，没有比开除教籍更严厉的处罚了。当然，教皇决定这样处置皇帝的理由不仅是这一点。我把这些理由归纳如下。

自幼成为孤儿的腓特烈，之所以能够成为西西里国王，接着成为德意志王，最终还当上了皇帝，这都是托了谁的福？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教皇不惜代价援助的结果。

这份教皇诏书的全文于同一年的11月18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正门上张贴出来，正式公布开除腓特烈教籍。教皇格列高利还大量抄写诏书，不仅发送给了欧洲全境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还发送给了全体国王和实力人物。

9月8日，腓特烈因为瘟疫流行而不得不撤回。9月19日，教皇决定开除皇帝的教籍。11月18日，教皇公布了开除教籍的诏书。可以想象，57岁的教皇认为自己被捉弄了，对32岁皇帝的怒火急速飙升。

这个时候，腓特烈也把与他地位相符的辞令抛到了一边。他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直抒胸臆。

“你说是罗马教皇帮助了幼小的我，但在我度过孩提时代的时候，教皇对西西里毫不关心，诸侯为所欲为，整个西西里王国成了无政府状态。在我成长的时代，甚至在我成人之后，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授予萨克森公爵奥托的，不也正是罗马教皇吗？

“而我达到今天的地位，究竟是托了教皇的洪福，还是因了在困难时期不遗余力帮助我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侯呢？”

这又在格列高利教皇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腓特烈在信的末尾还写着：“我将于明年即1228年春率领十字军出征。”

开除教籍（第二次）

转年到了1228年的3月23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告示。腓特烈第一次被开除教籍尚未解除，又被第二次开除了教籍。

第二次开除教籍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罗马教皇缺乏恭顺之意。

在格列高利教皇看来，被开除教籍的人必须扔掉一切跑到教皇这里，穿上象征悔罪的简陋衣服，在纷飞的大雪中肃立三天三夜，乞求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而腓特烈却只写来了一封信，而且满纸充斥着反驳的论调，真是不成体统。

然而，腓特烈二世皇帝不是因“卡诺莎之辱”[14]而留名历史的亨利四世[15]皇帝。格列高利教皇已经刹不住车了。在公布的开除教籍告示中，教皇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了以下命令。

一、对被开除教籍者的逗留及途径之地一律处以“禁止教务”的处罚。

所谓“禁止教务”，可以说是开除教籍的前一阶段，是教皇给俗界的处罚。一旦被处以“禁止教务”的处罚，从弥撒到出生洗礼、婚礼、葬礼统统不能举行。

当然，由于不能举行基督教徒不可或缺的这些仪式，这些人离人们祈愿死后要进的天堂便更加遥远了。

“开除教籍”是给个人的处罚，但“禁止教务”则是给居民共同体的处罚。两者在这一点上也不相同。

二、居住在被开除教籍者所领有的所有土地上的人民，将从对此人发誓顺从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人民不再需要纳税，也不再需要应征当兵。

“开除教籍”是罗马教皇最强大的武器，原因就在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服从被开除教籍者。教皇说了，家臣和士兵都可以离开，任何掌权者都有陷入孤立无援状态之虞。正因为如此，亨利四世才会在纷飞的大雪中，在卡诺莎城门前连续肃立以表恭顺，乞求卡诺城里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6]为他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

“开除教籍”这个词在中世纪历史中频繁出现，到了令人腻烦的地步。虽然这个词的词源为当时通用语言拉丁语，但却不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就有的拉丁语，而是古代末期基督教会造出的拉丁语，在词典中的分类是“后期拉丁语”。

非一神教世界是不会产生这种语言的，因为开除教籍意味着被从同教信徒组成的社会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就是牧羊人把羊群中的一只羊赶了出去，还对它说“你不可以回来”。牧羊人就是罗马教皇。在教皇看

来，皇帝也好，国王也罢，都只不过是羊群中的一只羊而已。

因而，“开除教籍”成了教皇手中强大的武器。不过，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向皇帝腓特烈二世打过来的这个武器还另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命令”的第二项，规定腓特烈的部下臣民已无义务服从于他。单凭这一项，腓特烈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远征了。但教皇又向信徒发出了下述第三项命令。

三、被开除教籍者率领的军队不是十字军。因而允许该军队行军沿途地方的民众阻止其行进，并可以抢夺该军队运送的物资。

不过，这第三项所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教皇的预料。

在那个时代，多半人是信任十字军的。在他们看来，教皇诏书的第三项反映的是教皇阻碍十字军远征甚于任何人，就连老百姓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

由于这些情况，尽管腓特烈一连两次遭到开除教籍的处罚，但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受到实际损害。既没有臣民暴动，也没有诸侯叛离。不仅如此，就连大主教、主教这些有义务绝对服从教皇的人也都继续留在了腓特烈身边，并明确表示将与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同行远征。这就是说，连大主教都不理睬教皇的命令了。

当然，腓特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被开除教籍。在第二次公布开除教籍的一个月前，他正驻跸福贾王宫，开罗苏丹的特使前来拜访。阿尔-卡米勒派来的特使和上次一样还是法拉丁，但他带来的苏丹亲笔信的内容却与上次大相径庭。

阿尔-卡米勒在信中告知了叙利亚苏丹于去年冬天去世的消息。没有人怀疑阿尔-穆阿扎姆不是因病自然死亡。正是这样，令阿尔-卡米勒头痛的叙利亚派的反抗也平息下来了，像是自然消亡一般。

就这样，由于弟弟以平稳的形式退出了舞台，叙利亚和埃及自然成为一体。47岁的阿尔-卡米勒和伯父萨拉丁及伯父去世后的父亲阿迪勒一样，成了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最高权力者。

他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归还对伊斯兰教徒而言也是圣城的耶路撒冷，来请求腓特烈不要进攻埃及。法拉丁带来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决定不再归还耶路撒冷，你就不要为此而来远征了。

这就等于，腓特烈本打算通过十字军远征和平收复圣城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便夭折了。

更有甚者，教皇传话要他出发，却不见一点儿要为他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关心。

被开除教籍的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成为得不到教皇祝福的十字军。十字军原本始于教皇的倡导，这样一来，腓特烈就连“十字军”领导者也不是了。也就是说，以免罪之名给予参加十字军者的报偿，也不会再给予跟随腓特烈远征东方的将士们了。

如果想顺从当时的气氛，腓特烈就应该暂缓在这样的状况下率军出发。他应该暂停远征，满足教皇的要求，身裹破衣烂衫，赤脚前往罗马，以悔罪的姿态站在圣彼得广场，心无旁骛地祈求教皇为他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以被开除教籍之身率领十字军远征，这本身就是徒劳。

尽管如此，腓特烈以毫不掩饰的亲切之情送走了法拉丁，却没有改变出征的计划。

为什么32岁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决定要出征呢？

腓特烈不是不想率领十字军去远征，只是不想按照以往十字军的方法率军前去而已。

而且，他不认为教皇与皇帝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关系。

腓特烈更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才是正确的。

腓特烈认为，既然所谓十字军远征既是军事，又是政治，还是外交之事，那么，这一切正如耶稣所说，应该是皇帝负责的领域。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宗教上的事情归在教皇管辖之下也属当然。

这个观点改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政教分离”。后世的欧洲把这种观点称作“世俗主义”。腓特烈在那不勒斯创设了只招世俗学者教授罗马法的大学，帮助普及了阿拉伯数字，认为连十字军远征也都应该由皇帝、国王和诸侯等世俗之人去做。也许腓特烈就是政教分离主义者或世俗主义者，尽管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名词。

第六次十字军

1228年6月28日，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从布林迪西港出发了。33岁的皇帝并没有因热衷于跟教皇吵嘴而虚度9个月，他把这9个月用在了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船队由40艘加莱船和超过百艘的运输帆船组成，总指挥是海军将领恩里克。船上装满了军粮、武器和马匹，载着100名骑士和3 000名步兵。腓特烈乘坐的大型加莱船上还有巴勒莫、卡普亚和巴里的三位大主教，他们都是高级神职人员，是西西里王国神职界第一、第二和第三号人物。

虽说率领十字军的是被开除教籍之人，但骑士、士兵和船员中却没有一个人因宗教理由离队。那是一个仅与被开除教籍者保持关系都会被

开除教籍的时代。当时的编年史作家几乎都是主教或修道士，支持教皇者居多。如果有离队者，他们是不会放过而不记录下来的，但却没有一个作家记录有人离队。

顺便一说，在参加这次十字军的意大利南方的志愿兵中，有不少人是已经集体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士兵。十字军把伊斯兰教徒作为敌人，腓特烈却随军带去了伊斯兰教徒。当然也可以说，既然是伊斯兰教徒，那么总司令是不是被开除教籍者也就无所谓了。

这件事日后成了罗马教皇方面弹劾腓特烈的一个理由，而当时腓特烈方面的反驳如下：

即便形成流血事态，那血也不是基督教徒的血，而是伊斯兰教徒的血。可见谁都不难理解，即便你不是罗马教皇，心里也想说上一句“别胡闹了”。

不管怎么说，感觉上所有人都在期盼的第六次十字军“终于”成行了。但总司令亲自率领的远征军规模也太小了，只有100名骑士和3 000名士兵。当然，此外还有先派出去的兵力。

这先行兵力是去年因瘟疫不得不延期时，腓特烈委托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率领的800名德意志骑士。他们不是单纯的骑兵而是“骑士”，所以加上辅助的步兵和马夫，实际人数会是800人的3至5倍。

这支先遣队已于去年秋天抵达巴勒斯坦，并按照腓特烈的命令完成了西顿港的整修工程和护卫这座海港城市的城墙的加固工程。

后来，他们还完成了阿卡和蒙特福特的城寨加固工程。转年到了1228年，他们甚至完成了仅次于阿卡的海港城市凯撒利亚的防卫强化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腓特烈到达时能够安全登陆，登陆后马上就能用作前线基地，而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地。

可是，这些兵力加上当地可能征召到的所有兵力，也不过只有骑士900到1 000人，步兵3 000人到4 000人而已。4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的时候，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率领的军队有骑兵3 000人和步兵8万人。

不过，腓特烈的指挥系统非常一体化。他本人是最高指挥，在他之下，陆军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海军由马耳他岛出生的恩里克这两位能力出众的武将分别节制。所以他们规模虽小，却称得上精锐。

另外的一个好处是，由于腓特烈受到开除教籍的处罚，出征时便不用再带那些忌讳与他同行的众多朝圣者了。这就是说，第六次十字军排除了碍手碍脚的善男信女，成为一支由纯粹战士充实起来的十字军。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还有一个有利之处。

那就是海军完全是自己的。参加第三次十字军的法兰西王腓力从运输到所有一切完全依赖热那亚，而特意让本国船队返回的狮心王理查，到了要用船队作战时也不得不去求比萨和热那亚。帆船适合运输，但海上战斗只能用加莱船。加莱船上配有当时的发动机——桨，行动自由。加莱船不是欧洲北部海洋里的船，而是适合于地中海的船，只有适应了地中海的船员才能驾驶加莱船。

腓特烈的领土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都面向地中海，不仅是海运国家，还是一个拥有惯于操纵加莱船的海军的国家。运送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先遣队的那20艘和腓特烈亲自率领的40艘船都是加莱船，全在意大利南方或西西里建造。

指挥这些海军的是生于马耳他岛、对地中海了如指掌的海军将领恩里克。海军力量不用求别国自然有利于指挥系统的一体化。腓特烈的海军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专门为远征建造了运输船。这些船的船底浅而平，能够溯尼

罗河而上，直击开罗。

由此可见，33岁的腓特烈是在做好了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之后才远征东方的。

为什么腓特烈一方面在考虑只靠外交和平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一方面却又在军事方面如此充分准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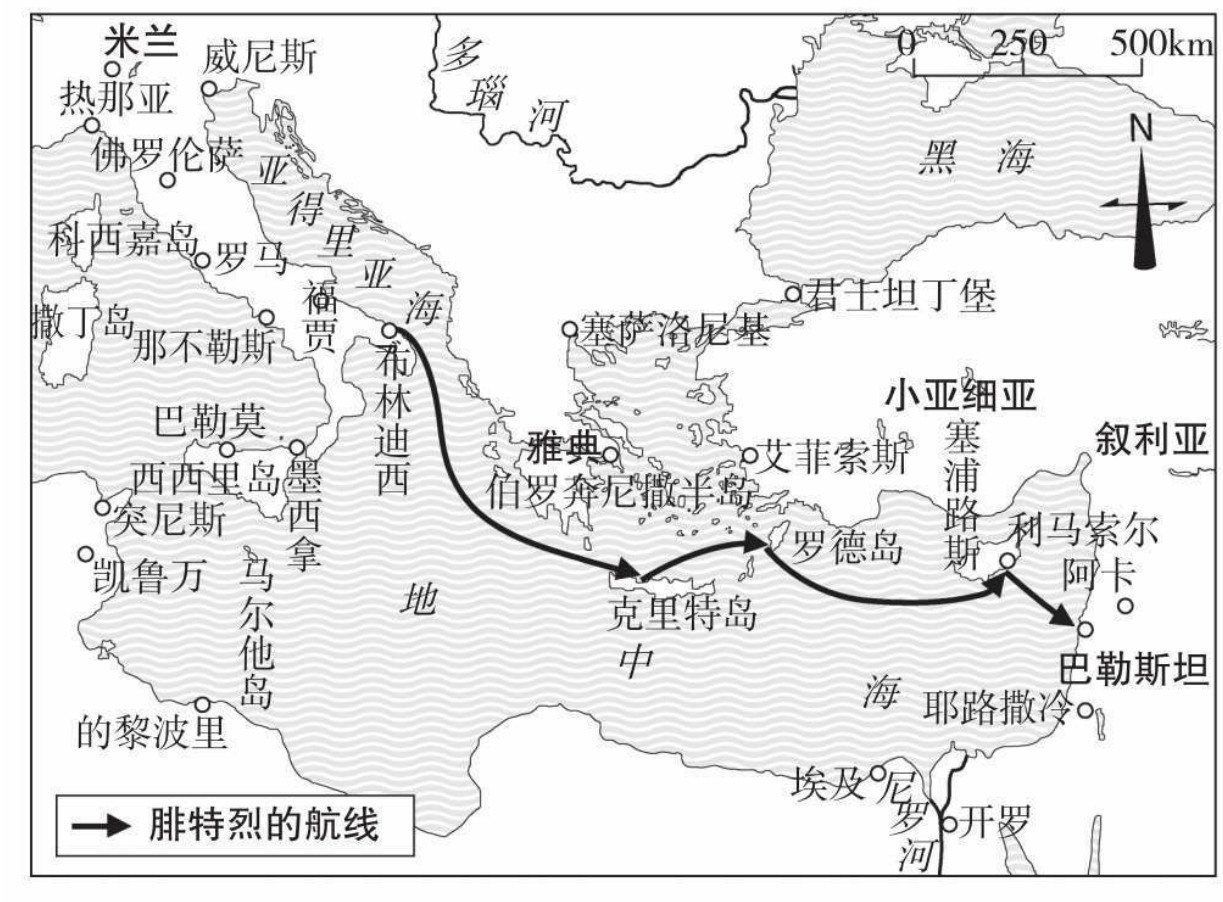
我想再说一遍，皇帝腓特烈二世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虽然相差12岁，他们却是同时代人，而且同为中世纪历史上的巨人。在这一点上，两人也很相像。但腓特烈不是圣方济各，他不认为光靠这位修道士在上次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所尝试的那样，用语言说教就能实现和平。

阿西西的方济各到敌人阿尔-卡米勒那里去说教，说要实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和平与共生，最正确的道路就是苏丹您改信基督教。

伊斯兰教规定，异教徒劝伊斯兰教徒改教便是死罪。所以，圣方济各即使当场被斩杀也无话可说。

然而，面对手里只拿着一根拐杖，穿着一身穷酸僧衣的年轻修道僧的大胆举动，苏丹阿尔-卡米勒的回应只是微微一笑，便派卫兵把他送回了基督教一方的阵营里，这才使方济各得以回到阿西西。比这位圣人年轻12岁的腓特烈一次也没有劝过阿尔-卡米勒改教，但却考虑要从伊斯兰教徒阿尔-卡米勒那里得到保证，实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十字军远征的终极目标，和让基督教徒在圣城继续生存下去这个伴随目标。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用语言去做说服工作，同时布置军事力量，这样的办法最具实现的可能性。

剑并不是拔出来才有效，插在鞘里也可以让它充分发挥效力。这在现代叫作“抑制力”。



腓特烈前往中近东的航线

1228年6月28日，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从布林迪西出港，沿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岸南下，然后转舵向东，在克里特岛、罗德岛的港口停靠后，于7月21日进了位于塞浦路斯岛南岸的利马索尔港。行船至此所耗时间仅为3个星期，而在这座塞浦路斯岛上他竟逗留了6个星期。腓特烈也同狮心理查一样，看到了后方重地塞浦路斯岛的重要性，于是他把建立塞浦路斯的统治体制放到了比进军圣地更加优先的位置。

这时离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已经过去了130年。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十字军国家即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到接近地中海的地方已经有所减少，但却仍然存续着。中近东的基督教社会在陆地上已经完全被伊斯兰教徒所包围。因而，塞浦路斯岛能否一直在基督教一边，对这个社会而言甚至成了关系到死活的问题。

中间隔着大海对基督徒来说不是问题。伊斯兰教徒在陆上很强大，但在海上，他们却不是基督教徒的对手，尤其不是基督教徒海上战斗主力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对手。

在13世纪前半叶，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已经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可以说地中海就是他们的海。这些海军原本也是为保护自己国家的城市和人民免遭北非伊斯兰教徒海盗的袭扰而建。海军因此得到加强的这三个城邦国家均以贸易立国。强大起来的海军为把满载商品的本国船队送出地中海而保驾护航，这也理所应当。当然，这时他们的敌人同样还是伊斯兰教徒的海盗船。

就这样，意大利的三个海洋城邦国家一方面在与伊斯兰商人做着贸易，另一方面却持续地对伊斯兰教徒海盗保持着常备不懈的战斗态势。他们因此在行船技能、高效造船，以及有效使用船员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果，这些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在海上战斗力方面的差距，在中世纪业已过半的时代已经拉得太大，后者想赶也赶不上了。

腓特烈率领的海军，无论在威力、规模和传统方面都劣于这三个国家的海军。但在伊斯兰教国家看来，这同样是基督教国家的海军。腓特烈率领自己的海军开了过来，这对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来说足以形成威胁。单单想象一下，腓特烈的海军溯尼罗河而上出现在开罗城前，阿尔-卡米勒就会像看到了腓特烈腰间佩戴的宝剑一般。

就这样，尽管阿尔-卡米勒可以在陆上轻易召集起10万兵马，他却无法对塞浦路斯动手，只因那是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座岛屿。

不过，这也必须做到塞浦路斯内部统治巩固，海上防卫充分才行。否则一旦让阿尔-卡米勒看到塞浦路斯处在分裂状态，采取让大量士兵同时登陆，变海战为陆战，最终将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基督教势力赶下大海的战术，塞浦路斯岛完全有可能伊斯兰化。

腓特烈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以前在狮心王援助下崛起的吕西尼昂王族，其在塞浦路斯的继承人年仅8岁，王族内部也处在类似家庭骚乱的状态之中。要解决问题动用军事力量最快。但不管是对基督教徒，还是对伊斯兰教徒，腓特烈都想不流血就能达到目的。在自己中途路过的塞浦路斯让基督教徒流血，对腓特烈来说是说不过去的。于是，33岁的皇帝选择了对话解决的道路，这花去他6个星期的时间。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腓特烈动身前往圣地，并于9月7日在阿卡登陆。自从失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这里似乎成了整个中近东十字军势力的首都。

进入圣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进入圣地，这在十字军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一片狂热。

不只是居住在阿卡的人们，居住在附近城市的基督教徒也都赶来，前来朝圣的人们也都加入了进来。港口挤满了群众，甚至有人被挤得掉进了海里。

腓特烈沐浴着秋天的阳光，在耶路撒冷总主教和阿卡大主教等中近东十字军国家要人的迎接下前往王宫。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们，看到了年轻皇帝骑在马上的雄姿，看到了保护他们安全和繁荣的人。

腓特烈受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欢迎，心情似乎很好。他写了一封反映抵达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信交给同行的巴里大主教，让他送回去交给格列高利教皇。腓特烈期望教皇能改变主意，解除对他的开除教籍处罚。腓特烈还命海军将领恩里克与巴里大主教同行，并交给他一项任务，再

带20艘船回来。

可是，他们二人的船与带着教皇命令的修道僧所乘之船走岔了。修道僧抵达阿卡后，把教皇的敕令交给了常驻中近东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总管耶路撒冷总主教。

敕令通知，再次开除皇帝的教籍，基督教徒完全没有义务服从这个皇帝，尤其禁止宗教骑士团服从腓特烈的命令，严禁在皇帝的旗帜下战斗。

接到教皇的这份敕令后，阿卡的居民们动摇了。但他们毕竟刚刚亲眼看到年轻皇帝进入圣地的盛况。于是，阿卡的人们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教皇的敕令为由开始敌视皇帝的人，一派是尽管如此仍将希望寄托在腓特烈身上的人。

被具体点名的宗教骑士团内部也为到底是跟随教皇还是跟随皇帝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其他诸多修道会一样，处在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绝对服从教皇的命令。但是，他们在中近东居住已久，对住在被伊斯兰教徒三面包围的十字军国家中基督教徒的现状了如指掌。

结果，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也都决定与腓特烈合作。不过，在向教皇报告这个决定时所列的理由，表现了做出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与皇帝合作的条件是仅在眼下同他合作。而且我们的合作不是在皇帝的名下，而是在为了上帝和基督教徒的名义之下。”

尽管同为宗教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则不存在什么问题。原因是这个骑士团的入团条件是团员仅限于德意志贵族，他们不在罗马教皇的管辖

之下，只服从皇帝的命令。

话虽如此，人们一定会认为腓特烈在圣地对这些事情的安排很聪明。十字军是他亲自率领的，但他却把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放到了总司令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在形式上，第六次十字军不是由被第二次开除教籍的皇帝所率领，率领它的是把一生献给了保卫圣地的宗教骑士团中的条顿骑士团团长。

重启接触

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腓特烈抵达阿卡后还是很快向阿尔-卡米勒派去了密使，要求重启接触。两位密使都是领主出身，住在圣地很久，都能操熟练的阿拉伯语。两位密使前往阿尔-卡米勒所在的纳布卢斯。腓特烈在热烈的欢迎中抵达阿卡后，立即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住在纳布卢斯，目的是把因去年弟弟阿尔-穆阿扎姆之死而统治者空缺的、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全境纳入身为开罗苏丹的自己的统治区域。这一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可阿尔-卡米勒还有一个年龄与死去的二弟同龄的弟弟，名叫阿尔-阿斯拉夫。亡父阿迪勒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交给了这个弟弟。弟弟对长兄独吞叙利亚感到不满，以不惜内战的姿态反抗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进入巴勒斯坦时正值阿尔-卡米勒通过对话调停这场兄弟间的对抗，且调停已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阿尔-卡米勒一定会觉得腓特烈来得不是时候。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继承了创始人萨拉丁的观点，一贯采取与哈里发

保持距离的做法。

当时的伊斯兰教徒是如何认知“哈里发”的呢？他们把同时代的罗马教皇称为“基督教徒的哈里发”。这意味着，“哈里发”是宗教上地位最高的人，而“苏丹”是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在萨拉丁以前，巴格达和开罗各有一个“哈里发”。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代表逊尼派，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代表什叶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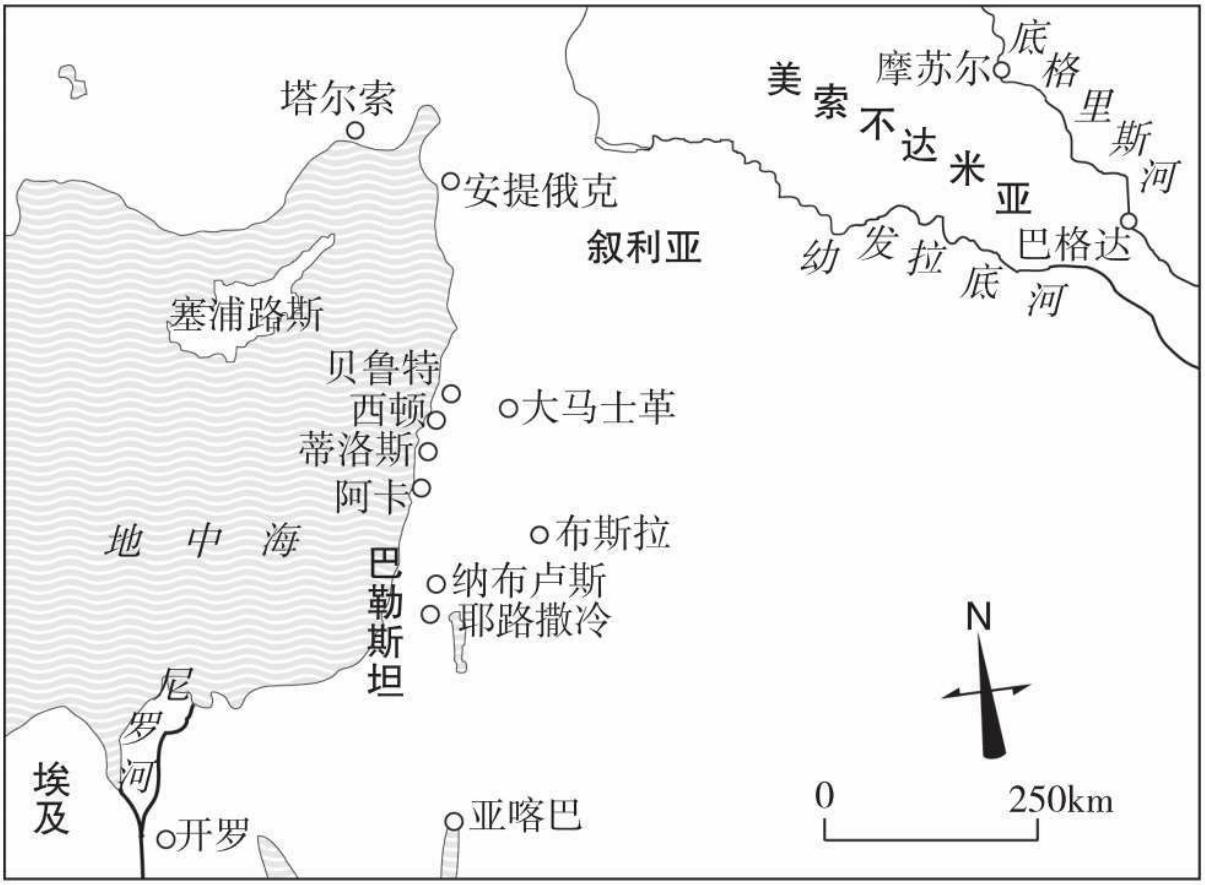
萨拉丁似乎还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分离主义者。开罗的哈里发死后没有继承人。此后，阿尤布王朝就一直在没有哈里发的状态下经阿迪勒和阿尔-卡米勒延续下来。

阿尔-阿斯拉夫受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后，其根据地在摩苏尔，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很快就能到达巴格达。他与巴格达哈里发的距离，自然要比他与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阿尔-卡米勒来得近。这就是说，他更容易受到充斥在哈里发周围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伊玛目[17]（领拜师）即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

在与阿尔-阿斯拉夫之间的对立渐渐平息之时重启与腓特烈的交涉，对阿尔-卡米勒来说甚至存在削弱自己地位的风险。

原因是腓特烈摆上谈判桌的一定是一年前接触时由阿尔-卡米勒提议的“归还耶路撒冷”的方案。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城。把圣城拱手让给基督教一方，拥有哈里发的美索不达米亚势力以及掌控这个势力的阿尔-阿斯拉夫不可能不发出反对的声音。

然而，以埃及为势力基础的阿尔-卡米勒又不能无视腓特烈带来的军事威胁。



巴勒斯坦及其周边

年轻皇帝率领的不仅是精锐军团，还有腓特烈专门命人打造的、可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船队。这支船队将满载着骑兵和步兵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出现在开罗中心。对阿尔-卡米勒来说，没有比这更不想看到的事情了。尽管叙利亚正在逐步收入囊中，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可一旦大本营开罗出现危险便会鸡飞蛋打。

苏丹阿尔-卡米勒接受了腓特烈要求重启谈判的请求，并派来已经和腓特烈认识的年轻埃米尔法拉丁担任主谈。这也是阿尔-卡米勒向腓特烈传递的将会认真对待谈判的信息。

不过可以想象，这时的阿尔-卡米勒脑子里想的不是尽快谈妥，而是要拖延谈判。

苏丹十分了解皇帝所处的境况，既知道他已经被教皇一连两次开除了教籍，还知道腓特烈停留的阿卡市内也分裂成为教皇派和皇帝派。

而且，他既了解教皇的领土在伊斯兰教徒称之为“狭长土地”的意大利半岛中部，与腓特烈在南方的广阔领国接壤，也知道如果憎恶腓特烈的教皇格列高利一旦下令越境进攻意大利南方，腓特烈就只能回国。

我写历史时痛切地感到，情报只有传递给那些能够理解其重要性的人才会准确。十字军的历史也是一样，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在这一点上也毫无二致。即使同为基督教徒，也是既有精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也有疏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即使都是基督教徒、都是意大利贸易商人，也有重视情报的威尼斯人和对情报谈不上重视的热那亚人之分。

古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到现实的全部。许多人只看自己想看的现实。”

只有那些敢于直视自己不愿看的现实的人才能充分利用情报。

身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他周围的伊玛目们，以及领有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尔-阿斯拉夫，他们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十字军来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皇帝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早晚要回欧洲。

然而，这位皇帝拥有只要他愿意就能直接打击开罗的海军力量，他们都没有去注意这件事的重要性。只有阿尔-卡米勒拥有这种认知能力。

棋盘放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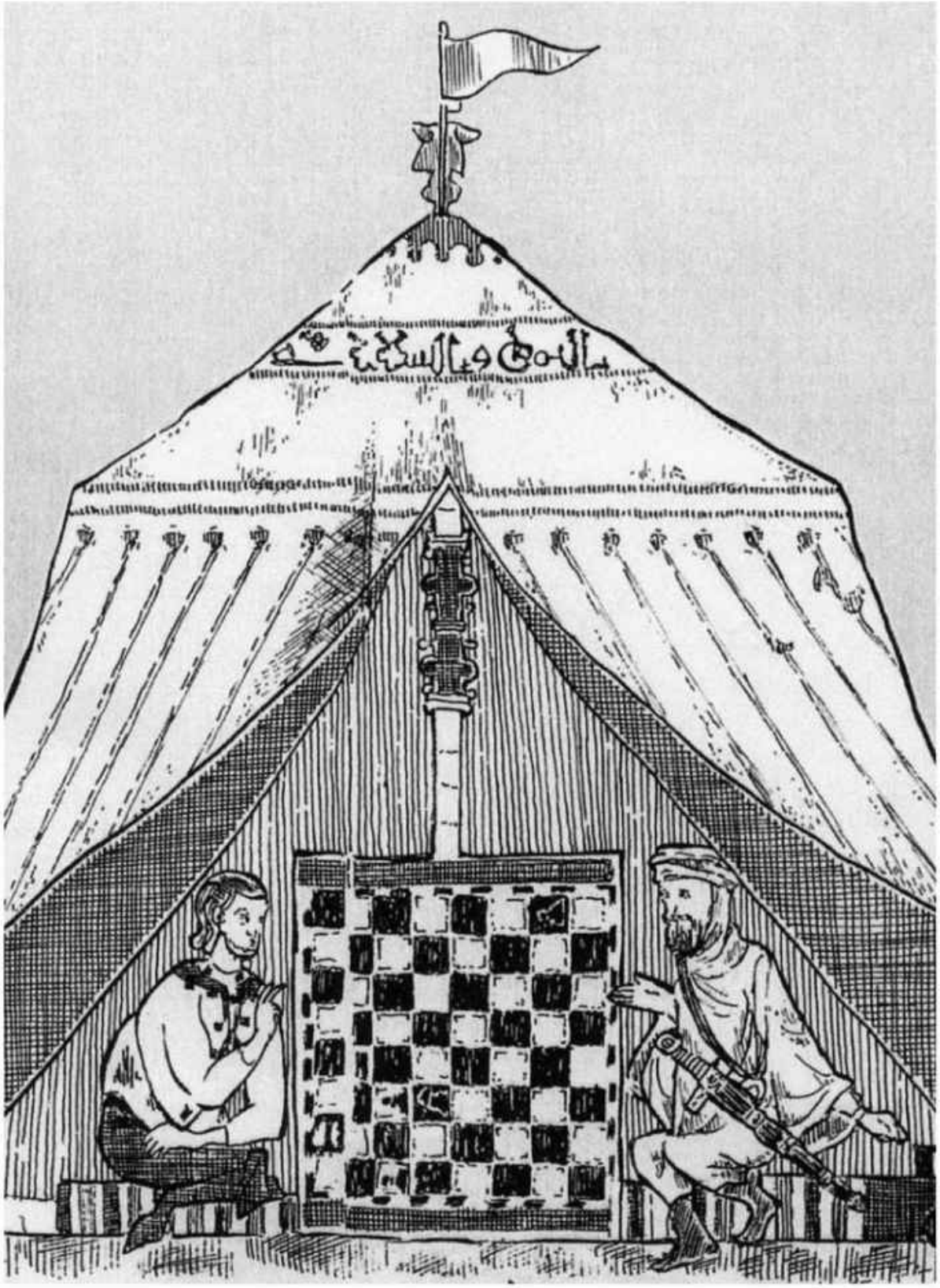
为了回应密使到纳布卢斯来提出的请求，苏丹与皇帝于1228年秋重开谈判。谈判起初在皇帝于阿卡郊外支起的帐篷里举行。这场外交谈判是贯彻现实政治的需要。苏丹派来了年轻的埃米尔法拉丁，同样30岁出头的腓特烈不通过翻译而与他直接面对面。他们二人之间总是荡漾着亲切的气氛，谈判时两人之间隔着棋盘。

腓特烈兴致勃勃地下着国际象棋，突然停住手中的棋子，切入了重要问题。法拉丁则说需要确认苏丹的意图才能答复。说完，他站起身来，撂下游戏策马而去。这种情形反复多次。

人们只能去想象谈判经过了，因为所有交谈用的都是阿拉伯语，基督教史官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不过，即使无法理解两人的话语，但气氛还是明白的。所以，还是留下了谈判“总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记录。

9月底开始交涉，刚进入11月就换了谈判地点。

阿尔-卡米勒与弟弟阿尔-阿斯拉夫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已无必要待在纳布卢斯。他在回开罗途中顺道去了加沙，那里有他的离宫。



一边下着国际象棋一边谈判的腓特烈和法拉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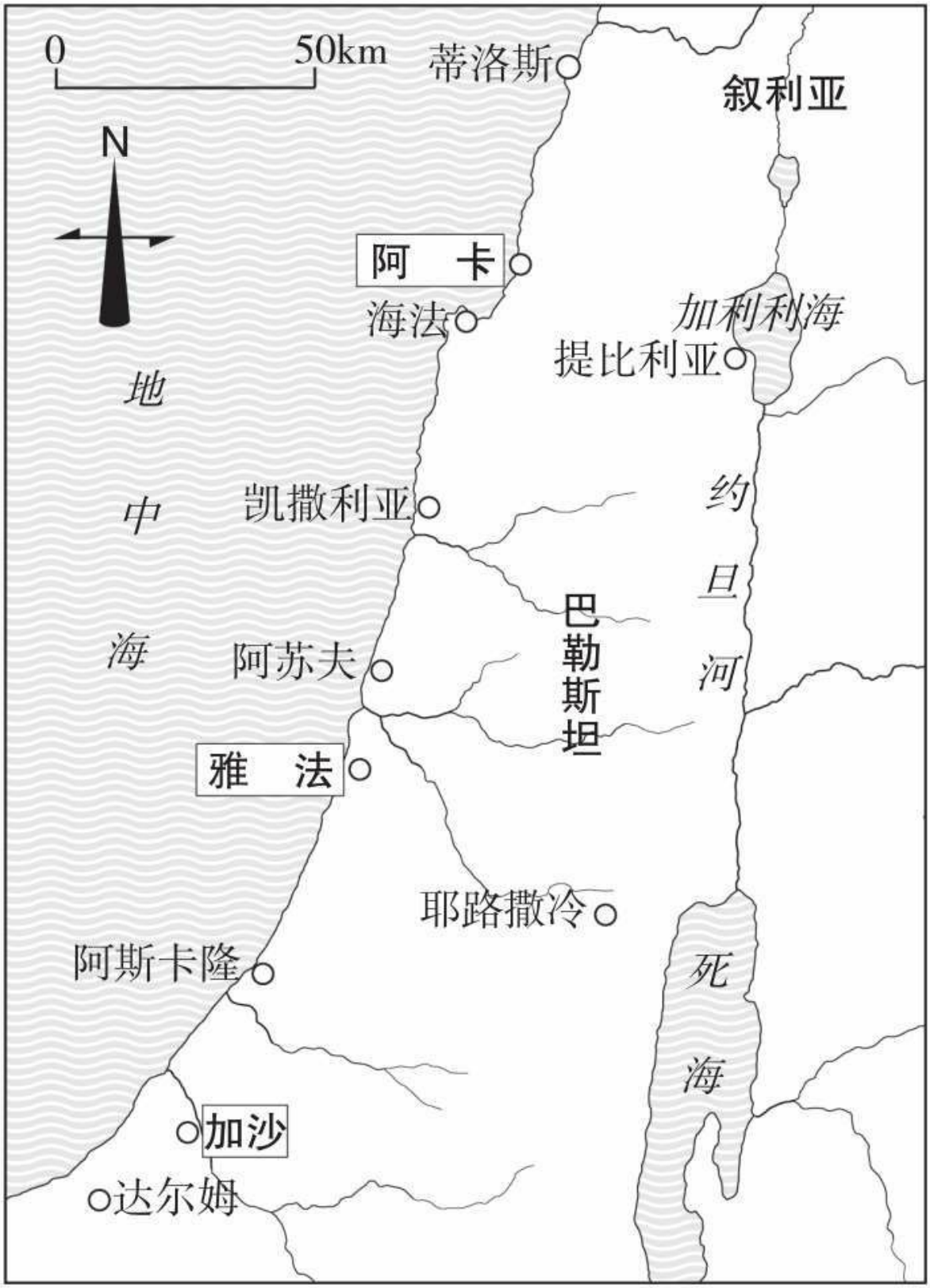
腓特烈得知消息后离开了阿卡这个有着王宫的基督教在圣地的首都，他从阿卡来到雅法，把与真正的谈判对手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以上。

雅法如今已经更名为特拉维夫，是集中了首都功能的以色列第一大城市。加沙现在还继续叫着这个名字，如今是巴勒斯坦人的自治地区，核心区是过激派统治的“加沙地带”，也是一座集中了政治功能的城市。

从特拉维夫到加沙只有70公里的距离。在21世纪的今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隔着这段距离对峙着，一方打来导弹，另一方就用空袭报复，这样的状态延续已久。

然而在距今800年前的1228年到1229年之间，在同样这段距离之间曾经进行过谈判，试图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实现共生。

而且这场谈判还发生在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与伊斯兰世界俗界最高领袖之间，是最高人物中的最高人物之间的谈判。


0
50km
N
蒂洛斯
叙利亚
阿　卡
海法
加利利海
提比利亚
地
中
海
凯撒利亚
约
旦
河
巴
勒
斯
坦
阿苏夫
雅　法
耶路撒冷
阿斯卡隆
死
海
加沙
达尔姆

雅法与加沙及其周边

33岁的腓特烈率军而来，大幅缩短了距离。48岁的阿尔-卡米勒被他的魄力所震慑，1229年开年后也开始留在了加沙。

因为腓特烈所要求的事项太过重大，每次都得法拉丁驱马往返于雅法与加沙之间，接受苏丹的指示。幸运的是，雅法与加沙之间是农村地带，地势平坦，利于驱马驰骋。

尽管谈判因为穿梭往来而经常中断，但谈判的友好气氛却始终未变。阿尔-卡米勒送来了只有苏丹才能使用的豪华帐篷，皇帝则把欧洲产的骏马穿上缀有黑鹰的御用黄底马衣作为回礼送过去。有时他们两人还交换自己创作的诗歌。写诗是伊斯兰世界有教养人的必备技能。腓特烈也留下了一些诗篇。

有一次，腓特烈甚至举行西欧式的仪式，授予已经跟他意气相投的法拉丁骑士地位。也许法拉丁汇报这件事的时候，阿尔-卡米勒会笑着对他说："你也被弄成骑士啦。"36年前，父亲阿迪勒被萨拉丁委以媾和重任，带着这位阿尔-卡米勒前往十字军阵营时，阿尔-卡米勒就曾被狮心王理查亲手"弄成了骑士"。

不过，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有义务宣誓忠于授予自己骑士的人。但即使被授予骑士，伊斯兰教徒也不会宣誓效忠于基督教徒。所以，理查和腓特烈都做了基督教所不允许的事。不过他们都不在乎，所以很愉快。而且，不论是阿尔-卡米勒还是法拉丁都坦然接受，被"弄成了骑士"。

在阿尔-卡米勒看来，原本为了争取时间而开始的谈判，就这样一点点地变成了以异教徒之间共生为目的的认真而重要的谈判。

腓特烈一边推进谈判，一边也在巩固保障对于中近东基督教势力的

安全不可或缺的防卫。

从这个时期起，腓特烈也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建造条顿骑士团管辖下的城寨。以前这个地区的城寨多为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所建。从这时起，条顿骑士团营造的城寨开始增加。如果没有皇帝的积极支持，成立刚10年左右的条顿骑士团是做不成这件事的。

虽然如此，腓特烈并没有只给条顿骑士团特别待遇。对其他骑士团拥有的城寨，只要他看到了战略上的重要性，都会支持这些城寨的加固工程。他还与医院骑士团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把海港城市防卫要冲的城寨也都交给了这方面经验和业绩都很丰富的医院骑士团。

腓特烈一边坚持以和平为目的的谈判，一边不忘巩固防卫力量。这些必要的工程有效地防止了自己带来的士兵游手好闲，同时也能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把中近东基督教徒中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强硬派的注意力从谈判上挪开。尽管腓特烈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却试图根本不使用武力而单靠外交解决问题。

媾和成功

以媾和为目的的谈判从1228年11月开始在雅法和加沙之间展开。

3个月以后的1229年的2月，双方终于谈妥。从内容来看，我们只能认为在此期间一直坚韧不拔地坚持谈判的腓特烈获胜了。

2月18日早晨，在雅法，在十字军总司令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在座的情况下，腓特烈首先在达成了一致的媾和协议上签字捺印。当天晚上，在加沙，阿尔-卡米勒也完成了签字捺印的手续。这两个人从未直接晤面，但却使媾和获得了成功。

媾和协议的内容分项整理如下。

一、伊斯兰方面将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方面。但耶路撒冷市内东侧三分之一的地区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土地留给伊斯兰方面，作为非武装伊斯兰教徒管理的“伊斯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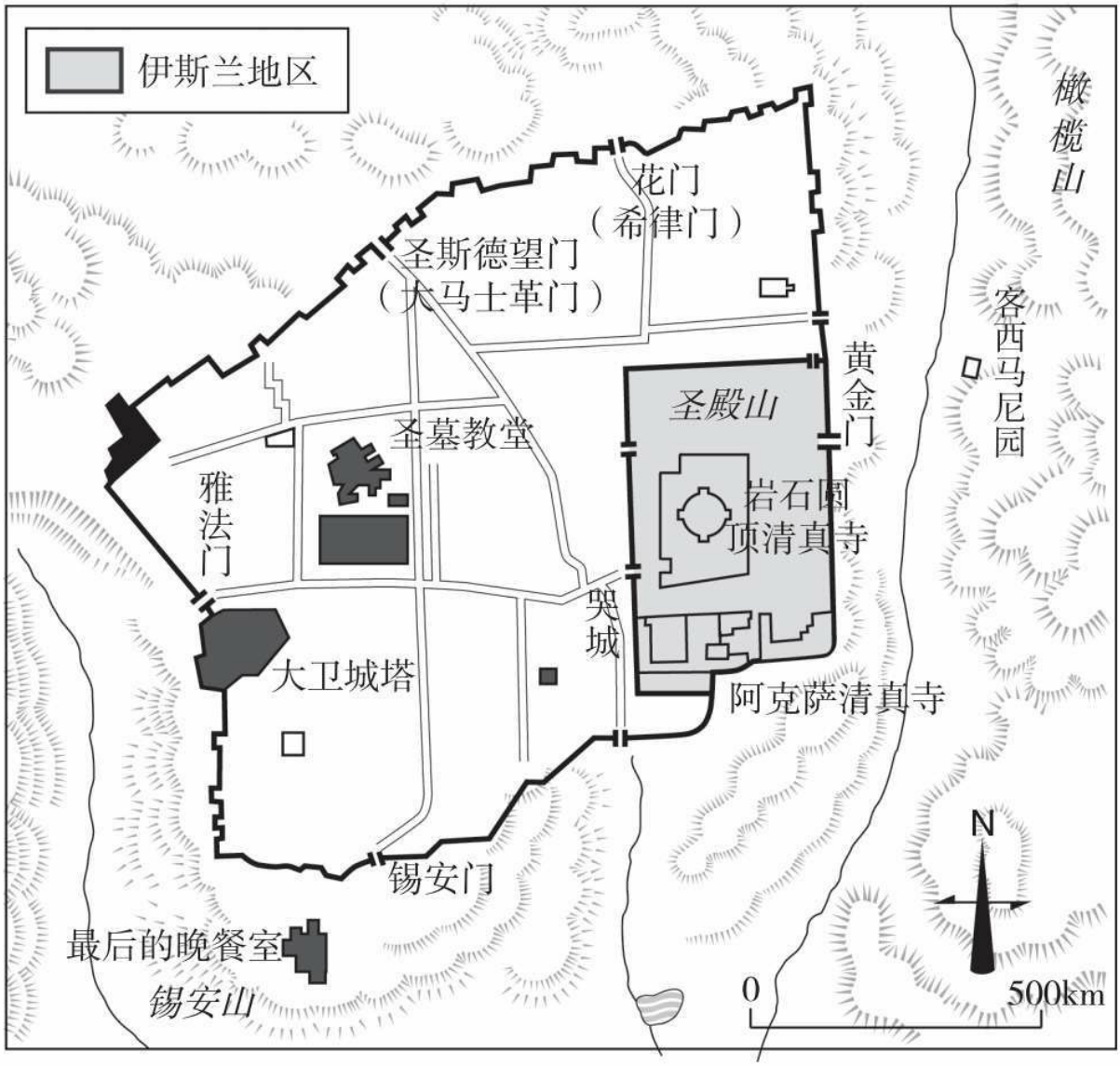
在这个地区，有传说中是苏丹奥马尔下令建造的清真寺，金色辉煌的穹窿顶引人注目。这里还有阿克萨清真寺[18]，据说这个清真寺在中世纪更为伊斯兰教徒所信仰。所以媾和协议把划归基督教徒的耶路撒冷中的这一带规定为“伊斯兰地区”予以保留，规定如经伊斯兰方面准许，基督教徒可以进入这个地区。

为什么要允许基督教徒进入伊斯兰教徒奉为圣地的这一地区呢？根据古代写成的《圣经·新约》记载，当时，少年时代的耶稣曾在位于这个地区的犹太教神殿里同犹太教祭司进行过争论。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只要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地方，无论何处都要参拜。朝圣路线中还有位于市区之外的“最后的晚餐室”[19]，也是因为那里被认为是耶稣和他的弟子用了最后晚餐的地方。

出于同样的原因，腓特烈也成功地让阿尔-卡米勒同意让基督教方面领有了耶稣的诞生之地伯利恒和成长之地拿撒勒。

二、除“伊斯兰地区”以外，耶路撒冷全市都将让给基督教方面，但耶路撒冷周边仍作为伊斯兰方面的领土保留下来。

然而这样一来，耶路撒冷便不能不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座孤岛。即使基督教方面在市内有常驻武装兵力，防卫体制也不能说足够充分。于是腓特烈要求加固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阿尔-卡米勒同意了这项由腓特烈负责的工程。



耶路撒冷市区图

三、伊斯兰方面承认基督教方面拥有从贝鲁特到雅法之间一连串的地中海沿岸海港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领有权。

可以说这项条约是对理查和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媾和条件的追认。不过，当时双方承认的是基督教方面从蒂洛斯到雅法之间地区的领有权，而在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之间的媾和条约中承认的却是，从位于蒂洛斯北面的西顿到贝鲁特都是基督教方面的土地。

而且，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加”。由于领地中增加了西顿和贝鲁特这两个海港城市，从安提俄克公爵领地到的黎波里伯爵领地再到雅法，地中海沿岸十字军方面的土地便形成了带状，自北向南连成一片，不再被伊斯兰领土所切断。

在这个时代，不论是朝圣者还是贸易商人，从欧洲到中近东一带一般都走海路。伊斯兰方面承认地中海东岸像串珠一样连在一起的这些海港城市的领有权归属基督教方面，这给基督教方面带来的利益不可估量。

四、对以朝圣和通商为目的的往来人员，不论是基督教方面还是伊斯兰教方面，双方都将保障其自由和安全。

只有这一项完全追认了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媾和条件。这就是说，自从那时以来，基督教方面和伊斯兰教方面都享受到了这一点带来的利益。

五、双方交换各自所“保管”的全部俘虏。

不过，因此而重获自由的几乎全部都是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在达米埃塔攻防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士兵。

六、此次媾和的有效期自签字捺印后开始到1239年2月为止，共计10年。

但如双方同意，有效期可以延长10年，其后还可以再延长10年。

反对大合唱

然而，此次媾和的内容为人所知以后，不论是在基督教方面，还是在伊斯兰教方面都立即引发了一片哗然。

在伊斯兰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苏丹阿尔-阿斯拉夫认为这是把圣城耶路撒冷拱手让给了敌人，首先发声反对。但由于阿尔-卡米勒的势力极其稳固，反对的呼声没有蔓延到伊斯兰世界全境。

我们不知道阿尔-卡米勒是如何说服弟弟的。但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出自伊斯兰教徒之手的关于十字军的书籍仍然坚持将此次媾和定性为伊斯兰教徒的“耻辱”。

基督教世界掀起的反响之激烈远远超过了伊斯兰世界的反应。

首先，身在阿卡的耶路撒冷总主教言辞激烈地提出了反对意见。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进言说，毕竟圣城已从异教徒手中夺了回来，是否可以带朝圣者去占领解放的圣城。但总主教的答复却是断然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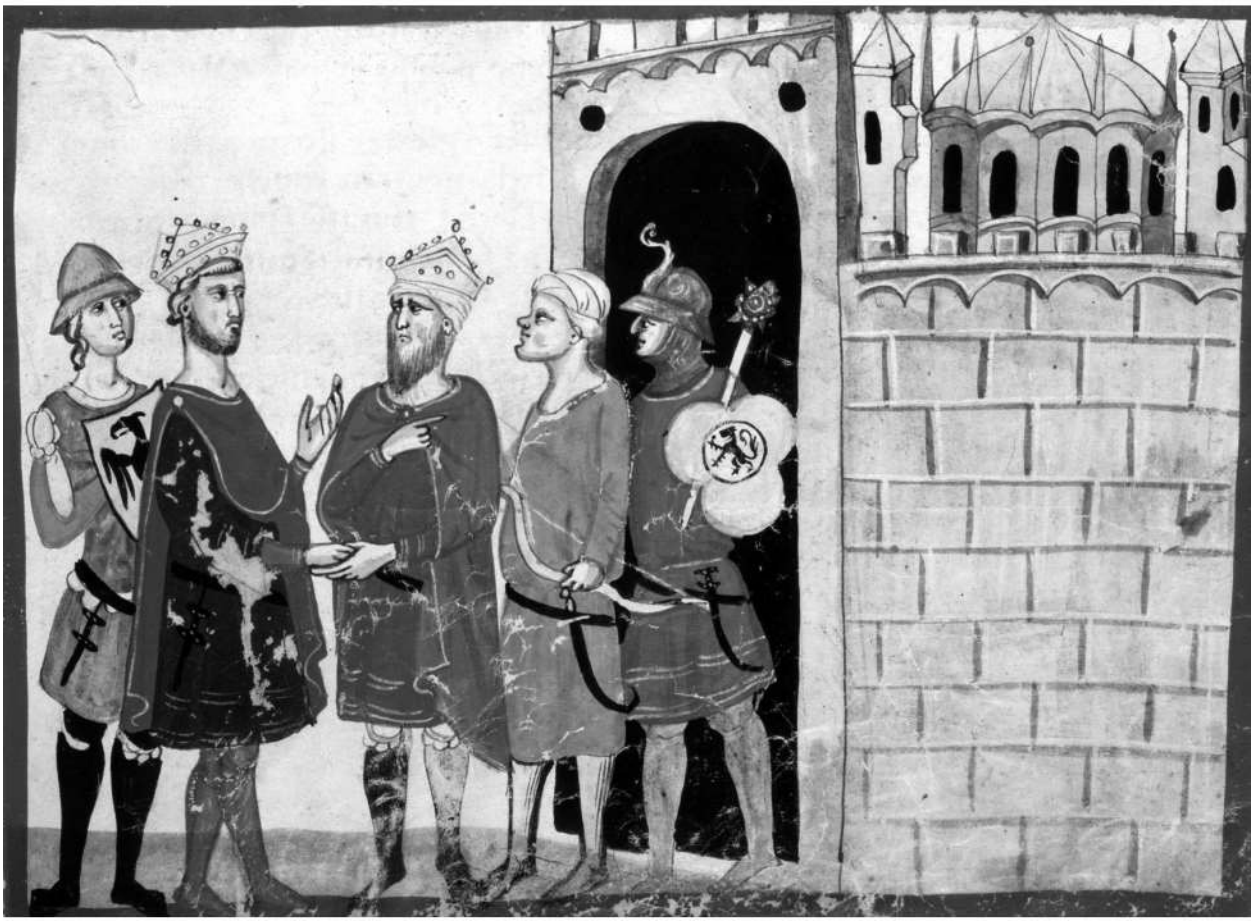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总主教还十万火急地给教皇写信谴责腓特烈。他说：

“这个皇帝完全不配做基督教徒的皇帝，他只是一个无能之人，只知道跪在萨拉森人面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净是些感谢萨拉森人的话，这些话甚至受到那些无信仰之徒的轻蔑。”

对总主教杰拉尔德来说，媾和条件所反映的腓特烈对异教徒的尊重和与异教徒共生的思想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程度。收到总主教的信后，教皇对腓特烈的评价非但没有好转，相反更加恶化。教皇为腓特烈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对这些神职人员来说，与异教徒交涉本身就是基督教徒的错误行为。“解放”圣城耶路撒冷不能依靠与异教徒的对话，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徒流血来完成。何况媾和还承认了圣城中的一部分为“伊斯兰地区”，这样的“解放”不值得称为解放。

然而，只要不承认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的圣地，就永远不能实现与异教徒之间的共生。



正在握手的腓特烈和阿尔-卡米勒（实际上二人从未晤面）

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中激烈反对媾和的除了神职人员以外，还有圣殿骑士团。这个骑士团自成立以来就没收了阿克萨清真寺，把它作为自己的总部。萨拉丁夺回耶路撒冷那年，他们被赶了出来，圣殿骑士团没有总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协议中，阿克萨所在地一带作为“伊斯兰地区”留给了伊斯兰方面。他们42年来的梦想是能够回到成立时的总部。然而，这个梦想由于媾和的成功而彻底无望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媾和。首先，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就很高兴。自从腓特烈抵达这里以后，这些人就以安全为由被禁止前往圣城朝圣。随着媾和的成功，他们一窝蜂地涌向了耶路撒冷。

其次，在宗教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直属皇帝，所以不存在问题。医院骑士团也一直坚持配合皇帝行动。媾和成功之后，腓特烈离开雅法开始视察城寨，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就经常与皇帝同行。

还有，居住在划归基督教方面的海港城市里的居民，以这些城市为据点同伊斯兰世界做贸易的商人，他们都因为媾和成功而受益，因而内心一定赞成媾和。

不过反对的声浪总是很高，而赞成的声音总是很小。腓特烈似乎早已知道情况会是这样，毫不在意这个反对和谴责媾和的大合唱。从2月到3月，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巩固那些已成为基督教方面防卫要冲的各地的城寨。

我不禁要反过来思考。再度把耶路撒冷夺回伊斯兰手中的最大功臣萨拉丁同狮心王理查签订了媾和协约，同意基督教徒来耶路撒冷朝圣，保障这些朝圣者旅行期间的行动自由和安全。继承萨拉丁的阿迪勒也继承了这条路线。可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把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徒，也从没想过要这样做。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徒的圣城，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城。这座城市处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但却一直都向基督教徒开放。尽管其间有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的3年中断期，但从理查与萨拉丁媾和到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为止的37年间，耶路撒冷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之下。

阿尔-卡米勒要以完全的形式把这座城市断然让渡出去。这是为什么？局势对阿尔-卡米勒有利，为什么还要断然迈出这一步？

时间也对阿尔-卡米勒绝对有利，因为腓特烈不可能一直待在中近东，这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明摆着的。

喜欢古希腊的人来到雅典，会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喜欢古罗马的人来到永恒的城市罗马，心里也同样会是热乎乎的。喜欢法兰西的人来到巴黎，喜欢英国的人来到伦敦，心里都会是热乎乎的。然而，不但使人心里热乎，而且会让人连头脑都发热的城市却只有耶路撒冷。

基里基雅
埃泽萨
塔尔索
安提俄克
阿勒颇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的黎波里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蒂洛斯
加利利海
阿卡
提比利亚
约旦河
凯撒利亚
阿苏夫
杰里科
雅法
耶路撒冷
加沙
死海
阿斯卡隆
达尔姆
N
0
100km
亚喀巴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构筑的十字军国家领土（1119年）

基里基雅
埃泽萨
塔尔索
安提俄克
阿勒颇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的黎波里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蒂洛斯
加利利海
阿卡
提比利亚
凯撒利亚
约旦河
阿苏夫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阿斯卡隆
达尔姆
亚喀巴

“哈丁战役”后的基督教势力（1187年）

13世纪时的欧洲人单凭耶路撒冷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这一点，就会悲哀叹息，认为主耶稣之城在异教徒的桎梏下痛苦煎熬，而根本不管圣城的实际情况如何。这种悲哀叹息会转化为仇恨，要以派十字军前去夺回才可能消解。这就是说，只要耶路撒冷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居住在欧洲的基督教徒内心和大脑便会持续发热，就不会停止组织十字军攻取耶路撒冷的行动。

也许是腓特烈以忠告的形式让阿尔-卡米勒悟到了这种可能性。腓特烈正是因为在十字军等事情上把容易头脑发热的教皇和天主教会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历经艰辛。

阿尔-卡米勒倾听了他的忠告，才想到索性就把耶路撒冷果断地让出去。难道不是这样吗？

埃泽萨
基里基雅
塔尔索
安提俄克
阿勒颇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的黎波里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蒂洛斯
加利利海
阿卡
提比利亚
约旦河
阿苏夫
凯撒利亚
雅法
杰里科
耶路撒冷
加沙
阿斯卡隆
达尔姆
亚喀巴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后的基督教势力（1192年）

当初同腓特烈谈判的时候，阿尔-卡米勒根本不需要对腓特烈做出让步。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充分预料到，把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方面必然招致伊斯兰世界的猛烈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断然迈出了伯父、父亲连想都没想过的一步：把耶路撒冷让出去。

不能忘记的是，第五次十字军在十字军历史上第一次入侵了埃及，而迎头痛击十字军的，正是这位当时刚刚当上苏丹、权力基础还很薄弱的阿尔-卡米勒。他当然会认为，只要十字军不来远征，埃及不但能够安泰，还能同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共生下去。而且他还会想，如果把耶路撒冷让给十字军，他们便不会再来，问题便会消解。

基里基雅
埃泽萨
塔尔索
安提俄克
阿勒颇
叙利亚
塞浦路斯
哈马
法马古斯塔
托尔托萨
霍姆斯
的黎波里
贝鲁特
西顿
大马士革
蒂洛斯
阿卡
阿苏夫
凯撒利亚
雅法
耶路撒冷
加沙
阿斯卡隆
达尔姆
亚喀巴

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后的基督教势力（1229年）

然而，这终究是我的想象。归根结底，这只是某些人的想象而已，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思想：即便存在宗教上的差异，也会有理解和协调的余地。但不诉诸这样的想象，我们就无法弄清阿尔-卡米勒如此决断的真正原因。

很多研究家主张，即将50岁的阿尔-卡米勒对比他年轻15岁的腓特烈抱有个人的亲近感。但单凭这一点解释不了问题的全部。单靠阿尔-卡米勒对两度遭到开除教籍的腓特烈所处的艰难处境抱有同情心这个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即便把岩石圆顶清真寺[20]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伊斯兰地区”刨除在外，做出把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拱手让给基督教方面的决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也是要冒极为重大的风险的。因为对伊斯兰教徒来说，耶路撒冷也是他们的圣城。因而，当时的反对就很强烈，就连800年后的现代，这件事仍然一直被认为是“耻辱”。

阿尔-卡米勒冒着风险成就了“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腓特烈也冒着同样的风险。而且，当时34岁的腓特烈所冒的风险纠缠了他一辈子。

狮心王理查也与天主教会所说的“无信仰之徒”成功地进行了媾和。但理查是在同对手萨拉丁反复激战之后，才与这个“无信仰之徒”成功媾和的。相反，腓特烈一仗未打，只凭着同“无信仰之徒”对话就达成了媾和。

这一点正是罗马教皇对理查和腓特烈评价的不同之处，前者最终未能夺回而后者成功夺回了耶路撒冷。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按照罗马教皇的想法，圣地巴勒斯坦和圣城耶

路撒冷必须通过基督教徒流血才能得到“解放”。正因为如此，教皇许诺参加战斗的人全部免罪。这是中世纪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最渴求的愿望。

在耶路撒冷

1229年2月18日媾和成功后，腓特烈专心致志地去各地视察城寨，他于3月17日抵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总督阿尔-加乌吉在城门前迎接腓特烈。他把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呈献给这位皇帝，耶路撒冷的交接仪式便告结束。

腓特烈首先去了临近医院骑士团医院的骑士宿舍。他决定把那里当作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住宿地，只有那里可供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下榻。

耶路撒冷被萨拉丁夺回到伊斯兰统治之下以后，只允许留下医院骑士团运营的“医院”作为前来此地的朝圣者的医疗设施。除此而外，既没有王宫也没有总主教的官邸，防卫耶路撒冷的基地“大卫城塔”[21]也因为以前一直驻屯的伊斯兰士兵要搬走而混乱不堪。

腓特烈来到医院骑士团的住所落脚不久，在晚饭前一刻，又带着少数几个随从去了圣墓教堂。

管理圣墓教堂的僧侣也和在医院骑士团运营的医院里从事医疗的人一样，得到了萨拉丁的许可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被伊斯兰统治的62年间一直居住在这座圣城里的基督教徒。他们也知道皇帝已经被开除了教籍。因而他们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迎接这位被开除了教籍但仍是皇帝的人。

可是，腓特烈并不在乎这些。皇帝从心神不定的僧侣面前走过，让

跟他来的随从等在那里，一个人径自走向祭坛。他跪在祭坛前，独自祈祷了片刻，随后撂下惊魂未定的僧侣回宿舍去了。

第二天，3月18日，耶路撒冷国王的加冕典礼在圣墓教堂举行。

起初腓特烈打算在加冕典礼前的弥撒开始时就来出席。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向他提出忠告，说一旦他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出现在基督教重要仪式上的事情传扬开去，肯定会为身在罗马的教皇与腓特烈的关系中火上浇油。腓特烈采纳了赫尔曼的忠告。

腓特烈在弥撒结束后走进圣墓教堂，参加弥撒的朝圣者们还都留在那里。见到一身正装而来的腓特烈，他们之中极其自然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在如今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里、在这座建在耶稣基督墓上的圣墓教堂里向上帝祈祷，他们就很高兴了，根本无所谓这是不是由被开除教籍的人实现的。

群众下意识地让开了道，皇帝从他们中间走向祭坛。不过，被允许加冕的只限于负责当地教务的高级神职人员，而常驻圣地的总主教、大主教和主教，当天一个都不在耶路撒冷。

34岁的皇帝用自己的手拿起摆放在祭坛上的皇冠，把它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这天，圣墓教堂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极不寻常的行为提出异议。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事后解释道，腓特烈今天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皇帝对上帝表示敬意的行为。也许是这个真意不明的事后解释产生了作用。

那天，从长期居住在中近东的诸侯到宗教骑士团的团长们都在座。所以，事后解释只是对那些认为这样就好的人才会有效果。中近东基督教社会的这些实力人物还出席了腓特烈在加冕典礼后召开的会议，会议

讨论了今后如何统治耶路撒冷的问题。

会上，腓特烈解释了同阿尔-卡米勒之间缔结的各项媾和条件。圣城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防卫还要靠坚固的城墙和常驻的守备力量。城墙的加固工程已在进行，剩下的就是维持耶路撒冷市内的安全。耶路撒冷四周城墙围绕，里面自古就建有城寨，叫作“大卫城塔”。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进入驻守。

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是三大宗教骑士团。针对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和已被确认为归基督教徒所有的圣地的防卫和安全，腓特烈部署由这三大宗教骑士团负责。

由于媾和决定将阿克萨清真寺原封不动地留给伊斯兰方面，圣殿骑士团回归阿克萨的希望破灭，他们曾一度强烈反对腓特烈。但他们后来看到皇帝对他们所拥有的城寨表现出的强烈关心，不满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这样，腓特烈不断地拿出了统治和防卫的方法，就连当初反对媾和的人们也开始配合他了。但耶路撒冷总主教则一直坚决拒绝同他合作。

总主教杰拉尔德不断写信给教皇表达不满，发出叹息，他身居“耶路撒冷总主教”的位置却一直待在阿卡，不去职责所在的耶路撒冷。他把部下凯撒利亚主教派到耶路撒冷去，对圣城采取强硬手段，施以“禁止教务”的处罚。

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重要的圣城，这座现在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却被施以“禁止教务”这种仅次于开除教籍的重罪处罚。总主教的理由是圣城由被开除教籍的人解放不算真正的解放。

可是，一旦被“禁止教务”，就连内心规矩的基督教徒也都无法去耶

路撒冷了。整个耶路撒冷成为禁止入内的地区，最为难的就是朝圣者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总主教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没有人被总主教的强硬措施吓得逃出耶路撒冷。相反，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入这座圣城的城门。他们排着队，流着感动的泪水，哽咽着走向圣墓教堂。对他们来说，在主耶稣死去的地方献上祈祷比什么都重要。

在此期间，腓特烈每天忙于落实耶路撒冷的统治与安全事宜，尽管他会在心腹面前对那些神职人员的执迷不悟抱怨上几句。

虽说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的手里，但以前居住在那里的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一扫而光。“伊斯兰地区”被确定为他们的圣地。以圣地管理人员为首的很多伊斯兰教徒都居住在这座城市里。在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协议中也允许这些人继续居住下去。耶路撒冷因媾和回到了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从这里撤走的只是以前常驻在这座城市里的守备队即伊斯兰方面的军事力量而已。

耶路撒冷不仅是基督教徒的圣城，对伊斯兰教徒和对犹太教徒而言也是圣城。所以，不论哪方面成了统治者，自古以来三者背对背的分别居住状态都会延续。不管是在统治方面还是在防卫方面，耶路撒冷都要求比其他城市更高的管理技巧。

腓特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统治和防卫。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来到耶路撒冷，他的证言反映了腓特烈的管理成果。

这位威尼斯商人有着长期在中近东做贸易的经验，他对腓特烈的来到前后进行了比较，他说道：

“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果非要找出变化，那第一个是大街上看到的守备队士兵从伊斯兰教徒变成了基督教徒，第二个就是基督教教

堂传出的钟鸣声比以前更有气势了。”

腓特烈在耶路撒冷逗留了一个星期。

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时期的总督是阿尔-加乌吉。因为诸多手续上的需要，腓特烈频繁地接见他。有一天，腓特烈问他：“我来到耶路撒冷后怎么一次都没有听到宣礼声呢？”

前总督回答说，因为接到了阿尔-卡米勒的指示，说在皇帝逗留期间不要宣礼。34岁的皇帝便笑着说：“要是那样，你们有人访问我的领国时，教堂的钟不就不能敲了吗？”

从第二天开始，一天五次，洪亮的宣礼声又从清真寺的尖塔上响起。腓特烈带着部下视察时，天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听到宣礼声，随从中就会陆续有人当场伏地，开始祈祷。

伊斯兰方面对此很惊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基督教世界的皇帝手下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伊斯兰教徒。但当他们看到腓特烈留下那些不断匍匐、起身进行伊斯兰式祈祷的部下，带着其余的人继续视察时，更是惊讶不已。

伊斯兰教徒对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腓特烈有过评价，有几则留存了下来。

其中有一个人说：这个皇帝难道不是无神论者吗？他说，尽管腓特烈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遗迹走走看看，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跪下，也不会感动得泪水哽咽。

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已经看惯了来访此地的基督徒朝圣者。与那些朝圣者相比，腓特烈也许更像一个“游客”，甚至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在“伊斯兰地区”到处参观，见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时，总会为其壮美发出感叹。

还有一个人发出了恶评，说这个皇帝就是拿到奴隶市场也只能卖点零钱。

伊斯兰教徒，尤其是其中的阿拉伯人认为，好男人的肉体，要么是肌肉隆起、骨骼健壮的身躯，要么是肥硕敦实大气的躯体。腓特烈虽然不是肉体贫弱，但也不属于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在阿拉伯人看来，腓特烈的肤色太白，头发也太红，还是卷发，遗传了绰号“红胡子”祖父的模样，很难想象那是一个男人所会有的。

“基督的敌人”

腓特烈在耶路撒冷足足待了一个星期，然后于3月24日启程前往阿卡。他将于第二天的25日召集圣地全境所有实力人物开会，讨论今后的事务。

然而在阿卡，迎接腓特烈的气氛与耶路撒冷大相径庭。

首先，阿卡事实上的统治者耶路撒冷总主教对腓特烈的态度丝毫没变。尽管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为改善关系做出了努力，但同在一城的总主教却连见皇帝一面都予以拒绝。腓特烈也不想卑躬屈膝与他见面。

皇帝回到了阿卡。可是，不但总主教及其属下的神职人员迎接他的态度和他到达时完全不同，就连阿卡的居民也变得敌视他了。不过，这些人态度的变化和总主教不同，起因于现世的事情。

腓特烈来之前，从欧洲来的朝圣者都是在阿卡下船，再从阿卡经陆路前往耶路撒冷。这已经成了“朝圣路线”。从腓特烈为与阿尔-卡米勒进行媾和谈判转至雅法到媾和成功的3个多月里，腓特烈一边交涉，一边修缮雅法港并进行了这座海港城市防卫的巩固工程。结果，媾和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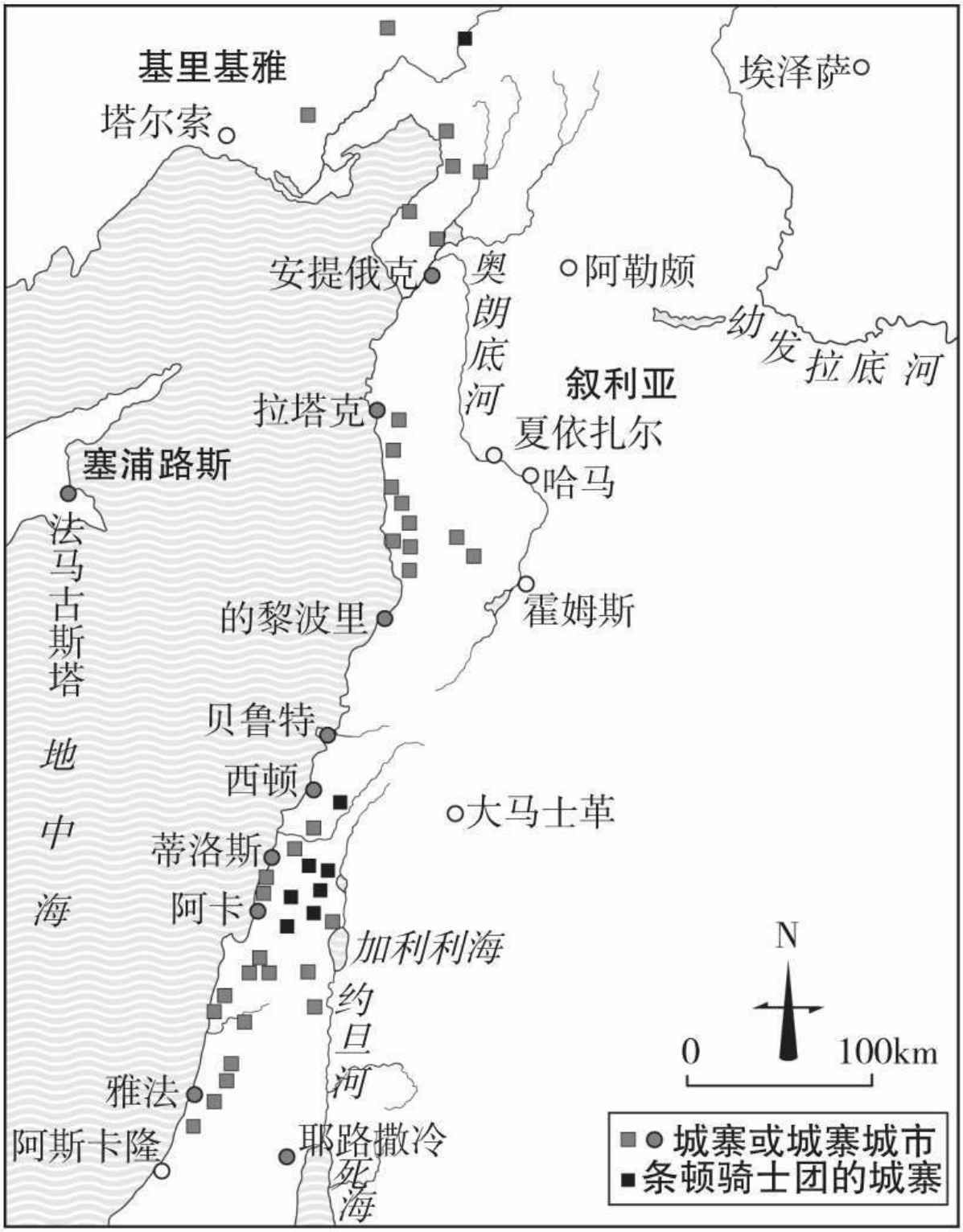
的时候，雅法已经变成了一座比阿卡更安全、各种设施更完备的海港城市。

雅法比阿卡更靠近耶路撒冷，来自欧洲的朝圣者当然会选择在雅法登陆。这样使得朝圣者在阿卡的消费锐减。以总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发出的反腓特烈的声音会遍及街头巷尾，这恰恰是由于现世和宗教两方面原因叠加造成的。

如果是这种敌视，腓特烈恐怕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如果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都能因媾和而充满活力，其中之一的阿卡自然也会享受到活力与繁荣。所以，这种敌视只能让时间去解决。腓特烈为了推进留给他的重大工作，有必要继续把阿卡作为根据地，而这样的敌视还没有对此形成障碍。

可是，腓特烈进入阿卡不久后收到了一个消息，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料到，但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

消息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派军队越过教廷领土边境，入侵意大利南方的腓特烈领国。据说来犯的军队以白底黄色的教皇旗为先导，由前耶路撒冷国王布里昂的约翰率领。教皇公布的进攻理由是，腓特烈以被开除教籍之身率领十字军，未经战斗就与“无信仰之徒”达成媾和。这就是说，教皇认为腓特烈一直在与他作对，就算他为教皇夺回了基督之墓，也要把他断罪为“基督的敌人”。



形成网络的基督教势力城寨群

腓特烈出发远征之前在自己国家的防御上采取了充分的措施，并托付给了值得信任的部下。所以，在军事上很轻松地就把年迈的约翰所率领的临时拼凑的教皇军赶了回去。但很多人怕被断定为“基督的敌人”，产生了动摇。面对打着这个旗号进攻的教皇军，越来越多的城市打开了城门，不战而降。

事已至此，对留守的人来说，唯一的指望就是腓特烈尽快回国。抵达阿卡的使节带来的信里满是请求皇帝早日回国的急迫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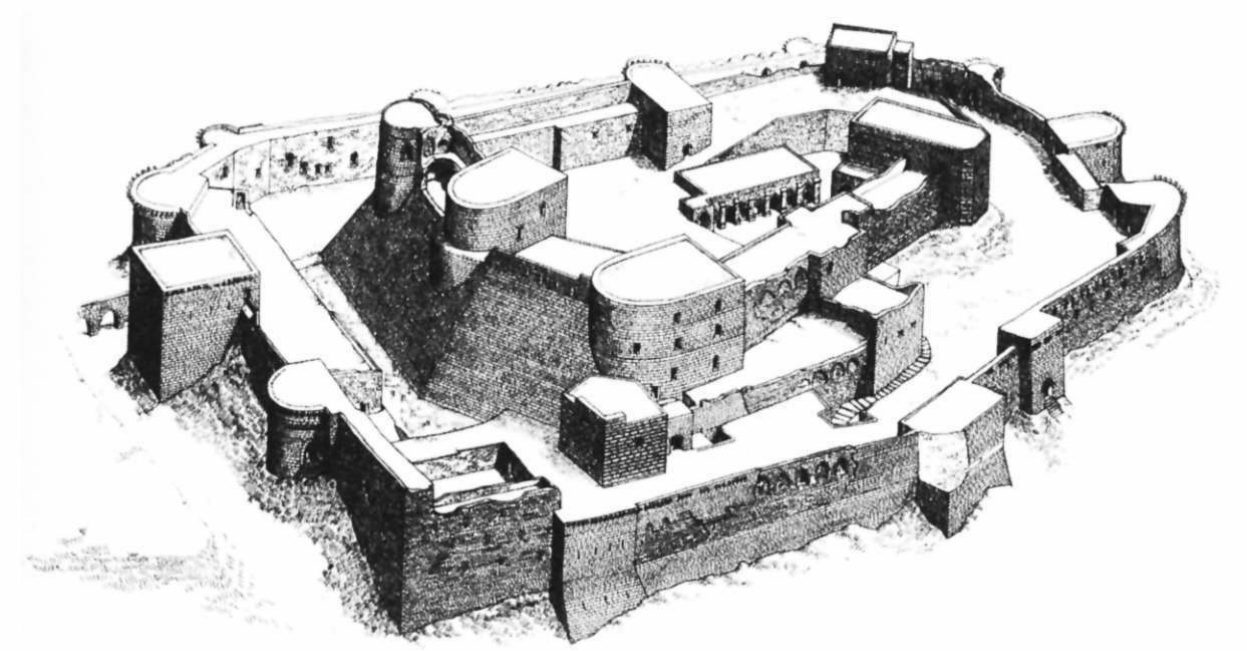
这件事在腓特烈看来，可能只有一个词能形容：遗憾！他懂得，要想把媾和得来的和平维持下去，健全的防卫体制必不可少。而且，这还得在没有欧洲十字军远征的情况下去实现，十字军远征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也会有新的大军前来。

要想单靠现有兵力去实现这个目的就只能用好城寨，而且要在不新建城寨的限制下，因为新建城寨一定会刺激到伊斯兰方面。

腓特烈把从媾和成功到进入耶路撒冷为止的一个月时间全部用于这个目的。他把在耶路撒冷逗留的一个星期时间花在了完善耶路撒冷的防卫体制上。他要让散落在阿卡以北、以东的众多城寨形成有机网络，以便用好这些城寨。他想把来到阿卡后的时间用在这个方面。

单靠一个城寨效果有限，但以往中近东各十字军国家的城寨并没有网络化的概念。

原因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城寨，是由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各地封建领主三方各自独立建设的。这些城寨之间几乎从未相互合作过。只有的黎波里伯爵领土所在地的城寨群是个例外，那些城寨已经由医院骑士团以“骑士堡”[22]为中心实现了网络化。



クラク・ド・シュヴァリエ

骑士堡

腓特烈想把医院骑士团的这个先例普及到基督教徒称为“圣地”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全境。他把在城寨防卫方面有骄人业绩的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与新加入城寨管理群体的条顿骑士团联成一体，把他们各自管理的城寨在保卫中近东基督教势力这个战略大目标下实现网络化。

这样，即使没有希望等来新的十字军，基督教方面仍可采用不刺激伊斯兰方面的办法，来保障基督教徒居住的中近东地中海沿岸的安全，因为形成网络的城寨群可以发挥海港城市群城墙的作用。

从自己在欧洲的时候起，腓特烈就已经为巩固自己领国——意大利南方——的防卫体制推行过这个设想。

古罗马人已经懂得，网络化道路的效用比走一条条孤立的道路的效用有飞跃性提高，因而他们实行了道路的网络化。作为防卫据点的城寨的建设，在这一点上道理相同，可以通过有机的网络化飞跃性地提高防

卫能力。

但在推进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需要腓特烈亲自巡视。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可是现在，腓特烈的时间就要被夺走。

不得已，他得在短时间内完成阿卡地区城寨的网络化。在阿卡的王宫里，他一连几天召集三大宗教骑士团团长和封建诸侯开会。

腓特烈在这项工作上耗费了整个4月份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事情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但可以认为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理解皇帝的想法，并愿意配合他实现城寨的网络化。在腓特烈离开圣地后15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兰方面几乎没有入侵过这里——尽管头10年是由媾和保障的。

腓特烈在阿卡为这件工作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5月1日，他出发离开了阿卡。

回师

前一年的1228年9月7日，腓特烈率领第六次远征的十字军进入圣地。他在圣地只待了8个月，但圣城耶路撒冷已回到了基督教徒的手中。

然而，34岁的腓特烈是在居民们肮脏的谩骂声和抛掷的污物中出发离开圣地的。没有一个神职人员为皇帝送行。

腓特烈还是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他只带了海军将领恩里克指挥的7艘加莱船。他回国了，却把带去远征的共计80艘船和士兵中的大部分留下来保卫圣地。

为了确认建立防卫体制的成果，腓特烈在塞浦路斯岛逗留了几天。离开塞浦路斯后，他向意大利南方直航而去，于6月10日进入布林迪西港。

腓特烈是前一年6月28日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的，加上往返航行用去的天数，第六次十字军的远征之旅尚不满一年。对腓特烈而言，这是他从33岁到34岁的一年光阴。

就在腓特烈于1229年6月10日靠港的同时，皇帝回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南方。消息还传到了教皇所在的罗马，传到了意大利北方，教皇正要求北方提供兵力以对付腓特烈。

意大利南方领地的居民得知皇帝回师后重新振奋起了精神，腓特烈见状便从布林迪西去了北面不远的巴列塔城。他决定在这座临海城市逗留，不是为了休养，而是为了一边观察他回国引起的各方反应，一边准备有效的反击行动。

不管怎样，腓特烈都是成功完成了十字军远征后回国的，远征中他没有杀害一个伊斯兰教徒。如果回国后立即对基督教徒大开杀戒，不光说不过去，他的处境也难免会变得更加恶劣。杀害基督教徒会让罗马教皇谴责的调门更高。尤其在这种时候，腓特烈更需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把入侵自己领地的敌人赶出去。他在巴列塔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其说是为了筹备反击的军队，不如说是为了给敌人施加更强大的心理压力。

9月，腓特烈的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大敌当前，率领教皇军的布里昂的约翰抛下军队临阵脱逃，逃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紧接着意大利北方各自治城邦纷纷拒绝加入教皇军。

腓特烈收到了这些情报，但他仍然率军继续北上，进入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大学的学生也加入到居民行列，他们一起为腓特烈的军队开道，从那不勒斯一直走到卡普亚。

到了10月份，腓特烈并未与教皇军交战便已成功收复了全部被侵占的领土。从布林迪西登陆开始，即便加上在巴列塔的两个月，也不过4个月的时间。

教皇孤立了，但他并未投降。罗马教皇岂能向皇帝低头！

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会见教皇。赫尔曼第一次去罗马时，教皇把他赶了回来，第二次去时教皇接见了他。赫尔曼回来后告诉一直等在卡普亚的皇帝，教皇的态度在逐渐软化。

可是，腓特烈既要不损教皇的面子，又要同他改善关系，这并不容易，因为对方是一个坚信“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人。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相互确认教廷领土与腓特烈领国边界这个谈判的名目很漂亮，但谈判实质上不过是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在教皇回家乡阿纳尼时，皇帝去那里问候教皇。阿纳尼是位于罗马南边的一个小城，也是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出生地。

格列高利教皇在迎接腓特烈皇帝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哪怕是一个管不住的儿子，所有信徒的母亲罗马教会也会由衷地以慈爱的感情迎接他的归来。皇帝也将由此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基督教世界也将因此忘却过去那充满恐惧的日子，今后将充满光明和安宁！”

1230年9月1日，“重归于好”的庆祝仪式在60岁的教皇格列高利和35岁的皇帝腓特烈的相互拥抱亲吻中结束了。这种亲吻在基督教世界里叫作“和平之吻”。腓特烈开除教籍的处罚被解除了。

当天，教皇邀请皇帝享用本家的午餐，皇帝毕恭毕敬地接受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也出席了午餐。

阿纳尼“和平之吻”的3天之后，腓特烈已经在意大利南方了。

维护

腓特烈离开圣地后也没有忘记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他同阿尔-卡米勒谈成的媾和有效期为10年，如果双方都愿意遵守，和平将持续到1239年。

腓特烈在此期间仍然不断地进行着“维护”工作。他从未间断过通信交流，信都用阿拉伯语写成，直接寄给媾和时的直接谈判对手法拉丁。当然，他一定估计了到这些信都会交到阿尔-卡米勒手中。

所有这些信与其说是写给面对面进行外交谈判的对手的，但从那满纸的内容上看不如说像是写给亲密的同龄朋友的。信中充满了幽默和讽刺。我真想提醒他，给伊斯兰教徒写这样的信，一旦暴露又会被开除教籍哩！

然而，像这样相互通信，愉快地告知近况，谈论科学和哲学问题，而不是一味直接请求延续媾和——正是腓特烈做派的维护工作。

1238年，媾和有效期再有一年就将届满的时候，阿尔-卡米勒寿终正寝。他的长子继承了苏丹。对这位新苏丹，腓特烈继续采取通信的做法。也许是通信产生了效果，媾和续期10年。这位苏丹于1248年去世，他的弟弟继位。腓特烈也同样一直给这位新的苏丹写信。

就这样，从媾和成功的1229年到1248年这20年间，中近东地区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一直延续着共生的状态，尽管这样的共生并不完美。

改变这个状态的不是伊斯兰方面。法兰西王路易九世率领第七次远征十字军进攻埃及，改变了这个状态。这次十字军遭到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败绩，不光让众多士兵送了命，甚至路易九世也成了俘虏。那时，腓特烈也已年过半百。他写了信，请求伊斯兰方面释放身陷囹圄的法兰西王，而以前的老对手法拉丁也在迎击这次远征十字军的前线战死。我们不知道腓特烈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次十字军远征的。一年后他去世了，对此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

[1] 即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1093—1152）。

[2] 路易七世（Louis VII，le Jeune），法兰西王（1137—1180年在位），又称为“年轻的路易”。路易六世之子。前妻为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de Aquitain），后嫁予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路易七世曾与德王康拉德三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积极推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他在位期间，巴黎大学设立，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得到蓬勃发展。

[3] 哈丁战役，1187年7月4日发生在十字军国家与穆斯林之间的一场战役，地点在现以色列境内太巴利（Tiberias）附近的哈丁村，双方参战人数各超过2万人。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指挥穆斯林军队大败十字军，俘虏大批十字军方面要人及士兵。其后萨拉丁夺回了耶路撒冷和一些十字军占领的城市。此役对十字军与穆斯林之间的局势演进有深刻影响。

[4] 阿尤布王朝，12—13世纪统治埃及、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也门以及西至突尼斯的北非沿岸的伊斯兰教王国。由库尔德人阿尤布家族的萨拉丁建立于1171年。1187年哈丁战役胜利后取得了耶路撒冷王国。1250年起，蒙古人逐渐取得对该王朝的控制，王朝衰微。阿尤布王朝时期王国经济繁荣，伊斯兰文明再次兴盛。

[5] 哈里发（Caliph/Khalifah），阿拉伯语“继承人”的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伊斯兰教对最高权威者的尊称，后成为阿拉伯帝国元首的称呼。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阿卜·伯克尔成为教主时始用这个名称。

[6] 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前63—14），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前27年—14年在位）。原名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恺撒的养子。同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三头同盟执政。公元前31年打败安东尼，掌握政权。公元前28年被元老院封为“奥古斯都”（神圣伟大之意）。他改革军队，对外扩张，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顺应形势的内外政策，开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帝国初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7] 布里昂的约翰（Jean de Brienne，又称John I，约1170—1237），耶路撒冷国王（1210—1225年在位）及拉丁帝国皇帝（1229—1237年在位）。他是法国布里昂伯爵埃拉尔二世（Erard II）的幼子，本是一文不名的小贵族，后结识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耶路撒冷的伯爵们建议他与王国的女王玛丽（Maria）结婚，在取得腓力二世和教皇英诺森三世同意后，他迎娶女王，1210年加冕，与女王共治王国。玛丽于1212年去世后，他们的女儿伊莎贝拉二世（即约兰达）即

位，约翰摄政。

[8] 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1099—1291），欧洲封建主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于1099年在黎凡特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到12世纪中期，王国大致领有耶路撒冷及周边大片土地，即现今的耶路撒冷、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东至今天的约旦河即叙利亚，北至西奈沙漠，南至加沙。1291年阿卡城被穆斯林攻陷后王国灭亡。

[9]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家。1501—1505年在图灵根的埃尔福特大学学习哲学。1505年进入奥斯定会修道院，1507年成为神父。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天主教会发售赎罪券，揭开宗教改革序幕。1521年被逐出教门。1534年完成了《圣经》的德语翻译。他还创作过赞美诗，并能作曲。

[10] 亨利七世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Babenberg）是当时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六世的长女。

[11] 格列高利九世（Papa Gregorius IX，约1170—1241），罗马教皇（1227—1241年在位）。生于意大利阿纳尼，本名Ugolino di Conti，1206年任枢机主教。因十字军东征问题与腓特烈二世发生冲突。1233年颁布通谕，坚持只有教会才有解释教会法规和审判宗教异端的特权，加强对“异端裁判所”的领导。1234年颁布第一部《教令集》5卷，成为天主教会法规的根本文献。

[12] 女巫审判，又称魔女审判，日本称为魔女狩猎，是14—17世纪中基督教对所谓异教徒的一种迫害方式，受害者多为女性。按照臆造的女巫形象寻找迫害对象，加以宗教审判并处死。3个世纪中约有10万人遭到杀戮。女巫审判是以中世纪社会政治、宗教的崩溃所引起的不安为背景的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现象，是欧洲中世纪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页。

[13] 加莱船，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14] 卡诺莎之辱，格列高利七世曾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激烈冲突。1076年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召开德意志宗教会议，指控教皇玩弄权术、滥用权力等，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发布敕令，革除皇帝教籍，解除臣民对其效忠的誓约。反对皇帝的诸侯趁机要求亨利四世“暂时放弃皇帝职位”，向教皇忏悔，否则将另立新君。亨利四世面临诸侯叛乱的危险，不得已于1077年1月15日赶到教皇居住的亚平宁山中的卡诺莎，站在城堡外雪地中赤足披毡，哀求三天。教皇终于赦免其罪过，恢复其教籍。“卡诺莎悔罪”是一件象征着帝权屈服于教权的事件，“卡诺莎之辱”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义语。

[15] 亨利四世（Heinrich IV/Henry IV,1050—1106），德意志王（1056—1105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84—1105年在位）。1075年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叙任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卡诺莎之辱”后回德意志扑灭反对势力。随后对教皇采取敌对行动。1084年另立“对立教皇”克雷芒三世，进军罗马，将格列高利七世逐出罗马。后格列高利七世死于萨莱诺。

[16] 格列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约1020—1085），罗马教皇，1073—1085年在位。意大利人，原名Ildebrando da Soana。任教皇期间，巩固教会权势，整肃修道院，领导克吕尼运动。

1075年发布《教皇敕令》，宣称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有权干涉各国内政，废黜君王或命令臣民控告皇帝。

[17] 伊玛目（imām），阿拉伯语中意为站在前列的人、首领。此处指清真寺的教长、率众做礼拜的人。

[18] 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与岩石圆顶清真寺毗邻，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主体建筑高88米，宽35米，大殿可容纳5 000人礼拜，穹顶为银灰色。相传由阿拉伯古代先知易伯拉欣始建，8世纪初由伍麦叶王朝瓦利德一世重建。

[19] “最后的晚餐室”（Cenacolo），位于耶路撒冷锡安山（Mt.Zion）的马可楼（Cenaculum，意为“用餐之处”）内。

[20] 岩石圆顶清真寺，伊斯兰教圣地，又称金顶清真寺、萨赫莱（阿拉伯语岩石之意）清真寺，欧洲人称其为奥马尔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建于岩石之上，呈八角形。由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马利克于688—691年间建造，后经多次改建，形成了现在的蓝色外墙和金色穹顶外观。寺内有巨石，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在此登霄，巨石上留有其脚印。

[21] 大卫城塔，位于耶路撒冷旧城靠近雅法门处，为一处城堡式建筑，内有三座塔楼。公元前1世纪由希律王所建，后经十字军和奥斯曼帝国增建、改建。

[22] 骑士堡位于今天叙利亚塔尔图斯以东霍姆斯峡谷一座650米高山的山顶，距霍姆斯约40公里，因地处的黎波里和霍姆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内外两道城墙把城堡分为内院和外院。城堡由复杂的开阔地与壕沟构成防御体系，外墙上筑有雉堞，角落及每面墙中部有方形塔楼，构成外部防线。内墙内有厅室、库房和小教堂。骑士堡是世界上现存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堡，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五章
坚决走向法治国家

作家通过著作表现自己。腓特烈也写过一本论述鹰猎的书。但他不是只能通过著作表现自己的作家。他属于通过行动表现自己的那类人，所以我以为应该把他的行动当作他的“作品”（Opera）。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就是他的“作品”。完成了这件“作品”之后，他又投入到了创作另一件“作品”之中。

这件“作品”就是“建成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腓特烈对十字军远征的家业尽到了责任，他也从被开除教籍的棘手问题中解放了出来。这件“作品”值得他把人生中期的全部精力投入其中。

从1231年的5月到9月之间，意大利南方内陆的梅尔菲城的居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形。他们新的一天不是始于雄鸡的第一声报晓，也不是始于教堂的钟声，而是始于山岗上城堡传来的石阶上的马蹄声。

黎明前，浅浅的月亮还挂在天际。皇帝早早就起了床，也不用早餐，骑着已经准备好的爱马出城去。与几个同好、少数随从及鹰匠和猎犬一道，一行不超过20人。梅尔菲城最高处建有城堡，城堡东侧是斜坡，房子建在斜坡上，就像粘在上面一样。道路是石阶，在房屋间隙中蜿蜒而下，走过去回声响亮，足以打搅人们的睡眠。

不光是原来住在城里的人被吵醒，很不情愿地开始穿衣。被皇帝召到梅尔菲来的人也是一样。地位高的人在城堡里有睡觉的地方，其他随行人员都借宿在梅尔菲的一般家庭。

腓特烈在这年5月初到9月底的5个月时间里，把整个梅尔菲城变成了一个“集体宿舍”。

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结果是，晨猎成了起床号。狩猎本身不是目的，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回来。但对住在梅尔菲“集体宿舍”的人来说，这回来又成了另一个号令。沿着石阶坡道回到城里的马蹄声告诉人们，把

书夹在腋下进城上班的时间到了。

腓特烈的时间观念非常强，不知道该说这是巧合呢，还是该认为这是他日理万机理所当然形成的习惯。不是他严守时间，而是时间似乎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很多人嘲笑他，说他被阿尔-卡米勒赠送的精巧的机械钟迷住了。在那个时代，同样的机械在教皇看来就是恶魔之物。

吸了一肚子清晨的凉气，驱马奔跑了大半小时回城后，腓特烈会利索地洗个温水浴，并用完早餐。这时，皇帝的重要合作者们也开始在会议室集中。所有人的年龄都比他大。待他们全部到齐后，36岁的皇帝就会一脸神清气爽地走进会议室。

“阁下，早上好！”

大家都出生于意大利，早晨的寒暄也该是用意大利语。

1231年这一年的夏天形成雏形的这项伟大事业，实际上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开始。

1229年6月10日，腓特烈在结束了不流血的十字军远征后，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他在中近东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1230年9月1日，腓特烈与格列高利教皇进行了“和平之吻”，开除教籍的处罚被解除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家业、与教皇之间多年未决的十字军远征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腓特烈也从被开除教籍这个困扰统治者的麻烦中解放出来。万事俱备，他终于要全力以赴着手解决最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了。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城市阿纳尼同教皇进行“和平之吻”后早早就回到意大利南方，也是因为没有必要长时间在阿纳尼逗留。当时35岁的腓特烈赶早回到意大利南方后，又在那里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1]刊行了《罗马民法大全》。

公元123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颁布了《梅尔菲宪章》。

《梅尔菲宪章》

《民法大全》（Novus Iustinianus Codex）就像它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是罗马帝国尚未被基督教化时就已经存在的古罗马法律的集大成，尽管收录其中的条件是这些法律也能适用于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的罗马帝国。

700年后腓特烈逐步完成了《梅尔菲宪章》（Constituiones Melphitanae）。正如他在自己所写的前言里表明的那样，宪章的内容是为把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政体应该如何设定，应该用怎样的法律约束这个政体。所以，这些法律中既有古罗马法律，也有中世纪拜占庭和伦巴第等时代的法律，还有在他之前统治这块土地200年的诺曼王朝的法律。而腓特烈及其合作者认为需要的新法占据了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古罗马《民法大全》对学习古罗马时代的法律提供最好基础方面大有功绩，而腓特烈则全然不想这样做。他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才能把封建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国家，想的是要排除宗教完成这个转变只能依据法律。为此，如果有用得上的法律则予以采用而不论出处，如果没有就制定，其目的最终在于有益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而不在对学问的兴趣方面。

这种区别也直截了当地表现在所用语言的差异方面。查士丁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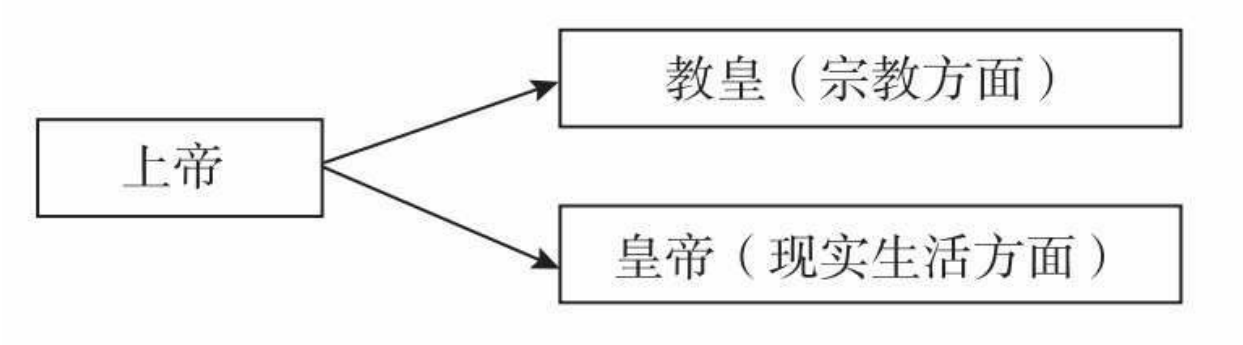
《民法大全》只是“法律集”的意思，而腓特烈的《宪章》翻译成现代法律语言则是《宪法》，里面罗列了统治的基本方针和具体落实所需要的法令。

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皇帝要亲自做这样的工作。腓特烈在前言中也明快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明确说道，既然上帝把统治的任务交给了皇帝，皇帝就有责任究明他的统治是否根据法律正义而为。明确地说出来就等于明确了责任所在。这一点正是他的《宪法》乃至《宪章》的根本。

中世纪天主教会信奉的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因为接受了太阳的光才会发亮，而腓特烈试图自己发光去普照众人。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上帝是通过他在地上的代理人——历代罗马教皇——把统治权委托给皇帝和国王等世俗君主的。正因为如此，由教皇或大主教授予皇冠或王冠的加冕典礼作为象征上帝委托的仪式才具有意义。这时的权力关系是：

可是，腓特烈不这么认为，试以图解如下：



离腓特烈度过少年时代的巴勒莫王宫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座马尔托拉纳教堂。教堂内部铺满了马赛克，直到今天都很美丽。一进教堂的右面墙上有一幅马赛克壁画，描绘的是腓特烈外祖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加冕情况。画中的国王罗杰正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此外，建在巴勒莫郊外的蒙雷阿莱大教堂里同样有一幅金色打底的马赛克壁画，描绘的是诺曼王朝最后一代国王威廉二世的加冕情况。画中的威廉二世也是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的。

西西里的这些国王们既不是由教皇，也不是由大主教，而是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的。腓特烈是看着这些国王长大的。在孩提时代这些体验的基础上，长大成人后他又有了扎根于自己内心的思想。

腓特烈承认信徒精神上的关照和死后的安心归罗马教皇管辖，但他认为除此而外的世俗世界中的实际生活，终究要由皇帝或国王来承担领导责任。腓特烈一直把《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

正因为如此，《梅尔菲宪章》中的各项法令都是以“皇帝诏曰”开头的。这是一种宣言，宣布这个法律是自己制定的，自己作为皇帝也将对法律的公正执行负全部责任。现代人听来这就是无可救药的保守和反动，但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教分离宣言”，不这样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基督教世界的大胆君主所能冒的最大风险。

制定宪章的工作1230年秋天就已经在皇帝的完全主导下启动了。很多人已经持续合作了一年，从1230年秋天到冬天，又从第二年1231年5月到9月一起在“梅尔菲集体宿舍”。除了腓特烈可以通过大清早的鹰猎散散心以外，其他人都被密闭在了没有任何娱乐的山间小城里。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法律专家。

グイエルモ二世(モンレアーレ大聖堂)とルッジェロ二世(マルトラーナ教会、右)

威廉二世（蒙雷阿莱大教堂）与罗杰二世（马尔托拉纳教堂，右）

代表人物是贝内文托出生的罗弗莱多。他原先在博洛尼亚大学教书，被腓特烈挖过来担任了那不勒斯大学的首任校长。另外还有三个人属于这一类人。他们都是年轻的法学家，《宪章》制定完成后都去那不勒斯大学教书了。

第二类是高级神职人员。

这一类人的代表人物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卡普亚大主教贾科莫。他们二人不仅是西西里王国神职界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也是高级神职人员中的实力人物，曾随同被开除教籍的腓特烈所率领的十字军远征。

他们二人有两条参加理由。第一，尽管制定宪章的真正意图在于政教分离，但还是要让世人知道有两位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制定。即使目标是“政”与“教”的分离，但也不能单由“政”来制定宪章，“教”也参与了制定工作。展示这一点也是一种战术，可以达到在走向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消除与“教”之间无谓摩擦的目的。

第二，需要他们二人对文章的遣词造句把关，这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我甚至认为，尤其是对异端问题的处理部分，恐怕是采纳了他们两人的意见后重新改写的。

第三类是一帮可以称之为实务专家的人。1220年腓特烈着手重组王国的时候，他们都是封建领主。自那以后，他们被腓特烈录用为政府高官。身为封建诸侯却成了向中央集权转化过程中重要的齿轮，人人心情愉快。前面讲过，由于腓特烈灵活的用人术，他们起到了被用来整治黑帮的黑帮老大的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恩里克·迪·莫拉。除了这位至死效忠腓特烈的人以外，原先有实力的封建诸侯担任高级官僚的人也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人，他不属于三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但却是制定《梅尔菲宪章》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此人比腓特烈年长几岁，需要他的最大理由就是他写华美文章的出色能力。内容再好，如果不用美文写出，让那些自视教养高雅的人心中佩服，文章就有看也不看被直接扔进垃圾桶的危险。在中世纪，这种对文采的强调必不可少。顺便一说，腓特烈本人不是一个文笔拙劣的人，但他有行文时切入问题核心过于直白的毛病。

腓特烈不但网罗了西西里王国各领域的重要人物，还在梅尔菲把他们封闭了一个时期，但宪章的制定工作完全不是秘密进行的。实际上，罗马教皇早就知道了这件事。1230年圣诞节前夕，参加制定宪章的人从第一次密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各回任所的时候，格列高利教皇看准时间，给腓特烈写来一封私人信件。60岁的教皇对刚满36岁的皇帝这样写道：

“最近有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说你正在准备新的法令集。我不知道你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还是受到险恶进言者的影响才这样做的。这将带来巨大弊害，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因为推行这一套法令会把你自己变成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你会因此失去更多的上帝恩宠，甚于其他任何人。我相信你的理智和良知，所以更要建议你远离身边充满恶意的进言者，尽早收手，不要做使自己成为上帝和信徒敌人的事情。”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格列高利教皇还给卡普亚大主教因而也是教皇部下的贾科莫写去了一封信。在给这位部下的信里看不到只言片语的客气，教皇严厉斥责了积极参与腓特烈宪章制定工作的这位大主教，教皇对大主教身为高级神职人员却去做违背教皇旨意的工作感到不快，说他绝不会放过此事。

可是，腓特烈虽然已经着手制定宪章，但却毫无排斥基督教会的想法。他所考虑的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明确责任分工基础上的共存。他不过是要分清，教皇负责的是信徒在宗教方面的事务，而自己作为世俗君主则负责这些信徒现实生活方面的事务。腓特烈认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清各自负责领域的责任所在，对基督教会也没有什么不便。

然而，这样的想法不适用于中世纪。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相信，只有用基督教约束一切才是沐浴上帝恩宠的唯一路径。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上帝不仅会看到人们的精神层面，还会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向只相信自己想法正确的人指明其他新路，不光在中世纪，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难事。

可是，中世纪也不可能被这一种颜色所抹杀。如果真能如此，即使再过200年也无法产生文艺复兴。教皇拐弯抹角地告诫腓特烈，让腓特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又简单粗暴地斥责了卡普亚大主教。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给教皇写的回信。不过，他们二人都没有回到教皇所认为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一点千真万确。

转年的1231年5月，梅尔菲重开了“集体宿舍”，并于当年9月公布了成果。

《梅尔菲宪章》又被称为《奥古斯都宪章》（Liber Augustalis）。古罗马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也创建了法治帝国，他是腓特烈崇拜之人。

“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始于奥古斯都。腓特烈也把建立“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当成了自己的目标。但他没有在号称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进行尝试，因为他是靠选帝侯们的选举才坐上了那里的头把交椅。他打算在西西里王国尝试，因为那里是行使世袭权而拥有自己的领地的国度，行动可以更加自由。不过无论怎样，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南欧的实验总有一天也能成为北欧的榜样。

国体

《梅尔菲宪章》的制定让基督教会的元首罗马教皇很担心，怕这会破坏一直以来以教会为统治中心的社会秩序。那么，《梅尔菲宪章》实际上都有哪些法令呢？

首先是国家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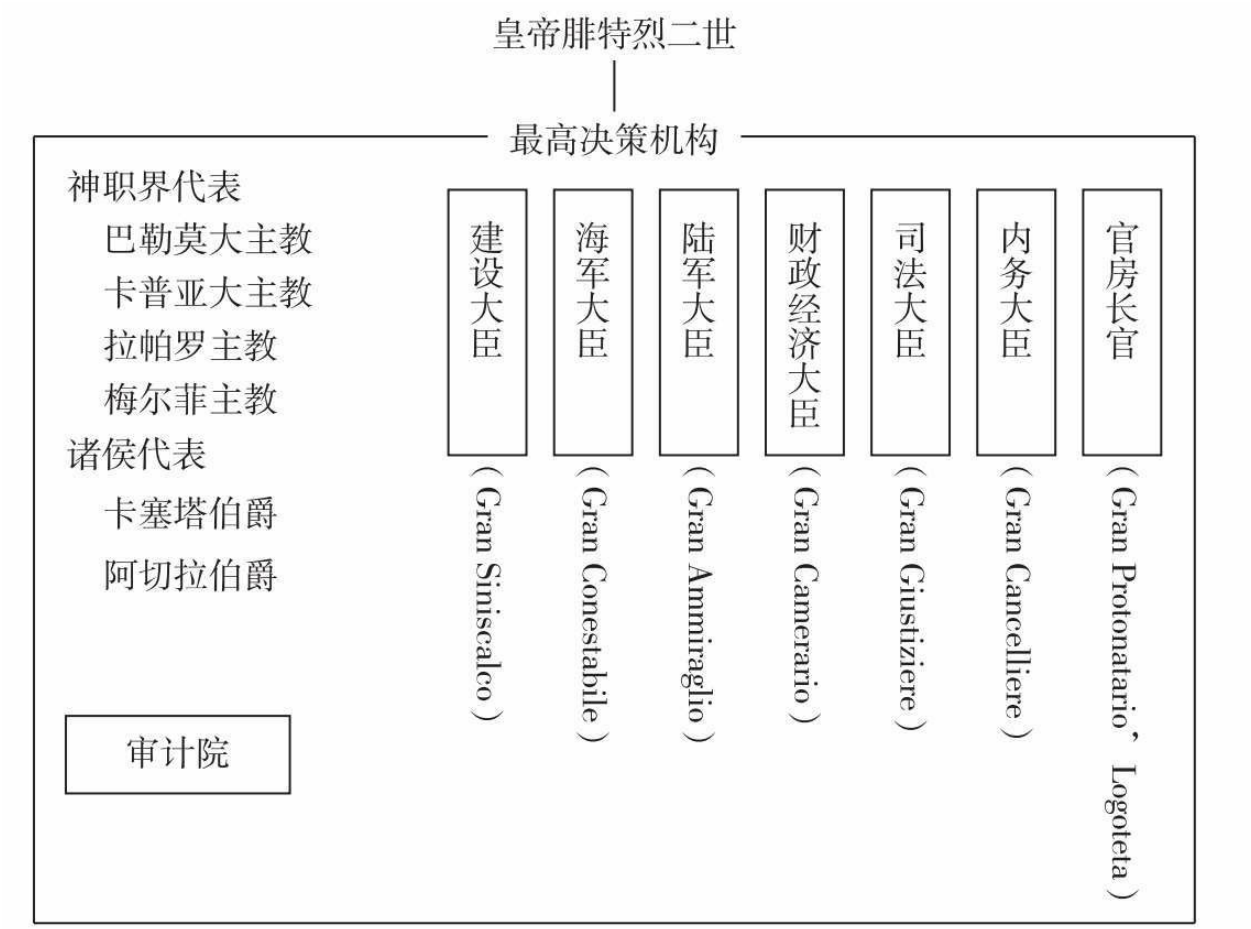
皇帝或国王君临于割据各地的封建诸侯之上，这就是直到当时为止的封建国家形式，可以说这就是中世纪本身的特征。

但腓特烈所追求的不是这样的国家形式。皇帝或国王不单要高于诸侯，而且要能发挥主导权，引领整个国家，因此要对国家运营负全部责任。

直接体现这一思想的条目是，受到不当行为侵害时，不管被侵害者是诸侯，还是老百姓或是教会人员，都不能自己随意报复处置，而要诉诸裁判所，等待法律解决。这意味着把封建诸侯以往享有的既得权中的司法权削减为零。因为腓特烈设想的秩序要靠法律，而不是靠武力或暴力来实现。

在腓特烈的王国里，仅仅召集封建诸侯的传统会议消失了，设置了一个常设的“王室会议”。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阁僚会议。议长是腓特烈，下设7个部门，相应设7位大臣。此外，还有4位高级神职人员和2位封建领主加入阁僚会议。这不光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他们代表了各自所属社会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使是排除了宗教的世俗国家，也应有神职界的代表参与，即使是从封建制度蜕变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应有旧制度的代表参与。

腓特烈的想法是君临天下同时统治天下，所以在阁僚会议上，连议长腓特烈在内总共14人之间的讨论通常很活跃。腓特烈不在时，议长似乎由皇帝最信得过的巴勒莫大主教担任。



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机构

上图是试用现代语言对西西里王国最高决策机构进行的图解。[2]整个西西里王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以巴勒莫为首府的西西里岛和以福贾王宫为中心的意大利南方。所以上图还须加上在两处分别设置的地方政府。

既然国家形式本身就呈金字塔形，阁僚会议上决定的事项当然就得向金字塔的下层传递，做到上意下达。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腓特烈经常席不暇暖地巡视各个城市。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就会立即召集只能译为“议会”的会议。被召集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封建诸侯，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神职人员，市民代表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面对坐在上首的皇帝，知无不言的自由气氛恐怕并不存在，但应该是允

许他们说话的。这种三部分人开会的场景一直到570年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梅尔菲宪章》分为三卷，共260条，充满了对基督教徒现实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照，反映出腓特烈要为此负全部责任的气魄。腓特烈两次让相关人士待在不能干其他事的梅尔菲住“集体宿舍”，把他们密闭在那里共计半年，如果不研究法律，他们又如何打发时间呢？每每想到这些，我便忍俊不禁。下面让我们把这些无微不至的条目按领域整理一下吧。

司法

首先是腓特烈最重视的司法方面。

只要不排除以往随心所欲行使权力的封建诸侯和神职人员的干预，就无法实现施行法律时的公平和公正。为此，需要有专家取代被排除的人来负责司法领域。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大学的法学部变得重要起来。对法律专家的需求也无止境，因为腓特烈决定法官在一地的任期为一年，并将此作为保证公正的一项措施。判决也必须在任期内做出，也许腓特烈认为，判决的公正也体现在尽快拿出结果方面。然而想想现在的意大利，一个判决竟要拖10年以上，真让人叹息。

腓特烈还让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三方各自成立自己的同业者行会。他已经让医师和药剂师成立了行会，使这些中世纪的自由职业者第一次有了保护自己权益，同时又能以合适的经费完成职务的行会组织。

既然提倡法治国家，就需要形成任何人都能诉诸审判的环境。《梅尔菲宪章》规定，穷人、寡妇、孤儿等社会弱势群体诉诸审判的全部费

用由国家负担。《梅尔菲宪章》还承认了上诉权，这明显继承了罗马法。也就是说，单凭被人起诉不能定罪。与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梅尔菲宪章》还规定应直接向皇帝上诉。

经济

经济对建立有秩序的和平国家来说也极为重要。人如果饿极了就容易变为暴徒。腓特烈决定，要在国家的统制下提高西西里王国的经济水平，而不像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那样放任自流。这就是统制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执西西里海外贸易之牛耳的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也不再被允许拥有居留地——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总而言之，既然要以西西里王国为基地做生意，哪怕是外国人，也得缴纳关税及其他税金。此外，腓特烈还决定，西西里的产品要用西西里人的船出口。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指望热那亚和比萨商人开拓销路就靠不住了，为此腓特烈不得不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苏丹们缔结通商条约，以确保自己国家产品的销路。

中世纪最大的产业怎么说都是农业。“西西里王国”还是小麦的一大产地。为了进一步振兴农业，腓特烈把皇家农地用作了示范田或曰核心田。他试图通过以农民个人耕作的形态与作为企业运营的皇家大农庄并立的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大农庄从耕作的品种到所有事务，都由管理者负责并详细确定。皇家支付管理者薪水，并要求管理者忠实履行职责。在腓特烈设置的内阁直属审计院的工作中也有这样一条，不仅要审查这些大农庄的收入，还要审查详细费用是否正确记账。

这种大农庄可以被称为国营农场。我们再来看看农民耕作自有农地的情况。《宪章》规定，收益的十二分之一作为国税缴纳给国家，剩下的十二分之十一的收成农民可以拿到城里的市场上去自由销售，《宪

章》承认所得收益归农民。

此外《宪章》还涉及扩大耕地的情况，免征开拓新耕地者10年的“十二分之一税”。

税制

我也相信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所以我认为古罗马帝国考虑并实行的“税要广收少收，税率不变”的税制是公正税制的样板。在古代，国有土地的租地金也是交给国家的，可以认为是直接税，规定租地金是该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所以，《梅尔菲宪章》规定的“十二分之一税”忠实于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精神。

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处于一神教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同古罗马因为是信仰多神教而无专门神职阶级不一样。一般认为，在中世纪，人被分为下述三种。

“祈祷的人”：意为专门的神职人员。

“战斗的人”：封建诸侯及其下属的骑士，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祈祷的人和劳作的人。

“劳作的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被视为“庶民”（popolo），属于这个阶层。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没有被课以纳税义务，只有“劳作的人”被课以向“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两者纳税的义务，理由为“祈祷的人”是祈祷他们心灵平安的人，而“战斗的人”则是保护他们肉体安全的人。

我们在这里不谈间接税而集中说说直接税的事。腓特烈统治的西西里王国的国民除了要向国家缴纳“十二分之一税”外，还必须向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缴纳“什一税”。这项著名的税金是欧洲所有基督教国家全都要缴纳的。粗略算下来，他们要向罗马教皇缴纳几乎与缴纳给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一样多的税金。

仅此一项，腓特烈统治下的“劳作的人”已经缴纳了古罗马人两倍的直接税。但居住在封建诸侯领地里的“劳作的人”，只缴纳这些还是不行的。不管农地的所有者是封建领主，还是大主教或修道院，再有良心的所有者都会以保障领民安全为由收取农民收入的五成。五成之外，还要再缴给“祈祷的人”十分之一的税收。这就是中世纪社会。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税收要高于古代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古代没有中世纪要付给“祈祷的人”的那一成税。

但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减去这一项后还有五成的直接税。

用一句话说，中世纪与古代不一样，税金高的原因是保障安全的费用高。

古罗马帝国以被称为“内海”的地中海为中心，土地覆盖了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疆域辽阔，保障安全的费用金额庞大似乎也属当然。然而，古罗马人的安全保障费用却低得惊人。古罗马仅完全铺装的干线道路就达8万公里，加上砂石道路，古罗马道路网长达30万公里，遍布帝国全境，已经形成系统，可以迅捷地从设在每个战略要地的军团基地把兵力调动到所需要的地方。古罗马人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约在帝国全境常驻兵力的庞大费用。在保卫偌大帝国的防卫力量中，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有15万到18万人，加上辅助兵力也不超过30万，这与日本自卫队的兵力相差无几。

可是到了中世纪，保护居民安全的已经不再是大帝国，而是割据各地的数量众多的封建领主国家。必须承担防卫责任的地域也变得很小，与古罗马已不能相比。尽管如此，他们还必须常备有防卫所需的骑士和士兵。既然是割据，他们同近邻领主的关系不可能会好，相互提供常备兵力便是梦想。所以，即使在军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直保有“战斗的人”，他们也不得不常备防卫人员，防卫费用便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费用自然会转嫁为对“劳作的人”的课税。

腓特烈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是统治者，领土绝对比封建领主要大，但却在极度削减常备兵力，甚至削减到了只有1万人或更少。这个规模与有实力的封建诸侯的水平相当。

腓特烈注意到，诸侯们常备的兵力不仅用于对付国外的敌人，还用于镇压国内的敌人即领民。所以，腓特烈想要用低税率来减少领民的不满，而不是用军事力量阻止领民叛乱。向罗马教皇缴纳的“什一税”属于无奈。但作为领主，他想压低缴纳给自己的税金。“十二分之一税”就是这个想法的体现。

我们能理解腓特烈有模仿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的想法，但毕竟他生活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封建领主们为了继续当“战斗的人”，不会削减自己的兵力。为了把这些诸侯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腓特烈需要拥有超过他们的兵力。

所以，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作为国王和皇帝，他自己拥有在必要时征收临时特别税的权力。这一点成了日后历史学家们集中批评的靶子，认为这是腓特烈合理而一以贯之的政治中唯一一个中世纪式的政策。我甚至认为，腓特烈是想一个人把历代罗马皇帝一贯的政治坚持下去，伴随着一些勉强也属无奈。

正是因为腓特烈试图尽可能减少这种勉强，他的经济政策才被批评为统制经济。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了国家专卖的产品，盐、

铁、黄铜、焦油等都是国家专卖品。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国家根据财务状况以4到6倍不等的价格拿到市场上出售。顺便一说，被定为国家专卖的这四样产品被罗马教廷以不让敌方利用为由列入了禁止向伊斯兰世界出口的禁运目录，可见在当时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物资。腓特烈一边要压低税负，一边又要增加国库收入，很是操心劳神。但是，如果不改革坐收五成的封建制度，无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还是划定专卖品，随之而来的辛劳将永无止境。

《梅尔菲宪章》是腓特烈36岁时的作品，我们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解读它，毕竟里面不但讲到了公平公正地施行法律，还讲到了市场经济主义。

展销会

不论如何努力提高生产力，产品卖不出去就不能发展经济。在《梅尔菲宪章》中，甚至规定了重建“市场”。市场在意大利语中叫作“fiera”，是买卖商品的地方。以前，王国内各城市都是随意开设市场，现在皇帝对市场做出了规定。仅举留下了史料的意大利南方为例，情况如下。

阿奎拉附近的苏尔莫纳：4月23日至5月8日，共15天。

卡普亚：5月22日至6月8日，共17天。

卢切拉：6月24日至7月1日，共7天。

巴里：7月22日至8月10日，共19天。

塔兰托：8月24日至9月8日，共15天。

科森扎：9月21日至10月11日，共20天。

雷焦卡拉布里亚：10月18日至11月1日，共14天。

巴列塔：11月半至12月半。

令人愉快的是，这个时间表考虑了在各商品市场之间的移动时间，只要业者愿意，就能在所有这些市场摆摊出货。这些都是由国家与地方共同管理的一年一度的大型展销会。地方还管理各城市自己的“市场”，即使小城市也是每个周末都开市的。

商品的流通就像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是搞活国家这个居民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在这种展销会上不仅可以见到居住在卢切拉的阿拉伯人，还能见到来自与腓特烈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身影。所谓“市场”既是物产的展销会，也是谈生意的地方。

意大利南方

此外，在西西里王国的“市场”中，甚至还能见到当时连在贸易立国

的意大利北方城邦国家都难得一见的犹太人的身影。腓特烈虽然规定了利息的上限，但准许他们从事兑换和贷款的业务。这些犹太人不坐在商品的前面，而是坐在一种叫作“banco”的桌子前面，一眼就能认出。“Banco”正是银行一词的词源。在所谓的“市场”，不同物产的流通引起了不同民族的交流，所以这里也就可能成为交流不同思想的地方。腓特烈热衷于搞活“市场”，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

确立货币

但是，如果期望搞活“市场”，还有两件事情必须安排，那就是建立正确的计量法使任何人都难以欺骗他人，以及确立一种具有信用的货币使任何人都喜欢拥有它。

封闭在梅尔菲的皇帝及其合作者们当然没有忘记对这两大重要事项做出安排。

他们在长度、重量和数量等所有方面规定了准确的数值。他们还规定对违反者将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将其永远从“市场”中驱逐出去。

确立货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还没有一种货币可称得上是国际货币。其中流通较广的是拜占庭帝国的索利都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第纳尔，但都不是欧洲的货币。西西里王国有阿马尔菲的货币塔里，但自从阿马尔菲跌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以后，塔里也失去了国际货币的地位。而下一时代的经济大国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都还没有自己国家的金币。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国际通用货币还是一张白纸。

腓特烈决定自己新造国际通用货币，并在颁布《梅尔菲宪章》的同

时，在意大利南方的布林迪西和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两地开始造币。为了纪念他所崇拜的人，腓特烈将金币命名为“奥古斯塔”。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复古”，成为后来文艺复兴的口号。

被称为“奥古斯塔”的金币重5.3克，直径20毫米，纯度20.5K。正面雕有腓特烈模仿古罗马皇帝的侧面像，很像古罗马的奥里乌斯金币，周围刻着略语文字。背面雕刻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鹫，周围的文字是拉丁语“FRIDERICUS”（腓特烈）。简言之，三十过半的腓特烈把自己当成古代皇帝奥古斯都了。

フリードリッヒのアウグスターレ金貨（右）、ディナール金貨（中）、アウグストゥスのアウレリウス金貨（左）

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右）、第纳尔金币（中）、奥古斯都的奥里乌斯金币（左）

想模仿重量达7.8克的古罗马时代奥里乌斯金币的心情可以理解，“奥古斯塔”本身也足有5.3克。奥里乌斯金币并未被广泛使用。在帝政下的罗马，支付工资等使用的是价值只有奥里乌斯金币二十五分之一的第纳里乌斯银币。

然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到，确立一种具有信用的基本货币也有很大好处，因为发行这种货币可以提高发行国家的信用度。“奥里乌斯”金币存在的理由，以及模仿它的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存在的理由都在于此。简言之，一个国家拥有让人喜欢得到的货币，人们也就

喜欢与这个国家保持经济关系。这也是腓特烈所瞄准的目标。

话虽如此，既然是货币，平常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也是很重要的。在美观方面，据说“奥古斯塔”金币胜过中世纪任何国家的金币。但还需要有平常使用的其他货币。因而还有一些以“小奥古斯塔”金币为主的、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其他货币。“小奥古斯塔”只有“奥古斯塔”重量的一半，好像与含金1克的轻便货币“塔里”同时并用。

尽管如此，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仍然是中世纪时代欧洲最先铸造的、信用度很高的货币。听说没有一个伊斯兰商人不喜欢用自己的货币“第纳尔”去兑换“奥古斯塔”金币的。

仿佛以1250年腓特烈之死为界一般，其后“奥古斯塔”金币的铸造量一落千丈。许多意大利城邦国家也接二连三地开始铸造其他金币取而代之了。

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铸造“热那维诺”金币。

1252年，佛罗伦萨开始发行“弗罗林”金币。

虽然威尼斯通常起步较晚，但一旦开始总是做得很彻底。到了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发行“达克特”金币，加入了金币铸造国家群。

以后，“弗罗林”和“达克特”这两种货币逐渐成为后来欧洲及中近东世界的国际通货。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方，谈生意都可以用“以弗罗林计价”或“以达克特计价”的方式了。人们感觉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成为文艺复兴主人公的过程中，一路上都为信用货币的铸造所伴随。而文艺复兴正产生于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孕育的文明文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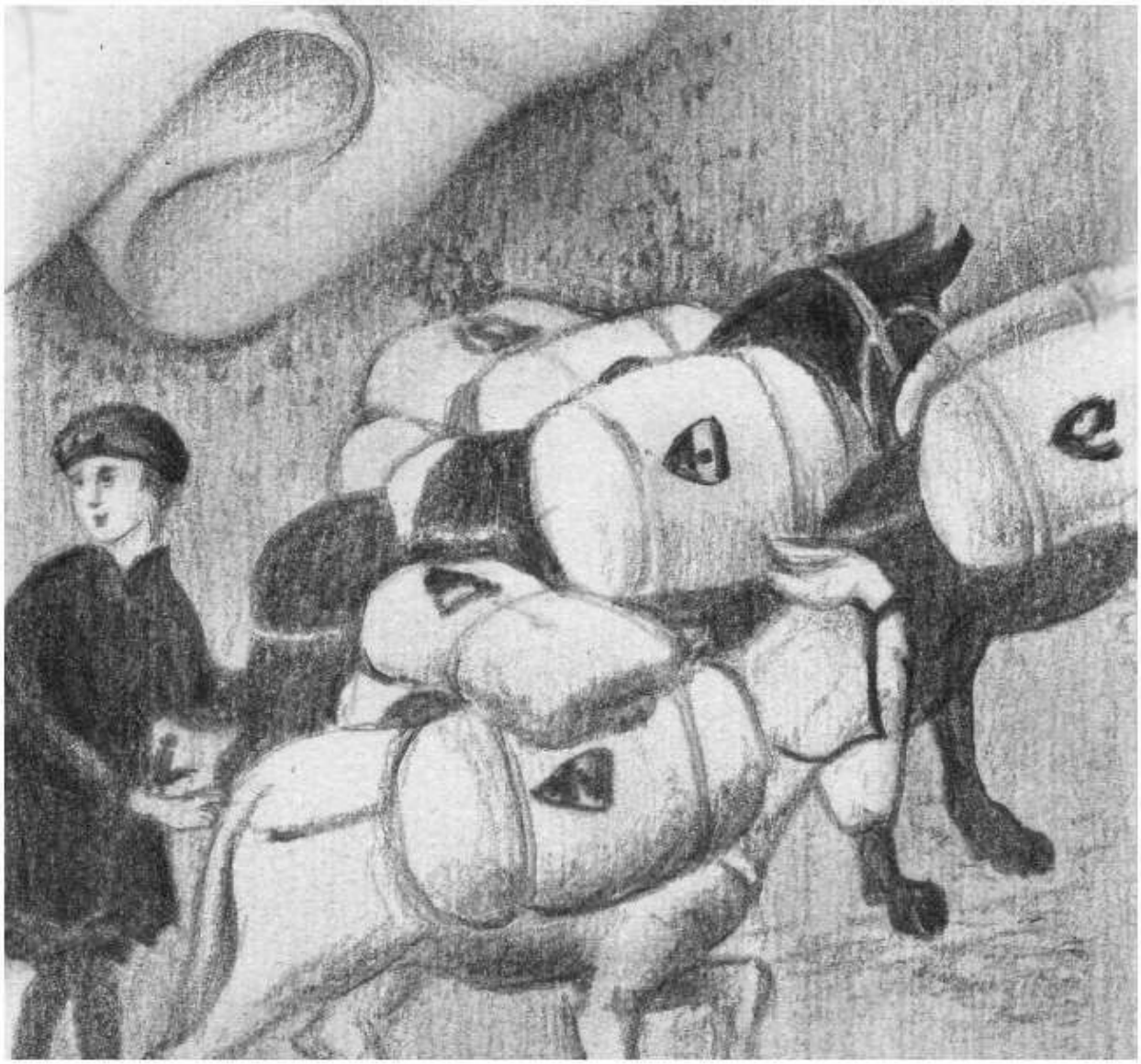
顺便说一下，我寻找刻有腓特烈侧面像的“奥古斯塔”金币有30多年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我买到了刻有奥古斯都的2000年前的金币，所以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抚摸它。我能够亲手抚摸仅仅800年前的“奥古斯

塔”金币，还是因为托了意大利造币局的福，最终用他们收藏的一枚藏品方才实现。除此之外，听说德国和英国的博物馆里还存有不多的一些。

这种金币存世数量之少，原因不仅在于铸造数量本身就少。由于这枚金币被评价为中世纪欧洲的最美金币，很多人想要得到，硬币市场中不见其踪影。伊斯兰世界也有很多人热衷于弄到这枚金币，以至于连确定散失地点都不可能。也许只能认为那是梦幻金币。

在腓特烈主导下完成的《梅尔菲宪章》就这样把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国家转型所需要的一切事项以法律的形式逐条罗列出来。可是，要想让这些法律实际发挥功效，还需要数量庞大的官僚。光靠那不勒斯大学的毕业生终究不够。于是腓特烈在巴列塔城里新建了一所专事培养事务办理的官僚的高等学校。从那不勒斯大学和这所官僚培养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都将成为把腓特烈这个“头脑”考虑出来的政策付诸实施的、有能力的“手和脚”。这样，腓特烈也成为中世纪欧洲关注到建立官僚机构重要性的第一人。

要用好已经建好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能够发挥功能的传递机制不可或缺，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中世纪首先注意到这种制度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通商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但他们是生意人。若论及不是专做生意的君主，那腓特烈则是第一人。



腓特烈的公函

在盖着皇帝纹章的口袋里塞满公函，放上马背，成队的马走出城门。在腓特烈逗留的城市里，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了。同样，人们也看惯了背上驮着同样口袋的马队反向走进城门的景象。

传说光是跟随腓特烈在各地走动的人就有100到150人之多。说到皇帝出行，无论是谁，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众多身着华丽服装的宫廷人员随行的景象。然而经常跟着腓特烈的却是记录公文的书记员和运送这些公

文的人。皇帝的队伍等于移动的官邸。

以上是1231年腓特烈颁布的《梅尔菲宪章》及其重要部分的摘要。通常，这种重要文书应该用也是法律语言的拉丁语书写。而《梅尔菲宪章》则是通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读懂的俗语写成，表现了腓特烈想让更多领民阅读《梅尔菲宪章》的热切之心。

读了这份文书，人们就能知道三十过半的腓特烈想如何构建西西里王国这个自己的国家了。用一句话说，那就是脱离封建社会，向以君主为最高领袖而发挥功能的国家转型。刚听到腓特烈要制定宪章，就传来了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担心与恐惧之声。教皇是否读了完成后的宪章便能打消他心头的担心与恐惧呢？

格列高利教皇在《梅尔菲宪章》还未公开以前就已经给腓特烈写信说，腓特烈搞的这个宪章“是对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因而是失去上帝恩宠的行为，将成为上帝和信徒的敌人，收手吧！”

但腓特烈并没有收手，《梅尔菲宪章》得以完成。完成后的宪章必定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上。因为尽管腓特烈自己不承认，但根据罗马教皇的说法，归根结底西西里王国是罗马教皇领土的一部分，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也是罗马教皇的一个家臣。

所以，罗马教皇是读了《梅尔菲宪章》的。那么，读了以后他的担心和恐惧打消了吗？

完全没有。非但没有，他的担心和恐惧愈发加大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认为腓特烈制定《梅尔菲宪章》就是对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是失去上帝恩宠的行为，是跟上帝和信徒敌对的行为。他根本没有改变这个想法。

这就是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断定，《梅尔菲宪章》是腓特烈针对教皇和基督教会的反体制思想结出的果实。

integro. & non sia infame.

De li apostatanti.

APOSTATANTES.

Comanda lo Imperatore: che se alchuno christiano deuentasse Judeo: p- da tutta la robba sua: & non possa succe- dere ad alchuna persona: ne possa exer- cire alchuno acto legitimo.

De li sacrilegi.

MVLTÆ·LEGES.

Comanda lo Imperatore: che si alchuno piglia cose sacre da loco sacro: si como fusse uno calice da la ecclesia: nõ rumpendo le porte: sia punito ad arbi- trio del Judice: ma si lo farà de nocte: sia punito de la uita.

梅尔菲宪章的一部分

要是以前的格列高利，大概当即就开除腓特烈教籍了。可是，教皇自己已经痛切地知道，开除腓特烈的教籍不会有效果。而且，不愿意带十字军远征同制定让国家发挥功能的法律不是一回事。单凭制定了法律是不能处以开除教籍处分的。

60岁的教皇通过“和平之吻”与腓特烈重归于好，并解除了对他开除教籍的处罚，而36岁的腓特烈却紧接着就投入了制定构筑排除宗教的世俗国家不可或缺的法令集。教皇根本不想允许腓特烈这样下去。他认为“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单单想到腓特烈处在必须服从的地位却拒绝服从，格列高利就会怒火中烧，其他一切他都视而不见了。教皇开始寻找新的“武器”，当然，这是能够有效牵制腓特烈的“武器”。

1231年9月，皇帝腓特烈二世颁布《梅尔菲宪章》。

1232年2月，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设立“异端裁判所”。

这些日期并非偶然。《宪章》的所有条目都是以“皇帝诏曰”开头的。在教皇格列高利看来，即使是约束信徒的现世法律，也必须以“教皇命令”开头。

“异端裁判所”

“开除教籍”在日本就是“村八分[3]”制裁。不过，基督教教会的规矩是必须与被开除教籍的人断绝任何关系，那就不是“村八分”，而是“村十分”了。但最坏的情况也只是被居民共同体驱逐出去，并没有规定要被处以死刑。

在基督教徒看来，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统统都是“异教徒”，只是一群信仰了跟基督教徒不一样的宗教的人而已。即使歧视他们，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些尚未觉悟到真正教义的可怜人这层意义上的歧视。

与异教徒是外人相反，“异端之徒”是内部问题，指的是虽然同为基督教徒，但被断定为信仰方式与基督教会的规定不同的人。所以，“异端之徒”比“异教徒”对基督教社会更加有害。一旦这样认为也就清楚应该如何处置了。一个烂水果能害了一箱好水果。一旦发现已经烂掉的水果，就只能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扔掉。既然想到就要付诸行动。既然这是为了保护剩下的水果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名分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光是“村八分”或驱逐就不够了，只能是用火刑把扰乱秩序者从地球上抹去。

“异端裁判所”是找出腐烂水果的机关，正式名称是要在前面要加上一个形容词“圣”（sacro）的，因为这个机关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坚守信仰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无上神圣。格列高利教皇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运作这个机关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多明我会[4]的修道僧。

圣方济各派以贫穷为口号，力主基督教的上帝是爱之上帝。而多明我会虽然同样也是修道僧修会，但却是以一个汇集了爱好学问者的集团而为人所知。

爱好学问并不坏。相反，隶属于多明我会的僧人还是忠实抄写古人所留书籍传诸后世的重要功绩的主角。但他们也有缺点，他们的性格倾向是毫不怀疑地相信已经写下或定下的事情。于是，他们认为写下或定下的都是正确的，而与此不符的人都是错误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多明我会修道僧在欧洲被称作“上帝忠实的狗”。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把他设立的这个“神圣异端裁判所”托付给了这些“上帝忠实的狗”。

以前也有敌视“异端”的思想，但还没有到在专门的裁判所审判“异

端者”的地步。格列高利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专门裁判所”。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设立“神圣异端裁判所”的原始动机，正如现代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在于掌握一种用于牵制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武器，一旦他认为腓特烈有反体制的行动时便可运用这种武器。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腓特烈自己也在这点上启发了格列高利。

《梅尔菲宪章》中也有涉及异端问题的地方。腓特烈在这些地方规定，异端问题由罗马教皇决定。如果想遵循耶稣基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话语，作为皇帝自己就要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负起责任，而人们信仰方面的事则属于罗马教皇负责的领域。格列高利教皇一定是咬住了这一点，认为是否是异端得由我这个罗马教皇决定。

就这样，从中世纪到近代震惊整个欧洲的“异端裁判所”启动了。这个“神圣异端裁判所”在我看来就是当时的秘密警察，是一个由直属于同样神圣的罗马教皇的“上帝忠实的狗”运营的机关。这件事发生在《梅尔菲宪章》颁布仅仅5个月之后。

皇帝主导形成的《梅尔菲宪章》和教皇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只隔了5个月就成了既成事实。我想这个现象反映出中世纪人对法律认识的差异。

法律是人们一起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则，大致可分为下述两种。

第一种是上帝创造而授予人类的法律，《摩西十诫》就是好例。因为是上帝制定的，因而不允许人类改变。

第二种是人类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毋庸赘言，古罗马法是这类法律的代表。并且，因为是人类制定的，如果不适用了当然可以修改。

而且在罗马时代，就连法律的修改办法也崇尚简单。他们甚至考虑到了，修改旧法也可能会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因而，他

们不是修改旧法，而是另行制定新法，让旧法中与新法有抵触的部分自动失效。这就是古代罗马人修改法律的办法。

腓特烈《宪章》的修改条款也沿用了这种罗马式做法。《梅尔菲宪章》的基础本身在10年前制定《卡普亚宪章》时便已形成。在这10年中，腓特烈已经反复修改了4次。这反映出腓特烈的想法。他认为法律就是自己这个人为领国国民那些人所制定的、为让大家共同生活下去的规则，如果不适用了当然可以修改。

与此相反，与格列高利教皇异端裁判所有关的各项法律，自成立当初就从来没有修改过。异端裁判法的特质是，不修改已有的内容，但可以增加没有的内容。

而且，这种积累的方向是越走越严酷。例如当初没有的刑讯拷问，18年后被明确规定下来；当初只规定为死刑的刑罚，后来成了火炙活人的刑罚。

腓特烈与格列高利的第二个不同在于，法律既然已有规定，那么是否要按照法律的字句忠实执行呢？这是从前述第一个不同中他们二人对法律的不同观点派生出来的。

不消说，格列高利的立场是，法律是自己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制定的，必须严格实施。

而腓特烈呢？他当然不单是宗教界信徒，也不是法律专家，而是统治者，是政治家。他认为，法律不是简单地严格实施就万事大吉的，只有良知的介入，才能期望平等而公正，并符合共同体的利益。古时候的所罗门断案[5]很著名，正是基于良知施行法律的好例。当时的所罗门，并不是作为犹太法的忠实施行者，而是作为统治犹太这个国家的国王进行审判的。

腓特烈也向居住在自己国内的犹太教徒下令，要求他们遵循那个时代的惯例，在衣服上缀上黄色的犹太之星。居住在卢切拉的伊斯兰教徒也不喜欢穿会与基督教徒混淆的衣服。

异端裁判所虽然指责腓特烈让这些人居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却以他们是异教徒而非异端为由，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个问题。

不过，即便是异教徒，既然居住在腓特烈的领国里，也不允许做出违反腓特烈制定的法律的行为。在腓特烈逗留德意志期间，有一次德意志人中间爆发了激烈的排斥犹太人的运动，说是一些犹太教徒拐走基督教徒的幼儿，并杀人食肉。所以，德意志人认为有充分理由烧掉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居留区，杀戮居民，并告到了皇帝那里。杀人食肉是犯罪行为，所以，作为统治者的腓特烈如果想忠实地施行法律，就只能同意大量杀戮犹太人。

可是，腓特烈却以处罚罪犯是皇帝的职责为由没有同意德意志人的诉求。但搁置处理很容易成为政治灾难的源头。

于是他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找出证据。这个委员会完成调查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狂热的反犹太情绪在相当程度上降了温。而结果，这个委员会最终未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腓特烈统治下的犹太人得救了。

法律可能成为好法，也可能成为恶法，取决于如何施行。时刻保持这样的意识是统治者的第一职责。但有些人对执法者的职责就是忠实地施行法律深表怀疑，在他们看来，就连这也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

然而，哪怕腓特烈被视为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者，他也会勇于应对。不过，有实例表明，即使是同样的事情，他有时也会做得更狡猾。对待异端审判，威尼斯共和国采取的态度是，也接受教皇派来的异端审判官，但接受是有条件的。他们没有同意异端审判官只能由修道僧这些

直属于罗马教皇的神职者担任，而是加进了一个威尼斯政府的人。如果这个威尼斯人反对，审判就将无效。

威尼斯共和国的信条是“首先是威尼斯国民，然后才是基督教徒”，因而它不是恭顺罗马教皇的国家。在这样的威尼斯，究竟如何审判异端呢？

首先是担任检察官角色的多明我会修道僧发现的嫌疑人被带上被告席。然后由多明我会修道僧担任的异端审判官宣读起诉理由。念完后，如果坐在审判官席上的威尼斯共和国方面的人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异端审判就不成立。

威尼斯共和国没有从正面反对罗马教皇搞起来的异端审判，但他们采取了经济人国家的做法，在现实中坚持消极怠工，使包括女巫审判在内的异端审判在威尼斯共和国内没有成功过一次。他们对一般罪犯执行过斩首刑，但没有发生过一起以对基督教信仰方法不当为由的火刑。

腓特烈的《梅尔菲宪章》与格列高利教皇“异端审判”的最后一个不同，充分表现在下面这件事上。

正因为参考了古罗马法，被告方的人权在《宪章》中也得到了尊重。《宪章》规定，只有一审判决被告仍然无罪，是否有罪要等终审判决。这就承认了上诉权，也就重视了辩护人的作用。

而虽然同为审判，异端审判却是一旦在一审中被定有罪，只要没有足以推翻判决的相反证据就会被定为有罪。首先没有辩护人的辩护。而且，在被带到审判的地方之前，被告已受到了极端残酷的刑讯，哪里还能指望提出什么“足以推翻判决的相反证据”呢？所谓异端审判，只不过是把开始就认定的结果做成审判的样子而已。

而在腓特烈统治下的法庭上，辩护人非常重要。腓特烈甚至同意辩

护人与医师和药剂师一样建立同业者行会，可见他的心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相反，在异端裁判所里，辩护人的存在连有名无实都做不到。上帝是绝对不会犯错的，而罗马教皇则被指定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多明我会修道僧是教皇的部下，在异端审判中既是检察官又是审判官。在这样的审判中，起反驳作用的辩护人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这在基督教会方面看来完全符合逻辑。

一句话，一个人一旦被当做异端者盯上就完了。他会被抓走受到严刑拷打，不管招不招供，都会被吊死或放在火上烧死，从地球上抹去。这就是被“上帝忠实的狗”盯上的命运。因为所谓异端者，就是那种腐烂的果实，弃置不管就会危害有正确信仰的人。

这样的“神圣异端裁判所”在西班牙存在的时间长于其他任何地方。直到西班牙被拿破仑征服[6]后，“神圣异端裁判所”才终于沉静下来。这也是因为催化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启蒙思想与异端审判的思想处在相反两极上的缘故。

但在此前长达500年之久的时间里，漂亮女人因其他女人的嫉妒而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有钱人因嫉妒富裕者告密而被带到异端审判官面前的状态一直持续不断。嫉妒和羡慕产生不了任何东西，相反只能毒害社会，然而却被那些戴着正义面具的人延绵不断地维系着。

一直站在异端审判最前线的修道僧们也完全不是什么恶魔，他们只是些廉洁清白、认真而信仰笃深的神职人员。但是，他们也是一群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行为而毫不怀疑的人。

可以说，在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异端审判是基督教会的最大污点。与异端审判相比，十字军远征之类倒是可爱之举。我在这里并不是赞扬不管动机如何都要跑到别人国家去的行为，参加十字军

的很多人都付出了客死他乡的代价。

相反，异端审判的当事人身处安全之地，却从未停止过把很多人一个个地逼向残酷命运的行径。他们坚信自己正在完成让上帝高兴的神圣事业，相信对腐败之人当然要采取非人道的、毫无顾忌的残酷打击。

用宗教狂热一个词来做了断实在令人悲哀。欧洲史上可耻可憎的异端审判风潮始于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32年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它的设立并非由于把腓特烈定性成了异端，而是出于一个60岁老人害怕异端的被害妄想症。

不过，如果一味地这么想，历史将被染成清一色的悲观色彩，让人失去亲近历史的欲望。历史是人们言行的积累，其中有值得我们探寻的东西，人们通过接触历史也能得到拯救。

想出异端审判的是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而反抗这个潮流的腓特烈和威尼斯人也同样是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

公元2000年，从异端裁判所启动的1232年数起，已经过去了768年，时任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7]就长期以来基督教会所犯的几宗罪向全世界正式道歉，其中一项就是异端审判。

当初的效果

话题回到异端裁判所设立当初的1232年。腓特烈皇帝通过《梅尔菲宪章》光明正大地树立了政教分离的国家样板。对此，格列高利教皇想通过设立异端裁判所掌握牵制腓特烈的有效武器。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具备使用这件武器的环境。

如果以1232年为基准来看，尽管法兰西正在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但当时的国王路易九世[8]才17岁，尚处于母亲的摄政之下。

在英国，人称“失地王”的约翰死后，登上王位的亨利三世[9]虽已25岁，但由于“失地王”接受了《大宪章》，国王的权力下降。加上这位国王崇拜腓特烈，不会站在教皇一边。

这就是说，在当时欧洲强国的领袖中，没有一个君主拥有与37岁的腓特烈二世皇帝对抗的实力。不管62岁的教皇如何恼火，也没有一个君主能站在教皇一边向腓特烈举起战刀。腓特烈还是耶路撒冷王。对基督教徒来说，没有人比耶路撒冷王担负更大的义务去保卫圣城，他们又能以怎样的理由把他归为异端呢？

这样一来，就连教皇也不得不慎重行事。下面所说的故事就反映了这一时期格列高利的内心状态。

卢切拉作为萨拉森人（即伊斯兰教徒）的城市已经名声在外。多明我会修道僧接受了教皇的委托处理异端审判的实际事务。格列高利教皇要求腓特烈准许把他们派进卢切拉，卢切拉也是腓特烈领有的“西西里王国”的城市。

腓特烈以萨拉森人是异教徒而不可能成为异端为由拒绝了教皇的要求。

但就此退却将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于是格列高利教皇再次向腓特烈提出要求，说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僧的目的不是找出异端者，而是向伊斯兰教徒布教。腓特烈认为改信宗教是个人问题，自然答复既然如此那就好吧。

多明我会的僧人们作为布教者似乎也很有能力。据说，伊斯兰城市卢切拉的居民中有不少人就是在这时改信了基督教。其中有一个阿拉伯

年轻人改名乔万尼·莫洛，日后出了名。他是因为被腓特烈启用而成名。

不过，比这故事更重要的是，卢切拉后来仍旧是继续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拉森人和改信基督教的萨拉森人共同居住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以前只能听到清真寺塔尖上传来的宣礼声，现在也能听到教堂响起的钟声了。这意味着，腓特烈通过第六次十字军实现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耶路撒冷长期居住，这一实例也被复制在了卢切拉。

得知布教成功，格列高利教皇向腓特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说要派多明我会僧人去卢切拉调查，看改信基督教后继续居住在卢切拉的那些萨拉森人的信仰是否真实。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如何答复这一要求的，但我们知道他的确没有同意，因为同意这点就等于容忍异端审判。

腓特烈看似没有敌人，但他的敌人却从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这就是任何家庭都可能发生的父子矛盾问题。出身再优越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这样的悲哀。

儿子亨利

身为腓特烈的长子，当然可以行使世袭权登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也最容易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因为他是时任西西里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和第一位正妻阿拉贡王族女儿所生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子。他于1211年出生在巴勒莫的王宫里，与他嫡出王子的身份正相适应。他是腓特烈16岁时得到的第一继承人，腓特烈给他起了和早逝的父亲一样的名字，叫亨利七世。也就是说，从出世的那一瞬间起，命运就安排他做了腓特烈的继承人。

首先，1212年2月在他即将迎来自己1岁生日的时候，蹒跚学步的幼儿就在巴勒莫主教堂加冕成为西西里国王。当然，幼儿并不知道这是腓特烈的一个对策，因为罗马教皇讨厌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归于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3月，17岁的父亲便出发去了德意志，把1岁的儿子和他27岁的母亲留在了西西里。当年轻父亲在德意志为落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而饱尝艰辛时，幼小的儿子在慈祥母亲的保护下，在阳光明媚的南欧茁壮成长。

不过，这段时间只有4年。1216年，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典礼成为现实。这时，腓特烈把妻儿接到了德意志。腓特烈打算在罗马完成加冕典礼后正式着手重新构筑西西里王国，他没想加冕典礼之后再回德意志。为此，他需要拿出一套方法，使他所重构的德意志在他不在的时候也能照样发挥功能。他认为，让长子这位第一继承人当首脑，在德意志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社会是最自然、最现实的选择。

1216年7月，腓特烈把接妻儿来德意志的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妻子康斯坦丝反对儿子去德意志，腓特烈便派平素总是帮助康斯坦丝的贝拉尔德大主教和德意志人中难得一见的灵巧外交名家赫尔曼当说客，去说服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反对的理由是，她自己与腓特烈结婚之前嫁给过匈牙利王族，但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但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还失去了年幼的儿子，历经痛苦。尽管康斯坦丝教养并不卓越，个性也不强，但她凭女人的直觉，希望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远离卷入政治斗争的风险。她出生在西班牙，但却嫁到了匈牙利，吃尽苦头。也许她认为，德意志人也和匈牙利人一样，都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送到那种德意志人社会中，作为母亲她无法忍受。

但是，腓特烈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决定的人，一旦说出口很少会改变。贝拉尔德和赫尔曼两人太了解腓特烈了，他们

也许是这样说服康斯坦丝的：这是腓特烈的命令，只能照办；他这个人并不缺少感性，不会做出那种对孩子亨利不好的事情。结果，5岁的亨利当月月底就跟母亲康斯坦丝一起在巴勒莫大主教和条顿骑士团团长的陪伴下离开了西西里。

10月，他们一行先经海路，后经陆路抵达了纽伦堡，腓特烈正在那里等着他们。5岁的幼儿4年之后再次见到了两个月后就要年满22岁的父亲。自1岁那年分别之后，这也许应该算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等着这位5岁幼儿的是授予他的领地。父亲腓特烈当着应自己的邀请汇集到纽伦堡来的诸侯们的面，把施瓦本公爵领地授予了这个孩子。施瓦本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发祥地。任命亨利当这里的领主，意味着腓特烈把亨利作为“红胡子”、腓特烈一脉传承下来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介绍给了德意志的全体实力人物。

父亲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席不暇暖、东奔西忙的人。就算亨利以后待在德意志，父亲不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来到德意志后，他也是继续跟母亲一道生活。康斯坦丝似乎不喜欢德意志人，也不喜好社交，所以母子二人在哈格瑙城里过得很平静。

然而，这样的生活4年后被打断了。腓特烈见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的机会已经成熟，决定结束已经8年的德意志生活前去罗马。他还认为，接受罗马教皇亲手加冕的不光是他这个皇帝，妻子也应该作为皇后接受加冕。所以他命康斯坦丝也同往罗马。一向听从丈夫的康斯坦丝这时也随了腓特烈。不过这次要把刚满9岁的儿子一个人留在德意志，说不定这次离别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但是，腓特烈也为9岁儿子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1220年8月，腓特烈命令随他去罗马的军队在奥格斯堡集结，这里是德意志传统的军队集结地。汇集而来的不光是跟随皇帝南下的将士，

还有前来送行的各路诸侯。

25岁的腓特烈当着这些人的面，任命9岁的亨利当上了“德意志王”，正式告知世人，自己不在期间，德意志将由这位亨利七世统治。同时，他又任命科隆大主教担任小国王的监护人，承担辅佐9岁德意志王而实际上由自己统治的任务。

这个人事安排也是在当时德意志能够想到的最佳方案了。科隆大主教恩格尔伯特那年35岁。他出生于德意志名门贵族，同属一个阶级的诸侯们很难反对他。他还是一个修养很深的人，对反对派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身为神职人员却完全没有狂热之处。他6年前开始就与腓特烈过从甚密。腓特烈不会与狂热之人亲密相处，可以说恩格尔伯特大主教有着本真的平衡感。

此外，恩格尔伯特身居大主教之位，是仅次于教皇的神职人员，但却从不以权压人。一句话，他还是一个颇通人情之人。腓特烈把9岁的儿子托付给了这位35岁的大主教。

实际上，有这位大主教在身边相助的5年间，亨利从9岁到14岁这段时期的统治一直状态良好，没有让去意大利后再未回来的父亲操过一点点心。

母亲康斯坦丝在罗马和丈夫一起接受了加冕，两年后病逝于西西里。对只有11岁的亨利来说，母亲的去世不会不是一个打击。但在大主教的帮助下，他克服了母亲之死带来的心灵上的动摇。

然而，一些人对腓特烈重构的德意志社会心怀不满，他们暗杀了恩格尔伯特大主教。从那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大主教在从亨利居住的城堡回自己宅邸的途中，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而被杀害。失去了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人，14岁的亨利当然就像被扔进了从未体验过的孤独之中。而且很快他又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尽管婚事是已经定下的。

结婚对象是奥地利公爵的女儿玛格丽特。这婚姻是腓特烈安排的，当然是一场政治婚姻。腓特烈想把势力扩大到奥地利。新郎14岁，新娘21岁。有年龄差距的婚姻并不罕见，但这场婚姻从开始就冰冷彻骨。生孩子是义务，似乎夫妻对此都很配合。但生了两个儿子后，夫妻关系依旧冰冷彻骨。

我认为，14岁时经历的这场不幸婚姻，对亨利来说，是在构筑自信过程中的第一个障碍。有哪个男人在遭到女人的冷落后不会失去自信？而且亨利才14岁。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一个微妙的年龄，而亨利却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

这时，他完全可以敞开心扉，学习父亲，到处找情人，到处生孩子。但我想亨利继承的是慈祥呵护自己的母亲的性格，而不是父亲坚韧的性格。他没能这样重新开朗起来。结果他患上了女性恐惧症，进而发展成社交恐惧症。他只跟下层女人交往，只跟那些用甜言蜜语接近他的人见面。

也许，父亲在这个时候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但腓特烈身上的缺点阻碍了他把眼光投向亨利的这种需求。没有比腓特烈更特立独行的人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容易认为，我连更加恶劣的情况都挺过来了，你不可能不行。也就是说，他往往会要求别人也具有和自己相同的能力。

然而，人是不一样的，哪怕父母与孩子也是有差异的。有人能够克服逆境，但也有人是过不了这个坎的，甚至还有人会把自己逼入更差的境地。

从结婚的1225年到被父亲叫去训斥的1232年这7年间，父亲腓特烈度过了繁忙的岁月，的确没有时间关心身在德意志的儿子。

腓特烈要把西西里王国从封建社会改变为君主制国家，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

他率领十字军远征，却想只靠外交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是十字军远征史上的首次尝试。

他功成回国，却为改善与罗马教皇的关系花了一年时间。

被解除开除教籍处罚后，他立即通过《梅尔菲宪章》开始了西西里王国向法治国家的蜕变，建立了统制经济和货币制度。

这些都是腓特烈从30岁到37岁之间成就的事业。就在同一时期，亨利在年龄上处在从14岁到21岁这段时期，而他却生活在性格逐渐分裂的地狱之中。他的做法更加恶劣，他连续不断地颁布了违背父亲所定政策的法律。

《梅尔菲宪章》颁布后不久，德意志诸侯不满亨利统治的声音也传到了腓特烈耳朵里。这种声音越来越高，已经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颁布了《梅尔菲宪章》，腓特烈觉得完成了一项巨大工作，遂决定于第二年1232年的复活节，召集诸侯来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利亚，召开一次皇帝亲自参加的“巡会”，这样的会已经很久未开了。

1232年春天，腓特烈和亨利在久别12年之后父子重逢，但腓特烈对待儿子的态度谁看着都是严厉的。37岁的父亲原谅了21岁的儿子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原谅的条件是把各种事项逐条写下，命儿子今后忠实执行。腓特烈当着在座诸侯的面吩咐儿子，21岁的亨利在德意志实力人物的面前发誓一切遵从父命。

然而，告别父亲重回德意志的亨利看不出一点儿感到屈辱的样子。在别人的眼里，他的行为就好像和父亲重逢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再次回到意大利的父亲并没有注意到，从女性恐惧症发展为社交恐惧症的亨利，由于同父亲的重逢又进而发展为父亲恐惧症。

一个出众的父亲留给儿子的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是忠实地执行父亲的所有命令。

第二条是因为太想摆脱父亲的影响而走上反抗父亲的道路。

21岁的亨利选择了第二条路。

首先，他开始接近反对腓特烈统治的诸侯。德意志王亨利的这个行动自然提高了反腓特烈派的气焰。但亨利的反抗并没有只停留在德意志内部。他还去接近可说是父亲宿敌的、以米兰为中心结成的“伦巴第同盟”。接近父亲的这个宿敌的理由并不是站在父亲与伦巴第同盟中间努力改善关系。真实的理由是，如果参加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能封锁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即便是腓特烈也将无法轻易来到德意志。只是因为不想同父亲见面，亨利便与父亲的敌人联手。

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同盟”是意大利半岛西北部的自治城邦联合结成的同盟。虽然意大利东北部也同样位于意大利北部，但却处在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影响之下，所以很少有自治城邦参加伦巴第同盟。即便如此，在从意大利跨越阿尔卑斯山通往德意志的干线道路中，他们还是控制了从米兰和从维罗纳出发的两条路。

不过，处在伦巴第同盟下的意大利西北部，在法律上归神圣罗马帝国领有。但这些自治城邦拒绝腓特烈的统治，所以结成了伦巴第同盟。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论动机如何，亨利接近同盟都不仅仅是对父亲，而且还是对皇帝的背叛行为。在法律上，这可是相当于大逆之罪的行为。

3年前的1232年，当时腓特烈在意大利半岛最东北部的阿奎利亚召开了“巡会”，并以此为由叫来了儿子，把今后他该做的事情一条条写下来交给他，还让他发誓忠实执行，才让他再次回到德意志去。可是，这个阶段如今已然成为过去。1235年，根据《梅尔菲宪章》的国家重建已经扎实地向前推进，腓特烈决定亲自去一趟德意志。

但因为与皇帝的长子结盟而气焰高涨的伦巴第同盟自治城邦摆出了一副断然阻止皇帝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架势，走从维罗纳北上越过布伦纳山口进入德意志的这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干线道路已经无法保证安全。腓特烈只能先从海路到阿奎利亚，再从那里经陆路绕个大弯进入德意志。

腓特烈这时去德意志，带上了7岁的次子康拉德同行。不管是对正妻的儿子还是对情人的儿子，腓特烈都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培养方法。但自己的正式继承人却必须是嫡出之子，因为即便让基督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知晓，他们也不会承认庶出之子。亨利是正妻所生之子所以是嫡子，而康拉德是腓特烈与第二位妻子耶路撒冷王国公主所生之子，所以也是嫡子。带康拉德同行表示腓特烈已有了舍弃亨利之心。

即使如此，对一位40岁的父亲而言，24岁的长子从年龄上看是托付自己身后事的理想人选。而现在，他却不得不舍弃24岁的长子，以7岁的次子取而代之。无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可能不感到痛苦。

不过，虽说被迫绕了远路，但进入德意志后腓特烈受到了以诸侯为首的德意志人的热烈欢迎，我想这也许让他的心情变得爽朗起来。德意志人从上到下已经被亨利的朝令夕改弄得极度为难。他们认为，腓特烈严厉但却一以贯之的、有条不紊的统治很好。

7月，父亲的影子越来越近，亨利感到恐惧。他首先想到了逃跑。他请求把法兰西作为流亡地，但法兰西王甚至没有给他回音。亨利没有考虑逃往米兰。他没有勇气带领伦巴第同盟军冲锋陷阵，同父亲在战场上决一雌雄。

父亲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来到了这个儿子的身边。亨利5岁那年第一次来德意志时，就是他护送的。我们不知道他如何说服了如今已经24岁的这位当年的幼童。但不论他如何说服，留给亨利的路只有一

条：到父亲面前发自内心地乞求原谅。

两天后的7月4日，亨利被赫尔曼带到了腓特烈所在的沃尔姆斯城。40岁的腓特烈对24岁的儿子冷峻而严厉。如果只是儿子伏在父亲脚下乞求原谅，在座的诸侯们也许会予以同情。但是这个儿子的罪状太过明显。

父亲宣布了儿子的死罪，罪状是背叛了自己发誓效忠的人。当死罪一词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在座的人们震惊得面面相觑。腓特烈接着宣布亨利死罪可免，但要处以终身监禁。话音传来，又让那种像无形的空气一样的感情轻轻地飘落在地。事情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亨利被直接押进了沃尔姆斯城里的监狱。

后来不久，亨利又被送到了意大利南方，当然，并不是作为戴着镣铐的囚犯。只是这位年过25岁的亨利被完全隔离，不能见任何人，包括孩子们在内。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在意大利南方内陆的各个城寨之间换来换去。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6年，从一个城寨换到另一个城寨已成惯例。6年后的1242年，在去往另外城寨的途中发生事故。趁监视他的士兵走神，亨利连人带马从当时恰好通过悬崖的路上跃起飞向空中。那年他只有31岁。

得知消息后，父亲给主持葬礼的修道僧们寄去了一封不知道是指示还是属于私信的信件。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根据这封信我们知道，47岁的腓特烈指示，在靠近事故现场的科森扎主教堂为31岁时选择了自杀的儿子举行葬礼。他还指示，要让遗体穿上亨利曾经拥有的德意志王的正装，并命令用黄底缀有黑鹫的德意志王旗包裹入殓遗体的大理石棺。在信的最后，腓特烈写道，作为皇帝他只能这样处置，但作为父亲，他的心情自当别论。他要求葬礼要足以表达

一个父亲的悲哀。也许是为了满足腓特烈的这个愿望，在科森扎主教堂举行的亨利的葬礼是一场当地罕见的壮观葬礼。

756年后的1998年，比萨大学病理学系对亨利的遗体进行了检查。根据检查，亨利身高1米72左右，骨骼结实，体格健壮。他的左膝有重大缺陷，据认为，他生前一定是拖着左腿走路的。说不定这就是妻子冷淡他的原因，也是他患上社交恐惧症的原因。研究家们进而指出，更有确实可能性的是，亨利死前10年左右得过性病。也许，性病的发展所引起的精神不稳定也是让亨利进入20岁以后痛苦不堪的原因。

亨利的两个孩子因为这样的不幸事件而失去了父亲，腓特烈领养了他们，让他们在意大利成长。腓特烈不放心把他们继续放在那位对再婚兴趣强烈的母亲身边。

后世的学者们异口同声地严厉批评这位亨利七世，理由是他“缺乏继承腓特烈所必需的素质”。

事情完全如这些人所说。腓特烈的长子缺少父亲所具有的一切资质，更具决定性的是，他缺少那种可称得上坚韧的意志力。

不过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在起点上跌倒后便一跤接一跤地跌倒。并不是历史上所有著名人物都具有马基雅维利[10]所说的领袖所需要的所有资质——力量、运气和应对时代所要求的才能。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地位不高的日子过得安稳，要么觉得假如自己活在别的时代一定能发挥力量。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把力量（virtu）和运气（fortuna）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司掌命运的是女神，她心情易变。她会把好运惠及的人一转脸推到厄运的深渊里去。不管怎样，儿子所遭遇的不幸似乎也让父亲腓特烈对自己的过错有所反省。

腓特烈必须把替代亨利的次子康拉德留在德意志。在遴选辅助这位少年的人物时，腓特烈务求完美。

首先，他没有只停留在让那些各方面都能胜任的人紧紧团结在康拉德周围，他还对这些人课以义务，让他们忠实执行皇帝的政策。此外，他们还被赋予向皇帝详细报告的义务。这就是说，腓特烈建立了一个机制，不论走到哪里，父亲与儿子周围的人都能够保持密切联系。哪怕皇帝本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也仿若就站在阿尔卑斯山北面儿子的身后。

此外，腓特烈还与康拉德频繁地相互通信。我认为这才是他从亨利的不幸中学到的。他想让儿子感到父亲总是关心着自己。

10岁的儿子写来信说，自己喜欢鹰猎，但却不喜欢拉丁语课。43岁的父亲就写回信给他说，你可以喜欢鹰猎，但自如地说和写拉丁语也是君主不容欠缺的能力，不要说讨厌，好好学习吧。为了让儿子适应拉丁语，腓特烈开始用拉丁语给儿子写信了。

在给儿子的另一封信里，腓特烈说：

“皇帝和国王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人，并非因为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因为君主们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恰当应对的判断力。身居高位的权力也只不过是来自这种区别而已。”

每当我想起腓特烈也会和普通父亲一样去说教儿子就会哑然失笑，但他的这种关怀似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康拉德在德意志茁壮成长，既没有得女性恐惧症，也没有得社交恐惧症，更没有得父亲恐惧症。

腓特烈没有被不幸打垮，每当不幸袭来时他总会予以反击。

7月15日，他在沃尔姆斯城宣判亨利终身监禁仅仅11天后，还是在同一座城市，他举行了第三次婚礼。

新娘是英国国王的妹妹，21岁的伊莎贝拉。这场婚姻当然是不放心只有嫡子康拉德一人接班而做的准备，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一年之前，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和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结了婚。普罗旺斯伯爵是法兰西南部的最大领主，可以说是一号实力人物。所以这场婚姻意味着将法兰西南部置于羽翼之下的普罗旺斯伯爵与统治法兰西北部的法兰西王联手，意味着法兰西南北部之间长期相争的“阿尔比十字军”终于画上了句号，并且是以法兰西王把法兰西南部收入囊中的形式了结的。

这使人预测到今后法兰西王的力量将强大起来。为不放任法兰西王的强大，让英国从背后施加压力才会有效。可是，由于前国王约翰丢失了在法兰西境内的大半领土，又因为这位“失地王”签订了《大宪章》，现在英国的王权明显衰落。但英国与法兰西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多佛海峡，这足以让法兰西王感到英国的压力。

腓特烈决定和英国联手。这当然是一项想让法兰西老实一点儿的战略。

这位21岁的英国公主美丽活泼，教养深厚，很难让人联想到她竟然是失地王的女儿。跟哥哥狮心王相比，失地王可是遭人们鄙视的。腓特烈心知肚明，婚姻的目的就是政治和繁殖嫡子，但婚姻本身似乎也教会了腓特烈愉快地享受婚姻生活。当然，只有一位英国研究家如此推断。总之，40岁的腓特烈跟21岁的伊莎贝拉的婚姻生活持续了6年，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伊莎贝拉在27岁那年死于第三个孩子的难产。这昭示着生孩子对当时的女人来说也是一项冒险，甚至伴随着死亡。

而丈夫腓特烈，好像脑子里丝毫没有自己已是结婚之人的概念，总是日复一日地埋头于他的政治。历史上有不少男人丝毫不受女人的影响，腓特烈算是一个。

---

[1]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482/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史称查士丁尼大帝，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他先后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并与波斯进行了长期战争，重新控制了西罗马帝国从前的大部分土地。他下

令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等四部法典（总称《民法大全》），集罗马法律之大全，对后世西方各国法律有重大影响。

[2] 表中的官衔名称均为本书著者模仿日本的情况译出。内阁官房是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负责整理内阁会议材料，处理内阁事务和收集情报。内阁官房长官为国务大臣，统辖与内阁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助手。

[3] 日本江户时代以来对违反村规的村民实行的一种非官方制裁。全村人断绝与此村民的往来，只有葬礼和火灾除外。后面的“村十分”是本书著者的引申说法，意思是全体村民对此人连葬礼和火灾也不相助。

[4]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亦译“多米尼克派”。罗马天主教托钵修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1211年创立于法国图卢兹。在法国的该派修会以雅各比修会为根据，故又称“雅各比派”。该派注重布道活动，故又名“布道兄弟会”或“道明会”。1216年获得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该派传播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讨，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参与镇压阿尔比派。该会为女修道者设有“第二会”，为在俗教徒设有“第三会”。以口含火焰的犬像为徽章，会士披黑色披风，挂念珠，故又被称为“黑衣托钵教团”，会士被称为“黑衣修士”。

[5] 所罗门（Solomon），大卫之子，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第二位国王（约前973年—前933年在位）。在位时为王国最强盛时期，但因向人民征收重税，死后导致王国分裂。据载他曾于梦中得见耶和华，赐其富足、尊荣与长寿。据《列王记上》记载，两妇人因争子求所罗门评判。一个称她与对方同住一室，自己生男孩后3日对方亦生一男婴。对方睡觉时压死了孩子，便用死孩子调换了自己的活孩子。该妇人天亮后发现死孩子并非自己的，但对方却坚称活孩子是她自己的。所罗门命人拿刀来，声称要将活孩子劈为两半分给两人。一个妇人同意，另一个坚决不同意。所罗门便把活孩子判给不同意者，因为她宁可把孩子让给别人，也不愿他被杀死。这个传说表现了所罗门的高超智慧。

[6] 指拿破仑于1808年进攻西班牙，1813年底撤退为止的这段时间（半岛战争期间）。

[7] 若望-保禄二世教皇（Pope John Paul II，1920—2005），1978—2005年在位。波兰人，本名Karol Josef Wojtyla。1967年任枢机主教。1992年宣布为伽利略平反。1994年成立教廷社会科学研究院。主要著作有《人与行动》《爱与责任》等。

[8] 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又称圣路易，法国国王，1226—1270年在位。扩大领土，创设巴黎高等法院，强化中央集权。曾组织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后病死于远征途中。

[9] 亨利三世（Henry III，1207—1272），英国国王，1216—1272年在位。约翰（“失地王”）之子。1258年曾被迫接受大贵族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

[10]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政治学鼻祖。他出身于佛罗伦萨，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他以独立于宗教权威和个人道德的现实主义立场，揭示了政治权术的规律性。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

第六章
“腓特烈治下的和平”

腓特烈最强大的敌人贯其一生都是“时间”。

腓特烈放下了一切去追求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国家。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实现了这个目标，成为他所崇拜的先人。在他看来，只有奥古斯都才是成就了“罗马治下的和平”的人。腓特烈想通过实现“腓特烈治下的和平”成为中世纪的奥古斯都。

然而，和平却不像有良心的人们所梦想的那样。和平不是有关人等聚集一堂，敞开胸襟商量一下就能实现的。如果是那样，即使起了纷争也能立即解决，世界就将轻而易举地得到和平。可是，人类世界的现实却是解决不了的纷争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

那么在现实中，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过和平呢？

一言以蔽之，在“和平”之前完成“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换言之，一个人相对于所有其他人在军事上或别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和平才能实现。只有在经过平定这个阶段之后才能得到和平。

平定与和平的关系

以“罗马治下的和平”为例，那并不是奥古斯都一个人所成就的事业。的确，是他在罗马城中心建起了一座名为“和平祭坛”的神殿，被认为象征着罗马治下的和平。但在他登上舞台之前，恺撒已使用军事力量为他平定了天下。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自己的著作《高卢战记》中就曾写道：“高卢和平了。”这句话如果直译就只能这样翻译，但如果按照古罗马人的想法

意译，应该译为“平定这个和平的前提完成了”。在古罗马人的大脑中，“平定”与“和平”是极为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尤里乌斯·恺撒从39岁争霸高卢开始到56岁遭到暗杀为止的17年间，平定了罗马帝国的大半领土，囊括了欧洲、中近东和高卢北部。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从36岁打败竞争对手安东尼那年开始，到77岁去世那年为止，他花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亦即“确立了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

继承奥古斯都的是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1]。那么，提贝里乌斯从56岁登上帝位到79岁去世的23年间又做了些什么呢？

先说结论，他不仅把“罗马治下的和平”推及外国的敌人，而且还推及国内的敌人，即他建立了治安秩序。一个人可以自己关上自家的门，但他做不到白天黑夜都能在自家门外安全行走。向每个人提供这种安全保障是公共机构的义务。对提贝里乌斯而言，内部的敌人当然就是盗贼山匪。在提贝里乌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被处以活活喂给猛兽吞食这种极刑的一定是那些盗贼山匪的头目。

由于完成了这些内治，“罗马治下的和平”也臻于完成之境。居住在广袤罗马帝国里的人们，即使没有权势可以使用卫兵，也没有钱雇佣卫兵，他们也能在帝国各处放心旅行。“和平”不仅针对国外，国内也需确立。也就是说，只有外部的称霸而没有内部的治安，成就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也没有资格被称为“和平”。

“罗马治下的和平”是由能力和经验已臻老到的三个人前仆后继，连续三代接力，总共花费了80年的岁月才创造出的国际秩序。

正因为这样，后来即使有卡里古拉[2]和尼禄[3]那样不合格的统治者登上帝位，帝国也没有崩溃。到了百年之后的五贤帝时代，贤帝们所

要做的，说起来也不过是维护“罗马治下的和平”而已。维护帝国当然和维护道路桥梁不同，那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这一点千真万确。但他们没有必要改造国家体制，因为恺撒、奥古斯都、提贝里乌斯这三位“罗马帝国建国之父”已经把帝国所有的基础、建造和装修工作完成得扎实而坚不可摧了。

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平。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了强烈兴趣。但我们知道他的兴趣以明确的形式出台的年份，那年他25岁。

1220年，腓特烈在罗马由罗马教皇亲手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的眼里，只有经过在罗马举行的由教皇亲手加冕的典礼之后才算正式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5岁的腓特烈通过了这第一次考验。

其后腓特烈南下意大利，前往卡普亚，在那里颁布了《卡普亚宪章》。再后来，他于10年后的1230年开始起草，并于第二年颁布了《梅尔菲宪章》。这部《梅尔菲宪章》也被称为《奥古斯都宪章》（Liber Augustalis），与宪章中规定的新金币的名称“奥古斯塔”（Augustali）相呼应。《卡普亚宪章》与《梅尔菲宪章》的关系就好似试行版和决定版。也许定名为《奥古斯都宪章》正是因为它是决定版的缘故。不过，单凭这个名称，就已经显示出30岁刚出头的腓特烈的胆略。

我们了解腓特烈追求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和平，但他是否认识到平定作为前提的重要性呢？其实，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关心这一问题了。

他在14岁那年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根据教皇的提亲迅速完婚，率领新娘作为嫁妆带来的500名骑兵，开始平定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在此之前，由于腓特烈是孤儿，年纪尚幼，封建诸侯便借机为所欲为，西西里王国一直处在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之

中。现在腓特烈成人了，可以全面行使母亲一方的世袭权了，从而有了“平定”他们的名分。14岁的国王宣布今后不允许诸侯们我行我素，诸侯们也不得不服从。即使他们是封建社会中最具实力的成员，在社会地位上也还是国王的部下。

17岁那年，腓特烈去了德意志，花了8年时间“平定”了阿尔卑斯山北面。耗费时日的原因在于，与在西西里王国不同，腓特烈不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德意志行使世袭权。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皇帝，他的确距皇帝宝座最近。但在德意志，只要选帝侯不选你，你就当不上德意志王，而德意志王可以说就是待任皇帝。从14岁到25岁的这段时间，腓特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待在德意志，对由高级神职人员和世俗诸侯构成的封建社会进行调整。

腓特烈通过这种现实的政治方略，落实了德意志王和皇帝的宝座。“平定”德意志的目标就是罗马教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正因为如此，加冕典礼一结束，他便立即着手制定《卡普亚宪章》。在西西里王国，腓特烈最大限度利用了自己门第和地位的就是“平定”这件事。

腓特烈有着“罗马帝国建国之父”们所不必面对的障碍。

古罗马是多神教社会，没有哪一个宗教被定为国教，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专事宗教的固定的神职人员阶级。即使是宗教仪式也都由拥有其他职业的人轮流主持，只要用罗马人的正装托加袍的一端遮住头就能主持仪式。

相反，在中世纪，不论是东方的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一神教的世界，需要有人进行解释，这便产生了专职的神职人员阶级。这是一个被称为“祈祷的人”的阶级，天主教会就是这些“祈祷的人”的组织。运营教会的是教廷，罗马教皇君临在所有组织之上。这就是说，“祈祷的人”不光祈祷，还是一个有着强大权力的集团。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祈祷的人”的集团有权为自己以外的其他集团制定方针。这就是说，他们同意法律是人类社会的规则，但法律必须基于基督教会的方针。

罗马的皇帝们却认为，制定发挥人类社会功能的规则，只需要考虑居住其中的人们的需求。腓特烈生活在中世纪，他推行自己的思想必须游走于基督教会的思想缝隙之中。因为一旦触犯了教会法，也就是一旦被认为违反了教廷的方针，就会有被定为异端的危险。在中世纪，异端与被定为反体制性质是一样的。

腓特烈要建设一个模仿罗马的法治国家，还有一个考验挡在他的面前，即他无法采取宽容路线（clementia），而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得以长久存在的最大因素。

罗马人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犯罪。他们认为，战争结束达成媾和后，撕毁当时的誓言，举旗造反则是犯罪，因为那种行为违反了罗马人最重视的道德规范——信义（fides）。

一旦有人背叛，罗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予以镇压。那些把曾经达成的媾和当成废纸，起来反对罗马的民族，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彻底灭亡。正是由于背后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宽容路线才能发挥效果。

腓特烈一生没有拥有过绝对优势的强大军事力量。祖父“红胡子”皇帝能够召集10万兵力，而腓特烈所能用的兵力经常只有1万左右。

在封建社会拥有兵力的是这个社会里的“战斗的人”——封建诸侯。祖父腓特烈一世只满足于把这些封建诸侯归拢起来，所以能让他们提供兵力。但孙子腓特烈二世热情高涨，要把封建社会改革成法治国家，同时要把封建诸侯改变成法治国家的高级官僚。

腓特烈二世由于世袭领土的缘故，原本在意大利南方征召士兵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他却为此大费周章，最后不得不在德意志征兵。这不是因为他更加信任德意志士兵而不信任意大利士兵，而是因为在西西里王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进展得更加好。由于阿尔卑斯山北方的封建制度残留情况更严重，反而只要诸侯同意就能征到兵。

顺便说一句，在中世纪的1000年间，“宽容”这个词成了没有应用场合的被废弃的词。因为在那时，不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无人拥有足以压倒他人的军事力量。腓特烈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却想要实现“腓特烈治下的和平”。而他1236年决定进一步强力推进“腓特烈治下的和平”时已经41岁了。“时间”总在催着他。

“伦巴第同盟”

当年夏天，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法兰西王路易、英国国王亨利为首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全体实力人物都收到了来自腓特烈皇帝从德意志发来的将要开始平定伦巴第同盟加盟城邦的通牒。腓特烈不仅给其中的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发去了信件，甚至还专门派去特使解释理由，以取得谅解。

理由简单明了，腓特烈每次从意大利去德意志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都会受到伦巴第同盟加盟城邦的阻碍，这样的现状不能放任自流。既然意大利北方的这些城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之上，自己作为皇帝就有权让他们停止这一反抗行为。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都因本国国内的反抗分子而面临同样的烦恼，所以很容易取得他们的谅解，唯独教皇格列高利另有想法。

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属于罗马教皇的领土。对也是领主的教

皇而言，这片领土恰好被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西西里王国的领土南北夹击，而这正是教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都不想看到的情况。

然而现实恰恰就是，南面和北面都被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西西里国王的腓特烈控制着。腓特烈每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都要受到伦巴第同盟阻碍的现状，在教皇看来并没有丝毫不合适。教皇甚至希望这样的现状一直持续下去。

腓特烈当然知道罗马教皇的内心所想。他也派特使去了教皇那里，但给特使的任务并非像对法王和英王那样解释原因，取得谅解，而是要求教皇召集会议，以便不诉诸战斗也能解决他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对立。简而言之，他试图让潜在的敌人作为居间人登上舞台。格列高利认为这才是祈愿和平的教皇的作用，接受了腓特烈的请求。

虽然接受了请求，但教皇的本意并不是要和平解决。皇帝方面派出了特使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可伦巴第同盟方面的代表连影子也没有见到。教皇也没有催促他们尽快前来。外交解决的尝试就这样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腓特烈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次，他作为皇帝亲自在皮亚琴察召集会议，向伦巴第同盟的加盟城邦发出了召集令。同时，他亲率1 000骑兵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得知这一消息后，前来阻挡的人立即逃回了各自的城邦。没有一个城邦派代表参加皮亚琴察的会议。

历史上以“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之名而为人所知的这个同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目的而结成的呢？

又是哪些被称为“自治体”（commune）的自治城邦参加了这个同盟呢？

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与米兰一样，既是城邦国家，又位于意大利北部，但却没有参加这个同盟呢？

中世纪进入了后期，自治体成为这个时代意大利的一大特色。然而，自治体现象为什么没有发生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而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西北部呢？

那个时代，意大利出现的这些自治城邦，在领土大小方面根本无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相比，甚至也无法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合并而成的西西里王国相比。然而，如此狭小地域的城邦却能联合起来，敢于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力量从何而来呢？

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现在仍被称为伦巴第地区。伦巴第同盟是1167年在米兰的号召下成立的。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腓特烈一世，他在历史上以“巴巴罗萨”（Barbarossa，红胡子）而闻名。他要在法律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意大利北方确立皇帝的统治权，为此他挥师南下。伦巴第地区的这些城邦不想让他得逞，便结成了这个同盟。

一旦确立了皇帝的管辖权，负责行政、军事和司法的长官（podesta）将由皇帝派人担任，税制也将由皇帝决定。自治体的居民不喜欢这样。历史研究家中有不少人主张他们是为了追求自由。可是在当时，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力量限制现在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由，包括行动和言论的自由。

不过，想要自己决定司法、行政和经济政策的愿望，在现在看来是极自然不过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学家把意大利语的“commune”翻译为“自治城邦”。可是，“commune”的实质可没有这么简单和理想。前面讲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真实反映了“commune”的实际情况。自治城邦内部的势力斗争炽烈已极，胜利的一方排除失败的一方的手段，不是杀戮就是流放。胜利方会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人当长官，税制的决定也

会对自己有利。在炽烈争斗得不出结果时，他们就会从其他城邦招人来，担任代表自己城邦的“公家人”即长官。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多，米兰的长官就是由威尼斯市民担任的。

“要自由”的心愿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即使付出极为惨烈的内部斗争的牺牲的代价也要保住自治，这便是被称为“commune”的自治城邦的实际情况。

这样的“commune”自然会同皇帝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也就是试图压制的旧势力与反抗压制而奋起的新兴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因为如此，“commune”才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赋予了200年后迎来文艺复兴的中世纪后期以时代的特色。

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红胡子”皇帝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军事冲突历时10年都没打完。但他们并非在10年内不停地打仗，好像是皇帝南下便即刻再战，每隔几年就会打一仗。开始是皇帝占据优势，甚至有一次让米兰化为了灰烬。但是战况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开始朝着对伦巴第同盟有利的方向发展。到了1176年，“红胡子”皇帝在一场名为莱尼亚诺战役[4]的著名战役中大败亏输。

这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威尼斯跳了出来，拉上了内心并不希望皇帝胜利而支援自治城邦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5]，在威尼斯召开了一个媾和会议。罗马教皇、“红胡子”皇帝和伦巴第同盟代表在海洋之都威尼斯聚首。当时虽然只谈成休战6年，但6年后的1183年媾和也成功了。这场媾和被称为“康斯坦茨媾和”，因为皇帝在德意志的这座城市签下了媾和协议。在意大利，只要提到“红胡子”便无人不晓的这位有名皇帝的野心就此遭到挫折。

那么，“康斯坦茨媾和”有些什么内容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正式承认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尽

管这些城邦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皇帝承认各自治体内部的经济、行政、司法的自治权。皇帝还承认放弃各自治城邦的长官任命权，各自治城邦派驻他国的领事遴选权也归各自治城邦。

做为交换条件，自治城邦发誓恭顺在法律上拥有领有权的皇帝。由于长官和领事的任期都是1年，于是他们每年都要向皇帝宣誓效忠。另外，协议中明确记载，除宣誓效忠以外，这些自治城邦的公务执行者们在决定外交和对外战争等重要事项之前，须与皇帝协商。

此外，协议还规定，自治城邦须向皇帝一次性缴纳1.5万里拉的赔偿金，并每年缴纳2 000里拉的年贡金，似乎很像是房客向房主支付房租。皇帝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时，自治城邦还将承担其所需的全部费用。

“康斯坦茨媾和”是妥协的产物。皇帝保了名声，自治体得了实惠。然而，德意志人不会一直相信与意大利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即使是与意大利北方人之间的协议。这就是两个民族的历史。“红胡子”本身是一个德意志男人，是代表着“战斗的人”的皇帝。对手意大利男人是活跃的手工业者，在中世纪是被视为比“祈祷的人”或“战斗的人”低一等的“劳作的人”。“红胡子”绝不是被弄来与他们讲和后就会默默退场的人。他才58岁，身体强壮。7年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夺回的圣城耶路撒冷又被伊斯兰名将萨拉丁抢了回去，“红胡子”震怒，率领全欧洲奋起组成的第三次远征十字军奔赴东方，这比狮心王理查还要早。尽管“红胡子”进军到圣城附近因无聊事故而溺亡，但他同与萨拉丁铿锵血战的狮心王相比只强不弱。那些“自治体”还在为把皇帝拉到谈判桌上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红胡子”就已经想好了出其不意的策略。

西西里王国国王、诺曼王朝的威廉二世没有子嗣。这位因没有继承人而烦恼的国王有一位一直没有结婚的31岁的姑姑。而“红胡子”有一个20岁的继承人亨利。“红胡子”想出了让这两个人结婚的点子。这样，亨利就会在作为皇帝继承人的同时成为西西里国王，以后将由康斯坦丝和

亨利所生子嗣继承下去。说服工作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没有让身在罗马的教皇和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发现。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为没有继承人而烦恼的他看来，这使得在自己身后西西里王国的存续得到了保障。

1186年，《康斯坦茨条约》签字3年后，迟早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康斯坦丝，在米兰主教堂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在“红胡子”看来，米兰毕竟在法律上是本国领土，在那里举行婚礼可以向米兰夸耀权力。米兰市民尽管明白这一点，还是为皇帝的儿子举行了婚礼。费用全由米兰承担，新郎新娘一行逗留意大利期间所需的费用由伦巴第同盟承担。

这两个人迟迟不能生子，但丈夫依旧对康斯坦丝很温柔。这让康斯坦丝内心感到对不起丈夫。结婚8年后，她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腓特烈二世。

可是，红胡子的担心似乎还是成了现实。1190年，红胡子在奔赴东方途中溺亡。伦巴第同盟各城邦得到消息，马上把媾和协议当成了一张废纸。虽然亨利在红胡子死后继承了帝位，但他也在7年后英年早逝，享年32岁，留下了3岁的腓特烈。紧接着在第二年，腓特烈又失去了母亲，完全成了孤儿。这意味着对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而言，事实上没有皇帝的时代到来了。

他们当然不会继续遵守《康斯坦茨条约》，意大利北方又回到了“红胡子”决心南下之前的状态。既然敌人已不复存在，伦巴第同盟也就自然解散了。

然而，他们对皇帝本身的反感并未消失。同盟解散15年后的1212年，17岁的腓特烈首次出行德意志。他已经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但在这个时期他还不是德意志王，通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道路也远未确定。要从意大利南方去德意志只有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条路。17岁的腓

特烈只得带着仅有的几个随从，在热那亚弃船后斜贯意大利西北部，前去阿尔卑斯山的进山之路维罗纳。

一队米兰士兵追了过来，不让腓特烈一行去德意志。这时，腓特烈一行连人带马跳入河里，一路逃命。他们逃进了从“红胡子”时代起就一直是皇帝派的克雷莫纳城，好不容易躲过一劫。

虽然同盟处于解散状态，米兰仍是参加伦巴第同盟城邦的实际领袖。腓特烈才17岁，但既然他属于“红胡子”和亨利连续两代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他就是最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人。不论老幼，决不能让这个家族的任何男人自由往返于意大利和德意志之间。这个想法在米兰人胸中如烈火般燃烧不熄，同盟解散后也不曾消失。

到了1226年，伦巴第同盟在解散30年后再次结盟。这次的盟主还是米兰，目的同样还是反抗皇帝。6年前的1220年，腓特烈已经在由罗马教皇亲手加冕的仪式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为了反抗四十来岁的“红胡子”皇帝，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结成了伦巴第同盟。现在，他们又对只有一半年纪的新皇帝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腓特烈二世与祖父不同，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还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这就等于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处拥有领国。这些自治城邦所散在的意大利北方，正是意大利南方通往德意志的通道。仅仅出于地理上的原因，腓特烈也要比“红胡子”有更加充分的名分去平定意大利北方。

在历史上，为反抗“红胡子”而结成的同盟称为“第一次伦巴第同盟”，为反抗他的孙子腓特烈而结成的同盟称为“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结盟期为25年，这也有明确记载。难道中世纪的欧洲也有“人生五十年”这个概念吗？想来令人莞尔，好像他们在结盟时就已经估计到当年31岁的腓特烈只能活到五十来岁。

不论是当初没有确定结盟期的“第一次”，还是结盟期确定为25年的“第二次”，由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集合结成的伦巴第同盟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同盟的目的仅限于对皇帝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一样的。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背后总有罗马教皇。罗马教皇一贯憎恶力量强大起来的皇帝，他当然会这样做。伦巴第同盟与皇帝之间的对决因此成为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对决。虽然这时宗教还未走上台面，但在本质上，这种对决就是“教皇派”与“皇帝派”的对决。

“教皇派”与“皇帝派”

如果有南欧史这个学科，伦巴第同盟的历史是不容或缺的内容。但如果提问，要求列出参加这个同盟的自治体（自治城邦），却很难准确回答。我们可以列出始终坚定的同盟派城邦和始终坚定的皇帝派城邦，它们分别是米兰和克雷莫纳。这两个都是以手工业制造立国的城邦，相互之间是竞争对手。

除此以外的其他城邦都是先参加后脱离，过一阵又回来，因而给不出准确的答案，确定旗帜的颜色也要受到自治体内部抗争情况的左右。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根据的原始编年史即以这个时代为舞台。维罗纳是这部作品的舞台，也是伦巴第同盟的成员，其内部也分为两派。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当时自治城邦的情况。罗密欧所属的蒙太古家族与朱丽叶所属的凯普莱特家族是仇敌关系。蒙太古家族推崇皇帝派，而凯普莱特家族则是死心塌地的教皇派。

如果蒙太古家族在内部斗争中获胜，维罗纳就会脱离伦巴第同盟而成为皇帝派。相反，如果凯普莱特家族获胜，维罗纳就会继续留在同盟一边。面对皇帝坚决的进攻，这个自治城邦内部人心动摇，皇帝派取代了过去一直处于优势的教皇派而成为多数派。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也是参加伦巴第同盟的城邦和数量始终都在变化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参加以对抗腓特烈为目的而结成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中，有下列城市当初即表态参加。

它们自西向东是：都灵、维切利、洛迪、亚历山德里亚、皮亚琴察、米兰、克雷马、贝加莫、布雷西亚、曼托瓦、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靠近意大利中部的还有费拉拉和博洛尼亚。

参加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意大利北方城邦

这16个自治城邦于1226年3月响应米兰的号召派出代表，参加了第

二次伦巴第同盟。此外，意大利北部还有5个拥有相当实力的自治城邦，它们是热那亚、帕维亚、克雷莫纳、威尼斯和比萨。这5个城邦并非都站在皇帝一边。可以说，公开的皇帝派只有克雷莫纳，其他4个城邦只是没有派代表去而已。

这样，腓特烈经常辛苦地往返于意大利和德意志之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横亘在腓特烈面前的不仅是阿尔卑斯山，在阿尔卑斯山南面，还有伦巴第同盟的全线阻挡。

意大利北方全境可分成西部的伦巴第地区和东部的威尼托地区两部分。伦巴第地区的中心城邦是米兰，威尼托地区实力最强的城邦是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始终与伦巴第同盟保持着距离，还利用中立的立场成了康斯坦茨媾和的中间人。威尼斯也是打着自治旗号的城邦国家，也位于意大利北方，与其他自治城邦有着相同的条件，但为什么只有威尼斯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呢？

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人并没有像意大利北方其他城邦那样借某个地方领主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城邦。威尼斯这座城市，是古代末期在以前根本没人想居住的海上，把各处露出海面的陆地一块块连接起来建成的。进入中世纪后，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查理大帝的儿子丕平[6]想把威尼斯据为己有，在9世纪进攻过威尼斯。威尼斯成功击退了他的进攻。威尼斯从来都没有被纳入过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和他的孙子腓特烈都没有把威尼斯与其他自治城邦等同视之，一直把它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独立国家对待。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的第一个原因。威尼斯没有被皇帝干预的风险，也就没有反抗皇帝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出自威尼斯人独特的对国家乃至居民共同体的观点。与能够使用陆路的其他城邦不同，海洋之都威尼斯的“脚”就是“船”。如果船的内部发生争斗，船不但无法前进，搞不好还会沉没。关于威尼斯如何小心翼翼地努力建设没有内部争斗的社会，我只能请各位阅读《海都物语》这本书了。人们把威尼斯同具有卓越能力做到举国一致的古罗马做了比较，而把威尼斯称作“中世纪的罗马”。

在海上，船长和船员们的意见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的。但只要船长和船员们把继续航行放在第一位，他们就有可能相互接近。威尼斯共和国靠着这个观点一路走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会发生在维罗纳和米兰，但却无法发生在威尼斯，因为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民之间形成敌对关系，无论他们属于上层，还是属于下层。

对如此思维的威尼斯人而言，同在意大利北方的其他自治城邦的内斗怕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也许他们在内心也鄙视这样的内斗。在内斗中消耗的能量也是能量，这样的消耗就是浪费。在中世纪屈指可数的经济动物威尼斯人看来，这种争斗不过是充满孩子气的相互赌气，产生不了任何经济利益。

虽说如此，威尼斯还是一边同皇帝和同盟都拉开距离，一边留心保持不疏远的关系。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不管是皇帝派还是教皇派，他们都是买家，同时又都是卖家。“康斯坦茨媾和”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成功的很好的案例。因为威尼斯不仅提供了媾和会议的场所，而且这种体现了威尼斯精神的氛围始终主导着聚红胡子皇帝、伦巴第同盟代表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一堂的媾和会议。

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威尼斯共和国为什么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但还留下了一个问题。在同样认为“船”就是“脚”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还有威尼斯的竞争对手热那亚。热那亚起初站在皇帝一边，后来又站到了同盟一边。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绝对不允许船内争斗的生存方式已经刻进了威尼斯人的DNA中，但在热那亚却没有得到那么彻底的贯彻。200年后的热那亚不但出了哥伦布，其男儿的驾船能力在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也是出类拔萃的。但热那亚却内斗不已，四大实力家族分成多里亚和斯皮诺拉的一派，与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的一派，这两派之间你争我夺。

在内斗中，如果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获胜，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被流放。然而，被流放一方的势力与获胜方的势力在伯仲之间，他们当然会策划夺回政权。只是在热那亚人那里，“策划”成了这样的做法：把与祖国近在咫尺的摩纳哥作为基地，将热那亚船也视为敌人，见船便袭，抢夺货物，把船员卖作奴隶。而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一旦夺回了政权，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也会被立即流放国外。他们也同样用和仇敌一样的做法攻击本国人的船只。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的历史就是这种反复的历史。所以，热那亚同皇帝的关系与其说取决于是否赞成腓特烈的方针，不如说取决于两派中谁在热那亚国内夺取了政权。顺便一说，多里亚家族对皇帝抱有亲近感，但菲耶斯科家族有很多人对皇帝心怀反感。这就是热那亚。在威尼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却在热那亚发生了。这方面的情况，只要看看威尔第[7]的歌剧《西蒙·波卡涅拉》就能明白。

可见，即使都是位于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其内部实质也是形形色色的。

无论是用好了，还是浪费了，这些城邦的确充满了能量。这种城邦如此充满能量的现象为什么出现在意大利北方，而没有在意大利南方和中部出现呢？难道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人是勤劳之人，而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人都是懒汉吗？

在13世纪的这个时代，这与是勤快人还是懒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否发挥了国家功能而已。

首先，意大利中西部是教会领土，不论是善政还是恶政，都处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

再说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自从古罗马帝国灭亡后，这里就成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进攻拜占庭并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统治持续了200年。从北方法兰西涌来的诺曼人又征服了这些阿拉伯人，成为统治者。这些人建立的诺曼王朝也持续了200年左右，直到腓特烈的母亲身后。阿拉伯人和诺曼人都没有靠驱逐或杀戮被征服者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征服者通过同化被征服者的形式成功地建立了统治权，所以都持续了200年之久。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即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南方在历史上没有经过权力的真空时代便进入了中世纪的后期。

另一方面，意大利北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长期由入侵的蛮族统治。由于没有一个蛮族具有足够的力量在意大利北方全境建立统治权，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自治城邦便产生于这样的权力真空状态之中。如果长期无人决定税收的缴纳数量，人们就会想要由自己决定缴纳数量。他们成为“劳作的人”，也是在这之后产生的结果。当初，一帮认为既然没有人做决定那便自己决定的人聚在一起，所谓“commune”的自治城邦便雨后春笋般的在意大利北方诞生了。

“commune”这个意大利语词汇本身意为“共生”。古代没有这个词语，是中世纪的创造。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纯属中世纪才有，是在发挥“国家”（Res publica）功能时所不可或缺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下产生的“居民共同体”（Res publica）。

尽管在同一个时代，地理上也很接近，法兰西就没有出现这种“居

民共同体”。这个时代的法兰西是封建社会，有封建诸侯和统治他们的国王，且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还算稳定。法兰西不存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产生不了自治城邦。

可是，这些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统治的地方只有巴掌点儿大，为什么与其他同类城邦结成同盟后就有力量反抗拥有广袤领土的皇帝呢？

经过了1000年以后，中世纪进入了后期，人口也有所增长。也许是因了气候变暖的缘故，也许是由于农耕技术提高的原因，这里面说法颇多，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死亡。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自公元1095年开始，十字军从欧洲大举入侵中近东。我甚至认为，如果欧洲人口没有增加，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十字军运动后来又持续了200年。

然而，人口不断增加，光靠农业已经不能吸纳了。十字军中的很多人也因为满足朝圣心愿后返回欧洲，产生了同样的问题。那么，让他们去哪里呢？这可不能靠权宜之计，而是要找到能长期容纳他们的地方。

自治城邦的力量

现在，北非伊斯兰世界已经分为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当时，与北非隔地中海相望的是一些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在我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收集的资料中，有书籍研究当时基督教世界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同北非伊斯兰世界之间进口什么、出口什么。

据书上说，北非国家向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出口的是穿过撒哈拉沙漠运过来的黄金和非洲产的大理石等天然资源。而装在意大利海洋城邦

国家船上向北非出口的却是工业制品，尽管那是手工业水平的。也就是说，北非出口原材料，进口加工制成品。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主题是写罗马治下的和平崩溃后地中海的主人公海盗、海军和贸易商人。所以，如果弄清楚北非出口的是天然资源，就能最终得出由于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不能就业的人就只能继续做海盗的结论。如果把同样的考察扩大到意大利，就会关系到本书的主题。

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出口的都不是自己国家制造的东西。只有威尼斯不久以后变身为制造业国家。但在13世纪，威尼斯也和其他海洋城邦国家一样，是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都是从邻近的自治城邦买进产品，把它们运到中近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卖掉，再用赚到的钱购买香料等东方物产运到欧洲销售。这就是贸易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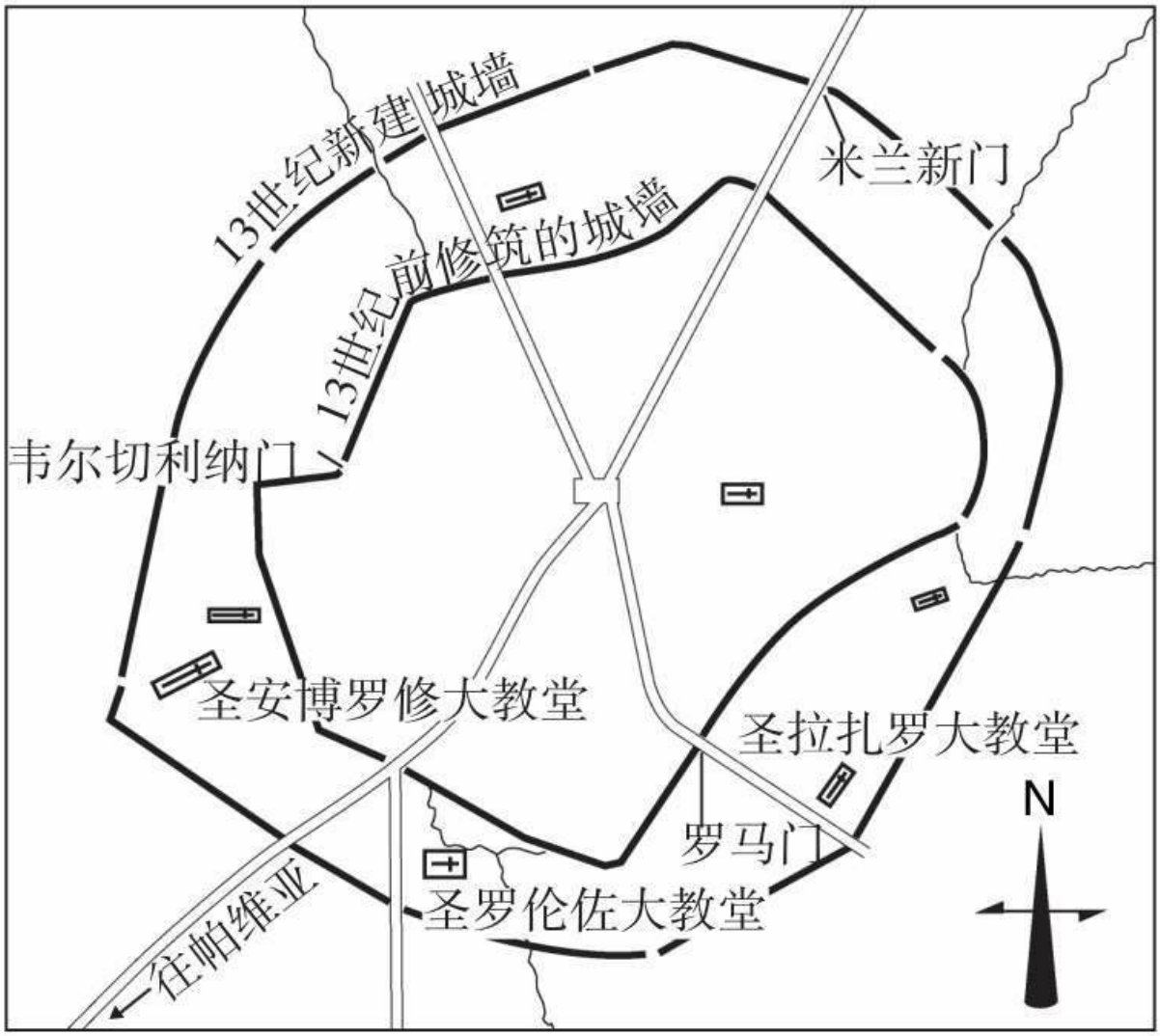
因而，在这个时代这些意大利城邦还不能直接依靠制造过程吸纳人口。不过，通过购买克雷莫纳、米兰和佛罗伦萨等这些把能量集中于手工业的地区的产品，它们为这些城邦吸纳人口作出了贡献。

此外，在别的方面也不能说它们没有贡献。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船从船长到划桨手靠的是薪水有保证的人，而伊斯兰教徒的海盗船则总是用绑架来当奴隶的基督教徒来充任所需人数最多的划桨手。仅此一点就表明，到了中世纪后期的这个时代，与其说在伊斯兰世界，不如说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在意大利北方，正逐步形成一个社会，能够吸纳因不再容易死亡而不断增加的人口。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当时反抗“红胡子”皇帝的第一次伦巴第同盟的力量来源，但解释不了腓特烈所面临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力量来源。第二次同盟结盟于1226年，那一时期重叠发生了两件事，使得同盟方尤其是领袖米兰强大了起来。

第一件事是大量难民从法兰西南部移民到了意大利北方，这些人都是本身拥有生产技能的中产阶级。

1208年，由时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倡导的“阿尔比十字军”终于接近尾声。这是一场以异端基督教徒而非异教徒为对象的战争，而最终演变成为法兰西南部与北部之间的争斗。1234年，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与法兰西南部最大的实力人物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迎来了“阿尔比十字军”的终结。这场婚姻表明，这次争斗是以法兰西北部吞并南部的形式结束的。于是，不愿意被吞并的法兰西南方人便大量流向了意大利北方。



米兰市区图

这个时期的米兰坚固了防守市区的城墙，足以防守两倍于市区的地域。单靠自然增长，人口不可能如此急剧地增加。通观整个中世纪时代，意大利南方与北方相比，北方与法兰西南部的距离更近，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着共同之处。意大利西北部成为法兰西南方人的避难地也是自然趋势。

从法兰西南部涌入到意大利北方的难民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使得米兰及意大利西北部自治城邦的人口激增。难民如果不能为收容他们的地

方所用，就是那里的累赘，甚至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当时意大利西北部的自治城邦都有用好难民的体制。这些自治城邦都是制造立国的国家，可以为难民提供职业。这样难民便可以定居。这就是使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强大起来的最主要原因。

这个时代巴黎是欧洲的最大城市。法兰西的国王们把巴黎作为定居之地，巴黎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古罗马是一个人口近200万的城市，但中世纪已经没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最多的就是拥有12万人口的巴黎。仅次于巴黎的就是要同腓特烈决一雌雄的米兰。米兰那时的人口是8万到9万人。威尼斯的人口在7万左右。热那亚的人口是威尼斯的一半。新兴意志高涨的佛罗伦萨人口不超过6万，而基督教的大本营罗马才只有3万人口。古代号称“世界首都”的罗马现在人口已经少到只要修复11条古代水渠中的1条就足够用的程度。

在这个时代，拥有超过8万的人口，而且这些人都是可以从事生产的中产阶级，有着很高的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富裕。人还有另外一面，他们热爱保障自己安居乐业的国家。如果有人来进犯，他们具有哪怕拿起生疏的武器也要保卫国家的勇敢气概。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西北部自治城邦扩大了城墙范围，有这种思想的人在里面集中住下。他们都将成为腓特烈的敌人。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使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力量强大起来的第二个原因不能不说是宗教。在这方面，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罪魁祸首”。这位修道僧生于1182年，死于1226年，即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结盟的当年。在他生前，就有很多人同他的说教有共鸣，这些人广泛渗透在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的居民之中。

我把生于阿西西并创立了圣方济各会的这个人当作文艺复兴的第一棒看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宗教家开展的那些活动。的确，他的说教在当时的基督教中具有革命性。是他，力劝以清贫的高贵抵抗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的奢华糜烂。是他，力陈基督教的上帝并非以前所说的那样会给人以严厉的惩罚，而是慈祥而饱含着爱。麻风病虽然难以治愈，但在古代也只认为是一种病。可是到了中世纪，麻风病被当作了遭到上帝诅咒的证据，麻风病患者也被当成了被上帝诅咒的人。还是他，改变了这些人的遭遇。这些可怜的人被赶出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去生活，还被要求必须在走路时摇铃以提醒别人远离他们。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认为这些人是被上帝诅咒之人，对此情况弃置不管是理所当然。

圣方济各和与他有共鸣的年轻人最先做的是自己亲手为这些人清洗身体，整理好城外的洞穴让他们安眠，并不断向他们提供食物。

单凭这些对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圣方济各的思想就已经超越了他所生活的中世纪这个时代。但是，宗教学家从来都不会去说阿西西出生的这位意大利年轻人所成就的更具革命性的事业。

这就是把意大利语称之为“terza ordine”的“第三阶级”组织起来。

我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中世纪社会分成三类人：“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劳作的人”要向“祈祷的人”缴纳什一税，向“战斗的人”缴纳由他们定下金额的税。缴纳这些税，是为了请“祈祷的人”为自己祈祷活着和死后的内心平安，请“战斗的人”保障自己活着时的人身安全。但钱的流向总是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顺序相反。“劳作的人”的社会地位只能排在“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之后，是第三阶级。

圣方济各是作为商人的儿子成长起来的。父亲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阿西西的实力人物，但他仍然是一个“劳作的人”。圣方济各也并不是一个鼓吹彻底废除中世纪已有的“祈祷的人”阶级和“战斗的人”阶级的革命家。他或许也赞成耶稣基督“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的教

诲所体现的现实主义。

这位圣方济各实行的所谓“革命”，是从“劳作的人”身上扫除他们以前所具有的劣等意识。他说：

“我选择了成为一名修道僧的道路。我将为救济那些不幸的人们献出自己的一生。赞同我的同志们也将度过同样的人生。

“但是，只做一名修道僧，社会将无以为继。我们的慈善事业也需要金钱。所以，同意我的思想但对当一名修道僧有抵触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继续他的世俗生活。

“把这些人叫作‘第三阶级’吧。这也可以意味着一种组织，把那些念念不忘世间还有贫穷和不幸的人，以及为了救济这些人而不惜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平时则专心从事追求利润的工商业的人组织起来。如果他们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捐赠给修道会，就完成了信徒的义务。如果他们有时间，还可以到附近的修道院，和修道僧共同生活一个星期，那他们作为‘第三阶级’的一员便无可指责。”

圣方济各的这个教诲瞬间传遍整个意大利北方和中部的自治城邦，这是历史研究家们所一致公认的。被告知可以不用顾虑地专心赚钱了，意大利“劳作的人”不仅放下了一颗心，一定还增添了勇气。我甚至想说，资本主义始于13世纪的圣方济各，而不用等到马克斯·韦伯[8]所说的16世纪的新教运动。

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

腓特烈比圣方济各小12岁，他们是同时代人。腓特烈还制定了《梅尔菲宪章》，他把神职人员、封建诸侯和市民代表都召进了自己国家西西里王国的地方议会，他也意识到了“劳作的人”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把“劳作的人”的共同体自治城邦当成敌人的时候，他完全理解了其中

的困难吗？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圣方济各和腓特烈都是200年后开出绚烂花朵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两个人都没有囿于传统观念，在开明方面也很相似。但他们也有不同。不同的原因应该在于，圣方济各生为商人之子，而腓特烈则生为皇帝之子。用现在的话说，圣方济各继承的是商人的DNA，而腓特烈继承的是皇帝的DNA。

然而，在他们生活的13世纪的意大利，不断抬头的新兴势力不是“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而是“劳作的人”。这些人在百年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前期被称为“市民”。

照这样考察下去，我们还得碰到另一个问题。在不合理就不能成功的经济世界里，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不断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为什么能够与不合理甚至是最大旧势力的罗马教皇结成统一战线呢？为什么他们会与身为旧势力但却合理开明的腓特烈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呢？

意大利西北部总称为“伦巴第”（Lombardi），居住在那里的人完全不是信仰不深的基督教徒。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为自己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拥有更纯粹的信仰而自负。在第一次十字军把圣城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后不久，他们便于1101年把全由自己组成的十字军派去了东方。尽管远征惨遭败绩，但对意大利北方人来说，单凭随十字军参战这一点就值得自豪。朱塞佩·威尔第创作了一部歌剧，名字就叫《伦巴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中》（*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9]。

这件事表明，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充满了新兴精神，但在宗教方面却完全沉浸在传统观念中，甚至没有一点儿怀疑。这些人没有摆脱异教徒穆斯林即是敌人的观念。

同住意大利北方，同为自治城邦的居民，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就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即使与同盟有关系，也始终如温吞水般。我想，

原因就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是靠和伊斯兰世界做贸易而生存的，而内陆的米兰等自治城邦不以贸易立国，与异教徒接触的需求很少。即使自己制造的产品买家是伊斯兰教徒，实际销售产品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同为基督教徒的海洋城邦国家。

这些伦巴第人深深地为圣方济各的教诲所折服。圣方济各跟随第五次十字军出征了，但他没有上战场，而是毫不设防地拜访了敌人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并向他说教道，只要苏丹改信基督教，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就能实现和平。这次和平外交失败了。单单规劝伊斯兰教徒改信，在他们的世界里便会被定为死罪，当场被杀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阿尔-卡米勒却笑着赦免了圣方济各，这位在中世纪最受爱戴的圣人才没有死于东方。但失败终究是失败，圣方济各比谁都懂得这一点。阿西西的圣人后来再也没有第二次尝试赤手空拳的外交了。

相反，伦巴第人所憎恨的腓特烈即使搞以和平为目的的外交，也并非毫无防备。他虽然率领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近东，但挟军力却只期望单靠外交解决问题。当然，他没有做劝伊斯兰教徒的苏丹改信基督教的事。也许是尊重对手所信仰的宗教产生了效果，腓特烈使阿尔-卡米勒让出了基督教徒悲切祈愿的耶路撒冷。

然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却反对通过与异教徒交涉达到目的的做法。这位教皇竟然号召趁腓特烈去东方不在的机会进攻他的领国意大利南方。响应号召的是参加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只是由于腓特烈在他们南下之前回到了国内，1230年那年才没有发生腓特烈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战斗。

这个事件表明，神职人员和经济人之间看似不可能共同作战，但如果经济人是伦巴第人则有可能如此。十字军远征的最后目的，在于夺回对基督教徒而言至高无上的圣地耶路撒冷。但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能容忍通过与异教徒对话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罗马教皇和伦巴第人的想法一致。合理的人也未必会在所有领域都能合理地思维。

第一次伦巴第战役

1236年8月，已经41岁的腓特烈带着1　000名骑兵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说是1　000名骑兵，如果加上辅助的步兵和马夫，人数则会超过3 000人。但主要战斗力终归还是这1 000人。腓特烈正在筹备15 000人的兵力，准备以伦巴第同盟为对手战斗一场。但这个时期，他手上只有这1 000名骑兵。

然而从头到脚穿着钢铁铠甲的1　000名骑兵，也会给人以类似现在面对100辆坦克时的威慑感，对硬挺着不让腓特烈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同盟军产生了效果，使他们逃回了各自的老家。见到这1　000名骑兵，维罗纳当即投到了皇帝一方。

不过，在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伦巴第问题以后，腓特烈仍然没有关闭外交解决的大门。尽管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本意并不想让皇帝获胜，但腓特烈还是打算继续坚持军事和外交两面作战。腓特烈以请求教皇做他与同盟方中间人的名目，把在幕后操纵的格列高利拉到了前台。

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人给腓特烈起了“鹰”的外号，而罗马的老百姓给格列高利起的外号却是“猫头鹰”。

“鹰”是比喻，意思是脑子好使，好动，欲望大。“猫头鹰”也是比喻，但意思却是眼睛只盯着别人坏的一面，跟人交往总说人坏话，是冷漠阴险的坏人。绰号本身就是老百姓的评判。

同“猫头鹰”谈判，腓特烈也只能派出手中最好的王牌去做主要谈判者。首席代表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以前的情况已经表明，这位德意志人作为外交官，应该说作为腓特烈的外交大臣是相当有能力的。他是三大宗教骑士团之一条顿骑士团的团长，明面上是教皇一边的人。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以及条顿骑士团和其他很多非骑士集团的修道院

一样，都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也就是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的直接上司不是腓特烈，而是教皇格列高利。

且不说有多么信任，起用这种地位的人当主要谈判者，原因在于腓特烈外交的主力不得不以罗马教皇为对手。如果对手是伊斯兰教徒的苏丹，腓特烈自己就能搞定。但是，以罗马教皇为对手的外交，原本就该起用教皇一边的人。

派到罗马给这位赫尔曼做副手的是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和塔德奥·达·塞萨两人。他们都出生于意大利南方，与腓特烈是同时代人。他们二人是腓特烈所用的人才，不是教皇一边的人。这三人抱团全力以赴，但“猫头鹰”依旧是一个强硬的对手。

关于消解与伦巴第同盟对决的条件，腓特烈方面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即参加同盟的自治城邦要承认皇帝的统治权。表面上看，这似乎只限于任命行政长官，在政治方面进行统治。但实质上，统治还包括了经济政策的施行。总之，这个条件就是接受皇帝任命的行政长官，按皇帝确定的税率缴纳税金。而这是伦巴第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政党“北方联盟”的象征徽标

顺便一说。现在意大利有一个政党叫“北方联盟”（Lega

Nord）[10]。这个政党的象征徽标是一个自治城邦的士兵向皇帝军挥剑的姿势，让人联想起800年前的伦巴第同盟。威尼斯共和国早已成为过去，但威尼斯现在仍然高举以意大利北方全境为地盘的“北方联盟”的大旗，第一要求地方分权，第二要求在意大利北方所征之税不交中央政府，而应该仅用于意大利北方。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强硬坚持这个主张，却仍然能够获得意大利北方居民的选票，这也是事实。历史不会原样重演，但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感情却会重复。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首长的任命权和经济政策的自决权是地方分权主义的要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腓特烈是800年前的古人，他想在意大利北方建立正在意大利南方顺利推进的君主治下的中央集权国家。我们不能要求腓特烈能与生活在800年后的我们对地方分权有同样的认识。一句话，腓特烈的脑子里装不下伦巴第同盟所要求的地方分权的那些东西。他认为，《康斯坦茨条约》让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获得了地方分权，但那是祖父“红胡子”皇帝在莱尼亚诺战役中打了败仗后不得已而承认的协议。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的脑子里也装不进什么地方分权，在这一点上他和皇帝一样。说真的，对教皇而言，同盟要求的地方分权之类的东西并无所谓。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不能消除自治城邦同皇帝之间的对立状态，这种状态今后也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消除了对立，意大利中部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领土就会受到把意大利南北方都置于统治之下的皇帝的夹击。如果对立不能消除而持续下去，意大利南方和德意志之间的往来便很不容易，这会导致腓特烈因以前巧妙的政治外交而不断上升的“力量”大幅度减弱。

这就是皇帝与教皇之间的交涉一贯流产的真实原因。既然这样，打出最好的王牌去当主谈，却始终没有结果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腓特烈终于把舵扳向了行使军事力量的方向上。在翻越阿尔卑斯山

进入意大利后，他立即进入维罗纳城，但并未久留。他定下了明确的目标，要一个个地征服参加了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腓特烈离开维罗纳之后向曼托瓦进军。事先召集的士兵开始从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追赶他。

腓特烈不光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意大利北方，他还把视线投向了罗马。他本质上不是武夫，而是政治家。如果可能，他总是选择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这是研究他的大部分专业学者的意见。

10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军事示威后，腓特烈来到了克雷莫纳。克雷莫纳虽然是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却一贯忠于皇帝。腓特烈打算在这里落脚，等候正在罗马进行的外交战的成果。

尽管外交是不动用军事的战斗，但也有缺点，即只有对手与自己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时候才会成功。腓特烈与伊斯兰教徒的苏丹做到了共有同样的价值观，但与基督教徒的教皇却很难达成共识。所以，负责谈判的三个人所取得的成果，只是撕掉了满嘴谎言的教皇的假面具，让教皇格列高利吐出了真实想法。“猫头鹰”最后说，既然那么想解决伦巴第同盟的问题，就请皇帝亲自来罗马，匍匐在教皇的脚下乞求吧。

腓特烈通过赫尔曼的汇报得知了此事。10月30日，他率领骑兵离开了克雷莫纳。埃泽里诺·达·罗马诺[11]在等着皇帝。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成了腓特烈的副将。他和腓特烈是同龄人，还是一位武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罗马教会的憎恶，放言打仗不能心慈手软。

10月31日，腓特烈率军一口气奔袭了120公里，同埃泽里诺会合。41岁的腓特烈只是在简单用餐时才下了一次马。他们又奔袭了30公里，来到了维琴察城下。

皇帝的到来完全出乎维琴察居民的预料，他们没有时间来准备防御。11月1日，进攻开始，维琴察甚至没有时间去关闭所有的城门，当

天便打出了白旗。

皇帝军进了城，并没有在对方投降后结束行动。他们忠实执行了腓特烈的命令，放火、破坏，骑马驱散四处逃窜的人们，对抵抗的市民格杀勿论。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之一维琴察遭到了彻底破坏，对其他自治城邦以儆效尤。

腓特烈把统治刚刚被征服的维琴察的事宜托付给了埃泽里诺。他走在维琴察主教宅邸的走廊上，拔出身上佩戴的匕首，一边砍着支棱在走廊树篱外的树枝，一边说道，统治用武力征服的城市只能这样做。对听他说话的埃泽里诺来说，大概不需要这样的忠告。埃泽里诺·达·罗马诺这个人，在后来但丁的《神曲》中是要被贬下地狱的，他不光会砍掉支棱出来的枝叶，还会把树连根拔起，人们都害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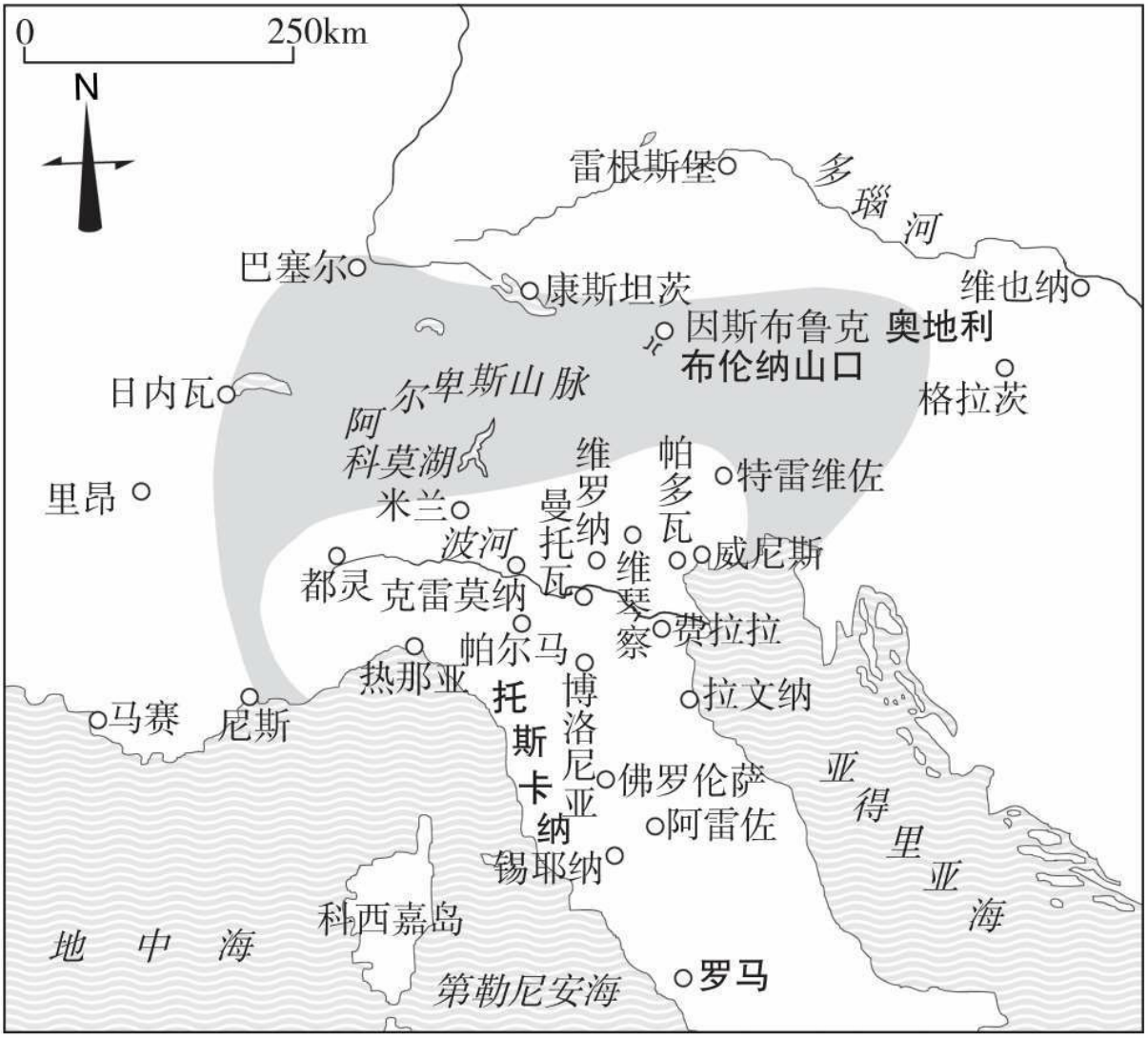
维琴察的惨事产生了效果。维琴察的惨状立即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接二连三地在皇帝面前打开了城门。特雷维索、帕多瓦、曼托瓦，还有皇帝军刚走就有动向要回到同盟一边的维罗纳，以及费拉拉的实力领主埃斯特家族，纷纷向腓特烈派来使节，宣誓恭顺皇帝。

意大利北方的东半部分，以及除威尼斯共和国以外的意大利东北部全境都在腓特烈的面前屈服了。10年前结成第二次伦巴第同盟时有16个自治城邦加入，其中的近一半赶紧脱离了同盟。伦巴第同盟名副其实地成了只有意大利北方西半部分加盟的同盟。这就是腓特烈从8月到11月这3个月里所取得的战果。

腓特烈于是决定离开意大利北方。这是因为阿尔卑斯山北边有问题要他去解决，同时也是因为他期待着教皇会因他这3个月里在意大利东北部取得的战果而改变态度。

已经到了11月底的冬季，但腓特烈还是翻过了阿尔卑斯山。8月的时候他是由北向南翻山而来，这时则是从南向北了。腓特烈要去维也

纳。他在山路上骑马前行，迎来了自己的42岁生日。他回过头去和随从人员开起了玩笑说，候鸟可是要朝相反方向飞的吧。在意大利北方所取得的战果一定让他心情大好。



阿尔卑斯山脉与意大利北方周边

他要去维也纳，是为了给退位长子亨利所犯的政治失误收拾残局。亨利的妻子是奥地利公爵的女儿。奥地利公爵满心以为当上了皇帝继承人的岳父，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这一切却因亨利的下台泡了汤，他很不满，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动向。尽管他不是公开造反，但却不再参加皇帝召开的“巡会”了。

制住奥地利公爵对腓特烈来说并非难事。腓特烈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广袤的神圣罗马帝国里的威势就和在意大利南方西西里王国一样巩固。

腓特烈召集“巡会”，全体诸侯都会跑来参加，他所要求的事情当场就会变成法律。尽管他自己并不拥有像样规模的军事力量，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无论是实力人物，还是庶民百姓，都认为腓特烈是他们自己的皇帝，甚至为此而骄傲。

腓特烈重视司法行政的政策使德意志社会稳定，战争和饥饿销声匿迹。在腓特烈管辖的社会中，高级神职人员大主教统治的地方与世俗领主统治的地方有着共生的机制，这个机制充分地发挥着功能。这也许正迎合了喜好秩序的德意志人的秉性。

德意志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腓特烈还是要到各地巡视，每到一个重要的城市，都要在那里召开“巡会”，继续他笼络诸侯的工作。把叛乱处理在萌芽前，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格拉茨、雷根斯堡……他的旅程没完没了。在格拉茨，他度过了1236年的圣诞节。第二天，他庆祝了自己的42岁生日。

腓特烈唯一的担心是他的继承人，次子康拉德还是个9岁的少年。除了这个9岁孩子以外，没有其他候补人选。于是他决定，在这次逗留德意志期间，要让康拉德正式登上德意志王位。他再度前往奥地利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召开的“巡会”上，腓特烈把康拉德正式介绍给了诸侯们。诸侯全体同意这位9岁的少年登上德意志王位，这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第一个阶段。这样，腓特烈就确定了正式的继承人。

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针对德意志诸侯的对策。腓特烈的情况不允许他一直待在德意志，他需要用明确的形式让德意志诸侯长期看到自己的“代理”。可是，康拉德还是个孩子。于是，腓特烈指定自己的老朋友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担任康拉德的老师兼监护人。这个人属于神职界，但更是一位饱经风霜、通晓人情世故的人。腓特烈不想重蹈长子亨利失败的覆辙，即使离开也要通过密切联系，与西格弗里德两个人共同培养只有9岁的继承人。儿子已是德意志王，即使自己要回意大利，也

只能把他留在德意志了。腓特烈把儿子留下，自己离开了德意志。离他上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北边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德意志。在德意志逗留期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来到了腓特烈的身边。尽管已有预料，把教皇拉进来与伦巴第同盟进行的谈判还是破裂了。

破裂的原因是，即使把去年腓特烈对伦巴第同盟取得的战果摆在面前，罗马教皇也没有改变态度。无论战果如何，教皇也压制不住对腓特烈的愤怒，后者根本不想改变其一贯的做法。

腓特烈式的情报公开

无论是教皇、大主教还是主教，神职人员都喜欢与信徒保持一对一相处的关系。举忏悔罪过这个信徒的义务为例。在专门为信徒坦白罪过而设计的狭小忏悔室里，神职人员隔着隔板面对信徒。信徒在里面坦白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坏事，神职人员倾听信徒的坦白，听完后让信徒连说几遍“阿维·马利亚”，然后赦免忏悔者犯下的罪过。神职人员被认为可以传达上帝的旨意，因而也被认为有资格宽恕违反上帝旨意的信徒。

这种神职人员与信徒的一对一关系并不仅限于忏悔室里。除了向众多信徒说教以外，神职人员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喜欢一对一的做法。

腓特烈打破了这个做法。回溯10年以前围绕十字军远征所引起的开除教籍事件，腓特烈在那时就已经打破了这种做法。但在目前为解决伦巴第问题而与教皇进行的交涉谈判中，腓特烈更加明确地打破了这种做法。

当时的外交交涉并非采用现在我们所想象的交涉形式。交涉的当事人是教皇与皇帝，交涉是在他们二人之间以书信为媒介进行的。腓特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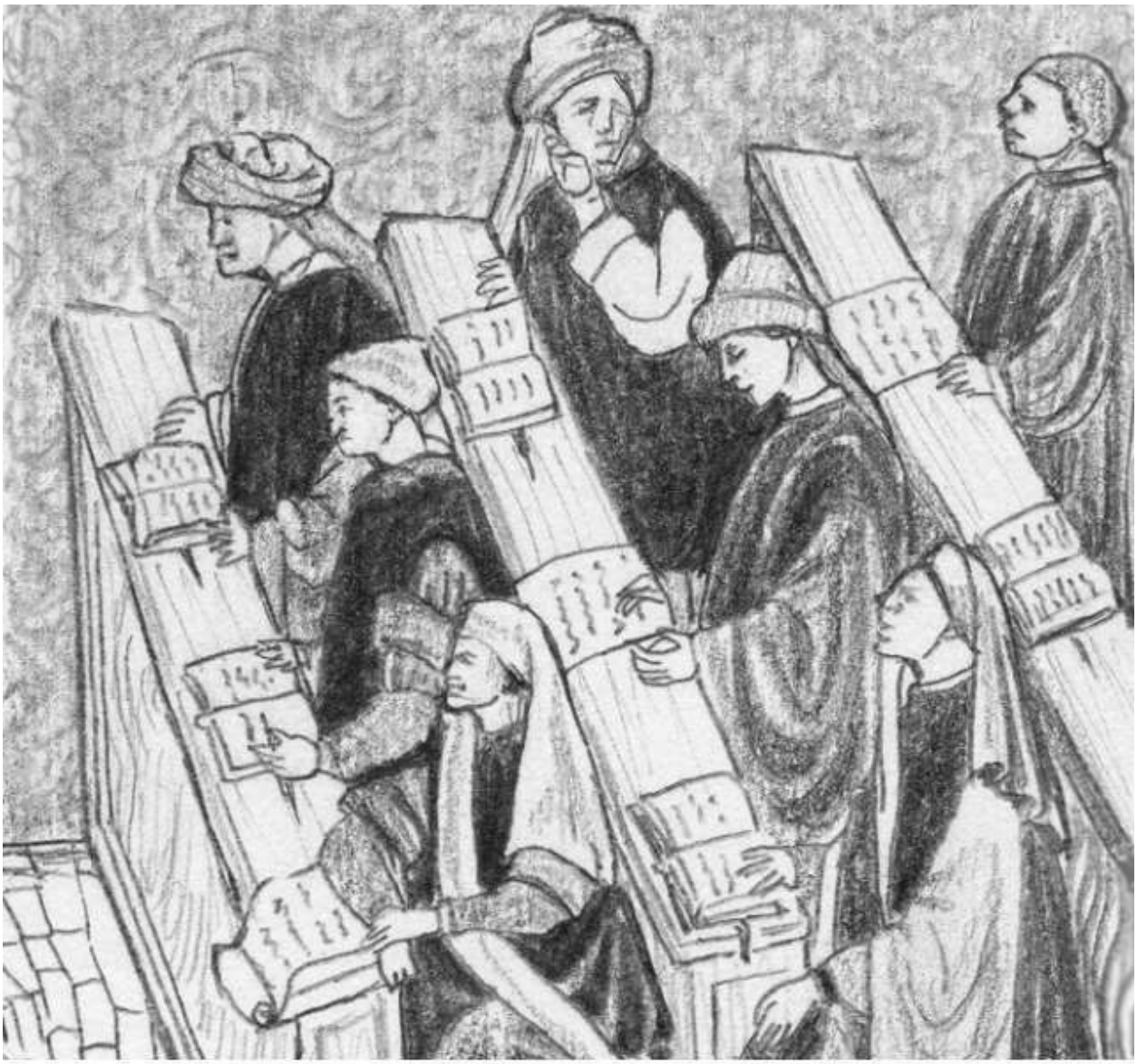
派遣的赫尔曼是皇帝方面的首席特使，特使们的任务是把教皇交给他们的书信送达皇帝，以及向皇帝报告写信时有关教皇和教廷的情况，这是他们任务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任务是把皇帝写给教皇的信交给教皇，再把教皇读信后的反应告诉皇帝。特使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腓特烈的真实意图用自己的话委婉地转达给教皇。

这就是当时的外交交涉，教皇与皇帝之间频繁互通信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腓特烈并没有把教皇写来的书信公开出来。那个时代还没有尊重隐私的概念，但却有着遵守礼仪的概念。

但腓特烈皇帝公开了自己写给格列高利教皇的书信，他让人大量抄写并寄给了全欧洲的王侯。

皇帝写给教皇的书信中充满了对教皇来信所写内容的反驳。最佳的反驳方法就是使用对方的话进行反驳。如果读了皇帝写给教皇的信，就能了解教皇对皇帝说了些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事用一台机器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但在800年前古老的13世纪，这种事只有让很多书记员用笔抄写，再让很多专事送信的仆从带着这些抄件送到欧洲各地才能实现。腓特烈走动起来，会带着上百号的随行人员。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随行人员中很多都是从事抄写工作的书记员和送信人。



当时的抄写书记员

腓特烈用这个方法，让法兰西王、英国国王等欧洲实力人物了解了罗马教皇对他们这些世俗王侯的真实想法。腓特烈在本该是密室的忏悔室里装上了“喇叭”，让一贯在那个狭小空间内部一对一进行的神职人员与世俗人之间的对话响彻了整个教堂。这座教堂里坐满了全欧洲的实力人物，他们全都竖起耳朵听着忏悔室传出来的两个人的声音。

10年前纠结于十字军是不是要远征的洪诺留教皇性格温和，他没有

识破腓特烈的这种诡计。我们不知道一味强硬的格列高利是否识破了腓特烈的坏招，但却能想象得出他怒火中烧的样子。在琢磨出史无前例招数的才能方面，腓特烈技压群雄。让整个教堂，甚至连在教堂外的一般民众都能知道忏悔室里的对话，这一招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不过，腓特烈这样做并非出于情报要对任何人公开的想法，而是期待取得具体成果，是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

我们不得不说他成功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皇帝与教皇之间展开了长达15年的激烈抗争。在这15年中，没有王侯明确站在皇帝一边同教皇斗，但也没有一个王侯站在教皇一边与腓特烈敌对。王侯们明白局面很危险，现在教皇针对皇帝的敌对意识，明天就会被用于对待自己。

法兰西王、英国国王和德意志实力诸侯都知道教皇已经说过的话，自从古代末期君士坦丁大帝[12]向罗马教皇献土以来，欧洲全境就已经是教皇的领地了，王侯不过是受教皇委托进行统治而已。从王侯手中收回领土，对从那时起就已经是欧洲全境真正领有者的罗马教皇来说是行使正当权力。王侯们自然会想，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

格列高利九世作为罗马教皇，身居天主教会的最高地位，也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却犯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错误。他暴露出了教皇与皇帝的对立并非因宗教问题而起，只不过是因为再世俗不过的领土问题。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他的伯父英诺森三世教皇所说的“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这句话深信不疑。

皇帝腓特烈二世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应该回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上来。耶稣基督的话是“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教皇与皇帝并非上下级关系，只是各自负责的领域不同而已。

腓特烈的这种想法起初还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但慢慢却扎扎实实

地变成了欧洲王侯们一致的声音。当然，腓特烈采用的放喇叭的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1237年，期待把教皇拉到前台来解决伦巴第问题的外交交涉事实上以失败告终。腓特烈知道，必须决策的时候到了。皇帝向阿尔卑斯山北边各地发出了命令，要在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集结兵力。第二次伦巴第战役开始了。

第二次伦巴第战役

既然外交交涉指望不上，腓特烈在这一年召集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与往常相比可谓是大军了，然而也只有15 000的兵力。而拥有8万人口的米兰所领导的伦巴第同盟，即便除去作为去年腓特烈的战果而脱离的，同盟内仍有9个城邦。在这个节点上，腓特烈可用的兵力才勉强与同盟方的兵力形成对等之势。

在奥格斯堡集结的全部15 000兵力中，除2 000名德意志骑兵以外，步兵有13 000人。其中6 000人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半部，即现在的法国东部、瑞士、德国南部、奥地利，以及来自阿尔卑斯山南边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另外7 000人是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士兵。

不过，这些士兵多半不是根据皇帝的命令应征而来，而是由腓特烈出钱，志愿在他手下参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雇佣兵。如果腓特烈命令手下封建诸侯提供兵员，费用便要由诸侯承担。如果那样会增加他们的话语权。正是因为“红胡子”皇帝保留了封建社会，他才能够召集到10万兵力。而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满腔热情地要把封建社会转变为中央集权国家，他甚至连士兵招募都不依靠诸侯，而只花钱雇佣。我觉得，15

000士兵恐怕就是他财力的极限。

此外，对腓特烈的指责尤其集中在让7 000名萨拉森人参战一事。伦巴第同盟的成员都是基督教徒。用仇敌伊斯兰教徒来对付他们成何体统？然而腓特烈并未予以理睬。他的想法是，既然自己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花钱雇来的士兵，那么，不管他们是德意志的基督教徒，还是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伊斯兰教徒，都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萨拉森士兵的弓箭手颇为优秀，德意志人也都认可这一点。

即使士兵的数量相当，伦巴第同盟方全都是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意大利人，构成单纯。而腓特烈率领的则是各地召来的混编军，有其不利之处。即将43岁的腓特烈反复思考了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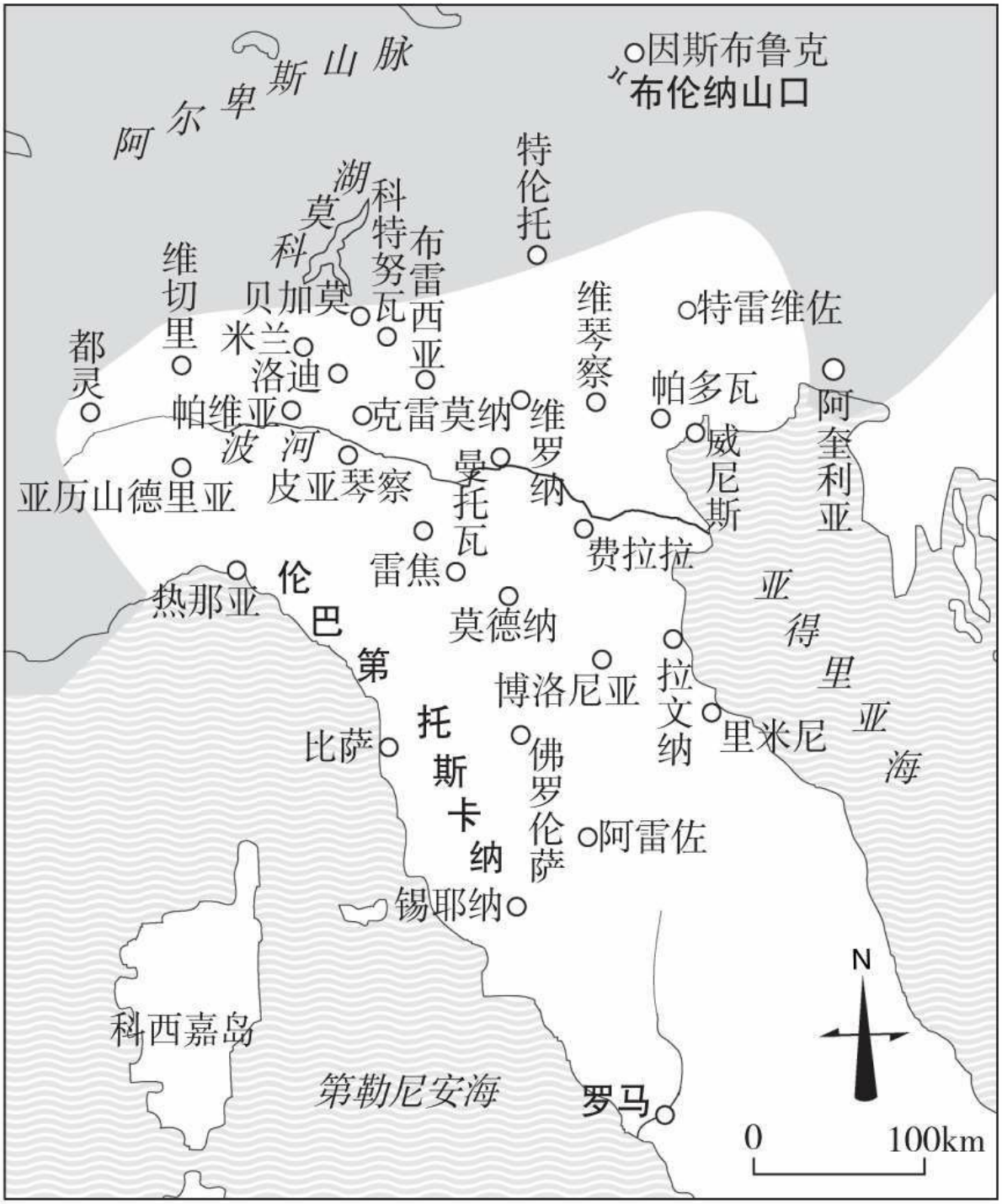
生活在25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写道，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领袖所需要的第一资质就是想象力。人们评价腓特烈时认为，他本质上不是武人而是政治人物，但他有着超凡的想象力。也许8月份在奥格斯堡等待士兵集结的时候，他已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9月，他率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召集的6 000名士兵离开奥格斯堡，首先前往因斯布鲁克，再从那里经由布伦纳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下山后到维罗纳。在那里与在阿尔卑斯山南边召集的士兵会合。

9月15日，腓特烈在维罗纳召集将领们开作战会议。但会议只是决定在执行腓特烈的战略战术时把什么事情交给什么人。

通过上一年的战役，意大利北方的东半部分归顺了皇帝。于是，1237年的战线便放到了伦巴第同盟的根据地意大利的西北部。这次战役的前线基地安排在克雷莫纳。传统上属于皇帝派的克雷莫纳最合适作为前线基地，但克雷莫纳与维罗纳之间的安全也需要得到保障。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干线道路在德意志的入口是因斯布鲁克，而在意大利的出口

便是维罗纳。此时仍是教皇派同盟方成员的曼托瓦正挡在维罗纳与克雷莫纳之间。



意大利北方及其周边

腓特烈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曼托瓦。拿下曼托瓦，不仅可以保障与德意志的联系，也可以免去对处在维罗纳、曼托瓦、克雷莫纳一线东侧

的意大利东北部后方之忧，以便专心进攻同盟的根据地意大利西北部。

腓特烈让15 000名士兵在城墙外布阵，仅此足矣，无须下令猛攻。10月1日，曼托瓦接受了皇帝送来的劝降信。在米兰派出增援曼托瓦的援军尚未到达之前，事情便已结束。

投降后，曼托瓦居民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他们害怕一年前袭击维琴察时皇帝军造成的破坏在曼托瓦重演。可是，腓特烈只要求曼托瓦投降并且今后恭顺皇帝，除此之外，他只要求驱逐两个人，这个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这两个人都是格列高利教皇派来的枢机主教，他们的任务是按照教皇的旨意煽动曼托瓦居民反抗皇帝。腓特烈让这两位枢机主教拿着他写给教皇的信，把他们送回了罗马。他在信中写道，这里是战场，很难保证以向上帝祈祷为本职的神职人员的人身安全。

腓特烈对曼托瓦的宽容措施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副产品。位于曼托瓦南面的帕尔马也来请求投降和恭顺。这样就形成了连接维罗纳、曼托瓦、克雷莫纳、帕尔马的对伦巴第同盟作战的最前线。

米兰派来救援曼托瓦的军队已经抵达布雷西亚附近，这里距曼托瓦仅有60公里。他们没能赶上救援曼托瓦，明知如此，但他们并不撤退。

率领这支伦巴第同盟军的是当时米兰的长官提埃波洛。由于自治城邦的内斗，让自己国家的任何人当长官都无法收拾局面，于是便从外国聘人来当长官。这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意大利自治城邦中并不鲜见。这位提埃波洛是威尼斯共和国市民，而且是现任威尼斯元首的儿子。威尼斯共和国并非伦巴第同盟的成员，却并未禁止本国市民在加盟的自治城邦就任长官。

无论是谁率领的，腓特烈都不能容许对60公里外的敌人放任不管，

但要开战时机又太差。意大利北方的冬季寒气逼人，这个季节降雨还多。自西向东流过意大利北方的波河在这里还有很多支流。常识认为，冬季在这种地方打仗简直同疯子无异。实际上，腓特烈虽已到达布雷西亚，却丝毫没有进攻同盟方的迹象。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决定主动出击。11月初，他见士兵们已经休养足够，便率领15 000名士兵中的12 000人离开了曼托瓦。他们沿着流入波河的支流之一的奥廖河向西北偏西方向挺进，一路上都能看见河水在左手边流淌。他们的目标直指在奥廖河上游构筑了营地的同盟军。

他们顺利走完了60公里的路程，到达了前沿地点。后面一连15天保持着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皇帝军由2 000名骑兵和10 000名步兵组成，在数量上胜过2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组成的同盟军。但先来的同盟军在有利的高地上构筑了营地，而后到的皇帝军只能在不利的低地上扎营。低地在河边，附近有很多沼泽。如果冲过沼泽渡河进攻高地，那就恰好成了敌人的靶子。同盟军也并不进攻，他们认为出去进攻就等于抛弃有利地形。时间在持续的对峙中流逝。

在腓特烈的面前有两种选择。现在是11月过半，撤离这里回到克雷莫纳过冬，待来年开春再来进攻，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在这个季节发起进攻。

两种选择都伴有风险。第一种选择的风险是，给了已经处于守势的同盟军东山再起的时间。而第二种选择的风险是，一决胜负不可避免，但在不利的地形作战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兵力损失。

再过一个月就满43岁的腓特烈采取了第二种选择。同时他也在考虑，赌归赌，但不能轻易付出巨大牺牲。

腓特烈使用了间谍。他把部下派到附近的城镇和乡村，让他们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散布消息，说皇帝军要回克雷莫纳过冬。同时，他召集

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将领，交给他们详细的作战方案。将领们各自率兵分头行动。在渡过奥廖河之前全军统一行动，渡过这条河是前去克雷莫纳的近路。这也是欺骗敌人的一个战术。渡河之后，大部队转为各队分别行动。一位将领率领步兵开始取道前往克雷莫纳，其他将领率领骑兵躲在树林里待命。受命担任后卫的6 000名萨拉森士兵的任务是，接到新命令后，立即后军变前军。1237年11月27日的清晨就这样来临了。

同盟军信以为真了。他们完全相信了皇帝要撤军前往克雷莫纳，皇帝军也将在克雷莫纳附近过冬的情报。他们以为皇帝要在克雷莫纳庆祝圣诞节，第二天好好欢度自己的生日。他们不了解腓特烈是一个如有重要事情会牺牲圣诞节和自己生日的人。他们自己也希望回米兰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两者掺杂在一起，让他们产生了误解。

大胜

提埃波洛一声令下，同盟军撤出了营地，向着他们认为要南去克莱莫纳的皇帝军相反的方向，开始朝米兰所在的西面行进。

侦察到这一切的士兵向皇帝做了报告。接到多个侦察兵送回的同样报告后，腓特烈并没有立即下命令。他在等同盟军离开安全的营地，走到一个想撤也撤不回的地点，一个有利于骑兵发挥的地面平坦而坚硬的地方。确认后，他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了狼烟，进攻开始。骑兵打头阵，后卫变前锋的萨拉森士兵紧随其后。

同盟军朝着自家城邦行军。也许是心情松弛的缘故，他们甚至没有排成战斗队列。发现攻势后他们想逃回营地，但已被皇帝派来的步兵堵在了中间。德意志骑兵和萨拉森士兵发起了猛攻，向进退两难的同盟军袭来。他们想逃往北面的贝加莫，又想逃往西面的米兰，可都已被绕道

而来的皇帝军的步兵别动队挡住了去路。除了奥廖河方向以外，他们被皇帝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古代名将汉尼拔[13]拿手的包围歼灭战千年之后又在意大利北方的科特努瓦平原再次上演。

腓特烈取得了完美的胜利。8000人的同盟军战死30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跳入冬天涨水的奥廖河淹死的。俘虏达到4000人。总司令提埃波洛也当了俘虏。还有很多米兰实力人物的子弟也都战死。不过，他们与其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士兵而战死，不如说是为了捍卫米兰的象征——“自由旗车”（Carroccio）而战死。

辞典对“Carroccio”的解释是：

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邦所使用的4头牛拉的货车，上面载有城市的旗帜、祭坛和大钟等，作为城市的象征受到市民的尊崇，即使在市内行走，通常也会有士兵警卫。

在古罗马，军团的旗帜“鹫旗”（aquila）被敌人缴获是耻辱之事。事实上，十字军也是在十字架的带领下战斗的。与这两者相比起来，自由旗车要用4头牛拉，动作迟缓。逃跑的时候要护着它，当然跑不快。米兰名门的年轻人大多认为，如果把动也动不了“自由旗车”交给敌人，自己也不能苟活。于是，他们在科特努瓦的原野上迎来了自己的死亡。外乡人都会觉得，应该用搬运方便些的东西做象征物。现在意大利政党“北方联盟”的象征标志是一个抵抗皇帝的伦巴第同盟士兵的雄姿，这些人就把自己政党的别名叫作“Carroccio”。米兰人是经济人，做事应该更加合理。然而他们也有执拗的一面，很重视那些在外乡人看来离奇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12月1日，皇帝和他的军队从科特努瓦拉着“自由旗车”和俘虏一路走过30公里，来到克雷莫纳。克雷莫纳的居民都是坚定的皇帝派，他们狂热地欢迎腓特烈。皇帝骑在马上行进，五花大绑的米兰长官提埃波洛坐在自由旗车上跟在后面。米兰是坚定的反皇帝派，因而是克雷莫纳的

仇敌。象征米兰的“自由旗车”的惨相，让克雷莫纳人更加狂热。俘虏太多，监狱收容不下。不但市政厅，就连商品交易所都塞满了俘虏。当晚，全体居民参加的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把那些俘虏撂在了一边。

几天后，腓特烈差人把这架自由旗车送去了罗马。米兰人引为骄傲的自由旗车附上腓特烈亲手写下的一句话后，被当成了赠给罗马人的礼物。他写道：与今天的罗马人共同赞美古代皇帝的荣耀。我苦笑了，只能说这话相当挖苦人。因为古罗马的皇帝成为过眼烟云之后，罗马教皇取而代之成了罗马的主人，腓特烈的话里含有“忘却什么教皇，想起皇帝”之意。

据说得知科特努瓦的结果后，格列高利教皇大失所望。他的表现甚至让看惯了他发怒的人都大感惊讶。当然，他一定没有心情去看放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公开展示的“自由旗车”了。

继而传来的消息令格列高利教皇更加沮丧。皇帝在科特努瓦取得的胜利让意大利北方的空气为之一变。参加同盟的城邦尚未遭到进攻就接二连三地向皇帝投降，发誓恭顺。伦巴第同盟事实上解体了，甚至连米兰周边城市洛迪、维切利、帕维亚都脱离了同盟。米兰孤立了。

1237年对腓特烈来说是自己生涯中最好的一年。他一定是在安详无虑的心境中欢度了圣诞节，在回味着两年来的成果中度过了自己43岁的生日。1237年是腓特烈告诉全欧洲谁才是皇帝，是给全欧洲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年。然而，腓特烈还不知道，命运女神有着强烈的嫉妒心。

---

[1] 提贝里乌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14—32年在位）。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的养子。年轻时多有战功。

[2] 卡里古拉（Caligula，本名Gaius Julius Caeser Augustus Germanicus，前12—41），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37—41年在位）。即位不久患精神方面疾病，多行暴政。后与其妻一起被杀。卡里古拉为其爱称，意为小孩的鞋子，指他小时随父在北日耳曼征战时曾穿小军靴。

[3]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54

—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是暴君的典型。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4] 发生于1176年5月29日北意大利莱尼亚诺的腓特烈一世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一场决战。是役，同盟军15 000人对战腓特烈一世的3 000人，腓特烈一世受重伤大败。战后腓特烈一世对伦巴第同盟及教皇做了一系列让步，包括结束对教皇领土的宗主权，签订《康斯坦茨条约》等。他的怀柔政策使他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

[5] 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1181），1159—1181年在位。本名Rolando Bandinelli。曾在博洛尼亚任法学教师。1153年任枢机主教。

[6] 丕平（Pepin Carloman，773—810），查理大帝之子，丕平三世（“矮子丕平”）之孙。781年查理大帝征服伦巴第以后成为“意大利王”，并由教皇哈德良一世加冕。

[7]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 Verdi，1813—1901），著名意大利作曲家，一生创作了29部歌剧和《安魂曲》等许多音乐作品。他音乐技巧娴熟，善于使用意大利民间曲调，注重管弦乐的效果，刻画歌剧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细致入微，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他的《弄臣》《游吟武士》《茶花女》是歌剧史上的里程碑。《西蒙·波卡涅拉》（Simon Boccanegra）是威尔第的第22部歌剧，描写了热那亚首任总督西蒙·波卡涅拉与其私生女玛丽娅扑朔曲折的重逢过程，表现了14世纪热那亚派系家族间争斗的历史以及对和平的向往。剧中对大海有精彩的音乐描绘。

[8]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现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之一。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教。曾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会议，参与过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设计起草工作。他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理论有奠基性的贡献。他在出版于1904—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角度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伴随16世纪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有着生发上的影响。

[9] 威尔第创作的一部四幕歌剧，首演于1843年，1847年在巴黎演出的法语修订版名为《耶路撒冷》（Jerusalem）。歌剧描述了阿尔维诺和帕加诺兄弟二人为争夺姑娘维克琳达的爱情而引出的曲折故事。兄弟二人都参军或加入过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

[10] 北方联盟（Lega Nord），全名为Lega Nord per l'Indipendenza della Padania，缩写LN。意大利右翼政党，成立于1989年，前身为意大利中北部6个自治联盟，创始人为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政治主张有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等反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伦理，反对中央集权，要求地方自治，反对异文化圈移民，要求保护绿化及农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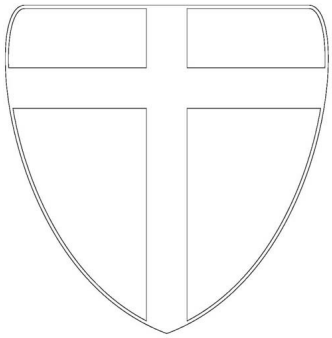
[11] 埃泽里诺·达·罗马诺（Ezzelino III da Romano，1194—1259），意大利北方威尼托地区的封建领主，腓特烈二世的盟友，曾统治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等地达20年之久。历史上以残忍暴君闻名。他于1236年与腓特烈二世13岁的庶出女儿塞尔瓦吉亚（Selvaggia）结婚。

[12]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约272—337），罗马皇帝，306—337年在位。他即位后收拾乱局，再次统一帝国，推进政府和军事改革，营造新都君士坦丁堡，巩固了拜占庭帝国

的基础。他于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大帝。

[13]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下册）



北 海
英格兰王国
弗里斯兰
波美拉尼亚
伦敦
多佛海峡
萨克森
布兰登堡
莱茵河
布鲁塞尔
科隆
亚琛
图灵根
梅森
西里西亚
洛林
美因茨
弗兰肯
巴黎
波希米亚
哈根瑙
纽伦堡
雷根斯堡
法兰西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
拜仁
奥地利
多瑙河
康斯坦茨
施瓦本
维也纳
施泰尔马克
蒂罗尔
布达佩斯
克恩顿
里昂
米兰
弗留利
都灵
威尼托
帕维亚
勃艮第
（阿尔勒王国）
伦巴第
威尼斯
拉文纳
热那亚
博洛尼亚
比萨
安科纳
托斯卡纳
教皇领土
亚得里亚海
科西嘉岛
罗马
福贾
巴列塔
卡普亚
那不勒斯
普利亚
巴里
阿马尔菲
布林迪西
巴利阿里群岛
撒丁岛
萨莱诺
地中海
第勒尼安海
西西里王国
N
巴勒莫
雷焦·卡拉布里亚
墨西拿
蒙雷阿莱
0
250km
突尼斯
叙拉古
伊奥尼亚海

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欧洲

第七章
一切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1238年过去了。转年后的1月，腓特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再次行动起来了。他已经决定，趁此机会平定意大利西北部。他去年已经平定了意大利东北部，如果此举顺利，除威尼斯共和国外，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将成为皇帝的领土。这样一来，他的邻土便从北面与教皇领土接壤。由于南面已经与教皇领土接壤，他就可以实现对教皇所在的罗马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也许这样才可以让教皇只专心于宗教。达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巩固对科特努瓦战役后请求效忠的自治体的统治。

皇帝与“自治体”

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腓特烈不打算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而采用在意大利南部和德意志行之有效的“巡会”方式。所谓“巡会”就是皇帝巡视各个城市，把当地和附近自治体的代表召来开会，让他们在会上承认皇帝的统治权。

1月，他首先在帕维亚召开“巡会”。帕维亚自不待言，诺瓦拉和维切利等自治体的代表全员参会。

2月，“巡会”转场都灵。都灵及其附近的萨沃纳、库内奥和其他自治体的代表也都齐聚一堂。

当月月底消息传来，此前旗帜不鲜明的佛罗伦萨同皇帝特使进行了交涉，接受了皇帝派遣的行政长官（podesta）。

至此，留在同盟方即米兰方面的自治城邦只有亚历山德里亚、皮亚琴察、布雷西亚和博洛尼亚4个自治体了。孤立米兰这个伦巴第同盟领袖的圈子越缩越小了。

3月，米兰终于改变了躲在教皇背后的一贯做法，直接向皇帝请求媾和。科特努瓦彻底失败以后，时间过去了3个月，米兰在那次战役中丧失了军力的一大半。米兰所拥有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仅次于巴黎，在意大利名列第一。即便如此，它也难以补充在科特努瓦之战中丧失的兵力。研究家们也都写道：米兰的军事力量在科特努瓦遭到了毁灭。

尽管如此，米兰人的好强性格似乎并未改变，特使提出的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想要恢复到“康斯坦茨媾和”时的状态。具体条件如下。

一、米兰向皇帝投降，发誓今后效忠皇帝。

二、将象征米兰的市旗置于皇帝脚下。

三、解散第二次伦巴第同盟。

四、皇帝再次率领十字军远征时，米兰将派出1万名士兵参战，费用全由米兰承担。

五、放弃纳入米兰领土的两个地方。

六、双方归还俘虏。

七、今后，米兰接受皇帝任命之人担任本国士兵的指挥官。

上面是米兰接受的条件，下面是同盟即米兰方面开给皇帝的条件。

一、皇帝允许自治体以后易帜而不作为叛乱分子予以处置。

二、皇帝同意自治体保有环绕全城的城墙和塔楼。

三、皇帝以官方名义承认自治体保有其位于城外的城堡和农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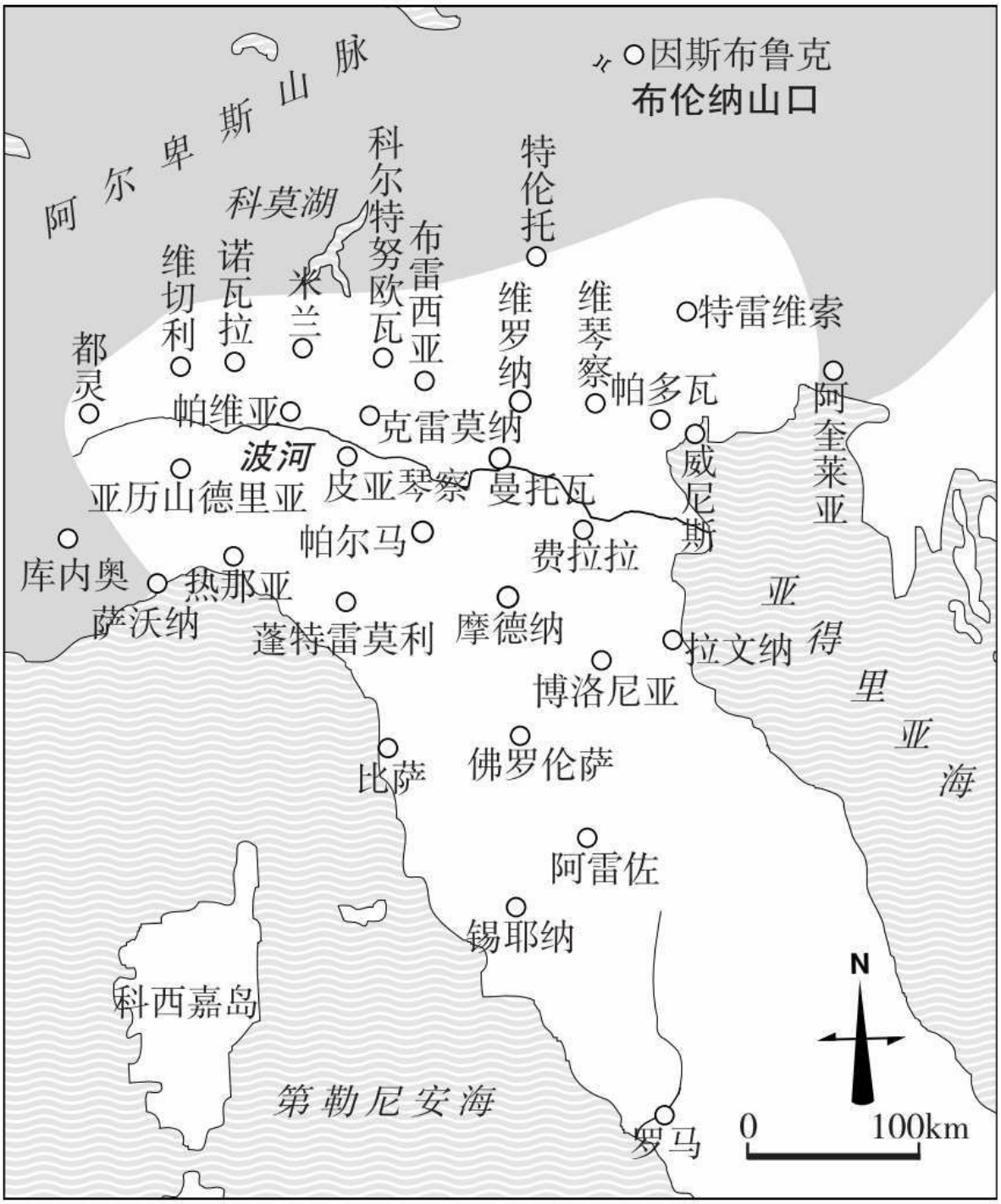
四、皇帝再次认可“康斯坦茨媾和”时的协定，自治体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

据说腓特烈听完后没有发怒，反而笑着回答了特使。但是没有史料显示他的答复内容，我们在这里只能发挥想象了。如果考虑他的谈话方式和气质进行创作，我想皇帝可能有下面的回答。

“首先，既然打了大败仗，投降是当然之路。既然意大利北部已经成为皇帝的领土，效忠我不过是极为自然之事。

“你说要献出米兰的市旗，我们在科特努瓦已经缴获很多，再拿过来也难以处理。

“你说到要解散伦巴第同盟，那个同盟的目的是对抗我。既然你们都来我这里求和了，不用任何人说，解散也是理所当然的。”



意大利北部及周边

我认为腓特烈会回避回答特使列举的第四项条件。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时，腓特烈本人就与敌方的阿尔-卡米勒缔结了媾和条约，耶路撒

冷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一边。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有很大的可能是情况会发生变化。阿尔-卡米勒在那年去世，腓特烈打算继续对继任苏丹采取友好政策。他当然没有再次率领十字军远征的心思。不过，在当时，只要有不关心十字军这一条，就有可能被基督教徒当作敌人。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回答，十字军远征就是公职人员必须慎重回答的问题之一。

皇帝继续回答道："你说要放弃米兰近郊的两块土地的领有权，但那里已经归了我方。

"你说双方归还俘虏，但俘虏只有一方有，'双方'的说法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你说让我任命指挥米兰军队的人，司令官通常要带副官等人数不一的随从。如果米兰愿意全部接受这些人，我可以考虑。

"你要求我同意的事项，第一个是让我不要把意大利北部对抗我的人视为叛乱分子。这不是我要根据你们的情况回答的问题。第二个是保留城墙等防御设施。如果是为了保卫市民的安全我可以同意，没有异议。城外的城堡和农庄，我也可以同意，没有问题。尊重私有财产也是我的信条嘛。

皇帝腓特烈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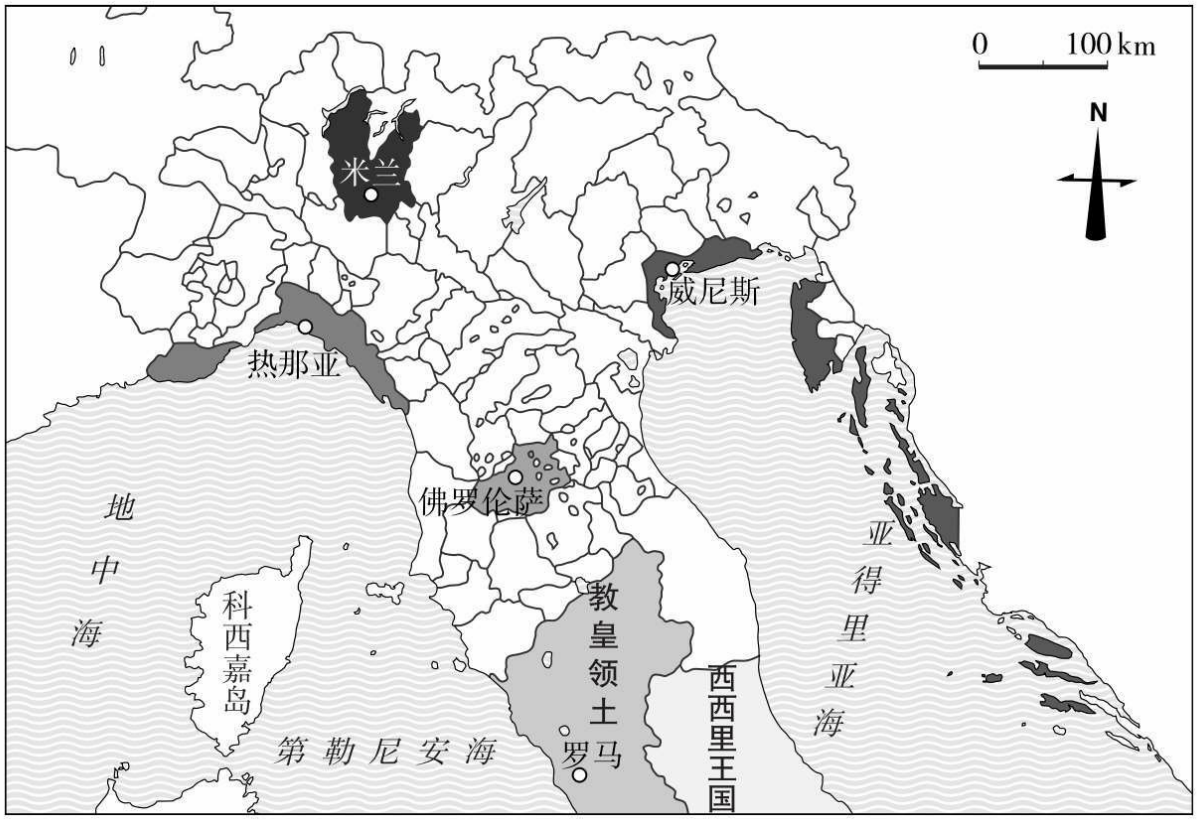
"但是，在包括税制在内的行政和建立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司法方面，我不能同意自治体自治。这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权力。"

米兰方面提出了有条件投降，但腓特烈要求的是无条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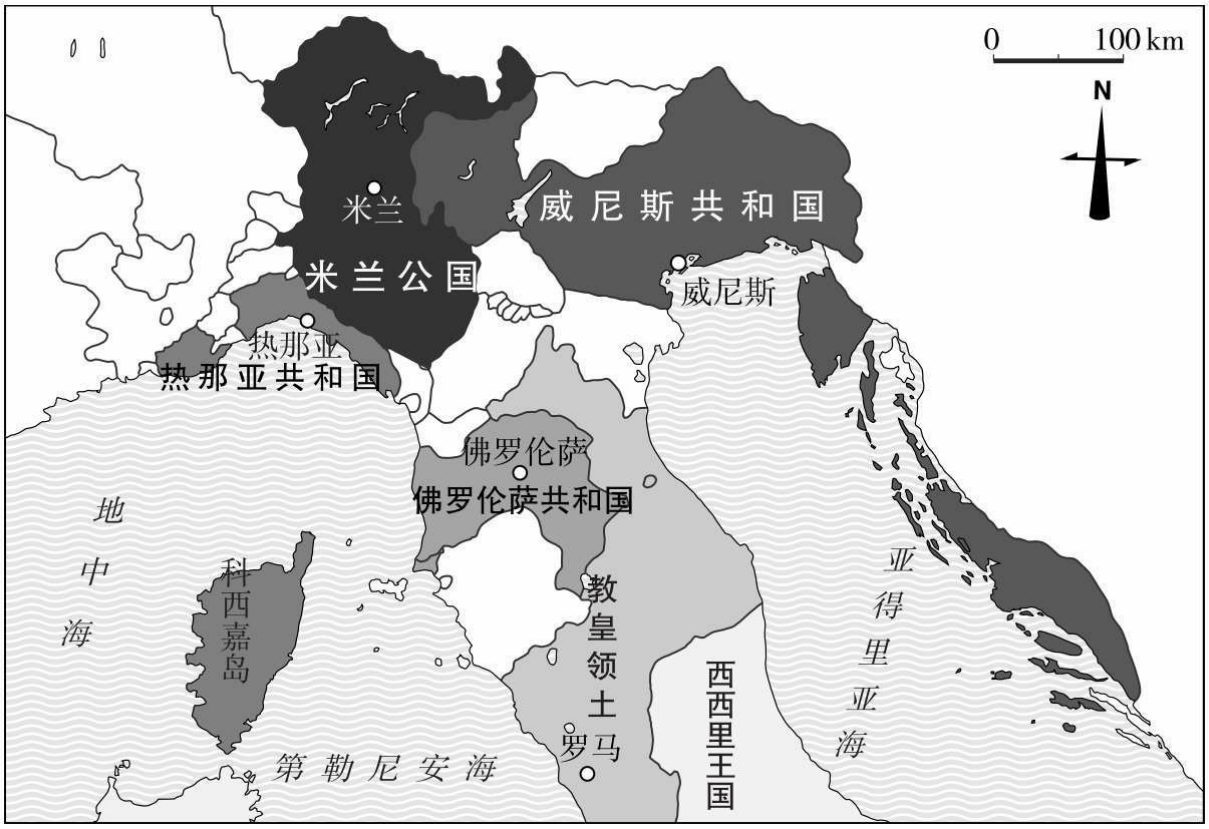
米兰特使见皇帝死守这条线不肯退让一步，便撂下一句逞强话退了出去：“我们宁愿战死沙场，也绝不死在绞刑架下！”

这句逞强话成了解释所谓伦巴第同盟就是奋起对抗皇帝中央集权化的自由人集团的根据。

被称为自治体的自治城邦在自由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它们在自治城邦内部和与其他自治城邦的抗争中耗尽了能量，结果在后来不到百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几乎所有的自治体都是因被政体为所谓“领主”（Signoria）一个人统治的国家吞并而消亡。13世纪前是所谓的“自治体时代”，14世纪开始进入所谓“领主时代”，形成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发展转变的历史过程。



“自治体时代”的意大利



“领主时代”的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后来被西北部的米兰和东北部的威尼斯这两个国家整合了。米兰是公爵统治的君主国家，威尼斯虽然是共和国，但一直实行少数人领导。在“领主”时代，君主政体也好，共和政体也罢，目标都是根绝内斗，确立国内秩序，从而全面发挥市民活力。在最重视政治稳定方面，彼此都是一样的。

腓特烈一以贯之的思想是“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100年后人们可以证明这一想法确属远见卓识，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么强烈反抗他的意大利北方人都接受了这一想法。

但是，1238年春天离这个将来的时代还很遥远，腓特烈皇帝与米兰谈崩了。我只能认为谈判破裂理所应当。

原因是双方的对立是先有自由还是先有秩序这样的无解对立，这也是人类世界的永恒课题。这个对立产生于神圣罗马帝国和自治体之间，这两者是中世纪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

腓特烈想把包括意大利北部在内的自己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变成皇帝在政治、外交、军事、司法、经济等一切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以法律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他已将此付诸行动。

而自治体（自治城邦）则希望自己决定这一切，并要求皇帝认可这一点。

0这样一来，即使说这是地方分权，情形也同古罗马不一样了。罗马帝国虽然承认名为“Municipia”（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体拥有自治权，但自治权仅限于自治体内部的行政方面。

所以，意大利北方自治体逼迫皇帝承认的与其说是地方的自治，不如说是国家的自治。这也并不是要求皇帝承认“伦巴第同盟”这种全体意大利北方的国家，而是要让皇帝承认每个加盟自治体各自拥有国家水平的自治权。

伦巴第同盟不是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结成的同盟。不管是为对抗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结成的第一次伦巴第同盟，还是以其孙子腓特烈为目标结成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都是如此。伦巴第同盟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同盟。我想以现代日本的“县”打个比方。考虑到规模，自治体比不上美国的“州”，也就是日本“县”的规模。如果以日本的“县”来举例，只在抵御外敌入侵所需要的防卫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合作，其他一切事务均由“县”自行决定，那么，理解地方分权的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又会如何作答呢？

在800年前的中世纪后期，如果地方的要求超越了地方分权而上升为国体问题，情况也是一样的。腓特烈皇帝面对要求“自决权”而非以往

所提“自治权”的米兰寸步不让，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答应了米兰的要求，腓特烈实现自己治下“和平”的思想就会先为自己所否定。这很可能还会导致神圣罗马帝国自身崩溃。

有不少研究家认为，谈判破裂后，腓特烈应该立即转而进攻米兰。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众多史实所做的推测，这个时期米兰的总人口是8万到9万人。那么，可以拿起武器上战场的人数为人口的五分之一，即18 000人，减去在科特努瓦损失的5 000人后，兵员数量应为13 000人。但是，一旦得知皇帝的军队要进攻米兰，米兰的盟友贝加莫和皮亚琴察等反皇帝派自治体一定会有人赶来增援，15 000人很容易扩大到两倍。这是很现实的想法。

人们也一定会想，皇帝军队前一年11月在科特努瓦取得了完胜，未损毫发的15 000人应该都能投入战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皇帝的军队在前一年年末临时解散了。这一情况且容后叙。

此外，米兰在古罗马时代叫“梅迪奥拉尼乌姆”，一直被视为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有4条古罗马时代敷设的大道在这里汇集，在1 000年后的中世纪后期仍可使用，其中两条分别通向米兰的伙伴贝加莫和皮亚琴察。

进攻围着城墙的大城市，除非把整个城市与周围隔绝，否则便不能成功。

腓特烈大概认为，在这个时候强攻米兰胜算不大。米兰同这位皇帝交涉时表现强势，这也是建立在这些事实，即米兰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基础之上的。

可是，腓特烈也不能允许跟米兰吵翻之后就放任态势恶化，而不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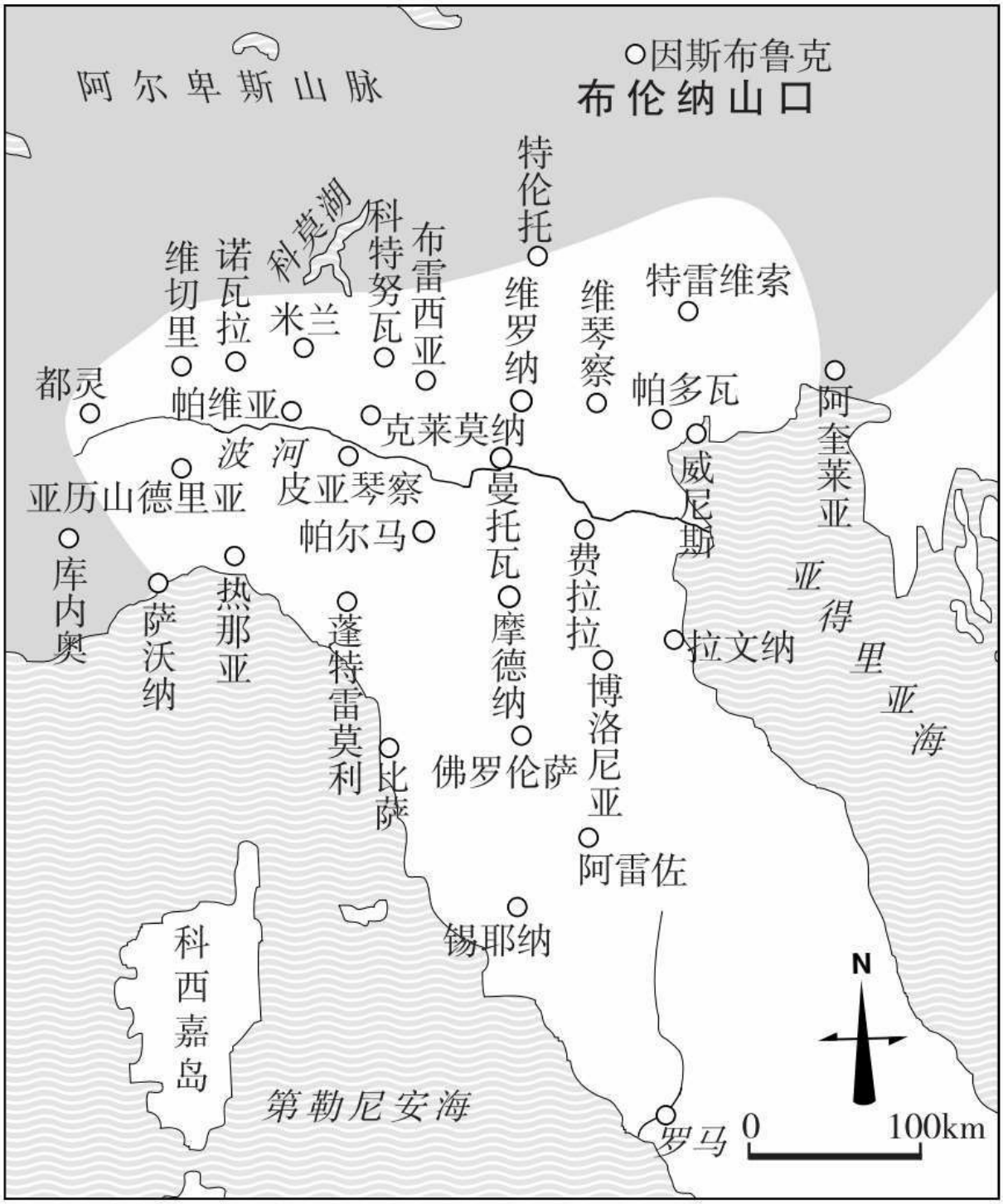
出任何手段。那样就有可能使两年来的成果付诸东流。看到皇帝的怯弱，眼下已经臣服的意大利北部其他自治体也有可能立即回到米兰方面。而且，腓特烈本人也是一个无所作为便死不瞑目的人。既然进攻米兰有困难，他便决定进攻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攻防

这个时期的布雷西亚号称有4万人口，可以出战的男子约在8 000人上下。但他们也有很多人在科特努瓦战死或被俘，残余战斗力不过6 000人出头。

而且，布雷西亚在古代并非主要城市，它位于从维罗纳到贝加莫大道的中段。维罗纳已经在皇帝的手中，只要封锁住通往贝加莫的道路，即可切断布雷西亚的补给线。然而，皇帝虽然把目标定在了布雷西亚，但却无法立即派去军队开始进攻。

常备军的概念在古罗马早已有之，这正是罗马帝国军事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真正原因。然而，古罗马的很多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却已被彻底抛到了脑后，这个概念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宣誓臣服于己的少数骑士之外，中世纪的战争都是国王和诸侯带着战前临时召来的士兵，组成军队进行的。



意大利北部及其周边

同腓特烈的情况一样，米兰和布雷西亚也都没有常备军。但他们只

要一声号令，住在同一城市的人便能组成军队。相反，腓特烈却要从遥远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招兵买马。腓特烈在科特努瓦打了胜仗，回到克雷莫纳后，就付钱解散了军队。

顺便提一句，古代以后第一位认识到常备军重要性的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他是佛罗伦萨的官僚，反对祖国佛罗伦萨依赖雇佣兵的防卫战略，鼓吹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他只是一介官僚，地位卑微，没有决定权。尽管如此，他还是坚韧不拔地不断游说，向拥有决定权的人们做工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起了只有400人的小规模军队。然而这支军队也只是参加了市政厅前广场上举行的游行检阅后便散伙了。此后，需要时可以花钱招兵的观念又延续了很久，直到拿破仑才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腓特烈也有貌似常备军的军队，那就是号称有六七千人的萨拉森弓箭兵。靠着这些异教徒，腓特烈可以把常备军的概念变为现实。这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腓特烈却承认他们的宗教，还允许他们集体居住在属于皇帝领土的意大利南方。他们感激并敬佩腓特烈。腓特烈把这些萨拉森士兵用作身边的警卫。由此看来，我们只能认为，皇帝与萨拉森士兵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防卫上的常备军概念，而是基于人的心理因素。

这是一个说到士兵就会想到雇佣兵的时代。腓特烈同米兰谈判破裂后不到3个月便征召到了士兵。这可不是因为他撒了钱，而是因为腓特烈通过前面所说的“喇叭方式”，使全欧洲的王侯都认为他有道理。“喇叭”使他们全知道了伦巴第同盟的背后站着罗马教皇。

响应腓特烈要求派来士兵的国家遍布欧洲全境。

把妹妹嫁给腓特烈的姻亲英王派来了100名带着随从士兵和马丁的骑士。

尽管史料没有人数的记载，但法兰西王、西班牙的王族阿拉贡家族也都派来了骑士队伍。而且，法兰西普罗旺斯和图卢兹的两位伯爵还派来了下属的士兵。这时，不仅法兰西北部，就连南部也站到了皇帝一边。

德意志当然要响应皇帝的要求，但此时德意志的派兵方式却意味深长，表现了腓特烈所推行的对神圣罗马帝国本国的统治方式。腓特烈在领土世袭的意大利南部推行中央集权化，但在选他当皇帝的阿尔卑斯北侧，他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封建社会。他并非单纯地温和对待这些既有势力，而是建立了让神职人员大主教治理的领国与世俗诸侯治理的领国并存的体制。这个策略让以往家常便饭一般的领土争议安静了下来。这就是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其成功的程度令人满意。德意志和法兰西东部也派兵前来，便反映出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勃艮第拥有领土的主教们从法兰西东南部派来了士兵。

在德意志，以实力领主科隆和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大主教们派来了由康拉德率领的军队。康拉德虽然刚满10岁，却是皇帝的嫡子，已经当选为德意志王。

德意志人一旦成为世俗诸侯，就是典型的“斗士”。他们拥有骑士，并与骑士结为主仆关系。诸侯们响应皇帝的要求，把这些常备军派了过来。人数似乎跟前一年一样，有2 000骑左右的规模，由后来成为腓特烈忠臣的荷亨洛赫（Hohenlohe）家族兄弟指挥。

在意大利，首先响应皇帝号召的是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西西里王国”。参战的准确人数不详，但应该有萨拉森的弓箭兵部队。没有充军参战的人们也一定心甘情愿地缴纳了腓特烈下令征收的特别税。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也为皇帝派来了士兵。不过，这些城邦都

是这两年来因腓特烈的战果而脱离伦巴第同盟的自治体，并非全体市民都愿意跟随皇帝。实际情况是，当时每座城市里都有皇帝的支持者，他们因这两年腓特烈的优势而势力大增，招募了不少人参战。然而，这些城市里也有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帮助被当作进攻目标的布雷西亚。

还有史料记载，除了这些人以外，应皇帝邀请而派兵的还有希腊的尼西亚帝国[1]皇帝和埃及的苏丹。但今天人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记载受到了罗马教皇散布的假情报的蒙蔽。与同天主教会水火不容的希腊正教会和异教徒苏丹关系良好是罗马教廷谴责腓特烈的套话。而在布雷西亚战场上也根本没有见到希腊兵和埃及兵的影子。

1238年7月11日，双方开始了布雷西亚攻防战。皇帝一方约有15 000名兵力进攻，防守方布雷西亚有居民4万人，手持武器战斗的人数约为8 000人。光看人数似乎胜负已见，但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古代名将辈出，但中世纪为什么出不了名将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回答这个问题令人愉悦。

我们先说结论。古代战争主要是两军在平原对阵的会战，而中世纪的战争则主要是城市攻防战，一方从外部进攻有城墙护卫的另一方的城市。这就是原因。

古代名将，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汉尼拔，不论是西庇阿[2]还是恺撒，都是在会战中取胜的。如果以广阔的平原为战场，人们就更有可能用好战略和战术。也就是说，如果指挥者具有构思战略战术的能力以及按照这些战略战术调兵遣将的能力，即使他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也可能成为胜者。不论是在伊苏斯、高加麦拉，还是在坎尼、扎马，或是阿莱西亚[3]，胜者都是兵力处于劣势的一方。他们喜欢会战的方式，是因为胜负可以定于一天之内。时间拖得越长，发生不测事态的概率就越高。

到了中世纪，通过会战一决胜负的事越来越难。中世纪的城市全都围着城墙，士兵通常也都是花钱雇佣的。在这样的时代，打起仗来不是谁都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到平原上去的。换句话说，在中世纪，打仗时更多用的是一个军团左右的兵力。在古代，任何名将都不会只用一个军团去打会战。中世纪大量的战斗是双方隔着城墙的攻防战，而不是会战。

在中世纪，配称武将的人只有伊斯兰方面的萨拉丁以及挑战萨拉丁的英国国王理查。不过，他们两人也是在平原作战获胜的。尽管狮心王理查已经进攻到可以远远看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但他还是不得不放弃进攻这座圣城。亚历山大能够在会战中战胜10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而进攻一个提洛斯城却要花费他4个月的时间。即使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在进攻城市的战役中也不会像在会战中那样顺利。正因为他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才会选择会战。

进攻城墙环绕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利之处，即防守方可以在屋檐下安睡，进攻方却不行。还不仅是睡觉，进攻方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野外进行。当然他可以支起帐篷，一如描绘城市攻防战的古地图上所画的那样，一排排帐篷可以沿着城墙外侧把城市围得像铁桶一般。

在这种状态下，军队短时间还可以坚持。但如果时间拖延，由于气候变化和卫生状况的恶化，瘟疫便会流行。小小的口角也会很容易演变为全军的争斗。如何有条不紊地打长期攻防战，这可是一个超越了总司令战略和战术能力的问题。

直到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进攻围有城墙的城市所要面临的这些问题才得到解决。那时人们已经可以使用大炮把城墙一下子轰上天。东方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历时50多天的攻防战后陷落了。可是，腓特烈生活在距此200多年前的时代，那时还没有装填火药的轰击型大炮。

进攻周围全部用深沟高墙围绕的城市，与进攻靠沟壑和石垣护卫的城堡可不一样。

不论是欧洲还是东方，中世纪的城市内部必定建有要塞。建要塞的目的在于即使城墙被攻破，敌人侵入城内，防守方最后还可以躲在要塞里继续战斗。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天守阁[4]。不过，这种要塞周围既没有护城河，也没有城墙。米兰、布雷西亚的护城河和城墙都是环绕全城的。日本没有这种建城概念。德川在关原获胜[5]后所进攻的只是城堡本身有护城河和石垣保护的大阪城堡及其附近地区，而不是大阪全城。也就是说，德川进攻的只是丰臣方面的“要塞”，所以短时间便可以攻陷。

进攻布雷西亚的腓特烈十分了解这些情况。他没有仅仅封锁住通往贝加莫的道路就在布雷西亚城下悠然地过起帐篷生活。

他用种种手段寻找机会，把布雷西亚的士兵引诱到城墙外边，以便在平原上作战。他取得了一次成功。一些布雷西亚士兵上了当，被等在城外的皇帝军队全歼，没有一个士兵逃回城里。

但这次成功让布雷西亚人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一点。这一点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许就是专守防卫。他们决定接受科特努瓦之战的教训。如果他们出城与腓特烈作战一准是输。他们决定，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腓特烈如何叫阵，绝对不越出布雷西亚的城池一步。皇帝不得不面对钻进洞里坚守不出的敌手。

这个敌手虽然躲在城里不出，但却不会老老实实地待着。他们把抛石机在城墙上一字排开，把石块抛向一排排帐篷。士兵连在帐篷里睡觉也不那么容易了。

让进攻方烦恼不已的是，米兰通过贝加莫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援助布雷西亚的物资。布雷西亚拼了，米兰更是豁出去了。如果布雷西亚陷落，米兰就完全孤立了。一旦意大利北部全落到了皇帝手中，米兰人再

怎么夸口拥有9万人口，也说不出“宁愿战死沙场，也绝不死在绞刑架下”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一来二去之间，7月过去了，8月也过去了，连9月也接近了尾声。布雷西亚地处意大利的最北部，10月下旬就要进入冬季。如何过冬的问题摆在了腓特烈的面前。他不能在寒冬里把士兵们钉在意大利北方的荒郊野外。可附近没有可以收容15 000名士兵过冬的城镇。如果强迫他们在意大利北方过冬，说不定会把近两年好不容易归顺自己的自治体再次逼回同盟方。意大利北方人没有热情到喜欢收容别国士兵，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数量。

10月10日，在开始攻城后的第三个月，皇帝撤除了进攻布雷西亚的阵地。解散命令发出后，城墙上挤满了布雷西亚的市民，围城军队在市民的骂声中各自回国去了。皇帝和他手下的将领们前往克雷莫纳。进攻布雷西亚明显失败了，皇帝需要重新制定的战略。腓特烈的敌人是同盟方，而这些敌手都已知道“出城必败，坚守不出便能赢敌”。

没有史料记录腓特烈是如何接受这次失败的。再过两个月他就44岁了。在此前的生涯中，他总是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屈辱的滋味，不会没有苦涩。

历时3个月布雷西亚进攻战结束了，没有任何效果。如果这场战役的总指挥不是腓特烈皇帝，而是狮心王理查，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历史才会允许这样愉快的空想。

对理查令人愉快的勇将风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十字军的故事》第三卷。作为那部书的作者，我在想，如果是理查，他肯定会想出什么妙计来解决战斗，那些方法连敌将萨拉丁都会佩服不已。也就是说，无论理查采取什么方法，他都会取胜。相比之下，腓特烈也许不是一个“武将”，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不过，狮心理查虽然是一个特别高强的“武将”，但却根本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像一个交响乐指挥家

“武将”和“政治人物”的区别，我想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武将与一个优秀的统治者的区别。以音乐为例，那就是独奏者与乐队指挥家的区别。

皇帝腓特烈二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位“交响乐指挥家”。追踪他的所作所为，我越发觉得，他能够同时考虑并处理诸多事项。研究家有义务逐一详述这些事情，但这样做就会无法表现出叙述历史所必不可少的线条。所以我会删繁就简，比较简略地写来。同时代的其他皇帝和国王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型的人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只能认为腓特烈一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他在中世纪后期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异的存在。

品味一下腓特烈作为“指挥家”的部分风采也并非浪费时间，这可以起到反映中世纪时代风貌的作用。我想在这里罗列一下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后思考了什么，又是如何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

意大利北方对策

进攻布雷西亚3个月以后退兵，这当然给以米兰为头领的伦巴第同盟增添了气势，但危险还不止于此。已经倒向皇帝一方的原同盟方自治体开始动摇了。挽回并消除这一事态是腓特烈的当务之急。他的应对办法是让配备在各地的军事力量进行监视。

腓特烈把意大利的西北部交给了已进入皇帝阵营的萨伏依伯爵和以前就是皇帝重臣的兰齐亚家族。

在意大利中北部，腓特烈以当地皇帝派大本营克雷莫纳为基地，他让比自己小两岁的刚刚崭露头角的武将乌贝托·帕拉维奇诺镇守此地。

腓特烈把监视意大利东北部的任务交给了以维罗纳为根据地的同辈人埃泽里诺·达·罗马诺。此外，腓特烈庶出儿子中最年长的恩佐已经到了可以正式上阵的年龄，腓特烈要求他在这些老将的手下积累经验。腓特烈有意让22岁的恩佐负责意大利北方全境。

这些安排取得了成果，获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成功，并没有发生倒向皇帝一方的自治体又像雪崩一般回到米兰方面的情况。

德意志对策

康拉德虽然年方10岁，但却是皇帝嫡出的长子，还是德意志王。德意志派来了以他为先锋的军队，却从一个地方城市布雷西亚撤退了。腓特烈大概已经预测到了皇帝的威信在德意志难免会因此跌落，他没有忘记在撤退后不久便以树立康拉德的形式再次强化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组织。不过，腓特烈这是有些担心过头了。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诸侯也生活在中世纪，他们也能体会到进攻有城墙围绕的城市有多么困难。他们自己平时也热衷于加固城墙。

欧洲对策

派来援军的英国、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的国王在布雷西亚失败后也没有改变对皇帝的态度，他们也为这种隔着城墙的战斗而苦恼。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连续写信的策略，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开情报的方法。这是在与罗马教皇正面对决时让他们站在自己这边的最好办法。

蒙古对策

这个时期，蒙古对欧洲的入侵愈演愈烈。从亚洲涌来的这个威胁使位于欧洲东部的波兰和匈牙利陷入了困境。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面与这两个国家接壤。波兰和匈牙利国王前来求救，腓特烈派去了援军。腓特烈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他拥有俗界的最高地位，帮助受到以蛮勇闻名的亚洲异教徒进攻并陷入绝望的基督教徒，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清楚他派去的军队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插足欧洲的蒙古暂时被成功击退了。

伊斯兰对策

腓特烈还得操心遥远东方的事情。

那年，埃及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去世，他是中近东最大的实力人物，也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腓特烈的谈判对手。他与腓特烈之间缔结的媾和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到期。对此，腓特烈也放心，他派出一位意大利南方出身的家臣代表皇帝前去吊唁并祝贺新苏丹即位。在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条约中写明，如双方均无异议，10年的媾和期将自动延长。他派遣使节的真实目的当然在于要新苏丹确认这一条。新苏丹平日里总是听到父亲阿尔-卡米勒对腓特烈的高度评价，所以毫无问题地承诺了一年后续订媾和条约。

这就让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十字军国家领土上的基督教徒在过去10年的基础上又得到了10年的和平保障。对中近东生活在被伊斯兰教徒包围中的基督教徒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顺便说一句，基督教世界在10年后打破了这个状态，腓特烈在那年去世。

罗马教皇对策

腓特烈与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良好关系，但他作为基督徒却说不过去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得知进攻布雷西亚失败后一下来了精神。当初他在知道腓特烈在科特努瓦获胜后，不见了平时的强势，一下子蔫掉了。时隔一年，他大概觉得终于轮到自己出手了，来了勇气。腓特烈的失败就是格列高利的喜悦，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格列高利没有喜形于色，他打算居间消解皇帝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对立，以中间人的地位达到自己回归第一线的目的。

这个时期，腓特烈失去了与教皇交涉的最佳人选。平时，腓特烈总是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与教皇交涉，现在他病倒了。

赫尔曼出身德意志贵族，这时已经60岁了。他是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原本是教皇方面的人。可他一直站在皇帝一边。赫尔曼离开了以教皇为对手的外交最前线，这不啻为腓特烈的一大损失。皇帝把病倒的赫尔曼送到了萨莱诺。那里靠近那不勒斯，有一所被认为中世纪欧洲水平最高的医科学校，学校有完善的附属医院。

赫尔曼离开第一线不仅仅是对皇帝的打击。从罗马教廷整体利益的视角来看，对教皇格列高利也是一个打击，只是格列高利似乎没有理解个中意义。

赫尔曼的作用是一道富有弹性的墙，隔在企图打倒对方、动辄拳脚相向的皇帝和教皇之间。有赫尔曼挡在中间，皇帝打出的拳头不会直接落到教皇身上，而教皇挥出的拳头也无法直接打到皇帝身上。

格列高利教皇得知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离开了战场，认为这是收回对皇帝交涉主导权的大好时机。按基督教的方式来说，这是把误入歧途的皇帝拉回到正确道路的大好时机。

教皇没有任命枢机主教、大主教等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做面见皇帝的特使。他任命了身份不过是一介修道僧的埃里奥·达·科尔托纳。不过此人受圣方济各之托，成为方济各会的第二任会长。当时他的年龄是58岁。教皇期待他面对44岁的腓特烈时，能够挺起胸膛主张教皇的说法。

然而，这位修道士却一去不回。教皇得知后雷霆震怒，把他逐出了圣方济各会。

这位修道僧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科尔托纳，所以被叫做埃里奥·达·科尔托纳，意为来自科尔托纳的埃里奥。圣方济各派里很少有人潜心修习学问，而他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这实属罕见。可是，他毕业后没有走这所大学为毕业生铺就的成为高级神职人员或法学家的道路，而是自愿当了一名修道僧。在今天的小镇阿西西，献给圣方济各的教堂已然成了镇中之宝，埃里奥这位教堂的最初建设者也广为人知。同纯粹而富于理想的“创业者”圣方济各相比，他也许是理智而现实的“第二任”会长。

他与腓特烈见面后便彻底成了腓特烈的一位拥趸。研究家说，埃里奥本身就是一个现世的野心家。但他真的仅仅为此便会甘冒被逐出修道会的风险吗？一年以后，腓特烈被开除了教籍，他也一并被开除。当初他既没有当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有去做法学家，而选择了做一个修道僧的道路。这样的人会甘愿承受如此的重罪吗？

细想起来，我认为被奉为中世纪后期的巨人、文艺复兴先驱的圣方济各和腓特烈皇帝并不像罗马教皇所认为的那样另类。

阿西西的方济各始终提倡回到耶稣时期的基督教。腓特烈皇帝一直主张回到耶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状态。方济各曾经与第五次十字军同行，向阿尔-卡米勒游说和平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成功。而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与那位阿尔-卡米勒成功媾和，实现了和平。研究家一直在拼命探究，这两人年龄只相差12岁，

又同样生活在意大利，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可时至今日没有发现足以证实这个观点的史料。

不过，假设他们见过面，我想他们会超越修道僧与皇帝的地位而相互产生共鸣。这种共鸣至少要比格列高利的多，这位教皇坚信不疑地认为“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圣方济各把建设自己所创修道会的后事托付给了埃里奥·达·科尔托纳，而正是这位圣方济各的接班人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叙述了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以后同时处理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他一直留在意大利北方。皇帝就在现场，这本身就是对同盟方的无形压力。

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卧病于萨莱诺，一去不回的修道僧埃里奥既没有回阿西西，也没有去罗马，而是一直待在了皇帝的身边，这使教皇的怒火更旺。在这样的状况下，1239年来到了。

第三次开除教籍

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是基督诞生祭和复活祭，一般称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圣诞节确定在12月25日。但因为规定复活节要在礼拜日庆祝，所以复活节的日子每年都在变化。历史史料中记录某某年复活节的，要多于记录具体日期的情况，为此人们还制作了记载每年变化不定的复活节日期的一览表。根据史料，1239年的复活节是3月27日。对基督教徒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庆祝耶稣复活的礼拜日。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世纪，复活节前三天的礼拜四是公布受到开除教籍处分人员名单的日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要在排除罪人后再来迎接神圣节日的缘故。可能还是这个原因，“礼拜四”也是公布教廷规定基督教徒禁止阅读的书籍及其

作者名字的日子。

1239年3月24日，这一天是基督徒所称的“神圣的礼拜四”。在位于罗马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正门上醒目地贴出了教皇诏书，内容是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皇帝腓特烈二世处以开除教籍的处分。

在那个时代，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的事并不罕见，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都各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但这是腓特烈第三次被开除教籍，三次都是被教皇格列高利开除的。

教皇诏书所叙述的开除教籍的理由从对教皇不够尊重开始，罗列了一堆老生常谈之事。而且每次都会宣布，与被开除教籍者有关人等也被开除教籍，被开除教籍之人所到之地都要受到禁止教务的处分，因为努力排除这些罪孽深重者是每个本分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义务。

如果理由仅此而已，那便与普通的开除教籍并无二致了。但这次挥舞这个只有罗马教皇才拥有的武器之人是被现代英国研究家叫作“睚眦必报之人”的79岁老者。在罗列了通常开除教籍的理由后，他又列举了以下理由。

教皇首先旧事重提，回溯了第六次十字军之事。他说腓特烈一再拖延后终于出发远征，却又以瘟疫流行为由撤了回来。他还说腓特烈指使他人杀害了从德意志前来参加远征的图林根伯爵，谎称伯爵死于瘟疫，再次拖延出发。这不仅不被允许，而且是犯罪行为。

教皇诏书继续写道：

皇帝扬言，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是人类产生的三大骗子，说圣母马利亚是否为处女也值得怀疑，他还嘲笑基督教。皇帝的这种态度，只能表明他是“反基督”的。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的说法，根据这些理由开除腓特烈皇帝的教籍，

对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教皇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腓特烈在平定意大利北方时的基地之一帕多瓦得知自己被开除教籍，当时正是庆祝复活节的高潮。同一天，他还接到了赫尔曼在萨莱诺去世的消息。这位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二十载的人去世了。但这并没有迟滞腓特烈的行动，他立即开始反击。

开除教籍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乱用就会降低效力。所以对原来就是自己一方的人使用没有多大效果。可是，不论开除教籍的理由是什么，光是被开除教籍就有被敌人利用的风险。而且，还会让那些非己非敌但却自认为是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的善男信女产生动摇，因为“反基督”就是“基督的敌人”。

腓特烈动员了比平时更多的书记员和递信员，写了反驳的信件，对教皇开除他教籍的理由逐一进行了反证，并把信件送给了选举并辅佐教皇的机构枢机主教团，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送给教皇。此外，腓特烈还使用了他惯常的做法，大量复制反驳信件，送往全欧洲的国王和实力诸侯手中。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就此罢手。

教皇格列高利把写有开除皇帝教籍的教皇诏书贴在了意大利所有城市主教堂的大门上，而皇帝则把反驳信贴在了通常位于主教堂对面的市政厅大门上。如此一来，不光是枢机主教和王侯，就连普通老百姓，只要穿过广场也都能够看到教皇开除皇帝教籍的诏书和皇帝对教皇的反驳信。想到这中世纪方式的信息公开，我不禁莞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格列高利挥剑而来，腓特烈则仗剑相向。

腓特烈的措施取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成功。枢机主教团分裂了，一部分人赞成教皇的做法，另一部分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开始认为是教皇冒进了。教皇与皇帝的正面冲突已经表面化，欧洲的王侯们对此感到担心，希望教皇三思而行的人占了一多半。此外，腓特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的祖国是德意志。德意志还是封建社会，只要封建诸侯坚

持支持腓特烈，德意志便不会有问题。

腓特烈的自家领地意大利南方离罗马很近。教皇可没那么心慈，认为单靠公开信息就足以对付意大利南方人了。他已经派说教僧进入意大利南方，开始了反皇帝的宣传活动。

腓特烈采取了强硬政策对付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合二为一的“西西里王国”的老百姓。他把教皇派进来的说教僧驱逐出境。可那并不是单纯的驱逐出境，他把说教僧集中起来装到船上，送往耶路撒冷。把他们逐出意大利时，腓特烈还给了他们一份皇帝文书，说在圣地他们便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了。对教皇的讽刺也算到位了。

也许是这些措施见了效，在腓特烈的领土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开除教籍所带来的危害成功地减到了最小。但意大利北方却并不如此。有几个自治体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教皇诏书依旧张贴在主教堂的大门上，而贴在市政厅大门上的皇帝反驳信却一大早就被撕毁。

为了把意大利北部的这些自治体拉到自己一边，腓特烈这次毫不犹豫地动了武。他派去了一队士兵，进攻并烧毁了为这些城市“输血”的郊区农村地带。得知帕尔马又重新开始与米兰联系之后，皇帝亲率军队突袭帕尔马，成功扑灭了尚未燎原之火。这一年很快过去，腓特烈甚至没能腾出时间回一趟意大利南方。

转年到了1240年。对70岁的教皇和45岁的皇帝而言，这又是激烈动荡的一年。

教皇对开除皇帝教籍的效果不大感到失望，对派去的说教僧被驱逐到耶路撒冷感到愤怒。根据编年史作者们的说法，教皇完成了一项“奇迹”，他与腓特烈多年的宿敌热那亚和威尼斯达成了一致，联手从海上进攻“西西里王国”。

作为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主人公。这两个国家都靠贸易立国，通过贸易把异教徒的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同行，但也因此在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地方存在利害冲突。

威尼斯共和国巧妙地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成功地把被推翻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了自己的一大贸易基地。这意味着1204年以后威尼斯在东方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热那亚共和国当然不想这样下去。他们企图通过搞垮起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威尼斯援助的拉丁帝国来挽回自己的不利。

这两个国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代表，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限于地中海的海上。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它们都是竞争对手。这样的两个国家统一了步调，只能说是奇迹。威尼斯承诺派出25艘加莱船，热那亚知道后也承诺派出同样数量的加莱船参战。

腓特烈立即察觉到了这个联合所带来的危险。组成“西西里王国”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都为海洋所环绕。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将联手进攻这里。但是腓特烈也有海军。

使者飞奔南方，命令海军提督进入临战状态。准备迎击敌人的命令同时也发向王国的所有海港城市。完成陆海迎击布防并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另一方面，尽管热那亚和威尼斯决定共同作战，但一直没有进展。以前的宿敌关系难以轻易消解，但这并不是理由。两个国家不仅是船舰之国，也是商人之国。他们不需花费多少时间就能想到，跟教皇搞在一起以皇帝为敌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理由。但约定就是约定，他们开始从海上发起了进攻。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联合行动，而是各自为战，消极进攻。结果，教皇的想法所带来的奇迹昙花一现地完结了。

教皇格列高利再次绝望。他只好决定召开公会议，在会上谴责皇帝为异端，剥夺他的帝位。教皇的邀请函送到了全欧洲的高级神职人员手中，通知将于第二年1241年的复活节召开公会议。

然而，要剥夺腓特烈的帝位需要事先找好替代他当皇帝的人。这个人要把拥有武力的腓特烈拉下马，没有军事力量是不行的。教皇派特使去找法兰西王，要让王弟阿图瓦伯爵当皇帝，要求法兰西王把军事力量交给弟弟。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那年25岁，与腓特烈一直关系良好。他根本不想撕毁祖父腓力二世年轻时与腓特烈缔结的德法互不侵犯条约。这位法兰西王给教皇的回复是：拒绝。但路易并没有禁止收到邀请的法兰西高级神职人员前去罗马，参加第二年的公会议。

公会议原本是以主教、大主教为主的高级神职人员应教皇之召聚集一堂，讨论基督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达成统一见解的会议。王侯们也会派自己的代理人参会，但他们毕竟只是观察员，不参与讨论和起草形成统一见解的工作。公会议在中世纪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中称为“Concilium”。会议集合以指导各地信徒为业的神职人员，商讨基督教徒的信仰、伦理和纪律等方面的议题，通过作为信仰规范的正式见解。这就是说，公会议应该只讨论宗教问题，而不能把讨论非宗教人士皇帝的去留作为议题。

但是，按照格列高利教皇的想法，腓特烈一事可以顺利地成为公会议的讨论议题。正是这位教皇，在10年前的1232年设立了异端裁判所。

“异教徒”（paganus）与“异端者”（haereticus）不一样。异教徒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而异端者则是与自己信仰同一宗教，但信仰方法错误的人。“异教”和“异端”用于这样的意义，是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的事情。这两个词可以反映出中世纪在宗教方面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

在创立了异端裁判所的格列高利教皇看来，腓特烈是彻头彻尾的异端者，排斥他是可以在公会议上讨论的议题。格列高利知道，将于第二年复活节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召开的公会议上，仅仅开除腓特烈的教籍是达不到目的的。

格列高利教皇就是赌上罗马教皇的权威也要让公会议绝对成功。为了不让收到邀请的主教们以经济上的理由拒绝参会，教皇通知他们，不但免除从乘船地点热那亚到罗马外港奇维塔韦基亚的船钱，就连出席公会议期间在罗马的住宿费等也都由教廷全额负担。既然腓特烈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派人参会的希望渺茫，教皇也就只能指望法兰西、英吉利和西班牙等地了。为此，他打算支付船钱，为他们做什么都行。

不过，这些地方距离遥远，要走完这迢迢之路来到热那亚，在那个时代确乎不易。1241年3月31日是复活节的日子。到这天为止抵达罗马的人数令人绝望。尽管如此，格列高利教皇召开公会议的决心并未改变，大主教和主教们只好前去热那亚。

4月25日，欧洲各地会集到热那亚的高级神职人员终于全部上了船。热那亚为了把这批重要客人送到罗马，准备了一支30艘的船队。为了不让皇帝方面察觉，所有船只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离开了港口。凌晨，港口上还不见人影，船队便出发了。除了相关人员以外，这件事便再无人知晓。然而，事情还是被察觉了。

与竞争对手威尼斯不同，热那亚共和国内部各派的斗争从未间断。国内的四大家族总是分裂成两派，两两一派，循环往复地上演着驱逐和被驱逐的闹剧。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是教皇派，与之敌对的多里亚和斯皮诺拉站在皇帝一边。这个时期的热那亚紧跟教皇，是因为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联合执政的原因。热那亚内部当然会有人暗通多里亚和斯皮诺拉这两大家族。

梅洛里亚海战

腓特烈肯定是在格列高利教皇宣布把北欧的主教也召到罗马参加公会议的时候，决定用实力说话的。这里的诉诸实力，就是在半道上俘获那些从热那亚南下罗马的出席公会议的参会者。不过，皇帝已经不需要密探跑来秘报这批人已经离开热那亚的消息，皇帝甚至也不需要在得到消息后向海军司令下什么命令，因为他已经周密部署了作战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作战由西西里王国海军实施，皇帝派的海港城市比萨配合。西西里海军司令已经率领由适合海上战斗的窄体加莱船组成的船队在比萨港待命了。皇帝只需将参会者船队离开热那亚港的消息送至在比萨待命的司令即可，这个消息便是他立即出战的信号。教皇和热那亚对这个作战计划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皇帝和比萨联合舰队的规模如何。但这次战斗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精锐军队的速战。所以，哪怕舰队在数量上不敌30艘热那亚南下船队，肯定也是由被称为快速加莱船的窄体船组建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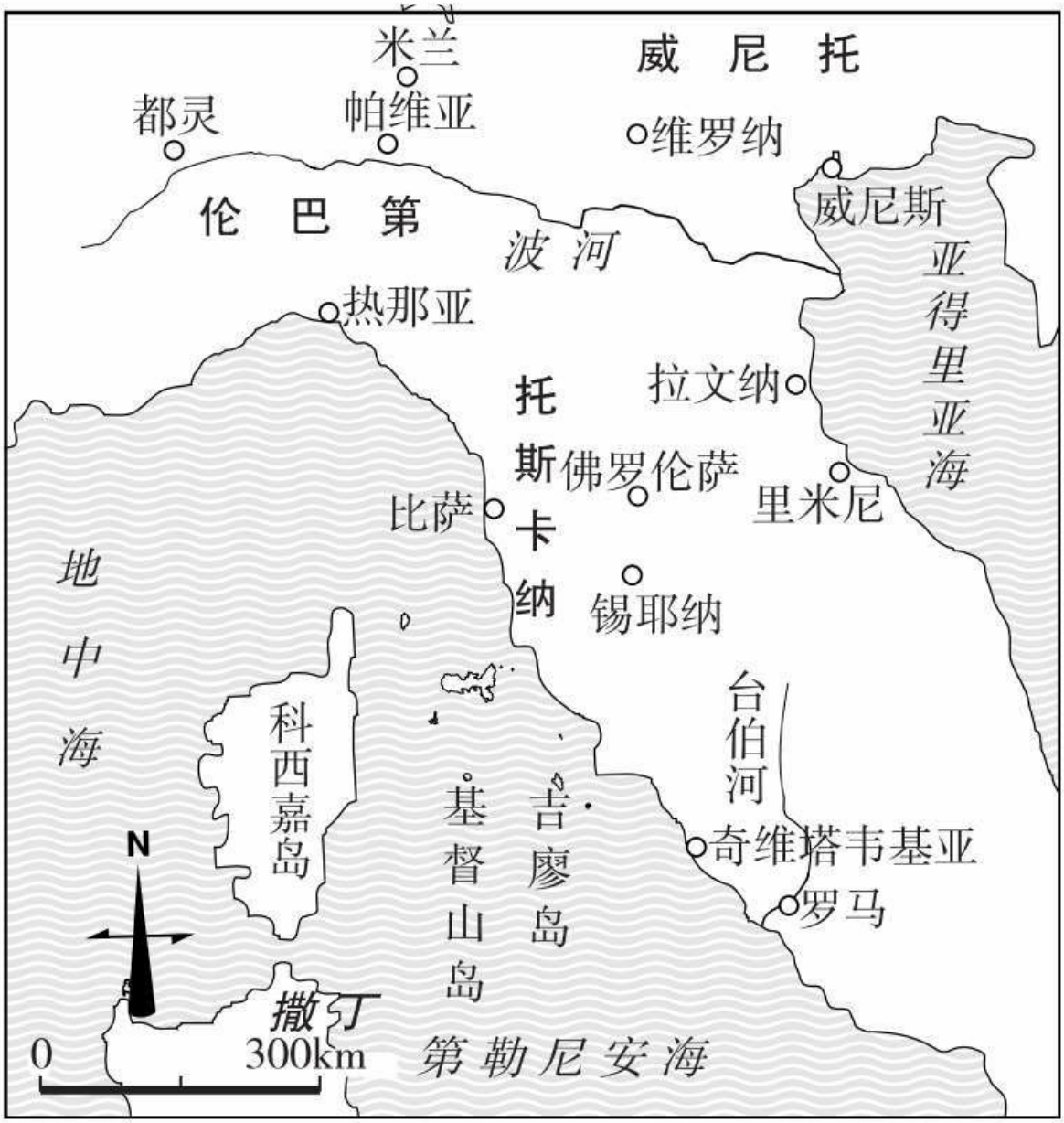
而从热那亚离港的30艘船中帆船似乎占了一半数量。高级神职人员平日里惯于养尊处优，不喜欢乘坐住宿条件较差的加莱船。不过，热那亚还是配备了数量足以应付小规模海战的加莱船护航。

4月到5月间是第勒尼安海最适合于游艇航行的季节，经常是天气良好，微风轻拂。船儿从热那亚南下，惬意地航行在海上。在比萨港待命的皇帝舰队先把远处海面上南下的30艘船放了过去，让他们航行到逃不回热那亚的距离以外。通过热那亚送来的情报，皇帝舰队还了解到，教皇船队里有一半是行动不便的帆船。

待教皇船队走完四分之三的航程时，皇帝和比萨的联合舰队开始出动。他们充分利用快船船队的长处，全速追击。在吉廖岛和基督山岛中

间有一座名叫梅洛里亚的无人岛。皇帝舰队在这座小岛附近的海域追上了教皇船队，并且形成了皇帝海军在前堵截，比萨海军在后追击的局面。

海上作战的基本战术是，一旦开战，就要降下船帆，靠划桨来灵活行动。自然是由加莱船，尤其是窄身加莱船组成的皇帝和比萨的联合舰队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



第勒尼安海及其周边

5月3日，这场历史上以“梅洛里亚海战”[6]而闻名的战斗在仲春的海上开战，结果以教皇船队的惨败而告终。对一向自认为拥有地中海头号控船能力的热那亚汉子而言，这简直就是耻辱。

派去的30艘中有3艘沉没，22艘被俘获。逃回热那亚的船只，连同司令乘坐的那艘在内，总共只有5艘。

4 000人成为俘虏，其中400人是以大主教和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败北一方的死亡人数不详。而获胜方的损失极小，编年史中写的是“数量不足为记”。不过，即便不足为记也会有少量伤亡，牺牲的只是人员，而没有损失一艘船。战败方的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死一个，反映出腓特烈“抓活的”的命令得到了彻底贯彻。

捕获的人和船被带到了比萨。腓特烈的儿子、25岁的恩佐迎接了成为阶下囚的高级神职人员。恩佐不仅是出众的美男子，还以举止有品位而闻名。他一定不会怠慢这些神职人员。热那亚的船员们在比萨过起了牢狱生活。而皇帝下令将这多达400名的神职人员押送到意大利南方。命令得到了忠实的执行。

这些人收容在分散于意大利南部各地的城堡之中。梅尔菲城也是其中之一，城中一隅留下了他们被禁闭的痕迹。那是围着中庭的一串小房子，而不是地牢，环境并不使人感到不快。腓特烈此次诉诸实力的目的是阻止召开公会议，这些人都是要出席会议的人，只要把他们捉住隔离起来也就足够了。

梅洛里亚海战将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一网打尽，使整个欧洲胆战心惊。皇帝原本的任务是捍卫基督教，现在却胆大包天地公然挑战教皇。在欧洲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眼前，皇帝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公会议泡汤了。教皇要求皇帝释放被抓捕的高级神职人员。我们不知道皇帝是如何回应教皇的。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教皇只是给已经成为阶下囚的高级神职人员不断写信，安慰和鼓励他们。腓特烈并没有扣压或检查这些信件，他对这种只看一时的做法不屑一顾。

在另一方面，腓特烈在这个时期迈出了意义更大于梅洛里亚海战的决定性一步。他开始公然入侵被称为“圣彼得的资产”的历代罗马教皇所拥有的教皇领土。

《君士坦丁献土文献》

在现代，很多人听到罗马教廷领土一定认为那是指“梵蒂冈城国”[7]。然而，罗马教皇具有统治权的地域缩小为只限于台伯河西岸狭长一隅，只是近150年来的事情。在那以前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罗马教皇是基督教徒在宗教上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同俗界领主一样，一直拥有自己的领地。

当然，他们有这样做的名分：要维持信徒的福祉、慈善和诸般事业就需要有经费。为此他们已经征了“什一税”，人们要将相当于收入十分之一的金额缴纳给罗马教廷。这项制度在中世纪被认为理所当然。此外，教廷还有宗教组织经常都会有的捐赠和遗赠收入。总之，大本营位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宗教团体，即使不劳作也无断收之虞。

不过，中世纪的“祈祷的人”似乎认为光有这些还不够。他们在这方面主张的根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献土文献》。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之一，他于公元313年发布

《米兰敕令》，这使他以第一位承认基督教的皇帝为世人所知。不过，西欧基督教世界称他为“大帝”，可见他所做的并不止这一点。他还建起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大教堂。此外，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和罗马是五座基督教会的主要城市，罗马主教不过是这五座城市的主教中的一位。但这位皇帝决定置罗马主教于其他四城市主教之上。从那时开始，只有罗马主教才被称为罗马教皇。在我看来，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这位皇帝的所为是颇具疑义之事。但天主教会一直确信如此。

问题在于《献土文献》。手中掌握着罗马帝国一切的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7年去世。这份文献明确记载了他在死前16年（公元321年）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赠给了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8]。

根据这份文献，罗马教皇成为整个欧洲的合法“所有者”。在握有这个后盾的教皇看来，皇帝、国王、诸侯统统不过是合法所有者罗马教皇委托的统治人而已。所以，在委托人认为不合适的时候，皇帝也好，国王也好，诸侯也好，罗马教皇都有“解雇”他的权力。简而言之就是，教皇是“房东”，王侯是“租客”。

实际上，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屈服于开除教籍的威吓，而向罗马教皇发誓自己只是作为教皇的臣子统治国家者不乏其例。教皇拿出皇恩浩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献土文献》摆在面前，基督教徒是无法反对的。在罗马教皇的眼里，英吉利也好，法兰西也罢，还是西班牙，或者是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这些统统都是自己的领土。正因为如此，才有“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一说。至于国王诸侯之类，也就是些“星星”而已。不管是皇帝、国王，还是强大的诸侯，只要不合心意，教皇都可以收回他们的领土。这只是教皇行使正当权利而已。

这就是1 000多年以来基督教会所拥有的束缚欧洲王侯最厉害的武器，开除教籍不过是剥夺地位的事先警告。

即使在中世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怀疑过《君士坦丁献土文献》的可信性。大帝捐赠的如果是教堂、修道院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整个欧洲情况就不一样了。君士坦丁皇帝是平定欧洲的人，是他在付出千辛万苦之后才再次平定的罗马帝国。在没有看到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在47岁这生龙活虎的年龄，这样的人会下决心把自己刚刚平定的帝国的西半部全部捐献出来吗？腓特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了意大利北方。我觉得，他也是怀疑《献土文献》真实性的人。

但是，怀疑与否定并不是一回事，否定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生活在中世纪的人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直到1440年以后，《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才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侍奉于那不勒斯宫廷的人文学家洛伦佐·瓦拉[9]采用考据学方法证实了那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文献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只有通过收集、研究各个时代形成的文献，才有可能准确客观地理解文献中使用的语言。采取这种方法，人们可以知道文献中使用的语言写于什么时期。

洛伦佐·瓦拉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证实了《献土文献》中所使用的语言不是文献成文时的4世纪所用的拉丁语，而是11世纪以后的拉丁语。他揭示出了君士坦丁大帝根本没有把欧洲全部捐赠给教皇的事实，记载捐赠的这份文献是11世纪由罗马教廷的某人所炮制的伪作。这时距离君士坦丁大帝之死又过了700年。

对久远以来一直被信为权威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以及用实证主义来澄清这种怀疑正确与否，这些都是文艺复兴精神最重要的特质。长期以来一直用以威胁欧洲王侯的《献土文献》被证实纯系伪造，表明欧洲已经在15世纪彻底走出了中世纪。

不过，教皇格列高利向皇帝腓特烈出示《献土文献》是13世纪的事情，200年后的15世纪才证实了这一文件是伪作。腓特烈皇帝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即便怀疑，他也拿不出证据。

从炮制到被证伪时间长达400年，这期间人们竟然一直认为那份文献是真实的存在，这令人很惊讶。一旦相信便不再怀疑，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还有些人即使确凿证据摆到面前也会认为情况不实，因为他们自己强烈认为那不是事实。《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历代罗马教皇一直将其用作对付世俗王侯的武器，坚信那是真实的。而面对这件武器的王侯们，不管心里怎么想，多数人也都认为那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中世纪。

“圣彼得的资产”

可见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罗马教皇拥有领土理所当然。因而，即使教皇们想在自己居住的罗马附近拥有直辖领土，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反正《献土文献》已经承认了教皇拥有地上的，即世俗领土的所有权。

与委托给王侯统治的欧洲其他地方不同，教皇的领土在意大利半岛。即使实际上已交给了自己任命的官僚去代理，那里也是罗马教皇直接统治的领国。

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就是这样产生的，正式名称叫作“圣彼得的资产”（Patrimonium Sancti Petri）。这是因为历代罗马教皇都被认为是基督大弟子渔夫彼得的继承人。

从现代国家意大利的大区的角度来看，罗马教皇所拥有的这块俗界直辖领地，达及拉齐奥、翁布里亚、马尔凯和罗马涅四个大区。从罗马

向北，著名的城市阿西西、佩鲁贾、维泰博、安科纳、里米尼、博洛尼亚、拉文纳连成一串，其面积之大足可以把拥有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比萨等的托斯卡纳地区与意大利中部分割为东西两块。

这片“圣彼得的资产”北与自治体割据的意大利北方接壤，南部边境连接着腓特烈在意大利南方的领国。

这里是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的角色由历代罗马教皇担任。这里的内政并不因为由罗马教皇直接统治而在司法上有所宽大，税负也不低。这里总体上是农业地区，但因土地肥沃而并不贫困。

这里拥有古罗马时代就有的港口城市安科纳和拉文纳，还有博洛尼亚，这里诞生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此外，诞生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父亲同法兰西之间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这里完全不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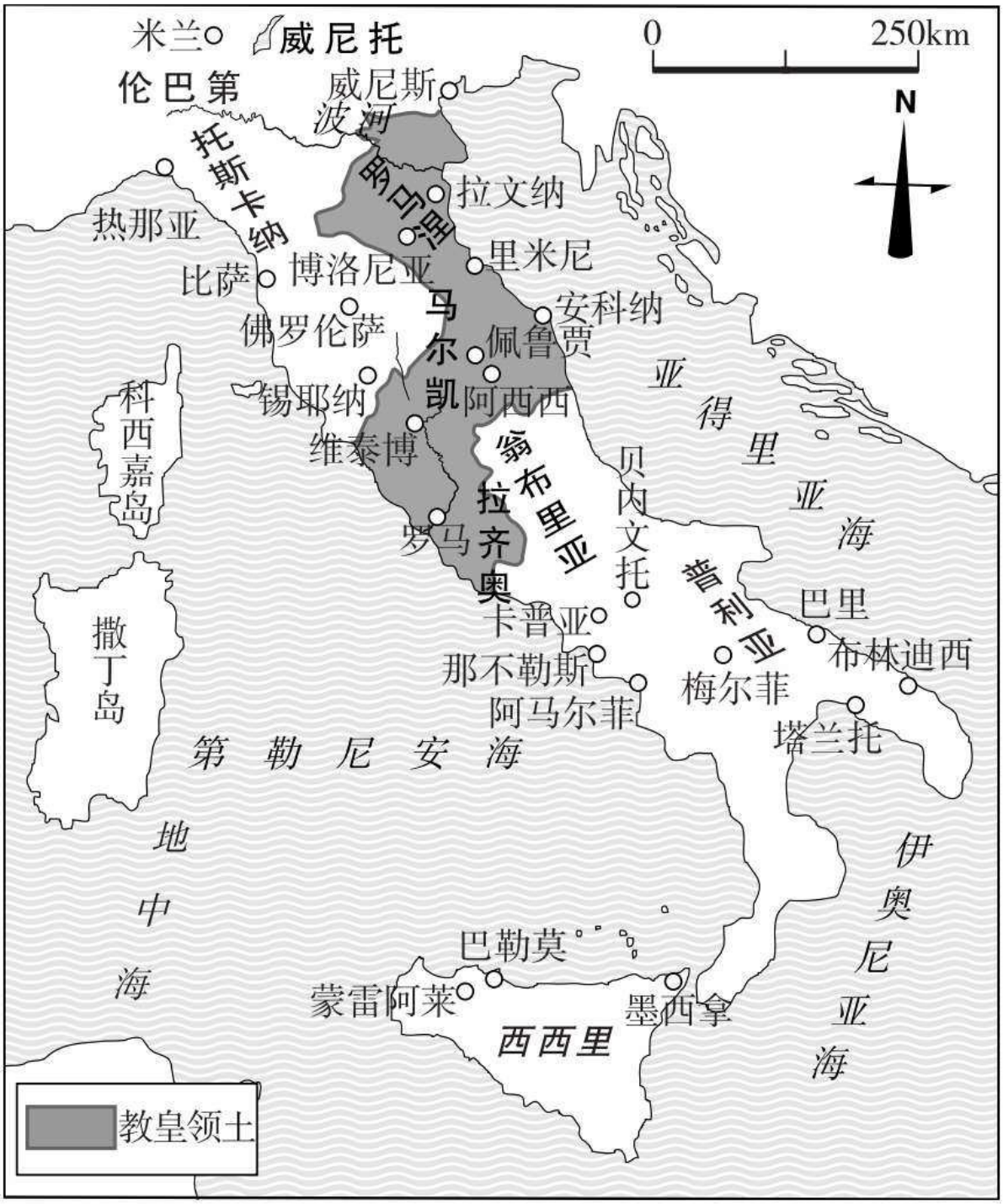
这里占据了意大利中部土地的一半，一直以“圣彼得的资产”之名处于罗马教皇的直辖统治之下。这样的岁月实际上长达1 000多年。

公元1870年，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之火燎原的形势之下，延续千年的教皇国寿终正寝。从那年开始，教皇领地缩小，只领有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城国。

然而，正是由于丧失了与世俗君主同样拥有的俗界遗产，罗马教皇重又回到了宗教领袖的原本地位。教皇也可以摆出一副面孔，说自己是耶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思想的继承人了。

在此630年以前，腓特烈便断然侵犯了“圣彼得的资产”。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将此视为是迈向政教分离的里程碑。当时更多的人都像罗马教皇主张的那样，认为这是被领土欲望驱使的皇帝对教皇领土的侵略，认为皇帝到底是入侵了神圣的教皇领地，在基督教徒眼里，这是不

容置疑的暴行。



意大利半岛和教皇国

在1241年整个一年里，腓特烈的行动可谓形形色色，多到无以复加。这一年，腓特烈46岁，他的组织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不论他自己身

在何处，怀里揣着他的命令驰马奔向各地的人数，有时一天超过百人。

首先是内政方面。要实施决定性军事行动，国内稳定最为重要。皇帝所谓的“国内”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在这两个国家的各个地方，腓特烈都在各个方面配置了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扎扎实实地实施符合他想法的政策。这是他的一贯做法，而在这一年里这个做法得到了彻底的遵循，自始至终处于良好状态。

同时，腓特烈也没有忘记外交。平时的信函外交这时也取得了成功。他已开始同罗马教皇正面对立，而法兰西和英吉利却仍在静观状态。同以前进攻意大利北方不同的是，他们这次没有派来援军。对腓特烈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军事分为防卫与进攻两个方面。关于本国防卫，在意大利南方，皇帝沿用了他的一贯做法，在明确了陆军与海军的职责以后，交给了各军种负责人去实施。在封建色彩浓厚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只需把事情交给不愿意自家领地遭到侵犯的诸侯即可。皇帝从南北两侧开始进攻教皇领土，各方责任明确。他在最前线及基地积极起用年轻人。

要想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责任明确和指挥统一这两方面必不可少。

腓特烈这一年在组织方面没有什么毛病。总之，他是一个出色的“交响乐指挥家”。

逼迫

“圣彼得的资产”遭到了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皇帝军队在将领们的率领下，像收网一般朝教皇所在的罗马攻来。

恐怖攫住了罗马的居民。人们认为是格列高利教皇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把教皇逐出罗马的呼声高涨。

格列高利教皇内外交困。5月3日皇帝打了梅洛里亚海战。这一仗阻止了公会议的召开。从那时起到现在尚不满3个月。皇帝对教皇的进攻战略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为速战速决。

腓特烈本人则在8月10日进到了位于罗马西面的蒂沃利。他于15日向南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格罗塔费拉塔。蒂沃利距离罗马30公里，而从格罗塔费拉塔到罗马，沿拉提纳大道前进只有13公里。教皇格列高利似乎已经无路可逃，但格列高利祭出了留到最后的唯一一件武器。

8月22日，教廷公布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去世的消息，享年79岁。全罗马所有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阴沉的钟声，连根据皇帝命令正向罗马城门逼近的先头部队士兵也听到了悼念死者的丧钟声。

想到日本的一则谚语“黄鼠狼的最后一个屁”[10]，我不禁莞尔。然而，被逼上绝境后祭出的非常手段居然取得了成功。

腓特烈已经打到了离罗马只剩13公里的地方，却下令全军撤退了。

腓特烈是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之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能攻入基督教世界神职人员之首教皇去世后的罗马。那条路与基督教徒该走的道路背道而驰。

罗马教皇首先是罗马的主教。对教区的居民而言，主教就是自己信仰的指路人。直到现在，罗马教皇还被称为“父亲”，对居住在罗马的人们而言，他还是顾问一般的商量对象。所以，即使教皇是外国人，人们也会要求他说意大利语。这么一位“父亲”去世了，罗马正在服丧。在这个时候进攻罗马，从做人方面来说是不能允许的。

腓特烈撤军了，返回了意大利南方自己的领国。他打算等到选出下

一任教皇，罗马居民服丧完毕再说。他一定没有想到，教皇皇位空缺的时间竟会达到22个月之久。

---

[1] 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1204—1261），第四次十字军于1204年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建立拉丁帝国，出逃的拜占庭贵族建立了尼西亚帝国、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Despotate of Epirus）、特拉布松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等流亡政权。拉斯卡利斯家族的塞奥多里一世于1206年称帝，建立尼西亚帝国，定都尼西亚（今土耳其以兹尼克）。尼西亚帝国主要在小亚细亚，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逐渐成为原拜占庭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国家，最终于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后尼西亚帝国的第4代皇帝约翰四世被大贵族米海尔·帕列奥列格所废，米海尔成为恢复后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帕列奥列格王朝取代了拉斯卡利斯王朝。

[2] 大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前236—前184），古罗马的将军、政治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在扎马大败汉尼拔，获“征服非洲者”（Africanus）的尊称。

[3] 伊苏斯、高加麦拉、坎尼、扎马、阿莱西亚均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名，当时曾在这些地方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4] 天守阁为日本近代的一种城郭建筑，是耸立于城堡中央的望楼。

[5] 关原在日本岐阜县西南与滋贺县交界处，古属美浓国。1600年9月15日，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与以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在此展开决定政权归属的大会战。东军获胜，家康确立了其霸主的地位。

[6] 这场发生于1241年5月3日的海战西方一般称为“吉廖岛海战”或“第一次梅洛里亚海战”，以区别于发生在1284年8月6日热那亚与比萨之间的“梅洛里亚海战”或“第二次梅洛里亚海战”。

[7] 梵蒂冈全称为“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是一个以教皇为君主的政教合一的城国，位于罗马城西北梵蒂冈高地，面积0.44平方千米，除东面圣彼得广场向外敞开外，周围有高墙与罗马城隔开。政权机构名为“罗马教廷”。梵蒂冈曾为教皇国的政权中心以及世界天主教中心。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教皇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陆续统一于意大利王国。1870年教皇仅据有梵蒂冈，但其主权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认。1929年梵蒂冈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并承认其设于罗马城内的某些机构享有治外法权，梵蒂冈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国中之国。

[8] 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t. Silvester I，？—约335），罗马教皇（314—335年在位）。传说中的罗马城主教。后世天主教会称其为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时的教皇。据传曾派代表参加尼西亚公会议。324年兴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圣乔万尼大教堂。

[9]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出生于罗马，研究古典文献，游历各地，供奉于那不勒斯宫廷。后在拉特兰圣乔万尼大教堂任圣职。他从文献学的角度证明了《君士坦丁献土文献》系伪作。瓦拉的工作揭穿了西方最著名的作伪，为新教改革势力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启蒙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怀疑精神。他指出了文献中语言和年代

的错误，继承发展了古典史学中的史料考证精神，为下一个世纪的文献校勘运动做出了范例。著有《论快乐》《拉丁语的优雅》《君士坦丁赠与的辨伪》等。

[10] 意为最后的一招，绝招。

间奏曲（intermezzo）

下面我要讲述的种种事情，并不是集中发生在教皇格列高利死后到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期间的事。无论是从他所处的立场，还是从他自身的气质来看，腓特烈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会同时做很多事情，乍看上去感觉这些事情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人们不可能用严格的编年方式来叙述他的一生。

皇帝与教皇的正面冲突已经发展到了对决阶段。而在格列高利去世到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时间中，这一对决事实上进入了休战状态。在这22个月内，腓特烈行动的频率也大幅减低。从46岁到48岁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大概成了他的休养时间。

在写腓特烈时，作者很难把他的很多事情一一插进编年式的叙述中去。因为这样一来，只有编年式叙述才能产生的“历史流动”便会停滞。因此，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把无法插进编年式叙述中讲述的种种事情做一个汇总叙述。由于这是以事件为线索的叙述，因而很多事件不是按时间的先后关系来叙述的。

女人们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被罗马教皇们视为理想的君主。他的女人，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王妃玛格丽特一人，多达10人的子女全由这位王妃一人所生。国王走到哪里就把王妃带到哪里，连十字军远征也会带上她。

而比路易年长20岁的腓特烈皇帝打仗时绝对不带女伴，此外的一切也与路易正相反。仅因为他生育子女而为世人所知的女人就有11人，这些女人所生子女共计有15人。

腓特烈只是按照政治结合和非政治结合把这些女人分为正妻和情

人，只要是他的女人便一律不加歧视。正因为如此，我不想把正妻和情人分开叙述，而是采用编年式的叙述方式。

路易九世与王妃玛格丽特

康斯坦丝出生于西班牙王族阿拉贡家族，14岁时嫁给了匈牙利王，第二年生了个儿子，5年后丈夫去世。国王死前把国政委托给了弟弟，约好等儿子长大成人再还政于王子。但国王的弟弟抢走了王位，康斯坦丝只好带着5岁的儿子逃到匈牙利的近邻奥地利公爵那里。可是，在这期间年幼的儿子夭折。康斯坦丝与中欧的缘分已尽，失去了安身之所。于是她又回到了西班牙，进了母亲创办的修女院。这位22岁的寡妇只能在此安身。

1209年，过了5年修女院生活的康斯坦丝再婚了。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决定让她结婚，对象是教皇监护的14岁的腓特烈。不过这个14岁的孩子可不简单。他不仅是拥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还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弄得监护人张皇失措。提婚的当年便举行了婚礼。14岁的新郎迎来了从西班牙沿海路在西西里王国首都巴勒莫登陆的康斯坦丝。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是基督教世界要隆重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他们在那天举行了婚礼。

两人在14岁和26岁上开始的这段婚姻似乎过得不错。26岁的康斯坦

丝已经饱尝过人生之苦，一定是她用她那颗温柔的心包容了年轻的丈夫。对于女人而言，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的男人要比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男人更容易应对，因为她只要一旁守望着丈夫即可。况且，腓特烈自幼成为孤儿，紧张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也许他在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妻子身上，找到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方法。1211年，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腓特烈用亡父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叫亨利（意大利语读音为“恩里克”）。

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到3年便中断了。1212年1月，德意志使节团来巴勒莫的王宫见腓特烈。撒克逊公爵奥托是这个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德意志的诸侯们对其不满。他们选中腓特烈做对抗奥托的候选人。这次他们前来邀请腓特烈去德意志，将这个选择变成现实。

这一年腓特烈已经17岁。康斯坦丝似乎反对丈夫前去德意志。但腓特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也绝不会错过如此的大好时机。

2月，他为自己不满1岁的儿子举行了西西里王国国王的即位仪式。罗马教皇忌讳让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成为一个人的领土。所以在出发去德意志以前，腓特烈需要表示一下，把西西里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3月，这位17岁的丈夫把统治西西里王国的事情交给妻子，自己出发去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

在此后4年的岁月中，康斯坦丝再也没有见到过丈夫。1216年，使节团来到她的身边，带来了丈夫的信，让她带着儿子去德意志。腓特烈命令使节团，务必让母子同行到德意志，原因是要让他们同去罗马参加加冕典礼。康斯坦丝只好从命。

1220年，教皇在罗马为腓特烈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腓特烈为此南下罗马，康斯坦丝随行。他们9岁的儿子还像是皇太子，但已经登上了德意志王位，因而只能留在德意志。从此以后，这对母子

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教皇在罗马亲手为腓特烈加冕，腓特烈名副其实地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康斯坦丝也接受了加冕，当上了皇后。不过，丈夫在加冕后天天埋头政务，席不暇暖，而等着妻子兼皇后康斯坦丝的只是南方岛国西西里安定平凡的日子。她在加冕仪式两年后死于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城，享年39岁。

因抛妻不顾而备受谴责的腓特烈得知妻子过世后，十万火急地回到了西西里。他事无巨细地亲手安排了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的庄严葬礼。康斯坦丝的遗体穿着象征皇权的红色丝绸服装，头戴皇后冠。她当上皇后时丈夫赠送的所有珠宝首饰同遗体一道入殓。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巴勒莫主教堂的珍宝馆中看到这些宝物。

腓特烈为妻子入殓的棺椁，是她以前就一直喜欢的古罗马时代的石棺。即使现在看上去，制作亦属精良。不过，她对基督教的信仰笃深。可以想象，用制作精美但一望便知是异教物件的石棺为她入殓，难免有好心办坏事之嫌。她的丈夫还让人在石棺上雕刻了文字："你的腓特烈"。我觉得，尽管13年过去了，但腓特烈对年长于己的妻子一直保持着当初结婚时的亲爱之情。

腓特烈仅正妻就有4人，连同情人，他有11位女人。但腓特烈只允许康斯坦丝一个女人在自己将来的葬身之所西西里王国首都的主教堂里建墓。因为只有她一人与丈夫一起接受了罗马教皇的加冕，是名副其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然而，妻子对基督教信仰笃深，腓特烈却很无所谓地选了一副异教时代的石棺入殓她的遗体，理由仅仅是制作精良。这只能让人惊讶不已。

让人吃惊的还不止这一件事。腓特烈17岁那年去的德意志，两年后就找了个情妇，她是德意志贵族乌尔斯林根家的女儿，名叫阿德莱德。在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的出生年份不为人所知，但这个女孩好像与腓特

烈同龄。12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下了儿子恩佐。

腓特烈清楚自己和正妻的结合是政治婚姻，所以她们的姿色并不是问题。不过，他所选定的情人似乎都是美女。因为没有历史记录表明他与正妻之间所生的嫡子面容俊美，但他与情人所生的庶子却个个都是美男子。其中比较突出的美男子是恩佐和曼弗雷迪两人。因而恩佐的母亲阿德莱德大约也是一位姿色姣好的女人。但是关于这个女人，人们只知道她为腓特烈生了两个儿子，至于后来生活在哪里、哪年去世都不为人所知。她之所以史上留名，是因为她是为腓特烈生了男孩的情妇。

既然采用了编年方式来写，下一个我要写的还是一位情妇，安提俄克的玛利亚。人们对这个女人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名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她是腓特烈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近东时，认识的某个安提俄克实力人物的女儿。但是我发现，不久后腓特烈就重用了这个女人所生之子。可如果按照上述说法，此时这个儿子的年龄过小。似乎还有一位研究家对此持有疑问。他调查的结果产生了另一种说法，认为腓特烈与这个女人认识于十字军出征以前，大约是他1220年在罗马加冕典礼后回到意大利南部差不多3年之后。玛利亚的娘家说是在安提俄克，其实是一个与叙利亚的安提俄克有关系的西西里诸侯。这个说法现已被认为最有说服力。中世纪后期，欧洲与东方的交流已经相当密切，这也是十字军运动的成果之一。

可见，以安提俄克的玛利亚为名留于史册的这个女人，不知道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被腓特烈看上，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28岁的父亲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德语读作腓特烈。由于他始终活跃在意大利，这个名字便按意大利语读为费德里科。为了区别于父亲，他以“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记载于史册。人们知道这个儿子的去世年份，但他母亲的卒年却无人知晓。

一年之后，腓特烈于1225年第二次结婚，对象14岁，却已是东方十

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王，名叫约兰达。腓特烈一次接着一次地拖延十字军远征，罗马教皇为了让他出发去远征，导演了这场婚姻。不过，结婚也好，其他别的也好，只要对自己有利，腓特烈都会接受。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迎来在此登陆的约兰达，他们在布林迪西的主教堂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当时有人用漫画描绘了这场婚礼，画中把教皇画在了新郎与新娘中间。其实，教皇洪诺留并没有参加这场婚礼。把教皇画进画中表明，民众已经通过漫画风格的绘画——这个唯一的途径——了解到了这场婚姻为罗马教皇一手策划。

约兰达是位少女，但作为女人她似乎没能满足腓特烈。但正式婚姻对处在腓特烈这种地位的人来说具有制造储备继承人的意义。腓特烈似乎尽到了这个义务。第二天，他就与随约兰达嫁过来的一位女官阿内丝发生了猛烈的接触。约兰达自己给父亲写信悲叹此事，这事才为外人所知。但即使没有那封信，这个插曲迟早也会被人知晓。阿内丝一年后生下了名叫比安科费奥莱（“白花”之意）的女孩儿。

正妻约兰达两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康拉德。这个名字和腓特烈、亨利一样，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男性的传统名字。但他的母亲于分娩后10天去世。在那个时代，不论阶层高低，女人生孩子是要豁出性命的。约兰达死后，33岁的腓特烈又成了“单身”。

然而，正妻约兰达还活着的时候，腓特烈就于1226年又有了命中注定的艳遇。

那年春天腓特烈视察了位于意大利北部最西边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地区。陪同他视察的是当地实力领主、皇帝派的重要人物兰齐亚侯爵。视察途中为了吃午饭，他们顺道去了侯爵家族一个分支居住的城堡。主人的两个女儿出来施礼，31岁的腓特烈对妹妹比安卡·兰齐亚一见钟情，她当时16岁。

在有效利用时间方面，腓特烈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他不喜欢浪

费时间，在追求女人方面也是一样。腓特烈会集中接触要追求的对象。但不知什么缘故，一向速战速决的腓特烈对比安卡没有这样做。这对人一直到认识后4年才有了孩子。这4年中间，腓特烈为解决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忙得席不暇暖，之后接着又是耗时一年的十字军远征。

腓特烈大概在远征回国后立即把比安卡召到了身边，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取名为康斯坦丝。又过了两年，期盼中的男孩诞生了，取名曼弗雷迪。比安卡娘家家族的很多男人叫这个名字，德语发音为曼弗雷德。一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维奥兰特。同腓特烈育有三个孩子的女人仅有比安卡一人，正妻中没有一人生过三个子女。

那个时代女性的装束

有两位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写道，这位比安卡是皇帝腓特烈真心喜欢的唯一女人。从认识到去世的20年间，这个女人只为腓特烈一人而活。

然而，在这20年间，腓特烈在耶路撒冷女王约兰达死后，不但又与英国的公主结婚，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有了5位情妇，其中一位还是比安卡的侍女。我们只能说腓特烈实在令人惊讶。

40岁那年，腓特烈第三次结婚，对象是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亲妹妹，21岁的伊莎贝拉。这当然是场政治婚姻，腓特烈的目的在于联英而牵制法兰西，并巩固与原本就崇拜他的亨利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位英国妻子不仅举止优雅，还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人。在6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生育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这是腓特烈非常愉快的6年。即使如此，他在从事军务和政务的时候从来不带女人同行。我追踪了一下他的行踪，他曾经去拉文纳探望过生了孩子的妻子，但几个小时后便离开了拉文纳。即使是以正妻的身份，想在腓特烈那里得到一点特殊待遇也属徒劳。

1241年冬，这位英国公主在福贾的王宫去世，享年27岁，她是被第三次怀孕折腾死的。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之死而不得不退兵的腓特烈，至少在妻子弥留之际守在了她的身旁。

多年以来一直隐忍着这一切的比安卡，在此5年之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变化，虽然这变化只是那么一丁点儿。1246年，第三任正妻死后5年，51岁的腓特烈与比安卡结婚。这是腓特烈的第四次婚姻，但却是36岁比安卡的第一次婚姻。

仪式由婚礼上不可或缺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主持。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也出席了婚礼。对他们的母亲而言，这可是心情畅爽的仪式。除了两年前已经嫁给希腊尼西亚帝国皇帝的长女外，14岁的曼弗雷迪和13

岁的维奥兰特都出席了婚礼。

然而，罗马教廷却不认可这场婚姻。在罗马教皇看来，基督教徒的正当婚姻必须是发生肉体关系前在上帝面前起誓的婚姻。天主教会的观点是，即使娶了多年的情人她也不是正妻，情人时代所生的孩子不能是嫡子，而只能是庶子。

不过，神职人员的地位高了也会懂得妥协让步。他们也时常会认可国王离婚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得到对方相当程度的让步后，再假装不情愿地同意。不过，腓特烈却是一个绝对不让步的主儿，尤其是对罗马教皇。

比安卡心情畅爽地当上了正妻，却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没有住进巴勒莫和福贾的王宫，而一直住在腓特烈以前赠送给她的位于焦亚德尔科莱的城堡里。两年后，她在这座美丽的城堡里迎来了死神的降临。

再加一句后话。比安卡死后两年，死神也降临到了腓特烈身上。皇帝的遗体由送葬的队伍运送到葬礼举行地和陵墓所在地的巴勒莫。通常可以从布林迪西上船前往巴勒莫，但这支送葬队伍绕道进入意大利南方内陆住了一宿，然后到塔兰托港，再从那里乘船去巴勒莫。儿子曼弗雷迪安排了送葬的一应事务，他是父亲去世时在场的唯一儿子。腓特烈的遗体在焦亚德尔科莱的城堡里与长眠在那里的比安卡共度了一宿。这也许是18岁的儿子曼弗雷迪对父母温馨时光怀念的表露。

我本想在这里打住关于女人的话题，但腓特烈这个人让人头疼，我很无奈。他在知道自己对比安卡·兰齐亚之爱是命中注定之后，又找了4位情人，其中3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因为她们生的都是女儿。即使是女儿，父亲腓特烈也一定会相认，并会一直关心到她们长大成人后嫁给谁。在中世纪，人们对没有生男孩的女人是很冷淡的。

在腓特烈的情妇中还有一人值得介绍。这个女人只留下了曼娜这个

名字，但对腓特烈来说，她一直都是不可替代的人。她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一想到腓特烈对自己深信不疑之人的侄女都会下手，我就会感到震惊。但贝拉尔德自己恐怕也想让自己的侄女成为腓特烈的情人。虽说情人与政治无关，但腓特烈也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人。

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里卡多。他是腓特烈的庶出之一，长大成人后被父亲委以要职，受到重用。

腓特烈的11位女人为他生了7个儿子和8个女儿。这11个女人中没有一个惹过什么事。在腓特烈的正妻和情人中，没有一个人做过向罗马教皇告状、通敌、说动儿子造反这类祸事。腓特烈到处有女人，却从来没有一次为女人问题而头痛。

腓特烈这个人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对他的女人隐瞒过什么，对正妻自是当然，对情人也是这样。他有情妇的事情甚至连公开的秘密都不算。这些女人的存在人尽皆知。罗马教皇，其他国家的国王，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实力诸侯，他们全都知道皇帝的这些女人。众所周知的事实不会被作为问题提出，因而成不了丑闻。

而且，他绝对不让妻妾同住。他也从来不会把以前的情妇下嫁给某个家臣，即把自己不要的女人甩给家臣。

对腓特烈来说，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过去的情人”，她们全都是“现在的情人”。对其中很多女人而言，腓特烈的临幸大概也会越来越少。但是对他来说她们始终是情人，他从来没有做过让她们感到不自由的事情。虽然这里我只能说他把她们照顾得很好，但我觉得实际上他可能也很累。此外，我认为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尽管这些女人做了皇帝的情人，但她们的娘家却从来没有仅仅因此而获利。得不到好处，也就没有理由特意把女儿交给皇帝了。

还有一点我也认为是最重要的。腓特烈不仅把自己的情人照顾到最

后（这一点容我后述），他对情人所生孩子也照顾到底。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有女人会不择手段地让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未来一切的男人生厌呢？

最成功的操纵女人的方法只有一条，这就是不隐瞒、不抛弃，做不到的可以不做，但能做到的不管什么都尽力去做。这是极为普通的公平做法。有人把这叫做“诚实”。如果得到了别人的“诚实”对待，人们还能怨得起来、怒得起来吗？

古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也是拥有这种稀罕才能的主儿。他到处找情妇，却没有一个情妇怨恨他。恺撒对女人总会以诚相待，这与他对男人的态度不一样。女人没有平庸男人所想的那么傻。

孩子们

腓特烈不把女人分为正妻或情人，他的孩子也就不分嫡子和庶子。于是，我准备也同叙述他的女人一样，采用编年的方式来叙述他的孩子。

话虽如此，嫡子和庶子仍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中世纪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大的特色，继承领国的必须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嫡子，否则罗马教皇不予承认。腓特烈也是让正妻所生的嫡子作为自己领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继承人。除此之外，腓特烈对嫡子和庶子一视同仁。

不仅如此，庶子断比嫡子有更多的与父亲亲密接触的机会。嫡子是继承人，少年时候就会被送到将来的任职地去。而且，腓特烈的教育方法与同时代的王侯也不同。

男孩到了7岁上下就会与母亲分开，被父亲带走。而庶子不需要送到任职地去，他们可以一直在父亲的身边长大。腓特烈不让妻妾同住，但却让不同母亲的儿子们同住在一起。在15岁成年之前，孩子们应该是寄宿在福贾的王宫里，在父亲选定的老师门下学习成长。尽管腓特烈席不暇暖地在各地穿梭，但他却是一位十分热心地养育儿子的父亲，这同他们是嫡出还是庶出没有一丁点儿关系。

成年后，儿子们开始跟着父亲实习。到了20岁前后，他们就要担任父亲任命的要职，进入发挥他们天生资质和后天教养的阶段。这就是庶子的道路。腓特烈没有把这些庶子培养成单纯的宅男，他希望庶子能发挥支持嫡子的重要作用。

腓特烈在教育孩子方面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对长子亨利的教育。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他，这里不再重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认为别人也会和自己一样，一个人也能干得好。于是，他把9岁的儿子留在德意志后便不管不顾了。他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此。

然而，亨利毕竟不是腓特烈。如果他生来就是一个领主的继承人，他一定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可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欧洲世界的俗界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继承这样的父亲的事业，对亨利来说任务太重。

即便如此，比自己小16岁的长子已经24岁了，是最适合做继承人的年龄。父亲不得不废掉长子，我想他一定心情复杂，能够替代这位长子的嫡子康拉德才只有7岁。

按照年龄排序，嫡子亨利下面是1216年出生的庶子恩佐。

同时代人的笔下对恩佐无与伦比的容貌满是赞赏，说他波浪一般的金发披肩，身材苗条匀称，举止品位无人可与比肩。他身手敏捷，碧眼中充满微笑，被他看上一眼，哪怕不是女人也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然

而，恩佐所拥有的何止这些。

恩佐教养颇高，可以和父亲以及身边的知识精英们平等对话。他富于诗才，爱好野外生活，尤喜鹰猎。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无论在统治方面，还是打仗方面，他都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腓特烈不但钟爱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21岁的儿子，还很依赖他。跟随父亲的实习期刚一结束，腓特烈就让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担任要职。人们甚至说，皇帝军所到之处，战场上就少不了恩佐。他已然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

恩佐22岁与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了婚。之后，恩佐活跃在整个意大利北方，发挥自己的作用，为遏制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同盟做出了巨大贡献。

27岁那年，恩佐被父亲任命为撒丁岛王。腓特烈的战略是利用科西嘉、撒丁二岛和比萨，把第勒尼安海北部纳入自己的霸权之下。冲在最前线实施这个战略的就是恩佐。

一旦这个战略成为事实，最受打击的就是与比萨同为海洋城邦国家的仇敌热那亚。后来，热那亚出生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策划了针对皇帝的阴谋，具体目标就是杀掉腓特烈和恩佐二人。这说明了恩佐在20岁到30岁这个时期有多么重要。恩佐35岁以后的生涯容后另述。

比恩佐小8岁的“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是按照始于寄宿生活的庶子课程培养起来的。16岁成人时，父亲把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尔巴伯爵领地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他的实习期就开始了。同恩佐一样，他一直辗转各地战场。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不如恩佐辉煌。不过，在统治方面他也许胜过恩佐一筹。20岁以后，他这方面的才能如花朵绽放。

费德里科是从做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长官（podesta）起步的。佛罗伦萨决定站在皇帝一边，请求派遣长官，腓特烈接受了这个请求，选中了这个年纪尚轻的儿子。意大利中部重要的城邦国家佛罗伦萨能站在皇帝

这边多久，便取决于21岁的费德里科了。

费德里科成功了。论派别，其他城市只分皇帝派和教皇派，但按佛罗伦萨人的气质，教皇派中还会分为“白”“黑”两派。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能把佛罗伦萨人凝聚起来，这不是一般才能所能做到的。但是这位21岁的年轻人却做到了。紧接着，阿尔巴伯爵费德里科又接受了父亲的任命，担任了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托斯卡纳地区全境的皇帝代理人。托斯卡纳人的脾气是凡事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便觉不爽。费德里科一连5年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解托斯卡纳人脾气的人仅因这一点就会惊叹不已。腓特烈把如此重任交给年纪尚轻的儿子，这一定为自己减了负。这个时期，罗马教皇支持的意大利北部自治体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而意大利中部却一直处在稳定状态之中。这点不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情况更多地也是由于这位以“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垂名青史的人物所起作用的缘故。

费德里科后面的是比他小4岁的康拉德。康拉德为腓特烈第二任正妻所生。康拉德刚一出生母亲便故去了。他在福贾的王宫里长大，但跟其他孩子一起在王宫里过寄宿生活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是长兄被废位后，他成了第一继承人，7岁就被送到了德意志。不过，他并非就此在北方的国度里成长，而与意大利、与父亲再无关系。

腓特烈不想重蹈长子失败的覆辙，他没有把养育儿子的事交给信赖之人。他经常亲自写信，不断予以关怀，密切自己与年纪尚幼的儿子之间的关系。

腓特烈的那些书信从身居高位的心理准备、勤勉学习的必要性，到应对臣下的方法，可谓包罗万象，读后让人不禁发笑。幸运的是，康拉德对父亲信上所写之事记一半忘一半。因而，他没有被在全欧洲名声如雷贯耳的父亲所压倒，朴实而健康地成长起来。

不过，与在意大利父亲身边成长起来的其他庶子不同，由于成长在

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德意志，这位嫡子对学艺不太关心。他喜欢狩猎，也喜欢战场，在德意志人气很高，作为下任皇帝候选人顺利成长。

康拉德后面又是一位庶子。当年腓特烈34岁，虽然有正妻，但还是迷上了忠臣中的忠臣、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这个儿子便是那位女人所生，取名叫里卡多。他走的也是父亲准备好的“庶子路线”。

腓特烈不仅对情人，而且对她们所生孩子的照顾也无微不至。等着里卡多成人后的是基耶蒂伯爵和斯波莱托公爵的地位。父亲不只是把领土给了儿子。基耶蒂伯爵领地和斯波莱托公爵领地都位于意大利中东部。对从意大利半岛的北、西、南三面不断挤压教皇的腓特烈来说，基耶蒂和斯波莱托是战略要地。因此，里卡多也早早地结束了实习期，被派到了最前线，年纪轻轻就战死疆场。腓特烈的7个儿子中，给父亲带来失子之痛的就是自杀的亨利和战死的里卡多。

按照年龄顺序，腓特烈下一个儿子是曼弗雷迪，他的母亲是比安卡·兰齐亚。

若论容貌，曼弗雷迪与恩佐堪称双璧。但若论在后世的知名度，则曼弗雷迪完全胜过了恩佐，因为诗圣但丁写过曼弗雷迪。

但丁让很多人物在《神曲》中登场亮相，但描写了人物容貌的仅曼弗雷迪一人而已。也许是受此影响，后世有很多以曼弗雷迪为主人公的作品，拜伦还写有长诗，甚至创作了歌剧。

“biondo era e bello e di gentile aspetto”（金发、帅气、端庄的容貌），这是《炼狱》篇开篇的一部分。仅用三个词就说尽了曼弗雷迪的容颜，让人不得不佩服但丁的诗才。曼弗雷迪美丽、年轻、悲剧的短暂一生，对浪漫派艺术家自不待言，也给了但丁这位曼弗雷迪死前一年出生的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印象。

诗是用声音朗诵的。

首先是“金发、帅气、端庄的容貌”，接下来是“但一边的眉毛被从中间断开”。然后，曼弗雷迪向活着但却迷路进入死人世界的但丁微笑着说：“我是曼弗雷迪，是皇后康斯坦丝的孙子。”

但丁在日本被称为诗圣。在欧洲，人们称颂他为“桂冠诗人”。这首诗当然要用意大利语原文朗读，我还是想尝试着把它译成日语。其中，“biondo”和“bello”译了出来，但“gentile aspetto”这两个词却让我吃了苦头。

但“gentile aspetto”这两个词是关键。因为只有“端庄帅气”“举止高雅”才能最简洁地表现出曼弗雷迪的出身和教养。仅仅是“biondo”和“bello”的男人，找起来并不费劲。但如果他还“gentile aspetto”，……后世浪漫派艺术家们对这一点一定反应敏感。

研究家在评价曼弗雷迪时说他是腓特烈所有儿子中最像腓特烈的。因为热心鹰猎而对学艺产生爱好，与伊斯兰世界交流时毫无偏见。的确，在这些方面他很像父亲。不过我想，腓特烈一生具有强烈的自负心、坚持到底的意志、合理冷静的观点和摆脱困境的能力，曼弗雷迪在这些方面远不及父亲。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曼弗雷迪才迷倒了艺术家们。但丁也让腓特烈在《神曲》中上场。但是，悔罪的曼弗雷迪是在还有可能进入天国的《炼狱》篇中上场的，而父亲则是在根本没有可能进入天国的《地狱》篇中上场。可见，但丁虽然踏入了文艺复兴，却还残留着中世纪人的观念。对天主教会定的罪，腓特烈一概不悔。但丁很难处理腓特烈。他把腓特烈放在写异端者的《地狱》篇中的第十章出场，却只点了个名就继续往下写了。人们可以用曼弗雷迪作主人公做成电影、连环画或者游戏，但是腓特烈二世皇帝今后也一定享受不到这种荣誉了。

父亲去世那年，这位曼弗雷迪只有18岁，正处于实习期的正中间。他真正意义上的生涯开始于父亲死后的第16个年头。

腓特烈7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个，是他第三次婚姻时与英国公主伊莎贝拉所生的恩里克。他是正式婚姻所生之子，是嫡子，父亲去世那年才12岁。他的名字和康拉德、曼弗雷迪、已故亨利的两个儿子一起记在了遗书中，他被授予了耶路撒冷王位。然而人们只知道，这个儿子在父亲死后3年也去世了，不知道是因为出生太晚，还是没有足够资质的缘故。

除自杀的亨利以外，腓特烈6个儿子之间的关系相当好，这在当时的一般情况下宛如奇迹。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像狮心理查和失地王约翰那样关系失和，在战场上对决的例子并不罕见。而腓特烈的儿子们始终团结一致，既没有发生嫡子无视庶子之事，也没有发生庶子之间争斗之事。腓特烈死后，罗马教皇曾经企图在他的儿子之间制造分裂，但没有一个人响应。“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甚至断然拒绝了教皇的利诱，被开除了教籍，还被剥夺了领土。尽管如此，他仍和弟弟曼弗雷迪一起守护父亲留下的西西里王国，坚持战斗。我想，这是腓特烈不分嫡庶，把所有儿子领到身边一起培养的好结果。

腓特烈除了这些儿子，还有8个女儿。在中世纪这个时代，不能用于政治婚姻的女子是“不作数”的，如果是庶出，一般就会被送到修女院。可是，腓特烈却让她们“作了数”，而且不分嫡出庶出。对娶了她们的一方来说，即使庶出也是皇帝的女儿，形式上也许有点仅次于嫡出的味道。

在这一点上，腓特烈这位父亲对女儿的照顾也很到位。他为8个女儿中的7个安排了与皇帝女儿相称的去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希腊尼西亚帝国的皇帝、德意志实力诸侯等。其中三人嫁给了后面将要讲述的“后备干部”。腓特烈不仅热衷于家庭建设，也很热衷于巩固家庭。

在8个女儿中，只有一个女儿是否出嫁情况不详。她就是从东方嫁过来的耶路撒冷公主约兰达的随从女官阿内丝所生的叫作“白花”这个罕见名字的女儿。不过，从她卒于1279年这点来看，她在当时算是长寿的。弄不好她是腓特烈的女儿中唯一进了修女院的人。那个时代的长寿女人，要么原本身体健康，要么不需要生育。

腓特烈既没有在女人方面出问题，除了长子外，儿子们没有一个让他烦心，女儿们嫁出去之后也没有一个有过必须让他出面处理的情况。如果说这就是幸运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幸运的人。不过，私生活方面的幸运不一定会导致事业上的幸运。光靠照顾周到，事业上的合作者是不会跟着你的，需要有点什么让他们也跟进来才行。

合作者们

有一个拉丁语单词叫作“familiares”，虽然是家庭的意思，但成员间没有血缘关系。用在腓特烈身上，这个词指的就是以家庭成员一般的热情与家长合作的人。

说起厌恶腓特烈的人，那一定是站在罗马教皇一边的人。但提起腓特烈的“家庭”（familiares），即便是在教皇派研究家的笔下也不得不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为例。

贝拉尔德1177年前后出生于一个在意大利中部拥有领地的旧家族。他很早进入神职界，也很早崭露头角，不到30岁时就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重要城市巴里（现为普利亚大区首府）的大主教。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16岁的腓特烈。腓特烈当时宣布自己已经成人，要开始重建领国。那时贝拉尔德34岁。

此后，贝拉尔德改任了巴勒莫大主教。有说法认为，这是腓特烈求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做的人事安排。腓特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西里王国”，巴勒莫是王国的首都。但是，腓特烈改变贝拉尔德任职地的目的不仅是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在中世纪，权威之高仅次于国王的就是首都的大主教。如果说国王是统治国民的，那么大主教就是国民在宗教方面的领袖（即基督教界的牧羊人）。不过，当上了巴勒莫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所发挥的作用却远不止于此。

翌年，17岁的腓特烈接受德意志诸侯们的邀请，出发去了德意志，目的是要除掉现任皇帝奥托取而代之。当时的腓特烈前途未卜，跟他随行的人数也很少，其中一位就是贝拉尔德。

这一行人绕道罗马，谒见了教皇英诺森三世。4岁成为孤儿以后，教皇就一直是腓特烈的监护人，他来向教皇表示感谢。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老教皇赞成眼前这位年轻人去德意志取代奥托，他接受了17岁年轻人的请求，不但赞助了他们去德意志的旅费，还授予了贝拉尔德教皇代理的资格。

这一点在德意志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对普通的德意志人来说，教皇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进入德意志以后，只要碰到犹豫要不要为腓特烈开城门的城市，一身正装的贝拉尔德大主教都会走到前面，向在城墙上张望的居民们大声喊话，于是城门洞开，屡试不爽。

结果，腓特烈在德意志一待就是8年。为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8年是需要的。但在这8年中，贝拉尔德并没有一直待在腓特烈身边。腓特烈出发前把“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托付给了妻子康斯坦丝。8年间康斯坦丝的统治相当顺利，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贝拉尔德的帮助。贝拉尔德多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往返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为了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决定把康斯坦丝和儿子亨利召到身边，而送他们到德意志的也是贝拉尔德。

1220年，25岁的腓特烈在罗马接受了教皇洪诺留的亲手加冕。曾经的“普利亚少年”就此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贝拉尔德也与从德意志来到意大利的皇帝同行，列席了罗马的加冕典礼。不过，这位25岁的年轻人心里根本不想以此作为剧终（The End）。对已经43岁的贝拉尔德来说，这一年也不是“终止”。

贝拉尔德积极协助腓特烈制定了《卡普亚宪章》，正式着手进行西西里王国的法治化建设。他本人身为神职人员，却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的博洛尼亚大学相对抗，不遗余力地协助创建以培养官僚为目的的那不勒斯大学，这所大学依靠世俗学者，把神职人员排斥在执教者之外。以罗马教皇为领袖的天主教会对新建这所教授古代罗马法、世俗色彩浓厚的高等教育机构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腓特烈想让居住在西西里王国的伊斯兰教徒能安全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能生活在他们的宗教得到保护的环境中，他建设了萨拉森人的城市卢切拉。对此，这位大主教没有说一个不字，尽管这件事得罪了罗马教皇。

身为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明明白白地就是天主教会的人。他完全没有道理赞成和协助世俗君主腓特烈的所想所为。

然而，他却一直在协助腓特烈。也许，贝拉尔德结识腓特烈以后改变了思想，与神职人员的“义”相比，更加遵从人的“理”了。

1227年，已经50岁的贝拉尔德被腓特烈派往埃及。为了同身在开罗的苏丹阿尔-卡米勒直接交涉，他从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乘船，在亚历山大登陆再去开罗。这样的埃及之行还不止一次。第二次光去开罗还完不了事，他不得不又去了一趟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不过，当时托付给贝拉尔德的任务委实重要。

腓特烈不想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又不得不远征。于是，他打算不

使用军事力量而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远征的目的。为此，事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交给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任务就是可能决定谈判成功与否的事先交涉。

罗马教皇做出开除教籍的处罚时，与被处罚者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到株连，被开除教籍。因而每次腓特烈被开除教籍的时候，巴勒莫大主教也都会一起被开除教籍。这就引出了可笑的插曲。有一次，腓特烈派遣的使节团甚至进不了罗马。因为使节团所有人都被开除了教籍。可是教皇又必须会见他们。于是，教廷紧急解除了贝拉尔德一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让他跟教皇见了面。

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出征时，军中从统帅皇帝到跟随他的贝拉尔德及以下全体参加者都是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成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但就是这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实现了夺回圣都耶路撒冷这个基督教徒的夙愿。如果把罗马教会开除教籍的处分放在心上，腓特烈的合作者就没法干了。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让十字军不流血就获得了成功，但班师意大利后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腓特烈想通过制定《梅尔菲宪章》完成已由《卡普亚宪章》开启的建设法治国家的构想。贝拉尔德也是为了编制这部宪章而被隔离在梅尔菲城中的一员。他何止仅仅是一个成员！他是参与编制的人员中最重要的合作者。

建设法治的君主政体国家，这在中世纪不啻为一项大放异彩的大事业，也是俗界的一项大事业。贝拉尔德身为神职人员却积极支持这项事业。这个法治国家以腓特烈为最高领导人，其最高决策机构被命名为“向国王进言委员会”，由负责各部的七位大臣和六位贤人组成。被选作贤人的有两名封建诸侯、两名大主教和两名主教，共计六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这个时期以后，贝拉尔德似乎是只要巴勒莫大主教职务允许，他

就会尽量在腓特烈的身边协助他。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贝拉尔德更好的顾问了。同罗马教皇谈判的主谈多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担任。贝拉尔德上了年纪，生活也需要逐渐平静一些。贝拉尔德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有开明的头脑，他同出入于腓特烈宫廷的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很谈得来。

腓特烈弥留之际守在他身旁的也是贝拉尔德。贝拉尔德已经73岁了，他为腓特烈鞠躬尽瘁了40年，最后作为神职人员为腓特烈进行了傅油仪式[1]。皇帝已被开除了教籍，大主教也已被开除了教籍。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另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恕罪，这个行为并不为基督教认可。然而，贝拉尔德明知如此，却照样我行我素。也许他认为，腓特烈比罗马教皇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

此外，许多见证人在皇帝的遗书上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贝拉尔德。他在“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签名之后又写上了“imperatoris familiaris”——“皇帝的家属”。他一直把皇帝的遗体送到巴勒莫，并主持了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的葬礼。

得知腓特烈的死讯之后，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立即写信给贝拉尔德劝说他，将解除他开除教籍的处罚，请他回到基督教者的正确道路上来。但巴勒莫大主教连回信都没有写。腓特烈死后两年，贝拉尔德在巴勒莫去世。与腓特烈一样，他也是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去世的。

腓特烈生前曾经这样评价比自己年长17岁的贝拉尔德：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他总在我的身旁。为此，（作为献身神职的人）他必须忍受许多许多。”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出生于意大利。还有一个人，再厌恶腓特烈的研究家都不能不承认其献身精神，他就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他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不仅是德意志，当时欧洲贵族家族出生的男子

只有三条路可选：要么子承父业当领主，要么进入神职界往上爬，要么参加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宗教骑士团。年轻的赫尔曼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所以他也和贝拉尔德一样是罗马教皇一边的人。

腓特烈把赫尔曼用于同教皇交涉的主谈者。这并不是因为腓特烈人才缺乏到不得不用神职人员的地步，而是要以神职人员对付神职人员。

据信赫尔曼于1215年与腓特烈结识。那年，腓特烈20岁，赫尔曼35岁。他比腓特烈大15岁，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已有7年时间。

赫尔曼让人佩服，使人不得不感叹德意志人中还有头脑和行动都如此灵活之人。相较于手执武器打仗，他更擅长于用头脑打仗。他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腓特烈把他用到了极致。

与工作据点在意大利巴勒莫大主教区的贝拉尔德不同，赫尔曼的工作地点在东方，因为三大宗教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原本的任务是保护从欧洲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条顿骑士团的团长不可能一直待在欧洲。

即便如此，赫尔曼还是频繁往返于中近东和欧洲之间，每次回到欧洲，他首先就会造访腓特烈。依他的身份来看，造访其上司罗马教皇应先于造访腓特烈。

让赫尔曼去同教皇交涉对腓特烈很有利，原因之一是教皇可以开除皇帝和大主教的教籍，却不能开除宗教骑士团团长的教籍。宗教骑士团团长为在伊斯兰势力包围中的中近东保护基督教徒奉献了一生，如果开除他的教籍，王侯和诸侯一般都不会保持沉默。

所以，腓特烈用肯定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赫尔曼去跟教皇谈判。腓特烈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出发远征，仅此一项，教皇格列高利就已经雷霆震怒至今。从东方班师回国后，经过长达一年坚忍不拔的交涉，腓特烈和

教皇格列高利终于实现了世人所谓的“和平之吻”，即格列高利解除了开除腓特烈教籍的处分。这一切都是这位年届五旬的德意志骑士的功劳。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派遣特使，没有比赫尔曼更合适的人选了。

腓特烈懂得这个“特权”的功效，赫尔曼似乎也有感觉。他利用自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身份，在因被开除教籍之人统率而得不到教皇批准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站在皇帝一边积极活动。而且，在皇帝对以教皇为后盾的伦巴第同盟作战而需要在德意志招兵时，赫尔曼也冲在前头积极活动。所谓条顿，就是德意志的意思。冠以此名的骑士团团长一声召唤，德意志的骑士当然会全体响应而来。

可见，使用赫尔曼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利，唯独有一件事不能让他去做，即不能让他去同伊斯兰教徒交涉。宗教骑士团的旗号是保护基督教徒，对一心想把基督教势力赶出中近东的伊斯兰势力来说，他们就是敌人。任何身着白底红十字制服的圣殿骑士团人士要想靠近苏丹，苏丹的卫兵们就会充满杀气。对身穿白底黑十字制服的条顿骑士团人士情况也一样。赫尔曼对自己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一事非常自豪，腓特烈没法让他脱下制服，只好派别人去和伊斯兰教徒交涉。

赫尔曼病倒了，就连腓特烈也慌了。他把赫尔曼从所有工作中解放出来，送到了萨莱诺，严命他专心疗养。萨莱诺有欧洲最高水平的教授医学的学校，腓特烈也为复兴这所学校出过力。学校有医师和设备都很完备的附属医院。

然而，长年累月的繁重公务已经不允许年过花甲的赫尔曼再次站立起来。尽管医师们拼命施救，腓特烈也强烈希望老友痊愈，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还是在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腓特烈这时在意大利北方。他在同一天收到了赫尔曼的死讯和教皇格列高利第三次开除他教籍的通知。许多研究家都说，如果赫尔曼还健在，也许这第三次开除教籍可以避免。我也这样认为。只有赫尔曼可以

用他那德意志人少有的灵活性把自卑感很强反而会动辄跑过头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扳回正轨。

44岁的腓特烈没有把这位老友的遗体送到德意志。面海而建的巴列塔城堡是腓特烈很喜欢住的一个城堡，城堡所在的城市里有条顿骑士团的一个支部。皇帝下令把这位为自己鞠躬尽瘁长达24年的老友安葬在这个支部的附属教堂里。据说，腓特烈每次在巴列塔逗留时都会去那座教堂。

腓特烈总是用教皇方面的神职人员去对付罗马教皇，用封建诸侯去对付封建诸侯。这就像我在前面写过的那样，任命当地有实力的黑帮担任消灭黑帮的部门长官，我们且不论这样比喻是否确切。腓特烈的目标是要摆脱封建社会，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但他又不允许用军事力量压制，因为他起步时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拥有广阔领地、长年统治着“国中之国”的诸侯们却拥有丰富的财力和人力。要让他们跟从自己，光靠腓特烈自幼所拥有的“西西里王国国王”地位是不够的。自打腓特烈出生前100多年起，还是他母系一方诺曼国王统治的时代，这些诸侯就已经是西西里王国强者了。

直到25岁，腓特烈才第一次抓住了对付诸侯的有效王牌，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年是1220年，他打响了宣告君主政体国家诞生的第一炮，公布了《卡普亚宪章》。

之后，腓特烈立即开始了对封建诸侯的拉拢。他首先任命他们担任以其领地为中心的区域地方长官。其中一位诸侯恩里克·迪·莫拉很快就在3年后担任了整个王国的司法首脑，相当于法务大臣。除他以外，其他强大的诸侯基本上也都被任命担任了公职。

后来，腓特烈完成了十字军远征，又与教皇言归于好，于是轻装上阵，于1231年公布了《梅尔菲宪章》，高调宣示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

主政体国家。在制定宪章过程中被隔离在梅尔菲城的人中，也有如今已经当上高官的诸侯。他们这些封建诸侯不但参与了制定工作，还占据了因《梅尔菲宪章》而起步的君主政体国家的一半要职。司法大臣、建设部首脑、可作为腓特烈“内阁”的“辅佐国王委员会”六贤人中的两位都是封建诸侯。

以莫拉、阿奎诺兄弟为首的这帮人都是在中世纪这个乱世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封建领主，他们是不会听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跪地臣服的。这些人加起来超过10人，他们一直侍奉着腓特烈，20年、30年，直到死神不允许腓特烈继续履行职务为止。只要有能力，腓特烈就会毫无保留地使用他们，而他们也都成了腓特烈的合作者。腓特烈还让他们做规定领域的工作。最终当上代理人的恩里克·迪·莫拉经常被派去与罗马教皇交涉，阿奎诺家族的托马索一世被指派与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同行去开罗与苏丹交涉。苏丹阿尔-卡米勒派到腓特烈这里来的特使是埃米尔法拉丁。所谓埃米尔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封建领主。派来的是封建领主，派去的也得是封建领主。于是，这位只知意大利南方的人就得远游伊斯兰世界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数次远游。

这位托马索一世·达·阿奎诺的弟弟兰杜尔夫也在腓特烈手下担任高级行政官，直到去世。而兰杜尔夫的儿子在历史上可是名人。他儿子名字托马索·达·阿奎诺的拉丁语发音是“托马斯·阿奎那”[2]，他提出了经院哲学。人们说到中世纪时代的哲学，回答基本就是“经院哲学”。他是老幺，但也是强大诸侯之子。因而，这位未来的大哲学家得以在父亲侍奉的君主所创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后来他还登上了这所大学的讲坛。腓特烈是一个专制君主，但这个专制君主却不妨碍家臣之子加入多明我会，并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腓特烈的合作者除了神职人员、封建诸侯以外，还可以举出第三种人，他们在理性上属于上流阶层，但出身于经济上的中流阶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塔德奥·达·塞萨这两个人。他们都于

1190年前后出生于意大利南方，比腓特烈大4到5岁。

这二人可以说是腓特烈的同龄人。1240年前后，他们取代了已经年迈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病逝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已经担任要职20年的恩里克·迪·莫拉，开始作为腓特烈的合作者崭露头角。卡普亚的城门是腓特烈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城门上安放着一尊雕像，腓特烈端坐中央，这两个人分立左右。两人都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是卓越的“科班”之人。两个人都是俗界之人，他们之间也只有这点相似。

维尼亚还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因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举荐加入了腓特烈的心腹团队。参与创建那不勒斯大学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人们一般认为，是他把写入《梅尔菲宪章》中的政策改写为法律条文的。那年他40岁。

他是书写辞藻华丽的文章高手，除了正式文件以外，皇帝把给教皇写信的工作也都交给了他。如果不用这样的文章给神职人员写信，他们一般都会不高兴。腓特烈喜欢直截了当、简单明快的文章。要是他给教皇写信，原本不会发生的问题也会成为问题。此外，写给王侯们的信件似乎也经过了他的推敲。王侯的教养一般都很低，即使是皇帝的来函，他们也都是让伺候在身边的神职人员念的。

不过，这位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外交能力似乎不怎么样。派他当使节出使，没有一次办得漂亮。尽管他教养高，有诗才，但根儿上却是一个书斋中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与他同龄的塔德奥·达·塞萨却是一个外向活跃的人。塔德奥是腓特烈自己发现并重用的人，性格与内向的维尼亚成为鲜明对照。他外向，责任心强，而且热情有加。他填补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走后的空缺。不过，塔德奥·达·塞萨没有赫尔曼所拥有的连教皇都不能无视的宗教骑士团团长的地位。

这里，我只是列举代表人物而已，这些人都是腓特烈的合作者。与腓特烈合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像同时代其他同业人士那样，给予崇高地位和丰厚报酬，颐指气使就能轻松做到的。在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手下当差的一个书记写给上司一封信，感叹报酬低、工作重。这封信留存了下来。要说工作重，这些下级职员的上司“合作者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诉苦，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近旁看着皇帝从无歇息地干着比自己还重的工作。尽管腓特烈让手下干很重的活儿，但他在用人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

首先，一旦任命，他就会把所有一切交给受命的人去办理。而受命的人有义务经常向皇帝汇报。

他们之间的讨论也不是皇帝对家臣的一言堂。如果自由活泼讨论的结果使腓特烈理解自己的方案需要修改，他会立即修改。他在给德意志的儿子康拉德的信中都写着要经常倾听家臣之言。如果连写信者本人都不去实践，便不会有效果。

他使每个人的责任清晰明确，给他们的指示也总是很具体。事情办不好他会大发雷霆，但从来没有人会因此被投进监狱。只有一个例外。这人在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不在期间负责防卫，他竟然容忍了教皇军队的入侵。腓特烈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怠慢所造成的，让他挨了几年牢狱生活。除此之外，合作者中既没有人被流放，也没有人被处以死罪。

长期协助腓特烈，有时一定是件苛刻得难以忍受之事，但工作干起来应该很容易。在明了自己所做之事的领袖手下工作，即便满足他的要求要花大气力，但工作本身很容易。相反，如果一个领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实施过程中又左右摇摆，那他手下的人便不易工作了。

后备干部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valletto”，法语也叫“valet”。其词典意义是中世纪在欧洲宫廷里侍奉君主左右的仆人。腓特烈从不要求“valletto”做仆人的事。

在这些仆人中间，光是知道姓名的就达15人之多。他们全都是实力封建诸侯的子弟，除了两人来自德意志以外，其他都出生于腓特烈的王国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

他们十一二岁时就被腓特烈接过来，先住在福贾王宫的宿舍里接受教育。在这个阶段，他们和一同接受教育的皇子们上同样的课程，尽管这些皇子是可以不送到德意志去的庶子。也就是说，在到十五六岁成人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全面学习腓特烈所认为的统治者必备教养——文科七艺[3]。

他们成人后也同庶子们一样开始实习。他们经常与皇帝同行，侍奉于皇帝左右，但皇帝却不让他们干照顾起居的事情。皇帝要求他们通过在统治者身边工作，实地学习统治方法。

腓特烈经常要完成很多工作。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日常也很忙碌，甚至没有时间感叹他用人太狠。他们现在的地位是助手，是打杂的。腓特烈还会经常对这些比自己小20岁的年轻人说：我命你们做事又严又难，其中还会有无聊的问题。但胜任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命令别人时会有用处。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会变成下命令时不可或缺的明快而毫不犹豫的决断力回报给你们。

莫拉家的两个儿子、阿奎诺家的两个儿子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被投进监狱的那位防卫负责人的儿子也进入了后备干部课程。这些年轻人出身的家族几乎涵盖了意大利南方所有实力诸侯，关照如此之周到令人会心而笑。

腓特烈追求的目标是，摆脱一直统治欧洲的封建社会，创建以法治

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他试图通过任命政府高官的办法充分利用父辈，通过让他们的子弟接受后备干部教育，并用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家臣的儿子们建立起同窗关系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从1240年前后开始，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的子弟们便开始被任命担任要职，取代他们的父辈。

此外，即使在后备干部时代，这些年轻人平常也不只是为皇帝的统治做助手。后面我还会讲到，腓特烈的宫廷有各种人从各国前来造访和住宿，这反映了这位皇帝趣味的多样性。而年轻人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种场合。他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亲身体味异文化交流的机会。

腓特烈的宫廷中还诞生了意大利第一首用俗语意大利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情诗。皇帝和政府高官都对诗歌创作感兴趣，这种气氛不能不感染年轻人。

宫廷里还产生了现实的恋爱。有两个后备干部与皇帝庶出的女儿结了婚，有一个皇帝的庶子同后备干部的妹妹结了婚。

这对腓特烈而言大概也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他已经把“家庭”的圈子扩大到了庶子，现在又把这个圈子扩大到了将要取代父辈的未来干部中间。

这个做法除了一件事以外都取得了成功。1240年前后，长年由父辈们担任的要职的确明显开始转由结束了实习生活的子辈们担任了。当时已经年过45岁的腓特烈在年龄上正处在这些人的父辈与子辈之间。在合作者新老顺利交接这一点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坏。

而且，这些后备干部中的大多数在面对腓特烈死后的复杂局面时，也都能像庶子们那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曾经寝食与共的庶子和后备干部们起初一道支持嫡子康拉德，这位嫡出的继承者死后，他们又集结在出生时是庶子后来成为嫡子的曼弗雷迪旗下，继续反抗罗马教皇。腓特烈

把后备干部接到身边，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的做法没有错。

朋友们

如果是讲同时代其他国家国王的宫廷故事，我大概会写“宫里人”。“宫里人”指的是由国王保障衣食住用，讨国王欢心的人们。但在腓特烈的宫廷里，就算是讨国王的欢心，那也并不意味着开开玩笑，讲讲开心事，取悦主人。他们之间肯定开过玩笑，肯定讲过有趣的事情，但他们谈论的主题并不是叫个在民众中有人气的喜剧演员来就能解决的那类事情。这就是让我对把他们称作“宫里人”（cortigiano）感到犹豫，而只能把他们称作“朋友”（amico）的原因。

说到皇帝的“朋友们”，腓特烈大致有下列两种朋友。一种是以信为媒的朋友，另一种是召到身边来长期相处的朋友。腓特烈有很多书写正式公文和信函的书记员，在私人方面他也是一个写信狂。

以信为媒的朋友，我在这里只能列举代表人物，这些人里少不了前面介绍过的贸易商、数学家意大利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他是第一个把阿拉伯数字介绍到欧洲的人。同过去一直使用的罗马数字相比，阿拉伯数字简单且误算风险小，还有零的概念，不论在生意上还是在数学学问上的益处都显而易见。

然而，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天主教会，仅凭阿拉伯数字是基督教徒所敌视的伊斯兰世界的东西就说那是“恶魔的数字”，反对引进，就连经济立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都消极对待引进阿拉伯数字。可是，罗马数字不也是基督教徒所敌视不已的古罗马人创造的吗？看来逻辑性并非神职人员所擅长。

但是，不管罗马教皇如何反对，威尼斯共和国认为引进阿拉伯数字符合国家利益而坚决予以引进。威尼斯政府立即订购了斐波那契的著作，甚至开设了教授阿拉伯数字的学校。佛罗伦萨附近普拉托的一位商人发明了会计簿记方法。威尼斯引进了这一方法，并在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基础上予以普及。

重视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现实，除经济以外，政治、外交也莫不如此。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数字和把握整体所需要的广阔视野。乍看上去，阿拉伯数字和复式簿记不过是经济上的问题，但在罗马教皇被当作“太阳”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敢放言“我们首先是威尼斯市民，其次才是基督教徒”，这在中世纪也算是异样的存在了。

就在同一时期，腓特烈皇帝也是一个异样的存在。腓特烈在途经比萨时结识了斐波那契并听了他的介绍，意识到了阿拉伯数字的有效性。但他不是商人而是皇帝。相比于把阿拉伯数字引进自己国家，他更热衷于保障已经年过五旬的斐波那契以后的研究生活。斐波那契从皇帝那里领到终身年金后，不再做经常往返于东西方的贸易，开始专心研究数学。他的义务是把研究和著述的进展过程写信告诉皇帝和回答皇帝在信中提出的数学问题。他没有应邀去意大利南部，而是选择了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比萨继续研究。他的很多著作，尤其是被誉为欧洲数学史上里程碑的《算盘全书》（*Liber Abaci*）及其后的所有著作都献给了腓特烈。1240年，他在领到终身年金10年后于比萨逝世。

以信为媒的朋友中还有一位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出生的的伊本·萨宾（Ibn Sabīn）。他是伊斯兰教徒，是阿拉伯人，他的学说在伊斯兰社会也过于激进。在回答腓特烈的问题时，他正在北非的摩洛哥流亡。

腓特烈与伊本·萨宾之间的质疑问答，借用英国人研究著作的题目来说就是“Sicilian Questions”。尽管这些问答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涉及从神学的目的到灵魂是否不灭这样的重大问题。

这让当时的基督教很恼火。灵魂不灭的问题可以问基督教神职人员，干吗要去问伊斯兰教徒。因为提问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天主教会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中世纪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无须专门去向伊斯兰教徒询问灵魂不灭等重大问题。在800年后的现代欧洲人所写的研究著作中仍然荡漾着类似的情感，让人啼笑皆非。

也许因为我出身于大学哲学系我才想说，既然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答那个著名的“西西里问题”，就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回答得再简洁明快一些。也许这是不同时代伊斯兰知识分子中常见的共同倾向。总体来说，他们的理论展开既不简洁，也不明了。不过，敢于明确说出灵魂并非不灭，这并不只是亡命摩洛哥就能做到的。大概腓特烈也没能满意，他后来的兴趣便转向了具体问题。

即便这样，伊本·萨宾回答了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皇帝还是给了他报酬。可这位抛弃了西班牙的一切，在摩洛哥过着流亡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却把报酬退了回来，同时还写信说了不接受报酬的理由。他说这件事本身体现出了伊斯兰教徒的智慧优于基督教徒，这就足够了。如果是生活在多神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只要不受宗教束缚，合理冷静地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逻辑就足够了。

人们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腓特烈的“朋友”既不分宗教，也不分民族。仅仅是曾经在他的宫廷里待过并且留名后世的，我们就可以举出以下人物。

欧洲第一个研究兽医学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生于意大利南部，就学于萨莱诺医学校，后执教于当时医学研究的圣地萨莱诺医学校。

研究防疫学的阿达莫·达·克雷莫纳，生于意大利北部，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皇帝转化为政策，在提高卫生水平方面做出了贡献。

犹太人扎卡里亚是同样毕业于萨莱诺医学校的眼科专业医生。他受

到皇帝的邀请，开始了宫廷生活。皇帝这时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在不断衰退。

腓特烈有个像是“翻译工作室”的部门，其成员也是形形色色。

犹太人所罗门·科恩，生于马赛。他的工作是把雅各布·阿纳托利[4]的著作翻译成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阿纳托利因把希腊文献翻译成希伯来语而闻名于世。后述的米凯尔·司各脱也与他一起工作。

这个“工作室”里还在进行着《为行走在迷茫中的人指路》的拉丁语翻译工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哲学家马伊莫尼德[5]，他以追求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犹太教的融合而著名。我认为我在哲学系学到的就是搞清了自己是多么的非形而上。在像我这样的粗人看来，亚里士多德哲学跟犹太教的融合，连尝试都是徒劳的。但想遍尝一切的腓特烈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既然这样，通过阿拉伯语译本把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翻译为拉丁语也就是当然之事了，这本书的拉丁语书名叫作《De animalibus》。腓特烈要写《驯鹰的艺术》也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

腓特烈自己在相当程度上知晓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但专家的翻译则是另一码事。翻译其实是一种高深的工作，好的译者在资质方面应该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智力，如果达不到同等的智力水平，至少不能缺乏以原作者的思想进行翻译的想象力和气概。正因为如此，翻译才被视为是学问之始。腓特烈懂得这些道理。因为腓特烈的看重，中世纪的“翻译工作室”才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转移到了基督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方。

我在想，这帮人平时用哪国语言说话呢？难道不是拉丁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混用吗？会不会再加上英语和希腊语呢？

在腓特烈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下面两个人。

米凯尔·司各脱（Michaele Scot），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据说他出生于1175年前后，因而比腓特烈年长20岁。在中世纪，爱好学问很容易会被视为异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他年轻的时候就当了修道士。在牛津和巴黎求学之后，他年逾四十，却去了西班牙的托莱多。当时的托莱多可说是一个文化中心，以把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而出名。

在托莱多逗留期间，这位苏格兰修道士学会了阿拉伯语。尽管把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成为阿拉伯语的著名译者阿维罗埃[6]20年前就已去世，但托莱多却仍留有他的学风。

阿维罗埃（Averroes）这个名字在欧洲很著名。他的本名叫作伊本·鲁西德（Ibn Rushd），是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腓特烈把这些译著推荐给米凯尔译为拉丁语。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欧洲人才在千年之后又重新想起了他。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第一次知道了与柏拉图齐名的古希腊智者。

罗马教皇宫殿叫作梵蒂冈，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拉斐尔厅”。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拉斐尔[7]在这里创作了壁画。其中有一幅作品名为《雅典学派》，画面构图是古今的学问“明星”聚集一堂。中央站立的二人是模仿达·芬奇长相的柏拉图和模仿米开朗琪罗长相的亚里士多德，学问和艺术的世界巨擘们以各具特色的姿态围绕在他们左右。画面左下角画着裹着头巾的阿维罗埃，一副阿拉伯人的形象。

拉斐尔创作的《雅典学派》

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梵蒂冈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拉斐尔在梵蒂冈内部描绘了在学艺方面留下丰功伟绩的人，哪怕他不是基督教徒。每当我看到这幅作品心里都会想，没有比这更能高歌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了。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伟大，那么介绍他的业绩的人也做了伟大的事。因而，画中描绘了阿维罗埃也属当然。

这幅《雅典学派》里没有画上米凯尔·司各脱。我们的这位苏格兰人什么领域都要插一手，他甚至研究占星术而被当成了占卜师。但丁在《神曲》中把他贬低到了《地狱》篇第二十首中，把他评价为一个形迹诡异的人物。也许是因为这个评价，他没能进入《雅典学派》，这非常可惜。

听说研究阿拉伯数学的斐波那契把这个苏格兰人引荐给了腓特烈。司各脱离开西班牙，来到了意大利。斐波那契与他结识，两人性情相投。于是，斐波那契把他介绍给了皇帝，说他很有趣。也许腓特烈也觉

得他有趣，或者是他也觉得腓特烈有趣，就此待在了腓特烈的身边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不但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还完成了阿维罗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翻译工作。

如果把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反复实验，努力追求真实才愈加重要。

与理论派的柏拉图相比，腓特烈当然更喜好这位亚里士多德，也自然会与一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米凯尔·司各脱成为气味相投的朋友。不过，这位兴趣广泛的苏格兰人，有时也会因腓特烈而感到困惑。皇帝提问坦率，会问到你无法作答，而并不在意你是否会认为他幼稚。我仅举数例如下：

一、在宇宙中，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居住的地球？

二、上帝居住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三、人们都说天使和圣人围绕在上帝的身边，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

四、有没有天堂、炼狱和地狱？如果有，那么它们都在哪里，又有谁住在里面？

五、人死后也能知道活着的人在干什么吗？

六、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七、为什么会有涨潮和退潮？

八、地球的中心是什么构成的？

九、为什么长年静止的山会突然喷火？火山附近的水为什么会沸腾，发出恶臭？

这样的问题成年人会羞于启齿。可腓特烈却向米凯尔抛出了这些问题。这位苏格兰人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也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修道士，对基督教会有所顾忌，否则很容易被当成异端定罪。这位修道士所回答的不论是宇宙、天堂，还是炼狱、地狱，都跟半个世纪后出生的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腓特烈当然会认为灵魂不灭之类的问题就只能问伊斯兰教徒了。不过，问是问了，但伊斯兰教徒的答案却不能令他满意。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以“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之说收场了。我觉得，抛给米凯尔·司各脱的问题更加具体化，这反映出那段时间的情况。

话虽如此，只要是谈论具体的科学之事，如涨潮退潮及其对动植物的影响等，米凯尔还是一个愉快而有益的朋友。而且，这个苏格兰人爱好广泛，不用担心话题枯竭。他和腓特烈二人好像对现代被称为观相学的领域也大有兴趣。

米凯尔·司各脱在他所写这方面的著作中说道：如果具有观察面相和身相的眼光，你就能了解对方的性格，预测他的行动。书中还有一行令人愉快的文字：额头上没有皱纹，脸上也平滑的人吵架嘴快，撒谎也不脸红，头脑偏于简单。不过，米凯尔就是米凯尔。他在这段文字后继续写道：“但是不能仅凭这些来判断一个人。人会因为业绩而改变容貌。”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腓特烈正面临众多难题，一定是满头皱纹，满脸沟壑。如果不是这样，感觉再契合的朋友也写不出这样的话来。

这位米凯尔·司各脱甚至还为皇帝算命。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中，腓特烈没有踏足过的唯一城市就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那个时代叫“Fiorentia”，是鲜花之都的意思。米凯尔对皇帝说，你最好不要去地名带“花”的城市，因为你会死在那里。

这么一说，腓特烈一辈子还真的没有去过佛罗伦萨，甚至没有靠近过。即使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表态要把行政长官的任命权交给皇帝以表示归顺的时候，腓特烈也只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把儿子费德里科派去担任长官职务，自己却没有去。顺便说一句，腓特烈在出门鹰猎的途中病倒后被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名叫作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Castel Fiorentino，花之城堡的意思）。

我不知道腓特烈不靠近佛罗伦萨究竟是因为他相信了苏格兰人的预言，还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认为“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而不去造访。总之，“花”（Fiore）似乎成了合理主义者腓特烈的“鬼门关”。

不管怎么说，米凯尔·司各脱的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伙伴。不过很快，腓特烈就想再找一个理智交谈的话伴儿了。腓特烈写信委托以信为媒、已经成为好友的开罗苏丹选送一个合适的人。苏丹送来了出生在中近东的希腊人、基督教徒泰奥多罗。

就像米凯尔以“生于苏格兰的米凯尔”留名一样，这位泰奥多罗也是以“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名留历史的。他的生年不详，出生地是十字军时代作为公国而繁盛的叙利亚古都安提俄克。他是希腊裔，所以是基督教徒，但却不属于天主教派，而是希腊正教徒。他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还有法语。尽管十字军国家的公用语言是拉丁语，但那些地方当时广泛通用的却是法语。这大概就是他懂法语的原因。

这人对古希腊的所有学问都感兴趣。但他学习这些学问既没有去雅典，也没有去亚历山大，而是去了伊斯兰世界。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底格里斯河畔，先在摩苏尔，接着到巴格达求学。这件事显示了古希腊的“智慧”是怎样通过伊斯兰世界而流传后世的。

泰奥多罗在中东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了中近东，在附近的伊斯兰埃米尔手下当行政官，积累资历。苏丹受腓特烈之托寻找人才时，他被网

罗进来。于是，这位“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平生第一次来到了西方。

他成了腓特烈的朋友，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待在皇帝的宫廷里。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兴趣广泛，但专业只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医学和疫病学，第二个是把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语。

在第一个领域中，他与一位已经成为腓特烈朋友的意大利人合作，积极参与了西西里王国防疫对策的制定工作。因为有了意大利北方克雷莫纳出生的阿达莫和叙利亚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这两个人，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下水设施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还没有达到古罗马时代上下水两方面都设施完善的程度。排水技术当时还是东方更为先进。出生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这两个人灵活运用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技术和伊斯兰的技术，使流行病防治对策不断开花结果。

泰奥多罗专业的第二个领域是翻译。在这个领域中，他最著名的功绩是把多位阿拉伯人撰写的鹰猎指南书Moamin介绍到欧洲。原著大约成书于12世纪前后。泰奥多罗来到西欧后才为腓特烈把这本书翻译成拉丁语。这本书刺激了腓特烈，催生了中世纪唯一一本作者为皇帝的学术著作。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涉及了所有的领域。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比他晚来，也成了皇帝的一位朋友。在全能型知识分子这一点上，二人堪称双璧。他们之间的对话据说是压轴的精华。这对话大概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吧。对话间皇帝时不时插上一句辛辣的讽刺，腓特烈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人的话语所压倒而说不出话来。

米凯尔甚至给皇帝算命，而泰奥多罗的专业中则有希腊医学。泰奥多罗曾为命中注定生活紧张的腓特烈调制饮料，还做糖果送给他，让他尽快消除疲劳。

看了饮料的成分表后我们只能说，那东西不就是运动饮料吗？不过，补充糖分对用脑有效，这却是事实。

再说糖果。这东西只是以蜂蜜为底料加了些紫花地丁的芳香而已，但腓特烈却深好这一口。听说他还下令赠送给政府高官们。在讨论严肃问题的会议上，皇帝和家臣们一边讨论，一边鼓漱着嘴里的糖果，光想象一下就会令人忍俊不禁。尽管如此，淡紫色糖果散发着紫花地丁的高贵香气，用作疲劳恢复剂的确不赖。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是修道士，即使是最下层也属于神职人员。献身于上帝的人不允许拥有最终的安身之所。对他来说，不管是在皇帝的宫廷里还是在修道院度过余生都没有关系。但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是个俗界人士。所以，腓特烈让人在意大利南方准备了一处带有领地的宅邸送给他。宅邸的庭园里绿树繁茂，流水潺潺，一派东方气息。

我认为这样可是不行的。住进让他想念起故乡的地方，就是在他望乡之乡愁上又点了一把火。

这时的腓特烈与终于选出的新教皇之间关系紧张，为此劳心伤神。

泰奥多罗即使想回归故里，也不想做违背厚待自己的皇帝心愿之事，思前想后，苦恼不堪，最终选择了自杀。48岁的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逗留期间得知了这位朋友的死讯。

“朋友们”的最后一人还是得归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同他没有见过面。尽管如此，对腓特烈这位基督教徒来说，没有比这位伊斯兰教徒更好的朋友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欧基督教徒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大举进攻伊斯兰教徒在中近东的地盘。从那以后，十字军国家勉力支撑长达200年之久。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确定的原因是敌人伊斯兰方面

的领袖都是阿尤布王朝的苏丹。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由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和土耳其民族所构成。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都是库尔德族出身，这个民族在伊斯兰世界至今还是少数民族。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连三代苏丹萨拉丁、阿迪勒和阿米勒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伊斯兰世界的神职人员哈里发和伊玛目都主张把基督教徒一个不剩地统统赶走。在仍然实行这种强硬路线的情况下，只有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采取了温和应对的态度。跟着第一次十字军打过来以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已经扎根了100年。三代苏丹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他们并没有把基督教徒赶出去，而是改变了方向，与基督教徒共存。他们看到了中近东伊斯兰社会通过十字军接触了西欧，伊斯兰社会的产品也卖往西欧的事实。

在西欧，威尼斯共和国和皇帝腓特烈最先抓住了这种形势的变化。

威尼斯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虽然出发远征，但目的地既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埃及，他们进攻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因为威尼斯政府与苏丹萨拉丁之间签有密约，双方同意只要十字军不来，苏丹将保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的安全。威尼斯共和国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相比于按照十字军精神屠杀伊斯兰教徒，他们自然会选择确保和扩大贸易的路线。

但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不能只优先考虑一国的利益。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有义务把居住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人们的愿望变成现实。这些愿望是：第一，要夺回被萨拉丁占领后回到伊斯兰手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第二，要确保基督教徒安全前往耶路撒冷等基督教圣地朝觐；第三，确保在中近东定居已久的基督教徒的生存。腓特烈了解这些愿望，他决定通过外交手段去实现这些愿望。

这个时期，敌方身居苏丹之位的是阿尔-卡米勒。他的父亲是阿迪勒，伯父是萨拉丁。他的大本营在开罗，但他的势力圈却不仅限于埃

及。同伯父和父亲一样，阿尔-卡米勒这位苏丹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继承了父亲阿迪勒的思想，认为只要十字军不来远征，就可以与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共生。

阿尔-阿米勒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苏丹，而腓特烈是基督教世界地位最高的皇帝。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是顶尖中的顶尖，尽管这与宗教界地位最高的哈里发和罗马教皇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这将促成问题的解决。皇帝方面发誓不进行十字军远征，苏丹方面则起誓把耶路撒冷归还给基督教一边，并承认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存在。这样就会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两人决定达成媾和协议，有效期为10年，并写明今后可以续约。第六次十字军之所以被称为无血十字军，就是因为虽然率领军队过去了，腓特烈却没有使用军队，单靠外交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这次媾和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两方面的猛烈抨击。在东方，哈里发和伊玛目谴责这是“伊斯兰的耻辱”；在西方，罗马教皇说应该用基督教徒的鲜血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他甚至抨击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是“基督的敌人”。这是唯一一支没有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十字军。

不分古今东西，原教旨主义总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声音总是很大。声音越大，留在编年史作家——这些当时的记者——笔下的概率就会越高，甚至会让参考这些记载的后世研究家认为，这才是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声音。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由声音大的人书写历史的概率难道不是更高吗？

但是，不论是阿尔-卡米勒还是腓特烈，都冒着如潮的恶评遵守了媾和时的约定。有效期又延长了10年。虽然这是因为他们二人事后都有维系当时的约定，但对腓特烈而言还有考虑本国利益的一面。

西西里王国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合而成，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按现代的国别从东向西数过去，这些北非国家有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中世纪，这些地方由大小苏丹和埃米尔统治着。如果同他们搞好了关系，西西里王国就可以减轻其对海上防卫的担心。这些伊斯兰的小君主都知道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朋友关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违抗大国埃及苏丹的意志。

正如我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写的那样，从北非袭来的伊斯兰海盗是中世纪时代居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基督教徒最大的恐怖。基督教方面很早就转为贸易立国，而北非却还持续着海盗立国的状态。因为这个原因，南欧海边建起了数量惊人的用于监视的塔楼——“萨拉森塔”（Torre Saraceno）。

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突出于地中海的中央，最容易受到海盗船的袭击。但今天还残留在那里的“萨拉森塔”几乎都建于腓特烈以后的时代。因为在腓特烈统治意大利南方的时代，海盗惮于袭击他的领国。

在年龄上，阿尔-卡米勒似乎比腓特烈年长十五六岁。这位苏丹经常向皇帝派来感觉像是维护关系的使节团，每次必给皇帝带来礼物。

了解了这些礼物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尔-卡米勒实际上很理解腓特烈。他没有送来阿拉伯的绝世佳人。苏丹送来的礼物更多的是使用伊斯兰社会最新技术制作的产品，如制作精巧的水钟、所有星星都是用宝石镶嵌而成的宇宙仪等。皇帝的回礼则是在北欧捕获的白熊。这的确令人发笑，但在中世纪，东方在技术方面也是领先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状况才得以逆转。

我很同情被送到开罗的白熊。但在苏丹送给皇帝的礼物中，也有大象、豹子等猛兽和形形色色的热带鸟类。

腓特烈把这些动物放在了召集诸侯开会的地方，用在了进入一座城

市，而该城市屈服并决定归顺到他旗下的时候。人们感觉就像来到了一座马戏城。但夸耀自己的权力也对行使这些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意志诸侯对制作精巧的宇宙仪毫无反应，却会瞪圆了双眼观看异国情调的猛兽游行。

阿尔-卡米勒于1238年去世，距他与腓特烈所签的媾和协议还有一年到期。一年后，继承阿尔-卡米勒当上苏丹的长子同意无条件续签协议。我认为这是他父亲交代的。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因此又可以享受10年的和平。腓特烈是在媾和破裂一年后去世的。

一位基督教徒委托一位伊斯兰教徒物色一位人物。这位伊斯兰教徒接受了基督教徒的请求，为他派去了一个生于东方却是基督教徒的人。不过，这种关系在中世纪这个时代罕见得让人悲哀。这两个人构筑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东方之地共生共存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以“圣路易”闻名，被罗马教皇称为理想君主，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打破了这种局面。

不过，皇帝腓特烈二世不是一个只满足于把知识分子召到身边的人。他也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只举其代表作就有《梅尔菲宪章》、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和关于鹰猎的著作。

《梅尔菲宪章》

这里，我用中世纪欧洲通用语言拉丁语来写书名。

Magma Charta Libertatum（《大宪章》），公布于121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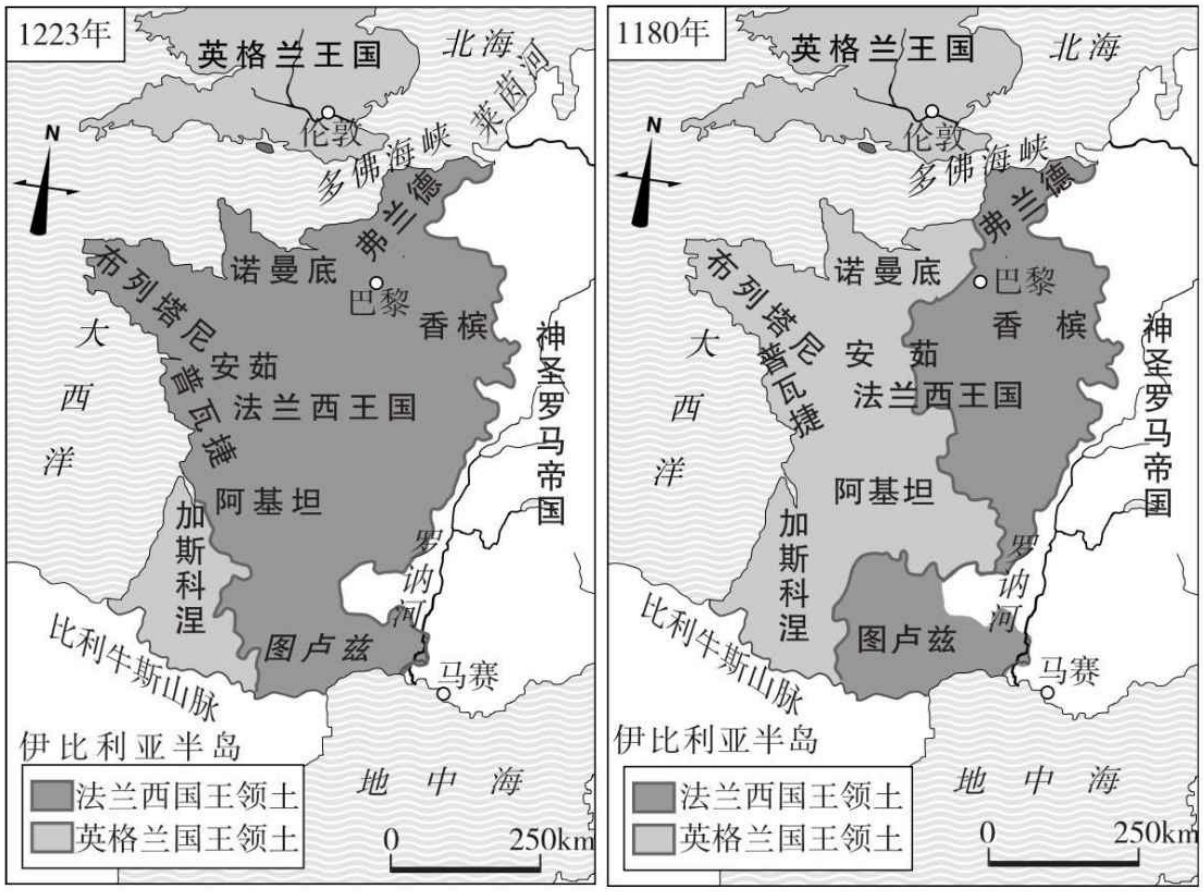
Constitutiones Melfhitanae（《梅尔菲宪章》），公布于1231年9月。

《大宪章》越到后世越有名，而《梅尔菲宪章》却被遗忘。这也是“历史的讽刺”的一个例子。这里的原因是，后世英国历史学家评价说《大宪章》才是国王承认市民权利的最早历史文件，这个评价根深蒂固。另外，《大宪章》后来有过诸多修正，其成果成为英国国王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维持至今。这也对确立《大宪章》的名声大有裨益。

可是，人们当初制定《大宪章》时，在写进去的条款中并没有要求国王承认市民的全部权利等内容。只是因为英国国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受到削弱，引起了对神职人员和封建诸侯所拥有的既得权益的再次确认。

为什么呢？在《大宪章》上签字的是英王约翰。在他手上，英国一块接一块地失去了其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一如他的绰号“失地王”所表现的那样。国王手下的诸侯纷纷认为，在如此无能的国王手下，连自己的领土也将不保。没有了诸侯的合作，王位也坐不稳。为了留住诸侯，约翰不得不在明确载有贬抑王权、提高诸侯权力内容的《大宪章》上签字。然而这样一来，英国就会在亨利二世[8]和狮心理查所推进的从封建社会走向君主政体国家的道路上走回头路。也就是说，在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不得不在迷茫中痛苦挣扎。

中世纪后期英国国力衰退，原因不光是因为失去了在法兰西境内所拥有的领土。在国内姑息封建诸侯才是最大的原因，而允许这样做的正是《大宪章》。



法兰西与英吉利的领土比较

法兰西一边旁观着如此这般的英吉利，一边推进着从封建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国王腓力二世是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大功臣。他是一个政治性人物，军事上则完全不行。但幸运的是，最大的敌人英国的国王从战无不胜的狮心王换成了每战必败的失地王。腓力二世还是一个巧于玩弄卑劣手法的人。原先的实力诸侯由于反复不断的十字军远征，人力、物力衰微不堪，他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的领土变成了国王的领土。他于1180年登基，1223年去世。这两个年头的法兰西地图显示了他所以被法兰西人赞扬为奥古斯都的业绩。奥古斯都可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到13世纪前半叶时，中世纪已步入后期。这是一个欧洲激烈动荡的时代。

《大宪章》公布于1215年。

腓力·奥古斯都死于1223年。

可直译为“宪法”的《梅尔菲宪章》公布于1231年。

其后5个月，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开设了“异端裁判所”。

腓力国王和腓特烈皇帝在把封建社会转向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国家的目标方面很相似，但这两位君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腓力脑中的君主政体国家就是通过吸收封建诸侯的领土来扩大国王的直辖领土。而腓特烈的君主政体国家尽管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但却是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也就是说，在以法治国家为目标这一点上，这两人是不一样的。

腓力似乎没有注意到罗马法的存在。法的概念已经装不进他的脑子了。但腓特烈注意到了罗马法的有效性，他抱有强烈的观念即国家必须是法治的。

这就是腓力与腓特烈的不同，前者根本没有想要制定什么宪章，而后者意欲通过制定《梅尔菲宪章》来明确国家发展的方向。

顺便说一下近现代研究家作为高度评价《大宪章》的理由而使用的“市民的权利”一词。在13世纪的当时，勉强能够配得上“市民”这一概念的只有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因为这所谓的“comune”（自治体）就是市民自治的居民共同体。到了14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城邦国家的“市民”已经明确成为共同体的主人公。

不过这里的所谓“市民”并不是已经习惯了民主政体的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种“市民”。当时的“市民”大约分为“大市民”和“小市民”。能够掌握权力、决定国家方向的总是属于上层社会具有实力的市民。只有在

法国大革命之后，市民的概念才扩展到下层社会。所以，“市民”定义的不明确也是夸大评价《大宪章》的原因。尽管名为《大宪章》，当初不过是遭到忤逆、慌了手脚的国王想留住那些诸侯而大幅让步的结果而已。

古罗马时代已存在、到了中世纪却被丢失的不只是“市民”的概念，“法”的概念也被忘到了脑后。

《摩西十诫》为上帝所授，相信上帝的人是不允许它被改动的。但是，除此以外的法则是人想出来的。既然如此，如果法出现了不适合的情况或不符合时代了就应该改变。这就是罗马人对法的认识。

腓特烈通过《梅尔菲宪章》复兴了这种“罗马法的精神”。

《宪章》的各项条款都以“Comanda lo Imperatore”（皇帝诏曰）开头。一般人都会想，要是改变了俗界最高权威皇帝的命令，就会伤害他的权威。然而，腓特烈的脑子里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宪章》自1231年公布起近20年间，条款修改过数次。腓特烈就像反复推敲原稿的作家，《梅尔菲宪章》和以其为基础的国家建设就是他的“作品”。因此，无论局部如何反复“推敲”，法治国家一直都是整体的主线。

那么，撇开历史研究家不谈，为什么《大宪章》都写进了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而《梅尔菲宪章》却被普遍遗忘了呢？

这里的第一个原因是《梅尔菲宪章》为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所厌恨。教皇默认了法兰西国王已经迈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行为。但是，中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相信，他们拥有不仅在信仰方面，而且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会发挥影响力的权力。“皇帝命令”式的做法一旦得到普及，他们便会很为难。因为他们认为，下命令是只允许上帝授意的神职人员拥有的权力。《梅尔菲宪章》公布5个月后，教廷便设立了“异端裁判所”，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意味着罗马教皇对皇帝的一种牵制。

这是为了宣示“命令”的权力不在皇帝，只在上帝，亦即只在罗马教皇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人。

我想在这里谈清罗马法与教会法的不同之处。

所谓“罗马法”是古罗马人制定的法律，因其在中世纪对《梅尔菲宪章》的制定以及在近现代对各国的法律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广为人知。

而“教会法”则是统治中世纪欧洲的法律，今天仍适用于梵蒂冈城国。

这两种法在大学都有独立的学科，有专门学习研究这些法的研究家，详细的验证工作就交给这些专家去做吧。我在这里只谈谈关于审判的方法，连我这个外行都认为这是基本的一条。

在罗马法中，即使被起诉，只要没有证据证实就不会被判有罪。

相反，在教会法中，一旦被起诉就是有罪。被起诉后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进行反证，则可以判其无罪，但这并不存在实际的案例。

关于不服判决者的上诉权，不论是罗马法还是《梅尔菲宪章》都明确予以承认，而且明确规定接受上诉的是皇帝。因为皇帝既不属于判决方，也不属于被判决方，被认为是超越两者的存在。如果在现代，这应该就是最高法院。我在写《罗马人的故事》时，看到皇帝们所到之处都在忙于应付上诉，甚至夜里还要下判决，觉得当皇帝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不过，腓特烈干这种艰苦的工作得心应手。他把这项工作放在了一切工作之上，认为这是皇帝作为超越原被告的第三者的一项义务而特别重视。

教会法不承认上诉权。说不承认不如说实际上是不能承认。你去向谁上诉呢？只能向上帝上诉。我们找不到传达上帝旨意的罗马教皇接受上诉而对上诉案件下判决的例子。也就是说，在根据教会法进行判决的

异端裁判所，一旦成为被告也就有了结局。

话虽如此，腓特烈并没有把罗马法直接引入《梅尔菲宪章》。《梅尔菲宪章》中有一条独特的条款，规定有上诉的一般判决必须在起诉后一年内拿出结果。判决应该公正，如果一拖几年，就会加大原告和被告所蒙受的损失，连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也保障不了。近来官司一拖10年的情况司空见惯，我在心里不禁叹息。

在中世纪，除腓特烈的唯一例外就是重视公正执法而被称为“中世纪罗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过，威尼斯再怎么热衷于维持法治国家，也只是停留在本国国内，不曾想过要将法治的理念输出到其他国家，实际上也没有输出过。

腓特烈不是将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的经济人国家的元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基督教世界俗界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所说所做不能以输出与非输出来衡量。他的所作所为如果被输出，影响所及，危险巨大。

罗马教廷感知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设立异端裁判所来加以阻止，裁判所用于审判违反基督教会所规定的基督教徒生活方式的人。

法兰西国王腓力实现了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转变，但他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并没有错。而腓特烈建成的中央集权制君主政体国家依据的是教会法以外的法律，作为统治基督教徒的君主，他被认为犯了错。

《梅尔菲宪章》后来被遗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法治国家的观念直到近现代才得以复兴。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法也失去了效力。所谓法律，只要没有付诸实施的“场所”，就只是学者们研究的纸上条文。

腓特烈的“作品”、法治国家的“西西里王国”在他去世16年后，因曼

弗雷迪的死亡而告终。后来的意大利南方先是在法兰西国王，接着是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下走了回头路，回到了残留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社会。这期间，《梅尔菲宪章》也变成一份历史文献，一份出自于被基督教会定罪为异端者之手的历史文献。

然而，只要读一遍这份文献，人们就不能不感受到当时三十五六岁的腓特烈的热切之心，他是在盛夏时节把全体合作者封闭在梅尔菲城执着地让他们完成这份宪章的。

《大宪章》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中世纪的正式文书都要用基督教会的公用语言拉丁语书写，这也是当时的常识。然而，只有西西里王国的正式公文《梅尔菲宪章》是用被称为俗语的意大利语写就的。当然，当时的意大利语还没有达到百年之后经过了在佛罗伦萨锤炼后的语言境界。文章的水平就像美国人、英国人或是法国人讲的意大利语，不笑便无法卒读。《梅尔菲宪章》便是用这样的意大利语写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读懂。

腓特烈皇帝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有秩序的和平国家。为此必须把那些被认为“学问”没有神职人员高的、以诸侯为首的普通世俗群众带入这项事业。按照腓特烈的想法，如果用这些人读不懂的语言去写宪章，那它就不能成为“法律”——这个人们赖以共生的规则了。

“蒙特城堡”

在中世纪，建教堂被认为是地位崇高、握有权力之人的义务。天主教会一直在说，建设教堂是感恩上帝的表现。只建城堡而不建教堂是腓特烈遭到非难的理由之一。

13世纪可以说是北欧各地一窝蜂建造哥特式大教堂的时代。那时建设的大教堂至今还展现着威容。

那时还是一个对十字军狂热的年代。那个时代的流行观念是，一般人通过参加十字军远征表示信仰坚定，而具有财力的王侯则通过建造大教堂来表示坚定的信仰。他们都认为，完成这些事情就能预订到死后在天堂的席位，因而得到心灵的慰藉。

在这个时代，腓特烈只让人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建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尔塔穆拉，不论外观还是内部，它在美术史和建筑史上都不值一提。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教堂。当地原先没有教堂，人们感觉这教堂就是为建而建，根本无法与同时代在法兰西一座接着一座建起来的大教堂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腓特烈对建设教堂不热心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极高水平的壮美教堂了。

尤其在西西里岛上，已经建有很多阿拉伯、诺曼和拜占庭风格绝妙融合的西西里式的壮美教堂，其代表作是位于巴勒莫附近的蒙雷阿莱大教堂，美得我只能想到华丽一词来形容。位于西西里岛东侧的叙拉古有一座直接按照古希腊神殿翻建的大教堂，反映了这座海港城市自古以来的漫长历史。这座教堂，只能用壮丽一词来形容。

除了这两处宏大教堂以外，意大利南部根本不缺美丽的教堂。在整个中世纪，阿尔卑斯山南侧地区的文化水平一直高于北侧地区。

尽管当时很流行，但一个劲儿地向上突起、直刺苍穹的哥特式建筑，原本就不适合建于南欧这块湛蓝天空下沐浴在阳光中的土地上。

当然，腓特烈建设教堂的兴趣与同时代的王侯相比的确明显偏低。

建造新教堂需要请罗马的教皇派来主教或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请这个人举行祝圣[9]弥撒，宣告这座教堂以后将成为与上帝相会的神圣场所。可是教皇与皇帝的关系已经众所周知，腓特烈哪有心情这样做呢？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做就能预订到天堂的席位。

因此，腓特烈只建造了一座教堂，但却建设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和要塞。所有这些都建在了战略要地，规模也根据战略上的重要性分成了大型城堡、中型城寨和小型要塞。它们不是孤立的防御设施，而是作为防御网络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

同北欧的城堡要塞相比，它们的造型更接近中近东的很多十字军城寨。其原因大概在于气候，南欧的气候更接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不像北欧那样。建筑的内部开放而空阔，住在里面的感觉一准不差。

在不必担心遭到飞机空袭的时代，战略要地的处所几乎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在西西里王国，几乎在所有的战略要地都有腓特烈母系的诺曼王朝的国王们建的城寨。腓特烈所做的就是根据这些城寨在战略上的重要程度加固或改造它们。腓特烈没有新建过一处。几乎所有腓特烈进行过大规模改造的沿海城堡，直到今天还为意大利海军所用，这证明了腓特烈战略眼光的准确性。

不过，在大小数量过百的城寨中，只有一处城堡不知为何而建，这就是“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意为“山上的城堡”）。蒙特城堡由于壮美而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造访人数众多，城堡景象被印在了欧盟货币“十分之一欧元”的钞票上。

蒙特城堡

蒙特城堡所有的一切都由“八角形”构成，在欧洲任何地方、在到处都分布着十字军城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们见不到如此特异的城堡。

一望而知这不是一座为了防御而建的城堡。

蒙特城堡坐落在一座矗立在广阔平原中央的山岗上，老远就能见到。如果进攻方在周围的原野上支满帐篷，攻陷它易如反掌。

这座城堡也没有建在能够监视重要道路的地方。城堡边虽然有道路通过，但那路并不是从一座城市去另一座城市的必经之路，不过是些乡间小道。

走近了你就会发现，这座城堡并没有其他所有城堡都有的护城河环绕周围，因而也就没有中世纪城堡所必备的吊桥。

蒙特城堡由八面外墙构成，外墙由八座八面塔楼支撑。开在外墙上的窗户同其他城堡相比过大，如果是为了追求眺望和采光可以理解，但却完全不适合防御。

城堡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摆放弓弩，也没有适合射箭的地方。屋顶上也没有城堡必有的向爬上城堡的敌兵头上浇烫油的开孔。这里既没有马厩，也没有存粮的仓库，连独立的厨房都没有，不适合人们长时间驻留。人们不可能骑马进城堡，哪怕是皇帝，也得在城堡外面下马后走进城堡。

然而，城堡中有很好的蓄水系统。沿着八角形塔里的螺旋楼梯向上爬就能到达屋顶。屋顶有其他城堡见不到的石板铺装。通过微妙倾斜的石板和旁边窄窄的水沟，可以收集雨水而无浪费。城堡里既有冲水厕所，也有巨大的取暖壁炉。这样完备的设施在那个时代已经令人满意至极了。

室内用了很多昂贵的彩色大理石来装修，所以没有北欧城堡的那种粗糙，也没有伊斯兰式装饰过度的感觉。装修的整体风格是品质上乘，明快流畅。

不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内部装修已经过了800年的剥落和掠夺。当然，罗马斗兽场经历了两千年的剥落和掠夺以后只残留了当初的三分之一，但它还是斗兽场，只有把想象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才有可能看到它当年的雄姿。蒙特城堡也同样是历史遗迹。不同的是，这里只有800年的历史，可以认为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当初的二分之一。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是蒙特城堡。

腓特烈为什么要建这座城堡呢？由于腓特烈写给地方长官的详细指

令得以留存，我们明确知道了只有这座城堡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建造的。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的是“为什么”。围绕这个题目，研究家发表了很多论文，可谓眼花缭乱。有人说是为了鹰猎，另一些研究家则主张是为了天文学和数学实验。

腓特烈狂热地喜好鹰猎，说为鹰猎而建不是没有可能。

但腓特烈大概不会在城堡顶上鹰猎。鹰一般是要从高处放才会飞的鸟，但腓特烈所喜好的鹰猎是在平原上驰马放鹰式的狩猎。在城堡顶上放鹰，又在原地等鹰回来，这样的狩猎，他怕是根本不会考虑的。在他的“书”中根本没有提及这种鹰猎方式。如果是享受野外狩猎后过来住宿，我认为这里倒是个可用之所。没有厨房的问题可以在中庭做烧烤解决。而且，蒙特城堡适合训练猎鹰。城堡坐落在高高的山岗上，城堡的屋顶应该是最适合猎鹰驯养师训练猎鹰的地方。

腓特烈是个实验主义者，说建城堡是为了天文学和数学实验也并非一点可能性没有。但人们至今没有发现可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证据。此外，从八角形的外观开始，蒙特城堡里的一切都归于“八”这个数字，人们至今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于是，研究家中坦率的人只能以“腓特烈之谜”收场。腓特烈也是个给人找麻烦的人，他甚至让800年后的研究家都不得不认输。

不过，像我这样不重研究的人可不会那么轻易地上他的当。每次造访蒙特城堡时，我都强烈地感到，腓特烈投入了他各种各样的想法，造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要是我，即便再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无法实现在自家房子上。但腓特烈是皇帝，有充足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干成了这种事。说不定这座城堡建成之后，腓特烈才去想要用它干什么。

耸立在意大利南方普利亚平原上的“蒙特城堡”是皇帝腓特烈二世的

作品。我们要忘却各种解释，像一张白纸一样面对这件作品，这样才能欣赏腓特烈这件作品的美妙之处。

“驯鹰的艺术”

下面才是真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著作*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直译为“使用鸟类狩猎的技能”。这里的鸟类当然指的是鹰。这本书今天仍收藏在梵蒂冈，书的每页上都有彩色插图，精美绝伦，让人感到如果不能用色彩来介绍鹰猎那将是一种遗憾。书用拉丁语写成，可能作者自己都认为，鹰猎是供贵人们消遣的体育运动，没有必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

但是，这本精美的书在腓特烈生前却没有刊行。他在当上皇帝后的30年间，在政务和军事的间隙里编写，找人画插图，留下了书稿。他死后，儿子曼弗雷迪将书稿整理成书。文章完全是腓特烈所写，没有改动，表现了儿子对父亲的敬爱之心。全书条分缕析，逻辑性强，行文冷静。而且，曼弗雷迪也和父亲一样狂热地喜好鹰猎，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合适的“校阅者”。

现在说说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本单纯介绍鹰猎的指南手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完全可以发挥指南书的作用。但腓特烈的真实意图在于，在反复实践所获得的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考察，这一点贯穿全书。他自己在“序言”中明确写道：

“在写这本书，这本讲述用鸟类狩猎的书时，我内心的体会只有一句话：

一切都如实写来，一如所见地写来（Que sunt, sicut

sunt）。

“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地一以贯之，才能打开迄今为止尚无人尝试过的通向科学之路——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与作为经验才能理解的知识结合起来。”

既然开头写了这句话，我还以为科学家的观点会贯穿全书呢，然而统治者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书中。这主要表现在讲述鹰猎有效性的地方。

为什么鹰猎对社会上层人士有效用呢？腓特烈写道：因为鹰猎可以把他们从紧张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他说，至少在鹰猎的时候，“每天的担心”会让位于“快乐的时间”。

写到这里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紧接着却是这样的句子。他说鹰猎被视为是贵人的体育运动，但对普通人也有有效之处。他写道：为什么对普通人也有效呢？因为鹰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育运动，从事这项运动的人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细心的关怀，娴熟于此的人掌握了相关技能，所以容易谋到职位。

我觉得像是在读反对最近英国废止猎狐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最近是否有哪位英国贵族像解剖过鸟的腓特烈那样，也写过一本关于猎狐的科学考察书。

这本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和考察了鹰的猎物——鸟和小动物。

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考察了捕食这些猎物的鹰的全部种类。

第三部分对鹰猎进行了考察论证。从鹰的饲养方法、饲料，到拴鹰的结绳方法等等，面面俱到，观察之精细，追求之完美，完全超越了单

纯的指南书。

腓特烈的这部著作由上述三部分构成，深入细节进行分类和分析，一一进行严密的解释，着实令人惊叹。不仅如此，这本书对人人皆知的事情也进行了认真叙述，并未忽略。这种对分类的喜好一定源自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喜好。但他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所写的一切都很好。他断言这位古典希腊的“知识巨人”所写的动物学是书桌上的产物，令人啼笑皆非。总之，腓特烈写了一本关于鸟类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作为鹰的猎物的其他鸟类。书中有很多插图，还可以用作鸟类图鉴。因此有人说，即使在鹰猎这项体育项目已经衰微的现代，这部著作仍然可以作为鸟类观察者的参考书。

腓特烈在这部书的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鹰猎是贵人的运动，并说到原因，但他却没有说到自己为什么如此喜好鹰猎的个人想法。我们如果根据他贯穿全书的想法想象一下，我想该是这样一番景象。

第一，鹰在空中翱翔高飞的姿态俊俏，本身就具有美感。

第二，鹰具有力量。射击对手腕有强烈的冲击，但无法与放鹰后手腕受到的冲击相比。那种冲击让人不能不感受到鹰所具有的力量。

第三，鹰捕获猎物的方法巧妙。发现鸟类猎物后，鹰首先会盘旋到猎物的上方，张大羽翼，阻断上升气流。这样猎物就会被来自地面的气流带飞上来并靠近自己。鹰便瞄准这个时机捕获猎物。鹰绝对不会从下方袭击猎物，它的袭击总是自上而下。

所以，鹰既漂亮又有力量，是一种聪明的猛禽。腓特烈应该在鹰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这本书还举出了会享受鹰猎乐趣之人所必备的特质。

他说，首先要喜欢鹰猎，并且要有持续的热情。他写道，单从鹰匠

手中接过鹰来放飞是享受不到鹰猎乐趣的，必须充分了解每只鹰不同的性格，并据此采用不同的放飞方式。他反复说，鹰是猛禽，鹰猎就是在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去驾驭好鹰。这自然要了解并尊重鹰的性格。

可见在腓特烈的观念里，享受鹰猎最需要的资质就是智力。他写道，这不但要有智力，要有良好的记忆力、视力和听力，还要有敏捷的行动力、冷静果断的判断力以及不为愤怒所左右的自控力。他甚至提到为了早起晚上要早睡。腓特烈所说的鹰猎并非是单纯的鹰猎。他在书中甚至深入细节，详细分析了什么样的天气适合或不适合鹰猎，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气象学家。到了这个份儿上，即使是皇帝，恐怕他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富有特色的皇帝。当我读到书中写着并非年轻就好的地方时，我就会在脑子里想象年届五十的他，不禁会心而笑。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如果受到邀请，你会同行吗？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不会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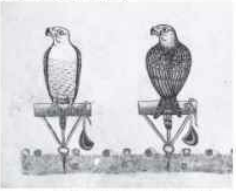
首先，星星还在天上眨眼就要叫我起床，说不去也值了。他们要骑着马从建在高处的城堡上下来，经过石板下坡路走到城外。石板路被朝露浸湿容易打滑，骑着马走过也是一大辛苦。出得城来，光是跟着皇帝驰马奔向山野就很够呛。时间这么早，山野中还下着晨露。我却不得不骑马奔驰在刚刚泛出鱼肚白的天空之下。

到达适合狩猎的地方时，周围的天色已经很亮。皇帝勒马止步。这是开始狩猎的信号。腓特烈鹰匠团队的负责人是阿拉伯人。他把一直停在他手臂上的鹰交给我。我的任务是把裹在鹰头上的红头巾解掉，把鹰交给皇帝。我刚解掉红头巾，就传来了皇帝的怒吼声：鹰会变得神经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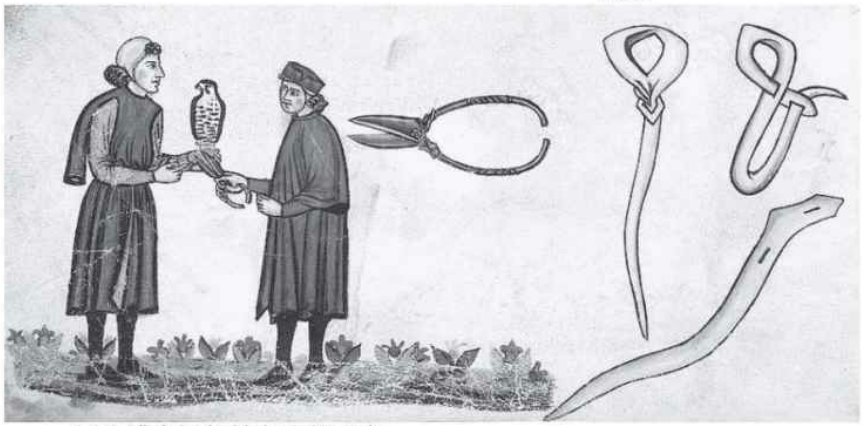
（1）照顾鹰的随从们

（2）捕猎野生鹰时的情形

（3）野生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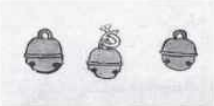


（4）受过训练的鹰。吊在鹰爪下的是头巾



（5）缚鹰绳打结方法的示意

（6）运送鹰的情形



（7）鹰戴的铃

（8）制作鹰饲料的情形

（9）鹰匠。左手戴着皮革手套

选自《驯鹰的艺术》

他在说停鹰的方法不好，虽然只是停鹰，但不考虑风向不行。为了不让鹰变得神经质，人倒要变得神经质了。这就是跟随腓特烈鹰猎的负面情况。

不过，好像也不是没有人像我这样想，他的儿子们就没有全部都跟父亲同行去鹰猎。恩佐和曼弗雷迪因为喜欢鹰猎而与父亲同行。但“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似乎就说了不去。皇帝走到哪里就得跟到哪里，这应该是那些皇帝身边的后备干部的任务，但却只有一半人跟皇帝同行鹰猎。“朋友们”可以与皇帝讨论哲学和数学，但似乎没有人有随同皇帝鹰猎的记录。“合作者”中也没有人有随行鹰猎的记录。总之，腓特烈只带喜好鹰猎的人去。要是工作，他会若无其事地强迫别人干重活，但在兴趣爱好上，他却从不强迫别人。

顺便一提，都过去了800年，据说现在欧洲的鹰匠们仍会每年一次聚集在腓特烈最喜欢的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区，一块儿过上几天享受鹰猎的日子。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读过腓特烈的《驯鹰的艺术》。

意大利语的诞生

语言不是召集相关专家讨论一下就可以形成的，只有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产生。因为不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不仅要求传达意义，还要追求听起来心里舒畅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否则就会写也难说也难。要创造令人满意的语言，就只能依靠艺术家的感性了。直到今天都在写在说的意大利语，便产生于腓特烈的宫廷，在其产生50年后移植到佛罗伦萨，最终成为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

即使在拉丁语久已成为通用语言且被作为知识分子语言的中世纪，俗语也为人们所用。虽说俗语从地方方言进化而来，但意大利南方的方

言本身就很复杂。由于统治者走马灯似的更迭不息，这些方言中还加进了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诺曼系法语以及德语的成分。要让这样的方言进化成俗语的意大利语也需要具备革新精神。

来自各地的人混合生活在腓特烈的宫廷里，每天各种语言满天飞。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梅尔菲宪章》，皇帝本人都会让人把这部本该用拉丁语书写的法典用意大利俗语写出来。他宫殿里的环境的确适合实质性提高意大利俗语的水平。

长年以来的南北法兰西之争也以北部吞并南部的形式而告结束。不愿意看到这一切而从普罗旺斯逃来的游吟诗人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创作的爱情诗，为提高俗语时代意大利语的质量点起了一把火。爱情诗必须是写者易写，收者易读，听得舒畅，因为爱情诗讴歌的是生命。似乎是顺应这种要求，在腓特烈的宫廷里诞生了一种被称为“十四行诗”[10]（sonnet）的诗歌形式，在文章的结构方面也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随着十四行诗的流行，并非爱情主题的诗也开始使用这样的形式。如同和歌、俳句和狂歌[11]意思相通一样，皇帝、政府高官、实力诸侯都流行玩一下十四行诗。皇帝的儿子们和后备干部这些年轻人自然会写一些这种形式的情歌。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被称为“西西里学派”（scholar sicilina）的诗人群体里，地位很高的官僚并不鲜见。“西西里学派”的准确含义是产生于“西西里王国”的学派，而“西西里王国”是腓特烈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领国。这个学派后来被腓特烈死后15年出生的但丁和其他人移植到托斯卡纳地区，形成了“托斯卡纳学派”。但丁的《神曲》就是用被称为“俗语”的意大利语写成的。但丁之后有彼特拉克、薄伽丘，其后又有马基雅维利、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12]，他们持续不断地把意大利语完善成为一门语言。正因为如此，意大利语中有句话“在阿诺河水里洗洗”，意思是让你“去佛罗伦萨好好练练意大利语”。

意大利人500年前就已经拥有高质量的国语了，但追溯根源，意大

利语却肇始于800年前腓特烈的宫廷，正像希腊文化产生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却在雅典开花结果。

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这是腓特烈的常用手法。他还把这个方法用在了语言领域。他在这个方面，也同一直拘泥于拉丁语而轻蔑俗语的罗马教廷产生了碰撞。那么，当时的编年史作家是如何看待腓特烈的呢？

同时代“媒体”的评价

我在这里举三位当时的“媒体”代表。前两位在教皇派时期出生于帕尔马和佛罗伦萨，研究家把他们归类为反腓特烈派。最后一位是站在腓特烈一边的记录者。

修道士萨林裴内·德·亚当（Salimbene de Adam）

他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马的神职人员，大约比腓特烈皇帝年轻20岁左右，在神职人员和生养地点双重意义上都被认为是教皇派编年史作家的代表。他年轻时曾经见过皇帝一面。

“不幸的是他一生都没有停止与罗马天主教会为敌，尽管养育他、守护他、援助他的正是这个教会。

“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是一个无信仰之徒和享乐主义者。他非但不相信灵魂不灭，还以《圣经》的内容为材料饶有兴趣地论证人死后一切皆无。

“他有许多恶德，狡猾奸诈，好色，不诚实，暴躁。不过，如果他愿意，待人接物也很亲切和蔼，还懂得理解对方的立场。

“他总是在行动。他中等个头儿，容貌俊美，举止优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当即喜欢上了他。他当时能不费力地讲多种语言，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

“如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忠诚于上帝和教会，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比同时代任何一位君主都杰出的统治者。”

乔万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

与其说他是腓特烈的同时代人，不如说他是生于半个世纪后的但丁同时代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庶民阶层，曾在当时佛罗伦萨的实力金融家佩鲁济和博纳科尔西手下当银行职员，后来投身政界，曾经三次担任任期两个月的佛罗伦萨政府高官六人团成员。

不过，正如但丁所写的那样，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像一个病人想摆脱痛苦而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是因为卷进了政治之争，维拉尼曾经被认为有贪污嫌疑而入狱。72岁那年，死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因薄伽丘著作《十日谈》而闻名的鼠疫大流行事件的牺牲者。

他所写的编年史在后世最为有名，这并不是因为他写了腓特烈皇帝，而是因为他写作时把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意大利和欧洲纳入了视野。这是他的特色。在他的著作中，腓特烈只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很多方面堪称之最的名人而已。

“腓特烈作为皇帝统治了30年之久。仅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人。如果让他写文章，他自己原来的自我也会跃然纸上。

“他的拉丁语掌握得很完美。他不但能说、能写我们的俗语（意大利语），还懂并会讲德语、法语、希腊语和萨拉森语（阿拉伯语）。他热衷于翻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保障给从事翻译的学者以足够的报酬。后代也会享受这些成果。

“在战场上他很勇敢，同时也很谨慎，因此敌人都害怕他。但他的私生活糜烂，沉溺于包括肉体方面在内的各种享乐。

“他不相信死后还会有今‘生’。这是他一直受到神圣的天主教会敌视的原因。”

尼科洛·迪·詹姆西拉（Niccolo di Jamsilla）

根据研究家的说法，这个拗口的名字可能是顾忌别人知道而用的假名。他撰写了从1210年腓特烈任性地宣布自己成人开始，到1258年儿子曼弗雷迪就任西西里国王为止这段时间的编年史。从他所叙述的内容来看，他在那不勒斯大学毕业后可能在皇帝手下当过公证人或国家指定辩护人。他用假名发表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正值皇帝死后教皇发起猛烈的反腓特烈运动的时期。

“腓特烈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人，这一点千真万确。他总是言行大胆，但他懂得以自己的贤明掌握好平衡。他没有因为莽撞冒进而坠下悬崖，而是能够用谨慎的判断面对和处理一切困难问题。如果没有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流思想妨碍他，他将留下更加伟大的业绩。

“他在一生中连续不断地遇到困难局面。不过，他会巧妙利用这之间的些许闲暇。他不仅热心于奖励学习技艺，还热衷于充实教育。他身边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各种才能的人。皇帝保障他们获得固定的收入，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使自己的才华开花结果。对那些贫困的年轻人，皇帝也毫不吝惜地从国库里出资让他们继续学业。因为他认为，满

足年轻人追求学问的愿望是统治者的义务，与他们有多少财产无关。皇帝也很热心于表现自己的学识。他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表现他这方面造诣的《驯鹰的艺术》。

“不过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强烈热情。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对每条法律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却不单纯依靠这些，而是经常倾听精通法律的专家们的建言和忠告。他在任何障碍面前都没有动摇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

“在他用这样的思想统治的王国里，律师为谁辩护都不会招致厌恶。对付不起律师费的人，腓特烈会为他们安排国家指定辩护人，以保障他们的权利。不过，由于过于重视法律实施的严格公正，酌情裁量有时受到轻视。

“敌人强烈而执着地憎恶这位皇帝，使得皇帝常常陷于艰难境地，饱尝苦恼。

“然而，他们的任何敌对行为都没能毁灭腓特烈。他的智慧守护着他，直到死神降临，敌人都没能毁灭他。”

---

[1] 病人傅油圣事（unctio infirmorum），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一种圣事。在教徒生病或临终时，由神父行按手礼，用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额和双手，并诵念一段祈祷经文，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使其痊愈或善终。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Tommaso d'Aquino，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会员。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文科七艺（liberal arts）。中世纪欧洲学校教授的作为一般修养的学科的总称，包括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七种科目。

[4] 雅各布·阿纳托利（Jacob Anatoli，1194—1256），出生于法国南部。中世纪著名翻译家。他受腓特烈二世之邀到那不勒斯，在米凯尔·司各脱的协助下将众多阿拉伯典籍文献译为希伯来语。他翻译了阿维罗埃的众多著作。

[5] 马伊莫尼德（Maimonides/Rabbi MosesBen Maimon，1135—1204），中世纪著名犹太哲

学家、神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曾任犹太教拉比。他将犹太教法律整理分类成书，总结了犹太教13信条，著有哲学著作《为行走在迷茫中的人指路》。

[6] 伊本·鲁西德（Ibn Rushd，1126—1198），拉丁语名为阿维罗埃（Averroes），出生于科尔多瓦（今属西班牙）。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广泛译注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基督教经院哲学家称为“译注者”。他综合了阿拉伯哲学的成就，对西欧中世纪哲学有极大影响。他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沟通东西方哲学的关键人物。他还在逻辑学、心理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诸多方面卓有建树。

[7] 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之一，确立了和谐而优美的古典主义风格。作品有《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

[8] 亨利二世（Henry II，Curtmantle），英格兰国王，1154—1189年在位，金雀花（安茹）王朝的创建人。他在英格兰进行了司法、军制等多项改革，强化了王权。他还企图控制英国教会，未果。

[9] 祝圣（consecration）是基督教的一种仪式，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规定程序，诵念规定经文，可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如为人授予神职所行的按手礼，按规定程序为新建教堂或新启用的圣杯、祭服等举行的礼仪，或在圣餐时使酒和饼化为基督的血和肉的祷告仪式等，皆称为祝圣。教堂新建须按规定程序由主教祝圣，拆毁时也须行解除祝圣的仪式。

[10] 十四行诗（sonnet），又称短诗、彼特拉克体。13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由彼特拉克完成的最严密的格律诗，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的形式。

[11] 和歌是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形式之一，是以五音和七音为基调构成的长歌、短歌、旋头歌的总称。俳句是日本独特的短诗形式之一，以5、7、5共17个音，“季语”（表示季节的词），“切字”（断句用的助词或助动词）的形式吟咏自然和内心。狂歌是以滑稽谐谑为宗旨的短歌，取材、构思、用语均不受限制，起源于《万叶集》的戏作歌和《古今集》的俳谐歌。

[12] 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1449—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繁盛时期佛罗伦萨的富豪和统治者。他保护和奖掖艺术，充分利用政治和外交手腕，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第八章
冲突再起

日本的高中教科书把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争斗归结为叙任权问题。关于叙任权问题有两派，一派认为任命大主教、主教的权力在教皇，另一派认为既然大主教和主教拥有的名为“教区”的领土在世俗的王侯领地之内，他们的任命权也在王侯。两派意见冲突，引发了叙任权问题。

然而，叙任权问题不过是导火索。只是在这时，罗马教皇与腓特烈皇帝之间的对决点燃了这根导火索，其背后守旧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对决是他们发生正面冲突的主要原因。

单举语言为例便可明白这一点。中世纪的拉丁文已经与古代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拉丁语是古罗马人的语言，进入中世纪后继承了这种语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这些灭亡的古罗马的当事人。古代简洁明快的拉丁语到了中世纪变得既不简洁也不明快。在他们看来，一般信徒不懂拉丁语才好。信徒不懂拉丁语，可以通过壁画让他们懂。一旦依赖绘画，用文章传达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神职人员写文章的能力也会降低。但这对神职人员并没有什么不好。与其让一般信徒理解，不如让他们相信更有利。

这种倾向也从神职界发展到了被认为没有“学问”的俗界。结果，以既不简洁也不明快的文章为好文章的历史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这样的时代，甚至连提高俗语的质量都会被视为对神职界的挑战。

顺便一说，但丁和腓特烈这两个人到底是中世纪的人物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这个问题让学者们很苦恼。除了代表作《神曲》外，但丁还有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就有《王国论》（De Monarchia）和《论俗语》。他的著述活动是在腓特烈死后半个世纪才进入高峰期的。

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和平，只有提高俗语的质量才能丰富表现力。这是这两部著作的关心所在。单凭这一点，我就会把他定位成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物。

教皇英诺森四世[1]

与腓特烈皇帝敌对了15年之久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1241年8月去世。22个月以后，英诺森四世于1243年6月当选新教皇。在此期间，欧洲一直处在教皇空缺的状态之中。

有资格选举教皇的人不仅要求是大主教或主教，还必须获得枢机主教的地位。他们所戴帽子的颜色不同。大主教和主教是紫红色的，而枢机主教是绯红色的。只有教皇才有枢机主教的任命权。此外，在中世纪，枢机主教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满20人。而在现代，这些人已数量过百。

为什么这20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未能选出新教皇呢？

其实，选是选出来了，他们在格列高利死后两个月就选出了米兰出身的枢机主教任新教皇[2]。但被选出的这位不到15天便过世了。他是米兰人，出身于贵族，以性格温厚而闻名。他被枢机主教团内部的皇帝派和反皇帝派的激烈斗争打垮了。这样一来，空缺状态便又持续了20个月之久。皇帝派枢机主教指的是那些认为腓特烈的说法也有道理的枢机主教；反皇帝派枢机主教指的则是完全不认可皇帝说法的枢机主教。自1170年以来的规矩是，候选人必须获得枢机主教三分之二人数的选票才能当选教皇。教皇持续缺位的原因在于枢机主教团的分裂，哪一派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选票。不过，这两派都有小聪明，能够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把教皇空缺当成条件，悠悠然地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

这个小聪明是，他们知道皇帝在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开会期

间，不会施加军事压力。

实际上，当皇帝得知教皇格列高利的死讯后，立即撤走了已经进逼距离罗马仅13公里之处的军队。而且，在选出下一任教皇的22个月中，他再也没有派兵施加压力。他甚至没有暗中做工作，以求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人做下任教皇。他认为，新教皇的选举归根结底是神职界的事情。

腓特烈皇帝贯穿一生的信念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信徒内心的平和、安定由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负责，现实生活则是以实施公正统治为己任的皇帝负责的领域。这种责任分担的思想，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所谓的“政教分离”。

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的人都有死也不能做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原则，却又做了违背这种原则的事，就做不到始终如一了。相反，完全不考虑贯彻什么“道道”去生活的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违反“道道”的事情。

这一点就是皇帝腓特烈同半个世纪之后毅然决然实施“阿维尼翁之囚”[3]的法兰西美男国王腓力的根本区别。

“阿维尼翁之囚”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法兰西国王把罗马教皇幽禁在法兰西领内的一个小城阿维尼翁长达70年之久。这已经不是什么分工的问题了，因为这样一来，俗界领袖的权威、权力都在精神领袖之上了。这可不是政教分离。

而且，一方占据了优势，劣势的一方必然反抗，这也是人之常情。到了这个地步，靠建立秩序才能实现的和平会离得越来越远。明确分工是一种防范措施，用以防止发生妨碍和平的反抗。

既然皇帝这样想，等待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成为事实上的休战期也就无可奈何了。我想再重复一遍：有自己信念的人，死都不会做违反

自己信念的事，一旦做了就会成为“耻辱”。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始终不渝的观点，也就不会感到耻辱，什么都干得出来。

以前罗马的百姓称腓特烈皇帝为“鹰”，称与皇帝敌对的教皇格列高利为“猫头鹰”。还是这些罗马百姓，用“乌鸦”的绰号称呼格列高利去世后继位的英诺森四世。在意大利语中，如果人们说哪个家伙是“乌鸦”，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本性卑劣却又冥顽不化的家伙”。

1243年6月25日，新教皇终于选出，定名为英诺森四世。新教皇出身于热那亚四大实力家族之一的菲耶斯科家族，并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由于成绩出众，年纪轻轻便站上了讲坛。后来他不知为何进入了神职界。由于受到前任教皇格列高利的赏识，他很快出人头地，当上了枢机主教。我们不知道以举止粗野而闻名的格列高利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学者风范的人。他晚腓特烈一年出生，但腓特烈出生于12月26日，所以两个人几乎可以看作是同庚。当选教皇那年，他年龄为48岁。

不过，热那亚四大家族中，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是皇帝派，而出了新教皇的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则被视为教皇派。目前热那亚的国政在菲耶斯科家族的统治之下。尽管在腓特烈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似乎也把教皇更迭看成一个机会，可以给多年未能解决的教皇与皇帝的抗争打上休止符。新教皇当选还不到一个月，腓特烈就向罗马派去了一个由地位、能力都毫不逊色的成员组成的使节团。

使节团由五人组成，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接替去世的赫尔曼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的杰拉尔德[4]、西西里王国海军总司令安萨尔多和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以及塔德奥·达·塞萨。

可是，这些人选触怒了新教皇，除了由于是宗教骑士团团长而不能开除教籍的杰拉尔德之外，其他四人都被开除了教籍。当时教会的观点是，任何人只要与被开除教籍的人有接触，也要被开除教籍。于是，腓特烈身边都是被开除教籍的人，无人可以派到教皇那里去当使节。

不过，教廷真是一个看上去严格却也有马虎之处的组织。我们不知道后来是如何处理的，但塔德奥·达·塞萨和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两人接触了教皇。

另一方面，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也把教皇更迭看作是教皇与皇帝改善关系的好机会。路易已经28岁了，12岁时就继承早逝的父亲登上了王位。由于他的祖父腓力·奥古斯都与腓特烈之间签订了德法互不侵犯协定，他的统治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对腓特烈有着感恩之心。他自己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同时也是世俗国家法兰西的国王。明确信仰领袖和世俗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分工，对他而言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非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利益更大。

法兰西国王决定派法国南部实力人物图卢兹伯爵前去罗马，不是去当中间人，而是去充当皇帝使节所说事项的保证人，事实上是皇帝方面的一员。于是，以改善教皇与皇帝关系为目的的谈判就此开场了。教皇方面出席的是奥托内枢机主教，皇帝方面则是塔德奥·达·塞萨和图卢兹伯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正面冲突，是一个涉及从根本上动摇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国际问题。这样的谈判同两个吵架的人之间单纯的和解并不一样。

谈判少不了迂回曲折。身在意大利南方的腓特烈在摸索让步的分寸，身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也犹豫不决，确定不下来究竟是坚持过去的做法还是就此改变。于是双方都一直在讨价还价。

最终，双方决定在次年，即1244年3月31日之前签订和谈协议书。腓特烈为了赶上这个时间，于11月离开意大利南部取道海路北上，进入了托斯卡纳地区，然后弃船上岸，从格罗塞托沿奥勒利亚大道南下直抵罗马。

教皇临阵脱逃

我想，这样的状况大概引起了英诺森教皇心境的变化，事情又有了波折。他认为，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事会很没面子。3月31日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尽管皇帝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和谈还是被拖延下去，解除皇帝被开除教籍的处分一事仍被搁置。

事已至此，皇帝请求与教皇直接会谈。教皇也接受了这个建议。连首脑会谈的地点都定在了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城。这座城不仅地方大，防卫也完备，还能容纳得下皇帝与教皇这种首脑会谈的众多随行人员。

腓特烈来到了托斯卡纳的内陆地区。与其说他直接来到了与教皇会谈的地方，不如说他是一边处置托斯卡纳内陆地区的反皇帝活动，一边去往会谈地点的。教皇也于6月7日出发，离开罗马前往奇维塔卡斯泰拉纳。但是，教皇离开罗马的做法令人不可思议。

既然是教皇，如果带着众多的枢机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在白天堂堂正正地走出罗马城门，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是，英诺森教皇仿佛不想让罗马城里的皇帝派注意到自己的离开，他化装成士兵，只带着三个同样化装成士兵的枢机主教，拿上教廷金库里的所有钱，深更半夜偷偷地离开了罗马。

如果直接去会谈地点，那他们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不到两天即可抵达。英诺森教皇和另外几个人走的也是这条道。但是，就在快要到达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城的地方，他们离开了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一条小道。

他们走过田间小道，来到了一个叫苏特里的小村庄，村里只有一家酒馆兼旅馆。这里成了教皇暂时的隐身之所。

教皇一定是在这个隐身之所等着事先指派好的从热那亚来的船只进港。6月29日夜里，他们又趁夜上船，从这里的港口离开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去了奇维塔韦基亚。

这个季节，第勒尼安海原本该是风平浪静的，然而这时却被狂风暴雨所翻弄。大海如此狂暴，若非驾船技能堪称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热那亚船员，船上的人也许早已化为海藻屑了。一周后，教皇终于在热那亚登陆了，那模样形同死尸。

面对其他领导人，腓特烈有自信让谈判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这要建立在与“工作人员”事先谈好、准备周到的基础之上。他自然也很自负，自10来岁开始，只要是与人面对面，他总能胜出。

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不是接到教皇答应直接会谈的消息后，一直紧张不已的腓特烈也松弛了下来。在此期间，为了能够进行会谈，“工作人员”也一直在进行着交涉。教皇是扔下了派来当“工作人员”的枢机主教们逃走的。因而，等到腓特烈知道教皇逃亡时，教皇已经到了热那亚。

听说腓特烈接到教皇逃走的消息时，他的反应不是暴怒而是愕然。

迄今为止，历代教皇中确有临阵脱逃的。罗马教皇身为宗教界之首，不允许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遇到军事力量袭来就只有逃跑一途。但是，在迄今为止的天主教会史上还没有一个教皇约好见面，甚至定好了见面地点而逃跑的。

皇帝得知教皇逃亡后所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详细记录下来写成信函，寄给了欧洲全体王侯，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他把托斯卡纳地区托付给儿子费德里科，自己去了意大利北方。他担心教皇逃到热那亚后，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同盟自治体势必会再次起来反对皇帝。

但他最终发现这个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原因是英诺森教皇休养了一阵子后发现，即使待在自己的祖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教皇要求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地区的领主萨伏依伯爵提供保护。但萨伏依伯爵的女儿嫁给了腓特烈的儿子恩佐，萨伏依伯爵的领土现在属于皇帝派。伯爵自己没有明确拒绝教皇，但伯爵属下的领地居民却以拒绝提供住宿或不愿提供膳食的方式消极怠慢。后来又有4位枢机主教追了过来，教皇一行中仅枢机主教就有7人。他们在意大利西北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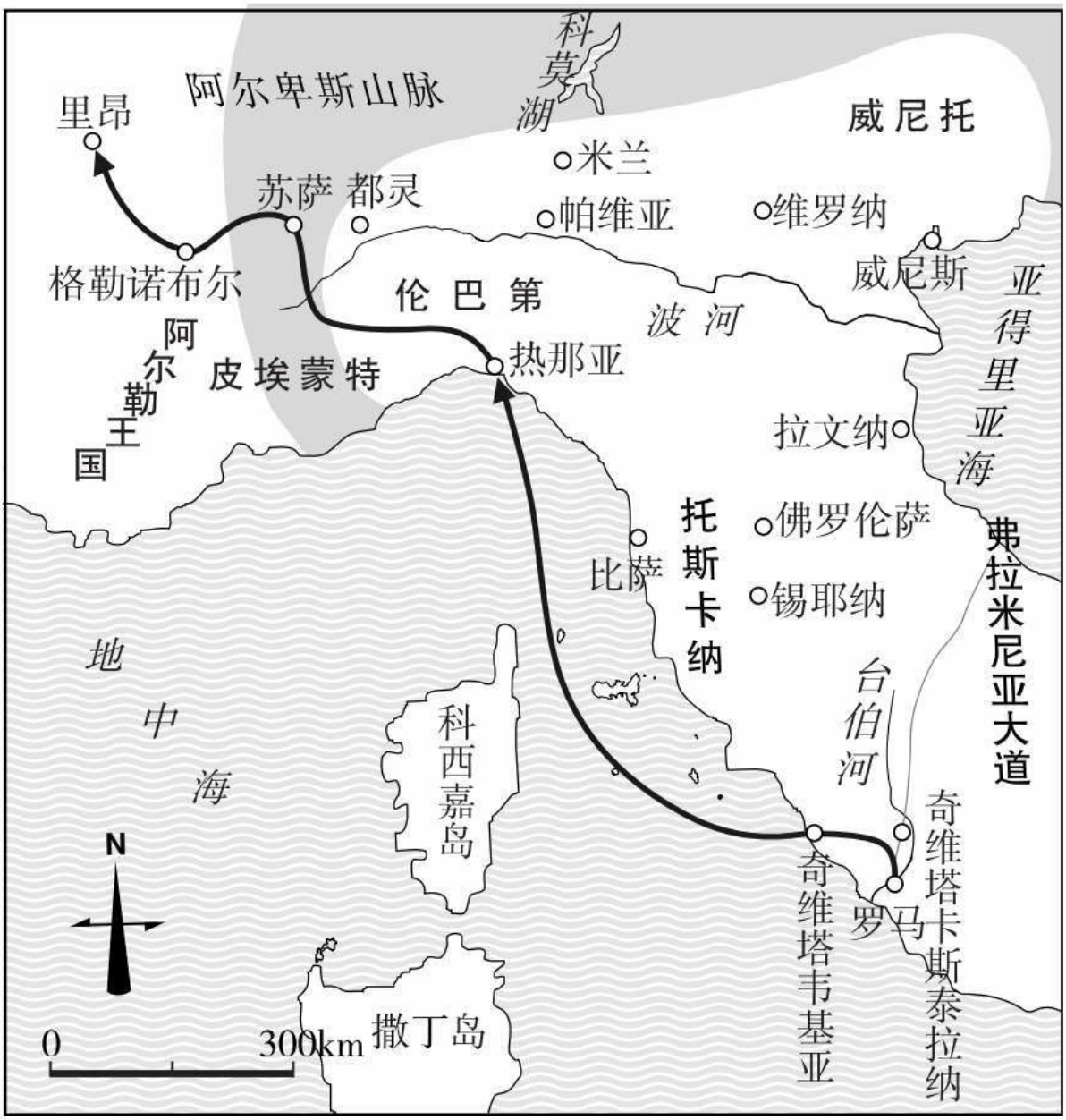
英诺森教皇最终请求巴黎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准许他流亡法兰西，但使者带回了拒绝的答复。尽管如此，教皇还是在这隆冬时分强行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兰西。教皇及其一行从意大利一侧的苏萨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取道通达法兰西一侧的格勒诺布尔。这样相当于走了古罗马时代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干线。到中世纪时，罗马大道已经被弃置了1 000多年，夜宿的旅馆和换马设施都不可能像曾经的那样完备，而且时值严冬。直到1244年12月2日，教皇一行才走到了里昂。教皇疲惫至极，根本没了宗教领袖的样子。自打他乔装成士兵逃出罗马以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

进入里昂

为什么是里昂呢？里昂难道不在法兰西王的领国之内吗？

如果教皇英诺森四世是在了解那个时代里昂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那里作为避难之所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他的确有资格站在世界最古老大学、当时的最高学府博洛尼亚大学的讲台之上。

因为这个时期的里昂还不在法兰西国王的领国之内，它是阿尔勒王国[5]境内的一座城市，而这个王国已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的治下。里昂地处帝国领土的最西端，在腓特烈看来即使在自己的国内也是边境了。所以，很久以来，里昂一直是一个大主教区。



英诺森教皇的出逃路线

中世纪的大主教区，实际上是指大主教作为领主统治的地区，其领主不是世俗君侯而是神职人员。既然是高级神职人员，在地位上即从属于罗马教皇。

这种领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位于法兰西境内却不是法兰西领土，同

时它也不是罗马教皇的领土，也不是皇帝的直辖领土。当时并非只有里昂有这样的特殊性。在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这种情况都存在。高级神职人员作为领主统治的地区就像大小不一的水滴一样洒遍了整个欧洲。这是中世纪欧洲世界的现实。正因为这样，皇帝和教皇的对立才会在叙任权问题上表面化，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对拥有这些领地的大主教或主教们的任命权究竟归谁。

里昂正是这种领土的典型：法兰西的王权不能达到这里，由于地处边境，神圣罗马帝国的力量也难以到达。这里是大主教统治的城市，而大主教的地位又在罗马教皇之下。教皇英诺森就逃到了这里。12月27日，教皇疲劳已极地来到里昂还不到一个月，就从这里向基督教世界的全体高级神职人员发出了请柬，邀请他们参加将于翌年1245年6月在里昂召开的公会议。

“公会议”就是在教皇的召集下，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以及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汇集一堂，就基督教信仰问题统一见解。基督教会称这种统一的见解为“dogma”（教义、教条）。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见解，直接与一般信徒接触的主教和修道士等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说教。于是，基督教会每过几年就需要集中一次，统一见解，以此作为教会的观点。因而，会议讨论的内容规定仅限于信仰上的问题，不触及世俗方面的问题。王侯们也可以派代表与会，但他们的身份只能是观察员。

异端审判

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福贾的王宫里度过了圣诞节和自己的生日。刚进入翌年1245年的1月，他便得知教皇要召开公会议。几天后，他又得知里昂公会议的讨论议题，第一个是教会内部改革，第二个是派遣新的

十字军，第三个是如何对付不断入侵东欧的蒙古。

只要知道这些，年届五旬的腓特烈会立即明白，在里昂召开的公会议并非为了讨论这些难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隐藏在公会议之名背后的异端审判。

所谓“异端”指的是那些身为基督教徒却拥有错误信仰的人。因而对异端的审判也在基督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的管辖之下。

借公会议之名把腓特烈作为对象的异端审判已有先例。4年前的124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企图在罗马召开拉特兰公会议就是先例。当时，腓特烈埋伏在海上，抓捕了经海路去罗马的高级神职人员，让公会议流产。4年后，教皇英诺森又要在里昂召开公会议。在里昂与在罗马不同，腓特烈无法在海上抓捕出席者而使公会议流产。腓特烈决定前往意大利北部，在那里准备应付里昂公会议。

腓特烈猜对了。1245年4月，教皇在里昂发出了通缉令，目标不仅是腓特烈，还扩大到了腓特烈的两个儿子恩佐和曼弗雷迪。父子三人都被张榜通缉。三个人所在之处都很清楚，所以“通缉”也只是怪谈，但这是罗马教皇反对皇帝的第一枪。

事已至此，腓特烈也需要有人站在审判现场为自己辩护。公会议只有神职人员才有资格出席，但允许俗界君王的代理人出席。皇帝任命塔德奥·达·塞萨为自己的代理人。他忠心可鉴，逻辑性强，雄辩，热情洋溢，说服力强。但是，无论是公会议，还是异端审判，都要在教会法的框架之下，亦即“检举等于判决”的范围内进行。

为了防备公会议，腓特烈必须去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一直不需要他担心，这对他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在15年前公布的《梅尔菲宪章》的基础上，西西里王国享受着和

平，富饶且秩序井然。以恩里克·迪·莫拉为首的封建诸侯变身为腓特烈手下的高级官僚，他们发自内心地协助腓特烈实现了这个目标。但这些第一代人去世的去世，退场的退场。不过，作为他们儿辈的第二代人已经被腓特烈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起来，被任命担任要职，活跃在第一线。而且，腓特烈的儿子们比第二代人还要年轻10岁，现在也已经成长起来。后备干部往往30岁上下就被任命担任要职，而皇帝的儿子们不到20岁就被派到了第一线。

后备干部和皇子们在年龄上都是第二代，他们长大后也互相合作，推进事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皇帝身边亲密无间地度过了成长期。腓特烈有他的方针，如果开罗的苏丹送来应用东方最新技术制造的水钟和宇宙仪，年轻人就会并肩观摩。他们还一起旁听皇帝与朋友们的谈话，一起随同皇帝外出鹰猎。他们之间当然有强烈的同窗意识。

托付给这些“第二代”的不只是西西里王国这一个地方。甚至连被称为“圣彼得遗产”的意大利中东部的马尔凯地区和佛罗伦萨的统治也都交给了他们。但在意大利北部，以米兰为领袖的伦巴第同盟尚未被完全抑制，所以这里被托付给了已经用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经验老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儿子中的最年长者、已经29岁的现任撒丁王恩佐，另一个则是封建诸侯中的能人，冷酷而富有军事才能的维罗纳领主埃泽里诺·达·罗马诺。

正如腓特烈在他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有着一种强烈的性格倾向：只要情况允许，他要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之后再向前迈进。突发性的临时起意也许来自跟朋友们的愉快聊天。

1245年4月，腓特烈离开意大利南方，前往意大利北方。为了防备里昂公会议，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要去维罗纳。在维罗纳召开“诸侯会议”的请柬已经发给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诸侯们。如果定在维罗纳开会，即使是从德意志赶来，也只要翻过布伦纳山口就能到达。这一年，17岁的儿子康拉德自然也要来维罗纳。他是嫡出，是腓特烈的第一

继承人。这一点他与年龄比他大但是庶出的恩佐不一样。

6月2日，世俗领主和圣职人员领主到齐，皇帝在会上做了说明。他明白坦率地讲了自己与教皇之间长年争执的起因，讲了教皇的说法和自己的说法。听说他讲话没有使用与自己帝位身份相符的拉丁语，而是用了全体与会者都能听懂的德语。德语作为一门语言，当时尚未发展成熟。

除了封建诸侯以外，奥地利公爵、摩拉维亚公爵、卡林西亚伯爵等地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但独立色彩浓厚的地方领主也都前来出席了在维罗纳召开的“诸侯会议”。腓特烈皇帝已经把话说清，为的是不管里昂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将其波及到阿尔卑斯山北侧这些地方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诸侯们回阿尔卑斯山北面去了，只有康拉德在维罗纳逗留了一段时间。而这两个星期是他们父子共同度过的最后时光。

里昂公会议

1245年6月28日，圣歌队“降临吧，神圣的造物主啊……”的歌声响彻里昂大教堂。里昂公会议开幕了。其实，这次公会议连低级神职人员在内，出席人数也不到150人。要在平时，会有500到800人参会，而这次意大利和德意志均无人参会。尽管如此，英诺森教皇还是强行召开了这次公会议。听了议长英诺森教皇的开幕演说，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明白了，这次公会议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请柬上所写的教会改革、十字军远征和寻找应对蒙古的对策，因为教皇在开幕演说中强调的词语是“异端”。

教皇的演说刚一结束，塔德奥·达·塞萨便站起身来讲话。他主张，这次审判（他明确说出了审判一词）因为检举方、审判方都同为一方，所以无效。但他的主张只能是空话，因为只有罗马法和根据罗马法制定的《梅尔菲宪章》才重视检方的检察官和给出判决的审判官之间的角色分离。而教会法却不同。即使到了以后的时代，异端审判蔓延到整个欧洲，审判官和检察官也并不分离，这两个角色经常由同一个人担任。公会议是按照教会法进行的，腓特烈再让步，这位皇帝的话再有英、法两位国王做担保，也只能是空话。教皇英诺森只说了句“谁能相信皇帝的话呢”，就驳回了两位国王派来的代理人的请求。在决定7月5日召开下一次会议以后，当天的会议便告散会。

7月5日，公会议进入第二天。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三位西班牙人主教检察官和辩护人塔德奥·达·塞萨之间的言语交锋。在演绎法庭剧的美国电影中，辩护人举手高喊一声“审判长，我有异议”后便可以开始反驳了。塔德奥·达·塞萨在里昂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卡伊拉斯、康博斯泰拉、特拉戈纳三位主教接二连三地举出“皇帝的罪状”，他就一次次地站起来单手拿着材料进行反驳。

教皇英诺森借1245年里昂公会议之名行异端审判之实。会场上检察官与辩护人的言语交锋留下的记录被人们视为史实。我们如果收集有关记载，尝试重构当时的场景，审判过程似乎是这样的。

检察官：皇帝不仅对嫡出长子亨利态度冷淡，还在精神上虐待他，逼他自杀了。

对此，塔德奥·达·塞萨详细列举了亨利担任德意志国王期间的种种行为，反驳检察官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检察官：与皇帝正式结婚的三位妻子都在几年后就去世了，原因也与他让伊斯兰宦官监视、虐待身为基督教徒的妻子有关。

塔德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如果你们说有这种情况，应该传唤证人让他们作证。皇帝甚至对情人都没有那样虐待过。

检察官：卢切拉原来是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皇帝却把他们赶走，让萨拉森人移居这里，还同意他们建造自己的城市。

塔德奥：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管是希腊正教徒、犹太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只要他们不反对皇帝的统治，皇帝就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只把伊斯兰教徒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卢切拉，归根结底只是因为统治上的原因罢了。

何况以前卢切拉是内陆地区，农田很多，居民人数很少。而如今，卢切拉居民增加，其中的确有很多萨拉森人，但也不是没有基督教徒居民。尤其是皇帝同意前任教皇格列高利派遣说教僧的要求以来，有不少伊斯兰教徒改信了基督教。其中还有一个人被皇帝录用，就任了意大利南方的重要官职。

检察官：同伊斯兰国家的苏丹和埃米尔保持友好关系，这不是一个以捍卫天主教为己任的皇帝所可以做的事情。更有甚者，皇帝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希腊正教徒尼西亚帝国的皇帝。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这是不应有的事情。

塔德奥：如果断定与接壤或不接壤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国家利益，那么，与这些国家的领袖们保持友好关系就是肩负统治国家重任者的义务。所以，不管对方是希腊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对非神职人员的皇帝而言都没有什么不便。皇帝也并没有把女儿嫁给伊斯兰教徒。即使希腊正教现在同基督教分开了，但毕竟还是基督教。

塔德奥·达·塞萨的这些反驳在近现代都是正确之论，不会有问题。可在当时，尽管教皇的权威开始受到撼动，但时代仍旧是中世纪后期。他的话并没有起到让神职人员觉醒的作用。所以，担任检察官的主教们

就像牛看到红布一样愤怒不止。

检察官：听说福贾的王宫里经常开宴会，还有萨拉森女人陪酒跳舞。

塔德奥：首先皇帝并不喜欢宴会。即使设宴，也仅限于外国要人来访的时候，而且从不让女人陪席。宴席上有时候也会以舞蹈招待客人，但叫来的都是以舞蹈为职业的女性，而这种女性只会是伊斯兰教徒。

检察官：福贾的王宫里有萨拉森女人常驻。那正是伊斯兰式的皇帝后宫。

塔德奥：王宫的一角有伊斯兰教徒的女人居住，这是事实。但她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为皇帝和高官们穿的服装织布料。特意从东方花高价采购高级纺织品，不如自己在国内生产。这也是皇帝鼓励本国产业的一项政策。

检察官：皇帝手下的士兵里有不少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统率的士兵却是伊斯兰教徒，成何体统！

如果说塔德奥·达·塞萨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心里想什么，脸上和话中就会表现出来。这时他肯定已经相当不耐烦了，于是开始了冷嘲热讽。

塔德奥：这不过是因为皇帝觉得，现实中上战场就得流血，那就不要让基督教徒而让伊斯兰教徒去流血好了。

检察官：皇帝身边经常有很多年轻人出没，这反映了皇帝贪恋男色的性取向。

对此，用今天的话说，塔德奥忍无可忍了，他斩钉截铁地予以回击。

塔德奥：他们都是皇帝的儿子们或是高官的儿子们。如果你们硬要说里面有人跟皇帝有那种关系，就请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这些对话的内容简直就像是花边新闻，就连出席公会议的神职人员们也都皱起了眉头。会议记录里只记载说会场陷入了沉默，所以并没有人在座无虚席的里昂大教堂里发出嘘声。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冷静了下来。充任检察官的三位西班牙主教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他们改变了攻击的方向。

检察官：皇帝侵略了教皇领土马尔凯地区，犯了侵害“圣保罗遗产”罪。

塔德奥：皇帝已经明确说过要归还的。既然法兰西国王和英国国王都已经站出来说为皇帝的承诺做担保人，这事已经不成问题。

检察官：皇帝对重新发动十字军远征毫不关心。

塔德奥：因为以前一直没有那种必要，这就是原因。去年（1244年），耶路撒冷被一个鲁莽的埃米尔占领了。如果因此决定必须远征，皇帝随时准备出发。

里昂公会议（居中者为教皇英诺森四世）

这就是公会议第二天的大致情况。这天的交锋情况被逐一报告给了身在维罗纳的皇帝。

人们不知道腓特烈如何看待这个情况，只知道他离开维罗纳，转移到了都灵。

可能他认为在都灵要比在维罗纳能够更快地获悉从里昂送来的报告。

也可能是他在考虑自己亲自去一趟里昂。

皇帝腓特烈二世成了缺席审判的被告。但教皇英诺森既没有向“被告”发来传票，也没有让“被告”派出全权大使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代理

人。

已在里昂的塔德奥·达·塞萨起到了事实上的全权大使的作用。不过，他的地位跟法、英国王的“代理”一样，只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出席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参加的公会议。也就是说，塔德奥作为捍卫皇帝的人，并不是教皇请到里昂来的。

一般人们都会认为，哪怕是缺席审判，也会允许保护被告的辩护人出席，这才是审判。可那是罗马法的观点。里昂公会议是一场被告和以保护被告为己任的辩护人都没有出席的审判。

而塔德奥·达·塞萨能够起到事实上的辩护人的作用，是因为教皇不能无视在座的法、英国王代理的存在。他们认为，塔德奥秉承自己国王的意思站出来反驳是天经地义的。

5天后的7月10日，公会议开始了第三天的日程。这天，塔德奥·达·塞萨向同时为审判长的教皇请求于15天后的7月25日召开下次会议，并成功获得批准。也许塔德奥在想，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需要等待皇帝正式任命的全权大使到来。

法、英国王的代理人也赞成这次延期。在有决定性结果之前，双方相互靠拢，以避免决裂，这也是欧洲许多王侯所希望的。他们认为15天的延期是妥当的。

教皇英诺森知道腓特烈皇帝已经到了都灵。从都灵到里昂的直线距离只有从里昂到巴黎的一半，虽然从都灵到里昂中间要翻越阿尔卑斯山，不能做简单比较。如果善骑马，从这里翻越阿尔卑斯山并非太大难事。现在又正值夏季，如果翻山下到格勒诺布，只要骑马驱驰就能到达里昂。再说，腓特烈虽已年届五旬，但现在仍少不了鹰猎运动。鹰猎是一项需要巧妙地御马奔驰的体育项目。

7月17日，教皇紧急召集公会议开会。这次会议本应于25日召开，可现在是17日，时间差了8天。

关于提前8天开会的理由，教皇只说了句皇帝连全权大使也不派，因而没有必要给他把时间延迟到25日。

然而，全权大使已经从都灵出发，正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腓特烈不管教皇是否发出邀请，已经向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委以全权，派他前往里昂了。皇帝还通过快马信使把已经派出全权大使的事情通报了教皇。所以，教皇是明知此事却提前召集公会议，还声称皇帝不派全权大使。

由于有15天的休会时间，有不少出席公会议的人不在里昂。英国国王的代理甚至为了利用这个机会与国王商量而回国去了。虽然他已经见过了国王，但还没有渡过多佛海峡。不过，塔德奥留在了里昂，等待同事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到来。

因此，7月17日参加紧急召集的公会议的人数一定大大少于当初的150人。但教皇仍然强行开会。

教皇面对与会人员宣读了审判官的判决。既然依据的是不承认上诉权的教会法，这便是最终判决了。

审判长英诺森四世教皇直接认定了三位西班牙主教检察官所列举的皇帝的所有罪状，驳回了塔德奥所做的所有反驳。教皇这天判决的主要内容如下：

皇帝腓特烈二世完全不配拥有他所占据的崇高地位。他的所作所为均为异端行为，完全违反了他自己所属的天主教会的教诲。以前开除教籍的处罚对把这个“教会的敌人”拉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没有起到作用，所以不得不对他处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教皇接着说道：

“我要对德意志的选帝侯等全体诸侯进一言，赶快选出新皇帝取代腓特烈。

“决定西西里王国未来的权力在于王国真正的所有者罗马教皇，我将考虑王国国王的人选。”

听到这些，塔德奥·达·塞萨连手都没举就站了起来，巨大的主教堂中回响着他的喊声：

“今天上帝震怒，灾难降临，人类的苦难时代开始了！”（Dies ista dies irae，calamitatis et miseriae！）

塔德奥·达·塞萨的观点总是和他的君主一致。我想，他用拉丁语喊出的意思是这样的：英诺森教皇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耶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上帝对此震怒。由此导致的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决定性抗争将开启使无关人们陷入苦难的时代，好似巨象在草原上激烈的冲突将更大规模地波及中小型动物。

事情已经超出叙任权问题的范围了。问题已经不是在世俗王侯领国里以教区名义拥有领土的主教、大主教的任命权是归世俗王侯，还是归神职界之长罗马教皇这样简单了。换人的对象也已经不是主教或大主教，而是皇帝或国王了。

我想请读者记起，在这次里昂公会议召开的时代，人们还普遍认为《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是真实的。直到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才被证实是教廷在11世纪前半叶伪造的假货。但里昂公会议给腓特烈定罪是在1245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但相信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认了基督教，还相信他把欧洲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也赠送给了罗马教皇。正因为如此，英诺森教皇才会说腓特烈从母亲一方继承的世袭领土西西里王国的真正所有权属于罗马教皇。

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们，尤其是11世纪以后的教皇们之所以能把“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这一句话用作武器，就是因为那时《君士坦丁献土文献》尚未被揭穿是伪造之物。相反，中世纪被忘掉的恰恰是耶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

里昂公会议所做的是，宗教界地位最高的人剥夺俗界地位最高的人的地位。这叫作“theokratia”——“神权政治”。

震撼了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始于“卡诺莎之辱”，到了腓特烈时代形成了正面冲突，一直延续到“阿维尼翁之囚”。也许事情到此仍未结束，因为历史在进入普遍认为“政教分离”理所应当的现代之前，还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腓特烈在都灵得知给自己的判决后震怒了，他喊道：以前我一直对他表示敬意，以后就不客气了！我要变成铁锤！

他采用一贯的做法，向全欧洲的王侯们发去信函，信中明确表明了他的想法。全文没有一句华丽辞藻，劈头一剑，一气呵成。腓特烈没有让擅长撰写美文的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来写这封信，而是自己面对很多秘书口述内容，让他们记录而成。

信函首先斩钉截铁地说，假借公会议之名在里昂搞的异端审判根本就不是审判。

原告方没有出示一件证明罪状的确凿证据。原告方带上法庭的所有证人只是重复了原告方的说辞而已。这样的证人在任何审判中都不会得到承认。而在里昂，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被当作了证据。相反，辩护方无论什么证言的提出和无论什么证人的出庭，都被无视、被驳回。

接着腓特烈把矛头直指作为审判长和宗教界之长的教皇。

腓特烈谴责道，审判官必须在倾听原告方和辩护方陈词的基础上才

能做出判决，而审判长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要求被告到庭。这样，审判长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坐在这个位子上的资格。

腓特烈断言，作为宗教界之长，教皇在里昂的行为已经大大偏离了他的地位所授予他的权限，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写着，也没有任何人讲过教皇可以剥夺皇帝的地位。

皇帝的权力是上帝恩准的，就和教皇的权力是上帝恩准的一样。

即使皇帝施行恶政犯了罪，皇帝也只对上帝负责，没有必要对罗马教皇负责，因为罗马教皇的权限仅限于宗教方面，不允许涉及上帝恩准给皇帝的世俗权力。

腓特烈用这样的语气给全欧洲的王侯写了信函。他在信末这样写道：

“你们要认识到，教皇这次对我的处置明天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这次假借公会议之名在里昂搞的审判已经证明，无论谁坐上罗马教皇的位子，都可以对世俗的权威和权力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最后的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和德意志诸侯没有一个同皇帝断绝联系，就连一直打着自由的旗号反抗腓特烈的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城邦都没有对教皇表示赞成，他们反而都沉默了。

“里昂”以后

对教皇英诺森来说，意外之处起了火。里昂主教因为教区的缘故，是里昂事实上的领主，他对原本应该讨论宗教问题的公会议以这样的结果结束流露出不快。教皇一气之下撤了这位主教的职。这位主教一直就

对教皇的做法相当厌烦，现在索性躲进修道院闭门不出了。

然而这位主教因施善政而受到居民的爱戴，他们对撤职一事感到愤慨，教皇下榻的主教宅邸周围气氛险恶。教皇感到了人身危险，不得不离开里昂，转移到北边的克吕尼修道院。中世纪的大修道院都是正儿八经的城寨建筑，这里要比位于里昂市内的主教宅邸更让人放心。

不过，教皇在修道院里并不只是祈祷上帝。

他号召全欧洲举起军事大旗，打倒“天主教会的敌人”“反基督者”“可恨的异端之徒”腓特烈皇帝，结成反皇帝十字军。他也并未仅仅停留在号召的地步。

尽管中世纪已经过去了800年，但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没有变。教皇发动起来搞宣传的不是各地方大主教、主教管辖下的修道院的修士，而是罗马教皇直辖的修道院的修道士。教皇从克吕尼修道院向各地修道院发出了指示，命令他们把所属的所有修道士都动员起来，掀起一场反皇帝宣传运动。

大主教、主教管辖下的教士都在城镇教堂的祭坛上说教。而修道士却是在街头说教，他们不在教堂，而是在广场上或大街小巷里说教。

那年11月接近月底的时候，通向克吕尼修道院的路完全被雪覆盖。一队人马在路上行进。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豪华服装，带着负责警卫的士兵，看上去和上帝之家很不协调。

这一行人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和王妃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出身于卡斯蒂利亚王族、对30岁的国王有巨大影响力的国王生母比安卡，以及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国王。

他们在修道院的一个厅里与教皇相见。路易代表一行请求教皇与皇帝改善关系，以免使欧洲全境卷入骚乱。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英诺森教皇非但没有听进三位国王的请求，反说要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授予法兰西王的一个弟弟，要求国王把军队借给这个弟弟，协助他从腓特烈手中夺回西西里王国。

路易九世有三个弟弟。路易有义务给予这三个弟弟适当的地位和领土。但在这个时候，路易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教皇。

原因不仅仅是要考虑自己与年长20多岁的腓特烈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路易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不在人后，但他不得不醒悟，以前的开除教籍只是开除教籍，一般总会解除的。但在里昂公会议以后，开除教籍就等于剥夺领国了。如果你承认教皇有授予领国的权力并且接受了授予，那就等于你承认了他也有收回的权力。

不只是王侯级的人不同意教皇在里昂公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明显越权行为，他们手下的“骑士”甚至有了更具体的行动。法兰西境内，在街头开展反皇帝宣传的修道士被骑在马上的骑士撵走的事件越来越多。德意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诸侯担心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纷纷向教皇派出使节，要求他改善与皇帝的关系。

身在克吕尼修道院的教皇改变了战术。以前教皇只是“建议”德意志的诸侯选一个皇帝替代腓特烈，现在他亲自出马了。

教皇的“长臂”

亨利·拉斯佩是图林根伯爵的三儿子。他的长兄参加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但在出发前染病身亡。这个年纪尚幼的儿子便以摄政的形式统治了图林根伯爵的领地。他在37岁那年受皇帝之命，被派到东欧抗击入侵的蒙古军队。腓特烈一边与教皇对立，一边向波兰和匈牙利国

王调派援兵，这两地处在抗击入侵欧洲的蒙古军队的最前线。拉斯佩这一年的积极表现也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腓特烈第二年任命他做了高官，辅佐皇帝年仅14岁的继承人康拉德。

这位拉斯佩引起了教皇的关注。教皇派遣密使前去游说这位不是自己领国的领主但却有军事才能的拉斯佩，开出的条件是准备让他当选德意志王，把康拉德赶下台，然后再让他当皇帝。42岁的拉斯佩同意了。

教皇所说的“准备”的意思是由教皇方面为拉斯佩当选德意志王拉到足够的选票。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中世纪的德意志是“世俗诸侯”和“神职人员诸侯”并立的社会，前者由自己获得领土并充当统治者，后者由教皇“叙任”的大主教以教区为名而事实上当领主。让这两种“诸侯”和平共处，是腓特烈成功统治的主要原因。而教皇英诺森采取了离间这两种诸侯之间关系的策略。

“神职人员诸侯”有软肋。那就是即使想通过让外甥等人当主教来继承以形成事实上的世袭领土，他们也不同于“世俗诸侯”，不能主张正当的世袭权。而且里昂公会议以后，被教皇开除教籍意味着被剥夺领国。被开除教籍便不能再当大主教，领国也要被剥夺，大主教就成了掉下树来的猴子。[6]

教皇搅浑了水。在逼迫之下，德意志“神职人员诸侯”中被认为有实力的科隆和美因茨的大主教就范了。这样，尽管遭到几乎所有“世俗诸侯”的反对，但拉斯佩还是成功当选了德意志王。这两位大主教站在了拉斯佩一边，拉到了其他“神职人员诸侯”的票。

当选德意志王后，拉斯佩立即逼迫康拉德让位。他以为这位17岁的年轻人会轻易退位，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断然拒绝。年轻人当然听从了身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父亲的指示，康拉德自己也已经在德意志王位上待

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拉斯佩刚刚当选德意志王就栽了跟头，他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世俗诸侯”的支持。世俗诸侯们都称他为“rex clerus”（靠僧人当上国王的人）。而这样称呼他的诸侯们几乎全都站在了康拉德一边。

采用和平手段更迭国王的办法失败了，拉斯佩要赌一赌使用军事力量来更迭国王。1246年8月，两军在法兰克福决战。当时拉斯佩获胜了。失败不是因为刚满18岁的康拉德缺乏军事才能，而是因为教皇向两位原本应该站在康拉德一边战斗的领主承诺，说给他们每人6000枚马克银币和康拉德领土内的一块伯爵领地。所以，失败几乎没有带来损失，康拉德自己也在一个月后同拜仁公爵的女儿举行了婚礼。

第一仗的6个月之后，拉斯佩与康拉德又打了第二仗。这次康拉德获胜。拉斯佩受了伤，逃回了出生地图林根，没有一个诸侯跟随他。拉斯佩在这样的状态下死去，距离他当选德意志王还不满一年。

拉斯佩的死并没有改变英诺森教皇的想法。但德意志诸侯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教皇与康拉德即腓特烈敌对了。教皇不得已挑中了20岁的荷兰王子威廉。如果一下子就让荷兰人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只会招致德意志诸侯的反弹。于是教皇承诺转而让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让他同意去德意志。教皇又借助科隆和美因茨大主教的力量，在查理曼下葬的亚琛让他登上了帝位。

但没过几年，这位荷兰王子也逃回了荷兰。他在战场上被康拉德击败，连“神职人员诸侯”都抛弃了他。

以上就是英诺森教皇企图借公会议之名消灭腓特烈皇帝的里昂公会议之后，即1245年和之后一年的情况。

尽管腓特烈被开除了教籍，被剥夺了皇位和王位，但欧洲的王侯并

没有改变同他的关系。至于教皇呼吁建立以反腓特烈为旗号的十字军，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诸侯响应。

这期间，腓特烈一直留在意大利北方。他在都灵、维罗纳、帕多瓦之间走动，要监视欧洲各地的动向和制定对策，待在意大利北方十分方便。

但是，腓特烈的脚底下起了火。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地的情况不断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着。而祸起萧墙不但他没有想到，更使他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远方玩弄策略，这在欧洲叫作“长臂”。教皇英诺森四世已经把他的“长臂”伸向了德意志，同时又伸向了意大利。教皇在德意志玩弄选举拉斯佩当德意志王伎俩的同时，在意大利还做了另一件事。

阴谋

英诺森教皇有个妹夫，名叫奥兰多·罗西。这个人在他大舅子当选教皇之前就参加了皇帝腓特烈的军队，与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伦巴第同盟作战。因此，他跟皇帝属下的将领们关系亲密。大舅子当选教皇后，他便不再在皇帝手下当差，去了妻子娘家菲耶斯科家族的领地。这块领地在皇帝属下的帕尔马附近。于是他便开始接近代理皇帝统治这里的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

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是独自承担皇帝早期教育的圭列尔莫·弗朗切斯科的儿子。皇帝很感激这位老师。在自己被人抛弃成为孤儿的时候，这位老师教给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从不扼杀这位学生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泰巴尔多不过是一位教师的儿子，皇帝却像对待封建诸侯即现

今作为政府要员的孩子一样，把他接进宫里，让他上了“后备干部”课程。“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皇帝又把帕尔马交给他统治。而帕尔马这个地方一会儿倒向皇帝，一会儿倒向教皇，很难控制。

我们不知道泰巴尔多听到奥兰多告诉他教皇的内部计划时，他的心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只知道，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按奥兰多所说，立即把这个计划转告了潘多尔福·法桑埃拉和贾科莫·莫拉。以老好人闻名的泰巴尔多大吃一惊也情有可原，因为奥兰多告诉他，教皇的意图是刺杀皇帝和他的儿子恩佐。

但潘多尔福和贾科莫二人从泰巴尔多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后却没有吃惊。他们二人在腓特烈宫廷里的后备干部中属于年长的一辈。也就是说，他们从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被皇帝任命担任要职已有10年的时间。

不过，最近在潘多尔福·法桑埃拉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他在托斯卡纳地方当皇帝代理官的地位被皇帝的儿子费德里科取而代之。贾科莫·莫拉被皇帝任命为马尔凯地方的皇帝代理官，他并未被拉下马来，还同过去一样是皇帝手下的一位要员。这两人分别招呼自己的兄弟，全家参与了这个阴谋。

就这样，阴谋在原后备干部中不断扩散，参与者增加到了九人，其中包括西西里全岛的皇帝代理官德·阿米契斯、同样作为皇帝代理官负责普利亚地方的齐卡拉，还有大领主兼高官桑塞维里诺一家。然而，问题不在于数字。

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父辈都是实力诸侯，又被委以腓特烈政府的要职；他们都是被作为下一代的干部而培养起来；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三四十岁，并具备了担任要职的经验。腓特烈把他们作为人才培养起来，打算把自己的身后托付给他们，还给了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然而，他们却背叛了年逾50的腓特烈。

既然这样，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要一辈子忠于腓特烈呢？在自己父亲的身边成长起来的儿辈又为什么突然翻脸向腓特烈举起反旗呢？

还有，正在同他们一样经历同样课程但更年轻的一代为什么没有加入这个阴谋呢？

最容易得出答案的是第三个“为什么”。更年轻的一代人正处于20岁上下，还在后备干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尚未被任命担任要职。因而他们还没有被教皇列入阴谋者名单，决定造反的上一代人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不过，属于这一代的人里也有人被当成了阴谋的参与者。他就是贾科莫最小的弟弟鲁杰罗·莫拉。把他当作阴谋参与者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莫拉全家都参与了这个阴谋，事情败露后他们逃进了一座城堡，而这个年轻人也跟着逃了进去。

再说第一个“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选择忘记各自利害、共同拥有梦想的活法。

他们第一代人都是意大利南方有实力的封建领主，像过去一样继续当他们的封建领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所生活的中世纪后期是封建制社会。教皇极度憎恶意大利南方和德意志由同一个人统治，也希望西西里王国继续维持封建诸侯势力强盛而国王势力孱弱的社会状况。而且，当时推翻腓特烈很容易。

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一辈子协助腓特烈实现其“梦想”。他们明知腓特烈的梦想是缩小他们这些封建领主的权力，却又一直与他拥有同一个梦想。腓特烈决定摆脱封建社会，实现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

贾科莫的父亲恩里克·莫拉死于这个事件的4年之前。最重视公正执法的腓特烈把类似司法大臣的要职交给了他，他一干就是20年，直到死而后已。腓特烈把海军交给了齐卡拉，他便当了一辈子西西里王国海上防卫的最高负责人。桑塞维里诺因为其领土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便一

直专司陆上防卫。

此外，并不只是这些世俗的实力人物与腓特烈有着共同的“梦想”，在已经属于神职界、成为教皇的人的神职人员中，也有人与腓特烈有着共同的“梦想”。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勒莫的大主教贝拉尔德都不曾离开过腓特烈。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也为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埃里奥·达·科尔托纳接替阿西西的方济各，成了方济各修道会的第二任会长，他受教皇派遣去腓特烈那里说教，却一去不回。哪怕被震怒的教皇开除了教籍，他也一直站在了皇帝的身旁。

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不遗余力的合作，腓特烈才得以去德意志，去意大利北方。至于莫拉，皇帝不在时他就是以仅次于皇帝的资格统治西西里王国的人。腓特烈想把这些合作者的儿子们接到身边，作为下一代干部培养也属理所当然。这一做法在他们的父辈去世后切实地结出了果实。也就是说，合作者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传承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那么，为什么第二代合作者造反了呢？

研究家举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他们对里昂公会议的结果感到震惊，想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第二是以前他们就对腓特烈用人的粗暴心怀不满。

腓特烈以前就受过好几回被开除教籍的处分，最后一次是1239年。所以，他的那些家臣阴谋者们从5年前开始就有机会“想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可是，就在同一时期，贾科莫·莫拉被腓特烈任命为斯波莱托的长官并赴任。尽管开除教籍的规矩是被开除教籍者的家臣可以从尽忠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但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耳旁风。5年后成了阴谋首谋者的贾科莫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在腓特烈的宫廷里不论地位高低，任何人都得忍受他用人粗暴的情况。腓特烈自己比谁都忙，在他手下工作的高官们也都不是一般的忙，但以前并没有人抱怨过。所以，事到如今再提出这点来，还是回答不了为什么的问题。

最终，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些“原因”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驱使这些已经进入三四十岁政治成熟期的人们走到了弑君的地步。

后备干部中年长的一代看到，腓特烈的君主政体国家越是扎实稳定，自己的父辈就越是会从领主转变成官僚。

在封建社会的中世纪，人们非常执着于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懂得，自己的力量基础在于领地。在那个时代，“市民”一词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领地的人”。

而且，中世纪的封建诸侯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领地的。领地不是教皇和国王授予的，而是靠自己获得的私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个个都认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领地，他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腓特烈并没有怠于照顾这方面的情况，即使使用封建领主做政府高官，也不会收回其领地。他只是认为在他统治的王国里，封建领主领地内也要根据他制定的法律决定一切事务，因而他也承认领主的儿子们具备拥有领地的权力。实际上，贾科莫是莫拉家的次子，没有莫拉家族领地的继承权，但腓特烈却赠送给他一块专属于他的土地，尽管面积很小。

皇帝腓特烈二世并没有企图完全废除体现中世纪特性的封建制度，把国家彻底变成君主政体国家。他是想保留封建领主的形式而改变其实质内容。如果他步伐冒进，废除全部的封建领主，恐怕也绝对创建不了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国家。

其中的原因在于，13世纪整个欧洲都是封建社会。在英国，王权因《大宪章》而被缩小，又回到了封建领主割据的社会。在貌似君主政体有所进展的法兰西，诸侯的势力依然强大，打起仗来国王也得依仗诸侯的兵力。在德意志，“神职人员诸侯”和“世俗诸侯”并立，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

在这个时代，单在嘴上说说要摆脱靠力量吃饭的封建社会，把国家改变为君主政体国家，由君主任命的官僚负责行政，就已经就很不一般了。而更加不一般的事情，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后。那时，没有土地作为经济基础的人们汇聚起来创造了城邦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定胜负。这里蕴藏了文艺复兴的革新性。

文艺复兴的文化和文明是这些“市民们”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化和文明在这50年后萌芽，100年后花朵初绽，250年后鲜花盛开，最终彻底结束了中世纪。

不过，1246年离文艺复兴还有漫长的岁月。在当时，封建领主阴谋杀害皇帝也是自然之事。他们也并非是因为自己失去了现实所拥有的什么才谋划弑君这样的大事，他们是手里握着一些，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250年后这样写道：

“人成为不安的俘虏，往往不是在已经失去现实所拥有的东西之时，而是在开始认为即将失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英诺森教皇所说的在腓特烈手下未来没有保障的话当然会对他们奏效。

阴谋的目的在于杀掉皇帝和恩佐二人。谁都知道，已经30岁的儿子恩佐虽然是庶出，但却可以说是皇帝的右臂。为了在成功杀死这两个人之后立即把整个意大利南方收归统治之下，他们已经决定把执行刺杀以外的所有人全部集中到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城市。

执行的日子定在了复活节，1146年的复活节是4月8日。

把执行的日子定在复活节是因为圣诞节和复活节是基督教徒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全家围坐在餐桌边欢聚一堂的日子，这天的警卫自然也会松懈下来。此外，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被确定为暗杀的执行者。他们也是被皇帝当作儿子一样培养起来的人，在节日访问皇帝和恩佐也不用担心有人会觉得奇怪。

然而，这个阴谋在预定执行的一个月前暴露了。

“袭击猎物的鹰”

年轻一代的后备干部中有一个人名叫乔万尼·达·普雷森扎诺。他被这次阴谋的首谋者年长一代的后备干部拉来加入此次阴谋。当时，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到后来，他因为事关重大而感到了恐惧，便到同一代后备干部里卡多那里，把阴谋和盘托出。

里卡多还是卡塞塔的领主，年纪虽轻，但性格冷静沉着。他立刻派了一个可信赖的手下前去确认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所在地点，命令他一旦查清两个人在什么地方，立即骑马来追自己。而里卡多自己则跟乔万尼一道，驰马奔向这个时期皇帝逗留的意大利中西部海港城市格罗塞托。

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已经51岁的腓特烈听到这两位年轻人带来的消息后是怎样的心情。但从他以后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愤怒至极。没准儿会比听到里昂公会议结果时的愤怒更为强烈。第二天，里卡多的手下也到了，带来了那两人已经逃亡的消息。

贾科莫和潘多尔福都知道里卡多跟乔万尼一起去了皇帝那里，醒悟

到自己的企图已经暴露。在当后备干部期间，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二人都曾为腓特烈“拎包”。他们再了解不过皇帝在这种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根本不要指望躲在城寨里能够逃过此劫。

于是，他们逃跑了。但能去的地方很有限。如果腓特烈知道他们的逃亡之地，便会集中进攻那里。他们二人直到最近还是皇帝的高官，没有城市敢救他们，因为它们无法承受皇帝军队的进攻，就连可以确认犯有反皇帝罪的米兰都不敢这样。他们只能逃到罗马去。因为任何人没有充分的理由，无法派军队进攻教皇的都城罗马。两个人便藏身在罗马市内反皇帝派枢机主教的宅邸里。

不过这样一来，这两个首谋者便只能对在意大利南方等待他们的同伴见死不救了，并眼睁睁地看着住在意大利南方的妻子和孩子遭到杀害。

1246年4月8日，假如阴谋没有败露，皇帝和恩佐就会在这一天遭到暗杀。这天，皇帝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负责人召集到了格罗塞特，哪怕牺牲复活节也要制定对付阴谋者的对策。不过，与其说是大家讨论后做出决定，不如说是腓特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每个人。

意大利北方托付给了维罗纳事实上的领主埃泽里诺和儿子恩佐。意大利中部交给了儿子费德里科。不过，他们三人的任务并不是进攻。交给他们三人的任务是镇压各地反皇帝派因受这次事件的刺激而可能发生的叛乱。虽然事情已经败露，但事件策划的本身更令人震惊。皇帝亲自率军讨伐躲藏在意大利南部的阴谋者。两个逃亡者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单靠一己之力形成不了任何威胁。

据编年史作家说，腓特烈虽然像一只“袭击猎物的鹰”杀奔意大利南方，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做不到那么迅速。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了不使战斗拖成耗费时间的围城战，需要集中进攻，速战速决，因此必须造出很多大型抛石机运到意大利南方。腓特烈的方法是把这些东西装上

船，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绕过呈长筒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在塔兰托上岸。而军队则由腓特烈亲自率领，由陆路南下。他们沿奥莱里亚大道南下杀向罗马，但却没有进罗马，而是在那里转向，经亚壁大道一路向南。尽管这样一来到达目的地需要时日，但却可以向知道阴谋后必定会产生动摇的西西里王国民众宣示皇帝的力量。

从阴谋者躲藏的城寨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起，腓特烈彻底变成了一只袭击猎物的鹰。大度、雅量、宽容、高洁这些他以前的特色统统不见了踪影。在皇帝亲临前线指挥的巨大攻势之下，阴谋者分两路躲藏的两个城寨全部陷落了。

阴谋者中没有人在此次攻防战中战死。被俘的阴谋者有贾科莫·莫拉的哥哥和弟弟、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潘多尔福·法桑埃拉的两个弟弟、圭列尔莫·桑塞维里诺、鲁杰罗·德·阿米契斯、安德里亚·齐卡拉共八人。没被抓捕的阴谋者只有早就逃到罗马去的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二人。

被抓捕的人全被带到了皇帝面前。对腓特烈而言，没有一个陌生面孔。其中，莫拉家族的三子鲁杰罗是一个很喜欢鹰猎的年轻人，只要腓特烈说去鹰猎，他就会放下手头的任何事情跟去，皇帝甚至拿他开玩笑。由于他的热情和技术的提高，皇帝甚至把以前总是由阿拉伯人担任的鹰匠任务都转而交给了他。这位莫拉家的三公子，只是听了哥哥贾科莫之言卷入阴谋而已。

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腓特烈面对他们暴怒发火。然而，正是因为没有爆发，愤怒反倒有可能更恐怖、更深。

阴谋者们策划的是暗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腓特烈。针对最高地位者的这种行为的罪名，翻译成日语是“大逆罪”。剥夺了最高地位者的生命就会威胁他所统治的国家的命运。罗马法也把这种行为定为重罪中的重罪，就是因为杀害领袖会破坏“国家”这个“居民

共同体”（res publica）的秩序。

即使在中世纪的意义上，阴谋者也犯下了重罪。这个行为破坏了“臣从誓言”，违背了信义，是一种背信行为。

中世纪的臣从之誓不是通过签订合同而有效力的。一般认为，在中世纪，只有商人才会有不签合同就不可信的想法。骑士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日本所谓的“武士无二言”通行无阻。誓言就是信义，坚守誓言就是贯彻信义。因而，阴谋者破坏了基于信义的誓言。

除此之外，阴谋者还犯有弑父之罪，这也是自有罗马法以来的重罪。腓特烈在视同己出的环境中培养了他们。与为承父业而远离父亲、只能在德意志成长的嫡子相比，他们享受到了更加适合培养下一代领袖的环境。但正是这些人，在1246年从背后捅了腓特烈一刀。

最为重视以法律为基础的腓特烈恰恰对这帮人没有搞什么像样的审判。

腓特烈首先没收了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然后用火红炽热的铁杵戳瞎了他们的双眼。这个刑罚用的是炽热的铁棒，不但能够达到戳瞎眼睛的目的，还能防止化脓，在中世纪多用于重罪犯。

只有鲁杰罗·莫拉和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两人在戳瞎双眼后得到赦免。腓特烈查明了鲁杰罗只是被哥哥贾科莫拖进来的。但赦免他却并非仅仅因为这一点，腓特烈无论如何狠不下心处死这个单纯幼稚、喜欢鹰猎的年轻人。而赦免泰巴尔多则是因为腓特烈不忍让曾经的恩师去承受独子之死这一最大的悲哀，老人虽已风烛残年但却一息尚存。

其余六个人则被处以腓特烈从来没有下令执行过的极刑。他们被绑着双手，由飞奔的快马拖着在全城游街，手脚的骨头碎裂。有的人随后

便直接被处以绞刑，其他人则被塞进装有毒蛇和铅坨的皮囊扔进了大海。人们知道，这是对弑父罪犯的刑罚。

早早逃到罗马的两个人也没有被放过。这两人是首谋者。这一点已由其他被捕人的证词以及腓特烈让人搜集到的他们周围人的证词坐实。

皇帝给他们的惩罚是把他们的妻儿老小投进监狱，不给食物。两人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被投进监狱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这两人因逃跑而躲过一劫。但腓特烈认为他们以后已经形不成威胁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潘多尔福·法桑埃拉的名字从这一年起永远消失了。贾科莫·莫拉后来又活了5年，但连教皇也都不再理睬他。皇帝死后不到一年，他便音信全无了。

但腓特烈并没有把阴谋者的家族赶尽杀绝。腓特烈没有处罚那些虽属同一家族但完全不知情的人，以及有所感觉但没有进一步行动的人。如果把他们赶尽杀绝，很可能就把西西里王国运行所需要的人才也都赶尽杀绝了。正因为如此，腓特烈没有处罚那些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的人，哪怕是首谋者的弟弟。腓特烈是震怒了，但他没有因此瞎了眼，他把维护王国放在了优先位置。

在腓特烈的善后处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比安卡的病愈发加重了。根据编年史作家的说法，比安卡·兰齐亚是唯一一个腓特烈发自内心喜爱的女人，她与腓特烈结合已有20年之久，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腓特烈与比安卡结了婚。比安卡与包括正妻在内的其他女人不同，腓特烈只有与她一人的婚姻抛开了政治因素，虽然这已是他的第四次婚姻。

我很希望那年夏天，善后处理告一段落后，腓特烈是在焦亚德尔科莱城堡这个他赠送给比安卡，后来成了比安卡居所的地方，陪伴在卧病的心爱之人比安卡身边度过的。可是，没有史料能够证实这一点，不过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腓特烈这个时期究竟在哪里，能够证实的只有比安

卡是在那年夏天过世的。自她16岁那年春天与时年31岁的腓特烈邂逅以来，岁月已经逝去了20年。

秋天到了，年近52岁的腓特烈再次开始行动。他还必须做三件事。

10月，腓特烈把负责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行政高官们全部召集到了耸立在海边的壮观的巴列塔城堡。

发给他们的邀请函上写的是参加王国行政机构重组讨论会。可是，在拉丁语中，“讨论会”（colloquium）一词除了讨论的意思之外，还有口试的意思。如果腓特烈是这个意思，那可就不是一团和气地讨论之后再做决定，而是类似皇帝向他们通报决定，让他们回去付诸实施的意思了。

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的所有条款前都冠以“皇帝诏曰”（Comanda lo Imperatore）几个字。腓特烈思想中的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国家是一个由皇帝拿主意并对实施负全责的政体。

腓特烈心知肚明，这年春季开始秋季结束的这场由高官制造的阴谋，就是一帮封建诸侯在逐步转化成高级官僚时对自身现状感到不安而策划的。

如果是一般的君主，遇到这种情况，大概会通过让封建诸侯回到过去的状况即让步来打消他们的不安。只要消除了不安情绪，他们就没有理由去造君主的反了。签署《大宪章》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就是这样做的。

但腓特烈不是失地王约翰。他绝对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通过让封建诸侯担任政府高官逐步实现从封建社会向君主制国家的转变。

这并非因为腓特烈比约翰内心更强大，而是因为约翰几乎所有的家臣都背叛了他，而腓特烈不一样，许多重臣都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恩里克·莫拉的儿子们侍奉腓特烈多年，从来不耍两面派。他们向腓特烈射暗箭，对腓特烈打击巨大。也许他心里在想，如果恩里克没有在4年前去世的话……不过，在皇帝手下的重臣中，只有莫拉和桑塞维里诺这两个家族参与了这次阴谋。实力诸侯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都留在了皇帝一边，他们都是王室会议里的封建诸侯代表。王室会议是《梅尔菲宪章》确定的君主政体国家的顾问机构。如果他们两个家族留了下来，作为他们“卫星”的中小诸侯也都会留下来。

腓特烈在这次阴谋事件失去的只是算不上有实力的几个诸侯和结束了后备干部课程担任了要职的几个人，总共不到十人。

不过，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几乎都是现役的政府高官。如果不看人数而看战斗力，腓特烈至少损失了手下战斗力的三分之一。

有几个阴谋者被快马拖着游街后处以绞刑，并被弃尸街头。遵皇帝之命，在其中一个阴谋者的胸前贴上了身在克吕尼修道院的教皇写给一个阴谋者的信件。

当然，英诺森教皇是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写得让人知道是他在背后操纵。不过，从收信人的姓名和罗马教皇的印绶来看，谁都会明白此次阴谋中也有罗马教皇伸来的长臂。

重建

借用一位研究家的话说，在巴列塔城堡进行的王国行政机构重组是“扳正了弯曲了的脊梁骨”。这次重组重视“数量”更甚于“战斗力”。“数量”很重要。不得不接受《大宪章》的英国国王约翰是导致在法兰西的英国领土“失地”的责任人，因为这一点，他没能保住“数量”。相反，腓

特烈却拥有“数量”。

应该尽快填补因为逃跑、处死而空缺的职位。腓特烈没有从封建诸侯阶层，而是从中流阶层中选拔人来填补空缺。说他们是“中流”，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领地可称得上领主，但却有掌握学问的充裕资质，在意志力和能力方面并不亚于诸侯阶层。

腓特烈在录用人才时总是不光看出身，也重视能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与往常有什么特别。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塔德奥·达·塞萨和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出人头地的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他们都是知性上流但财力中流的人。不过，他们的知性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智力。辞典上解释说，这个“知性”意味着才智与力量。

皇帝完成了在巴列塔城堡的工作，他把1246年剩下的所有时间用在了事后处置的第二阶段。用一句话来说，他的战略是要通过加强血缘结合来强化后备干部人才网。

腓特烈没有改变后备干部体系。无论是否参加了阴谋，这些人在阴谋之前所表现的业绩已经证明了这个体系的有效性。所以，腓特烈只是去改变其内容实质。过去，腓特烈从来没有干涉过作为接班人培养起来的后备干部们的婚姻。但在以后，他要加以干涉了。

腓特烈恋过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总共为他生了15个孩子。这对腓特烈改变战略起了很大的作用。腓特烈甚至为只爱过一次的女人也安排了适当的安身之所。也许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而已。然而，如果是腓特烈这样做，那可就不是简单地安排安身之所的事了。

在后备干部中，不只有出生在意大利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根据地德意志的诸侯子弟。按照规矩，这些年轻人在意大利南方留学后回到德意志，将担任腓特烈任命的要职。腓特烈期待他们发挥支持皇帝接班人

康拉德的作用。

失地王约翰的女儿、现任英国国王亨利的妹妹伊莎贝拉嫁给了腓特烈，成了他的第三任正妻，为他生下一男一女后去世。她留下的男孩8岁，其姐姐也还只是9岁的少女。但是，做父亲的却让这位少女同德意志实力诸侯图林根伯爵的继承人订下了婚约。在那个时代，一旦婚约成立，女孩儿经常会被立即送去夫家生活，直到举行婚礼。

当了多年情人的比安卡成了腓特烈的第四任正妻，为他生育了一男二女。长女康斯坦丝在比安卡成为正妻那年嫁给了尼西亚帝国的皇帝。

把情人变成正妻，这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中相当罕见。但腓特烈对比安卡这样做了。研究家们推测，这是因为他无法辜负比安卡不想让孩子们一辈子当庶子的哀求。但我却认为，这是因为腓特烈的庶子多于嫡子，而他想要更多嫡子的缘故。虽然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现在被赶出君士坦丁堡，流亡到了小亚细亚，但却是能够主张继承拜占庭帝国的最直接的人。嫁给这样的皇帝，庶出的女儿怕不合适。

比安卡所生的唯一儿子曼弗雷迪14岁。由于母亲成为正妻，他现在也成了嫡子。父亲要让这个儿子赶紧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婚。

萨伏依伯爵的长女已经在4年前和恩佐结了婚。自从腓特烈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了嫡长子以后，庶出的恩佐就成了腓特烈最年长的儿子。这次曼弗雷迪的婚姻使得皇帝与萨伏依伯爵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不过，这也是皇帝的战略，如果伯爵的领地——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坚定地站在腓特烈一边，皇帝的目光就能达及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米兰和南面的热那亚。

恩佐还是撒丁岛王。这样，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也都进入了腓特烈的势力范围。

比安卡所生的小女儿维奥兰特在1246年时还是个13岁少女，父亲已把她嫁给了卡塞塔伯爵的长子里卡多。得知阴谋后立刻驰马报告皇帝的就是这位里卡多。卡塞塔伯爵被认为是腓特烈王国封建诸侯中最有实力的两位诸侯之一，而里卡多是爵位继承人。

年轻的后备干部和13岁少女的婚礼在蒙特城堡举行，意大利南方所有实力人物悉数出席。耗时几天的奢华婚礼是在这座美丽城堡举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仪式。

父亲的名字在德语中读作腓特烈，在意大利语中读作费德里科。庶子费德里科需要同父亲区别开来，于是“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这个名字便固定了下来。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阿尔巴伯爵领地，并与皇帝任命的托斯卡纳皇帝代理波罗家的女儿结了婚，波罗家族在罗马北面拥有广阔的领地。也就是说，“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成了皇帝的一个棋子。

庶出的另一个女儿阿尔坦西娅并没有因为母亲出身不祥而受到歧视。在意大利南方生长的这位公主嫁给了一位德意志诸侯。这位德意志贵族也有后备干部的培养经历，夫妻之间的对话也许是用腓特烈宫廷里讲的意大利语，而不是妻子还不懂的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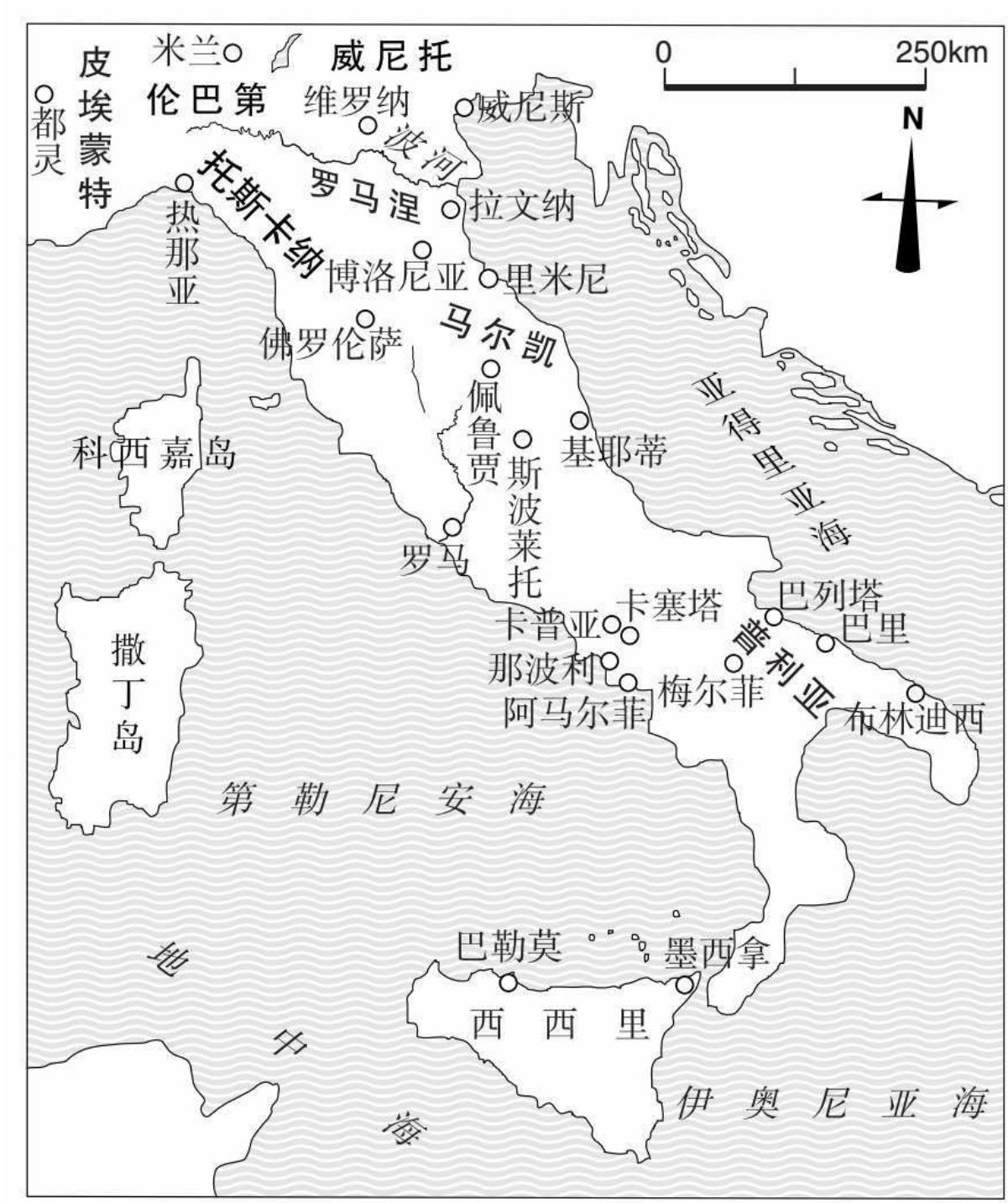
皇帝挑来选去，最终挑中了里卡多。皇帝恋上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同她生下了庶子里卡多。父亲把基耶蒂伯爵领地给了里卡多，又让他作为皇帝代理去统治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公爵也迎娶了实力诸侯的女儿为妻。

最后一个棋子是玛格丽塔。人们完全不知道皇帝于何时何地同德意志贵族的女儿生下了她。父亲为这个女儿找的夫婿是阿切拉伯爵的长子托马索·达·阿奎诺，阿切拉伯爵和卡塞塔伯爵同为意大利南方屈指可数的实力诸侯。

我觉得托马索·达·阿奎诺和中世纪最伟大的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阿奎

纳不是兄弟就是堂兄弟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皇帝的女婿是一个大领主的继承人。他是个实力人物，名字经常出现在王室会议的最高顾问机构名单中。腓特烈不但把代表自己手下封建诸侯的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两个家族的继承人培养成了后备干部，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

后备干部体系照样延续，但以后皇帝要把女儿嫁给他们。皇帝还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后备干部的姐姐或妹妹联姻。这就是腓特烈因遭遇阴谋而改变的人脉网的建设。



意大利半岛及其周边

转年到了1247年春天，皇帝公布了事后处理第三阶段的对策。这个对策已经不仅是把意大利南方，而且是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纳入了视

野，在历史上被称为“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

腓特烈决定把除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以外的意大利东北部交给埃泽里诺·达·罗马诺负责。皇帝把自己与比安卡的侍女所生的名叫塞尔瓦吉娅的女儿嫁给了这位和自己同龄的维罗纳僭主，强化了与这位部下的关系。

意大利北部的中心地区叫作伦巴第，皇帝把这里交给了儿子恩佐。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拥有8万人口的米兰尚未改变反皇帝的立场。31岁的恩佐接下了这块最困难的地方。

从伦巴第地区西面到阿尔卑斯山一带被称为“伦巴第西部”。萨伏依伯爵、比安卡的娘家兰齐亚侯爵和卡莱托伯爵三人在这里和皮埃蒙特地区拥有自己的领地，皇帝便决定由他们三人负责这片地区。

皇帝把意大利中部交给了另一个儿子“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他虽然才20岁出头，却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绩。

此外，皇帝决定把意大利中东部的罗马涅和马尔凯这两个地方交给另一个儿子基耶蒂伯爵里卡多负责。

除了皇子以外，腓特烈也给孙子分配了工作。长子亨利被废位后，他的儿子便被祖父接到身边抚养。他已经17岁，与祖父同名。腓特烈把一队骑兵交给了他，目的是让这位将要继承母方奥地利公爵的年轻人积累实际经验。

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是腓特烈的心灵故乡。他把王国的统治交给了瓜尔蒂耶罗·马诺佩罗。

这人似乎比腓特烈年轻一些，曾经跟随腓特烈参加过第六次十字军。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成功之后，皇帝给了他一件困难的差事，监督因媾和而在中近东形成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共存情况。

腓特烈回意大利后，他又在东方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意大利以后，他仍旧一如既往忠诚于皇帝。

马诺佩罗虽然也出身于封建诸侯，但他家并非大领主，而是中小领主。腓特烈把他升格为以往实力诸侯才会有的地位。腓特烈不但把大领主的继承人，还把两个与皇帝女儿结婚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年轻人安排到他手下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说起来就是让年轻人在经验丰富的实干家手下学习统治实务。

腓特烈任命里卡多·蒙特内罗担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所有地方的法务行政最高负责人。这人也是一个智力上流而财力中流的人。在16年前完成的《梅尔菲宪章》的起草班子中，他就已榜上有名了。腓特烈从博洛尼亚大学调来了罗弗莱多，让他当了自己创办的那不勒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位罗弗莱多的专业是民法。而被腓特烈从那不勒斯大学调来的蒙特内罗的专业似乎是刑法。腓特烈任命蒙特内罗担任了司法大臣。

腓特烈把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提拔起来，让他成了地位在所有这些人之上的“logotheta”。“Logotheta”是中世纪拉丁语，意思是“皇帝的最高代理人”。说起来，对统治这些地方的腓特烈而言，这个职位便类似于现在的政府秘书长。腓特烈使用了封建社会新兴阶层的人来担任这个要职中的要职。

塔德奥·达·塞萨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维尼亚并称双雄，但他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责任范围。腓特烈和这位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人似乎是所谓意气相投的伙伴。这人的作用就是以后经常侍奉在皇帝左右。一直跟在皇帝身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已经7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频繁走动的腓特烈了。但贝拉尔德并没有退休。他留在了意大利南方，给新一代统治者做顾问。腓特烈的口头禅就是“任何事都要先听听贝拉尔德的意见”。

研究家所说的“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始于1246年，它所

依靠的是既留下了老一代，又积极使用经验丰富的老手和年轻一代。可以说，腓特烈借此机会一举完成了阶层和世代的更迭。

尽管实施了新体制，但仍有未能归入腓特烈治下的地区：在意大利半岛领土不多因而与皇帝利害冲突较少的威尼斯、被压制但仍坚持反皇帝的米兰、现任教皇的祖国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家以及罗马。

罗马是圣彼得的殉教之地，一直被认为是其继承人罗马教皇们的都城。恐怕连腓特烈都没有想过要把这座罗马城也归入自己的领土。他反对主张“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教皇。但如果教皇能够守住“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这条线，腓特烈也是认可的。

然而，这个新体制一旦铺开，意大利半岛可就再也没有英诺森教皇回得去的地方了。即使他想回热那亚，那里本身也已变得不再安全。陆路上有皇帝的军队追逼；海路上有归顺皇帝且与热那亚处于竞争关系的比萨严阵以待，阻止热那亚船只的行动。撒丁岛现在又成了恩佐的领土。如果撒丁都归了皇帝，那么位于撒丁北面不远处的科西嘉近海也就不再是能容许热那亚船只安全航行的海域了。

在热那亚，教皇的本家菲耶斯科家族与多利亚和斯皮诺拉两个家族常年处在仇敌关系之中。后两个家族都是皇帝派，一直在想着夺回权力。既然这样罗马的情形如何呢？罗马事实上现如今也在皇帝派的包围之中。那么逃往法兰西安全吗？还不能这样断言。

教皇由于里昂已不再安全才转移到了克吕尼修道院，但这里也在法兰西王国的领土之内。法兰西王多次前来劝他与皇帝改善关系，这让他很厌烦。但他又没有别的地方可让自己过上安全的逃亡生活。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满脑子想的是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这对教皇而言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对路易而言，在这个当口要避免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恶化，但他也并未请求教皇派出教皇代理在第七次十字军远征时

与他同行。法兰西王尽管默认了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逗留，但他并没有重视罗马教皇。

此外，教皇伸向德意志的“长臂”也所获寥寥，并无改观。虽然对手是黄口孺子康拉德，但取代腓特烈的拉斯佩却在吃了败仗后很快死去。德意志诸侯中的世俗诸侯仍旧紧跟着皇帝。

这就是里昂公会议过去一年半后欧洲的情况。

教皇英诺森四世逃到法兰西后不再担心皇帝的骚扰，他借讨论宗教事务的公会议之名强行进行了事实上的异端审判。他要消灭被开除了教籍却毫发无损的腓特烈，硬是对他采取了剥夺皇位和王位的严厉处罚，然而成果却也不过如此。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的“判决”后立即给全欧洲的王侯写信，并在信中说“这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

对法国国王、英国国王以及德意志诸侯而言，腓特烈皇帝是否真是异端之徒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与此相比，只要被罗马教皇定罪为异端，自己的脑袋可能搬家已经成了主要问题。

教皇在里昂的所作所为甚至在高级神职人员看来也属越权行为。作为与他们不同的世俗之人，王侯们对教皇的行为自然会有更加敏感的反应。这对神职人员而言是神学上的问题，但对世俗的王侯而言则与现实的利害相关。

容我重复一下。《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使教皇的这种行为正当化。这一文件在近200年后才被证实是教廷的伪造。然而，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皆有之，即使没有科学证明，本能也会唤醒感觉。科学证明显示感觉正确的情况多得出人意料。

要问1245年的里昂公会议是怎么回事，我会这样回答：这是点

亮“罗马教皇要小心”信号灯的最好机会。腓特烈皇帝想法明快，他甚至用恰当的形式公开了这个想法，堂堂正正地正面接招，奋起反击。

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发生在献土文献被证实是伪造的200年之前，发生在距离认为政教分离理所应当的今天800年之前。这不是一场主教任命权归谁的叙任权之争，而是一场皇帝、国王、诸侯等世俗统治者们的更换权是否在罗马教皇手中的斗争。

于1247年2月开始的新体制已经稳固。皇帝便在这年的下半年再次出手，打压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同盟。因为腓特烈已经53岁，“时间”已然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中世纪社会中的人被分为三类：“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

“祈祷的人”是神职人员，“战斗的人”是骑士阶级，而“劳作的人”所包含的是日本所谓士、农、工、商中做农、工、商的庶民。居住在“工”“商”崭露头角的城市里的“市民”也属于这第三阶级。

在日本，“士”是“战斗的人”。不称他们为统治者，而称他们为战斗者是因为中世纪是群雄割据的时代，在统治之前必须先称霸。

称霸有政治称霸和军事称霸之别。古罗马也存在这个区别。所谓“政治称霸”就是划定称霸区域，为高效实行计划而确定各地负责人。然后，“政治称霸”转为“军事称霸”，其后才能进行正式的“统治”。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也就太平了，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

1247年2月公布了“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这在除已经进入统治阶段的意大利南方以外的中部和北部，只不过是“政治称霸”的宣示而已。尤其在伦巴第同盟势力很强的意大利北方，还有“军事称霸”的工作要做。这也是一个强者需要经常宣示之事。人都有自我保护

的本能，大多数人是“背靠大树”派。这就要求想要称霸者不断宣示自己是“大树”。这是对以称霸为目标的人的要求。绝对的王权政体是近代才确立的，中世纪时还不存在，那时的君主生活在比近代君主所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之中。

火烧维多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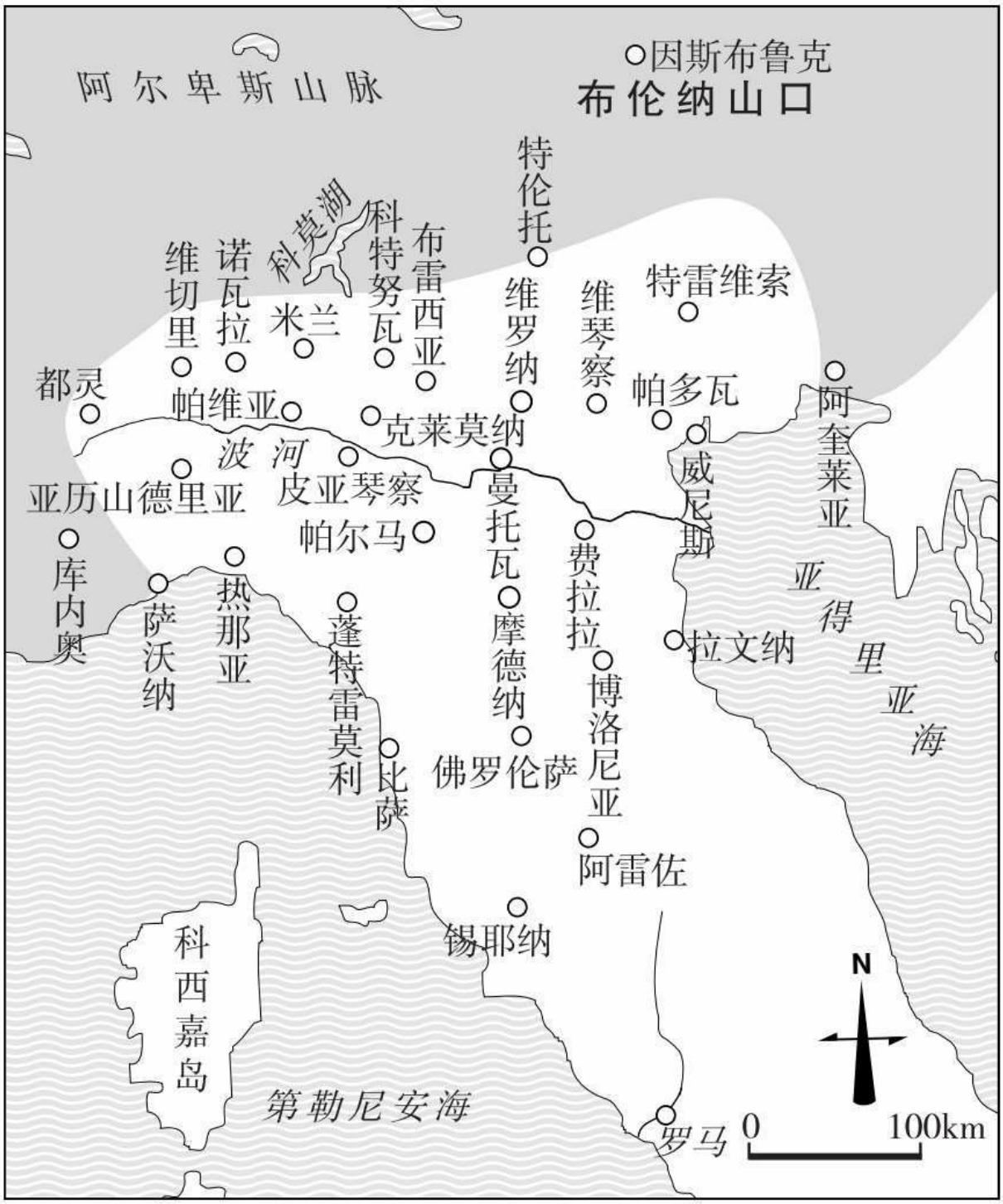
我们这些现代人知道，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尔马是司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7]中故事展开的舞台，又是意大利歌剧巨匠朱塞佩·威尔第的故乡。帕尔马这座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在从亚得里亚海边通往米兰的艾米利亚大道边上发展起来。与起源于罗马时代的拉文纳、维罗纳和克雷莫纳等城市一样，帕尔马这个地名也一直延用着古代的读音。

进入中世纪以后，帕尔马也成了自治体。它一会儿参加伦巴第同盟反对皇帝，一会儿又脱离同盟站在皇帝一边，立场反复无常。城里有教皇派和皇帝派两个派别，两派之间争夺势力的斗争从未断绝。这与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很多自治体并无二致。

不久前开始，帕尔马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皇帝派在城里占据了优势。对腓特烈而言，帕尔马站在自己一边有着不可忽视的好处。原因是确保德意志通往意大利北方，进而通往意大利南方的道路畅通永远是皇帝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维罗纳，就可以一路南下曼托瓦、帕尔马，直抵比萨。如果从比萨取海路到那不勒斯登陆，就可直入西西里王国。腓特烈已经完全能够通过海路往返于南北意大利之间了。

英诺森教皇的“长臂”伸到了帕尔马。教皇的表弟奥兰多·罗西要在

这里采取实际行动了，连教皇代理这样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也都被动员起来。



意大利北部及其周边

教皇代理是蒙特隆戈枢机主教，他在前教皇格列高利时代曾被派驻

伦巴第同盟的领袖国米兰。教皇把这位激烈反对腓特烈的神职人员派到了帕尔马，其目的是向帕尔马居民灌输皇帝是一个异端之徒的说法。

如果你认为帕尔马是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已经开始致力于“商”“工”领域的发展，那里的居民都是“经济人”，都像威尼斯人那样具有“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的观点，那可就错了。

意大利北方的人统称为伦巴第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以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骄傲。朱塞佩·威尔第创作过一部歌剧作品，剧名就叫《伦巴第人》（*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只是宗教热情未必就能导致战场上的胜利。伦巴第人参加了第一次和之后的十字军，但最终也是战果了了。不过，战斗不看结果。除威尼斯以外，所有当时意大利北方的“经济人”都认为，参加奉上帝之命组成的十字军、同异教徒进行了战斗，就算完成了基督教徒的使命。

在他们的心底里自然会经常产生一些反对腓特烈的情绪。他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与伊斯兰敌人媾和。在他们看来，仅凭这一件事就是异端。也许腓特烈想说，他们经济实力的提高也得益于伊斯兰教徒购买了他们制造的商品，但没人会听这样的解释。他们的想法在意大利被评价为“乡下人”（provinciale）。他们就是这方面的乡下人，这种“乡下人”最容易受教皇的蛊惑。

奥兰多·罗西也出了力。他纠集起了被皇帝派放逐而流亡在外的帕尔马人。这些人不光有反皇帝的情绪，还有人员和武器。他们政变成功。至多有70人起事，只用了一天时间，帕尔马就从皇帝派一变而为反皇帝派。

腓特烈皇帝决不会放过这次事件。他立即把恩佐统率的军队派了过去。但城里居民们在教皇代理的热烈支持下躲在城墙里面展开防卫战，不出城池一步。腓特烈这时正在意大利南方。他也认为既然这样就只能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断水断粮，逼其投降。于是，1247年夏天开始建

设帕尔马包围网。只有这次，腓特烈没有急于取胜。

包围网似乎很完美。人员、食物，一切的一切从外面都进不来了。补给路线全被封锁。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拼命要往城里送人送物，但终究突破不了皇帝派结成的封锁网。交在皇帝孙子手中的一个骑兵队也因为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而战绩斐然。

另一方面，恩佐和兰齐亚率领的数量众多的大军开始在帕尔马周边实行焦土战。往年，郊外的农田一到秋天就会一片金黄，而现在已被烧得精光。帕尔马城孤独地矗立在被烧成焦土的平原上，风景萧瑟。城里粮食告罄，不光吃的，一切开始枯竭。教皇代理弹劾皇帝的亢奋叫声在开始挨饿的人群头上回荡，听上去好像皇帝就在面前一般。人们绝望了。绝望高涨到极限，很容易突变为愤怒。

在另外一头，腓特烈让人在帕尔马附近建起了一个基地，起名叫作维多利亚（胜利之意）。

说是基地，却又不考虑持久性，很像古罗马军团在移动中建的基地，周围挖一圈沟河，再用不留缝隙的原木栅栏围住。如果里面只有一排排供士兵使用的帐篷，那便是单纯的军事基地。但维多利亚不是这样。据说里面既有皇帝逗留所需的各种设备，又有为住在里面的人修建的教堂、店铺和食堂，建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城镇，只是建材都是木料。如果是军团基地，四面会各开一个门。但维多利亚是半基地、半城镇的设施，四面各开了两个门。这也就意味着，防御没有做到绝对安全。在这座既非基地又非城镇的维多利亚基地中，甚至还有小规模的工厂，为上到皇帝、下到士兵的人织布做衣，里面工作的手艺人大多是从福贾的皇宫带来的萨拉森女人。

1248年过去了。转年的2月初，皇帝搬进了维多利亚，他接到报告说帕尔马投降已指日可待。皇帝的皇冠、皇帝的正装衣服、嵌满宝石的皇帝宝座，甚至连皇帝放军费资金的金库也都跟着皇帝一起运进了维多

利亚。腓特烈打算，帕尔马居民忍受不了饥饿投降时，他就让全体帕尔马居民住进旁边的维多利亚，然后彻底毁掉整个帕尔马城，让它在地上消失。当然，到那个时候，维多利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全由木头建造而成，而会变为一座石头建造的城市。在53岁的腓特烈的脑海里，这已经是一幅现实的图景了。

这时，皇帝手上的兵力分成了两部分在行动：儿子恩佐率领的部队和比安卡·兰齐亚娘家的本家加尔瓦诺·兰齐亚率领的部队。但防卫维多利亚是兰齐亚的责任。31岁的恩佐严冬行军不在话下，而与腓特烈同龄的兰齐亚则选择了防守基地。

1248年2月过了一半，意大利北方的天气难得地连续晴好。这样一来，腓特烈忍不住了，他决定第二天外出鹰猎。也许他认为，虽然现在还处在军事称霸的过程之中，但这很快就会结束。16岁的曼弗雷迪和父亲同行，他得了父亲的遗传，特别喜好鹰猎。他们与其他同好组成了一个50人左右的队伍。对腓特烈而言，在意大利北方还不像在南方那样如处自己家中，警卫仍必不可少，这次约有500骑随行。

皇帝离开了，留守维多利亚的是兰齐亚和他手下的士兵，留在基地的重要人物还有塔德奥·达·塞萨。他在所有方面都和腓特烈意气相投，唯独没有共同拥有对鹰的挚爱。

2月18日。根据闪烁的星光预测，这天从黎明开始一整天都是晴天。皇帝照例凌晨时刻就让人牵过马来。一到基地外面，他便快马加鞭，背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向西奔去。帕尔马在基地的东面，也就是说他奔往了更往西去的地方。曼弗雷迪、鹰匠和鹰猎爱好者一干人等紧跟在皇帝的身后。

帕尔马正等着这个机会。此时，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都把皇帝看作是恶魔的头目，但是如果面对面进攻腓特烈，谁都会畏缩不前。然而，这位皇帝现在不在基地。

帕尔马的行政长官是从皇帝这边反水到教皇那边的，自然反皇帝意志高昂。帕尔马站在皇帝一边时他正逃亡，加入米兰的军队后同皇帝的将领打过仗，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这人叫吉尔伯托，军事才能相当了得。

吉尔伯托长官把队伍分成两队，一队全由城里的士兵组成，另一队全由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组成。两队分工明确。士兵队首先冲出城外，摆出进攻架势，把维多利亚的兰齐亚军队引出来后佯装逃跑，从而把敌人从基地引向远方。然后，不成队形的居民成群地涌进已无防守的维多利亚。

作战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数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袭击了事实上处于无防备状态的维多利亚。相比于受到严格执行作战命令的军队的袭击，遭到大群暴徒的袭击更加恐怖。栅栏被烧毁，大门被破坏，男女老幼人人手持镰刀斧头，雪崩一般涌了进来。

塔德奥·达·塞萨几乎是一个人喊破了嗓子，试图召集剩下的士兵。可手持剑矛的士兵们却被惊吓得走不动路，统统被杀。

所有木造建筑都被暴徒点火烧毁。一处起火，火势立刻蔓延开来。群众已化作暴徒，他们没忘了抢劫，能抢就抢。皇帝的皇冠、宝座、金库中的东西全被抢走。就连每页上都画有精美彩色工笔画、马上就要装订成册的皇帝处女作《驯鹰的艺术》也被抢走。人们撂下被烧光抢光的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撤回了帕尔马。他们很多人都身背成捆奢华纺织品，手牵俘虏来的男女。

维多利亚与帕尔马的攻防

编年史作家这样记载了皇帝因火烧维多利亚而蒙受的损失：死者1 500人，被俘2 000人。不过，这个数字不能轻易采信。其原因在于：第一，这个数字如果加上兰齐亚手下军队的人数肯定过万，那样规模的基地装不下这么多人；第二，这个数字是获胜方帕尔马留下的记录。研究家中也有数量不少的人认为，实际人数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即便如此，这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腓特烈的失败。

皇帝这个强大人物居然被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小小城邦打败了，还是在他外出鹰猎的间隙中。腓特烈接到报告后急忙赶回，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化为灰烬的维多利亚。他随即调转马头去了绝对忠诚可信的克雷莫纳。

皇帝在这次事故中失去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只有塔德奥·达·塞萨一人。这位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忠臣，在帕尔马也很知名。他被捕后被乱刀砍伤，最后被投进帕尔马的监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皇冠作为胜利的象征被奉献给了帕尔马的主教堂。皇帝的宝座被抠掉宝石后损毁。金库里的金币、银币当然被直接运进了帕尔马市的金库。腓特烈失去了为此次称霸之行准备的全部资金。他保证将换用银币支付自己军队士兵的薪水，可后来也只能用皮革制成的货币来支付。

《驯鹰的艺术》被米兰商人买去，但后来似乎找不到买家，因没人懂得这本书的价值，很快便不知所终。如前所述，现在收藏于梵蒂冈的这本书是儿子曼弗雷迪在腓特烈死后收集父亲生前留下的草稿和素描等资料后重新编辑的。

腓特烈到克雷莫纳避难去了，没有任何史料告诉我们他那时的心情。腓特烈就是腓特烈，只是被抢走了一些物品，愤怒和沮丧他都能消化。不过，失去了塔德奥，他恐怕不会轻易忘掉。伤了体面他也很痛。这不是什么面子或名声的问题。他是皇帝，得必须经常示强，体面受到伤害就有招致实际危害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只能提前阻止帕尔马的个例扩散到整个伦巴第地区。

实际上，3月过半前后，事情过去还不到一个月，包括帕尔马周边在内的整个伦巴第地区的制地权（模仿制海权的说法），就掌握在了在帕尔马打了败仗的皇帝派而不是在帕尔马打了胜仗的教皇派手中。腓特烈亲自率领军队冲在确保制地权的最前线。儿子恩佐也率领别动队不断取得战果。兰齐亚也拼命冲在确保制地权的最前线英勇作战，那意思是要收复失地。

以确保伦巴第地区制地权为目的的这次军事行动，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在腓特烈发布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条，要抓活的俘虏，不要杀死对手。这是为了用于交换在火烧维多利亚时被帕尔马方面抓走的那些人。

中世纪是一个频繁交换俘虏的时代，这很让人感到意外。媾和也一定会加上双方交换俘虏这一条件。然而，即使事情还没有到媾和的程度，也就是说在处于敌我关系的情况下，双方也会经常交换俘虏。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俘虏太多便要交换，管理俘虏也得花费一定的费用，因而交换俘虏还有节约费用的意思。当然，交换俘虏不一定需要双方条件对等。有时一方的俘虏较多，而另一方却没有那么多的数量。这时，金钱就会以赎金的形式介入进来。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交换俘虏在中世纪很普遍。这并不是因为在欧洲打仗的双方都是基督教徒的原因。即便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打仗，也同样会交换俘虏。在十字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交换俘虏的习惯也是处于不合理统治下的中世纪中所存在的合理精神的表露。

1248年夏天，腓特烈为了确保制地权和获得俘虏而大踏步迈进。就在这时，兰齐亚率领的皇帝军遭遇了奥兰多·罗西率领的教皇军。这是两军之间的决战。最终，兰齐亚大获全胜。以前总是充当教皇“长臂”爪牙的教皇表弟成为俘虏，被剑砍刀切后抛尸在帕尔马城墙前。

火烧维多利亚5个月后，腓特烈挽回了因帕尔马倒向教皇派而造成的地理损失。皇帝派把蓬特雷莫利弄到了手。这里地处帕尔马通往第勒尼安海道路的中间。这样，即使不通过帕尔马，连接意大利南北两方的道路也有了保障。

腓特烈在火烧维多利亚后所表现出的力挽狂澜的强大力量，让流亡在阿尔卑斯山彼侧法兰西境内的英诺森教皇吓得发抖。

法兰西王一直以来默认了教皇的流亡，但他现在也顾不上教皇的安全了。33岁的路易九世终于实现了十字军远征这一他多年以来的梦想。他带着三个弟弟，还让王妃同行，于这年8月15日从法兰西南部的艾格莫尔特起航了。

这次是第七次十字军远征，但结果惨淡。不到两年工夫，国王及全军就当了俘虏。对于教皇，法兰西王以前虽然态度消极，但一直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他的离去使教皇感到在法兰西也不安全了。这也在情理之中。教皇无法预料皇帝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命令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后者现在甚至把意大利西北部的实力人物萨伏依伯爵都拉了过去。教皇的流亡地就在法兰西东部，翻过阿尔卑斯山即到。英诺森教皇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请求英国国王亨利允许他移居波尔多。由于亨利的父亲约翰“失地”的缘故，英国失去了位于法兰西境内的大部分本国领土。但波尔多一带仍然作为英国领土保留了下来。然而亨利的答复是冷冷的拒绝。教皇只好继续在克吕尼修道院过他的流亡生活，感受着皇帝在阿尔卑斯山东面不断进行军事称霸的威胁。

腓特烈尽管已把蓬特雷莫利收入囊中，随时可以回意大利南方，但他一直在北方逗留到第二年。也许他想以克雷莫纳为大本营，一直待在米兰和帕尔马附近来实现在这一地区的军事称霸。

我们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腓特烈的存在竟然会产生胜过数万军队的军事效果。

在腓特烈个人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理想中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制国家”是一种无论君主是谁都能持续发挥功能的政体，而现实却是仰仗他个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对这位年近55岁的人而言，“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留情。

到了第二年1249年的1月，从来不需要医生的腓特烈第一次显现出肉体衰老的征兆。他全身发痒，皮肤一挠就红，似乎是医学上所说的红斑狼疮。侍医说过段时间就会好，皇帝也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我想这恐怕是极度劳累导致的身体免疫力下降的结果。但腓特烈过度发挥着自我控制力，一直在做皇帝应做的事情，停不下来。

皮耶罗·德拉·维尼亚

2月，在皇帝及其宫廷逗留的克雷莫纳，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当时有大众媒体的话，这件事一定会成为头条新闻。“皇帝最高代理人”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突然遭到逮捕。如果说皇帝是“首相”，维尼亚的地位就相当于他的“秘书长”。维尼亚的罪状是欧洲人都知道的“犯上罪”（lesa maesta）。腓特烈一派的克雷莫纳居民得知这个罪状后群情激奋，袭击了从住处被带到监狱途中的维尼亚，押解他的士兵不得不成了他的卫兵。

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生于1190年前后，比腓特烈大5岁左右。他出生于那不勒斯北面卡普亚城的一个小店主家庭，自幼以聪慧而闻名。卡普亚不只是一座意大利南方的中等城市。自古罗马时代开始，通往南方的两条干线道路亚壁大道和拉提纳大道就在这里汇合。进入中世纪以后，这里虽已不再是重镇要塞，但还存有灵气。在这位头脑清晰的年轻人上大学学习期间，卡普亚市给了他奖学金。

维尼亚开始在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他梦想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然而，博洛尼亚大学的赞助人是罗马教廷，没有高级神职人员的推荐，他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维尼亚在主教和实力诸侯圈里并没有熟人，他以优异成绩从法学系毕业了，却成了一个失业者。

他在这时受到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关注，从此平步青云。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因什么机缘而相识。当时腓特烈热衷于网罗人才已经很有名，说不定是30岁的维尼亚自己主动找上门的。

贝拉尔德大主教把一生都献给了腓特烈。我们不知道大主教在这位年轻学士失业者身上发现了什么，但他把维尼亚推荐给了当时25岁的腓特烈则是清楚的事实。就这样，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开始在刚刚即皇帝位的腓特烈手下干活了。最初的时候，他只是逐一记录皇帝口述的书员

记之一。这个时期完成的《卡普亚宪章》是腓特烈自己与贝拉尔德大主教以及他从博洛尼亚大学挖来的以罗弗莱多为首的法学家们制定的。在这一时期，维尼亚的参与度只限于书记员职务。

但是，维尼亚深深地参与了4年后完成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创建工作。到7年后，即1231年公布《梅尔菲宪章》的时候，维尼亚已经出人头地，成为封闭在梅尔菲的要人之一。10年前的穷学生已经作为宪章的制定者之一，参与了中世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废弃强者决定一切的封建制度，建设法律决定一切的国家。如果这时维尼亚想要实现年轻时站上大学讲台的梦想，那一定会很容易。协助完成《梅尔菲宪章》的很多法学家都跟着那不勒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弗莱多回大学去了。但年届四旬的维尼亚似乎对往日的梦想已无兴趣，《梅尔菲宪章》完成后一直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一在皇帝身边工作。

不过，我以前对他的评价一直就是“书生”，他当外交使节时的业绩相当不好。他作为亲信经常会被外派，但却没有一次干得漂亮。维尼亚谈判搁浅，别人就会被紧急派去替换他，这样的事情何止一两次。也许他在战场上根本就是一个弱者。腓特烈大概也了解这一点，他派了塔德奥·达·塞萨去参加里昂公会议这样的决战。尽管维尼亚最后也被派去，但他在里昂终究什么也没干成。

不过，维尼亚仍是能臣中的能臣。皇帝任命已经56岁的维尼亚当上了皇帝的代理官——“皇帝最高代理人”。直到突然被捕时，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还在这个位置上。

皇帝的第一心腹被捕，仅此一点就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许多人的臆测也在欧洲不胫而走。

有人说，逮捕维尼亚的原因是在他的私人物品中发现了他与在法兰西的教皇暗通的证据。确实，维尼亚在里昂见过教皇。当时，教皇和维尼亚摒开他人，两人单独交谈。

还有人说，维尼亚已年近60，还横刀夺爱，抢走了皇帝的情人。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让人逮捕了他。

此外还有人认为维尼亚的敛财癖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

狮心王理查和失地王约翰的父亲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让人杀害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8]的事件曾经震惊了整个欧洲。腓特烈皇帝和他的秘书长维尼亚之间的这起事件，作为两个长年关系亲近的男人之间的悲剧，与托马斯·贝克特事件很相似，也成了人们的一个饭后谈资。

这起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但丁也把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写进了《神曲》。但丁在书中用维尼亚自我陈述倒台原因的方式叙述了这个事件，认为个中原因是嫉妒维尼亚的高官们向皇帝进谗，而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谗言。也就是说，但丁是个维尼亚无罪论者。但丁在向读者介绍维尼亚时用了这样一句话：维尼亚是“掌握着腓特烈心灵的两把钥匙的人”[9]。

可是，事情恐怕不是这样。腓特烈不会把打开自己心扉的钥匙交给其他任何人，要想打开心扉就靠自己。心灵是自己想打开的时候才会去打开，腓特烈更是如此。

有一位修道僧叫萨林贝内，他比但丁早出生50多年，因此实际见到过腓特烈。他写下了当时的印象。我在《同时代“媒体”的评价》一章中介绍过这个人。在那个章节里介绍的他对腓特烈的评价中，还有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每次提到腓特烈的时候，萨林贝内都不用“皇帝”这个字眼，而通篇都用第三人称单数“他”来称呼。在萨林贝内这样的教皇派眼里，里昂公会议后腓特烈已经不再是皇帝了。

“腓特烈对谁亲切和蔼，对谁的立场表示理解，都要看他‘有无兴致’。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把打开自己心扉的钥匙交给别人。”

连如此“反腓特烈”的人都这样评价腓特烈，那么腓特烈最讨厌被别人任意摆布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说不定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认为这样做对主君有好处才握住了教皇伸过来的“长臂”。“皇帝最高代理人”这个地位上的人可以独断很多事务而无须上报皇帝，只是所下决定最终必须符合皇帝的意思。

况且，与教皇改善关系已经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事了。尽管如此，维尼亚独断专行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真如此，这明摆着就是越权行为，通俗点说就是“飘飘然”。没有比臣下飘飘然发生越权行为更让腓特烈厌恶的事情了。发现了维尼亚并在以后30年中一直支持维尼亚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在这件事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维尼亚是贝拉尔德的骄傲，但贝拉尔德却没有为维尼亚做任何辩解。

维尼亚被关进了监狱，但没有进行审判。皇帝下令对他处以用烫铁棒戳瞎双眼的刑罚，但没有下令判他死刑。维尼亚只是被从克雷莫纳的监狱转移到位于托斯卡纳地区圣米尼亚托的某个地方去了。被捕一个月后，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在被关押的监狱里，用头部撞墙的方式选择了自杀，享年59岁。

尽管研究家不懈努力，但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不明，比起因为王权与教会权对立的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事件还要令人琢磨不透。在罗马大学教授中世纪史的拉菲罗·摩根[10]这样写道：

“对皇帝腓特烈来说，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是皇帝树立的一个具体榜样，皇帝试图以此显示新兴阶级，即出身于封建体制之外、只能以法律为武器的新型统治阶级的有效性。中世纪出现的这个全新的阶级也和20年后灭亡的皇帝家族命运与共。”

如果摩根教授的假说成立，那么，腓特烈对这次事件的感受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绝望。

在与教皇的抗争中那么能说会道的腓特烈对这起事件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并非历史研究家，更不是中世纪史的研究家。我只不过是一名写写历史的作家，我是这样认为的：

塔德奥·达·塞萨一年前被杀是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不幸。

事业不分大小，都需要有同龄人的合作才能做好。这是因为同龄人的合作可以在所有方面做到毫不勉强。无论是腓特烈、维尼亚，还是塔德奥，尽管年龄上有着些许差距，他们都属于同龄的一代人。腓特烈在卡普亚立了一座石雕群像，自己站在中间，塔德奥和维尼亚分立左右，一如古罗马的三主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石雕中皇帝的头部后来遭到反皇帝派的破坏，只剩下颈部以下部分。但分立左右的两位重臣却留下了头部完好的胸像。这座雕像群建在维尼亚的出生地卡普亚。曾经的穷学生维尼亚以最华美的形式衣锦还乡了。

说起来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是“书生”，而塔德奥·达·塞萨则既是“书生”，同时又是“行动者”。腓特烈皇帝也属此类。

塔德奥于一年前被杀，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腓特烈每次见到还活着的维尼亚，一定都会想起塔德奥。

如果是这样，留给维尼亚的只能是不幸了。维尼亚的地位是政府秘书长，见到皇帝的频率绝对比别人高。而每次见到皇帝，他是不是都会感受到主君视线有些许游移呢？那感觉好像在问他，为什么你还活着？

如果是这样，维尼亚握住英诺森教皇伸过来的“长臂”就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自己伺候了30年的主君表示，塔德奥死了但自己还活着，还活着的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为主君起到足够的作用。

地位已经升至“皇帝最高代理人”的维尼亚，按日本的说法已是位极

人臣。从所出身的阶级来看，他也不能指望进一步出人头地，不能指望有更多的财富了。那他还希望得到什么而又去向主君背后捅刀呢？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会变成向主君背后捅刀。他忘记了，腓特烈最憎恶的是，别人不与他商量就办掉了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塔德奥·达·塞萨死后，腓特烈一直没有去动安放在卡普亚城门上的大理石雕像。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自杀后雕像也没有动。卡普亚位于腓特烈自己的领土之内，如果他下令拆除必定做得到。但腓特烈没有下令。人们不知道个中缘由。根据反皇帝派所写的编年史，得知曾经的重臣自杀的消息时，皇帝嘴里只说了句“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这不就是他被自己从“赤条条”提拔起来的人所背叛的绝望吗？

1249年春，腓特烈身边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但军事称霸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在此期间仍在一直推进着。儿子恩佐率领的皇帝军一直在攻打让皇帝遭受沉重打击的帕尔马。在阿尔卑斯山北面，21岁的嫡子康拉德也在德意志境内痛打教皇派。在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骁勇善战，为的是把意大利中部要地佛罗伦萨切实拉到皇帝一边。在意大利西北部，17岁的曼弗雷迪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婚后，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腓特烈与最能牵制米兰的萨伏依伯爵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腓特烈决定回到意大利南方。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意大利北方了。克雷莫纳已经成为意大利北方的参谋本部，这里交给儿子恩佐接手。皇帝从左侧走过偃旗息鼓的帕尔马，来到了第勒尼安海边。他乘上等在比萨港的船只南下，于5月底在那不勒斯登陆。在那里逗留期间，腓特烈听到了两个噩耗。

第一个噩耗是刚刚20来岁的年轻人基耶蒂伯爵战死的消息。里卡多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基耶蒂伯爵领地，他是腓特烈与心爱的女人之一曼娜所生的儿子。他作为意大利中东部的皇帝代理被派到了由政治称霸转向

军事称霸的最前线，在履行职责中战死。继被废位的长子亨利自杀之后，腓特烈遭遇了第二次丧子之痛。一位后备干部助手当即代替了战死的基耶蒂伯爵指挥作战，才使得除里卡多战死外，皇帝方面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皇帝甚至不需要再任命里卡多的后任了。

第二个噩耗是一个比噩耗更为强烈的消息。基耶蒂伯爵里卡多于5月22日战死，4天之后的5月26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身兼撒丁王的恩佐在与博洛尼亚军队作战时被俘，被直接带去了博洛尼亚。

恩佐被俘

恩佐虽然是庶出，但在腓特烈的儿子中却是最年长的，时年33岁。恩佐被誉为无与伦比的美男子。在此前十几年中，他一直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主要活跃在意大利北方建功立业。在3年前的那场阴谋中，阴谋者把他与皇帝一起确定为杀害的目标。恩佐被敌人俘虏，这对腓特烈来说不啻为会造成巨大打击的噩耗。

俘获了恩佐的博洛尼亚方面也充分了解恩佐的价值。恩佐在战斗中负伤，博洛尼亚首屈一指的医生被叫来为他疗伤。关押恩佐的地方也不是监狱，而是在市政厅顶层，所有设施一应俱全。在身边照顾他的人不止一个，而有好几个。恩佐是一个重要的人质。博洛尼亚的实力人物也都知道，只要手上有这个恩佐，皇帝就不会前来进攻。

恩佐可以自由地写信收信。只要不是皇帝方面的人，什么人他都可以见。一向举止自然的恩佐被带到市政厅来的时候，既没有被绑住手脚，也没有被押解，而是像往常一样安静地悠然步行而来。沿途挤满了

市民，希望一睹被俘的皇子。这位美男子让他们惊艳。只见恩佐长发披肩，头发卷着金黄色的波浪，容貌典雅俊美。要是但丁，一定会这样评价他："容貌端庄"（gentile asppetto）。他可以自由会见任何人，这些人中间甚至有博洛尼亚实力人物的妻子。此言不虚，这位被俘之人甚至可以自由拥有情人了。

被俘的恩佐在博洛尼亚

父亲为了救回这个儿子用尽了种种手段。

接到消息，他当即就给博洛尼亚的长官（podesta）写了信，内容半恳求半威胁。他说服长官道：人的运气沉浮是常有之事，但察其微妙而下判断则是一个中等城市统治者的应取之道。但这一套似乎没能说通博

洛尼亚长官。长官的回复只有一行字：有时小犬也能捕获野猪。

于是，皇帝采取了另一种手段，让同恩佐一起推进意大利北方军事称霸的维罗纳僭主埃泽里诺率军队向博洛尼亚施加军事压力。可是博洛尼亚不但不理睬挑衅，反而关闭了城门。

皇帝的第三招是派大主教去博洛尼亚做和平使者，说要给博洛尼亚与恩佐体重同样重量的银子，请博洛尼亚放人。但博洛尼亚仍然充耳不闻。博洛尼亚是一座大学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样的博洛尼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大量的银子，而是皇帝的军队不要来犯。

恩佐并没有去享受舒适的囚徒生活。他好几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躲在长箱子里由大车运着，已经从市政厅卫兵的面前安全地走了过去。但在大车走在街上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几个妇女。她们发现了长箱子边上露出一缕发亮的金发，便叫来了卫兵。恩佐又被送回了市政厅。

以后，幽禁恩佐的“牢房”仍未成为真正的牢房。他仍和以前一样被关在市政厅的顶层。唯一变化的是卧室被钉上了铁栅栏，晚上要睡在里面的床上。

如果要提恩佐与父亲的不同之处，应该是恩佐之前都活得不坏。

这里的“坏”在意大利语里用“cattiveria”一词表示，不用于贬义。这个“坏”是指区别超一流和一流的水平。人们在输了足球比赛的时候会说“还不够坏”来反省。

有一个非凡的父亲，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幸。只要按照父亲的命令去做，总会做得很好，也许自己也感觉不到有独立思考的必要。如果感到没有必要，就会错过机会去磨练对挫折的应对。

营救和逃跑都以失败而告终后，还不到35岁的恩佐似乎选择了甘受眼下状况的生活。他爱好诗歌，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不光从博洛尼亚，也

从托斯卡纳的其他城市汇集到他的身边。在这个时代的意大利，诗歌和小说的爱好者中也有名门闺秀。恩佐和其中一个女性发展成情人关系，还育有两个女儿。汇集在恩佐身边的文学爱好者们竟发展成为始于但丁的意大利通俗文学的一翼。

大概是继承了父亲鹰猎的兴趣，恩佐自写自画，搞成了一本书。但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各个门类的深入探讨，都比不上父亲所写的那本书。从书中可以体会他对鹰猎的热爱，但在表达等所有方面都很粗糙。

恩佐被俘后的后半生都是在自己的嗜好中度过的，他也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了。

直到56岁去世，恩佐的囚徒人生持续了23年之久。

被俘一年后父亲去世，接着弟弟康拉德也去世，17年后另一个弟弟曼弗雷迪也去世了。恩佐以阶下囚之身知道了这些消息。所以恩佐创作的诗歌都是哀歌，也在情理之中。我在这里介绍他的一首诗歌：

> “飞翔吧，我的歌，飞到普利亚平原去吧！我的心啊，朝向昼夜运行的太阳照耀着的那片大地……”

1272年，恩佐去世了。他厚密的金发卷着金黄色的波浪，里面掺进了点点白色。人们都说，只要同他打个照面，不仅女人，就是男人也会瞬间惊艳，他那罕见的容姿之美一点未变。

最后一年

恩佐的父亲在普利亚迎来了1250年。

恩佐的退场对意大利北方教皇派的影响比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背叛还要大。以米兰为领袖的伦巴第同盟开始再度抬头，因为以前是恩佐在率领意大利北方的皇帝派战斗。

很难找到能够替代恩佐的人了。

康拉德正在德意志同教皇派交战。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无法从他负责的意大利中部腾出手来。皇帝虽然给了18岁的曼弗雷迪一队骑兵，把他派出去打仗，但要他统帅大军还太年轻。腓特烈决定启用乌贝托·帕拉维奇诺担任原来恩佐的角色。

乌贝托·帕拉维奇诺比腓特烈小3岁，出生于意大利北方的封建领主家庭。他不是长子，只能找其他的谋生手段。他率领父亲给他的队伍为人打仗。这就是在始于5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成为主流的佣兵队长的肇始。帕拉维奇诺家原来就是皇帝派，16年前他加入了腓特烈的军队，这几年也一直在恩佐的指挥下干事。为皇帝打仗最终是看在钱的分上，但他的情形却不光是为了钱。

他是一个战争专家。为人打仗，战斗业绩决定包括报酬在内的一切。从53岁的年龄上看，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又给了他这么多军队，他还没有带过这么多的兵。这个打仗的行家里手要一战定乾坤。因恩佐被俘的消息而再度抬头的意大利北方城市群，遭到了这个打仗能手所率领军队的全面进攻。

很快，布雷西亚陷落了，帕维亚投降了，皮亚琴察打开了城门。这三个自治体都是米兰的卫星城。就连火烧维多利亚，让皇帝喝下苦酒的帕尔马也在皇帝军面前屈服了。

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市，包括领袖米兰在内，城市内总有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派。皇帝派占据了优势，这些城市便由皇帝派掌权，而一旦教皇派卷土重来，市内的教皇派也会势力大增。这

就是以自由为旗帜的“自治城市”的实际情况。

那些得知恩佐被俘的消息后马上认为皇帝就要完蛋的自治体倒向了教皇派，受到帕拉维奇诺进攻后便又倒向了皇帝派。

有这么一句话，“打赢战争的总是掌握主导权的一方”，虽然这不是出自昔日亚历山大大帝之口。意大利北方皇帝派的优势波及到了意大利中部。意大利半岛的形势是，由于皇帝的儿子里卡多战死和另一个儿子恩佐被俘而出现的空洞，半年后就被填补上了。

腓特烈以前就显现过力挽狂澜的强大能力，这次又是一样。那些认为皇帝就要完蛋的人，这次又错了。遭遇苦难是想做事之人的宿命。如果想逃避苦难，就只能选择无所事事的生活。问题不在于是否会遭遇苦难，而在于是否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且，如果不能及早挽回局面，就不会产生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早，即早于敌人把主导权拿到手里。

面对皇帝派的优势，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只能龟缩在市内。已经逃到了阿尔卑斯山西面的英诺森教皇，这回因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而发抖。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现在控制在萨伏依伯爵的势力之下，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皇帝派。只要腓特烈做出决断，皇帝军就可能翻过阿尔卑斯山攻进法兰西。而法兰西国王几乎带着所有重要人物，随十字军去了东方。一旦皇帝军进攻法兰西，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为教皇保驾。

这时，教皇又收到了一个噩耗。

前一年夏天，法兰西王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大张旗鼓地从法兰西南部艾格莫尔特出发，一路战果辉煌，进而占领了尼罗河口城市达米埃塔。然而，从尼罗河溯流而上的时候开始，形势发生了逆转。他们在行进中吃了大败仗，这里离目标开罗还有很远。国王及手下的全军都成了俘虏。

十字军也是军事行动。信仰笃深的路易表现得毫无战略眼光，这次的十字军行动确切无疑地以十字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惨败而告终。

伊斯兰教徒也很在意交换战俘。如果十字军方面还握有俘虏，便可进行交换。可是，路易手上没有伊斯兰俘虏。这次号称25 000人的大军连同国王在内全军都成了俘虏。

得知失败的消息后，腓特烈给获胜的开罗苏丹写信，请求释放法兰西王路易。可是，开罗的苏丹已经是阿尔-卡米勒的孙子了，腓特烈曾经与阿尔-卡米勒合作，实现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媾和。这时的苏丹疾病缠身，没有祖父那般的力量。结果，法兰西国王路易花了天价的赎金，买回了自己和三个弟弟以及部下的自由。路易没有战略眼光但却人格清高，他将在1254年付完赎金前一直滞留在东方。于是，在125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整个欧洲竟没有一个当权者可以与腓特烈相抗衡。在同一时期的德意志，康拉德对教皇支持的威廉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荷兰人只好逃回荷兰。

所有这些动向，都一一报告给了身在意大利南方福贾王宫里的皇帝。圣诞节次日的圣司提芬节一到，腓特烈就满56岁了。他知道，5年前自己反抗了里昂公会议所下的判决，如今自己已经拥有比当时更为强大的力量了。

研究家中有人主张，腓特烈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亲率大军进军意大利北方，把伦巴第同盟从地球上铲去，然后挟此余威进攻法兰西，彻底消灭罗马教皇的影响力。他们甚至这样评价在普利亚按兵不动的腓特烈，说他消极怠惰（apatia）。即使没这样说的研究家，也认为腓特烈已经体力衰弱。

腓特烈56岁了，这56年活得不容易。自他14岁时任性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以后，他度过了连续42年的紧张生活。他一定感到了自己体力的衰退。

不过我认为，腓特烈并不想进攻国王不在国内的法兰西，而把流亡教皇逼入绝境。

首先，那样做是违反他与法兰西王签订多年的互不侵犯协定的行为。其次，至于逼迫教皇一事，如果罗马教皇只负责上帝的事务，对腓特烈而言也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他认为，叫它宗教也好，称它信仰也罢，普通人谁都多多少少需要这样的精神状态。即便你极力压制它，消灭它，它也一定会起死回生。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只要明确分工，这两者就能相安无事地生存下去。

腓特烈挑战的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提出，并被后来历代教皇奉为圭臬的“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观念。他赞成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如果这样去考虑，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腓特烈的思想中完全没有废弃天主教会的想法。即使这个时期的腓特烈看上去体力衰退，但他也只是没有行动，而并非没有思考。

女儿维奥兰特嫁给了卡塞塔伯爵，却总喜欢待在父亲身边。1250年9月，在她的劝请下，腓特烈终于决定休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假。

说是度假，可他是腓特烈，不可能待在福贾的王宫里虚度时光。他一边鹰猎，一边走遍了普利亚——这片走到哪里都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地方，转遍了分布在这片被幽禁的恩佐所歌颂的“太阳照耀下的那片大地”上的所有城堡。因为是在“自己家”，所以他不必带卫兵。别名为统治机构的宫廷（corte）也撂在了福贾。

然而，他还是摆脱不了劳碌命，经常从逗留的城堡派出信使，从人事到税收，事无巨细地发出指令。在包括普利亚在内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由于采取了腓特烈创造的政体而绝无居民叛乱，统治也一直很稳固，但腓特烈是一个见到不妥不纠正就不放心的人。不过休假似乎还是舒适快乐的。10月过去，进入了11月，腓特烈仍未回到福贾的王宫。

最后的鹰猎

冬天，在南国普利亚，也是一样的，也下雪，尽管是偶尔。腓特烈隆冬2月在意大利北方的外出鹰猎导致了敌人火烧维多利亚，在11月的意大利南方他更应该优先养生。然而，腓特烈没有这样做。

11月25日，他如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出发了。这天要在从托雷马焦雷城向卢切拉方向去的平原上鹰猎。行程正好走到一半，一阵剧痛向皇帝袭来。

回托雷马焦雷的路太远，去卢切拉还有12公里。从皇帝的状态来看，送到离此30公里以外的福贾王宫已无可能，只好把他抬到附近山上的小城堡里。

这个村子叫作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村子中间是一个为狩猎而建的城堡，腓特烈自己从未来过。不过眼下，不管在哪里，都得先让皇帝尽快休息，即使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只有小城堡，也得把皇帝抬进去。

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病因。很多编年史记载说是脱水症。在中世纪，几乎所有非外伤的疾病都会被当成脱水症。

侍医被从福贾的王宫里紧急叫来。驰马奔来的侍医名叫乔万尼·达·普罗奇达，是那不勒斯湾普罗奇达岛领主的儿子，曾在萨莱诺医学校学医。他由于坦陈自己的诊断结果讨得腓特烈的欢心，前不久刚刚当上皇帝的侍医。

侍医乔万尼六天六夜服侍在皇帝的病床边。这种时候他仍旧直话直说。他告诉大家，皇帝已经无法救治。皇帝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下令召来在福贾的所有高官。这天是12月1日。

这天刚回到福贾的曼弗雷迪最先赶到。维奥兰特的丈夫、皇帝的女

婿卡塞塔伯爵也一路快马加鞭赶来了。负责意大利南方的陆军司令鲁福、司法大臣蒙特内罗、最高法院长官罗伯特也纷纷在冬季的原野驱马奔行而来。年已73岁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也赶来了。大主教和曼弗雷迪二人自赶到后，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皇帝身边。

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状态好时，腓特烈可以听取高官们的汇报，发出简短的指示。看到这样的情形，城堡里的人知道皇帝的大脑还好用。侍医乔万尼拿出的药似乎对止痛很管用，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东西调制的。听了高官们的汇报后，皇帝可以安稳入睡。

然而，在时好时坏的病情中，状态糟糕的时间越来越长。12月7日，为了书写遗书，腓特烈叫来了王国专任公证人。

腓特烈用拉丁语口述了遗言。他的声音已经低弱到几乎听不见，但语句完整，言辞简洁明快。编年史作家也都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腓特烈都保持了清醒的意识。

遗言

康拉德是皇帝第二位正妻、耶路撒冷王国的公主约兰达所生的嫡子，这年已经22岁。皇帝把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传给了这位最年长的嫡子。用今天的话说，康拉德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遗言里明确记载着，在康拉德去世而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嫡出的次子恩里克将继承统治权。如果恩里克去世也没有留下子嗣，统治的全权再传给曼弗雷迪。这其中的原因是，曼弗雷迪那年虽已18岁，但他是因母亲与腓特烈结婚才成为嫡子的，因而被认定为嫡子的时间较晚。腓特烈区别对待了这种情形。

恩里克的德语读音是海因里希。他是腓特烈第三位正妻英国公主伊莎贝拉所生的儿子，这年12岁。他一出生就是嫡子，父亲便把自己的称号之一“耶路撒冷王”传给了这位12岁的儿子。

塔兰托公爵领地这时直接传给了曼弗雷迪。塔兰托自古以来就是海港，位于长靴形意大利半岛抬起的鞋跟部位。曼弗雷迪成了以塔兰托为中心的这块领地的主人。这就是塔兰托公爵领地，蒙特圣安杰洛[11]圣地也在这里。从东方朝觐回来的人一踏上欧洲土地，一定要去参拜这处圣地。对从母亲一方继承了诺曼王朝的腓特烈来说，这里有着特别的意义。

诺曼人从法兰西北部诺曼底出发，前往东方朝觐，回来时参拜这一圣地后，一些骑士便直接在意大利南方居住下来。这就是诺曼王朝的肇始。这样，腓特烈把这块祖宗之地传给了自己最爱的比安卡所生的独生子。曼弗雷迪18岁就成了“西西里王国”的第一顺位大领主。

被废位的嫡出长子亨利有两个儿子，也就是腓特烈的孙子。他们两人在意大利长大。皇帝把奥地利公爵领地传给了长孙。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里也属于实力封建领地。腓特烈考虑，康拉德当上皇帝后可以把奥地利领主当作靠山。

遗书里明确写着，免除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居民为皇帝驾崩而缴纳的特别费用，也就是说奠仪全免。

遗书里还写着大赦天下，悉数释放关押在王国牢房里的人，但因背叛罪而获刑者除外。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背叛是比因争执而杀人还要重的罪。

遗书里明确记载着王室借款应全额返还，交代在需要新的十字军远征时，可以支出资金10万盎司金币。

腓特烈交代，可以把从罗马到意大利中东部的地区，即被称为“圣彼得的遗产”的教皇领土归还给罗马教皇，但必须附加条件。

这个条件是教皇要承认皇帝的正当权力，即罗马教皇应该按照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分工行事。

在这份遗书中，皇帝只字未提请求教皇解除开除教籍处分的事。腓特烈选择了以被开除教籍之身赴死的做法。

细想起来，腓特烈皇帝要求教皇的事情简单明了：

上帝（耶稣）认为拯救灵魂是教皇及其下神职人员的职责，拯救肉体是皇帝及其下世俗统治者的职责。教皇只须忠实执行就好。

然而，这件事正是震惊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争执的焦点。

这场抗争的中心人物腓特烈，在走到人生终点的瞬间都坚持了他一贯的观点。他要作为一个自己认可的皇帝去迎接死亡。

死

在意大利，人们把走向死亡的旅程说成是到没有日落的世界去。这意思大概是说，所谓死，就是到没有明天的世界去。腓特烈走向没有明天的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1250年12月13日。腓特烈过去总对曼弗雷迪说，今后你们兄弟之间也要好好配合，今天却一整天把手放在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手中，大主教的椅子一直靠在皇帝的病床边。

他们两人已经不必再说什么了。他们共同走过了40年的岁月。腓特

烈被开除教籍，身为神职人员的贝拉尔德也随之被开除教籍。教皇震怒，收回了大主教的教区，那就收回好了。腓特烈要他去开罗的苏丹那里，他便不顾自己的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身份，去同伊斯兰教徒谈判。当腓特烈迷上他的侄女还生了孩子时，他大概也就付之一笑，遂了腓特烈之愿。从制定宪章、创建大学到与教皇交涉，为了实现腓特烈的想法，贝拉尔德总是冲锋陷阵，积极配合。他虽然出身于封建领主家庭，但却同意腓特烈从封建社会向法治国家转变的思想。我觉得，对贝拉尔德来说，在小自己17岁的腓特烈的最后日子里，他只能守在腓特烈身边而别无选择。

想起来，这真是一幅奇妙的光景。一个被开除教籍原本没有资格听忏悔、听了也没有资格宽恕的神职人员，在为另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做临终祈祷。别人眼里的奇异在他们两人之间却一点也不奇怪。何止如此，在场的人也没有一个感到奇异。这光景就这样自然演进下去。

有位编年史作家说，当时腓特烈呼吸微弱，他对贝拉尔德说了句："死后万事空（post mortem nihil）。"腓特烈是否真的说了这句"死后万事空"尚存疑，因为这位编年史作家那时在远离意大利南方的巴黎。我想，那位编年史作家认为腓特烈可能会这么说，于是他就这么写了。腓特烈去世时有十几个人在场。除了在遗书上第一个签字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以及其他高官们和最后一个签字的侍医乔万尼以外，还有曼弗雷迪。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及腓特烈的这句临终话语。而且，腓特烈本人真的就认为"死后万事空"吗？

再过两个星期腓特烈就满56岁了，死神在这一天降临了。

翌日，腓特烈的遗体被运到了福贾的王宫，为的是一丝不苟地完成皇帝的遗愿。

在西欧，即使在与埃及有很深关系的古罗马时代，也几乎不把遗体做成木乃伊。何况中世纪遵从的是基督教教义，采取尽量不动遗体的埋

葬方式，遗体处理不能损伤遗体。处理遗体必须使用的药物只能从东方进口，所以只有地位崇高之人的遗体才能得到处理。

把这些药物与橄榄油搅拌在一起，涂抹在遗体上，然后用浸透着同样药油的极薄的棉布包裹遗体。古代也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如果装殓遗体的石棺密封得好，仅仅这样的处理也能收到相当好的效果。

腓特烈的遗体一定在福贾的王宫里经过这样的处理，因为如果按腓特烈的遗愿葬在巴勒莫，前面还有漫长的旅途。

在做这些事的同时，腓特烈临终在场的唯一儿子曼弗雷迪开始执行父亲之命。

第一，毫不隐瞒地立即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

腓特烈选择了死后也要堂堂正正地正面挑战的做法，而根本不是什么“死后万事空”。

第二，通知第一顺位继承人康拉德皇帝已死，让他尽快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然后南下意大利，落实西西里王国的继承权。

18岁的曼弗雷迪给大自己4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的最后加了这么一句话：

“对法治近乎执拗的热情，彻底公正的言行，对知性不倦的探求心，多方面的丰富才能，与生俱来的真正的高贵，如果这些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灭，腓特烈今后就将继续活在我们的心中。”

把皇帝遗体送往西西里巴勒莫的送葬队伍离开福贾后，经过一个又一个普利亚的海港城市，一路向南。队伍经过巴列塔、托拉尼，从焦维纳佐进入内陆地区，从那里到塔兰托，再乘船去西西里。

走在最前面的是长年担任腓特烈卫队的伊斯兰教徒萨拉森人的步兵队。隔开一些距离，跟在后面的是载着遗体的马车，遗体上覆盖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曼弗雷迪和大主教贝拉尔德骑着马紧随其后。曼弗雷迪劝年迈的大主教乘马车前往，贝拉尔德谢绝了，一直没有离开遗属队伍。政府高官和途径城市的市长骑马跟在他们两人身后。再后面是6个小队的骑兵。长长的送葬队伍由修道僧祈祷着徒步断后。

虽说地处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以阳光普照而闻名，但这可是在12月底。一路上，人们聚集在路边，默默地目送着送葬队伍在马蹄踩踏石板路的声音和修道僧们低回的祈祷声中缓缓而过。

12年前，44岁的腓特烈在意大利北方给普利亚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已久居皇帝之位，但我觉得把我当作一个普利亚人非但不是坏了我的名声，相反是我的荣光。

“职责经常迫使我离开普利亚，但每次我都感到，我的心境就像流离失所的流亡者。气候甜美温和，阳光毫不吝惜地照耀大地，把我温柔地包裹其中。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你们对我的态度，更让我感到普利亚就是我的家。

“当厄运向我袭来的时候，你们感同身受，为我悲哀。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你们比我还高兴，欢呼着迎接我的归来。”

两年之后，腓特烈又从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写来了这样的信。

“不知道为什么，回普利亚时我的脚步总会加快。在我的领国中，只有普利亚会让我一旦决定回去，便会如此急切。”

意大利南部

送葬的队伍从焦维纳佐进入内陆地区，向焦亚德尔科莱进发。在途

中比通托城给皇帝送行的人中，有一位叫作马修·帕里斯[12]的编年史作家。他详细记录了送葬的情况。他写道，送葬队伍安静肃穆，只听见马蹄声和修道僧们低回的祈祷声，前来默默送行的居民络绎不绝，与统治他们长达40年之久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在海港城市巴列塔，来自意大利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向皇帝告别。来自内陆地区的人们将在焦亚德尔科莱城向皇帝告别。遗体只在这座腓特烈送给比安卡的城市停留了一天。比安卡是腓特烈真心爱过的唯一女人，她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并在这里去世。

送葬队伍从焦亚德尔科莱出发，途中不再停留，直接南下前往塔兰托。在塔兰托，西西里王国海军的船只正等待着腓特烈，这是他培育起来的军队之一。

所有停泊在港内船上的船员，包括小渔船的水手，都高高举起手中的船桨。安放皇帝遗体的船只从这一排排如林的船桨中穿过，离开了港口。这是腓特烈向他热爱的普利亚诀别的时刻。

船在西西里岛的海港城市墨西拿稍事停留，旋即直奔巴勒莫而去。队伍在第二年2月抵达巴勒莫。1251年2月25日，在西西里王国首都巴勒莫的主教堂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葬礼。

皇帝的遗嘱得到了完美的实施，包括每个细节。

一、在首都举行的葬礼，除地位崇高的人以外，也允许一般居民参加。

实际上，虽是冬天，但巴勒莫天气晴朗，主教堂前广场上站满了挤不进教堂的人。

二、葬礼由巴勒莫大主教主持。

贝拉尔德大主教为他的主君更是长年的挚友主持了华美而庄严的葬礼。

三、棺材要用“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用外祖父罗杰二世从埃及弄来的大理石制作的棺材。这大理石是诺曼王朝鼎盛时期西西里国王的订货，是大理石中的极品，叫作红斑岩。棺材上雕着图案。守护棺材的四根圆立柱也是用同样颜色的大理石制成。深红色是皇帝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古罗马哈德良[13]皇帝特别喜爱的颜色。

这个大理石石棺是罗杰二世预订的，但后来他选择了西西里式阿拉伯风格的墓地，没能用上这个石棺，就留了下来。腓特烈十来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石棺，便决定死后用它安葬。西西里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只要说“那个东西”便能听懂。

如今，马上就要成为腓特烈最终去处的“那个东西”在主教堂里摆放已久，同外祖父罗杰二世、父亲亨利六世和母亲康斯坦丝，以及腓特烈的第一正妻阿拉贡王族出身的康斯坦丝的棺材并排安放着。这也是腓特烈之所愿。

殓入红斑岩大理石石棺的遗体穿着一身用薄丝里和多层厚丝料做成的丝绸衣，丝料的颜色都是红色。紫色是古代皇帝的颜色，但因基督教会把紫色定为丧色，所以在基督教势力强大的中世纪，红色就成了皇帝的颜色。

腓特烈在正式场合，不论是邀请诸侯的巡会，还是召集王国高官的议事会议（colloquium），抑或是在自己的婚礼上，都经常穿红色服装。皇帝走向死亡之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红色的。于是，皇帝腓特烈二世被红色包裹着，踏上了通向没有明天的世界的旅程。

[1] 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ius IV，约1195—1254），罗马教皇（1243—1254年在位），意大利人，本名Sinibaldo Fieschi。拉瓦格纳伯爵，1227年任枢机主教。英诺森四世决定赐给枢机主教戴红帽的权力，提出“双剑”论，强调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1245年在蒙古帝国大举入侵欧洲的情况下，遣使前往蒙古都城说服其统治者皈依天主教，停止杀戮基督教徒，反被要求向蒙古臣服。

[2] 此处提到的新教皇即教皇西莱斯廷四世（Pope Celestinus IV，？—1241），意大利人，本名Goffredo da Castiglione。早年入西多会，1238年任枢机主教。他于1241年10月25日被选为教皇，同年11月10日去世。

[3] 13世纪末，罗马教廷与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空前激烈。1305年，在法王腓力四世的重压之下，教廷选出法籍主教戈特任新教皇，即克雷芒五世。新教皇惧怕意大利人反对，一直未去梵蒂冈，并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意边境意大利一侧的阿维尼翁（当时属于教皇国，今属法国）。天主教教会出现了阿维尼翁和罗马两地教皇并存的局面。此后70年间，先后有7人在阿维尼翁任教皇。历史上称这些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以类比古巴比伦将以色列人掳至巴比伦70年的“巴比伦之囚”。1378年，为平息内乱，稳定局势，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并再行三重冠礼，宣布自己为正统罗马教皇，从而结束了阿维尼翁教廷时期（Avignon papacy）。这一事件标志着教皇权势的没落。

[4] 接替赫尔曼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的应该是第五任团长康拉德（Konrad von Thuringen，又称Konrad Raspe，1206—1240），他1239年接任团长，1240年去世，再由杰拉尔德（Gerhard von Malberg，1200—1246）接任第六任团长至1244年。

[5] 阿尔勒王国（Royaume d'Arles/Kingdom of Arles），又称第二勃艮第王国（Royaume de Bourgogne/Second Kingdom of Burgundy），存在于933年至1378年，由上勃艮第（今瑞士西部及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和下勃艮第（今法国东南部地区）组成。第二勃艮第王国于1032年加入康拉德二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后称为阿尔勒王国。王国后因外交、与外国王族通婚等原因逐渐分裂，1378年灭亡。其时，王国的大部分土地已归于萨伏依公国，其余大部归于法国。

[6] 掉下树的猴子：日语中是比喻失去依靠、不知所措的人。

[7]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本名Marie Henri Beyle，法国小说家。曾加入过拿破仑的军队，1814年侨居意大利，1821年回到巴黎。他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擅长人物的心理描写，著有《吕西安·娄万》《红与黑》《意大利遗事》《巴马修道院》（即《帕尔马修道院》）等。

[8] 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19/1120—1170），曾为英王亨利二世密友，1155年被任命为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Lord Chancellor）。1162年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捍卫教会、反对亨利二世的政策，于1170年12月29日被亨利二世手下的四名骑士杀害。罗马教廷于1173年封其为殉教圣徒。

[9] 见但丁《神曲·地狱篇》：“我就是掌握着腓特烈心灵的两把钥匙的人，那么灵巧地转动着它们，锁上和开启，除了我没人能分享他的秘密。”（张曙光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10] 拉菲罗·摩根（Raffaello Morghen，1896—1983），意大利历史学家，长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史及宗教史。

[11] 蒙特圣安杰洛（Monte Sant'Angelo），位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11世纪形成城镇。传说天使米歇尔曾在此现身，13世纪以“天使洞”为中心营建，成为天主教圣地之一。2011年被联合国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2] 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Matthaeus Parisiensis，约1200—1259），英国人，本笃会教士，编年史家，美术家，著有多种史书，其中《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为后人引用最多。

[13]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他改变前代皇帝图拉真的对外政策，停止对东方的战争，着重防守，致力于内部治理，下令修筑了著名的不列颠省长城（哈德良长城）。他博学多才，在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学等领域有颇深造诣。

第九章
腓特烈死后

皇帝死于1250年12月13日，但流亡法兰西的教皇却是在第二年1月底才知悉此事。

罗马教皇英诺森欣喜若狂，立即给腓特烈的领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全体居民发出了教皇书简。

“苍天啊，大地啊，高兴起来吧！全体基督教徒去到室外，饱吸新鲜的微风，用朝露润口，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吧！如今，射向我们的雷光终于消逝，封锁我们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

敦促反皇帝派行动起来的信就这样开了头。这封信不但送到了德意志和意大利，也送到了英吉利和西班牙。但光是老百姓行动起来还是达不到教皇的目的。正如第一次十字军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只要拥有自家兵力的国王和诸侯不行动，教皇便无法达到消灭皇帝派的目的。

然而，尽管教皇如此煽动激励，欧洲各国的王侯却并未行动起来。

不安

腓特烈于1214年就已经与法兰西王签订了用现在话说的所谓德法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腓特烈的领国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这就事实上约定了“德+意”与“法”之间的互不侵犯。

签订这个协定的时候腓特烈19岁，正要行动来确立横跨德意的帝国。对他而言，只要法兰西王不站在敌人的一边就达到了目的。而已经49岁的法兰西王腓力·奥古斯都也正忙于用巧妙，应该说是狡猾的办法把国内封建诸侯网罗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对他而言，在法兰西迈向强大的当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介入进来则最好不过。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能够持续近40年，是因为他们两者的利害一致。

德意志诸侯按兵不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里昂公会议后教皇推举的两个皇帝候选人都败在了皇帝派诸侯支持的康拉德手下。第二位荷兰公爵威廉在腓特烈去世当天大败于康拉德，逃回了荷兰。

此外，英吉利和西班牙也被腓特烈通过婚姻关系拉到了自己一边。而这时的法兰西，则因为国王留在东方料理完败的第七次十字军的后事，处于国王不在国内的情形之中。

从罗马加冕那年算起，腓特烈实际上已经做了30年的欧洲政坛老大。这个老大如今不在了。眼见得巨星陨落，王侯们首先感到的就是“不安”。那是对未来的不安：以后谁来替代腓特烈？又有谁能够替代腓特烈？

腓特烈称之为“我家”的“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也对未来感到不安。

腓特烈从《卡普亚宪章》开始推动从封建社会向基于法律的君主制国家的转变，这一转变获得成功，并在《梅尔菲宪章》颁布时结出果实。这是因为腓特烈承认封建诸侯可以保有以前所拥有的领地。

你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拥有领地。但从此以后领地内的大小事务不能由你们领主任意决断，而必须依据皇帝我制定的法律决断。这就是在西西里王国既是皇帝又是国王的腓特烈对诸侯们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才会赞成腓特烈的改革，按照他的任命担任政府高官，积极参与王国的统治。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0年。30年来，他们一直在腓特烈这顶大伞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只要有腓特烈在，他们的领地就可以不受以《君士坦丁大帝献土文献》为后盾而滥用领有权的罗马教皇的侵犯。

现如今，腓特烈不在了。皇帝在遗书里明确记载了由谁来接替皇帝。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康拉德22岁，排在他后面的恩里克才12岁，被指定为康拉德前来意大利代行皇帝权力的曼弗雷迪才18岁。真的有人能够取代已故的腓特烈吗？这种不安在这里也无法消解。

曼弗雷迪安葬完父亲后立即去了意大利南方。维持君主制政体的最好办法，就是统治者经常出现在被统治者面前。西西里是一座岛屿，但当时被称为普利亚的意大利南方却是大陆的延伸。因而如果必须现身，曼弗雷迪应优先出现在这里。他进了福贾的王宫，也在巴列塔等其他城市现身。这个策略暂且取得了成功。

教皇们的执念

整个欧洲笼罩在不安之中。唯一感到雷光消逝，暴风雨过去，可以出来饱吸微风，用朝露润唇的，恐怕就是伦巴第同盟自治城邦集中的意大利北方了。对欧洲各国王侯不能揭竿而起而大失所望的英诺森教皇，把希望寄托在了这里。他急切地起程，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隔7年后再次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教皇前往罗马，一路上受到了久未“露面”的各地教皇派的热烈欢迎。

不过，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并没有随教皇的回归而变为清一色的教皇派。埃泽里诺·达·罗马诺和乌贝托·帕拉维奇诺等老资格皇帝派还在意大利北部严阵以待。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还坚持在意大利中部。尽管如此，回归罗马后的教皇仍未放弃消灭腓特烈二世所属并因他而闻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执念。教皇根本不忌讳公开表示这个决心。他警告说，不论谁继承霍亨斯陶芬血统，他的命数已定，想帮助他们的人不论是谁都是罗马教皇的敌人。

不过，里昂公会议以来，教皇已经刻骨铭心地知道，光在嘴上说说是不会有用的。他需要找到能用军事力量推翻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人。

法兰西王路易去了东方指望不上，教皇便与英王亨利商量此事，答应把西西里王国赐给国王的弟弟康沃尔公爵理查德，劝国王率英国军队进攻意大利南方。

亨利的妹妹嫁给了腓特烈，二人成了兄弟关系。而且，亨利妹妹所生的恩里克是紧跟在康拉德后面的继承人，他人还健在。英王讨厌进攻这样的国家，国王的弟弟更加厌恶。这个话题于是不了了之。

但教皇的想法仍很强烈，觉得国王不行，那么王子爱德华行不行呢？不过，结果这次又没有谈成。神职人员执念很深，这在欧洲是常识。但只有这个时期一个接着一个坐上圣彼得宝座的罗马教皇们能够如实地表现出来。

然而，康拉德在德意志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由于打败了教皇派威廉，他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应该是很稳固的。在这时召集诸侯会议，在他们面前正式通知父亲去世，正式宣布父亲的遗言，是使德意志成为皇帝派一统天下的大好机会。我们不知道那天他在诸侯面前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但我们知道，这位22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能够消除封建诸侯内心在腓特烈去世后的不安感。也许这位儿子没有腓特烈17岁时就已具备的、靠着言谈的内容和方式就能把对方拉过来的才能。

德意志的封建诸侯们也同样怀有巨星陨落的心情。他们因腓特烈之死而产生的不安感，在见了康拉德之后依然存在。他们还不至于向教皇低头，但对未来的不安却仍然留在心里。

这时，康拉德又犯了错。不安感不但会在信息的接受者之间传染，也会在信息的发散者之间传染。诸侯们的冷淡反应也使康拉德不安起来。他决定，与其优先稳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盘，不如先去意大利。这

时是1251年秋天，离腓特烈去世还不到一年。

1252年1月，康拉德和曼弗雷迪在意大利南方会合。这是父亲死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但康拉德在德意志长大，而曼弗雷迪则生长在意大利南方。连英国研究家也这样评价：23岁的康拉德在德意志长大，严谨刻板；19岁的曼弗雷迪在意大利长大，才气焕发。这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

在旁人看来，他们兄弟关系很好。曼弗雷迪崇拜父亲，遵守了父亲要他们兄弟好好合作做事的遗愿。

但这在罗马教皇的眼里是更大的危险信号。英诺森教皇首先对康拉德处以开除教籍前的一项处罚。

3月，康拉德的第一个孩子在德意志出生，是个男孩，起名叫康拉丁[1]，意为小康拉德。

9月，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去世。教皇到罗马之后立即专门给腓特烈第一忠臣的这位大主教写信，劝他回归基督教会。但是，已故皇帝最信赖的贝拉尔德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对教皇的的劝说充耳不闻，甚至没有写回信。与腓特烈一样，他选择了以被开除教籍者之身离世，享年75岁。

1253年，腓特烈去世过去两年，时间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康拉德率兵打仗取得了相当好的战果。弟弟曼弗雷迪与其说是武将，不如说是文人。他也在为巩固意大利南方而奋斗，这似乎是他们的分工。然而，转入攻势的教皇也毫无收剑入鞘的意思。

只要被视为皇帝派就会被开除教籍。像维罗纳的僭主埃泽利诺那样即使被开除教籍也毫不动摇的人是例外。乌贝托·帕拉维奇诺和埃泽利诺一样，也是意大利北方皇帝派势力的一根支柱。他原本就是为金钱而

战的佣兵队长，所以轻易就改换门庭，成了教皇派。

更为严重的是，曼弗雷迪生母比安卡的娘家兰齐亚家族在皇帝死后也传染上了“不安”。不过染病的不是整个家族，而只是几个人。但教皇偏偏任命其中一人担任了伦巴第同盟领袖米兰的长官，像是在树立榜样。

意大利西北部的实力领主萨伏依伯爵也是传染上不安的一个人。他向教皇请求解除与曼弗雷迪的婚姻，教皇允准了。但基督教不承认离婚，便以虽然举行了婚礼，但没有实际婚姻生活为由宣布婚姻无效。曼弗雷迪已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已经同将要继承西班牙阿拉贡王位的王子订了婚。尽管如此，教皇还是以没有同床共眠为由批准了离婚。

意大利北方就这样从皇帝派成了教皇派。整个意大利北方没有成为教皇派的只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未参与两派争斗的威尼斯共和国。

就这样，“不安”也传染到了意大利南方。

这也直接打击了在西西里王国北部与教皇领土接壤的地方拥有领土的实力诸侯。

他们是卡塞塔伯爵里卡多·圣塞韦里诺和阿切拉伯爵托马索·达·阿奎诺。

这两个家族在王国内部也是有实力的大领主。在腓特烈制定的《梅尔菲宪章》中，有六个人与负责各部门的七位大臣共同组成王室最高会议。他们就是这六个人中的两人。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的父辈作为王国内封建诸侯的代表，一直与以建设基于法律的君主制国家为目标的腓特烈积极合作。

到了儿子这一辈，腓特烈也把他们当作下一代的后备干部予以培

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其中的这二人，让他们成了自己的女婿。其中的卡塞塔伯爵里卡多就是7年前及时向腓特烈告发暗杀皇帝和恩佐阴谋的人。

连与已故皇帝缘分如此之深的实力诸侯，在皇帝去世后也都传染上了接连袭击实力人物的“不安症”。我认为，在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中他们最先传染上“不安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与教皇领土接壤的地方拥有领地。也许他们不看好25岁的康拉德和21岁的曼弗雷迪能够替代腓特烈。

我总觉得嫁给这两人的腓特烈的女儿维奥兰特和玛格丽特应该能对丈夫的变心做点什么，但她们什么也没能做到。在中世纪，只有拥有自己的领地，即自己有收入来源的女人才是女强人。腓特烈甚至给庶出的儿子们封了领地，但他却没有余力也给女儿们封地。

尽管如此，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都没有请求教皇允准婚姻无效。两人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背叛了自己的哥哥。后来，维奥兰特又活了10年，而玛格丽特则又活了30年。他们的丈夫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领主地位，但妻子终归还是妻子。

可就在这一年，腓特烈指定的继康拉德之后的继承人恩里克去世了。他一向多病，人生走到15岁就谢幕了。因为他是英王的妹妹、腓特烈的第三任正妻所生的嫡子，腓特烈在遗书中指定他的继位顺序先于年长的曼弗雷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男性，从在博洛尼亚过着囚禁生活的恩佐开始，一个接着一个退场了。

康拉德之死

转年到了1254年，退场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

5月，病了几天的康拉德去世了。来到意大利后的两年中，他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军事行动。但他得上了疟疾，刚满26岁便死去了。

教皇方面广泛散布他是被曼弗雷迪毒死的说法。尽管没有人知道确切病名，但研究家也说，对腓特烈，教皇方面都会散布说他是曼弗雷迪用枕头捂死的，这次也只是故伎重演。

首先，嫡出兄长死后最为难的是曼弗雷迪。曼弗雷迪12岁前一直是庶子。直到10年前母亲比安卡成为正妻后他才成为嫡子。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嫡庶有着巨大的区别。尤其在绝对不承认庶子成为国王的罗马教皇毫不掩饰其敌意的这个时期，曼弗雷迪毒杀康拉德是完全没有任何好处的。

康拉德死后，曼弗雷迪改变了对教皇的策略。康拉德一味强硬，曼弗雷迪则改用了相互妥协靠近的策略。皇帝的两位嫡子死后，曼弗雷迪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只要把腓特烈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世袭遗产、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继承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北方都可以不要，只要诺曼王朝时代的“西西里王国”就好。在他看来，这样一来，一向不喜欢由一个君主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的罗马教皇也没有反对他的理由了。

康拉德死后两个月，22岁的曼弗雷迪和大他8岁的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一起，造访了教皇逗留的阿纳尼城。教皇英诺森四世在和腓特烈的两个儿子会谈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两个月后的9月，教皇宣布开除曼弗雷迪的教籍。

理由是“西西里王国”的正统国王应该是康拉德的遗子，曼弗雷迪没有任何权力却把王国拿到了手中，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开除他的教籍。然

而，教皇却找理由阻止两岁的康拉丁前往意大利。他优先考虑的是斩断在意大利的霍亨斯陶芬血统。教皇的这个想法已经不是秘密。

这一年的12月，教皇英诺森四世去世。5天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2]登基。曼弗雷迪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新教皇身上，再次开展了接近教皇的策略。新教皇对腓特烈及其儿子们的憎恶似乎没有前任那么强烈。

可是，1255年过去了，情况也未见好转，现状并没有改变。到了1256年4月，哥哥费德里科战死，年仅32岁。在意大利语中，费德里科这个名字与父亲同名，所以腓特烈的这个儿子多被称为“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他毫无芥蒂地接受了庶出的身份，从父亲在世时就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父亲去世以后，他仍然不惜与小他8岁的弟弟亲密合作。曼弗雷迪才24岁，他失去了比任何人都靠得住的支柱。

西西里王曼弗雷迪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到了1258年，曼弗雷迪终于做出了决定。这时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8年，离康拉德去世也已经过去了4年。

我想曼弗雷迪已经不再犹豫了。父亲的遗书是这样规定的：“西西里王国”与帝国一道，也由康拉德继承；如果康拉德去世时没有子嗣，就由恩里克继承；如果恩里克去世时没有子嗣，就由曼弗雷迪继承。如今，康拉德和恩里克都已去世，而腓特烈死后两年出生的康拉德的儿子这年6岁，人在德意志。

如果真的想要忠于父亲的遗言，那么，同时是塔兰托公爵领地这个王国最大领地领主的曼弗雷迪就必须是摄政，直到这个6岁孩子成人。但是，康拉德的遗孀再嫁了，把儿子寄养给了别人。所以尽管时光流

逝，康拉丁却一直没有来意大利。曼弗雷迪也没有硬性要求。我认为，莫非曼弗雷迪是希望德意志归康拉丁，意大利南方归自己？这也是他要求与教皇改善关系时必提的条件。他认为，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不再处于同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罗马教皇也应该同意了。然而，但丁所说的这位“金发美丽、容貌端庄”的26岁年轻人也许没有考虑到，神职人员往往比俗人的执念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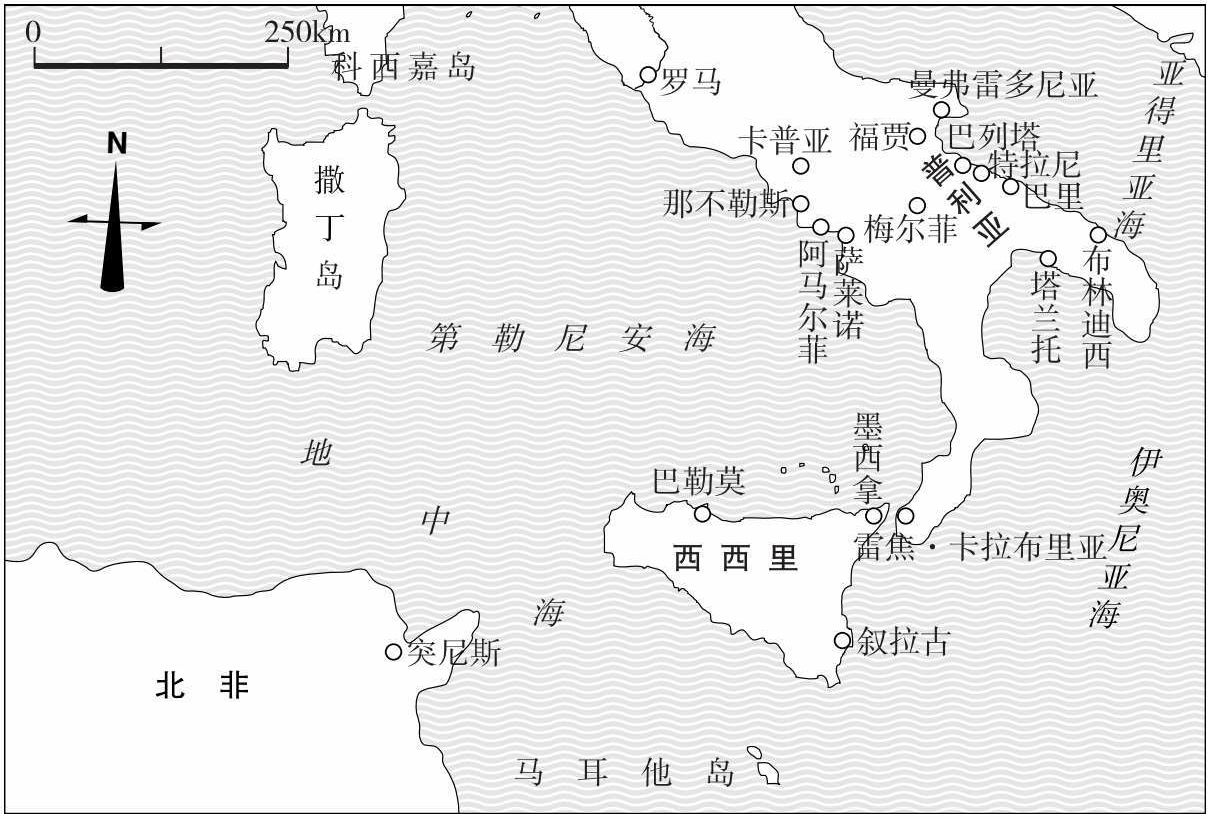
加冕西西里王的曼弗雷迪

1258年8月10日，26岁的曼弗雷迪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了自己作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加冕典礼。他通知了亚历山大教皇，但却没有请求教皇的批准。

曼弗雷迪统治着腓特烈创建的法治体制下的“西西里王国”，水平令人满意。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遗产，那就是王国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隔海相望的北非伊斯兰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不需要曼弗雷迪为海防花费精力。从意大利北方撤回来以后，经济也从特别税中解放出来。王国的百姓充分享受了低税率和政治稳定带来的经济繁荣。

加冕典礼两个月后，国王曼弗雷迪实现了那不勒斯大学的复校。根据前教皇英诺森的指示，欧洲第一所全由世俗之人开办的大学“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已经被关闭了整整7年。

国王曼弗雷迪还着手建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海港。这个被称为曼弗雷多尼亚的海港城市同巴列塔、特拉尼、巴里和布林迪西一道，成为普利亚的出海口而繁荣起来。就这样，西西里王国与父亲统治的时代一样，一直是连接东方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中转之地。



意大利南部及其周边

通过这些海港城市的不仅仅是物资。许是曼弗雷迪在这方面也学习了父亲，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人员的往来也盛极一时。和腓特烈在世时一样，在曼弗雷迪时代，来自开罗苏丹的使节也频繁来访。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被从古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又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曼弗雷迪读了希伯来语版，认为这部著作会在欧洲广为阅读，便提供赞助将其译为拉丁语。尽管西西里王国在领地方面回到了诺曼王朝时代，但无论是基于法律的统治、与异文化的交流，还是与异教徒的共存，都完全延续了腓特烈时代的情形。

如果罗马教皇们引进外国军事力量的策略同以前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以后也将会一直处于曼弗雷迪的统治之下，因为曼弗雷迪是意大利南方人民所喜爱的那一类型“君主”（principe）。

1259年，罗马教皇虽不承认但已事实上确立了国王地位的曼弗雷迪已经27岁了。由于前教皇英诺森认定无效而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离了婚的曼弗雷迪，于这年春天再婚，对象是希腊伊庇鲁斯公国[3]国王的女儿，名叫海伦。

但凡希腊女人叫海伦的，中世纪编年史作家们大概都会联想到“特洛伊的海伦”，以为都是绝世美人。于是，曼弗雷迪再婚的对象也成了绝世佳人。不过，尽管谈不上是绝世佳人，但她似乎仍是一位美女。曼弗雷迪并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到处找情人的癖好，他与这位妻子接二连三地生下了三男一女。

西西里王国在曼弗雷迪治下国泰民安。

德意志自康拉德去世整整5年时间，连续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事实上缺位的情形之中。

法兰西第七次十字军以完败而告终的伤痛难愈，人们都对责任人国王路易冷眼相看。不仅是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之死，还有为让被伊斯兰方面俘虏的国王及手下全体人员获释付出了巨额赎金，使得国库空虚。最大的融资方热那亚银行甚至濒临倒闭。赖账是当时国王们的常用套路。但在那个时代，腓特烈却在遗书中指示要全额还款，这实属特例。

英吉利也没能恢复《大宪章》以来一直弱化的王权。在欧洲这种状况之下，只有西西里王国在讴歌再次来临的春天。

然而，晴朗的天空未能持续很久。两年后的1261年，对霍亨斯陶芬家族一向稳健应对的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去世，耗时两个月才选出了下任教皇。在对以曼弗雷迪为代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是稳健应对，还是恢复强硬的问题上，枢机主教们分裂了。两个月后，强硬派胜利。法兰西出身的乌尔班四世[4]当选为新教皇。

教皇的名字由教皇在教皇选举大会上当选后自己确定。通过教皇取什么名字可以推测新教皇的“施政方针”。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倡导者，应该是煽动者，是法兰西出身的教皇乌尔班二世[5]。1261年当选的乌尔班四世也出身于法兰西，当选教皇前是耶路撒冷主教。说到耶路撒冷主教，代代都是反腓特烈的领头人。原因是腓特烈仅依靠与伊斯兰教徒苏丹的外交交涉就让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尽管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这些主教们也从不去耶路撒冷，一直把主教公邸设在阿卡。

这些狂热反皇帝的人中的一位当选为教皇，回到了罗马。他还是一位法兰西人。而且他还知道，仅靠开除教籍打不倒皇帝派。这位教皇当然会比前任更加热心地去做法兰西王的工作。

法兰西王的变心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为什么会在这时起意要打破祖父腓力·奥古斯都传下的不介入方针呢？为什么会在腓特烈死后13年的1263年加入罗马教皇消灭霍亨斯陶芬的作战呢？

原因之一在于第七次十字军失败以来，路易的地位虚弱了。这个路易，面对教皇让他的一个弟弟率军进攻西西里王国的劝说，已经没有实力像以前那样坚决说不了。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无法拒绝弟弟查理想拥有自己的王国的愿望。里昂公会议后他断然拒绝了，但第七次十字军失败后他已无法拒绝。

原因之二是，路易自己一直抱有十字军远征的执念。路易已经48岁，他的脑中只想着要为13年前的第七次十字军雪耻。信仰笃深的路易对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实现解放圣地的神意深信不疑。

哥哥都48岁了还这么想，远比哥哥现实的弟弟便轻易地用“如果西西里王国归了自己，去远征也就容易了”的说辞说服了哥哥。37岁的王弟查理被称为“安茹家的查理”。安茹伯爵领地是结婚后妻子的领地，他不过是入赘女婿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没有法律确认领地的王弟。

罗马教皇乌尔班四世也积极帮助这位王弟查理。为了说服路易，教皇还搬出了曼弗雷迪的出身，说他是庶出，作为国王他就是个“杂种”，不能把基督教徒的统治交给如此出身的“黑暗君主”云云。

路易九世也有很多孩子，但都是王妃玛格丽特所生。对一辈子与情人无缘的路易而言，所谓嫡子必须生来即为嫡出。而像曼弗雷迪那样由情人所生，12岁还是庶子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庶子，是“bastardo”（杂种）。

总之，曼弗雷迪是“杂种”这一点，让以前长期犹豫不决的路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路易12岁就登上了王位。他深知，对当时的自己而言，腓特烈的互不侵犯路线是多么值得感激。“杂种”说给了他背弃长期坚持的这条路线以精神上的说法。

不过，由于十字军大败带来的财政赤字，路易并无余力向弟弟提供军费资金。于是军费也交由罗马教皇考虑。教皇决定说服佛罗伦萨的金融家们，让他们向查理提供25万小金币的融资，折成金块为900公斤。

这样，路易便从资金忧虑中解放出来，于腓特烈死后13年的1263年年底，下令弟弟查理实施对西西里王国的进攻。

事已至此需要早日实施。翌年的1264年5月，法军先头部队便早早到达罗马。7月，第一军抵达罗马。

10月，教皇乌尔班四世去世。不过，这位法兰西人教皇生前任命了很多法兰西出身的枢机主教。在选举新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conclave）上，法兰西出身的人成为多数派。当然，选出的新教皇克雷芒四世[6]也是法兰西人。打倒曼弗雷迪的行动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25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写的主张宗教应与政治分离的《君主论》和《论李维》[7]，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根据地在罗马的基督教会之所以危害意大利，就在于罗马教皇自身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解决问题，但却有能力拉来他国的军事力量。历代罗马教皇常常会依靠别国的国王来解决意大利的内部问题。意大利也因为他们而长年且反复地苦于外国势力的侵略。”

如是写来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他还写道，让罗马教廷迁往瑞士将有益于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这样写，其结局只不过

著作被禁、升官受阻，这实为幸运之事。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个人。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圭恰迪尼[8]说他死前希望看到三件事，第一件就是神职人员不介入政治。

不过，腓特烈也好，曼弗雷迪也罢，都是活在他们之前250年的人。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即使庶出的人也可以凭实力争夺王位。然而，腓特烈和曼弗雷迪却生活在距文艺复兴时期250年之前。曼弗雷迪的例子是罗马教皇把别国军事力量拉进意大利的最早实例。

王弟查理

法军络绎不绝地抵达罗马。1264年结束，转年到了1265年的5月，国王的弟弟查理抵达罗马，受到了教皇的热烈欢迎。

6月，在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教皇为查理举行了授予其西西里王国统治权的仪式。

不能忘记的是，当时还是将《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信以为真的时代，这份文件200年后才被证伪。在那个因大帝献土而被认为整个欧洲的真正领有权属于罗马教皇的时代，教皇这时是把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托付给了”查理。

腓特烈皇帝对此一贯反对，但查理对这类教皇和君主统治权的争论毫不关心。查理长期寄人篱下，对他而言，当务之急只是得到自己的王国。因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统治权而非领有权的授予。查理跪在教皇面前起誓：“我作为罗马教皇的臣下对教皇领土的一部分西西里王国实施统治。”

然而，这次并非正式仪式。他们约定，正式的加冕典礼要到最后一名法军士兵抵达罗马后再举行。

玩弄谋略的人总是疑心重重。在教皇看来，“王国的统治权已经交给了你，你真会为我去进攻吧”。实际上，正式的加冕典礼直到下一年即1266年1月法军士兵全部进入罗马后才举行。

罗马的梵蒂冈是教皇的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象征着教皇的权力。以前，这里只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举行过加冕特别典礼。这次是第一次为地位低于皇帝的国王举行这样的特别典礼。罗马教皇为了给侵略他国的王弟查理一个名分，打破了以往的惯例。

在此期间，曼弗雷迪都做了些什么呢？

曼弗雷迪在做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实施统治。父亲死后马上就要16年了。从那时起，种种不祥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当初18岁的曼弗雷迪已经34岁，也已学会了做国王。火烧维多利亚时遗失的父亲关于鹰猎的著作，也在他的重新编辑下完成了，成为一本插图精美的图书。曼弗雷迪可谓是鹰猎专家，不论是在书的结构还是在语言选择方面，人们都可以充分认可他主编的这部作品。从文意也能看出，他打算把这部作品作为送给亡父的礼物。

但这位34岁的容貌端庄的金发美男子有两点与他的父亲腓特烈不同。

第一，如果是腓特烈，遇到任何危机都绝对不会放弃，而会用他那不屈的精神不断探索力挽狂澜之策。但曼弗雷迪却没有如此的毅力。

如果他也玩弄谋略的话，还是能够把离开皇帝派，却尚未变成教皇派的诸侯拉回来的。

曼弗雷迪没有腓特烈所怀有的那么多的“意志力”，那种只要彻底实

行就会反过来帮到别人的“意志力”。

第二，曼弗雷迪这个国王并非是他在自己的强烈意志下才当上的，所以他不懂得查理的心理。查理是用尽各种手段也要得到自己的王国。如果得不到就会被轻视。

曼弗雷迪作为国王无可挑剔，但他看轻了教廷。在教廷看来，我们费尽心思都没有在腓特烈生前将他扳倒，在他死后第16个年头，才第一次抓住查理这颗具有实际效力的棋子。

可以认为，曼弗雷迪缺乏自觉意识，没有意识到查理和教皇勾结起来，于1266年进攻意大利南方，才是腓特烈死后真正的危机。

1266年1月6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德·安茹被教皇克雷芒四世正式授予了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

1月20日，25 000人组成的法兰西军队开始南下，沿拉提纳大道直指卡普亚。

2月10日，卡普亚在查理面前打开城门。这是查理进攻西西里王国的第一步。

曼弗雷迪也迎击了敌人。加上驻扎在卢切拉的宣示绝对忠诚的7 000名萨拉森士兵，曼弗雷迪也有超过2万人的军队。他原先打算率领这支军队在王国北部某地迎击南下的法军。

查理得知消息后，决定率自己的军队主动进攻曼弗雷迪。就是说，他决定不等敌军出动而自己先下手。

2月26日，两军在亚壁大道经过的贝内文托附近平原对阵。

曼弗雷迪之死

1266年2月26日，以“贝内文托之战”而闻名的战斗打响。这场战斗虽然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其本身却毫无值得一书之处。原因在于，就军队规模而言，法方虽略占优势，但双方却也大体上势均力敌，可是率领这些军队的两位司令官却远非名将。

34岁的曼弗雷迪虽有些争夺战的作战经验，但却毫无正式会战的经验。40岁的查理也同样如此。他虽然参加过第七次十字军，有些作战经验，但那只是十字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经验。说是经验，也只是打败仗的经验，而且那也不表示以后查理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司令官。

没有战略战术都出类拔萃的名将统率，战斗很容易沦为混战。“贝内文托之战”也是如此。战斗一开始，双方立即陷入混战。这是一场敌我两军胡乱冲撞的战斗。曼弗雷迪方面开始露出败象。

在开始转成劣势的时候，司令官有两条路可以考虑。这两条路都是尤里乌斯·恺撒用过并取得成功的办法。

第一个做法是亲自驱马上阵，呵斥和激励己方那些开始恐惧逃跑的士兵，让他们重整旗鼓，间不容发地发起反击。

第二个做法也同样是亲自驱马上阵，呵斥激励自己的士兵，然后率领重整旗鼓后的士兵撤退，以期卷土重来。

即使曼弗雷迪不具备实施第一种做法的能力，他应该有充分的可能性去实施第二种战略。即便查理打赢了这一仗，以后对于他来说也是在敌国境内作战。退到本国的纵深之后，曼弗雷迪便有了充分的可能性去打败军粮补给及一切的一切都陷入不利的敌人。

可是，曼弗雷迪没有采取这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他冲在骑兵的

前面杀入了敌阵。他也许指望着自己的士兵见状会重新鼓足勇气，跟着杀入敌阵的司令官冲锋陷阵。然而，亚历山大大帝能用这个法子取胜，是因为他手下的士兵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打法。

中世纪时代的战斗，战胜方的士兵经常会拿走敌兵遗体上的武器，脱去他们的甲胄，剥光他们的内衣，然后弃尸于荒野。如果抢来的东西能够卖掉，他们就能挣钱。

曼弗雷迪的生死直到战斗结束后都没有得到确认。查理在当天晚上给教皇的信里也写道，尚未确认曼弗雷迪的生死。

然而，“金发并容貌端庄”反害了他。有士兵注意到成堆的尸体中有一具与其他人不一样。根据他们的报告，查理叫来了认识曼弗雷迪的人。这个人是兰齐亚家族中变节投靠教皇的人，是曼弗雷迪的伯父。至此，曼弗雷迪的死才得以确认。

确认完毕，曼弗雷迪仍被弃尸原地。他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天主教会不允许被开除教籍的人拥有坟墓。

可是，法兰西士兵感到了一种一起拼杀的对手情分。何况曼弗雷迪是在勇敢拼杀之后倒下的敌方统帅。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起石块，码放在被弃置的敌方将领的裸体之上，为他筑起了一座坟墓。

仅仅一仗，诺曼的也是霍亨斯陶芬的西西里王国就此崩溃。

5天之后，企图从特拉尼港逃回希腊娘家的王妃海伦和子女一行四人，在登船前一刻被捕，被直接押送到了拉格佩佐莱。那里是内陆地区，远离大海。

这座临湖小城是曼弗雷迪生前最为喜爱的美丽城市，现在却成了一处短暂的幽禁之所。不久他们母子被分开，王妃被转送到了另一座内陆城市诺切拉。5年后，王妃死于此处的幽禁之所。

曼弗雷迪的一个年纪尚幼的女儿也与他的三个儿子分离。女儿贝雅特丽切一个人被带往那不勒斯，软禁在查理居城的一个角落里。她18年后才被释放，去西班牙投靠娶了同父异母姐姐的阿拉贡家族。也许是时来运转，她在那里与一个意大利贵族结婚，育有三男一女，过上了平静安定的婚姻生活。

曼弗雷迪的三个儿子被带到了蒙特城堡，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软禁生活。曼弗雷迪的儿子们在幼小年纪就成了囚徒，蒙特城堡这座美丽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囚禁他们长达30年的地方。这座城堡矗立在广袤平原的中央，适合做幽禁之所。

30年后，幽禁地点改到了那不勒斯。除了一个在迁移过程中成功脱身后逃往英吉利的王子之外，其他两位王子又在那不勒斯被软禁了20年，并死在了那里。当上了西西里王国国王的查理，大概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给继承曼弗雷迪血统的人以自由。

在贝内文托之战后只过了两年的1268年，虽未继承曼弗雷迪的血统但却因为是康拉德的遗子而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血统的康拉丁，被德意志的皇帝派诸侯逼迫着南下来到了意大利。大惊失色的教皇立即开除了康拉丁的教籍，还给查理去信，要他有所作为。查理也一样，他必须有所作为。他停止了对意大利南方的压制，率军北上。

康拉丁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皇帝派的最后希望，他们集中了兵力。但康拉丁毕竟才16岁，毫无战斗经验。查理也能轻易打败这样的对手。

1268年8月23日，战斗在位于罗马东面蒂沃利以东的塔利亚科佐打响，并以查理的胜利而告终。逃跑的康拉丁被抓，立即被押往那不勒斯。战斗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在10月29日，他在那不勒斯中央广场被处以斩首刑。

单是发动战争还构不成死罪，这在古罗马法中就已确定下来。但对

查理和教皇来说，重要的不是了解罗马法，而是要斩断血统。如果说16岁少年有什么罪，那就是他继承了爷爷腓特烈的血统。

两年后的1270年，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实现夙愿，再次发动了十字军远征。查理也参加了已经是第八次的十字军远征。但这次的十字军既没有征讨基督教徒称之为圣地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剑指中近东伊斯兰势力中心的埃及，而只是在突尼斯登陆后便宣告结束。法兰西王路易登陆后得病驾崩，十字军只得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天主教会还是在27年后把这位路易列为圣人。基督教重视动机甚于重视结果。这就是腓特烈远征成功却被当作异端受到追究，而两度失败的路易却被授予圣人荣誉的原因。

1272年，曼弗雷迪同父异母的哥哥恩佐在幽禁地博洛尼亚去世。

一年以后的1273年，腓特烈曾经的忠臣、一直侍奉康拉德的哈布斯堡家族[9]的鲁道夫[10]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历经20年，腓特烈死后皇位一直空缺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但鲁道夫也没等到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就去世了。

罗马教皇们对强大皇帝的过敏症，在腓特烈死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查理为了得到自己的王国，连16岁孩子的脑袋也要砍掉。他于14年后的1282年遭到了惨烈的报应。一个男人的执念和一个女人的刚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个男人是侍医乔万尼·达·普罗奇达。他是腓特烈弥留之际一直守护在他身旁，见证了皇帝的遗书，并在遗书上签字的皇帝心腹之一。

这个女人是嫁给了西班牙阿拉贡王族的曼弗雷迪的长女康斯坦丝。

“西西里的晚钟”

自从康拉丁被斩首后，查理对皇帝派的追讨愈加严厉，西西里王国的皇帝派都逃去了西班牙。已经成为阿拉贡王妃的康斯坦丝的宫廷就是他们流亡的去处。曾经混在群众中亲眼看到康拉丁被行刑的医生乔万尼也是其中一人。这位医生是一位皇帝派，皇帝死后就一直跟在曼弗雷迪身边，曼弗雷迪死后又投奔了康拉丁。

王妃康斯坦丝从医生乔万尼那里听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开始说服她的国王丈夫。要想让医生谋划的复仇取得成功，国王一声令下便能团结一致、共同行动的军队必不可少。而且，尽管民众对法兰西高压统治的不满愈发高涨，但要说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起义也需要时间。完成这一切花去了14年的时间。这就是执念！这次起义的所有一切，全都由医生乔万尼、兰齐亚家族中剩下的皇帝派考拉德以及在曼弗雷迪手下担任海军司令官的劳利亚三人细密筹划。

1282年复活节于3月31日如期而至。那天的晚钟就是起义的信号。几天前就从巴塞罗那起航的西班牙舰队不断在附近海上现身。为了呼应陆上的起义，他们计划从海上登陆。

晚钟在所有教堂一齐响起。钟声里，人们高呼着“杀掉法国兵”，把起义切实地付诸于行动。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杀戮。西西里人的心中早已充满了对法兰西人的憎恶。登陆的西班牙兵不愧是职业军人，更精准地进行着扑杀。一夜之间，他们就把法兰西兵从整个西西里岛一扫而光。

身在那不勒斯的查理得知情况后紧急派兵，但为时已晚。西西里周围都是大海，没有强大的海军连登陆都难。而强大的海军却站在了曼弗雷迪的残部与西班牙的联军一边。

实际上，查理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半壁江山。这也是查理统治的失败。他把首都设在了那不勒斯，而只把西西里岛看作征税的对象。

赶走了法兰西王以后，阿拉贡王妃康斯坦丝就任西西里的统治者。曼弗雷迪的女儿回来了。

600年后，朱塞佩·威尔第把这场起义写成了歌剧，剧名就叫《西西里的晚钟》（I Vespri Siciliani）。剧中的主人公是位男中音，这位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腓特烈的侍医乔万尼。

然而，1282年的“西西里的晚钟”并没有穿越墨西拿海峡响彻意大利南方。查理也一直还是意大利南方一侧的国王。曼弗雷迪被幽禁在蒙特城堡里的三个儿子和被囚禁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女儿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

尽管如此，“晚钟”对查理也是一个打击。3年后他便满怀愤怒地死去。这也是当然之事。这个时代的西西里，不但风光明媚，气候温暖，文化的馨香正浓，而且与伊斯兰各国的贸易繁盛，人民富足幸福，因而也税收丰厚。腓特烈的屡次军事行动也都在资金方面得到了西西里的支持。

“西西里的晚钟”过去了9年。到了1291年，最后的堡垒阿卡陷落了，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延续了200年的十字军国家崩溃了。伊斯兰教徒的夙愿，一定要把最后一个基督教徒赶下地中海的夙愿，200年后终于实现了。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十字军以来一直担任旗手角色的罗马教皇的权威坠落。

不过，现有权威的坠落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开端。

自阿卡陷落起，十字军精神便开始了决定性的衰落。但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新时代并没有走到胜利的伊斯兰一方，而是来到了失败的基督教一方。不，这也许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可思议之处。“不安”带不来什么，而“危机”才会生出新事物。危机的词源是拉丁语的“crisis”，那里面就含有“复苏”之意。但这层含义只为意识到危机的人而存在。

1298年，画家乔托[11]在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西西，开始用湿壁画法创作讲述圣方济各一生的壁画。

在同时代的佛罗伦萨，腓特烈死后15年出生的但丁正处于创作活动的鼎盛期。

宣告文艺复兴就要到来的曙光已经开始染红地平线。

这距离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仅仅过去了48年。

终焉之地

我是在盛夏造访腓特烈的终焉之地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的。那天天空晴朗，灼热的太阳无情地照晒着大地。因为造访普利亚兼有避暑之意，所以没有选在腓特烈去世的冬季，而是选在了夏季。

周围是一片广阔的麦田，中央隆起一个不高的山丘，那便是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腓特烈活着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专供狩猎用的小城堡和小教堂，麇集着一些农舍。农民们白天下地干农活，傍晚随着晚钟声回来。近80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也没留下。由于长年的风雨侵蚀和盗贼掠夺，这里已经成为废墟。

去废墟的道路，漫说铺装，就连踩实的痕迹都没有，我真后悔开了吉普车来。

来到山丘顶上，也没有见到一处配叫遗迹的地方。从那里远眺，盛夏的平原上杳无人迹，远方甚至没有汽车驶过。这里没有留下一处使人舒心的地方。

在曾经的村庄入口，似乎是后人做的铁门半开着，那铁门完全锈蚀成了红色。穿过铁门进到里面，也只有枯草连连。南欧的阳光甚至不容人们发出“夏草啊！士兵们的梦，梦的遗迹”[12]的感伤，只给人一种点燃星火即刻燎原的现实感想。

然而，在这座可以360度旋转眺望的山丘的最高处，立着一座据说是2000年12月13日为纪念腓特烈去世750年而建立的八角形柱碑。我想，这八角形柱碑定是模仿八角形蒙特城堡的产物。

八角柱上用拉丁语镌刻着下面一段话语，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才是腓特烈皇帝的墓碑。

——FRIDERICVS DEI GRATIA ROMANORVM IMPERATOR ET SEMPER AVGVSTVS

REX IERVSALEM ET SICILIE DVX SVEVIAE

26-XII-1194 IESI 13-XII-1250 FIORENTINO

“腓特烈，受上帝恩宠，封罗马帝国皇帝、永远的奥古斯都、耶路撒冷和西西里王以及斯威维亚（施瓦本）公爵

“1194年12月26日生于耶西1250年12月13日卒于菲奥伦蒂诺”

施瓦本地区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肇始之地。删去施瓦本公爵这个词，就成了腓特烈经常在公文开头所写的自己的称号。

纪念腓特烈的八角形石碑

在这座八角柱剩下的三面上，镌刻着英吉利出生的编年史作家、本笃教派修道士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所撰编年史中的一句话。

在所剩的三个面上，第一面是编年史中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另一面上是德语译文，最后一面上是意大利语译文。

腓特烈名字的拉丁语读音是“弗里德里库斯”，德语读音是“弗里德里希”，意大利语读音是“费德里科”，铭文当然也要用这三种语言镌刻。

这位修道士生于1220年，死于1259年，是生活在腓特烈同时代的人。他一次也没有见过皇帝。但当得知一直是当时欧洲政界核心人物腓特烈的死讯之后，这位30多岁的英国修道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年，皇帝腓特烈亡故。他是俗界君主中最伟大的统治者，是世界惊异，也是在众多方面做出卓越而崭新成就的改革者。”

“STUPOR MUNDI”（世界惊异）后来成为腓特烈的代名词，只要提起“世界惊异”，欧洲有教养的人都知道是谁。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不少书籍以此为大标题，以“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为副标题。

废墟上甚至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坐下。孤零零的一棵树兀自立在那里，人们只能直接坐在树下的地面上。

尽管废墟上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但人们却可以思考。

难道皇帝腓特烈二世真的像几位专门研究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历史上的失败者吗？

他自己是在帝位上去世的，但他的子孙却连施瓦本公爵都不是。如果把家族的延续作为一家之长最重要的职责，那就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是个失败者。

然而，在腓特烈死后53年、曼弗雷迪死后37年的1303年发生了一桩事件，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3]被法兰西王“美男子”腓力抓了起来。而且，从两年后的1305年开始直到1377年，史称“阿维尼翁之囚”的状态持续了72年。先后共有七代罗马教皇被法兰西的国王幽禁在法兰西南部小城阿维尼翁，他们不在罗马，也不在意大利。

依靠别人的军事力量是罗马教皇的宿命。让其中的一个人强大起来是他们绝对回避不了的事。只因为憎恶腓特烈这一个念头，教廷就要去削弱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并因此去加强法兰西王的势力，最后得以使法兰西王再也不必顾忌任何人而决意发起史无前例的行动，把罗马教皇幽闭在了阿维尼翁。如果是这样，半个世纪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难道不是那些罗马教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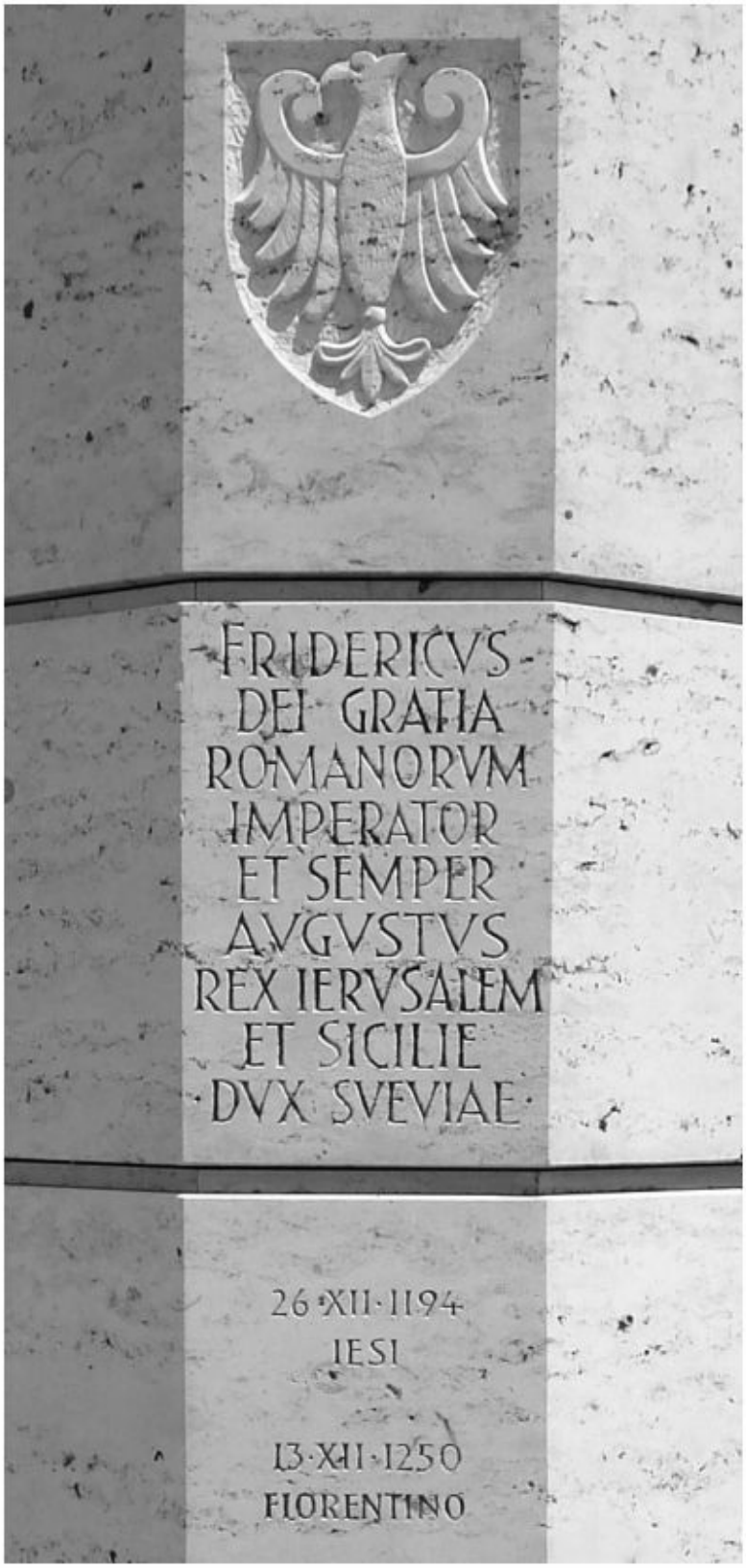
顺便一说。13世纪审判腓特烈、16世纪审判伽利略·伽利雷的“Inquisizione”（异端裁判所）改名为“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缩写CDF，信理部），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不过在现代，信仰方法是对是错的审判仅限于神职人员，一般世俗之人已经不再是审判对象。可以说，走到这个程度，历史还是进步了。

我正想着，突然一个念头袭上心头：难道已经死去的腓特烈不是变为鹰从这里飞走的吗？

生前，他是那么地爱鹰，死后变成鹰也该是他之所愿吧？位于高岗之上的腓特烈的终焉之地，才是鹰腾飞的最佳之地。

对腾飞而去的鹰来说，是胜者还是败者已经没有关系，就像对已经活到头的人来说，是胜者还是败者已经无关紧要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FRIDERICVS
DEI GRATIA
ROMANORVM
IMPERATOR
ET SEMPER
AVGVSTVS
REX IERVSALEM
ET SICILIE
DVX SVEVIAE
26·XII·1194
IESI
13·XII·1250
FIORENTINO

八角柱碑文

[1] 康拉丁（Conrad，通称Conradin，1252—1268，又称小康拉德），康拉德之子，母亲为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他是腓特烈二世之孙，曼弗雷迪的侄子。Conradin在德语中称为Konradin，意大利语中称为Corradino。他是施瓦本公爵（1254—1268年在位，称为Conrad IV），耶路撒冷王（1254—1268年在位，称为Conrad III），西西里王（1254-1258年在位，称为Conrad II）。

[2] 亚历山大四世（Pope Alexadnder IV，约1199—1261），罗马教皇，1254—1261年在位。意大利人，本名Rinaldo di Segni，赛尼伯爵。1231年任枢机主教。任教皇期间，因政教冲突使教皇国丧失大片土地。

[3] 伊庇鲁斯公国（Despotate of Epirus），中世纪巴尔干国家。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建立于伊庇鲁斯（今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交界处），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独立。1337年被塞尔维亚王国征服，1359年重新兴起。1479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4] 乌尔班四世（Pope Urban IV，约1200—1264），罗马教皇，1261—1264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Jacques Pantaleon。1255年任耶路撒冷主教。1264年确立“基督圣体节”。

[5] 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II，约1035—1099），罗马教皇，1088—1099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Odon de Lagery/Odo of Chatillon。1070年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1078年任枢机主教。任教皇期间，因扩张教权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法兰西王腓力一世斗争。1095年借口恢复“基督圣墓”和拯救“圣地”耶路撒冷，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推进教会改革和教权至上政策，支持克吕尼改革运动。

[6] 克雷芒四世（Pope Clement IV，约1190—1268），罗马教皇，1265—1268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Guido Falcodius/Guy le Gros。原为法王路易九世的宫廷法学家和顾问。1261年任枢机主教。

[7] 《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完成于1517年的一部著作，原名为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直译为《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章》，中文书名有《李维史论》《论李维》等。

[8]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曾在帕多瓦和费拉拉的大学学习，做过律师，教授过法律。后转入政界，服务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罗马教廷。他写过许多政论文章。他的历史著作引用政府官方材料，客观分析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开辟了历史写作的新路。著有《意大利史》《佛罗伦萨史》和《格言集》等。

[9] 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Haus Habsburg），神圣罗马帝国及奥地利帝国的皇室。家族起源于德意志的阿尔萨斯，11世纪初，家族建立哈布斯堡（鹰堡），因而得名。1273年鲁道夫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家族成为皇室。1483年以后该家族大致上一直占据着帝位。16世纪卡尔五世兼西班牙国王，王室达到鼎盛时期。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成为奥

地利皇室。1918年卡尔一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而退位，皇室没落。

[10] 鲁道夫一世（Rudolf I/Rudolf von Habsburg，1218—1291），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在位）。他于1240年成为哈布斯堡伯爵，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创始人。他于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束了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延续20多年的帝位空缺期。他通过征战、联姻以及政治捭阖，奠定了哈布斯堡王朝强盛的基础，在哈布斯堡家族成为欧洲最重要王室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11] 乔托（Giotto di Bonde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建筑家，文艺复兴美术的先驱，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造型力创造出划时代的绘画风格，其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的分界线。作品有《圣弗兰西斯科传》《圣母和救世主传》《两约翰传》等。

[12] 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的名句。

[13] 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sius VIII，约1234—1303），罗马教皇（1294—1303年在位），本名Benedetto Caetani，生于意大利的阿纳尼。1281年任枢机主教。1294年，他逼迫教皇西莱斯廷五世退位后继任教皇。1302年颁布《神圣一体敕谕》，宣称教皇权力绝对高于世俗王权。因教权与王权之争和法王腓力四世积怨。1303年被法王使者拘捕，返回罗马后抑郁而亡。

年表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194 年	12 月 26 日，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出生于意大利中西部城市耶西。父亲亨利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父是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母亲康斯坦丝（诺曼王朝西西里王罗杰二世的女儿）。		（日本）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
1197 年 （3 岁）	父亲亨利去世。		
1198 年 （4 岁）	5 月，在巴勒莫主教堂即西西里王位，同时成为普利亚公爵和卡普亚公爵。	1 月，英诺森三世即位任罗马教皇。	（日本）源赖朝去世。（1199）
1208 年 （14 岁）	6 月，叔父菲利普在德意志被对立派暗杀。 11 月，母亲康斯坦丝去世。以后便以母亲指定的英诺森为监护人，在巴勒莫自由地学习、生活。 12 月 26 日，自认为已经成人，宣布独立。	由教皇提议发动阿尔比十字军（直到 1234 年）。	（日本）《新古今和歌集》诞生。（1205）
1209 年 （15 岁）	8 月，接受英诺森之劝与西班牙阿拉贡公主康斯坦丝结婚。	10 月，由教皇推举萨克森公爵奥托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	（英）剑桥大学成立。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10 年 （16 岁）		10 月，奥托因同侵犯教皇领土和西西里王国诸城，被开除教籍。	
1211 年 （17 岁）	任用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为顾问。此后，贝拉尔德成为腓特烈的终生帮手。 与康斯坦丝所生的长子亨利（恩里克）出生。		
1212 年 （18 岁）	被德意志诸侯选为新皇帝。在巴勒莫主教堂让儿子亨利即西西里王位。赴德意志。 12 月，在美因茨主教堂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 与法兰西王腓力二世结为同盟。		（日本）《方丈记》诞生。 （日本）和田会战。（1213）
1214 年 （20 岁）		布汶战役。腓力二世击败英王约翰与奥托的同盟军。	
1215 年 （21 岁）	在德意志领土西端亚琛的主教堂正式加冕皇帝。誓言进行十字军远征。 这个时期启用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为心腹，与贝拉尔德一起派往拉特兰公会议。此后，赫尔曼也成为腓特烈终生的帮手。	失败后约翰签署《大宪章》，翌年去世。 教皇召开拉特兰公会议。	

西历（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16 年（22 岁）	秋，把皇后康斯坦丝和长子亨利从西西里接到德意志。 冬，封亨利为施瓦本公爵。 与德意志贵族的女儿阿德莱德生庶子恩佐（后来的撒丁王）。	7 月，英诺森三世去世。洪诺留三世即位新教皇。	（中国）成吉思汗开始西征（1219）。 （日本）北条氏执权政治开始。（1219）
1220 年（26 岁）	视察博洛尼亚大学。结识法学家埃皮法尼奥，后予以重用。同一时期结识精于修辞学的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引为心腹。 11 月 20 日，在罗马举行加冕仪式。 11 月底，公布《卡普亚宪章》，作为法治国家的基石。任命恩里克·迪·莫拉为法务大臣。 自卡普亚赴那不勒斯。产生开设那不勒斯大学的设想。		
1221 年（27 岁）	由埃皮法尼奥陪同从那不勒斯前往萨莱诺。强化当地的医学校。 2 月，第一次进入普利亚。	冬，西西里农村爆发伊斯兰教徒暴动。	（日本）承久之乱。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22 年 （28 岁）	6 月，皇后康斯坦丝去世（39 岁）。		
1223 年 （29 岁）	开始在普利亚全境建设城寨，在福贾建设皇宫。 5 月，让参加西西里起义的阿拉伯人及他们的家属集体移居到普利亚的城市卢切拉。 这个时期谋划复兴西西里海军，启用生于马耳他岛的恩里克。	法王腓力二世去世。	
1224 年 （30 岁）	开设欧洲第一所国立大学那不勒斯大学（现在的费德里科二世大学），任命埃皮法尼奥为第一任校长。大学培养了托马斯·阿奎那等人才。 与安提俄克的玛利亚生庶子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后来的阿尔巴伯爵及托斯卡纳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1225 年 （31 岁）	7 月，教皇正式要求腓特烈率十字军远征。 11 月，与耶路撒冷公主约兰达结婚。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26 年 （32 岁）	结识数学家斐波那契，策划引进阿拉伯数字，向斐波那契支付年薪，让他从事数学研究。通过斐波那契的介绍得知亚里士多德研究家米凯尔·司各脱。 会见埃及苏丹阿尔－卡米勒的使者法拉丁。 与女官阿内丝生女儿比安科费奥莱。 邂逅皇帝派重要人物兰齐亚侯爵的女儿比安卡·兰齐亚。	3 月，“伦巴第同盟”在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诸城市再次兴起，与皇帝派对立。	（中国）西夏投降蒙古军。
1227 年 （33 岁）	9 月，率十字军从布林迪西出发，但由于发生了瘟疫，前往奥特兰托避难，让赫尔曼先行前往东方，自己在波佐利静养。 11 月，被格列高利九世开除教籍。 约兰达生次子康拉德。 约兰达去世（16 岁）。	3 月，洪诺留三世去世。格列高利九世即位任新教皇。	（中国）成吉思汗去世。 （日本）道元从宋朝归国。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28 年 （34 岁）	3 月，被格列高利第二次开除教籍。 6 月，率十字军从布林迪西港出发。7 月，抵达塞浦路斯岛。在该地处理内政的混乱之后，于 9 月在阿卡登陆。 在阿卡和雅法（现在的特拉维夫）与阿尔－卡米勒的使者法拉丁交涉，以图通过对话实现和平，收复耶路撒冷。		
1229 年 （35 岁）	1 月，与阿尔－卡米勒交涉成功，收复耶路撒冷。伊斯兰地区继续留在该地，贝鲁特到雅法之间的海港城市为基督教一方的领土。协议有效期为十年，根据双方意愿可以续约。 3 月，进入耶路撒冷，举行耶路撒冷王加冕典礼。 5 月，前耶路撒冷王约翰·布里昂在教皇授意下入侵西西里王国。腓特烈从阿卡出发，向意大利南部进发。 6 月，进布林迪西港。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30 年 （36 岁）	9 月，在教皇的出生地阿纳尼同教皇进行“和平之吻”，双方和解。教皇解除了对腓特烈的开除教籍处分。 与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生庶子里卡多（后来的基耶蒂伯爵和斯波莱特公爵）。		
1231 年 （37 岁）	9 月，公布《梅尔菲宪章》，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	格列高利九世谴责公布《梅尔菲宪章》的行为是针对“上帝和信徒”的敌对行为。	（朝鲜）蒙古军入侵高丽。
1232 年 （38 岁）	德意志对长子亨利统治的不满高涨。受到叱责的亨利与反皇帝派勾结。 与情人比安卡·兰齐亚生庶子曼弗雷迪（后来的西西里王）。		（日本）制定《贞永式目》。 （中国）蒙古灭金。（1234）
1235 年 （41 岁）	带领次子康拉德前往德意志。对亨利处以终身监禁。（1242 年亨利自杀。） 与英王女儿伊莎贝拉（约翰之女，现任英王之妹）结婚。		（中国）蒙古在哈拉和林建都。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36 年 （42 岁）	在同站在教皇一边与皇帝对立的意大利北部伦巴第诸城市（伦巴第同盟）的战斗中获胜。意大利北部的东半部归顺皇帝。 康拉德登上德意志王位。		
1237 年 （43 岁）	与伦巴第同盟军再战，在科特努瓦战斗中击破同盟军。伦巴第同盟事实解体。		
1238 年 （44 岁）	3 月，同盟盟主米兰请求媾和，但谈判破裂。 7 月，进攻意大利最北部的布雷西亚久攻不下，10 月撤除布阵退回克雷莫纳。 与伊莎贝拉生三子恩里克（后来的耶路撒冷王）。	埃及苏丹阿尔－卡米勒去世。	（泰国）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
1239 年 （45 岁）	3 月，被格列高利第三次开除教籍。		
1240 年 （46 岁）	与教皇的对立加深。这个时期，将塔德奥·达·塞萨和维尼亚引为心腹。		（俄罗斯）蒙古军攻克基辅大公国。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41 年 （47 岁）	5 月，在梅洛里亚海战中打败热那亚，捕获准备参加拉特兰公会议的神职人员，幽禁于意大利南方。 8 月，开始进攻教皇领地，接到格列高利去世的消息后撤退。 冬，伊莎贝拉去世（27 岁）。	格列高利九世宣布在罗马召开公会议。 8 月，格列高利去世。此后连续 22 个月教皇空缺。	
1243 年 （49 岁）		6 月，英诺森四世即位任新教皇。	
1244 年 （50 岁）	请求与教皇直接谈判。	英诺森四世撕毁谈判约定，逃亡里昂。	（日本）道元创建永平寺。
1245 年 （51 岁）	派塔德奥·达·塞萨作为皇帝代理参加里昂公会议。 7 月，公会议否决了塔德奥的主张，腓特烈被定罪为异端者，并形成决议，剥夺腓特烈的帝位及西西里王位。	6 月，教皇在里昂召开公会议。 公会议后，教皇让图灵根伯爵拉斯佩当西西里王，又让荷兰王威廉当皇帝，企图把现任德意志王赶下台，均遭失败。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46 年 （52 岁）	3 月，部下潘多尔福和贾科莫通过教皇义弟接受教皇旨意，谋划暗杀腓特烈和恩佐。实施前被告发，阴谋者一干人等被逮捕定罪。 康拉德在与教皇推举的拉斯佩军队的战斗中败北，6 个月后再战获胜。 与比安卡·兰齐亚正式结婚。与比安卡所生庶子曼弗雷迪成为嫡子。		
1247 年 （53 岁）	2 月，确定统治意大利全境的新体制。 帕尔马发生英诺森授意的政变，倒向反皇帝派。 夏，为包围帕尔马，在附近建造了维多利亚基地。	教皇通过义弟和枢机主教等策划在帕尔马进行反皇帝政变。	（日本）宝治会战。
1248 年 （54 岁）	2 月，搬进维多利亚。外出鹰猎时维多利亚遭到帕尔马军的突袭被烧毁。心腹塔德奥·达·塞萨阵亡。自己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也被抢走。 3 月开始，成功控制包括帕尔马周边在内的伦巴第全境。 比安卡·兰齐亚去世，享年 38 岁。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49 年 （55 岁）	1 月，身体不适（红斑狼疮）。 2 月，最亲近的心腹维尼亚因叛逆罪被捕，一个月后自杀。 5 月，里卡多（基耶蒂伯爵）去世。 已经当上撒丁王的庶子恩佐在与博洛尼亚军的战斗中被俘。		
1250 年 （56 岁）	让手下武将帕拉维奇诺替代恩佐负责意大利北方的统治，当地回归皇帝派。 9 月开始在意大利南方静养兼视察。 11 月，外出鹰猎时发病，被送到附近的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 12 月 7 日，口述遗言（1. 康拉德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衔和西西里王国；2. 恩里克为耶路撒冷王；3. 曼弗雷迪为塔兰托公爵；4. 长子亨利之子为奥地利公爵等。）	第七次十字军在埃及的达米埃塔附近大败于伊斯兰军队，全军被俘。	（埃及）建立马穆鲁克王朝。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50 年 （56 岁）	12 月 13 日，在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去世，享年 55 岁零 11 个月。 教皇推举的皇帝荷兰王威廉被康拉德打败，回到荷兰。	第七次十字军在埃及的达米埃塔附近大败于伊斯兰军队，全军被俘。	（埃及）建立马穆鲁克王朝。
1251 年	2 月，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葬礼。 德意志诸侯对康拉德的统治表现出不安。 康拉德离开德意志去往意大利。	英诺森四世回到罗马。	
1252 年	康拉德的长子康拉丁诞生。 9 月，腓特烈二世最亲近的心腹贝拉尔德去世。	教皇给康拉德定罪。	
1253 年	除威尼斯以外，整个意大利北方由皇帝派变为教皇派。 康拉德之后的第二继承人恩里克去世，享年 15 岁。		（日本）道元去世。
1254 年	康拉德去世，享年 26 岁。 9 月，曼弗雷迪被英诺森四世开除教籍。	12 月，英诺森四世去世，亚历山大四世即位任新教皇。	

西历 （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56 年	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战死，享年 32 岁。		
1258 年	8 月，曼弗雷迪在巴勒莫主教堂加冕西西里王。 曼弗雷迪重开被前教皇封闭的那不勒斯大学，建设港口城市曼弗雷迪尼亚。		（中近东）蒙古军占领巴格达。
1261 年		亚历山大四世去世。乌尔班四世即位任新教皇。	（日本）净土真宗初祖亲鸾去世。
1264 年		乌尔班四世去世，克莱孟四世即位任新教皇。	
1265 年	到这个时期为止，曼弗雷迪以父亲腓特烈留下的草稿等为基础，编辑并复原了《驯鹰的艺术》。		
1266 年	2 月，曼弗雷迪在“贝内文托之战”中败给了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率领的法兰西军队并战死，享年 34 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西西里王朝崩溃。		

西历（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68 年	康拉德之子康拉丁被查理捕获，处以斩首刑，享年 16 岁。		
1270 年		路易九世率第八次十字军出发，客死于登陆地突尼斯。	（中国）定国号为元。（1271）
1272 年	恩佐在幽禁地博洛尼亚去世。		
1273 年	腓特烈的忠臣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		（日本）元日战争文永之役。（1274） （中国）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汗。（1275）
1282 年	嫁到西班牙阿拉贡家族的曼弗雷迪长女康斯坦丝、腓特烈的侍医乔万尼等率领的西班牙军开往西西里，以复活节的晚钟为信号登陆，将法兰西军队扫出西西里（该军事行动被称为“西西里的晚钟”）。查理倒台，3 年后去世。 康斯坦丝成为西西里的统治者。		（日本）元寇，弘安之战。（1281）

西历（实足年龄）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相关事项	其他
1291 年		中东基督教城市阿卡被伊斯兰势力攻陷。十字军国家消亡。	
1298 年	这个时期开始，但丁和画家乔托等人的活动兴盛，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的曙光。		（日本）永仁的德政令。（1297）
1303 年		罗马教皇被法王腓力四世抓捕（两年之后开始了共有七代教皇被幽禁的“阿维尼翁之囚”）。	（日本）嘉元之乱。（1305）
2000 年	12 月 13 日，为纪念腓特烈去世 750 周年，在他的终焉之地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的遗迹处，建立了一座八角形纪念石碑。		

代跋
盐野七生及其笔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盐野七生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7月7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母因而为她取名“七生”。她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26岁游学意大利，便爱上西欧。两年后，她因抗婚而辞去公司的工作，离家出走，定居意大利。在那里，她穷一生之精力苦心研习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历史。她于1968年因偶然机缘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欧洲历史，在海量阅读和精细研究的基础上，用日语创作了大量讲述欧洲历史的写实文学作品，成为用日语写作欧洲历史的大家。

盐野七生历时半个多世纪，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屡获大奖。她的历史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下列四大系列：

（1）古罗马系列：《罗马人的故事》（1-15卷，1992起每年一卷，历时15年于2006年出齐）；

（2）中世纪欧洲系列：《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德岛攻防记》《黎凡特海战》；

（3）文艺复兴系列：《海都物语》《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文艺复兴是什么》《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语录》；

（4）古希腊系列：《希腊人的故事》（三卷，2017年出齐）。

此外，她还写有《思想的轨迹》《生存的演习》等散文和随笔系列的作品。

盐野七生尊重历史，主张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她爱憎分明，在作品中直抒己见；她知识渊博，作品取材广泛，剪裁得当，故事精彩，风格怡人，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老少皆宜。她的作品在日本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商界和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独具慧眼，获得了在中国大陆出版盐野七生全部作品简体字汉译本的版权，从而组织了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浩大而艰辛的文化工程，影响波及大陆的出版、史学、文学、教育、政商等各界。王石、王巍、俞敏洪等著名企业家向读者倾力推荐这些译作，凸显了盐野七生作品在中国商界的影响力。

笔者作为盐野七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部分作品（到目前为止是六种）的汉译者，为能参与这项文化工程感到荣幸。尤其是在盐野于2014年访问中国大陆时，笔者有幸作为她大部分在华行程的全程陪同，担任了她生活、演讲、参观、接受采访和出席记者招待会等活动的口译工作，与她以及原著的出版机构有了直接的交往，建立了友谊，这对笔者的翻译工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是盐野七生的一部重要著作，部头较大，时间较紧，因此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打破兄弟二人合作的惯例，特邀左翼女士加盟，请她翻译了下卷中的《间奏曲》（约4万3千字）。今天，我们翻译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即将面世，笔者为此感到高兴。同时颇想就此书内容与读者做些交流，于是不揣谫陋，在这里以本书为依据，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文艺复兴运动是14至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旨在弘扬资产阶级思

想和文化的运动，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旗号，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发出了先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说到文艺复兴，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但丁、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不朽名作。再往前溯，大概就是类似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先驱。

盐野七生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用文风亲切的传记体裁和美好的情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人物、一段历史和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在文艺复兴大幕开启前数百年的千禧之交，在黑暗的中世纪后期，有一位伟大的统治者突破宗教藩篱，打破宗教桎梏，用自己的实际统治行为，为西方世界挑开了黑夜帷幕的一角，把后来称为文艺复兴思想的一缕曙光洒向了欧洲大地。

这个人物就是皇帝腓特烈二世，这些故事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这部《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一书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腓特烈生于1194年，卒于1250年，享年不到56岁。腓特烈短暂而奇葩的一生中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出生在小城耶西主教堂前广场的帐篷里，2岁时自己站着接受洗礼，14岁时便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以后万事均由自己做主。他登基后颁布《神职君主优待法》，统治德意志，建立起“腓特烈治下的和平”。他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提出成为“文艺复兴宣言”的“回归知识和教育的本源”的校训。他挑战神权，与教皇发生冲突，曾屡次被开除教籍，对教皇既斗争又包容。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对伊斯兰教徒采取包容政策，通过外交谈判“不流血”地收复了耶路撒冷，却被教皇断为基督的敌人。他制定颁布了《卡普亚宪章》《梅尔菲宪章》，用不同于统治德意志的形态统治西西里王国，在国体、司法、经济、税制、市场等方面迈出了从封建制国家走向中央集权法治国家的坚实步伐。他发行“奥古斯塔”金币，以“复古”的精神启示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他以武力打击伦巴第同盟，胜利在望却被火烧军营，旋又力挽狂澜，震慑教皇。而后他突然病倒，安排王

子继承遗志，力战教皇和反皇帝势力，直到贝内文托战败而使腓特烈的理想和事业付之东流……

盐野七生用其手中的彩笔将这段历史描绘得精彩绝伦，其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有一点这里不得不提。

盐野七生说，“这部作品写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对立和围绕神权和俗权的对决。所以在感觉上，这也是我写中世纪的‘压轴’之作。”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认为存在着两个最高领袖：一个是罗马教皇，是精神上即宗教的最高领袖，拥有神权；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的最高领袖，拥有俗权。腓特烈二世与他在世时的历任教皇在神权和俗权的内涵与边界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而基督教内部的这种争斗竟也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最有趣的例子是，教皇（英诺森七世）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是靠了太阳的光芒才发亮的。而腓特烈二世则引用圣经经典语录认为“教皇的归教皇，皇帝（恺撒）的归皇帝（恺撒）”，教皇管好精神世界的事情就好，不应干涉俗界事务。这种争斗持续了腓特烈二世的一生。

盐野七生认为，宽容使罗马帝国强盛，“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得以长久存在的最大因素”，所以“腓特烈要建设一个模仿罗马的法治国家”。可是由于基督教会和教皇的阻挠，“他无法采取宽容路线”。尽管如此，腓特烈二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治理西西里王国的过程中，他在西西里王国制订和实施了包容伊斯兰教徒的政策和措施；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他与伊斯兰教领袖谈判，实现了“不流血”收复圣城的大业。

然而，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不久，教皇以及保守势力便彻底摧毁了他包容伊斯兰世界的象征——卢切拉城，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了它。甚至在腓特烈二世生前，在他和平收复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后尚未来得及率领十字军凯旋之前，教皇就认为“应该用基督教徒的鲜血夺回圣城耶路撒冷”，认为与伊斯兰教媾和是对基督教的背叛，认定腓特烈二世通过媾和“不流血”收复圣城不但无功，反而有罪，是基督的敌人，第四次把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更有甚者，教皇还派出军队入侵了腓特烈二世的领国西西里王国。可见，腓特烈二世包容了教皇，教皇却要置腓特烈二世于死地而后快。

我们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腓特烈二世最重要的统治行为几乎都是在挑战神权、与教皇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做出的。

例如《卡普亚宪章》和《梅尔菲宪章》颁布一事，在笔者看来，这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在腓特烈二世去世后，教皇与教廷保守势力击溃了他的后辈，铲除了这两个宪章，把《梅尔菲宪章》收进了教廷，彻底阻止了这一伟大历史成就的传播，导致这个宪章的历史功绩被长期埋没，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近代人权意识的发端不是《梅尔菲宪章》，而是英国的《大宪章》。

因而，盐野七生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和历任教皇（至少在腓特烈二世的时代）开了历史倒车，用严酷的手段（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异端裁判所等）阻碍了历史的发展，遮挡了进步的光芒照进中世纪。正因为如此，盐野七生非常坦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基督教不是那么回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逆反和反弹，才会有人在黑暗中抗争、摸索，提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观点、政策、策略和措施，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转动，为黑暗的中世纪带来文明发展和文艺复兴的曙光。腓特烈二世便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是文艺复兴运动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正如盐野七生所言，提及文艺复兴运动时，我们记住的的确不应该只是那些天才大师们，也不应该只是他们那些人皆称颂的绘画、文学等

艺术作品，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它因何而生，了解它赖以兴起的思想源头。

如果阅读这部作品能够让读者通过盐野七生的眼睛看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知晓皇帝腓特烈二世挑战神权、主张人本和法治而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能够让我们一起去不断探索发现文化传播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物与故事，梳理那些人物以及故事背后的思想渊源，发掘其源头，那将是我们作为译者的莫大幸福。

田建国

2018年6月12日

于沪上稚豚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全2册/(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左翼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9231-9
Ⅰ. ①皇… Ⅱ. ①盐… ②田… ③左… Ⅲ. ①世界史－中世纪史 Ⅳ. ① K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477号

KOUTEI FRIEDRICH NISEI NO SHOUGAI 1.2.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2013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3.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上、下）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左翼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90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42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31–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希腊人的故事》

（套装共3册）

中信出版集团

希腊人的故事

（全三册）

[日]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徐越 田建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　录

希腊人的故事 1 文明的诞生
前言：写给读者的信
第一章 希腊人是谁？
奥林匹克运动会
诸神的世界
向海外发展
第二章 纷纷建国
斯巴达——吕库古“宪法”
雅典——梭伦改革
雅典——庇西特拉图时代
政变
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
陶片放逐
“弃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
波斯帝国
第一次希波战争
马拉松
两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
排除政敌
战争前夜
温泉关
强制疏散
前往萨拉米斯
萨拉米斯海战
普拉塔亚陆战
爱琴海重回希腊
第四章 希波战争以后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城市一体化
年轻的斯巴达将军

提洛同盟
英雄的余生
年表
图片出处一览
希腊人的故事 2 文明的崩坏
民主的成熟和崩坏
第一部 伯里克利时代
前期
对手客蒙
宿敌斯巴达
30多岁的伯里克利
连续当选
武器是语言
年轻的掌权者们
伯里克利的演说
巩固地盘
极致的“民主政治”
客蒙回归
对手退场
后期
脱胎换骨的伯里克利
《卡里阿斯和约》
帕特农
雅典的劳动者
“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
“商谈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
斯巴达与雅典的分庭抗礼
深爱的阿斯帕齐娅
发生变化的“提洛同盟”
开拓新市场
萨摩斯岛事件
爱琴海北侧
战争始于边陲

扩大的战线
“战争”这个魔物
各国的谨慎派
伯罗奔尼撒战争
底比斯行动
战争最初之年
伯里克利的开战演说
真意在哪儿
阵亡者追悼演说
瘟疫大暴发
弹劾
久违的胜利
死
第二部 伯里克利以后
前期
为何变成众愚政治
煽动者克里昂
斯巴达的动向
莱斯沃斯问题
不断升级的残酷
斯巴达的败北
“编外录用”的开始
战线扩大
历史学家的诞生
来自斯巴达的提议
《尼基阿斯和约》
对希腊人而言的“和平”
年轻领袖的登场
苏格拉底
青年政治家阿基比亚德
四国同盟
曼丁尼亚会战
独占奥林匹克领奖台

柏拉图的《飨宴》
米洛斯问题
西西里远征
赫尔墨斯神像斩首事件
出征
出庭命令
叙拉古
叙拉古攻防战
阿基比亚德投奔斯巴达
再度编外录用
帮手到来
尼基阿斯落单
尼基阿斯的家书
派遣援军
攻防的第二年
第一次海战
第二次海战
援军抵达
月全食
第三次海战
最后的海战
逃离
终焉
后期
闻悉惨剧
复兴
爱琴海之东
再说阿基比亚德
政局不稳
海军将领阿基比亚德
新税制的失败
“三层加莱船的船长”
连战连胜

回归民主政体
“爱他、恨他，又需要他”
吕山德
阿基比亚德失势
司令官们的死刑
唯一一次海上败北
暗杀阿基比亚德
被遣返的人们
无条件投降
年表
图片出处一览
希腊人的故事 3 新希望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自信的丧失
人才外流
审判苏格拉底
第二章 无法蜕变的斯巴达
胜利者的实质
阶层差别的固化
执意护宪
公民兵变佣兵
斯巴达的品牌
把希腊售予波斯
第三章 底比斯的极限
底比斯双雄
打倒斯巴达
少数精锐的极限
希腊一分为二
群龙无首
第二部 新生力量
第一章 父亲腓力
被诸神背弃

马其顿脱胎换骨
新生的马其顿军队
近邻政策
提高经济实力
挺进奥林匹斯南麓
“忧国之士”狄摩西尼
成为希腊霸主
父对子的处罚方式
离婚，再婚
暗杀
第二章 儿子亚历山大
一生之书
一生之友
托命之马
斯巴达式教育
恩师亚里士多德
首上战场
20岁的国王
东征
内情
迈向亚洲的第一步
格拉尼科斯战役
利用胜利
戈尔迪乌姆之结
通往伊苏斯之路
走岔
伊苏斯战役
建立海上交通线
推罗攻防战
占领埃及
通往高加米拉之路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高加米拉战役

“金刚钻”
从巴比伦、苏萨到波斯波利斯
斯巴达最终出局
挺进中亚
走在别人前面的悲剧
重启东征
游击战的艰辛
通向印度之路
最后的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
士兵拒绝从军
印度河
探险未知之地
同化战败者与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
亚历山大的愤怒
密友之死
梦想西征
最后的告别
亚历山大的一生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交给更优秀的人”
继业者战争
亚历山大的遗产
十七岁时的夏天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一览
返回总目录

希腊人的故事

1

文明的诞生

前言：写给读者的信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想法，只是有些长

首先，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到。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动笔写希腊人的历史？原因有两个。

在我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会提及古希腊人。我以为，这“或多或少”对古希腊人很不公平，甚至很失礼。这是第一个原因。

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础，一个是后来兴起的基督教，另一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后者甚至被冠以“希腊罗马时代”之称。

关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罗马，我已经用15卷的文字进行了介绍。但关于希腊，仅在《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中有所提及，单行本270页中仅占了52页。而且，我所写的希腊只是罗马人眼中的希腊。当然，如果希腊和罗马后来一直有关系，我大概都会写进书中。但是，自公元前453年，罗马元老院三议员视察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后，在其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和罗马之间再没有发生可称之为“关系”的关系，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希腊和罗马仅仅相隔一个亚得里亚海。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在希腊人眼里，罗马太过弱小，不值得理会。即使在公元前6世纪，因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雅典开始实行民主政体的同一时期，罗马也放弃君主政体，转向了民主政体，罗马依然没有引起希腊人的重视。

要了解古希腊，一定要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以及阿里斯托芬等人的作品。其中阿里斯托芬是讽刺喜剧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民心所向。然而在他们所有人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到代表罗马人的“R”字样，无论你看得多么仔细。对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来说，意大利半岛的居民中，只有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系殖民城市的人，才是他们的“伙伴”，例如叙拉古人、塔兰托人等。尽管罗马和希腊相距不过500公里，但是，在希腊本土的城邦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岁月里，罗马人始终没有进入希腊人的视野。说难听点儿，罗马人甚至没有被希腊人正眼瞧过。对此，罗马人只能苦笑一声，用一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来掩饰自己的失落感。

用运动会选手来做比喻，希腊人犹如短跑运动员，而罗马人则更像长跑运动员。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辉煌之后，希腊渐渐沉寂下去。而就在那个时代，罗马完成了称雄意大利半岛的壮举。而且，其统治地域之广绝非希腊可比。曾经被希腊人看轻的罗马人，在元老院三位元老组成的视察团视察过希腊之后，虚心向希腊学习，吸取希腊人好的经验，舍弃希腊人的缺陷，做到了扬长避短。

希腊人是一个极富改革创新意识的民族。他们有“一件”唯一未取得创新成功的事。罗马人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施，从而成功建立了囊括希腊在内的庞大帝国。

《罗马人的故事》全面介绍了罗马人的历史。9年之后的今天，我想书写那个时代的希腊人——那些从未正视过罗马人的希腊人。因此，本书的主角变成了希腊人。在写作本书时，我依据的资料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写的著作。因此，我需要和他们一样，把自己变成希腊人，不去正视罗马人。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每每想到《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我就会觉得好笑。但是，本书不仅丰富了《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关于希腊人的内容，而且将更加详尽。

书中人物多姿多彩。这次我是将自己当作希腊人来写希腊人的故事，所以，自然增加了很多《罗马人的故事》中不曾提及的事情。因此，别说50页，甚至需要三卷的篇幅才能完成。

不过，我想也就这么多了。因为，用人的一生来做比喻，《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写的是人近30岁之前的罗马人。从时间上来说，本书所写的希腊人正好也处于这个年龄段。但是，希腊是突然崛起又迅速衰落的，所以，感觉刚进入青春期，就已经走向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从年代上来说，《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所写的那个年代，希腊人的历史事实上已经结束。希腊人终究只是短跑运动员，当然，他们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至今尚未有人破此纪录。

最后，我想简单说说写希腊人的第二个原因。

近来，有关民主主义的辩论突然兴起，诸如民主主义究竟为何物，民主政体下的领袖应该如何云云。针锋相对展开辩论的是政治家和所谓的有识之士，他们常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上。

我也参与过辩论。但是很快，我厌倦了。我不再看报纸、杂志等上面的相关报道，甚至电视上一出现此类话题，我就立即换频道。因为我认为，不管辩论多么激烈，对立的双方都不可能提出可以驳倒对方的论据。

民主政体和该政体下的领袖能力如何，对某一个体来说很重要。因为严格地说，有些事情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得到解决，有些事情只能由国家出面才能解决。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我选择回到古希腊，特别是回到雅典，因为他们才是民主政体的创始者。

因此，本书中，类似民主主义应该怎样、民主政体下的领袖应该如何作为、选民应该怎样参与其中等，一概不提。

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创造出迄今从未有人想到过的民主政体，什么时候、是谁、又是怎样推动民主政体的，在国家存亡的危机关头，有决定权的选民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之后又有怎样的结果，等等。

我曾经用《罗马人的故事》做书名，并把此书名看作他们的语言拉丁语中的RES GESTAE POPULI ROMAN，即“罗马人的行为”。而追踪“行为”（GESTAE），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因此，在本书中，尽管主角变成了希腊人，但是追踪他们“行为”的宗旨不变。同时，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否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交由读者来判断的态度也没变。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古希腊人的世界吧。

盐野七生

2015年夏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及爱琴海沿岸

第一章

希腊人是谁？

奥林匹克运动会

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地点选择在奥林匹亚，实在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决定。奥林匹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与不断崛起的强大城邦国家斯巴达、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等之间的距离都很合适。

奥林匹亚处于茂密的森林包围之中。对于生活在希腊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环境是他们心向往之的。希腊土地贫瘠，希腊人大多生活在岩石裸露的土地上。因此，一走进森林，便觉神清气爽，内心安宁。而且，这片森林不像北欧的森林那般昼夜昏暗阴沉。在这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南欧森林中的每个角落。你遇到的任何动物，与其说是猛兽，不如说更像精灵。希腊人把奥林匹亚森林叫作“神圣之林”。

第一次在“神圣之林”举办盛大的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选择此时举办运动会绝非偶然。不久前，希腊人开始大举向地中海各地开展殖民运动，此时已告一段落。同时，留在本土的住民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住民共同体“城邦国家”的一员。此时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既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也可代表国家（城邦国家）参加。

奥林匹亚建起了比赛场馆。观众席设在两侧，跑道在中央。跑道的长度一圈为185米左右。今天，在英语中，我们把赛场叫作“stadium”（运动场），这一名称就始于270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

最初，比赛项目好像只有赛跑，也就是沿跑道竞跑。但是，希腊人是个富有创新意识的民族。不久，比赛项目中增加了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拳击等。其中摔跤和拳击项目比赛中，无论选手如何出手都无须担心违反规则。此外，还增设了“五项全能”：一人参加包括赛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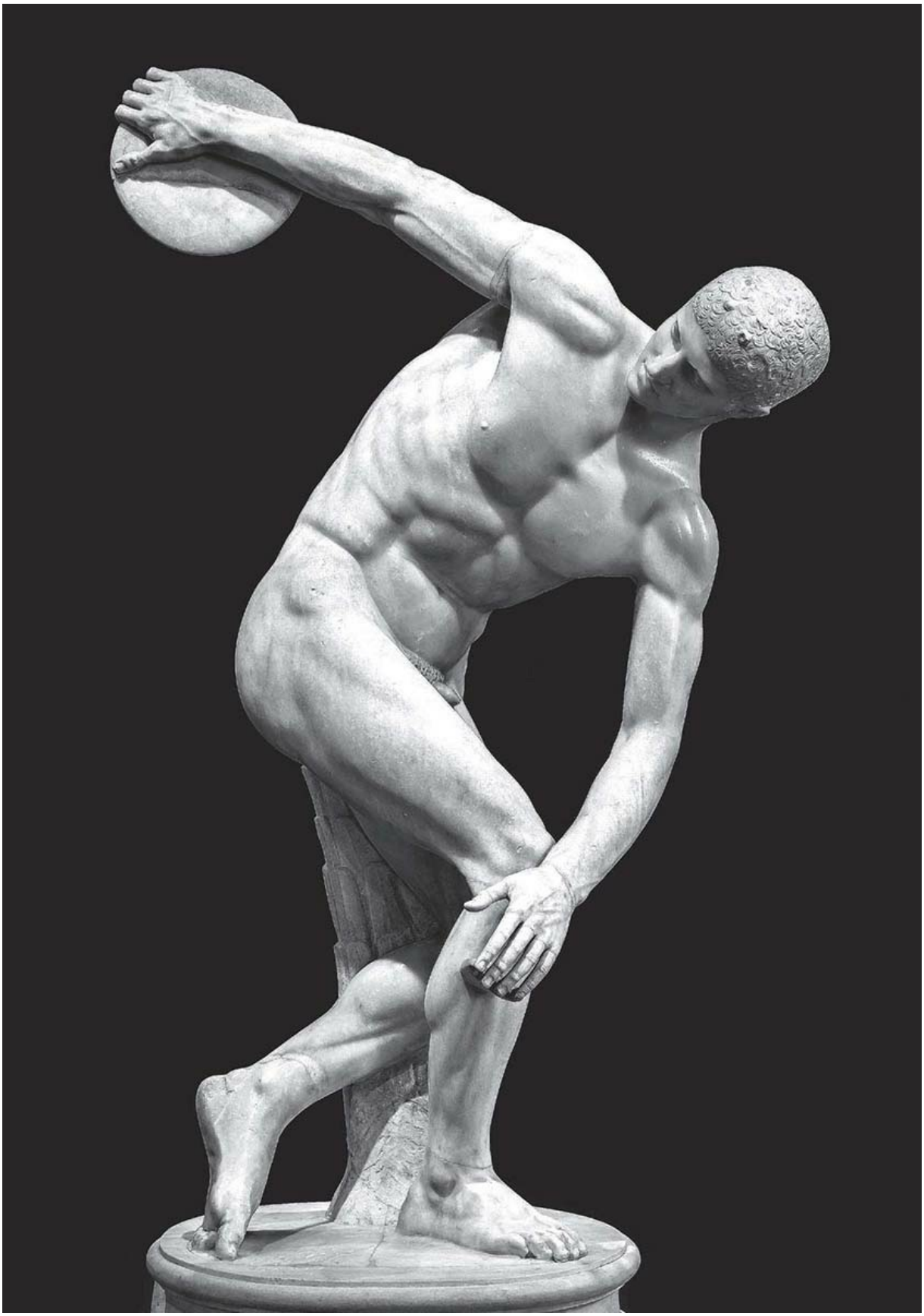
跳远、掷铁饼、标枪和摔跤在内的5个项目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项全能”赛作为运动会的压轴赛事，令观众为之痴狂。

其间，供奉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大神殿也建成完工。运动会开幕之日，全体参赛选手参拜神殿，并在神像前宣誓，保证比赛公平公正。后来，这一仪式被固定下来，成了惯例。

其间，比赛项目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多样化。希腊城邦国家的士兵通常指重装步兵，叫“hoplite”。他们头戴头盔，遮挡住半个头部，身佩胸甲，脚缠绑腿，手持长矛和圆形盾牌。这是上战场时的装束。他们就身着这样的装束参加比赛，在运动场跑上几圈。运动会的高潮是战车赛，战车由四匹马牵引。选手驾驭马匹一出现在赛场上，观众席立刻一片沸腾，全体观众齐刷刷地站立起来。

四马战车竞赛最早出现在奥林匹亚，是在公元前680年，即奥林匹克运动会迎来第25届的那一年。因为这一项目太受欢迎，所以后来作为固定的压轴项目，安排在运动会的最后进行。

选手驾驭四马战车出现在赛场上已然非常壮观，而战车还要绕运动场竞跑10圈。这是一项比拼技能和耐力的运动。在希腊城邦国家，男性到了30岁才被承认可以独当一面。因此，驾驭四马战车全力以赴参加比赛的大概是正值壮年的希腊男性吧。



运动会规定，参加比赛时，运动员必须赤身裸体。希腊人认为最美不过匀称的体形、壮硕的体格。他们相信只有健美的肉体才能拥有健全的灵魂。而奥林匹亚举办运动会的时间是7月至8月的盛夏季节，运动员即使全身赤裸，也不会受寒。应该说，希腊的夏季，气候宜人。

观看比赛的除了希腊人，还有外国人和奴隶。但是，没有女性观众。在希腊，男尊女卑的思想比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希腊人的创造力惊人，但耐力极差，差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奥林匹亚的运动会却被长期保留下来，并且每次都能信守公平原则。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希腊人需要这种形式的运动会。

在古希腊，有希腊人，却没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希腊是大大小小无数个城邦国家的总称，包括规模极小的国家，加起来有500个以上。因此，古代有雅典人、斯巴达人，却没有希腊国家的人。

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只有希腊人，在当时指的是：

一、说希腊语的人。

二、信仰希腊诸神的人。

诸神的世界

通过《希腊神话》，我们知道了希腊诸神。众神之王是宙斯，他是守护全希腊的神，住在希腊东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他一生气就会打雷，因此，闪电是他的象征。

宙斯的妻子是赫拉，她是家庭主妇的守护神。赫拉的嫉妒心很强，大概是因为她有一个到处拈花惹草、私生子无数的丈夫吧。这位女神的象征是孔雀和石榴。

女神雅典娜是宙斯的私生女。她是智慧女神，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守护神，其象征是猫头鹰和橄榄。

这位女神掌管的“智慧”，定义有点儿广。在荷马的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有英雄无数，而该女神最钟情，甚至不惜施以援手的是《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

女神最爱的既不是攻打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也不是勇猛果敢的美男子阿喀琉斯，而是用“木马计”结束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攻防战的功臣奥德修斯。可以说，女神雅典娜掌管的“智慧”包括“狡诈”，这位女神守护下的雅典人很清楚这一点。

男神阿波罗是宙斯的私生子。我们常常用美貌和年轻来形容他。他是阳光和音乐的守护神，其象征是月桂树和竖琴。因为他掌管的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快乐，因此希腊人对他无比崇拜，甚至在德尔斐建起了供奉他的神庙，人气之旺，尤胜奥林匹亚供奉宙斯的神庙。阿波罗神庙常有人前往拜祭，而不是4年一次。人们去神庙的目的除了祭拜，更多的是为了祈求神谕。如果你说去德尔斐，那就表示你是去聆听通过女祭司之

口赐予的神谕。

至于如何解读神谕，在那个时代，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我想，可能有点儿类似日本神社的签，全看女祭司如何为你解读。但是，大多数古希腊人都深信神谕，甚至连苏格拉底也会用“去德尔斐”来打发向他讨教但他无意回答的人。

男神阿波罗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阿耳忒弥斯，拉丁语叫“Diāna”（狄安娜），英语叫“Diana”（戴安娜）。这个女神和她的双胞胎兄弟不同。弟弟喜欢追求年轻姑娘，而她追赶的是活跃在森林中的野猪。她是狩猎女神，对男性毫无兴趣，弓箭是她的象征。阿耳忒弥斯守护贞洁，大概也是因为反感弟弟的行为举止吧。我觉得她很适合做女权主义者的守护神，只是在欧美，一神教一统天下，所以大概行不通。

众神之王宙斯的另一个私生女阿佛洛狄忒，拉丁语叫“Venues”，英语叫“Venus”（维纳斯）。这位女神在诸神中长得最漂亮，作为爱与美的女神而闻名。阿佛洛狄忒没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是因为她绝无仅有的女性身体本身就是象征。她的身边常有手持弓箭的丘比特相随。

继母赫拉很妒忌她的美丽，逼着她嫁给了长相丑陋的赫菲斯托斯为妻。赫菲斯托斯是赫拉与宙斯生的孩子。不用说，这对夫妻的关系极不和谐。阿佛洛狄忒整天在外面招蜂引蝶，只要她看上哪位男性，就命令丘比特射出爱情之箭，使那个男人成为自己的玩物。所以，女神的桃色事件层出不穷。

赫菲斯托斯几乎成了“绿帽子”的代名词，虽然他是一位稳重踏实的勤劳之神。他是冶炼商的守护神，教会了人类在冶炼金属时如何用火。他的象征是铁锤和长凳。

波塞冬是宙斯的弟弟，在英语中叫“Neptune”（尼普顿）。在兄弟之争中落败后，他离开奥林匹斯，住到了海里。也许是因为和哥哥宙斯

发生争执后带着怒气离开的，波塞冬的脾气很暴，动不动就发怒。只要他一生气，大海就会波涛翻滚。因此，水手少不了向他祈福，祈祷平安。此男神通常用壮年男子的形象来表现，其象征是三叉戟。一旦他挥舞起三叉戟，不仅可以搅起狂风暴雨，甚至还可能引发地震。或许，海啸也是波塞冬的杰作吧。

赫耳墨斯是宙斯的另一个私生子，英语中叫“Mercury”（墨丘利）。人们常用年轻男性的形象来表现他。他有一个特殊技能：走路速度极快。因此，很多时候他充当宙斯的信使。其象征是带羽翅的手杖。赫耳墨斯不仅是旅行者的守护者，也是商人的守护神。不知为何，他还是小偷的守护神。希腊人把商人和小偷一视同仁，很令人费解。但是，把诸神视为与人类一样，这就是希腊人的世界。

在希腊诸神的等级制度中，上述诸神加上战神阿瑞斯和守护家庭的女神赫斯提、得墨忒耳等构成了最高一层。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爱神厄洛斯属于第二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诸神构成了希腊的神话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神是古希腊人的信仰所在。

然而，如果你认为众神的世界没有纷争，那就大错特错了。围绕特洛伊的攻防战持续10年未决出胜负，就是因为互相对立的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波塞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雅典娜支持希腊联军，阿佛洛狄忒和波塞冬支持特洛伊。为此，每每惹得充当调解员的宙斯大动肝火，带来电闪雷鸣，降祸于人间。

特洛伊战争因为“木马”的出现而终结。但是，人类的现实世界却没有如此幸运，因为人类世界没有一个宙斯这样既权威又强大的调解员。几乎每年夏天，希腊都会战争频发。也许你会说，他们可以选择休战。但是，休战协议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撕毁。这就是希腊人。

他们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在奥林匹亚举办运动会。希腊人钟爱体育竞技，所以，只要规定在运动会期间休战，应该没有人会撕毁休战协

议。运动会开幕时，代表各城邦国家的运动员要在建于奥林匹亚的神殿内向宙斯的神像宣誓。要求他们起誓“我宣誓，保证堂堂正正地战斗”，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宣誓的对象不是别的神，正是充当诸神调解员的宙斯。宣誓仪式结束后，选手们全力以赴，投入深受人们喜爱的比赛之中。

运动会4年举办一次，包括7天的比赛时间，休战时间只有1个月。古希腊人不会因为你在战争中败北而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也不会因为敌视某个国家而联合抵制其参赛。就好像现代赛车比赛，一旦有安全车进入，所有参赛车辆都不得超车一样。昨日之前还在战场上针锋相对，今日随着赛期的到来，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大家暂时相安无事。

希腊人需要奥林匹克运动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偃旗息鼓坚持休战那么长时间。也许因为向宙斯发过誓，不能随意破坏誓言的想法支撑他们坚持了下来。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战争不断的古希腊人发明的、基于人性的“智慧”产物。

运动会的最后环节是冠军表彰仪式，月桂冠是冠军的标志。虽然月桂冠只是用希腊随处可见的月桂树枝叶编成，但是冠军是他所属城邦国家的骄傲。赢得月桂冠，一定会让城邦的全体公民欣喜若狂。冠军回国后，大概也无须再担心今后的生存问题了。到了用餐时间，无论走进谁家，他都会受到盛情的款待。去商店买面料做短衣，店主不仅免费赠送，还会因此深感荣幸，说这是自己店的店规，等等。即使只是一介普通士兵，只要成为冠军，也会载入古希腊人撰写的著作中，被称为××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届奥运会好像形容词似的，成为固定的修辞用语。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上夺冠，是他所属城邦国家的荣耀，是家乡全体父老乡亲的大喜事，举国为之欢欣鼓舞。比赛结果甚至可能改变战斗的结果。就好比因安全车进入而一度休战期间，曾经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冠而士气大振，重启战斗之后，他们可能一举扭转不利局势。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性正体现于

此。因此，他们就连计算年份也采用××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年的说法。

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始于公元前776年，终于公元393年，持续时间长达1169年。因每4年举行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举办了292届。

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接受洗礼之后，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不仅于公元394年终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其余宗教一律归为邪教。

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之所以为一神教，是因为它不承认其他宗教。对于基督徒狄奥多西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供奉的是邪教众神之首宙斯。因此，他绝不允许举行这样的活动。而且，早期的基督徒既不喜欢运动员赤身裸体，也不喜欢借体育运动的名义展开竞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在被废除之前的六百多年里，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已变得死气沉沉，没了生气。罗马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帝国之后，因为热爱希腊文明、敬仰希腊文明，给了雅典和斯巴达自由城邦的待遇。除了不能发动战争，他们享有所有国内自治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腊人留下了伟大的业绩。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安全车”的进入能够使频发的战争进入休战期。到了“Pax Romana”（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人们对运动会的热爱程度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是无战争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安全车”。此外，曾经代表城邦国家参赛的选手也变成以个人名义参加比赛了。尽管如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第一，崇尚匀称的身材、强壮的体格这一审美意识始终未变。

第二，不说希腊语的其他民族也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登上皇位之前，曾经驾驭四马战车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一举夺得冠军，戴上了月桂冠。这个时期，还有来自北非和中近东的选手参加运动会。因此，运动会期间的奥林匹亚，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听到希腊语。这时，拉丁语、腓尼基语等各种语言也会传进你的耳朵。此时的运动会变成了纯粹的体育技能竞赛大会。

向海外发展

通常，尚处于“未成年”期的住民共同体，无论是像希腊那样的“城邦国家”（polis），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国家”（Res publica），首先都应整顿充实内部。但是，希腊人却不然。

走进希腊，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小”，而且土地极度贫瘠，甚至连建造神庙也只是把随处可见的岩石从左侧搬到右侧而已。在希腊，可称为平原的地方只有中部的色萨利等地。

好在希腊冬天是雨季，夏天光照充足，非常适宜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绵羊和山羊仅靠岩石间长出来的草也能生存。不过，用作主食的小麦，产量想必一定很低。

村庄、城市紧贴狭窄的山谷而建，隔着陡峭的山峰，另一面就是别的城邦国家。除了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这些城邦国家之间总是纷争不断，或攻打别人或挨别人打。

我曾经穿越法国，从马赛前往多佛海峡。当时，有两点让我感受很深。一是在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时代，法国竟然如此富裕；二是在这个国家，理所当然早早实现中央集权。与法国相比，意大利的地势复杂得多。与意大利相比，希腊的地势更加复杂。

坐大巴车在山上绕行，到达海边时，视野豁然开阔，让人顿觉心旷神怡。爱琴海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这里岛屿遍布，波澜不惊。爱琴海在日语中译为“多岛海”，非常形象。如果像赫耳墨斯神那样穿上带羽翅的鞋，顺着一座座岛屿飞行的话，到达彼岸的小亚细亚似乎并非难事。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没有人会想到要修建陆地公路，人们只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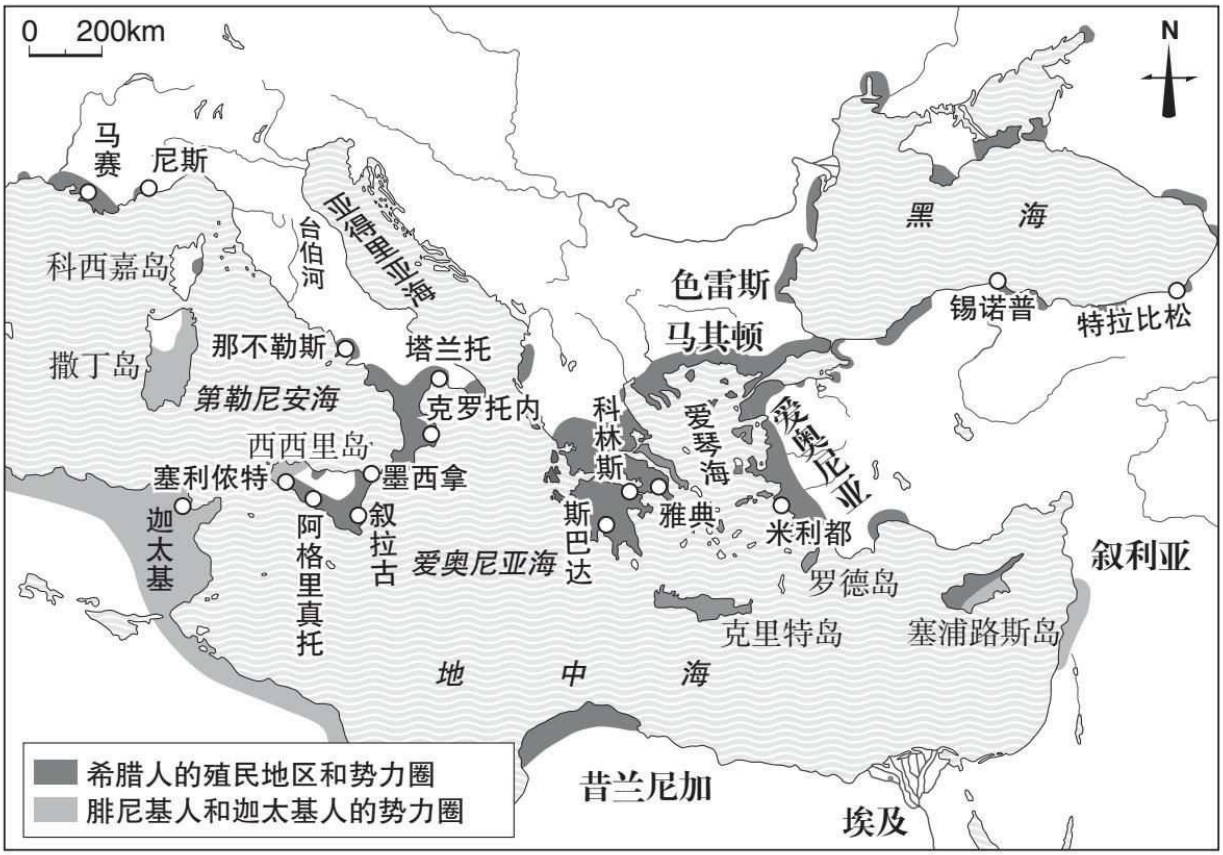
择坐船出行吧。

不管称作王政还是君主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它的优点是可以控制部族首领和豪族，防止他们割据一方。但是，希腊的地势不允许建立君主政体。群雄割据的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

希腊历史中，雅典和斯巴达这些城邦国家的时代叫“古典希腊”。在此之前叫“古代希腊”，也叫“希腊的中世”。所谓中世，是一个“即使没有开花也布满根茎”的时代，不提希腊史中的“中世”，就无法讲述其后的“古典希腊”。而希腊史中的“中世”最大的特点，就是向地中海各地开展殖民运动。

在地势狭窄的希腊，一方面各城邦之间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希腊人又特立独行，欠缺协调精神。只要其中一方不退让，事态就会难以收拾。没有陷入胶着的内战状态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这也并非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而是因为古代希腊尚未达到足够富裕的程度，不值得他们不惜一切困守家园。因此，犹如全民总动员一般，希腊人带着一家老小，纷纷开始向海外发展。

他们尽量避开已经建立起国家的地方，例如埃及，也不会选择尚无人类居住的地区。他们会赶走原住民或逼他们为奴，在当地从零开始，建设只为自己所用的城镇和港口。



希腊人的殖民地区

那不勒斯始于雅典人的殖民，塔兰托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国家，叙拉古是科林斯人殖民以后发展起来的……诸如此类，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殖民地，就可以看出他们在选择地理位置时有独到之处，令人不能不为之感叹。所有殖民地都面朝大海，背靠肥沃的土地。也就是说，殖民之后希腊人有了适合耕作的土地。其后，犹如宗家“分家”一般，殖民城市的数量有增无减。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希腊人殖民以后发展迅速，一时变得异常繁荣。和母国希腊相比，这里甚至享有了“大希腊”的称号。就知识领域的大事来说，毕达哥拉斯在这一地区开设学校，欧几里得在此发表学说，柏拉图来访此地，这里还出现了阿基米德。这些事件标志着这里的居民的知识层次在当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战事中，不如向海外拓展。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当然，因上述原因走向海外，使得这些殖民城市和母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甚至可以说极其疏远。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和社会阶层也和母国有所不同。例如，那不勒斯虽然始于雅典人的殖民，但是并没有像母国雅典那样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这也再次印证了希腊人的独立精神。

当然，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同样使用希腊语，同样信仰希腊诸神。因此，他们有资格参加奥林匹亚的运动会，而且也确实参加了比赛。

与这一切相比，更重要的是，因为殖民运动，希腊人的经济圈不再局限于爱琴海，而是扩大到了地中海全域。可以和希腊人相抗衡的，当时只有起始于腓尼基人殖民的迦太基。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最初在爱琴海对岸，也就是其后不久取名为爱奥尼亚地区的小亚细亚西岸。这里距离希腊较近，沿着爱琴海上的岛屿即可到达。紧接着，是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发展。这个时期叫第一次殖民运动时期。第一次殖民运动结束后，希腊人又开展了第二次殖民运动。第二次殖民运动是以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和雅典为首开展起来的，殖民对象从希腊北部直到黑海南部。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是第一次殖民运动的殖民地，它们迅速成长起来后，参加了第二次殖民运动。爱琴海正如其名，成了真正的“希腊人之海”。

斯巴达没有参加第二次殖民运动。它位于内陆地区，原本就缺少向海外发展的条件。因此，与雅典人的殖民城市数量众多相反，斯巴达人的殖民地只有塔兰托。当然，斯巴达有斯巴达特有的情况。我想，公元前8世纪末，希腊的“中世”接近尾声之时，他们似乎有意优先强化自身实力，即优先积蓄国家力量。

因此，在送走“古代希腊”，迎来“古典希腊”的这一时期，走在前面

的不是雅典，而是斯巴达。

第二章

纷纷建国

斯巴达——吕库古“宪法”

斯巴达不同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的地方是，它是来自北方的多利安民族入侵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斯巴达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后很长时间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泾渭分明。而其国内的等级制度又因吕库古实施的改革而稳如磐石、坚不可摧。

从奥林匹亚举办第一届运动会算起，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的时候，人们迎来了第15届运动会。这时，斯巴达出现了一位名叫吕库古（Licurgos）的男子。在这里我只能用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来表达，因为进入“古典希腊”之前，希腊尚处于传说中的世界。在依赖传说和代代口耳相传的时代，要获得准确的信息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某人出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或长相如何了。

此人不是国王，但是社会地位应该很高，其学识之渊博深得斯巴达人的尊敬。

大约过了中年不久，他开始周游列国。当然，他不是漫无目的地旅游，而是带着明确的目标进行考察。据说他游遍了东地中海的波浪能够冲刷到的所有地方，更别说当时的大国埃及了。回国后，他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法令。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吕库古改革”。

后世研究者中，很多人将吕库古改革称为“改革”（reform），而我认为应该用“宪法”（constitution）治国来表述更准确。

因为改革的前提是已有相关法律存在。但是，吕库古之前的斯巴达只有惯例，没有可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有雅典随后进行的“梭伦改革”，因此才取名为“吕库古改革”的吧。但是，梭伦的改革是“改革”，而吕库古的改革实质上是为斯巴达制定了“宪法”。吕库古的“改革”不仅明确了斯巴达的国体，还规定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

之后，斯巴达人开始频频使用“守法”一词，意思是遵守吕库古“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法律。

吕库古没有改变斯巴达特有的社会阶层。非但没有改，反而让这种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

城邦国家斯巴达有“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入侵斯巴达后定居于此的征服者，庇里阿西人指归顺或早早向入侵的斯巴达人投降但未能进入统治层的人，希洛人则属于最下层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地不同，分工明确。

斯巴达人——唯一享有公民权的群体。他们只负责军务。因为是城邦国家的公民，所以他们有权参与国政。所谓的“斯巴达公民”，指的就是他们。

庇里阿西人——生产、制造并向斯巴达人提供所需物资的群体。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无权参与国政。但是，作为主要战斗力斯巴达战士的辅助战斗力，他们有时也要上战场。他们被允许享有迁居和婚姻自由等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希洛人——他们不是奴隶，是斯巴达的农奴。除了务农和畜牧，他们还要纺织简单的布料。他们只有婚姻自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即使上战场，他们也只是作为斯巴达战士的仆从，负责照顾正统斯巴达人的生活起居，不能参加战斗。斯巴达军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开赴前线时，每个士兵都要带希洛人，最多可以带7个。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三个阶层，即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构成比例，据说是1：7：16。如果这一比例正确，那么，相对于很少超过1万人的斯巴达公民，庇里阿西人为7万人，希洛人则达到16万人。

在古代社会，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其首要职责是保护国家安全。因此，统计公民人数时，通常不包括女性和未成年人。上面提到20岁以上的斯巴达公民人数近1万人，我们假设这一数字是真实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人口数量是否仅指成年男子，尚无人给出明确答案，因为他们从事的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女性和儿童大多可以胜任。所以我想7万人和16万人这两个数字中或许包括了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数量。

尽管如此，1：7：16这一人口比例，对统治者斯巴达公民来说，一定有不小的压力。也许严格划分居住区域就是减轻这种压力的一个手段吧。

居住在斯巴达城区的只有斯巴达人。希洛人的居住区域在城市外围的农耕地带，而庇里阿西人居住在农耕地带之外的各城镇中。

希洛人居住在斯巴达城的外侧，不是因为与庇里阿西人相比，斯巴达人更信任希洛人。相反，斯巴达人把希洛人当作假想敌，让他们毗邻城邦国家斯巴达而居，是为了防止他们勾结其他国家的住民，合谋图反。

后来，雅典市区的人口曾经达到10万人。但是，和雅典势均力敌的强国斯巴达城区人口只有3万左右。因为除了斯巴达公民和他们的亲属，他们讨厌不相关的人住到城内。作为军事强国，斯巴达声名显赫。但是，他们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认为要防御外敌，必须从提防内部敌人开始。

斯巴达有5个监察官，叫“ephoros”。当地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在这5个监察官的监督下接受体能测试。只有身体健全的婴儿才能通过检

测，被当作斯巴达人培养。他们认为，只有身体健全的孩子才可以被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斯巴达战士，一个不会给斯巴达人丢脸的人。如果婴儿有残疾，马上就会遭淘汰。轻度残疾的婴儿被降为庇里阿西人或希洛人。如果是重度残障，则直接扔下悬崖，活活摔死。

通过体能测试的婴儿由母亲抚养至7岁，之后开始过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除了学习简单的文化知识以外，他们每天都要进行体能锻炼，学习武艺。

所谓的宿舍只是简易的帐篷，仅用来睡觉。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垫子，在中间塞一些干草，直接铺在地面上。这就是他们的床。他们没有餐厅，吃饭时端着铁盆直接坐在地上吃。铁盆里装的是用肉块和蔬菜熬成的汤，由仆从希洛人从咕嘟咕嘟冒着泡的锅中舀出。

这种汤黑乎乎的，很浑浊。漂浮在上面的肉块硬邦邦的，没有味道。就连斯巴达人自己也承认这种食物难吃至极。这就是著名的“斯巴达大杂烩”。但是，要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追求美食？孩子们的主食是黑面包，同样难吃，坚硬如石。饮料只有水。

吕库古认为，只有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经受无异于实战的严酷训练、接受劣质食物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斯巴达战士。

吕库古的“宪法”还规定，从7岁开始到20岁结束的未成年期完结时，孩子们必须接受“达标仪式”的考验。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孩子到了20岁就要半裸身体，仅持弓箭、剑、矛和盾走进山林原野，凭自己的本事在那里待上7天。没有食物，他们就靠偷窃希洛人的家畜或抓捕野猪等为食。在斯巴达，偷盗希洛人的东西无罪。至于睡觉，只能自己想办法。如果出生在冬季，20岁时接受这一考验应该相当严酷吧。

满7天后，年轻人才能回到住处。可以说，他们经历的“达标仪式”已经超出了人类极限。然而，在斯巴达人的意识中，从来没有人类极限这种概念。

年轻人结束7天的山野生活回到住处时，必须带回一个希洛人的脑袋，以此证明他成功突袭了希洛人。只有完成了这一切，斯巴达男人才能真正进入成年人的行列。

然而，即使已经成年，在30岁以前他们依然要过集体生活，和之前完全一样。过了30岁他们才可以拥有集体宿舍之外的私宅，才可以娶妻生子，过家庭生活。不过一到晚上，他们还是要回宿舍睡觉。

在斯巴达，现役年龄从20岁到60岁。因此，斯巴达男人的大半生是在集体生活中度过的，这里只有男性。

在斯巴达，肌肉发达、体格健硕的女性最受欢迎，原因是她们可以生育健全的孩子。性情温和、身体柔弱的“女性”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斯巴达王妃海伦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海伦就是个绝世美女。尽管这是遥远的往事，到吕库古改革时已过去了五百多年。

因为集体生活中只有男性，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男人们难免会产生互相爱慕的念头。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相比，斯巴达人的同性恋倾向尤其严重。

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孩子刚满7岁就要离开父母身边，来到一个陌生的集体里，从人性上说，他一定会对周边的人产生依赖心理。而身边的人很多，一个个都比自己年长，见多识广。

据说监察官常常光顾宿舍。他们总要来检查是否有事情发生，否则寝食难安。监察官担心的不是这种肉体关系会让斯巴达男人变得软弱，

而是担心一旦这种性取向成为主流，必定造成人口锐减。

因为斯巴达人从小开始锻炼，所以你可能以为他们一定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独占月桂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保留下来的公元前5世纪的史料中，半个世纪的奥运会冠军名单里，斯巴达人只有一个。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4年一届的运动会上，尽管参赛选手代表城邦国家，但是说到底，比的终究是个人的能力。

斯巴达人个体足够强大，一旦集体作战，他们的强大即以几何级数增加。只要有同伴在，他们可以变得无比强悍。斯巴达重装步兵团被认为是希腊最强的军队，就是因为他们是集体作战。

如果把他们的强大归因于士兵的同性之爱，大概有失偏颇，因为这两者毫无关系。斯巴达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 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
>
> 在战场上，不胜即死。

关于吕库古改革以后的斯巴达，后世的评价是："一个建立在武器之上的国家"。也许吕库古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冠。

像这样培养起来的"斯巴达式"战士，只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那就是留长发。他们的同性恋取向是被默许的，当然也不能太过分。但是，留长发是得到正式许可的。头发可以长过肩，人们可以自由决定编多少条辫子。至于允许士兵留长发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留长发的目的是固定沉重的头盔。但是，雅典的重装步兵同样佩戴沉重的头盔，他们的头发明显比斯巴达人短很多。而且，后来的罗马军团也证实，短发更适合将头盔固定在脖子上。因此，斯巴达战士留长发

应该不是出于实用。有一个现象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战斗失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最后做的事情竟然是整理头发。

斯巴达人毕竟不是机器，他们是人。也就是说，他们也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缺点。对此，吕库古当然了然于心。

斯巴达的流通货币是铁币。此时的希腊早已开始流通银币，而斯巴达却逆潮流而行，规定只能使用铁制的货币。

长发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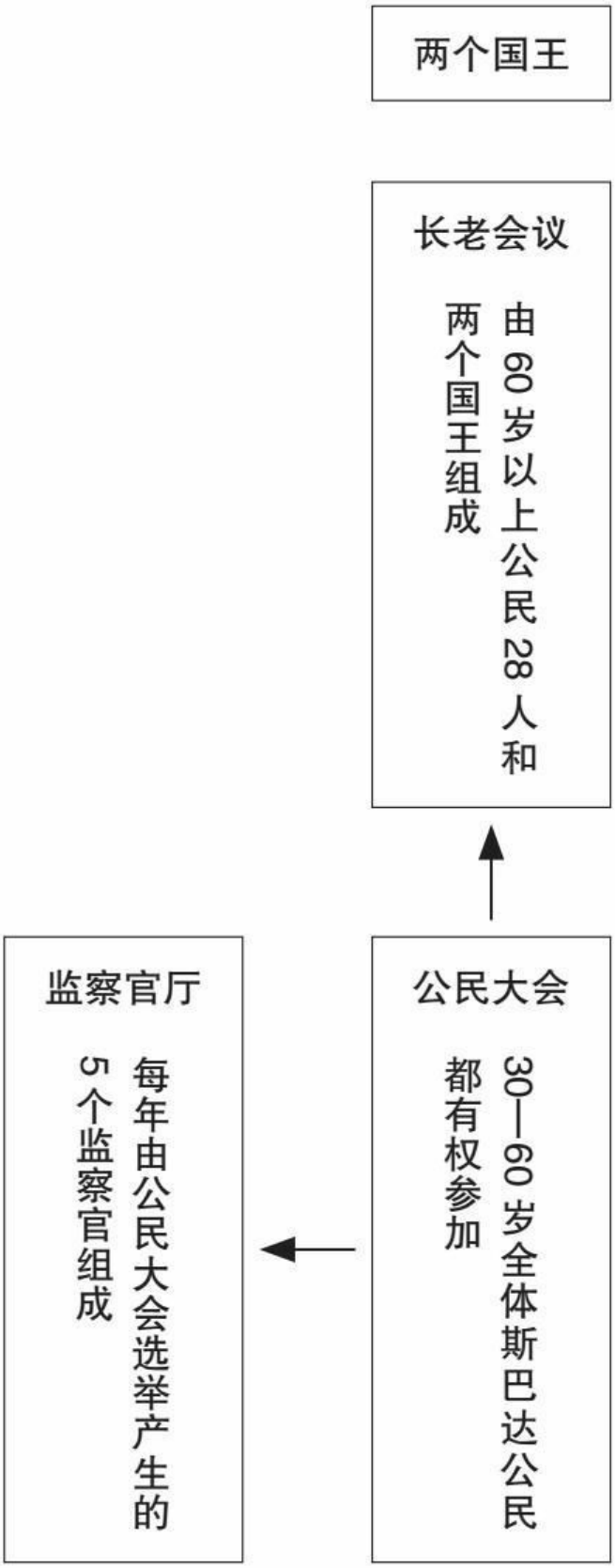
重装步兵

铁币自然不受其他国家商人的欢迎。这样一来，国外的商品就不会流入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斯巴达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满足人们的最低需要。斯巴达人的格言是质朴刚健。对于这样的斯巴达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有来自外国的物品。

事实上，斯巴达公民并不富裕。在斯巴达，希洛人介于奴隶和佃农之间，翻译成日语，不知道用“农奴”好还是“隶农”好。总之，他们向主人——斯巴达人缴纳的“租费”是收成的二分之一。可见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剥削并不厉害。一方面，他们或许是担心过度榨取会引起希洛人不满，导致暴动不断；另一方面，按照斯巴达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鉴于这种情况，原本质朴的斯巴达人失去了储蓄的兴趣。不管生活水平多低，毕竟大家都一样。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里，没有妒忌，也没有羡慕。斯巴达甚至没有小偷，也没有权力之争，而在雅典，对权力的争夺犹如家常便饭。这种状况使斯巴达人的社会维持了长期的稳定。究其原因，当然是他们制造了“斯巴达式”的社会，也就是封闭的社会。

吕库古制定的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政体，从形式上看很简单，图示如下：


两个国王
长老会议
由60岁以上公民28人和两个国王组成
公民大会
30—60岁全体斯巴达公民都有权参加
监察官厅
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组成

国王（BASILEIS）——斯巴达有两个自建国以来延续下来的王族，这两大名门各选出一人为国王，任期为终身。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尊敬，在正式活动中常常入座贵宾席。

两位国王的任务只是领兵打仗。他们率领斯巴达人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团战斗。之所以有两位国王，大概是为了一旦其中一位战死疆场，立即就有人顶替指挥吧。

两位国王的权限仅限于军事方面，他们几乎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长老会议（GHERUSIA）——斯巴达人的年龄到60岁以上意味着已经退役，这是由28个60岁以上公民和两个国王共30人组成的机构。两个国王只要没上战场，就兼任长老会议的议长。因为吕库古的本意是军政分离，所以可以想象，他原本的设想很可能是让长老会议负责包括内政和外交在内的政治。按现代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个机构相当于“上议院”。

公民大会（APELLA）——由30—60岁全体公民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下议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不会出现热烈讨论的场面，表决也不采用投票或举手的方式，只能听到与会者喊出“哦”的声音。声音高亢，就表示通过。无论什么议题，也不管是否决定开战，都采用这样的表决方式。

斯巴达位于拉科尼亚地区。将“Laconia”（拉科尼亚）一词用作形容词，它所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斯巴达人，还有“沉默寡言之人”的意思，因为能说会道不是斯巴达男人的特点。为此，他们还受到同时代雅典人的嘲讽，说他们没有思想所以无话可说。即使到了现代，欧洲人对沉默寡言的解释，依然主要采用雅典人的说法，而不解释为“沉默是金”。

监督官厅（EPHOROI）——由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构成。

这是斯巴达特有的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植根于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有必要实施监察与监督。

监察与监督机构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其他机构相比，该机构更有可能成为“吕库古宪法”的短板。

此时，希腊尚处于“古代希腊”时代，确立国体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吕库古体制是铜墙铁壁。

不仅如此，吕库古在掌控民众方面也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他广而告之，说他的“宪法”不是他一个凡人臆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神谕制定的。因为他一次次去德尔斐，不停地向神祈求，最后得到了神谕。希腊人笃信神谕，其中以斯巴达人为最。

待斯巴达人完全接受了“宪法”之后，吕库古又采取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个举动犹如画龙点睛之笔。

吕库古告诉斯巴达全体公民：“我要出一趟远门。我要大家发誓，在我回来之前，绝不改动已经定下来的规矩。”

不用说，所有人都发了誓。接着，吕库古离开了斯巴达。吕库古的“宪法”此时好像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好评。所以，他所到之处的各国国王纷纷向他取经，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和忠告。对他来说，这次海外之旅是忙碌的。他忙着解答问题，应该比前一次愉快许多。这一次，吕库古没有回斯巴达，他最后客死他乡，连遗骸也不让他人送回祖国。

因为他的决绝，吕库古“宪法”变成了“宗教”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可以随时代的变迁进行修正，而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更改了。一想到这正是护宪主义的极致，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脱离“古代希腊”，进入“古典希腊”。曾经牢不可破的吕库古体制开始显现它的弊端。

国王——出身于两个王族、有资格登上王位的男性，按照王位继承顺序最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可免除7岁开始的集体生活，也免除20岁时要经历的那个极不人性的“达标仪式”。这是吕库古“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本身并无问题。

免除集体生活，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的影响，这是长期的集体生活灌输给斯巴达男人的思想。它还意味着他们比其他斯巴达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然而，国王只有军事指挥权、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状态并无改变。

起初，国王对此并无怨言，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王族的男性获得的知识不断积淀，他们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国王同时也是国家政体的领导者，而只有斯巴达不是。

长老会议——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机构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原因是在战事频繁的斯巴达，能够活过退役年龄，即活过60岁的人少之又少。幸存者无法担负起国家政事这一重任。

公民大会——这是所有公民有权参加并决定国家政事的机构。但是在斯巴达，公民就是士兵，他们只知道服从二字。这些受到雅典人嘲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们，没有能力担负起立法机关的重任。

监督官厅——结果，这个由5个监察官构成的机构成了“内阁”。把它叫作官厅，是因为5人之下还有一个叫执行官的男性群体。

监察官到青少年的训练现场监督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是否在默许的范围内，这样做尚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还干涉国王的婚姻。国王没有子嗣，他们就要求他离婚另娶。如果国王拒绝，监察官则强行要求其

纳妾。

与国王一起上前线时，监察官会逼问国王为何不开战。一旦开战，监察官又会不顾策略，一味要求把敌人杀得一个不剩。这就是监察官。他们深信，监督国王的行为举止、修正国王的战略战术是他们的职责。

倘若有其他城邦国家的使节来到斯巴达，出现在谈判桌上的也是5个监察官。在雅典，将军相当于大臣。即使雅典政府派来的使节只有一个将军，他的谈判对象也是5个监察官，而不是国王。“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一词的词源，将军们不仅担纲政治，同时也是军队的司令官。因为在雅典，政治和军事都是国家政事。而在斯巴达，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属于监察官的职责范围。

斯巴达的监察官是在公民大会上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任期只有1年。所以，每年都要换人。而且，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斯巴达，一个人如果不是长老会议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尚未退役，还是现役士兵。由于他们长期过集体生活，又承受着严格的现役的约束，因此无论在意识上还是时间上，他们都无法独立思考，缺乏做独立判断的能力。

服从是双向的，一方要求服从，一方愿意服从，立场不同。率领几千名重装步兵的人和重装步兵中的一员，他们的立场不同，思考的问题、要决定的事情的复杂程度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完全不同。公民大会由现役重装步兵构成，而5个监察官就从他们之中产生。

只要稍加留意斯巴达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不仅做决定时优柔寡断，甚至将决定了的事情付诸行动时，也是慢条斯理的。

而且，国王和监察官之间常常发生对立。

当然，监察官履行他们的职责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斯巴达，由

于监察官每年都要换人，因此他们又叫“无面5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忠实信徒，是坚持贯彻吕库古“宪法”的正义之士。一旦有违背“宪法”的行为出现，他们有权加以制止，以杜绝一切违宪行为。但是，斯巴达的监察官似乎没有机会行使这种权力。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吕库古“宪法”早已成为一种信仰。因此，当国王与打着维护宪法旗号的监察官发生冲突时，最后让步的总是国王。假如国王坚持己见，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监察官的护宪行为容易给人假公济私的错觉。应该说，像监察官那样自以为肩负着纠正社会一切不正之风的人，更容易盲目自大、一意孤行。

然而，斯巴达战士是强大的。尽管早已破绽百出，但是吕库古“宪法”依然至高无上，原因就在于斯巴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有一个习惯，脑子里一有想法，即使不在书桌旁也会随手记录下来。但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想法，我从来不会照搬进我的作品中。唯独这一次，我很想把我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笔记介绍给读者朋友。我想，“如果能有所帮助，实乃我的荣幸”。

斯巴达监察官	——×——	斯巴达国王
中世纪罗马教皇代理	——×——	率领十字军的司令官
伊斯兰教的哈里发	——×——	伊斯兰世界的苏丹
中世基督教世界的异端审判官	——×——	皇帝腓特烈二世和其后的伽利略·伽利莱

雅典——梭伦改革

雅典比斯巴达晚一个多世纪才开始实施名为“改革”的国体改造。什么原因呢？理由有两个：

一、在这一个多世纪里，雅典人热衷于向海外开展殖民运动。

二、雅典已有贵族政体存在，只是寡头政体不再适合雅典，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存在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

前面介绍了斯巴达，下面就来介绍雅典。首先，我想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做比喻，来说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不同。

斯巴达：吕库古的个人赛跑，自始至终他一个人独自往前跑。

雅典：参加的是接力赛，由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5人团队完成。

当一种法律成为宗教，人类就不会允许对其进行修改。但是，如果法律始终是法律，则人们可以随时对其进行修改。

公元前638年生于雅典的梭伦出身名门，当时叫贵族。虽然血统高贵，但是其财力却只属于“中产”。原因大概在于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我想很可能他借出去的钱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来吧。当梭伦继承家业的时候，家里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于是，年轻的梭伦决定去海外闯荡。当然，说是去海外，并非移民，只是奔走于海外各地，一门心思地做生意挣钱。

吕库古在“改革”之前也遍访各国。他旅行的目的是调查和考察，以

便回国后着手进行改革。梭伦和吕库古一样，足迹踏遍各国，但他只是为了做生意。当时的梭伦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改革者。

40岁时，梭伦回到祖国雅典。他好像很有经商才能，此时的资产已经达到上流水平。不知为何，除了斯巴达人，希腊人大多擅长经商。梭伦的好友、哲学家泰勒斯也在某一年预计第二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早早备好榨油机器，狠狠地赚了一笔钱。梭伦觉得通过经商使家产置身上流水平已经足够，而泰勒斯也没有再进行此类投机。大概两人都很自律吧。

梭伦回到国内，发现在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梭伦出身前者，但是贵族气并不浓，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没有加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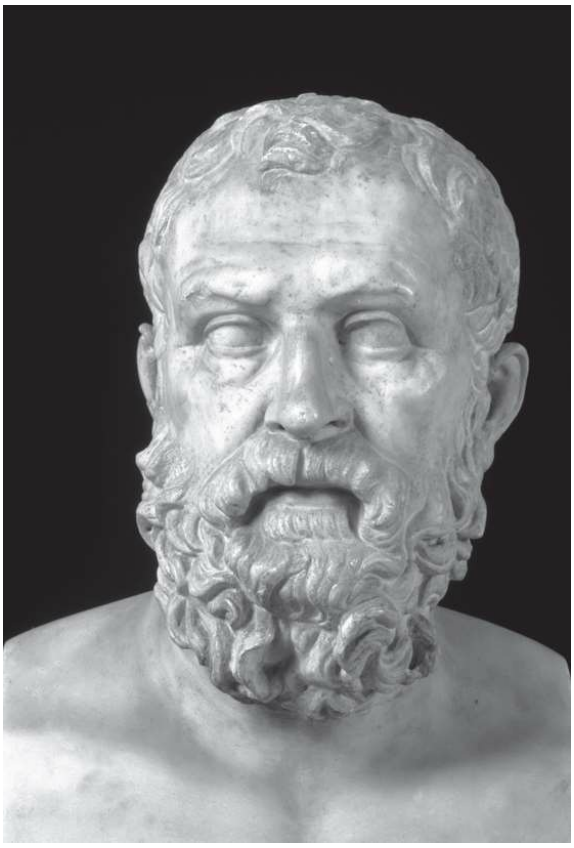
贵族阶层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消除阶层之间的对立，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危机感，而是因为贵族有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认识到了消除对立的必要性。他们开始注意梭伦，因为梭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公元前594年，44岁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一年。执政官每年选出9人，这9人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内阁。作为内阁成员，执政官有提议法案的权力。有资格参选这一公职的只有贵族，因此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很容易选出自己派系中的人。也就是说，梭伦是经既得利益者推荐当上执政官的，是贵族们推选了他，给了他实施改革的职位。

梭伦似乎很有政治才能。他首先针对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进行立法，然后再实施全面改革。这是一种冲击疗法。毕竟任期只有1年，他不能保证自己会再次当选。

由梭伦提出、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如下：

废除以往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用身体偿还、债务人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的法律。



梭伦

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大会由贵族和平民构成。在那个时代，平民没有资格担任国家要职，但是他们有选举权，而且人数占大多数。

因为这一法律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贵族很可能并不满意。但是，既然意识到有必要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视野自然更长远更宽广。于是，梭伦改革稳健地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梭伦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呢？

按现代的说法，梭伦的这一法案不是为了帮助债主（银行），而是旨在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

古代历史学家说到梭伦出身名门却财力不济的原因，只说是他父亲同情弱者，对于上门求助的人来者不拒，慷慨施援。因此我推测，他父亲借出去的钱大多没有收回来。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但却有据可依。

首先，如果梭伦的父亲忠于以前的法律，让债务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并出售他们，梭伦家的资产绝不可能日渐减少。

其次，如果父亲死后继承家业的梭伦一改父亲温和的做法，和大多

数贵族一样把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收为奴隶并出售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跑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年轻的梭伦选择闯荡海外，通过经商来增加自己的资产。

不管怎样，梭伦提出并成功确立的这条法律，在古代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站在人性的角度看，这是破天荒的一项举措。从活跃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律。

说到借款，人们往往认为那是因为穷得吃不上饭，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借款还有前期投资的意思。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前期投资。

前期投资往往伴随着风险。例如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货船遭遇暴风雨沉入海底，商品进口国和雅典爆发战争，使商品只能闲置于仓库等，各种风险都有可能出现。

无力偿还为前期投资所借的钱款时，不仅借款人要成为债主的奴隶，就连其家人也不能幸免。如果家人被分别卖到不同的主人家，以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有这样的风险，谁还愿意通过前期投资来增加财富呢？

结果必定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会借款进行前期投资，因为只有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依然有偿还能力。于是，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也将因此产生动荡。

接着，梭伦又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借款的方法。

他没有提出有人欢喜有人恨的方案，即借款一笔勾销的方案。他的方案自始至终没有提“借款”两字，他提出的是降低货币的价值。

雅典的流通货币是银币，重量单位为“米娜”。改革前，1米娜的价值为73德拉克马，改革后，变成100德拉克马。不用说，这是使货币贬值的做法。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减轻四分之一。

公民大会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投票。人口占多数的平民自然投了赞成票，就连富人也有不少投了赞成票。因为对于无力偿还借款的人，不能逼其为奴的法律已经实施，所以，富人担心债务人因此不愿还钱。他们宁愿选择牺牲四分之一的债权，从而保证债务人还款的可能性。

这一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是那些其他城邦国家的说希腊语的人，得知德拉克马银币贬值后，对移居雅典经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对此，梭伦很快做出反应。他对这些人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欢迎他们来到雅典。但是，他们不享有雅典本国公民的权利。

首先，无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久，都不会被授予公民权，因此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

其次，国家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住宅和办公楼。外国人只能向雅典公民租赁。

最后，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在雅典得到了利益，所以他们有保护雅典安全的义务。雅典公民不会允许他们只在雅典获取利益而没有付出。

话虽如此，组建正规军是雅典公民的义务。住在城邦国家雅典的外国人只是危急时刻被临时征集的后备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后方支援。

移居雅典的外国人，可以期待得到相应的利益。

当然，“利益”不只是物质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例如得到他人的认可、容易找到工作等。对于这种无形利益，人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

梭伦的好友泰勒斯是希腊哲学第一人，他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后来的小亚细亚西岸），一生从未离开过此地。尽管希腊哲学第一人在爱奥尼亚地区，但是后来，包括哲学在内的希腊文明中心从爱奥尼亚转移到了雅典。梭伦的治国理念也充分显示出雅典是文明文化的中心。

3年后的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执政官。也许就在这一年，梭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政体改革。

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这3年他一定没有虚度，因为梭伦的政体改革需要以人口普查为前提。这项改革是“财权政治”改革，在日语中曾经翻译为“金权政治”，意思是根据所持资产的多少，按比例确定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梭伦首先将所有雅典公民，也就是全体成年男性，分成四个等级。划分方法与出身家族、社会地位和名声无关，唯一的依据是收入的多少。

当时，雅典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收入按照农作物的收成来计算。基准单位是“斗”，1斗小麦相当于52升。

第一等级——可收获500斗（约200吨）以上小麦或相当于这一数量的橄榄油、葡萄酒的土地所有者。在当时的雅典，这一等级属于超级富豪，人数自然不多。

第二等级——可收获300到500斗小麦的土地所有者。

第三等级——可以获200到300斗小麦的人。

第四等级——农作物收成在200斗以下的公民。在罗马，这个等级属于无资产者，叫“proletarian”。他们是需要每天通过劳动来赚取口粮的公民。

划分等级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因为古代采用的是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兵役相当于直接税，叫“血税”。可以认为，对于公民来说，如果他们的权利是参与国政，那么他们的义务就是保卫国家。

因此，四个等级的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雅典也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在军队中担任骑兵。作为骑兵，其装备不只是一匹马，还要带仆从、马夫等，负担很重。因此，也只有资产较多的富裕阶层才能担任。正因如此，骑兵人数极少。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的人口最多，但是其现役骑兵也只有1000人左右。

第三等级的公民人数最多。他们的兵役义务是担任重装步兵。装备中，矛和盾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头盔、胸甲、护腿、剑以及其他装备由个人配备。因此，需要具备中产阶层的实力。

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战时担任轻装步兵。海战时，他们担任船只的操舵手或桨手。这是他们的义务。100年后，战争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等级的价值因此急剧提高。但是，在梭伦时代，他们还属于最底层的公民。

可以想象，着手此次改革之前，梭伦一定提出过进行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开历史之先河，其目的是调查可能从军的人数，因此，“数”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点。在雅典，骑兵数在1000人左右，重装步兵超过1万人。这意味着，相对于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的总数，相当于中产阶级的第三等级公民人数在其10倍以上。

但是，第三等级公民的身份是平民，在梭伦改革前，他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梭伦进行政体改革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我将梭伦的改革结果列成了图表，如下所示，箭头表示参选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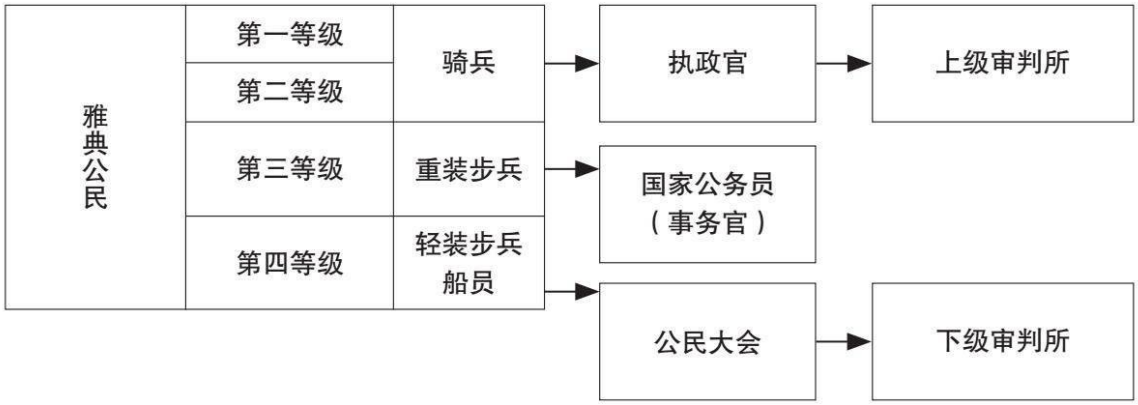
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随后，他又开始游历各国。当然，他选择自我放逐并非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暗杀，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将付诸东流。

梭伦改革以前，贵族政治时代的雅典政体

执 政 官：任期 1 年，由 9 个执政官组成
审　　判：由当选过执政官的人组成
公民大会：全体公民享有选举权，但仅限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

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 594 年—公元前 508 年）



上级审判所：由当选过执政官的人组成
下级审判所：从四大部落中各选 100 人，合计 400 人组成
公 民 大 会：没有被选举权

出国时，他没有要求雅典全体公民发誓，在自己回国之前绝不修改业已完成的改革内容。因为他知道雅典人的批判精神极其旺盛，从不甘落后于人。如果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出发前，他明确宣布了自我放逐的期限。他说：“10年后，我一定会回来。”10年后，他真的回去了。因此，他的人生是在雅典结束的，坟墓也在雅典。

在斯巴达，吕库古将自己的改革变成了“宗教”；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始终只是基于法律的“政治”。

接下来，我将介绍雅典的教育和兵役。这不是梭伦制定的规定，而

是梭伦改革完成以后，在雅典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只是在雅典，无论教育还是训练士兵，其方法和指导思想都与斯巴达截然不同。

首先，雅典不会对刚出生的婴儿进行筛选，也不要求孩子一到7岁就离开父母身边过集体生活。雅典的少年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到了7岁，他们要去学校开始学习。学校相当于现在的私塾。上午，他们在学校学习读写、珠算。

随着年级的升高，课程中逐渐增加了诗文朗读和背诵。雅典人重视学习，是为了培养孩子们表达思想的能力，他们要在增长学问、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会用文人擅长的语言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教科书选用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使在现代，它们依然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在背诵诗歌的时候，一定把自己当作英雄阿喀琉斯或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了吧。

在雅典，学习演奏鲁特琴，合着音乐节拍跳舞也是学校设置的重要科目。据说，学习这些科目是为了锻炼协调能力。

孩子满12岁以后，雅典政府不强制但是会鼓励孩子们下午去体育学校（Palestra）。体育学校这类机构不是国营而是私营，其运营费用依赖家长交来的学费。当然，既然国家鼓励，学费自然不贵。理论上，体育学校向全体公民子弟开放。只是，第四等级的公民的孩子需要帮父母干活，所以无法每天都去。第三等级及以上的公民子弟下午去体育学校是每天的惯例。

希腊人爱好体能锻炼，所以，即使是非强制性的，父母也愿意送孩子去体育学校。当然，孩子自己也很愿意去。

罗马时代乃至从罗马时代至今，依然有“Palestra”。这类机构大多不是孩子专用的，成年人也可以使用。因此，它变成了不分年龄大小的公民交际的场所。

在体育学校，所有人必须全裸或半裸进行肌肉锻炼。希腊雕塑因为艺术上的需要才用裸体来表现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结果论。只有反映真实状态的作品才可成为“艺术”。

雅典也有同性恋。雅典人从不试图掩饰这种关系。希腊人追求真善美的世界。美既是善，同时也是真。当然雅典人无须担心这种性取向会影响人口增长，因为雅典不同于斯巴达。斯巴达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仅有男性的集体生活中度过，而雅典人并没有严格要求禁欲。当然，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方面，雅典和斯巴达完全一样，因此为了培养合格的士兵，训练必不可少。

在雅典，18岁就算成人了。斯巴达有进入成人行列的“达标仪式”，而雅典没有。刚成年的年轻人只需去居住地官厅做士兵登记，回家后接受家人的祝福即可。在随后的一年里，不同等级的年轻人要在不同教官的指导下，分别接受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的训练。以人数最多的重装步兵为例，他们的武器是矛和盾。圆形的盾直径达1米，至于长矛，是身高的两倍。如果不能熟练使用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就无法施展本领。因此，训练并不容易。

单人训练结束后，接下来是编队训练。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只有集体发起进攻，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教官的指导也更加严格。

相当于“实习期”的训练期为两年。第二年，这些年轻人要去分布于国境线上的各个基地接受训练。属于第四阶级的年轻人和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也要前往各基地接受训练。雅典是统治阿提卡地区的城邦国家，因此，驻扎在该地区各处的要塞守卫边境，是公民的重要任务。

结束两年的实习期后，年轻人才能成为正式士兵。实习期结束后，国家配给盾和长矛，他们可以带回家，目的是一旦有征召令，即可赶赴集结地。所以，盾和矛放在士兵家中成了惯例。

无论骑兵还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现役年龄都是20岁到50岁。过了50岁就转为“预备役”。18岁到20岁的实习期人员和50岁以后的预备役人员，只在现役士兵全部出征或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才会征召。

当然，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普通士兵，并不适用于指挥官。能力的积累和年龄的限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这样，在和平时期，雅典士兵只是普通公民，而斯巴达人一生都是士兵。这也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不同之处。

关于斯巴达和雅典的军事力量，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的数量对比大体如下所示，即使加入了时代变迁的因素依然如此。

斯巴达：5000到8000千人。

雅典：8000到1万人。

位居这两个大国之后的是科林斯和底比斯，当然，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古代希腊城邦国家中，卓越不凡的只有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国家。而规划这两大城邦国家发展方向的分别是斯巴达的吕库古，和在雅典紧随其后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梭伦，以及之后接力团队中的其他4人。

雅典——庇西特拉图时代

公元前580年，梭伦结束10年的自我放逐回到国内，他看到的雅典出乎他的预期。

雅典政体维持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所以不是改革本身出了问题。他希望通过改革彻底消除雅典内部的对立，这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原因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国土状况。阿提卡地区是雅典的领土，可粗分为四部分：首都雅典、雅典背后开阔的平原地区、沿海地区和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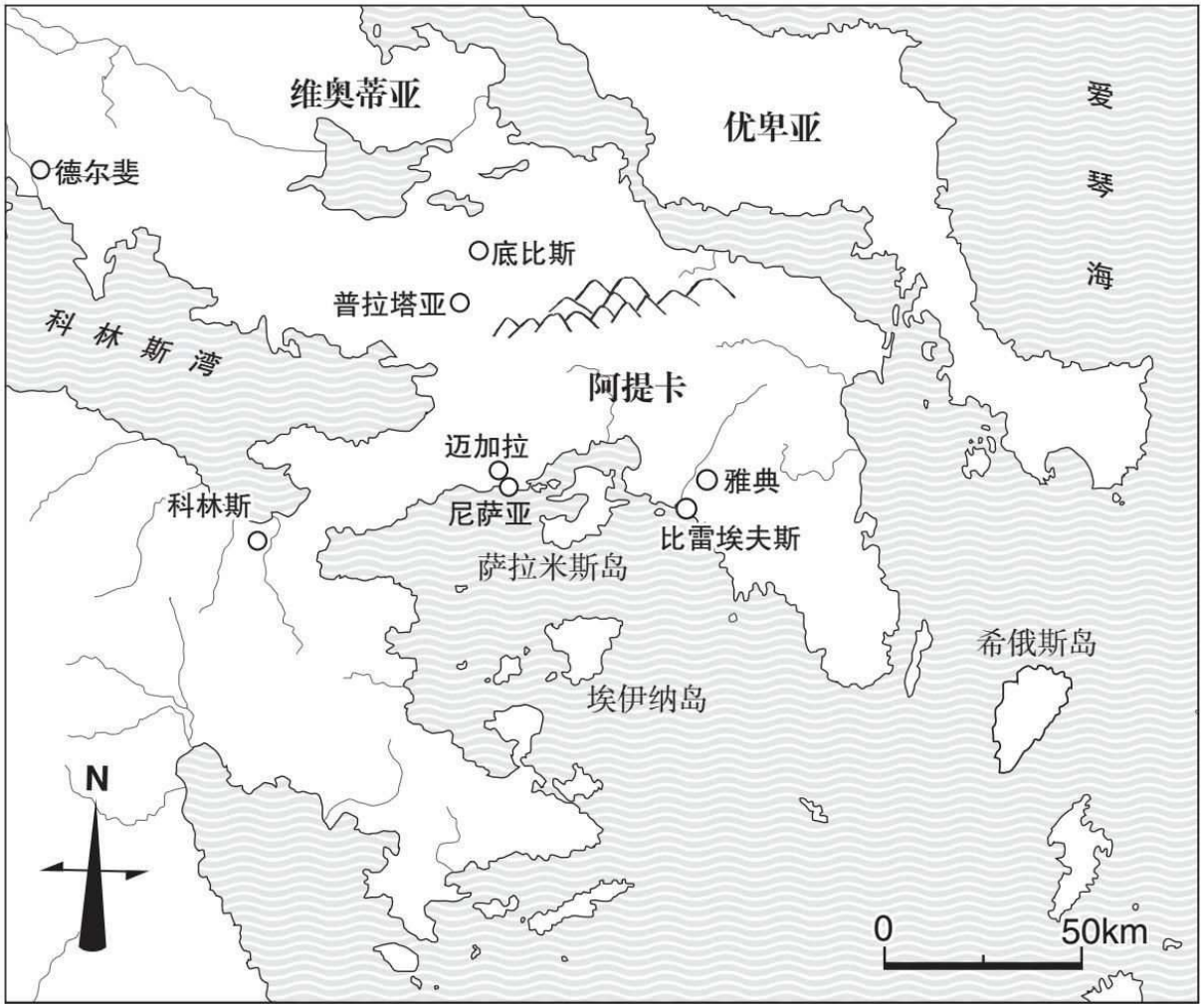
与其他国家的平原相比，雅典的平原实在说不上开阔。好在这里没有丛生的岩石，很适合耕作。雅典的富裕阶层都在这个地区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

梭伦的改革划分了四个等级。这意味着这些人的经济基础不会遭到分割，可以完整保留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殖民运动让市场扩大到了爱琴海对岸。结果，商品流通越来越兴隆。我想，梭伦改革中属于第三等级的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一分为二，有人发达有人衰落。

第三个原因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生活在山区的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一方面，山区只有岩石裸露的土地，生产力低下；另一方面，生活在山区的人即使有心外出殖民，也找不到可以殖民的地方了。因此，

他们被剩下来成为“底层人”，无限接近第四等级，而且情况可能更糟。在城里，只要不挑剔，总能找到工作，而生活在山间谷底的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雅典及其周边

第四个原因是梭伦改革不包括海外资产，因此，雅典的富裕阶层人数不多却拥有强大的潜在势力。梭伦改革是根据财力高低划分等级的，所以又叫“财权政治”。

但是，不能因此把责任推到梭伦身上。希腊人以及其后的罗马人都承认私有财产，而且保护私有财产是他们法律的基本原则。海外资产是某人或某人的祖先承担风险后得到的果实。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是矿山。因为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没有认识到这些矿山的价值，而外来的雅典人不仅知道其价值，还具备挖掘其价值的能力。

雅典名人大多拥有海外资产，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被驱逐出雅典后，依然可以自由从事写作，也是缘于他有来自色雷斯矿山的收入。当然，修昔底德还算不上超级富豪。

关于私有财产，斯巴达和雅典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巴达完全不承认私有财产。

梭伦一心致力于雅典的改革。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有时又是一个现实的人。

雅典公民之间纷争不断，但是要解开引起他们纷争的症结却不那么容易。于是，梭伦绞尽脑汁思索怎样做才可以让全体公民愿意暂时放下纷争。最后，他注意到了萨拉米斯岛。

萨拉米斯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为了绕爱琴海航行，船只拉起船帆，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出发，乘风波浪向前航行，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萨拉米斯岛。

雅典人原本就热衷于向海外发展，他们自然希望可以从比雷埃夫斯港自由且安全地驶向爱琴海。但是，要自由且安全地出入爱琴海，必须掌握邻近的制海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将对岸变成自己国家的领土，才能彻底将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因此，对雅典人来说，占领萨拉米斯岛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梦想。

雅典人有此野心，意味着邻近的其他城邦国家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萨拉米斯岛东侧与雅典隔海相望，西侧则与迈加拉遥相呼应。雅典要想占领萨拉米斯岛，迈加拉不可能熟视无睹。也就是说，要占领萨拉米斯岛，与迈加拉之间的争夺战不可避免。

尽管如此，公民大会依然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攻占萨拉米斯岛的提案。只要争夺战一打响，国内纷争自然会平息。

梭伦回国后反复思考这件事，不知不觉转眼两年过去，梭伦已年过六旬。因为自我放逐，他离开祖国的时间长达10年。现在的年轻人在梭伦完成改革时年纪尚小。因此，如果梭伦依然相信自己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力，显然过于乐观。但是，如果没有年轻人的支持，攻占萨拉米斯的提案就无法实施。

梭伦母亲家有一个亲戚，叫庇西特拉图（Peisistoratos），正值青春年华。梭伦离开雅典那年他才10岁，刚开始去体育学校。而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英武的年轻人，时年22岁。

既然他已经22岁，自然完成了两年训练，作为士兵可以独当一面。不知为何，这位年轻人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龄相仿的同龄人。

根据我的想象，很可能60岁的老人梭伦叫来了这位22岁的年轻人，亲切地和他进行了交谈。22岁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当即理解了梭伦的想法。在公民大会上，英武的年轻人喊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

“让我们出征吧！让我们浴血奋战吧！为了那座美丽的岛屿！为了洗掉曾经的屈辱！”

公民大会通过了占领萨拉米斯岛的作战方案，但是没有马上派兵出征。因为萨拉米斯是一座岛屿，要攻占这座岛屿需要海军力量。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还不是海军强国，虽然有船，但商船不同于战船。当时，拥有战船的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强的是科林斯，其次是迈加拉和埃伊纳，雅典并不在前三名中。埃伊纳也是一个岛国，位于萨拉米斯岛的南面。

鉴于这种现状，尽管已经决定开战，雅典人却踌躇不决。好在雅典人是有智慧的，而他们的智慧中不乏狡诈。雅典首先盯上了迈加拉的内乱，因为雅典人知道，一旦他们出兵征服萨拉米斯岛，迈加拉一定会派援军进行干扰。

如果说雅典的外港是比雷埃夫斯，那么迈加拉的外港就是尼萨亚。城邦国家迈加拉的政府此时正为尼萨亚住民的叛乱而头痛不已。

庇西特拉图率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刚刚成为正规兵的年轻人登上了尼萨亚。他们煽动尼萨亚人说："我们愿意帮你们打败迈加拉的总督。"同时又向萨拉米斯岛派出使者，意在说服他们和平归顺雅典。

鉴于这一情形，尽管公民大会上群情激愤，决议还是得以顺利通过。但是要真正付诸行动，尚需更多时日。

这时，梭伦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请斯巴达从中调解。斯巴达作为军事大国，做决定却总是踌躇不决、拖拖拉拉，因此又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梭伦没有放弃。

他说服斯巴达，说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有一个英雄叫阿伊阿克斯。他是亚加亚人，也是萨拉米斯岛民敬爱的英雄。亚加亚地区归属雅典，因此萨拉米斯归属雅典合情合理。从小就学习荷马叙事诗的雅典公民一听就知道梭伦满口胡言。但是，不重视学习的斯巴达人一听到荷马的名字就晕头转向。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

雅典停止向尼萨亚提供军事援助，以确保尼萨亚为迈加拉外港。

作为交换条件，迈加拉同意萨拉米斯岛归属雅典。

请斯巴达出面居中调解，雅典得到了想要的好处。迈加拉接受了这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尽管在他们看来，这个方案实在太过莫名其妙。

公元前570年，经过10年时间，萨拉米斯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此时，梭伦已经68岁，能记起他的雅典公民已经不多了。而30岁的庇西特拉图则一举赢得了公民的爱戴，甚至被冠上"萨拉米斯英雄"的称号。

接力棒已经传下去了，但是庇西特拉图并没有马上起跑，因为有两

个超级富豪严重妨碍了他起跑。

一个是吕喀古斯，另一个是麦加克勒斯。吕喀古斯是“平原派”的领袖，即在平原地区拥有肥沃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领袖。麦加克勒斯是“海岸派”的领袖，是雅典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一族的领袖。“海岸派”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因此实力雄厚。

梭伦改革以后，围绕雅典的领导权，两派依然争斗不休。他们看到年轻的庇西特拉图在市民中的声望如日中天，于是决定联手。

庇西特拉图出身名门，却不属于超级富豪阶层。虽然在市民的支持下他挑战了超级富豪，但是最终他决定让步。此时，他刚满40岁。庇西特拉图离开雅典城，移居到了阿提卡地区的山区。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性的退避，是因为他预料到对手内部早晚还会反目。果不其然，不出一年，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

起因是“平原派”拒绝了“海岸派”提出的联合方案。于是，“海岸派”领袖麦加克勒斯转而拉拢庇西特拉图，条件是麦加克勒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庇西特拉图。

曾经的“萨拉米斯英雄”、年过四十的庇西特拉图，原配妻子为他留下两个儿子后，早早离开了人世。于是，庇西特拉图接受麦加克勒斯的建议回到了雅典，只是这次回归时间并不长。

和庇西特拉图结盟后，麦加克勒斯决定彻底铲除竞争对手“平原派”，却没有得到女婿的支持。原因是庇西特拉图不愿和雅典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走得太近。麦加克勒斯恼羞成怒，转而掉头又去联络“平原派”。两个强敌再次联手。

他们再度结盟是有原因的。一度策略性隐退后又重返雅典的庇西特

拉图采取的一个行动，给了这两派既得利益者重新联合起来的理由。

庇西特拉图回到雅典后，有一天在街上遭到一群男人的袭击。虽说他只负了点儿轻伤，但是毕竟受伤了。因此，他在公民大会上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公民大会允许他带警卫出行。既然这是“萨拉米斯英雄”的愿望，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他的请求。然而公民大会没有规定警卫人数的上限，于是庇西特拉图的警卫人数不断增加。这就给了对手指责他的口实，他们说庇西特拉图要做“暴君”了。

事情发展至此，不管是出于策略性考虑还是非策略性考虑，庇西特拉图只能选择再次退避。这次他移居到阿提卡地区的山区好像并没能平息事态，于是已经44岁的庇西特拉图带着一家人去了位于希腊北部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他的现任妻子好像也选择离开父亲，与庇西特拉图同行。不知何故，深受民众欢迎的男人也受到女人的青睐。

这次策略性退避长达10年。当然，庇西特拉图绝不是一个坐叹时运不济的男人。

卡尔息底亚地区离色雷斯不远。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庇西特拉图摇身一变成了矿山经营者。他开采新矿山，开发新技术提高矿产质量，拓展优质矿产销路。除了雅典和斯巴达，他的销售网点几乎遍及全希腊。因为雅典现在仍处于对手的控制之中，而斯巴达禁止外国商品的流入。

在拓展销路的过程中，他不忘与各地权贵建立起友好关系。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西北部与马其顿王国接壤。公元前6世纪的马其顿还不是王国，只是位于希腊边境的一个落后国家。庇西特拉图结交了马其顿国王，与其成了好友。他周游列国时结识吕戈达米斯，也是在这个时期。吕戈达米斯一直在寻找机会占有纳克索斯岛。于是，因经营矿山而致富的庇西特拉图为他组建了一支雇佣军，帮助其达到了目的。

当然，他也没有断绝与身在雅典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他们是在他第一次策略性退避时认识的山区农民。10年的时光，他并没有虚度。

政变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等待已久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1000名阿尔戈斯雇佣兵加上前来支援的山区农民，一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附近的海岸登陆。马拉松距离雅典不足30公里。雅典迅速做出反应，派兵迎战。

双方曾正面交锋，但没有发生激战。这不是因为庇西特拉图和雅典方面的将领展开对话避免了激战，而是因为雅典方面的士兵选择弃战回家。

士兵返回市内，与他们相向而行往外出逃的是10年间在纷争中统治雅典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首领。他们的海外资产很多，所以逃到国外以后无须担心生计问题。

然而这些人没有预计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孩子们一起出逃。庇西特拉图如入无人之境，未遭遇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雅典城。随后，这些被留下的孩子被带到了庇西特拉图面前。

庇西特拉图把这些孩子送到好友吕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名义是去海外留学。他在纳克索斯岛为孩子们安排了寄宿家庭，他们和在雅典时一样上学、去体育学校。

这次政变自始至终意外不断，但是几乎没流一滴血却是事实。

这次政变的主谋庇西特拉图一定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做到最好。22岁时被梭伦看中，30岁时成为“萨拉米斯英雄”的庇西特拉图时年已经54岁。

近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庇西特拉图是“僭主”（独裁者），甚至把他的统治说成是“雅典独裁者统治的时代”。即使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人也说他是“僭主”。他是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所以这个称呼也算符合实际。只是，日语词典中，对僭主的解释是“自封帝王、君主之人”。因此，“僭主”不适用于庇西特拉图。他从来都没有自封为王，而且，对于梭伦的改革成果，他不仅没有摒弃，甚至采用了拿来主义。按照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梭伦的改革是“走向民主政体的里程碑”。至于如何运用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自有他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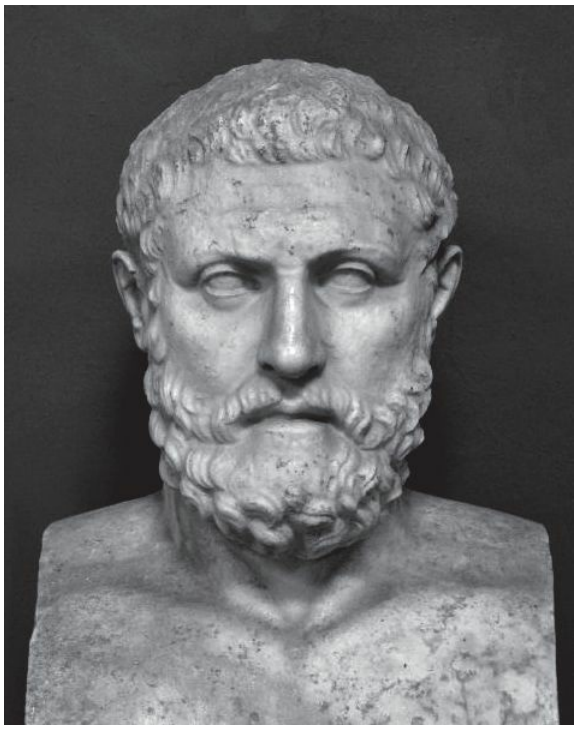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独裁者统治下的雅典的20年。

回到雅典后，庇西特拉图以留学海外为名，把曾是强劲对手的孩子们送到了纳克索斯岛。这一做法当然很温和，但是人质终究是人质。趁着他们尚在自己手中，他要尽早采取一系列措施。

“平原派”逃走后，阿提卡地区的土地成了无主之地。庇西特拉图接手了这个地区，果断实行农田改革。他将这里的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之前的佃农和山区农民。于是，“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全面坍塌。

当然，庇西特拉图不是单纯的“穷人的救世主”。他向刚拥有私有土地的人征收赋税。土地肥沃的须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土地相对贫瘠的缴纳收成的二十分之一。当时，这个税率并不高。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实质上是一种直接税。在只有间接税的当时，这是一项破天荒的举措。

庇西特拉图将这一税收用作城邦国家雅典各机构的运转经费。因为在这个时代，从政的人都没有报酬，因此未用于参政的人。曾经，重装步兵的装备国家只配发盾和长矛，其余由个人承担。此后，所有装备均由国家承担，这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国家运转所需的其他零星费用、公共事业的财源也有了保障。



庇西特拉图

尽管每人缴纳的税费很少，但是因为人数众多，税费总数并不少。此外，庇西特拉图还鼓励农民缴纳税赋以后将剩余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农民收入因此有增无减。自营农收获的农作物不仅满足了城邦国家雅典人的需要，送到市区和沿岸地区的农产品还通过海运销往希腊其他地方。之前从未走出过山区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

庇西特拉图还向雅典的贸易商提供了自己在流亡期间拓展的销售渠道。因为没有附带条件，自然深受商人的称道。商品销往雅典新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的朋友统治下的城镇街巷。不用说，因为有这层关系，与这些地方交易比以前简单多了。另一个曾经的强敌——“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送到纳克索斯岛的孩子们回到了父母身边。出逃的“平原派”和“海岸派”人员中，除了首领继续流亡，年青一代开始陆续返回雅典。因为雅典保留了梭伦推行的政体，所以他们要担任公职，也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也有选举权。雅典的精英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庇西特拉图也就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试图根除反对派。也许他在想：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雅典要提升经济实力，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有信誉的本国货币。

二、保证国内稳定，与他国建立友好关系。

三、生产高档商品。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城邦国家，要将重点放在制造附加值高的高档商品上，而不应追求廉价品的批量生产。也就是说，制造出来的东西虽然价格昂贵，依然有人愿意购买。

雅典有自己的流通货币，但是很不稳定。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雅典人只能用科林斯银币或埃伊纳银币结算。庇西特拉图一改这种状况。于是，正面为女神雅典娜侧脸，背面为和雅典娜形影不离的猫头鹰的德拉克马诞生了。使用最广的是“泰特拉德拉克马”（四德拉克马银币），它作为雅典货币的代表，流通时间长达200年。

为了保证银币的铸造，必须确保银矿的开采，而这又是庇西特拉图擅长的。除了色雷斯地区的矿山，他又对阿提卡地区的矿山进行了开发。

梭伦改革给雅典以秩序，而庇西特拉图要给雅典的是稳定，并在稳定中提高经济实力。

2500年前的四德拉克马银币

现代希腊发行的1欧元硬币

由于没有取缔“在野党”，因此，不排除“在野党”的人进入9个执政官组成的内阁。为此，庇西特拉图将候选人圈定在自己的一派中，避免内阁变成在野党的巢穴。

作为法治国家的标志，法庭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400人组成。庇西特拉图本人曾经作为证人，要求出庭作证。

至于和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说他实施的是和平外交。没有一个城邦国家与雅典处于明显的敌对关系。先不说庇西特拉图在其流亡期间结交的底比斯、阿尔戈斯和埃雷特里亚，就连因萨拉米斯岛归属雅典而神经紧绷的埃伊纳、对雅典的崛起心生嫉妒的科林斯、常常带着怀疑的眼光看雅典的斯巴达等，这些曾经与雅典关系紧张的城邦国家也与雅典结成了友好关系。庇西特拉图与色萨利地区的统治者结交，只因告知对方自己为新生儿取名塞萨洛斯，二者就成了朋友。不能不令人感叹其手段之高明。

庇西特拉图的外交政策中有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让对方知道自

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这是全希腊人都知晓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意图是暂时休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城邦国家之间的纷争通常都围绕着领土问题。

没有史实证明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雅典发起过战争。在这期间，雅典人甚至没有听说过需要大规模派遣军队的战争。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二个条件完全实现了。

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三个条件是改变批量生产廉价商品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制造高档商品。

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之前，在制造高档商品方面，走在全希腊最前面的是科林斯。

城邦国家科林斯（Corinth）的完整名称是“Corinthos”，它面向海湾，准确地说，这个海湾更像一个内海。这条宽阔的海湾经过狭窄之地纳夫帕克托斯（后来的勒班陀）通往爱奥尼亚海。沿着它进入爱奥尼亚海以后一路往西，就可以抵达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科林斯利用这一地理条件，将市场扩大到了地中海中部。在希腊人眼里，这些城邦虽然属于海外，却是希腊移民建设起来的。这些海外城邦的领地广阔，经济之富裕尤胜母国希腊，甚至被冠以“大希腊”之称。

通过同这些城市开展贸易活动，科林斯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当时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相比，科林斯的船只数量最多。一条条船装着享誉世界的科林斯壶，不仅销往横渡爱奥尼亚海即可到达的西方，还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穿过爱琴海，销往东方。庇西特拉图是瓜分被科林斯垄断的高档商品市场。

壶是希腊人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习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壶中。葡萄酒、橄榄油、磨好的面粉、豆类，几乎没有不装壶的东西。因此，只要有希腊人的地方就有制造壶的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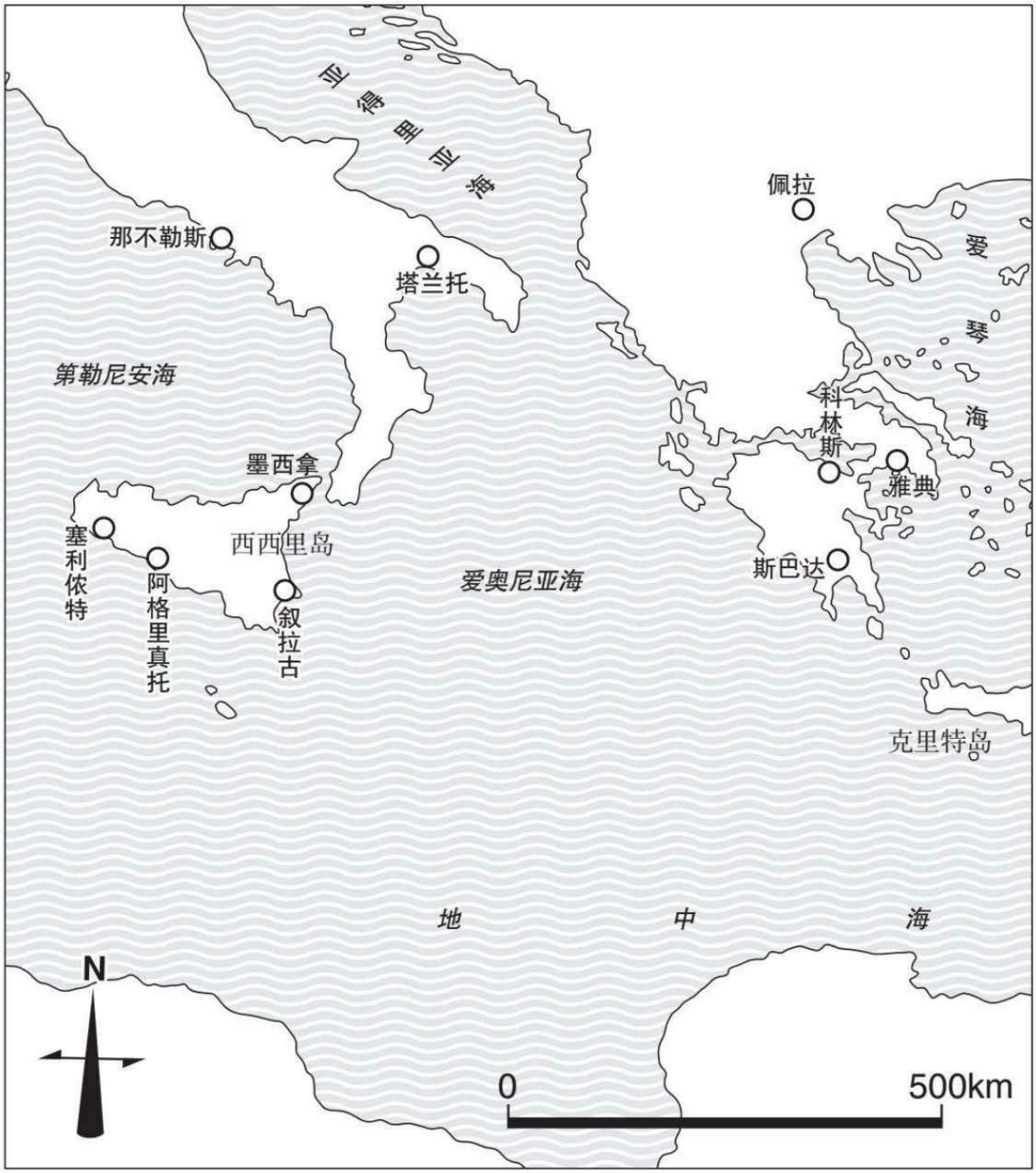
其中，科林斯生产的壶最漂亮。科林斯的壶上画有人物，美不胜收。也有其他国家模仿科林斯在壶上作画的，但是无人能出科林斯之右。科林斯的画风让人一看就感到东方的宁静之美。

在雅典，制造壶的是梭伦改革中属于第四等级的匠人。不清楚庇西特拉图是怎样鼓动这些匠人的，总之他们的工作热情大大提高是毋容置疑的。

他们是小企业家，也是在梭伦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他们借了钱，即使无法偿还也不必担心沦为奴隶。

如果庇西特拉图承诺匠人只需要专心制造优质产品，销售由他负责的话，相信会有不少匠人为之心动。之前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壶，最多只是让儿子们帮忙。有了庇西特拉图的承诺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自己负责早期的设计和最后的润色，加工过程雇人来做，以此提高优质产品的产量。只是，雇用奴隶有些难度。

购买有制壶经验的奴隶，所需费用是自己一天劳动所得的20倍。购买技术过硬的奴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熟练技工，就要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500倍的钱。因此，扩大规模难度很大，必须依靠借款做前期投资。



爱奥尼亚海及其周边

他们大概采用如下方法来克服困难：用自己一天劳动所得4倍的钱购买两个少年奴隶，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再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20倍的钱，买一个有经验的奴隶，制作过程交给他负责，而自己专心

从事设计和最后的润色。梭伦改革中，前期投资失败也不会沦为奴隶的法律深得人心，庇西特拉图承诺的只要制造出优质产品，销售由国家负责的政策也一定深得人心。

绘有女性的科林斯壶

就这样，占据当时制造业最重要地位的制壶业，在雅典迅速发展起来了。

他们既没有模仿科林斯，也没有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来占领市场。雅典制造的壶好像在挑战科林斯壶一样，其颜色搭配主要采用红底配黑色、黑底配红色，上面绘以人物的造型。

雅典和科林斯制造的壶除了颜色不同，图案也不尽相同。首先，科林斯壶上的人物是静止的，而雅典壶上的人物是动态的；科林斯壶上的人物大多只有一个，而雅典壶上的人物较多。从荷马叙事诗中的一个场面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群裸体男人赛跑的场面、四匹马拉着战车竞跑的场面等跃然壶上。

雅典壶上的图案题材丰富多彩，从雅典百姓的日常生活到鱼、鸟等造型都有。雅典人的想象力之丰富，令我们不得不自叹弗如。随着人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绘画技术也越来越精湛，雅典出现了专业从事设计的“画师”。他们设计各种图案，提供给各作坊用于壶或碟子上。后来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壶和碟子上，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声誉之高。

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以后，雅典制造的壶几乎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市场。罗马人无限敬仰希腊人的这种才能，在他们居住的意大利半岛出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壶和碟子。将这些壶和碟子与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进行比较，彼此的不同显而易见，甚至连外行也能一眼分辨出来。尽管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模仿自雅典壶。如此高端的商品只有属于第四等级的、罗马人定义的“无资产者”才能制造出来。在雅典，第四等级的人要维持日常生活，必须每天工作。

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传说国王米诺斯的手可以变凡物为黄金。看着雅典壶和碟子上华丽又风趣的画，不由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也许雅典人的手碰过的东西都将变身为“美”。

这种“美”就是黄金。因为只要卖出去，金币就会收入囊中。我想，看着外行都能辨认出的出自雅典人之手的壶和碟子，即使花上两倍的价格购买也心甘情愿吧。

雅典人的想象力因壶上的绘图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在雕刻上。雅典的雕刻，之前是古代风格，到庇西特拉图时代，变成了古典风格。静止的雕像变得富有动感，“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了。

“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也惠及了神庙建筑。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是修公路、水道及桥梁，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首先就是造神庙。要修建神庙，用来支撑房梁的圆柱必不可少。公元前7世纪之前被广泛使用的多立克柱式圆柱简单粗壮，稳定性很好，但难免有些笨重。

绘有四马战车竞技的雅典壶

到了这个时代，多立克柱式换成了爱奥尼亚柱式，它简洁流畅、排列于四边，被称作柱廊。用于柱廊的爱奥尼亚柱式很美，别具风格。

世界文学巅峰之作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此之前一直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庇西特拉图将这些故事搬上羊皮纸，从而有了标准版本，也方便学校的教师使用。到了后世，除了庇西特拉图的标准版，又有了各种译本。因此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标准版，不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翻译成各国语言的译本。

举办活动是现在的说法。说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庇西特拉图竟是举办活动的鼻祖。“泛雅典娜节”就是他创办的。这是4年一度供奉女神

雅典娜的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这个活动比的是唱歌。只要是希腊人，无论属于哪个城邦国家，人人都可以参加。这里所说的歌，实际上是荷马的叙事诗，人们在竖琴的伴奏下，高声歌唱。

希腊人喜欢体育比赛，也喜欢歌舞比赛。荷马叙事诗有了标准版本后，就不能随便更改故事情节，也不能随意添加原版中没有出现的人物。“泛雅典娜节”对于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的普及功不可没。

喜欢举办活动的人，大多自己乐在其中，也愿意看到别人乐在其中。

拉丁语中，狄俄尼索斯叫巴克科斯，他是酒神，是曾经属于第二个级别的神。庇西特拉图提高了他的地位，把他升为最高级别的神，继众神之首宙斯和雅典娜、阿波罗之后，与其他最高级别的神地位相当。狄俄尼索斯以前还是葡萄园的守护神，只属于葡萄园主。庇西特拉图扩大了他的守护范围，使其成为全体雅典公民的神。

酒喝多了，有人会发酒疯。这会让提升酒神地位失去意义。希腊人相信诸神时刻都在默默地帮助自己，因此，他们要为狄俄尼索斯寻找一个守护对象，于是戏剧充当了这个角色。也就是说，戏剧表演是献给狄俄尼索斯神的，因此，看完戏后饮酒作乐是得到狄俄尼索斯认可的。

就这样，希腊悲剧走向鼎盛的大门被打开了，半个世纪以后，出现了埃斯库罗斯。

没有史料记录在批判精神极其旺盛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是如何做到统治雅典长达20年的。他既没有把雅典变成专制国家，也没有暗杀过反对派，甚至没有让公民坐牢，最多只是放逐过一些人而已。直至今日，依然未找到任何史料记录有这些情形。

有研究者认为，他本人出行有警卫保护，却禁止雅典公民携带武

器，就是他独裁的证据。但是，禁止携带武器进城，在先进的现代国家是很寻常的治安规定。而距今2500年前的雅典人性格急躁易冲动，一旦发生争吵，难免升级成拔刀相向的严重事态。由争吵导致的流血事件曾经在雅典司空见惯，这一禁令使其彻底变成过去时。

即使是自诩绝对民主主义者的英国学者也不得不这样写：

“无疑，庇西特拉图是专制统治者，但他是个让人舒服的专制统治者。”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gagliardo”（活泼愉快），形容男性时，意思是“厚颜无耻却讨人喜欢的家伙”；形容葡萄酒时，则变成“vino gagliardo”，意思是“既烈又醇的高档葡萄酒”。

有一个意大利人说，庇西特拉图是gagliardo式的领袖。他还说：“庇西特拉图统治下的雅典，几乎每天都有展会（商品交易会）。”

引进外资、吸引外国人的大门早已被梭伦打开。庇西特拉图没有改变梭伦的改革，在他统治的20年间，城邦国家雅典的首都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这位专制领袖的晚年时期，斯巴达牵头结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原因是雅典越来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警惕。

我忍不住想，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也许是“雅典的高速成长期”，而这也许是公元前527年这位专制统治者在自家床上安详地结束73年生命的重要原因。

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作为反对派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都没有找到反击的机会，他们只能一直在海外过流亡生活。

但是，无论多么让人舒心，多么让人感觉轻松，这位僭主（通过政

变或其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独裁者）终究死了。

雅典人是一个擅于创作辛辣讽刺喜剧的民族。原本他们的批判精神就比其他国家的人高出许多，因此，当把持政权20年的专制统治者离世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改变雅典的时机到了。只是，要找出一个合适的领导者并不容易。

庇西特拉图将所有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了农民，“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因此大大受损，成为弱势群体。

相反，庇西特拉图鼓励海外贸易，沿岸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大大增强。“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削弱。“海岸派”为首的是雅典尽人皆知的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这个家族的领头人麦加克勒斯在流亡期间去世，继他之后成为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掌门人的是其长子克里斯提尼。

庇西特拉图发起政变，未流一滴血进入雅典成为统治者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还是个刚满19岁的年轻人。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庇西特拉图死去，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未回过祖国雅典，长达19年。因为他是“海岸派”的领袖，即使族中其他男人回到了国内，他也不能回去。

庇西特拉图去世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38岁。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知名度上看，他都有充分的条件回国东山再起。但事实上他用了17年时间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是因为庇西特拉图死后，“庇西特拉图体制”依然存在。那么，这种体制为什么可以延续17年呢？

庇西特拉图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他们的出生年月不详，只能根据死亡时间进行推断，当时，两人很可能都在20到30岁之间。兄弟二人都不是无能之辈，所以父亲一定想过把权力移交给这

兄弟二人。

父亲庇西特拉图有特殊能力，能得到神谕，雅典公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两个儿子似乎很清楚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他们既没有要求带随从保护自己，也没有像父亲那样过着高调的私生活。当然，他们秉承梭伦改革中确立的政体，而他们的父亲对这一政体也未做过任何修改。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成为9人之一。这距离庇西特拉图去世，只过了两年。

克里斯提尼的东山再起开始了，但此时他还只是9人中的一个。为了控制反对派在9位执政官中的人数，“庇西特拉图体制”规定在选举前要对候选人进行筛选。因此，已满40岁的克里斯提尼回到祖国，开始实施东山再起的计划，说到底还是受限于“庇西特拉图体制”。

随后的10年里，这位“海岸派”领袖好像一直都在雅典。其间，他也许再次当选过执政官，还曾是“亚略巴古”（areios pagos）的一员。“亚略巴古”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组成。他再次流亡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14年以后，也就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统治的最后时期。

兄弟二人共治天下，大多数时候会分道扬镳。但是，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两人分工明确。兄长希庇亚斯全面负责国家政事，弟弟希帕克斯则专门负责举办活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可以延续这么多年，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雅典公民虽有求变的想法，却缺少正当理由，始终下不了决心。毕竟雅典公民并不认为雅典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然而，公元前519年，就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迎来第8个年头的这一年，“裂痕”开始显现。长达37年的时间里，雅典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此时出现了非派军队不可的状况。

起因是侵犯他国的惯犯底比斯攻打了普拉塔亚。普拉塔亚距离雅典不远，但他们选择向号称陆地最强军事大国的斯巴达求助。

在“庇西特拉图体制”下，雅典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庇西特拉图死后依然保持繁荣。斯巴达人对此充满了戒备。他们认为，来自普拉塔亚的求助是把雅典引入战争的绝佳时机，于是推托说，从地理位置上，雅典距离普拉塔亚更近，普拉塔亚应该请求雅典派遣援军。

普拉塔亚转向雅典求援，希庇亚斯不能拒绝，公民大会也不能不同意。因为一旦普拉塔亚被底比斯控制，那么阿提卡地区势必与“侵犯他国的惯犯”成为邻居。

幸运的是，在与底比斯军的战斗中，雅典取得了胜利。但是，希庇亚斯统治下的雅典，却因此出现了两个不稳定因素。

一是与希腊城邦国家中的强国底比斯彻底为敌了。

二是底比斯好像故意挑衅雅典似的，将属于底比斯的维奥蒂亚地区南部赠予“庇西特拉图体制”的反对派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作为他们的前线基地，为他们夺取雅典统治权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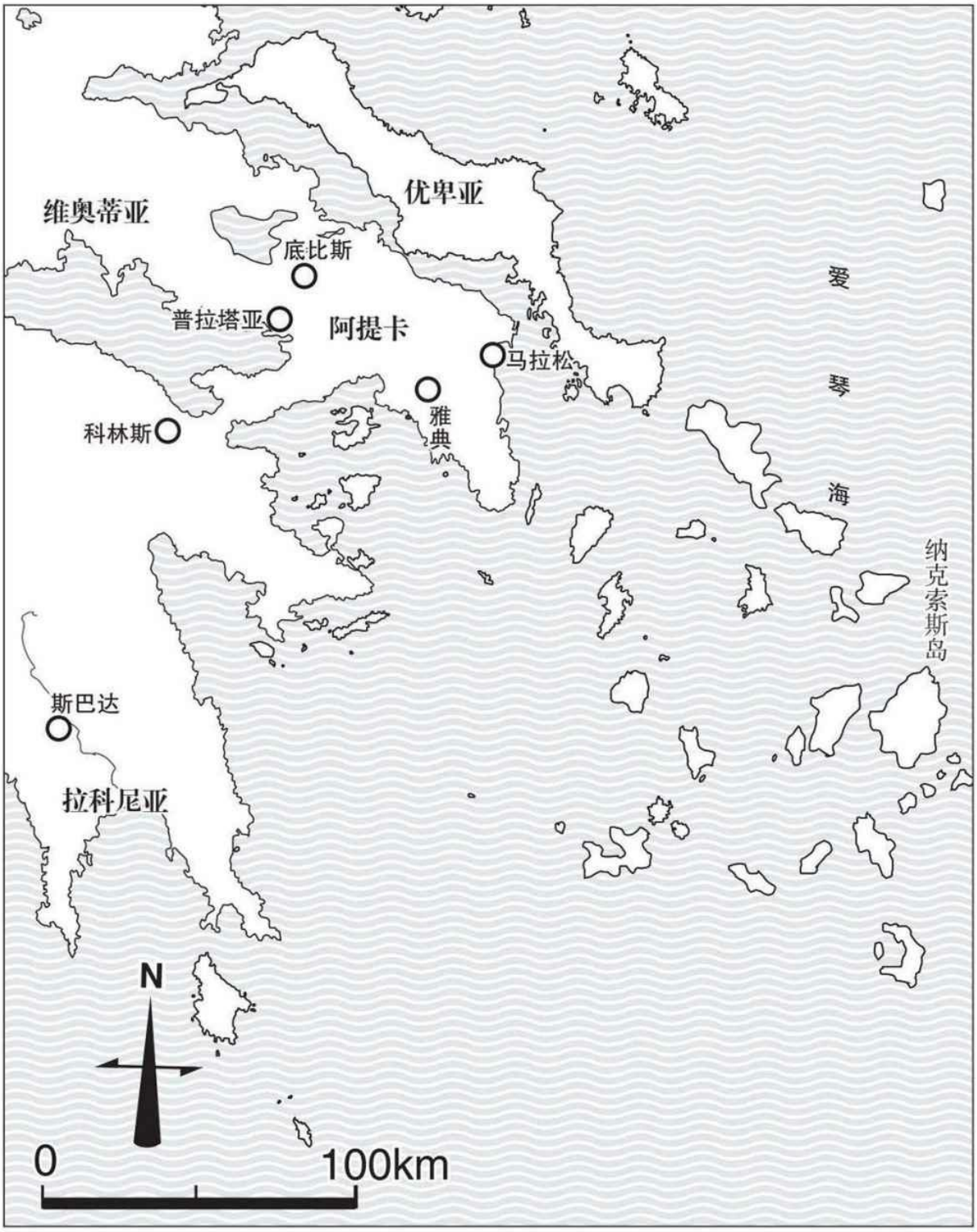
如果发生此事时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首领克里斯提尼就在雅典市内，也许后来的民主主义霸主会非常不好过。

与底比斯的战事让希庇亚斯有了新的麻烦，敌对势力增加了。国内有克里斯提尼领导下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国外有斯巴达，现在又加上了底比斯。

就在同一时期，庇西特拉图生前的好友、在他死后继续支持兄弟二人的纳克索斯岛僭主吕戈达米斯也去世了。对于希庇亚斯来说，吕戈达米斯的死不仅让他失去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还让雅典失去了商船的航线。包括爱琴海南半部在内的雅典商船航线失去了有力的保护。之前吕

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确保了航行于其近海的雅典船只的安全。

接踵而至的变故让希庇亚斯再难保持冷静，冲动之下，他尝试与遥远的波斯帝国进行接触。好在此时，所有与雅典为敌的对手似乎都下不了决心，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虽摇摇欲坠，却维持了下来。



雅典及其周边

突变发生在5年后的公元前514年。这一年，弟弟希帕克斯遭遇暗杀。凶手是两个雅典公民。雅典只有在祭祀战斗之神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娜节”期间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而希帕克斯正是“泛雅典娜节”活动的全权负责人。

两个犯人当场被捕并被处以死刑。根据梭伦改革的规定，这两个人都属于第一等级。他们的动机据说是个人恩怨。但是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克里斯提尼认为，此时只剩下了希庇亚斯一人，是反击的绝佳时机。他回到底比斯赠予他作为前线基地的维奥蒂亚地区，带领一家老小进军阿提卡地区——城邦国家雅典的边境。

得此消息后，希庇亚斯向父亲时代的同盟国家色萨利求助。因为色萨利和底比斯交恶，所以对方马上派来了援军。就这样，克里斯提尼的军队尚未踏上阿提卡地区的土地，就早早宣告失败。

已经50岁的克里斯提尼不得不承认，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希庇亚斯抗衡。他马上改变策略，决定请其他国家军队支援。

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属于富裕阶层，而且是超级富豪阶层。其拥有的海外资产超级庞大，因此无须担心资金问题。

35年前，阿波罗神庙毁于一场大火，一直未被修复。克里斯提尼决定出资在德尔斐重建阿波罗神庙。

说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人们自然而然想到吕库古。对斯巴达人来说，德尔斐是很重要的地方，只要遇到难处，他们就会去阿波罗神庙祈求神谕。看到重建后的宏伟神庙，斯巴达人非常感动，他们对克里斯提尼顿生好感。

后来，有一个出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的传闻说，克里斯提尼用

钱收买了阿波罗神庙的神官，让他们通过女祭司之口告诉前来祈求神谕的斯巴达人：“你们要帮助雅典人，把他们从庇西特拉图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斯巴达人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因此虽然有女祭司进言，他们仍然迟迟没有表态。希帕克斯被杀3年后的公元前511年，克里斯提尼的策略终于奏效。第二年春天，斯巴达派出小规模军队登陆了阿提卡地区。

然而，色萨利的1000名骑兵早已等候在那里。斯巴达的重装步兵不敌骑兵全军覆没，连队长也丢了性命。

这次战败大大刺激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对斯巴达战士来说，胜负关乎他们的尊严。他们不再想着帮助雅典人推翻庇西特拉图，也忘记了阿波罗神庙女祭司口中的神谕。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雪耻。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的斯巴达人，这次行动出乎意料地神速。克里昂米尼率领重装步兵前往雅典。

希庇亚斯指挥下的雅典士兵和色萨利骑兵一败涂地。队列整齐的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市内后继续追杀希庇亚斯。希庇亚斯带着残部逃到了卫城，斯巴达军追到此处，包围了这个建于山丘之上的城堡。

国王克里昂米尼知道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并不擅长攻城战。因此他向希庇亚斯派去使者，承诺只要希庇亚斯投降离开雅典，就可以确保他和追随他的所有人的安全。希庇亚斯接受了他的建议，离开雅典，去了希腊北部。那里有他的土地。

就这样，公元前510年，雅典专制统治宣告结束。“庇西特拉图体制”历经36年，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又持续了17年以后，终于走到了尽头。虽然借助了他国之力，克里斯提尼终究赢了。

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公民就是战士，就是吕库古规定的要将终身奉献给保卫国家事业的人。在他们的认识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庇里阿西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不是公民，虽然我们认为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存续离不开他们。正因如此，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一方面，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匠人、商人和农民都是公民。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他们可能没有被选举权，但是，既然他们是公民，就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既然承认他们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他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帮助克里斯提尼赶走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不是为了感谢克里斯提尼在德尔斐重建了阿波罗神庙。

“民粹主义”是现代人的说法，当时尚无此词。斯巴达人因为雅典的“民粹主义”，即“庇西特拉图体制”，早已对雅典充满了戒心。在雅典，庇西特拉图致力于提高农民、匠人和商人的经济实力；而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人绝不允许身为商人、匠人和农民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进入公民社会。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民粹主义的危险，担心民粹主义给自己国家的下层人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赶走“庇西特拉图体制”的继承者希庇亚斯，斯巴达自有斯巴达的理由。

在赶走希庇亚斯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打算帮助克里斯提尼上位。

克里斯提尼出身超级名门，属于既得利益者。他的势力范围在阿提卡地区的沿海地区，当地住民大多是匠人和商人。在斯巴达人看来，领

导这一新兴阶层的克里斯提尼同样是一个危险分子。不要忘了，掌握斯巴达国家政权的不是两个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吕库古确立的斯巴达国体。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

用军事力量推翻“庇西特拉图体制”后，斯巴达人考虑在雅典建立一个与斯巴达相似的政体，也就是在雅典引入“寡头政治”（少数人统治的政体）。

斯巴达看上了一位名叫伊萨哥拉斯的男人。此人以前常去斯巴达，父母是亲斯巴达的雅典人。

两年后，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率领一支小规模部队进驻雅典，成功使伊萨哥拉斯当选执政官。因为9人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富裕阶层，即资产达到第一等级或第二等级的公民，因此，伊萨哥拉斯很可能出身富裕阶层。

当选执政官后，伊萨哥拉斯因为有斯巴达国王这一靠山，在公民大会上十分专横。他向公民公布了三个决定：

一、开除所有亲庇西特拉图派的公民的公职。

二、将克里斯提尼及其家族赶出雅典。

三、解散公民大会，新的机构将由新当选的执政官，也就是伊萨哥拉斯决定。

伊萨哥拉斯的言行极大地激怒了雅典公民。他们联合起来围住斯巴达国王和伊萨哥拉斯居住的卫城城堡。尽管斯巴达国王带来的斯巴达士兵英勇无比，无奈对方人数太多，又正逢群情激愤之时。斯巴达国王坚持了两天，最后，他未征求身在国内的监察官的意见就选择了让步。

国王克里昂米尼接受公民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后带着士兵安全撤退。伊萨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将交由雅典公民处死。不知道伊萨哥拉斯是怎么做到的，据说他一人成功出逃，去了斯巴达避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场混乱结束之后，雅典公民终于想到接克里斯提尼回来了。

公元前508年，从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的那一年开始，历经38年，克里斯提尼终于结束流亡生活回到雅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祖国。他19岁开始流亡，此时已经57岁。步入暮年的克里斯提尼非常清楚，公民之所以把他请回雅典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出别的人选。

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写过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中世和古罗马。我深切地感受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人、开创新时代的人，只能出自既得利益阶层。

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并非只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都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当中总有人敢于正视自己所属阶层的弊端。

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向既得利益者开刀。执刀之人，必须对症结了然于心。如何对症下药，用罗马人的话说，只能从“餐桌杂谈”中体会。这种“经验”非一朝一夕所能得到，即便出身新兴阶层的杰出人物也是一样。那个时代没有相应的教育机构，获取这类经验只能依靠在家庭中耳濡目染。

接下来我要介绍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乍一看，克里斯提尼改革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他本人所属的特权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将国家大事交给了公民。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绝对是否定的。

如果真的将国家大事交给公民处理，就不可能有40年后的伯里克利，他是雅典改革接力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同出一门——雅典的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直至今日依然如雷贯耳的“雅典民主政体”就是由这些超级精英创立起来的。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公民掌控国家政治方向”，而是“精英构思并提出国家政治方向，交由公民决定”。

克里斯提尼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自己所属的特权阶层。不仅如此，他还力图保留这个阶层。他只是要重新分配当时的雅典社会力量，以此彻底切除特权阶层的毒瘤。

雅典的民主政体不是产生于高深的意识形态思考，而是产生于现实的需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领袖人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雅典的民主主义才会在这个时代发挥巨大的作用。当民主政体转为意识形态的时候，等待城邦国家雅典的就只剩下衰败了。

出人意料的是，鼎盛时期的雅典，几乎所有领袖人物都出自名门，只有一个例外。看看雅典改革接力赛的选手名单——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他们都出身世袭名门。这甚至让人不得不三缄其口，告诫自己绝不能说世袭的弊端。

雅典的统治者虽然使用的统治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热爱女神雅典娜。他们不是单纯的、置人性于不顾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以意识形态为名追求自身的理想罢了。

克里斯提尼是典型的雅典人，有那么一点儿狡诈。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大刀阔斧打破自己所属阶层的基础，从而建立起新型政体的。这种政体可以进一步激发特权阶层的潜力。

众所周知，“克里斯提尼改革”内容相当复杂。我曾经为此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让我苦苦思索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方案，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一定是克里斯提尼在长达30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

对于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来说，理解这极其复杂的改革内容并不困难，这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哲学家，用《诗学》论述悲剧。在《雅典的政体》（*Athenaion Politeia*）中，他又分析了雅典政体的变迁。

这本讲述雅典政体的书通俗易懂，直到2000多年以后的公元1891年才被发现并第一次出版。这意味着城邦国家雅典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彻底遗忘，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人对这本书也一无所知。如果他们了解雅典，了解雅典的政体，就一定能体会到仅靠一知半解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

在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克里斯提尼改革”，比亚里士多德的讲述更简单明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比克里斯提尼晚150年，当时城邦国家雅典尚存，而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距离那个时代已过去了2300多年，城邦国家雅典早已杳无踪迹。因此，要了解2500多年前的雅典，做进一步的简化是必要的。

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克里斯提尼的真实意图是明确的：

一、绝不允许僭主政治在雅典死灰复燃。因为不管让人多么舒服，僭主政治终究不是一个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国家政事的体制。

二、必须建立一个可无限激发人力资源——雅典公民活力的体制。

第一个内容继承了梭伦改革的精神，第二个内容继承了庇西特拉图

的政治。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不是彻头彻尾颠覆改革之人。

前面已经介绍过，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土阿提卡地区分3个部分，即首都所在的城区、朝海的沿岸地区和内陆山区。

克里斯提尼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划分，把每个部分再分成10个区：

城区——从1区到10区。

沿海地区——也是从1区到10区。

内陆山区——同样从1区到10区。

如果区域划分到此为止，那么雅典一共划分成30个区。但是，克里斯提尼的设想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真正的意图是，让土地分成小块，同时还要防止过度分散。

他对30个区进行了重组。3个地区的各区之间进行合并，产生了10个“部落”，拉丁语叫“tribus”。这是后世的人还在使用的一个词语的词源。

例如，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进行合并，构成“第一部落”。

第二区以下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10个“部落”。

无论是在克里斯提尼之前的雅典，还是在现代的伊斯兰国家，“tribus”的意思都是“部落”。无论是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抑或是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人类群体，其核心是当地权贵。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首先划分出30个小区，再对其进

行重组建成10个“部落”。曾经“tribus”的最佳译词是“部落”，但在这里，“部落”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部落。因为自然形成的部落变成了人为建立起来的住民共同体“行政区”。因此，说到城邦国家雅典的部落，只能用“tribus”而不能用部落一词。[1]

无论领导人叫国王还是叫僭主，抑或称君主，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的政治体制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属下各“部落”轻举妄动。

克里斯提尼构思的改革，目的是要在雅典建立起这样一个政体：尽管没有国王或僭主，却能防止各“部落”肆意妄为，以确保国内统一。一直以来，让雅典伤透脑筋的内部对立都是由权贵家族所属“部落”的争斗引起的。

阿提卡地区被划成了若干小片区，因此权贵人家分布于各地的土地也被碎片化了，他们不敢再说这是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也不能在那些地盘上耀武扬威了。首当其冲成为解体对象的“部落”，自然是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有此先例，我想公民大会一定会以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克里斯提尼的提案。

当然，克里斯提尼并没有满足于解体旧势力。在完成这一改革后，他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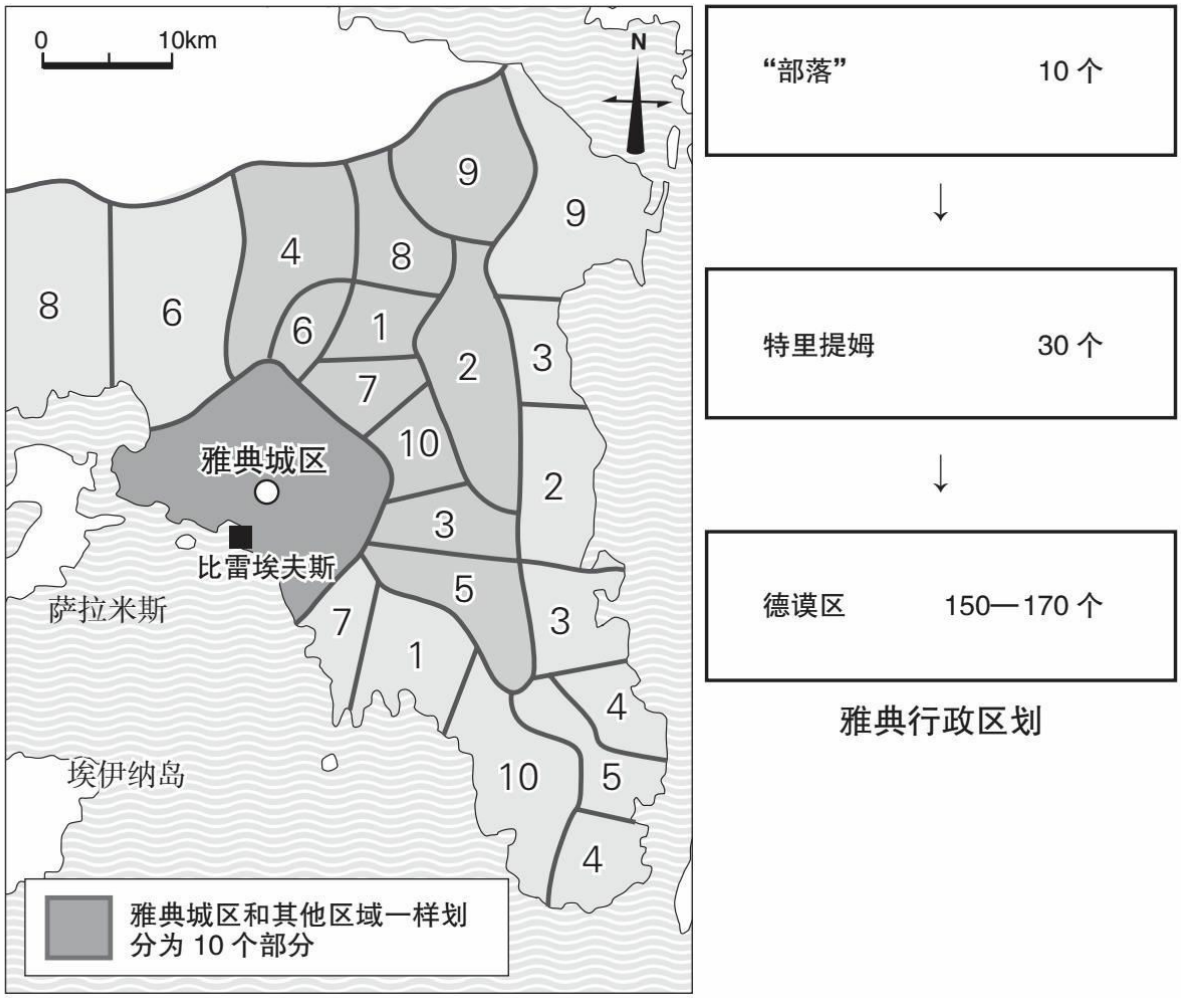
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合并成为“第一行政区”后，其余区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了10个行政区。接着，他又将每个行政区划分成3个“特里提姆”（trittium），各特里提姆再分成5个“德谟区”（demos）。

至此，城邦国家雅典的阿提卡地区全域划分终于完成，共产生了10个“部落”、30个特里提姆和150个德谟区。德谟区的数量后来又增加到170个。可以认为德谟区就是现代国家“城镇”或“村落”的雏形。

距今2500多年前，克里斯提尼就为全体雅典公民建立了“户籍”，即英语中的“identity card”。

通过实施户籍制度，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保障基础得以确保。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

在现代国家，正确掌握户籍和住民票[2]所在地，通常是出于税收的需要。但是，古代只有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古代的直接税是兵役，也叫“血税”。公民是符合兵役条件的、20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他们又是享有城邦国家公民权的人。



雅典行政区划

还有一个说法，据说克里斯提尼要求10个“部落”分别上报3000个满足兵役条件的人名，共计3万人。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雅典，公民总人数不过4万人左右，却有3万人作为现役军人被登记在册。尽管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但是，仅在人员数量上，雅典超过了公认陆战实力最强的斯巴达两倍之多。

克里斯提尼一定还记得庇西特拉图时代末期，由斯巴达牵头成功缔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雅典发展迅速，让斯巴达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斯巴达号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国家结成同盟，这就是伯

罗奔尼撒同盟。随后，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结盟以前，斯巴达会剥夺被征服者的一切权利，剥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沦为底层人，犹如奴隶。若允许被征服国继续维持城邦国家的状态，则要求高额的贡税。结盟之后，斯巴达改变了这种做法。

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国的唯一要求是，斯巴达发动战争时为其提供兵力支援。斯巴达重装步兵之强众所周知。除了阿尔戈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多数城邦国家都表示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阿尔戈斯未加入同盟是因为历史上一直与斯巴达交恶。而伯罗奔尼撒同盟是留在克里斯提尼心里的一件事。

斯巴达人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勇往直前。雅典人与他们不同，确定目标以后并不一定勇往直前。斯巴达人只觉得雅典的户籍制度非同寻常，却找不出可以提出抗议或质疑的理由。雅典通过明确户籍所在地，有效地保障了兵源。当然，除此之外，户籍制度还有其他不少好处。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公民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一个人的名字中必须包括其户籍所在的德谟区名、父名和本人的名字。例如：

“户籍在阿洛裴盖德谟区的苏弗洛尼斯科之子苏格拉底。”

“户籍在克拉尔戈斯德谟区的克桑提普斯之子伯里克利。”

名字中不再出现代表出身阶层的家族名称。因此，克里斯提尼的名字中也删去了雅典众所周知的阿尔克迈尼翁之称。

如此一来，是不是重视个人才华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正如亚里士多德评价的那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

不断推进建立民主政体，是为了推动雅典向实力主义（meritocracy）发展的进程。

25年后雅典出现了统治者中唯一一个“非名门出身”的人。他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meritocracy”是后世造的词，融合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它在古代希腊和罗马都不存在。尽管当时没有这个词，却不表示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理解中，“民主政治”和“meritocracy”的意思惊人地相似。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公民拥有了户籍。只是，当时的户籍只显示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并不表示他必须居住在此地。

例如，出生于内陆山区的人可以去沿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也可以租住在城区学习在壶上绘图。也就是说，雅典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这种自由是雅典不同于斯巴达的又一个方面。

当然，雅典和斯巴达相同的一点是，两国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一到18岁，雅典的年轻人必须回自己的德谟区申请参加兵役训练。毕竟，一旦敌军入侵、国家沦陷，原本享有最高平等权利的全体公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因此，介绍兵役也就是介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新政体。

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政体，但他没有全盘照搬。

梭伦的政体在历史上叫作“财权政治”，它根据收入的多少，将其划分为从富裕阶层到无资产者四个等级。也许你会以为，土地划分成小片，富裕阶层的富裕程度会大打折扣。然而贫富差距终究存在。而且富裕阶层还有海外资产，这部分资产并不包括在梭伦改革中。在没有直接税的时代，自然没有累进税。我想在那个时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

骑兵义务，恐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累进税吧。

第三等级的兵役是担任重装步兵，除了盾和长矛之外，其余装备由个人负担。到了庇西特拉图时代，重装步兵的所有武装改由国库提供。既然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无产者匠人和商人，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重装步兵呢？

事实确实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从轻装步兵升为重装步兵，但至少有一部分人升为重装步兵了。

有研究显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城邦国家雅典，享有公民权的人数在4万人左右，即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4万人。当然，这个数字包括了5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预备兵和已无力参加预备役的老年人。

15年之后发生在马拉松平原的战斗中，雅典总共投入了9000名重装步兵，占全体成年男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后来雅典成年男性人数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成年男性总数，城邦国家雅典可以送往前线的重装步兵数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雅典，虽然男性人数增加了，但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始终保持在斯巴达的2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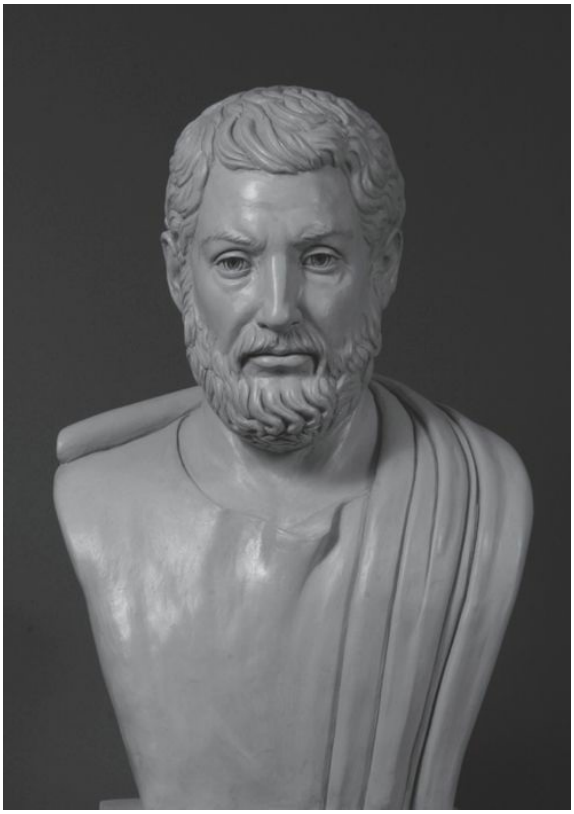
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之前，陆地上两军交战，主要战斗力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只是辅助力量。因此，在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的15年之前，克里斯提尼在雅典改革的过程中致力于扩充重装步兵力量是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但是根据庇西特拉图时代的状况和划分小片区后出现的改变来看，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以前是9人，此时增加到10人。原因是每个“tribus”都要选出1个执政官，10个“tribus”就有

10个执政官。人数增加，每个人的权限却大大缩小了。执政官成了一种名誉，而不再是决策者，因此他们的组织也不能称为内阁了。与此相应的司法机构亚略巴古的权限也缩小了。这个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构成。也就是说，富裕阶层的权限因为他们中的一人——克里斯提尼的缘故大为缩水。

执政官的权力弱化了，10位“将军”（strategos）组成的机构取而代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机构成了“内阁”，不仅负责政治事务，也负责军事行动。古代国家大多军政不分，明确有文武官之分的只有斯巴达。斯巴达人的语言中一定不存在“strategos”一词，尽管它是“战略”（strategy）一词的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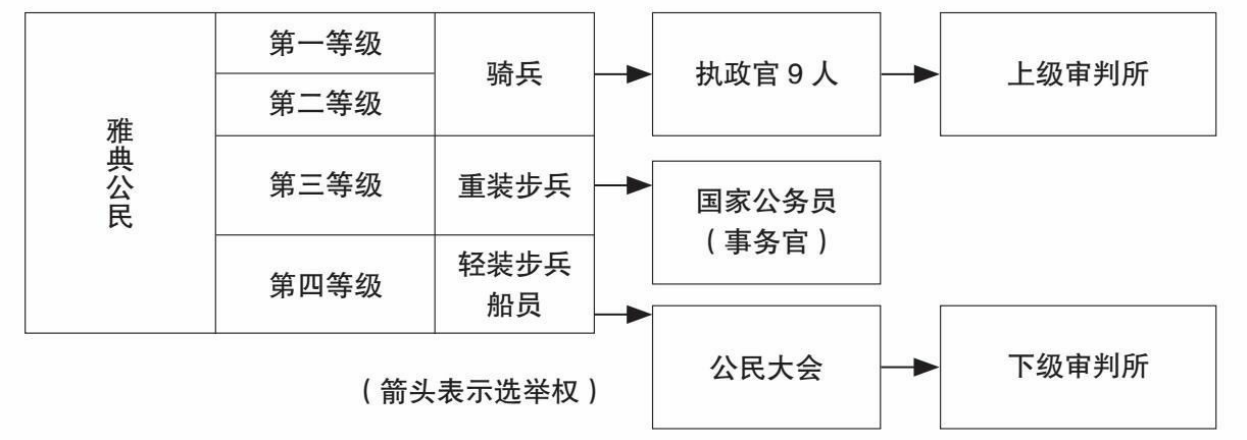


克里斯提尼像（现收藏于美国俄亥俄州事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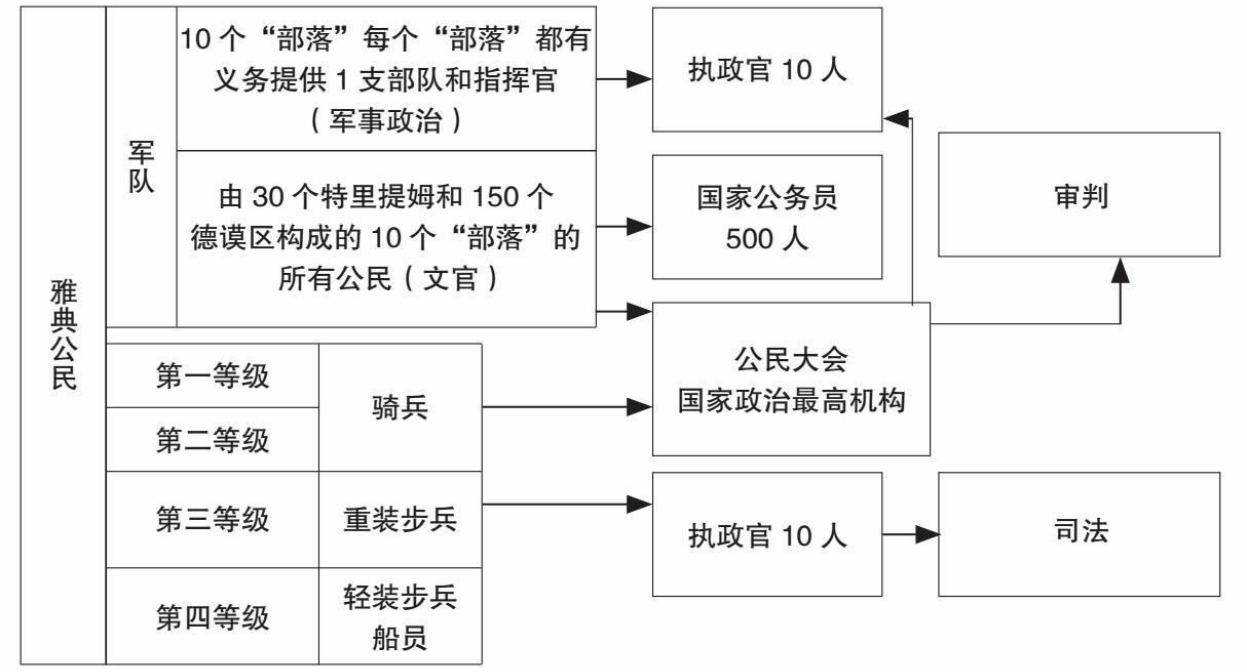
10位将军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只有1年，每年改选，可以连任。只要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论什么等级都可参与投票。

法治国家的政策一定是用法律制定的。法律虽然重要，但如果拘泥于法律，就会成为欧洲人口中的“法律的奴隶”，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克里斯提尼虽然重视法律，却没有固执到不知变通的地步。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08年—公元前322年）



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94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一个机构，叫“布列”（bule），由500人组成。雅典是直接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把公民大会看作下院的话，我认为“布列”就相当于上院，当然它与近现代国家的上院并不相同。我想，它更像是梭伦改革中的事务官僚机构。

构成500人委员会的布列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从10个“部落”满30岁以上的居住者中分别抽取50人构成。

如果你觉得抽签随意性太强，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了解古代雅典人。对于他们来说，抽签意味着神意，是诸神的决定。可以想象，克里斯提尼引入抽签的方法，其目的大概是给所有雅典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吧。

雅典全面负责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是“将军”，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是凭抽签。雅典人在灵活运用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方面，也很有天赋。直接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在雅典长期存在，应该缘于雅典人的灵活机敏，毕竟直接民主政体是一个容易出现麻烦的政体。

亚略巴古作为司法机构，长期被富裕阶层独霸。随着这一机构权力的弱化，梭伦改革中业已存在的“陪审法庭”（eliaia）的作用得以大大提高。“陪审法庭”相当于法院，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于是，与雅典公民相关的民事案件都转到此机构进行审理了。

就这样，人类史上诞生了普通公民也有权参与政治的政体。

“公民大会”（ecclesia）成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公民大会上，20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改革，经过几年时间得以最终完成。这一政体持续了170多年，直到公元前322年。其间虽有过小的变动，但是基本形式保持不变。

公元前322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去世的第二年。亚历山大大帝生前为了东征，曾经对雅典的国家政治不闻不问，任由城邦国家雅典自生自灭。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遭肢解分割，雅典最终沦为马其顿国王的属国，告别了独立城邦国家的历史。

在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改革中，也有昙花一现的内容，那就是陶片放逐。

读者们即使不知道克里斯提尼的名字，对陶片放逐也一定有所耳闻

吧。

---

[1] 为方便表达与理解，本书在提及“tribus”时，使用加引号的“部落”，以示与一般意义上的部落有所不同。——编者注

[2] 住民票是日本记录现居住地的证件。——译者注

陶片放逐

一方面，当时造纸所需的原材料纸莎草需要从埃及进口，非常昂贵；另一方面，雅典的壶和碟子制造业非常发达，人们常常为如何处理陶器碎片而苦恼。

于是，城邦国家雅典采用陶器碎片代替纸张进行投票。每个人自带小刀，在公民大会上将自己的意见刻于陶器碎片上。即使投票的目的不是决定放逐某人，也以陶片（ostracon）为纸进行投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的一大发明。决定是否对某人采取陶片放逐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同于普通投票。

第一，目的明确，只为决定是否放逐某个人。此人有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

第二，以放逐为目的的投票一年一次。

第三，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能少于6000人，少于6000人自动流会，投票无效。

第四，票数超过半数，处以当事人流放国外10年的惩罚。

成为陶片放逐对象的是“可能带来危害的人”，不是“造成危害的人”。

因此，决定是否放逐某人的不是审判官而是公民，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司法问题，而属于政治问题。

遭到陶片放逐的人不是罪犯，因此他们的资产不会被没收，家人也可以留在雅典。只是本人在被流放的10年间不得踏入阿提卡地区。其间他可以指定资产管理人，也允许他让管理人给自己送钱。

要凭陶片放逐一个人，至少要有3000名以上雅典公民以“可能带来危害”为由，将其名字刻在陶片上，因此这样的人一定声名显赫。可以说，遭到陶片放逐，意味着这个人是雅典政界的大人物。

在那个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离开政治中心长达10年，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大大降低。因此，陶片放逐的真正目的大概只是为了让一个人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毕竟放逐本身完全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10年以后，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国内，而且有可能再次当选将军。不仅如此，只要公民大会同意，不满10年也可以回国。这一制度实施了25年以后，遭陶片放逐的人频频出现，这种状况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

对于政治家来说，剥夺10年政治权利的处置相当严厉。那么这一决定是否真的是3000人以上的公民的意愿呢？

举行公民大会如果是为了决定是否放逐某人，参会总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假设投票者的总人数在6000人以上，过半就是3000人以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数，也就是有投票权的人的总数从4万增加到了6万。当然，这个数字是研究者们推算出来的。即便如此，3000除以4万是7.5%。

这意味着史上著名的“陶片放逐”实际上只是有投票权的人中7.5%的人决定的。

克里斯提尼活着的时候雅典从未出现过陶片放逐的牺牲者。但是，从他死后的第8年开始，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遭到陶片放逐。

公元前484年，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普斯。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

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

公元前461年，客蒙。

陶片放逐成了排挤政敌的一种手段。最后一次陶片放逐是在公元前417年。这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对立的两个大人物中必须有一人被放逐。但是两人秘密达成协议，结果被放逐的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雅典公民也许因此觉醒了。这一年后，雅典废弃了陶片放逐制度。此时，从确定陶片放逐制度算起已经过去了85年。

当我看到考古发掘出来的陶片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惊讶于当时雅典公民的识字率竟如此之高。刻在陶片上的不是×或〇，而是人名，甚至详细到某人之子。在采用记名投票的日本，没有人注意过日本的识字率有多高。而且，当今世界采用符号——例如用×或〇等进行投票的国家仍不在少数。2500年前的雅典，应该很少有人为了讨论某项议案或投票而特意前往卫城吧。但是我想，他们个人的智商应该都相当之高。

“弃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联想总是一个接一个，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决定是否陶片放逐某人这一重大议题时，公民大会的参会人数规定在6000人以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决定其他议题的公民大会参会人数要少很多呢？至今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参会人数的要求。那么是不是说除了决定陶片放逐的大会，其余都不要求最少参会人数呢？

在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有一段引导公民进会场的描写。雅典人个性独立，个个能言善辩、伶牙俐齿，一句“开会了，请大家依次入场”，很难让大家老老实实地进入会场，甚至很难说大会几时才能开始。所以，引导者就像羊倌，吃力地把羊群——参会公民赶进会场。这个场面一定非常滑稽。但是根据这一描述，可以推测参会人数应该数千人。

因此，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通常在4000人左右的这一推测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直接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人讨论一个议题时，参与投票的人为有投票权者总数的10%左右。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疑问。我睁大双眼，努力从那个时代的雅典人撰写的作品中寻找有关“弃权”或“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内容。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结果是0。我完全没有看到“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之类的字样。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2500年以前创造了民主政体的雅典人的意识中，既没有弃权之说，也没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想法呢？如果是的

话，我想，也许那些男人是这样想的：

> 公民有投票的权利，但是否行使这一权利是每个公民的自由。
>
> 不行使这一权利，即弃权的话，则有义务服从参与投票的人做出的决定。

因此，雅典人不会把弃权现象看作问题。至于少数人的意见，既然公民大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做出了决定，那就足够了。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过分看重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本身就是反民主政治。而且，未经过认真冷静的思考，就无法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

欧美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欧美，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创造雅典民主政体的人是梭伦。但是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应该是克里斯提尼。

爱琴海上的岛屿希俄斯和距离雅典不远的迈加拉也试行过民主政体，而雅典与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是否确立了民主政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

因为雅典成功确立了中产阶层的地位。最先由梭伦迈出第一步，接着庇西特拉图大大提高了雅典的经济实力，继他们之后的克里斯提尼又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至此，雅典出现了“健全的中产阶层”，他们亲力亲为参与生产。

将领土划成小片，再对小片进行重组，这样的做法缩小了社会差距。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很难实行民主政治，这不只是历史现象，现代

的世界形势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克里斯提尼确立的民主政体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对城邦国家雅典来说，能够在这一时期完成它，犹如神赐一般幸运。如果晚些时候完成，很可能赶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当头之际，也就是波斯入侵之时，那么民主政体很可能毫无用武之地了。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第一次希波战争之间相隔15年时间。

15年足以让雅典公民了解民主政体，足以让他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城邦国家雅典不只是富裕阶层的国家，而且是所有人的国家，足以让他们意识到作为雅典公民，面对入侵的敌人拿起武器不只是义务，而且是责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家，保住自己的工作。

真想对克里斯提尼说一句：“你太幸运了，克里斯提尼先生。”

第一次希波战争爆发的两年前，克里斯提尼在祖国雅典安详地过世，享年73岁。

从流亡到回国，又过去了18年。身为雅典政界的翘楚，克里斯提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私人逸事。他的私生活如在雾中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伯里克利的母亲和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是表亲。

有一些作家认为，评价一个人只需要用“作品”说话，不应该扯上私生活。克里斯提尼与这些作家颇有相似之处。他用他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

波斯帝国

从未有过如此不同的民族书写同一段历史的先例。

波斯人和希腊人几乎都在公元前6世纪崛起。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波斯人和希腊人一直关系密切。到了公元前333年，时任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三世完败于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波斯走向了灭亡。

在此5年前，在与马其顿的交战中，雅典和底比斯联军败北，希腊城邦国家时代宣告结束。

长达200多年的岁月里，专制君主国家波斯和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同生共死。

在公元前6世纪，没有人想到波斯帝国会在25年的短暂时间里迅速崛起，将辽阔的土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其疆域之大打破历史纪录。

公元前539年，尊称为“大王”的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从此，中东全域进入波斯统治之下。

继居鲁士之后，冈比西斯尽管在位时间只有短短7年，但是他只需要继承居鲁士的方针即可。

中近东最先沦陷。于是，以陆地军队见长的国家波斯有了船只——腓尼基人的船只。腓尼基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民族，有较长的海运历史。

公元前525年，埃及沦陷，也被纳入波斯的统治之下。波斯征服中东、中近东以及从埃及到利比亚的北非东半部分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

家，它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东方君主中，波斯国王赢得了“王中之王”的赞誉。

同一时期，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

第三代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6年，共计36年。因其在位时间长，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王中之王”。也是他将帝国首都定在帕塞波里斯。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统治者虽然实行专制君主制，但他们是现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征服，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被军事力量征服的人是否接受胜利者的统治，要看统治者的政治才能。

波斯统治者首先将辽阔的波斯帝国划分成20个行省，分别任命行省总督（satrape），由他们管理各个行省。担任总督的，则是被征服者中的权贵。

这个职位为世袭，总督的后代可以继承总督之位。当然，他能否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则取决于国王的意愿，毕竟波斯是一个君主专制国。

行省总督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但是他们要尽三项义务：

一、参加一年一度在苏萨召开的、由国王主持的最高会议时，必须携带符合臣服之礼的贡礼。

二、各行省用金或银缴纳年贡。没有史料显示年贡具体是多少，想必数额一定不低。

三、“王中之王”御驾亲征之时，按要求提供兵力，由总督本人或行省高官指挥随同作战。

就这样，“王中之王”在实施宽松的专制统治的同时，确保了帝国运行所需的资金来源。也确保了主要战斗力波斯军队以外的军事力量的来源。

波斯帝国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他们的宗教是拜火教。拜火教是一神教，但不强制异教徒改教。因此在波斯帝国，无论是一神教信徒犹太人，还是多神教信徒希腊人，在信仰上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到了大流士一世时代，波斯帝国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

首先，它将临近小亚细亚西岸的萨迪斯收入囊中。萨迪斯是内陆城市，不靠爱琴海。接着，它开通了从苏萨到萨迪斯的公路。

这条路取名为“王之道”，全线用石头铺就，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每隔一天行程建有一个驿馆，人们可以在驿馆换马。200年后，罗马铺设亚壁古道时就模仿了这条路。只是，波斯人建成这一条公路以后就心满意足了，而罗马人却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公路网。两者如此不同，也颇有些意思。大概是因为前者只注重“王中之王”的权威，而后者更看重效率吧。

尽管如此，这条“王之道”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波斯人并不重视这类基础设施，希腊人更无兴趣。对于这条公路，希腊人除了感慨一番，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感慨不等同于关心。大多数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王之道”的真正意义，而这条路的终点就在爱琴海的不远处。

也许他们认为，波斯国王既然已经拥有如此辽阔又肥沃的土地，不可能会觊觎希腊和爱琴海吧。毕竟希腊的土地不仅贫瘠而且狭窄，而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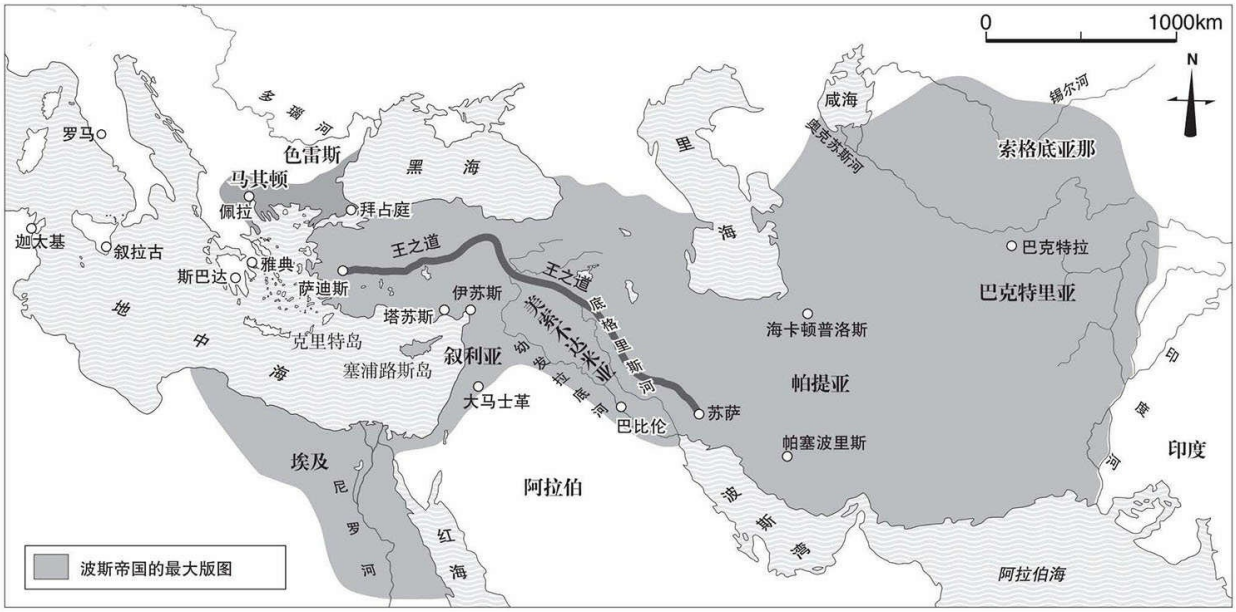
琴海又遍布小岛。

但是，对领土有强烈霸占欲的人不会在意土地是否贫瘠，也不会在意海上的岛屿是大还是小，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掌控所有的土地，否则绝不会罢手。

波斯国王出征时通常会给被征伐国送去一个通告，要求献上“土地和水”。这一要求也充分说明波斯是一个领土控制型国家。

接受这一要求，该国自然成为波斯属国；拒绝这一要求，那就准备迎战波斯军队的进攻吧。

送别公元前6世纪，刚迎来公元前5世纪的这个时期，希腊各城邦国家开始陆续收到通告。此时的雅典在公民的支持下，正在不断巩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成果。



波斯帝国领土和“王之道”

第一次希波战争

古代希腊文明最先诞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哲学家泰勒斯是米利都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也是爱奥尼亚地区的本地人，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出生地是科斯岛，因波斯军入侵，为避战祸，他逃到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并在那里开设了学校。

应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不可能产生于和平之地，因为那里没有来自异域的刺激。身处祖国这一温室中的人不可能创造出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这种文明也不可能自然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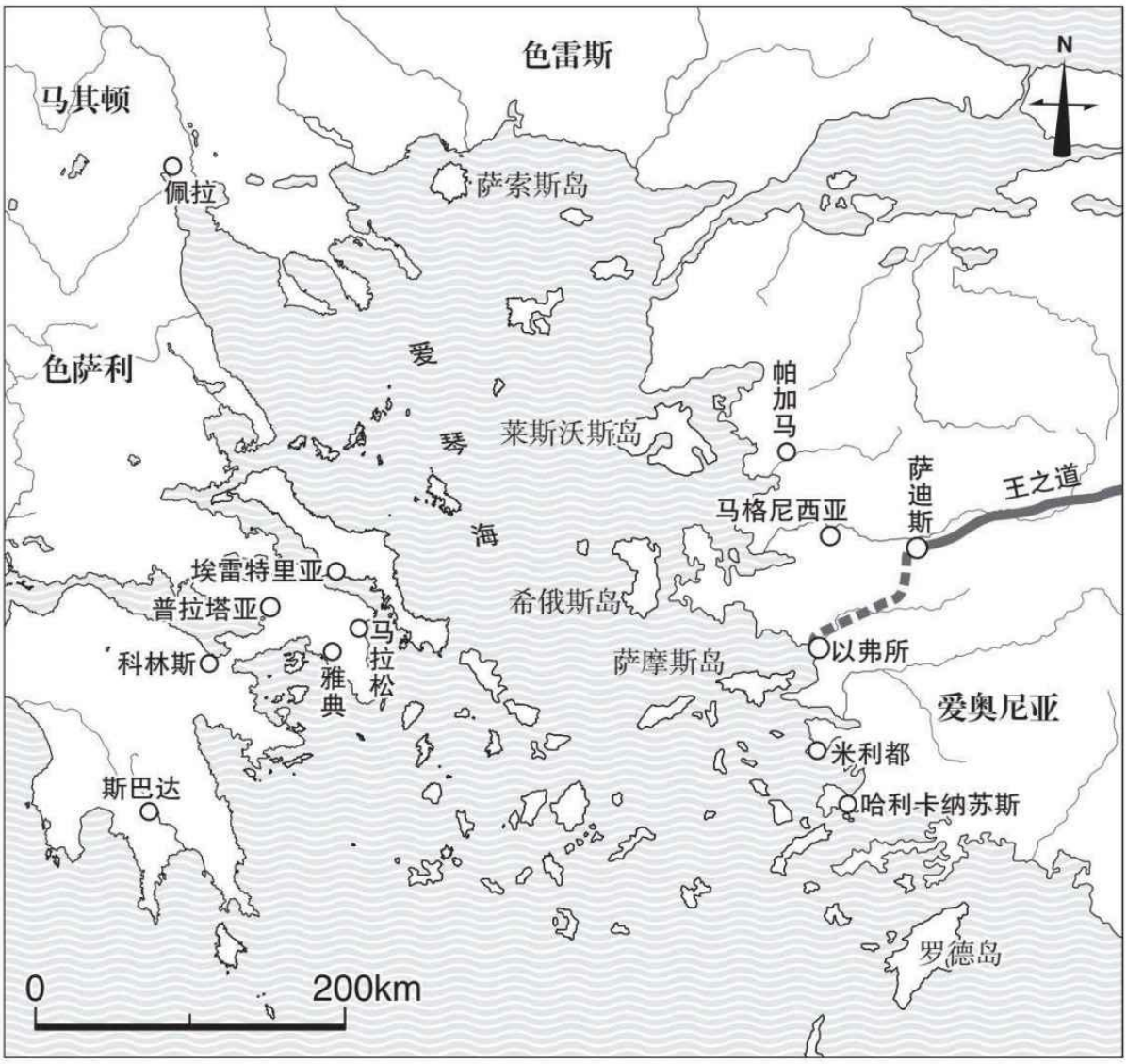
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人是从希腊本土移居过来的，身上流淌着希腊人的血液，他们和埃及交流频繁。当时，埃及是一个发达国家，这里所说的频繁交流主要指生意往来。通过与异域的交流，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大增。

经济实力增强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文明，但是，没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一定不会产生新的文明。

爱奥尼亚地区不同于希腊本土，它在地理条件上有一个很大的劣势。位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各城邦国家面向大海，与海外开展贸易往来十分方便，但时时感受着背后来自领土控制型国家波斯的威胁。城邦国家住民总人数不会太多，即使每个住民的生产力极高，也不会提高人口数量。相反，对领土充满贪欲的波斯，其“能量”是要用“数”和“量”来体现的。

波斯国王大流士成功占领萨迪斯的时候，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

腊人一定意识到了波斯人的入侵绝不会止步于此。他们很清楚，用不了多久，自己的担心就会变成现实。



爱琴海周边

和波斯帝国辽阔的版图相比，希腊不过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尽管如此，大流士还是把目标锁定在希腊，稳稳地踏出了侵略的脚步。马其顿屈服于“土地和水”的要求，成为大流士的属国。波斯征服色雷斯的行动同时进行，虽然稍微花了点儿时间，也成功完成了任务。色雷斯位于爱琴海北部，聚集了雅典富裕阶层的海外资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些雅典人和他们率领的原住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此，大流士不得不派军队进行镇压，最后色雷斯也被置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大流士以萨迪斯为前沿基地，在同时展开的入侵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的行动中，除了色雷斯，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征服行动异常顺利。连接萨迪斯和苏萨的“王之道”让大流士侵略这些地方变得容易了许多。此时的苏萨集中了首都的功能。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这些极尽繁荣，甚至被誉为爱奥尼亚地区珍宝的城邦国家悉数归入了大流士的统治之下。

爱奥尼亚地区成为波斯领土，也决定了那些靠近爱奥尼亚地区的爱琴海群岛的命运。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等纷纷屈服于波斯。接着，大流士把“王之道”从萨迪斯延伸到了以弗所。因为他选中了萨摩斯岛，决定将此岛作为波斯海军集结地。萨摩斯岛位于以弗所附近的海面。

波斯本质上是一个以陆地力量著称的国家，没有海上力量。海上军队也不会诞生于一个没有海运传统的国家。但是，包括腓尼基在内，波斯已将中近东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可以征用腓尼基人的船，连同船员一起。当时，腓尼基人是最强的海洋民族。只是在波斯人的意识里，船只是用来输送兵力的工具，他们从未想过海上作战。

爱奥尼亚地区成了波斯领土，但是居住在此地的是希腊人，他们的想法自然与东方民族波斯人不同。

波斯人重视“土地和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富裕的根本。但是，希腊人认为，即使缺少“土地和水”，依然可以创造财富。尤其是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用贸易促进经济，非常富裕。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的意识中，这种想法更加强烈。

当然，两者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关于这点不同，没有史料可用来参考，只能想象。我想，波斯帝国要求向国王进贡的贡税，会不会是一种直接税呢？

希腊城邦国家都采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制度，按惯例，直接税是以兵役的形式来体现的。但是，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除核心部队以外，其余部分的惯例是，每逢战事临时征集军队。因此，在波斯人的意识中，兵役始终只是附加要求而不是义务。既然不是“义务”，也就不是“税”了。根据波斯国王的要求，各行省总督每年从属下全体公民中征收一定金额的钱献给国王作为感恩之礼，感谢国王允许自己生活在他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进贡只是为了感恩而不是“税”，住民自愿缴纳，是他们作为王国一员主动呈献的。

对于这样一种体系，东方人或许没有异议，希腊人是否很不情愿接受呢？不管希腊人接受与否，我认为这不是制度的优劣问题，只是不同民族的习惯不同而已。

爱奥尼亚地区反抗波斯力量的最后堡垒是米利都。直至米利都沦陷，爱琴海东岸全域进入了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形势变化至此，不可能不影响到雅典，因为雅典和爱奥尼亚地区仅隔着一个爱琴海。此时，克里斯提尼时代已经结束，新一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或许可以说，他们的崛起本身就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侵略的结果。

在雅典，以名门和富裕阶层为核心的集团消失了，但派系依然存在。因为利益集团可以被消灭，不同的想法却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人类本就是喜欢拉帮结派的生物。

想法不同，就会产生对立，对立的阵营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当然，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为了权力本身，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理想。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变成国策从而落到实处，他们需要权力。雅典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没有公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掌握权力。

就在这个时期，波斯的矛头开始刺向雅典的胸口。作为新一代领袖人物，阿里斯泰德当时三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出身名门，曾多次与克里斯提尼并肩作战。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好像没有

经历过青春期就直接长大成人似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另一方面，比阿里斯泰德小6岁的地米斯托克利30岁出头。他出生于雅典，却不是名门出身。非但如此，他的母亲还不是雅典人。他的母亲出身色雷斯，在雅典人眼中只是一个外国女人。而且，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雅典公民。如果身处罗马时代，地米斯托克利大概属于“新移民”（Homo Novus）吧。

此后的20年间，这两人平分秋色，是雅典政界的佼佼者。

研究者把阿里斯泰德和他那一派叫“稳健派”，把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一派叫“激进派”。但是，我总觉得这两个叫法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形。

两人之间的对立缘于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不同。波斯军队入侵时，他们会放下对立的立场，精诚合作，当危机过去，重回对立的两个阵营。

我想，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不同，与先见之明或长远目光似乎并无直接关联。

对于波斯入侵，阿里斯泰德最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就像克里斯提尼尝试过的那样。也许他认为，大流士的征服欲会满足于侵占爱奥尼亚地区、马其顿和色雷斯等希腊北部地区，不会继续南下至希腊中部。当时，斯巴达人的想法也与阿里斯泰德一样。所以在希腊本土，怀着侥幸心理静观其变的态度占据了上风。

我想，这也许就是米利都请求援军支援时斯巴达拒绝的原因，也是雅典只派出20艘大帆船的原因。雅典仅提供20艘船，显而易见是不想刺激波斯。但是，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然而“新移民”的影响力终究太过弱小。

雅典向米利都提供了20艘大帆船。尽管只是区区20艘，但在“王中

之王”大流士看来，这已然表明了反波斯的立场，他绝不会原谅这一行为。萨摩斯岛是波斯运送军队的船只集结地，他决定从萨摩斯岛出发横渡爱琴海，直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因为埃雷特里亚也向米利都送去了增援船只。好像故意让雅典人难堪似的，大流士让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随波斯军队同行。希庇亚斯是被雅典驱逐出去的，让他随行表明征服雅典以后，波斯帝国将把他扶上雅典统治者的位置。第一次希波战争前夜，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

雅典一筹莫展，好在幸运频频降临。

首先，年届六十的大流士大概认为，攻打雅典无须自己亲征，于是把波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两个属下。后来，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凡的双将不如平凡的单将。

国王不亲征，意味着与国王如影随形的1万名号称“不死军”的近卫军精锐士兵也不会参战。“不死军”的意思不是士兵不会战死疆场，而是一旦有人战死即刻有人补充上去，保证1万人的数字不变。这种叫法确实很可笑，但是“不死军”无疑是由正宗的波斯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也许是大流士小看了希腊人，大流士只派遣了小规模的骑兵，远远达不到可称为骑兵团的规模，尽管骑兵是波斯军队的骄傲。在马拉松平原这一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势上，波斯军队未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优势，这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也是雅典的第二件幸运事。

正当雅典被波斯军队逼得走投无路之时，上天恩赐，为雅典送来了一个人。这是雅典的第三件幸运事。

此人就是米提亚德（Militiades）。他和波斯军队交过手，有过和波斯军队作战的经验，熟悉波斯军队。他对波斯怀有强烈的憎恨，是波斯人把他赶出了色雷斯——早已被他当成自己永远的家乡的地方。这些是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经验和经历。

米提亚德也出身雅典名门。他所在的家族和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实力难分伯仲。在雅典人称“僭主政治”时代的庇西特拉图和其儿子希庇亚斯的时代，他与克里斯提尼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僭主政体时代，克里斯提尼选择主动流亡国外，而米提亚德选择了顺从。他迎娶了希庇亚斯的亲戚为妻，多次当选相当于内阁成员的执政官。

波斯帝国的近卫军“不死军”

34岁那年，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因为兄长去世，他接管了曾经由兄长全面掌控的父亲留下来的海外资产。

所谓的海外资产是雅典人在殖民地开垦取得的资产。资产规模大了，就要交给当地的总督进行管理。因此，在位于希腊北部的色雷斯，34岁的米提亚德当上了最东端地区的总督。这里靠近亚欧交界的达达尼尔海峡，也是军事和经济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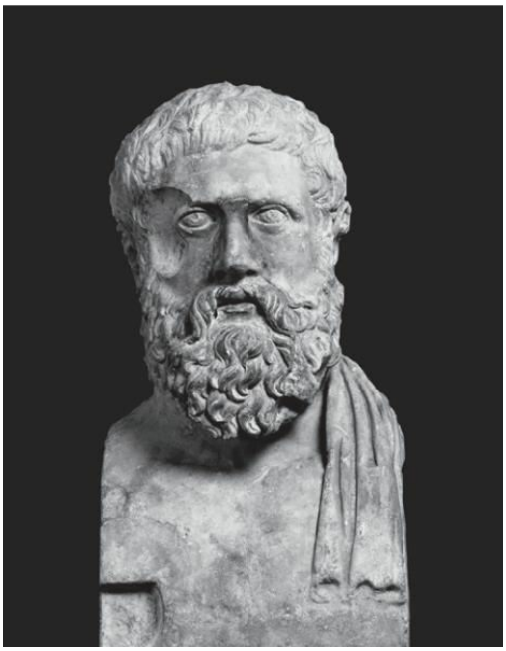
米提亚德在此地生活了25年。驱逐希庇亚斯之后，雅典成了克里斯提尼的天下。虽说已是20多年前的事，但是因为和希庇亚斯的关系，米提亚德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国内。

20多年前，米提亚德来到色雷斯，不久爱上了色雷斯国王家族中的一个女孩子。他与妻子离异后与该女子结婚，生下儿子取名客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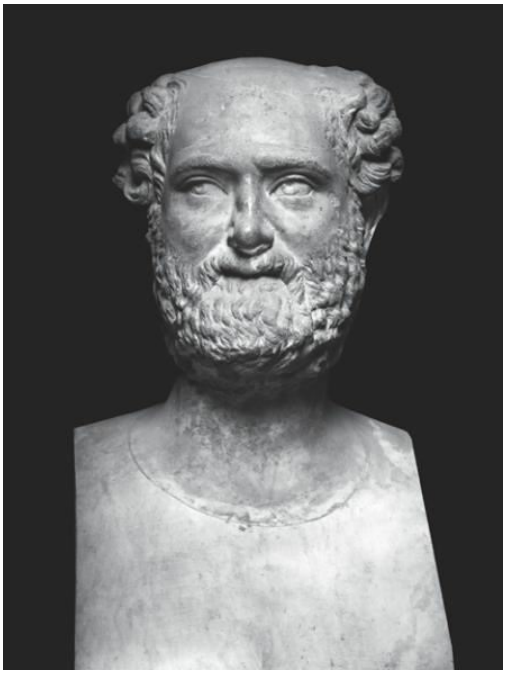
米提亚德在色雷斯生活得非常舒心，然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一纸“土地和水”通告，将他赶出了色雷斯。

最初，米提亚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是，当他看到波斯军队的士兵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源源不断进入色雷斯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波斯国王的真正用意不只是“土地和水”，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

于是，他把所有住民动员起来，不管是来自雅典的人还是色雷斯当地的人，共同抵抗波斯军队。尽管他们英勇善战，但劣势很快显现。他安排了4艘船，让尽可能多的雅典人离开色雷斯回到雅典。公元前492年，米提亚德已经58岁。



地米斯托克利



阿里斯泰德

米提亚德刚回国就遭到了举报。举报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是僭主政体的支持者，尽管这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理由之二是，他在色雷斯实施僭主政治。举报他的是稳健派领袖之一克桑提普斯。稳健派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要一听到僭主政治就心生厌恶。

克桑提普斯因为有一个叫伯里克利的儿子（此时的伯里克利还只是一个3岁的幼儿）才成为历史名人。这样说对他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在后面的介绍中，不再注解“伯里克利的父亲”，而直接用克桑提普斯的名字。他和克里斯提尼同出一门，属于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在这一时期，掌控雅典政界的就是他们。克里斯提尼一贯坚持反对庇西特拉图和其子希庇亚斯实行的僭主政体，因此米提亚德刚回到国内，就遭到了雅典政界大人物的举报。

也许是通过母亲的关系，地米斯托克利了解了米提亚德在色雷斯时

的情况，因为他母亲也是色雷斯人。他决定帮助米提亚德。至于他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又是如何行动的，没有史料记载，只能想象。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是下面这样的。

33岁的地米斯托克利找了年长自己6岁的阿里斯泰德，请求他说服克桑提普斯撤销对米提亚德的举报。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一样，同属稳健派。也许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自己作为激进派领袖公开为米提亚德辩护，不如让稳健派内部消化此事。

两人相差6岁，在世人眼里他们是竞争对手。但是，不知何故，两人虽为竞争对手，一旦需要，却都愿意坐下来对话。这两个男人的性格、想法等也许截然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保障城邦国家雅典的利益吧。

不管怎样，对米提亚德的举报最后不了了之。而且仅仅一年以后，米提亚德就在公民大会上当选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90年的将军。米提亚德未在雅典抛头露面长达25年之久，如果不是稳健派和激进派一起做工作，他应该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得到公民的支持。

决定第一次希波战争走向的马拉松会战，在半年之后的公元前490年夏天打响了。

波斯军队好像全然无视雅典内部的变化一样，从集结地萨摩斯岛出发，一路向西横渡爱琴海，直驱希腊本土。

研究者认为，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希波战争的战争中，大流士侵略希腊的兵力总数为2.5万人是比较可信的数字。2.5万名士兵中，骑兵1000人，运送这支军队的船只300艘，其中超过半数的船是已处于波斯统治之下的腓尼基船。因此，船上坐的是波斯士兵，操纵船只的掌舵手、桨手都是腓尼基人。

国王大流士把总数达2.5万人的军队交给了两个将军指挥。两人没有上下级之分，即他们不是总指挥官和副总指挥官的关系。他们兵分两路，第一路为1万人，由行省萨迪斯的总督阿尔塔费尼斯率领，第二路为1.5万人，由来自波斯的达提斯指挥。这样一来，这两路军队该如何协同作战呢？也许这不是“王中之王”应该操心的事。总之，率领2.5万人前来攻打雅典的波斯军队指挥权压在了两个司令官的肩上。2.5万人，这是希腊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都不可能有的兵力数量。

波斯军队进犯的消息传来时，雅典公民大会刚刚通过新当选的将军米提亚德的提案——要求斯巴达参战的提案。原因是，雅典拒绝了大流士的“土地和水”的要求，斯巴达也拒绝了。

但是，要斯巴达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常常需要漫长的等待。雅典只好先加强自身的力量，第一步迅速组建了迎战部队，由9000名重装步兵构成。率领该军队的是10位将军。与雅典总是保持一致的城邦国家普拉塔亚为雅典送来了1000名重装步兵。

史料中只明确记录了10位将军中的米提亚德和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都参加了马拉松会战，他们分别率领各自“部落”的士兵参战，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将军。雅典的10位将军是从10个“部落”中选出来的，每个“部落”有一位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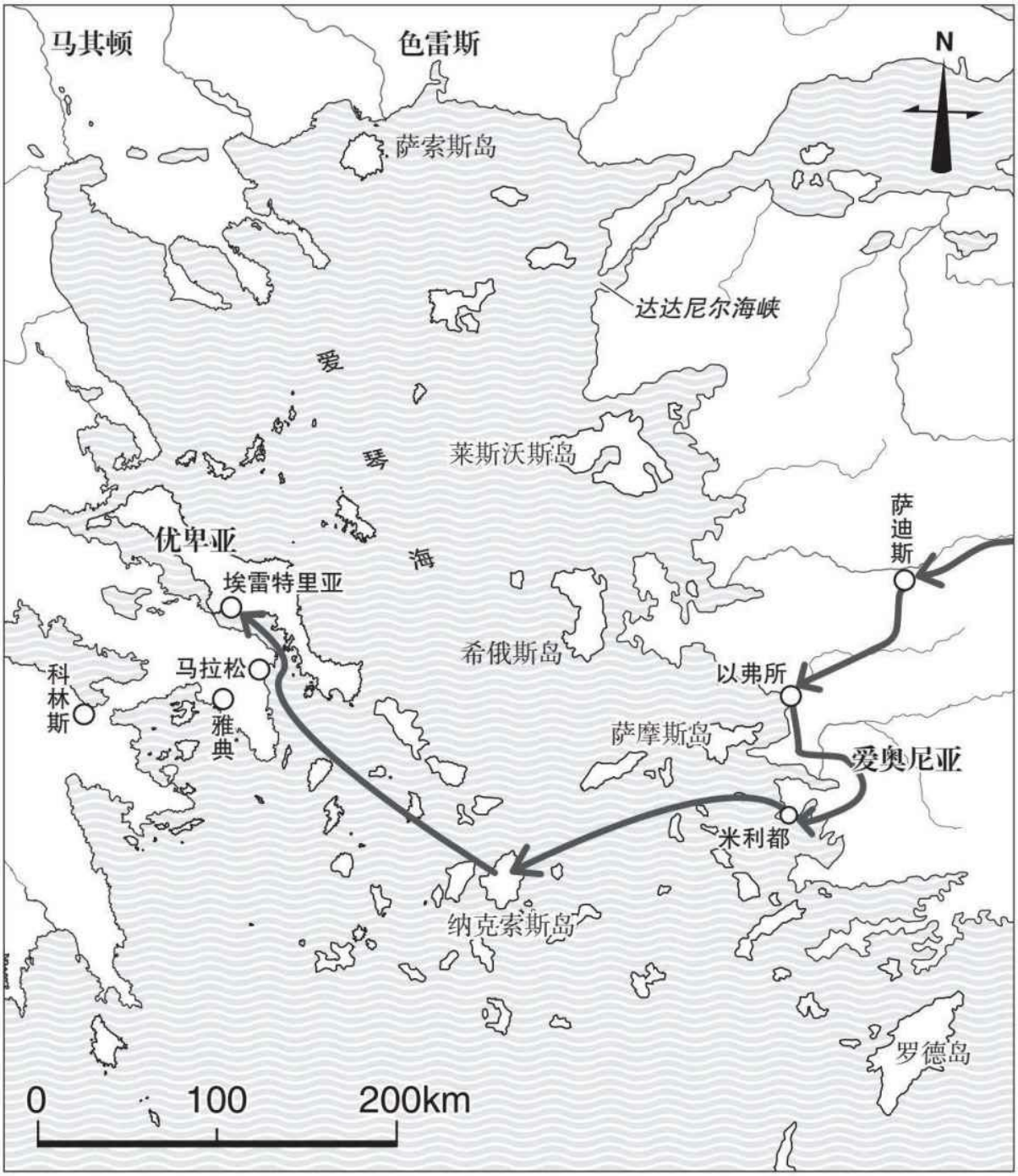
指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斗的结果，而雅典军队中将军多达10人，那么雅典是如何统一指挥体系的呢？

军队组建完成后，率领这支军队的10位将军也准备完毕，只是，雅典不知道应该把军队送往何处迎战来犯的波斯军队。

原因是波斯军队一路向西，中途转道去了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

4年前，米利都人抵抗波斯入侵，最后遭到波斯镇压。在他们发起反击前，纳克索斯岛是他们的集结地。波斯国王大流士对此耿耿于怀，他下令彻底摧毁纳克索斯岛。

一旦波斯军队登陆，纳克索斯岛完全没有胜算。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该岛还是很快沦陷，所有住民沦为奴隶，将被带到苏萨作为送给大流士的礼物。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征服埃雷特里亚和雅典，因此波斯军队决定暂时将他们留在俘虏收容所，待收服埃雷特里亚和雅典之后，再次转道此地将他们带走。



第一次希波战争

波斯军队再次登船前往西北方向。船队航行于爱琴海上直奔埃雷特里亚。城邦国家埃雷特里亚因为派了5艘船支援米利都而激怒了大流士。

埃雷特里亚位于优卑亚半岛。优卑亚半岛与希腊本土之间夹着一个海峡，属于希腊本土。公元前491年秋天，波斯军队成功登陆埃雷特里亚附近海岸。

秋天到来意味着作战季节已近末尾。埃雷特里亚人得知纳克索斯岛民的结局后，拼死抵抗。对于波斯军队来说，攻克埃雷特里亚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埃雷特里亚沦陷后，波斯军队不得不在优卑亚半岛过冬。

这样一来，他们给了雅典强化士兵训练的时间，同时也给了遇事拖拖拉拉的斯巴达做出决定的时间。

马拉松

冬季过去了，公元前490年的春天来临。不管你如何一厢情愿，这一年波斯军队的目标就是雅典。

不清楚这个时候波斯军队的两个指挥官制定了怎样的战术，我们只知道两人没有采取共同行动。

第一路军队负责埃雷特里亚的战后处理，埃雷特里亚也遭遇与纳克索斯岛相同的命运。第二路军队向雅典进发。不清楚第一路军队是打算处理完埃雷特里亚的事情后在马拉松与第二路军队会合，还是计划登陆马拉松后走陆地，在临近雅典的海港法莱隆与第二路军队会合。总之，雅典只知道波斯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在马拉松登陆。

尽管如此，雅典依然不知道该将军队派往何处。总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雅典决定派遣军队向马拉松出发。雅典距离马拉松大约40公里，他们一定是急行军到达马拉松的。走直线的山路更近，但他们却选择了沿海道路，可能是为了监视从海上不断向雅典接近的敌方船队吧。

马拉松平原背后森林环绕。雅典军到达森林一端时，眼前开阔的平原上已经集结了成群结队的波斯士兵。将军们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波斯兵远比雅典兵多，而这还不是对方的全部兵力。雅典军队加上普拉塔亚的1000名士兵，也不过1万人。

当然，波斯军队也很快得知雅典军已经到达马拉松，因为雅典军队没有隐藏在森林之中，而是直接出现在平原上。大概这也是计划之一，让敌人知道自己已经到了。

就这样，两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相遇了。

两军并没有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波斯军队没有动，雅典军队也没有动。也许，波斯方面在等待第一路军队的到来，而雅典方面在等待斯巴达的援军。

对峙状态好像持续了五六天。其间，雅典方面的将军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在这几天里理顺了指挥体系。因为他们知道指挥体系很重要，可能左右战斗的结果。

城邦国家雅典有10位将军，按照规定，每个将军分别担任4天总指挥。这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指挥权也必须平等。

但是，如果忠实于这一规定，那么即使是公认最优秀的指挥官，执掌总指挥权的时间也只有4天，这4天一过，只能等36天后才能再次担当总指挥官。我们不清楚是谁，总之有人认为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人时，没有必要拘泥于法律的规定。

他提出“根据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当然，米提亚德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他是一位率性的人，在战场上是个天才，政治上却有点儿迂腐。当然，这个意见也不会是公认的正义之士阿里斯泰德提出来的。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一定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最后，在此人的提议下，其他9人经过理性判断，做出了决定。

10位将军中的9人将总指挥权“委托”给了米提亚德。注意，这里用的是“委托”，而不是放弃。

于是，尽管雅典在兵力上不及波斯军队一半，但是指挥体系得到了有效统一。

名义上是10人之一、事实上是唯一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在马拉松平原上给其他几位将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决定是

多么正确。

打破两军对峙状态的是雅典军队。

米提亚德在等待斯巴达军队到来。他担心在斯巴达军队到来之前，波斯的两支军队先行会合。于是，他决定用现有兵力与波斯军队决一雌雄。他反复研究战术，并征得了全体将军的同意。

这是波斯军队和雅典军队的一场对决。波斯军队1.5万名士兵，雅典军队包括普拉塔亚的1000人在内，共计1万名士兵。

在对峙的几天里，米提亚德观察分析后认为，这场马拉松会战将是步兵与步兵之间的对决。

骑兵是富裕阶层的角色，所以雅典军队中骑兵数量很少，不能作为主要战斗力量。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始终是重装步兵。

波斯军队非常重视骑兵的战斗力，他们在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战场上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波斯骑兵不仅攻击力很强，灵活性也非常好，他们可以在疾驰的马背上准确射箭。

但是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流士只派出了1000名骑兵，而且在马拉松会战中，这1000名骑兵事实上没有参战。也许是攻陷埃雷特里亚之后，波斯骑兵的大部分编入第一路军队参加全面征服优卑亚半岛了吧。总之，马拉松平原上的波斯骑兵规模很小，不能算是一股战斗力。

同时，米提亚德一定也注意到敌军的1.5万名步兵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他们是轻装步兵。米提亚德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生活了20多年，那里与亚细亚接壤，所以他只要看一眼武器就可以判断出当时的波斯士兵属于什么兵种。

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不同，不仅体现在作战用的剑、长矛或弓箭

等武器的优劣，更在于防御用的头盔、胸甲、护腿、盾等装备的优劣。这些装备可以保护士兵在与敌作战时减少伤亡。

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会战是一场数量占优的轻装步兵和数量处于劣势的重装步兵之间的对决。

我想，以战胜波斯军队为最大目标的战术大概是米提亚德在两军对峙的几天时间里制定的。因为，波斯方面在对峙期间调整了阵形，完全遵循会战的作战常识。

会战中的阵形通常采用左翼、中路和右翼的布阵方式，敌我双方一样。所以，从战斗开始直到结束，战场上始终是我方左翼军队攻打敌方右翼军队，我方中路军队对阵敌方中路军队，我方右翼军队打击敌方左翼军队。

达提斯将手下的波斯军队编成了左翼、中路和右翼，其中，中路的士兵人数最多。大概他设想的战术是由左翼和右翼保护中路，提高中路军队必胜的信心，并在右翼军队和左翼军队的协助下一举拿下战斗吧。

雅典军队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也把雅典军编成了左翼、中路和右翼三部分，和波斯军队一样。只是，各部分的兵力分配和波斯军队相反，两翼人数较多，中路军兵力很少，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

很多古代名将都采用过围歼战术，例如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再后来的汉尼拔，打败汉尼拔的罗马武将西庇阿、尤利乌斯·恺撒等。

只是他们依靠的是骑兵，而米提亚德需要依靠步兵，也只能依靠步兵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想，米提亚德一定召集全体将军举行了会议，在会上做了如下说明，并下达了指令。

敌军和我们相距1400米。

如果快速跑过这段距离，重装步兵必定消耗很多体力，导致在之后的战斗中无法正常发挥我们的战斗力。

波斯军队的弓箭射程最远只有200米。因此，进入弓箭射程距离前的1200米中，我军以正常速度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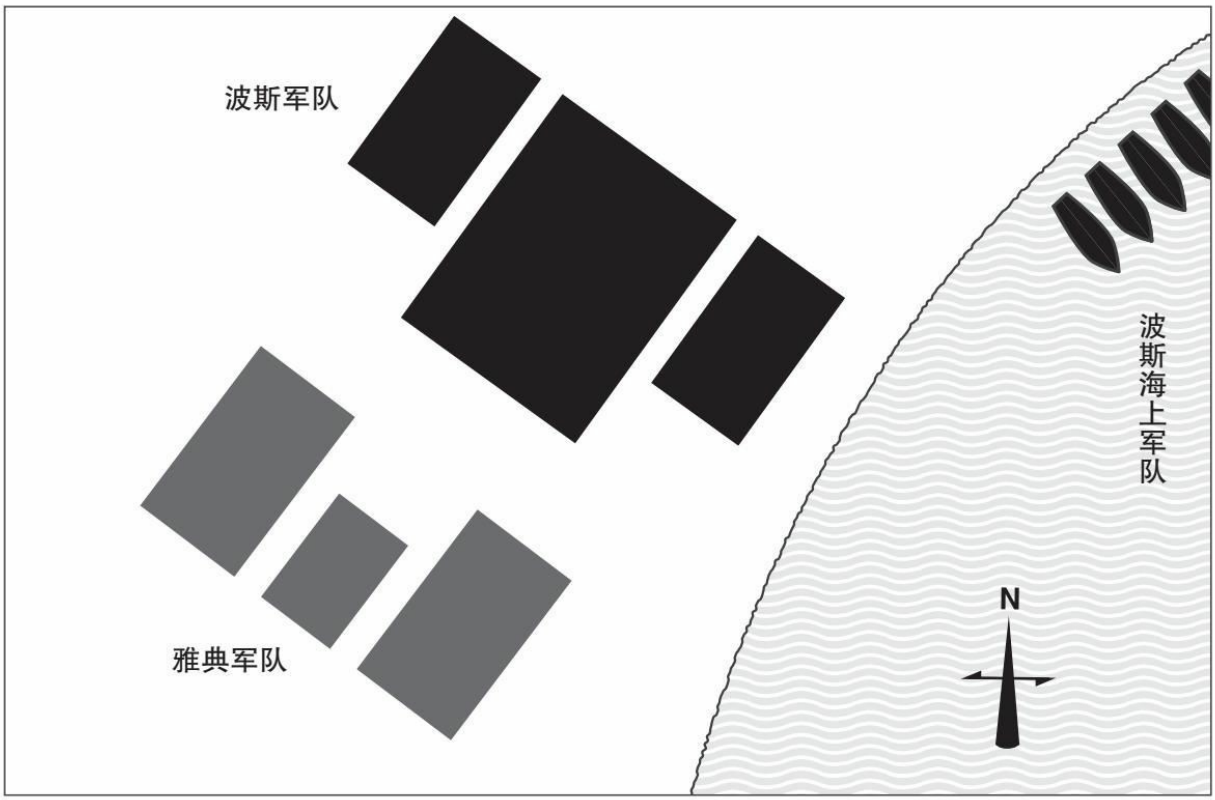
一旦进入射程范围，举起盾牌遮挡敌人射来的箭，同时加快速度，迅速拉近与敌人之间的距离。

我军重装步兵的长矛和剑都长于波斯军队，因此只要开始近距离作战，战斗必将有利于我们。

波斯军队长矛的长度不到2米，雅典军队长矛的长度是他们的2倍。同样，波斯军队的剑长是40厘米，雅典军队的剑长接近波斯军队的2倍。

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上，有一个比赛项目要求运动员身戴沉重的装备绕运动场竞跑若干圈。而这也是米提亚德在马拉松战场上对士兵的要求，不同的只是“选手”负重疾跑是在嗖嗖的箭声之中还是观众的呐喊声中进行。

指挥体系统一了，要有效发挥这一体系的作用，就必须让所有参与者彻底了解各自的行动。在马拉松，最先理解米提亚德战术的自然是各位将军，接着士兵们也清楚并记住了米提亚德的战术。



马拉松会战中的两军布阵图

上图是两军的布阵图示。

雅典军队右侧能看到大海，波斯军队左侧能看到大海，运送波斯军队的船队就停靠在他们左后方的海边等待会战的结果。如果波斯军队在战斗中失利，船队就是他们逃跑的后方。

米提亚德要求雅典右翼军队击破波斯军队左翼后尽快结束战斗，不给波斯军队逃向船队的时间。

卡里马科斯是将军会议的议长，右翼军队由他指挥。因此，马拉松会战中，名义上的总指挥官就是他。因为在城邦国家时代的雅典，按惯例，右翼军队必须由总指挥官率领。

米提亚德亲自指挥左翼军队。他们的任务是攻打敌军的同时，绕到

敌人背后，对敌军形成包围之势。无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最后是中路部分。尽管兵力很少，但是米提亚德要求他们面对五六倍于自己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要顽强作战，绝不能被敌人击破。不仅如此，米提亚德还要求中路部分的军队有序后退，因此任务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不仅要以寡敌众，还要在敌人未察觉的前提下步步“后退”。

中路部分的军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右翼和左翼展开围歼。之所以说中路部分任务艰巨，是因为中路部分一旦崩溃，围歼战也将化为泡影。60岁的米提亚德把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中路部分交给了40岁的阿里斯泰德和3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

作为雅典政界的新生代，正不断崛起的这两个人常常针锋相对，互为竞争对手。但是在马拉松战场上，他们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们只知道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会战发生于公元前490年夏天，详细月份和日期并不清楚。因为关于这次会战，希罗多德是唯一做过记录的历史学家。也许他对战斗发生的时间不太关心吧。近现代研究者认为，战斗大概发生在8月末至9月初的某一天。

战斗完全按米提亚德设想的那样开始、展开并结束。结果是：

波斯军队阵亡6400人。

雅典军队阵亡192人。

指挥右翼军队的卡里马科斯和另一位将军也在192人的阵亡者名单中。因为战斗中，雅典军队的指挥官一定身先士卒。

波斯方面损失的兵力是6400人，在1.5万名士兵中，死亡人数高达42%。雅典方面的损失是192人，在1万人中只占1.2%。雅典军队同时缴

获了波斯军队的7艘船只。

波斯军队的残兵抛下阵亡者，甚至丢下伤员，跳上船仓皇逃离了马拉松。

雅典军队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他们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因为波斯军队虽然败北，但是他们的兵力还有8000多人，而且还有未参加马拉松会战的第一路军队。

一旦波斯第一路军队和第二路军队的残兵会合，尚有近2万人的兵力。这支波斯军队就在雅典附近。

马拉松会战中，雅典投入了全部兵力，因此雅典城内正处于不设防状态。一想到波斯军队可能趁虚而入，将士们哪里还有庆祝胜利的心情。战斗结束后，士兵只休整了一小会儿。

米提亚德留下阿里斯泰德和他的部下负责埋葬阵亡者和安排伤员，自己率领余下全军匆匆回雅典。为了尽快回到雅典，这次他选择走山路。他没有遇到不慌不忙前来支援的斯巴达军队，因为斯巴达军走的是沿岸的路线。

斯巴达军队到达马拉松已是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迟到的斯巴达士兵进入战场后，绕战场走了一圈，看着堆满波斯军队阵亡者尸体的战场，对阿里斯泰德说了这样一句话：“完胜！”

在希腊和波斯的第一次正式会战中，雅典没有依靠希腊最强大的陆战国家斯巴达的帮助，仅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阿里斯泰德全权负责战后处理，他记录下每一位雅典阵亡者的名字，记录下他们所属的“部落”名字之后，将其火葬。波斯没有火葬的习惯，所以处理完雅典阵亡者尸体后，他把波斯军队阵亡者集中埋在了一处。

然而，波斯军队没有攻打雅典。大概是率领第一路军队的阿尔塔费尼斯和率领第二路军队残部的达提斯在马拉松吃了败仗后决定避免冒更大的风险吧。

专制国家的臣子都有官僚习气。如果选择继续作战，万一再次落败，阿尔塔费尼斯会丢掉萨迪斯总督的职位，这可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位。而来自波斯的达提斯有可能脑袋搬家。两人经过考虑，一致决定将埃雷特里亚和纳克索斯岛的住民带到苏萨献给国王，以此减轻大流士的愤怒。

雅典民众得知波斯军队的船队向东离去，这才从心底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希波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发生于马拉松平原的这场战役历史意义巨大。

因为它证明了无敌的波斯并非真的战无不胜。事已至此，波斯国王大流士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这一事实不仅传遍希腊全境，甚至也传到了中东和埃及。

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一个比赛项目叫“马拉松”，此名称就源于第一次希波战争的“马拉松”。

两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

米提亚德在雅典公民中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人记得仅仅两年前，这位马拉松英雄曾经被起诉。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票再次选举米提亚德为次年的将军。

这时，60岁的米提亚德一定踌躇满志。距离被波斯军队赶出色雷斯，灰头土脸回到国内还不到3年时间，从人生最低谷一跃上升到人生巅峰，他一定喜不自胜吧，毕竟他是一个感性又率真的人。公元前489年如常共选出10位将军，但是感觉似乎只有米提亚德一人。雅典公民期待他下次取得更大胜利。

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南部。这里有一片海域，是名副其实的多岛海域，基克拉迪（Cyclades）群岛就位于这里。自北向南，仅著名岛屿就有安德罗斯岛、米克诺斯岛、提洛岛、纳克索斯岛和帕罗斯岛等。这片海域东侧有萨摩斯岛、科斯岛。只要到了这里，爱奥尼亚地区就在眼前了。也就是说，马拉松会战以后，尚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的爱奥尼亚地区和雅典之间，仅隔着几座岛屿。

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这些岛屿几乎都纳入了波斯的统治之下，除了提洛岛和纳克索斯岛以外，几乎所有岛屿都屈服于大流士，成为波斯的属国。提洛岛因为当地希腊人笃信诸神这一原因，大流士没有染指；纳克索斯岛因为和米利都关系密切而明确表示追随希腊，米利都曾经顽强抵抗波斯国王的入侵。结果，拒绝“土地和水”通告的纳克索斯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多数岛民沦为奴隶，不得不离开爱琴海，被送到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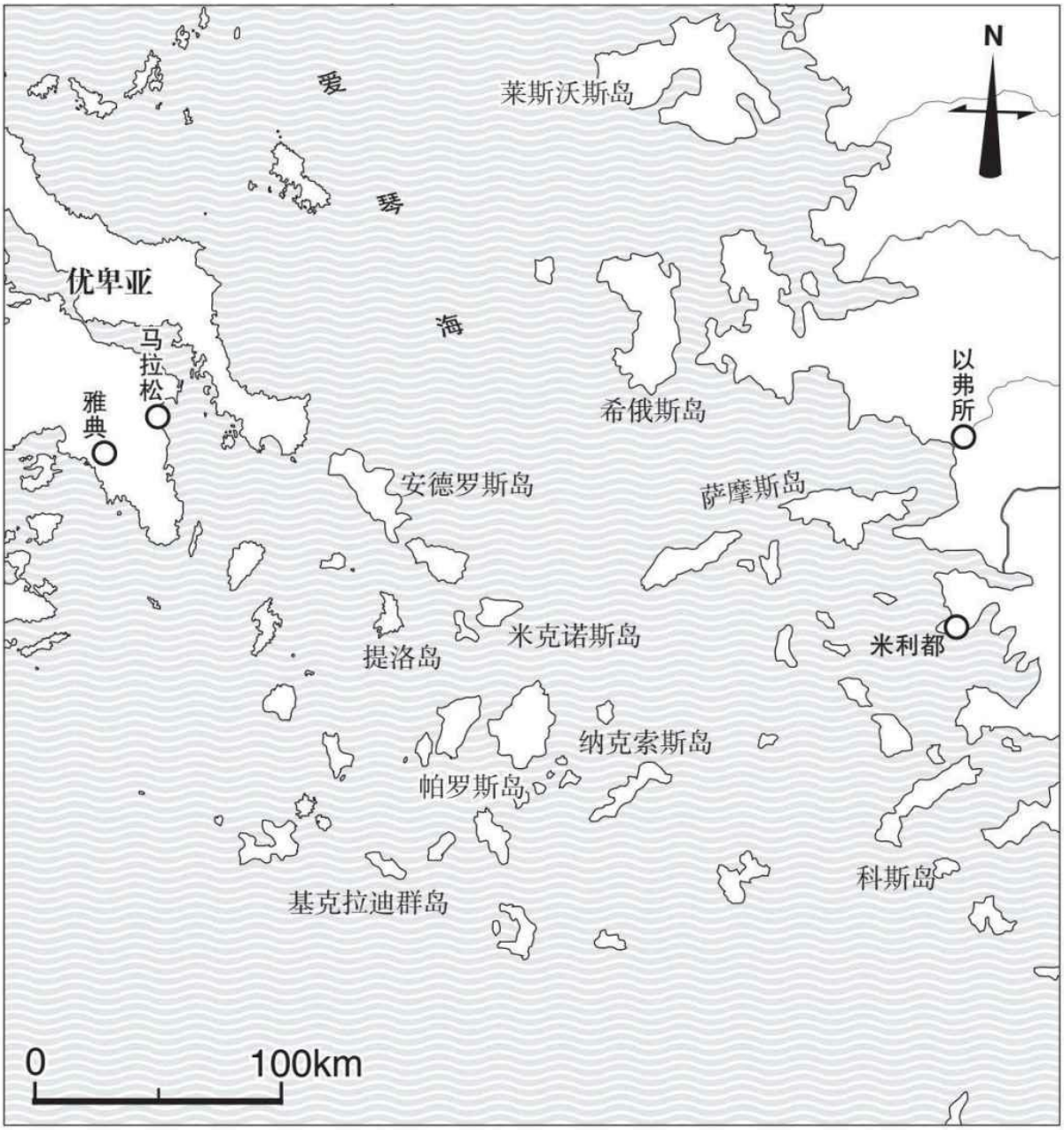
以绝对优势当选将军后，米提亚德决定攻打帕罗斯岛，他要求公民大会提供60艘船。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一要求。帕罗斯岛是基克拉迪群岛之一，距离纳克索斯岛最近，因接受“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了波斯的领土。

目标的选择完全正确。只是，我想米提亚德有些急于求成，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选择了并不正确的战术。

纳克索斯岛遭受的打击绝对是毁灭性的，岛上几乎只剩老幼病残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然坚持拒绝“土地和水”的要求。因此，米提亚德完全可以登陆这个亲希腊的纳克索斯岛，以此为前沿基地攻打相距不足10公里的帕罗斯岛。

然而，米提亚德没有将纳克索斯岛作为前沿基地，而是直接攻打帕罗斯岛。在登陆作战前，他向帕罗斯岛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只要支付100塔兰特，就接受他们重回希腊。

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在一个匠人的月收入为15德拉克马的时代，100塔兰特等于60万德拉克马，相当于4万匠人的月收入。如果重回希腊需要支付如此巨额的赔款，帕罗斯岛民宁可选择继续留在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毕竟，虽然要向国王纳贡，但数额并不大。



爱琴海群岛

攻防战在8月炽热的阳光下展开，不清楚60艘船上乘坐了多少名士兵。

虽说有60艘船，但是当时的雅典不可能拥有60艘适合作战的三层加莱船（trireme），史料中也没有说明是“三层加莱船”，因此很可能是60

艘兼做商船的普通船只。雅典军队登陆帕罗斯岛后，20天过去了，不见有任何进展。

不仅如此，总指挥官米提亚德还受了伤。在马拉松与波斯大军展开激烈战斗时，米提亚德都不曾受伤，而在帕罗斯岛与帕罗斯守军作战时，他的右大腿受了重伤。尽管帕罗斯守军的兵力不足马拉松会战中波斯军队的十分之一。

时间悄然流逝，很快到了秋天。往日的爱琴海总是风平浪静，但是随着冬季临近，天气变化无常，大海常常翻卷起层层波涛，拍击着停靠在悬崖边的船只，不少船只变成了一块块木板。海神波塞冬一旦发起怒来，连众神之首宙斯也束手无策。

米提亚德决定在波塞冬真正发狂之前踏上回程，这一决定正合士兵们的心意。就这样，为攻占帕罗斯岛而来的雅典军队未达目的就撤离了，距离发出最后通牒只过去了26天，除了米提亚德身负重伤，损失倒是不大。这次远征没有造成太多伤亡是不幸中的万幸。

回到雅典，开始接受治疗的米提亚德面对的是自己再度被举报，罪名是“作为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导者背叛雅典公民”。举报者还是稳健派领袖之一克桑提普斯。

克桑提普斯和阿里斯泰德同属稳健派，米提亚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是激进派的领袖，两者的不同在于对波斯问题的认识不同。

马拉松会战之后，稳健派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而激进派从来没有想过用外交手段解决，他们坚信波斯一定会卷土重来。

3年前的举报因为有人暗中做了工作而被撤销。当时是地米斯托克利积极奔走，阿里斯泰德好像也出了力。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过上一次教训，这次进行了公开审理。

米提亚德因受重伤未能出庭。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法庭判他“背叛了雅典公民”而不是“背叛了雅典公民的期望”。公民对他期望很高，因此失望更大，他们把怒气全部撒在了米提亚德的身上。稳健派则充分利用了公民的这种心理。

地米斯托克利极力为米提亚德辩护，他知道，一旦“背叛了雅典公民”的罪名成立，等待米提亚德的将是死刑。他指出，米提亚德是取得马拉松会战胜利的最大功臣。

对此，举报人克桑提普斯疾言厉色地反驳说，在马拉松之战中，阵亡的总指挥官卡里马科斯的功劳更大。

此时，阿里斯泰德就坐在法庭上。在马拉松会战中，他是米提亚德的副将，他很清楚，马拉松会战的战略和战术都是米提亚德制定的。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地米斯托克利拿出米提亚德身负重伤一事，成功减轻了公民大会对米提亚德的处罚，死刑改为了罚款。

米提亚德的罪名是“背叛了雅典公民的期待”，罚款金额是50塔兰特，相当于2万个匠人的月收入总和。要拿出如此巨额的罚款，对于被迫回国、之后又一心扑在研究马拉松会战战术上的米提亚德来说，绝无可能。

米提亚德的儿子、已经20岁的客蒙提出分期缴纳，得到了审判长的同意。

米提亚德得知判决后不久就去世了，因为受伤部位化脓造成全身感染。所以，即使没有这场审判，他也难逃一死。就这样，马拉松之战的英雄离开了人世。

在对待波斯的问题上，激进派领袖只剩下35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了。

而波斯帝国经过马拉松一战，所受打击也着实不小。

在民主政体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统一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专制君主政体下维持一个国家的统一要容易得多，也是大错特错。

自诩“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大流士面前，跪着属国和行省的总督。原因如下：

一、他们认为既然大流士是拜火教至高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在地上的代理，那么他本人也是神。既然他是神，就不可能犯错。因此，只要追随他，自己就是安全的。

二、他们认为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享有无敌之誉，是战无不胜的。因此听从这位波斯国王的命令，就不会有危险。

马拉松会战失利对波斯国王来说，军事上的打击并不大，因为他有能力召集更强大的军队。派往希腊的兵力只有2.5万人，按照波斯当时的国力，即使第二年再次入侵希腊，依然可以派出10倍于此的兵力。因此，大流士受到的真正打击来自上面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马拉松会战的失利打破了“王中之王”“战无不胜”的“神话”。

以雅典士兵为主的希腊军队只有1万人的兵力，波斯大军完败于这样一支军队，导致多于此数10倍的行省住民纷纷揭竿而起。波斯国王大流士顾不上向雅典报仇雪耻，匆匆撤离马拉松。镇压埃及不断蔓延的叛乱，耗费了他4年以上的时间。

公元前486年，不知是否因为操心过度，属国住民暴动的野火尚未完全扑灭，“王中之王”大流士就死了。

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大流士统治时间长达36年。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追根溯源正是由于马拉松会战的失利。他给儿子薛西斯

（Xèrxes）留下了遗言：希腊之仇非报不可。薛西斯是继他之后的“王中之王”。

薛西斯是在33岁那年登上波斯帝国王位的。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薛西斯是个身材高挑的美男子，他血统纯正，是波斯至高无上的国王的最佳人选。

其父大流士虽出身王室，却是旁系。大流士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攀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者居鲁士国王之女，与她结姻后掌握了权力。

大流士的行动力极强，在他的统治下，波斯的疆域版图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形成一个大帝国。儿子薛西斯是他的长子，薛西斯的母亲是居鲁士国王的女儿，因此薛西斯一出生就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此人性格略显温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作为“王中之王”，只要薛西斯在位，就算没有父亲的遗言，他也不可能避开希腊问题。无论入侵方波斯还是迎战方希腊，对他们双方来说，第二次希波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好像为了证明雅典是民主政体国家似的，同一时期，雅典内部的派系之争再次上演。这种派系之争不会出现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却常常可以在民主政体的国家看到。把人类称为“政治种族”的正是希腊人亚里士多德。

在马拉松会战取得胜利以后，雅典出现了四个派系。按当时雅典人的称呼，它们分别是：

阿尔克迈尼翁派：克里斯提尼所属的名门望族领导的一派，领袖有阿里斯泰德、麦加克勒斯、克桑提普斯。

庇西特拉图派：公民组成的派系，他们对曾经的僭主时代心存留

薛西斯

恋。此时的领袖好像是庇西特拉图的孙子希帕克斯。

贵族派：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领导下的人们组成的一派。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可能是那些因波斯军队入侵而失去海外资产的人们。

民众派：地米斯托克利领导下的第三等级中的下层公民和第四等级的公民。

四个派系两两联手合并成两个派系。在民主政体下，这种现象极为常见。就这样，从马拉松会战取得胜利到米提亚德攻打帕罗斯岛的一年里，雅典形成了两个派系：

前两派结成了“稳健派”。

后两派结成了“激进派”。

“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名称是后世研究者为了方便而取的，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称为“对波斯态度缓和派”和“对波斯态度强硬派”。

“对波斯态度缓和派”认为，波斯在马拉松吃了败仗后疲于应付埃及的暴动，因此波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

“对波斯态度强硬派”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波斯迟早会卷土重来，因此极力主张雅典尽早备战。

对立的这两派中，最早受到打击的是“对波斯态度强硬派”。

首先，米提亚德早早退出了这场派系之争。因为攻打帕罗斯岛失利，他回国后不仅横遭弹劾，更因伤势加重不幸离世。

强硬派领袖只剩下地米斯托克利，他一个人要面对四个政敌，分别是阿里斯泰德、克桑提普斯、麦加克勒斯和希帕克斯。

尽管如此，地米斯托克利毫不退缩。他不断在公民大会上、在市场上激情洋溢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与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 波斯必定卷土重来。
>
> 抵御敌人、保护雅典的防线在海上，必须尽快建造战船。

36岁的他慷慨激昂，但是对于他的演说，别说是政敌，就连公民也反应平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自然。

首先，毕竟人类更愿意看到或听到有利于自己的预测。后来，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说过这样一句话：

> 人类并非个个都能正视现实，大多数人只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

其次，马拉松会战的胜利完全是陆上军队的功劳，也就是重装步兵的功劳。对雅典人来说，无论你再怎么坚持，他们也很难理解下次战斗必定发生在海上的说法。

当时的雅典还不是一个海上军事强国。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拥有三层加莱船最多的是科林斯，其次是埃伊纳。包括爱琴海对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在内，雅典只能排在第5或第6位。必要的时候，雅典就

向科林斯请求支援。而拥有战船最多的科林斯，三层加莱船也不足百艘。

地米斯托克利提出雅典必须建造200艘战船，超过科林斯和埃伊纳，成为希腊最强的海上军事大国。雅典公民听闻此言，相信一定目瞪口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

前面已经介绍过，地米斯托克利不是雅典名门出身，按照梭伦改革中的收入划分，其父亲大概属于第三等级，而母亲出身色雷斯，对雅典人来说只是一个外国女人。因此，母亲一方的亲戚都不在雅典。

尽管如此，在雅典，怀抱政治野心的优秀年轻人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名门之女联姻。名门望族无论在知名度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占据优势。庇西特拉图和克桑提普斯都娶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子为妻。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没有选择这条捷径。在雅典，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30岁前，他移居到了雅典的百姓居住区，决定将此地发展为自己的势力地盘。生活在这个区域的都是陶器制造业者，因为需要用火，所以这个区域位于远离市中心的郊外。

年轻的地米斯托克利来到这里后，没有从事壶和碟子等陶器的制造业工作。他是律师，主要为民事案件做辩护，所以他每天都要去市中心的审判所。但是他上下班的时候，很少从家直接去审判所再直接回家。他是一个移动咨询点，经常走进陶瓷作坊，询问匠人的工作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若他们有司法方面的需求，就为他们辩护。像这样，上下班路上他总是走走停停。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地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我甚至想，他是一个善于利用口碑的政治家，可以说，他这样的政治家在古代极为罕见。

然而，当他提出雅典需要200艘战船组建海军时，他的支持者也只

会面露惊讶之色，难以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社会生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其他公民反应无异。

但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勇于坚持的人。面对这一现实，他毫不气馁。因为这些人是雅典公民，就算他们没有能力理解他的政策，至少他们手中握有选票。

排除政敌

公元前487年，地米斯托克利已近37岁。他要采取行动，用强硬手段击垮政敌。

他决定利用克里斯提尼改革中制定的、迄今尚未启用过的陶片放逐制度。

目标是希帕克斯。他是4个政敌中最容易扳倒的人。他曾经是庇西特拉图派的领袖，身上流着“僭主”的血，后来与阿尔克迈尼翁派结盟，成了稳健派的一员。他最容易被扳倒是因为，阿尔克迈尼翁派的人一听到僭主的话题就会备感警觉。如果说希帕克斯企图复辟僭主政体，那么，他们不会在他被陶片放逐时施救于他。

陶片放逐的投票结果不出地米斯托克利的预料。就这样他少了一个政敌。

重申一下，所谓的陶片放逐既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没收他的财产，在他流亡期间，家人可以留在雅典。对被放逐者的唯一要求是他要在国外生活10年，其间不得回雅典。不用说，离开雅典政界10年，他的影响力必将大大弱化。

第二年，即公元前486年，地米斯托克利再次利用了陶片放逐制度。

这次的目标是麦加克勒斯。作为政治家，此人能力有限，但他是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直系后代。他被陶片放逐的理由是秘密串通波斯国王。

与地米斯托克利的“对波斯态度强硬派”不同，麦加克勒斯既然是“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一员，同波斯之间有联系本无可非议。但是，作为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麦加克勒斯的政治才干并不出色，在市民中的声望也不高。我想，或许这才是他被轻松搞垮的原因吧。就这样，地米斯托克利的第二个政敌退场了。

前面提过，陶片放逐制度一年只能行使一次，而且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其中过半数的公民在破碎的陶片上刻下同一个人的名字，陶片放逐才会生效。

建立陶片放逐制度的是克里斯提尼。他的目的是防止雅典重回僭主政体，保证自己的改革成果——民主政体在雅典落地生根。他一定没有预想到，这一制度会成为地米斯托克利排挤政敌的手段，我想，当时有思想的人必然对此忧心忡忡。

利用这一制度成功排除了4个政敌中的两人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采用同一手段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原因如下：

第一，陶片放逐一年只有一次，如果每年都有政敌遭陶片放逐，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公民识破自己的“真正意图”——排除政敌。

第二，已退出雅典政治舞台的两个人在雅典的影响力较小。与他们相比，留下来的克桑提普斯和阿里斯泰德的势力要强得多。要想用陶片放逐制度来解决这两个人，需要慎之又慎。

第三，排除两个政敌后效果已经显现。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即逐步增加新建船只数量。当然，这个数目距离200艘的数字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雅典造船能力开始稳步提高。地米斯托克利要求的不只是船只的数量，还有质量。这一切也在逐渐成为现实。他需要将精力投入造

船事业中，因此暂停了与政敌之间的争锋。

希腊的地势不适宜骑马出行，适合乘船出行，后者轻松得多。

雅典人一出生就与船和大海为伴。对他们来说，船和大海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对船和大海的熟悉程度是斯巴达人难以想象的。只是，他们看惯的是运送人或物产的商船，不是战船。商船和战船绝不能相提并论。

为了运输更多的商品，商船越大越好，船身越轻越好。当时，包括贸易大国腓尼基、农业大国埃及以及希腊各城邦国家在内，几乎所有船只都是商船。本书的重点之一、历史上第一场海战“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后来，在那之前，古代世界里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因此，这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船就是商船，也就无可厚非了。

船一旦用于军事目的就完全不同了。

在陆地上作战，没有一个总指挥会选择一望无际的平原作为战场，无论他带领的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因为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胜利，必须集中使用兵力。

而兵力处于劣势的军队，总指挥在选择战场时更需要慎之又慎。

理论上，海战也一样。选择辽阔的海面作为战场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作为海战战场，海域的宽窄也是左右战斗结果的重要因素。

爱琴海上风向多变，在爱琴海上选择狭窄的海湾作为战场时，不仅要考虑风向，还必须考虑海潮。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雅典建造的三层加莱船体积小却很重。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将风向和海潮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海战开始以后，船上的所有船帆都要落下，仅靠划桨接近敌人。因此，大型船

只虽然适合在辽阔的海面航行，但在海战中，它的优势难免会变成劣势。

波斯没有海运传统。波斯需要从其属国腓尼基或埃及征调船只为自己的入侵服务。但来自腓尼基或埃及的船只不仅大，还很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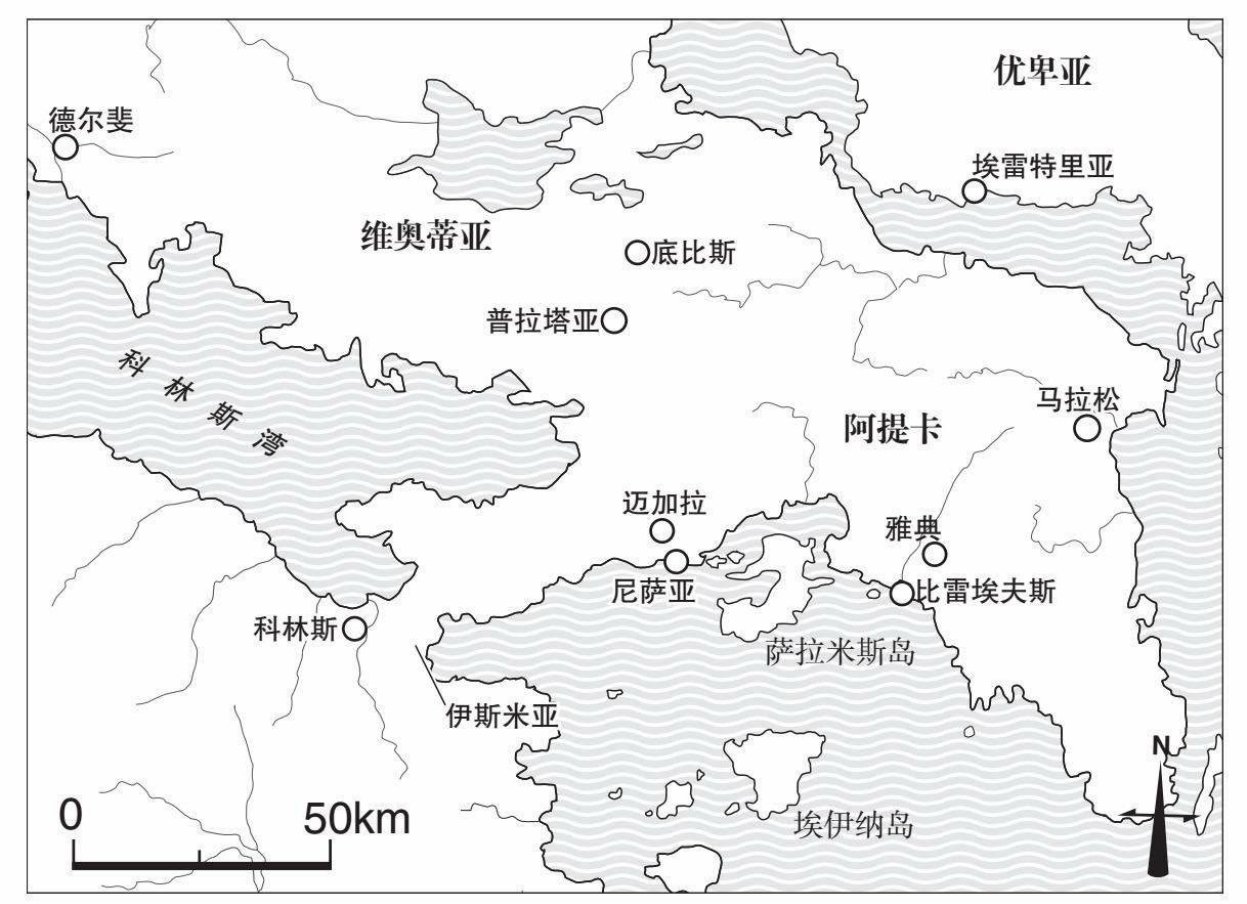
已经39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很有远见，还很重视当下。

最初，他告诉公民波斯一定会卷土重来，极力主张雅典建造200艘新型战船。而此时，他改变了策略。曾经，他力图让人们意识到未知的危险，现在，他提示人们注意眼前的危险。

萨拉米斯岛往南不到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岛屿叫埃伊纳。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中，该岛的整体实力属于中等。但是，作为海运国家，它的实力远在雅典之上。

自从雅典占领萨拉米斯岛以后，埃伊纳人不再掩饰他们的危机意识，他们明确站到了波斯阵营中。

这意味着距雅典不足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波斯的同盟。雅典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土地和水”的通告，埃伊纳却接受了通告。为此，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它们进入了战争状态。



雅典及其周边

这场战争的结果很不确定。因为雅典输送士兵前往埃伊纳岛的船只有40艘，加上科林斯支援的20艘，总共不过60艘。而埃伊纳岛作为一个先进的海运国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组织起60艘船的船队。

要攻占漂浮于海上的岛屿，船只必不可少。船只不仅要运送士兵，还要运输粮食。

在公民大会上，地米斯托克利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提醒公民雅典面临的危险，再次强调有必要建造200艘战船。

这次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民大会的重视，公民们在会上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然而，“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壁垒实在太坚固。

大流士死了，继承波斯王位的薛西斯是位绅士。也许，稳健派领袖比以前更固执地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吧。他们极力反对建造战船，理由是此举只会刺激波斯国王采取行动。

公元前484年，地米斯托克利40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请求公民拿起陶片，实施陶片放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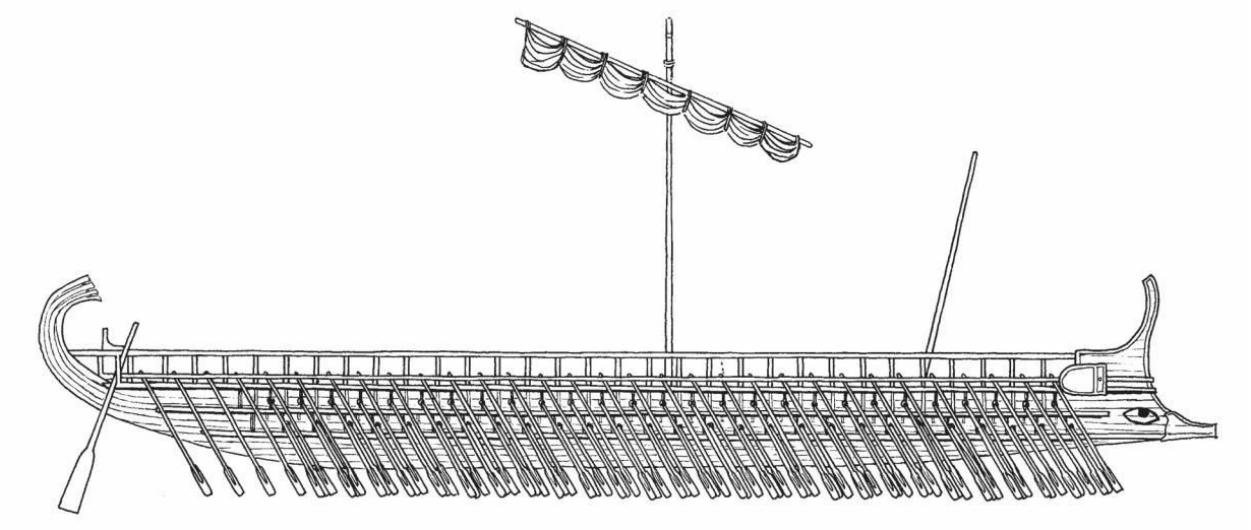
他的目标是克桑提普斯，理由是克桑提普斯在与埃伊纳岛的作战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

36岁的克桑提普斯率领雅典军在埃伊纳岛作战，前一年回到雅典。因为一直未能解决埃伊纳问题，公民对他极其不满。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陶片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完美的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此时11岁，成了被放逐者的儿子。

因为陶片放逐了克桑提普斯，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建造100艘新型战船的提议。

当然，说是“新型战船”，其实并非建造全新的船只。

所谓的“新型战船”，只是三层加莱船的改进版。船身得以加固，同时为增加船只重量，船底装了很多石块。



雅典新建船只“三层桨大帆船”

石块堆放在船底，容易造成船只重心不稳。因此，石块的堆放必须认真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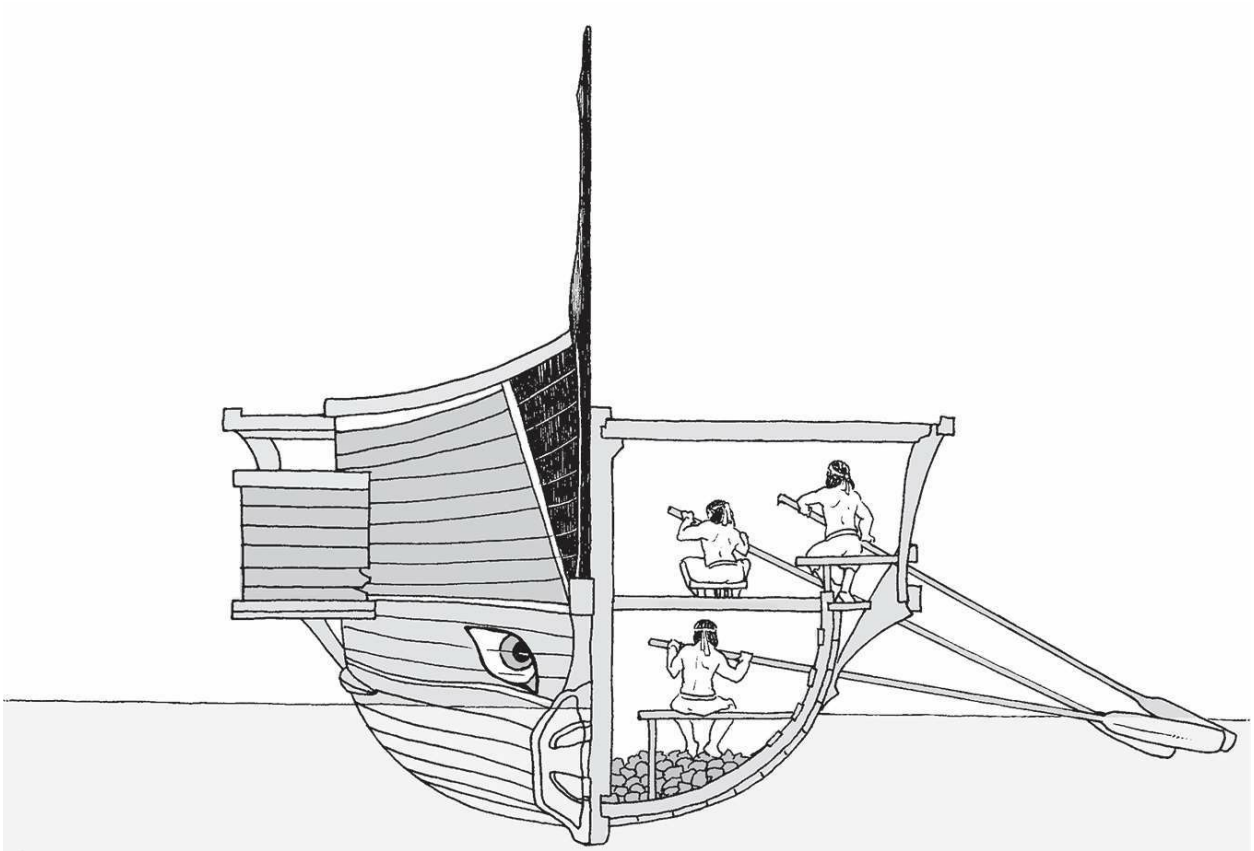
堆放好的石块要固定，不能随着船身的晃动而来回滚动。

船只重量变了，自然需要训练船员适应这种重量。

地米斯托克利设想的“建造新型战船”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包括他一直以来的全部设想与智慧。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意识中，这就是未来雅典的海上力量。

地米斯托克利和反对他的稳健派之间真正发生冲突，是在两年之后。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在雅典附近的拉夫里翁发现了银矿。围绕银矿收益的使用问题，双方的对立显现出来。

42岁的地米斯托克利理所当然地认为银矿的收益应该全部用于建造200艘新型战船。



新建“三层桨大帆船”的桨手和堆放了石块的船底

阿里斯泰德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他以前只让年轻的克桑提普斯出面，自己在后面运筹帷幄。克桑提普斯遭到陶片放逐之后，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了。他提出，来自拉夫里翁银矿的收益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雅典公民，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要求公民赞成自己的意见或阿里斯泰德的意见，他让公民们用陶片放逐的办法来做选择，即在公民大会上，只要阿里斯泰德的意见遭否决，他将自动被陶片放逐，这样就可以排除阿里斯泰德了。

陶片投票的结果是阿里斯泰德遭陶片放逐，尽管他提出的意见对公民有利。

公元前482年，波斯国王终于结束镇压埃及的叛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攻打希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终于愿意认真倾听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了。

关于这一年的陶片放逐现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写过这样一段逸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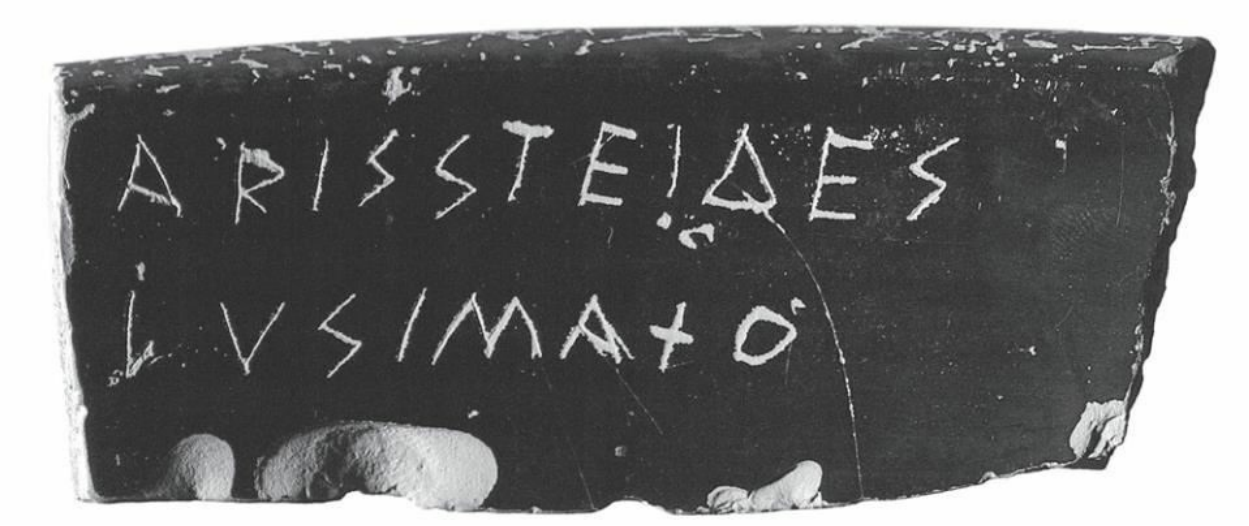
> 陶片放逐现场，一个男人叫住了阿里斯泰德。此人很可能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总之他不认识阿里斯泰德。他请阿里斯泰德帮忙，说："你能帮我写一下阿里斯泰德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
> 阿里斯泰德问他："阿里斯泰德做了什么坏事？"
>
> 男人摇摇头回答："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说阿里斯泰德是正义之士，让我很烦。"
>
> 阿里斯泰德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他。这一年，阿里斯泰德被赶出了雅典。

只看这段逸闻，你一定会认为陶片放逐制度是一个相当不严肃的制度。

但是，普鲁塔克是个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希腊人。他是一个乡绅，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即五贤帝时代，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无须担心生计。因此，缺少危机意识也属正常。

普鲁塔克给了阿里斯泰德极高的评价，而阿里斯泰德本人大概比任何人都看重"正义之士"这一评价吧。作为超级名门又超级富裕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他本人并不富裕，可以说他是在贫穷中度过一生的。如果在那个时代，雅典的选举口号是"宁选众望所归之人，不选一

心向权之辈”的话，大概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可以超过阿里斯泰德成为“众望所归之人”。



刻有阿里斯泰德名字的陶片

相反，地米斯托克利却是“一心向权之辈”的典型。作为政治家，他可以列举一件件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的例子，提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雅典应该如何应对，每一个公民应该怎样做。

雅典公民不可能人人都识字。但是包括这些不识字的文盲在内，大多数公民此时已经意识到在遥远的地平线彼岸，波斯军队正蠢蠢欲动。于是，他们果断选择地米斯托克利，放弃了阿里斯泰德。因为此时公民心中都已有了危机意识。

相差6岁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尽管想法和做法截然相反，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作为政治家，两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雅典，担任公职没有报酬，自然没有通过为国家服务来挣钱的概念。因此雅典不会发生有人因贪污公款而被起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未

想过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但是，因滥用公款罪被起诉的事情是有的。滥用国家的钱意味着滥用政策，因为滥用政策而给国家带来危害，就是所谓的滥用公款罪。

至于陶片放逐，先不论这一制度的好坏，用这一制度来惩罚“还没有带来危害，但是有可能带来危害”的人，说起来也算是一种预防措施。

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做政治领袖是要付出代价的。小林秀雄也写过这样的话：

> 我不知道修昔底德的《历史》讲述的是怎样一种情形。
>
> 至少《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都是政治家。当然，作者（普鲁塔克）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想法，即政治家类型的人。他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德又有行动力的人必定是政治家……
>
> 政治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何种情形，看上去似乎都在展示各自的一切经验……
>
> 像空谈政治和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
> 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说，如果拘泥于条条框框，就无法理解生活在古代的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心体会他们的“全部经验”，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他们。
>
>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我们不用21世纪的现代眼光去看他们，只要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人追忆2500年前时，用心体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离开后，雅典全力以赴投入建造新型战船的工作。200艘船一艘接着一艘下水了。

造船体制已经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成200艘船即大功告成。造船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必要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建造新的船只，同时也方便改造和维修已投入使用的船只。造船体制一旦确立，造船工人必须常驻船坞。

随着新建战船的增加，对船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在操控战船的船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桨手，对他们的需求量也最大。

桨手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马达。船只扬帆航行会受到风向的左右，而靠人划桨前行则自由得多。海战中，敌我双方交战前需要降下船帆，依靠划桨接近敌船。因此，确保有经验丰富的桨手就成为重中之重。

在东方，桨手通常是奴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帆船为主的时代。但是在古代希腊，自古以来桨手都是自由公民。因为希腊是城邦国家，人口较少，一旦战船接近敌船，双方的桨缠在一起，桨手就要弃桨拔剑，变身为一名战士。

梭伦改革中，无资产者被划归到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正是这一等级的公民在地米斯托克利组建的雅典海上军队中担负起了桨手的重任。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让这些雅典无资产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让他们有了保卫国家的意识。

新型战船建造体制确立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着手改造雅典政体。在所有政敌都被铲除的此时，公民大会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尽管如此，他依然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改革。理由有二：

第一，地米斯托克利不像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他无意成为一名改革

者。

他的心思只在一件事上，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即如何迎战即将来犯的波斯军队。

如何解决眼前的根本问题可能影响到“百年大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当时，雅典面临第二次希波战争。因此，当时地米斯托克利的唯一目标就是战胜波斯。

第二，地米斯托克利从心底里感谢雅典的现有体制，即民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的政体，像他这样出身在普通公民之家又没有太多财富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如今的地位的。他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受益者。

需要强调的是，与出身名门、资产丰厚的前辈改革者一样，他意识中的“民主政体”不是唯心的“主义”。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一种“手段”，是最大限度运用城邦国家雅典的资源，即运用每一个公民力量的手段，这种政体远比君主政体、僭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高效。

在雅典，领袖人物可以提出法律和政策，他们同时又是创造逻辑学和修辞法的希腊人，他们可以运用这些技能来引导公民。

但是，决定“同意”或“不同意”的始终是公民大会，年龄在20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也就是说，你可以运用你的语言能力来引导公民，但是，最终决定权仍在公民大会。

因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直接民主政体的基础。

然而，“形式”上的民主政体和这种形式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民主主义来说，最大的敌人是“不作为”，是“没有结果”。因

此，在尊重民主政体的前提下，地米斯托克利想到的、请求公民大会做出决定的是具体的对策，即面对波斯军队的入侵，在维持雅典民主政体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这一政体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雅典的最高官职叫执政官，那是梭伦改革的产物。梭伦改革根据公民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也就是富裕阶层。因此，当选此官职的人一定属于这两个阶层。

克里斯提尼推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保留了执政官的职位，新设了将军一职，被选举权属于全体公民。执政官有9人，将军有10人。由于新设将军这一职位，相当于雅典“内阁”成员的执政官的影响力和权力大大缩水。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进一步削弱执政官的权力，一改以前的选举方式，用抽签的方式选出9人执政官，从而使这一机构变得有名无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议。

“选举”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而“抽签”在希腊人的意识中是神意。将“选举”的方式改为“抽签”的方式，就缺少了要求当选者承担责任的依据。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抽签方式仅用于选举行政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选举“官僚”。地米斯托克利将抽签方式用在了任命执政官上，因此，执政官必然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还要求公民大会修改将军制度。

我想他或许是在马拉松会战中受到了启发吧。因为他本人作为将军之一参加了马拉松会战。

随着执政官权力的丧失，将军开始全面掌管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和军事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在这一政体下，10位将军权力均等。战时，10人轮流担任总指挥官，每人4天，依次轮换。由此可见，这种体系下责任很不明确。

如果囿于这种体系，那么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统一指挥体系就是一句空话。

在9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除米提亚德以外的9位将军（包括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将自己的4天总指挥权委托给米提亚德，从而解决了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也因此取得了希波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地米斯托克利不曾想到当时的应变方案还会再次被用到。当时大家主动让出总指挥权。既然是让出，就会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既然10人平均享有4天总指挥权，难免有人拒绝让出这一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这样的假设完全可能变成现实。于是，他考虑将“主动出让”变成“法律要求”。

他提议增设“首席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总理大臣，从10位将军中选出1人担任。余下9人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9个大臣。该内阁任期内发生的任何问题由首席将军负全部责任。战时，首席将军为最高指挥官。

在民主政体的雅典，10位将军的任期是1年，首席将军也是将军，因此任期也是1年。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上述所有提议，公民大会都以多数票赞成通过。

地米斯托克利就任下一年度的首席将军。

选举他出任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不是通过掷色子决定的。

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雅典人得知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军队离开首都苏萨，正在向西行进。

波斯国王率领军队沿着“王之道”这条波斯唯一全线铺设的道路一路向西，到达终点萨迪斯时一定已进入秋季。因此，可以推测薛西斯离开萨迪斯向希腊发起总攻的时间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前480年的春天。

可以预测，入侵的波斯军队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支大军攻打敌国，粮食补给必不可少。要在敌国筹措如此大规模的军用物资，即便对于“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来说也绝非易事。

而且，波斯国王的目标是将埃及和中东全境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他不可能把精力一直耗在这里。国王一定希望尽快拿下希腊。

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上述种种情况，于是主动提出担任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

39岁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决定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80年将希腊全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与此相对的是，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决定在公元前480年击退波斯军队的进攻。

迎战的准备工作在雅典如火如荼地展开。

造船厂满负荷运转。以最高指挥官为首，下属9个指挥官（将军）的统一指挥体系已经确立。以重装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陆上军队集合完毕，因为这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这些事情安排好之后，地米斯托克利提请公民大会决定可否召回被放逐者。

他说，国家正当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全体公民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提议召回因陶片放逐而流亡国外的人。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他的提议。

3年前被放逐的克桑提普斯和1年前遭放逐的阿里斯泰德因此回到了国内。

这二人是强硬的“在野党”，政策方面总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反调，但是要说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担任将军。

地米斯托克利开了一个先例，即被放逐者一旦回国，不管还差多久才满10年，统统一笔勾销。

不管怎样，面对一心想征服希腊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希腊方面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说此时正值雅典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并不夸张。

战争前夜

波斯国王薛西斯要求此战必须获胜。

10年前，只因为在马拉松会战中战败，他的父王大流士不得不在其后的4年时间里为镇压巴比伦和埃及的叛乱而殚精竭虑，而且，镇压行动并没有因大流士的去世而结束。薛西斯继承的不只是王位，还有叛乱。这位坐拥疆域从中东到埃及的大帝国波斯的国王，最终得以腾出手来准备攻打希腊，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以后了。尽管在波斯人的眼中，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

薛西斯需要承受父亲大流士不曾感受过的压力。

他是尊称为“大王”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居鲁士的亲外孙，他的母亲是大王居鲁士的女儿。仅此一点，在波斯帝国臣民眼中，他就是波斯国王——“王中之王”的最佳人选，波斯帝国的王位非他莫属。

鉴于这一背景，他自然不能输给“一把小麦”。对于这位温和且富有人情味的东方贵公子来说，入侵希腊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39岁的薛西斯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他首先确保父亲大流士在10年前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征服的地区的稳定。

爱奥尼亚地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面向爱琴海，因为距离波斯前线基地萨迪斯较近，在马拉松之战后依然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距离米利

都不远的萨摩斯岛上一直驻扎着波斯船队。这意味着爱琴海东侧全域依然是波斯的领土。

同样，位于爱琴海北侧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在这10年间也一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他们接受波斯国王送来的“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为波斯的属国。

因此，希腊人生活的地方，即希腊世界的东部和北部，在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之前已经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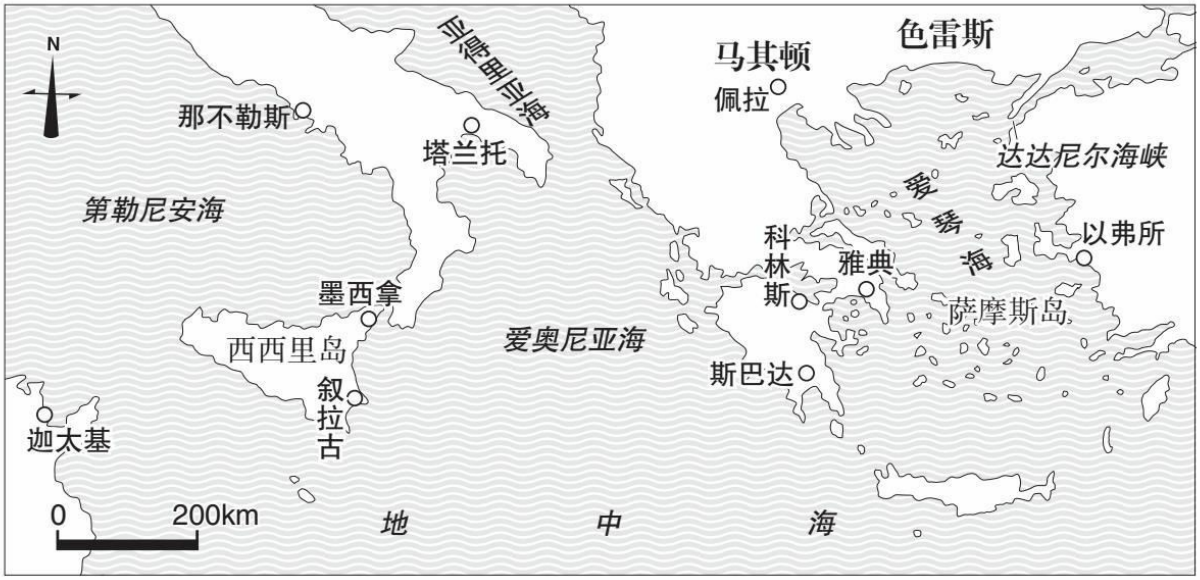
于是，为成功征服雅典，薛西斯制定的战略是波斯军队从萨迪斯出发，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希腊，接着从希腊北部向雅典发起进攻。

年轻的波斯国王做了一个决定，这是其父大流士从未想过的事，那就是与迦太基结盟。

当时地中海西侧有两个强国，是波斯和雅典都不能不承认的强国。它们是叙拉古和迦太基。叙拉古位于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东部，迦太基在非洲北部。

叙拉古与希腊之间的关系始于希腊人的殖民。迦太基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则始于腓尼基人的殖民。此时，迦太基人的母国腓尼基已经臣服波斯帝国。

薛西斯和迦太基结成同盟并非希望迦太基提供兵力支援。他对迦太基的要求是迦太基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从背后给叙拉古施压，让叙拉古接到雅典的求助时，因自顾不暇而无法支援。



爱奥尼亚海及其周边

最后是重整军队，这是所有战争必不可少的基础。

为了确保此次入侵希腊绝对成功，“王中之王”需要表明他的态度。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流士没有亲征，而且只派出2.5万人的兵力，按东方人的标准来看，军队规模过小。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一切都不同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次都只能用大规模来形容。

率领大军的是“王中之王”薛西斯。包括他的几位胞弟，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随军同行。当然他们不只是随行，还肩负着指挥战斗的重任。这就意味着，他们战死的可能性也很大。既然王室成员都参战，帝国境内各行省的总督自然也要参战。公元前481年末至公元前480年初的冬季，波斯帝国的首都功能好像转移到了萨迪斯一样。

这位年轻的东方君主知道希腊是城邦国家的集合体，并无一个叫希腊的国家。他也知道城邦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国家，每个城邦国

家的人口都很少。

因此，波斯国王首先考虑以“量”取胜，给希腊来一个下马威。曾经，波斯帝国利用人海战术成功收服了巴比伦和埃及。

希罗多德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位描述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第二次希波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80年。为成功收服希腊，波斯国王带去的士兵多达180万人，此外，还有随从和当地的非战斗人员共500万人。这个数字还只是陆上部队，不包括海上部队。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现实”。他们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如果180万名士兵全部投入希腊战线，波斯帝国内部就会变成空城。对于波斯国王来说，只要他还没有忘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的叛乱，就不可能冒如此大的风险。

二、加上非战斗人员，波斯需要解决远远超过600万人的饮食问题。

波斯军队的船队只用于运输武器和武装类的东西，饮食问题在当地解决。也就是说，由那些屈从于波斯国王提出的“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为波斯属国的地方来解决。但是在环绕爱琴海的希腊境内，找不出一个地方有如此实力能提供如此大规模的食物补给。这是学者们的共识，我深有同感。

据此，在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从波斯方面采取的所有行动来看，学者们推测波斯军队的全部兵力为大约20万人出头。其中包括与国王如影随形的1万名精锐组成的“不死军”和波斯引以为傲的1万名骑兵，余下的18万是希腊人眼中的轻装步兵。

再看希腊方面。即使斯巴达和雅典达成共识联合作战，这两个国家能派出的全部兵力合计也不超过2万人。因此，希腊要迎战的是仅陆上

军队就10倍于自己的敌人。

波斯没有海运传统，对波斯国王来说，海上部队只能依靠自己统治下的异族国家。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波斯国王有三层加莱船1200艘、小型运输船3000艘。

此外，运输船的数量难以想象，暂且不论。学者们只能就“主要战斗力”三层加莱船进行分析。按照不同民族，各国提供的战船情况如下：

来自腓尼基的船只——300艘。

来自包括爱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群岛在内的希腊境内的船只——300艘。

来自埃及的船只——200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各地征用的船只，数量不多。而非主要战斗力的运输船则不计其数。

古代腓尼基人生活在现在的中东地区，这里有叙利亚和黎巴嫩。他们以擅长通商和海运闻名，作为海上战斗力最受波斯国王的器重。腓尼基人的航运海域在东地中海，大型船只较多。按照东方人的习惯，桨手由奴隶担任。

爱奥尼亚船队的300艘船只，活动范围仅限爱琴海，因此，与腓尼基船相比吨位较小。但是，谈到操控力，由于爱琴海风向多变，所以爱奥尼亚船优于腓尼基船。另外，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担任桨手的是自由公民。对于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这是仅次于腓尼基船队的、值得期待的海上战斗力。

波斯国王不太信任来自埃及的200艘船。埃及是个农业大国，没有

海运传统。埃及的船只大部分只是内河用船，航行在尼罗河通往地中海的河道上。和腓尼基一样，桨手也是奴隶。与腓尼基船、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船相比，他们甚至不曾有过打击海盗的海战经验。

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最高司令官薛西斯似乎没有料到海上的战斗力将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

波斯人只要脚不踏在土地上，就会心生不安。所以，对波斯人薛西斯来说，海军只是输送兵员和补充物资的运输工具，是波斯军队与雅典军队发生陆战时用来封锁海面的力量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征用的船只中有好几千艘运输船，目的只是在兵力对比上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一旦开启海战全无用武之地。

相对于这支波斯海上军队，我们再来看希腊方面的海上战斗力。参战的各城邦国家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船只全部加起来也不足400艘，虽然相比陆地战斗力的10：1要好许多，但希腊方面在海上也不得不迎战2倍于自己的敌人。

公元前481年冬季，身在萨迪斯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与当年他父亲大流士一样，向希腊几乎所有城邦国家包括爱琴海群岛派出使节，送去了“土地和水”通告。只有雅典和斯巴达没有接到通告。原因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拒绝了“土地和水”的要求。这次波斯国王以此表明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目标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与此同时，希腊方面也召集各城邦国家代表举行了会议。未接受“土地和水”通告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聚集到了伊斯米亚。伊斯米亚是一条狭窄的海峡，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和斯巴达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分为二。

已当选此年度最高指挥官的地米斯托克利作为雅典代表出席了会议。斯巴达代表是两个国王，色萨利、底比斯、科林斯也分别派了代表

参加，正与雅典打得难解难分的埃伊纳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议题当然是商讨如何击退入侵的波斯军队。

有一个提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同意，即希腊城邦国家之间停止一切纷争，直到把波斯军队赶出希腊。

雅典和埃伊纳暂时放下了纠缠不清的敌对关系，埃伊纳也决定改变以往亲波斯的立场，明确站到了希腊阵营中。

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他坚持认为和波斯之间的决战将在海上展开。在他看来，埃伊纳成为盟友意味着制海权所及海域范围大大增加。之前，雅典的制海权仅限于外港比雷埃夫斯到萨拉米斯岛之间的海域，现在，海域扩大到萨拉米斯岛至埃伊纳岛，再从埃伊纳岛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侧。也就是说，雅典海上战斗力的行动范围大幅度扩大。

讨论到其他议题时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希腊人特有的能言善辩，使得做出一个决定异常艰难。好在地米斯托克利擅长驾驭这种局面，不断引导大家回到正题上。

看到波斯即将入侵希腊，战争一触即发，希腊人自然理智许多，他们尽力控制争辩的冲动，共同商讨在何处迎战波斯军队。

根据派出去的侦察兵以及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带回的消息，他们弄清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波斯军队的规模。

其次，是波斯军队攻打希腊的路线。

根据得到的情报，敌军规模在己方10倍以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

此甚至不曾表现出一丝不安。

情报显示，敌军的进攻路线是海上军队从萨摩斯岛出发，在爱琴海上一路向北，陆上军队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两军在塞尔玛（后来的塞萨洛尼基）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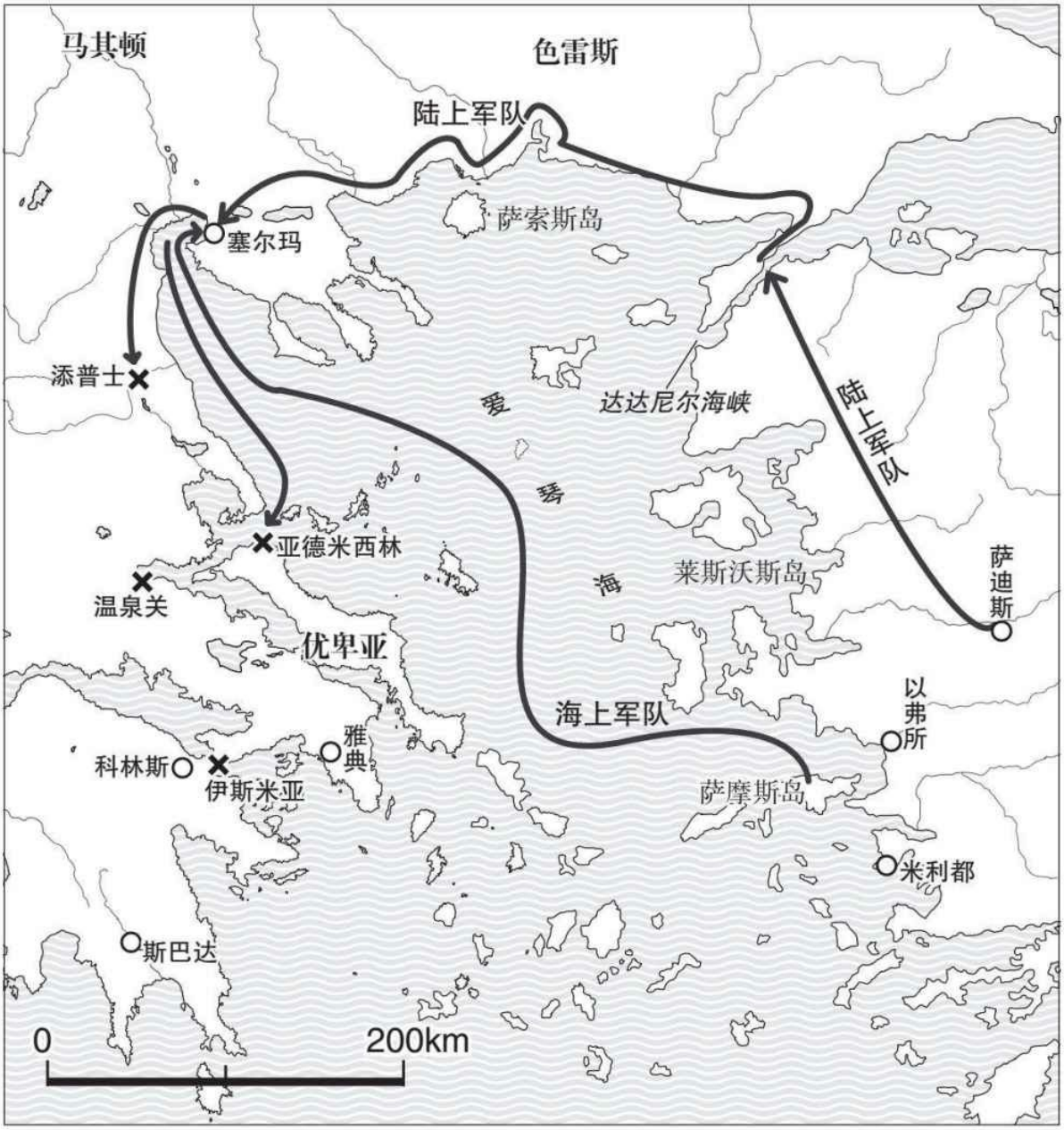
波斯国王亲自率领陆上军队离开萨迪斯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因为军队规模庞大，依靠船只往返运送需要好几天时间。按照国王的要求，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浮桥”。浮桥是用绳索将一条条船连起来再放上木板做成的，共有两座。全军通过浮桥进入欧洲。在达达尼尔海峡搭建浮桥横渡海峡的方法是薛西斯的首创，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不曾使用过。

仅靠侦察兵的情报，希腊方面未能掌握波斯军队在塞萨洛尼基会合后的行军路线。此时，关于在何处迎敌，希腊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在添普士山谷迎击敌人。添普士山谷位于希腊中部的入口，是从塞萨洛尼基沿海边大道进入希腊中部的必经之地。

第二个选择是在温泉关山顶阻止敌人陆上军队南下。温泉关位于添普士山谷南边，两地相距150公里。与此同时，海上军队北上进入亚德米西林，阻止敌人海陆两军会合。

第三个选择是在伊斯米亚迎战敌军。伊斯米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入口，位于温泉关的南边，直线距离也是150公里。此时，各城邦国家代表正会聚此地商讨迎敌对策。狭窄的伊斯米亚已有双重屏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两个强国斯巴达和科林斯所建。



第二次希波战争

第一个选择早早就遭到了淘汰。

敌军离开他们的属国马其顿，刚进入希腊中部就将他们击退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在鲜有平原的希腊，色萨利地区是个例外，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除了添普士山谷，还有几条南下的路线。同时，该

地区临海的位置找不到适合大量船只停靠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不适合海陆两军合力迎敌。

然而，放弃这一选择意味着放弃希腊中部的北半部。

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色萨利代表表情沉重。他表示，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抗波斯大军，既然放弃这一选择，我们只能接受“土地和水”通告了。

屈服于“土地和水”的要求意味着归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在战时，必须按要求向波斯军队提供一切军用物资，包括粮食。

不仅如此，波斯方面一定还会要求提供兵力。这就意味着，色萨利士兵将作为波斯军队的组成部分与包括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内的希腊人为敌，意味着他们与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爱琴海群岛上的希腊人一样，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站在波斯阵营中。

尽管如此，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依然决定放弃第一个选择。他们不惜放弃色萨利一地，也要为保卫希腊而战，陆战在温泉关，海战在亚德米西林。

此时，代表雅典出席会议的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会感觉孤立无助。

三个选择都把赌注放在陆地战上了，不同的只是迎战地点。无论是第一个选择，还是第二个选择，抑或是第三个选择，海上军队都不过是陆上军队的辅助力量。

这完全背离了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海上战斗力”的设想。他设计中的海上战斗力不是“辅助战斗力”而是“主要战斗力”，两者有天壤之别。

陆上军事大国波斯把赌注压在陆地战上理所当然。但是，兵力不过波斯军队十分之一的希腊为什么也把赌注压在陆战上呢？

那是因为，一直以来，希腊的主要防卫力量都是重装步兵，公民的义务就是作为重装步兵保卫国家，这在雅典指的是第三等级以上的公民。

应对发生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的作战，这一体系是奏效的，因为城邦国家之间的作战是性质相同的部队之间的作战。

但是，现在的敌人是波斯。就算建立了共同战线，迎击敌人的兵力也不过敌人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赌注”不是应该押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上吗？

地米斯托克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马拉松战役取得胜利后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与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提高雅典的海上力量。即使采用强硬手段、利用陶片放逐制度将反对他的雅典政界大人物一个个逐出雅典，也要把雅典建设成为希腊第一的海上军事强国。

结果，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从以前的40艘三层加莱船增加到随时可出动200艘的实力。随时可出动200艘战船意味着还有船只在港口待命以应对不时之需，例如出现海战这类人为突发事件或暴风雨等天灾，船只受到重创回港修理时，待命的船只可及时补充上去。因此，至少还需要百艘以上。

10年里，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坚持下，雅典战船从40艘增加到了300艘，雅典海上战斗力超过以前位居第一和第二的科林斯与埃伊纳，一跃成为希腊第一。

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预知未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商讨第二年春季将展开的与波斯对决的伊斯米亚会议上，以陆上军力为主要战斗力的方针没有改变。

其主要原因在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希腊人的特性。

公认的希腊首屈一指的陆上军事大国斯巴达就不用说了，雅典、底比斯和其他所有城邦国家都把保卫国家的重任交给了重装步兵。由中坚阶层的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团是希腊城邦国家的骄傲。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即无资产者因为享有公民权，自然也有义务服兵役。但在战场上，他们始终只是作为重装步兵的辅助力量。

战斗中只有打垮敌人才能获得胜利。击垮敌人是主要战斗力量的任务，辅助战斗力量只起协助作用。

然而，一旦演变成海战，情况将截然不同。

重装步兵是纯粹的战斗人员，当然要坐上三层加莱船。但是，按照指挥官的指示让船逼近敌船的是操控船只的船员，是桨手的任务。战斗开始后，船帆落下，战船仅靠桨手划桨接近敌船。因此，这又是一项来不得一丝马虎的工作。

古代的无资产者需要每天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在雅典，他们属于第四等级。无产者，后来的罗马叫作proletariat，在海战中是极其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战斗力。

我想在那个时候，希腊人一定很抵触这一点，他们一定不愿轻易承认这一点。这也是希腊人很难放弃陆上军队作为主要战斗力的想法的主要原因。

但是，已届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坚定的人。坚持己见需要超强的忍耐力。作为其时已是名副其实的雅典领袖，他的坚持就是“等待时机”。

当然，所谓的等待并非无所作为地被动等待。他用心观察各方动

静，伺机而动。当然，等待时机同时也意味着机会来临之前，即使盟友受创也要忍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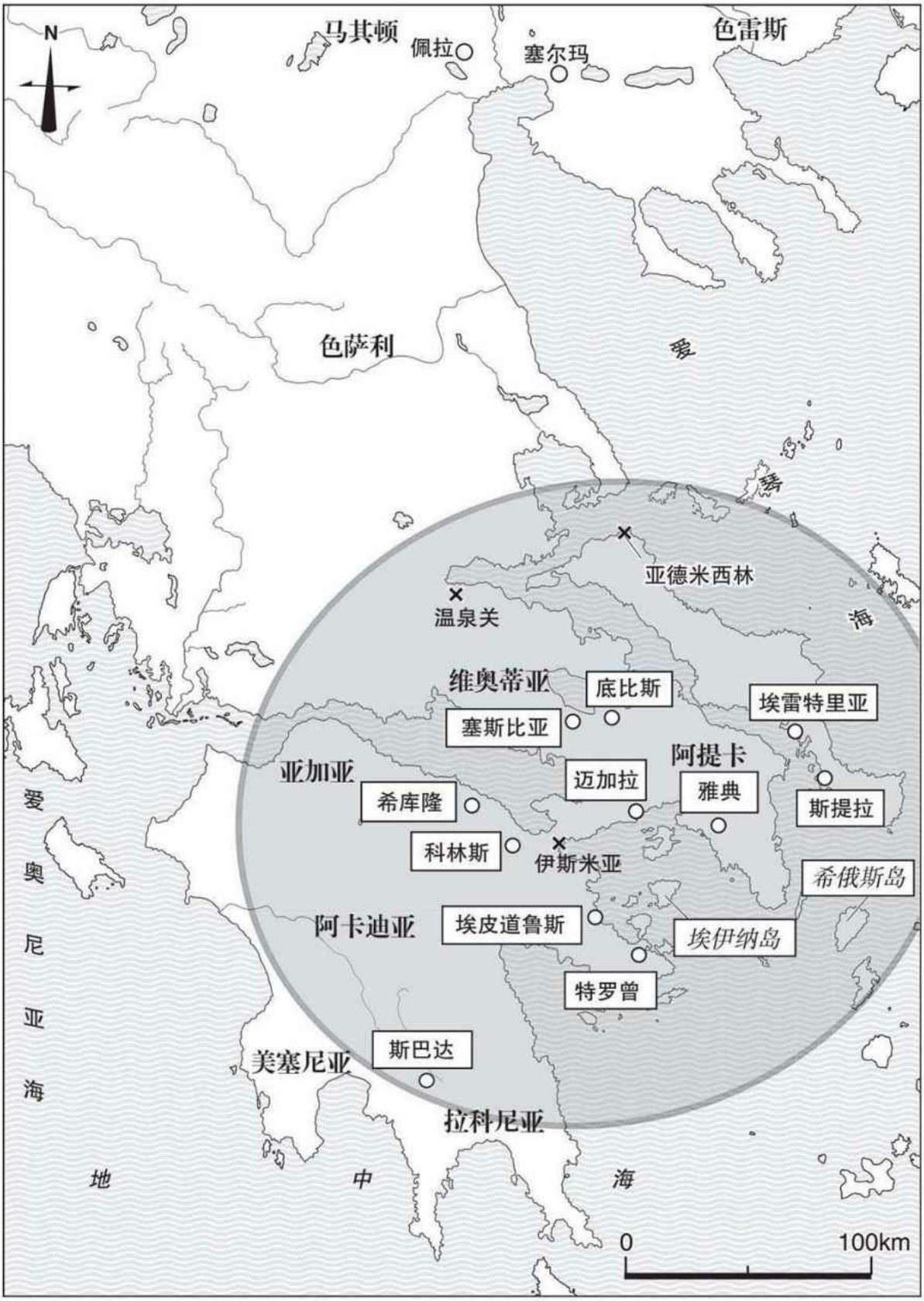
不过，出席此次伊斯米亚会议的代表中，我想还有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面临的现实，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

此人就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在温泉关迎战39岁的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的任务落在了这位年已六旬的斯巴达勇士肩上。

公元前481年冬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前召开的伊斯米亚会议上，决定参加抵抗波斯之战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还商讨了各国分别可提供的战斗力，毕竟第二年春季的这场战斗将不可避免。统计结果如下：

地图是参战城邦国家的分布图。

表是各城邦国家可提供的战斗力情况，当然分陆地战斗力和海上战斗力。


N
马其顿
佩拉
塞尔玛
色雷斯
色萨利
爱
琴
海
亚德米西林
温泉关
维奥蒂亚
底比斯
埃雷特里亚
塞斯比亚
阿提卡
亚加亚
迈加拉
雅典
希库隆
斯提拉
科林斯
伊斯米亚
希俄斯岛
阿卡迪亚
埃皮道鲁斯
埃伊纳岛
特罗曾
斯巴达
美塞尼亚
拉科尼亚
爱
奥
尼
亚
海
地
中
海
0
100km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军战斗力

海上战斗力

总指挥官：欧里拜德斯（斯巴达）
雅典海上军队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事实上的总指挥官）
200 艘——雅典
（其中 20 艘船上坐的是来自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难民，逃离了波斯军队统治的人们）
40 艘——科林斯
20 艘——迈加拉
18 艘——埃伊纳
12 艘——希库隆
10 艘——斯巴达
8 艘——埃皮道鲁斯
7 艘——埃雷特里亚
5 艘——特罗曾
2 艘——斯提拉
2 艘——希俄斯小型船

合计 324 艘船中包含了 9 艘小型帆船，因此三层加莱船数为 315 艘

陆地战斗力

总指挥官：列奥尼达（斯巴达）
300 人——斯巴达重装步兵
3400 人——伯罗奔尼撒同盟步兵
700 人——塞斯比亚步兵
400 人——底比斯步兵
1000 人——富丘亚地区步兵
1000 人——色雷斯地区的难民组成的士兵队伍

合计 6800 人，再加上来自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的士兵，共约 1 万人

希望读者朋友看地图和表的时候，不要忘记以下几点：

一、地图上的圆点只表示各城邦国家的首都所在位置。所谓城邦国家，是以首都为中心向周边呈放射状分布的住民共同体。

二、表中的数字不是各城邦国家全部战斗力的数量。任何一个城邦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成为空城。因此，可提供的战斗力已经从全部战斗力中减去了保卫国境线的战斗力数量。

此外，斯巴达是个例外。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它还要抽出一部分兵力保护伊斯米亚地峡。

雅典也是一个例外。雅典海上军事力量增强，三层加莱船上的纯战

斗员即重装步兵的数量也增加了。

雅典可提供的海上战斗力按200艘战船计算，每艘三层加莱船所需的士兵包括重装步兵、船员和桨手至少200人。200人乘以200艘，即需要4万人。

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坚持认为这一战的胜负将在海上决出，所以雅典没有抽出兵力参加以斯巴达为主的陆上军队。

三、与士兵数和船只数多少无关，地图和表中记录的是参战的所有城邦国家。

我只是为了提醒读者朋友记住，**希腊并非一个国家。古代希腊只是众多城邦国家的集合体。**

同时，我也希望读者朋友记住，**古代希腊的历史就是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之间冲突不断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尽管只是4年一届，至少在运动会期间，各城邦国家做到了和平共处。

还有一点，我也希望读者朋友认真思考。

这是一个关于独立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并不辽阔的地域内，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分而治之，意味着希腊人的独立意识极强。

正因如此，共同对抗波斯的联盟中，由哪个城邦国家的人担任最高指挥官，大家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如果是其他民族，一定是由提供兵力最多的国家出代表担任。如果希腊人有这种意识的话，想必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分而治之的状态就不会长期存在了。

斯巴达是公认的陆上军事力量第一强国，斯巴达人要求派他们的人担任陆上军队最高指挥官。对此无人表示异议，提议顺利通过，因为其他城邦国家都承认斯巴达是希腊首屈一指的陆上军事强国，特别是在士

兵的“素质”方面。

代表雅典出席会议的地米斯托克利也参加了竞选，却遭到科林斯的强烈反对。

科林斯曾经是希腊第一的海上军事强国，他们认为自己失去第一的地位都是拜地米斯托克利所赐。因此他们绝不能让雅典人担任最高指挥官，尤其是地米斯托克利。

如果你认为在科林斯仅提供40艘战船而雅典参战战船达200艘的情况下，科林斯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总指挥官没有道理，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希腊人。再说，与其他参战国家相比，科林斯尽管只提供40艘战船，却也是仅次于雅典位居第二的。

地米斯托克利深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注意到科林斯只是反对他当选最高指挥官，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议。于是，他要求与斯巴达代表单独会谈。他建议斯巴达代表不仅要求担任陆地最高指挥官，而且还应该要求担任海上最高指挥官。对此斯巴达代表欣然接受，科林斯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统帅总数300多艘战船的海上力量最高指挥官一职落在了斯巴达代表的身上，尽管雅典一个国家就提供了半数以上的船只，而斯巴达只提供了10艘战船。不用说，这个结果一定正中科林斯代表的下怀。

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心口绝对一致的人。虽然他让斯巴达代表担任了最高指挥官，却不会拱手让出指挥权。他建议斯巴达代表担任海上军队最高总指挥官不过是迫于形势压力的权宜之计。斯巴达代表欧里拜德斯并不熟悉大海，对于海上作战并无良策。结果，各国代表于会议结束前签署的共同抵抗波斯海上军队协议附带条款中增加了一个条款：“雅典海上军队的指挥权由雅典公民地米斯托克利负责。”

科林斯得知此事已是后话。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要求自己国家的40艘船由科林斯代表安德马托斯指挥。

不管怎样，对抗波斯的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权实质上已经落到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手中。陆上军队指挥体系已经统一起来，列奥尼达是最高总指挥。海上军队的指挥体系也统一由地米斯托克利负责。因为有名义上的总指挥官、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的支持，这件事并没有遇到阻力。

那么，在波斯入侵前会聚在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伊斯米亚地峡的希腊各城邦国家代表，为什么会同意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战线迎战波斯军队呢？

对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没有做过多介绍，他似乎对参战的人更感兴趣。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我们的想象。

我想，选择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迎敌的战略不是随便定下来的，应该是充分讨论后决定的。

陆地在温泉关、海上在亚德米西林的战线设计，粗看似乎采用了“人盯人”的防守战术。但是仔细研究参战同盟各城邦国家的所在，就会发现这是“区域防守”的战略，以温泉关为顶点的一线将希腊一分为二。

借用足球术语就是“链式防守”（catenaccio）。这个词原是意大利语，因AC米兰队采用这一战术成功阻挡住对手的进攻而成为国际通用语。这一战术的目的是用“链条”来巩固防守，等待敌人自我消耗，等待敌人出现焦虑情绪。

公元前5世纪，对于此时的希腊来说，只要在这条战线上成功拖住敌人两个月，那么对波斯一方来说，早期的有利条件就可能变成不利条

件。

冬季已经悄然临近。在敌方地盘上作战的波斯军队，加上非战斗人员超过40万人，饮食问题的压力必定越来越重。

同时，薛西斯还必须时时留意背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的动静。他会急于结束入侵希腊的行动，早日回国。

如果敌人的想法果真如此，如果链式防守能坚持两个月，那么，波斯国王就有可能放弃进一步南下的计划，波斯军队也有可能撤离希腊。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过先例的。10年前，仅仅因为在马拉松会战中失利，波斯军队就撤退了。既然有过一次，很难说不会有第二次。

波斯军队是一支大部队，军队转移需要较长时间。可以预计，波斯军队出现在温泉关的时间将在进入夏季之后，实际战斗发生的时间大概会在8月初。因此，链式防守的时间只有8月和9月两个月。

在这一战中，肩负艰巨任务的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公元前480年的链式防守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位斯巴达勇士。而地米斯托克利的任务是率领海上军队北上直抵亚德米西林，负责海上警戒并切断敌人从海上向陆上军队提供补给的补给钱。

温泉关

这一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已经60岁了。普通的斯巴达士兵一到60岁就退役了，但是，肩负指挥军队之职责的斯巴达国王没有退役年龄。

列奥尼达出身于斯巴达两个世袭王族之一。因为种种原因，在继承王位的排序中，他的排位过于靠后。因此，与排序靠前的其他亲属不同，后者接受的是帝王教育，而他接受了和普通斯巴达少年相同的教育。

所谓种种原因大概是只有斯巴达才有的原因吧。当时，5个监察官担心他父王生不出儿子，于是建议他父王休掉王后另娶他人。

国王一口拒绝，他对监察官介入自己的私生活非常愤怒。但是5个监察官并不气馁，他们自认为是斯巴达国体的真正守护者。于是他们提出，既然国王不肯休妻，那就纳妾吧。

于是，深爱王后的国王有了侧室，这个女人很快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昂米尼。

克里昂米尼出生不久，王后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多莱奥斯。接着，王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根据王位继承排序，第四子列奥尼达被认为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最小，于是，他和普通斯巴达少年一样，7岁至20岁在以培养士兵为目的的集体生活中长大。

那是一种相当严酷的寄宿生活，甚至缺少人性。一到20岁，他还要经历野蛮至极的达标仪式，在荒山野岭依靠个人的机智和力量生存一个星期，还要杀死一个希洛人，取下他的头颅带回营地。经历过这一切的斯巴达国王大概只有他一人。这就是列奥尼达的前半生。

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是因为他父王死后，同父异母的兄长克里昂米尼继承了王位，哥哥多莱奥斯对此心怀不满，他离开斯巴达后死在了意大利南部。其后不久，双胞胎中的哥哥也死了。斯巴达有两个国王，兄长克里昂米尼已是两个国王之一，他以列奥尼达娶自己的女儿为妻作为条件，将另一个王位给了他。

列奥尼达接受了这一条件。他是典型的斯巴达人。想必确立斯巴达国体的吕库古知道后，一定对他大加赞赏。

公元前480年，列奥尼达成为第一个正面与进犯的波斯大军交锋的希腊武将。对于他来说，温泉关将是决定他生死的地方。

波斯军队从色萨利地区南下而来。对他们来说，温泉关无疑是一个会妨碍他们顺利进入阿提卡地区的关卡。

温泉关隘口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是因为道路曲折多弯，实际长度超过10公里。两侧都是悬崖，站在南下的波斯军队一侧，左侧的悬崖下面是一条河，右侧的悬崖是陡峭的山体，犹如刀劈过一般。山路蜿蜒曲折，宽度就是两个悬崖间的距离。要通过这里，着实需要勇气。

到了21世纪的现在，站在温泉关之上，很难想象2500年前那场战斗的悲壮场景。理由至少有二：

一、从波斯军队的位置看在左侧、从希腊军队的位置看在右侧的河流，经过2500年的时间向北移动了1公里以上。因此，陡峭的悬崖看上去和缓了许多。

二、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关之战”过去600年后，希腊被罗马帝国吞并。出于罗马人追求合理性的特有精神，他们劈山建路，削去陡峭的山体，拓宽了道路。

这就是罗马人。再比如亚壁古道，就因为道路上上下下、绕来绕去，他们认为很不合理，于是从百米高处削去面海的悬崖，建成了亚壁古道。尽管他们非常敬仰希腊文明，但是在保留古战场遗迹和方便希腊人出行的选择上，他们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当然，那时希腊人早已成为罗马帝国的成员。

因此，曾经非常险峻的温泉关，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险峻了。

在罗马时代，温泉关是自北向南通往雅典的主干道。所以，罗马帝国选择修建温泉关山路而非保存古战场遗迹无可厚非。但此时，波斯军队只要过不了这条路，就无法进入希腊。

此外，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的补给来自海上，只有通过温泉关，他们才能看到停靠在岸边的船队，得到所需的补给。

正因如此，即将迎战波斯军队的希腊联军决定，由列奥尼达率领陆上军队在温泉关抗击敌人，同时由地米斯托克利率领海上军队在附近的亚德米西林湾阻击敌人。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从斯巴达重装步兵中只挑选了300人前往温泉关。关于这一事实，现代研究者中有人指出，列奥尼达也许从一开始就怀揣壮烈牺牲的想法。我却认为，他或许有这个想法，但绝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斯巴达战士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因此对他们来说，战斗非胜即死。

肩负阻挡敌军的重任，列奥尼达一路向北来到温泉关。此时已过六旬的他心中或许想过不得已就以死相拼吧。

300个斯巴达人都是已婚的人，并且都已有了儿子。选择他们是因为即使他们英勇牺牲，也不至于断子绝孙。斯巴达战士不会在战斗开始前就想到要壮烈牺牲。因为如果随随便便就牺牲生命，又怎么取得战斗的胜利呢？但是，如果战场上的形势发展需要他们献出生命，他们也会视死如归。

面对南下的20万波斯大军，迎战的希腊军队加上辅助战斗力量不过1万人，兵力对比是20：1。在此情形下，列奥尼达依然没有要求自己的国家斯巴达和以雅典为首的其他城邦国家增派兵力。不仅如此，由于温泉关以外还有两条近道，他又从1万人中派出两支1000人的小队，分别防守那两条近道的要冲。

也许他认为在狭窄险峻的山路上作战，需要的不是“量”而是“质”。也许他认为，只要是精锐，无须太多士兵就可以与敌人抗衡。人数少意味着在战斗中可以做到灵活多变。斯巴达重装步兵从小接受训练，这方面的能力已是至臻至强。

波斯军队有20万人。也许他认为，在温泉关这样的险要之地，企图以量取胜的波斯军队很难发挥他们的优势。

首先到达温泉关的是列奥尼达率领的希腊军队。他们没有等很久，敌军也到达了此地。波斯军队离开塞萨洛尼基以后，在希腊中部平坦的地方一路加速南下，经过12天的急行军，很快出现在温泉关。波斯国王薛西斯将指挥部设在距离温泉关山麓不远的一个镇上。

第二天，波斯军队各部指挥官按照国王的命令，让尽可能多的波斯士兵出现在温泉关山顶，只为了让等候在山顶入口的希腊士兵看到。当然，他们提醒士兵不要进入对方的弓箭射程之内。这是波斯国王向希腊发起的挑衅，其目的是震慑希腊士兵。他希望希腊士兵看到如此规模的大军心生惧意，弃械逃跑或投降。

尽管看到敌军规模惊人，希腊军队的将士没有出现丝毫慌乱。非但如此，根据波斯侦察兵带回的近距离侦察结果，在希腊阵营内，士兵们正专心致志地整理各自的头发，看不出有一丝恐惧。

时年39岁的波斯国王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叫来随行的斯巴达人询问，得到如下回答：

> 斯巴达战士以质朴和刚健为宗旨，纪律严明。只有一件事他们可以自己决定，那就是头发。他们大多长发及肩，喜欢不时整理，保持干净漂亮。

这位东方君主依然不理解。大敌当前，他们非但不惧怕，反而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仪容。他觉得斯巴达人很可怕。

尽管如此，波斯国王并没有改变战术，他依然决定用优势兵力强行突破温泉关。第二天，他向希腊军指挥部派去了特使。特使穿着东方风格的漂亮服装，向列奥尼达传达了国王的意思。

“放下武器，各回各家。”

列奥尼达接见了波斯国王的使节。他只回答了一句话：

“想取我脑袋，请便。”

这句话成为一句名言，一直流传到后世。后世的人一听说斯巴达战士，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

这样一来，波斯国王想轻而易举地通过温泉关隘口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如此，薛西斯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作为绝对专制的君主，此人遇事习惯找家臣一起商量，当然，最终决定还是由他来做。也许你会觉

得他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给他的评价却是“好人”。

尽管波斯20万大军已到温泉关，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列奥尼达

就这样，4天过去了。

再说海上。波斯军队在塞萨洛尼基兵分两路，国王率领陆上军队走陆路南下，海上军队在海上一路南下，与此同时希腊联军正一路北上，两军不断接近亚德米西林海角。

波斯的海上军队尚未到达亚德米西林海域，就已经遭遇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来自埃及的船队不熟悉爱琴海，遭遇暴风雨后或沉入海底或毁

损严重，几乎派不上用场了。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此时，波斯海上军队的1200艘船中有近三分之一脱离了战线。尽管如此，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的战斗力之比依然高达8：3。

希腊人在家门口作战，因此占较大的优势。

希腊的海上军队是沿优卑亚半岛与阿提卡之间的海峡北上的，因此未遭遇暴风雨，顺利到达亚德米西林的希腊海上军队船只总数据说是271艘。其中，来自雅典的船只147艘，包括从波斯的进攻中成功逃脱的20艘难民船只。来自科林斯的船只40艘，来自斯巴达的船只10艘。余下的来自其他各城邦国家。

率领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官是斯巴达的欧里拜德斯。前面已经介绍过，这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尽管斯巴达方面参战船只只有10艘。

接近150艘的希腊船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而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总指挥官的科林斯也要求自己国家的40艘战船由本国的安德马托斯指挥。

因此这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合海军有了三个总指挥官。

地米斯托克利非常重视统一的指挥体系，他不可能对这种状况坐视不理。在沿优卑亚半岛向亚德米西林北上的途中，他说服了两位同僚。

说服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很容易，因为他对担任海军总指挥官一职本来就没有信心。科林斯人安德马托斯在地米斯托克利不厌其烦的劝导下也接受了他的意见，尽管科林斯与雅典互为竞争对手，并且安德马托斯作为熟知海战的将领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二人成了地米斯托克利最好的搭档。

就这样，在抵达亚德米西林海域前，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名义上，欧里拜德斯与安德马托斯分别是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

官和来自科林斯海上军队的指挥官，但是他们一致同意希腊海上军队的实际总指挥由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指挥体系统一后，地米斯托克利成了事实上的总指挥官。

所谓说服力就是让他人接受自己想法的能力，不是在尊重并接受他人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妥协寻找合作可能性的能力。

看上去君主专制国领袖薛西斯似乎更民主，而民主政体下的雅典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却不太“民主”。的确，第二次希波战争的两大主角——39岁的薛西斯和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分别代表波斯人和希腊人两个不同的民族，彼此的性格也截然不同。

在温泉关，敌我双方对峙了4天。终于，薛西斯下定了决心。

既然列奥尼达回答说“想取我脑袋，请便”，那就去取吧。薛西斯决定第二天一早发起总攻。

波斯军队试图以人数取胜，一举击败对方。然而，第一次进攻以波斯军队的完败告终，波斯方面阵亡士兵多达2万人。

等候在山路拐角处的斯巴达精锐攻击勇敢、精确。很快，走在狭窄山路上的波斯士兵变成一座座尸山。仅这一天，波斯方面就失去了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难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薛西斯在司令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

同一天，亚德米西林海角外，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之间也展开了第一场海战。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与其打败敌人的海上军队，不如阻止他们进入海湾与陆上军队会合重要。因此，希腊海军虽然成功地给在暴风雨中已遭严重损失的波斯海上军队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继续扩大这一天的战果。日落前，两军分别返回各自的营地。

次日，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这天，波斯国王投入了国王的近卫军1万人的“不死军”。率领这支波斯精锐之师投入战斗的是国王的两个弟弟。

然而，这天波斯又以彻底失败告终。不仅号称“不死军”的精锐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甚至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国王的两个弟弟也变成两具尸体，被抬回了指挥部。这次希腊方面也牺牲了2000人，但是他们连续两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天晚上，结束战斗回到指挥部时，列奥尼达接到了一个报告，是来自近道防守部队的报告。

报告称，波斯军队已经知道了近道的所在，并向驻守在那儿的希腊士兵发起了进攻。

近道逆河流而上，因为是小道，所以不适合大部队通行，但不影响小规模部队的通行。一旦波斯军队通过这条小道到达温泉关隘口的出口，防守温泉关的希腊联军就会受到前后夹攻。

列奥尼达马上召集了希腊陆上军队的全体指挥官，向他们说明了情况。随后，他说：

我们一定会留下，但是，我不阻止想走的人。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撤离并不可耻。但是，如果决定离开，必须马上动身，必须在敌人尚未出现前离开。明天我们将在这里做最后一搏。

总指挥官把去留的决定权交给了各城邦国家的指挥官和他们的士兵，大多数人选择离开温泉关。

决定留下来的只有斯巴达士兵300人、塞斯比亚士兵700人和底比斯士兵400人，共计1400人。

这个数字是希腊联军刚到温泉关时以上三个国家的士兵总数。在波斯军队发起的两次总攻中，波斯方面损失2万人，希腊方面损失了2000人。也就是说，希腊方面最初的1万人中已有2000人死在战场上，其中应该有来自斯巴达、塞斯比亚和底比斯的士兵。因此从1400人中减去已经阵亡的士兵数，这个数字必定大幅缩水。

在敌人的前两次总攻中，300名斯巴达精锐士兵除了一人身负重伤离开战场，其余人都无大碍，这充分证明了斯巴达战士的作战能力。他们的勇敢善战，别说是希腊各城邦国家，即使与当时的陆军强国波斯的士兵相比也毫不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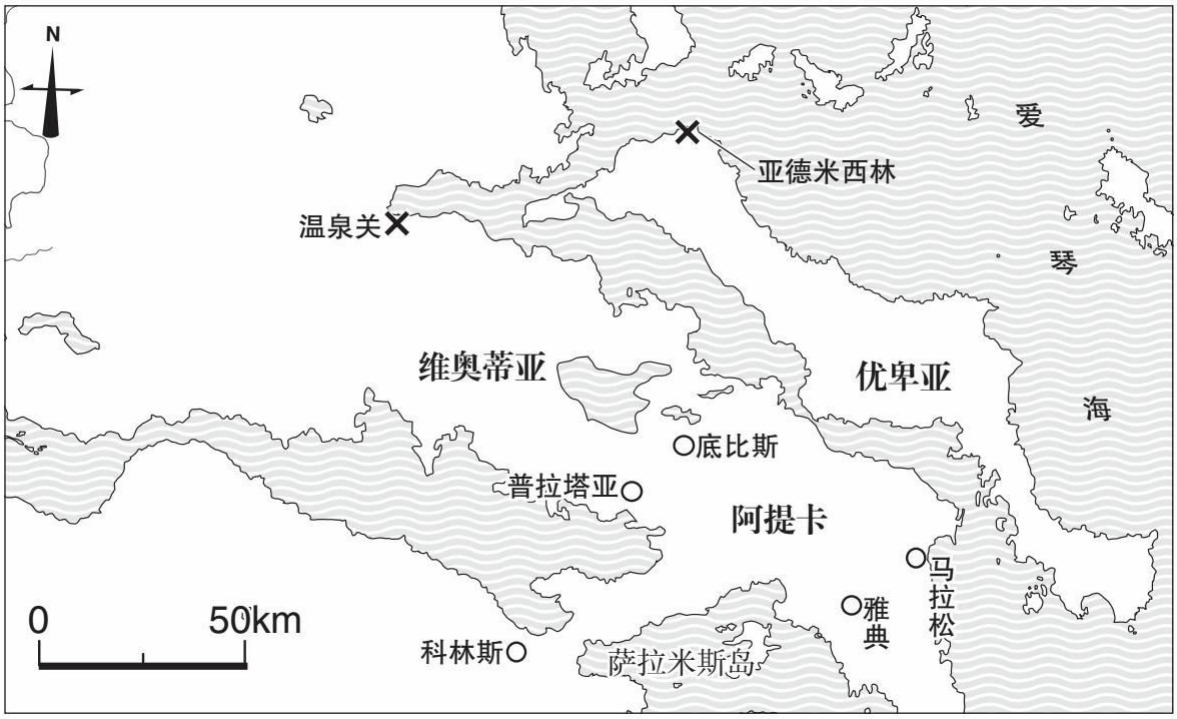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300勇士和另两个城邦国家的约800名士兵准备在温泉关做最后一搏，以微不足道的兵力迎战18万大军。

波斯军队的指挥部调整了第二天的作战战术。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他们认识到在近身战方面波斯人不是斯巴达军队的对手。因此，波斯军队决定远距离作战，用人海战术让希腊军队在箭雨之下被一个个射死。

希腊城邦国家重装步兵的盾呈圆形，面积较大，非常结实。箭射到盾上会反弹回去，射箭数量少难见效果。因此，波斯国王下令万箭齐发，箭矢犹如倾盆大雨砸向希腊士兵。

因为波斯军队已发现近道的位置，波斯国王薛西斯决定采用前后夹击的方法攻打希腊联军。他下令从近道包抄希腊军队，在天色未明之前出发。



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

地米斯托克利在亚德米西林海面随时关注着温泉关的战况。为了及时掌握温泉关战场的情况，他派不少侦察士兵不间断地向他报告，因此，他十分清楚温泉关战场上的形势变化。他很遗憾，原本计划只要坚持两个月或许就能成功的链式防守战术仅仅一星期就以失败告终。但是，他没有时间感伤，因为他还要指挥希腊海上军队彻底阻止波斯海上军队登陆希腊。

指挥温泉关战斗的毕竟是列奥尼达，人们很难预计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而且，战斗结果本来就很难预料。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不受温泉关战况的影响，按原计划在亚德米西林海面与希腊海上军队决战。

就这样，波斯陆上军队对战希腊陆上军队、波斯海上军队对战希腊海上军队的酣战在直线距离不足80公里的温泉关隘口和亚德米西林海面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爆发。

这一天，在温泉关，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最高司令官薛西斯没有和前两次一样留在司令部等候战斗结果。他命人将国王的宝座搬到隘口入口附近。宝座是用纯金打造的，国王走到哪里就要带到哪里。他要上前线，目的是让士兵知道国王亲自督战，以此鼓舞士气。

不管有多少士兵坠入深渊，国王也绝不改初衷。他决定无论损失多大，也要拿下温泉关。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波斯军队射出的箭雨落在希腊士兵的头上、身上、前后左右。

关于这场战斗，希罗多德没有做任何描述。因此，我们只能想象。尽管希腊陆军防守顽强，终究不敌密集而来的箭雨。落败的迹象最早应该出现在隘口出口附近。

如果这一天希腊军在隘口的布阵分为前卫、中路和后卫三个部分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底比斯的400名士兵作为后卫，防守区域在隘口出口附近。

底比斯400名士兵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率先投降了，总指挥官里列奥尼达对此却毫不知情。

也许负责攻打这一阵地的波斯指挥官在发起进攻的同时，向希腊联军发起了喊话："只要投降即可回家。"

不管怎样，来自底比斯的400名士兵脱离了战场。结果，希腊联军只剩下斯巴达的近300名士兵和塞斯比亚约500名士兵，合计不足800人。

不足800人的希腊士兵不仅受到连续不断的、来自前后左右的箭雨的威胁，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要躲避来自峭壁之上如骤雨般落下的飞箭，根本无法施展近身战。一旦倒下，他们甚至来不及出声就死在蜂拥而至的波斯士兵的剑下。

来自塞斯比亚的近500名士兵大概在这天的前半阶段激战中就已经全体阵亡，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是斯巴达的“300勇士”。

国王列奥尼达是指挥官，他需要了解战斗形势，寻找反击的机会，也需要身先士卒以鼓舞士气。他冒着密集的箭雨探头查看战况，不料身上中了好几支箭。

斯巴达战士绝不会将自己受伤的指挥官交到敌人手中。

列奥尼达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士兵们为保护国王改变了阵形。他们以列奥尼达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圆，却为波斯军队创造了极好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箭落到了这个牢固的圆阵中。

发生在公元前480年8月的这场战斗——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关之战”，以斯巴达最后一个士兵战死宣告结束。

可以说“非胜即死”是一种哲学思想。在这场战斗中，斯巴达战士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壮烈牺牲的列奥尼达和他率领的斯巴达“300勇士”可谓典型的斯巴达战士。

来自波斯的威胁过去以后，希腊人在温泉关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如下文字：

> 异乡的人啊，请告诉斯巴达人，为了我们热爱的祖国而献出生命的我们长眠于此。

这场战斗以斯巴达“300勇士”壮烈牺牲而告终。战斗结束以后，波斯国王说要看看战场，抬腿就走了过去。国王薛西斯视察了激战后的战场，他最大的愿望是在现场亲自验证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的尸体。

找出列奥尼达的尸体并不难，因为他的尸体就在死去的斯巴达士兵

中间。

39岁的波斯国王久久俯视着这位年过六旬、胆敢挑战“王中之王”的斯巴达国王的遗体，然后下令砍下他的头颅挂在矛尖上，在全体波斯士兵面前示众。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过：“这位高贵的波斯人对战场上勇敢作战的士兵，不论敌我都会表现出敬意，然而此时，他却做出了极为少见的残忍举动。”

我深表赞同。我当然认为砍下头颅示众是极其残忍的行为。

但是，我又觉得此时薛西斯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

在波斯眼里，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然而，就是这“一把小麦”让“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羞辱。

对手让自己率领的波斯军队失去了十分之一的士兵。

更何况，他们让国王的近卫军“不死军”死伤无数。

更何况，他们让国王的两个弟弟惨死在温泉关。

更何况，他们让波斯军队被困温泉关长达一星期，尽管希腊联军的兵力只有波斯军队的二十分之一。

也许这就是让这位39岁的国王忘记自己高贵的身份，做出野蛮之举的原因吧。

最高指挥官的态度难免影响到士兵。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波斯士兵始终无人理会倒在温泉关隘口的希腊阵亡者的尸体。

同一天在亚德米西林，地米斯托克利结束与波斯海上军队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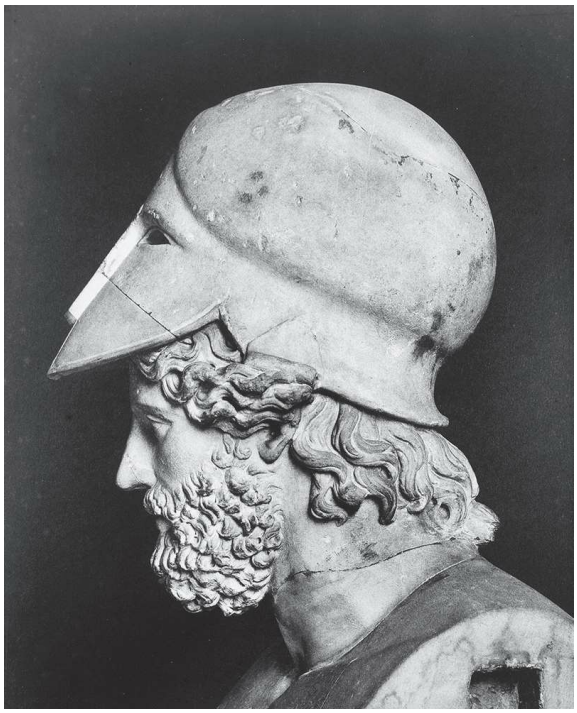
回到了营地。负责侦察的士兵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向他汇报了温泉关的战斗结果。随即，他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召集希腊联合海上军队的全体指挥官，一五一十地将侦察兵带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认为在这里继续与波斯海上军队周旋已无必要，遂下令让全体海上军队撤离此地，南下前往萨拉米斯湾。

他说："我们失去了温泉关要冲，已无法阻挡波斯军队继续南下，因此，接下来的决战将在海上展开。"

全体指挥官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地米斯托克利下达了指示：

在波斯海上军队注意到我们撤退之前，要尽最大可能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为此，今晚营地所有帐篷前都要点起火把，让对方误以为我们的士兵都在睡觉。同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所有船只通过优卑亚海峡南下，因为走这条航线无须经过敌船停泊的港口。



地米斯托克利

他严令这一切必须于今晚完成。所有人再次表示同意。

地米斯托克利另派了两艘雅典战船执行其他任务。

他认为波斯陆上军队已经成功突破温泉关，而敌方海上军队向陆上军队提供补给后一定也会南下。他判断敌人海上军队南下的航线应该在优卑亚半岛靠爱琴海一侧的海面，因为这里大型船队更容易通过。此时还是盛夏，他知道敌人船

队必定随时靠岸以补充淡水。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一计。

他向执行任务的两艘雅典战船下达了秘密指令：

一、离开联合海军船队，沿优卑亚半岛爱琴海一侧南下。

二、在可补充淡水的所有地方登陆，在泉水旁醒目处张贴布告。

布告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内容如下：

希腊城邦国家联合海军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致参加波斯军队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

爱奥尼亚的男子汉们，你们正走在背离正义的路上。你们攻打的希腊本土是你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波斯军队企图将希腊人变成奴隶，现在，你们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是一条背离正义之路。

因此，我奉劝各位阵前倒戈。

考虑到实际困难无法倒戈时，我建议各位保持中立。对于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来说，这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

如果现状使你既不能倒戈又无法保持中立，也不是没有可能回到正确道路上来。路，还有一条。

那就是当波斯与希腊的海上军队发生交战之时，站在波斯阵营参战的你们，请想一想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那是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发起的反抗波斯的战争。所以，作为希腊人，你们迫不得已参加战斗的时候，只要消极怠战就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了。

难道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希望吗？他是在期待敌人阵营中的希腊人

倒戈吗？

当然不是。一个多月以后发生在萨拉米斯海面的海战中，离开波斯海上军队加入希腊阵线的船只只有6艘，是波斯阵营中的希腊参战战船300艘中的区区6艘。

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望他们保持中立吗？

绝对不是。

爱奥尼亚地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而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前哨基地就在萨迪斯，因此，爱奥尼亚人随时都能感受到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因此当波斯和希腊本土发生酣战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不可能保持中立。

那么，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望海战爆发时，参加波斯阵营的爱奥尼亚船只消极怠战吗？

当然也不是。一旦战端开启，必定是一场近距离搏杀，敌我双方的船桨会缠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士兵根本无暇考虑如何消极怠战。

那么，地米斯托克利究竟在期待什么呢？

也许他认为，无论倒戈还是保持中立抑或消极怠战，劝告一下总没有损失吧。毕竟，为了胜利，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试。

然而，地米斯托克利的真正用意并非在此。他只是想让波斯国王薛西斯看到自己写的布告，因为薛西斯看到这个布告后可能会对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300艘战船心生猜疑。

波斯帝国没有海运传统，海上战斗力只能依赖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最受国王器重的腓尼基海上军队虽然熟知东地中海，却不了解爱琴

海。熟悉爱琴海的是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300艘希腊战船。实际上，波斯海上军队离不开希腊本土军队。即使只为补充淡水，来自腓尼基的船队也需要希腊人带路。而海上战事一旦爆发，战场就在爱琴海上。

站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的立场上，只要想一想爱奥尼亚海军有可能全体倒戈，他一定会担心得寝食难安吧。

在扑克游戏中，握有一手好牌未必一定会赢，拿一手不太好的牌也不一定会输。只要成功地让对方变得疑心重重，让对方变得畏手畏脚，就会有胜算。

39岁的东方国王是否意识到他的敌人已不再是60岁的斯巴达男人，而是44岁的雅典男人了呢？

我甚至想，如果此时的他早早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后来也不会变成“多疑之人”了。

地米斯托克利得知温泉关的战果后，马上撤出亚德米西林的时间，大致在8月中旬的话，那么距离萨拉米斯海战仅有1个月时间。

在这短短1个月里，地米斯托克利做了这么多事。尽管40岁出头的他正当盛年，这依然让人心生敬佩。

以地米斯托克利的性格，他不是一个静静坐在扑克牌桌前一心一意和对手打心理战的人。他一定常常离开牌桌，又随时带着新的心理战术回到牌桌前。可以肯定，一旦与他为敌，他必定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

公元前480年，地米斯托克利主动请缨，坐上了首席将军的位置。

首席将军是10位将军之首，类似危机管理内阁的首相，任期1年。后来，在共和政体时代，罗马曾经采用过临时独裁制度，或许就模仿了雅典此时的做法。

不管怎样，这一年，城邦国家雅典的命运就掌握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手中。在军事上，他是最高指挥官；在政治上，他是最高领袖。当然，责任也要他一人承担。

得知温泉关的战果后，他决定离开亚德米西林。在返回雅典的船上，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思考了以下战略问题。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勇敢战斗却未能守住温泉关防线。列奥尼达指挥下的底比斯军队向波斯国王缴械投降，使希腊中部城邦国家中的强国之一底比斯如今也站到了波斯阵营之中。

这就意味着，波斯军队将通过温泉关一路南下。能阻挡波斯军队南下的，在希腊中部只剩下雅典了。

然而，雅典的重装步兵作为三层加莱船的重要战斗力，几乎都在海上。就算他们悉数上岸迎敌，兵力也不足1万人。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尽管在与列奥尼达率领的斯巴达“300勇士”的作战中减少了十分之一，依然是一支超过18万人的大军。

强制疏散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陆地上迎战强敌绝无胜算。因此，他决定将雅典市内的所有住民转移出去。只要雅典变成一座空城，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在海上与一路南下而来的波斯军队决一雌雄。

只能说这是一场赌博，因为波斯国王未必会如他所愿。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有两个有利因素：

第一，波斯国王薛西斯要在年内结束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因为波斯国王需要随时关注波斯帝国的重要属地中东和埃及的任何异动。对于波斯国王来说，在希腊的每一天他都过得心神不宁，他不能长期留在希腊。

第二，列奥尼达和他率领的“300勇士”壮烈牺牲，波斯国王对待列奥尼达的残忍之举更激怒了斯巴达人，斯巴达国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波斯浪潮。

之前，斯巴达这个封闭社会中的住民目光只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为了迎战敌人，他们最远只到过通往半岛入口处的狭窄地峡伊斯米亚。对于斯巴达来说，越过此地，将军队送往温泉关已是一个相当积极的难得之举。

温泉关战役以后，斯巴达人的视野开阔了，至少扩大到了希腊中部。雅典就位于希腊中部，因此对于雅典领袖地米斯托克利来说，他手中有了一副好牌。

在地米斯托克利看来，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使雅典变成一座空城。因为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抛下早已熟悉的城市和家，迁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雅典是当时希腊最大的城市，居民人数达数万。现在他要将这数万人全部疏散出去，不论身份高低，不论贫富贵贱，也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自由公民和所有奴隶都要疏散。

关于疏散一词，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入侵造成的人为损失而采取的措施。

地米斯托克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危机管理内阁首相的权力，采取了强制疏散的手段。

当然在这之前，他尽可能做了周到的安排：

一、与一些城邦国家达成协议，让他们接收雅典公民，确保疏散后的公民有住所。

于是，萨拉米斯岛和埃伊纳岛，以及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侧的许多小城邦国家成了雅典公民暂时落脚的地方，包括特罗曾。

二、用国库的钱在雅典住民暂住地为未成年孩子修建了教养学校和体育学校。

也就是说，连培养孩子必不可少的教养学校和体育学校也都疏散出去了，教员和体育辅导员自然也在这支疏散队伍之中。

下一个时代出现了一位大政治家，叫伯里克利，这一年他15岁，此时也一定是这支疏散队伍中的一员。因为在城邦国家雅典，男子达到服兵役的18岁之前都属于未成年人。

为了完成强制疏散，地米斯托克利动员了雅典所有类型的船只。他指挥下的三层加莱船自不必说，为运输货物往返于附近岛屿的帆船，甚至捕鱼的小船等，只要在海面上可以移动的船，全部动员起来了。对于私有船只，均由国家出资有偿使用，理由有二：

一、避免有人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留在雅典境内。

二、由于无法预计何时才能回来，为了让雅典居民在暂住地尽可能过得舒适，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都要带上。要在疏散时带上所有用品，多少船都是不够用的。因此哪怕只有一个帆、一个船员、一次只能运送一家的小船，也都用上了。

但是无论怎么动员，还是有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对于这样的人，地米斯托克利作为危机管理内阁的首相，权力再大也无能为力，毕竟他不能用绳索将他们捆起来拉走。正当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时，他听到了一个祭司说的话，这位祭司在供奉女神雅典娜的神庙任职。

祭司说，养在神庙中与女神形影不离的蛇这几天都没有吃为它准备的蜂蜜面包。

地米斯托克利一听，计上心来。他叫来那位祭司，让他把这些话讲述给那些犹豫不决的公民听。

祭司按要求向举棋不定的公民讲了地米斯托克利希望传递的意思。

他说，与女神形影不离的蛇从几天前开始就不肯再吃面包，原因是这条蛇已经不在雅典。蛇不在雅典就意味着常与蛇相伴的女神也一定离开雅典了。

于是，犹豫不决的人的数量大大减少。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坚持不肯离开雅典，这些人数量不足100人，

其中以高龄者居多。他们拿出早些年的传说，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雅典。

他们拒绝离开的理由是，雅典只要有“木”保护，别国侵略者就不会进入雅典。他们坚称，卫城有圆木护栏围着，只要固守在卫城之中，雅典就绝不会沦陷。

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们，传说中的“木”指的是用木头建造的三层加莱船，与雅典城市无关。但是，固执的老人根本不听。结果，他只好由着他们，让他们留了下来。

这次强制疏散行动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非常完美，效率之高令人吃惊。然而，地米斯托克利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前往萨拉米斯

为了抵抗波斯入侵，希腊城邦国家结成了联盟。此时，温泉关—亚德米西林防线已经被突破。那么，接下来应该在何处迎战敌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出现了意见分歧。

科林斯认为选择伊斯米亚为最佳方案。伊斯米亚是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狭窄地峡。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斯巴达赞成在伊斯米亚迎敌。

如果采用这一战略，意味着联盟要放弃雅典。与此同时，派出20艘战船加入希腊海上军队的迈加拉也将遭放弃。毋庸置疑，地米斯托克利坚决反对此提案。

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出席伊斯米亚会议，他认为在伊斯米亚迎战敌人，海上军队将无所作为。他列举以下事实，极力说服其他城邦国家代表放弃这一方案。

一、伊斯米亚附近的海域过于开阔，有利于大型船只为主的波斯海上军队。

二、雅典近海萨拉米斯湾海域较窄。将战场设在此地，波斯海上军队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船体不大却很稳重的三层加莱船受潮流影响小，行动自如，最适合在这里迎战敌人。

但是，波斯军队认为船只只是用来输送战斗人员的，而此时的希腊人也这样认为。

毕竟靠海战决定战争胜负史无前例，因为历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萨拉米斯海战。

鉴于这样一种认识，尽管地米斯托克利极力劝导，同意将萨拉米斯海湾作为战场的城邦国家依然很少。

地米斯托克利不得已采用了威胁的手段。他提出，如果战场不设在萨拉米斯，雅典将退出对抗波斯的希腊联军，雅典所有船只将带着所有雅典人迁往意大利南部。

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都知道地米斯托克利的强制疏散将雅典变成了一座空城，他们也知道这次强制疏散行动时间短、结果圆满。所以，听到地米斯托克利的话后，他们毫不怀疑他会把全体雅典人迁往意大利南部。

尽管如此，依然有个别城邦国家表示反对。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又采取了另一个对策。

他有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孩子们的教育。家庭教师是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原是奴隶，精通波斯语。此人非常崇拜地米斯托克利，甚至愿意为他去死。

地米斯托克利让此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前往波斯营地，去见波斯国王薛西斯。他要求此人一定要面见国王，用波斯语转达地米斯托克利的意思。

为了不留下证据，他让使者口头转达他的意思，内容是：希腊城邦联盟意见分歧严重，雅典对此深感绝望，欲与波斯国王单独讲和。

这位家庭教师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然而波斯国王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薛西斯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对此很有兴

趣。”

波斯国王薛西斯认为，在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与斯巴达势均力敌。如果希腊强国雅典脱离联盟，波斯入侵希腊就成功了一半。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已经打败斯巴达，论海上战斗力，仅雅典就占了全希腊海上军队的一半以上，如果雅典能够脱离联盟，那么……想到这些，39岁的国王不免喜形于色。

这位家庭教师回来后，向地米斯托克利做了汇报。之后，地米斯托克利再也没有理会波斯国王，但是他故意放出风声，让别人误以为雅典和波斯有可能单独讲和，以此给固执己见、坚持要在伊斯米亚迎敌的城邦国家代表施加压力。

尽管如此，要让希腊联合海军将迎敌战场从伊斯米亚海面转移到萨拉米斯湾，还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力。

这时，阿里斯泰德正好回国了。两年前，地米斯托克利用陶片放逐制度将他逐出了雅典，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地米斯托克利认为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效力，于是建议公民大会向陶片放逐者发出召回令。

10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阿里斯泰德是指挥官之一，曾经与地米斯托克利并肩作战。这次回国，他是带着“见面礼”回来的。回来前，他对波斯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掌握了一定情况。

阿里斯泰德来到伊斯米亚，叫出正在开会的地米斯托克利，向他讲述了一个情况。

他说，自己在回国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埃伊纳岛，看到停泊在法莱隆港的一支波斯海上部队横越萨拉米斯和埃伊纳之间的海面，正在向萨拉米斯西侧行进。

显然，波斯海上军队的战术是从东西两侧夹击停泊在萨拉米斯湾的希腊海上军队。

众所周知，此前的10年间，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和50岁的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政界的两大人物互为对手。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受情绪左右的人，而此时也不是纠缠于政治斗争的时候。因此，当他听到希腊海上军队可能遭左右夹攻的消息时不禁面露喜色，他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一，波斯方面发起海战的行动已经明朗化。

第二，如果东西两侧同时遭封锁，停泊在萨拉米斯湾内的希腊海上军队只能在湾内与敌人展开决战。

他说："由我说明这一情况，恐怕其他国家的代表未必相信。所以，我希望由你来向大家进行说明。毕竟你是公认的正义之士，大家都相信你绝不会说谎。"

在城邦国家代表面前，阿里斯泰德将自己亲眼所见以及埃伊纳岛民的证言等一切关于波斯海军动向的信息讲给了大家。

效果出人意料。所有代表当即同意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决战的战场就定在萨拉米斯湾。

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两侧被封锁，就只能选择在中间地带作战。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地让大家接受了背水一战的设想。

萨拉米斯海战

波斯国王，包括公元前490年企图占领希腊的大流士和10年后继承父亲遗志正在进犯希腊的薛西斯，都知道希腊是独立性很强的众多城邦国家的集合体。

他们也知道城邦国家之间争斗不断，甚至需要每隔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来休战。

他们利用希腊人的这一特点，用“土地和水”通告对其分而治之。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位于小亚细亚西侧的爱奥尼亚地区和与爱奥尼亚地区近在咫尺的爱琴海群岛，包括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等，在第一次希波战争期间已经归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

还有伯罗奔尼撒狭窄海峡对岸的欧洲部分，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境内北部地区，也因接受“土地和水”通告而变成了波斯的属国。

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后，辽阔的色萨利地区屈从了“土地和水”通告，南侧毗邻维奥蒂亚地区的强国底比斯，其军队作为希腊联军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列奥尼达指挥下参加了温泉关之战，却在最后时刻举旗投降，现在也成了波斯军队的一员。在波斯军队离开温泉关直奔雅典的行军途中，薛西斯就安排刚刚归顺的底比斯士兵担任先锋。

波斯军队南下异常顺利。因为底比斯的临阵倒戈，再无希腊人阻挡波斯军队直捣雅典。

也许是因为行军太过顺利让人心情大好，也许是因为心血来潮要尊重他国宗教，总之，薛西斯下令对沿途城市村庄可以毫不留情地进行掠夺，唯独对德尔斐不得肆意妄为。可能是他想到征服希腊在即，要考虑占领希腊以后的统治策略，因此他要求海上军队在提洛岛上也不得胡作非为。德尔斐和提洛岛是希腊人的信仰中心，或者说这两地是希腊人遇事必去祈求神谕的地方。39岁的波斯国王下令不许掠夺这两个地方，或许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把征服希腊并实行统治当成了既成事实。或许他想借此发出一个信号：只要归顺波斯国王的统治，就保证信仰自由。

尽管如此，貌似宽宏大量的大流士和薛西斯唯独对雅典和斯巴达准备严惩不贷。原因是波斯第一次和第二次入侵时，这两个国家拒绝了波斯国王发出的“土地和水”通告。

波斯国王的使者带着“土地和水”通告来到雅典，被斩首后抛尸郊外。波斯国王的使者带着通告来到斯巴达，被推下悬崖摔死。这两个国家采用如此强硬的手段，目的是彻底切断国内和平派与波斯媾和的通道。

对波斯国王薛西斯而言，这两个国家的做法是在向身为“王中之王”的父子二人宣战。因此，站在波斯人的立场上，他要彻底摧毁雅典和斯巴达无可厚非。

39岁的波斯国王进入了雅典。攻占希腊中心雅典的任务，父亲大流士没有完成，作为儿子的他眼看就要实现梦想。

然而，他进入的是一座空城，城里不仅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连猫和狗都不见踪迹。地米斯托克利在强制疏散的过程中，将猫和狗也一并带走了。

只有卫城山上仍有一群男人，他们不知恐惧地待在木栅围绕的卫城之内。波斯骑兵很快将他们杀得一个不剩。

薛西斯下令火烧所有神庙，包括卫城之上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既然敌人是雅典，自然无须尊重他们的信仰。

此时，希腊将士正站在萨拉米斯湾内的船上向雅典眺望，卫城山上熊熊燃起的大火刺痛了他们的双眼。来自雅典的船只占希腊海上军队的一半以上，这些船上的雅典重装步兵和桨手站在甲板上，眼睁睁地看着远处的这一情形。设在萨拉米斯港附近的希腊海上军队总指挥部内，以地米斯托克利为首的全体指挥官也呆呆地看着熊熊燃烧的卫城。

所谓“背水一战”是说，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作战。只有成功将盟友逼入绝境，这个战术才会奏效。地米斯托克利制定的“背水一战”战术非常完美，剩下的只是如何实施了。

波斯国王占领雅典以后，不仅下令火烧卫城，还下令在市内各处放火，整个雅典变成了一团大火。也正因如此，波斯国王尽管成功进入雅典，却失去了可以休养生息、用以休整的地方。迫不得已，他把临时宫殿安置到了波斯海上军队的集结地——港口城市法莱隆。

在法莱隆，波斯国王召开了作战会议，陆海两路军队的全体指挥官参加了会议。海上作战已经拉开序幕，来自埃及的海上军队前往萨拉米斯西岸，在那里与来自法莱隆的两支军队将希腊方面的海上军队封锁在萨拉米斯湾内。当然，这并不表示它们已经在萨拉米斯湾与希腊海上军队开战。

在陆上军队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该继续南下进军伊斯米亚，在那里首先击败希腊的陆地力量。对于纯粹的波斯人来说，海上战斗力始终只是用来为陆上军队提供补给，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在海上决一死战的想法。

不仅陆上指挥官这样认为，就连海上指挥官中也有人主张陆战优先的战略。海军指挥官中有一位女性叫阿尔泰米西娅，是小亚细亚西南部

国家卡里亚王国的王妃。因为丈夫去世，她现在是摄政王妃。她出生在克里特岛，是希腊人。这一次，她作为波斯阵营中的一员带领卡里亚的船队前来参战。

她反对与雅典为首的希腊海上军队展开海战。当然，她只是表示反对，并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或建议。因此，在波斯军队大多数指挥官倾向于展开海战的情况下，她的意见属于少数派。

所有指挥官都发表了意见，接下来就是服从国王薛西斯的决定了。前面已经介绍过，作为绝对专制国家的领袖，这位年轻的东方国王的做法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在作战会议上，他总是让全体参会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他还郑重其事地向其中唯一的女性阿尔泰米西娅表示了感谢。当然，他的决定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说，最终的战场定在海上。

也许温泉关的胜利让这位年轻的39岁的东方国王信心十足，相信波斯会在萨拉米斯之战中取得胜利吧。

也许薛西斯的心里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地米斯托克利已经表现出与波斯单独讲和的意愿，如果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雅典海上军队真的主动投怀送抱，那么摧毁整个希腊海上军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萨拉米斯海战前夜，薛西斯相信己方此次海战必胜。我的依据有两点：

第一，波斯海上军队的总指挥是他年轻有为的弟弟。

第二，他下令把纯金宝座搬到悬崖边，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海战现场，他要求所有家臣和陆上将领一同观战。

表面的理由是国王亲自督战可鼓舞士兵斗志，但真实原因并不在此。他坚信萨拉米斯海战将是征服希腊的最后一战。在父亲未能征服的

希腊，他已经取得了一次次成功。现在，他要亲眼目睹这最后一战的辉煌战果。这一年远征，除了留守首都的长子，他带来了其他所有王子。因此，在悬崖上陪伴国王观战的人中，还有众位王子。

在战场的另一边，向西直线距离法莱隆不足10公里的萨拉米斯湾内，民主政体国家的领袖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却表现得丝毫不民主。他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只管果断地向众人发出一个又一个指令。

首先，他命令科林斯的40艘战船向西绕过海湾，打击波斯方面的100艘埃及战船，尽管科林斯此前与雅典一直都是竞争关系。

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摆脱掣肘。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雅典海上军队将在萨拉米斯湾东部与敌人主力海战部队展开决战，为此，必须解决敌军从背后攻击的后顾之忧。因此，他交给科林斯的任务意义重大。科林斯的指挥官安德马托斯对此心领神会，他将率领科林斯40艘战船对阵2倍以上的敌人。

以海战决定一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萨拉米斯海战首开先河。关于波斯和希腊双方投入的战斗力量，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做了种种推测。

首先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希罗多德。

《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认为，波斯方面的船只总数为1207艘。其中，来自腓尼基的300艘、来自埃及的200艘以及希腊的500艘战船构成了主力。希腊船队来自波斯统治下的爱奥尼亚地区、爱琴海群岛以及克里特岛。

至于希腊方面的船只总数，希罗多德指出是380艘。

仅看参战的船只数量，雅典作为主力军派出了200艘船，在数量上领先其他希腊国家。当然，这200艘船中包括为卡尔息底亚地区难民所用的20艘船。

继雅典之后是科林斯的40艘、埃伊纳的30艘、迈加拉的20艘和斯巴达的16艘船。

余下13个城邦国家提供的船只数量从1艘到10艘不等。还有6艘是脱离波斯船队回到希腊阵营的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利姆诺斯的船只。

当然，上述数字仅指用于海战的三层加莱船，波斯方面不计其数的运输船不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萨拉米斯海战是波斯海上军队的1207艘战船与雅典海上军队的380艘战船之间的一场战斗。

对于希罗多德提出的数字，后世研究者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这个数字包括了之前已损失的船只数量。波斯军从塞萨洛尼基南下的途中在爱琴海遭遇暴风雨，不少船只因此沉入海底，在亚德米西林海面的战斗中，波斯方面也损失了一些船只。

因此，他们推断，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波斯海军船只总数应该在900艘左右。

而希腊方面减去在亚德米西林海战中的损失，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船只总数应该是375艘。

也许后世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数字更接近真实情况吧。在爱琴海暴风雨的袭击中，埃及船只损失最大。因此，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埃及船只很可能只有总数200艘中的一半。

波斯人善用人海战术，常常喜欢夸大事实。而希罗多德大多数时候可能信以为真了。

不管怎样，发生于公元前480年秋季的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

在拥有900艘战船的波斯帝国和不足400艘战船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之间展开了。

战斗力量的对比如此不利，地米斯托克利必须设法扭转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最后的胜利。

根据阿里斯泰德回国时提供的情报，地米斯托克利已知埃及的200艘战船负责封锁西侧。

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地米斯托克利得知集结在法莱隆港的波斯海军编队的情况。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作为主力负责左翼，已归顺波斯的希腊地区船队作为主力负责右翼。

希腊方面对阵埃及海上军队的是科林斯的40艘战船。余下的335艘必须迎战800艘敌船，不只是迎战，还必须取胜。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将335艘战船分成左右两翼。

根据惯例，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后，通常己方右翼进攻敌人左翼，左翼攻打敌人右翼。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不会受这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他制定的战术是己方右翼打击敌人的右翼，左翼进攻敌人的左翼。

由135艘战船组成的希腊海上军队右翼，由名义上的总指挥官、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率领。但是斯巴达人不熟悉大海，而且参战船只只有16艘。因此，实际指挥右翼作战的是埃伊纳的指挥官。埃伊纳的参战船只是30艘。

对于这样的安排，斯巴达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斯巴达男人个个都是勇士，但是他们不熟悉大海，他们很清楚，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斗的结果。

希腊海上军队的左翼是来自雅典的船只。在200艘战船中，180艘船上的参战人员从重装步兵到桨手都是雅典公民，此外是难民志愿者驾驶的20艘船。这是主力军，指挥官当然是地米斯托克利。

地米斯托克利是整个希腊海上军队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根据他的构思，己方右翼迎战敌军中的爱奥尼亚军队，而他指挥下的200艘雅典战船包围腓尼基的300艘战船。因此，希腊海上军队的左翼承担的任务最艰巨，也最有挑战性。

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决定用自己的主力攻打敌方的主力。

说到波斯海上军队，通常都指来自腓尼基的海上军队。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所共知的。

地米斯托克利决心一定要让波斯国王亲眼目睹自己如何摧毁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他要给薛西斯以沉重一击的愿望必定异常强烈。

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设想，由斯巴达和埃伊纳负责的右翼即使不能完全消灭波斯军队中的爱奥尼亚军队，让他们逃之夭夭也无所谓。

但是，他率领的左翼绝对不能给敌方的腓尼基海上军队留下逃跑的机会，他必须全歼敌人。1个月前，发生在亚德米西林海面的海战未分出胜负。地米斯托克利认为，那次战斗不能算给了入侵者波斯军队真正意义上的迎头痛击。

为此，他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策略。

他也给刚回国的阿里斯泰德指派了重要任务。

萨拉米斯岛和雅典本土之间有一个小岛叫普斯塔雷阿。这个岛很小，只有近海渔民常常上岸小憩。但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中，这个小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只有波斯海上军队的左右翼分别从此岛两侧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湾内，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才能奏效。自从波斯军队集结到法莱隆以后，该岛已被波斯士兵占领。

阿里斯泰德的任务是带领一队重装步兵消灭这个岛上的波斯士兵。这一行动的目的也是为了给敌军的心理造成威慑。

他预料一旦波斯军队得知该小岛被希腊军队夺回，为了挽回损失，一定会选择从该小岛两侧进入萨拉米斯湾。也就是说，夺取小岛是诱使波斯海上军队从该岛两侧进入萨拉米斯湾的一个策略。

这一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公元前480年9月23日，朝阳从右后方冉冉升起。波斯军队的800艘战船离开法莱隆，分左右翼从普斯塔雷阿东西两侧向着萨拉米斯湾开始北上。因为船只较多，左翼和右翼都排成了三列纵队。

希腊海上军队也离开了萨拉米斯的港口。他们是两列纵队，右翼先行，左翼紧随其后。

波斯海上军队一定以为自己刚通过小岛就要进入战斗。

然而，航行在最前面的希腊海上军队右翼到达目的地后，不仅没有改变方向向波斯军队发起进攻，还转向左前方，继续向海湾深处行进，甚至不惜将船身暴露给不断接近的波斯右翼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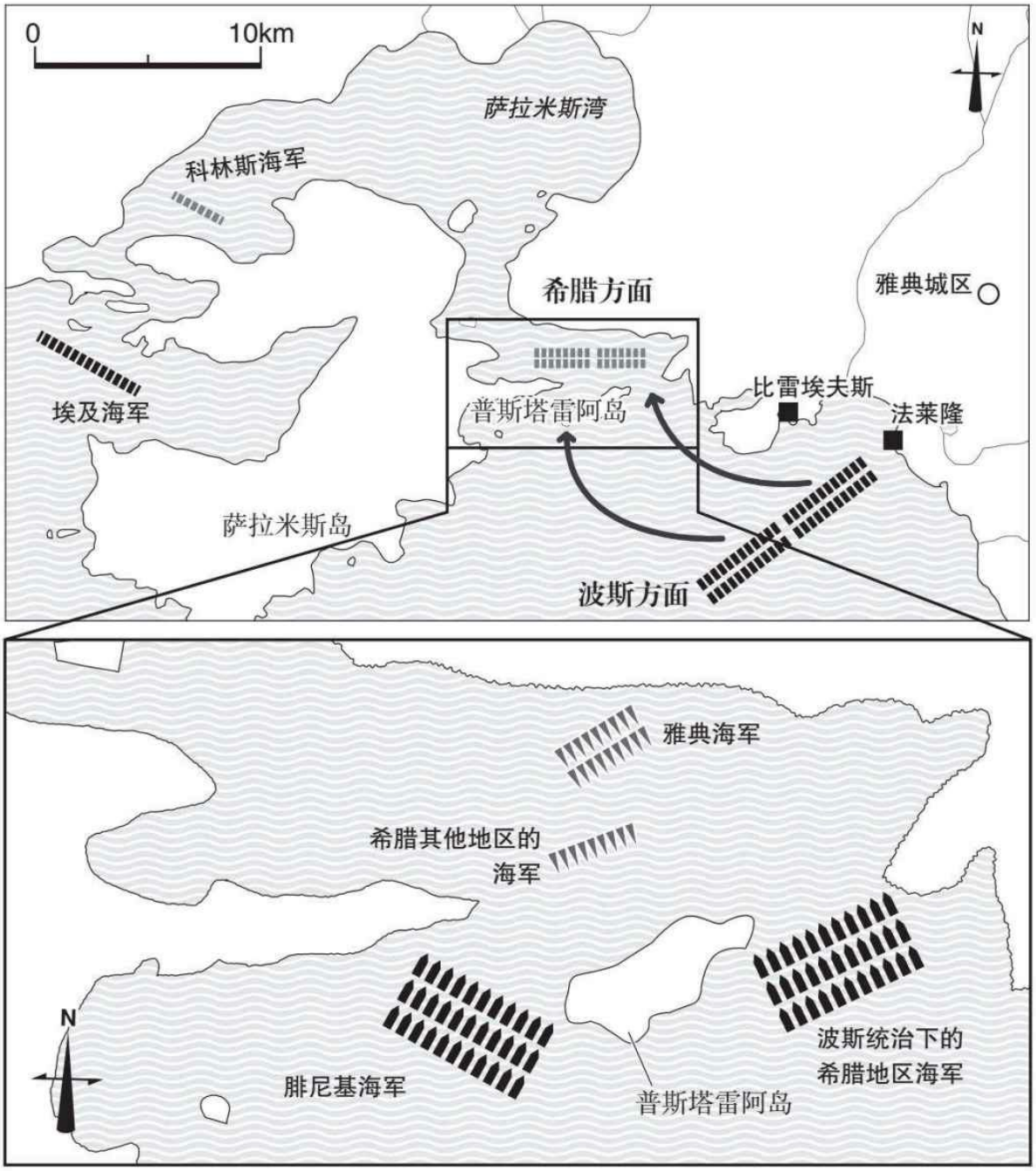
波斯海上军队的右翼见此情形以为敌人要逃跑，于是紧追其后，却没有注意到以埃伊纳船队为首的135艘希腊右翼船队开始绕向右侧。

在200艘雅典战船组成的希腊海上军队左翼，地米斯托克利一定坐在最前面的大帆船上。因为紧随其后的所有船只排成两列纵队，看着总指挥官乘坐的船，也就是“旗舰”前进。

希腊军队的左翼同前面的盟军右翼一样，刚遇到腓尼基的船队时先向左打舵，将船身暴露在从右后方不断靠近的敌军眼前，然后突然改变方向，这一行动远比右翼军队复杂得多。

右翼军队还在不断向右绕行。与右翼军队一样，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左翼军队将敌人诱入了萨拉米斯湾深处。接着，他们的行动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尤其是左翼的行动更加复杂。

他们首先需要向左拐一个很大的弯，几乎接近掉头，然后将敌人包围起来。这一过程必须严丝合缝。



萨拉米斯海战

由雅典公民组成的船员出色地完成了地米斯托克利交给他们的这项艰巨任务。

在古代海战中，通常的战术是落下船帆，仅靠划桨接近敌船，然后

或撞击敌船或桨手扔下桨拿起剑或矛杀入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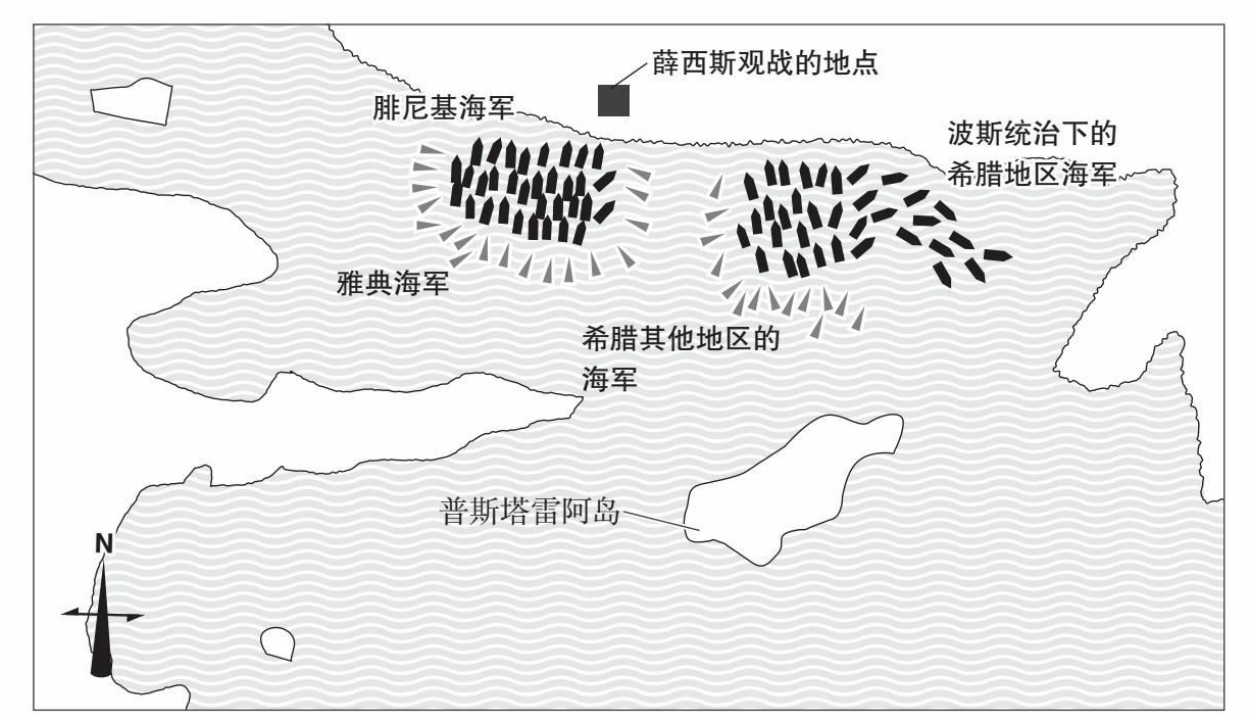
敌我双方远距离的海战是大炮出现以后的事情，也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此前的海战和陆战一样，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不同的只是战场在海上。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采用撞击战术，他设计的雅典船有了用武之地。

与腓尼基船相比，地米斯托克利设计的雅典三层加莱船船体小但重量大。船身太重，操纵起来相对困难。因此，地米斯托克利一直很注重训练船员尽快适应操控重量大的战船。雅典人本来就对操控船只不陌生，因此进步很快。

此时，雅典的200艘战船成功诱使腓尼基的300艘战船进入了萨拉米斯湾深处。接着，地米斯托克利发出了下一个行动的信号。

船员全力划动船桨，沉重的船体向着腓尼基的大船船腹猛烈地撞去，犹如竭尽全力举起又重又大的铁球砸向前方。腓尼基船体积大，因此撞击命中率极高。



萨拉米斯海战的最后阶段

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上的士兵顿时陷入恐慌。他们熟悉的环境是地中海，本来就不擅长小弧度的转弯，而且在萨拉米斯湾内还排成了三列纵队。于是，己方船队中相互撞击的船只越来越多，许多船纷纷沉入海底。

相反，雅典的战船船身小、便于转弯，在乱作一团的敌船之间穿行自如，又利用船体本身的重量不断撞向敌船，就好像围成一圈的狼群撕咬着牛群中一只只体型肥硕的牛一般。

如果这时希腊海军右翼的135艘船被敌人的500艘船撞击陷入被动，大概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不可能发挥出如此效果。因为波斯右翼船队一旦冲破希腊右翼船队的纠缠，就有可能从外侧反包围正在攻击腓尼基船队的那200艘雅典战船。这样一来，包围敌船的雅典船只有可能遭到内外夹攻。

幸运的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首先，率领希腊海军右翼军队的总指挥官名义上是斯巴达将军，实际上是来自埃伊纳的30艘战船的指挥官。

埃伊纳不愧是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海运强国。在雅典海上力量崛起前，埃伊纳拥有的三层加莱船数量与科林斯不相上下。

虽然仅有30艘船，但是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善战，逼得敌船自顾不暇，更谈不上从背后包抄希腊船只，给腓尼基的部队以有效的支援。

其次，希腊右翼船队攻打的波斯右翼是来自希腊的船队，敌人都是希腊人。

他们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希腊北部以及爱琴海群岛等，这些地区原本都是希腊人开辟出来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以后，他们被迫纳入波斯国王统治之下，从时间上推算，最多不过10年。

他们看到了10年前曾是同胞的地米斯托克利的劝说告示。内容是：如果无法临阵倒戈，战场上还可以采取消极战法。他们看到这一劝说告示是在温泉关之战结束以后，就在1个月前。

以500艘对135艘，波斯非但没赢，波斯右翼船队还抛弃了正遭毁灭性打击的300艘腓尼基战船临阵脱逃。究其原因，我想可能因为他们同为希腊人。这种感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最重要的是揪住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心生疑虑、举棋不定。

不管怎样，在萨拉米斯海战的主战场上，雅典的200艘战船与腓尼基的300艘战船战斗激烈，在这里看不到一丝迟疑，也看不到一点儿彷徨。

薛西斯坐在悬崖上，把眼前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

以国王为首的波斯帝国权贵所在的这个悬崖大概是最佳观战地点。悬崖下面，腓尼基船只正与雅典船只浴血奋战。左侧不远处的海面上，是波斯右翼对阵希腊右翼的战斗。

没有史料记录波斯国王薛西斯此时是怎样的心情，也没有史料显示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是否勃然大怒。可以想象，39岁的年轻东方国王一定陷入了绝望——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绝望，非勃然大怒不能发泄的绝望。他最看重的腓尼基船队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惨遭毁灭。

关于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的结果，历史学家推测如下：

波斯方面：沉没加烧毁的船只总数——300到400艘。

希腊方面：沉没加受损严重拖回港口维修的船只总数——40艘。

双方死伤者人数不详。

但是，史料中记录了指挥官级别的阵亡者。希腊方面没有指挥官伤亡，波斯方面国王的弟弟阵亡，他作为总指挥官坐在腓尼基的指挥舰上。悬崖上，39岁的波斯国王只能眼睁睁看着年轻的弟弟死去。

发生于公元前480年9月23日的萨拉米斯海战以希腊的绝对胜利结束。

这是一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斗，是一场战斗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利用有效战术取得胜利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双方分别回到各自的基地。波斯方返回法莱隆港，希腊方回到萨拉米斯港。

回到基地后，双方的状态有天壤之别。

在法莱隆，全体指挥官神色黯然，一言不发地站在刚从悬崖上观战回来的薛西斯面前。

在萨拉米斯，人们兴高采烈，忘却了曾经的争斗，互相拥抱在一起，有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士兵们的表现更直截了当。这个晚上，在萨拉米斯，人们欢呼雀跃；但在法莱隆，连各帐篷前燃起的火把都显得无精打采。

在萨拉米斯，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希腊方面的临战状态并没有被解除。

相距不足10公里的法莱隆，敌人还有一半以上的兵力。也就是说，敌军剩余船只数量和希腊海军的现有战斗力旗鼓相当。只要他们不放弃，尚有足够的战斗力在次日发起进攻以雪前耻。

作为事实上的总指挥官，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和之前一样，继续派遣侦察兵侦察敌情，同时要求停泊在港口的全体船队做好随时迎敌的准备，不得懈怠。他的命令得到了欧里拜德斯和安德马托斯的支持。前者是名义上作为总指挥官的斯巴达人，后者是给了埃及船队以毁灭性打击的科林斯船队指挥官。

然而在法莱隆，人们完全没有了一雪前耻的斗志。

作为主要战斗力量深受国王倚重的腓尼基船队惨遭全歼。

作为波斯国王的全权代表，担任船队总指挥的国王亲弟弟死在了战场上。

在希腊右翼船队的猛烈攻击下成功逃脱的波斯船只，大部分是波斯国王统治下的希腊人的船队，薛西斯对于他们并不放心。

在这种状况下，何谈报仇雪耻？

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波斯国王一心只想尽早离开希腊，不愿意多逗留一分钟。而时间也临近冬季，到了不适合作战的季节。

但是，他是“王中之王”，不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薛西斯有苦说不出，好在重臣之一马多尼乌斯向他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我们在海战中失败了，但是陆上战斗力尚存。我提议将这支战斗力量交给我，由我带领这支军队在波斯人控制下的色萨利地区越冬。我们擅长陆战，来年我们就用陆战一雪前耻。”

39岁的年轻东方国王一口允诺。在马多尼乌斯的请求下，他甚至同意将波斯陆上军队引以为傲的全体骑兵也留了下来，同时他还决定留下1万人的近卫军“不死军”，这曾经是和波斯国王寸步不离的一支军团。总之，薛西斯将骑兵、重装步兵外加近20万人的轻装步兵都留给了马多尼乌斯。包括非战斗人员，这又是一支超过30万人的大军。

还有一个人也提了一个建议。对心情沉重的薛西斯来说，这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她就是指挥官中唯一的女性——卡里亚国王的未亡人阿尔泰米西娅。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她参加了波斯右翼船队的战斗，其间看到形势不妙，立即降下船帆上的卡里亚旗帜，换上雅典的旗号，才得以成功逃离战场。

她说愿意用船将波斯王子们送到以弗所，请薛西斯安心沿陆路北上，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亚细亚。

对此，波斯国王也当即表示同意。

要做到不露痕迹地撤退，最好尽可能轻装。轻装上路也方便随机应变。

说到底，薛西斯终究是个波斯人，波斯民族只有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才会踏实。

他下令把纯金宝座等所有可能成为旅途累赘的豪华用品全部搬上船运到亚细亚。负责运输的船大多是希腊船只，来自爱奥尼亚以及爱琴海群岛等波斯统治下的地区。他甚至不假思索地允诺，只要他们完成任务，即可返回各自的国家。此时，39岁的波斯国王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到亚细亚。

然而，正因为波斯海上军队的解散，薛西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交给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计划在下一年报仇雪耻，他们没有了来自海上部队的补给。

“后勤”是负责补给和运输的体系，不仅负责粮食补给，还负责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等的补给。

300年后，罗马帝国军团以无往不胜闻名遐迩。甚至有人说“罗马军的胜利归功于完善的后勤保障”。

但凡著名的优秀武将，没有不重视后勤的，忽略后勤保障很难取得战斗的胜利。因为战争是综合实力的体现，仅靠当地筹措，仅靠士兵的精神力量，很难在战斗中赢得胜利。

如果说一国领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指挥官，那么只能说薛西斯没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同时，没有向国王要求后勤保障的马多尼乌斯也缺少对胜利的执着追求。

一心一意只想赢得胜利的是地米斯托克利。

根据派出去的侦察士兵的报告，希腊海上军队得知波斯海上军队事实上已做鸟兽散。于是，指挥官们在萨拉米斯指挥部就下一步行动展开了讨论。

在会上，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提出船队立刻沿爱琴海北上，破坏波斯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为横渡海峡而建的浮桥，切断波斯国王回国的通道。

对此，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斯巴达代表欧里拜德斯表示反对。

他说，这样做只会使波斯国王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逼着他与留下来的马多尼乌斯会合。留在希腊的波斯陆上军队受国王情绪的影响，一定会产生破釜沉舟的想法。一旦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攻打希腊，对希腊很不利。所以，对于希腊来说，让薛西斯顺利回到亚细亚才是上策。

出席会议的参战国代表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地米斯托克利。

对于希腊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年。首先各国在伊斯米亚结成了反抗波斯的希腊城邦国家联盟，接着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同时与波斯军队展开了激战，而短短1个月之后又赢得了萨拉米斯海战。

一切尽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预料之中。因为参战各城邦国家全体代表的支持，这其中当然包括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欧里拜德斯的支持，希腊船队在萨拉米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战果的最大功臣是地米斯托克利，就算没有人说出口，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现在，地米斯托克利——这位最大的功臣，听了反对意见后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所有人都好奇地等待着。

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沉默了数秒钟后明确表示：

“我同意，我认为欧里拜德斯的意见更稳妥。”

阻止波斯国王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北上计划取消了。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因此不再有作为的人。他想起萨拉米斯海战战俘中有一个跟随国王弟弟的随从。国王的这个弟弟已经战死在战场上。

他命人带来这个波斯人。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要释放他，条件是他要带一封信给波斯国王，而且他必须亲手把信交给国王。信中是这样写的：

“在希腊指挥官中有一个意见占了上风，那就是乘胜追击，率领船队一路北上，切断贵军为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而建的浮桥，剪断绳索。我们雅典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讨论的结果难以预料，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这位年轻的东方君主又一次钻进了地米斯托克利给他设的圈套。

他甚至不知如何保持“王中之王”的体面。

薛西斯一路向北，在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军队的保护下，顺利到达色萨利。在此与留下来越冬的波斯陆上军队分手后，他仅带着最低限度的护卫队继续北上，一溜烟儿似的越过马其顿、色雷斯和希腊北部地区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

他是庞大的帝国的国王，因此撤退时所带的士兵人数在五位数以上。途中薛西斯要求他们加速行军，自己更是快马加鞭，一路疾驰。结果从法莱隆到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仅用了45天。作为庞大帝国的领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走完这段路，也只能用“一溜烟儿”这个词来形容了。

当他确认连接浮桥的两根绳子完好无损、浮桥安然无恙时，应该大

大松了一口气吧。但是，他没有时间回味那种轻松的感觉，匆匆走过浮桥进入了亚细亚。紧接着，他从小亚细亚西部一路南下，到达萨迪斯后才彻底放心。

波斯城市萨迪斯位于辽阔帝国的最西北端，薛西斯回到这里时已经是12月了。对于这位39岁的波斯国王来说，提心吊胆的撤退之行在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终于结束。

其间，地米斯托克利虽然不像薛西斯那样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却也神经紧绷。

首席将军，即危机管理内阁首相的任期结束前，他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此时，1年的任期就快结束了。

首先，他和雅典主要掌权者一起视察了波斯军队离开后的雅典。雅典市区已经化为一片焦土，已疏散出去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然而，波斯军队撤离雅典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波斯军队虽然离开了雅典，却在色萨利过冬。他们还停留在希腊中部的北半部分。

色萨利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并不直接接壤。但是，两地之间的维奥蒂亚地区有一个强国底比斯。温泉关战役之后，底比斯已是波斯的盟友。

很难预料波斯军队什么时候会让底比斯军队打头阵再次进入雅典。因此，还不到将疏散出去的普通公民接回的时候。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继续保持雅典被疏散后的现状。

既然雅典的现状如此，那么这个城邦国家的首都功能也只能继续暂留在萨拉米斯，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也在萨拉米斯召开。

在这一年年底，还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希腊方面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下一年，即公元前479年。

地米斯托克利坚信萨拉米斯海战给了波斯以“决定性”的一击。但是，马多尼乌斯率领的20万波斯大军还停留在希腊本土。

他相信来年必将与这支波斯军队有一场陆上激战。他确信，这场陆战才是抵抗波斯军队入侵的“最后一击”。

为此，20多个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再次聚集在伊斯米亚地峡，讨论这一议题。

对于希腊来说，这一年值得庆幸的是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制定的战术。除了陆上决战，全体代表还通过了另一个提案，那就是率领胜利后士气高涨的船队，一口气横渡爱琴海攻打米卡勒。可以想象这个提案也是地米斯托克利提出来的，因为如此大胆的战略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米卡勒海角距离萨摩斯岛不远。如果希腊海上力量成功拿下米卡勒，就有可能夺回萨摩斯岛。此时，这里是波斯攻打希腊的船队集结港。

此事一旦成功，彻底将波斯人赶出爱琴海将成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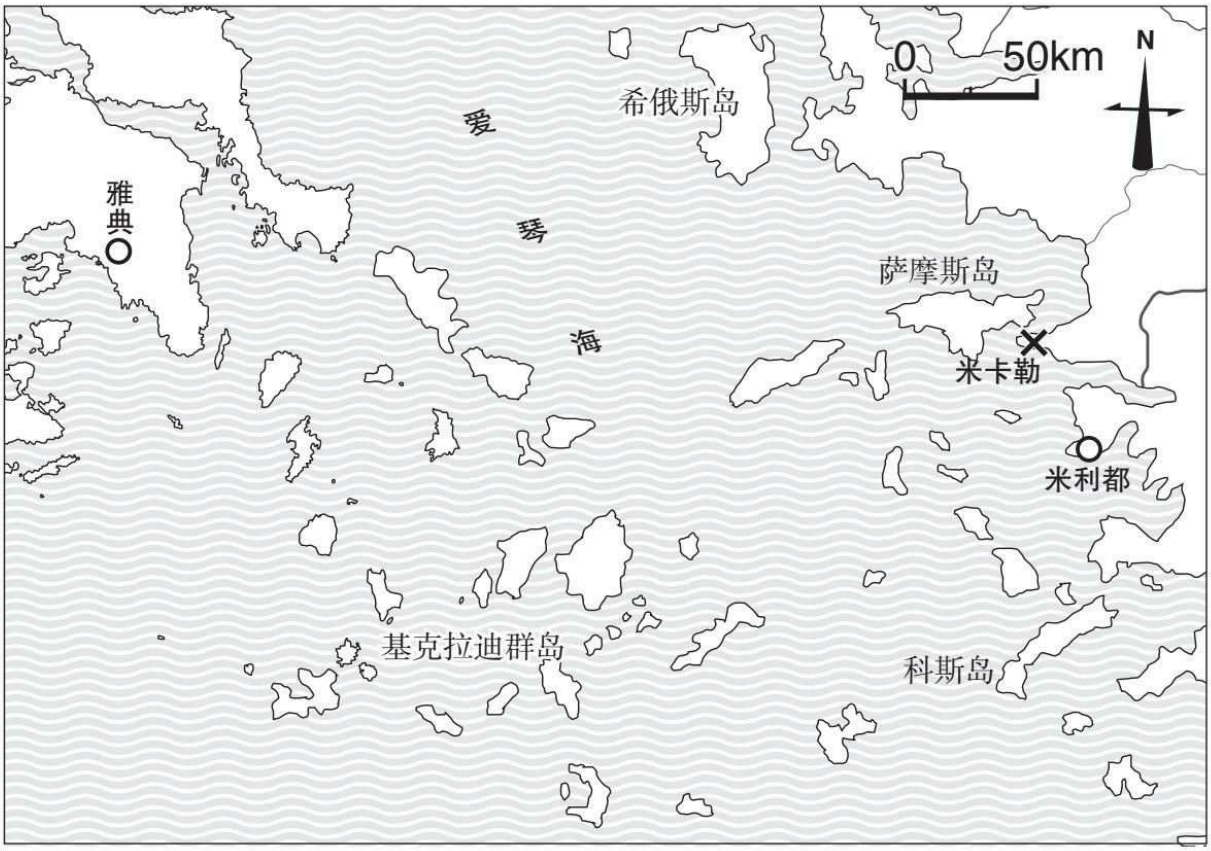
萨拉米斯海战取得完胜以后，此次会议上各项议题的讨论进展非常顺利。

公元前480年年末的这次会议与公元前480年年初的会议不同，此时没有一个城邦国家代表再提在伊斯米亚狭窄的地峡迎战波斯军队。

这就意味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内的城邦国家无须像斯巴达和科林

斯那样派主力守卫伊斯米亚防线了。

斯巴达向温泉关战场只派去300名士兵，这次决定派5000人。未向温泉关派遣一兵一卒的科林斯这次也决定出兵5000人。还有，因全部兵力投入海上而无力向温泉关战场派遣军队的雅典，这次也决定派遣重装步兵8000人。由此可见，全体代表一致认为来年将是给波斯“最后一击”的一年。



爱琴海周边

有史料记载，这次会议的“茶歇时间”里，代表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投票。

投票内容是这一年即公元前480年，在抵抗波斯之战中，最大的功臣是谁，谁排名第一，谁排名第二等。各城邦国家代表慎重地投出了自

己手中的一票。

这次投票充分反映了希腊人的特点。20多个参战国代表都提名自己国家的指挥官排名第一。排名先后无关参战船只的数量，像雅典那样派遣200艘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只派1艘，与提名之间全无关系。

因此，最大功臣的候选人名单中出现了各城邦国家指挥官的名字。至于第二名，全体代表一致投给了地米斯托克利。

不对，不是全体。因为雅典将第一名的票投给了地米斯托克利，将第二名的票投给了埃伊纳总指挥官。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他曾经率领30艘战船勇敢战斗。

仔细分析一下雅典人的心理，也不难理解。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正因为埃伊纳的30艘船牵制住了敌军的右翼，雅典的200艘战船才能集中精力全歼波斯船队主力腓尼基的300艘船。

埃伊纳和雅典的关系完全是希腊式的。几年来，两个国家之间小摩擦不断。但是，为抵抗波斯入侵，一旦结成联盟，就摈弃彼此的隔阂共同抗敌。

无疑，波斯国王进犯希腊对纷争不断的希腊城邦国家团结起来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一年，即公元前480年年末，还有一件事必须决定。这是民主政体国家雅典才有的事情。

这一年，地米斯托克利是首席将军。

这个职位相当于危机管理内阁首相。一年前，地米斯托克利向公民大会提议获得通过后走马上任。其后的罗马在共和政体时代创立的“临时独裁者”大概就源于此。

首席将军一人独揽大权，任期只有1年。也就是说，地米斯托克利行使这一权力的时间截止到这一年年末，而给波斯的“最后一击”在第二年。

民主政体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2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都享有投票权。

但是，雅典的最高执行机构是10位将军组成的机构，每个“部落”各选1个将军，他们享有平等的权限。

雅典10位将军中只有首席将军独揽大权。如果地米斯托克利继续留任，就违背了克里斯提尼确立的雅典民主政体。

如果当时雅典有媒体调查的话，萨拉米斯海战以希腊绝对胜利结束的公元前480年秋冬，地米斯托克利的支持率一定会大幅飙升。如果他以下一年彻底结束希波战争为由，提出继续留任首席将军的话，相信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此提案的可能性很高。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会连任最高指挥官。

但是，这位44岁的雅典男子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没有要求公民大会同意他连任，甚至从未想过提这样的要求。等任期一到，他就辞去了首席将军一职。

没有史料表明他是否当选了下一年的将军。因此，10位将军中很可能有他。也就是说，作为内阁成员，他留在了最高执行机构。

在选举10位将军时，地米斯托克利好像推荐了两个候选人，这个举动有些非同寻常。此时的地米斯托克利深得人心，既然是他推荐的，这两个人自然轻松当选了将军。

他们是年届五旬的阿里斯泰德和40岁的克桑提普斯。两人同属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属于稳健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

的10年里，他们都是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总是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政策，并且态度坚决。

为此，地米斯托克利采用陶片放逐这一强硬手段，于公元前484年将克桑提普斯赶出雅典，又在公元前482年把阿里斯泰德也逐出了雅典。

但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所有人才的作用，于是请求公民大会解除对他们的放逐，并要求他们即刻回国。

地米斯托克利推荐二人为下一年的将军理由充足。

10年前，第一次希波战争爆发之时，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将军，曾在马拉松会战中协助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共同作战。虽然他缺乏统揽全局的才能，但是，率领成千上万名士兵夺取一场战役的胜利却游刃有余。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让阿里斯泰德出任雅典军队总指挥，在下一年与斯巴达军队联合，在陆上战斗中给波斯军队以致命一击。

克桑提普斯并没有傲人的战绩。因为他一直未能解决雅典与埃伊纳之间的纷争，公民们毫不留情地在陶片上刻下他的名字，将他赶出了雅典。

地米斯托克利似乎认为，长期纷争和短期决战是两回事。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的战斗中，年轻的克桑提普斯或许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地米斯托克利将不再亲临战场。但是，关于下一年，即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队如何迎战波斯军队，他订下了作战计划。陆上作战由阿里斯泰德负责，同时展开的海上作战，即攻占米卡勒之战，交由40岁的克桑提普斯负责。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临时独裁者”（任期6个月）深受地米斯托克利创设的“首席将军”的影响。总之，在1年的任期内，地米斯托克利独揽大权，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其他将军无权反对。

地米斯托克利主动辞去这个职位，也断了他人竞选此职位的念头。而他利用任期最后一点儿时间，制定了下一年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正所谓“趁热打铁”。

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者。

虽然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赢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想过功成身退，毕竟此时的他还不到45岁。

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了另外两个人，地米斯托克利要开始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那就是“搞建设”，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雅典。此时，只有他才能想到建设一事，只有具备先见之明的人才能想到重建之事。我想，他一定认为，要开展这项工作离不开公民的大力支持。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使他很容易争取到公民的支持。

不管怎样，地米斯托克利绝不是一个只想着功成身退的人。他并不看重荣誉。在他的意识里，荣誉不过是服务于下一个任务的手段而已。

在首席将军任期结束前安排好这一切以后，地米斯托克利接受了斯巴达的邀请。

斯巴达人向来不喜欢雅典人。他们并非讨厌雅典人，只是认为雅典人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们担心雅典人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良影响。所以，斯巴达人极不希望雅典人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斯巴达的全体住民中，只有4%的人享有公民权，只有这4%的公

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都没有公民权，这就是斯巴达。城邦国家斯巴达长期推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政体”。即使同为希腊人，斯巴达对其他城邦国家始终紧闭门户，从不尝试改变封闭的社会结构。

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开始提出尊重人权，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公民所属等级不同，但是他们都享有参政的权利。无资产者也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手中握有一票。无资产者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曾作为桨手英勇奋战，此后他们更可以在路上昂首阔步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领袖正是地米斯托克利。

当然，斯巴达男人是纯粹的战士。作为战士，他们有能力辨别战场上总指挥官指挥能力的优劣。

斯巴达人第一次郑重其事地邀请雅典人访问斯巴达。当然，斯巴达人邀请地米斯托克利不是因为他是雅典的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卓越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因此，在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只是斯巴达人的信条是质朴和刚健，他们不会用抛洒鲜花之类的举动来表达对地米斯托克利的崇拜之情。

但是，全体王族成员、长老、全体现役战士一律身着白色长袍出迎的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欢迎仪式在神庙前的广场举行，尚在学习武艺的未成年少年也被允许参加。他们一个个带着崇拜的神情紧紧盯着这位来自雅典的英雄。

虽然同是希腊人，斯巴达人不像雅典人那样伶牙俐齿，他们不擅长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斯巴达感受到的只有崇拜。他成了斯巴达青少年的偶像。

访问斯巴达期间，地米斯托克利结识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此人出身王室，是温泉关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列奥尼达的侄子，到下一年才满34岁，因此比地米斯托克利小11岁。

此时的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不会想到，这位年轻人会继自己之后在下一年与波斯军队的决战中成为主角。这个年轻人态度友善，这在斯巴达并不多见。地米斯托克利是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领导者，这个斯巴达年轻人将是普拉塔亚陆战胜利的领导者。当然，任命指挥官是各城邦国家自己的事。

地米斯托克利在斯巴达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欢迎。几天后，他提出要返回雅典。因为雅典市内已是一片焦土，所以他回的是公民的疏散地萨拉米斯。回国之时，他享受到斯巴达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待遇，斯巴达派出了300个年轻重装步兵将他送至国境线。

就这样，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不，对于雅典来说，激动人心的公元前480年过去了。

普拉塔亚陆战

薛西斯回到了亚细亚，马多尼乌斯率领陆上战斗力留在色萨利地区越冬。其间，他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国王没有授予他指挥20万士兵的权力。

20万士兵中，有4万人属于萨迪斯总督率领的军队，他们甚至有权采取单独行动。马多尼乌斯可以要求他们派援军，却不能指望他们马上做出回应。

第二，波斯陆上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弃营逃跑。

萨拉米斯海战的影响太过巨大，大部分来自波斯统治下的爱琴海群岛的士兵，在见识了雅典海上军队的实力后，强烈希望回归希腊。不仅如此，面向爱琴海的内陆地区也不愿再受波斯国王的统治了。此时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叛乱，但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希腊人显然出现了心理上的变化，他们已不甘心继续屈从波斯的统治了。

逃兵不断出现是因为有人暗中帮助他们。趁着夜色离开帐篷逃出去的都是希腊的士兵，而家乡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波斯士兵没有一个逃跑。

第三，后勤问题。波斯的海上船队实质上已经解散，因此他们彻底失去了后勤补给。

除了食物，大多数必需品补给也中断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无法安置军中伤病员，也无法运走战场上毫无用处的冗余物品。例如，薛西

斯留下了一大批帐篷。这些帐篷华丽至极，象征着波斯帝国最高权力者的身份。

薛西斯的本意是为了尽快回到亚细亚而选择轻装上路。但他贵为东方的一国之君，有些话自然不能明说。他只是对马多尼乌斯说，“为了你在这里越冬舒服些，这些东西都留给你”。既然国王有此话，马多尼乌斯自然不能丢弃这些东西。其实若后勤有保障，留下再多的东西也无所谓。但现在，马多尼乌斯不得不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又庞大又笨重的东西带在身边，无论行军还是上战场。

尽管诸多不利因素纷纷显现，但马多尼乌斯手中的兵力少说还有12万人，乐观地说可能多达15万人。

其中1万人是骑兵。他们是波斯民族特有的战斗力量，是波斯军队的骄傲。即使在疾驰的马背上射箭，他们依然可以百发百中。

仅次于这1万骑兵的是波斯军队中的重装步兵。他们是国王的近卫军，又叫“不死军”。在波斯军队中，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这支军队以往与波斯国王如影随形，但薛西斯“撤离”希腊时，把它留给了马多尼乌斯。

除此之外，大部分是来自亚细亚的步兵，是希腊人眼中的轻装步兵。在希腊人看来，轻装步兵甚至算不上主要的战斗力量，但是在采用人海战术的波斯军队中，他们不是单纯的辅助战斗力量。

当然，公元前479年，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中也有希腊士兵。他们大多来自波斯统治下的地区，例如位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希腊北部的色雷斯地区等。在希腊士兵中，马多尼乌斯唯一信任的是来自希腊中部的城邦国家底比斯的士兵。

这不是因为底比斯士兵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加勇敢，而是因为他们

在前一年的温泉关之战中抛下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指挥下的300名斯巴达勇士，投降了波斯国王。之后，波斯军队南下火烧雅典时，底比斯人又是波斯军队的急先锋。

得知斯巴达这次派遣了大规模的军队，底比斯的士兵们一定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斯巴达人不可能忘记温泉关，底比斯人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死在斯巴达人手里。

在希腊中部的城邦国家中，底比斯算得上是一个强国，但还没有强到可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提并论。从人口规模来说，派遣2000名士兵参战已是极限。

尽管底比斯士兵人数不多，但马多尼乌斯依然要求他们负责右翼。原因是其他士兵大多是雇佣兵，受雇作战只是他们的工作。

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希腊城邦国家没有雇佣兵的概念。而在君主专制国家波斯，雇佣兵制度极为普通。这又是欧洲和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之处。

像这样，马多尼乌斯在越冬期间为诸多问题苦恼不已。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马多尼乌斯的出生日期不详，我们只能依据想象推测他的年龄。在波斯帝国，有资格担当重任的不是王公贵族出身就是积累了一定阅历的人。因此，此人大概已过50岁。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发生在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他是否参加了马拉松会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知道马拉松会战。

在那场战斗中，本该并肩作战的斯巴达军队未及时赶到战场，结果，只有1万的雅典军队以寡敌众，战胜了拥有2.5万人的波斯军队。

萨拉米斯海战前夜，地米斯托克利曾经给薛西斯送去一封信，暗示雅典有意单独讲和。

马多尼乌斯想起了这两件事。因此，第二年一开春，他就向雅典，准确地说向仍在萨拉米斯的雅典政府提出了单独讲和的要求。

中间人是马其顿国王。马其顿是波斯属国，因为他们接受了波斯国王送去的“土地和水”通告。雅典坚拒“土地和水”的要求，所以是波斯攻打的对象。马其顿和雅典虽然立场不同，但是马其顿国王和雅典的关系不错，所以请他做中间人非常合适。

马多尼乌斯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他想离间以斯巴达为首的其他希腊城邦国家与雅典之间的关系。马多尼乌斯认为，即使雅典不站到波斯阵营中来，只要保持中立，以现有的波斯军队完全可以战胜希腊联军。

中间人带着单独讲和的请求而来。雅典当然不能像对待带着“土地和水”通告的使者一样，将其杀死后抛尸野外。想必这位中间人带来的要求一定会呈现在10位将军（这一年叫军队指挥官）面前，其中包括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因为这是在民主政体国家雅典，地米斯托克利辞去“首席将军”一职以后，雅典恢复了以前的集体合议制。

马多尼乌斯送来的讲和条件内容如下：

一、原谅雅典前一年让波斯国王备受屈辱的种种行为，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二、归还雅典在此次战争中失去的所有领地和权益。

三、波斯国王承认城邦国家雅典完全独立并享有完全自治权。

四、波斯方面负责重建被波斯军队烧毁的所有神庙。

五、达成和解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波斯和雅典互为合作伙伴。

可以想象，看着这些内容，雅典的10位将军一定嗤之以鼻。

首先，以离间敌人为目的的讲和不应该发生在吃了败仗之后。

其次，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夜，地米斯托克利去信暗示波斯国王，单独讲和只是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个佯动战术。

所谓“佯动战术”是这样的：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而制造假象，从而扰乱敌人的计划。

这一战术用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夜的薛西斯身上是有效的。同样，用在下一年的马多尼乌斯身上似乎也有效。

10个司令官无须对此展开讨论，因为答案早已有了。

除了地米斯托克利，其余9人当即表示拒绝。只有地米斯托克利回答“我们考虑一下再做答复”。

他想应该将马多尼乌斯提出单独讲和的事告诉同盟军斯巴达。

他要利用这件事刺激优柔寡断、行动拖沓的斯巴达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但是国王的权力仅限于指挥军队作战，至于与哪个国家交战、派遣什么规模的军队等，都由公民大会每年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决定。

5个监察官从重装步兵中产生，他们在非人性的集体生活中过了10年以上，只有底层士兵的经历，从未担任过指挥官。也就是说，他们从未有过一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经验。

斯巴达军队的所有事情都采用5人合议制。优柔寡断、行动拖沓正是这个体制的弊端。当然，一旦决定出兵，斯巴达军队的行军速度还是很快的，急行军不分昼夜，一天的行程是70公里。

但是，雅典人不可能因为斯巴达的国体问题而对他们表示同情或理解。尤其是本年度10位将军中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他们不仅参加了10年前的马拉松会战，还是当时10位将军中的两人。他们亲历了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因等不及斯巴达军队的到来而不得不仅靠雅典军队展开的与波斯的决战。

如果不想重蹈马拉松的覆辙，就要催促斯巴达尽快做出决断。只要有效果，无论是来自波斯方面的单独讲和要求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要求，都值得加以利用。

可以想象，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又一个佯动战术，余下9人一定面带微笑，愉快地表示同意。

事实上，这一佯动战术十分奏效。

地米斯托克利说要考虑考虑再做答复，这让马多尼乌斯心里很不踏实。时间已进入春季，大军可以行动了。马多尼乌斯下令让波斯军队开始南下，他们一口气进入了雅典城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期待雅典的答复可以如他所愿。

然而，雅典城内依然空空如也。当地住民仍然疏散在外，雅典政权也还在萨拉米斯岛。因此，对于马多尼乌斯的这次行动，雅典全然不当回事，依然表示还在“考虑之中”。但是，斯巴达有了反应。

斯巴达的这次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斯巴达一直坚持的本国保护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原则。

本国保护主义乃至一国和平主义，可以说是斯巴达的“宪法”，自吕

库古改革以来，斯巴达人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坚守的法律。此时，斯巴达为什么会突然违背这一法律呢？

首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温泉关之战中列奥尼达和“300勇士”壮烈牺牲的意义。

列奥尼达率领的300名斯巴达士兵在温泉关壮烈牺牲。他们是勇士，让斯巴达男人备感自豪。不仅如此，其他城邦国家的希腊人听到他们的壮举，也会热血沸腾。甚至在2500年后的今天，只要说到斯巴达，就会有人接腔说“温泉关、列奥尼达和300勇士”，还有人制作了以此为题材的漫画和电影。在2500年后的现在，只要有人说到“300勇士”，听者就知道所指为何。可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不过，电影中列奥尼达的扮演者有些过于年轻了。

但是，在古代还是有所不同。“300勇士”的任务是坚守温泉关两个月，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全体阵亡了。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无疑就是失败。

如果希腊人在1个月之后的萨拉米斯海战也失败的话，第二次希波战争就会以希腊方面的连败终结，陆上是温泉关，海上是在萨拉米斯。

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波斯大军就会轻松突破伊斯米亚地峡的双重屏障。在他们的疯狂抢掠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市将被夷为平地，生活在半岛上的希腊人会纷纷遭屠杀。而自建国以来从未屈服于他国统治的斯巴达，将不得不接受波斯国王强加给他们的“土地和水”通告。

斯巴达人曾经认为，思考是喜欢夸夸其谈的雅典人的专利。但是现在，他们也要开始认真思考了。

斯巴达人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抵御波斯这样的强敌。如果不与其他城邦国家联手，特别是不与雅典联手，很难说斯巴达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下去。

斯巴达人开始了全面的思考。波斯提出与雅典单独讲和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一旦雅典脱离联盟，希腊联军能够依靠的就只有斯巴达了。他们知道仅靠斯巴达一个国家很难与波斯军队一争高下。相比兵力至少在10万人以上的波斯军队，斯巴达所能派遣的兵力甚至不足对手的十分之一。

英勇牺牲的故事是打动人心的，是振奋士气的。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男人为形势所迫，完全有勇气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他们是单纯的，又是传统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全力奋战，直至壮烈牺牲。

公元前479年，斯巴达做出改变的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斯巴达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

斯巴达5个监察官坚信，对斯巴达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其职责所在。但此时，他们却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做法吧。

“上面”是指国王。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唯一的任务就是站在最前线指挥军队作战。

“下面”是指斯巴达年轻的战士。他们曾经怀着崇拜的心情，用炽热的目光欢迎应邀来访的地米斯托克利。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马拉松会战还是萨拉米斯海战，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与波斯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总是雅典。在马拉松会战中，斯巴达晚到一天没有参加战斗。萨拉米斯海战中，斯巴达仅派出16艘船，无异于未参战。而在温泉关之战中，列奥尼达带去的士兵只有300人，结果还全体牺牲了。

可以想象，这对斯巴达人来说绝对是一种耻辱。因此，尽管5个监察官坚信只有自己才能保护斯巴达，但是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原则吧。

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就无法解释这一年斯巴达为何会投入这么多作战兵力。他们从未向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战场派出如此众多的男人，这甚至让全希腊人为之惊讶不已。

下表有很多数字需要分析。

第一，海战中能否灵活操纵三层加莱船最重要。在陆战中，决定胜败的是主要战斗力即重装步兵的行动。因此，在这个表中，最有意义的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即38700这一数字。

公元前479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二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军陆上战斗力量

城邦国家	主要战斗力 = 重装步兵	辅助战斗力 = 轻装步兵等	小计
斯巴达	1 万人（其中 5000 名斯巴达公民，5000 名柏里伊赛人）	3.5 万名希洛人（1 个斯巴达公民即 1 名重装步兵带 7 个随从）5000 名柏里伊赛人（1 个柏里伊赛人带 1 个柏里伊赛人）	5 万人
雅典	8000 人	800 名弓弩兵 8000 人 （1 个重装步兵带 1 个随从）	16800 人
科林斯	5000 人	5000 人 （1 个重装步兵带 1 个随从）	1 万人
迈加拉	3000 人	3000 人 （1 个重装步兵带 1 个随从）	6000 人
希库隆	3000 人	3000 人 （1 个重装步兵带 1 个随从）	6000 人
19 个中小城邦国家	根据各国能力，参战人数在 150—200 人之间，合计 9700 人	1800 名轻装步兵	11500 人
城邦国家数合计 24 个	38700 人	61600 人	100300 人

除了这一主要战斗力量，另外的6万人与海战中的运输船情况相似，数字是否准确对战局的结果没有太大意义。

也就是说，相对于波斯12万人的兵力，希腊方面的兵力不足4万人。

第二，斯巴达自建国以来一直恪守吕库古制定的“宪法”，坚持本国保护主义。囿于这一政策，斯巴达从未尝试过改变僵硬的、封闭的社会结构。

结果，斯巴达的人口不断减少。斯巴达和雅典一样，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但是，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只有统治阶级。因此，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始终不见增多。

在斯巴达，庇里阿西人只能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工作，希洛人专门从事农业。他们住在斯巴达却没有斯巴达公民权，因此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原因是斯巴达公民担心他们一旦有了武器就会造反。斯巴达的这种社会结构又造成了斯巴达的主要战斗力量重装步兵总是处于后继乏人的局面。

在不改变吕库古“宪法”的前提下，斯巴达人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在迫不得已时允许部分庇里阿西人加入重装步兵。但庇里阿西人加入重装步兵团后依然得不到公民权，他们是“二级重装步兵”。

派往温泉关的300名士兵都是“一级重装步兵”，没有“二级重装步兵”。

公元前479年，除去保护本国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入口伊斯米亚的兵力，斯巴达派出了1万名重装步兵，其中“一级重装步兵”5000人，“二级重装步兵”5000人。“一级重装步兵”几乎倾巢而出。

派出1万人的战斗力量，大概是故意做给雅典看的。因为雅典派出的陆上军队是8000人，当然雅典还派出了海上军队。不管怎样，至少证明在这一年，斯巴达下定了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战斗的胜利。

看上表时，还有一点希望读者朋友注意，那就是重装步兵的随从人数。

一个雅典重装步兵所带的随从最多只有一人，海战时甚至一个都不带。坐在雅典战船上的都是重装步兵。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努力下，雅典已经开始重视海上力量，与其留空间让随从上船，不如多上去几个桨手。

然而斯巴达重装步兵一人可以带7个希洛人作为随从。可见在斯巴达社会，享有公民权的“一级重装步兵”的地位之高。

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公认的希腊最强军事国家斯巴达的主力军队。

既然投入了5000名超级精英，就不允许一败涂地。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斯巴达人摩拳擦掌，决心以斯巴达的力量来赢得战斗的胜利。

看表，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注意到了另一点。

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中只列出了作为主要战斗力的近4万名重装步兵，没有显示骑兵的数量。

骑兵团除了骑士，还需要马匹、马具、马夫、随从等相应的配备，这样才可能组成一支战斗力量。因此，在君主政体国家，服骑兵役是贵族需要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波斯领先于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上看，以公民为最高决策者的希腊城邦国家缺少组建独立骑兵队伍的必要条件。骑士阶层也就是富裕阶层人口原本就少，这是希腊骑兵不能成为独立战斗力量的重要原因。

希腊人意识到骑兵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到150年以后马其顿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他注意到了骑兵的优势。但是在希波战争期间，连波斯也不曾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性。

公元前5世纪，希腊没有能力将骑兵作为重要的战斗力。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元前479年在波斯和希腊之间展开的陆战中，希腊只能依靠重装步兵迎战骑兵和轻装步兵组成的波斯军队。

此时，由谁来指挥希腊联军这个问题尚未确定下来。

雅典决定由51岁的阿里斯泰德率领本国的8000名士兵。

前一年，为抵抗波斯入侵而结成的希腊城邦国家联盟在伊斯米亚举

行第一次会议时，已经决定希腊联军由斯巴达人担任总指挥官，包括海军和陆军。前一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尽管雅典的参战船只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但名义上的总指挥官仍是斯巴达人。

今年，加上“二级重装步兵”，斯巴达仅陆地战斗力就派遣了1万人。因此，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对于斯巴达将领担任全希腊陆上军队总指挥官一事，没有人提出异议。

只是关于具体人选，斯巴达人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必须出自斯巴达建国初始就已存在的两个名门望族。

出身于这两个家族的男性，王位继承排序靠前的从小接受帝王教育。他们不会像普通公民的子弟那样，从7岁就开始过集体生活，学习武艺。他们也不会像普通公民的子弟那样，一到20岁就要经历极不人性的达标仪式，以获得成人资格。

可一旦登上王位，他们就要率领斯巴达战士出征，身先士卒保卫斯巴达。这是他们的责任。

只要听到斯巴达国王这一称号，我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生活在非洲辽阔草原上的雄狮。

雄狮身边每天围着几头雌狮和幼狮，看上去既快活又享受。找食物是雌狮的事，养育幼狮也是雌狮子的工作。雄狮不仅有权优先享用食物，而且好像整天只会睡觉。

然而与雌狮相比，雄狮的寿命短得多，因为雄狮担负着重要职责。当其他雄狮试图征服它的狮群时，它必须奋力保护自己的狮群。其战斗之激烈，常用“死守”一词来形容。因此，雄狮的生存率很低。不少狮群

有两头雄狮，这样的狮群大概就相当于两个国王的斯巴达吧。

斯巴达国王的寿命也受外敌入侵频率的影响。在希波战争期间，这一影响尤其突出。

列奥尼达是两个国王之一，战死在温泉关。另一个国王克里翁布罗托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这一年的年末，在结束伊斯米亚会议回到国内后也死了。此时的斯巴达，没有国王。

就算有两个国王，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典因为有10位将军，国家政权稳定比较有保证。

虽说没有国王，却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担任总指挥官。在斯巴达，率领军队出征的必须是国王。而且，公元前479年，斯巴达为了表明决心，派出的大军人数前所未有。因此，率领这支军队的首先必须是本国人，同时他要能得到其他希腊人的认可。

经过再三斟酌，斯巴达人最后将这一重任交给帕萨尼亚斯。选择帕萨尼亚斯不是因为他将继承国王的王位，甚至可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可能登上王位。

但他是王室出身，前国王克里翁布罗托是他父亲，另一个前国王列奥尼达是他伯父。下一任国王——列奥尼达的儿子年纪尚小，帕萨尼亚斯是他的监护人，代替他的亲生父亲照顾他。

前一年，地米斯托克利应邀访问斯巴达时，帕萨尼亚斯33岁。公元前479年，他34岁。

之前两个国王健在，无人知晓他是否上过战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总之，这位从未想过做狮群之首的年轻雄狮，只因斯巴达人才匮乏，才被选出来统率大军迎战波斯陆上军队。

不管怎样，他当选总指挥官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斯巴达人认为他是代替年纪尚幼的国王出征。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则认为，他是列奥尼达的侄子，列奥尼达在温泉关壮烈牺牲了，因此侄子替儿子上战场为温泉关一役报仇，这种做法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鉴于此种原因，这位刚满34岁的斯巴达年轻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希腊联军的总指挥官。当然，他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这份重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5个监察官虽有勇气将1万名斯巴达士兵交给这个年轻人，却没有能力看出这个年轻人是斯巴达人中的另类——一位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人。

在温泉关英勇牺牲的列奥尼达是典型的斯巴达男子，但他的侄子帕萨尼亚斯不是。这位34岁的斯巴达男子从来没想过壮烈牺牲，他甚至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帕萨尼亚斯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包括自己直接指挥的1万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在内，近4万名希腊士兵的生死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他知道，如果士兵听到总指挥官阵亡的消息，这支军队将不战而败。

因此，担任全军总指挥的这位年轻统帅是不允许自己死在战场上的。在斯巴达战士的格言“要么胜利，要么战死”中，他只能考虑前半部分。

44岁那年，在萨拉米斯大获全胜的地米斯托克利在战争爆发前有10年的准备时间。

而34岁时突然被委以重任的帕萨尼亚斯没有准备的时间。但是，他必须赢得胜利。

帕萨尼亚斯和地米斯托克利都是希腊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两人都清楚，只要受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条条框框”束缚，就不可能赢得胜利。

公元前479年夏天，也就是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二年的夏天，波斯军队和希腊军队决战的战场定在了普拉塔亚。这也是波斯军队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所希望的。

薛西斯回到了亚细亚，马多尼乌斯则带领波斯陆上军队留在了希腊。马多尼乌斯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君主专制国家中常见的宫廷中人。也就是说，这个波斯人和希腊将军一样，做好了一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

然而，他上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当，尽管他所犯的错误没有他的君主薛西斯那么严重。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未接到雅典有关单独讲和的答复。其间，他得到的消息是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20多个城邦国家组建了希腊联军。听闻此消息，想必马多尼乌斯的心情一定十分沉重，他只能下决心在战场上与希腊人一决高下了。为了离间希腊人，他再次占领了已经化为一片焦土的雅典。

作为波斯军队的总指挥官，他深知国王将军队交给他的真正意图。那就是，用胜利一雪萨拉米斯之耻。

不用说，希腊联军一定自南北上。他决定将战场设在希腊中部平原普拉塔亚，依据大概是底比斯要人提供的情报。底比斯自温泉关战役之后就站到了波斯阵营之列。马多尼乌斯根据底比斯情报做出这一决定有充分的理由。

第一，底比斯就在普拉塔亚以北10公里处，不必担心前后受敌。同时，在海上补给无望的情况下，相距10公里的底比斯是补给的重要保

障。对于超过10万人的大军来说，有了这一保障就可以少一份担心。

只是这个平原叫“普拉塔亚平原”，在这个平原的西南数公里处有一个叫普拉塔亚的城邦国家，它是希腊阵营中的一员。不过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普拉塔亚规模很小，向希腊联军提供的兵力仅有600人。也许马多尼乌斯认为这样一个小国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个理由是，普拉塔亚平原中央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马多尼乌斯将指挥部设在这条河的北岸，下令沿河筑起防护栏，以保护所有士兵的安全。

同时，波斯军队无须担心饮水问题。在盛夏的希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在缺水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

第三，选择普拉塔亚作为战场充分反映了东方人的传统。马多尼乌斯认为决定战斗结果的关键在于优秀步兵的“数量”和骑兵的“破坏力”。而希腊实际上并没有骑兵力量。

阿佐珀斯河的河道窄，水流缓慢。不用说骑兵，就连步兵也可以轻松蹚水而过。

马多尼乌斯猜测战斗将在这条河的南岸展开。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将敌人赶至南岸辽阔平原背后的丘陵地带。

一旦敌军进入这片丘陵地带，数量占优势的步兵和战斗力强悍的骑兵就可以决定战斗结果了。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波斯军队抢先进入了普拉塔亚平原。

波斯军队集结到普拉塔亚平原的时候，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也开始了行动。

他们并非号令一下即全军集合完毕。毕竟这是一支分散在全希腊各地的大、中、小城邦国家组建的联军。

疏散至萨拉米斯的雅典人不得不用船将参战的近9000名士兵从萨拉米斯送往集结地埃莱夫西斯。担任海上军队指挥官的是该年度的将军之一克桑提普斯。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将担任陆上军队指挥官的将军阿里斯泰德和他手下的雅典士兵送到希腊本土。

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依靠30艘船牵制住敌人船队的埃伊纳也表示将派遣500名重装步兵参加这一年的陆上战斗。埃伊纳是萨拉米斯南部海域上的一个岛屿，也是需要首先将这500人送上陆地的城邦国家之一。

此外，还有不少城邦国家需要先用船将士兵送到希腊本土，然后再派军前往集结地。尽管他们提供的重装步兵数不多，每国200人或300人。但爱琴海毕竟是一个多岛海域，所以要运输的士兵总数不少。

最后到达集结地的依然是斯巴达人。他们晚到的理由听起来很荒唐，不是类似未及时完成军队编组这样的理由。

斯巴达每年夏天都要举办一场运动会，运动会上人人手举风信子花。他们解释说，等到运动会一结束就集合队伍出发。

斯巴达人的死板已经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事实上，全体希腊人都知道他们极其缺乏灵活性。但现在，敌人已经等候在希腊中部的普拉塔亚了。听了他们的解释，惊呆不已的不只是雅典人，在场的所有希腊人都目瞪口呆。

雅典、迈加拉和普拉塔亚这三个城邦国家负责催促斯巴达尽快出兵。三个国家的使节即刻动身前往斯巴达。他们要求斯巴达立即出兵，说一旦错过时机，波斯军队就会围攻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迎接他们的5个监察官只答应10天后出兵。

这个情形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打破这一僵局的据说是以帕萨尼亚斯为首的、摩拳擦掌的斯巴达年轻人。他们请出了一个5人监察官不敢小觑的大人物，成功改变了这5个“小肚鸡肠的人”的决定。

不管怎样，这一年斯巴达男人手举与其极不相称的风信子花参加比赛的运动会取消了。在帕萨尼亚斯的率领下，斯巴达军队终于出发了。

一旦做出决定，斯巴达军队的行动还是很迅速的。他们经过伊斯米亚地峡，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横穿迈加拉，很快到达了集结地埃莱夫西斯。

埃莱夫西斯建有宏伟的神庙，因圣礼而闻名。将此地作为集结地大概是考虑到了希腊公民的共性，即他们相信神明的力量。

从埃莱夫西斯到波斯军队严阵以待的普拉塔亚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

波斯大军仅主要战斗力就有10万人，他们已等候在战场上。希腊城邦国家联军指挥官在去往战场的途中确定了作战方案。

帕萨尼亚斯率领斯巴达一级和二级重装步兵共1万人负责右翼。

这位34岁的将领不只是斯巴达军队的指挥官。根据希腊城邦国家结盟时达成的协议，陆、海两军的总指挥官都是斯巴达人。因此，他又是由4万人组成的希腊联军的总指挥官。

科林斯5000人、迈加拉3000人、希库隆3000人以及来自其他中小城邦国家的兵力，共计2万人，负责中路阵线。

左翼除了来自雅典的8000名重装步兵为主要战斗力之外，还有普拉塔亚的600人和其他小城邦国家的兵力，共计1万人，由雅典的阿里斯泰德负责指挥。这是继11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之后，51岁的阿里斯泰德第二

次参加与波斯军队的战斗。

仅看这样的阵容就可以知道，公元前479年发生在普拉塔亚平原的战斗中，希腊军队沿用了11年前在马拉松会战中采用的战术，即主力放在两翼，中路军负责牵制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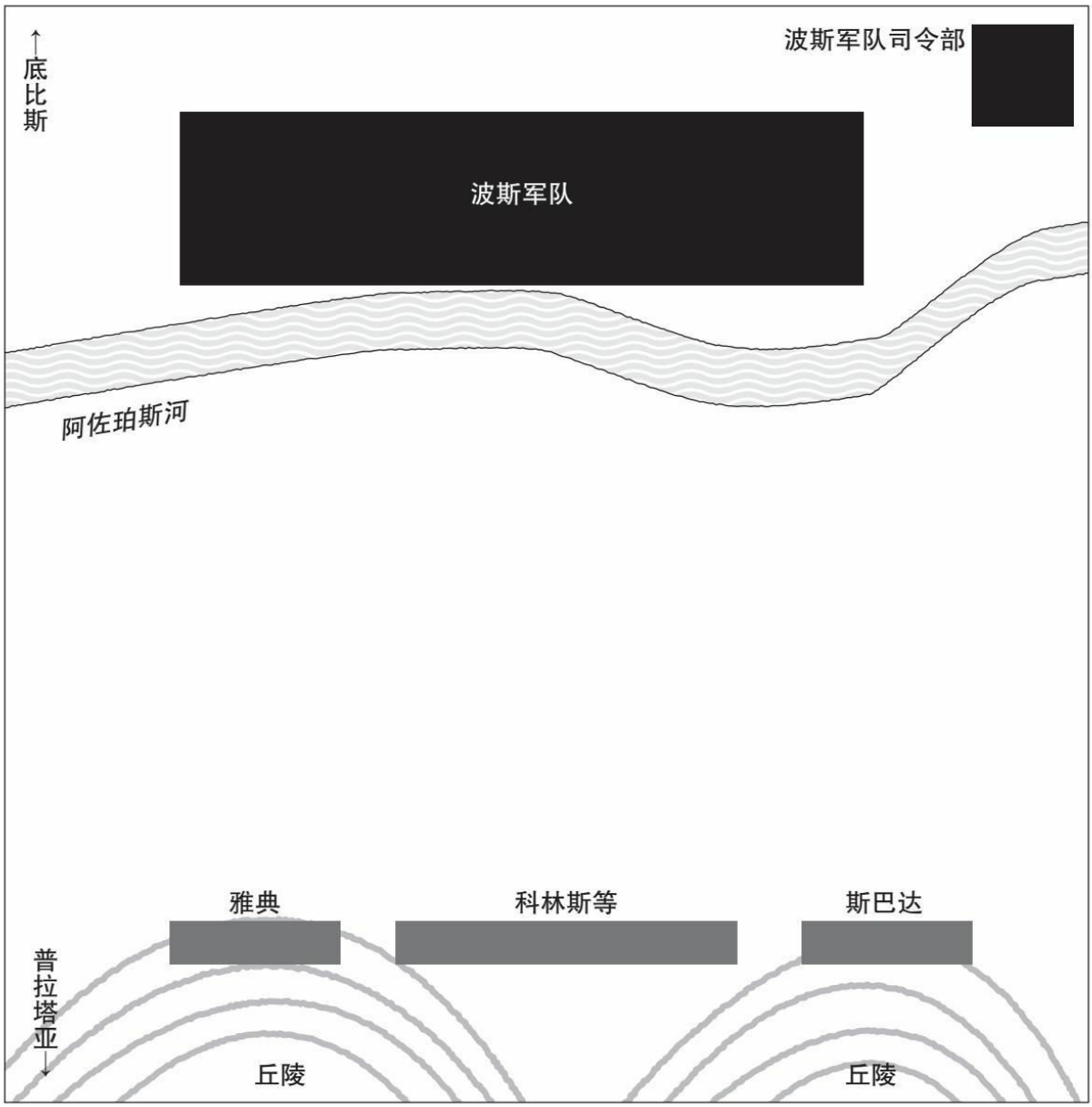
其中的原因是希腊城邦国家虽然全体公民皆为士兵，但缺少骑兵，重装步兵不得不同时担负起骑兵的任务。

希腊军队到达普拉塔亚平原前的丘陵地带时，时间已是8月。流经平原中央的河流对岸已经布满了波斯士兵。波斯军队营地的右后方，波斯国王留给马多尼乌斯的奢华至极的东方式帐篷正闪烁着金蓝色的光。

希腊军队的营地设在丘陵地带，那不是光秃秃的连绵不绝的丘陵，而是在希腊并不多见的树木茂盛、随处可见平地的丘陵地带。作为夏季野营之地，这里的环境相当不错，只是饮用水的问题不好解决。

到达战场后的最初两天，希腊方面没有任何动作。不，应该说是没办法有所动作。看着3倍于自己的敌军，说好听点儿是观望，实际上他们真的是被惊到了。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波斯军队。



普拉塔亚战役布阵图

波斯军队先于希腊军队到达战场，因此，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已经视察了普拉塔亚平原及其南部连成一片的丘陵地带。他知道丘陵地带有两个缺陷。

第一是饮用水不足。

第二是希腊军队只能在丘陵地带扎营。从地势上来看，那里高高低低，面对波斯军队的攻击，很难采用横向排成一线的阵型，也就是说，很难采取全军同时迎战的战术。

马多尼乌斯决定在敌人还没有完成布阵时迅速采取行动。

他决定首先派出最具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骑兵。马多尼乌斯让旗下的1万名骑兵渡河，在对岸整理好队形后一口气穿过平原，向守在丘陵地带的敌人发起进攻。

“力量”一词涵盖了耐力和瞬间爆发力。

我想，波斯军队的总指挥官只了解来自辽阔的波斯帝国各地的士兵和用钱雇来的雇佣兵，却不了解全体公民皆为士兵体制下的希腊城邦国家士兵的“力量”。

斯巴达人在成为真正的士兵前，专心学习武艺长达10年以上。就算斯巴达是特例，雅典公民在20岁正式服役前也要接受为期两年的训练，一年接受军事训练，一年戍守边境。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其他城邦国家的体制也大同小异，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

也就是说，只要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他们都要在20岁开始服兵役，平时过普通的日常生活，一旦需要立即变身一名战士。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有耐力，同时也具备瞬间爆发力。

马多尼乌斯下令发起的普拉塔亚初战失败了。原因是：

第一，骑兵在平原上的机动灵活性无与伦比，但是在树木茂盛的丘陵地带却难以正常发挥水平。

第二，波斯人没有预计到希腊士兵的瞬间爆发力如此强大。

第三，率领波斯骑兵闯入敌阵的骑兵队长不幸阵亡。

波斯军队投入了全部骑兵，但损失不是很大。因为得知自己的指挥官战死后，几乎所有骑兵都立即掉头回营了。

指挥官的生死对部下士气的影响就是这么大。在战场上，为了保护指挥官，在其身边作战的常常都是精锐，毕竟指挥官过早死在战场上总是一件麻烦事。

指挥官的生死也会影响对方的士气。希腊士兵受到敌人的猛烈突袭，他们依靠瞬间爆发力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结束之初，他们一定不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心有余悸吧。

希腊士兵用担架抬回了敌军将领的尸体。我想应该是帕萨尼亚斯下达的命令，因为这种事情只有总指挥官才有资格下令。他下令将敌方将领的尸首示众，之后就不清楚是就地埋葬还是送回敌方阵营了。

不管怎样，希腊军队所有士兵亲眼看过敌方将领的尸首后，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初战胜利了。

也许是因为自信心增强了，希腊方面决定转移营地。他们离开丘陵，转移到河流南侧开阔的平原上。

在这里，完全可以横向摆出一字阵形。最重要的是饮用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路部队和左翼部队可以从阿佐珀斯河取水，远离河道的右翼部队可以饮用丘陵方向流下来的泉水。

波斯军队初战失利，希腊军队无须再担心饮用水的问题，两军隔着河流对峙了整整8天。

第9天，马多尼乌斯改变了战术。他没有直接攻打希腊军队，而是采用阻断希腊军队粮食补给的战术。

这一战术成功地给希腊军队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波斯军队后方有底比斯，这是一个可靠的补给地。希腊军队后方没有这样的补给地。距离最近的普拉塔亚是个小国，没有能力提供4万人的军粮补给。原本可以成为最佳补给地的雅典已经化为一片焦土。因此，希腊军队的军粮补给只能依赖其他城邦国家源源不断地送过来。但是现在，补给队伍在运输途中遭遇袭击，运送军粮的人马惨遭杀害。希腊方面陷入了困境，他们不得已将营地搬回丘陵地带，因为这里距补给路线较近。

4万人转移必然出现混乱。见此情形，马多尼乌斯决定抓住这个绝佳机会发起进攻。他下令全军过河，超过10万人的大军在对岸开阔的平原上声势浩大地布下了战阵。

波斯的右翼是以底比斯为首的来自希腊已归顺地区的士兵。

中路部分是来自波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的士兵。

左翼是清一色的波斯士兵。波斯军队引以为傲的骑兵和称为“不死军”的超级精锐在左翼担任主要战斗力量。

在这个阵形中，波斯军队右翼将对阵以雅典军为首的希腊军队左翼，波斯军队中路部分对阵以科林斯为首的希腊军队中的中小城邦国家联军，清一色由波斯人构成的左翼对阵保护希腊军队右翼的斯巴达士兵。

得知敌军的阵容后，帕萨尼亚斯好像心生一丝不安。

于是，这位34岁的斯巴达年轻指挥官找到率领雅典军队护卫左翼的指挥官阿里斯泰德。他开诚布公地提出希望左翼军和右翼军互换位置，由雅典军队负责右翼，斯巴达军队负责左翼。理由是10年前阿里斯泰德在马拉松会战中与波斯军队作战，有取得胜利的战绩。

对于34岁的年轻人的请求，51岁的阿里斯泰德一口答应。

于是，左右翼开始调换位置。原本为右翼军队的斯巴达1万人去了左翼，原本为左翼军队的雅典1万人去了右翼。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次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却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结果，第二天，朝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发现两翼分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想起来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既然如此，这位斯巴达年轻指挥官只好下定决心，让相当于希腊全军主力的斯巴达军队对战波斯军队的主力。

在一年前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率领希腊船队中的主力——雅典船队，主动承担了对阵敌军主力——腓尼基船队的重任。

在一年后的普拉塔亚陆战中，敌我双方也将以主力对阵主力的方式展开激烈战斗。

在萨拉米斯，向波斯军队发起进攻的是雅典人。在普拉塔亚，向波斯军队发起战斗的是斯巴达人。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制定战术的是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在普拉塔亚陆战中，制定战术的是斯巴达的帕萨尼亚斯。

这位34岁的斯巴达人想到了萨拉米斯海战时的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温泉关战场上的列奥尼达。列奥尼达不仅是他的同胞，还是他的伯父。

一年前，60岁的列奥尼达得知自己带领的斯巴达重装步兵只能有300人时，挑选的都是已有后代的士兵，因为无论战死还是生还，这些士兵的家族都不会绝后。

城邦国家斯巴达长期坚持闭关锁国，王室以外的普通公民中，有不少人的家族历史悠久。列奥尼达深知，对斯巴达人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家族无后。

一年后，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是享有公民权的“一级重装步兵”5000人和没有公民权的“二级重装步兵”庇里阿西人5000人，共计1万名士兵。

“列奥尼达和300勇士”的故事流传很广，“300勇士”都是“一级重装步兵”。就“一级重装步兵”而言，列奥尼达率领的士兵有300人，而帕萨尼亚斯率领的士兵有5000人。

人数上了5000，挑选士兵时自然无暇顾及其是否有后代。别说后代，甚至连尚未成婚的年轻士兵也不得不带上。斯巴达不允许不同阶层之间通婚。为此，重装步兵常常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我想，斯巴达派出5000人的战斗力应该已是极限。

斯巴达和雅典一样，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士兵的现役年龄都是20岁到60岁。正在服役的士兵中，45到60岁的一代叫“老兵”，他们通常被派往边境戍守国境线。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除了保护斯巴达，它还需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保护狭窄的地峡伊斯米亚地区，这里是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入口。

可以想象，在帕萨尼亚斯的率领下前往普拉塔亚的斯巴达士兵大部分是年轻士兵。

当然，帕萨尼亚斯此时的任务不是和列奥尼达做比较，而是必须率军获胜。只有这样才能让属下的士兵不会白白牺牲，不会让他们因献出

生命而抱憾。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呢？这位斯巴达年轻统帅心里一定只有这一件事。

波斯在历史上和传统上是一个靠陆军力量立国的国家。同样，即将与波斯大军展开激战的斯巴达在历史上和传统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波斯有骑兵，斯巴达没有骑兵。

帕萨尼亚斯一定思考过这些。

敌人的主力将攻打斯巴达负责的右翼。那么，如何仅靠重装步兵来削弱敌军最具机动灵活性、攻击力最强的骑兵呢？他知道，这是决定战斗结果的关键所在。

真正意义上的重装步兵只存在于希腊。

如果有人问波斯军队中1万名特级精锐组成的“不死军”是不是重装步兵，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不死军”步兵的装束非常华丽、花哨，头上戴的是帽子而不是头盔，他们也没有胸甲来保护最重要的胸部。盾看上去很精致，却徒有其表，圆形的盾直径60厘米，在希腊只为骑兵或轻装步兵所用。剑是长剑，一旦展开肉搏战，非常不便。长矛不足2米，只比身高长一点儿。上战场时的服装还是东方风格的长袍。也许你会问，这个样子也能打仗？能打，因为当时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战法采用的是“人海战术”。

数量从来不占优势的希腊城邦国家必须提高每个士兵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结果，他们的头盔大得夸张，犹如扫地用的扫帚，视觉效果比实际用途更具威慑力。一旦开始战斗，士兵们就会拉下头盔，只露出眼睛和

嘴。

古代留存至今日的雕像都是用裸体来呈现的。因此你可能以为他们在战场上也是赤身裸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战场既不是运动场也不是体育学校。战场上，希腊男子身着短衣，外披胸甲遮挡整个胸部和背部，腿上还绑金属护具。

他们的盾呈圆形，很结实。直径足有1米，盾上装有两个环，用来固定在胳膊上。

一旦开始肉搏战，他们就拔出吊在腰部的剑。就重装步兵来说，最强大的武器是长矛。长矛的长度是他们身高的两倍以上，两端装有尖尖的、闪闪发亮的刀锋。两头都装刀锋的目的是一旦长矛断裂，还可以继续利用刀锋杀敌。

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首先必须具备随心所欲操控长矛的能力。

帕萨尼亚斯注意到了波斯军队与希腊军队的不同，注意到了希腊重装步兵无论在个人防御能力还是个人进攻能力上都优于波斯军队。

于是，他决定采用“战略性撤退”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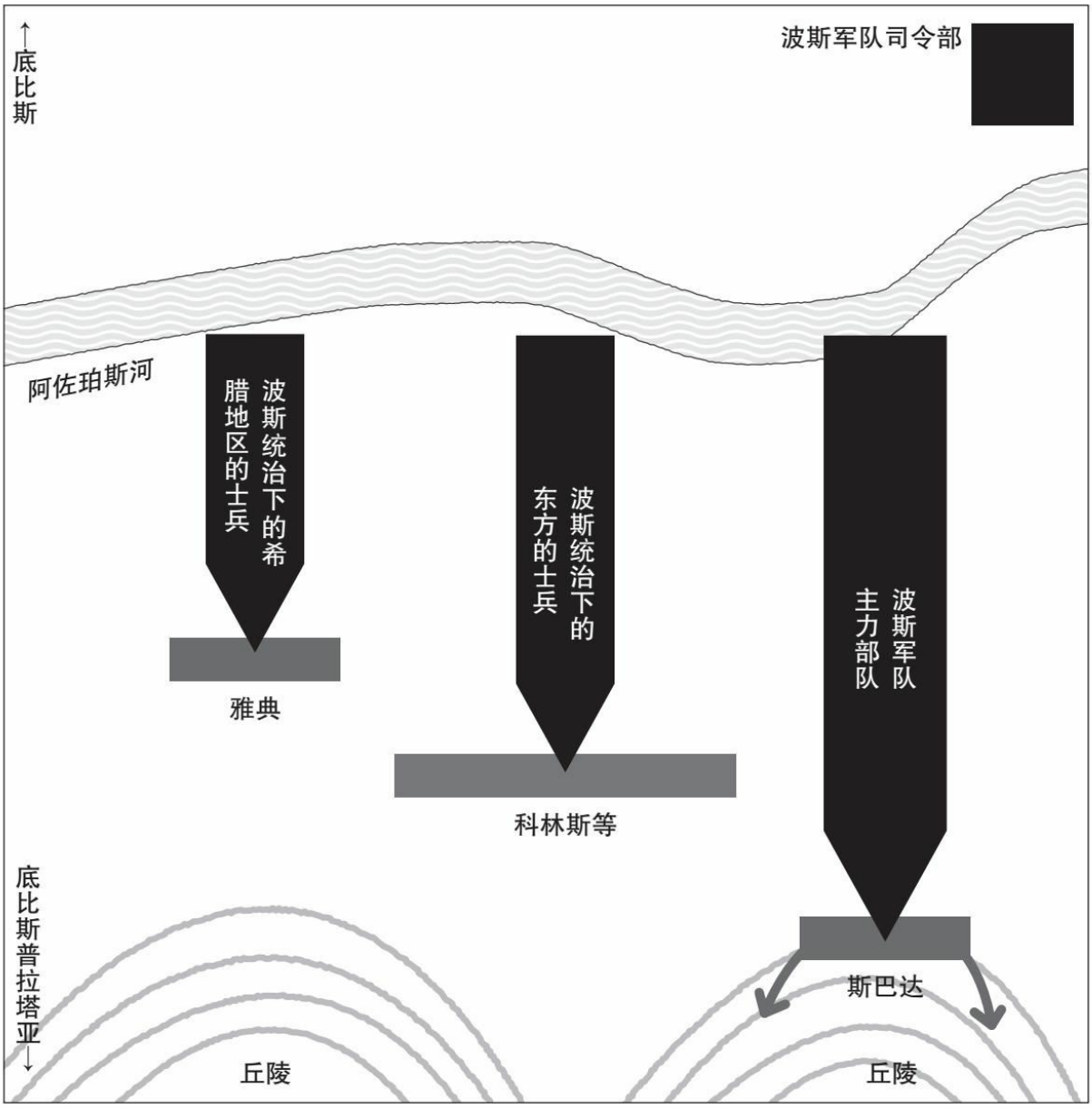
首先在平原尽头接近丘陵地带的位置部署兵力，尽可能把敌人引诱过来，然后突然撤离。欲乘胜追击的敌方骑兵进入他们难以施展优势的丘陵地带时，先用长矛攻击其马匹，致使敌军骑兵不得不下马。

只要敌方骑兵变成步兵，希腊军就有了胜算。距离远就用长矛进攻，距离近则用剑和防御力超强的盾作战。

论长矛，与波斯军队不足2米的矛相比，希腊军队的长矛接近4米。

论盾，无论是大小还是结实程度，希腊方面占绝对优势。

帕萨尼亚斯决定采用这一战术战胜4倍于己的敌人。



普拉塔亚战役决战图

但是，他的这一战术遭到了部下强烈的反对。5000名“一级重装步兵”中，老兵的反对尤其激烈。

他们向总指挥官提出了抗议。

“我们从小只知道斯巴达战士绝不能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无论

敌人多少，我们就是这样打过来的。从敌人眼前撤退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要这样强迫我们吗？！”

这些老兵都比帕萨尼亚斯年长，面对以老兵居多的斯巴达士兵，年轻的总指挥官耐心地做了解释。他强调这不是单纯的退却，是为了胜利而进行的战略性撤退。

但是，斯巴达战士坚信最可耻的行为莫过于让敌人看到自己的后背，因此要他们接受这一战术着实不是一件易事。有一个老兵甚至拿起长矛往地上一戳，强硬地表示绝不后退一步。

34岁的年轻人很有耐心。他叫来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士兵队长，进行了一对一的说服工作。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指挥官帐篷外的士兵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这位队长最后表示服从时，开阔平原的远处，东方已经开始泛白。

对斯巴达战士来说，他们的信条除了“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还有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然而，这样一件斯巴达士兵人人皆知的事情，波斯方面却毫无知觉，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纵观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热衷于派遣侦察兵，让他们乔装打扮成羊倌接近敌人阵地进行秘密侦察，以此获取情报，尤其是雅典军队。没有史料记载波斯方面也有此类行动。对于坚信“人海战术”的波斯人来说，也许刺探敌情纯属多此一举吧。

总之，马多尼乌斯完全不了解帕萨尼亚斯制定的这个战术。

正因为他不知道，公元前479年8月28日一早，未对部署于河对岸的

己方阵形做任何更改，马多尼乌斯就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由归顺波斯的希腊士兵组成的右翼军队攻打以雅典军队为主的希腊军队左翼，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士兵组成的中路部分攻打科林斯率领的希腊中路部分，由清一色波斯士兵组成的、以1万名骑兵和1万名“不死军”战士为主力的左翼军队攻打斯巴达的1万人。

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陆地最大战役“普拉塔亚战役”就这样在辽阔的平原上分三个部分展开了。

正像后世的战争史学家一致指出的那样，普拉塔亚战役的主战场是波斯军队主力与斯巴达激战的地方。就如同萨拉米斯海战中的主战场在雅典的200艘战船猛烈撞击腓尼基300艘战船的地方一样。

阅读战争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得知战斗完全按帕萨尼亚斯的设想展开，不禁感叹不已。这正是区别名将和一般将领的地方。

平凡的将领只会循规蹈矩地制定战略战术。

著名的将帅不会墨守成规，他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测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他们除了考虑情况对己是否有利，甚至还会考虑对敌是有利还是不利，在此基础上再制定战术。

战斗开始后，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指挥官都了然于心，而且早有应对之策。因此战局一定会按他们的设想展开，结果他们自然会成为胜利者。

波斯军队和斯巴达军队展开激战后，战况一如帕萨尼亚斯设想的那样开始、展开和结束，他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仅用了半天时间。当然，战斗过程异常激烈。

前面已经介绍过，斯巴达重装步兵分“一级重装步兵”和“二级重装

步兵”。通常指挥官会让“二级重装步兵”首先冲锋陷阵，在关键时刻再投入“一级重装步兵”，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但是帕萨尼亚斯没有这样做。

斯巴达的“一级”和“二级”之别不仅在于有无斯巴达公民权，还在于士兵是否有长年训练出来的技能。

帕萨尼亚斯决定充分发挥“一级重装步兵”的作用，因为他们即使拿着笨重的金属武器和盾，也能灵活使用近4米长的长矛。

“二级重装步兵”作战技能较差，如果让他们首先冲锋陷阵，只会在敌人骑兵的踩踏下堆砌起一座座尸山，这会成为“一级重装步兵”作战时的障碍，使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这一原本就不利的条件更加不利。

他的战术成功了。波斯骑兵胯下的马在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长矛攻击下纷纷倒下。波斯骑兵不得不弃马作战。敌方骑兵变成了步兵，这时防御力占绝对优势的防护装备和两倍于敌的长矛就成了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而波斯方面原本引以为傲的“人海战术”让他们陷入了窘境。在总指挥官下达进攻命令后，已经出动的波斯军队士兵不知前方的情况，前拥后挤，陷入了一片混乱，身处前面的士兵甚至动弹不得。

这就是军队规模庞大的弊端。在此情况下，即便是精锐部队也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内部的混乱成了失败的主要原因。

希腊中路部分和左翼部分的战场在平原的西侧。他们也分别参与了激烈的战斗。

不用说，由中小城邦国家士兵组成的中路部分也是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尽管敌人数量占优势，但他们的武装和装备只有轻装步兵的

水平。面对那些来自中东和埃及的士兵，希腊方面引导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展开并非难事。

以雅典军为主体的左翼军队对阵的敌人是波斯阵营中以底比斯人为主的希腊人。因此，左翼战场上演的是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

51岁的阿里斯泰德指挥下的8000名雅典重装步兵打得非常出色。在前一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他们是三层加莱船上的海军士兵。现在他们是在陆地作战的陆军士兵，感觉自然不同。这次他们的脚实实在在地踩在土地上，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士气极高。左翼的战况同样向有利于希腊军队的方向发展。

这时，传来了马多尼乌斯战死的消息。这种消息无须刻意传播，瞬间即可传遍全军上下。

这一天，8月28日，波斯军队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亲自上阵，指挥波斯军队主力发起进攻。他从“不死军”中特别挑选了1000名精锐士兵保护自己。这1000名精锐士兵就围在马多尼乌斯身边作战。

有一个斯巴达士兵认识马多尼乌斯，从远处向他投去一块石头。石头正中马多尼乌斯的头部，他从马背上摔了下去。为了保护总指挥官，不让他落入敌人之手，1000名精锐士兵马上加强了防守。

但是，斯巴达战士不会放过敌人的任何破绽。他们扔下长矛拔出剑冲了上来。在他们面前，波斯军队的1000名精锐士兵不堪一击。

尽管如此，波斯军队的1000名精锐士兵没有一人逃跑。他们一边保护受伤的总指挥官一边奋勇作战，纷纷倒在血泊中。这一场面犹如列奥尼达和他的“300勇士”在温泉关壮烈牺牲的翻版。

消息很快传遍战场。总指挥官阵亡的消息犹如给波斯军队全体士兵下达的撤退号令。

波斯军队全面溃败。他们纷纷蹚过河逃进防御栅栏内。希腊士兵乘胜追击，对于他们来说，逃进寨内的波斯士兵犹如待宰的羔羊，消灭他们只是杀戮而不是战斗。

波斯军队中幸存下来并保持完整队形的只有阿尔塔巴兹率领的4万人。因为在这天的战斗中他们处在靠后的位置，一得知马多尼乌斯的死讯，他们立即逃跑。

余下的8万名士兵中，除了向北逃往底比斯的希腊士兵，不清楚还剩下多少波斯士兵。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仅有3000人幸存。

如果真是这样，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波斯方面的阵亡人数就超过7万人了。如果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自誉为陆上军事大国的波斯帝国来说无疑是一次不容置辩的完败。

另一方面，希腊方面的阵亡情况如下：

右翼（以斯巴达人为主）——91人

中路（科林斯人等）——16人

左翼（以雅典人为主）——52人

合计——159人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下的这个数字大概是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的阵亡人数。后来普鲁塔克说，包括掷石兵等轻装步兵在内的死亡人数是1360人，是这个数字的近10倍。

不管怎样，这次战役希腊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普拉塔亚战役与萨拉米斯海战不同，对于当时的超级大国波斯来说，这是一场不容置辩的失败。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败的是腓尼基船队。波斯方面可以说，战败的是其属国腓尼基的船队而不是依靠陆上军事力量立国的波斯。

但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波斯投入的是其陆上军队主力。因此，这绝对是一次无以辩驳的完败。

后世有一位战争史学家这样评价普拉塔亚战役：

“胜利的荣誉百分之百要归功于帕萨尼亚斯和他的重装步兵。”

杀戮结束后，回到阵地的斯巴达士兵来不及洗掉满身的血污就团团围住了总指挥官。

他们要求总指挥官砍下马多尼乌斯的脑袋，就像波斯国王薛西斯对温泉关阵亡的国王列奥尼达做的一样。他们要求把马多尼乌斯的头挂在矛尖上，在全体希腊士兵前示众。

对此，帕萨尼亚斯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成野蛮人了。

斯巴达男人似乎不喜欢变成野蛮人，他们接受了帕萨尼亚斯的意见。

希腊人洗去波斯军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脸上、耳朵里的污渍，用白布将遗体包裹起来，郑重其事地埋在了丘陵最高处。

这一夜，欢庆活动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留给马多尼乌斯的豪华帐篷内举行。希腊城邦国家全体指挥官和他们的士兵都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中，总指挥官帕萨尼亚斯说：“波斯已经富甲天下，薛西斯为什么还想征服贫穷的希腊呢？”

听闻此言，大家都笑了。据说平时一向表情严肃的阿里斯泰德也笑

了。

但是接下来，大家突然都变了神色。看到端上来的盘中食物，除了斯巴达人，所有人顿时泄了气。帕萨尼亚斯只说了这样一句：因为波斯军队的厨师逃跑了。

盘中装的是漂着肉块的浑浊不堪的汤。这是斯巴达人在集体生活中吃的传统食物，被认为是世上第一难吃的食物。

就算厨师逃跑是事实，想象一下，在象征东方富裕生活的金蓝色为主色调的豪华帐篷里，喝着象征斯巴达极简生活的、世上最难以下咽的汤，这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只能说，它证明了这位34岁的斯巴达年轻人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武将，也是一位颇具幽默感的人。

但是，就算幽默感再强，他们在这里喝着这种被称作“黑色大杂烩”的、世上最难以下咽的汤，决定的却是严肃的正事。

第一，不乘胜追击，任由阿尔塔巴兹指挥下的4万士兵逃之夭夭。

这些波斯士兵逃回亚细亚的速度一定不会比萨拉米斯海战后波斯国王逃回亚细亚的速度慢。所以，听之任之未尝不可。

第二，关于底比斯的问题。从战场上逃走的底比斯士兵数量不少。

关于这件事，帕萨尼亚斯提出交由他来处理。

在温泉关战役中，底比斯是希腊联军的一员。但是后来他们置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战士于不顾，投降了波斯。帕萨尼亚斯说，对底比斯的处置应该交给斯巴达，希望由斯巴达单独来解决。其他城邦国家代表知道前因后果，没有人表示反对。

第二天，帕萨尼亚斯带领1万名斯巴达士兵，追击逃跑的底比斯士

兵。

站在底比斯城门前，帕萨尼亚斯要求底比斯人交出向温泉关和普拉塔亚派兵的底比斯军队责任人。

底比斯方面紧闭城门，拒绝交人。

帕萨尼亚斯下令火烧底比斯城。

围城战没打多久。尽管底比斯在温泉关战役后站到了波斯阵营，但他们还没有愚蠢到看不清形势。他们知道，普拉塔亚战役之后，他们在希腊被彻底孤立了。

他们答应向斯巴达交出3个责任人，条件是进行公开审判。

帕萨尼亚斯下令将这3个底比斯人送到科林斯，在公开审判前暂时将他们拘禁在那里。在送他们前往科林斯之前，帕萨尼亚斯偷偷给负责押送的队长下了一道密令。

“一到科林斯就杀死他们。”队长向一位科林斯将领口头传达了帕萨尼亚斯的命令。在普拉塔亚战役中，这位将领是以科林斯士兵为主的中路阵线的指挥官之一。不用说，这位科林斯人忠实地执行了帕萨尼亚斯的密令，因为在半个月的作战期间，他对帕萨尼亚斯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除了这3个主要负责人，帕萨尼亚斯没有对底比斯公民动一根手指。帕萨尼亚斯不会为了报温泉关之仇而把一个城邦国家的人斩尽杀绝，因为那样做太过丧失理智。也正因如此，有一些老兵向他投去了不满的眼光，但这位34岁的年轻统帅对此视而不见。

解决了底比斯问题之后，帕萨尼亚斯率领军队开始北上，前往一年前的激战之地温泉关。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士兵已经在这里曝尸一

年，此时只见由一具具白骨堆成的山，分不清都是谁的尸骨。

帕萨尼亚斯下令找齐所有白骨，用马车带回斯巴达。就这样，普拉塔亚战役的最大功臣——斯巴达重装步兵带着勇士们的遗骨返回了祖国。

回国途中，他们顺道去了德尔斐。德尔斐是供奉男神阿波罗的神庙所在地，是斯巴达人的信仰中心。阿波罗神庙是斯巴达人最喜爱的神庙。但凡有事，他们都会前往这里乞求神谕。这是他们的圣地。

在德尔斐，他们应该没有忘记为勇士遗骨净身。当然，活下来的勇士也不会忘记感谢阿波罗神，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胜利离不开阿波罗神的庇护。

34岁的斯巴达年轻统帅与他的士兵一样，向阿波罗神表示了感谢。他是全军的指挥官，是他率领心怀感恩之心的士兵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于是，作为赢得胜利的统帅，他向阿波罗神敬献了一块铜板，上刻：

“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为感谢神助我消灭波斯军队，特献立此铜牌。”

此时的帕萨尼亚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会刺激到5名监察官——掌握斯巴达国家政事的那5个人。

关于5名监察官，我想提请读者朋友注意：

在阅读本书时，只要看到“5名监察官”的字样就要想到，他们不是单纯的“5名监察官”，而是“小人闲居为不善”的5个“小人”。

词典对于“疑心”一词的解释是“嫉妒猜忌”，而嫉妒猜忌的情绪只有闲居的小人才会有。

斯巴达人极度厌恶个人崇拜。在斯巴达，像帕萨尼亚斯这样直截了当地刻上个人的名字尚属首例。

但是，他终究只有34岁。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他卸下沉重压力之后的一声呐喊，就像全力奔跑的运动员跑过终点时的一声大吼，是紧张感获得释放之后的一声吼。毕竟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重。

如果是懂得换位思考的普通人，大概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猜忌。但是，斯巴达的监察官是“小人”，这些小人不能与人为善，他们自以为是且心胸狭隘。这种人在意大利语中叫“piccolo uomo”。

当然，“小人”有小人的生存之法。尽管他们心怀猜忌，却知道应该择机而动。因此，帕萨尼亚斯和1万名普拉塔亚之战中的勇士在斯巴达公民的热烈欢呼声中回到了祖国。

爱琴海重回希腊

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名震天下的不只是斯巴达，雅典也充分调动了已跃居希腊第一的海上战斗力。

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公元前479年8月末的一天，希腊联盟的海上军队在米卡勒取得胜利的消息和陆上军队在普拉塔亚取得胜利的消息于同一天传到了希腊后方。

在普拉塔亚平原，希腊联军给予波斯陆上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在米卡勒半岛，希腊海上军队成功歼灭了波斯海上军队。这两个消息几乎同时到达临时设在萨拉米斯岛的雅典政府办公地点。

希腊海上军队一口气横渡爱琴海直取敌人船队基地的战术可谓大胆至极，这应归功于前一年秋天他们在萨拉米斯取得的胜利。

爱琴海是名副其实的多岛之海，海面上散布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岛屿，其中大部分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屈从了波斯国王的“土地和水”通告。因此，当地岛民虽然是希腊人，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从波斯统治下的这些岛屿之间穿过去直捣敌军基地的行动近乎于自杀。

但是，因为希腊海上军队在萨拉米斯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岛屿纷纷脱离波斯的统治，回到了希腊阵营。否则，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希腊海上军队没有可能在安德罗斯岛越冬。因为之前的10年里，安德罗斯岛一直处于波斯的控制之下，希腊船只想在这里靠岸补充淡水都没有可能。

此时回到希腊阵营的仅限于爱琴海南半部分的岛屿。位于爱琴海北

半部分的利姆诺斯、莱斯沃斯、希俄斯等大岛东侧靠近爱奥尼亚地区，而爱奥尼亚地区尚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因此这些大岛仍缺乏回归希腊的勇气。

萨摩斯岛位于爱琴海南北交界处。第一次希波战争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这里是波斯方面的船队基地，波斯船队攻打希腊时常常从这里出发。

米卡勒是一个半岛，紧邻萨摩斯岛，相距不过5公里，中间仅隔着一个海峡。希腊海上军队选择攻打米卡勒而不是萨摩斯岛，是因为波斯的防守力量集中在萨摩斯岛，而米卡勒的防守相对薄弱许多。攻打米卡勒期间，雅典海军指挥官克桑提普斯向萨摩斯岛秘密派去使者，策动当地岛民起来反抗波斯。

这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盟的海上军队由250艘三层加莱船组成，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拿下了米卡勒，萨摩斯岛民与之呼应，奋起抗击，赶走了占领当地长达20年的波斯军队。

波斯海上军队在萨拉米斯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停泊在萨摩斯的船只不足200艘，其中还有不少毁坏严重，无法使用。因此，希腊海军这次在数量上也占尽优势。在希腊海上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波斯海上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3个指挥官无一幸存，只有极少数士兵成功逃至位于内陆的萨迪斯得以幸存。

拿下米卡勒、夺回萨摩斯岛的“米卡勒之战”很快显现出连锁效应。

米卡勒半岛东南方向40公里处，有爱奥尼亚地区的一大强国——城邦国家米利都。海上向北50公里处有爱奥尼亚地区实力雄厚的海港城市以弗所。

萨摩斯岛回归希腊，意味着米利都和以弗所回归希腊的时机已经到

来，也意味着位于爱琴海北半部分的主要岛屿利姆诺斯、莱斯沃斯和希俄斯将不日回归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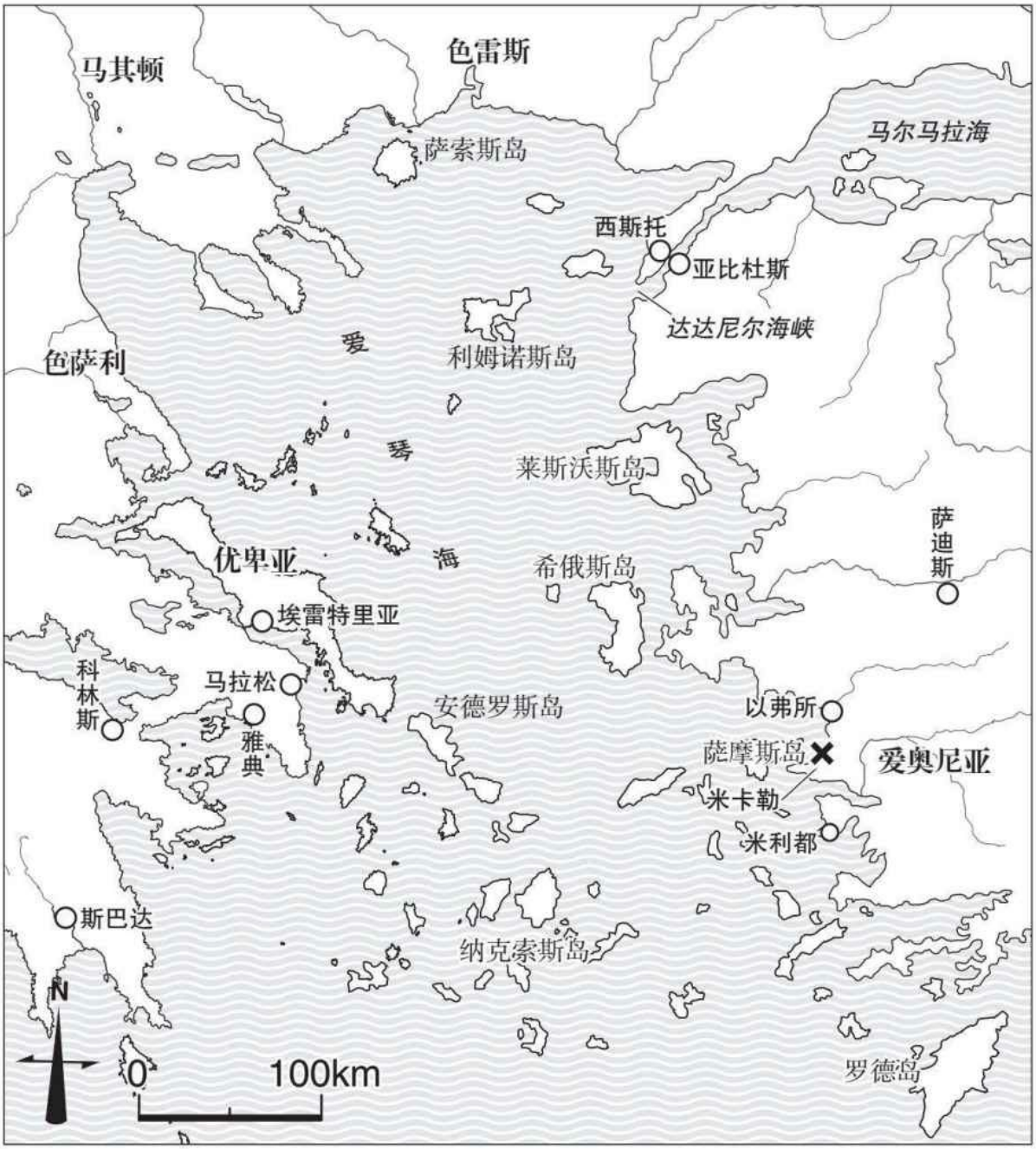
希腊军发动米卡勒之战的目的就是引发这一连串连锁效应。这一战术的成功实施应归功于地米斯托克利和克桑提普斯这两位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留在萨拉米斯岛制订作战计划，克桑提普斯在前线实施作战计划。

俗话说“打铁要趁热”，但是打在不同位置，效果大相径庭。

米卡勒之战胜利后，希腊军彻底肃清了爱琴海南半部分的波斯军队。随后，参加希腊联盟海上军队行动的各城邦国家指挥官在萨摩斯岛举行了会议，讨论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总指挥官斯巴达国王列奥提吉达斯主张就此结束本年度抗击波斯的行动，参战人员各回各国。他年事已高，又是典型的斯巴达人，总觉得留在海上心里不踏实。

对此，雅典指挥官克桑提普斯表示反对。时间刚刚进入9月。他说：“现在我们军队的士气正旺，我们应该继续北上，乘胜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彻底切断波斯入侵希腊的路线。”



爱琴海和爱奥尼亚地区

但是，斯巴达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说，他们对海外没有兴趣。对于大多数斯巴达人来说，所谓本土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内地区，除此之外的地方，不管是陆地还是海洋都属于海外。

结果，前往达达尼尔海峡成了雅典海上军队单独的行动。之所以说是单独行动，是因为250艘战船中雅典船占了200艘。总之，参加米卡勒战斗的绝大多数战船在克桑提普斯的指挥下挥师北上。

北上的过程中，攻占米卡勒的连锁效应不断显现出来。希俄斯、莱斯沃斯、利姆诺斯等各岛的船队纷纷加入雅典的海上军队。一路上，雅典船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的西岸有西斯托城，东岸有亚比杜斯城。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海面就是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经过的地方。国王薛西斯下令在这里用牢固的绳索将排成一列的船只连接起来，再铺上木板，搭建了两座浮桥。

当然，波斯方面部署于这两个地点的防守力量很强，特别是在西斯托。克桑提普斯命令雅典海上军队全力攻打西斯托。

防守西斯托的波斯海上军队抵抗得很顽强。因为萨拉米斯海战以后，薛西斯经过浮桥回亚细亚时留下命令：死守西斯托。

于是，克桑提普斯改变战术，放弃正面进攻，采用围困战术。他在等待当地住民起义，因为西斯托虽然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但生活在此的都是希腊人。

波斯守军担心粮食越来越少，更担心当地住民起义。在坚持了两个多月后，他们在一个深夜跳上船逃到了对岸的亚比杜斯。

敌人逃跑了，当地住民打开了城门。希腊军队切断连接浮桥的绳索，进攻西斯托的作战宣告结束。这时，已接近公元前479年12月。

希腊海上船队不顾冬季大海的变幻莫测，返回了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据说在回程中，船队一直拖着作为战利品的绳索。

取得普拉塔亚胜利后，雅典人结束了被强制疏散离开雅典的生活，纷纷回到国内。雅典重新焕发了活力。来到城门口欢迎海上军队凯旋的雅典人群中，大概有克桑提普斯的长子伯里克利，在疏散期间，他已长到16岁。

就这样，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也过去了。

第一年是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给了波斯人以“毁灭性的一击”，战场在萨拉米斯海面上。

第二年是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给了波斯以“致命的一击”，战场在普拉塔亚平原、米卡勒和西斯托。终于，爱琴海重新回到了希腊人的怀抱。

希腊军夺回西斯托又造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因为不必再担心波斯军从陆地打过来，位于希腊北部的色雷斯地区回归了希腊，位于色雷斯西侧的马其顿、马其顿以南辽阔的色萨利地区和爱琴海回归了希腊，希腊本土也回到了希腊人的怀抱。

认为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的波斯彻底输给了这“一把小麦”。

其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直停留在萨迪斯。这是波斯入侵希腊的内陆前线基地。

得知普拉塔亚战役大败和米卡勒被攻占的消息时，薛西斯就在萨迪斯。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怒，一见家臣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大骂，也不管对方是谁。如果他发泄怒火的方式仅止于此，倒也可以理解。

但是，真正把这位40岁的波斯国王推向痛苦深渊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

这位东方君主彻底失去理智大概始于萨拉米斯海战之后，而非得知普拉塔亚和米卡勒战役结果以后。

他彻底失去了自制能力，甚至霸占了儿子的爱妻。王后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命人砍去儿媳的四肢。王室内部乱作一团。作为当事人的薛西斯不仅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反而一味沉溺于荒谬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据说他得知普拉塔亚战役失败的消息后才离开萨迪斯回到苏萨。从萨迪斯岛前往苏萨要经过波斯唯一的大道——王之道。一路上，这位40岁的人格严重分裂的男人坐在御轿上会想些什么呢？

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薛西斯是波斯和希腊两军指挥官中外貌最帅气的一位。

回到苏萨后，他在波斯帝国国王的宝座上又坐了14年。在这14年间，尽管他依然叫“王中之王”，但完败于希腊一事成了他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道阴影。

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叛乱此起彼伏，犹如家常便饭，让他疲于应对。其间，唯一能让他高兴的，不，准确地说，唯一可以让他内心感觉宁静的是看到建筑工程师、装饰工匠和他们设计的图纸的时候。想想这确实有些悲哀。

在薛西斯的全力支持下，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变成了当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城市。这是始于父亲大流士的事业，只可惜父亲尚未完成建设就撒手人寰了。

薛西斯终究是个悲剧人物，他未能寿终正寝。54岁那年，他被一位企图篡权夺位的家臣暗杀。

薛西斯死后，这个家臣和国王长子之间发生了王位争夺战。一年

后，家臣和长子都遭暗杀，这场乱斗才终于结束。

这就是从希腊回到波斯以后，失去了统治者风度的东方君主的残生。

根据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才能，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对此我深表赞同。此后的希腊，尤其是雅典，迎来了鼎盛时期。

连续两次希波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中的第二年，为希腊人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为希腊人指明了发展方向。

波斯（东方）执着于“人海战术”，凭借将士的“数量”进犯希腊。希腊（西方）更重视调动个人能力，依靠将士的“素质”迎战强敌。

这里所谓的“素质”，不是指每个人的个体素质，而是有效调动起来的全体公民的集体素质。也就是说，领导人利用公民素质的能力。

正因如此，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希腊以“一把小麦”之力战胜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以希波战争为契机，在希腊文明发展成为欧洲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依靠集体力量的精神在希腊人心中落地生根，这成了欧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这一想法正确的话，那么延续至今的欧洲与东方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就诞生于希波战争——准确地说是诞生于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

那就是，决定输赢的是“质”而不是“量”。

第四章

希波战争以后

公元前478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波斯军队被彻底赶出环绕爱琴海的希腊领土。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这144年间，希腊和波斯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以称得上是“战争”的战事。

当然，这144年间希腊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尤其是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甚至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希腊世界，那就是“乱象丛生”。因此我想，希腊世界维持和平局面的时间只是希波战争结束之后的100年。

那么，如何理解他们的和平局面呢？

难道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保证了100年的和平吗？

或者是各国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战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种新的政策，从而保证了100年的和平？

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看法不尽相同。后人看历史，相信都会选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很可能选择这是制定和实施了各种保障政策的结果。

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后人眼里，生活在当时的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枉费心机。至于比常人付出更多的领袖人物则比常人更加愚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

持此种观点的人用“peace”来表现长期安全的状态也许是最合适的。因为英语中的“peace”给人的感觉是，无论说与不说，和平都可以实现。而“peace”的词源——拉丁语“Pax”，给人的感觉则不同。

古罗马人用这个词创造了“Pax Romana”（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说法。由此可见，古罗马人已经认识到“和平”是指“长期的和平局

面”，他们认为和平局面是人们理性和冷静的结果。

如果你想到了这一层，就不会再认为当权者和领袖人物为保障百姓的安全而付出努力是愚蠢之举了。即使在后人眼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也绝不是愚蠢的。

因为制定政策时预想了种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100年，希腊人也充分享受到了“和平”，他们无须再担心波斯人的入侵。

如果你坚持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地位和权力，那么，请允许我用一个难听的词，这是“小人之见”。带着如此消极的态度去看待历史，除了“小人之见”，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了。

地米斯托克利因萨拉米斯海战一举成名，此后他再也没有作为最高指挥官率领希腊联军抗击过敌人，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对此，不少历史学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的确，公元前480年秋，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打败波斯海上力量以后，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许他当选过每年一届的10位将军（指挥官）之一，只要他愿意，以他当时的声望，再次率领军队出征应该不会有人反对。

从年龄上来看，公元前479年，即希腊给波斯以致命一击的那年，地米斯托克利才45岁。

公元前479年对希腊全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雅典率领军队上战场的两位将军，陆地上是阿里斯泰德，海上是克桑提普斯。来自雅典的这两位将军和来自斯巴达的帕萨尼亚斯联手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公元前479年成了“给波斯致命一击的一年”。

那么这一年，45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他只是无所

事事地守在雅典临时设在萨拉米斯的政府机构里吗？难道他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吗？当然不是。

雅典向普拉塔亚战场派出了8000名重装步兵外加800名弓弩手。对于雅典来说，这已是可派出的全部兵力了。因为在陆战的同时，为了攻打米卡勒，雅典派出了200艘战船。多达200艘的三层加莱船需要4万人的兵力，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当然也包括舵手和桨手。因此，对于雅典来说，向陆上战场派遣8800人已是极限。

陆地战斗中，担任雅典军队指挥官的是51岁的阿里斯泰德。他在马拉松会战中有过对战波斯的作战经验，因此，就算他没有统率全军的能力，作为助手也完全可以胜任其职。马拉松会战中，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曾是并肩作战的指挥官，前者一定很清楚后者的能力，所以举荐了后者。我想，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以地米斯托克利的声望，如果他反对，阿里斯泰德应该没有可能担任陆上指挥官之职。

因为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帕萨尼亚斯的能力。不仅他的国人斯巴达人不了解，雅典人心中对此也是个未知数。因此，雅典需要派遣有经验的指挥官指挥自己的军队，这样即便帕萨尼亚斯没有克敌制胜的韬略，雅典军队依然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无疑，阿里斯泰德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米卡勒之战中，雅典投入了全部海上力量——200艘战船。米卡勒海角距敌人海军基地萨摩斯岛较近，攻占米卡勒可激励萨摩斯岛民反抗波斯。这样的战术除了地米斯托克利，估计没有人能想得到。

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以后，萨摩斯岛成了波斯海上军队的集结地。一口气横渡爱琴海，打击敌人海上军队集结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攻占敌人的集结地本身。

只要成功拿下波斯人在爱琴海最大的海上军队基地，就可以促使爱

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群岛的居民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萨拉米斯海战以后，这些地区的希腊人仍犹豫不决，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脱离波斯的统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出乎敌人意料、效果奇佳的作战构思，我想除了地米斯托克利再无第二个人能想得出来。

而且，米卡勒之战没有止步于将波斯军赶出萨摩斯岛。

成功夺回萨摩斯岛后，斯巴达人对继续推进爱琴海上的作战失去了兴趣，他们离开希腊联盟的海上军队回到斯巴达。雅典决定仅靠自己的战斗力量继续在爱琴海北上。为了将波斯军队彻底赶出希腊，可以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想法。

在爱琴海继续北上的目的是切断波斯陆上军队入侵希腊的路线。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将欧洲和亚细亚彻底分隔开来。

希腊人的具体做法是，到达达达尼尔海峡以后首先攻占位于欧洲一侧的西斯托，接着破坏连接西斯托和亚比杜斯的浮桥，切断连接浮桥的牢固绳索，使敌人无法轻易往返亚细亚与欧洲之间。

波斯是超级大国，又是一个以陆上军事强国闻名的大国。当年，波斯军队入侵希腊时走的就是陆路。而“西斯托之战”的目的就是切断他们的陆上道路。

这一作战计划的目的非常明确，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世人都明白“希腊走出了来自波斯的威胁”，即便不懂用兵韬略的普通希腊人也知道他们从此无须再担心敌人来自陆地的进犯了。

很难相信这一作战计划是克桑提普斯想出来的。一方面，他是第一次上前线，缺乏实战经验。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他有制订这种作战计划的才能以及将其付诸行动的决断力。

只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地米斯托克利才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奇思妙想，因此才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也许你会说，既然如此，他为何不亲自挂帅呢？先不说统率普拉塔亚战役的陆上军队，仅凭他在萨拉米斯的作战经验，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率领海战军队前去攻打米卡勒和西斯托。

我想，这是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此时的他已走上了人生巅峰。

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到达巅峰之后，前面只有下坡路了。

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以后，地米斯托克利应邀访问了斯巴达。斯巴达人坚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路线，但他们隆重迎接了这位英雄。按现在的标准，他受到了国宾级的礼遇。

平日里，斯巴达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雅典人，但是对地米斯托克利，他们却大加赞赏。他们将月桂冠戴到这位雅典人的头上，就好像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一般。

尽管他是雅典人，但是斯巴达老兵都十分认可他作为武将的才能，青少年更是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地米斯托克利。

不久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

在运动场上，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时，地米斯托克利来到了观众席上。原本正在专心观看比赛的观众扭头齐刷刷地向刚走进观众席的地米斯托克利望去，运动员都被冷落了。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是雅典最有名的人物，而且成了整个希腊境内最负盛名的人物。

萨拉米斯海战以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上过战场。如果你以为他是担心战果不佳会损害自己的荣誉，那才是“小人之见”呢。

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誉受损，而应该是担心自己重蹈马拉松之战后米提亚德的覆辙吧。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平原上发生了马拉松会战。这一次战役与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以及萨拉米斯海战并称为三大著名战役，是希腊联军迎击入侵的波斯军队的三大重要战役。即使过去了2500年，欧洲人对这三大战役依然耳熟能详。尤其是马拉松会战，成了近代恢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压轴赛事马拉松赛的起源。马拉松长跑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对历史漠不关心的人也都知道。

马拉松会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希腊军队仅靠1万人的兵力完胜兵力10万的波斯军队。其最大功臣是实际上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是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战斗力。

传递捷报的信使为了将胜利的消息尽早送到正翘首以待的祖国，从马拉松平原一路跑向了雅典。他一刻不停地跑呀跑，终于将胜利的喜讯送到了祖国。然而，信使刚说完这一喜讯就一头栽倒在地，气绝身亡。这就是马拉松长跑的起源。最初，“马拉松”还只是一个普通地名，但在马拉松之战大获全胜后，雅典人有理由对这个地名备感骄傲和欢欣鼓舞。

第一，波斯人在马拉松会战中失败后士气大落，直接选择了撤退。第一次希波战争仅此一战即告结束。

第二，希腊联军虽说是联军，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雅典公民组成的部队。尽管雅典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却以绝对优势打败了一直所向披靡的波斯军队。雅典公民对重装步兵有了更大的信心，重装步兵是保卫雅典的主力军。

第三，马拉松距离雅典不远，虽然雅典在这个地点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敌人不甘心失败，就会直逼雅典。而胜利的消息使雅典公民的担忧烟消云散，他们为此欣喜若狂。

取得胜利后，米提亚德的声望飙升。雅典公民开始觉得，只要由他指挥，战斗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60岁才享受到如此盛誉，也许米提亚德飘飘然了吧。第二年年初，在公民的要求下，他率领海上军队发动了攻打帕罗斯岛之战。

由于准备不充分，再加上米提亚德身负重伤，不到一个月，雅典军队就撤离了帕罗斯，无功而返。

米提亚德回到国内，遭到雅典公民的一致声讨。这位身负重伤的总指挥官被起诉。

当时最坏的结果是，这位“马拉松英雄”可能被判死刑。

这时，站出来为米提亚德辩护并成功使其免于死刑的正是地米斯托克利。他是马拉松会战中的指挥官之一，曾协助米提亚德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位年轻人努力争取到的结果，仅仅是将死刑改为罚款。

一年前，米提亚德还沉浸在一片赞誉声中，而此时却被判处50塔兰特的巨额罚款。他的儿子客蒙以分期赔付的代价使其避免了死刑。但是不久，米提亚德因伤势恶化不治身亡。

这一年，地米斯托克利35岁。我想，他一定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他认识到，民众对他的期望越大，一旦不能兑现，他们的失望也会越大。

他一定也认识到，民众不会反省自己，他们只会在过高的期望未变成现实时，更强烈地感受到巨大的失望，并因此怨恨让他们备感失望的当事人。

马拉松会战结束后，米提亚德已经61岁。而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后，地米斯托克利只有45岁。45岁的他还有事情要做。

接下来他要做的是一件大事，只有勇于革新的地米斯托克利才会想到的一件大事。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他传遍全雅典甚至全希腊的声誉将极大地有助于他实现这一计划。即使在雅典有人反对，即使不采取陶片放逐之类的强硬手段，这至少可以让反对派领袖住嘴。在萨拉米斯海战前，他曾多次采用过陶片放逐的办法。

既然地米斯托克利另有打算，萨拉米斯海战后他不再上前线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吧。

制定战略战术不一定要在前方，在后方也可以完成。而且，雅典有合适的人担任指挥官奔赴前线。毕竟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只要适合，他可以起用任何人。对他来说，让曾经的反对派、自己曾经利用陶片放逐制度驱逐出雅典的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分别担任陆上军队和海上军队的指挥官，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不需要再三犹豫，毕竟一年前向公民大会提议召回并重用流放国外的这两个人的也是他。

这两人在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分别在陆上和海上给了敌人“致命一击”。

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上战场，我想应该归因于他有较强的自制力。“自制力”是一种能力，是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具备的能力。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城市一体化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强制疏散城市住民的手段不可反复使用。

公元前480年，面临波斯军队的入侵，他将雅典全体住民疏散到了希腊各地，使雅典变成一座空城。同时，他将决战的赌注放在海上，并一举取得成功。但是他认为，这种战略不能重复使用。

如果每次敌人来犯都采用这种手段的话，敌人就会制定相应的对策。而且，由于这次强制疏散的时间不长，住民很快就回到了雅典。因此他担心，如果还有下一次，无论采取多么强硬的手段也很难疏散得如此彻底。

出其不意的计策是不能反复使用的。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制订了一个大计划，一个无论什么人来犯都可以在不采取强制疏散手段的前提下保障雅典安全的计划。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

环绕雅典城建一座既高又坚固的城墙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方案早早就被他放弃了。那个时代由于军事技术尚不成熟，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几乎都采用围城战，而雅典是当时希腊人口最多的城市。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人口较多的雅典，无论建起多么坚固的要塞都很难守得住。

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已经跃升为海上战斗力最强的国家。如果能有效运用这支海上军队的力量，即使敌人采用围城战术，雅典应该也不

会陷入被动。

此时，爱琴海已经回归希腊。这意味着雅典可以用自己的船只从海外运来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雅典不靠海，距离外港比雷埃夫斯还有7.5公里。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考虑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连成一体，在相距7.5公里的两地之间铺设一条直线道路，两侧以城墙相围。一旦此计划变成现实，那么雅典不临海的不利因素就没有了。

这是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它不是将环绕雅典的城墙重建使之更坚固，也不是用等长的城墙围绕比雷埃夫斯，而是用一条长7.5公里、宽180米的直线道路连接两地，再在道路两侧建起6米高城墙的大工程。

比雷埃夫斯地区除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港以外，还有两个港口。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设想，港口功能应集中到比雷埃夫斯港，另两个港口用来造船。因为要保持希腊最强海运国家的地位，造船能力必须保证希腊第一。

为了有更多的选择，他还考虑在雅典到法莱隆的道路上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道路两旁建起高墙。

在萨拉米斯海战时，法莱隆是波斯海上军队的基地。法莱隆有一个缺陷，就是必须随时清理内河带来的泥沙。尽管如此，它也成了地米斯托克利的选择之一。

当然，首先要建设的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的联络线。仅这条道路的建设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毫无疑问，大多数雅典公民并不理解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公民的真

实想法是应该优先重建被波斯军队破坏了的城市。但是，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它在公民大会上还是获得了通过。

在公民大会上，他向参会公民做了说明。他说，比雷埃夫斯与首都雅典一体化之后，前者除了保有海港功能外，还要建设并完善仓库群，使商品交易成为常态，从而成为希腊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先见之明是一种超越常人的才能，并非人人具备。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情，想象力也只停留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一定超出了当时雅典人的想象。但是在雅典享有投票权的公民中，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就投了赞成票，另一半考虑到这可能对自己有利而投了赞成票。

这另一半人包括：

一、雅典越重视海运职业对其生活越有保障的造船技师和船员。

二、只要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就心满意足的以制壶业为首的手工业者。

三、对开拓新兴市场反应敏锐的贸易商。

也就是说，他们是雅典社会中资产收入属于中下层的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公民。

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不会要求全体公民都理解这个计划的种种好处。

关于与这些职业相关的优惠政策，他提出了具体方案，请公民大会进行表决。

首先，对于从事海运业的人，保证每年有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

其次，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幅度降低税赋。

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必然大大提高相关从业者的信心，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

因此，这一关于公共事业的提议在往常争论不休的公民大会上出乎意料地得以顺利通过。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反对，既然是民主政体，有人反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提出反对的依然是阿里斯泰德和他的那一派人。

阿里斯泰德属于比较有意思的一类人。他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此时刚刚50岁出头。他是稳健派的首领，出身于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长期以来，这个家族为雅典政界源源不断输送了不少人才。作为稳健派的首领，阿里斯泰德经常与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

当然，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两人精诚合作，为保卫祖国雅典做出了贡献，因为人人都明白第二次希波战争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话，那么第二年发生的普拉塔亚战役中，率领雅典军队取得胜利的就得数阿里斯泰德。

然而，无论是在决定第一次希波战争结果的马拉松会战中，还是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了波斯最后一击的普拉塔亚战役中，阿里斯泰德都是副手，不是总指挥官。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全军总指挥官，没有站上过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最关键的位置。

“决定胜负的最关键人物”是制订全军作战计划并率领军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的人。在马拉松，这个人是米提亚德；在萨拉米斯，这个人是地米斯托克利；在普拉塔亚，这个人是帕萨尼亚斯。不管战斗结果如何，最关键人物将承担全部责任。希腊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取得胜利的。

正因如此，人们盛赞这三人是英雄。

在这个意义上，阿里斯泰德不是英雄，他是配角，他的重要性始终不及主角。他没有机会成为主角，因此也没有机会赢得众人的赞誉。

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担任主角，只能说他缺少勇气，或者说缺少魄力。就算机会出现在眼前，他也做不到一跃而起果断将其抓在手中。

对人有一定辨识能力的人一定会认为阿里斯泰德从小就少年老成。他有一个做法很奇怪。

他喜欢躲在幕后，让别人为他冲锋陷阵。

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地米斯托克利坚持主张增强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对此，雅典政界的稳健派始终持反对态度。在前面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的是克桑提普斯，阿里斯泰德只在他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因此，地米斯托克利利用陶片放逐来排除政敌时，36岁的克桑提普斯年纪轻轻就被赶出了雅典。直到这时，阿里斯泰德才不得不亲自上阵，两年后，他也遭到了陶片放逐。

波斯军队入侵时，两人同时被召回国内。他们协助地米斯托克利，为解救雅典于危难之中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一事实，我想已无须重复。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有责任心的在野党”。只是，他们的“责任心”仅体现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一旦威胁解除，他们又恢复了“在野党”的本性。

因此，危机过后，当地米斯托克利提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一宏大计划时，阿里斯泰德不惜亲自登场，唱起了反调。

这绝不是因为年过五旬的阿里斯泰德突然觉醒，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

这种“勇气”只可能有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两种情况。

阿里斯泰德亲自上阵，是因为没有人替他登台呐喊。

克桑提普斯曾经呐喊过。但是，克桑提普斯在率领海上军队成功拿下米卡勒和西斯托后的第二年，就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享年不详。他是下一代雅典政坛第一人——伯里克利的父亲，本人又有获胜战绩的荣耀，因此，如果他死在战场上，无论如何都应该会留下记录。既然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认为他是病逝的。

克桑提普斯的儿子伯里克利当时只有17岁，就算阿里斯泰德有心将他推到台前，他终究年纪太小。在古代，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公认男子可以独当一面的年龄是20岁以上，可以担任重要职位的年龄是30岁以上。也就是说，此时的阿里斯泰德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得不亲自出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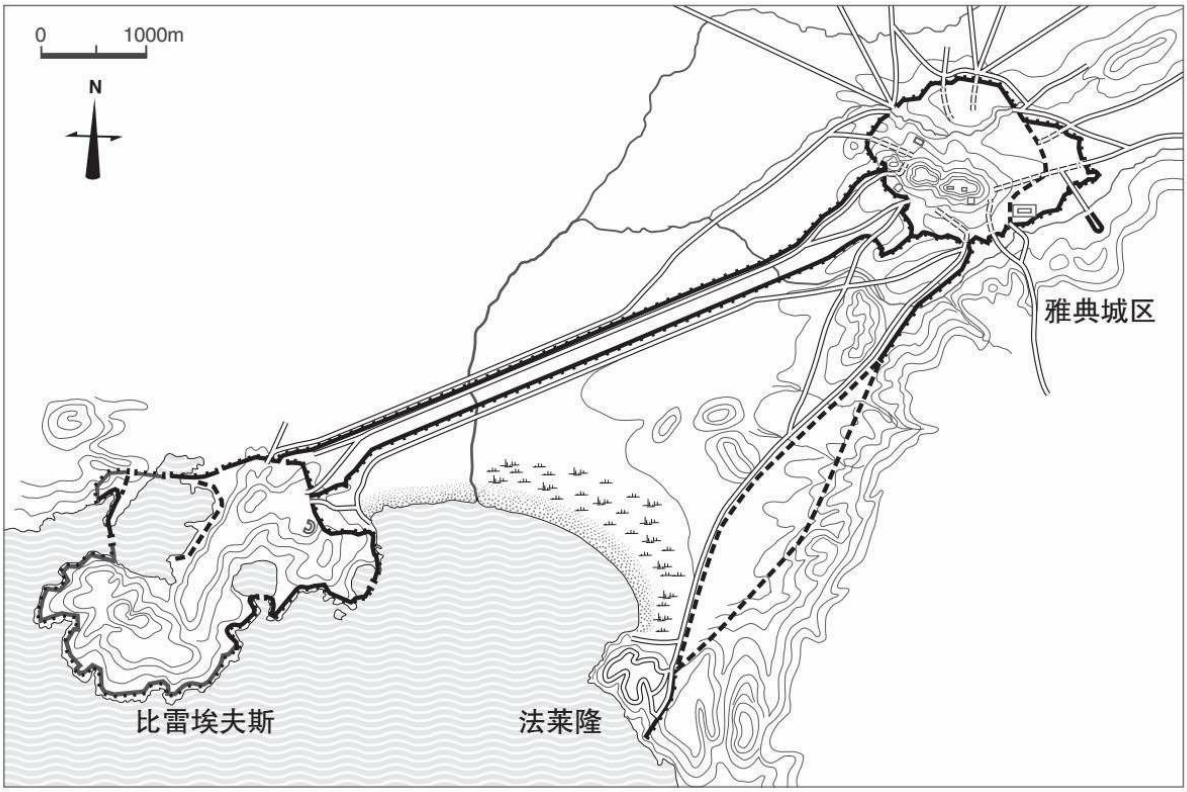
阿里斯泰德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个时期，雅典大多数公民对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理解，就是为防止波斯军队再度入侵而制订的安全保障计划。

波斯是陆上军事强国，陆上战斗力很强。如果波斯再次入侵希腊，一定会从陆路而来。关于这一点，全体公民早已有了共识。

一方面，在波斯输掉萨拉米斯海战、失去萨摩斯岛海上基地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波斯会从海上打过来。另一方面，此时的雅典已经成为希腊海上军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雅典担心的只是来自陆地的进攻。鉴于此种原因，公民大会顺利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

但是，希腊也有陆上军事强国，那就是斯巴达。



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

阿里斯泰德指出，雅典的这一做法可能会刺激到斯巴达。

他说，为共同抵抗波斯，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结成联盟，雅典和斯巴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雅典启动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工程，势必导致这一良好关系出现裂痕。因此，对雅典来说，这个一体化建设计划并非良策。

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考虑斯巴达的因素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也不能说认真考虑过。

总之，地米斯托克利在决定一件大事时不管是否有先例，他的想法

是：

圆满达成一个目的本身，有利于实现其他任何目的。

后来的罗马道路网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多么正确。

不管怎样，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案，阿里斯泰德成了少数派。于是工程破土动工。在民主政体下，雅典人没有尊重少数派意见的习惯，既然公民大会已经通过提案，少数派就要服从决议，对此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工程开工了，雅典沸腾了。然而，就像是为了印证阿里斯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似的，斯巴达向雅典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不是你们的假想敌国，请立刻停止这项工程。”

斯巴达是友好国家，对于他们的抗议，雅典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亲自前往斯巴达做解释，他还要求阿里斯泰德随后也赶往斯巴达。

离开雅典前往斯巴达之前，他秘密召集了工程的全体负责人，给他们下达了指令。

他下令突击建造此项工程，要求无论时间多么紧张，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道路宽度必须按既定方案施工，建于道路两侧的城墙高度和厚度也必须忠实于既定方案。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必须突击完成，而重要地方必须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安顿好这一切后，地米斯托克利才前往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的全权代表，迎接他的不是国王，而是5位监察官。

前面已经反复提到，在城邦国家斯巴达，决定国家大事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位监察官。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来到斯巴达后，谈判对象也是5名监察官，他们相当于斯巴达的“事务官”。

5位监察官提出，雅典的这项工程显然针对斯巴达，是把斯巴达当成了假想敌。他们要求地米斯托克利立刻停止这一工程。

对此，地米斯托克利明确回答：“我们的假想敌是波斯，绝不是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解释说，阿里斯泰德曾经强烈反对建设此项工程，现在连他也服从了公民大会的决议，很支持这项工程。为了向斯巴达表明态度、说明原因，随后阿里斯泰德也会来到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说：“只要你们听一听他为什么会同意建设这一工程，就一定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他不打算直截了当地向斯巴达人解释清楚此事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地米斯托克还一本正经地假装抱怨阿里斯泰德怎么还没有到，对阿里斯泰德迟迟未到表示意外。

姗姗来迟的阿里斯泰德向斯巴达做了解释。

阿里斯泰德郑重其事地表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只是一项安全保障措施，目的是防止波斯再度入侵。不用说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大多数公民都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因此他完全接受公民大会的决议。

5个监察官知道阿里斯泰德是正人君子，绝不会说谎。

但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是疑心很重的人。而且他们坚信，正因为他们疑心重，斯巴达国体的安全才得以确保。

阿里斯泰德的解释对于消除他们的疑虑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又开口说道：

“你们亲自去一趟雅典，亲眼看一看这项工程怎么样？我作为人质留在这里，直到你们回来。”

疑心重并不代表他们有过人的洞察力，相反，因为受疑心的干扰，很多时候他们的洞察力比常人还要差。斯巴达的这5位监察官认为，既然地米斯托克利这样说，那么就把他当作人质留在斯巴达，应该不用担心什么。于是他们留下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一起去了雅典。

只是，他们不知道地米斯托克利此时已让一个随从带着密令返回了雅典。密令中说，尽可能将5个斯巴达人留在雅典市内，实在留不住，再带他们去工程现场。

就这样，监察官们去了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作为人质留在了斯巴达。在斯巴达逗留期间，他过得很舒心。他可以自由外出，因此他还观看了著名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训练。

看到地米斯托克利，士兵们欣喜万分。他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老兵带着敬意欢迎他。至于年轻的士兵，就好像见到摇滚明星的粉丝一样把他团团围了起来。

世上第一难吃的汤，里面有猪肉块还有猪血，黑乎乎的，很浑浊，这是斯巴达质朴和刚健的象征，想必地米斯托克利和士兵们一起喝下了这种汤吧。他的目的只是消磨时间，强忍着把汤喝下去也是值得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5个监察官终于回来了。他们怒不可遏。原来，到雅典后，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困了好几天，后来终于去了工程现场，却发现工程已接近尾声。他们知道自己上了当，回国后能平心静气才不正常呢。于是，他们一回国就把这份怒气发泄到了地米斯托克利身上。

事已至此，还能怎样？这时，地米斯托克利也撕下了假面具。他要求召集全体斯巴达公民，也就是全体重装步兵，发表讲话。他当着5个监察官的面，当着国王的面，向全体重装步兵做了演说。

建设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塞通道，源自萨拉米斯海战前夜雅典实施强制疏散的教训。我们决定建设这项工程，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情况，为了保障雅典安全。

雅典安全有了保障，不仅有益于雅典一个国家，它与整个希腊的安全保障也密不可分。经历希波战争之后，我们希腊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在保障雅典安全的同时，也可以保护雅典的同盟者——全体希腊城邦国家。

我们雅典发誓，即使将来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出现矛盾，也会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矛盾。

另外，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欢迎其他城邦国家学习雅典。大家可以模仿雅典，可以向我们取经，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接受雅典的做法即可。究竟怎么做，各城邦国家可以自己决定。

如此这般，地米斯托克利理直气壮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两国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结果自然是双方相安无事。斯巴达人最后认可雅典的做法并无不当，是因为他们不想和雅典撕破脸皮，至少现在不想，毕竟雅典已是强悍的军事大国之一。

地米斯托克利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雅典。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也接近尾声。

也许你会说，既然要发表演说，为什么一开始不这样做呢？这是因

为人类社会并没有那么单纯。

人的本性，包括斯巴达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们对于任何尚未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都要说三道四，不愿耐下心来听对方解释。

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即使内心依然不愿承认，但只要有人耐心解释，人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我想，地米斯托克利大概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等到他们看到工程已近尾声再做解释，以此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吧。

他的目的当然是完成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如果在不损害斯巴达人感情的前提下达成此目的，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罗马是首都，奥斯提亚是它的外港。罗马与奥斯提亚之间有台伯河相连，但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没有河流。

罗马与奥斯提亚相距22公里，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相距只有7.5公里。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不仅有长远意义，而且有现实需求。如果把罗马和奥斯提亚比作两个不同的人，那么可以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是同一个人，雅典是这个人的上半身，比雷埃夫斯是这个人的下半身。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这一庞大工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地米斯托克利创作的唯一一件“作品”。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由于他的“作品”是突击施工而成，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材料精挑细选，因此石材规格不统一，有时甚至用墓碑来充数，工程质量不尽完美。

但最重要的是，这项工程的建设完全遵循了既定方案。

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并不太重视社会资本。因此对他们来说，建造这项基础设施工程已是难得之举。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成为雅典领袖的伯里克利对此工程进行了重大改造。经过这次改造，这项基础设施才达到了真正的完美。

这项大工程很快传遍整个雅典，甚至一提到“城墙”，人们就知道所指为何。这项工程的建成正像地米斯托克利说过的那样，使雅典成了希腊的一大通商中心。

在海上作战、运输和贸易等方面，雅典彻底赶超了曾经走在希腊最前面的科林斯和埃伊纳。

后来，在雅典国内政治陷入低迷的时代，这里依然保持了爱琴海一大通商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它应该还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一大通商中心。

雅典不再是通商中心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建成以后。亚历山大港由马其顿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那时距地米斯托克利时代已过去了150年。

所以说，地米斯托克利不只是“萨拉米斯英雄”。

年轻的斯巴达将军

同一时期，“普拉塔亚英雄”又在做些什么呢？

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帕萨尼亚斯只有34岁。这一年，他率领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在普拉塔亚平原将波斯帝国引以为傲的陆战主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帕萨尼亚斯年纪轻轻就立下如此功绩，想必他一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吧。

在德尔斐拜祭阿波罗神庙时，他敬献了一块铜板，上刻“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为感谢神助我消灭波斯军队，特献立此铜牌”。为此，他惹来了5个监察官的猜忌。

斯巴达是一个极度讨厌个人主义的国家，只知道一味遵守吕库古的“宪法”而不知变通。即便是国王，只要他有个人主义倾向，一样会被猜忌。不仅如此，斯巴达对国王的约束更加严格，因为吕库古的“法”就是通过牵制权力来保证国内稳定的。

既然斯巴达是这样一个城邦国家，那么5名监察官坚信自己的使命是监督每一个斯巴达人严守法纪，也就无可厚非了。

5名监察官一知道帕萨尼亚斯在德尔斐的所为，立刻从斯巴达赶到德尔斐，要求帕萨尼亚斯取回已经献立的铜牌，修改上面的内容。

他们要求从“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中删去“帕萨尼亚斯”5个字。

他们没有给予帕萨尼亚斯任何处分，但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斯巴达

指挥官因此上了监察官的黑名单。

的确，帕萨尼亚斯可能缺少谦虚的美德。但是，谦虚的美德与超常的天才这两者原本就很难兼而有之，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更像希腊人。

普拉塔亚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斯巴达部下逼帕萨尼亚斯下令砍下敌将马多尼乌斯的脑袋，就像波斯国王在温泉关对列奥尼达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将马多尼乌斯的脑袋挂上矛尖在全军士兵面前示众。但是，这位34岁的指挥官一口拒绝。

“这是野蛮人的行为，不是我们希腊人应该模仿的事情。”

在献给德尔斐阿波罗神的铜牌上，他刻的是“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而不是“帕萨尼亚斯，斯巴达军队指挥官”。

有一个现代研究者评价帕萨尼亚斯说，他不是典型的斯巴达人。

如果他完全不像斯巴达人，也许他会有别样的人生选择。他的不幸在于他只是50%不像斯巴达人，还有50%仍是斯巴达人。

我想，普拉塔亚战役之后，5个监察官的真实想法大概是让帕萨尼亚斯立即回国，在国内将他软禁起来吧。

但是在这个时期，斯巴达完全找不出可以领军打仗的人，因为有资格率领斯巴达军队的人必须是现任国王，或仅次于国王地位的人，也就是像帕萨尼亚斯这样的人。他是前国王的儿子，又是尚未成年的下一任国王的监护人。在希波战争的余波尚未彻底消散的这一时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普拉塔亚战役中，帕萨尼亚斯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刚过35

岁。在其他城邦国家，谁也不会认为帕萨尼亚斯继续担任总指挥官率领军队上前线，是破坏宪法的行为吧。

但是，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斯巴达一直是吕库古“宪法”的忠实执行者。在斯巴达，作为个人，可以接受赞誉的只有列奥尼达，因为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壮烈牺牲。也许在斯巴达人的心目中，“死了的英雄”无害，而“活着的英雄”难免会带来危害吧。

虽然不能说是“小人闲居为不善”，但此时的5个监察官为了帕萨尼亚斯，为了斯巴达，也为了全希腊，的确要为“不善”了。

帕萨尼亚斯刚从普拉塔亚凯旋就被革去了斯巴达陆上军队指挥官的职务。

现任国王列奥提吉达斯取而代之，担任了这一职务。他是帕萨尼亚斯为战胜波斯军队而殚精竭虑制定战术的同一时期，与雅典的克桑提普斯合力将波斯海上军队赶出萨摩斯岛的总司令官。

成功夺回萨摩斯岛以后，雅典军队继续北上攻打达达尼尔海峡要塞西斯托。列奥提吉达斯认为爱琴海与斯巴达没有关系，于是带着斯巴达士兵离开希腊联合海军回到了斯巴达。

在5个监察官看来，也许此人才是符合斯巴达国家利益的人选。他们大概认为，他一定会是忠实执行斯巴达安全保障政策的司令官，绝不会允许敌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

列奥提吉达斯取代帕萨尼亚斯担任了斯巴达陆上军队指挥官的职务。5个监察官随即将他派往希腊中部色萨利地区。因为普拉塔亚战役的前一年，色萨利地区是马多尼乌斯率领下的波斯陆上军队的冬季营地。

然而，斯巴达于公元前478年派出的镇压色萨利的部队无功而返。

这并不奇怪。波斯大军入侵时，位于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地区被迫归顺了波斯，成为波斯军队的冬季营地。当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彻底战败以后，色萨利自然重新回到了希腊阵营，因此斯巴达派兵前去镇压纯属多此一举。事实上，雅典就没有派兵前往色萨利的想法。

公元前478年，5个监察官革去了帕萨尼亚斯的职务，但没有软禁他。他们虽然可以让帕萨尼亚斯删除献给阿波罗神的铜牌上的名字，却不能剥夺他“普拉塔亚英雄”的称号。

因此，刚刚卸下陆上军队指挥官一职的帕萨尼亚斯又被任命为海上军队指挥官。

接下来，这位35岁的斯巴达年轻指挥官在海上取得的战果又一次大大出乎监察官们的预料。

萨摩斯岛夺回了，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西斯托也已收回了。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爱奥尼亚地区和靠近这一地区的岛屿都回归了希腊。希腊人普遍认为波斯军队已被彻底赶出爱琴海。因此，公元前478年，他们似乎无须再向爱琴海派遣大规模作战力量，也许他们认为保证已回归希腊的这些地区现有的安全就已足够。

当然，希腊各国似乎还没有考虑就此解散为对抗波斯而组建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它们甚至还向刚就任联合海军总指挥官的帕萨尼亚斯提供了近百艘三层加莱船。

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提供了20艘战船，雅典提供了30艘。余下的船只来自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和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罗德岛等岛屿，这些地区刚刚摆脱波斯统治回归希腊。

帕萨尼亚斯掌握着近百艘战船，任务却只是在海上巡逻，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也许因为波斯军队已经彻底离开爱琴海了吧。

但是，这位35岁的年轻将领并没有将这个闲职当成闲职来做。

帕萨尼亚斯率领百艘战船离开爱琴海，进入东地中海，突然接近了塞浦路斯岛。

接近塞浦路斯岛并非完全师出无名。该岛距离地中海东岸较近，虽然是波斯的领地，当地住民却是希腊人。因此，把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理由是成立的。

在地中海各岛屿中，塞浦路斯岛是排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克里特岛之后的一个大岛。帕萨尼亚斯率领船队绕岛一圈后，方知仅靠百来艘船的战斗力拿下此岛难度很大。

同时，该岛距离腓尼基较近，一旦发生战斗，波斯方面不可能坐视不管。而且两年前腓尼基人在萨拉米斯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其心中一定余怒未消。帕萨尼亚斯知道自己已过于深入敌方区域，于是决定离开。

帕萨尼亚斯选择撤离塞浦路斯，另找一个进攻目标。士兵上船后，他指挥百艘战船回到爱琴海，在爱琴海继续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横渡马尔马拉海，直抵拜占庭。一到拜占庭，他就下令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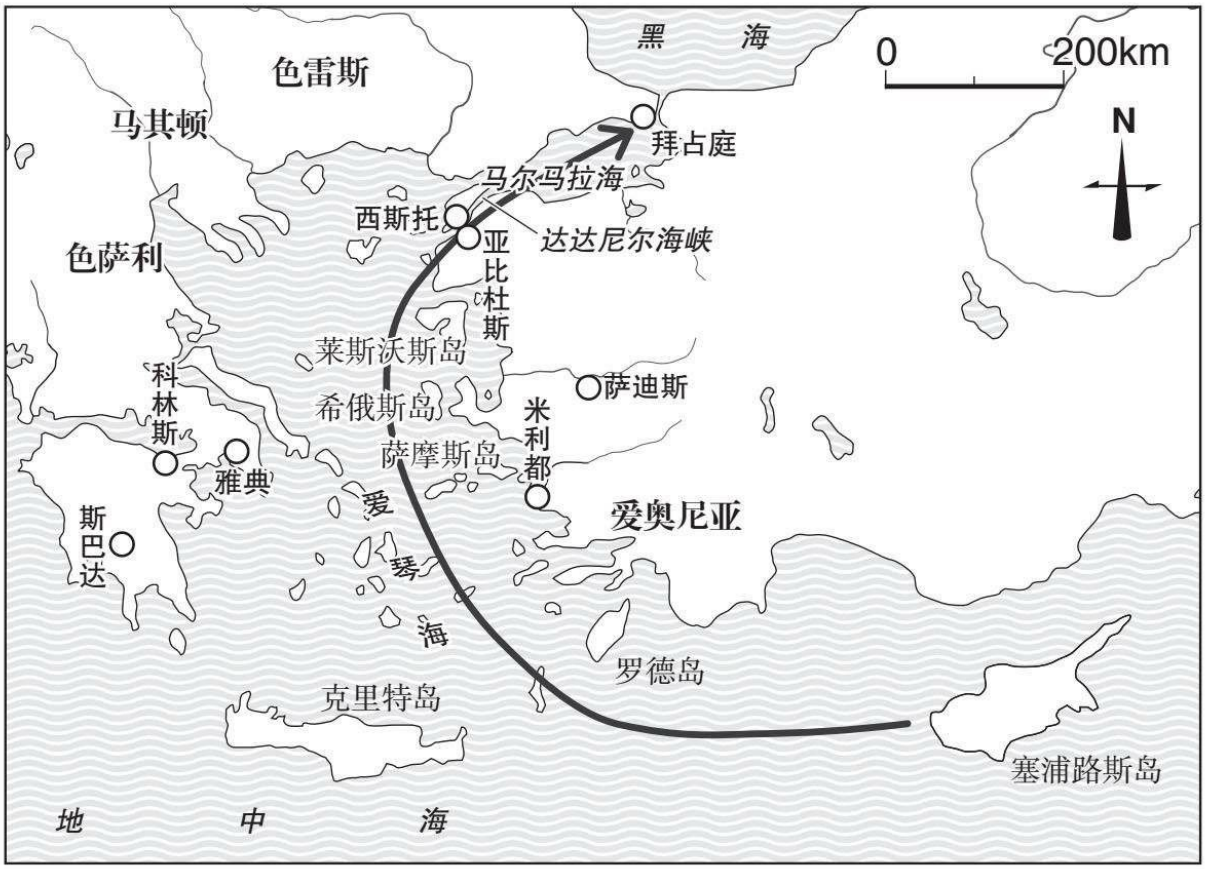
拜占庭在当时的希腊语里叫“Βυζάντιον”，到了罗马时代后期改叫“君士坦丁堡”。公元15世纪，被土耳其征服后，它又改名“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帝国时代的这座城市不过是希腊世界边境的一个小城，既不受希腊人的重视，也没有引起波斯人的关注。

决定攻打这座城市只能证明帕萨尼亚斯不是典型的斯巴达人。那个时代没有人关注这个地方，甚至连雅典人都没有注意到此地。

但是仔细想想，帕萨尼亚斯攻打这个“盲区”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要彻底切断波斯的入侵之路，仅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要冲西斯托远远不够。只有将位于其东北的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也掌握到自己手中才能彻底放心。



攻打拜占庭

那么，连地米斯托克利都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拜占庭，帕萨尼亚斯又是怎么注意到的呢？

普拉塔亚战役结束后，排在波斯阵形最后面的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和他带领的4万名士兵几乎不损一兵一卒就逃离了战场。帕萨尼亚斯没有乘胜追击，但他也许注意到了他们的逃跑路线。

阿尔塔巴兹和他的4万名士兵落败而逃。他们逃跑的过程并不顺畅。原定的路线是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亚细亚，但是当地希腊人得知普拉塔亚战役结果后，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波斯，阻断了这位总督和他的4万名波斯士兵返回亚细亚的路线。

阿尔塔巴兹是一位很务实的总督，波斯军队战败后，他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希腊军队再次交战。因此，他放弃了横跨色雷斯地区的这条近道，选择绕道而行。他率领4万名士兵沿山脚绕过一个大弯到达拜占庭，然后从拜占庭回到亚细亚。出征时至少有12万名士兵的波斯军队，顺利回到祖国的只有这4万人。他们逃回国未经过西斯托的浮桥，而是绕道遥远的拜占庭。

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亚细亚入侵欧洲的威胁，就有必要控制从拜占庭到西斯托的所有地方。

前一年秋天，雅典人克桑提普斯已经夺回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地西斯托。时隔一年，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让拜占庭也回到了希腊的怀抱。

当然，攻取拜占庭并没有那么容易。与西斯托一样，波斯人深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此留下了守军。因此，帕萨尼亚斯必须首先打败波斯守军，当地住民发动起义反抗波斯则是之后的事情。

夺取西斯托跨了两个年份，彻底攻下拜占庭也是在公元前477年以后了。

斯巴达人不是海洋民族，因此对斯巴达人来说，凭借海上力量取得胜利，这是第一次。

希腊城邦国家为共同抵抗波斯入侵而结成联盟后，根据最初的约定，陆军和海军的总指挥官都由斯巴达人担任。

无论是亚德米西林还是萨拉米斯，抑或是米卡勒，尽管参战的主力军来自雅典，但是全军的总指挥官都是斯巴达国王。

当然，他们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熟悉大海，因此无论制定战术还是确立事实上的总指挥官，他们都交给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和克桑提普斯来负责。

与以往不同，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拜占庭之战的总指挥都是斯巴达人。这一战是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斯巴达为此举国沸腾。但是，欢欣鼓舞的只是士兵，5名监察官并没有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与雅典一样，斯巴达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城邦国家。不同的是，雅典士兵是“兼职”的，而斯巴达士兵是“专职”的。以专职士兵自居的人，更容易为胜利而欢欣鼓舞。

5个监察官以吕库古“宪法”的执行官自居。因此，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很难为帕萨尼亚斯的胜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

首先，帕萨尼亚斯的行动严重违背了吕库古的“宪法”，即以保卫斯巴达本国为首要任务。

其次，帕萨尼亚斯的行动严重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斯巴达国策，即斯巴达的管辖范围仅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很早以前，伯罗奔尼撒同盟就在斯巴达的倡议下成立，但是这个同盟从未将目光投向过爱琴海。

5个监察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成功攻取拜占庭的帕萨尼亚斯。因为在斯巴达国内，帕萨尼亚斯深受士兵爱戴，支持率直线上升。

雅典得知斯巴达的这一情况后决定好好加以利用。

达达尼尔海峡将欧洲和亚细亚一分为二。为切断波斯军队的入侵路线，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极其重要。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没有什么比破坏连接西斯托和对岸的浮桥更重要的了。雅典军切断了波斯的入侵路线，促使色雷斯地区顺利回归了希腊。广阔的色雷斯地区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由于切断了波斯的入侵路线，当地住民得以从波斯的统治中

解放出来。

一直以来，雅典人热衷于殖民色雷斯地区。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雅典人的大部分海外资产集中于此。

希波战争的胜利使色雷斯重归雅典。雅典控制了西斯托，所以保证了色雷斯的安全。

但是，斯巴达人攻占拜占庭使雅典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希腊民族中，雅典人的经济头脑超乎想象的发达。对此，斯巴达监察官甚至觉得很不可理喻。

对雅典人来说，占有拜占庭意味着新的机会——开拓黑海沿岸这一新兴市场。拜占庭位于通往黑海的入口处，掌握这个地方不仅可以彻底切断波斯军队入侵的路线，出入黑海沿岸还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无论从战略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这片海域无疑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此刻，拜占庭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手中。雅典人想掌握从西斯托到拜占庭，即从爱琴海到黑海的所有地方，首先必须将帕萨尼亚斯赶出拜占庭。那么，如何才能赶走帕萨尼亚斯呢？

雅典收集了有关帕萨尼亚斯的信息，整理成材料后送到了斯巴达反帕萨尼亚斯的监察官手中。他们相信这些材料足以赶走帕萨尼亚斯。

斯巴达5个监察官不太相信雅典政界大人物地米斯托克利，他们承认他是优秀的指挥官，但他们更清楚地米斯托克利的支持者多为雅典庶民。他们害怕地米斯托克利会给斯巴达下层百姓带来不良影响。因为在斯巴达，作为下层百姓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

少数人统治（寡头政治）体制下的斯巴达人比较相信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阿里斯泰德。他们认为，与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相比，稳健派领袖阿里斯泰德更值得信赖，后者出身于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

迈尼翁家族。

就这样，雅典的稳健派开始收集有关帕萨尼亚斯的材料，将其送到了斯巴达监察官的手中。他们没有采用密告的方式，而是受斯巴达掌权者的委托收集相关材料。当然，他们收集到的所谓的材料不过是道听途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这位刚满36岁的斯巴达年轻将军企图凭借波斯的力量征服希腊。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这个年轻人向波斯国王提亲，要与波斯国王的一个女儿结婚。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向波斯国王表示，波斯征服希腊之后他愿意做国王的第一心腹。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在拜占庭深受波斯风俗熏染，出门必带由波斯俘虏组成的卫队。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没有杀死拜占庭攻取战中的俘虏。这点可以不追究，但是他独断专行，对参加拜占庭攻取战的雅典和其他城邦国家的人态度蛮横。

掌握这些材料后，监察官决定马上召回帕萨尼亚斯，等他一回国立即进行审判。

斯巴达监察官坚信“法”可以挽救权力拥有者的不自律行为。他们手握审判大权，对于滥用职权者，即使是国王也绝不姑息。

在斯巴达，5个监察官同时又是检察官，做出判决的是“长老会议”。长老会议由6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28人外加两个国王共30人组成。

36岁的帕萨尼亚斯被召回国后接受了长老会议的判决。结果如下：

对待同盟国盟友态度蛮横、独断专行，判处此项罪名成立，予以警告。关于其他诉讼，因证据不足判处无罪。

于是监察官又提了一个要求：帕萨尼亚斯从此不得领军作战。对此长老会议表示同意，5个监察官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从此帕萨尼亚斯成了一个普通人。他在斯巴达又逗留了一段时间，不少王室成员好像很同情他的处境，甚至有一人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

但是监察官对他依然心存戒心，不依不饶。也许他厌烦了这种感觉，于是选择离开祖国。他将列奥尼达的遗子、尚未成年的国王托付给弟弟，随后带着妻儿和愿意追随他的几个人坐上三层加莱船，移居到爱奥尼亚地区最东北的海边城市克罗奈伊。

克罗奈伊以北30公里处有一个特洛伊古战场。按照帕萨尼亚斯的性格，他一定对《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怀有一种亲切感。或许这也是他选择在此处安家的理由。

不管怎样，已经变成普通人的“普拉塔亚英雄”从此开始了平静的人生第二阶段的生活。

我把斯巴达5名监察官看成闲居不善的“小人”是有原因的。他们没有远见卓识，却偏偏掌握着斯巴达的国家政权。这样的权力机构除了斯巴达，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

对帕萨尼亚斯做出判决以后，5个监察官派遣多吉斯取代帕萨尼亚斯管理拜占庭。

雅典不可能坐等多吉斯来到拜占庭，他们早已抢先一步将客蒙送到

了拜占庭，当时他就在相距不远的西斯托。客蒙是“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的儿子，时年38岁。与父亲一样，他很有战略天赋，是阿里斯泰德为对付地米斯托克利而培养的一名年轻将领。

多吉斯晚于客蒙到达拜占庭。他不仅到得晚，还是个无能之辈。别说掌控拜占庭，他甚至和留守此地的斯巴达士兵一起被客蒙赶出了拜占庭。

斯巴达人遇到突发变故时，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们不会努力扭转局面，总是选择退避三舍。

帕萨尼亚斯案件给斯巴达带来了两个后果：

第一，从爱琴海到黑海的所有要地都掌握在斯巴达的竞争对手雅典手中。

第二，生活在爱琴海周边地区的希腊人认为斯巴达是靠不住的。

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不难理解。

希波战争始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国家米利都，因米利都反抗波斯统治而引发。

当时，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提供援助。斯巴达一口回绝，理由是他们对爱琴海没有兴趣。雅典没有拒绝，却也只是象征性地派遣了20艘三层加莱船。

为此，不仅米利都对希腊本土的两大强国深感失望，小亚细亚西岸辽阔的爱奥尼亚地区和相距不远的海上诸岛也纷纷接受了波斯的统治。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很多希腊地区的人站在波斯阵营参加了海上和陆上的作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可选。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战役”和“米卡勒之战”。

自此，波斯军队从爱琴海上彻底消失了。

爱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岛屿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了。

形势变化至此，斯巴达竟然还说跟他们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希腊各地区的人再也不愿意重回波斯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唯雅典马首是瞻。而此时的雅典已是一个拥有200艘战船的海上军事大国，再也不是只有20艘战船的国家了。

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成了“提洛同盟”的接生婆。

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不仅在希腊史上有名，甚至在西方史上都很有名。命名为“提洛同盟”是因为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上，那是一个因阿波罗神而闻名地中海的岛屿。

就这样，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诞生了，它与存在已久的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驾齐驱。

两个同盟的目的都是几个国家相互合作开展集体防守。但是，现代学者一致认为，成立提洛同盟不是雅典提出来的，但这“正中雅典下怀”。

第一，因为成立提洛同盟不是雅典提出来的，而且又是斯巴达离开后成立的，因此斯巴达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另外，组建提洛同盟的目的是集体保护爱琴海域的安全，而成立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目的是保障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安全，两者没有利害冲突。

第二，雅典为保障自身安全，完成了首都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建设。对雅典来说，影响遍及爱琴海全域的提洛同盟是一体化工程的延伸，成立这个同盟是一件大好事。

第三，雅典在建造船只和保有船只方面的能力强于其他同盟国10倍以上。因此，雅典担任盟主顺理成章。

这就是雅典人，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

为了讨论与同盟相关的事宜，会议在爱琴海南部海域上的提洛岛召开。这片海域是多岛之海，刚过一个岛，下一个岛就会映入你的眼帘。按照希腊的惯例，关于政治的重要决策都在冬季讨论制定。在这个季节出海很难保证绝对安全，但是来到提洛岛的城邦国家代表之多，充分表明成立同盟乃众望所归之事。

52岁的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首席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

“即使为达目的，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阿里斯泰德的观点。

两种观点反映了希腊的战时领袖和和平时期领袖之间的不同。在和平时期讨论同盟事宜，也许和平时期的领袖更加合适。

地米斯托克利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在他面前，人们容易感到紧张。而公认的正义之士阿里斯泰德则可以让人放松情绪。因为他好像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阿里斯泰德似乎很擅长协调工作，各国代表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提洛同盟成立了。

包括“微型”城邦国家在内，参加同盟的城邦国家达三百多个。当然，将一年到头纷争不休的希腊人统一起来的确并非易事。毕竟希腊人为了短暂的休战，甚至需要4年一度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

提洛同盟成立以后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之所以能存续这么久，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希腊人真切地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大国波斯的威胁，只能有赖于集体防守。就算邻国之间有可能关系交恶，对波斯的警惕是共有的。

第二，加入同盟的城邦国家不论大小都要缴纳成员费。金额设有下限，不设上限。各城邦国家根据各自的国力、各自的情况缴纳。

在三层加莱船时代，一艘大型帆船包括操纵船只的船员、起到船只马达作用的桨手在内，船上至少需要2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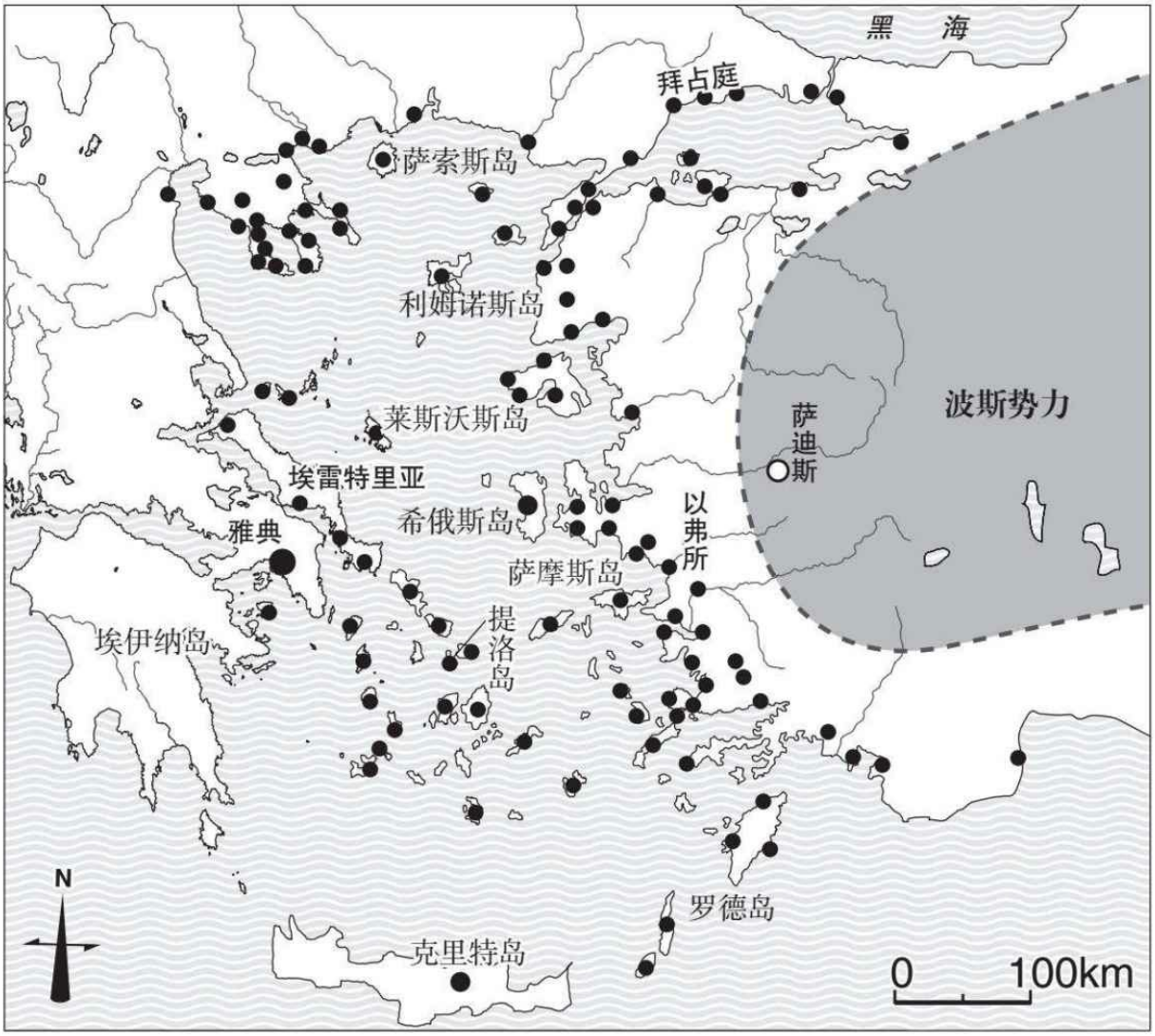
如果雅典派出200艘船，就需要派遣4万名雅典公民。提洛同盟中，埃伊纳岛、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的海上军事力量较强，却也只相当于雅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是提供船只的数量。此外，根据国力的强弱，各国每年向同盟缴纳的成员费有所不同。有些小城邦国家甚至无力提供一艘三层加莱船。这样的城邦国家只需要每年缴纳一次成员费即可。

由于交纳了成员费，一旦自己的国家受到进攻，可以期待其他国家前来救援。这就是集体防守的好处。

提洛同盟之所以能存续这么久，第三个原因是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运作中又是非民主的。提洛同盟“正中雅典下怀”，他们从同盟成立之初就彻底掌握了同盟的主导权。

哪些城邦国家有义务提供船只，提供多少；哪些城邦国家要缴纳成员费，缴纳多少等，这一切都在雅典的主导下决定。



提洛同盟的主要城邦国家

各国缴纳的成员费保管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内，但是从经费的使用到其他一切事务都由雅典政府的官员负责。当然，与其他城邦国家相比，雅典的组织体系要完善得多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看似非民主的运作方式在明确责任方面非常有效。在战场上，指挥体系必须职责明确，和平时期要让组织机构正常发挥作用，其领导体系同样必须职责明确。

成立于公元前477年的提洛同盟在30年后，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迎来了鼎盛期。这个时期，参加同盟的各国实力进一步增加。爱琴海上甚至看不到一艘波斯战船了。

提洛同盟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军事上的集体防守，还在于爱琴海沿岸希腊境内形成了一大经济圈。

销声匿迹的不只是波斯战船，连海盗也不见了踪影。

当然，彻底消除波斯的影响指的是波斯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不针对所有波斯人。爱奥尼亚地区的繁荣离不开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的贸易。波斯帝国的百姓，包括波斯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似乎都不在意提洛同盟针对的是波斯，也不反感与希腊人保持贸易关系，虽然这些希腊人大多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的人。

提洛同盟在之后的存续期间或多或少发生过改变，在改变中又维持了很久。究其原因，我想就是上述诸多缘由吧。

如果说提洛同盟只是“正中雅典下怀”，不免过于强调运气。事实上，机会这种东西，只会留给善于利用的人。

英雄的余生

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遭陶片放逐，流亡到了国外。

这是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第9年。

是普拉塔亚战役之后的第8年。

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实现一体化之后的第7年。

也是提洛同盟成立后的第6年。

我们只能认为，至少在提洛同盟成立后的6年间，雅典与斯巴达从未停止过合谋。

“合谋”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和以后修昔底德所著的《战争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词。但是仔细阅读他们描述的各部分细节，人们很容易想到“合谋”这个词。

为了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彻底赶下台，合谋的一方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另一方是雅典的阿里斯泰德和他那一派人。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如此轻易地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赶下台呢？

在当事人强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很难把他拉下台。

因为这个时候，危机已经远离希腊全境。

也许你会说，危机离去不正是那两个人的功劳吗？但是，有一句话

说得好，叫“此一时彼一时”。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只记得住别人的坏而记不住别人的好。容易忘记别人的好是人类的特性之一，于是有人展现出了人性中的这一特点。

这6年间，雅典一帆风顺。

来自波斯的威胁解除了。

比雷埃夫斯与雅典一体化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最大的港口。另外两个港口的造船所周边渐渐集中了从事造船相关工作的技师和匠人。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雅典每年新建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公民大会予以通过。于是，与造船业相关的人群有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提洛同盟成立以后，雅典又开始接受其他中小同盟国的订单，因为这些中小城邦国家没有造船能力。

既然提洛同盟以雅典为主导，那么由雅典人担任同盟海上军队总指挥官一事自然无人反对。于是，不到40岁的客蒙年纪轻轻就连任了这个职位。

客蒙是“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的儿子。他很像他父亲，有非常敏锐的战略天赋。在这位年轻将领的指挥下，爱琴海作为“希腊人之海”越来越安全，大多数雅典公民甚至认为，只要交给客蒙就可以高枕无忧。

客蒙之所以深受雅典人的爱戴，不仅因为他是“马拉松英雄”的后代。萨拉米斯海战中，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客蒙担任了其中一艘战船的指挥员。当时这位年仅31岁的年轻人表现出势不可当的英勇气概，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位被处以巨额罚款、最终不治身亡的“马拉松英雄”。人们惊叹，他原来是米提亚德的儿子。

当时客蒙并未引起阿里斯泰德的注意，因为此时年长客蒙10岁的克桑提普斯尚在，完全可以与地米斯托克利较量。

然而第二年，克桑提普斯在米卡勒和西斯托两场战役中大显身手以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清楚真实的原因，只能推测他因病去世。阿里斯泰德注意到客蒙正是在此之后。

为了实现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雅典开始建造带有城墙的道路。斯巴达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说明建造此工程的目的，阿里斯泰德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去了斯巴达，客蒙随行前往。正是在这个时候，阿里斯泰德决定培养客蒙，让他成为自己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帮手。

因为父亲被判50塔兰特的罚款，年轻的客蒙负担很重。尽管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但那仅仅是一小部分，距离还清还差很多。

当时，雅典有一个大富翁叫卡里乌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阿里斯泰德给客蒙和卡里乌斯牵的线。但是阿里斯泰德领导的雅典政界的稳健派毕竟与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激进派不同，它是集中了富裕阶层人士的一个圈子。

卡里乌斯是这一富裕阶层的一员，他提出如果客蒙同意将妹妹嫁给自己，他愿意替客蒙交清罚款。

客蒙长得很魁梧，可以想象他妹妹很可能是个米洛斯的维纳斯式的美女。不管怎样，客蒙肩上的重担因此卸下去了。

其次是客蒙自己的婚姻。这一次，是阿里斯泰德主动提出的。

嫁给他的是出身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孩儿，还是统帅麦加克勒斯的孙女。在这个闻名全希腊的名门中，她绝对是血统纯正的直系后代。也许你会认为在民主政体国家，这样做会不会不利于他的发展。但是，普通百姓总是向往“高贵的血统”。

把客蒙拉进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后，阿里斯泰德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客蒙成了他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有力帮手。

但是，客蒙不是一个满足于做豪门女婿的人。

此时，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战役这样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已不存在。但是，提洛同盟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为保障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安全而建立的集体防守体系。如果止步于制定制度而懈怠于管理，那么很难指望这个同盟会长久发挥有效作用。

维持提洛同盟，有低调的做法，也有高调的做法。

客蒙很有战略天赋，但行事一向高调。为了得到金矿而攻占萨索斯岛后，客蒙得到了据称是雅典建国始祖忒修斯的遗骨。不管真假，他把遗骨当作真迹带回雅典，让雅典公民为之疯狂。这就是客蒙。

客蒙是战略天才，却不是谋士。阿里斯泰德与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关系很好，却从不表现出来，而客蒙公开与斯巴达交好。他为儿子取名“Lakedaimonias”，意思是“斯巴达之子”，完全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因此，雅典公民认为他是一个坦诚的人。

就这样，客蒙不仅成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回到国内后他的声望日益高涨。与此相反，地米斯托克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同39岁的客蒙相比，地米斯托克利已经53岁了。

公元前471年，在决定陶片放逐的公民大会上，正是客蒙强烈要求放逐地米斯托克利。

以修昔底德为首的同时代史学家没有一个人明确记载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理由。

尽管如此，流放国外长达10年，一定有一个能让人接受的理由，只是究竟是什么理由，至今尚不清楚。

也许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暗示的那样，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参战的各指挥官瓜分了波斯国王遗弃的财宝。10年后旧事被重提。当然，没有证据证明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是因为此事。

现代学者从卫城山上发掘的陶片中找出所有刻有“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进行了仔细比对，结果发现大多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刻在上面的字不仅字形相同，甚至出错的位置都一样。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有关阿里斯泰德的章节中有这样的描述：雅典公民并非人人识字，其中也有文盲。所以，不排除有人事先将“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字样刻在陶片上，然后交到既不会刻字也不认字的公民手中，让他们投进投票箱的可能性。当然，上面刻了谁的名字他们自然不会如实相告。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雅典人就不仅仅是民主政体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

不管怎样，“萨拉米斯英雄”在海战之后的第9个年头遭到了陶片放逐。

53岁时突遭此变故，地米斯托克利却好像没事人一样，完全看不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被流放了？哦，知道了。”好像这就是他的反应。他把家人留在雅典，一个人痛痛快快地离开雅典，移居去了阿尔戈斯。

现代学者认为，此时的他本该小心行事，却选择了阿尔戈斯作为流放地，实非明智之举。

也许地米斯托克利根本没想过自己应该表现得谨慎一些。作为排挤政敌的手段，他自己就利用过陶片放逐制度。而且，目的达到以后，他又在必要的时候召回政敌，让他们担任要职，给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机

会。在他眼里，陶片放逐不过是权宜之策。也许他认为，一旦需要，公民大会随时可能召他回国。

然而，阿里斯泰德不是地米斯托克利。

陶片放逐制度只规定被放逐者要在国外待上10年，并没有规定只能去何处。所以，只要在雅典国境以外，选择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地米斯托克利为什么会选择阿尔戈斯呢？理由尚不清楚。

阿尔戈斯是希腊城邦国家之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其南侧与拉科尼亚地区接壤。拉科尼亚的首都就是斯巴达。但是，不，也许应该说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阿尔戈斯甚至仅仅因为总指挥官是斯巴达人而拒绝加入共同抵抗波斯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

走陆路，只要穿过伊斯米亚狭窄的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再向东横穿迈加拉即可从阿尔戈斯到达雅典。如果走海路就更容易了。坐船绕过埃皮道鲁斯，经过埃伊纳、萨拉米斯，一路北上，当天即可到达雅典。

得知地米斯托克利移居阿尔戈斯后，年届六旬的阿里斯泰德会有什么想法呢？他知道，要让长期以来的政敌彻底威信扫地，仅靠陶片放逐是不够的，因为他本人仅流放一年就被召回国了。而且此时雅典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势力依然强大。

另一方面，总是疑神疑鬼的斯巴达监察官们知道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之后，大概觉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吧。

也许他们认为“萨拉米斯英雄”倒台了，那么推翻“普拉塔亚英雄”也就不难了。带着这样的想法，5个监察官命令帕萨尼亚斯即刻回国。此时，帕萨尼亚斯就在特洛伊古战场附近的克罗奈伊过着隐居的生活。

这位“普拉塔亚英雄”已经43岁，作为普通人，他已经过了6年隐居生活。

事实上，因与监察官不和而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并非只有帕萨尼亚斯一人。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大多出身王室，他们或逃往波斯，或去了意大利半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监察官主宰的斯巴达体制的叛逆者。但是，监察官从来没有向那些人发出过召回令，也没有派刺客暗杀过他们。也许他们认为，只要这些人离开斯巴达，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了吧。

但是，帕萨尼亚斯不同，他是“普拉塔亚英雄”，即使他离开了祖国，在监察官眼中依然有害。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帕萨尼亚斯会给肩负斯巴达未来的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

斯巴达的监察官制度的弊端就在于监察官除了多疑猜忌之外，还有所谓的使命感。

不要忘了，帕萨尼亚斯有50%是斯巴达性格，还有50%不是斯巴达性格。

正因帕萨尼亚斯采用了非常规的策略，他才能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歼灭波斯军队。而“战必胜”的信念是典型的斯巴达式的想法，因为这是斯巴达男人们最看重的事。

监察官只有当士兵的经历，他们从未担任过总指挥官。总指挥官需要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帕萨尼亚斯认为没有指挥官经历的监察官没有资格审判自己。

而且6年前，对他的审判结果是无罪。因此，他以为这次召回令只是上一次的重复。然而这一年，5名监察官从一开始就认定他有罪，甚至还准备了物证。

认定帕萨尼亚斯有罪的依据可能是以下两点：

第一个罪名是，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企图利用波斯的军事力量征服希腊。

第二个罪名是，为达到以上目的，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揭竿而起反对斯巴达。

认定他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的证据是他写给波斯国王的信，发信地是拜占庭。因为帕萨尼亚斯攻下拜占庭后不久就被勒令离开，所以通信事件应该是在公元前477年，即7年前的事。

关于这件事情，起诉内容与上一次大同小异。煽动希洛人起义的罪名是这次新增的，这是叛国罪。这一次，审判权不在“长老会议”而到了5个监察官的手中。

关于信件这一“物证”，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它是可信的。

斯巴达指挥官帕萨尼亚斯写给波斯国王薛西斯

我有一个想法，可能合您的心意。

我想娶您女儿为妻。作为交换条件，我可以将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全域献给您。

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愿意听从您的忠告和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要求感兴趣，请速派可靠的使者前来。

薛西斯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他马上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前往拜占庭，将国王写的回信亲手交到帕萨尼亚斯手中。

波斯国王的家臣见到帕萨尼亚斯后，将国王的信交给了他。

国王写给帕萨尼亚斯

我非常愿意接受你的请求，无论白昼还是黑夜，我都希望没有障碍能够阻挡你兑现你的承诺。

如果需要组编强大的军队，无论需要多少钱我都愿意提供。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差遣阿尔塔巴兹。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我二人的愿望。

这就是所谓的勾结波斯国王、背叛希腊的确凿“物证”。

那么，斯巴达5名监察官是如何得到这件物证的呢？帕萨尼亚斯有一位好友叫艾尔基尼奥斯。据说他看到这封信后非常害怕，于是将它交给了监察官。

关于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农奴起义的证据是否真实存在，尚不清楚，至少修昔底德没有提及。

为了证明所谓的物证纯属伪造，人们竟然用了2300多年的时间，只能说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太过强大。

2300多年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从中世到近世再到近代的欧洲人都相信帕萨尼亚斯是一位杰出的将帅，同时也是一个可恨的卖国贼。

直到20世纪以后，一位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物证是伪造的。他认为要证明此物证系伪造甚至无须高深的学问。

第一，当时抗击波斯的战斗刚刚结束，波斯高官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拜占庭街头。

第二，帕萨尼亚斯成功拿下拜占庭的这一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已经回到波斯首都苏萨。

苏萨位于中东，阿尔塔巴兹统治下的萨迪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其间虽有一条全线铺设的大道——王之道，但是，这条路从头走到尾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假设帕萨尼亚斯真的给波斯国王送去了信，那么，送信人必须从拜占庭到萨迪斯，再从萨迪斯前往苏萨。

第三，假设波斯国王看到这封信后，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带着回信去拜占庭。从帕萨尼亚斯写信过去到国王送来回信，一个往返最快也需要6个月时间。

而帕萨尼亚斯攻取拜占庭以后不久就被召回斯巴达。他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完成此事。

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学者最先提出的伪证说主要依据的就是这条线索。以此为开端，欧洲出现了帕萨尼亚斯冤案说。现在普遍认为这才是真相。

希罗多德记录此事时，心中多少是怀有几分疑惑的，而认为自己书写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更加真实的修昔底德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怀疑。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修昔底德不喜欢帕萨尼亚斯。

只要是关于帕萨尼亚斯的负面消息，甚至比街头巷议更具有杀伤力的逸闻，他都会不加分析拿来就用。

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写的不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是其后不久发生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对他来说，帕萨尼亚斯是一个时代之前的重要人物，更是敌国斯巴达的人。

帕萨尼亚斯指挥的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他承认这一战的胜利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雅典人修昔底德来说，那只是敌国斯巴达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已。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公正叙述历史，不应该以一己之好恶来书写历史人物。

但是这样一来，人类行为的集大成——历史就会失去光彩。

历史学家有好恶之分，他们会在写作过程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有助于读者阅读。

不管怎样，因为修昔底德，帕萨尼亚斯不仅被斯巴达监察官当成了“卖国贼”，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一直被看成“卖国贼”。

也许正因为如此，希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像，唯独看不到帕萨尼亚斯的雕像。

古希腊人的雕像能够保留至今要归功于古代罗马人，他们仿制的雕像多到不计其数。罗马人对希腊的崇拜之情无以复加，无论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自家书房里，他们都喜欢摆放古希腊伟人的雕像。

没有帕萨尼亚斯的雕像只能说明无往不胜的罗马人也认为帕萨尼亚斯是一个“卖国贼”。

正因如此，关于“普拉塔亚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后世的评价截然不同，尽管希腊军在普拉塔亚也将波斯军打得落花流水。

以斯巴达人为主导的战斗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壮烈牺牲的温泉关之战。

没有人想过，在战斗中活着取得胜利远比牺牲生命以致失败难得

多。

帕萨尼亚斯接到命令后回到国内去了一个朋友家。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看一眼离开6年的祖国，5个监察官就出现在他面前，宣布他被捕了。

他听后大吃一惊，仓皇从后门逃了出去。因为事发突然，他甚至连短剑也没带，一路逃进附近的神庙正殿，锁上了门。

见此情形，5个监察官下令彻底封锁神庙。他们用泥土封住通往正殿的门，揭去屋顶瓦片，把帕萨尼亚斯困在了里面。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白天，强烈的太阳光暴晒；夜里，寒气逼人。在这样的环境中，43岁的帕萨尼亚斯想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他坚持了多少天。在没有屋顶、除了并不雄伟的神像没有任何东西的空荡荡的正殿里，在来自神庙缝隙的窥探和监视中，“普拉塔亚英雄”走向了死亡。

没有人验证过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存活多少天。因此我找到了一位相识的日本医生。他的专业是脑神经外科，他为我咨询了法医。下面就是他给我的答案：

> 在完全没有食物和水补充的情况下，通常人三四天就会死亡。考虑到最大的可能性，生存一周已是极限。
>
> 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分补充的话，生存1—2个月是有可能的。
>
> 斯巴达战士藏匿的神庙绝不可能有食物，而补充水分却是可能的，因为可以利用降雨。因此，降雨情况如何成了决定其生存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
>
> 一个人通过呼吸，每天每公斤体重会令其蒸发掉15毫升（气温为28度以下）的水分（叫无感蒸发）。

如果一个人的体重为80公斤，那么一天就会从体内流失1200毫升无感蒸发的水分。如果在阳光下，水分流失会更多。

为了生存，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2000毫升甚至更多的水分。如果不能保证这个量，绝无可能存活1—2个月。

因此，是否有可能依靠降雨来补充水分是关键。但是，考虑到地中海性气候，再加上他经受过斯巴达战士必须经历的严酷训练以及尚不满45岁等因素，从逃进神庙到死亡，生存时间最长一周左右。

由于没来得及带短剑，他甚至没办法自尽。揭去屋顶上的瓦片说明此时很可能是夏季，而不是冬春季。也就是说，按照地中海气候，此时不是雨季。

他躲在神庙中。这是神圣之地，即便是一只小虫也要在一口气尚存时赶出神殿，否则很不吉利。因此，监察官对外正式发布的说法是，帕萨尼亚斯被拖出神圣场所不久就死了。

同时公布的还有所谓的“物证”——信件。斯巴达方面的解释是，因阴谋暴露，帕萨尼亚斯选择了绝食而亡。

帕萨尼亚斯一死，斯巴达监察官宣告此事尘埃落定，他的朋友、近亲和孩子都没有受到牵连。

帕萨尼亚斯的儿子顺利长大成人，继列奥尼达的儿子之后登上了斯巴达的王位。他为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为帕萨尼亚斯的孙子取名帕萨尼亚斯。60多年之后，这位帕萨尼亚斯登上斯巴达王位。

帕萨尼亚斯的孙子成为国王以后，曾尝试改革监察官制度，但终究没能撼动早已植根斯巴达社会的这个牢固的壁垒。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将生杀大权交给所谓有使命感的人。

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官单凭捕风捉影就能判决男女通奸，他们用火刑烧死了无数无辜男女。古代人从未接触过基督教，他们没有感受过中世纪异端审判官的恐怖行径。因此，在他们描述的历史中，对监察官制度的弊端缺少切身感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斯巴达的监察官逼死了帕萨尼亚斯之后，决定不追究与他相关的人。这好像也是斯巴达人的行事风格。

斯巴达派特使前往雅典，正式向雅典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的要求是，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发起反政府运动一事，身在邻国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不可能不知晓。因此，雅典必须调查此事，并在此基础上对地米斯托克利进行审判。

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政府把客蒙推到了前面，但实际掌握权力的却是阿里斯泰德。

阿里斯泰德认为，地米斯托克利在公民中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仅靠陶片放逐将其逐出雅典还不够彻底。因此，斯巴达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我们不清楚他具体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总之，雅典政府向居住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发出了即刻回国的命令。理由是根据斯巴达的要求，他必须回国接受讯问，并根据讯问结果接受审判。

身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大概知道了帕萨尼亚斯的死讯，而且也一定知道所谓的罪状。因为帕萨尼亚斯死后，斯巴达监察官公布了这一切。

地米斯托克利也知道要求自己立即回国的雅典权力机构现在掌握在阿里斯泰德的手中，知道他还没有消除对自己的敌意。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决定无视回国命令。

随即，雅典政府和斯巴达政府同时发出了逮捕令，执行这一命令的部队分别从雅典和斯巴达向阿尔戈斯扑来。

已经5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现在又遭到了“国际通缉”。

他决定逃跑。有人为他提供了船只。他坐船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奥尼亚海继续北上，最后逃到了科孚岛。

在科孚岛上，上至国王下至普通岛民，都对这位逃亡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他们没有忘记这位“萨拉米斯英雄”。

但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使节很快来到科孚岛，他们要求引渡地米斯托克利。他们威胁说，如果拒不交人，两国的海上军队将联合攻打此岛。

如果雅典和斯巴达真的打过来，科孚岛是不堪一击的。看到国王左右为难，地米斯托克利决定离开此地。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科孚岛国王为他准备了前往希腊本土的船，同时还送给他数额不小的金币。

如果只是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可以保全所有资产，亲朋可以从国内送钱给他。但是一旦遭到通缉，国内的所有资产就被没收了。地米斯托克利没有海外资产，因此逃难用的资金只能依靠他人资助。

他离开科孚岛，到了相距不远的伊庇鲁斯。这里的国王同样热情地迎接了他。然而很快，他又被雅典和斯巴达找到了。

于是，他逃到了马其顿王国。马其顿国王为他安排了住处等。但是，不久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

后世的我们之所以可以追踪到地米斯托克利的逃亡之行，是因为每

次他的避难之地被发现后，雅典和斯巴达都会派军队前去抓他。

从54岁到60岁，他是在逃亡中度过的。但是他的逃亡之行并不孤单，也不是惶惶不可终日。

不管逃到哪里，他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当然他不会让帮助他的人为难，而帮助他的人个个心甘情愿，甚至为能够帮到他而深感荣幸。他的逃亡之行与其说是逃亡，不如说是冒险。

当然，逃亡的日子不会过得舒心，因为他必须时时注意不让雅典和斯巴达发现。

色雷斯地区集中了雅典公民的海外资产，这里他从未踏足过。

除了追缉令，还有悬赏令。

悬赏令是萨拉米斯海战以后波斯国王薛西斯发出的。只要抓到地米斯托克利，不论死活，赏金200塔兰特。在当时，200塔兰特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地米斯托克利还是希腊最受尊敬的人，他完全不必在意这个悬赏令。但现在他是两个国家的通缉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逃亡之行同时也是冒险之旅。

也许是因为厌倦了逃亡生活，被通缉的第二年，地米斯托克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个雅典政府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那就是以弗所，爱奥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雅典海上军队的基地萨摩斯岛就在这个城市附近。

俗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以米卡勒海角为中心，雅典人在以弗所、萨摩斯岛、米利都一带常来常往。雅典政府无论如何也不

会想到有人会将这里作为避难之地，而地米斯托克利就选择了此地。

以弗所面临大海。站在以弗所，看着雅典战船从眼前的海面上驶向萨摩斯岛，地米斯托克利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想到这些，我曾经为他感到难过，但现在我不再为他伤感了。

海军士兵没有忘记雅典海军船队的创始人是地米斯托克利。

雅典海上军队颇有些自负，后来他们经常违抗本国政府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是海军保证了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

让他们如此自信的是率领他们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

因此我猜想，正因为相距较近，海军中一定有人频频从萨摩斯岛来到以弗所，秘密资助在此避难的地米斯托克利。

接下来长达4年的时间里，雅典政府一直没有找到地米斯托克利。

其间，在朋友的帮助下，地米斯托克利还与家人团聚，在以弗所当地一位有权势的人提供的住宅里悠然度日。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生活的人。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希腊人，与波斯人有往来。有一次，地米斯托克利在和房子主人的聊天中得知薛西斯已于前一年去世，继任的新国王已登上王位。

尽管此时已年过六旬，地米斯托克利依然决定赌一把。他请此人帮忙安排他和刚继任王位的波斯国王见面。

此人是个商人，经营范围极广。他在波斯宫廷上下活动，成功说服了新国王同意见面。

不清楚他们在何处见面。总之，两人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担任翻译的大概就是安排此次会面的那位房主。

60岁的雅典人对31岁的波斯国王说：

“我是地米斯托克利，打败你父亲的人就是我。现在，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据说刚刚登上波斯帝国王位的31岁的国王这一天甚至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他是国王的次子，参加过对希腊的远征。当时除了把长子留在首都，薛西斯带上了其他所有儿子。

因此，刚登上王位的阿尔塔·薛西斯曾经与父亲一起在悬崖上目睹了发生在16年前的萨拉米斯海战。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15岁那年的那一天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一个秋日”。

那一天，正是此时此刻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在父王的眼皮底下将波斯海上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也因此将父王推入了绝望的深渊。我完全理解他说不出话来的心情。

两人决定第二天再见。就在这天夜里，国王寝室中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我的想象是：

卧室里只剩下31岁的年轻国王一人。他一件件脱去象征国王威严的衣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房间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地米斯托克利来了，哈哈哈！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

第二天，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

年轻的国王说：“我们有一个悬赏令，是悬赏捉拿你的，赏金是200塔兰特。现在既然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份赏金是不是应该给你？”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理会他的话，他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您的庇护，我愿意为国王您统治下的波斯效力。只是在此之前，我需要一年时间学习波斯语，同时我要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波斯国王一口答应。他不仅答应了地米斯托克利的请求，还任命他担任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地的总督，出自这三个地方的收入全部归他支配。

不清楚波斯国王为什么选择马格尼西亚，但这绝对是一个妙不可言的选择。

首先，年轻的国王没有怨恨地米斯托克利的个人理由。

他的父王在征服希腊的野心被地米斯托克利彻底打碎后，精神出现异常，以致最终遭家臣暗杀，甚至连累本该继承王位的长子也遭杀害。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变故，这位年轻的国王将无缘波斯王位。

在波斯，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他是次子，本无缘登上王位，现在却当上了国王，细想想，不能不说与“萨拉米斯海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波斯帝国版图辽阔，除了中东还包括中近东、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境内还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拥有如此庞大的帝国，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如果只是单纯地“恩赐”地米斯托克利，有的是可赠予的城市。但是他却选择了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的马格

尼西亚。这又是为什么呢？

波斯曾经企图占领希腊，最后大败而回。因此，也许有人认为他有“穷鸟入怀”，仁人所悯的心理。但是，我认为对于现任国王阿尔塔来说，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打败波斯军队的希腊军队主力来自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他想，地米斯托克利此时被雅典和斯巴达追得四处藏匿，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恶心恶心这两个国家。

因此他才安排地米斯托克利去统治马格尼西亚。

马格尼西亚距离以弗所30公里，距离萨摩斯岛60公里，距离米利都40公里。也就是说，这里与爱奥尼亚地区的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相距都不远。

这些城市曾经都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回归希腊，现在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成员国。

爱奥尼亚地区已经彻底回归希腊。波斯国王交给地米斯托克利统治的地方，以马格尼西亚为首，都在波斯帝国境内，与爱奥尼亚地区近在咫尺。

这一次，先不论斯巴达原本就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地方漠不关心，就连雅典也不能轻易出手，尽管雅典认为爱琴海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希腊人。

而且，知道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会迎战前来追捕自己的人，雅典的指挥官中谁还胆敢前去攻打那个地方？

马格尼西亚与爱奥尼亚地区接壤，但是在这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通缉令彻底失效。只要地米斯托克利移居到此地，就有充分的自由，他

可以随时与希腊人交流，住在雅典的朋友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拜访他了。

另外，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保证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年收入绝不亚于雅典的那些大富豪。

不知道是不是对“入怀的穷鸟”充满了同情，总之，31岁的波斯国王对待年已六旬的地米斯托克利相当慷慨。

年轻的波斯国王似乎有点儿心急，没等到一年，就邀请地米斯托克利一同外出狩猎。

允许他一同前去狩猎意味着允许他携带武器。

一年后，波斯国王依然屡次邀请地米斯托克利同去狩猎。

每一次，年轻的国王都会带着问题请教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也会给出合理的意见、忠告或解决办法。

位于苏萨的波斯宫廷内，地米斯托克利成了“最能影响国王的人”。

波斯国王从不要求地米斯托克利做这做那。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也许把地米斯托克利留在身边就已足够。至少他不必再担心这位出色的将领会率领雅典的海上军队与波斯作战了。

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掌管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易如反掌。只要捋顺了各机构的工作内容，在各个位置安排好合适的人选，他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即可，这远比指挥海上作战容易多了。

作为外国人，他施行善政，深得管辖地内住民的欢迎。他去世后，当地住民不仅在马格尼西亚中央广场为他修建了宏伟的墓地，还坚持每年给他的遗属送去当年的收益。可见，地米斯托克利还有做地方行政官

的才能。

那么，地米斯托克利有没有担心的事呢？他会不会担心波斯国王有一天要求他担任总指挥，入侵希腊呢？

我想应该没有。

为了征服希腊，从祖父大流士到父亲薛西斯都发动过入侵希腊的战争，结果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亚细亚。对于这一事实，现任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铭记于心。他不会忘记每次攻打希腊最后遍体鳞伤的总是波斯。

与希腊军作战，波斯不只会损失兵力，还要面对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例如辽阔的帝国境内各地纷纷揭竿而起。阿尔塔·薛西斯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为镇压各地叛乱而心力交瘁。至于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希波战争的失败使父亲国王的威严尽失，遭到家臣的暗杀。

阿尔塔·薛西斯是看着父亲的变化长大的，他在心里早就下定决心，绝不再挑衅希腊。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他这样想完全可以理解。

年轻的国王心中藏着这样的打算。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也认为波斯与希腊之间不会再有大规模战争。狩猎时，他一定细心观察过国王的言行，而且越观察越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吧。

这一时期，雅典在战争天才客蒙的指挥下向波斯发起了进攻。但是波斯方面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反击。

到了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

此条约被命名为“卡里阿斯和约”，和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犯。卡里阿斯是雅典的代表，此和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那时地米斯托克利已去世10年。和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互相承认既成事实，既往不咎。

提出签订和平条约的是波斯当时46岁的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雅典积极响应并极力促成此事的是同样46岁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是地米斯托克利思想的拥趸，他继承和发展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思想。

比地米斯托克利小30岁的波斯人和希腊人实现了波斯与雅典之间的和平。

有一种人，肉体死了，但“灵魂”不灭。

公元前459年，地米斯托克利在马格尼西亚的家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65年生涯。

有一个说法是，波斯国王要求他率军攻打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于是选择了服毒自杀。但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指出他的确是病故。

我完全相信修昔底德的说法。我还认为他不是单纯的“病死”，而是“厌倦了舒适的生活，终至病故”。

他不再遭人迫害，生活稳定富足。这样的舒适生活，他过了5年。

修昔底德出生在地米斯托克利去世的前一年。我想介绍一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而不是生平概要。

> 地米斯托克利的横空出世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
> 一旦需要，他那无与伦比的坚强信念就会随时被激发出来。
>
> 还有那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独创性。他的独创性也许只能用天赋二字来解释。

他的大脑充满了智慧，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学过的知识以及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他的洞察力既敏锐又深刻，只需一看就能把握状况。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哪怕是用阴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无论是眼前的问题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他都能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于他做过的事情，他深知付诸实施的所有行为的意义，同时为了便于他人理解，他能做出最简洁、最明了的解释。

关于他不曾做过的事情，他所下的判断和提出的对策从不曾出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有先见之明。别人尚未看出端倪，他已经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态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洞察力不仅停留在眼前，还可以达到遥远的将来。

不得不说，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天赋异禀、才华盖世的天才。

他有着超人的精神集中力和瞬间爆发力。每当遇到问题，他瞬间就能找出解决方案。这样的才能令人惊叹。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这是地米斯托克利时代之后的雅典人对他做的评价。而地米斯托克利在选择长眠之地时，宁愿放弃宏伟的墓穴，也要回到祖国。

为了实现他的遗愿，朋友们悄悄将他的骨灰带回雅典秘密埋了起来。

由于对他的通缉仍然有效，所以即使已化成骨灰，城邦国家雅典也不会允许一个罪人回到国内。

当然，雅典当局者即使知道也会睁一眼闭一眼。

写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和他的死亡之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

样结束对这个时代的描述：

> 就这样，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和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走完了他们各自的人生。
>
> 两人都为希腊争了光。他们的光辉不仅留在他们大有作为的时代，也留给了此后的希腊。

人可以成就伟大，同样难免做出愚蠢的行为。

人总是充满矛盾。为了让矛盾的人类觉醒，为了让矛盾的人类充满理性，“哲学”应运而生。

而对人类智慧和愚蠢等所有事件做出的描述，就是“历史”。

创造“哲学”和“历史”的都是希腊人，这绝非偶然。

年表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8 世纪前后	希腊各地纷纷建立城邦国家	（597、586 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将古犹太人囚禁于巴比伦城——“巴比伦囚虏”事件（耶路撒冷沦陷）
	希腊人纷纷开展殖民运动，第一次在爱奥尼亚地区、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等，第二次在希腊北部、黑海周边等	
	爱琴海成为“希腊人之海”	
	荷马完成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776 年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亚“神圣之林”举办	
8 世纪末	吕库古制定“宪法”，斯巴达确立身份制和政体	
594 年	雅典开始梭伦改革（从贵族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禁止将债务人变成奴隶，货币贬值促进经济活跃，根据资产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	
580 年	梭伦结束自我流放回到雅典。雅典公民之间的对立激化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578 年前后	梭伦联合亲属之一的庇西特拉图占领萨拉米斯	
570 年	萨拉米斯成为雅典领地。“萨拉米斯英雄”庇西特拉图赢得公民的强有力支持，同时反对庇西特拉图的势力增强	
	庇西特拉图退至希腊北部，在色雷斯开采矿山，积聚财富。开始接触近邻马其顿的国王和欲霸占纳克索斯岛的吕戈达米斯等人	
546 年	庇西特拉图发动政变，率领军队登陆马拉松平原附近。雅典军队不战而退，庇西特拉图顺利进入雅典	（公元前 539 年）阿契美尼德王朝即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王征服巴比伦，中东全域归入波斯统治之下 （公元前 538 年）居鲁士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
	庇西特拉图开始实施统治和改革，雅典进入“古典雅典”时代。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雅典实行农地改革，鼓励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铸造独立货币德拉克马等；添加了精湛绘画的制壶业欣欣向荣；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出版了标准版本	
	庇西特拉图统治下的雅典稳步发展，越来越强大，引起斯巴达的警惕，伯罗奔尼撒同盟随之成立	
527 年	庇西特拉图去世（73 岁）。其子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继位。流亡中的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领袖克里斯提尼回到雅典	
525 年	克里斯提尼当选执政官（40 岁）	波斯征服埃及 （公元前 522 年）大流士一世即位波斯国王
519 年	底比斯入侵近邻国家普拉塔亚。普拉塔亚向斯巴达求援未成，转而向雅典请求支援	
	希庇亚斯向普拉塔亚派遣援军，与底比斯的战斗初战告捷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519 年	底比斯将维奥蒂亚地区南部赠与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支持其反对庇西特拉图的继承者	
	庇西特拉图的盟友、纳克索斯的吕戈达米斯去世	
514 年	克里斯提尼再度流亡	大流士占领小亚细亚西岸附近的萨迪斯，铺建从苏萨到萨迪斯的“王之道”
	希帕克斯遭暗杀	
	克里斯提尼回到前线基地维奥蒂亚地区，率领其族人进军雅典边境	
	克里斯提尼自费在德尔斐重建神庙，赢得斯巴达人的好感	
511 年	克里斯提尼与斯巴达建立共同战线。春季，斯巴达军队登陆阿提卡地区，但败于色萨利骑兵队	
510 年	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率领重装步兵进军雅典，击败雅典军队和色萨利骑兵队	
	希庇亚斯投降，前往希腊北部。庇西特拉图体制终结	
508 年	克里昂米尼对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充满戒心，力推亲斯巴达的雅典人伊萨哥拉斯，助其当选执政官，欲建立伊萨哥拉斯政权，却受挫于公民的抵制。伊萨哥拉斯成功逃离雅典，克里昂米尼放弃控制雅典	
	克里斯提尼重回雅典，着手改革。承认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按地区将各势力圈划成 10 个区，再分别合并成行政区（“部落”），各行政区内再划分德谟区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508 年	执政官以外增设 10 个将军掌管军事和行政事务，设 500 人委员会（布列），“公民大会”为国家政治最高决策机构，引入陶片放逐制度	
494 年	集中了希腊殖民者的爱奥尼亚地区城邦国家米利都归顺波斯国王大流士。随之，以弗所、哈利卡纳苏斯等也归入波斯的统治之下	大流士将“王之道”延伸至以弗所，继续侵占爱奥尼亚地区
	接着，爱琴海上的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等岛屿也归入波斯统治之下	
	米利都请求支援，斯巴达拒绝，雅典仅派出少量大帆船支援	
492 年	克里斯提尼去世（73 岁）	
	出身豪门、现任色雷斯东部地区总督的米提亚德被波斯军队赶出色雷斯回到雅典	
491 年	米提亚德当选次年度的将军	波斯开始进军希腊本土
	波斯军队离开前线基地萨摩斯岛，开始向西进军。途中，兵分两路。第一路军队 1 万名士兵由萨迪斯总督阿尔塔费尼斯率领，第二路军队 1.5 万人，由波斯将军达提斯率领	
	雅典要求斯巴达共同迎敌，普拉塔亚明确表示参加战斗	
	波斯军队占领纳克索斯岛	
	秋季，波斯军队登陆优卑亚半岛埃雷特里亚附近海岸，攻占埃雷特里亚，在优卑亚半岛越冬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490 年	第一次希波战争正式开始	
	春季，波斯第二路军队（1.5 万人）开始进犯马拉松平原	
	希腊军队（雅典军队 9000 人、普拉塔亚军队 1000 人）前往马拉松	
	夏季，两军在马拉松平原相遇（马拉松会战），指挥官米提亚德的战术成功奏效，希腊军队大获全胜。斯巴达军队晚一天到达战场，波斯第一路军队未出现在战场上，直接选择了撤离	
489 年	米提亚德率领军队攻打波斯统治下的帕罗斯岛	波斯军队在马拉松会战中失利，在波斯统治下的行省以埃及和巴比伦为首，当地住民的叛乱此起彼伏
	8 月，帕罗斯攻防战爆发，米提亚德腿部重伤	
	秋季，攻防战结束，希腊军队无功而返	
	米提亚德回到雅典后，遭到反对派举报，被判有罪。因腿部伤势恶化，不治身亡（61 岁）	
488 年	与米提亚德同属对波斯态度强硬派的地米斯托克利，与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阿里斯泰德、克桑提普斯、麦加克勒斯的希帕克斯，两派之间的对立加剧	
487 年	地米斯托克利利用陶片放逐，将希帕克斯赶出雅典	
486 年	地米斯托克利用同样的手段，赶走麦加克勒斯	大流士去世，薛西斯继承波斯王位
	地米斯托克利推进高性能战船的建造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485 年	为了抗衡波斯统治下的海军大国埃伊纳，地米斯托克利提议建造更多战船，受到稳健派阻挠，理由是这会引起斯巴达人误会	
484 年	地米斯托克利（40 岁）利用陶片放逐赶走克桑提普斯，接着又于公元前 482 年赶走阿里斯泰德。开始建造新型战船，数量超过 200 艘	
481 年	地米斯托克利就任“首席将军”，全面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并亲自担任下一年度最高指挥官	薛西斯率领波斯军队离开苏萨，冬季在萨迪斯集结
480 年	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波斯军队派遣陆上军队 20 万人，海上战斗部队 800 艘船。与此相比，希腊军队的陆上战斗力是 1 万人，海上战斗力不足 330 艘船	
	春季，继大流士之后，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波斯军队离开萨迪斯，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希腊。再从希腊北部一路南下直扑雅典	
	为迎战敌人，以 300 名斯巴达战士为首，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希腊军队前往国境地带温泉关隘口	
	8 月，波斯军队在温泉关攻打希腊联军，“温泉关之战”开始。斯巴达重装步兵英勇作战，波斯军队死亡人数多达 2 万人	
	在亚德米西林海角，双方海上力量相遇。为防止敌人海上军队与陆上军队会合，地米斯托克利阻止波斯船只进入湾内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480 年	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发起第二次进攻，再度败退。精锐近卫军“不死军”也死伤无数	
	国王薛西斯亲自督战下，18 万波斯大军发起第三次进攻。底比斯士兵 400 人、塞斯比亚士兵 700 人、斯巴达士兵 300 人组成的希腊联军迎战	
	在波斯军队的猛烈进攻下，底比斯投降。塞斯比亚军队被消灭，留到最后的 300 名斯巴达士兵壮烈牺牲。温泉关之战结束	
	地米斯托克利强制疏散雅典市内全体住民，率领海上联合军队前往萨拉米斯，计划向波斯海上军队发起进攻	
	薛西斯进入空城雅典，火烧城市和神庙	
	9 月 23 日，两军在萨拉米斯海湾发生激战，开启了“萨拉米斯海战”。波斯海上战斗力量为 900 艘左右的船只，与之相比，希腊海上战斗力量只有 375 艘船只	
	地米斯托克利率领雅典军队将波斯海上军队主力腓尼基船队诱入萨拉米斯海湾内，充分利用新建战船的特点，大获全胜	
	薛西斯留下陆上军队后撤回到位于小亚细亚的萨迪斯	
	希腊军队在伊斯米亚举行会议，决定次年攻打米卡勒海角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479 年	8 月 28 日，希腊军队在希腊中部普拉塔亚附近的平原击退波斯军队（普拉塔亚之战），斯巴达英雄列奥尼达的侄子帕萨尼亚斯大显身手	孔子去世
	希腊海上军队取得米卡勒海战的胜利，夺回波斯军队的前线基地——萨摩斯岛	
	11 月，雅典海上军队夺回西斯托——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岸、受波斯控制的小镇，破坏连接海峡两岸的浮桥，切断波斯陆上军队的入侵之路	
	爱琴海群岛和希腊北部的色雷斯、马其顿、色萨利回归希腊	
478 年	为保护雅典，地米斯托克利着手建设坚固的城墙，将雅典和外港比雷埃夫斯连成一体	
	帕萨尼亚斯突然出现在波斯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岛附近	
477 年	帕萨尼亚斯夺取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却被召回祖国斯巴达，因独断专行而受到警告，移居至爱奥尼亚地区东北部的克罗奈伊。斯巴达派将军取代帕萨尼亚斯统治拜占庭，却被雅典人赶走	
	以拜占庭为首，雅典控制了爱琴海至黑海的各处要地	
	为保障爱琴海安全，以雅典为中心，成立了集体防守体系提洛同盟（总部设在提洛岛）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希腊之外的世界
471 年	因反对派客蒙（米提亚德之子，属于稳健派）提议，地米斯托克利遭陶片放逐离开雅典，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尔戈斯	（467 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去世，其子阿尔塔·薛西斯继承波斯王位
	帕萨尼亚斯再次被召回国内，获罪。拒捕逃进神庙，力竭而亡（43 岁）。后世研究者证实，判处帕萨尼亚斯有罪的证据系伪造	
	稳健派为彻底搞垮地米斯托克利，召他回国。地米斯托克利无视命令，逃到爱奥尼亚地区的以弗所	
466 年	地米斯托克利与波斯新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会面，接受阿尔塔·薛西斯的邀请，出任小亚细亚西端的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城市的总督，同时为国王出谋划策	
459 年	地米斯托克利在马格尼西亚去世（65 岁）。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就这样，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和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走完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两人都为希腊争了光。他们的光辉不仅留在他们大有作为的时代，也留给了此后的希腊。"	
449 年	克桑提普斯之子、雅典领袖伯里克利（46 岁）与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46 岁）签订了和平条约（《卡里阿斯和约》）	

图片出处一览

罗马国家博物馆藏品（罗马），© Alamy Stock Photos

右：英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伦敦），© 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Ltd/Alamy Stock Photos

左：卢浮宫博物馆藏品（巴黎），© Bridgeman Images

那不勒斯考古学博物馆藏品（那不勒斯），© Bridgeman Images

梵蒂冈美术馆藏品（梵蒂冈），© Bridgeman Images

作者藏品，新潮社写真部拍摄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品（牛津），© Bridgeman Images

塔兰托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品（塔兰托），© Alamy Stock Photos

美国俄亥俄州议事堂藏品（哥伦布），© The Ohio Statehouse

描绘波斯士兵的浮雕（帕塞波里斯），© Bridgeman Images

右：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藏品，© AKG/PPS通信社

左：拉韦纳国家博物馆藏品（拉韦纳），© AKG/PPS通信社

描绘薛西斯的浮雕（帕塞波里斯），© Heritage Images Partnership Ltd/Alamy Stosk Photos

画：畠山莫谷

同上

古市集博物馆藏品（雅典），© AKG/PPS通信社

列奥尼达像（德摩比利），© Stephen Frink Collection/Alamy Stock Photos

地米斯托克利肖像，梵蒂冈美术馆藏品（梵蒂冈），© Rijksdienst voor het Cultureel Erfgoed/德尔斐神庙锡夫诺斯宝库浮雕、© Bridgeman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参考文献列于第3卷卷末

希腊人的故事

2

文明的崩坏

民主的成熟和崩坏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年—约公元前560年），雅典政治家。废除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禁止奴隶化，雅典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

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27年），雅典政治家。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中下层农民的政策，推动德拉克马银币的流通，振兴了雅典的经济。

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约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92年），雅典政治家。新创雅典行政区制度，通过国体改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约公元前524年—约公元前459年），雅典政治家、军人。雅典民主政体和海军的创建者。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波斯帝国军队。晚年遭陶片放逐，流亡波斯。

阿里斯泰德（Aristeides，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62年），雅典政治家、军人。马拉松战役时与米提亚德共同率领希腊联军打败波斯军队。

吕库古（Lycurgus，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为斯巴达制定宪法，创立了监视王室的监察官体制。

列奥尼达（Leonidas，？—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温泉关之战中，以区区300人对抗波斯大军，使波斯付出惨重代价，最终壮烈战死。

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约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71年），斯巴达王家出身的军人。普拉塔亚之战中率领希腊联军击败波斯军队。后因个人表现突出遭监视官嫉恨，被以奸计害死。

第一部

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29年的33年）

——“民主政体”运作最完善的时代——

前期

（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51年的11年）

对手客蒙

公元前462年，阿里斯泰德死去。雅典上下，为这位被称作“正义之人”的重要政治家的离世而感到悲痛。

实际上，阿里斯泰德代表了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他本人自始至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位高权重却一生俭朴，没有比这样的事迹更能赢得庶民的好感了。

听说阿里斯泰德身后连葬殓费都没有时，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最高决策机构的公民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决定由国家出资为他举行葬礼，甚至连他没钱结婚的女儿的嫁妆，也一并担起。

回顾自己68年的人生，阿里斯泰德应该是带着平静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吧。

常年的绊脚石地米斯托克利，被阿里斯泰德用陶片放逐的方式流放国外，随后又以违抗召回令为由，发出了“国际通缉”。两年前，地米斯托克利作为政治顾问被波斯国王收留，从此与雅典政坛绝缘。

再者，作为自己“稳健民主政体”理念的接班人，阿里斯泰德一手培养起来的客蒙（Cimon）时年48岁，正值壮年。

客蒙的父亲米提亚德（Miltiades）是雅典打败波斯赢得马拉松战役的功臣。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客蒙在军事上表现非凡，屡建功勋，雅典人为之疯狂。

不仅雅典市民，所有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把长于军事视为领袖必备的能力。理由非常现实，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战败意味着能当兵的适龄男

人一律被杀，妇女儿童被变卖为奴。

雅典每年选举10位“将军”，要求候选人政治才能与军事才华兼备，相信这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这就是公元前5世纪即将进入后半期时，客蒙获得雅典市民高度支持的原因，也是令阿里斯泰德感到可以放心离去的理由。

话说这位客蒙还是一位“正直之人”。

也许在被誉为“正义之人”并一生以此为傲的阿里斯泰德的心目中，客蒙正直的性格，是他作为雅典领袖最宝贵的品质。

人与人相处，重义、正直，的确属于值得赞美的品德。然而，国与国之间打交道，好品德未必能为国家带来更多利益。在阿里斯泰德死去的一年之后，曾经人气居高不下的客蒙遭陶片放逐。68岁的阿里斯泰德以自己的年龄估算，以为接班人至少能驰骋政坛20年，不料仅一年的光景，客蒙便黯然退场。

一向自诩政治经验丰富的阿里斯泰德，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轻视了伯里克利（Pericles）的存在。准确地说，他没有看出这位当时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的政治抱负。

当然，伯里克利这个人阿里斯泰德是知道的，他是长期以来与阿里斯泰德同处“反地米斯托克利”战线的盟友克桑提普斯（Xanthippos）的独生子。这位年轻人来自“超级”富裕的阶层，是世世代代为雅典政坛输送人才的著名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Alcmaeonidclan）的成员。伯里克利与娶了这个家族的女孩为妻的客蒙，还是亲戚。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伯里克利，势必成为以阿里斯泰德为首的稳健派的一员。“正义之人”大概对此深信不疑。

可是，年轻的伯里克利却选择了复兴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理念。

公元前471年，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背后操纵者是阿里斯泰德，站在第一线不遗余力达到目的的是彼时39岁的客蒙。

10年以后，以陶片放逐的强制手段将客蒙逐出国门的，是34岁的伯里克利。

如果阿里斯泰德晚死一年，这位“正义之人”或许不会走得那么安详。

频频出现于雅典城邦政治史上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堪称雅典最有名有势的家族。他们维持势力的战略，或者说处世之道，相当耐人寻味。

首先，家族不会因为某人是其直系的男性成员，便无条件地给予他支持。当然，如果这个人有出众的才华，那他会像克里斯提尼那样，得到家族从人脉到经济全方位的支援。倘若直系男性中没有出现如此有才能的人，家族会将女孩们嫁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外族男子，再用家族的影响力为女婿助阵。

虽然外族男子可以为婿，但他们不会完全进入家族的核心。庇西特拉图、克桑提普斯以及客蒙，都娶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孩，与这个家族结成姻亲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仅限于亲戚，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所以这些人的政治活动没有被这个家族束缚。

长期反对庇西特拉图的僭主制，最终在雅典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是阿

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直系成员、一族统帅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的母亲与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是表姐妹，前者的儿子放逐了同族的客蒙。女人们私下里交往密切，而男人们在政治上争得你死我活，这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维持势力战略”中不是什么稀罕事。

雅典重要的政治家中与这一豪门没有干系的，仅梭伦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可见这个家族为保持势力，构建人际网络的手段有多么高明。

在伯里克利之后，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还出了一位政治家，他是本书下半部的主人公阿基比亚德。

也就是说，自梭伦开启雅典民主制以来，在这段时期执掌政坛的男人们，哪怕有执政党、在野党之分，都和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段时期”长达150年之久。让我们想象一下以下场景。

丈夫们在公民大会上激烈争辩，他们的妻子聚集在某位家中，勤快地纺纱织布，嬉笑着聊天谈心，年幼的孩子们在母亲身边开心地玩耍。

当这些幼童成长为少年，曾经的玩伴会变成一起读书的同窗、一起去角力场强身健体的朋友。如果哪位孩子幼年时父亲战死，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人际关系网”便开始运作。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的监护人，即代理父亲正是伯里克利。

那么，作为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代表、稳健民主派的重要政治家，阿里斯泰德为什么会选客蒙作为接班人，而没有关注家族关系更近的伯里克利呢？

或许他是出于政治成熟度的考虑，毕竟客蒙已经40多岁，伯里克利才刚过30岁。除了年龄的差距，两人迥异的性格，会不会也是原因之一呢？

客蒙是一位行事张扬的男人。哪怕从战场短暂返回雅典，他的宅邸也是夜夜笙歌，来者都是客。在雅典人口最密集的大市场，客蒙总是被民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不仅善待手下的士兵，对普通市民的态度也相当友好。

而伯里克利一辈子保持着贵族式的生活，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

他极其厌恶来者不拒的宴会。当时的雅典还有一种限制人数的小范围聚会，叫作“会饮”。伯里克利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史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他在家中举办会饮活动。

这里顺便将不同的聚会做一个分类。

古代雅典的会饮：甄选宾客，客人在愉快地饮酒用餐的同时，围绕特定的话题展开讨论的一种知性的聚会。

现代的专题研讨会：募集听众，在不提供任何食物、酒水的严谨的气氛中，专家学者面对付费入场的听众，就预先设定好的议题，依次上台发表演讲。

现代的家庭派对：有条件地选择宾客，提供餐饮，客人不会因某个话题发生争论，主要以交际为目的。

以上三种聚会，估计伯里克利都不会喜欢。所幸，他还不至于厌恶与人交流。

根据史料记载，伯里克利会不时邀请少数亲密的朋友去家中聚会，共同度过一天的时光。是否邀请某人参加，完全取决于他是否与客人趣味相投。至于他是不是雅典人，属于哪个阶级，都不是问题。

希腊的“家庭派对”

宾客中既有来自爱奥尼亚的阿那克萨戈拉斯（Anaxagoras），也有与伯里克利阶级地位、年龄辈分相仿的雅典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klēs）。雕刻家兼建筑家的菲狄亚斯（Pheidias）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却是伯里克利家宴上的常客。

不过，伯里克利宅邸的聚会有别于其他雅典人家的会饮，宾客不会醉酒闹事。

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有喝葡萄酒易醉的毛病，也就是说容易喝多。很多人喝醉了随地呕吐，醉汉之间甚至流行互掷呕吐盆的游戏。古

代雅典的家庭派对常常充满了恶臭和噪声。

相信这种情形不是伯里克利喜闻乐见的。他自己不举办类似的家宴，也不赴别人家的宴会。

作为政治家无法回避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在这一点上，客蒙与伯里克利的风格也大相径庭。

客蒙演讲时，民众欢呼沸腾，而伯里克利开口说话，大家会安静地聆听，并且思考。

城邦国家雅典，是一个连最底层公民都有权参政的大众民主的国家。阿里斯泰德选择客蒙作为国家领袖，也算合乎情理。显然客蒙更有大众民主制国家政治家的样子。

然而，时代在变化，民众对政治家的要求也与时俱进。在客蒙遭陶片放逐退出政坛之后，领导雅典长达30年的竟然是不像大众民主制国家政治家的伯里克利。

宿敌斯巴达

“伯里克利时代”始于客蒙遭陶片放逐。不过，为了让大家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回头从3年前说起。

公元前464年的夏天，一场可怕的大地震袭击了斯巴达，现在想来，它应该属于垂直型地震。在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拉科尼亚（Laconia）地区，首都斯巴达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除了九间房屋没有倒塌，几乎全城被毁。

希腊位于地震多发地带，斯巴达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更是直接坐落于地震带上，灾害尤为频繁。尽管斯巴达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灾，但那一年的情况实在惨烈。惊恐的人们叫它“波塞冬的愤怒”，提心吊胆地等待余震过去。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陆地上的地震源自海神波塞冬的指令。

除却忍耐别无出路的斯巴达的市民们，好不容易熬过余震，刚松下一口气，就发现有新的危险朝他们逼近。

大批的希洛人正向刚经历了人力、物力、精神三重打击的首都蜂拥而来。

这些半奴隶身份的农奴被禁止携带武器，他们手中握着的可能只有镰刀、斧头，但人数是斯巴达市民的16倍，而且他们一直对高高在上的斯巴达市民心怀恨意。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社会结构与实施“民主制”、连最底层民众都有投票权的雅典不同，斯巴达人选择了由少数人掌握国家政权的“寡头政

体”。因此他们的社会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斯巴达公民——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人口，不超过15000人。他们要服兵役，名闻天下的斯巴达战士指的就是这群人。

庇里阿西人——为军人阶级提供必需物资的手工业者或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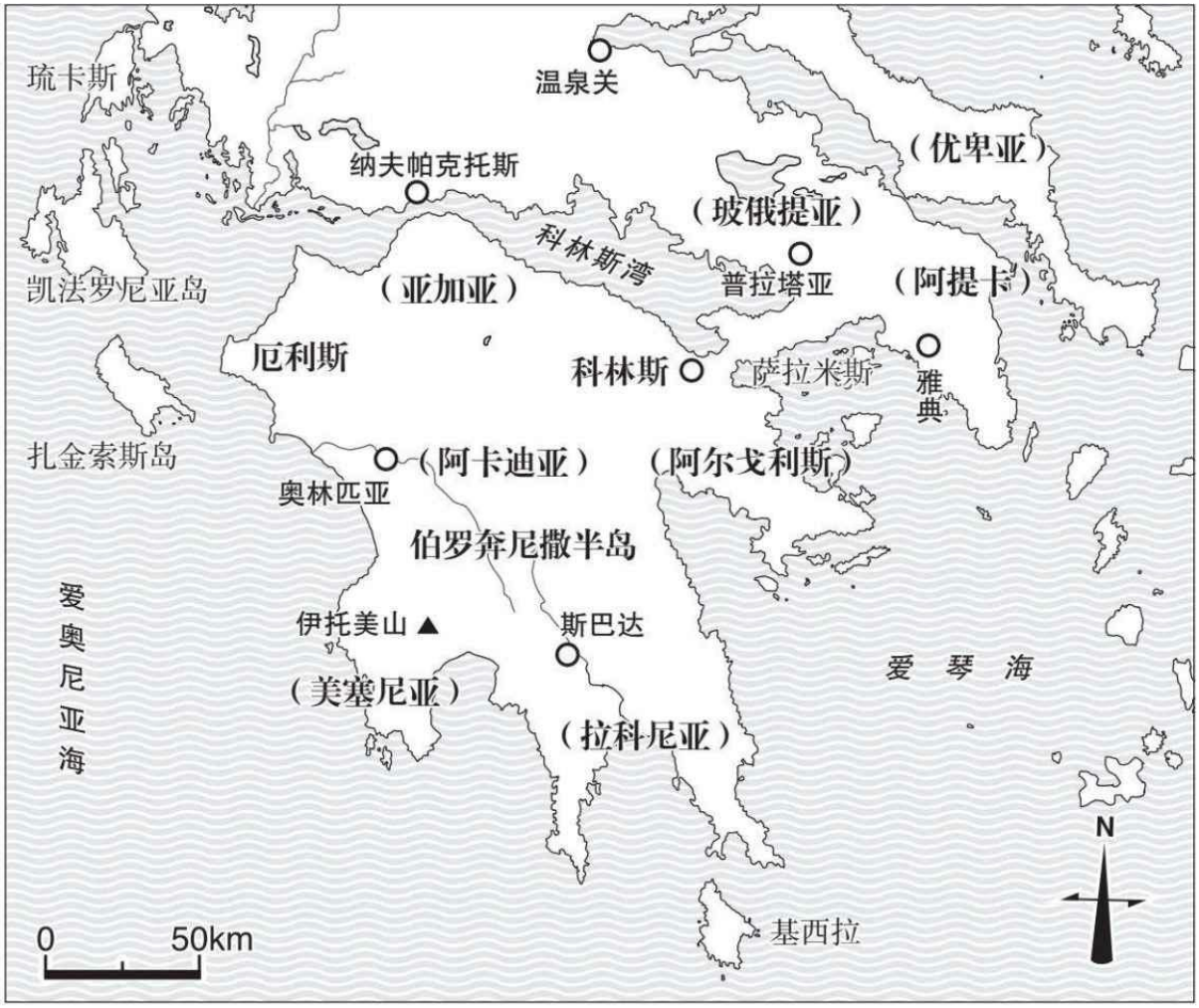
希洛人——国有农奴。终其一生为统治阶级的斯巴达战士耕田种地。

根据学者的估算，以上三个阶级的人口比例是1：7：16。

在斯巴达，具备公民身份必须履行兵役，同时又拥有投票权的斯巴达男性只有一万多。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都不是公民，也就是说算不上真正的斯巴达人。

鉴于这样的社会状态，斯巴达对地震和希洛人的暴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戒。然而在公元前464年，这两大威胁接踵而至。

斯巴达陷入深刻危机的消息，从手持镰刀、斧头朝首都进军的希洛人人群，传到从没想过造反的庇里阿西人耳里，甚至蔓延到位于拉科尼亚西部的斯巴达属国美塞尼亚，一场暴动演变成直接左右斯巴达存亡的严重事件。



伯罗奔尼撒半岛

就在同一年，斯巴达迎来了他们的新国王——刚满30岁的阿希达穆斯（Archidamos）。

相较于灾后重建，年轻的国王首先得调动兵力。上至6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老人，下至尚未经历过“通过仪式”提着希洛人首级回营地的未满20岁的男孩，但凡能拿武器的男人，无一例外地统统被动员起来。

国王率领着这支军队，在步步逼近的希洛人大军前布阵。军队的具体人数不详，以当时的情形，哪怕全国总动员，阿希达穆斯能够调集的兵力也就一万人。

尽管人数处于劣势，但他们毕竟是从7岁至60岁坚持强身习武的斯巴达男子。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装备、武器，虽说是刚从倒塌的房屋中找出来的，但较之希洛人手中的镰刀、斧头，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斯巴达人击退了数量在自己10倍以上的希洛人，将他们赶进首都斯巴达以西50公里左右的伊托美山中。

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希腊的山多岩石。因此，攻山犹如攻击城墙高筑的要塞。首先，需要大量的士兵；再者，战法十分复杂。

斯巴达从来没有足够的士兵能够彻底包围山岩打封锁战。

16年前的希波战争中，斯巴达战士因温泉关血战以及普拉塔亚战役的全胜而声名远扬至远东，但他们擅长平原作战。

“永远不要将后背朝向敌人”“战场上不胜利，毋宁死”，这些斯巴达人自孩童时便接受的教导，在实战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面防守来自上方、左右甚至背后的袭击一面进攻杀敌的战法，不是斯巴达人所长，或者说是他们的先天缺陷更为合适。纵观斯巴达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攻下过建有城墙的城市。

虽说攻山战有违斯巴达人的天性，可是任由希洛人盘踞山中，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如果叛乱的势头扩散至庇里阿西人和美塞尼亚地区，斯巴达人再勇猛，仅靠一万名士兵终是难以抵挡。

胶着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以后，斯巴达人终于低下头，向雅典求援。之所以熬这么久才开口，是因为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当年波斯来袭，希腊危在旦夕之际，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要归功于雅典人。但是在温泉关之战中，是列奥尼达国王率领斯巴达300名勇

士，以全体战死换取对手损兵2万，让波斯大军的南下延迟了一周。更何况，温泉关之战的第二年，在普拉塔亚平原歼灭波斯军大获全胜的是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战士。

如此强悍的斯巴达竟然要向雅典讨救兵，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倘若是海军，多少还情有可原，毕竟斯巴达没有训练海军的传统，但要求陆军支援，实在让高傲的斯巴达人纠结不已。

形势危急，骄傲的斯巴达人不得不向雅典派去了求援的特使。

在接到斯巴达的正式请求后，雅典紧急召开了公民大会。

最先表态赞成派兵的是客蒙。这个人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甚至为儿子取了一个意为“斯巴达之子”的名字。

不过在大会上，客蒙没有用“情”，而是以“理”服人。他说：“希腊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只脚，方能四平八稳。我们必须帮助斯巴达。”

而反对客蒙的是吸取了地米斯托克利政治理念的一批人。如果客蒙算“稳健民主派”的话，这批人就是“激进民主派”。彼时，伯里克利尚未成为这一派的领头人，还处于类似副手的位置。因此，在公民大会上与客蒙展开激烈辩论的是比伯里克利稍稍年长的埃非阿尔特斯（Ephialtes）。

埃非阿尔特斯究竟以何种理由反对出兵，史料没有记载。据说埃非阿尔特斯的思想比伯里克利激进数倍，也许他会这样反驳客蒙：“斯巴达一味压榨剥削希洛人、庇里阿西人，不赋予他们公民权，对采取这种社会制度的斯巴达，雅典没有支援的必要！”

然而，当时客蒙的民意基础可谓坚如磐石。最终，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客蒙的提案，客蒙亲率4000重装步兵支援斯巴达。

客蒙顺利率军进入斯巴达后，处境渐渐变得微妙起来。也许是他直率的性格引发了冲突，毕竟“正直之人”不等于“外交高手”。

首先在军事方面，客蒙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信心十足，他可能向斯巴达军的上层提出了什么建议或忠告，损伤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斯巴达人天性顽固、保守。对奠定国家体制基础的吕库古“宪法”，他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要护宪”，而是“反正就是要护宪”。斯巴达人欠缺灵活性简直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无论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凡外国人提出的建议，他们都坚决予以拒绝。客蒙越直言不讳，在斯巴达越不受待见。

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客蒙及其麾下4000雅典士兵的存在，让斯巴达一方颇感不安。

如第一卷中所述，斯巴达的国家政治由每年选出的5名监察官操控。这些人以吕库古“宪法”守护者自居，对滞留斯巴达的客蒙和4000雅典士兵逐渐产生了怀疑，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威胁到斯巴达的社会体制。

客蒙再怎么亲斯巴达，终究是来自民主雅典的公民。他率领的4000名重装步兵是雅典的中坚力量。他们会不会表面上来救援斯巴达人，其实在暗中帮助希洛人？就算没有直接的行动，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斯巴达底层人民的激励。监察官们对这4000名雅典公民来斯巴达的真正目的产生了怀疑。而客蒙对此毫不知情，一心一意援助斯巴达，想来也是够可悲的。

斯巴达的5名监察官以维护国家体制为使命，只要心存疑虑即可给人定罪，不必冷静地去究清事实。在第一卷中，我说这些监察官类似中世纪将大批无辜民众投进火堆的无耻的异端裁判官，就因为他们都有妄

下断言的特质。

不到10年之前，在普拉塔亚平原战中，率领斯巴达重装步兵彻底打败波斯王牌骑兵团，英名远扬至远东地区的统帅帕萨尼亚斯，最终也是惨死在监察官手里。他被定罪的理由是利用普拉塔亚战的声誉煽动希洛人，勾结波斯，企图背叛斯巴达。

帕萨尼亚斯的叛国罪在当时看不过是有些疑点，如今确定完全是冤案。是斯巴达的国家体制决定了5名监察官可以实际控制国家政治。

遭到猜疑的客蒙在斯巴达的处境变得微妙。而这些监察官一旦生疑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客蒙被告知斯巴达已不需要帮忙，请他即刻返回雅典。明明是被请来救援的，结果还没做什么就被斯巴达人要求离开。

希洛人虽然被赶进了伊托美山里，但仍然顽强反抗，叛乱并没有结束。在这种时候，斯巴达要求客蒙及其军队离开，可算是监察官们一旦怀疑便不计后果的典型一例。

客蒙接到逐客令败兴而归，迎接他的是群情激愤的民众。受到斯巴达人如此怠慢，雅典人自然义愤填膺。

雅典人对斯巴达人的行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对不做任何抗议便顺从而归的客蒙产生强烈的不满，客蒙的民意支持率急剧下滑。反客蒙派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

公元前461年的春天，49岁的客蒙遭陶片放逐，他离开雅典，远离政坛长达10年。客蒙下台后，埃非阿尔特斯领导的激进民主派掌握了大权，但埃非阿尔特斯在执政后不久便遭暗杀，暗杀者据说是客蒙的狂热支持者。

埃非阿尔特斯的死，对于政治生涯刚起步的伯里克利而言是一个好消息。这种情形有点像一心想闯出自己事业的儿子，碰巧遇上了父亲的早逝。

就这样，刚满34岁且完全不像政治家的伯里克利领导城邦国家雅典进入了新时代。

然而，史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

30多岁的伯里克利

繁荣不会从天而降，人们必须为之付出努力和辛劳。

建立繁荣昌盛的国家需要两类人：一类是为走向繁荣开辟道路的人，另一类是为实现繁荣夯实基础的人。如果效仿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从罗马人和希腊人中各挑选一位写《比较列传》的话，我会将继承了恺撒事业的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拿来与伯里克利对比。

“保江山”与“打江山”性质有所不同，但要论孰轻孰重，实际很难分出上下。伯里克利执政的30年，是不懈努力、付出辛劳的30年。

小林秀雄曾经说过：“道德高尚、精力充沛的行动家，为顺应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成为了政治家。”这简直就是伯里克利的写照。

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年轻的伯里克利必须应对的课题十分明确。

第一，保证雅典的民主政体有效运行。换言之，在维持政体的同时，尽量提高治理效力。

正因为雅典是民主政体，所以民众的要求层出不穷。如果对他们言从计听，社会就无法前进。如何在全面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推动社会有序发展，是对政治家领导力的极大考验。

第二，守住希波战争的胜利成果——爱琴海制海权。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保地米斯托克利一手建立起的海军的战斗力。对于雅典而言，守住爱琴海的制海权不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与经济息息相关。

从进口主食小麦到出口陶壶等手工业制品，城邦国家雅典是一个在国际贸易上保持领先才能生存的国家。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助于经济发展。

第三，坚守希波战争的胜利成果——提洛同盟。

只有保证这个同盟的健全运作，爱琴海才真正属于希腊人，所以这对雅典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个同盟也存在缺陷。

提洛同盟的成员并非雅典以军事力量强行聚集在一起的。各城邦是为抵抗超级大国波斯的侵略，自发结成同盟的。这正是问题所在。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

提洛同盟结成——公元前4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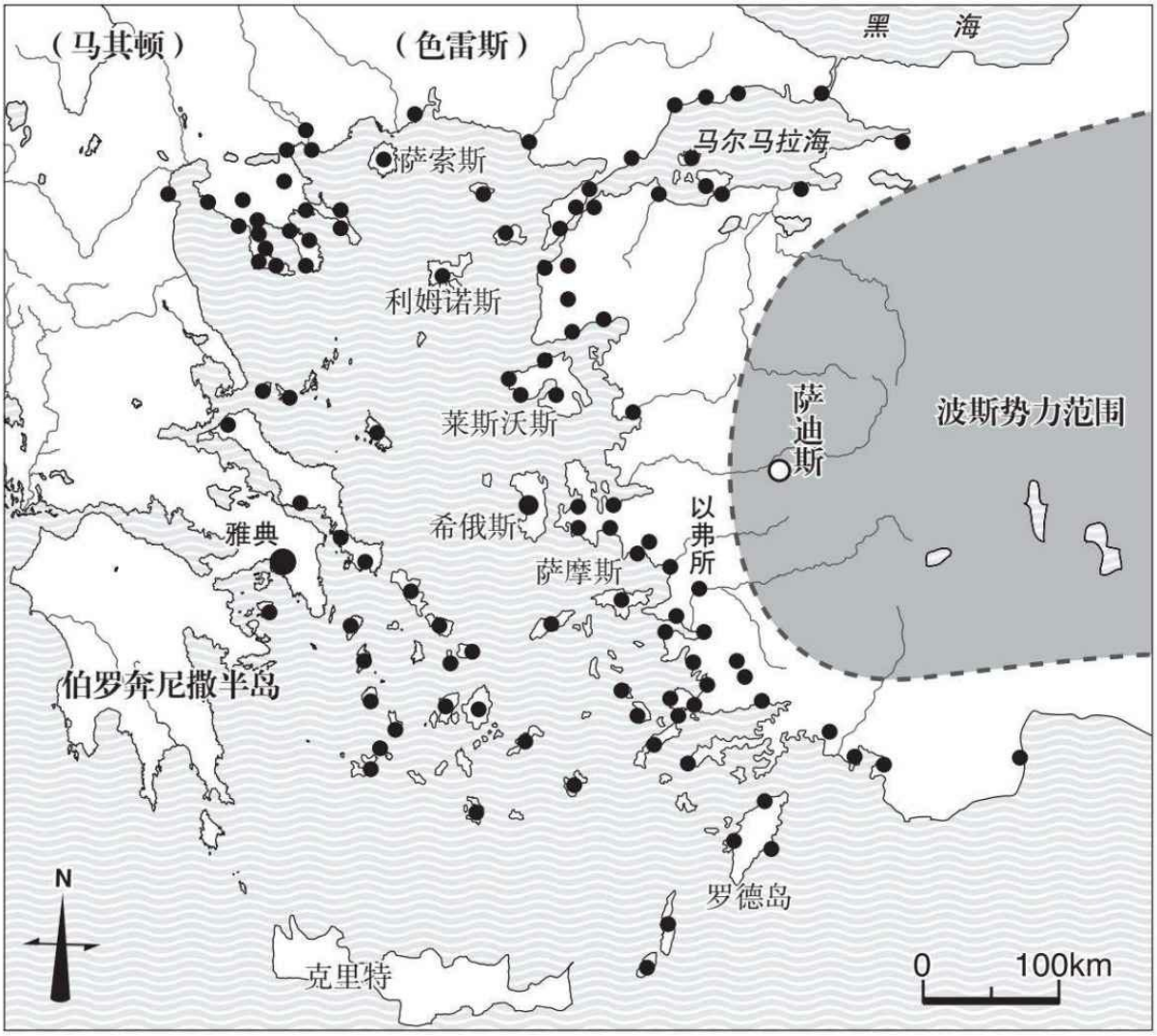
伯里克利成为雅典领袖——始于公元前461年。

伯里克利面临的困难是，在希腊人对波斯的恐惧渐渐淡薄的时代保持同盟的稳定。

毕竟加入提洛同盟是各城邦的自发行为，有利可图便参与其中，感到不利就可能退出。

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对于自主独立、平等的诉求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因此要将他们统合在一起相当不易。

地米斯托克利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点，是因为彼时有强敌波斯在前。地米斯托克利将波斯赶出了爱琴海，接下来便是伯里克利守住爱琴海的时代。



提洛同盟各成员（黑点）

伯里克利面临的第四项课题，对他而言是最简单的。

最先意识到雅典的安全保障有赖于海军，通过打造三层加莱船增强了海军实力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他主张壮大海军，这一主张的有效性首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得到了印证，随后又因为雅典掌控爱琴海全域的制海权而成为全雅典人的共识。因此，伯里克利只要延续先人的做法即可。

此外，修筑城墙也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推动下实施的。用城墙将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连为一体，已经没有雅典人对它的有效性有所怀疑。不过，城墙建成已经20年，必须做一次彻底的改造。所以，伯里克利只需要从政治上判断实施这项大工程的合适时机。

对于伯里克利而言，最棘手的大概是避免卷入战争，这是他的第五项课题。

首先，雅典除了提洛同盟之外，还与其他一些城邦结盟。同盟方之间，一方有难，他方必须履行派兵支援的义务。然而，战争往往会让介入弱小国纷争的大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其次，希腊人必须通过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场运动会才能休战。他们会因为一些微乎其微的理由一次次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所谓一言不合就开打，讲的就是希腊人。

代表和平的各国语言

拉丁语	Pax
意大利语	Pace
西班牙语	Paz
法语	Paix
英语	Peace

如今西方各国使用的“和平”一词均源自古罗马人的拉丁语“Pax”。“维系才是和平”是罗马人的理念，不是希腊人的。

希腊人几乎创造了所有的理念、概念，但唯独没有“和平”。

对于希腊人而言，没有战争的状态不过是短暂的休战状态。就像赛车场上发生事故，安全车出动，赛道上所有的赛车不得互相超车一样，属于暂停时间。

面对这样一群人，想尽量不卷入战争，难度可想而知。

伯里克利在执政期间基本完成了第一至第四项课题，唯有第五项未能如愿。这究竟是缘于希腊人的民族性，还是因为伯里克利本人也是希腊人呢？

连续当选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时代最著名的是以下这句：

>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这句话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人统治？

名门出身并没有为伯里克利带来什么利益。那些反对派成员也几乎全都来自望族。同样，伯里克利的有钱人身份也没有特殊的意义。城邦国家雅典的当权者个个都是无须公款私用的有钱人，以至于法律中没有盗用公款这项罪名。

再者，雅典人如果有意参与国政，不管出身高贵还是财力雄厚，都得在部落选区中获胜，必须被选拔为将军。

相当于城邦国家行政区的部落并不集中在一起。经由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各部落分散在雅典的阿提卡地区的三个地方。候选人想回到选区拉拢选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将军的选举每年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伯里克利自30岁初次当选将军以来，连续32年当选，史料中从未有过他落选的记载。

城邦国家雅典赋予全体公民即20岁以上的男性选举权。如果学者的推算无误，那个时期拥有公民权的雅典人应该在6万人左右。部落选区共10个，每个部落的选民大约是6000人。

伯里克利的选区是阿卡曼提斯部落。这个部落的6000位选民中，有半数以上的人由始至终将选票投给伯里克利。长达30年以上的“当选无疑”让现代的政治家们羡慕不已。

连续当选是伯里克利能实现一人统治的原因之一。

一度与伯里克利同时当选为将军的索福克勒斯，在第二年的选举中落败。曾与他一起奔赴战场的伯里克利称这位同辈兼好友写悲剧比当将军对雅典更有意义。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判断，索福克勒斯所在选区的选民们才没有把选票投给这位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

在2500年前的雅典，掌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所有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是政府内阁，它由10个部落选出的10位将军组成。不同于现代国家内阁的是雅典不设总理一职，因此无法任命各部门首长。

10位将军中有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政治上认同伯里克利的成员，可是反对派同样有机会当选。客蒙虽然遭陶片放逐，但他的支持者仍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伯里克利的政敌。

如此状态下，要实现一人统治，伯里克利必须说服其他9位将军接纳自己的想法，这种可称为“内阁一致”的工作必不可少。如果事先沟通不到位，那么决定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上极有可能出现强烈的反对之声。没有什么比内阁分裂更容易失去民心。如果民众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反复出现，民主政体就会崩溃。

话说回来，民主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公民大会。20岁以上的男子人人都有参加大会并投票的权利。若政治家希望自己的设想成为国策，公民大会就是斗争最激烈的战场。哪怕是成功取得“内阁一致”的政策也经常会在公民大会上被推翻。

武器是语言

那么，在这个战场上，伯里克利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语言。仅靠语言的说服力，30年间劈波斩浪，简直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战斗了。

让我们看看在当时闻名遐迩的伯里克利的“说服力”是何等神器。

有一次，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询问来访的雅典人，伯里克利是怎样一个人。

斯巴达王当然会对这位雅典第一人感兴趣。他肯定想了解对手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访客是这样回答的：“我和伯里克利在众人面前比武，我赢了，观众们也都认可这个结果。不料，明明输了比赛的伯里克利说是他获胜了，还举出种种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那些亲眼目睹比赛过程的观众，听了伯里克利的一席话后居然开始认为赢家的确是伯里克利。”

乍一听，感觉伯里克利的“说服力”像是用冠冕堂皇的辞藻迷惑听众的诡辩，是一种弄虚作假的手法。不过，仔细阅读史料记载的他的发言、演说，又会觉得并非如此。

如果用体育比赛做比喻的话，这有点像网球比赛的鹰眼挑战，足球比赛的录像裁判。换一个角度观察，大家会发现网球出了界，足球运动员踢进的原来是个乌龙球，从而推翻裁判原本的裁定。

伯里克利的“说服力”之所以有效，最大的原因是，他向雅典民众展现了转换视角后事物呈现的不同形态。

请大家不要忘记，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执政者的提案并投票表决的人，只占雅典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从当时的高识字率可以想象，这些人都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能力的。

与伯里克利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雅典人，是充分享受到希波战争的胜利果实，充满自信的一群人。自信的人往往能以平常心做出判断。相反，人们一旦丧失自信，就会陷入不安，对现状不满，做决定时容易情绪化。如果出现那样的状况，离民主政体的危机就不远了。

不过在那个时期，伯里克利面对的是信心十足的雅典公民。他在民主国家雅典能够30年保持一人统治的状态，除了能成功地说服民众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之外，还得益于他的演说方式。

伯里克利面对民众，不会客套地称诸位都是国家的主人，请毫无保留地提出你们的要求，我们当政者的任务就是将公民的期望变成现实云云。

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他本人认为某个政策最合适。哪怕有转移视角之嫌，好歹是摆明了现状。随后他会强调，是否采用该政策的决定权在各位公民手里。这种方式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在完美履行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征求可否的论述。

伯里克利持续一人统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演说能让听众们对未来心怀希望。

人们听着伯里克利对政策的说明，对他独特的见解点头称是，感叹原来可以这样看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又为自己被称作最终决定者而感到满足，主人翁精神油然而生。听完他的演讲，民众往往能带着积极开朗的心情离去。

劝诱、引导。大概“诱导”一词最能体现伯里克利的论述之道。

在言论自由的民主政体下，强迫民众唯命是从是不可能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劝诱引导”以理服人。不过，伯里克利的诱导手法之高明，还真是令人惊叹不已，不得不承认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听完雅典客人以武艺比赛之例评论伯里克利，斯巴达国王放声大笑。笑完他说想见见此人。之后，他俩果真见了面，见面后还成了好朋友。

年轻的掌权者们

比伯里克利年轻一岁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明白雅典第一人伯里克利的说服力不是来自诡辩，而是来自巧妙的诱导。阿希达穆斯本人也很善于理性思考，这在不善言辞的斯巴达男人中实属难得。

话又说回来，就算伯里克利在国内能够诱导民众，单凭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30年以上的一人统治的。内政也会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第一人的30多年中，雅典必须正视的强国有斯巴达和波斯。在那个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三大强国分别是雅典、斯巴达和波斯。

三个国家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雅典是民主政体，斯巴达是寡头政体，波斯是君主专制。

或许是出于偶然，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30岁出头就执政掌权，并且在随后的30年中始终保持着领导地位。

当然，三位领袖各有各的烦恼。

伯里克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和国家利益。

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的麻烦是以牵制王权为使命的5名监察官。如果被这群人猜忌，他有可能像帕萨尼亚斯那样，贵为国王照样被处死。

作为君主专制帝国的主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看似没有地位不保的风险，但他的一生过得也不轻松。这位年轻君主请地米斯托克利做政治顾问，以如此标新立异的手法开始治世，他最担心的就是被世人认为对外态度软弱。

一旦被视为软弱，不仅波斯统治下的埃及等国会爆发叛乱，而且王族内部的不满分子会以此为理由开展暗杀行动，危险无时不在。

尽管三位领袖各有不同的辛劳，不过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拥有良知。

战争，似乎无法避免。对他们三位而言，国内最大的敌人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但若找到适当的时机，与之相互做出一些妥协，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长期化的。

伯里克利一人统治的30余年是雅典尽情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这已经是历史定论。

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出现，原因之一是雅典的假想敌——斯巴达与波斯的掌权者也是富有良知的人。伯里克利就算再能干，也有不足之处。作为政治家，他的能力的确超一流，但说到军事才能，英国某学者的评价是“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如果对手看准他的这个软肋发起攻击，那么雅典就没有什么繁荣昌盛可言了。

在西方历史上，若论同时拥有超一流的政治和军事才华的人物，我认为非尤利乌斯·恺撒莫属，无人能出其右。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都是非凡的军事天才，但论及政治才华，恺撒勾勒出长治久安的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蓝图，然后交由其继任者实现了大业，绝对出类拔萃。

说到继承人，恺撒没有将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大任交给战功卓著的副将安东尼，而是托付给当时年仅17岁、尚无建树的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可能恺撒认为，相较于“热血之人”，治理帝国还是“智慧之人”更为合适。

当时17岁的屋大维在军事上几乎一无是处。恺撒没有对他提出“从现在开始学习”之类不现实的要求，而用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办法，弥补了这位年轻人的不足。

恺撒提拔了一位同样17岁的士兵，让他做屋大维的帮手，从此打仗就靠这位阿格里帕了。

如果没有阿格里帕，“智慧之人”奥古斯都恐怕没机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因为在那场决定未来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亚克兴海战中，他们的对手是安东尼。

伯里克利身边没有类似阿格里帕这样的人物。

甚至有学者认为，伯里克利不该陶片放逐客蒙，两人通力合作反而更有利。然而，这是不现实的。

客蒙虽然军事能力不凡，但在政治上属于亲斯巴达派。而伯里克利将斯巴达视为阻碍雅典提升国力、国威的假想敌。

倘若没有遭陶片放逐，客蒙势必连年当选将军。伯里克利同样如此。那么10位将军会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内阁不一致将成为常态，公民大会最终会沦为两派争斗的战场，甚至可能引发内乱。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山不容二虎。

国家	名字	生卒年（公元前）	作为“第一人”的统治时期（公元前）	在位时间
雅典	伯里克利	495–429 年	461–430 年	31 年
斯巴达	阿希达穆斯	494–427 年	464–427 年	37 年
波斯	阿尔塔·薛西斯	495–425 年	464–425 年	39 年

伯里克利的演说

所谓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指的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这里我不做严谨的分析，仅从一般的常识角度做个归纳。

政治才能——深思熟虑，让自己长时间酝酿的计划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

军事才能——随机应变是作战的铁规，前思后想有可能置手下的官兵于死地。因此，战场上必须迅速决断、迅速执行，领导者必须具备当机立断的能力。将于百年之后登场的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

其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不仅限于战场，它同样适用于公民大会。当然方式有所不同。

在战场上，要获得主动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政治上，领导者需要耐心地花时间让权力稳固。

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演说前总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演说并非普通的发言，自己的构想是否能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决定权在听众手里。因此，对伯里克利而言，会场宛如战场。

他会先在家中起草演讲稿，随后花时间仔细斟酌直至成稿。在雅典，演说人照稿宣读有遭陶片放逐的可能，因此内容必须烂熟于心。相信伯里克利不会疏于放声朗读的练习。

通过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伯里克利那些精湛

的演说经过了反复思考、仔细推敲，这让以文为业的我颇感亲近。话说，尤利乌斯·恺撒的文字不仅不会让我产生亲近感，而且让我嫉妒得直咬牙。被视为战争文学经典的《高卢战记》是恺撒口述的作品，根据在场人的证言，恺撒出口成章，文章完全没有事后修改的必要。他果真是文武两道都做到了极致的人物。

伯里克利虽然感觉更像政治家，但面对公民大会上的各种刁难、非议，也不能不具备即刻反驳的反应力和爆发力。

公元前445年前后，伯里克利50岁的时候，雅典为建造帕特农神殿投入了大量资金，反对派以此为由企图逼伯里克利下台。

遇到这样的情况，普通政客一定会竭力强调建造神殿是公共事业，值得国家付出巨额投资。

然而，伯里克利是这样说的："如果诸位认为建神殿不值得耗费国资，那么我来承担全部费用。但有一个条件，神殿建成后要立一块石碑，刻上'本殿由伯里克利出资完成'。雅典公民们，你们只须决定是继续公费建设，还是由我负担后续工程费用。"

当时，矗立于卫城山丘之上的帕特农神殿已逐渐展现出雄伟的形象，令外邦人也为之倾倒。

最终，公民大会决定仍然以公共财政完成神殿的建设。就是说，再次确定神殿是属于全体雅典公民的公共设施。由此，反对派让伯里克利下台的计划彻底破产。

无论是深思熟虑后的演说，还是机敏的瞬间应答，伯里克利最强的武器始终是语言。拥有这种武器他才能在民主政体下，在民众可以自由批判执政者的环境中保持一人统治。

巩固地盘

仅凭巧妙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伯里克利必须掌握权力。而赋予他权力的是雅典拥有公民权的人们。

对于34岁开始政治生涯的彼时的伯里克利而言，确立民意基础是他的首要任务。如前文所述，从自己的选区胜出只能让他成为10位将军之一，分量明显不足。

在执政初期，由伯里克利提案且得到公民大会承认的，大多是保护雅典公民既得利益，同时以提高伯里克利个人地位为目的的法规。

其中有一条限制公民权的法令，在当时颇受好评，却被现代学者们斥为“反动”。

限制令是对公民权的要求。此前雅典人要获得公民权，其父必须是雅典公民，新限令在原有要求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项母亲也必须出生在雅典的规定。

如果这条法令溯及既往，那么母亲是外邦人的地米斯托克利、客蒙都得失去公民权。所幸，该限制令不溯及既往，对生活在国外的雅典人也一视同仁。但不可否认，这一法令的出台事实上是以限制公民数量为目的的。

伯里克利的这个提案在公民大会上轻松地以多数票赞成通过。由于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获胜，20年来外邦人不断涌入，引起不少当地民众的不满，这些不满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民主政体的国家须保障公民人人平等地享有权利。然而，忠实地按

章办事可能引发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在当时的雅典，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拥有公民权这个利益的人是20年前打败波斯的主力军。

在他们看来，那些新来的人从未参加过战争，他们在雅典赢得胜利、逐渐繁荣之后才拖家带口移居这里，如今竟然与自己享受同等的权利。既得利益者由此产生不满可以理解。

那些新来的人是原本住在国外的雅典公民，他们大多娶了当地女性为妻。

伯里克利很清楚，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必须与这些新居民保持距离。忽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是很危险的。

将限制令视为“反动”，我不能苟同。

因为当时的雅典对外来人口的流入没有任何限制。

雅典公民享有参政权的同时，需要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他们承担着保家卫国之责，所以在经济上可享受免除直接税的待遇。

尽管外邦人不能享受以上的特权，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居住在雅典。自雅典打赢希波战争之后，这类外来移民的数量激增。

在商人的眼中，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的魅力都市。

首先，首都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使雅典城邦成为大经济圈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雅典具备生产畅销品的能力，不缺乏购买他国物产的资金。比雷埃夫斯附近有两个专门造船的海港，外国的商船若遇故障，不愁找不到地方修理。

再者，爱琴海全域完全处于强大的雅典海军的控制之下，商船遭遇海盗袭击的风险逐渐降低。爱琴海上几乎所有的岛屿都加入了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如果外国商船遇风暴需要避难，那些岛屿势必不会拒绝。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它的货币以及计量方法便可在国内外通用。雅典的德拉克马银币就是当时的国际流通货币。

总而言之，用现代语言讲，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周围形成了一个广域经济圈。对生意人而言，这里是拓展事业的最佳之地。

此外，希望居住在雅典却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外国人也不少。虽然古代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还是姑且把他们统称为“文化人”。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居住着一批以头脑与双手为武器，立志以创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具体地说，他们中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等。

这些“文化人”中有不少雅典本地人，也有很多在国外出生，移居雅典后事业达到高峰的人。其中的著名人物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雕刻家米隆（Myron）、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不胜枚举。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忽然不约而同地奔向雅典呢？

因为这里有机会。

希腊人搞城市建设的时候必须先建神殿。而建造神殿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从建筑家、雕刻家到石匠，它需要集中各行各业的专家，经年累月才能完成。而且神殿内还要修建诸神的雕像。

除此之外，希腊的体育比赛十分频繁。以奥林匹亚召开的运动会为首，光大型赛会就有四项，每四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体育比赛上的优

胜者会为他的国家带来荣誉，因此，再现运动员英姿的雕像需求源源不断，有很大市场。

雅典的比赛并不限于体育。这里每年举办戏剧节，无论悲剧作家还是喜剧作家，每年都必须完成多部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不愁销路。为强迫富人花钱做公益，雅典富裕阶层被要求承担戏剧演出的费用。伯里克利就曾做过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波斯人》的赞助者。

不过，对立志以创作为生的人而言，他们在雅典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接触他人的作品及与其作者间的交流，获取崭新的视角和观念。搞创作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这种相遇相知更能提升自己的创作力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这些“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创作环境。伯里克利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

在很久以后，柏拉图创建了柏拉图学院（Academy），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吕克昂学院（Lykeion）。在这些学院出现之前，雅典已经是一个为充满好奇心的感性的艺术家们输送养分的“学校”。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再晚一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为什么这些现象出现在这些地方？因为人才荟萃，尤其是创作欲旺盛的人。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类人的流向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

不过，伯里克利是政治家。振兴文化固然重要，但保卫国家安全、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责任。

极致的“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的提案中，有一条规定被现代人认为是雅典民主政体的象征，它就是向担任公职的公民支付日薪。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设立了一个叫“治理委员会”（buoule）的国家行政机构。其成员在10个选区中抽签选出，总计500位，任期一年。这些公务员有大量繁杂事务需要处理，因此任职期间无法再从事其他工作。

根据梭伦改革，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客蒙、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属于富裕的第一或第二等级。

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街头免费传授真理，仍能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想来是有些薄产，而且史料证明他曾经两度服役担任重装步兵，因此可以认为他属于第三等级。

由此可见，自梭伦改革以来持续了150年的四等级制度只是以财产多寡来划分，对个人从事的活动没有影响。

希腊悲剧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巅峰。最负盛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所属的等级完全不同。

埃斯库罗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应该属于第三或第四等级。

索福克勒斯曾经当选为将军，作为司令官与伯里克利一起率军出征，所以几乎可以确定他属于第一等级。

因为“粉丝”马其顿国王的照顾，安逸地度过后半生的欧里庇得斯，其双亲从事处理新鲜食材的工作，因此属于第四等级。

此外，从事建筑、雕刻工作的人都被视为工匠。

伯里克利的好友菲狄亚斯，曾受托担任帕特农神殿工程总监，他为神殿制作的浮雕群像如今成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要论等级，他属于最低的第四等级。

由此可见，雅典的等级制，对于文化艺术创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因为有这些超越门第的天才带来知性与感性的双重刺激，希腊文明之花才能盛开得如此绚丽。

不过，文明之花盛开的雅典也有很多生活灰暗的人，他们是被称为“thetes”、隶属第四等级、与艺术创作无缘的一般庶民。罗马人称这类人为“普罗列塔利”（proletarius），将他们定义为靠每日出卖劳力养家糊口的人。

在雅典，农民、工匠以及商人都属于这个等级，他们也是有尊严的公民。在民主政体下，这些人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同时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役期间，他们大多担任轻装步兵或战船的划桨手。战船划桨手为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第四等级的力量因此变得强大。

然而，这些人必须每日劳作才能维持生计。战争时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可以心甘情愿地不取一文，但在和平时期为从事公共服务而断了生活来源，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了。因此，不少人即使抽签当选公务员也会自动放弃。

担任公职本是公民参与城邦国家运作的一个好机会，有些人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

伯里克利认为这种状况有违民主主义的理念，有损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的形象。因此，他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制定公职津贴法。

公务员每天的公职津贴与他们平常的日收入大致持平或略低，金额十分有限且不面向所有公务员发放。苏格拉底曾是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但没有史料记载他曾领取日薪。在抽签当选的500人中，这个政策大概只针对第四等级。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参军还是担任文职，但凡公共事务，无薪任职都被视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即使是少额补贴，伯里克利的提案还是引来不少非议，反对者称此举有违公民社会的理念。

公民大会最终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该法，而反对之声依然不绝。反对派指责伯里克利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花钱买选票，而且花的是国家的钱。

如果当时客蒙没遭到陶片放逐，势必会站在反对阵营的第一线。作为稳健民主派的领袖，在他眼里，伯里克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民主派分子。

然而，伯里克利以公职津贴法为契机，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利用对手不在雅典的机会，他乘势巩固基本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嗅觉实在敏锐。

话说回来，伯里克利虽然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军事才华的欠缺依然是他无法忽视的弱点。

所谓有军事才华，不仅要在战场上制定合理的战术，还要具备在战

争开始之前谋篇布局，即有制定战略的能力。

伯里克利的公职“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的词源。担任这个公职，意味着他在政略和军略上都必须是最高统帅。

客蒙回归

从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50年，伯里克利从35岁至45岁的这10年，他似乎一直将客蒙视为潜在的对手。在客蒙遭陶片放逐远离雅典政坛期间，伯里克利非常渴望能取得与政敌比肩的军事成就。

当时雅典的军事力量相较于其他城邦，可谓傲视群雄。由于实施民主政治，连最底层的无产者也算公民，雅典城邦的公民总数达到约6万人。当然，这是20岁到50岁，随时可以手握武器奔赴战场的现役公民总数。

另一方面，与雅典同为强国的斯巴达由于长期维持寡头政体，只有1万多成年男性被赋予公民权利。

有读者读完本书的第一卷后发表感想："这下总算清楚了。所谓的民主政体与安全保障互为表里。"说白了，雅典的民主体制暗藏着可以送更多人去前线打仗的意图。

这个冷酷的政治真相，民主政体的创建者克里斯提尼知道，充分利用体制优势打赢波斯的地米斯托克利知道，他们的继承者无论稳健派或激进派，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事实上，雅典能够动用的士兵数量是斯巴达的6倍。

不过，斯巴达军队是由终生从事军事训练的人组成的专业军队。

雅典虽然也全民皆兵，但公民平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索福克勒斯当选将军的那一年曾率领海军舰队出海打仗。如果他没有当选，应该在照常写他的悲剧。苏格拉底也曾经参军当过步兵。如果

没被征兵，他肯定认为在街上向来往的年轻人传授哲学之道才是自己的本业。

另外，自地米斯托克利凭借海军力量打败波斯后，海军是雅典的主力军已成为全民共识。不过，要武装三层加莱船，仅划桨手就需要170名。从掌船的水手到作战的重装步兵，一艘战船出海至少要配备200人。

与此同时，雅典作为提洛同盟的主导者，必须承担保护同盟方安全以及在爱琴海巡逻的任务。为此，雅典始终保持百艘战船出海的状态，如事态严重，战船数量将增加两倍。雅典仅海军就需要2万到4万的兵力。

与没有海军的斯巴达相比，有海军的雅典自然占了上风。尽管军力居希腊城邦国家榜首，但雅典还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伯里克利能冷静地看待雅典仅具备相对军事优势的现实，就不应该让战线过于分散，不应千里迢迢去补给困难的埃及打仗。然而，这些不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他没有遭陶片放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希腊中部塔那格拉的战役中，由于斯巴达无心与雅典正面交锋，以回国祭祀为由主动撤兵，雅典才算逃过一劫，没有输得太难看。远征埃及时，由于不了解尼罗河的水位变化，再加上统治埃及的波斯人猛烈反击，雅典人被打得七零八落。

伯里克利没被陶片放逐，似乎是因为民众看在他亲自率军远征的情面上，没有穷追猛打追究其责。不过在卫城山上挖掘出的陶片中，刻着伯里克利名字的不少，所以没被放逐可能单纯是因为赞成放逐的票数没有达到法定的6000票的半数以上。

不管怎么说，那个时期的伯里克利强势、好战，他的确做了不少铤

而走险的事情。

同一时期，客蒙结束了流放生活，暌违10年回到祖国，随即当选为将军，成功重返雅典政坛。这位作战的高手此时已经59岁。

相信客蒙归来后与伯里克利有过秘密的会谈，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但根据前后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

这两位政治家虽然在政治上对立，但同属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姻亲关系为两人会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于是，59岁的将军与44岁的将军，达成了“分庭抗礼”的协定。

客蒙全盘接受自己被流放的10年间伯里克利制定的政策。

这个决定有效地阻止了翘首盼客蒙回归的反伯里克利阵营的进一步反弹。

在客蒙接受的政令中，有一项是在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之间修建两座城墙使之一体化。20年前地米斯托克利建造城墙时，以尽快完工为优先目标。时隔20年，伯里克利如果全盘继承地米斯托克利当年建城墙的理念，就需要对20年前的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客蒙和被他奉为导师的阿里斯泰德对于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始终持反对态度，理由是这会刺激斯巴达。

的确，斯巴达对此相当恼火。

有了这个完美的“一体化”，从陆地一侧再怎么猛烈攻击，首都雅典都不会陷落。从雅典通往外港比雷埃夫斯大约7.5公里的道路两侧有两堵长墙的坚固防护，哪怕遭遇围城，雅典人依然可以出海购买必需物资，他们本来就有足够的船队。

斯巴达认为雅典修建的长墙完全是针对自己的安全防御措施，因此常年心存不满。

事实上，在赶走波斯人之后，地米斯托克利预见到斯巴达将成为雅典在陆地上的另一个威胁，于是断然决定建造长墙。可见斯巴达人的不悦并非空穴来风。作为地米斯托克利多方面政策的继承者，伯里克利决定全面改建城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么，一贯亲斯巴达的客蒙为什么会认可这件事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客蒙被流放仅两年后雅典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修建城墙。眼下这项大工程业已完成，雅典人数年来已经享受着它带来的好处。事到如今再提出反对意见，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客蒙不想自寻死路表示反对的政策还有一项，那就是在公元前453年将设立于提洛岛长达24年的提洛同盟基金储备库转移至雅典。

伯里克利力推这项政令的理由是，金库放在小岛有遭遇海盗抢劫的危险。但没有多少希腊人相信他的这番说辞。

提洛岛是敬奉阿波罗神的圣地。海盗也有信仰底线，他们不会去碰触交给天神保管的钱财。在当时的希腊，不少城邦和个人都会把神殿作为存钱的场所。

提洛同盟是爱琴海海域的一些城邦国家和岛屿，以共同防卫为目的结成的同盟。各国和各岛根据自己的实力承担相应的义务。同盟成员中，既有雅典这种可以提供200艘战船的强国，也有实力略逊一筹的莱斯沃斯岛（Lesbos）、希俄斯岛（Chios），甚至还有连一艘战船都拿不出的小岛。

说到战船，当时是三层加莱船的时代。制造一艘这样规模的船只，需要花费1塔兰特币的高额费用。建成后须配备200名船员，才能真正运

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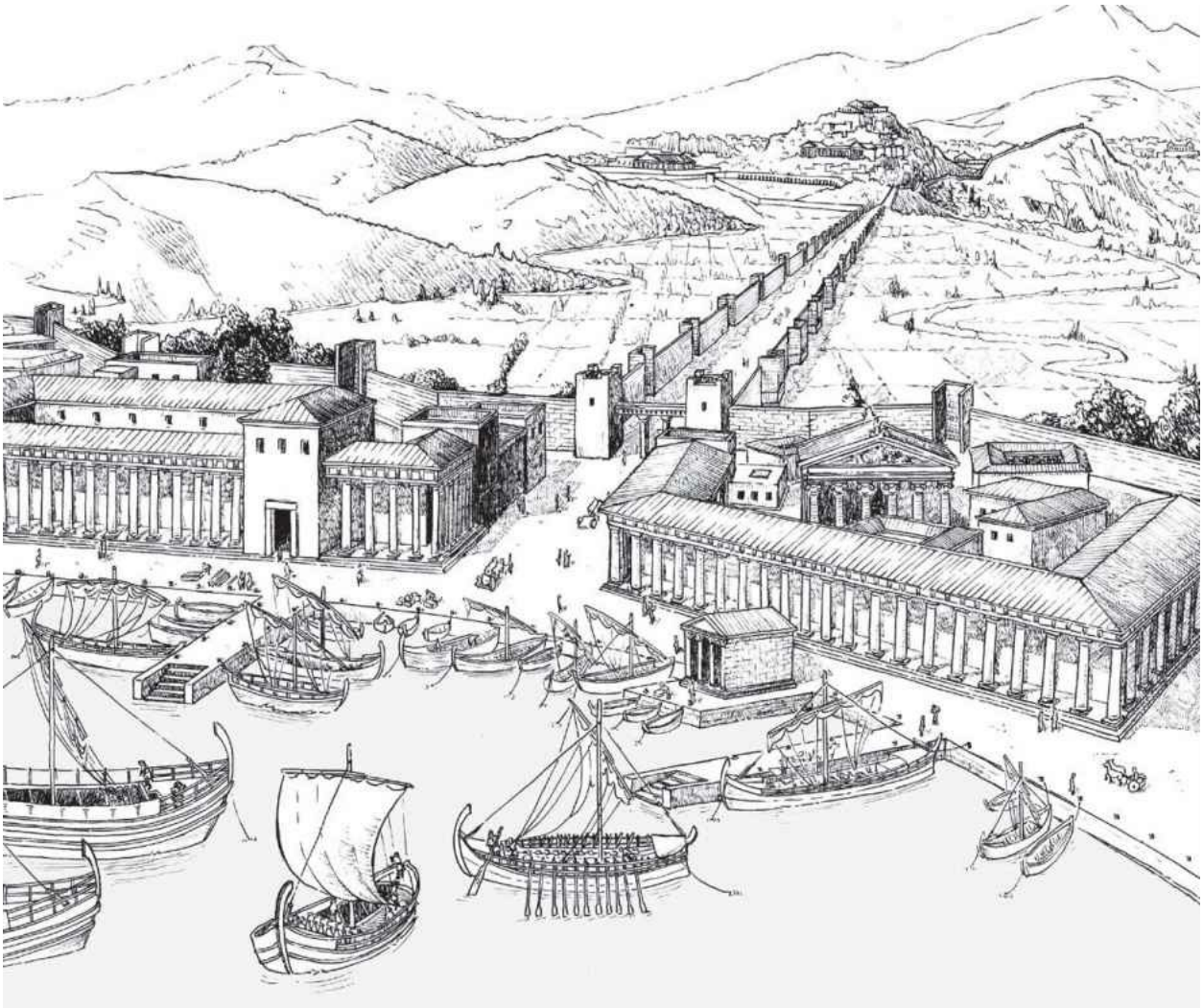
因此，提洛同盟在成立之初便规定各成员要根据自身的财力拿出一定的款项，作为同盟的活动基金，每年的累计总额在500—600塔兰特。

将金库转移至雅典，意味着雅典将在承担同盟大半军事任务的同时，掌控基金的使用权。

这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放在当今势必遭到严厉谴责。如果当时客蒙在雅典，他肯定不会同意。

然而，这个决定已得到其他同盟方的同意，雅典的民意也认为既然雅典提供了同盟一半以上的海军战船，金库放在雅典合情合理。政坛空窗期长达10年的客蒙，对此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客蒙虽然对伯里克利的一系列政策做了妥协，但他亲斯巴达的政治理念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改善与斯巴达的关系，主张与对方签订至少5年的停战协议。



与雅典城一体化的比雷埃夫斯港

伯里克利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他全权委托客蒙与斯巴达交涉，并表态会尽力促使停战条约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

伯里克利还接受了客蒙的另一个要求。

客蒙提出，和斯巴达签订停战条约以后，他希望率军远征波斯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岛，理由是向埃及战役中痛击雅典的波斯复仇。这个举动十分符合他的性格。

对打仗一向自信的客蒙第二年一开春便出兵前往塞浦路斯。

客蒙首创了将陆地战中防御力量最强的重装步兵用于登陆战，类似现代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式。这种战术让他屡建战功。塞浦路斯一仗的关键，同样取决于登陆战是否成功。

客蒙与伯里克利能成功达成“分庭抗礼”，是他们二人都冷静地直面现实的结果。

客蒙看到做出重大错误决策的伯里克利依然拥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

伯里克利在客蒙身上看到自身欠缺的军事才能。

客蒙暌违10年归来，人们屏息静气地等着政坛上掀起惊涛骇浪。然而，不管客蒙与伯里克利私下是否真有过秘密接触，事实上，雅典政坛风平浪静。

对手退场

公元前451年春天，客蒙率军离开雅典出征塞浦路斯。他率领的舰队由200艘战船组成，每艘战船至少配备200名船员，因此出征的雅典公民数量超过4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军，按惯例至少应有两位将军担任司令官。不知是客蒙表示自己一人足矣，还是有其他原因，总之这一次仅他一位将军率军出征。虽说有10年没有担任公职，但只要想到他曾经的辉煌战绩，估计没有人会建议他再带一位将军。

塞浦路斯岛东部的登陆战非常成功，客蒙仍然运用了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战法。在重装步兵的重创之下，派驻塞浦路斯岛的波斯军一败涂地。

10年前，客蒙曾经率军成功登陆小亚细亚南部隶属波斯领地的潘菲利亚（Pamphylia），大破波斯大军。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客蒙这个名字依然令波斯人闻风丧胆。

雅典军在塞浦路斯岛势如破竹，而统帅客蒙却因病倒下。

塞浦路斯地理位置比较靠近远东，这里的夏季比爱琴海岛屿气温低很多。再加上客蒙已经60岁，苦等10年终于再掌兵权，老将军或许已经殚精竭虑了。

不久，司令官病逝，雅典军无心再战，将解散军队立即回国。在海浪汹涌的冬天来到之前，他们必须从塞浦路斯岛回到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

在古代，论及城邦国家雅典最优秀的武将，一定会提到以下三位的名字。依照年代顺序，他们分别是：

公元前490年，击败波斯军赢得马拉松战役胜利，从而结束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功臣——米提亚德。

10年之后，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胜二度进犯的波斯军，以雅典的胜利结束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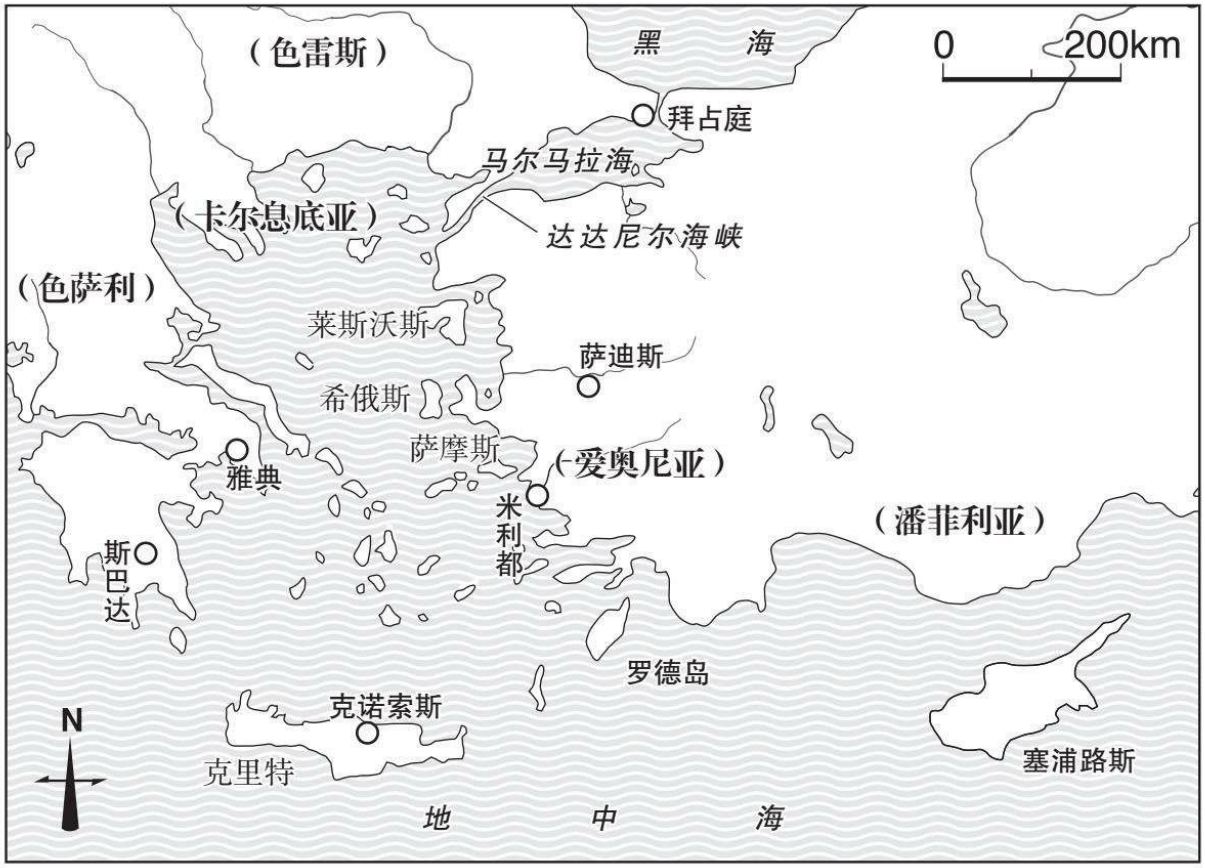
第三位就是米提亚德之子——客蒙。

相较于父亲和地米斯托克利，客蒙未能用胜利改变历史的走向。他最大的功绩是运用军事力量巩固了提洛同盟的团结。

如果不做“定期保养”，同盟便欠缺持续性。

名为同盟海军实为雅典海军的舰队由200艘战船组成，几乎一直由客蒙担任统帅。在他的指挥下，舰队定期进行海上巡逻，或运载重装步兵打登陆战，总之不容波斯肆意妄为。军事上的成功增强了入盟各成员的信心。

客蒙将传统上用于平原会战的重装步兵用作登陆战的主力，目的是加强登陆后军队的地面攻击力。这样可以向与波斯接壤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同盟成员证明，不仅在海上，在陆地上其同样会得到妥善的保护。只要当地居民有安全感，同盟就不会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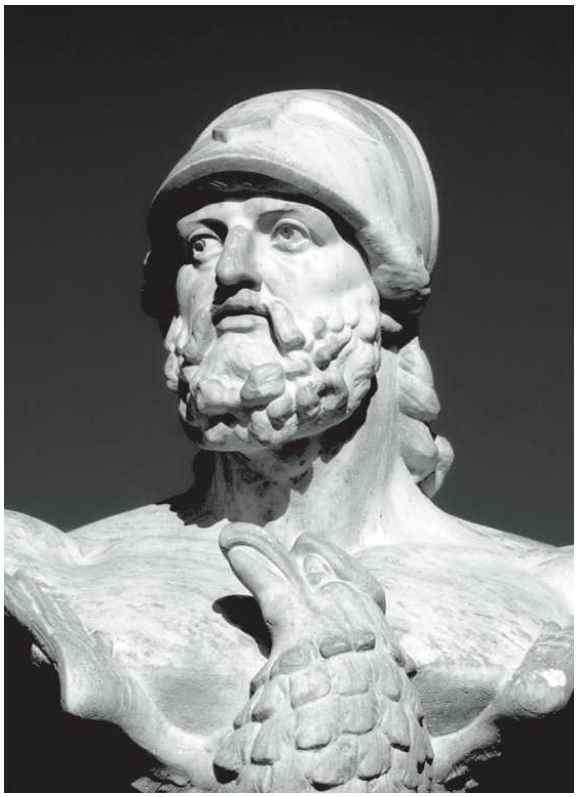
塞浦路斯及其周边

可见，客蒙成为“海军陆战队”战术的高手，也是迫于现实的需要。

总而言之，为同盟团结做出巨大贡献的客蒙是继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之战的两位英雄之后雅典的又一名将。在遭陶片放逐之前，他已经驰骋沙场15年。历数那些辉煌的战绩，名将之誉可谓当之无愧。

客蒙在战场上是一名猛将，生活中是一位豪爽之人。他出手大方，花钱如流水，不仅对所有人开放家宴，还十分热心于公共事业。他不惜重金整修道路、建造公园，因此深得民心。

政敌的挥金如土曾经令伯里克利感到危险，他怀疑那些钱是客蒙从他打败的对手那里收受的贿赂，于是决定追究。对此，客蒙在公民大会



位于塞浦路斯的客蒙半身胸像

为自己辩护道："我从来没有作为使节被派往充满诱惑的富饶国家，而且我尊敬以刚健质朴为本的斯巴达，希望能像他们那样生活。我对敛财没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从战场上赢得的战利品能够让祖国雅典繁荣富强，我会大有兴趣。"

客蒙的一席话引来民众阵阵欢呼。伯里克利只好放弃追究。

时刻把雅典的假想敌斯巴达挂在嘴边，是客蒙的坏习惯。他是位出类拔萃的武将，但直言不讳并非有效的政治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他不算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不管怎么说，作为反对派的领袖，客蒙始终是伯里克利强劲的对手。所以伯里克利才会动用陶片放逐这种激进的手段将他排除出政坛。

两位对手达成"分庭抗礼"短短一年，客蒙便撒手人寰。伯里克利这一次是真正"排除"了政敌。

然而，伯里克利不会因为这点成功沾沾自喜。他以客蒙的死为契机，180度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后期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29年的22年）

脱胎换骨的伯里克利

“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赢”不仅适用于战场，同样适用于政治、外交、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可谓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期，斯巴达与波斯是城邦国家雅典必须防备的两个强国。这时的雅典失去了军事大师客蒙。此时的伯里克利连续当选将军，他必须继续客蒙未完成的军业。然而，这位司令官在军事方面的水平只能说“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

所幸伯里克利手中握有两张牌。

一张是由客蒙主导并由公民大会认可生效的与斯巴达签订的停战条约。

当初伯里克利接受客蒙的建议，主要是给亲斯巴达派一个面子。但在客蒙死后，这个条约为雅典带来了不少利益。停战的5年间，雅典无须担心在陆地上受到斯巴达的攻击。

第二张牌与波斯帝国有关。

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发动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侵略希腊的战争，结果以惨败告终。战后的30年间，希腊与波斯始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胜利而逐渐强大的雅典和斯巴达或许不需要主动求好，不过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也都没有与波斯缔结和平条约。

伯里克利打算与波斯缔结和平的外交关系是因为客蒙的离世。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认为眼下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在这30年里，雅典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其实并没有停止。波斯念念不

忘战前曾经属于自己的小亚细亚西岸地区，不断地发起进攻，而提洛同盟的主导者雅典不断地给予回击。由于有客蒙统领，雅典在爱琴海保卫战中始终保有优势，但从未能给予波斯致命打击。

但是，以前的战争不一样。同样是波斯进攻、希腊防守，结果完全不同。

公元前490年第一次希波战争，波斯王大流士派遣的军队在距离雅典不到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遭到雅典大军的迎面打击，大败而归。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波斯再度向希腊发起进攻，这一次国王薛西斯御驾亲征，兵力是上一次的10倍以上。然而，无论海上的萨拉米斯海战还是陆地上的普拉塔亚之战，波斯军输得颜面无存，国王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亚洲。第二次希波战争再次以希腊的胜利告终。

在战后30年的公元前450年，坐在波斯王位上的是阿尔塔·薛西斯。这位现实主义者决心不重蹈祖父和父亲覆辙，成功地抑制了宫廷内部好战派，即领土扩张主义者们的势力。而决定雅典一方态度的是，与波斯王同龄的伯里克利。

在客蒙的遗骨随舰队回国后，伯里克利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决定派遣卡里阿斯（Kallias）作为和谈代表前往波斯。这个人选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卡里阿斯娶了客蒙的姐姐为妻，且与客蒙关系密切，这是雅典众所周知的事情。伯里克利选他做谈判代表，是为了向民众显示与波斯谈和并不违背客蒙的意志。

就算是10位将军组成的内阁已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权仍然在公民大会手中。民众很清楚，这次塞浦路斯远征军是撤退而非败退。由于司令

官客蒙病逝，军队不得不结束胜利在望的战事，这不算铩羽而归。由于客蒙已死，对于向波斯派遣和谈使节而不是舰队，民众只能表示同意。

不知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是如何说服民众的。突然从两国交战变成握手言和，要让大家接受这个状况，想来需要相当巧妙的诱导之术。

总之，卡里阿斯的波斯之行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许可。他本人大概也被伯里克利的劝说打动，相信有客蒙战绩在前，和谈必定会顺利，所以欢欣鼓舞地前往东方。

《卡里阿斯和约》

任命卡里阿斯为和谈代表还有一个有利因素。

客蒙在波斯也是赫赫有名。让卡里阿斯去和谈可以让波斯王及其家臣想起他的小舅子客蒙，借此提醒对手切莫忘记雅典的军事实力。

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是决定和谈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10年前他以政治顾问的名义收留了被雅典通缉的地米斯托克利。那个时期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波斯宫廷称为“对国王影响最大的希腊人”。客蒙打的第一场大仗就是地米斯托克利率军歼灭波斯海军的萨拉米斯海战。此后客蒙又取得了许多耀眼的战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通过地米斯托克利，波斯王早已了解客蒙的强大实力。

10年之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客蒙的姐夫卡里阿斯。这是雅典一方谈判的好筹码。更何况波斯王有祖父及父亲的前车之鉴，不想介入希腊太深，以免陷入战争泥潭。

以雅典谈判代表的名字命名的《卡里阿斯和约》从派遣使者至签署和约耗时两年，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从雅典到波斯首都苏萨的路途十分遥远。

使者先从雅典走海路至爱奥尼亚，再横穿小亚细亚进入波斯境内。随后渡过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横穿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才能抵达终点苏萨。返回雅典的路线正好相反。

其次是卡里阿斯锲而不舍地就和约与对方展开漫长的谈判。他不仅为雅典，也为爱琴海东面的提洛同盟的重要成员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

城邦国家雅典与波斯帝国签订的和约，简单地说是互不侵犯条约。

雅典和波斯都不侵犯对方的势力范围。

雅典同意塞浦路斯归波斯统治。

波斯尊重爱琴海东部的城邦以及岛屿的独立自主，在距离其边境骑马一日抵达的范围内不设兵力。这意味着波斯放弃了其自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一直主张的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此外，雅典承诺不会派遣海军前往波斯治下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的附近海域，波斯保证不会派任何战船进入爱琴海。

尽管战船的活动范围受到约束，但商船的航行以及商人的通行却获得全面许可。

从此，波斯船只进入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后世从波斯首都苏萨旧址出土的雅典陶壶的碎片，或许正是两国关系改善的证明。

与对手讲和对希腊人来说是休战，他们不会称之为和平。和平大抵只会出现在讽刺喜剧作家充满调侃的文字里，但公元前448年雅典与波斯的谈和却被希腊人非常罕见地称为“卡里阿斯的和平”。

这大概是因为这次雅典与波斯签署的和约与希腊城邦之间只有几年期限的休战协定不同，它是一个持久的约定。其后近40年的时间里，爱琴海摆脱了大国波斯的威胁。

《卡里阿斯和约》确立的雅典霸权领域

伯里克利在48岁之际第一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放开手脚”的局面。

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了停战协定，尽管期限只有5年，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雅典避免了来自陆地的威胁。而且斯巴达两王之一的阿希达穆斯与同龄的伯里克利时有私下接触，双方都抱有相安无事的意愿。

与此同时，与波斯签订的《卡里阿斯和约》化解了来自海上的威胁。

伯里克利酝酿已久的构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帕特农

在帕特农神殿之前，雅典不是没有修过奉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神殿。雅典娜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守护神，很久以前卫城山上便矗立着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殿堂。

不过以前的雅典娜神殿无论规模还是外观都无法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德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殿媲美，流于平常。

就算是那样普通的神殿也没有逃过劫难，公元前480年它被大举入侵的波斯军焚毁。雅典人只能委屈他们的守护神住在“临时住宅”里。

33年后，雅典决定重建神殿。当时的雅典市民应该是将《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与重建雅典娜神殿视为同等大事。事实上伯里克利提出重建神殿时，公民大会没有任何异议地通过了该提案。

伯里克利并不打算造一座在希腊比比皆是的普通神殿。

与位于山谷的奥林匹亚、德尔斐不同，在卫城山顶可将雅典城尽收眼底。建造象征城邦国家雅典繁荣兴盛的神殿，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当宏伟壮观的神殿在卫城山顶完工，雅典市民势必对此充满自豪，到访的外邦人势必会为之惊叹和羡慕不已。

这就是伯里克利的设想。他不要一座随处可见的普通神殿，他要造一座希腊前所未有的“帕特农”。

将伯里克利的理想化为现实的，是被他委任为工程总监的菲狄亚斯。

大约比伯里克利年轻5岁的菲狄亚斯彼时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雕塑家。因此，他的工作不只是监督工程，从殿内的雅典娜女神像到装饰神殿的浮雕群像都由他亲手制作。说整座帕特农神殿是菲狄亚斯的作品也不算言过其实。

始于公元前447年的这项庞大的工程，不仅包括帕特农神殿，还包括通往卫城的山道及其周边建筑，完成总体工程历时15年。菲狄亚斯在工程完工两年后死去，伯里克利在完工三年后离世。以帕特农为中心的雅典卫城，堪称他们两人共同的杰作。

时光流逝2500年。如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高耸于卫城之上的帕特农遗迹。但神殿的不少装饰雕像可以在伦敦、巴黎以及雅典的博物馆见到。

至高的艺术作品不但可以用肉眼观赏，还可以通过心灵之眼去感受。

大家可以先去博物馆观赏那些残缺的雕像原作以及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复原图，然后造访雅典，登上卫城山顶，让2500年前的神殿重现在脑海中，想象着当年雅典人眺望神殿时的心情。

经过这样一段心路历程，才会对它有真正的感受。

帕特农是一首宏伟的交响曲。

神殿及其装饰的雕像，都是单独制作完成的。那些雕塑不像平面的浮雕，简直就是一个个三维的立体像。尽管每个雕像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整体却呈现完美的和谐感，就像一首交响曲。

交响曲（symphonia）原本就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词汇。“sym”意为共生，加上意思为声音的“phone”构成“symphonia”一词。古罗马人直接把

它当作拉丁语使用，在拉丁语系中地位如同长女的意大利语，沿用了这个词。至于英语的“Symphony”只是在词尾稍做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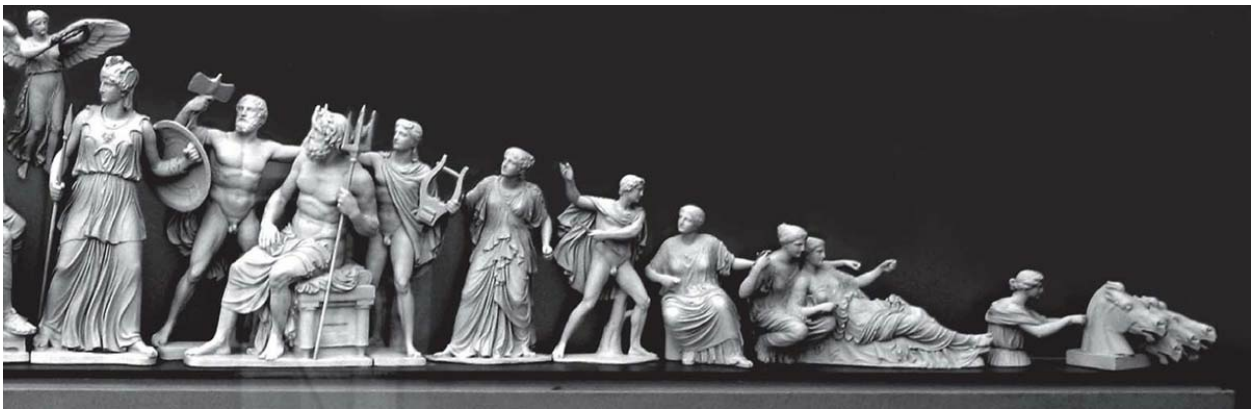
将帕特农神殿当作一首交响曲聆听，想来不会有违创作者菲狄亚斯的心愿。

正因为帕特农神殿成为了一首恢宏的交响曲，它才超越众多神殿建筑，成为至高无上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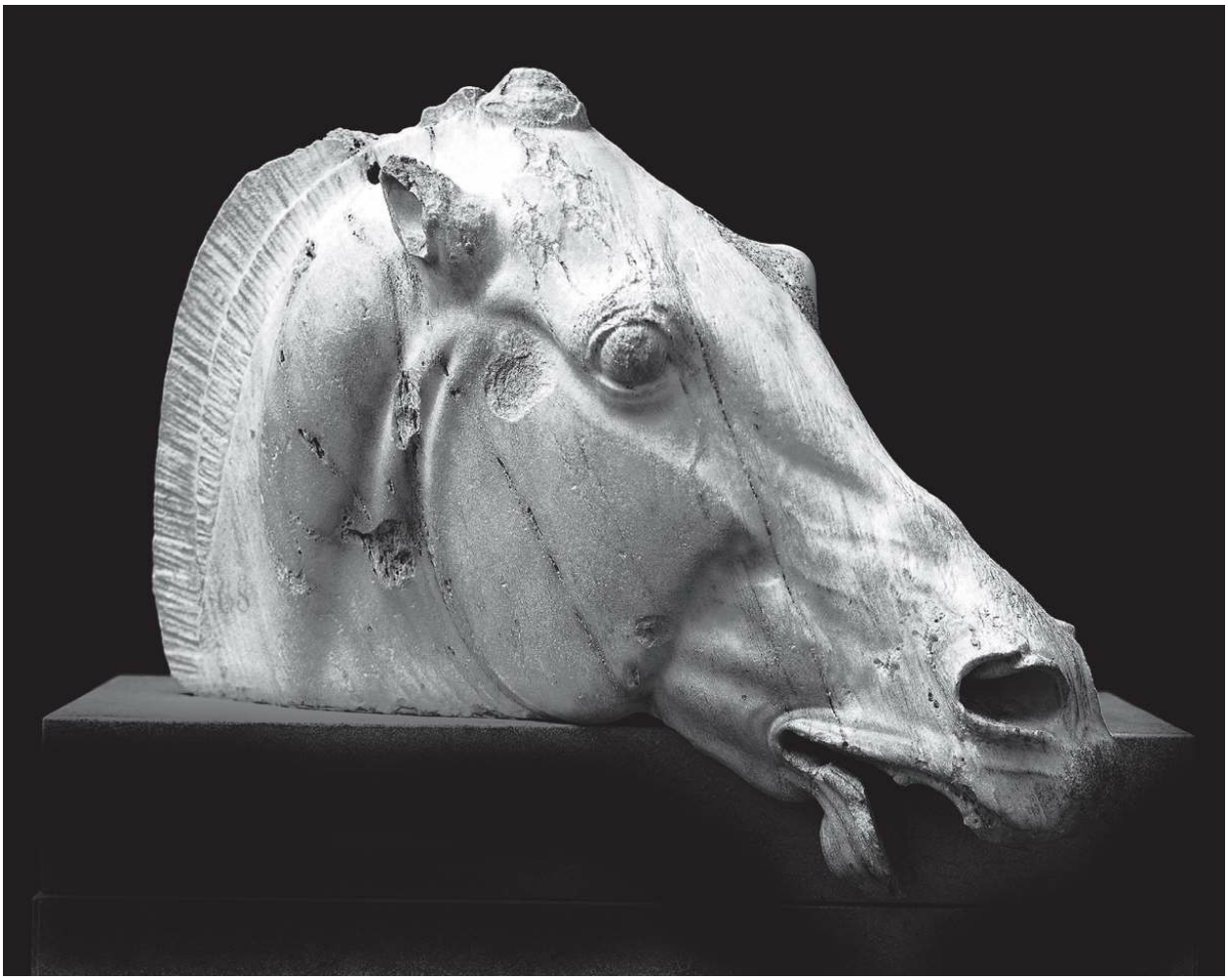
这座希腊史无前例的巨型神殿也是当时最新技术的结晶。希腊是地震多发之地，建筑再雄伟壮观，倘若不抗震也会成为其规划及建造者的耻辱，同时让雅典成为其他城邦的笑柄。

虽然人们建造神殿的初衷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这并不妨碍帕特农成为一件完美融合希腊技术与美学的佳作。它令2500年后的我们不禁对现在的人类是否真的有所进步产生了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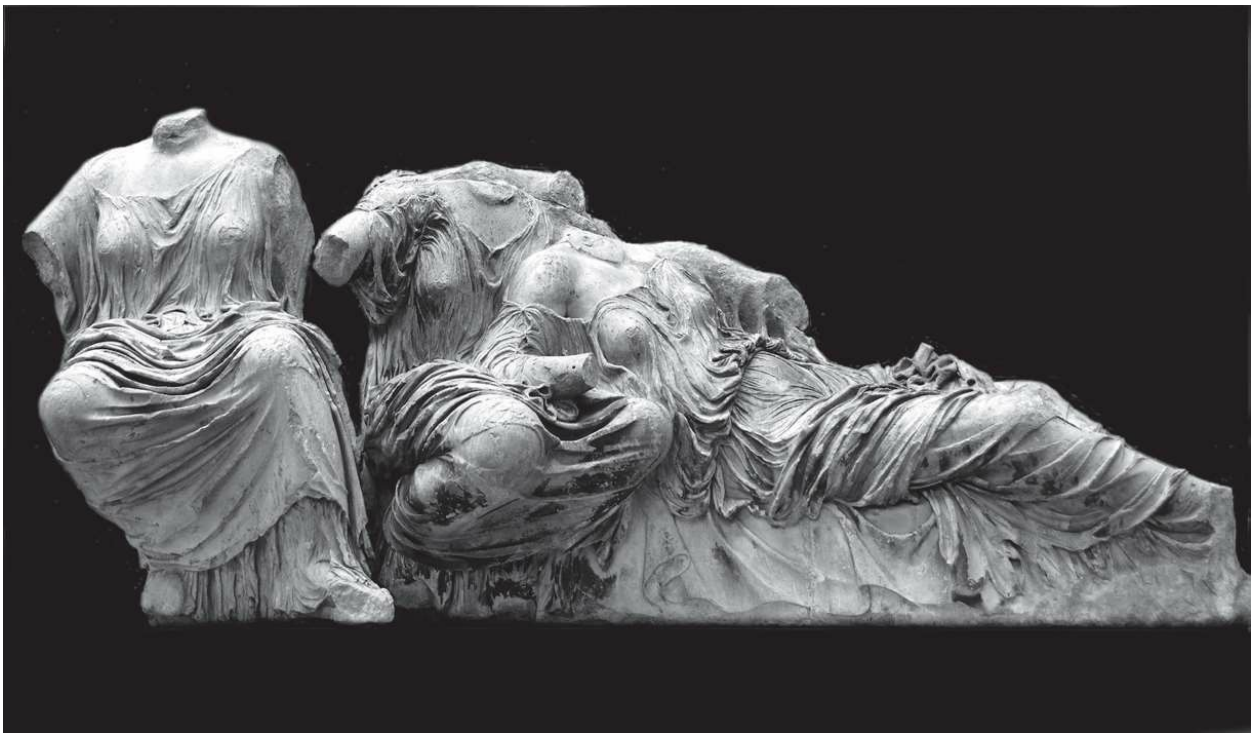
在帕特农神殿建造期间，伯里克利时常造访工程现场，与菲狄亚斯交换意见。艺术家菲狄亚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制作，连续当选将军、受民众所托执掌国政的伯里克利，却不能沉湎于这种快乐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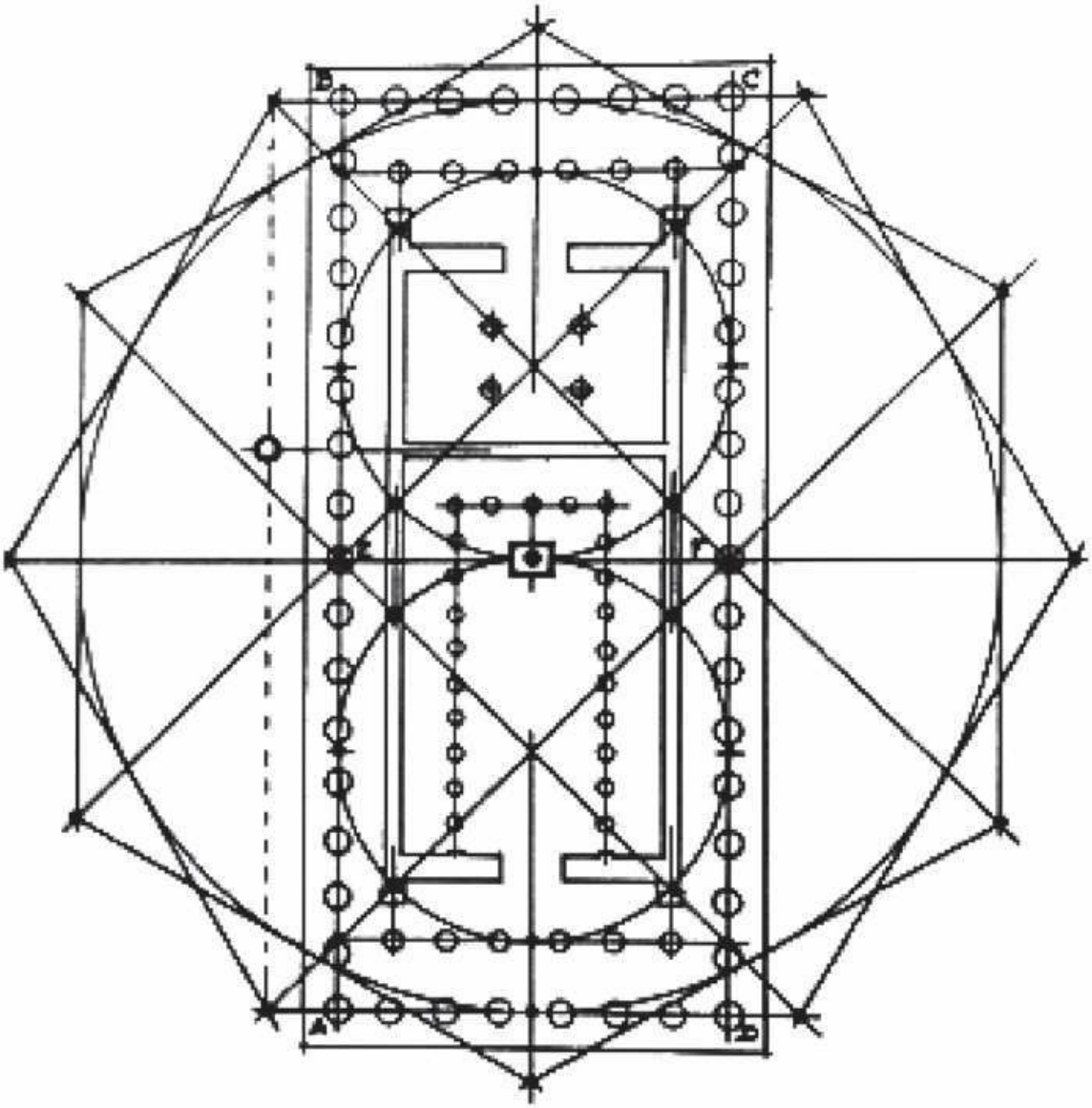
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殿的门楣雕像（复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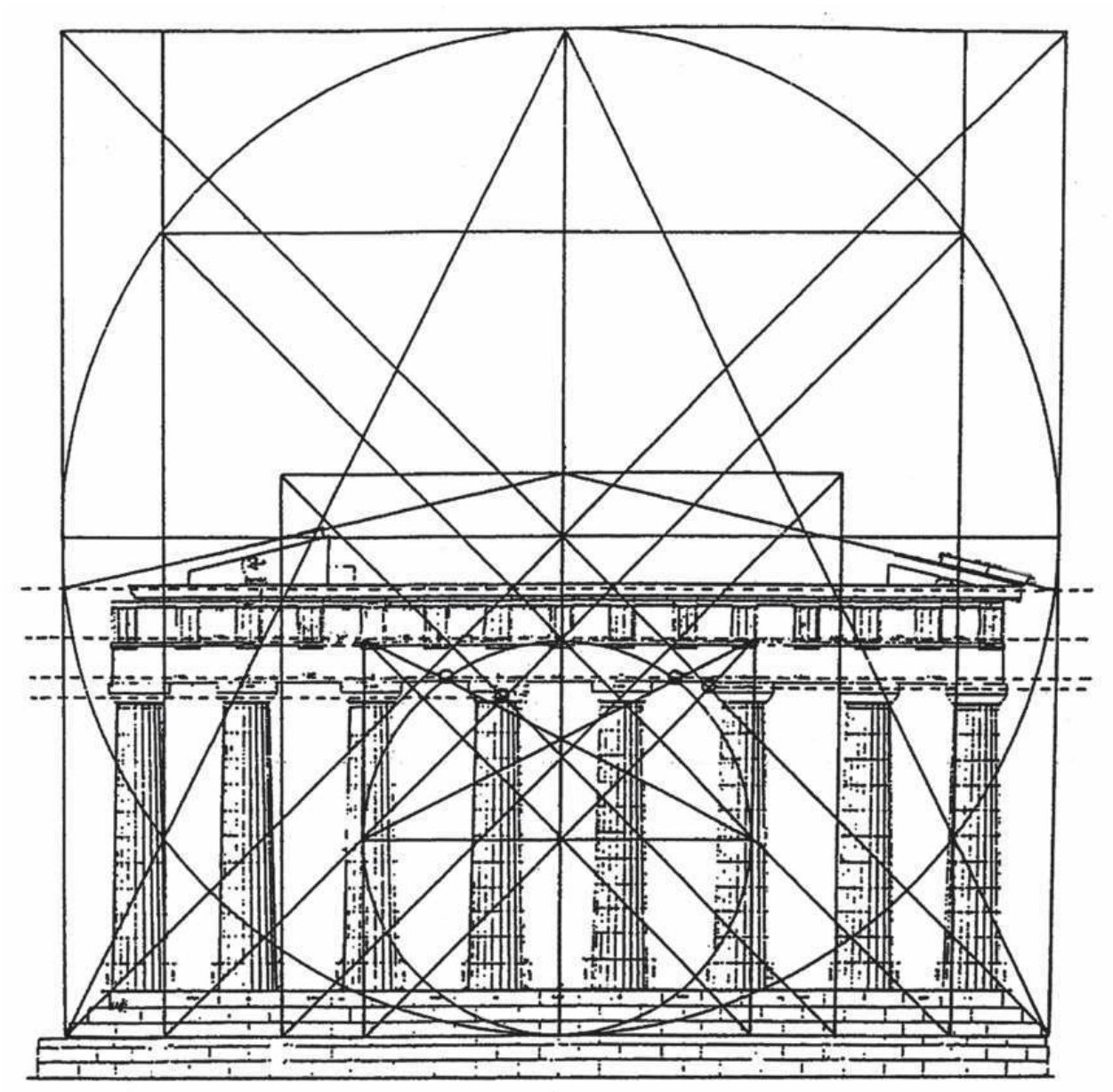
马头



命运之女神



美学与防震技术均来自数学。帕特农神殿的几何分析图。中央应该是放置雅典娜神像的位置。



出处Tons Brunés, The Secrets of Ancient Geometry and Its Use, 1967,P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ublishers.

在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才有的将军是负责政治、外交、军事等所有国家事务的最高职位。雅典每年从10个选区中各选出一人，即10位将军。常年连续当选将军的只有伯里克利，所以他实际上就相当于总理。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的“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由

一个人统治”，指的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一个人统治”指的正是伯里克利。

雅典的劳动者

“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30年的31年。

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时期，这已经成为历史定论。

那么，为什么身为超级资产家、来自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世袭政治家伯里克利能够实现一人统治呢？

这是因为他的理念，或者说他的“政治哲学”，是让城邦国家的所有公民参与政治、行政、军事等国家事务。

其实，他的这个理念本身没有太多的新意。

早在半个世纪前，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就做出了政治改革，让普通的雅典市民也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

30年前，又因为地米斯托克利这位非资产家也不是世袭政治家的将军的上位，雅典第四等级公民、被罗马人叫作“普罗列塔利”的底层公民地位急速上升。

陆地战中，除了从第一或第二等级的公民中选出的将军，决定战争胜败的是第三等级公民占大多数的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成为城邦的主要战斗力。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地战中只担任辅助性的轻装步兵。

然而，在海战中，这种战力对比关系完全颠倒。

在三层加莱船为主流的时代，武装一艘船需要200名船员。其中，船长以下的指挥官、掌船的水手，以及能够应急修理船只的技师合计10人。航行中在船中央待机，当两军接近时，跳上敌船厮杀搏斗的重装步

兵20人，其余的170人都是桨手。

希腊的海上战法是，战船到达前线后降下船帆只靠桨手划行前进。当敌船遭到攻击不能动弹时，桨手以船桨为长枪投入战斗。顺便提一句，波斯战船的桨手都是奴隶。而且他们人口众多，有充足的兵力，无须桨手参与作战。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运用了希腊战法，这非常考验桨手的操作技能。

经地米斯托克利改造的雅典战船相较于波斯一方属于小型船，但建造得非常坚固，而且船底装满石头，这让船只的重量得以增加。

小而重的战船具有不易受海风、洋流影响的优势，但要求船员在司令官发出命令后灵活熟练地操控船只。

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关键，除了战略和战术才能兼备的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就数勇敢的桨手——雅典第四等级公民。

自萨拉米斯海战以来，雅典海军之所以能30年威力不减，也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的雅典海军的特色。

除了爱琴海，在著名的腓尼基海军依然活跃的东地中海地区，雅典海军的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作为划桨手重要来源的第四等级公民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在持续两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向这些人支付了薪酬。

这是理所应当的。战士们再有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还是会对留在后方的家人生计牵肠挂肚，这难免影响士气。这些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必须靠每日出卖劳力以求温饱的穷人。为他们消除后顾之

忧，是司令官应尽的责任。

伯里克利全面继承地米斯托克利的这套模式，是因为他完全认可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相信雅典的未来在海上，雅典将逐步向海洋国家、海洋帝国发展壮大。

要实现这一目标，海军必不可少。那么，作为海军主力战船原动力的底层市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就不能被忽视。

伯里克利将地米斯托克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桨手发放薪酬的临时措施进一步制度化，使之变成国家政策。

支付金额换算成月薪在15德拉克马左右，基本等于桨手们在非兵役期从事本职工作的报酬。之所以以日薪的方式支付，也许是因为海军从秋末至初春通常不会出海，市民们无须服兵役，可以靠劳动谋生。军队只在海战或陆战时才向他们提供生活补贴。

此外，向贫困家庭支付上述金额的三分之二作为补贴，也成为法律。这或许是针对主要劳动力战死的家庭制定的一项遗族政策。因为雅典原本就规定战死者的孩子由国家负担抚养费直至他们成年。

当然，在战场上担任司令官的将军及其手下的指挥官阶层是不适用这项薪酬制度的。这些人一如既往地以零报酬的方式履行城邦国家的公民义务。如果他们战死，国家不会为他们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

这里提醒一句，雅典的第四等级公民，即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无资产者，而不是现在常说的无产阶级。这些人虽然没有赖以生存的财产，但他们本身是出色的生产者。

然而，在资产极具意义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点。

因此，哪怕只是发放小额的补贴，这个政策还是引发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后来哲学家柏拉图指责此举将雅典公民变成了乞丐集团，欲与之一刀两断。稳健民主派批评伯里克利是“过激的民主主义者”。

建造宏伟的帕特农神殿，坚实的地基必不可少。工程总监菲狄亚斯替伯里克利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伯里克利本人必须考虑为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持续繁荣奠定不可或缺的国家基石。因此，他才会想到给雅典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即雅典的劳动者阶层，提供生活的保障，使他们能够安身立命。虽然伯里克利本人是第一等级的资产家，不过想象力让他能够站在对方立场思考。

顺便说一下，在雅典还有两项迫使资产家们掏腰包的政策。

首先他们要担任戏剧演出的赞助人，承担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上演所需的全部费用，这是一笔金额不小的开支。

其次他们要负担一艘三层加莱船从建造至出海所需的费用。建造一艘新战船需要1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超过一个雅典劳动者30年的总收入。

赞助人要负担的不只是新船的建造。作为战船，有战斗力才有意义。因此，赞助人还需要负担170名桨手以及其他船员服役期间的薪水。

与戏剧演出不同的是，赞助人必须担任自己花钱打造的战船的船长，随它奔赴战场。他们就算贡献了钱财，仍然要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

当然，如果他在战场上有英勇表现赢得声誉，或许能当选下一任将军，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倘若战死，那就是万事皆空了。

由此可见，雅典城邦善用民众的力量。或者说，没有忘记民众的活力。

就这样，城邦国家雅典成为一个常备百艘战船（船员2万人）、必要时可以立即出动200艘三层加莱船（船员4万人）的海上强国。

雅典能成为海上强国，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是因为它有一个“熟练技工集团”。为了维持这个集团的存在，哪怕背负“公民乞丐化”的骂名，也必须向无产者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充分为国效力。

在伯里克利看来，最底层的公民皆能积极参政的民主雅典最好的象征就是矗立于卫城山丘上向世人展现雄姿的帕特农神殿。

现实主义者总以为他人会同样基于现实考虑问题，不可能做愚蠢的事情。但伯里克利忘了，希腊人将奔赴战场视为强身健体的延伸。

因《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而深信自己从此远离波斯威胁的提洛同盟的各成员首先开始了动摇。

同时，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的5年停战协议，也即将到期。

“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

希腊的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都有各自主导的同盟。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担任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虽然都叫同盟，性质却相当不同。

在波斯入侵之前，斯巴达与雅典已经是希腊的两个强国。

与大家的想象不同，因吕库古法率先建立起国家体制的是斯巴达并非雅典。雅典后来居上，国力最终超越了斯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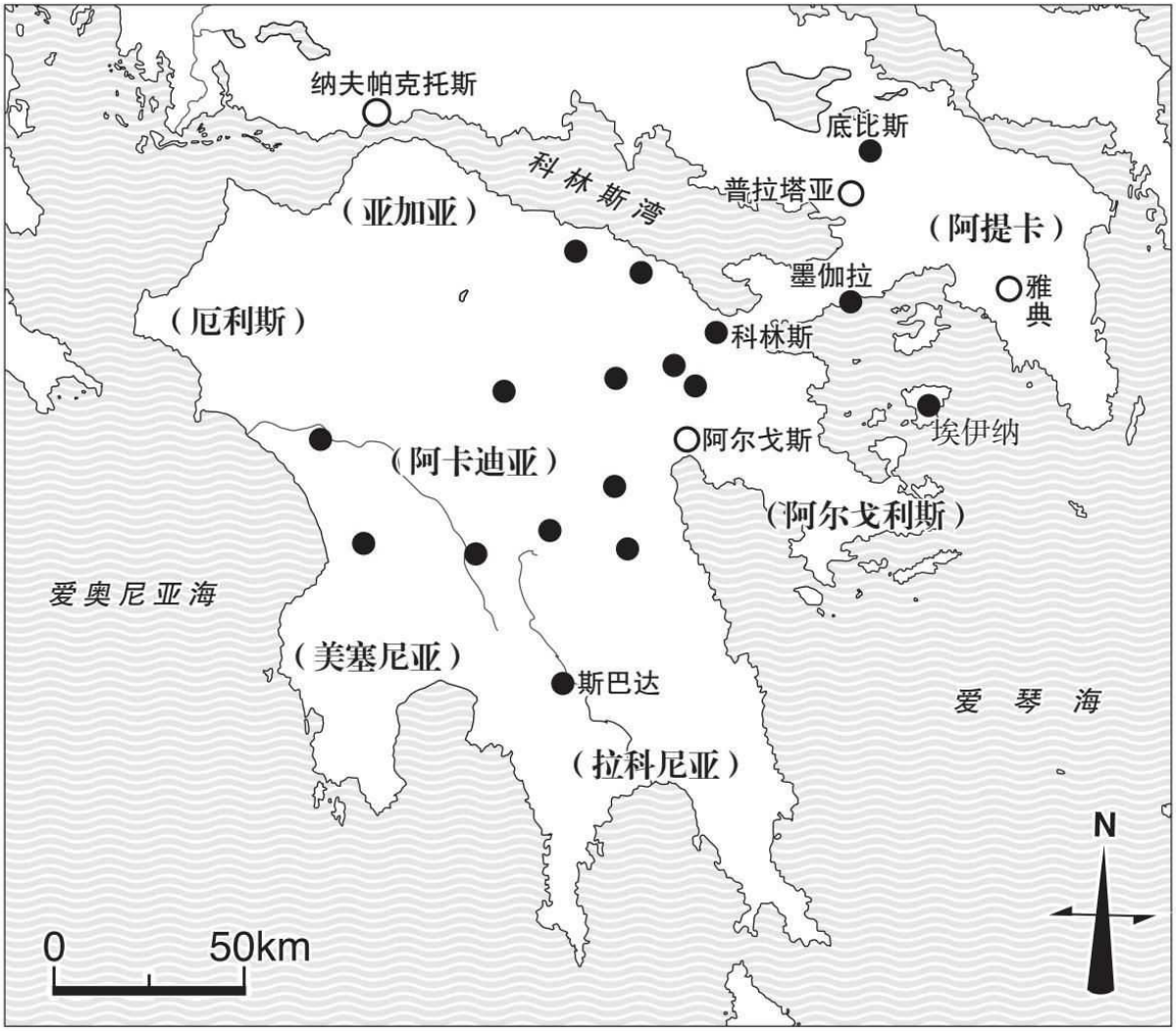
对于两国实力的逆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原因归结于斯巴达顽固的保守主义和雅典的灵活性以及进取心。简单地说，就是后起之秀雅典赶超了固步自封的斯巴达。

两国迥异的国民性也体现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

由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国家联合结成的这个同盟，尽管最初是由斯巴达倡议成立的，但不是始终处于斯巴达主导之下。

斯巴达在同盟中的地位仅相当于议长或裁判。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要成员

因为斯巴达本质上是一个对他国不感兴趣的国家。就连希腊最强悍的斯巴达战士的存在，也是为了镇压没有公民权的被统治阶层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的反抗，并非以扩张领土为目的。

这是吕库古为保护斯巴达制定的规定，对斯巴达人而言，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宪法”。

不过，斯巴达也有过一次扩张领土的尝试。城邦国家斯巴达的领土位于拉科尼亚地区，西临美塞尼亚。由于两地相连，斯巴达打算将邻邦

据为己有。

拥有希腊最强军队的斯巴达要征服美塞尼亚易如反掌，问题是随后的统治让斯巴达犯了难。军队实力再强不过区区1万人，斯巴达人发现他们无法掌控整个美塞尼亚地区。结果，美塞尼亚避免了被吞并，成了斯巴达的属国。

那么，如此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人怎么会与其他城邦结盟呢？

这是因为他们看到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推动下提升了经济实力，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改革让最底层民众也获得了公民权，这一切令斯巴达感到了危机。

斯巴达人以质朴刚健为座右铭，只认可铁币为流通货币，因此无法与他国通商，这样提升经济就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斯巴达人依然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再说国家体制。斯巴达人并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寡头政体比民主政体优秀才选择了前者，真正的原因是，如果实施民主政体，斯巴达就不得不向希洛人、庇里阿西人授予公民权。所以，他们不采用民主制度，同时将民主国家视为威胁。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增强国力的雅典如果远在天边，或许斯巴达人还能做到闭目塞听。可现实是，斯巴达与城邦国家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仅相隔陆路三天、海路一日的距离。

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546年缔结，彼时雅典正处于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末期。在这位僭主的领导下，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相当于斯巴达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阶层）携手共进，迈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庇西特拉图，一贯奉行睦邻外交，其继承者克

里斯提尼专注于国内民主政体的建立，两位领袖对扩张领土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欲望。

没有来自雅典的压力，伯罗奔尼撒同盟事实上变成一个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主导国斯巴达对同盟各国几乎没有强制力。虽然同盟规定斯巴达与他国发生战争时同盟诸国须提供兵力支援远征，但斯巴达几乎没有远征他国的意愿。更何况是否跟随斯巴达远征、提供多少兵力均由同盟各国自行决定，斯巴达无权命令。

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各城邦也没有缴纳同盟会费的义务，这也是松散型同盟的表现。在当时主要流通银币的情况下，斯巴达坚持只认可铁币。哪怕收下了同盟各国缴纳的费用想来也无用武之地。

斯巴达人是出色的“战士”，经济观念为零。他们深信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让人丧失质朴刚健的精神，因此顽固地坚持保守主义。而经济嗅觉敏锐的雅典人顺应形势变得充满进取心和灵活性。

为什么那些与斯巴达“秉性”不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呢？

这是因为各城邦都期待紧急时刻能有名震四方的斯巴达战士赶来救援。更何况加盟不用缴纳会费，这种“期待”是免费的。

就这样，伯罗奔尼撒同盟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并未将雅典视为假想敌。正因如此，为抵抗波斯帝国的再度侵犯，雅典、斯巴达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各成员在第二次希波战争时能团结一致为保卫希腊共同作战。第二次希波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9年，对斯巴达和雅典而言，这两年宛如蜜月。

海上的萨拉米斯之战，希腊人在雅典率领下完胜波斯。翌年，在陆地的普拉塔亚之战中，以斯巴达为主力的希腊军队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成功击退波斯入侵的两年后，提洛同盟成立了。

提洛同盟

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结成70年之后建立的提洛同盟，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抵御波斯。不过制定这个目标并倡议结盟的不是雅典，是居住在爱奥尼亚地区城邦及附近岛屿的希腊人。

这些人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站在波斯一方，与希腊同胞厮杀。当时的爱奥尼亚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这种状态因波斯军的败退而宣告结束。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居民，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不过，彼时的人们并不相信他们能从此远离波斯的威胁。波斯为征服希腊而建的前线基地萨迪斯（Sardeis）情形一如既往，依然由波斯王指派的地方长官管理。从萨迪斯到波斯的首都苏萨有“御道”连接，便于军队移动。爱奥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和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虽然临海，但毕竟立于陆地之上，这些地方的人始终战战兢兢，不忘背后有强敌波斯。

附近海岛也无一例外面临波斯的威胁。莱斯沃斯、希俄斯、科斯（Kos）等岛屿距离陆地仅10公里左右，正如当地的难民偷渡问题显示的那样，哪怕乘橡皮船也能登陆。如果波斯再次来袭，居住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首当其冲。

这些人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打赢萨拉米斯海战并在翌年成功夺回波斯爱琴海海军基地萨摩斯岛（Samos）的雅典。

雅典人接受了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结盟邀请，决定顺势而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雅典霸权领域

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一年取得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翌年又打赢米卡勒（Mykale）海战，从波斯手中夺回萨摩斯岛，成功让爱琴海再次成为希腊人之海。

以此为契机，雅典逐渐发展成希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然而，要让爱琴海长期保持“希腊人之海”的状态，还要牢牢地掌握制海权。要建立所谓制海权首先要让包括对岸在内的相关方进入同一阵营。

海军出征不是坐船去附近的岛屿那样的小事，而是要渡过一望无际

的爱琴海。就算是强大的雅典海军，也必须在秋天返回比雷埃夫斯港。如果能与爱奥尼亚地区结成同盟，靠港、补给以及后勤兵站的问题均能得到解决，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样，在波斯人被赶出爱琴海的两年后，公元前477年提洛同盟成立。

与希腊中部的德尔斐齐名的提洛岛，也是信奉阿波罗的圣地。由于加盟的各城邦代表在此聚集，所以该同盟被称为提洛同盟。与早年建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比，提洛同盟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两者同样是出于防卫目的成立的同盟，但以斯巴达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主要目的在于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提洛同盟是为了守护爱琴海世界。前者主要依靠陆军力量，而后者的主要军力是海军。

其次，斯巴达并不热衷带领加盟城邦开展军事活动，而雅典从同盟成立之初便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点始终未变。

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会遭遇外敌侵略，但不是每年都会发生。而爱琴海上不仅有波斯的船只，还有海盗船出没，所以必须有人定期在整片海域巡逻。能够做到整年不间断巡逻的唯有雅典海军。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提洛同盟的加盟城邦有分担经费的义务。

相较于陆军，海军耗资庞大。光是打造一艘三层加莱船便需要1塔兰特，更何况还需配以人力才能形成真正的战船。一艘战船需要200名船员，其中桨手170人。桨手的技术越娴熟，船只的战斗力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提高战力就得向无资产者占大多数的桨手支付薪酬，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能够常备100艘战船，必要时出动200艘的城邦，也只有雅典。莱斯

沃斯、希俄斯可提供的战船数量不到雅典的五分之一，其他城邦大多只有百分之一，甚至还有一艘战船都无法提供的城邦。

由实力参差不齐的城邦组成的提洛同盟，决定根据各城邦的财力让大家分担同盟每年的支出。

不过每个成员分摊了多少费用，这笔开支占城邦经济收入的具体比例都无据可查。希腊各城邦的经济指标，除了某个时期的雅典之外，都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

估计各成员承担的费用应该不到其收入的一成，因为波斯要求属国缴纳的年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如果提洛同盟的经费超过这个比例，成员可能宁愿接受波斯的统治。

与没有费用分摊机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比，成员必须缴费的提洛同盟的性质迥然不同。这种差异将在日后逐渐显现。

在雅典人看来，只要同盟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就能在爱琴海全域建立起一个大经济体，以这里为市场的各城邦均能得利并迎来经济繁荣，为此缴纳一些费用算不得很大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想法。

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决定将存放同盟经费的金库从提洛岛移至雅典。这个决定在第二年被迅速执行，没有任何加盟城邦提出抗议。同盟成立24年，各加盟城邦早已接受雅典的主导，所以默认了金库的转移。

这样的状态在5年后由于《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开始发生变化。

《卡里阿斯和约》是波斯与雅典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波斯与

提洛同盟的和约。但当时很多提洛同盟的加盟城邦相信这个和约能消除波斯对自身的威胁。此时，提洛同盟成立已30年。

公元前448年，波斯与雅典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提洛同盟的各成员闻风而动。

两年后的公元前446年，雅典与斯巴达的5年停战条约即将到期。希腊所有城邦都知道这件事，大家为战乱时代可能再次到来而惶恐不安。

对49岁的伯里克利而言，这是严酷试炼开始的一年。

“商谈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

最早采取行动的是阿提卡地区东边优卑亚（Euboea）半岛的城邦，它们宣告脱离同盟，不再缴纳经费。

紧接着是提洛同盟成员墨伽拉（Megara），它位于阿提卡的西面。它的行动更进一步，不只是宣告脱盟和停止缴费。

墨伽拉宣告脱离同盟后，伯里克利旋即做出制裁决定，禁止其商船进入比雷埃夫斯港。对此深感不满的墨伽拉，请求斯巴达派兵攻打雅典。

斯巴达人仿佛终于盼来停战协议期满的那一刻，他们迅速发起了进攻。

这里再重申一次，控制斯巴达国政的不是两位国王，而是公民大会每年选出的5位监察官。也许他们认为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墨伽拉脱离雅典有助于维护斯巴达的安全。

率领斯巴达军队的是两王之一的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亲征意味着正规军出动，由此可见斯巴达人志在必得。

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团一旦决定行动就雷厉风行。他们很快穿过墨伽拉进入阿提卡地区，直抵厄琉息斯城（Eleusis）。

以厄琉息斯秘仪闻名的这个城镇，距离雅典不足20公里。斯巴达是否会乘势攻打雅典，成了全希腊关注的焦点。

不料，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竟然以“渐入深秋”这种在南欧不能成立的理由，一仗未打班师回朝。

5位监察官勃然大怒，逼迫国王退位。

对于斯巴达国王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行动，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他收了伯里克利的贿赂。

对此我无法苟同，理由有二。

首先，普雷斯托纳克斯被迫退位后似乎一直生活在斯巴达，后来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在斯巴达的社会环境下，就算他接受了大笔贿赂也无用武之地。以质朴刚健为准则的斯巴达人甚至不懂得如何花钱。城邦上下都没人想到要去建造一座超越帕特农神殿的建筑。

其次，与普雷斯托纳克斯的出身有关。普雷斯托纳克斯的父亲帕萨尼亚斯率军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赢得普拉塔亚平原之战，与打赢萨拉米斯海战的克里斯提尼一同被誉为拯救希腊的英雄。这位英雄父亲最终因监察官的奸计落得饿死的下场。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普雷斯托纳克斯少年时，但他应该不会忘记这场悲剧。

进攻阿提卡是斯巴达监察官的主意，国王只有行动的权力。普雷斯托纳克斯执行了任务，但他对监察官制度向来没有好感，所以才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反而做出撤军的决定，哪怕付出退位的代价。

或许，在厄琉西斯郊外的某处，伯里克利与普雷斯托纳克斯曾私下见面密谈。尽管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有性格上的差异，但这两人毕竟是一辈人，而且伯里克利承认他与另一位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是朋友。

伯里克利擅长洞察人性。身为超级富豪的他不缺贿赂的钱财，但对方是斯巴达男人，而且是一位国王。伯里克利应该不会用钱，而是选择以语言为武器，说服了对方。

无论如何，斯巴达人撤军了，墨伽拉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伯里克利得以集中精力对付优卑亚。

这一次他没有用语言做武器，而是果断投入兵力进行镇压。

优卑亚是与希腊本土隔着一道狭窄海峡的半岛。虽然是半岛，但面积不小，仅城邦国家就有5个。

雅典出动了50艘三层加莱船、5000名重装步兵，共计15000人从海陆两路对优卑亚发起攻击，迅速镇压了反抗。

对背叛雅典的当地居民的处罚，根据表现轻重不一，按当时希腊处置战败者的手法看属于中规中矩的程度。不过，作为杀鸡儆猴的手段，已足够对其他同盟成员起到警示作用。

雅典人的这次武装行动遭到全希腊的谴责。用现代语言讲，他们这是“帝国主义行径”。

带头谴责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科林斯（Corinth）。在斯巴达召开“商谈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也是应它的强烈要求。

科林斯及其周边

科林斯对雅典的敌意并非一朝一夕间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30多年前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期。

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努力下，雅典第一次具备了真正称得上“海军”的海上战斗力。原本希腊第一的海上强国科林斯从此屈居第二。这个差距很快就显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派出200艘战船，科林斯只有40艘参战。

在那个时代，海军实力等于海运实力，也等于贸易实力，三者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贸易带来收入，有收入就可以投入海军建设，海军实力由此愈发强大。

当年双方携手打赢了萨拉米斯海战，战后30年科林斯始终未能夺回海军第一的宝座，自然不会加入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这个贸易立国的城邦以自己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为由，反倒加入了对贸易毫无兴趣的斯巴达辖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不过，当雅典的市场在东方的爱琴海，科林斯的市场在西方的爱奥尼亚，双方商贸圈没有交集的时候，这两个以贸易立国的城邦还不至于公开表达敌意。

《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改变了形势。雅典很难再从波斯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取得土地用作基地。为开拓新市场，雅典把目光瞄向了西方。

雅典拿下了地处科林斯湾的纳夫帕克托斯（Nafpaktos，后称勒班陀Lepanto）。它是大陆通往爱奥尼亚海的出口，而且是在面向最狭窄海域的北岸。随着基地的建立，雅典向西扩张的意图日益明显。

其实，仅靠派驻在纳夫帕克托斯的20艘三层加莱船，雅典尚不能封

锁科林斯湾。但只要它有心，就可以从本国调遣援军与当地驻军联手，包围科林斯湾。

被激怒的科林斯首先煽动墨伽拉反抗雅典。科林斯与墨伽拉在地理位置上是面向科林斯湾又临接萨拉米斯湾的邻居，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然而，科林斯的计谋由于斯巴达国王的撤兵以失败告终。

从科林斯的立场看，事态发展至此，接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全希腊的城邦国家举行会议，在会上控诉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阻止其继续扩张。会议召开地选在斯巴达，主要是因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全体成员可以同仇敌忾向雅典施压，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唤起斯巴达的责任感。

和雅典缔结的5年停战协议到期后，斯巴达也很担心如果不做些什么可能会让希腊再次陷入混乱。

说起来斯巴达男人是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对他国的事务漠不关心，却偏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伯里克利能成功说服斯巴达国王，就是因为他唤起了对方的责任心。

公元前446年的冬天，在斯巴达召开的“商讨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上，雅典被推上了被告席。

主持会议的议长是与伯里克利保持友好关系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没有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率领雅典代表团的是伯里克利。会议进展情况同样无史料可查。

不过，阅读了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我相信伯里克利一定出席了会议。

斯巴达与雅典的分庭抗礼

宣告全希腊30年和平的“共同声明”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希腊世界从此分为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

陆地的强者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海上的霸主雅典主导提洛同盟。

斯巴达首次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地位，在此之前斯巴达对提洛同盟的态度仅仅是不加入。斯巴达的认可意味着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全体成员，包括科林斯在内，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斯巴达的承认是会议的正式决定，它给雅典带来巨大的利益。

最初以防范波斯为目的结成的提洛同盟，在《卡里阿斯和约》签订后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而此时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从前爱琴海沿岸各城邦、岛屿齐心合力对抗波斯的同盟不复存在。如今的提洛同盟变成斯巴达认可的雅典对爱琴海全域享有霸权的代名词。

同盟性质改变了，各成员国不能再以波斯撤退为借口，提出脱离同盟或拒绝分担同盟支出的要求。雅典可以公然打压那些反抗者。

会议还做出了另一项决定。

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将希腊世界一分为二，双方不得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若某同盟中有成员国变节要求救援，另一方不得出手相助。

有了正式的约束，向斯巴达求救的墨伽拉只能与雅典重修旧好。两个反叛的城邦重新回到提洛同盟，一如既往地缴纳同盟经费。而雅典也取消了禁止两国船只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的处罚。

这次会议原本是应科林斯的要求召开的，结果会议正式承认了雅典对纳夫帕克托斯的所有权。自此以后，科林斯的船队只能从雅典海军基地纳夫帕克托斯的海上经过，前往地中海西岸活动。

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斯巴达会无视科林斯的诉求，肯定是因为有利可图。就像其他议题一样，在这件事情上斯巴达与雅典也在私下达成了交易。

近10年来，斯巴达被希洛人的抗争搞得烦恼不断。名震四方的斯巴达战士打平原战天下无敌，打攻城战却一筹莫展，虽然将反抗的希洛人赶进了山里，但后患无穷。他们又不肯接受希洛人提出的以下山换公民待遇的条件。

如果斯巴达赋予希洛人公民权，建立在吕库古法基础上的国家体制就会崩溃。在墨守成规的斯巴达人心目中，公民必须是战士。给予希洛人公民权这种事，一根筋的斯巴达人死也不会答应。

最终他们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斯巴达保证下山的希洛人的人身安全，条件是希洛人必须离开斯巴达统治的拉科尼亚地区。希洛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但要求全员居住在同一地区。

找到一个能容纳万名以上难民的地方并不容易，这让斯巴达又陷入了困境。结果，向斯巴达伸出援手的，正是出席会议的雅典代表。

帮忙不是免费的。雅典可以将这批被驱除的希洛人安置在纳夫帕克托斯，但前提是斯巴达正式承认雅典对纳夫帕克托斯的所有权。

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的5年停战协议期满之际召开的“商谈希腊和平的会议”上，雅典最初处于被弹劾的位置。

而结果是雅典收获最多，而且他们收获的是最实惠的利益。伯里克利不愧是语言的高手，他说服众人转换视角，改变结果，让自己从输家变成赢家。说不定整个会议就是他在背后操控。

这个推断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会后最先展开的行动是让大批希洛人从斯巴达移居至纳夫帕克托斯。请大家不要忘记，当时主持会议的议长是一直以来与伯里克利意气相投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深爱的阿斯帕齐娅

作为极致民主政体的设计者和践行者、人类至高文化遗产帕特农神殿的缔造者，伯里克利受到了后世如圣人般的赞誉。他不仅在公共领域是个不法常可的人，在私人领域也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

如果换一种比较优雅的说法，就是摆脱了固有观念或固有价值观的男人。

年近50岁之际，伯里克利在政治和私生活上都做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事。

恋爱本身不算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事，哪怕恋爱的对象与伯里克利不属同一个阶层，在雅典也完全不是问题。

伯里克利的好友索福克勒斯与情人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仍与原配过着平常的生活，情人始终是外室。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雅典属于正常现象。

伯里克利却不同。

他给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妻子找到再婚的对象，然后与她正式离婚。随后和恋爱的对象结婚，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样的举动在雅典属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更何况这位对象还是在雅典人眼中的外邦——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出生的职业女性。

如果问我希望出生在希腊还是罗马，我会回答，若生为男人两地皆可，倘若生为女人，毫不犹豫选择罗马。

罗马女性拥有财产权，能与男性一同出席宴会，参与社会生活，而在雅典、斯巴达乃至整个希腊，身为女性几乎没有一点儿好处。

在雅典，不论已婚未婚，第三等级以上的女性除了可在节日与丈夫或父亲一起参加例行的神殿祭拜，没有其他的外出机会。日常用品的采购由奴隶代劳，如果想买些特别的东西，可以叫商贩送货上门。街上能见到的女性都属于劳动阶层。那些守着小店忙忙碌碌的女人们反而能享受更多的自由。

那么，中间阶层以上的女人们在家中干些什么呢？她们的生活与荷马时代即神话时代相比毫无变化，无非嘎吱嘎吱地纺纱织布，如荷马作品《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赛的妻子佩涅罗佩一般，坐在机杼前等待丈夫归来。另外，对女人们而言，与家务同等重要的另一项工作是抚育孩子。

在雅典，哪怕是举办会饮，女主人也不会露面与宾客们寒暄。

反观雅典男人，终日出门在外。孩童去学校读书，少年去角斗场强身健体。待成年之后，他们或聚集在大市场高谈阔论，或出席卫城山丘上举行的公民大会。有人前往海外做贸易，也有人服兵役奔赴战场。总而言之，只要生为男人，至少生活不会无聊至极。

雅典的民主政体在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极致，但说到男女同权，却完全没有进步。

正因为是这样的社会形态，有一类女性应运而生。她们能歌善舞、奏乐弹琴，具有能与男性对话的教养，倘若再兼备曼妙的肉体，那就完美无缺了。

希腊人把这类职业女性称为赫泰拉（Hetaira），这些人几乎都是出生于外邦的希腊女子。雅典第四等级公民无资产者家庭的女性或许会在

店铺打工，但绝不会去做赫泰拉，否则那才是做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事。

雅典古典时期的三大雕塑家菲狄亚斯、米隆、波利克里托斯创作女神、女性雕像时使用的模特儿估计都是赫泰拉。艺术家终究也是男人。让雅典良家妇女赤身裸体或只披一层薄纱站在陌生男人面前，她们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相比之下，男模特倒是不愁人选。角斗场、奥林匹亚运动会上飒爽英姿的男性比比皆是。

伯里克利爱上的是一位名叫阿斯帕齐娅（Aspasia）的赫泰拉。

这段情史我早有耳闻。但第一次在梵蒂冈美术馆见到阿斯帕齐娅的外貌时，我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继而忍俊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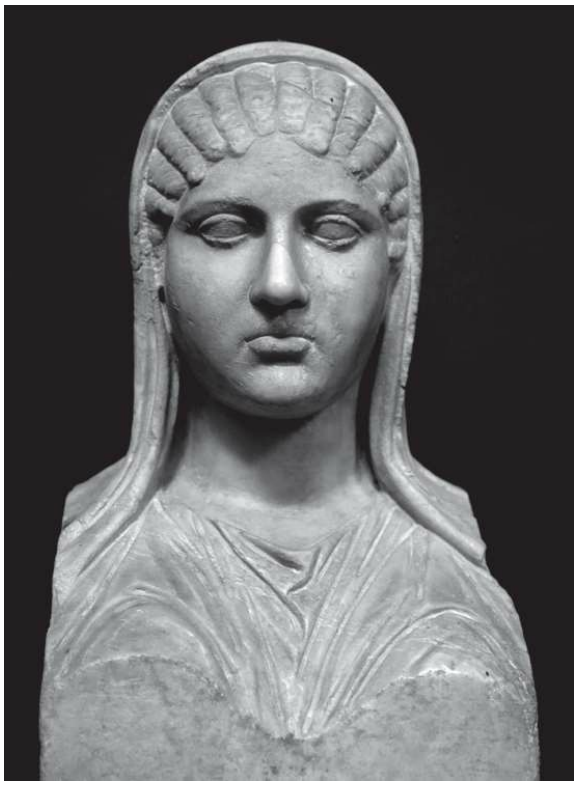
伯里克利及其继任者阿基比亚德，以及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是古代公认的三大美男。他们分别将静谧之美、危险之美、冷峻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绝不是单纯的英俊男子。

我一直以为，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爱上的女人，势必像菲狄亚斯创作的雅典娜或米隆的维纳斯一般倾国倾城。没想到，她竟然是一位胖乎乎的女子。

的确，没有史料证明阿斯帕齐娅是一位美女。倒是有记录称她素养高雅，能够与苏格拉底等雅典学界精英进行平等的对话。

伯里克利与阿斯帕齐娅相差25岁。两人开始共同生活时，阿斯帕齐娅大约2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希腊已经不能算年轻女子，所以说伯里克利爱上的是一位成熟女性。

雅典最高统治者与赫泰拉女子结为夫妻，这件事已经足够不按常理



阿斯帕齐娅

出牌了，不料两人的生活状态更加非同寻常。

伯里克利从不要求阿斯帕齐娅做所谓的良家妇女。尽管他厌恶出席会饮活动，但会不时邀请若干好友来家小聚，聚会上总有阿斯帕齐娅的身影。她不仅与宾客同座，还能参与男人们的话题。

对那些来拜访阿斯帕齐娅的男性朋友，伯里克利也毫无芥蒂。那些频繁出入的男友中有与阿斯帕齐娅同龄的苏格拉底。当时正逐渐表现出哲学家风范的年轻的苏格拉底甚至还带着他的少年弟子一起上门。

结束公务回到家中的伯里克利常常会见到一群年轻人围着妻子谈笑风生的景象。他不会顺势坐下加入谈话，只是向客人们打声招呼，像平时一样拥抱一下心上人，然后将妻子和客人们留在那里，独自走进房间。

研究希腊的历史学家有不少人关注伯里克利对苏格拉底不感兴趣的原因。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对民众说“你们要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恐怕会招来嘘声一片，继而被赶出会场。政治家可能仅仅因为失言就遭到陶片放逐。

国民不要求执掌国家政权的人能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他们需要的是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

伯里克利与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是好朋友，可见他对哲学并非漠不关心。只不过对他来说，哲学是余暇的消遣而不是工作。如果伯里克利听说在他死后一年才出生的柏拉图声称国家政权应该交给哲学家，一定会放声大笑，继而平静地说："那就让他们来试试。"

伯里克利是政治语言的高手。比他年轻25岁的苏格拉底是哲学语言的高手。政治语言和哲学语言完全不同，但他们二人有着不受局外者影响的共性。此外，尽管目标各不相同，但在善于诱导他人接受自己观点这方面，两人非常相似。

和阿斯帕齐娅共同生活后，伯里克利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深居简出是雅典良家妇女一贯的生活方式，但伯里克利时常带着阿斯帕齐娅出门。

他们不是携带祭品去神殿参拜，而是前往渐显雄姿的帕特农神殿的建设工地。两人聆听工程总监菲狄亚斯的介绍，并与他交换意见。此番场景要令那些认为女人的意见一文不值的雅典男人目瞪口呆。

菲狄亚斯是伯里克利家宴的常客，相信他们三人应该常常谈及帕特农神殿。但耳闻与目睹是完全不同的。想来伯里克利是希望心爱的女人亲眼见见那雄伟的建筑。

从古到今，人们对伯里克利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他始终保持着贵族式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贵族式生活与出身高贵或生活奢侈完全无关。

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会泰然自若地去做很多人想做却顾及世俗的眼光

不敢做的事情，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品位与格调。

坚持民主政体，并不需要领袖本人是民主主义者。应该说正因为伯里克利不是单纯善良、一心一意的民主主义者，雅典的民主机制才能保持正常运转。

事实证明，“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时代，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

阿斯帕齐娅陪伴伯里克利走到生命的终点，始终是他忠实、体贴的伴侣。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们有正式的婚姻，但两人之间没有不能成婚的障碍，所以我相信他们是正式夫妻。同时代撰写的史料大多将阿斯帕齐娅叫作情妇或小妾，让人感叹与伯里克利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被固有观念束缚的人竟然如此之多。也许是他们无法容忍伟大的伯里克利居然有一个赫泰拉出身的妻子。无论外人如何看待他们，他们两人相处得很好，还生了一个儿子。

只有一件事，就算伯里克利也会感叹：“这下麻烦了！”

曾有一条他本人提案并得到公民大会核准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出生在雅典，孩子才有雅典公民资格。而阿斯帕齐娅出生在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

伯里克利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病死之后，他那与自己同名的儿子才获得雅典公民权。这还是公民大会看在伯里克利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的面子上，将其作为特例批准的。

伯里克利的儿子在其父死后曾当选将军，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便默默离世。虎父大都有犬子。

阿斯帕齐娅在心爱的人离世后又活了29年。这多活的29年让她目睹城邦国家雅典走向衰败。这是她的爱人耗尽心血想避免的结果。

阿斯帕齐娅死于公元前400年。那是雅典败给斯巴达的4年之后，苏格拉底被雅典宣判死刑喝下毒酒的1年之前。

发生变化的“提洛同盟”

公元前448年签订的《卡里阿斯和约》，让雅典实现与东方大国波斯的分庭抗礼。

公元前446年冬季于斯巴达诞生的宣告希腊30年和平的“共同声明”，让雅典在希腊世界实现了与强国斯巴达的分庭抗礼。

所谓分庭抗礼指的是互不侵犯，雅典即使有扩张领土的意图，也不应轻易碰触那些对两国而言很敏感的地区。

然而，雅典不像波斯在小亚细亚地区之外还拥有辽阔的领土，也不像斯巴达奉行一国和平主义，对发展经济无动于衷。

对于庇西特拉图，雅典人一方面在政治上抨击他的僭主制，一方面又因他推出有利经济的政策而长期拥戴他。雅典正是由一些对经济极为敏感的人组成的城邦国家。

面对这样一群人，处于领导地位的伯里克利自然会热衷于开拓新兴市场。为了不招惹波斯和斯巴达，他将视线投向北面和西面。

迈大步前得先站稳脚跟。具体来说就是摆平国内与提洛同盟。

在国内，面对“公民乞丐化”等批判，伯里克利力排众议，断然通过了向担任公职的第四等级公民发放津贴的法案。

这个政策其实是想让被简单归为无资产者，需要靠劳作养家糊口的第四等级人中产化。

尽管伯里克利独揽大权，但他并没有颠覆民主政体的打算。他知道

建立中产阶级是保证国家体制运作不可欠缺的一环。

不管是叫无产阶级还是无资产者，这个阶层的中产化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对于以海军为军事主力的雅典而言，在安全保障层面也非常必要。此外，中产化还有益于经济发展。也许这个等级每个人的消费力很有限，但他们有人数上的优势，积少成多，终能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说很少提到众神保佑，话题往往围绕政治、军事展开，也常常涉及经济，这一点非常有趣。

古代并不存在政教分离概念。应该说，西方是在多神教的希腊、罗马消亡，进入一神教统治欧洲、一神教信徒的时代，才产生了有必要政教分离的认识。

稳住国内局势之后，接着要确保伙伴的团结，也就是对提洛同盟进行改革。“商讨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召开之后，伯里克利对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决定最大限度利用会议认可的提洛同盟等于雅典势力范围的概念。

加盟诸国根据各自国力提供相应的战船、承担相应支出的规定全面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将超过300个同盟成员分为三类，分别制定规则。

第一类是保证常备战船百艘，必要时可以出动200艘战船的实力雄厚的雅典。

第二类包括平时或紧急事态发生时能够提供的战船数量是雅典五分之一的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三个较大的岛屿。这三个岛屿与雅典都不用缴费。

最后一类是以上4个城邦之外的所有加盟国。同盟免除它们提供战

船的义务，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国力每年缴纳相应的费用。

雅典还改变了征收费用的体系。

爱琴海全域被分为5个征收区，雅典派专门的官吏前往各个区征收费用，从而提高征收的效率。此时同盟的金库已经从提洛岛移至雅典，因此同盟的经费全部集中在雅典。

卡里亚征收区：第二次希波战争时，它是波斯属国卡里亚统治的地区，后因客蒙的积极作战，实际被雅典控制。《卡里阿斯和约》签订后，波斯正式承认它归属雅典以换取塞浦路斯岛的所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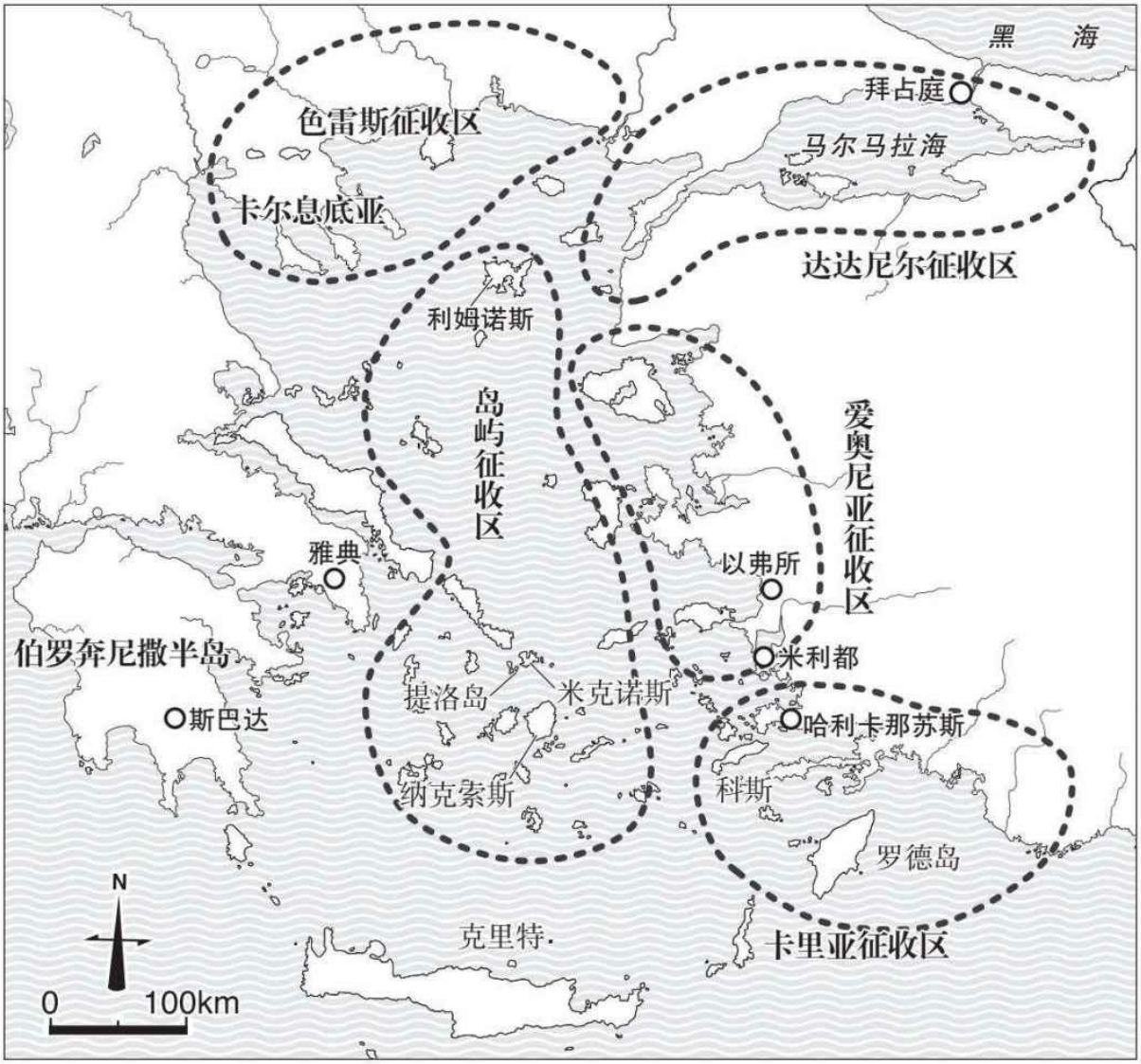
这个征收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偏南部。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那苏斯、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的主要活动地科斯岛，以及这个时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罗德岛（Rhodes），都属于这个地区。

爱奥尼亚征收区：爱奥尼亚地区的中心部，是以米利都、以弗所等为代表的富裕海港都市的聚集区。估计这个地区为同盟贡献了最多的经费。

达达尼尔征收区：包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Marmara），直至拜占庭的海域两侧的加盟国。这片海域有雅典从黑海地区进口小麦的主要线路，因此对雅典意义重大。

色雷斯征收区：背靠色雷斯、马其顿两大王国的爱琴海北部地区。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一直以来都是雅典人海外资产的集中地。

岛屿征收区：包括利姆诺斯（Límnos）、米克诺斯（Mykono）、提洛岛、纳克索斯（Naxos）等散落于爱琴海中部的岛屿。要去这些岛屿征收费用，这一圈跑下来是够辛苦的。



提洛同盟经费征收区

就这样，提洛同盟的名称虽然没改，但其实质与30年前创立时有很大的不同。它从以防御波斯为目的的同盟，变身为各加盟国承认的雅典霸权下的同盟。伯里克利捕捉机会也是眼明手快。

提洛同盟诸国虽然属于外邦，但居民同样是希腊人。伯里克利应该不会认为高压政策是有效的管理手段。他毕竟是无论遭到怎样的批判、

中伤，始终尊重他人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实际上，雅典是以一种相当宽松的管理方式维持着提洛同盟的存在。

对于那些仅负担经费的城邦，雅典没有禁止它们拥有战船。禁止它们保有独立的军事力量，等于明确了它们和雅典的从属关系。把那些城邦变成自己的属地明显有悖希腊人崇尚独立的个性，对雅典来说，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倒不如让它们保留一些沿海警备规模的海军力量，如果近海发生紧急状况，这些海军可以作为一支军队在雅典司令官的指挥下参与战斗。

此外，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一带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造船基地。所有提洛同盟的加盟方都可以在这里定制船只。

向所有加盟方开放的不只造船设施。雅典赢得第二次希波战争胜利不久，地米斯托克利便开始在首都与外港之间组织修建7.5公里左右的长墙。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使雅典在之后的30年间都是爱琴海的一大贸易中心。爱琴海海域这个大经济体内有了商务中心。

提洛同盟各成员方的人在等待定制商船完工期间，可以往返于比雷埃夫斯与雅典之间，专心从事贸易活动。

相比作为军事同盟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转型后的提洛同盟很难简单地定义其属性。

因为它既是军事同盟又是经济同盟，还是人才交流的同盟。

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雅典海军的领导下，爱琴海得以避免敌国和海盗的入侵。

在经济意识超前的雅典人的主导下，爱琴海世界大经济体内的投资与贸易变得更为活跃。

文化方面也有交流和发展。

帕特农神殿工程总监菲狄亚斯是雅典人，而他手下负责神殿建设的两名建筑家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

伯里克利时代的两大代表性雕塑家菲狄亚斯和米隆，前者的才华集中表现在交响曲一般的雕像群制作上，而流芳百世的《掷铁饼者》的制作者米隆则是一位“独奏”的高手。菲狄亚斯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米隆不是雅典公民。

描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雅典人，在他之前书写希波战争历史的希罗多德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哈利卡那苏斯。

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雅典人，他们对弟子们毫不介意。亚里士多德不是雅典人，却书写了城邦国家雅典的政体史，他出生在马其顿，却在雅典做出成就。

提洛同盟是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两个人的“作品”，前者以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奠定同盟基础，后者在此基础上建立同盟。他们的“作品”存在了31年。

随后接棒的是转型后的提洛同盟。它完全是伯里克利的“作品”。

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们的作品能留存于世间，人们对它们的赞誉代代相传。出生在2500年以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见证伯里克利的另一作品帕特农神殿的伟大。

然而，政治家的“作品”无法留存至后世，只能根据它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给出评价。

提洛同盟转型后维持了42年。

在此期间，霸权国雅典一直保持着威慑力。支持雅典的莱斯沃斯、希俄斯岛、萨摩斯岛，除了中间发生某个事件的一段时期，一直留在提洛同盟内，也就是说一直处于雅典的霸权之下。

开拓新市场

在希腊人中，雅典人历来特别富于进取精神，哪怕远赴海外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提洛同盟转型后，雅典人在爱琴海世界的人力和经济投入更为活跃。引导这个趋势朝更恰当、更现实的方向发展，是伯里克利的职责所在。

300年前，雅典人只要借着向海外发展的东风，便能去想去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殖民城市。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面对的形势已有所改变。心仪之地或早已被殖民，或是像拿波里、塔兰托（Taranto）、叙拉古（Siracusa，又译锡拉库萨）那样，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因此，伯里克利改变了策略。雅典会继续向那些有殖民可能的地区输送移民，使之成为殖民基地，但其野心不局限在实现领土扩张上，此外雅典还要与新兴殖民地周边的既有城邦国家结成同盟。

这是伯里克利在缺乏适合的候选殖民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策略。但就是这样一个苦肉计，还是出了问题。

西方世界最早被雅典殖民的地区，是位于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靴底”与“靴跟”之间的图里（Turi）。在它附近有一个叫作锡巴里（ibari）的城邦国家。

锡巴里城邦派市民代表来到雅典，抗议雅典殖民图里是不当的侵略行为。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伯里克利以他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对锡巴里来的代表说，雅典确实给予雅典移民定居地图里一定的援助，但这些利益不仅属于雅典移民，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也享受了权益。

伯里克利的此番说辞颇有成效。再加上锡巴里代表见雅典到处是来自外邦的希腊人，这繁荣的景象令他们相信对外开放会带来很好的结果。

伯里克利劝锡巴里人与图里结成同盟，并且说他已令图里与塔兰托

缔结友好关系，希望锡巴里也能这么做。

塔兰托是无意进行海外扩张的斯巴达人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当时它建国已超过300年，是南意大利最强的城邦。不想与这个强国为敌的锡巴里听从了伯里克利的建议。

其实，伯里克利真正的意图，是向那些因雅典对图里的殖民化行动而对雅典的西进政策抱有警戒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传递一个信号：雅典真正想要的不是以武力扩张领土，而是缔结同盟关系。事实上，没过多久雅典便开始争取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结盟并获得成功。

雅典针对爱琴海北部的北进活动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只取一点作为基地，与其周边城邦结成同盟。

由于对方尚未摸清这种缓和之策的真正意图，在最初的10年，雅典在北方也取得了颇令人满意的成果。

所谓同盟，不是以武力征服对方再与之结盟，而是与没有被征服的地区，与地位对等的城邦联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和其他加盟国的陆军力量不对等，提洛同盟中的雅典和其他加盟国之间仅海军力量便有着云泥之差。

话说回来，只要同盟表面上“对等”，加盟国就愿意相信这是对等的关系。人们总是期待，久而久之“希望如此”会变成“果真如此”。这是人的自然心理。

对于这种虚假的“对等”，斯巴达以不发挥主导作用来尽量避免刺激他国，而雅典乐于主导同盟并将得到的利益分给各加盟国，以求得内部的团结。

对斯巴达式或雅典式同盟的有效性颇为怀疑的罗马人，后来创造出一种与二者不同的获取盟友的方法。

罗马人先征服对手，哪怕战争旷日引久，然后在征服了的土地上开通道路、铺设上下水管道。长期坚持这样的做法，战败者最终被罗马同化。

生活在帝国时代罗马的希腊人、《比较列传——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曾经写道：

“罗马兴盛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同化战败者的理念。”

罗马帝国也许就是罗马人对何谓平等结盟的多国关系所给出的回答。

在提洛同盟转型即将5年之际，其内部发生了首起恶性事件。萨摩斯和米利都这两个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恶化。

萨摩斯岛事件

米利都如今的海岸线已大幅后退，很难想象它2500年前的地势。古代的米利都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10公里宽的开阔海湾。在它的对岸有一个名叫普里埃内的港口城镇，萨摩斯岛看中了这个与米利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小镇，企图占为己有，这成为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萨摩斯岛虽然面积只有雅典的五分之一，但它是提洛同盟中以海军力量加盟的三个岛屿之一。米利都人眼看着强大的萨摩斯势力扩张到仅相隔10公里的对岸，十分担心自己作为海港城市的优势会被削弱。

他们派使节前往雅典，对萨摩斯的侵略提出控诉。

面对这个半径不到50公里的地区发生的麻烦，伯里克利要求萨摩斯也派代表来雅典，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做裁决。结果，萨摩斯岛的侵略行为被明令禁止。

这个裁决点燃了雅典国内反伯里克利派的怒火。他们认为伯里克利偏袒米利都是因为其情人阿斯帕齐娅出生在那里。

不知萨摩斯人是被这些来自雅典内部的反对之声鼓舞，还是原本就对裁决结果心怀不满，他们的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当萨摩斯代表从雅典返回时，迎接他们的岛民同样群情激愤。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前，萨摩斯岛是波斯海军的基地。战后这里又成为雅典海军的基地已近40年，虽然这是提洛同盟内的海军基地，但态度强硬的当地居民还是希望能拆除基地。

不过，就像希腊所有城邦一样，萨摩斯也面临人口不足的问题。武

装战船已经占用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兵力，他们没有余力去袭击基地。

于是，萨摩斯人在附近的波斯领地征募了一支雇佣军，成员都是希腊裔。也许《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让萨摩斯人觉得波斯已经不再是仇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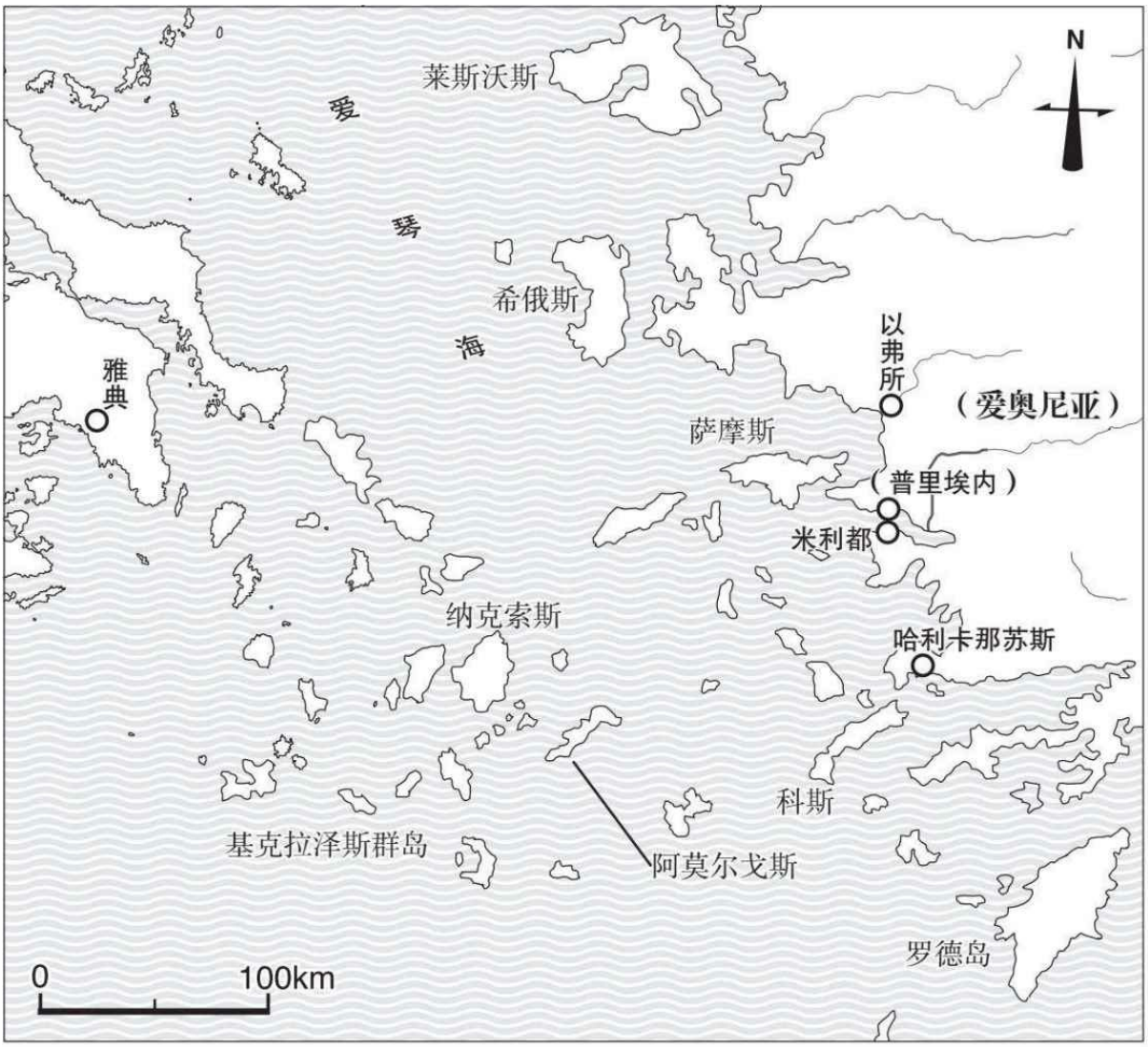
雇佣军袭击了雅典的海军基地。事发突然，雅典军毫无防备匆忙应战，很多士兵被俘。

萨摩斯对这些俘虏既不杀害也不囚禁，而是将他们交给了波斯的地方长官。可见萨摩斯并不想与雅典为敌，同时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对波斯人确实抱有一种似敌非敌、是贸易对象又不能完全信赖的复杂看法。

事态发展至此，雅典不得不采取实际行动。它派遣使节往返两地，召开公民大会征求意见，两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最终，雅典决定派60艘三层加莱船出征。率领这支超过12000人的军队出征的两位将军，一位是已经55岁的伯里克利，另一位是伯里克利的好友、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

率领萨摩斯海军迎战雅典海军的，是一位名叫墨里索斯的哲学家。



萨摩斯岛与米利都，以及爱琴海岛屿

希腊城邦奉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无论本行是干什么的，为国而战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作为武将，伯里克利的军事才能被2500年后的英国人评价为“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除他之外，就是悲剧作家与哲学家在指挥作战。所以，要求他们像说出“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恺撒那般干脆凌厉，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雅典军时而海上出击，时而封锁包围，用了8个月的时间，直到公元前439年的春天才迫使萨摩斯人举手投降。

战败的萨摩斯岛接受了伯里克利提出的所有条件。

围绕萨摩斯而建的城墙被全部拆毁。

原本属于萨摩斯领土的纳克索斯岛附近的阿莫尔戈斯岛，今后归雅典所有。

雅典在这次战争中耗费的总计1400塔兰特的费用，由萨摩斯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全额赔偿。

挑起叛乱的主谋们被驱逐出萨摩斯岛，他们去了海对岸的波斯领地接受波斯王的庇护。

不过，萨摩斯的海军被保留下来，可见伯里克利没有将萨摩斯踢出提洛同盟的意思。

不论是波斯很快释放了萨摩斯交给他们的雅典俘虏，还是雅典将叛乱的主谋交给波斯，这一切让人感觉波斯国王和伯里克利之间有过秘密的沟通，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

与伯里克利同世代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20年来一直将地米斯托克利作为自己的政治顾问。也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他没有与雅典为敌的意思。10年前签署的《卡里阿斯和约》也是在这位国王的积极推动下达成的。

而伯里克利能与假想敌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成为朋友，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这类关系的政治家。

尽管未能达到“我来，我见，我征服”的高度，平定萨摩斯岛一战仍

然向爱琴海全域再次彰显了雅典海军的威力。战事结束后，一直没有加入提洛同盟的拜占庭迅速提出了入盟申请，那些曾经不愿加盟的城邦也接二连三地要求加盟。

尽管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平定萨摩斯岛之乱，但伯里克利的支持率并没有下降。同样是海战，但这一次没有萨拉米斯海战那样激烈，因此牺牲的人数较少。何况，战争费用由萨摩斯岛分期偿还。

不过，反对派依然不肯罢休。他们嘲笑伯里克利说："那个洋葱头大言不惭，称阿伽门农用了10年才攻下特洛伊，自己只用了8个月。"

像伯里克利那样的人不可能口吐如此狂言。不管怎么说，没有超乎常人的神经，大概是做不了民主国家的领袖的。

所幸还有令伯里克利高兴的事情。公元前438年，菲狄亚斯雕刻的雅典娜女神雕像终于被摆放在刚完工的帕特农内殿里了。有精美的艺术品，才有美轮美奂的神殿。它不仅属于懂艺术的人，更是全雅典人的心灵寄托。

神殿从开工到完成耗时9年。卫城全域的建设随后展开，又用了6年的时间。

对艺术家菲狄亚斯和政治家伯里克利而言，以帕特农神殿为中心的卫城整体建设是他们穷其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被入侵的波斯军烧毁的神殿，经过漫长的42年，终于重新建起。这是旧殿无法比拟的、雄伟壮观的圣域。

成为强国不易，保持强国地位更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这有点像获得冠军与蝉联冠军间的差异。

眺望着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帕特农神殿，伯里克利也许正在内心中注视着爱琴海北方。那一带属于提洛同盟的色雷斯征收区和达达尼尔征收区。

爱琴海北侧

色雷斯征收区是雅典人传统上的海外财产集中地，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闻名。因此它对雅典的重要性，用时下的话讲，在于对雅典人权益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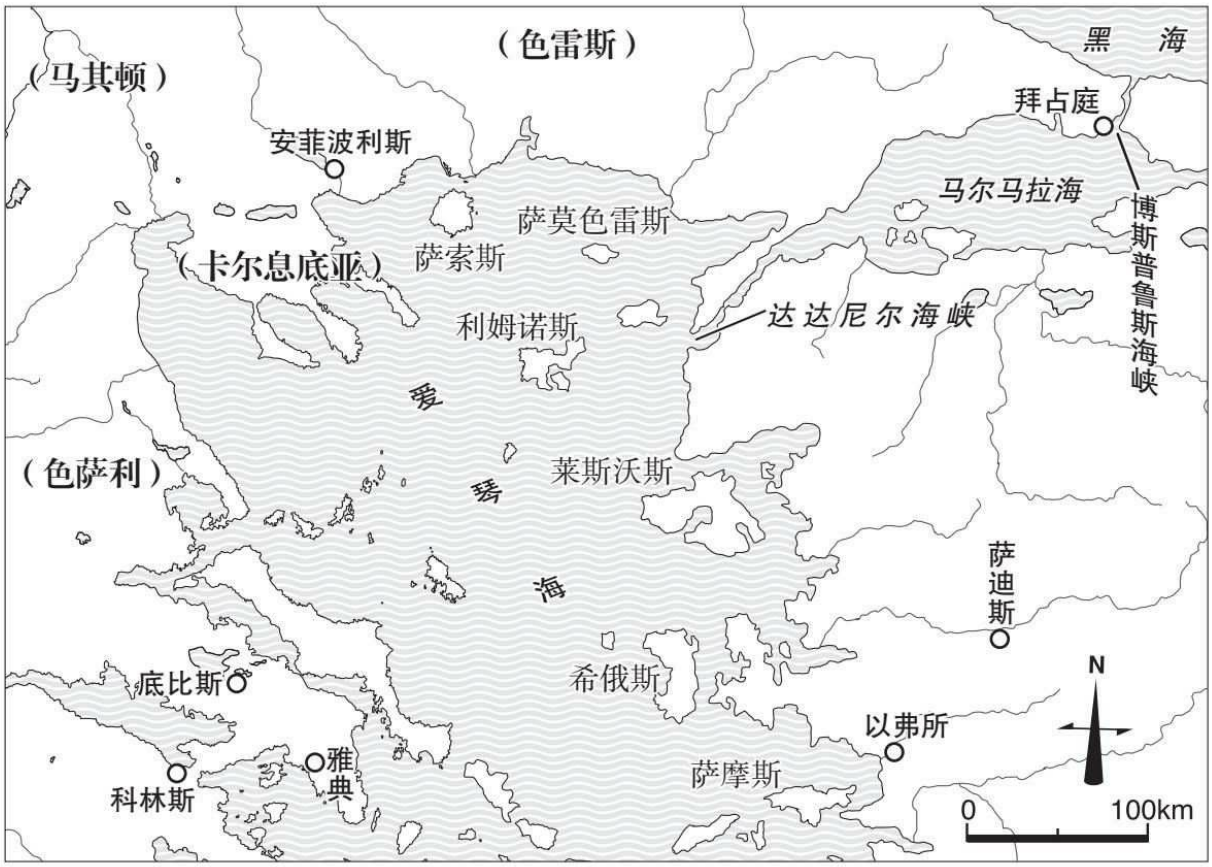
这个保护不仅意味着保护既得利益，还包括对新来者的奖励，因此在进一步提升雅典经济的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统称为卡尔息底亚（Chalcidia）地区的这一带，背后有马其顿和色雷斯两个王国。这两个王国在希腊世界均属落后地区，在那个时代尚未形成南下的力量。

正因为落后，那里的男人们无所畏惧，而且居住在内陆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找走向海洋的出海口。为阻断这股势力，雅典必须在卡尔息底亚地区建立起霸权。

由于那个时代不存在明确的国境线，山脉、湖泊或河川就成了国界。

马其顿王国与色雷斯王国的分界线是个湖泊以及从湖泊注入爱琴海的大河。现在那里已经干涸。



爱琴海和色雷斯地区

这条河的东岸有一个名叫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小镇。也就是说这个小镇正好处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两国边境。

伯里克利看中了这个小镇，下令雅典人移民至此地，将这里变成殖民都市。

把安菲波利斯作为雅典在这个地区的据点有两个明显的好处。

第一，可借此控制其背后的森林地带。这里是建造三层加莱船所需木材的最佳来源地。

第二，在这里确立雅典霸权，相对来说不会刺激北方的两个王国。

雅典人没有必要赶走原住民重新打造一个都市，只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迁入雅典移民即可，甚至可以允许附近地区的人移居这里，这就是伯里克利式的殖民策略。雅典在安菲波利斯建立据点后，继续推行伯里克利式的殖民政策，让安菲波利斯与周边的城镇结成了同盟。

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斯巴达不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雅典相比扩张领土，通过和各城邦结成友好关系构建贸易网才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这些小城邦加入提洛同盟，还可以为雅典军船、商船的停靠提供便利。它们是雅典的贸易对象，同时它们缴纳的同盟经费亦可为雅典带来现金收入。

公元前437年前后，雅典在安菲波利斯一带建立了霸权。翌年，也就是公元前436年前后，59岁的伯里克利决定远征黑海。

那一年，雅典海军北上不是为了在达达尼尔征收区到拜占庭一带建立霸权。因为霸权的建立，也就是把这个地区纳入提洛同盟的行动已经结束且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此次远征的目的是穿过拜占庭前往黑海沿岸城市，在那里建立市场。

黑海沿岸城市中由希腊人殖民建立起的城邦，比较出名的是锡诺普（Sinope）和特列比松（Trebizond）。除了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城邦，位于黑海东岸至北岸的高加索（Caucasus）以及克里米亚半岛，都与雅典有贸易往来。

雅典出口的商品有葡萄酒、橄榄油、优质麻布，以及地中海世界最高级别的红绘和黑绘陶壶，当然还有当时最好的造船技术。

雅典从这个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小麦和木材。木材是保障希腊海军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小麦对于仅首都人口就超过10万人的雅典

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雅典建造三层加莱船的木材来源于卡尔息底亚和黑海周边。同理，伯里克利不打算让黑海地区成为雅典唯一的小麦进口来源地，只把它当作三个进口来源地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叫“多元化”。

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喜爱享受舒适的生活。雅典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国产粮无法满足他们的口味。雅典人很早就抛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小麦一直是他们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传统的进口来源地是埃及和西西里。

然而，埃及和西西里都是由国王或僭主统治的国家，很难保证不发生政变。如果当地政局不稳中断小麦的出口，雅典立刻会陷入粮食危机。

所以，让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是一个必须推行的政策。

伯里克利死后，黑海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原因在于连接黑海与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那里可以说是城邦雅典的生命线。

从粮食安全的政策上，也可以看出伯里克利是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

话说回来。伯里克利这一年率军远征黑海，进行了怎样的海战或陆战，我们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想来他是带着超过百艘的三层加莱船舰队，巡回于黑海周边的各个城邦，与它们缔结了经济协定。

舰队往返于达达尼尔海峡时，恰好可以向海峡两岸的城邦展示雅典海军威风的形象，由此增强提洛同盟加盟国的向心力。

这很像是59岁的伯里克利会采取的做法。

这场远征应该有其他将军作为副将同行，只是不清楚是哪一位。他肯定不是4年前镇压萨摩斯岛叛乱时出征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连年当选将军，而悲剧作家此后再也没有当选过。

这里讲一个笑话。

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一次，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说："雅典竟然每年都能找出10位将军。我这里始终只有帕米尼欧（Parmenion）一个人。"当然，这完全是在嘲讽雅典。

民主政体雅典独特的官职将军在执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是军队的司令官。每年从10个选区各选出1位，共计10人。

不过，很难保证各选区每年都能选出称职的人才。或许应该说，庸才当选的概率更大。

伯里克利自知军事能力不足，但他有发现军事人才的能力。事实上，对于比自己年轻约15岁的弗尔米奥（Phormio），他就用得非常出色。

海军将领弗尔米奥骁勇善战，但仅靠他一人作用有限。伯里克利时代战争不多，或许就是因为军事方面人才不足。作为连续当选的将军，伯里克利肩负率军出征的职责，但是在30余年的伯里克利时代，他亲自率军出征仅有三次，即萨摩斯岛平定战、黑海远征，以及最后的近海出征。

如果因为统帅人才不足就可以避免战争的话，那战争这种罪恶的现象早就应该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了。现实并非如此。战争的发生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伯里克利从黑海回到雅典的第二年，战争的火苗就再度燃起。

战争始于边陲

听到埃比达姆诺斯（Epidamnus）这个地名，能够立刻指出它方位的人，在当时的希腊恐怕寥寥无几。

罗马时代，埃比达姆诺斯改名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作为横贯希腊的埃纳提亚大道的起点，成为战略重地。但300年前，埃比达姆诺斯只是一个位于希腊世界西北边缘、毗邻亚得里亚海的小镇，是众多希腊城邦中的一个普通的殖民城市。

不过，那里的居民也是希腊人，是只要有10个人聚在一起便能分成两派相互争斗的希腊人。

内斗这种希腊世界里的常见现象也在埃比达姆诺斯上演。输的一派向附近的科孚岛求救被拒，继而转投科林斯，科林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尽管被雅典拉开了差距，但科林斯依然拥有希腊第二强的傲人的海军实力。科林斯是一个海运大国，并且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主要的市场位于地中海方向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科林斯之所以接受埃比达姆诺斯残党的救援请求，是因为他们打算借机攻占科孚岛建立霸权，夺回被雅典不断蚕食的西方市场。

于是，事情跳过埃比达姆诺斯，变成科孚岛与科林斯的之间的对立。两方相争的结果竟然是科林斯输了海战。

说是战败，其实科林斯不过是损失了15艘战船并撤退而已。而科孚岛人因为这个意外的胜利狂喜不已。他们不仅拒绝归还俘虏，还杀了为

科林斯打仗的异邦士兵，或将他们变卖为奴，这种种野蛮行径在希腊十分少见。

公元前435年，发生在希腊世界边陲的争端就这样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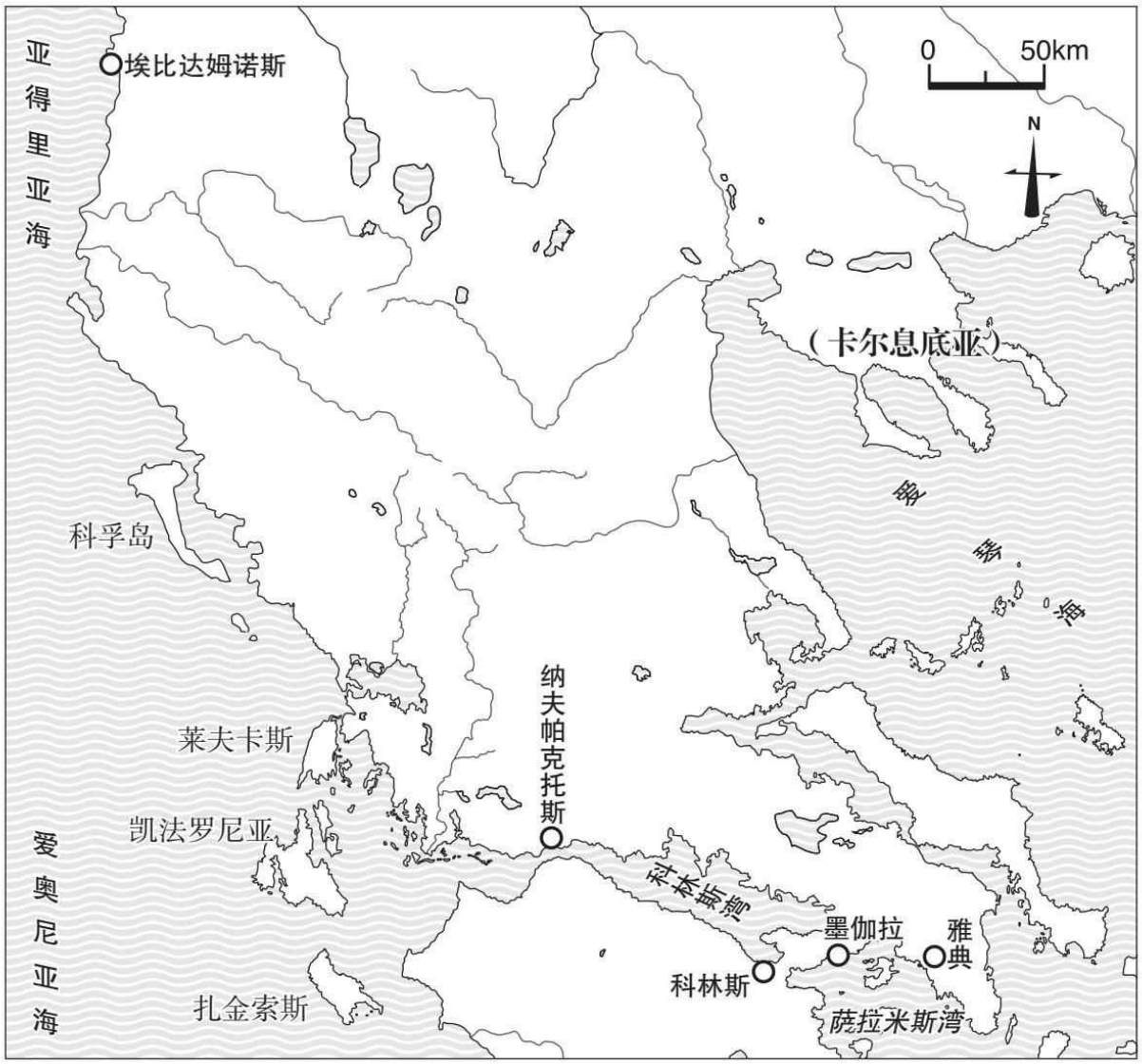
第二年，实力远胜科孚岛的科林斯为一雪前耻、重振国威而积极备战。他们在希腊全境招募桨手，组成一支大规模的海军舰队，誓要扳回一局。

科林斯备战的消息引起科孚岛的恐慌，惊恐之下科孚岛转向雅典求援。他们派去的全权特使表示，翌年科孚岛与科林斯必有一仗，希望能与雅典结盟，得到雅典海军的支援。

得知此事的科林斯也派了使节前往雅典。这或许是遵循了希腊人先辩论再动手的传统，但真正的意图只有一个——不希望雅典插手此事。由于科林斯特使说话欠缺外交技巧，雅典人显得十分不悦，尤其是伯里克利，态度十分冷淡。

其实这件事并不简单。发生在偏远地区、仅限于局部战的敌对活动有扩大至希腊全境的危险。

那么，听完科孚岛和科林斯使者的申诉以后，61岁的伯里克利做出了怎样的决断呢？



科孚岛和希腊东北部

首先，雅典接受科孚岛的结盟请求。也就是说，科孚岛成了提洛同盟的一员。

自从雅典将位于科林斯湾出口的纳夫帕克托斯变为殖民基地，在意大利南部的图里开展殖民活动以来，伯里克利脑海中向西拓展市场的蓝图变得越来越清晰。与科孚岛结盟，等于为他的西进战略又添了一块基石。

既然双方已是同盟关系，雅典决定派海军支援科孚岛。

不过，雅典不打算与科林斯全面为敌。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雅典要尽量避免刺激盟主斯巴达出手干预。

于是，雅典人采取了意大利俗语说的“给锅不给锅盖”的办法。

他们向科孚岛先派遣了10艘三层加莱船，后来又派去20艘。这个数字令现代史学家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看漏了一个零。

伯里克利甚至严令战船的指挥官们不得与科林斯海军直接交战。

就这样，在公元前433年的夏天，科孚岛和科林斯以一种奇怪的形式在海上展开了对决。

第一仗科林斯差一点儿取得压倒性胜利。之所以差一点儿，是因为科孚岛船队在10艘雅典战船的保护下成功逃脱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三周后展开的第二仗，战况更加滑稽可笑。

为了保全海军大国的面子，志在必得的科林斯组建了150艘战船的大规模舰队朝科孚岛前进。另一方的科孚岛海军依然是在10艘雅典战船的护卫下南下迎战。

就在科林斯海军接近作战海域时，他们接到报告，得知另一支雅典海军船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奥尼亚海，正向这里逼近。

科林斯海军司令官以为雅典派来了200艘战船。虽然报告说是只有20艘，加上先遣的10艘，统共不过30艘，但了解雅典海军实力的科林斯海军司令不相信，在这个数字上加了个零，确实200艘看起来更合乎常理。

科林斯纵有150艘战船，但毕竟不是200艘的对手。于是科林斯决定不和雅典交战，直接撤退了。

科孚岛和科林斯的对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希腊。传言往往省略细节，结果变成“雅典海军稍稍靠近，科林斯海军便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颜面尽失的科林斯人火冒三丈。此时他们的怒火已不再针对科孚岛，而是朝向雅典爆发。13年前被逼喝下的苦水，仿佛又回流到喉咙口。

在斯巴达召开泛希腊城邦会议后，纳夫帕克托斯这13年来始终是雅典的基地。

面对牢牢占据科林斯湾出口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科林斯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更何况拿下纳夫帕克托斯之后，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向属于科林斯传统市场的西方海域延伸。

当年的泛希腊城邦会议决定将希腊世界一分为二，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约定互不侵犯对方的势力范围，可如今科林斯却不能抗议雅典违反了约定。

因为雅典染指的西方海域及其岛屿，不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陆地城邦联合体的势力范围。

南意大利的图里在塔兰托、叙拉古两大强国势力范围之外，爱琴海北侧的安菲波利斯位于色雷斯、马其顿两大王国分界线上，可见伯里克利总是瞄准两大势力圈之间的“缝隙”建立雅典的殖民都市。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登场的各路英雄里，女神雅典娜最宠爱且不遗余力给予帮助的，不是勇敢的阿喀琉斯，而是献出木马计终结长达10年特洛伊战争的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城邦国家雅典将雅典娜奉为守护神，崇尚智慧。和前一代领袖地米斯托克利一样，伯里克利也是一位典型的雅典人。

然而，科林斯人不是雅典人。这里再借荷马之言，科林斯人“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但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

科林斯复仇的对象变成了雅典。复仇的怒火让他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会令伯罗奔尼撒同盟卷入战争。

公元前433年初冬，成为全希腊笑柄备受屈辱的科林斯得到一个雪耻的机会。用欧洲人的话讲，这个机会仿佛“摆放在银盘上被端了上来”。

换言之，向雅典复仇的机会不是科林斯自己创造的，是意外送上门来的。

扩大的战线

无论先进还是落后，王权国家都存在一个缺陷——王族容易为争夺王位发动叛乱。马其顿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胞弟发动了企图夺权的叛乱。

这本是一场马其顿王国内部的斗争，可唯恐王位不稳的国王想要到国外寻找支持。马其顿国王看中的是位于马其顿南边、正在雅典霸权下逐渐兴起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一个叫波提狄亚（Potidea）的海港城市。

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各城邦中，马其顿国王为什么偏偏挑上了波提狄亚呢？

如果按照提洛同盟经费征收区划分的话，波提狄亚隶属“色雷斯征收区”。当地居民对于雅典霸权逐渐产生不满，这正是马其顿国王看上它的原因。佩尔狄卡斯认为，只要向波提狄亚人表明自己反雅典的立场，势必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

有关这个地区的居民对雅典不满的原因，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与希腊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有关。

事实上，人们的不满很少源于高贵的精神，更多时候是基于非常实际的问题产生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居民对加入提洛同盟并没有异议，他们只是不喜欢负担经费。

恺撒说过：“但凡是人类，并非个个都能正视现实，大多数人只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

与爱奥尼亚相比，卡尔息底亚属于爱琴海世界的落后地区。

人们不太会考虑加入提洛同盟这一经济体能获得的利益，反而对负担经费深恶痛绝。加入经济体的好处无法明确计算，但是向雅典缴纳经费的不利，却是有确凿的数字证明。

这类人的看法虽然片面但并不令人吃惊。当波提狄亚的居民知道马其顿国王会做自己的后盾时，一下子信心大增，继而想到把不久前因为雅典丢了颜面的科林斯拉进同一个阵营。

这种“摆放在银盘上被端上来”的好机会，科林斯自然不会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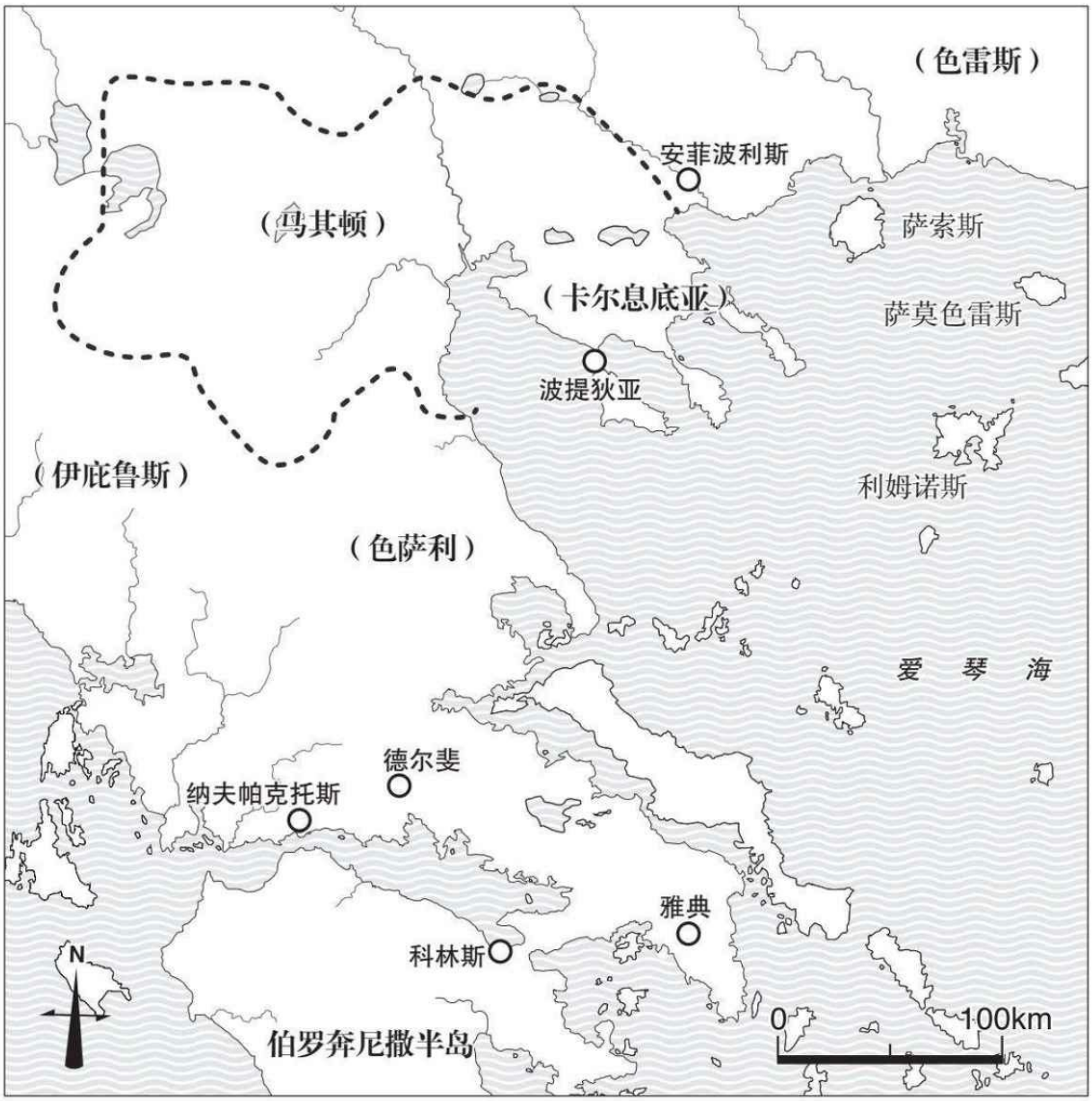
不过，在希腊世界属于先进国的科林斯可比波提狄亚考虑得多。

如果科林斯派遣正规军，便违背了泛希腊城邦会议上确定的两大同盟互不侵犯对方势力范围的约定。波提狄亚所处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属于提洛同盟。另一方的科林斯虽说被雅典摆了一道，但毕竟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

于是，科林斯决定组织一支“志愿军”去支援波提狄亚。

科林斯在除斯巴达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招募了2000名“志愿军”。他们的军饷由科林斯支付，事实上属于科林斯军队。但由于没有科林斯公民加入，不是正规军，所以无须征得盟主斯巴达的同意。

2000人的雇佣军没有走海路前往目的地。爱琴海的制海权掌握在雅典手中，在海上航行极有可能遭遇雅典海军。如果雅典人发现他们所乘船只属于科林斯，那么科林斯的参与便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决定先坐船北上到卡尔息底亚地区，然后沿陆地长途行军至波提狄亚。



马其顿和卡尔息底亚地区

但是，在科林斯出手之前，雅典抢先采取了行动。年届63岁的伯里克利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与科孚岛问题的性质不同，卡尔息底亚地区某个城邦的反雅典叛乱大有蔓延至提洛同盟其他城邦的危险。拒绝支付同盟经费这个倡议，任谁都能理解，任谁都会同意。

公元前432年5月，希腊已进入夏天。1 000名重装步兵即雅典正规军搭乘30艘三层加莱船离开了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这是第一支先遣军。紧接着，雅典决定再出动40艘战船运载2 000名重装步兵。

两支军队都由将军率领。出动重装步兵可见侧重点在陆战。为镇压一个海港城市的叛乱，雅典居然投入了合计70艘战船和3 000名重装步兵。

去卡尔息底亚地区旅行过的读者，应该理解我下文的意思。

那里的地形犹如三叉戟般插入爱琴海，相比组成队列的正规阵地战，更适合打游击战。而且，正规军打仗非赢即输，而游击战只要不输就是赢。

此外，拥有最强实力的雅典海军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一般来说，若海军从海上发起攻击，就算攻击再猛烈，岸上受攻击的一方只要躲起来熬一阵子，总会等来进攻方的撤退。

与之相反，从陆地发起攻击时，对方躲藏也好忍耐也罢，进攻方是不会轻易罢休的。换言之，对方只要不举手投降，进攻方就不会撤退。

斯巴达军队出兵并不频繁且规模只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希腊世界之所以能保持不怒自威的姿态，靠的就是陆军斩尽杀绝的攻击力。

这多少有点像现代战争的空中轰炸与陆上攻击的不同。

为了弥补陆地战方面的不足，自客蒙以来，雅典一直将平原会战的主力重装步兵当作“海军陆战队”使用。不过像卡尔息底亚那样的地形，“海军陆战队”恐怕无用武之地。

雅典面临的不利因素除了地形还有将军指挥作战的能力。雅典并不

是每年都能出现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能攻坚克难的天才。

就这样，从夏到秋，雅典久攻不下。如果雅典从波提狄亚撤军，提洛同盟就有解体的危险，所以绝不能退兵。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认识到雅典誓不罢休，于是抛弃波提狄亚，再次与雅典接触，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国王态度的转变对局势完全没有影响，这足以证明马其顿在当时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偏僻王国。

雅典攻城不下，斯巴达也左右为难。

尽管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没有正式参战，但那些与雅典军作战的人再怎么说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

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的，首先是“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的科林斯人。同时，斯巴达的5位监察官也在背后煽风点火，对他们来说，做这种事实在易如反掌。

以“吕库古‘宪法’守护人”自居的5位监察官是维护国家体制的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反雅典派。由此，反雅典的势头在斯巴达国内不断高涨。

14年前在斯巴达举行的泛希腊城邦会议上，斯巴达和雅典以“30年和平”之名达成了平分天下的协议，按理说这样的状态还应该持续16年。然而，就在和约达成14年后的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都面临着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

“战争”这个魔物

形势变成这样出乎科林斯人的预料，也不是斯巴达和雅典所希望的。正因为不想参与战争，两国才会在14年前缔结希腊史无前例的长达30年的停战协定。

如果严守协定，雅典军攻击的包括波提狄亚在内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无权干涉，因为上述地区在提洛同盟辖内。但是在那里与雅典人打仗的又是科林斯派去的2000名伯罗奔尼撒“志愿军”。

不久，原本已够复杂的局势再添变数。或许是受到善战的波提狄亚的鼓舞，墨伽拉表示脱离提洛同盟，事态愈发错综复杂。

墨伽拉位于雅典首都阿提卡地区以西，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它的西面与科林斯边境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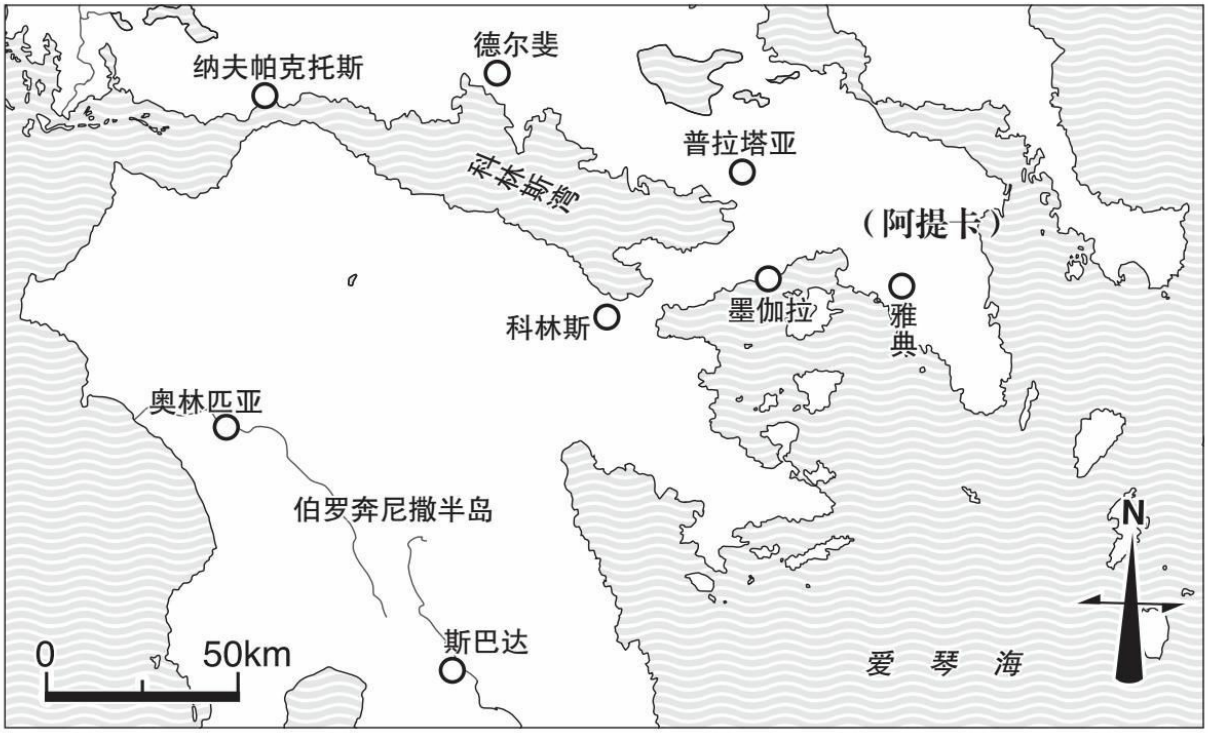
不知是否受到科林斯的煽动，墨伽拉不仅宣布脱离提洛同盟，而且要求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对于邻国的这一举动，雅典迅速出手反击，禁止墨伽拉船只停靠比雷埃夫斯港，宣告与墨伽拉断绝贸易关系。

雅典的决定等于给斯巴达监察官们的反雅典情绪火上浇油。他们声称雅典无权对自愿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墨伽拉做出如此不公的制裁。

不过，斯巴达内部还存在着以阿希达穆斯国王为首的不希望与雅典发生冲突的派系。

结果，斯巴达的民意罕见地分成两派。



墨伽拉及其周边

发生类似情形时，斯巴达人通常会前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听取女祭司传达的神谕。在雅典，人们会因个人问题去神殿求神谕，但国家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而斯巴达人对待国事、家事都一样。

向来言语含混不清，需要助理祭司翻译的女祭司，这一次的回答异常清晰："如果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全力以赴，他们将会取得胜利。只要向阿波罗神祈祷，神会保佑伯罗奔尼撒人。"

对这条神谕的真实性，不仅我们现代人，就连古希腊人都表示怀疑。且不说天神附体的女祭司是否可信，那些将女祭司意味不明的话翻译给祈求神谕者的助理祭司有不少都被人收买了。

不过，斯巴达人比任何城邦的人都笃信著名的德尔斐神谕，想来不会染指收买之事，而科林斯人倒有这个可能。

各国的谨慎派

在斯巴达内部，谨慎派是有实力的。

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国王阿希达穆斯。这位20多岁即位、与伯里克利年龄仅相差1岁的国王，从开始治国便不断遭遇变故。特大地震、希洛人造反接踵而来，最初的15年可谓历尽艰辛。

雅典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后，这位斯巴达国王的生活也变得安稳起来。斯巴达国王肩负率军出征的职责，但阿希达穆斯几乎30年不曾奔赴战场。因为在此期间，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希腊强国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阿希达穆斯还以私人身份拜访了伯里克利位于雅典郊外的庄园。

睽违30年，两大强国再次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站在第一线的这两人，不知内心作何感想。

他们都是超级精英家庭出身。阿希达穆斯来自吕库古“宪法”之前便统治斯巴达的古老王族，伯里克利是梭伦改革前便已存在的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

他们在年纪上属于同辈。在两国关系变得紧张的公元前432年之前，阿希达穆斯年纪轻轻就登上王位，做了32年的斯巴达国王；伯里克利在“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雅典，保持了长达29年的一人统治。

此外，这两个人的气质似乎也很接近。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介绍过他们两人的演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

的演说几乎不曾提及众神、神谕、命运等，反倒传达了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的信息。想到这些话出自2500年前的男人之口，我不禁为他们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平衡能力惊叹不已。

他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思想，应该是与常年位居高位的经验，以及由此蓄积的责任感有关吧。

不过，这两位也各自戴着束缚自己行动的“脚镣”。

对伯里克利而言，他的“脚镣”是雅典的民意。在实施民主政体的国家执政，自然不能无视民意。但是民意有一种看近不看远的特质。

伯里克利用近处的利益、肉眼看得见的实绩，以及动人的语言这强大的武器，成功掌控了民意。正因如此，他才能作为“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统治者，保持30年地位不变。

然而，当紧急状态发生时，普通民众多少会失去冷静变得冲动。在公元前432年秋冬的雅典，伯里克利的“脚镣”变得沉重起来。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的“脚铐”是每年公民大会选出的5位监察官。

这5位监察官负责的可不仅是把有先天缺陷的婴儿摔下悬崖，他们真正监管的是来自两个王族的两位国王。防止国王独断专权，是监察官们的首要任务。

当初吕库古为斯巴达设计出这个独特的制度的确有其实际的意义。当时两个王族拥有强大的权势，5位监察官就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也就是说，这是象征着牵制王权的斯巴达特有官职。

自吕库古立法已经过去了200年。在此期间，监察官的牵制也许充

分发挥了作用，国王的权力逐渐弱化，只剩下率军打仗的权限。

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担任议长的阿希达穆斯发表了针对雅典的谨慎派言论，一位监察官立刻做出了主战的反击。常年担任军队司令的人和任期只有一年的监察官的发言竟然具有同等地位，真是令人错愕。

如果涉及内政，外行人的意见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是涉及是否与雅典发生正面冲突的重大问题。更令国王头疼的是，如果自己被强权在握的监察官列入黑名单，哪怕贵为国王也同样会不得善终。

普拉塔亚战役的英雄帕萨尼亚斯背负冤罪被迫自杀，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退兵撤军，因此被控收受贿赂，不得不退位，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雅典，被准许行使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10位将军，他们可以连任。

在斯巴达，实际掌握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5位监察官，他们不得连任。

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率军打仗的将军要自己承担风险，而以牵制王权为职责的监察官自身并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不会受到惩罚。

斯巴达的这种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不承担风险之人的独特制度，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在斯巴达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尚且可行的年代，虽然国王吞下了苦果，好在国家还能保持正常运作，但30年后，这种体制的魅力完全丧失。

打败雅典成为唯一霸主的斯巴达，竟然失去了维持霸权的能力。用现代语言讲，斯巴达的国家体制缺少“国际竞争力”。

当然，这些问题要到30年后才会露出端倪。公元前432年的冬天，极力主张与雅典展开军事对决的监察官给希望避免战争的阿希达穆斯国王带来巨大压力，等于给他套上了一副比以往更沉重的脚镣。

所幸斯巴达公民大会最终接受了国王的建议，为避免战争决定和雅典交涉。不过，这份经监察官之手写给雅典的“回避案”，内容像是预见到雅典会断然拒绝。斯巴达人要求雅典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包围即刻撤军，这形同要求解散提洛同盟，自然激起了雅典民众的怒火。

斯巴达与雅典之间这种你来我往掷球般的交涉，给其他国家留下了两国处于僵持状态的印象。

大国处于僵持状态很危险，弱小国家会趁机突然采取行动。

公元前431年初，雅典北部城邦底比斯（Thebae，又译忒拜）率先采取行动，这又是一起始于边陲的事件。不过这次事件未能像以往一样简单收场。

它成为决定希腊世界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

伯罗奔尼撒战争

回顾希腊人的历史，如果问决定他们命运的有哪几场战争，回答一定是：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最后的亚历山大东征。

《希腊人的故事》共三卷，第一卷介绍希波战争，第二卷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展开，最后一卷讲述亚历山大东征。

这套书如此重视战争，并不意味着我对描写战争本身有兴趣。是谁、何时、怎样发动了战争，战争的发展如何改变当事者乃至局外人的命运，这些人类世界的现象才是我关注的焦点。

希波战争分成两次。公元前490年的第一次希波战争速战速决。入侵的波斯军在马拉松地区的会战中失败，随后匆匆撤兵。

因此，所谓“希波战争”通常指的是10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希波战争，这是历史学上的常识。

公元前480年，雄心勃勃欲征服全希腊的波斯帝国大军大举进攻，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败，翌年又在普拉塔亚平原战役中一败涂地，迎头反击的希腊军以大获全胜的战果终结战争。

尝尽苦头的东方大国波斯在之后的100年再也没向希腊派过军队。

希腊人胜利的关键是雅典人打赢了萨拉米斯海战，以及斯巴达人打赢了普拉塔亚平原战役。两国冷静且彻底地发挥了各自的强项，大获成功。

第二次希波战争证明，希腊两大强国联手可以击退大国波斯。战争

很快在翌年结束，两国得以避免陷入灾难性的长期战。

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准确地说是48年间，除去一些局部战，希腊人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话说回来，希腊城邦国家不会因为解除了武装就保持和平。希腊人始终是要靠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大会休战的民族。

所以，和平持续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是雅典和斯巴达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

雅典不断增强海军力量，凡事采取保守态度的斯巴达专注于巩固其引以为傲的陆军力量，没有斯巴达人会有异议。

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功地达成分庭抗礼状态，是希腊世界保持50年和平的真正的原因。用现代语言讲，是因为形成了势力均衡的状态。

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同为希腊城邦国家的雅典和斯巴达兵戎相见。

和平已经持续了50年，按理说两国可以继续保持分庭抗礼的状态。

雅典是海军国家，斯巴达是陆军国家。

雅典有意在外国建立基地，但没有扩张领土的企图。就算有此想法，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输往海外。而斯巴达长久以来奉行一国和平主义，对本国社会结构无法承受的领土扩张没有野心。

这样说来，这两大强国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冲突。也正因如此，雅典第一人伯里克利和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都不希望开战。

尽管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爆发了。

两同盟平分秋色

有关战争的起因，如前文所述是科孚岛与科林斯擦枪走火，而后战火蔓延至其他地区。我们把小石头扔进池塘，水波纹会向四周扩散，而战争正好相反，边陲地带发生的事件产生的影响会向中心聚拢。伯罗奔尼撒战争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从开始写伯罗奔尼撒战争，我心里就有一个近乎愚蠢的简单问题。

雅典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海上，斯巴达的主要军事力量——应该说唯一的军事力量在陆地上。

海洋国家与立足于陆地的国家如何对战呢？

这两个国家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吗？

详情将在下文展开，先说结论：没有。

正因为没有，这场战争才迟迟决不出胜负，以至于打了27年。

如此说来，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一出喜剧。不过悲剧和喜剧如同硬币的正反面，所以才有悲喜剧（tragico-comico）一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改变了三大强国命运的战争。

公元前404年，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的雅典被迫放弃海军，解散提洛同盟，保持了百年的霸权地位彻底丧失。

而赢得战争的斯巴达在雅典退场后一国独霸，却无法维持霸主的地位。因为它的社会结构落后于时代潮流。

在战争进行了三分之二才登场的波斯渔翁得利，但它的成功反而导致波斯帝国分崩离析。

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失去对全境的控制，70年后，波斯轻易放过了年轻的亚历山大的东征之举，结果导致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

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多或少影响了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所有人，包括对政治、军事并不热衷的苏格拉底。

底比斯行动

公元前431年的春天，刚进入适宜出兵的季节底比斯军队便开拔南下，直奔目的地普拉塔亚。

底比斯是雅典城邦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北面的玻俄提亚（Boeotia）地区的一个强国。和雅典、斯巴达两大强国相比，底比斯不过是个中等实力的城邦，但它有统治整个玻俄提亚地区的野心。底比斯这一年的行动纯粹是意欲扩张领土的侵略。

希腊世界从一年前开始处于雅典、斯巴达两大国对峙的状态，这让底比斯看到了实现夙愿的好机会。

那么，它的目标为什么是普拉塔亚呢？

阿提卡地区与玻俄提亚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国境有一个很麻烦的性质，就是只有将紧靠国境外侧的土地占为己有，才会有明确的界线。

普拉塔亚是一个既不属于阿提卡也不属于玻俄提亚的地方城镇，距离底比斯南部不足10公里。

普拉塔亚和雅典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对普拉塔亚而言，雅典就像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哥。雅典军队出征时，普拉塔亚会派兵参战，在雅典将军指挥下作战。

第一次希波战争时，雅典有9000人的军队，普拉塔亚派出了1000名士兵，在米提亚德的率领下为击退波斯军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普拉塔亚由于不临海，所以没有参与萨拉米斯

海战，但在翌年的普拉塔亚平原会战中，他们有600名士兵加入了以8000雅典战士为主力的左翼战线，并且提供了后勤兵站方面的协助。

底比斯瞄准与雅典关系如此密切的普拉塔亚，唯一的理由就是雅典和斯巴达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僵持状态，没有余力派军救援。更何况底比斯人相信，如果攻击普拉塔亚遭遇困难，斯巴达会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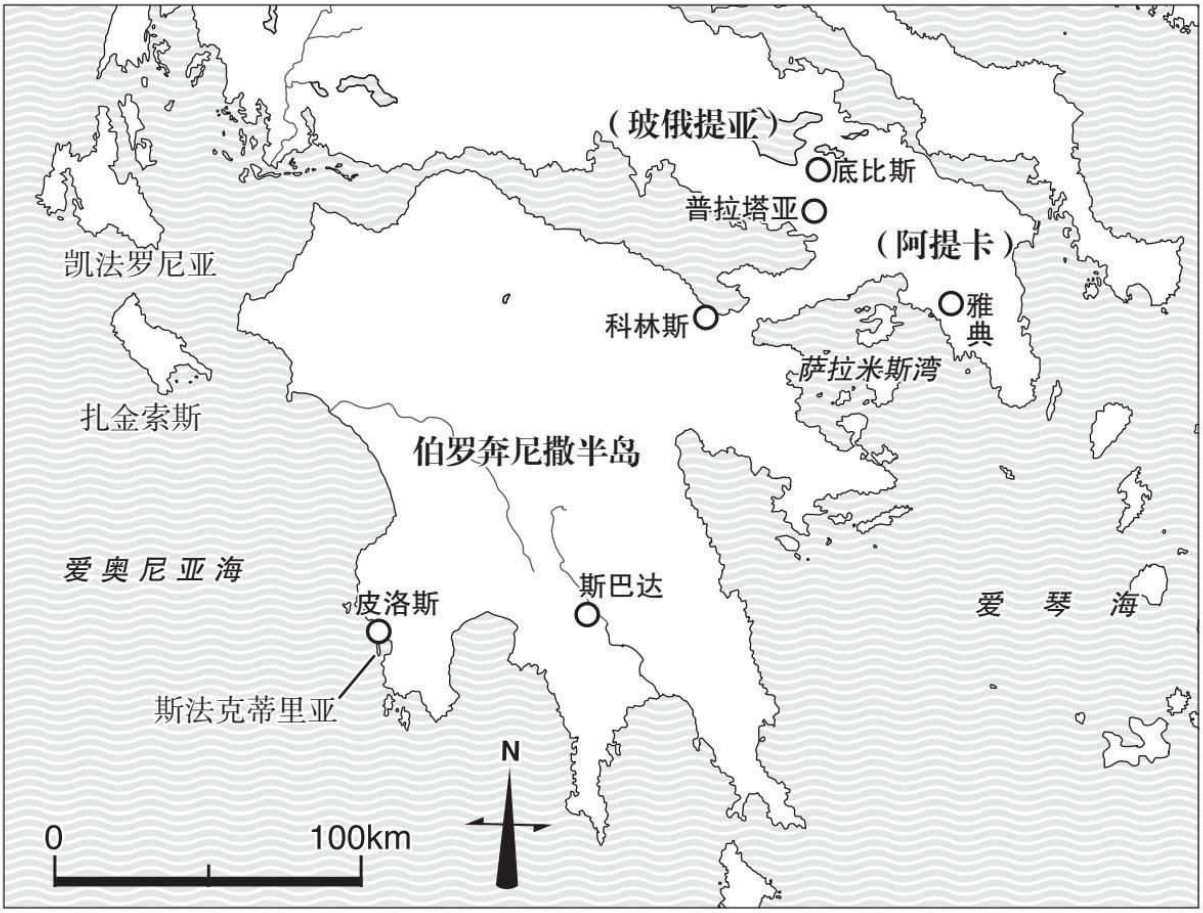
大约20年前，底比斯也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斯巴达为盟主的这个同盟与提洛同盟不同，加盟国没有缴纳经费的义务，所以不存在不交钱会受罚的问题。另外，斯巴达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强求盟国派遣援军，所以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一个出入自由的松散组织，这对那些不愿和雅典扯上关系的希腊小城邦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如果读者从头开始阅读本书，读到这里大概可以和专家学者一样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动向”，想到幕后可能是科林斯在操纵。

事实的确如此。在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忘记昔日之仇的典型代表科林斯的煽动下，底比斯决定出手。

科林斯人非常狡猾。他们没有表态会派遣本国军队支援，只答应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第二强国的科林斯有能力说服斯巴达予以支持。

无论斯巴达、科林斯还是底比斯，在同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一点上，立场是一致的。



伯罗奔尼撒半岛

鉴于这些原因，底比斯借着雅典与斯巴达对峙的好时机，对普拉塔亚发起了进攻，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片土地。

成功原因之一是普拉塔亚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且普拉塔亚不相信底比斯只派了300名士兵来攻城，害怕后面还有大军跟进。

躲在家中观察动静的当地人没过几天便搞清了状况。底比斯军队真的只有300名士兵，主力军不仅没有抵达，甚至尚未从底比斯出发。

重新找回勇气的普拉塔亚人走上街头，袭击了因轻易获胜而松懈的底比斯士兵。一些士兵被杀，大部分士兵被俘。

底比斯对普拉塔亚的侵略在通过科林斯向斯巴达求救之前，便早早以失败告终。

得知战事的伯里克利立即派特使紧急前往普拉塔亚。特使携带着伯里克利的严命。

严命要求处置底比斯俘虏必须谨慎，等待雅典的指示。另外，考虑到底比斯不会就此罢休，伯里克利命令普拉塔亚的女人和孩子全部前往雅典市内避难。

可是当雅典特使抵达普拉塔亚时，被俘的底比斯士兵已经被愤怒的当地居民全数杀死。

被激怒的底比斯火速向斯巴达派去特使，要求伯罗奔尼撒同盟出兵。

雅典并没有攻击底比斯。阿希达穆斯国王以此为由建议谨慎对待，但他的发言随即被一名监察官的强硬表态推翻得一干二净。在寡头制的斯巴达，对国家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机构同样是公民大会。大会决定由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加盟诸国组成同盟军，进攻阿提卡。

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遵从吕库古“宪法”规定的“斯巴达国王的任务”，率领斯巴达正规军重装步兵出征。

被称为“30年和平”的雅典与斯巴达的分庭抗礼，在半途露出了破绽。

这个势力均衡政策的策划者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从此变成两个敌对国的领袖，尽管这并非他们所希望的。

自公元前479年普拉塔亚会战之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军

暌违48年再次出征。

当年迎战敌军波斯的希腊阵营，斯巴达在右翼，科林斯及其他城邦居中，雅典在左翼。48年后，出现了右翼和中路联手对付左翼的希腊同胞之间的战争。

伯罗奔尼撒联军的军力如下：

伯罗奔尼撒半岛24000人、玻俄提亚地区10000名陆军士兵加1000名骑兵，总计重装步兵34000人，骑兵1000人。

率领这支军队的是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24000名士兵中，斯巴达人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但国王亲征带领的必然是斯巴达正规军，名震天下的斯巴达战士估计至少有5000名。这是48年来斯巴达首次出动这么多士兵。

除了这支陆军，科林斯决定组编一支百艘战船的海军参战。这百艘战船的组编完全应科林斯的主张，主要针对希腊西部属于雅典领地的岛屿。对科林斯而言这是夺回失地之战，所以不受斯巴达国王的指挥。

另一方，雅典得知伯罗奔尼撒联军出动的消息，立即组成了反击军队。

由雅典公民和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组成的重装步兵合计13000人。此外，以长枪作为武器的骑兵1000人、弓箭骑兵200人。

海军方面，主力自然是雅典引以为傲的三层加莱船。雅典有常备200艘、非常时期可出动300艘战船的雄厚实力。

雅典展开行动，意味着提洛同盟随之而动。爱琴海沿岸的同盟城邦

除莱斯沃斯和希俄斯岛之外，能够提供的战船数量极其有限。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性质仍然是提洛同盟对抗伯罗奔尼撒同盟。

雅典虽然具备完胜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海上战力，但在陆地上抵挡34000人大军的只有区区13000人。雅典海军必须投入40000人，所以陆军的人数已经到达极限。伯里克利相信雅典有足够的能力予以反击。他从13000人的陆军中抽出1900名士兵，令弗尔米奥带队前往久攻不下的波提狄亚。

伯里克利的策略是予以回击但不做激烈的正面交锋。

雅典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已经一体化半个世纪之久的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安全。充分利用有压倒性实力的雅典海军，是防御的关键。

其次，雅典要求纳夫帕克托斯、科孚岛，以及附近与雅典有同盟关系的岛屿联手，在爱奥尼亚海抵挡科林斯的军事行动。

对普拉塔亚，雅典要求当地军队与底比斯侵入时雅典派去的支援部队一起，阻挡从玻俄提亚南下的底比斯的10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

另外，雅典赋予爱琴海同盟城邦死守比雷埃夫斯至黑海制海权的使命。此举目的非常清楚，是保障人口超过10万的雅典的粮食供应。

伯里克利还收到一个好消息。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希望他们向小亚细亚西岸一带出兵的请求。

如果波斯介入，势必引发提洛同盟主要加盟国所在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而且雅典与黑海之间的粮食安全保障航线也将陷入危机。

战争最初之年

当时的希腊人大概多数都已忘记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在战争以后出生的人也为数不少。

但是有预见力的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那场战争发生时，伯里克利15岁，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14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15岁。

前两者因尚未成年所以在后方度过了学生时代。而阿尔塔·薛西斯在父王身边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萨拉米斯海战，那是他想忘也无法忘记的经历。触碰希腊势必引火烧身，这是阿尔塔·薛西斯从性情因此变得乖戾的父亲那里学到的教训。而且他还收留了赢得海战却在政治上失意的地米斯托克利，让他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并一直关照他直至自己去世。

因而，时年64岁的波斯国王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请求。理由是他必须信守17年前波斯与雅典缔结的《卡里阿斯和约》。

有学者认为，斯巴达并没有参与伯罗奔尼撒同盟请求波斯国王出兵一事，那是科林斯的单独行动。对此我颇为赞同。

斯巴达人欠缺外交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有过多的自尊心。

希腊各方团结一致反击波斯军是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平原会战。赢得那场会战的是与阿希达穆斯有血缘关系的帕萨尼亚斯及其手下的斯巴达战士。

这样的斯巴达人会在半个世纪后低下头向当年一败涂地的波斯国王的儿子请求援军吗？

斯巴达人不像雅典人那么狡诈，没有多少心眼。说到底，自尊心是一种宁死也不突破某些底线的决心。

所以，这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波斯的置身事外，变成了一场希腊同胞相互厮杀的战争。

公元前431年春意盎然之际，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24000名士兵，进攻阿提卡地区。

此时国王再次做了尝试。他派一名心腹去见伯里克利，但不是以私人名义，是以公开的使节的身份前往。

在那时，敌对国双方领袖如果有私下接触会被视为叛徒，有被控叛国罪的危险。去对方的地盘拜访做客，转眼成了一去不复返的过往。

很可惜，雅典法律禁止己方与率军进入雅典境内的敌方交涉。雅典人赶走了斯巴达国王的使节，阿希达穆斯最后的努力化成泡影。

伯里克利的开战演说

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斯巴达虽然陆上战斗力具备压倒性优势，但在外政方面常常被科林斯牵制，这就是长期“不争”导致的主导力低下的典型例子。所以斯巴达才会对科林斯言听计从，向雅典提出了雅典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要么开战，伯里克利向民众摆明了观点。

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指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过于苛求对方。

不过，决定开战的政治家任谁都会用类似的言论引导民众。

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说朝着战争的胜利必定属于雅典的方向展开。

他的根据是雅典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由熟练技工组成的强大海军。战争说到底是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而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越是经验丰富越不容易被一时的战势左右。

有了财力人力，那么“精神力”呢？伯里克利提倡的可不是“一亿人变身火焰冲进敌阵”之类的精神。

他所谓的“精神力”，简单地说是自我克制的能力。

他说，我们雅典人最应该警戒的不是敌方的高明战略，而是一直潜

藏于我们内部的自信的丧失。

伯里克利所说的“精神力”指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失去冷静，哪怕财产被掠夺。要相信人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因此挺过难关的忍耐力至关重要。

作为最高司令官，伯里克利接着向公民们说明了雅典大体的战略构想。敌人从陆地侵入，雅典就从海上攻打他们的国家。

最后，他用以下事例作为结束语——

> 我们的父辈打败了大国波斯，他们当时面对的状况比我们现在更不利。50年后的我们一定能击退来犯之敌。即将到来的战争，是针对入侵的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自卫反击战。

作为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势必要以自卫作为开战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伯里克利演说之后，公民大会进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开战。

真意在哪儿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全希腊的注目下打响。从旁观者的视角看，第一年的战斗始终处于奇妙的状态。

斯巴达国王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大肆入侵阿提卡北部一带，另一方的雅典海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岸登陆，征服了附近地区。到这里为止，战争基本按照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提出的战略展开，奇妙的是之后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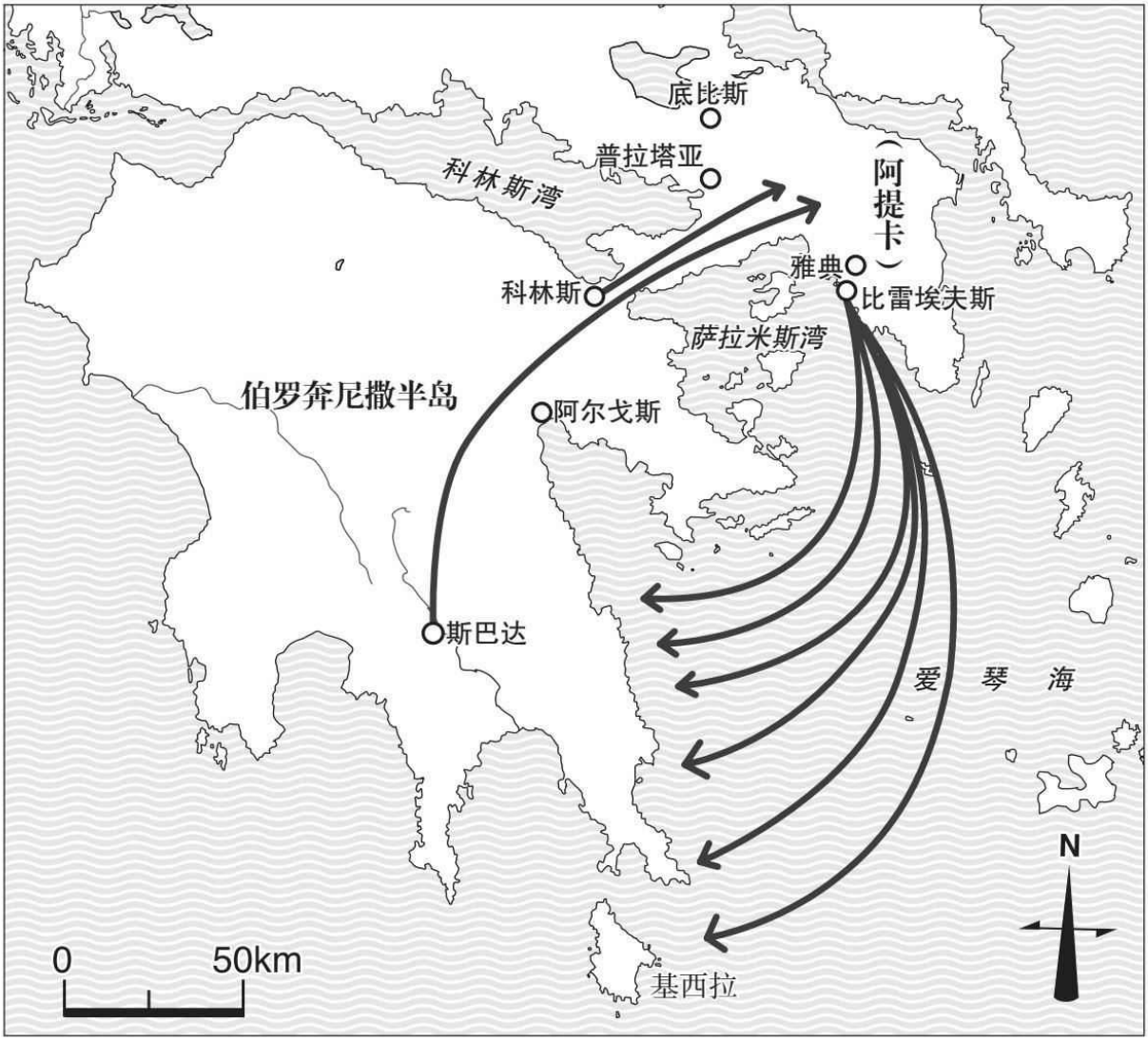
率军进攻阿提卡地区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入侵不到40天时突然下令撤军回国，而彼时仍是适合作战的夏季。

他的理由是军粮不足。几万大军的伙食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型城邦底比斯的确无法提供充足的补给。更何况当时希腊正处于收割期，就算去抢粮食数量也有限。

尽管如此，率领如此规模的一支大军出征，不到40天便打道回府，仍然显得异常。同行的监察官对此表示抗议，但国王不改决定。他令来自玻俄提亚的士兵们就地解散返乡，自己带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士兵们一路回到了斯巴达。

获悉这个消息的雅典海军也停止了在敌区的破坏行动，返回比雷埃夫斯港。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

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了解了伯里克利的真正意图。

他虽然下令海军登陆入侵敌国领土，但对入侵阿提卡的敌人却始终态度消极。他要求普拉塔亚地区坚壁清野，禁止雅典军在其他地区与敌军正面冲突，坚持相互侵犯对方土地的战法。

这就成了一场消耗战，不断消耗人力和资金。持续打消耗战这种愚蠢的事情，年届64岁的伯里克利肯定不会考虑，如果他真有此心，只能

说是完全不负责任。

另外，比他年轻1岁的老朋友阿希达穆斯常常不惜与顽固的监察官发生冲突而坚持己见，是一位平衡感极好的人物，想来他也不会认为打无用的消耗战是上策。

他们二人在开战前夜中断了联系。他们既是同辈又是多年好友，再加上常年担任领袖，估计不见面也能对对方的心思心领神会。

那么，我们就能做出以下的联想。

阿希达穆斯在每年的春季率领伯罗奔尼撒军队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另一方的雅典出动海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一带。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雅典的伯里克利还是斯巴达的阿希达穆斯，采取的都是不给予对方致命性打击的“敌对行动”。

斯巴达国王的军队肆虐于阿提卡虽然打击了雅典的农业，但雅典不会因此衰败。凭借提洛同盟和本国的海运能力，从国外进口粮食足以满足雅典的需要。

同样，对斯巴达而言，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遭到入侵，蒙受损失的是属于被统治阶级的农奴们，对那些以质朴刚健为本的统治阶级而言是无关痛痒的。

也就是说，斯巴达国王和雅典第一人都把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控制在非致命性的程度。

如果不留余地的话，雅典和斯巴达即刻会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避免激烈冲突的前提下，以这种战法拖个两三年，两国民众的敌对情绪会逐渐冷却。

然后找个适当的时机，雅典与斯巴达先达成5年的休战协定。5年以后，当形势进一步稳定，再缔结长期休战的“30年和约”。

这是有先例的。公元前451年缔结的雅典-斯巴达休战协定就为5年后以“30年和平”之名实现两国分庭抗礼奠定了基础。而那一年促成“分庭抗礼”的推手就是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

如果形势按照我的假设发展，就算双方都要做出一些牺牲，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会持续27年之久。

当时，保持雅典第一人地位30年的伯里克利64岁。

即位33年的阿希达穆斯63岁。

这两人会不负责任地打一场无止境的消耗战吗？倘若如此，那必定是出于置下一代于不顾的老人们的自我膨胀。

然而，事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7年。

因为伯里克利、阿希达穆斯以及任何人都没预料到的不幸，在第二年很快到来。

阵亡者追悼演说

战争第一年结束的冬天，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都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斯巴达国王应该视察了遭雅典海军摧残的拉科尼亚地区，而伯里克利则出席了雅典阵亡者葬礼。虽然雅典方牺牲人数有限，但因为是在开战首年，所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十分强烈。

在环绕首都雅典而建的城墙外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市民公墓。希腊人和罗马人都采用火葬，因此墓地没有阴森诡异的气氛。再加上雅典冬季依然有灿烂阳光和海上吹来的凉风，且空气干爽，公墓里时常可见雅典人以及亲人墓地在此的外国居民在此散步。

阵亡者专用的墓地也在这里。在能眺望到帕特农神殿的公墓一隅，为阵亡者举行追悼仪式，是雅典的惯例。

出席仪式的除了阵亡者家属以及政府、军队的高官之外，也有不少普通市民。大家追悼为国捐躯的战士，非常合情合理。

另外，雅典规定由当年的将军发表纪念阵亡者的演说。演说者应是率军出征或者派军出征的当事人。

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的追悼演说由伯里克利发表。登上讲坛的伯里克利开始了时隔多年的追悼阵亡者的演说。

伯里克利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他做事总能出乎意表。他高超的演说技巧在这30年里已是众所周知，但他没有以华丽的辞藻来展现语言的威力。他的演讲从语言的无用开始，这让听者感到十分意外。

他说，任何言语在高贵的牺牲面前都是无用的，但重温死者为国家做出的奉献并非无用。接下来的一段演说堪称雅典民主政体的最佳宣言，2500年以后它还被收入欧洲中学课本。

我们雅典的政体，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如果给它一个名称，可以称作民主政体。因为决定国家方向的不是少数人，是大多数人。

在这个政体下，所有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担任公职所获得的名誉，并非缘于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业绩。哪怕贫穷，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不会因出身卑微而默默无闻。

除了公共生活，我们在私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充分享受着自由。雅典公民享受的，是在言论等各方面都得到保障的自由。公民不仅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对执政者个人的嫉妒、中伤、羡慕都是自由的。

即便如此，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卷入这些激烈情绪的旋涡。

雅典有各种让我们忘却平日辛劳的娱乐，有定期举办的祭祀、竞技和戏剧活动。即便在战时也照常进行。

这一点以及下面要说的事实，都证明了我们和对手的不同。

我们的对手通过排斥外国人来保证国内的安定，雅典正好相反，我们向外国人敞开大门。我们相信向外国人提供机会会让我们的城邦更为繁荣。

在子弟的教养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孩子年幼时就对他们施以严格的教育以培养他们勇敢的性格。我们不像他们一般对子弟施行如此严格的教育，但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勇气从来不比他们逊色。

对于试炼，他们用非人的残酷训练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我们根

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们锻炼。我们的勇气不是法律逼迫出来的，它源于雅典公民每日生活的行动准则。

诸位现在所见的雅典的荣光和繁荣，是无数无名英雄创造的，他们给雅典带来永恒的生命。

我们热爱美，但保持节制；

我们热爱知识，但不沉溺；

我们追求财富，是为了寻求超越，并非为了愚蠢的炫耀。

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努力摆脱贫穷。

我们相信尊重私人利益可以提升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因为人们在追求私利的事业上展现的能力，也有可能被很好地应用于公共事务。雅典赋予每一位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我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不是崇尚平静的生活，而是没有履行公民的义务。

诸位每日所见到的，是可以称为全希腊人的学校的雅典。我们的阵亡者为了保护它的荣光和繁荣，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对这些人的光荣牺牲，国家能够回报的，仅仅是将这些牺牲铭记于心，抚养其子女，给予他们经济保障直至他们成年。

在此我可以向雅典全体公民再做一个承诺。尽管我们在战时不得不增强海陆两方面的军力，但我会尽力保证公民们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只有在这两方面都获得成功，雅典才不辱这个伟大城邦之名。

现在，遗属们可以继续沉浸于丧亲的悲哀之中，然后回家去，和其他人一样。

面对这位坚持开战的领袖，遗属以及其他市民没有发出任何抗议或指责之声。雅典人在这种时刻，同样被伯里克利诱导。

战争第二年的公元前430年，进入夏季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入侵阿提卡。这一年，雅典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严重事件。

瘟疫大暴发

在地米斯托克利充满远见的领导下，雅典整个市区早在50年前便处于城墙的保护之中。之后城墙延伸至外港比雷埃夫斯，雅典成为希腊唯一的被连绵不断的石壁包围的都市。其他城邦之所以没有像样的城墙，是因为斯巴达人一听到城墙二字便会神经过敏，这令各城邦有所顾忌。

在那个时代，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科林斯、底比斯都没有名副其实的城墙。阿提卡地区的村庄、乡镇更不可能具备防御性的墙垣。这意味着，面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联军的夏季入侵，当地农民毫无防卫能力。

这些农民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伯里克利因此准许他们进入雅典市内避难。雅典原本就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从前一年秋天开始又陆续有难民进入，到第二年夏季时，城市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粮食短缺的问题倒是没有发生，因为从黑海至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补给线依然正常地运作，但市内难民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收容所大多被安排在公共设施内，而希腊人没有多少卫生观念。多年以后一位去意大利半岛旅行的英国人说："希腊人不管做什么先造神殿，而罗马人先铺设道路，整备上下水道。"

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类至高文化遗产、雄伟的帕特农神殿光芒闪耀，但没有人想到下水道的重要性。

诚然，这是孕育出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民族，他们无疑具有高水准的医疗技术，医生的数量也相当多，可是医生们面对从难民收容所蔓延至富裕人家的大规模传染病时却一筹莫展，找不到治疗的对策。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疾病。那些声称病源是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经由埃及登陆比雷埃夫斯港的说法，不过是慰藉痛苦民众的传说而已。

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德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出现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顺便提一句，罗马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记录疫病的杰作，是因为罗马人热衷于建设下水道，所以那段时间当地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传染病。

话说回来，根据修昔底德描述的症状，现代学者推测那一年肆虐雅典的传染病并非薄伽丘时代的黑死病，而有可能是伤寒。

不管怎么说，雅典市内的居民大量死亡。修昔底德也染上了瘟疫，所幸之后得以痊愈。可见年轻力壮的人相对容易康复，死者大多是孩童或年老体弱者。

这场传染病沉重地打击了雅典人，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神殿内充满恳求神灵保佑的祈祷声，焚烧献祭动物的烟火熏染着雅典的天空，缕缕黑烟在空中飘荡，久久不散。

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听说了这场席卷雅典城的灾难。随军同行的见习监察官说，此时袭击雅典定能轻易攻克。

阿希达穆斯只回答了一句“难道要不惜牺牲我们的士兵”，便下令撤军回国。就这样，这一年斯巴达对阿提卡的侵略不足一个月就算了事。

伯里克利得知斯巴达国王进入阿提卡后，亲自率领海军入侵敌区。随后，按照惯例，接到阿希达穆斯撤军回国的消息后，他也率军回到了比雷埃夫斯港。

这时，传染病尚未威胁到伯里克利。

但雅典人的怒火正向他逼近。

难民的家园、耕地、家畜被敌人掠夺，来到雅典避难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度日，结果又遭遇传染病。难民们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自然是悲愤不已。

愤怒的不仅是难民。常年居住在雅典城内的人们被大量涌进的难民搅得烦恼不断，又听说这些人是害死自己亲人的疾病的源头，烦恼即刻变成了愤怒。当民众发现向神祈祷也无济于事时，他们将愤怒转向了伯里克利。

弹劾

但凡这种场合，势必会出现一个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人。

“是谁，劝说我们投入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

“伯里克利！”

“是谁，准许首都雅典接收大量的难民？”

“伯里克利！”

“是谁，说瘟疫会很快过去？”

“伯里克利！”

这情形不禁让人想起某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回答似乎被提问牵着鼻子走。实现长达30年的一人统治的雅典第一人，一夜之间竟然被视为造成雅典所有不幸的“犯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罪的话，他唯一的罪就是没有预料到瘟疫的传播。

但那可是气度不凡的伯里克利。面对民众激烈的指责，这位65岁的领袖毫无退缩之意。

伯里克利召开公民大会，在会场上进行了严肃的反驳。

> 诸位对我的愤怒，我有所预料。但请诸位决定是否开战时，我已经对战争的必要做了明确的说明。
>
> 今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被不安情绪控制的诸位想起你们过去所做的决定。看看你们如今变得多么懦弱、多么消沉。

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始终认为有城邦才有公民。

有人会凭借好运展翅高飞，但他也有回到地面的时候。若接纳他收起翅膀休养生息的祖国不断衰退，他会失去再次高飞的能力。国家的作用就是给有能力的个人提供起飞的基础。

对于必须时刻面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出抉择的领袖而言，此时国家整体的安全当然优先于个人的安全。对于有权赞成或反对领袖选择的公民而言，冷静接受最优选择是当然的义务。

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伯里克利这样说合适吗？他的这番言论不禁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2500年前创造出民主政体的雅典人，难道是这样考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吗？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使在现代也是难得其解的宏大命题，伯里克利的同辈兼好友、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安提戈涅》（*Antigonē*）是伯里克利此番演讲12年前的作品。根据观众的投票，这部悲剧获得当年最佳作品的荣誉。

政治家坚持有国家才有个人，艺术家则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艺术家索福克勒斯当选将军后，依然选择率军奔赴战场。这就是说，索福克勒斯并不完全赞同伯里克利有国家才有个人的观点，但他对公民履行应尽的义务，毫无异议。

伯里克利对这位好友的观点也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在《安提戈涅》荣膺月桂冠的第二年，他们两位作为将军（司令官）共赴萨摩斯岛平定叛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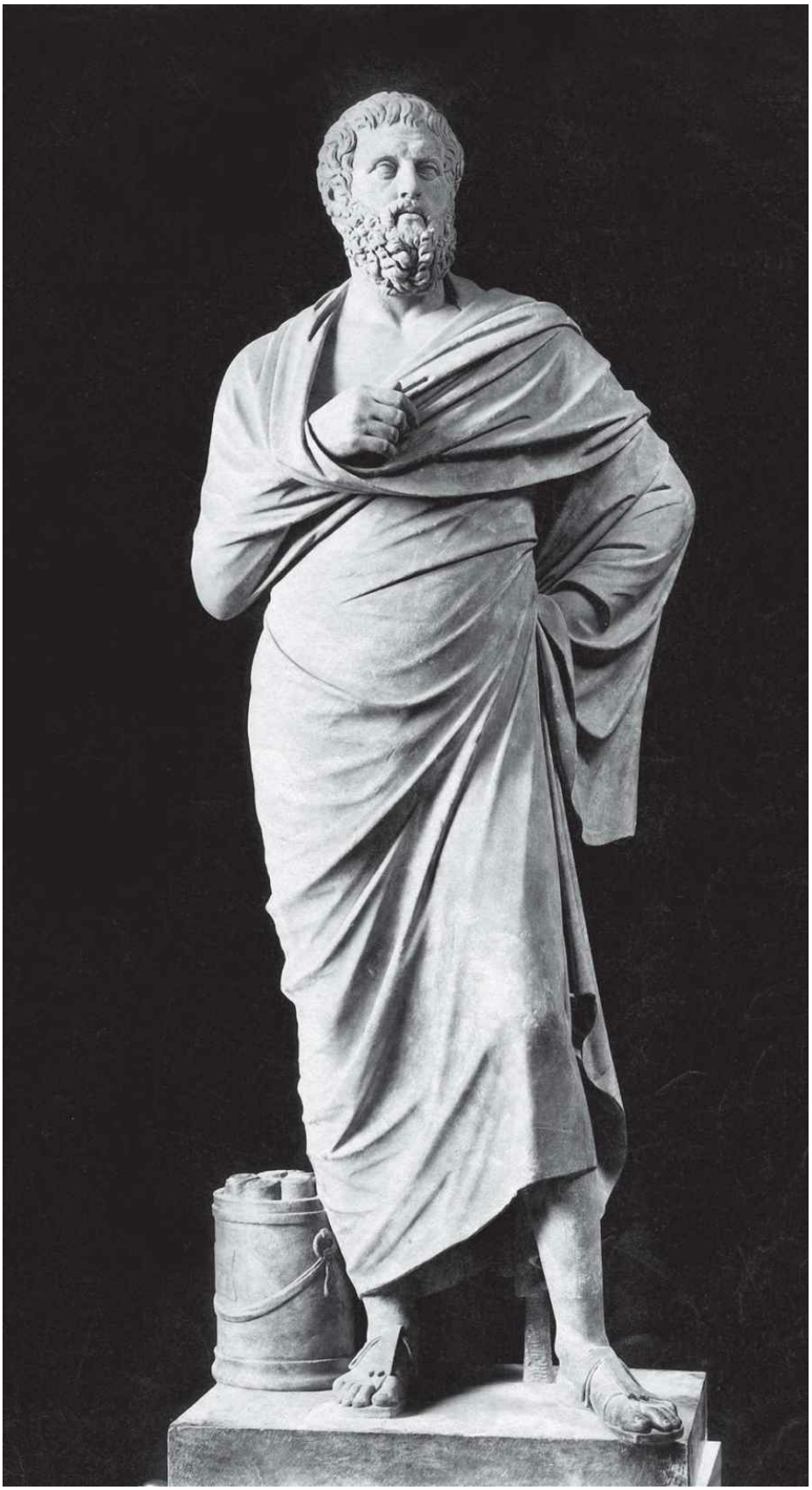
然而从本质上说，索福克勒斯是艺术家，伯里克利是政治家。艺术家只需提出问题并以最好的形式展示，而政治家必须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伯里克利始终坚持有城邦雅典才有雅典公民的观点。所以，他要求民众做出符合雅典公民身份的行动。

伯里克利声称，无论能不能预测，今后必然还会有灾难降临。每当灾难发生都将责任推给他人，是被不安控制、丧失理智的人才会做的事。不辱雅典公民之名的人应该牢记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再大的苦难也要承受，要冷静地等待形势好转。

“每个人担起自己的责任，既是为了诸君自己，也是为了雅典城邦。它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伯里克利的演说以这句话结束，众人表示接受，激烈的情绪没有进一步升级，会议得以平稳结束。

然而这些人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为亲人的伤病或过世而悲痛欲绝的女人们。面对眼前的情景，男人们很快就把伯里克利的“不要局限于眼前，要面向未来”的话抛在脑后。



索福克勒斯

民怨再度升起，不乏煽风点火之人。在伯里克利没有召集的情况下，公民大会自行召开，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30年来从未有过的判决：

解除伯里克利的将军之职。

以滥用公款罪判处伯里克利缴纳罚金50塔兰特。

滥用公款相当于把国家引入歧途。

伯里克利面对各种非议、批判都能以他的贵族精神泰然应对，唯有滥用公款这一罪名让他忍无可忍。

所幸30年来始终支持他的阿卡曼提斯选区的选民们这时没有弃他而去。在第二年的选举中，伯里克利再度当选将军。

这个结果像给燃烧的火焰泼了一盆冷水。曾经沸沸扬扬的罢免公职、滥用公款罪的风波，顿时平静了许多。

不过，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民众再次认识到伯里克利无法替代并不能平息骚动，不过是让火势减弱而已。

伯里克利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状况。那个对他穷追猛打、叫克里昂（Cleon）的男人的激烈言辞，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倾听。更何况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翌年，公元前429年的夏天，斯巴达国王照例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北上，践踏阿提卡地区。雅典海军照例南下，侵犯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

一带。当夏季结束，双方像事先约定好似的都撤军回国，重复了前一年的流程。

至少在这一年，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依然得到贯彻。

持续消极战法对哪一方来说都不容易，毕竟大家的忍耐力都有限度。若在这时发生振奋人心的事情，民众的忍耐力会得以提升。这一年的夏天，久违的喜讯令雅典沸腾。

久违的胜利

不知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像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那样属于上流阶层，还是因为没有当选将军，弗尔米奥是伯里克利自10年前开始任用的武将之一。弗尔米奥不是将军（司令官），只能率领小规模的军队，但他们就像一辆小汽车一样机动灵活。他弥补了伯里克利欠缺的军事才华，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弗尔米奥的出生年月不详，他大约比伯里克利年轻15岁，这一年应该在50岁左右。

公元前429年的春天，弗尔米奥从之前驻守的爱琴海北部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出发，由东向西绕希腊半周，调防到与科林斯海军对峙的爱奥尼亚海域。

雅典只给了他20艘三层加莱船，命令他迎战以科林斯海军为主力的伯罗奔尼撒联合海军。趁雅典海军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扫荡的间隙，科林斯跃跃欲试，打算夺取雅典在希腊西部的基地和岛屿。

弗尔米奥抵达面朝科林斯湾的雅典基地纳夫帕克托斯后，把他带来的20艘战船先藏了起来。

离开科林斯港的伯罗奔尼撒联合海军见海上没有雅典战船，认为机不可失，马上朝着科林斯湾的出口方向航行，准备攻打位于海湾口西面的凯法罗尼亚岛（Cefalonia）。

他们战船的数量是47艘。由于满载着重装步兵，船体负担沉重，速度缓慢。弗尔米奥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他率领20艘战船跟在47艘敌船的后面，保持距离不让对方察觉。当

对方船只刚驶出海湾，他即刻下令桨手加速划行。

雅典的20艘战船迅速围住了对方的47艘战船，而且不断缩小包围圈。弗尔米奥的计划不是以自己的船去冲撞对方使之沉没，而是让动弹不得的敌船相互碰撞自沉海底。

对方的47艘战船沉没数量不详，被俘的有12艘，雅典赢得胜利。

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海军实力最强的科林斯不可能就此罢休。第二战他们集结了77艘战船。而雅典一方依然是20艘。

这次战场换在毗邻纳夫帕克托斯的科林斯海湾内。

弗尔米奥改变了战法。他令常驻纳夫帕克托斯海军基地的11艘战船一起参战。即便如此，雅典一方总共只有33艘，不可能正面迎战对方77艘战船。于是弗尔米奥将舰队分成20艘和11艘两组，从左右两侧展开攻击。当敌船靠近时，两支舰队组成圆形阵型继续打包围战。

实际战况无须多言。第二战又一次证明了雅典海上无敌的事实。

科林斯及其周边

“海军才是保障雅典安全的关键。因为雅典海军是由经验丰富的熟练工组成的集团，它已经达到他国无法轻易赶超的水平。”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其正确性再次得到了印证。

得知这一消息，雅典人自然是欢天喜地。尽管每一场胜利都令人兴奋，但国家主力军获胜尤其让民众感到心满意足。人们对伯里克利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

死

可惜此时伯里克利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作为现役将军，他应该比所有人更早获悉弗尔米奥胜利的消息，应该非常欣慰，但这个喜讯没能让他生命的火焰重新燃起。

66岁，还算不上会自然死亡的高龄。

索福克勒斯活到90岁。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喝下毒药时70岁。柏拉图也很长寿，活到80岁。

过去人们的平均寿命短是因为儿童的死亡率高。那时的人类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只要能挨过幼年时期，之后的人生全凭个人的体力和运气。

自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古代医学，尤其重视提高人的抵抗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关于伯里克利的死因，不少史学家认为他染上了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出现过那种疾病特有的症状。更何况那场瘟疫流行的高峰期是他去世一年前的夏天。虽然此后瘟疫再次暴发，但那是他去世两年后的公元前427年。

上一次瘟疫盛行时，伯里克利的一个妹妹和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因病死亡。有些学者认为是家庭的不幸导致了他的早逝。然而，不断呼吁大家为了国家忍受个人不幸的伯里克利，会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至死吗？

我认为，半年前被控滥用公款即执政不当，对伯里克利的自尊造成

了极大的伤害。像他那样心高气傲的男人，对于这样的责难必定无法忘怀。

伯里克利的病榻前聚集了很多忧心不已的朋友。他们不想让他独自死去，这些人守在他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一天，朋友们以为伯里克利睡着了，于是赞诵起他远征的辉煌战绩。这时伯里克利睁开了眼睛。

他说："没想到你们竟然看重这些事情。将军获取战功不过是因为他碰巧那一年被选为司令官，是偶然而已。真正值得称赞的，是没有一位雅典公民因为我错误的政策而死去。"

如果普鲁塔克描述的以上场景是真实情况，那伯里克利临终前的内心不安，应该与我假设的事情有关。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但正常情况下，双方应该以避免正面对决的方式僵持两三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达成5年休战协定。待形势进一步稳定，双方再缔结长期休战的"30年和约"。这是伯里克利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再次重申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那样，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两年半后——公元前429年的秋天死去。

以维持城邦雅典的繁荣为最高目标的伯里克利的宏图大略，不幸中途夭折。这可能是66岁离开人世的伯里克利心中唯一的遗憾。

他的挚友、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在两年后死去。

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内，为希腊的稳定做出贡献的两位人物相继

去世。虽身处远方但也为希腊世界的和平做出间接贡献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第4年死去。主人公新旧交替的时代来临。

伯里克利的死并没有给雅典人带来多大的冲击，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也没有谁提议以国葬的形式追悼他，就像“正义之人”阿里斯泰德去世时那样。

而且，伯里克利不是在战争中牺牲，不能埋葬在雅典城墙外位置最佳的国有公墓。

雅典人似乎对伯里克利没有什么缅怀之情。大多数人的态度也许就像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嘲讽的那样，认为那个不近人情、不倾听民众声音，犹如奥林匹亚宙斯神般怒声呵斥的霸道的伯里克利终于死了，天下总算太平了！

没有人想到，伯里克利的死之于雅典，或者说对整个希腊都意味着衰败的开始。

修昔底德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急剧衰落的时代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里克利死时才29岁的修昔底德在当时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

公元前429年的雅典，没有一篇为伯里克利之死而感伤的诗歌。

但有一部杰出的悲剧。

伯里克利去世的那一年，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俄狄浦斯一生与命运抗争，最终未能逃脱神的预言的人间悲剧。

伯里克利生前不断呼吁命运不是天神所定，人类要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命运。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宏大构想因为自身的死亡中途夭折。如果这不是命运，那什么才算命运呢？

伯里克利与索福克勒斯既是同辈又是好友，曾经作为将军共同远征。尽管被伯里克利调侃“做海军司令不如写悲剧”，但索福克勒斯始终是伯里克利的支持者。围绕在伯里克利病榻前的朋友中一定有索福克勒斯。

如果伯里克利知道这位好友又有新作问世，不知会如何评价。也许他还会用那调侃的口吻说：“你果真是写悲剧比率领军船，对雅典更有意义。”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伯里克利早已习惯人们对他的批判、责难、中伤，但有一天来纠缠他的男人异常烦人。

他站在正在处理公务的伯里克利身旁，用粗鲁的语言不停地咒骂。伯里克利始终不发一语，也没有流露出愤怒的表情。

罗马的执政官有12名护卫，雅典的将军没有如此待遇。伯里克利只带了一位夜晚帮忙提灯照路的仆人。

傍晚时分，伯里克利结束工作，起身回家。那个男人依然不肯罢休，紧随其后，一路骂骂咧咧。走到家门口时，伯里克利第一次开口说话，不是对那个男人，而是对仆人说：

“拿着灯，送这位公民回家。”

伯里克利对那个人的咒骂不做任何回应，不是因为尊重对方的言论

自由，而是出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愚昧者的强烈轻蔑。不发怒是不愿将自己贬低到对方的水准。所谓的愤怒，是对和自己对等的人才会产生的感情。

如上，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式的、非民主主义式的男人，引领雅典的民主政治抵达空前绝后的巅峰。

雅典的重装步兵墓碑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第二部

伯里克利以后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04年的26年）

——“民主政体”失控的“众愚政治”时代——

前期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13年的17年）

以伯里克利的死为分水岭，雅典进入了众愚政治的时代，这个观点占据希腊历史学主流地位已经很长时间。

公元前480年，地米斯托克利率军一举击败入侵的波斯大军，为雅典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继承了他的路线，不畏“表面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非议，为雅典带来安定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以及灿烂文化的是伯里克利统治下的30年黄金时代。

以上两段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时期，共计50年。

50年之后，雅典经历众愚政治时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的公元前404年，一共是25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雅典耗费50年构筑起的繁荣，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让它走向了衰亡。

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此后又延续了82年。然而那已经不是令后世赞叹不已的拥有灿烂文明的雅典。

那么，导致雅典衰败的罪魁祸首——众愚政治是什么呢？

demokratia——民主（众）政治。

demagogia——众愚政治。

它们都是希腊人发明的。请注意，貌似不同形态的政体其主角都是“众”（demos）。

为何变成众愚政治

城邦雅典的主人是被称为“公民”的民众（demos），所以主权在民。在最高决定权属于民众这一点上，民主政治和众愚政治没有不同。

换言之，哪怕是被视为恶政范本的众愚政治，也不可能从没有民主政治土壤的国家中产生。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

覆手之间面目全非，这就是反面。

因此，并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特别有智慧，在伯里克利死后他们就突然都变成了傻瓜。

然而雅典在伯里克利死后进入众愚政治时代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要解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需要说明另一个问题。

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明出一种没有领导者的政体。

民主也好，众愚也罢，这些体制中都有领袖存在，但性质不同。

民主政体的领袖唤起民众的自信。

众愚政治的领袖巧妙地煽动起民众心底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安。

如果说前者是“诱导者”，那么后者就是“煽动者”。

前者展示光明的前景、引领民众，后者掀开阴暗面、挑动人们的不安。因此，煽动者并不限于政治家。

如果以当下为例，那些示威抗议的组织者、宣传媒体和网络，无论他们有意或无心，都是不折不扣的煽动者。

那么，伯里克利给雅典留下令人不安的因素了吗？

理性思考的话，答案是没有。

内政方面，民主政体的常态化历时长久，在诱导高手的领导之下，政体保持稳定。尽管反对派无时不在，但伯里克利时代仍然保持了政权30年的长期稳定。

外交方面，雅典与波斯和斯巴达这两个无法回避的强国达成了一种类似互不侵犯的分庭抗礼的状态。不管波斯还是斯巴达，面对已成为强国的雅典，都没有冒险发动正面冲突的意思。

经济方面也不存在问题。有提洛同盟这个广域经济圈的建立，以及在各地以基地为轴心的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再加上加盟国上交的会费，雅典的国家财政长期稳健，以至于伯里克利可以信心十足地称“战争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力赢得胜利”。

在文化上，雅典更是当之无愧的全希腊的“学校”。人们络绎不绝地从希腊各地来到雅典。由于这些人的加入，文化、文明的花朵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灿烂盛开。

在军事上，雅典拥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的海军力量。

或许“海军”这个概念原本由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经伯里克利之手得到完善。在此之前地中海只存在商船和海盗船。

陆上战力方面，除了奉行少数精英主义的斯巴达，雅典是全希腊拥有最多兵力的城邦。

古代希腊全体公民皆为士兵。公民权仅限于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他们在行使参政权的同时，肩负保家卫国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的公民数量在1万人左右，雅典则有5到6万人。据说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人数超过了6万。

在斯巴达，从事农业的希洛人和从事工商业的庇里阿西人没有被授予公民权。而在雅典，那些靠每日出卖劳力求得温饱、被罗马人称为“普罗列塔利”的最底层民众也享有公民权。所以，这些人同样有义务服兵役。

按照一艘三层加莱船至少配备200人计算，200艘战船总共需要4万人。整个希腊只有雅典具备随时出动200艘战船的实力，正是民主体制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那么，享受着这些红利的雅典人有什么不安呢？

首先是疑似伤寒的瘟疫，以及入侵阿提卡地区的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军。

瘟疫迟早会过去。至少伯里克利这样说过。

阿提卡遭蹂躏的状况，伯里克利也请大家暂且忍耐。经历伯里克利30年执政的雅典人应该很清楚，他绝不是只要求民众忍耐而拿不出对策的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民心动荡？

这是因为瘟疫、敌军入侵引发的不满，和每个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

在的不安全感相重叠，集聚成一种害怕明天会失去所有的恐慌。

指责这种情绪既负面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感觉不景气，经济状况就越糟糕，要安抚躁动不安的人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类自然存在的心理。伯里克利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语言诱导使民众保持镇定。

相反，被视为雅典第一位煽动者的克里昂，不断刺激、强化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挑动人们仇富仇权的情绪。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动起多数人的怒火，是因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愤怒。

伯里克利离去后，雅典就剩下这位克里昂。

煽动者克里昂

皮革是重装步兵军装必不可少的材料。通过制造皮革积累了财富的克里昂，应该是一个颇有才能的经营者。

让他一举成名的，是针对生命末期的伯里克利的弹劾演说。虽然他成功地说服公民大会以滥用公款罪（即政策失误罪）向伯里克利处以罚款，但30年始终支持伯里克利的选民们没有弃之而去。

他们并不在乎克里昂鼓吹的那一套，再次把伯里克利送上了将军的位子，甚至连罚款一事也不了了之。遗憾的是，伯里克利在6个月后病逝。

虽然伯里克利的死与克里昂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事实上的彻底退场使曾经与其唇枪舌战、对其穷追不舍的克里昂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被视为良知派的一批雅典人首先看到这种危险的趋势。他们推出尼基阿斯（Nicias）作为对抗好战派、反斯巴达的克里昂的先锋。

以伯里克利去世的公元前429年为线，当时克里昂大约35岁，尼基阿斯41岁。

根据梭伦改革制定的等级制，克里昂属于第四等级，拥有千名奴隶劳工的银矿主尼基阿斯绝对是第一等级。

当然，在雅典，第四等级的出身并不妨碍以后的人生发展。

帕特农神殿的工程总监雕塑家菲狄亚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都是劳动阶层出身。克里昂也在数年后当选为相当于雅典城

邦内阁大臣的将军。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坛首先分裂成以克里昂和尼基阿斯为首的两派。

要论两位的寿命，克里昂在7年后死去，尼基阿斯比他多活了9年。然而相较于对政府穷追猛打的在野党，执政党的态度多少显得软弱被动。

如果伯里克利死后雅典进入众愚时代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克里昂和尼基阿斯两人就是“众愚雅典”的主人公。

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面临两大严峻的问题。

第一，伯罗奔尼撒联军对阿提卡地区的入侵进入第三年。

第二，莱斯沃斯岛叛乱。

斯巴达的动向

对于伯里克利的死，不知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会作何感想，斯巴达人自己是从来不做任何记录的。不过根据雅典一方的记录，在伯里克利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28年，66岁的阿希达穆斯一如既往地履行了国王的职责，率军对阿提卡地区进行第三年的入侵。

按照惯例，国王出征率领的是正规重装步兵军团，即大名鼎鼎的“斯巴达战士”。5位监察官中有2位同行。监察官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监视和牵制国王的言行。

这一年与阿希达穆斯同行的监察官没让国王像前两年那么随心所欲。

国王第一年以粮草不足为由，第二年以瘟疫流行为由，两次都是入侵一个多月便下令撤军。监察官向国王施压，要求他采取真正的打击行动，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走过场。

事实上，国王这次确实改变了战略。也许在伯里克利死后，他对之前做法的效果也产生了怀疑。

不过，阿希达穆斯仍没有对监察官言听计从。他放弃了对阿提卡的侵犯，决定攻击普拉塔亚。

自第一次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派兵支援雅典以来，普拉塔亚与雅典保持了长达60年的同盟关系。斯巴达攻击普拉塔亚，雅典会如何反应？

这是阿希达穆斯想了解的。或者说，他想试探一下伯里克利死后雅

典的态度，根据对方的反应，再决定日后是继续走过场，还是动真格。

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阿希达穆斯没有急于发起攻击。斯巴达军在普拉塔亚城外围起两重木墙后，再一次早早撤军。

莱斯沃斯问题

所谓莱斯沃斯岛的叛乱，其实并不是全岛举旗造反。在海岛众多的爱琴海，除了南边的克里特岛和罗德岛之外，莱斯沃斯岛是最大的岛屿。

岛上的居民是最不擅长共处的希腊人，因此即使同一个岛也分成几个城邦。背叛雅典的是位于岛屿东侧、相当于莱斯沃斯首府的米蒂利尼（Mytilene），其他的城邦没有参与行动。

莱斯沃斯岛是与希俄斯岛比肩的提洛同盟的主要成员，由于拥有独立的海军，因此同盟中免缴会费的，除了雅典就是这两个岛。换言之，当雅典出动海军执行任务时，这两个岛都会按惯例派军参战。

正因为地位重要，所以对于雅典而言，莱斯沃斯岛形势不稳兹事体大，哪怕只是一个城邦的叛乱，也可能左右提洛同盟未来的走向。

不知为何，此时莱斯沃斯岛的一角喷出反雅典的火焰。这个城邦不需要缴纳会费，所以应该不是钱的问题。据学者们的分析，导火索是米蒂利尼内部的权力斗争。

这里说到的权力斗争，是主张由米蒂利尼主宰莱斯沃斯全岛的强硬派和主张维持现状以免得罪雅典一派之间的斗争。类似的纷争在希腊中小城邦国家司空见惯，只不过这一次是强硬派占了上风。

他们甚至与斯巴达进行接触，派去谈判特使讨论脱离提洛同盟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上战斗力与雅典相差甚远，而莱斯沃斯岛拥有

海军。米蒂利尼大概认为自己的加入对弱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有所帮助，势必受到斯巴达的欢迎。

结果，斯巴达接受了他们的申请，甚至答应派出百艘三层加莱船支援。

其实不用深想也知道，斯巴达向来是行动迟缓的国家，哪怕其做出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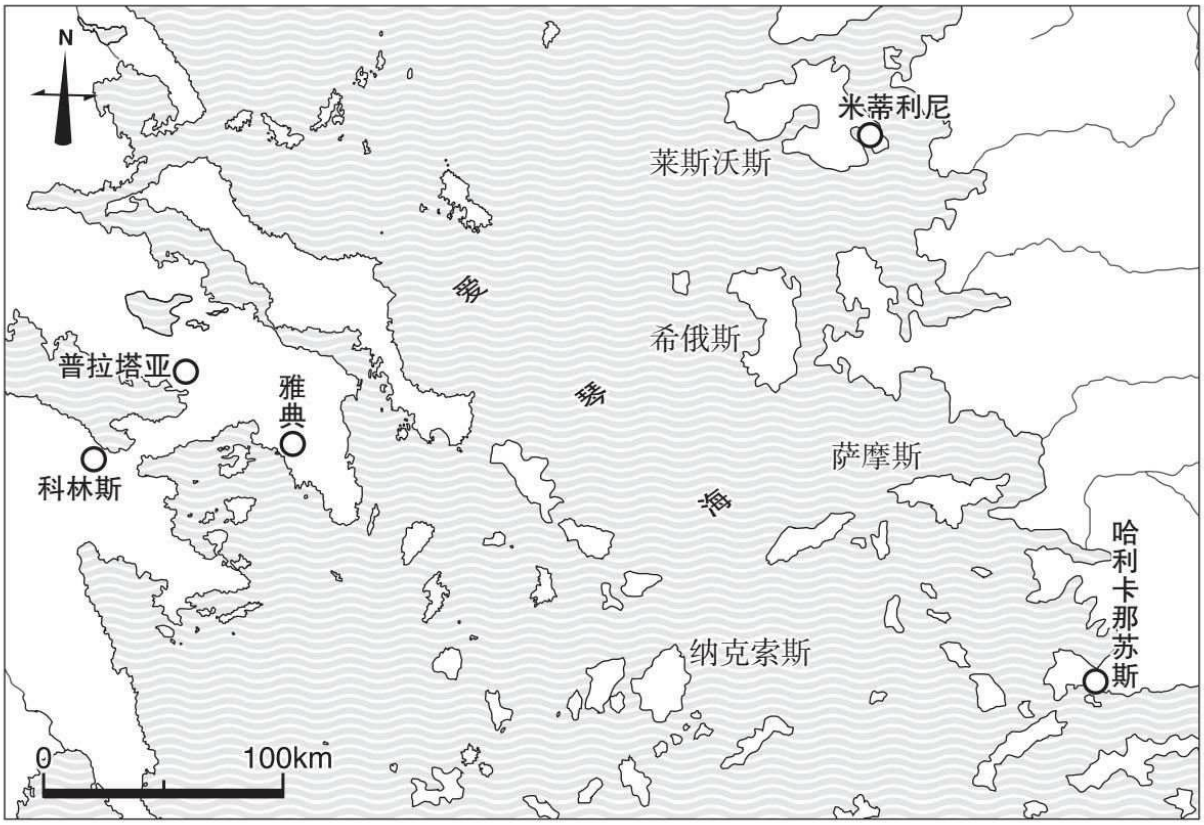
更何况，伯罗奔尼撒同盟海军唯一的依靠是科林斯。即便科林斯人愿意在属于本国市场的爱奥尼亚海域与雅典海军发生冲突，但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远征作为雅典的市场爱琴海，与对方大动干戈吗？

莱斯沃斯岛一角的城邦借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权处于空窗期之机，趁势烧起叛变之火。对此，斯巴达打算让它自生自灭。

然而，雅典一方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提洛同盟的命运就是雅典的命运。尽管米蒂利尼没有正式宣布退出提洛同盟，但对这个公然提出要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雅典绝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必须在这团叛变之火蔓延至爱琴海东部其他加盟城邦之前，将其尽快熄灭。

只有在这种时候，雅典执政、在野两党才完全达成一致。

他们一致决定，针对伯罗奔尼撒联军侵犯阿提卡而且正在普拉塔亚建造包围墙的情况，今年继续派雅典海军南下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一带进行扫荡，与此同时，横穿爱琴海前往莱斯沃斯岛镇压叛乱。



莱斯沃斯岛及其周边

计划兵分两路的雅典海军首先要准备三层加莱船。克里昂为筹集资金，似乎向富裕阶层征收了特别税，据说筹得了200塔兰特。这位克里昂的强势手腕很是了得。

不过，钱是有了，人手还不够。一艘战船仅桨手就需要170人。

为解决桨手人数欠缺的问题，除了第四等级之外，雅典允许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加入。这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就已经实施的措施。

虽然叫外国人，但他们不过是出生在希腊其他城邦的人，和雅典人一样都是希腊人。

雅典相信这些人忠诚或者说有爱国心，是因为除了公民权和不动产

所有权之外，雅典向他们开放了一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住宅租赁生意兴隆，也算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特色。

另一方的斯巴达完全拒绝外国人流入。

正在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果以斯巴达赢雅典失败而结束的话，希波战争以后不断兴起的希腊世界的人才、经济交流将中断，这是雅典让外国居民参战的理由。

这些不具备雅典公民权的外国人不能担任重装步兵，但可以成为桨手。

如此说来，地米斯托克利缔造的雅典海军将底层民众和外国人也纳入战斗力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民主政体的优越性。正如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所断言的那样，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保障关键在于海军。

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攻城战与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平原会战情况不同。平原会战哪怕战况再激烈，一天内总会决出个胜负，而攻打一个城邦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结果，攻城战一直打到第二年才算结束。带头叛变的米蒂利尼以及跟随它的其他城邦无条件向雅典投降。

此时，一直保持一致行动的雅典执政、在野两党，对于战后处理战败者这件事产生了意见分歧。

克里昂以他一贯的态度主张对叛乱者严惩不贷。他强调必须残酷地惩罚叛变者才足以威慑提洛同盟的其他加盟城邦，让它们看清背叛雅典的代价。他提出：

一、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所有领土均由雅典直辖，向当地输送雅典移民。

二、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所有成年男子一概作为叛乱分子处死。

三、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女人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

那么，对抗克里昂的干将、由良知派推选出的尼基阿斯在公民大会上做了何种反驳呢？

他没有反驳。面对激烈的争吵、对方的叫嚣，尼基阿斯并不害怕，但往往会由于厌恶而放弃交锋。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最大的缺陷。

不过，当时伯里克利去世才刚两年，公民大会中还留有他的一派人马。其中一人站出来反驳克里昂说，实施如此强硬的处置会导致其他城邦疏远雅典。

克里昂很快察觉到大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收回之前的方案，又提出了另一套方案。

一、将参与叛乱的所有主谋送来雅典处刑。

二、拆除米蒂利尼的城墙。

三、除却没有参与叛乱的城邦，将莱斯沃斯岛划成30个区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移居当地的雅典公民出售。

这样一来，莱斯沃斯岛等于沦为雅典的殖民地。

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第二次提出的方案。

或许是最初的提案过于严酷，相比之下民众感到第二套方案温和不少。

莱斯沃斯岛的海军在这段时期并入了雅典海军。

被引渡到雅典的主要叛乱者据说多达1000人。这些人以反叛罪和勾结斯巴达的罪名，被当作雅典的叛徒处死。

雅典的同盟城邦发起叛乱，莱斯沃斯岛并非首例。12年前萨摩斯岛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当时伯里克利亲自率军平定叛乱，战后的处置和这一次相差甚远。

城墙的确被拆除了，但伯里克利没有让萨摩斯岛变成雅典的殖民地。分期支付战争赔款是针对萨摩斯岛政府的惩罚，岛屿本身还是维持独立，海军也保留了下来。

当年受到惩处的反叛主谋仅数十人，他们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流放岛外。这些人作为波斯国王许可的“暂存者”，被送往附近的波斯领地。过了惩处期，他们仍然可以返回祖国。

公元前439年被处置的萨摩斯岛，以及公元前427年被处置的莱斯沃斯岛，它们日后与雅典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萨摩斯岛一直作为提洛同盟的成员与雅典患难与共。

莱斯沃斯岛也作为同盟一员留了下来，但15年后当雅典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难时，莱斯沃斯岛第一个脱离了提洛同盟。

正为成功镇压莱斯沃斯岛欣喜不已的雅典人，没过多久就失去了他

们的另一个盟友。

被伯罗奔尼撒联军围城一年的普拉塔亚终于不堪重负宣布投降。

被围期间，普拉塔亚曾数次请求雅典派兵支援。进入“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虽然没有拒绝，但最终也没派出援军。就这样，他们抛弃了自第一次希波战争以来就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忠实盟友，而且仅仅是以平定莱斯沃斯岛叛乱没有多余战力为理由。

普拉塔亚人发现守城无望便偷偷放走了很多年轻人，只告诉他们一句话：逃去雅典。

因此，一年后陷落的普拉塔亚城中并没有多少守军，何况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城邦。留下的具体人数不详。

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处死了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亚人和25名雅典人。

这25名雅典人是伯罗奔尼撒联军首次入侵阿提卡时，作为援军被派遣到当地的残余的雅典士兵。他们的祖国抛弃了普拉塔亚，但他们选择坚持到底。

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被卖为奴隶。普拉塔亚整座城镇被夷为平地，变成底比斯的领地。从此，城邦国家普拉塔亚从陆地上消失。

在此过程中，雅典仅仅是向早先来雅典避难以及后来逃出城的普拉塔亚男性授予了雅典公民权。

雅典人的行为让他们又丧失了另一样东西。他们给同盟成员造成了负面印象：盟友有难，雅典不一定会出手相助。

不断升级的残酷

“伯里克利时代”与“后伯里克利时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简言之，其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

没有这样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杀害投降的民众、俘虏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

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我认为古希腊人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指点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在左与右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

英语称“中庸”为“good sense”，法语叫“bon sens”，意大利语是“buon senso”。日语以“良識”一词对应最为合适。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不仅雅典人，所有的希腊人都变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

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伯里克利死后不到两年发生的莱斯沃斯岛事件和普拉塔亚事件，创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无意义杀戮的先例，此后这种现象不断上演。

开创这个先例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性质就更加恶劣。它意味着希腊人的“学校”放弃了“为人师表”。

雅典迷失于无意义的杀戮之中，是因为克里昂的煽动。雅典先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才有“后伯里克利时代”，但斯巴达没有类似的经历，它的前后变化是因为自身独特的情况。

自吕库古法确立以来，斯巴达始终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讲，它意味着不干涉他国的事务。

陆军战斗力希腊第一的斯巴达奉行不干涉主义，让那些跟随它的弱小城邦只能随波逐流。

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对投降的普拉塔亚进行残酷惩罚，并非联军统帅阿希达穆斯的意愿。

原因是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参与普拉塔亚攻城战的底比斯人重提4年前的旧事，强烈要求报仇雪恨。

4年前，底比斯入侵普拉塔亚，他们派去的300名士兵被当地人处死。尽管挑起事端的是底比斯一方，但胜利者无须倾听失败者的辩解。而且，底比斯人的复仇要求得到了与斯巴达国王同行的两位监察官的强烈支持。

斯巴达监察官对雅典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他们发誓守护吕库古法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

由于斯巴达不向本国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开放公民权，斯巴达人必须时刻防范这些人叛乱，他们始终将公民权普及至最底层公民的雅典民主政体视为带来恶劣影响的东西。

底比斯人提出处死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亚人以报4年前300名士兵被杀之仇，而向阿希达穆斯国王强烈要求一并处死25名雅典人的，是与国王同行的斯巴达监察官。

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根据斯巴达的吕库古法，决定国家方针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公民大会选举出的任期1年的5位监察官。其中两位监察官在国王出征时必须同行，同样基于吕库古法的规定。

就这样，以无意义杀戮为标志，雅典以及斯巴达进入了“后伯里克利时代”。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完成此次出征的所有任务归国后不久，仿佛油尽灯枯般死去，比他的对手以及盟友伯里克利晚走了两年。

翌年，公元前426年，也许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对野蛮行径都

有所收敛，这一年相对比较平静。然而，公元前425年又有新的事件发生。

所谓“着眼未来的一贯性政策”有点像同时驾驭数匹骏马的四匹马战车竞赛，手执马缰的车夫的能力极其重要。没了车夫，缰绳便形同虚设。劣马也许跑不远，但换成骏马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雅典在“后伯里克利时代”还是有“骏马”的。

斯巴达的败北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角有一个叫皮洛斯（Pylos）的小镇。它不属于斯巴达领地拉科尼亚，而是在西边的美塞尼亚地区，所以也算是斯巴达的辖下。

此时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六年到来，交战的雅典和斯巴达都扩大了战线。这也是政策马车失控造成的现象之一。此前双方战争近似相互骚扰，斯巴达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雅典南下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一带，但从这一年开始，两国都陆续开辟了新的战场。

不过，双方始终回避正面交战。这一年的战争以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战役留名史上，因为这场战役最终变成两国的直接对决。这个结果并非两国所期望的，只能说随着战况的发展变成了这样。

雅典一方有三位将军率领海军奔赴再度求援的科孚岛。德摩斯梯尼（Dēmosthénēs）将军率领的5艘战船为占领皮洛斯中途留下。占领的目的有二。第一，在斯巴达拉科尼亚地区的西邻建立雅典基地，向斯巴达人示威。第二，雅典的“市场”迟早会扩展至西地中海，因此必须有连接两端的中间基地。

另一方的斯巴达阻止雅典出兵反击，于是局势变成两国直接交战。不过，起初战争仅限于局部范围。

雅典军队包括战船桨手在内超过了1000人。斯巴达一方士兵数量处于劣势，但其中有300名重装步兵。也许斯巴达人自信这些闻名希腊的斯巴达战士足以打败对手。

经过几轮激战，最终德摩斯梯尼凭借巧妙的战法为雅典赢得了胜利。

被打败的斯巴达震惊不已。令他们惊讶的不是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等弹丸之地被雅典占领。奉行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原本就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欲望。

真正打击到他们的是犹如“国宝”的斯巴达战士一半战死、一半被俘。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斯巴达是一个限制公民权的城邦。唯有公民才能加入重装步兵部队，要找到替补并非易事。更何况国家将公民送上战场就有义务救回这些不幸沦为俘虏的士兵。

雅典同样为这批俘虏而骚动。这些人可都是连小孩都知道的鼎鼎大名的斯巴达战士，他们居然有150人被押送到雅典。也许是雅典人亲眼目睹了这些勇士的英姿，认为有必要礼遇他们，俘虏们在收容所中没有带脚镣之类的枷锁，而且每天都有高质量的伙食供应，待遇之高简直媲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然而，这些事情和远方的斯巴达人没有关系。他们迅速派出特使前往雅典谈判，以交还俘虏为条件谈和。

这是一个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好机会。

如果与斯巴达特使谈判的是伯里克利，他必定会抓住时机和对方签订休战协议。经过数年休战，便可将两国趋向缓和的关系进一步推向和平，即恢复战前分庭抗礼的状态。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6年就可以终结。

可是，迎接斯巴达特使的雅典要人中有克利昂。他激进的继续战争论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以为抓了斯巴达俘虏就等于赢得了战争。终结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机会就这样化成泡影。

谈判特使无功而返，但斯巴达还有两个对策可以选择。

第一，充分发挥斯巴达战士打平原战天下无敌的优势，用尽一切手段把雅典从海上引向陆地。随后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和对方谈休战，换回俘虏。

第二，与第一个对策正好相反，不再把宝贵的斯巴达正规军送上战场。但战争仍在进行，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不能退出战场。于是，他们想到可以让其他人——非正规军去打仗。

斯巴达人自幼习武，终生经受严格的训练。如果论身体的灵活性，只接受不足两年军事训练的雅典人绝对望尘莫及。然而，斯巴达人的优势仅在身体上。说到斯巴达人的精神层面，正如修昔底德所指，欠缺灵活性。

这种精神上的缺陷让斯巴达人遇到情况恶化时倾向退缩保守，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因此，斯巴达人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对策。

没有哪个斯巴达人会想到，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自寻死路。

下克上，指身居低位的人替代身居高位的一方。

斯巴达规定，率军打仗是国王的职责，但国王率领的必须是正规军。

如果率军的不是国王而是其他人，那么也无须出动正规军，这样就不会损失宝贵的斯巴达战士。

自此以后，除了不可避免的场合，斯巴达两王率军出征的情况急剧

减少。

正是斯巴达国内形势的变化造就了伯拉西达（Brasidas）的崛起。

“编外录用”的开始

斯巴达人对保存本国历史毫无兴趣，连大多数国王的出生年月都无据可查。因此，一介重装步兵出身的伯拉西达的生辰，就更加不得而知。根据雅典一方零散的记录推测，他代替国王率军出征在公元前425年到公元前422年之间，当时他的年龄在45岁以上。

在古代，男子20岁成为正式公民，30岁左右获得一定的职位属于普通现象。40多岁正是成为战场指挥官最好的年纪。

这时他们有体力、有经验。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况，这个年纪的男人还有足够的反应能力可以迅速应对。

刚进入40岁后半期的伯拉西达被赋予的任务是报复雅典。

斯巴达人没想到他们会输掉陆地战，没想到会有众多士兵被俘，甚至连休战的提议也被拒绝。

伯拉西达此时的立场类似以下的情况。

某公司决心报复竞争对手。如果派正式员工上阵，万一失败将有损公司的威信。于是，公司决定派一队非正式员工冲锋陷阵，率领这群人的是唯一的正式员工。这位正式员工就是珍贵的斯巴达战士伯拉西达。

不过，情况也有对伯拉西达有利的方面。由于率领的不是正规军，他出征时没有两位监察官同行。身边少了指手画脚的人，他可以自己决定战略、战术并迅速执行。这是他的“现场”优势。

斯巴达只给了伯拉西达700名士兵。由于是非正规军，这些人都是

希洛人。虽然他们的装备和正规军重装步兵相差无几，他们也接受过军事训练，但说到底他们只是一群奴隶。

除了700名希洛人之外，为彰显这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的军事行动，军队还添加了1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士兵，总共也就1700人。这支由合同工和临时工组成的队伍唯有统帅是正式员工，即伯拉西达。

这位伯拉西达似乎不是典型的刚毅却不懂融通的斯巴达人。

他锁定了一个打击目标，可以让他充分发挥统帅一人独断和小部队灵活机动的优势。

伯拉西达的目标是雅典辖下的卡尔息底亚地区。这里属于爱琴海北部，当年伯里克利在安菲波利斯建立基地，成功将这个地区纳入提洛同盟。可以说，正因为雅典控制了卡尔息底亚及其东面的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才真正成为雅典人的海域。

卡尔息底亚对于雅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这里有大片的森林，是打造雅典三层加莱船不可或缺的木材产地。

伯拉西达打算在这个雅典经济圈的一角打下一根桩子，同时切断雅典的木材来源。

在尽快雪耻这个目标上，实际掌控斯巴达国家政权的5位监察官似乎达成了共识。凡事慢一拍的斯巴达难得行动敏捷。在休战提议被雅典拒绝的第二年，伯拉西达率领1700名士兵北上。那一年是公元前42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7年。

战线扩大

从斯巴达出发前往卡尔息底亚的行程，是一段从南到北纵跨希腊的遥远的路程。人们通常会选择走海路，但伯拉西达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选择海路是因为不能选。如果他们坐船北上，势必会被闻风而动的雅典海军扔进海里喂鱼。

不过，走陆路也不安全。希腊中部的色萨利（Thessalia）地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是雅典的盟友，那是前往卡尔息底亚的必经之地。

此外还得补充军粮。1700人的小部队同样存在伙食供应的问题。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们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这里再次重申，伯拉西达不是国王，他率领的也不是堪称精英的斯巴达战士。

国王及精英们不能做野蛮的事情，而伯拉西达和他的1700个手下是被默许的。大概出发前监察官们就给出了这样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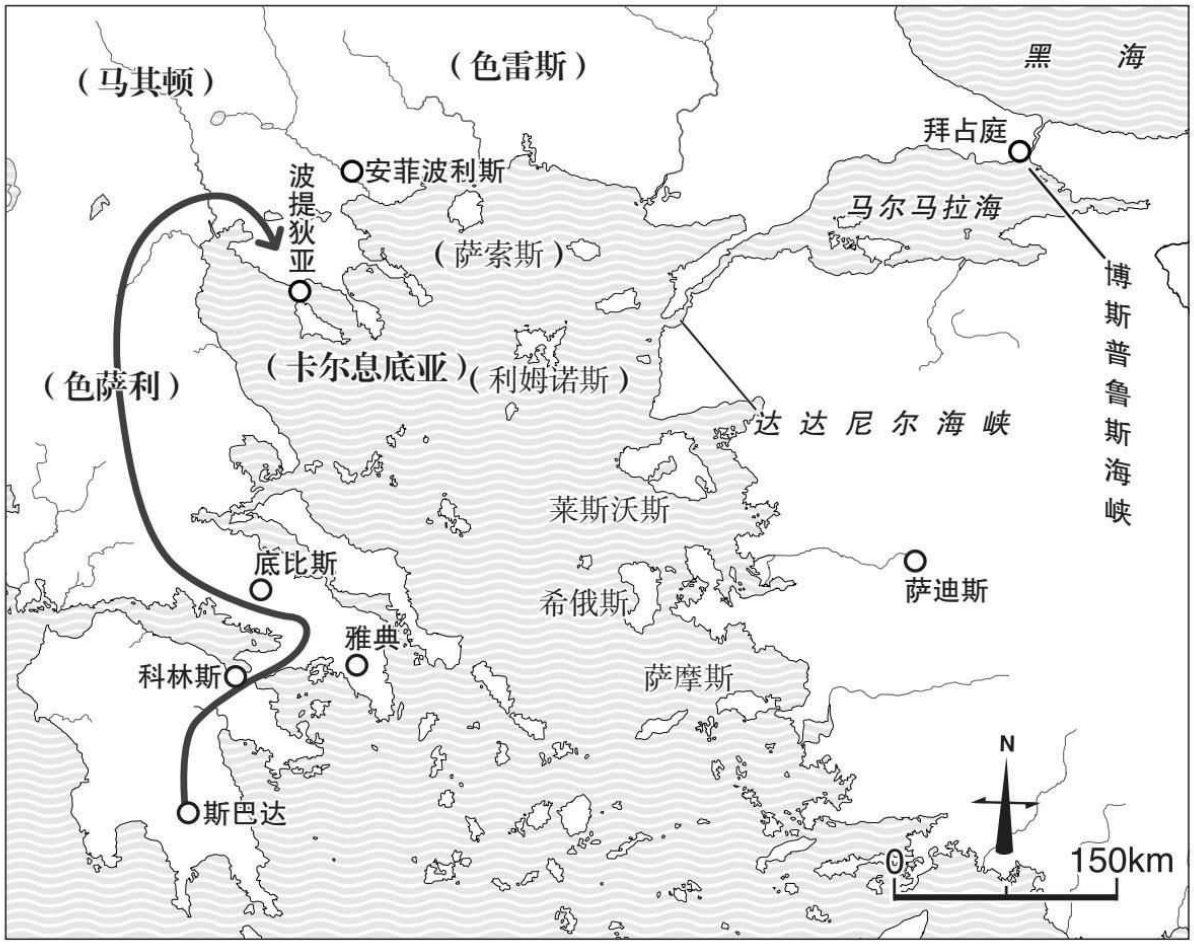
然而，伯拉西达不是普通的斯巴达男人。尽管军粮要紧，但如果为此犯下暴行，被掠夺的一方势必反抗，从而造成己方伤亡。伯拉西达不打算让这支只有1700人的小部队在抵达目的地前损失一兵一卒。

在那个时代，寡默是斯巴达人的代名词。伯拉西达在这一点上也有异于典型的斯巴达人。

进入相当于敌区的色萨利后，伯拉西达严令不许骚扰经过的村镇，晚上在城外露营。这对当地居民自然是好事，他们似乎向军队提供了粮食。

伯拉西达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通过了色萨利地区。

从色萨利往北是马其顿王国的领土。彼时尚未崛起的边境小国马其顿，也算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员。只要平安进入马其顿境内，雅典领地卡尔息底亚就在眼前。



伯拉西达行军路线

就这样，伯拉西达的军队来到正和雅典持续冲突的卡尔息底亚城邦——波提狄亚的城墙下。

得知消息的雅典城内肯定是警报长鸣。

雅典人清楚伯拉西达的真正意图。他不是去支援至今不肯臣服雅典的波提狄亚，而是要拿下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重镇安菲波利斯。

为阻止斯巴达人的行动，雅典迅速派两位将军率军出征。

这两位将军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率领陆军的攸克利斯直奔安菲波利斯，死守这个战略要地。

率领7艘三层加莱船的修昔底德前往萨索斯岛（Thasos）。他的任务是以萨索斯岛为基地，控制住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各城邦，保证其不会叛变投敌。此时争取更多的盟友对打赢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年轻的修昔底德之所以被赋予这个外交任务，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他的家族自上一代起就拥有色雷斯的银矿，他本人对那一带非常了解，有信心与当地的城邦做好沟通。

雅典的错误不在于选错将军，而是错在他们没有想到伯拉西达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

冬天即将来临，斯巴达人通常不会在冬季打仗。两位雅典将军判断真正的战役要到第二年开春才打响。因此，他们抵达目的地后没有急于备战。

然而，伯拉西达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换言之，他是一个罕见的不循规蹈矩的斯巴达人。

与深信打仗全凭真刀真枪的同胞不同，伯拉西达相信语言也是有力的武器。这是他的另一个特点。

眼下正在进行的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伯拉西达率领的军队虽说零散，也算伯罗奔尼撒联军。

这位入侵提洛同盟辖下的卡尔息底亚的伯拉西达，不断强调自己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他向当地民众保证，他们脱离雅典的控制后不会成为斯巴达的臣民。

伯拉西达深知，与雅典正规军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自己率领的这支

农奴军绝不是对手。所以他放弃兵戎相见，改用宣传达到目的。

这也是伯里克利常用的手段。对那些雅典打算用作基地的城邦，他没有实施驱赶当地居民的措施。哪怕是对雅典极其重要的安菲波利斯，他也只是在原有居民的基础上，安插进部分雅典移民。

伯拉西达的宣传不用说首先是针对安菲波利斯的原住民的，但他也没有忽略当地的雅典移民。那些移民毕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十年。

他对原住民、移民一视同仁，向所有人提出了优厚的投降条件。

第一，想离开的人尽管离开，可以带上所有想带走的人和物品。为了让打算离开的人有准备的时间，给予5天期限。

第二，保证留下的人继续享受现有的权利和财产。

伯拉西达还强调一点，脱离提洛同盟成为独立的城邦，当地可以摆脱缴纳同盟会费的义务。

不用花钱还能得益，不论古今中外这都是最有吸引力的承诺。最终安菲波利斯的居民大半决定留下，这个结果只能说是大势所趋。

在聆听伯拉西达承诺的人群中，有一位雅典派来的将军，他就是攸克利斯。虽然上级命令他死守安菲波利斯，但面对眼前的情形他还能有何作为？他只能在城门向伯拉西达打开前，带着军队离开安菲波利斯。

作为资深将军，攸克利斯知道不管自己以何种方式撤离安菲波利斯，都意味着提洛同盟的一角已被撕裂。他也很清楚，如果就这么返回雅典，自己将受到怎样的处置。

攸克利斯下令让士兵们回国，自己销声匿迹。不清楚他是自杀了，还是找了什么地方隐姓埋名地生活。

另一位将军修昔底德获悉伯拉西达率领的斯巴达军队逼近安菲波利斯以后，立即前往安菲波利斯南边的爱昂（Eion）。但他抵达目的地时，安菲波利斯已经向伯拉西达投降。

修昔底德下令死守爱昂。他手下的士兵包括划桨手在内有1400人，再加上被迫撤离安菲波利斯的雅典军，他相信这足以对抗伯拉西达。

安菲波利斯是临河的内陆城邦，而爱昂是位于出海口的港口小镇。修昔底德估计拿下安菲波利斯的伯拉西达会继续向爱昂发起攻击。只要守住爱昂，迟早能夺回安菲波利斯。

然而，重视出海口是贸易国国民的想法，与商业无缘的斯巴达人对此毫无感觉。相信伯拉西达从来没考虑过要掌握港口。此刻他脑子里唯一想的恐怕是把卡尔息底亚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从雅典势力范围内分离出去。

虽然我不是伯拉西达，不过我能猜到之后的结果。只要安菲波利斯脱离雅典控制，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其他城邦势必效仿。

结果，修昔底德不得不放弃死守爱昂，返回雅典。不知雅典民众是觉得他责任感过强，还是太年轻，总之对他的战绩十分不满，针对于他的民愤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34岁的年轻司令官刚回国就遭到指控，被判处流放国外20年。

陶片放逐法规定的流放期限也只有10年，20年的处罚实在过于严酷，但也许他能逃过死刑已是万幸。或许因为这位被告只有34岁，那些主张严惩的人动了恻隐之心，将死刑改判为流放。

历史学家的诞生

上述判决促成了一位稀世历史学家的诞生。仅担任一次将军便断绝了政治生涯的修昔底德决定，从今往后专心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被流放的20年，修昔底德在生活上应该是衣食无忧。他在色雷斯，也就是当初率军前往的萨索斯岛的北方拥有银矿。单靠这个收入，修昔底德就能成为和伯里克利、尼基阿斯不相上下的富豪，他无疑属于梭伦制定的等级制中的第一等。

撰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在波及全希腊的希波战争结束50年之后才动笔的。

才华比希罗多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修昔底德撰写被后世誉为史书最高杰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战争仍在进行之中。至此，将军修昔底德死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诞生。

此前，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历史记录很久以前就出现在埃及、远东等地区，修昔底德的伟大之处是在记录中增加了关于“为什么”的因果探究。准确地说，书中充满他努力找寻“为什么”的执着。

作为雅典上流社会的子弟，修昔底德原本应该一帆风顺的仕途在34岁时中断。他探寻“为什么”的这份执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位失败者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呢？

话说回来，公元前424年的冬天至翌年春季的这段时间，雅典人可

没有余暇揣摩被流放的司令官著书的目的。斯巴达的非正规军已兵不血刃地撬开了提洛同盟的一角。

这场危机让雅典人心惶惶。最擅长在这种时刻煽动不安的克里昂发起了针对政府的批判，让公民大会的气氛愈发紧张。

来自斯巴达的提议

危机中的雅典从一个令人意外的地方得到了援手。

这双援手来自斯巴达。对于伯拉西达的辉煌战果，有些斯巴达人并不那么欣喜，他们担心斯巴达社会由此形成“下克上”的风气，所以向雅典提出了休战的建议。

那些感觉前景暗淡又不赞同克里昂那一套的雅典人，抓住了斯巴达送来休战方案的机会。

休战期为一年。在此期间，雅典继续拥有卡尔息底亚地区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暂时保持现状。

在休战期，斯巴达和雅典将为构建永久的和平继续谈判。

此间所有国家的战船禁止通过他国的海域。商船不受禁令限制。

这也是贸易立国的雅典求之不得的条件。

那么，休战又能为斯巴达带来什么呢？

表面上看，条约明文规定雅典须交还一年前在皮洛斯战役中俘虏的150名斯巴达战士，归还当时抢占的皮洛斯和斯法克蒂里亚地区。

不过，台面下没有写在条约里的事项，反而对雅典更有吸引力。

斯巴达人答应，以两国在卡尔息底亚地区不再有利害冲突为由，召回伯拉西达及其手下的1700名士兵。

面对如此利好，只剩下一贯主张强硬路线的克里昂及其党羽反对休战。

公元前423年的春天，雅典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决定以上述条件与斯巴达缔结休战协定。

当时伯拉西达不顾冬季严寒，也不管什么保持现状的约定，正继续在卡尔息底亚地区进行瓦解战。

他雄心勃勃地要征服地形犹如海神的三叉戟一般插入爱琴海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所有雅典盟友。

这时，雅典代表带着斯巴达签字的休战协定出现在他的面前。

作为斯巴达公民，伯拉西达有义务遵守政府签署的协定。但在那个节点，他尚未收到归国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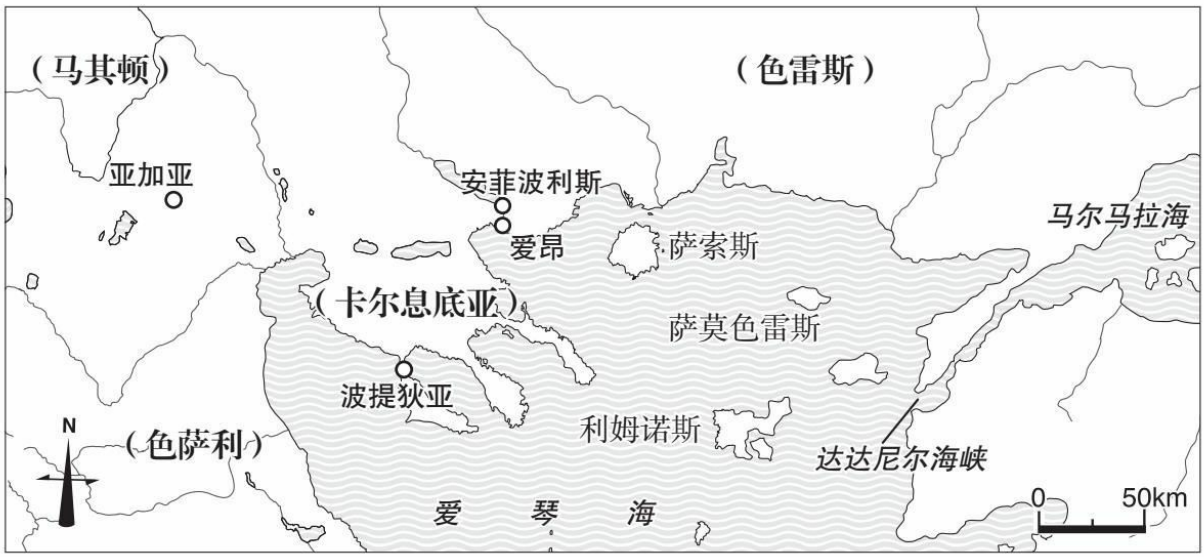
于是，伯拉西达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对策。

面对雅典代表的抗议，这位斯巴达将军是这样回答的：协定在规定时间内送达才算有效，迟来的协定等于白纸一张。

雅典代表似乎是比协定规定的时间晚到了一些。

真是佩服伯拉西达的口才！如果他生活在2500年后的今天，绝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雅典派来的代表面对伯拉西达的这番理论，找不到反驳之词。



卡尔息底亚地区及其周边

代表们的无功而返令雅典人愕然失色。雅典人竟然辩不过木讷的斯巴达人，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话说回来，伯拉西达违背休战协定的举动，事实上是斩断了雅典的救命稻草。

不过，伯拉西达也第一次遇到了困难。

尽管以宣传攻势代替军事行动获得了成功，但瓦解战越是成功，越需要相应的军力震慑那些城邦，以使其不会重投雅典麾下。对此，他手上的这支1700人的队伍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斯巴达仍然没有向伯拉西达下达归国令。政府对他提出的派遣援军的请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伯拉西达无可奈何转向马其顿国王求援。孰知没有比那个时代的马其顿国王更不守信用的盟友了。

对于伯拉西达面临的窘境，雅典人很清楚，也知道他们的休战希望断送在这个人手里了。

于是，雅典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兵力打击伯拉西达军。

雅典派出了50艘三层加莱船，这意味着动用了1万人以上的兵力。除此之外，为应对不可避免的登陆战，又另外增加了1000名“海军陆战队”的重装步兵。总计11000人的规模，对付伯拉西达的区区1700人，相信雅典人是带着十足的信心奔赴战场的。

率领这支军队的有两位将军。其中一位是在雅典政坛和克里昂对立的稳健派领袖尼基阿斯。也就是说，这支军队集结了饱受煽动家克里昂抨击的人们。

雅典军实力雄厚，抵达卡尔息底亚后战果辉煌。那些当初听信伯拉西达甜言蜜语而宣告独立的城邦，又重新回到雅典辖下。

伯拉西达终于被逼到绝境。

不料，已经将对手逼到悬崖边的关键时刻，雅典的两位将军竟然下令撤军回国。

他们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寒冬将至，不适合继续作战。不过，我猜测两位将军，尤其是尼基阿斯，是不想把斯巴达逼得太紧。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这8年来雅典和斯巴达都在避免正面交锋。

当然，其间也发生了皮洛斯战役那种近似“摩擦”的事件。在那场战役中，斯巴达不仅失去了皮洛斯，还有150名宝贵的重装步兵被俘。即便如此，斯巴达也没有正式向雅典宣战。

在斯巴达看来，入侵卡尔息底亚地区不属于城邦发起的军事行动。

伯拉西达的确是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的一员，但他率领的军队中有700名是希洛人。这些人在国王率正规军出征时，是作为重装步兵的随从同赴战场的。每个步兵手下有7名希洛人。

因此，伯拉西达率领的这支军队成了不被斯巴达正式承认，而被其他城邦视为斯巴达军的奇怪军队。

如果伯拉西达军被雅典全歼而斯巴达无所作为，那斯巴达势必会被其他盟友——特别是敌视雅典的科林斯指责为软弱。那么，雅典将面临和斯巴达正规军直接对决的危险。

把自尊心视为头等大事的斯巴达人一旦被指责软弱，定会将和平共处的理智抛到脑后。

47岁的尼基阿斯尽管不具备长远的眼光，但他有能力看清眼前的形势。为回避和斯巴达正面交锋，他放弃了歼灭伯拉西达军的机会。

无论尼基阿斯心中如何盘算，雅典民众看见的是放弃大好战况掉头回家的军队。民众不满，克里昂自然不会错过火上浇油的机会。靠着煽动民愤，他在第二年的10位将军的选举中首次当选为将军。

为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克里昂要求率军夺回安菲波利斯。对于即将迎来43岁生日的他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初次上阵。一心想报复尼基阿斯等稳健派的克里昂提出无须其他将军同行，他要独自率军出征，公民大会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

克里昂率领的雅典军具体人数不详，相信至少有前一年尼基阿斯军队的一半规模。因为上一次有两位将军率军，这次只有克里昂一人。

公元前422年9月，他们沿海岸北上在爱昂登陆。托伯拉西达不屑之福，这个港口小镇仍然属于雅典领地。

接下来就是沿河往上进攻伯拉西达所在的安菲波利斯。不过，司令官克里昂在行军途中已经失去了士兵的信赖。

在公民大会上面对群众讲话和战场上面对士兵讲话的内容完全不同。

公民大会上只要批判政府、对当权者表示不满，就可能获得民众支持。

面对即将和敌人厮杀的战士，司令官的发言事关每一位战士的性命。

士兵们希望听到的是最具体的内容，是自己该怎样行动。

同时，激烈的批判、责难会令人绝望。司令官必须给予士兵们希望，必胜的希望。

很遗憾，劲敌在前，克里昂依然是在公民大会发言时的做派。煽动者克里昂身份地位有变，却无法改变自己。民众给了他当将军的机会，他却不能脱胎换骨。

安菲波利斯是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重镇，在这里展开的攻防战意义重大。然而，简直没有比公元前422年秋天在安菲波利斯近郊展开的战斗更糊涂的战斗了。

伯拉西达一方是“有将无兵”，克里昂一方则是“有兵无将”。

我不清楚最终究竟是哪一方获胜，总之士兵牺牲的数量似乎不多。可以确认的是处于进攻第一线的克里昂战死，处于防守第一线的伯拉西达身负重伤，被移送至后方不久后身亡。

雅典军以司令官战死为由，抢在海浪汹涌的冬季来临之前匆匆返回

了祖国。

克里昂唯一的功绩就是让伯拉西达做了陪葬。

《尼基阿斯和约》

这一年的冬天，雅典和斯巴达迅速展开了休战谈判。克里昂和伯拉西达这两块“绊脚石”的死亡，让两国的稳健派有了机会。

刚到第二年的春天，休战条约已经签署完毕。

《尼基阿斯和约》的条约内容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主要谈一下斯巴达和雅典各自获得了怎样的利益。

斯巴达获得的利益显而易见。

首先是换回了4年前因皮洛斯战役失败被俘的150名斯巴达战士，收回了被雅典占领并一直作为中继基地使用的皮洛斯及周边岛屿。这块紧邻斯巴达拉科尼亚地区西部的地方被雅典掌控，是斯巴达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斯巴达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不过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伯拉西达率领的1700人中，有700名是武装过的农奴，不管怎么说他们好歹算是斯巴达人。剩余的1000人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城邦。

就算伯拉西达的军队本质上不属于斯巴达正规军，但依然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

斯巴达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不能因为伯拉西达战死便撒手不管。

他们必须让伯拉西达留下的战果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向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友证明这场远征并非没有意义。

面对不达目的绝不签字的斯巴达，雅典只能做出妥协。《尼基阿斯和约》中最终出现奇妙的内容，也是双方博弈之后无可奈何的结果。

和约将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城邦分成以下几类：

地图上标○的城邦从和约签订以后脱离雅典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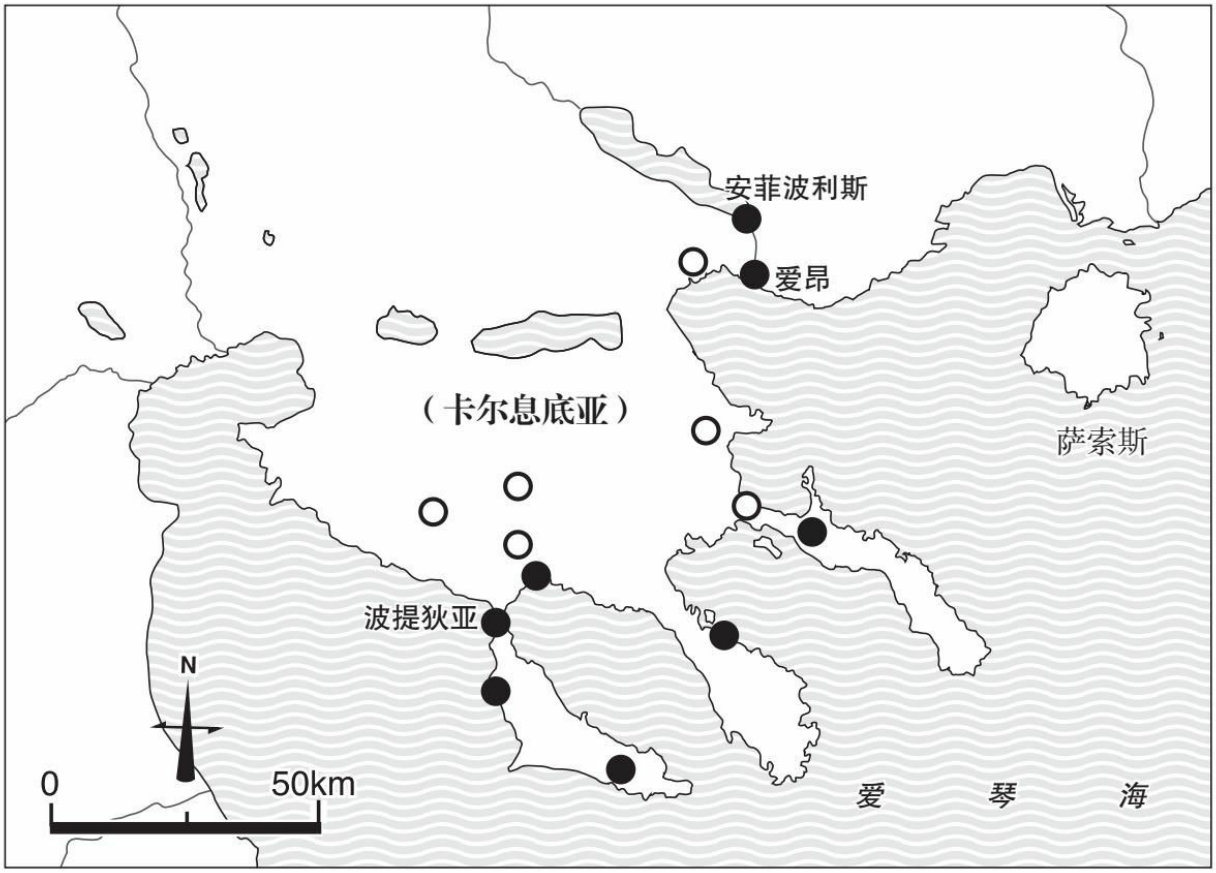
但是，提洛同盟的会费要按照56年前同盟缔结时规定的金额，继续向雅典缴纳。

地图上标●的城邦，统统归雅典辖下。

如果这些城邦背叛雅典，雅典有权处置。不仅斯巴达不能出手相救，其他城邦一律无权介入。

对急躁的希腊人而言，这个和平协定的有效期实属罕见，长达50年。

为了向所有希腊人证明雅典、斯巴达坚守这份和约的决心，双方签字的协议书制作成三份，分别供奉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爱奥尼亚的波塞冬神殿，以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也就是说，雅典和斯巴达向天神们立下了誓言。



《尼基阿斯和约》缔结后的卡尔息底亚地区

对希腊人而言的“和平”

乍一看，《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使卡尔息底亚地区重新回到伯拉西达侵占前雅典统治的状态。

但反映出希腊民族奉灵敬神之虔诚的这份《尼基阿斯和约》被称为“空洞的和约”。给出这种苛评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因为这份和约是两个包括国家形态在内各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城邦国家，为解决纠纷相互妥协创造的产物，这种和解并非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真诚和解。

斯巴达极端厌恶他国人员和物产输入，一贯奉行锁国的一国和平主义。

而雅典的生存依赖于人员和物产的交流。

对“霸权”这个概念，两国也有不同的理解。

斯巴达人理解的“霸权”是侵略他国的领土，将之占为己有。始终以一国和平主义为核心的斯巴达自然对这种霸权主义无动于衷。

雅典人所谓的“霸权”不是占有领土，而是扩大奉行雅典式观念及行为模式的世界版图。雅典人满足于建立基地，不觊觎更多的领土就是一个证明。

仅在对“霸权”的理解上就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城邦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自然会成为“空洞的和约”，因为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伯拉西达之所以能成功瓦解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霸权，是因为他很好地宣传了不缴纳同盟会费生活可以更好的理念，触动了人们最为敏感的神经。

对那些因《尼基阿斯和约》重新回归的城邦，雅典不得不从“钱”这种低级但不容轻视的事项开始一一处理。

这些棘手的问题，雅典人单是想想就烦恼不已。

对这份和约予以恶评的雅典文人不止修昔底德一位。

阿里斯托芬在《尼基阿斯和约》签署后不久创作了一部剧名充满反讽意味的喜剧《和平》。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自出道以来他一直是深受民众喜爱的“流行作家”。被他挖苦调侃过的雅典名人不计其数，伯里克利、苏格拉底、克里昂、尼基阿斯，以及即将登场的阿基比亚德都中过他的枪。

在这部名叫《和平》的作品中，阿里斯托芬提出了希腊人为什么总是打仗的问题。

剧情是这样的：因持续战争而对现状绝望的某人前往奥林匹斯山请求众神帮忙。不料，对希腊人的好战厌烦透顶的宙斯诸神已经迁去别处，只剩下赫尔墨斯留守。

更糟糕的是，战争之神霸占了此地，他甚至把总是如影随行的和平女神关进了洞穴。难怪人类世界从早到晚都在战争状态。

雅典人坐在舒适的露天岩石剧场观看这部喜剧，不由得捧腹大笑。

那些乐不可支地将此剧选为当年狄俄尼索斯戏剧节优秀作品的观众

都明白，这部剧嘲笑的不是别人，正是雅典人自己。

《尼基阿斯和约》让雅典人发现，他们不再拥有决定规则的实力。这个事实让民众沮丧不已。人们需要用喜剧忘却眼前的忧虑，哪怕只是获得暂时的快乐。

雅典社会气氛整体低迷，这正是政治家出手的机会。

无论和约如何“空洞”，它都是雅典目前必不可缺的。冷静地分析现状，扫除民众心中的阴霾，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尼基阿斯有充分的能力对现状做出判断，并且总是正确的。但他不具备通过改换视角让民众恢复信心，给彷徨不安的人们展示光明未来的超一流的说服力。

这里有一个杯子，里面的水只剩下一半。

尼基阿斯会向民众指出只有半杯水的现状，说明不得不妥协的原因。

这种做法只会让民众更为沮丧。这不是看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大笑一场就能解决的问题。

话说回来，像克里昂那样的煽动者也令人诟病。事实证明，那种平素言论极端且富于感染力的人，关键时刻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领导力。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10年。雅典人感到疲惫不堪。

年轻领袖的登场

就在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他指着杯子说，不是还有半杯水嘛，更何况，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也没有哪个人说过，不能再往杯子里注水。

雅典公民们将这位年龄刚达到能担任要职的30岁年轻人选为将军。也就是说，他成为每年选出的负责城邦国家雅典政治、军事事务的10位将军之一。

既然是之一，自然还有另外9位将军，其中就包括一直连任的尼基阿斯。

这位年轻人与尼基阿斯的差别不仅是20岁的年龄。

关键在于，他能向民众指出未来的前景。

	知性	说服力	肉体的耐力	自我克制力	持续的意志力	运气	容貌
伯里克利	100	100	90	100	100	90	100
克里昂	10	50	70	10	10	20	10
尼基阿斯	90	40	70	50	50	20	20
阿基比亚德	100	100	100	100 或 30	70	20	100

以上沿用了写《罗马人的故事》恺撒篇时，我出于好玩制作的评分图。不过写恺撒时没有运气和容貌这两项。

之前没设这两项是因为罗马人对于命运秉持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一旦做了决定便坦然接受后果。

与之相对，希腊人认为无论怎么尽人事最终都逃不过命运。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几乎充斥着整个希腊悲剧世界。

在容貌上，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评价标准也不同。

罗马人不是完全不介意领袖的长相。谁都希望率领自己的将军相貌堂堂、魁梧高大。光靠仪表就能增添士兵胜敌的信心。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与希腊人没有不同。

但对罗马人而言，外观上的不足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恺撒虽然气宇轩昂，但绝不能算容貌英俊的美男子。

希腊人就不一样了。容貌是评价男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阅读他们的史料会发现，其中论及长相美丑的内容多到令人吃惊。

到底是提出真、善、美的民族。在希腊人看来，美丽的容貌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是深受众神眷顾的证明。

顺便提一句，接下来登场的阿基比亚德被认为是少年时清秀，青年时俊朗，壮年时再添成熟男子独有的从容气度，一生美貌永驻的男人。与他相关的史料没有一篇不提及他的美貌。

阿基比亚德，公元前450年出生于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战死沙场。在他需要监护人即代理父亲时，同族的伯里克利担当了这个角色。

当时正值“伯里克利时代”的鼎盛期，相信雅典政界第一人伯里克利应该是无暇培养这位少年的。伯里克利似乎也不适合当父亲，他属于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他曾以准备公民大会的演讲稿为由拒绝了想来见他的少年。

但不管怎么说，有这层关系在，少年阿基比亚德应该会经常出入伯里克利的宅邸，只不过对他笑脸相迎的是伯里克利的爱妻阿斯帕齐娅。

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养育阿基比亚德的不是伯里克利，而是阿斯帕齐娅。

当时频繁出现在阿斯帕齐娅身边的还有年轻的苏格拉底。

希腊史上著名的佳话——哲学家苏格拉底和风云儿阿基比亚德的交往，可能最初就是阿斯帕齐娅介绍的。

而第一个看出这位美少年将成为雅典领袖的，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西方哲学始于希腊哲学，而希腊哲学始于苏格拉底。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后世之所以能了解苏格拉底的言行，全仰仗和他相差42岁的他最年轻的弟子柏拉图。

我在大学时代读哲学专业，对于哲学家柏拉图总有些距离感。但作为文学家的柏拉图总能以寥寥数语令我目瞪口呆，他有超一流的文字水平。从此，哲学家柏拉图就交给其他专家研究，我专心通过文学家柏拉图的笔墨寻找苏格拉底的足迹。

在柏拉图众多的作品中，被誉为杰作的《飨宴》（*Symposion*，又译《会饮》）的开头是这样的：

某人在路上遇到苏格拉底。后者看上去不同寻常，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而他平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于是，某人问苏格拉底今天怎么了。

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要去阿伽通家里吃晚饭。他的悲剧昨天获得了戏剧节的大奖，今晚盛宴庆祝。去美男子家做客，我得打扮得漂漂亮亮。你愿意一起去吗？"

"好极了。"

"那么，跟我一道走吧。"

可是这个叫阿里司托得姆的人并没有受到邀请。这个宴会是希腊文

人们喜爱的会饮，众人会在饭后喝着葡萄酒就某个主题展开讨论。苏格拉底觉得他作为主宾去弟子阿伽通家做客，带上个把人同去不算什么事情。

于是两人动身前往。走着走着，苏格拉底像往常一样突然想什么入了神。

这个境界可称为忘我。一旦陷入忘我的状态，苏格拉底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与世隔绝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阿里司托得姆大概早已习惯了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等了一会儿，见他仍然没脱离忘我的境界，便留下他，独自一人前往阿伽通家。

阿伽通没见到苏格拉底有些担心，听阿里司托得姆说起事情的原委，也只能不去管他。

过了一阵子，苏格拉底笑呵呵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当晚的会饮这才正式开始。

所幸苏格拉底每次陷入忘我境界的时间都不长，而且打仗时不会发作，所以不会给人造成麻烦。每每遇上这种情形，他的朋友、弟子们会见怪不怪地说："啊，又来了！"然后嬉笑着等他回过神来。

的确，苏格拉底是一个怪人。但又会令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

教别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苏格拉底授课的基础。但他绝对不会指着哪个人说，你是一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蠢货。

和人谈话时，他首先会问，你知道自己无知吗？你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吧？接着，他会继续说，我可以帮你发现自己的无知。

于是，放下心防的人们开始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类比性问题，答着

答着，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答不下去，不知不觉就被他逼到了死角。

这就是以独特的类比法构成的苏格拉底式的“诱导”。

一旦被这种魔力俘获，便只有举手投降。

那些对苏格拉底式的“诱导”感到厌烦，受不了他刨根问底的人会渐渐与他疏远。有人甚至憎恶苏格拉底。尽管苏格拉底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树敌甚多。被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嘲讽过的雅典名人中唯有苏格拉底不是政治家。

我们说回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飨宴》。那天晚上参与讨论的有6人。

宴会主人、悲剧作家阿伽通。

深受阿伽通尊敬、彼此交往密切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阿伽通的好友——应该说是他的恋人——包萨尼亚。在当时的雅典，这一对是著名的美男子情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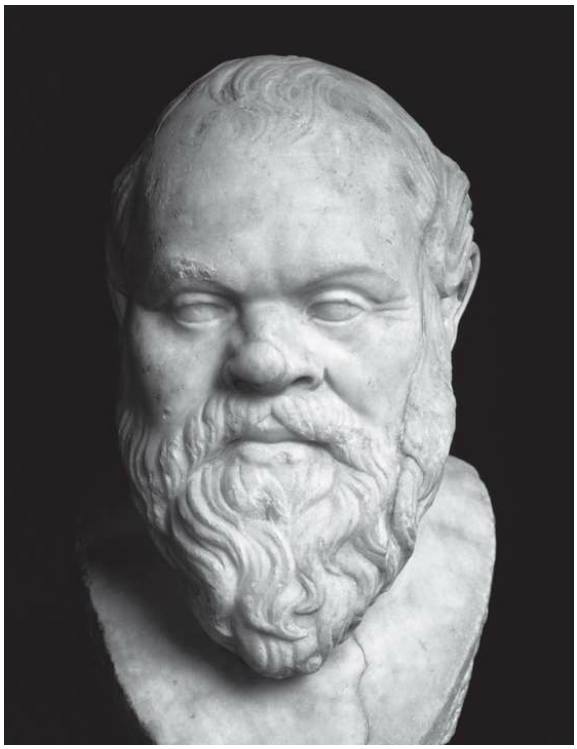
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和斐德罗也加入了这场知性的飨宴。

还有一位是开创了讽刺喜剧新领域，与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二分希腊戏剧天下的阿里斯托芬。

当晚的主题是“Erōs”（爱）。

哪怕群贤毕至，这种专题研讨的内容还是令人多少感到无趣。我硬着头皮读到后半段，忽然觉得场面变得熠熠生辉。

那是因为喝得醉醺醺的阿基比亚德闯入宴会，搅得研讨会天翻地



苏格拉底

覆。

这个著名的场面我将在后文介绍。这里先做个小铺垫。《飨宴》之所以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正是因为有这段阿基比亚德借着醉意对苏格拉底的深情告白。

这段深情告白可不仅仅是单纯地赞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哲学的所有魅力或者说魔力，统统被概括在这段告白中。

如果哪位想了解苏格拉底，我建议在挑战柏拉图为数众多的对话作品之前，先读一读《飨宴》。

在柏拉图大量的对话作品中，有一篇题为《阿基比亚德》。

预见到少年远大前程的苏格拉底，教导当时还是孩子的阿基比亚德成为领袖必须具备哪些德行。作品中的阿基比亚德未满15岁，苏格拉底应该也不到35岁。

面对意气风发、优越感十足的傲气少年，苏格拉底的教导简言之就是自我克制的重要性。

他依然用他那独特的诱导方式，提出两个相反的命题让对方做二选一的回答。经过一连串的提问和回答，逼对方认输。

阿基比亚德有没有接受挑战呢？在这篇作品中，阿基比亚德始终表现得可爱、天真、率性，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他早就被苏格拉底的魔力征服了。

《飨宴》谈话的那一年，阿基比亚德已经34岁，苏格拉底54岁。

《阿基比亚德》与《飨宴》之间相隔20年的岁月。

在这20年里，苏格拉底始终我行我素地到处拉着人谈话，教他们人生的道理。而阿基比亚德全身心地投入他那波澜起伏的人生旅途。

老师，是专注于思考的哲学家。学生，是靠行动获得成果的政治家、将军。

青年政治家阿基比亚德

公元前420年，30岁的阿基比亚德刚达到担任要职的法定年龄便当选为将军，即政治上的执政官和军事上的司令官。这位年轻人在当年就展示出非凡的一面，证明他不只是10位将军之一这么简单。

对几乎年年当选将军的尼基阿斯而言，这位年轻人可不是克里昂之辈，他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两年前战死的克里昂，用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话说就是，一只嗡嗡乱飞、冷不防射出蜂针的煽动民心的马蜂。但阿基比亚德绝不做那种事情。面对对手，他不会批评、非难，而是堂堂正正地应对挑战。

阿基比亚德不同于皮革制造商克里昂的另一点是，他来自雅典无人不知、堪称名门中之名门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不论古今中外，大众对贵族从来都心怀仰慕。

说到容貌，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让人感到没有可比性。无论何时何地，阿基比亚德始终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尼基阿斯虽然长得并不丑，但属于淹没于人群中的大众脸。

如果古代的民主国家雅典赋予妇女参政权的话，阿基比亚德势必连年当选将军。好在希腊的男人们对美也非常敏感。

在年龄上，尼基阿斯50岁，阿基比亚德30岁，两人相差20岁。这个年龄差对尼基阿斯来说很不利，但真正的不利在其他方面。

尼基阿斯少年老成，所以日后他能作为良知派、稳健派的领袖长期屹立在雅典政坛。

相反，阿基比亚德从青年到壮年，无论从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上说，他都是永远的少年。

他们两人之间最大的隔阂，用现代语言讲，就是采取紧缩路线还是成长路线的问题。

尼基阿斯向民众展示了“杯里只有半杯水”的现状，通过努力促成了《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而阿基比亚德以“执政在野党”的姿态，主张杯中还有一半的水，只要再加些进去又可以回到满杯的状态。

雅典民众有权决定把雅典的未来托付给他们中的哪一位，这些人对持续了10年的战争感到绝望，对未来充满惶恐。

构成提洛同盟一角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诸城邦必须回归雅典，这是《尼基阿斯和约》明确规定的事情。

那些地方的人民受到伯拉西达的鼓动，认为无须支付同盟会费的生活会很好，于是脱离了雅典的控制。想说服他们再次回归，雅典不具备充分的理由。就连卡尔息底亚的重镇安菲波利斯也对《尼基阿斯和约》表示不满。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

这样一来，战争还得继续。面对厌战的民众，尼基阿斯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保持忍耐、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阿基比亚德不同意对卡尔息底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因为他理解当地人民的经济诉求。在伯里克利这位代理父亲身边长大的阿基比亚德非常清楚提洛同盟与城邦国家雅典的命运息息相关。

因此，这位刚满30岁的将军主张，雅典不仅要关注东方，也应该把眼光转向西方。雅典今后除了东边的爱琴海，还可以把势力范围向西延

伸至爱奥尼亚海域。用现代语言说，这叫多方位战略。

对此，尼基阿斯当然不能接受，如果迈出这危险的一步，雅典既有的步调将被打乱，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其实，关注西方的政策并不是阿基比亚德的独创。

早在60年前，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者地米斯托克利已经迈出了向西的一步。之后，全面继承他的理念的伯里克利一面小心谨慎地尽量不去刺激各相关国，一面扎实地推行着这个政策。

在所有相关国家中，斯巴达当然是最举足轻重的。尼基阿斯反对向西扩展的真正原因，正是不想刺激斯巴达。

但阿基比亚德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要让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不愿发挥主导性的斯巴达有所作为，适当的刺激反而更加有效。

当年地米斯托克利就是以雅典在海上的辉煌胜利，让斯巴达不得不站起来在陆地与波斯人决一死战。

伯里克利通过与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令斯巴达不得不坐下来与雅典商谈和解。

阿基比亚德与两位先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斯巴达。

其实，他不像克里昂那样对斯巴达抱有强烈的憎恨。阿基比亚德行动的目的可能纯粹是为了让斯巴达尽快地“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战法会过度刺激对手，让雅典处于毫无回旋余地的风险之中。因此，向来意志不算坚定的尼基阿斯才会如此执拗地一路反对到底。

出乎意料的是，民众不顾尼基阿斯这位连年平稳当选将军、50岁的

雅典政界第一大佬的强烈反对，接受了阿基比亚德这位首次担任将军，在政治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人的主张。

看见尼基阿斯，雅典人仿佛看见垂头丧气的自己。相反，阿基比亚德光鲜俊郎的形象，激发出人们奋进的信心。

这正是阿基比亚德在政坛一出道即成为雅典全民偶像的原因。

阿基比亚德是超级富豪。

在这一点上，尼基阿斯并不逊色，也许他的财产还超过了阿基比亚德。但是以雅典稳健派代表而自豪的尼基阿斯只会做些捐款建小神殿之类踏实却不起眼儿的事情。

反观阿基比亚德，浪费成性、挥霍无度。他曾经称全雅典人都知道他有钱，有钱还要瞻前顾后地花，那是虚伪。这种肆无忌惮的口吻，居然没引起民众的反感，那些普通市民认为他是位性格直率的好人。

阿基比亚德打破了民主雅典的领袖一直以来保持的低调朴素的生活习惯，向传统的领袖形象发起挑战，这反倒赢得了庶民们的好感。

阿基比亚德长得超级英俊。

这是他成为希腊世界的偶像的最大原因。

代表雅典雕塑艺术巅峰的雕塑家有菲狄亚斯、米隆、普拉克西特列斯三位。与生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前两者不同，普拉克西特列斯在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简单地说，此前的希腊雕塑追求完全无可挑剔的理想之美，美中不免带些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充满浓郁的人情味。阿基比亚德现象或许也影响了造型艺术家们。

阿基比亚德的言行大概只能用“天然率真”来形容。

民主政体国家的政治领袖，他们的武器是运用语言的力量进行演说。哪怕是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发表重要演说之前都会花时间写草稿做充分的准备。

而阿基比亚德向来是临场发挥。

即兴演说难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不得不暂时中断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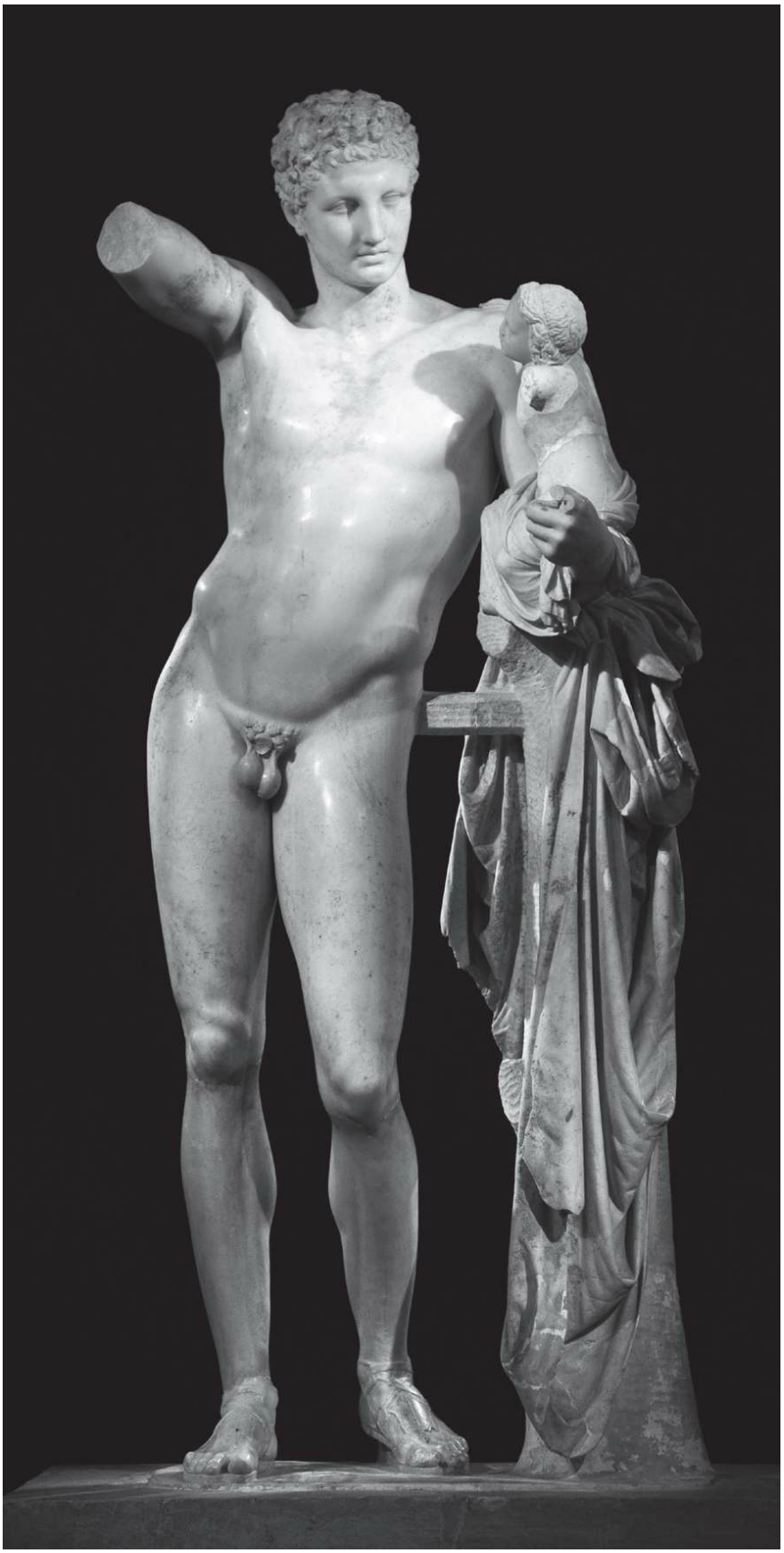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雅典民众绝不会原谅。他们会大声嘲笑、起哄，逼得演说者不得不退场。

但对阿基比亚德，雅典人的反应大不相同。

他们像看着步履蹒跚的幼儿摔倒又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慈爱的长辈，耐心地等待演讲台上一时语塞的阿基比亚德找回头绪完成演讲。

对于这位年轻人L与R发音不分的缺陷，众人也是一笑了之。

结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模仿阿基比亚德的演说方式。这让那些以传授语言技巧为业的智者担心找不到生意。和免费教学的苏格拉底不同，这些智者是要收取报酬的。



普拉克西特列斯制作的赫尔墨斯雕像

阿基比亚德倔强、急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被指责为轻率。当结果不好时，他绝不推卸责任，一人担起罪名。

他完全摆脱了既有观念的束缚，从来不掩饰对愚钝的、单纯的老好人的轻蔑。最令他厌恶的是那些以有良知自居的伪善的人。但有时他又会毫无节操地抛弃自己的喜恶奉迎世俗，令支持者们嫉妒怨恨。

他超级聪慧，却生来带着地中海式的任性、反复无常，没有长性。

这样的阿基比亚德令雅典民众像热爱一匹不受拘束、恣意奔腾的野马一般爱着他。

正因为如此，他树敌众多。

主要的敌人是以尼基阿斯为首，唯恐《尼基阿斯和约》被毁的雅典的良知派、稳健派。身为流行作家的阿里斯托芬对普通雅典人的心理尤其了解，他曾经借作品《蛙》中的一位角色之口说：

“雅典，不该养育雄狮的孩子。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在阿基比亚德出生百年后又诞生了另一位雄狮之子，他就是马其顿王国的王子。

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忽视当事人出生时的环境和成长的时代，否则评价无法成立。以上便是一个例子。

雄狮之子阿基比亚德向公民大会提出结成四国同盟的提案。对此，公民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四国同盟

得到苏格拉底真传的阿基比亚德在把握争议走向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到位。

他绝不做正面攻击，而是先从侧面下手。他把来到雅典的斯巴达使节逼进了公民大会的会场。在那里，阿基比亚德控诉《尼基阿斯和约》签订后，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诸城邦依然没有回归之意，而斯巴达在这方面毫无作为。

看着那些被逼得语无伦次的斯巴达使节，雅典人情绪高涨。或许是为了缓和气氛，尼基阿斯站起来发言，表示自己愿意去斯巴达探清对方的真意。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反对的事情，尼基阿斯反而推波助澜让其得逞。真是位可悲的人物。他在心里大概会破口大骂：

“见鬼去吧，不知闭嘴的混小子！见鬼去吧，给这种混小子发言权的民主政体！见鬼去吧，为实现那混小子的计划，老子我要低声下气跑到斯巴达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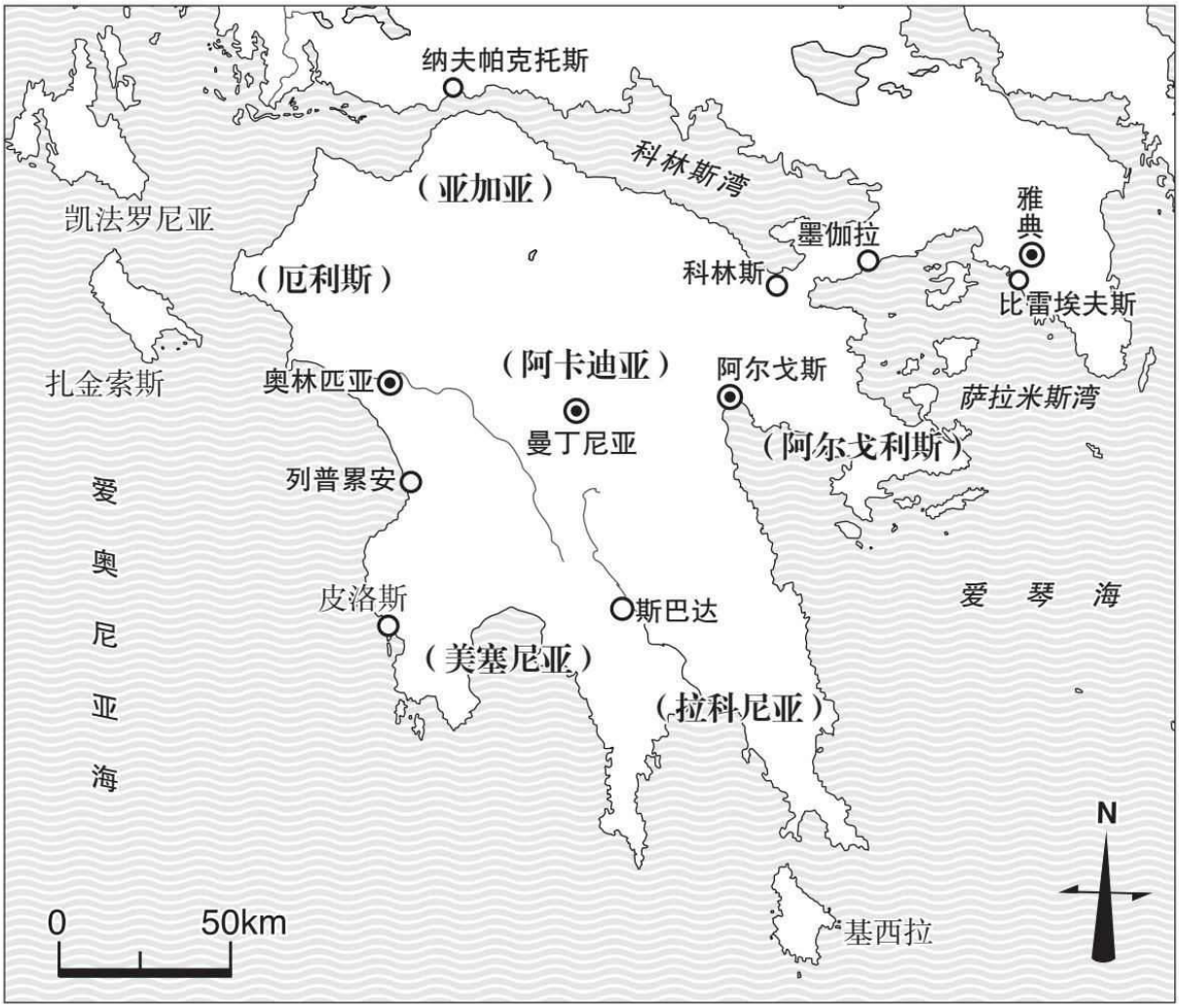
斯巴达留存的阿基比亚德的马赛克画（斯巴达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当然，温和有良知的尼基阿斯绝不会如此粗鲁。不过，如果他能这

样发泄，说不定有助于精神稳定。这样说是因为他面对的斯巴达谈判代表是传统的吕库古法护法派、民族主义者、仇视雅典的两位监察官。

不管过程如何不快，最终斯巴达还是接受了雅典的申诉，容许成立四国同盟。

这是因为雅典抓住了斯巴达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点头同意。斯巴达不是心甘情愿的。



阿基比亚德倡议的四国同盟

四国同盟除了倡议方雅典之外，其他三国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它们由西向东分别是厄利斯（Elis）、以曼丁尼亚（Mantineia）为中心的阿卡迪亚以及首府位于阿尔戈斯（Argos）的阿尔戈利斯（Argolis）。

只要看地图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阿基比亚德提议结盟的真正意图不是防守而是出击。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雅典的同盟，不仅可以从北面包围斯巴达

所在的拉科尼亚地区，而且可以分隔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两大强国斯巴达和科林斯。

能否达成切断两大国联系的目标，关键在于北邻科林斯、南连斯巴达的阿尔戈利斯的态度。

阿尔戈利斯这个城邦国家具有鲜明的希腊特色，阿尔戈利斯人将理想视为比现实更重要的东西。

最令阿尔戈利斯人自豪的是其城邦从神话时代延续下来的、比斯巴达还要悠久的历史。让阿尔戈利斯人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斯巴达人、科林斯人结盟，简直是白日做梦。结果，阿尔戈利斯成了一个光荣的孤立的国家。

在雅典、斯巴达和希腊其他城邦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希波战争期间，阿尔戈利斯人仅仅因为有斯巴达参与，便拒绝加入全希腊联军。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以后，他们既不站在斯巴达一方，也不与雅典联手，保持中立。

我不清楚雅典是如何将常年保持中立的阿尔戈利斯拉进自己阵营的。根据学者的推测，阿基比亚德可能是背后的推手，因为有记录证明他曾多次前往阿尔戈斯。刚刚30岁的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力的，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坐船前往阿尔戈斯，只要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

这位阿基比亚德比起成功地说服众人，更擅长说服个人。一对一的场合下他从来都是赢家。

话说回来，这个以阿基比亚德设想、尼基阿斯实践的形式促成的四国同盟，真是一个奇怪的同盟。

《尼基阿斯和约》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签的协定。

四国同盟是以斯巴达为假想敌，由雅典与其他三个城邦结成的同盟。

斯巴达为什么能容忍这样一个没有道理且不利于自己的同盟存在呢？

原因是阿基比亚德刺中了斯巴达的软肋。

斯巴达不知如何处理4年前在伯拉西达手下打仗的700名希洛人。

伯拉西达战死后这些人回到斯巴达，他们虽然出身农奴，出征时用的却是重装步兵正规军的装备。也许这让他们有了自己是军人的意识。归国以后，他们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赠给他们一些拉科尼亚地区耕地的建议。

他们下决心再也不做回农奴，要求和斯巴达正规军一样居住在首都斯巴达。

首都斯巴达仅限具备公民权的斯巴达战士及其家属居住。这是作为斯巴达宪法的吕库古法规定的。

如果政府同意这些农奴在首都居住，不用猜也知道，他们接下来就会要求获得公民权。

授予希洛人公民权，意味着吕库古法严格规定的国家体制将分崩离析。

进退两难的斯巴达既得利益阶级，即斯巴达公民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希洛人隔离在国外的某个地方。可仅仅隔离，并不能保证他们不成为叛乱的火种。既要允许原农奴保持士兵身份，又不能

授予他们公民权，斯巴达人找到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让这些人去驻防边境基地。

被隔离的人仅伯拉西达麾下的希洛人就有700人，再加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不久被派去沿海一带防守的300人，总共1000人及其家属。

这些人的身份变成了“neodamodeis”，意译是“被解放的希洛人”。斯巴达人相信这样做可以消解“下克上”的现象。

“被解放的希洛人”被派去的地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侧的列普累安（Lepreum）。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抵御绕过半岛南端前往爱奥尼亚海域的雅典海军。然而斯巴达人没有给他们战船，可见隔离才是真正的目的。

正因为雅典清楚斯巴达的目的，所以才会同意斯巴达在列普累安设立基地，以此为交换让他们吞下了“四国同盟”这颗苦果。

斯巴达的妥协被雅典人视为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在外交上的胜利。经过公民大会投票，两人翌年都当选将军，实际上也就是当选了军队总司令。

公元前419年，31岁的阿基比亚德利用刚成立的四国同盟展开行动。这场被学者们称为“阿基比亚德战争”的军事行动，从夏天持续到初秋。

雅典只给了这位31岁的年轻人1000名重装步兵。将军出征只有这个规模未免说不过去，但阿基比亚德并不在意。

他率领这支1000人的军队渡过萨拉米斯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东端登陆，一鼓作气穿过半岛的北方，抵达亚加亚（Achaia）地区的爱

奥尼亚海沿岸。

四国同盟的厄利斯、阿卡迪亚、阿尔戈利斯均位于半岛北方，所以行军途中不怕遭遇敌军。紧接着，阿基比亚德成功地攻下了半岛最西端的地区。

科林斯人闻讯怒不可遏，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科林斯的市场在爱奥尼亚另一边的地中海西面。商船前往当地需要通过虽不算大但却是必经之地的科林斯湾。

然而，位于海湾中部的纳夫帕克托斯，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就是雅典的基地。这一次雅典又攻占了对岸的海角。穿过海角进入爱奥尼亚海域，又是雅典辖下的凯法罗尼亚岛、扎金索斯岛（Zakynthos）等岛屿。

无论是对商船还是军船，科林斯的航海安全都亮起了红灯。如果雅典再进一步行动，科林斯的船队就可能会被封死在科林斯湾内。

怒火中烧的科林斯人直接向斯巴达提出了抗议，质问伯罗奔尼撒同盟存在的意义何在。

对于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科林斯的不满，斯巴达不得不有所回应。伯罗奔尼撒战争以两大国回避直接交战的奇妙形式持续至今的状态，终于也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雅典的局势也是风云变幻。

阿基比亚德坚持采用的速攻战术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使雅典市场的西向版图进一步扩大。这本来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没想到，雅典人反而因此产生了担心。

年轻的阿基比亚德出彩的言行令人感觉整个雅典政坛都是他的天下。其实并非如此。雅典政坛依然处于尼基阿斯派和阿基比亚德派势均力敌的状态。

两派都没能赢得过半优势。

或许有人会说，两党并立，选民有选择的机会，这对民主政体国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吗？在理论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然而正确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不一定有正确的表现。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位哲学家要到34年以后才出生，他并不是这个时期的人物。

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是他们能用语言将既有现象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概念化。其实理论与现实不一定一致的事实在亚里士多德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于人类世界中。

话说回来，雅典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选民们在两派之间犹豫不定。

两派都没有过半的优势，这意味着双方势力此起彼落。有一派表现得强势，另一派就会压上去。这种状况用如今的讲法，叫经常性政局不稳。

在这一年冬天进行的决定下一年将军人选的选举中，尼基阿斯当选，阿基比亚德落败。

这并不是因为雅典的中老年人嫉妒年轻司令官耀眼的成绩，而是人们对其激进感到忧虑，而反对派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个心理。

阿基比亚德最大的不幸，是城邦国家雅典总是让他有一个好的开始，却不能让他完美地结束。这个不幸伴随他整整一生。

这是出生在民主政体国家的雄狮之子的宿命？

还是因为阿基比亚德不具备伯里克利那样强大的力量，能实现实质上的一人统治？

公元前418年，也就是阿基比亚德失去权力的那一年，雅典遭受了始料未及的打击。

曼丁尼亚会战

斯巴达终于决定由国王率军出征，这不是为了安抚愤怒的科林斯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13个年头，斯巴达依然不愿意与雅典展开正面交锋。此时令慢吞吞的斯巴达人行动起来的不是科林斯，而是阿尔戈利斯。

保持光荣的孤立貌似高贵，但事实上不管光荣与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势必导致问题出现。就像人的大脑、肌肉，如果不经常使用就会退化。四国同盟的达成让阿尔戈利斯人感到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侵略了东面的邻居埃皮达鲁斯（Epidaurus）。

对斯巴达来说兹事体大。因两国接壤，阿尔戈利斯一向被斯巴达视为眼中钉。如今这颗眼中钉居然越来越强硬，跑去占领埃皮达鲁斯，这种行径超过了斯巴达容忍的范围。

阿尔戈利斯与斯巴达历来关系不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邻国常交恶，而是因为阿尔戈利斯是一个实施民主政体的城邦，尽管它没有雅典贯彻得那么彻底。

在阿尔戈利斯，除奴隶以外，全体自由民都有公民权。

而在长期维持寡头政体的斯巴达，公民权只属于专业军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和工商业者庇里阿西人没有公民权。这些人，尤其是希洛人，对邻国阿尔戈利斯十分憧憬。

换言之，在斯巴达既得利益阶级的眼中，阿尔戈利斯不仅是邻国，

还是一个会刺激希洛人作乱的危险存在。

阿尔戈利斯没有向与斯巴达接壤的南方展开行动，而是向东边的埃皮达鲁斯发动了侵略。

从做出决定到实施行动向来迟缓的斯巴达，这一年动作异常迅速。理由有二：

第一，不能再让阿尔戈利斯这个眼中钉继续发展壮大。

第二，不能让对阿尔戈利斯抱有好感的希洛人有机会逃离斯巴达加入对方军队。

那么，雅典一方又是怎样对待这件事情的呢？

阿基比亚德落选后，雅典政坛由尼基阿斯一派掌控。

就算这些人不想违背《尼基阿斯和约》与斯巴达人为敌，但有四国同盟契约在，雅典就有义务援助盟国阿尔戈利斯。

这原本是斯巴达与阿尔戈利斯的战争，结果雅典和其他两个城邦都卷入其中，使之变成一场同盟缺陷大暴露的会战。

这场会战在希腊历史上被称为“曼丁尼亚战役”。战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迪亚地区的曼丁尼亚附近。

这场战役中，斯巴达出动了国王率领的正规军，雅典一方也派出了由两位将军率领的重装步兵团。这个阵势相当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的直接对决。那么，拖拖拉拉打了1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就此决出胜负了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不想主动破坏《尼基阿斯和约》的斯巴达回避了与雅典的正

面交锋。

其次，基于那个愚蠢透顶的同盟条约而参战的雅典军在左翼，它不是斯巴达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第三，还是基于那个愚蠢透顶的同盟条约，联军的总指挥权交给了阿尔戈斯一方。

挑战斯巴达的是阿尔戈利斯，自己不过是处于援助的立场。这是雅典参战的态度。

阿尔戈利斯在希腊属于小规模的城邦，长期的孤立又造成其既缺乏充足的战斗力又缺乏军事经验。

小小阿尔戈利斯，在这场伯罗奔尼撒联军对决四国同盟军的曼丁尼亚战役中，不仅担任主力与斯巴达的最精锐部队在中路交战，而且还掌握着四国同盟军的总指挥权。

如果雅典军的司令官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话，他应该在战斗前就看出这一阵型的致命缺陷，哪怕耍手段也会把雅典军部署在中路，并且掌握总指挥权。

战役的胜败取决于两军主力的战况。而统一指挥系统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并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

可惜，雅典派出的两位尼基阿斯派的将军没有地米斯托克利那样随机应变的能力。

敌对双方各自寻找有利地形，导致曼丁尼亚战役姗姗来迟，如果有第三方的军官在场观战的话，大概一早就预见到了结果。

两军阵营中唯一阵形严整的是斯巴达的3584名重装步兵。

这些自幼习武、经受了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不会给敌人留出一点破绽。为防守左侧，他们左手持盾，在士兵们聚拢成一团时，左手的盾牌还能保护右侧的战友。年轻的斯巴达国王阿基斯（Agis）率领的这支斯巴达精锐军队，不仅一举击溃阿尔戈利斯军，而且取得没有牺牲一名斯巴达人的完胜。

以斯巴达军为主力的伯罗奔尼撒联军最终死亡300人，他们都是不妨叫作杂牌军的小盟邦士兵。

相反，包括雅典军在内的四国同盟军损失巨大。仅雅典就有1100人战死。当阿尔戈利斯军在斯巴达军的猛攻下溃不成形，雅典军没有置盟友于不顾，两位司令官带头杀进敌阵，结果两人全都战死。

雅典不仅输了战斗，还造成包括两位将军在内的大量军人死亡，这导致原本打算从北面将斯巴达人逼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的四国同盟彻底瓦解。

赢得胜利的斯巴达，要求被打败的阿尔戈利斯从此不准外部城邦介入其事务，保证伯罗奔尼撒半岛属于半岛人。斯巴达所指的外部城邦不用说就是雅典。

死伤惨重却换来如此糟糕的结局，雅典人义愤填膺。如果两位将军没有战死，说不定归国后也会被判处死刑。如今没了当事人，民众便把矛头转向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

制定四国同盟战略构想的是阿基比亚德，实施这个战略的是尼基阿斯，这两个人是导致败北的元凶。雅典公民打算用陶片放逐处置他们。

感到危险的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第一次联手应对。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两人中肯定有一个会遭遇10年的国外流放。于是，他们决定找一个替罪羊。

被他俩挑中的是一位灯具制造商。他在公民大会常常有激进的发言，因此被叫作小克里昂。激进的小克里昂跟这次败北没有半点关系。

尽管如此，雅典政界两位大人物联手，总有办法让赞成他们的票数达到法定的3000票左右。结果，灯具制造商遭到陶片放逐。

话说回来。不愧是雅典公民，他们看出这个制度藏有猫腻。就在当年（公元前417年），陶片放逐法就此作废。这个持续了90年、造成无数人间悲喜剧的制度，终于得以终结。

让两位大人物达成一致的，不只逃避陶片放逐这一件事。

如果雅典军全力以赴却输了战斗，至少在精神上还可获得救赎。可雅典不过是被动卷入曼丁尼亚战役，结果饮恨败北。这场失败不仅导致雅典利用四国同盟打败斯巴达的计划未满两年便化成泡影，而且让那些再次感受到斯巴达威力的城邦逐渐向斯巴达靠拢。

雅典在丧失权威的同时，也面临着丧失权力的危机。雅典公民们茫然无助，不知如何是好。

独占奥林匹克领奖台

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都认为，有必要提振民心。

为达到这个目的，投些私财做些令大家开心的事，对这两位大富豪来说不算太困难。

不过他们的一致性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他们又分道扬镳。个性不同的两个人决定以不同的方式来提振民心。

53岁的尼基阿斯投入巨资邀请众多雅典市民前往提洛岛，大家在阿波罗神殿前举行了壮观的祭拜仪式。随后他带领所有人进入神殿，郑重、虔诚地祈求天神保佑城邦国家雅典。

尼基阿斯借此成功地塑造了自己虔诚、笃厚的形象。但同时他也给亲历以及听说这场盛大活动的雅典人留下保守型领袖的印象。

33岁的阿基比亚德同样投入了巨资。不过使用方法不同。

他去的不是男神阿波罗的所在地，而是众神之王宙斯所在的奥林匹亚。阿基比亚德带着7辆四匹马战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大会最后一天的压轴比赛、令观众最为狂热的项目是四匹马战车的决赛。

阿基比亚德早就拥有养马场。但不知道他出征打仗以后，马场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状态。阿基比亚德购买良马向来不惜重金，遇见优秀的骑手同样如此。知道阿基比亚德这个爱好的人，常常会带着马匹或骑手上门兜售。

以一辆四匹马战车参赛已经耗资不菲，更何况阿基比亚德带来了7辆。尽管这项比赛并没有对各方参赛的战车数量做出限制，但携7辆四

匹马战车参赛，无论如何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阿基比亚德想让这7辆马车在比赛时发挥不同的作用。前3辆一路疾奔，剩下的4辆防止对手干扰。

不仅战车竞赛，古代奥运会的任何项目都没有犯规一说。驾驭四匹马战车的竞赛甚至不会因为出现死伤而被废除。越是危险的竞技越令观众疯狂。

这一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阿基比亚德的7辆战车中有3辆分别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

请大家想象一下，沙尘翻滚的奥林匹亚主会场上3辆四匹马战车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的情景。

这位阿基比亚德一定是亲手驾驭着战车冲在最前面。当然第二、第三名也属于他，雅典队独占整个领奖台。

疯狂的不只是奥林匹亚会场中的观众。

喜讯很快传到雅典，整个雅典为之沸腾。独占领奖台的消息甚至飞过爱琴海，传到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上。

提洛同盟两个主要加盟国的居民们像自己获得胜利般欣喜不已。他们向神殿敬奉大量供品感谢众神的保佑，并且提出今后一年阿基比亚德的赛马饲料由他们提供。

疯狂的不只是雅典的年轻人。

就连67岁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都暂时忘记了沉重的悲剧，欣喜之下谱写诗歌一首：

啊！克里尼阿斯的儿子阿基比亚德，让我歌颂你！

你带给我们辉煌的胜利！

从未有希腊人夺取过如此美好的胜利！

荣膺第一、第二、第三名！

主神宙斯一定会替你戴上橄榄叶编织的桂冠！

传令人一定会大声叫着胜利者你的名字！

在当年冬季举行的选举中，阿基比亚德再次当选为将军。

柏拉图的《飨宴》

柏拉图《飨宴》的时间背景，大概是在阿基比亚德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后不久。

作品描述的阿伽通宅邸举办的宴会，是为庆祝阿伽通的悲剧作品荣获当年戏剧节的优秀奖。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阿伽通获奖是在公元前416年的春季。

这一年阿基比亚德34岁，苏格拉底54岁。

经常拿这两人的关系做文章，引得雅典人捧腹大笑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是当晚宾客之一，他应该在30岁前后。

阿基比亚德与苏格拉底即使成为众人的笑柄，也未曾妨碍他们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当年雅典良好的社会风气，至今令人羡慕不已。柏拉图的《飨宴》同时也是雅典鼎盛期文人社会的写照。

这一天的飨宴，宾主就“爱”这一主题轮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最后由苏格拉底总结。按理说，这次宴会应该像以往一样，优雅安静地结束。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苏格拉底刚结束发言，前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就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只见喝得醉醺醺的阿基比亚德半靠在替他开门的仆人身上，来到众人面前，后面还跟着一帮同样醉醺醺的男人。他站在门口开口道：

“群贤们！我只是来祝贺阿伽通，替他戴上花冠和绣带。你们决定，我是替他戴上就走呢，还是让我进来加入你们？”

大家自然是请他进门入座。主人阿伽通令仆人过来替新到的客人洗脚。希腊人习惯用一只胳膊肘撑着侧卧着吃晚饭。

阿基比亚德将花冠和绣带挂在阿伽通身上，洗完脚躺下，这才发现苏格拉底也在。

他惊呼："我的神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在这里？！"

"你为何不躺在阿里斯托芬的边上，干吗要躺在阿伽通的身边？哦，我知道了！你想和这里最漂亮的男人靠在一起。"

苏格拉底忍不住开口："阿伽通，帮帮我吧！自从我爱上这个男人，我就不能看其他年轻人一眼，也不能说一句话。他会嫉妒得大发脾气。希望你能劝他和我和解。"

不等阿伽通开口，阿基比亚德大声叫起来："没门儿！让我跟你和解，绝对不可能！"

然后，他继续说：

"不过现在，阿伽通，刚才给你的绣带还几条给我好吗？我想在苏格拉底的头上绑上几根。这个人和谁争论都会赢。你戏剧节获奖一年一次，他一年到头儿都在赢。"

见席间安静下来，阿基比亚德继续说：

"各位请打起精神。我看你们根本没沾过酒杯。今夜是庆祝阿伽通在献给酒神的戏剧节上获奖的宴会，不喝对不起酒神。阿伽通来吧，让我们今夜一醉方休。"

阿基比亚德一口气喝干端上来的酒，又令仆人再倒满，端给苏格拉

底喝。苏格拉底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当晚宾客之一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在边上插嘴说："岂能如此喝酒！阿基比亚德，这不是灌酒比赛。"

阿基比亚德说："哦，是你呀，厄律克西马库，最贤明的父亲生下的最贤明的儿子！我为你干杯！"

厄律克西马库和他干杯后说："除了喝酒之外，你还想做些什么？"

阿基比亚德边喝边答："什么都可以。悉听尊便。"

于是，厄律克西马库告诉阿基比亚德："我们刚才对'爱'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新来的你也有这个权利，你来说说如何？"

阿基比亚德说："很好，就这么定了。不过，有苏格拉底在场，不管我赞扬人还是神，都会被他痛打。"

"你给我闭嘴！"苏格拉底呵斥道。阿基比亚德趁势反击。

"不！向波塞冬发誓我决不！你才应该闭嘴！你比谁都清楚，我从来不能当着你的面赞美他人。"

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再次开口："那么，你不妨赞美一番苏格拉底。"

阿基比亚德问："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厄律克西马库？"

苏格拉底大概忍无可忍了，向阿基比亚德抗议："喂，你够了没有？难道你想用所谓的赞美来让我出丑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目的？"

阿基比亚德说："我只讲事实，这总可以吧？"

苏格拉底说："当然可以。实际上我命令你说真话。"

阿基比亚德点头答应。接下来他开始歌颂苏格拉底，或者说这是爱的告白。

亲爱的朋友们，苏格拉底像手拿笛子就能迷惑人类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不对，他那丑陋的鼻子、凸出的眼球、总是半张的嘴，更像萨梯鲁斯神之一的玛息阿。玛息阿可是挑战过阿波罗神的笛子高手。

二位神用乐曲迷倒人们，而苏格拉底不需要美妙的笛声帮助，单凭语言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听完苏格拉底说话的人，都会神魂颠倒不能把握自己。

我听伯里克利演说时，虽然觉得精彩高妙，但我的心灵从来不会为之动摇。

而听完苏格拉底的讲话，我流泪不止，不断地质问自己都在干些什么。

我关心政务，就是想借机逃避那塞壬一般的声音，以免我在他的身旁一直坐到老。

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感到过羞愧，除了在这个人面前。

因为我知道他的教导非常重要。民众对我有不同的要求，它们同样很重要，我不能忽视。

有好多次我都希望他从地面上消失。可是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肯定是最痛苦的那一个。

诸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应该明白我说的话。

要知道，苏格拉底迷恋漂亮的年轻人，总是围着他们转，向他们献殷勤。而他自己像西勒诺斯那样丑陋。其实他不在乎地位、金钱，也不在意那些美丽的东西。

你们见到过他的内心吗？

我见过一次。我发现那里像众神居住的世界，金光闪耀。那个

世界只有服从他和他的教导的人才能进入。

阿基比亚德曾经以自己的美貌为武器，希望独占苏格拉底。在随后的对话中，他和盘托出了事情的经过。

有一次，阿基比亚德终于找到单独和苏格拉底同榻而卧的机会。结果，他们像父子、兄弟般共度一夜。也就是说，中年丑男苏格拉底并没有受到雅典第一美男子阿基比亚德的诱惑。

这深深地刺伤了比中年丑男年轻20岁的阿基比亚德的心灵。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如果只是自尊心受伤也就罢了，偏偏年轻的阿基比亚德“同时又对苏格拉底强烈的自制力敬佩不已”。

接着，他又讲述了自己和苏格拉底两次共赴战场的经历。

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雅典，根据梭伦制定的财产等级制，阿基比亚德成为骑兵，苏格拉底是步兵，两人同属一个部队。第一次出征时，苏格拉底38岁，初次上阵的阿基比亚德18岁。第二次出征是在10年以后。

苏格拉底在战场上的表现令这位年轻的弟子惊叹不已。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苏格拉底也从不抱怨，吃苦耐劳，和其他士兵一样奋勇杀敌。

他还救了负伤的阿基比亚德的性命，并且带领他们两人所属的部队安全撤离到后方。

当司令官对他们进行嘉奖时，苏格拉底强烈要求把勋章发给队长阿基比亚德。

那时的阿基比亚德再次感到羞愧万分，这一次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高于苏格拉底。

在尽公民义务服兵役时，苏格拉底的表现同样超越常人。根据阿基比亚德的描述，战场上的苏格拉底依然是那位“伟大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陷入忘我状态的事，在战场上也发生过。所幸当时不在激战之中，只是引来士兵们好奇的关注而已。

阿基比亚德继续他的颂歌。

> 没有人可以与苏格拉底相比。前阵子给雅典带来麻烦的伯拉西达，可以比作英雄阿喀琉斯。
>
> 睿智的伯里克利，可以比作涅斯托耳。
>
> 但苏格拉底，我找不到和他相似的人。过去没有，今天也没有。只能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
> 他爱用的那种说话方式，听上去有点傻里傻气，普通人都会觉得很好笑。
>
> 但是能够剥开表面往深层看的人，就会发现他的语言中有美德的意象、崇高的目标，宛如尊尊闪亮的神像。
>
> 这就是真正值得赞美的苏格拉底。
>
> 所以，阿伽通，你也要当心这个人。

阿基比亚德说完之后，苏格拉底对他说：“我看你今天没醉。”

阿基比亚德放声大笑没有作答。

他的笑声中既有向老师一股脑倾诉敬爱之情后的酣畅，又带着一点

无可奈何的自嘲，因为他的这番赞美完全暴露了自己对苏格拉底恒久的爱慕。

这个时候，院外一阵喧闹，一群酒徒涌到门前。阿基比亚德站起来，和那群人一起消失在黑夜之中。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和斐德罗也起身回家睡觉。

剩下阿伽通、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三个人平静地谈了一阵子话后，阿里斯托芬也说要回家，阿伽通进了自己的卧室。只有苏格拉底没有回家，他在逐渐泛白的天色中走向吕克昂。

柏拉图的《飨宴》到这里就结束了。

吕克昂位于雅典郊外，那里建有供青少年锻炼的体育场。苏格拉底每天都会去那里。

苏格拉底坐在山丘上眺望体育场，周边的草木、房屋在朝阳下渐渐显现，这位54岁的哲学家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柏拉图描绘了说话时的苏格拉底，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沉默时的苏格拉底在想什么。

意大利语中有一句话叫“Pace con se stesso”。直译是“与自己和解”。通常“和解”指的是与他人归于和好。但这里的“和解”应该是指原谅并接纳自己。

意译的话就是尽所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拥有了平静的心情。

“就像度过一天后有安稳的睡眠，度过充实的一生后有平静的长眠。”

说这话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是做到“Pace con se stesso”的人物。

伯里克利在病床上死去时，大概也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

苏格拉底70岁端起毒酒的那一刻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一定也是做到了与自己和解。

但是，阿基比亚德不一样。

这个男人灵魂与肉体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究没能迎来与自己的和解。

他在哲学与政治的拉扯中度过了一生。虽然哲学与政治本质不同、目标迥异，但我个人认为不至于造成人格分裂。

苏格拉底的“哲学”告诉人们良好的人生必须具备的德行，它只要起到启示的作用便功德圆满。

而伯里克利的政治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生活之必需，还要拿出具体的对策，在策略没有实现之前，它不起任何作用。

苏格拉底教导人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优秀。他又教导人们，不能过分相信天才和万能。

只有坚信这些，才可能比别人优秀，才可能成为“天才”。

相信自己胜于常人，才有率领众人的信心。率领一个组织或国家之类的共同体奋勇前进，大多需要领袖的自负。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创作者、科学家们，不计报酬地用自己的一生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样源于他们的自负和自尊。

这种精神被后世称为“Noblesse oblige”（贵族的义务，位高则任

重）。

自觉无知，的确极其重要。

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温顺的小羊，那么谁来带领羊群呢？

当然，自恃天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有遭遇墨纪拉（妒嫉女神）复仇的危险。换言之，因自负产生的狂妄，最终会让人走上自毁的道路。

这种时候，苏格拉底教授的自我控制力就派上用处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领袖们遵从的中庸之道，其实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天24小时都自我控制。

这就好比普通人减肥失败往往是因为每天每顿严格地控制饭量，造成精神压力，结果功亏一篑。如果昨天吃多了今天就少吃一点，成功率反而会高。

简单地说，我们要保持平衡。如果能长期保持身心的平衡，就能实现整体上的控制。

被称为“哲学家皇帝”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多瑙河前线征战时，白天用拉丁语指挥军团，夜晚独处时用希腊语书写《自省录》（中文亦译《沉思录》），将一天分成两半过。

罗马帝国的领袖们创造了“工作”与“闲暇”的概念。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便能达到自我控制。

从热爱知识这个层面上说，伯里克利并非对哲学漠不关心。

他与阿那克萨戈拉斯是好朋友。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学说是人类哲学的话，阿那克萨戈拉斯关注的是自然哲学。

对于以“政治”为工作的伯里克利而言，哲学大概只能算他的闲暇活动。

此外，伯里克利与苏格拉底之间有25岁的年龄差。彼时不过是一名青年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为了与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齐娅聊天，成天泡在伯里克利家里，那时伯里克利已是雅典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也许他根本看不上这个菜鸟哲学家吧。

相反，经常出入代理父亲家、可能就在那里与苏格拉底相识的阿基比亚德，当时正值15岁前后的青春期。敏锐、善感的阿基比亚德，就这样喝下了年长他20岁的苏格拉底的“猛药”。

本书尚在草稿阶段时，阅读此篇的责任编辑对我说：“苏格拉底太可怕了！”是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可怕的智者。

或许这就是《飨宴》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

尽管《飨宴》反映出雅典人热爱知识的高贵精神，但就在两个月后，这些人的祖国雅典便犯下了伯里克利时代从未出现过的野蛮罪行。

那就是对米洛斯岛的处置。

米洛斯问题

米洛斯岛是爱琴海南部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和宛如从南边环绕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关系密切。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洛斯和克里特采取同样的态度，既不偏向斯巴达也不接近雅典，始终保持着中立。

米洛斯的中立并没有为雅典带来不利。除去它不缴纳提洛同盟会费以外，没有其他的问题。雅典的军船、商船可以自由地在当地靠港，获得淡水、粮食的补给。

米洛斯这种中立状态持续到第15年，公元前416年，雅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雅典要攻击克里特岛那样的大岛并非易事，而米洛斯是一座小岛。雅典向米洛斯派出军队，胁迫其加入同盟。

在那时盯上米洛斯的似乎是尼基阿斯。也许他在提洛岛大张旗鼓举行祈愿仪式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洛岛处于雅典辖下，而它附近的米洛斯岛一直保持中立。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尼基阿斯为了打压主张西扩的阿基比亚德，希望用征服米洛斯来证明掌控爱琴海东部才是确立雅典霸权的有效手段。

就这样，这一年的夏天，为攻占米洛斯这个小小的岛屿，雅典派出了38艘战船，运载了27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轻装步兵。除此以外，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也一同参战，以显示这次进攻不是雅典单方面的行为，而是提洛同盟的军事行动。这种做法非常像尼基阿斯的风格。

米洛斯为避免陷入战争危机，极力与雅典展开谈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有关的场景做了长达数页的精彩描述，面对大国的专横，小国的无奈令人感到十分悲哀。

尽管如此，米洛斯依然拒绝屈服，展开了防守战。

但决出胜负其实不需要多长时间。夏季结束之前，米洛斯全面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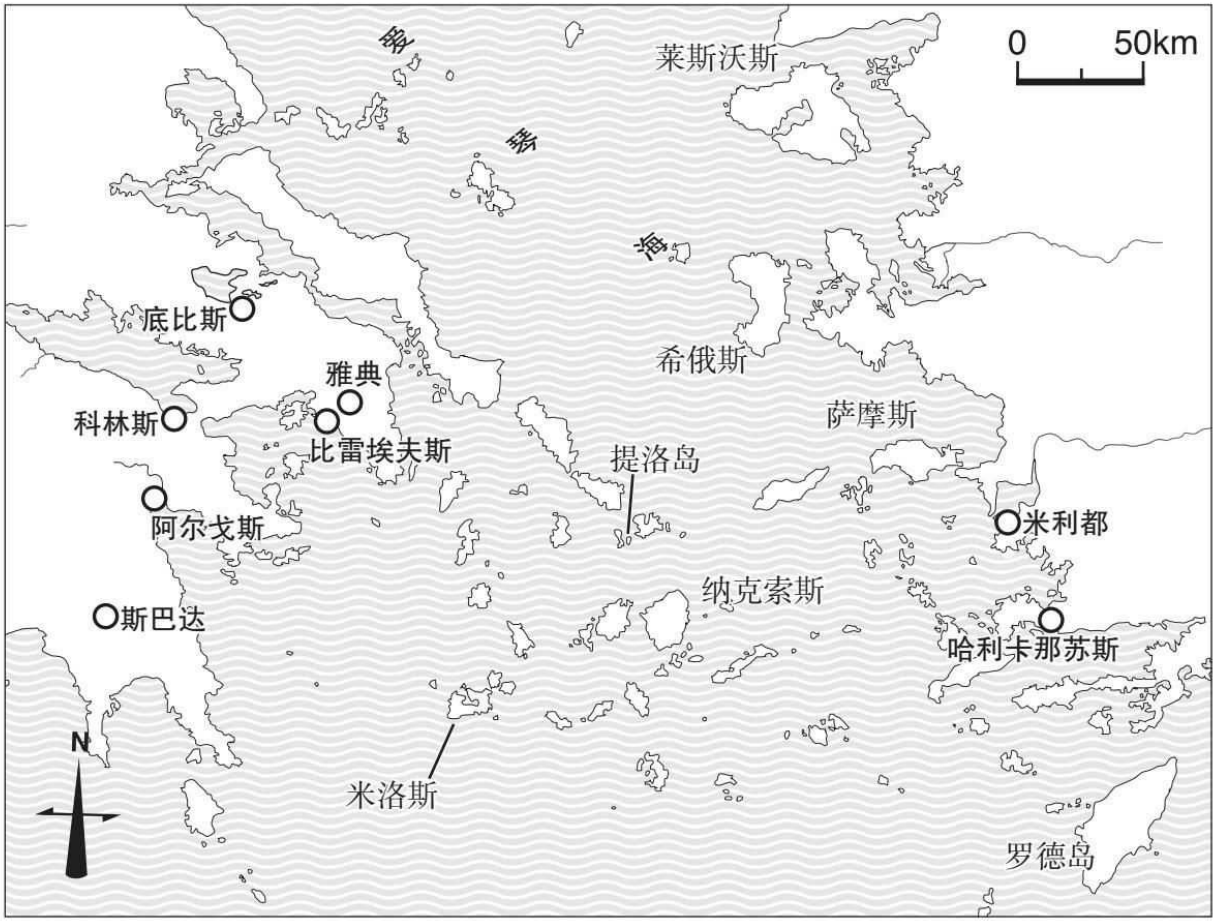
在战后处理问题上，雅典人采取了在伯里克利时代绝不会使用的手段。

他们就地处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俘虏的数量因此为零。

妇孺被变卖为奴。事实上已成为无人岛的米洛斯，改由愿意移居当地的雅典人居住。

其实这种野蛮至极的处置方式，不过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的雅典没有采取，但它在古代属于普遍现象。胜者为所欲为，败者俯首听命。这是罗马掌握霸权之前的时代，常见的战后处理办法。

可是，霸权国家如果和其他国家一样按惯例行事，就不可能维持霸权。唯有采取有别于他国的宽容政策，才能真正保持霸权地位。



米洛斯岛及其周边

赢者才谦让。尼基阿斯虽然政治经验丰富，但还是欠缺了这样的气度。

不是所有的雅典民众都赞成雅典军的这种行径。

在第二年春天的戏剧节上，根据观众的投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获得了第二名。

《特洛伊妇女》可以说是荷马《伊利亚特》的后传。它描写了希腊以奥德赛的木马计赢得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后，特洛伊妇女们的悲惨故事。

她们哀叹家园被希腊人烧毁，祖国从陆地上消失，她们为被杀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哭泣。特洛伊勇将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克等王族女人，绝望地接受悲惨的命运。

这些出身高贵的女人被当成战利品分赏给希腊军的将领。她们不得不离开故乡，随希腊将军们去往不同的地方，作为女奴在异国他乡度过余生。

这就是当时战败国女人们的命运。

这部作品在公元前415年上演，可能写于公元前416年的秋季至冬季。

大国雅典对小国米洛斯实施残暴的战后处置，发生在公元前416年的夏末。

虽然将时空背景移至特洛伊战争时，但抨击暴行的欧里庇得斯还是非常了不起。那些坐在露天剧场冰冷的石阶上观赏这部悲剧，将它选为优秀作品的观众，同样很了不起。而我对那个时代如空气般自然存在的雅典的普遍言论自由感佩不已。

尼基阿斯，还有阿基比亚德，大概也坐在观众席上吧。

毕竟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是雅典的春季盛典。所以它值得阿伽通在家中举办飨宴招待朋友庆祝获奖。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相比，欧里庇得斯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说亲身参与过萨拉米斯海战的埃斯库罗斯是代表希波战争时期

的作家，那么索福克勒斯就是象征伯里克利时代的作家。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以男性为主。

比索福克勒斯仅年轻10岁的欧里庇得斯，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

例如身为特洛伊皇太子妃，在丈夫赫克托尔战死、特洛伊灭亡后，作为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的战利品，以奴隶之身在迈锡尼王宫度过余生的安德洛玛克。

爱上继子，最终令自己和对方甚至周围人一并毁灭的王后费德尔。

为了向抛弃自己移情别恋的丈夫复仇，竟然将两人的孩子杀死做成菜肴让丈夫吃下的癫狂暴怒的王妃美狄亚。

她们都成了希腊悲剧的新主人公。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塑造的主人公，是即使被命运左右仍勇于进取的男人们。

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主人公们，大多无法摆脱个人的苦恼，丧失自信、敏锐善感，最终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相较于理性的一面，这些人物更多体现出背负忧伤前行的感性色彩。

这是不是很像阿基比亚德呢？

奥林匹亚四匹马战车竞赛中，阿基比亚德独领风骚，欧里庇得斯之所以为之感动，或许是因为阿基比亚德身上那种摇摆不定的气质让这位悲剧作家产生了共鸣。

顺便说一下，阿里斯托芬从来不掩盖他对欧里庇得斯的厌恶，他认为后者总描写雅典人的堕落颓废。两人的年龄相差40岁，如果按世代划

分，欧里庇得斯属于伯里克利时代，阿里斯托芬是伯里克利以后的一代。

这两人的差异或许体现出悲剧与喜剧的不同。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借某个角色之口这样说过：

“有的人看起来年轻，其实已经老了。有的人虽然青涩，未成熟前已经枯萎。自知无知被收入学校课本，只能让人们失去柔软的心。这里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愚蠢。只有这个，永远不变地长存。”

听闻此言，我们只能报以苦笑。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之所以经常在戏剧节上演，是因为雅典人不但喜欢观赏悲剧，也非常喜爱阿里斯托芬式的揶揄和幽默。

如果说欧里庇得斯象征着一种新的雅典氛围，阿里斯托芬同样如此。

给雅典人增添信心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不安和愤怒的代言人克里昂也已死去。如今的雅典，进入了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的时代。

前往提洛岛向阿波罗神祈愿，是尼基阿斯个人的自由，但雅典民众不相信求神保佑便万事大吉。

阿基比亚德独占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奖台，虽然令人疯狂，但没有人认为这能化解雅典面临的困境。

征服一个弹丸小岛米洛斯，更不能解决问题。

雅典人不知如何是好。只要能消解这种处处碰壁的郁闷心情，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围绕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困局这一问题，这一年冬天举行的公民大会变成阿基比亚德与尼基阿斯激烈争辩的战场。

西西里远征

34岁的阿基比亚德似乎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要打破现在的僵局，除了向西，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然而，讲宏观战略无法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相较于抽象的理论，庶民们更容易接受具体的方案。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远方的使节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雅典。

使节来自西西里西侧的城邦塞杰斯塔（Siggésta）。他们到访的目的是希望雅典给予叙拉古军事打击。

在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的城邦中，第一强国叙拉古其实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塞杰斯塔，塞杰斯塔和附近的塞利农特（Selinunte）发生了领土之争。塞杰斯塔人认为纠纷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因是叙拉古在背后支持塞利农特，所以来向雅典讨救兵。

西西里各地的城邦都市都是300年前热衷于走向海外的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因此当地居民全是希腊人，他们也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领土之争这个希腊本土的“特产”，被希腊人带到了殖民地。类似塞杰斯塔与塞利农特之间的冲突比比皆是。

当时居住在西西里及南意大利一带的希腊人，从经济层面而言，比本土的希腊人更富有。希腊本土土地贫瘠，而统称为“大希腊”的西方殖民城邦有着广阔的耕地。雅典的粮食必须靠进口，而以叙拉古为首的“大希腊”各城邦，都是可以出口粮食的农业大国。

正因如此，当塞杰斯塔表示愿意向雅典支付60塔兰特以获得军事支持时，没有人表示怀疑。60塔兰特相当于建造60艘三层加莱船的费用。塞杰斯塔的使节甚至提出，还可以奉上他们存放在神殿的钱财。

把神殿当作金库是当时希腊人的一种习惯。提洛同盟的经费曾经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斯巴达有额外收入时通常会将其储藏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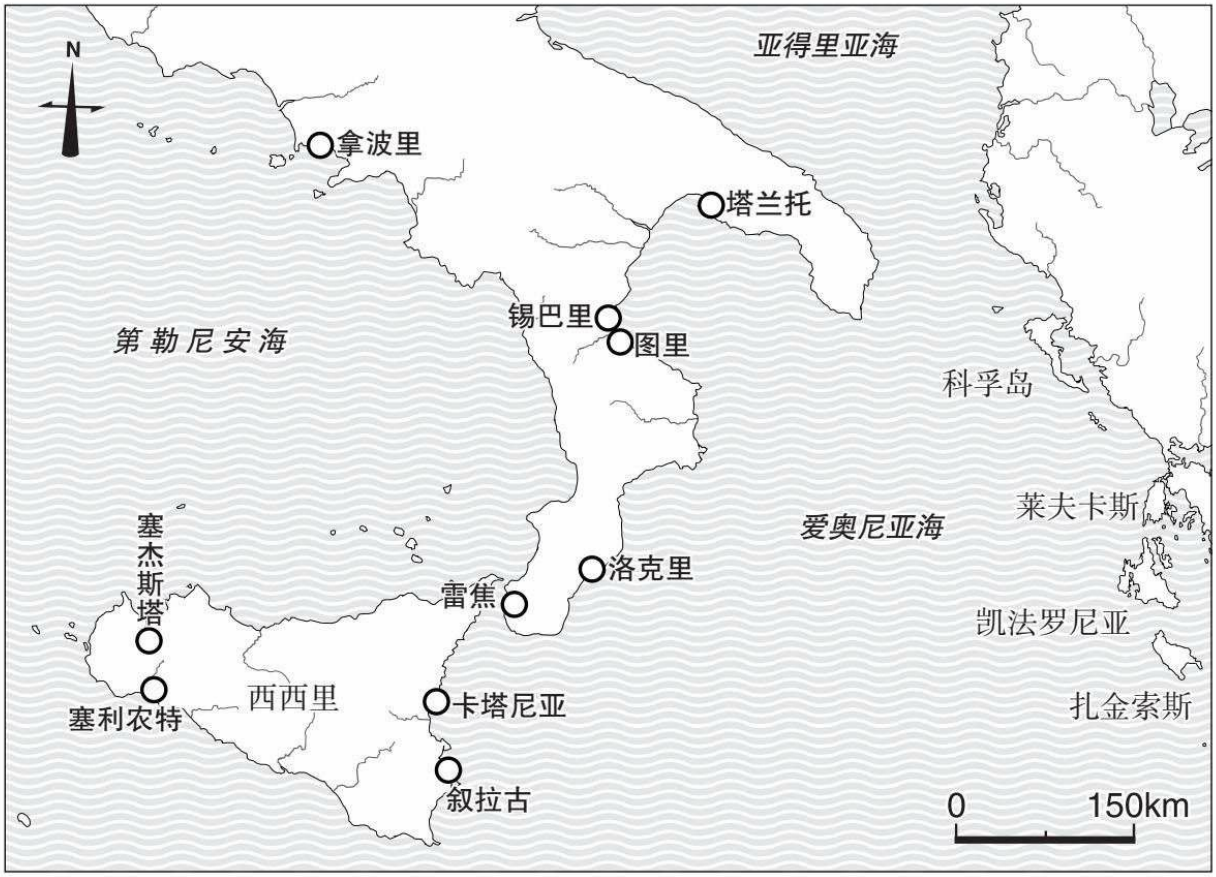
希腊人相信，没有人敢在天神眼皮底下偷东西，神殿的防盗功能还是挺强的。

在2500年后的今天，塞杰斯塔依然保存着壮观的神殿遗址。神殿雄伟，其中的金库也一定壮观，当时的雅典人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塞杰斯塔为阿基比亚德的西进计划提供了经济保障。就算雅典需要先垫付必须的军费，反正迟早都是塞杰斯塔负担。

34岁的年轻领袖在公民大会上强烈提出进一步西扩的计划，希望公民大会接受他的主张。

54岁的资深政治家称这种有勇无谋的远征只有年轻人才想得出来，他不能同意。他举出了以下的理由。



西西里和南意大利

第一，雅典的确是领导提洛同盟的霸权国。但目前雅典仍然处于和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交战的状态。更何况，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如今的雅典没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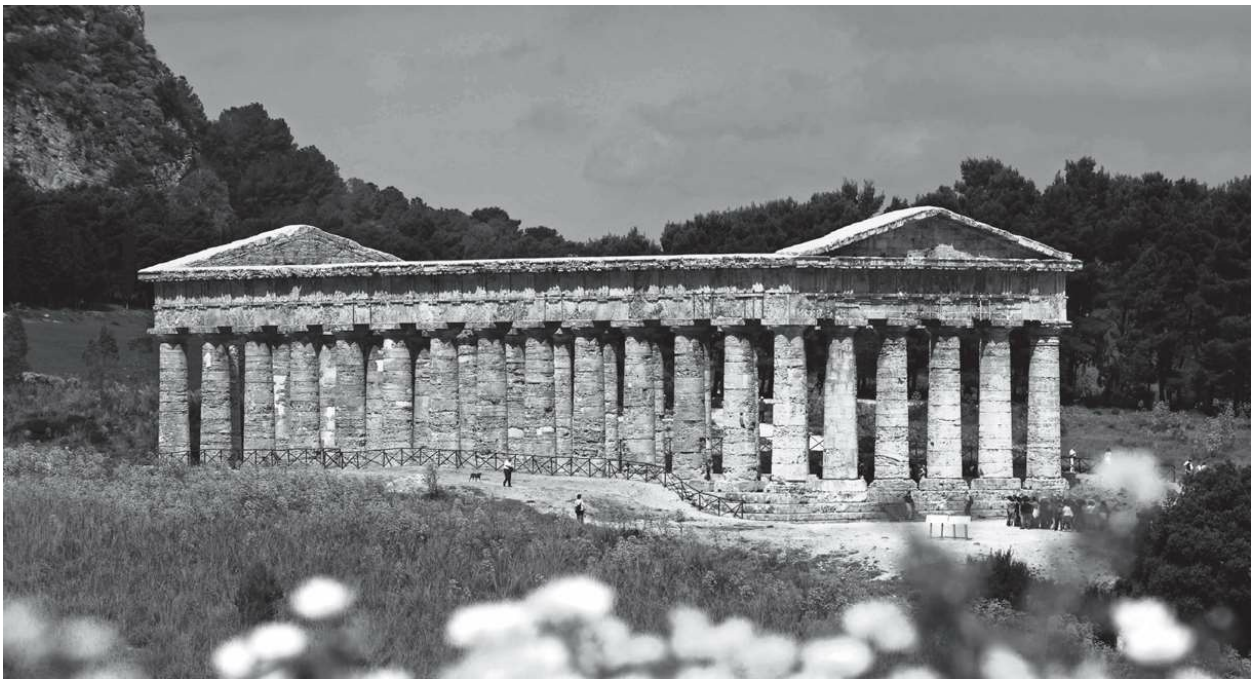
第二，即便西西里远征获得成功，如何控制那一大片地域也是个难题。雅典维持提洛同盟的团结已经相当艰难，不可能统治西西里全域。现在雅典需要努力保住现有的成果。

第三，西西里距离遥远。庞大的远征军费开支将掏空雅典的国库。

尼基阿斯以他一贯的方式敲响了警钟。

他举出的理由每一条都很正确。也正因为他指出了雅典面临的严峻

现实，在场的民众愈发沮丧，这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塞杰斯塔的神殿

针对尼基阿斯的发言，阿基比亚德表示反对。这位34岁的年轻政治家首先承认，除了一件事情之外，尼基阿斯说的都对。然后，他话锋一转，转入攻势。

他说，首先，雅典人在决定国家重要事项时，不应该以思考方式、世代不同来做切割。一直以来，雅典人面对重大事件，无论年轻人或老年人，都是大家共同商议应对。

紧接着，他直击尼基阿斯论点的主干部分。

> 雅典，正如尼基阿斯所言，是霸权国家。然而，霸权到手之后不是什么都不做就能维持霸权的。成功地维持霸权，才算真正的霸权国家。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掌握主导权，还要有灵活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包括不放过大好机会。

西西里的确是远方的大岛，所以我们要派遣大军远征，耗资巨大。

但说到这一路的海上安全，早在我们雅典的掌控之中。

阿基比亚德的讲话用现代语言解释的话，就是这位30多岁的领袖，向民众强调了改变观点、视角，拓展新思路的必要性。与其纠缠在未解决的问题中，不如通过解决其他问题来克服原先的困难。

总之，对于远征西西里，尼基阿斯的“我们已经不行了”和阿基比亚德的“我们还行”两种观点持续对立。

宏观层面上的争论，雅典一般民众或许不能理解。但对具体的内容，他们会做出回应。阿基比亚德提出的军费由塞杰斯塔负担，以及至西西里的海路没有风险这两点打动了民众。

如地图所示，从雅典前往西西里，首先要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绕过半岛的南端，沿海岸线北上至科孚岛（Corfu）。从那里往西才是真正的远征。途中可停靠补给淡水等物资的岛屿都和雅典保持着友好关系。

雅典海军可能遇上的唯一障碍是科林斯海军。但雅典在纳夫帕克托斯建有基地，再加上4年前阿基比亚德成功促成了亚加亚地区的中立，所以雅典人随时都可以将科林斯海军困在科林斯湾内。

面对以上事实，尼基阿斯无话可说。但这位以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领袖自居的老政治家，不想让阿基比亚德那混小子得逞。阿基比亚德发言后，他仿佛孤注一掷地说道：“好，阿基比亚德你想做就去做！不过我提醒一句，要远征必须有100艘三层加莱船和5000名重装步兵组成的大军。你确定还要远征吗？”

还没等阿基比亚德张口，民众先做出了回答：“要！”雅典岂有拿不

出百艘战船和5000名重装步兵的道理。公民大会的气氛顿时变得激情澎湃。

尼基阿斯想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借此否定阿基比亚德的主张。没想到却因此损伤了雅典人的自尊心。

走到这一步，尼基阿斯已无计可施。公民大会一致决定，特准3000塔兰特的临时开支。3000塔兰特，基本上是雅典国库一年的总收入。

紧接着，大会又选出了西西里远征军的三位司令官。

他们是阿基比亚德、拉马库斯（Lamachus）、尼基阿斯。他们三位都已当选下一年的将军。作为肩负军队司令官职责的将军，尼基阿斯不能拒绝这个任命。

就这样，尼基阿斯再一次参与了他极力反对的事情。

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西里

雅典决定派三位司令官出征，并不是因为拉马库斯有丰富的战场经

验，而是因为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两人事事作对，影响战略、战术的制定。加上拉马库斯的话他们就能以2比1的民主方式做决定。

三位司令官没有总司令和副将之分。平起平坐的三位将军率领军队，就不要指望指挥系统一体化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公民大会决定的。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是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而指挥权的统一是取得胜利最关键的要素，天神和民众大概对此都同样无知。

决定远征西西里之后，雅典的气氛焕然一新，生气勃勃。位于比雷埃夫斯外港的两家造船厂昼夜不停全天作业。要运载数量众多的重装步兵，必须打造比以往更大的三层加莱船。

士兵家中，女人们忙碌地为丈夫、儿子准备军装，男人们勤快地擦盾磨剑。就连在边上看热闹的孩子们，也是个个眼睛发亮、兴奋不已。

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的春天，所有准备都已就绪。雅典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雅典公民意志的结晶，壮观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它们是134艘三层加莱船。

其中100艘是雅典的船只，包括为增加士兵运载量特制的40艘大型船只。这40艘都是崭新的战船。

另外的34艘来自雅典的盟邦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和科孚岛。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的船队已经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科孚岛船队在原地等待与大军汇合。

除三层加莱船之外，还有130艘帆船用于运输。战船需要运载大批的划桨手，因此远征不可或缺的武器等其他物资只能靠帆船运输。这些

运输用的帆船基本上全是雅典提供的。

战斗的主力是几乎成为希腊城邦代名词的重装步兵，共5100人。其中雅典人2200名，其余的2900人是同盟国的士兵，来自那些无法提供船只但可以提供人力的城邦。

另有骑兵30人，全都出身于雅典富裕阶层。

由弓箭手、投石手等组成的轻装步兵有1300人，其中400人是雅典公民。

此外，战船的划桨手以及操控帆船的船员，都是具备熟练技能的公民。虽然雅典全民皆兵，但一般会尽量挑选20岁到45岁身强体壮正当年的男子奔赴战场。

大致计算一下，包括同盟国士兵在内总人数超过33000人的这支军队，仅雅典一国就投入了接近25000人的士兵。

雅典只有成年男子具备公民权，那个时期的雅典人口以6万计算，差不多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出征。

而且，这只是第一批出征的人数。在第二年，雅典不得不派出第二支军队。

这就是雅典民众针对尼基阿斯“你们确定还要远征吗”的质问所给出的回答。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热潮，让整个雅典一片欢腾，仿佛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似的。

赫尔墨斯神像斩首事件

不料，就在出征前的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怪事。

早晨一觉睡醒，雅典人发现各家门前竖立的赫尔墨斯神像的头部不知被谁统统砍了下来。

紧急召开的公民大会尚未开始，民众已经一片哗然。对于亵渎神灵这种事，就算是知性文明的创始者雅典人，照样暴跳如雷。会场中有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定是阿基比亚德和他那些朋友干的！"

阿基比亚德喝醉酒后带着朋友胡闹恶搞的行径，在雅典无人不知。

但也有人高声回应："不可能！这是想把阿基比亚德赶下台的反对派的阴谋！"

阿基比亚德很快就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他听说有两位市民向他提出了控告。

他登上讲坛在民众面前非常干脆地说："出征迫在眉睫。请检察官立即开始搜捕罪犯，尽早澄清事实。"

"说得对！""没错！"大多数人点头称是。但被叫来会场的检察官只说了一句话："司法有司法的行事方式。"

结果，按照"司法的行事方式"没等到判决的阿基比亚德，只能带着被调查的嫌疑犯之身，和另外两位将军共同出征了。

出征

在希腊，六月是一年中最舒适最美丽的月份。

一缕缕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天空清澈碧蓝，从海上吹来的微风终日轻抚着人们的身体。

这一天，比雷埃夫斯港大清早已是人山人海。

满心祈祷出征的父亲、丈夫、儿子平安归来的女人们，紧紧地拉着亲人不肯放手；留在国内的男人们也来为朋友们送行。

这里不分雅典本地人还是外邦人。这场倾雅典全国之力的远征，胜败结果对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同样意义重大。他们中不少人还作为轻装步兵加入了远征军。

当天战船出港的仪式也有别于以往。三位司令官分别站在各自旗舰的船首，他们高高举起手中盛满葡萄酒的黄金杯，随后将酒洒入海中。这是向海神波塞冬祈祷，希望他保佑海路平安。波塞冬一旦发怒，会掀起惊涛骇浪。

首先出发的是帆船队。比战船更容易受风力影响的帆船，按惯例最先出港。

130艘运输船同时扬起风帆驶入爱琴海。当它们航行至从右舷方向可以眺望萨拉米斯岛，准备继续南下时，远征军主力三层加莱船队依次出港。三位将军乘坐的都是战船。欢送的人群响起阵阵欢呼，现场热烈的气氛达到最高潮。

9年前也曾作为将军出征，其后以著史作为人生目标的修昔底德，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那是一场盛大的军事庆典，向全希腊人展示了雅典的伟大和它拥有的全部力量。”

话说修昔底德担任司令官那年，在应对斯巴达的伯拉西达军队进攻时，因犯下无可辩驳的战略错误而被流放海外20年。之后他似乎获得减刑，20年海外流放改判成20年不得担任公职。如果事实如此，这位立于历史文学金字塔顶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应该也在欢送的人群中，再次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彼时恰是出海的好季节，波塞冬也没有生气，远征军从出发至科孚岛的这一段海路走得顺风顺水。正如阿基比亚德之前保证的那样，从比雷埃夫斯港到科孚岛，如同在雅典自家的海域航行。

为等待所有船只集合完毕，先抵达的船队在科孚岛靠港做短暂停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问题出现了。

希腊与西西里之间横亘着爱奥尼亚海。离开科孚岛后，雅典军必须在途中停靠若干南意大利的港口，一步步接近目的地西西里，而靠港需要事先征得相关城邦的批准。

为此，船队在前往科孚岛的途中，已经派出三艘战船去和对方交涉。三艘船返回科孚岛时，没有带来一点好消息。

塔兰托拒绝雅典军船靠港，洛克里（Locri）亦如此。唯有雷焦（Reggio）表示同意，但船只可停靠的不是临城的主港，是城外的渔港，并且对方规定远征军不得进入城内。

这些意大利南部的海港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与雅典保持着良好关系。不过伯里克利是在这一带建立基地和输送雅典移民，并非携大军远征。这次雅典远征军是去攻打西西里，西西里岛第一强国叙拉古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这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到的。

拒绝雅典军靠港的是位于长靴形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几个海港城邦。相较于和地处远方的雅典交好，它们更不愿与近邻叙拉古为敌。这些城邦拒绝的理由无一例外都是它们要保持中立。

还有一个坏消息。

三艘战船组成的先遣队还去了西西里的塞杰斯塔。他们在那里发现，当初拜访雅典要求派军的塞杰斯塔使节的承诺都是假的。他们神殿里只储备着30塔兰特。所谓随时可以支付60塔兰特再加上存在神殿的钱财，全是假话。

雅典相信对方能支付超过60塔兰特的费用，因此集结了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岂止是掉以轻心，简直是愚蠢之极。

这个坏消息足够令三位司令官灰心丧气。

尼基阿斯一脸阴沉，称既然事态如此，唯有折返雅典。

拉马库斯发出怒吼，说大张旗鼓地出征，岂能就这样觍着脸回去。

三人当中，反倒是最年轻的阿基比亚德表现得最为冷静。他主张至少先到雷焦观察一下情况。

结果，阿基比亚德的意见被采纳。远征军来到了位于南意大利前端的雷焦，但没有入城。雷焦与西西里之间只相隔一条3公里宽的墨西拿

海峡，西西里近在眼前。

雷焦，当时称瑞吉昂，如今称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i Calabria）。三位司令官在那里再次坐下协商。这是为确定今后战略而举行的会议，可是55岁的尼基阿斯几乎处于放空的状态。与他同辈的拉马库斯提出径直驶向叙拉古，一举投入所有战斗力攻城的激进想法。

这一次仍然是阿基比亚德保持着冷静。他认为不应该直接攻打拥有天然屏障的叙拉古，而是应该打迂回战。他们要先和西西里的其他城邦交好，孤立叙拉古。

随后，阿基比亚德扔下阴郁的尼基阿斯和狂怒的拉马库斯，自己带着小部队奔波于西西里各城邦之间。小规模的军队不会引起对方的警戒，这是他率小部队游说的理由。

阿基比亚德的游说相当见效。

那个时代的西西里虽然有“大希腊”之名，但和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相比，仍然属于偏远地区。

小地方的民众被这位相貌英俊、举止优雅的雅典年轻将军的魅力征服。无论是一对一的谈判，还是面向众人发表演讲，只要阿基比亚德有心拉拢，绝对所向披靡。

阿基比亚德的游说远至西西里的北部和东部，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让卡塔尼亚（Catania）加入了雅典阵营。卡塔尼亚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邦，但它距离叙拉古只有60公里。作为进攻叙拉古的前线基地，这里再合适不过。

就这样，远征军全体移动至卡塔尼亚。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也随军到来，远征军司令部设在了此地。

出庭命令

一艘从雅典来的船驶进了卡塔尼亚港。来人召见正忙于准备下一场谈判的阿基比亚德，交给他一封公文。

这是雅典法院下达的出庭令，要求阿基比亚德随来者一起即刻归国。

阿基比亚德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出任何狂怒的反应。

他唯一的要求是带上随从一同走。这个要求得到了准许。雅典法院还不至于把将军五花大绑地押送回国。

阿基比亚德没能和露营的战士以及停泊在港口的战船上的船员们告别。为稳定军心，法院禁止他和外部接触。

就这样，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阿基比亚德乘船离开了卡塔尼亚港。35岁的司令官肩负着雅典人的期待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征，未满3个月就不得不掉头回去。

在归途的船上，阿基比亚德听说了以下事情。

控告他的两个人都是自称克里昂继承者的煽动者，受理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虽然不是尼基阿斯派的成员，但他们对阿基比亚德都怀有敌意。

此外，阿基比亚德很清楚，雅典人绝不原谅亵渎神灵的行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对这种行为予以惩罚。雅典的惩罚，就是死刑。

由于船上载有接到即刻出庭令的当事人，所以阿基比亚德乘坐的这条船不像其他船只沿岸航行，而是一口气横穿爱奥尼亚海，直接驶往比雷埃夫斯港。在横穿爱奥尼亚海之前，船只需要找地方靠港备齐所需物资。结果，船停靠在南意大利的图里。

图里在伯里克利时代就是雅典的殖民城邦。此地虽然靠海，但没有直通大海的入海口，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军船停靠。这里作为雅典的基地已有30年，只要是雅典人，谁都可以自由上岸。

阿基比亚德乘坐的船停靠在图里外港锡巴里，这里也是伯里克利赢得的雅典友好城邦。他们预定在当地停留2~3天，阿基比亚德承诺夜晚返回船上，以此换得自由行动的机会。

然而，就在船准备出港的当天早晨，阿基比亚德及其随从消失得无踪无影。雅典法院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判处阿基比亚德死刑。35岁的司令官新的身份是国际通缉犯。

直到那一年的冬天，都没有人知道阿基比亚德的行踪。

罗马人从先驱希腊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时也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罗马法律规定，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准对派往前线的司令官下达召回令。

法院还是会受理相关诉状，但受理后的调查以及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判决，都要等战争结束后再进行。

如果罗马人承袭了希腊人的那一套，就不会有恺撒的高卢战役。恺撒征战欧洲西北部的10年间，首都罗马的反对派们对他发起过无数次的诉讼。

阿基比亚德离去后，率领远征军的司令官剩下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作为政界的大佬，尼基阿斯俨然成为实际领导人，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和他唱反调。

可是尼基阿斯并没有因此振作。55岁的尼基阿斯，政治生涯的开始阶段是和煽动家克里昂相争，克里昂死后阿基比亚德登场，成为他的反对派。如今没了对手，他反倒无所适从。

彼时还是适合作战的秋天。作为将军，他必须有所作为。于是，尼基阿斯实施了阿基比亚德筹划的战略，打算把西西里的一个小城拉入雅典的阵营。

没想到尼基阿斯在那里遭遇了失败。他以武力胁迫对方加入同盟，引发了西西里人的反感。

雅典海军绕着近似三角形的西西里岛的海岸转了一圈，结果还是没有震慑住对方。尼基阿斯不得不承认失败。

他改变方针，接受了拉马库斯提出的攻打叙拉古的建议。

叙拉古

那么，被雅典军威胁并被锁定为进攻目标的叙拉古，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过。

在当时的地中海西部，论强国，当属叙拉古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关系尚未恶化到爆发激烈冲突的程度。

再者，叙拉古是背靠广阔平原的农业国，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叙拉古人没想过通过与他国结盟来保卫自身的安全。尽管叙拉古是科林斯人建立的殖民城邦，但叙拉古与科林斯的关系也不算特别好。

此外，叙拉古城中心建立于天然屏障上，面向开阔的港湾“大港”，是一个地形绝好的海港城市。

由于城市防御性好，多少年来未被重兵攻击过，叙拉古的民众根本没经历过生死攸关的大战。

当他们听说雅典派出西西里远征军时，似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打击目标。直到阿基比亚德开始在西西里的各小城邦活动，叙拉古才闻出浓浓的火药味，发现自己成了雅典人的靶子。

按理说，叙拉古人应该就此开始积极备战，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叙拉古实行僭主政权，即没有正式建立王政的一人独裁的政权。

不过当地居民是希腊人，这意味着国内派系相斗的现象肯定不少，政坛因此分成执政、在野两党。叙拉古的在野党主张实施斯巴达式的少数人领导制，他们的领头人是赫莫克拉提斯（Hermocrates）。

早在雅典军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北上爱奥尼亚海之际，赫莫克拉提斯便提出了警告。可以说他是唯一敲响警钟的叙拉古人。

然而，警钟并没有震动执政当局。他们认为，接纳反对派的意见会影响到现有政权的稳定，因此备战工作推行得相当迟缓。

等到雅典军在卡塔尼亚建立大本营，紧迫的形势再也不容他们拖拉。叙拉古人真正意识到必须防御雅典军进攻的时间节点，和尼基阿斯承认对西西里小城实施怀柔政策失败的时间正好一致。

长达一年半的激烈的叙拉古攻防战，就此开始。

叙拉古攻防战

叙拉古并非没有战斗力，只是没有抗击强敌的力量。它毕竟是西西里的第一强国。能成为第一强国，也是因为其军事实力凌驾于其他城邦之上。

相较于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希腊本土部队，叙拉古的主力军是骑兵，必要时最多可以集结2000名骑兵。

这个不同点，可以说是政治体制的不同造成的。叙拉古实施僭主制，没有形成成熟的公民阶层。此外，这也和当地的地形有关。那里的辽阔平原延伸至市区，非常适合养马。

除了骑兵，必要时还可以征集轻装步兵。这个城邦很富裕，有众多的居民。

当然叙拉古也有海军，它毕竟是希腊人建立的海港城市。只不过和爱琴海上无敌的雅典海军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战斗力它都相差甚远。

尼基阿斯打算利用自己的强项，从海上向叙拉古发起攻击。同僚拉马库斯表示赞同。

雅典军为这场登陆战几乎出动了所有三层加莱船。他们从卡塔尼亚出港，一鼓作气南下直抵称作“大港”的海湾。靠岸后，按照雅典海军的惯例，除了5000重装步兵，划桨手也变身“海军陆战队员”登陆作战。他们还有骑兵在其中，相信大型战船上运载了战马。

这场突击战大获成功。雅典大军进入开阔的“大港”后迅速登陆，并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摧毁了流向“大港”的阿纳普斯河上的桥梁，进而

占据了附近的奥林匹昂（Olympeion，又译宙斯神殿），封锁住内陆地区与叙拉古城之间的道路。面对眼前的景象，当地民众与其说恐惧，不如说是惊愕。

随后，雅典军马不停蹄地前往达斯孔（Dascon）安营扎寨。这里将成为雅典军进攻叙拉古城的前线阵地，同时也切断了从叙拉古市区通往南方的道路。

在那里，雅典军首次在陆地遭遇1200人的叙拉古骑兵队的袭击。迎战的雅典骑兵只有30人，而且战场较小，无法布下平原会战时雅典步兵、骑兵共同作战的阵列。

雅典士兵们还是勇敢地反击。他们不仅赶走了叙拉古的骑兵队，甚至没让对方接近达斯孔营地。雅典军最终死伤260人，这是二位将军认为可以容忍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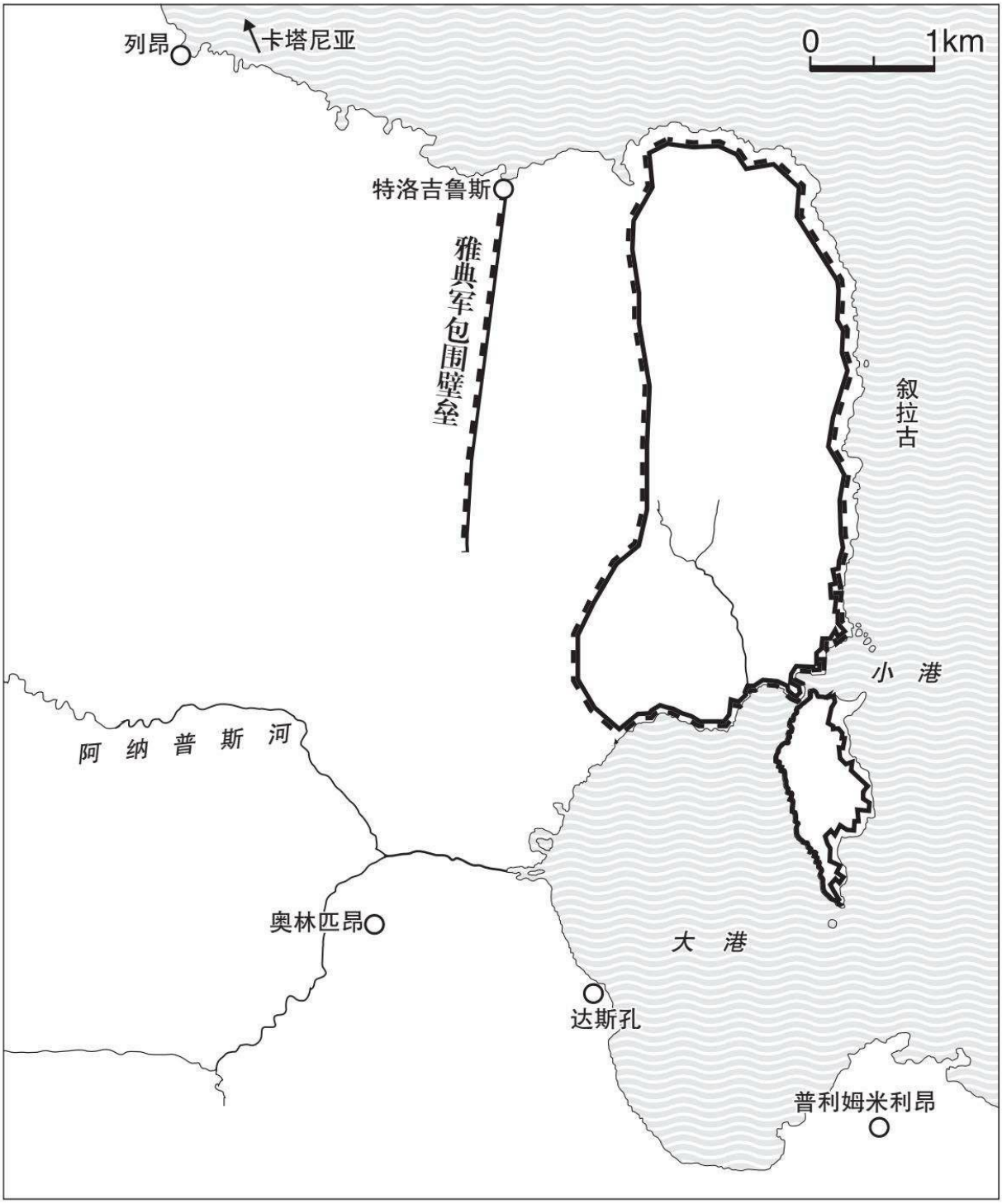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骤雨急降，隔着开阔的海湾，人们竟然看不清对岸的叙拉古城中心。

见此情形，尼基阿斯决定暂时中断在达斯孔的筑营行动，全军坐船返回卡塔尼亚。

撤退的理由一是即将进入冬季，二是暴雨中滞留敌后过于危险。

其实，西西里的雨大多是阵雨，到次日早晨便阳光灿烂、晒干泥泞。西西里的冬季也相当温暖，和色雷斯、马其顿一带简直有天壤之别。

攻入敌后不战而退，等于给了对手扭转局面的机会。



叙拉古及其周边

谨慎当然很重要，但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到底是谨慎行事还是勇往直前的正确判断，才是获胜的关键。55岁的尼基阿斯或许在精神上

也进入了暮年。

返回卡塔尼亚大本营的尼基阿斯给雅典政府写信申请追加军费，要求尽快派遣骑兵，因为雅典骑兵的数量和敌方过于悬殊。

雅典公民大会决定追加300塔兰特军费，并同意再派出280名骑兵。

即使加上这些援军，叙拉古和雅典的骑兵数量依然是1200对310，差距很大。面对善用骑兵的对手，不清楚尼基阿斯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无论如何，远征第一年的公元前415年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这时，人们终于有了阿基比亚德的消息。这位缺席审判被宣告死刑，从而变成国际通缉犯的35岁前司令官，逃去了斯巴达。

阿基比亚德投奔斯巴达

为什么？居然是斯巴达？

阿基比亚德在被护送回雅典的途中，利用船只停靠南意大利图里的几天时间，秘密寻得一只小船，乘着夜黑逃之夭夭。

他避开与雅典有同盟关系的莱夫卡斯（Leukás）、扎金索斯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端登陆。

那一带被称为亚加亚地区，5年前在阿基比亚德的主导下归入雅典辖下，属于四国同盟地区。

尽管四国同盟缔结两年后因联军在曼丁尼亚会战中失败而解体，但亚加亚地区没有回归斯巴达辖下，保持着中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不与斯巴达结盟也不投靠雅典、保持中立的城邦，只有亚加亚和阿尔戈利斯。

阿基比亚德在亚加亚弃船上岸，就地向斯巴达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申请，而是旁敲侧击地先拉拢了斯巴达的一位监察官。

决定斯巴达国家政治的不是同时在位的两位国王，而是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的任期一年的5位监察官。这是全希腊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斯巴达国内也不是秘密。举行公民大会时，当五位监察官入场，连国王也要起立欢迎。

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成员都是20岁至50岁的现役重装步兵。也就是

说，如果没有当选监察官，他们不过是一名斯巴达战士，在战场上有义务服从国王的命令。然而，一旦当选监察官，他们在任期中便握有命令国王的权力。

一直以来，斯巴达以这种方式牵制王权，保持政局的稳定。

阿基比亚德之所以从监察官下手，是为了有效且尽快达到政治避难的目的。

他拉关系的方法说起来也挺好笑。阿基比亚德拉拢的这位监察官的祖父也叫阿基比亚德，所以他称两人有血缘关系。

没想到这还真奏效。那位监察官为阿基比亚德积极活动，说服另外几位监察官，最终促成了雅典前司令官流亡斯巴达一事。

我个人认为，斯巴达不会因为那么不靠谱的理由接受阿基比亚德政治避难。真正的原因是，对斯巴达而言，与其让这位危险的雅典人跑去其他国家，不如留他在斯巴达更为安全。

阿基比亚德是促成四国同盟的推手。尽管该同盟已经解体，但当初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斯巴达，这点斯巴达人是不会忘记的。除此之外，阿基比亚德曾经是雅典的主要政治家及常胜将军，这也是两个加分项。总之，斯巴达接受了阿基比亚德的流亡申请。

阿基比亚德不是那种可以一个人静静度过流亡生涯的人物。他很快就和5位监察官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成为两位国王及斯巴达政府的军事顾问。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写过，没有比斯巴达人更欠缺灵活性的希腊人。这就如同他们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正面进攻天下无敌，但应对方向

不明的突然袭击却意外地薄弱。

阿基比亚德建议斯巴达占领位于阿提卡北部的狄凯里亚（Dekeleia）地区，在当地建立斯巴达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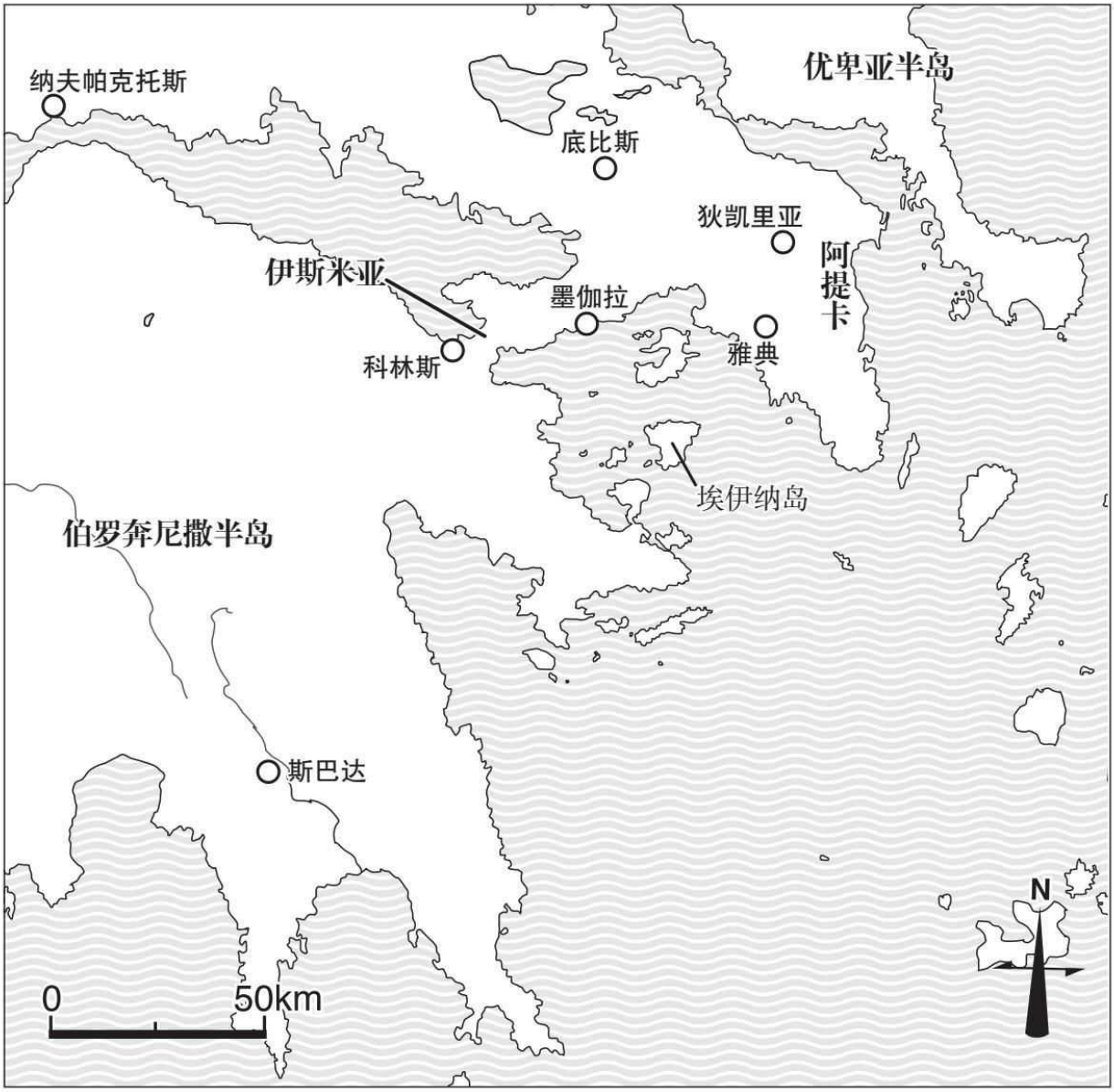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这16年，斯巴达军几乎每年入春后都在国王的率领下北上，对雅典的阿提卡地区进行侵犯。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拖泥带水的战争。因此，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对阿提卡的侵略，与其说是正规的军事行动，不如说掠夺的色彩更为浓厚。

尽管如此，斯巴达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远征。开春后派军北上，通过狭窄的伊斯米亚（Isthmia）地峡，进入墨伽拉的领地，由此侵犯阿提卡地区。

此外，斯巴达人有秋天不打仗的习惯，所以入秋后他们会沿原路返回。

阿基比亚德认为，如果斯巴达在狄凯里亚建立基地，军队可避免来回奔波。除了国王等指挥官返回国内，其余人可以在基地休整。



雅典及其周边

斯巴达人听闻此言，觉得阿基比亚德说的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就因为这个建议，曾经被雅典人深爱的阿基比亚德，从此变成他们憎恨的对象。

理固当然。原本雅典一年中只有半年的时间要忍受敌人的侵略，如

果斯巴达在距离雅典不到30公里的狄凯里亚驻军，当地的农民一年365天都要处于恐惧之中。

另外还有一件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源自阿基比亚德的建议，但没有过人的聪慧才智，是想不出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甚至可以称为恶毒的计策的，怎么看它都不像出自保守的武人气质的斯巴达人。部分学者推测，阿基比亚德有介入的可能性。

这个计策是关于斯巴达如何应对叙拉古提出的派兵请求的。

尼基阿斯率领的雅典军攻入敌区后又返回卡塔尼亚的大本营。叙拉古利用冬天的休战期向斯巴达派去了请求增援的使节。

他们提出两个要求斯巴达派兵的理由。

第一，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仍在持续，既然攻击叙拉古的是雅典一方，那么斯巴达应该帮助叙拉古。

第二，斯巴达人和叙拉古人是源自多利安族的同一民族，所以应该组成统一战线，对抗爱奥尼亚人的雅典。

回顾历史，叙拉古是300年前由科林斯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而科林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加入了由斯巴达担任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叙拉古方面主张斯巴达有义务援助，至少有十分之一在理。

希腊历史在荷马描绘的英雄传说时代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居住于北方的多利安族大肆南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希腊从此进入多利安人和幸免于难的爱奥尼亚人二分天下的时代。历史学家们称这个时代是希腊的“中世”。

伯罗奔尼撒战争，讲到底是斯巴达率领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主

导的提洛同盟的对决。将它解释为“多利安民族”与“爱奥尼亚民族”的对决，并非毫无道理。

虽然地中海西部的叙拉古不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加盟国，但它的母国科林斯是多利安系希腊人的国家，所以称叙拉古人是多利安人，似乎也说得过去。

不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16年前，雅典领袖伯里克利以及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都不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以民族有别为由要求支援，是战争长期化的恶果之一。

战争长期化会催生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划分阵营。所幸在多神教的古代，尚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是多利安人还是爱奥尼亚人，信仰的都是奥林匹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众神。因此当时的希腊没有出现自中世纪开始显现的“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在伊斯兰旗帜下”之类的问题。

话说回来。斯巴达必须以某种形式回应叙拉古的请求。

斯巴达一直不愿意与雅典发生正面冲突。他们希望遵守与雅典缔结的《尼基阿斯和约》，该和约明确规定，双方互不向对方敌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因此，不能派遣国王率领的正规军。斯巴达人也想保存他们只有1万人左右的重装步兵的实力。斯巴达人不敢忘记，10年前那场只能算局部战的皮洛斯战役中，150位斯巴达战士被雅典俘虏，为了让他们平安归来，斯巴达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

然而，斯巴达对叙拉古的请求也不能一口拒绝。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属于多利安系希腊人拒绝叙拉古会让他们失望，进而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

再说斯巴达按兵不动等于让对手雅典有利可图。

斯巴达首脑们绞尽脑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采用9年前伯拉西达的方式应对。准确地说，是采用伯拉西达式的改良版。

当年斯巴达纯粹为了给雅典找麻烦，派遣伯拉西达率领700名希洛人攻打与他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卡尔息底亚地区。

伯拉西达成功达到目的，雅典因此失去了在当地的要塞安菲波利斯。那一年作为雅典将军被派往第一线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战败被问责，受到长达20年的流放惩处。伯拉西达虽然战死，但卡尔息底亚问题从那以后一直令雅典人感到棘手。

长期锁国的斯巴达与叙拉古之间并不存在需要特别考量的利害关系，但斯巴达又不能对后者置之不理。

于是，他们决定再次采用伯拉西达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一次没有沿袭之前的做法。

再度编外录用

虽然当年伯拉西达率领的是农奴出身的士兵，但他本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斯巴达公民。换言之，他是拥有斯巴达公民权的父亲与拥有公民权的母亲生下的孩子。所以他从少年时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最终通过暗杀希洛人、提着其首级归营的野蛮的成人仪式，成为一名斯巴达宝贵的重装步兵。

这次被斯巴达派往叙拉古的吉利普斯（Gylippus）不同。

这位男人的父亲是斯巴达公民，母亲是希洛人。面对“国宝”数量难以保证的现实，斯巴达似乎对士兵的出身渐渐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吉利普斯也是从少年时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不知道他能否像伯拉西达一样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外，伯拉西达除了有700名希洛人组成的非正规军，还被准许率领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1000名同盟国士兵。这次斯巴达没有派给吉利普斯这样的兵力。

因为吉利普斯的正式任务不是通过积极参战来帮助叙拉古，而是向当地军队提供战略指导，向士兵传授作战技巧。

这种做法不禁令人联想到现代先进国家海外作战时不投入地面部队，仅派遣少量军人去指导当地部队。当然，现代与古代是不同的。

在斯巴达，率领正规军的是国王。国王出征，按惯例5位监察官中必有2位同行。

伯拉西达和吉利普斯率领的不是正规军，因此身边没有指手画脚的

监察官。这一点反倒对战略战术的制定有利。

伯拉西达曾经率非正规军大获成功，吉利普斯这一次应该沿袭之前的做法。

可是吉利普斯没有走前人的老路。他不仅当指导员，而且自己站在了叙拉古军的第一线。

吉利普斯率领的士兵人数与当年一样在700人左右，军队在公元前414年的春天从斯巴达出发。

公元前414年的春天对前一年的夏天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征的雅典军来说，是他们在西西里迎来的第一个春天。

此时司令官尼基阿斯没有立即下令展开军事行动。他在等待去年冬天向雅典申请的骑兵团的到来。与对手骑兵有1比40的数量差距，这令他迟疑不决。

运载着骑兵的雅典船队抵达雅典军大本营卡塔尼亚时，已经是4月末。骑兵团包括250名雅典精英和30名普通市民担当的弓箭骑兵，总计280骑。

有了这支雅典援军，再加上先前向西西里境内的塞杰斯塔城邦要求的300骑以及纳克索斯派来的百骑援军，雅典军骑兵的总数达到710人，与叙拉古的骑兵差距缩小至1比2。

雅典军真正开始军事行动是进入5月后，适合打仗的季节就这样被浪费掉两个月，并且尼基阿斯还改变了战略。

去年秋天尝试过的利用海军进攻“大港”的战略被中止，改为从北边

攻击叙拉古的陆地战。

根据这个计划，雅典军首先从卡塔尼亚搭船至列昂，在列昂登陆后占领悬崖高地。随后，雅典军准备建造一道通往“大港”方向的包围叙拉古的壁垒，但他们很快发现悬崖地形陡峭，作业相当困难。

雅典军再一次改变战略。军队从列昂移动至东南的特洛吉鲁斯，从那里建造通往“大港”的壁垒，目的是完全断绝叙拉古城与周边的联系。

这个设想本身非常正确。如果不从陆地发起进攻，临海的城市是不可能被攻陷的。

要完成这道全长超过5公里的壁垒，哪怕全部使用当地材料，也需要35000人的人力。所幸士兵数量不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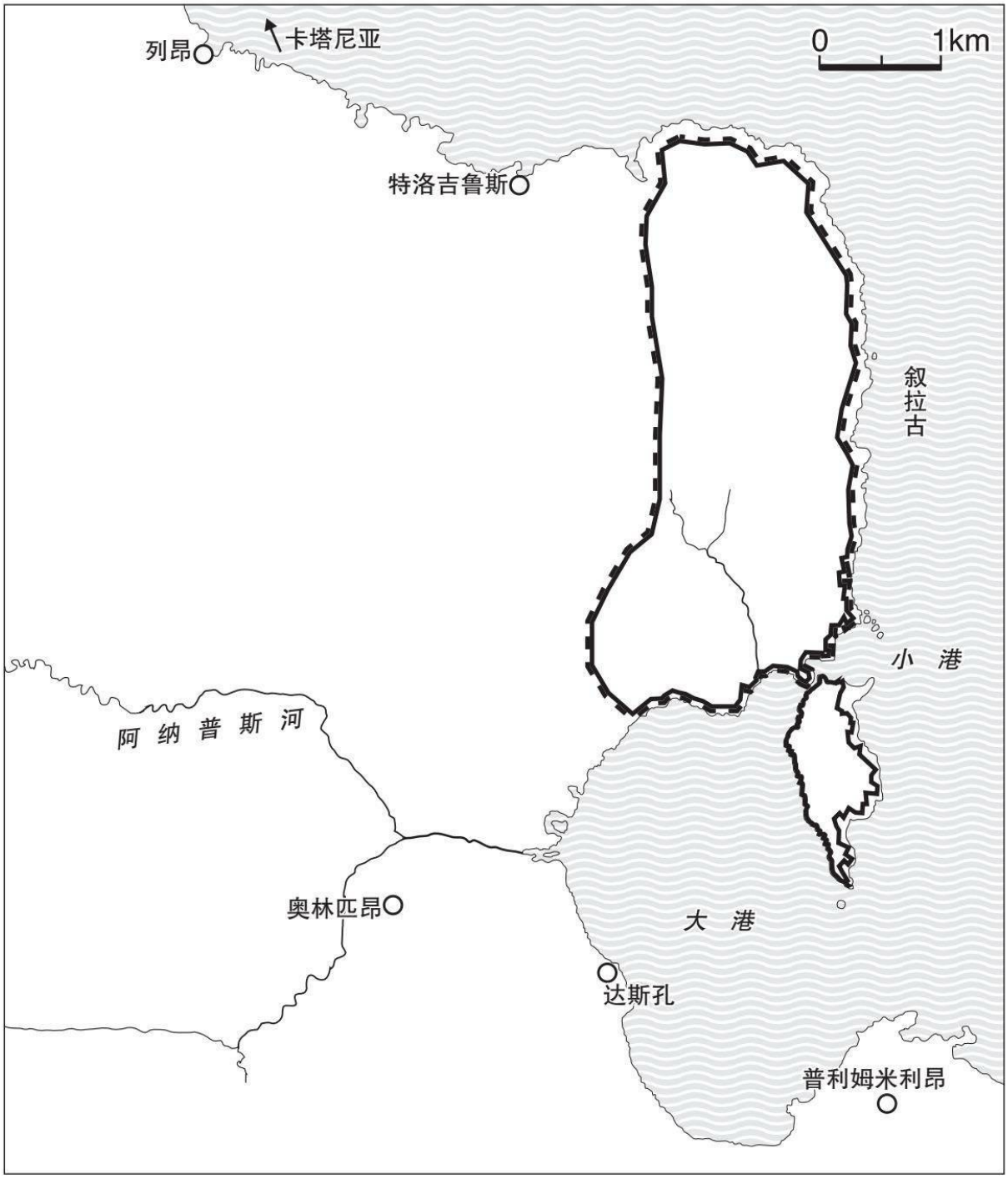
但要将设想变为事实，还需要以下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施工期间，雅典军必须抵挡住势必会来搞破坏的对手的攻击。

第二，这个战略的最高负责人必须要有哪怕天摇地动也要坚持到底的铁一般的意志。

在最初阶段，壁垒工事进行得相当顺利，骑兵战斗力的增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跑来破坏捣乱的叙拉古骑兵，每每都被雅典军打得七零八落。

然而就在这时，吉利普斯一行抵达了叙拉古。



叙拉古及其周边

帮手到来

听到斯巴达战士这个称呼，我们后人会想到温泉关之战中抵抗波斯大军壮烈捐躯的列奥尼达，普拉塔亚会战中打得波斯军无还手之力的帕萨尼亚斯，身为斯巴达人却和伯里克利成为好友的阿希达穆斯等“男人中的男人”。

他们都是斯巴达建国以来世代相传的两大王族的成员，从小习武练兵，但不用提着希洛人首级归营完成成人仪式。这些自幼接受帝王教育的男人自然成长为绅士。

非王家出生的斯巴达男子同样也是名满天下的斯巴达战士。他们身强力壮、沉默寡言，唯一看重的是自尊心。

母亲是希洛人的吉利普斯与这些人不同。他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大概没想过要去当什么“男人的榜样”。

凡事慢一拍的斯巴达召开公民大会，决定派吉利普斯前往叙拉古，是在公元前414年春天。吉利普斯想来早已急不可耐，立即率军从斯巴达出发。如果换了其他人，此时一定直奔叙拉古，而吉利普斯没有那样做。

斯巴达只给了这位草根军官4艘战船。虽然按希腊的惯例桨手登陆后会加入战斗，但士兵的总数不会超过700人。吉利普斯所有的军力就是这批非正规军，不到700人的散兵游勇。

吉利普斯没有直接前往叙拉古，而是先去西西里内陆的城邦招募士兵。不用说，这一路上他都号称自己是斯巴达正式派来的军官。

哪怕是不知天下事的西西里乡下人，也知道斯巴达。更何况这是为了支援西西里同胞叙拉古人抵御雅典入侵，当地民众踊跃参战。就这样，出发时700人的队伍壮大至3000人。

率领这支3000人军队的吉利普斯听说雅典军正在北边建造包围壁垒，南边的防守薄弱，于是他决定走陆路从南边进入叙拉古。

见到这3000人到来，叙拉古的民众欣喜万分。他们以为希腊最强的陆军国家斯巴达真心实意地派出军队来支援自己。吉利普斯及其军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叙拉古城。

如此情形下，吉利普斯超越斯巴达政府赋予他的权限，成为叙拉古防卫军的统帅，也是再自然不过。这样一来吉利普斯已不是指导作战，而是直接率领当地军队作战了。

不知道是不是叙拉古方面认为有吉利普斯一人足矣，他们竟然解除了之前孤军奋战、拼死防守的赫莫克拉提斯的军职。

话说回来，吉利普斯的到来的确令叙拉古的防御战略为之一变。

此外，在吉利普斯抵达叙拉古之前雅典军中发生的不幸事件，也帮了他的大忙。

尼基阿斯落单

为修建包围叙拉古的由北向南5公里长的壁垒，雅典人将军队一分为三。最南端也就是距离“大港”最近一侧的工事，交由将军拉马库斯负责。这一带靠近叙拉古城，叙拉古军的破坏活动尤为激烈。相较于修建壁垒，这里的雅典军更多时候在与敌人作战。

雅典军在激战中付出很大的代价，司令官拉马库斯也战死了。

当初率领西西里远征军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的三位将军，先是阿基比亚德因为接到本国的召回令而脱离战线。一年后，拉马库斯战死。

如今，只剩下尼基阿斯一个人。

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人的反应大抵分为两类。

第一类人认为虽然此时需要独自担起全部责任，但所有的事情可以由自己决定，这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转机。

第二类人因为少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伙伴而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一个人难以应付现状。

56岁的尼基阿斯属于后者。

更何况他本来就反对远征西西里。叙拉古攻防战打响后，他仍常常考虑如何在保全颜面的情况下撤军回国。

现在将军只有他一位，雅典军总算能实现指挥系统的一体化了。可惜这是尼基阿斯掌控下的一体化。

成为叙拉古防卫军主帅的吉利普斯，没用多少时间便了解了叙拉古军队的实际状态。

叙拉古陆上的主要战斗力是骑兵。希腊本土城邦当作军队主力使用的重装步兵，在叙拉古形同全无。尽管叙拉古是西西里岛第一强国，但它的步兵至多是起辅助作用的轻装步兵。

此外，他们没有能称为海军的船队。不过作为海港城市，叙拉古倒是不缺船只，它们可用来撞击或阻挡敌方的战船。在吉利普斯来到之前，叙拉古人从来没想到利用船只作战。

吉利普斯向叙拉古军的船队——应该说是商船队下令，要求他们对船首进行加固改造。

他将船队留在“小港”内进行改造，自己率领叙拉古的骑兵和他带来的3000名士兵，集中打陆地干扰战。

吉利普斯没有全线破坏包围壁垒，而是对它进行分段破坏。

壁垒全线相连才有效果，一旦被切断就失去了意义。

壁垒中间大约1公里的墙体遭到叙拉古军的破坏，雅典军迄今为止的心血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这个时期雅典军死伤者的人数持续攀升。

这段时间，尼基阿斯不在前线，他卧病在床，想来是长期精神压力所致。在病床上，他又改变了战略。

他决定重新启用前一年秋天尝试过的战略，全军坐船南下，攻入“大港”，将那里作为雅典军的前线基地。

雅典军基地的位置由此从前一年的达斯孔改到普利姆米利昂的山崖

上。

对这个改变，我完全不能理解。

达斯孔是连接海湾的低洼地带，虽然雅典战船数量众多，但大部分的船还是可以上岸的。普利姆米利昂是高地，对于防守敌人骑兵来袭也许有利，但附近连一个可以容纳船只上岸的沙滩都没有。基地处于悬崖之上，遇到敌人船队来犯时，士兵们必须走下悬崖跑到海边上船，反击速度会受影响。

更何况木制船长期漂浮于海中，会受到海水的侵蚀。叙拉古夏天受到来自北非的热风直击，比雅典炎热，更加快了船底的腐朽速度。

把基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的唯一好处是可以相隔一公里眺望拥有天然屏障的叙拉古城中的情况。这一公里内侧是“大港”，外侧是外海。

因此只要封锁住这一公里，雅典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从海上向叙拉古城发起攻击。

不过，叙拉古人的“大港”是个面积为4公里乘3公里的大海湾。雅典军想要从容不迫地进攻，首先得保证叙拉古的船队不会进入湾内，其次是普利姆米利昂的基地不遭受敌人陆军的袭击。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一公里的距离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

话说回来。相较于雅典的将军，斯巴达草根军官的本事明显更大。

吉利普斯命令在“小港”内完成改造的叙拉古船队，迅速转移至“大港”，并且停靠在城墙附近的沙滩上。

此外，他利用雅典军刚在普利姆米利昂建立基地、尚未稳定的机会，亲自率领叙拉古的骑兵团绕着“大港”海滩不断发起攻击。

结果，雅典军变成海陆两面受敌。湾内有叙拉古的船队，陆上有叙拉古的骑兵。原本计划打包围战的雅典军，反倒被对手包围。

尼基阿斯的家书

尼基阿斯不得不承认形势严峻。

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给祖国雅典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战况的信。这封信被某位学者以英国人特有的讥讽口吻称为“Nikias writes home”，是写给雅典全体公民的。

对尼基阿斯而言，雅典的确是“home”。

不过“home”在这里译成“家书”可能比较合适。

接下来，我将介绍与尼基阿斯一直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的这封家书。由于内容较长，我做了部分删减。

> 雅典公民们，以前写给你们的那些信只是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一次不同。我会将迄今为止的真实状况告诉你们，请你们做出决断。
>
> 在之前的战斗中，我们的战斗力一直是优于叙拉古军的。但是自从斯巴达人吉利普斯来到叙拉古，战况发生了逆转。叙拉古方面的破坏行动变得激烈，我们不得不中断包围壁垒的工事。那以后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根据最新的消息，叙拉古组织了船队，准备从海陆两个方向对我们发起攻击。
>
> 他们的海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攻击我们的战船，我们的海军做出反击，不断地消耗精力。敌人的船队停泊在靠近岸边的海滩上，这使他们的船可以很快下水，缩短了出动的时间，同时又便于将船拖到岸上晒干。
>
> 我们的海军为尽快登船做出反击，不得不一直将船停泊在海

中。船底被海水侵蚀，行船的速度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的水和粮食的补给也出现了问题。派出去寻找粮食的士兵被埋伏的叙拉古骑兵杀害，牺牲人数不断上升。我们的奴隶纷纷逃离，现在只能派桨手们离开营地去找补给。相比海战，我们在陆地上损失了更多的桨手。

其实，逃亡的不只奴隶，还有同盟国士兵。这意味着雅典海军的桨手们不得不承担起原本奴隶做的事情，在作战时他们还必须奋力划桨。

我希望你们理解，我们无法从西西里获得桨手的补充。我们在西西里的两个盟邦卡塔尼亚和纳克索斯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尼基阿斯强调战船桨手的损失，此外无须做出更多的解释。因为雅典人非常清楚本国海军强大的根源在哪里。

战船的桨手通常由梭伦制定的等级制中的第四等、罗马人叫“普罗列塔利”的民众担任。

他们不是单纯跟随船长的号令划船的水手，而是熟练的技工。常年的实战培养出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们具备高超的掌船技术，能根据战况适时做出判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战船的作用。

伯里克利常常说：“经验丰富的桨手代表了技能之极致。”

这些雅典的桨手面对吸满海水变得沉重不堪的船只，相信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尼基阿斯强调不断损失划桨手是雅典军最大的痛处，完全没有言过其实。

除此之外，尼基阿斯还提及了陆地战中重装、轻装步兵折损愈加严重的现状。

总而言之，修建包围壁垒时，雅典陆上战斗力损失较大，营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之后，海上战力遭受更多的打击。

在信尾，尼基阿斯希望民众根据他的陈述，了解雅典军在叙拉古的苦境，然后做出决定。

> 因此你们要决定，是让雅典军全体从叙拉古撤退回国，还是再派遣一支战斗力同样强大的军队。

在古代希腊，即便是司令官也不能凭个人意志决定撤军回国。

决定是由公民们做出的。雅典自不用说，就是在寡头制的斯巴达，没有监察官们的同意，贵为国王同样不能擅自决定。

没有得到城邦国家的公民批准就擅自撤军，会被视为临阵脱逃或脱离战线，回国后下令者将作为逃兵被处以死刑。

在罗马法出现之前，古代希腊的前线司令官权力仅限于制定狭义上的战略、战术。

> 我身体状况不佳，希望你们解除我的职务，选出能代替我承担当下职责的人选，尽早派往这里。

尼基阿斯在信中要求雅典人赶快做出决定，因为下一年的春天敌军的实力会进一步增强。字字句句宛如悲鸣。

雅典人总算感觉到事情不妙，紧急召开公民大会。可是，以多数票

通过的决议与尼基阿斯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派遣援军

首先，尼基阿斯的辞职要求没得到批准，他甚至被任命为首席将军，因为随即会有另外两位将军抵达前线。

大概在雅典民众的心目中，身体欠佳不算什么大事。56岁的年龄在领袖没有“退休”规定的雅典也不成理由。

第二，针对尼基阿斯提出的撤军或派遣大军增援的两个选项，雅典人选择了后者。公民大会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决定派出第二支大军。

难道雅典人不了解雅典军在叙拉古的困境吗？

我想他们是理解的。只是考虑到前期投入的人力、经费和军备，不愿就此罢休而已。

人们不是因为好战才让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感到退无可退只能前进，所以才让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

关于增援的第二支远征军的规模，公民大会做出以下决定。

首先，由于军队庞大只能由国家负担费用，第二支远征军所需的费用将以特别费的形式从国库开支。具体费用虽然不详，但是援军规模有据可查，公民大会决定派出几乎与第一次同等数量的援军。他们的决心显而易见。

就这样，在欢送第一支远征军出征1年4个月之后，比雷埃夫斯港又送出了援军。

三层加莱船73艘。其中雅典船51艘，同盟国船22艘。

重装步兵5000人。其中雅典1200人，同盟国士兵3800人。

弓箭手、投石手、长枪手等组成的轻装步兵部队3000人，其中1000人左右是雅典公民。

除此之外，启动三层加莱船的桨手每艘170人，加上其他水手，总人数超过12000人。运输用的帆船船队应该也加入了战列。

雅典是希腊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三层桨战船在雅典的船只中自然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同盟国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战船。与前一次相同，陆上的重装、轻装步兵很多来自同盟国。

由此可见，提洛同盟在这个时期依然发挥着正常的功效，各加盟城邦并没有抛弃雅典。

不过，单看雅典一国规模的投入，就令人咋舌。

两次远征军的总人数估计超过35000人。

城邦国家雅典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地方。伯里克利时代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以至于伯里克利不得不推出限制公民权的政策。据说仅成年男子就超过6万人。

虽然司令官没有退休年龄，但士兵是从登记在册的18岁到50岁的雅典公民中征集。

彼时56岁的苏格拉底和尚未成年的14岁的柏拉图，都属于编外人员。不过，31岁的阿里斯托芬应该册上有名。这位稀世的希腊讽刺喜剧作家没有被征召入伍，是后世希腊文化爱好者们的幸运。在这段时期，

他每年都有作品发表。

尽管雅典处于战争时期，但奉献给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每年照常举行。雅典人没有战时自慎的想法，戏剧、哲学、建筑、造型美术等文化一如既往地蓬勃发展。

话说回来，具备公民权的雅典男子两人中就有一人加入了西西里的远征军。柏拉图《飨宴》中登场的人物虽然都不在其中，但上演阿里斯托芬、阿伽通作品的露天剧场，想来冷清了许多。

公元前414年冬季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仿佛押上所有剩余的国力，派遣第二支远征军出征，任命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Eurymedon）两位将军作为率军的司令官。

这两人相差几岁，都是40多岁的年纪。

他们两位不属于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的天才型武将，但都是脚踏实地能赢得战斗的军官。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国力不稳，国家之所以没有急剧衰落，多亏这两位实干家。

第二次派遣远征军，雅典似乎投入了所有剩余的兵力，同时司令官级别的人才也尽数出征。

为什么第一支远征军中没有出现这两位将军呢？

当时阿基比亚德是远征的倡议人，尼基阿斯作为牵制他的角色随同出征，他俩出任司令官可以理解，但是没有非拉马库斯不可的理由。

实际上，雅典当时就应该派遣德摩斯梯尼或欧律墨冬出征，尤其是欧律墨冬，他是司令官中唯一熟悉西西里内情的人。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四年的公元前427年，似乎为了继续执行伯里克利的战略路线，曾再度尝试向西地中海发展。当时率领40艘战船在西西里滞留3年，并努力与岛上中小城邦建立友好关系的，正是欧律墨冬。

不过，这项军事任务在3年后即被迫停止。尼基阿斯对向地中海西部扩展势力并不积极，他利用公民大会终止了西进活动。

自停止西进到西西里远征，中间相隔9年。这段时期欧律墨冬始终有良好的战绩，照理说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再次西征时，他应该和尼基阿斯、阿基比亚德同时当选为司令官，毕竟他是西西里通。

但就在此前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欧律墨冬遭到起诉，被科以罚金。这也是伯里克利时代之后出现的乱象之一，国内动辄起诉、审判，或许欧律墨冬也是牺牲品。

有志成就大业的人势必树敌，什么都不做的人自然太平。虽然谈不上天才型武将，但欧律墨冬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可就因为这样，他被排除在西西里远征军的司令官名单之外。

那么，德摩斯梯尼为什么第一次也没当上司令官呢？

这里另有内情，与11年前发生的事有关。

11年前的皮洛斯战役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但却是斯巴达与雅典的首次直接交锋。在这场战役中，斯巴达输给了雅典，他们宝贵的150名重装步兵作为战俘被押送到雅典。

斯巴达人自幼被教导战场上非胜即死，对他们而言，做俘虏是十分耻辱的事情。然而这些人被斯巴达视为“国宝”，为换回战俘，斯巴达无

可奈何地向雅典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当年在皮洛斯战役中率领雅典军的正是德摩斯梯尼。

尼基阿斯在雅典政界是出名的亲斯巴达派，因此他才会与斯巴达签署《尼基阿斯和约》。他没让德摩斯梯尼和自己、阿基比亚德同任远征军司令，是不想引起斯巴达人的不快。

于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德摩斯梯尼被排除在第一次远征军之外。

雅典原以为一支大军足以平定西西里，谁知1年4个月后不得不又送出援军。这一次重任落在了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肩上。除了他们，雅典已经没有能够胜任将军的人才。

面对如此重大的事项，雅典公民在超乎想象的短时间内做出了决定。看来尼基阿斯的“writes home”还是十分奏效的。

援军出港的时间也确定下来。

欧律墨冬不顾冬季航行的危险，先率领10艘战船直奔叙拉古。雅典通知尼基阿斯援军已经出发，希望这位56岁的司令官能够撑到他们抵达。

第二次远征军的主力由德摩斯梯尼率领，他决定在第二年的春天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同盟国士兵来雅典集结也需要一段时间。

翌年春季出发，意味着援军要到夏天才能抵达叙拉古。叙拉古得到吉利普斯援助后攻势渐猛，他们不可能让雅典军舒服地等援军到来。

事实上，叙拉古确实没有给对手等待的时间。

攻防的第二年

斯巴达的草根将官连冬季也没有浪费。他制定出春季战的战略向事实上已成为他手下的叙拉古的要人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做好相关的各项准备。

他所谓的战略，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即削弱雅典主力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要做的是将他们赶出普利姆米利昂。

叙拉古人问理由何在，吉利普斯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普利姆米利昂有目前雅典军唯一可以停靠的海岸。

第二，对雅典军而言，普利姆米利昂是存放着远征军所有财产的大本营。

第三，叙拉古如果不拿下普利姆米利昂，就无法占领“大港”。

斯巴达拥有陆上最强战斗力，但海军实力为零。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吉利普斯对制海权的重要性理解得如此透彻。

或许因为他出身底层，少了固有观念的束缚，思维变得更灵活、发散。另外，率领叙拉古骑兵阻击雅典军粮草补给队的经验，也为他制定后续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吉利普斯还指示，翌年春天开打的战役要积极利用叙拉古船队的战斗力。

叙拉古目前在“小港”内停泊的三层加莱船有45艘，已经移动至“大港”的有35艘。

这总共80艘船将与雅典海军直接交锋，吉利普斯对此也设计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拥有80艘船算是拥有相当规模的海军了，但叙拉古的船一半以上是商船。与雅典的三层加莱船相比，其造船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掌船水手以及桨手的技巧相差甚远。

尽管海水浸泡导致船身重量增加，雅典战船的速度依然胜过叙拉古一方。换言之，如果双方船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叙拉古就没有胜算。

吉利普斯没有要求叙拉古的水手们提高划船水平。他只下达了一个命令：全力冲击撞沉敌船。

叙拉古人被吉利普斯点拨之后，已经加固了船首及其周边的部分。吉利普斯打算以加固改造过的船只打“撞击战”。这位斯巴达的编外人员，似乎刚进入叙拉古不久，便看到了未来战势的走向。

实际上，如果大家亲眼见过叙拉古的“大港”，可能都会感到这里只有打“撞击战”才能奏效。

“大港”面积有4公里乘3公里大，的确配得上“大港”之名。然而它毕竟只是个风平浪静的港湾，距离外海有1公里。在2500年后的当下，这里是帆船新手们的训练场。

就像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优势，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获全胜那样，雅典海军擅长的是海上作战。由高级技工组成的雅典海军能够发挥最大优势的地方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而是人们必须对风向、潮流、海浪做出准确判断的大海。

在平静且面积有限的海域作战，高级技工与经验、训练不足的业余人员之间的能力差距，并不会对战势造成多大的影响。

就这样，时间慢慢过去。西西里的冬天就快结束，即将迎来春天。

在这段时期，雅典方面获得两个情报，估计是由欧律墨冬打探来的。

所谓胜利者永远不缺追随者。听闻叙拉古人的英勇事迹后，西西里各中小城邦派出的援军络绎不绝地抵达叙拉古。这是第一个情报。

援军的到来意味着叙拉古骑兵以及轻装步兵的战斗力增强了。

情报之二是雅典第一次准确地掌握了叙拉古海军的规模。自叙拉古攻防战开打以来，雅典军的首脑们一直疏于情报收集。他们甚至不知道“小港”内停泊着45艘船。

对雅典人来说，形势不断恶化。雅典军不得不等待援军，而叙拉古急不可待。

公元前413年的春天，西西里远征已经过去1年6个月。

第一次海战

营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的雅典海军预料到叙拉古海军将会来袭，于是决定在对方动手之前主动出击。既然掌握了敌军的规模，就能制定相应的战术。

雅典海军将船队一分为二。

针对已进入“大港”的35艘叙拉古战船，雅典一方派出25艘战船迎战。

与此同时，雅典军的另外35艘战船去阻击正从“小港”前往“大港”方向汇合的45艘敌船。

此时此刻，雅典海军能够使用的战船只剩下60艘，这个数目实在令人震惊。

第一次派遣的134艘加上欧律墨冬带来的10艘，雅典军总共应该有144艘战船。

这1年半的战争的确让雅典海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船只减少到半数以下还是过于惨淡了。

我个人想象，他们缺少的不是船只，而是桨手。桨手总数减少一半，而每艘船需要的人手不能减少。要发挥军用战船原本的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人力。需要170名桨手的船只靠70个人是划不动的。

雅典可用的144艘船减少到60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这1年半的战斗使雅典损失了部分船只。

其次，营地改到普利姆米利昂后，由于船不能上岸，不得不一直停泊在海上，因此船底遭受海水侵蚀造成部分船只无法使用。

最后，一些船只不能保证配备170名桨手。

这样算下来，差不多只剩下60艘。

尼基阿斯在“家信”中讲到最令人痛心的是损失了桨手，实际上它确实影响战局。

雅典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有16000名公民死去，这还仅仅是桨手牺牲的数量。

话说回来，只要到了海上，哪怕是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内，哪怕规模只有敌方的四分之三，希腊最强的雅典海军还是有足够的应战能力的。

面对除了冲撞毫无战术可言的叙拉古海军，雅典的熟练技工们巧妙地掌控着船只，打乱了敌方的阵型。原本打算撞沉对手的叙拉古船队纷纷被自家船撞沉。

就这样，雅典海军阻止了叙拉古海军的汇合。他们将对方剩余的船队一半赶往“大港”北边的海滩，一半赶向“小港”，结束了当天的海战。

可是，倘若问这一天的战斗谁是输家，只能回答是雅典。因为雅典虽赢了海战，却失去了普利姆米利昂。

在这段时期，雅典军似乎是由欧律墨冬指挥海战，尼基阿斯负责基地防守。

留在营地的雅典军紧张地从悬崖上观察海上的战势，过分担心反而疏忽了防守。

就在这时，吉利普斯率领骑兵和步兵向他们发起了攻击。被追杀的雅典士兵们和尼基阿斯一起跑下悬崖，跳上了刚赢得海战返回的战船。

士兵们见船就上，慌不择路，雅典军只能放弃实际上已被敌军占领的普利姆米利昂大本营，匆匆逃离。

船也不能就这么停在海上。于是他们在“大港”西侧的海滩登陆，将那里作为新的营地。

这一次基地是在岸边。船可以上陆地，但这些船只和士兵不能置身于毫无防御措施的海滩上。

这天夜里，刚打完海战的和从基地逃出来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彻夜未眠地在海滩上修建防御用的木栅。

就这样，原本打算包围敌人的雅典军，越来越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大港”虽然是个开阔的港湾，但现在它的北边被叙拉古的船队占领。南边的普利姆米利昂重新回到叙拉古人手里。面朝外海的东边与外海之间有一公里的海路。雅典军只剩下西北海滩这一块阵地。淡水和粮食的补给也出现问题。

身处这种状态，雅典军极可能在援军到来前就被歼灭，他们必须找到出路。这个任务唯有托付给海军。

此时的吉利普斯收到了雅典派出的援军正接近爱奥尼亚海的情报。他决定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和对手一决胜负。

第二次海战

雅典军终于完成了位于“大港”西北面海滩边的新营地建设工事。

他们在朝向陆地一侧竖起栅栏，将战船拖到沙滩上，在靠近岸边的海上排列好运输船，每艘船都放下船锚固定，以便充当海上防御栅栏的角色。

运输船不能排列得过于密集。海风与海浪会令聚拢的船只相互碰撞。

因此，船与船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这样做还有另外的目的。

第一，留出三层加莱船出击的安全通道。

第二，运输船上都有搬运货物的抓手，也就是起重机。必要时可以用它装上石块，在敌船接近时从高处往下砸沉敌船。

闻名天下的雅典海军如果能像第一次海战那样正常发挥控船本领，他们应该有很大的胜算。

然而，吉利普斯不愧是斯巴达“编外人员”，他完全没有采用斯巴达传统的战法。

首先，他集合了叙拉古军的主力骑兵队，以及来自西西里岛各地的志愿兵，从陆地攻击雅典营地。

为保卫营地，雅典的重装步兵不能上船战斗。结果，雅典海军只能

在没有主力重装步兵的情况下出海作战。

除此之外，吉利普斯指示叙拉古海军，首要任务是射击对方桨手，其次才是撞船。

为方便步兵在甲板上作战，三层加莱船的桨手们都坐在甲板的下面。虽然头顶受到保护，但是船身两侧却处于无防备状态。船身两侧之所以设计成开放式，是因为双方船只接近时，桨手们可以放下船桨拿起长枪参与战斗。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桨手也是堂堂正正的公民，是公民就有保家卫国的义务。

所谓“射人先射马”，在2500年前的地中海上，吉利普斯完美地实践了这个战术。第二次海战中，叙拉古的战船上增加了很多弓箭手和长枪手。

被当成“马”射中，再怎么技能熟练的桨手也会陷入恐慌。他们努力控制住局面，躲过敌人的攻击撤回营地。这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第三天重复着同样的战况。一直打到第四天战斗总算彻底结束，要问谁是赢家，只能说是叙拉古。雅典军虽然守住了营地，但没能给叙拉古海军致命的打击。

雅典军被包围的状态始终没有改善。

援军抵达

7月初，翘首以待的援军终于抵达。德摩斯梯尼率领的第二支远征军包括三层加莱船73艘、重装步兵5000人、轻装步兵3000人。

士兵总数近13000人，加上随行的奴隶，总人数超过了15000人。

营地内自然是欢呼声一片。迎接的一方热泪盈眶，抵达的一方见到友人健在欣喜不已。那一夜，雅典军的营地通宵未眠。

难以入睡的还有三位将军。

雅典军必须找出打破困局的方法，43岁的德摩斯梯尼、早先抵达的47岁的欧律墨冬，以及57岁的尼基阿斯，司令官们的确是没工夫睡大觉。

德摩斯梯尼主张打陆地战，但出发点与最初从陆地攻击叙拉古城时不同。他的想法应该是消灭叙拉古军在陆地上的战力，保证通往特洛吉鲁斯的道路安全，随后从那里撤退到卡塔尼亚。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就算没打赢战争，至少可以摆脱目前被包围的苦境。

欧律墨冬对此表示赞同，尼基阿斯既不赞成也没反对。

为了对付叙拉古军陆地的主战力——骑兵团，德摩斯梯尼决定率领所有重装步兵在深夜向敌人发起突袭。

从出其不意这一点上说，雅典军的确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自己土地上战斗的叙拉古骑兵熟悉地形。灵活机动的骑兵与重装步兵的交锋，势

必是熟悉地形的一方占上风。结果，雅典军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攻击行动本身只能说以失败告终。

这场失败令德摩斯梯尼痛下决心，他逼迫尼基阿斯做出决定。

事到如今，除全军撤退外无法保全士兵的性命。

现在走还有足够的船只，不如带上所有的士兵冲出“大港”的包围圈，先退到卡塔尼亚。对于德摩斯梯尼的这个主张，欧律墨冬表示赞同。

然而，尼基阿斯表示了反对。

之前要求公民大会解除自己职务没有被准许的尼基阿斯，这一次竟然反对回国。

他真正的理由何在，我们不得而知。

继续战斗还是结束战争，是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的。尼基阿斯或许没有勇气冒着政治风险，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撤军。或许他只是不愿意自己政界大佬的资历沾上污点。

德摩斯梯尼没有放弃。他执拗地劝服尼基阿斯，甚至不惜对这位前辈恶语相向。用了两周以上的时间，他终于等到尼基阿斯点头答应。

就这样，雅典军将撤退——或者说逃离更为准确——的行动定在8月27日。

月全食

可是，就在8月27日的晚上，发生了全月食。

月亮完全消失不见，士兵们在黑暗中惊恐万分、手足无措。

彼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日食、月食属于自然现象。当年伯里克利远征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他亲自向那些相信灾难将至、动摇不安的士兵们做出说明，稳住众人的情绪。

而此时的尼基阿斯向随军远征的占卜师询问当夜发生月全食的意义。

占卜师回答说这是大凶的征兆，避凶化吉需要等三九二十七天，出发应该延迟至27天以后。

于是，这就成了尼基阿斯的意见。

原本定于8月27日的出发时间，延后至9月23日。

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对此都坚决反对。

其实就算先撤回卡塔尼亚，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如今的西西里几乎全岛敌视雅典。退回卡塔尼亚，结果就是向雅典撤退。军队必须横渡广阔的爱奥尼亚海，继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穿过爱琴海，抵达雅典有一段漫漫长途。

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反对的理由是入秋后海上风急浪高，全程走海路很艰难。

三位将军尽管都是将军，级别却不同。

尼基阿斯是首席司令官，这是公民大会决定派遣援军时做出的决定。没有他的准许，出发时间不可能调回原定计划。

雅典军延期出发的情报被叙拉古掌握，也许他们是从逃跑的奴隶那儿得到的消息。奴隶没有公民权，因此被免除兵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照料高级将官的生活起居，所以有机会接触到最高机密。

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最高机密。为安抚把月全食视为凶兆、慌作一团的士兵们，曾经有队长暗示将撤退回国。

没想到这造成了反效果。

月全食引起的恐惧和不安尚未平息，再听说可以回国，人心自然摇摆不定。

这些情绪不稳的士兵，没过多久又遭遇了叙拉古军的袭击。

第三次海战

从8月末开始，叙拉古海军在设于海滩的雅典营地前方海上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仿佛在做防止雅典军逃跑的演练。

9月初，欧律墨冬终于说服两位同僚，为突破包围出海行动。这是在“大港”展开的第三场海战。

那一天欧律墨冬采用了雅典海军最擅长的战法。

要最大限度发挥雅典海军控船技术娴熟的优势，最好的办法不是从敌人正面进攻，而是从侧面包抄对方船队，逐渐收缩包围圈。

这是在开阔的海面上才有效的战法。“大港”虽大，但毕竟是海湾，属于浅海。

雅典军的包围速度因此减缓。船身较低的雅典船被叙拉古战船上射下的箭矢、投下的长枪不断击中，而且被击中的几乎全是桨手。

被敌军追赶不断向海滩败退的雅典战船接二连三地触礁，这一天出动的船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部分弃船跳海的士兵被自己人救上岸侥幸活了下来。

站在阵前指挥的欧律墨冬也在混战中战死。

9月初发生的这场海战给雅典军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他们已经顾不上纠结月全食的征兆、撤退的延期。

除了强行突破，别无他路。不仅德摩斯梯尼，就连尼基阿斯也是这样考虑。

就这样，因占卜师的预言延期撤退的雅典海军在9月23日到来之前开始了行动。

最后的海战

9月10日，雅典军决定在“大港”内发起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海战。

他们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击退敌军，而是强行突破包围，冲出海湾。

这一天，在德摩斯梯尼的指挥下，雅典军调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战船。

据称有110艘。

叙拉古方面加上科林斯派来的援军，共有76艘船只。

或许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雅典军的突围还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

然而，叙拉古人很快发现了雅典军的动向，知道他们不是进攻而是打算逃跑。

既然如此，110艘对76艘的规模上的差距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阻止雅典军突围，就是叙拉古的胜利，海战经验的欠缺也不再是问题。

9月10日。在秋天的阳光下展开的激战以叙拉古损失26艘战船、雅典损失50艘战船告终。

双方剩余的船只数量为雅典60艘、叙拉古50艘。雅典依然占上风。

然而，用剩余的60艘船带上能带走的士兵再进行一次强行突破，尼

基阿斯没有这种勇气，德摩斯梯尼也没有。

最主要的是，从激战中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已经失去了再战的信心。

唤起士兵们的勇气，率领众人踏上唯一一条生路的领导力，两位司令官都不具备。

逃离

士兵们返回本以为再也不会回到的营地。他们有36个小时为出发做准备。

雅典军决定放弃海路，从陆路突围。

由“大港”营地从陆路北上，可以一直抵达特洛吉鲁斯。从那里前往卡塔尼亚，有一条沿海的道路。

陆上撤退的行动定在9月12日的黎明之前。

60艘战船被留在了营地。雅典海军丢弃多达60艘的三层加莱船，还是史上第一次。

被抛弃的不仅是船，还有因伤病无法行动的士兵。这也是雅典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海上强行突围失败的36小时后，即9月12日的黎明时分，雅典军离开了营地。

从距离上来说，他们要走大约5公里的路程。

然而，没有比军队撤退更困难的事情。一步走错，便是败走。队伍秩序一旦混乱，东逃西窜的士兵就成了俎上鱼肉。

于是，雅典军分成前卫和后卫两段。前卫由尼基阿斯率领，后卫由德摩斯梯尼负责。后卫遭遇敌军追击的概率大，所以让年纪较轻的德摩斯梯尼殿后。

这个时候，雅典军究竟还残余多少人，没有详细的记录，但至少有2万人。

他们开始行军时发现不可能向北直行。像海上一样，叙拉古调集了所有的骑兵和步兵，在陆地上等着他们。

撤退的军队只能改往西北方向走。向北走必须翻越丘陵地带，朝西北方向走可以沿着阿纳普斯河前进，相对有利。雅典军大概是打算先往西北方向走，再迂回向北，前往卡塔尼亚。

叙拉古军队紧追不放。雅典军与他们至少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冲突，每次战斗都令雅典军队失去一批士兵。

第一天他们行进了6公里，第二天才走了3公里。可见叙拉古的追击越来越猛。

到了第三天，雅典军准备渡过阿纳普斯河向北移动，结果遭遇埋伏在河边悬崖上的叙拉古军箭如雨下的射击。雅典军两次试图突破，两次未果。

雅典军放弃渡河，再次改变撤退路线，从西北转往南边。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得而知。参加叙拉古攻防战的雅典军全军覆没，没有一名现场见证者回到雅典。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这段撤退描述为“pathos”（悲怆），通篇充满伤感。彼时45岁的稀世的历史学家也许是根据侥幸归国的同盟国士兵的证言写下了这一段。

不管怎么说，雅典军改向南方撤退。

叙拉古一方的追击愈发凶猛，尤其集中在德摩斯梯尼率领的后卫部队身上。后卫军不得不边打边撤，与前卫拉开了8公里的距离。

对雅典军来说，这是最后的一击。他们被叙拉古骑兵团团围住。士兵们如同被赶进栅栏中的羊群一般，被躲在橄榄树后面的叙拉古弓箭手们射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德摩斯梯尼要求和骑兵队长谈话。

他提出，如果保证他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他们可以放弃抵抗投降。叙拉古人答应了他的条件。

雅典军后卫部队所有幸存的士兵成为俘虏，8公里之外尼基阿斯率领的前卫军是在次日早晨听说德摩斯梯尼投降的消息的。

也许叙拉古希望雅典前卫军也能缴械投降，特地派人放出风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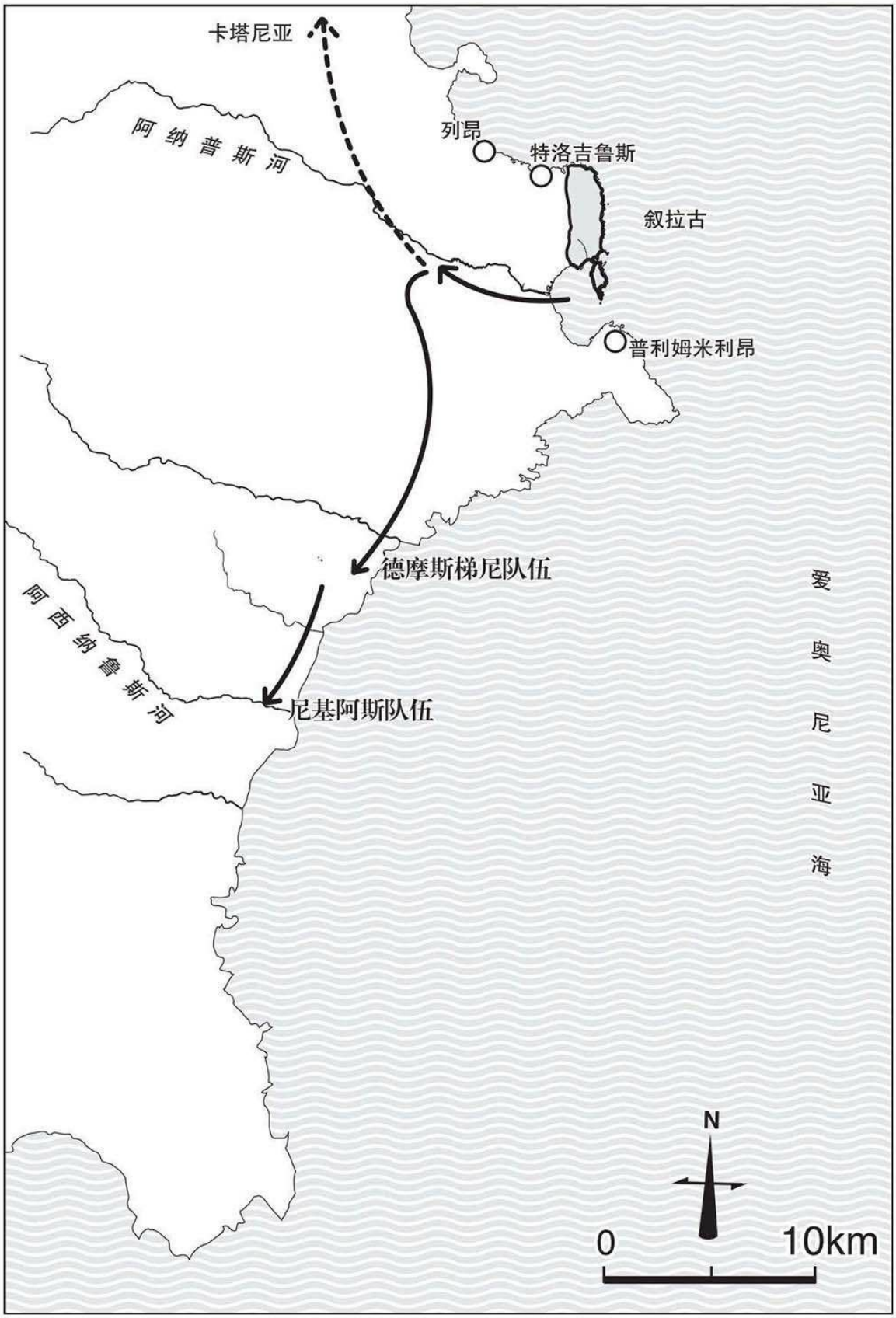
尼基阿斯和对方交涉，他提出支付2000塔兰特，赔偿叙拉古在这场战争中的所有损失，请他们放雅典军撤退。

叙拉古人拒绝了他的建议。

尼基阿斯命令军队继续南下。

行军4公里后，不远处就是注入大海的阿西纳鲁斯河。雅典军快到河岸边时被叙拉古军包围。

又饿又渴、精疲力竭的雅典士兵在叙拉古军的乱箭之下，彻底狂乱了。


卡塔尼亚
阿纳普斯河
列昂
特洛吉鲁斯
叙拉古
普利姆米利昂
德摩斯梯尼队伍
阿西纳鲁斯河
尼基阿斯队伍
爱奥尼亚海
N
0
10km

雅典军的退路

他们扔掉长枪、盾牌，争先恐后地跳进河中。面对这群发疯般喝着河水的雅典士兵，站在岸边的叙拉古士兵的行为只能用杀戮来表述。

结束这场惨剧的是率领叙拉古骑兵队赶来的吉利普斯，他下令停止杀戮。

尼基阿斯向吉利普斯提出无条件投降。吉利普斯接受了投降。

这一天是雅典军陆上撤退行军的第八天。

终焉

被俘虏的雅典军士兵总数据称在7000人左右。

包括同盟国士兵在内超过5万人的远征军，活下来的只有7000人。

在叙拉古妇女、儿童的咒骂声中，所有俘虏被拖到街上。

叙拉古的要人们完全没想过要遵守他们答应德摩斯梯尼的条件，即保证士兵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被判死刑，并且随即执行。

吉利普斯提出希望把两位将军带回斯巴达，遭到叙拉古人的拒绝。没有这位恩人叙拉古说不定早就败北了，但他们仍然拒绝了吉利普斯的要求。

如果雅典的这两位将军被带去斯巴达，他们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应该很高。

首先，斯巴达人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感情。

其次，皮洛斯战役时被雅典俘虏的15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在雅典受到了堪比《日内瓦条约》规定的礼遇。

雅典和斯巴达都懂得俘虏的利用价值。

但叙拉古人，在讨论人性之前，首先是不懂得俘虏的利用价值。

尼基阿斯57岁，德摩斯梯尼43岁，两人在叙拉古终结了他们的人生。

不过，被立即处死的这两位或许还算幸运。

剩下的7000名俘虏将要面对的，是被拉到叙拉古郊外的采石场强制劳动。

所谓采石，不是说站在野外挖石头，而要到地下采掘。俘虏们从地下挖出石头，再运往地上。白天地面上有叙拉古士兵把守，晚上通往地面的出口被铁栅栏锁住，地下就变成了监狱。

不管患病还是撤退时负伤的伤势恶化，俘虏们一概不准走出地下采石场。

众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恶劣的环境使原本健康的人也染上疾病。即使有人死去，尸体也不会被及时抬走。

坑道里只有岩石的缝隙能漏进一点空气。俘虏们在汗水和尸臭中，日复一日地劳动。

进入12月后的某一天，全体俘虏被带到地面上，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苦工结束了。

战俘们被分成两批，一批是雅典士兵，另一批是同盟国士兵。

后者被当作奴隶变卖。

前者被赶回地下，在坑道内继续牢狱生活，靠着每天两次从地面扔下来的少量水和面包维持生命。

究竟有多少雅典公民成为战俘，无人知晓。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7000人中有一半是雅典公民。

这就是说，3000人以上的雅典人没有骑兵、重装步兵或桨手的等级

差别，一同忍受着暗无天日的残酷劳动的折磨，在地下坑道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据说没有一个雅典人活着回国。

2400年前成为雅典人坟场的这座采石场如今还在，叫作拉托米亚（Latomie）。由于长年累月的开采，现在入口设在地下。走进坑道内，一股凉意扑面而来。

可当我看见墙壁上刮凿的印迹时，身上的凉意立刻变成了寒意。

我完全无法证明石壁上刮凿的残迹与当年的雅典俘虏们有关。

但是，那些雅典人痛苦的呻吟声仿佛穿过2400年的岁月，在我耳边回荡。

这就是从坏的开始、坏的推进到最坏的结果，在公元前415年至公元前413年发生的，雅典西西里远征的结局。

后期

（公元前412年至公元前404年的9年间）

闻悉惨剧

没有什么比坏消息传得更快。

雅典国内民众得知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是在公元前413年入冬之际。以当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可以说军队被全歼之后消息立刻就传至雅典。

不到两年半，雅典人以浩大声势送出的队伍，竟然全军覆没。惊闻噩耗的雅典人的心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很久都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仅雅典一国就投入了三层加莱船150艘、士兵3万名、将军4人，这几乎是雅典全部的军力，最后竟迎来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雅典所有的家庭都有亲人牺牲，相较于哀伤、愤怒，大多数人处于难以置信的状态中。然而，雅典没有彷徨的时间。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势必引发新一波的浪潮。雅典人不得不暂时忘记丧亲之痛，站起身抵御即将席卷而来的大浪。

可以预料的第一波大浪，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向衰弱的雅典发起更激烈的攻击。所以，必须加强防御。

赢得叙拉古攻防战胜利的是斯巴达以军事顾问的形式派往当地的吉利普斯，城邦国家斯巴达没有参与。

但攻防战结束后，实际结果就是斯巴达变得更强，雅典变得衰弱。

更何况从两年前开始，斯巴达国王阿基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就在雅典城北不足30公里的狄凯里亚建立了军事基地，全年不间断地侵犯阿提卡地区。

此外，得知叙拉古战役结果后不久，没有海军传统的斯巴达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开始打造三层加莱船，正逐渐对雅典海军形成威胁。

同样是三层加莱船，斯巴达与雅典的战船在战斗力上存在明显差距。可是，雅典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斯巴达陆军、海军从北、南两个方向夹攻，雅典城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

随之而来的另一波大浪，是提洛同盟加盟国脱离同盟。

提洛同盟与纯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除军事合作以外，它还是一个共享经济、文化成果的同盟。军事安全保障有赖于经济实力。当年伯里克利的话，犹在雅典人耳边。对于粮食依赖进口的雅典而言，它还是一个保障粮食安全的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就算瓦解，对闭关锁国的斯巴达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提洛同盟的解散则攸关雅典生死。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同样令雅典的同盟国蒙受重大损失。虽然三层加莱船主要来自雅典，但同盟国参战士兵的死亡数量几乎与雅典持平。

当然，至死留在采石场、被强制劳动的只有雅典战俘，同盟国的俘虏在采石场待了两个月后被变卖为奴，其中有些人付了赎金得以返回故乡。

但所谓同盟，是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加入。叙拉古之战的惨状令提洛同盟的加盟国不禁怀疑，今后是否还要跟随雅典。

提洛同盟主要加盟国之一的希俄斯岛，向斯巴达派去使节的消息也

传到了雅典。

复兴

城邦国家雅典的复兴其实就是雅典海军的复兴，对于这一点，雅典民众达成了共识。

几乎可以确定，在那个时间节点，比雷埃夫斯港应该还停泊着50艘三层加莱船。

自地米斯托克利创建雅典海军以来，雅典海军始终保持着常备200艘三层加莱船的规模。

雅典军在地米斯托克利的率领下打赢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爱琴海的制海权一直掌握在雅典手中。在西西里远征中，雅典两次总共派出150艘战船，但它在爱琴海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被掏空。

如果雅典要复兴海军，除了现有的50艘战船，还需要再新建150艘三层加莱船。每艘船需要170名桨手，加上其他水手和负责打仗的战士，一艘战船须配备200人，出动150艘战船所需人力是3万人。

雅典在西西里失去了同样数量的同胞，如今它还有能力复兴海军吗？

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而且，要尽早完成任务。

首先要提振士气。眼下最简单的办法是以追究战败责任为名要求现任政府下台，随后建立新政府取而代之。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民众的手里。

西西里远征前，雅典政界被尼基阿斯率领的稳健派和阿基比亚德率领的激进派一分为二，处于两大政党对立的状态。

两派领袖同时出征之后，雅典政府受到两位民众煽动家的影响。

雅典民众对这个政府投了不信任票，重新选出10人组成内阁。

学者们称这个内阁为实干内阁，可是在哪个领域都没出现实干家。

实际上，公民大会选出10位政治色彩淡薄的人物，他们既不属于稳健派也不是激进派，更不是煽动家，他们组成了类似危机管理机构的内阁。

这个内阁叫“贤人内阁”可能比较合适，其中包括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就因为比好朋友伯里克利多活了16年，这位《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的作者尽管已83岁高龄还是被推上了第一线。

不过，这个“老贤人内阁”不需要主导政局，其主要任务是稳定人心。在国家财政空空如也的这个时期，雅典复兴即海军复兴，必须由民间主导才能实现。

自梭伦改革以来，城邦国家雅典根据财产的多寡将民众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中既有大地主也有矿主，还有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富裕阶层。从伯里克利时代算起，这个等级的著名人物包括伯里克利、尼基阿斯、阿基比亚德、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等。

第二等级如果参战，有能力支付马匹和马夫的费用，通常会作为骑兵参战。

雅典的执政者们，即战时作为司令官率军出征的将军，几乎都来自

第一或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可以称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这些男人担任陆地战主力重装步兵，要担起保家卫国的公民责任。

希波战争中雅典胜利的头号功臣地米斯托克利，根据财产划分的话，应该属于这个等级。因此他当选将军后一直被视为“新人”。

罗马人在公民大会演说时，习惯以“建国之父们、新加入的诸君”作为开场白。新加入者被称为“Novus homo”，其中并无歧视之意。但在希腊，哪怕是在民主的雅典，“新人”多少有点异类分子的含义。

另外，免费传授知识的苏格拉底似乎也属于这个等级。他曾经作为步兵出征。

第四等级被称为无资产者，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民众不具备让自己坐享其成的丰厚财产。罗马人将他们称作“普罗列塔利”。“无产者”（proletarier）一词正是来源于此。

在雅典，凭借射箭、投石、用长枪等技能参战的轻装步兵都属于这个等级。当然他们最重要的角色是雅典三层加莱船的划桨手。

话说回来，在民主政体的雅典，虽然人们所属等级不同，但在拥有公民权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换言之，全体公民都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和保家卫国的责任，人人平等。

响应雅典的复兴要靠海军复兴的号召，率先表态的就是第四等级的男人们。

在牺牲者高达3万人以上的灾难发生之后，他们依然表示即使薪酬减半也会参军打仗。

由富人构成的第一等级也不甘落后。他们决定每人承担一艘战船的建造费用，包括桨手及其他水手的薪资。

他们做的不只是捐款造船。在希波战争期间，曾有捐出1塔兰特巨款的人亲自担任战船的船长，率领船上的200人投入战斗。这种特例在西西里远征大灾难之后变成了惯例。

阅读这段相关史料时，我十分愉快。这战船关乎自己的性命，想来富豪们造船时不会偷工减料。想到这个惯例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人心，还是挺有趣的。

言归正传。在全民齐心协力的努力下，150艘新船终于打造完成。加上原有的50艘，雅典海军实现了复兴。由于个人捐款造船并亲自担任船长的富人为数不少，“三层加莱船船长”成为一个专用语。

要武装三层加莱船，需要170名桨手，加上其他水手、修理工等，一艘船至少需要180人，再算上搭乘的战士，总共是200人。

战士可以由重装步兵担任，可雅典在西西里牺牲了超过3万名第四等级公民，这给雅典带来人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桨手的人数不足。

了解到这个状况后，第二、第三等级公民中不断涌现出志愿者。不管是曾经的骑兵还是重装步兵，他们舍弃马匹，扔掉长枪、重装装备，坐在了桨手的位置上。

指导这些新手划船的，是第四等级公民、被伯里克利称为“熟练技工”的经验老到的桨手们。

雅典海军再次崛起。雅典人经历了“很久都不肯相信”的失落后，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海军的重建。

这支再度崛起的军队果然不负众望。侵入雅典领海萨拉米斯湾的斯巴达海军，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雅典海军令希腊城邦再次认识到，雅典依然是海上最强的。

就这样，对于雅典而言最糟糕的公元前413年过去了，时间进入公元前412年。

从这一年开始，战场从希腊本土转移至爱琴海东部海域。

爱琴海之东

从现代回望希腊历史的我们知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持续了27年，它不仅决定了雅典的命运，也决定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命运。

在其最后的8年，为什么雅典与斯巴达对决的战场转移至爱琴海东部，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

雅典与斯巴达都位于爱琴海西部的希腊本土。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分之二的时间即18年间，除了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两年之外，战场始终在希腊本土。

为什么战场会转到爱琴海东部呢？

首先，雅典一方的确有不得不转移战场的原因。

提洛同盟的主要加盟国，也就是提供军船参战、免缴同盟会费的城邦，以雅典为首，还有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等岛屿。与这些岛屿相邻的小亚细亚西岸一带的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那苏斯，都是爱奥尼亚地区主要的城邦。

它们的北面是达达尼尔海峡。对于从黑海周边地区进口粮食的雅典而言十分重要的地区，都集中在爱琴海东部一带。

雅典常年坚守爱奥尼亚地区，是为了防止那些如珍珠项链般串联在一起的提洛同盟加盟城邦脱离组织。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促使雅典进一步将战场东移。

雅典的理由清楚了。那么，与爱琴海东部没有利害关系的斯巴达又是为了什么呢？

任谁都会有这个疑问。

斯巴达没有雅典街头常见的外国居民。它是一个闭关锁国、常年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以坚守吕库古法为国本的城邦国家。因此，斯巴达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派遣珍贵的重装步兵去扩张领土，是斯巴达人做梦都没想过的事情。

不过，斯巴达人也有平常人的感情。看见对手雅典渐渐没落，不能说他们一点儿都不开心。他们的这个心理被波斯人抓住了。

对波斯人来说，爱琴海东部一带可是有着相当的利害关系。

时间回溯至80年前，公元前490年，爱琴海东部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而且波斯正野心勃勃地欲向希腊本土扩张。

那一年发生了第一次希波战争，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遭遇雅典重装步兵团的痛击，大败而归。

10年之后，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国王御驾亲征的波斯大军先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败给雅典，随后在第二年的普拉塔亚平原，被斯巴达率领的希腊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侥幸脱身的国王逃去了美索不达米亚。

从此以后，历任波斯国王都没有摆脱碰触希腊会引火烧身的阴影。67年后的公元前412年，当时在位的波斯国王是输掉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国王的孙子。历经三代，雅典阴影仍未消失。但这位国王有强烈的愿望，希望夺回第一次希波战争前属于波斯领地的爱琴海东部。

要夺回失地，必须削弱目前控制着这个地区的雅典的势力，使之放

弃管辖权。如今，雅典因西西里远征损失惨重，波斯人认为此刻正是他们完成夙愿的好时机。

不过，波斯人不想自己动手，以免再次引火烧身。

因此，他们找上了斯巴达。波斯人表示会提供资金援助，希望斯巴达军队进入爱琴海东部。

当然，双方也不是一拍即合，能达成合作是因为有一个男人介入。但总体来说，斯巴达进入爱琴海东部，是遵照了金主的意愿。

就这样，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战斗，集中于远离双方国土的爱琴海东部。

公元前412年的夏天，雅典和斯巴达军事、外交对决的“战场”附近，出现了阿基比亚德的身影。

爱琴海岛屿以及爱奥尼亚地区

再说阿基比亚德

在3年前的公元前415年的夏天，阿基比亚德作为三位司令官之一，率领西西里远征军离开了雅典。

出征不到半年，本国发来召回令，他将作为赫尔墨斯神像斩首案的主犯被审判。在雅典，亵渎神灵罪的人几乎不用审就可以直接被判死刑。这位35岁的年轻将军似乎没有国法不得不从的想法，他在坐船回国的途中逃跑，向斯巴达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申请得到了斯巴达的批准。不过，阿基比亚德可不是一位能与世无争地静静度过流亡生涯的人物。

他不仅笼络了实际掌控斯巴达政权的5位监察官，还与国王阿基斯保持密切的关系，成为斯巴达的政治、军事顾问。

他向斯巴达建议在阿提卡北部的狄凯里亚建立基地，这样每年夏季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的斯巴达军队无须秋天原路返回。国王及其随从可以每年归国，其他官兵常驻狄凯里亚。经他这么一指点，斯巴达人恍然大悟。这种军事活动持续了16年，从来没人想到这个主意。斯巴达人思维的僵化，不用修昔底德提醒，我们也能明白。

据古代历史学家称，就在国王阿基斯从夏至秋远离斯巴达的这段时间，阿基比亚德诱惑了王后。

对此，我要为阿基比亚德做一些辩护。

为生下身体强健的男孩，斯巴达的女人被要求具备结实魁梧的体格，这个习俗已经持续了百年以上。在斯巴达男人的心目中，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机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视女人裸体为至美的雅典人截然相

反。

因此，斯巴达的女性不习惯被男人当作女人对待。换言之，她们对男人的关注没有免疫力。

在这种环境下，斯巴达出现了一位极具雅典风范的男人——阿基比亚德。

35岁、褪去青涩未至熟年的雅典第一美男子。被这样的男人注视，对爱情没有免疫力的王后会产生怎样的感觉呢？

阿基比亚德根本不需要花心思去诱惑。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也有现代学者不满地认为，他何必和王后纠缠，有的是其他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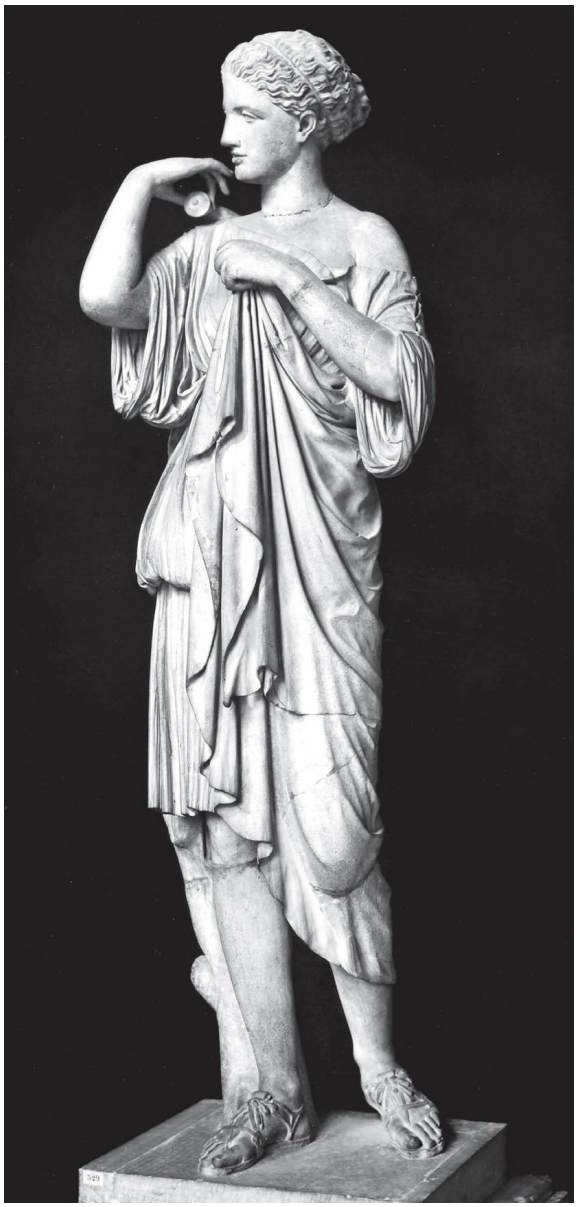
这大概是因为阿基比亚德和国王来往密切，相比斯巴达其他女性，与王后接触的机会更多吧。

不管怎么说，王后怀孕了。想来阿基比亚德应该认为拒绝女性是男人之耻辱。

王后诞下男孩，在斯巴达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此前阿基斯国王与王后多年未能生育，连国王的私生活都能介入的监察官们，对继承人早已不再抱有希望。

所以这个孩子怎么推算都有问题。王后怀孕的时间和国王留在斯巴达的时间不一致。不过，斯巴达人不懂医学知识，王后似乎也要硬撑到底。再说阿基比亚德，他闭口不谈此事，至少这一点上，他还是有绅士风度的。

初次迎来孩子诞生的阿基斯国王似乎还挺高兴的。他温和的态度使



雅典女性像（普拉克西特列斯作品）

得一时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消失得无踪无影。

斯巴达女性像

不管怎么说，王后诞下的孩子是一个健健康康、粉雕玉琢的可爱男孩。在斯巴达，把天生有缺陷的婴儿摔下悬崖是自古即有的风俗，可面对如此健全的孩子，负责审核的5位监察官只能举手放行。

国王亲自给婴儿取了一个很有历史渊源的斯巴达名字——雷奥特齐斯。可是王后在身边只有侍女时会轻声地叫孩子阿基比亚德。

史学家认为，阿基比亚德是因为与王后有私情而无法在斯巴达待下去，所以逃去波斯。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并不正确。

阿基比亚德的确是在离开斯巴达后前往小亚细亚西岸。但他搭乘的是斯巴达的船，而且在目的地萨迪斯迎接他的是波斯的地方长官。

我个人认为，阿基比亚德前往正在变成新战场的爱琴海东岸，应该是他和斯巴达国王以及监察官们商议的结果，身份有点像派往波斯的外交使节。

阿基比亚德在萨迪斯也没有消停，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这一次他成了代理波斯国王管理当地的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Tissaphernes）的政治、军事顾问。

顺便说一句，迄今为止唯一得到确认的阿基比亚德的肖像画，就是从斯巴达发掘出的马赛克画。

38岁的阿基比亚德结束在斯巴达的流亡生活，生平第一次踏足爱琴海东部地区。但他具备迅速掌握状况的能力，并且还有将所见与所闻相联系，从而预测未来的能力。

成为他新雇主的波斯，为什么会同意他去萨摩斯岛，我们不得而知。出身高贵的提萨弗涅斯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作为东方人，他的缺点是往往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精明世故。或许对阿基比亚德而言，他是个容易应付的对手。

自萨拉米斯海战胜利后，萨摩斯岛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已经有68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雅典能够一直掌控着爱琴海的制海权，就是因为有大本营设在爱琴海西部比雷埃夫斯的本国海军，和常驻爱琴海东部萨摩斯岛的海军这两支武装，从西向东把守着爱琴海。

萨摩斯岛的北面是希俄斯岛。希俄斯岛以北是莱斯沃斯岛。后两个岛屿城邦都拥有独立的海军力量，也是提洛同盟的主要加盟国。西西里

远征的失败让这两个岛屿产生了动摇，它们渐渐出现想脱离同盟的迹象，尤其是希俄斯岛已经开始与斯巴达方面接触。对雅典而言，萨摩斯岛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比以往更为明显。

常年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的萨摩斯岛，居住着很多雅典人。阿基比亚德决定将这里作为重新崛起的根据地。

政局不稳

另一方面，雅典国内的局势不断发生变化。

雅典人从最初闻悉西西里远征军全灭时“无法相信”的情绪中缓和过来，齐心协力再建雅典海军，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绝望和不安情绪的考验后，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较为平稳的时期。

然而，抬出83岁高龄的索福克勒斯等人组成“老贤人内阁”，不是长久之计。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府，但在商讨哪一种政体适合雅典的问题上，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不信任喷薄而出。

仅从文学界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等，反民主主义者意外地多。自伯里克利死后开始的众愚政治，令雅典上流社会的文化人深恶痛绝。

普通市民同样心存疑惑。若说是雅典的民主政体导致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的惨败，大家大概无法反驳。发起远征以及继续远征战，都是民主投票做出的决定。结果，雅典一半的男人永别家园，死于异国他乡。

就这样，雅典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四百人会议”以及随后的“五千人会议”的政体。雅典从6万选民构成的民主政体转向了寡头政体。

从此，包括无资产者在内的20岁以上公民具有参政权的政体被废除，参政权仅属于30岁以上拥有资产的公民。

这种改变代表了雅典人希望结束战争的愿望，想法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意。

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e，又译《公民大会妇女》）上演，收到热烈的反响。

对长年累月的战争忍无可忍的雅典妇女们，在吕西斯特拉忒的带领下向斯巴达妇女喊话，为终止两国男人的战争，决定停止房事。持续争战是男人们犯下的错，此时唯有女人们能解决问题。与罗马相比，希腊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下。这样想来，说她们唯一有效的抗争武器是拒绝做爱，似乎有点说服力。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对决是已经持续了2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要终结这场战争，除了双方讲和没有第二条出路。

斯巴达提出的条件是雅典解散提洛同盟，也就是要求雅典放弃帝国主义路线。

然而，与纯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的成员方除开展军事合作以外，还有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

换言之，如果解散提洛同盟，作为海军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雅典不可能再存在下去。

作为陆军大国、经济小国且几乎没有对外交流的斯巴达，是无法理解雅典的这种处境的。

倡议拒绝做爱，是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的。

民众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大多是在战争长期进行且战果不佳的形势下涌现出来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时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

决定发动战争的是伯里克利，决定继续战争的是民主政府。远征西西里最初是雅典民众决定的，其间没有及时做出终战的决定，最后以悲剧收场的责任也在民主政府。面对寡头派的严厉指责，民主派毫无反驳之力。或许寡头派认为汇总大众的意见是国家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如果由被选出的人做决定，就能避免错误的发生。

无论集结“四百人”还是“五千人”，目的都是为了实行由少数人领导的政治体制。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四百人会议”是“过激的寡头制”，“五千人会议”是“稳健的寡头制”。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称“五千人会议”是雅典城邦迄今实施的最好的政体。

这一派人的目标就是废除伯里克利时代建立起的完全的民主政体。

一、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底线从20岁提升至30岁。

以前雅典规定担任国家要职的人最低年龄是30岁。因此被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与以前一样，改变的是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要求。也许寡头派认为积累了一定经验、思想成熟的人不会对国家政治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全面废止向国家公务员支付日薪。

当初伯里克利实施这个政策，是为了让那些靠每天劳作求得温饱的无资产者即劳动者，也有参与公务的机会。但要这些人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是不现实的，因此就算他们抽签获得公职，也只能辞去。虽说这是个人的决定，但他毕竟放弃了原本每个人都有的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因此，伯里克利推出了公务员在一年任期中由国家以薪水方式支付其生活费的政策，并将之制度化。

这个制度如今被全面废止。尽管国家公务员只有一年的任期，但能够胜任的只有无须劳作、生活有保障的有产者。

不过，三层加莱船的桨手也作为国家公务员领取薪水。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的报酬也被停掉。

桨手是那个时代的船马达。在叙拉古失去了所有战斗伙伴仍坚定地表示哪怕薪水减半也绝不放弃的这些人，都是来自雅典最下层的无资产者。

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取决于能否重建雅典海军。在这一点上，寡头派和民主派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失去桨手，三层加莱船不要说海战，就连动也无法动弹。既然水手们主动提出薪水减半，也许寡头政府就同意付给他们一半薪水了。

总之，面对西西里远征军的全军覆没，雅典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茫然无措期之后，于公元前411年的6月进入了“四百人会议”的时代。

唯一反对“四百人会议”的是萨摩斯岛基地的雅典驻军。在同盟国脱离提洛同盟越来越公开化的情况下，有雅典海军常驻的萨摩斯岛的地位愈发重要。自认为已经掌控了雅典国内的“四百人会议”，对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为说服当地的雅典人，政府派遣了两位高官前往萨摩斯岛。

他们在萨摩斯岛见到的是一群深受阿基比亚德影响的雅典人。

有意夺回爱琴海东部的波斯，以及逐渐与波斯结成同盟的斯巴达，都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给阿基比亚德公开发言的机会。只要他开口，一切就结束了。阿基比亚德优秀的说服力不仅表现在一对一的谈话场合，面对大众发言时，他的说服力在当时的雅典也是无人比肩。

就这样，雅典来的两位高官谈判的对手变成了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国际通缉犯阿基比亚德。

39岁的阿基比亚德在成为国际通缉犯之前，曾经被视为雅典民主派的领袖。他的代理父亲是伯里克利。让这样一位人物承认寡头政体，简直就是荒诞的喜剧。然而，阿基比亚德没有立即拒绝谈判。

他答应会尽量安抚海军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同时提出了条件。

他的条件是推举他为常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将军（司令官），但当地是否接受这个推举，最终由萨摩斯岛的雅典公民决定。两位高官答应了他的要求，也许他们脑子里只想着平息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

他们的决定使4年前被定罪、目前依然是通缉犯的阿基比亚德重新恢复了公职。因为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再无兴趣与寡头派纠缠，高高兴兴地将阿基比亚德选为将军。他成为正式隶属于雅典海军的萨摩斯岛常驻军的司令。

阿基比亚德的这种行为被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指责为背信弃义。他一面接受寡头政体，一面又是导致该政体垮台的罪魁祸首。

但是，对当时的阿基比亚德而言，首要任务是再次拿回雅典公职。尽管他暂时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达成回国的目标，但成为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实权。

相信阿基比亚德也不看好寡头政体。

雅典的民主政体哪怕从伯里克利时代算起，也已经持续了50年。更何况如今的雅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民同心协力。在如此重要的时期，一半以上的公民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带来长

治久安。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雅典人复杂的心情。在这一点上不分阶层、男女。

所有雅典人都知道，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手拥有吉利普斯这位斯巴达武将。

尽管斯巴达声称没有正式介入，但没有斯巴达政府的许可，编外人员吉利普斯不可能率军出征。另一方面，由斯巴达国王率领的正规军每年都对阿提卡地区的农田进行大肆破坏。这些都令雅典人的反斯巴达情绪有增无减。

可是寡头派从来不隐瞒他们与斯巴达的接触。不赞成寡头政体的雅典人在理智上能够理解与斯巴达接触是构建两国和平的需要，但他们心底的反斯巴达情感难以磨灭。

所以，雅典今后的政体如何选择，关键在于哪种政体更适合雅典的现实。

事实上，“四百人会议”不足四个月便倒台，随后的“五千人会议”也没能维持超过一年的时间。

公元前410年，雅典恢复了民主政体。

话说人在萨摩斯岛的阿基比亚德，来不及等待国内政权此起彼伏地交迭。他在拿到指挥权后，未等“四百人会议”崩溃便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出征了。

也就是说，阿基比亚德再次换了雇主。他先是从雅典逃往斯巴达，继而投奔波斯，这一次又回到雅典。

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介绍这位人物倒也简单。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并不单纯是更换雇主这么简单。学者们称阿基比亚德脚踏雅典和波斯两只船。

我个人认为，他这一次应该是换乘了雅典这艘船。不过，他并没有和波斯彻底断绝关系，之后也一直和波斯保持着秘密接触。

为什么会怎样呢？

这就要讲清楚阿基比亚德这个男人面对的困难。

年近40岁的阿基比亚德与波斯负责处理爱琴海东部问题的35岁的提萨弗涅斯究竟有过怎样的交流，史料并没有记载。想深入探究两人的关系只有凭借想象力。我认为雅典男人与波斯男人的对决，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最有效果。

阿基比亚德："波斯是打算夺回70年前曾经占据的爱琴海一带的领土吧？"

提萨弗涅斯："嗯，是这样。"

"雅典是你们的障碍。所以你们向斯巴达提供援助，想把雅典赶出这个地区。"

"这种观点也没错。"

"不过，借斯巴达之力赶走雅典后，对波斯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居住在当地的希腊人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波斯的统治。"

"的确如此。"

"为防止雅典再次抢占这里，你们不能事成后便抛弃斯巴达。相信

你们一定不愿意再和希腊人发生战争。”

“嗯，是这样。”

“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城邦，不管是以莱斯沃斯、希俄斯为首的诸岛，还是以弗所、米利都那样的陆地城邦，它们都以贸易为生。因此，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它们不会甘心接受波斯的统治，也许会再次寻求雅典的帮助。

“能够控制这些城邦的斯巴达是一个与商业无缘的国家。你应该知道，那里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铁币是唯一的流通货币，外国人不受欢迎，哪怕商人也不准入境。这种状态下，爱琴海东部的希腊人会因为有斯巴达的军事威胁，便心甘情愿地长期接受波斯的统治吗？”

提萨弗涅斯有些答不上来。“这个嘛，怎么说呢……”

这时，阿基比亚德话锋一转。

“波斯想要夺回爱琴海东部，让当地恢复希波战争前希腊人社会的秩序，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希腊本土的城邦——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实力不断衰落。所以，不能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要让它们始终处于相互争斗、相互消耗的状态。”

提萨弗涅斯不置可否：“嗯，嗯……”

“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波斯停止向斯巴达提供资金援助。”

苏格拉底式对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对方会在穷追不舍的佶问之下思路逐渐混乱，对自己原本持有的观点失去信心。

如果这类对话属于哲学层面的讨论，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过是令自

认为“有知”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倘若话题涉及众多人的命运，情况就比较严重。因为谈判的主导权会被阿基比亚德这样的人所掌控。

受命夺回爱琴海东部失地的波斯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与拿下萨摩斯岛雅典驻军司令官一职的阿基比亚德，在会谈中是否会出现以上情景，我不能保证。

但事实上，自阿基比亚德在这一带出没之后，为排除雅典势力而结成的斯巴达与波斯的统一战线确实开始出现破绽。

波斯人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希望斯巴达帮他们夺回至今被波斯人称作“王的领土”的爱琴海东部地区。但斯巴达拒绝将土地转让给波斯。

普拉塔亚平原战的胜利令斯巴达与打赢萨拉米斯海战的雅典共同成为希腊世界赢得第二次希波战争的两大功臣。如果斯巴达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卖给波斯，势必会引发整个希腊世界的不满。

斯巴达拒绝转让土地是双方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波斯提供的资金少于斯巴达的预期。或许这是因为波斯人对斯巴达的军事威胁效果并不满意。

斯巴达也因为形势的发展，到了不能没有海军的时期。斯巴达人第一次意识到，从拥有海军到拥有海军战斗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可以从半岛全域征集到足够的人力，但正如伯里克利指出的那样，雅典海军这个“熟练技工的集团”是自地米斯托克利以来经过70年打磨形成的。

既然熟练技工是形成海军战斗力的必要条件，斯巴达只能去挖雅典

的墙脚。波斯给雅典桨手们开出的价格，让这些雅典底层民众嗤之以鼻。

得知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之际，他们向国家表示，哪怕薪酬减半，也会继续出海作战。波斯给出的正是这半数的薪酬。如果波斯给出的薪酬在雅典的数倍以上，对本国寡头政府不满的这些人也许会答应波斯的要求。

波斯人商业天分的欠缺简直令人无语。当然，这可能是将土地视为资源的波斯人和相信人的智慧、技能才是资源的希腊人在观念上的不同。

总之，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雅典船员大批外流的现象。

就在同一个时期，阿基比亚德开始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频频出现于海上。他的目的是再次彰显雅典海军海上无敌这一事实。与此同时，阿基比亚德通过打击斯巴达海军，让波斯感到自己的援助得不偿失。没有波斯的资金，斯巴达海军不可能进入爱琴海东部一带。

海军将领阿基比亚德

一国的政府对国民有两大应尽的责任：保证安全和粮食供给。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以来，斯巴达几乎每年夏天都会派军北上侵犯阿提卡破坏耕地。雅典人之所以能挨下来，是因为通往黑海粮食产地的运输线一直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可是，西西里远征失败带来的雅典的衰弱，让伯里克利时代好不容易稳固住的粮食补给线也岌岌可危。

为坚守达达尼尔海峡，雅典在海峡最窄处的塞斯托斯港（Sēstos）常驻18艘三层加莱船。

为夺取塞斯托斯港，斯巴达海军将16艘三层加莱船编成船队北上爱琴海。

这次向斯巴达提供资金的不是提萨弗涅斯，而是与他肩负同样任务的法那巴佐斯。

现代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小亚细亚西岸，以及与之相连的属于希腊领土的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诸岛，在古代都被划为爱琴海东部一带。波斯帝国将这片地区划为北部和南部两部分，分别交给两位地方长官掌管。

希波战争时，波斯为征服希腊设立的前线基地萨迪斯，以及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富饶的内陆地区位于南部，归提萨弗涅斯管辖。北部的埃俄利斯（Aeolis）、佛里几亚（Phrygia）地区则归法那巴佐斯管辖。因此，将雅典势力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经费由法那

巴佐斯提供。

就这样，在从爱琴海通往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雅典和斯巴达于海上展开了直接对决。

第一战的结果是雅典获胜。

获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狭窄的海峡尤其考验水手们的技术，在这方面双方水准相差甚远。

第二个原因是，连海运传统都没有的斯巴达没有能统管全船的称职的船长，他们甚至找不到通晓海上气象知识的人才。

所以斯巴达海军遇上风暴时，常常不知如何躲避。叙拉古攻防战中，派去增援吉利普斯的船队在途中遭遇风暴，原本朝西航行的船被海浪推向南方，结果在北非临时停靠。

公元前411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斯巴达的16艘军船被强风吹得七零八落，不能集中发起攻击，这成了他们败北的原因之一。

雅典获胜的第三个原因是，阿基比亚德获悉斯巴达海军北上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后，率领萨摩斯岛的海军加入了战斗。

驻守塞斯托斯港和萨摩斯岛的两支雅典海军部队具体是如何联手作战的，并没有详细资料可查。但很多学者们认为，之所以将第一战的胜利归功于阿基比亚德，是因为其间雅典针对斯巴达的海战几乎全部是由这位国际通缉犯制定的战略和战术。

赢得塞斯托斯港保卫战后，雅典海军没有立即返回基地。他们趁热打铁继续作战，展开了在海峡两岸及其东北方向的马尔马拉海全域夺回雅典霸权的军事行动。

虽然他们没能如愿夺回拜占庭，但位于其对岸的卡尔西登（Chalcedon）重新归属雅典辖下。

只要能确保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行安全，从黑海到比雷埃夫斯港的这条粮食补给线便畅通无阻。

城邦国家雅典在遭遇西西里远征这场重大灾难后并没有一蹶不振，它不仅再次建立起海军队伍，而且海军战力重振雄风。可惜雅典海军的再度崛起被国内政府的弊政拖住了后腿。

爱琴海东部和爱奥尼亚地区的周边

新税制的失败

叙拉古攻防战的失败，以及之后雅典的重整旗鼓，使雅典的国库空空如也。为发掘新的收入来源，寡头政府向提洛同盟的所有加盟国实施了新税收政策。

同盟国商船需要向雅典支付相当于运载货物总价5%的税金，作为提洛同盟全体的安全保障费。

曾因西西里远征军的惨败出现动摇，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同盟内的这些盟国，见证了雅典海军复兴后的力量，因此它们在最初阶段同意缴纳5%的税金。

但不久后它们发现，只有雅典的商船被免除税金。

各同盟国的不满喷涌而出，这个政策太不公平！

的确如此。提洛同盟内原本是不需要缴纳货物税的。如今增加的5%的税金，最终会体现在商品的售价上。相比其他盟国，雅典商船运载的货物价格明显更有竞争力。

面对盟国强烈的不满，雅典政府不得不撤回新税收政策。

雅典寡头政权缺乏一贯性政策的问题暴露无遗。虽然雅典海军的实力正在逐渐恢复，这正是让同盟国接受提洛同盟是命运共同体的绝好时机，可惜被寡头政府浪费了。

与国内政府的混乱局面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人们对阿基比亚德的好评度不断上升。

他在雅典国内原本就有着很高的民众支持度。

那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终日，驾着四匹马战车率队独占前三名，令整个雅典为之疯狂的阿基比亚德，时隔7年依然没有被雅典人忘记。

他自由奔放的言行举止也颇有人气。

雅典的权贵们哪怕出身富裕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拥有1000名矿工的银矿主尼基阿斯从来没有过奢侈的表现。在民众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民主政体下，一个政治家的生活方式绝不能引起民众的反感。

可是，阿基比亚德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天生有钱，何必遮遮掩掩。

当年四匹马战车的竞赛相当于现在的F1赛事。为了加大获胜的概率，他竟然带了7辆战车去参加比赛，最终果然是他一人独占领奖台。除了他本人以外，7辆战车还需要其他骑手，这绝对是一笔莫大的开支。所有的费用都由阿基比亚德个人负担。

除了赛马之外，他在衣服、家具方面都十分讲究，不惜重金购买，并且对师长苏格拉底的苦苦忠告充耳不闻。

不料这反而令他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虚伪、正直。

“三层加莱船的船长”

阿基比亚德即将迈入40岁。

自从他与斯巴达在海上交战以来，他拥有了一批新的支持者。

这些人统称“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他们不仅自费打造战船捐献给国家，而且乘坐自己的船加入海战，所有人都来自雅典富裕阶层。

这些男人们对阿基比亚德的军事才华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甚至认为阿基比亚德将成为第二个伯里克利。

阿基比亚德由代理父亲伯里克利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来自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对“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们而言，他和他们同属一个阶层。雅典富豪们心目中的伯里克利，是民主政体的领袖，同时也是政局稳定的象征。

政治稳定是富裕阶层最为向往的事情。在这个大前提面前，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争执都属于次要问题。

“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们逐渐认识到，相较于没有明确方向性的寡头政体，一位有能力的人领导下的民主政体更有利于雅典的政治稳定。

除了这些船长，阿基比亚德的支持者中还有一些曾经和他共同担任过司令官的能干的海军军官。

以特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特拉墨涅斯（Thēramenēs）等为首的军官，与阿基比亚德属于同一个世代，均是寡头派成员。他们被寡头政府派往萨摩斯岛与阿基比亚德并肩作战以后，没有人再去介意政体上的分歧。

纵使总司令有高明的战略、战术，没有优秀的副将完美执行，依然打不赢战争。

就这样，相较于雅典国内，“国际通缉犯”阿基比亚德在海外基地的地位不断稳固。

最终令海外基地的雅典人决定拥戴阿基比亚德的是基齐库斯（Cyzicus）海战。这场公元前410年与斯巴达海军的战斗再次彰显了雅典在马尔马拉海的霸权。

连战连胜

斯巴达人的骄傲是在波斯也赫赫有名的“斯巴达战士”。由他们组成的重装步兵团强大的关键，是士兵们一手持枪一手拿盾牌组成的集攻防能力于一身的密集方阵。它的威力有点接近现代的装甲车军团，浩浩荡荡，令对手胆寒。

与敌人近距离厮杀时，每位士兵之间保持着准确的距离，枪与剑纵横交错，进退娴熟，密集的队形绝不溃散。斯巴达之所以成为希腊城邦中最强的陆军国家，正是因为斯巴达人自少年起日夜习武练就的这种战斗方式。

然而，天下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也有一个缺陷。

行动迟缓。所谓“迟缓”指的是遇到突然袭击时，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弱。

斯巴达从来就是一个缺少灵活性的国家，在海上作战也照搬陆地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没有一位斯巴达海军军官怀疑过这样做的有效性。

这个弱点被阿基比亚德抓住了。看来他在斯巴达流亡期间，不只做了让王后怀孕这一件事。

停泊在基齐库斯港的斯巴达战船，和打算夺回此地的雅典海军战船数量不相上下。为了击败对手，阿基比亚德将他麾下的船队一分为三。

第一队由他亲自指挥，第二队的指挥是特拉西布洛斯，第三队由特拉墨涅斯负责。

季节正值6月初夏。战场位于宽阔但不属于外海的马尔马拉海域。雅典海军的“熟练技工集团”正处于“强将手下无弱兵”的最佳状态。

第一船队慢慢接近港口。在港口的斯巴达海军看到雅典船队的规模，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便接二连三地驶向港外。

在阿基比亚德率领下，第一船队时而攻击时而后退，往返数次，成功地将斯巴达的战船全部引出港外。

就在这时，躲在附近岛屿隐秘处的第二船队，出现在斯巴达船队的左侧，第三船队从右侧包抄，先前充当诱饵的第一船队此刻也掉头转向，同时从三个方向围住了斯巴达船队。剩下的缺口根本无须担心，反应迟钝且控船技术有限的斯巴达海军战船没有几艘能逃回港内。

雅典军在基齐库斯的胜利导致了国内寡头政体的谢幕。风格稳健但依然属于少数人统治的“五千人会议”在这一年垮台。

话说回来，这个修昔底德口中“雅典最好的政府”执政不满一年便分崩离析，并不完全是由于一场战役的缘故。

首先，寡头派产生内讧，有一人被暗杀，这使得民心渐远。

其次，雅典国内民众重归民主政体的意愿不断增强。

国内是寡头政府，另一方的萨摩斯岛支持民主政体。打败斯巴达海军的又是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萨摩斯岛的海军是反对派。而率领海军的阿基比亚德又是众所周知的民主派。

萨摩斯岛对寡头政府表现出不满始于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8年的这3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在爱琴海东部发生过四次海战，雅典四战四胜。在雅典国内民众的心目中，位于爱琴海另一侧的萨摩斯岛已不仅仅

是一个海军基地。

回归民主政体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人类其实并不厌恶战争。人们厌恶的是长期战，尤其是己方走向失败的漫长征途。

因此，名将们会把赌注押在一场大仗上，一战决出胜负，不分海战或陆战。

马拉松会战中的米提亚德、萨拉米斯海战中的地米斯托克利、普拉塔亚平原战中的帕萨尼亚斯，以及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帝概莫能外。

这种倾向与民族性无关。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都是如此。

因为没有比败退而导致战争长期化更容易失去民心的。

阿基比亚德的四战四胜对雅典居民而言，不是单纯的战场上的胜利。它的意义在于，依然拥有希腊最多人口的城邦雅典，保住了粮食的补给线。

此外，四战四胜再次显示了雅典人海上无敌的实力，这对那些因西西里远征失败而有意脱离提洛同盟的加盟邦，起到了遏制作用。

提洛同盟是一个广域经济体。主导这个经济体的雅典用现代眼光看不过是手工业比较发达，但在古代它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造业国家，是经济大国。可以说提洛同盟得以维系，就意味着雅典城邦可以维系下去。

阿基比亚德没有一味在海上作战，他同时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不过，在与哪方进行外交谈判这个问题上，他和雅典的寡头政府还是存在分歧的。

本国寡头政府希望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目标本身非常正确，但其深信除了与斯巴达和解别无他路。

可是，斯巴达一方坚持要求提洛同盟解散，不肯妥协，结果造成和谈毫无进展。寡头政府公开接触斯巴达的行径，引起民众对寡头制的反感。

身处萨摩斯岛的阿基比亚德将目标锁定在波斯。斯巴达在爱琴海东部一带活动，如果没有波斯的资金援助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选择直接和金主交涉。

在这个时期，相信遵波斯国王之令企图夺回失地的提萨弗涅斯肯定焦头烂额。出钱组建斯巴达海军，虽然凑足了战船数量，但在海上接连败给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内只是一介臣子的提萨弗涅斯，面临被追究战败责任的危险。

于是，他想调遣波斯海军进入爱琴海，与弱势的斯巴达海军并肩作战。对陆军大国波斯而言，其海军就是其辖下弗里吉亚（Phoenicia）的那些船只。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带属于提萨弗涅斯的管辖区，调遣海军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这样，战船数量是雅典两倍的弗里吉亚船队进入了爱琴海。

阿基比亚德闻讯后，带着他仅有的13艘战船前往当地，与提萨弗涅斯进行了高层会谈。

相信这一次他不再需要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雅典海军近来屡战屡胜

已经证明了一切。再稍稍提一下萨拉米斯海战，便足够有说服力。

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70年前，那时阿基比亚德和提萨弗涅斯都未出生。当时雅典海军打得波斯海军几乎灰飞烟灭。当年的波斯海军实际上就是弗里吉亚的船队。

如果让萨拉米斯海战重演，提萨弗涅斯的脑袋肯定不保。

阿基比亚德和提萨弗涅斯会谈之后，带着13艘战船穿过停泊在海湾中的弗里吉亚船队，返回萨摩斯岛。他前脚刚离开，留在当地的密探就送来了报告，说弗里吉亚的船队已离开爱琴海，沿着原路返回。

在雅典，继“四百人会议”短短4个月就垮台后，“五千人会议”撑了8个月也轰然倒台。

寡头政体被终结，雅典回归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权将迎接阿基比亚德的归来。

“爱他、恨他，又需要他”

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407年的冬天，阿基比亚德坚定了归国的意志，在公元前407年的年中实现了返回祖国的愿望。

然而，雅典没有赦免回国罪犯的法律规定。阿基比亚德在西西里远征时，拒绝接受本国的召回令逃去了斯巴达，雅典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判他死刑。所以阿基比亚德面临归国即遭逮捕并被处以死刑的危险。

还有一点也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那就是本国的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在流亡期间建议斯巴达在狄凯里亚建立基地，这使阿提卡地区的农民这7年来几乎颗粒无收。

鉴于以上原因，阿基比亚德对他的归国计划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不能以武力向雅典施加压力，必须等对方主动接受他回归。

将近43岁的阿基比亚德应该是在流亡生涯即将进入第8年的公元前407年，做出了此刻是归国最好时机的判断。

萨摩斯岛不存在障碍。当地居民对他能回归祖国如同迎接爱子归来般高兴。不过，为避免斯巴达在他离开爱琴海东部后伺机侵略，他必须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尽管他只是萨摩斯岛的雅典公民4年前推选出的将军，但无论如何阿基比亚德都必须尽到责任。因此，他率领20艘战船，对分散在这一带的提洛同盟加盟国进行巡视，整顿防御体系。

结果这趟行程成了向各盟国征收会费的巡视。他征收到的会费高达100塔兰特。这个金额可以打造100艘三层加莱船。

战船仅靠富裕阶层捐赠，到底数量有限。同盟国缴纳的会费对于长

期争战、经济实力不断衰退的雅典而言，是一笔可喜的收入。阿基比亚德这个不可理喻的男人，为归国备好了伴手礼。

安排妥所有事情后，阿基比亚德掉转船头向西航行。时间正值公元前407年，秋天即将来临。

在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听到阿基比亚德归来传闻的民众们等待着船只抵达。阿基比亚德并没有立即下船。当聚集在港口的人看见那个伫立于船中的身影时，他们大声欢呼，宛如欢迎英雄凯旋般狂热。暌违8年，阿基比亚德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从那一天起，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是簇拥着热情的民众。

雅典紧急召开公民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做出了以下的决定。

撤除对阿基比亚德破坏赫尔墨斯神像的起诉。不追究他违抗本国召回令的罪行。不过问他在斯巴达流亡期间担任军事顾问一事。全额归还他被没收的财产。也就是说，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被正式撤销。

好事还不止这一桩。

公民大会再次以压倒性多数票推选阿基比亚德为统领陆海两军的雅典军总司令。祖国雅典对他的欢迎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

不知每天沉浸于民众欢呼声中的阿基比亚德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时隔8年再见的雅典人变得比以往暴躁。暴躁其实是愤怒的一种表现。雅典人的心此时已经伤痕累累。

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因不满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应，已经接受马其

顿国王的邀请，离开了雅典。

苏格拉底还在。但他的爱徒阿伽通加入了抛弃雅典的行列中，和恋人包萨尼亚一起去了马其顿。

柏拉图的《飨宴》中登场的人物，当时还留在雅典的除了63岁的苏格拉底，还有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的同世代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悲剧描述的是人性的高贵，而喜剧嘲讽人性丑陋的一面。日渐迷失的雅典对阿里斯托芬而言，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的主要人物，有每年雅典戏剧节祭祝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众多作品在戏剧节上演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两位。剧情主要围绕他们三人的对话展开。这里介绍戏剧的最后一部分。

首先狄俄尼索斯开口称，雅典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戏剧节今后将十分堪忧。

狄俄尼索斯："雅典还有没有能干事的人？你们两位对阿基比亚德怎么看？我认为他对城邦来说是一个麻烦的孩子。"

埃斯库罗斯："雅典人对他抱有怎样的感情？"

狄俄尼索斯："应该是爱他、恨他，又需要他吧。你们是怎么想的？"

欧里庇得斯："我憎恨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己的事情有办法、对祖国的问题束手无策的雅典人。"

狄俄尼索斯："嗯，你说的不错。埃斯库罗斯，你呢？"

埃斯库罗斯：“雅典，不该养育雄狮的孩子。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狄俄尼索斯听后，长叹一口气说：“主神宙斯啊！拯救这个城邦的希望在哪里？”

对迷失方向正急速下滑的雅典，连天神也无计可施，这应该就是这部作品想说的重点。

顺便说一下。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按照年代排序分别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

埃斯库罗斯本人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他的作品反映了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人的心情。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风格及其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代表了伯里克利时代。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伯里克利时代以后雅典人的面貌。

阿里斯托芬比他们三位要年轻许多。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把伯里克利时代当作前尘往事的雅典人。

讽刺喜剧虽然对社会弊端有尖锐的揭批，但没有构建一个新时代的能力。因为批判和创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能力。

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而言，阿里斯托芬是一位辛辣、幽默的优秀讽刺喜剧作家。对2500年后的我们而言，他是一位机智的稀有的社会记者。

翌年，公元前406年的春天，44岁的阿基比亚德从比雷埃夫斯港出

发，前往爱琴海东部。这一次他率领了百艘三层加莱船、1500名重装步兵以及150名骑兵。这浩浩荡荡的阵势，与陆海两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十分匹配。

然而，就在他返回祖国的这半年里，爱琴海东部的局势风云突变。

吕山德

波斯国王有位名叫居鲁士（Cyrus）的弟弟。这位年轻人野心勃勃，不满足于苏萨王宫里美女如云、左拥右抱的生活。国王授予这位胞弟“安纳托利亚西部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将他派往小亚细亚西部地区，远离波斯帝国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

国王的本意是赶走麻烦，居鲁士却将之视为实现野心的契机。他的地位凌驾于提萨弗涅斯等地方长官之上，手中握有用之不尽的资源。

来到辖区的居鲁士首先对屡战屡败的斯巴达海军表示了不满，但没有说停止援助。他提出今后不仅继续提供资金援助，而且会增加金额，前提是斯巴达方面要拿出打败雅典的策略。面对波斯王子给予的压力，斯巴达不得不做出回应。

斯巴达不能派遣国王率领的正规军。自吕库古法以来，斯巴达始终坚持一国和平主义，军事上以防守为重。

在爱琴海东部一带和雅典开战，并不是由于斯巴达领土遭受侵略。若国王率正规军出征就是违宪，但他们也不能违背金主的意愿。

于是，斯巴达人再次使出惯用的伎俩，即起用编外人员。派遣由一介士兵率领的非正规军不违反吕库古法。前有伯拉西达、吉利普斯，这一次是吕山德（Lysander）。极端护宪派的5位监察官，以这种编外人员的机制规避宪法，他们的煞费苦心让人忍俊不禁。

吕山德被任命为海军将军，率军前往爱琴海东部，但仅有一年的任期。斯巴达的护宪派对不断起用编外人员带来的“下克上”的风险，还是

保持着警戒心的。

从此，吕山德登上历史舞台。他之前的经历无人知晓。

吕山德不像伯拉西达那样父母均为斯巴达公民、本人曾经作为斯巴达的重装步兵经历过严苛的训练，担任过一年的监察官。这些吕山德都未经历过。换言之，吕山德不属于真正的斯巴达公民。

此外，他和父亲是斯巴达公民、母亲是希洛人、本人也受过重装步兵训练的吉利普斯，似乎也不一样。

希腊所有城邦均实行公民全民皆兵制。不具备公民权的人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同时也没有参军义务，这是希腊民族创造出的理念。雅典公民权普及至社会底层，所以尽管它经历了西西里远征那般惨重的打击，依然能够征集到士兵。而斯巴达不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农民开放公民权，它始终面临士兵人数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斯巴达人推出一个政策，将那些父母是希洛人，但本人年轻时曾随军队出征，作为辅助兵积累下战场经验的男人，提升为斯巴达公民。这些人统称“被解放的希洛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士兵数量不足的问题。

从斯巴达起用编外人员的情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编外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人员质量越来越差。

古代历史学家称吕山德是“农奴出身的士兵”，现代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不少。

有关吕山德的出生年月，目前只知道是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40年之间。如果取一个中间值以公元前445年计算，他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

抵达爱琴海东部的这位斯巴达司令官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没有去拜访提萨弗涅斯，而去萨迪斯参见了居鲁士。

波斯王子与斯巴达派来的海军将领之间，具体展开了怎样的谈话，我们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居鲁士非常喜欢这位斯巴达人，称以后联系不必通过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吕山德可以直接与他本人联系。

吕山德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的委任状。在战略、战术以及资金方面，居鲁士对他有求必应。

派往爱琴海东部的斯巴达海军决定将基地设在以弗所。

为什么会选在这里？以弗所曾经是希腊世界首屈一指的城邦，比雅典更早兴起和繁荣。如今这里因为雅典在西西里的败北，不断被来自内陆的波斯势力渗透。

此外，波斯设在小亚细亚的大本营萨迪斯和以弗所之间修有一条道路，它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修建的连接波斯首都苏萨与萨迪斯的“御道”的延长线。也就是说，波斯王子与斯巴达的编外将军可通过陆路直接联系。

吕山德没有浪费这个到手的好机会。他在以弗所建起造船厂，以高薪吸引希腊城邦的造船技师。与此同时，他直接将手伸进雅典海军内部，展开对熟练技工的策反行动。斯巴达海军的实力要超过雅典，人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斯巴达海军事实上降格为波斯的雇佣兵。

但还是有不少雅典水手冒着被判叛逃罪的风险，在高薪的诱惑下，跑去投奔了吕山德率领的斯巴达海军。

希腊民族在精神层面上不断劣化。

萨摩斯岛位于距离以弗所50公里的西南海上。相隔半年回到此地的阿基比亚德见到的就是这里的希腊人。

在距离以弗所1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以弗所的外港诺提昂（Notium）。有居鲁士的出手相助，那里停泊的斯巴达海军战船数量增加到90艘。

回到爱琴海东部的阿基比亚德，仅率领着13艘战船出海视察。

那个时候，相较于斯巴达的90艘战船，雅典海军除了国内派来的百艘战船，还有驻守萨摩斯岛的海军，在军力上处于优势。这支海军的统帅阿基比亚德决定，先加入副将特拉西布洛斯攻打弗凯亚的战役，随后再和斯巴达海军做正面交锋。

为此，他们要绕过萨摩斯岛北面的希俄斯岛海域，前往海上距离约200公里的弗凯亚，不能让仅与敌军相隔50公里的萨摩斯岛门洞大开。

于是，阿基比亚德决定带20艘船前往弗凯亚，余下的80艘留在萨摩斯岛。这80艘加上萨摩斯岛驻军的10艘战船，总共90艘，足够与斯巴达海军角力。

阿基比亚德对副官下达严格命令，在他本人返回之前，绝不能向斯巴达海军挑起事端。

安排好相关事宜之后，阿基比亚德带着载满重装步兵的20艘战船，出发前往弗凯亚。

不料，受命防守萨摩斯岛的副官安条克斯（Amtiochus）来不及等司令官归来便采取了行动。

他渴望像阿基比亚德那样赢得辉煌的胜利。阿基比亚德指挥的基齐库斯海战堪称战术使用的典范，安条克斯跃跃欲试，也想立下军功。

这位雅典人不明白，所谓战斗，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都不仅是士兵与士兵肉体的搏斗，更是司令官与司令官之间头脑的较量。

就这样，史称“诺提昂海战”的战斗在斯巴达海军基地诺提昂附近展开。

手中握有90艘战船的雅典军副官打算把斯巴达海军从港内引向海上，但吕山德没有上钩。他不仅没有上钩，反而趁雅典海军因计划落空而动摇之际，出动全体船队向雅典海军发起了攻击。

阵型大乱的雅典一方损失了15艘战船。吕山德向被俘的15艘战船的船员提出条件，让他们为斯巴达打仗，以换取一条生路。所有人都接受了他的条件。这次海战的结果是雅典海军损失15艘战船，斯巴达海军增加了15艘战船。

爱琴海东部、诺提昂及其周边

阿基比亚德闻讯火速返回萨摩斯岛，率领剩余的船队直奔诺提昂。在港口封锁的状态下，向吕山德下了战书。

吕山德没有理会他的挑战。哪怕雅典海军的前卫冲进港内，攻击了数艘斯巴达战船，吕山德依然不准船队出港迎战。

若与阿基比亚德直接交锋，后果不堪设想，吕山德绝不肯冒险。阿基比亚德挑战未果，只能返回萨摩斯岛。

消息传到雅典国内，沉默了一年的反阿基比亚德派，终于抓到机会再次发声。这一派原本就是煽动家占多数，而雅典也重新回到煽动家耀武扬威的社会状态。

这些人善于煽动民众的不安和怒火，所以被称为煽动家。在他们看来，批判、指责无所谓有没有事实根据。雅典海军虽然在诺提昂海战中遭受损失，但那只是雅典海军上百艘战船中的15艘。可惜这种冷静的意见，完全淹没在煽动家们的叫嚣声中。这些人宣称阿基比亚德去弗凯亚是为喝酒找女人，他扔下雅典海军不顾才导致败给斯巴达人。

阿基比亚德失势

受煽动者挑唆的雅典人举行公民大会，当场决定解除阿基比亚德“陆海两军雅典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此外连“将军”的职务也被一并撤销。

吕山德收获的不只是15艘雅典战船，他最大的战果是把阿基比亚德踢出了战场。

对阿基比亚德而言，这是雅典第三次让他心想而不能事成。

第一次是四国同盟结成后不久的公元前419年。

第二次是西西里远征开始的公元前415年。

这一次是公元前406年。

此时，阿基比亚德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立即回国，在公民大会上说明诺提昂败北的实际原因，洗刷自己的罪名。说服民众的自信他还是有的。

不过，这样做意味着与反对派正面交锋。虽然出征是副官的自作主张，但作为最高司令官就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民众同意反对派提出的这种观点，阿基比亚德就可能被起诉，面临被制裁的危险。

第二条路是接受革职的命令，找个地方暂时隐居，待风头过后东山再起。阿基比亚德选择了第二条路，或许他相信雅典人早晚有一天会需要他。他才40多岁，有时间等待。

阿基比亚德乘坐其自费打造的曾经作为最高司令官旗舰的三层加莱船，离开了萨摩斯岛。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马尔马拉海西岸的一个城镇，那里有他的土地和房子。

退出爱琴海东部战场的不单是阿基比亚德。吕山德也因为一年任期届满被召回斯巴达国内。

如果吕山德就此留在斯巴达，那将是雅典人的幸运。然而，吕山德再次被斯巴达人派往战场。

得知吕山德被召回，居鲁士表示了强烈抗议，斯巴达不能置若罔闻。不过，作为斯巴达保守派代表的5位监察官并没有让吕山德继续担任原职。他们任命卡里库拉迪塔斯（Kallikratidas）为海军司令，吕山德以副官的身份与其同赴前线。卡里库拉迪塔斯是一名勇敢的陆军将领，但不熟悉海战，实际指挥权明显还是掌握在吕山德手里。

在雅典，阿基比亚德被革职之后，关于“陆海两军雅典军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导致集权化的反对声依然不绝于耳。为防止一人独大，雅典决定采用10人集体指挥体系，选出的10位将军被授予同等的指挥权。相较于吕山德一人指挥的斯巴达海军，雅典海军的指挥权越来越分散。

司令官们的死刑

公元前406年，雅典民主政府从这一年当选的10位将军中挑出8人，将他们派往爱琴海东部。

部队增加的不仅是司令官的人数，110艘战船也在短时间内被打造出来。雅典人通过征收特别税、剥下神殿内神像身上的金箔、熔化祭祀用的银制餐具等方式扩大财源，并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军，终于获得了110艘三层加莱船的战斗力。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战船的桨手。在这一点上，从雅典挖去大量熟练技工的斯巴达海军处于有利位置。

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的110艘战船，再加上萨摩斯岛的战船，雅典军总共150艘战船。这支雅典海军船队将和获得波斯资金援助、战船数量增加至百艘以上的斯巴达海军，在海上对决。

战场位于莱斯沃斯岛与小亚细亚西岸之间的阿吉纽西岛（Arginousai）的近海附近。

如今拥有大量熟练水手的斯巴达海军甚至效仿雅典最擅长的战术，不再直接撞击，转而采用大幅度迂回包抄的战术。不过，使用这种战术除了技术熟练的划桨手，还需要能发出正确指令的舰长级军官。非海运国的斯巴达缺乏相关人才，即便是吕山德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准。话说回来，这一年雅典也没有出色的海军将领。

结果，一场海上会战变成了混战。站在旗舰的船首高声发号施令的卡里库拉迪塔斯掉进海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总司令的死令斯巴达海

军陷入混乱，他们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失去了69艘战船，侥幸脱身的船队逃去已经归斯巴达管辖的希俄斯岛。

但雅典军方面并未赢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在追击退往希俄斯岛的斯巴达船队时遇上风暴，桨手们来不及应对，战船接二连三地沉没。面对漂浮在海上大声呼救的同袍，自身难保的海军们放弃营救，匆匆撤离。

得知消息后，雅典民众——尤其是那些因未获营救而沉没海底的阵亡者的家属怒火中烧。煽动家们趁机造势，人们愤怒的情绪愈发高涨。此时的雅典已经没有能及时有效地平息这种状态的政治家了。

狂怒的雅典民众对被派往战场的8位将军提出诉讼，要求判处他们全体死刑。

负责审议此案的“五百人委员会”中有64岁的苏格拉底，他的反对没有奏效，“五百人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将判决权交给公民大会，这等于变成了人民公审。

两位司令官在听到风声后逃走，剩下的6人被处以死刑。

雅典人早已没有了能一次处死6位司令官的底气和人才储备，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就这样，打赢了海战却伤害了自己的雅典，在公元前406年的冬天，收到来自斯巴达的和谈建议。这不是斯巴达人在海战败北后做出的绝望决定，而是他们厌倦了对波斯唯命是从。

令斯巴达产生转变的领头人是刚即位不久的帕萨尼亚斯。这位年轻的国王是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在普拉塔亚平原率领希腊军彻底歼灭波斯大军的帕萨尼亚斯的孙子。

70多年来，波斯始终不敢踏入爱琴海，是因为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萨拉米斯海战和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指挥的普拉塔亚平原战，将波斯人彻底赶出了希腊世界。和当年的英雄同姓的年轻的斯巴达国王，对目前斯巴达人亲近波斯的状态，想来是感到难以忍受吧。

这一次，5位监察官与国王站在了同一阵线。而越过斯巴达政府与波斯王子居鲁士关系密切的吕山德，令这些吕库古法的坚定守护者感到极其不安。

可惜希腊世界两大强国达成和解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雅典的拒绝终究未能实现。

此时的雅典公民大会已经完全被煽动家们操控。这些人声称雅典掌握着海上优势，如果议和，斯巴达必须归还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所有属于雅典辖下的地区和岛屿。这等于是彻底否定伯罗奔尼撒战争。

斯巴达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面对共同征战至今的科林斯、底比斯等盟国，斯巴达不可能权当这场战争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时间来到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26年。

雅典为选出合适的将军大为苦恼。在前一年，8位司令官被集体起诉，除了两位逃亡，其余的全部被处死，这使能率领海军的将才严重紧缺。但雅典人依然选出了10位将军，令其中6人前往爱琴海东部。

吕山德的动作比雅典人更快。

此时的吕山德已经放弃了始终将他视为编外人员的祖国斯巴达，决定为认可自己能力的波斯效力。

波斯正打算收回在75年前的希波战争中失去的爱琴海东部一带。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驱逐控制着这个地区的雅典势力。

吕山德认为削弱雅典力量最有效的方法是切断其粮食补给线。于是他率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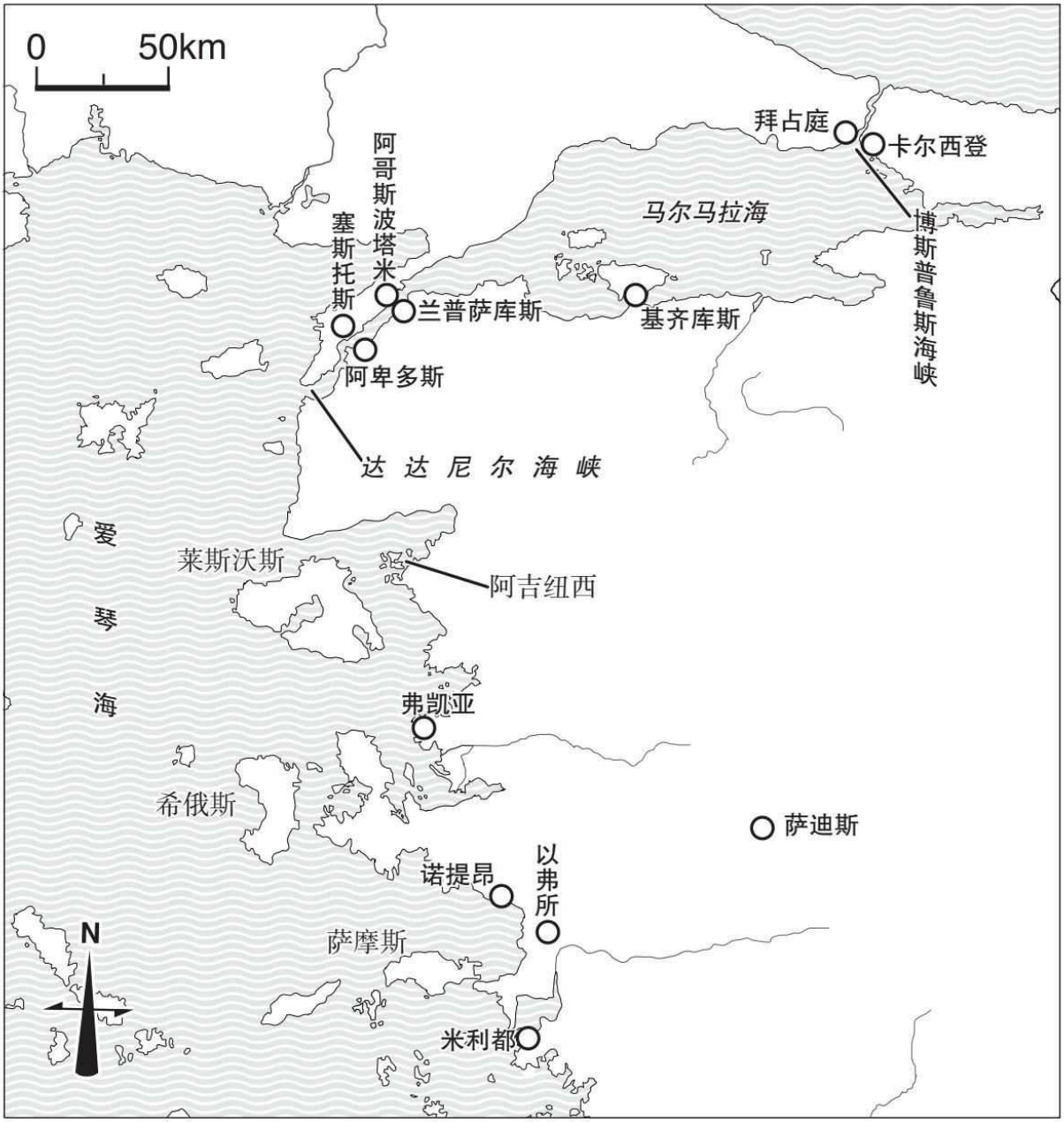
想到这个策略并不需要特别聪慧的头脑。雅典人是被对方钻了空子。他们因为起诉司令官的骚乱以及随后的处刑、选新将军等问题浪费了时间，疏忽了对重地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守。

事实上，率领斯巴达海军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吕山德，见到当地实际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也感到相当吃惊。

吕山德首先占领了两个最容易得手的海港，它们是位于海峡亚洲一侧的阿卑多斯（Abydos）和兰普萨库斯（Lampsacus）。达达尼尔海峡最宽处也仅有10公里，那里正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掌控住亚洲一侧的两个港口，便能阻断从黑海经马尔马拉海通往爱琴海的雅典粮食供给线。吕山德向拥有希腊世界最多人口的雅典发起了粮食攻击战。

这个消息足够震撼雅典人。如梦初醒的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向同盟国发出紧急呼吁，最终调集到180艘战船，由6位将军率领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180艘三层加莱船，是提洛同盟当时的总军力。船只需要配备3万名划桨手。作为提洛同盟的领袖，雅典摇摆不定的战略以及因此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使他们的海军在船只和人力两方面都出现不足。



爱琴海东方、达达尼尔海峡周边

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雅典海军将战船停靠在欧洲一侧的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他们与集结在兰普萨库斯港的吕山德麾下的斯巴达海军相隔8公里。也许6位司令官认为这个距离最适合两军对阵，所以选了此地。

在面临达达尼尔海峡的海港中，当时的阿哥斯波塔米是一个几乎没人关注的小港。它因阿哥斯波塔米河从附近流过而得名。与其称它为港口，不如叫它浅滩，总之这里非常不适合150艘以上的三层加莱船停泊。

这时，阿基比亚德突然出现在阿哥斯波塔米。被解职后居住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城镇的阿基比亚德，没有忽略吕山德及斯巴达海军的动向。他从隐居地一个人策马飞奔来到雅典海军营地，情绪激动地向司令官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阿基比亚德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基地设在阿哥斯波塔米，而且还是全军聚集在一起。

此地与敌军仅相隔8公里，而且海面过于狭窄。更何况这里远离爱琴海，无法获得友军提供的补给。士兵们不得不下船前往内陆采购军粮。

阿基比亚德建议将基地转移到塞斯托斯港。那里海域开阔，而且常年处于雅典辖下，当地居民和雅典关系友好，同时那里靠近爱琴海，便于接收补给。

虽然塞斯托斯对岸的阿卑多斯掌握在斯巴达人手里，但那里的斯巴达海军的战斗力无须担心。雅典人需要担心的是集结在兰普萨库斯港的斯巴达海军，他们是吕山德的直属部队。吕山德不像我们熟悉的斯巴达人，所以雅典海军首先要让他不能自由行动。

听完阿基比亚德热情的解说，雅典海军的司令官们只是冷冷地回答：“你已经不是将军。我们没有义务采纳你的意见。”

如果当时的司令官中有特拉西布洛斯和特拉墨涅斯，或许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两位曾经作为阿基比亚德的副将，在爱琴海东部取得屡战屡

胜的战果。只可惜他们卷入前一年的起诉案，尽管侥幸逃生，但被革除了海军军官的职务。

结果，阿基比亚德只能灰溜溜地独自踏上归程。

而吕山德发现了雅典海军的弱点。他麾下的海军中有很多是从雅典海军争取过来的水手。虽然相隔8公里，但双方水手私下联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也许吕山德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也许他一早就打算利用这些水手打探敌军的消息。

斯巴达海军严阵以待，只等机遇降临。他们的补给由波斯提供，因此有底气耐心等待。吕山德等待的时机是雅典海军忍受不了基地的不利环境着急出动的时刻。

在两军对峙中，时间来到公元前405年8月。

唯一一次海上败北

这场战役史称“阿哥斯波塔米海战”。但实际战况根本配不上海战之名。

雅典海军闻悉斯巴达海军来袭，便出海迎战。不料斯巴达人匆匆打了几个回合便扬长而去。于是，放松警惕的雅典人返回阿哥斯波塔米港，下船准备找食材做饭。就在这时，他们遭遇掉头回来的斯巴达海军的攻击。雅典海军在来不及反击的情况下被一网打尽。这就是“海战”的经过。

斯巴达海军的船只和士兵损失几乎为零。

雅典海军中幸免于难的是在某两位司令官率领下个别行动的10艘战船上的士兵和水手。这些人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逃回本国，而逃去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克里特岛。大家都很清楚，如果逃回雅典，等待他们的就是死刑。

就是这样一场没有发生真正的海上交锋的海战，让雅典把包括参战的同盟国在内的多达170艘战船、3万名士兵拱手交给了敌人。

吕山德亲手用剑削下了被俘的4位雅典将军的头颅。

斩首的处刑法，在斯巴达及其他希腊城邦已经很久没有实施了。就算在东方，像波斯那样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也不再使用这种野蛮的处刑方法。

随后，吕山德从3万名俘虏中挑出3000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是雅典公民，便惨死于刀剑之下。

剩下的27 000名俘虏在接受了严令后被释放。

吕山德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跑去其他地方，会和那3000雅典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吕山德释放俘虏，并不是因为他恢复了善良的人性，只不过是因为斩杀3000人已经足够劳神劳力，要杀死3万俘虏是不现实的。

以回国为条件释放雅典俘虏的另一个原因是，吕山德打算让雅典进一步陷入军粮不足的危机。

这一年的秋天，吕山德将主要精力放在达达尼尔海峡两岸，他准备把当地城邦一个不漏地统统收归斯巴达辖下。因而，另一边的雅典没再收到一粒来自黑海的小麦。

暗杀阿基比亚德

暗杀计划可能在当年的冬天开始酝酿，在新一年即公元前404年到来后不久便迅速执行。

公元前404年，春天尚未到来，阿基比亚德就在隐居地被杀。

有关凶手及其背后的主谋，在当时就是个谜，时至今日依然不明。

袭击阿基比亚德的一群男人，先点燃了房子，随后见阿基比亚德提着剑从火中冲出家门。他们没有接近他，只远远地围起一个包围圈，同时拉开弓箭，射死了阿基比亚德。

对于背后的主谋，在当时有三种说法。

第一，和阿基比亚德同居的女人的父亲。这位波斯权贵因不满阿基比亚德与女儿在一起，派人杀了他。

第二，雅典的反对派。是他们派出刺客执行了暗杀行动。

第三，吕山德派去一队波斯士兵杀了他。

事情的真相连现代的学者们都没有弄清。不过，如果问年仅45岁的阿基比亚德的死对谁最有利，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吕山德。

吕山德是那么极力回避直接对决，任凭阿基比亚德挑衅，绝不回应。对吕山德而言，令他恐惧的对手只有阿基比亚德一个。阿基比亚德死后，吕山德才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下一个战略：彻底瓦解提洛同盟。

被遣返的人们

公元前404年的春天，成功完成达达尼尔海峡镇压任务的吕山德，带着在阿哥斯波塔米缴获的已经换上斯巴达军旗的雅典军船，从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爱琴海。在阿基比亚德这个威胁消失后，吕山德制定的战略是镇压遍布爱琴海全域的提洛同盟的城邦。

雅典人听说了吕山德的动向，却无计可施。前一年夏天的阿哥斯波塔米海战造成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雅典虽然还剩少部分英勇的年轻人，但他们什么也做不成。

雅典已经没有海军了。一直以来，凭借海军这块根基，雅典总能从打击中再次崛起。现在海军没有了。

此刻，吕山德率领的斯巴达海军有充足的底气，他们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对提洛同盟的瓦解行动。

吕山德用的手段并无新意。

提洛同盟不但是军事同盟，也是一个经济同盟。加盟的诸国有点像现在大公司的分公司、分店，有很多雅典人居住在这些城邦中。

提洛同盟自创建已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从祖父辈起便生活在盟邦地区的雅典人为数不少。

吕山德要求这些人放下一切全体返回雅典。阿哥斯波塔米海战后3000名同胞惨遭杀害的消息传遍提洛同盟的各个盟邦，所有人都很清楚违令者会被处死。

他们只被准许准备数日，大多数人除了一些随身用品，几乎是两手

空空地登上了返回祖国的海船。

雅典富裕阶层的海外资产就这样被一扫而光。

因停止进口黑海地区的小麦而陷入恐慌的雅典本国人，在比雷埃夫斯港等来的不是满载小麦的船只，而是满载被遣返同胞的一艘艘船只。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船入港。它们包括：爱琴海北面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以及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城镇，连接爱琴海东部的利姆诺斯、莱斯沃斯以及位于希俄斯岛的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那苏斯这些希腊文明的诞生地。除此之外，还有爱琴海中部岛屿纳克索斯、米洛斯、埃伊纳，爱琴海全域的海外居民都遭到遣返，提洛同盟的盟邦无一漏网。

唯一没有向吕山德屈服的，是长年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的萨摩斯岛。

然而，区区数十艘战船的抵抗力太微不足道，吕山德甚至连动武的心思都没有。在他眼中，萨摩斯岛是一个不值得耗费时间和劳力的地方。

仅仅因为一次海上惨败，提洛同盟就在创立75年后灭亡了。

像要追赶满载被遣返者的船只似的，吕山德率领150艘三层加莱船逼近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

另一方面，由阿基斯和帕萨尼亚斯两位斯巴达国王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从首都雅典北部的阿提卡地区正朝着雅典的方向南下。

雅典城邦自建国以来，首次受到来自陆海两方的攻击。

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的第一步，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代经

济得到发展。随后在克里斯提尼领导下全面改为民主政体，在地米斯托克利率领下击败波斯，之后经由伯里克利之手实现了民主政体的完善。在此期间雅典经历过多次战争，失去大量的男子，但它始终保持着希腊世界最大城邦的傲人地位。现在这里又增加了大批被遣返者。然而在提洛同盟消亡的情况下，小麦的进口渠道被完全切断。

断粮的攻击手段对雅典最为见效。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雅典人上下认识一致。他们除了与斯巴达谈判无路可走，这一次没有人反对。

这种时候，煽动家们无用武之地。斯巴达人不喜欢这些激进的民主分子，如果派他们去谈判，势必会被赶回来。

于是，和斯巴达谈判的任务落到了寡头派的特拉墨涅斯身上。与寡头政体的斯巴达交涉，还得是寡头派人士。

特拉墨涅斯当初被“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成为阿基比亚德的副将，他在那一带曾经和斯巴达有过海上交战的经历。因此，特拉墨涅斯虽然感情上倾向于寡头派，但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寡头主义者。这位更接近现实主义者的雅典武将逃过了死刑判决，却无法从国家存亡的危机中抽身离去。

在另一方的斯巴达，情况也有变化。吕山德对雅典俘虏残暴的杀戮，引起斯巴达当权者们的厌恶，他们把他排除在谈判席之外。

代替吕山德出面与雅典交涉的，是两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另一位国王阿基斯卧病在床。

送走谈判代表特拉墨涅斯之后，雅典人一边面临粮食日益短缺的困境，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判决，在夏季的3个月中苦苦煎熬。向来对祖国的危机也能打趣调侃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这段时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如果连他也无心提笔，相信整个雅

典都失去了笑声。

特拉墨涅斯从斯巴达归来是在3个月之后。

对于终结长达27年的战争，不仅雅典，连斯巴达也表示赞同。谈判之所以耗时3个月，不是因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地位仅次于斯巴达的科林斯和底比斯反对终战，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谈和的价码。

科林斯人和底比斯人的态度极其强硬。

他们主张将雅典城夷为平地，杀尽所有打仗适龄男子，妇女和孩子全体变卖为奴。他们认为挑起战争的雅典理应受到这样的处置。

但斯巴达没有同意。尤其是帕萨尼亚斯国王，他面对不肯妥协、坚持严惩雅典的科林斯和底比斯代表，以严厉的口吻说："你们难道忘记了吗？你们的国家至今作为自由城邦存在，你们能够作为自由公民在这里发言，这一切都拜80年前雅典率领希腊人赶走波斯人所赐。"

雅典逃过一劫。斯巴达年轻国王的态度，可谓英雄惜英雄，欧洲人称之为"骑士精神"。他挽救了雅典，也保全了帕特农神殿。

话说回来，特拉墨涅斯3个月后带回来的谈和条件，仍然相当苛刻。

无条件投降

一、城邦国家雅典从此成为斯巴达的同盟国。也就是说，无论是本国防卫战还是前往他国作战，没有斯巴达的允许，雅典不得擅自行动。

二、放弃提洛同盟时代控制的所有城邦、岛屿，这些地方从今往后就是和雅典毫无关联的城邦。

三、允许保留12艘三层加莱船。雅典拥有的战船不得超过这个数量。

常备200艘战船的雅典，今后只能拥有区区12艘。雅典海军被彻底消灭。

四、撤除所有建立在比雷埃夫斯外港的防御设施。当地的两间造船厂的规模要收缩至最小程度。

五、连接首都与外港长达7.5公里的“长墙”数段被毁，被破坏的部分总长2公里。

长墙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当中被切断就形同虚设。

第二次希波战争刚结束，地米斯托克利即下令建起这道“长墙”，伯里克利时代又进行了完善改建的工程。它的作用在75年后被终结。

地米斯托克利构思并在他执政期间完成的雅典—比雷埃夫斯外港的一体化，长久以来始终是雅典繁荣的源头。如今化为泡影。

凭借这个一体化，雅典曾成为爱琴海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的一大通商中心。这已成为昔日往事。

雅典人的性命被保全了。他们没有被杀，也没有被当成奴隶。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帕特农神殿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但是，城邦国家雅典不仅无法维持海军大国的地位，甚至被迫失去经济大国的地位。

无条件投降的雅典，还有另一个必须接受的条件。

六、接受流亡在外的反民主派人士归国。

斯巴达没有强制雅典放弃民主政体，建立寡头制政府。

斯巴达人将营地设在俯瞰市区的卫城山上。雅典市民在斯巴达士兵的监视之下，“接受”了这些反民主派人士的回归。

虽然新政权只是一个处理战败问题的政府，但雅典已经在事实上从民主政体转向寡头政体。

以上这一切在公元前404年春天至秋天的短短数月内，成为现实。

它们发生在雅典击退来犯的波斯大军，为日后的繁荣昌盛铺平道路的75年后。

它们发生在保持雅典的繁荣并成功将之发扬光大的伯里克利去世仅仅25年后。

作为希腊代表的城邦国家雅典，在公元前404年侥幸地躲过了灭亡，但躲不过衰败。

雅典兴盛的四大要素有：

一、民主政体。

二、雅典海军。

三、雅典—比雷埃夫斯港一体化。

四、提洛同盟。

雅典在短短的25年内丧失了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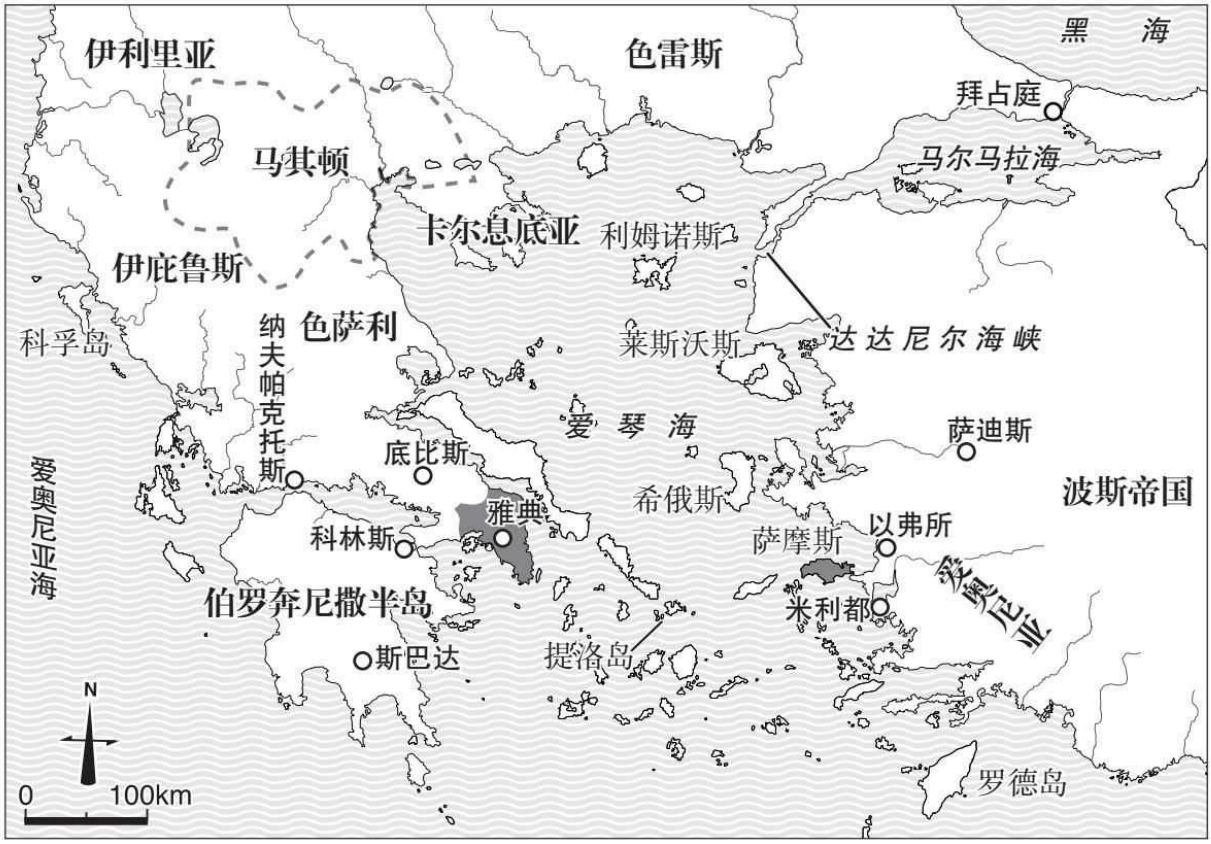
它再也不是霸权国家。

苏格拉底的教导正确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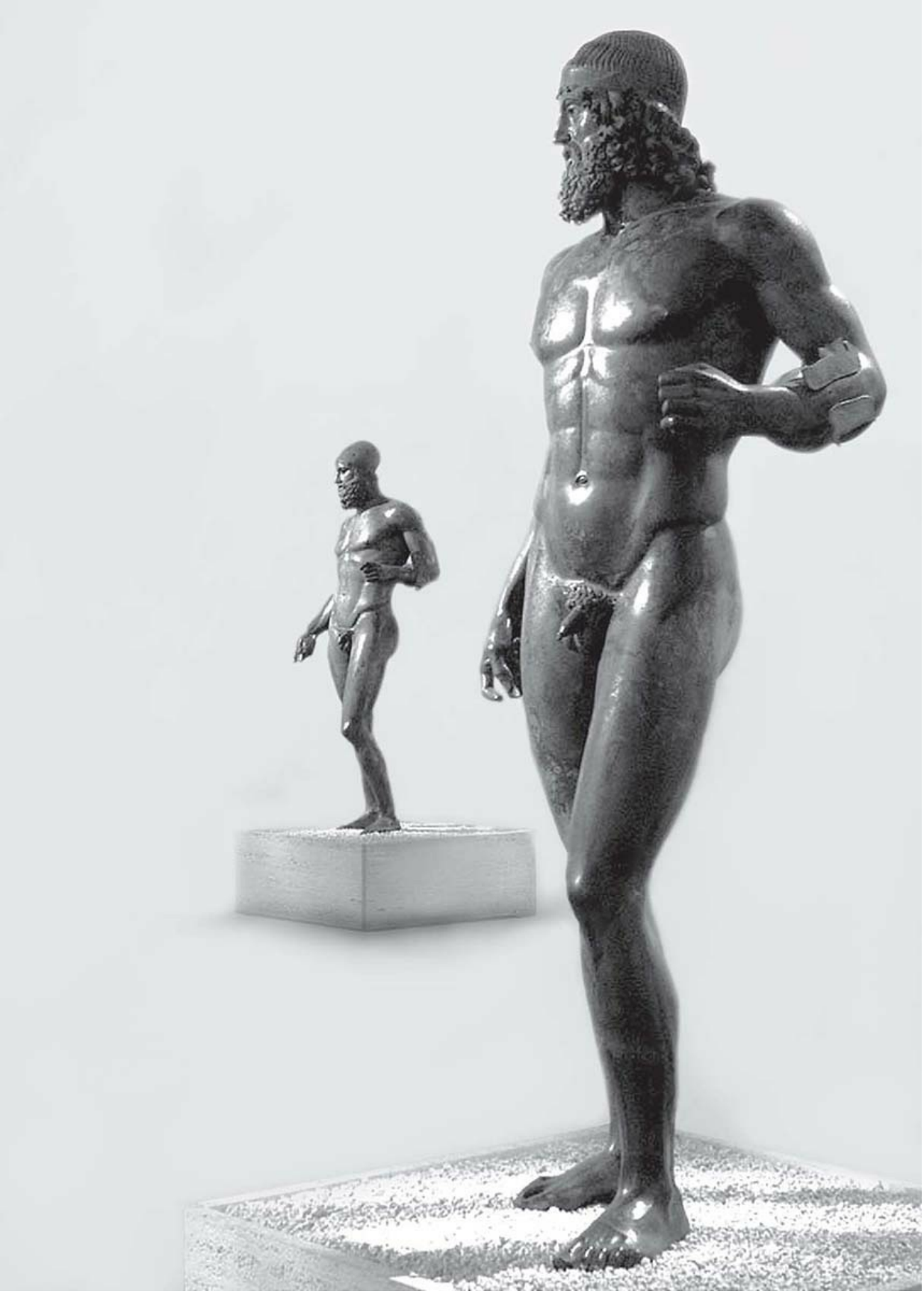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

雅典人败给了他们自己。换言之，是自我毁灭。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的势力范围（公元前431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残存的势力范围（公元前404年）



年表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546 年	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国家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	（公元前 539 年）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今中东地区归属波斯
477 年	以雅典为中心的遍布爱琴海海域的城邦国家结成提洛同盟	
464 年	夏，以斯巴达为中心的拉科尼亚地区发生严重地震，造成巨大损失。没有公民权的希洛人纷纷叛乱	阿尔塔·薛西斯继承波斯王位
463 年	被希洛人叛乱所扰的斯巴达向雅典请求援助	
462 年	稳健民主派领袖阿里斯泰德死去。为压制势力逐渐增长的激进民主派，客蒙继任稳健派领袖	
	雅典公民大会接受斯巴达的求援，决定派遣客蒙率领 4000 名重装步兵出征。后斯巴达担心社会形态遭到破坏，令客蒙即刻率军返回雅典	
461 年	雅典公民大会不满客蒙对斯巴达一味顺从，决定对其实施陶片放逐，客蒙被流放国外 10 年之后，激进民主派的伯里克利成为领袖	
453 年	提洛同盟基金储藏地从提洛岛变更至雅典	
451 年	客蒙的国外流放期满，客蒙回到雅典。与斯巴达签订 5 年期休战协定。春天，客蒙率大军远征塞浦路斯，于途中病逝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50 年	伯里克利任命客蒙姐夫卡里阿斯为特使，向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提出议和	
448 年	雅典与波斯和谈成功，签署以特使名字命名的《卡里阿斯和约》	
447 年	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雅典开始于卫城山丘建造帕特农神殿。雕塑家菲狄亚斯担任工程总监	
446 年	雅典与斯巴达签订的休战协定到期	
	这个时期，雅典在面朝科林斯湾的纳夫帕克托斯建立基地	
	优卑亚的各城邦国家和阿提卡的墨伽拉宣告拒绝缴纳提洛同盟会费。雅典禁止墨伽拉船队进入比雷埃夫斯港	
	墨伽拉为此向斯巴达求援以对抗雅典	
	斯巴达军队入侵阿提卡地区。率军的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纳克斯以入秋不宜作战为由，撤军回国。对此不满的监察官逼迫国王退位	
	伯里克利率军镇压优卑亚	
	冬，“泛希腊大会”召开。希腊各城邦国家聚集于斯巴达，商议今后和平相关事宜。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达成 30 年互不侵犯协定	
	伯里克利对提洛同盟进行改革，将它变成承认雅典霸权的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	
441 年	这个时期，提洛同盟下的萨摩斯岛与米利都围绕附近的普里埃内的归属问题产生对立。雅典应米利都的要求做出仲裁，萨摩斯岛不服裁决，态度强硬，与雅典发生纷争	
439 年	春，雅典军镇压萨摩斯岛	
438 年	帕特农神殿完工	
437 年	雅典在安菲波利斯建立基地，作为巩固周边卡尔息底亚地区的立足点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36 年	伯里克利为扩大提洛同盟领域远征黑海。和以锡诺普、特列比松为中心的希腊人城邦国家签订经济协定	
435 年	埃比达姆诺斯发生内乱，败北一方要求科孚岛支援，遭科孚岛拒绝。随后科林斯答应支援，科孚岛与科林斯因此对立，在海战中，科孚岛击败科林斯	
434 年	科林斯为击败科孚岛集结大军。科孚岛表示加入提洛同盟，请求雅典帮助。雅典决定支援科孚岛	
433 年	夏，科林斯和得到雅典援助的科孚岛发生冲突，但没有演变为大规模战争。科林斯撤退。	这个时期，波斯帝国的犹太人预言家希尼米返回耶路撒冷进行社会改革
	冬，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的胞弟发起叛乱，欲夺王位	
	佩尔狄卡斯利用雅典辖下的波提狄亚高涨的反雅典情绪，唆使其脱离雅典。波提狄亚相信有科林斯和马其顿做其后盾，背叛了雅典	
432 年	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征集雇佣兵，组成反雅典的非正规军	
	5 月，雅典派军前往波提狄亚镇压叛乱	
	秋季前后，墨伽拉脱离提洛同盟，宣告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采取断绝贸易的措施，引发斯巴达反感，主战声占据主流	
431 年	春，被科林斯煽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底比斯，入侵雅典的同盟国普拉塔亚，占领当地后遭遇反击。普拉塔亚人杀害了底比斯战俘	
	以此为导火索，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斯巴达监察官决定开战。属于稳健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前往阿提卡地区，袭击雅典周边地区 为报复斯巴达，雅典派遣海军攻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岸城市	
	夏，阿希达穆斯以军粮不足为由撤军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30 年	夏，阿希达穆斯率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入侵阿提卡地区。在雅典城中避难的阿提卡难民的聚集地暴发瘟疫，随即扩散至整个雅典	这个时期在东方，撒马利亚人脱离犹太人独立，建立撒马利亚人教团
	雅典国内因此掀起反伯里克利的浪潮	
	阿希达穆斯撤军	
	雅典公民大会以难民数量增多和瘟疫流行导致国力衰退为由，判处伯里克利滥用公款罪，免去其司令官（将军）职务	
429 年	夏，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照例袭击雅典周边地区，雅典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	
	同一时期，弗尔米奥率领雅典海军在爱奥尼亚海附近对战科林斯海军，赢得胜利	
	秋，伯里克利死去。稳健派推举尼基阿斯对抗以反伯里克利的急先锋声名大噪的煽动家克里昂	
428 年	阿希达穆斯与往年一样率军侵略阿提卡地区，随后锁定普拉塔亚为攻击目标，在当地建起包围墙后撤军	
	莱斯沃斯岛的城邦米蒂利尼竖起反雅典叛旗，接近斯巴达	
427 年	雅典海军镇压米蒂利尼。莱斯沃斯岛所有的城邦国家归雅典直辖	
	普拉塔亚被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攻陷。城市被毁，最终变成底比斯的领地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死去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25 年	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战役打响。以雅典在皮洛斯建立驻军基地为起端，斯巴达与雅典海军发生冲突，雅典获胜。斯巴达的大部分重装步兵战死或被俘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死去
	因克里昂的煽动，雅典失去与斯巴达议和的机会，两个同盟之间的战争继续	
	斯巴达征募非正规军，伯拉西达被任命为指挥官	
424 年	伯拉西达率领斯巴达非正规军向卡尔息底亚地区进军	波斯帝国大流士二世即位
	雅典为此派出攸克利斯和修昔底德率军赴当地阻击	
	伯拉西达占领卡尔息底亚的重镇安菲波利斯。攸克利斯令军队回国，自己销声匿迹	
	修昔底德从卡尔息底亚撤退，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流放 20 年。修昔底德从此以著书为生	
423 年	春，不愿看到伯拉西达表现过分突出的斯巴达，向雅典提出议和，双方决定休战一年	
	伯拉西达以停战协议无效为由，继续瓦解卡尔息底亚地区的提洛同盟	
	雅典以对方违反停战协议为由，决定派尼基阿斯率军前往卡尔息底亚	
	尼基阿斯成功地令卡尔息底亚诸城邦重归雅典阵营，却未击灭伯拉西达军队，率军返回雅典	
422 年	批判尼基阿斯消极政策的克里昂首次当选司令官，为击破伯拉西达军队，率军前往卡尔息底亚	
	秋，克里昂军与伯拉西达军交战。由于两军司令官均在战斗中阵亡，战斗因此结束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21 年	雅典与斯巴达双方再次议和	
	春，双方签订《尼基阿斯和约》停战协定。斯巴达换回被雅典俘虏的重装步兵以及被雅典占领的皮洛斯。雅典重新取得对卡尔息底亚诸城邦的控制权。停战协定有效期为 50 年	
420 年	阿基比亚德当选雅典将军。主张与阿尔戈利斯、厄利斯、阿卡迪亚结成四国同盟	
419 年	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再次当选将军	
	阿基比亚德率领 1000 名重装步兵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最西部，为雅典市场扩张至爱奥尼亚海对岸打下基础，此举引发科林斯对阿基比亚德的强烈不满	
	冬，在翌年将军的选举中，阿基比亚德落败	
418 年	阿尔戈利斯入侵埃皮达鲁斯。被激怒的斯巴达与参战的四国同盟发生冲突，爆发曼丁尼亚会战，会战以斯巴达胜利告终	
417 年	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被追究曼丁尼亚会战战败的责任，两人联手将一名煽动者作为替罪羊放逐。当年，雅典废除陶片放逐制度	
	为振奋民心，尼基阿斯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举行盛大祭祀仪式，阿基比亚德率 7 辆四匹马战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独占领奖台	
416 年夏	夏，尼基阿斯率军进攻爱琴海小岛米洛斯，实施残暴的战后处置	
	冬，西西里城邦塞杰斯塔请求雅典派兵进攻叙拉古。阿基比亚德在公民大会上主张远征，尼基阿斯反对未果，公民大会决定远征。阿基比亚德、拉马库斯及尼基阿斯当选为远征司令官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15 年	雅典市内发生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阿基比亚德被怀疑是主犯。6 月，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联军出发前往西西里。阿基比亚德以嫌疑犯身份出征	
	军队在科孚岛靠港时，听说南意大利诸城邦拒绝提洛同盟军靠港，并发现塞杰斯塔虚报当初承诺的军费。但雅典军决定继续远征 通过交涉，远征军成功在距离目标叙拉古较近的城邦卡塔尼亚建立前线基地	
	在卡塔尼亚，阿基比亚德接到召回令，他将作为亵渎神像的主犯被审判。归国途中，阿基比亚德利用船靠港上岸之机逃跑	
	秋，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两位司令官率提洛同盟军从卡塔尼亚出发，攻入“大港”，上岸后在叙拉古近郊的达斯孔建立营地 尼基阿斯向雅典国内要求派遣援军	
	这个时期，阿基比亚德的行踪得以确定。他逃去斯巴达，通过拉拢监察官，成为斯巴达军事顾问	
	冬，叙拉古向斯巴达求援	
414 年	4 月末，雅典以骑兵为主的援军抵达卡塔尼亚 雅典军以西西里近郊的特洛吉鲁斯为据点，开始建造包围壁垒	
	斯巴达公民大会决定派遣吉利普斯率领非正规军支援叙拉古。吉利普斯成为叙拉古军统帅 雅典军司令官之一的拉马库斯阵亡，尼基阿斯成为唯一的司令官 吉利普斯率领叙拉古军队，破坏提洛同盟军正在建造中的包围壁垒 尼基阿斯改变战略，决定从海上攻击叙拉古，军队移动至叙拉古近郊的普利姆米利昂，结果落入叙拉古军海陆两方的包围圈 尼基阿斯再次向国内要求增援。公民大会决定在翌年春天派遣援军，并任命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为司令官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13 年	春，战斗再次展开。提洛同盟军将军队一分为二，分别攻击了位于“大港”和“小港”的叙拉古海军，却失去了普利姆米利昂阵地 第二次海战，提洛同盟军依然未摆脱叙拉古军的包围圈	
	7 月，雅典援军抵达。尽管发起了反攻，但德摩斯梯尼依然主张雅典军全面撤离叙拉古 8 月 27 日，月全食现象发生，引发提洛同盟军军心动摇	
	9 月初，两军在“大港”发生激烈冲突，提洛同盟军遭致命性打击 9 月 10 日，提洛同盟军做出最后的反击，结果完败于叙拉古军，他们决定从陆路逃离 9 月 12 日，提洛同盟军扔下伤员和船只，向特洛吉鲁斯方向逃离，途中遭叙拉古军队追击。同月 20 日，提洛同盟军彻底毁灭 雅典建立危机管理内阁	
412 年	这个时期，阿基比亚德作为斯巴达的外交使节前往波斯领地萨迪斯，成为波斯帝国地方长官的军事顾问	
	由于叙拉古攻防战惨败，各城邦陆续出现脱离提洛同盟的动向	
	阿基比亚德登陆萨摩斯岛，取得海军指挥权	
411 年	雅典废弃民主政体，改为寡头政体。处于民主派阿基比亚德领导下的萨摩斯岛发布反对声明。阿基比亚德说服两位赴萨摩斯岛交涉的雅典高官，为回归雅典铺平道路	
	接受波斯援助的斯巴达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提洛同盟各城邦发起攻击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10 年	阿基比亚德率领的雅典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内的基齐库斯与斯巴达海军对战，赢得胜利。之后，雅典海军在阿基比亚德领导下，在与斯巴达海军的作战中取得连战连胜的战果 雅典因寡头政府失误不断，回归民主政体	
407 年	阿基比亚德返回雅典国内，成功实现回归政坛的目标。雅典人对此欣喜若狂，公民大会决定任命他为陆海两军总司令	
406 年	阿基比亚德率雅典海军前往爱琴海东部一带	
	斯巴达派遣吕山德率非正规军前往爱琴海。在波斯帝国居鲁士王子的支持下，规模壮大的斯巴达海军在以弗所设立大本营，准备向雅典海军发起进攻	
	在以弗所附近的诺提昂近海，两军发生激烈冲突。虽然双方都无重大损失，但雅典公民大会在不满战果的煽动家的影响下，决定解除阿基比亚德的职务 阿基比亚德逃往马尔马拉海西岸 吕山德接到斯巴达发出的归国令 居鲁士向斯巴达抗议，吕山德得以重归爱琴海东部战场	
	雅典公民大会派遣新选出的 10 位将军中的 8 位，作为司令官率军前往爱琴海东部 在阿吉纽西近海，雅典、斯巴达两军对战，未决出输赢 在煽动者的鼓动下，雅典公民大会对派往爱琴海东部战线的 8 位司令官做出人民公审，除 2 位逃亡之外，其余 6 位司令官被处以死刑	
	冬，斯巴达向雅典提出议和，被煽动者操控的雅典公民大会拒绝和谈	

年代（公元前）	希腊世界	其他地区
405 年	领会波斯帝国意图的吕山德进军达达尼尔海峡，占据了位于亚洲一侧的两个海港阿卑多斯和兰普萨库斯	
	雅典再次选出 10 位司令官，派遣其中 6 位率提洛同盟军所有兵力前往爱琴海东部	
	提洛同盟军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位于欧洲一侧的阿哥斯波塔米海港。阿基比亚德来到当地，建议将营地改为塞斯托斯港，遭到雅典司令官拒绝	
	吕山德率领斯巴达海军在阿哥斯波塔米将雅典海军一网打尽。侥幸免遭杀害的俘虏被命令回国，从而导致雅典陷入粮食危机	
	秋，吕山德称霸达达尼尔全域	
404 年	阿基比亚德遭暗杀	
	吕山德催促提洛同盟各城邦独立，命令居住在当地的雅典人回国。提洛同盟崩溃	
	雅典向斯巴达无条件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海军解散，雅典辖下所有城邦从此独立	

图片出处一览

上图：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下图：大英博物馆藏（英国） © Bridgeman Images

插图：畠山莫谷

塞浦路斯岛拉纳卡 © Markus Leupold-Löwenthal

大英博物馆藏 © Getty Images

Tons Brunés, The Secrets of Ancient Geometry and Its Use, 1967, R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ublishers

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 Lanmas/Alamy Stock Photo

柏林国立美术馆藏（德国） © ullstein bild/Getty Images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意大利） © Bridgeman Images

奥林匹亚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Konstantinos Tsakalidis/Alamy Stock Photo

© Hemis/Alamy Stock Photo

卢浮宫美术馆藏（法国） © 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玛格纳·加西亚国立博物馆（意大利） © Scala Archives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参考文献记录于第3卷卷末

希腊人的故事

3

新希望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如果霸权国家战败后有另一个国家代替它掌握霸权，或许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问题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人认为多极化的状态才是理想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也许只是混乱而已。

这种混乱不只祸害当事国，还会殃及其他国家。因而，它不会止步于暂时的混乱，而会成为一种可确切地称为“混沌”的长期现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绵延30年之久，它导致城邦国家雅典的凋败，在接下来的42年中又进而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霸权”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hegemonia”（英语为“hegemony”），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有强有力的影响。

在古希腊，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只有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虽然在陆战方面堪称希腊第一，但斯巴达战士的国家只有军事力量。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研究者们认为，从这一年开始到马其顿雄起的半个世纪间，先是斯巴达的霸权时代，接着是底比斯称霸。

果若如此，希腊世界的霸权便只是从雅典转移到斯巴达，再转移到底比斯而已。即便霸权转移时存在一定弊害，造成的混乱也应该会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可是，希腊世界却走向了“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论及政治制度，这些城邦国家有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两者的混合，情况各不相同。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终归都是城邦国家。与之相对，马其顿是王权国家。

我阅读学者的研究著作时感到，学者必须读懂文字记载背后的东西，即所谓的真话。

虽然书上写的是“霸权时代”，但必须理解为带引号的所谓的霸权时代。

本卷第一部讲述的是真正的霸权国家雅典存在80年之后，带引号的霸权时代42年的历史。

公元前404年战败的只是雅典，半个世纪之后败下阵来的却是希腊的所有城邦国家。

自信的丧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抛弃了民主政体（demokratia），转向寡头政体（oligarkhia），而这并非战胜国斯巴达的逼迫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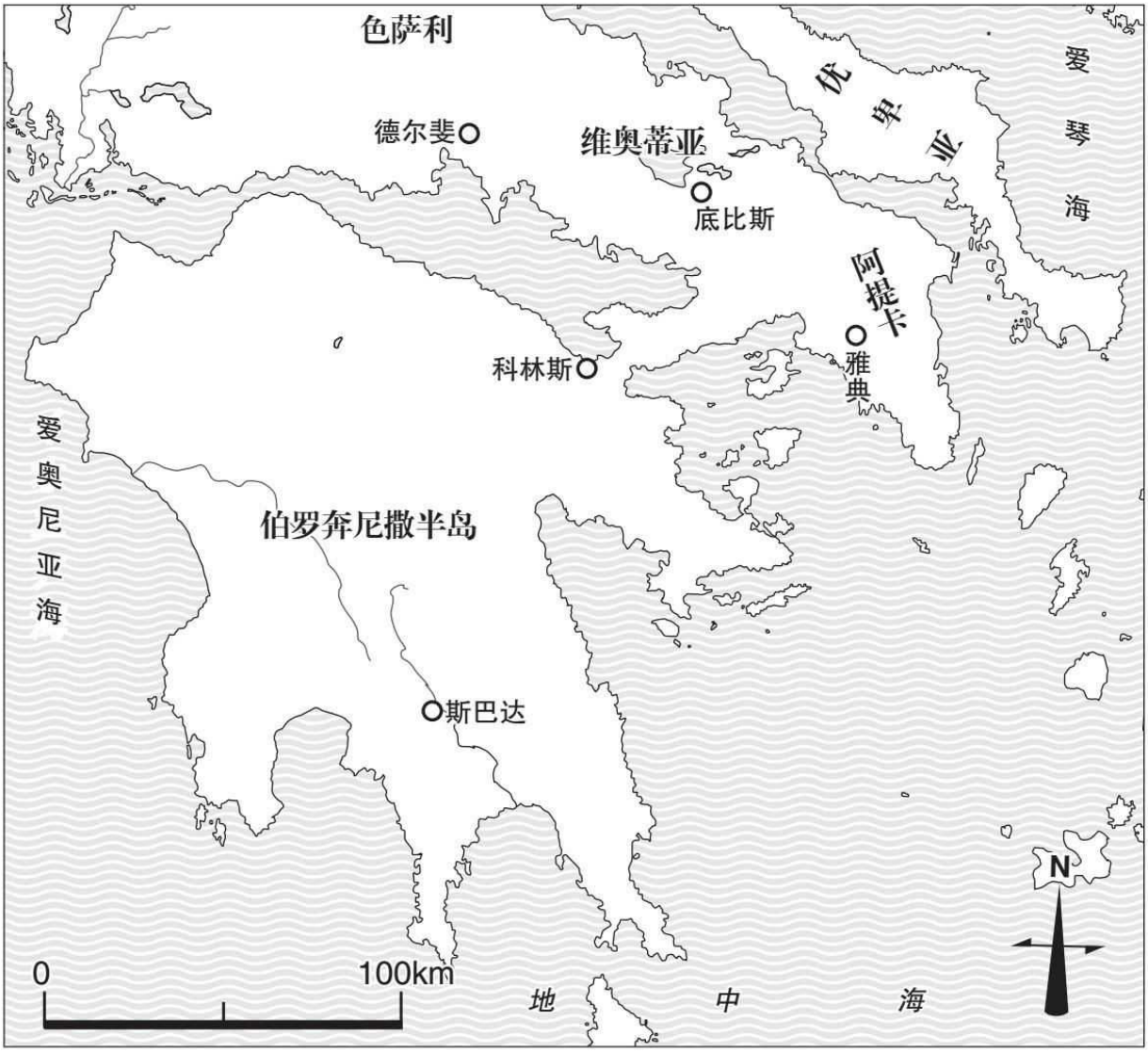
真正的原因在于，绵延近30年的战争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败告终，雅典市民对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体失去了信任。

的确，公元前404年的雅典丧失了80年来一直拥有的所有“力量”。

作为主战力的海军舰船从200艘减少到12艘，只能完成近海警备。

连接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7.5公里的“长墙”也多处被毁，“长墙”给予本国防卫和国民粮食两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为乌有。

此外，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与本国政府的意见相比，斯巴达的吕山德将军更热衷于听取支持他的波斯的意见。拜他所赐，在脱离雅典获得独立的美名下，爱琴海周边城邦和岛屿全都从提洛同盟分离出去。



雅典及其周边

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只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不同，它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经济同盟。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腊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经济敏感性。正因如此，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想到的广域经济圈。

很多雅典人因此选择在加入同盟的城邦和海岛定居，就像雅典在那里开分公司或分店一样。这些人因吕山德的强制回国令撤回雅典，环绕爱琴海的广域经济圈因此崩溃。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的

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经济大国的地位也不保。

大家原本觉得一旦有事可以相互帮忙才加入同盟。雅典本来有200艘战舰，确实有事可以前去相帮。可现在它仅有12艘战船，不可能再帮上忙了。雅典已不是海军大国，所以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可能继续担任盟主了。

雅典被夺走长期享受的霸权，跌落到与其他城邦国家平起平坐的境地。但雅典人并不是因为对这样的现状感到绝望，才主动抛弃民主政体，选择寡头政体的。

大多数市民面对天翻地覆的现状还处在茫然的状态。恰在此时，坚信雅典也应建立寡头政体的一小部分人回国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胜方斯巴达甩给雅典的媾和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允许逃往他国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国。作为战败者的雅典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于是，在市民尚未找出反对理由也无力反对的时候，一个称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在雅典成立。彼时的雅典充斥着从海外基地撤回的人士，嘈杂而混乱。

这“三十人”中，除了奔走于斯巴达进行媾和的塞拉门尼斯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跟随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领的所谓进驻军一同回到雅典的。

这些人的领袖克里提阿（Kritias）这时已经56岁，是当时年仅24岁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舅舅。克里提阿出身于雅典名门，按梭伦提出的财产等级制划分，他是属于第一等的不折不扣的富人。

据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子。不过，他与小他10岁但仍属同代

人的美男子阿基比亚德不同。阿基比亚德性格开朗，而克里提阿性格阴沉；阿基比亚德遇事不抱怨、不发怒，而克里提阿的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强烈的愤怒之火。

克里提阿很有才华。尽管他的诗歌、悲剧、喜剧和以哀歌形式撰写的政治论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敏锐的认知和纤细的情感。他一生中没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这在博学多才的人中并不罕见。

他对哲学饶有兴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件事广为流传。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饮鸩而亡。把苏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状之一是苏格拉底给雅典青年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指受其影响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正是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

在雅典，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底线是30岁。阿基比亚德刚满这个年龄便跃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而克里提阿49岁以后才在政界登场。

当时雅典人记录、称呼某人时习惯说成“某某之子某某”。和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不同，克里提阿年届五十父亲还精神矍铄，因此他很晚才当上一家之长。

公元前411年，寡头政权在雅典建立。那时雅典人刚刚得知远征叙拉古的军队惨烈的结局，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老卡莱斯库劳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里提阿就在他身边。这个寡头政体被称为“四百人会议”，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这个政权很短命，仅4个月便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五千人会议”，虽然执政人数增加了，但它仍是寡头政治。该政权寿命虽比前面的“四百人会议”长，但同样短命。不到两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体便杀了回马枪。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与建立寡头政权有关的许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克里提阿也逃离了雅典，他的父亲

似乎就死于这一时期。克里提阿的这段流亡生活持续了6年之久。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克里提阿率领同党回到雅典。这次他随战胜方斯巴达的军队归来。

已经56岁的克里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坚定，更起劲地反民主并亲斯巴达。时隔6年，他回国的目的是复兴寡头政权。他决心不让新政权重蹈上一次的覆辙。

“三十僭主”政权建立不久，就被人们叫作“三十暴君”。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派——即民主派人士，并开始付诸行动，执政方针从“不流血”转向了流血的暴力镇压。

不论执政者有无意识，镇压举措总会自然地走向扩大化。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发并被处以死刑，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没有积极向寡头派靠拢。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整个雅典被笼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尽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们是有钱人便可能会成为镇压的目标，理由是他们抢了海外归来者的工作。这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落千丈的雅典经济遭受到第二波打击。

雅典经济因提洛同盟广域经济圈的解体而遭到沉重打击。对这时的雅典而言，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实际起着重新与海外建立经济关系的“连线”作用。

恐怖政治不断升级，遭到肃清的牺牲者已多达1500人。这在“三十僭主”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三十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塞拉门尼斯就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克里提阿。

塞拉门尼斯在年龄上是克里提阿的同辈，他曾代表战败的雅典与斯巴达完成媾和，因此声名鹊起。从心态上讲，他即使属于寡头派，也不是一个顽固的寡头派。在“四百人会议”时代，他被派往不支持“四百人会议”而一直支持民主派的萨摩斯岛，任务是把那里的雅典海军拉到寡头派这边来。然而他被迎接他的阿基比亚德说服，还作为其副将参加了海战。海战期间，他把当初的任务完全忘到脑后，可见他这个寡头派并不坚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爱琴海的东面成为战场，雅典在与斯巴达海战的初期连战连胜。在整个海战中，本应是寡头派的塞拉门尼斯一直在帮助民主派的阿基比亚德。

还有一位叫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os）的寡头派人士，在这个时期和塞拉门尼斯一道被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他也明确表态要留在民主派的萨摩斯岛雅典海军里。在阿基比亚德的指挥下，塞拉门尼斯负责阵形的右翼，色拉西布洛斯率军在左翼战斗，为祖国雅典带来了胜利。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公元前404年形成的“三十僭主”中，塞拉门尼斯榜上有名。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参加其中，他在“三十僭主”变为“三十暴君”的征兆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离开雅典逃往底比斯。这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对民主政治恢复了信心，也许只是他对雅典寡头政体的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吧。

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完败告终。在雅典被彻底打垮的这一时期，雅典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有很多人像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选择离开。所以如果采取的方法得当，“三十僭主”也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曾经与色拉西布洛斯共同战斗的塞拉门尼斯对寡头政治抱有幻想，他企图通过加入“三十僭主”，在内部使之刹车。

然而，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在修昔底德之后书写希腊人历史的色诺芬笔下，塞拉门尼斯与克里提阿的对立甚至没有发展到论战的地步。前者道理说尽，后者面对责难只是一味地暴跳如雷。

根据现代研究者的说法，克里提阿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他的内心已经被一种不安搅得痛苦不堪。那是担心“三十僭主”政权也会同“四百人会议”一样归于失败的不安感。将不安转嫁给别人就是愤怒。这种愤怒使人盲目，让冷静的人变得疯狂。在克里提阿看来，塞拉门尼斯在同党中属于很有能力的人。这使塞拉门尼斯成了克里提阿憎恨的对象，而且恨到只想杀掉的程度。

克里提阿检举塞拉门尼斯并把他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怎么都能编造出来的。在雅典，喝毒酒似乎已经成了实施死刑的固定方法。塞拉门尼斯被定为反国家罪，喝下了毒酒。死前他叫喊着要把杯中剩下的几滴毒酒“留给美男子克里提阿”。

这为逃亡底比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党起义创造了契机。

当初色拉西布洛斯离开底比斯南下雅典时，跟随他的雅典人不过70人。随着离首都越来越近，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发展为数千人的规模。与其说这些市民对寡头政治感到失望，不如说他们对恐怖政治感到绝望。

克里提阿可靠同党的数量不及对手一半，于是他开始向斯巴达求援，也许他认为斯巴达同为寡头政体，定会伸出援手。

斯巴达回应了这个请求，他们出动了由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如果斯巴达军与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雅典民主派发生冲突，消灭后者将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帕萨尼亚斯刚展现了一下斯巴达的军力便立刻撤退，回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以此表态不愿介入雅典内部争斗。

为什么会这样，其内情容后再叙。既然斯巴达把手缩了回去，雅典的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一场内乱。

起初是规模略大的示威队伍与警察的冲突。双方都拿着武器，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随后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展开的已不能称为冲突，得叫作战斗了。结果寡头派失败，克里提阿在激战中战死，战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大人物。

“三十僭主”就这样匆匆垮台，这时政权建立刚过半年。

统率民主派获胜的色拉西布洛斯宣布特赦，不再追究克里提阿追随者的一切罪过。这也表现出人们对“三十暴君”的恐怖政治已经有了过敏反应。

雅典的民主政治回来了，但它的功能并未回来。

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政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是与下述事项密切相关的。

雅典海军不仅在爱琴海，在整个地中海都是最为强大的。

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一体化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位列希腊世界之首。

提洛同盟使各方面的知识、物资交流越发活跃。

虽然民主政体回来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年后的雅典尚不具备这

一切条件。

另外，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也减少了，正是他们使雅典成了希腊城邦中唯一的国际化都市。

说是外国人，其实他们是从希腊其他城邦来雅典定居的人，都是希腊人，都讲希腊语。

雅典虽然一直向这些人敞开门户，但不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少年，都不会取得公民权，即不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其不动产所有权也不会得到确认。但这些外国人却被要求加入防卫军，尽管仅限于辅助战斗。这些人在上述情况下还会选择居住在雅典，是因为那时的雅典充满了商业机会。

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变得一穷二白，失去了这种魅力。恐怖政治又使人们面临被剥夺生命和财产的境遇。外国人继续居住在雅典的好处越来越少。为扭转这种状况，雅典人改变了方针，授予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以雅典公民权。但这并未能阻止居留外国人的进一步减少。这种情况对雅典市民中的传统中间阶层形成了直接的打击。

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原本不能获得不动产。所以雅典有很多住宅都租给了定居在此或因临时来访开展商务活动的外国人。

公元前480年，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外国人的流入开始增多。此后的七十多年中，外国人支付的房租在许多雅典市民的收入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状态。

如同突然战败一样，外国人的撤离也来得突然，让人没了任何希望。

其他打击接踵而至。恢复了民主政治的政府开征不动产税。房主们

没有了房租收入还不得不缴纳这种新税。

可能因为这个新税种是临时性的，人们居然不知道税率是多少。政府以国库空虚为由，试图用税金来填补窟窿，这种政策显然不可能得到市民的好评。如果这种恶评如潮的政策得以延续，市民对政权的信任度会越来越低。

人才外流

更糟糕的现象是人员流动发生了变化。

过去，人才总是从其他国家流入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才转而从雅典流向了其他国家。

这些人员可以分为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两大类。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应马其顿国王之邀前往马其顿，抛弃了雅典。前途可期的年轻悲剧作家、苏格拉底的学生阿伽通也前往马其顿久矣。不过，这两人去了别的国家后再没有杰作问世。

这意味着，雅典有某种东西能让这些知识精英创造出杰作。至此，留在雅典的名人只剩下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两人。苏格拉底安然若素，阿里斯托芬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他连以辛辣的批判引人发笑也做不到了，这位绝代喜剧作家和欣赏他喜剧的雅典人，恐怕都消沉到了极点。

精英以外的人员大多到其他国家当了佣兵。雇主并不是希腊的其他城邦，而是80年前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波斯。

我倒真心希望，雇主既为大帝国波斯，所付薪水应该高些。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使人悲哀。这些雅典人作为重装步兵参战，可雇主付给他们的薪水只相当于当年伯里克利付给三层桨战船桨手的1.5倍。如能保证高薪，他们必定不会跑去外国挣钱。可他们如今在雅典已经生活不下去，只能出国挣钱。

更加悲哀的是，就像艺术家去了别国创作不出杰作一样，这些佣兵

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划时代的战斗，只被用于波斯帝国内部的势力斗争。

这些在雅典过不下去的人到了别国也没能施展才华，这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即使在“斯巴达霸权时代”也没有想过要建设一座可与帕特农神殿相媲美的壮丽神殿。

所谓“先有雅典，再有希腊”，这话绝非夸张和过誉。

抛弃祖国远走海外的雅典市民中，有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色诺芬（Xenophon）。

根据梭伦改革的等级划分方法，色诺芬出身于被称作骑士阶层的第二等，若他留在雅典不会生活不下去。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师徒二人的邂逅也是苏格拉底式的。

一天，色诺芬走在一条小路上，苏格拉底从对面走来。路太窄，无论怎么走两个人终会碰面。于是苏格拉底问道：

“去哪里才能得到新鲜的鱼呢？”

年轻的色诺芬面对声名远扬的哲学家恭敬地回答道：“去鱼市就能买到。”

苏格拉底接着问：“去哪里才能得到知识呢？”

23岁的年轻人答不上来，沉默不语。66岁的老者对他说：

“请跟我来。”

就这样，色诺芬加入了苏格拉底学生的行列。他与师出同门又年龄

相仿的柏拉图不同，虽然这两人都倾向于寡头派。柏拉图和寡头派领袖克里提阿是甥舅关系，但柏拉图始终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而色诺芬积极地参与政治。在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民主派与克里提阿率领的寡头派的内战中，色诺芬站在寡头派一边参加了战斗。

所幸色诺芬没有丢掉性命，后来又遇到特赦，他留在了雅典。不过，面对民主派回归的雅典，他恐怕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

在那段时间，一个朋友传来消息，说斯巴达接到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的求援，正在征召派往波斯的军队。

他们派到波斯去的军队并不是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军队虽由斯巴达的将军指挥，却是从别国雇来为别国利益而战的雇佣军。加入这样的军队的人就是为钱而战，与为祖国而战的市民兵相比，会被社会看低。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色诺芬没有轻易地做出决定，他去找苏格拉底商量这事。

苏格拉底有个怪癖，问他问题他不直接回答。

当时他的回答只是“你可以去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这只能理解为让色诺芬自己思考、自己决定。不过这话里有话。人即使自己通过思考已经有了决定，也要有神祇的同意才会放心前行。苏格拉底参透了这点才给出这样的忠告。

色诺芬似乎真的去了德尔斐，结果是自己思考自己决定去波斯当佣兵。

和这个时期离开祖国的很多雅典人一样，色诺芬并非暂时出国。他26岁离开祖国后，直到72岁去世都没有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数量众多

的著作没有一部写于雅典。

色诺芬的全部著作都流传到了现代，这在古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幸运。《希腊史》[1]和《长征记》[2]这两部书应该是他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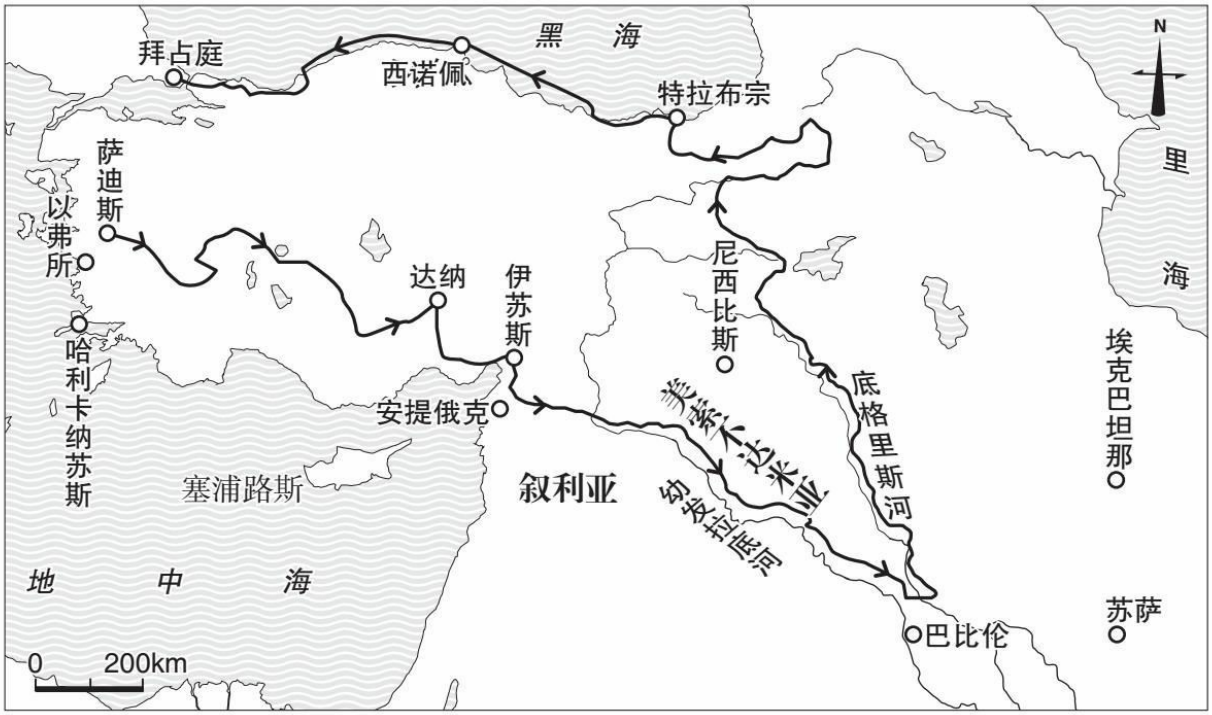
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便中断了写作，《希腊史》正好从这一战争的末期开始，一直写到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终结的公元前362年。同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色诺芬的《希腊史》无论在观察力、洞察力还是文章表现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尽管该书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但我认为，作为运用史料讲述历史的史学家，色诺芬不及修昔底德。

然而，色诺芬描写亲身经历的《长征记》，成就确实与世界第一部非虚构作品的地位相称。

顺便一说，《长征记》的原书名在希腊语中是“上”的意思。我想，恐怕古希腊人与日本人相似，认为从地方去首都是“上”京，从首都去地方是“下”吧。[3]

虽然书名为“上”，但色诺芬《长征记》叙述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希腊佣兵从小亚细亚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尽管佣兵在那里打了胜仗，但因波斯国王的弟弟战死，他们被迫滞留在敌营中。毋宁说《长征记》主要叙述的是这些希腊佣兵历经艰险，跨越6000公里的路程回到故国的逃离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下”。

率领一万人摆脱波斯国王发起的一波波追击，这可是难中之难的事。而28岁的色诺芬正是完成这一难事的指挥官之一。



色诺芬撤回希腊的路线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此14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年，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进攻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失败，而且未能从那里逃出，竟至全军覆没。

当时雅典军队试图从叙拉古向北逃往60公里外的卡塔尼亚，其距离只有色诺芬指挥军队成功逃离敌营的百分之一。

前往叙拉古的雅典军全军覆没，而14年后同样由雅典人率领的希腊佣兵，虽然在与敌人一波波的交锋中耗时两年，但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最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却未能成为哲学家。作为史学家他远不及修昔底德，但作为军队领袖，他率领一万士兵撤回希腊，完成了难中之难的事，我认为他具有卓越的能力。

色诺芬5年后被祖国雅典判处流放国外。他曾追随斯巴达引弓射向

雅典，所以流放并非事出无因。当初雅典并未把他视为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可是32年后才解除了对他的流放。对色诺芬来说，这可是他从33岁到65岁的几乎全部的人生。

无论政体如何，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利用自己具有的力量。对于自然资源匮乏的雅典而言，**“人”就是资源。**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此后雅典的实力便以断崖般的趋势下降，那情形令人感慨万千。

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丧失了主导权，从此再也未能恢复。

让整个雅典为之颤抖的“三十僭主”政权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民主派的回归而成为过去。

拜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所赐，雅典民主政体得以复活。帕萨尼亚斯应“三十僭主”的要求出兵雅典，却又在关键时刻撤军。

这证明了雅典人已经无力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有勇气靠70个人起事，但没有那种狡诈的智慧，那种能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雅典人一直下意识地拒绝在认识上有所醒悟，他们不承认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领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伯里克利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实际上他实施的是一人统治，但他能让大家觉得最终做决定的是民众自己。雅典民众没有领悟这种“一人统治”的必要性。伯里克利之后的所有领袖都没有发挥出作用便垮台就

是明证。因为民众不想培养“一人统治”的领袖，所以这种人刚崭露头角便会被拿下。

“民主”并非集合更多人的头脑便能搞好政治那么简单。

雅典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能够领导众人的人了，人们也没有理由认可这种领导人的存在。对雅典人来说，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本身也许已经成为重负。

然而，这里还是希腊人的国度，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休战还是必要的。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平静了10年，或者说是不得不平静了10年。但它并没有同战争这个魔物绝缘。

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一会儿参加反斯巴达的城邦联盟与斯巴达为敌，一会儿又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起战争。

尚未明白为什么要把人送上战场，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死亡。每到这时雅典都国库空虚，为填补空虚便乱征新税，结果当然是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个时期上演了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打破10年沉默创作的《吕西斯特拉忒》[4]。

故事情节是雅典女人绝望于把一切交给男人来摆脱自身的惨状，便采取了占领议会的过激行动。

她们断言没有资格执掌政权的男人中，包括恢复民主政体的有功之臣色拉西布洛斯。

在雅典社会，女人不被看作完整的人，自然也没有公民的权利。

被这样的女人嫌弃，这已经不是“讽刺喜剧”，而是“悲剧”了。

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冷酷现实，对于曾认定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雅典人来说，也许更加难以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愤懑的心情。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格拉底事件爆发了。

---

[1] 有汉译本《希腊史》，色诺芬著，徐松岩译注，三联书店，2013年。——译者注

[2] 有汉译本《长征记》，色诺芬著，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译者注

[3] 在日本人的方位概念中，从地方到首都或中央称为“上”（上がる），如“上京”（去东京）。而从首都或中央到地方则称为“下”（下る）。——译者注

[4] 又译《公民大会妇女》《伊克里西阿》（Ecclesiazusae），阿里斯托芬创作于公元前391年的讽刺喜剧。——译者注

审判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学生色诺芬在遥远的波斯率军步入撤回希腊6000公里行程的最后一程。此时在希腊的雅典，70岁的苏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

告发他的人叫美勒托。仅告发苏格拉底这一件事就足以让这无赖历史留名了。阿尼托斯和另一位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后操纵着这个想在文学界出名但并不顺利的年轻人。

逼死苏格拉底的不是“寡头政体”这个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是以全体市民的决定为决策基础的“民主政体”。

诉因有两个，即苏格拉底缺少对希腊传统神祇的信仰，以及给雅典青年讲授哲学从而对他们施加恶劣影响。

我这个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对此产生朴素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信仰不可能存在客观标准，而法律以有无证据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有关信仰的事能用法律来审判吗？

对年轻人施加了恶劣影响是第二个诉因。当时的雅典人听到这条会立刻想到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这两个人都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学生，而且都被认为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了祸害。

阿基比亚德的罪名是罔顾法庭的出庭令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斯巴达提供了危害祖国雅典的战略计划。

而克里提阿建立了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造成了雅典的恐怖

政治，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敌人。

此时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阿基比亚德于5年前被暗杀，克里提阿也在4年前战死。

那为什么现在这两人会被拿来说事呢？

有现代研究者主张，因为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政府对民主政体能否存续没有自信。

我认为这两人确实有罪。可是，雅典规定担任要职的人必须年满30岁。阿基比亚德35岁亡命斯巴达，克里提阿56岁那年实施恐怖政治。

他们青少年时代的老师，还要为成人已久的学生的行为负责吗？

我认为，苏格拉底教给他们的是思考的重要性。至于他们后来是民主派还是寡头派，这不是哲学问题，是政治问题。

苏格拉底曾应征入伍打过仗，也被抽中当过国家公务员。他做这些并非因为拥护雅典的民主政体，而是要尽到他作为雅典公民的义务，是出于极其自然的爱国心。

自己的学生是民主派也好，有寡头派的同情者也罢，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

同样，学生属于上流社会也好，属于社会底层也罢，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哪怕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奴隶，只要他有热爱知识之心，苏格拉底都会满心欢喜地把他纳为弟子。而且，他对谁都不收取报酬。雅典的法律是参照绝大多数人的情况制订的，雅典人能以这样的法律来审判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吗？

按照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惯例，审判苏格拉底的责任落到了抽签决定

的500位市民身上。

告发者美勒托在这500人面前担任检察官的角色。他历数并谴责了苏格拉底的罪行，主张应该叛他死刑。

在检方发言之后500名市民进行了第一轮投票，即裁决投票。

有罪250票，无罪220票，弃权30票。

由此看来，也许这500位审判员中有不少人对苏格拉底被起诉的诉因抱有疑问。

此外，在有罪和无罪的票差很小的情况下，被告缴些数额不大的罚金或自己逃往国外便可结案。雅典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然而，苏格拉底不打算接受这两种妥协方案中的任何一种。

随后开始的辩方辩护是他自己进行的。当时雅典的通行做法是要么委托专业辩护人辩护，要么在法庭上念这些人写的辩辞。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些做法。

当时雅典的法庭上经常出现另一种做法，即带来恸哭的妻儿以博取审判员的同情。苏格拉底也没有采取这种战术。

他断然拒绝了酌情减刑，采用正面作战的方法展开了一场“申辩”。

有些古希腊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哲学上，让人感到有些片面。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柏拉图，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集研究苏格拉底。

说到柏拉图著作的译本，不同时代、不同译者做了大量翻译，众多出版社出版了很多译本，数量多到令人难以选择。

这些书中，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苏格拉底的申辩》[1]：以审判现场为舞台，叙述了原告起诉、被告辩护和500位审判员的反应等审判的全过程。

《克力同》[2]：以判刑后监狱里的单人牢房为舞台，学生克力同劝苏格拉底说，只要苏格拉底愿意，他可以从监狱逃出去保全生命。苏格拉底说，这样做会违背自己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想法，不可为之。他娓娓道来，说尽了道理。

《斐多》[3]：舞台也是监狱里的单人牢房。

离别的时间一点点逼近，苏格拉底盛有毒芹饮料的酒杯就要被喝干了。单人牢房里挤满了赶来的学生。他们坐立不安，有的抱着头，有的绝望地薅着自己的头发。苏格拉底反倒安慰起大家。情节的展开非常符合苏格拉底临终时应有的景象。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还要扮演安慰别人的角色。

在恩师临终时赶来的学生们，是要从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口里聆听其哲学的真髓，聆听阿基比亚德曾经说过的“令人泪水泉涌不止”的真髓。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这三部作品就像一出三幕戏剧。

三部作品洋溢着28岁的柏拉图对恩师的敬慕之情，闪耀着柏拉图的文学才华，让人感到顶尖作家之杰作的魅力。

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就像坐在观众席的最前排，屏住呼吸观看舞台上剧情展开的戏剧。

我认为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终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世界里的最大明星。

顺便一说，罗马人没有取得什么哲学成就，但在他们仿制的古希腊时代的希腊人雕像中，苏格拉底的雕像是最多的。那些仿制品都是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让人很有亲切感，就像是为了摆放在公共图书馆或自家书斋而做，并非要大模大样地放在广场上。

500位审判员最初做出的判决是250人认为有罪，220人认为无罪。但听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后，他们的最终判决是360人认为有罪，140人认为无罪，和第一次有巨大的差距。这使付点罚款就能了事的情况一下子变为死刑判决了。

人们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便会了解情况为何会变成这样。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激怒了原本想差不多就收场的审判员们。

苏格拉底不承认所有罪状，他的话很明确："我过去曾两度应征入伍上战场，还当过一次公务员，并未少尽一点雅典公民的义务，既然你们用雅典的法律审判我，那我服从这个法律。"

这是苏格拉底向全体审判员发起的激烈挑战，他等于声称他们正以违反雅典公民应尽义务为由审判他。

听了苏格拉底的这番申辩，仍有审判员投了无罪票，也许他们对苏格拉底陈述的思想抱有同感。然而剩下的360人不这么想。

这360人为何愤怒呢？

我想是由于这时雅典人处于不能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状态，内心焦虑。

这时苏格拉底出现了。他明确说不用交罚金或自行流亡的方法收场，他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市民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只有焦虑，而苏格拉底一点也不焦虑。于是他们把怒火发泄在苏格拉底身上，结果便是以多数赞成票判苏格拉底死刑。

如果不做这样的想象，我们就无法解释投有罪票的人数为何从第一天的250人变为第二天的360人。

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他的挑衅战术获得了成功。

苏格拉底已年届七旬，接近了人生终点。

伯里克利死的那年他41岁，他属于饱享了雅典黄金时代的一代人。

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给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带来了巨大灾难。那年，这位哲学家57岁。

他66岁时又经历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混乱而悲惨的时光。

苏格拉底在70年的生涯中体验了民主政体下雅典的所有荣耀和屈辱。

对他而言，学生比家庭更重要。但他们不是被暗杀就是战死，活着的年轻学生又像阿伽通和色诺芬一样，抛弃雅典去了他国。

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们的祖国雅典虽然恢复了民主政体，但并未恢复自信。人们找不到可以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焦虑地一个劲儿把责任推给别人。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虽然他没有成文的作品，但他的一生就是作品。

于是，如何结束一生便如同如何写完作品。

我认为，苏格拉底思考过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

雅典人创造了思想、言行和表达自由这些理念，苏格拉底不但贯彻了这些理念，还思考了人生如何谢幕。

把自己的死法从头到尾展现出来，是他能够给予学生们的最好教诲。

由衷敬佩苏格拉底的柏拉图正确地领会了恩师的这一想法。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三部作品写得就像一出三幕戏剧，读后使人感到这才是苏格拉底哲学的集大成。

此外，我们认为，正如《斐多》描写的那样，苏格拉底喝干掺有毒芹的饮料之后，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首先，他的四肢末端开始麻痹变凉。然后这种症状一点点逼近心脏。这期间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

然而，毒素不停地侵入他的身体中心，让他犯困。这期间他也一直不觉得疼痛，完全没有痛苦的样子。

苏格拉底最后说："请代我向阿斯克勒庇乌斯神献上一只鸡作为供品！"

也许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安乐死方法。

至少毒酒是他自己喝下去的，虽然同样是死刑，但这与绞刑等不同。这种方法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人的尊严。

苏格拉底没有做出任何难看的动作，他自己拉下了人生的大幕。

尽管苏格拉底以那样站不住脚的罪名不得不赴死，但这反而成就了他的哲学。雅典因处死最后留在雅典的爱国者，证明了它此后绝无力量走出迷茫。

审判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题目，也是一个历史题目。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一样，是“真正的雅典人”，他们不可能诞生在希腊的其他城邦。

他们都具有一种才能，能使别人动摇而自己绝不动摇，并能安抚变得不安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遭遇一时的失败，也终将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

[1] 有汉译本《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 Sokratous），柏拉图著，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17年。——译者注

[2] 《克力同》（Kriton）汉译本见《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柏拉图著，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译者注

[3] 有汉译本《斐多》（Phaedon），柏拉图著，杨绛译注，三联书店，2011年。——译者注

第二章
无法蜕变的斯巴达

胜利者的实质

人们都说，野生动物世界里适者生存。我们不由得思考，人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者是雅典，胜利者是斯巴达。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面对入侵的波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国家同心协力，成功地击退了波斯的进攻。从那年算起，两个国家共享希腊半岛霸权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并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时，剩下的唯一一个霸权国家明显是斯巴达，雅典只得吞下无条件投降的苦果。其明证是双方媾和条件中有两项重要条款是斯巴达一直以来都在向雅典索求的。

第一项是拆毁连接首都雅典和外港比雷埃夫斯的长7.5公里的通道，雅典人称这条通道为“长墙”。

这是一处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称之为通道都怕人说小觑了它。它宽180米，两侧均有高6米的坚固墙壁护卫。这个设施由地米斯托克利建起之后历经74年的岁月，一如“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个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成为保障雅典安全的基本设施。即使首都被敌人包围，也可以通过外港比雷埃夫斯保障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补给。

对雅典而言，波斯被击退之后有可能从陆路进攻本国的国家只有斯

巴达。

斯巴达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当初雅典建造“长墙”时斯巴达便激烈反对，建成后他们也一直看着不爽，认为这是把斯巴达作为假想敌的象征。

胜利者斯巴达让失败者雅典吞下的第二颗苦果是提洛同盟的解体。

与此同时，斯巴达还让雅典把拥有200艘三层桨战船的常备海军力量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只有12艘。12艘船仅够近海警备之用。

提洛同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有希腊最强海军力量的雅典在主导。斯巴达想把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拉下来，削弱雅典的海军力量是必然的措施。

但这里有一件事想请读者考虑。

斯巴达让雅典拆毁“长墙”，让雅典海军非军事化进而瓦解提洛同盟，其意图是纯军事性的。

然而，拆毁“长墙”无论对“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还是对提洛同盟，都有经济方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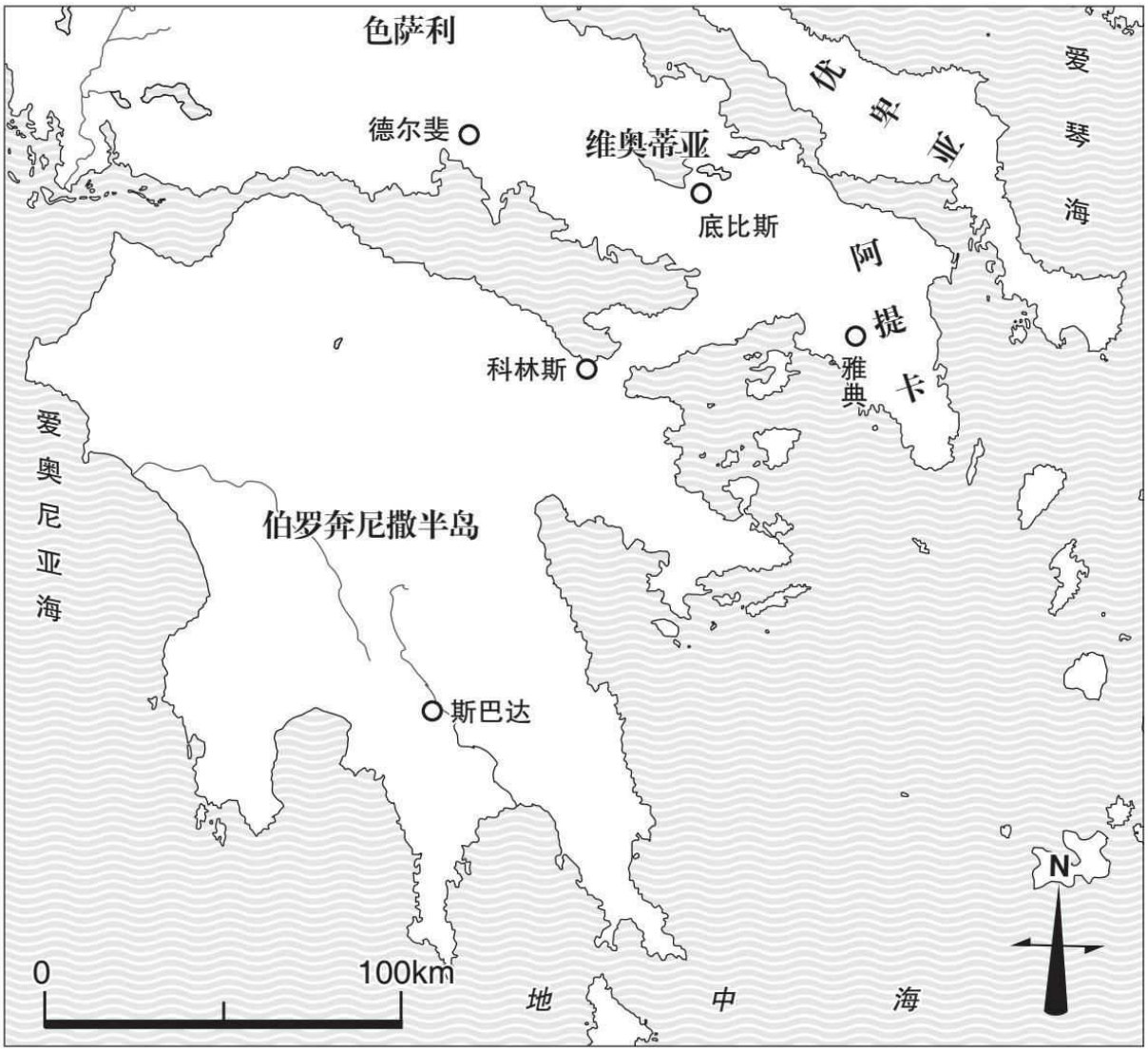
“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让雅典成为爱琴海乃至东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大通商中心，而提洛同盟让雅典受益于广域经济圈。

公元前404年的战败，不仅让雅典从军事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去，还让它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可是，斯巴达并未理解到这个层面。斯巴达人的座右铭是质朴刚健，其国内只允许使用铁制通货。这遭到其他国家商人的嫌弃，其他国家的物产也就进不了斯巴达。我们只能无奈地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的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经济头脑。

这样的国家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希腊还有未来吗？



斯巴达及其周边

一个人若只想着自己赚钱，便不能长期赚钱。相反，做生意让别人也赚钱，则自己和别人都能长期赚钱。

我对经济很无知，我所理解的经济只是如此程度。不过我知道，“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提洛同盟既是军事政策，也是经济政策。

与希腊其他城邦的人相比，雅典人在经济方面的头脑是出类拔萃

的。

他们创造了民主政体，比别的城邦更长久地发挥这个政体的作用。

民主政治还是一种政治思想，目标是通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进而飞速提高整个国家的收益水平。

而斯巴达是一个坚持固化阶层差别的寡头政体的国家。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但它并非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说斯巴达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重大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斯巴达面临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

仔细分析持续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得知，在战争中取得重要战果的总是那些受到斯巴达社会排斥的人。

结束战争的有功之臣吕山德的地位也并不高于其他被排斥者。

与之相对，斯巴达的正规军由二王之一率领，有两位监察官随行参谋，那些人在这30年里又做了些什么呢？

每年一到夏天，他们就入侵雅典领土阿提卡，在那里祸害农田，入秋就马上撤回斯巴达，如此循环往复。

年复一年，雅典农民的收成都被抢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雅典依靠“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完善了来自海外的补给体系。耕地遭到破坏不至于对雅典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这很像棒球赛中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而且每次派上场的还都是正式选手。如果试着让板凳队员上场反倒得分，全队的气氛又会怎样呢？

可惜斯巴达没有让板凳队员凭实力成为正式选手的机制。这样做会让国家崩溃。斯巴达一直以来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

阶层差别的固化

我尝试将斯巴达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尽管它们有2000年的时代差距，有西方与东方的地域差距，但因为这两者之间仅有的一点共性，我仍然要把它们作为比较对象。

这仅有的一点共性是，两者都因社会等级的固化而享受了300年的和平。

不过，外部环境并非一样。斯巴达的武士们不得不进行对外战争，而日本的武士不需要这样做。

在尚未有日本这个国家的公元前8世纪末，吕库古为斯巴达制订了“宪法”，此后斯巴达一直严格遵守。即便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5世纪末，他们仍然坚守着按等级划分的社会差别。这使斯巴达远离希腊其他城邦司空见惯的国内党派争斗，拥有了300年的和平。

在斯巴达，只有一万名斯巴达战士才拥有公民权，他们通过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参与国家政治，并拿起武器尽到保卫祖国的义务。

数量是斯巴达战士16倍的奴隶则生来从事农业工作，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结，他们只能一辈子作为农奴来支撑武士的生活。

数量7倍于斯巴达战士的半自由民从事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工作，和奴隶一样，斯巴达也不承认他们是社会成员。

斯巴达社会等级如此固化，是因为统治者斯巴达人是从北方攻来的，他们征服了原来一直居住在拉科尼亚的奴隶和半自由民。奴隶和半自由民的区别仅在于半自由民投降早，后来投降的那部分人成了奴隶。

虽然斯巴达社会等级的差别长年存在，但这种差别仅限于社会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奴隶只须交出农产品收获的一半，剩下的允许归为自有。至于半自由人，这种税赋似乎更轻。

身为统治者的斯巴达公民坚持质朴刚健的原则，再加上国家本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他们觉得无需剥削被统治者。

各等级经济方面没有太大差距也是300年和平的重要原因。

此外，斯巴达能够长期享受和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以区区一万名斯巴达战士赢得了希腊最强陆上战斗力的名声。

据说哭闹的孩子一听到斯巴达重装步兵的名号便不敢作声。这不仅对斯巴达国内的奴隶和半自由民起到震慑作用，而且给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也造成一种压力。

这样的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就像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的球队。终结战争的竟是像替补队员一样派出去的奴隶出身的吕山德。

虽然斯巴达最终赢了战争，但这使斯巴达的社会精英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

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留下历史记录，要接近他们的思想，人们只能根据雅典和其他城邦国家的史实进行推理。推理的结果是，这个时期斯巴达上层的意见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对立和分歧。

这种对立在如何处置战败的雅典方面已见端倪。

斯巴达上层也承认，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功臣，尽管他出身农奴。

这位武将虽可算是斯巴达进行被排斥者的骄傲，但他的战法龌龊。也许是为了洗刷影响，他对战败者进行了极度残忍的处置，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

正如本书第二卷结束部分介绍的那样，他亲手挥剑砍下已成为俘虏的雅典司令等4人的头颅，并下令从俘虏中找出3000名雅典人用长矛全部刺死。

他还令雅典人撤离提洛同盟的所有加盟国，威胁说如果反抗，等待他们的是跟这3000人同样的命运。于是，居住在海外的雅典人全部撤回了雅典。

提洛同盟的瓦解不是反复战斗的结果，而是只靠这一件事就实现了的，可见吕山德的确能力出众。

但是，吕山德的祖国斯巴达似乎是一个靠战士之魂生存的国度。它甚至不允许吕山德参加置雅典于被告席的媾和会议。

如果吕山德出席会议，也许会采纳一心报复雅典的科林斯的强硬意见。科林斯和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在斯巴达的指挥下同雅典打了30年仗，终于坐在了媾和会议的战胜者席上。这些城邦强硬地主张杀光雅典全部成年男子，把女子和儿童卖为奴隶，并把雅典城区夷为平地。

吕山德不但未被允许参加媾和谈判，还不得不远离雅典去镇压提洛同盟瓦解后唯一站在雅典一方的萨摩斯岛。代表斯巴达出席会议的是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面对主张把战败的雅典从地图上抹去的科林斯和底比斯的代表，年轻的国王厉声道：

“难道你们忘了吗？你们的国家至今作为自由的城邦存在，你们能够作为自由公民发言，这一切拜75年前雅典率领希腊人赶走入侵的波斯

人所赐！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最终，雅典的男人没有被杀，女人和儿童也没有被卖为奴隶，城区也没有被夷为平地，以帕特农神殿为中心的整个卫城都以伯里克利建造的模样留存下来。

各城邦的代表们并非因年轻国王的当头棒喝而恢复了理性。斯巴达是战后希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在这一事实面前，任何人都只有沉默了。

这一年秋天，帕萨尼亚斯与吕山德再次对立，也是因为如何处置雅典的问题。

战后不久，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控制了雅典，但他们因实施恐怖政治而失去了市民的支持，逃亡国外的民主派得以回国。

充满危机感的克里提阿向吕山德求援。后者憎恶民主派是出了名的。吕山德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请求。

然而斯巴达国内又来了另外的命令。国王率领正规军前去援助雅典的寡头政权，吕山德要负责指挥左翼参战。

斯巴达的惯例是国王率领右翼部队出站。这样国王率领的正规军可把握战斗的大方向，而指挥左翼的吕山德则归帕萨尼亚斯指挥。

雅典民主派和寡头派在比雷埃夫斯港近郊展开内战，如果斯巴达军队参战，胜负恐怕在战斗打响之前便会见分晓。民主派必定会被永久驱逐出雅典。

然而，斯巴达军的最高司令帕萨尼亚斯几乎没和敌方发生正面接触便率领全军迅速回国了。吕山德只能跟着国王撤退。结果“三十僭主”的领袖克里提阿战死。失去领袖的雅典寡头政权失势，民主政权在雅典复

兴了。

因为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并不同情雅典的民主派。

他只是认为，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没有能力把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强加给其他城邦国家。

间接施压要发挥需要适度的量。

希腊的城邦数量众多。我认为，斯巴达国王认识到了要向所有这些城邦施压，即使是“间接施压”，仅靠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重装步兵肯定不够。

吕山德只会打仗而不具备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一定在想，如果希腊的所有城邦都实行寡头政体，那斯巴达会一直保持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

这两者的对立是象征着既有势力的国王与久经沙场的军官之间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一直是帕萨尼亚斯占据着优势。在这个时期，帕萨尼亚斯身边的监察官共有5人之多。

执意护宪

讲到斯巴达就不能不提起5位监察官，因为斯巴达独特的监察官制度左右着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各个方面。极端地说，斯巴达是一个由监察官管理的社会。

两位国王的工作只是率领重装步兵团奔赴战场，在那里指挥战斗而已。

重装步兵是斯巴达的骄傲，他们只要想着“战场上不能逃跑，上战场不是战胜就是战死”就好。

只有一万人左右的重装步兵具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每年公民大会选出5位监察官。他们自认为是“吕库古法的守护人”。他们的工作涉及国内外的政治事务，这在斯巴达社会中是很自然的。所以，雅典将军去斯巴达交涉，其对手不是国王而是监察官。

这个乍看上去铁壁一般牢固的监察官制度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是监察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规定不可以连任，国家政治因此缺乏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第二是监察官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重装步兵中选出，虽然他们有丰富的行伍经验，却无任何做总司令的经验。

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战场上士兵用肉体战斗，而总司令用头脑战斗。雅典的司令官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军队的总司令。

由于有监察官制度发挥作用，斯巴达至此已经享受了300年国内安定的局面。问题出在斯巴达成为唯

一的霸权国家之后。

斯巴达成为希腊唯一霸权国家两年之后，对监察官制度是否继续有效的考验不期而至。

公元前402年，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发来求援信，请求斯巴达派遣军队前往波斯本土。

信中所写的请求派兵的理由是，居鲁士要推翻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统治，自己当国王。

信里还说伯罗奔尼撒战争能以斯巴达的胜利结束，是因为有小亚细亚西部最高领袖居鲁士提供资金援助，这次轮到斯巴达帮助他了。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的确，战争末期波斯向斯巴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吕山德用这些资金打赢了绵延30年的战争，这是事实。

不过，以前我帮过你，这次轮到你帮我的逻辑，在个人之间可以成立，到了国家层面就不一定了。如果帮忙的结果是负面的，损失是要加诸整个国家的。这时领导人需要冷静地做出判断。在国家层面，即便结果是拒绝对方的请求，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况且，国王的弟弟居鲁士造反的理由太牵强。

现任国王是居鲁士母亲所生的胞兄。居鲁士认为哥哥只因出生早就登上了王位，这违反人伦，所以他要造反，要自己当国王。这就是居鲁士的理由。所谓“违反人伦”的根据是，哥哥是父亲尚未登上王位时所

生，而自己生于父亲登上王位之后。对于这样的说法，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有很多人感到诧异。

如果说哥哥是暴君，或者是个不适合占据王位的无能之辈，即使在规定长子继承的波斯王族，大概也能成为弟弟取而代之的“理由”。

可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性格温厚、统治有方，也不是一个好战的国王，推翻这样的国王而由弟弟取而代之，这对波斯人能有多少说服力呢？

居鲁士这时50岁上下，年富力强，一直野心勃勃，他已经无法再等下去了，便仗着母后更加宠爱自己举旗造反。面对这种情况，肩负国家政治使命的斯巴达监察官自然要谨慎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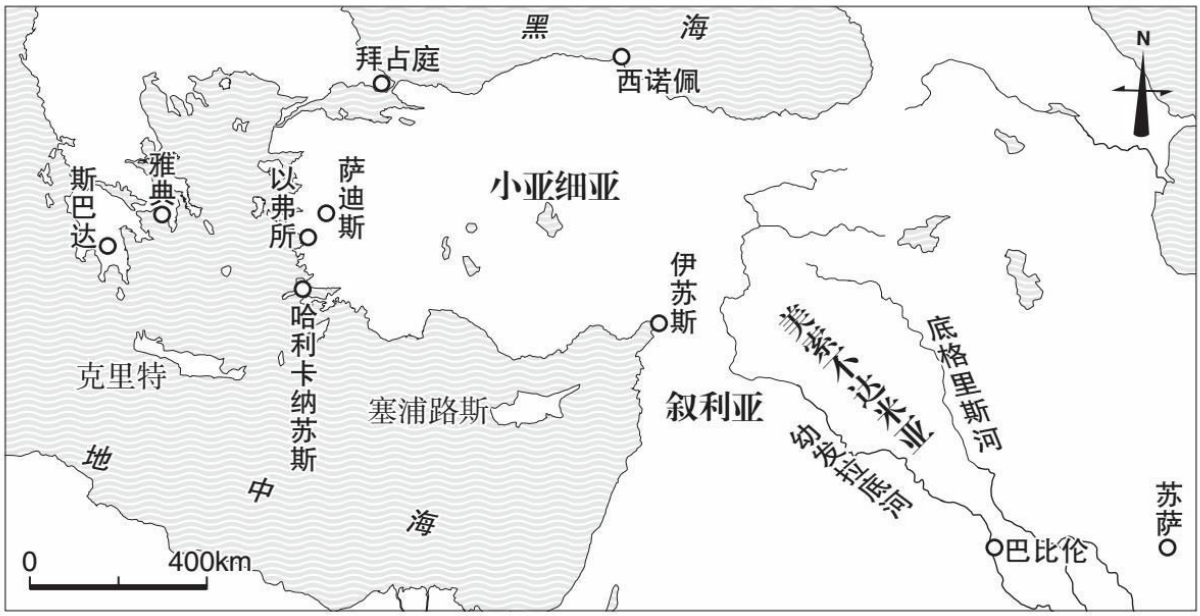
帕萨尼亚斯似乎反对援助居鲁士的冒险行为，另一位国王阿基斯年老卧病在床。而那年担任监察官的5个人在远见和判断力方面又令人怀疑。

最后斯巴达接受了居鲁士的请求，决定派斯巴达军队去帮助国王的弟弟。

这次他们又选择了以前曾经用过的做法。

他们没有派国王率领斯巴达正规军出征。司令按规定由斯巴达人担任，但在他指挥下打仗的士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来的志愿者，居鲁士负责付给他们报酬。

居鲁士同意了这个条件。第二年即公元前401年，由希腊人组成的居鲁士援军在小亚细亚的波斯城市萨迪斯集结。



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

色诺芬笔下的《长征记》是一部叙述希腊联军行进6000公里撤回希腊的非虚构类杰作，绝非单纯的打斗故事。

色诺芬参加此次行动时年仅二十多岁。他虽然位列末席，却不愧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他能够冷静、准确地认识现状，阅读他的这部作品能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并使我们思考。对一名哲学家来说，不带偏见地认识现状是最基本的要求。

集结在萨迪斯的斯巴达的军队规模，仅主力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几乎都是希腊人。其中，斯巴达的士兵和指挥官有1700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总共只有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虎狼之师”，有1700人要送出国去，这行吗？

斯巴达已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需要向希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哪怕只是震慑。此时斯巴达应该没有余力向波斯派兵。为什么斯巴

达的监察官没有想到这些呢？

斯巴达以外的志愿兵来自色萨利等希腊各个城邦。有研究者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失业的老兵们一齐前来报名了。

如果唯一的霸权国家斯巴达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希腊其他城邦的志愿兵起初由本国指挥官率领，现在要受斯巴达人指挥了。

已经归在斯巴达羽翼下的雅典也来了30名骑兵，色诺芬也许就是其中一人。

此外，斯巴达派出了35艘三层桨战船组成的斯巴达海军。所谓“斯巴达海军”的舰船全是从投降的雅典缴获来的，其船长、水手、桨手都是雅典人。

率领军队的总司令是斯巴达武将克雷阿尔克斯。他可不像吕山德，他不是斯巴达社会的非主流势力。据色诺芬说，他公正仁义，给人以典型斯巴达勇士的印象，没有那种可以参透人心的狡诈。

可惜后来他中了波斯的奸计，在部下尚未开始6000公里撤退行动时，就遭到了暗算。

其他斯巴达将领是一群和克雷阿尔克斯一样的人。于是，年轻的雅典人色诺芬脱颖而出，成为撤退行动的领袖。

斯巴达就这样响应了居鲁士的请求。

大概作为斯巴达实际管理者的5位监察官认为，没有国王率领的军队不是斯巴达正规军，所以没问题。可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斯巴达都明

摆着在全面支援居鲁士。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斯巴达军”远征到美索不达米亚时，在靠近波斯首都的地方与现任国王的军队打了一场会战，取得了胜利。

可是，急于亲手打败哥哥的居鲁士冲到第一线，结果遭到国王部下反击，不幸身亡。不论古今东西，统帅的生死时常左右着战斗的结局。斯巴达一方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得知居鲁士死亡的消息后，他们面对重新起势的波斯军只有逃跑。

这就是6000公里突破撤退行动敌营的肇始。他们要摆脱打着消灭叛军旗号的波斯国王正规军的追击。历经6000公里回到希腊自然要耗费两年的时间。

我们只能认为，答应居鲁士的请求对斯巴达而言是彻底的愚策。

斯巴达的这次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发生在击败长期对手雅典仅仅3年之后，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第3年。从此之后，斯巴达与波斯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已经是可以充分预测到的事情。

斯巴达在外交方面犯错并非始于这件事。但这一年与以往不同。公元前399年，色诺芬把撤退行动活下来的5000人交到斯巴达统治者的手上。斯巴达上层围绕支援居鲁士失败一事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

这场冲突发生在国王帕萨尼亚斯与5位监察官之间。

远征波斯的失败使得大家都认为帕萨尼亚斯现在应该有力量弹劾监

察官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吕山德站在监察官一边。

按说农奴出身的吕山德不是国王的对手，但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功臣，这是斯巴达人承认的铁定事实。也就是说，在斯巴达，这个身经百战的人已经成了有威望的人物。

尽管如此，吕山德一直被排除在重要事务的场合之外，例如与雅典的媾和谈判、响应雅典寡头政权的请求出兵……排斥他的总是帕萨尼亚斯。

吕山德站到监察官一边，并不是因为他拥护5位监察官所制定的斯巴达的对外政策，而是对他这个被排斥的非主流人物而言，监察官更容易成为自己人。

还有一个人也站在监察官一边。他就是一年前刚刚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二世，他支持监察官也是出于个人原因。

斯巴达自古规定由两个王族各出一人担任国王。眼下国王是帕萨尼亚斯和阿基斯。阿基斯寿终正寝。他有一个亲生儿子，但尚未成年。

斯巴达王室的惯例是，在正统继承者尚未成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伯父等近亲担任监护人。

可是，前国王的弟弟、44岁的阿格西劳斯不想做侄子的监护人，而是要自己当国王。虽然他在练武时受伤行走不便，但他似乎不甘心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卧室里度过后半生。

斯巴达是个尚武的国家，凡是身体有缺陷的新生儿都得被从悬崖上扔下去摔死。因此不难理解阿格西劳斯身有残障便心情不好，想着自己若是当国王就好了。

不管斯巴达人的接受度如何，要篡夺正统继承人的王位，理论武装

必不可少，而且还需要有支持者。

阿格西劳斯的支持者是被帕萨尼亚斯弹劾的5名监察官和怨恨帕萨尼亚斯的吕山德。

阿格西劳斯主张，前国王的儿子不是国王阿基斯亲生的，是当时逃亡到斯巴达的阿基比亚德与国王之妻的私生子。吕山德旁敲侧击道，阿格西劳斯虽然身体有缺陷，但他与前国王一样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之子，这一点是清楚的。对照吕库古法典，相比可能吕库古有雅典血统的年轻人，阿格西劳斯这样的人当国王更加靠谱。自诩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对这一说法都不持异议。

就这样，作为王子成长到15岁的列奥提基达斯（Leotychides）没能当上国王，他的叔父登上了王位。

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占据王位40年。据说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每年5位监察官就任时向他们送贺礼。每当他们进入公民大会会场，他都会不顾国王身份起立欢迎。

此时，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矛盾尚未爆发。帕萨尼亚斯的权威尚不可动摇，而斯巴达内部有不少人对依靠监察官的国内外管理体系抱有疑问。帕萨尼亚斯在那个时期一直在专心为改革监察官制度扫平障碍，他在谋划修改“宪法”。

4年过去了。公元前395年，火山爆发了。那年，吕山德战死疆场。失去有力支持者的监察官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再不出招，监察官制度将面临崩溃。

捏造罪名是历代监察官的拿手好戏，他们以反叛国家罪传唤国王帕萨尼亚斯。

帕萨尼亚斯的祖父也叫帕萨尼亚斯。公元前479年，他率领斯巴达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打得波斯大军落花流水，因而成为与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比肩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的英雄。此后他被监察官诬陷，因而逃进了神殿，最终饿死。

他的父亲普雷斯托阿纳斯也是监察官制度的牺牲品。普雷斯托阿纳斯对监察官要向雅典开战的决定心怀不满，以秋天将近不适合作战的理由解散军队，回到了国内，使监察官大为光火。结果，他被套上一个私通伯里克利的罪名，被迫退位。

帕萨尼亚斯一家三代都与监察官对立。

这一代的帕萨尼亚斯没有理睬监察官的传唤令，逃到了邻国阿卡迪亚，在那里作为一个希腊人平安度过了15年。

帕萨尼亚斯选择逃亡，监察官也不再追究，让他的儿子登上王位了结了此事。既然已经挫败了帕萨尼亚斯修改宪法的尝试，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监察官成功地排挤走帕萨尼亚斯，却使斯巴达永远失去了脱胎换骨的机会。

此后，斯巴达所谓霸权国家的地位只维持了20年。

阿格西劳斯在王位上坐了40年，亲眼看到斯巴达跌下霸权国家的位置。不仅如此，他还亲眼看到了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公民兵变佣兵

我认为，希腊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审判苏格拉底所反映出的自信丧失，也不是斯巴达人身上的那种古板僵化，而是希腊的男人曾经为自己国家而战，如今被其他国家雇佣为别国而战。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兵变成了佣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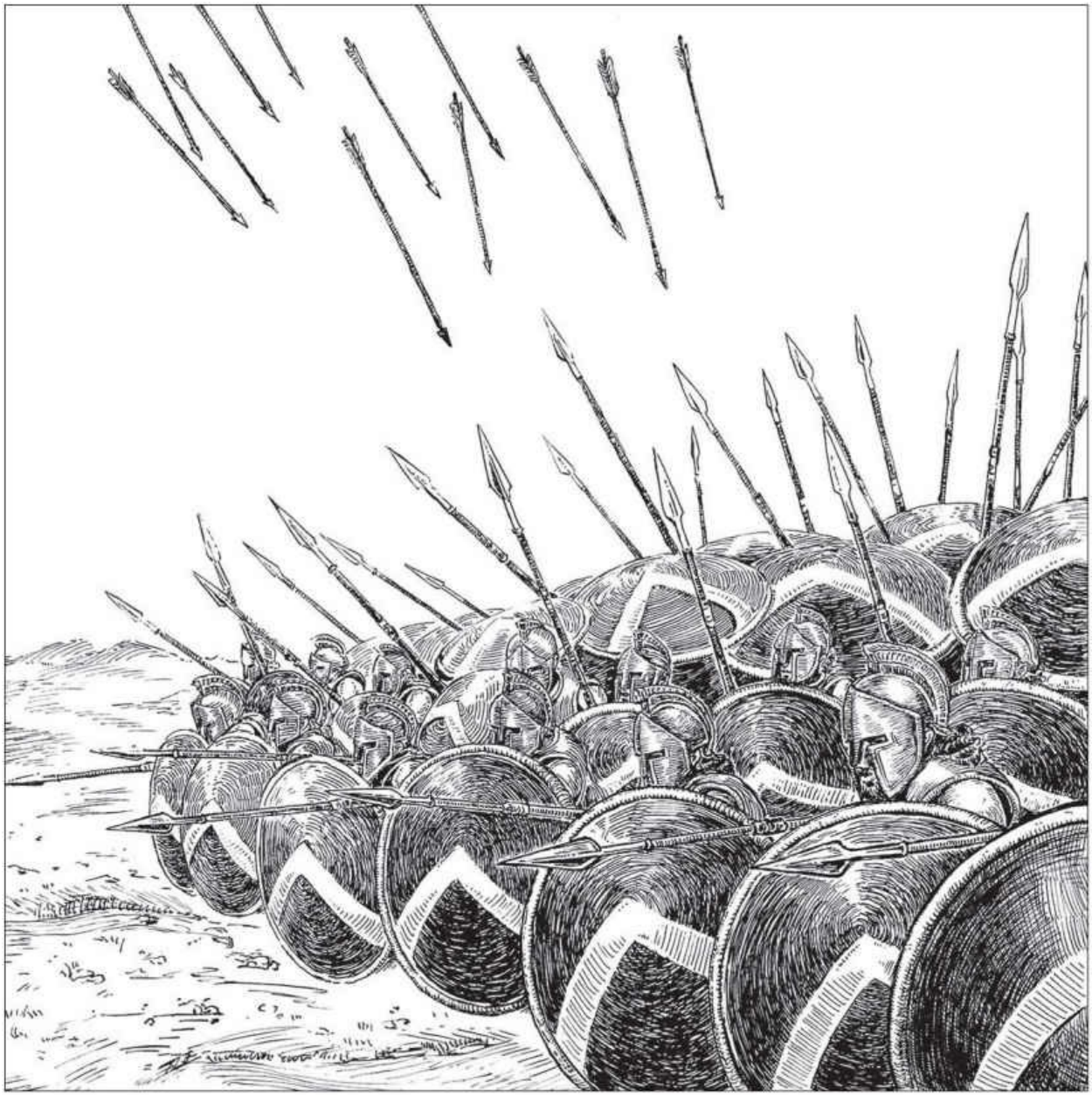
雅典人色诺芬的《长征记》详细叙述了对佣兵化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很有历史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波斯以雇佣海军打击敌人斯巴达为由，用钱悄悄抽走了曾经被伯里克利称为“熟练技工集团”的雅典海军。

这是雅典战败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不到6年的公元前401年，希腊的重装步兵又被波斯的金钱之力悄悄抽空。

斯巴达深深参与到这两次事件之中。甚至可以认为，斯巴达正是导致希腊公民兵变为佣兵的主犯。

重装步兵是靠公民皆兵制度组织起来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公民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同时负有作为士兵保卫祖国的义务。

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将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的国家、工作、房产和家庭。以前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打仗却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佣兵制度是波斯的东西，没有人认为它与希腊有关。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会战之时（这场会战因马拉松比赛这一体育项目而名垂青史），公元前480年以及翌年，希腊人在海上的萨拉米斯和陆上的普拉塔亚两度大破波斯军队之时，在雅典和斯巴达分立的整个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语言里甚至没有佣兵这个词汇。

不到百年的时间竟至于此。

希腊公民兵的佣兵化导致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其最大的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如果佣兵只是被波斯人支付高额的佣兵费所吸引，这事也并非不值得同情。

自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战败国雅典以及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都在降低。士兵在长期战争结束后成为失业者，他们很难觅得其他工作。

在希腊民族中，雅典人在经济方面能力出众，而提洛同盟的解体使雅典人的经济活动大幅减少，这降低了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

人们有理由外出挣钱，但如果外出挣钱没有在祖国工作挣得多，就不合算了。波斯王弟居鲁士保证支付的佣兵费并不高，这让希腊人的佣兵化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可悲现象。

雇主是波斯人，支付的货币是波斯的大流克（daric）。这种钱币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由当时的国王大流士一世开始铸造的，于是有了这样的名字。希腊的通货叫“德拉克马”，波斯的通货叫“大流克”。

当时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大概是1大流克兑换20德拉克马。

居鲁士同希腊佣兵签订了每月每人1大流克的合同，折合20德拉克马。而雅典的劳动者（proletarii）据说1个月可挣15德拉克马左右。

不过，居鲁士承诺的这一佣兵费是在没有告知希腊士兵战争的对手是现任波斯国王的情况下给出的。

据说只有斯巴达派来的总司令克雷阿尔克斯从一开始便知道这一情况。

得知打仗的对手是波斯现任国王时，集结在萨迪斯的希腊人有一部分离队。指挥官跑得比士兵多，因而归克雷阿尔克斯指挥的士兵人数激增。决定留下来的士兵要求居鲁士提高佣兵费。

居鲁士同意了这一要求，佣兵费从每人20大流克涨到了30大流克。从金额上看，这是他们在国内月收入的许多倍。

但他们的雇主居鲁士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战死了，这些钱很可能并未支付。通过色诺芬的书，人们很难想象踏上撤退之路的希腊人在经济上很富裕。

总之，我们通过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雅典海军被波斯大批抽走的案例发现，波斯人付给希腊佣兵的报酬按月薪计算大约为1大流克，约合20德拉克马。

这比留在国内工作，算是增收了。

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希腊人当初只是外出挣钱，后来竟不再回故国，而在波斯居住下来，要以做佣兵为“生计”生活下去了。

在同一时期，雅典苦于财政危机，再也没有能力支付伯里克利时代起一直支付给水手的薪水。虽然雅典的造船技术仍是希腊第一，但却未能复兴海军。

在斯巴达，一直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也减少到了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50年以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最先在会战中遭遇的就是以希腊佣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

当必须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人去保卫别国的国家利益了，这条路的尽头自然是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这里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想问。

为什么庞大的波斯帝国要持续从希腊雇佣士兵呢？为什么不用本国士兵，要选择外来佣兵呢？尤其是为什么要雇佣重装步兵，而不招募轻装步兵呢？轻装步兵只要招够数量，农民也能成为战斗力。

斯巴达的品牌

过去，波斯一直以其陆军实力统治着整个东方，但它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雅典的重装步兵，又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斯巴达的重装步兵，败得毫无悬念。

以重装步兵为代表的希腊陆上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得到了实际验证。

那么，为什么波斯国王不在本国培养希腊式的重装步兵呢？

波斯资金实力雄厚又是大国，并不缺人。它虽然拥有人称“不死军”的一万人的常备军，但那是国王的近卫军团，不是可以左右战局的主力军。

希腊城邦国家无论在资金实力还是人力方面都远不及波斯帝国，为什么波斯帝国只能仰仗希腊人呢？

在我的脑海中，希腊主力重装步兵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对战败的波斯人来说不啻为一个“品牌”。与其拙劣地仿造品牌商品，不如直接购买来得快。况且，作为卖方的希腊已经分裂，连统一谈判都做不到，这就造成了买方市场。

尽管如此，为什么波斯就不能“国产”呢？

我们先不谈连最下层百姓都有公民权的雅典和只把一万名战士视为公民的斯巴达之间的区别。希腊城邦国家的中坚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部队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在这一点上，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以及底比斯都是一样的。

而在波斯，“不死军”的万名士兵不过是波斯国王的臣下。对他们而言，波斯不是自己的国家，波斯是波斯国王的国家。

因为士兵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所以希腊城邦国家能把重装步兵培养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士。波斯尚未培育出公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希腊式的重装步兵。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希腊重装步兵前往波斯谋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斯巴达过分偏向居鲁士的重大外交失误不到一年就让斯巴达付出了代价。

一向温厚的波斯国王被激怒了，国王的怒火当然指向了斯巴达。

虽然派来支援居鲁士的希腊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而来，但军队是在斯巴达的主导下形成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监察官们所谓的没有国王率领就不算斯巴达正规军的谬论是行不通的。

波斯国王决定动真格了，他把一直以来托付给弟弟居鲁士的将小亚细亚西部纳入波斯帝国计划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战争前线基地和以往一样设在了萨迪斯。波斯唯一一条正规铺装的道路“王之道”连接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苏萨和小亚细亚西部城市萨迪斯，特别适合转移部队和运送必需物资。

国王任命长年担任当地长官的提萨菲尔尼斯为此次对斯巴达战争的统帅。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是波斯派往斯巴达运送资金的人。现如今，他要同斯巴达开战了。

波斯“王之道”

如此一来，斯巴达只能奋起抵抗。

斯巴达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从雅典手上夺走了霸权，因而它有义务阻止波斯将其控制下的城邦国家以及毗邻岛屿纳入波斯领土。

然而，斯巴达一贯不擅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制定长期战略。

到了这种时候，斯巴达居然还不想投入正规军事力量而希望逃避过去。雅典人色诺芬率军完成了6000公里撤退的壮举以后，把生还士兵交给了斯巴达，他们全部被收编进反抗波斯入侵的斯巴达军队。

波斯国王的怒火喷向了斯巴达，他们在小亚细亚西部战场陷入苦战。

我们可以举出三个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首先，监察官每年全员更换，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决断，或者说监察

官制度本身不能承担做出决断的全部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斯巴达首屈一指的武将吕山德这时已经无力为斯巴达继续赢得胜利了。对他来说，农奴出身已不再是问题。他为人狡诈，善于把握机会。虽然其能力出众，但在手下的士兵中没有太高威望。他的手下对他并无敬意，他所命令之事有成果便跟随他，若无成果便弃他而去。

结果，尽管吕山德正处在45岁左右的人生黄金期，但爱琴海东部未能再次成为他活跃的舞台。

最后一个原因是，尚在王位上的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意见对立已经成为统一对外政策的障碍。5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解决，战士们却一直在白白流血。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人终于做出决断，他们高举保护爱琴海东岸希腊人的大旗，派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出战。

率领军队的是腿脚不便且年近五旬的阿格西劳斯。

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虽然年纪尚轻，但不能委以如此重任。他根本不想隐瞒自己与监察官之间的对立。把军事力量交给这样一个人十分危险，监察官们还是懂得这一点的。

阿格西劳斯率领的是斯巴达正规军，但他来到小亚细亚后战果平平。

色诺芬似乎与阿格西劳斯关系亲密，对他有上佳的评价。就个人而言，这位斯巴达国王性格开放，虽贵为国王却与当时尚籍籍无名的色诺芬关系亲密。

阿格西劳斯能够当40年国王，是因为他一直和监察官保持良好关系。其实正如他的战绩所反映的那样，他并无特别优秀的军事才能。

国王亲自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第一次远征希腊本土以外的地方。

斯巴达军把波斯军队赶到萨迪斯，双方在郊外激战一场，最终打败了提萨菲尔尼斯率领的波斯军。

波斯国王对此又是雷霆震怒。

这位提萨菲尔尼斯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利用金钱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居鲁士事件中用计暗算过克雷阿尔克斯及其副官。如今他已年届五旬，不幸被愤怒的国王下令斩首，结束了一生。

不到两年，阿格西劳斯也被召回希腊，原因是希腊本土已结成城邦国家联盟，它们举起了打倒斯巴达的旗帜。

这又是波斯国王伸出“长手”造成的。

波斯国王断定，只要本国陷入危险，阿格西劳斯只得回国。同时，波斯国王的金钱流向了希腊各个城邦。

就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在十年后被拖入在爱琴海东西两面作战的境地。

如今爱琴海的制海权已被波斯夺走，斯巴达已经不能称为霸权国家了。

就在国王阿格西劳斯回到希腊的那年，留下保卫小亚细亚的斯巴达海军败给了波斯海军。

斯巴达海军船员都是雅典人，他们的对手波斯海军的舰长及手下也

都是雅典人。希腊人成了波斯海陆两军的佣兵。

斯巴达没有公布打了败仗的消息，政府担心这会助长反斯巴达的希腊各城邦的势头。隔着爱琴海军队不能自由往来，国王阿格西劳斯和监察官们大概都明白两面作战的困难。

这一年帕萨尼亚斯不再是斯巴达的国王。如前所述，他与监察官的冲突爆发后他被人告发，逃往邻国。空出来的王位便由帕萨尼亚斯二十来岁的年轻儿子继承。

此时决定斯巴达内外政策的仍然是5名监察官和从不违逆他们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然而，面对在小亚细亚与波斯的战争，以及在希腊本土与底比斯、科林斯和雅典的战争，斯巴达终于顶不住了。

如果不摆脱这深陷8年的泥淖，斯巴达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

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签订了被称为“国王治下的和平”的媾和协议。所谓“国王治下”是“波斯国王治下”，这已经说明了这个协议的性质。

把希腊售予波斯

波斯国王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也就是说，波斯以后不再染指爱琴海西面的希腊本土。

作为交换，斯巴达正式承认爱琴海小亚细亚西岸一带及其毗邻岛屿的领有权归波斯国王所有。

小亚细亚西岸及其毗邻岛屿在古代多被称为“爱奥尼亚”。这一带也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在文明之花转移到雅典全面绽放以前，一切都诞生于此。

哲学之父泰勒斯来自米利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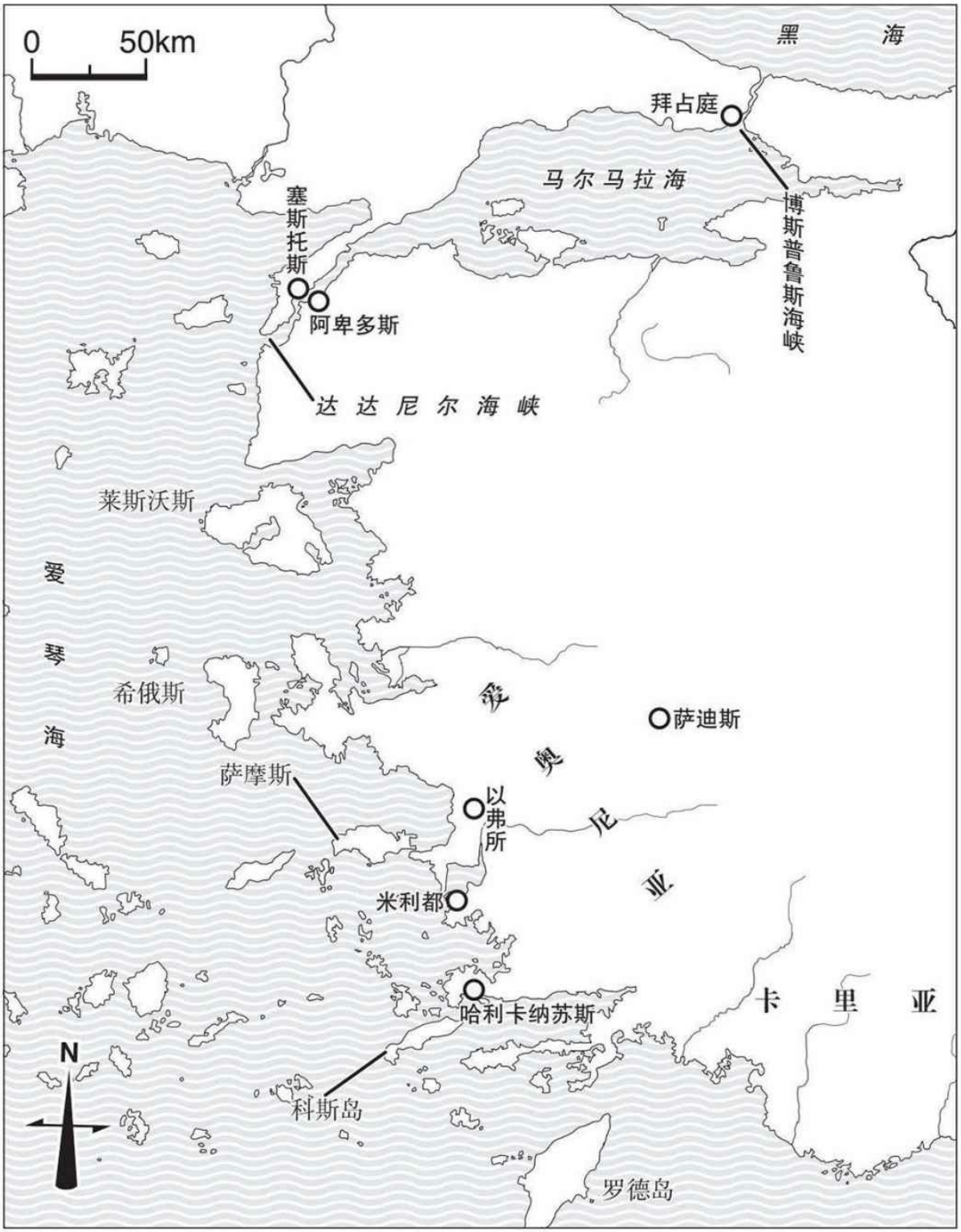
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岛。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来自科斯岛。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纳苏斯。

这里的居民一直都是希腊人。

正因如此，当波斯国王派军企图占领这里时，他们遭遇了全体希腊人的奋起反抗。


0
50km
黑
海
拜占庭
马尔马拉海
博斯普鲁斯海峡
塞斯托斯
阿卑多斯
达达尼尔海峡
莱斯沃斯
爱
琴
海
希俄斯
爱
奥
尼
亚
萨迪斯
萨摩斯
以弗所
米利都
哈利卡纳苏斯
卡
里
亚
N
科斯岛
罗德岛

爱奥尼亚地区及其周边

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的“第一次”和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腊人参战不只是为了保卫希腊本土，还为了保护爱琴海彼岸爱奥尼亚的希腊人。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获全胜后，希腊人立即派海军把波斯势力彻底赶出了爱琴海。对希腊人来说，爱琴海彼岸同样也是希腊世界。

然而不过百年，准确地说是在93年以后，爱奥尼亚被卖给波斯国王。波斯在93年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从此，在希腊人的历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爱奥尼亚被划入了波斯帝国，直到50年后才由亚历山大重新夺回。

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听说波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国王治下的和平”，恐怕不会有以前的感慨了。

以这个时期为拐点，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对斯巴达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向斯巴达低头吗？不，绝不！”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从此时到斯巴达的权威完全崩解还有15年。

这并不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强大到让他国无力反抗，而是因为科林斯、底比斯、雅典这些希腊强国对付斯巴达的步调还未一致。每当这些城邦要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时候，这三个城邦中总会有一个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样的状态反反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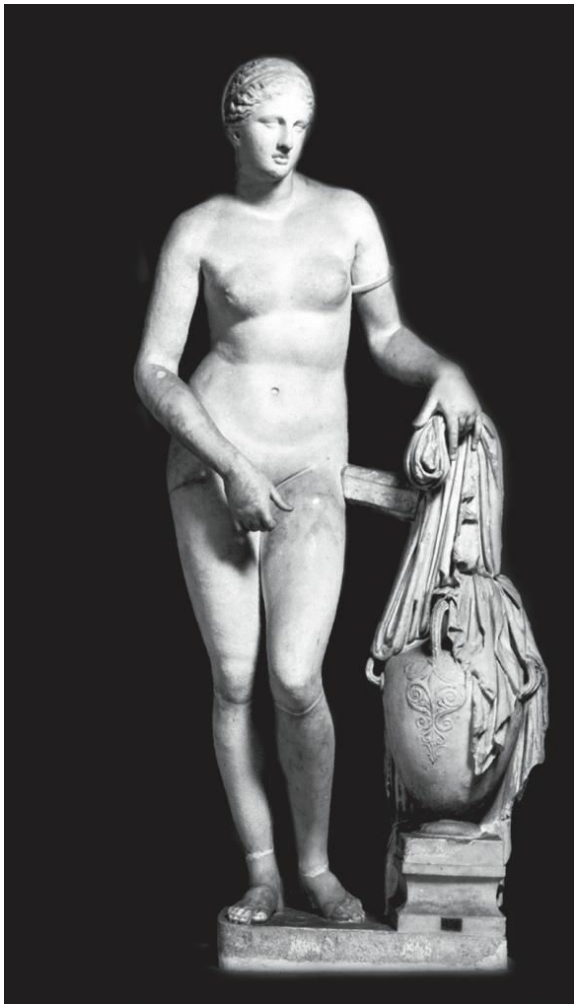
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71年的33年，在历史学上称为“斯巴达霸权时代”。不过，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学者讽刺的反话可能更接近真实情

况。

斯巴达人没花多少时间便明白了，他们出卖爱奥尼亚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的“保证”只是一纸空文。

话虽如此，“斯巴达霸权时代”仍延续了15年，因为没有其他城邦国家可以取代斯巴达。

科林斯一如既往不具备承担风险、挑头干事的能力。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维纳斯像

雅典在经济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海运能力也基本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海军未能发展起来。

海运用帆船就行，还可以少用些水手。但海军不能缺少不受风力影响的三层加莱船。这个时代的雅典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无力为这种船所需的众多水手提供保障。

然而，雅典不愧是雅典。在文化方面，雅典仍然是“希腊的学校”，一如伯里克利曾经说过的那样。

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他生活在雅典政治、军事活动都持续低迷的时代，继菲狄亚斯和米隆之后成为古

典时期造型艺术的最后接棒人，施展了全部的才华。

在爱奥尼亚被斯巴达卖给波斯的前一年，即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的“学院”开张了。

柏拉图不在教室里教学，而是在雅典郊外树木掩映之处边漫步边教学，因而又被称为“逍遥学派”。他的学院汇集了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从马其顿来留学的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一位。

传说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20年，其后他在雅典郊外的吕克昂开办了一所学校。

相传为每天参见苏格拉底的年轻人建的体技训练场就在吕克昂。亚里士多德开办的学校因此也被称为“吕克昂学园”。这所学校提供升入“学院”以前的教育。

如今由“吕克昂”这一名词演化而来的法语单词“Lycée”和意大利语发音“liceo”一直沿用至今，意思是一种5年制的高中，教授升入大学所需的全部科目。

我们不仅在哲学、数学、医学、历史、建筑、造型美术方面得益于希腊文明，而且还在民主政治到教育制度方面得益于古希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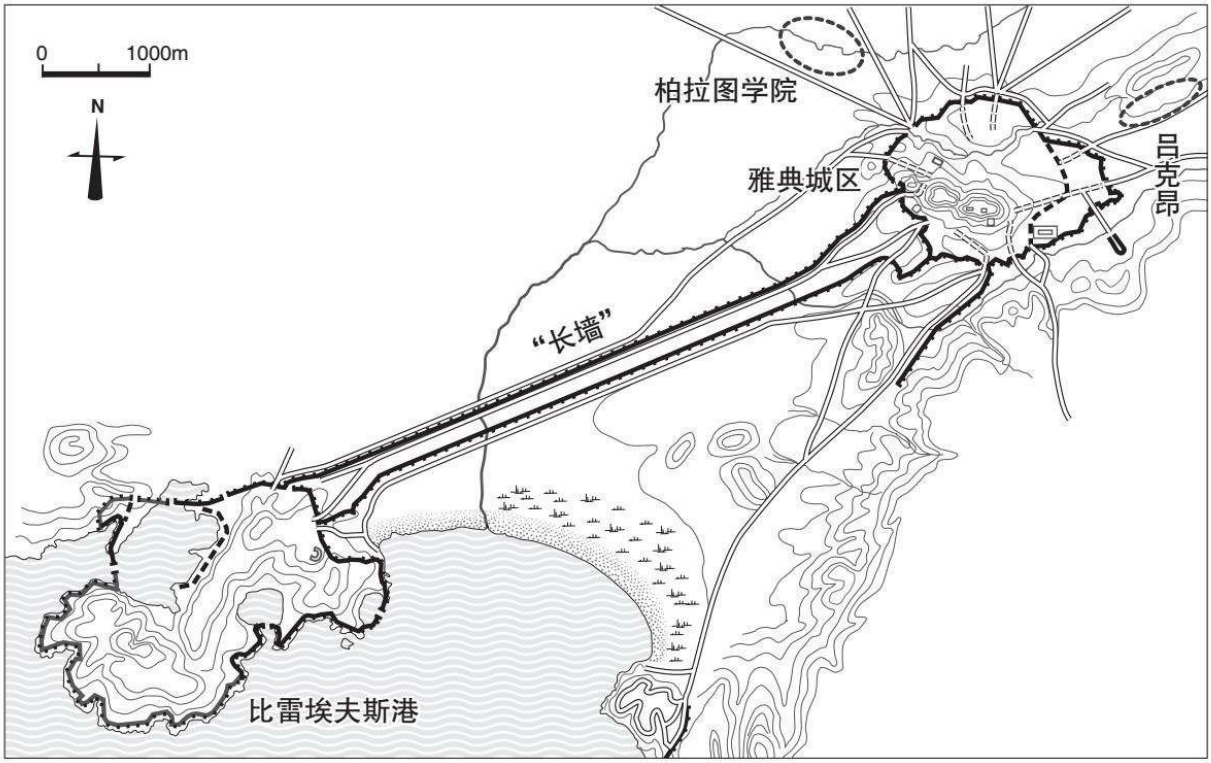
希腊人继续创造着辉煌的文明，尽管他们被波斯的金钱所摆布。

斯巴达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签订“国王治下的和平”之约的做法，当然会让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产生某种感慨。

为使自己的霸权存续下去，霸权国家必须要有某种理由使其辖下的国家接受现状。这种理由可以单纯，却必须有魅力。

由于吕山德高压而龌龊的做法，巨额资金流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获胜的斯巴达。



雅典城区及其周边

我真希望他们能用这些钱从雅典招来艺术家和匠人，建造起一座胜过帕特农神殿的壮丽神殿。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定是自诩为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没有允许，理由是这种做法违背斯巴达质朴刚健的信条。

既然这样，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拿手技能，在斯巴达开设一所“西点军校”那样的培养高级军人的学校，向全希腊的年轻人开放。然而斯巴达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点。

就算他们这样做了，希腊其他城邦来的年轻人真能忍受冬天住帐篷、睡在草上、吃天下最难吃的炖肉杂烩这样的生活吗？

结果，斯巴达从提洛同盟各加盟国搜刮来的巨额资金在德尔斐的阿

波罗神殿里做了一辈子“存款”。

一句话，斯巴达没有吸引外国人的魅力，除了军事力量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创造过。许多年后，建立罗马帝国并把希腊纳入其中的罗马人只给雅典和斯巴达“自由城邦”的特殊待遇，认可它们拥有除了发动战争以外的所有自由，对它们曾经创造的文明表示敬意。

此外，罗马人还给这两个城邦经济援助，尽力帮助它们振兴。

然而，罗马人的这种做法只在雅典产生了一定效果，斯巴达什么都没能留下，想振兴也无济于事。

2400年后的今天，人们去雅典可看的东西很多，那里的宝物数不胜数。

可斯巴达没有什么可看的，那里什么都没有。

那里只有与波斯大军作战，在温泉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列奥尼达；在普拉塔亚平原把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帕萨尼亚斯；与雅典的伯里克利合作开辟了斯巴达30年和平时代的阿希达穆斯。

造访斯巴达，人们只能产生这些壮士曾经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感慨。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一座雕像。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介绍过许多雅典人的容貌，但我却介绍不出斯巴达男人的长相。

我一直觉得，斯巴达轻易地把希腊文明发祥地爱琴海东岸割让给波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对文明、文化不感兴趣。

到了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唯一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也面临着危机。

就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迷茫徘徊之时，它们中唯一崭露头角的底比

斯从正面向霸主斯巴达发起了挑战。此时连波斯国王都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

第三章
底比斯的极限

底比斯双雄

60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时，位于雅典以北70公里的底比斯就已经是一个城邦国家。它一直是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员，本不该对斯巴达发起攻击。

底比斯从正面发起挑战，让斯巴达的霸权显得更加脆弱。

这个时期的底比斯有两位了不起的人物。

一位是佩罗皮达斯（Pelopidas）。他出身底比斯名门，在祖先传下的辽阔农庄里长大。传说他生于公元前4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刚刚16岁。

也就是说，他在战争胜利者、唯一的霸权国家斯巴达强制推行的“寡头政体”下度过了他善感的青春时代。

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内部爆发了国王帕萨尼亚斯与5名监察官之间的冲突，其核心原因如下。

帕萨尼亚斯主张给予斯巴达霸权下的各城邦选择本国政体的自由。但监察官主张，它们既然已纳入斯巴达的辖下，就必须改为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两者意见抵牾。

公元前395年，帕萨尼亚斯被判叛国罪，他逃亡邻国。此后，斯巴达的对外政策统一为一条路线，即监察官和另一位国王阿格西劳斯的路线。

也就是说，已率先采用寡头政体的城邦国家不会有问题。若有城邦拒绝寡头政体，斯巴达会派军驻于该国，驻军会监督其建立寡头政体的

政府。底比斯就有斯巴达的驻军基地。

从社会地位和资金实力方面看，佩罗皮达斯应该对少数人领导的寡头政体抱有亲近感。然而，他是一个农庄经营者。

经营一个大型农庄需要很多人。为了用好包括奴隶在内的整个团队，即为了人尽其才，农庄主要考虑每个人的个体需求。

于是，据说很有才能的农庄经营者佩罗皮达斯出于现实需要成为民主派。而且，他对常设驻军基地、骑在底比斯人头上的斯巴达持敌视态度，因此是反斯巴达派。

比佩罗皮达斯小两岁的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同样出身名门，但他并非出生于大农庄主家庭，家庭经济可能也就是中上水平。他因父亲的安排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倾倒的哲学青年。

当时的哲学家中反民主派占比很高。就像柏拉图一样，青年时代的埃帕米农达斯似乎也是一位寡头派。

尽管成长环境不同，但上述两人都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热衷于提高体能和武艺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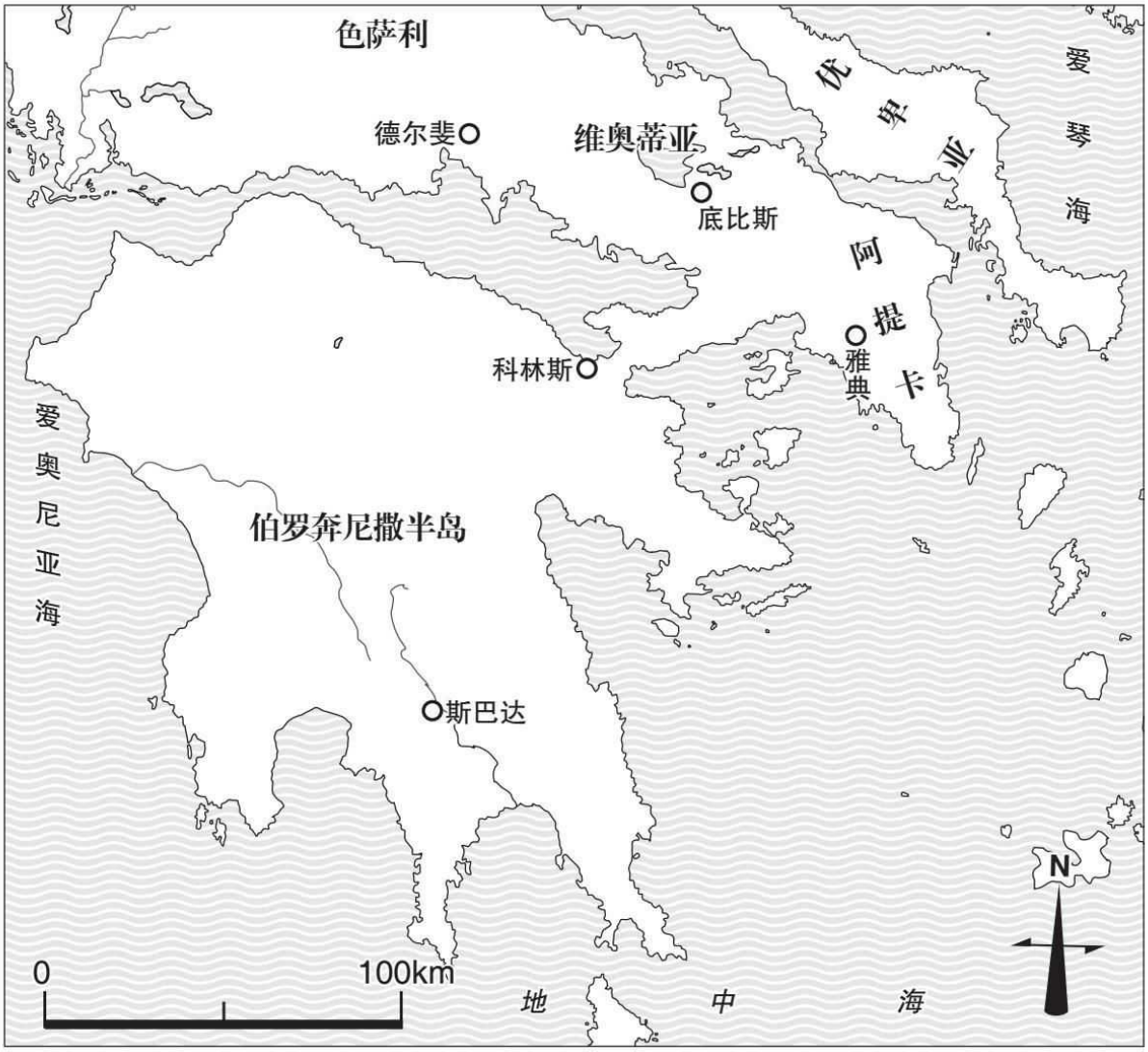
底比斯也是希腊城邦国家。男人一到成年就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大家将来都要上战场，谁都不愿意因为疏于锻炼而在战斗一开始就战死沙场。

如果想当指挥官，就更要提高武艺水平。很多事自己不会就无法命令下属去做。

古代名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比士兵更擅长武艺。士兵不服气就不会跟

着将领征战。

希腊的城邦国家政治上不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寡头政体，男人们只要年满20岁都要登记服兵役。“底比斯双雄”就邂逅于战场。



底比斯及其周边

当时，两个人并不在同一支部队作战。得知佩罗皮达斯指挥的部队陷入苦战后，有一支部队被派去增援，埃帕米农达斯就在这支部队。战况对己方来说已经是令人绝望的局面。队长佩罗皮达斯身负重伤，被压在战死的士兵尸体下面，看上去像是已经战死。

面对这样的战局，增援部队无法继续前进。敌人占据优势、气势正盛，若贸然杀入敌阵，增援部队很容易被全歼。

然而，埃帕米农达斯与众不同。他一个人手握长矛冲入敌阵。他的胸甲被敌人的长枪刺中，左臂也被敌人的长剑砍伤，但他仍在一步一步接近倒地不动的佩罗皮达斯。

底比斯年轻人作战时像狮子一样迅猛。斯巴达国王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当时，底比斯还和斯巴达站在同一战线上。

尽管二人都身负重伤，但他们最终还是得救了。这场战斗是35岁的佩罗皮达斯与33岁的埃帕米农达斯之间友情的滥觞。他们之间的友情一直延续到21年后其中一人去世。不，应该说它一直持续到23年后两人均已过世时。后亡人在朋友去世后就当他依然活着一样，他们的友谊从未中断。

据说在战场外，他们两人的性格完全相反。佩罗皮达斯热情奔放，是个行动派，而埃帕米农达斯喜欢静心思考。

对祖国底比斯强烈的爱，对霸权国家斯巴达的轻蔑和憎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在此之前，他们二人并不认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不同是个问题。

公元前382年，佩罗皮达斯不得不亡命外国。那年他们一位38岁，另一位36岁。当时寡头派控制了底比斯政府，他们认为佩罗皮达斯是个危险分子。因此佩罗皮达斯只得逃亡在外达3年之久。

在这3年中，佩罗皮达斯曾精心策划了一个政变计划。公元前379年与公元前37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他带着11位同伴化装成猎人潜入底比斯。埃帕米农达斯也是他们的同伙，他在城里接应他们。

整个计划得到完美实施，政变非常成功。几乎没有流血，政府寡头派人士逃往国外。

希腊中部维奥蒂亚地区的实力城邦底比斯，在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

农达斯二人的完美配合和领导下，得到了统一。他们领导的政权既是寡头政权又是民主政权，尽管信仰某一种政体的人会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

重要的是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下，底比斯政局趋于稳定。此后的15年间，佩罗皮达斯一直处于一把手的位置。他死后的两年国家在埃帕米农达斯的领导下，依然政局稳定。

政治的稳定可以阻止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同雅典和斯巴达相比，底比斯只有中等规模，它只能彻底发挥自己拥有的全部力量。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倒斯巴达！既然对手是只有军事实力过硬的斯巴达，那就在战场上战胜他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底比斯双雄”完成了军制改革。

底比斯兵力较少，关键在于如何使其作用最大化。军制改革势在必行。

这两人研究出的战略战术，多年以后为马其顿国王父子所参考。其战略要点是有效利用步兵和骑兵。

另一个要点是创建特殊部队。这个部队由300名精英组成。尽管只有区区300人，却被冠以“圣队”之名。

底比斯军队的实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年之后考验到来。这次的敌人足够强大，那就是宿敌斯巴达。

结果底比斯轻松获胜。不过对手未拿出全部实力，公元前375年的胜利只是一次试验。

决策总是慢半拍的斯巴达开始在意底比斯的动向。

他们请求波斯国王召开会议讨论希腊和平问题，企图给跃跃欲试的底比斯刹刹车。

波斯国王10年前与斯巴达签订了“国王治下的和平”协议，斯巴达承认小亚细亚西岸一带为波斯国王的领土。作为交换，波斯国王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既然如此，波斯国王没有理由拒绝斯巴达的要求。他甚至对一有事就来找自己仲裁的希腊城邦怀有一种优越感。

然而，斯巴达在波斯首都苏萨进行的外交活动皆以失败告终。

第一，如果能保证波斯对爱琴海亚细亚西岸土地的所有权，波斯就把希腊本土让给斯巴达。所以波斯对希腊本土的各城邦国家已构不成威胁。

第二，希腊本土的各城邦国家已经感觉到斯巴达军事力量的衰微。斯巴达渐渐变得不再可怕。

最后，斯巴达要求底比斯放弃维奥蒂亚，底比斯坚决不从。

战火重燃只是时间问题。

打倒斯巴达

斯巴达先走了一步。

那年，执掌斯巴达内外政治的5位监察官命令国王克莱奥姆波罗图斯进攻维奥蒂亚。

克莱奥姆波罗图斯顶替逃亡的父亲帕萨尼亚斯登上王位，是位30岁的年轻人，以前也无战绩。而另一位国王阿格西劳斯已经70岁，此时卧病在床。

既然由国王率领，那就是正规军。于是，和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一样，有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加盟国的士兵参战。

与其说这是斯巴达军，不如说是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

迎战的底比斯一方也拉来同盟国对抗，组成了底比斯主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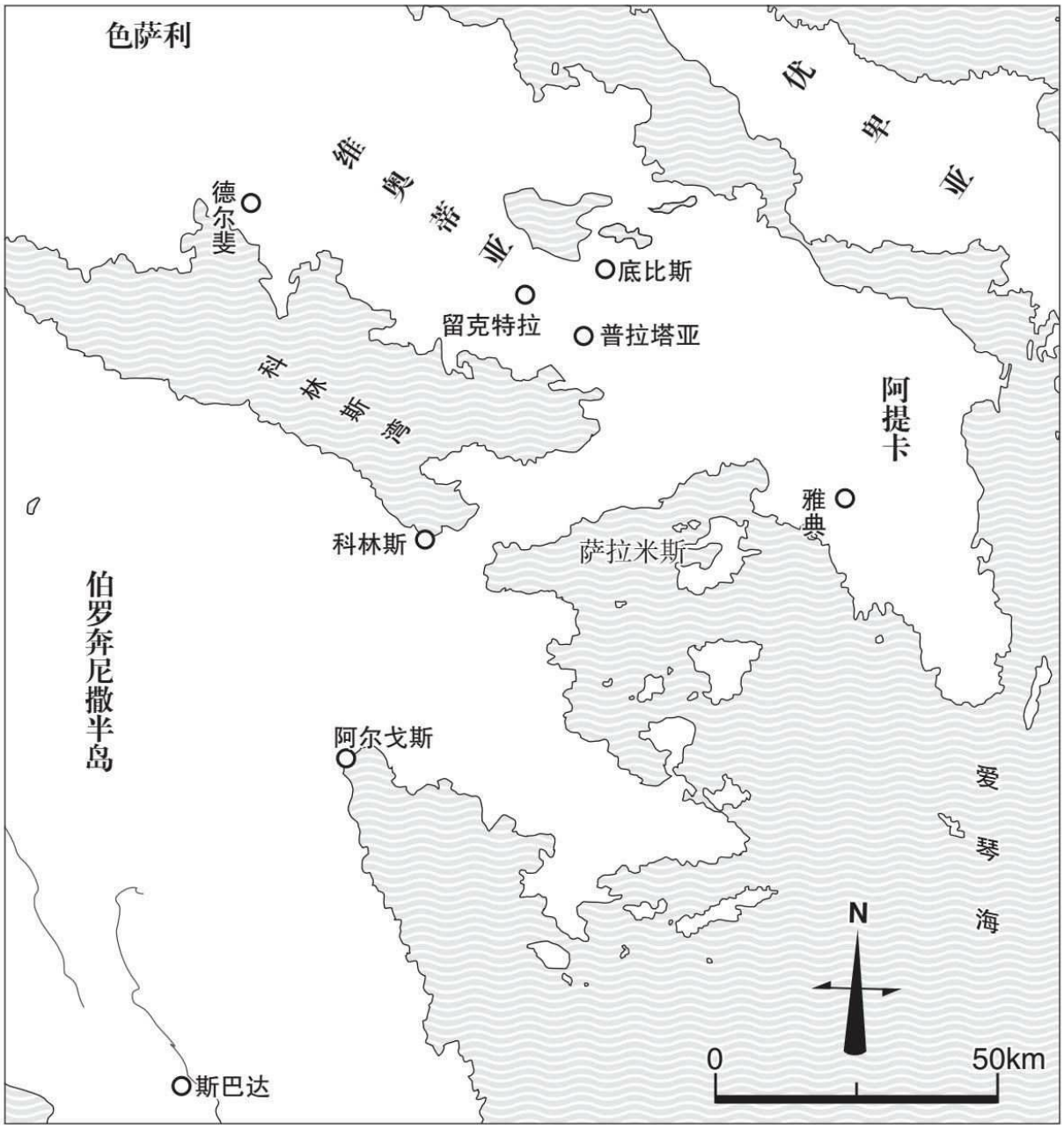
希腊的城邦国家规模都很小，一遇会战便会结成同盟参战，这已经成为惯例。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

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直指底比斯北上而来，士兵总数为一万人。

其中，斯巴达的主力是让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人数只有

700人。



底比斯及其周边

“700”这个数字令我愕然。

100年前的公元前479年，斯巴达在普拉塔亚平原上迎战波斯大军，他们投入了共一万人的主力部队，夺得了胜利。

100年后，这支主力军只剩700人。100年间人数不该如此锐减，这期间应该会有孩子出生让人口自然增长。

这个惨状应该是斯巴达应波斯要求输出佣兵造成的。

因为史家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佣兵的具体数量。当时的情况竟已发展到连国王率领的斯巴达主力中都有人去当佣兵的地步。

当斯巴达的社会精英——重装步兵远走他国，空缺是否得由来自北方落后地区的佣兵填补？

果若如此，斯巴达军力下降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如此，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阵型和战法都同全盛时期一样，并无变化。重步兵、轻骑兵的观念也毫无改变。

士兵接到战斗号令后的行进速度极慢。如果有“慢攻”一词，我真想用在这里。

即便如此，如果有“量”上的优势，攻过来的敌人也会感到压力，然而，他们仅有700人……

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聚集了一万名士兵，而底比斯主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只有6000人。

底比斯本身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邦国家，维奥蒂亚同盟也没有存在多年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那么团结。

不过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要论骑兵战斗力，底比斯方面占优势。

这正是“底比斯双雄”改革的成果。要想战胜斯巴达，只有依靠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速攻”。

“底比斯双雄”在战场上也做了分工。

埃帕米农达斯考虑综合战略，是全军的总司令。佩罗皮达斯冲在300人机动部队前面突击，拉开整个战线。

曾经醉心于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哲学青年，想出了任何人都不曾想到的战略战术。这一年他已经47岁。

公元前371年夏天，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北上来到维奥蒂亚南边的小镇留克特拉的郊外。

他们决定在这里设下战场，因为这里有一公里见方的平原，适合调动己方一万人的军队。平原西端有一个小山丘，可以在那里构筑营地。

战场是斯巴达方面选定的，但在家门口作战的底比斯更有“地利”。

留克特拉是一个沿河而建的小镇。在希腊的夏天，没有水的地方不能打仗。而这里河面狭窄、水流缓慢，周边还有面积适当的平原。希腊很少有这样的地势。底比斯知道斯巴达把留克特拉郊外作为战场后并未感到意外。

底比斯领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从战场东北仅15公里外的底比斯出发，由佩罗皮达斯带领进入战场。

联军构筑了营地，但只是平原上的“临阵磨枪”。“底比斯双雄”的想法是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之战。

斯巴达方面在平原中央布阵，远远望去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斯巴达军的阵型。

担任全军总司令的斯巴达国王在本国精锐重装步兵的拱卫下在右翼布阵。国王总是率领右翼，这是希腊军队的传统。

重装步兵在右翼布阵，显示出盾和长枪的优势，阵型也忠实地依照斯巴达军的传统，摆成横排200人、纵向12排的横向矩形阵。

这种密集队形一直被认为是斯巴达军强悍战力的基础，其他城邦国家也从未怀疑过。

但这次留克特拉战役有个特殊情况，斯巴达军就连右翼也不是由纯粹的斯巴战士构成的。

12排中只有3排是传说中让孩子不敢哭闹的斯巴达战士，其他都是来自同盟国的士兵。

从右翼向左，依次是中路两个大队和左翼一个大队。中路和左翼都是来自同盟国的士兵。骑兵布置在右翼和左翼的外侧。

底比斯的布阵彻底颠覆了希腊人的常识。研究者给这个阵型起了一个“斜型阵”的名字。

首先，要同敌人主力对决的左翼安排的都是底比斯的重装步兵，据说人数达3000人。

埃帕米农达斯把他们编成横排60人、纵向50排的巨型长方形阵型。

他命令全副武装了头盔、胸甲、长枪、重剑、盾牌的重装步兵用平时两倍的速度前进。

虽然古希腊男子体格健壮，但在盛夏的草原上奔行无异于从事重体力劳动。

然而这些重装步兵必须忍受的艰苦，与佩罗皮达斯率领的300人“圣队”相比，甚至还是很人性化的。

因为300人机动部队的士兵装备与别人无异，但被要求以再快两倍

的速度前进。

数量优于斯巴达的骑兵配置在这支机动部队的左侧。

左翼集团向右依次是中路的两个大队和右翼的一个大队，士兵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国。

埃帕米农达斯布阵的新意在于没有采取斯巴达军那样的一列横排队形。正像“斜型阵”所说的那样，其新意在于斜线布阵。

当然，给各路人马下的命令也不同。

左翼接到的命令是以超常的速度速攻，中路第一大队接到的命令是以平常速度前进，中路第二大队和右翼接到的命令是在战斗的前半段后退，后半段转为进攻。

埃帕米农达斯真正想要的不是击溃敌人全军，而是击破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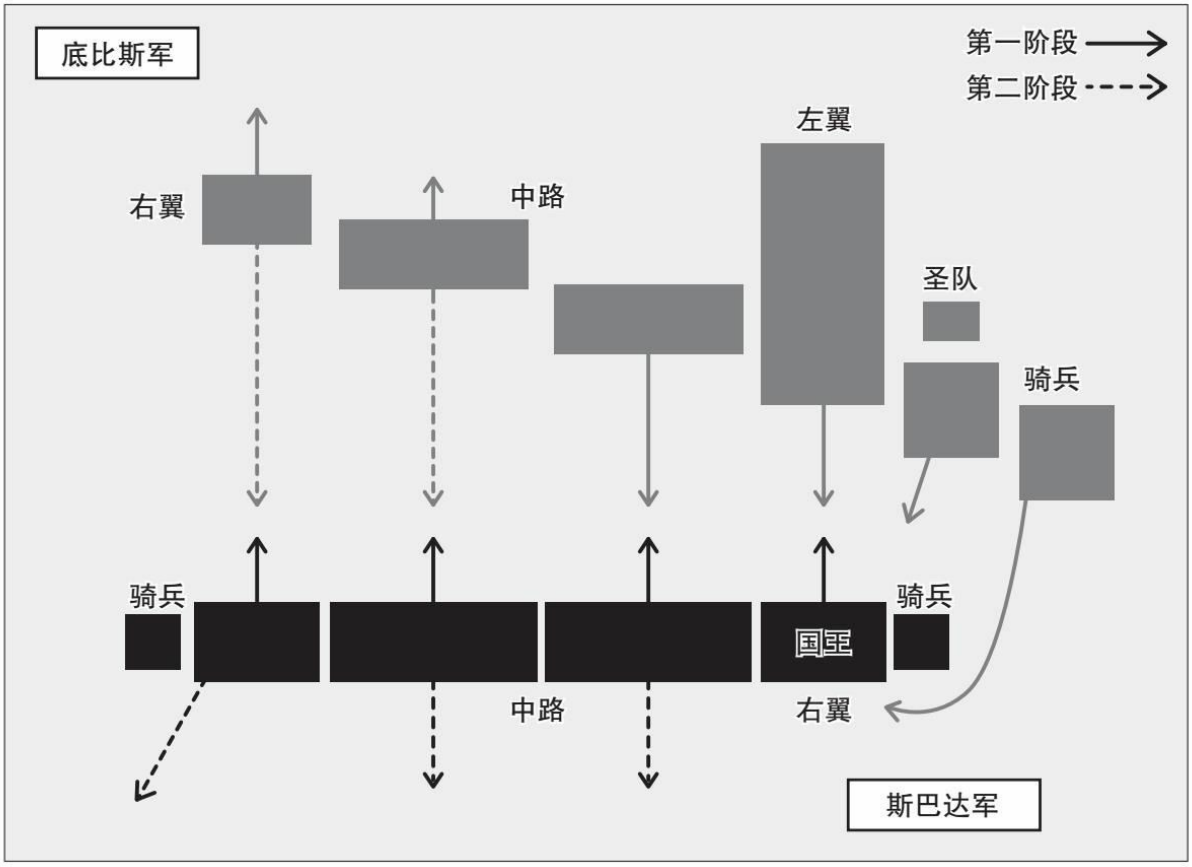
首先用数量占优的骑兵驱散敌方的骑兵。

继而用佩罗皮达斯率领的300人冲击敌人右翼予以击破。

再向已被打乱节奏的敌人右翼投入3000人乘胜追击。

这就是三阶段攻击战术。

在萨拉米斯海战以及普拉塔亚陆战中，双方主力冲锋的结果决定了整个战斗的结局。这个战术汲取了这些战斗的经验。



留克特拉战役

一旦得知主力被击破，其他国家的参战人员没有接到命令也会逃跑。

埃帕米农达斯把自己的军队布成斜线形，命令远离敌人的中路第二大队和右翼先后退再转入进攻，大概是要逼斯巴达士兵以外的敌方士兵逃跑吧。

正如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塔亚陆战证实的那样，击破敌方主力便可把胜利导向己方。这是己方人数少于敌人时总司令所能采用的唯一战法。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斯巴达年轻国王的曾祖父是普拉塔亚战役的胜利者，而自己却成了这种战法的牺牲者。

这是一场激战。但日头高挂时会战的胜负已见分晓。

进攻缓慢的斯巴达人被底比斯的速攻打乱了阵脚。

声嘶力竭地指挥作战的年轻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遭到佩罗皮达斯率领的底比斯机动部队的狙击，很快战死。因不想让国王的遗体落入敌手，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勉强应战最终全线崩溃。

国王的遗体被运到了后方营地。但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的右翼已经被摧毁。很多盟国士兵逃进营地，距离营地较远的左翼士兵也都七零八落地溃逃四散。

希腊的城邦国家总在打仗。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精通战场礼仪。胜负确定以后他们会临时休战，收容战死者的遗体，这已经成为惯例。

斯巴达方面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底比斯表示接受这个请求，但底比斯方面的总司令埃帕米农达斯附加了条件。

首先要收容来自斯巴达盟国的士兵。

收容结束后底比斯方面先行视察，然后才能把斯巴达士兵的遗体运出战场。

埃帕米农达斯想知道斯巴达重装步兵准确的死亡人数。

后世的我们因此知道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参战士兵死亡人数为1000人左右。尽管这无外乎是一种推测，但我们可以得知主力斯巴达的损失。

战斗开始前斯巴达战士有700人，其中400人战死，活下来300人。只此一战，斯巴达的骄傲减少到300人。

而底比斯方面的战死者，连同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国的参战士兵在内，也没有超过300人。

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来了1万人，战死1400人。

底比斯领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以6000人迎战，战死300人。

单凭这一点，留克特拉战役的胜败已然明朗。这场战斗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斯巴达重装步兵兵团就此形同毁灭。“底比斯双雄”制订的打倒斯巴达的计划完美成功。

战争的同时，斯巴达国内举行了每年例行的祝祭仪式。神殿里升腾起烧烤牺牲羊的青烟，青少年们参加体育比赛，献给神祇。斯巴达战败的消息是在祝祭活动的最后一天送达的。

5名监察官封锁了消息，直到所有活动结束后才予以公布，连战死者家属服丧也被禁止。

这样的事情，在漫长的斯巴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斯巴达的战士们都是用“不在战场上战胜，便在战场上战死”的信念培养起来的。死，对他们而言是心甘情愿的事。

但斯巴达在公元前371年的战败不仅带来战士之死，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死亡。

靠军事力量强大起来的国家一旦失去军事力量，自然会威信全无。

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对此非常明了。加盟国开始背叛斯巴达，仿佛石片从行将崩塌的石墙上不断剥落一般。就连斯巴达的西邻、斯巴达多年的农产品产地麦西尼亚也宣布独立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自结盟以来历经200年，终于在公元前371年轰然瓦解。

斯巴达沦为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一隅的一个普通的城邦国家。

这距离它打败雅典一跃成为唯一霸权国家仅仅过了33年。

留克特拉战役终结了所谓的“斯巴达霸权时代”。

从此开始了“底比斯霸权时代”。然而，这也不过是带引号的霸权时代而已。这便是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的悲剧。

“底比斯双雄”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次胜利。他们无暇充分享受在留克特拉取得的胜利。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两人对自己的年龄有什么担心，而是底比斯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令人不安。

大企业无所作为是因为怠于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中小企业有志于高效利用，人力资源又太少。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底比斯。

刚打完胜仗，两人便进行了分工。

佩罗皮达斯负责北方，埃帕米农达斯负责南方。

两个人都在自己负责的地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而不止于军事方面。维奥蒂亚地区以底比斯为中心，若只注意巩固与附近各城邦的同盟关系是无法取得更大发展的。如今底比斯已经把斯巴达拉下马，成为新的霸权国家。

把斯巴达从霸权国家地位拉下来后的7年，是“底比斯双雄”东奔西走、日夜操劳的7年。

负责北方的佩罗皮达斯走出维奥蒂亚，来到了色萨利。当然，他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前色萨利不过是希腊的落后地区，因而也是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地方。但这里平原辽阔，不缺人马。底比斯军队虽然因“双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仍很难平定这里。而且，色萨利在政治上是僭主体制，有着统一的指挥系统。

佩罗皮达斯不只会冲锋，还懂得迂回前进。他考虑把色萨利的邻国马其顿牵扯进来。两年后，他利用马其顿王国的内部纷争，成功地与其结盟。这样他可以从南北两面对色萨利进行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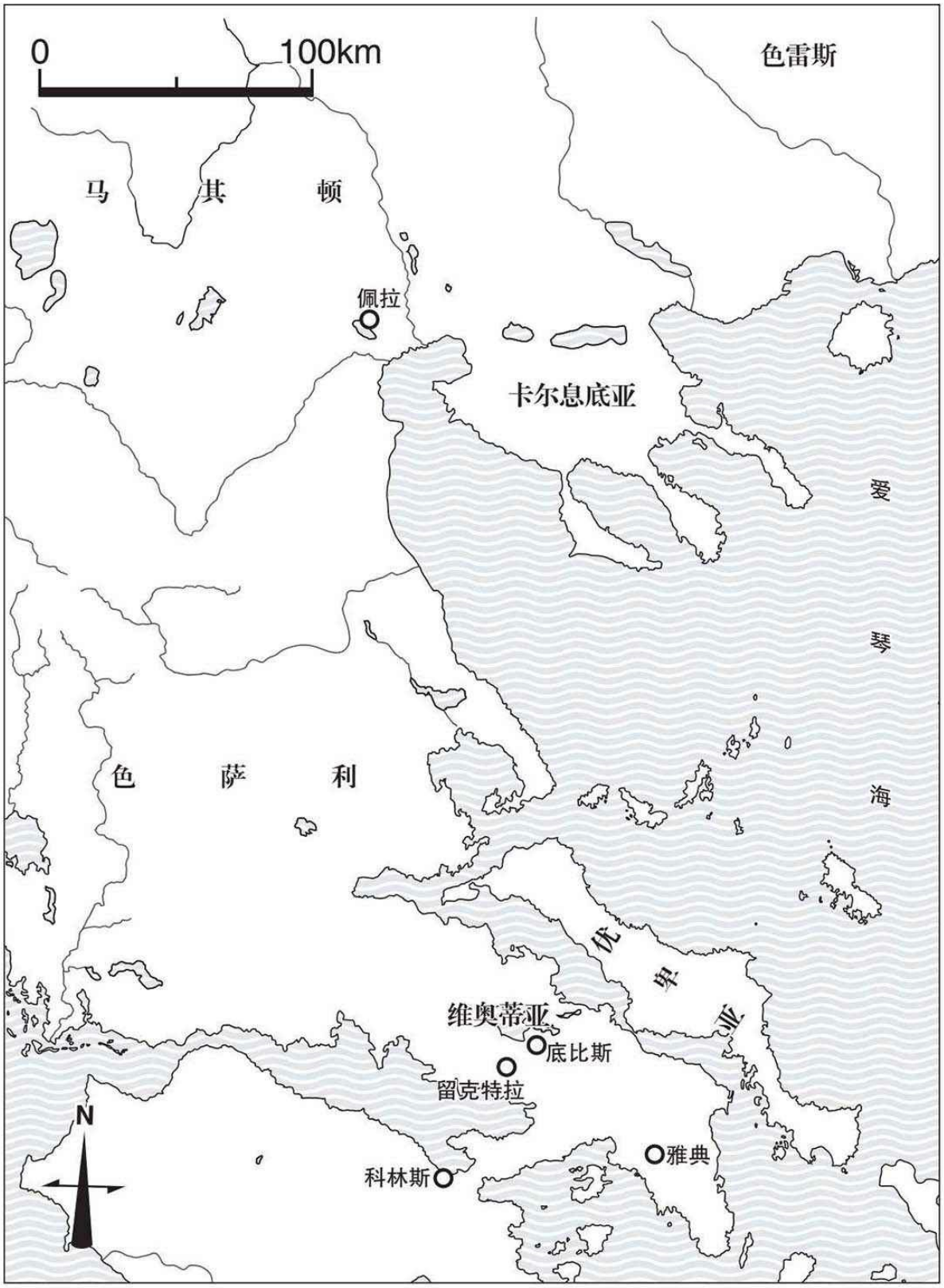
作为结盟的信物，翌年马其顿送来了一位王家少年当人质。说是人质，其实他并未被幽禁，是一个行动自由的客人。这位少年就是日后登上马其顿王位的腓力。

这位后来断然推行马其顿王国军事改革的少年，从15岁起在底比斯度过了4年的时间，亲眼看到了“双雄”改革后脱胎换骨的底比斯军队。

让马其顿脱胎换骨是这位少年长大成人之后完成的事。在那以前，马其顿一直属于落后地区，和这个国家结成同盟并无多大实效。

佩罗皮达斯与色萨利一直斗得非常辛苦。他想使用外交方法解决问题，便大老远地去了波斯的首都，但没起多少作用。

非但如此，就在他东奔西走的时候，敌人钻了他一个小空子，将他逮捕。



色萨利地区与马其顿周边

得知朋友遇袭，埃帕米农达斯停止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转战，紧急北上救出老友，把这件事的影响局限在一场暂时的危机上。

这个袭击霸权国家最重要领导人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68年，它显示出始于公元前371年的底比斯霸权时代也不过是浪得虚名。

负责南方的埃帕米农达斯进行一波接一波的进攻。

目标只有斯巴达。他想借这个机会攻进斯巴达，彻底打垮这个国家。

可是斯巴达一旦专注于防守，力量仍旧很强。

斯巴达大概进行了总动员，出动了尚未成年但自幼练武的年轻人以及年过六旬的退役士兵。在后方守护他们的是即将75岁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敌军已经打进了本土，这是斯巴达建国以来首次面对这样的危机。以留克特拉战役中生还的300人为中心，连同平时从来不上战场的人都团结一致，奋起反击。

埃帕米农达斯率领下的底比斯军队采用了名副其实的波浪式进攻。第一波进攻发起于留克特拉战役获胜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70年。第二波进攻发起于翌年，即公元前369年。第三波进攻发起于公元前367年。他们似乎不想给斯巴达喘息的时间。

其他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也背叛了斯巴达，它们的士兵似乎也开始加入这支底比斯军队。

但斯巴达仍在坚持。

他们只在城区防守而绝不打出城去，这使得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无论佩罗皮达斯还是埃帕米农达斯，他们都未能专心致志地进攻色萨利或斯巴达。

底比斯是民主政体国家。因为是民主政治，所以有反对派。在底比斯国内，寡头派针对东奔西跑的“双雄”掀起了一场起诉风波。起诉在希腊城邦国家已成为一种排除政敌的手段。

佩罗皮达斯首先成为目标，起诉理由是他与埃帕米农达斯二人专权。

埃帕米农达斯的退出使这个起诉未能立案。他从司令官的位子上退下来，只作为一个士兵参加战斗。第二年他又官复原职，这场风波成了一幕愚蠢的闹剧。

起诉风波并未就此收场，反对派的下一个目标是埃帕米农达斯。罪状是他让任期已满的下属指挥官继续执行任务。

战争的延续与指挥官的任期毫无关系，让他们继续执行一段时间的任务也被当作犯了滥用权力罪。如果被判有罪，那等着他的就是死刑。希腊城邦国家排除政敌的手段反映出希腊人过激的性格。

曾经的哲学青年站出来为自己辩护。面对审判员，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 我，埃帕米农达斯将要受到底比斯公民给予的死刑处罚。
>
> 我的罪状是对斯巴达取得了任何一个底比斯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胜利，拯救了底比斯使之免于毁灭。不但如此，我还把希腊的其他城邦从斯巴达的锁链下解放出来。
>
> 我的第二个罪状是，现在底比斯已经把斯巴达人赶回了他们的老家，让他们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最后一条，我作为司令官正

在实施让麦西尼亚独立从而孤立斯巴达的计划，而这被判重罪。

不仅审判员，就连旁听的人都笑了起来，埃帕米农达斯就此从起诉风波中解脱了出来。

底比斯没有余力忙于这种事情。

少数精锐的极限

一支棒球队或足球队能打完漫长的赛季当上冠军，是因为队里有充足的选手储备。底比斯的人才储备很薄弱。

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都不能只专注于自己负责的地区。佩罗皮达斯经常南下去助埃帕米农达斯一臂之力，第二年埃帕米农达斯又要北上去增援老友开展对色萨利的战斗。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

旁观者一定会就此得出整个希腊都陷于战乱的判断。

如果我们只关注希腊历史，那么有件事恐怕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希腊人自己也没有留意。那就是这时，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已经开始了决定今后地中海世界走向的划时代的改革。

这个改革始于以立法者名字命名的《李锡尼法》的诞生。

详情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这里只概述于下。

还有一件事请诸位记在脑中。即使在古代，信息的传递路径也发挥着很大作用。

一种路径是与别国人的交易。另一种路径是前往德尔斐和提洛岛神殿接受神谕。当时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对此评价很好，认为特别灵验。

人只要聚在一起自然会交换信息，这两条“路径”非常好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族袭击罗马。希腊人了解袭击给罗马人造成了打击，罗马人也一定知晓公元前370年前后希腊的乱象。

我认为，如果罗马人不知道同一时期发生在希腊的战乱，他们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样决绝地完成始于《李锡尼法》的罗马改革。

罗马人认为，希腊城邦国家战乱的最大原因在于城邦内部的持续分裂。

他们认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互阋，哪边都没有压倒性的实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两大党派不仅在国内对立，很多时候还会拉来别国同党参与斗争。于是国内对立演变成城邦国家间的对立。

于是，罗马人想把这两大党派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不妨碍自由又能实现国内统一的政体。

希腊人创造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而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不断的罗马创造出“共和政体”（Res Publica）的新概念。既然要“共和”，就要“融合”而不是“对立”。

罗马人做事喜欢具体化。所以，《李锡尼法》开宗明义，承认平民阶层也有权成为两名执政官的候选人。

平民提出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出自平民的提案被删除，实现全面放开。

第二年，政府向平民开放所有重要政府职务。

罗马也曾是城邦国家，一切公职人员均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选举决定。

这个选举的候选人全面放开，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两名执政官均为贵族，有时两人都出自平民阶层，因年份而异。

不论结果如何，它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两派均无法抱怨。

这项改革的最大益处是彻底废除了容易成为贵族（以及精英）阶层或平民阶层利益代表，进而使二者形成对立关系的旧制度。

根本性的改革仅靠一次立法是不能完成的，只有在短期内连续立法才有可能完成。

《李锡尼法》颁布后不到两三年，又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法案。

该法规定，有担任国家要职经验的人不分贵族、平民均有权获得元老院议席。

以保护平民阶层利益为己任的护民官退体后将成为元老院议员。这就好比工会主席卸任后出任公司董事。

罗马人是罗马法的开山鼻祖，他们非常喜欢法律。但他们不认为立下新法后改革就能成功。

也许他们认为具体的事情可依照法律来决定，抽象的事情要交给神祇。这时，罗马人把民主派和寡头派的理论融合在一起神格化了。我们只能对罗马人如此露骨的现实主义报以一笑。

古罗马广场现在只是罗马城里的一处遗迹。但在古罗马，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这里处理。从罗马斗兽场方向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圣道”（Via Sacra）就能来到康克蒂雅神殿（Aedes Concordiae）。虽然现今连一根圆柱都未留下，但它可是在罗马的一等地块古罗马广场上建造的神殿。这座神殿是公元前367年为纪念《李锡尼法》而建造的。

“康克蒂雅神殿”这个名称是献给司掌一致、和谐、融合、协调之神的神殿之意。

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因《李锡尼法》而化解，从此两者将一致、和谐、融合、协调地为罗马尽力。两方将此事神格化，起誓认同。

当然，司掌此事的神必须是女神，而不是威武的男神。

就这样，罗马人创造了“共和政体”，以对抗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我总认为师业有赖于弟子。罗马成为希腊的弟子。把老师作为反面教材汲取经验教训证明了弟子的优秀。当时西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强国叙拉古完全没有在希腊的乱象中学到任何东西，但尚未成为强国的罗马却学到了很多。

公元前364年，所谓的“底比斯霸权时代”迎来了第七个年头，佩罗皮达斯在与色萨利军的战斗中战死，享年56岁。

埃帕米农达斯此时正在进攻斯巴达，他得知此事一定会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半个身体。他们两人的合作关系长达20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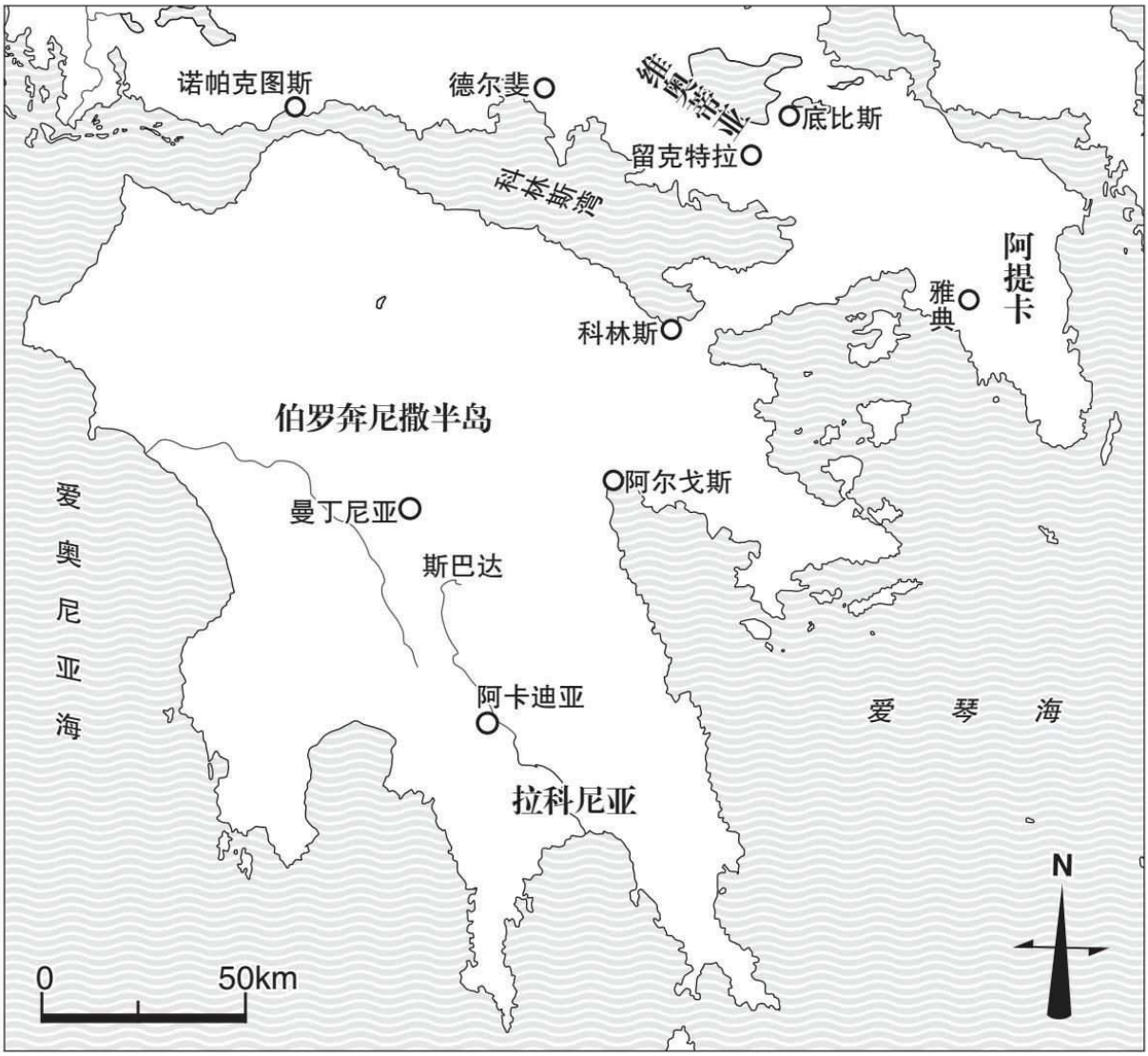
“底比斯双雄”成了“孤胆英雄”。

两年后，时间到了公元前362年。这一年发生的事不仅关系到底比斯，也关系到整个希腊的命运。

这年，已经56岁的埃帕米农达斯率领底比斯全军南下，第四次进攻斯巴达。军队里还有已归入底比斯麾下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士兵。

这年他们无法直抵斯巴达，需要先压制住途中的曼丁尼亚。

曼丁尼亚位于斯巴达领土拉科尼亚地区以北，在阿卡迪亚地区的城邦国家中颇有实力。9年前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一败涂地，曼丁尼亚就此脱离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倒向底比斯，但后来又离它而去。



伯罗奔尼撒半岛

研究者们认为，曼丁尼亚“变心”是因为它反感霸权国家底比斯的高压态度。

我不能立即同意这个观点。

底比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即使它想采取高压态度，也没有足以压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汇集了精锐力量的“圣队”才300人，只相当于9年前在战斗中生还的斯巴达精锐士兵的数量。

在一次战斗中可以靠战术取胜，而连续多年对外施压需要强大的实力，底比斯不具备这种力量。

曼丁尼亚仅仅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普通城邦。我认为曼丁尼亚“变心”可能是对底比斯变得过于强大感到不安。不安、嫉妒和恐惧弥漫在希腊所有城邦国家。

底比斯军逼近曼丁尼亚。曼丁尼亚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当然接受了请求。埃帕米农达斯的真正目标是彻底打倒斯巴达，斯巴达不可能放过阻止他的机会。

然而，雅典也响应了曼丁尼亚的救援请求。雅典并非底比斯的直接目标，但雅典领土阿提卡与底比斯领地维奥蒂亚接壤。底比斯过于强大对雅典来说并非事不关己。

就这样，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对战的最大规模战斗——曼丁尼亚战役打响了。

希腊一分为二

加上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城邦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反斯巴达城邦的军队，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的是一支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的大军。

另一方是接受曼丁尼亚求援请求、一致抵抗底比斯的斯巴达和雅典，军队共有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

两军虽然都有步兵，但不都是重装步兵，抛石兵等轻装步兵占了绝大多数。百年前，希腊尚有两军相加有5万名重装步兵的实力，但这个时代的希腊已今非昔比。

此次希腊本土的所有城邦国家几乎都加入了战斗。

两军没有直奔曼丁尼亚平原，埃帕米农达斯掌握着主导权。

首先，他让自己的骑兵攻击敌方的补给基地曼丁尼亚城。

但攻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部队遭到城里雅典骑兵队的猛烈反击，不得不撤退。

埃帕米农达斯立即转入下一轮战略部署。他得知斯巴达82岁的老国王阿格西劳斯率领的斯巴达军正在北上，目标直指曼丁尼亚。

连老国王都出动了，他率领的部队一定集结了斯巴达剩余的所有的战斗力。也就是说，首都斯巴达可能已经处于不设防状态。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命令底比斯军急行军，直捣斯巴达。

斯巴达人善于防守。国王阿希达穆斯勇敢地率军进行了阻击。国王的父亲9年前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杀，他自己尚未成年就登上了斯巴达

的王位。密探来报底比斯军队已经靠近，万事俱备，只等来敌。

大军行进到能远远看见斯巴达的地方，埃帕米农达斯被迫进行决断。

奔曼丁尼亚去的斯巴达大部队一定会掉头回来。那样的话，在这里哪怕消耗少许时间，自己也会受到两面夹击。

敌军攻不进斯巴达领土拉科尼亚，这是300年来斯巴达人的骄傲。只要他们活着就誓死不让敌兵打进首都。

眼下还在夏天。如果底比斯一方在适合战斗的季节退兵撤回底比斯，全希腊人都会知道底比斯还不具备霸权国家的实力。费了很大劲儿才建立起同盟关系的那些国家会像雪崩一样四散而去。

埃帕米农达斯下定决心，决定把所有赌注全部押在曼丁尼亚战役上。

反底比斯一方的军队在整个曼丁尼亚平原上布阵，一字排开。

右翼是斯巴达军，左翼是雅典军。原本总指挥可以交给曼丁尼亚军，但它与其他城邦增援的士兵一起被挤在了中路。毕竟曼丁尼亚不过是一个小规模城邦国家。骑兵分布在两翼。

看到敌军如此布阵，埃帕米农达斯没有采用9年前留克特拉战役的致胜法宝斜线阵。奇招也有缺点，就是它不能再次使用。

他像当年一样加强了面对敌人右翼的自家军队左翼的军力。

反底比斯联军事实上的主力明显是右翼的斯巴达军。埃帕米农达斯没有改变靠两军主力对决一决胜负的战略。

此外，他还加强了自家军队右翼的力量。在骑兵队列之间插进了抛

石兵队列。这是阻止雅典骑兵发挥优良机动性的战术。

战斗终于开始。埃帕米农达斯命令自家军队展开奇特的运动战。

以战舰打比方，他像是让舰船从敌人面前通过，把船腹暴露给敌人，这样做风险极大，但如果做得巧妙，则可收到削弱敌人斗志之功效。

反底比斯联军看到埃帕米农达斯骑马冲在前头，率领底比斯军队横向从阵前穿过，都惊呆了。

底比斯军士兵把头盔斜戴在脑后，把长枪扛在肩上，那姿态看上去无论如何不像是要开战的战士。

然而，就在全军从排成一线的敌军面前闲庭信步般走过的瞬间，埃帕米农达斯发出信号，于是全军立定。

紧接着，响起一片战士拉下头盔的声音，全军战士一起改为右手持枪的姿态，开始了总攻。

接着是一波接一波的冲锋。

根据色诺芬在《希腊史》里对此次战役的叙述，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的左翼宛若三层加莱船一般全力冲入敌阵，朝镇守敌方右翼的斯巴达军猛插过去，就像船头在破浪前进。

底比斯一方的骑兵和轻装步兵也跟着与敌方左翼的雅典军英勇战斗。

抛石兵抛出的石块如同火山喷火，雨点般砸向雅典的骑兵军团，阻滞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机动性。

战斗打到现在，一切都按照埃帕米农达斯的预想发展。

连续的激战渐渐使人数较多的底比斯一方占据了优势。

配置在左翼的底比斯士兵像船头朝前的战船队全力突入敌阵那样，以纵向长队阵型冲锋，效果初显。不久对方的骑兵队列被击破，斯巴达士兵组成的右翼也被切断，敌军即将溃逃。

照此下去，底比斯人将会重演9年前在留克特拉的胜利。

然而就在这时，不知何人投来了长矛，矛深深扎进正在马上指挥战斗的埃帕米农达斯的胸膛。

士兵们把跌落马下的总司令抬到了后方，此时他口中气息尚存。

然而，刚拔出带着铁制矛头的长矛，他便断了气。

底比斯打赢了战斗。但底比斯军队中无人下令追击败逃的敌人。

最高司令官是全军行动的指挥塔。没有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士兵无法行动。底比斯方面已经没有哪一位指挥官有力量让士兵重新行动起来。

已经明显分出胜负的会战就这样以没有胜负的结果告终。两军默默地收着己方士兵的遗体，好像一出默剧。

群龙无首

色诺芬接着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写了《希腊史》。他写到这场战役结束便选择搁笔。色诺芬在书中苦涩地回顾了公元前362年的这场曼丁尼亚战役。

这是所有希腊城邦国家分为两方进行的一场内部战役。

这场战役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留下的是一个没有领跑的霸权国家的希腊。

《希腊史》书写了长达49年的希腊历史。这部书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让希腊痛苦不堪的乱象，在这场战役之后与以前一样毫无改变。”

以公元前362年为界，希腊“群龙无首”。

3年后，在希腊北方的马其顿，23岁的腓力登上王位。

再过3年，腓力的儿子降生，取名亚历山大。

---

[1] 汉译本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岩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等多种译本。——译者注

第二部

新生力量

第一章
父亲腓力

被诸神背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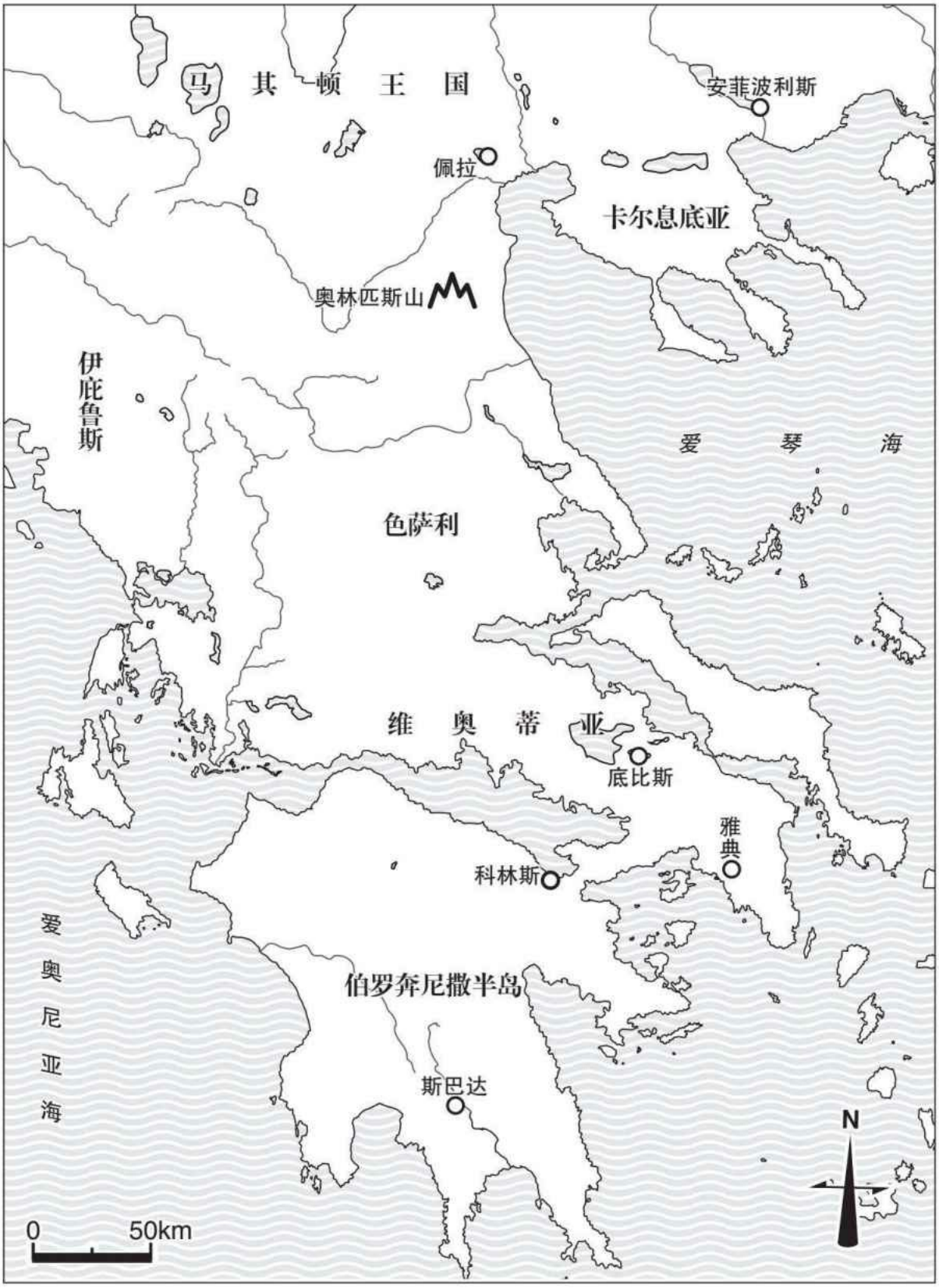
希腊北部和中南部的交界线上有一座山，名叫奥林匹斯，高度接近3000米，为希腊半岛最高峰。

顶峰附近云雾缭绕的日子居多。古希腊人相信，那座山上居住着保佑自己的诸神。

然而，这座山没有一点诸神生活的圣地的感觉。正如本书第一卷开头所写的那样，希腊诸神不论善恶都颇为人性化。主神宙斯常常溜出奥林匹斯，沉迷于世间的男欢女爱。其他男神女神也都很人性化，不亚于他们的父亲宙斯。这些神平时都围在宙斯身边聚会，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

诸神与人类十分相像，即使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们也会把脸朝向温暖的南方，而不会面朝寒风劲吹的北方。

山的南麓不仅有希腊实力城邦雅典、底比斯、科林斯、斯巴达等，还有因前来接受神谕的人络绎不绝而热闹非凡的德尔斐，以及全希腊的运动员每四年前来一次的奥林匹亚。


马其顿王国
安菲波利斯
佩拉
卡尔息底亚
奥林匹斯山
伊庇鲁斯
爱琴海
色萨利
维奥蒂亚
底比斯
雅典
科林斯
爱奥尼亚海
伯罗奔尼撒半岛
斯巴达
N
0
50km

马其顿及其周边

马其顿位于奥林匹斯山的北麓，在希腊诸神的背后。

马其顿人在民族上属于希腊人，与希腊人信仰同样的神祇。尽管方言色彩浓厚，但他们使用的语言仍是希腊语。

尽管如此，马其顿300年来都不曾被邀请参加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人的运动会。

希腊城邦尽管有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之分，但它们都是城邦国家。在这些城邦的人看来，坚持君主制政体的马其顿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度。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一切方面，马其顿一直被认为是落后国家。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亲率大军入侵希腊，志在必得。当时全体希腊城邦国家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最后通牒并建立联军，只有马其顿未被邀请加入。马其顿早早屈服于波斯国王，接受了作为其属国的条件。

这一年发生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和翌年的普拉塔亚战役中，希腊大获全胜，波斯国王逃回了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

不过，此后马其顿首次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获胜的希腊城邦国家对曾经跟随敌人的马其顿十分宽大。这种宽容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战胜方自信的表现。也许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因为打败波斯而提高了自信，领悟到了“奥林匹克精神”。虽然马其顿人过去依附于敌国波斯，但他们同样是希腊人，一样信仰希腊诸神，一样说希腊语，尽管他们的方言口音很重、很难听懂。

尽管马其顿可以参加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也被认可参加其他的运动会，但在后来的120年间，它一直处在被忽视的状态中。马其顿人从来没有在奥林匹亚拿过冠军，因为整个希腊一直处于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等城邦国家强势的状态。

直到公元前362年，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内斗让它们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希腊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这一年，在奥林匹斯诸神背后的马其顿，一个名为腓力的年轻人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

马其顿脱胎换骨

腓力并不是马其顿王位的首选继承人。作为落后国家的马其顿王国，王权制度并不完善。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仍有余地凭实力上位。

公元前382年，腓力出生在首都佩拉。他是国王阿敏塔斯的第三子。12年后他的父王去世，其长兄亚历山大登上王位。

马其顿王族的人都以腓力、亚历山大、佩尔狄卡斯等传统名字起名。腓力正式的称呼是腓力二世。他的儿子是后来被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其正式称谓是亚历山大三世。

话题回到腓力尚未成为“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其长兄亚历山大当上国王仅两年就被一位王族成员杀害。一番动荡之后，登上王位的是其次兄佩尔狄卡斯。在次兄统治时期，弟弟腓力作为人质被送到了底比斯。

虽说是人质，但他完全未被当作囚徒对待。底比斯为了在色萨利称霸，想把北方的马其顿拉到自己一方，便与马其顿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保证这种友好关系能延续下去，马其顿国王的弟弟被送到了底比斯。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一举打败斯巴达，历史由此进入所谓的“底比斯霸权时代”。

腓力在底比斯度过了15岁到19岁的青春岁月。他是重要的人质，所以住在底比斯颇有权势的人物家中。据说因留克特拉战役名震希腊的埃帕米农达斯和佩罗皮达斯都经常造访这户人家。年轻的腓力正值学习能力最强的年纪，住在那里好似在“西点军校”留学一般。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腓力甫登王位便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有他在底

比斯做人质的经历作为基础。

理应如此。如果他没能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东西，这个腓力国王一定与之前的马其顿国王们别无二致。

学习有两种，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吸取他人的教训。

年轻的腓力应该从底比斯很好地学到了如何使用兵团。他一定也了解了底比斯的不足之处。

不管怎么说，底比斯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只拥有中等实力。尽管它是维奥蒂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但维奥蒂亚在各个方面都很贫乏。底比斯位于农业区，不靠海，从来不是贸易国家。它还没有矿山。这些都造成底比斯人口稀少。

靠着一定要从斯巴达手中夺过霸权的决心，底比斯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埃帕米农达斯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力量。但是，为组建“圣队”，他想尽办法也只招到300人。无论每个人多么骁勇善战，300人终究是太少了，力量有限。仅仅9年时间，“底比斯霸权时代”便终结了。

年轻的腓力身在底比斯，一定对局势有过思考。

论领土，马其顿辽阔广大，各地农民组织起来也能形成一支齐整的力量。可以称为封建诸侯的武士阶层也可以组织起来。而且希腊北部有许多矿山，过去都是交给雅典人开发的。

马其顿王国一直没有充分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呢？

腓力结束在底比斯的人质生涯后，回到了马其顿。4年后，其次兄佩尔狄卡斯在与伊利里亚族的战斗中战死。王位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但

他的儿子尚未成年。于是，22岁的腓力成了侄子的监护人，而年幼国王的监护人不止腓力一人。

每次国王去世都要发生家族动荡，这是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国家视马其顿为落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一般只有波斯那样的东方国家才会有托孤摄政王这样的现象。在马其顿，年幼国王的监护人是有可能废黜幼主自己登基的人。腓力有4位这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或是王族的亲戚。

22岁的腓力没有浪费时间。首先，他命人在首都佩拉暗杀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对手。这个人遭到宫廷内外的厌恶，甚至无人把这次暗杀当回事。

接着他对另外两位没有能力但为人不错的对手采用了说服战术，和他们促膝谈心，承诺给他们优厚的经济待遇。于是这两人选择了主动流亡外国。

最后剩下的阿尔格乌斯处置起来颇费周章。阿尔格乌斯跑到雅典，承诺如果雅典在军事上支持他成为国王，他就把安菲波利斯还给雅典。重新占有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要地安菲波利斯是雅典的夙愿。

腓力对此毫无惧色。他也派出使者前往雅典政府，申明自己登上王位那天的凌晨，归还安菲波利斯就会成为现实，这仅仅是承诺。

此时的雅典已经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了，但它仍是人们公认的贤明中不乏狡诈的雅典人的国度。雅典人决定“脚踩两只船”。

雅典政府组织起舰队，载着已经来到雅典的阿尔格乌斯和他那一派的马其顿人，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在北上的雅典船上，阿尔格乌斯等人对雅典会给予己方军事援助毫不怀疑。然而，船进入马其顿首都佩拉

以南40公里的港口时，他们发现自己被雅典出卖了。

他们本认为雅典军队也会在这里登陆，可是实际登陆的只有马其顿人和雅典的佣兵，雅典正规军留下一句祈祷他们幸运的话便迅速离港了。

阿尔格乌斯和他那一派人马被撂在了那里。身在首都的腓力得知情况后并未采取行动。

他在等待害怕爆发内战的空气蔓延到整个首都。实际上，几乎没有马其顿人响应阿尔格乌斯的号召起来反对腓力。

即便这样，阿尔格乌斯还是率领为数很少的同党和雅典佣兵北上，目标直指首都佩拉。

直到这时，腓力才发起行动。他宣布要击溃已公开叛变的阿尔格乌斯一伙，并命令军队南下。

在离首都25公里的地方，阿尔格乌斯一伙被彻底歼灭。等着他们的只有余生苦难的流浪生活。

对雅典人，腓力没有不理不睬。他为负伤的雅典佣兵提供充分的医疗救护，用马其顿的船把他们送回了雅典。这是在告诉雅典：我知道你们在脚踩两只船！

从外交上讲，雅典政府犯下了重大过失。没有实力还要耍奸，结果形成了如此局面。不过雅典政府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决定立即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以承诺归还安菲波利斯为条件，缔结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友好条约。

交涉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了，几个月后的公元前359年年初，腓力

正式被确定为年幼国王的唯一监护人。

腓力这个人，一旦开始行动就会做到最后。所谓做到最后，就是废黜年幼的国王，自己登上王位。马其顿国内拥护腓力的气氛逐渐形成。

马其顿改变了它的王权体制，血缘不再是继承王位的绝对条件。国王由实力武将们选举决定。马其顿的强者们做出了判断：只有腓力才配当他们的国王。

第一，腓力是先王的胞弟，血统没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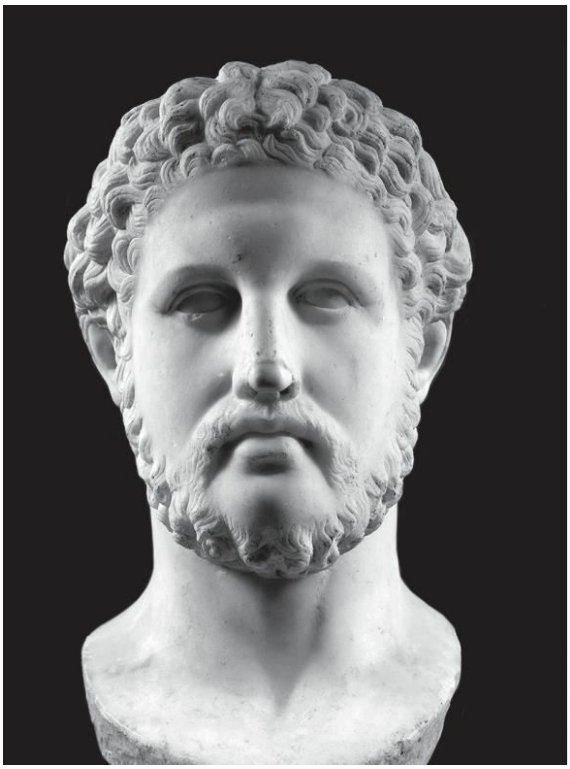
第二，在与非希腊民族的北方蛮族伊利里亚的战斗中，腓力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作为军队的总司令是合格的。

第三，腓力颇具外交手腕，与奥林匹斯山以南的城邦国家中仍具较强实力的雅典维持着友好关系。

最后，腓力具有内政手腕，化解了险些发生内战的危机。

在古代希腊，最高领导人无能很容易导致国家灭亡。对于时刻准备统率士兵奔赴战场的人们来说，最高统帅有无能力是一个具体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严肃的问题。对这类事情具有充分判断力的专业人士最终选择腓力做国王。

公元前359年，23岁的马其顿新任国王登上了王位。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新生的马其顿军队

腓力刚把王位弄到手就立即开始军事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划时代意义反映在主力重装步兵的名称变化上。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不论雅典还是斯巴达，抑或是底比斯，都把重装步兵称为“Hoplites”。

年轻的国王改革后，马其顿的重装步兵被称为“Phalanx”（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

同样都是重装步兵，他们有什么不同，又为何不同呢？

腓力首先把征召步兵方阵主力的招兵网撒向农民。

过去，重装步兵在雅典是由所谓第三等的中间等级构成，在底比斯也是由中间等级的公民构成，在斯巴达是由占全体男性不到百分之四的精英公民构成。施行王政的马其顿超越了这些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的城邦国家，转向建立国民军。

马其顿是对公民概念淡漠的王国，这样做起来可能容易一些。

腓力理想中的重装步兵不是数量有限的“精锐”，而是数量充足的“老手”。

因为缺乏史料，对比我们只能想象。我怀疑腓力为了他追求的理想状态，可能把招兵对象的年龄限制在20岁到30岁之间。

要成为他的步兵方阵成员，首先要体力健壮，同时还要动作敏捷。

任何改革彻底完成最少需要10年的时间，更何况这是从零开始把人培养成经验丰富的老手，10年时间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改革开始阶段将征兵聚焦于年轻农民也是理所当然的。

马其顿重装方阵步兵是新生的马其顿军队的主力，他们必须既健壮又敏捷。这一点的重要性，腓力一定是在底比斯学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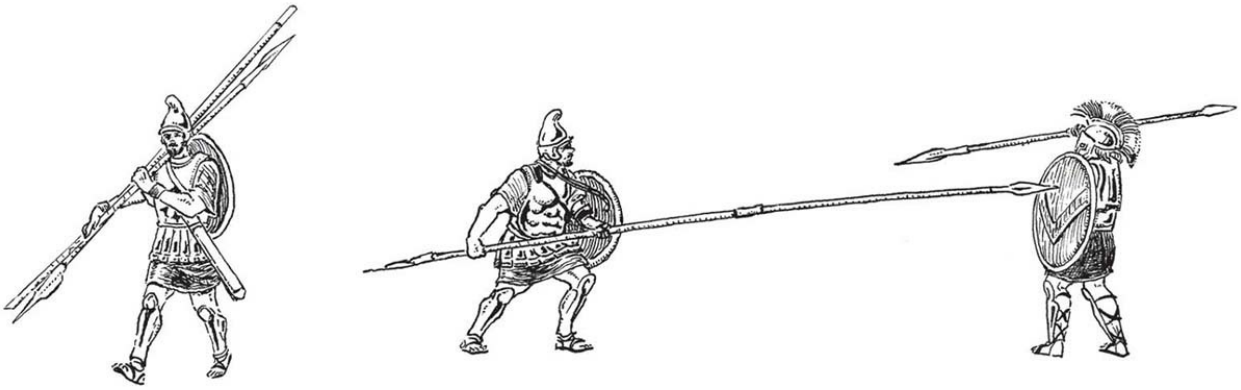
四年前，腓力还在底比斯“留学”时，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战胜过斯巴达，而斯巴达以勇猛的希腊最强重装步兵著称。在那次战役中，底比斯敏捷的300人击败了健壮但动作迟缓的7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那是埃帕米农达斯研究了战略战术以后把敏捷的作战理念灌输给底比斯士兵的结果。

腓力首先在这个方面模仿了底比斯。虽然斯巴达被底比斯拉下霸权国家的宝座，但腓力对斯巴达重装步兵强大的真正原因看得十分清楚。

重装步兵强大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可以顶住敌人的攻击不后退一步。在这一点上，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堪称勇士。

然而，斯巴达却败给了底比斯。虽然只有700人参战是最大的败因，但失败是事实。

腓力希望把斯巴达勇士能顶住敌人攻击而后发挥自身攻击力的特长传授给马其顿的方阵步兵，然后让马其顿重装步兵拥有比斯巴达战士更强的耐力。



手持长矛的马其顿重装步兵

首先，马其顿士兵的头盔、胸甲、腿甲、盾和剑做得轻了一些。

长矛的长度增加了。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斯巴达以长矛长度最长而著称，腓力军队的长矛长度接近斯巴达的两倍。

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长矛有3.5米，而马其顿的加长至6.5米。

这样一来，士兵就不能单手拿长矛了。看一下田径赛中撑杆跳高选手的动作，我们就会知道，士兵必须双手持矛。为防止长矛自然弯曲，还要改为从下方撑起持矛的姿势。

这样的长矛于防御于攻击都无用处。

腓力想出两个办法弥补这个缺陷。

他将接近7米长的矛从中间一分为二，再用金属制的套筒连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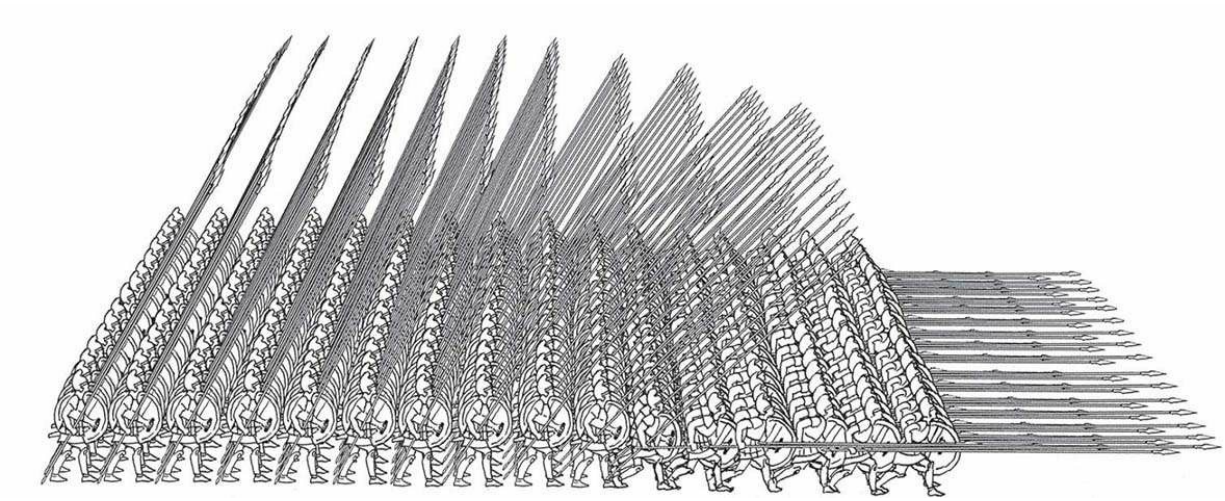
这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止长矛木柄产生自然弯曲。

这样也便于士兵运动。士兵用盾牌上的绳子把盾背在肩上，把一分

为二的长矛扛在肩上便可以行进。

到了战场，士兵们只要用金属套筒把长矛连接成一根即可。长矛两端都有锋利的矛头，近战时还可以当两根标枪用。

这种马其顿式长矛称为“sarisa”（马其顿长矛），与“Phalanx”一起成为马其顿重装步兵的象征。



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

腓力的另一个想法是把希腊城邦国家重装步兵的传统密集阵型进一步大型化。

马其顿军队的作战单位是大队（相当于罗马军队的两个军团），横向260个士兵，纵向16排，合计由4160个士兵组成。

仅此一项就会使敌人感到压力。此外，近7米的长矛不都是竖直持握的。

最前面的5排士兵左臂持盾护胸，左右手双手持矛，矛水平朝向前方。

从第6排开始，各排的持矛角度逐排往上加大。也就是说，从平持到直角手持，各排持矛角度都有角度差。

当然，进入战斗后，这个角度会发生变化。马其顿长矛是攻击型武器，光像片树林似的立着是没有用的。

一旦会战打响，敌人看到几个这样的方阵会怎样想呢？他们一定会有像遭到巨大刺猬群进攻似的恐惧。

腓力不追求本国战士个人的精英化，而是追求步兵方阵整体的精锐化。

如果年轻国王的这种改革发生在有悠久传统、公民又很自傲的雅典、斯巴达或底比斯，改革也许不会成功。

这种长矛也许会被讥讽根本不是矛，士兵甚至会拒绝拿在手上。也许因为改造对象是落后国家马其顿的农民，所以改革才能结出果实。有不少传统和习惯之类的东西会成为新生事物的绊脚石。

腓力的改革都颇有新意，要让改革得以落实，下面两件事必不可少。

第一，决定改革的人意志不能动摇，必须坚持下去。

第二，要有人能够正确理解改革者的意图，具备带头协助实现改革的决心和能力。

年轻的国王拥有帕米尼欧这位人物。

帕米尼欧生于公元前400年前后，马其顿贵族出身。他比腓力年长18岁，腓力23岁登上王位那年，帕米尼欧已经41岁。

没有史料记载他用了什么办法把年轻农民培养成老练的重装步兵。

据我的想象，他大概会先让他们观看具体实例，去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让两个士兵各站一侧，一个人手持马其顿长矛，另一个人拿着希腊传统的长矛。然后他说道：

“瞧，你拿的马其顿长矛已经刺到敌人胸膛，而敌人的长矛却离你老远。”

让新兵了解密集队形的好处也会帮助他们消除自然存在的恐惧。

“每个士兵都拿着盾保护着自己的左侧身体，而右侧没有保护。如果是密集队形，右侧就可以得到右边战友所持盾牌的保护。”

一旦去除了士兵的恐惧，接下来只要让他们一丝不苟地反复训练，掌握如何使用近7米长的长矛即可。

听说有一次腓力对雅典的使节说：

“雅典还真能选，每年都要选出10位将军，我这里就帕米尼欧一个人。”

当时雅典选出的将军净是些平庸无能之辈。这话是讽刺雅典的，但也表现出腓力对他的这位独一无二的合作者的坦率看法。

马其顿的重装步兵方阵一定是由帕米尼欧统率的。

如果两军在平原上对阵，马其顿一方会用好几个步兵方阵，还会加上骑兵和轻装步兵等，这时由国王腓力指挥全军。帕米尼欧指挥的士兵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这时存在命令无法正确传达到每个方阵大队的风险，规避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充分了解每个方阵最前排最右端的那个士兵的重要性，然后用好他们。

这个士兵起着乐队指挥的作用，不像足球场上队长的作用，这个士兵直接接受帕米尼欧的命令。

方阵中只有最右端的那一排重装步兵左侧靠自己的盾牌保护，而右侧没有战友。为了保护自己的右侧，他们会朝左边靠。这是人本能的反应。如果放任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就无法迎击正前方攻来的敌人。必须有人有意识地纠正大家向左靠的动作。这也是“乐队指挥”的工作。

腓力的改革之一就是让帕米尼欧发出的命令准确而迅速地传达到这个所谓“中层管理者”的士兵那里。这样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会战时的混乱。这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之一，只要每个士兵都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没有人会被不安袭扰。

统一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最大因素。腓力让自己的命令通过帕米尼欧和各步兵大队的队长在全军得到贯彻。

马其顿军队除重装步兵以外也有轻装步兵。他们是弓箭兵、抛石兵和投枪手。投枪手使用的枪比马其顿长矛短很多。腓力只把他们作为主力重装步兵的辅助。这种用兵方法在他儿子那里得到了出色的运用。

对骑兵的巧妙使用也有待于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出场。

腓力并非不知道骑兵的优点。他对占领色萨利地区表现出异常的有兴趣。色萨利紧靠奥林匹斯山南麓，适合养马，那里是骑兵的家园。

古代人还不知马镫为何物，他们不能在马上固定住脚。骑兵要在这样的状态下用矛去刺杀敌人，还要向敌人投出标枪。

要在脚蹬不住的状态下发挥攻击力，如果不从幼年就开始骑马是做不到的。骑兵往往出身于社会地位高、经济状况好的等级。在雅典及后来的罗马都有所谓“骑士等级”便说明了这一点。

色萨利地区多马，熟练的骑兵也多，这是极其自然之事。

但彻底而充分地使用骑兵有待亚历山大出场。

也许腓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但与他的儿子相比，他还没有完全超越这个时代。

近邻政策

腓力登上王位即将3年。这期间马其顿重装步兵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

他们不缺少通过实践促进改良的机会。帕米尼欧经常率领“巨大的刺猬”部队奔赴北方，击退伊利里亚人。

伊利里亚族被视为蛮族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讲希腊语，还因为他们做事只追求眼前利益。一旦天气不好作物歉收，他们不去研究如何改良农耕方法，提高第二年的产量，而是侵入邻国进行掠夺。

他们不与邻近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或同盟关系，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他们就不能侵略、掠夺邻国了。

伊利里亚面向亚得里亚海，人们靠渔业也过得下去。可他们却更愿意当海盗。

伊利里亚族的这种作风长期以来丝毫不加收敛，直到罗马帝国初期他们被彻底剿灭。学者们经常说这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使然，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认为当山贼或海盗利益来得快而已。

不知道什么原因，蛮族的目标总是指向南方，马其顿即位于伊利里亚人栖息地的南方。所以马其顿要向东面的色雷斯和奥林匹斯山南方扩张，首先要狠狠打击伊利里亚人，遏制他们的侵略。

公元前356年，腓力26岁。这是他登上王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佳报频传的一年。

他首先接到了去打击伊利里亚人的帕米尼欧发来的捷报。在“巨大的刺猬”方阵面前，伊利里亚人的尸体堆成山。于是，眼下这段时间暂时不需要担心北方了。

接着腓力收到王后奥林匹娅斯诞下一个男婴的喜讯。奥林匹娅斯那年17岁，是腓力的第三个妻子。这位妻子与之前的女人相比有着决然不同的重要性。她是马其顿西邻伊庇鲁斯的公主。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腓力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既会用武力解决与蛮族的问题，也会通过结姻亲把文明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奥林匹娅斯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正妻。

刚刚诞生的男孩取名亚历山大，这也是马其顿王族的传统名字。从母亲的重要程度看，对腓力而言，这个婴儿才是他第一个嫡出的男性后代。

接着传来的消息也令腓力狂喜不已。在奥林匹亚召开的运动会上，马其顿选手第一次获得了冠军。

这个冠军不是标枪或铁饼项目上的冠军，是比赛最后一天在观众全体起立欢呼中进行的四马战车赛的冠军。驾驭四马战车，头戴月桂冠，这是希腊男子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奥林匹亚每四年召开一次运动会，但300年间马其顿没有受到过一次邀请。被允许参加比赛以来经历了120年，在此期间，马其顿人的头上从未有过月桂冠的光芒。

被邀请去奥林匹亚意味着马其顿人被承认是希腊民族的一员。这次他们又得了冠军。这证明马其顿人已经成为希腊民族的出色一员。

庆祝在运动会上获得冠军的马其顿

腓力只为比赛提供了马匹和战车，驾驭它们获胜的是别的马其顿人。不过，奥林匹亚的四马战车赛不但奖励驾驭者，还表彰马匹和战车的提供者，如同现代的汽车拉力赛中法拉利、梅赛德斯等厂家会和赛车手一起获得冠军奖杯一样。

金币

对于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半蛮族的马其顿人来说，与传统的希腊人平起平坐是他们的夙愿。26岁的马其顿国王因这项冠军而获得的巨大喜悦不亚于嫡子诞生带来的欣喜。

但腓力是马其顿的国王，他不能只想着高兴的事不考虑其他。虽然他发起的军事改革得到帕米尼欧的协助，正不断取得成果，但当时的马其顿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国家，就算为了维持国民军的存在，也必需找到可靠的财源。

提高经济实力

如果腓力是一个平庸的国王，大概会用榨取农民血汗这个最快捷的办法获得资金。但腓力不是一个平凡的领袖。

他把农民打造成士兵，转身又去榨取他们的家庭收入，这太不合逻辑。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不能指望速成，他选择了提高农业效率的方法。

敌人为蛮族的好处之一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打赢了就可以把他们的土地纳入自己的领土。腓力统治初期集中向北进攻，直接扩大了马其顿的版图。

年轻的国王把进攻获取的土地和马其顿既有领土合起来加以规划，再分给农民。他还为农民搞了灌溉工程。于是马其顿的自耕农一时大增。如果明确了土地归自己所有，农民自然热心于农田维护和改良农耕技术的工作。有些现代学者甚至认为腓力的这项政策是土地改革。

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也没有忘记为通商制定政策。鼓励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国内政治稳定。确立优良货币也是不亚于此的重要事项。若商人不能放心接受“良币”，无论统治者怎样鼓励，物产也不会流通。

我收藏了一些马其顿金币，它们都是良币，产自材料价值和面额不一致便不算良币的时代，在现代的古钱币市场上也是有保证的“良币”。它的质地以及模仿阿波罗神侧脸的铸造技术，不亚于同时代的经济大国迦太基的货币和技术。

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货币是波斯的大流克和雅典的德拉克马。腓力率领马其顿一举跨入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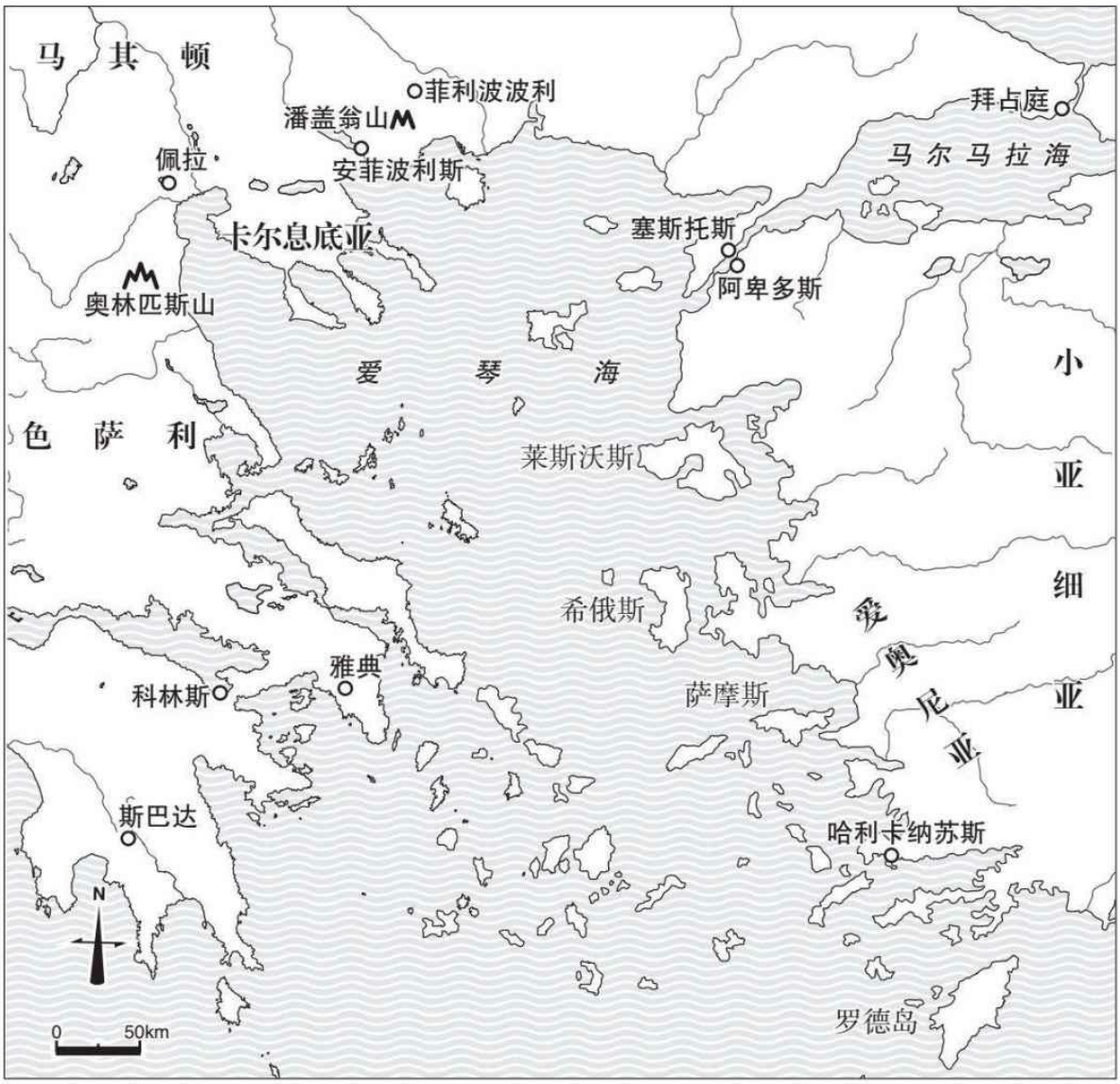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腓力还积极建立据点。他在首都佩拉之外建设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冠名的新城市，叫作“菲利波波利”。

这座城市不是随便选点建设的。人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他的意图。

新城市建在潘盖翁山东侧色雷斯地区远近闻名的富矿旁边。潘盖翁山西侧有安菲波利斯城。伯里克利时代这里曾是雅典的领土，重新占有安菲波利斯是雅典的夙愿。

腓力打算把曾经集中了雅典富裕等级海外资产的色雷斯矿山弄到手。对各个方面都在大胆改革的马其顿来说，没有比用好矿山更能确保财源滚滚。

色雷斯是王国，很像腓力成为国王前的马其顿，政治上不稳定。正因如此，雅典人很早就深入其境了。现在，腓力也不断将侵略之手伸向这里。



马其顿及其周边

如此一来，马其顿自然会与雅典发生利害冲突。

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虽然仍是民主政体国家，但已经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了。

雅典没有目光长远且一以贯之的政略，每年选出10位将军，却没有一个人有觉悟承担责任，所有决定都扔给公民大会去做，到了施行阶

段，责任人又不明确，拖沓现象更为严重。

这源于事事都需民主决定的传统，但它失去了过去的灵活性。民主政治用得好会有许多益处，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政治体系而已。这种政治后来演变为似乎绝对美好而独一无二的“民主主义”。

过去的雅典人具备灵活性，面对重大事件时，有时会临时让“民主”让步。

公元前480年，不得不迎击波斯大军的地米斯托克利就任总司令[1]（strategos autokrator）。在一年任期内，他不需要同其他9位将军达成一致。他可以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实施。

善于学习希腊的罗马人创造了一个“独裁官”的职位，地位相当于危机管理内阁的首脑，任期为6个月。在这期间，“独裁官”可以决定任何事情，并由他带领实施。

一旦设立了“独裁官”，常设的两位执政官就不能再行使他们的否决权。这无外乎是要统一指挥系统。

在罗马，公元前367年制订的《李锡尼法》为国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打上了休止符。仅仅11年后罗马便产生了最早的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证明斗争已被化解。这种情况在腓力当上国王后的第3年便开始在马其顿出现。

时代在变迁，不仅在地中海的东方，西方亦然。然而，斯巴达坚持寡头政体未能做出改变，雅典同样固守着民主政体而未能改变。

而腓力是王国之主，可以一人决策，实施也靠他一人。马其顿与雅典发生冲突时，腓力攻击雅典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其僵化的体制。

正如2300年后的现代研究者所写的那样：“与其他城邦相比，雅典在腓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帮了他很多忙，尽管雅典人并不愿意这样做。”

由于事关矿山利权，雅典没有轻易退缩。

但事实上，腓力以安菲波利斯为诱饵展开外交战，雅典已被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为阻止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侵略色雷斯，希腊甚至试图与伊利里亚人和佩奥尼亚人那样的蛮族结盟，尽管那些蛮族连结盟的概念都还没有。

最终，潘盖翁矿山的开采权落到了腓力手里。

腓力没有欺骗雅典。雅典人满脑子只想着重新占有安菲波利斯，应对决策出台艰难，露出了破绽。年轻的国王只是钻了这个空子而已。不过，雅典这时表现出的“狼狈相”更为严重。

见马其顿国王没有停止侵略色雷斯王国南部的势头，和雅典有同盟关系的拜占庭、希俄斯岛、罗德岛等纷纷表示要退出同盟。就连赫勒斯滂海峡[2]沿岸以塞斯托斯为首的一系列港口城市也表现出追随之意。这是雅典面临的重大事态。

小麦是雅典人的主食，其进口依赖于黑海周边地区。雅典的船队满载着从那里采购的小麦，通过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塞斯托斯靠港后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船队进入比雷埃夫斯港之前，少不得要在希俄斯岛停靠。对船员来说，踏上陆地补给新鲜饮用水必不可少。

所以对雅典来说，确保这条航线畅通就是“保障食品供应安全”。

为了阻止这些城市和岛屿叛离，雅典决定派遣海军。

这时的雅典海军已经不是伯里克利所说的由雅典公民组成的“熟练技工集团”了。大半水手都是别国的佣兵，只有司令官是雅典公民。逃避兵役的想法在雅典公民中不断扩散，雇佣佣兵实属无奈。但是这样做有两个致命缺陷。

第一，佣兵对雅典并无忠心，一旦战况不利他们立即逃走。

第二，在佣兵制度下，受雇的经常是团队而非个人，佣兵由队长率领。雅典的司令官向这些队长下的命令往往不能顺利下传。

如此勉强派出的海军只有不过60艘船。即便不去想伯里克利时代常备200艘战船的情况，人们也会有今不如昔之感。

这仗不打还好，打了雅典损失更大。它不但没能阻止那些城邦和岛屿退出同盟，还不得不公开承认拜占庭、希俄斯岛和罗德岛退出同盟。此外，从黑海周边港口城市到莱斯沃斯岛都断绝了与雅典之间的友好关系，雅典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因为用了很多佣兵，此战耗费了雅典1000塔兰特[3]。毫不夸张地说，城邦国家雅典的国库空虚了。而雅典依靠增税来填补国库，这就带来了问题。

这期间，腓力又在干什么呢？

他在静观局势，静观雅典日渐迷失。此外，他把帕米尼欧率领的重装步兵派往北方和东方，不懈地扩张着势力。

此时腓力不到30岁却聪颖狡诈过人。他没有把侵略占领的地区正式并入马其顿王国，而把它们划为“马其顿王国影响下的地区”。当地居民

都是希腊人，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不过分刺激希腊其他城邦国家。

这个“马其顿王国影响下的地区”，就是曾为雅典繁荣基础的“提洛同盟”的北方部分。因此，反腓力的情绪首先在雅典高涨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

[1] Strategos autokrator指古希腊享有自主指挥权的将军，即总司令。在雅典，总司令可在不征求公民大会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某些军事和外交决定。这种权力主要授予那些远离雅典作战的将军。他们返回雅典后，仍有义务向公民大会说明自己的行动。总司令一职还可授予那些指挥城邦同盟国联军作战的将军。——译者注

[2] Hellespontos（或Hellespont）Strait，即今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

[3] 古希腊钱币单位，价值因质地为金或银而不同，又因城邦不同而不同。通常指阿提克塔兰特，1塔兰特合6000德拉克马。——译者注

挺进奥林匹斯南麓

好机会终于降临，这位马其顿国王要挺进奥林匹斯山南面，即希腊中南部了。

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爆发了史称“神圣战争”的内斗。这是一场由毫无神圣之处的低级问题引起的争斗。

这场争斗围绕希腊人奉为圣地的德尔斐展开，因而被称为“神圣战争”。

奉献给阿波罗的神殿位于德尔斐，它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自远古时起，这里就成了希腊人信仰的圣地。不仅对希腊人如此，对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而言，德尔斐都是最著名的圣地。

阿波罗神的神谕通过侍奉他的女祭司传达给人们，其很高的“灵验率”有着很好的口碑。

真实情况是，女祭司口中说出的话意思含混，需要通过神官翻译传达，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在国家层面上不接受神谕，罗马也无此做法。但在斯巴达，不少国家政治事务要在接受神谕之后才做决定。个人前往德尔斐参拜就更加稀松平常了。

于是，一年到头都有很多人来德尔斐接受神谕，这里热闹非凡。德尔斐就此成了情报集散地。人们甚至说，去了德尔斐便可知道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

此外，位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还有一个存在理由。

对希腊人来说，神殿起着存款金库的作用。人们认为没有人会在神祇的眼皮底下偷盗。确实，没有史料记载德尔斐神殿里的金钱曾经被盗。

果若如此，那就没有比德尔斐的神殿更安全的“金库”了。虽然没有相关史料，但神殿方面一定会让存款人支付金库的使用费。不少史实显示，德尔斐居民有相当好的经济头脑。

就这样，德尔斐靠着灵验的神谕和保证安全的金库保管业成为一块富裕之地。以阿波罗神殿为中心的广阔区域没有用于耕种，而作为“圣城”保留了自然风貌。

然而德尔斐居民中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不满足于依靠神谕以及金库赚钱。他们要耕种“圣城”的土地。这引发了“神圣战争”。

底比斯响起了一片谴责声，称这是玷污阿波罗神殿的不敬行为。底比斯迅速与色萨利地区结成同盟，取名“捍卫阿波罗神及其神谕之神圣的同盟”，并起诉德尔斐所在的福西亚地区。我们不知道他们告到了哪里，总之他们提起了诉讼，要求福西亚为玷污“圣城”的行为支付罚金。

被告方福西亚认为这是希腊人的事，他们根本不想支付罚金。他们向喜好德尔斐神谕的斯巴达请求派遣援军对抗底比斯。

自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完败给底比斯，斯巴达不仅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而且已经回到希波战争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国和平主义路线上了。不过，斯巴达有很多个人对德尔斐信仰笃深，国王阿希达穆斯就是其中一位，他自掏腰包寄去了15塔兰特。

尽管福西亚也向雅典请求派遣援军，但雅典正在色雷斯与腓力苦斗，没有余力回应，也没有人自掏腰包捐款。

尽管如此，福西亚极不情愿把摇钱树德尔斐交给底比斯，它接受了

底比斯的宣战。当时除马其顿以外，希腊世界已进入佣兵时代，只要筹到钱就会有战斗力。福西亚很快募集到5000人的兵力，不久这个数字接近了1万。

底比斯是东边与福西亚接壤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强国，福西亚这点儿兵力对底比斯来说应该不在话下。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底比斯在公元前371年战胜斯巴达，进入“底比斯霸权时代”，9年后即因曼丁尼亚战役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

可是天下只有底比斯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底比斯在曼丁尼亚打赢了斯巴达，不过因为总司令埃帕米农达斯战死而以平局结束战斗而已。所以，自己还是希腊的一个强国。

因为总司令战死而没有明确分出胜负，这是事实。但埃帕米农达斯死后底比斯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当霸权国家，这才是“底比斯霸权时代”仅持续9年便完结的真正原因。底比斯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严峻的现实，也未意识到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两位俊杰死后，底比斯已经又回到了中等城邦国家的水平。

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因曼丁尼亚战役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从那年起到公元前353年为止的9年间，“神圣战争”的小规模拉锯战反复发生，总也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这给马其顿国王腓力提供了准备南进的时间。历史学家把这9年称作“神圣战争的第一阶段”。

就在第二阶段尚未开始的公元前352年，30岁的腓力开始行动，他终于向奥林匹斯山南麓的色萨利进军了。

30岁的马其顿国王不关心谁会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弄到手。他的脑子里只想向南挺进。为此，他利用了“神圣战争”。

只有雅典人知道这位腓力相当危险。为了对付腓力，雅典积极拉拢遥远的波斯国王，但并无成果。雅典只想着夺回被腓力抢走的海港城市，只要用这个做诱饵，雅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上前去。

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国家尚未采取实质性行动时，腓力已经把色萨利收入了自己囊中。

公元前352年，腓力开始率军南进，当年夏天便控制了色萨利。“群龙无首”的希腊已经没有任何城邦国家能够阻挡腓力了。

30岁的腓力再次出征。他率领着2万多步兵和300名骑兵。这支军队最终抵达了温泉关。

温泉关是窄道蜿蜒的隘口。从这个时期前溯128年，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接受了迎击波斯国王的任务，面对20万大军压境，国王仅率领300名部下，在此阻滞了波斯大军的前进步伐长达一周之久。这段历史希腊妇孺皆知。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放出话来，只要斯巴达人交出武器，就准他们所有人安全回国。列奥尼达回答说：“你来取吧！”他与300勇士一起战斗到最后。虽然勇士们全部牺牲，但这个故事至今还会令希腊人热血沸腾。

波斯国王付出己方士兵战死一成、两个王弟战死的代价，但他仍执着地想要突破温泉关，因为越过这个隘口便是希腊所有实力城邦：底比斯、科林斯、雅典、斯巴达……

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隐退状态的斯巴达，其他城邦都向温泉关派去了军队，合起来的规模似乎略小于马其顿军队。

腓力也明白温泉关的意义。他没有在这里强攻，而是选择撤退。他以适合战斗的季节行将结束为由撤兵。他不只退兵，还打道回府回到了马其顿。

我真想写腓力也懂得等待，但我认为他喜欢的是等待本身。

事实是他又回到了起点。不过，年仅30岁的他还有的是时间。另外，马其顿在色萨利地区的统治还需要巩固。

色萨利是良马的产地，因此也是骑兵之国。腓力想要把马其顿军队的300名骑兵扩大到10倍的规模。

“忧国之士”狄摩西尼

这一时期的雅典被年轻的马其顿国王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时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就是狄摩西尼（Demosthenes），后世赞誉他为“敢于起来反抗暴君的自由旗手”。

狄摩西尼将腓力直呼为“暴君”，他比腓力大两岁，两人属同时代人。声讨“暴君”的“自由旗手”言辞尖锐而充满能量，他不断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马其顿国王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未压制过言论，更未谴责过雅典的民主政体，然而却被说成“暴君”。

不过，腓力好像并未介意。也许他知道狄摩西尼对雅典公民的影响力也没多大。

安放在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的狄摩西尼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表情都显得很沉痛。据说他老后与年轻时的区别只是皱纹和白发的数量，给人的印象是一样的。他的一生是忧国的一生。为了使雅典避免被咄咄逼人的“暴君”吞噬，狄摩西尼请求公民大会采取以下政策。

一、把雅典海军的常备战舰增加到300艘。

二、全力以赴真正修复对陆上防御有用的要塞、桥梁和道路。

三、整编管理雅典国库的公务员，准确掌握国库的实际收入情况。

四、研究国内物产交流和对外贸易两方面的鼓励政策，尽早付诸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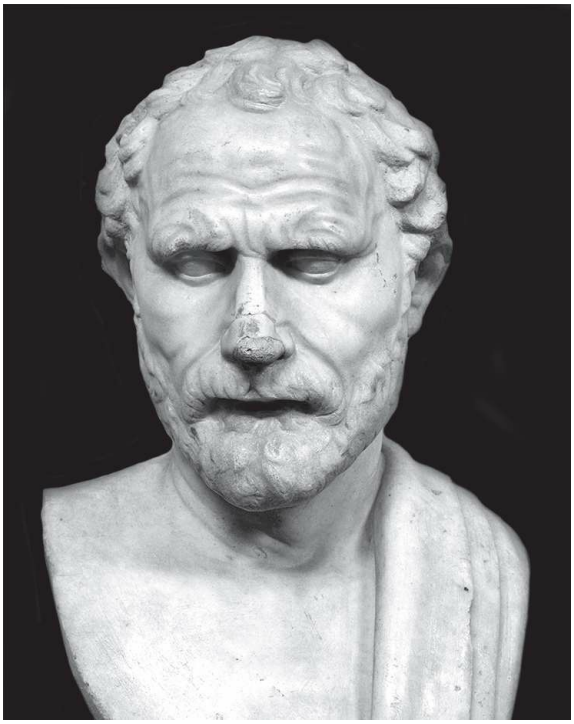
五、除了敌人来袭时，平时也必须保障新鲜水的供应。为此要重启水渠的完善工程。

这项工程曾经实施过，后因资金不足而中断。

这些论点全部正确。年轻的狄摩西尼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回归到伯里克利时代。

然而，所有外部环境都已经与伯里克利时代不同了。问题在于去哪里找实现这些政策的资金。

狄摩西尼主张，所需资金可以通过重新制定雅典的社会福利政策来获得。这与他回归伯里克利时代的主张相互矛盾。于是，公民与他渐行渐远。



狄摩西尼

民主雅典的社会福利政策叫作“theorikon”。这是伯里克利考虑并制定的政策，目的是让第四等人——每天工作养活家庭的人，亦即罗马时代的“无产者”——从事军务而无后顾之忧，或可放心地从事公务员工作。

伯里克利时代的这个政策仅限于从事军务或公务活动的人，他们不能从事本职工作期间，由政府为他们提供经济保障。

克里昂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在雅典横行一时的煽动家之一。为讨好大众，他把这项政策改成了恒常的福利制度。雅典公民即使不再作为桨手和轻装步兵从事军务，即使不再根据抽签去做国家的行政工作，国家也向他支付比原来工作所挣略少的保障金。改变后的制度已经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哲学家柏拉图在世时批评伯里克利的这个政策把雅典公民变成了一群乞讨者。我想不如说他批判的是克里昂以后的福利制度。

如果是那样，柏拉图的批判是正确的。光领钱不工作，这是欺骗国家。

这种福利制度也是雅典人逃避兵役成为常态的主要原因。当然会是这样！无论是否服兵役，都会有同样的金钱进到口袋。

然而，这种福利对雅典下层民众来说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不管是战事迫在眉睫需要出动军船，还是确保水供应的工程，他们都不允许触动福利制度。

在公民大会上，人数占多数的第四等人会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动福利制度，要让第三等人以上的有资产者付钱！”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后，雅典经常国库空虚，每到这时都是通过临时增税的措施来填空的。

资产在当时就是不动产。雅典不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租给他们住房为雅典中产阶级带来收入。

对此所课的税金属于直接税。这在征收间接税的古代免不了给人重税的印象。

海外资产是上流阶层的财富来源。但如今提洛同盟已成为过去，跨

入了马其顿不断侵蚀雅典势力范围的时代，雅典人的这部分财源也在不断缩水。也就是说，雅典公民中所有阶层的经济状况都在恶化。

古代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从事军务活动相当于支付直接税。因此，直接税的别名又叫“血税”。所以上流社会出骑兵，中产阶层出重装步兵，人们去为自己的国家打仗。

第四等人逃避兵役的主要原因在于扩大解释了福利制度。逃避兵役还蔓延到上面的等级。这也是很自然的。已经让他们支付过直接税，再让他们付“血税”，他们当然会认为这是双重征税。

就这样，雅典越来越依赖佣兵，通过增加税收来筹集佣兵经费也成为常态，其结果只能是国防力量的恶化和经济实力的衰退。

尽管忧国之士狄摩西尼极尽辩才，但他的提案一个都未能通过。

他也从未当选过每年的10位将军之一。

也许是对同胞的冷淡感到绝望，狄摩西尼没有成为以公民大会为舞台的政治家，而成了一位面向广大公民发声的言论家。

他撰写并发表了*Philippika*。这个标题用他的思想解释的话可意译为《反腓力辞》。

有四篇《反腓力辞》流传至今，篇篇锦秀，字字玑珠，可谓把希腊人的修辞用到了极致。

狄摩西尼与政治家伯里克利、历史家修昔底德和哲学家柏拉图，都是在语言表现力方面让外国人望尘莫及的雅典人。他们即便是写谴责文章，也要发挥出卓越的创作力。

第一篇《反腓力辞》发表于公元前351年，也就是腓力抵达温泉关又撤军的第二年。

狄摩西尼在这篇文章中强烈地告诫雅典人，面对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的马其顿国王，只有拿起武器战斗这一条路可走。

然而这位忧国之士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雅典公民没有奋起反抗马其顿，反而选择与马其顿和解。

第二篇《反腓力辞》发表于7年后的公元前344年。狄摩西尼已经40岁，但笔力不减，这一篇反而比第一篇更为尖锐。

他坚决反对雅典两年前与马其顿缔结的媾和条约，强烈主张废止该条约。因为腓力“尊重”雅典权益的条件是雅典承认色萨利以北的希腊全境为马其顿领土。

此外，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了反斯巴达的动向，腓力出手援助这些反斯巴达的城邦。对此，狄摩西尼也敲响了警钟，认为这只会有利于“暴君”。

他还指名道姓地抨击反狄摩西尼派的重要人物、主张与马其顿和解的埃斯基涅斯，说他是叛徒。

然而，这第二次声讨也成为哑炮。

第三篇《反腓力辞》发表于3年后的公元前341年。

这篇给人的感觉是作者不能用行动表达的思想全都在文章中迸发出来，悲观情绪越来越浓。

狄摩西尼并不只是叹息悲伤。他对小自己两岁的腓力的力量有着正确的认识。他一直在观察希腊城邦国家相对于马其顿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的凋落，从未挪开自己的目光。他甚至说，现在希腊人深陷的苦境就像是神对人类的无情攻击。

尽管如此，狄摩西尼没有沉沦于绝望，他让自己悲痛的心情彻底爆发。他说："我宁愿死去千回，也不会跪在腓力面前！"

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反腓力辞》很快于第二年发表。

文章内容一如以往，对马其顿国王扩大势力范围敲响警钟，要求雅典人奋起反抗。倡导与波斯结盟是这篇文章的唯一新意。

他主张，雅典应该与东方大国波斯联手阻止马其顿扩张。

这种思想与最受雅典人尊重的伊索克拉底的想法完全相反。86岁的伊索克拉底认为，希腊的未来只能在马其顿。

十多年来，腓力屡屡被指名道姓地抨击，他会如何对付这位与自己同辈的雅典言论家呢？

他没有做任何应对。他知道狄摩西尼就在到访马其顿首都佩拉的雅典使节团里，却没有表现出刁难的态度，更不用说扣押他了。

现代的研究者怀疑马其顿国王是不是没有读过《反腓力辞》。

狄摩西尼的声讨书也许是希腊修辞的杰作，强而有力，传递出愤怒的感情，但没有一点讽刺和幽默，读着让人感到窒息。我知道那是忧国之书，但若论有无使人有兴趣读完的力量，我只能说没有。腓力大概没读完就把书扔到一边了吧。

不，也许这四篇腓力全都精读过。

因为《反腓力书》生动地描写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来希腊各城

邦一盘散沙的情形。

狄摩西尼不再发表声讨书，但他仍然反对腓力，没有停止反马其顿的言行。

腓力被暗杀时，他对暗杀者大加赞赏。不仅如此，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他甚至明确站在马其顿体制内反对派重臣一边。

他憎恨马其顿，而且一以贯之。但是，腓力没把他当作对手，他的儿子也没有。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位忧国之士。

狄摩西尼死于公元前322年，死因是自杀。

那一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的雅典最终灭亡，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暴君”和他的儿子都放了雅典一马，雅典这才得以苟延残喘。大帝死后，他的将军们不再姑息，希腊被收归其中一名将军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城邦国家的时代就此终结。

这位狄摩西尼留名后世，是因为他拥有罗马的西塞罗这样的崇拜者。

狄摩西尼自杀278年后的公元前44年，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尤利乌斯·凯撒遭到暗杀。凯撒曾经治理好的内乱再度爆发。

这一年开始的内乱是第二次内乱，对峙双方是暗杀凯撒的布鲁图及其同党，以及明确表示要继承凯撒遗志的安东尼（因以与克娄帕特拉恋爱而闻名）和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一派。

西塞罗与暗杀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被认为是布鲁图的思想导师。对西塞罗来说，凯撒被暗杀后罗马与他希望的样子越来越不一样了。

布鲁图及其同党逃到了希腊，罗马成了凯撒派的天下。

哲学家兼政治家西塞罗对此发出了抗议之声，他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共计14篇“声讨书”。

他把这些文章也定名为《反腓力辞》，像是狄摩西尼《反腓力辞》的续篇。他大概也认为狄摩西尼是“敢于起来反抗暴君的自由旗手”。

西塞罗的《反腓力辞》内容多为中伤和低级的个人攻击，缺乏品味。这大概是因为他做过法庭辩护人。

被点名声讨的安东尼没有放过他。

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的三头同盟甫一成立，西塞罗就被列在肃清名单之首。

63岁的罗马首屈一指的言论家，在位于福尔米亚的别墅被三头同盟派来的士兵所杀。

一年以后的希腊，在马其顿国王腓力建立的城市近郊，反凯撒派和凯撒派开战，布鲁图得知自己的军队战败后自杀。

11年之后的公元前31年，接踵而来的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对抗也宣告结束。第二年，33岁的屋大维改称奥古斯都，原本只存在于凯撒头脑中的罗马帝政起步。这距离罗马的忧国之士发声仅过了14个年头。

由此上溯三百多年回到希腊，自狄摩西尼发表第一篇声讨腓力的文章起，到腓力把希腊全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是14年的时间。但这只是单纯的数字上的一致，过程大相径庭。

马其顿国王腓力是一个等着敌手出错的玩家。在希腊，围绕圣地德尔斐的“神圣战争”再度开战。

这次开战和之前的数次战争一样也缘于一些小事。据说控制着德尔斐的福西亚人挪用了存在阿波罗神殿里的钱。福西亚筹集佣兵费用黔驴技穷，就对神殿里的宝物和金库里的钱下了手。对此感到愤慨的底比斯和其他城邦开始向德尔斐进军。

福西亚再次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派出3000名士兵北上。

福西亚军队的对手底比斯派出4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

希腊中南部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波斯的介入使这种状态恶化。

这时，城邦国家时代已经进入末期，希腊人已经把鼎盛时期努力自助的精神抛弃殆尽。

斯巴达能够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有波斯的资金援助。于是，对斯巴达出兵3000人抱有危机感的底比斯人此时也在琢磨，自己何不也向波斯请求资金援助呢？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波斯国王居然接受了这个请求，立即送300塔兰特。

波斯国王的真正用意不是帮助底比斯。底比斯人声称自己是德尔斐神殿的守护者，而波斯是信奉拜火教的国家，它的国王对希腊人信仰的神祇并不关心。

波斯国王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只要希腊城邦的争斗持续下去，与希腊本土隔爱琴海相望的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邦和岛屿就能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

先是斯巴达，现在又是底比斯，瞄着波斯金主的希腊城邦国家层出

不穷。

这种混乱持续了3年。为德尔斐而战的两派并未决战，一直小打小闹。似乎阿波罗神对此也感震怒，让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一带。两派只在余震不断的这段时间放下了武器。

在这段时间，年过三十的马其顿国王并非无所事事，他继续蚕食曾经在雅典势力范围内的色雷斯。

雅典人也在拼命抵抗，即使耳畔已经没有了狄摩西尼的训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色雷斯矿山的权益，还关系到来自黑海的小麦的进口路径。

有时会发生满载小麦的整个帆船队都被马其顿人捕获的事件。对粮食依赖进口的雅典而言，这可是要让市场断粮的大事件。要阻止马其顿的这种行动，雅典只有出动海军明确表示捍卫本国粮食安全才行。然而，狄摩西尼主张的300艘三层桨战船的常备军力，对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雅典而言只是梦想。

总之，腓力很清楚雅典虽有商船但战船奇缺的现状，他立即撤走部队，但派了一队士兵在雅典领土阿提卡地区的马拉松登陆。

马拉松是近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马拉松的词源。那里是沿海平原，第一次希波战争时，在此登陆的波斯军队与前来迎击的雅典军队在这里展开了激战。马其顿士兵在这里登陆说明他们离雅典已不足全程一个马拉松赛程的距离了。

“神圣战争”还在拖沓地继续着，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战也在无止境的拖延中。虽说事关粮食大事，但雅典只是不断向马其顿首都佩拉派遣了媾和谈判团，狄摩西尼也是其中一员。

“忧国之士”在外交场合也起不了作用。谈判团由10人组成，只有他总是发表强硬观点，别人不接受他的意见。

内部分裂会被对手看透。囊括雅典全部实力人物的谈判团被30来岁的腓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时谈判团到了马其顿首都佩拉，要等上50天才能见到国王，理由是恰好国王出征色雷斯。雅典谈判团来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这种傻等是何滋味？

谈判团中最能忍耐的菲洛克拉特斯的努力发挥了作用，公元前346年马其顿与雅典成功媾和。媾和只维持了数年，雅典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首先，一项具体的收获是被马其顿俘虏的雅典公民终于可以回国。

马其顿国王按照谈判团的要求，让这些人在守护女神雅典娜的祭奠日以前回国了。

马其顿承认色雷斯矿山的开采权一如既往归雅典人所有，但所有权归马其顿国王。我猜测收益可能会由两国按比例分掉。雅典与马其顿可能类似现代的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的关系。

此外，双方明确约定，马其顿尊重雅典在其粮食补给线路上的活动，马其顿对此不设置任何阻碍，并会配合打击出没于这片海域的海盗。

作为交换，雅典最终失去了念念不忘想要重新占有的安菲波利斯城，正式承认安菲波利斯归马其顿国王所有。这个城市在伯里克利时代由雅典开发并一直是其在色雷斯地区的据点。

安菲波利斯归了马其顿，就等于色雷斯地区南部，以及从那里到爱琴海像三叉戟一样突出去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全都成为了马其顿的领土。

雅典在8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去了安菲波利斯。80年来雅典人一直祈愿收复安菲波利斯，这让人感觉他们没有读懂时代的动向。

雅典人为实现这个夙愿牺牲了很多，结果却是全面放弃。

斯巴达未能顺应时代做出改变，在囿于过去未能改变这一点上，雅典也一样。

研究马其顿国王与雅典人的谈判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有趣，那就是年仅35岁的马其顿国王似乎买到了雅典人的经营能力。

国王把安菲波利斯弄到了手，但完全承认雅典人在以安菲波利斯为中心的整个色雷斯和卡尔息底亚地区有开展经济活动的自由。

腓力懂得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他似乎还知道发展文化的重要性。3年后，他把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20年之久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聘来做儿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

也许，90岁的伊索克拉底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雅典的未来在于并入马其顿，在那里发挥自己拥有的能力。用今天的话说，大约就是依靠软实力生存。

不过，当时的雅典人好像还没横下这条心。

谈判团完成与马其顿的媾和回国后，公民们鼓掌欢迎。公民们认为，能避免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就不错了。

拒绝了狄摩西尼的强硬要求、与马其顿达成妥协的菲洛克拉特斯也很满意。当人们问到他与狄摩西尼意见冲突的原因时，他这样说：

“我与他之间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因为我喜欢葡萄酒，而他只喝水。”

多数雅典人喝酒，他们不会彻底信任只喝水的人。

然而，腓力显示出他并非一个简单的30岁男人。他让军队再次南下，直指温泉关。

雅典人只能以苦涩的心情回味墨汁未干的媾和条约，那里面没有一项条款禁止马其顿南下。

没有人知道底比斯是何时请求马其顿介入的。但请求介入这事是肯定有的，也许底比斯人痛感波斯国王经常拖延资金援助，“神圣战争”前途未卜，因而急于打开局面。

腓力没有明确表示站在底比斯一边，他选择了中间人的立场。

福西亚也同样烦透了没完没了的战争。马其顿的介入受到战争双方的欢迎。

不过腓力的真实意图是借帮助结束“神圣战争”正式进入希腊中南部。

这时，只有一个人早早看透了这一点。他总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只喝水而不断发表声讨书《反腓力辞》，他就是狄摩西尼。

腓力虽然抵达了温泉关，但此后行动谨慎。他没有直接向希腊中部展开军事行动。

马其顿与雅典媾和后差不多一直处在友好状态。

他已没有必要把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当成问题。

他甚至与遥远的波斯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他向希腊中小城邦表明了捍卫圣地德尔斐的意志，博取他们的好感。

希腊人相信了这一切，他们推举腓力担任德尔斐运动会的主持人。

自古以来，希腊有四种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的运动会。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献给主神宙斯的运动会最为著名。

其次是在德尔斐举行的献给阿波罗神的运动会。

还有在科林斯举行的献给海神波塞冬的运动会。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尼米亚还有一场献给宙斯的运动会。

这些运动会都是每4年举行一次。希腊人会中断战斗前来参加。受托主办这些运动会是非常荣耀的事。

腓力的祖国马其顿长期被视为半蛮族国度，作为国王他一直热衷于马其顿的希腊化。所以担任运动会主持人无疑是一个令他喜悦的礼物，尽管他内心明白这是他实现野心的一个手段。

这个时期，还有更多令他高兴的礼物。“神圣战争”开始向终结的方向发展。与其说是腓力的外交战奏效了，不如说是为德尔斐而争斗的双方都不愿意再继续下去。底比斯与福西亚决定双双放手，把德尔斐神殿的运营全部交予马其顿国王。

腓力甚至得到了德尔斐神殿守护者的地位，而这个神殿一直被视为希腊人信仰的第一神殿。

从马其顿军队抵达温泉关又撤回的那年算起，已过去了十多年。行事谨慎的腓力已年届四旬。

此前腓力在奥林匹斯山南面一直处于所向无敌的状态。然而这时反马其顿势力开始在斯巴达和雅典抬头。

斯巴达的反马其顿情绪仅仅是因为不认可马其顿崛起而对其产生厌恶，而雅典的反马其顿现象牵扯到实际利益，不仅是厌恶。

在此之前，腓力虽然一直行事谨慎，但他忘记了雅典不仅有爱琴海，还有地中海西部这个市场。

腓力向位于科林斯湾出口处的诺帕克图斯派兵，占领了那里。对此，与马其顿缔结过媾和协议的雅典认为马其顿背叛了自己。

诺帕克图斯（后世的黎凡特）是雅典进出地中海的中转基地，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海港城市，雅典的商路畅通和市场繁荣都仰仗于此。

上述情况使反马其顿情绪高涨的斯巴达和雅典抵制由腓力主办的德尔斐运动会。

这是因政治原因抵制希腊运动会的第一个案例。希腊运动会的惯例是哪怕两国正在交战也要暂时放下武器，搁置争议，同场竞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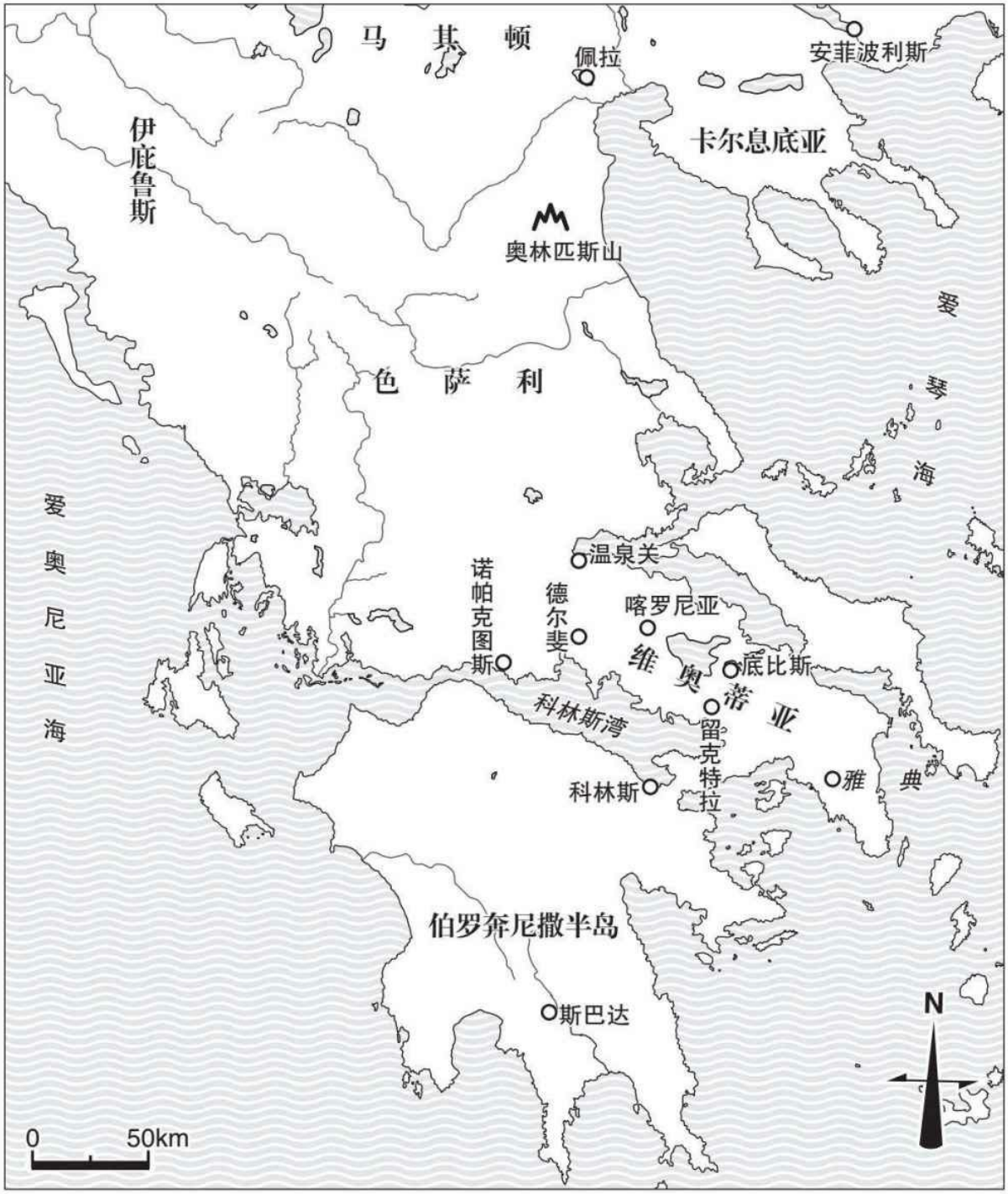
还真是这么回事。

希腊人既能创造民主政治，也能创造独裁政治。

既能实现全体公民投票，也能搞投票舞弊。

既能发明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能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

因为创造了某个事物，就要创造出它的反面。这里叫“欧罗巴”，那里就要命名为“亚细亚”。自此开始，生活在后世的人们无论好坏，很多事情上都有赖于生活在古代的希腊人的创造。



德尔斐及其周边

始于希腊的不仅仅有哲学、科学和艺术。

希腊人历史的循环往复也让人钦佩和惊愕。

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雅典，仅仅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平息不了公民的怒火。表面上看这是对不断声讨腓力的狄摩西尼思想的继承，但实际上事情没有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首先，成功与马其顿媾和的菲洛克拉特斯成了牺牲品。他被人告发上了审判庭，后来选择了自行逃亡得以免除死刑。

雅典人没有认识到，通过强化自身军事力量与马其顿正面对决，才是狄摩西尼的一贯主张。雅典选择联合底比斯，共同对付马其顿。

底比斯拥有把斯巴达拉下霸权国家地位的胜利经验。雅典选择依靠底比斯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自己复兴。

与雅典人一样，底比斯人也对马其顿的崛起忿忿不平。

“底比斯双雄”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活跃时该国就在觊觎色雷斯地区。

色雷斯紧靠底比斯所在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北面。

“双雄”在世时，底比斯的梦想是合并维奥蒂亚和色雷斯，建成希腊中部的最大强国。

如今色雷斯被马其顿国王腓力纳入麾下。

就这样，希腊中部的强国雅典和底比斯迅速接近。

组建大规模军队需要时间。希腊中部阴云密布，转眼两年过去了。

成为希腊霸主

这两年对即将44岁的腓力来说是不断思考的两年。

他面临登上马其顿王位22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战。

人们都说，有雅典才有希腊。腓力的对手是雅典以及底比斯，前者全盛时期持续很久，后者曾经打败战胜过雅典的斯巴达。

底比斯和雅典后面还跟着科林斯等弱小城邦。

这意味着，马其顿要与斯巴达以外的希腊中南部所有城邦国家为敌。

腓力过去的战争对手只是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内陆地区的非希腊蛮族，或是希腊政治体制不完备的色雷斯王国和色萨利地区。马其顿与历史悠久的城邦国家，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等从未在战场上照过面。

腓力一向行事谨慎，没有发动战争也走到了今天的程度。这也造成他没有与先进国家打仗的经验。

不止最高司令官腓力没有经验，“巨大刺猬”一般的重装步兵方阵以及率领重装步兵的帕米尼欧同样没有经验。

由腓力创立、帕米尼欧培养出来的“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是第一次与希腊实力城邦国家进行会战。

如果在这里撤退，就等于退回奥林匹斯山北面去了。

但局势对全无经验的马其顿军队而言也有两点有利之处。

第一，很多城邦国家一起组建的联军中有用钱雇来的佣兵。而马其顿的军队可谓国民军，军队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第二，因为马其顿军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他们不会像对手那样被过去的成功经验束缚。

不过就腓力个人而言，他也许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第二点好处。

总之，喀罗尼亚之战是马其顿与希腊城邦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是20年前还被视为落后国家的新兴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正面对决。

公元前338年夏，从北方南下的马其顿军与北上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在德尔斐以东30公里外的喀罗尼亚平原对阵。

城邦国家联军以底比斯和雅典为主力，以科林斯、墨伽拉为首的中小城邦亦来参战，外加5000名佣兵，共计35000人。

马其顿军有3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共计32000人，都是纯粹的马其顿士兵。

腓力登上王位开始军事改革时，马其顿只有1万名步兵和600名骑兵。20年以后其兵力已经发展到之前的3倍。腓力辛苦吞并的色雷斯和色萨利，对强化马其顿军队实力也做出了贡献。

希腊军的惯例是主力部署在右翼。这种部署别名叫“荣誉部署”，最高司令官也在右翼。

有12000人参战的底比斯军组成了城邦联军的右翼，指挥是底比斯人特阿根尼。

雅典有9000人参战，在左翼布阵。科林斯等中小城邦派来的士兵共计9000人为中路。佣兵5000，一分为二，分别部署在右翼和左翼的后方。

中路、左翼加上佣兵超过2万人。这部分部队交给雅典人卡瑞斯和吕西克列斯指挥，其理由有二。

第一，囿于民主决策的雅典公民大会讨厌将军队交给某个人指挥。

第二，雅典已经没有一位武将值得信赖并可以委以重任了。

与这支城邦联军对阵的马其顿军没有因袭右翼、中路、左翼这种希腊传统的布阵方式。

重装步兵及轻装步兵共3万人被一分为二，右路由国王腓力指挥，周围环绕着近卫军，左路交给帕米尼欧指挥。

2000名骑兵部署在马其顿军的最左翼，由刚满18岁的亚历山大指挥。来自色萨利的骑兵也在其中，纯粹的马其顿骑兵大概不足1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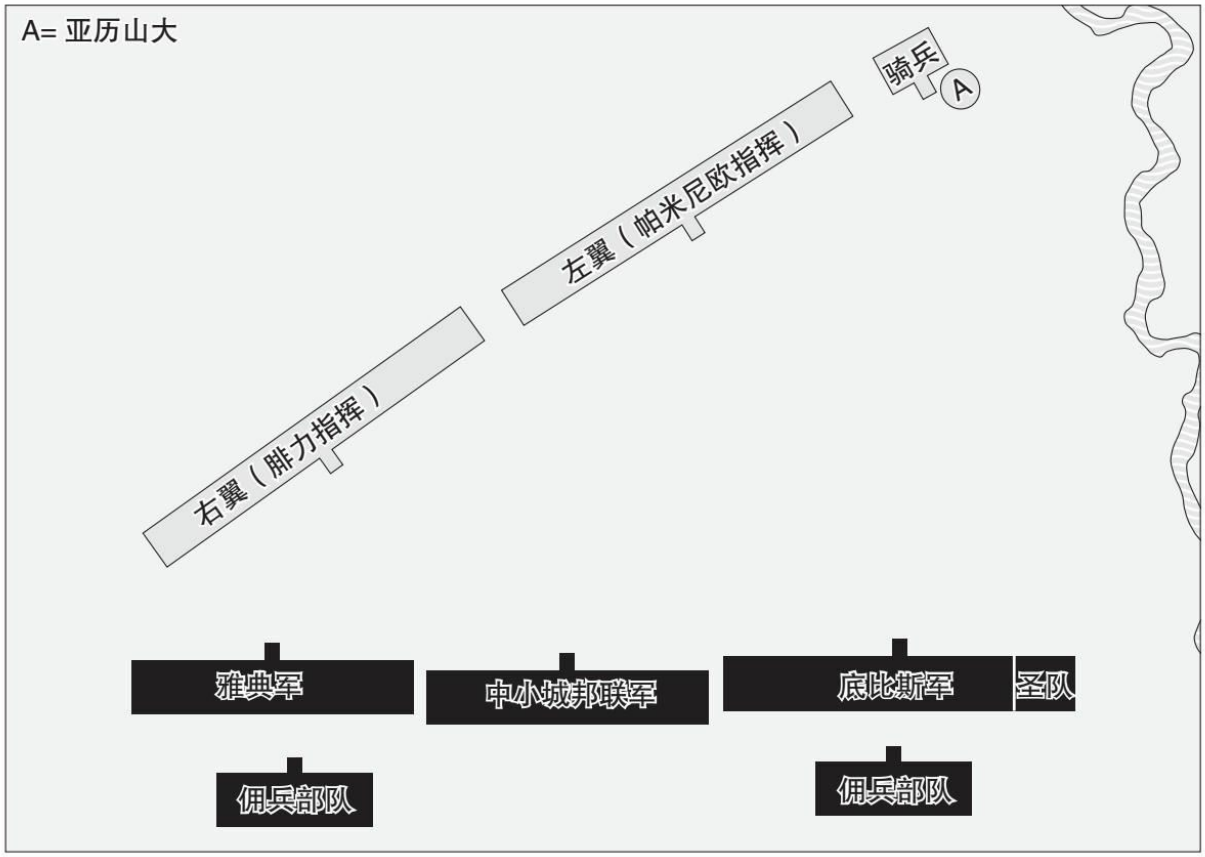
在希腊，20岁是开始服兵役的年龄。征召18岁的未成年人入伍仅限于十万火急的时候或多面开战、兵力不足的情况。

从喀罗尼亚战役-1图所示开战前的布阵可知，腓力并没有把左翼完全交给儿子。

研究者也认为亚历山大是被当作预备队使用。也就是说，18岁的亚历山大被视为板凳队员。

实际上，父亲已经严命儿子没有命令不得行动。

这样做理所当然，喀罗尼亚战役是亚历山大首次上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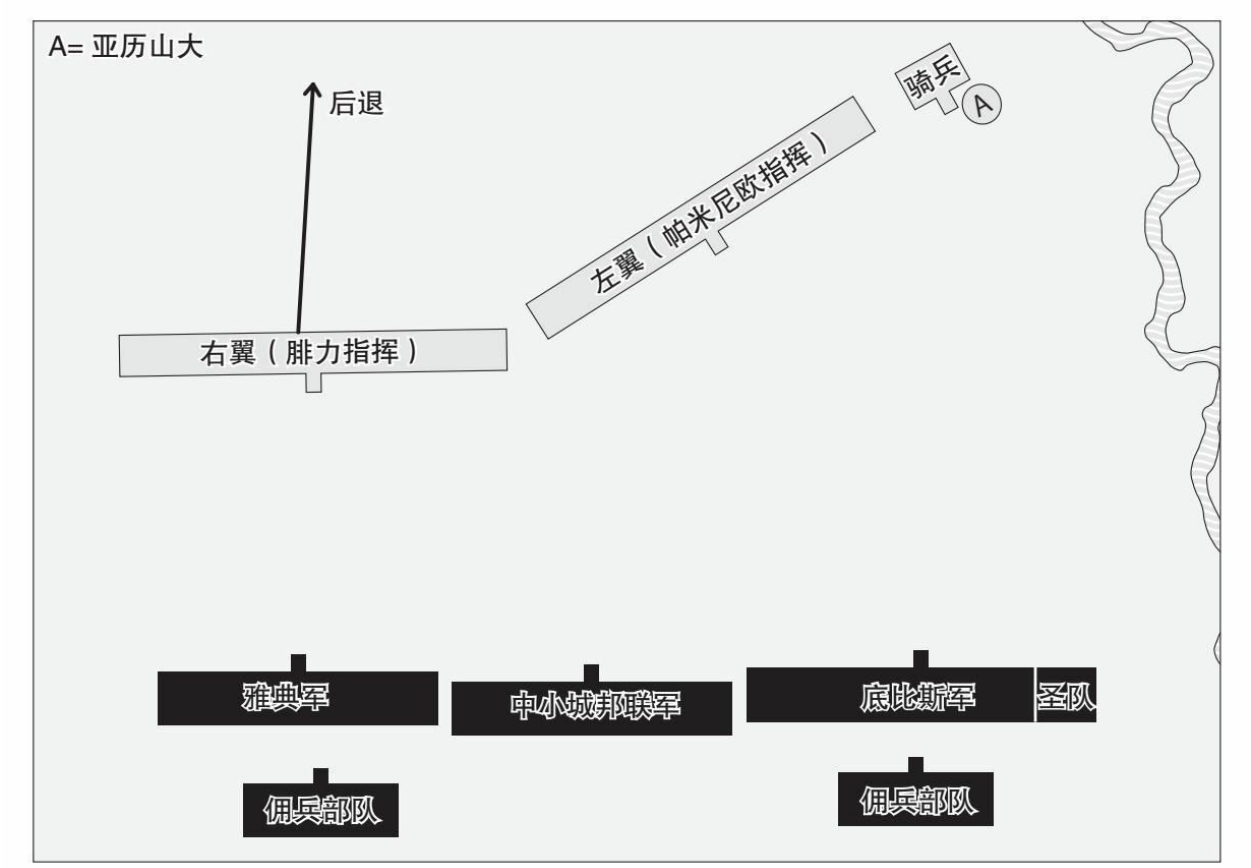
喀罗尼亚战役-1

公元前338年8月2日，喀罗尼亚平原成为战役的战场。地形有利于城邦联军。

左面是低矮的丘陵，右面有蜿蜒的河流，3公里见方的平原夹在其中。城邦联军北上而来，自然按照地形布阵，形成左翼雅典军从高处向低处进攻的态势。部署在右翼的底比斯军受河流保护，可以免受敌军左翼骑兵团的攻击。

底比斯军的最右翼是号称不败的300人“圣队”，33年前他们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一举把斯巴达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推了下去。

尽管雅典军占据由高向低进攻的优势，但不得不面对马其顿“巨大的刺猬”。较之雅典军，底比斯军的防卫可谓铜墙铁壁。



喀罗尼亚战役-2

44岁的腓力率军南下，他不得不在明显不利的地形上布阵。国王思考着对策。

战斗在公元前338年8月2日打响。（见喀罗尼亚战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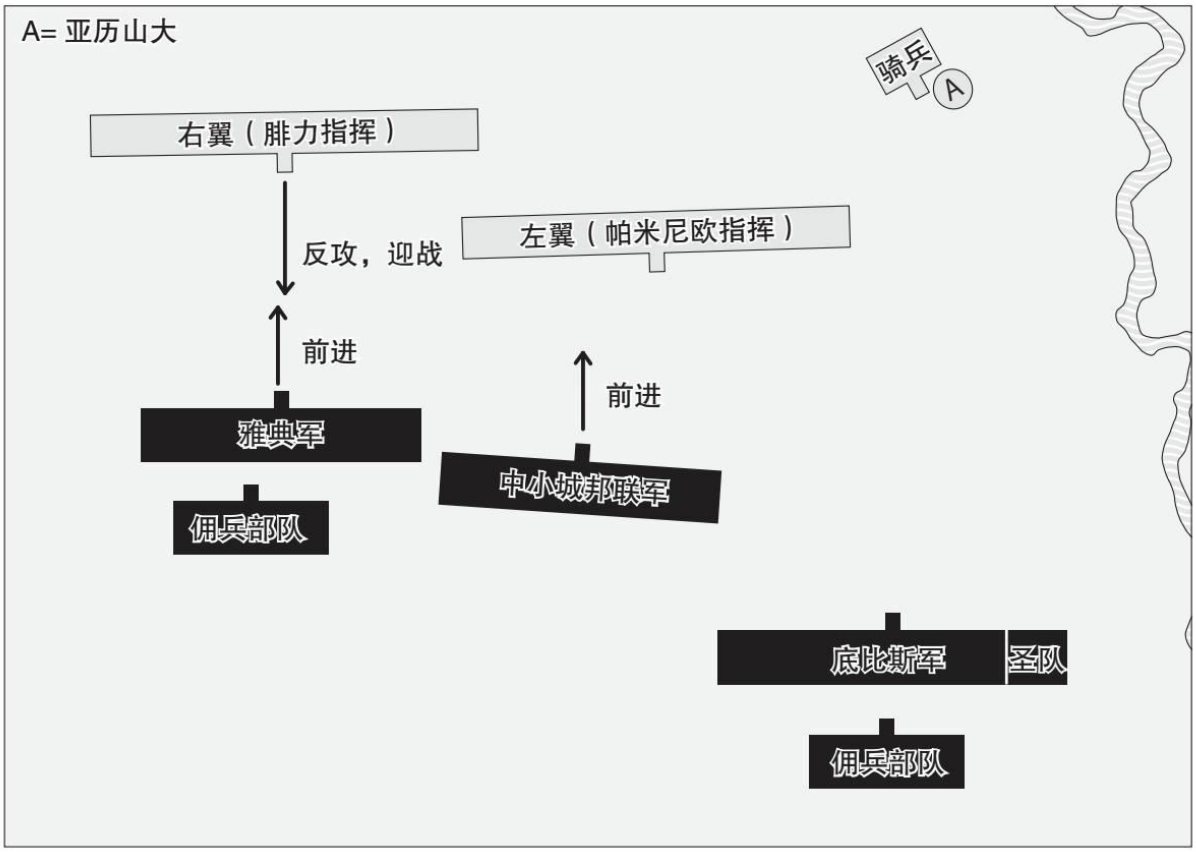
腓力命令自己率领的右翼后退，保持刺猬队形不变。队伍一点点地后退，像是经不住敌人的攻击。

后退时，士兵用右手和穿过内环持着盾牌的左手手持近7米长的长矛，保持着规定角度。重装士兵们经过长达20年的训练和实战，个个都是老手。马其顿方阵很好地执行着国王的命令。

雅典军指挥官看到马其顿方阵后提高了嗓门，大声激励将士：“一

口气把敌人赶回马其顿！”

然而，雅典军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从高处下到了低处。



喀罗尼亚战役-3

这时，腓力发出了命令：“停止后退！”马其顿方阵立即停止后退进入近战，长矛发挥出了威力。（喀罗尼亚战役-3）

城邦联军的左翼与马其顿军的右翼（应该是右翼的右半部）展开了激战。

大约是受到马其顿方阵后退的刺激，城邦联军的中路也加入到激战中。

研究者说，直到这个阶段，两军都相信自己会获胜。

此时部署在城邦联军右翼的底比斯军尚未采取行动，帕米尼欧率领的马其顿方阵的另一半也未行动。

在布阵图上画出右翼、中路和左翼只是为了让人容易看懂。

我们现代人去画阵型实际并不能分得很清楚。双方相距数公里布阵，各队之间虽有间隔，但在战斗开始前看上去只是一条横线。

用肉眼去观察，只要两军距离超过1公里，人们便搞不清敌军的右翼到哪里为止，中路又从哪里开始。

腓力后退和雅典军顺势前进使人们看清了对方布阵的情况。这时，退到最左翼的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团与对面的底比斯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也就是说，随着两军距离缩短，他们逐渐看清对阵情况。

战斗开始后，原先看上去是一条横线的敌军阵型分出了右翼、中路和左翼。因为战斗一开始，士兵们会靠向自己所属的队伍。

18岁的亚历山大没有放过这个时机。（见喀罗尼亚战役-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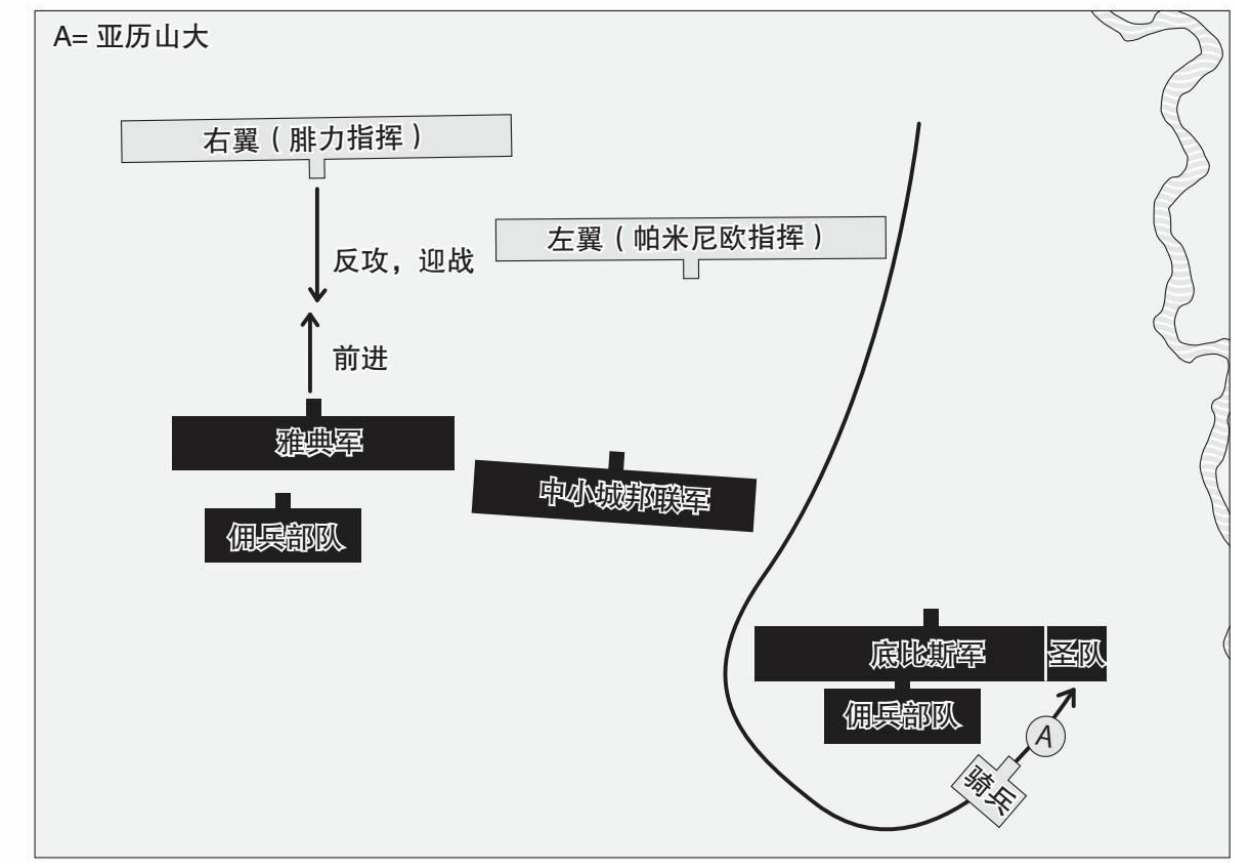
他没有放过出现突破口的时机。

但是父王尚未下令。亚历山大面对获胜的机会恐怕早已把父亲的话忘到了脑后。

根本不需要叫“跟上”。马其顿骑兵紧紧跟在冲锋在前的亚历山大身后，色萨利的骑兵也跟了上来。

2000名骑兵斜刺过战场，穿过城邦联军右翼与中路之间狭窄的缝隙，绕到镇守右翼的底比斯军背后。

在不知马镫为何物的古代，骑兵骑马的姿势不能像现代赛马选手那样保持前倾，他们在马背上只能挺直身体、让双脚下垂，那姿势就像美国电影中的印第安人。



喀罗尼亚战役-4

骑兵要用这样的姿势穿过战场，接近敌人，全力投枪，这是只有习惯骑马的人才能做的攻击。

2000名骑兵抱团突击不可能不对其他士兵产生影响。

帕米尼欧指挥的方阵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腓力率领的方阵在你推我搡的近战中行动越发活跃。整个喀罗尼亚战场一下子陷入了激战。

18岁的亚历山大一直在快攻，马其顿骑兵紧随其后。他们绕到底比斯军背后并未停下，直接冲进了部署在底比斯军最右翼的“圣队”。

这支战绩辉煌的精锐部队30年来一直享有不败的威名，此时竟全军覆没。根据史书的记载，300人全部被标枪贯穿胸膛而死。

公元前338年8月2日的这场喀罗尼亚战役以马其顿大获全胜告终。

底比斯军有12000人参战，生还者不过十分之一。

9000人的雅典军中1000人战死，2000多人被俘。

没有史料记载马其顿方面的死伤人数。很多时候，史书不会记录那些不会影响事件结果的数字。

不论如何，在几乎以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为敌的战斗中，马其顿取得了完胜。

腓力陶醉于胜利的美酒，但他的内心难道不会五味杂陈吗？

如果按腓力的战术将战斗坚持到最后，喀罗尼亚战役还是会以马其顿方面的胜利告终吧。

因为双方在士兵素质与指挥系统明确化方面的差距已经很明显。

但要按腓力的战术打，一定会拖长战斗时间，敌方乃至己方牺牲者的数量会大大增加。

是亚历山大的冲锋陷阵让战况为之一变。

快攻会缩短战斗时间。缩短战斗时间，战死者的人数就会减少。而且这次快攻的结果是大获全胜。

这就好比比赛中教练还未下令，一个新球员，还是板凳队员，径自跳上场连进三球助球队获胜。这让教练情何以堪。腓力的心情不就跟这教练一样吗？

在日本，这叫作“子胜于父”。

腓力不是平庸的父亲。正因为不平庸，他看到了刚刚起飞尚显稚嫩的儿子的威力。

己方损失轻微，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优势。

每个士兵都会认为自己不必无为而死。

想到自己不会像狗一样死去，军中士气高涨。

腓力不是平庸的领袖，他不会不懂这些。

可腓力是马其顿国王，他使落后的马其顿获得如此成就，他很自负。

作为父亲，他该为初次上阵便显露才华的儿子感到骄傲。

但是，他才44岁。他现在是希腊最有权势的人物，在喀罗尼亚他又是最高司令官。于是，他先公布了对亚历山大的处罚。

父对子的处罚方式

无视最高司令官的严格命令擅自冲锋，按军规这是要严惩的。

可是，马其顿军的每个士兵都知道，是亚历山大抓住战机打了胜仗。

44岁的父亲用以下方式处罚了18岁的儿子。

他让亚历山大带着骨灰罐前往雅典，里面装着战死者火葬后的骨灰，说是奉国王之命交给雅典政府。18岁的儿子当即领命。

这段时间，雅典正担心在喀罗尼亚获胜的马其顿军会立即进攻雅典，城里弥漫着一股杀气。

而父亲派给儿子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任务。

父亲命令说，你可以带一队士兵前去雅典，但你必须一个人走进城门。你可以穿戴短披风、胸甲和铠甲，但不能戴头盔，也不能佩剑持矛，不能设防，为了表示悼念之意你还必须裸足前往。

有人会因为战败而红了眼，雅典人极有可能投来标枪或挥剑砍来。然而，当年轻人双手捧着骨灰罐走在路上，路两边站满了人，没有人发出愤怒的喊叫，也没有人口吐脏话谩骂。

雅典人的表情僵住了。那也许是一种感情流露，其中混合着对本国不幸感到的悲哀，以及对勇敢的年轻人的些许赞赏。

18岁的年轻人经过人群，走过通往卫城的漫长道路，亲手把骨灰罐

交到等候在那里的政府官员手中。他致悼念辞后再次沿着来时的道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回去。

这是一场冒险，只会甚于而不会亚于冲入敌阵之时的风险。

不过，腓力让儿子带着骨灰去雅典，不止有惩罚儿子这一个目的。

他想把雅典拉到自己这边来。

儿子完成使命安然回来后，腓力立即把俘虏中的雅典实力派人物送回雅典，还安排了两位马其顿高官护送，他们要去和战后的雅典政府进行媾和谈判。

媾和条件只有一个，立即让马其顿俘虏的2000名雅典士兵全部回国。这是雅典人未曾想到的好条件。马其顿甚至没有提出在雅典市内驻兵。

雅典人害怕马其顿军打过来，因而战战兢兢，他们被这个媾和条件深深吸引，再也没有人去听狄摩西尼声讨腓力的发言了。

被后世奉为“忧国之士”的狄摩西尼那年46岁，他也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他可能是作为骑兵参战的。正因为骑兵跑得快，他逃回了雅典，没有沦落为俘虏。

而喀罗尼亚战役的雅典司令官因战败罪被判处死刑。狄摩西尼未被选为司令官，因而没有被追究战败责任，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了。

马其顿与雅典的第二次媾和成功得轻而易举。这一次雅典没有附加姑息条件。雅典人为和平的到来而狂喜，他们甚至决定授予腓力和亚历山大雅典公民权。

腓力让雅典享受了如此优厚的待遇，对底比斯却充分行使了胜利者的权力，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处罚。

腓力允许底比斯作为城邦国家继续存在。但底比斯所有有实力的人物统统被处死刑，他们的家属全部被卖为奴。

腓力不允许底比斯重建“圣队”，底比斯的军事力量形同归零。

不仅如此，底比斯还不得不接受马其顿在其城内一座城堡里驻兵。

在当时的希腊，只有雅典被城墙包围。城墙会在很多方面造成不便，因而城邦国家大多在城内建造城堡，敌人打过来时可以依托城堡坚持抵抗。

关于市内城堡，大家可以想一想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尽管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会给人类似的印象。

此外，希腊强国中还有斯巴达没有被提及。腓力似乎认为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已不足为惧。马其顿没有对斯巴达做任何安排。

公元前338年秋，马其顿国王召集的泛希腊会议在科林斯开幕。除了斯巴达以外，所有城邦都向科林斯派去了代表。

会上，腓力的角色不止是议长。喀罗尼亚的胜利让他像面对学生的老师一样。“学生们”只要用笔记下老师所念的东西就行了。

马其顿国王没有要求把希腊中南部全部并入马其顿。

不但如此，他还在完全承认各城邦国家独立的基础上，倡导各国结成“联邦”，即英语的“confederation”。

“学生们”用笔记下了“老师”念的提案细节。

一、各城邦国家有权向联邦派遣议员，数量与自身国力相匹配。

二、从此以后，希腊全面禁止联邦加盟国之间的战争行为。整个联邦共同负责防卫，各城邦有义务向联邦提供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兵力。

三、加盟联邦的城邦居民因去外国当佣兵等情况采取与联邦敌对的行为，将被视为全体希腊人民的叛徒，会被驱逐出境、没收财产。

四、联邦尊重所有加盟国的国境和政治独立。

五、不允许任何城邦向其他城邦索要年贡金或在其他国家设置基地。

唯一的例外是该地在战略上对联邦整体防卫有重要意义。

六、向所有人开放海域。

通商自由必须得到完全的保证，将海盗作为全体盟国的敌人对待。

七、希腊联邦军队的总指挥权归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国王还拥有召集联邦会议的权力。

八、类似圣地德尔斐争端之类的事，以后可通过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解决。

如果各国针对这些内容达成一致，希腊将会再现大团结的局面。150年前希腊奋起迎击波斯入侵时曾有过一次这样的局面。

除了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以外，所有希腊城邦国家都同意了这些条款。

众多国家结成同盟，不能没有共同的目标。科林斯会议开到最后，腓力提出了这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进攻并征服波斯。

解放处在波斯国王统治之下、居住在爱琴海对面的希腊人，这是150年前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提出过的目标。

当时他实现了这个承诺，现在他们要再次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率领远征军出征的一定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为了提前做好准备，他甚至已经派帕米尼欧和阿塔洛斯去了亚细亚。

离婚，再婚

腓力暂时结束战后处理工作，回到首都佩拉。凯旋后他要做的是与多年的妻子奥林匹娅斯离婚。

离婚后没隔几天，腓力便与年轻得几乎能当他女儿的克丽奥帕特拉结了婚。女方好像是高官阿塔洛斯的侄女。克丽奥帕特拉这个名字和腓力、亚历山大等名字一样多见于马其顿上流阶层。

喀罗尼亚胜利带来的兴奋尚未消退，庆祝国王结婚的盛大宴会又让整个首都为之疯狂。

亚历山大虽然对母亲的处境感到愤慨，但还是出席了父亲的婚宴。

众人之中，克丽奥帕特拉的叔父、与国王沾上亲的阿塔洛斯手拿盛满葡萄酒的杯子，向在座的人们敬酒道：

“祝愿我们的国王能够得到血统纯正的马其顿人后代，干杯！”

话音刚落，亚历山大就把手中盛满葡萄酒的黄金酒杯用力向他砸了过去。

杯子是否砸中，史书没有记载。从后来的情形推测，应该是直接命中，至少阿塔洛斯被泼了一身酒。

奥林匹娅斯与腓力

亚历山大为父亲手下高官轻率的话语发怒也不无道理。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对马其顿而言，伊庇鲁斯是外国。用现在的话说亚历山大是混血儿，不能说是一个血统纯正的马其顿男人。

腓力也发怒了，史家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发怒。亚历山大在父亲的怒骂声中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大厅。他的朋友们也跟了出去。

他不仅走出了宴会大厅，还走出了王宫。王子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他没有去母亲离婚后回去的伊庇鲁斯王宫，而是去了马其顿北面蛮族伊利里亚族的地盘。他带着一帮年轻的伙伴断然离家出走了。

没有人知道腓力是如何看待这个儿子的。

也许他的本心是放任不管。

但是，不可一直这样放任下去。伊利里亚族是不承认马其顿权威的蛮族。一想到亚历山大可能会统率这个蛮族，腓力就像在做噩梦一样。

但是腓力还有其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雅典和底比斯的处置只是战后处理的前半部分。眼下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是以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为对象，正式重组希腊。

转年到了公元前336年，这是腓力的大限之年。他46岁，距登上王位已过了23年。

暗杀

在挺进奥林匹斯山南方之前，腓力在面向各种势力的外交活动中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蛮族使用军事力量，对差不多水平的文明国家则用结姻亲拉近关系。

奥林匹斯山北面勉强算是文明国家的只有马其顿及其西邻伊庇鲁斯王国，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马其顿国王不能与她离了婚就算完事。

于是腓力考虑让伊庇鲁斯现任国王与自己的女儿结婚，重续因离婚而断绝的姻亲关系。

伊庇鲁斯现任国王是腓力前妻奥林匹娅斯的弟弟，也就是亚历山大的舅舅。嫁给伊庇鲁斯国王的克丽奥帕特拉是亚历山大的亲妹妹。

离家出走的亚历山大也参加了在马其顿王宫举行的婚礼和婚宴。

席间，父子又发生了冲突。

不清楚起因为何。

狂怒的父亲持剑站起身，朝儿子走了过来，腓力那天晚上好像喝多了。

腓力醉了，刚走近两三步便摔倒在地。

儿子站着，也没有过去扶上一把。他俯视着父亲冷冷地说道：

“扬言要从欧洲打到亚洲的人，才走几步就成了这个样子！”

撂下这句话，亚历山大又带着伙伴们走出了大厅。

这次他似乎只是走出宴会大厅，没有再次离家出走，因为下面的变故发生时他仍在首都。

公元前336年7月的一天，已成为当今希腊全境统治者的马其顿国王腓力前往一家位于首都的剧场。有一队近卫兵像平时一样保护着他。前面就要到剧场了，卫兵跟随的距离比平时稍远了一些。

腓力一个人走着。突然，阴影里闪出一个男子，手中持剑扑了上来。

马其顿国王来不及喊出声便被刺死。犯人也没来得及喊出声就被冲上来的卫兵捅成了马蜂窝。犯人是近卫队的成员，叫帕萨尼亚斯。

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刺杀国王，古代就有很多说法。

认为是儿子亚历山大操纵暗杀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

亚历山大不是那种躲在暗处搞名堂的人。即便他知道父亲的死对他有利也不会夜袭，他会选择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挑战。他绝对不会让可以接近父王的近卫兵去暗杀父亲。与其说这样做违背伦理，毋宁说以他的性格做不出这种事。

有几位古代史专家认为，这是离婚后怀恨在心的奥林匹娅斯幕后操纵的。

亚历山大的母亲的确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但恐怕没有智慧去谋划这种事。

古代史专家们的另一种推测可能更接近真相。

这种说法是，帕萨尼亚斯犯罪是为了泄私愤。

近卫兵帕萨尼亚斯有一位年轻美丽的情人。高官阿塔洛斯对这个女孩儿穷追不舍，终于追到手后又转眼间抛弃了她。准确地说是强奸之后抛弃了她。这使女孩儿精神变得不正常。

帕萨尼亚斯对此事感到愤怒，便在腓力面前控诉。他是近卫兵，自然可以天天见到腓力。

可国王对此充耳不闻。他非但不听，还多次向卫兵发火。这使帕萨尼亚斯把对阿塔洛斯的仇恨转嫁到了腓力身上。

也许有人怀疑，他为了这点事就会断然采取行刺国王的重大行动吗？一般不会。

然而，起意杀人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就多数人而言，他们即使非常愤怒也不至于杀人。

可是就有人走出了这一步。警察侦案初期经常出错，就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这点动机会导致杀人。

无论什么原因，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死了，在他46岁的时候。

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

不过不要忘记，马其顿虽是王国，但国王得由家臣——或说实力武将全体投票决定。即便亚历山大生来就是继承人，也不能自动登上王位。

亚历山大经全体投票登上马其顿王位。

刚满20岁的年轻国王登上了历史舞台。

腓力二世死了，死在46岁的盛年。这虽然引人同情，但不知为何无人觉得遗憾。

我认为，他在这个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不只对儿子有好处，也算成全了父亲。

腓力再活下去，这对父子之间迟早会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

能够避免这种冲突不但是这对父子的幸运，也是整个希腊的幸运。

有权势的人物之间进行权力交接，两人的能力越强交接越困难。

历史上成功交接的案例实在太少。

46岁的腓力一定不希望交接，但接力棒还是传到了20岁的亚历山大手中。

第二章
儿子亚历山大

冬日里的一天，已经决定来年开春出发东征的亚历山大在出征前拜访了旧师。

亚里士多德年逾五十，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少年时期的老师。

哲学家听曾经的爱徒热烈地讲述着远征计划，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丝毫未变。听完后老师说道：

“我知道，这是一个希腊人从未想过的宏伟计划。不过，我认为向后延上几年也不是一件坏事。在这期间，你既可以积累经验，还可以学习谨慎行事的好处。”

21岁的年轻国王微笑着回答道：

“正如您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增加经验，也能学会谨慎行事。但是，只有年轻时才有的快速反应能力会衰退。”

一生之书

被后世尊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56年7月出生于马其顿首都佩拉。

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母亲是邻国伊庇鲁斯的公主、腓力的妻子奥林匹娅斯。

他是国王的第一个嗣子，妹妹出生前他一直是独生子，集父母的宠爱于一身。

不过，父亲经常外出打仗。不论动物还是人类，都是母亲掌握着子女幼年和童年时期的养育主导权。后来的“大帝”也由母亲带大。

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生长在与内陆国家马其顿不同的面向大海的国度。那里的希腊化程度较高，至少她自己相信如此。

她不嫌恶丈夫，但当腓力被部下将士簇拥时，她毫不掩饰对其举止的厌恶。

她认为豪放磊落固然很好，但做出与野蛮士兵同样的举止，作为国王腓力缺乏品位。

奥林匹娅斯把独生子培养成一个彻底希腊式的人、文明的人。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成为反面教材。

奥林匹娅斯认为，在希腊化方面自己比丈夫优秀。她很有“学问”，这在当时的希腊女子中很罕见。

她把《伊利亚特》[1]念给年纪尚幼的儿子听，到儿子自己能念的时候，她把书送给了儿子。

从此以后，荷马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成了亚历山大“一生之书”。这部叙事诗中的第一大英雄阿喀琉斯成了少年亚历山大最崇拜的人。

传说诗人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最伟大的杰作。如果你认为那是一部仅以篇幅长闻名而内容枯燥的作品，那你可就完全错了。

《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与特洛伊之间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作品从第10年开始讲述，而且是从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讲起。其后发生了许多故事，最后希腊人靠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这中间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接一个，不让读者有喘息之机。作品中人物也有很多，绝对不是一部乏味的古典作品。

《奥德赛》也被认为是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它讲述了特洛伊陷落后奥德修斯辗转返回祖国伊塔卡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可见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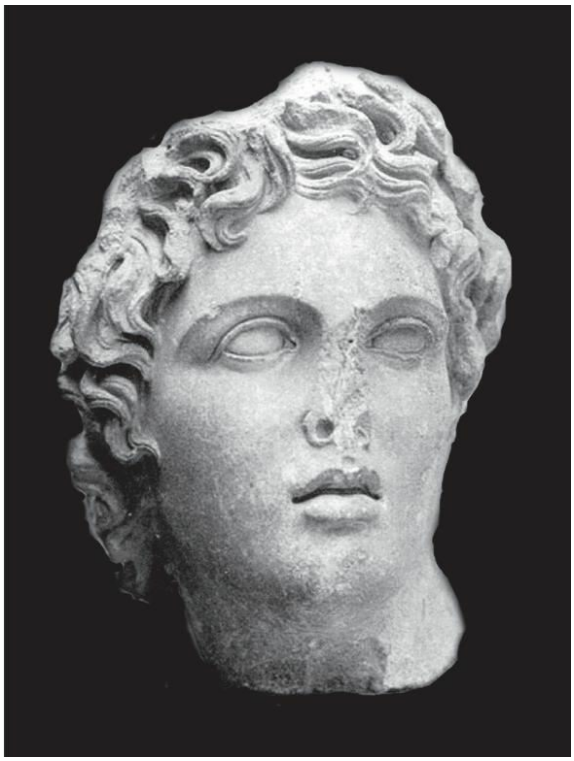
《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则毫无狡诈之处。他纯朴诚实，一心只想着光明磊落地解决问题。他公开宣称自己宁要短命而辉煌的一生也不要长寿而碌碌无为。

热情多梦的少年崇拜阿喀琉斯而不是奥德修斯，也在情理之中。

---

[1] 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有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等的多种汉译本。——译者注

一生之友



亚历山大

童年时期的亚历山大有一个玩伴，名叫赫菲斯提安（Hephaistion）。

赫菲斯提安生在一个与王族几乎同样古老的马其顿贵族家庭，母亲有雅典人的血统。他与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伊庇鲁斯血统的亚历山大一样，都是混血儿。这也许是他们性情相投的原因所在。

论发色，亚历山大是黑色的卷发，赫菲斯提安是茶色的卷发。论身高，似乎赫菲斯提安略高一些。两人年龄一样、体型相仿，都身着少年的短衣，而且不管做什么、去哪里，两人经常出双入对。首都居民都说他们简直是一对双胞胎。

自然，他们也一起读《伊利亚特》。

合上书后，亚历山大说：

“我是阿喀琉斯，你是帕特洛克罗斯。”

赫菲斯提安优雅地笑着让亚历山大说完。

他知道，阿喀琉斯刀枪不入，帕特洛克罗斯却不能。阿喀琉斯的母亲特提斯抓着他的脚踝把他浸在冥河里，因而他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被抓的脚踝不行。直到现代，人们还管脚踝的这个地方叫作“阿基里斯腱”[1]。

亚历山大是会死的，他是“人类”。他把自己比作除了跟腱都刀枪不入的不死的英雄，这是一个矛盾。不去戳破这幼稚的逻辑矛盾，是赫菲斯提安的优雅之处。

这位幼年时的朋友成了亚历山大的“一生之友”。

---

[1]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语’χιλλεύζ（阿喀琉斯）转写为拉丁文后的汉语音译。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是人体最大的肌腱，由小腿的比目鱼肌和腓肠肌的肌腱共同构成，下端附于跟骨，俗称“脚筋”。——译者注

托命之马

将满12岁，亚历山大又邂逅了另一个“一生之友”。

一位科林斯商人来到马其顿，要把一匹产于色萨利地区的马匹卖给国王。

卖价为13塔兰特，这可是能让13艘军用三层加莱船下水的价格。

我们可不能一提到马就想到现代的英国纯种马。科林斯人卖的这匹马与优雅的英国纯种马完全不同，可说是一匹怪马。这匹马体型像马，头却像牛。它的体格大于其他的马，却是一匹快马，奔跑速度不亚于任何马匹。有人给它取名“比塞弗勒斯”[1]。正如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一样，这匹马的正面给人以一种威严的压迫感，似乎一靠近就会被它踢飞。它的目光根本不是沉静的，而是凶猛异常的，似乎它已经决定不与人类发生什么关系。

此前没有一个人能骑好这匹马，因此它还是一匹没上嚼子的名副其实的裸马。马其顿骑兵军团的老手们想驾驭它，在国王的眼前挨个儿试骑，结果所有人都是刚刚跨上马背就被甩落在地。这马只是轻轻抖动身体，就像抖掉身上的脏东西一样。

谁都能一眼看出比塞弗勒斯是一匹特别的马。

不过，花13塔兰特买一匹没人能骑的马，放在马场任它游玩，就算马其顿国王也做不到。腓力只能告诉科林斯商人说他不买。

就在这时，看热闹的亚历山大开口了。他请父王买下这匹马。

父亲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儿子狂妄的主张。

“你要是能骑得好，我就买下送给你。不过要是失败了，买马的费用就由你自己出。”

骑不好就得支付13塔兰特的巨资，亚历山大压根儿没考虑这回事。

还没听完父亲的话，少年就冲进了马场，但他不像之前那些人一样立即尝试上马。

他花了一会儿工夫在马的周围绕来绕去，寻找合适的机会。马也许没把这个小家伙当回事，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不过，这马还是用眼角盯着少年的动作。

少年一点点向马靠近，但还不想骑上去。在他接近马之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这一切。时间在流逝。

说时迟那时快，少年眨眼间飞身骑上了马背。

比塞弗勒斯使出吃奶的劲儿企图把少年甩下去。没有缰绳，少年紧紧地抓住马的鬃毛。

少年与骏马展开了一场美国西部牛仔竞技表演式的格斗。

忽然，那匹马驼着紧紧抓住鬃毛的少年，冲过惊恐的群众让开的空隙向城外狂奔而去。

连国王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想象着少年被马甩下来，垂头丧气回来的样子。

然而，亚历山大竟笑嘻嘻地骑在比塞弗勒斯背上回来了。人们用赞叹声迎接少年，父亲腓力笑得脸都变了形。

打这以后，比塞弗勒斯就成了少年的爱马，除了亚历山大，它从来不让任何人骑，就连马夫靠近都要被踢。在马熟悉马夫之前，只能由亚

历山大与马夫一起照顾它。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cavallo da battaglia”，直译是“战场上的马（战马）”，实际意义是“在紧要关头可以性命相托的马”。

在喀罗尼亚、格拉尼科斯、伊苏斯、高加米拉以及印度的最后一战，在亚历山大获胜的所有大战中，他都把性命托付给了比塞弗勒斯。

亚历山大的骑兵战法是让骑兵军团形成菱形阵型，自己冲锋在前杀入敌阵。

比塞弗勒斯不但体格巨大，还跑得快，用它去实践这个战法，岂不是很理想？

亚历山大与比塞弗勒斯人马合一，他率领马其顿骑兵军团取得了所有战役的胜利。

亚历山大在少年时代不仅早早得到了“一生的朋友”，还得到了“一生的爱马”。

亚历山大13岁了，他做梦都想成为英雄阿喀琉斯，喜欢跟性格狂野的爱马嬉戏。但到了这个年龄，只有这些是不够的。父亲腓力决定要赶紧收回培养儿子的主导权。

教师人选也由腓力亲自确定下来。

首先入选的是帮助少年提升体力、提高武艺的教师，名叫列奥尼达。

当时的希腊人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一定会想到一个人。

136年前的公元前480年，率领300名士兵阻击波斯大军，一个星期

内把20多万波斯人死死挡在温泉关外的人——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

最后300名勇士全体牺牲，波斯方面却战死2万人。列奥尼达让“斯巴达战士”的威名响彻整个希腊。

波斯国王提出，只要交出武器就让斯巴达人全部安全回国，列奥尼达用“你来取吧”一句话给顶了回去。他不仅让斯巴达人，也让全希腊的汉子们热血沸腾。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斯巴达男性才用列奥尼达这个名字。

在父亲选定的这位列奥尼达的指导下，亚历山大在13岁到15岁这整整三年中，受到了最好的“斯巴达式教育”。

---

[1] Bucephalus，又译布西发拉斯，意为牛头。——译者注

斯巴达式教育

凌晨天还没亮，亚历山大就被叫起床。他迅速戴上重装步兵的装备，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吃早饭了。

重装步兵的装备不仅包括头盔、胸甲和铠甲，还有又重又大的圆盾和缓缓后弯的长剑。他还要把近7米长的马其顿长矛从中间一分为二扛在肩上。

此外，结实的大麻袋中还装着行军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些都是步兵经常要带的。武器加上其他的所有物件，总重量超过40公斤。这就是希腊重装步兵行军的装备。

斯巴达老师让马其顿王子和普通士兵一样背上重装备，进行长距离行军。

白天王子的餐食和士兵一样是军队大锅饭。亚历山大一定学到了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

不管下雨积雪，还是烈日暴晒，一切不予宽容。哪怕已倒地而眠，命令一下也得跳起来。亚历山大不得不习惯这一切。

温泉关时代斯巴达战士花费10年掌握的一切，亚历山大和他的伙伴们3年内必须学会。

这是腓力选列奥尼达当儿子老师的初衷。

只有这样王子才会懂得，士兵必须将自己能做的事做到完美，做不到也要拼命去做。这样他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士兵。

只有这样，他才能像用自己的手足一样用好所有部下。

“斯巴达式教育”在列奥尼达的指导下进行着，王子的学友伙伴也一起参加。

他们个个都是马其顿王国地位很高的高官的子弟。据说堪称国王左膀右臂的帕米尼欧的儿子菲洛塔斯、马其顿世家出身的克拉特罗斯也在其中。他们要比亚历山大大4岁。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二人在少年组，其他的伙伴都大他们几岁。

在这个年龄段上，4岁是相当大的差距。

也许有过这样的情景：年少的两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目的地，发现年长的伙伴早已到达，和列奥尼达谈笑风生。他们用冰冷的目光俯视着好不容易赶到的两个人。“畜生，输了像什么样子！”培养王子不服输的心理也是列奥尼达的教育目标。

参加这项“斯巴达式教育”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的领军大将。

恩师亚里士多德

父王腓力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认为只让儿子接受“斯巴达式教育”是不够的。

他聘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提升亚历山大的思想境界。

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刚刚年届四旬。从出生地来说他是马其顿人，但他年轻时留学雅典，在柏拉图开设的“学院”里学习了20年，算是一个雅典人。他是柏拉图的学生，而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意味着亚历山大也算苏格拉底的弟子。

40来岁正值壮年的哲学家成了老师，学生是亚历山大和他形影不离的赫菲斯提安，以及其他的学友伙伴。他负责教给他们所有必需的教养，这可不是老先生在教育孙辈的少年。

与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相比，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给予的“雅典式教育”有哪些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推测。

第一，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知识和兴趣面非常广阔。这些领域如果按现代大学的讲座分类的话，需要17位教授才能授课。

刚才还在论述悲剧，转眼就开始详细分析政治。亚里士多德既是人文学科的专家，又对自然科学到医学的多个领域怀有兴趣。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他可能认为，把众多领域纳入视野，才会深刻认识其中的某一领域，才能根据这种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

自然界的现象也好，人类世界也好，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人们只能叹服于他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他还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讲求平衡

的人。

他是逻辑学的创始人，却用下面这句话为滥用逻辑敲了警钟。

“即使逻辑正确，用于人类世界也不一定正确。”

这句话不能不让人感叹“知识”和“智力”的区别。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有第二个特质。他做完马其顿王子的家庭教师后，又回到雅典。不久，他在雅典郊外一个叫吕克昂的地方开办了一所学校。

如果把柏拉图开办的“学院”看作是大学，那吕克昂学园就是一所高中。其办校目的是全面教授进入专业课之前必须具备的所有教养。

这种理念传承至今，表现在由法语的“Lycée”和意大利语的“liceo”上。“吕克昂”（Lyceum）是这两个词的词源。

为什么这位哲学家要这样做呢？

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认为古代哲学与现代才有的讲坛哲学是一回事。

其实不然。哲学原本不是获取知识的学问，而是锻炼智力的学问。

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教给少年弟子们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学习先人们思考什么又如何行动。

这是历史，即纵轴上的信息。

第二是横轴上的信息，也就是日常的信息。

学生需要学习毫无偏见地、冷静地接受这些信息。

最后一点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基础上，提高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意志冷静判断，然后付诸实践的能力。

这三点既是学习哲学的基本姿态，也是原则。只要掌握了它们，以后不管做什么，不管进军什么领域，都可以用得上。

因为教养是可以应用的，所以才有学习的价值。

这就是后来罗马人所说的“自由学艺”（artes liberales），也就是英语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1]。少年亚历山大从最适合教授这些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内容，并且是在13岁到16岁感受性最强的年龄段学习的。

如果学生只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老师的教诲，那么最终他只是个单纯的优等生而已。亚历山大并非如此。他完全没有听从老师下面的这段教诲。

“可把希腊人当作朋友平等相待，但对非希腊人（即蛮族）应以对动物或植物的态度相待。”

亚历山大去波斯以后持相反的态度。

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我感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终究是一个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而亚历山大是超越了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

他跟随老师学到了一切，但没有一切服从老师。这不正是优秀学生的证明吗？

不论怎样，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角度教会亚历山大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重要性。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从13岁到15岁这3年间，亚历山大集中接受了列奥尼达的训练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他的学习日程是如何安排的呢？

据说，列奥尼达搞的是斯巴达式的魔鬼训练，太阳还没有升起就已开始，经常持续到太阳落山。等到这一切都结束，学生只能深陷死一般的睡眠之中。

这样学生肯定无法继续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而且，少年正在生长发育，这样不但不能锻炼身体，还会损害身体。

可是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斯巴达式的魔鬼训练和雅典式的授课中坚持了3年。训练和授课是每隔3天交替进行，还是每天分时段进行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魔鬼训练持续3天之后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这对亚历山大而言不就是全身心吸收对知识的爱，愉悦而惬意的时光吗？教养的作用是长远的，不能立竿见影，非愉悦地学习不能掌握。

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特训随着亚历山大的成长渐近尾声，他的精神和肉体已逐渐脱离少年期。这时，父王腓力又给了他一个学习处理重要公务的机会。

公元前340年，腓力已满42岁，他发动了一项军事行动，把已经撒到希腊北边的镇压之网扩大到拜占庭。这次出征他带上了帕米尼欧率领的重装步兵方阵，可谓马其顿王国主力军队的总动员。

腓力把国王不在期间统治马其顿的工作交给了16岁的儿子。

亚历山大要统治整个王国，而且这时主力空虚。这完全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就能完成的任务，他不能在应对乘虚而入的北方蛮族方面有任何

懈怠。

不久，父亲完成镇压回国了，16岁的亚历山大把第一次承担的这项公务交还到父亲手中，父亲十分满意。他成功完成了统治方面的“首次上阵”。

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

亚历山大被后世称为“大帝”。描写他幼年、少年时期的生活时，我经常会笑出来，我觉得腓力这个父亲做得相当不错。

尽管腓力被妻子鄙视，她说他野蛮、没品位，但他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教育问题考虑得相当妥帖。

在体育方面采用斯巴达式训练，在教养方面采用雅典式教育，而且做法一以贯之。

腓力心中总有一种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雅典人的愿望。他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了吗？

正如人们从亚历山大后来的演讲中感受到的那样，儿子对父亲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承认了父亲的成就。

尽管腓力经常被儿子出乎意料的表现惊到，但作为父亲，他把儿子的才能视为自己的骄傲，完全把儿子当作成年人来看待。

可是这对父子见面就争吵。

亚历山大愤然离席，带着伙伴出走。

腓力在儿子身后怒骂，没完没了。

但没过多久这对父子便重归于好。

这不是因为儿子收起了执拗的锋芒，是父亲在试图改善关系。按我的想象，腓力可能悄悄地叫来了赫菲斯提安，让他想办法。

总之，他们终于重归于好。但两人一碰面就又吵架，真是一对奇特的父子。

第二年，父亲让17岁的儿子第一次上战场历练。

不过，腓力没有让亚历山大参加战斗，只是拜托帕米尼欧让亚历山大现场观摩马其顿人与北方希腊人打的小仗。这次体验的成果一年后便展现出来。

---

[1] artes liberales到中世纪已成为欧洲学校的一般教养学科，通常有七科，即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又称文艺七科或自由七科。——译者注

首上战场

历史上著名的喀罗尼亚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38年，这是刚满18岁的亚历山大的“初战”。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希腊历史，也是腓力的一场重要战役。马其顿只是一个新兴国家，而它的敌人是雅典和底比斯这两个历史悠久、可谓城邦之雄的国家。

喀罗尼亚战役是马其顿军队与以雅典和底比斯为主力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之间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我已在前面做了详述，此处不再赘叙。这场战役的最高司令官是马其顿国王腓力。

在喀罗尼亚战场上，亚历山大被允许参战，但国王并没有把骑兵全部交给他。腓力把军队一分为二，自己指挥右翼和中路的一半，中路的另一半和左翼交给了帕米尼欧。

在马其顿的阵型里，亚历山大和他的学友伙伴组成的骑兵队在左翼，但被部署在最边缘的位置上。

在总指挥腓力的安排下，18岁儿子的队伍负责辅助作战，具体任务是在马其顿军不得不撤退时起侧面掩护作用。

父亲给亚历山大下了严格的命令，没有父亲的命令绝对不许他行动。

然而，18岁的儿子行动了。他无视父亲的命令，没有放过转瞬即逝的一线战机，身先士卒地投入进攻。

这次行动决定了喀罗尼亚战役的走向。亚历山大骑在比塞弗勒斯背上，冲入了敌阵。他率领的骑兵队与被他们冲乱的底比斯军之间的战斗决定了喀罗尼亚战役的结果。

研究战略战术的专家提到亚历山大时，很多人都只论述他进入波斯以后的战斗。

喀罗尼亚战役已预示出亚历山大日后将会取得的成就。

当时他被安排辅助主力作战，率领的只是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队，并无司令官的地位。尽管如此，18岁的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展现出他作为武将的能力，就好像作家的一切才华尽在处女作中展现一样。

第一，正因为有亚历山大率领的一波接一波的快攻，马其顿军才取得战场主导权并最终取得胜利，缩短了战斗时间。

第二，缩短战斗时间使己方军队的伤亡减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亚历山大以后的古代名将，如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苏拉，还有凯撒，都把亚历山大推为武将之首。因为他们都曾率领数万名士兵出征，他们从心底里懂得每一个士兵的士气将如何影响战果。

让每个士兵相信自己不会像狗一样死去，这点最能体现领袖的价值。

史料中留下了败北的底比斯和雅典的战死者人数，马其顿方面的战死者数量因为太少而“不值得一记”。

第三点是希腊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希腊人第一次见识到，骑兵打先锋，然后由骑兵与步兵绝妙联动展开的战斗，它决定了战役的走向。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城邦的主战力一直都是重装步兵。骑兵一直被视为富裕等级的专属。

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用事实证明了骑兵也是卓越的主战力。

然而，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这一严峻而冷酷的时代变化。尤其是斯巴达，这个一直重视重装步兵，以致骑兵战斗力为零的国家，不肯承认马其顿新战术的先进性。

马其顿国王腓力承认骑兵的战斗力，靠骑兵在喀罗尼亚取得了胜利。这时，有一个问题等着他解决。

儿子亚历山大是腓力的继承人，迟早会当上马其顿军的最高司令官。如何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是一个难题。

这位继承人有一个癖好，喜欢冲锋在前，率先杀入敌阵。

亚历山大冲在纵向菱形阵型的最前方杀入敌阵，即便比塞弗勒斯有特异功能，跑得飞快，他也比其他人更明显地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

而且，亚历山大冲锋在前是基于他的信念，无法阻止。

他必须成为全体士兵最好的榜样。这是他给自己定义的责任。任何事情都要冲在前头的秉性支撑着他的这个信念。叱责他也好，讲道理也罢，谁都无法改变他。

但是放任不管又容易造成最坏的事态。最高司令官战死会直接导致战败，这已经被很多场战斗所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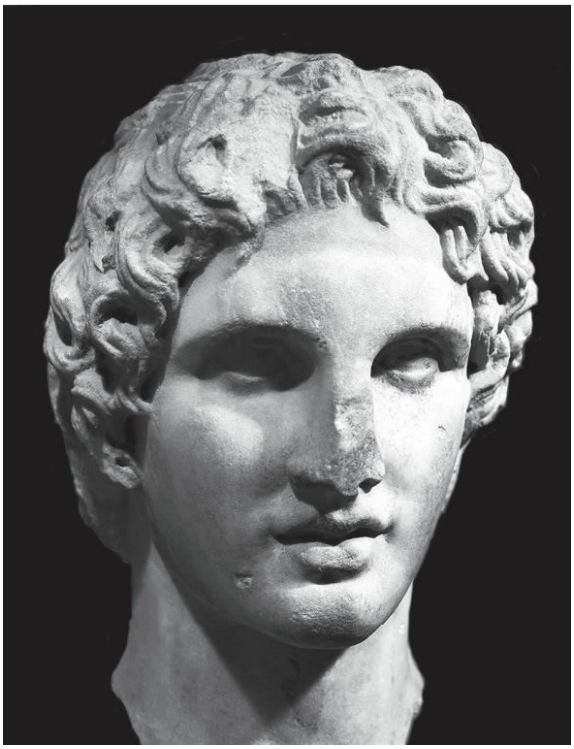
领袖存在的意义是，他能做普通士兵不能做的事。最高司令官不是一旦战死即可轻易更换的。

腓力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想矫正儿子的这个癖好。

他放任儿子的同时，另外想出一计。

腓力叫来一个名叫克雷托斯（Kleitos）的士兵，让他担任儿子的护卫。

克雷托斯这年37岁，比亚历山大年长19岁，很久以前就与马其顿王子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姐姐给亚历山大当奶妈的时候他们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亚历山大还是婴儿的时候，克雷托斯就认识他了。



亚历山大

父亲请他在战场上给儿子当护卫。

克雷托斯恭敬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其实他本人有才能指挥骑兵军团，但他牺牲了这一切，此后一直追随在只顾冲锋的亚历山大身后，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他拥有北方民族马其顿人罕见的浅黑色皮肤和一副武人的面孔，人们都叫他“黑色的克雷托斯”。

两年过去了。

在喀罗尼亚获胜后的这两年，腓力极其忙碌。

首先，连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国家都败在了马其顿国王手下，希腊再没有城邦能同马其顿抗衡了，他要让希腊人承认马其顿的霸权。除了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之外，希腊所有城邦都承认了马其顿的霸权。

马其顿各城邦代表参加的科林斯会议正式承认马其顿国王腓力为希腊全军最高司令，在喀罗尼亚战败的雅典和底比斯也投了赞成票。

腓力认为，为远征波斯要建立一支由希腊各地士兵组成的军队。

在腓力看来，只有把连接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希腊人居住的各个城市及附近岛屿全部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收复爱琴海，使之成为希腊人的海。要做到这些，少不得要进攻波斯。

情况确实如此。所以，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必须迎战蜂拥而来的波斯大军，打败他们并把他们赶走。

但在150年之后的希腊，曾经强大的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都只想着眼前，日子得过且过。希腊人再高的荣耀都只存在于往昔而已。

因而，尽管腓力力陈建立希腊联军的必要性，前来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各城邦代表恐怕只会在心里发出阵阵嘲笑。

但大家不敢否决马其顿国王的提议，他已经在喀罗尼亚让大家见识到马其顿的军事威力。

腓力没有要求把整个希腊归入马其顿。

各城邦国家保住了自身的独立，现在仅仅被要求归入马其顿的霸权之下而已。

马其顿国王提议建立由腓力主导的希腊联军，由腓力担任最高司令

官，目的是远征波斯帝国。

尽管喀罗尼亚的失败者们在心里嘲笑这个想法，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腓力的建议。喀罗尼亚战役之后，他们也只能如此。

结束科林斯会议回到马其顿的腓力一定极其得意。住在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从来都是背对着马其顿的，而他使马其顿成为希腊最强的国家。

第二年他与长年陪伴他的奥林匹娅斯离婚，迎娶了高官阿塔洛斯的侄女为妻。

离婚后的奥林匹娅斯一怒之下回到娘家伊庇鲁斯。思念母亲的亚历山大鄙视父亲，因为父亲娶了同女儿一般年纪的年轻女子为妻。

腓力与伊庇鲁斯公主奥林匹娅斯的婚姻是一桩政治婚姻，虽然这段婚姻破裂了，但两国政治上的联系不能割断。

翌年夏天，马其顿首都佩拉隆重举行了伊庇鲁斯国王与马其顿国王之女的婚礼。每次与父亲见面必定爆发冲突的亚历山大也参加了婚礼，因为新娘是他的亲妹妹。

王族之间的婚礼包括众多公众活动，其中一项是在剧场看戏。在去剧场的路上，腓力遭到袭击，被人暗杀。

这不是马其顿内部异见分子的暗杀，只是一起为泄私愤而实施的行刺。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希腊最高统治者46岁就去世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突然死亡，不仅在马其顿，在整个希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造成了局势不稳。这对刚刚年满20岁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20岁的国王

马其顿虽是君主制王国，但它毕竟是希腊人的国家，与东方的王国仍有不同之处。

在马其顿，国王继承人不能自动登上王位。马其顿的惯例是召集拥有指部队挥权的将领们开会，在会议上推举出国王。

这个会议还兼有最高法院的作用。没有该会议的判决，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叛部下死刑。这点也同东方的君主国家不同。

在腓力死后立即召集的会议上，亚历山大被部下正式认可为国王。

有研究者认为，喀罗尼亚战役后的两年间，亚历山大已经确立了其在将士们中的威信。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不过我认为帕米尼欧迅速表态支持亚历山大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总之，20岁的亚历山大跨过了第一关。这次会议很快稳定了国内的形势，避免了权力真空状态的存在。

亚历山大没有改变“快攻”的风格，他马上在科林斯召集了希腊所有城邦的代表再次开会。

得知腓力突然死亡的消息后，希腊各城邦开始议论，两年前科林斯会议上的誓约是对腓力而言的，随着腓力死亡，这誓约会不会成为一张废纸。

知道这一动向后，亚历山大只率领骑兵军团抵达科林斯。

他要求集聚而来的代表们再次通过两年前对腓力立下的誓约，即承认马其顿霸权。

他没有以军事力量胁迫大家，尽管实际就是如此。他给誓约附加了一个条款，推动了代表们的决断。

这个条款是霸权国家马其顿完全承认参加科林斯会议的所有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不过，马其顿不认可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如果发生这种战争，它将由科林斯会议的全体成员讨论解决。这是两年前腓力让大家约定的，现在延续了这项约定。

总之，各城邦之间的争斗从此在希腊销声匿迹，各城邦可以自由选择政体了。

在雅典称霸的时代，民主政体大行其道；斯巴达取得霸权以后，寡头政体受到鼓励。现在，这样的时代结束了。马其顿称霸后王权政治并未受到广泛欢迎。

在一国霸权之下保证各地方的自由和独立，这成为亚历山大统治的基本方针。

由于亚历山大尊重了希腊各城邦国家，汇聚到科林斯的各城邦代表接受了他的要求，承认马其顿的霸权，宣誓派遣援军参加马其顿国王统率的远征波斯的行动。20岁的亚历山大跨过了第二关——再次确认了科林斯会议的誓约。

亚历山大逗留科林斯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人们只要一提到亚历

山大就一定会提起这件事。这事发生在赫菲斯提安和亚历山大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教过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故亚历山大应该认识他。

年轻的国王恭敬地对这位住在科林斯城外一个大酒桶里的老哲学家说：

“如果有我能效力的事情，请告诉我，不必客气。”

衣衫褴褛、身体肮脏的第欧根尼从酒桶里仰视着亚历山大说：

“您能靠边一点吗？您站在那里挡住了阳光。”

第欧根尼是“犬儒派”的哲学家，是一个鄙视物质生活、喜欢讽刺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哲人，相当愤世嫉俗。

据说听了第欧根尼的话，亚历山大回应道：“我要不是亚历山大，也想当第欧根尼呢。”不过，我认为亚历山大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不可能这样说。这恐怕是哪个冒牌哲学家捏造出来，又在后世知识分子中流传的说法。这些知识分子有一种癖好，只要统治者有点文化就喜欢大书一笔。我觉得，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恐怕只是相视苦笑一下便离开了。这样恐怕更接近真相。如果他真的要信奉第欧根尼的哲学，就不会去远征波斯了，这好歹是人类的一项大事业。

年轻的国王从科林斯回到马其顿，等待他的是一定会被第欧根尼称作“如此辛苦没有价值”的任务。

北方蛮族认为腓力之死是个可乘之机因而蠢蠢欲动。腓力生前已经基本解决了与伊利里亚族的问题。这次，从更北面南下的凯尔特族成为马其顿未知的敌人。

刚从科林斯回来的年轻国王还未及解下战袍，就要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马其顿士兵也一样，未及脱下战袍，就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下全体北上。北上并不那么容易。他们要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多瑙河。

这次北方的敌人是正在兴起的凯尔特族。50年前，凯尔特族一度南下意大利半岛，占领了罗马，给正在缓缓上升的罗马以沉重打击。这一事件被称为“凯尔特冲击”。这次的敌人与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凯尔特人”是希腊人给他们起的名字，罗马人称他们为“高卢人”。

罗马人在此时的300年后最终解决了“高卢问题”，靠的是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争”。

亚历山大时代的高卢人还没有多么大的势力，他们与伊利里亚人一样是北方的蛮族，憧憬着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农产品，时常企图南下。

不过，对这个时代的凯尔特族来说，年轻国王率领的马其顿军队过于强大了，这使他们不敢轻易冒进。这让他们和不想耗时间对付北方蛮族的亚历山大很快达成一致。

于是，亚历山大同凯尔特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回到马其顿之后，他得知在此期间有个假消息传遍了整个希腊。

消息说他在多瑙河附近与凯尔特人的战斗中战死。

底比斯人信以为真，打出“打倒马其顿”的旗号起事了。

亚历山大在3年前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运用快攻战术全歼了底比斯的精锐“圣队”，底比斯人深深恨着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

底比斯人起来反抗马其顿，他们袭击了设在城里的马其顿军基地，杀光了那里的士兵。

亚历山大得此情报后立即挥师南下。和上次去科林斯不一样，这次他带着步兵主力——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一同前往。

他让全军包围底比斯，要求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城邦决定如何处置违反誓约起来造反的底比斯。

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国家答复说，当然要严惩底比斯。

年轻国王得到答复后迅速行动。底比斯被彻底摧毁，主要领袖悉数被处死，其他居民全部被卖为奴。

底比斯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属于中等规模，历史悠久。在令整个希腊为之战栗的残酷战争之中，底比斯彻底被夷为平地。

在写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时我总有一种想法，日本所谓的“武士无二话”也适用于西欧。

百分之百地相信对方，有时会很危险。

可总是怀疑，就什么事都推进不了。

所谓“誓约”是一种相信对方才能成立的约定。纵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违背誓约也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

罗马人喜欢把一切神格化，他们甚至把“信义”都当作神，因为他们的伦理是神位于人制定的法之上。

古代人要严惩叛变行为，是因为那是对信任的背叛。底比斯是在第

二次科林斯会议上立下誓约的城邦国家，现在它违背了誓约。所以它要被马其顿以及其他城邦当作叛徒给予处罚。武士一旦推翻自己说出口的话，便不再被视为武士。近现代以后，人们以叛国罪来概括这类背叛行为。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在狭窄险峻的温泉关走了两个来回。他的辛劳得到了回报。除了仍未响应号召出席科林斯会议的斯巴达以外，希腊所有城邦国家都偃旗息鼓，归到了亚历山大麾下。

亚历山大21岁了，终于到了要把父王远征波斯的话付诸实践的时候。

东征

亚历山大优先考虑的是自己出征后马其顿的安全和希腊的稳定。

他把这个维系安全稳定的重任交给了安提帕特（Antipatros）。

安提帕特是腓力时代的高官。如果说帕米尼欧是腓力军事方面的臂膀，那么安提帕特就是前国王外交方面的一只臂膀。年轻的国王决定带帕米尼欧去远征，便把留守的重任交给了安提帕特。也许他认为军事方面摆平后就要用到外交了。

亚历山大也许还把另一件棘手的事交给了安提帕特，那就是处理好他母亲奥林匹娅斯的问题。

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不仅要强，还什么都要插嘴。遇事总要给儿子写信。对安提帕特来说，她是最需要用外交手腕对付的对手。

除了亚历山大的母亲以外，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军事力量摆平。亚历山大给代理人安提帕特留下了纯马其顿人组成的12000人的步兵团和1500人的骑兵队。不过，这些士兵并非只驻守在本国，国王年轻的还想建立在远征过程中完成士兵换班的机制。

留下12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自然会减少远征的兵力。参加远征的军队最多也就是3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的规模，这其中还包括马其顿以外其他地方的支援兵力。

即便如此，年轻的国王也不担心。他说，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

被委以重任的安提帕特的工作相当困难。财政问题大概是让他烦恼

的第一件大事。马其顿王国财政状况之惨原本不该考虑远征波斯的。

国库中只剩下70塔兰特。

借款额已经达到1300塔兰特。

腓力根本没想到自己46岁就会遇刺。他为儿子购买马匹的13塔兰特还是借来的。

仅亚历山大带去远征的陆军的开销，每年就要200塔兰特，维持海军运转每年也需要100塔兰特。

在这种状况下，亚里士多德也劝他延期。然而，21岁的亚历山大说人的反应能力会随年龄增长而衰退，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决定第二年春天出征。

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是在资金运作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干出的一番大事业。

这是年轻人才敢做出的大冒险。

我问一个意大利人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亚历山大，怎样形容才贴切。他当即回答道：

“值得去爱的incosciente。”

“incosciente”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是“盲目、冒失且相当轻率”。

但看一下这个“冒失鬼”统率的远征军阵容，人们就知道，冒失只是他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并不是这样。

内情

既然在科林斯会议上得到了各城邦的认可，那么共计35000人的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就是亚历山大，虽然他只有21岁。军队二把手是帕米尼欧，他的年龄在65岁以上。

亚历山大给“一把手”和“二把手”分配的任务与以往不同，3万名步兵的总指挥是帕米尼欧，5000名骑兵的直接指挥是亚历山大。

先看步兵。21岁的亚历山大没有把全部步兵都交给帕米尼欧指挥。

总计3万人的步兵中，只有12000人属于固定的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这是一个人人手持近7米的长矛，咄咄逼人的巨大“刺猬”团队，全部由纯粹的马其顿人组成。

从本源上讲，帕米尼欧是这支重装步兵方阵之父。但自从亚历山大接替父亲担任最高司令官以后，这巨大的“刺猬”有了变化。它被分成几个分队，目的在于提高灵活性和机动性。这当然是亚历山大的主意。

远征的12000人中的9000人被分成6个大队。

每个大队分别由1500人组成。6个大队分别由克拉特罗斯等6人指挥。他们都和亚历山大一起在列奥尼达手下接受了“斯巴达式教育”，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12000人减去9000人后还有3000人的方阵步兵，亚历山大把他们打造成特种部队，命名为“持盾卫队”。

首先，他们的装备让我觉得这是一支特种部队。

不论再怎么进行马其顿式的改造，马其顿方阵步兵终归是重装步兵。而持盾卫队的士兵更接近轻装步兵。

他们的主要武器不是长矛，是短枪。左手所持的盾牌也属小型。

持盾卫队没有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给予敌人的那种威慑力，但富于机动性，用法不止一种，既可以和重装步兵团一起使用，也可以和骑兵团组合使用。

这是一个机动灵活的集团，对既要保持一贯性又喜欢随机应变的亚历山大来说，这3000人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重装步兵的作用在于顶住敌人的攻击、保持阵型，然后直接转入进攻。这在雅典和斯巴达都一样。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改变了这一点。重装步兵先防守再进攻的战法大多被保留下来，然后他拿出一部分兵力与骑兵组合使用，把他们改造成从一开始就能进攻的部队。

这支特种部队被称为持盾卫队，是亚历山大战略战术改革的象征性成果。

亚历山大把这支特种部队交给了帕米尼欧的次子、比他大两岁的尼卡诺指挥。他也是亚历山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时的伙伴。

亚历山大往往在行动前不久才给这支部队下达命令，因而要花时间听解释的人不适合做指挥官。

加上这支特种部队，12000人的步兵队伍中所有士兵都是纯粹的马其顿人。

科林斯会议确定的远征目标是“把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解放出来”，

所以东征军里也有来自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士兵。

从希腊各地征召来的步兵人数与马其顿士兵一样，也是12000人。

另外，同行的还有未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国家的士兵。他们出身于色雷斯等希腊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在腓力时代已被征服，可以说是马其顿的属国。这些属国以及来自克里特岛的士兵一共6000人，全部为轻装步兵，只能用于辅助作战。不过，正因为有辅助部队的支持，主战力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两者同样重要。

接着是亚历山大直接指挥的骑兵，总数为5000人，其中2000人是马其顿人。

这2000人多为出身于马其顿王国统治阶层的年轻人，称为“companion”，意为“国王的伙伴”。

亚历山大认为骑兵决定了战斗的走向。对他来说，这些“国王的伙伴”才是名副其实的主力。他们会率先冲入敌阵，战死率高于其他部队。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骑兵多来自富裕等级，那些少爷完不成这样的任务。

亚历山大把这2000人的指挥权交给了帕米尼欧的大儿子、比自己大4岁的菲洛塔斯。这位菲洛塔斯是“斯巴达式教育”时代的高年级生。

像马其顿方阵分为6个大队一样，亚历山大把“国王的伙伴”分成8个中队。

每个中队由250名骑兵组成。采取这种编队方式是为了提高机动性，每个中队也都任命了指挥官。

第一中队的指挥官是克雷托斯。

只有他这支骑兵中队被称为“国王卫队”。亚历山大总是冲在这支中队前面杀入敌阵，受命保护国王的克雷托斯率领的第一骑兵中队只能紧跟在这位“鲁莽”的年轻国王身后。

面对组成横向长方形阵型的步兵，让骑兵军团的阵型呈纵向菱形的做法委实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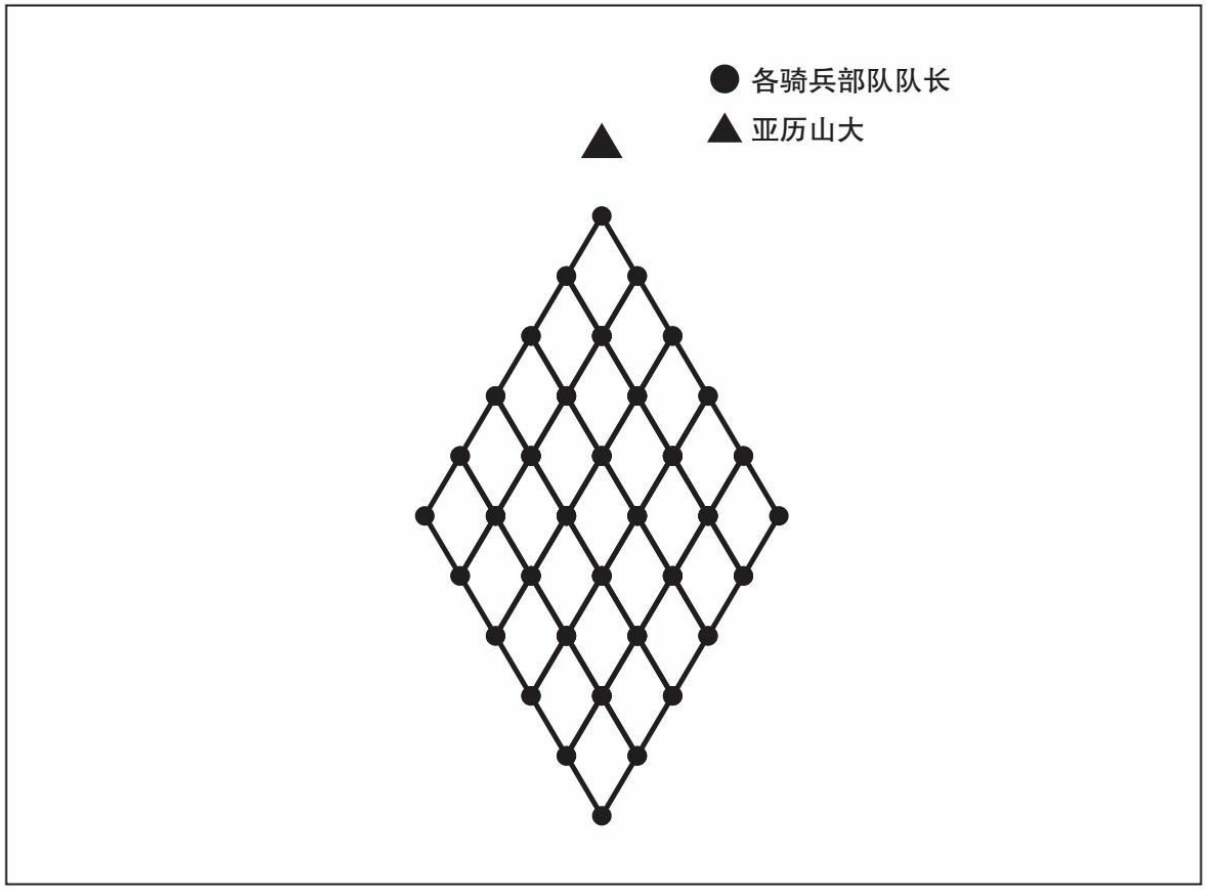
相对于顶住敌人猛攻而后转为进攻的马其顿方阵，亚历山大认为骑兵的作用在于将楔子钉入敌阵，从而切断敌军的联系。

把楔子钉进敌阵，用前端尖锐的菱形阵自然更加有效。冲在最前面杀入敌阵的是跨在比塞弗勒斯背上的亚历山大，这成了马其顿军队的特色战法。

年轻的国王把“国王的伙伴”也分成8个中队，这里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马其顿方阵一样，主要是为了明确责任和指挥系统。第二个是基于骑兵机动性强，楔子钉进敌阵后可以立即兵分两路，直接包围敌人。

所以，8个中队的指挥官必须全部是随机应变的战术高手，这一点不可或缺。

除第一中队队长克雷托斯以外，以赫菲斯提安为首，所有队长都是年轻国王的学友伙伴，可谓少年朋友的总动员。



“金刚钻”

据说亚历山大每次跟父亲吵架离家出走，都跟着一伙一起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这使我忍俊不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能相互理解的同辈朋友。

战斗一旦打响，骑兵军团首当其冲，他们的死亡率要高出其他部队。可是他们不能诉苦，因为置身于最危险地带的是亚历山大。

在远征军的骑兵当中，只有2000名“国王的伙伴”是马其顿人，不过亚历山大可以信赖的骑兵还有来自色萨利的1800人。

希腊中部的色萨利是马其顿的属国。那里平原辽阔适合养马，自然

也是优秀骑兵辈出之地。

此外，来自科林斯会议各城邦和色雷斯地区的骑兵，合计也有1200人。

所有这些骑兵的总数达到5000人。前面我们说过，全体骑兵由帕米尼欧的长子菲洛塔斯指挥。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要求父辈的帕米尼欧同行，但实际行动的各部队都交给了亚历山大这一辈人指挥。

这是亚历山大统率的远征军的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点是将大部队划分为几个小部队，其目的当然是提高灵活性、机动力，但这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

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在最高司令官发出的命令即使在战斗中也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各个队长。这点令人惊叹。我认为这是确定各队负责人的效果。

第三个特点是3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的这个比例。

这偏离了城邦国家时代希腊人的常识。以往希腊步兵与骑兵的比例最少不低于10：1。

这意味着在亚历山大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关注骑兵的机动性。

军队中占多数的步兵，包括重装步兵，由中产阶层担任。而与步兵相比人数很少的骑兵由富裕阶层担任。这是城邦国家的观念。可能是这种国体妨碍了人们对骑兵重要性的认识。

尽管腓力生于王权国家，但感觉他仍有一只脚踏在城邦国家的时代。而他的儿子不同，他的两只脚都从城邦国家时代拔了出来。也许正

因如此，儿子敏锐地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东征要从希腊渡过大海奔赴波斯，所以海军必不可少。

这不仅是为了把军队从欧洲运送到亚洲，到了亚洲以后，也需要确保前线与马其顿之间的联络和补给路线，以免远征军在敌人的地盘上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说到海军，马其顿是依靠陆上战斗力强大起来的国家，历史上没有过海军，所以也不懂海军。我认为，腓力生前对雅典的宽大是因为他高估了雅典海军的力量。不过，他的儿子没有高估这一点，他也理解海军的重要性。但亚历山大眼下同样没有像样的海军。

海军只能依靠科林斯会议的同盟国了。他成功调集到160艘船，但他寄予希望最大的雅典只派来了20艘三层加莱船。

其实，希腊城邦国家中最不配合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在科林斯会议上投了赞成票，所以好歹派来20艘船。而在暗地里，雅典从未中断过向波斯首都苏萨派遣密使，与波斯国王取得联系。

雅典给人的感觉是脚踩两只船。亚历山大在科林斯会议上明确表示会尊重各个城邦的自由与独立。雅典因此得以延续民主政体，继续讴歌自由。

狄摩西尼一直称腓力为“暴君”，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谴责、攻击他，年届半百仍丝毫不改反马其顿的态度。在他看来，“暴君”依旧在，只是儿子接替了父亲而已。

狄摩西尼当然反对亚历山大进攻波斯，他断言一旦开打马其顿军必

定会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和雅典不同，斯巴达是公然不配合。斯巴达一直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因而没有义务配合亚历山大东征。

而且，在过去70年里，斯巴达与波斯一直维持着密切的联系。

斯巴达以佣兵形式提供兵力，资金由波斯支付。

正如雅典人色诺芬所著的非虚构作品《长征记》（别名《万人大撤退》）中表现的那样，波斯雇佣的希腊兵的指挥官几乎都是斯巴达人。完成6000公里撤退的色诺芬也是把他率领的生还者交给了斯巴达高官。此后两国仍然延续着斯巴达提供士兵、波斯雇佣的关系。

应该说，波斯仍然存在30年前已在希腊本土失去价值的“斯巴达品牌”。

斯巴达70年来一直坚持把自己国家的士兵送往波斯，所以斯巴达不可能配合东征波斯的行动，不管这次远征是由哪里发动，也不管由谁统率。

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两国都不予理睬，亚历山大仍然坚持远征，可见这位21岁的马其顿国王的确相当“鲁莽”。

此外，这位21岁的国王带去远征的与军事无关的人员组成，也超越了当时的常识。这些人被分成以下各组。

第一组由记录人员组成，他们就像电影场记，任务是跟在亚历山大后面记录发生的一切。

第二组是翻译人员。

这一组由懂波斯语的希腊人组成。他们不仅要在与波斯人谈判时担

任口译，审问俘虏时也少不了他们。

亚历山大和以前的地米斯托克利以及后来的凯撒一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亲自审讯抓到的俘虏。也许他认为只有亲自审问了解情况的人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情报。

第三组是技师团队。

亚历山大是一位热衷引进新技术的领袖。他开发了运输时可以拆开，组装起来可以在战场上移动的各种攻城器械。这些工具在罗马时代得到了改良，是欧洲中世纪使用的攻城器械的原型。

第四组是医师团队。

其中不光有国王的侍医，还有给士兵看病疗伤的医生。医生团队的规模简直就像跟着一个野战医院。远征军兵力不过35000人，带这么多医生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为了充分用好士兵，所以要对士兵进行良好的“维护保养”。

亚历山大东征时还有地理、历史、动植物等许多领域的专家随行。我想这大概是受对任何现象都有兴趣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随行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名叫卡利斯西尼，好像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靠伯父的关系得以同行。亚历山大交给他的工作是统领照顾自己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少年。希腊和罗马男人都没有让女人照顾起居的习惯。

这些非战斗人员靠马其顿一个国家无法保证，于是亚历山大从希腊全境招募志愿者，将他们组织起来。

年轻国王的学友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随行东征，这人就是卡桑德。把他留下来的目的是让他给受命摄政的父亲安提帕特当助手。

总之，年轻国王率领的远征军将领除了帕米尼欧和担任警卫的克雷托斯以外，大半都是年轻一代。我甚至认为，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远征，其实是一群阳光男孩在鲁莽的统帅率领下搞的一场冒险。

他们行军的速度飞快。因为领头的亚历山大速度快，跟在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行军速度。

公元前334年春，军队从马其顿首都出发，途中与希腊其他地区来的士兵汇合。他们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时总共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迈向亚洲的第一步

达达尼尔海峡旧称赫勒斯滂海峡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海峡的最窄处在欧洲的塞斯托斯和亚洲的阿卑多斯隔海相向处。这里不仅海峡宽度不到5公里，而且潮流平缓。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时候，波斯王室全体出动远征希腊，仅实战力量就达20万人，加上各种随行人员，大军人数超过30万人。当时也是在这个海峡，众多船只首尾连接造出了两座桥，从亚洲跨到欧洲。

146年后，亚历山大率领人数只有波斯军十分之一的军队，要从欧洲跨到亚洲。

总共才35000人，不用专门架桥。让160艘战船中的大型船在上游减缓水流，再动用其他船只往返运兵，就可以渡过海峡。

假如亚洲一侧的阿卑多斯有波斯兵，往返运兵就不那么容易。然而，腓力已经把塞斯托斯和阿卑多斯这两个地方都变成了马其顿的领土。

用船往返运输35000人需要时间。率先渡海到了亚洲的亚历山大认为自己会有一些富余时间。

他把监督渡海的任务交给了帕米尼欧，带着朋友到阿卑多斯以南30公里处的特洛伊古战场观光去了。

那里是他少年时代爱读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上演的地方，是他崇拜的阿喀琉斯与特洛伊人打仗的古战场遗迹。

已到阿卑多斯却不涉足特洛伊古战场，这对21岁的亚历山大来说大约是不能想象之事。

亚历山大不知道波斯军队得知他登陆后何时会打过来，但这个特洛伊古战场是他不能不去的地方。

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并未遭遇袭击，他的部队也安然渡过了海峡。尽管特洛伊是他憧憬的地方，但他没有在当地久留，不久就回到了已渡过海峡的自家部队。他虽然有点鲁莽，但责任心还是有的。

达达尼尔海峡及其周边

在这期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又在做什么呢？

虽说他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苏萨，但通过雅典和斯巴达传来的情报，他已经得知马其顿国王率领希腊军队进入了亚洲。不过，当他听

说对方人数不过35000人以后，危机感便淡薄下去。对大国波斯的国王来说，他亲自统率的军队规模是以10万人为单位计算的。

大流士三世认为区区35000人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他把对付亚历山大之事交给替国王统治小亚细亚的地方长官们。

他有底气让自己放心。在军事方面支持这些地方长官的是由希腊人组成的佣兵团。统率这些佣兵的是门农，国王大流士对他的依赖更甚于对波斯家臣。国王把王室的女人嫁给这个罗德岛出身的希腊人，还给了他王族成员待遇。大流士感到，门农对自己的忠心超过了用钱雇来的佣兵队长。

希腊人将军门农是亚历山大在波斯第一仗的真正意义上的敌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在波斯地盘上首战的对手是同胞门农率领的希腊佣兵。

格拉尼科斯战役

波斯帝国领土从中东延至埃及，对波斯国王来说小亚细亚不过是帝国西端边境一隅。不过，来到这个边境之地的敌人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希腊人。代国王统治这里的地方长官当然明白这个情况特殊。他们紧急集合召开了作战会议，门农也参加了会议，主张首先采用焦土战术。

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队刚进入敌境，补给线应该尚未健全。中断他们的粮草，消耗他们的体力，然后展开会战打垮他们。这就是门农主张的战术。

波斯地方长官全体反对。

所谓总督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波斯王国官僚。他们的任务是受国王委托统治地方。他们会从统治地方的收益中留出事先规定的一份交给国王，剩下的装入自己的腰包。

使用焦土战术要在尚未收获的季节烧光庄稼，但地方长官必须如往年一样向国王交钱。对他们而言，这样做不但无钱装入腰包，还得倒贴出去。

如果是在穷途末路的危急关头，也许他们会接受这种做法。但此时他们同国王一样小觑了亚历山大率领的35000人。

而且，门农的影响力有限。在波斯人地方长官的眼里，门农再怎么深得国王信任，也只是一个来自希腊的佣兵队长。

就这样，作战会议决定派波斯军在距敌方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的平原上迎战马其顿国王统率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刚入敌境，士气高昂。门

农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决定。

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有8000人，都是重装步兵。

亚历山大进入亚洲后的第一场战役被称为格拉尼科斯战役，因为这场战役发生的平原上有一条叫作格拉尼科斯河的河流，这条河向北最终流入马尔马拉海。

波斯决定把战场设在这里。亚历山大率军进入战场时，敌军已经严阵以待。

亚历山大是一个会充分利用斥候（侦察兵）的武将。一拨拨派出去的斥候接连带回了情报。亚历山大在去战场的路上就已准确掌握了敌人的阵容。

而且，21岁的马其顿国王在去战场的路上就已经开始按战场阵型安排部队行军。说他21岁是因为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34年5月，离他22岁还有两个月时间。

亚历山大的部队一到战场便兵分两路开始应战。波斯人以为他们需要花时间布阵，因此大为震惊。这话绝非空穴来风。

格拉尼科斯战役是亚历山大成为国王后的第一场像样的战役。毕竟他才21岁，估计他周围的人也都感受到他的紧张。

这支远征军中地位仅次于国王的帕米尼欧靠近国王，和他并辔前行。他对国王说，等到天黑再进入战场，搞一场夜袭如何？

听了这位老将的建议，21岁的国王回答：

“我不想去偷取胜利。”

这个酷酷的回答实际上也很合理。夜袭可以出其不意，但自己的士兵也容易陷入混乱。

夜袭这种进攻方法在以少攻少的时候可以奏效，但在用数以万计的兵力进攻时则不然。河对岸有数以万计的敌人在睡觉。而半夜渡河不可能不发出声响。

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饱睡一觉后于第二天早晨进入战场。直到这时，士兵们才看清波斯军队已把对岸不足百米的战线塞满。

在这场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如果我们把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称为“马其顿王国和希腊城邦国家联军”，那与之决战的波斯军队就应该称为“波斯地方长官率领的波斯军和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联军”。实际上，挤满格拉尼科斯河东岸的波斯军队明显分成了由波斯人构成的右翼和由希腊佣兵构成的左翼。

波斯兵军服华丽，老远就能一眼识别。

波斯方面最醒目的是号称超过15000骑的骑兵军团。波斯领土辽阔，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培养边骑马边射箭的骑兵。

骑兵后面是1万名步兵，他们的作用是在骑兵把敌阵冲乱后进一步杀伤敌人。在他们的右边和后方，还部署着12000名从整个波斯征召来的步兵。

波斯一方的左翼是由门农率领的希腊佣兵，仅步兵就有8000人之众。

希腊式方阵由8000名重装步兵组成，门农及其手下指挥官级别的骑兵也在其中。

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波斯方面的兵力达到45000人，包括波斯人和为波斯而战的希腊佣兵。

与这45000人的兵力相比，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有步兵3万人和骑兵5000人，共计35000人。

然而，马其顿国王没有采用敌人数量占优势时通常使用的布阵方法。他沿河布了一个横向长而纵深浅的阵型。

他命令帕米尼欧指挥左翼部队顶住敌方右翼骑兵团的猛烈进攻，坚决守住战线。

他们已充分预料到超过15000人的波斯骑兵军团的进攻将十分猛烈，所以在自家军队的最左翼部署了1800名色萨利骑兵。为了避免敌方骑兵从右侧包抄，希腊城邦参战骑兵的一半部署在了左翼。

中路部署的是分成几个大队的马其顿方阵，分别由国王的几位学友伙伴指挥，而帕米尼欧担任总指挥。方阵中近7米长的长矛林立，形成一只巨大的刺猬，睨视敌方。

问题在右翼。

已经是国王的亚历山大所处的位置不同于喀罗尼亚战役时，那时他被安排在最左翼。按照希腊军队的传统，最高司令官的位置在右翼，这也是他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所处的位置。

不过，他对这个位置的使用有别于过去的最高司令官。

他决定自己指挥右翼，但他可用的兵力只有2500名骑兵，加上弓箭兵等轻装步兵以及一声令下即可运动的特种部队，也远远达不到6000人。

面对门农手下的8000名希腊佣兵，他只有按功能用好兵才有胜算。

5000名骑兵的一半被派去坚守左翼，亚历山大可用的骑兵只有2500人。

其中2000人是被称为“国王的伙伴”的近卫军团。

亚历山大想依靠帕米尼欧长子菲洛塔斯指挥的2000名骑兵掌握战斗前半期的主导权，而把启动战役的任务交给其余的500名骑兵。

这500名骑兵由名叫苏格拉底的队长率领，其作用是向敌人投放诱饵。他们最先渡河杀入敌阵，使指挥敌人左翼的门农认为希腊军从正面实施攻击。

21岁的国王看到，分隔两军的格拉尼科斯河从西南流向东北，途中一处略有转弯，两岸树木茂密。

门农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在那一带的防备较其他地方薄弱。

21岁的国王让2000人的近卫军团向树木遮蔽的方向移动，在将要进到树林尽头时停下，这时向苏格拉底发出了攻击命令。

可怜了苏格拉底率领的那500名骑兵。为虚张声势，让敌人以为是希腊骑兵全体发起了进攻，他们放开嗓子高喊着渡河。对方真的以为马其顿骑兵发起了总攻，于是赶来全力迎战。这500名骑兵一下子陷入即将全军覆没的境地。

亚历山大很冷静，但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人。这时他已经渡过河去，率领2000名骑兵向敌人的侧面突袭。

看见苏格拉底率队喊叫着渡河，波斯骑兵军团也开始冲锋。

可是，即便有15000名骑兵的猛烈进攻，要想击溃巨大的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谈何容易。在帕米尼欧的总指挥下，率领各大队的年轻将领们个个英勇战斗。希腊军的左翼一步也没有后退。坚守在最左翼的色萨利骑兵也阻挡住了企图包抄过来的波斯骑兵团。

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亚历山大的战术。

首先，骑兵冲锋把楔子直插敌阵，分割敌人阵营。

接着，由防守转入进攻的步兵和先前一直进攻的骑兵联合作战，包围并消灭已被分割的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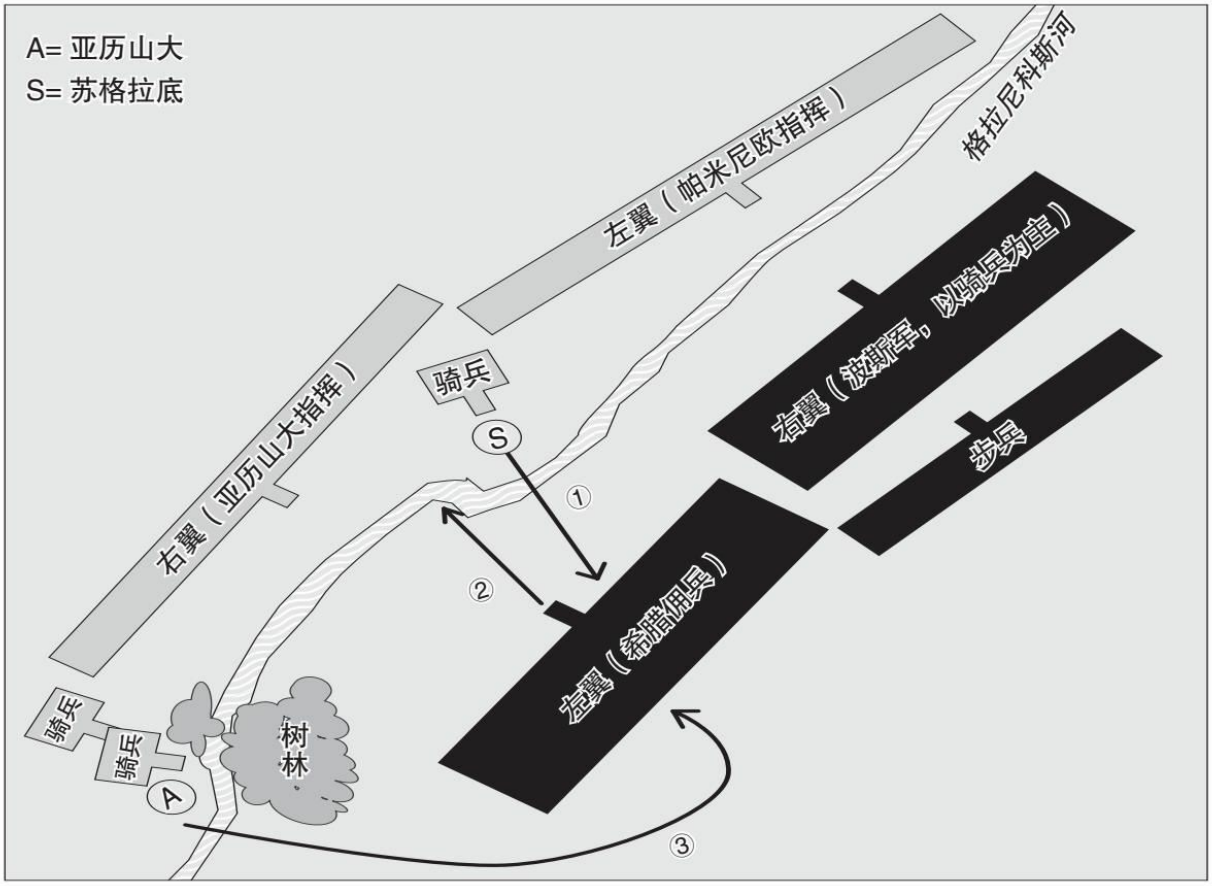
这期间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快攻。“胜利属于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这正是亚历山大说的话。

亚历山大毕竟才21岁，他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有些孤军深入。

他冲在2000人的骑兵军团前面杀入敌阵，因为过于深入敌阵而脱离了自己的队伍。

希腊骑兵习惯用长长的翎子装饰头盔，翎子在头上随风飘扬。亚历山大的“国王的伙伴”们也都戴着这种迎风飘扬的华丽装饰。但在五颜六色的翎子中，只有亚历山大一个人可以使用白色，这是规矩。

为了让自己的士兵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最高司令官所在的位置，只有亚历山大的战衣用了白色。但是，自己人看得出来，敌人同样也能区分出来。



格拉尼科斯战役

率先冲入敌阵的“白色翎子”孤军深入，这没能逃过一位波斯武将的眼睛。

敌兵包围了形单影只的亚历山大。

这时，克雷托斯和他率领的250骑及时赶到，使亚历山大摆脱了眼前的危险。

这时，“鲁莽”的亚历山大真正反省了自己，以后他虽然也杀入敌阵，但再也没有孤军深入过。

这场战役自始至终都是快攻，决定胜负所花的时间很短。太阳升起后开战，太阳仍在三竿时战斗已经结束。

据说波斯方面的战死者超过了4000人，其中还有两位地方长官。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部队也战死过半。除了跟门农一起逃跑的人以外，剩下的2000余人被俘。

亚历山大把这2000人押送到马其顿的矿山去强制劳动。按照科林斯会议的决定，以希腊军队为敌、作为佣兵参加战斗者将被视为希腊民族的叛徒，会被严厉处罚。

战胜者亚历山大一方的战死者情况如下。

集合了马其顿精英的近卫骑兵军团战死25人，其他骑兵战死60人。

包括马其顿方阵在内的整个步兵团战死30人。

这115人就是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损失的士兵人数。

骑兵的损失大于步兵的原因在于，骑兵在亚历山大的军队里是攻击的主力。

另外，即使是勇冠东方的波斯骑兵军团，想要打垮巨大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也的确是一件难事。

就这样，公元前334年初夏，格拉尼科斯战役以亚历山大大获全胜结束。这是亚历山大登上王位后的第一场正式战役，也是他进入敌人地盘后的第一场战役。

希腊人在温泉关一战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后，虽然在萨拉米斯和普拉塔亚等地连续取得大胜，但都是在“主场”取胜，而如今这场胜利是他们在“客场”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国王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做出了亚历山大式的举动。他把在格拉尼科斯战死的300名波斯士兵的军服装备送回希腊本土，并附上了

下面这句话：

“献给斯巴达人以外的全体希腊人。——亚历山大”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士兵在温泉关与波斯大军奋战，全体壮烈牺牲，那时的勇士人数是300人。这个数字全希腊人尽皆知。

作为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的第一役，格拉尼科斯之战的胜利另有其真正的意义。21岁的国王深知这一点。

小亚细亚西岸一带曾经属于希腊世界。自从这里的统治者成了波斯人，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

这场胜利的真正意义在于，从马其顿远征而来的年轻人打垮了波斯人。

这70年间，波斯人一直依靠军事力量把这一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果波斯在军事上失败，其统治者的地位将难以为继。

希腊人称为“爱奥尼亚”的希腊文明发祥之地，70年后能否回到希腊人手里，就全看这位马其顿年轻人的了。

利用胜利

要把战斗的胜利落到实处，靠的是获胜后的行动。

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5月份，当年适合军事行动的时间还很长。

亚历山大军队从最高司令官到普通士兵都喜欢饮酒欢宴。我以为在远征过程中他们会每天通宵达旦地喝酒嬉闹。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获胜当晚，马其顿军中会举行盛大宴会来犒劳全体士兵。因而，在格拉尼科斯获胜的那天晚上，场面大概是热闹非凡的。然而，亚历山大比谁都清楚胜利后要做什么事。

他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萨迪斯，这是统治小亚细亚的波斯势力在这一地区的一大据点。

波斯首都苏萨甚至有公路直通萨迪斯。如果发生事端，大军能很方便地从波斯帝国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运动到萨迪斯。

这条路全线铺装，被称为“波斯王道”。在辽阔的波斯帝国，这种全线铺装的道路只有连接首都苏萨和萨迪斯的这一条。

这条路体现了历代波斯国王企图征服希腊的执着。

亚历山大必须趁波斯还未从格拉尼科斯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抢先占领萨迪斯。

庆贺活动适可而止，年轻国王统率的希腊军队向南运动，直指萨迪斯。

部队到达萨迪斯城墙前，国王没有下令立即进攻。

统治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波斯地方长官们几乎都参加了格拉尼科斯战役。地方长官参战意味着他们指挥的波斯军事力量大半都参与了战争。

他们打了败仗，必然造成萨迪斯防守力量骤然减弱，尽管这里是波斯势力多年占据的一大基地。

亚历山大逼迫防守萨迪斯的波斯高官做出选择。当然，他希望这位知道格拉尼科斯战役结果的波斯人做出现实的判断。

是召集所有残存兵力抵抗到底，还是在希腊军队面前打开城门？选择后者可以维持现状，包括保住波斯长官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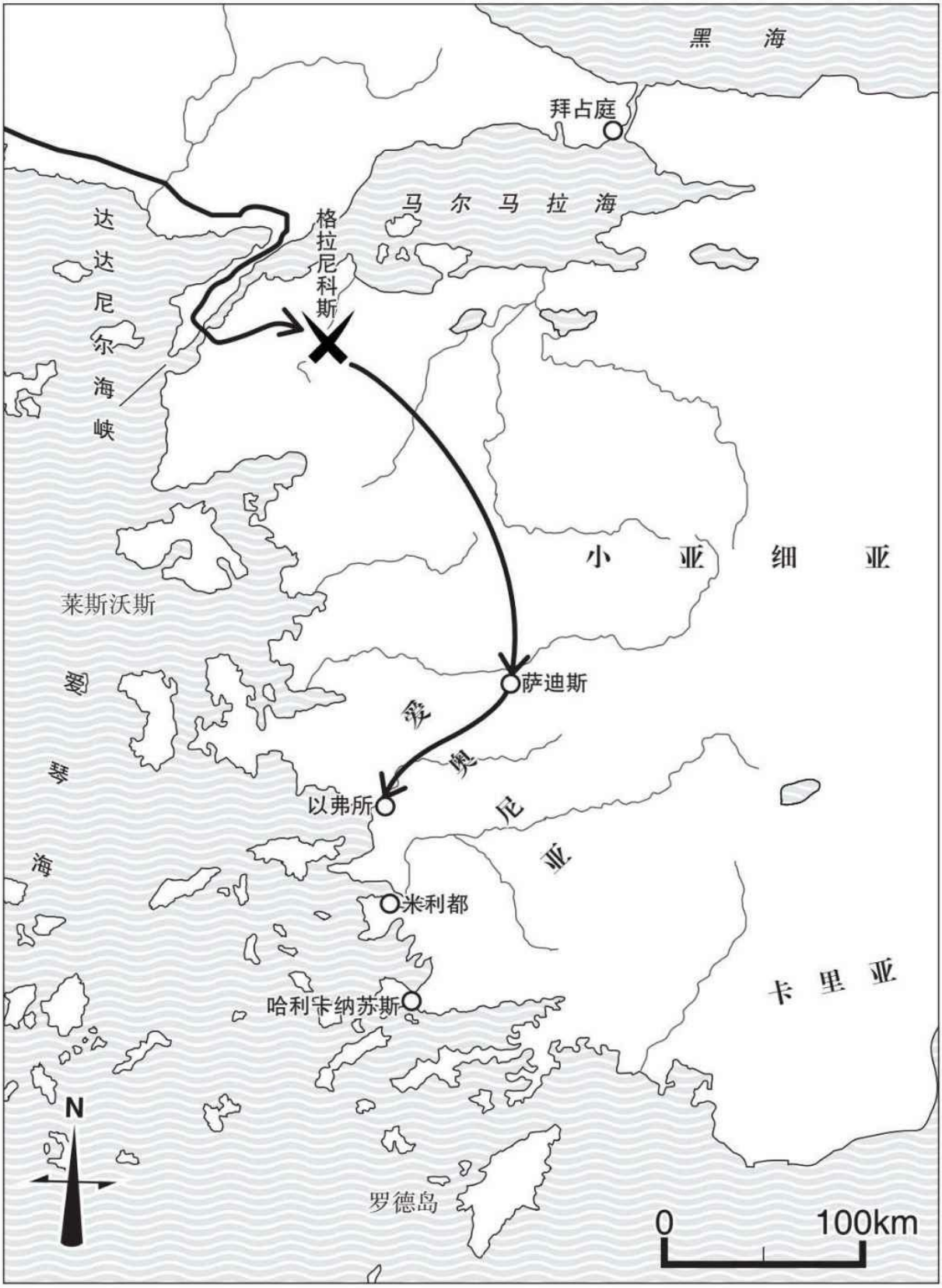
波斯高官选择了后者，送来了誓约书。

这样，一直是波斯人城市的萨迪斯变成了一座向希腊人开放的城市。

萨迪斯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无须减缓南行的速度。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以弗所，然后是米利都和哈利卡纳苏斯。

后面三座城市都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居民都是希腊人，为什么它们与居民都是波斯人的萨迪斯不同，在亚历山大面前拒不开城门呢？


黑 海
拜占庭
马 尔 马 拉 海
格拉尼科斯
达达尼尔海峡
小 亚 细 亚
莱斯沃斯
萨迪斯
爱 琴 海
爱 奥 尼 亚
以弗所
米利都
哈利卡纳苏斯
卡 里 亚
N
罗德岛
0
100km

从格拉尼科斯到以弗所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三座城市代表着爱奥尼亚地区，在雅典主导提洛同盟的时代，它们与希腊本土城邦共同构成了隔爱琴海相望的希腊世界。

建造雅典引以为傲的帕特农神殿的建筑家中有两位出身于米利都。

书写希波战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

当希腊的文化、文明中心转移到雅典，这些爱奥尼亚出身的人也把活动的舞台移到了雅典，人才的来源没有任何变化。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钟爱的女人也是米利都人。

雅典在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退，此后这种密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斯巴达与波斯联手打败了雅典，波斯进而统治了提洛同盟一翼的爱奥尼亚地区。

可是，波斯人的统治对居住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来说并无多少不便之处。

波斯人只要拓疆扩土使爱奥尼亚处于自己统治之下便可满足，他们并不干预爱奥尼亚人的生意。只要缴纳事先定好的税金，当地人可以自由地做生意。这样的状况对居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的希腊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便。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70年。这时，亚历山大横空出世。

我认为，雅典借通商与他国接触甚多，它的情报影响了同盟国对亚历山大的评价。

雅典的言论家狄摩西尼是一个彻底厌恶马其顿的人。他反复宣传马

其顿是一个专制国家，马其顿的国王是一个暴君，是公民的敌人，马其顿人远征早晚会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生意人厌恶别人干预自己的经济事务。也许这三个城市的希腊人因此对亚历山大抱有恐惧。

雅典同盟国反马其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门农。

门农逃离格拉尼科斯保住一命，但这次战役的失败让他从一个有8000名部下的司令官变成了一介佣兵队长。

部下大多战死，2000人未能逃出，当了俘虏。他们被送到马其顿的矿山强制劳动。也许他不向亚历山大报仇内心便无法平静。

门农组织了一支抵抗队伍。他是出生在罗德岛的希腊人，了解海军的威力。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海军，又为资金不足而烦恼。门农极有可能成为他的强劲对手。资金不足已经成为亚历山大面临的重大问题。除了雅典的20艘战船以外，160艘船中的其他船只都能解雇。

很快，门农得到消息说腓尼基来的400艘船已经到达。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可能是比格拉尼科斯战役更为严重的问题。

有了门农和来自腓尼基的400艘船，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态度越发强硬起来。

不久，以弗所老老实实地打开了城门。这个好消息让年轻的国王高兴得忘记了自己22岁的生日。不过，以弗所居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他们对马其顿国王的实力进行了冷静判断，而是因为他们得知门农和腓尼基的400艘船放弃了他们，转向了米利都。

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能节约时间、经费和兵力，亚历山大都非常高兴。他认为只要与以弗所缔结同盟关系即可，于是他率军直奔米利都而去。

然而，他刚靠近米利都就看到海上停满了敌人的船只。腓尼基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400艘腓尼基船就是波斯国王的海军。

正因如此，深得波斯国王信赖的门农才能把他们召来。亚历山大看到这一切似乎很后悔。他命令刚刚离开的140艘战船立即返回。也许他在想，管他什么经费问题，我不知道。于是，希腊军战船的数量从20艘又回到了160艘，但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帕米尼欧再次向亚历山大进言。他一定对亚历山大说了下面的话。

虽然只有160艘战船，但我们必须对400艘战船发起挑战。否则，400艘船守卫着大海一侧，要在陆地一侧攻陷由门农防守的米利都，恐怕不容易。

但22岁的国王没有采纳这位66岁老将的进言。

亚历山大不是因为帕米尼欧是长辈所以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对帕米尼欧说，我们单靠陆上进攻就可以攻陷米利都。

160艘与400艘战船之间的差距说什么都不容忽视。

要想逆转这个局势，需要有与地米斯托克利同等水平的海军将才。生长在陆军国度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不具备这样的才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正因如此，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产生了一个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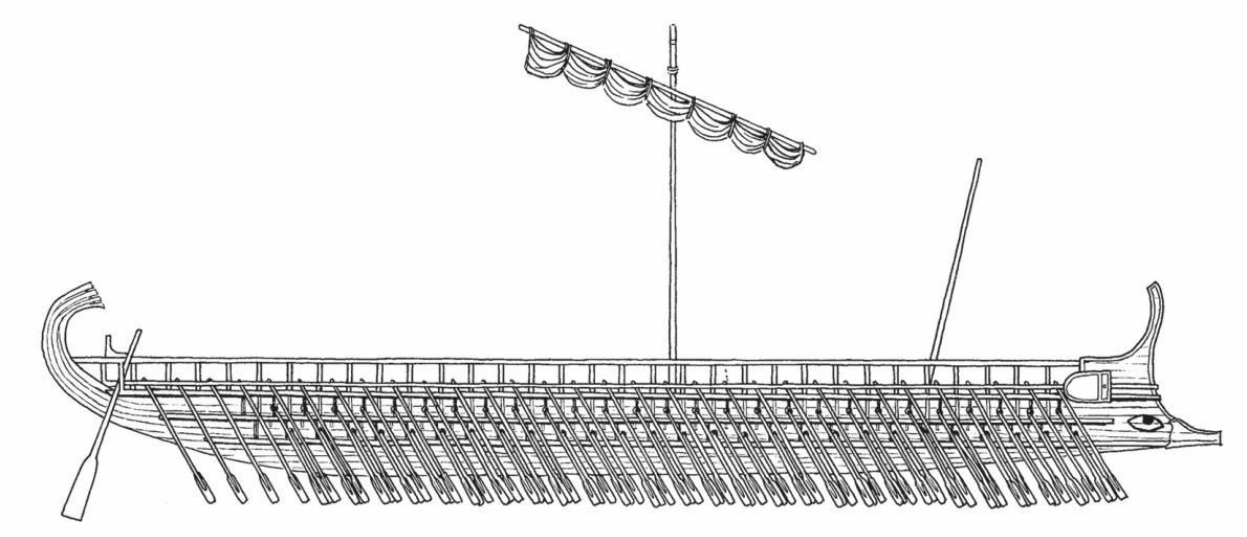
充分用好马其顿的陆军力量这没错，但以35000人的兵力在陆地发动进攻，就不担心400艘船上的敌人在背后登陆发起进攻吗？

先说结论，不管亚历山大还是帕米尼欧，他们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自《伊利亚特》时代起，希腊海军的传统就是由自由民担任战船的

桨手。

这些战船在海战中靠近敌船后，桨手会立即放下船桨拿起剑和矛参加战斗。在登陆战中，他们同样会扔掉船桨拿起剑和矛冲向敌人，成为优秀的陆战队员。



古希腊的战船

而在东方，不管是埃及还是腓尼基，战船桨手都是奴隶。为了防止他们在海上暴动，他们都被用锁链锁在划桨台上，也没有武器。所以，无论在海战中还是在登陆战中，东方战船的桨手都不可能成为士兵。

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种种原因。欧洲战船与东方战船的最大不同是桨手能否用于战斗。

这种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不同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存在，一直到三层桨战船作为军船主力的时代结束，即到公元1571年的黎凡特海战为止。

因而，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都不担心敌方400艘战船上的至少4万名腓尼基桨手会从背后袭击他们。

所以，尽管400艘战船舶在海上，亚历山大仍能专心进行他的陆上进攻。米利都是临海城市，70年来一直把陆上防卫交给波斯负责。不管专业的门农如何组织，也不可能防得住35000人都是专业士兵的马其顿军队。

门农一看败势明显，立即再次放弃战斗，带着腓尼基的400艘船逃往哈利卡纳苏斯。

事已至此，米利都人只能在22岁的国王面前打开了城门。

亚历山大就这样制服了米利都。尽管米利都是抵抗之后才投降的，但亚历山大还是像对待以弗所那样以宽容的态度处置了米利都。

也就是说，米利都成为一座不再依靠波斯的自由的希腊城市，除了今后要把过去付给波斯地方长官的税金转付给马其顿以外，一切维持现状。这样的处置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现实”。

此外，在门农指挥下打仗的希腊佣兵有300人成为俘虏。亚历山大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大处理。

亚历山大没有像格拉尼科斯战役结束时那样，把俘虏送去马其顿矿山强制劳动，而是申明他会给予战斗勇敢的士兵良好的待遇，建议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俘虏们当然会接受这个建议，因为根据科林斯会议的规定，他们会被祖国驱逐。

国王这样做并非出于单纯的好心。这是让在逃的门农孤立的一项策略。不过，这时收留的这300名士兵在远征的全过程中一直都是亚历山大的忠诚士兵。

制服了米利都以后，亚历山大的下一个目标是哈利卡纳苏斯。西方中世纪以后，这个城市更名为博德鲁姆。这是小亚细亚南部的一座重要

城市，亚历山大不会放过。

这时哈利卡纳苏斯的防守由门农指挥。他对在哈利卡纳苏斯打防御战似乎早有准备。亚历山大动员了技师团队，发起了猛烈进攻。然而攻防战你来我去，整个秋天就要在这拉锯中逝去。

城墙尚未崩溃，哈利卡纳苏斯城内的人却崩溃了。

他们分成了两派。门农和波斯长官主张抵抗到底，而哈利卡纳苏斯原来的统治者卡里亚王族的人主张像以弗所和米利都那样温和地解决问题。

代表王族的是先王的妹妹，一个名叫阿妲的老年贵妇。这个老妇人向亚历山大提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方案。

方案里说，我自己年老无子，如果马其顿国王做我的养子，哈利卡纳苏斯就属于马其顿国王。但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必须让我继续统治。

亚历山大正在为攻防战双方相持不下而心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好消息。

当养子？当什么都行啊！就这样，亚历山大与老妇人成了养子和养母的关系。

大概是对这个解决方法大感欣慰，亚历山大不但承认这位贵妇对哈利卡纳苏斯的统治，还任命她当以这座城市为首府的卡里亚地区的总督。

这位贵妇一向广受人们的尊敬，这事由她定了下来，彻底抵抗派只好跑去外国，门农也只好逃往科斯岛。

这样一来，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哈利卡纳苏斯及其周边的卡里亚

地区就都归了亚历山大。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于这年春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取胜，他已经完成了当初定下的“把居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的希腊人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计划。

从公元前334年春天到入冬的8个月内，亚历山大完成了这一计划。

尽管不是所有目标都达到了，但亚历山大至少实现了当初预定的设想。

在完全入冬以前，亚历山大决定了三件事并迅速付诸实行。

第一，给此次出征前刚结婚的士兵放假，约定他们来年春天归队，然后便准许他们回马其顿了。

第二，把带领他们回希腊的任务交给部分将领，并让他们在希腊全境征召新兵，新兵要与休假结束的士兵一同归队。

亚历山大的士兵在战场上损失较少，这些新兵并非用来补充军力，而是为了在新征服的地区驻兵。补充兵员是一个必须时刻想着的问题。

第三，冬季他和帕米尼欧兵分两路行动。

亚历山大把年长者分配给帕米尼欧率领的占全军三分之二以上的第一军，让他们运输分量重、体积大的物资。他们可以走不大会遭遇敌人的、平坦宽阔的道路。

亚历山大率领的第二军由年轻士兵组成，他们不需要拉货车，全体轻装赶路，但极有可能与敌人遭遇。

第二军要进入小亚细亚中心地区，这时不能指望散落在安那托利亚内陆地区的小部族会轻易放他们过去。

波斯帝国当时虽然是最大最强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构筑在明确组织体系上的牢固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内有很多部族，部族首领往往被授予“总督”的官衔。在这些总督和部族首领上面，松散地张着一张国王统治的大网，形成国家。这就是波斯帝国的实际形态。

格拉尼科斯战役时波斯对这些总督实行了总动员，于是这场战役成了一场推翻波斯在小亚细亚统治的战役。整个小亚细亚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权力真空。那些没有被召集去格拉尼科斯的小部族很有可能对战胜者随意采取行动。

但是，不收归这些部族就无法保障希腊人居住的西海岸的安全。即便正值冬季，亚历山大也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定好翌年春天，即公元前333年春上会合的地点，那是位于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南不远的戈尔迪乌姆城。

亚历山大的部队向位于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戈尔迪乌姆北上。这次北上过程中希腊军并未消灭遇到的小部族，而是与几乎所有的部族都和平地解决了问题。

年轻的国王告诉部族首领说，我可以和你们约定维持现状，但请记住，如果你们违反约定我绝不轻饶。

这些部族首领只知道格拉尼科斯之战的结果，亚历山大要让他们醒悟当地并未出现权力真空，只是希腊人取代了波斯人。

第二年春天，帕米尼欧的部队先期到达会合地点。这位老将立即给残雪中北上的亚历山大送去了以下消息。

第一，通过与长老们谈话，他已经征服了戈尔迪乌姆，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安全的城市。

第二，临时回国的战士已经归队，新兵也同他们一并抵达。

新兵的构成如下。

3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均为马其顿人。

此外还有来自色萨利的200名骑兵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征召的150名步兵，总数达到3650人。率领35000人进入亚细亚的马其顿国王现在可用之兵已近40000人。

另一方面，身在首都苏萨的波斯国王大流士收到的尽是坏消息。

首先，不仅小亚细亚西部，就连中心地区都落到了年轻的马其顿国王手中。

第二个消息是逃到科斯岛上的门农犯病去世。这或许是因为他对追随他的部下不断减少感到绝望。

这样一来，国王只得亲征了。

大流士这时47岁，正值盛年。但不知道为何，他是一个出招迟缓的人。

波斯的惯例是国王亲自率领的军队必须声势浩大。

他必须在没有爱将门农的情况下组编这样一支大军。此时还有2万名斯巴达佣兵留在波斯。

就在大流士心情沉重、心烦意乱的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在戈尔迪乌姆与另一队人马会合完毕，之后便有了一段至今仍然妇孺皆知的有趣插

曲。

戈尔迪乌姆之结

戈尔迪乌姆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格里达尔死结”的传说。

城市的中央广场上摆放着一架单人战车，连接战车和套马木辕的结不同寻常。

如果是用很多根皮带拧成的坚韧粗绳倒也罢了，可这根粗绳又缠绕了许多层。

人打的结总会有绳头，可谁也不知道这根绳的绳头藏在哪里。

戈尔迪乌姆的长老们同意归顺马其顿国王，接受了和平开城的要求。他们告诉年轻的国王、他们的新统治者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也是暗藏某种心机的戈尔迪乌姆人的挑衅。他们说：

“相传只有解开这个结的人能成为东方的统治者。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过。”

话说到这里，国王也没了退路。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圈圈绕在那里的粗绳绳头藏在哪里。

马其顿国王默默地凝视了一会儿但没有迷惘。

他想看清胜机究竟藏在何处。

转眼间，亚历山大挥舞着长剑，一剑砍了下去。皮带拧成的粗绳被一刀砍为两段，战车和套马的辕木两相分离。

传说中没有说必须用手解开死结。

也没有任何地方讲到不可以用剑砍断粗绳。

只是以前的所有挑战者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必须用手解开死结而已。

以前没有人想过只要是未被禁止的事就可以做。

在今天的欧洲，人们对戈尔迪乌姆之结的解释是这样的：

“坚定的意志和简单、果断的处置是解决复杂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公元前333年发生在戈尔迪乌姆的这个插曲，是在亚历山大远征的第二年。

这一年，马其顿的年轻国王23岁了。

通往伊苏斯之路

理论上，隔开欧洲和亚洲的是位于爱琴海东北端的达达尼尔海峡。

可是在感觉上，穿过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以后人们才觉得是踏进了东方。

古代的小亚细亚，尤其是其西海岸住着许多希腊人。要去往小亚细亚须渡过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要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必须经经过托罗斯山脉的险峻山路。

这条山脉有个别名叫“奇里乞亚门”。托罗斯山脉是横亘在从西方去往东方的人们面前的“门”。

如果波斯国王大流士有意切断亚历山大前进的道路，想必他会在这座“门”前以逸待劳，打击刚翻山越岭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

然而，大流士虽有能力想到这一点，却没有执行的领导力。就算自己决定的事，他也会旋即转入怀疑。因而他手下的将领无法行动，即使有所行动，也经常迟滞。

结果，他总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白白溜走。而正在征服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亚历山大并不了解这些情况。

他知道进入“奇里乞亚门”之后的这段时间最为危险。

这段时间，亚历山大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即尽快翻过托罗斯山脉到达最近的城市塔尔索斯。

可是，位于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安纳托利亚与其东邻卡帕多西亚可

不一样，这里虽非荒野但地势复杂。

地势复杂正好适合小部族割据。

所以，要从戈尔迪乌姆经安卡拉再到地中海，必须先一个个征服这些小部族。

年轻的国王虽然统率着数万人马，但在这种时候他并未采取抢掠或杀光的强硬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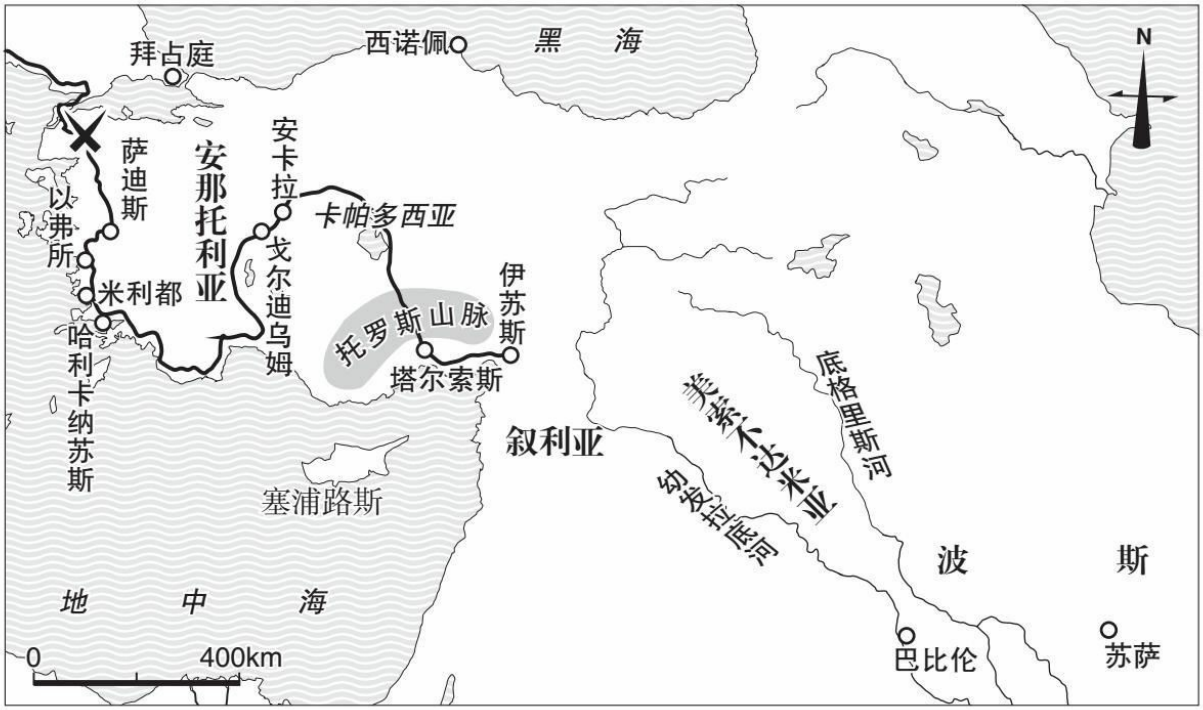
不过他做了一件事，让部族首领们明白他同意维持现状，但如果他们违背誓约反对马其顿，他绝不轻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抑制措施”，这个措施获得了成功。

大帝国波斯眼中的小亚细亚不过是边陲土地。对小亚细亚的部族首领来说，即使马其顿国王取代波斯国王成为统治者，他们也不会有多大不便。

亚历山大在整个行程中既要征服割据在各个地区的小部族，又要率军跨越高山，所以离开安卡拉抵达地中海花去了他两个多月的时间。

安全跨越托罗斯山脉，出了“奇里乞亚门”抵达塔尔索斯城时，每个士兵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这期间波斯并未来骚扰。时间也进入了夏季。



前往伊苏斯的路程

士兵们感受到安全跨越托罗斯山脉和再度看到地中海的双重喜悦，纷纷跳进附近的河里享受着久违的河水沐浴。年轻的国王也加入其中。

当天夜里亚历山大就病倒了。

他洗完澡后光着身子四处走动，可能是着了凉，我们不清楚确切病因。

国王发着高烧，躺在那里痛苦挣扎。他的主治医生立即赶了过来。

这名医生叫腓力，像是马其顿王室的家庭医生，亚历山大自小就让他看病。小王子擦伤后曾经拒绝治疗，他便摁着王子坐下，给他抹药。这种事还不止一次。因为有这重关系，亚历山大远征也带着他同行。

腓力医生诊查了躺在床上的国王，开始当场调制口服药。

这时一个士兵拿着一封帕米尼欧来的信走了进来，一边说消息紧急，一边把信递给了亚历山大。

年轻的国王开始看信。等医生把调制好的药倒进杯子里的时候，国王也看完了信。

帕米尼欧在这封信里告诉亚历山大，他听到传闻说波斯国王大流士企图毒死亚历山大，许以重金成功收买了腓力医生。

亚历山大右手接过医生递过来的盛有口服药的杯子，左手把帕米尼欧的信递给了医生。

国王喝药的同时医生看信。

国王喝干了药而医生面色惨白地看着信。这是他们两人之间上演的无声而紧张的一出戏。

也许是药里加进了安眠药，亚历山大喝完药后陷入了深睡。医生在国王的身边直到天亮也未曾合眼。

早晨，国王醒来。医生看到国王爽朗的笑容，安心感油然而生。那是腓力医生熟悉的亚历山大。

这件事以后，腓力仍旧是亚历山大的主治医生，后者每有不适他都会赶来。

当然，年轻的国王没有责备送来疑似假情报的帕米尼欧，甚至没有拿这事来当笑柄。

向上司报告所有情报是下属的义务，哪怕是看似虚假的情报。如何处理报上来的情报，是由上司决定的。

总之，亚历山大痊愈了。听到亚历山大病倒的消息后，将军们个个

面色苍白，现在他们把悬着的心放下了。看到国王恢复了健康，士兵们又精神起来了。

有消息传来，波斯国王大流士已率领大军从东方向西而来。大流士率领的波斯军人数比亚历山大所率军队的5倍还多。

但这对亚历山大是个好消息。

波斯帝国的中枢位于中东，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大河流之间，希腊人把那里称作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等于深入敌境。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在各个方面都不利。

现在波斯军自己来了，离开中东根据地千里迢迢远行来到中近东。

亚历山大越过托罗斯山脉进入了奇里乞亚，在大流士看来，他是踏进自家院子的蛮横之徒。大流士也许在想，必须尽快打垮这个不可饶恕的入侵者，把他赶走。

亚历山大决定等待大流士前来。此前率军不断前进的年轻国王这回决定等待了。

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分头行动。他们兵分两路采取军事行动，巩固刚拿下的奇里乞亚的防御，以保证与大流士正面对决时背后安全。同时也让包括新兵在内的全军士兵在实践中领会灵活机动的战法。

总之，23岁的亚历山大等待着敌人到来，同时做着确保奇里乞亚安全和训练士兵的工作。

大规模部队行军缓慢，在行军的同时还要集合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埃及也来参战，波斯国王率领的波斯大军进入中近东时已近冬季。

大流士又犯了一个错误。

波斯全军会合后集结在一个叫安提俄克的地方。在这里集结也应在这里与亚历山大对决。安提俄克周边平原辽阔，适合大军作战。然而大流士放弃了这里，率军北上而去。也许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趁敌人尚未深入自家院子就把他赶走。

走岔

然而，大流士这一步令人啼笑皆非。

历史上划时代的战役在旁人看来总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开端。历史上著名的伊苏斯战役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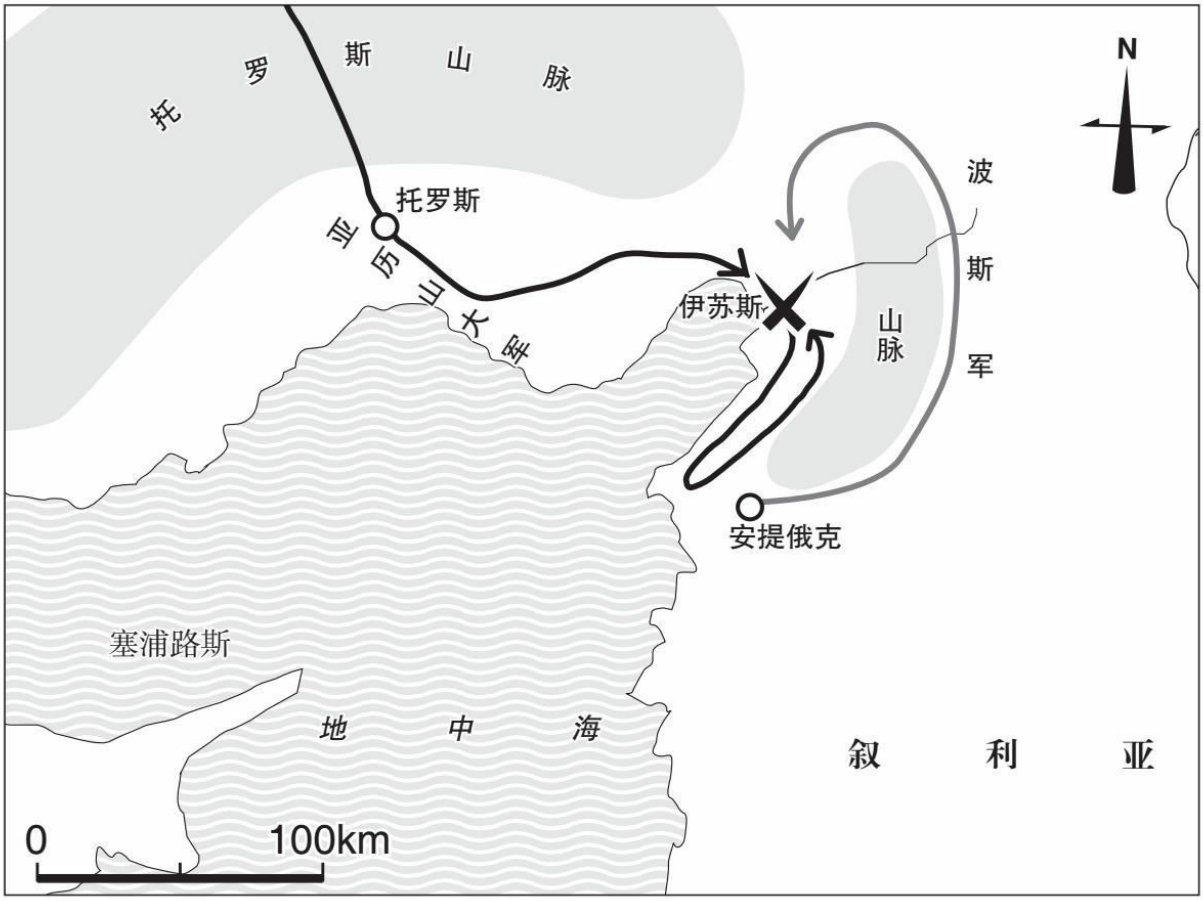
大流士大概是过于急躁，亚历山大虽未急躁但的确心神不宁。

亚历山大对对手是国王一事有着强烈的反应。他以前的敌人是总督、佣兵队长、部族首领什么的，这次不同，他要以波斯国王为对手了。这可不像格拉尼科斯战役，当时只是同波斯帝国的地方势力打仗，而现在他要以波斯中央势力为敌手了。23岁的亚历山大似乎产生了这个年龄应有的极大兴奋。

得知大流士进入安提俄克后，亚历山大立即率军南下，直指安提俄克。

可是，当他抵达安提俄克后却连波斯军队的影子都没发现。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波斯军队早已向北进发。

亚历山大从来不会根据单一情报做出判断，他让部下乘坐渔船再去确认。部下回来告诉他波斯军队的确正在北上。



伊苏斯平原周边

双方走岔了。亚历山大沿海边道路南下，而大流士北上。他们之间横亘着一座山脉，两军都没有发现对手在反向行军。

亚历山大了解情况后未有丝毫犹豫。他掉头北上，自己走在军队的前头。

伊苏斯战役本应是南下的亚历山大军和北上的大流士军发生激烈冲突，现在两军的走向颠倒了。

不过，选择伊苏斯为战场的是先行抵达的大流士。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大流士当时是已经47岁的成熟男人，是唯一一个在古代被称为“王中之王”的大帝国波斯的头号人物，他为什么要把战场选在伊苏斯呢？

这是一片随处可见的普通平原，因附近的村庄而得名，即伊苏斯平原。如果这里没有发生过这场战役，它必定不会留名青史。

这里西临地中海，东面低矮丘陵延绵，是一片夹在大海和丘陵之间、面积只有3公里见方的平原。

平原中央有一条河流过，来自丘陵的河水注入地中海。这条河与格拉尼科斯战役时的那条河一样，河面狭窄、水流平缓。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5月份，现在的伊苏斯正值11月份，河水水量减少，步兵甚至可以一口气蹚水跑过河去。

根据古代史学家的说法，波斯国王大流士率60万大军来到了伊苏斯。

不过，东方人往往会夸大数字。现代的研究者估计其只有20万人，实际投入战场的是其中的15万人，这个数字较为现实。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进攻希腊时的兵力为20万人。在波斯，国王亲自率军时兵力不能低于20万人，这对号称“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来说是个面子问题。

即便如此，波斯军也实打实地有15万人。亚历山大要用不足3万人的兵力去迎战这支波斯军队。

格拉尼科斯战役时亚历山大已有35000人的兵力，到了伊苏斯战役，加上国内的补充兵员只有不到3万人。这并非因为征服小亚细亚时牺牲者过多。兵力减少另有原因。希腊军在卡里亚设立驻屯基地，在其

他每个战略要地设置基地，都需要留下士兵，这造成了兵力的减少。在敌人的腹地，希腊人做不到兵力减少多少就补充多少。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可用的兵力是步兵24000人，骑兵5000人，共计29000人，加上杂兵也只有不到3万人。亚历山大将以3万人去面对大流士的15万人。而且，与格拉尼科斯战役一样，伊苏斯战役的战场也并非由亚历山大选定。

但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不但能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而且有卓越的化不利为有利的才能。

亚历山大得知大流士抵达伊苏斯后，一定当即确信伊苏斯将成为他与波斯国王的首场对决之地。

11月的确不能说是适合打仗的季节。即使在冬天不下雪的中近东，也有两军相约明年春天再战然后解散军队、各回老家过冬的惯例。

各地承认国王权威的总督和大部族首领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组成波斯国王的军队。

这些部队一旦解散就很难保证翌年春天还能再来集合，波斯国王大流士没有这个自信。大流士一心想的是马上在伊苏斯一战定乾坤。

从这点上说，在波斯国王眼中不过蕞尔小国的马其顿处在有利位置。冬天、露宿和粗糙的饭食对亚历山大及其率领的希腊军而言完全不成问题。

大流士还认为，现在不是回到首都在王宫里过冬的时候。3万人的敌军已经进到波斯国王家的院子里了。大流士非常急切地要在伊苏斯进行决战。

最高司令官双肩担负着全体将士的命运，他需要具备有看透敌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以少胜多。

亚历山大具备这种能力。

亚历山大确信大流士要在伊苏斯一决胜负，便在前往伊苏斯的行军途中考虑好了战略战术，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各队指挥官。

指挥官们利用运往伊苏斯途中愈发宽敞的道路，一边行进一边按照命令调整阵型。

就这样，抵达伊苏斯平原之前希腊部队已经调整完毕，一到战场即可兵分几路完成全军布阵。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以后，一共进行过4次值得称为“战役”的大会战。

这四大战役分别是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和海达斯佩斯战役。按我的想法，四大战役中不论对亚历山大个人还是就历史而言，最重要的都是伊苏斯战役。

因而，归纳、总结这次战役展开之前两军最高司令官的姿态或风格，不是无用之功。两军的战略战术及至战役的展开情形都与统帅的性格和风格有关。

大流士，大帝国的统帅，具有东方人的气质，经常被一群顾问和谏官簇拥。

他似乎是一个性格稳沉的人，遇事会在决策前听取所有顾问或谏官的意见，听完之后才做决定。但他往往在拿定主意之前听取意见，所以决断之后他自己会立刻产生怀疑。

看着国王伤透脑筋，他手下的将领们也不得不见风使舵。他们无法预测命令何时生变，如果贸然行事，一旦做错，在波斯等着他们的就是不经审判的死刑。

更糟糕的是对士兵的影响。指挥官们见风使舵，会让按照他们的命令行动的士兵失去自信。

如此一来连统一战斗意志都很困难，遑论彻底贯彻战略战术。

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相反，他会采取适度的上对下的独断。

他也经常召集司令官和指挥官开作战会议。与其说亚历山大要在会议上听取手下将领的意见，不如说他想借会议向手下说明战略战术，然后结束会议。虽然独断，但他会向手下将领们详细解释这样做的理由。

除了67岁的帕米尼欧和他手下的克雷托斯外，几乎所有将领都与亚历山大是一代人，相互理解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亚历山大虽然独断，但也有灵活性。他经常会在看过战况之后紧急改变部署。

他一贯实行以快取胜的基本战略，但在战术上能随机应变。

亚历山大有想法但不优柔寡断。改变战术也是当场思考后做出决定，而不是犹豫之后的决断。

各队的队长突然接到改变部署的命令后，行动毫不拖泥带水。改变战术已无必要再解释理由。从指挥军团的司令官到小队的队长都坚信亚历山大改变战术有充分理由。

上层的这种气氛会传递到士兵层面，从最高司令官到底层士兵都怀着必胜的热情。

犹豫会拖胜利的后腿，而信心会推人走向胜利。

大流士

大流士15万人和亚历山大3万人之间的差距也在这一点上。

毫不含糊地说，赢得战斗的方法只有一个：避免让自己陷入困境，让敌人进退维谷。

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这就要用战术了。

在战场上，士兵用肉体战斗，总司令用头脑战斗。

国王、将军和士兵都是抵达伊苏斯平原后才看到敌人的大军。

他们一定都注意到了，挤满河对岸的波斯军队尽管兵力5倍于己方，但他们注重的不是进攻是防御。

因为河对岸除了敌人右翼骑兵军团以外，战线上都建起了栅栏，尤其战线中央有好几层栅栏防守。在波斯，国王的位置在全军的中央。

见此情景，亚历山大采用轮换制让全军休整一天。往返200公里的强行军之后休整一下是必要的，但这可是在敌人能看见的地方。

亚历山大

士兵们忘掉抬眼可见的敌人好好地睡了一觉，又饱饱地吃了一顿。

没有史料准确记载亚历山大是如果度过战斗前夜的。

很难想象他会在帐篷里踱来踱去，直到天亮都不合眼。根据一位古代史学家记述，当晚帕米尼欧前来查看，发现沉睡的亚历山大后惊讶不已。这一幕应该是更接近真相的。

伊苏斯战役

公元前333年11月初的一天，伊苏斯战役终于开战了。

天空晴朗。已经进入11月，阳光不如夏天那么强烈，士兵即使身穿甲胄也不会冒汗。

波斯军率先进入战场待敌，其布阵堪称完美。

我刚才之所以说波斯军挤满了河对岸，原因是波斯全军分为四层布阵。总共只有3公里见方的平原被河流一分为二。波斯军实际有15万人，如此数量的兵力如果不分为四层，恐怕在平原上都摆不下。

有纵深的阵容在战斗顺利时可以形成前压的力量，强化攻击力。

但战况一旦不利，就存在一发崩溃的风险。

大流士一定是想靠自己军队人数的优势，一波接一波地向前压上，直到胜利。他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安排得十分周全，第一层决定胜负，第二层和第三层补空，第四层作为预备。

第一层是右临地中海的右翼，部署着波斯帝国引以为傲的超过2万人的骑兵。

这些骑兵是从帝国各地召集来的波斯社会的精英。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习惯从牛羊身上获取奶油和黄油的地方都习惯把社会精英称为“奶油”。在伊苏斯战场上，布阵在波斯军右翼的都是波斯帝国的“奶油”。正为如此，他们的军服装备很华丽，看上去显得人数比实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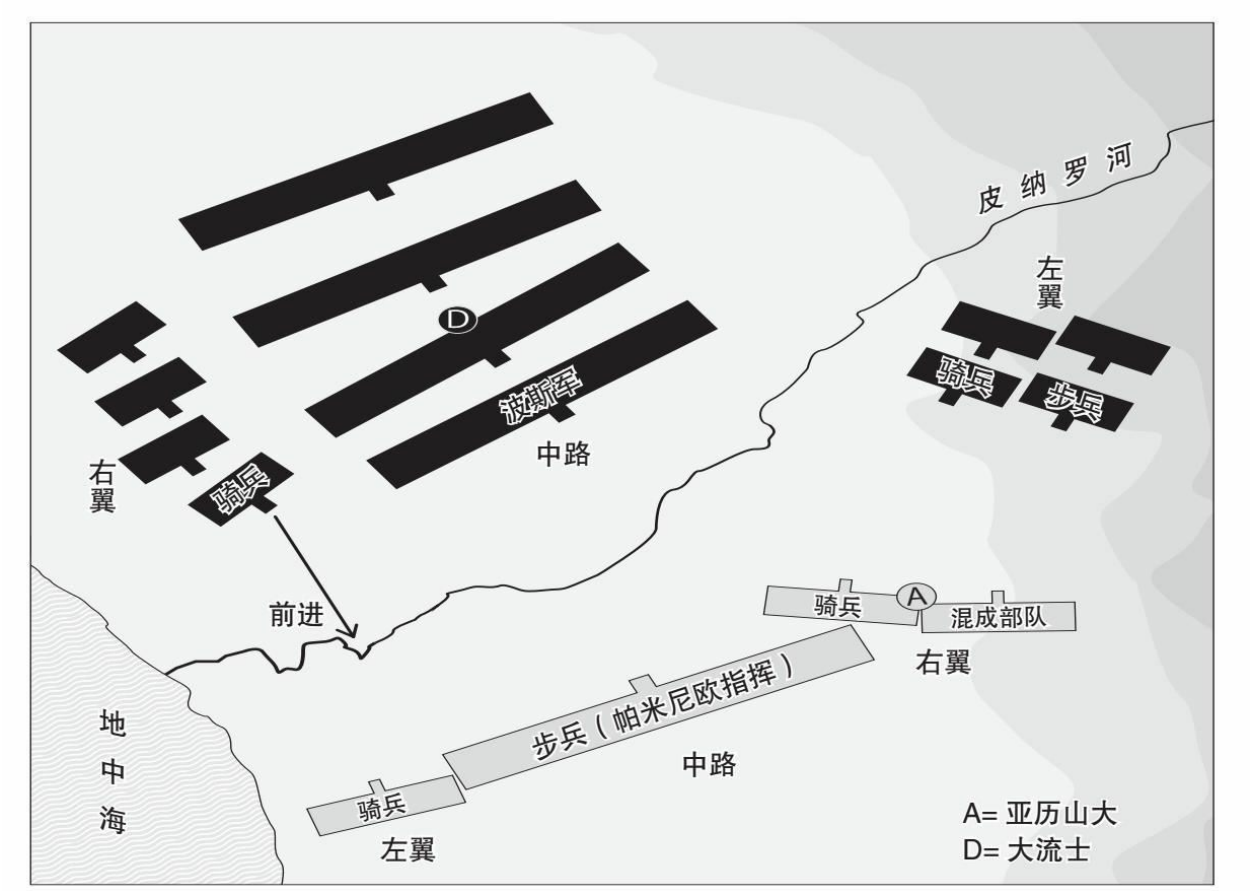
这个精英军团的左侧是“中路”，部署着超过2万名希腊佣兵。

他们多为斯巴达人，装备与过去的斯巴达勇士一样，从头盔、胸甲、腿甲到盾牌，保护身体的装备比其他城邦国家的更大、更坚固。

这些士兵一旦进攻，会给人一种类似小型坦克集群攻过来的压力。这是一个由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把他们部署在国王所在的中路最前线，显示出“斯巴达品牌”在波斯仍具影响力。

紧贴佣兵军团的背后，是1万名号称“不死军”的波斯精锐，他们围着大流士乘坐的战车布阵。

所谓“不死军”不是说他们打不死，而是战死造成的空缺会立即被后来者补上，一直保持1万人的数量而已。这1万人是波斯国王的近卫军团。国王御驾亲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同行。



伊苏斯战役-1

波斯国王在自己的左翼部署了步兵和骑兵的混合军团。

大流士一定知道去年格拉尼科斯战役的过程。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军团发起冲锋，不但开启了战端，而且决定了胜负。

大流士还知道，希腊军的最高司令官位于右翼，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在右翼。

大流士大概想要阻止亚历山大率领右翼发起冲锋，即使无法阻止，也要对冲锋进行干扰。

所以他让自己左翼的一部分人先渡过河去，部署在希腊军右翼的侧面。我想他设计的是这队人马阻击希腊军右翼冲锋，他右翼的骑兵军团

借机发起猛攻，打垮希腊军的左翼全部力量。

这招战术并不差。可是对手棋高一招。

经过充分睡眠之后，亚历山大进入敌人严阵以待的战场。他看到敌人纵深布局的阵形后，把己方改成了与之相反的阵型。

尽管兵力不足敌人的五分之一，但他仍然摆出了横向比敌人更宽的阵型。

使用这种布阵若开战后发起冲锋不顺，容易被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轻易击破。但是，敢冒风险才能获胜。

亚历山大改变了部队部署。

他自己负责右翼，以马其顿方阵为主力的中路交给了帕米尼欧，左翼部署的仍是希腊各地的骑兵，这些都没有变化。

不同的是他把公认实力仅次于马其顿的色萨利骑兵全部放在了左翼。

这个措施加强了左翼，这个方向必定会遭到敌人骑兵军团的猛攻。

同时，他还调整了自己率领的右翼，紧急组建了一支由特种部队和骑兵构成的混合部队，部署在由马其顿骑兵构成的右翼的右边。

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发起进攻的是亚历山大率领的骑兵军团，而在伊苏斯战役中率先启动的是这支步兵骑兵的混合部队。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除掉马其顿骑兵冲锋时前来干扰冲锋的敌人。

希腊军靠快攻取胜的战法没有改变，只是有障碍物需要清除。

平原上的战役都是一样的，开始总是进展缓慢。

在伊苏斯也是这样，两军都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分隔敌我的河流前进。这种前进速度一直保持到双方距离进入200米弓箭射程的时候。

伊苏斯战役开始后，希腊军缓慢前进，波斯军只有右翼的骑兵军团在向前挺进。由栅栏护卫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待命状态。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兵力5倍于敌人，随时都有机会压上击溃敌人。东方人对人员数量的信赖几乎到了信仰的程度。

公元前333年，伊苏斯战役终于在初冬的阳光下点燃了战火。

尽管希腊军紧急改变部署，但调到最右翼的希腊混合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清除障碍的任务。他们不仅把波斯的前哨部队赶上了丘陵，还打垮了这支部队，很快就使他们失去了战斗力。

亚历山大见状向马其顿骑兵军团的3000名骑兵发出了冲锋命令。

事实上，与其说国王发出了冲锋令，倒不如说他骑在爱马比塞弗勒斯身上高喊着“冲啊！冲啊！”先冲了出去。

马其顿骑兵都知道，国王冲出去后自己要紧跟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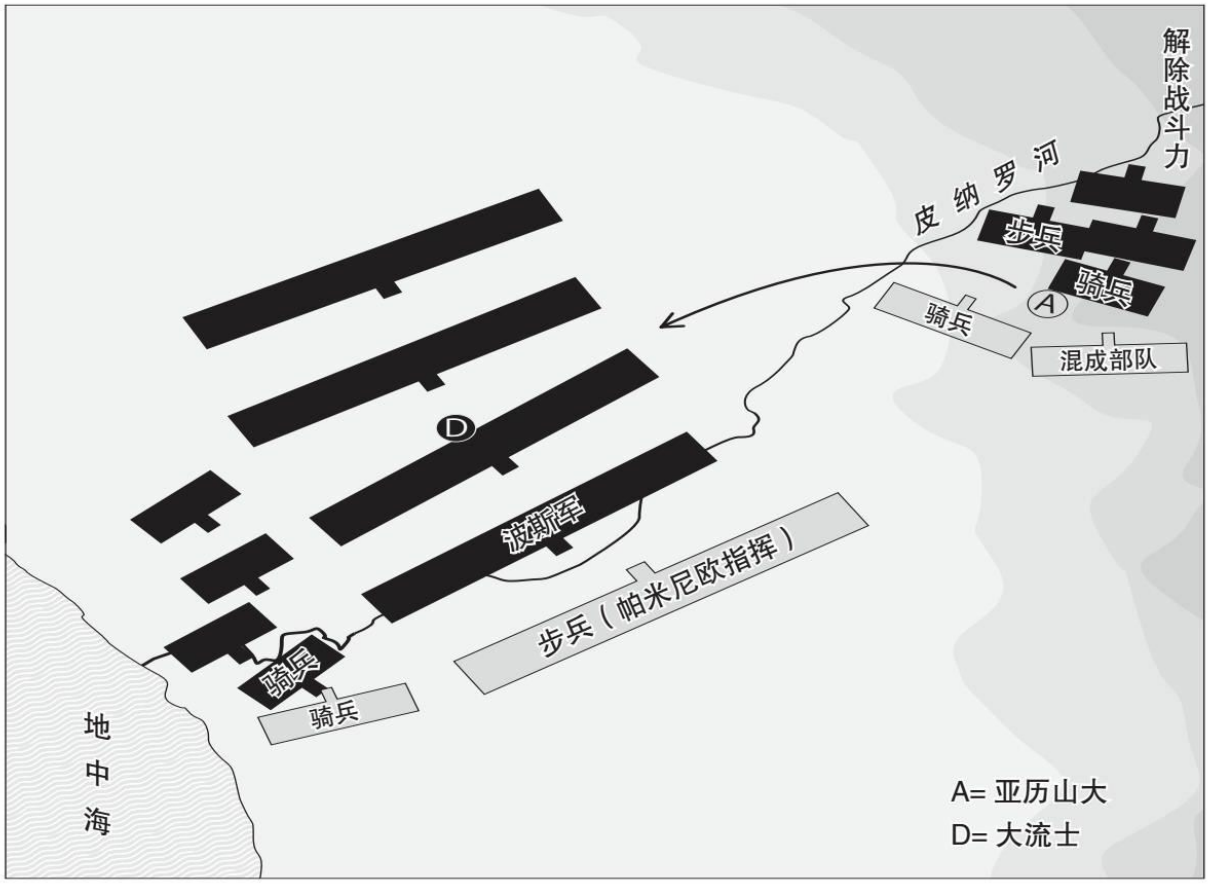
他们绝对不会重蹈格拉尼科斯战役的覆辙。当时国王冲在前头杀入敌阵，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马其顿骑兵全体投入进攻，由此伊苏斯战役正式打响。

在战场靠海的另一边，波斯骑兵也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两军的中路尚未发生激烈的冲突。

亚历山大命令帕米尼欧率领的中路顶住敌人的进攻。马其顿引为骄傲的马其顿方阵形成一个巨型“刺猬”严阵以待，等着为波斯而战的斯巴达佣兵渡河缩短两军之间的距离。横向的长阵型一旦崩溃，失败便很快到来。



伊苏斯战役-2

年轻的国王这次虽然也渡河发起了冲锋，但他注意着不要冲过头。国王始终在骑兵军团的前方战斗，而骑兵军团寸步不离国王左右。

马其顿骑兵军团成功地把楔子打进了波斯阵中，分隔开波斯军的中路与左翼，原本这两部分应该联合防守。

阵型崩溃后毁灭接踵而至。马其顿骑兵军团的目标是消灭敌人，在他们的猛攻面前，波斯军的左翼束手无策。如果左翼失去了战斗力，大流士所在的中路左侧就如同没有设防一般。亚历山大率领3000名骑兵集中猛攻中路。

战斗由此进入了第二幕。

年轻的国王左右开弓，连续放倒敌兵，视线却不曾离开大型战车上的大流士。

在丘陵一侧成功解除敌人左翼的战斗力后，马其顿骑兵军团迅速强化了对大流士所在的敌军中路的进攻。

只要扳倒波斯国王，胜负立见分晓。23岁的亚历山大冲在最前头，率领全部骑兵投入对中路的攻击。

可是围绕在四周守护波斯国王的“铜墙铁壁”太厚。

在战场中央，像发怒的刺猬一样的马其顿方阵与小型坦克集群一般的希腊佣兵军团终于开始了激烈碰撞。

7米长矛组成的森林怎么也攻不破，倒下去的都是像小型坦克一样的斯巴达重装佣兵。帕米尼欧就这样按照国王的命令成功坚守到了最后。

在靠海的一侧，波斯军团渡河大举攻入敌阵，以色萨利骑兵为主体的希腊骑兵一边缓缓后退一边不停反击。两军展开了激战。

数量十倍于敌的波斯骑兵军团在战斗中占据着优势。但色萨利骑兵也非浪得虚名。面对敌人的猛攻他们顽强反击，没有一个士兵逃跑，阵型也没有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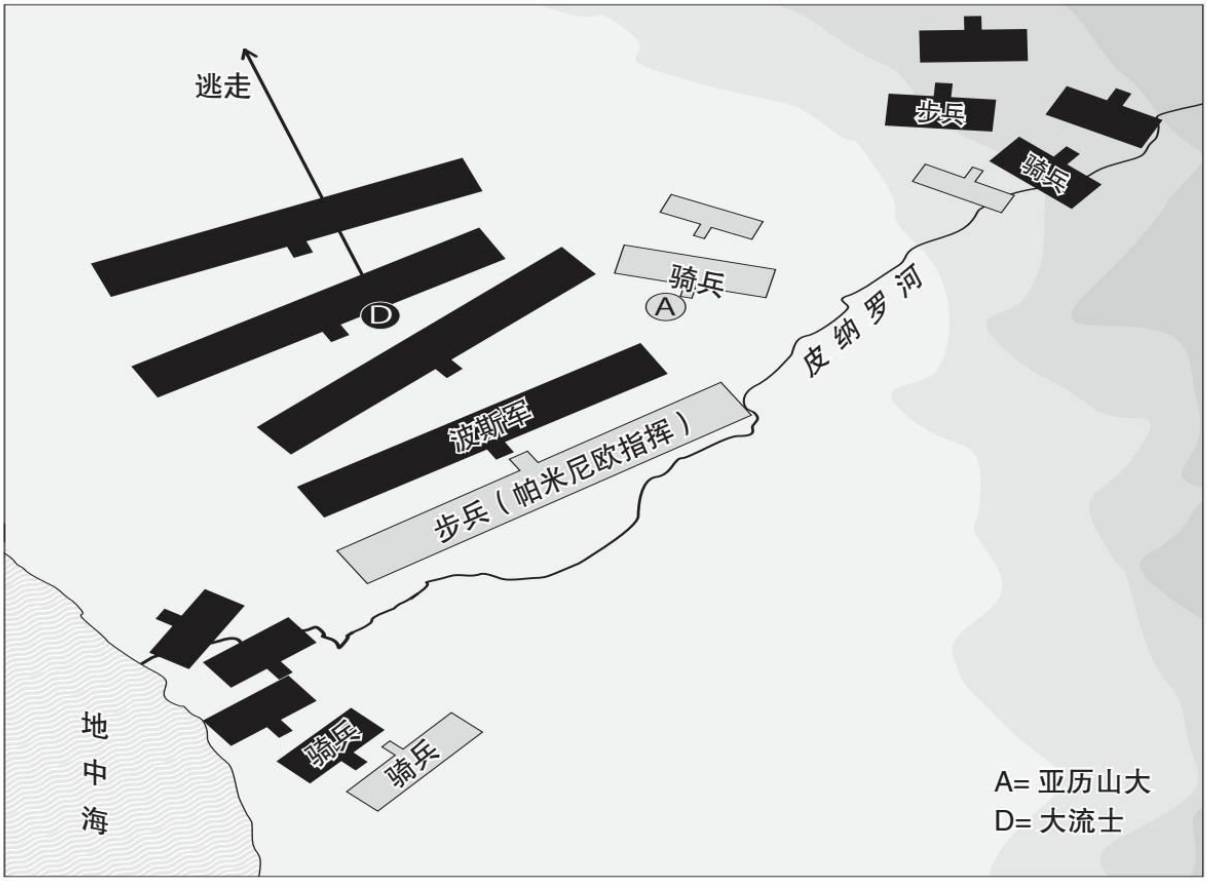
波斯国王大流士心生恐惧，伊苏斯战役以完全不同的情形进入了第三幕（见伊苏斯战役-3）。

亚历山大领头的马其顿骑兵军团从左侧逼近。

挡在前面为国王保驾的“不死军”尽管是精英，但毕竟是步兵，他们纷纷成了敌人马蹄下的牺牲品。在这天的战斗中，他们1万人中阵亡了

6000人。

47岁的大流士看到这一切，被逼近身边的危险吓得忘记了自己是国王。



伊苏斯战役-3

他试图坐战车逃走，但身边己方的士兵太多，连路都让不出来。于是，他骑上一匹马一溜烟逃出了战场。中路的波斯骑兵们跟在国王的身后。

在右翼作战的波斯骑兵军团注意到中路发生的这一变故。国王乘坐的是大型战车，士兵们老远就能看到他所处的位置，而且这种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看到国王已经逃跑，骑兵们也没有理由再留在战场上了。于是，他们也调头逃跑，还把自家的步兵队伍冲得七零八落。

整个波斯军就这样全面崩溃了。那些波斯精英没能全部逃脱。由色

萨利骑兵队打头阵，整个希腊骑兵团投入追击，成功逃脱的精英不足半数。

最先发现大流士逃跑的应该是已逼近他身边的亚历山大。

他当即准备追击逃跑的波斯国王。

可就在这时，帕米尼欧派来的急使追了上来。

帕米尼欧请求他赶紧回马进攻敌人的中路。

按照亚历山大个人的想法，他一定要追击逃跑的大流士。

可是他和帕米尼欧谁都没有料到波斯国王真会逃跑。

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两人当初商定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消灭敌人的左翼后进攻敌人中路。以此为号，帕米尼欧也令马其顿方阵全面转入进攻。

亚历山大大概记起了这件事，他给帕米尼欧回了一个字“回”，真的调头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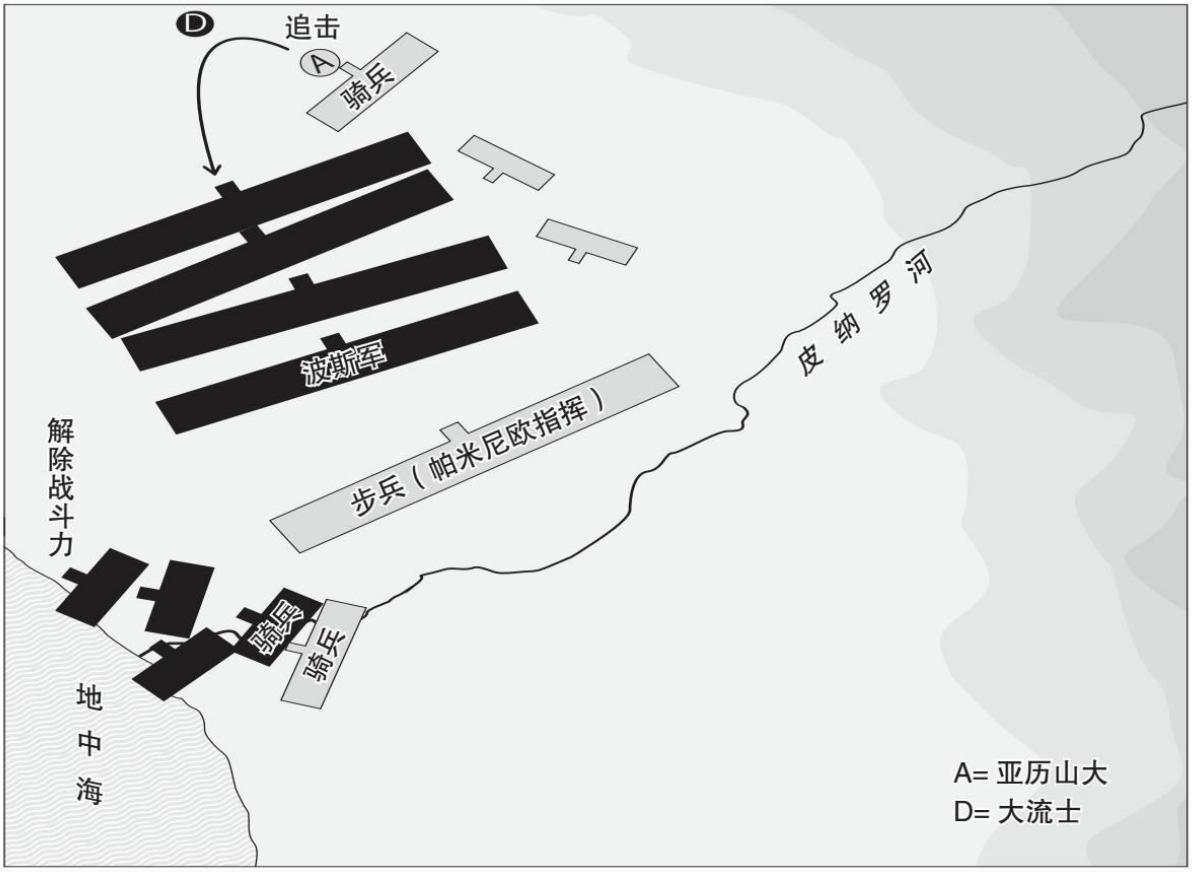
就这样，波斯军中路前有马其顿方阵，后有马其顿骑兵军团，他们在两面夹击下彻底崩溃了（见伊苏斯战役-4）。

3万人对15万人的伊苏斯战役以3万人的压倒性胜利告终。

根据古代史学家的说法，波斯方面的牺牲者包括步兵10万人、骑兵1万人。

多数战死者不是被马其顿兵用长矛刺死的，而是被己方逃跑士兵挤倒踩死的。若全军陷入混乱，士兵人数越多，被压死的人也就会越多。

超过2万人的希腊佣兵逃离战场的只有8000人。波斯兵往东逃，而他们往西逃。他们大多出生于斯巴达，此时要逃回祖国去，没人搞得清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径。



伊苏斯战役-4

斯巴达没有参加科林斯会议，没有义务遵守以下决定：凡为他国当佣兵对抗希腊的希腊人将被逐出祖国。所以，只有斯巴达的佣兵能回到祖国。据说他们为找下一份工作四散而去。

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据说有450人战死。

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希腊军的战死者为115人。在伊苏斯战役中，敌人的数量5倍于己，战死者的数量也就有所增加。

在伊苏斯战役中，23岁的亚历山大取得了绝对胜利。

大流士渡过幼发拉底河才放下心，生还的4000名“不死军”之士紧跟着他。大流士带着这4000人横跨美索不达米亚，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

终于逃回了首都苏萨。

他从战场逃跑了。他抛弃了士兵，抛弃了豪华的国王专用战车，抛弃了为付佣兵费带去的3000塔兰特巨款，还抛弃了他带去战场的家人。而他本人毫发无损。

亚历山大在激战中被敌兵的长矛刺伤了大腿，接受了腓力医生的紧急处理后，他又开始了活动。

首先，他埋葬了战死者。希腊军队有个规矩，战死者要在战场火化并下葬。

按照惯例要由率领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为其下葬。波斯没有这样的做法，但希腊这样做，罗马也这样做。

因为士兵是最高司令官的战友。后来罗马的凯撒对士兵讲话时，总是称呼士兵们为“诸位战友”。

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对士兵讲话时用什么样的称呼。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愿意把部下看作战友，士兵们也把这位年轻的国王当成自己的战友。

埋葬死者后，年轻的国王还要去看望那些负伤的战友们。这也是最高司令官必须参与的战后仪式。最高司令不但要犒劳士兵，还有义务把身负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的士兵送回祖国。

不过人们都说，亚历山大指挥的战斗不仅战死者少，而且通常伤兵的人数也很少。伊苏斯战役希腊军的伤兵数量很少，几乎没有必要专门备船送他们回国。也许随军的医生团队为伤兵提供了恰当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亚历山大每次战斗之后去看望伤兵，都带着医生团队一起去。

这一切结束后，亚历山大才和亲密伙伴赫菲斯提安一起吃了当天的第一顿饭。

这时，手下人进来报告说波斯国王的母亲、王妃以及两位公主哭闹不止，不知该如何处置。

23岁的亚历山大毕竟年轻，全力作战之后还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他决定前去看望，并且说走就走。当然，与他形影不离的赫菲斯提安也一同前往。

波斯王室有个习惯，预计能够打胜仗时会让家属同行。

150年前率大军进攻希腊的波斯国王薛西斯是带着弟弟们和儿子们一同前去的。大流士这次不是远征希腊，是在“主场”伊苏斯打仗，所以他带上了女眷。

亚历山大来到后方专为王室女人建起的帐篷，哭喊声从里面传来。

同大流士的国王专用战车一样，王室女人的帐篷也制作得漂亮豪华，象征着波斯的财富。

一见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走进帐篷，波斯国王的母亲立即跪在其中一人的脚下，一边哭泣一边乞求饶命。

可是这位王太后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她搞错了跪地求饶的对象。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两人从身材到穿着都很相像，幼年时代就被说成是双胞胎。赫菲斯提安个头儿略高，波斯王太后便把他当成了马其顿国王。

这个“外交上的重大失误”立即被一个侍奉王室女人的希腊人指出。

这下王太后的绝望更到了顶点，因为没有比认错国王更失礼的行为了。

不过，亚历山大从小就喜欢母亲，对别人的母亲也很温柔。

他一边拉着老妇人的手让她站起来，一边跟她说话，称她为“母亲大人”，这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他说：

“母亲大人，您完全不必害怕。他是另一个亚历山大。”

他通过翻译继续说下去。

他说大流士国王已经逃走，很有可能还活着。

他许诺，一旦知道大流士的消息立刻通知她们。

他还承诺，贵妇们的待遇一概不变，并严令士兵不得做出任何损害她们名誉和地位的行为。

于是，连佣人也加入其中的“悲伤大合唱”就此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大流士送来了媾和方案，但遭到亚历山大的断然拒绝。

这个方案内容如下。

第一，波斯割让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给马其顿国王。

第二，支付1万塔兰特的赎金赎回波斯王室的女人们。

最后，作为波斯帝国与马其顿王国解除敌对关系的证明，可以让一位公主嫁给亚历山大。

对此，亚历山大大笑道：

首先，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已经归我所有。

第二，如果没有必要继续扣留王室的女人们，我会给她们自由且不需要赎金。

第三，只要我愿意，现在就可以让公主成为我的妻子。

总之，波斯国王与亚历山大的第一次对决宣告结束。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已经过去了两年。

从下一年的春天开始，当代研究者所说的“后伊苏斯时期”在等着这位年轻的国王。

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建立海上交通线

前一年5月，亚历山大靠格拉尼科斯战役一举扫清了小亚细亚的波斯势力。象征波斯统治的地方长官们大半战死，活下来的也在年轻的马其顿国王面前打开了城门，接受了马其顿的统治。

实际上，小亚细亚的地方长官们并未参加第二年11月的伊苏斯战役。

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面对波斯国王亲自率领的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打赢了波斯帝国的核心力量。而波斯吃了败仗，国王还落下个临阵脱逃的污点。

那些从伊苏斯逃出来的总督和部族首领们看自己国王的眼光必定会与以前不同。他们也许开始认为，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对波斯地方官员采取的宽容态度颇有魅力。

这样一来，即便大流士有心雪耻，也只能依靠那些帝国东半部的实力派人物了。

我们以现代的国名大致分析一下庞大的波斯帝国。

小亚细亚对帝国而言是西北边境，它相当于现代的土耳其，与麻烦的希腊世界接壤。格拉尼科斯战役以后这里已经归亚历山大统治。

帝国西南部是埃及。埃及是一个富庶之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霸权的民族都会染指这里。正因如此，这里也很难统治。一旦发现波斯的统治有所松懈，当地人会立即发动叛乱。但这里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当地波斯总督还率领军队参加了伊苏斯战役，自己在伊苏斯战死。

这意味着过去波斯统治的埃及在伊苏斯战役之后出现了权力真空。

接着是波斯帝国的核心部分。

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起于地中海东端，越过幼发拉底河，直达底格里斯河东侧的辽阔大地。按照现代的国别，这里覆盖了中近东各国，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及伊朗的西半部。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经常成为中东的核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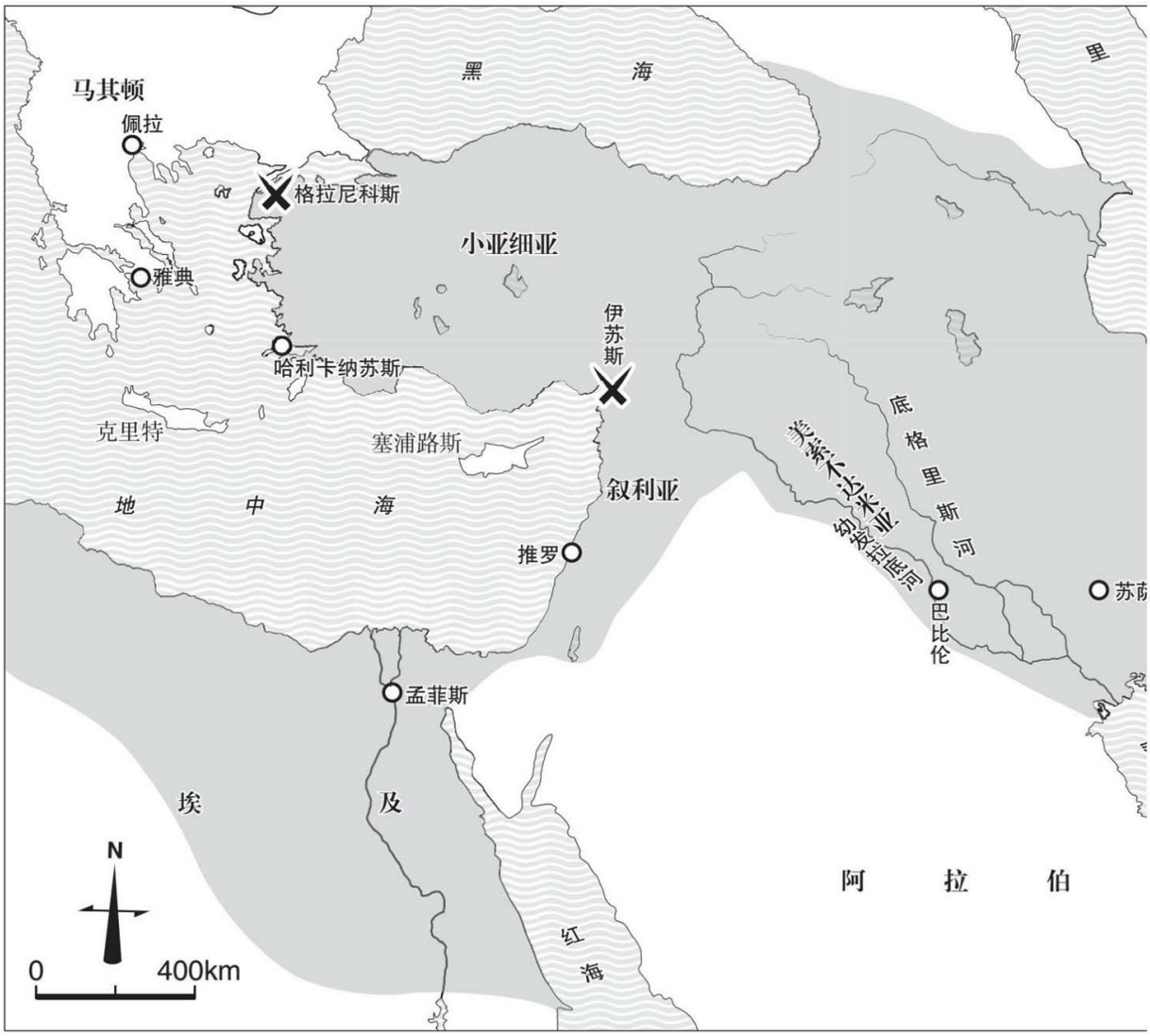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获胜的意义在于他征服了这片核心地区。

波斯帝国的东半部分为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区域。按照现在的国别，这部分包括伊朗东半部分、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北面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里大半是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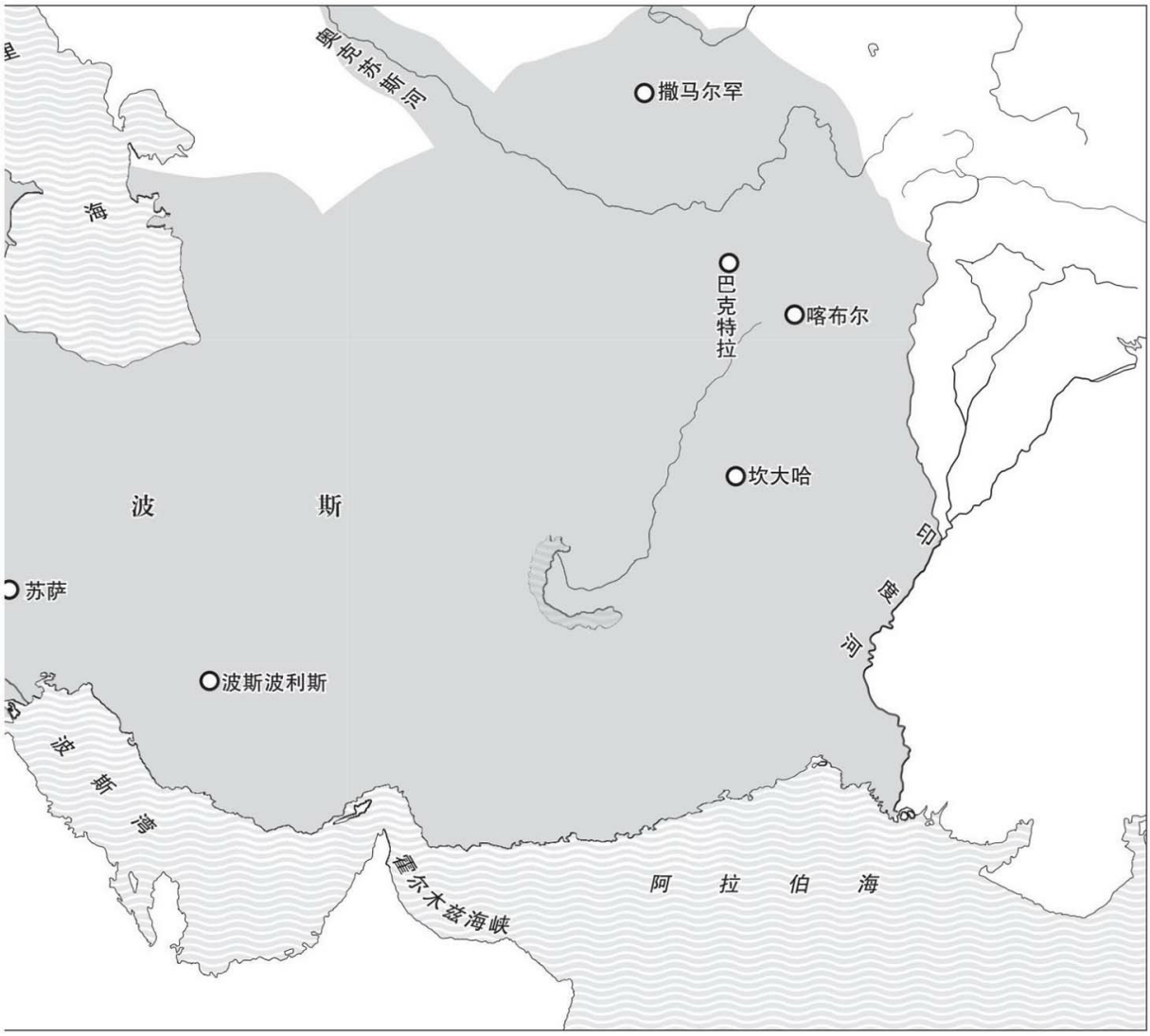
实际统治这些地方的实力人物几乎都未参加伊苏斯战役。大流士如果想卷土重来，只能召集这些尚未与亚历山大打过仗的人。

我们回到伊苏斯战役后亚历山大面临两种选择这一话题。

他的第一个选择是趁机进攻美索不达米亚，一口气打垮波斯帝国。第二个选择正相反，他可以一边征服中近东，一边优先拿下埃及。



亚历山大东征前的波斯帝国版图



第一个选择的好处是可以直取尚未再次组建军队的大流士，但也有补给线太长的不利之处。

第二个选择的好处是征服行动从中近东开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伊苏斯战役的影响。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波斯手中夺过制海权。

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海军，所谓海军只是来自雅典的20艘战船。

而波斯拥有400艘战船组成的腓尼基海军。东地中海自不必说，就连爱琴海的制海权现在都还掌握在波斯手里。

在这样的状况下，就连与希腊本土之间的联系和补给都难以保证，遑论与马其顿了。

不重视后勤保障的司令官在战场上再勇猛果敢也成不了胜利者。他也许能打赢战斗，但赢不了战争。亚历山大在陆上的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取得了绝对胜利，但他并未打赢海战。

23岁的国王在战场上靠连续快攻取得了胜利，但这时的他却改变了方针。尽管士兵中一口气攻克敌人老巢的呼声很高，但这位最高司令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即优先考虑制服中近东和埃及。

他这个人在战场上行动神速，学东西也神速。

亚历山大不顾已经入冬，将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他让帕米尼欧率领一半的军队直捣大马士革。他在审问伊苏斯抓到的俘虏时得知，大流士在去伊苏斯之前把国王的财宝几乎全部送去了大马士革。

他自己则南下攻打中近东。公元前333年可以说是伊苏斯战役之年。这一年行将结束，时间将步入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不存在冬季休战这类说法。

伊苏斯战役有着深远的影响。

地中海东岸的一系列港口城市齐刷刷地抛弃了波斯，接受了亚历山大的统治。

自北向南有劳迪科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连附近的海岛塞浦路斯都在马其顿国王的面前打开了城门。

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港口城市，都拥有海军，尽管规模较小。亚历山大同意维持城市的内部现状，只是其海军由他直接指挥。

亚历山大金币

这时，派去大马士革的帕米尼欧带着大量的金银回来了。亚历山大当即让人把金银铸造成金币和银币。就这样，大流士弃之不顾的金锭银条化做了士兵的报酬和奖金。

我藏有一枚这时期的金币，正面是头戴头盔的亚历山大侧面像，背面是胜利女神尼凯。据我所知，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侧面像铸在货币上的人。后来，希腊化时代的国王们纷纷效仿，罗马时代的凯撒及各位皇帝也无不效仿。

总之，大流士扔下的财宝被充分利用，分发给士兵作为报酬和奖金。还有一件东西也做成了金币，那就是在亚历山大面前投降的城市献上的黄金王冠。他立即熔化这些王冠，铸成了金币。

亚历山大是在军费不足甚至借款的情况下坚决进行大远征的，眼下的行动把他从财政不稳定的状况中解放了出来。

亚历山大对奢侈品并无兴趣。大流士丢弃在伊苏斯战场上的豪华物品中，有一只极尽东方之奢华的漂亮小盒，里面装满了珍珠、红宝石和祖母绿宝石。亚历山大望了一眼这些珠宝，转而瞪大眼睛盯着制作豪华的小盒子说：

“要是我，会在里面装一本《伊利亚特》。”

他的意思是将金锭、宝石等当作报酬发给士兵就好。他不想拥有这些。

在战场上，他自己的军服装备跟其他司令官一样，只有头盔上迎风飘扬的白色翎子同大家的不同。这也不是为了同下属拉开差距，只是为了让士兵一看便知最高司令官在哪里战斗。

就这样，亚历山大征服中东之路都很顺利，直到推罗挡在了他的面前。

推罗攻防战

推罗是面向地中海的一个中近东港口城市，城区原先在陆地上，不久前城中心移到了距离陆地500米开外的海岛上。在有飞机以前，离开陆地的岛屿绝对有利于防守。

这座新的推罗城南北两面都有适合停泊大量船只的港口。

这两个良港都是腓尼基海军的停泊港。随着亚历山大不断推进东征，波斯帝国的海军——腓尼基军船队接二连三地失去停泊港。

他们先是在格拉尼科斯战役后失去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米利都和哈利卡纳苏斯，伊苏斯战役后又失去了中近东的贝鲁特和西顿。

这些港口城市由亚历山大统治后，腓尼基海军便被禁止停靠。这些年来他们的停泊港不断减少，推罗已是最后一个了。

海军不能没有停泊港。只有停泊港得到保证，他们才能掌握周边海域的制海权。

我想，当初把推罗纳入自己统治之下的时候，亚历山大并没有充分理解推罗海岛的特殊性，他毕竟是出生在马其顿的领袖。

因而，他根据以往的成功案例考虑和平征服推罗。

他派使者前往推罗，说他想去参拜岛上供奉赫拉克勒斯的神殿，请求对方打开城门。推罗方面冷冷地回道，陆上的旧城区也有赫拉克勒斯神殿，你可以去那里参拜。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只能靠军事力量打开城门了。

人们也许会说，不就是一座海上的港口城市嘛，不理会它继续前行也没什么不方便吧。然而，这里的确有两个不便之处。

第一，这样做不符合亚历山大坚持至今的战略，他绝不会在自己背后留下可能再次投靠波斯的城市。

第二，即便放过推罗，他也不会放过腓尼基海军。

第二条尤为重要，推罗关系到与希腊的海上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否建立起“海上交通线”。

年轻的国王是马其顿人，他应该在听到推罗冷淡的回复后才第一次对“大海”有所领悟。

双方开始了推罗攻防战。这战事竟从公元前332年1月打到同年7月。

对于喜欢在战斗中快攻，恨不能一天定胜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持续紧张的7个月。他控制着、忍耐着，但没有忘记寻找胜机。

海上的推罗新城与陆上的旧城之间相隔500米。

亚历山大满以为那是一片浅滩，想筑一道堤连接上这500米的距离。

可他后来发现，从海边稍向前去海水会突然加深。尽管如此，筑堤工作仍在向前推进。他们把大量木头栅栏埋入海中，阻断海水后投入大量岩石，填入各种填料。然而，岛上的推罗人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海港城市有船。他们在船上射箭投石块，坚韧地阻碍筑堤工程。

亚历山大不会一味忍受敌人的这种妨碍，他立即出手反击。

他在建造中的大堤前端的两侧建起了两座塔，在上面装上抛石机，居高临下地击沉海面上我行我素忙于阻止工程的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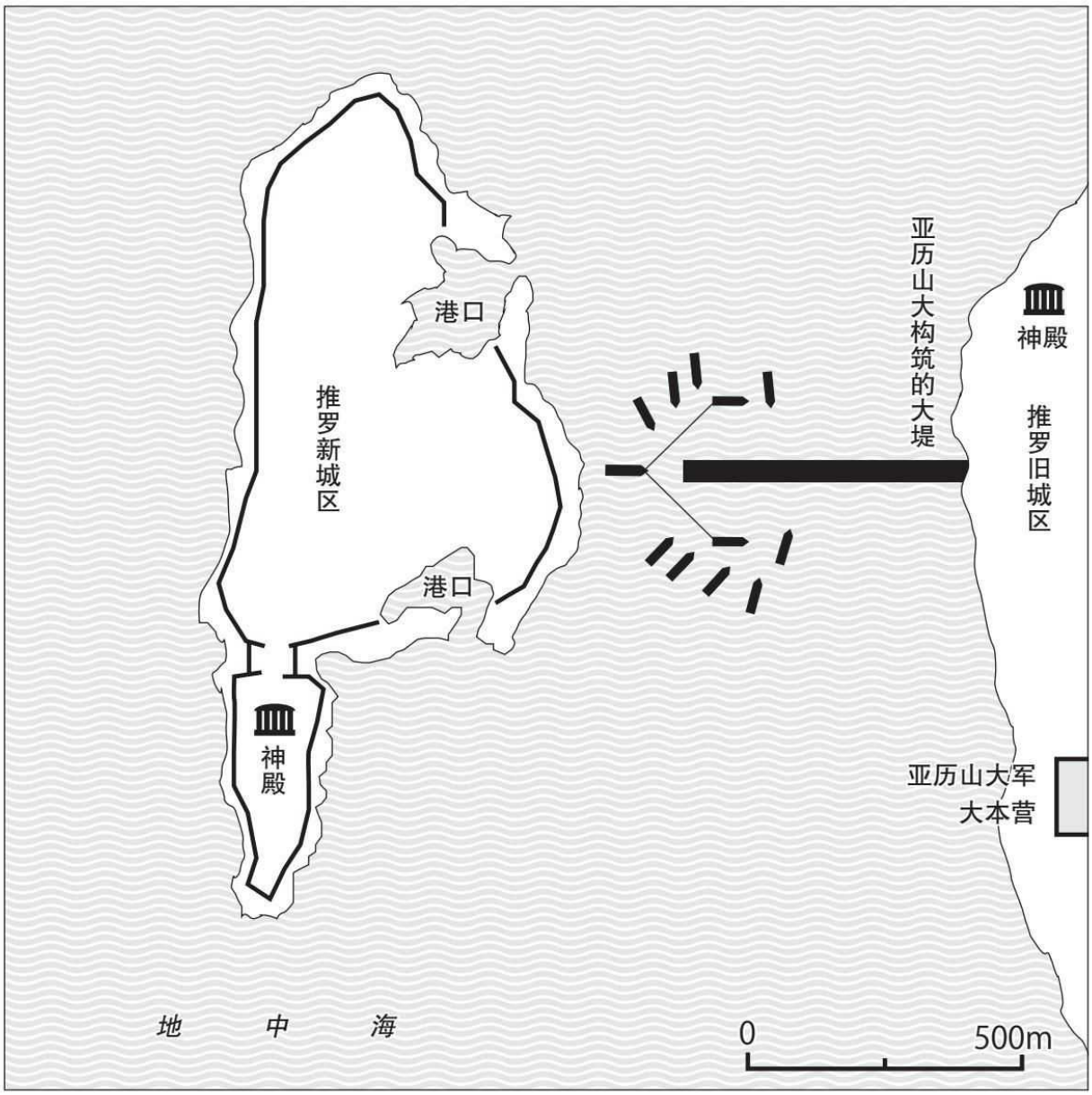
从这时开始，亚历山大与推罗之间的攻防战越来越像国际象棋的棋局。一旦一方进攻，另一方立即使出新招予以反击。

亚历山大在塔上从高处攻击，让叫苦不迭的推罗人想出了新的攻击方法。

他们在两艘三层加莱船这种大型船上装满了可燃物，用驳船拖着从港口出发，靠近矗立在堤上的高塔后点燃可燃物，用燃烧着的船去撞塔，从而烧毁高塔。当然，在燃烧着的战船猛烈冲撞堤上的高塔之前，两艘牵引船已一左一右分别逃走，牺牲的只是船只而无人员。

推罗的战术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两座塔和安置在塔上的抛石机一起烧了起来。大堤上的士兵全力灭火，哪还顾得上攻击敌人。这种战法他们还不只用了一次。推罗人因为这次的成功心情大好，后来也曾用这种战法作战。

亚历山大的大本营位于旧城区临海一侧，推罗派出船队到大本营前的海面上进行威胁。



推罗城区图

年轻的国王首次遇到危机。这是他不了解的海上世界带来的危机。

亚历山大没有命令士兵不惜牺牲继续进攻，他不想这样做。

但危机必须破解。靠什么去破解呢？要靠转变思维方式。

亚历山大认为，敌人船来我就应该派船去。

可是他没有自己的海军。除了雅典的20艘船以外，希腊各城邦派来的船队几乎都为了节约经费而已经各自回国。

亚历山大命令士兵继续筑堤，自己率领小队人马往北去了50公里以外的西顿。

西顿已经和平地归顺了马其顿。在中近东海港城市中，具备一定实力的西顿和推罗以前一直是竞争对手。西顿人不仅喜滋滋地迎接亚历山大，而且不遗余力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觉得这下终于可以除掉可恶的对手了。正因为亚历山大了解这些情况，才选择西顿作为实施新战略的基地。

带着亚历山大紧急调集军船的命令，船只从西顿港向东地中海各地散去。

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获胜的效果巨大。命令送到了小亚细亚沿海城市、罗德岛、塞浦路斯岛，以及中近东到西顿为止的所有港口城市。进入亚细亚后仅过了两年，马其顿年轻国王的英名已经响彻了整个地区。

亚历山大回到推罗等待，以西顿为首的中近东港口城市派来的80艘船最先出现在他的面前。

罗德岛来的10艘三层加莱船接着抵达。三层加莱船是正规军船，10艘船便有2000人的兵力。

小亚细亚沿海城市也派来13艘军船。塞浦路斯岛来的120艘船最后抵达。

加上雅典的20艘船，亚历山大一下可以动用的船只达到243艘，他以前从未拥有过一艘可称为军船的船只。

每支船队都由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统率。在临海的亚历山大的大本营，大概召开过很多次有这些海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

至此，推罗攻防战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时，双方的状态是你筑堤我破坏，你砍断拴船的缆绳，我就把缆绳换成铁链。第二阶段完全不同于第一阶段，舞台转移到广阔的大海上。我想，这是亚历山大听取了海军将领们的意见的结果，他们对大海了如指掌。

得知200多艘船只抵达的消息后，推罗人仍然斗志不减。他们采用游击战术，不停地派出小船队趁敌人午饭时突袭骚扰，打了就走，完全不响应对方希望打的海上会战。

亚历山大的作战会议针对敌人的游击战法确定了以下打法。

会议决定采取封锁战术，把推罗海军封锁在港口里，一艘也不让出港。推罗海军除了打游击出港以外，一直龟缩在南北两港中坚守不出。

会议让塞浦路斯的120艘船在推罗岛北港防守，其他地方的船队在南港实施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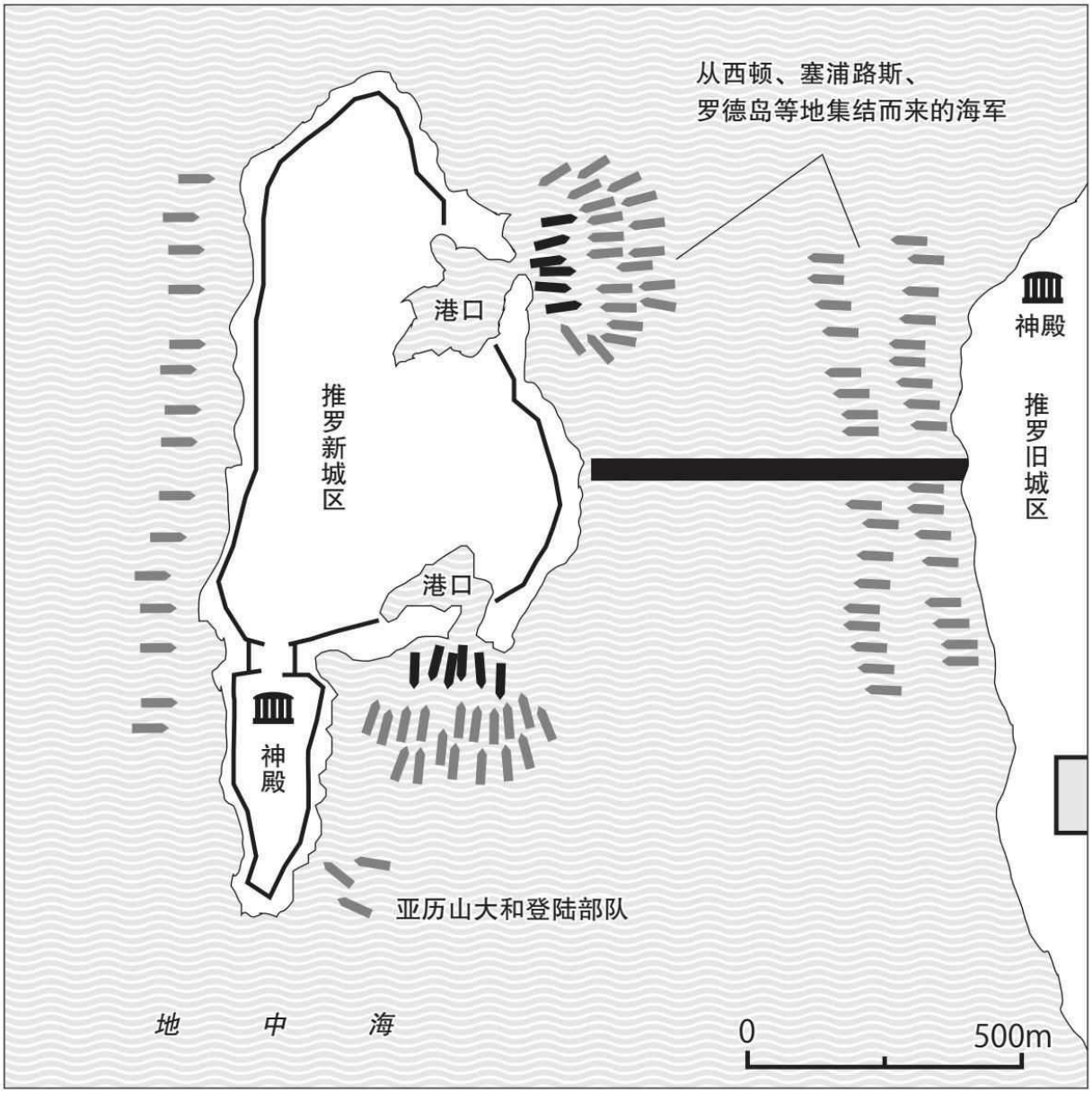
那亚历山大自己只在后方观战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身不在前线心不甘。

他率领小船队积极参加了封锁战，同时没有忘记放眼整个战场。

随着封锁战的推进，亚历山大的243艘船渐渐转入了对全岛海岸的攻击。

这扩大了推罗必须派兵防守的区域。

面对这种局面，推罗不得不把防守主力集中于包括南北两港在内的核心城区。结果，南面虽有神殿但远离城中心，推罗已经没有富余的兵力可去防守了。换句话说，那里成了薄弱环节。



推罗封锁战

推罗城南面很安静，但与岛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城墙。可如果没有守兵，城墙只不过是一堵高墙而已。

亚历山大觉得可以在这里突破，他认为这里隐藏着胜机。

把沉重的抛石机运到推罗岛南边安装在海滩上，这工作花了整整三

天时间。

第四天，亚历山大命令所有船只向推罗岛北部发起总攻。封锁部队接到命令，停止了对北港和南港的封锁，一齐攻入港内，撂倒敌兵，转入了登陆战。

另一方面，石块雨点般砸向推罗防守薄弱的南城墙。

见城墙被打开缺口，亚历山大立即投入了步兵精锐部队。这支被称为“持盾卫队”（hypastai）的部队由专门负责进攻的步兵组成。按我的想象，他们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亚历山大一下子把这支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

推罗岛成为战场。亚历山大的“海军陆战队”并不满足于攻下岛屿南端，他们开始进攻岛屿的中心地区。

推罗人在希腊联军港口登陆部队和南来的“海军陆战队”的夹击下，尸体堆积成山。

据说仅这一天的战斗，推罗方面就战死8000人。

在这场持续7个月之久的推罗攻防战中，亚历山大一方仅马其顿士兵就死亡400人，其中包括在这天的战斗中战死的“海军陆战队”的20人。

亚历山大对陷落后的推罗进行了严厉而残酷的处置。

所有生还的推罗人无论男女全部被卖为奴。但这只限于在岛上抵抗到最后的推罗人，居住在陆上旧城区的推罗人不在此列。

推罗岛上的居民被清空，这岛变成了马其顿的海上堡垒——海军基

地。

推罗攻防战是亚历山大为建立海上通道而进行的战斗。

持续了7个月之久的推罗攻防战终于结束，亚历山大喘了一口气。这时，他收到了波斯国王的第二封信，是大流士的第二套媾和方案。

从内容上看，第一封信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有两项没有变化，即为王室女性重获自由支付1万塔兰特的赎金，以及把一位公主嫁给亚历山大。这些同第一封信相同，只有一条有所改变。

波斯国王在第一封信中提出把小亚细亚全境割让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第二封信改成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地区。

我想，可能是推罗攻防战中发生的事情使大流士受到了冲击。

当时，从小亚细亚及中近东的港口城市到罗德岛及塞浦路斯岛，都响应亚历山大的请求派出了船队，并积极参加了攻防战。

在雅典衰落后70年的岁月里，一直是波斯国王命令这些城邦和岛屿派军船参加战斗，因为波斯国王是这一地方的统治者，这里是波斯帝国的领土。

自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一切都变了。格拉尼科斯战役后情况开始变化，伊苏斯战役以后则有彻底的变化。

如今是马其顿的年轻国王命令它们派遣军船，东地中海世界恭顺从命。

对波斯国王大流士来说，这种变化不啻为一个冲击。

这个变化让他觉得，只要能阻止亚历山大继续前进的步伐，即便是

这个年轻人尚未涉足的地方，从叙利亚内陆到埃及的整个区域，他都可以舍弃。

一旦媾和成功，幼发拉底河将成为波斯与马其顿的国境。然而，这时的亚历山大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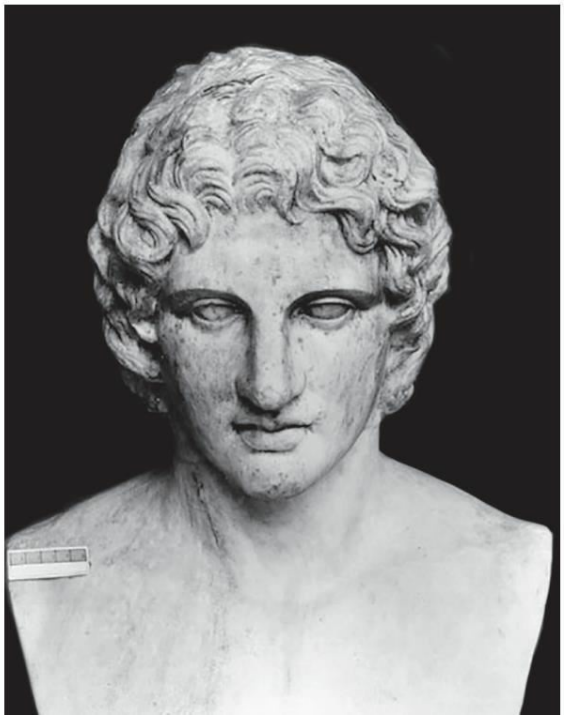
看了波斯国王送来的媾和请求，帕米尼欧对亚历山大说：

“从种种情况看，应该接受这次的方案。”

年轻的国王当即回答道：

“帕米尼欧大概会这样做，但我不是帕米尼欧。”

现代的研究者中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摩擦之始。但我不这么认为。



亚历山大

不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一直是马其顿重臣的帕米尼欧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做法，他总是向亚历山大报告一切，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告诉他。并且，即使自己的建议被驳回他的心情也不受影响，下一次有机会他还会重复同样的做法。

尽管只是我的想象，但我认为帕米尼欧是用父亲般的情怀对待年轻的亚历山大的，他们的年龄相差44岁。

或者说，帕米尼欧与前国王腓

力齐心协力把马其顿建成了强国。他与亚历山大相处时一定会想象，如果腓力活着会怎样对待这个争强好胜的儿子。

不应忘记的是，帕米尼欧是腓力遭到暗杀后第一个表明赞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的人。

在马其顿王国，即使生为国王之子，如果没有家臣们的赞成票也是不能继承王位的。在这样的马其顿，帕米尼欧的赞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像帕米尼欧当初认可腓力一样，他也认可当时只有20岁的亚历山大，认为他具备统率马其顿，进而统率希腊的器量。亚历山大当上国王后没有辜负帕米尼欧的期望。

帕米尼欧在与亚历山大相处的过程中应该会觉得，已故的腓力看到这样的儿子一定会感到骄傲。

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与帕米尼欧之间只有一个区别。

每次与亚历山大的想法发生冲突时，腓力总是怒斥狂妄的儿子，帕米尼欧则不然。仅此而已。

即使自己的忠告和进言被顶回来，帕米尼欧也不会放在心上，以后照样继续进言。而亚历山大也一直把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位老将。

有一位意大利人说，帕米尼欧在内心深处是把亚历山大作为养子看待的。

帕米尼欧有三个儿子，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他失去了次子。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在所有方面都才华横溢，但的确相当欠缺细腻的

感情。

我真的不明白，面对年长自己44岁的忠臣帕米尼欧，亚历山大就不能回答得更加温和一点吗？可话又说回来，“狂妄”是年轻人的特权。

不管帕米尼欧怎么说，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第二次媾和请求，还怀着厌恶冒出了一句“我不是帕米尼欧”。亚历山大再度踏上沿地中海南下中近东的征程。

除了加沙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城市挡在亚历山大的面前。

听到加沙这个地名，我们现代人只会想到巴勒斯坦人的大本营加沙。在没有人重视耶路撒冷的2300年前的古代，加沙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加沙是从中近东进入埃及的必经之路。

公元前332年9月，波斯高官统治着加沙。他拒绝了亚历山大和平开城的建议。

这并非因为他对波斯国王有多么忠心，他只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亚历山大的力量而已。无知往往会以顽固抵抗的形式表现出来。

加沙决定抵抗到底的重要原因是它雇佣了大量的阿拉伯士兵。历时两个月的加沙攻防战就此开始。

与推罗不同，加沙是内陆城市，但这场攻防战依然耗时两个月，原因是亚历山大与平时一样身先士卒，冲在最前线，这次他负了重伤。

在推罗攻防战中他也受了伤，他被推罗方面抛来的石块重重地砸中了左肩。而在加沙战斗中，他的左肩又被敌兵射来的箭深深刺中。

24岁的亚历山大不等医生赶来，命令身边的一个士兵把箭拔出来。

年轻的士兵一闭眼猛地拔出了那支箭，鲜血一下喷涌而出。年轻的国王昏死过去。

伊苏斯、推罗、加沙，亚历山大这是第三次负伤了。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他冲在最前面。亚历山大不但狂妄而且顽固。

然而，他的顽固建立在深知自己冲锋在前对士兵的心情会有多大影响的基础上。

正因为加沙城阻挡了亚历山大前进的道路，其陷落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有重要人物悉数被处死，居民被卖为奴。

结束了这一切后，亚历山大开始挺进埃及。公元前332年就要结束了。

占领埃及

埃及人一向对波斯的统治心怀不满。他们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对波斯战无不胜的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在埃及逗留了半年之久。

这半年是没有战斗的半年。东方传来消息说大流士组建了大军。我想亚历山大也许会受到干扰吧，但他一点都不担心，十分愉快。

他先来到尼罗河口三角洲好好地过了个冬天。这是一次漫长的休假，就连不应对历史人物投入感情的学者都说这是一次“理所应当的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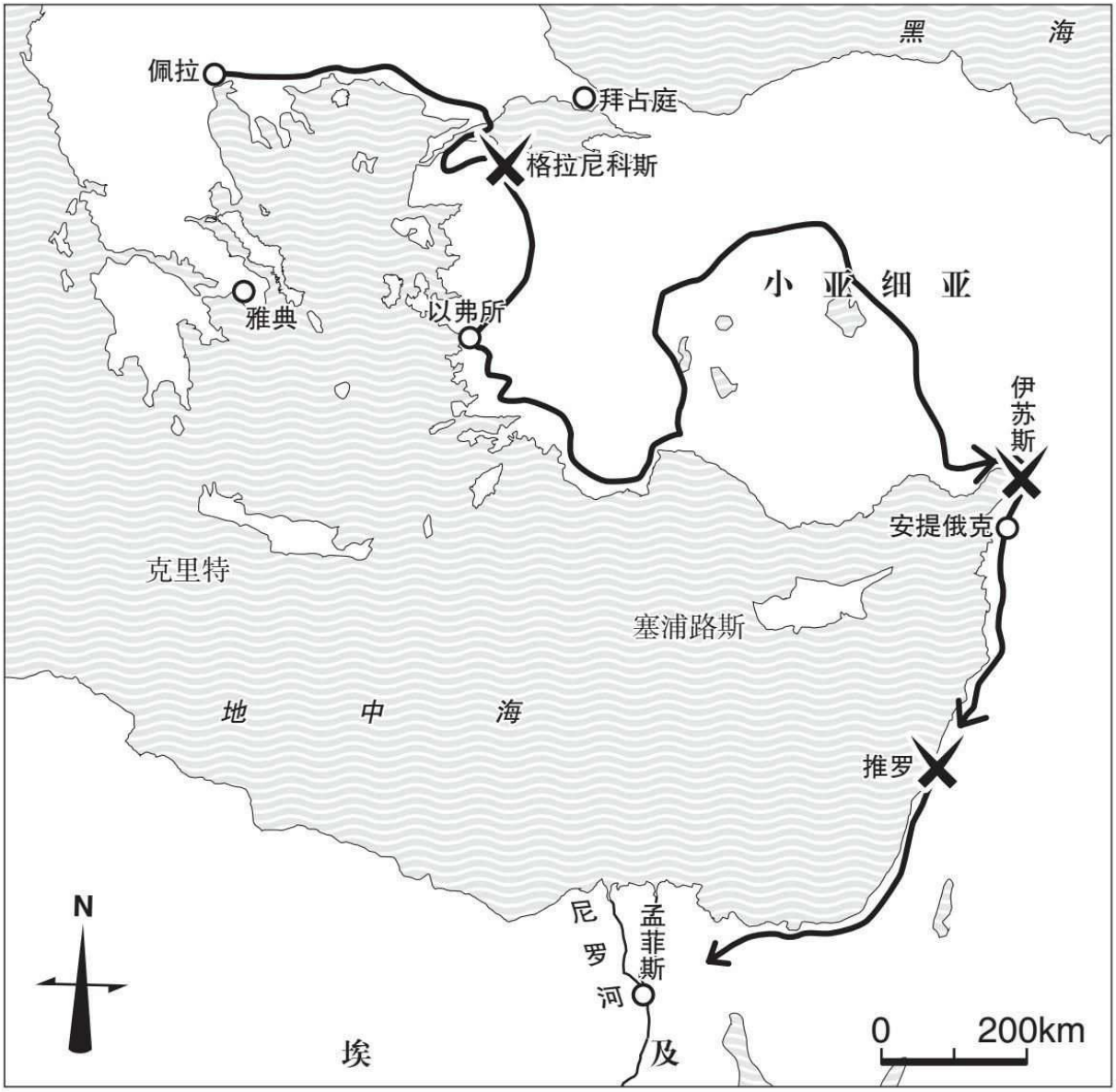
这半年中，亚历山大兼顾了国王的任务与个人的愉悦。亚历山大有着成倍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埃及有很多他想去的地方。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后已经过去3年。3年来，亚历山大从21岁到了24岁。

公元前334年是格拉尼科斯战役之年。

公元前333年是伊苏斯战役之年。

公元前332年是征服中近东建立海上交通线之年。



从推罗到埃及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的军队挺进埃及。

这3年亚历山大看上去一直在打仗，但他并未忘记将征服后的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他一贯的政略和战略是，在自己不断前进时绝对不在背后给波斯势力留下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在每次战役中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让更多的城市和地方接受了亚历山大的和平劝降。他向一直处在波斯统治下的这些城市承诺维持现状。

不过，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从未彻底相信这帮不久前还追随着波斯的人。所谓维持现状是不杀人不流放，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城市在波斯时代的制度。

波斯国王一直全权委派被称为总督的地方长官对帝国各地进行统治，这些人拥有很大的权力。

从行政、军事到财政，权力集中于总督一人。正因如此，无论格拉尼科斯战役还是伊苏斯战役，多有总督率领任职地士兵参战的情况。可见在波斯帝国内部，总督与大部族的首领并无多大的区别。

总督最初由波斯国王任命从而获得地位，以后世袭领主。

部族首领是当地实力派人物，此后成为波斯国王的臣下，原有权力得到公认。

这些人形成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阶层。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体制，他们极有可能反水。

亚历山大爱做梦，但也非常现实，他改变了当地的制度状态。

亚历山大决定把集中在总督和部族首领身上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由不同的人掌握。

行政事务交给允准留任的波斯人。

防卫军事交给马其顿人。

征税等财政事务交给非马其顿人的希腊人。

基于这种思路，无论征服这些城市依靠的是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亚历山大都会在征服后立即开始重组工作。也就是说，战斗与重组同时进行。

埃及把亚历山大作为解放者欢迎。但亚历山大在埃及也未改变权力三分的政策。

亚历山大一直被视为名将，不仅因为他战无不胜，还在于他总能把己方战死者人数控制到极少。

即便如此，他仍然经常从马其顿和希腊各地补充兵员。因为他必须在每个被征服的城市和地方留置将士，此时应他的要求补充的1000名士兵抵达了埃及。

为补充兵员，即使花费7个月的时间他也要攻下推罗。腓尼基海军因失去了停泊港而失去了战斗力，希腊人取而代之掌握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建立海上交通线比拥有大海军更有意义。

然而，亚历山大的权力三分战略并非总能带来好的结果，也并非所有的改革都能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

有些波斯人不满足于仅有行政权，通过贿赂把手伸向了其他领域。还有一些希腊人卷着征收来的税金逃走。

亚历山大一旦得知会立即出手打击。他首先撤换负责人，然后追捕不法之徒。

亚历山大在战场上喜欢快攻，平时应对这种事件也非常神速。如果让我找一个词来代表他，我只能选“速度”这个词。

他的政略把亚细亚西部变成了希腊人的世界。

当地所谓的“希腊时代”其实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就已开始。

刚进入“希腊时代”，埃及就成了一大强国。埃及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情况。

实际统治埃及的是以侍奉神祇为唯一工作的神官。

埃及的老百姓不会轻易服从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国王，也不会轻易服从打败了波斯但仍是新来者的马其顿国王。他们真正服从的是通过神官传递的神的声音。

所以，要把埃及纳入统治之下，就要把神官拉到自己一边。

怎么拉拢？

承认他们存在的理由。

这意味着要表态尊重他们侍奉的神祇。

这样神官们才会接受统治，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也无妨。神官并没有统治整个国家的政治野心。

亚历山大似乎早已察知埃及的这种特殊情况。

进而，他也是最早看清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的欧洲人。他认为，埃及可以成为连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

怎样做才能不使用军事力量而把埃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呢？

把神官阶级拉入己方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

拉拢神官阶级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手段”。因为亚历山大生活的那个时代除了没有多少势力的犹太教以外，是绝对的多神教的世界。

代表一神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这个时代终结后才出现的宗教。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区别不在神的数量，本质区别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神教只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神。相反，多神教承认别人信奉的神，即使自己并不信奉这些神。多神教的这种承认并非勉强认可，是因为尊敬而包容。

这种态度类似有些日本人自己并不信奉宇迦之御魂神[1]，但会尊重信仰它的人的想法，不会用脚去踢坐镇在稻荷神社前的狐狸石雕。而且，如果稻荷神社精美到可以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会高兴地前去参观。

亚历山大在埃及也是这种态度。

因为他是在多神教百姓创造的希腊文明中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要以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情去理解埃及的这个特殊情况，有两个例子可供参考。

第一个是为什么埃及人对波斯国王的统治“过敏”。

波斯人是信奉拜火教的一神教教徒，但拜火教相当宽容，不像犹太教以及此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

波斯人不能成为埃及人信奉的“神之子”。在埃及人看来，波斯统治者没有统治自己的正当权力。波斯对埃及的统治是在军事镇压下施行的。

第二个例子是300年后开始的罗马对埃及的统治。为什么埃及人会接受打败克娄帕特拉成为埃及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并把他当作自己国家正当的统治者呢？

因为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是死后被神格化的尤利乌斯·凯撒的义子，他是成为神的人的儿子，所以他是“神之子”。

罗马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希腊文明，继承了人死后神格化的做法。

就像希腊人在英雄赫拉克勒斯死后把他神格化一样，罗马人对神化那些生前取得了卓越业绩的人的做法并无抵触情绪。

罗马虽不像日本有数不尽的神，但神祇也有30万之众。他们甚至接受手下败将信奉的神。神的数量越多，对增加新神也越没有抵触情绪。

实际上，在广袤的罗马帝国，只有埃及没有被纳入帝国正统主权拥有者——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统治之下。正确地说，埃及是历代罗马皇帝的私有领地。

罗马皇帝身上只要不发生特殊的不祥事件，死后都会被神格化。因此继承皇位的皇帝也都是“神之子”。

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去统治庞大的国家，绝对不会长治久安。如果不去关注、照顾埃及的特殊情况，大国无法进行统治。

这一点，亚历山大很早就明了于心。

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口度过了两个月的冬天，在久违的休假之后他再次开始行动。他先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前往赫里奥波利斯。然后渡过尼罗河，探访了对岸的孟菲斯。

这一带一直是埃及的中心。亚历山大造访这里的正式理由是参拜埃

及的古代诸神。当然，这也是满足他个人好奇心的一次观光。

回程是从孟菲斯沿河顺流而下回到尼罗河三角洲，路线与去时不同。为了了解未曾见过的埃及，他去了辽阔三角洲的西部地区。

抵达目的地后，他再次看到了地中海，这位马其顿年轻人的脑中究竟闪现了什么呢？

他决定在这块面临大海的地方建设一个地中海世界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真正的海港城市。

据说他用短剑亲手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让身边人看。

他以自己的名字将新城市命名为“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做事非常讲求速度。城市规划和公共建筑建设等方面负责人的遴选很快就完成了。新城市亚历山大城的建设工程旋即开始。

这位总设计师的性格不允许他在原地守候自己的想法一点点成为现实。他把工程现场交给别人，自己继续西行，看着地中海在自己的右方一路相随。按照现代的国别，他来到了利比亚。

到了这里，他可能已经对绵延不断的地中海和杳无人烟的土地感到了厌倦。

亚历山大想去一座阿蒙[2]的神殿看看，同行的伙伴全体赞成。随他一路来到这里的是他从小的朋友以及警卫小部队。他们这么少的人要深入沙漠实在有些勉强。闻名地中海世界的阿蒙神殿位于沙漠之中，神殿反映了埃及人的嗜好。

亚历山大是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当即向阿蒙神殿进发。那是著名的神殿，有专用道路通向那里。

一行人来到神殿，神官们出来迎接，丝毫不觉惊讶。我想，他们恐怕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过马其顿的年轻国王。

亚历山大居然在这座阿蒙神殿里聆听了“神谕”。

亚历山大在神殿里向神问道：

“如果暗杀父王的主谋还活着，请告诉我他的名字。作为儿子我有义务使他受到惩罚！”

阿蒙之神通过神官之口回答道：

“亚历山大之父不是已死的人类。”

意思是说亚历山大真正的父亲不是腓力，而是神这个不死的存在。

“啊！”亚历山大肯定感到震惊。自己被说成是神之子，不感到吃惊反而不自然了。

他大概马上想到，自己就此获得了统治埃及的正当性。

在埃及，正当统治者的资格不是来自希腊人认为的能力、力量和气量等，而源自他是“神之子”。

收买神官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要的“神谕”，这在希腊世界并不稀罕。

但亚历山大是一个极度憎恶这种伎俩的人，他必不会去干收买神官的勾当。

所以我认为，侍奉阿蒙神的神官们是用埃及式的方法表明接受亚历山大统治。这在希腊不好使，但在埃及是极其常见的“欢迎词”。

那么，亚历山大相信通过神官之口传达的神谕吗？

从后来的言行看，亚历山大确实并未完全相信所谓的神谕。不过，他大概会在“不影响心情”的情况下相信神谕，比如他或许相信了“我也许是神的儿子”。毕竟他只是一个百战百胜走到今天的24岁的年轻人。

心情没受影响的年轻国王和同辈朋友离开了阿蒙神殿。如果他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一定很安全，然而他们决定一出门就转向东方，横跨距离足有400公里长的沙漠。

如果他们遇到沙漠风暴，《希腊人的故事》应该就该结束了。说他们鲁莽也好，不计后果也罢，横跨盛夏时节的沙漠，这可是欧洲人的第一次冒险之旅。

幸运的是，也许有了阿蒙神的保佑，他们安全抵达了孟菲斯。

帕米尼欧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迎接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即命令他做好出战准备。他们终于要向东方进发了，大流士在那里等着他们。

年轻的国王并不是因为听了“神之子”的神谕后信以为真，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突发奇想要建设亚历山大城之前，亚历山大就把出征与大流士进行第二次决战的时间告诉了帕米尼欧，命令他做好一切准备。

亚历山大拥有超群的才能，他可以把预料之外的事情纳入计划中来。

自己积极行动，众将也会积极起来，士兵们也会士气高涨。

面对以波斯大帝国存亡为赌注的战役，消极只会使顺利变为不顺利。

部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集结后迎来了从孟菲斯而来的亚历山大。他们离开埃及后北上中近东。同去年沿海南下不同，这一年行军走的是内陆。他们首先北上到达推罗。

然后，他们从那里经大马士革转向东北方向行军，目标直指幼发拉底河。有情报说，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帝国大部队在幼发拉底河东边的底格里斯河附近等着他们。

公元前331年7月，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迎来25岁的生日。

他统率的希腊军队有步兵41000人和骑兵7250人，共计48000余人，以马其顿士兵为主。

49岁的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有超过20万人的步兵和35000人的骑兵，是一支全部兵力合计接近25万人的庞大军队。

此外，大流士还带了200辆战车和15头大象参战。在波斯国王大流士看来，这是一场退无可退的战斗。

---

[1] 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掌管谷物和食物、保佑农业丰产和商业繁盛的神明，宇迦之御魂神是诸多稻荷神中为首的一位。日本有众多祀奉稻荷神的神社。日本人视狐狸为稻荷神的使者，因而稻荷神社前多有狐狸雕像。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在日本这类神社中最具代表性。——译者注

[2] 古埃及人的太阳神。——译者注

通往高加米拉之路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离开埃及向大流士严阵以待的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对他而言，这是继伊苏斯战役之后第二次与波斯国王亲自统率的军队对战。

不过，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与两年后的高加米拉战役之间有着明显区别。

以足球冠军联赛打比方，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决定冠军所属的只有一场决赛，但在半决赛之前各俱乐部队要每轮打两场比赛以决胜负。即使在第一场比赛中以大比分落败，如果在第二场比赛中以更大的分差获胜，仍然可以成为胜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苏斯战役是“第一场比赛”，即将进行的高加米拉战役是“第二场比赛”。

所以，这次战役对伊苏斯战役中完败的大流士来说，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第二场比赛”。

可是，在伊苏斯战役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亚历山大肯定也想打赢这场战役。在他看来，高加米拉战役是以波斯国王亲自统率的军队为对手，在敌人的大本营——美索不达米亚打的一场决赛。

公元前331年7月，刚满25岁的亚历山大离开埃及，首先前往推罗，从推罗横跨分隔中近东与中东的山地进入大马士革，那里是带去“决赛”的全军的集结地。

亚历山大完全不会因为喜欢快攻就只想着前进。

他的“快攻”战术只有在背后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会付诸实行。

他绕道推罗和大马士革，也是为了确认与马其顿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联络和补给的通道是否在发挥作用。

亚历山大率部离开大马士革后向幼发拉底河挺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就是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了。

亚历山大确认了补给保障后转入快攻。他离开大马士革到看到幼发拉底河，耗时不到一个月，直线距离有500公里。在夏季行军，人和马的负担都会有所减轻，但他们不顾绕路选择了绿荫较多的路线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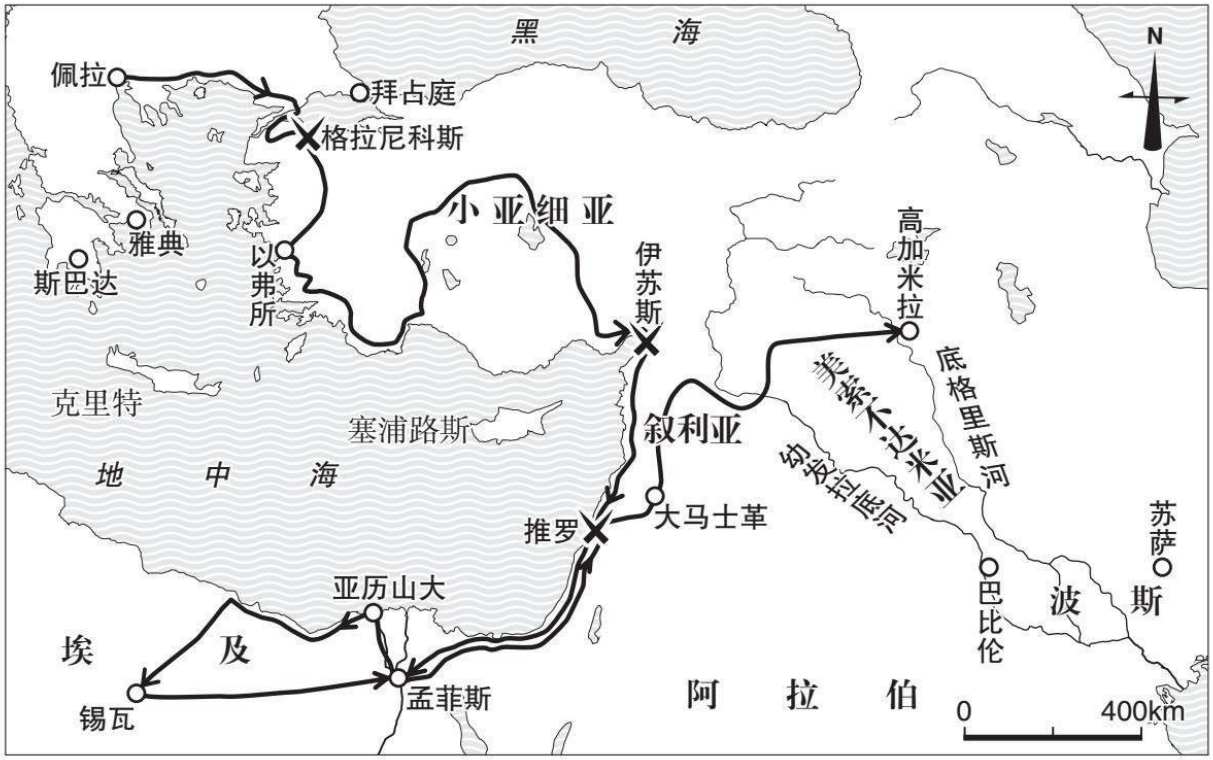
如果他们为了尽快抵达幼发拉底河而选择横跨叙利亚沙漠的近路，一旦遭遇有名的叙利亚沙漠风暴，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就此终结。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下面这三点也做得非常好。

第一，巧妙利用当地向导。

这是西方人的军队头一回踏入东方。亚历山大经常使用多个向导一定是因为他收到的情报五花八门。用多个向导能够提高情报的准确率。进入敌人的地盘当然需要这样考虑。

第二，完美组织自家军队的士兵进行侦察。



从埃及到中东

阅读古代史学家的叙述，我感觉当时几乎每隔30分钟就会有斥候回来报告情况。

即使连续报告说情况没有变化，亚历山大也不会减少外派斥候的人数，因为“没有变化”本身也是情报。

第三，我在前面已经写过，对抓到的俘虏，只要是士兵中地位较高的骑兵，亚历山大都要亲自审问。

记者的采访成功与否，与其说取决于被采访人，不如说取决于采访者的能力。审问的原理也一样。

就这样，虽然士兵和马匹的负担有所减少，但统率他们的最高司令官的负担从未有什么变化。亚历山大统率的总数近48000人的希腊军队安全到达了幼发拉底河边。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波斯国王大流士应该在这里阻击他们。

虽然夏天水量会减少，幼发拉底河仍是一条大河。亚历山大的48000人不可能保持整齐队形渡过河去，大流士应该趁他们到达对岸队形混乱时实施攻击。

然而，大流士的意图不在于“阻击”，而只在于改变亚历山大的行进方向。

大流士害怕亚历山大渡过幼发拉底河后改变行进路线，沿着这条大河直奔下游杀向东南，去进攻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巴比伦和苏萨。

为了规避这种危险，大流士特意把与亚历山大决战的战场选在巴比伦以北500公里，离底格里斯河东岸不远的高加米拉。

大流士真意如此，便只派了波斯武将马扎亚斯率领的数千人马去幼发拉底河畔。

马扎亚斯也知道大流士的真实意图。当他得知即将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亚历山大军队人数10倍于己后，立即判断自己完全不是对手，便不战而退，直奔高加米拉，回到了国王身边。

于是，亚历山大安全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可是过河之后他并没有改向东南方向行进。他不管巴比伦和苏萨，直奔底格里斯河而去，尽管去那里必须横贯美索不达米亚。

事到如今，我对年已49岁的大流士的思维能力之低下感到绝望。

无论是古都巴比伦还是首都苏萨，都一定有相当完备的防御体系。要攻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耗费相当的时日。在此期间，现在身在高加米拉的波斯军可以挥师南下，从背后攻击正在进攻巴比伦和苏萨的亚历山大。这种风险是需要想到的。

在平原上打仗，根据战法的不同，有时一天就会分出胜负。如果亚历山大在这场波斯投入全部战斗力的战役中获胜，那么巴比伦及苏萨极有可能在他面前和平地打开城门。

我坚信，即使49岁的大流士不特意考虑亚历山大是否会在幼发拉底河畔改变行进方向，25岁的亚历山大也会直接杀向大流士严阵以待的高加米拉。

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人起的名字，意思是夹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河之间的地方。这一带现在在伊拉克境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都在这一地区。在古代，那些伊斯兰的发祥城市尚未出现的时候，这一带已经有了巴比伦和苏萨等城市。古代的高加米拉是现在摩苏尔附近的一片平原。

就这样，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完成了横跨美索不达米亚的行军。他们于9月份来到了底格里斯河边，河景尽收眼底。

大流士在底格里斯河也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让人觉得他对自己统率的大军很有自信。

渡过底格里斯河与渡过幼发拉底河不同，多少有点艰难。亚历山大选择的渡河地点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士兵和马匹开始都有惧色。

亚历山大身先士卒，骑马下河，像是在下达命令："渡过河去！"士兵们见状也下定决心，跟着下河，结果全军顺利渡河。领袖和全军将士奋勇向前，几乎无人受伤。

亚历山大统率48000人的军队，从现在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行军到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成功横跨了中东全境，却没有多大损失。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出色的领导力。

渡过底格里斯河来到东岸以后，亚历山大得到的情报变得更加丰富，准确度也有所提高。

有时大量情报一齐送到，着实让年轻的国王和他的伙伴们喜不自禁。

一个斥候向渡过底格里斯河后稍事休息的亚历山大报告说，前方山上有一队波斯骑兵。

年轻的国王认为那可能是敌人的前哨部队，当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做好迎战战备。他以为，前哨部队的后面肯定会有敌人主力攻来。可是，根据此后收到的其他斥候的报告，他搞清楚了这队骑兵有1000人，像是前来观察情况的，因而不用担心。

亚历山大不想把这1000人放回去。他派出了骑兵和弓箭兵组成的一队人马。他命令他们不要消灭这些人，要专射马匹抓俘虏。结果敌人逃走了一部分，大多数当了俘虏。

亚历山大一个个审问这些俘虏，这时才准确了解到大流士所率波斯军队的全貌和大流士选做战场的高加米拉平原的现状。

尽管以后免不了有带俘虏的麻烦，但没有比准确了解敌情更大的收获了。

亚历山大带来的翻译团队在这种场合正好派上用场。

俘虏的供词并非剥光衣服严刑拷打的结果。

在希腊，人类裸体被认为有一种极致的美，诸神的雕像都用裸体表现，人们根本不以裸体为耻。

但裸体在东方却是耻辱之最，因为裸体意味着被降到奴隶的等级。对东方男人来说，裸体意味着最大的羞辱。

亚历山大没让俘虏体味如此耻辱。

骑兵是波斯社会的精英，据说年轻的国王甚至用尊重的态度对他们说话。

我想波斯骑兵因此都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总之，亚历山大一下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不愧是在庞大帝国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召集来的，它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军。

步兵人数超过20万人。

骑兵人数接近4万人。

200辆镰刀战车。

投入战场的总兵力为25万人，另有15头大象。

四马战车的两轮分别装有长达1米的锋利镰刀，一旦奔驰起来会把左右敌兵拦腰砍倒。大象背上装有围栏，士兵从上向下投掷标枪、射出弓箭，可以形成雨点般的火力。波斯大军配备了这些在伊苏斯战役中不

曾出现过的新式武器。

这反映了大流士胜负在此一战的意志，同时也体现出高加米拉战役中的波斯军带有帝国东半部分的浓重地方特色。

大象产于印度，而波斯帝国的东部边境隔印度仅隔着印度河。

相比之下，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兵力只有波斯军队的五分之一。

亚历山大只有略超4万人的步兵和7250人的骑兵，全军总数只有近48000人。

而且，选择战场的不是亚历山大，是大流士。

不过，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的战场都是波斯方面确定的。马其顿的年轻人前往敌方确定的战场，不仅在那里打仗，还在那里取胜。对敌人来说肯定没有比他更可恶的对手了。

这次，大流士决心把那个傲慢的入侵者打得体无完肤。波斯方面已经万事俱备。

高加米拉战役

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名为高加米拉，历史上便把这片平原称为高加米拉平原。大流士把这里作为战场，命令所有步兵整平整个平原。

他们削平高处、填平低处，使地面平坦。与格拉尼科斯和伊苏斯不同，高加米拉没有河流流经。

平整地面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镰刀战车和大象的作用。

已经抵达幼发拉底河的马扎亚斯远远看见了亚历山大的部队，他向大流士禀告了敌情。大流士得知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的兵力只有自己的五分之一。大流士还有亚历山大从未见过的新式武器——200辆镰刀战车和15头大象。

波斯君主应该认为自己能打赢。但49岁的大流士的缺点在于想定之后仍会陷于迷惘。

而亚历山大根本未把敌人选择战场当成一个问题，既已决定在那里打，便不再犹豫。渡过底格里斯河后战场近在咫尺，他立即挥师前往附近的高加米拉平原。

亚历山大一边向高加米拉进发，一边研究斥候不断带回的情报，已在相当程度上准确掌握了敌人的阵容。他注意到，波斯军的布阵与几天前俘虏口供提供的信息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大流士完成平整地面后，在平坦的平原上摆开了右翼、中路、左翼的阵型，这些天没有变化。

也许他对靠斥候收集情报并不热心，连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到了哪里都不知道。也就是说，波斯军士兵已经连续数天处于临战状态了。

来到距离平原10余公里的地方，亚历山大命令全军停止前进。他们停在一座矮山的背后，即使敌人派来斥候，也很难注意到这一带。

亚历山大命人在这块地上围起栅栏，建起一个小规模的寨子。

建寨的目的是收容波斯的骑兵俘虏、摆放攻城器械等重型物资，此外还要存放眼下不急用的所有东西。

士兵上战场只要带上全套武器和入口即能果腹的食物，其余一律不带。

这一切工作结束后，亚历山大命令轻装后的士兵继续行军。天开始昏暗下来，48000人马在微暗的薄暮中又开始行军。太阳落山时分，全军已经走完了去高加米拉平原的一半路程。

全军再次停止前进，士兵休息，司令官和指挥官召开作战会议。

帕米尼欧建议国王实施夜袭。这次亚历山大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理由是他想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打仗。帕米尼欧接受了他的意见。帕米尼欧接受的原因应该是，对士兵来说，在看得见敌人的情况下打仗要比看不见敌人时更有勇气。没有比看不见敌人更可怕的事情了。

于是，在开战前夜，亚历山大的士兵们把武器放在手边踏实睡了一觉。

与之相对，大流士害怕夜袭，严令枕戈待旦，波斯军全军一宿没有合眼，一直熬到天亮。

士兵已经沉睡，亚历山大和司令官们在黑暗中来到高加米拉平原边

上的小山包，从上面眺望敌军。波斯军帐篷前的火把熊熊燃烧，像是布满了整个平原。

天一亮就是公元前331年11月1日。明天就要打响高加米拉战役了，亚历山大眺望了敌军情况后回到士兵中间，和他们一样沉沉睡去。

基本的战略战术已制订完毕，全体司令官和指挥官已将它们全部记在脑海里。

只剩在次日清早的晨曦下看清敌阵，对必要的地方进行微调了。亚历山大手下的将军们都具备迅速、准确执行命令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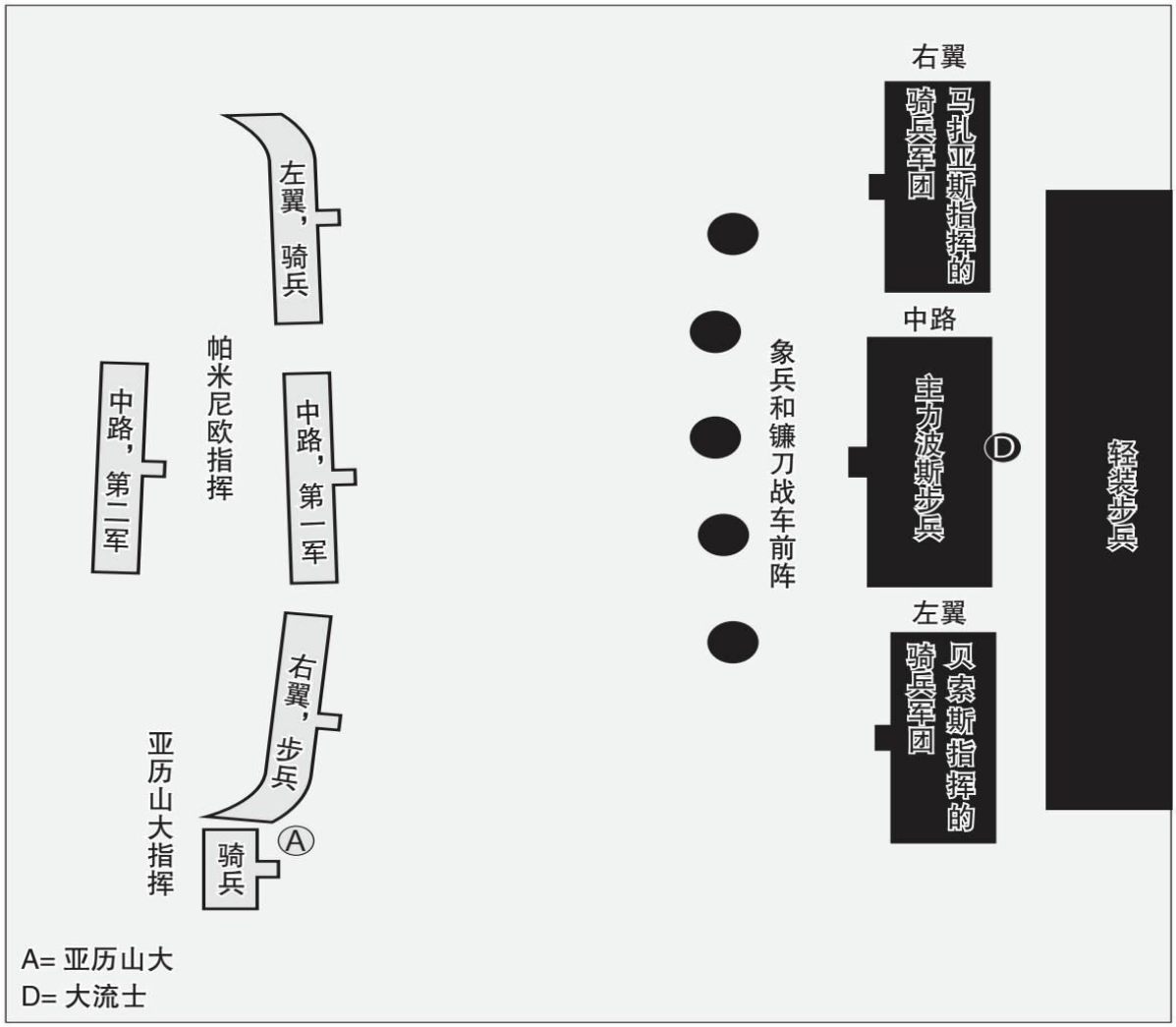
这种能力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他们随着亚历山大不断作战自然掌握的。

在亚历山大的军中，指挥系统总是明确的。他的指令从司令官和指挥官一直传至一兵一卒，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其结果是全体官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仗该如何打、没有命令的时候该如何行动。

这是亚历山大能够像运动自己的手脚一样用好全体士兵的真正原因。

高加米拉战役不是简单的25万人对5万人的战斗，是考验最高指挥官能否做到“用兵如己身”的对决。



高加米拉战役-1

公元前331年11月1日，亚历山大在晨曦中第一次看清敌军。

只需一看，他一定就看明白了大流士决不重蹈伊苏斯战役覆辙的决心。

伊苏斯战役中，大流士在隔开两军的河岸上围起栅栏。当时，波斯国王布了一个“等待”的阵型，想看清亚历山大如何出手再发起进攻。

高加米拉没有隔开两军的河，也没有栅栏表示波斯将在开战后先处

于等待状态。

取而代之的是15头印度象和200辆镰刀战车分成5队部署在最前线。（见高加米拉战役-1）

这表现大流士希望三世一开战立即发起进攻的心情。

波斯军的正规部队在最前线的正后方。

右翼是波斯将军马扎亚斯率领的波斯骑兵军团，人数达到3万，都是波斯帝国的精英。不过在高加米拉，骑兵军团里也混有相当数量的非波斯人，波斯帝国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半数以上已战死于伊苏斯战役。

右翼的左边是波斯军的“中路”。除了2000名希腊佣兵以外全为波斯兵，1万人的“不死军”也部署在中路。

国王位于全军中央是波斯帝国的惯例。大流士三世循例坐在格外豪华的战车上坐镇中路。也就是说，大流士在波斯帝国步兵精锐集团的守护之中。

接着是左翼。左翼是不想重蹈伊苏斯战役覆辙的大流士最重视的部分。左翼必然要同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右翼发生激烈冲撞。把左翼交给谁呢？

大流士把左翼交给了巴克特利亚的总督贝索斯。

古代的巴克特利亚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伊苏斯战役时波斯军几乎全军都是波斯人，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波斯军左翼由来自波斯帝国东半部分——即现在的伊朗东部及其东面的阿富汗和北面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士兵构成。

这些地方一直是部族社会，文明程度远不及波斯人。部族间的争斗

是家常便饭。这种环境培育了勇猛甚至可以称为凶猛的战士。

主力军的背后部署着轻装步兵大军。这些士兵甚至说不上是预备队，感觉像是集合了一帮剩余兵力。这种前方和后续主力的安排，显示了大流士必胜的决心。

看到波斯方面的阵容之后，亚历山大像往常一样对战略战术做了微调。

不过他没有改变由自己率领的右翼负责进攻，帕米尼欧率领的中路在战斗前半程顶住敌人攻击的基本结构。

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亚历山大只是改变了以前士兵横排保持直线接近敌人的做法，让右翼和左翼稍微错向后方，形成弓形阵。

两翼稍向后错的原因首先是防止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从左右两侧包抄过来，其次在于引诱波斯军的右翼和左翼进攻，这一点似乎与前一点相互矛盾。

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一开战就发起了进攻。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改变了战术，引诱敌人发起进攻后再转入进攻。

为此，亚历山大特意把中路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又分成了两部分，用马其顿方阵巩固第一军，把希腊各城邦士兵组成的第二军部署在第一军的背后。

这个变化让大流士产生了疑惑。对方为什么不进攻，为什么不动呢？大流士在苦思冥想。这期间，布阵等待多日的波斯军等不下去了。

终于，大流士命令镰刀战车和大象出击。

然而，高加米拉战役的新式武器——镰刀战车和大象几乎当即失去

了战斗力。

大象身躯庞大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被认为最适合冲垮敌方阵型。然而欧洲人不重视大象这种战斗力的原因不仅在于欧洲不产大象这一点。

罗马人后来创造了一个包括北非在内的大帝国。他们可以轻易得到非洲象，但也没有把大象当作战斗力。这表明人类控制巨型动物非常困难。它们不愿意冲入敌群就会狂奔，大象的狂奔呈U形，它们会冲入后面跟上来的自家士兵中。

一旦御者控制不住大象，他们会立即在致命处针戳大象，使其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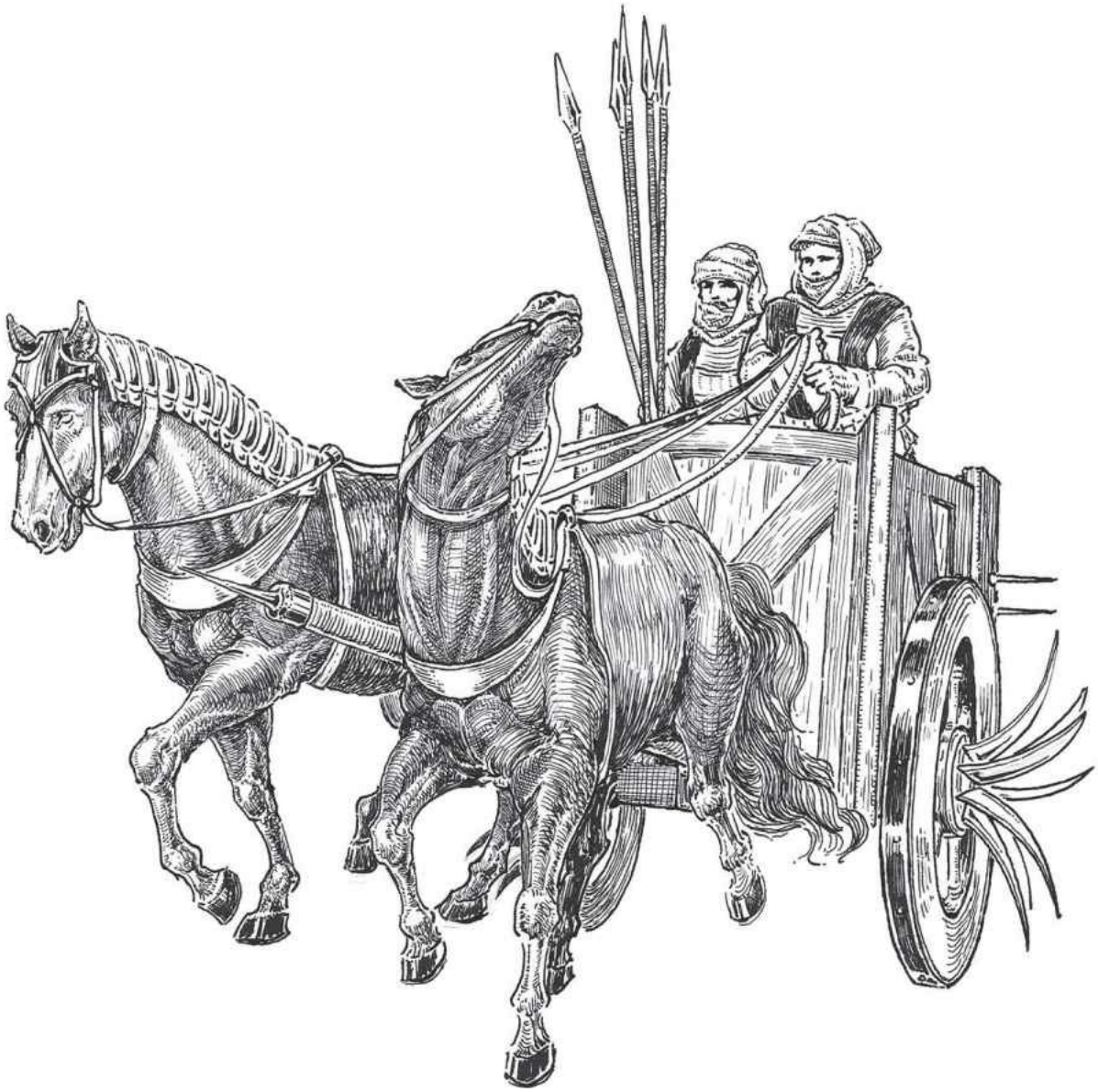
高加米拉战役中也发生了这种使大象失去战斗力的情况。

那15头大象全部拒绝冲入挺着7米长矛，像巨大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

接着是大流士寄予厚望并专门为其平整战场的200辆镰刀战车。

我们在电影《宾虚》（Ben-Hur）[1]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战车，但电影中用的是追求画面效果的道具，实际战斗中使用的战车并非那么简陋。它追求的不是画面效果，是将敌兵拦腰砍倒。

战车由两匹马牵引，左右车轮装有人抡不动的又重又长、磨得锋利的巨大镰刀。



波斯军的鐮刀战车

战车宽1米多，可供御者和士兵2人乘坐。战车两侧安装的1米长的镰刀分别突向左右，随着车轮旋转可以拦腰砍倒敌兵。这种兵器十分恐怖。不过它也有缺陷。缺陷在于它们不能排成密集队形。

大流士在他的中路左右各部署了100辆镰刀战车。但这100辆战车不能抱团进攻。

首先，战车由马匹牵引，马加上战车，每辆长度超过了5米。

战车横向左右各有1米长的镰刀突出于车身之外，镰刀加上车身，战车宽度至少3米。

镰刀战车这种兵器每台需要的空间达到长5米、宽3米。

一辆战车就需要如此之大的空间，为了不让战车自相咬合，横向纵向都需要留出相当大的车间距离。

结果，虽然战车总数达到200辆，但每辆都必须各自为战。

25岁的亚历山大看破这一点。

亚历山大给自己的中路守兵下达了孩子气的命令，令人忍俊不禁。

他命令士兵在镰刀战车冲过来时迅速闪开身体，放过战车后再合拢队形，第二辆战车冲过来时再闪开放然后合拢，如此重复即可。

这毕竟不是孩子过家家。士兵们在反复闪开合拢的时候，会对准敌人的马匹投枪射箭。只要拉战车的马匹倒下，杀死车上的御者和士兵就很简单了。

看到大象和镰刀战车这些新式武器这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我想大流士会相当动摇了。大流士向右翼和左翼的骑兵军团发出了总攻命令。

右翼的波斯骑兵和左翼的巴克特利亚骑兵都开始了集群进攻。希腊军布的是弯曲阵型，好像在说“来打我呀”。

到了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仍然按兵不动。

希腊军的左翼主力是亚历山大继马其顿骑兵之后第二信赖的色萨利骑兵。面对波斯骑兵军团的猛攻，他们顽强地坚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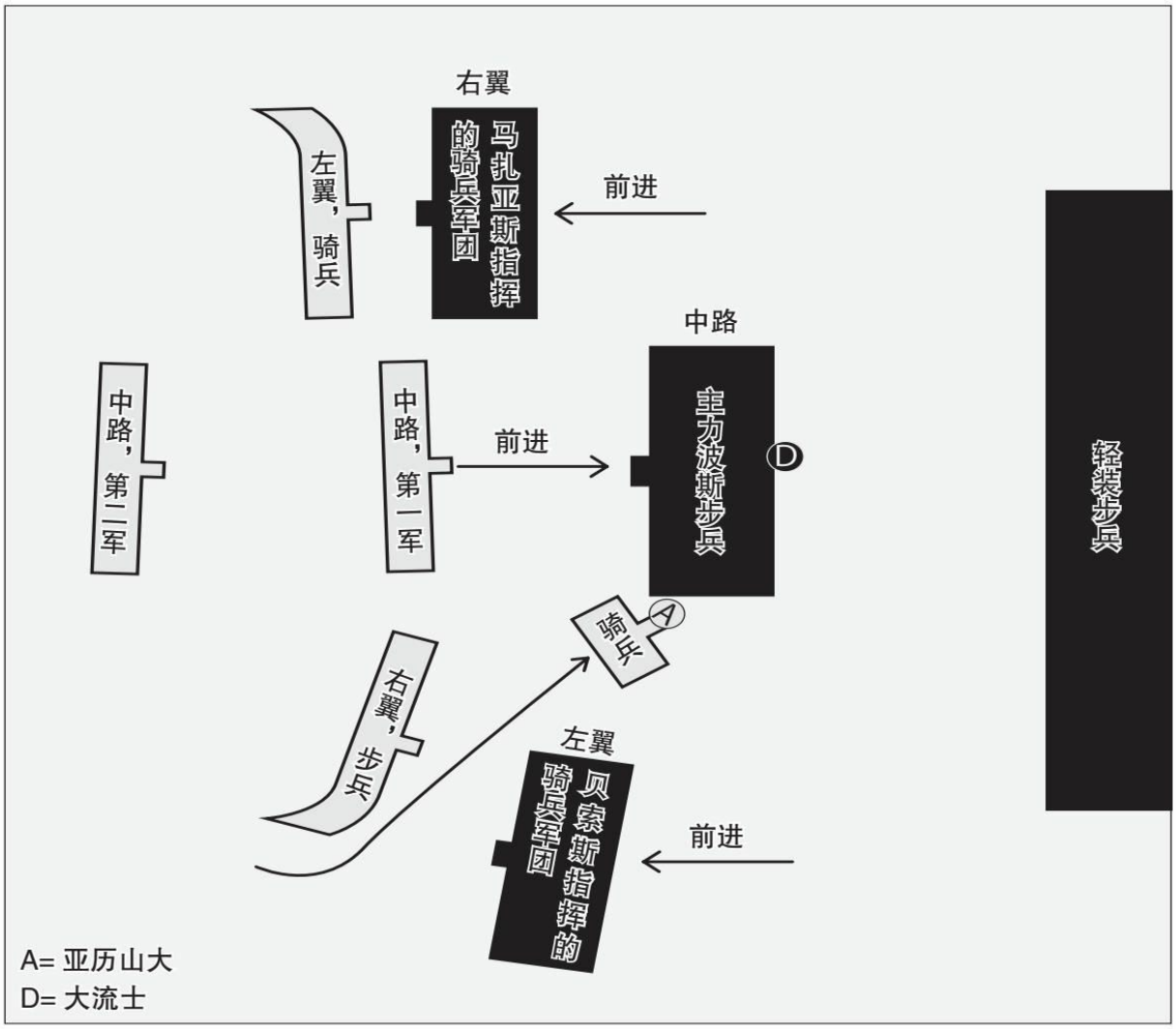
巴克特利亚骑兵军团猛攻希腊右翼，双方展开了一场不同于左翼的战斗。

希腊左翼是骑兵对抗骑兵的战斗，而另一侧是步兵对抗骑兵的战斗。

克里特岛出身的弓箭兵名气之大使人们说起弓箭兵必称克里特岛。

亚历山大命令这些弓箭兵射人先射马。

巴克特利亚骑兵再凶猛，马被打倒了便无能为力。率领他们的贝索斯只能下令撤退。



高加米拉战役-2

以上情况使贝索斯率领的左翼与大流士所在的中路之间产生了空隙。（见高加米拉战役-2）

亚历山大没有放过这个空隙。

一直在自家军队右翼最右端忍着的亚历山大和他的伙伴率领的3000名马其顿骑兵，这时发起了冲锋。

根本不需要发出冲锋号令，亚历山大已经冲在了前头，他的伙伴和他们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只好跟在统帅的后面。

就这样，呈纵向菱形的3000名马其顿骑兵跟着比塞弗勒斯背上的亚历山大，以他头盔上迎风飘扬的白色翎子为标识，向敌方中路和左翼之间的缝隙冲了进去。

亚历山大一旦做出决策绝不犹豫。伊苏斯战役中，他从右侧迂回进攻敌人的中路。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猛攻的目标仍是位于敌军中路的大流士，这点没有改变。

同时，帕米尼欧率领的“巨型刺猬”也加入了进攻。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全都投入了战场。

此时，战场另一头的战况发生了变化。以色萨利骑兵为主力的希腊军左翼一直在顶着波斯骑兵军团的猛攻，他们开始一点点地后退。

如果这条战线被攻破，希腊军的中路将被包围。

亚历山大在己方马其顿方阵背后部署了由重装步兵组成的第二军，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这些重装步兵来自希腊的各个城邦，他们已经不需要等亚历山大发令了，年轻的国王事先已布置了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

现代的战史研究者说，这支第二军的行动决定了左翼的战况。

得到第二军的增援后，一直坚守左翼的色萨利骑兵不但扭转了战局，还转入了进攻。

因为敌人右翼的骑兵军团发生了异常情况。

波斯骑兵一直被誉为波斯帝国的骄傲，但他们中很多人战死在伊苏斯战役中。因而参加高加米拉战役的骑兵军团中加入了不少来自帝国东部的骑兵。

这些来自现代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骑兵停下了对希腊军左翼的进攻，跑向马其顿设在后方很多远处的营地抢掠财物去了。

这意味着人数有3万之众的波斯军右翼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留下继续战斗的波斯骑兵，另一部分是跑去抢夺财物的东部骑兵。

去掠夺财物的那些骑兵被希腊军的第二军发现并受到追击，还没抢到财物便被歼灭。

在这种态势下，作为波斯社会精英的波斯骑兵仍在坚持与色萨利骑兵战斗。

这时传来了国王逃跑了的消息。（见高加米拉战役-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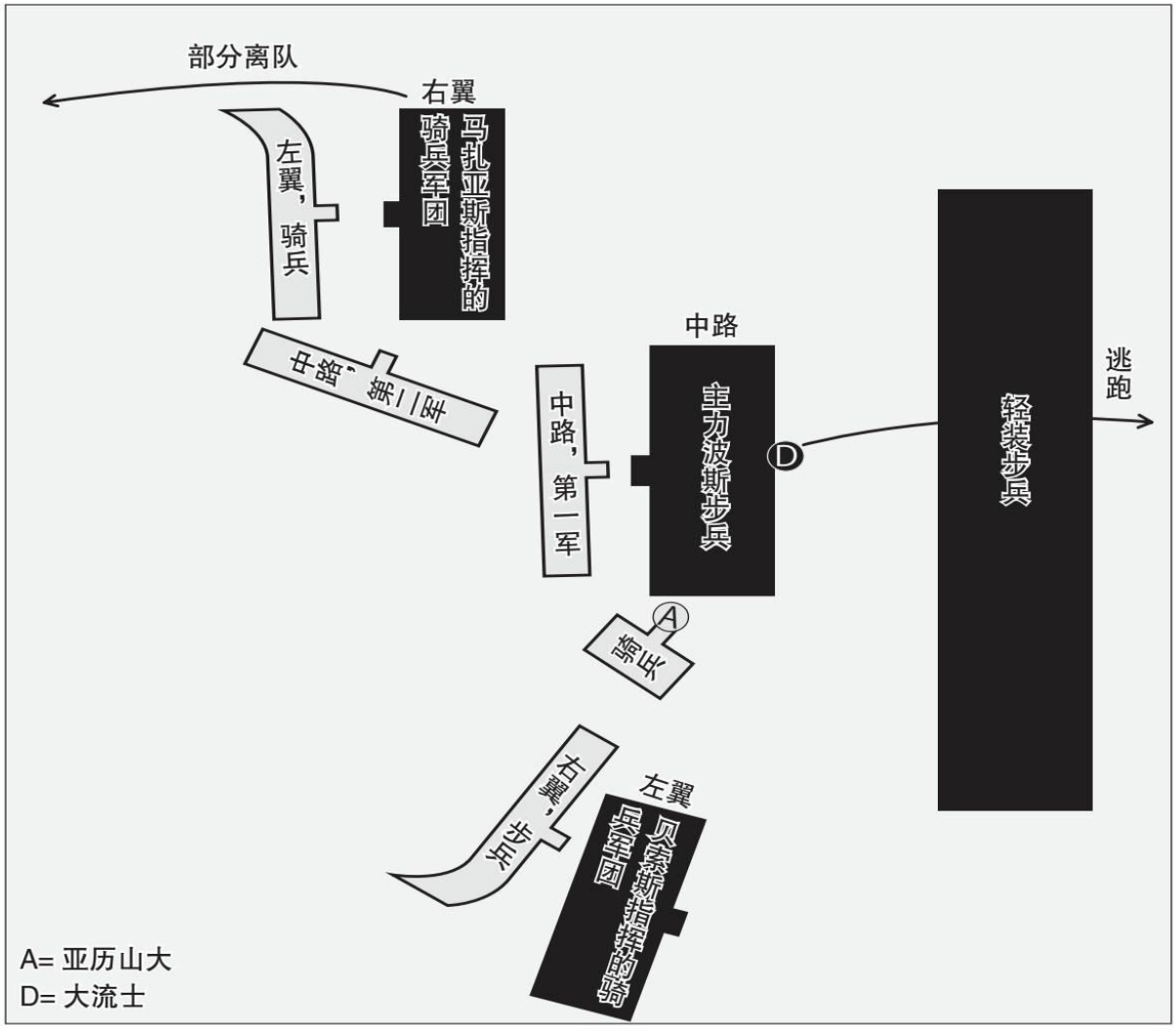
与伊苏斯战役时一样，亚历山大尚未逼近他的身边。

大流士与亚历山大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波斯军的精锐部队1万人以及2000名战斗高手——希腊佣兵挡在中间保卫着国王。

在此之前，大流士只看到开战不久大象和镰刀战车的悲惨灭亡，贝索斯所率左翼的撤退，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骑兵军团猛攻自己所在的中路，以及帕米尼欧率领“巨型刺猬”步步逼近。

右翼的波斯骑兵军团正在同敌人的左翼激战。大流士所在的中路还未遭到过像样的打击。

不过，也许这些足以构成大流士逃跑的理由，他心中的某些东西可能已经崩溃。



高加米拉战役-3

国王在自家部队中辟出一条路逃之夭夭了。

这是继伊苏斯战役以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第二次抛弃士兵、放弃战场了。国王逃跑何其迅速，让人觉得他有逃跑癖。

假设大流士没有逃跑，波斯军会打赢高加米拉战役吗？

答案是否定的。战斗也许会拖长，但亚历山大仍会获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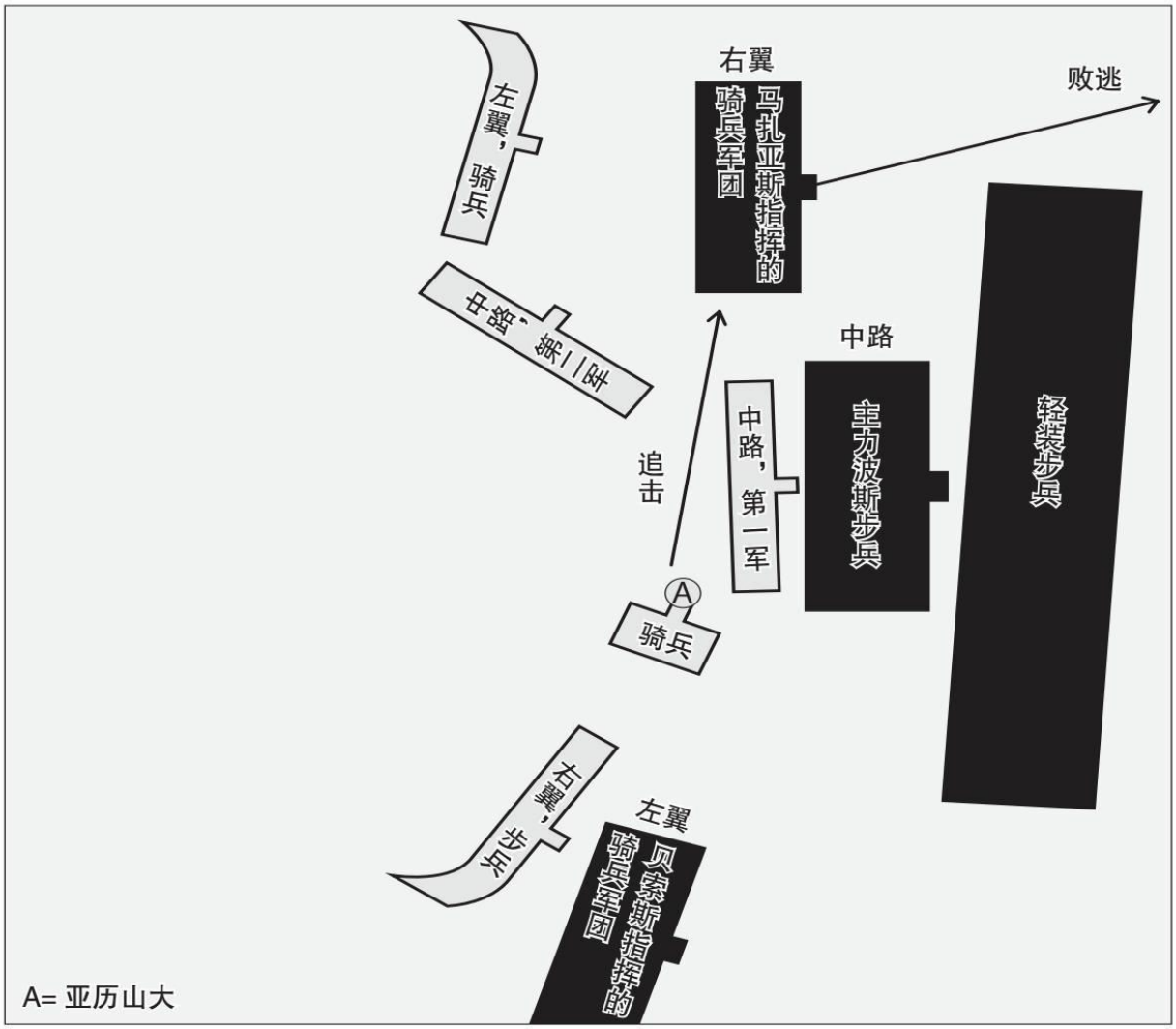
虽然兵力只有敌人的五分之一，但胜利者一定会是这位25岁的国王，他能够把这五分之一的兵力运用得好像自己的手足一般。

如果不逃跑，大流士恐怕会被斩杀，他将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死得其所。

正在同希腊军左翼交战的波斯骑兵得知国王逃跑的消息后，当即明白再打下去已无意义。

系统指挥这些骑兵的马扎亚斯和手下全体骑兵企图掉转方向逃离战场。然而一旦溃败，指挥也就失灵了。

这次，亚历山大知道大流士逃跑后根本没去追击，而是直扑马扎亚斯，仿佛要把遗憾深深烙在马扎亚斯的心里。（见高加米拉战役-4）



高加米拉战役-4

以亚历山大为先锋的马其顿骑兵军团的猛攻之下，波斯精英们想全部逃走没那么容易，多数被当场杀死。

但带头逃跑的马扎亚斯及其少数部下还是逃到了巴比伦。

这个时候，贝索斯率领的巴克特利亚骑兵也已无影无踪。后来，他们追上了逃跑途中的大流士。

最悲惨的是那些被国王和骑兵抛弃的波斯军中路的步兵。

帕米尼欧率领的“巨型刺猬”已经从正面攻了进来。

亚历山大率领的骑兵军团又从后面逼近。

波斯骑兵已从右侧逃走，没了对手的希腊军左翼从右侧逼近。

要歼灭数量占优的敌人只能采取围歼战术。这是先包围敌人再缩小包围圈的战法。使用这种战术与其说是撂倒敌兵，不如说是造成敌兵自相残杀的状况。被国王和骑兵抛弃的波斯士兵完全陷入了混乱。一旦阵形崩溃，被自己人踩死的人会比敌人杀死的更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的结局。

波斯国王大流士逃离战场后，既没有去南面的巴比伦也没有去首都苏萨，而是一个劲儿地向东逃去。

他已经预料到，不来追击自己而优先打围歼战的亚历山大一旦结束战斗，必定会来攻打这两座城市。

大流士的预感只有这次灵验了。

---

[1] 又名《宾汉》，1959年出品的美国电影，导演为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曾获1960年奥斯卡金像奖。该影片又由提莫·贝克曼贝托夫（Timur Bekmanbetov）执导于2016年重拍。——译者注

“金刚钻”

要问亚历山大之后的古代名将还有哪些，我只能举出下面三人。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连16年把罗马军队搅得团团转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

在最后一战中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将军大西庇阿。

再就是罗马首屈一指的武将尤利乌斯·凯撒。亚历山大征服了远至印度的“东方”，而凯撒让丘吉尔说出了“英国历史始于凯撒渡过多佛海峡之时”的话。

这三位对战略战术有绝对自信的人都认为，亚历山大是武将第一人。

但他们三人都没有生搬硬套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做法。虽然他们借鉴了一些，但没有全部照搬他的做法。

为何如此呢？

意大利语中有个说法叫“punta di Diamante”。

它是金刚钻的意思，是指将钻石装在前端的研磨切割工具。把钻石这种最硬的矿石安装在工具的前端，能切开不易切断的物体。

这三位名将充分了解马其顿骑兵军团以纵长菱形阵型冲锋的威力和效果。

不过他们也懂得，只有亚历山大这个“金刚钻”才能使这样的阵型发

挥效力。

他们三人并不缺少当“金刚钻”的勇气。

身先士卒冲入敌阵，“金刚钻”将置身于最大的风险之中。

全军最高司令万一有个好歹，中路和左翼打得再好也会全军崩溃，转胜为败。这是采用会战方式打仗的现实情况。

汉尼拔、大西庇阿和凯撒都经常在最前线指挥作战。凯撒甚至常常身披只有他才穿的红色大披风，甘冒被敌人认出的风险。

然而他们都不曾当过“金刚钻”，甚至没有尝试过这种战术。

与偶尔有失的这三位相比，亚历山大可谓百战百胜。

在喀罗尼亚战役、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以及高加米拉战役这些以会战的方式进行的战役中，亚历山大总是“金刚钻”。

他自己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在他手下作战的司令官和指挥官不可能对此事实无动于衷。

实际上，年长者表情凝重，同辈人充满热情，年轻人流着热泪，他们都曾恳切地请求他别再做“金刚钻”，说他的安全就是全军的安全。

亚历山大大概也为之所动，他饱含深情一个个地拥抱了恳切请求他的部下，然后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 对我来说，你们不仅是最忠诚、最有献身精神的部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用言语说不尽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
> 你们的感情不单是温暖的同情。战争开始以来，你们已经用战绩明确表达了你们对我的爱。

>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有你们围在身边，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爱自己的人生。
>
> 你们的热情使我幸福。也正因为有我表现出的勇气，你们才会产生这种感情。这也是事实吧。

罗马时代撰写亚历山大传记的库尔提乌斯·鲁夫斯写过，这番话是亚历山大在重要人物面前说的。他并未写这是亚历山大对士兵说的话。

然而，没有比亚历山大更能对将士一视同仁的统帅了。因此，也没有比亚历山大更受士兵爱戴的统帅了。

他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冒着大于其他任何人的风险在战斗。

看着亚历山大头盔上迎风飘舞的白色翎子，不仅将军们，就连一介兵卒都一心要跟着国王去战斗。

亚历山大心目中优秀的领袖必须是部下的模范，部下看到他身先士卒、甘冒风险才会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表率。

正因如此，他才对司令官和指挥官说“你们那么爱我，不也是因为我表现出的勇气吗？”这样的话。

亚历山大
（取自疑似亚历山大石棺的浮雕。伊斯坦布尔考古学博物馆藏）

总之，亚历山大表明了自己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做“金刚钻”的意志。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和罗马将军大西庇阿互为敌手。但有记载说，战后数年两人相遇，作为武将相互评价甚高。

凯撒的活跃时期要比他们晚150年，他当然不曾见过他们。为数众多的史实表明，这位罗马首屈一指的名将从年轻时开始就仰慕亚历山大。

我很愿意想象一下，如果让这三个人相聚谈论武将的话题将会是什么景象。

这三个人一定会在一点上取得一致，那就是与他们相比，亚历山大才是天下第一武将。

他们一定不会对用“金刚钻”把楔子钉进敌阵的战术思想提出异议。三人会对只有亚历山大能让这个战术发挥作用抱有同感。

最后，他们三人可能会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他还很年轻啊！”

亚历山大的才华在他20岁到30岁这段时期得到了全面施展。

汉尼拔的鼎盛时期是在30岁到45岁。从他翻越阿尔卑斯山一路打进罗马领土意大利半岛开始，直到他在扎马战役中败给大西庇阿为止。

大西庇阿打败汉尼拔，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他的鼎盛时期在30

岁以后。

最后是凯撒。他在40岁的时候发动了高卢战争，建构了后来的欧洲版图。

与这三人相比，亚历山大怎么说都很年轻，在他们开始活跃的年龄，亚历山大已经去世了。

“金刚钻”的战法正因为他年轻才能获得成功。

从巴比伦、苏萨到波斯波利斯

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没有像伊苏斯战役结束后那样举行官兵同乐的大宴会。

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直接攻打敌人的老巢——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个是为建立海上交通线而先征服中近东和埃及，然后再进攻美索不达米亚。

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他只剩一个选择。攻进美索不达米亚并取得了胜利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波斯帝国的大本营和威势的象征——巴比伦、苏萨以及波斯波利斯收入囊中。等攻下这些城市再追击逃走的大流士也不迟。

会战的好处是一天便能结束战斗。亚历山大在会战胜利后不会忘记巩固胜利成果。

于是，那些与平生初见的大象和镰刀战车奋战的士兵们只得到了一个晚上的休整时间。

年轻的国王照例参加了埋葬战死者的仪式，又照例带着医生团队前去看望伤员，与密友赫菲斯提安二人共进了这天的第一餐。然后，他贪婪地睡了几个小时。

翌日清晨，他们重又开始行军，方向朝南，目标直指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古城巴比伦，距离有400公里。行军全程都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间宽广的平原上，行军速度得以加快。征服巴比伦竟如此轻而易举，亚历山大喜出望外。

亚历山大来到环绕这座古城的城墙前。这时，城门从里面打开，波斯人走了出来，请求年轻的国王不要攻城，他们开城投降。

这位名叫马扎亚斯的波斯人第一次与亚历山大面对面。但是从两年前开始，这人就已与亚历山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了很密切关系。

那年他担任小亚细亚东南部奇里乞亚的总督，受波斯国王委托负责该地的防务。他在行动神速的马其顿年轻国王面前慢了一步，轻易地把奇里乞亚拱手送给了眼前的这位敌手。

这引起国王大流士的不悦，他甚至没有让马扎亚斯参加后来的伊苏斯战役。

让他参加高加米拉战役也完全是因为大流士在伊苏斯战役中损失了众多将军。

马扎亚斯一度遭到大流士的冷落。这次大流士让他复出，给了他一项特别任务。

大流士给马扎亚斯的任务是，在幼发拉底河畔等待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历山大军队，改变他们的行进方向，把希腊军引向高加米拉所在的北方，而不是首都苏萨所在的南方。大流士只给了几千人马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看到十倍于己的希腊军，马扎亚斯觉得一切尝试都是徒劳，便不战而退了。但他不是逃跑，而是回到了大流士严阵以待的高加米拉。

大流士任命马扎亚斯担任波斯骑兵军团司令官，作为进攻主力在右翼作战。

因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没有与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军团直接交战。马扎亚斯率领的波斯骑兵军团勇敢奋战，让色萨利骑兵防

守的希腊军左翼不得不后退。

然而，这时传来了国王逃走的消息。这位武将只得带着残部从混战中逃出，回到了巴比伦。

他和跟他逃出高加米拉的波斯骑兵都不想继续追随两度抛弃自己人、放弃战场的波斯国王了。

这种心态通过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的行为表现出来。

亚历山大接受了马扎亚斯的投降，同意和平进城。不仅如此，他还任命马扎亚斯担任总督，管辖巴比伦及周边一带。

马扎亚斯的例子能很好体现亚历山大的性格。

一个人干不成大事业，没有众人的配合是绝对不行的。

因此，领导者需要相信他人，给他人以明确的目标，再放手交给他任务。如果总在审查他人是否值得信赖，那将一事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只能凭着直觉大胆用人。

亚历山大最痛恨背叛，因为他人背叛的是他给予的信任。他认为背叛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

波斯高官马扎亚斯没有背叛他的君主，他只是抛弃了两度丢弃国王责任和义务的大流士。

亚历山大认为这不构成背叛。相反，这显出马扎亚斯是最远离背叛的人。

亚历山大大概觉得自己在希腊人称为“蛮族”的波斯人中发现了一个

颇通情理的对手。马扎亚斯后来同儿子们一起成了亚历山大忠诚的家臣。

马扎亚斯的例子在波斯精英中掀起了波澜。

自此之后，任用战败的波斯人的情况日趋显著，但他们均非亚历山大招募，也非希腊人推荐的。

几乎所有人的任用都凭亚历山大的第六感。第六感也有不准的时候。这时年轻的国王所做的只是和决定任用时一样迅速地换人而已。

波斯国王的高官们就这样开始转变成希腊人国王手下的高官。

尽管“总督”这个官名没有变化，但内涵有所不同。

波斯帝国的“总督”是行政、军事、经济一手抓，但在亚历山大的帝国里，“总督”只管行政，军事由马其顿人管，财政由其他人管，权力被一分为三。

尽管亚历山大十分喜欢做“金刚钻”，但他也是一个现实的统治者。

亚历山大的做法与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相反。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的希腊哲学巨人。他这样教诲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

> 要像对待自己的领路人一样对待希腊人，要像主人那样对待蛮族。
>
> 你可以把希腊人当作朋友或者亲人去对待，但一定要把蛮族当作奴隶或者动植物去对待。

这些话毕竟出自希腊哲学巨人之口，因而当代的不少研究者愿意认为，这里的“蛮族”是指不讲希腊语的民族，并非歧视性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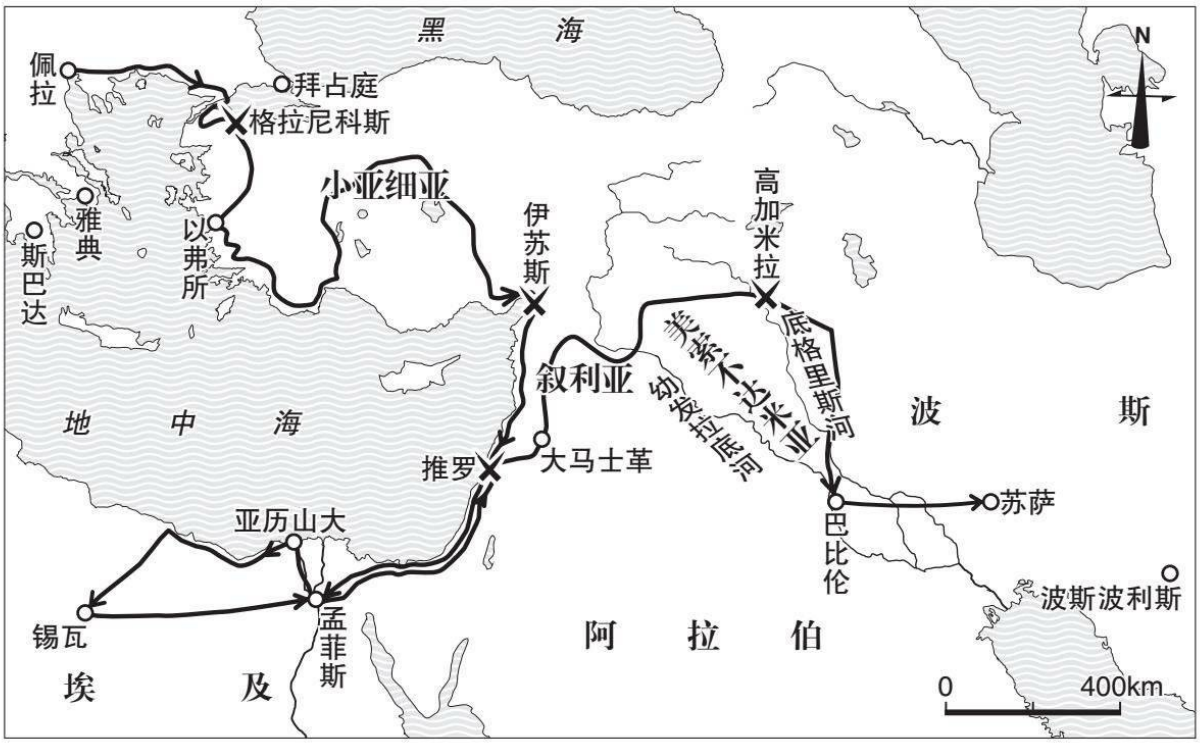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个词就带有歧视性，不论出自何人之口。

这源于当时希腊人的常识性观念。我认为，亚历山大对待“蛮族”的不同方式，是他在持续东征的过程中自己学到的。

有句话叫作“巴比伦的荣华”[1]。亚历山大在古城巴比伦逗留期间一定每天都在惊叹中度过。徜徉在极尽东方之奢侈的建筑之间，来自希腊新兴国家马其顿的年轻人一定有过发自内心的感慨，哪怕只是对赫菲斯提安一个人。他也许还参观了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

当时的波斯，不说文明程度，在文化方面甚至不比希腊的雅典逊色，尽管二者有所不同，如果说雅典是“壮丽”之美，波斯就是“华丽”之美。

亚历山大是一个绝对不会忘记终极目标的人。他还没有享尽古城之美带来的愉悦，便抓紧时间前行了。他要尽快拿下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



从高加米拉到波斯“心脏”

从巴比伦到苏萨的路程不足400公里，要向东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畔，渡过底格里斯河便可到达苏萨。

恐怕亚历山大逗留巴比伦期间就已经展开让首都不流血开城的秘密谈判。我想，有关的疏通工作已经在刚当上巴比伦总督的马扎亚斯与苏萨防务负责人之间进行了。

苏萨不愧是首都，具备相当的防御力量。不使对方动用这些防御力量而以和平方式取得苏萨是最好的，拙劣地显摆军事力量为大忌。把疏通工作交给波斯高官去做也是明智的做法，疏通的结果很好。

亚历山大只在最重要的场合使用那匹自他少年时代就跟着他的爱马比塞弗勒斯，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骑这匹马。只有上战场，他才会带这匹爱马去。他只把比塞弗勒斯当作可以托付生命的马。他觉得形

象漂亮的白马更适合用于进入被征服城市的入城仪式和阅兵游行。

亚历山大是骑着白马进入波斯帝国首都苏萨的。他身着豪华军装，上面点缀着种种装饰，这些装饰在战场上只会成为累赘。但在胜利者的入城式上，视觉效果不可忽视。

苏萨的居民们洒下了花瓣雨，他们用华丽的仪式迎接这位25岁的胜利者。可能是疏通工作卓有成效，欢迎仪式期间没出任何意外。

进入王宫，亚历山大坐上了大流士经常坐的宝座，波斯的权贵们围了上来，一齐匍匐在他面前，表态臣服。

对此，亚历山大一定十分惊讶，随他而来的马其顿武将们也都大为惊讶。

在东方，光屈膝下跪而不磕头，不足以表示向王者臣服。这件事影响深远。

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被顺利征服。

当然，大流士存储的18000塔兰特巨款被悄悄取走。不消说，这些钱被直接用作给士兵的报酬和犒赏。

亚历山大任命波斯人担任苏萨的“总督”。也许那人就是马扎亚斯在不流血开城交涉中的谈判对手。

亚历山大还命令此人做了下面这件事。

亚历山大下令接回留在大马士革的大流士的母亲和女儿们，让她们像以前一样居住在王宫的一隅。

大流士的妻子在伊苏斯战役时已经怀有身孕并很快分娩。不久母子双亡。所以，流亡中的大流士只有母亲和两个女儿这三位亲人了。

做完全部必须做的事情之后，亚历山大离开苏萨前往波斯波利斯。当然，与在巴比伦时一样，亚历山大留下了由马其顿人组成的一队士兵。以率军打仗伤亡少而闻名的亚历山大必须在每个战略要地留下士兵，所以他时常需要补充兵员。

波斯波利斯也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城。我们只能认为，帝国中心地区的波斯人已经不把两次临阵脱逃的大流士当国王看待了。

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以希腊语的“波斯波利斯”闻名。与自古就是重要城市的巴比伦不同，它是由始于居鲁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代波斯国王们极尽奢华装扮起来的城市，像是要向古城巴比伦炫耀一般。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波斯国王们的城市。国王死后一定会葬在这里。

大流士一世是第一个想到把波斯波利斯建成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国王之城的。

这位国王可以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中兴之祖，他是第一个想要征服希腊的波斯国王。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登陆，发动了第一次希波战争。

大败于雅典重装步兵后，波斯军马上撤退，结束了第一次希波战争，只给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个马拉松项目的名称。

10年后的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率20万大军进攻希腊。

但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仍是波斯。

希腊人在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的率领下取得了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英明指挥下，普拉塔亚战役又以希腊人的完胜告终。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国王们每次入侵希腊，必遭痛打而只能败退。

尤其是薛西斯，他看到自己亲率的大军在自己眼皮下遭到毁灭，回到首都苏萨后便把国王的公务都抛在了一边。

薛西斯产生了人格分裂。为了忘记这一切，他一心只想把波斯波利斯建成一座最美的城市。

其中王宫的美丽甚至传到了希腊。然而，那都是薛西斯为了忘却绝望以及出于自我厌恶做出的。

这个时期往后，波斯的国王们再也没有把手伸向希腊。他们已经刻骨铭心地懂得，伸手必被烧。

但是波斯也未彻底收手。

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伯里克利利用提洛同盟把爱琴海变为希腊人之海的30年间，波斯完全收手了。伯里克利死后，波斯再次出手。

不过，这个时期波斯对希腊作战倚靠不是军事力量，是资金实力。波斯图谋向斯巴达提供经济援助，让希腊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自相征讨。

绵延了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失败告终，把爱琴海变为希腊人之海的提洛同盟也崩溃了。

结果，因为提洛同盟的作用才变成希腊人地盘的小亚细亚西海岸一

带再度回到了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的状态，回到了波斯人的统治之下。

自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开始，到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跨过赫勒斯滂海峡攻入亚细亚为止的70年间，希腊世界的东半部分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

如今，马其顿的年轻国王率领希腊军队夺回了爱琴海，而且连波斯波利斯也夺到了手中。

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逗留的时间超过了他在巴比伦和苏萨的时间。

若说这是为了在来年春天行动之前让士兵们得到休整，我们能理解。但亚历山大在逗留期间去祭扫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君王的墓地，这使我们难以理解他内心的想法。

赫菲斯提安是亚历山大形影不离、无话不说的伙伴，他从不做有失礼仪之事，因此他不会把亚历山大的心里话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我们只能想象25岁的亚历山大逗留波斯波利斯期间的内心想法。我想，亚历山大应该认为自己是来打第三次希波战争的。

第一次希波战争的胜者是雅典人米提亚德。

把第二次希波战争引向胜利的是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和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

亚历山大自己将以胜利结束第三次希波战争。

在波斯波利斯，亚历山大仍然任命波斯人担任总督。

他还把安放在王宫里的两尊雅典造的雕像运去了雅典。

这两尊雕像是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薛西斯入侵雅典作为战利品带回来的。这两尊希腊雕塑杰作时隔150年后回到了故国。

亚历山大下令焚毁了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帕米尼欧表示反对，但年轻的国王没有改变主意。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波斯国王薛西斯焚毁了整个雅典！

也许亚历山大心里想，自己烧掉的并非整个波斯波利斯城，只是薛西斯装饰的王宫。所以他坚决执行了自己的决定。

在亚历山大看来，要想让希腊人、波斯人知道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了，就必须焚毁王宫。

他要让人们知道，波斯以后还会存续，但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国王的王宫已经灰飞烟灭。

亚历山大没有动居鲁士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墓地一草一木。他严禁破坏这些陵墓，尽管其中葬有发动了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大流士一世和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焚毁雅典的薛西斯。

不管人们生前行为如何，绝不冒渎死者，这也是亚历山大的信条。墓地是死者最后的安息之地，哪怕这里安息的是敌人。

亚历山大是一个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也是懂得站在对方立场上想问题的人。

公元前330年的夏季，亚历山大再次率军启程，目标是位于西北方的埃克巴坦那，波斯国王的夏季离宫就在那里。

不同于在美索不达米亚行军，这次行军是在蜿蜒崎岖的山地上。这一带已经没有任何部族会挡在年轻的征服者面前。

埃克巴坦那建在一座小山上，夏季凉爽。城市的防御设施完备，通过拉吉（现伊朗首都德黑兰）到里海也很近。

亚历山大照例和平拿下了埃克巴坦那。他决定把这里当作征服波斯帝国东半部分的前线基地。

所谓前线基地就是部队会经常回来的基地。但亚历山大的偏好是一旦离开便不轻易回来。在他看来，这里与其说是前线基地，毋宁说更富于后方补给基地的色彩。

亚历山大决定把帕米尼欧留在埃克巴坦那。根据各种情报，让帕米尼欧同去山地连绵的东方，对年逾七旬的他来说过于苛刻。虽然不跟随国王东征，他的任务同样重要。亚历山大让他做了后方基地的负责人，一半的军队也留给了他。

亚历山大逗留埃克巴坦那期间还做出过比这更加重要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行。

逗留埃克巴坦那期间，亚历山大收到了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些决定被立即付诸实施也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

[1]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有云，“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译者注

斯巴达最终出局

这个消息就是希腊唯一公然反对马其顿霸权的斯巴达终于衰落了。

消息说，从伊苏斯战场逃回祖国的佣兵为主体的斯巴达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加罗波利斯近郊与马其顿军对战，大败亏输，死者人数超过5000，斯巴达国王战死。

斯巴达最终出局，这对就要打进中亚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个值得双倍三倍开心的消息。

第一，可以称为祖国的希腊就此完全稳定地处于马其顿的霸权之下。

第二，以前一直勾结波斯的希腊内部势力因斯巴达的大败而被消灭。

不要忘记，波斯国王大流士还在逃亡之中，并未死亡。

第三，佣兵大国斯巴达的衰落让希腊人醒悟为他国当佣兵的人没有好下场。

亚历山大一直痛恨希腊人抛弃祖国为别国当佣兵的潮流。他毫不怀疑是希腊民族的佣兵化害了希腊世界。

在麦加罗波利斯战役中战死的斯巴达士兵，大半是在伊苏斯战役中为波斯而战，战败后逃回来的佣兵。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希腊士兵为波斯作战了。

于是，亚历山大得到了可以把自己的重要决定付诸实施的外部环境。

这个决定就是准许马其顿以外城邦的希腊士兵回国。

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亚历山大在所有以波斯军为对手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此外，他还得到了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以及埃克巴坦那等波斯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

亚历山大认为波斯帝国已经就此崩溃。

他6年前召集希腊所有城邦代表召开了科林斯会议，在会上被选为统率希腊兵奔赴波斯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官。

至今为止的4年间，他统率的是全希腊的军队，尽管主力是马其顿士兵。

既然科林斯会议上确定的目标已经达到，亚历山大不再有资格继续统率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了。

马其顿士兵有义务跟随他这位国王，雅典和科林斯等其他城邦国家的士兵无此义务，因为派遣他们是与马其顿有同盟关系的城邦。

让他们回国，对亚历山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行动。

但是，马其顿的年轻国王请求色萨利骑兵作为志愿兵留下。

在这4年的时间里，色萨利人已经感受到亚历山大对他们的信赖，他们同意全体留下。也有不少其他城邦的参战人员愿意当志愿兵。他们留下来并非受所属国家指使，是他们自己愿意作为亚历山大麾下的士兵作战。

亚历山大在这4年里受到士兵们的爱戴。爱戴他的不仅有马其顿出身的士兵，还有来自希腊各地的士兵。

如此这般，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里佣兵的数量有了增加。

不过，他们并非科林斯会议禁止的佣兵，他们不会像斯巴达佣兵那样为敌对国家而战。虽然他们可以得到刻着亚历山大侧面像的金币和银币，但他们是在与希腊的敌人作战。马其顿士兵也会获得报酬。他们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他城邦的士兵不能称呼亚历山大为“我们的国王”。

不知道是因为久违的冬季休整时间太长，还是斯巴达的衰落使亚历山大对希腊的担心一扫而光，他从埃克巴坦那出发后行军的速度快得令人惊异。古代的史学家和现代的研究者都这么说。

亚历山大把士兵中年长的一辈留给了驻在埃克巴坦那的帕米尼欧，在他率领下踏进山地的士兵以年轻人居多。

这也理所当然。他眼下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击逃走的大流士。

11月1日的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11月、12月，接着是第2年的1月、2月和3月，这5个月给了临阵脱逃的大流士足够的时间，让他拉大了自己与迟早会追上来的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

亚历山大已经得到波斯帝国的所有核心地区，并于公元前330年春开始再次追击大流士。根据斥候团队带回来的情报，大流士居然还在距埃克巴坦那不多远的里海附近！

为什么？为什么大流士会在这种地方磨蹭呢？

我想，这是因为大流士虽然在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米拉战役中吃了败

仗，但他自己逃了出来，还在指望卷土重来。他大概还没有放弃动员整个帝国的总督组成大军向亚历山大发起挑战，一雪前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流士不仅需要动员跟在他身边的贝索斯等东方的总督，还需要动员帝国核心地区的总督们。

大流士离开帝国核心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

大流士才50岁，他能在目前的状况下得到他想要的情报。然而，他没有冷静地认识到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以及埃克巴坦那这样的帝国核心地区的大城市全部在亚历山大面前开城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顽固地认为，家臣们的这种变化是源于自己打了败仗。他不愿意承认旧家臣已经抛弃了自己。

然而他也不信任一直跟随自己的帝国东方的总督们。

官名一样都是“总督”，但东方的总督本质上不是国王手下的高级官僚，只是臣服国王权威的地方豪族之长。波斯帝国有很高的文明程度，但那只限于帝国核心地区的上层人士，东方部族的首领们可不是那样。大流士本人是一个文明人，他不能完全相信贝索斯及其伙伴们。

贝索斯等东方的总督逐渐了解国王及其内心的想法，他们接二连三地逃走。国王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也在情理之中。

即使大流士拥有兵力，也没有力量统率这些人。

由于这些情况，亚历山大在出发追击大流士之前，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准确掌握了大流士一行的藏身之地。他的追击行动自然会相当神速。

大流士好像知道亚历山大已经到达埃克巴坦那。

他只能放弃不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念头。

他再次开始逃跑，向东去往贝索斯担任总督的巴克特利亚，那里是贝索斯的领地。

挺进中亚

古代的巴克特利亚地区是现代伊朗东部的一片区域。

即使在现代，伊朗东部和西部的人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居住在今德黑兰所在的伊朗西部地区和今伊拉克对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波斯人，对“高加米拉战役是一场决战”有着正确的认识。与此相反，在现代统称中亚的巴克特利亚以东的帝国东方，人们认为波斯不过是输掉了一场战斗而已。

贝索斯与仍对美索不达米亚恋恋不舍的大流士的关系在不断恶化。每次贝索斯说点什么，大流士的表情连旁人都看得明白。这进一步影响到跟随他的将士，让他的逃跑之路变得不再顺利。

讲求速度的亚历山大率领着同辈士兵追了上来。

跟随亚历山大追击的士兵，有堪称“国王的伙伴”的500名骑兵和标枪兵、弓箭兵近千人，以及每个骑兵配一个的随从，总共2000人左右，是一支少而精的部队。

被追击的大流士有贝索斯等部族首领们率领的超过万人的兵力。但大流士和贝索斯已经没有了迎击的念头，只是一个劲儿地逃跑。这时已经进入了夏天。

从这里开始，亚历山大又开始了神速的追击，从古至今的史学家们众口一词地评价其真乃“令人惊异的速度”。一天的行军距离达到60至80公里，我们只能认为这种速度快得“令人惊异”。这是把睡觉、吃饭和休息时间都计算在内的行军速度。

他们首先奔赴拉吉，即今天的德黑兰。在那里，他们得知大流士已经逃走，越过了被称为“里海之门”的险阻。

当天他们夜宿拉吉，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追击，一口气走完了到“里海之门”的80公里路程。

当他们来到“里海之门”的时候，被任命为巴比伦总督的马扎亚斯的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上来，拿出一封信，说是自己父亲写的。

马扎亚斯一年前还是波斯高官，他在信里写着宝贵的情报。

信中说，贝索斯和他的三名总督伙伴把大流士抓了起来，他们正带着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继续向东逃窜。而且，大流士被废，贝索斯已经取而代之自称波斯国王。

亚历山大没有犹豫，立即穿越“里海之门”，开始了速度更快的追击。

“里海之门”离马扎亚斯说的国王被抓的地方有好几天的路程，亚历山大一行却只用了两天——实际上36小时就走完了这段路。

不过他们抵达时贝索斯一行已经带着被抓的国王离开了那里。

亚历山大又率军进行了16个小时的急行军，继续追击。

到达下一站之后，亚历山大又得知贝索斯已于一天前离开。

就连亚历山大也没有心情再追击了。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命令全体骑兵把带来的备用马匹借给步兵。于是，全军士兵都成了骑兵。

亚历山大大概把这次追击当成了战斗去完成，他骑上了爱马比塞弗

勒斯，把备用的马匹借给了步兵。

亚历山大决定抄近路直奔贝索斯一行逃跑途中不得不停留的达姆甘镇。

所谓近路是不通道路的沙漠。亚历山大在埃及有过走沙漠的经验，不会说到沙漠就犹豫。

然而他们似乎忘记准备饮用水。行走在沙漠中，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全军都为干渴所苦，一夜之间走完了80公里。

被追的人对这个速度惊讶不已。为了不落到亚历山大的手上，他们决定扔掉所有累赘，大流士也在被抛弃之列。

三个总督用剑刺伤大流士，把他扔到路旁的草丛中，逃之夭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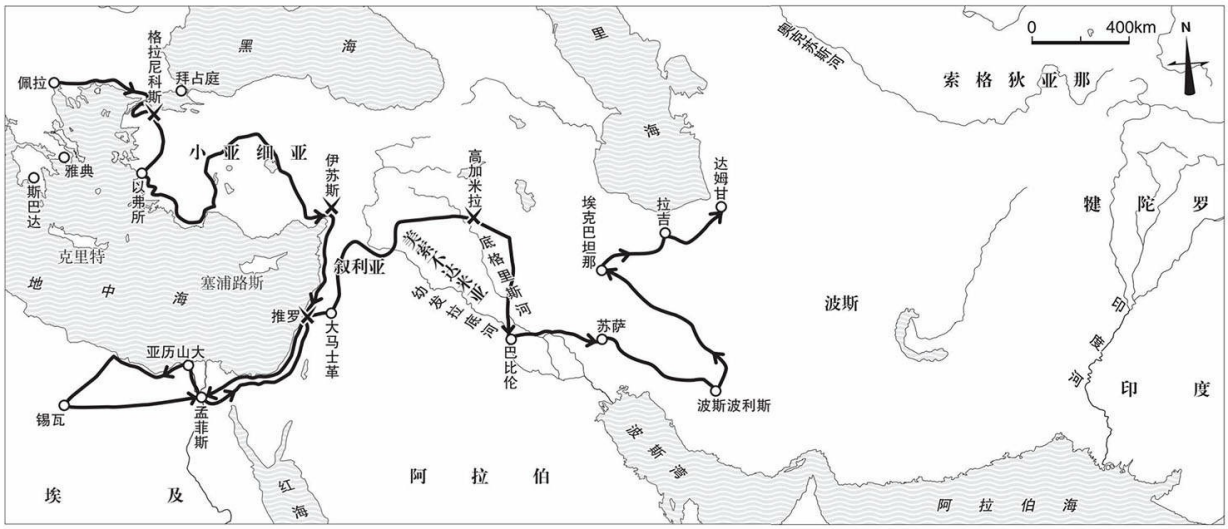
全速追击敌人的亚历山大路过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大流士，后来一个士兵发现了他。

这个士兵让战友快马加鞭赶去通知跑到前面的亚历山大，然后走近身穿华服倒在那里的大流士。

士兵给还没断气的大流士含了一口水，但亚历山大得到急报紧急返回的时候，大流士已经断了气。

马其顿国王俯视着大流士，沉默良久。

他脱下身上的披风盖在大流士的遗体上，命令靠拢过来的部下用符合大流士生前身份的方法把他送回苏萨他母亲那里。按照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身份举行葬礼。



挺进中亚

三个总督原以为亚历山大追击的是大流士，只要把大流士交给他，他便会停止追击。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亚历山大虽然没有当即继续追击，却也没有停止追击行动。

一年后，亚历山大开始追击把国王刺成重伤抛弃的三个总督。他又一次加快了他那令人惊异的速度。

追者与被追者之间的距离日渐缩短。在这样的状况下，贝索斯与其他两个总督闹翻了。

这次贝索斯成了他们逃跑的累赘。他被一道道的绳索捆成了卷儿。

亚历山大根本不想见被抛弃的贝索斯。

他下令扒光贝索斯的衣服，把他裸体捆绑起来。对东方男人来说，裸体比死还要屈辱。

亚历山大只瞥了一眼被拖到路边的贝索斯，算是见了他。

然后亚历山大命人把贝索斯押送到埃克巴坦那。他命令他任命的这个城市的现任总督依据波斯法律对贝索斯进行审判。波斯帝国的法律规定，背叛国王者应判处死罪。

巴克特利亚的波斯总督、在高加米拉战役中统率左翼的贝索斯结束了他的一生。

想通过抛弃贝索斯让亚历山大停止追击的两个总督此后成功躲藏了半年时间。

他们不知道亚历山大一旦开始做某事就绝不会半途而废。最后，他们还是被抓住，像贝索斯一样以背叛国王罪被处以死刑。

对帝国东方三个总督的处置中，最重要的是对巴克特利亚总督贝索斯的处置。

从大流士死亡到处置贝索斯，中间有将近一年的空档。这对有始有终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段难得的空白期。

为什么会有这一年的空档呢？

因为大流士死后，一场亚历山大从未遭遇过的悲剧袭来。

以前，就是拿来1000个问题请亚历山大决定，他都能轻松处理好。

只有这个问题伤了他的心，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第一次，完全是第一次，军队中出现了反亚历山大的动向。

而且这个动向还产生于少年时代就是学友的“国王的伙伴”中间。

如果波斯国王大流士从战场上逃出来并且还活着，他有资格再次组

织军队对抗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朋友”知道这一情况。担任马其顿高官的他们对此产生了不安。由于这种不安，他们在亚历山大麾下团结一致。

他们的这种不安因波斯国王的死而消除，之后他们放下心来。此后他们心中或许已生出了些许松懈。

总之，这是26岁的亚历山大第一次遇到类似的难题。

走在别人前面的悲剧

马其顿军上层萌发对国王的不满，有以下5个原因。

一、任命战败的波斯人担任总督，厚待他们。

二、把波斯人在国王面前伏地起誓表达恭顺的做法强加给胜者马其顿人。

三、亚历山大身穿波斯风格的豪华丝织服装，坐在镶嵌着金银宝石的玉座之上，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质朴刚健的马其顿人，着迷于波斯“柔弱”的生活方式。

四、亚历山大似乎完全相信了在埃及接受的“神之子”的神谕，他认为迄今为止的百战百胜是因为自己是神之子才取得的，他忘记了胜利也来自将士的勇敢战斗，并非仅靠他一人之力。

五、大流士驾崩，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灭亡了。既然消灭波斯帝国是希腊各城邦代表在科林斯会议上的决议，他们委托亚历山大担任总指挥的东征目的已经达到。

实际上，亚历山大已经让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参战士兵各自回国了。

亚历山大率领着马其顿兵以及志愿留下的希腊兵追杀杀害波斯国王的人，要进一步东征。这样下去，马其顿将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马其顿呢？

如果我是亚历山大的辩护人，在最后的辩护中我大概会这样说。

一、随着东征的成功推进，亚历山大懂得了仅仅依靠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亚历山大懂得了如果不能用好战败的波斯人，不管在战役中如何百战百胜，也不能进行随后的统治。

此外，亚历山大没有全盘继承波斯帝国时代的各种制度。虽然保留“总督”这个波斯帝国时的官名，但其权力被分割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部分，波斯人总督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只管行政，由总督率军作战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军事事务交给了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人。

已经在小亚细亚开始实施的这种统治方式，在中近东由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人执行，在埃及由埃及人执行，在波斯由波斯人执行。总督的工作是接触当地居民，起用懂得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生活习惯的人合乎道理。

要想统治战败者，给战败者以存在的理由最为合理，这是实现长久统治的方法。后来的罗马人完美地继承了这一点。

二、严厉批评匍匐行礼的是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

不同于亚历山大东征，罗马人的帝国可以认为是西征的成果。

居住在埃及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人，都因亚历山大的影响而相当希腊化了。欧洲人原本没有匍匐行礼的习惯，希腊化的东方人中也久不见这种做法，罗马的当权者根本不必面对这种问题。

但是，亚历山大必须面对这些。他必须统治那些只臣服于神之子的埃及人，和不伏地磕头不足以表达恭顺的波斯人。

年轻的国王接受了匍匐行礼的做法。他接受这种方式并非因为这是战败者的做法，而是因为这是当地的习惯做法。这点引起了他手下将领

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胜者，战败的波斯人应该遵循胜者的习惯，放弃自己习惯的做法。亚历山大当初并未多想，他似乎认为自己手下的将领行同样的礼是理所应当。

后来亚历山大没再把波斯式匍匐行礼的做法强加给马其顿人。

按我的想象，下面这种情况应该对此发挥了作用。

有一天，因为国王召见，赫菲斯提安一身礼服走进了亚历山大的房间看见亚历山大正在一个人思考着什么。

赫菲斯提安要穿着这身礼服按照波斯的方式匍匐磕头向国王行礼。

因为身穿希腊式军服，光是跪下，就会丁零当啷地发出一阵烦人的金属声。再匍匐于地面，这声音更大，不仅烦人而且成为噪音。那头磕在地上倒没事，但头叩下去身子就起不来了。

亚历山大看着这位朋友的样子哑然失笑，后来咯咯地笑着伸出手去，帮他站了起来。赫菲斯提安好不容易才站起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人快活地相视而笑，像是回到了孩提时代。

赫菲斯提安是想表演给亚历山大看，让他注意到希腊人模仿波斯人的样子是多么难看。

不过，波斯人仍然觉得不匍匐磕头不能表达出恭顺之意，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后来，国王分开召见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我想这也是赫菲斯提安表演的结果。

不过，这种政治上的微妙决定不能公开。因而马其顿上层人士仍然心存不安，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得匍匐磕头。

他们对国王的第三个不满是亚历山大嗜好波斯风格。对此不满只能说明他们不理解亚历山大其人，他们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缺乏置身他人立场上思考的想象力。

我没有角色扮演的嗜好，但我去中国的时候会想穿穿中国的服装，访问印度的时候会买一套纱丽。我的意大利女性朋友总对我说想穿正式的和服，哪怕只穿一次。

亚历山大屡屡表现出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但他也一直保持着20来岁年轻人的好奇心。我们并不说他已经到了喜欢角色扮演的程度，但他应该会有想试着穿穿异民族服饰的心情吧。

波斯服装豪华但沉重宽大，太不适合做事讲究速度的亚历山大了。衣服长到遮住了脚踝，让他没法骑马。穿成这样显然就当不成“金刚钻”了吧，只能像大流士一样，上战场也得坐在战车里。

亚历山大不可能喜欢这样做，所以他应该只是在宫殿里休息的时候才穿穿波斯服装。在行军帐篷里，我想他该是穿着朴素实用的马其顿服装吧。不然他这位征服者便无法做事了。

下面是高级军官对亚历山大的第四个不满。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关于亚历山大是否为“神之子”，不如说是关于亚历山大究竟抱有怎样的宗教观。

古代时，不论希腊还是罗马，军队出征必有占卜师同行，战斗开始之前都要占卜，看看即将开始的战斗有吉兆还是有凶兆。总司令面向士兵做的激励演讲都放在占卜仪式之后。

有时与亚历山大军队同行的占卜师也会举行占卜仪式，亚历山大总是默默地听完。

占卜仪式结束后，亚历山大才开始向士兵发表激励演讲。占卜师们总批评国王的演讲里没有敬神的意思。年轻的国王总是当场回击道：

“我在你扮成赫拉克勒斯神搞仪式的时候没有打搅你。所以，你也不要妨碍我演讲！”

在今天看来，这种言论属于政教分离的言论，说这话的人会完全相信他是“神之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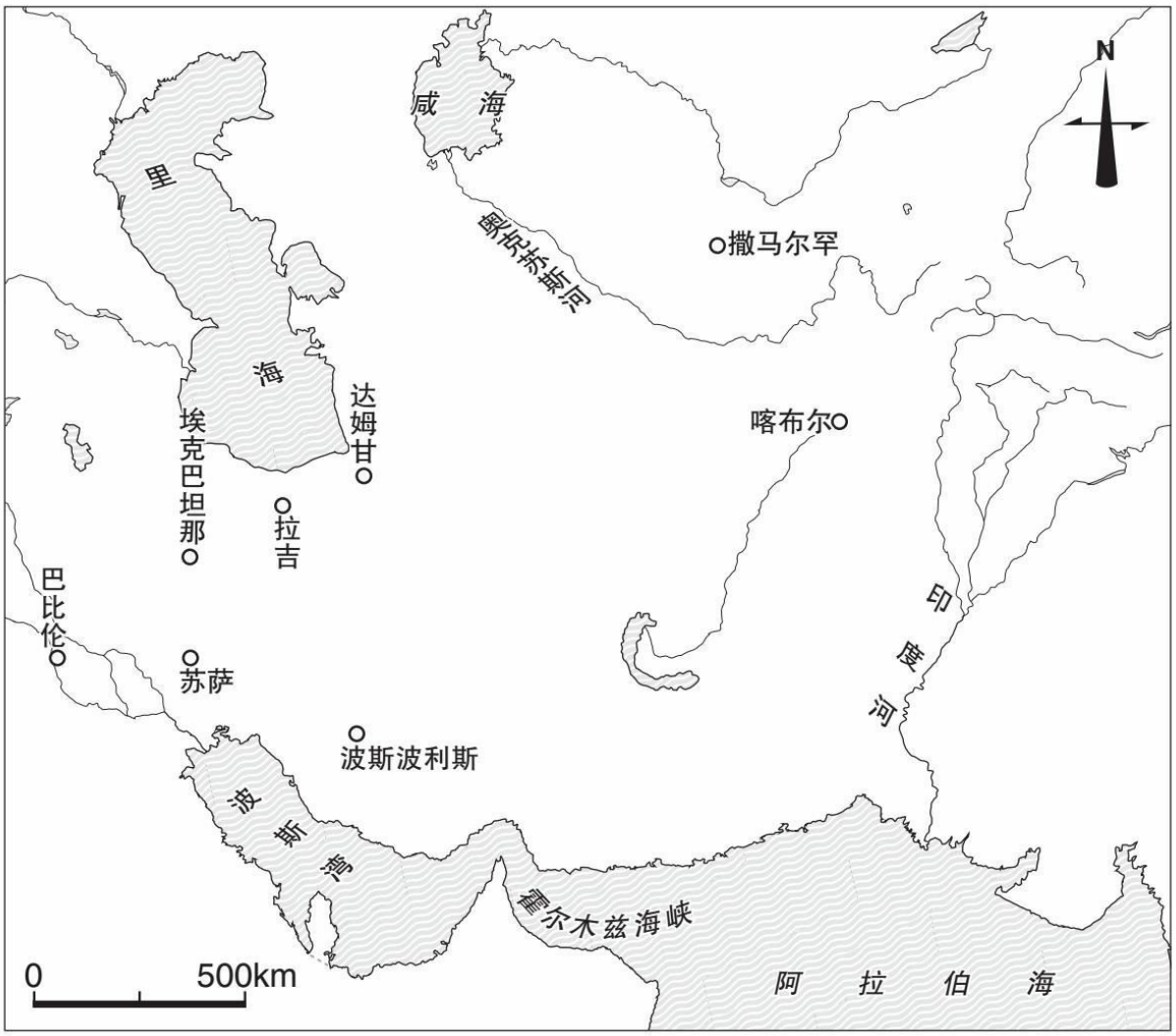
当我们全力工作取得成功时，不也会觉得自己是天才吗？古人亚历山大也只是在赢得了漂亮的胜利之后，觉得自己也许是“神之子”而已。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是“神之子”。所以拿这事谴责他，只是从未想过自己也许是“神之子”的人的过激反应而已。

最高司令官本人比任何人都懂得，所有涉及到人的事情，包括打仗，都是因为有别人的协助才会成功。

亚历山大从20岁起就只担任最高司令官了。

接下来是将领们的最后一个不满，即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继续挺进征服东方。这个问题最能体现亚历山大与他手下将领之间战略思维的不同之处。



中亚

的确，对波斯帝国核心地区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服业已完成，波斯帝国因大流士的死亡而崩溃。

可是，迄今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称霸的所有王朝都灭亡于底格里斯河以东山地人的来袭。这些山地人来自现在的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北面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200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中东的稳定依然为其东面各国的动向所左右。

古代波斯帝国的东半部就是这个问题诸多的中亚地区。

杀害大流士的就是以这里为势力基础的贝索斯等三位总督，即三位地方实力派人物。

这三个人如果躲过亚历山大的追击，以后注定会威胁到美索不达米亚。对亚历山大而言，这个问题不能放任不管。

亚历山大的梦想是建立马其顿主导的融合希腊和波斯的大帝国。对他来说，继续向东进攻不是因为单纯的征服欲，是基于冷静的战略思考。

然而，面对心怀不满的同僚，没有人为国王的立场辩护。

如果这些不满表现出来，肯定会有人站出来为亚历山大辩护。首先，亚历山大自己就会站出来说服大家。马其顿国王的宫廷不像上下等级森严的波斯国王的宫廷，尤其是行军途中，与其说是宫廷，它更像是大学运动部的集体外宿活动。

不满尚未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藏在心里的不满很容易升级为刺杀国王的阴谋。

而且，实际上不满已经升级了。

从古代史学家到现代的研究者，没有人为我们解明这一事件的真相。升级到暗杀国王的不满情绪萌生于马其顿骑兵军团，他们总是跟在“金刚钻”亚历山大的身后杀入敌阵。

不满的情绪刚开始萌生，尚未形成具体计划。

话虽如此，问题仍是严重的，因为有“国王的伙伴”之称的亚历山大最信任的朋友参与其中。

当人们顺着线索追查这尚未实施就已暴露的阴谋，居然挖出了菲洛

塔斯。

菲洛塔斯比亚历山大年长4岁，是帕米尼欧的长子。

在此之前，亚历山大一直把骑兵军团总指挥的重任交给菲洛塔斯。这不是因为他是腓力时代的重臣、亚历山大时代一直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帕米尼欧的儿子。

因为菲洛塔斯实在是一位优秀的武将。

菲洛塔斯在过去的4年中没有辜负年轻国王的信任。

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中，亚历山大冲锋在前，骑兵军团紧随其后冲锋陷阵，堪称马其顿军的的一把利刃。骑兵军团的总指挥总是由菲洛塔斯担任。

菲洛塔斯统率的骑兵在平原战场的战役中是3000人，追击大流士时是500人，尽管人数有变化，但一直是菲洛塔斯担当重任，统率马其顿军主力骑兵军团。

他是可以不打招呼就进出亚历山大大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那么，30岁的菲洛塔斯计划暗杀亚历山大了吗？

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他并未参与这种行动。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了解到的大家流露出来的不安传达给亚历山大。

那么，不满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的不安告诉了菲洛塔斯，没有告诉赫菲斯提安呢？

因为赫菲斯提安与国王的特殊关系无人不知。菲洛塔斯与国王之间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他是帕米尼欧的儿子，因此他被视为对任用波斯人不满的守旧派。

这场未遂的阴谋暴露于亚历山大处理完大流士三世被杀后的种种事务，再次追击贝索斯等人的行军途中。当时他们已经攻入贝索斯曾管辖过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即今阿富汗的深处。

在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的行军途中，这些问题逼着亚历山大去解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这些与自己并辔驰马的人居然背叛了他的信任。

年轻的国王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他忠实地按照马其顿王国的法律在审判地位高的菲洛塔斯时召集了他的同僚——军中高官到场。

于是，菲洛塔斯的命运握在他的同僚手中。做出判决之前，亚历山大一直一个人留在大帐里。

审菲洛塔斯的赫菲斯提安和克拉特鲁斯等高官，都是同亚历山大一起接受列奥尼达“斯巴达式教育”的学友。

一直以气质高雅闻名的菲洛塔斯面对曾经的学友们，一直主张自己是无辜的，始终没有改变昂首自信的态度。

他说，如果他有刺杀国王的意图，他每天至少两次全副武装进入国王大帐，什么时候都可以动手。

他承认自己知道不安的空气在号称“国王的伙伴”的骑兵军团里涌动。

审判方有人问菲洛塔斯：

“你跟国王关系那么近，为什么不告诉国王？”

菲洛塔斯回答，打小报告不是他的作风，而且他认为没有值得向国王报告的具体计划，所以没有告诉国王。

菲洛塔斯所犯的错误就在这里。

不完整的情报不能称为真正的情报。下面的人把筛选过的信息报上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报。

筛选应该由统帅进行。

以前，帕米尼欧曾经送上情报说，医生腓力被波斯国王收买，他也许在调和的药汁里搀了毒药。亚历山大没当回事，因为他十分信任孩提时代以来一直追随他的家庭医生。他一边让医生看帕米尼欧送来的信，一边喝着这位医生调的汤药。

亚历山大的判断是，与其相信传闻，不如相信孩提时代以来一直跟随他的家庭医生。

下面的人是不能对情报下判断，即筛选情报的。

可是菲洛塔斯独自筛选了情报。他犯下了知情不报之罪。

目前战斗还在继续。这是亚历山大必须很好地整合军队内部人员的时期。

他的旧友一致决定以谋逆罪判处菲洛塔斯死刑，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菲洛塔斯一直主张自己没有参加阴谋，是无辜的。他也许没有想到无辜的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如果亚历山大被杀，他的顺位继承人是第二把手帕米尼欧。可是，这位老将已年届七十，他死后接替他职位的人，无论是从出身还是目前

的地位或能力看，都会是菲洛塔斯。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难道菲洛塔斯的脑子里没有想到这些吗？难道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才对国王知情不报吗？他每天至少同国王见面两次，不缺报告机会。

然而，亚历山大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菲洛塔斯的死而得到解决。此外还有几个人被处以死刑，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帕米尼欧。这位老将有着辉煌的业绩，眼下仍在马其顿军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其顿有一条规矩，即儿子犯罪父亲也要负责。

亚历山大不能把帕米尼欧送上由高级将领进行审判的军事法庭，那样给士兵的影响太大。

这个问题必须由国王亚历山大一个人做出决断。

古代史学家们写道，亚历山大向留在埃克巴坦那的帕米尼欧身边紧急派遣了3名刺客。

这3人都是亚历山大麾下的武将，他们得到的命令不是见面后当场杀死帕米尼欧，而是先让他看菲洛塔斯的审判记录，劝他自裁，如果他拒绝自裁，再杀死他。直到这时，帕米尼欧才知道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切。

单凭想象也能知道年届七旬的老将心中的悲哀。

他有3个儿子，次子战死于格拉尼科斯战役，三子在前往埃及途中的战斗中战死，唯一剩下的长子，3个儿子中最具才华的菲洛塔斯，现在也成了亡人。

帕米尼欧向国王做了报告。被人当作笑柄也罢，他已经顾不上了。

他只能承认知情不报的儿子没有搞清自己的立场。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一无所知。帕米尼欧的罪只有一项，那就是他是菲洛塔斯的父亲。

这一点，劝帕米尼欧自裁的亚历山大肯定比谁都清楚。

如果老将拒绝了国王的劝告，马其顿军会怎样呢？

帕米尼欧与先王腓力一道创建巨型刺猬一般的马其顿方阵。这支重装步兵部队现在和骑兵军团同为马其顿军的主力，威震波斯。

如果帕米尼欧起来反对亚历山大，也许会有为数不少的重装步兵追随他。

如果是那样，虽然灭了波斯帝国，马其顿自身将走向分裂。

对帕米尼欧来说，他的一生功亏一篑。他与先王的关系可谓盟友，也可谓伙伴。他完全认可先王继承人亚历山大的才华，一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着他。

帕米尼欧是如何迎来死亡的，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

但帕米尼欧确实没有白白牺牲。

没有一个重装步兵为他的死而激愤叛乱。

马其顿军的士兵们相信，帕米尼欧是为儿子承担责任而选择了自裁。这个事件之后，马其顿军队的统一没有丝毫动摇。

英国学者说："亚历山大的悲剧始于这个时期。"这并非指他的学友伙伴中间出了反叛者。真正的悲剧在于亚历山大不断成长，而他的朋友

没有跟着他成长起来。

他已经不是一被父亲腓力责骂便马上和伙伴们离家出走的年龄了。“出走伙伴”们、一起玩笑嬉闹的年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是只有赫菲斯提安具有在精神方面跟上走在前面的亚历山大的能力。但他具有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感情，想去理解凡事一个人判断、一个人决定并下令付诸实行的亚历山大。

比别人成长得越快越孤独。

亚历山大把长期担任帕米尼欧副将的克拉特鲁斯提拔到帕米尼欧生前的位置上，在马其顿全军他有仅次于亚历山大的地位。

克拉特鲁斯也是亚历山大一起接受“斯巴达式教育”的学友伙伴，与菲洛塔斯同岁。亚历山大没有忘记自己与菲洛塔斯的4岁年龄差，却忘记了与克拉特鲁斯的年龄差。

当年吃力地跟着他们这些年长者的亚历山大，如今已经是统率他们的人了。克拉特鲁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一点。

克拉特鲁斯此后当上了亚历山大的副手。他没有留在埃克巴坦那，而成为全程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全军副总司令。

菲洛塔斯的死造成了骑兵军团统帅的空缺。亚历山大把2000人的骑兵军团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赫菲斯提安和克雷托斯两人。

研究者们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因菲洛塔斯事件而不再信任他人的缘故。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全面。

赫菲斯提安的忠心不容置疑。但这位性格温柔的朋友造桥比打仗拿手，打大战役时骑兵军团会增加到3000人，这时很难将部队全部交给

他。

克雷托斯与其说是司令官，不如说他更像是独狼式武人。多年来亚历山大交给他的唯一任务就是率领200到250名骑兵紧跟在自己后面。

先王腓力无法改变在喀罗尼亚战役中一马当先、陷入敌阵的儿子的秉性，便命令克雷托斯跟着他，不让他孤身一人。克雷托斯与亚历山大的关系由此开始。

从那以后，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等所有战役中，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紧跟在骑兵军团纵长菱形阵型最前头的亚历山大的后面。他拥有统率整个骑兵军团的能力，却只做着其中一队的队长，因为他要做好亚历山大的保护者。由于一直担任这个角色，克雷托斯在担任司令官之前，能力一直没有长进。

菲洛塔斯死后，他必须率领至少1000名骑兵，不是以前的200名了。

参与菲洛塔斯事件的人被处以死刑后，他们的空位很快就被填补。在这时得到晋升的人中间，有一位是亚历山大死后当上了埃及国王的托勒密。

总之，由于知情不报的菲洛塔斯被处死刑，马其顿军队被迫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改造。

亚历山大是一个几乎不去回首过去，更愿意向前看的人。他又将重新踏上征程。

重启东征

公元前329年，待春天到来，还差4个月就满27岁的亚历山大重新踏上了征服东方的征程。

这次他已经不是单纯去追击那三个杀死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了。虽然对这3人的追击不容懈怠，但通过重启追击去征服波斯帝国的东部全境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同上次只带少数精兵追击不同，亚历山大这次带上了全部部队，甚至还运去了攻城器械，因而行军更加困难、更花时间。

分工已经确定。

亚历山大自己是全军的最高司令官。

亚历山大把晋升为二把手的克拉特鲁斯留在身边支持自己。需要时分兵两路，亚历山大统率第一军，克拉特鲁斯统率第二军去完成夹击敌人的任务。

在通过胜仗得到的地盘上，亚历山大会在每一块自己认为是战略要地的地方建立名为亚历山大的新城。这些新城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基地。从基地建设到修路架桥，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都由赫菲斯提安负责。

亚历山大要去的波斯帝国东部，是现在的伊朗东部往东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向北到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广袤地区。

希腊人了解古城巴比伦和苏萨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迄今为

止还没有一个人率军踏上过这些地形复杂而由众多部族割据的地方。

贝索斯以为抛下濒死的大流士就能让亚历山大满足。如今他见亚历山大还是不停地追击，便对逃跑感到了绝望。他烧光马其顿军前进路线的周边地区，断绝了敌人的补给后，率领8000名巴克特利亚士兵奋起迎战。

可是，亚历山大的速度超出了贝索斯的预料。亚历山大要在自己断粮之前收拾掉敌人。

巴克特利亚军遭到了亚历山大所率第一军和克拉特鲁斯所率第二军的夹击，在被消灭之前他们投降了。

只有贝索斯再次逃走。我觉得他手下的士兵已经不是参加过高加米拉战役的那些人了。

如果还是那些与亚历山大交过手的士兵，只要回想一下那次战役中亚历山大的表现，士兵们就该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

这些士兵投降后请求在亚历山大手下战斗。年轻的国王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他还任命波斯人担任了巴克特利亚总督。

巴克特利亚与现代阿富汗位置重叠。这一带的部族首领没有全部起来抵抗亚历山大。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与迎战的贝索斯同流合污。亚历山大自然认为，只要赶走了贝索斯就算征服了巴克特利亚。

贝索斯这次又成功地逃开了。他逃到一同抛下大流士的另一个同伙的地盘上。在那里他明白自己已经被当成了“瘟神”。

贝索斯的这个同伙叫斯皮塔米尼斯，是古代索格狄亚那地区的波斯总督，这里在现代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他受贝索斯蛊惑刺杀大流士，

亚历山大却没有因此停止追击。他觉得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十分不安。

说是总督，实际上他不过是个部落酋长而已，文明程度不高。他认为，事到如今只能把贝索斯抓起来交给亚历山大，这才是让亚历山大停止追击的办法。

于是，贝索斯被一道道绑成卷儿丢弃了。他以后的命运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亚历山大让贝索斯成了一个罪犯。

就这样，在重启追击不过半年的时间里，贝索斯问题得到解决。

但亚历山大仍然没有停下脚步。追击杀害大流士的罪犯的行动成了征服波斯帝国东部的行军。

游击战的艰辛

收拾杀人犯花了一年，完成征服东方全境又花了两年。

重启正式东征以来已过去了整整三年时间。

也许人们会认为，从现在的国别来看，东方全境包括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广阔地域，征服这些地方当然需要这么多时间。实际这里还有其他特别的情况。

首先，地形复杂。

割据各地的部族数量众多，没有一个有实力统合它们的大国。波斯国王对它们的统合也不过是那么回事。

因此，两军在平原上作战的会战形式不可能出现，双方只能打游击战。

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迄今为止打的都是可以充分发挥其战略战术才能的战役，所以才会百战百胜。现在他们要跟藏身山地、会在预料不到的时间从出其不意的方向袭来的游击队作战。自从高加米拉战役以来，亚历山大已经3年没有打过一场战役了。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能否达到目的将取决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统率全军的人是否意志坚定，一以贯之。

第二，全体将士是否身心统一、紧跟统帅。

第三，能否确保补给也是重要问题。

首先第一条，没有人能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拥有“恒久意志”的榜样，这是作为领袖的条件之一。

第二条，亚历山大追求速度。在不可能提速的情况下，他的另一个特质——强大的忍耐力便会发挥作用。

他并不是一味追求快攻。追溯史实我们可以知道，他经常会让士兵休整。尽管没过几天就会重启攻势，但亚历山大仍是一个懂得让部下休息的领袖。

即便告诉他某条路只有山羊过得去，他也会回答说，山羊能过人就能过，然后身先士卒走过去。

他的餐食与士兵们的一样。没有地方支很多帐篷时，他会和将军们挤着睡。

区别他与手下将军的既不是待遇也不是服装，只是在他头盔上翻飞的白色翎子。其他将军戴五颜六色的翎子，只有亚历山大一人能用白色翎子。

无论在雪中行军，还是进攻敌人构筑在山顶上的碉堡，亚历山大绝不会只下命令而自己不动。

士兵们总能望见冲在自己前面的白色翎子，于是他们跟在后面向前冲。

亚历山大从不把部下看成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

行军路线选错，打仗时战术搞错，亚历山大会坦率地承认那是自己的错误。

只是承认自己错了之后，他总是接着说：“所以我决定今后……”这

是他一贯的作风，但士兵们听了他的话能感觉到，自己被当作人来对待。

撰写亚历山大传记的古代史学家把“人性”也当作这位年轻国王的特质，列在“快攻”和“忍耐”之后。“humanitas”是英语“humanity”（人性）的拉丁语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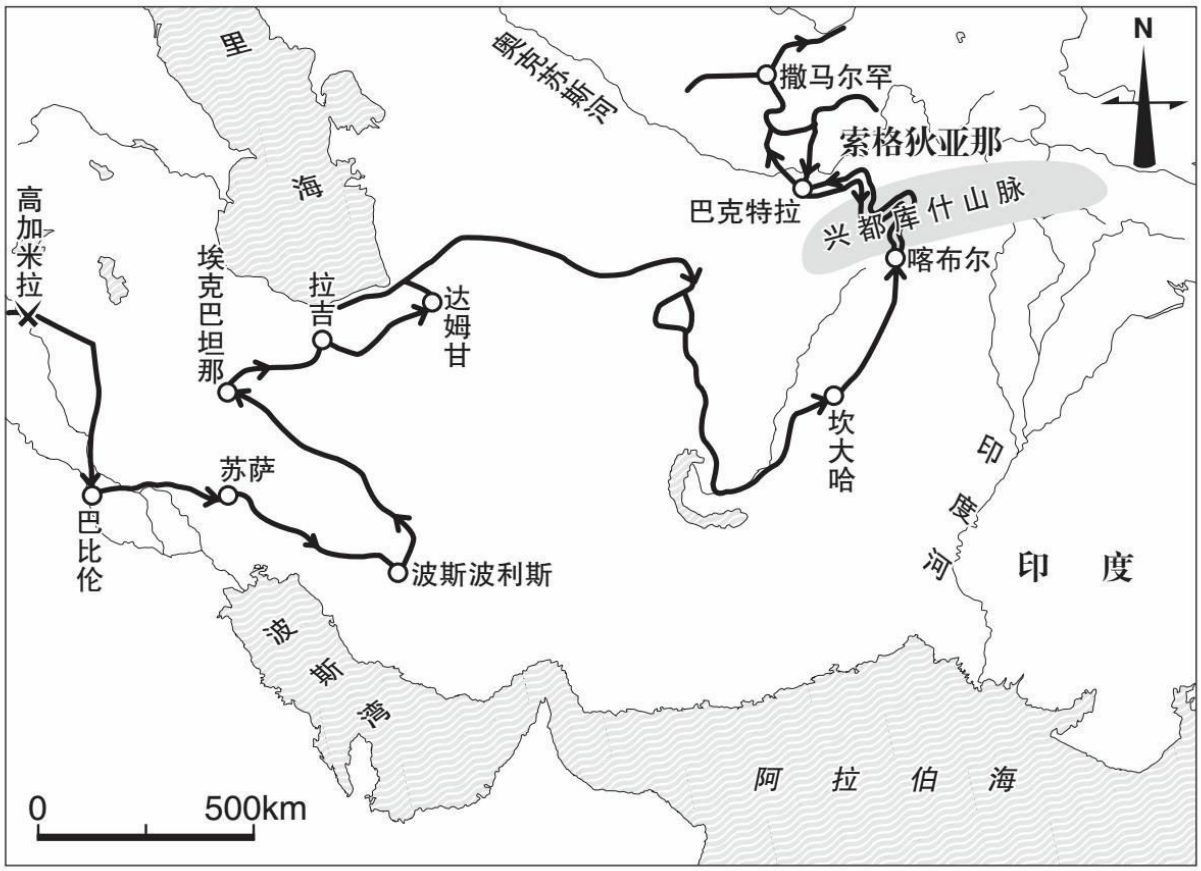
最后一条是保障补给线。要让士兵们一直保持士气高涨，这点必不可少。亚历山大的补给线作用发挥到令人佩服的地步。从位于欧洲的希腊到中亚兴都库什山脉的深处，只要亚历山大下令补给物资、补充兵员，它们总能一件一卒不少地及时送到。

亚历山大是一个频繁写信的人，尤其经常写信给母亲。从私信到记录公事的文书都能安然送达，从未丢失，这只能令人惊叹。

补充兵员对亚历山大来说不可或缺。在争霸东方的过程中，他建设了超过25座取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新城市，或称基地，在所有基地他都要留下士兵。

补充的兵员总能足量到达指定地点。那时可没有什么联邦快递和黑猫宅急便[1]之类的运输公司，能做到这点真让人佩服。

顺便一说，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城市中有几座现在还在，其中一个是同喀布尔并列当代阿富汗重要城市的坎大哈。



征服中亚

进入罗马时代以后，亚历山大被称为“大帝”。也许由于他总是战无不胜，自古就有无数关于他的战役的分析和研究。

然而，聚焦他在组织和后勤方面能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太善于作战了。可是，不管打战役还是进行由很多战役积累起来的战争，不重视后勤工作就不能取胜。后来罗马人甚至断言：“罗马军团胜在后勤。”

这解释了亚历山大为什么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也能不断取胜。

不管怎样，我认为马其顿军出色的后勤工作充分发挥了作用。这既帮助统帅坚定了意志，也帮助士兵坚定了紧跟统帅的信心。饿着肚子不

能打仗，这可是古今东西恒定不变的。

中亚地区的地形和社会形态给欧洲人的征服带来重重困难，征服中亚、完成霸业的欧洲人只有亚历山大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罗马是一个向西扩张形成大帝国的国家。罗马在东方把国境定在幼发拉底河后就不再继续东扩了。现在看来，罗马的东线仅止于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阿拉伯、埃及，罗马人没有以扩张领土为目的进入伊拉克以东地区。

到了近现代，英国、俄罗斯、美国都尝试过征服这一地区，但最终都是撤退。有时我不禁会想，亚历山大成功地征服了东方，能够真正理解和评价其辛劳的，与其说是未曾踏入那里的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有着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战经验的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前线部队首长们。

除了称霸中亚，在另一件事情上亚历山大也是欧洲第一人。

他是第一个见到石油的欧洲人。

他东征途中山多、沙漠也多。马其顿军经常被迫横穿沙漠。在行军中，他们遇到过一种散发着恶臭、黏糊糊的东西，它把一片沙漠染成了黑色，还会喷出火焰。

希腊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士兵们骚动起来，哭喊着，口中叫着“凶兆凶兆”，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亚历山大向占卜师求助，说随便你怎样，赶紧举行仪式安抚士兵。

士兵来自希腊乡下，在这种时候跟他们讲理也是白搭。说不定，

不，几乎可以肯定，就算亚历山大不认为这是凶兆，他对石油这种物质也确实一无所知。

总之，士兵们镇静了下来，他们绕过喷火的黑色地带，继续在沙漠行军了。

索格狄亚那总督斯皮塔米尼斯虽然把贝索斯抓起来交了出去，企图逃避亚历山大的追究，但他还是没有活过一年。

他手下的将军为亚历山大顽强的追击叫苦不迭，于是出手将斯皮塔米尼斯杀死了，然后拿着他的头颅向亚历山大投降了。

巴克特利亚实力人物贝索斯和索格狄亚那实力人物斯皮塔米尼斯退场了。亚历山大参事实上完成了对波斯帝国东部的征服。

这个成功是亚历山大以不断追击的形式对3位总督施加压力的结果。

他们顶不住这种压力首先内部分裂了，最终连他们手下的将士都被亚历山大以不断追击、造成压力的战术玩弄于股掌之间。

亚历山大尚未征服的只有现代的巴基斯坦北部通往印度的山地了。

时间进入公元前328年的冬天。亚历山大决定在索格狄亚那的首都撒马尔罕过冬，等待来年开春。

亚历山大21岁开始东征，如今他已经28岁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幸似乎专挑情况好转的当口袭来。也许，亚历山

大眼看情况明显好转就松懈下来。

古代史学家们写道，这一切都是酒神狄俄尼索斯惹的祸。

同样都喝葡萄酒，希腊人很容易喝醉，而罗马人却不会。原因在于希腊人直接喝酒，而罗马人掺水喝。

罗马人中也有人喜欢直接喝，他们被称为超常酒鬼。罗马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和五贤帝时代的皇帝图拉真喝酒都很厉害，凭他俩的体格，直接狂喝恐怕也不至于烂醉。

正在撒马尔罕过冬的亚历山大和全体将领都明白，从第二年的公元前327年开始，他们将进入征服波斯帝国的最后阶段。

行军途中，亚历山大的宫廷与其说是宫廷，不如说是集体宿舍。大家在中亚的严冬中聚会喝酒，说笑话嬉戏。总督家成了亚历山大和手下将领的宴会场。

克雷托斯比亚历山大年长20岁。与身为国王学友的其他将领不一样，他并非出身于马其顿上层。他的姐姐是亚历山大的乳母。

因为有这层亲密关系，克雷托斯受先王腓力之托保护已经可以上战场的亚历山大。因为无法改变儿子喜欢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的秉性，国王把保护儿子，不让他孤身陷入敌阵的任务交给了克雷托斯。

克雷托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孤身陷入敌阵，克雷托斯打倒了用剑劈向他的敌兵，救出了亚历山大。

菲洛塔斯死后，克雷托斯还与赫菲斯提安分别担任两支骑兵军团的指挥。他以自己是马其顿武人为最大骄傲，这种心情从未改变。

与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新一辈相比，克雷托斯在辈分上帕米尼欧是一

代人。因而，他对亚历山大推行的对波斯人的融合政策颇感不爽。

那天晚上，大家并不急着第二天就出发行军。尽管国王亲临，但那毕竟是一场伙伴们的宴会，大家无拘无束，全体喝醉。

由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开始，话题转到了帕米尼欧身上。

帕米尼欧之死是亚历山大心头之痛。国王感到被人触到痛处，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可是克雷托斯没有在意。

这位47岁的武人没有住嘴。

他说起帕米尼欧如何为马其顿鞠躬尽瘁，话题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先王腓力身上。他说，亚历山大是得益于先王和帕米尼欧共同创建的马其顿方阵，才会战无不胜。

亚历山大屡屡胜利的原因是他使用了战斗力强却行动迟缓的步兵与机动性好的骑兵相结合的战术。但老辈武人克雷托斯理解不到这一层。克雷托斯统率的是骑兵军团，但他无法忍受国王更看重骑兵的现状。

克雷托斯醉了，说完这些之后仍不停地责备亚历山大。

他叫道：埃及神官说你是“神之子”又算什么！做腓力的儿子你感到耻辱吗？做一个马其顿人有什么不好？波斯人匍匐磕头就重用他们，这不是马其顿国王做的事！你就是小看马其顿人。他接着说，托我这个人的福，“神之子”才能在格拉尼科斯战役后活到今天。

亚历山大的面孔完全扭曲了，他站起身来。

几个将领走近亚历山大，想阻止他下面的动作。另外几个将领把克雷托斯拉出房间，想把喊叫不停的克雷托斯拉到别的房间。

可是，亚历山大也酩酊大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开始大声喊

叫：克雷托斯去了哪里？

听到国王的声音，克雷托斯甩开同僚们的手走了回来。

走回来的克雷托斯口中念着欧里庇德斯悲剧中的一段话，站到了亚历山大的面前。

他念的那一段说，胜利是士兵们的功劳，将领总是忘记这点。

亚历山大从卫兵手中夺过长枪，朝克雷托斯掷去。

长枪直接命中克雷托斯的胸部，他无声地倒下，当场毙命。

亚历山大的酒醒了，他茫然伫立。朋友们拖着他去了卧室。

从那天夜里起，亚历山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事发当晚在其他地方办事的赫菲斯提安赶了回来。但他也被禁止进入房间。

房间里传出了亚历山大呼喊克雷托斯和他的姐姐、自己乳母兰妮凯名字的声音。

我想，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陷入自我厌恶的情绪。

不错，挑衅的是克雷托斯，但亚历山大犟上了。

亚历山大活到今天，靠的是平常一心想成为将士榜样的念头。居上位者必须履行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自我控制。亚历山大忘记了这一点。

从将领到士兵，所有人都在担心亚历山大，怕他是不是疯了。

连赫菲斯提安也不让进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动员了占卜师。

可是，任占卜师在屋外怎么喊叫“我是神的使者”，房间的门仍旧紧闭。占卜师扔下一句“这是神祇惩罚平时敬神之心淡薄的国王”，退了下去。

到了第4天早晨，亚历山大出现在因担心他而聚集在广场上的士兵们面前。

士兵们先是担心地望着憔悴至极的国王。也许是见亚历山大挺了过来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士兵们一齐向他发出了欢呼。

面对这些士兵，泪水沿着亚历山大的面颊流了下来。

这是士兵们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国王在流泪。

28岁的国王出于对他们的责任重新站了起来。从那天起，亚历山大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征服现代的巴基斯坦东部一带。这片地区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处在印度国王波拉斯的统治之下。

亚历山大照例在奔向下一个目标之前，先巩固好已经征服的地方。这是为了不把敌人留在背后，也是一个充分考虑到现实的战略。这种现实是，不管你用多大的军事力量收拾了“大老板”，如果你放任不管，马上就会出现“中小老板”。如果给他们时间，辛苦完成的霸业会归零。

推翻了巴克特利亚总督贝索斯和索格狄亚那总督斯皮塔米尼斯，由现代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当时的中亚，就只剩中小部落的首领了。

这些“中小老板”在亚历山大显示的力量面前纷纷不战而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反水。那种一旦承诺就一定守信的做法，即日本所

谓的“武士没二话”，在那里根本行不通。

既然现状如此，相较于使用军事力量一个个地去推翻他们，把他们之中愿意听话并对亚历山大怀有敬意的人拉到自己这边来才是捷径。

巴克特利亚有一个中等规模的部族，其首领叫奥克夏特斯（Oxyartes）。这个人处理圆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但接受了年轻征服者的统治，还把带来的女儿献了出来。

据古代史学家们的说法，这个名叫罗克珊娜（Roxanne）的姑娘是一位绝代佳人。

亚历山大已经28岁了，在此之前不曾对女人有过感觉。他这次没有把她立为侧室，而是直接同她结婚。所以，三百年后写到此事的史学家都认为，她一定是一位绝世佳人。

然而，亚历山大其实是一位厌恶拥有情人或侧室的人。

古代的史学家们也认可这是一桩政治婚姻。一般认为政治婚姻是与和征服者势力相匹配的人家联姻，这位中等部族首领的女儿似乎不够格，这让他们犯了难。这种犯难使得罗克珊娜被写成一位绝世佳人。不仅在古代，现代的电影里也是这样。

且不论她是不是那样的美女，既然结了婚，亚历山大是不是办了仪式也尽到了丈夫的义务呢？似乎并不是这样。按理28岁可以立即要孩子了，但女方过了5年才生孩子。这件事也被当成亚历山大对女人没有兴趣的佐证。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把罗克珊娜的父亲变成了自己人，这点立竿见影。

巴克特利亚人奥克夏特斯说服同胞们，告诉他们归顺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如果不同意，他将配合亚历山大的副将克拉特鲁斯进行军事打压。亚历山大甚至为准备与印度国王波拉斯进行决战而回到了巴克特拉城。这里是取名为“亚历山大”的其中一个城市。

就在这座城市里，亚历山大又遭遇了马其顿守旧派的阴谋。

在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军队中，常有人不赞同年轻国王推行的与当地人融合的政策。

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国王娶马其顿女人或希腊女人也就罢了，现在同战败的中亚国家的女人结婚，他们不能容忍。

如果这个女人生了儿子，那孩子迟早会当上马其顿国王。单单想到将来要服从一个有非希腊血统的国王的命令，他们就忍受不了。

于是他们搞起暗杀国王的阴谋，主谋应该是他们思想上的领袖卡利斯西尼。他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侄孙，也是一位哲学家，是随同亚历山大东征的为数众多的非军事人员之一。

亚历山大把监督做勤务工作的少年团队的差事，交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师亚里士多德的这位侄孙。

虽说是做勤务，这些少年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家的子弟。通过侍奉高官，在他们身边学习高官应该做些什么，这才是少年们的真正目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士官生”，即后备干部。卡利斯西尼煽动了这些少年。

得知未遂的暗杀计划之后，亚历山大对恩师的侄孙毫不留情。卡利斯西尼被捕后被送到了后方，死于狱中。

这件事招致希腊哲学家，即当时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对。

亚历山大因此被他们定性为一个不惜钳制思想的“暴君”。

可是讽刺的是，仅仅过了5年，他们一直讴歌的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便崩溃了，因为一直认可这种自由的“暴君”的去世。

我不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暴君，但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独裁”一词在辞典里有下面的意思。

一、凡重大事项均由自己一人思考并决断。

二、特定的个人、组织、阶级等掌握所有权力，实施统治。

亚历山大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始终独断专行。

亚历山大回到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巴克特拉，为与印度国王波拉斯决战做准备，着手重新整编军队。这也是为了填补克雷托斯死后的空缺。可是，亚历山大一旦动手，就不仅仅是填空了。他借此机会，为进一步提高效率而改编了军队。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听取每个人的希望后再交代任务的领袖。

根据亚历山大的安排，骑兵军团一直担任马其顿军队的进攻主力。骑兵军团插入敌方左翼与中路之间狭小的缝隙，把敌人的左翼与中路分割开来。以此为信号，巨型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转入攻势。采用这种包围战法是马其顿军队以往战无不胜的原因。

肩负如此重任的骑兵军团别名为“国王的伙伴”，其3000名骑兵的总指挥以前由菲洛塔斯担任，菲洛塔斯死后由克雷托斯和赫菲斯提安两人担任。

当然，一马当先冲在纵长菱形骑兵队伍最前面的人，即“金刚钻”，一如既往是国王自己。

与印度国王决战前，亚历山大把这支骑兵军团分成了5个部分，每队最多600人，并任命了各大队的指挥官。各队可以根据指挥官的判断比以往更加灵活、更加自由地行动。

第一大队的指挥官是亚历山大自己。这一队的名称意译为“国王卫队”。

接近30岁的亚历山大在自己指挥的600多名骑兵中加入了为数不少的波斯骑兵。

年轻的国王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教育那些被任命为总督、成为自己下属的波斯人。被分配到“国王卫队”的这些波斯青年身上穿的不是传统的波斯军装，而是希腊式军装。

第二到第五大队的指挥权分别交给了赫菲斯提安、克拉特鲁斯、佩尔狄卡斯和德米特里乌斯这4个人。单看这些指挥官，就知道亚历山大多么重视骑兵军团的攻击力了。他们全都具备指挥整个军团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队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他自己作为“金刚钻”冲入敌阵。其他4个大队的任务是紧跟其后发起攻击。组成这4个大队的骑兵几乎全是马其顿人，以及少数波斯人等东方人。

亚历山大已经料到有人不愿与所谓的蛮族并肩作战，这样做是对他们的一种照顾。

可亚历山大的照顾不是普通人的那种照顾。换句话说，这种照顾仍是一种“强迫”，因为骑兵队里出现来了一年前还是敌人的“蛮族”出身的人。

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从原来的马其顿·希腊军队渐渐地变成了一支多民族军队。

这是他同化战败者的战略之一。

与骑兵军团相比，已经以“马其顿方阵”之名名扬四海的部队还保留着浓厚的马其顿色彩。

直到3年以前，马其顿重装步兵的总指挥还是帕米尼欧。这位忠臣退场之后，原来的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得到了晋升。加上相当于“海军陆战队”的专事进攻的步兵，这支队伍达到了3万人。

亚历山大把这3万人分成了10个大队，各队指挥交给了塞琉古等年轻人。

这是为了让部队小规模化，促进士兵在战场上行动的机动性。一直以来，随机应变的任务基本上由亚历山大一人承担。从今以后，亚历山大要让比他年轻的一代去亲身体验。“胜负感”是只有经常身处胜负场上才能领会的感觉。

公元前334年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东征时，亚历山大统率的是一支由5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组成的军队。

7年后的公元前327年，士兵数量几乎没有改变。

减去3次大战役和其他战斗中损失的人员数量，以及留给东征途中建设的众多基地的防御人员数量，再加上从马其顿派来的补充兵员，总兵力维持在35000人到4万人。仅凭这一项，人们就不得不认可亚历山大作为领袖的力量。

不过，这也是因为亚历山大对统率庞大军队没有兴趣。

军队大了行动迟缓，后勤问题也会增加。

所以，他把东方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不是为了增加兵力，而是要同化战败者。

他在战场内外一向主张“胜利属于掌握主导权的一方”。主导权并非靠人多就能掌握。

亚历山大不像波斯国王那样认为人多就能打胜仗。在灭掉波斯大帝国以后，在相信靠质量而不是数量取胜这一点上，他仍旧是一个希腊人。

分割军团，明确各个部队的指挥负责人，也是以少胜多的战略需要。亚历山大在这个基本战略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

[1] 联邦快递（FedEx Express）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性快递公司，成立于1971年。黑猫宅急便是日本雅玛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项快递业务，其商标为一只大黑猫衔着一只小黑猫。——译者注

通向印度之路

公元前327年的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印度。

他们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大河中间的地方取名“美索不达米亚”，因而他们知道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但再往东，从现代的伊朗东部到阿富汗及其北方一带，进而到巴基斯坦，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更别说印度河以东更为广袤的印度了。

然而，这对已经29岁的亚历山大来说并不是问题。对他而言，仅凭下面这些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东征了。

第一，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因大流士三世之死而灭亡。被誉为波斯中兴之祖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曾经远征到了印度河，使这条大河的西边皆为波斯帝国的领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也曾入侵希腊，发动过第一次希波战争。

第二个理由是，把今巴基斯坦北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自称印度国王的波拉斯与希腊人有过节。高加米拉战役时，大流士三世要求帝国全境实力人物参战，波拉斯送去了15头大象。尽管波拉斯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王，但这个国家与波斯帝国有同盟关系。

按照亚历山大的逻辑，不征服波拉斯的国家，便不能算是征服了旧波斯帝国全境。

亚历山大的做法是首先尝试以外交解决问题，对印度国王波拉斯他首先展开了外交攻势。他把在征服巴克特利亚的过程中结交的印度朋友作为使节派去了印度。

西方历史记载印度国王波拉斯有成年的儿子。我据此推断他比亚历山大年长10岁。这样他应该在40岁上下，继承王位已有13年的历史。

他当然知道，他派去15头大象参战的高加米拉战役是以怎样的结果告终的。他也知道战役之后大流士三世的结局。

尽管如此，他那刚愎自用的态度似乎并无改变。他这样回复了希腊年轻人的要求：

“如果要来，我们手执武器欢迎。”

这就是不欢迎。在亚历山大看来，这可不是回他一句“哦，是吗”就能过去的。

于是，年轻的国王继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米拉战役之后，走上了发动最后一场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的道路。

他们于公元前327年夏天离开巴克特拉，一边打击不断出没的游击队，一边前进。当年冬天在今阿富汗的喀布尔过冬，翌年开春再向波拉斯严阵以待的今巴基斯坦北部挺进。

那个冬天士兵们得到了休息，但亚历山大和手下的将领们无法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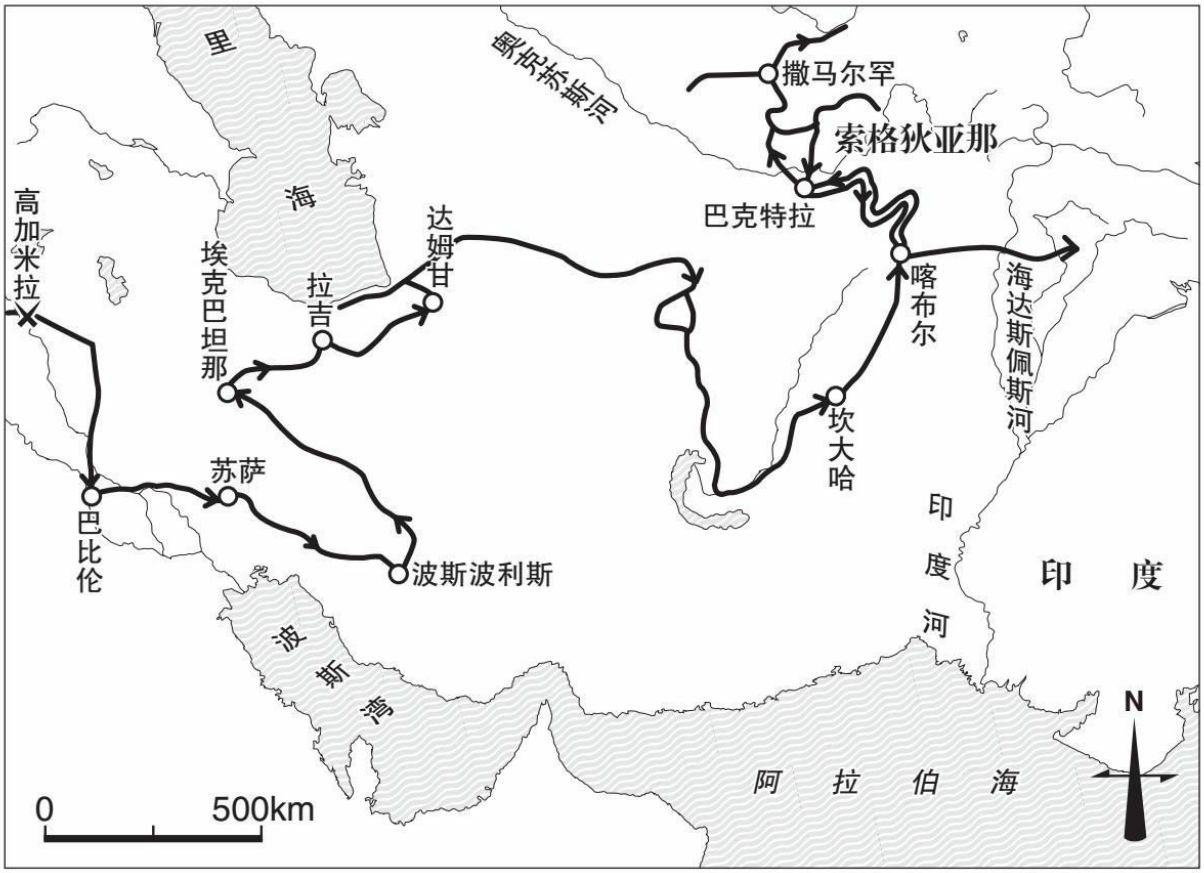
第一，他们要等待从马其顿赶来的补充兵员。

第二，他们要把带来的士兵按特长技能分别编队，对他们加以训练，以便他们掌握在亚历山大手下作战所需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第三，他们要把新老士兵合编起来。先把全体士兵分成小队，再把几个小队合成中队，然后合成大队，进而形成军团，进一步明确指挥系统。这样，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发出的所有命令都能更快、更准确地传

达到末端士兵。“快攻”并不是只有“金刚钻”亚历山大一个人需要具备的能力。做完了所有这些事，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公元前326年春天，东征重启。



从中亚到海达斯佩斯

以前所有战役的战场都不是亚历山大所选，他每次都在敌人选择的战场上作战。想想那也理所当然。因为打过来的是亚历山大，迎战他的一方当然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战场，在那里严阵以待。

根据一拨接一拨派出去的斥候带回的报告，亚历山大得知印度国王波拉斯在注入印度河的支流海达斯佩斯河的东岸严阵以待。这里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直线距离往东有600公里。

还在今阿富汗到今巴基斯坦的行军路上，亚历山大已搞清了波拉斯军队的规模。

步兵5万人，骑兵6000人，双轮镰刀战车500辆，大象200头。

而亚历山大的兵力为步兵4万人，骑兵4000人，没有战车和大象。

听说得知这个情况后亚历山大非常高兴。

他不是因为双方兵力基本势均力敌而高兴。高加米拉战役时敌我兵力有着五倍的差距。他要与敢以势均力敌的兵力应战的对手作战，这让他心情大好。

这是一次同游击队打了很久之后的久违的战役。同不知会从哪里杀出来的敌人相比，这次战役以平原为战场，可以施展战略战术。高加米拉战役后5年才遇到这样的战役，他当然高兴。

可是，亚历山大也有误算之处。

在高加米拉战役曾有15头大象，而这次海达斯佩斯战役增加到200头。亚历山大以为这只是简单的数字不同而已。因为印度是大象的产地，所以波拉斯能带来为数众多的大象。

然而，量变导致质变。

高加米拉战役时，印度是应波斯国王的请求派大象去参战的。现在不同，波拉斯亲自指挥军队参加海达斯佩斯战役，他调集了惯于战斗的大象200头。

首先，这些大象体格巨大，而且已经习惯了战场，即使被枪刺到或被箭射中也不会轻易失去自制力。它们不会轻易发怒奔跑。

另外，象兵的技能也格外高超。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大象刚开始发狂奔跑，象兵就慌了手脚，用匕首去刺大象的要害，使大象失去战斗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

这200头大象以及象兵都是打仗老手。亚历山大直到亲眼见到、参

与作战后才悟到它们的威力。

最后的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

公元前326年5月，两军隔海达斯佩斯河对阵。这里是印度河的支流，虽然是支流，河面也有1公里宽，在这个季节仍然水量巨大、水流湍急。

波拉斯面对河流亦即面对敌人，建起了一道200头大象组成的“厚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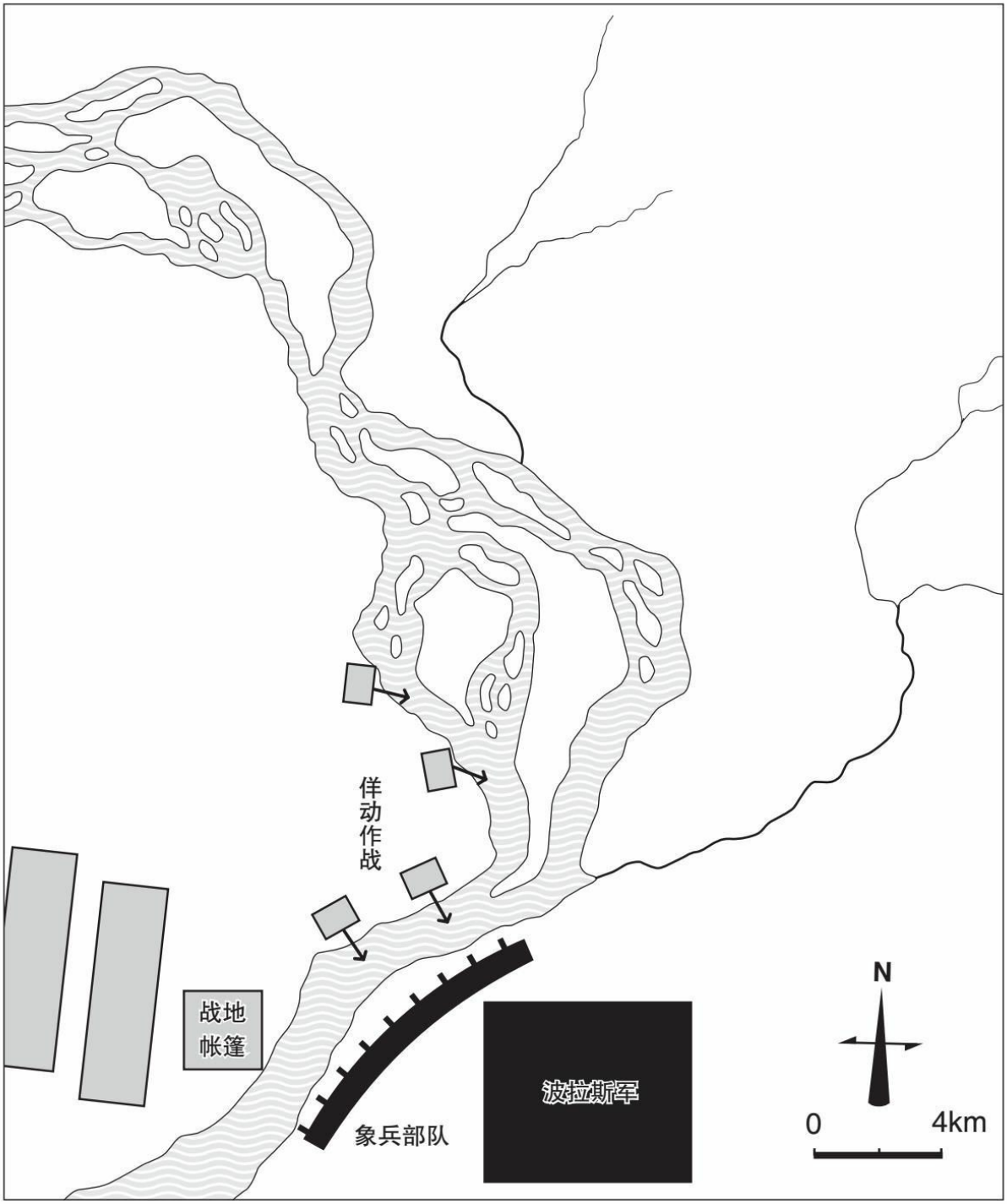
波拉斯想，只要希腊人渡河，就在河岸上把他们一口气踩死。

亚历山大再过两个月就要30岁了。他看到眼前的阵势后陷入了沉思。

首先，他把大本营设在可以隔着1公里宽的河面看到象群的河边。这大本营不过是集中在一起的战地帐篷。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敌人看得见自己。即使在军队需要秘密调动时，大本营的位置也仍然保持不变。

这是亚历山大实施佯动战术的第一步。（见海达斯佩斯战役-1）

“佯动战术”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引人注目地展开无关行动引开敌方注意，使其误解战斗真实意图的战术。”



海达斯佩斯战役—1

这个战术的第二步是让人在敌方散布消息，说亚历山大一方渡河作战要延期到水量减少后的秋季进行。亚历山大把这个消息告诉行军途中

抓获的印度人后释放了他们，看着他们逃回位于对岸的印度军。被敌人俘虏的人回到同胞中间，一定想把敌方的情报传递回去。亚历山大利用他们散布假情报。

波拉斯好像根本不懂搜集情报的方法，居然相信了这一套。

随后，亚历山大施展了更加细腻的演技。他让自己的军队行动起来，假装要渡河进攻，让士兵们发出嘈杂的喊叫声。

波拉斯疑惑了，延期到秋季渡河的情报和眼前见到的骚动，哪一个才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的行动呢？

因此，波拉斯彻夜无法撤回后方休息，因为眼下对岸骚动不止。

亚历山大在不同的日子会在不同的地方搞这种佯动渡河的作战，而且一搞几天。

亚历山大每次一动，波拉斯就不得不派士兵去迎战。他不知道这是佯动，只能每次派兵迎战。

10天的佯动以后，波拉斯的心理陷入了“老说狼来了，谁都不再相信”的状态，即使对岸再有渡河骚动，他也不再调兵遣将。波拉斯的迎战心理出现了松懈的迹象。

而亚历山大在这期间去摸索了哪里容易渡河，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

这个地点位于大本营上游20公里处。那里河面狭窄，不到500米宽。河流向东转个大弯逶迤而去，距离波拉斯的大本营有50公里之遥。在全军渡河完毕之前，希腊人不希望被敌人发现。

亚历山大决定在那里渡河，他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在司令官到小队队长的全体指挥官面前，亚历山大像往常一样向每个人下达了明确而具体的命令。

首先，他把全军一分为二，第一军由亚历山大统率渡河，第二军交给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指挥。

亚历山大给克拉特鲁斯的命令是：留在大本营，看到对岸头朝自己的200头大象调转90度后立即就地渡河，渡河完毕后立即从敌军背后发起进攻。

这样，亚历山大率领第一军从20公里外的上游渡河，从那里向敌人严阵以待的下游发起进攻，向敌人放出“诱饵”。这是一种第一军和第二军对敌人形成夹击的战术。

为形成夹击之势，第一军只是开始时当“诱饵”，后面必须迅速转为攻击主力。

亚历山大把骑兵军团4000名骑兵中的3000人配给了第一军。各大队的指挥官是学友伙伴赫菲斯提安和佩尔狄卡斯为首的年轻一代。

亚历山大留下的名言是，胜利属于始终掌握主导权的一方。第一军有不满30岁的亚历山大以及骑兵和专事进攻的步兵这些精兵，从指挥官到士兵都是年轻人。要在战场上持续掌握主导权，速度决定一切。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以天黑为信号，第一军开始北上，奔赴渡河地点。他们在黑暗中离开，让帐篷保持原样，帐篷前的篝火依旧燃烧。

抵达渡河地点时天还没亮。黑暗中，赫菲斯提安让人把事先造好的大量小船运到河边，为的是把这些小船排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建造舟桥。

亚历山大两年前就命令赫菲斯提安开始制造小船。也就是说，刺杀克雷托斯之前的公元前328年，印度河之战就已在亚历山大的脑中。

受命于亚历山大的赫菲斯提安以年轻的国王根本没有想到的办法完成了使命。

小船全部是组装式的，只要它们能够支撑铺在上面的木板就行，因为人不用乘坐这些船去下游。小船需要时组装起来，拆开即可运走。

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了工兵。他们隔开适当间隔把组装好的船连接起来，在上面铺上备妥的木板，完成了舟桥的建造。

很快，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渡河作战开始了。

士兵们渡过500米宽的河，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亚历山大严命不许出声，部下当然服从，甚至连马都服从，真令人忍俊不禁。然而，他们立刻发现了问题。

亚历山大满心以为己方已经渡过了海达斯佩斯河，却发现他们只是到了河里的一个洲岛。从河这边观察，亚历山大看不到对岸。

难道只是上了洲岛吗？众人无语，但没有一个人想要退回去。这里到对岸的距离应该和刚才的距离差不多，然而河很深，只要看一眼缓缓的水流，大家就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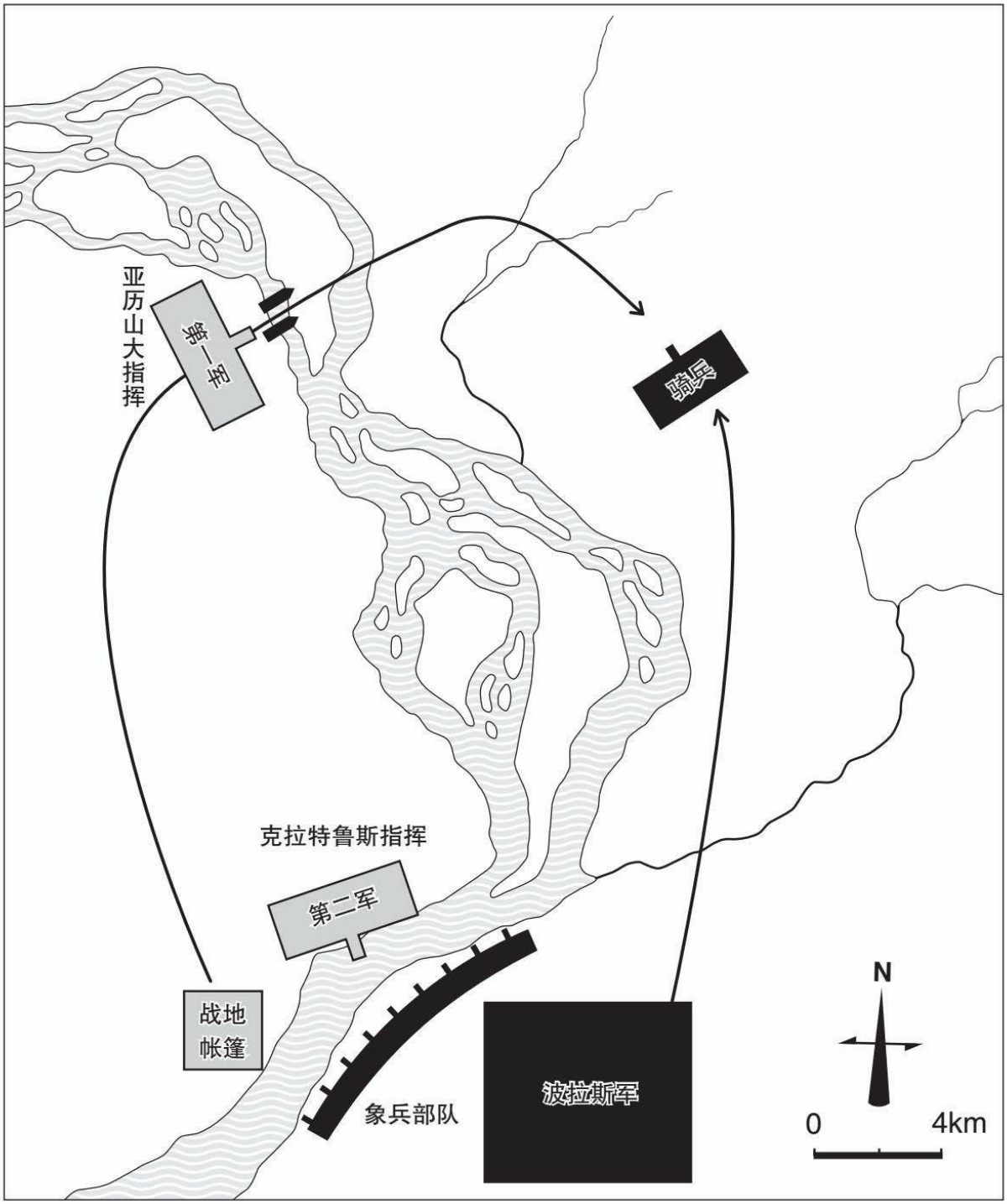
面对眼前的河流，士兵们个个沉默不语。这时，亚历山大的声音在他们头上响起。

“我们连达达尼尔海峡都渡过来了，还能让这般小河挡住我们前进吗？”说着，年轻的国王跟爱马比塞弗勒斯开始渡河。

没有一个人想要离开亚历山大。

骑兵骑在马上，只有马头露在水面上，步兵们用双手把武器高高举起，全军跟在国王的后面。所有人都想着要努力渡河。

渡河花去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天已大亮。他们成功渡河而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只能说他们干得太棒了。



海达斯佩斯战役—2

仅第一军士兵的人数就接近2万。这么多人总会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亚历山大军队渡河的消息马上传到了波拉斯那里。

波拉斯终于明白，这次不是佯装渡河。但1公里开外的对岸照样支着希腊人的帐篷，还看得见士兵们来回走动。

波拉斯下不了决心让自己手下的军队全部去迎战亚历山大。

于是，他首先派儿子率领2000名骑兵去迎战亚历山大。

他再把全军一分为二，让一半部队像以前一样监视对岸敌军的动向，剩下的一半人调转90度，前去与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作战。（见海达斯佩斯战役-2）

200头大象也被分为两部分。这影响了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二军渡河的速度。但也拖延了波拉斯布置全军迎战的步伐。

国王儿子率领的2000名骑兵被渡过河便立即布好阵型的亚历山大消灭了，王子战死。

波拉斯没了选择，只能自己率军迎战。

然而，亚历山大这时又抢先一步。消灭王子率领的2000名骑兵之后，他迅速从自己军队中抽出骑兵和相当于“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步兵组成一支混编部队，让年轻的科那斯指挥，命他们迂回到北上而来的波拉斯军的左侧。

亚历山大从前面，克拉特鲁斯从后面，混编部队从侧面三面进攻波拉斯军。剩下的一面临河，河边尽是沼泽地。如果能将敌人的镰刀战车赶进去，就能让现代大型收割机一般的镰刀战车失去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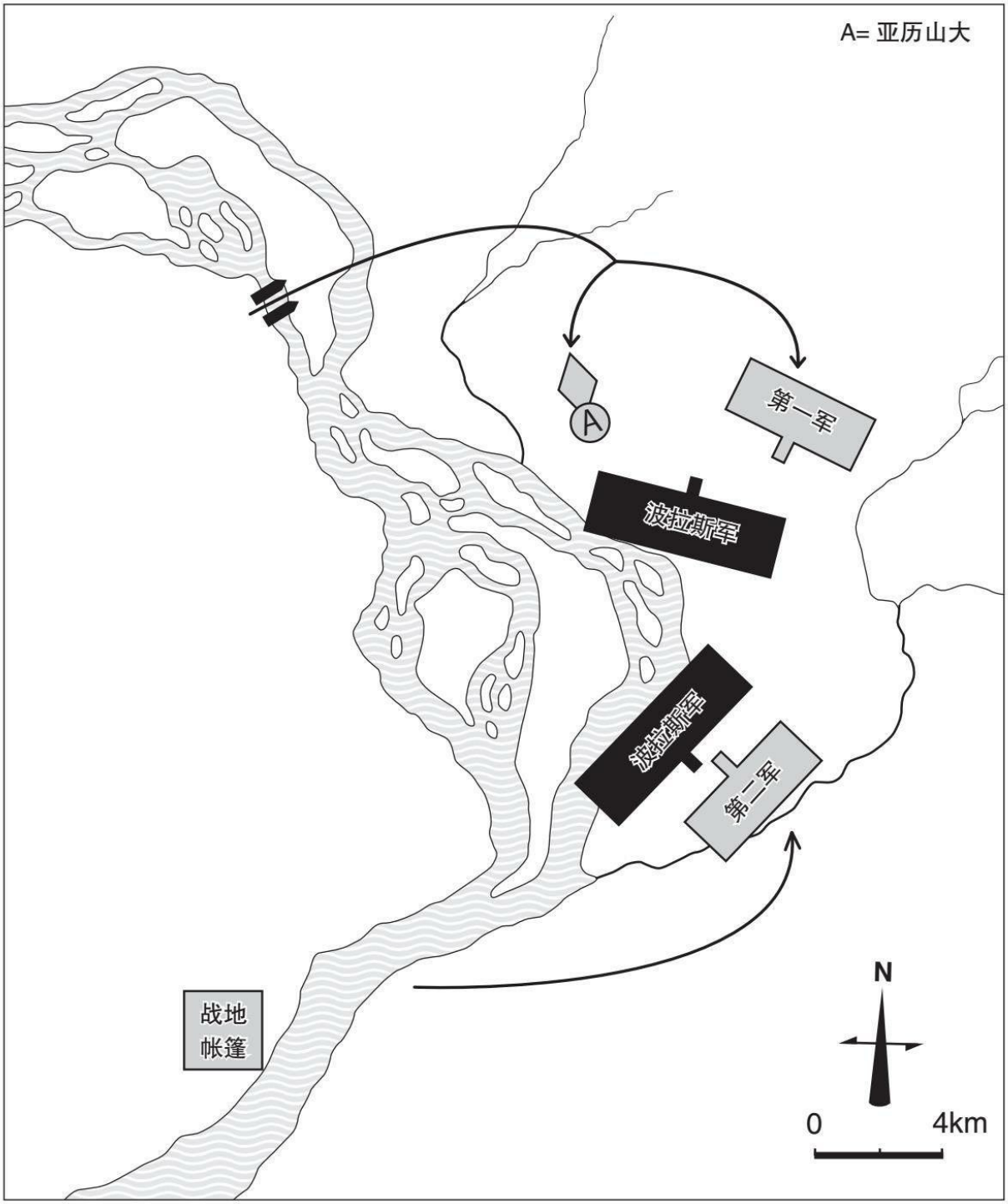
仅提高战略战术的机动性这一点而言，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延续了以往亚历山大经历的所有战役的打法。

亚历山大总是胜利者的原因在于每场战役他都会有进步。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军团是让波斯人都崇拜的“品牌”。

腓力改进了重装步兵军团，创造出巨型刺猬般的“马其顿步兵方阵”。

现在轮到亚历山大。



海达斯佩斯战役—3

亚历山大在军事方面的改革不仅限于有机地利用骑兵和步兵，还在于把骑兵和步兵分成小队。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提高机动性。提高机动性

必定会导致装备的轻量化。

在亚历山大的军队里，盾这个重装步兵的标志也小型化了，他们不再使用斯巴达那种大型盾。

因马其顿方阵而驰名的长矛被称为“马其顿长矛”（sarisa），它有近7米长，现在也改成了普通的长度。

缓缓前进的步兵长方形方阵，以其大型化形成马其顿方阵的威力。现在，马其顿方阵也被亚历山大分成众多的分队。

部队的装备更轻，武器更好用，分成小队后反应灵敏，这就是亚历山大实行改革的结果。后来的罗马军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了这些，只进行过小小的改良。

那么，海达斯佩斯战役实际上展开的情况如何呢？

实际战况是除了亚历山大对大象作战之勇猛产生误判，其他都按照他的预料展开。

因轮子陷入泥沼，镰刀战车接二连三地失去战斗力。波拉斯见状只好让留在河边的另一半军队也加入进来，全军迎战亚历山大。

大象在战场上的威力源于象群集体前进。而波拉斯的象兵是开始时的一半要等后面来的另一半，因而做不到集体前进。

在这期间，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二军已经成功渡河，开始了围歼战。（见海达斯佩斯战役-3）

惯于征战的象群很老练，被包围了也不怯战。箭和矛也只能在大象的巨型身体上造成一点擦伤而已。即使大象被一头头地隔开，任何敌人想靠近，都会被它用长长的鼻子卷起来摔出去，再被它的脚踩扁。所

以，接近大象很困难。

正因大象如此勇猛，所以波斯国王乘战车，印度国王骑大象。面对如此象群，亚历山大没有放弃。飘扬在他头盔上的白色翎子，在身躯庞大的大象面前看上去像是一只翩翩飞舞的白色蝴蝶。

亚历山大几处负伤。波拉斯骑在大象背上亲自指挥。他受到马其顿士兵的标枪和弓箭的集中攻击，因出血过多开始失去意识。但波拉斯没有逃跑。

不知为何，象兵没有注意到，而大象注意到了主人已经浑身是血。

一直载着国王的这头大象体格比其他大象更大。这头大象前腿弯曲着地停了下来，可能是想把受了伤的主人放下来。

这是一个信号。在印度，大象都受过训练，如果国王骑坐的大象前腿弯曲停下来，其他大象都会跟着这样做。

刚刚开战时有200头大象，战斗中死了一些，减少到85头。这85头大象全部前腿弯曲停了下来，海达斯佩斯战役就此结束。

在象群的后面，被马其顿军的箭射中和被矛刺中倒下的印度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被大象踩死的马其顿士兵的尸体也散落其中，数量大约是印度士兵的二十分之一。

亚历山大起初以为波拉斯死了，便派兵前去收尸。

大象看到这些士兵向国王靠了过来，突然站立起来，用长长的鼻子卷起国王的身体，把他放回安装在象背上的王座，似乎不让敌兵碰国王一根手指头。

亚历山大见状很感动。

海达斯佩斯战役以亚历山大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失血过多丧失意识的波拉斯成了俘虏。

亚历山大命令象兵把国王再次放到地上，然后让马其顿军的医生团队进行急救。

急救结束之后，亚历山大首次与波拉斯碰面。

年轻的国王向波拉斯问道："您希望我如何处置您？"

波拉斯躺着答道："不论死活，请把我当作国王对待。"

亚历山大决定给波拉斯国王的待遇。

第一，释放国王而不收赎金。给予所有生还的士兵自由。海达斯佩斯战役因此没有俘虏。

第二，承认波拉斯过去统治的所有小国今后依然是波拉斯的属国。

第三，印度国王波拉斯从此以后成为马其顿和波斯国王亚历山大的盟友。

我觉得，也许亚历山大和波拉斯在第一次碰面时就产生了相互信任吧。

波拉斯没有从战场上逃跑。仅此一事，按亚历山大的想法，波拉斯就比大流士适合做国王。

波拉斯战败而亚历山大仍把他视为国王。波拉斯也立即回报了亚历山大。

他提出要提供三种帮助，帮助年轻的国王实现梦想，横穿印度直抵恒河。

第一，提供若干印度人做向导，由波拉斯担保他们值得信赖。

第二，提供在此次战役中生还的勇敢战斗的85头大象外加50头，共计135头大象，以及所需的全部象兵和饲养人员。

第三，提供从波拉斯军中选拔出来的5000名印度兵。

可以想象，这样的体谅与两位国王的地位相匹配，这让年轻的胜利者心情不错。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又成为胜利者。

波拉斯损失了23000人，而亚历山大仅损失了1000人。

与以往的战役相比，这次亚历山大的损失较多。亚历山大给遗属与生还者一样的免税优惠，但这并不会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因为以前战役的战死者通常是以百人为单位计算的。

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亚历山大还失去了爱马比塞弗勒斯。

这匹名为牛头之意的比塞弗勒斯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这匹马体格健壮，奔跑起来任何马都追不上它的速度。亚历山大把这匹马当作“只带上战场的马”，这在欧洲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比塞弗勒斯之于亚历山大是“可托付生命之马”。

亚历山大18岁第一次上战场的喀罗尼亚战役，21岁时的格拉尼科斯战役，23岁时的伊苏斯战役，25岁时的高加米拉战役，以及29岁时的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在所有的战役中，亚历山大都把性命托付给了这匹马——比塞弗勒斯。

从邂逅到现在，整整17年，亚历山大和这匹马一直保持着人马一体的关系。

在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中，比塞弗勒斯完成了一匹被人托付性命之马所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打完仗回到营地，主人在大帐前下马后，比塞弗勒斯立即倒地，再也不动了。等亚历山大听到士兵的叫喊声回头看时，比塞弗勒斯已经断了气。

作为马匹，比塞弗勒斯已属老年，它在死前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亚历山大会因敌人的大象对波拉斯表现出的忠心而感动，他对比塞弗勒斯之死的感受绝不仅仅是感动。他决定在打这场战役的地方建设一座新城。

这座城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命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而是被命名为“比塞弗勒”（Bucephalia）。

年轻的国王并没有为爱马之死悲伤得不能自拔。他面临着自己从未想到过的事件。

士兵们得知波拉斯要为亚历山大横跨印度提供帮助后，发生了恐慌。亚历山大手下的士兵突然罢工了。

士兵拒绝从军

代表罢工士兵向亚历山大施加压力的是科那斯（Kenos）。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把科那斯提拔为骑兵和进攻步兵混编部队（即现在意义上的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把迂回到左侧进攻波拉斯主力部队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是亚历山大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科那斯不但因此取得了亚历山大的信任，士兵对其的评价也有所提高。

科那斯对亚历山大说：

“我们一定会紧紧跟随你的。但自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这8年我们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度过的。我们已经身心俱疲。再向东去，我们实在太受不了。”

这不是拒绝战斗又是什么？百战百胜的亚历山大竟被他称为战友的士兵们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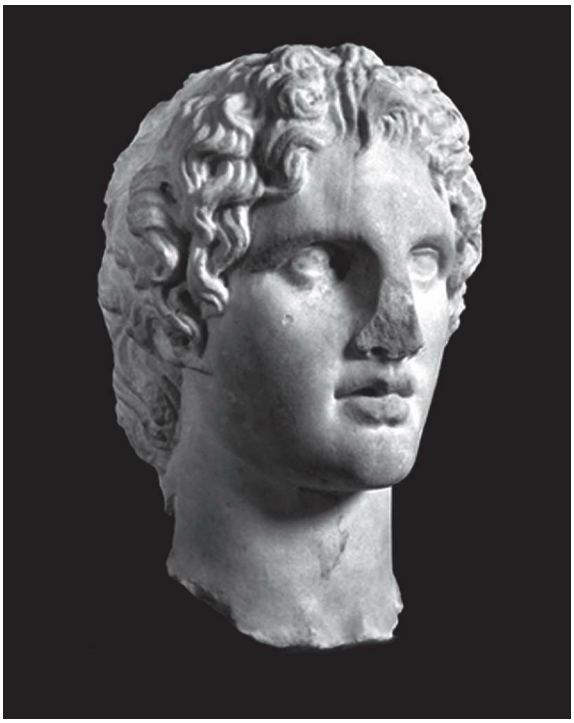
然而，亚历山大不能说，你们不干我就换波斯人干。他依赖的还是马其顿士兵。士兵们年轻，亚历山大也年轻。大家都是年轻人，不会轻易让步。双方各不相让，事态严重的风险大增。

对科那斯的情况说明，亚历山大只“哼”了一声就回大帐去了。

亚历山大虽然嗤之以鼻，却心生一计。

他决定模仿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景仰的英雄阿喀琉斯。

荷马创作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不满进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专横，呆在自己的帐中不再上战场。《伊利亚特》开头便落笔于阿喀琉斯对不了解他心情的同僚们的愤怒和哀叹。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也学阿喀琉斯的样子呆在帐中不出，但结果却不似《伊利亚特》那样。亚历山大在大帐里待了3天，士兵们没有反省，强硬的态度没有变化。

第4天，面对集合的士兵，亚历山大说：

“你们成功地让我做了一件任何战斗、任何敌将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你们想回家了，好吧，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士兵中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得到满意的答复。然而，他们的理解太肤浅了。

他们的国王虽然同意他们回家，但他接着说：

“不过，由我决定回哪里和怎么回。”

士兵们忘记了，亚历山大拥有非凡的好奇心，他最厌恶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他们还忘记了，亚历山大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多么辛苦，都有坚持到底的坚韧、坚定和顽强的精神。

印度河

亚历山大不愧跟随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学习过。

士兵们拒绝前进的理由是不愿意渡过印度河继续东征，但并没有说不愿意沿印度河顺流而下。如果顺流而下，拒绝前进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

亚历山大想知道，印度河究竟是像当时希腊人想象的那样流入湖泊，还是流入大海。

士兵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王会有如此狡猾的想法。他们充分享受了亚历山大给他们的一个月的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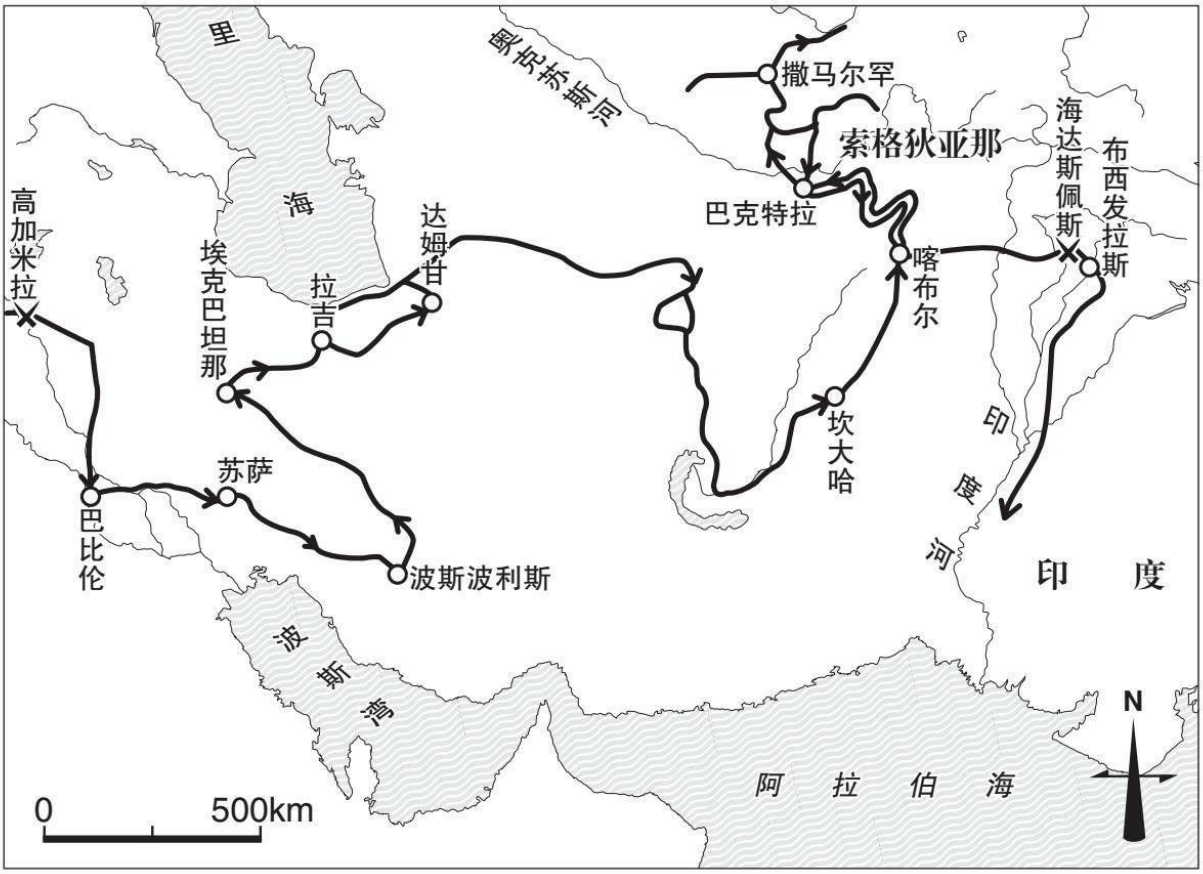
但在这既无战斗又不行军的一个月中，士兵们还是闲不下来，被拉去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马其顿的年轻人下令在自己脚踏过的最东方，建造一座壮丽的石碑，献给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

士兵们欢欢喜喜地参与了这项工程。他们认为，国王想在踏上归途之前留下证据，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来到过这里。

纪念碑落成。人们在碑前举行了焚牛献给诸神的感谢仪式。仪式结束后，士兵们才知道了亚历山大的真实意图。他们被告知，接下来的行军计划是沿着印度河南下。

如果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向西大约两个月他们就可以结束行军了。南下则要绕个大圈子，回家得花上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想回家的是士兵，亚历山大从未想过回家。



挺进印度河河口

就这样，他们开始沿着印度河向下游行军。这一带相当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是另一位印度人国王的领地。

这位国王与波拉斯有亲戚关系，他把进入自己领地的亚历山大的军队视为侵略者，坚决予以抗击。

他并没有像波拉斯那样出来会战，亚历山大只能攻打这位国王坚守不出的城池。

隔着城墙打攻防战，起初的进展并不理想。亚历山大不耐烦了，冲到城墙下面，像往常一样战斗在最前线。

说时迟那时快，城墙上射下的一支箭射中了亚历山大的胸膛。因为

只有他一人头戴白翎，他成了靶子。

亚历山大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枝箭深深扎进他的胸口，眼见得他的脸变得苍白起来。

在他身边作战的士兵们赶了过来。他们明白国王负了重伤，濒临死亡，而附近连个医生也没有。

慌张中，一个士兵用脚踏在倒地不动的国王的胸部，卯足了劲把箭拔了出来。他以为只要把箭拔出来就好了。

然而，这样做是不行的。

东方的箭做得像小鱼叉一样。

如果胡乱拔箭，周围的肉会被全部拽出来。

大量的鲜血从胸甲下面涌出。

等医师赶来的时候，国王已经昏死过去。

士兵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国王被担架抬走，同仇敌忾，一心报仇。没有任何人下令，全体士兵全都转入了总攻。城主号称国王，其实不过是个部族首领。在心中燃烧着复仇之火的马其顿士兵的总攻下，城池陷落了。

攻陷城池之后，士兵们心头的怒火仍不能熄灭，他们用箭和矛杀死了城内所有的居民。马其顿的士兵们左一个右一个地边走边杀，一心想为自己死去的国王报仇。

然而，亚历山大没死。

我们不知道是医师如何施救的，但他们确实拼尽全力。

据说波拉斯送来了印度药。亚历山大伤虽重却只是外伤。幸运的是，箭似乎并没有伤及内脏器官。

占卜师向诸神祈祷，却不灵验。人们只能等待30岁国王的肉体凭自己的力量自然痊愈。

医师已无计可施，只能让大家保持绝对安静。

以前亚历山大曾多次负伤，但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

他恢复了神态但意识朦胧。由于大量出血，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他趴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谁都看得出他伤势严重。

亚历山大的大帐周围静得出奇，只有医师和高级将领进出。士兵们离得老远围着大帐，十分不安。

没有人向他们介绍国王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国王已死，认为医师和将军们秘不发丧。

一天天过去，士兵中间弥漫的这种不安以及由此而生的恐惧濒临爆发。他们哭着，开始喊叫国王已死，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如此地步，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出面解释，说国王虽然伤重但仍活着，但仍不能平息事态。

士兵们的哭喊声传进了在大帐里卧床的亚历山大的耳朵。

士兵可不是只有几百人，他们的数量超过了4万人。虽说他们是担心过头，但要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谈何容易。

亚历山大下令备船，同时命令集合士兵沿河列队。

他想躺在担架上上船，让沿岸列队的士兵们看到他的身影，从而消

除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亚历山大很顺利地上了船。

船载着亚历山大，开始静静地沿河向下游划去。

可是，只是看看躺在船上的亚历山大，士兵们的不安和恐惧并没有消除。

看着士兵们默默地望着自己，亚历山大略抬起上半身，向他们挥起了双手。

这是为了表示自己还活着。

这样才好不容易有了效果。虽然是躺在船上的床上招手，但士兵们见状终于放下了心。

士兵中间响起了欢呼声："国王！国王！"欢呼声随着船行在河岸上响起。

这些士兵与两个月前向亚历山大提出拒绝前进的是同一拨人。

两个月前代表这些士兵向亚历山大陈述拒绝前进理由的科那斯队长，在这天的游行结束后又代表士兵们向疲惫至极的亚历山大说：

"如果没有您，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请您承诺，再也不要在最前线战斗了！"

不过，他很快就悟到了，亚历山大一点儿都没听进去自己的进言。

但是，这次亚历山大听从了医师们的忠告。他听医师的话保持绝对安静，但这安静只是肉体上的，不是大脑里的。

探险未知之地

刚进入公元前325年，结束恢复期重新站起来的亚历山大宣布了回哪里和如何回的具体办法。

全军超过4万人被一分为三。

第一军由年长的2万人组成，在克拉特鲁斯的率领下向西进发。

第一个目的地是亚历山大已经征服并建设的城市——“亚历山大·阿拉科西亚”，即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

这件事表明，第一军要确认并在必要时修正征服后阿富汗一带的统治体制。在亚历山大征服的整个区域内，这一带是统治最为艰难的地方。所以，亚历山大有充分理由把第一军交给第二把手。

这一带已经被征服，第一军是去已知地域行军，不用担心安全。亚历山大决定把组装式攻城器械等重而碍事的物资以及无关人员交给第一军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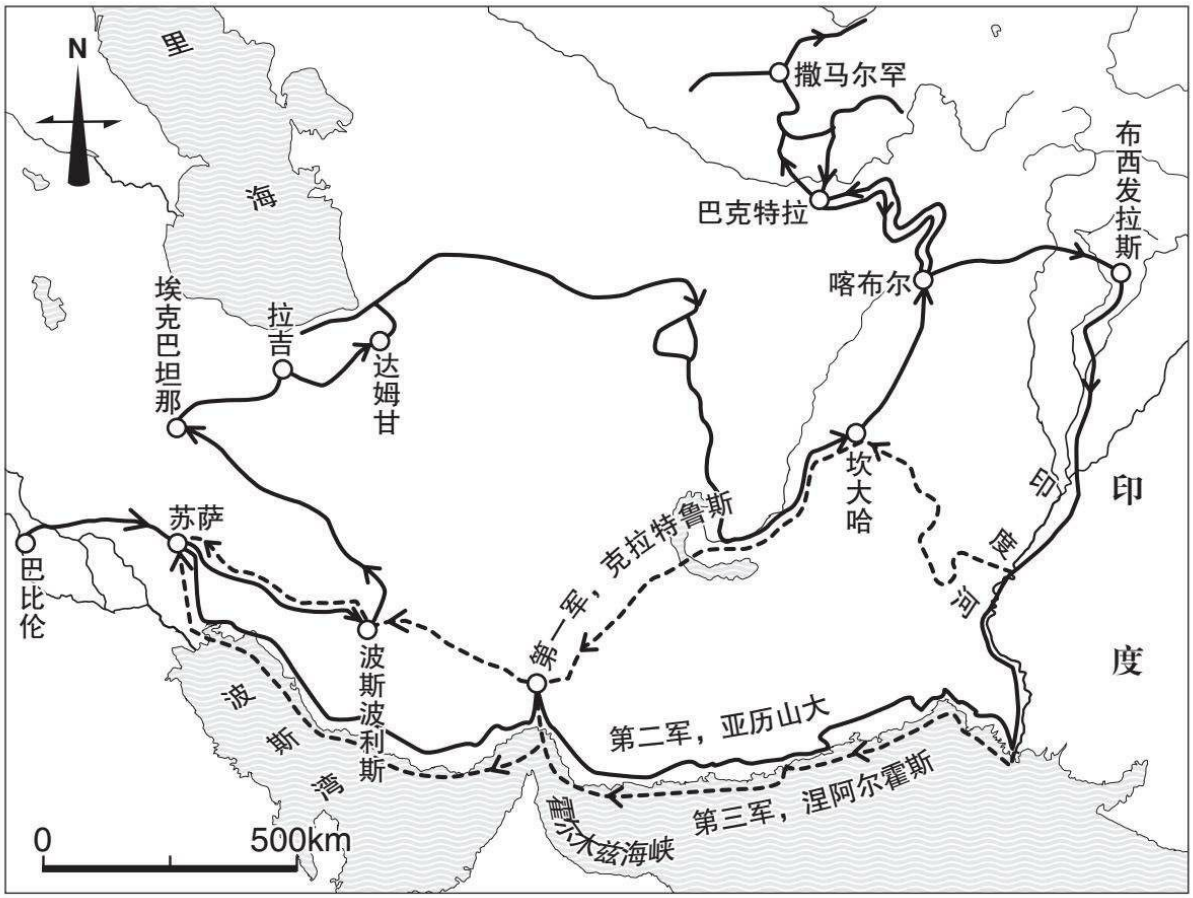
不过，他并没有说第一军路过坎大哈后可以直接回到苏萨。

离开阿富汗后，第一军要进入伊朗东南部，在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与走其他路线过来的亚历山大会师，然后再去苏萨。

尽管克拉特鲁斯是第二把手，亚历山大并没有授予他全权处理权。所有决定由亚历山大一人做出。

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是相当独裁的，而克拉特鲁斯是他理想的副手。

受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上亚里士多德的教养课，克拉特鲁斯一直是亚历山大的学友。他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第二把手的任务，而且对赋予第二把手的任务有着充分的认识。



回苏萨之路

亚历山大自己率领的第二军由1万名年轻士兵组成。

第二军不是去确认霸权，也不是去征服新的地方，称其为探险更为合适。

第二军的路线是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与第一军会师，然后左手向海沿波斯湾东北岸行进，直到看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大河注入波斯湾的河口后，再去苏萨。

在亚历山大时代，连亚洲的波斯人都从未到过这里，更不用说欧洲的希腊人了。

这次行军不算征服之行，尽管现代这一带有巴基斯坦的重要城市卡拉奇，但当时那里不过是一座荒村，连镇子都谈不上，更不是值得征讨的城市。要去这些地方，除探险以外不会有别的目的。

最后一支军队是由剩下的士兵和技术团队组成的第三军。

亚历山大把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克里特岛出身的涅阿尔霍斯。

第三军形式上走的是与第二军并行的路线，但是在海上从印度洋进入波斯湾，从那里北上。

亚历山大已经远征到了人迹未至的地方，归途还要走人所未走的陆路和海路。

简单地说这是强烈的好奇心使然，但亚历山大这个人又非常讨厌徒劳无功。这样说的证据是尽管他踏上了归途，却还要照例在那些从未到过的地方建设“××地区的亚历山大”城。如果说这是为后人考虑，那就是所谓的先期投资，其效果会在他死后得到验证。

公元前325年2月，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亚历山大号令全军，花3个月的时间为三个方面军的行军做准备。如前所述，三个方面军的作用各不相同，出发准备工作要根据它们各自的作用来。

6月，第一军在克拉特鲁斯的率领下首先出发。

第一军出发后一个月左右，第二军和第三军开始沿着印度河南下。

8月抵达印度河河口。在这里，亚历山大和涅阿尔霍斯之间有一段对话，别人听来绝对会笑话他们。

面对汪洋大海，亚历山大问涅阿尔霍斯道：

“这究竟是大湖，还是大海啊？”

亚历山大毕竟生长在内陆国家马其顿，所以才这么询问出生于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涅阿尔霍斯。

涅阿尔霍斯用手指沾点水舔了一下，回答道：“这是大海。”

靠这种程度的知识去探险，亚历山大肯定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绝对不容忽视的季风现象了。受季风影响，第三军虽然已经建好船队，却只能等季风季节过去后才能出港。于是第二军只好先行出发了。

亚历山大鲁莽却不草率。为去未知之地，当时能考虑到的事情他都毫无懈怠地做了准备。

首先，只带体力好的年轻人去。

其次，让他们严守纪律，所以没有发生散兵游勇抢掠、强奸这类会激起当地居民敌意的事情。

再次，给全体士兵以平等待遇，包括统率他们的亚历山大在内。

最后，行军时尽可能走能见到大海的地方，没有比深入未知之地更让士兵恐惧的了。人是一种看到大海便会放心，被包围便会不安的动物。

这毕竟是探险之行，不会不出一点预料之外的糟糕事，其中之一是在沙漠里迷路。

人们没有想到会迷路也就没有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到了知道迷路的时候，亚历山大便拿出他的对策付诸实施。

骑兵，包括亚历山大在内全体下马，把步兵背着走的行李全部放上马背，全体人员就都成了步兵。

在夏天的烈日之下，带来的水全部喝光，但所有人忍着干渴继续前行。

在临时休息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泉水。但水量少得可怜，不能为所有人解渴。

士兵们把水盛在头盔里，端到亚历山大面前。如果分给所有人喝，那每个人一滴水也摊不上。士兵们想这水至少要先让国王喝。

年轻的国王接过水来。士兵们都在直勾勾地仰望着他。

亚历山大把拿在手里的头盔倒扣了过来，里面那少得可怜的水把他脚下的一小片沙子打湿了。

什么话也不必说。他不说，士兵们也都理解。国王迈开步伐，士兵们默默地跟在后面。

就这样，他们走完了从巴基斯坦南部海岸到伊朗南部海岸的未知之地。

这是欧洲人在这里的首次探险。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旅行，却没有一个人牺牲。

这一年冬季来临时，亚历山大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一个小城。在这个小城里，他们终于与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一军会师。第一军的规模超过了2万人，但也没有一个人牺牲。

转年到公元前324年。这年2月，由涅阿尔霍斯率领的海军也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因为季风拖到10月份都没能出发。三军在两大河的波斯湾入口处会师。

从这里开始，他们将进入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区。花费一年多时间进

行的未知土地的探险之行就此结束。

抵达苏萨的时候已经是仲春季节。

公元前334年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的“东征”终于在10年之后的这一年结束了。

亚历山大已经31岁。

同化战败者与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

31岁的亚历山大时隔6年回到文明城市苏萨，终于能够享受久违舒适的生活环境了。但只有士兵能够饱享休假的愉悦，领导人不行，一堆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正等着他们。

其中包括处理未能按要求执行任务的波斯人高官。

6年前，亚历山大出发追击逃跑的大流士，前去征服波斯帝国的东部时，任命波斯人担任后方几个地区的统治者，即“总督”。

这些总督中有几个人掌握了超越权限的权力。不知道他们是想钻“山中无老虎”的空子，还是暗自盼望前往中亚的亚历山大在同游击队作战时被打死。

总之，他们超越了应有的行政权，雇佣私兵，拥有了军队。

这完全违背了亚历山大的初衷。波斯帝国时代的总督是将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一把抓的，亚历山大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保留了总督的官名，但总督只能负责行政事务，军事事务交由马其顿人、征税等财政事务交给了希腊人管理，权力一分为三。

而且，有越权行为的并不止总督。负责财政的人本来任务只是公正收税，却渐渐出现了暴敛私财之人。

这是当事人没有公共事业心的表现，但公共事业心是希腊人的发明，不是东方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亚洲人没有公共事业心，不过一般而言是比较欠缺的。民主政体也是公共事业心的产物，也源于希腊的政治理念。

亚历山大向来憎恶违法乱纪。他认为，违法乱纪是统治庞大帝国的最大敌人。

对查明有违法行为的人他立即予以撤职严处。然后他任命以马其顿人为主的希腊人替代他们。暴敛私财的主犯逃到了希腊，但被亚历山大派去追捕的人杀死。

他们全都背叛了亚历山大对他们的信任。一般人必定会因此陷入不相信任何人的心理状态。

可是亚历山大不是这样，他说：

> 欧洲和亚洲如今已是一个国家了。
>
> 你们所有人都和我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你们都是我的士兵，也是我的朋友。
>
>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
>
> 你们所有人，已经共同拥有了在一个国王之下和平生存的命运！

亚历山大是一个会巧妙掌控人心的人。他懂得说服众人光靠抽象的理论是不够的，还要用具体形式体现出来。

于是，在春光烂漫的苏萨举行了一场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大型活动。

他举办了一场1万名马其顿将士与1万名波斯姑娘的集体婚礼。

在战斗中，担任“金刚钻”的总是亚历山大。在集体婚礼上，亚历山大又站到了前头。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大流士有两个女儿。亚历山大同他的长女结了婚，又让次女和赫菲斯提安结了婚。

他还安排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与斯皮塔米尼斯的女儿结婚。斯皮塔米尼斯是索格狄亚那的总督，也是杀害大流士的凶手之一，后来因亚历山大的追击，他被自己人背叛杀死。其他的将士跟随在他们的后面。

这简直就和打仗一样，亚历山大冲锋在前，突入敌阵，骑兵军团紧跟其后，不让国王孤军奋战。

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战斗中他们杀向敌人，而婚礼上是冲向东方女人的酥胸。

亚历山大不是已经与罗克珊娜结婚了吗？还有，不是说马其顿将士们都有妻子，东征前留在了国内吗？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亚历山大不在乎。

同化战败者和由此实现民族融合才是他最重要的政略。

实际上，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已经着人组建了一支由波斯年轻人独立组成的3万人的军团。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与邻国伊庇鲁斯的公主所生的混血儿，不易受马其顿传统束缚，即使如此他这事办得也太不像话。

首先，士兵是奉命结婚。其次，几乎所有男人都是重婚。

更加岂有此理的是，据说他对与波斯姑娘结婚的马其顿将士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的妻子以及你们与妻子生的孩子都要留在波斯。如果是男孩，就得让他接受马其顿式的教育。”

这不就跟只要配种，其他都不管一样了吗？

不过，我们不知道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否尽到了这个义务。与亚历山大结婚的波斯公主虽已成人，却没有一点怀孕的征兆。赫菲斯提安的妻子也一样。克拉特鲁斯似乎尽到了责任，此后他的血统被亚历山大死后诞生的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强国继承了下去。

不过，这是少有的例外之一。

亚历山大同化战败者并借此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随着他的死去烟消云散。

等到后来罗马强盛，他的这个梦想才成为了现实。

罗马人是一个现实的民族。这个民族宁愿通过制定法律使其制度化，走质朴而踏实的道路，也不会选择由一个人做出暂时性的创举。

因为再好的政策也不免会被制定这项政策的人的命运所左右，不能持续。他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罗马人是这样同化战败者和实现民族融合的。

要成为罗马主力军团的士兵，首要条件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握有罗马帝国主权的人不是被称为“将军”（imperator）的军队最高司令官，也不是皇帝，是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帝国规定，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负得起保卫罗马帝国安全的责任。

军团士兵的服役年限是从17岁起的20年。当兵期间他们要在基地里过集体生活，不允许结婚。

不过，罗马人是现实的，当兵期间士兵可与居住在基地外的女人交往，对此国家不止是允许，甚至是鼓励。罗马军团的基地当时都设在被

称为“Limes”（古罗马的边境）的帝国边境上，现在其中一些地方成了维也纳、布达佩斯这样的首都。

也就是说，与军团士兵相好的女人都是被罗马征服的战败国的姑娘。军团士兵与战败国的姑娘会有孩子。

军团士兵到37岁服满兵役退伍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和长年交往的女人结婚。当然，他们生的孩子都会成为罗马公民。这些孩子成年后将获得与祖辈都是罗马公民的人同等的待遇。

当然，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待遇而去当军团士兵，是这些孩子的自由。为退役军人和当地居民着想，罗马在军团基地附近通常建有城镇。如果这些人想进入商界，他们可以住在城镇中，专门与军团做生意，这也是他们的自由。

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一书时我曾想过，这已经成为混血儿的量产体系。

然而，罗马同化战败者的方法还不止于此。

在罗马时代，被罗马征服的人称作“行省居民”（provincialis），他们也会被充分用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工作。

在军团基地里，还有数量几乎与主力军团士兵同样多的辅助兵。他们是行省出身的人，在罗马人看来就是战败者。他们的兵役期比军团士兵长5年，为25年。

当他们服满兵役退伍时，罗马会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像是给他们发放退休金。当时，“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不断扩大，有很高比例的士兵会干到退役期满。罗马公民没流一滴血，就把这些人收为罗马公民了。

这些人的孩子当然也拥有罗马公民权。授予国家防卫人员的罗马公民权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世袭权利。

罗马因尤利乌斯·凯撒提议设立的法律改变了做法，开始把罗马公民权授予教师和医师。不论战败者还是肤色不同的人，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人都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享受免除直接税的优惠。

不过这种公民权只限一代人享有。儿子也从事教师和医师的职业，才可以继承公民权，这和授予防卫人员的世袭公民权有所不同。

罗马军团不仅是混血儿的量产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座同化战败者进而融合各民族的大型工厂。

罗马人从先行者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拒绝接受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对公民权的看法。

在希腊，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国家都只承认双亲均出生于本国的孩子拥有公民权。

柏拉图的父母都是雅典人，所以开设“学院”时，他可以购买周边的土地建校。

相反，亚里士多德开设高中，为培养雅典人的一般教养做出贡献。他因为出生于马其顿而没有雅典公民权。雅典禁止外国人拥有不动产。所以开设“吕克昂学园”时，亚里士多德只能长期借土地办学。

这是因为希腊人思想中的公民权是一种“既得权”。

而罗马人思想中的公民权是“取得权”，是一种只要为罗马尽心尽力，不管是谁都可以获得的“取得权”。

亚历山大是希腊人，还不具备罗马人的那种公民权思想。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感觉的，尽管并不清晰。

由于有亚历山大，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才会被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

即使在罗马，同化战败者以求民族融合的战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也曾招致过强烈的反对。

尤利乌斯·凯撒把元老院（相当于今天的国会）的议席授予他征服的高卢实力部族的首领，元老院内的保守派由此都成了他的敌人。他最后遭到了布鲁图一派元老院议员的暗杀。

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44年，从亚历山大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的年份算起，在280年之后。

希腊人把其他民族视为“蛮族”，予以歧视。就连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如果希腊人战胜了，那他们就应该是统治者，战败的“蛮族”应该是被统治者。

亚历山大试图消除这种歧视。

罗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歧视。

亚历山大并非死于暗杀，他死后没有接班人继承他的思想。凯撒虽被暗杀，却有接班人。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和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把凯撒的政策法律化并且一贯实行，使其成为了一种制度。

到了凯撒百年之后的五贤帝时代，同化战败者进行民族融合已经成为罗马帝国上下的共识。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作者普鲁塔克写道：

“让罗马强大起来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有成功同化战败者的思想。”

顺便说一句，普鲁塔克是希腊人，因而上面那句话是出自一个被罗马人成功同化的战败国公民之口。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把罗马人尤利乌斯·凯撒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

亚历山大的愤怒

话题回到31岁的亚历山大。

年轻的国王为1万对新人举办了一场豪华集体婚礼。到了夏天，他突然遇到一个重大问题。

士兵们再次造反。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只是士兵拒绝前进，这是一场很容易发展成为叛乱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决定。

即将32岁的亚历山大计划让自己的军队年轻化。

东征以来已经过了10年。跟随他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马其顿士兵中的老兵在10年后的今天已经年逾五旬，他们的人数已接近1万人。

年轻的国王决定让这1万人退伍回马其顿去。当然，亚历山大给予他们优渥的退休金以及特别待遇，为他们全额偿还了累计借款。

然而，这1万人举起了反旗。

在希腊，现役兵的年龄是20岁到60岁。一满60岁，士兵要从现役转为预备役。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这1万人的不满在于60岁前退役意味着被解雇。

他们手中还有大义名分。

有一个传播甚广的流言说，亚历山大打算用波斯人士兵来填补他们回国后留下的空缺。

这对自认为胜者的马其顿士兵来说是不可忍受之事。这已经不再是圆满退役还是被解雇的问题了。马其顿的国王要排斥马其顿人，是想把老兵换成战败的波斯人吗？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

就这样，这1万人的不满引起其他士兵们的同感。这样下去可能会出现马其顿军自行崩溃的危险。

得知情况后，亚历山大孤身深入到士兵中间。面对士兵，他不但没有努力解释，反而暴跳如雷，把三十来岁年轻人的愤怒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据说他这样说道。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直接跟你们讲话，因为我根本没有放弃让你们离开的打算。你们去哪里我不感兴趣。不过，在你们离开之前我要把话撂在这里。

我先说说你们的处境因为先父腓力得到了多大的改善。

在腓力当国王之前，你们不过是山里整天追着羊群跑的穷苦农牧民。日子过得很不安全，你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近邻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蛮族袭来。

腓力让只能兽皮裹身的你们穿上甲胄成了士兵，从山里搬到城里，战胜了过去让你们恐惧的蛮族，把你们培养成无所畏惧的真正的男人。

就这样，你们不仅征服了邻近的蛮族，还因为腓力开发矿山过上了更加文明的生活。

后来，你们进攻希腊中南部，击破了色萨利、底比斯、雅典和斯巴达，把整个希腊的霸权握在了手里。马其顿国王也被所有希腊城邦推选为进攻老对头波斯的联军总司令。

腓力做完这一切死去了。对他的丰功伟绩谁都不会有异议。说

到他死后我们做了些什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先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那个年龄死去，他留给我的国库空空，里面只有70塔兰特，还有1300塔兰特的借款。靠这点钱根本不可能东征。我只能再借800塔兰特。如果不去借款，我连35000名士兵都没法养活。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东征。爱琴海的制海权长期掌握在波斯人的手里。可是，我们还是渡过了爱琴海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

我们不仅渡过了海峡，还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战胜了那些波斯总督。我们征服了小亚细亚，从西海岸直到内陆。

还有中近东、埃及、叙利亚、巴比伦、巴克特利亚，我们征服的地方不胜枚举。你们勇敢战斗，胜利后享受到手的财富。你们不应该忘记这些。

被征服的国王们献上了黄金王冠，我把它们也化成金币分给你们，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

我率领你们作战得到的报酬，只有一件紫色披风和一顶王冠。我与你们吃同样的食物，睡同样的帐篷。我没有理由去聚敛财宝。

在最近的日子里，你们应该过得舒适了很多。你们可以忘记一切，贪婪地睡觉。但我不行，夜晚对我来说是思考如何应对明天的时间。

跟你们战斗在最前线的人不一样，我是最高司令官。如果有人说我躲避危险，我倒想看看他是谁。

如果你们要我看你们在战斗中负的伤，那我也让你们看看我的伤。

我的身体上到处都是刀伤、箭伤、石块砸伤的伤疤。这就是我翻越高山、穿过沙漠、渡过河流得到的功勋！是我把荣誉和财富都

给了你们而得到的勋章！

正如你们所做的那样，我也娶了波斯女人为妻。因为这样做了，我们的儿子们会成为亲戚。

你们借的钱，我都为你们还了。我不知道你们得到了那么多报酬，为什么还要借钱。我不会追究这一切，我已经为你们全额偿还了。

还有，你们跟我一同度过了10年，参加了东征这个没有任何人尝试过的伟大事业，享有了别人根本享受不到的荣誉！

有人不幸倒在了战场上，他们当然也配得到与这个荣誉相称的待遇。我已经决定为他们铸铜像安放在故乡，他们的遗属将享受免税的待遇。这些事都在扎扎实实地做着。

最后，还有一事我要补充一下。

那就是我从来没有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遇到过我背对敌人临阵脱逃的情况。

现在我听说你们要回国，要跟我一刀两断。

“我为何让跟我共同战斗了10年的士兵，和因负伤不能继续服兵役的士兵回故乡，你们根本不懂，你们居然要跟我一刀两断。

既然如此，我也要说，那你滚吧，有多远滚多远吧！

回国后你们可以到处去说，我们把自己的国王抛弃在别的国家。你们去说吧！

在祖国，不管你们说什么人们都会相信，你们会成为他们的英雄，诸神也会爱你们的！

这样的士兵和我缘分已尽。

滚吧，有多远滚多远吧！”

就这样，亚历山大一吐胸中不快，离开了现场，身边依然没有人护卫。

他态度凛然，一个人在士兵们中间穿行，瞪着他们每一个人，然后离开了现场。所有士兵鸦雀无声地目送亚历山大。

不大一会儿，士兵们的心头便涌起了反省的念头。他们单纯、朴素，打心底里后悔。有的人后悔之极，兀自痛哭了起来。

他们分别通过自己的指挥官向国王表达谢罪之意，请求宽恕。

然而，亚历山大很执拗，就是不点头。

于是，后悔的念头在士兵们的心里越积越大，他们聚集在亚历山大所在王宫前的院子里静坐，得不到宽恕便不散去。

1万人，再大的院子也会被填满。

亚历山大很快让自己的心情焕然一新。

年轻的国王走到院子里，站在士兵们的面前。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吧！"士兵们一下子放下心来，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亚历山大又对他们说道：

"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我们恢复关系！"

欢呼声更加高涨。

当天晚上，国王的宫廷花园变成了招待全体士兵的巨型宴会会场。所有人都想和国王干杯，年轻的国王身边热闹非凡。于是，那天晚上的宴会变成了不拘礼仪的饮酒大会。酒也是希腊式的喝法——直接喝干烈酒。

士兵们再次感到亚历山大就是他们的国王。他们把这种喜悦和烈酒一起，舒心地喝了下去。

1万人回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

年轻的国王把率领这1万名士兵回国的任务交给了克拉特鲁斯。

在马其顿军中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第二把手专程领队回国。这事一经明确，1万名士兵的回国就成了圆满退役的人员回国，而不是被裁撤人员回国了。

极易引起马其顿士兵大量离队的士兵抗议事件得到了平稳解决。

这年的夏天和秋天，亚历山大是在埃克巴坦那度过的。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波斯历代国王的避暑之地。

亚历山大让1万人回国后，留在他身边的都是年轻士兵。也就是说，他们这代人只有在亚历山大手下战斗的经验，已经不了解先王腓力的作风了。这些年轻人很少对波斯过度敏感。

尽管让部分士兵回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军队年轻化，但送回国的士兵数量毕竟有1万人。

亚历山大不可能让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把1万人送到以后空手回来。他肯定命令克拉特鲁斯在马其顿为主的希腊全境征召志愿兵，再把他们带出来。

在东征的10年中，所有补充兵员都安全抵达了指定地点。没有快递服务而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令人佩服。不过，每次补充兵员的规模都在两三千人，没有一次超过五千人。忠厚老实的克拉特鲁斯带来的兵员规模也不会有。

也就是说，仅靠这点补充兵员填不满1万人的空缺。

这样，被裁撤人员的担心就成为现实了，他们的国王得用波斯的年轻人来填补马其顿兵回国产生的空缺。

不过，亚历山大并不是要完全用波斯人替换。年轻阶层尚在，科那斯也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克拉特鲁斯要带回来的新兵与留下来的人一样是马其顿兵，即便不是马其顿人，也是希腊人。所以，即使波斯人加入马其顿军，毕竟还是少数，规模还不至于刺激到马其顿的守旧派。

希腊人新兵需要训练，波斯人新兵就更需要训练了，因为还需改变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

亚历山大那年要在埃克巴坦那度过夏天，并不是想躲避苏萨的炎热，而是因为他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容易引人注目，而在避暑地埃克巴坦那这些麻烦会少很多。

亚历山大把埃克巴坦那郊外变成了武艺训练场。他让事先选拔出的波斯年轻人在此集训。

虽说是武艺训练，但主办者是希腊人，结果它成了运动会的延续。在希腊，每4年要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运动会，各地也有各自的运动会。这种运动会与武艺训练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观众。日复一日地在埃克巴坦那举行的是没有观众的运动会。

希腊人参加运动会不是全裸就是半裸。我不禁会想，波斯人认为奴隶才会赤身裸体，亚历山大是如何让他们接受这种希腊式做法的呢？不论古代的史学家还是现代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

也许因为亚历山大召集的波斯青年年轻，适应希腊式做法的速度快

得出乎意料。

毕竟穿着波斯式的长袍上阵，动作会变得迟钝。亚历山大的军队重视机动性，穿长袍是不中用的。正因为波斯士兵在战场上也穿长袍，波斯军才会一败再败。

波斯的年轻人大概也了解这些。可以想象，在与异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妥协了，就反映在穿短衣这点上。

密友之死

进入秋天，武艺训练仍在继续。亚历山大也很热心，一连多日亲临现场。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他还会亲自参加训练。

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赫菲斯提安不久前还总出现在亚历山大的身旁，最近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亚历山大在朋友卧病之初常去探视，赫菲斯提安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不用担心。当时，旁人看不出他有多严重的病。

于是，亚历山大把生病的朋友安顿在城里的宫殿里，自己在离城数公里的郊外平原上参与新兵的武艺训练，就这样度过了多日。

深秋的一天，亚历山大正和平时一样训练波斯的年轻人，一个马其顿士兵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身边，告诉他赫菲斯提安的病情突然恶化。

年轻的国王连汗都顾不上擦一把，飞身上马，向城里飞奔而去。

然而，当亚历山大快马加鞭赶到的时候，赫菲斯提安已经没有了呼吸。

亚历山大抱住朋友的遗体，哭号不已，许久许久，谁也没有办法。

亚历山大一边哭着一边不断呼喊朋友的名字。曾经的学友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亡友的遗体边拉开。

国王的学友们好不容易把半疯的亚历山大拉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赫菲斯提安也曾经是这些学友中的一员。国王在他们面前紧闭房门，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吃也不喝。

人们已经听不见哭喊声了。三天三夜，亚历山大飘荡在黑不见底的悲伤深渊里。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

据说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少年时代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曾经评论说，他们两人拥有分在两具躯壳中的一颗心。

亚历山大失去了另外一半的心。他失去了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无人可比的亲密朋友，赫菲斯提安伴随在自己身边已再自然不过。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朋友总在身旁。古代的史学家们写道，只有赫菲斯提安洞悉亚历山大内心的一切。

无话不说，当然可以洞悉内心。赫菲斯提安与国王关系如此亲近，却一次也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去谋取自己的利益。

谁都知道他们之间的特别关系。可是特别关系之外，什么都没有。

克雷托斯死后，赫菲斯提安继续发挥着克雷托斯的作用，直到去世。

也就是说打仗时他紧紧跟着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的亚历山大，国王一旦有事立即上前救驾。

担起这份工作以后，赫菲斯提安头盔上的翎子被定为蓝色，而亚历山大的翎子是白色的。混战中只要看到白蓝两色的翎子，马其顿军的将士们便会安心战斗。现在，那根蓝色翎子消失了。

我想起曾经在电视里看过的BBC制作的节目。在那台节目中，英国人以冷静的态度用人体模型具体指出并解说了东征10年中亚历山大的所有受伤情况。

我一边看节目一边想，所谓体无完肤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吧。

可是，我又在想，所有这些都是外伤，不是心头之伤。心上的伤是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的。写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写到现在，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强烈到几乎成为一种确信：从赫菲斯提安死去的那一刻开始，亚历山大便开始走向死亡。

英国BBC电视台的节目也认为，亚历山大在沿印度河而下的途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即便如此，他只花了两个月就痊愈了。

然而，因密友之死受的伤是不会痊愈的。

亚历山大有异常强烈的责任心。赫菲斯提安去世第4天，他又开始履行国王的职责了。

在一场为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举行的祭祀活动上，亚历山大当着众

人说道：

“我举行祭祀是因为国王的义务。诸神中阿斯克勒庇俄斯没有给我带来过一点幸运。这么早就从我的身边夺走了赫菲斯提安，这最能表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怠慢了！”

神官和占卜师自然要谴责亚历山大缺乏敬神之心。聚集的人们虽然不至于谴责，但也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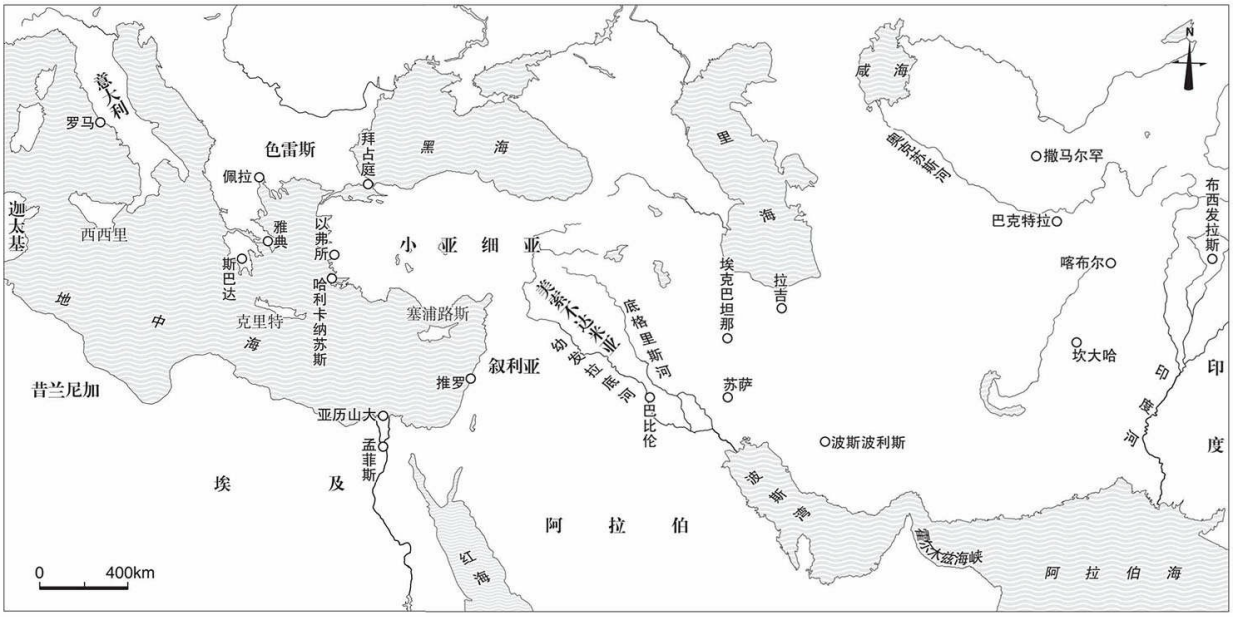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对这些反应毫不在意。哪怕夺走赫菲斯提安的是神，对亚历山大而言也是敌人。

梦想西征

转年进入了公元前323年，在旁人看来，亚历山大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他召集全体将领，在接下来的远征之前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阿拉伯半岛。国王考虑把军队一分为三，从陆上和海上的三个方向完成远征。

陆军一分为二，第一军由克拉特鲁斯率领向西进军，从北面攻入阿拉伯半岛。



从东征到西征

亚历山大自己率领第二军，从波斯湾偏南的地方攻入半岛内陆地区。他似乎并不了解阿拉伯半岛的内陆地区是大片的沙漠，但他知道那里有沙漠。

海军由克里特岛出生的涅阿尔霍斯率领，任务是南下波斯湾，绕过阿拉伯半岛，寻找红海的入口。

当时的战船，如果船员操作不是十分熟练就得沿海边航行，需要频繁靠港，结果会变成征服沿海地区的行动。

于是，从结果上看，涅阿尔霍斯开辟了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海岸到伊朗南部海岸的波斯湾航线。现在他又肩负着开辟从阿拉伯半岛到红海航线的任务。

9年前征服埃及时，亚历山大就已经知道红海的存在。他认为只要绕着阿拉伯半岛走，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到达红海。

征服阿拉伯半岛在他脑中不是一个独立的目的，他是要为统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找一个连接点。当然，阿拉伯半岛是古代花高价才能买到的乳香等香料的产地，但这不是亚历山大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目的。

亚历山大已经在考虑征服阿拉伯半岛之后要进一步西征。

按现在的国别，亚历山大9年前征服埃及，已经把名为昔兰尼加的今利比亚东半部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从今利比亚的西半部开始是西地中海世界第一强国迦太基的领土，包括现在的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的整个地域。亚历山大在9年前征服中近东唯一吃了苦头的推罗攻防战中知道了迦太基的存在。

推罗是海上的一个岛屿，当地人擅长海战，当时亚历山大没有足够的海军。

由于同为腓尼基民族，迦太基提出要增援推罗。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亚历山大一定会更加辛苦，因为海上部队是强国迦太基的主力部

队。

当时腓尼基民族与希腊民族之间的决战并没有实现。西地中海的另一个强国叙拉古的军队已经在北非登陆，迦太基只能专心于本国的防卫，没有余力向东地中海派出援军了。

从那时起，迦太基的存在就刻在了年轻国王的脑海里。

所以，对转而西征的亚历山大来说，以迦太基为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亚历山大的头脑再次被宏大的远征计划塞满。东征打到了印度河，却因士兵们拒绝前进而无以为继。那就改成西征。跟随他的将士们大概又会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有人曾经说过：跟着亚历山大的确非常辛苦，但肯定不会无聊。

作战会议的会场从苏萨移到了巴比伦，亚历山大那充满30来岁年轻人热情的谈吐一点也没有变。学友伙伴和士兵们看到他们的国王这个样子，都以为他已经从痛苦中完全走了出来。

然而，如果他们具有能洞悉人心的感受性，应该会注意到下面的情况。

亚历山大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会在热情洋溢地说话时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沉默片刻，然后摇摇头，再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

年轻的国王还不能适应没有赫菲斯提安的情况。

若是以前，只要投去视线，就有人用目光回答他。即使没有言语的交流，也有人会理解他。这样的人现已不复存在。

亚历山大自孩提时代起就习惯把头微微歪向左侧。赫菲斯提安总在

他视线投去的方向。这位朋友总是无言地回答亚历山大无言的问题。

赫菲斯提安在自己身边，长期以来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亚历山大会不由自主地歪过头把视线投过去。可现在，每当他投去视线，他都会感到这个动作是那么虚无。

亚历山大逐件安排好征服西方要做的事，看上去比以前更加活泼而积极，这或许都出于他想忘记独一无二的朋友之死的念头。

会议确定全军4月在巴比伦集结，5月从巴比伦出征。

造船开始了。亚历山大时常亲临现场，与已成为海军将领的涅阿尔霍斯反复讨论。

先王腓力时代，马其顿与军船无缘。而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正在逐渐成为陆海军事大国。

然而，就在出征日子临近的时候，亚历山大在一次与将领们开会时突然倒下。

在将领们的搀扶下，国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直接倒在了床上。赶来的医生也不知道病因。

从这天开始，他有时起得来床，有时又起不来，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

他会一连三天在高烧中挣扎，第四天早晨却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手下的将领们都感到亚历山大没什么大事，没有一个人提出推迟出征。

可是，精神的日子就那么几天，高烧再次袭来，亚历山大又躺在了病床上。几天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忠实履行希腊人国

王的职责，入浴净身，然后规规矩矩地祭祀诸神。

亚历山大恢复体力到再次病倒的间隔越来越短。他宣布延期出征。

此后，人们仍然无法阻止间隔的缩短。亚历山大每天挣扎在高烧之中。现在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亚历山大得了疟疾。如果是疟疾，凭他32岁时的体力是可以恢复的。而现实是这病实实在在地消耗着他的体力。

亚历山大把曾经的学友伙伴、现在在自己手下担任要职的人全部召集到自己的房间里，命令他们哪怕他死去也要进行西征。全体人员起誓服从国王的命令。

到了这种时候，士兵们也都知道了国王的病情。

他们请求上司，说哪怕只看一眼，也让他们见国王一面。

亚历山大听到了士兵们的请求后，决定答应他们的要求。床被搬到了王宫前的花园里。

最后的告别

巨大的王宫花园里，希望见一眼国王的士兵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亚历山大已经没有力气向士兵们挥动双手，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了。

亚历山大躺在搬到花园里的床上，连抬起上身的气力也没有。他身下垫了很多垫子，在垫子的支撑下，他微微地抬起了上身。

士兵们排成一队，从国王的面前走过。有些人不出声地哭泣，有些人紧咬嘴唇，努力控制着不要哭出来。

年轻的国王微微动动头和眼睛，回应着他们每一个人。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就这样，亚历山大和并肩战斗的士兵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告别之后，没有一个士兵愿意离开。他们全都留在了花园里。

亚历山大不停地默默告别，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一切结束之后，在全体士兵的目送之下，国王的病床被搬进了宫殿。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仪式结束了。

两天后的夜里，亚历山大去世了。

这是公元前323年6月10日，再过一个月他就满33岁了。然而，他已经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烛。

自从21岁那年离开欧洲来到亚洲，亚历山大一次也没有回过马其顿

和希腊，他死在了美索不达米亚。

国王死后，在他手下担任要职、几乎都是军队司令官的人们一致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们决定，让西征回到起点，理由是西征不现实。

我在想，当初的东征，也有相当大的不现实成分啊！

西征在亚历山大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他的大脑。后来，罗马人实现了这个西征的梦想。

不论史学家还是研究他人历史著作的学者，很多人会在讲述马其顿年轻国王的一生之后，加上对亚历山大性格、才华和业绩等的评论，像是在做总结。

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用自己的话去做总结，只是试着做了一份追踪他一生足迹的年谱。

请你看一下这份年谱，静下心来，在一位不到33岁便去世的青年的一生中驰骋你的想象。

我想，大凡是人，自己的一生被人简单地做了总结，谁也不会释然。亚历山大肯定也不喜欢自己短暂而充实的一生被人草率地总结。若每个人都静下心来，一边回顾他的一生一边思考，一定更能让他高兴。

我想请大家思考：

为什么只有他被后人称为“大帝”？

他不是基督教的圣人，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父母会给孩子取名亚历

山大，至今不绝？（亚历山大英语为Alexander，意大利语为Alexandro，昵称Alex。）

仅仅因为他是广袤地域的征服者吗？

抑或是有更充分的理由？

为什么过了2300年，人们依然如此爱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一生

年代（公元前）	事　　件
356 年 7 月	马其顿国王腓力与伊庇鲁斯公主生亚历山大
343 年前后—340 年前后（13—16 岁）	接受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和亚里士多德的教养培训
336 年 7 月（20 岁） 秋（20 岁）	父王被暗杀，亚历山大成为马其顿国王 在科林斯召集希腊全境的城邦国家代表开会，再次确认父王授予的全权，包括担任征服波斯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官一职
335 年春（20 岁） 秋（21 岁）	征服威胁马其顿北部边境的北方蛮族。消灭举旗造反的底比斯
334 年春（21 岁） 5 月（21 岁） 夏至秋（22 岁）	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攻入亚洲 格拉尼科斯战役 征服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
333 年春—秋（22—23 岁） 11 月（23 岁）	征服小亚细亚内陆地区。“戈尔迪乌姆之结” 伊苏斯战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
332 年春至秋（23—24 岁） 12 月（24 岁）	征服中近东全境。推罗、加沙攻防战。身受重伤 兵不血刃征服埃及
331 年 7 月—9 月（25 岁） 11 月（25 岁）	为了再次与波斯国王决战而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高加米拉战役。大流士三世再度临阵脱逃。

年代（公元前）	事　　件
330 年 1 月 –5 月（25 岁）	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古都巴比伦、波斯首都苏萨、波斯历代国王陵墓所在地波斯波利斯所在的波斯核心地区全境
	在希腊，斯巴达在美加罗波利斯战役中失败，衰落已成定局。
夏（26 岁）	追击逃跑的大流士，开始征服波斯东半部
	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被属下将军杀害
秋（26 岁）	处死菲洛塔斯，菲洛塔斯的父亲帕米尼欧自裁
329 年夏（27 岁）	杀害大流士的总督贝索斯因背叛罪被逮捕并处死。亚历山大继续东征
328 年秋（28 岁）	背叛贝索斯的斯皮塔米尼斯也未能逃过亚历山大追击，战败而死
冬（28 岁）	杀克雷托斯
327 年春至秋（28—29 岁）	继续东征。赫菲斯提安受亚历山大之命开始为渡过波斯帝国与印度之界河的印度河做准备
326 年 5 月（29 岁）	与印度国王波拉斯进行海达斯佩斯战役
夏（30 岁）	亚历山大试图渡过印度河横跨印度，因士兵拒绝前进而作罢
冬（30 岁）	顺印度河而下。作战中负重伤，生命垂危
325 年春（30 岁）	亚历山大痊愈，集合全军，分为三个方面军
6 月（30 岁）	克拉特鲁斯率第一军向西进发
8 月（31 岁）	亚历山大率第二军经印度河河口向西进发
10 月（31 岁）	涅阿尔霍斯率海军从海路向波斯湾进发
12 月（31 岁）	第一军与第二军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会师
324 年 2 月（31 岁）	与海军会师。第一军经陆路向苏萨进发
	第二军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入波斯湾的河口与海军会师。海军完成从印度到波斯航线的开辟
3 月（31 岁）	亚历山大时隔 6 年回到苏萨。10 年东征结束
春（31 岁）	为 1 万名马其顿男人与 1 万名波斯女人举行集体婚礼。凡事总爱冲在前头的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三世的长女结婚，其好友赫菲斯提安与大流士次女结婚
夏（32 岁）	士兵造反引起亚历山大震怒
	士兵们反省，和好后举行宴会
	亚历山大去埃克巴坦那训练波斯人
秋（32 岁）	赫菲斯提安因病去世

年代（公元前）	事　　件
323 年春（32 岁）	开始准备征服阿拉伯半岛和迦太基的西征
4 月（32 岁）	前去征服西方的军队在巴比伦集结
5 月（32 岁）	确定出征日期
	亚历山大突然病倒。高烧与退烧不断反复
6 月 10 日（32 岁）	亚历山大逝世于 33 岁生日前一个月
	属下将领以不现实为由决定停止西征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交给更优秀的人”

亚历山大没有留下一般意义上的遗言。

以前，他曾多次因感冒、在战场上负伤而卧床，每次都能恢复并回到工作中。这次他大概也认为自己过一段时间便会痊愈，虽然病情好好坏坏，但他距33岁差一个月，仍很年轻。

但是，与士兵的最后告别结束后，他不但起不了床，就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将领们聚集在国王房间里，问躺在床上的亚历山大：

“这个帝国，您打算交给谁？”

根据古代史学家们的记载，亚历山大痛苦地喘着气，回答道：

“交给更优秀的人。”

这不是遗言，因为没有明确指定将王位传给谁。现代的研究者有不少人认为，在濒死的状态下，剩下的体力已经不足以让他明确说出传给谁了。

可是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亚历山大自己已经无法判断谁才是“更优秀的人”了。

请求亚历山大回答的将领们，都是从他继承马其顿王位开始13年如一日一直紧跟这位年轻国王的人。

除了色雷斯出身的攸美尼斯和克里特岛出身的涅阿尔霍斯以外，其

他5个人被研究者们称为“离家出走的伙伴”或“学友伙伴”。每当亚历山大同父王争执被父王骂“滚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着亚历山大一道出走，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和亚里士多德的课业，他们也都跟亚历山大一起学过来。

他们全都出生于马其顿贵族人家，都是30来岁，属于亚历山大的同代人。

这5个人是马其顿人，加上同为希腊民族但出身色雷斯和克里特的两个人，这7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亚历山大属下的“将领”。这7个人都是跟亚历山大一起在历时10年的东征中打拼过来的战友伙伴。

因为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7个人，亚历山大才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既然能用好他们，肯定从性格到能力能准确地把握他们。

只要分析一下亚历山大什么时候交给他们每个人什么任务，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

他们7个人全都拥有作为武将的卓越能力，拥有统率一支军队的统率力和责任心，能够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在忠于国王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与其说他们组成了国王的宫廷和军队的总参谋部，不如说是大学的探险俱乐部更为合适。在国王面前，他们毫无顾忌地争论，就连性格沉稳的赫菲斯提安与攸美尼斯关系不好，也会受到亚历山大斥责，让他适可而止。

亚历山大的“学友伙伴”就是如此开放并拥有卓越才华的集体，但他们与年轻的国王相比，缺少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洞察力。词典对洞察力这个词

的解释是能够看透事物的能力。在意大利，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往往被说成只能看到自己鼻尖的人。所以，具有洞察力的人就是有能力看得更远的人。

不过，如果没有能力自己动脑筋思考，所谓洞察力便不是货真价实的。

我觉得，亚历山大没有给属下将领思考的时间。

亚历山大做任何事情都喜欢追求速度，思考应该也很神速。

属下将领们受命完成任务时已经精疲力竭，死一般地睡了一觉起来，亚历山大已经在思考新的事情，并向他们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解释。当他们做完了这些回来以后，又在思考下面事情的亚历山大又会给他们别的指示。

东征10年，难道不是一直在这样重复吗？

结果，他们只有时间思考眼前的事情，洞察事物的能力退化了。头脑和肌肉一样，一直不用便会劣化。

当他们听亚历山大说“交给更优秀的人”时肯定感到困惑。开始时大家可能还在想“交给谁”，到了后来便开始想“也许是我吧”。

此时，已经没有人能训斥他们，让他们适可而止了。

继业者战争

就这样，继业者之间开始了相互讨伐。

从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到公元前270年，他们相互讨伐了半个世纪之久。

他们已经用事实证明，继业者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详细叙述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继业者战争，不仅会让我和读者心情沮丧，还有脱离历史本质之虞。

希腊化世界是亚历山大真正意义上的遗产。所谓的历史本质在于这个遗产在继业者战争期间及其后能一直存续下去。

为此，我把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总结成下表，请读者边看表边展开自己的想象。

继业者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亚历山大家族里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异母兄长精神失常。亚历山大的直系儿子出生在他死后，他的母亲在马其顿人看来是中亚蛮族，不少马其顿士兵对母亲为蛮族的国王感到抵触。

因而，继业者战争实际上是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做名义上的国王，背后由谁操纵的摄政者之争。

腓力一辈中的两个年长者也参加进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不久，窗户纸被捅破，当事人全都走到了台前。于是，王位被称为“追随者”（Epigonen）的年轻一代继承。这是继业者战争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亚历山大手下的7位将军旗鼓相当、半斤八两。

争执到最后，当初的7个人减少到2个人。继业者们一个很早便死于战斗，一个因部下背叛被杀，第三个由于战败死于狱中，第四个也死于战斗。涅阿尔霍斯好像要为故去的国王殉葬一般，早早退出继业者的争斗隐退了。

剩下的是塞琉古和托勒密两人，这两人胜出并非因为他们是“更优秀的人”。

与其他5个竞争者相比，他们同样在内讧中耗费了能量，只是他们两人无谓耗费的比例小一点而已。

这导致了叙利亚塞琉古王国的建立和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建立。

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

	姓名（生卒年）（年代为公元前）	亚历山大去世时其年龄	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及个人经历
家族	腓力三世（359—318 年）	36 岁	异母兄长。脾气暴戾，精神异常。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下令在亚历山大去世 5 年后将其杀害
	亚历山大四世（323—310 年）	0 岁	唯一的儿子。父亲亚历山大去世 13 年后与祖母奥林匹娅斯、母亲罗克珊娜一起被卡山德所杀
上一辈	安提帕特（397—319 年）	74 岁	东征时受亚历山大之托统治马其顿和希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屡屡与奥林匹娅斯发生争执，与克拉特鲁斯对调后前往巴比伦。亚历山大去世后立即行动。亚历山大去世 4 年后战死。继业者战争交儿子卡山德接棒
	安提戈纳斯（382—301）	59 岁	参加东征。格拉尼科斯战役后受亚历山大之命统治被征服的小亚细亚。亚历山大死后积极行动。后战死。继业者战争交儿子德米特里乌斯接棒
国王的伙伴（亚历山大的将军们）	克拉特鲁斯（360—321 年）	37 岁	学友伙伴。公元前 330 年开始顶替自裁的帕米尼欧成为亚历山大的第二把手。率领 1 万名老兵回到马其顿后与安提帕特对调，负责统治马其顿和希腊。亚历山大去世时并不在场。2 年后与岳父安提帕特联手以过去的同僚为敌，在战斗中战死。他是一个最适合担任第二把手却不一定能胜任第一把手的好例子

	姓名（生卒年）（年代为公元前）	亚历山大去世时其年龄	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及个人经历
国王的伙伴（亚历山大的将军们）	佩尔狄卡斯（355—321 年）	32 岁	出身于仅次于王族的马其顿名门。亚历山大去世后比其他任何人都积极地运作，制订对策。明目张胆的行动遭到同僚们的憎恶，于是与众多同僚为敌。于亚历山大去世 2 年后遭背叛而被杀
	莱西马库斯（361—281 年）	38 岁	学友伙伴。亚历山大去世后握有小亚细亚的统治权。但他不满足于此，继续进行继业者战争，在战斗中战死
	塞琉古（358—281 年）	35 岁	学友伙伴。他也参加了继业者战争，但重视确保自己的领地。为对抗埃及的亚历山大政权，在安提俄克建都。由此在叙利亚建立了塞琉古王国，但仍未停止伙伴相争，最后战死
	托勒密（367—283 年）	44 岁	学友伙伴。他也参加了继业者战争，但并未抱很大希望，成为埃及托勒密王国的始祖。在曾经的同僚们中间，只有他自然死亡。
	攸美尼斯（362—316 年）	39 岁	色雷斯出生的他不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认可其才能而予以重用。在与过去的同僚们进行继业者战争，在战斗中被捕后被杀
	涅阿尔霍斯（356—300 年）	33 岁	克里特岛出生，亚历山大认可其才能，提拔他为以陆军为主力的马其顿军的海军将领。亚历山大去世后，他像殉葬一般很早退出了继业者战争。留有从印度洋到波斯湾的航海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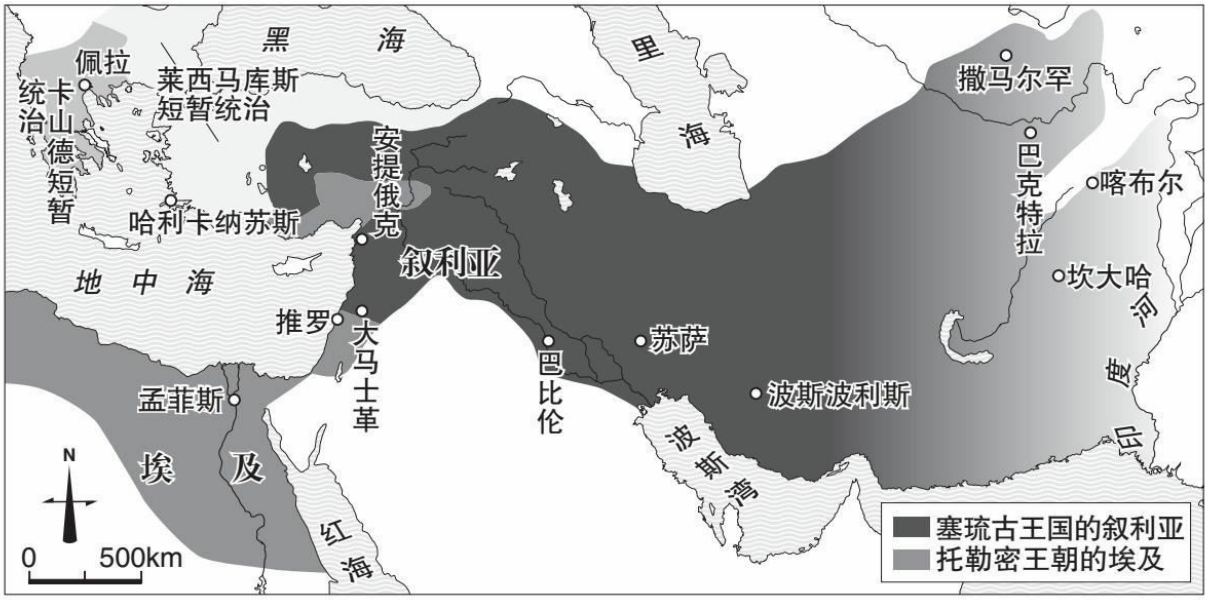
	姓名（生卒年）（年代为公元前）	亚历山大去世时其年龄	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及个人经历
追随者、上一辈的儿子们	卡山德（350—297 年）	27 岁	安提帕特之子。为了协助父亲完成任务而留在马其顿，未参加东征。其间一直身在马其顿，反对亚历山大同化败者和民族融合的政策。积极参加继业者战争，为把马其顿王国攫为己有而不择手段。亚历山大去世 13 年后，杀害了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妻子罗克珊娜和儿子亚历山大四世。后病死，野心并未实现。
	德米特里乌斯（337—283 年）	14 岁	安提戈纳斯之子。父亲有野心，却止于一介总督。他继承父亲的野心，积极参加了亚历山大帝国的继业者战争。能征善战，但拙于利用胜利成果。其他方面亦才华横溢，但无恒心。在继业者战争中被捕，在狱中自杀。只看外表和举止，被视为亚历山大再世。此人为美男子，有过 5 次政治婚姻

塞琉古是很优秀的武将，为亚历山大所重用。而托勒密只是一个平庸的武将，几乎没有可称为军功的业绩。

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后者正在埃及总督的任上。还好，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能够把埃及变成自己的领地足矣。

他还有一种政治上的狡猾，利用竞争对手漠不关心的态度，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埃及下葬。这为他赢得了正统性，表明他是已故的国王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

托勒密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很早就着手掌握自己的王国——埃及。他让儿子登基当上第二代国王，自己退下来编写并留下了亚历山大言行录之类的书。不过，这本书把实际上没有受到重用的托勒密写得十分受重用，阅读时很打折扣。亚历山大的学友伙伴中，只有他撰写并留下了这样的东西。



被塞琉古王国的叙利亚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一分为二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葬礼在巴比伦隆重举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把他葬在巴比伦。这里可是国王生前设计的自己帝国的首都啊。

正因如此，才没有任何人反对托勒密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去埃及。这件事情说明，亚历山大刚死，争夺继承权的武将们就从脑子里抹去了亚洲。所以，他们大帝的陵墓放在巴比伦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国王的陵墓将给予内讧获胜者地位正统性。

实际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内讧中，底格里斯河以东地区已经开始一点点地叛离马其顿。

首先，今巴基斯坦地区脱离了马其顿。接着，今阿富汗及其北方的各部族也叛离了。

它们并不是先叛乱再与前来镇压的亚历山大旧部作战获胜而独立的。它们是趁亚历山大旧部在西方内讧之机，逐步脱离控制的。

塞琉古很担心这种叛离倾向，但他一个人无能为力。他自己也是继业者战争的参与者之一，他在地中海附近的安提俄克建都，欧洲才是他关心的地方。

继业者战争开始于亚历山大去世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结果使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被一分为四。

——塞琉古建起的王国包括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在内的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广袤地域。

——当上埃及主人的托勒密建立的托勒密王国。

——安提戈纳斯的子孙们统治的马其顿王国，这个王国将马其顿和希腊其他地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以帕加马为首的几个小亚细亚小王国。

亚历山大的帝国被大致分成了四大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分割”而非“解体”。

分割不过是分成几块而已。

而解体是一个组织的各部分相互分离，四分五裂。

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被分割，但没有四分五裂。

这就是“希腊化世界”，在罗马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以前的200年间地中海东半部都属于“希腊化世界”。

半个世纪的继业者战争没有成为形成这个世界的障碍。

因为“继业者”或“追随者”的战斗只限于当事人之间，并未发展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争。

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过亚历山大生前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不断变换敌我的战斗只是小打小闹的规模。

这对一般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此，所谓希腊化时代，从整体上看是亚历山大生前就已经开始，在他死后并未中断发展的和平时代。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亚历山大的遗产

第一个必须列举的原因是亚历山大登上历史舞台所带来的政治稳定。

希腊人围绕民主政体、寡头政体的政治抗争销声匿迹了，只要没有严重的恶政，人们也可以接受王权政治了，政治气氛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亚历山大打破了以前的国家与民族的藩篱。

世界变大了。原本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希腊人一下子迈向了广阔的世界。

亚历山大在东征途中建设了许多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城市。据研究者说，这种城市的数量多达25个或70个。

25个是像埃及的亚历山大那样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城市的数目。

70个则是包括今阿富汗坎大哈那样在已有村庄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的数目。

这些城市并不是亚历山大想用自己的名字冠名便建设起来的，是因为新征服的地方需要有基地提供保障。

这些城市也有可能用于其他目的。

军事基地后来成了经济基地。我想亚历山大也考虑到了这种应用效果，所以在各地建设起多达70座的“××地区的亚历山大”。

在敷设连接这些城市的大道之前，他死去了。

如果知道只消一两天行程就能到达另外的城市，人们来往于此地的行为便会活跃起来。而且各地的亚历山大城都有亚历山大留置的士兵常驻，治安也很安全。

日益活跃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必然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的交流。

“希腊化世界”虽被分割却未解体，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世界通用语也是一大原因。

在此之前，希腊有阿提卡方言、马其顿方言，但没有一种堪称标准语的希腊语。由于雅典在文明文化方面的实力，阿提卡方言被当作标准语使用。亚历山大虽然也能操一口完美的阿提卡方言，但与众多农民出身的士兵讲话时，他还是使用马其顿方言。

这种希腊语被亚历山大标准化。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被称为“Koine”的这种希腊语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标准语。

这种希腊语又传播到地中海的西部，成为古代社会的通用语。希腊的贸易商不论走到哪里，不管对方是波斯人，是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语言都能相通。

亚历山大在生前还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换算值。

不过这种统一并未形成固定值。波斯与希腊的货币换算值被确定在一个宽松的范围内，也许这是一种设定了上限和下限的区间变动制度。

所有这一切必定有助于建立一个大经济圈，并使其持续发挥作用。

这个大经济圈的两大基地，一个是面朝地中海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另一个是亚历山大设想中可以使人轻松出入波斯湾的巴比伦。

在他病倒前不久，他还在思考开辟从波斯湾绕道阿拉伯半岛北上红海，进而抵达埃及的航线。

由于继业者并无兴趣，巴比伦与希腊渐行渐远。埃及的亚历山大则发展成地中海最大的经济城市，取代了以前与爱琴海第一大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一体化的雅典。

人们自由往来，各地物产广泛流通，语言统一，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社会安泰。如此环境下，学问和艺术之花盛开理所当然。

首先是亚历山大的“Mouseion”（图书馆），使学者们把埃及的亚历山大当作研究活动的一大据点。

“Mouseion”这个词语是“museum”（博物馆）的词源，意译为图书馆。东自美索不达米亚，西至西西里的叙拉古，研究者们为了阅读收藏在这里的万卷图书云集亚历山大。

从波斯天文学家到欧几里得等来自希腊的数学家，就连出生于地中海西部叙拉古的阿基米德都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研究者。

读书，思考。思考后与同好交流。交流后写成论文发表。

一般认为古代科学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那100年，这段时间与希腊化时代完全重合。解剖学也诞生于这个时代。以脉搏了解病情也在这个时代成为一般常识。

在哲学方面，去雅典的留学生依然很多。柏拉图创设的“学院”、亚里士多德办的“吕克昂学园”那时依然存在。哲学也与雅典到希腊化世界的时代发展不无关系。

伊壁鸠鲁是萨摩斯岛出身的希腊人，与他一起代表希腊化时代哲学最高成就的芝诺，是塞浦路斯岛出身的腓尼基人。

我再把话题转向艺术。仅聚焦于造型艺术，希腊化时代作品群的完成度堪称无可挑剔。1500年后的米开朗基罗感叹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懂，我们也有同感。

希腊美术经历了古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这些时代的作品至今仍是各国美术馆的至宝。

希腊化世界的统治者仍旧是希腊人。分割出去的各王国的国王都是希腊裔。

但他们没有排斥希腊人以外的民族。他们虽然没有像亚历山大希望的那样完全同化和融合被称为亚细亚人的东方人，但他们成功做到了保持社会稳定，与东方人共存。

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人们也许已经像斯多葛学派鼻祖芝诺所说的那样，“从比身高还高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拥有面对现实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位哲学家的晚年，亚历山大继业者们的战争终结了。

“亚历山大症候群”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内讧之后终于消解。

虽然未再出现多么有能力的国王，但希腊化时代仍旧延续下去。这里有两个明确的原因。

第一是地中海西部的各个强国根本无暇向东方伸手。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内讧时代，西方的迦太基一直在与叙拉古争斗。

东方的内讧结束于公元前270年前后。这时，迦太基的强国地位没有动摇，但罗马却刚刚辛苦地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

短短6年之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罗马赢得这一战争23年以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挑起第二次布匿战争。

罗马又打赢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成为地中海西部的霸主。在此之前，罗马完全无力将手伸向东部。

4年以后，罗马开始进入东方。首先爆发了与马其顿的战争，因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马其顿王国站在了汉尼拔一边。此后，罗马挺进地中海东部，但那在历史上已属于“罗马史”的范畴了。

“希腊化世界”并没有因为罗马人的入侵而衰落。

罗马人尊重希腊人所成就的各方面的业绩。

“学院”“吕克昂学园”“图书馆”，“希腊化世界”的新统治者罗马人没有把它们迁移到自己的首都罗马去，而是让自己的子弟去留学。

罗马人也没有因为“Koine”是战败者的语言就强行推行自己的拉丁语。罗马的精英们学习希腊语，他们选择使用双语。在地中海世界东部，就连皇帝的告示也是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行发布的。凯撒与克娄帕特拉的枕边情话也有很大可能性用的是希腊语。

当然，希腊人创作的艺术品得以全部保留下来。

希腊经过亚历山大时代后被罗马继承了下来。

我认为在文化与文明的传承方面，这是一个历史上罕有的幸福案例。

我有一份罗马时代绘制的被称为“Tabula Peutingeriana”[1]的旅行地图的中世纪摹本的复制品。它全长近7米，便携用的，两头连着画轴，可以卷着看。

地图右端即东方，是印度河。因为这是罗马时代绘制的地图，所以用拉丁语写着：“HIC ALEXANDER RESPONSUM ACCEPIT”。

直译为“亚历山大在此接受神谕”。

其实，真相是由于士兵拒绝前行，亚历山大已经到了这里却要返回。考虑到如实记录可能会有损亚历山大威严，所以才这样写的吧。

而罗马史学家记载的神谕是：“亚历山大，以后你仍要东去吗？”诸神都与士兵同感，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对罗马时代的人只有这样说才让人信服。

地图的左端即西边，画着古代称为布里塔尼亚的英吉利。

大概没有必要专门向罗马时代的人解释了，因为最早让他们知道布里塔尼亚的人是率领罗马军团渡过多佛海峡的尤利乌斯·凯撒。

这份地图是给旅行者用的，已经普及到一般百姓。

从亚历山大抵达的印度河，到凯撒踏上的布里塔尼亚，这就是古代欧洲人了解的世界。

这种情况直到古代结束进入中世纪都没有改变。

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威尼斯出生的马可·波罗向东沿陆路走到了中国，热那亚出生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由海路到达了新大陆。世界由于这两个意大利人而变得更为辽阔了。

他们两人之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断前往未知之地探险。在历史上，这个时代被称为大航海时代。

此前1500多年的岁月里，欧洲人一直认为东起亚历山大所到之处，西至凯撒所踏之地，中间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

普鲁塔克的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2]（Le Vite Parallels）是一部用一位希腊人物对比一位罗马人物的方法撰写的评传集。

书中把亚历山大与凯撒列为一对撰写。

我不禁想象，难道古代人普鲁塔克也拿着为旅行者绘制的这份地图旅行过吗？

---

[1] 即Peutinger Map，波伊廷格古地图，是绘制于古罗马时代的一份道路地图。该地图长6.75米，宽34厘米，由羊皮纸缀合而成。存世的唯一一份为中世纪摹本，现藏于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该地图历史上曾长期由德意志人Peutinger家族保管，因而得名。——译者注

[2] 又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比较列传》，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出版的席代岳译本等众多汉译本。——译者注

十七岁时的夏天

——致读者

荻原朔太郎[1]有这样一首诗：

想去法兰西，
法兰西太远。
那就让我穿新衣，
随性去旅行。

我在伊豆度过了一个夏天。我把这首诗改后这样吟咏：

想去地中海，
地中海太远。
那就让我光脚丫，吧嗒吧嗒伊豆海里走……

诗被改得不成样子！我对自己诗心之贫乏感到绝望，但17岁的我很乐观。

我没有停止过展开自己的想象。从伊豆的海出发可以穿过东海，穿过南海，横跨印度洋进入红海，再沿着红海北上，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我的思绪飞到了古希腊人称为葡萄酒之海的地中海。

9年后的秋天，我的双脚吧嗒吧嗒地行走在曾经是罗马帝国外港的

奥斯提亚的海滨。

绕地球半圈花了9年的时间。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整体上还很贫穷。第二年，高声讴歌战后日本复兴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了。

我则开始了环地中海的旅行。那毕竟是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时代，所谓旅行，在陆上就乘公共汽车，海上就乘游艇。

来到游艇码头，停靠在那里的船头都挂着写有“一个人随心而行”的牌子。你可以应聘合适的游艇上的工作，随它一起走。上了船你得工作，航行期间有食宿，可以免费乘船。

我并没有游艇工作经验，游艇却可以带我走。那游艇也就是长10米的小型游艇，只能沿着海岸航行，早晨起航，傍晚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但这样的游艇也有它的好处。

在用这种方式环游地中海的人们心目中，乘坐游艇不是玩体育，游艇只是你旅行时的“脚”。每次靠港，都可以住上几宿，在周边观光一圈。这才是主要目的。我经常遇到一些把游艇扔在港口一个多星期，跑到陆上去转悠的人。他们好像不仅把我当成驾驶游艇的助手，还当成一个旅伴。所以，我会全程与他们同行。

这个时候，我会开着借来的吉普车，沿着迦太基罗马水渠的遗址驱车100公里去探寻水源地。看了一圈北非的罗马时代遗迹，停靠亚历山大港，就能从尼罗河去开罗，再去金字塔。当然，我没有错过去耶路撒冷的机会，从大马士革穿过叙利亚沙漠，就到了帕尔米拉。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战乱之地，但以前并非这样。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似乎是世界上难得的安全时期。不论去哪里都不用检查身体，只要出示护照即可。

两年多后我回到罗马，偶然邂逅了回国后要担任《中央公论》主编的粕谷一希[2]。当时我时间充裕，他在罗马逗留的几天都由我陪同。最

后一天，粕谷先生说：

“我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这个题目交给你，试着写写吧。”

地中海也有点转腻了，所以我接受了。粕谷先生指定的责编是当时在巴黎进行编辑学习活动，遍访各报刊社的塙嘉彦[3]。我和他是那种可以一起用原文阅读所需史书和研究著作并交流想法的伙伴。

记得那是熬夜校对完《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第一部《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走到印刷厂门口时的事情。早晨的天空开始泛白，塙先生突然停下了脚步对我说：

“我们跟搞翻译作品的岩波[4]抗衡一下，搞国产的吧。”

30多岁，年龄只差3岁的两个小年轻竟要对抗被视为学者大本营的岩波书店，怎么想精神都不正常。于是，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了两人之间的密约。

所以，15年后他患白血病去世前，我们二人的告别也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

“我会坚持下去！”

已经说不出话的塙先生用眼神回答了我。

塙嘉彦去世后，有不少认可我作品的编辑。

每当我说起想写的主题时，他们总是说：“好呀，你写吧！”只是是杂志编辑，他们会接着说“我们会连载”；如果是做书的，他们会说“做成书吧”。

出版业不是慈善事业，即使利润不那么丰厚也是一种要营利的事

业。如果老让出版社亏损，编辑不可能把“做成书吧”挂在嘴上。

所以向我伸出援手的是你们，你们不但阅读，还买我的书来阅读。

虽然我与销售量上百万册的书无缘，但有你们购买我的书，不至于使出版社的仓库堆满被退货的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

我从未从属于什么组织，除了卖作品以外没有别的收入渠道。我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写作50年，是因为我拥有许多读者，他们通过购买我的作品为我创造了能坚持工作的环境。

在《罗马人的故事》成套发行之际，我向读者们表达过这种感激的心情。丰田公司的丰田章一郎[5]先生笑我说“你这是遍访最终用户啊”。我虽然不能遍访全日本，但还是去了五六个地方。每到一处我就会重复同样的话。

我知道你们阅读书籍，是期待获得新的知识和阅读历史的愉悦。但如果仅此而已，那走的就是单行线。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

因为购买和阅读作品会把撰写下一部作品的机会带给作者。

从那时起到现在即将11个年头。我已经没有体力遍访读者表示感谢了。

我已经决定以本卷结束我在调查、思考并以此重构历史这个意义上的“历史随笔”的创作，我应该说点什么留下来。请允许我用写在本卷最后的这句话代表我的心声：

“真的感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我才得以坚持写到今天！”

此外，我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列成图表请大家浏览，虽然它仅限于“历史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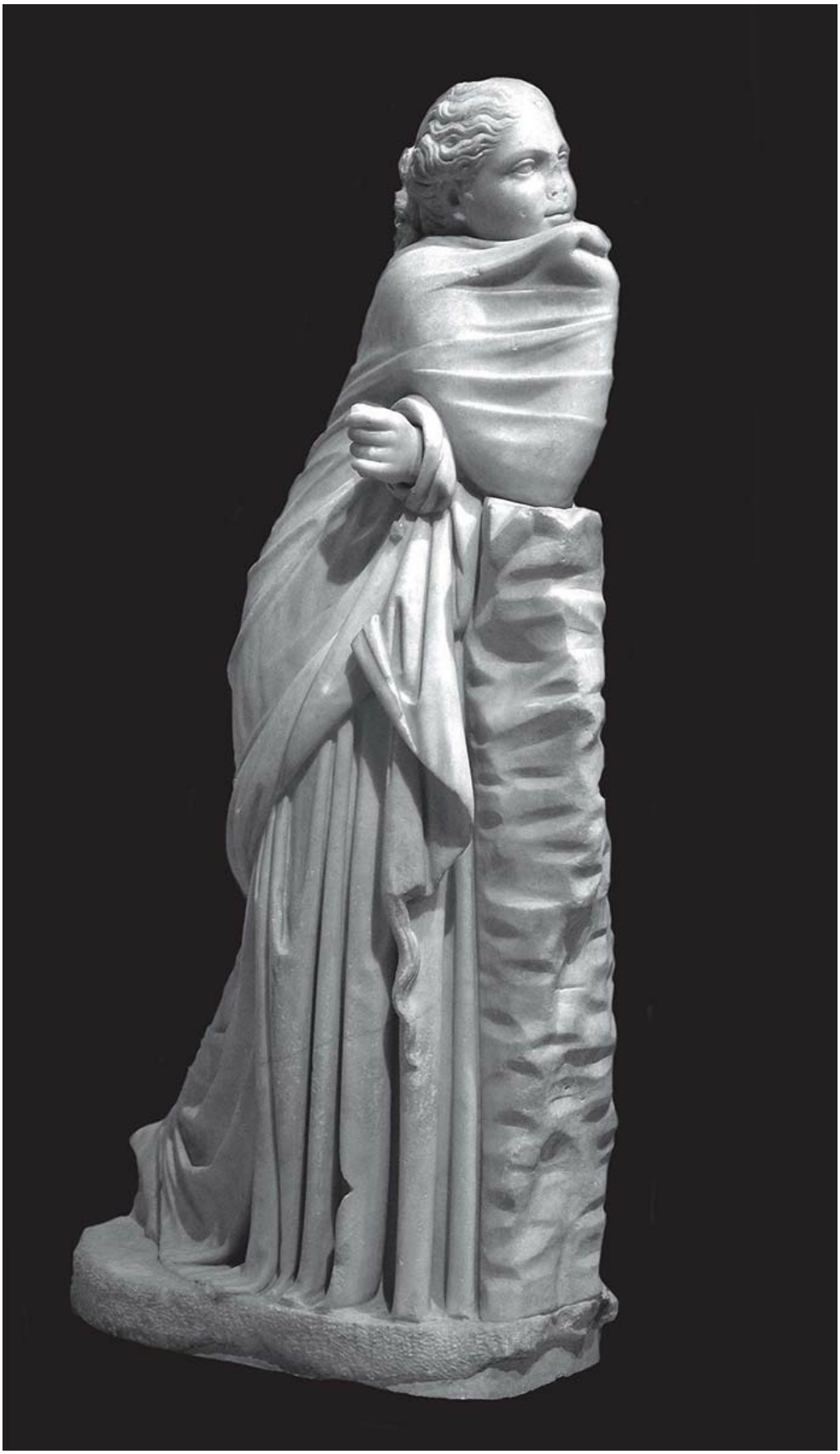
你们帮助我完成了哪一部作品，在图表上一看便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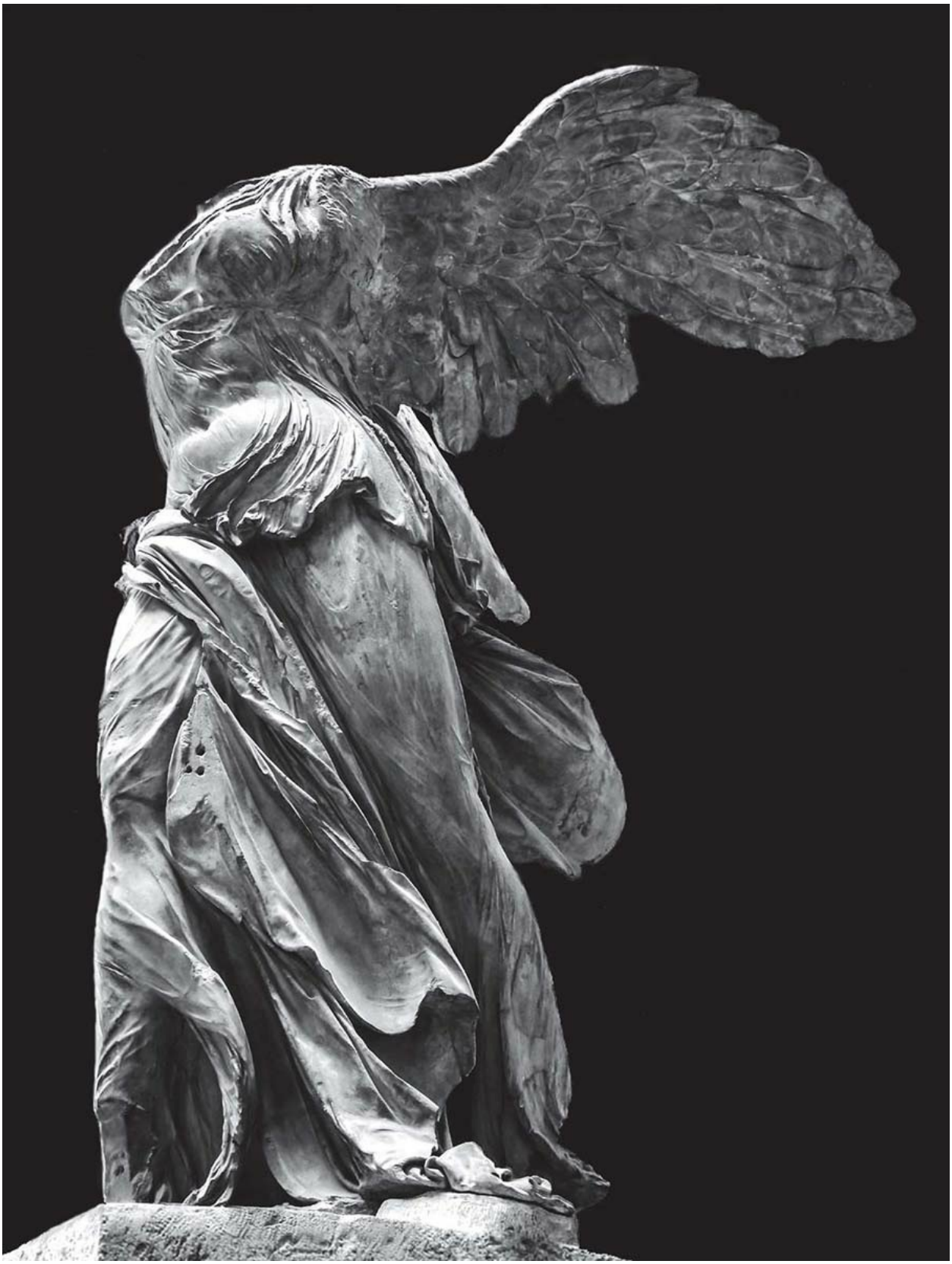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用意大利语说就是“Grazie mille”。

谢你一千回！

盐野七生

2017年秋于罗马





[1] 萩原朔太郎（1886—1942），日本诗人，主张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坦率的感情，确立了近代日语自由诗的地位。著有《吠月》《青猫》《诗的原理》等多部诗集和诗论等。——译者注

[2] 粕谷一希（1930—2014），日本评论家、出版家、编辑。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央公论》杂志的主编。——译者注

[3] 塙嘉彦（1935—1980），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编辑，曾任主编。东京大学法文科毕业。——译者注

[4] 即岩波书店（Iwatani Shoten），日本的一家出版社，由岩波茂雄创立于1913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对普及经典著作和学术研究成果有所贡献。该社还出版《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丛书，对文化普及也有很大作用。——译者注

[5] 丰田章一郎（1925— ），日本企业家，丰田汽车公司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长子，毕业于名古屋大学。1952年加入丰田汽车公司，1982年任社长，1992年任会长，1999年起任名誉会长。——译者注

参考文献

原资料

Aristofane, *La festa delle donne*,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3.

Aristofane, *Le donne al parlamento*,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4.

Aristofane, *Lisistrata*,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6.

Aristofane, *Gli Acarnesi. Le Nuvole. Le Vespe. Gli Uccelli*, G. Paduano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1988.

Aristofane, *Pluto*,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8.

Aristofane, *Le Rane*,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98.

Aristofane, *I cavalieri*, G. Padu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2013.

Aristofane, *Pace*, U. Albini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2013.

Aristotele, *Topici*, A. Zadro (ed.), Loffredo, Napoli 1974.

Aristotele, *Trattato sul cosmo per Alessandro*, G. Reale (ed.), Loffredo, Napoli 1974.

Aristotele, *Le Categorie*, M. Zanatta (ed. and trans.), 2° edition, BUR, Milano 1987.

Aristotele, *La Costituzione degli Ateniesi*, G. Lozza (ed.),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1991.

Aristotele, *Poetica*, D. Lanza (ed.), BUR, Milano, 1993.

Aristotele, *Retorica*, M. Dorati (ed.), Oscar Mondadori, Milano 1995.

Aristotele, *Opere biologiche*, M. Vegetti - D. Lanza (ed.), 2° edition, UTET, Torino 1996.

Aristotele, *L'anima*, G. Movia (ed.), Bompiani, Milano 2001.

Aristotele, *Politica*, C.A. Viano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2002.

Aristotele, *Problemi*, M.F. Ferrini (ed.), Bompiani, Milano 2002.

Aristotele, *Fisiognomica*, M.F. Ferrini (ed.), Bompiani, Milano 2007.

Aristotele, *I colori e i suoni*, M.F. Ferrini (ed.), Bompiani, Milano 2008.

Aristotele, *I Dialoghi*, M. Zanatta (ed.), BUR, Milano 2002.

Aristotele, *Le Tre Etiche*, A. Fermani (ed.), Bompiani, Milano 2008.

Aristotele, *Vita, attività e carattere degli animali. Historia animalium. Libri VIII e IX*, A.L. Carbone (ed.), Edizioni Due Punti, 2008.

Aristotele, *Meccanica*, M.F. Ferrini (ed.), Bompiani, Milano 2010.

Aristotele, *Fisica*, R. Radice (ed. and trans.), Bompiani, Milano 2011.

Aristotele, *Le Piante*, M.F. Ferrini (ed.), Bompiani, Milano 2012.

Aristotele, *La Generazione e la Corruzione*, M. Migliori - L. Palpacelli (ed.), Bompiani, Milano 2013.

Aristotele, *Il movimento degli animali*, P. Giuffrida (ed.), Mimesis Edizioni, 2014.

Aristotele, *Organon*, M. Migliori (ed. and trans.), Bompiani, Milano 2016.

Aristotele, *Metafisica*, E. Berti (ed.), Laterza, Bari 2017.

Aristotele, *Sull'Impero. Lettera ad Alessandro*, F. Cicoli - F. Moretti (ed.), Mimesis, 2017.

Arriano, *Anabasi di Alessandro*, D. Ambaglio (trans.), vol. I-II, BUR, Milano 1994.

Demostene, *Filippiche*, G. Cortassa (ed.), II edition, Garzanti, Milano 2007.

Diodoro Siculo, *Biblioteca Storica*, G. Cordiano and M. Zorat (ed.), vol.1-2-3, BUR, Milano 2004, 2014, 2016.

Diogene Laerzio, *Vite dei Filosofi*, M. Gigante (ed.), vol.1-2, Biblioteca Universale Laterza, Bari 2010.

Erodoto, *Storie*, F. Càssola (intr.) and A.I. D'Accinni (trad.), vol.I-II-III-IV, BUR, Milano 1989.

Erodoto, *Le Storie. Libri VIII-IX. La vittoria della Grecia*, F. Barberis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2001.

Erodoto, *Le Storie. Libri V-VI-VII. I Persiani contro i Greci*, F. Barberis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2006.

Erodoto, *Storie. Volume Quarto (libri VIII-IX)*, A.I. D'Accinni (trad.), BUR, Milano 2010.

Eschilo, *I Persiani*, M. Centanni (ed.), Feltrinelli, Milano 2014.

Isocrate, *Orazioni*, C. Ghirga and R. Romussi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93.

Omero, *Odissea*, G. Tonna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1986.

Omero, *Iliade*, F. Codino (intr.) and G. Tonna (trans.), Garzanti, Milano 1987.

Pausania, *Viaggio in Grecia*, S. Rizzo (ed. and trans.), vol. I-II. BUR, Milano 1991-92.

Platone, *Simposio*, F. Ferrari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5.

Platone, *Lettere*, P. Innocenti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6.

Platone, *Simposio. Apologia di Socrate. Critone. Fedone*, E. Savino (ed.),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1987.

Platone, *Apologia di Socrate. Critone. Fedone. Il Convito*, E. Savino (intr.) and N. Marziano (trans.), Garzanti, Milano 1988.

Platone, *La Repubblica*, G. Lorza (ed.),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1990.

Platone, *Alcibiade Primo. Alcibiade Secondo*, D. Puliga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95.

Platone, *Le Leggi*, F. Ferrari and S. Poli (trans.), BUR, Milano 2005.

Plutarco, *Vite Parallele*, C. Carena (ed. and trans.), vol. I-II,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orino 1958.

Quinto Curzio Rufo, *Storia di Alessandro Magno*, G. Baraldi (ed. and trans.), vol. I-II, Zanichelli Editore, Bologna 1986.

Senofonte, *Le tavole di Licurgo*, G. F. Gianotti (ed.), II edition,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1985.

Senofonte, *Anabasi*, I. Calvino (intr.) and F. Ferrari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7.

Senofonte, *Memorabili*, A. Santoni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89.

Senofonte, *Economico*, F. Roscalla (ed. and trans.), BUR, Milano 1991.

Senofonte, *Elleniche*, M. Ceva (ed.),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2011.

Senofonte, *Anabasi. Elleniche*, D. Musti (intr.) and U. Bultrighini - M. Mari (ed. and trans.), Newton Compton Editori, Roma 2012.

Strabone, *Geografia. Il Peloponneso*, A. M. Biraschi (ed. and trans.), vol. VIII, BUR, Milano 1992.

Tucidide, *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E. Savino (ed. and trans.), Garzanti, Milano 2013.

Tucidide, *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M. I. Finley (ed.) and F. Ferrari (trans.), BUR, Milano 2014.

研究著作

Abbagnano N. - Fornero G., *Filosofi e filosofie nella storia*, I, Paravia, Torino 1986.

Abbott E., *Pericles and the Golden Age of Athens*, G. P. Putnam's Sons, 1898.

Abbott J., *History of Darius the Great: Makers of History*, Cosimo, Inc., 2009.

Albini U., *Riso alla greca: Aristofane o la fabbrica del comico*, Garzanti, 1997.

Anderson J. K., *Mili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Age of Xenoph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Andrews A., *Greek Society*, Penguin, 1967.

Ashley J.R., *The Macedonian Empire: The Era of Warfare Under Philip I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359-323 B.C.*, McFarland, 2004.

Austin M.M.,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Babuder G., *La donna spartana*, Apollonio, Capodistria 1978.

Badian E., *"The Peace of Callia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50 (1987), pp.1-39.

Baltrusch E., *Sparta. Geschichte, Gesellschaft, Kultur*, München 1998.

Barkworth P.R., *The Organization of Xerxes' Army*, in Iranica Antiqua, n.27, 1993.

Bean G.E., *Aegean Turkey: An archaeological Guide*, 3rd edition, E. Benn, London 1972.

Benson E.F., *The Life of Alcibiades: The Idol of Athens*, D. Appleton Co, New York 1929.

Berti M., *Fra tirannide e democrazia: Ipparco figlio di Carmo e il destino dei Pisistratidi ad Atene,* Edizioni dell'Orso, Alessandria 2004.

Bianchi U., *La religione greca*, Torino 1975.

Bieber M., *Alexander the Great in Greek and Roman Art*, Heinemann, Chicago 1964.

Billows R.A., *Marathon: How One Battle Changed Western Civilization*, Duckworth Publishers, 2010.

Blok J.H. - Lardinois A. (eds), *Solon of Athens: New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es*, Leiden, Brill, 2006.

Boardman J., *The Greeks overseas*, 2nd edition,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3.

Boardman J., *Athenian Red Figure Vases. The Archaic Period*,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5.

Boardman J.,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4*, (II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8.

Boardman J.,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Bommelaer J.-F., *Lysandre de Sparte. Histoire et traditions*, De Boccard, Paris 1981.

Bosworth A.B., *Conquest and Empire :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1988.

Bosworth A.B.,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Bradford E., *Thermopylae: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Da Capo Press, 2004.

Buck R.J., *Boiotia and the Boiotian League, 432-371 B.C.*,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94.

Buckley T., *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750-323 BC*, Routledge (UK) 1996.

Bultrighini U., *Maledetta democrazia. Studi su Crizia*, Edizioni dell'Orso, Alessandria 1999.

Burn A.R., *Persia and the Greeks -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546-478 B.C.*, II - The Median and Achaemenid Peri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ury J.B. - Cook S.A. - Adcock F.E.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Persian Empire and the West, vol.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Bury J.B. - Cook S.A. - Adcock F.E.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Athens 478-401 B.C., vol.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Bury J.B. - Cook S.A. - Adcock F.E.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Macedon, vol.V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Bury J. B. - Cook S. A. - Adcock F. E.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Hellenistic Monarchies and the Rise of Rome (I-XIX chapters), vol.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Cahill T., *Sailing the Wine - Dark Sea: Why the Greeks Matter*, Doubleday, New York 2003.

Calvo F., *Cercare l'uomo. Socrate, Platone, Aristotele*, Marietti, Genova 1990.

Campanella D., *Nascita, apogeo e caduta di Sparta*, Nuova Cultura, Roma 2007.

Campbell D. B., *Greek and Roman Siege Machinery, 399 BC - AD 363*,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3.

Campbell D. B., *Besieged: Siege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6.

Canfora L., *Un mestiere pericoloso. La vita quotidiana dei filosofi greci*, Sellerio, Palermo 2000.

Canfora L., *Critica della retorica democratica*, Laterza, Roma-Bari 2002.

Canfora L., *La guerra civile ateniese*, Rizzoli, 2013.

Canfora L., *La crisi dell'utopia. Aristofane contro Platone*, Collana I Robinson. Letture, Laterza, Roma-Bari 2014.

Cartledge P.,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II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2001.

Cawkwell G., *Epaminondas and Thebes*, i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22, n° 2*, november 1972, pp. 254-278.

Cawkwell G., *The Greek Wars: The Failure of Per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erchiai L., Jannelli L., Longo F., *Città greche della Magna Grecia e della Sicilia*, Arsenale Editrice, Verona 2004.

Cerri G., *Platone sociologo della comunicazione*, Milano 1991.

Charbonneaux J. - Martin R. - Villard F., *Grèce classique*,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69.

Charbonneaux J. - Martin R. - Villard F., *Grèce hellénistique*,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70.

Citati P., *Alessandro Magno*, Adelphi, 2004.

Connolly P., *The Greek Armies*, Macdonald, 1977.

Cook J.M., *The Greeks in Ionia and the East*,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62.

Cook J.M., *The Persian Empire*, London 1983.

Crosher J., *The Greeks*, Mcdonald Educational Ltd., 1974.

Dahmen K., *The Legend of Alexander the Great on Greek and Roman Coins*, Routledge, London 2007.

Davies J. K.,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1.

Davis P.K., *Leuctra*, in: *100 Decisive Batt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2001.

De Sanctis G., *Filippo e Alessandro dal regno macedone alla monarchia universale. Lezioni universitarie 1949-1950*, Monica Berti - Virgilio Costa (ed.), Edizioni Tored, Tivoli (Roma) 2011.

Detienne M., *L'invention de la mythologie*, Paris 1981.

Doherty P.,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rroll & Graf, 2004.

Ducrey P., *Le Trait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dans la Grèce antique,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 Travaux et Mémoires, XVII, E. de Boccard, Paris 1968.

Ehrenberg V., *From Solon to Socrates : Greek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6th and 5th Centuries BC*, Hoboken: Taylor & Francis, 2010.

Ellis W.M., *Ptolemy of Egypt*, London 1993.

Engels D.W.,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gistics of the Macedonian Arm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8.

Erdas D., *Cratero il Macedone. Testimonianze e frammenti*, Edizioni TORED, Tivoli (Rome) 2002.

Fields N., *Ancient Greek Fortifications, 500-300 BC*,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7.

Fields N., *Ancient Greek Warship, 500-322 BC*, Osprey New Vanguard 132, Oxford 2007.

Fields N., *Thermopylae 480 BC: Last Stand of the 300*,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7.

Fields N., *Syracuse 415-413 BC: Destruction of the Athenian Imperial Fleet*,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8.

Fink D.L., *The Battle of Marathon in Scholarship*, McFarland, 2014.

Franco C., *Il regno di Lisimaco: strutture amministrative e rapporti con le città*, Giardini, Pisa 1993.

Frediani A., *Le grandi battaglie di Alessandro Magno. L'inarrestabile marcia del condottiero che non conobbe sconfitte*, Newton Compton, Roma 2012.

Fuller J.F.C.,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60.

Ghirshman R., *Iran: Parthians and Sassanians*, Thames and Hudson, 1962.

Glover R., *The Elephant in Ancient War*, 《The Classical Journal》, 39, 1944, pp.257-269.

Graham A.J.,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4.

Grainger J.D., *Seleukos Nikator: Constructing a Hellenistic Kingdom*,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Green P., *The Year of Salamis, 480-479 BC*,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0.

Green P.,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Age*, Orion, 2007.

Gruen E.S.,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4.

Hale J.R., *Lords of the Sea: The Epic Story of the Athenian Navy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Viking, 2014.

Hammond N.G.L., *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 Park Ridge, N.J., 1980.

Hammond N.G.L., *The Geni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1997.

Hanson V.D., *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89.

Hanson V.D.,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5.

Heath T.L., *Greek Mathematics*, Dover, New York 1963.

Heckel W., *The conspiracy against Philotas*, 《Phoenix》, XXXI (1977), pp.307-339.

Heftner H., *Alkibiades. Staatsmann und Feldherr*.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11.

Hesk J., *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irsch S. W., *The Friendship of the Barbarians. Xenophon and the Persian Empire*, Hanover/London 1985.

Hornblower S., *Leuctra to Mantineia and the Revolt of the Satraps*, in: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Taylor & Francis, 2006.

Hornell J., *Water Transport. Origins and Early Evolution*, Cambridge 1968.

Jaeger W., *Paideia. 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 3 Bde., Berlin 1934-1947.

Jaré G., *L'educazione spartana. Cenni*, Tip. Mondovì, Mantova 1878.

Jones R., Heckel W., *Macedonian Warrior: Alexander's Elite Infantryman*,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6.

Jori A., *Medicina e medici nell'antica Grecia. Saggio sul "Perì téchnes" ippocratico*, il Mulino editore, Bologna-Napoli 1996.

Just R., *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 Routledge 1991 (UK).

Kagan D.,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1981.

Kagan D.,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The Free Press, 1991.

Kagan D.,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Kagan D., *The Peloponnesian War: Athens and Sparta in Savage Conflict 431-404 BC*, Penguin Books, London 2004.

Kerényi K., *Die Religio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1963.

Krentz P., *The Thirty at Athe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1982.

Lami G.F., *Socrate, Platone, Aristotele. Una filosofia della Polis da Politeia a Politika*, Rubbettino, Catanzaro 2005.

Landström B., *Skeppet*, Bokförlaget Forum AB, Stockholm 1961.

Lavelle B. M., *Fame, Money and Power: The Rise of Peisistratos and "Democratic" Tyranny at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Lear J., *Aristotle: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vi P., *Atlas of the Greek World*, Phaidon Press, Oxford 1984.

Lewis D.M., *Cleisthenes and Attica, Historia*, 12, 1963.

Lippold A., *Pausanias von Sparta und die Perser*, in RhM 108, 1965.

Lombardo G., *Cimone. Ricostruzione della biografia e discussioni storiografiche*, Roma 1934.

Long A. A. - Sedley D.N.,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2 vo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rkle M.M., *The Macedonian Sarissa, Spear, and Related Armor*,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LXXXI (1977), pp.323-339.

Michel P. -H., *De Pythagore à Euclid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préeuclidiennes*,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50.

Morrison J.S., Coates J.F., Rankov N.B., *The Athenian Trireme. The Histo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 Ancient Greek Wa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Mossé C., *La Fin de la démocratie athénienne. Aspects sociaux et politiques du déclin de la cité grecque au IVe siècle av. J.-C.*, Paris 1962.

Mossé C., *Le Procès de Socrate*, Complexe, Bruxelles 1987.

Mossé C., *Le Citoyen dans la Grèce antique*, Nathan, Paris 1993.

Mossé C., *Démosthène ou les ambiguïtés de la politique*, Armand Colin, Paris 1994.

Musti D., *Demokratía. Origini di un'idea*, Laterza, Roma-Bari, 1995.

Nafissi M., *Pausania, il vincitore di Platea*, in Bearzot C. - Landucci F. (ed.), *Contro le leggi immutabili: gli Spartani fra tradizione e innovazione*. Collana: Ricerche e Storia. Editore: Vita e Pensiero Università.

Napoli M., *Civiltà della magna Grecia*, Roma 1969.

Ober J., *Political Dissent in Democratic Athens: Intellectual Critics of Popular Ru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lumbo V., *Le donne di Alessandro Magno*, Sonzogno, Milano 2005.

Parente M. I., *Introduzione a lo stoicismo ellenistico*, Bari, Laterza, 2004.

Parke H.W., *Greek Mercenary Soldi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Ipsus*, Oxford 1933.

Pastoretto P., *La battaglia del fiume Granico*, in Panoplia (1996), n. 25.

Pédech P., *Historiens compagnons d'Alexandre. Callisthène - Onésicrite - Néarque - Ptolémée - Aristobule*, Paris 1984.

Pedretti C.A., *Gli ipaspisti di Alessandro*, in *Panoplia* (1994), nn. 17-18.

Podlecki A.J., *Perikles and His Circle*, Routledge (UK) 1997.

Pritchett W.K., *The Greek State at War Volumes I-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1-91.

Proto B., *Alle fonti della storia: la Preistoria, l'Antico Oriente, la Grecia*, I, A.P.E. Mursia, Milano 1988.

Reale G., *Cinismo, Epicureismo e Stoicismo*, in *Storia della filosofia greca e romana*, vol. 5, Bompiani, Milano 2008.

Rhodes P.J.,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inson C.E., *The Days of Alkibiades*, E. Arnold, 1916.

Rolandi S.B., *Dizionario Mitologico: Dei ed Eroi dell'Olimpo*, Giunti Editore S.p.A., 2015.

Roochnik D., *The Tragedy of Reason. Toward a Platonic conception of Logos*,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Rougé J., *La marine dans l'Antiquité*, PUF, Paris 1975.

Rusch S.M., *Sparta at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Campaigns*, Frontline Books, London 2011.

Sabin P., van Wees H., Whitby 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I: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Samons L.J. - Fornara C.W., *Athens from Cleisthenes to Peric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1.

Samons L.J.,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What's Wrong with Democrac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2004.

Sarri F., *Socrate e la nascita del concetto occidentale di anima*, Vita e Pensiero, 1997.

Schmeja H., *Dareios, Xerxes, Artaxerxes. Drei persische Königsnamen*, in *Griechischer Deutung (Zu Herodot 6,98,3)*, Die Sprache 21, 1975.

Sealey R., *The Decline of the Spartan Hegemony*, in: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 700-338 B.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Sekunda N.V., *The Arm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1984.

Sekunda N.V., *The Spartan Army*,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1998.

Sekunda N.V., *Greek Hoplite 480-323 BC*, Osprey Warrior 27, Oxford 2000.

Sekunda N. V., *Marathon 490 BC: the First Persian Invasion of Greece*,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2.

Sekunda N. V., *Macedonian Armies after Alexander 323-168 BC*,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12.

Seltman C., *Greek Coins*, 3rd edition, London 1960.

Shepherd W., *Salamis 480 BC: The naval campaign that saved Greece*,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10.

Shepherd W., *Plataea 479 BC: The Most Glorious Victory Ever Seen*,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12.

Shepherd W., *Pylos and Sphacteria 425 BC.*,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13.

Shrimpton G.S., *The Theban Supremacy in Fourth-Century Literature*, in *Phoenix*, vol. 25, n° 4, 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Canada, 1971.

Sidnell P., *Warhorse: Cavalry in Ancient Warfare*, Continuum, London 2006.

Smith W., *The Supremacy of Thebes*, in: *A Smaller History of Greece*, Echo Library, 2006.

Spinola G., *Il Museo Pio Clementino*, da 《Guide Cataloghi Musei Vaticani 3-4》, vol.I-II, Città del Vaticano, Roma 1996-99.

Squillace G., *Filippo il Macedone*, Laterza, Roma-Bari 2009.

van Steen G., *"Politics and Aristophanes: watchword Caution!"*, 2007, in: M. McDonald and J.M. Walt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Theat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A., *One Hundred Greek Sculptors: Their Careers and Extant Works*, Part III of Stewart's Greek Sculp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Taaffe L. K., *Aristophanes and Wome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Talbert R.J.A., *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2000.

Tarn W.W., *Alexander the Great*, 2 vols, Cambridge 1948.

Tarn W.W.,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3rd edition, Cambridge 1966.

Thomas C.G.- Conant C., *Citadel to City-S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ce, 1200-700 B.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Vegetti M., *L'etica degli antichi*, Roma-Bari 1989.

Vernant J.-P. (ed.), *L'Homme grec*, Paris, Le Seuil, 1993.

Wade-Gery H.T., *The Question of Tribute in 449/8 B.C.*, in: *Hesperia*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4 (3): 212-229, July-September 1945).

Warry J., *Alexander 334-323 BC, Conquest of the Persian Empire*, Osprey Publishing, Oxford 2008.

Wassermann F.M., *Post-Periclean Democracy in Action: The Mytilenean Debate (Thuc. III 37-48)*,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87, 1956.

Will E., *Korinthiaka,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a civilisation de Corinthe*, De Boccard, Paris 1955.

Will E., *Le monde grec et l'Orient*, vol.I, Paris 1972.

Will W., *Athen und Alexander*, München 1983.

Worthington I., *By the Spear. Philip II,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cedoni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4.

Wuilleumier P., *Tarente,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De Boccard, Paris 1939.

图片出处一览

画：畠山莫谷

同上

罗马时代雕塑仿制品，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Gre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p118：画：畠山莫谷

同上

菲茨威廉博物馆藏（剑桥）© Fitzwilliam Museum, Unifersity of Cambridge, UK/ Bridgeman Images

罗马时代雕塑仿制品，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Erin Babnic/ Alamy Stock Photo

菲茨威廉博物馆藏（剑桥）© Fitzwilliam Museu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大英博物馆藏（伦敦），© BM Images

卫城博物馆藏（雅典），© DeAgostini/Gretty Images

画：畠山莫谷

那波利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那波利），© Adam Eastland Art + Architecture/Alamy Stock Photo

同上

个人收藏

埃尔巴赫城藏（埃尔巴赫）© Betriebsgesellschaft Schloss Erbach GmbH

画：畠山莫谷

伊斯坦布尔考古学博物馆藏（伊斯坦布尔），© Firdes Sayilan/Shatterstock.com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人的故事 : 全三册 / (日）盐野七生著 ; 计丽屏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086-9571-6
Ⅰ. ①希… Ⅱ. ①盐… ②计… Ⅲ. ①古希腊－历史 Ⅳ. ①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464号

GIRISHIAJIN NO MONOGATARI Ⅰ MINSYUSEINOHAJIMARI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2015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5.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希腊人的故事（全三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徐越 田建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858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552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8）4700号
书号：ISBN 978-7-5086-9571-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